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

主编　王　博

中国经济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王博主编－北京：中国经济文献出版社 2006.9
ISBN 7－88361－378－8/I·6
Ⅰ.中… Ⅱ.王… Ⅲ.①中华－国－经济－全史 ②经济发展－史 Ⅳ.C88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87603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
主　　编：王博
责任编辑：胡光伟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文献出版社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440
字　　数：10154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 套
定　　价：3980.00 元（十二卷）

前　言

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每一步都留下了自身清晰的足迹；1949年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如本书所述，从五十年代初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二十一世纪初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绩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加快，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迈出新步伐，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50年巨变为共和国的继续发展，在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新世纪的第二个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指导方针和重大部署，这就是承前启后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所涵盖的课题涉及了当前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课题包括三农问题、能源资源、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等。“十一五”时期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期”。但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拓进取、锐意改革、不断创新、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一定能够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任务，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业绩，创造共和国新的历史篇章。

历史所蕴含的知识空间是广阔的；而经济史不仅时空广阔而且发展关联度极为复杂，研究成果给人的启发往往非常独到和深刻。“鉴古至今”、“资政育人”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为了进一步挖掘历史的借鉴作用，认真总结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建设历程，也是为了配合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编委会在建国五十七周年来临

之际奉献此书，有针对性地满足专业类人员了解经济史的需要，同时体现经济史对理论研究的基础性作用以及经济史对当代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借鉴作用，最终目的就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小康社会的道路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另外本书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案例，来充实人们对新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和理解。

本书以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为依据，以改革开放的需要为切入点，将1949年~2006年这五十七年间的经济发展史划为若干专题，即国史、经济政策史、经济工作史、经济发展史、经济通史、回顾成就与展望、1949年~2006年大事记。内容包括经济建设的各个主要方面，以及与当前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重点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立项、审核、编制、实施的全过程及利弊分析和经验总结。对于当前正在实施的"十一五"规划作了详尽的论述。"十一五"期间将是一个从制度、政策、机制、对策上变经济的水平扩张模式为经济的垂直扩张模式的特殊时期，将突出六大重点，即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所涉及并必须解决的每一课题都关乎国计民生，每一措施都体现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微观搞活，整体蓄势，参与循环。对政府职能的描述比如历届政府工作报告的再现，将会引导读者从制度上全方位了解经济现象及其本质。

由于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涉及面广，时空跨度长，文字量大，错误之处挂万漏一，尚祈读者批评指正，以期改进我们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编委会

2006年9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理论背景

第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史

第三篇　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通史

第一篇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第二篇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第三篇　社会主义经济的曲折发展

第四篇　1950—1969 年中国实施的重大项目

第六篇　世纪之交的经济飞跃

第七篇　2006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

第三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纪实

第一篇　1949年的中国

第二篇　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

第三篇　文革前十七年经济事件

第四篇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第五篇 农村人民公社史

第六篇 “文化大革命”简史

第七篇 农业学大寨始末

第八篇　工业学大庆始末

第九篇　改革开放时期到来

第四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成果和展望

第一篇　中国经济布局

第二篇　光辉的成就

第三篇　21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第五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理论背景

第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的准备

一、为建立新中国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斗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和473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的国土。中国是一个包括56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富有革命传统，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科技文化，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如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了19世纪中叶，它的独立发展进程被破坏了。从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起，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一步步地把一个独立的封建的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使中国日益贫穷落后、灾难深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尖锐发展的基础上，爆发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

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间，中国人民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解放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期间，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广大农民群众，都曾显示过他们的斗争勇气和力量。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才使得外国侵略者没有能够灭亡中国。但是，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局限，所有的反抗斗争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洪秀全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结果是“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和光绪帝被囚瀛台。以大刀长矛和血肉之躯抵挡洋枪洋炮的义和团，最终成为中外反动派屠杀的对象。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历史进入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时代。但革命果实被封建买办阶级的巨头袁世凯所篡夺，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这样，虽然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帝

国，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变，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甚一日。

1919年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和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从此，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并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努力奋斗，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北伐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然而，就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即将被革命的波涛冲垮之时，革命营垒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国民党内各个反动集团的相继叛变和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惨痛地失败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在革命人民鲜血的基础上，国民党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相继领导100多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不同于一切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走上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力量重新壮大起来，星星之火渐呈燎原之势。虽然后来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和反复“围剿”下，革命力量几经挫折，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了准备。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时期。八年抗战，是异常艰难困苦的，中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统计，在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整个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胜利，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次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是中国由衰败到振兴的重大转折点。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起来。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到121万人。人民军队达到12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解放区遍布19个省区，人口1.2亿。尤为重要的是，经过20多年革命斗争的磨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已充分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些，就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人民盼望和平，盼望国共两党继续携手共同建设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为了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积极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停战协定的签订。可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方针，继续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老路，它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一切和平努力，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迎接了国民党的挑战，仅仅经过一年时间，就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保卫解放区的自卫战争发展为解放全中国的战争。

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后，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还适时地提出了打倒国民党独裁政府，建立新中国的号召。1947 年夏，各路人民解放军相继转入外线作战。经过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接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于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 22 年之际，占领南京，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到 1949 年 9 月，祖国大陆基本解放。这样，继清王朝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也伴随国民党统治的覆灭而寿终正寝，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二、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

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出路问题上，曾有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由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随之破产；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经过长期奋斗和探索而逐步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22 年中共"二大"区分了党的最高目标和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主张民主革命要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接着，无产阶级再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建立。此后几年，中共中央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著作，提出过"革命民众政权"、"真正平民共和国"、"革命平民政权"、"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等口号，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抛弃旧的民主革命的模式，而开始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国家的问题。经过 1927 年上半年党的领导机关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讨论，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主专政"，经济上不立即废除私有制，但大产业要由国家经营，同时使国民经济上升到一个相当水平。这样，就可以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以上这些探索和讨论，对后来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起了先导的作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而斗争。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代表会议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它实行共产党一党执政，保证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剥夺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用和平的方式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政权主张，不失为一种建立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尝试，但其中的一些规定，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和民主革命的要求。

当新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到来之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苏维埃政权口号，恢复并发展了"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先是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上，党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 年 8 月，宣布要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种民主共和国，既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工农共和国，它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国内一切同意民族民主革命分子的联盟，是“新的民主共和国”。其前途，将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国家和社会，正式定名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作了规定。

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七大”、中共 1948 年九月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一系列论著中，对革命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如何建设这个国家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从而使人民共和国的方案趋于完善。其主要之点是：

第一，关于国体和政体。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即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此后，毛泽东多次论及这个问题。1948 年 1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1948 年 6 月，中共中央文件开始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接着，毛泽东在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尤其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各个方面，作了充分阐述。他指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主要纲领。这个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它的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第二，关于经济形态和经济方针。1948 年 9 月，张闻天在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对解放以后东北地区的经济构成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分析。中共中央对张闻天的分析加以肯定和补充，并推广至对全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五种经济成分”的理论。即：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分所构成，“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又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以此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第三，关于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中共中央从 1948 年九月会议开始讨论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至 1949 年 3 月七届二中全会，全党形成这样的看法：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限制和

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但是，这并不是说，建国后要很快采取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由于中国经济还处于落后的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必须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至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党中央明确指出，应是动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第四，关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其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由于新中国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端落后，因此中国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文化，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当新民主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并且国营和集体经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据压倒优势之后，即可采取步骤向社会主义转变。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估计，少则十年、十五年，多则二三十年、几十年。

人民共和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方向问题的伟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中国各革命阶级的共同愿望，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规律。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为新中国的筹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国内条件

新中国成立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 4 年，又值世界“冷战”局面开始不久。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过人民大革命的洗礼而诞生的。这些也就是新中国成立时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基本条件。具体说：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中苏两党关系加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只用几年的时间就迅速恢复了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国力更加强大。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蓬勃兴起。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组成了一个可以同帝国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存有误解。抗战后期，苏共领导人曾对美国表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是共产党”；“苏联政府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赞同美国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先是不准中国共产党革命，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以后，对中共能否取胜存有疑虑。中共打胜了，又怀疑这是“铁托式的胜利”。为了使苏共领导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主动措施。毛泽东不仅多次给斯大林写信，而且在 1948 年春东渡黄河之后，还准备赴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只是由于斯大林不赞成毛泽东在革命紧要关头离开指挥岗位，才取消了这次莫斯科之行。1949 年 1 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

中共领导人会晤。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通过两党高层领导人互访，尽管苏共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但理解增强了，苏共领导人作出了将大力支援新中国建设的承诺。

第二，世界“冷战”局面开始出现，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由于全球战略中的利害冲突，曾是反法西斯盟友的美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1946年3月，二次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城发表演说，攻击苏联扯起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号召讲英语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苏联。这个讲话吹响了战后“冷战”的前奏曲。一周后，斯大林发表谈话，指责丘吉尔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一年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宣读咨文，声称美国要领导“自由世界”抵制“极权政体”国家的侵犯。这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正式破裂和世界“冷战”局面的正式形成。这种局面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为了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从抗日战争末期开始，美国就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随后，出钱出枪，援助国民党大打内战。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美国虽然决定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但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力图拼凑反新中国的共同阵线，以使新中国在世界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中国共产党曾经考虑，如果美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也可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为此，当南京解放后仍然滞留那里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希望前往北平会晤中共高层领导人时，中共中央立即表示认可。但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意见，因为杜鲁门坚持的原则是：美国在中国“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不能“表现出对共产党人的任何手软”。根据这样的原则，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坚持执行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

第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端落后。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通过索取战争赔款、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投资设厂、把持海关以至明火执仗地抢夺等各种手段，疯狂榨取中国的财富，压制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本国反动势力顽固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并且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又给社会经济套上沉重的锁链和不断造成损伤。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不能得到正常发展，经济、文化呈现极端落后的状态。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峰。此后经过连续10余年的战争，已经十分落后的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几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是：原煤3243万吨，原油12万吨，生铁25万吨，钢15.8万吨，棉布18.9亿米，粮食11 318万吨，棉花44.4万吨。当年全国人口为5.4亿，按人均计算，每人占有的重工业产品数量是非常微小的，棉布、粮食、棉花三项，也只有3.5米、200公斤、0.8公斤。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而原煤、钢、谷物、棉花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却是第

9、第26、第2、第4位。如按人口平均，位次都将是最末一批。机械工业几乎等于零，飞机、汽车、拖拉机、大型机械均不能制造。文化教育同样落后。1949年各级学校在校学生共2 577.6万人，其中高等学校11.7万人，中等学校126.8万人，小学2439.1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全国文盲占人口总数的80%。全国医院病床数为8万张，平均每万人占有1.5张，而农村则每10万人才占有3.2张。

毛泽东感慨地说："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这种一穷二白状况，使新中国面临着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革命胜利后更为艰巨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任务。

第四，经过人民大革命，形成全国空前的大团结。

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革命的胜利，又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大团结。

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思想基础，这就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大团结，包括广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各个民族，包括基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所有民主党派，范围十分广泛。这个大团结，有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个大团结中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以极为喜悦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都愿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广大工农群众欣喜自己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革命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踊跃参加革命工作。一些人正在换脑筋，许多人要求重新学习，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整个中国大地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这是新中国成立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也是建国后继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第二节　新中国的诞生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其中第5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就提出来了，并得到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势力的响应，但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反对。抗战胜利后，中共继续坚持这一主张。在国共重庆谈判中，进一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1946年1月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五个方面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习惯上称旧政协），达成五项协议，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允许进

行有利于人民的改革，不久，便将中国重新推入内战的火海之中。至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放弃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主张，不得不等到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革命力量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考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

到1948年上半年，人民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局势已基本确定。人民解放军早已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南部战线从黄河以北推进到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中原地区，东北的敌军已被压缩到几个孤立的城市之内。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已在酝酿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华北解放区。至1948年6月底统计，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已占全国总面积和总人口的24.5%和39%。革命新形势下出现的"左"的错误偏向已被纠正，党的各项政策全部走上了正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在继续不断地开展着斗争。经过实践的教育，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已逐步放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开始否定曾一度大力宣扬的"中间路线"。一些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尽快成立新的全国政权机构的建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的。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很快得到全国的响应。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及海外侨胞，或联合或单独发表通电、宣言、声明、文告、文章，拥护中共主张，号召全国同胞共策进行，完成大业。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始进入解放区，一部分到达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一部分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在中国政界、军界影响很大的爱国人士冯玉祥，也从美国乘船回国，准备参加新政协，不幸途中遇难。经过反复协商，11月下旬，中共中央首先同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规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单位组成及新政协的任务。随后不久，又重新确定了新政协的使命，把原来"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发展为直接宣告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是因为新政协本身，即带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即可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和继续由香港、上海北上的民主人士很快汇集到了北平。3月，中共中央在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后，也迁入北平，先驻在香山，9月迁至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年时间中，全国各界人民团体纷纷建立。1948年8月，经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49年3月，成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4月，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月，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7月，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此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也筹备召开代表会议，工商业者准备成立工商业联合会。这些群众团体和筹备机构，都成为新政协的参加单位。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由23个单位、134人参加。毛泽东被推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六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之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单、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起草大会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六项筹备工作。

关于参加单位和代表人选，经过多方协商，再三斟酌，历时三月，才最后确定下来。单位共有五类：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前四类的单位共45个，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第五类代表75人。总计正式和候补代表共662人。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各界、无党派人士约占26%，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党派类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特邀类以宋庆龄为首席代表，其中包括有清末翰林，老同盟会会员，原北洋政府官员，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国民党军起义将领，老解放区民主人士，教育界、艺术界、少数民族知名人士，工农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等。

除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外，当时全国尚有小的党派几十个，其中不少提出了参加政协的要求，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革新民主社会党）等。筹委会常委会均在调查研究、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作了妥善处理。由于这些党派都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组织条例规定的标准，因而都未能成为参加单位；但对于其中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则在他们的党派宣告结束后，特邀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

政协筹备会议期间，正式确定了新中国的国名和政协会议的名称。本来，在发出召开新政协号召前后，在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著作中，即多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但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电、11月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议等文件中，曾改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筹备会成立后，代表中有的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称“人民共和国”就已经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民主”二字。最后确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政协会议的名称，根据筹备会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小组的意见，从1949年8月，开始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作出采用新的政协名称的决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除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几个已经起草完毕的重要文件作进一步审议外，又就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会前，共征得国旗图案近3000幅，国徽图案900幅，国歌歌词690多首，意见书20多封。经评选委员会的筛选，共确定候选国旗图案38幅、国徽图案5幅，供全体会议选择。国歌词谱，则没有入选者。毛泽东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的讨论，他赞成五星红旗的国旗图案，认为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而现在和将来都要有这种大团结。

9月27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29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80人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至此，筹建新中国的伟大使命宣告完成。下午6时，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二、《共同纲领》的制定

制定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作为新中国各项工作和全国人民行动的准则，是建国筹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共中央在发起召开新政协之时，就提出了制定共同纲领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共同纲领曾几次起稿和命名。第一次初稿是中共中央于1948年10月提出的，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初稿》。这个初稿的侧重点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但也初步规定了新中国应该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和政策。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时，中国的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向新民主主义建设；同时，中国共产党有关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也有进一步发展。因此，前一个纲领初稿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形势需要和新的理论观点重新起草。由周恩来担任组长的筹备会第三小组，专门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工作。小组委托中共方面再次草拟初稿，而小组成员则按自愿参加原则分成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五个分组进行讨论和拟定条文，供起草人参考。8月，中共方面提出第二次草案初稿，题目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随后，由于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9月29日为政协全体会议通过。

共同纲领分序言和七章，总计60条，7000余字。它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100多年来中国革命、特别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

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这就表明，在推倒三大敌人统治后建立的新中国，既不是欧美式样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同于苏联式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它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又保留着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联盟。它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这种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斗争的产物，也最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对共同纲领草案进行讨论时，曾有一部分代表提出，既然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实现

社会主义，那就应该在纲领中把这一目标写出来。另一些代表则认为，在今日的政协中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还为时过早，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以不写社会主义字样为好，而且，新民主主义本身就预示着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共产党支持后一种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都在政协全体会上对此作了解释。

第二，关于新中国的政权制度、军事制度及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政策的总原则。

对政权制度，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这些规定说明，"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种政权制度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它是立法与行政相统一的一种制度，能够保证最广大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

中国政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协商制。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规定：政协"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政协仍将长期存在，作为协商国家大政方针的机构。

对军事制度，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要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建设空军、海军，实行民兵制度。

对经济政策，纲领作了15条规定。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要从多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完成旧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要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应鼓励其经营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根据必要与可能，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所有这些，都是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所必需、因而也最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对文化教育政策，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努力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

对民族政策，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各项建设事业。

对外交政策，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旧有的条约和协定，由中央政府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三，关于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人民系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人们在其改造成为新人之前，只称作国民，不能享受人民的政治权利。

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妇女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

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这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具体体现，又是全体政协代表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既切合实际又坚定明确，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工作，都起了规范和指导作用。

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全体政府委员在首都北京就职，并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有30万军民参加的开国大典。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并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检阅陆海空三军，发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受检阅部队以海军的两个排为前导，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前。空军14架飞机盘旋在广场的上空。整个阅兵式历时三个小时方告结束。

之后是群众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和“同志们万岁”的口号声，在天安门上下呼应。群众的节日欢腾直至深夜。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政务院总理以下各单位负责人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参谋长。他们是：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秘书长李维汉；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内务部长谢觉哉，公安部长罗瑞卿，财政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长叶季壮，重工业部长陈云，燃料工业部长陈郁，纺织工业部长曾山，食品工业部长杨立三，轻工业部长黄炎培，铁道部长滕代远，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水利部长傅作义，劳动部长李立三，文化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长史良，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总参谋长徐向前。

至此，中央人民政府的所有机构完全组建起来。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共有副部长级以上干部500名（内有兼职），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的代表，知名人士和专家。其中非共产党人士约占1/3以上，而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委员，及一些部委中，非共产党人士占到1/2或1/2以上。除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外，在政务院各部委中，有12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部长、主任职务。这个高级领导干部的阵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同时，千百年来由少数剥削者主宰国家、统治人民的历史宣告结束，人民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旧中国的历史就是落后挨打的历史，新中国的成立，为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创造了前提。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上个世纪末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时才具备了实现的可能。

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世界上发生的最有影响的伟大事件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一系列国家继俄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的成立是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它把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打开一个大缺口，严重打击了世界殖民体系，而大大增强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对于改变世界力量格局，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推动世界走向进步和光明，具有深刻、久远的影响。由于国情的相似，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被压迫民族的影响力尤其巨大，直接推动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发展。

新中国的诞生证明一条真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特有的国情和人民的愿望，去决定中国应该走什么

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固然在中国行不通，照搬别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也不会使中国走向新生。中国革命是沿着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先占农村、后占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方面问题的革命三大法宝；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历程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新中国正是这些基本经验凝聚而成的伟大成果。

第三节 新中国的初步巩固

一、全国大陆的解放，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两方面任务：一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二是动员全国人民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通过完成这两方面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为完成这两方面任务，首要工作是将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随之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

当时国民党军队尚有 100 多万人，盘踞着一大片国土，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沿海一些岛屿上负隅顽抗。其中主要是白崇禧和胡宗南两个集团。

1949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开始由湖南、江西分三路向华南进军。9 月中旬发起衡（阳）宝（庆）战役，历时一个月，歼敌白崇禧部 4.7 万余人，解放湘西、湘南广大地区，白部大部分退人广西。10 月上旬至 11 月上旬进行广东战役，歼敌余汉谋等部 6.2 万余人，解放除海南岛以外的广东全省。由南京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首领李宗仁、阎锡山等逃往重庆。11 月上旬至 12 月中旬进行广西战役，歼敌 17.2 万余人，白崇禧部除万余人逃人越南外，全部被歼，广西全境解放。1950 年 3 月上旬至 5 月初，四野一部进行海南岛战役，解放海南岛全境和附近的一些岛屿，歼敌 3 万余人，该地敌军大部逃往台湾。这次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使用的是落后的航渡工具，只有木船和少量机帆船，而敌人实施的是陆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御”，但人民解放军斗志昂扬，采用小部分批偷渡与大部正面强渡相结合的战术，并且得到了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配合，仍然顺利地完成了渡海作战任务。

第四野战军开始向华南进军后，第二野战军主力和一野、四野各一部，于 1949 年 11 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11 月中下旬，先后解放贵阳、遵义、重庆。蒋介石和国民党

政府逃往成都。12 月 9 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12 月 10 日，蒋介石偕国民党政府由成都逃往台湾。12 月 27 日，成都解放。进军西南战役共歼敌 90.2 万余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接着，二野、四野各一部，于 1949 年 12 月底至 1950 年 2 月中进行了滇南战役，歼敌 2.7 万余人，解放滇南，少数残敌逃往国外。1950 年 3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西南军区部队进行了西昌战役，歼敌 1 万余人。

与第四野战军向华南进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第 10 兵团于 1949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进行了漳厦战役，解放漳州、厦门和福建全省，歼敌 4 万余人。10 月下旬，三野一部发起金门战斗，首攻大金门岛。由于轻敌急躁、缺乏渡海作战经验和敌情变化等原因，致使这次战斗失利，解放军损失 3 个半团 9000 余人。1950 年 5 月中旬，三野一部解放舟山群岛。

从 1949 年 9 月中旬至 1950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共歼敌 130 万人。连同前 3 年，即从 1946 年 7 月至 1950 年 6 月，共消灭国民党军 807 万人，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原计划解放台湾的任务，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停止执行。

向西藏进军的准备工作，是 1950 年初开始的。以二野第 18 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的西藏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当时西藏仍然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贵族、官家（即政府，藏语音译噶厦）、寺院三位一体，构成统治集团，百万农奴在农奴主的残酷压榨下，生活极为悲惨。英帝国主义势力于 18 世纪末侵入西藏后，长期勾结和控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企图变西藏为英国的殖民地。新中国成立后，英国侵略势力支持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并扩充藏军，将主力置于昌都地区，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一面积极准备向西藏进军，一面力争和平解放西藏。藏族爱国人士、西康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拉萨联络，途经昌都时被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分子残酷杀害。

为了打击阻碍西藏和平解放的反动势力，消灭反动藏军，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等部于 1950 年 10 月发起昌都战役，歼灭反动藏军 5700 人（约占藏军总数的一半），解放了昌都，从而打开了进藏的大门。之后，西藏当局内部发生分化，大扎下台，达赖喇嘛亲政，身处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则早已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愿为祖国的统一贡献力量。

1951 年 4 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和班禅率领的致敬团相继到达北京。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经过谈判，于 5 月 23 日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 17 条协议。主要内容有：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教育，逐步发展西藏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

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等。17 条协议的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达赖和班禅间近 30 年的纠葛也得到了解决。10 月 26 日，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一部进驻拉萨。祖国大陆实现了多少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统一。

中国革命是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局部地区首先取得胜利，尔后发展为全国胜利的。因此，地方人民政权，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在老解放区存在着。但是由于新解放区地域广大，所以，更为繁重的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工作，还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进行的。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新解放的地区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初级形式。经过一段时间后，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地方人民政府。

1950 年 1 月和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制定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区、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使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有了规范。建国第一年，全国的行政区划是：28 个省（不包括台湾）、13 个直辖市、8 个省级行署区、1 个自治区（内蒙）、1 个地方（西藏）、1 个地区（昌都）。已建立 1 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东北），4 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大区起初为一级地方行政机关，1952 年 11 月改为中央派出机关，并更名为行政委员会），28 个省人民政府，1 个自治区人民政府，8 个行政公署，1 个地区公署，12 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属的市人民政府，67 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及 2087 个县人民政府、几十万个乡人民政府。

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1949 年 12 月和 1950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制定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1951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专门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按期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各该级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在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与审查，一切重大问题应经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于年内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区级人民政府。

到 1951 年 10 月，即建国两周年时，28 个省中有 27 个省、8 个省级行署的全部、154 个市中有 146 个市、2068 个县中有 2038 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 17 个省、69 个市、186 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了同级政权领导机关。至 1952 年底，除台湾外，全国所有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30 个省中的 19 个省、160 个市中的 85 个市、2174 个县中的 436 个县和绝大部分乡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日益巩固的群众基础，并为正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创造了条件。

政权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逐

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机关。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自治区的建立、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政府领导原则等作了系统规定。至1953年3月，已建立县级和县级以上民族自治区47个，这些自治区连同区、乡级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1000万人。

全国大陆的统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新中国建设的开展和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官僚资本，即中国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达到最高峰，"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全国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66%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在旧中国工业品产量的最高年份，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掌握着钢铁产量的90%，煤炭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水泥产量的45%，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的生产。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邮电、航空运输以及44%的轮船吨位，还拥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规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之中，把"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1949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规定了"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内容。

官僚资本是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但它的作用又有别于反动政权，其主要社会功能是从事物质生产。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过程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打碎旧的政权机构的办法。1949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即将大规模展开，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规定了接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指示指出："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具体要求和做法是：第一，不打乱企业原来的组织机构。原厂长、矿长、局长、工程师、职员，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并愿继续服务者，令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代表去监督他们的工作，而不去代替他们的工作，如企业主要负责人逃

跑，应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人员代理，除非无合适人选而被派去人员又是内行者，才任命他们为该企业负责人。第二，保持企业中原来的规章制度、工资制度。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均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必须加以改良者，也要等到以后经过详细研究，再提出改订办法，不能草率行事或用老解放区的制度硬套。第三，军代表有权监督企业中的一切活动，并在一切命令和指示上签字，但不管理生产，只监督原有人员去管理生产。所有这些规定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上述正确政策，保证了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顺利进行。至1949年底，国家接收的企业和产业计有：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一库”系统和省市地方银行系统的银行2400多家，官商合办银行中的官股；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的全部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2.18万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4000辆、货车47000辆、车辆船舶修造厂30多个、船舶20万吨；十几家垄断性质的贸易公司；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兵工后勤系统等所属工矿企业2 858个。接收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企业设备被破坏的现象，并且使原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大都保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1951年1月5日和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布《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根据这两个文件，又对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作了彻底清理，最后完成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

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连同原革命根据地生长起来的公有经济，就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旧中国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被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所代替。据1949年统计，全国工业固定资产中，国营工业占到80.7%。全国大型工业产值中，国营占41.3%。全国生产资料生产（包括手工业）中，国营占48%。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国营工业占有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还掌握着全国铁路和其他大部分现代交通运输业、绝大部分银行和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使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为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物质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还面对着如何处理在华外资企业问题。

随着各大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收回了海关，管制了外贸，实现了对外的经济自主权。而对于在华外资企业，则没有采取没收政策，只是通过法令手段对它们进行管理和监督。新中国成立时，在华外资企业尚有1192个，职工12.6万人，资产12.1亿元，其中主要为英美两国的企业。尽管人民政府允许外资企业继续存在，但由于它们过去享有的特权的丧失，因此纷纷歇业、出售或委托他人代管经营。到1950年底，外资企业还只剩135家，连分支机构，共200多个单位，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两地。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并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驶往中国。中国政府针锋相对，于12月28日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冻结美国在华的一切公私存款。但管制后的企业仍可继续生产和经营，为此，政务院特颁布《关于美国企业及个人存款申请动支的规定》，以作为保证。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决议。7月18日，上海军管会征用了三家美资石油公司除办公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所存石油。未被征用的外资企业继续生产和经营。由于英国追随美国，几次劫夺我国在香港的船只、飞机，我国有关方面也征用了英国在华部分企业和财产。美国等国的对华禁运政策，使外资企业首当其冲，受到严重损害，一大批企业宣告歇业，尚存者，有的出售，有的出租，有的停产，有的转让，有的自动放弃经营。在1954年初，外资企业已所剩无几。60年代初，最后一批自动消失。

三、整顿经济秩序，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严重困难之一，是投机资本横行，经济秩序混乱，市场物价不断上涨。

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全国出现4次大规模物价上涨风。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4月，由华北地区开始，涉及华中、山东和苏北。物价涨幅，华北1倍多，华中近4倍，山东、苏北半倍。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7月，从上海开始，影响到各个解放区。首先是粮价上涨，然后纱布跟进，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上海市场物价综合平均上涨1倍半，天津上涨2倍。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10月，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此次涨风最为猛烈，而且持续时间近2个月。天津、西安、汉口、上海4大市场，大米、白细布的价格上涨了2至4倍。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2月，仍始于上海，影响全国。15个大中城市的25种主要商品价格上涨2倍多。在整个4次涨风中，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总计上涨20倍。物价的多次大波动，给人民生活和各项工作都造成巨大困难。

上述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物资缺乏。由于长期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榨取、连年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处在破败不堪的状态中，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因而物资极端缺乏，供应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中国工业中心上海，解放时主要行业的工厂只有1/4左右开工，人民政府掌握的大米、煤炭、棉花，一度只能满足15天、7天和1个月的最低需要。1948年秋，冀中、冀南水旱虫雹各灾俱全，粮食欠收。1949年7月，华东、华北暴雨成灾，上亿亩耕地被淹，粮食减产120亿斤，灾民达4000万。

第二，投机资本操纵。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造成庞大的商业投机资本。这种资本利用国家的经济困难，大肆兴风作浪。它们扰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疯狂地追逐暴利。上海的投机资本家以上海证券大楼为指挥中心，同全国各地进行联络。特别是第三次涨风中，各大城市的投机资本家利用电讯，遥相呼应，将全国的

投机活动连成一气。投机资本的猖獗，是造成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

第三，庞大的财政赤字的存在。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向全国进军，军费支出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要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有所增加。1949 年军费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由于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加上老解放区的公务人员，人民政府所负担的公教人员，到 1950 年初总数已达 900 万人。另外，几千万灾民和失业者需要救济，被破坏的工矿、交通和水利设施急待恢复，这又要支出大批救济费和生产恢复费。但财政收入，却因战争等原因，不能相应增加。1949 年国家支出中，赤字占 2/3。人民政府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增发钞票。人民币发行额，如果以 1948 年底为基数，到 1950 年 2 月猛增 270 倍。其结果，一方面解决了当时的急需，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造成市场物价的上涨。

能否把剧烈波动的物价稳定下来，是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巨大考验，直接关系着人民政权能否巩固和存在的问题。帝国主义者断言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上海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如同过去对待强大敌人的进攻一样，勇敢地面对新的困难，并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一步一步地整顿经济秩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

首先是打击投机资本，把物价初步稳定下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加强金融管理，制裁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在上海，封闭了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依法惩治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恶分子 230 余人。在其他各地，也对投机倒把分子予以严惩。同时加强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将它们置于国家银行的控制之下。

调集、掌握主要物资，实行集中抛售。这是战胜投机资本的物质基础和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在第三次涨风期间，从 1949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0 日一个月内，国家在上海抛售了棉纱 2 万件，棉布 30 万匹，11. 月 7 日一天，就抛售粮食 455 万公斤。针对各地投机资本家串通一气的情况，人民政府又采取在各大城市同时抛售的办法，以使投机资本家不能彼此呼应，或转移阵地。从 11 月 25 日起，全国各地国营商业连续集中抛售 10 天，使粮、棉等价格下跌 30 - 40%。这时投机资本把原来囤积的商品纷纷抛出，商品越多价格越下降，不少投机商人因亏损过多而破产。

加强市场管理。国家公布了工商业登记办法,未经核准者不得开业。建立了交易所,实行主要物资集中交易,禁止买空卖空。实行价格管理,禁止哄抬物价。管理物资采购,使大批量的物资采购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对投机者进行制裁,对正当营业者予以保护。

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投机资本家的不法投机活动而采取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实质是谁掌握市场领导权问题。经过斗争，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国家掌握了市场的领导权。这是整顿混乱的经济秩序的一个巨大胜利。从 1950 年 3 月起，物价即开始回落，并渐趋稳定。资本家对共产党领导经济的能力开始刮目相看了。当第三次涨风被抑制后，一位有代表性的资本家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但是，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还必须平衡财政收支，解决大量财政赤字问题。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2亿分，以缓解部分支出困难。接着，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全国解放前，各解放区处于被敌分割、独立作战的状态。那时的财经工作，是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经营。到新中国成立时，这种财经管理体制并没有随着地域的统一而立即改变。国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而公粮和税收则基本尚由各地区政府管理。就是说，只统一支出，未统一收入，收支机关脱节。不改变这样的体制，就不可能做到收支平衡；收支不平衡，物价的稳定就不能维持。全国财经会议和政务院的决定，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作出的。

决定采取的办法主要是：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是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包括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等，集中到中央，归中央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用于国家的主要支出。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仓库物资统由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使国家所有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变成有效的力量。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物资调度，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

政务院的决定发出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如有共产党员在财政工作中，有虚报人数、贪污腐化、破坏制度等等违法行为"，必将给予党纪和国法的严重制裁。政务院的决定很快得到全面贯彻并收到成效，使国家财政收支接近了平衡。

国家还在保证物资供应方面作了巨大努力，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粮食调运工作，使全国大城市和灾区的粮食供应问题得到解决。

在党、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市场物价终于稳定下来。全国主要商品批发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年底为85.4，1951年12月为%.6，1952年12月为90.6。多年来通货持续膨胀、物价不断高涨的历史，至此宣告结束。

财政统一和收支接近平衡，物价从狂涨到稳定，标志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开始好转。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军事、政治战线上取得辉煌成果后，又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它使新中国更加稳固地站住了脚跟。

四、剿匪反霸，清除旧社会遗毒

土匪猖獗，恶霸横行，是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面对的两大社会问题。它们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安全和新生政权的巩固。人民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加以解决。

土匪本来就是旧中国固有的一种祸患，而当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又有大批国民党残余武装，或溃散成匪，或潜伏为匪。因此各地匪患一时十分严重。他们打起所谓“救国军”、“自卫军”、“保民军”等旗号，破坏基层政权，杀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城乡交通，烧毁房屋，抢掠财产，无恶不作。

剿灭这些武装匪徒的任务，主要是由人民解放军承担的。这实际上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 41 个军 140 多个师大约 150 万人的兵力，分步骤地展开剿匪斗争。首先以重兵在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实行重点进剿，以消灭大股土匪；其次，实施分区驻剿，用分片包干的办法，消灭小股土匪；最后，结合农村土改，清除隐藏漏网分子，根除匪患。剿匪中，贯彻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密切依靠人民群众，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从而保证了剿匪工作的顺利进行。到 1952 年底，大规模剿匪工作结束，共歼灭武装匪特 240 余万人。

恶霸是旧社会直接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罪恶势力之一，其分布较土匪更为广泛，不仅在农村有土豪恶霸，在城市也有包工头、把头、帮头之类的恶霸分子。他们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称霸一方。反霸斗争，在农村是结合土地改革或作为土改的准备步骤进行的；在城市则是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对恶霸分子加以打击，对封建把头制度加以废除。1950 年 1 月和 2 月，政务院先后发出关于老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和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规定老区的城市郊区应于春耕以前或秋收以后完成土改，新区在分配土地以前一律先实行减租，而无论是老区还是新区，均要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予以惩处，但必须经过法律程序，由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依法审判，禁止乱打、乱杀、乱逮捕、乱处罚。1950 年 1 至 3 月，政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纺织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搬运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头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和煤矿工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废除把头制度向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的建议》等三个文件。政务院还做出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行业中封建把头的决定，燃料工业部发出废除包工把头制的通令，责令各地人民政府执行。经过这些民主改革工作，废除了封建把头霸占码头货场的行帮垄断制度及包工把头制、搜身制等，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经群众清算斗争后，由人民法院依法惩办。在此基础上，又经过 1951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恶霸势力被彻底扫清。

建国初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地普遍开展了禁止贩毒吸毒、取缔卖淫嫖娼和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这些斗争同反恶霸斗争有密切联系，当时都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也都是清除旧社会遗毒的重大举措。

鸦片对中国的毒害，从 18 世纪就开始了。鸦片战争后的 100 多年中，烟毒愈演愈烈。尤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更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的政策，把大片农田变成鸦片种植地。国民党的不少达官贵人和地方军阀，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而且把贩毒作为聚敛财富的手段。建国初，烟毒仍有蔓延之势，全国吸毒者达 2000 万人左右，西南几省尤为严重，云南、贵州几乎有 1/4 的人吸毒。

人民政府有步骤地开展禁烟工作。1950 年 2 月 24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国下达《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烟毒较盛地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

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定出限期禁绝办法”；设立各级禁毒委员会，督促进行；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亦应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地禁种；从禁令颁布之日起，禁止贩运、制造、售卖烟土毒品，违者从严治罪，存有毒品者，限期交出，人民政府酌予补偿；吸毒者限期登记、戒除，烟毒较盛的城市，设戒烟所。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重申《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同制毒、贩毒、吸毒行为作坚决斗争，“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重点打击制造、贩运毒品的罪犯，同时使吸毒者自觉地戒毒。据统计，在禁毒运动中，共登记制造、贩运毒品的罪犯36万人，关押3.5万人，处决大毒犯880人。到1952年底，为害一个多世纪的烟毒，基本被禁绝。

在旧中国，嫖娼比吸毒的历史更为久远。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既是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腐朽生活的组成部分，又是被压迫群众悲惨命运的一种表现。据北京市封闭妓院后对全部妓女沦落原因的统计，因家庭经济困难、拐骗、从小被卖、灾荒、政治压迫等原因者，总计占全部妓女的65%。妓女是整个社会中处境最为悲惨的人群，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则属封建余孽和剥削者之列。解放初期，妓院还是藏污纳垢的场所，不少罪犯隐蔽其中，烟毒也以妓院最烈。因此，各地人民政府都采取有力措施，封闭妓院，取缔嫖娼，改造妓女。

以北京为例。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北京市即制定了处理妓女的办法，规定：对妓女采取集中教育改造、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其中罪恶昭彰者依法惩处，其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两个月后，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封闭妓院的决定。《决定》指出：“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这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在新社会里是不容许存在的。当夜，北京市政府采取行动，一举将全市237家妓院全部封闭，1 316名妓女被集中到妇女生产教养院，进行教育改造和治疗疾病。另有老板和领家400余名，交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判。妓女们不仅被救出了火坑，而且通过生产教养院的改造，变成了新人。据统计，1 316名妓女中，结婚者596人，占’45.3%；回家者379人，占28.7%；参加工作者62人，占4.7%；被安排的妓女209人，由政府组织新生棉织工厂进行安排，占16%。

上海是解放前妓女最多的城市，30年代曾多达12万人，解放前夕有妓院800多家，妓女4000多人，另有私娼等几万人。1949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颁发暂行规定，对妓女的活动严加管理和限制，并支持和帮助妓女改业。1951年11月封闭妓院92家。此后又对私娼进行多次收容。至1958年，共收容妓女7500多人。

除北京、上海外，全国凡有妓院的大小城镇，也大都在解放后的几年内，采取了类似的查禁办法。从此，这种在旧社会延续了一两千年的蹂躏和摧残妇女的妓院制度被摧毁了，私娼也基本被清除。

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也是建国之初肃清封建影

响的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

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新的婚姻制度。即："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婚姻法还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这是解放妇女、移风易俗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这也是反封建斗争在一个方面的深入。

第四节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一、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

在国内获得初步巩固的同时，在国际上，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取得初步胜利。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随着人民革命接近全国胜利，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完善的。

人民解放军转入大反攻后，1947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之一为外交政策，要点是：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要求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活；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已基本勾画了新中国将采取的外交政策的轮廓。

随着新解放的城市日渐增多，面对的外交问题也越来越多。为此，在1948年2月至1949年4月一年多的时间中，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的重要原则有：保护外侨——"外国侨民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于外国侨民及其国家代表机关，一般地应采取保护政策。"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这些原则的核心，是实行"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外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周恩来说："'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与"另起炉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与外国（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建

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和条件问题。1949 年 2 月初，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曾经生动地讲到必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这是新中国外交的又一个重要方针。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因为虽然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帝国主义是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的，“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不久，毛泽东又指出，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是外国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由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执行的是从扶蒋反共、助蒋内战到敌视新中国政权的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确定，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要实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战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把“一边倒”的方针正式公诸于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实行“一边倒”，当然绝不是盲目地顺从苏联，而是指：在世界斗争的格局中，新中国要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并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坚决斗争。7 月 7 日，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拥护“一边倒”方针。

以上所述“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构成建国初期三大外交方针。这些方针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改造成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对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和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二、对外关系的初步展开

根据《共同纲领》确定的外交原则和政策，新中国积极开展外交工作，打开对外关系。

1949 年 10 月 2 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第一个照会中国政府，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0 月 3 日，毛泽东亲拟电文，向全世界发布了中苏建交的新闻。此后至 1950 年 1 月中旬，东欧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 10 国与中国建交。至建

国一周年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有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印尼。总计已有17国。另有8个国家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初期最重要的外交举动是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斯大林热烈欢迎毛泽东访苏，但半个月时间内，双方未能就实质性问题进行会商。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布了他这次访苏的目的。表示：“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是中苏条约问题，即如何处理1945年8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向苏联方面提出三种方案：一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代替旧的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二是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实际是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三是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苏方赞同了第一方案，即以新约代旧约。为商谈新的中苏条约，又决定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等到达莫斯科。经过包括斯大林、毛泽东在内的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商，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国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而由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贷款协定规定：1950年至1954年5年内，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中国向苏联购置机器设备与器材的费用。年利1%。中国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偿还，1954年12月底至1963年底偿清。

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当日，双方发表公告，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苏缔结的相应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双方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苏联将其经济机关在东北从日本人手中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苏联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

中苏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是当时国际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表示了中苏两国的团结和反对侵略的共同立场。这无论对新中国的安全和建设，还是对世界、特别是对远东的

和平，都起了积极作用。

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会议由我国著名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发起，有37个国家的370多名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参加，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号召亚太地区和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大型的国际会议。会议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会址设在北京。

第二章　共和国民主改革的全面展开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一节　抗美援朝与各项民主改革

一、建国初期战略策略方针的确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清除旧社会遗毒、建设新生活的伟大斗争。为了全面分析建国初期的形势，确定党和国家在这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1950 年 6 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还有一些同志就有关问题作了发言。

会议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年多时间内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以及取得的新的胜利。特别是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物价趋向稳定等，表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要实现这个任务，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大量节减。为达到这个目的，要做好以下八项工作：（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巩固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这就需要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工商业，切实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三）精兵简政。复员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并对行政系统进行整编工作。（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五）认真做好灾民和失业者救济工作。（六）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七）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八）进行全党整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

会议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就必需实行“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孤立和打击国民党残余、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

贯彻“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主要是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批评了党内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全会强调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这就是说，在建国之初主要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要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搞得太紧张了。

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为党和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步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结束后，1950 年 6 月 14 日至 23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会议听取了陈叔通副主席作的关于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陈云作的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的报告，聂荣臻作的军事报告，郭沫若作的文化工作报告，沈钧儒作的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系统地说明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有关方针政策，宣布了为最后消灭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目的是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讨论中，大部分民主人士表示赞同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报告，但也有不少人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有些开明士绅和起义将领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中国共产党对各种怀疑、反对土改的错误言论和幻想“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反复的说服教育，帮助大家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民盟主席张澜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完全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所谓“人民负担过重无法生存”的叫喊进行了批判。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章伯钧分别代表民革、民建、民进和农工民主党表示彻底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有些爱国起义将领如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也在大会上表示支持和拥护土改的立场，表示要“无条件无保留的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这些发言、讲话支持了广大农民的土改运动，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顺利进行土改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毛泽东

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他要求大家支持土地改革，以共同纲领为准则，过好土改这一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他强调数万万农村人民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是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不但革命而且国家工业化也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土改。

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中共中央起草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行土地改革法。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体现了建国初期各项工作都要“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尽管我们取得了中国从古未有的伟大胜利，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的敌人是够多够大的，因此我们还要进行历史上没有过的、很激烈的斗争。我们必须要稳步前进，把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放在第一位，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条件。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七届三中全会后，正当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新中国又面临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威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美国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厉斥责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并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但是，美国政府不顾我国的警告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纠集的英、法等16国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扩大侵朝战争。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美国参战后朝鲜战局发展的严重性作了充分的估计，因此，在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尽管这时朝鲜人民军正在胜利推进，将敌军压缩在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面积8%的地域内。但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强调必须从应付最坏的情况出发加紧各项参战的准备工作。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我们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下旬，中央军委估计战局可能会有变化，命令东北边防军务必于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这时，东北边防军已有5个军26万多人，这就做好

了最重要的战前准备。实践证明，这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9月15日，美军以优势兵力在朝鲜中部的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30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北上。10月1日，麦克阿瑟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战火有烧到我国边境的趋势，美机多次轰炸扫射东北边境城乡，炮击我国商船，严重危及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这种严重形势下，9月30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我国主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侵略军队必须撤退。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美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根本不相信我国敢出兵同它交战，竟把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视为“虚声恫吓”，下令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畔。10月1日，毛泽东收到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相联名发来的急电，代表朝鲜政府和人民，“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在当时，敢不敢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进行战争较量，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年，长期战争的创伤尚待医治，经济恢复刚刚开始，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我军的武器装备还很落后，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取胜？面对这样的危急形势，10月上半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既清醒地看到面临的严重困难，又充分估计了出兵作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兵的必要性在于：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失败，强敌压到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地从事建设，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嚣张，这对中国，对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同时，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周恩来指出，中朝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朝鲜的存亡同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抗美援朝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在讨论中毛泽东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种意见。他也认为我们确实有困难，出兵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他深情地在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在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政治局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有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取胜的可能性在于：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兵源充足；我军一贯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的精神；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援近便。而美军虽然武器先进，但其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后方太远，运输不便；士气不高，战斗意志不强。所以会议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国及李承晚的军队作战，力求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同时也准备美国可能用空军轰炸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样，中共中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但也是隐蔽地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10月25日打响了第一仗，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1月4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全力拥护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

抗美援朝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朝军队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中央军委为志愿军制定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10月25日，志愿军同长驱直人的敌人遭遇，利用敌人判断错误、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捕捉战机，给敌人以突然的袭击。初战告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在初次受到打击后，就以更大规模向北进犯，发动“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机狂轰滥炸、我军供应不足和气候严寒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为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后来又进行了互有进退攻守的三次战役。到1951年6月10日止，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多人（其中美军8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朝鲜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在此阶段，由于美国不放弃侵略野心，企图以“军事实力”配合谈判，致使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局面。这时，中共中央为志愿军确定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动员了它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近1/2的海军参战，多次发动攻势，进行“绞杀战”，甚至细菌战。中朝军队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构筑坑道英勇抗击，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多次的小胜，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1952年10月，美军为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无理要求，向上甘岭志愿军阵地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攻势。敌人先后投人6万多兵力，我军在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依托坑道，坚守阵地，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43天内，打退敌人670多次冲锋，歼敌25000多人，遏制了敌人的攻势。后来，中国国内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备力量轮番人朝作战，得到苏联援助的志愿军空军也开始出战，后勤运输得到加强，终于使这场战争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中朝军队经过三年浴血奋战，共歼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毁击落敌机1.2万多架，迫使美军三易统帅。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在此期间，我国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志愿军不断取胜的事实，深刻教育了广大人民，扫除了一部分人思想上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大批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军事干部学校，捐款价值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广大人民因抗美援朝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强大动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人民充分显示了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为了夺取胜利，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消耗

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0亿元人民币。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达36万多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有200多人。烈士中有黄继光、邱少云、毛岸英等。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是永载史册的。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是新中国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国力悬殊的较量。战争的结果，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军事上看，中国人民都取得了伟大胜利。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其次，这是中朝人民用劣势装备打败头号强国美国的胜利，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不能挽救其失败，这就极大地振奋了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精神。第三，这场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在世界上留下的软弱可欺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争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三、土地改革运动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从1950年冬天起在新解放区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受尽剥削，不得温饱。据估计，解放前农民每年要向地主缴纳大约300亿公斤至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不但占有了他们的剩余劳动，而且占有了他们大量的必要劳动。地主阶级还通过高利贷和强制佃户为他们无偿服劳役等手段榨取农民的血汗。这是中国被侵略、受压迫、贫穷落后的根源，也是新中国实现国家民主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国家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状况如果不彻底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农村的生产力不能得到解放，国民经济就不能迅速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就无法实现，所以土地改革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特别在这时，完成土地改革，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三项重要条件之一，是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必须做好的八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

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拥有2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农村分期分批展开的，它有以下三个新的特点：第一，这次土改是在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全国胜利、新中国已经建立的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的。这时国家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各项工作都应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并为它服务。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也在于此。所以，《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改的基本目的和基本方针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第二，在政策上把过去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的规定，改为保存富农经济，使富农在土改中处于中立的地位，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土地改革法》规定：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动；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这样做，有利于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更能孤立和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的阻力；也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第三，在人民政权已经在全国建立的条件下，强调土地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贯彻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要在斗争中提高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作主，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为了加强领导，各地在训练大批干部的基础上，每年组织30万人以上的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搞好土改运动。

在这次土地改革中，还特别注重建立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不但吸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参加土改工作团，投入这场伟大的斗争；也热情欢迎和组织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参观视察土改工作。实践证明，对爱国民主人士最有效的一种教育方式，就是推动他们投身于土改运动中，这样既有助于他们经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逐步提高政治觉悟；又有益于消除同他们有联系的各界人士的疑虑，使敌人破坏土改的谣言不攻自破；同时，这也有利于发现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分期分批进行的。第一批，1950年冬季到1951年春，在1.2亿多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二批，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1.1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三批，1952年冬到1953年春，在3000多万农业人口地区进行。每期都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当时试点地区土改完成后的情况是：“贫雇农得地开心，中农有利放心，富农不动定心，地主劳动回心”。到1953年春，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分得约4 660多万公顷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每年免交地租达350亿公斤粮食，更加重要的是：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即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历次土改运动中搞得最好的一次，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四、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全国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三大运动。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残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破

坏和捣乱，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活动更为猖狂。他们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美军即将登陆"，甚至说"黑暗将过，黎明即来"，有的还制作了青天白日旗，妄图里应外合，迎接美蒋卷土重来。他们造谣惑众，刺探情报，破坏铁路、厂矿，抢劫财物，残杀干部和群众，甚至组织反革命地下军，组织武装暴乱，袭击、围攻区、乡政府，以至攻打县城。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新解放区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其中广西就有7000多人。更触目惊心的是美国间谍分子秘密绘制天安门地形图，阴谋在1950年国庆节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此事在9月26日被公安机关破获，才未能得逞。显然，如不开展一次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权便不能巩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恢复经济的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人民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可是，当时不少干部存在麻痹轻敌思想，认为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的又片面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度出现了对反革命分子镇压不力，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恶分子该杀的不杀，重罪轻判，甚至轻率地释放，这使他们不知悔改，重新作恶，"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批评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他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因此，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严厉的镇压，已是势在必行了。

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严重的右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先镇压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解放后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这样，在各地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951年2月，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强调："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镇反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并把公安、司法等专门机关的工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密切结合起来，还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使镇压反革命成为人民政府和亿万群众共同的行动。人民群众自觉起来检举、揭发和协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东北地区到1951年8月收到群众检举材料16万件，上海收到3.3万件，检举反革命分子29 000人。河北群众帮助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1 394人。河南信阳专区1951年4月群众检举出恶霸664人，远道捕回匪首175名。川南区有些群众自动集资，组织"远征队"、"飞虎队"，协助政府追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1 500多名。人民群众的行动，形成了无形的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处处难以藏身。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

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这就使干部和群众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的健康发展。《惩治反革命条例》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具体化，规定：对于各种反革命首要分子，特别是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采取从重处理的原则；对于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对于解放前虽曾参加反革命活动,但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的分子,特别是已为人民立功的分子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这样,到1951年3、4月间,镇反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

在运动中，各地政府依法逮捕了大批作恶多端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罪行昭著的土匪、恶霸，同时还依法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有血债或其他严重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严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广大群众欢欣鼓舞，踊跃参加对反革命分子的公审会和控诉会。就连北京市佛教著名法师巨赞也说：“杀掉了极少数的反动分子，救活了最大多数的人民，并且警戒了犯罪的人少犯罪，这是功德。”

当镇反运动在全国城乡普遍发动起来后，到1951年5月，全国已逮捕反革命分子150万，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50万，急需加以收缩和清理积案，同时也发现有些地方出现了工作粗糙及错捕错杀的过左现象。为了总结经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公安部于5月10日至15日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决议》。明确规定从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今后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清理现有积案和组织犯人进行劳动改造。把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收回到地委、专署和省、自治区一级。规定：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当时还规定对于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公安工作历史上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它对于保证镇反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在运动中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通过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使我国社会秩序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初步总结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其他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指出：由于这些胜利，“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总之，我们的国家正在稳步地前进，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到的。因此，毛泽东说：“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财政经济方面极为困难，它继承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与掠夺，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加上长期战乱摧残，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1949 年与解放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 20%以上，其中粮食产量下降 24.5%，棉花产量下降 47.6%，1949 年粮食平均亩产仅 68.5 公斤，棉花平均亩产 10.5 公斤。工业总产值下降 50%，其中重工业下降 70%，轻工业下降 30%。1949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 70%，工业总产值占 30%，其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 17%。旧中国的工业不但比重小，而且基础薄弱，门类残缺不全，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没有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生产资料工业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机械工业实际上是修理装配业。工业的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少数城市，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现代工业。交通和通讯设备极为落后，铁路从 1876 年到 1949 年的 73 年间共修 2.2 万公里，这时能勉强通车的只有一半，而主要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 1/3 不能使用。农业生产仍是手工操作，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自然经济十分强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1949 年全国受灾面积达 800 万公顷，约有 4000 万灾民亟待救济。城市中大约有 400 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需要政府加以安置。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也要包下来管饭吃。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局面仍然存在，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直接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这些情况使得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和紧迫，成为当时的一项牵动全局的中心任务。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军事转向经济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筹备建国时，最先成立并开始运转起来的就是全国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即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专门从东北调多年从事财经工作、成绩卓著的陈云来领导中财委的工作。在建国之初同投机资本的较量中，中财委组织全国统一行动，主要依靠刚刚建立的国营经济的力量，取得了稳定市场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胜利，证明了共产党人是有能力管理经济的。1950 年 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确定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不少人曾担心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下去。由于战争始终是在朝鲜境内进行，又具有国际局部战争的特点，所以中共中央经过审慎的研究，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确保战争的胜利放在第一位，因为不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这表现在国家财政上，则需要适当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人也必然要相对减少。其次是稳定市场物价，这不但有经济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一旦物价飞涨，就会使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容易引起对政府的不满及政局的不稳，所以宁可削减经济、文化支出也要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要进行经济建设，当时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措施。这个方针的深刻涵义在于，要正确处理战争期间国内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仗要保证打好，经济要稳定，建设仍要占一定地位，三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这时，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更对我国实行了国际性的、全面的封锁禁运，这就阻碍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使我国难以同西方国家做生意。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就是打破封锁之道。帝国主义封锁禁运造成的困难不但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激励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把重点放在农业方面。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解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发展。在充分注意发挥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政府还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劳动互助，到 1952 年底，已有 40%的农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些农户普遍增产增收。国家还从适时发放农业贷款、减轻农业税收、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提倡和发展供销合作、保护贸易自由以及奖励丰产等方面，特别是动员群众兴修水利方面，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就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根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国家在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全国人民有重点地进行了经济建设。在建国后的头 3 年里，拿出 66.27 亿元进行建设，按年平均，超过了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任何一年的建设投资。当时重点进行了水利、交通运输和以煤、电、钢铁为主的工业建设。

国家十分重视水利建设，3 年中用于水利工程的投资达 7 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10.5%。在这些水利建设中，比较著名的有治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和官厅水库工程。治淮工作是从 1950 年开始的。这一年夏天，安徽、河南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时，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多达 489 人。毛泽东为此深情地落了泪，他对秘书田家英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从 1950 年 7 月 20 日到 8 月 31 日，毛泽东连续批发 3 份关于淮北灾情及治淮问题的报告给周恩来，提出要根治淮河；要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秋初即开始施工；并要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均须以此为中心等重要意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10 月 14 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也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经过几百万治淮大军的艰苦奋战，对淮河进行了全流域的治理，这对减轻以致消除淮河流域的水涝灾害起了巨大

的作用。三年间全国有 2000 万人直接参加了水利建设，共完成土方约 17 亿立方米，相当于修 10 条巴拿马运河或 23 条苏伊士运河所完成的土方。这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这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三年中人民政府用于交通建设的投资达 17.7 亿元，占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的 26.7%。到 1950 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在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上，到 1952 年底新建成的铁路有成渝（成都到重庆）、天兰（天水到兰州）、来睦（来宾到睦南关）等线，正在修建的有宝成（宝鸡到成都）、兰新（兰州到乌鲁木齐）、丰沙（丰台到沙城）等线，使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 2.4 万多公里。特别是成渝铁路的建成，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这条铁路从清末开始筹建，四川人民盼望了几十年，为保护路权进行过许多英勇壮烈的斗争，但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四川连一寸路轨也没有铺。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两年时间就把这条长达 500 公里的铁路修通了。1952 年 7 月 1 日通车的这天，在成都、重庆两地车站的几十万人欢呼跳跃庆祝通车。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新建公路 3846 公里，使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2.67 万公里，其中有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也有沟通新疆和内地的兰新公路等。

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经过三年的努力，到 1952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合作社商业为助手的新贸易网，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有很大的发展，逐步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14.9% 增加到 34.45%，合作社商业 1952 年全年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 19.6%。

在恢复和发展国内贸易的同时，人民政府还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对外贸易及有关的外汇、金融、航运、保险、商检等方面的垄断，把对外贸易的大权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建立了国营对外贸易体系。在扩大与苏联、东欧等国贸易的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也积极争取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到 1952 年，我国先后同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与锡兰、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以及英国、法国、瑞士、西德、芬兰、荷兰、智利、日本等国建立或发展贸易关系。1950 年，进出口总额为 41.6 亿元，已经超过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任何一年。1951 年为 59.5 亿元，1952 年上升为 64.6 亿元。在这 3 年对外贸易中，还实现了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情况，在进口货物中，大幅度增加了为我国建设所需要的工业设备、交通器材、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奢侈品几乎绝迹。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国家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为此，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一步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195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在民主改革中，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和废除了过去所遗留的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制，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等，清除了隐藏在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把一批在技术上有经验、在群众中有威信

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上，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同时，通过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消除了工人之间因地域观念、行会帮派所造成的隔阂。民主改革的实质是彻底消除官僚资本企业遗留下来的官僚机构和一些压迫工人的制度，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进一步体现出来。在生产改革中主要是在经营管理中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在生产中大力推广和使用新技术。这些改革是把官僚资本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些工作到 1952 年底在全国基本结束。通过改革，使国营企业面貌焕然一新，使广大职工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这时国家还挤出大量资金新建了一批骨干企业。三年中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共 26.98 亿元，新建 3 300 多个企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钢的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抚顺和西安的发电厂、山西重型机械厂、哈尔滨亚麻厂，武汉、郑州、邯郸、新疆的棉纺厂等。这些现代化企业的建成，对我国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合理调整工商业与“三反”“五反”运动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政府在打击投机资本、限制私营工商业消极作用的同时，大力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但是，随着物价的开始稳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滞销，有些私营企业关门歇业、失业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等情况。据统计，当时有 14 个城市的 2 945 家工厂关门，16 个城市的 9 347 家商店歇业，29 个城市的 160 万工人失业或半失业，上海有 300 个厂长、经理出走香港。暂时的困难使资本家普遍产生恐慌心理，甚至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不少人抱着“企业迟早要归公”的消极情绪，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说：“看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这就使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影响着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共中央分析认为，这些情况的发生，基本原因是整个旧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重新改组，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的消失、过去为三大敌人服务的行业失去市场等，不可避免地会给经济生活带来暂时的困难。此外，政府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如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公债摊派过多等，也造成一些困难。

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 1950 年 4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说：“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强调：共同纲领规定，国家应当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使它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个规定，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

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因此，中央财经委员会于5月召开了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合理调整工商业问题。在七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府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开始全面调整工商业。其基本环节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这三者又以调整公私关系为主。

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当时许多私营企业生产无原料，产品无销路，所以国营商业部门开始向私营工厂提供原料，委托加工，计划订货，收购产品，也就是开展加工订货业务。国家给这些企业一定的工缴费用，其中就有资本家的利润在内。这时，国家更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收购，对私营商业在经营范围和价格上给出路，使之有利可图；调整税收负担，工商税目由1 136种减为358种；适当收缩国营商业的部分机构等。其次是调整劳资关系。根据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发展生产、以协商方法解决劳资纠纷三条原则协调劳资关系。三是调整产销关系。中央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公私方代表在一起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协商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任务，逐步克服私营企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趋于平衡。通过这次调整，不但使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而且有很大的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私营工商业户数增加11%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额增加36.6%。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当然，这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更得到加强，也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尽管资本家的利润大大增多，他们中的不法分子却不满足于获得一般利润。出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他们采取向干部行贿等手段来牟取暴利。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1年秋，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重点建设，全国开展了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10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1月，东北局报告沈阳市部分单位揭发出3 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发现贪污案件400起，金额达5亿（旧币）元。11月20日，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首次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接着，北京、上海、华北局都反映了干部中发生贪污案件的严重情况，这向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关于“三反”斗争的意义，毛泽东在中央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后又发出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运

动看作如同“镇反”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指出对贪污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1952年元旦，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一二月间“三反”运动进入高潮。

“三反”运动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运动重点是打击大贪污犯。在运动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严肃处理，以引起全党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在这方面，毛泽东下决心坚决果断地严惩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特大贪污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其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初入党的老干部，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功劳。进城后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剥削民工血汗，克扣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总计折合人民币155亿元（旧币），腐化堕落为大贪污犯。在“三反”中，依法逮捕了他们，经过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时曾有人为他们说情，希望顾念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人死，有过功劳，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但是，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3月后，“三反”运动进入定案处理阶段。各级政府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分子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处理。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385万人，其中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有10.7万多人，贪污的总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三反”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三反”运动采取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决定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在运动高潮期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由于下达了一些过高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一些过火的作法，有些地方和基层单位发生简单粗暴，逼供信和斗争扩大化的情况，误伤了一些好人，这些错误在运动后期定案处理时一般都得到了纠正。

“三反”运动对于加强建国初期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向人们表明：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坚持不懈地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进行长期的斗争，“三反”运动只是这种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大多数干部，在全党、全社会开创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一代新风。

在“三反”运动中不断发现贪污分子的严重违法活动，大多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关。为了牟取非法暴利，不法资本家千方百计收买、拉拢国家干部，为其进行各种违法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这些违法活动主要是：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毒”。这说明“三害”和“五毒”是互相联系在一

起的。1952 年 1 月初，毛泽东在一个报告的批语中说：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因此，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以配合"三反"运动。在斗争中，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形成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这样，2 月上旬"五反"运动在各大中城市展开。

"五反"运动中暴露出"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据京、津、沪等 9 大城市被审查的 45 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 76%，其中上海为 85%，北京为 90%。据抽样调查，天津 1 807 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 82%，上海 351 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 99%，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税款的 50%，有的高达 80%。有的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订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少数资本家"五毒"严重，令人触目惊心。如上海大康药店经理王康年大量盗骗国家财产，用失效药品骗取志愿军购药款 3 亿元去做投机生意。他还设立了一个"外勤部"，用金钱、美女等卑鄙手段勾引、腐蚀国家干部，先后把 25 个机关的 65 名干部拉下水。天津 40 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 17 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换成废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残致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罪行，激起广大人民的公愤。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气焰整下去，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斗争，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当时，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

但是，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并不是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1952 年 3 月，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话时指出：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特别要做好团结大资本家的工作。针对运动高潮中党内露头的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积极的一面，主张"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的"左"的情绪，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明确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基础上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他指出：进行"五反"，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同时，鉴于"五反"斗争势必对经济生活产生震动和影响，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各大城市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并提出"五反"最终要达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的结果。

根据上述认识，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按照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进行处理，把他们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区别对待，打击重点是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定案处理的结果，在"五反"

运动中，全国共有99.97万户工商业者参加，约有3%属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其中大多数是退回其违法所得或罚款，受到刑事处分者1 509人，占参加运动总户数的0.15%，其中判处有期徒刑者1470人，判无期徒刑者20人，判死刑者19人(其中死缓5人)。这样，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半年结束。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开始造成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反"运动后，各级政府针对成品积压、市场萧条、经济停滞的情况，在资本家重新靠拢政府的新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法利润，使私营工商业在1952年下半年继续有所发展。1952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38次常委会上说："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三、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经过三年的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为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5.1%，平均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53.5%，平均年递增率为14.1%。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钢产量135万吨，比建国前最高水平增长46.3%；发电量73亿度，增长21.7%；原煤6 600万吨，增长6.5%；粮食1639亿公斤，增长9.3%；棉花1 303.7万公担，增长53.6%。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根本好转。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1952年全国高校学生达到19.1万人，比1949年的11.7万人增加7.4万人，增长64.1%；全国中等学校学生314.5万人，比1949年的126.8万人增加187.7万人；全国小学生达5110万人，比1949年的2439.1万人增加2 670.9万人，增长109.5%。政府先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使广大职工在旧中国无法解决的由于生育、衰老、疾病、伤残、死亡等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580万人；职工年平均工资到1952年为446元，比1949年的262元增加70%左右。新建职工住宅面积1952年达751万平方米，比1950年的251万平方米增加195.2%。1952年，农民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增加30%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而国营经济发展得更快，领导地位更加巩固。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4.7%上升为56%。国营商业的零售额占全国零售额的比重由14.9%上升为42.6%。

另一方面，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7%上升为26.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为35.5%。现代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64.2%。这些变化表明，我国的国民经济不但在数量上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而且在质量上有提高，在性质上也有变化。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所以能迅速恢复并取得辉煌成就，其原因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紧紧抓住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正确处理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把开展大规模政治运动同经济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人民群众在政治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引导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去。尽管这三年政治运动很多，阶级斗争十分激烈，但都没有妨碍生产的进行，反而促进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

其次，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建国初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在经济上，正确处理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使其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中共中央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正确区分了敌友我，明确了主攻方向，坚持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协调了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各党派的关系，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胜利完成。

第三，中国共产党加强了自身的建设，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地位的这种变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共中央十分注意和加强党自身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先后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和从1951年到1954年的整党运动，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与群众同甘共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这就使中国共产党能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

一、新中国文化教育方针的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必然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以与之相适应。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

潮。”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很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目前“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制度，加强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共同纲领》做了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新中国文化教育方针。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具体的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教育方面，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广大工农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1949年全国人口中80%是文盲。全国解放前36年中，高等学校毕业生一共只有21万多人。这种教育制度根本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强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确定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明确了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老解放区的教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应以巩固与提高为主，条件许可时，可作某些发展；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坚决执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的方针；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除极坏者应予取缔或接管外，一般应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会议指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教育，是一个长期奋斗过程，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合理的成分，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来逐步进行。

第二，科学事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旧中国经济落后，科学研究极为薄弱。到解放前夕，科研机构只有40多个，科技人员不到1 000人，科技成果寥寥无几，新兴学科全属空白。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共同纲领》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就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任命郭沫若为院长。它是中国自然科学技术最高学术领导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国家建设中的关键性、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后来逐步发展，在上海等地建立分院，拥有120多个研

究所。1955年6月，科学院建立学部，由全国各方面优秀的科学家233人担任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大会是该院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其选举院主席团；主席团推选院长、副院长，领导全院工作。中国科学院的建立为我国科学事业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8月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报告。会议听取并讨论了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等作的报告，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选出李四光为全国科联主席，梁希为全国科普主席，团结了全国广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也组织了中华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会。党和政府帮助科学工作者认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引导他们结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第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文学艺术事业。在建国前夕，新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于北平，采纳了郭沫若的建议，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给大会发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贺电，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毛泽东亲临会场讲话，朱德代表党中央到会祝贺，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这次大会总结了30年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运动，特别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文艺工作经验，确定了在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端正了文艺工作者前进的方向。会议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随后还分别建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成立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建国后，在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文艺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巨大的普及和提高工作。一批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以反映时代的革命变化和新人物新思想为主要特色的文艺作品的出版，对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仅1950年出版的文艺书籍就有2700多种，1 700多万册，文艺期刊、副刊达90种以上。

第四，在旧中国各种疾病广泛流行，医疗条件差，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短。1949年每万人口的医生数为6.7人，每万人口的医院病床数为1.5张。全国每年约有1 500万人死亡。新中国成立时，《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950年8月7日到19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军委卫生部贺诚部长所作的全国与部队卫生工作情况的报告，大家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积极

发展卫生事业，防病治病，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努力。鉴于我国医疗机构和卫生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人民政府除积极吸收社会零散医务人员参加各级卫生机构工作外，还号召和动员私人开业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尽可能参加各种医疗机构，以发挥他们的作用。由于我国医疗人员绝大部分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人民政府还提倡和鼓励医务工作者到国防部门、农村、工厂和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结合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政府还在全国城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和健全了基层卫生组织、医疗机构及群众性的卫生委员会。由于这些努力，使那些曾经在旧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天花、斑疹伤寒等急性传染病，解放后不久就陆续被消灭了。到 1952 年，全国公立医院比解放前增加了两倍多，医院的病床数已达到 13.8 万张。1952 年底，县卫生院已全部建立。这些使城乡卫生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广播、出版事业已掌握在人民手里，成为中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武器。《共同纲领》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就为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确定了正确的方针。1950 年 3 月 29 日到 4 月 16 日，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通讯社的组织和工作，建立全国广播网等问题。当时统计全国共有报纸 253 种，发行 245 万份。会议认为，改进报纸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报纸要把首要篇幅用于报道人民的生产劳动和经济建设工作；要建立通讯员网和读报组，并把负责答复读者来信，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会议认为新华通讯社的组织和工作必须统一，成为国家通讯社，每日播发通讯稿供全国务报和外国报纸使用。根据会议统计，当时全国有广播电台 83 座，约有 100 万部以上的收音机。会议认为，应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以便使人民广播事业在确实的群众基础上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

二、旧有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关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规定，以及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要求，逐步对旧有教育文化事业进行了深刻的改革。

首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地军管会立即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各级学校，并派干部到这些学校帮助工作，使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开学上课。同时，人民政府还对这些学校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废除了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国民党"党义"、"公民"、"军训"、"童子军"等反动课程和教材，实行民主管理，开设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为主的政治课，在大专院校一般增开《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1949 年底和 1950 年初，在一些学校还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少年儿童队、学生会及教工组

织。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正式决定开办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新型正规大学。1950年10月3日开学，朱德、刘少奇到会讲话。工农速成中学是工农干部补习文化的学校，到1950年12月在北京等地开办X所，工农干部入学的有3700多人。1950年6月，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制定了高等学校的暂行规程、课程改革、领导关系等问题的草案，经政务院批准实行。1950年我国开始实行高等学校有计划的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但仍允许各校自行招生，毕业生也可以自谋职业。我国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同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互换留学生，1951年8月第一批375人到苏联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各国的一些华侨子女纷纷回国求学，国家对他们的学习加以照顾。

其次，从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各种文化教育、宗教事业的自主权，是建国初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来因为建国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对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等在其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条件下仍然允许其存在并可继续接受外国津贴。但是帝国主义者不愿放弃其对华文化侵略的特权，拒不服从中国政府的规定。办辅仁大学的天主教会用削减甚至停拨经费的办法来要挟我国政府，企图达到侵犯我国教育主权的目的。因此，1950年10月12日政务院下令接收辅仁大学自办，任命陈垣为校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利用接受其津贴的文教救济机构在我国进行造谣、诽谤的反动宣传，甚至隐藏武器，勾结匪特，进行间谍活动；同时，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上发表颠倒是非、污蔑中国人民的演说，美国政府又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企图以此来增加人民政府的困难，威胁在接受美国津贴的机构中的全部中国工作人员。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先是北京于12月13日举行由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圣公会的成员1万多人的爱国反美示威游行，接着各地也举行了集会游行，要求政府接办这些文化、教育、宗教、救济机构，或者转由中国人自办。

为了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干涉，维护中国人民对文化教育、宗教、救济等事业的自主权，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以及接受外国津贴和外资经营的文教救济机关、宗教团体的《登记条例》。当时是把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教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的任务，看作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明确规定将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教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教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事业，其经费有困难者，政府予以适当补助。对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等要按有关规定向当地政府登记，接受审查。这个决定公布后，受到全国人民和有关单位的拥护。1951年1月，教育部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经过调查研究和酝酿协商，最后确定：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其中燕京、金陵等11所改为公办学校；沪江、东吴等9校改为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政府予以补助。学校中的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不得担任行政职务，美籍教师思想言行反动者辞退，其余留任；中国籍教职员工一般原职留用待遇照旧。此外，还接收了外资津贴的中学544所（其中美资津贴的255所）和小学1 133所。总之，接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教育设施，收回了教育主权，维

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第三，为了使教育事业进一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人民政府还陆续作出一系列决定，使教育改革逐步深入。一是改革旧学制。1951 年 10 月，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是因为我国的旧学制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工农干部学校、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没有应有地位；小学学制为 6 年，并分为初小和高小的办法，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难于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人民政府实行新学制，确定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地位，从而保证了城乡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小学改行五年一贯制；技术学校被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并建立必要的制度；还使各类学校互相衔接，形成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新的教育系统。二是进行高校的课程改革。1950 年 8 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要求对高校的课程必须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以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应以系为培养人才的教学单位，各系课程应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当前与长远的需要，在系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适当的专门化。决定要求坚决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课程。1952 年 10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的指示》，规定了各高校应设立的政治课程。三是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人高等学校准备条件。院系调整工作从 1952 年开始，到 1953 年基本结束。经过调整，各类高校的性质和任务更加明确，高等工业院校得到加强。据 1952 年统计，高等工业院校从原来的 31 所扩充到 47 所，其学生数占各科学生数的第一位。这次调整对于改变旧中国在高校院系分布和系科设置上的不合理状况，使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但是这次调整机械搬用苏联经验，对文科有些专业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专业，致使财经、管理、政治、哲学等学科受到削弱；有些专业设置过细，对人才的成长与合理使用不利。

教育方面的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对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改革旧有社会文化事业。为了改革和发展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 1950 年 7 月公布了《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有上映执照；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同时组织力量摄制了如《桥》、《中华儿女》、《赵一曼》、《钢铁战士》等优秀影片。到 1952 年，共摄制新故事片 86 部，纪录片 57 部、翻译片 101 部，迅速改变了旧中国由美国电影垄断我国电影市场的状况。

戏曲改革是改革旧有社会文化事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文化部在 1950 年 11 月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检查了各地

戏曲改革工作的情况。1951年5月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国戏曲遗产极为丰富，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为了继承这种遗产，必须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对旧有戏曲必须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历史的、艺术的观点重新加以评价和审定。对旧有戏曲中一切好的剧目都应作为民族传统节目加以肯定。对旧戏曲中颠倒或歪曲历史事实，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东西应坚决加以修改。同时在表演方法上，应删除各种野蛮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成份。戏曲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依靠与广大艺术工作者合作，共同审定、修改、编写剧本，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而一般地不应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方法。这个指示对全国戏曲改革工作，起了推动作用。1952年10月初到11月中旬，文化部主办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全国23个剧种、37个剧团，共1600多人参加表演了不同风格的大小节目81个。这样大规模地把民族戏曲集中展演，不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壮举，在我国戏曲史上也是第一次。会演进行了评奖，其中获荣誉奖的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有9个剧获剧本奖，《梁山伯与祝英台》位居首位，还有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川剧《柳荫记》、京剧《将相和》、淮剧《王贵与李香香》、越剧《西厢记》等。有28个演出团体获演出奖；有120人分获演员一、二、三等奖，其中丁是娥（沪剧）、李少春、吴素秋、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京剧）、新凤霞（评剧）、丁果仙（晋剧）、韩俊卿（秦腔）等34人获一等奖。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会演十分关心，他们观看了演出。周恩来在11月14日还到会讲话，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工作方针，作了详尽的阐述，并祝贺这次会演的成功，认为“它标志着戏曲工作前进一大步”。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强调我们一方面应把传统的优秀剧目和优秀的表演艺术加以整理而继承下来；另一方面要用极大的努力，在民族戏曲的基础上，创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戏曲。总之，这次会演对旧戏曲的改造和新戏曲的壮大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为新中国人民的戏曲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在改革旧的文化教育制度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由于旧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知识分子也很少。据建国初期粗略统计，全国有各类知识分子200万人，只占当时总人口的0.37%。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旧社会深受压迫，亲眼看到国家蒙受屈辱，人民遭受苦难，所以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的同情或参加民主运动，有的保持中立。全国解放前夕，一些知名学者不受威胁利诱，拒绝跟随反动派逃亡到台湾而留在大陆迎接解放；有的著名作家、教授、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香港转移到解放区；还有不少旅居国外的爱国学者如李四光、华罗庚、老舍等及留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下，克服重重阻挠，回国参加建设。1950年到1952年三年中就有2000多人回国。解放后广大知识分子的进步是很明显的。但是不少知识分子由于家庭和历史的原因，还存在着旧的思想，如有的人以清

高超脱自居，有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有的盲目崇拜西方特别是美国；有的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而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不了解，甚至有某些偏见和疑虑，特别是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不理解，很不适应。从总体上看，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立场和世界观方面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为了帮助他们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从旧中国过来的全部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继续从事自己原来的业务，对失业者分配适当工作，在经济上给予较优越的待遇，一些代表人物给予政治上的地位，并且欢迎在海外工作或留学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这个方针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他们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投人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根据《共同纲领》关于“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的规定，人民政府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帮助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一方面是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1949 年到 1950 年间，各地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及训练班，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假期学习会，吸收知识分子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另一方面是组织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实践。从 1951 年春天开始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这使一批长期只“限于学校的窄狭圈子”读书、教书的学者、知识分子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算是从井底跳出，看了一次大世面”，“深刻体会到阶级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

从 1951 年 9 月开始，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个学习运动是从北京大学教师中首先发起的。1951 年 6 月，马寅初担任北大校长后，深感解放后广大师生的进步和他们愿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的热情，但又看到由于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存在，所以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出现不少问题和阻力。因此，他同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等 12 人，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希望通过教职员的思想改造来推动学校的改革。为此，他在 9 月 7 日写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到北大作报告，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北大的行动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并决定将这一学习运动推广到京、津各高校，在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这样，首先在京、津各高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9 月 29 日向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着重阐明了知识分子要转变立场、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强调要分清敌我，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他要求知识分子自觉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还要力争更进一步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树立信心改造自己。他的报告使参加学习的教师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他“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此后，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大家总结思

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1月2日，北大、清华等校分别向教育部学习委员会介绍了经验。11月25日，教育部向全国教育系统通报京津经验。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这样，在全国大中小学教师及高中以上学生中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全国高校教职员的91%，高中以上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都参加了学习。不久，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胡乔木、周扬、丁玲讲话作了动员，号召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划清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界限，整顿文艺团体、文艺刊物。1952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样就使这个运动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立场、世界观的初步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的、封建的、买办的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也初步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使他们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这次学习运动的缺点，主要是思想批判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有些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急，做法有些粗糙，有些单位采用群众斗争的方法，因此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是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对运动中发生的缺点中共中央及时作了纠正，并且通报各单位要求注意防止。

当时在报刊上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

电影《武训传》是进步艺术家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这个电影所歌颂的武训，是清末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电影也指出武训这样做，其志可嘉，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穷人受压迫地位的主题。影片经中央宣传部审查同意后摄制完成，于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地放映。影片放映后，获得了一片赞扬声，并兴起了一股“武训热”。许多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甚至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等等。从1951年春开始，也有人对《武训传》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指出武训的行为不值得歌颂，武训“不足为训”。这样，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由此展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改写和加写了大段文字。他认为，这个电影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武训传》污蔑了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了中国历史，污蔑了中华民族，进行了反动宣传。他指出武训处在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他指出，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何种程度！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全国很快展开了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政治批判运动。7月，在毛泽东倡议下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根据带有很大片面性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在修改

《调查记》时，将武训说成是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等。这个《调查记》实际上为这场批判运动作了总结。电影编导、演员和发表过赞扬文章的同志及有关领导作了检查。8月底批判告一段落。

讨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它结合武训这个实例，通过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特别是毛泽东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和重新研究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场批判的主要缺点是：首先是对当时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界和党内的影响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一部电影及围绕这部电影所进行的学术讨论一下子提到进行反动宣传的政治高度，结果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其次，采取了大规模群众性批判、围攻的方式。本来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以及电影《武训传》，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可以通过正常的自由讨论，开展学术和文艺批评，来克服错误意见，发展正确意见。但是当时没有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而是在中央和各地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充满政治声讨的批判文章，一拥而上，无限上纲，又不容被批评者进行申辩，所以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非常粗暴的，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来解决学术争端的恶劣先例。三是对武训历史的“调查”，是带着“框框”去的，所以这个调查歪曲了武训的历史，特别是说武训“是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更是捕风捉影，是与有关史实不相符的。

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为发端，毛泽东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又发动过几次批判运动，都有消极的方面，对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害，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深刻记取的。

第三章　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贯彻

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从 1953 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中共中央在 1952 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便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起就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至于转变的具体途径，只能随着革命的发展，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向。但是，究竟如何转变，当时还只是一种设想，还缺乏实践经验，这只有留待建国后解决。

中共中央曾经设想，在革命胜利后，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要全面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方针，使国家实现工业化，国营经济壮大，新民主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得到加强。待条件成熟时，即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而进入社会主义。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新的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在 1952 年 9 月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 10 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最初提出。此后，毛泽东几次强调“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重要思想，并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和进一步阐述。当时党中央设想，10 年以后，私营工业在整

个工业中将占不到10%的比重，这时，中国资本家的多数可能同意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在农业方面，今后10年至15年内可以将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内，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党和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判断，和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设想显然是有部分变化的。即由10年到15年以后，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改变为从现在起就采取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的渐变。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党的战略方针发生如此变化，不是偶然的，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实际工作经验积累的结果。

第一，这是迅速发展国营经济和扩大计划经济，顺利实施"一五"计划的客观要求。新中国诞生后，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没收官僚资本，使旧中国的主要经济力量集中到国家手中，这个变革同时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保障人民和社会利益的主要经济力量，又是现有基础工业的主体，"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要由它来承担。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不能依靠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历史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更没有能力担负起实现工业化的重任。特别是当时的国营工业企业，大多数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强，明显地表现出国营经济对于其它经济成分的优越性。到1952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对强大力量并且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依靠力量。此外，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和财政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使国家经济很自然地走上计划经济轨道。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物资短缺而需要紧迫的严峻形势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在"一五"计划开始实行的重要时刻，进一步发展国营经济和扩大计划经济，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政策时，毛泽东就指出，这种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反抗。事实正是如此，新中国诞生之后，资产阶级就以哄抬物价，捣乱金融；施放五毒；抢购粮油等物资，扰乱市场为内容，和无产阶级连续较量了三个回合。对此，周恩来曾多次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针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党和政府给予坚决回击，并对广大工商业者进行普遍的守法经营教育。同时，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法行为和消极作用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国家采取措施，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一方面限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扶持其生存和发展。这些措施是受到资本家欢迎的。这些工作本身必然加深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方面不同程度的变化。国家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

经验，事实上是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改造的具体途径已经形成。这就改变了过去设想在将来某一天宣布实行国有化，要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做法和认识。

第三，是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个体经济成为农村主要的经济成分。这种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不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和兴办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缺少农具、耕畜、资金，维持生产尚且不易，扩大生产更加困难。这就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工业化对粮食与工业原料日益增长的需要。当时，在许多地区已建立了各种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有的地区甚至开始了高级社的典型试验。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帮助广大农民克服困难，增加了生产，改善了生活，而且在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农业互助合作经验，实际上已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说明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势在必行。

第四，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才能保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只有完成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这个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这样，才有利于技术上的革命，增加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更好地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国家政权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向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

第五，从国际环境看，中国人民革命的全国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给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巨大打击。但是他们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仍然对我国军事上侵略威胁，经济上封锁禁运，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不景气，都需要恢复元气，发展经济。我们必须争取时机，加快发展，增强实力。我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只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同时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经济制度的影响，这也是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总之，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别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也已经深入人心。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本来就具有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且在不断发展和扩大，这就使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就成为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正如周恩来在1953年9月所指出的："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所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他顺应历史潮流，审时度势，经过深思熟虑，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即将结束时，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

设想以后，党中央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慎重酝酿。1953 年 5 月，当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根据深入调查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送交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十分重视。毛泽东在对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6 月，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在 6 月 15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第一次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9 月，在庆祝建国 4 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宣布了这条总路线。12 月，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准确表述。这条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一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这两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由于我国原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要实现这条总路线必须经过长期努力。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时间，加上恢复时期 3 年，共 18 年。这是比较稳妥的估计。

由于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局限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充分认识我国原来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总想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毛泽东强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就孕育着"求纯"的倾向，不利于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和深入贯彻落实，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纲领。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编制和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重大步骤，是共和国历史上辉煌的篇章。这个计划的实施，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共中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参照苏联

的建设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多次修改，历时四年，五易其稿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1953年到1957年。它的编制工作早在1951年初就着手进行了。到1954年基本定案。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8月，提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年底，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讨论，提出四项指示：一是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使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二是突出重点，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增强国家工业基础的建设上；三是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四是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正确反映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一五"计划充分体现了这些重要指示。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赴苏联征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并得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大力支持。1953年6月至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初步总结了计划的编制工作。1954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工作需要，调整了领导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班子。同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出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一个月时间，审议这个草案。此后又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仔细讨论，并于1955年3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最后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批准，颁布实施。"一五"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计划规定，五年中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相当于7亿多两黄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在总投资中，55.8%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重点。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单纯发展重工业，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计划规定，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农林水利占7.6%，运输和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体现了相应地发展农业、交通、运输邮电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任务。在工业布局上，计划规定，五年中，既要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又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工业部门；既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等已有的工业基础，又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开始改善我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据此，五年中共安排限额以上的大中型建设项目694个，其中156项是由苏联援建的，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起到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一五"期间建设的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

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就资源、改变经济落后地区面貌及军事上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而精心设计的。按照这一设计，广大内地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39.3%上升到1957年的49.7%。随之而来，内地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体现了内地工业有发展，沿海地区工业生产仍然发挥主要作用的要求。

中共中央之所以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另方面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我国有计划的工业化建设起点非常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1954年6月，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只有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改变。只有钢铁等基础工业发展了，机器制造业的原料增多了，轻工业的装备才有保障。只有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发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正常运转。只有钢铁、有色金属、机器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建立发展起来，才能大力发展轻工业，才能给农业以更大的支持。同时，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极需要我们尽快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因此，"一五"计划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因为轻工业相对说来还有一些基础，并且增产潜力很大。而农业增产主要依靠农民本身的劳动积极性和资金投入，使国家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事实上，优先发展童工业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毛泽东称之为"大仁政"。他指出："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大仁政"和"小仁政"是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是长远利益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同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它们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存在一定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积累建设资金，这就需要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但是在扩大积累的同时，也要适当改善人民生活。计划规定，五年内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33%，农村人民的购买力1957年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总之，"一五"计划在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上，既保证了国家建设，又注意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是宏大的，建设速度是较高的。但是它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共中央在制定计划时，正确估计了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认真分析了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人才及国际环境等制约因素，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在建设速度上，经过反复研究，多方论证，改变了开始时提出工业生产年递增20%以上的指标，确定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4.3%，比较符合我国实际，能够保证完成。

"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得到了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大力帮助。在苏联援建项目

中，从技术设计到建筑安装，从提供贷款到资源勘探，从厂址选择到人员培训，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苏联派来的技术专家就达3000人，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实习生达12000人。这在中苏人民的友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同时，我国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凡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决不依赖外援，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和自力更生精神。

"一五"计划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共同愿望。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投身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之中。工人阶级是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七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使劳动竞赛运动迅速发展成了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广大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支持工业建设。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一五"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批高校和中专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工业建设最前线。

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底，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首批竣工投入生产，成为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胜利。继而，包头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开了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的先河。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1957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把内地和西藏紧密地连结起来。总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扎扎实实取得进展。

三、统购统销的实施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全面展开以后，国家于1953年10月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出现了全国粮食供销矛盾严重的问题。由于城镇和工矿区人口猛增，1953年城镇人口达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致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对商品粮食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但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增加生产和提高商品率的能力有限，小农余粮户又有待价惜售心理，加之东北等产粮地区受灾，造成1953年国家粮食收购量减少。当时是收购的少，完不成计划；销售的多，大幅度突破计划，情况十分严重，不少地方开始出现混乱。特别是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粮食形势一吃紧，私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十分尖锐，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城乡之间。1952年冬，江西吉安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买走。同年9月4日，北京一些粮商在两个小时内把市场内的大量粮食抢购一空。他们投机活动猖獗，企图操纵全国粮食市场。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指出：粮食紊乱时间要提早到来，范围也要扩大，从乡村一直到大城市。其结果是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使国家建设受到影响，使人心不安。

面对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国家必须改变光靠市场收购粮食的办法，而采取新的购

粮办法和新的粮食供应办法。当时经过对可能采取的八种方案进行研究，仔细斟酌权衡，反复对比筛选，排除了前七种方案，决定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的办法，名称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1953年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对这一重大决策拍板定案。

在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指出：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私营粮商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其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处理的又是第一种。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事就好办了。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在详细分析粮食购销形势后，进一步说明："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他强调，粮食不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更被动。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危险性可能小一点。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征购，管制私商，统一管理粮食，势在必行。配售问题也势在必行。这也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依靠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把这项工作做为极端迫切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担当起来。

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

这四项政策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决议》提出："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相互对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将无法实现。"

国家在部署了粮食统购统销之后不久，又部署了食用植物油和棉花、棉布的统购统销。11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同时对食油实行计划供应。1954年9月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同时，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由于加强了对农民的思想工作，加上统购中充分考虑农民合理利益的经济政策，国家关于统购统销的决策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初步缓解了粮食等重要物资的供需矛盾，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保证了"一五"期间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这一重大决策的实行，还初步切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经济联系，一方面促进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互助合

作、粮食征购，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对农民进行改造的两大战略措施；另方面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购销，这实际上是对私营粮食行业的改造，这也推动了对其他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总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对个体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继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物价后的第二次大战役。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机构的全面建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加强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52 年 12 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得到与会各委员的赞同。翌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于 1953 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 33 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的由 24 人组成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分别负责起草宪法和选举法工作。

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出发，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吸收苏联的选举经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拟定出草案并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选举法总的精神就是根据我国当时情况，规定一个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这主要表现在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方面，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相结合的方法。选举法的颁布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标志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

为保证选举的准确顺利进行，开展了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工作。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 24 时止，全国人口总数 6 亿 191 万 2 371 人。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的准确的人口数字。与此同时，各地进行了选民登记工作，登记选民总数为 3 亿 2 380 万 9684 人，占进行选举地区 18 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 97.18%。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全国参加基层选举的单位总计 21.4798 万个，参加基层选举地区的人口总计 5 亿 7143 万 4 511 人。这次普选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大大推动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为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954 年 4 月，中央选举委员会和政务院下达关于召开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的决定。6、7 月间，全国 150 个省辖市、2064 个县、自治县及县一级的单位

和170个中央直辖市的区，全部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6680人。7、8月间，各省、直辖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加上军队代表和华侨代表，总计1 226人，其中共产党员668人，占54.48%，非中共人士558人，占45.52%。这样，既保证了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1954年9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到会代表1211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法律；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毛泽东向大会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他指出，这次会议是标志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刘少奇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宪法草案，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9月20日，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于当日公布。继而大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

9月23日，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建国5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和外交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指出国家建设中的困难和各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欺压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决不允许在我们国家机关里存在。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周恩来又指出，目前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是有缺点的，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违反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原则。他们往往用个人的领导代替集体的领导，用官僚主义代替民主领导，不关心群众的痛痒，不倾听群众的批评，甚至打击报复批评者。这是同我们的国家制度不相容的，必须彻底克服。我们相信，即将由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产生的国家行政机关，一定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把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报告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的任务。这是对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次表述。对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

告》，与会代表进行热烈讨论，75人作了大会发言，高度评价了建国5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了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诚挚的希望。26日，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27日，通过无记名投票，大会选举出国家领导工作人员。28日，大会胜利闭幕。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圆满地完成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3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宪法草案初稿。从3月23日到6月11日，召开多次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同时，认真倾听了各地区、各级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武装部队等组织的各方面人士8000多人经过讨论提出的5900多条修改意见。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决议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全国共有1.5亿多人参加讨论，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118万多条。根据各方面意见，起草委员会进行了两次修改，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两次讨论通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1954年9月20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由序言和四章组成，共106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国家的性质和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二，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规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宪法条文又作了许多规定，既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目标，又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步骤和途径。

第三，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容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有劳动权利和受教育权利；劳动者有休息权利和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年满18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规定，共和国的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公民有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的义务，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有依法服兵役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受国家保护。履行义务是公民的职责。

第四，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宪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这样，既有利于保证整个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也有利于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地位，满足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

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宪法。它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们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也指明了全国人民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这就为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法律保证。它的颁布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全面建立了国家机构。大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彭真为秘书长，王昆仑等65人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大会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选的决定，由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务院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秘书长36人。大会根据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提名，通过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的决定。由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81人。

大会根据主席团的提名，一致通过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民族委员会、法制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主任和委员的人选。

国家领导机构的全面建立，为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伟大祖国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以《共同纲领》暂代国家宪法的过渡状态。这为加强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二、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新阶段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行，使人民政协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成为党外民主人士十分关切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积极筹备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为了做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时对民主人士的工作，使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的代表人物都在各自的地位上充分发挥作用，早在1953年7月，中央统战部就制定了《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和《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决不意味着要削弱统

一战线，而是要使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巩固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那种认为统一战线组织可有可无的观点是错误的。翌年1月，又制定了《关于县、市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时安排民主人士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补充意见》。同时，中共中央召集各类会议，讨论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性质、任务、组织原则等问题，并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等文件。

经过充分准备，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共计559人，其中共产党员150人，占26.8%，党外人士409人，占73.2%。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陈叔通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章伯钧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会议回顾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国五年来，协助政府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从事国家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的光辉成就。强调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作用消失后，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存在。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它爱国民主人士等，在完成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言》。会议还通过了《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慰问电》、《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等。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一致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等16人为副主席，选举邢西萍为秘书长，选举常务委员65人。

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包括总纲和三章，共25条。《章程》明确规定了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总纲明确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今后人民政协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这就是说，人民政协既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质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人民政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人民政协的具体任务是：第一，协商国际问题；第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组织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问题；并联系人民群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

建议；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第五，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关于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章程》依据宪法精神，规定凡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共同遵守七项准则：第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力贯彻实施宪法；第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地位；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第四，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第五，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第六，加强中国人民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友谊，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第七，在自愿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和国家政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这七条准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关于人民政协的组织机构和职能，《章程》规定，人民政协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决议和号召，有遵守和执行的义务，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对下一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职权是：(1) 负责修改人民政协章程；(2) 推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3) 听取和审查常委会工作报告。地方政协委员会要遵守和实行人民政协章程；贯彻执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决议和号召，协商和推进地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章程确认人民政协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将起巨大的推动和组织作用。

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的召开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后人民政协职能的变化，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和加强，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之间团结合作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存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进一步加强，表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共和国诞生后的头七年，我国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建国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也被称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是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这个统一战线是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的。

为了开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会前二天，毛泽东召集了党内外几十人举行座谈，他指出今后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人大是权力机关，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人大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们不能把政协搞成国家机关。政协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

的机关。人民政协同国家权力机关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民政协是我国统一战线的协商机关，人大和政府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国家权力机关颁布的宪法和其他法令，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执行。统一战线的协商机关则无此权力，这是两者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第二，人民政协代表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意见和要求，可以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机关那种监督、检查、质询、弹劾的权力。人民政协的作用，在于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充分反映他们的意见、批评和建议，以利于党和政府集中正确意见，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实行正确领导。人民政协这种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民主监督，对于健全国家政治生活，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三，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参加人民政协的单位和人选，不是经过选举而是由协商产生。其基本原则是民主协商。它的决议是经协商取得，内部关系是由协商确定。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对政协的决议，既有执行的义务，又有保留意见的权利。总之，人大和政协是有不同性质、作用和组织原则的，恰当地认识和运用这两种不同组织的职能，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对发展我国的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

三、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53年人口普查统计，各少数民族人口共计350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而他们分布的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逐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共和国诞生初期，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进行阴谋活动，搞所谓“民族独立”，企图分裂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指导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

首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文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这一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1952年2月政务院召开第125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各民族自治区区域界线的划定和调整，行政地位和名称的确定，均由各有关的直

接上级人民政府与各有关的民族代表协商拟定，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核准”。“各民族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分组成之；同时应包括自治区内适当数量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员”。纲要还规定了自治机关的各项自治权利，要求上级人民政府应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并促其实现；应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这个纲要为同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8次会议批准实施。《纲要》的主要内容载人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除了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还享有各项自治权利。如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等等。宪法还规定：“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宪法的各项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

我国最早建立的省级民族自治政府，是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10月，又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1956年9月，全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两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其后，1958年3月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10月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1965年9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权益，使他们能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既保证了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又保证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充分发挥各民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

一、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我国从1953年起，全面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农业的改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国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互助合作道路进行的。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并于1951年9月，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于1953年春发布全国。同年年底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我国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健康稳步的发展。

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力获得很大解放。加上国家对农业给以多方面的扶持和支援，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是小农经济分散落后，力量薄弱，增产缓慢。当时个体农民平均每户只有十来亩耕地，贫雇农平均每户不足半头耕畜、半部犁，资金也很缺乏，维持生产都不容易，要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多种经营更加困难。他们更无力抵御大的自然灾害、疾病、丧亡等事故。这使不稳固的小农经济时刻有向两极分化的可能，并且两极分化已有发生和发展。一些富裕中农力求变自己为富农，一些贫农因各种原因而出卖土地，成为雇农。面对此种情况，党内有些同志主张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增加公共积累和扩大按劳分配部分的比重，以此逐步战胜农民向富农方向发展的自发趋势，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互助组的私有基础。可是，有些同志反对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巩固互助组主要是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而不是逐渐动摇其私有基础。动摇私有基础，搞农业集体化，是将来的任务，应以国家工业的强大发展和农业机器的大量使用为条件，即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中共中央在这种背景下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并制定决议，明确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党对于农村生产的正确领导，具有极重大的意义。"针对农民的两种积极性，决议进一步指明了党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特点，看到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农民迅速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决议批评在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即采取消极态度和急躁态度，前者导致放任自流，会使互助合作运动陷于消沉和解体；后者导致强迫命令，违反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决议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和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大量地发展劳动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阐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可能性；说明了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步骤和方法。着重说明了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个体农业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不相适应的矛盾，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总结我国互助

合作运动的经验指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并有少量的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采取这样逐步过渡的步骤，可以使广大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习惯于集体所有制的生活方式，同时又可避免因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而引起农作物减产。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底，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同时试办初级社。这一阶段的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1953年春虽然一度发生过急躁冒进倾向，但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和《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对互助合作组织进行检查和整顿，纠正了急躁冒进问题，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转变了干部重社轻组的思想。

二是1954年到1955年春，是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阶段。根据第二个决议着重发展初级社的精神，初级社由1951年的300多个增加到1954年底的48万个。1955年4月，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7万个，超过了原计划。在这个合作社大发展中，全国大多数地方是健康的，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户，合作社优于互助组。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他们积极要求入社。但也有的地方一哄而起，发展过快过猛，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加上有些合作社在处理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牲畜时折价偏低，偿还时间过长甚至实际无法兑现，使农民的实际利益受到损害。加上1954年粮食统购中多购35亿公斤等原因，造成农村关系紧张。一些农村出现大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不热心积肥和备耕等值得严重注意的情况。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55年1月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并根据不同地区情况，或者暂时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或者适当收缩，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展。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紧急指示，决定对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以缓和农村紧张情况，安定农民情绪；同时放慢农业合作化的步骤。3月上旬，毛泽东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陈伯达四人谈话，提出"停、缩、发"的方针，告诫大家，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农村工作部重点帮助浙江省解决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的问题，要求：停止发展，进行适当收缩，全力巩固。到7月底，浙江收缩了15607个社，全国共收缩2万个社，初步巩固了65万个合作社。这个阶段合作化运动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步伐，基本保持了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稳步前进的势头。

三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阶段。1955年夏季，在合作化问题上，党内发生意见分歧。一方以邓子恢为代表，他们主张在现有65万个社的基

础上，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另一方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从南方考察回京，对合作化发展作出新的判断，主张修改计划，加快发展，从65万个社发展到130万个。这场争论在表面上看来，是翻一番和翻半番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指导思想之争。关系到对合作化的形势、步骤和方法上认识的分歧。为了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共中央于1955年7月31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道路、方针和方法；重申自愿互利的原则；提出在我国条件下，必须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原理；要求对运动实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报告的基调是强调反右倾。报告批评邓子恢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脚女人"走路。把党内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正常争论，夸大为两条路线的分歧，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的滋长。

1955年10月，中共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继续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9月到12月，毛泽东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阐明一些具体方针政策。同时更加尖锐地批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在其他方面工作中也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使"反右倾保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955年冬季，合作化运动出现了超高速度的发展。1956年1月，加入初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80.3%。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达1.17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87.8%，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这过程中，对富农经济采取了从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分子采取在劳动中改造、分期分批吸收入社的办法，从而消灭了富农经济。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5亿多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首先，农业合作化把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了土地公有，避免了两极分化。同时，这也解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小农经济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巩固了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次，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合作化后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些地方发展了集体企业，增加了公共积累。第三，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基本上保证了城乡人民对农产品的需要，也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还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也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主要是1955年夏季之后，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毕竟是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我国农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

我国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952年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13%左右，在农民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中，手工业品占80%左右。但是，个体手工业是分散落后、规模狭小的个体经济，同时也是小商品经济，很不稳固，因

此，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

手工业的合作化，在总路线提出后，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合作人手，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也影响到手工业合作化速度的加快。到 1956 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发展到 10 万多个，入社的手工业者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91.7%，基本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手工业合作化后期出现了发展过快、合并过多、统一计算盈亏等不利于手工业发展的缺点和问题，致使某些手工业产品出现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某些服务行业合并过多，使人民生活不方便。但是，总的来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取得了重要经验。与此同时，渔业、盐业、民间运输业，小商小贩等个体劳动者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家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采取和平改造方针的必要性在于：我国经济落后，需要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有利于争取和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一定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实行和平改造，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平改造也是可能的：一是因为在阶级力量对比上，无产阶级占绝对优势。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还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又同农民结成了巩固联盟，加上私营企业工人监督的加强，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促使资本家不得不接受改造。二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这时还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建国后经过各种斗争和教育，使大多数资本家认识到只有接受改造才有出路。三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政治上对资本家团结、教育、改造，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用、限制、改造，又采取逐步过渡的形式，在政治待遇、生活、工作等方面作出妥善安排，使资本家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不太勉强地接受了改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国家的性质而定的。在我国，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按照其中社会主义因素多少等情况，又可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是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 1953 年底以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建国后，

通过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等，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了经销代销，既帮助他们克服了困难，也使这些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到1952年底，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6%。建国后，通过没收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部分，建立了一批公私合营企业共997户，其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11.5%。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5月向中央送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讨论和肯定了这个报告，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决定对私营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概括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7月，毛泽东在一个关于工会工作的批语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社会主义性质的。9月7日，毛泽东在约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时，说明“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形式和政策的确定，大大促进了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1953年下半年，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加工订货范围，由主要行业发展到一般行业，由大型工厂发展到中小型工厂，由大中城市发展到小城市。到1953年底，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和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中已上升为53.6%，公私合营企业已占13.3%。商业中的经销代销也于1954年开始发展起来。国家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中，通过工缴货价，保证资本家获得10%～30%的利润，以此作为赎买代价。这些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国家不同程度地控制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55年夏，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这时，国家着重发展以公私合营为主的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国家同资本家的合作由企业外部深入到企业内部。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明确规定，发展公私合营必须采取积极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应当根据国家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来进行，这样更促进了公私合营企业的发

展。到1954年达1746户，职工53万多人，产值50多亿元，占全部私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的33%。1955年合营企业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总产值的49.6%。这时，国家对资本家的赎买形式为“四马分肥”，即在企业利润分配时，国家税收占34.5%，职工福利费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本家红利占20.5%，大体为四分之一。由此可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领导地位。国家派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扩建、新建，又整顿了企业管理，也使工人群众在这些企业中的地位有所改变，由为资本家生产改变成为国家生产。这必然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55年比1950年，合营企业提高2倍多，而私营企业只提高半倍多。公私合营企业显示了优越性。同时企业的大部分盈余可以根据国家计划用于发展生产。资本家不但在合营企业中得到更多的锻炼和教育，为自我改造创造条件，同时私股红利也比私营时期的利润多。

但是，合营企业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仍然存在两种所有制的对立。公私、劳资矛盾并未解决，同时又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只有打破企业界线，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个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秋，北京、上海、天津有一部分行业先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创造了对私营企业进行改造的新经验。

第三阶段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1955年下半年，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加快了改造的步伐。大部分工商业者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自然恋恋不舍，并顾虑重重，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为此，1955年10月底，毛泽东邀请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帮助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指出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光明的前途。鼓励他们努力把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1月间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听取陈云、陈毅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会议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日到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指出：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从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决议要求用两年时间分期分批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会后各级党委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于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在工人阶级积极推动下，在一些进步的工商业者带动下，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6年初，首都北京的资本家首先向国家提出全行业

公私合营的申请，并且天天敲锣打鼓，送喜报，表决心，要求国家批准公私合营。政府只好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的办法，即先承认公私合营，以后再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和人事调整。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118个大中城市在3月末以前也先后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赎买政策是，对私股实行定息办法，即把资本家的利润限制在一定的息率上，统一规定年息为五厘，当时国家决定付息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共计十年。此外还给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安排工作，他们的原有工资不降低。这些都受到资本家的普遍欢迎。这样，全行业合营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已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使用、管理和支配，资本家失去了对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因此，这种企业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了。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仅是对企业的改造，而且是对工商业者本人的改造。采取以企业为基地，结合他们的工作，有系统地对工商业者进行教育，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因为来势迅猛，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于粗糙，造成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不很适当，使他们不能发挥所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在企业改组中，合并过多，统一计算盈亏单位太大，造成产品单调，经营特点丧失，质量下降，服务行业、商业网点撤销过多，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特别是把大量无剥削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卷入全行业公私合营中，混淆了劳动者和剥削者界限，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它和农业、手工业改造后期出现的一些问题一样，是实际工作中的偏差。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

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在改造的后期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以致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是，有两个基本事实必须肯定：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完成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是在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二是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而是极大地加强了人民的团结，是在人民基本上普遍拥护的

情况下完成的。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对统治地位。1956年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占32.2%，合作社经济占53.4%，公私合营经济占7.3%，三者合计，公有制经济占92.9%。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32.5%，资本主义工业下降到接近于零。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为主体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使全国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为我国今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目标模式方面，还是以苏联为榜样，但是在具体道路上还是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在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首先，这个改造是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逐步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进行的。对个体农业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形式。逐步过渡可以使被改造者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避免因生产关系突然改变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其次，这个改造是用和平方法进行的。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方法即说服教育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把资本家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第三，这个改造是把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使这两种改造同时进行，互相促进。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

应当指出，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以致遗留下许多问题。诸如，对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允许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国营经济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集体经济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否划分层次，根据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层次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在改造过程中曾有所察觉，但是来不及反复研究和慎重决策，就在改造高潮中被掩盖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在旧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不仅没有及时正确解决上述问题，反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生一些严重失误。

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在借鉴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经济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从其形成来看，由于"一五"计划规模宏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我国的经济文化又极为落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个破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虽然经过三年恢复时期，财政经济状况有了基本好转，但要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仍然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国家建设资金不足。"一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就是400多个亿，其它方面的开支如军政费用等等也必须保证，而财政收入却不可能有大量增加。因此，有限的资金必须由国家作出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是国家技术力量极端缺乏。"一五"计划建设项目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仅建设工程和交通运输两项就需要39.5万人，而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只有28.6万人，人才严重不足。只有把有限的技术力量集中使用，才能保证重点工程的顺利进行。再次是建设经验不够。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但底子薄弱的国度里，组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只有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做到统筹安排，保证重点，使"一五"计划顺利进行。还有，"一五"计划中限额以上的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投资庞大，技术复杂，关系全国经济命脉，既不是仅仅某个地方所需要的，也不是一个地方所能承担的项目，必须由中央和有关部门集中统一管理。总之，建国后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建设任务，需要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

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更为中央实行统一领导，直接控制国家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

"一五"计划末期，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逐步建立了以大计划、小自由，大统一、小分散为原则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

195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随后，中央各部计划司、各省、市、自治区和县级计委及企业单位的计划科（股）也相应成立，从而组成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机构。国家实行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由国家下达指令性指标；对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实行间接计划即指导性计划，通过经济合同、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等，把它们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越来越大，成为计划管理体制的主要形式。

第二，实行以中央集权为主的财政体制。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奠定了中央集权型的财政体制基础。当时规定绝大部分财政归中央，实行"统收统支"。一年后改为"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为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三级。大区撤销后，改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县三级财政，由中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层层负责，但绝大部分资金集中在中央。"一五"计划期间，在国家总财政中，中央收入占80%，支出占75%，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拨款，属于中央项目的占79%。

第三，基本建设和工业管理体制。

基建项目以中央各部门为主进行管理。凡是重点建设项目，都由国家集中管理，基建投资由财政部直接拨款，中央各主管部门从人、财、物的调度到设计施工，生产准备的安排一抓到底。地方的基本建设，项目仍由中央各部指定，设计施工任务由国家下达。在工业管理方面，原来基本由各大行政区负责。大区撤销后，主要工业企业陆续收归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形成以"条条"为主的企业管理体制。到 1957 年，中央各部直接管的企业达到 9300 多个，产值占中央和地方管理工业的 49%。与这种企业管理体制相适应，实行由中央统一分配物资的物资管理体制。从 1953 年起，在全国范围实行计划分配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委统配，专用物资则由主管部门平衡分配。到 1957 年，统配、部管物资达 532 种。

第四，实行以计划流通为主的商业流通体制。

建国后，从上到下建立起国营和供销合作的商业体系。国营商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由专业公司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实行物资大调拨和资金大回笼。这种高度集中的商业体制不能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从 1953 年起，改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即对国营商业企业核定资金，实行经济核算制；按经济区域设置三级批发机构，分级管理，按合理流向组织商品流通；下放管理权，由专业系统与当地商业行政部门双重领导。除大力发展国营、供销合作商业外，对私营和个体商业也统筹安排。对外贸易始终实行国家统制政策，进出口业务均由国家所设各级外贸公司负责。

第五，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体制和等级工资体制。

建国初由于多种经济并存，为了解决就业和旧社会遗留的严重失业问题，国家实行多条渠道、多种形式和多种办法的劳动就业制度。介绍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一五"期间，随着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逐步扩大统一分配劳动力的范围。从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到干部、工人、复员退伍军人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此后，自行就业、自谋出路就被统一分配所代替。1957 年 1 月，国家规定，各单位对多余的正式职工、学徒不得裁减。这样就形成了统包统配和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的劳动体制。

工资体制方面，建国初没有统一的工资制度。从解放区进城的干部实行供给制（后改为包干制），对接管企业的职工和留用公教人员的工资，基本维持现状。由于当时物价不稳定、货币不统一，工资一般采用"折实单位"或"工资分"的办法，力求货币工资与物价相适应。当时各地各部门的工资标准相当混乱。1954 年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后，着手实行全国工资制度的统一。1956 年国务院颁布工资改革方案。规定：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统一的职务等级工资制；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职务、职称等级工资制；国营企业按行业和企业规模分别制定各类职工的工资等级表，工人实行五级或八级的等级工资制；职工的定级、升级都按全国统一规定，地方和企业无权机动处置，但企业可根据条件自行决定计件工资和建立奖励制度。

以上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国家以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对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重点建设顺利进行，促进

"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对于保证市场稳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暴露出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条块分割的弊病，影响和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更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

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加上苏联等友好国家的支援，1956 年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已提前完成。到 1957 年底，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

在基本建设方面，成就十分显著。五年中，建立起一批为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基础工业，同时大规模地改建、扩建了一些原有的工业企业。五年中，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总投资达 493 亿元，超过原定计划 427.4 亿元的 15.3%；加上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全国实际上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588 亿元，新增固定资产达 492 亿元，相当于 1952 年底全国拥有固定资产原值的 1.9 倍。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 1 万个以上，限额以上的有 921 个，比原计划 694 个增加了 227 个。到 1957 年底全部投人生产的有 428 个，部分投产的有 109 个。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冶金、矿山设备、重型机械、精密仪表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制造，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等纷纷在祖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填补了我国重工业建设的许多空白，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建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

在工业建设方面，发展速度很快。我国工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全国工业总产值达 783.9 亿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 1952 年的 41.5%提高到 1957 年的 56.5%。工业总产值超过原定计划 21%，比 1952 年增长 128.6%，平均每年增长 18%，超过原定计划 14.7%的增长速度。生产资料生产，比 1952 年增长了 210%，平均每年增长 25.4%。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35.5%提高到 1957 年的 45%，改变了旧中国重工业落后的面貌。消费资料的生产比 1952 年增长了 83%，平均每年增长 12.9%。"一五"计划规定的 46 种主要工业产品，有 40 种全部完成了计划。其中钢产量达 53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96%，原煤产量达 1.3 亿吨，比 1952 年增长 96%，发电量达 193 亿度，比 1952 年增长 166%。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达 16.7 万人，比 1952 年增长 1.9 倍，工业和基本建设部门职工达 1019 万人，比 1952 年增长 66%。劳动生产率比 1952 年提高 52%，年平均提高 9.9%。

在农业生产方面，增长速度也比较快。1957 年农业总产值达 604 亿元，完成计划的 101%，比 1952 年增长 25%，平均每年增长 4.5%。粮食产量达 19 50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9%，平均每年增长 3.7%；棉花产量达 164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6%，年均增长 4.7%。"一五"期间，国家对农村水利的投资额达 41.8 亿元，全国扩大耕地面积 391 万公顷，1957 年全国耕地面积达 11183 万公顷，完成原计划的 101%。

"一五"期间，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新建铁路 33 条，修复 3 条。1957 年全国铁路

通车里程达29 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25.5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

五年中，教育科学事业有较大的发展。1957年高等院校有229所，比1953年的181所，增加26.5%。五年共招生56.3万人，毕业生26.9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111.9万人，毕业生84.2万人。普通中学共招生874.9万人，毕业生430.5万人。小学共招生5898万人，毕业生1 852万人。全国共建科研机构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加2倍多。

五年中，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3%多，其中城市职工平均消费水平达205元，提高38.5%。农民达79元，提高27.4%。市场商品增多，物价基本稳定。五年中除1956年出现财政赤字外，其余各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始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但是距离社会经济面貌的全面改观还有漫长的路程，需要把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第四节　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发展

一、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同时又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建国初期，为了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与经济建设，即适应和推进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适应和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准备与实施，迫切需要加强思想和文化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就指出："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不够。"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把12本马恩列斯著作规定为干部必读的书。毛泽东说：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

为了在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中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中，着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对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作了深刻的分析，有力地批驳了帝国主义者歪曲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谬论。这就帮助和促进了广大干部和人民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学习和运用"科学的历史观

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所谓"科学的历史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指出：为了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这样，建国初期全国上下很快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厂矿、学校、部队，都集中了几个月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社会发展史，从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就有100万人参加了这种学习。当时知识分子学习的热情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还组织他们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经验。当时在各种训练班、革命大学和军政大学的课程中，普遍安排了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学习。1951年7月，通过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活动，进一步掀起了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热潮。

这时还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

《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胜利记录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两套党的文献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收集了1922年3月至1941年11月党的文献755篇。其中收录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他为中央起草的文件。这是《毛泽东选集》的最初基础。中共"七大"以后，有些解放区先后编印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但是，这些版本都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查，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著作又没有收进去。当然，它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准备《毛泽东选集》的正式出版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全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1951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要彻底纠正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很快地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比较正规的理论学习热潮。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学习上的需要，1950年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立即着手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拟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从1926年至1949年）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分为4卷出版。毛泽东亲自参加并主持了这项工作，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在指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期间，毛泽东抽出一部分精力亲自做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他不但参加选稿

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的修改，虽然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但也有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他还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经过毛泽东反复斟酌，慎重选择，细心修改，认真校阅，编入毛选的文章无论内容还是文字，都更加周密和完善了。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 1951 年 10 月出版，第二卷于 1952 年 4 月出版，第三卷于 1953 年 4 月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录了毛泽东从 1926 年 3 月到 1937 年 7 月的重要著作，共计 16 篇。其中北伐战争时期的著作 2 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14 篇。这些著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建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并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作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收录了毛泽东从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到 1941 年 5 月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的重要著作，共计 41 篇。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的重要著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录了毛泽东从 1941 年春到 1945 年 8 月的著作，共计 31 篇。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期和后期的重要著作。这一卷中还附录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著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相结合，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论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自力更生的原则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的路线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很快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纷纷举办报告会、座谈会等，畅谈学习心得，撰写体会文章。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了进一步认识，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革命运动指针的地位和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深刻认识和信服，这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全国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立。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了人民，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

195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3 月 1 日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指出，为了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为此，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行。对于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正确开展，《指示》作出一系列原则的规定，其中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批评中，"应当分清政

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于后者应当“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这些规定是在研究过去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为了纠正和防止学术批评和讨论中的偏差，使之沿着正确轨道发展而制定的。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它在实际上为后来提出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方针作了初步准备。但是，由于揭露和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掀起，就使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受到极大的干扰而被忽视。

二、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4年10月开始，在知识分子中和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是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开始的。

俞平伯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他在《红楼梦》研究中作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是“五四”以后形成的“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之一。1952年9月，他把30年前的旧作《红楼梦辨》稍加修改后，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出版。1954年3月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的文章。1954年9月至10月，《文史哲》、《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在10月16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不久，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从1954年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联合召开了八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对《文艺报》压制自由讨论的错误进行批评。在这场运动中，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批判文章，后来经过选编，选出129篇近100万字，结成《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4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批评了俞平伯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批判文章认为，虽然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作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但他承袭了胡适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断定《红楼梦》一是“感叹自己的身世”，二是作“情场忏悔”，“是为十二钗作本传”，即所谓“自传”说、“钗黛合一说”，他认为《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是“色”与“空”及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批判文章认为，他割弃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否认它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用实用主义的繁琐考证把人们引向不可知的迷津。

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开端，揭开了红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对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但

是，这场批判也有明显的缺点和失误。首先，把学术研究中的争论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背景相联系，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文章把学术观点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加以批判，如有的文章认为，俞平伯的学术著作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是“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等。其次，有些文章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评价有拔高的倾向，对其消极影响的一面缺乏分析，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对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则是全盘否定的，否认和忽视了俞平伯在建国后在红学研究中的进步因素和积极变化。

这场批判运动到 1954 年 12 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示精神，在 12 月 8 日文联、作协的联席会议上，周扬指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此后，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开始转向对胡适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1954 年 12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的讨论会。联席会议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等 9 人组成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任领导这场批判。此后，到 1955 年 3 月，共举行讨论会 21 次，着重批判了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哲学史观、文学史观等六个方面。与此同时，从 1954 年 12 月开始，全国各地特别是各高校也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批判会，全国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各种学术观点进行了批判。许多深受胡适思想观点影响的文化学术界人士一面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一面清理自己的思想。

这场全国规模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从开始到 1955 年 5 月，发展一般是健康的，它已经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于展开讨论。这次批判也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方面。这主要表现在突出批判的正义性时，没有很好地注意批判的科学性。对胡适的一生缺乏具体分析，未能作出科学的评价，不分他的前期后期，一概斥之为反动的买办文人等。对胡适思想也缺乏客观、全面、历史的分析，全盘否定了他的学术成就，这显然是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因此，批判本身也表现了某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开展对胡适思想批判的同时，1955 年又展开了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诗人，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进步文艺界中历来有不同意见和批评。解放后，分歧依然存在。1952 年文艺界整风时有些读者就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1953 年初，《文艺报》发

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两篇文章。胡风在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近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报告对关于生活或生活实践、关于思想改造、关于民族形式及关于题材等文艺理论方面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反驳了林、何两人对他的批评，对党的文艺领导工作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对改进文艺领导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12月，胡风在文联与作协主席团召开的批判俞平伯和《文艺报》的会议上作过两次发言，批评文艺界领导。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把这“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这样，文艺界围绕胡风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批判。各地的文艺团体、高等学校纷纷召开座谈会、批判会，批判胡风思想，形成了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又一次批判运动。但是，这时对胡风的问题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斗争限于理论批判的范围。

从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就使胡风问题的性质变成了敌我矛盾。从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变成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5年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了胡风等人。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1980年9月，中央对此案予以平反。

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这本来是属于人民内部思想争论的性质，应当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正常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的解决。当时这种把文艺思想的争论当做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做法，特别是根据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就把胡风及与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三、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加强和改善党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及知识分子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5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中共中央以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为重点，调查了解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状况和执行知识分

子政策中的问题。周恩来还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在此基础上，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中央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的负责人，全国性群众团体，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工厂、矿山、文艺界、医院、军队等方面党的负责人，共计1 279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深刻地论述了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完善，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加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这没有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和辛勤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是，加强领导，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大规模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以适应国家对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周恩来在全面考察和分析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建国后我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变化情况的基础上，正确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他指出，由于正确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努力，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

周恩来还阐明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就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其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为此，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专长；对知识分子要有最充分了解，给他们以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积极地工作；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以及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周恩来在报告中总结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经验，指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

周恩来还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处在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时期，人类面临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因此，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力求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周恩来的报告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是社会主义时期党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我国经济上还没有独立，科学上也没有独立，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和钻研精神。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在 1956 年 2 月 20 日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不久，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领导下，集中 600 多位科学家编制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大力组织实施。同时，在社会科学方面，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6—1967 年)。这是共和国的第一个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是党探索我国科学发展之路的具体体现。随之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纠正科学文化领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共中央在科学和文化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建国以来，在科学文化领域，由于受到苏联在学术领域中的粗暴批评的影响，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突出表现在科学上是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在学术、文化问题上动辄打棍子、扣帽子。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需要制定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早在 1942 年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在艺术上应“推陈出新”。1951 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就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 年前后，毛泽东针对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出了“百家争鸣”。1956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十大关系时，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1956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5 月 26 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应邀向在京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经验教训，也借鉴外国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

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性和长期性的正确方针。这个方针提出后，在科学界和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使科学文化艺术界的各部门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总之，在建国后头七年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的进行和《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出版，特别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双百”方针的提出，表明我国思想和文化建设在进一步发展。

第五节　国防建设与和平外交的成就

一、国防建设的初步开展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并开始实施建设现代化国防的任务。

首先，建立国防体制。在国防领导体制上，《共同纲领》规定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1949年10月，国家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为主席，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方勤务部。中央军委下辖各野战军（1950年6月野战军及兵团两级领导机关取消）和军区组织等。在武装力量体制上，新中国在继承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确立了解放军、公安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全国战略区域的划分及其军事工作体制上，建国初，全国划分为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东北和华北6个大军区（一级军区）和18个二级军区、24个三级军区（二、三级军区为省级军区）。各大军区领导机关，是所在战略区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机关。大军区之下的省军区及所属的军分区、人民武装部，主要任务是负责所在地区的兵役、动员和民兵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管理体制上，1951年1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兵工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任副主任，领导国防工业的创建工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由其主管兵器、坦克及航空工业局、电信工业局。

其次，着手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一是精简整编，组建新的军兵种。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总人数为550万。为了加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准备将军队总员额压缩至400万人。经过短短几个月紧张工作，全军即有100余万指战员转业、复员到地方。后由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军队精简工作被迫中止。建国时，人民解放军基本是陆军——步兵的单一结构。通过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在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部队）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学兵部队，初步实现了由单一步兵型军队向诸军兵种合成型军队的转变。这是我国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进步。二是制定条令条例，加强集中统一。中央军委从1950年起就开

始抓军队条令条例的制定工作。到 1953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纪律、队列三大共同条令（草案）先后颁发全军试行。在此期间，各军兵种也相继颁发了一批专业和勤务部门的条令、条例、教程、教范等，供部队试行。解放军通过贯彻各项条令、条例，促进了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三是开展文化教育和技术训练。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种状况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很不适应。1950 年 8 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1951 年底，中央军委决定从 1952 年起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人民解放军贯彻中央军委决定，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到 1953 年，部队中文盲半文盲由占全军总人数的 67.4%，下降为 30.2%；部队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或初中文化程度，从而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随着新军兵种的相继建立和部队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加强解放军战术技术训练日益紧迫。为此，中央军委加强了对全军军事训练的领导，确定了部队迅速而有效地掌握现代化兵器及其他战术技术的训练方针，从 1951 年起，在全军掀起了以学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热潮。此后，解放军的战术技术训练与学习文化运动相结合，促进了部队训练的深入开展。四是改建和新建军事院校。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干部的需要，1950 年 6 月，中央军委确定改建、新建一批军事院校，到 1953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先后成立。这期间，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也相继建立了初、中级军事、政治、文化和技术学校。到 1953 年底，全军院校已有 200 余所，比较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已初步形成。

除上述各项外，在此期间，还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加强全国的民兵建设。还开始进行国防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等等。

这样，建立了国家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从而统一了军事训练、条令各种制式和制度，其结果是使人民解放军初步完成了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重大历史转变。

1953 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战争结束，使中国获得了相对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条件。国内已基本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表明，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已由战争环境转入和平发展时期，转入建设轨道。这是中国国防建设环境和任务的一个根本转变。为了统一全军高级干部对军队建设方针、任务的认识，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1953 年 12 月 7 日到 1954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针，总结建国 4 年来的军事工作，对当前和今后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方针、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会议确定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将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为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奋斗。会议确定紧缩军队编制，军队的总员额为 350 万，减少军费开支，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为此要办好军事学校；要以条令的规定，把全军各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正规化；要减少国外订货，选择重点建设，依靠发展中国自身的工

业、特别是重工业来实现军队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道路；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采取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会议还就如何学习苏军经验、军队编制体制、司令部机关建设、后勤组织与建设、政治工作以及国防建设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定，会议并提出了建立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等根本制度问题。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对于统一全军思想，完成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使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1956 年 3 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状况，依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确定了新中国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坚持自卫立场和后发制人的原则，是维护和平、制止战争，准备以持久战取胜的方针。人民解放军常备不懈的重点，应当是应付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根据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定和要求，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和指示，1953 年后，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逐步展开。首先就是进一步调整了国防体制。1954 年 9 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并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隶属于国务院），由国家主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时规定由国务院领导武装力量建设。9 月 28 日，中共中央重新成立军事委员会，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仍简称中央军委）领导整个军事工作，原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随之撤销。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到 1955 年春，中央军委之下的"三总部"体制调整为"八总部"体制；全国战略区的划分也由 6 大军区调整为 13 个军区。国防体制的调整，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组织领导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军队建设全面展开。一是再次精简整编，紧缩编制，裁减冗员，各部队实行严格的定额、定型、定员。1955 年与 1952 年相比，全军总兵力精简了 23.3%，其中陆军精简了 29%。二是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三大制度，这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兵役法》，从 1955 年起，人民解放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取代长期实行的志愿兵役制。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保证了部队兵员的定期轮换，同时为国家储备大量后备兵员，为战时动员奠定雄厚的基础。1954 年 11 月，国防部决定从翌年 1 月起，全军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实行薪金制，提高了军官的物质生活待遇，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对于鼓励军官积极上进，安心部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1955 年 7 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并在《兵役法》中作出军衔等级规定。军衔制的实行，对保证军官质量，保持军队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加强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具有重大作用。此外，国家还建立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制度等。1955 年 9 月 23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并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以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三大制度的实行，激励着全军官兵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努力。三是调整、增建军事院校。到1955年，军队院校已达253所。中央军委根据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逐步撤销其中大部分文化、预备学校，增建指挥、政治院校。四是开始正规化军事训练。全国军事高于会议后，训练被置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全军转入了统一的正规化军事训练，掀起了持续的群众性的练兵热潮。1955年冬，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地区组织的首次规模宏大的陆、海、空军协同抗登陆战役演习，取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军事训练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均已达到较高水平。除以上所述外，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工作、后勤建设以及在东南沿海地区打击美蒋袭扰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民兵建设实行民兵工作与预备役工作合而为一。195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强调“民兵制度必须保留，绝不能取消”。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改进兵役工作，将民兵与预备役合而为一，即服预备役的公民就要参加民兵，民兵就是预备役，民兵工作就是预备役工作。也就是说，中国实行的义务兵役制，其预备役的组织形式就是中国既有的民兵组织。民兵与预备役合而为一，比较符合中国广大群众的习惯，工作也简便易行。这一制度的初步实践，使民兵组织得到了加强，预备役工作也有了较大的改进。

国防物质技术基础建设迅速发展。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国家陆续批准开工建设的大中型国防科技工业项目共100多个。随着这批重点建设项目的不断建成，国产的机枪、火炮、坦克、飞机以及相应的弹药和配套装备器材，不断装备到部队，很快实现了军队装备制式化。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发展以战略导弹和原子弹（简称“两弹”）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尖端技术。在大力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国家也加速了国防工程、国防交通、国防通信等基本设施建设。到1956年，东南沿海地区建筑永久性国防工事施工全面展开并取得重大进展。在此期间，一批海军基地、码头及海岸炮阵地相继建成。空军在全国的机场网、尤其是在福建地区机场的建设发展很快。中国国防交通网的建设，也已着手组织进行，重点在西北、西南、东南地区修筑了一批深具国防和经济意义的干线铁路和公路。中国的邮电通信事业发展迅速，到1957年，电信线路长度比1952年增长了137.4%，并基本实现了乡乡通邮，这就为国防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和平外交的重大成就

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国政府在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的形势开始趋于缓和。但是，美国政府并未认真履行停战协定，不但未从南朝鲜撤退军队，反而于1953年8月同大韩民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此作为美国长期赖在南朝鲜的依据。同时，美国的舰队继续游弋于台湾海峡，

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还企图进一步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为了和平解决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向全世界宣告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新中国阴谋的破产。

我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共中央确定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针是："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在会上，周恩来全面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谴责了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未能就第一项议程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

5月8日，日内瓦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苏联、越南代表团始终坚持和平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针，而美国代表团则极力阻挠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5月初，越南人民军在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下，组织实施的反对法国侵略军的奠边府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经过我国代表团积极的外交活动，争取了与会的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挫败了美国的阴谋破坏，终于在7月21日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从而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8年的殖民战争，进一步缓和了亚洲及世界的紧张局势。

为了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同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作为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应邀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此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后，美国坚持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以此使美国武装侵占台湾合法化，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2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严正声明，反对美蒋条约，宣告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5国总理发起，共有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参加的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即有名的万隆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确定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召开的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共同讨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

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干扰破坏及与会国之间的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加强团结合作。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代表团这种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态度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赞扬，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会议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亚非会议所显示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精神，被人们誉为“万隆精神”。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建立了联系，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周恩来还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声明导致中国与美国从 1955 年 8 月开始的大使级会议。

从 1953 年以来，我国同苏联等国的友好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3 年 11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率代表团访问我国。1954 年 7 月下旬，周恩来总理相继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四国。9 月底到 10 月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中苏经过会谈发表了联合宣言。会谈商定：苏联军队从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基地设备无偿移交中国；决定将 1950 年和 1951 年中苏联合创办的四个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股份价值由中国以供货方式数年内偿还；决定联合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等。双方还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给予中国 5.2 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当时，中国也曾给予朝鲜、越南各 8 亿元人民币的赠款。

我国在外交战线上的重大成就，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四章　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6年，随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照抄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另辟新径，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课题。建国头几年，我国经济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的，这是因为：第一，新中国是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一开始就面临着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紧张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加紧对我国的封锁，新中国为了生存与安全不得不与苏联结盟。第二，建国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虽然兴建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工业项目，但当时我国农业仍占主要地位，怎样才能把我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工业化国家？客观的现实要求中国必须选择一条既有利于实行高积累，又有利于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才投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体制。而这种体制只能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三，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只能根据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以及苏联的建设经验来建设新中国。这种做法当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渐渐地暴露出它不适应中国国情的一面。中国是一个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对此估计不足因而在“一五”计划后期出现了问题。比如：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增加过多，信贷增长过快，财政收支、物资供需和银行信贷失去平衡，出现了财政赤字，造成市场紧张、物资短缺，引起人民不满。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地注视着这些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了要“以苏为鉴”的思想，1956年初，又开始调查研究。这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有6年多的实践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大震动。同时苏联在建设实践中也暴露出弊端，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发展十分缓慢。赫鲁晓夫当政后，虽提出一些加强农业的措施，但收效不大，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把地方卡得死死的，在肃反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等。这些情况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由此，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也就更加明确了。

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参加了这些汇报会。这是建国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又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归纳为十大关系问题，并在4月25日举行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随后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十大关系是指：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

（一）指出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批评了苏联和斯大林。这些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产业结构一贯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农业过轻。苏联从1928年冬开始“一五”计划时，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后来长期片面注重重工业，导致产业结构很不合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比例失调，大大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

第二，国家把农民挖得太苦。苏联集体农庄建立后，国家通过义务交售和实物支付的方式无偿地拿走农庄很大一部分产品。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国家又用扩大剪刀差的办法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农业生产也大受影响。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只有8250万吨，低于沙皇时代1913年的8600万吨。毛泽东针对苏联农业倒退的情况，尖锐地提出：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怎么说呢？

第三，苏联在30年代形成了以中央部门管理为主，实行统一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统得过死。这样的体制，一切权力集中到中央，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毛泽东对此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

也没有。

第四，斯大林使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很不正常，导致国内民族关系紧张。毛泽东提出，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

第五，毛泽东批评了苏联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做法。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另外，毛泽东还批评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指出，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毛泽东批评苏联的错误，其目的是要中国避免犯类似的错误，这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道路的思想。

（二）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这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以便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毛泽东强调如下三点：

第一，在国内必须处理好党与非党的关系，以及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等，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明确宣布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而要实行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充分肯定过去镇反、肃反必要性的前提下，同时提出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用正确的政策，改造了不少反革命分子，这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利的。在处理党内矛盾方面，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第二，对外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这里关键是在如何对待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问题上，他不是简单地排斥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他认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又说，我们恨美国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他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一切照搬。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的经验，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在产业结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他认为重工业应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但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少些慢些，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

的多些快些。苏联是采取前一种方法，而中国必须采取后一种方法。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条同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在消费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处理好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处理好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因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他指出，在处理国家和生产单位的关系方面，要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利益，在统一领导下，要给基层单位一定的独立性。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在管理体制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他认为，地方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因此必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些论述已经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力图突破苏联模式，开始提出了一套在今天看来仍然比较正确的做法。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准备。它提出的一些原则对当时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极大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也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中共“八大”的召开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二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并且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对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认真总结从“七大”以来的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蓝图。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苏共“二十大”之后，1956年6月波兰的波兹南等地发生骚动，工人罢工，群众示威游行，要求苏军撤出波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些不安定的迹象。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中共中央意识到，要巩固和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避免重犯苏联、东欧国家的错误，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共“八大”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国外59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应邀列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代表们围绕上述报告，对党的各

项工作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的建议》。

这次大会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提出和初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一）明确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战略目标。

“八大”分析了我国形势的新变化，认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它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据此，“八大”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八大”制定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规划，这就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等能够保证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在“八大”党章的总纲中，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国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

（二）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

1956年春，在经济建设中曾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贪多图快的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陈云等及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对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党的“八大”肯定了这一方针，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所谓综合平衡，包括农业和工业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平衡、积累和消费的平衡，以及工业内部的平衡等。“八大”根据综合平衡的原则，明确提出，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并且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以及使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等方针。1957年1月，陈云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又指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国家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必须注意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物资供需的平衡和银行信贷的平衡。这些思想对防止社会主义建设中容易出现的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偏向具有重要意义。

（三）初步探索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时候，陈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经济运

行的调节问题以及市场问题作了探索。在“八大”的发言中，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陈云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但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这些论点，在“八大”上得到了肯定。周恩来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这将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此外，“八大”还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事业、企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同时规定，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

根据“八大”关于改进体制的决策，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这3个文件，于11月8日由国务院公布施行，中心思想是扩大地方的权力。这些改革，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但对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缺口。

（四）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八大”根据形势的新变化，提出要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主要是：(1)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八大”指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督促的办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2) 健全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秩序。“八大”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受到国家保护。(3) 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行政管理职权，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

（五）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八大"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群众路线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提出的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六）确定了发展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

"八大"指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需要，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大力帮助各类研究机构，以实现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同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力增加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数量；逐步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并且在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适合需要的文化教育和技术、业务教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坚决杜绝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不适当的干预。

总之，"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它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提出的许多新方针、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对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创立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矛盾的学说；列宁敏感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将发生变化，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要逐渐转向经济方面，并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斯大林却长期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 1952 年，他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仍然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毛泽东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上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后来经过整理、修改、补充，于 1957 年 6 月 19 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公开发表）。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56 年是个多事之秋。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之

后，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是指波兰的波兹南于1956年6月28日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匈牙利事件是指1956年10月到11月在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动。这些事件表明，能不能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存亡的问题。

在国内，也接连出现了一些闹事事件。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间，全国发生了数十起共约1万多工人罢工、请愿事件。有几十个城市发生1万多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也发生了闹退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哄闹等事件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10多万户。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它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矛盾，能否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关系到能否顺利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的大问题。

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事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认真对待、冷静观察的态度，并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整个形势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同时又指出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文章还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更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概括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波匈事件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波匈事件的教训。毛泽东认为，匈牙利党的错误，就在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同时对国内出现的问题，也作了客观分析。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指出，“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是反革命。”毛泽东的这些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正是基于这种正确的分析，他才能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贡献，在于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这一学说的基本点是：

(1) 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不但有各种矛盾，而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2)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改革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用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不一样，它虽有矛盾一面但基本上是适应的，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3)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当时在我国，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指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4) 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指出，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可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5) 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并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政策。如，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和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各民族关系上采取各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6)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因此，所谓工业化道路决不只是工业本身问题，它还反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只

有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中国的工业化才能胜利实现。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虽有矛盾的一面，但基本上是适应的，因此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调整得到解决，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它为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是当时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在实际进程中又搅在一起了。

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从此，一场全党整风运动在全国逐步展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动一场整风运动呢？首先，整风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便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这个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整风就是根据这一方针进行的，它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正如《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其次整风是因为党的地位和任务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沾染官僚主义的习气，形成了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建国后几年来，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党整风。第三，整风是为避免中国也出现类似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中国共产党认为，波匈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说匈牙利的错误就在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刘少奇也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可见波匈事件的影响也对党整风起了作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波匈事件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决定明年开展全党整风，现在就要进行酝酿和准备。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其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使党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

整风首先从党和政府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领导机关以及大的厂矿、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开始。主要是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采用召开座谈会、小组会或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并且在进行批评的时候，或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鼓励放手的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展开批评。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初至6月初，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组、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在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放肆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轮流坐庄”，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极少数右派借“鸣”“放”之机向党和人民政府发动猖狂进攻，是中共中央没有预料到的。本来，中共中央不主张搞“大鸣”“大放”，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对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地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5月19日，北京大学最早在校园内张贴大字报。中共中央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这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迅速地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蔓延开来，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并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这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和部署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认为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派分子的言论极为猖狂。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为反击右派做舆论准备。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的党委积极反击右派的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种种现象。这个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此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由整风转向反右派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不打

退右派的进攻，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当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坚决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批判这股思潮，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中央《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强调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斗争的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是，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次反右派斗争，全国共划出右派分子55.28万人，除极少数是右派外，大多数是错划的。同时，对右派性质的判定，开始认为是人民内部的左、中、右，后来判断为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就从数量和性质两方面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呢？

第一，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基本国情认识不够清醒。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当时党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对基本国情认识不清醒，因此，一当新情况出现，就背离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又走上对敌斗争的熟路，并在实践中，把一些符合实际的正确意见，看作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认识也不够清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认识不够深刻。没有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虽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在处理这种阶级斗争时，应该主要依靠法制，而不应当采用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这是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及后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的认识根源。

第二，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形势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在1957年5月以前，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他把匈牙利事件后国内出现的一些风波比喻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是，5月以后，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右派是"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对形势的估计又有发展，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对右派人数的估计，也不断地扩大。6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时认为，"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6月29日，毛泽东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有4000人，但10天后新的估计便翻了一番，认为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全国大约有8000人。到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2000多人，同

时估计全国右派分子大约 15 万人，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实际划右派分子 55 万多人。这表明，对右派的情况没有一个准确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这自然会犯扩大化的错误。

第三，反右派斗争方法不对。在反右派运动中不恰当地采用了“大鸣大放”的办法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取得政权之后，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大不相同的。在取得政权前，斗争主要形式是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但是在取得政权后，政权成为进行阶级斗争强有力的武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应该依据法制来进行。然而由于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使党的各级领导还是走上了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的熟路，把当时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这就很容易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第四，没有及时地制定和下达划分右派的标准。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对于什么是右派，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说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之所以把他们叫做右派而不叫反革命，“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由于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反右派运动前期主要是根据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来划的。这六条标准都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执行起来不易掌握。直到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中央才发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这些规定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再加上这一标准没有传达到基层，各单位仍然按照六条政治标准划分右派，因此势必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它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造成了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特别是因为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是错划的，这就打击了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员干部，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使他们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另一方面，就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动摇和修改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判断的作出，很快中断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党和国家长期陷人阶级斗争扩大化误区，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与“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共中央认为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试图再次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认为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党内有两方面的情况影响着对这个问题的继续探索。一是对形势的估计：一方面对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如前所述，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提法与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要求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也难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并将导致党用阶级斗争和搞政治运动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过于乐观。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在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社会主义也占了压倒优势。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钢产量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年第一季度工农业生产获得高速发展，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6%的情况，使毛泽东等人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这种估计导致在建设速度上犯急于求成的错误。

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实质是速度）上认识有分歧。1956年初，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现象，为此《人民日报》于1956年6月20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开始反冒进。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满意的。接着，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了一场争论。毛泽东认为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周恩来和许多人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1957年预算应该压低一点。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讨论1957年的计划和预算时，周恩来提出1957年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家的赞同。这次会议正确地调整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从而保证了1957年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和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的形势，使毛泽东更加认为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的做法，说反冒进扫

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后来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步步升级，说反冒进是政治错误，甚至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把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法、两条方针、两条路线的分歧。在1958年1月党中央先后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再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在3月8日—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在这场争论中，主张反冒进的正确意见是坚持和发展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而批判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把建设速度上的争论看成是政治路线问题，则助长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给进一步探索蒙上阴影。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并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谭震林作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这条总路线是在建国后八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他说，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就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经过1956—1958年经济发展的实践，最终形成了这条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条总路线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充分体现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它肯定了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它的提出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需要，它继承了前一阶段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继续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坚持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这些都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它的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宣传和实践中，不恰当地强调了“快”。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在一定条件下，强调速度，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较快的速度，但是速度不能太快，强调速度的同时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在中共“八大”上提出过这种看法。可是在总路线贯彻中却忽视了这一

点，并且不恰当地把力求按综合平衡的要求办事当作消极平衡而加以批判，认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这就导致了后来不顾客观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做法。在发展生产力的具体措施上也有严重的缺陷。它一面规定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经济建设；一面又错误地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它说的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继续完成经济战线上的革命，实际上是要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彻底消灭私营经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使公有制经济变成我国唯一的经济成份。它说的要执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实现全国的工业化，但实际上是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这必然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搞经济建设并在生产关系上求大求纯，以及全民大炼钢铁等“左”的倾向和做法。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包含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但是由于总路线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提出来的，加上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远未认识清楚，这就很难避免严重的失误。

“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宣传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热潮。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党的路线已经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

二、“大跃进”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企图在总路线的指引下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尝试。实践的结果，不但没有“大跃进”，相反却导致了挫折，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自从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尽快地巩固社会主义？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无时不希望颠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如果中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安全就不能保证；从国内说，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薄弱的，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不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因此有必要在生产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当时中国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195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发动“大跃进”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方面，有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指出，苏联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和1957年11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苏联人造卫星上了天，宣告了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最有

说服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莫斯科会议表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共产主义力量空前强大和空前团结。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胜过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7 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指标的 21%，比 1952 年工业增长了 128.6%。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生铁 590 万吨、煤 1.3 亿吨、发电量 193 亿度。这表明“加快建设速度的条件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完全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做法。这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运动首先从农业开始。1957 年 9、10 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农业在 12 年内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首先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紧接着在全国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运动。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的口号。随后，又不断地提高和修改粮食生产计划指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并引发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 年 6 月 8 日，报纸率先报道了河南省遂平县放出的小麦亩产 1052.5 公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亩产高达 4292.5 公斤，水稻亩产高达 65217 公斤。《人民日报》还曾报道了一个高产典型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计划发射“高产卫星”，一亩红薯 60 万公斤、一棵白菜 250 公斤、小麦一亩 10 万公斤，亩产皮棉 2500 公斤。由于各地“卫星”上天，使人们的头脑更不冷静了。7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丰收说明了什么》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后来又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粮棉产量指标也就越订越高。1956 年“八大”建议“二五”计划末 1962 年粮食产量为 2500 亿公斤，棉花产量 4 800 万担，而 8 月北戴河会议建议，1962 年粮食产量 7 500 亿公斤，棉花产量 15000 万担，严重脱离了实际。

1958 年 8 月以后，“大跃进”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认为 1958 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我国粮食产量比 1957 年增产--倍以上。按全国平均每人 750 公斤至 1 000 公斤计算，1958 年就有一部分省（区）接近或达到这个水平。这就是说，中国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应该由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对工业的领导；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 1958 年生产 1 070 万吨钢，即比 1957 年的产量 535 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这个决定和号召，把工业大跃进推向高潮。截止 8 月底，全国钢产量只完成 450 万吨，剩下 4 个月需生产 620 万吨，为了达到这个指标，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5 日又发表了《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号召全国上下一切部门为生产 1070 万吨钢“停车让路”，于是以“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全民炼钢运动迅速掀起。到 12 月就超额完成任

务，《人民日报》以《一零七零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的套红通栏标题，进行报道宣传。但实际上有300多万吨是土钢，基本上不能使用，合格的钢产量不足800万吨，还不到原计划的3/4。

应当肯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希望在较短时间内，使国家富强起来，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要巩固和发展，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当时，尽最大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大跃进，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如在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工业及内地工业等方面。但是"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加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相反却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统计，我国农业、轻工业生产1959、1960两年连续大幅度下降，只有重工业在冒进。1960年与1957年比，农业比重由43.3%下降到21.8%，轻工业由31.2%下降到26.1%，而重工业则由25.5%增至52.1%，人民生活则出现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

"大跃进"运动所以导致失败，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首先"大跃进"运动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对冒进思想在建设中可能具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广大人民在革命胜利后迫切希望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头脑是冷静的，作风是谦虚的。从1954年起，他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步骤作了反复的考虑。1954年6月，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又把50年扩大为50年至75年，就是10个五年计划至15个五年计划。但是，随着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毛泽东和许多中央与地方的领导干部开始骄傲起来，他们觉得完全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偏离了原有的设想，主张发动"大跃进"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由于"大跃进"运动背离了"八大"正确的综合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实践又一次走向了本来愿望的反面。

其次，"大跃进"运动说明企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快速发展生产力是不切合实际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冲破这种体制，要实现较快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用群众运动的方法也不能实现生产的高速发展。过去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曾广泛地运用了群众运动的方法，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于打仗，不同于土改，它有自身的规律，如果不遵守这些经济规律，只依靠群众运动，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搞乱经济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不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单凭主观意志搞群众运动所造成的。

再次，盲目追求高速度，破坏了经济的稳步和协调发展。"大跃进"是在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发起的，因此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1958年南宁会议错误地提出“真正的左比右好”的观点。当时，所谓“左”或右是根据指标来划分的。人们害怕自己右了，只好不断提高指标，如钢产量赶英国的时间，由原来的15年左右缩短为7年，后又缩短为2、3年。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才算大跃进，当时并没有统一标准，加上在速度问题上互相攀比，人们的头脑越来越热，指标越提越高，恨不得一个早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事实上这种超越客观历史阶段和实际可能的做法只能损害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深刻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但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实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这是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不但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人民公社化运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提出“小社并大社”的观点。他在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3月20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和耕作机械化。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很多不便。所以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也是必要的。当时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1000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陆定一在会议发言中讲到，毛泽东和刘少奇曾设想几十年后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研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初步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7月1日，《红旗》杂志刊登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传达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设想。文章中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人民公社的名称。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陈伯达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中传达毛泽东的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

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根据《红旗》杂志所登毛泽东的这两段话，建立起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其它各县也都开始试办人民公社。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农村时，对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大加赞扬，说“人民公社名字好”。他还概括人民公社的特点为：“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时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此，“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转成直接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2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论，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于是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中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

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迅猛，仅在二个月内，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据9月底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已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4个省区即将基本实现公社化，云南省计划在10月底完成。据1958年11月27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月底，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为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有1.2亿户，占总数的99.1%。农村人民公社化基本完成。

当时所以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客观依据是所谓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大跃进和亿万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以及较小规模的合作社阻碍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等。其实，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还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根源。

这主要是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在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其标准是，消灭剥削、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于是1958年，我国也制定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其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彻底解决衣食住问题、实现6小时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及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这些标准与苏联相比虽有差别，大体上是一致的，而其中最根本一条，就是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由此出发，建成社会主义首要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建立后，就要设法使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认识：一是容易导致把生产力排除在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之外，仅仅注重所有制，以为只要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建成了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二是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进行生产关系的过渡，认为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就越是社会主义。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本来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已经搞得过急过粗了，改造后还没来得及巩固，又要建立一种更高的所有制形式，这是完全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错误的实践。人民公社最突出的特点叫做一大二公，实际是搞“一平二调”，具体说：

（一）规模大。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规定，“社

的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为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适宜。”实际上，这个规定没有执行。在初期的人民公社，大多是几乡一社，平均规模为4797户，2万户以上的特大社，全国就有51个。公社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都集中到公社。当时认为：“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

（二）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来的几十个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合作社合到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为了保证公有化程度，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收归集体所有，家庭副业、小商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都被取消。当时认为，“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都可以逐步搞掉。”

（三）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主要是指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在当时被说成是按需分配的因素。此外，还有些公社实行基本生活资料如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供给制，更有少数公社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学、育、婚、乐全由公社包干的办法。工资制从理论上讲是一种按劳分配。1959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建议，人民公社分配收入，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各占一半。但实际上，由于收入低，绝大多数公社除了保障社员按低标准吃粮外，发不了工资。因此基本上就是“吃大锅饭。”

（四）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所谓组织军事化，就是组织工厂化、军队化，就是说公社的劳动组织，应当像工厂、军队那样地有组织有纪律。人民公社的各级生产组织中，建立相应的民兵组织，按团、营、排、班编制，实现全民皆兵。所谓行动战斗化，就是像打仗一样，实行大兵团作战，搞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组织者，也是生活的组织者。人民公社普遍兴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生活。

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质就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这只能是一种超越阶段的空想，它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大大地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理想庸俗化，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二是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1960年比1959年又下降16.2%，结果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这也助长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是：

第一，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通过人民公社形式，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所以，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这样就把人民公社直接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导致“共产风”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片面求大、求

公、求纯，以为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当时有的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山东范县等甚至提出了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和规划。这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认为可以试验。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缺乏了解，以为只要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中国共产党便宣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事业，任何超越这一历史阶段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58年以来，人民公社实行“穷过渡”，其结果从1958年至1978年20年间，我国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60元左右，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在600元左右，人民生活改善甚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人民共同富裕了，生活极大地改善了，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第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平均主义大泛滥，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误认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而等级制、工资制度，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废除。这就大大地助长了平均主义的发展，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又一次严重失误，它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在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或者说有许多错误的认识，但这次失误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节　纠正“左”倾错误的开始　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一、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先后发现在大办人民公社中出了乱子，并认为党内有不少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主要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自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连续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以及八届七中全会，重点讨论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通过这一系列会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党对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并提出一些正确的思想。

第一，关于所有制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混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区别。针对这个问题，第一次郑州会议明确指出，目前人民公社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渡。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充分体现了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成果，并且有所发展。决议指出，“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到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会上，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他认为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

第二，关于高指标问题。高指标是“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赶美超英”的号召下，指标一再提高，严重脱离了实际，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率先冷静下来，在议论到钢铁指标“十年规划”时，他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不去赶美国，只去超英国。在武昌会议上，虽然毛泽东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但由于仍未摆脱高估产的迷误，所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除基建投资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钢产量由原定的2700万到3000万吨降为1800万到20007/吨，粮食提高到1万亿斤外，其他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要求在1959年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1959年1月，国家计委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方案作了调整，部分工业指标降了下来。4月的上海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决定钢由1800万吨改为1650万吨，其他指标也有所降低。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又委托陈云对钢铁指标进行研究，5月，陈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提出了1959年钢产量1300万吨的数字，得到中央赞同。6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发出了《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指出，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完成得不好，主要原因是原来的生产指标定得偏高，超过了客观可能，因此必须按照生产的客观可能对原定物资分配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次调整提出的一套指标虽然仍是高指标，但已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第三，关于“共产风”问题。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其主要表现为穷富拉平，无偿调拨。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许多领导干部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分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

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在随后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规定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具体措施，要求在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物资、劳力等项的账要算，而且要退赔。"共产风"势头基本得到控制。

第四，关于农轻重比例关系问题。"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及其后果，引起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新思考，这里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1958年11月，他号召中央、省自治区、地委、县委四级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在读书谈话中，他批评了苏联的做法，毛泽东说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后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这体现了一条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陈伯达等人提出废除商品，取消货币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后来，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作了详细的阐述，其要点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两种所有制的存在，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区别，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并且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但是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均主义盛行。针对这一点，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1959年3月30日，

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文件中说，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第七，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自“八大”以来，中央多次进行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1958 年 4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决定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作如下改变：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开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然归中央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后来，中央又通过一系列决定，进一步下放了人权、财权、商权、工权。适当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因此中央决定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上收一部分下放得不适当的企业。1959 年 3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企业隶属关系的通知》，决定将有关全局性的 34 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4 月国务院又发出通知，批准 21 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24 个企业原由地方管理改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到 1961 年，中央决定把 1958 年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各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一律收回。这样，以下放企业管理权为中心内容的体制改革的工作又以上收企业管理权而告结束。

此次纠“左”，对抑制“共产风”、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提出了不少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思想。但是，这次纠“左”是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左”倾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是很不彻底的，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二、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1958 年 6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98 次会议决定，为了适应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以便及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决定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 1959 年 1 月召开，第二届人大代表在 1958 年 10 月底以前选出。但是，由于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需要根据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编制，1959 年 1 月 2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03 次会议决定，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改于 1959 年 4 月召开。

1959 年 4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1226 人，其中女代表 150 人，占代表总数的 12.2%，少数民族代表 179 人，占代表总数的 14.6%。大会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的《关于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作的《关于 1958 年国家决算和 1959 年国家预

算草案的报告》，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代表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决议。28日，大会闭幕。

这次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完成了下述几项任务：

（一）制定了1959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大会批准了根据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除对基本建设投资又作调整，从360亿元降为260亿至280亿元外，其他高指标大都未变。钢产量仍为1 800万吨，煤3.8亿吨。计划规定1959年的工业总产值将比1958年的2050亿元增长40%，达到2 870亿元，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共1092个。为保证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1959年的铁路货运量要比1958年的38000万吨增长36%，达到52000万吨。此外，商业、文化教育事业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指标。很显然，这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

（二）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

大会根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程潜、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何香凝、刘伯承、林枫为副委员长；选举谢觉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大会通过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为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兼国务院秘书长。同时还任命了各部、委的部长及主任。

（三）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阴谋叛乱，并武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拉萨的机关。3月19日夜间，叛匪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了。3月20日上午10时，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平叛，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1959年4月28日，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决议同意国务院对于平息西藏叛乱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并且严正申明，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平定西藏的叛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决议指出，“在西藏地区，贯彻和实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由广大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当家作主的民族区域自治，贯彻和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主改革，并且依靠各族劳动人民兄弟般的团结和互助，

建立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不移的方针。”

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维汉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全体政协委员还列席了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它报告，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彭真、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陈嘉庚、包尔汉、陈毅、康生、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席。

三、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

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2日至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从会议内容看，又可分为前期和后期。7月2日至22日为庐山会议前期，主要是继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从7月23日至8月16日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议的方向急转直下，变为进行反右倾斗争。

经过一个阶段经济工作中的纠“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逐步得到了解决，形势已经好转，但是，对纠“左”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同时研究若干具体政策，以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负责同志，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的工交、财贸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需要讨论的19个问题，即：(1) 读书；(2) 形势；(3) 今年的任务；(4) 明年的任务；(5) 4年的任务；(6) 宣传问题；(7) 综合平衡问题；(8) 群众路线问题；(9) 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10) 体制问题；(11) 协作区关系问题；(12) 公社食堂问题；(13) 学会过日子问题；(14) 三定政策；(15) 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 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 团结问题；(19) 国际问题。这些都是“大跃进”一年来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对此作了说明。他认为当前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了“大跃进”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等等；另一方面他又继续肯定了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肯定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表明“左”的思想还严重地存在着。

从7月3日起，会议围绕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组讨论，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但是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与会者出现明显的分歧。第一，对“大跃进”所造成的形势怎么估计？到底成绩有多大，问题有多严重？第二，对8个月来纠正“左”倾错误怎么评价？是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还是改正得不够？第三，当前的任务是继续努力纠“左”，还是转向反对右倾保守？一些同志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

要求继续纠“左”；另一些人则认为一味地纠“左”会使干部群众泄气，要求反对右倾保守。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以上小范围会议，又一次谈了形势问题，批评了党内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观点。他说，对去年的一些缺点要承认，但从全局来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与9个指头，或3个指头与7个指头，最多是3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又说，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他建议会议到15日结束。

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会议没有解决存在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左”的错误感到非常忧虑。他认为，这些问题如果由他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思想混乱，如果由毛泽东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于是，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建议系统地总结一下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成绩和教训。

彭德怀的信分为甲、乙两个部分。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的。在这部分中，彭德怀列举了国民经济增长数字，并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人民公社，他也肯定了其伟大意义，认为它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对全民炼钢，认为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但是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因此，也是有失有得的。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这部分，彭德怀着重指出“大跃进”的错误，虽然表现在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但就其性质来说，“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他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还说，纠正“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与会同志讨论。大家根据自己的认识谈了对信的看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发言中先后支持了彭德怀的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尖锐批评了彭德怀的信。7月26日，毛泽东又根据原国家计委干部李云仲给他的信，写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指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从此之后，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形势急转直下，一场“反右倾”的风猛烈地刮了起来。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主要议程是：检查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任务；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全会开始时，毛泽东作了讲话，他说，“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8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认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了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8、9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组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人民公社运动，而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和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认为他们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庐山会议转向反右倾并不偶然。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为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并认为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政策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形势已经发展到右倾成为主要问题。而彭德怀则强调总结经验教训，并认为只有根本转变“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才能避免今后继续或者重犯“左”的错误，在这点上，毛泽东与彭德怀是很不一致的。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又把彭德怀等的意见和当时国际背景联系起来。当时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逆流，赫鲁晓夫也公开攻击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便认为彭德怀的信同他前不久访问苏联，会晤赫鲁晓夫有关，以为彭德怀是想借纠“左”之机否定“三面红旗”，是在向他“挑战”，因此下决心要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

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和“反右倾”运动，　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一，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把反右派斗争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这就埋

下了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党内的种子，这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第二，严重损害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庐山会议后，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有一大批干部和党员受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极大地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这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是个重大的损失。

第三，中断了纠“左”的过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纠“左”过程完全中断，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严重发展起来，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按照继续“大跃进”的目标，1960年，计划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3000亿公斤。同时，又把前一阶段出现的“包产到户”、“地段责任制”等做法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幽灵，是要把人们拖回到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单干户的老路上去”，“一平二调”又重新泛起，其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庐山会议的教训说明，反对错误倾向要实事求是，要弄清一定时期内客观存在的错误倾向是什么，从而做到有什么错误就纠正什么错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如果把正确意见当作错误倾向去反，只能越反越错，1957年后我国的主要危险是“左”而不是右，庐山会议却大反右倾，这就使早已存在的“左”倾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有了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 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建设道路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与“八字”方针的制定

一、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主要是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建设合同的影响，到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国家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第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首先，以钢为纲的“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主要是农轻重比例失调。由于重工业发展过急，严重挤压了农业和轻工业。1957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2.33倍，轻工业只增长47%，农业却下降了22.8%，其中粮食产量下降了26.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从1957年至1960年，农业所占比重，由43.3%猛降到21.8%，轻工业从31.2%降为26.1%，而重工业则从25.5%猛增至52.1%。

其次，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钢产量指标，造成了重工业内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关系上，从1958年至1960年，我国生铁产量增加3.6倍，铁矿石产量增加4.8倍，煤炭产量增加了2倍多，但同期全国货运量仅增加1.1倍，大大落后于需要。铁路系统只好靠超载多拉和农村劳力突击短途运输。尽管如此，1960年仍有30%的铁矿石和2000万吨煤炭无法运出产区。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来看，3年“大跃进”中，重工业投资在工业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55%—57%之间，轻工业所占的比重除1958年高于1957年外，其余两年均低于1957年水平。由于轻工业建设缓慢，特别是农业原料减少，致使轻工业产品产量下降。“一五”时期轻重工业产值比例大体为3:2，而“大跃

进”期间轻重工业产值比例却大体成为1:2。

再次，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1958年到1960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亿元，同期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246亿元，新增加的国民收入的80%，用于投资，各年的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和39.6%，大大超过“一五”计划的平均积累率24.2%。另一方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1958年至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达1007.4亿元，比“一五”时期5年总额588.47亿元还多71%。高投资并没有带来高效益。基建周期长，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低。

第二，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下降。

196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2065亿元，只达到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所规定的高指标的69.3%。其中工业总产值是1 650亿元，而农业总产值只有415亿元，比1957年下降22.8%。农业方面，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1960年，粮食实产1435亿公斤，比1957年的1 950.5亿公斤减少了26%以上，甚至低于1951年的1437亿公斤的水平；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43.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数7336万头，比1957年的8 382万头减少了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农业减产，又直接影响到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生产。1960年轻工业产值550亿元，比1959年减少9%，与1957年比较，棉纱产量下降36%，食糖等某些轻工业产品下降了60%。只有重工业孤军冒进，1960年重工业产值110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2.3倍。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农业轻工业生产下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首先是出现全国性粮、棉、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一方面是农业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不得不采用高征购的办法。1958年征购587.5亿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29.4%，1959年征购674亿公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9.7%，1960年征购510.5亿公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5.6%。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动用库存粮食，1960年底粮食库存量降到286.5亿公斤，比1955年的402亿公斤减少了29%。农业大幅度减产，粮食库存减少，这就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大种瓜菜”以弥补口粮不足。至于食油、肉类、禽、蛋等副食品的供应，比粮食消费更紧张。据统计，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降为1960年的163.5公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2.4公斤降为1960年的1.85公斤，下降了23%；猪肉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5.1公斤降为1960年的1.55公斤，下降了70%。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许多地区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人口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这说明人民的生活已处在严重困难之中。

其次是通货膨胀，商品供应短缺。“大跃进”期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增

加过多，造成财政连年赤字。1958—1960年财政赤字合计高达169.4亿元，为财政收入的11.7%。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只好多发货币。1960年货币流通量为96亿元，比1957年多出43亿元，增加82%，于是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购买力下降。此外，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合理分配商品，只好采取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肉蛋糖等按户凭证供应，一些日用品凭工业券购买，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

造成国民经济困难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也有苏联领导集团背信弃义的原因。正当中国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1960年7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单方面撕毁了12个政府协议，343个合同和合同补充书，片面决定从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 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名，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带走所有援建工程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物资和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严重扰乱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

但是，从根本上说，国民经济的困难主要是由于经济建设上的“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在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唯心主义泛滥，人为地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主观地对生产关系“不断变革”，搞“穷过渡”，从而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只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来一个大的转变。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与贯彻

从1960年夏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并对三年“大跃进”运动进行反思。6月14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以及写的《十年总结》中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他还指出“大跃进”中指标过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认识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是个教训。1958年、1959年曾经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1960年的指标要加以调整。毛泽东的讲话表明，在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上，“大跃进”以来那种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做法开始有了改变。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工业等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11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人民公社实行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坚决纠正“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开始对农业进行调整。

北戴河会议后，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建议把“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但实际上，1960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贯彻下去，各项指标也没有降下来，当时还设想要在调整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这表明指导方针还没有纠正过来。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为方针是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中确定的。这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它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根据这一方针，全会强调1961年国民经济的安排，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注意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全会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从此，中国经济由“大跃进”转向大调整。

为了保证“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其主要任务，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的组织等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领导和统一安排，从各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组织建设，并按照本地区特点，规定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二是调整管理体制，规定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委三级，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各部，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必须集中力量，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八字”方针改变了“大跃进”以来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等错误做法，但对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彻底清算，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仍然认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对工业生产建设规模过大，工业发展速度太快，仍然认识不清。如全会通过的1961年计划，农业总产值为65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2310亿元，粮食为2050亿公斤，棉花为1600万公担，钢为1900万吨，煤为4.3亿吨，这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因此，要真正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必须进行调查研究，认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后果才能在指导方针上有一个较大的转变。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调整工作的初步展开

在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一切工作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认为你有很好的方针、政策，而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就等于没有。他指出，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社论指出，3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怎样掌握这些新情况，怎样才能把我们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呢？首先就需要调查研究，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各部队党委分别到基层中去，到公社、生产队、工厂、学校、商店、连队去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率先离京调查。1月21日，他派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1月26日，毛泽东乘火车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7个省委和3个调查组的汇报。3月10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由中南、华东、西南等地区有关同志参加的调查汇报会。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由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同志参加的调查汇报会议，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3月15日—23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不同意见，更不要怕推翻过去作出的决定。

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在河北，朱德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邓小平到北京郊区县等进行调查。与此同时中央又派出大批调查组赴农村调查，如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等，对农村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工业方面，国家计委、经委组织人力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城子煤矿、华北无线电厂、太原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单位调查。通过调查，基本上摸清了工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于是中央在这个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使各方面的调整工作都有章可循，调整工作有秩序地逐步展开。

首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农业生产。主要措施有：（1）对农村人民公社在所

有制关系上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规定公社对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生产队所有和支配的资金、物资不得无偿强行调用，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和小农具等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2) 在分配上取消过去实行的部分供给制的规定，严格实行评工计分和按工分配的办法，停办公共食堂。(3) 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一方面，尽量压缩农村各项事业占用的人力，挤出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另一方面，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动员一批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到 1961 年底，全国已精简职工 873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1000 万人，仅在 1960 年秋到 1961 年春，新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 2913 万人。(4) 从 1960 年开始对粮食实行超购加价和奖励办法，全国粮食平均加价 5%。1961 年提高收购价格，提价幅度为粮食 20%、油料 13%、生猪 26%、禽蛋 37%。同年 4 月还决定对棉花、油料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励政策，并把农副产品划为三类，实行不同的收购价格，以满足农民的自由贸易的要求。(5) 加强工业和其它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如 1960 和 1961 年，国家拨出钢材 151 万吨，以支援农业和农机制造，增产化肥和农药，提高农业和支农工业的投资比重等等。

其次对工业进行调整。根据 1961 年 9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调整工业的主要措施有：(1) 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去。(2) 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把过去下放过多的权力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一级，根据中央统一领导的要求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重新安排和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3) 抓住煤炭和钢铁两个主要环节进行调整，集中主要力量使煤炭生产稳步上升，使钢材品种增加，质量提高。(4) 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五定”、“五保”。“五定”指国家对企业实行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五保”指企业对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使用期限，同时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

再次，对商业也进行了初步调整。主要措施有：(1) 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减轻市场需求压力，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增强市场供应能力。到 1961 年底社会集团购买力由 1960 年的 75.4 亿元减到 49.4 亿元，同时，使日用轻工业、手工业品市场供应的紧缺局面逐步趋向缓和。(2) 国家对粮食、棉布等 18 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办法，同时对一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据统计，1961 年和 1962 年高价商品销售额共 74.5 亿元，增加财政收入 38.5 亿元。这对回笼货币起了积极作用。(3) 恢复“大跃进”以来撤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在政策上明确指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

以上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还

没有彻底纠正，高指标也没有调整下来，要实现国民经济根本好转，还必须继续进行全面调整。

第二节　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调整，十年建设的成就

一、“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各项政策的全面调整

从1960年9月“八字”方针的提出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行了一年多，但整个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重，有些方面还在进一步恶化。据统计，1961年全国农业生产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2.4%，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37.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减少12.8%，全国零售物价比上年涨了12.6%，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比1957年降低了29%，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的粮食消费量比上年减少了4.5公斤，食油消费量比上年减少了0.45公斤。1961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1 348万人，比1960年减少348万人，这表明，前一阶段的调整工作成效不大，国民经济的困难还很大。中共中央认为，调整不得力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没有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使我们丧失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但是，党内在对困难和错误的认识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一些同志对“大跃进”的挫折不服输，还想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所以迟迟不愿把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和过高的指标压缩下来；有的同志虽也认为应当大力调整，但怕被说成是否定“三面红旗”，而受批判，所以对调整采取观望态度；还有一些同志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产生了埋怨情绪。因此，要想实现进一步的调整，首先必须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为了总结经验，认清形势，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刘少奇认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报告指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加强农业战线，多生产粮棉油和经济作物，发展轻工业生产，坚决实行精兵简

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增产节约，稳定物价，整顿秩序。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指出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七千人大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因此，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只能是初步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同时，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党内高级干部对形势估计上的分歧。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是想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左”，因此主张要退够。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是有分歧的。毛泽东虽然带头纠“左”，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大跃进，他虽然同意“八字”方针，但只是把它当作克服困难的权宜之计，在他的思想深处并没有解决求快求纯的问题。林彪在会上更是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影响了调整措施的确定和贯彻。由于在七千人大会后，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所以在 1962 年 2 月 21 日—23 日，刘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指出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讲了系统的意见。根据刘少奇的建议，2 月 26 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陈云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并提出了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等克服困难的意见。陈云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赞同。3 月 18 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将这个讲话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西楼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主管经济工作，并任命陈云为组长。

中央财经小组成立后，多次举行会议，研讨经济调整问题。4 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这个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如实地指出了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严重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以讨论这个报告为中心议题的工作会议，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分别就经济形势与方针任务、农村工作问题、甄别平反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确定了进一步调整 1962 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并指出了当时全党应着重抓好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二是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切实加强农业。中央财经小组吸收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送交党中央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于5月26日发至全国贯彻执行。于是大幅度的调整国民经济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降低工业指标，调整工业措施。

中央财经小组确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至20%；其中钢产量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煤产量从2.5亿吨降为2.39亿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从59.5亿元降为46亿元。对现有的工业，下决心进行"关、停、并、转"，即有计划地保住一批工厂，缩小一批工厂，合并一批工厂，并掉一批工厂，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从而把工业生产战线和基建战线真正缩短，把力量集中起来，更好地完成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为以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据统计，到1962年10月为止，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数，从1961年初算起，共减少了4.4万个，相当于1960年底工业企业数9.6万个的45%。

第二，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

1961年曾经大力精简职工。196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196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5月27日再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把全国职工人数在1961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在1961年末的1亿200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2000万人。从1961年1月开始，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总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左右。

第三，加强财政金融管理，抑制通货膨胀。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收回几年来银行下放的一切权力，银行业务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严格信贷和现金管理。同年4月又决定严格控制财政管理，规定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按国家规定应该分得的地方财政结余、地方预备费、地方投资，由国家按年度季度统一分配。同时尽量减少财政支出，制止通货膨胀。

第四，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至少30年不变。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规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各项有关政策，同年11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政治、文化领域的调整也逐步开展。首先，调整党内外的关系。1962年3月21日，刘少奇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接着周恩来在3月27日到4月16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3月23日到4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而主要责任在中共中央。周恩来也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深受感动。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张治中即席发言，对中央领导同志自觉检讨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他说这可以充分，证明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他说，我

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他们表示愿同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其次，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这项工作自1961年6月即已开始，但有些地方和部门进度很慢。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受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到1963年，这项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三，调整了对知识分子政策。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提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重申了1956年的观点。陈毅在这两个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向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3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他强调说：“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其四，调整同各民主党派、归国侨胞、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人士关系。1962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央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要求对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被批判、追查、处分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进行甄别处理；6月14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要求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

文化上的调整是从制定科研、高教、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开始的。从1961年6月至1962年3月，先后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以及《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等。这些工作条例重点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了应该如何看待“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以及坚持“双百”方针的问题。《科研十四条》规定，要正确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高教六十条》规定，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文艺八条》规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二是明确了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科研十四条》规定，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在《文艺八条》中，对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保证创作时间也作了规定。此外，还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进行了调整，使之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1962 年 5 月 25 日，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的报告》，对在大跃进中盲目上马的学校，采取有步骤的方式下马。《报告》决定高等学校由原来的 845 所减少到 400 所，减少学生 12 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原来的 2724 所减少到 1265 所，减少学生 32 万人，中学以上各级学校教职工共精简 34 万人。

政治、文化的调整，对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保证了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但也应指出，当时中共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中共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没有说话。这不仅使这些讲话及条例的积极作用受到影响，这也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二、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国民经济经过两年的大调整，到 1963 年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农业总产值增长 11.6%，工业总产值增长 8.5%，财政收支平衡，且略有节余，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还要不要继续调整？“八字”方针要不要继续贯彻？为此，中共中央于 1963 年 9 月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认为 1963 年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确呈现出全面好转的局面，但是问题仍然不少。这主要是农业生产尚未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整个工交系统特别是基础工业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维修和配套等方面，还需要继续进行大量的工作，企业也还需要进行大力整顿。因此会议决定，从 1963 年起再用 3 年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从“二五”计划到“三五”计划的过渡阶段。这就是说，在 1962 年“二五”计划到期后，“三五”计划推迟到 1966 年再开始。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者超过 1957 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水平在 1957 年基础上提高 50%，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为达到上述目标，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必须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技术为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

根据会议精神，在后三年的调整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解决大型精密设备和进口设备配件的供应，同时有计划地更换老基地、老企业的陈旧设备，引进一批国外先进设备，对“大跃进”仓促建设的新企业、新基地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产品的品种质量，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1963 年 3 月中央决定试办托拉斯，即把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或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联合经营的专业性大公司，主要按经济规律而不是靠行政办法进行管理。先后试办

了中国烟草公司等一二十个托拉斯，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一些经验。增加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1963—1965年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比重由“二五”时期的13.2%上升到17%，用来满足职工住房和对文教卫生配套设施的需求。1963年4月国家还拿出近9亿元给45%的职工提高了工资。加强国防工业建设。在经济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围绕“两弹”进行会战，同时加强常规武器装备生产。1964年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以及核动力潜艇研制的进展，这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发展的重要成就。

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努力，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223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33亿元，工业总产值14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1957年相比，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市场供应显著改善，财政收支在后3年都有节余，其中1965年节余7亿元。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了使全国人民明确形势与任务，于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3040人，其中女代表542人，占代表总数的17.8%，少数民族代表372人，占代表总数的12.2%。会议的主要议程有：听取和讨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国家领导人，讨论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自调整国民经济以来我国在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周恩来总理还在报告中对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作了说明。他指出，1965年的主要任务是，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力争农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11%左右，为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大会强调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并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连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连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选举朱德连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刘伯承、李井泉、康生、郭沫若、何香凝、黄炎培、陈叔通、李雪峰、徐

向前、杨明轩、程潜、赛福鼎、林枫、刘宁一、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兼秘书长。选举杨秀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提名，任命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任命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为国务院副总理，周荣鑫为国务院秘书长，此外还任命了各部、委的部长及主任。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郭沫若作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周恩来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彭真、陈毅、叶剑英、黄炎培、陈叔通、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蔡廷锴、韦国清、邓子恢、李四光、傅作义、滕代远、谢觉哉、沈雁冰、李烛尘、帕巴拉·格列朗杰、许德珩、李德全、马叙伦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正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对调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个宏伟任务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三、十年建设的成就

我国从1956年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到1966年的1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受到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一，工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增长。

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长，尤其值得骄傲的是，196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到1131.5万吨，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10年中工业品主要增长情况为：

产品名称	1956年产量	1966年产量	增长（%）
原煤（万吨）	11000	25200	129.9
发电量（亿度）	166	825	397
原油（万吨）	116	1455	1154
钢（万吨）	447	1532	343
机床（万台）	2.59	5.49	112
汽车（万辆）	0.17	5.59	3188
棉纱（万吨）	95.2	156.50	64

产品名称	1956年产量	1966年产量	增长（%）
化纤（万吨）	（57年）0.02	7.58	37800
自行车（万辆）	64	205.3	220
缝纫机（万架）	20.6	142.40	590
手表（万只）	（57年）0.04	128.90	322100

工业产量大幅度增加，工业经济效益和技术经济指标也有很大的改善。据统计，1965年我国生铁合格率达到99.85%，钢材合格率达到98.5%，棉布一等品率达到97.4%，机械工业有些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首先，一些旧的工业部门，如能源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得到充实和加强。在能源方面，电力工业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联结成网。煤炭工业逐步向现代化发展，冶金方面，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钢的品种达900个，钢材品种达9000个，以前不能炼制的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高纯合金钢、有色稀有金属等，这时都能炼制了，钢材也基本上实现自给。汽车、拖拉机、万吨远洋轮船等所需多种钢材，国内基本上都能解决。

其次，电子工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原子能工业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旧中国的电子工业基本上是一个空白，仅有十几个很小的无线电通信修配、电讯器材厂，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电子工业从业人员只有4000多人，只能靠从国外进口元器件搞一点收音机和电台的装配维修。1956年至1965年，我国电子工业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逐步地发展起来。在这个期间，先后建成投产66项电子工业工程。到1965年，电子工业完成新产品定型项目762项，已能生产各种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电视中心设备、无线电通讯设备、原子射线仪器、各种气象仪器、水声设备、电话交换机、电子计算机、收音机、电视机等。电子元器件除少数电子管需从国外购买外，已基本立足国内。这个时期发展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在大庆开发和建设油田，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2/3，并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能够自豪地宣布：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同石油工业相联系的石油化学工业也逐步建设起来。到1965年底，全国已建成的石油化工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为乙烯5000吨、合成橡胶15000吨、塑料3000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原子工业研制出并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再次，工业布局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期间沿海工业基地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加强。东北地区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重工业基地更加强大。华北地区发展了冶金、钢铁工业，充实了机械、化学工业，使华北建立了重工业基础。广大的内地和边疆各省、自治区，

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在内地形成了不少工业中心，如以武汉、包头为中心的钢铁基地，山西、内蒙古、河南的煤炭基地，甘肃兰州的石油化工中心，四川成都、重庆的钢铁、机械基地等。据统计，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57年32.1%提高到1965年的35%。

第三，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层开，并逐渐收到成效。

首先是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56年我国农业总产值为610亿元，1966年为910亿元，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十几至几十，其中粮食增长11%，棉花增长61.7%。其次，农业的水利条件和技术条件都得到了加强。在这期间，我国建成了150多项水利工程，大大提高了农田灌溉面积。1965年全国灌溉面积比1957年增加了572万公顷。再次，用于农业的工业产品得到迅速的发展。1964年半机械化农机具拥有量达到3000多万件，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7年的165万马力增加到1965年的1494万马力，农村用电量由1.4亿度增加到37.1亿度，化肥施用量由37.3万吨增加到194.2万吨，农药由14.9万吨增加到54.3万吨，农用大中型拖拉机由14674混合台增加到72599混合台，机耕面积在耕地面积中的比重由2.4%上升到15%，机灌面积在灌溉总面积中的比重由4.4%上升到24.5%。此外，在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控制水土流失以及建立农业气象预报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四，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

1956年我国各类在校学生为6987.8万人，其中高校在校学生40.3万人。到1965年全国在校学生达13120.1万人，其中高校生67.4万人，10年间高校毕业生达139万余人，是前7年的4.9倍。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在这期间，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对我国的自然资源、自然条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考察和勘探，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金属矿。在陆相地层中找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农业科技方面我国最早育成了世界第一个水稻矮秆良种，并大面积推广；对东亚飞蝗的研究则为消灭飞蝗作出了贡献。在化学分支结构上，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弄清了第一个核糖核酸结构，为人工合成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固体物理、核物理、高能物理的研究和实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重水型）建成，在制造同位素和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1964年年底，我国试制安装成功第一台波段为3.2厘米的太阳射电望远镜，从而开辟了我国射电天文学这门新学科领域。1958年8月1日，我国第一台小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诞生，这标志着计算机技术这门学科已在我国建立。此外科技力量有了巨大的发展，到1965年底，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1714个，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员达12万人。

第五，国防建设取得巨大进展。

这10年间，国防建设虽然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和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曲折，但从整体上看，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国防建设，因此，这个时期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仍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仍以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加强海、空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建设，1965年人民解放军总人数为362万人。

军队的训练也得到了加强，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全军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训练高潮。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观看了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对训练成果和比武方式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通过全军大比武活动，检阅了部队训练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推动了部队练兵运动的更大发展。与此同时也加强了民兵建设，壮大了民兵队伍，使民兵成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防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国防尖端科技成果显著。从1958年起，由聂荣臻主持的国防科技研究已迈开步伐。党和政府克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停止供应设备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2年12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集中各有关部门组织全国大协作，攻克许多技术难关，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研制了两万多台关键设备，终于取得了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突破。1964年6月，中远程导弹试验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5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核弹空投爆炸实验，使中国拥有了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巨大进展，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大加强了我国国防力量。这也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取得，是同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顶住了国际敌对势力军事威胁、经济封锁的巨大压力，经受住了国内严重经济困难的考验，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表现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顽强斗争精神分不开的。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开展了宣传学习英雄模范人物及其先进事迹的运动。时代呼唤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应运而生。这个期间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和优秀集体，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就是这期间出现的光辉榜样。解放军班长、共产党员雷锋（1940—1962年）干一行，爱一行，甘当革命的螺丝钉，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言行一致的工作作风，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雷锋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学雷锋运动在全国深入开展，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特别在青少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庆工人、共产党员王进喜（1923—1970年）在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中，率领钻井队迎着困难上，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被工人们称为“铁人”，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1922—1964年），身患肝癌，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被兰考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焕发起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当时不仅学习英雄模范人物，而且学习优秀集体。1963年12月15日至1964年1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交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一封信指出：国务院

各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到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我也提议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做政治工作。不这样就不能振奋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会议按照毛泽东此信精神，决定在工交部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干部和工人的头脑，要学习解放军。会后，在工交战线出现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热潮。1964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油田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他们系统地学习与运用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部门也适用或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交战线开始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1964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共产党员带领群众战胜灾害，在贫瘠的山地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情况，并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农村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此后，全国农业战线开始了学习大寨的运动。这些后来就归结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学习运动，尽管有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缺点等，但是对于动员全国各条战线的干部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确实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总之，这十年我国的经济、教育、科技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当然，这时期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比如“共产风”、“穷过渡”、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够清楚。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第一，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克服错误倾向。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

第三节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

在克服严重困难，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国内外出现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在国际上，中苏争论进一步激化，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制造事端，印度挑起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在国内，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并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社会上极少数反动分子也蠢蠢欲动，企图“变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也有所增加，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某些方面有些激化。另外，由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对形

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在严重困难面前，暂时潜伏下来。随着形势逐步好转，党内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及工作指导上的意见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这时，毛泽东又重新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会前，从1962年7月起，先召开北戴河会议，后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这也成为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会议用大部分时间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也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工作问题，并通过了有关文件。会议要求全党继续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奋斗，指出当前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是：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

会议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30年不变的政策。对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家庭副业、减少干部补贴工分、少留公积金公益金、减轻社员负担等问题，都作了规定。这对于稳定农民的情绪，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会议强调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应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

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规定商业工作要遵循“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贯彻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规定了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三条流通渠道的不同作用：国营商业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合作社商业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通过三条流通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这些规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为活跃城乡经济，方便群众生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会上还强调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提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会议重申，对国民经济要进一步实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和决议，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除讨论了上述问题外，还着重讨论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会议过分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还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局部的问题看作是普遍现象，甚至把党内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也看成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和最后审定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提出：“在无产阶级革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些论断的中心思想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样，毛泽东就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他武断地认为，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更长，可能是100年或几百年。这个论断后来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除了受到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外，还因为他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都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

所谓“黑暗风”，就是对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及经济形势的不同认识。当时有的思想比较“左”的同志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而有的人则对困难估计得比较严重。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又认为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9月他曾说：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当时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强调要把困难估计够，并根据困难比较严重的情况，确定了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方针和措施。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设想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不会很快。但是，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并把这两次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估计说成是“黑暗风”加以批判。他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多次讲话认为形势“并非一片黑暗”。他说，自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是不对的。并严厉地

批评说：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在毛泽东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一些对困难估计严重的同志，只得重新认识，改变自己的观点。

所谓“单干风”，就是1961、1962年在全国一些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及极个别地区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农民群众创造的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经营方式，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经营方式自发的否定。它是在克服农村遇到的严重困难时应运而生的，它一问世就深受农民的欢迎。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也得到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支持。当时邓小平、陈云、刘少奇等对此也是赞成的。邓小平在1962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他们认为包产到户是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的好办法。但是，毛泽东对这些意见和做法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这是刮“单干风”，搞资本主义。在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都严厉地批判了“单干风”。毛泽东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还说：单干风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就把实际上属于生产经营管理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高度去分析。

所谓“翻案风”，则是指彭德怀于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两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审查，正确处理，而被认为是闹翻案。在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时，由于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没有错，只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所以，彭德怀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平反。而且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批判彭德怀是完全必要的，理由：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彭德怀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毛泽东插话补充说彭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写的意见书是等待时机，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彭德怀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后来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时，便写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进行辩解和申诉，于1962年6月16日上交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

彭德怀的这封申诉信，共分五个部分，大体上是围绕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他的批判进行申辩。他特别申明，说他阴谋篡党和有国际背景，“实在腹怀委屈”，是莫须有的罪名。8月22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勾结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再次要求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两封信送上去以后，被认为这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闹翻案，是向党进行的新的进攻。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已在多次讲话和插话中批评彭德怀，认为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但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彭德怀不能翻案，不能平反。为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说，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这里说的没有搞错，不能平反，就是针对彭德怀说的。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上的批判发言认为，彭德怀的申诉信，是1962年夏天刮的“翻案”阴风，是配合国际上“三尼”（即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主要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反华，申诉信是反党纲领，并算历史的旧账，说彭德怀一贯支持、执行错误路线，是“野心家、阴谋家”，他参加革命是来“入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是“国际反动别动队”，等等。批判发言都把彭德怀的信上升到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阴谋的高度。会上还正式通过组成对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加以审查。

由于毛泽东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看成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大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这就将全党的思想和注意力引导到抓阶级斗争的轨道。

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但是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也讲到，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他赞成刘少奇的提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不管国际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所以，会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又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会后各地区大多没有立即执行，只有湖南、河北等地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在外出视察时，分别在长沙、邯郸听取了汇报，并肯定了这些做法。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和河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让与会者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还特别强调要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他认为，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修正主义。“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规定，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和文教部门中进行。至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县级以下的工商企业中如何开展运动，将另行安排。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立即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开展运动。与此同时，各地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进行试点。接着，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转发了东北局、河南省委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和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进行“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及邢台地委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并在转发批语中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各地“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特别强调：“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5月20日正式发出，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决定共分十条，后来简称“前十条”。

“前十条”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十分夸大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向我们进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文件断定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因此，必须“重新组织革命阶级队伍”，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并且把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看作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1963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许多政策问题，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即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到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后十条”虽然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并作了许多政策性规定；也强调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团结中农，特别是正确对待上中农；要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也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并对这些问题规定了许多政策界限。

但是，“后十条”仍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规定的，继续不适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要求大搞群众运动。这就使“左”的错误继续发展。

1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点面结合，后又派出大批工作队，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有少数地方和单位夸大敌情，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情况上报以后，又进一步影响中央领导人的看法。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许多过火的意见和措施。

毛泽东在会上谈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在农村和城市，大约有1/3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根据这样的认识，会议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对烂掉了的单位要夺权，不仅要追“四不清”干部在下面的根子，还要追他们在上面的根子，把运动搞深搞透，认为这是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大计。会议还对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城市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整个运动要延长时间。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还对“后十条”作了重要修改。修改过的“后十条”，强调指出，阶级敌人“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要求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整个运动都要由工作队领导，领导人必须亲自蹲点；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要认真进行补课，对于运动的部署，提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整个运动大约需要5、6年或更长的时间完成；并规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衡量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六条标准。显然，修改过的“后十条”，进一步发展了“左”的倾向。特别是不再依靠基层干部开展运动，而是完全由工作队领导。这是导致扩大打击面的又一个步骤。与“后十条”修改草案下达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批转下发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运动的典型经验，并接连发出一些关于“反右倾”、对已经烂掉的单位和地区进行“夺权”等指示。这就进一步促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泛滥。

按照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的规定，各省、市、自治区，检查了前一段运动的情况。并参照中央转发的典型经验，重新调整了部署，确定以地区为单位，集中搞一个县，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搞“人海战术”，上下左右同时清理。1964年冬全国抽调100多万干部组成工作队，投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以神秘的工作方式，在少数人中扎根串连。在城市也加强试点，并在一些单位试划阶级成份。在开展运动的地区，工作队完全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致使许多只犯一般性错误甚至没有错误的基层干部被当作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批判，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扩大了打击面，开展了过火的斗争，伤害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基层干部。

为了总结经验，回答和解决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

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要求对待干部应一分为二，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工作方法上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反对“人海战术”、繁琐哲学。

“二十三条”下达后，各地对社教工作队进行了整训，解放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偏向，稳定了农村的形势。但是，“二十三条”并没有改变“左”的指导方针，仍然认为全国城乡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把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把“四清”正式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首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而使“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它成为后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二十三条”的指导下，1965年“四清”运动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在农村，到1966年春，全国约有1/3的县、社开展了运动。在城市，据1965年7月统计，国营工交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有1800多个，约占总数的3.9%；其他如财贸、文教卫生、街道企业和居民中，只有少数单位进行了试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的“四清”运动已无法继续下去。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至此，“四清”运动为“文革”运动所取代。

历时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在一些问题上还颠倒了是非，如把包产到户等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的责任制形式，看成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强行制止，把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与包产到户合称为“三自一包”，作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加以批判；在工商企业中，对一些有利发展经济搞活流通及许多正确的规章制度加以否定；特别是在政治上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发展。

“四清”运动虽然发生了严重偏差，但因为运动只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的，还纠正过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特别是在运动中还强调不误生产，并把增产或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和损失，全国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三、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

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也在不断发展，并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政治批判。

1962年8、9月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了批判。《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约请李建彤创作的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李建彤于1962年夏写出小说上半部后，工人出版社印出样书送请有关领导和中宣部审查。同时，有些报刊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作者在写出初稿时，曾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审阅过，习仲勋对作品也提出过修改意见。康生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再刊载此小说。接着，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它与“翻案风”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认为这一作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替高岗翻案。会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策划人和幕后指挥者，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同时“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因而是一部“伪造的西北党史”，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

《刘志丹》这部小说虽然有某些缺点，但总的看它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对它进行批判，特别是把它同所谓“翻案风”联系起来，是错误的。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表现。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小说《刘志丹》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指出，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他进一步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就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批判，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艺界根据会议的精神开始检查工作。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也很注意。1962年12月21日，他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就提出，现在的戏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的请示报告，决定停演“鬼戏”。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文艺界整风问题。会议认为文艺界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和修正主义影响抬头的状况，并提出当前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右倾。5月在江青的支持下，《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把孟超改编的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加以批判。在批判中，毫无根据地诬陷该剧影射攻击共产党，是要向共产党复仇，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占领戏剧舞台的重要表现。从此，报刊上开始了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

1963年以后，毛泽东对文艺尤其对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指责。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套不行”。意识形态也要抓，“要推陈出新”，陈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新是社会

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11月他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并批评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特别是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一个是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116号上的批示，认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在这个批示中，虽然也指出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主要是强调"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批示中还批评"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另一个是1964年6月27日，在江青送来的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写的。上一个批示之后，文化部党组立即根据批示的精神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5月8日，中宣部写出了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毛泽东看到报告草稿后，便在上面作了批示。他写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批示下达后，文艺界又开始第二次整风。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提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5人小组，负责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文艺界在整风的过程中，先后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大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政治批判，并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特别是在戏剧界，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生活的新作品，还很不够。对于这些缺点提出批评是应该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对一些问题的性质也过分夸大了，没有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必然导致否定一切的"左"的错误。

在文艺界整风的同时，从1964年8月份开始，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对一大批文艺作品，如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逆风千里》等进行公开的政治批判。这些电影、戏剧和小说，多半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很有影响的作品。虽然有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存在一些缺点，但仍不失为优秀作品。而对于其中的缺点也应以帮助改进、提高为出发点，通过正常的文艺评论加以解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这些作品全都被错误地当作文艺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而受到无限上纲的批判。

在批判文艺作品的同时，还在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方面开展了批判。许多本来是可

以进行讨论的学术问题，却被冠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帽子。例如，电影界批判了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文学界批判了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特别是对“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更为突出。邵荃麟在1962年前后，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教条主义的偏向，提出了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深化一步。这些思想被简单地概括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不但把这些主张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而且还把邵荃麟说成是“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错误批判，自1964年夏天开始，又从文学艺术方面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

在哲学界，重点批判了“合二而一”论。“合二而一”是1964年杨献珍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课时提到的。杨献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长期从事哲学研究中，认为“合二而一”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述方法，并且发现“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的提法，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述对立统一思想的。因此，当他讲解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时，不但讲解了“一分为二”的表述，同时也提到“合二而一”。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既包括“一分为二”，也包括“合二而一”。对于这一观点，哲学界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了讨论。本来作为学术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是正常的。但在当时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分裂，中国共产党强调反对修正主义，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且越来越扩大化的时候，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自然便成为重要的批判对象，“合二而一”的观点，一见报端，便被当时在共产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等人当作重要的靶子，认为“有问题”，立即组织批判，并把这一观点反映给毛泽东。对此，毛泽东也认为“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是“修正主义”的。这样一来，“合二而一”论者便难逃劫运，被有组织的进行了集中的“讨伐”。在批判中，一些文章竟毫无根据地说杨献珍大讲“合二而一”是同党大唱对台戏，是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在批判“合二而一”论时，还把刃年代杨献珍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再拿出来一并批判。还把这些说成是“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杨献珍也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并被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一批持有和杨献珍相同观点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也被看作是修正主义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之前，1963年下半年，已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孙冶方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提高经济效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在计划经济中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管理的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要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

造，等等。应该说这些见解都是正确的，如果采纳，用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孙冶方的这些主张，却被说成是宣传"利润挂帅"，提倡资本主义，被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

在历史学界则重点批判了翦伯赞的史学观点。翦伯赞对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片面性、简单化、绝对化的问题多次发表文章提出批评意见。他认为研究历史问题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不能片面强调"以论带史"，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他在史学研究中还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如对农民战争问题，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之后，新的统治者会对被统治者采取"让步"的政策。翦伯赞的这些见解却被概括为"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而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美化帝王将相，是歪曲和诬蔑农民起义，鼓吹阶级调和，宣扬唯心史观。甚至说他是以历史学家的面貌，积极地参加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

此外，1964年下半年，受到重点批判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冯定。把他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等对青年有很好教育作用的书，说成是"宣扬修正主义的坏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错误批判，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工作方面继续发展的表现，是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方针的结果。这种批判，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极大地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正常发展。它不但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对待，而且把某些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甚至把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东西硬是当作反动的东西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还以此把作家、学者打成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不但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伤害，而且也使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随着"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到1965年11月，便发生了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随之将思想文化方面的大批判引入了全社会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四节　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反对霸权主义，对外关系的发展

一、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和援越抗美的斗争

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美苏遥相响应，利用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失误和中国出现的暂时困难，掀起反华浪潮。美国一面妄图长期霸占台湾使其成为反华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一面扩大侵越战争，从东、南两个方面构成对中国的威胁。苏联则在蒙

古及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支持印度挑起与中国的边界冲突。这样就形成了反华包围圈。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坚决顶住国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坚定不移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1950 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占台湾，形成了所谓的“台湾问题”。朝鲜停战后，美国为达到长期霸占台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先后炮制“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中立化”等谬论，并于 1954 年 12 月同蒋介石非法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对于美国上述侵略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美国自恃其超级大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不仅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对中国台湾的侵略。美国的侵略是造成台湾海峡地区局势长期紧张的主要原因。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多次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的据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958 年 8 月开始炮击金门。美国一面派遣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士兵进驻新加坡，调动地中海舰队一部分驶往远东，将大批军队集结台湾；一面由国务卿杜勒斯出面宣称“保卫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美国已作好军事部署，将对中国“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

为了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自 8 月 23 日至 10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炮数十万发，全面封锁了金门岛的滩头阵地与飞机场。中国总理周恩来于 9 月 6 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任何所谓条约和美国国会通过的任何有关的决议，对于中国人民是完全无效的，他们决不能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更不能成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侵略范围的借口。”9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在第 15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整个世界局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10 月 6 日，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告台、澎、金、马同胞书》，指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同时宣布停止炮击金门--周，让蒋军恢复补给，但必须以没有美国军舰护航为条件，并建议同台湾当局“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此后，人民解放军采取了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方针。13 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但由于台湾当局 19 日夜在金门海域引进美国军舰护航，于是，20 日，人民解放军恢复炮击。同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文告，指出“中国人的事绝不允许美国人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执迷不悟的究竟是少数。台湾当局迷途知返，接受和平解决的时机，看来尚有所待，我们继续寄予希望。”25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表文告，宣布对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码头、海滩等处，逢双日不打，以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大小岛屿上的同胞得到充分的供应。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岛单日打双日不打的警告性炮击，一直延续到 1978 年 12 月 31 日。

1962 年，台湾当局趁中国大陆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的时机，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又企图反攻大陆。1 至 5 月，蒋军多次进行以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并同美军联合进行。针对美蒋的这些活动，中国政府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效的斗争。大陆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作好一切

准备，严阵以待，准备随时迎击蒋军的窜犯。人民政府还奖励国民党起义人员，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此后，有不少蒋军官兵起义回归大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也于1965年7月20日，从海外归来。他们的归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李宗仁在机场上发表声明说，回归大陆的目的是："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太义，毅然回归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贡献。由于中国大陆军民作好一切反击准备，使蒋介石集团不敢贸然大举窜犯大陆。美国虽然支持蒋介石集团，但为了推行其"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海中立化"政策，不同意马上发动军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企图无法实现。

对于美国侵占台湾，中国人民和政府在采取上述行动的同时，还通过谈判方式进行斗争。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出席亚非会议的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7月13日，美国作出反应，建议在中立国家举行大使级会谈。8月1日，中方代表王炳南与美方代表约翰逊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一轮会谈。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先后在日内瓦和波兰的华沙举行了上百次。虽然由于美国顽固坚持霸权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使谈判进展困难，但通过谈判对美帝国主义妄图长期侵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起了扼制作用，为以后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的斗争中，台湾同胞也做出了积极贡献。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台湾人民不断掀起反美浪潮。其中尤以"五二四"反美运动影响最大。50年代初美国"军事援助慰问团"进入台湾后，美军的霸道行为激起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怒。1957年3月21日，美国顾问团上士雷诺在美军住宅区枪杀了"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职员刘自然。由于美军在台湾享有不受台湾当局法庭审判的"治外法权"，所以雷诺只能由美方进行处置。5月23日，由美国人组成的军事法庭竟宣布雷诺无罪。过去美军在台湾所犯罪行由于多被台湾当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数人并不知晓。而刘自然事件为社会所知晓，台湾人民对美方的宣判怒不可遏。5月24日，台湾各报纸纷纷以显著位置发表抗议美军蔑视人权的社论和报道。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则到台北"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美军的暴行和奥特华的哭诉进一步激发了台湾同胞的爱国情绪。下午1时，2000多名群众冲人美国"大使馆"，将使馆的门窗家具打烂，扯下星条旗撕碎踩在脚下，并烧毁了"美国使馆"汽车，在墙上写下"美国佬滚出去"等标语，与此同时，群众还捣毁了台北的美国新闻处。由于台湾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宪兵逮捕群众，晚上6时，约3000名群众包围了台北市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群众。警察竟开枪

镇压，当场打死1人，伤32人。晚9时许，台湾当局颁布戒严令并调3个师的兵力进入台北，将这次大规模的反美运动镇压了下去。“五二四”反美斗争波及台中和台南，各阶层人士都参加了斗争，充分显示了台湾同胞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民族气节。

蒋介石集团为盘踞台湾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卑躬屈膝地求得美国的支持和庇护。但是，台湾当局同美国政府仍有矛盾，他们并不情愿接受“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海中立”的观点和政策，特别是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时，西方国家曾提出金门、马祖等岛屿应予“非军事化”、“中立化”。这不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也为台湾当局所抵制。

因此台湾问题十分复杂，它包含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中美之间的矛盾，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当局的矛盾。前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反对，要斗争。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统一，中国政府一贯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国家同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美国也不例外。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海峡两岸有一定的“共识”，都不赞成美国搞“两个中国”，因此，中国在解放浙闽沿海岛屿时，让台湾当局继续留在福建的金门和马祖。后者是如何实现祖国的统一问题，这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在阐明和平统一祖国政策的同时，还宣布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利，这就给了那些妄图分裂祖国，制造台湾“独立”或“一中一台”的敌对势力以当头一棒，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由于海峡两岸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反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由于中国政府坚定的原则立场和正确的政策，使美国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并长期侵占台湾的阴谋不能得逞。

美国在侵占和控制中国台湾的同时，还在越南加紧推行霸权主义，企图利用越南为基地威胁中国。1955年法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美国乘机取代法国，用军事援助扶植亲美势力。1960年底，越南南方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反抗统治南越的吴庭艳集团和其支持者美国。从1961年起，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发动了由美国出钱出枪、由南越傀儡政权出人的所谓“特种战争”。1962年又成立了“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加强对越南南方人民的镇压。但是，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遭到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抗。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并日益取得主动。美国虽不断增兵，却无法摆脱被动和失败的局面，遭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为了挽救侵略越南的被动局面，美国于1964年8月，一手制造了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悍然派遣军用飞机对越南北方实行突然袭击，轰炸沿海及内地的城镇，把战火烧到了越南北方。同年12月，美国又在所谓“对抗中国核力量”的借口下，派出核潜艇，驶入亚洲大陆沿海，并停泊香港，对中国人民及西太平洋各国人民进行战争挑衅，严重威胁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鉴于美国猖狂推行霸权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道义、物资和人力等各个方面尽一切可能给了越南人民以大力的援助，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抗美援越斗争。当美国挑起“东京湾事件”，武力侵入越南

北方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64年8月6日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指出，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8月9日，北京10余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周恩来、陆定一、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集会。12月29日，中国政府又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政府派北极星导弹潜艇到亚洲大陆沿岸海面活动的战争挑衅。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国进行抗美援越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体现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与爱国主义职责相结合的精神。

二、中苏关系破裂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引起了极大震荡。帝国主义势力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中苏之间也由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的破裂。在这个过程中，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我国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同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发生在苏共和中共两党之间。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这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许多观点，中国共产党有不同意见，认为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多次在不同场合向苏共领导人申明了自己的观点。1956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年12月29日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指导意义，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党政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争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就两党分歧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虽然抵制了苏共的一些观点，但为维护大局和团结，也作出了必要的让步。会议最后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对苏共提出的草案中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作了重大修改，吸收了中共代表团的一些意见，但也未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为此，中共代表团于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意见分歧本应通过内部协商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然而苏共领导人却以其二十大的路线来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并力图强加于人。在两国关系方面，苏联想控制中国，而且还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两国的关系方面。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信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要求在中国海岸建立特种收发报的长波无线电台，并提出所需费用由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6月12日，中国国防部长复函苏联，提出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电台请苏联帮助设计和装备，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就此签订一项协定。7月11日，苏联提出的协

议草案中，坚持由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是要求中苏共有。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对此，中国方面明确表示，苏方可以在器材和技术上给予帮助，但电台必须由中国进行建设和管理，主权属于中国。为了控制中国，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还代表赫鲁晓夫向毛泽东等提出在中国建立一支共同的原子潜艇舰队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建立联合舰队同建设长波电台一样，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不能搞。7月31日至8月8日，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就上述两个问题作了解释。他推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问题，至于建立联合舰队，则是苏联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在这次会谈中，苏联领导人虽然没有再坚持他们原来的建议，但是，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争执，却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基于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此后苏联开始对中国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行动。

1959年6月，即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有关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不顾中国多次解释和劝阻，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报刊还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大加攻击。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同毛泽东等进行会谈时，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马祖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竟提出让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的谴责，也必然恶化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

1960年6月24日到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共领导人对中共代表团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向与会各党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带头组织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大规模的围攻，谩骂中共是“疯子”，诬蔑中国共产党“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举起来”等等，妄图以此打击和压服中共代表团。会上，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但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议公报上还是签了字。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共代表团于6月26日散发了一个声明，指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错误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苏共未能压服中国共产党，转而又把两党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政府答复，便在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内，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等。苏联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破坏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困难和损失，更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

1960年11月，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前，苏共再一次向与会代表散发了长达6万余字的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件，进一步挑起两党的争论。对此，中共代表团仍然本着加强团结的

愿望，对苏共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会议虽然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但实际上并未解决问题。1961年10月苏共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观点，进一步大反斯大林，并且史无前例地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党，公开号召推翻当时同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主要领导人。同时，还含沙射影地反华。对于苏共这种观点和做法，中共是不能接受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10月19日致贺词中诚恳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各兄弟党之间，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我们的团结，兄弟党之间如果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的意见。

在苏共二十二大前后，苏共和苏联政府还制造了一系列恶化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事件。当时在中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苏联竟于1961年要求中国偿还在抗美援朝时援华军事物资、贷款利息，合计达14.06亿卢布。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列宁主义行为”“特殊立场”、“特殊路线”，并且支持印度大举入侵中国，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浪潮。4月16日，苏联还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经过长期策划，将塔城、裕民、霍城3县居民6万余人诱骗逃往苏联。中国政府虽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但苏联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5月25日，又在伊犁地区制造暴乱事件。苏联在中国边疆地区进行颠覆活动，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进一步破坏了中苏两国的关系。

在苏共和赫鲁晓夫的策划和影响下，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欧洲有5个国家共产党在他们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肆意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中共曾以各种方式呼吁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但均未得到应有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7篇答辩文章，答复和批评受苏联影响而指责中国的几个党。但文章留有余地既没有点苏共领导人的名，又对某些事实作了一些保留。

此后，中苏两党又通过信件往来，频繁磋商，争取通过会谈解决分歧。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了中苏会谈要讨论的问题范围，并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4月4日，中共中央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全文发表，并于6月14日针对苏共的信发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函。这封复信，共25条，系统地对国际共运中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苏共仍然继续发表大量文章和讲话，猛烈地攻击中共。6月27日，苏联还要求中国立即召回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研究生5人，同一天，苏联“公民”还砸碎了中国驻苏使馆的新闻图片橱窗。

尽管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中国共产党还是根据已达成的协议，派出了以中共中央总

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于7月5日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从7月6日至7月20日，共举行9次会议，中共代表团以最大的耐心和努力寻求在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但是，苏共方面并无消除分歧，恢复团结的诚意，还在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就于7月14日发表了长达35000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25条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并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后，苏联所有宣传工具都投入反华大合唱。仅从1963年7月15日至10月的3个多月内，苏联报刊广播就发表了具有反华内容的文章、资料近2000篇，其中有的公然煽动中共党内和国内的所谓“健康力量”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对此，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

中共中央发表的9篇评论文章是：1963年9月6日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1963年9月13日的《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26日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10月22日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这4篇文章发表后，苏共中央曾重新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但接着，苏共中央于1964年2月中旬又在有6000名积极分子参加的中央全会上发表反华报告，并通过决议，决定和部署“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又背着中国向各国党发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指出，你们说攻就攻，说停就停，“充分暴露了你们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此后双方虽多次相互致函磋商解决的途径，但苏共仍无诚意。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又于1963年11月19日发表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2月12日发表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4年2月4日发表了《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3月31日发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7月14日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9篇文章对中苏两党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分歧和发展，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和战略策略问题，基于当时的认识，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1964年10月中旬，苏共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接替的是勃列日涅夫，中共中央当时希望自此能使中苏关系向好的方面发展。因此，对苏联新的领导人就职发出热情的贺电，并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会谈。

但是，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他们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向中国施加压为。不但大量增兵中苏边界，挑起边境冲突，而且派重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把威胁中国的军事前哨推进到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1965年3月，勃列

日涅夫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中共和其他6国党拒绝参加。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中苏关系全面破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苏联当权者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任意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违背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又是邻邦。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有过密切的友好交往。两国边界长达2000多公里，但从未正式划定过，两国人民长期维持着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线。其走向：东段沿喜马拉雅山南麓，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沿喀喇昆仑山脉。英国侵入印度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便从印度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并于1914年3月，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用秘密换文方式，制造了一个所谓"麦克马洪线"，以此为界线，把中印边界东段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英属印度。这是英国强加于中国的，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1954年4月，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也进行了友好合作。但印度政府承袭了英国侵略者的扩张企图，在同中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危害中国的活动。特别是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以后，印度政府在苏联的纵容和支持下趁机向中国扩张，制造边界冲突。同年8月25日，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琅久地区的印度军队竟向中国驻军开火，在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下，印军才不得不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10月21日，印军又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空喀山口，后被击退。由于印度一再制造事端，使中印边界的局势日益紧张。

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多次建议中印双方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竭尽一切努力，在中印两国之间创造一条最和平最安全的边境地带，从根本上消除今后发生任何边界冲突事件。还提出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全线停止巡逻；对有争议的边境地点双方不派驻武装人员等。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4月访问印度，同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力求达成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初步协议，但是印度政府没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无理要求中国五条件地接受它的全部领土要求，致使会谈毫无结果。

印度政府不但拒不接受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建议，而且不断制造新的边境冲突，蚕食中国领土。在西段，1960年至1961年8月，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的行动达17起，2000余人次；1961年4月到12月，印军还以它非法占领的巴里加斯为据点，扩大巡逻范围，设立新哨所，企图占领桑格藏布河流域。在中段，1961年6月，印军50余人侵入中国领土乌热地区，修筑了碉堡等工事。

对于印军的频繁入侵和挑衅活动，中国政府一方面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另一

方面，仍以最大的忍耐和克制，多次向印度政府建议中印双方通过谈判解决边境争端，反复说明单方面强行改变边界现状的危险性。然而，印度政府不仅无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多次建议，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挑衅。1962年9月，印军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中国领土扯冬地区，并且连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多次制造严重流血事件。对此，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印军立即停止进攻，从它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撤出。对于继续进犯的印军则采取了自卫措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仍然本着以中印友好为重，通过谈判求得公平合理解决的一贯主张，继续向印度政府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但是，中国政府的多次建议都遭到印方的拒绝。1962年10月12日，印度政府竟然下令印军“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10月20日，派出10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在遭到严重伤亡、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对印自卫反击战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0月20日至24日。中国军队在东段歼灭了人侵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印军；同时，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侵略据点。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界冲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二）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三）两国总理再一次进行会谈。但印度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并继续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不得不再次进行自卫还击。第二阶段是从11月14日至21日。11月14日，印军在东段发动大规模进攻。16日，中国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先后击溃了各路进犯的印军，清除了印军设立的侵略据点，并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

经过两个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全歼印军2个旅和3个旅的大部，毙、伤、俘印军8700余人。

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目的仍然是为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因此，在打退印军的大规模进攻以后，主动采取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措施。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到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军完成全线后撤计划。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印军的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交给印方；对被俘的印军官兵予以释放和遣返，到5月25日止，释放遣返全部被俘印度军事人员3942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和边境的安全，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获得了世界公正舆论的称赞。

四、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1957年到1966年10年间，中国在顶住来自美苏等方面压力的情况下，继续以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

国际事务中，坚持原则，求同存异，不畏强暴，平等待人，努力发展同其他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大力加强了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有力地支持了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为了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63 年 4 月到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进一步发展了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亚非 13 国之行，更加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支持非洲人民的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总理一行于 1963 年 12 月到 1964 年 2 月，先后访问了非洲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和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 10 国，接着，又访问了南亚的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在访问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同亚非各国领导人就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广泛的一致，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受到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欢迎。这五项原则是：(1) 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 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 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4) 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 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这五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具体运用，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这对增进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人民及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 10 国时，在马里还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时所遵循的 8 项原则。这就是：(1) 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 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 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 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保证退换；(7)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 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这 8 项原则不仅适用中国对非洲新兴国家援助，也适用于中国对亚洲及其他地区新兴国家的援助，充分体现了中国同新兴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在世界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总理对亚非 13 国的访问，是中国一次重大而成功的外交活动，增进了中国

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国家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对国际交往应遵循平等互利原则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交往的同时，中国同样重视与发达国家的交往。1964年1月，毛泽东对来访的法国议会代表团说：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国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来往。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同西欧一些国家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同已经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如瑞士、瑞典、挪威、芬兰等国进一步加深了友谊；另一方面，对尚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进行民间交流和贸易往来。而中法两国，经过双方代表的谈判，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中法两国的建交，是中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是加强与西方关系的重大突破。它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对欧洲各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促进。

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同日本的睦邻友好关系。在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则是源远流长。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的某些当权者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但中国政府认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始终将发展中日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在日本某些当权者敌视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同日本的交往，主要是从加强民间往来入手，而日本广大人民也同样渴望发展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就是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希望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日本经济界的人士更是愿意同中国开展贸易活动。为了恢复和发展贸易，经中日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1962年11月由廖承志代表中国，高崎达之助代表日本，签订了备忘录及有关文件，规定从1963年至1967年作为第一个五年安排。1964年4月，中日双方就互设贸易代表机构问题达成了协议，规定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在中国设立“高崎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这样，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保持和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这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还逐步解决了同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和边界协定。

由于中国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积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所以，从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其他国家建交的第二个高潮，在这些国家中，既有亚洲、非洲的国家，也有拉美的古巴和西欧的法国。这表明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第六章　共和国发展中严重曲折的十年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全国性的大动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即“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正当我国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由此，党和国家陷入一场延续十年之久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其主观目的是为了寻求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办法，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据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则是完全错误的。这时，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以致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加以他的个人专断作风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之风盛行。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学家吴晗，称他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这种超出学术范围的政治批判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是在毛泽东于1959年4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精神鼓舞下创作的，剧本宣扬了明代清官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但姚文元的文章把剧中所写的有关海瑞“退田”、“平冤狱”等情节，硬是与1962年以来受到批判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实际上这是一种捕风捉影的政治陷害。这篇文章是江青伙同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秘密指使姚文元炮制出来的，

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所谓吴晗的后台，即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这篇错误的批判文章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姚文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因未研究讨论过姚文，因此持谨慎态度，北京的各大报纸也未予以转载。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要上海立即把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市新华书店因不明真相，没有立即表示订购，到29日才复电同意订，由此更使毛泽东加深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才予以转载，但只是把它作为对学术问题来讨论。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范围谈话中则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显然，毛泽东是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当做政治批判来处理的。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到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展到了思想文化界，各地报刊充斥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显然，毛泽东下决心以此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

针对这场批判运动中所出现的上纲上线、人身攻击等不正常情况，为了对已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内和中共的领导下，1966年2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4年成立，彭真为组长）扩大会议。会议拟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认为：吴晗的问题只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无关；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不赞成把学术讨论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未表示反对）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国。

根据《二月提纲》精神，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先后3次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毛泽东还严厉地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4月10日，由江青主持整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转发全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宣称整个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同时，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之间互相勾结利用的开始。

经毛泽东提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莫须有罪名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决定撤销他们4人的一切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继续审查他们的"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

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这个小组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只受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指挥部。此外，会议还撤换了中共北京市委、中宣部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这一切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5月16日，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没有进行认真讨论就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列举它所谓的10大罪状，进行种种歪曲和指责，说它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通知》提出在党、政、军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混入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据此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中这些尖锐的词句都是毛泽东加上去的，它为这场行将到来的风暴定下了基调。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仅使“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而且由于《五一六通知》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急剧展开，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被扭转到了歧路。

6月1日，由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后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人们投身“文化大革命”。当天晚上，经毛泽东同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随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人们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切“牛鬼蛇神”“造反”。在《人民日报》这些社论的煽动下，全国各地大中学校掀起了一股以学校领导、教师为斗争对象的“斗黑帮”浪潮。

6月上旬，面对各地大中学校的乱揪乱斗、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的混乱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协助领导运动。为保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拟定了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搞大规模声讨会”等内容的“八条要求”。此后，各地陆续采用了派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法。

工作组进校后，很快便与向校党委“造反”的学生发生矛盾。许多学校发生了两派或几派学生之间的斗争，学生与工作组的对立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在北京发生了驱赶工作组的现象。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返回北京，当天听取了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北京几所高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上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5日，毛泽东再次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违心地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委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清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认为必须再作一次全面的发动。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8月1日，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并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7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他还联系过去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大字报提出中央另外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针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这就指明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人们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它不但没有就如何区分走资派与革命派、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标准，反而鼓励人们以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去大鸣、大放，从而把运动进一步推上了盲目的大规模混淆敌我和是非的错误道路。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刘少奇的排名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副主席职务都不再被提及。会议期间和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

这次全会上及会后，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许多与会者尽管对领导层如此突然而重大的人事变动感到困惑和震惊，对“文化大革命”感到不太理解或怀疑，但在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却难有作为。

5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此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便如狂风暴雨一般席卷全国。

全国大动乱局面的形成是从红卫兵运动开始的。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的部分学生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影响下，北京大学附中等校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初期的红卫兵大多受到了工作组的压制。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6、7月份先后贴出三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请江青将他们的大字报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此信的发表导致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发展，并成为一种狂热的政治力量。

通过红卫兵运动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引向全国，是毛泽东推动运动发展的重要步骤。8月18日，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和检阅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再次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20日，北京一大批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开始了"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全国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大串连活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共接见了1100多万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在"保卫毛主席"和"反修防修"口号鼓动下，大批狂热的红卫兵冲向文化团体、教育机构、党政机关，冲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事物进行大破坏；对他们认定的"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采取批斗、抄家、殴打和侮辱等种种残酷手段加以迫害；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受到冲击；揪斗各地"走资派"的活动使各级党政机关几乎全部陷于瘫痪，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入停顿。

红卫兵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法制、随意抄家、打人、甚至乱杀人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各地相继出现了对红卫兵运动的抵制行动。为消除"阻力"，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红卫兵对党内"走资派"进行"造反"，"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大大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在10月9日至28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主张乱它几个月；陈伯达则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会后，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1月，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央名义发出了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从而将原定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部署，扩展到了工厂和农村。这是全国性动乱升级的一个标志。此后，"文化大革命"向工交财贸部门的基层单位扩展，造成了许多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红卫兵下乡串连和社队间的串连，也使农村卷入了动乱。至此，全国动乱的局面形成。

二、上海“一月风暴”与全面夺权“二月抗争”及其夭折

1967年，由上海“一月风暴”始作俑者进而逐步蔓延开来的全国性“夺权”斗争，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月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成为“一月风暴”的先兆。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以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一批领导干部，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这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

毛泽东大力支持这个夺权行动。1月8日，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2日，《人民日报》发表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22日，《人民日报》再次就上海夺权发表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派”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2月5日，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上海开始的夺权运动，迅速波及全国。1月12日，山西省夺权；22日，青岛市夺权；25日，贵州省夺权；31日，黑龙江省夺权。这些夺权行动均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乃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夺权者与当权者之间，不同派别的夺权者之间的对立，导致了各地夺权的反复进行并频繁发生不同规模的武斗现象，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

毛泽东估计“全面夺权”的任务在1967年春季就可基本结束。为了保证夺权成果和稳定局势，毛泽东要求各地“造反派”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夺取政权之后要实现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要求各地“造反派”组织要整顿，要反对“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同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下发一系列指示，要求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维护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特别是，毛泽东还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先后参加“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万指战员，他们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作了大量工作，尽力维护了社会和生产秩序。

然而，“天下大乱”却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由于地方分裂成多种派别，“支左”实际上是支持一派，因而部队也深深地卷入到地方“内战”中去，在有的省还发生了省军区和驻当地野战军各支持一派，导致部队内部对立的情况。当时，在由哪一派掌握夺

取权力这一问题上，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你争我夺，寸步不让，互相以左派自居而指责对方为保守派，酿成了无数的冲突和残酷的武斗。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造反派”组织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间的冲突，一些地方“造反派”组织冲击军事机关并造成流血惨案的事件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严重危害国家的动乱，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争”。

在1967年1月19日、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就陈伯达、江青等提出要在军队内搞大民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叶剑英拍案怒斥江青等人，力陈保持军队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反对在军内开展所谓“四大”。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在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他们相继愤怒地指斥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诬蔑陷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行为，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叶剑英质问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还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无言以答。谭震林也怒斥张春桥一伙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会议记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在听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深感不满。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这些老同志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又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连续7次组织对他们批判和围攻，指责他们的抗争是“二月逆流”。随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二月抗争”被压制下去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各地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间的派性争斗也不断升级的局面。林彪、江青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人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一事说成为“自首叛变”。从此，全国到处“抓叛徒”。林彪、江青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先后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广州地下党案”、“内人党案”、“冀东‘叛徒党’案”等重大冤案,株连干部、群众达几十万人。

对刘少奇的批判不断升级。3月，中央设专案组审查。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下，6月至8月，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纠集数以万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困中南海，组成所谓“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冲击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刘少奇

专案组”用严刑逼供手段，制造了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在接受审查和批斗期间，刘少奇却连最基本的申辩权利都没有。

全国内战烽烟不断升腾。1967年5月，一些地方发生了武斗事件。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公开提出要“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此后，全国许多地方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战斗队。8月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叫嚷要“砸烂公检法”。各地混乱局面进一步恶化。8月上旬，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手榴弹、冲锋枪等武器。此时，全国各地的公安、检察、司法机关也遭到了更加严重的冲击，几乎都陷于瘫痪状态。外交部也遭冲击，8月7日，王力发表了夺外交部权的讲话，“造反派”竟占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以外交部名义向我国驻外机构滥发“造反”指示，并制造了诸如8月22日，在北京造反派煽动下，1万多人包围甚至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酿成严重的涉外事件，给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形象造成恶劣影响。

人民解放军也遭冲击。在江青等人煽动下，武汉地区一些“造反派”组织挑起武斗，公然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7月14日，王力、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武汉，四处点火，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引起武汉军民的极大反感。7月20日，武汉发生围困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王力和数十万军民示威游行事件，反映出广大群众和部队官兵对“左”倾错误的强烈不满。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随即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一批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揪斗、迫害；一些地方连续发生冲击部队、抢劫军用物资、杀伤解放军战士的恶性事件。

面对这种极为严重的动乱局面，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8月底，他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命令。对部分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管。7、8、9月内，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指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他号召各地群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呼吁“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他重申“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是少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武斗”。1968年1月，又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全国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1967年冬起，社会动乱局势一度趋于缓和。但由于毛泽东始终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集团从中不断干扰和破坏，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动乱的局面。到1968年春夏之交，一度有所收敛的武斗狂潮再度掀起，派性斗争导致许多地区的形势再度恶化。北京一些高校的对立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升级，造成人员伤亡。后来根据毛泽东指示，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不久，各地大中学校陆续恢复了教学秩序。工人、解放军进驻学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红卫兵造反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群众自发的造反行为，转变为在工人、解放军和革委会有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斗、批、改的做法。

三、国家政治制度的被冲击和法制的被践踏

从1967年上海卷起的“一月风暴”到1968年9月，经过20个月的所谓夺权运动，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开始时被称为临时性的权力机构，取代了当时已经瘫痪、半瘫痪的各级党政机关。

上海所谓的“一月风暴”，是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紧急策划的。夺权后，他们狂妄地把它比作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把新组成的权力机构称作“新上海公社”。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风暴”给予了全面肯定，但对新建立的政权的名称和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比较慎重。考虑到国家政体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就涉及国务院的名称甚至国号的问题，且国家政体的改变又涉及到外国是否承认问题。因此，他认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从此，上海和各地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都称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当时曾被誉为是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过程中的“伟大创举”。但其建立过程，既不符合民主的程序，又没有立法上的依据。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酝酿、协商、审查之后“推选”出来的。当时被少数人控制的舆论竟称，这种方式比用选举的方式产生领导机构“既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而实际上，它摒弃了人民实行选举的权利，革命委员会的产生没有经过必要的立法程序，就轻易改变了当时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政治体制。

当时的革命委员会普遍实行“三结合”原则，即由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代表、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共同组成。一般来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占50%，军队和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约占20%，剩下的10%左右的名额给其他方面的代表。这样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强调“军、干、群”三结合，在年龄构成上强调“老、中、青”三结合。但在实际上，由于所谓群众代表的比例高，使一些“造反派”头面人物进入政权机构，他们唯我独“革”，派性高于一切，拉帮结派，制造事端，成为革委会内部以至社会不得安宁的一个重要根源。当时的革委会事实上是集党政军和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的，不仅党政合一，而且权力机关和行政、司法机关合一。尽管客观上它应当承担起管理国家的各方面的职能，但实际上主要是适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根本不能担当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开始它在机构设置上曾特别强调“革命化”和“精兵简政”的原则，也曾使省级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了比较大的削减，但随后不久就又走上了机构膨胀的老路。

文革期间，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严重破坏。按宪法规定应于1966年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二次会议，迟迟不能举行，之后，讨论全国人大三届二次会议何时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在康生等人的控制下，根本没有经过讨论，就决定这次会议改期召开，具体日期另行确定。但实际上，在此之后8年之

久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再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仅保留着一个名义，作为其常设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负责人，只是在报刊广播上偶尔出现。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也被迫停止了活动，无法行使作为地方权力机关的职能。很多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其负责人因各种名目的“政治问题”被审查，被批斗。1968年，由康生主持并亲自审定的《关于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竟把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60人诬为“特务”、“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或“有严重问题”的人，占总数的52%以上。一段时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竟被实行军管，机关从人民大会堂迁出。这不能不使国家机关发生严重紊乱甚至完全陷于瘫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正常运转，必然带来民主、法制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定阶段里，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法制观念和法制规范的时期，甚至连群众组织都可以抓人、审讯，而辩护则被说成是对抗，是“罪上加罪”的“证据”。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为量刑、定刑机构，它的“指挥官”，就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普通平民百姓，就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批准任命的中央政府的部长，乃至作为国家元首的主席，都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被投入监狱。尽管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上明文写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但这些法律规定，都已不起任何作用了。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被迫害时，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尊严与人格。他义正辞严地对那些横行无忌的造反派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作，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他还说：“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辩护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在林彪、江青一伙精心罗织的罪名诬陷和迫害下，1969年11月12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了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含冤逝世于开封。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达到2.6万多件，祸及2.8万多人。

同时，作为我国政治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严重冲击。林彪、江青一伙疯狂破坏统一战线，诬蔑人民政协是“牛鬼蛇神的窝子”，说“政治岂能协商”。各级政协完全陷于停顿状态。各民主党派也被视为“异己力量”而被迫停止活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不少领导人和成员也受到批判、斗争。1968年8月康生主持下编造的《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给159名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的74人扣上了“反革命”、“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帽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

四、国民经济的动荡与恶化

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来说，不能说不重视经济建设。他力图使政治

与经济、革命与生产达到和谐的统一。"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的提出，典型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意念。但悲剧在于，这个口号被赋予的特定内容，是各项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而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生产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破坏。

政治运动严重冲击经济建设，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普遍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江青集团对此更是推波助澜。"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连"使全国交通不堪重负，1966年底，仅积压待运的煤炭、钢材以及食盐等重要物资，就多达1000万吨，不仅严重影响生产秩序，而且波及人民生活。交通运输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忧心如焚，纷纷向中央反映。但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却极力批驳认为"全国串连妨碍生产"的正确意见。1966年12月9日和15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虽然文件规定应利用业余时间"闹革命"，工厂仍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但"革命组织"的广泛建立和"串连"的自由进行，不可避免地使内乱的浪潮在工厂、农村随之出现，冲击工农业生产。

1967年1月开始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不同观点和派别的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中相互攻击、争斗不已。不少地方和部门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而原来负责生产管理的干部则大都被迫"靠边站"，甚至被打倒了。江青提出的革命造反派不仅要"文攻"还应该"武卫"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使不同观点的派别斗争又升格为持枪持棍的"武装斗争"，"内乱"进而演变成了"内战"。在各种"造反派"头头的鼓动和胁迫下，大批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擅离职守，去"闹革命"或者参与武斗了，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铁路、公路、水运、港口不能正常运转，致使一些地区物资供应难以保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却仍然四处叫嚷："不能容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生产压革命"。在他们看来，似乎"革命"就是一切，生产是无关紧要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最为动乱的1967年和1968年的国民经济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管理机构瘫痪或基本上瘫痪，经济发展失去控制。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1968年竟没能制定出国民经济计划。虽然许多有良知的工人、农民依然坚守在生产岗位上，对铁路和煤炭等关键部门也实行了军管，但未能改变上述局面。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工农业生产显著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生产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10%，为2306亿元，1968年比1967年又下降4.2%，为2213亿元。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仅相当于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2534亿元的87.3%。由于生产下降和经济效益差，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和物资供应不足。1966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558.7亿元，1967年降为419.4亿元，减少了139.3亿元，减少了25%。1968年又降为361.3亿元，比1967年又减少58.1亿元，减少了13.9%。1967年还出现了22.5亿元的赤字。在此期间，1968年的国民收入比1966年实际减少171亿元。物资的不足，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甚至连日用消费品也开始出现短缺，人民生活水平随之下降。

五、动荡中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两字，主要是因为这场风暴首先是在文化领域掀起的，而运动初期发生的红卫兵狂热的“造反”行动，也主要开始于文化领域而波及到其他方面，因而这个领域受到的破坏最烈。

当时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狂潮，是以破“四旧”为先导的。这个荒谬的口号源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又为《十六条》所肯定。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又一次号召红卫兵破“四旧”。经过林彪的鼓动，先是北京随后又推向全国，各种名目的红卫兵涌向街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四旧”的狂热下，抄家打人、乱烧乱砸，不一而足。这场浩劫的直接结果，首先是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无数珍贵文物、古籍被破坏，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各地挖古墓、砸佛像、焚古书、毁古迹的严重事件不断发生。杭州西子湖畔，作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的岳飞像、平湖秋月碑牌，或被推倒，或不翼而飞。寺庙被破坏，有的被关闭，具有1300年历史的拉萨大昭寺也难幸免。按照“破四旧”的主力军——红卫兵的观点，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无不打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乃至修正主义的烙印，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是格格不人的，当然没有保存的必要。除去这些有形的破坏之外，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文明行为，也无不被按照红卫兵的标准重新衡量、审视一番，通得过的，才有继续留存下来的资格，否则就会被无情地破除。一时间愈演愈烈的打、砸、抄现象，不只是红卫兵的幼稚行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被“左”倾指导思想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而又被他们所肯定。

另一方面，以神化毛泽东为核心的现代迷信运动，又渗透到各种文化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出现了种种怪异现象。如在交通道口、十字路旁、路边围墙、临街楼面，原有的广告牌示全都取消，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刷上了红色的大幅毛泽东语录，这被称之为“红海洋”。工厂、机关、学校上午8点钟上班后，先不开始工作，而是先搞一个小时的“雷打不动”的“天天读”（“读毛主席的红宝书”），翻来复去地背诵“老三篇”，还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人人学跳“忠字舞”。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场实际上是“革文艺的命”的所谓“文艺革命”。在破除“文艺黑线专政”的旗号下，大批文艺界著名代表人物和知名人士被划人“文艺黑线”的圈子，成了反面人物，受到各种批判，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剧种、剧目和文艺形式，大都被勒令停止上演和表演，被允许上演的电影为数寥寥。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主管全国文化工作的中央文化部所属单位、文联、各种艺术家协会及其工作人员，全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文艺的百花园地一片凋零，唯独被誉为“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以其欺世盗名搞的几个革命“样板戏”“一花独秀”。70年代初，中国的文艺界可以称为是“样板戏”的世界。不仅

广播、电影不厌其烦地播映，各种其他艺术形式，如钢琴演奏、交响音乐乃至地方戏，也纷纷效法和移植“样板戏”。人们说：“八亿人口八个戏”，确实是当时文艺状况的真实写照。“样板戏”所贯彻的“三突出”原则，明显的是个人崇拜的英雄史观在文艺创作理论上的典型反映，是要突出江青个人及其所实行的“左”倾文艺路线。对不合其口味或不肯追随其后的文艺作品，江青等则利用其地位与权力轻则批判，重则打成“毒草”禁止上演。优秀影片《创业》和《海霞》，没有遵从江青等人的创作模式，被诬为“毒草”，不许公演。毛泽东对这种现象也表示不满，他说，现在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作为人们精神食粮来源的图书报刊的出版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也是一片凋零。“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0143种，杂志790种，报纸343种，到1968年，下降为：图书3694种，报纸42种，杂志22种。书店中书刊寥寥，图书馆中大批反映人类文明的书籍被封，不允许自由借阅。1971年国务院曾召开出版工作会议，之后，陆续出版了少量辞典、小说，对群众开放了一批经审查过的图书。为整理研究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整理出版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刊物复刊。但无论是书还是刊，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印记十分明显。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与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相去甚远。人们无不哀叹：“文化革命”，确实“革”了文化的“命”。

“文化大革命”从教育领域发源，也必然严重冲击教育。毛泽东对建国后的教育工作有个基本估计，认为学校处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之下，“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之一，是夺取教育领域的领导权，并“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文革”初期，广大青年学生缺乏政治经验，涉世不深，出于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与忠诚，出于对“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盲目地加入了打倒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代表人物”和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活动。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旗号下，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开展“革命大批判”成了中心任务。不少青年学生在政治狂热情绪支配下，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月“夺权”风暴之后，由于造反组织派系林立，你争我夺，校园内“炮轰”、“砸烂”之声不绝于耳。学校再也不是可以宁静读书的地方了。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但在教学和改革中，各种学校都强调“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主课”，因为这被视为“根本的政治方向，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方针”。由此可见，此时的教学与教育改革，实际上依然被严重依附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作为改革“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的一项根本措施，从1968年8月起，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他们被赋予的任务是：“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是由贫下中农的代表管理学校。

从1966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都停止了招生。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其中规定，废除以前实行的通过

全国统一考试录取新生的制度，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的对象，是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分子，而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学制缩短为3年。这些经推荐而进入高等院校的工农兵学员，在读书的同时，还被赋予“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任务。在这场“教育革命”中，原有的大学教师队伍，由于被认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不少人被分赴农村、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和再教育了。由于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师积极性不能发挥，教学秩序又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明显下降。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是中国高等教育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的10年，学业的荒废，无论对青年学生还是对教师来说，都是至为严重的。

中等教育也不能幸免于难。当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走出校门的时候，他们没有大学可以报考，正值动乱之中的社会本身又没有为安置他们就业做好准备。这是一支很庞大的人群。仅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高中学生就达近千万之多。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新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全国随即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边远地区锻炼和改造的热潮。这作为“反修防修”的一种运动，实际上也成为解决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应急措施。强调向工农学习，这固然是必要的，但由此导致中学毕业生全部放弃学业，使一代人的文化教育受到严重影响，其代价委实太大。这使我国本来就不算发达的基础教育受到又一次巨大冲击。

据统计，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少培养了100多万大专毕业生和200多万中专毕业生。基础教育也受害甚烈。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其后果将在以后若干年内显现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学技术事业所受到的冲击和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在“左”倾路线统治下，科技战线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而受到批判，其中许多学有所长、有建树和有贡献的专家们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对待，他们或者被迫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科研岗位，或者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干校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和立场”。由于内乱、武斗和群众组织间的严重对立，很多科研机构不得不中止科学研究，有的研究所则是被人为地“砍掉”和关闭了。作为中国科研机构最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大批研究所被拆散，很多科研项目被迫下马。全院的100个研究单位和6万名职工，经过几年折腾后，到1973年就只剩下53个研究单位和2.8万名工作人员了。地方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也与中国科学院的处境相类似。这种状况，不仅造成科技人才的一代空白，使科技事业后继无人，而且使亟待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本身受到极大损失，10年间，除个别研究领域有所进展外，中国科技园区大部分是一片荒芜，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研究因被批判而停止不前或被取消，应用研究也成果甚微。六七十年代，正是国际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中国周边一些原本不太发达的国家也通过“科技兴国”而使经济开始了腾飞，中国则由于政治的动乱，贻误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时机，并且进一步拉大了与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这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

第二节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

一、中共九大的召开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的合法化

当全国务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相继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准备“九大”，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中共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原 97 名八届中央委员和 73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竟占 71%，只有 40 名中委和 19 名候补中委出席全会，不到法定人数的一半。开会时从与会的候补中委中增补了 10 人为中央委员，才达到超过中委的半数。而被扩大吸收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各方面负责人达 74 名，占出席会议人数的 55%以上。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全会。他在讲话中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其根本方面是正确的。林彪则继续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损失最小，是足以和世界历史上的希腊古典文化传播、意大利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相提并论的“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一。在会议分组会上，在林彪、江青等人组织下，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遭到围攻和批判；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也遭到所谓“一贯右倾”的攻击。在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的情况下，全会即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酿成全国最大的冤案。中央委员陈少敏在表决时拒绝举手。

全会通过召开中共“九大”的决定。这次全会不仅继续和发展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错误，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程序，而且也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奠定了“左”倾错误的基调。

1969 年 4 月 1 日，在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中共九大在北京开幕。由于各地党委在所谓“造反”和“夺权”中受到严重冲击而大多瘫痪，正常的党员组织生活还未恢复，因此“九大”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和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酝酿协商”产生的。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权力将他们帮派体系的人塞进“九大”，使“九大”成为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组织严重不纯的一次党代会。

林彪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大力渲染这个理论的意义；回顾了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修改后的党章把“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取消了党员应有的权利，取消了新党员的预备期，为一些由“造反”起家的野心家混人党内、夺取权力大开方便之门。同时，这个新党章还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总纲，这在中共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月24日，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在新选的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委、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中央委员会不正常地换班，致使许多老革命家被排斥，而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组成。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成员占到了半数以上。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大大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九大”召开后，毛泽东以为大局已定，再用一年的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了。然而，“左”倾错误的发展，林彪、江青集团的形成，使中国政治又面临着新的危机。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抢班夺权阴谋的被揭露和武装政变的被挫败

林彪及其一伙虽然已经控制了党内军内很大一部分权力，但其权力欲望不仅没有满足反而随着权势的增加而更加膨胀起来，企图以召开四届人大为机夺取更大的权力。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在他看来，设不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但林彪一伙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机会，把国家主席一职作为觊觎的目标，叶群曾私下称：“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真实地暴露了林彪的野心和企图。林彪在革命战争年代立有战功，作过一定的贡献。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他的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在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后，利用其掌握的权力残酷地打击和迫害党内正直的同志，并形成了以攫取权力为目的、互相勾结和利用的宗派集团。这个集团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法西斯的特点。经过中共九大，不但林彪取得了被法定的“接班人”地位，而且它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人了中央政治局。这个集团同后来形成的“四人帮”江青等人，存在着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矛盾的微妙关系。这时林彪既担心自己的健康不好，又怕羽翼已丰的江青一伙抢先夺权，因而急于抢班，把国家主席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在毛泽东多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情况下，一向以紧跟著称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于4月11日仍然提出要设国家主席，他对其党羽一再强调：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表面上，他虚伪地建议请毛泽东担任

国家主席之职。毛泽东断然拒绝，明确表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他还拿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典故为例，指出：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林彪一意孤行，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加紧准备，指使党羽搜集"称天才"的材料，伺机借题发难。这种极不正常的做法，预示着一场大的斗争即将爆发。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心议题之一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会议一开始，林彪有预谋地抢先发表讲话，以颂扬毛泽东为幌子，称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继续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同时又利用宣传"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敲打不同意这种提法的江青集团。这样，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积累日久的矛盾表面化了。这时，陈伯达由于和江青的矛盾并看到林彪的权势炙手可热，投靠了林彪集团。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按林彪讲话的口径，在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陈伯达在华北组作的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登人华北组会议第2号简报，制造了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的紧张气氛，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也有人由于不明真相而附和林彪一伙的意见。

毛泽东觉察到了林彪一伙的宗派阴谋活动，8月2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2号简报，并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印发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同时也尖锐批评了"天才"论的观点，明确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全会赞同，开展了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并批评了吴法宪等人。全会恢复了对原定议程的讨论，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在党内开展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同时，号召全党高中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陈伯达所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军区，免去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职务；派人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以打破林彪及其党羽的把持。在中共中央1971年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叶群、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得不作了检查。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作总结时明确指出，他们这些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分裂党的路线上去了，希望

他们能实现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经过批陈整风，林彪等人知道，批判陈伯达，实质上是批判他们自己。

当时对林彪还留有余地，采取保的态度，没有直接点名批判。但林彪及其一伙不仅不思改悔，反而准备铤而走险，暗中加紧策划军事政变，企图谋害毛泽东，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林彪之子、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林立果充当了急先锋。1970 年 10 月，他利用职权秘密组织代号为“联合舰队”的武装政变力量。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并在上海、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其成员进行特种训练，其中包括对林家父子的“效忠训练”和“不成功便成仁”的法西斯教育。这个反革命别动队主要成员于 1971 年 3 月间在上海炮制了作为政变计划的《“571 工程”纪要》（“571”即“武起义”的谐音指武装政变）。《纪要》规定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为纲领，以“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用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手段，谋害毛泽东，实现其抢班夺权的目的。正当他们紧锣密鼓部署这个政变计划的时候，从 8 月 15 日开始，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一些省市巡视，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分别与两湖、两广及江西、江苏、福建、上海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他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并且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着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与斗争，明确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明确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9 月 6 日，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了解到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途中的谈话内容后，惊恐万状，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加害毛泽东。9 月 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9 月 8 日，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政变手令。林立果携带这个手令到北京后，即与“联合舰队”骨干分子部署实施方案。他们的计划是：乘毛泽东在外地巡视之机，在上海地区采取谋杀行动，事成即由林彪以“接班人”身份在北京宣布接班；若政变不成，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造成割据局面，同时还为外逃叛国作了准备。

9 月 3 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当他了解到一些异常情况后，立即机智地突然改变行程，提前乘专列离开杭州，于 9 月 12 日安然抵达北京。这一行动使“联合舰队”的谋害计划破产。

林彪在获悉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失败后，立即将在北京的 256 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并另安排 8 架飞机，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于 13 日南逃广州，实现其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计划。12 日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 256 号专机为何突然去山海关，并令该机立即返京。林彪等见南逃阴谋已难实现，惊恐中慌忙决定外逃叛国。13 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 256 号专机仓皇出逃，向北飞越中蒙边境。该机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落，机毁人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严重事件，使全国政治局势保持了稳定。“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中断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至1973年间，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负责领导政府工作的周恩来，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地减少这场动乱造成的损失，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生活。这时他又临难受命，协助毛泽东，尽力消除极左错误造成的恶果，使国家生活正常化。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党高级干部通告林彪叛国事件。其后又自上而下向各级干部和党员传达。鉴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继续频繁活动，毁灭罪证，拒绝向中央揭发交待，党中央于9月24日责令他们停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被林彪一伙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这一系列措施，妥善处理了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各种重要问题，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着手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解决他们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周恩来紧密配合下，这项工作取得较大进展。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就在实际上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在谈话中也肯定陈毅对中国革命是“立了大功劳的”，“是支持我的”。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各种不实之词。为陈毅恢复名誉一事，在广大老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重申党的干部政策，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这前后，一大批遭到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并被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也陆续回到工作岗位。1973年12月，毛泽东会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

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坦率地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清算林彪集团的罪行，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集中主要精力整顿经济秩序，恢复科技、文教和卫生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使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两年间，各方面的情况开始有了转机。应当说，林彪的自我爆炸，在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同时也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毛泽东仍然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仍然重用江青等人，并且又把"造反"起家的、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调中央工作，作为他在林彪事件之后，准备选择和培养的又一个接班人。这样，不但使当时一定限度的政策调整继续受到江青一伙的干扰和掣肘，而且还使政治局势的逆转和反复成为不可避免。

在批林整风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从1971年底到1972年秋，在中央相继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交通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和科学工作会议上，他都强调要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放在重要位置，清除它的影响。他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1972年7月，他鉴于极左思潮对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破坏，向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提出，要把北大理科办好，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这篇着重强调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重要性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的文章，在教育界、科技界和其他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反响。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两次讲话批判极左思潮的精神，组织并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3篇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和1973年提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两个文件对于纠正经济建设上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空谈政治，加强经济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措施，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切中时弊，抓住了要害，是1967年老一辈革命家在"二月抗争"中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但是，江青一伙是靠煽动极左思潮、制造混乱起家的，对极左思潮的深入批判，必然要触及他们一伙同林彪集团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江青等人讳莫如深的一个要害问题。因而江青集团以刻骨的仇恨窥测方向，阻挠和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发表攻击周培源的文章，并扬言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他们攻击《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是"毒草"，责令在人民日报社内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会议的任务是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个报告经周恩来批示同意，但却遭到江青、张春桥的极力反对。他们打出"批林要批得全面"的幌子，断言林彪的主要问题是"极右"，

并居心叵测地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在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深恐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作出了林彪集团是极右而决非极左的判断，错误地支持了江青等人的意见。从此，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江青一伙则乘机大反所谓"右倾回潮"，使周恩来纠正极左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经过大约两年的批林整风之后召开的，但大会未能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作为首要任务，并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提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的老党员，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江青集团的势力通过这次大会得到了加强，特别是王洪文被提升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此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四、国民经济在动乱中艰难举步

中共"九大"之后，随着政治局势趋于相对稳定，坚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治理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秩序，加强了中央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国民收入达到1617亿元，比上年增长19.3%，全国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了1966年的水平。197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农业方面，重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反对强制扩社并队搞"穷过渡"，反对限制多种经营和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反对把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不搞平均主义，等等。工业方面，国家对地方上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水泥、小煤窑、小化肥）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和税收、留利上的适当优惠，使地方工业的生产能力有了较迅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把中央所属的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权向省、市、自治区乃至地（市）下放，以解决经济管理体制中过于集中的弊端。这些，使1970年的国民经济比1969年又有所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7%，这一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订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1966年的指标。在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的时候，一种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情绪开始抬头，同时对国际对抗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战争危险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致使以加强战备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指导方针，要求建成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新飞跃。林彪一伙乘机提出和推行"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方针。其后，作为战略后方的三线地区（指相对于东北和东南沿海的一、二线地区，包括西北、西南等广大区域）的建设被置于最突出的重要地位。在三线建设中又由于实行

"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工程施工难度大，费用高，生产经营困难，而且冲击和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970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曾把全国划分成西北、西南、东北、新疆等10个协作区，要求他们迅速形成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具备"自己武装自己"的能力。为此，企业管理权、财权、投资权大部下放。企业管理权以1970年3月5日拟定的《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精神，很快把包括大庆油田、开滦煤矿等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2600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不加区别地一律下放到省、市、自治区乃至专区、市管理。由于动作不协调、政策不配套，造成企业的生产秩序难以维持，经济效益明显下降。1971年进一步提出"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要求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其结果，高积累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的问题随之产生，农轻重比例失调。1970年的积累率为32.9%，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为618亿元；1971年的积累率为34.4%，积累部分为684亿元，而且积累额中生产性的开支比重高达76.2%。这样高的积累率必然影响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规模过大，许多地方和部门争上项目。1971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692个，比1970年多出524个。这必然造成原材料和设备方面的紧张。重工业增长较快，1971年比1970年增长了29.9%，而轻工业仅增长了6.2%。农业的发展速度缓慢，造成工农业发展比例上的不协调。到1971年底，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原计划4 850万，实际达到5 318万），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原计划794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原计划290亿元，实际上达到320亿元），货币发行也"到了最大警戒线"。这表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已形成了危险的倾向。

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首先发现并提出国民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强调批判极"左"思潮时，明确指出，要破除"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观点；企业要整顿，不仅要抓产品的产量和品种，而且要抓质量，抓利润指标，抓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1972年与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着重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加强基本建设的计划管理和拨款监督，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加强经济核算，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通过采取调整政策，着重解决基建战线过长、三线建设过急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相应降低了军政费用支出的比重；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切实把农业放到首位；调整"四五"计划中原定的过高的指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强调计划的权威性和纪律要求等。这些措施使基本建设规模继续膨胀的势头得到抑制，"三个突破"得到有效控制，三线建设也转入了较正常的状态。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财政收支取得平衡。1973年成为几年来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这年引进工作也迈出了大的步伐。根据周恩来指示制定的"四三方案"，决定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化纤，3套石油化工，3个电站等大型项目。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第一次大型引进。其项目的相继建成、投产，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五、国防战线的斗争与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使国家许多军事机关被冲击，军事干部被打倒，军事院校被停办，军队和国防建设受到极大的损害。

军队的稳定，是国家安全之所系。在动乱中，党始终领导着整个国防事业，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对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作出指示，以排除干扰，保证军队的稳定，促进国防事业的发展。1967年1月，林彪、江青提出"揪军内走资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时，毛泽东即予以痛斥，指出这是"毁我长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发布命令和通告，三令五申军队要稳定，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准到部队抓人。林彪集团覆灭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一方面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同时着手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1972年4月，中央军委批发《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指出："要充分看到林彪的破坏给部队造成的恶果。办好教导队，抓紧基层干部的轮训，提高他们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是整顿好、建设好军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军备战的迫切需要。"1973年12月，中央军委转发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军院校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四十一所院校的报告》，提出了恢复和增建院校的原则和方案，以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适应军队建设和备战的需要。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提出大军区司令员长期在一个地方不好，应作相应调动的建议。12月22日，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调动。在此期间，还通过对军队的整顿，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促进部队的稳定和统一，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全国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警惕地守卫着祖国边疆，并在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坚决打击来犯之敌，取得了保卫国防斗争的胜利。1969年3月和1974年1月，我国边防部队胜利地进行了珍宝岛和西沙群岛的保卫战。

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属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岛上执行巡逻守卫的任务。自1967年起，苏联军队多次侵入珍宝岛及其以北的七里沁岛地区，干扰我边民生产，并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中国方面一再严正要求苏方立即停止入侵挑衅活动，恢复边境的安宁。但是，苏联方面对此置若罔闻，反而频繁侵入中国境内进行挑衅。1969年3月9日，苏方出动大批武装军人和4辆装甲车、汽车侵入珍宝岛，对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突然袭击，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15日，苏方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又出动坦克20余辆、装甲车30余辆和大批武装部队，在飞机掩护下，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并用重炮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猛烈轰击。中国边防部队再次将其击退。17日，中国边防部队又击退了苏联军队对珍宝岛的第三次入侵，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西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南越阮文绍集团不但继承日、法帝国主义的衣钵，

长期侵占中国西沙群岛的珊瑚岛，并于1973年又非法宣布中国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岛屿属其“管辖”。1974年1月11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南越当局对中国领土的肆意侵犯，重申中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等群岛拥有领土主权。但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竟于1月15日、18日，派遣军舰侵入西沙群岛海域，强占甘泉、金银两岛，并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多人。中国军民于1月19日开始进行自卫反击，收复了被占岛屿，保卫了国家领海安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外事工作一度陷入混乱和困境。林彪、江青一伙竭力插手外事部门，肆意抹煞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成就，煽动红卫兵制造了一系列重大的涉外事件，特别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周恩来一直设法制止这些极左错误的做法。毛泽东也多次亲自过问，提出批评。经过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林彪、江青一伙夺取中央外交大权的图谋无法得逞，逐步克服了外事工作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1969年以后，我国对外关系重新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美日等国提出的关于保留国民党集团席位的提案未予表决即被废置。这件事突出说明长期以来美国实行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反映了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敢于冲破美国制造的种种障碍，合理解决中国席位问题。这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大胜利。

在这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世界局势发生变化这一有利时机，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打破国际关系中的坚冰，开创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局势转换的关键，是他们及时作出的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亲自付诸实施，逐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这时，中美两国政府都依据各自国家的利益和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把改善两国关系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美国政府在坚持了20多年的孤立中国的政策已日益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力量，为了对付它面临的美苏对抗的严重局面，也为了改变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日益下落的国际形象，需要调整同中国的关系。而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为实现这个目的提供了机遇。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即通过一些渠道向中国方面表达了上述愿望，并采取了诸如宣布放宽对华人员来往和现场交流的限制、减少美国舰队在台湾海峡活动等措施，作出了要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中国政府对美国这种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向做了积极而迅速的反应。这时中国为了着重对付北方边境苏联集结重兵所构成的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为了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解决中美之间的长期争端，同时也为了打破国际关系中的某种僵局，扩大国际交往并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需要适时改善同美国的关系。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请他转告华盛顿：“如果尼克松到中国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并表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就得同尼克松谈。这是中国领导人向尼克松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1971年4月，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决策，指示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后又亲自会见他

们。这被称作“乒乓外交”的一着妙棋，通过“小球转动了大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71 年 7 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了准备。公告发表后，轰动了世界舆论。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同他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会谈，并于 2 月 28 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确认双方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关于台湾问题，美国方面在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并为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原则基础。1973 年 2 月，基辛格再度访华。经双方商定，为加速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扩大各方面的交往，两国各在对方首都设立一个联络处。同年 5 月，中美双方完成了互设联络处的工作。

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战后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政策，并与台湾方面保持着“外交关系”。日本朝野一些有识之士一直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努力。这时美国政府谋求缓和同中国关系的秘密活动，同样避开日本政府，这种“越顶外交”的做法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1972 年 7 月佐藤政府因遭到各方谴责而倒台。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明智地采取了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方针。通过双方的接触，1972 年 9 月 25 日，田中角荣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田中首相。中日双方经过会谈，于 9 月 29 日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提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日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国决定立即建立外交关系，随后，日本同台湾当局断绝了外交关系。1973 年初，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中日建交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陆续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和科技文化等一系列协定。两国贸易额迅速增加。根据中国政府建议，1975 年中日两国开始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睦邻友好关系，这对于两国的发展和亚洲与世界的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关系缓和与中日建交，打破了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孤立遏制中国造成的某种外交僵局，出现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1969 年以前，除苏联东欧以外的欧洲各国，只有 6 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中美关系改善后，出现了中国同西欧各国建交高潮。1971 年 7 月到 1973 年初，中国先后同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西德、卢森堡、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 年，中英、中荷之间也先后将原来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5 年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70 年代初，中国同北美的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4年初，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形成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观点。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美苏以外的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特别是受到第三世界广大国家的欢迎。这个理论是根据对世界新格局的认识，强调了美苏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同世界反霸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指出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并提出广泛联合第二世界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矛盾的思想。三个世界的划分，为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战略性指导原则，指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继续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间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个指导原则，为改善和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理论依据，并且为我国日后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

70年代，中国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重大发展，建交国家的数目大大增加，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建交高潮。在70年代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建交，亚洲地区由原来的16个增加到26个，非洲地区由原来的18个增加到45个，拉丁美洲地区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13个。这些新增加国家绝大多数是在70年代前期建交的。此外，大洋洲地区的斐济、西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也在这期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坚决支持这些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干涉和侵略的斗争。中国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和多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亚非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良好的协调合作关系，共同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斗争。

这一时期，由于苏联继续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挑起边界武装冲突，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被迫加强战备的同时，仍寻求通过谈判的途径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1969年9月，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见时，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达成协议。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关于边界问题的中苏副外长级的谈判，先后进行了15轮会谈。两国总理会见时曾商定双方应首先签订一项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但在副外长级谈判时，苏方竟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有争议地区的事实，违背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致使历时9年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取得任何结果。中苏关系未能得到改善。但在70年代，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却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中国同东欧各国的贸易、人员往来和科技交流都开始恢复。从1970年起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也有了明显变化。

第三节　全面整顿的成效及其挫折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一、"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组阁"阴谋的破产　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日益膨胀起来，并加紧进行夺取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他们把周恩来、邓小平视为其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千方百计制造事端，诬蔑、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在周恩来生病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使党和国家再次陷于危难。于是，党和人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进一步突出起来。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是"尊孔反法"的，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儒家和推崇法家联系起来。于是，江青等利用"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家中清查出来的一些儒家人物的语录卡片和条幅、笔记等，指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并于1974年1月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中共中央于1974年1月18日将这份材料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要借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维护"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而江青集团竭力推行"批林批孔"运动则是另有图谋。他们看到在这之前，即1973年7月毛泽东批评过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的工作，"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变，势必搞修正。"12月批评过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为"军委不议军"。据此，他们以为有机可乘，企图通过这次运动打倒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军领导人，扫除由他们"组阁"的障碍，以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以"批林批孔"领导者自居，先后在北京召开的驻京部队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动员，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部队的一批领导人，把周恩来、叶剑英置于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另一次讲话中声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求写文章批判"现代的儒"。由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文章，把孔子写成"宰相儒"，借批"宰相儒"影射污蔑攻击周恩来。4月，《红旗》杂志发表由江青、姚文元点题并定稿署名"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和署名"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评〈吕氏春秋〉》的文章。《孔丘其人》通篇不批林彪，却把孔子描绘为"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见鲁君"。而《评〈吕氏春

秋〉》则说："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今天仍还可以看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有的文章以批孔子"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实际上是对周恩来为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重新安排一度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针对周恩来纠正科研、教育中"左"倾错误的努力，从清华大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击右倾回潮"的浪潮。他们妄图搞乱军队，向部队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或派其亲信去部队单位，或利用有关会议之机，极力煽动在军队内部"点火放炮"、"放火烧荒"、"可以夺权"。这样，"批林批孔"运动使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度急剧下降。据 1974 年 1 至 5 月统计，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6.2%，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5%，钢铁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9.45%，化肥产量也比去年同期下降。

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情况，和江青等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觉察后，1974 年 4 月 10 日，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出"笼统地讲，'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批驳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7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并且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他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1974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通知发出前的 10 月 4 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又成了江青等实现"组阁"阴谋的一大障碍。10 月 17 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问题，要邓小平立即表态。邓小平顶住了他们的围攻。10 月 18 日，江青等经过密谋策划，派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10 月 20 日，毛泽东又作出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11 月 12 日，毛泽东对江青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12 月 23 日，周恩来带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3 个职务。1975 年 1 月 5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 月 8 日至 10

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1966年7月7日举行的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后，相隔8年零6个月举行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等方面推选的，有的是指定或特邀的。代表总数为2 885名。中共党员和工农代表所占代表总数的比例都大大高于前3届。这次会议议程有：①修改宪法；②审议政府工作报告；③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展示了1964年12月第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这部宪法的严重缺陷和问题是：在“序言”和“总纲”中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在经济制度上，忽视发展生产力这个极为重要的任务，离开生产力的状况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取消农业个体经济，对非农业个体劳动者经济和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予以极大的限制。在国家政体上，削弱政权机关的职权，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夺权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代替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人民政府，使革命委员会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一体化；肯定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取消国家主席建制；取消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制度，以及公开审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制度；取消了人民检察院，规定由属于行政机关系统的公安机关取代检察院，把公安机关逮捕犯人的批准权交由它自己来行使；取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和监督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等重要职权，以及取消“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等规定。

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二、全面整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其恶果

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2月2日，他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从此，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根据四届人大的要求，国家计委拟定了《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规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和8项主要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11%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375亿元，计划施工大中型项目1106个，其中新开工项目48个，建设重点大型化肥、化纤、乙烯和轧机项目18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安排121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70亿元。进出口贸易安排133亿美元到138亿美元，大体保持上年预计水平。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各850亿元。

为了实施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国的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

当时，在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下，闹派性、打派仗，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同日，邓小平到会发表讲话。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就是四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当前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铁路成了薄弱环节。“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铁道部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一些捣乱的派性严重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这些有力措施深得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1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到7800多车，是5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前4个月，全国欠产钢195万吨，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欠产严重。5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4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找一些不怕打倒

的人进领导班子，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步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腾腾的，总是等待。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现在“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钢铁工业的整顿立见成效，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国务院为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于6月16日至8月11日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李先念等8名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会议第一阶段，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第二阶段，分为理论、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规划、改革计划工作、轻工农林商业，以及文教和科技10个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开了6次会，听取各小组汇报研究结果。务虚会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在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办法，国家计划不能层层加码，或随便减少任务。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和远洋航运、重要的科研设计单位、专业施工队伍，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要由中央各部委为主管理，其余的由地方管理，但不能层层下放。在物资管理体制上，物资部门管理通用物资，专业部门管理专业物资，设备成套走向以地区成套为主。在财政体制上，推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大中企业的折旧基金中央集中20%至30%。要整顿软、懒、散的班子。对职工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建立岗位责任制，各项生产管理制度要严格执行。大中型企业非生产人员不得超过职工总数的18%，中小型企业不得超过10%。务虚会还就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技等问题，提出一些设想。

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于7月28日至8月4日举行，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除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和坚持质量第一以外，特别指出：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他提出要解决工人吃肉吃菜的问题，建议发展养猪、养鸡场。“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为使全国的工业发展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能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的章程，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起先是14条，后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改为20条，故简称“工业二十条”。邓小平在国务院8月18日讨论这个文件时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2）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

煤矿，用煤炭偿还。这样做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一个大政策。(3) 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4) 整顿企业管理秩序。(5) 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大政策。(6) 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7)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工业二十条”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得到普遍赞同，对当时工业的整顿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起草这个文件的同时，国务院有关部门也先后起草了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7 月 17 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指出：“3 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6 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 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针对农业受到很大破坏的情况，决定对农业进行整顿。1975 年 9 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并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中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

对科技和文化教育同时进行整顿。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发国防科委临时党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使这个部闹派性达 9 年之久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开始出现较为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7 月，中共中央批发国务院关于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9 月，科学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写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分 6 部分，主要内容是：(1) 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2)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3) 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科学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4) 自力更生，又不闭关自守。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5) 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6) 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学工作的

重要思想。

军队的整顿，是全面整顿的一个重要方面。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6月24日至7月15日，邓小平和叶剑英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直属院校的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问题。会议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军队现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讨论了军队进行整顿的措施。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军队必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军队本身的团结。军队建设中要克服"肿、散、骄、奢、惰"的缺点，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他认为军委工作要抓编制。"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的干部了"；要抓装备。装备要抓好，要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总后勤部要订出规划，要有一些人专门管这个事"；要抓战略。"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办法"。叶剑英在总结中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政策；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坚定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就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会后，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和叶剑英的讲话。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等组成的领导小组，从8月到年底，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军队部署，也进行了调整。这对于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全国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全面整顿，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人的支持，并迅速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扭转了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使1975年的形势明显地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75年达到4504亿元，比上年增加了480亿元，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左"倾政策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江青集团也以此作为反对邓小平的"依据"。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同周恩来等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

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作了误解，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了违反实际的分析。他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从维护“文化大革命”出发的，反映了他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忧虑。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提出全面整顿方针以后，毛泽东这些谈话中的错误论述被江青集团加以夸大、渲染，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3月1日和4月1日，姚文元、张春桥分别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因此，要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把“经验主义”看作主要危险，号召开展反对“经验主义”的斗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江青集团反对“经验主义”的提法引起毛泽东的注意。5月3日，他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江青集团说：“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再一次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江青集团进行了批评。8月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还在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成员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这次谈话中，他又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采纳姚文元的提议，批准发动评《水浒》运动，目的是把它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江青公然编造“《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借此诬蔑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斥责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但是，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毛远新来保持不多的联系。江青集团的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汇报，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恶劣的影响。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听了江青集团的诬告，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11月3日，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反映江青集团两个亲信人物的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指示为起点，开始

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个通知不寻常的地方，一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通知任命政府主要负责人；二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把叶剑英“生病”情况通知全党，而当时叶剑英身体健康，并无不适。显然，这是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组织措施。2月上旬至3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有关这次运动的多次谈话稿。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是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实际上是在江青集团直接控制下进行的。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放肆地攻击邓小平。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批文章，把当时为发展生产力而采取的措施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他们兜售“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谬论，把各项工作的整顿当作“走资派还在走”的“罪证”。于是，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些地区的派性斗争重新泛滥，交通堵塞，停工停产。这种状况，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看出江青集团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积聚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通过天安门事件爆发出来了。

三、天安门事件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噩耗传来，神州悲恸。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首都百万群众自动肃立在数十里长街两侧，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1月16日，遵照周恩来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江青集团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他们不准群众戴黑纱、送花圈、设灵堂、开追悼会，不准报社报导、采访、拍照吊唁周恩来的活动。他们指使其写作班子于2月13日在北京一家报纸发表《孔丘之忧》一文，恶毒地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3月5日，上海一家报纸在刊登新华社的一篇关于纪念雷锋的新闻稿时，把周恩来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去。3月25日，这家报纸发表的《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新闻稿中，竟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

上台"，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南京群众纷纷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并贴出反对江青集团的大字报、大标语。3月30日，王洪文对其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4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认为南京出现的大字报、大标语，是"分裂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并追查"幕后策划人"。自3月下旬起，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传统习俗，冲破江青集团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北京从3月底开始，如潮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朵白花系满了苍松翠柏，密密层层的花圈、花篮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人们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江青集团的罪恶。4月4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这次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4月5日清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时30分，1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月7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这个抗议运动的表现形式是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集团，而实质上显示了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反对，和对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支持。它鲜明地表现了全国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震级为7.8级，震中裂度为11度，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唐山市夷为一片废墟。中共中央当天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向灾区派出工作组，十几万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两万多名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迅速赶赴灾区，展开抢险救灾，大批救灾的物资运到唐山。经过20多天努力，抢救出大批受难人员，安顿了受难群众的吃穿住。但江青集团却认为"抹掉了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中共中央抓抗

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党和国家3位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造成巨大毁灭性灾害，在这危难之时，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的8月下旬，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亲信就突击发放枪7.4万多支、炮300门、枪炮弹1000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准备，妄图使上海成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基地。毛泽东逝世后，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中共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还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反复宣传，标榜他们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人。10月4日，他们的写作班子“梁效”在北京一家报纸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公开提出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显然，他们是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在党和国家的前途面临严重危机之际，老一辈革命家通过各种渠道，酝酿解决江青集团问题的办法。这时，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江青集团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在采取行动前，作了周密的部署。10月6日下午，发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通知。会议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扩大姚文元参加。晚8时，当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逐个来到会场时，叶剑英、华国锋已经等待多时。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对江青、毛远新也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这样，前后不到1小时，中共中央就顺利地处理了“四人帮”。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集团作最后挣扎。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后，举国欢腾，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四、“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及其历史教训

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0年间，全国上下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教育科技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的大破坏，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许多素负盛名的学者、教授、科学家和作出杰出贡献的作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蒙受凌辱、被迫害致死。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文盲和半文盲超过2亿人，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爱祖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排除干扰，努力工作，我国的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某些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 835亿斤。原油产量1976年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修建了成昆、湘黔、焦枝、枝柳等内地铁路干线。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长江葛洲坝大型水电站动工兴建。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26日，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外事工作也打开新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上述这些成就表明，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异常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健康力量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凝聚起来的伟大力量。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这个历史时期定会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的缺陷，并且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种说法在当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国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也应该采取和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去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内个人崇拜盛行，以致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

领袖错误的能力。个人崇拜所以能够在我们国家和党内滋长，是有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与党的关系而造成的过分集权的领导制度，对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特别是领袖本人由于长期受到党和人民的赞颂而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日益严重。对他的个人崇拜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形成一种狂热，这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因此，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树立由群众斗争中产生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坚持少宣传个人，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决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这样，才能保证党少犯错误，正确地领导国家的建设事业健康而又较快地发展。

第三，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的。破坏了宪法和法律，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空前的大破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成了不起作用的空文，各项法律荡然无存，执行机关被砸烂，国家主席和各级领导干部被随意揪斗关押，打、砸、抢成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都失去了保障，造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因此，必须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第七章　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节　在徘徊中前进

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理和纠正。人民共和国仍然处于困境之中。清除“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就成为共和国面临的迫切任务。

10年动乱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问题。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尚待重建，各级政权机关的正常运转尚待恢复。“四人帮”瓦解了，但其帮派势力仍然把持着国家机关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的领导权力，还在一些地区继续作乱。“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前因“左”倾错误而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也需要解决。被颠倒了的敌我是非关系需要重新颠倒过来。大批遭受错误打击的干部有待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社会秩序混乱状况亟待改变。

10年浩劫给国民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70年代前后，正是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不少国家和地区抓住国内外环境相对稳定，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机遇，加快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周边的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地区发展也很快。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正陷于动乱之中，不仅因此丧失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而且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上拉大了同发达国家差距。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下降，许多人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重灾区”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方面留下的问题就更多了。

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下来的“左”倾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左”的错误被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者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一些实事求是的思想、做法被当作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枷锁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不少人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许多地区、部门仍然受着派性、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干扰。

显然，如果不能全面地认真地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共和国就不可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打开新的局面；就不可能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解决好在当代的条件下，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首先领导了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工作，在着手调整、加强中央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1976年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并传达到全党、全国。通知中列举了毛泽东自1974年2月以来对“四人帮”的批评。同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和9月23日，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以大量事实揭露、批判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罪行，以及他们篡改、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表现。全国各地按照中共中央通知，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工作，从政治上清除“四人帮”的影响。

在这同时，各地区、各部门普遍清查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从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势力的影响，并调整和加强部分党政机关的领导班子。到1978年底，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通过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终于摧毁了这股盘根错节、作恶多年、危害最烈的反革命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中央还先后派出工作组，到仍处于动乱状态的少数地区，制止武斗。到1977年上半年，这些地区恢复了安定的局面。

1977年7月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造成严重后果，而他们赖以横行多年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利用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因此，随着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和清查工作的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就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这就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遇到严重障碍。

华国锋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过重要的贡献，也试图结束混乱状态，打开局面。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延续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坚持毛泽东的“左”倾论点，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方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的集中表现。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就提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2月7日，根据华国锋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

《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其中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方针。当时就有人点穿其实质，就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就是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然也包括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拨乱反正的艰巨性。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　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中，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的工作取得了成绩。国家机关作了初步的整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但是，由于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清除，也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华国锋等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拨乱反正受到阻碍。国内工作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

华国锋在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斗争中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他是在肯定毛泽东错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批判“四人帮”的。他又一再强调，“四人帮”路线的性质是“极右”。这就给揭、批、查的展开和深入造成困难。但是由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才逐步突破华国锋等人设下的禁区，使揭、批、查的工作得到发展。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的工作，是当时的一项迫切任务。冤案不平人心难顺。“四人帮”垮台后，许多干部、群众理所当然地提出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整个平反工作的进行，对于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对于全面拨乱反正，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这些正当的要求遭到华国锋等的阻挠。华国锋一再强调要继续“批邓”，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直到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仍然继续坚持这个错误。陈云、王震在会上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他们的正确意见，受到华国锋的压制，却为与会的大多数人所拥护。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突破。在此期间，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开始进行清理。但整个平反工作的进展缓慢。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揭露、批判“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说，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人史册"，"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政治报告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大会路线的基本内容完全肯定下来。因此，这次大会未能完成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为新时期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任务。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摆脱了"四人帮"困扰的全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人各项建设工作。国家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重建了生产指挥系统。1976 年底到 1978 年，国务院先后召开经济建设各部门的全国性会议，消除林彪、江青集团的影响，强调抓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通过整顿，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的问题得到解决，工业部门和企业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混乱的状况有所改变。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1977 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4.3%，1978 年又比上年增长 13.5%。1978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煤炭突破 6 亿吨，原油突破 1 亿吨，发电量突破 2500 亿度，钢突破 3000 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 12.4%、11%、14.8%、33.9%。1978 年主要农作物产量，粮食突破 3000 亿公斤，油料突破 1 亿担，棉花达到 2167 亿公斤。人民生活有所提高。1977 年 8 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从当年 10 月起提高部分职工工资，1978 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由 1976 年 605 元上升为 644 元。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 6.1%。

但由于对长期以来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尚未认真地加以清理和纠正，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又发生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倾向，出现了新的失误。1976 年 12 月，国务院提出要在 4 年内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即到 1980 年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 70%左右。197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下达国家计委关于 1976—1985 年国民经济 10 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还提出各方面的高指标，如规定 10 年中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型项目，其中有 10 大钢铁基地，9 大有色金属基地，8 大煤炭基地，10 大油气田，30 个大电站等。要求到 1985 年，钢产量达到 6000 万吨（1978 年实际产量仅为 3178 万吨），原油产量达到 2.5 亿吨等（1978 年实际产量仅为 1.04 亿吨）。尽管这个纲要（草案）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是，在国民经济经受 10 年动乱大破坏，元气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提出这些高指标，大大超出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承受能力，显然是脱离实际，不可能实现的。此外，这几年在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和借外债方面，也出现了不顾国力，过急过多的问题。由于引进项目过多，加重了国家财力负担。在引进项目中，大部分又是能源消耗大的项目，致使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更为突出。经济工作中的这些失误，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加重了国家财政困难。

在这两年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是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文化大革命"是从这个领域

"开刀"的，因此这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批准。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指出，建国后17年，全国教育、科研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1977年9月，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说，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批判，"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就推翻了强加给科学教育文化领域和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观点。根据上述这些思想，党和政府开始扭转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差，使教育科技和文化工作走上了正轨。1977年冬到1978年春，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制度，570万青年参加高考，27.3万人被录取。197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从大、中、小学撤出工宣队。1978年3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高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称。文艺领域也推翻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一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优秀文艺作品重新上演。1978年4月，文化部宣布为受迫害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平反。5、6月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止一切活动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

国家政权的建设，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1977年底到1978年初，各省、市、自治区都分别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3456人。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受中共中央委托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讨论并同意国务院提出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把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号召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强调要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加强政权建设，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但报告又强调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报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上片面追求高速度、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把一系列不顾国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作

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大会通过的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的一些正确的原则和制度，但同样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原因，未能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实质性的修改，而在许多方面保留着“左”的痕迹。这次大会同中共十一大一样，未能完成为新时期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任务。这次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廖承志、赛福鼎、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为副委员长。选举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五届人大召开前后，2月24日到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委员1862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选举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郭沫若、宋任穷、沈雁冰、许德珩、欧阳钦、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为副主席。政协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停止活动，现在重新发挥作用，对于重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个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在许多方面仍未摆脱“左”的束缚，因而未能完成拨乱反正任务。

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两个凡是”的方针严重地阻碍拨乱反正的进行，窒息着国家和民族生机。不推倒“两个凡是”，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认真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混乱，共和国就不可能摆脱困境，打开新局面。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

首先起来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方针的是邓小平。早在1977年4月10日，他就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着重地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要把实事求是的作风恢复起来。8月18日，他在中共十一大闭幕词中，又着重强调了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的问题。邓小平倡导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批评“两个凡是”，开了解放思想，实现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先导。

中共十一大以后，不少老同志带头发表文章，论述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批判

"两个凡是"的方针。1977年9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聂荣臻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徐向前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促进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针对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乱，1977年5月7日，他在全校整风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后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这篇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如果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是错误的。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这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打碎。这篇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由此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但是，这场讨论一开始就遭到华国锋等的压制。中共中央分管宣传工作又兼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多次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说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负责人没有党性，甚至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还针对拨乱反正的要求，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转变。

然而这场大讨论并没有因此而夭折。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他们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推进拨乱反正，克服仍然存在的"左"倾错误。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尖锐批评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即使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因此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这次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这是在胡耀邦支持下第一篇比较系统地反驳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的重点文章。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文章的发表亲自作了周密的、精心的安排，这就强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当时遇到重

重阻力和困难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9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

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支持、指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压力，在全国广泛展开。1978年下半年，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和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大批理论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参与这场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摆脱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而当时仍然存在的“左”倾错误的束缚，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次大讨论为全面的认真的拨乱反正，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节　拨乱反正，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国内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以便全面地认真地清理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在这次全会之前，作为会议的准备，中共中央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中央工作会议首先讨论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邓小平在1978年9月最先提出来的。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地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并作为常委的集体意见向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在会议讨论中，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为了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必须解决党内外关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11月12日，陈云率先提出，对有些影响大或涉及面广

的问题，需要中央考虑作出决定。他列举了6个问题：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叛徒的应给予复查平反；陶铸、王鹤寿等不是叛徒，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彭德怀应该正确评价；“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中央应予肯定；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状态负有重大责任。陈云的发言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事关重大，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还在于它所涉及的是全面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问题。与会同志纷纷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平反冤假错案，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研究，郑重决定为“天安门事件”、“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二月逆流”平反，撤销中央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撤销中央专案组，康生、谢富治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和阐述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几个重大问题。主要的内容是：

（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2）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认为，解放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他还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即改变经济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让地方、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强调指出，解决过去遗留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要，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他在讲到要科学地历史地看待毛泽东时说，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学会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了一

个“大政策”，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各项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取得了开创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

（1）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认真讨论了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充分肯定必须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这样，就彻底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2）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全会作出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新战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倾错误方针，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的战略转移问题。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全会决定调整国民经济，加快农业发展，重视科学、教育。会议要求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全会强调加强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为此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关心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全会提出了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等。全会还要求加强科学和教育工作。

（3）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会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

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全会还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4) 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会议指出，1975 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对“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把 1975 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在 1976 年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

全会认真讨论了民主和法制问题，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5) 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会议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 9 人为中央委员，全会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因而成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伟大起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在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

来，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但这时党内和社会上也出现了若干值得严重注意的干扰三中全会路线贯彻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有些人还深受“左”倾思想的毒害，怀疑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有的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三中全会的路线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极少数人从右的方面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曲解“解放思想”的号召，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借此攻击、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故意提出种种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静坐绝食，阻断交通，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在北京出现的“西单民主墙”，公开张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们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人权。他们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甚至同台湾及国外敌对政治势力相勾结。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诬蔑“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在共产党内部，有极少数人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支持。因此，继续排除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同时注意排除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就成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迫切任务。

1979 年 1 月至 4 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会议是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召开的。会议讨论了多年来被搞乱了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3 月 30 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批判“左”的倾向的同时，着重批判了从右的方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 60 多年的切身经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但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有极少数人或

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一直坚持的。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些原则，是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提出要批判和反对那种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各地也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二、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　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制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决策以后，党和政府的主要精力日益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国民经济进行了新的调整，并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又说，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全国人口中80%是农民。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把加紧经济建设作为80年代三件大事中核心的一件。他指出，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着不放，毫不动摇。又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由于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影响，由于“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的影响，尤其是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加上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建设上的新的失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仅为27.8%，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只占43.1%。1976年至1978年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占55.7%，轻工业只占5.7%。燃料动力工业严重短缺。积累率1976年

为31%，1978年增至36.5%，成为1958年“大跃进”后20年中积累率最高的一年。劳动就业问题严重。经济管理体制上问题很多，到1978年底全国还有1/3的企业生产秩序不正常。因此，实现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走出一条合乎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经济的路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工作中心转移后，作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的决策。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兼主任，李先念兼副主任（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同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张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把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大体上调整过来。李先念还说，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们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一个良好的新开端。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邓小平提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是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降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集中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还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等文件。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上述八字方针。

实现八字方针，就是要调整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进入健康发展轨道；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现有企业，建立和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提高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等方面的水平。

1979年开始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调整农村政策，加快农业发展。国务院决定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平均提高22.1%，主要由于这项措施，农民当年增加收入108亿元。同时，减免了部分社队的税收，降低了农用工业品价格，从各方面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在改革农业管理制度，改善农业结构等方面也采取了若干新的举措。二是调整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包括改善轻纺工业的生产和流通条件；大力支持集体企业和小商品生产；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允许一部分产品自产自销等。三是提高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比重，改善人民生活。四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到1980年，调整工作取得初步成果。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7.8%上升为30.8%；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47.2%，重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56.9%下降到52.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但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各级领导干部

对调整方针认识很不一致，很不深刻，执行很不得力；也由于长期形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经济形势虽有好转，却仍然存在不少潜在的危险。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没有压下来，工业改组整顿进展不快，能源交通紧张，财政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货币发行量过多，物价涨幅过大等。这些问题如不下决心解决，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政治局面的稳定。

为此，国务院于 1980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21 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同时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工作，重新调整了 1981 年国民经济计划。同年 12 月 16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陈云、赵紫阳、李先念、邓小平先后讲话。陈云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 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 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邓小平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其他方面，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生产、能源、交通建设，以及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把整个经济转上健康发展轨道。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他强调，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都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方针。会议确定了进一步调整的要求和方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实现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于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落实贯彻新八字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1 年起，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稳定经济、调整结构、挖掘潜力、提高效益。主要措施是：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加强财政信贷管理，控制市场物价；调整重工业服务方向，坚决退够，同时加快轻工业发展；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完善和稳定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等。

1981 年 11—12 月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待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提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走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今后经济建设应当坚持的方针是：(1) 依靠改革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2) 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3)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4) 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5) 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6) 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7)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8) 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9) 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10) 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报告提出，有必要再用几年时间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这样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打好基础，更好地前进。

到 1982 年，调整工作虽未完成，但已取得显著成效。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已趋于协调，经济建设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82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78 年增长

47.16%，每年增长 11.8%，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77.7%，工业总产值增长 35.4%。1982 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的比例为 33.6：33.4：33。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为 50.2：49.8。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为 28.8：71.2。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7.3%，其中农业平均每年增长 7.5%，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 11.8%。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1982 年全国职工每人平均生活费收入为 500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 1978 年增长 38.3%；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 270 元，比 1978 年增加 1 倍；城乡储蓄余额达到 675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2 倍。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走上均衡、持续发展的轨道。

教育科学技术事业也出现了新面貌。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发展。1982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比 1976 年增加 1 倍。1978 年到 1981 年 4 年中，招收研究生数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总和的 1.7 倍。职工学校、夜校、函授学校、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学校等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工教育发展更快。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普及小学教育的决定，要求在 80 年代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全国还进行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多渠道办学的方针。科学技术工作取得许多新成果。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全国重大科技成果共 12590 多项，其中经国家批准的发明创造项目 418 项。1981 年 9 月 20 日，用 1 枚火箭发射 3 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成功。同年 11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成功。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新水平。

三、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政治关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政机关，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面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有步骤地清理和解决建国以来历史遗留问题，调整社会政治关系，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前两年中已部分地开始，但那时进展迟缓。三中全会后平反工作的步伐明显加快。遭受错误批判或诬陷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领导人，各级干部，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陆续得到平反。这些冤假错案，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也有一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1979 年至 1982 年间，中央和地方先后平反纠正了一批重大案件。中央先后为“中宣部阎王殿”，“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中共中央联络部“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支援各国革命少）、“三降一灭”（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中共中央统战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总政阎王殿”等错案平反，推倒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宣传、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卫生以及统战、民族、宗教等方面工作的错误结论。先后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案，“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案，“杨

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案，“三家村反党集团”案，“习仲勋反党集团”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平反。先后为受错误批判、打击的领导干部、各界人士平反，如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彭真、肖劲光、陆定一、马寅初、谭震林、罗瑞卿、肖华、黄克诚、李德生、张闻天、李达、杨献珍、邓子恢等平反，为蒙受冤屈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昭雪。中共中央先后发出通知，1959年以来，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对“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电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一律平反，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斗争而遭迫害的张志新、史云峰等也得到昭雪。因所有这些错案而受牵连的人也恢复了名誉。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因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刘少奇举行追悼会。这样，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得到了纠正。因刘少奇案受株连错判为反革命的28000多人得到平反。

对30年代、40年代历史遗案也进行了复查，实事求是地纠正一些错案。如根据地肃反问题，在白区工作时曾被捕而被错定为“叛徒”、“变节”等问题，都一一作了改正。1982年8月，中共中央宣布，把潘汉年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以彻底平反。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涉及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因此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各种错案受到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改正错划右派分子案件。197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划错了的改正过来。三中全会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到1981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基本上得到改正，这部分人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8%以上，他们的政治名誉得到恢复，工作和工资待遇得到妥善安排。这样，就使几十万人从长期政治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家属子女也放下了政治包袱。

（2）给地主、富农分子改订成份。鉴于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经过几十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对摘掉地主富农分子帽子问题和他们的子女成份问题，作了合理的规定。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对多年来遵守政

府法令、老实劳动，不作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审批，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地、富家庭出身，今后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各地认真执行决定，全国先后有400多万人摘掉地主、富农分子帽子，加上摘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的共2000多万人。

(3) 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重申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是党对投诚、起义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这些人员的冤假错案给予纠正。凡因历史问题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或其他帽子的一律摘掉，被判刑的撤销原判，恢复公民权。因追究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的，要妥善安置。文件下达后，各地为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的建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并给予政治权利。这类人员中有尚在服刑的7000人，刑满留劳动改造单位的5.5万人。到同年6月，这类人员全部释放完毕。

(4) 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1979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等6单位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时，有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把他们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将这一部分劳动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份，是必要的。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这个报告。经过一年多的工作顺利完成。在全国原工商业者86万人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政府还明确宣布，属于资本家的原工商业者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在政治上和工作安排、福利待遇、参加工会等方面，均应与其他劳动者一视同仁。

(5) 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三中全会以来，逐步清除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影响，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国家开始建立学位制度。1980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年12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学术和技术职称的评定在冻结多年后又重新恢复。从1979年起，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工程技术、农业、编辑、外语、经济、会计等专业技术干部职称的暂行规定。到1982年，全国有100多万知识分子获得各种高、中级职称。国务院还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尽可能改善科技人员特别是中年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一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也得到安置。

(6) 调整和落实民族政策。1979年3月，拉萨市举行宽大处理参加叛乱人员大会，宽大释放1959年参加西藏叛乱的376名罪犯，宣布为6000多人摘掉叛乱分子帽子。4

月，四川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也宣布宽大释放1960年前参加武装叛乱的588名服刑在押犯，为已刑满释放的363人摘掉叛乱分子帽子。同年5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党组报告，要求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规定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和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全部摘掉这个帽子；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于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1980年3月、1981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新疆工作会议，总结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经验教训，纠正民族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落实民族政策。

（7）调整、落实宗教政策。1980年7月，国务院批转宗教事务局、国家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问题的报告》，规定宗教团体房屋产权全部退给宗教团体，无法退的应折价付款；“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的教堂、寺庙、道观及其附属房屋，属于对内外工作需要继续开放者，应退还各宗教团体使用。此后，各地的寺庙、道、观、教堂陆续修复、开放。1982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澄清了长期以来在宗教工作上的“左”的错误，明确了新时期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并提出了调整、落实宗教政策的具体要求。在此前后，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八个全国性宗教组织以及各地爱国宗教组织相继恢复活动，各地认真落实宗教政策，激发了各宗教团体及其成员的爱国热忱。

（8）调整、落实侨务政策和台胞、台属政策。1981年5月，全国国内侨务工作座谈会讨论了侨务政策落实情况和进一步做好侨务工作，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会议指出，要端正对华侨的看法，要提倡爱国一家，一视同仁。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文件指出，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把在台亲友称为“海外关系”，并一律视为政治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凡因此在政治上被错误对待的，应即改正。文件对各项有关政策作了明确规定。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又作了若干补充规定。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和落实各方面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勇于改正错误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在纠正自己的错误中，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这更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努力奋斗，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

拨乱反正，既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又是拨“左”倾错误之乱；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也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错误。因此，拨乱反正的过程，也是全面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各方面拨乱反正的进行，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的要求愈来愈迫切，条件也日益成熟。

1979 年 9 月，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建国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初步的总结。这个讲话是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经过了认真讨论后通过的。讲话肯定了三十年来的成就，初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

同年 11 月起，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 年 3 月，由胡乔木主要负责的文件起草小组提出初步设想，从这个时候起到 1981 年 6 月，邓小平多次提出对决议稿起草和修改的意见。他认为，“决议”的中心思想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为刘少奇平反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第二，对建国 30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决议”稿的起草、修改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前后八易其稿。在此期间，曾于 1980 年 10 月交中共党内 4000 名干部讨论了 20 天。1981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邀请了 40 多人讨论了 12 天。同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 70 多人讨论修改。此外还征求了 130 名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意见。

1981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建国 32 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总结。决议指出，党在建国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因而发生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决

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决议强调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指出，这条道路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这就是：(1)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3)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4)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5) 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任务之一；(6) 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7) 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8) 必须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9) 在对外关系上，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0) 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决议还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作出这个决议，使极其重要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问题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充分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高度成熟。

这次全会改选、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在此之前，1980年8月至9月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这次全会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鉴于华国锋在过去几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他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决定同意他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改选华国锋、增选赵紫阳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7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三节　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在拨乱反正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通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确立并初步显示优越性。但它的经济、政治、文教科技体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端，必须加以改革。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体现出来。这又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中国原有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建国初期统一财政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形成起来的。这种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曾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同当时生产力发展大体相适应的。但是后来把这种体制模式固定化、绝对化，以至权力高度集中，统得过死，所有制形式单一，分配平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随着条件的变化，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改革这种僵化的体制，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中华民族的振兴、腾飞，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

在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农民是人口的主体，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如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极大。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的2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取得一些进展甚至是重要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农业和农村发展迟滞、缓慢，长期处于徘徊状态，多数地方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农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的提高。到1978年还有2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20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52.4%，而同期全国人口增长了45.86%。按每人平均产量计算，1958年303公斤，1978年316.6公斤。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下降，每投入百元资金的纯收入，1956年为2.78元，1978年下降为1.85元。1957年到1978年间，农民家庭纯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增加3元，年递增率为2.5%，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递增率只有1.4%。造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历史方面的、自然条件方面的问题外，主要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策方面的原因。

以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统一经营，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为特征的人民公社，通过行政性的积累和投资机制，进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兴办公用事业，使农民得到某些利益，在消除极端贫困现象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体制政社不分，高度行政化，经营管理过于集中，排斥市场机制，农民缺少自主权，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缺乏内在的激励功能。这种体制加上与之相适应的"左"的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束缚了农村生产力发展。

在实践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农民曾经几次突破原有体制，实行包产到户等把报酬同产量联系的生产责任制。60年代初，全国农村1/5以上地方曾经实行过这种经营形式。但在1962年秋批判单干风后，包产到户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到排斥。那种僵滞、不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具体形式的观念窒息了农民的创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的转折，打破了"左"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开始纠正农村工作的"左"倾错误，为农村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次全会制定并在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生产队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要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各级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和建设的计划指导，"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就为农村改革的起步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农村改革最初在安徽、四川等地兴起。早在70年代末，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解放思想的春风乍起的时候，中共安徽省委为了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在农村实行"放宽政策"。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78年底1979年初，皖东地区部分生产队以及合肥、芜湖等的一些生产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效果极好。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包干到户，包干后第一个秋收就比上年增产6倍多。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社队采取类似的做法，效果也很好。但在其始，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即"双包"这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社会上有争论，干部中存在疑虑，中央领导机关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起

初各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中，主要形式还是定额定工责任制和联产到组责任制。实行“双包”的只是少数，而且大多处于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状态。

1980年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人先后到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和北京郊区农村调查。5月31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他讲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又说：“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各省、国家农委分别组织工作组到农村调查。在此基础上，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形成了座谈会纪要，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以1980年75号文件下发。文件提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地方、不同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文件肯定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饭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得到稳定。就这种地区的情况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一般地区，不搞包产到户；但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

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允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这是观念上、政策上的一个突破。不过这个文件还没有把“双包”作为适用于一般地区的普遍形式。改革的实践再次超越了这个限度。1980年冬到1981年，农村的改革进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发展阶段。“双包”不仅在边远地区和长期贫困地区普及，而且在一般地区迅速扩展。1981年10月统计，全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中，已有97.8%的生产队建立不同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双包”的已占基本核算单位总数50.8%。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属于家庭联产承包制，都是把土地包给社员，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两者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在分配方式上有所不同，前者以产量定工分，按工分分配。后者则直接联产计酬，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也叫“大包干”。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纪要》指出，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农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以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

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下达后，农村改革步伐加快。到 1982 年 8 月，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 7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此后，这种形式的责任制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基本形式。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农村还出现了大批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种经营形式，是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层次。实行这种经营形式，使生产者在劳动和经营方面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使劳动和经营的成果同生产者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既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等弊病，又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的积极性。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旧体制，又不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束缚农业生产力的旧体制，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城乡人民都得到实惠，并且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但是，在推行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有些原来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的社队，没有继续坚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则是一个缺点。同时，在这过程中，有些地方对保护集体财产和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注意不够，土地分得过于零碎，不利于使用机器和进行灌溉，也是一些缺点。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指示各地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农村的改革促进了城市的改革。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基层单位的自主权，即从解决企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入手的。

在原有经济体制下，经济管理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实际上成了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成为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的一个起点。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全会同意他的意见，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

四川早在 1978 年 10 月，就选择了 6 家企业开始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不过当时的扩权内容主要是允许企业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提留少量利润作为职工奖金。三中全会以后，四川扩大了试点面，并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权力。国家经委也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市选择了 8 家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将生产计划、资金使用、产品销售、利润分配、人事安排等方面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企业。

1979 年 7 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国营企业实

行利润留成、开征国营工业固定资产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率使用办法、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金额信贷等五个方面的文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选择少数企业作试点。到1980年底，扩权试点企业增加到6600家，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商业系统扩权试点企业，1980年为8900家，占商业系统独立核算单位的50%。通过试验性的改革，这些企业有了较多的自主权，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经营成果相联系，从而调动了企业和职工改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增加了活力。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利润增长一般都高于改革前，也高于其他企业。1980年9月，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但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办法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故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扩权的改革没有完全解决国家和企业之间责（经济责任）、权（经济权力）、利（经济利益）关系，也没有解决企业内部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二是城市中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不配套，企业的自主权难以落实。

为此，1981年4月，国务院在工交工作会议上开始提出建立和实行经济责任制的要求。此后，工业经济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广泛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以责、权、利结合为基本特点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是把责任放在首位，以责定权、以责定利。这也是要求企业的主管部门、企业、车间班组和职工，都要层层明确各自在经济上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建立和健全企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的各项专责和岗位责任制，在此基础上，把企业、职工的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就分配而言主要有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自负盈亏三种类型。企业内部的责任制，主要是把岗位责任、考核指标、经济效果同职工的收入挂钩，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到1982年底，80%以上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30%的国营商业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此外，还有一批国家和集体的小商业、饮食服务业、小型工业企业，开始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或由职工集体、个人承包经营的办法。

在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同时，为解决企业改革的配套问题，使企业改革获得良好的外部条件，国家还开始进行城市综合改革的试验。1981年7月，国务院批准湖北省沙市市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1982年3月，又批准江苏省常州市为试点。国家还在一些地区和城市进行了单项改革试验，如江苏省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等。这些试验都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积累了经验。

在此期间，由于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在所有制方面逐步摒弃了追求单一公有制的“左”倾错误，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

多种经济形式是随着城乡劳动力就业的需要而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为了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批回城后的安排以及城镇新增大批劳动力就业问题，197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劳动部《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推广北京市广开就业门路，大力组织集体所有制和各种生产服务事业，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经验。1980

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并转发了这次会议制定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文件首次提出，解决城镇劳动就业，要打破劳动力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就业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今后几年，要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自负盈亏的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发展以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场（厂）、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到1981年10月，全国已安置2000多万人就业。

为了扶持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6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出通知，指出对个体工商户应一视同仁，在资金、原料、税收等方面予以支持。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从政策上扶持个体经济。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强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权宜之计。《决定》还指出，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到1982年，全国城镇集体和个体劳动者人数比1978年增加了35.6%，其中个体劳动者人数为1978年的8.8倍。城镇集体和个体劳动者在城镇劳动者总数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1.7%增加到24.5%。

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对外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一些经济形式，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

流通体制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1980年起，对工业产品的购销形式，由主要是统购包销改为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和企业自销等多种形式。农产品的购销政策进一步放宽。社会商业结构有所改善，出现了生产自销、贸易货栈、各种联营商店、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多种经营形式，商业网点增加，城乡集市贸易迅速发展。1982年6月，国务院作出《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改变长期以来工业品按城乡分工的体制，国营商业可以下乡，供销社也可以进城，城乡多渠道流通。所有这些，都对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这几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和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探索、试验的阶段。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它本身的复杂性，其难度远较农村改革为甚，也不可能像农村改革那样见效快。当然，重要的是改革已经启动，新局面已经打开。

二、对外开放政策的初步实施

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战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经济、政治

格局的新变动，又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实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对外开放的方针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国外的科学管理经验，试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时在对外开放方面国家首先迈出的步伐是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广东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的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侨胞众多，资源比较丰富，便于吸收外资侨资，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加快经济建设。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提出发挥广东优势的问题时，邓小平就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 6 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提出《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的报告》、《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7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规定，两省可以实行财政包干；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两省的外汇实行大包干，即外贸和外汇以 1978 年的实情为基数，从 1980 年开始，除外贸出口外汇增长部分上缴中央 3 成以外，其他各项外汇收入的增长部分，全部留给两省；扩大两省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权限；两省可以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设厂，允许外国厂商投资办企业，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和旅游业等。由于这些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的实行，两省在经济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主动权，在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工作等方面迅速打开局面，人民生活也有了较大提高。

经济特区是进入 80 年代后正式兴办的。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同年 8 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正式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四市设置经济特区的建议，同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兴办特区工作逐步展开。中共中央、国务院规定，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建设资金的来源，以吸收外资为主；经济形式，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即“三资”企业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在特区内，对投资外商在税收、土地使用、入境出境管理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和方便。“三资”企业所得税率为 15%，中外合资企业外商所得合法利润汇出境外免征所得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进口必需的生活用品，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征收或减免进口税。特区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或另有规定的少数产品外，免征工商统一税。外商经过申请批准后，可在深圳特区取得土地使用权，但禁止买卖、出租和擅自转让。外商来特区投资，在投资方向、投资数量、企业经营管理、劳动工资等方面也给予优惠待遇。

深圳特区位于广东与香港交界处，东临大鹏湾，西接珠江口，南面以深圳河为界与香港新界隔岸相望，北傍梧桐山，面积327.5平方公里。珠海特区位于广东与澳门交界处，拱北海关两侧沿海地带，面积原定6.7平方公里，后调整为15.16平方公里。汕头特区在汕头市东郊龙湖一带，紧靠汕头新港，面积原定1.67平方公里，后调整为52.6平方公里。厦门特区原定在厦门岛西北部的湖里地区，2.5平方公里，后扩大为全岛，包括鼓浪屿在内，共131平方公里。各经济特区设特区管理委员会，对特区实行统一管理。经过两年多的工作，深圳、珠海特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改善投资环境，内联外引等方面就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到1982年，起步最早的深圳，已从一个人口稀少、工业落后的边陲小镇，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兴城市，同外商签约1600多项，投入资金17亿港元，引进大、小设备1.5万多套，并同内地联合兴办100多家企业。珠海、汕头、厦门特区的建设也开始实施。

资金不足，科学技术和管理工作比较落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的矛盾。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对于解决这个矛盾，加快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从各方面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外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我国实际出发，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制订和颁布有关的法律、条例。如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等。中国政府先后同西德、日本、瑞典、加拿大、瑞士等国就有关保护投资安全问题进行谈判或签订协定。中国在国际贸易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代表权得到恢复。国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各种形式吸收外国资金，在继续吸收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的中长期、中低息贷款及一般商业信贷的同时，通过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租赁等业务，以及中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等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截至1982年，中国政府同日本、丹麦、科威特、比利时等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复兴开发协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国际金融组织，正式签订建设贷款协议项目31个，累计金额28.3亿美元。在中国境内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发展到83家，累计外商投资约1.4亿美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近800家，累计外商投资27亿美元。补偿贸易签订合同880多项，引进设备价值7.6亿美元。先后同美、英、法、意等国家的石油公司，在南海、黄海、渤海湾合作进行海上地球物理勘探，并同日本、法国、美国等国签订了勘探开发协议，吸收外资10.6亿美元。

经过几年的发展，"三资企业"在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占居了一席之地，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外合资企业是由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商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境内举办的企业。双方合营者共同商定投资比例，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双方按股份分配收益。这是一种中国同外商股权式的合营企业。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则是中国同外商契约式合营

企业。一般由外商提供资金、技术，中国合作者提供土地、场地、劳动力和劳动服务，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共同举办企业。双方按合同规定分配收益，而不像合资企业那样取决于股份的比例分配。在合同期内，中方按一定比例的产品销售额，作为中方利润以偿还外商本息，合同期满，企业为中方所有。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是外商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境内租赁土地、独自投资、独自管理、自负盈亏的企业。"三资"企业的兴办，有利于增加建设资金，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利于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引进技术方面，1979年以后，国家政策上严格控制成套设备的进口，而在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方面鼓励许可证贸易、顾问咨询、技术服务、合作生产等多种方式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同时进口一些国内暂时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和测试仪器。1979年到1981年引进技术总额达42.3亿美元。1982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现有企业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的规定。技术引进工作逐步转向主要为技术改造服务。

国家还进行了改革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体制的试验。国家扩大了地方、部门的对外贸易经营权，并进行了产销结合、工贸结合等多种经营方式的试点，扩大对外贸易的经营渠道。出口商品实行分类经营，除一类出口商品由专业贸易公司统一经营、统一成交外，二类出口商品由国家、地方交叉经营，三类出口商品则全部由地方经营。这样就初步改变了统进统出的局面，使外贸体制由原来的独家经营、单一渠道、单一经营方式，逐步转变为多家经营、多条渠道、多种经营方式，从而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初步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加强

在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开始提到国家活动的日程上来。

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决策之后，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同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又重申，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有关问题。18日，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讲话。

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及其病根，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意义和目的，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和措施。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的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现在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同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另一个病根是领导机构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家长制作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集中制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几项重大措施，包括：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整国务院领导人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设立顾问委员会，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各企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他还提出，要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干部队伍要实现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及其他腐朽思想影响。邓小平的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一）党政机构和干部制度的改革初见成效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国务院负责人选的建议，以改变党政领导干部兼职、副职过多的状况。会议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接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名，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国务院副总理。会议还作出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决议，要求通过修改，使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随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又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这就在推进国家领导体

制改革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81年11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机构改革。国务院决定从国务院各部门首先做起。198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央机关精简问题，邓小平提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同年3月，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建议减少副总理，设相当于副总理的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为国务院的日常领导工作机构，在总理主持下，负责对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各项重要工作进行领导和决策。截至1982年4月，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的组建工作完成。国务院原有52个部委，经过这次机构改革，共设41个部、委。据38个部、委的统计，除兼职的部长、主任外，正副部长、正副主任原为505人，现为167人，减少67%；他们的平均年龄，原为64岁，现为58岁；他们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干部，原来占37%，现在提高到52%。据28个部委统计，司、局级机构减少32%，正副司局长减少43%；正副司局长平均年龄原为60岁，现为54岁；他们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干部，原来占36%，现提高到49%。

在此期间，还开始了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试点，着手解决党政企分开的问题。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改革企业领导制度，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加强和改善党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发挥职工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由厂长（经理）负责统一指挥。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加企业决策、管理和监督工作的权力机构，是发挥职工当家做主积极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农村，有的地方还进行了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的试验。

（二）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用大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些法规对地方政权组织和选举制度作了重要改革；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以利于人民行使权力；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并相应地恢复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和州、市、县长等职务，从而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党政军合一的集权体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从而在法制上扩大了地方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以利于人民群众对县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同时，还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45条的决议。决议称，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决定取消原45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1981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先后制定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试行）》、《学位条例》、《律师暂行条例》、《民事诉讼法（试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海洋环境保护法》、《商标法》等。

这几年中，国家颁布了几百个新的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民主的法制化方面开创了新局面。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特别检察厅依法于1980年11月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名主犯提起公诉（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起诉书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事实：(1) 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2) 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3) 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4) 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经过多次开庭审判，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并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是正义的判决，人民的胜利，也是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体现。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以法律手段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三）中国共产党加强了自身建设，开始进行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克服和防止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现象，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上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同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这在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改革个人交接班，实行集体接班的重大决策。全会选举万里等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党的重要法规。“准则”强调，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坚持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每个党员要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要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按照"准则"的要求，努力纠正党内不正之风。7月，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1月，陈云在中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党风建设。

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改革组织、人事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是中共中央为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稳定地向前发展中保持路线政策的连续性而采取的一项有战略意义的步骤。这年上半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同时，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也进行了机构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

（四）各民主党派重新恢复活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得到发展

1979年10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召开，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和组织发展工作，修改各自的章程，选举各自的中央领导机构。新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民盟中央主席史良，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胡厥文，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季方，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蔡啸，工商联执委会主任委员胡子昂。19日，邓小平会见了出席这些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在当晚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协商，与共产党亲密合作，互相监督，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改革开放，以及团结港、澳、台同胞和国外华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效的工作。

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在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报告》，中央强调，要克服清一色思想，切实安排好党外人士的工作，并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五）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开创了新的局面

人民解放军加强了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了提高，在军民关系、守卫边境、保卫祖国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诸方面作出了新的贡

献。国防科研和尖端武器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绩，1980年至1982年间，中国先后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首次以1枚火箭发射了3颗卫星和以潜艇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均获成功。1980年3月开始，部队进行精简整编。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提出，军队要提高战斗力，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消肿”。精简机构，减少不必要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二是改革体制。在这方面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三是训练。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四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的讲话为军队的建设和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3年多的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共和国的面貌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实践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

第八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纲领的制定

一、中共十二大的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

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各条战线蓬勃发展并取得巨大成绩。同时，实践进一步向党提出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于1982年8月召开了十一届七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十二大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中共十二大审议。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 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65万名党员。大会的历史任务是总结6年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致开幕词，阐明了中共十二大的历史地位、任务和指导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

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中共十二大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施纲领，体现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以及思想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方针和任务。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把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从原来的实现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是解决好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科技问题。经济建设的战略步骤，是把20年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大会强调指出，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对物质文明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体现着正确的发展方向。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大会强调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把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写进了总纲之中，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新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按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要求，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当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还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大会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大会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根据新党章，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中共十二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党和国家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并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之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章。中共十二大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订和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

1978年2月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一次会议颁布的第三部宪法，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左”的指导思想，存在着重大缺陷。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形势已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1978年宪法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需作全面修改，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负责提出新的宪法修改草案。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1982年2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部分委员、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领导人以及党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都提出了修改意见。4月，宪法修改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经过8个月的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于11月23日通过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12月4日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颁布实行。

这部宪法，包括“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和首都”四章，共138条。

新宪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宪法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新宪法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了1954年宪法设立国家主席的规定；新设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委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扩大基层直接民主，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在基层设立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取消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0年）等。

新宪法规定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中的主要经济形式，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营者的合法权利。国家允许外国的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投资，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其合法权利受国家

法律的保护。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协调发展。

新宪法规定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国家对发展教育、科学、卫生、体育和文化事业，分别作了专项规定。在思想建设方面，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社会新风尚，形成全国人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新宪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拟定了对台湾等个别地方设立特别行政区，在少数民族居住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新内容的条文。

这部新宪法继承和发展了 1954 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既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又注意吸取国际的经验；既考虑到当前的现实，又考虑到发展的前景，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这部宪法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权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新宪法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全国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保证作用。

1983 年 6 月 6 日至 21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选举和决定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组成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

6 月 6 日，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是我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克服困难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五年。今后的五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指出，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的目的是要克服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和缺陷，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改革是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和措施，必须有利于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确保国家财政收入逐年有合理增长。

为了“七五”期间有步骤地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1) 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指导。(2) 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3) 改革财政体制和工资制度、劳动制度。各级政府都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尊重和支持群众中一切符合改革方向的新创造，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因势利导，有条不紊地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国家应十分重视智力开发，把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文化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大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和提供强大的动力。为了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加强政法工作，努力消除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各种违法乱纪的消极现象，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报告强调我们一定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埋头苦干，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繁荣昌盛。

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郑天翔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易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始终洋溢着民主团结的气氛，是 10 亿人民团结的象征。它的召开，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于 6 月 4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邓颖超致开幕词。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具有空前广泛的代表性，委员总数共 2039 人，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少数民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侨胞、特邀人士 31 个方面。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充满民主、团结、奋发的精神。大会在充分准备和反复协商的基础上，选举邓颖超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提出各级政协要把协助有关部门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发扬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满怀信心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振兴中华作出新贡献。

这次政协会议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3 年 8 月，中共中央作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当时邓小平指出：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严打”就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严才能治住。“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在 8 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六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等，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各有关部门，在全国集中力量统一行动，迅速惩处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从而使社会治安状况和社会风气得到好转。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党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最早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是叶剑英，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

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和重要性进行了阐述：“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发扬这些革命精神，“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了新认识，并逐步开展起了群众性的创文明活动。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指出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革命传统和民族优良传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倡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使我国城乡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有所好转和提高。随后，一个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性活动，并认真总结经验，于1982年3月建议并倡导开展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普遍宣传“五讲四美”的内容，使亿万人民群众自觉地、热情地、有组织地参加“五讲四美”活动，以实际行动共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种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活动，连续开展了几年，使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在增长，人与人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上兴起了向张海迪、朱伯儒等先进人物学习的热潮，传播了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和行为。

198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一般地说，物质文明建设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殊地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客观环境，更迫切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十二大更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深刻阐述：“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共十二大还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文化建设指教育、科学、艺术、体育、卫生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思想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等。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

想、道德和纪律。中共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全面论述，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初步形成。

中共十二大以后，以思想建设为重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1982年10月，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对农村干部和群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环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村干部、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农民，在开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中起模范作用，使农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以保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11月，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应以蒋筑英、罗健夫、朱伯儒为榜样，在各条战线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贡献力量。1983年1月，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心议题是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体职工的思想认识，为实现中共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而奋斗。

根据中共十二大的决定，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准备用3年的时间，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内容，分期分批地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这次整党的目的是为了肃清十年内乱的流毒，改变党内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纪律松弛等问题，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经过3年半的整党，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通过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状况有了改变，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但是，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的甚至走过场。

在开展整党的同时，还在理论界、文艺界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斗争。

在党着重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理论界、文艺界出现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倾向。加上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确实存在着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这更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对此，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必须反对从右的方面来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但由于党内思想战线领导的软弱、涣散，这种右的思潮不但没有克服，甚至还在不断发展。在此情况下，1981年7月，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邓小平批评思想战线上存在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他指出，有的人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8月，中宣部召开思想问题座谈会。会上，胡乔木讲了话，实事求是地批评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和以此为题材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次座谈会在反对和抵制资产阶

级自由化方面虽然收到一些效果，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

1982年前后，在理论界，有的人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制造混乱，把社会上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文艺界，一些人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现冷漠，却热衷于写阴暗的、灰色的甚至黄色的东西，致使有些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甚至低级庸俗、黄色的书刊充塞银幕、舞台和书市。总之，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污染。

针对这种情况，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邓小平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关于精神污染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种表现和倾向。他说：“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说，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他说：“总之，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首先，《决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其次，《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它必须是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还强调，在新形势下，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全党面临的新课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一定要首先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抓好党风建设，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带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决议》还指出，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的考验。《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针对这次全会上那种不赞成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在会上明确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他还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1987 年 3 月，邓小平又说，不仅要讲十年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

《决议》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与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1979 年 6 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明确指出，建国 30 年来，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

些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同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1981年12月至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要求放手让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重申了共产党实行多党合作的一贯方针："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派合作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人数不断增加，从1975年四届人大的8.2%上升到1983年六届人大的18.2%，在各级政协委员中，近60%的委员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占30%以上。据1985年6月统计，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5000多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1.4万人担任了各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了关于国家领导机构人事安排的协商；参与领导了宪法和政协章程的修订工作，对国家经济的重大决策，教育与科技的改革、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等，他们都参加了讨论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也实行了有效的监督。同时，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改革开放的大业，尤其是在引进外资和开发人才资源方面，在促进祖国统一和团结爱国侨胞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各民主党派的特点和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对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汇集到统一战线中来。对于所有热爱祖国的人，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他们拥护祖国统一，渴望祖国富强，我们都予以争取和团结，因此，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与对象更加扩大，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更加广泛，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可以说，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丰富和广泛。

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兄弟民族。汉族人口众多，占全国总人口的92%，少数民族的人口占8%，各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很广，占全国总面积的64%以上，多数是与汉民族杂居，形成了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民族问题，注意清除在民族工作中“左”的思想，采取了照顾少数民族的一系列政策，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如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确定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实行一些特殊的灵活政策。中央各部门的一切决定和措施，都要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1981年2月和7月，中共中央在讨论云南、新疆、内蒙三省区的民族问题时特别强调，现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法制建设，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行。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的行为。”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根据国家宪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保证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照顾好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这样就把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具体化了。既要求各民族自治地方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障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又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使自治机关有大于一般地方机关的自主权。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力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到1987年全国设立了5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104个自治县（旗），包括44个少数民族的5900多万人口，实行了区域自治。在新时期，搞好民族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少数民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为此，中共中央要求有关部门要为开发少数民族聚居的大西北、大西南，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中央还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财政补贴，1979年补贴40亿元，以后每年递增10%；经济文化先进的汉族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等。党和国家各项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宗教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1982年，中共中央认真总结了在处理宗教事务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

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一个新时期宗教工作纲领性文件，主要内容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种宗教职业人员，是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宗教活动健康开展的重要组织保证；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对我国宗教组织的将来面貌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时，包括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在那些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政策，不得简单从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包括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行政、司法，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尤其要坚决打击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给中国各宗教团体和组织正常地开展活动创造了条件，巩固和扩大了宗教界的爱国联盟，调动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各宗教团体和组织普遍开展了爱国爱教，服务“四化”的活动，发扬中国宗教界的传统，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增强了同世界各国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的交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加快改革开放，都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兴起之后，中共中央尊重农民群众改革中的首创精神，不断总结经验，制定政策，推动改革的深入，加快农业的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指出：“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

中共十二大之后，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党中央和国务院更加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指出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

的合作经济；允许农村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建立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体系和培养农村建设人才的教育体系；逐步实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

在稳定与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1984 年 1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才能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为此，1984 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就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通知对农村政策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土地承包期延长至 15 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还可以更长一些。要积极支持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专业户等。总的精神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放宽政策，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和发展商品生产。1984 年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展顺利和发展迅速的一年，一系列农村改革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并得到贯彻落实。2 月 27 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国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营社会急需的行业，农村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方式可以灵活多样。3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通知指出，发展多种经营，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战略方针；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新的重要来源。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显示出它特有的生命力。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在发展方向上给予积极引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以工补农”，有利于促进专业承包，促进集镇的发展，加快农村经济文化的建设。这一年，基本上实现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第一步农村经济改革，促进了我国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整个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从 1985 年开始，我国农村经济第二步改革提上日程。1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从 1985 年起，改革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农业生产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打破农业经济发展的传统格局。积极发展乡镇企业。规定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兴办交通事业，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等。改革统购、派购制，调整产业结构为中心的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以后，又得到了生产经营上的较大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价值规律和市场情况，决定生产经营的品种、规模和数量，从而进

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也为使农村产业结构趋向合理提供了条件。这样，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农村改革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任务。到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面貌的进一步变化。一是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1987年粮食年产量达到4亿吨，比1978年增加了32%；棉花年产量达到419万吨，比1978年增加93.3%。农业总产值达到4676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倍。农民家庭的年纯收入也有了成倍的增长，绝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地区的农民开始向小康水平发展。二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首先是经济作物的比重提高，以1986年与1978年相比，其播种面积由2.17亿亩增加到3.04亿亩，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9.6%提高到14.1%，经济作物的产值也由11.9%提高到17.9%。同时，一向薄弱的林牧副渔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3.3%上升到37.8%。尤其是林业和牧业的恢复和发展，使农村的生产资料资源得到较为科学的利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三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中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乡镇企业的起飞是从大城市郊区的农村开始的，他们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与城市工业横向联系，得到较快发展，并逐步推动了广大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到1986年，全国乡镇企业达到15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到4390多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1.5%，乡镇企业1986年的总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2.3%。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总产值达到4765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8%，首次超过了纯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原来单一生产农产品的农村经济走上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加速了农村致富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兴起了一大批小城镇。这对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政社合一”为标志的人民公社制度，也随之进行了改革。1980年首先在四川省进行了政社分开的试点，并逐步在全国各省推开。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撤销原来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撤销作为行政机构的生产大队，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农村撤社改乡镇、撤队改村的体制改革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

实践证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繁荣了农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农村经济仍然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最主要的是农村剩余劳力的增多，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结果

导致了粮食产量从1985年以来的徘徊。这一方面是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不合理，长期偏低，影响了农民对生产的投资；另一方面是家庭承包仍然是在小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规模小，统一经营的优越性难以发挥。从1987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争取农业经济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一是实行合同订购与市场收购相结合的办法，逐步理顺粮价，解决粮食收益低的问题。二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向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发展，尽可能地组织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三是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以工补农"，向农业生产广度和深度进军，实现集约经营和科学种田。四是国家和各级政府根据财力增加对农业投资，在财力物力和科学技术上支援农业发展。总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深化，联产承包责任制要不断完善，在农村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要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政策，以保证我国的农业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取得了经验，为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标志着我国从试点阶段转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第二，系统地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增强企业活力，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对内的经济技术交流。第三，要起用一大批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决定》公布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和具体政策，以促进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进行。1985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扩权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1986年3月，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指出，"七五"期间应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改革的

内容是全面而广泛的，包括工业、商业、外贸、运输、建筑等管理体制，人事、税收、分配等制度，都逐步实行了综合改革。到1987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1) 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10个方面给了企业以应有的权限。1986年12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企业拥有了生产计划权、产品购销权、定价权、资金使用权、工资奖金分配权、横向经济联合权、劳动人事权等一系列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增加了企业的活力。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使企业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安排经济活动，有利于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2) 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7年同1978年相比，国营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7%上升到40%以上，使企业增强了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在企业内部，实行承包为主的经济责任制，提高企业效益。1981年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率先实行了承包经济责任制，并取得了成效。1982年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一经验，并随即进行推广。1984年10月以后，承包经济责任制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大规模推行，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交通、外贸、基建、商业等行业也先后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从而把经济责任制改革推广到全国。承包经济责任制是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用契约的形式来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体现着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原则。实行承包经济责任制，使企业的经营成果与职工经济利益挂钩，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和增强企业内部活力，对强化广大职工群众的责任感，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产生了积极作用。

(3) 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增强对企业的责任感。1984年初，全国有3000家企业进行了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取得了良好效果。同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充分肯定了厂长（经理）负责制。认为这是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的要求。《决定》推动了厂长负责制在全国工业企业的广泛实行。1986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厂长负责制被正式确定下来。《条例》规定，企业实行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厂长负责制，厂长可由政府主管部门委任招聘，或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厂长对企业实行全面负责管理，处于企业的中心地位，可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行使职权。推广厂长负责制的工作进展很快，到1988年，全国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已占国营企业总数的83.2%，实行厂长负责制，对过去企业党政不分的状况是一次改革，有利于发挥厂长对企业的管理的责任。

(4)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改变了原来那种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活跃了社会主义经济。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国家给予必要的保护。在国家的鼓励、支持和保护下，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很快，并在发展社

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87年同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有相当的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77.6%下降到59.7%，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个体工商等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与此同时，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到1987年9月，我国已批准建立的“三资”企业达到8943家，协议合同外资金额达到近200亿美元。这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以及“三资”经济并存的新格局，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成果。

（5）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促进经济区的开展和利用。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城市为中心，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形成经济开发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86年3月，国务院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横向联合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是横向联合的原则。发展横向联合有利于资源开发和资金利用，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形成，有利于促进技术和人才的交流，有利于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的合理化。横向联合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发展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批以大中型企业为龙头、以城镇集体和乡镇企业为两翼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城乡经济联合体，提高和加强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综合能力，到1987年，开始形成了一批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如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等，据统计，全国已建立了3.2万个新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100多个大中型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以及49个跨地区、跨部门的横向经济联合网络。

（6）实行“利改税”的财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调节功能。1983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国营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在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开始了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利改税”的试点。1984年10月，国务院决定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以国家向企业征收工商税、固定资产税和所得税，代替上交利润的办法。缴税后的企业自留资金可以自行安排使用，进一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国营企业这种“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财税制度改革，增强了经济调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财政“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状况，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调动了地方与企业的积极性。

（7）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和改进。1987年与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17%，国家统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筹集的从76.6%下降到31.2%，由银行筹集的从23.4%上升到68.8%，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另外，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中，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管理体制、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对国营企业试行股份制，对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

等的试点；对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国家对价格、外贸、金融等体制的改革等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经验。

总之，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冲破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克服了一些弊端，搞活了经济，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到 1988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 14015 亿元，国民收入 11 770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约 9.6%，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 8 位。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其中钢铁产量突破 6000 万吨大关，发电量达到 5400 亿千瓦小时，都跃居世界第 4 位。石油产量上升到第 5 位。煤炭产量居世界第 1 位。经济改革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多，生活提高，职工平均工资由 1978 年的 615 元增加到 1988 年的 1 747 元。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猛，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超越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要靠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进行治理整顿，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加以合理解决，使国民经济走上稳定协调的发展轨道。

三、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形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特别是从 1980 年 5 月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以来，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方面，特区发挥了“窗口”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不断总结广东、福建两省改革开放和特区工作的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1983 年 4 月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这就是在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走出的第一步。

1984 年 2 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时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不久，他正式向党中央提出，“除现在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就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把经济特区的政策推向整个沿海地区，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以加速沿海省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3 月下旬召开了天津、上海、大连、烟台、青岛、宁波、温州和北海等 8 市负责人及有关省区负责人座谈会，着重研究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和海南岛开放的经验和政策，论证了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开放的条件和设想。5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14 个大中港口城市。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是我国对外开放走出的第二步。1990 年 4 月，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了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

策，要把浦东建成为21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并作为今后10年开发开放的重点。上海原是太平洋西岸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重要口岸，拥有人才、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浦东开发开放，既能恢复上海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功能，又能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浦东开发开放是在上海人才、技术、管理优势的高起点上进行的。其特点是综合力量强，辐射面宽；吸收外资规模大，效益好；高新技术先进，层次高；在国内外影响大，意义深远。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浦东开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战略思想。

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才和科技优势也非常明显，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14个港口城市是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部，是对外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对内进行经济联系协作两个辐射扇面的交点，其作用可以直接影响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沿海港口城市开放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扩大这些城市的自主权，让它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二是对前来投资的客商都给予优惠政策待遇，以利于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在这些城市中都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优惠政策，重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集中兴办"三资"企业，建立外向型的新型工业区，这些开发区又是开放城市的"窗口"和改革开放实验区，在吸收、推广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传递科技信息和经济情报，培养和输送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自1984年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以来，在引进外资和科学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到1987年，全国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合同）项目10350项，累计协议金额625.0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等达257.73亿美元。同时还开办了内联生产企业940家，总投资28亿美元，已投产的外引内联企业共1 235家，其中有"三资"企业765家，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334亿元，其中"三资"企业产值188亿元，占56.3%；出口创汇29.1亿美元，"三资"企业创汇15.85亿美元，占54.46%。沿海开放城市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生命力。

在沿海港口城市开放的基础上，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并指出这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1988年初，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与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发区。同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建立海南省的决定，同时通过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这样，在我国沿海地区，就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有1亿多人口，科学文化比较发达，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农副产品丰富。这些优势对于内引外联，发展外向型经济，都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开放的活跃和发展，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经济特区的影响力，逐步向内陆省市和沿边地区不断拓展。进入90年代，东部沿海省市的经济开放政策，首先沿着长江流域迅速向腹地延伸，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城市。至此，长江沿岸10个中心城市全

部对外开放。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区，其固定资产净值与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40%，可开发水能资源占全国50%，内河航运量占全国70%，地下矿藏也极为丰富。长江流域横贯我国东西，是全国经济发展内联与外展的大通道，实行沿江开放政策，不仅可以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对于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形成，也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继沿江开放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将开放城市发展到全国各省区，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等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还逐步实行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的开放，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地区，有黑龙江省的黑河、绥芬河，吉林省的珲春，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新疆自治区的伊宁、博乐、塔城，广西自治区的凭祥、东兴，云南省的瑞丽、畹町、河口，西藏自治区的普兰和樟木两个口岸。中国沿江及内陆城市和沿边城市的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走出的第三步。

经过10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层层推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到1993年，全国对外开放地带的总面积已达50万平方公里，包括339个县市，3.2亿人口。至此，全国对外开放的城市已遍布所有省区，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对外开放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科技、经济、管理等方面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1988年即对外开放10年的统计，我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协议16377项，协议金额达785.1亿美元，外资企业已达15948家，外商实际投资121.08亿美元。我国引进的技术合同达3530项，总金额达205.5亿美元，其中用于改造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引进项目达2万多个。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198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1028亿美元。进入90年代，对外开放的形势发展迅速，成绩也越来越大。如1993年上半年，实际引进资金达9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近一倍。5个经济特区在这半年之中生产总值达到48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6%，进出口额达121亿美元，利用外资15亿美元。这些成就从一个方面呈现出思想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奋发前进的步伐，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前景。

四、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共十二大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党和国家决定对现行的科技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

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2年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但是，我国的科技体制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使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脱节，不利于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以促进经济建

设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科技人员的智慧和才能的发挥。因此，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1983年国务院成立了科技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科技体制改革的试点。1984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要有利于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促进科研单位的社会化，提倡多样化发展。7月，又召开了全国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谈会，着重研究了科技人才的流动问题，提出了对科技人员实行聘任制的办法。会后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科学技术与人才开发交流中心，逐步对科技体制改革进行探索。

1985年3月上旬，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召开，全面讨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步骤等重大问题。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决定》指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使科研机构面向经济生活，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的转化，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解决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工作的问题，克服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要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手段，使科技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在组织机构方面，要改变科研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与生产相脱节，军民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相分割的状况，大力加强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促进科研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技力量形成合理的配置。在人事制度方面，要改变对科技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面，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其基本精神，是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颁布，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8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自主权的暂行条例》，指出科研机构在保证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向社会承接各种科技任务。提倡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横向联系，发展科研生产联合体，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1986年，科研机构与生产单位组成的各种形式的联合体达一万多个，创造了很好的效益。1986年7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规定在优先保证国家需要的前提下，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鼓励企事业单位通过实行横向联合与技术经济协作，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到1987年，大约有36万科技人员通过各种方式流动到需要的单位工作。1988年2月，国家科委规定，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在其他单位业余兼职，从事科技开发、咨询等科技服务工作。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促使科研机构成为自主的面向经济的开发实体，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5月，国务院决定在科研机构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使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扩大科研机构自

主权和提倡科研人员的合理流动，为增强科研机构的活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科技体制改革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改革科研事业费拨款制度，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198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改变科研任务和经费主要由国家通过行政渠道下达的方式，根据科研机构的不同特点，分为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公益等类型，分别采取合同制、基金制和包干制等新的经营管理形式，既合理地应用了国家的科研经费，又促使科研机构积极开辟经费来源，走上科研经费自立之路。

建立和开发技术市场，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环节。1985 年 1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也是商品，应积极开展技术转让活动。1986 年 3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市场工作会议，要求社会各方面积极支持开发技术市场。10 月，中国技术市场联合开发集团正式成立。当年，全国通过技术市场实现价值的技术成果共 8.7 万项，成交金额 20.16 亿元。同时已有 50 多项科学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创汇数千万美元。技术市场的开发，为科技成果直接服务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加速了科学技术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使科技事业生机勃勃，取得了显著成绩。至 1988 年，我国的自然科学科技人员已发展到 966 万人，县以上独立的科研机构 5200 多个。近几年来每年的重要成果达 1 万项以上，到 1988 年累计获得国家奖励的重大成果达 5317 项，为国家增收节支 15000 亿元以上，初步显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巨大作用。我国在一些高科技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 1983 年我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每秒 1 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1984 年建成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地球资源遥感卫星地面站；1988 年 10 月，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并对撞成功；12 月，在兰州建成我国最大的离子加速器；另外，我国多次用"长征 2 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成功。这些重大成果也显示了科技体制改革给科技发展带来的活力。

在教育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一直把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传统教育体制，是为了"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普及中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了中等教育体制的改革。1983 年 5 月，又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这两个文件要求加快城乡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发展职业教育，以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具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的需要。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作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充分认识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要求：有系统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 9 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相应地改革劳动人

事制度；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改革的目的，是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的需要。《决定》的颁布，加快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1986 年 6 月，国务院制定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明确了高校拥有办学、财务、基本建设、人员、教师职称评定与职务聘任、教学、科研、对外学术交流等 8 个方面的自主权。《规定》改进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扩大了高校的管理权限，对增强高校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促进高校的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积极作用。

1986 年 4 月，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并开始正式实施。各地从实际出发，分别不同的经济条件和教育基础，制定了普及义务教育规划，有步骤地把实施 9 年制义务教育推向全国。

在几年中，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从中央到地方都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费逐年增加，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1978 年 5.9% 提高到 1986 年 9.5%。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工技术教育，1987 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已占高中阶段学生的 40%，初步形成了行业配套、结构合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经过教育体制改革后的高等学校，1987 年总规模已达 200 多万人。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经过调整充实后有了很大发展，为各条战线培育了大量人才。教育体制改革不仅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支援了各条战线的建设事业。

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改革整编的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1 年 9 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同年 9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在华北地区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成功，标志着我军在军政素质、装备水平、合成军种作战能力、运用现代化手段防御入侵的能力等方面，都迈出了新的一步。

80 年代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国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也应实行战略性转变，由原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准备，转入和平时期的轨道，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1985 年 6 月 4 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宣布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员额减少 100 万的决策。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家四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的规模、质量和速度，总是要受到国家经济实力制

约的。国防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除了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安全外，还要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可是长期以来，我军存在着规模过大，数量偏多，体制编制不尽合理，武器装备更新缓慢，军事技术比较落后的状况，这与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担负的任务，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因此，必须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实行转变，进行军队的精简整编，增强和提高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程度。

军队的现代化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就没有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军队的正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了与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相适应，就要求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加强组织性、计划性，搞好诸兵种的密切协同。革命化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革命性质。要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就要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必须全面地实施。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适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具有中国特色。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国家，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走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道路。

自 1985 年 6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来，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整编工作加快了步伐。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我国的现代化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首先，胜利地完成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把我军建成了一支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革命军队。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各地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顺利展开。到 1987 年，我军经过精简整编，裁军 100 万人的任务已经完成。结合精简整编，我军在编制体制、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国防科研、院校工作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经过精简整编，师团单位减少 4054 个，军级单位减少 31 个，大军区减少 4 个，三总部机关人员编制精减一半，铁道兵并人铁道部，撤销基建工程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官兵比例由 1:2.45 变为 1:3.3。此外，还将野战军整编为集团军，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加强了特种兵的建设。对军事院校进行了调整，组建了国防大学，对全军的教育训练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走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道路，将县、市人民武装部移交地方建制。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第二，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作风。在军队精简整编的过程中，全军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配合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行，1986 年 12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动员和团结全体官兵，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简整编后的军队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发挥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无产阶级柱石的作用。

第三，积极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党和国家对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战略思想转变后，军队从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出发，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的建设事业，开放了一批军事设施，全军有 59 个军用机场、四个军港码头、300 多条铁路专用线，改为军民合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全军所有医院均向社会开放，1985 年至 1987 年，每年平均收治地方病人近 100 万人，门诊地方病人 1400 多万；军队利用自己的科学技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仅 1985 年科技助民项目就达 350 多项，军用技术转为民用技术的项目，到 1987 年累计多达 10000 多项，军转民产品产值已占军工企业总产值的 48.9%；军队还直接承担了架桥筑路，开发矿山，治理江河等许多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完成了像引滦入津这样大型的艰巨任务；在发生洪水、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是奋勇当先，赴汤蹈火，全力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帮助老、少、边、穷（指老解放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地区脱贫致富活动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颂。

第四，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武装军队，培养了一批新的军事人才和军地两用人才。在军队精简整编过程中，调整了军事院校，组建了国防大学等现代军事人才的培训基地，加强了军事院校的领导，为部队培养和输送了 100 多万掌握专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干部，使部队官兵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实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等，都得到了增强和提高。与此同时，在部队中开展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到 1987 年，全军累计有 550 多万青年战士参加了民用技术训练，有 230 多万人领取了合格证书和技术等级证书，150 多万农村籍战士回乡后发挥了专长，其中 27 万人成为农村基层干部，32 万人进入了乡镇企业，12 万人成为各种专业户，成为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有生力量。

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和军队改革整编工作的进行，不仅使全军的军政素质和干部的指挥能力与业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现代化的国防科研和陆海空综合防卫作战能力有所加强，而且直接参加和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做出了新贡献。

第三节 “六五”计划的完成与“七五”计划的制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一、“六五”计划的超额完成

十二大以后的几年，特别是其前两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经过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批准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由于计划切合实际，加上通过前几年的经济调整，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到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

1985年同198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7707亿元增加到13 335亿元，按198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这个速度大体相当于1953年至1957年期间的速度，高于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期间，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

在这5年中，我国农业的发展更为迅速，是建国以来最快的时期。从1953年至1980年的28年中，平均每年增长3.5%，其中增长较快的是“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4.5%，而“六五”时期为8.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迅速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84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记录，达4073亿公斤，人均口粮达到393公斤，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提供了条件。

在这5年中，我国工业的发展也较迅速。1980年至1985年原煤产量由6.2亿吨增加到8.5亿吨；原油从1.06亿吨增加到1.25亿吨；发电量由3000亿度增加到4073亿度；钢产量由3700万吨增加到4666万吨。可见，在这5年中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有些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已跃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我国有10亿人口，所以，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还很低。然而，总产量的增加，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在这5年中，我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进展，5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五五”时期增长46%，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增长77%。“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530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880亿元，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496个，其中交通、能源项目103个。5年内新增发电机容量1950万千瓦、采煤能力8000万吨、原油开采能力5000万吨、铁路通车里程1 500公里、复线里程1 500公里、电气化里程2400公里、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1亿吨，现有企业更新改造步伐加快，共建成投产项目20多万个，这为“七五”计划和90年代经济“起飞”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国民经济活动的效益和效率有所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由“五五”末期连年下降转为逐年上升，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五五”末期，国家财政收入出现较大的赤字，1979、1980年合计赤字近300亿元。“六五”期间，通过调整和改革，生产发展，流通扩大，效益提高，收入增加。1983年增加收入127亿元，1984年增加收入255亿元，1985年增加收入362亿元，全年总收入达1829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

在这5年中，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的局面。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六五”期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300亿美元，比“五五”期间增长1倍。5年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1万多项，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在这5年中，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六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这方面的经费为1172亿元，比“五五”期间的577亿元增长1倍。5年中取得科研成果33000项，有937项获国家科技发明奖，其中有一部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校在校生从1980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万人。

在这5年中，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明显提高。1985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80年的277元提高到1985年的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了1953—1980年28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9%。5年合计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3500多万人。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六五”期间住宅竣工面积达63000多万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32亿平方米。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1985年底，达1623亿元，比1980年增长3倍。

“六五”计划的完成，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粮食、棉花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由于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过去许多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的商品，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市场繁荣，同时也使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率降到30%左右。

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内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这说明，经过这5年努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上，从片面追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值、产量增长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注意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的状态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

“六五”时期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十二大规定的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的部署，未能得到认真的贯彻。胡耀邦对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关于经济建设要扎扎实实、理顺关系、打好基础、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不同意。他同地方领导人谈话，主要是讲高速度、高指标，要求提前翻番，争名次。他还强调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把消费放在生产前头。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分配等现象。由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

增长过猛，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过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为以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但总的说来，“六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

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七五”计划的制定

由于“六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就着手进行“七五”计划（1986—1990年）的拟定工作。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考虑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宜，关系到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要作相当幅度的调整，尤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郑重从事，因此，根据党章第12条的规定，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提出了“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与主要政策措施，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步骤。

《建议》指出，按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互相促进；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共中央建议“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4—5%，使人民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有进一步的改善，到199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16000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1000亿元。在这5年中，我国财政总收入将达到9000亿元左右，比“六五”期间增长40%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将新增5000亿元左右，比“六五”期间新增额多60%；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消费将由温饱型逐步向小康型过渡。“七五”期间要求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

为了使党的事业保持旺盛的活力，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有64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37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0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些老同志的表率行动。全国代表会议经

过充分讨论，增选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顾委委员56人，中纪委委员31人。这样，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在十二大开始新老交替后，又在年轻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是中国共产党后继有人，大有希望，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首先，在关于形势和改革方面，他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强调，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各个方面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其次，关于"七五"计划，他说：这次会议通过的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确定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是一个好文件。"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定在7%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份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第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但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他强调，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因此，必须大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决不能削弱。同样，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

第四，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他说，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他强调提出新老干部都要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说："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1985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

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由22人组成。政治局常委是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全会增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胡耀邦任总书记。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对"七五"计划安排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综合平衡，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4月，经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批准实施。"七五"计划规定：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16770亿元，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按1980年价格计算，达到11170亿元，比1985年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7.5%；1990年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9350亿元，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1990年全国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到517元，平均每年增长5%。1990年，粮食产量达到42500～45000万吨，棉花425万吨，钢5500～5800万吨，煤10亿吨，电力5500亿度，石油1.5亿吨。"七五"计划的完成，将使我国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986年底，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

这次学潮直接引发的原因，各地各校虽有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

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党和政府对闹事学生采取正面教育，积极疏导的方法。由于学潮波及不少城市，有的地方在学生游行时，出现了堵塞公共交通，严重妨碍沿途各单位及居民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现象，还发生了少数人趁机打砸抢、污辱妇女、破坏社会治安的严重事件，在有的游行队伍中，有人公开呼喊反对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事实表明，确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煽风点火，企图把青年学生推向同人民政府对抗的方向，蓄意扩大事端，使青年人成为实现他们卑劣目的的牺牲品。

12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他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他指出，"从中央

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他强调：“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还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总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这个讲话的传达，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武器。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开除了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党籍。由于及时有力的疏导，学潮很快平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87 年 1 月 16 日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他担任总书记期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一致同意接受他的辞职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赵紫阳在 1980 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绩，1980 年 9 月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成绩，所以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来经同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87 年 1 月 22 日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中共中央于 1987 年 1 月 28 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

1987 年初，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讲到这次学潮和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他指出：“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他说，学生闹事和更换党的总书记这两件事，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他还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后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同时，他也指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行，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

第四节　“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对外关系的发展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实现祖国的统一，结束国家分裂，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解决历史上遗留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条件和时机，已经逐步的形成和具备了。党和国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从实际出发，以中华民族统一的根本利益为重，作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决策，并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

台湾、香港和澳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它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要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一国两制”就是根据中国的这种实际提出来的科学构想。从历史上来说，解决台湾问题和港澳问题都是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解决台湾问题是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居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同新中国实行军事对峙，人为地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成为祖国统一的主要问题。恢复我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是需要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谈判的，这是一个外交问题。在香港、澳门回到祖国怀抱后，国家对这两个地区实行什么政策，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香港和澳门本来是中国的领土。16 世纪中叶以后澳门被葡萄牙借口租占。1840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先后强迫清朝政府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割让和强占了香港和澳门。新中国成立后，一再庄严声明，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和平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是祖国统一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台港澳长期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近几十年来，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发展很快，台湾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四小龙”之一，香港是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和最大自由贸易港之一。台港澳的居民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习惯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大多数人希望和平统一后能够享有较多的自治权，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希望立即实现他们还不熟悉的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根据台港澳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为了保持那里的经济繁荣和稳定，照顾到那里大多数人民的希望和要求，逐步提出和形成了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设想。这一科学构想始于五六十年代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方式，即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从建国初到 1978 年底，中

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是立足于武力解决，但不放弃和平解决的途径。早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955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和"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

1957年4月，毛泽东公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和台湾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意愿。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又建议国共两党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到6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对台工作的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方针。"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可以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同"一纲四目"方案是有机联系的，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实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正常化，这就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了内部和外部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调整了对台政策，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

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和缓了海峡两岸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宣布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

1月30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在向美参、众两院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方针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指出：(1) 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 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3)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

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 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 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 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9)) 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这9条方针政策虽然没有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实际已含有这个意思。9条方针政策的公布立即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欢迎，海峡两岸也出现了和缓的气氛。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中谈到香港前途问题时，提出在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

1983年6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阐明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实行和平统一的设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第一次公开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6月，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再次阐明了"一国两制"科学概念的内容。他说："我们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我们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实现国家的统一。

1984年5月，"一国两制"的构想写进了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内容是丰富而实际的，"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来说，就是（1）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或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2) 努力实现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充分照顾到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情况和现实状况，既要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又要保持这些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只有用"一国两制"的方案才能解决问题。在台湾问题的解决方面，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

独立”图谋的。因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3）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是统一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是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部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补充，共同发展，50年不变。（4）祖国统一后，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特别行政区，行使地方政权的权力。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外交和国防事务上的管辖权。（5）在特别行政区内，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6）特别行政区享有大陆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的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7）大陆采取单一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行政区采用带有某些复合制特点的政权结构形式，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成员必须是当地的中国人、爱国者。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其各界代表人士，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的管理。（8）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调整大陆与各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关系，保证大陆地区和特别行政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具有十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为解决国际争端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有利于世界和平，尤其是地区间的和平。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这就是说，用“一国两制”这种和平方式，为世界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解决统一问题，开拓一条新途径。

二、中英、中葡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协议的签订

历史进入20世纪肋年代，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解决香港与澳门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了。一方面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威望的提高，为解决港澳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是“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为解决港澳问题指明了方向和依据。同时，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首先到来。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占香港岛。1860年又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又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英国对香港的永久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

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按照“一国两制”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1982年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了会谈。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期间，与中国总理进行了会谈。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英方，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了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英国政府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针对英国政府的错误言论，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强调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不仅要收回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英双方必须在“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前提下进行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通过这次会谈，中英双方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本着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共同目的，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继续进行谈判。

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22轮会谈，终于达成共同协议。1983年7月12日至13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4轮会谈毫无进展。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中国政府外交部也多次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时将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中国政府希望在1984年9月前，能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如果届时还达不成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的政策方针。10月，英国首相来函提出，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1983年12月第7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根据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进行组织和保证其权益。在谈判的过程中，英方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不再坚持对香港治权”相违背的主张，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予以拒绝。

从1984年4月第12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其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1984年9月18日，中英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于同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12月19日由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协议包括一个主体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三个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1985年5月27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还就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有关事项作了具体规定。1990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使香港在政权交接的过渡时期以及1997年以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了法律依据。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香港问题解决后，解决澳门问题已呈现出水到渠成之势。于是澳门问题的解决便立即列入议事日程。

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一样，也是历史遗留问题。早在16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殖民者就借口租占了澳门，到1887年，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强行占据澳门。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

1985年5月，葡萄牙共和国总统拉马路·埃亚内斯访华，中葡两国同意在近期内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5月24日，邓小平会见埃亚内斯总统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埃亚内斯总统也表示葡萄牙人民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中葡两国政府领导人坦诚友好的接触，为顺利解决澳门问题铺平了道路。

从1986年6月，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澳门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代表经过坦诚、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至10月份，两国政府代表团已进行了三轮谈判。双方决定为了具体讨论和修订中葡双方会谈中所提出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在双方政府代表团下设立一个工作小组。1987年3月，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中葡两国政府举行了第4轮会谈。3月26日，两国政府代表团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4月11日，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访问中国。13日《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宣告400多年来遗留下来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问题协议的签订，生动地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在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香港和澳门问题的相继解决，对台湾问题必定会产生深远影响，对早日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将会起着积极作用。

在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问题协议签订后的过渡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尤其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殖民利益，他们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于1992年10月单方面提出了包括香港94/95年选举安排的政改方案，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也违反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他们企图为平稳过渡设置障碍，延续英国对香港的影响，以便在1997年以后继续操纵香港政局，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对此，中国政府严正

声明：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行使主权，作为英国管治香港政制架构的最后一届区议会，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架构依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无论英国或其他什么人在香港问题上制造什么麻烦，因而发生什么波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有决心、有能力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且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行将结束，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

三、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使香港、澳门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也使海峡两岸的人民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增加了信心和希望，鼓舞着他们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促进海峡两岸关系有了新发展。

“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以后，党和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消除隔阂，促进交往。首先倡议海峡两岸直接实行“通航、通商、通邮”，随后又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欢迎和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旅游、考察和经商。198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89年大陆和台湾各自在香港成立协调解决海峡两岸商务争议的机构，为沟通双方联系和解决法律纠纷提供方便。台湾当局虽然没有放弃“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所谓“三不”政策，但迫于形势也调整了对大陆的政策。1987年10月，台湾当局迫于两岸人民的压力决定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988年2月又通过《中国国民党处理干部同志赴大陆探亲办法》，准许包括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在内的国民党员、干部赴大陆探亲、旅游。7月通过的《现阶段大陆政策案》，确定在维持官方“三不”政策的前提下，“民间、间接、单向、渐进”开放两岸关系。11月又宣布有条件地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病、奔丧。这实质上是放宽了对“三不”政策的限制。

随着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和放宽，海峡两岸的关系有了新发展和新突破。虽然这种发展主要还是在民间，但发展的范围已逐步拓宽，由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扩展到经济，甚至带有政治性的活动；发展的方式已成为多层次，由不公开、半公开到公开，由不合法、半合法到合法。这些关系的发展，说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越来越近，海峡两岸的人民对“一国两制”的认同越来越多，这正是祖国和平统一的希望所在。

在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方面，从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到1988年底，进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旅游的台胞近40万，其中有各界知名人士，原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甚至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和“省议员”等。1987年海峡两岸互通信件达800多万封，台湾民众直拨大陆电话每日多达数万次。台湾当局于1988年11月9日开始办理大陆同胞赴台探病奔丧，当日就办理了31件申请手续。这种民间交往的人数逐年增加，进入90年代，每年已达到百万人次。

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使台湾海峡日益成为繁忙的黄金水道。平均每日有200余艘各国船只往来通过，其中不少是大陆与台湾的渔船。在台湾的基隆、新竹、高雄、台南；澎湖与大陆的厦门、福州、东山、平潭之间有六条航线，约有10艘货船往返其间。从1979年到1984年5年间，就有2万余艘大陆船只安然通过台湾海峡。福建、浙江、广东、上海等省市在沿海地区修建了多处“台湾渔船停泊处”、“台湾同胞接待站”，热情接待前来避风浪的台湾渔船，并多次救援海上遇险的台湾船只和船员。

在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方面，大陆与台湾的著名学者、画家、作家、歌星、球星等相互交流，络绎不绝，人数逐年上升。1982年4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大陆与台湾都派出代表参加。大陆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领队，台湾方面由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文化委员秦孝仪领队。胡秦二人既是近代史学家，又分别为共产党、国民党中央委员，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这样的会虽然不是在国内，但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加学术活动，是一个良好开端。1988年下半年，有“台湾史研究会”多位专家到北京、厦门与大陆同行举办“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台北三位科学家前往北京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年会、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和围棋选手林海峰赴京参加“应氏杯”国际围棋锦标赛等一系列学术、体育交流活动。如果说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的两位记者不顾台湾方面的阻挠前来采访中共十三大，从而轰动两岸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两岸不断扩大的新闻交流活动则越来越使人习以为常了。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重要会议，走访各界、各方面人士，报导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增进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了解。

大陆和台湾还进行了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接触和会谈。1989年5月在北京举行“亚银会”，台湾派出财政部长郭婉容出席，这本身就带有半官方的性质。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两个颇具影响的民间组织，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这次会谈签署了四项协议，确立了两会联系的方式和会议制度，为两岸交流建立了正常化的渠道；确认两岸的经济应加强交流互补互利；在促进和保护台湾在大陆投资方面，双方取得了共识；确立了加强两岸科教文化交流的原则。同时，两会还决定联合成立经济科技小组、综合事务小组，处理两岸有关紧急事务问题。“汪辜会谈”的成功，将对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海峡两岸经贸往来日益扩大，双边间接贸易迅速发展。1979年经香港转口的贸易额只有0.77亿美元，1987年达15.26亿美元，1988年达24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30倍。到1988年底，双边间接贸易额累计约80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台湾也成为大陆第六大贸易伙伴。

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工商业者把目光投向大陆市场。1988年秋季广交会，来自台湾的商人多达1900多人。台湾商人中有70%希望通过香港与大陆做生意，至少有20%的台湾贸易商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以间接方式同大陆进行贸易。同时，台湾的不少企业家也纷纷来大陆投资设厂。1988年台胞到大陆投资的项目近300个，投资额达4亿多美元。1988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的规定》以后，台湾厂商来大陆考察或洽谈投资事宜更加活跃，投资范围从广东、福建等南方沿海地区向北方沿

海地区扩展。1991年，台湾到大陆投资的厂家有3000多家，协议投资额达30亿美元，1992年协议投资额达55亿美元，到1993年底，投资项目数量累计超过2万项，协议投资金额超200亿美元，占外资及港澳台同胞直接投资额的第二位。1994年3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胞投资保护法》，再一次表明党和政府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往来的一贯立场。海峡两岸的贸易关系正逐步从间接贸易、间接投资向直接贸易、直接投资的方向过渡。

海峡两岸人民非常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台湾大多数爱国同胞迫切希望与大陆实现“三通”，增进彼此了解。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等34名台湾“中评委”提出“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提案，台湾立法委员胡秋原不顾个人安危，前来大陆与各界人士探讨中国统一问题。这些都反映了两岸人民渴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愿望。两岸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和举办研究会，探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问题，大多主张在国共两党对话时机成熟之前，可先进行对话、沟通，以缩短两岸之间的距离。

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台湾当局在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的若干重要问题上，仍然坚持错误的观点，抱着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放弃反共基本国策”等陈词滥调，拒绝国共两党的直接对话与接触。尽管台湾当局有关两岸关系的政策有所变动，但其整体政策仍是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特别是李登辉大搞分裂祖国的所谓“务实外交”，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一系列言行，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台湾还有一股“台独”势力，企图分裂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到处活动，制造事端，抗拒和平统一历史潮流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坚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

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是光明的，经过两岸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祖国统一的大业一定能实现。

四、对外关系的发展与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在对外工作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打开了新的局面。

1977年8、9月间，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访问中国，中南两党恢复了正常关系。

在中美关系方面，卡特总统上台后，于1978年4月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中国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中美建交谈判于7月初在北京开始。在谈判中，美国不得不同意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即美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撤走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一切军事设施，废除美国同蒋介石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经过谈判，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

化。中美关系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经过谈判，美国政府终于表示承认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979 年 1 月 1 日，美国宣布同台湾断交；4 月，美国从台湾撤走了全部军队；1980 年 1 月 1 日正式终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此后，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台湾问题始终是主要障碍。就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又立即制定了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实质上是把台湾当作国家，把台湾当局当作政府，它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中国政府对美国违背《上海公报》及建交公报的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了美国，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在 80 年代，中美关系有起伏波动。1982 年中美达成了《八·一七公报》，进一步解决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原则和方向。1984 年、1985 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为了稳定两国关系，促进友好，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互访。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在遵守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三个公报所确定的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使中美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与合作都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和日本在 1972 年建交以后，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加强。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条约自 10 月 23 日起生效，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10 月 22 日至 29 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23 日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对日本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使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 年 4 月 8 日至 19 日，邓颖超副委员长率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中国人大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代表团。访问期间，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岚山举行的周恩来诗碑揭幕仪式。1982 年至 1983 年间两国领导人互访中，又一致同意确认“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依赖、长期稳定”的四项原则，这就为中日两国间的长期的平等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1984 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两国领导人又同意设立“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作为中日两国政府咨询机构。在中日关系得到扩大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日本国内一部分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如 1982 年和 1986 年两次发生教科书问题即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新编日本史》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85 年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亲台势力鼓吹“两个中国”等事件，都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只有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条约，正确认识和对待中日关系史上曾有过的那段不幸历史，维护好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才能使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继续发展。

在中越关系方面，由于越南当局掀起大规模的反华排华运动，驱赶大批华侨回国；越军又不断侵犯我国领土，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枪杀我国军民，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1979 年 2、3 月间，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奋起自卫反击，打击了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气焰，使中越边境地区获得了安定。这次自卫反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中苏关系方面，当中美关系发生变动时，中苏关系突出的问题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对中国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派大批军队进驻蒙古，支持越南侵柬反华，出兵占领阿富汗，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从 1969 年起，中苏经过 9 年的边界谈判，始终没有结果。1979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届七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 1980 年 4 月 11 日期满后不再延长的决定。

同年，中国政府建议并经苏方同意，中苏举行了国家关系的谈判。在 80 年代，中苏关系有所改善。从 1982 年 10 月起中苏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的特使磋商。1984 年底，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在经贸、科技合作方面，两国跨出了一大步。1985 年 7 月，姚依林副总理访苏，中苏都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中国方面坚持消除“三大障碍”（即苏联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从阿富汗撤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1986 年 9 月，邓小平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同他见面。此后，苏方采取了具体措施，从阿富汗、蒙古撤军，并且促进了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从而在实际上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88 年 12 月，钱其琛外长访问苏联，标志着两国长期对峙的关系开始解冻，两国关系逐步趋向正常化。

在这个期间，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也在发展。

从 1976 年 10 月到 1979 年 12 月，先后有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访华，其中有 20 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我国还同约旦、利比亚、葡萄牙、爱尔兰等 9 国建交。我国领导人先后出访了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法国等 11 个国家，发展了双边友好关系。我国特别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往来。1982 年 12 月 20 日至 1983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先后对埃及、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坦桑尼亚等 11 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加深了同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关系，并宣布以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等四项原则，发展同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1984 年，中国领导人李先念先后出访了亚洲、南欧、东欧、西欧、美国、加拿大等 18 个国家，并有 20 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访华。

在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发展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从 1977 年以来，相继恢复了同南斯拉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希腊、比利时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到 1987 年底，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 80 多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有着各种联系和接触。

总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适应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的对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局面。仅 1983 至 1987 年，我国主要领导人就先后访问了 64 个国家，足迹遍及五大洲；接待了来自 89 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中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日益扩大。到 1987 年，已有 135 个国家同我国建交，有经济贸易关系的国家与地区达 178 个。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为现代化

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为此，邓小平要求我们的外交工作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明确指出：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我国在外交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1985 年 6 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三线建设等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否有利于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是否有利于共同发展和繁荣，来决定我们的态度和对策，决不屈从任何大国或集团的压力。这更加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指出："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邓小平还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以根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中国特别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1984 年 5 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对第三世界各国来说，如何发展本国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把当代世界的问题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

是发展问题。在1985年3月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当前世界的发展问题，就是要建立世界各国间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以逐渐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日益扩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日趋激化的状况。因此，中国既要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也要为改善南北关系、加强南南之间的联系，一起为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共同繁荣而努力。

第九章　共和国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与贯彻

一、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为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党和政府紧紧地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过9年的改革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9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翻一番，创造了建国以来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长期困扰我国的一些严重社会经济问题，有66开始解决，有的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在全国人口中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水平发展，还有部分地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但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城市中新就业的劳动力达7000万人，农村中乡镇企业的崛起，有8000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了非农产业；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扭转了过去那种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局面；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显著改变，逐步转上了大体协调发展的轨道。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还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问题和矛盾也日益暴露。形势的发展要求党对我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判断，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加快和深化改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就成为代表大会的主题。

党的十三大由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共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中共十三大在认真总结9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基础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经验，作出了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其含义是：（1）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2)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

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长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我国从 50 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 1949 年到 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此，在现阶段，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将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阶段；也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大会对当前我国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表现是：10 亿多人口，8 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些情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些科学论断，为正确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与失败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正确地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中共十三大正是根据这个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它的全部内容：一是讲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实现的；二是讲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必须是经济建设，以别的代替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然重犯历史上的错误；三是讲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实现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四是讲实现的目标，即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中共十三大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的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所以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的、分阶段的奋斗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正处在第二步中，实现了第二步任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取得新的巨大进展：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商品质量将明显地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位次将明显上升，人民将能过上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而又基础落后的国家，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无疑是一项宏伟壮丽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

十三大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十三大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大会指出，60 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

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 月 2 日召开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

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

中共十三大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与全国人民的密切联系，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埋头苦干，开拓创新，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的召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88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等一系列议案，并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选举和决定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员、组成新的一届国家领导机构。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对六届人大以来的政府工作作了基本总结，提出了今后五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并对外交工作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在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国务院认真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力开拓，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

国家经济实力继续得到显著增强。国民生产总值 1987 年达到 10920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11.1%，经济发展速度比较高，波动幅度比较小，国民收入 1987 年达到 9153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10.7%。国内收入 1987 年达到 2243.6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12.9%。粮、棉、煤、电、石油、化肥、水泥、化纤、纱、布等产品产量，以及交通运输，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全民所有制企业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达到 5 854 亿元，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进一步趋于协调，宏观经济效益有了提高。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 6.5%。固定资产产值率、流动资金周转率都比过去有所提高。工业产品品种增加，主要产品质量有了改善。工业生产中的物质消耗水平有所下降。宏观经济效益有了改进，为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

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 1982 年为 270 元，1987 年提高到 463 元，平均每年增长 8.6%；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收入，1982 年为 494.5 元，1987 年提高到 961 元，平均每年增长 6.3%。城乡市场繁荣兴旺，消费品供应明显增多。城市新建职工住宅 8.5 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 39 亿平方米，城乡人民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全国城镇共安排 3700 多万人就业，基本解决了长期积累的城镇青年就业问题。贫困地区摆脱贫困面貌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取得了重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乡镇企业和各项社会化服务业，以及各种兼业经营得到了很大发展。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改革，调动了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经济发达地区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有了发展，开始出现现代化农业的集约化经济方式。城市改革紧紧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展开，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使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搞活消费品市场的同时，逐步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开拓金融、技术、劳务和房地产市场，对价格体系实行了初步改革；积极推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改革。

科技、教育、文化、政治等领域展开了改革，并日益显示出重大作用。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开始把竞争机制引进科技领域，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了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逐步加强；军队的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转变，人民解放军实现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进程加快，裁员 100 万的任务已经完成。

五年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改变了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沿海开放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开发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积极发展了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能力不断增强；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1987 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827 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 14.7%，技术引进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五年间为改造现有企业而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有一万多项，用汇近 100 亿美元；利用外资取得显著成效，五年间全国通过各种方式使用国外贷款 153.8 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87.8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国际旅游业迅速发展，五年间对外承包工程的劳务合作，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完成营业额近 40 亿美元，1987 年来华旅游入境总人数达 2690 万人次，创汇 18.4 亿美元。

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封建思想、小生产习惯势力和陈旧观念受到冲击，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得到传播和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和企事业管理的积极性日益提高。

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出现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全面地总结经验，在改革中加以解决。五年中获得的经验主要是：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改革，改革要促进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把改革放在

总揽全局的位置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不改革长期形成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是不可能的。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只有以改革总揽全局，才能高屋建瓴，驾驭复杂局势，带动各方面的工作。

无论建设还是改革，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尊重实践。我国的建设和改革，既不能照搬书本或外国的做法，也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实际，随心所欲，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努力探索自己的道路。

建设和改革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断推进科技进步和加强现代化管理。如果经济效益不提高，我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当前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体制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需要财力物力的支持，这些都只能从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中寻找出路。所以建设和改革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以此衡量建设和改革的成败。

要正确处理建设和改革中目标和步骤之间的关系，保证建设和改革的顺利发展，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了今后五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目标是：在这五年里，我们要加快和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行第八个五年计划。到 1992 年，力争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5500 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长 7.5%左右。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贯彻如下方针：以改革总揽全局，使改革和发展更好地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认真执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战略，更加突出地抓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进一步促进全国经济繁荣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造成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良好的社会风尚。

根据上述奋斗目标和工作方针，国务院要在今后五年里努力实现十项任务：(1)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 加快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把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3) 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逐步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4) 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5) 切实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严肃政纪法纪；(6)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7) 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8) 认真贯彻计划生育和加强环境保护这两项基本国策；(9)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城乡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0)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

报告指出，在过去五年里我们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继续进行了正确的调整，从而取得了

重大成就，开创了新局面。今后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要继续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开展外交工作。

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也审议和原则上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会议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会议审查并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1988年国家预算，批准了陈丕显、郑天翔、杨易辰分别向大会作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选举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王震为副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习仲勋、乌兰夫、彭冲、韦国清等19人为副委员长；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为副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于1988年3月24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钱学森作的政协报告，通过了决议，选举了七届政协主席、副主席。主席为李先念，副主席为王任重、阎明复、方毅、谷牧等27人。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召开，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他强调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他抓住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设计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他的这个报告很快被全党接受，成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邓小平在1986年进一步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中共十三大向全党郑重宣布："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面的论述，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目标、性质、内容、步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要完成这项事业，困难是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于中国实

际情况的，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保护和促进的作用。但是我国具体的领导体制、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主要表现在：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中共十三大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具体内容是：实行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切实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便利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按宪法和法律办事，才能实现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必须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

李鹏在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切实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严肃政纪法纪作为今后五年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明确指出：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下届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政府机构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根据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今后五年内，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理顺政府同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国务院这次机构改革主要着眼于转变职能，改革的重点是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极为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其中的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的专业机构；机构改革要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进程相适应。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全面衡量了改革的需要和实现的可能，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又考虑到了社会的承受能力，既对传统管理模式有所突破，又带有一定的过渡性。机构改革是很复杂的工作，既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又要审慎稳妥。其实施步骤是：改革方案经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3 个月内把新部委组建起来，并投入运行；其余部委的内部调整和人员精简，要求在半年内完成。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逐步开展。除国务院批准的试点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机构的改革，拟从 1989 年开始；县和乡政府机构改革，拟再晚一些进行。

三、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开始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的五年间，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最突出的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1988 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 18.5%，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城市部分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通货膨胀的加剧，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结果。从 1984 年下半年开始连续几年经济过热，1984 年到 1988 年，国民收入增长 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 200%，投资和消费增长都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这就造成了连年财政赤字，1984 年到 1988 年国家赤字累计 254 亿元，银行信贷差额累计 2000 多亿元，这些大多靠增发货币来弥补。光是 1988 年一年就增发货币 680 亿元，比 1987 年增长 46.8%。由于货币超过经济合理需要发行，必然引起货币贬值和物价大幅度上涨。

通货膨胀的加剧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有密切关系。由于 1984 年农业大丰收后，在指导思想上一度对农业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放松了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有所削弱，以致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不前，从 1985 年到 1988 年，农业平均每年增长 4.1%，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这五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7.8%，这样就使工农业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突出。在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和高消费服务业发展过快，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也失调，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业虽有发展，但远远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大量工业生产能力长期闲置。尤其是预算外的基建投资远远没有控制住，致使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另一方面，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的经济秩序相当混乱。在改革旧经济体制时，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搞活微观经济时，由于急于求成，在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进行宏观控制的新体制情况下，又过多地削弱了中央在计划、财政、银行、外贸等方面必要的管理能力，加上从 1984 到 1988 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 26.7%下降到 2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56.1%下降到 47.2%，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这样就使经济秩序混乱，尤其是流通领域更为突出。这表现在市场管理薄弱，黑市交易猖獗，有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紧俏消费品的缺口很大，致使中间环节层层加码，市场的混乱，更使物价上升加快。特别是公司发展太猛，1986 年底全国有 18 万多家公司，到 1988 年底已达 29.9 万家，其中 70%是商业性公司，这就造成商品层层转手，加大了流通费用，也推动物价上涨。更严重的是许多公司是由党政军机关办的，有些领导干部在公司兼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人事关系，以权换钱，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悬殊差价，插手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消费品的经营，官商合一，牟取暴利，这更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助长了贪污行贿等腐败现象的发展。

上述情况的产生，是同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迅速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

束的新机制分不开的。这也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的失误有很大关系。对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中共十三大虽然对经济发展再度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但由于对国情仍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以至在实际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倾向未得到扭转。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1988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谈到物价问题时虽然指出对现有的严峻形势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同时又认为我们有条件冒很大的风险来改革物价和工资，所以在1988年夏季曾经不适当地决定全面地推进价格改革。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虽然会议指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仍强调目前是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有利时机。价格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宣布大步进行价格改革，这实际上成为触发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的一个诱因。当时，在大大超过群众心理承受能力的加快价格改革的宣传下及名烟名酒以很高的价格放开后，一股抢购风潮从南到北展开，为了抢购，储户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抢购抢兑风潮，使人心浮动，影响社会安定。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1988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全会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少，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要充分认识坚决遏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下最大的决心，把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否则，不但价格改革很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损害十年来改革的成果。

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首先，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压缩500亿元，大体相当于1988年实际投资规模的20%。第二，要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第三，要采取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办好保值储蓄，开辟多种渠道，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把1989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的水平。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各种混乱现象。首先要坚决刹住乱涨价风；第二要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第三，要尽快确立重要商品的流通秩序，坚决制止高价抢购粮、棉和生丝等产品的“大战”；第四，要加强宏观监督系统，强化计划、银行、财政、税收等部门的宏观控制职能，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第五，要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全会指出，治理和整顿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治理整顿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1989年和1990年一定要抓出实效。务必确保1989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89年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点。

全会指出，要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其中要特别注重深化企业

改革，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

全会强调，为了保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要运用各种手段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全会指出，能不能搞好治理整顿，已成为对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力和驾驭局势能力的严峻考验。

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还针对当时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的情况，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符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称赞，各地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迅速开展治理整顿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89年底，治理整顿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成效，物价上涨势头趋于缓和，投资规模和消费需求有所控制，整个经济在治理整顿中继续发展，这就为进一步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积累了经验。

四、1989年政治风波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1987年初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5月13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现在应该加强改革的宣传。他说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地加以反对。这样，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此后，那些因宣扬自由化而受到批评的人物纷纷重新登场，发起新的进攻，而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受到压制和打击。这样，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开来。同时，赵紫阳还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对党风、社会风气趋于恶化的状况和干部中滋长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这使党的威信和战斗力一度下降。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也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发生了某些误解和忧虑。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这种情况，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他们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要“全盘西化”，鼓吹政治多元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他们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鼓吹中国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还宣扬思想多元化，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1988年末到1989年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通过多种形式，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在北京，陆续举行要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逐渐形成一种反动的政治势力。这时，国外敌对势力正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反社会主义势力猖獗，这些更使我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这样，终于在4月

15 日到 6 月 4 日，发生了动乱和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他们挑起了一场酝酿已久的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国为目的的政治动乱。胡耀邦逝世，各界人士深切哀悼。他自参加革命以来，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纠正“左”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所以各界人士对他表示沉痛哀悼。但是，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却以“悼念胡耀邦”为借口，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使首都一些高校的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中，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动和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他们还成立了“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煽动群众，激化对立情绪，使动乱迅即向全国扩展。在西安、长沙、成都等地还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 1987 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 月 23 日，赵紫阳赴朝鲜访问。4 月 24 日，李鹏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会议决定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中央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并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4 月 25 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在社论中明确地指出了 4 月 15 日以来各地发生的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号召大家“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社论发表后，由于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不少学生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高校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

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中央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 月 4 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接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国和地区代表时，发表一篇与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学生游行，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这一谈话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

央内部的分歧公开暴露于世。所以在赵紫阳讲话后，动乱筹划者从中受到鼓舞，又大肆活跃起来，使局势骤然逆转。5月6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个谈话使舆论方面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动乱策划者这时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5月13日，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一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不同角度发出的同情，加上新闻报道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多。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及一些中小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多数常委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5月17日，游行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从而表明了他同党的公开分裂。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发布命令：自5月20日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策划者则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断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终于使动乱在北京地区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3日，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甚至出现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6月3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部队在开进过程中，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对那些暴徒进行的野蛮袭击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保卫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教训。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中全会是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1) 审议并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2) 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策和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和正确的。全会高度评价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的正确决策，力挽狂澜，在关键时刻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会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在这场斗争中作出的贡献。他们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受了考验，为巩固社会主义祖国，立下了功劳。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的失误。特别是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地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七届八次会议又撤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全会对中央的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6 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就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继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后确立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对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转换和交接，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不断奋进的标志。

关于党的路线和今后的工作，全会指出，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以下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

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

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全会不仅对于当时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此后他多次讲要带头建立离退休制度，并尽早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愿望。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1989 年 9 月 4 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他提议江泽民当军委主席。在这个谈话中他还强调："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同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地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989 年 11 月 9 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并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的革命历史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卓著功勋。

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党中央已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第一，抓紧了党的自身建设。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证明，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好的，但也暴露出党内问题的严重性。一部分党员卷入了动乱，极少数党员甚至成为动乱、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放弃领导责任，个别的甚至支持动乱。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成了动乱中有不少人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邓小平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为了提醒全党认清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指出，分析党的状况时，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不可低

估赵紫阳的错误在党内造成的混乱和对实际工作造成的损失。正因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以便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以及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

为了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作斗争，1989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着重抓了当时群众反映强烈的 7 件事：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人员少数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8 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90 年 11 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提出的《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严肃执行党的纪律，认真查处违纪案件，特别是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查处党政干部违犯法纪建私房及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的问题，强调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必须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

1989 年秋、冬和 1990 年，在中央领导下，党组织对动乱、暴乱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进行了清查、清理；接着又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向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在部分单位进行了党员的重新登记。清查、清理工作是同干部考察工作结合进行的。根据考察的结果，对一些组织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目的是为了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核心。

为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1990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六中会全，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会认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全会提出，今后应从 7 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对加强党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89 年 12 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决定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参政议政中的重要作用。各民主党派自恢复活动以来，已有相当的发展。这时全国共有民主党派成员 33.7 万人，地方组织 1666 个，基层组织 1.4 万多个，有 540 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701 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到 1989 年底，全国担任县以上政府领导职务的非共产党干部共 781 人，其中有 14 人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指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有的知识分子担心由于少数“精英”制造动乱，会把知识分子的名声搞坏，中共中央多次重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1990年5月，江泽民在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精辟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论证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也明确指出，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我国2000多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同时也阐明了党的具体政策。

在1990年6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必须有一个包括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他指出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点，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同时，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他强调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旗帜鲜明地同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我国的图谋与行动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和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得到扭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重新受到重视。从1990年到1991年上半年，在全国党政干部和广大人民中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开展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工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一度发生过的那种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腐朽思想的作品在思想文化领域泛滥的现象，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整顿和清理图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的行动，着重清除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图书报刊及音像制品，使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传播和社会丑恶现象的蔓延受到了遏制，“扫黄”斗争收到很大成效。1989年11月，国务院又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除“六害”的斗争（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丑恶现象）。

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使思想宣传战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党的建设的抓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不仅对我国社会与政治稳定起了促进作用，也为在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

五、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继续前进　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开始执行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虽然作出关于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但因时届年底，当年来不及采取更多的实际措施，已经采取的措施一时也难以见到明显成效。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在1988年并未减退，社会需求继续膨胀，这就使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增加，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多年来未曾有过的18.5%的

上涨幅度，这给1989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困难。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89年3月，李鹏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好治理整顿，当前治理整顿的重点仍然是压缩需求，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把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密切结合起来，在治理整顿中积极发展对外开放，努力创造良好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从1989年起要用两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具体目标是：（1）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合理水平；（2）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3）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增长相适应；（4）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5）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的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和；（6）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但是，会后不久发生的政治风波，对治理整顿是很大的干扰，使这次会议确定的任务不能如期实现。再加上动乱与暴乱给经济带来的破坏，以及西方大国对我国的“经济制裁”，使经济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所以，中国共产党于1989年11月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认为，对国民经济采取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经过一年的努力，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远没有完成任务，因此，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这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所以五中全会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主要目标是：（1）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2）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求相适应；（3）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4）在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6%；（5）改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6）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全会认为，治理整顿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决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下功夫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科技水平，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的路子。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深化改革作了极大

的努力。1990年3月召开了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严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趋于缓和；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起步；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治理，清理整顿公司有了进展；国民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有效供给继续增加；重点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继续发展；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国防建设等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是，目前影响经济整顿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的不稳定。所以李鹏在报告中提出，必须坚决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一是要有一个国际的和平环境，二是要有一个国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前，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稳定更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必须保持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发展是基础，必须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90年是90年代的第一年，又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极为重要的一年，各级政府必须做好以下十项工作：集中力量办好农业，争取粮食、棉花等主要的农产品有一个好的收成，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努力改变市场销售疲软状况，重点抓好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保持工业生产适度增长；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证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努力做好财政金融工作；加强物价管理，稳定国内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深化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深化企业改革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扩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占用耕地，节约使用矿产资源，继续加强环境保护。会议还认为，坚决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清除各种腐败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上述10项任务。所以各级政府必须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力量继续加强廉政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改进机关作风，必须一年又一年地长期抓下去。廉政才能稳定，勤政才有希望。1990年的廉政建设必须抓紧抓好，抓出成绩。

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后，全国人民又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基本上完成了治理整顿的任务。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效：

一是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由于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抑制了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势头，使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趋于缓和。全国零售物价的涨幅连年回落，1990年为2.1%，1991年为3.5%。市场商品供应丰富，物价稳定，城乡居民储蓄额三年增加了5000亿元，这同1988年的抢购风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是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经济基本恢复正常的增长。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9%，1990年增长5%。粮食生产1989、1990年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业总产值1989—1991年均增长10%左右。国民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起步。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部门的

投资比重上升，处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受到一定限制；生产性投资比重上升，楼堂馆所及其他非生产性建设得到控制。基础产业得到加强。

四是流通领域的秩序明显好转，居民消费心理趋向正常。到1990年底，全国已撤并公司10万多个，占原有各类各级公司总数的35.2%；党政机关办的各种公司绝大多数已撤销或同机关脱钩，机关干部在公司兼职或任职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

五是进出口贸易由逆差转向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1989年和1990年，我国出口总额分别达到525亿美元和621亿美元，1990年对外贸易实现了顺差。到1991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上升到330亿美元。对周边国家的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特别是近三年，全国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8083家，比前10年的总和还要多，外商实际投资额达85.4亿美元。

六是在治理整顿的同时，改革也在深化。农业方面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工业方面不断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集团的组织也有明显进展。价格改革也迈出了较大步伐。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继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继续上升，这对于维持治理整顿期间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一切充分说明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已如期结束。整个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全国出现了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局面。这使我国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治理整顿为经济发展跨上一个新台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实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5%，都超过“七五”计划的要求。能源、交通运输都有显著发展。煤产量达到10.9亿吨，发电量达到6150亿千瓦小时，石油达到1.38亿吨，钢达到6850万吨，铁路货运量达到14.6亿吨。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03倍，粮食达到8500亿斤，棉花达到424万吨。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720元，科技、文教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国防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七五”计划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过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就为在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正当“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八五”计划即将开始执行时，1990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1991年3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和审议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为90年代制定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建议》和《纲要》都强调，90年代是振兴中华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的10年，是在80年代基础上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并取得更加伟大胜利的10年。《纲要》规定了从1991年到2000年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提出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是：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全国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全。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这些基本要求，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达了全国人民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迫切愿望和雄心壮志。实现这些要求，到2000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将取得全面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将以崭新的姿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纲要》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制定与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方针。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全面贯彻这些方针，是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实现90年代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总之，“七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从1988年以来的困难境遇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为实现90年代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

六、外交工作的新格局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改变，各种力量正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中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国际形势出现了空前的动荡与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冷静务实策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正常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缓和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格局。

（1）积极开展睦邻外交，周边环境和平安宁。

中国一向重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推行睦邻政策，把建立和加强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大大改善和发展了同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使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这就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

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

1989 年 5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同邓小平举行会晤，宣布两国从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标志着破裂了 20 多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此后，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气氛逐步缓解，两国经贸关系有所发展。1990 年和 1991 年，李鹏总理、江泽民总书记先后应邀访问苏联，使中苏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我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原则，同独联体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保持在各个领域里的友好往来。1992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建立了新的关系，它既不是 50 年代的结盟关系，也根本改变了六七十年代的对抗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间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世界也是一件大事。

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 1990 年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各种交流日益增多。

中朝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使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与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等先后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金日成主席、延亨默总理等朝鲜领导人也多次访华，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关系。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国同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韩建交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

1989 年政治风波后，中日关系曾出现过曲折，但总的说来还是朝着恢复正常的方向发展。1990 年 7 月，日本率先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在松动西方对华“制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91 年 8 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标志中日关系全面正常化。海部首相说，中日关系“已进入成熟的睦邻友好阶段”。199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江泽民总书记、万里委员长先后访日，日本明仁天皇于 10 月首次访华，这些使中日关系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国和越南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以 1991 年 11 月的高级会晤为标志，结束了长达 13 年的敌对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1992 年底，李鹏总理访问越南，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1990 年 12 月，李鹏总理访问老挝，实现中老关系正常化。1992 年，老挝主席凯山·丰威汉访问中国，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把改善与发展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同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国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1991 年，李鹏总理访问印度，这是 31 年来中国政府首脑首次正式访问印度，1992 年印度总统卡塔拉曼访华，这些使中印关系显著改善，开辟了中印关系的新时期。

在东南亚，中国同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1990 年 8 月，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 23 年的外交关系。10 月，中国同新加坡正式建交。1991 年，中国同文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中国同东盟国家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从而使中国与东盟 6 国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为消除亚洲热点，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全面、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为推动柬埔寨各方全面执行巴黎协定，实现民族和解，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与稳定方向发展，中国支持北南双方对话，同时加入联合国，签署《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协议书》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希望北南双方通过协商，消除分歧，早日实现自主和平统一。。

中国努力把解决同少数邻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问题当作创造和平周边环境的重要一环来进行，并取得了积极进展。其中，同老挝于1991年签署了两国边界协定，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有的还在谈判中。南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60年代以后，一些邻国非法侵占中国岛屿，侵犯中国主权，挑起争端。为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中国在坚持南沙主权的同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受到有关国家的注意和理解。

环视周边，一改过去几面受敌的态势，可谓四邻无战事，周边息纷争，变战场为市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和平安宁的睦邻友好周边环境已基本形成。这不仅符合中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2）团结合作，密切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一贯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团结，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1990年5月，杨尚昆主席访问了拉美的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5国。他在墨西哥时提出了中国发展同拉美国家关系的4条原则。1992年7月，杨尚昆主席访问了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科特迪瓦3国，在科特迪瓦发表了中国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的6条原则。这些原则表明了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响应。1990年，我国同沙特阿拉伯建交，至此，我国已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1月，中国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中国就同中东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几年来，我国与南太平洋各国的关系有很大发展。1989年，中国与南太平洋论坛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斐济总理、瓦奴阿图总理、基里巴斯总统、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先后访华。1990年，中国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初，李鹏总理访问斐济，7月，我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等5国，进一步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总之，通过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和磋商，使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还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际性、区域性组织的政治、经济合作，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合理的经济与政治要求。1992年9月，中国正式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标志着同不结盟运动的友好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同“七十七国集团”通过密切磋商，以“七十七国加中国”的方式提出了不少谈判文件，使会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中国对东盟、海湾合作委员会、马格里布、里约集团等区域性组织，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

总之，正如邓小平说的："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

(3) 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的又一个主要成就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的方针，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改善和发展。

1989年6月，中国政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美国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干涉中国内政。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对中国平息暴乱进行无理指责，并宣布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用和商业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的互访。6月20日，美国政府下令中止高级官员的互访，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给中国的一切新的贷款。接着，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关于制裁中国的决议案和修正案，对我国施加压力，这就使中美关系出现了自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从未有过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顾事实，不顾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横加指责，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使我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出现曲折和困难。西方的制裁主要是三条：一是不进行高级官员往来，二是限制经济贸易交流，不给贷款，三是禁止军事合作。这种经济制裁，实质上是政治制裁。我国制止了动乱，平息了暴乱，使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不甘心失败，就想用制裁的办法使中国屈服。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在当时就指出："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奋斗了二十八年才真正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总比过去好得多。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他还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他总结历史经验后深刻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特别强调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

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1989年秋冬东欧发生剧变的影响，中国在外交上执行了"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方针。经过努力，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没有被压服，也没有被孤立，反而使我国又经受了一次锻炼，使我们更坚信社会主义的中国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使我国的对外关系有了更大的突破。正如邓小平在1990年7月所说："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

1990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出现积极变化。继日本恢复对华日元贷款后，西欧国家逐步恢复了对华出口信贷保证、政府贷款、经济合作与科技交流。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立即取消对华制裁，恢复同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正常关系。1991年，继海部首相访华后，9月，英国首相梅杰、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及英、法、意等国外长相继访华，中国同日本及欧共体各国的关系恢复正常。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开始恢复对华贷款。

中美关系也逐步解冻。早在1989年7月至12月，美国总统派特使访华，表示：布什总统希望美中关系脱离消极轨道，美方将同中方一起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邓小平在会见他们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现象。1990年5月，美国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11月底，钱其琛外长应邀访问美国，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等，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美国副国务卿等来华访问。中美续签了科技协定。1991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经过坦率的会谈，双方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此后又发生美国政府违反“八·一七”公报，于1992年9月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事件，这是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事件。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表明：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是两国关系的准则，只要双方高瞻远瞩，求同存异，就能排除障碍，使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1992年中国政府提出中美之间应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日，江泽民和克林顿举行了正式会晤。江泽民强调，中美两大国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在会晤中，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世界范围来看，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双方重申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会晤后，江泽民指出，中美首脑会晤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会晤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

（4）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中国在联合国中，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反对军备竞赛，超级大国必须率先裁军等一系列主张，并为国际裁军问题作出了积极努力。中国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把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根本目标结合起来，推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1988年，邓小平提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

推动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促进经济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外交努力。1990年，在联合国解决海湾危机问题上，中国发挥了特殊作用。从伊拉克人侵科威特引起海湾危机后，中国政府就明确予以反对，认为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要求伊拉克五条件撤出，同时力主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海湾危机。对中东的巴勒斯坦问题，中国政府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以色列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必须得到恢复，巴、以相互承认，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和平共处。对在前南斯拉夫和原苏联地区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多次表明了原则立场，强调冲突各方应通过和谈解决争端，反对从外部使用武力，用一场战争来制止另一场战争。

近几年来，中国的多边外交空前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2年，第48届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北京宣言》。这有利于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同年6月，李鹏总理出席了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讲话中提出了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李鹏还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环保事业的高度重视与责任感。1992年3月，我国正式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这对推动该条约发挥有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总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92年，我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我国的外交在国际斗争的惊涛骇浪中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且形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完整的外交政策，它们是：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一、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发表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谈话。他的谈话贯穿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是在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发表的。从国际上看，近几年世界形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深刻、最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后，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更有可能。但世界依然很不安宁，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这时西方国家先后出现经济衰退，复苏乏力，而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崛起态势。所以，外部世界的形势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国内方面说，进入 90 年代后，我国出现了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好形势。经济发展经过三年的整顿和治理逐步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当然，在经济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好，财政赤字增加，腐败现象、社会丑恶现象有所发展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同时，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广大群众得到了实惠，对改革开放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加快发展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加快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此，邓小平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问题。这个重要思想的提出，从大的方面把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的谈话主要有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 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邓小平早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次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更尖锐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要坚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回答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时，明确指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突出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强调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决定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它突出地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前提和保证，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这条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2)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如果不抓住时机，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必将被历史所抛弃，不但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反而会葬送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同时，他也指出，快是有区别的，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条件暂不具备的地方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快起来，而不要一哄而起，忽视效益，盲目上新项目；快是有条件的，就是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他强调说：“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总之，“能发展就不要阻挡”，因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思想。他要求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我们这些年，也有过这样的经验，“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邓小平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我们经济发展的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他强调：“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邓小平还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会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所以“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他说：“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他还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3)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要敢闯。

邓小平深刻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生产力的原理。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他从理论上说清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因为社会

主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答案和模式，所以一定要大胆地解放思想，勇敢地去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在试验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针对当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思想障碍和思想束缚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担心“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个标准，邓小平明确指出：“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所以“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绝不能认为办特区就是搞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

针对长期困惑我们的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成为资本主义本质的观点，这就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思想，找到了目标，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早在 1979 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985 年 10 月，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87 年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又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1990 年底和 1991 年初，邓小平两次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 1992 年初视察南方时，他又讲了计划和市场问题，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强调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根据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

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4) 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他认为，广东省二十年赶上亚洲的“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邓小平还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长期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所以在苗头出现时就要及时解决。

邓小平强调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5) 关键是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要把领导班子建设好。

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他强调：一定要把军队教育好，把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

进班子"。重点是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这是我国长治久安的大事。邓小平重申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同时又指出：要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他强调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6) 强调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要充满信心，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所以，他要求全党要看清形势，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被一些国家出现的严重曲折，吓得惊惶失措，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总之，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时刻发表的，是他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这就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形成了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也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中共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如：允许股票进入社会主义经济领域，在上海、深圳进行股票上市试点；作出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决定；试行外汇期货交易；开放边境城市和长江沿岸主要中心城市；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等等。

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和国家工作指导方针的确定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江泽民在会上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战略部署，对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并把它确定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会议对如下几方面作出了贡献：

（一）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4年来的伟大实践作出了基本总结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14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的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14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14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14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14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4年的实践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二）概括提出了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主要任务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90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90年代实现如下10个方面的任务：（1）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2）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3）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4）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5）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6）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7）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8）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9）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10）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科学的概括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14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实质在党中央几次概括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

科学的概括，主要内容是：

（1）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7）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8）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

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9)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同这条路线相适应还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这条路线和这些方针政策也都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会议经过讨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入了党章的总纲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

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和把它确立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识这一理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邓小平 1992 年 2 月的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就是要把公有制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江泽民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

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它不仅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五）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对外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了改善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此，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主张在互相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江泽民在报告中还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

中共十四大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会选举了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2 年 10 月 19 日十四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总书记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温家宝、任建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全会批准尉健行为中纪委书记。

党的十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四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邓小平 1992 年初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1993 年 3 月 15 日至 3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八届第一次会议，审议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国家新的领导人员。

李鹏在报告中，首先总结了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以来的五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这五年中，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主要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近 24000 亿元，五年平均每年增长 7.9%。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四年获得丰收。乡镇企业五年间产值增长 2 倍，现已吸纳农村劳动力 1 亿多人，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5%，1992 年钢产量已达 8000 万吨，原煤产量已达 11 亿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有新的发展。五年间，进出口总额增长 1 倍，1992 年达到 1656 亿美元。五年共利用外资 609 亿美元，相当于前 9 年总和的 1.6 倍。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新成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步，科学技术事业成绩显著，教育事业有较大的发展。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1992 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 1826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784 元，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城镇居民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市场繁荣活跃，商品琳琅满目，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

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70岁左右，这是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综合反映。五年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提出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今后五年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性五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依靠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在保持产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逐步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要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稳定农村经济政策，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第三，提出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在90年代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今后五年是关键时期，必须力争在以下几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积极发展各类市场、抓紧进行价格改革、进一步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必须大胆实践，积极探索，才能完成任务。报告还提出要认真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努力开展外交工作。

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的总结是符合实际的；提出的今后五年任务经过努力是可以完成的；对“八五”计划的主要指标进行调整，把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6%调高到8%～9%是适当的。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及相应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有关决定，包括三个附件和区旗、区徽图案，关于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于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大会作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会议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选举和决定。大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荣毅仁为副主席，乔石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田纪云、王汉斌等19人为副委员长。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为副总理。

在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对宪法的若干条文作了重要的修订。在修订的宪法中，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根据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经验，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特别是把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

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修正案还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等。

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199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国家预算的决议等。

3月14日至27日全国政协举行八届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了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列席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审议通过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和提案委员会关于八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及其他各项决议。3月26日，会议举行第六次大会，选举李瑞环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叶选平、吴学谦等25人为副主席。

以上两会的召开，为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在中共十四大路线指引下，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特别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两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振奋精神，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完成中共十四大确定的任务而奋斗。

四、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经济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4.2%。

但是，在经济继续大步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某些方面的情况还比较严峻。到1992年的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开始升温，到年底和1993年初，已明显过热。许多地方发生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越演越烈。主要表现为：一是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1993年上半年净投放现金528亿元。金融机构违章乱拆借，社会上乱集资，大量资金被用于炒房地产、炒股票，盲目大办开发区，而正常的银行贷款不能保证，国库券发行停滞，1993年头5个月只完成年度预算的5%。有的基层银行甚至出现支付困难。二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1993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 542亿元，新开工项目、在建工程投资总规模，超过上年同期一倍多。房地产价格越炒越高，到处划地为“开发区”，开而不发，大批良田荒芜。三是财政困难状况加剧。四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

一步加剧。五是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六是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1993年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加快，三月突破10%，6月达到13.9%。35个大中城市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21.6%。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暴涨，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涨幅超过70%。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也是广大群众反应最强烈的热点问题。上述情况表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绷得很紧，有些矛盾和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如果不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抓紧实施宏观调控，势必导致社会供需总量严重失衡，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甚至会引起经济大的波动，影响社会安定。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出现的问题高度重视，并及时作出重要决定。早在1992年10月十四届一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地区、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经济情况通报会，就提出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注意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保证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顺利进行。江泽民指出，要对经济形势有个总体把握，加强预见性，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并尽可能把它们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要使之积累成大问题，影响全局。1992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强调，当前的经济形势大好，但要防止经济“过热”，要求各地积极、正确、全面地贯彻党的十四大和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1993年4月1日，中央再次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加快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中央提出防止经济过热，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稳妥，避免大的起伏，避免大的损失，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5月9日至11日，江泽民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沿用过去的老办法，而应通过改革，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对经济进行有效的驾驭，使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得到缓解，努力保持和发展经济运行的好形势。5月19日夜，江泽民亲自写信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强调对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抓紧时机解决，否则，解决问题的时机就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国务院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措施。1992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3年4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券发行管理的通知》，并决定派出7个工作组，由国务院有关部委部长带队到14个省区市进行检查。5月上旬，国务院又发出《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要求清理各类开发区，规定设立各类开发区实行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审批制度，并把设立经济技术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审批权归国务院。

5月下旬和6月初，国务院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发展中突出问题的政策措施。随后，根据朱镕基的指示，国家计委经过与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研究，形成《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意见》。最后，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定了1993年6月24日正式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通常所说的16条，宏观调控的各项举措全面启动。《意见》指出：要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切实贯彻"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的重要指导思想，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在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

（1）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2）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3）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4）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5）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6）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7）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8）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9）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10）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11）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12）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13）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14）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15）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16）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加强组织纪律性，做到令行禁止，坚决维护中央对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自接到文件之日起，必须立即组织贯彻落实，制定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党中央、国务院将组织调查组，深入各地进行督促检查。

为了加强对宏观调控的领导，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为了贯彻16条措施，1993年7月初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是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枢纽地位，所以强化宏观调控要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朱镕基在总结中强调，要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他指出，强化宏观调控，不是实行全面紧缩，而是进行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迅速调整资金投向，确保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解决"瓶颈"制约这个当务之急。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建立一个在中央银行监管下的以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一个统一、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同时，他给银行系统的领导干部提出"约法三章"：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接着，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朱镕基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句话："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在财税体制改革中要实行四个原则；一是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新的财税体制。要统一认识，制定方案，尽快全面推行。二是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和两类税收分别征收管理。三是在明确财政职能，进一步下放财政支出事权的基础上，划

分税种，保证中央必要的、固定的支出。四是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来规划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真正做到“约法三章”，这样才能严格要求部下，才能有真正的廉政勤政建设。他对财税部门的干部也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第二，要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帐；第三，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此后，宏观调控措施开始在全国逐步实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抓住主要矛盾，始终把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环节，坚持抑制通货膨胀不动摇。1994 年初，国务院提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四项紧急措施。9 月，李鹏在全国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坚决抑制通货膨胀的十条举措。强调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使物价涨幅逐步回落。

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又从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两方面双管齐下实行宏观调控。一方面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从而减少货币发行，促使物价降下来。从 1993 年以来，通过清理乱拆借、乱集资，管严固定资产贷款，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也使“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迅速降温。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广西、辽宁、河北等省的开发区，从原来的 1200 多个减少到 200 多个，规划面积从 7500 多平方公里减少到 1600 平方公里。加上提高银行贷款利率等政策措施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从 1992 年的 58.6%，下降到 1996 年的 20%左右，货币发行从 1993 年的 1 529 亿元回落到 1996 年的 917 亿元。另一方面是大力加强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使总量平衡状况逐步改善。这样就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 1996 年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使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最高峰 1994 年 10 月的 25.2%降低到 1996 年 12 月的 4.4%；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达 9.7%，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次“软着陆”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次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次成功实践，有不少新的特点，创造了新的经验。一是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提出“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和“主要运用经济办法”的指导方针，力求通过加快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二是时机掌握得比较好，面对当时的突出矛盾，果断决策，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采取了“点刹车”的微调手段，避免了“一刀切”而使经济大起大落。三是调控手段更加丰富，以经济手段为主，又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互相配合。主要是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同时加快经济立法进程，以法律法规约束和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同时，在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物价监管等方面采取

了必要的行政手段。这样，遵循价值规律进行宏观调控，这标志着我们的宏观调控正在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化。四是调控力度适当，调节灵活，坚持适度从紧，紧中有松，稳中求进，着重于结构性调整。不搞“一刀切”，对那些效益好的有市场的企业，在紧缩银根的同时，该给资金支持的还要支持，而不是一律冻结。五是宏观调控与改革结合，注重治本，所以，财税、金融、外汇、物价、国有企业等项重大改革在宏观调控中相继出台。这说明中央宏观调控决策正确，措施稳妥，也表明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逐步在深化，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提高了。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构建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

（一）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

中共“十四大”和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织各方面力量，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并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规划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蓝图。1993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通过改革建立新体制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决定》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作了如下规定：

（1）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中心环节。（2）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和信息市场等。（3）要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器。（4）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坚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5）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决定》强调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五种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外，《决定》还提出要深化农村、对外经贸、科技、教育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强调指出市场经济

本质上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中国到本世纪末要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服务机构；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

这个《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它既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既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又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总结了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这是我国在 90 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

（二）出台了重大的改革措施

为在 20 世纪末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共十四大后，从以下几方面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发展和培育市场体系；加快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公务员制度；加快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推进金融、财政、计划、投资、外汇和外贸体制的配套改革；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在 1994 年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并取得很大的进展和突破。

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十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中共十四大以前，是以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责任制、两权分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性调整阶段；十四大后，特别是上述《决定》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转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抓紧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继续贯彻《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步伐，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同时，制定并贯彻了《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加强对国有企业财产的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此，国务院设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专门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1994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要求到 20 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国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朱镕基在会上指出，要全面、正确理解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四句话，不能只讲“产权清晰”一句话。现代企业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我们要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有益探索。不是要把所有企业都办成股份制，更不是把所有企业都办成上市公司。要理解江泽民提出的深化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要抓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搞好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要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 1995 年开始，国务院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重点抓了百户现代企业

制度的试点，55户企业集团，3户国有控股公司试点和若干城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股份制试点的步伐加快。到1993年底，全国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进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近4000家，股票市价总额达4000亿元。在试点企业中，企业职工内部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约占47%，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约占46%，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约占7%。股份制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途径。

2. 粮价的放开。到1993年，绝大多数农产品包括粮食的价格和经营均已放开，对粮食实行"保量放价"、建立保护价及相应的风险基金和储备制度。粮价全面放开，实行市场定价为主，粮票粮本全部取消，原来的定量配给转变为市场自由采购。粮食价格和分配的放开，标志着中国价格改革已经基本闯过了特别棘手的一关。

3.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外汇分成；实行银行售汇制，消除外汇双重汇率，实行人民币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并轨，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等。汇率并轨的一举成功，为进一步沟通国内外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条件。

4. 所得税的统一。从1994年起，改革企业所得税，合并国有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为统一的内资企业的所得税，改变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税种和税率的状况。统一后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所得税的统一，为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竞争创造了前提。

分税制的出台。分税制是1994年出台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将现行地方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管理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实行分税制对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以及企业的分配制度，健全国家财政职能，确保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较大比重，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5. 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在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海南洋浦同时，全国建立了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开放了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直接对外开放的城市有339个，县（市）919个。我国已建成经济特区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52个。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17个。我国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逐级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总之，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开放的势头之猛是上一阶段没有过的，这就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4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5%，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6%，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良性循环。事实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

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方针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后的新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这是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全新的深刻革命，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一些旧的社会问题有时也会沉渣泛起，治理国家的难度骤然增大。在千头万绪的社会问题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好这三大问题及其内在联系，是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保证。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有机的统一整体。因此，我们的治国方针，就是要正确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维护和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大局。

这个治国方针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当时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制定 1994 年工作要点时，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今年全党工作大局"。1994 年 1 月 24 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述了这个重要思想。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 20 个字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并强调确定这一总揽全局的重大指导方针是必要的、正确的，认真贯彻这个指导方针，就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995 年 9 月 28 日，江泽民指出："实现今后 15 年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必须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他指出，这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加快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还要为下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我们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这个治国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经验得出的至理明言，是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重要指针，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邓小平理论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除了要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坚决查禁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搞好综合治理，努力消除不安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江泽民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提高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观念和处理能力。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比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错综复杂多了。”“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他还指出，全党应十分重视和认真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制定正确政策妥善处理，特别要注意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及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绝不能让矛盾激化，事态扩大，影响大局。我们的方针就是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并且能够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正是因为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在中共“十四大”以后的几年间，尽管有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未发生大的波动，整个社会始终保持着健康向上的势头。

为了肩负起领导12亿中国人民进行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此，中共中央于1994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四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组织建设的三个问题：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培养和锻炼数以万计的党的中高级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用人机制。总之，要努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会议增选黄菊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吴邦国、姜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为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胡锦涛在会上指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明确前进目标，这就是：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尤其要有一个好书记；培养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好队伍；选准一条适合当地经济加快发展的好路子；完善一个好的经营体制；健全一套体现民主管理、保证工作有效运转的好管理制度。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由于各级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坚持新时期发展党员

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工作方针，到1997年7月，全国党员总数已达5 800多万人，党的基层组织增至348.7万个，党员在人口中的比重约为4.9%。

第三节　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

一、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并把它放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地位，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十四大”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邓小平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全新事业中积累的基本经验、创造的基本理论、形成的基本路线作了系统的总结，这既是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著作，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在北京又隆重举行学习报告会，进行动员、部署、指导。会上，江泽民强调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我们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他说，我们学习邓小平的著作，要联系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精髓，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个主题，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首要的理论问题，提高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这次大会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热潮。

从1993年11月开始，中央举办了四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研讨班。中央制定了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到党校轮流进修、后备干部要经过党校培

训的制度，同时规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全部轮训县处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见》。根据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全国广大党员和干部普遍参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学习。三年来，全国共有 5600 多万党员参加了“双学”活动，约占党员总数的 93%。此外，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及时总结交流干部群众的学习经验，澄清一些错误思想。由于思想对头，方法科学，措施得力，党的理论建设真正得到了加强和改进。为了更好地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5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供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学习，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实践证明，只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所以广大人民也积极学习这个理论。据统计，到 1998 年 3 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已发行 2300 多万册，修订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发行总数达 1 760 多万册。90% 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通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选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的重点篇章。学习并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这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大精神支柱。

同时，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通过各种形式，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1993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回顾了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阐述了邓小平继承、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他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是我们毕竟在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大规模建设中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江泽民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江泽民强调：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课题。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对这两个历史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江泽民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它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

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精神支柱和科学指南。

二、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十四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面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多方面作了积极有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提出了"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的战略任务，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1994 年 1 月 24 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此后，他又多次号召党的领导干部和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同志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以高度的责任心正确引导舆论。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开展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提倡顾大局、讲风格、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培养人民的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而绝不允许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腐蚀人们的精神，污染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秩序。

为了探索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和政府还提出了许多重大措施和办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在党的领导，要切实建立各级主要领导负总责的制度，要制定发展规划。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用两三年时间，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阶段性目标和具体措施。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1994 年 8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央宣传部制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指出：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各地区、各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细则。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这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十四大"以来，中央有关部门突出宣传了一批先进典型，如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以及马恩华、李国安、徐虎、吴天祥、邱娥国、吴金印、田沛发、谭彦、李素丽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敬业奉献精神和高尚情操，在全社会形成学先进、讲奉献、树正气的良好风尚。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为人们自觉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同时，还宣传介绍了一批两个

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先进地区，如江苏张家港市等。

为了推动精神产品生产，多出优秀作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宣部从 1991 年开始组织实施“五个一工程”（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每年推出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一部优秀电视剧、一篇或几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好文章）。“五个一工程”不仅成为弘扬时代主旋律、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而且也是多出人才，进一步促进精神产品创作繁荣、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尽管目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已取得很大成效，这是主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部门、地方和单位也出现过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以致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令人担忧的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唯钱是图的拜金主义，以及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封建迷信活动和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干部中以权谋私，腐败现象严重；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认为，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再次作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决议，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1996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主要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分七个部分：(1)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3) 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4) 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5) 深入持久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6) 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7) 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决议》指出，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今后十五年的奋斗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决议》指出：在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对全党同志的一个重要考验。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全会强调，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各级党委一定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以两个文明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三、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1. 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科学分析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于1995年5月6日作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果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个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是确保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5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这是继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制定了第一个长期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会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作了重要讲话。

中央《决定》和江泽民等有关科教兴国的多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1) 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他的科技思想的精髓，是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科教兴国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根本思路，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贯主张。在90年代初，江泽民就指出：“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各国为谋求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更加重视加强科学教育。世界正迎来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成为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焦点。”

1991年5月，江泽民在中国科协四大的讲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而且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样具有战略

意义。所以，中共中央极其重视科技教育问题。多年来，江泽民论述最多、关心最多的就是推动科技进步，加快发展教育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

(2) 正确认识科教兴国战略的涵义和实施这一战略的意义。中央《决定》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决策，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把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建设蓝图的关键措施，这是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时代赋予包括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光荣使命，是历史的必然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强大的杠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还深刻分析了当前已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点，这就是："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革命来势迅猛，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二是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国际间科技、经济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产业技术升级加快，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科技、经济越来越趋于全球化；三是科技革命创造了新的技术经济形式，产生了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形式，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四是各国更加重视科技人才，教育的基础作用愈益突出。"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只有紧跟时代潮流，奋发有为，才能走向繁荣昌盛、文明进步。我们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认真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迎接挑战，抓住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把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搞得更好。

(3) 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江泽民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当代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不断加速。今天称得上先进的技术，不久就有可能变为落后的。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科技实力和基础，具备相当的自主创新的能力。现在我们更要十分重视创新。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我们

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开发能力，提高创新能力，使我们跻身于国际科技发展的先进行列。

(4) 必须认真执行党和政府制定的正确的科技工作方针和政策。中央《决定》指出："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一方针的核心是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的主体。

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是推进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人类近现代文明进步史已充分证明，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要求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要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不断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追求新的发现和创立新的学说，丰富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研究中，要实行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扬长避短、自主创新的方针。同时，必须改革科技体制，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加强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科技成果更快更好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与宏观管理都是科技进步不可缺少的手段。中央提出的"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体现了这两种手段结合的内在规律。要保持一支精干的国家队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其他科研机构都应从事应用科技的研究开发，其技术开发、成果推广等活动，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努力满足市场需要，特别要注意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效率。

(5) 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特别要注重青年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关键是人才。""加速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特别强调："要重视跨世纪青年学术带头人和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努力创造青年优秀科技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条件，委派他们在关键岗位承担重任，使他们在实践中健康成长。"

2. 科教兴国战略的初步实施。

(1)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央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这使我国的科技力量加速进入了经济建设主战场。目前我国已有80%左右的科研机构、90%左右的科研人员以多种形式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放开一片的关键就是使开发型科研院所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机制在科研运行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我国技术市场交易额以年均50%的比例增长，1996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突破300亿元，成交合同22.6万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1997年的38%。5年

间，国家重大科技成果累计达15万多项。以“一箭三星”技术为代表的火箭技术，以重离子加速器、自由电子激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以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计算机集成制造为代表的大型计算工程和大规模数据处理技术，以航天育种、无性繁殖为代表的生物工程技术等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863”计划、“科技成果推广计划”和“星火计划”顺利实施，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工程化加快，我国的科技实力大为增强。

(2) 基础研究的发展。对于基础性研究，国家采取了增加科研经费，更新科研装备，配备优秀人才和实施扶持政策等多种方式给予支持，在推进“863”计划和加强自然科学基金的同时，于1992年开始实施“攀登计划”，并首批确定了30个重大的前沿性研究项目。此外，一批新型基础科研中心和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相继建成，既稳定了基础研究队伍也培养了大批青年学术带头人。这就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使我国基础研究实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涌现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如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高温超导研究、澄江动物化石群研究、金融数学研究，油气形成新理论研究等。

(3) 高新技术产业化速度加快。从1988年8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以来的10年间，在邓小平“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精神指导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已建立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0年来累计确定实施火炬计划项目12599项，到1997年底，火炬计划项目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4147亿元，利税721亿元，创汇60.4亿美元。到1997年高新区内企业已近13700家，年末从业人员147万，实现年技工贸总收入3 388亿元，工业总产值3109亿元，利税350亿元，出口创汇65亿美元。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0年前的不足1%已提高到1997年底的11%。实施火炬计划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把我国已具备的科技优势有效地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在科技与经济领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为发展我国的知识经济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为走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础。

(4) 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针对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新趋势，1997年底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递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报告提出：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要紧紧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加快培育新的科技力量，迅速构建一个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个体系应当包括以国立科研机构和教学科研型大学为核心的知识创新系统、以企业和科研机构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系统、以高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为主的知识传播系统、以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知识应用系统。国家创新体系应当成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成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成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柱和后盾。

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在这个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传统产业的发展会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调整则提供了机遇。科学院提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

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根据这一批示精神，中科院积极筹备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中科院不仅确定了到2010年前后，把自己建设成为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国际科技前沿、具有强大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的知识创新中心；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科技知识库、科学思想库和科技人才库的目标。还提出了近期知识创新的重点，决定首批建立8个知识创新基地，它们是：上海生命科学、北京物质科学、北京地球科学、西北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西南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基地和上海高技术、北京信息科学技术、东北高性能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研究发展基地。

同时，中科院计划按照“聘任年限制度”，争取未来3年内吸引600名左右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到科学院工作，与现有优秀科研人员一起，形成面向新世纪的骨干科研队伍。

（5）加强领导，健全科技立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在领导。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朱镕基任组长，1998年6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职责、会议制度和办公室设置等事项，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讨论了当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工作要点和安排。

会议认真学习了江泽民的批示，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关于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后，朱镕基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江泽民关于知识经济和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批示精神。他说，知识创新非常重要，要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已经具备的条件进行整体规划，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国家要在财力上支持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要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

会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国务院将召开全国知识创新工程工作会议，总结中科院试点经验，全面推动我国知识创新工程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还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缓解科学家和高校教师住房困难问题。

会议认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要面向21世纪发展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加强对全国科技教育工作的宏观指导，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科技与教育水平，全面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推动全社会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为了用法律武器保障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还要加强科技立法，把一批重大的科技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目前我国已制定并实施了《科技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法》、《技术合同法》等重要法律，今后还要争取尽快制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高科技风险投资法、科学技术基金法和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法，以促进、引导、规范和保障科学技术进步。

3. 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教育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及《〈纲要〉实施意见》，绘制了中国教育事业未来发展与改革的宏伟蓝图。《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国家教委制定了《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特别是全国人大制定了《教育法》、《教师法》和《职业教育法》，国务院颁布了多项法规，初步形成了中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

（2）在坚持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同时，认真实施素质教育。我们确立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方针，"两基"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996年底通过"普九"验收的人口地区覆盖率达52%，全国扫除青壮年文盲2440万人，青壮年文盲率为6.1%，比1992年下降4个百分点。在基础教育中注意加快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步伐，其根本目的是使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和美育等方面全面发展。要着重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作出一项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3）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宏观教育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1996年底全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1.7万所，在校生1010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生人数的56.8%，比1992年增长10.1个百分点。高等职业教育从80年代中期起步，目前，全国职业大学已发展到108所，在校生近10万人。同时，遍布城乡的61.7万所各类成人学校，在学总人数近7000万。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者由1992年的541万人次增加到1996年的846万人次，其中88万人已获得本专科毕业证书。有1.8亿职工和近3亿农民接受各种形式的岗位培训和文化技术教育。

（4）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培养跨世纪的高级专门人才。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我国一定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使他们成为带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先导和骨干。江泽民在一个重要批示中强调指出："纵观历史，国际上的一流大学都是经过长期的建设形成的。固然要有政府的支持、资金的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长年累月辛勤奋斗的结果。特别是学生毕业以后，在国家的各个建设岗位上乃至在国际上体现出了公认的信誉。同时这种学校集中有一大批知名的学者、教授，有的人宁可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而以到这种大学去执教为荣。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要办成一流大学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过程，要经过社会实践考验。对此，既要有雄心壮志，又必须脚踏实地。"几年来，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与教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普通高校招生收费并轨改革到1997年已如期完成。全国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42个中央部

委所属614所高校积极稳妥地进行了共建、合作、合并、划转、协作等多种形式的管理体制改革。5年来，各级各类学校为国家输送大专以上人才650万人，中专生770.7万人。到2000年左右，要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新体制。

高校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加强基础研究，发展高新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基地陆续建成，目前高校已建立了10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8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的各层次科研课题已达9万项左右，有的已经产生了重大效益和影响。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高校党建和学校德育工作，从1990年以来连续召开了七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改革也不断深化。高校党建和学校德育工作的加强与改进，保证了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改革、建设的健康发展。

（5）国际教育交流也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有近30万人到国外留学，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为我国留学史上前所未有。目前，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已达10万人。在不断完善留学政策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指导方针，使出国留学工作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1996年，国家教委决定全面试行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选派新办法，选派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此外，社会关注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高等教育的“211工程”和教职工住房建设的“广厦工程”得到了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为教师办实事，始终把它作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提高教师地位、稳定教师队伍、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件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来抓。为解决教职工的住房困难，国务院办公厅近年来先后召开三次全国教职工住房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对全国教职工住房的建设工作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据统计，从1994年到1998年，全国城镇教职工住房建设共投资600多亿元，竣工建筑面积8000多万平方米；教职工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由1992年底的6.6平方米提高到1997年底的8.45平方米，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了解决高校青年教职工住房的突出困难，在北大、清华改造筒子楼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国务院拨出20多亿元专款对中央部委所属普通高校的筒子楼和危房全面进行改造，改善青年教师的居住条件，争取在1998、1999两年内完成。这是国务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项工作的启动，受到居住在筒子楼中广大教职工的欢迎，也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安心从教的决心。

江泽民明确指出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1999年6月15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从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发展更长远的利益着眼，制定以

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90年代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针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贫乏、环境保护难度大等实际情况，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他说："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大力提高人口质量"，同时，"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次全会进一步把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国家战略。根据这个决策，"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90年代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国土资源和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指标。

2. 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这几年成绩显著。全国连续8年实现了人口控制计划，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已平稳度过，开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时期，初步形成了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局面。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基数大，到1996年全国总人口已达12.24亿，"九五"期间预计每年净增1300万左右；各地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出生人口素质差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我们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要确保在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

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实践中，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人口问题的路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如提倡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为群众提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增强全民人口意识等。江泽民指出："要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和负总责不变；坚持贯彻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方针；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要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计划生育工作的机构、人员、报酬要做到'三落实'"。要把这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做法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目前，要重点抓好人口大省、贫困地区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贫困地区要把计划生育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实行综合治理，建立由政府统一领导，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流出地和流入地各负其责，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工作机制。特别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要下大力气抓好优生工作，认真贯彻《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以农村为重点，大力帮助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总之，人口警钟要经常敲，年年都要抓紧，不能放松。

3.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李鹏根据中央的决策，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保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把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付诸行动。为此，1994年3月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从中国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情况出发，提出了促进中

国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质，是要开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从而把一个发展、繁荣、稳定的中国带人21世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增加了投人，"八五"期间全国环保投人共1306亿元，"九五"期间预计投入4500亿元；加快了法制建设，加大了治理力度，有些地区的环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基本避免了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实践使人们看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选择。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和贫穷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国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开展了江河污染治理、国土资源整治、荒漠化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程。

(1) 在国家统一部署下，治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巢湖、滇池)、"两区"（二氧化硫控制区、酸雨控制区)、"一市"（北京）的污染防治重点工程全面展开。其中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是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水污染治理工程。在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经过流域四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已依法取缔、关停污染企业5700多家，基本实现国务院要求1997年底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的目标，干流水质趋于好转。太湖流域排污单位到1999年元旦前必须达标排放。

(2) 根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取缔、关停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小造纸、小印染、小制革、小土焦等15类小企业的要求，各地在1996年9月30日前，共关停"15小"企业历244家。

(3)《"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正在积极推进。截至1997年底，已开工项目700多个，占项目总数的一半，累计落实资金868.9亿元，已竣工项目180个，完成投资106.6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污染和环境治理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

(4) 城市环保工作和工业污染防治深人开展，自然保护工作呈现新的局面。上海、南京、北京等28个城市通过新闻媒体定期发布本城市的空气质量周报。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中国已建立了926处自然保护区和200多个动植物引种繁殖中心。国家环保局首次评出6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5) 在50个国家生态农业试点县的带动下，全国又建立了100个省级试点县。造林绿化和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快，"三北"防护林体系已长达4500/公里，荒漠化治理力度加大，一些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生态环境已明显改善。国家环保局批准建立了100多个全国生态示范区。

(6) 长江、黄河等7大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已经展开，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00多万公顷，部分破坏严重的地区生态环境正在恢复。特别是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特大洪水的严重危害，使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毅然决定禁伐天然林，这标志着全民族生态意识正在加强。

(7)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我国已颁布实施了环境保护法等6部保护环境的法律，9部与环境相关的资源法律，100多个环境法规、规章等。特别是修改后的《刑法》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首次把严重破坏环境与资源的行为定为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国家立法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使环保工作更好地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

这些成就表明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总的来说，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还相当突出，环境质量还在继续恶化。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此，环境保护的任务还很艰巨。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今后15年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到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到2010年，基本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这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跨世纪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要求各地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要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要千方百计地增加环保投人，建立和完善环保投入制度，排污者和开发者要成为投人的主体，要多渠道筹措环保资金。防治污染要抓住重点，集中力量先行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不仅要保护环境，而且要依法保护好事关国计民生的土地、水、森林等重要资源。对非法采矿、乱占耕地、滥伐森林、污染水源等各种破坏和浪费资源的现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坚决予以禁止。

1997年8月，江泽民、李鹏在姜春云副总理写的《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分别作了重要批示。江泽民在批示中充分肯定“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和经验是好的”。同时也指出，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后来由于历经战乱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滥砍滥伐等导致了目前恶劣的生态环境。他强调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的改观。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要再造壮丽秀美的新山河，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农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生命线。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进行大规模综合性治理。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断探索符合实际的治理路子。总之，要按江泽民指出的“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保护工程。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观；到下个世纪中叶，在全国建立起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环境，大部分地区做到山川秀美、江河清澈。这是一个跨世纪的伟大

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壮举。各地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规划，年复一年地抓下去，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战，这个宏伟的奋斗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江泽民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能不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发挥它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决策是否正确，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

在新时期，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重要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 按照宪法赋予的职权，加强了监督工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逐步加强了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检查并已形成制度。从1993年至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了21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情况。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执法检查工作。

3.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和集中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审议和决定了全国的和地方的一些重大事项，选举、决定了各级政权的领导成员。全国人大先后审议通过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及长期发展规划和每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批准了中英、中葡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等，促进了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4. 加强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六届全国人大设立了民族、法律、财经、教科文卫、外事、华侨6个专门委员会，七届全国人大增设了内务司法委员会，八届全国人大增设了环境和资源保护委员会，九届全国人大又增设了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2/3参加了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以加强制度建设，使工作更加规范化和程序化。

5.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积极开展与外国议会的交往，增进了与外国议会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

(二)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基层民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地吸引人民群众直接参加民主管理，保证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全面发展。

1. 直接民主权利体现在人民群众以最直接的方式参与国家根本大法和重要法律的制定。1982年的新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如企业法、行政诉讼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在正式通过前都曾经把草案公之于众，让人民讨论，并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

2. 人民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这些年开展的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和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工作，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审判、检察机关与公安、监察机关，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及时受理举报的问题，对检举、揭发人还采取保护措施。这提高了人民参政的积极性，使惩治腐败取得了一定进展。

3. 创造了人民直接参加社会管理的途径和形式。首先，企事业的民主管理开始走向法律化和制度化。《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颁布，进一步健全了我国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强调要发挥职工代表和基层工会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选举和监督企业领导干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1982年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要求在城市按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是我国政权肌体的细胞。我国目前有居委会近10万个，居委会干部36万多人，他们在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负责主持本选区候选人的酝酿、提名、协商和投票选举工作；在办理本居住区的社会公益事业，治理环境卫生，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6年，98%以上的居民区由居民直接投票依法选举了居委会。特别是以1987年1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简称《村委会组织法》)为标志，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上了一条坚实的道路。《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了村委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成员由村民选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到1997年底，全国农村有村委会905804个，村委会干部3788041名。在这10年间，全国90多万个村委会已普遍进行了三次换届选举，1998年，全国绝大部分村民委员会正在进行新一轮直接选举。推行农村村委会干部直接民主选举制度，是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进行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农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重大创新。

199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关于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精神，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

开和民主管理制度”。《通知》指出：“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正确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推行村务公开为基础，坚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推动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推动农业、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这样做可以使农村工作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这是做好农村工作的治本之策。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要实现上述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这对于促进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包括这样一些做法和内容：在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中，在全国政协委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都占有一定比例；有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还担任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如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9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任副委员长，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60名。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16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非中共人士1319人，占60%左右。在九届全国政协中，还有一批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爱国、敬业、守法，同时又具有一定经营管理成绩和社会影响好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共40多位。截至1997年8月，全国担任地方县（处）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共有8.3万多人，还有一些担任国务院部委及直属局和省级政府的领导职务。

2.中国共产党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系，还采取了民主协商会、高层次小范围谈心活动和专题座谈会等三种民主协商形式。

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重大问题与民主党派协商已形成制度，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逐步规范。到1997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谈心会、情况通报会达55次，协商水平不断提高。各级地方党委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也有很大进展，许多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带头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为多党合作增添了新的内容。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到1997年8月，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活动共150次；有6位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1997年6月30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陪同江泽民主席出席了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政权交接仪式。实践证明，这些举措密切了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并且在国际、国内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近年来，民主党派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改革、民主与法制建设等工作，提出重大建议100多项，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主党派的建议，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一些建议作了重要批示。1993年以来，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先后对三峡工程、山东、苏南、浦东和“京九”铁路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主持座谈会，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

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各种活动，开展经济、科技、教育、法律、医疗卫生、文化等咨询及社会服务工作；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籍华人的联谊工作，以发展经济往来，推进科技、文化交流。到1997年8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共成立咨询服务机构近2000个，向社会各部门提供咨询服务项目达3.2万多项；发挥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协助引进资金人民币9.4亿元，美元8.2亿元，港币7.8亿元；发挥智力优势，积极开展社会办学，共开办各类学校、培训班、进修班6.5万多个，培训总人数达165万人次；同时，派出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3.5万多人次到老少边穷地区，完成智力支边和开发扶贫项目2.6万多项，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3. 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到1993年11月，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总数已达37.4万多人，地方组织1606个，基层组织24013个。特别是1997年第四季度，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后不久，我国政治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相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各自的章程，讨论确定了各自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各自选举产生了跨世纪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在这次选举中，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各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除个别留任外，大多退出领导岗位。8个民主党派的8位中央主席中，届中调整和这次新任的有7位；70位副主席中，调整和新任的共29位；621名中央常委和1400名中央委员中，有一多半和近一半人为新任人选。通过这次换届，各民主党派均平稳顺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老交替。目前，民革中央主席是何鲁丽、民盟中央主席是丁石孙、民建中央主席是成思危、民进中央主席是许嘉璐、农工党中央主席是蒋正华、致公党中央主席是罗豪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是吴阶平、台盟中央主席是张克辉、全国工商联主席是经叔平。199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江泽民、李瑞环、胡锦涛等领导同

志亲切会见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新老领导人，并就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总结半个世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这个话题进行座谈。江泽民在座谈时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已基本完成了组织上跨世纪新老交替的历史任务。进一步搞好政治交接，是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组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政治交接的核心，是把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老一辈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一代一代传下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江泽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长期合作要坚持的四条基本原则和重大方针：一是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和行动，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亲密合作的政治基础。三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战学说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四是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体现。民主党派也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在自身建设中要向着政治方向正确、政治立场坚定、政治基础稳固的目标努力。这样，就可以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彼此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

此外，人民团体的活动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同国家生活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个规模最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发挥着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四）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是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在 1993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民族问题是关系我们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再一次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加强民族团结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重要任务。同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十分突出而引发流血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情况相反，我国民族、宗教方面总的情况是好的。民族关系是和睦的，民族团结是巩固的，宗教界也是稳定的。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强大凝聚力的，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一方面，国际敌对势力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西化”和“分化”的突破口。这很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另一方面，在民族工作方面，在一些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境外国外敌对势力挑拨我们各民族的关系，煽动民

族情绪，加紧进行政治渗透和分裂活动，威胁着这些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和经济建设。在宗教工作方面，一些地方滥建、扩建寺观教堂，频繁进行大型宗教活动，信教群众的宗教负担加重。利用宗教干涉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甚至恢复了早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有的地方教派纷争，发生流血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敌对势力加紧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活动，扶植地下势力，建立非法组织，同爱国宗教团体争夺寺观教堂的领导权。此外，有的地方也还存在着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宗教团体合法权益的现象。我们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当然，也不要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以致草木皆兵，惊慌失措。

首先，关于民族工作。

1992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如此规模的会议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会上，江泽民作《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 1993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他在民族问题上又强调三句话：一是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二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是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当前的关键是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和健全同实施此法相配套的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这就需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在各族干部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他强调，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所以，我们处理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都必须牢牢掌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通过政策调节，加强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和帮助。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各种项目，都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繁荣结合起来。同时，经济发达地区要加强对口支援，积极有效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少数民族地区要自力更生，发挥自己的优势；要通过共同努力使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98 年 7 月，江泽民在新疆考察时反复强调，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各民族人民保持坚强团结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我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我们的民族政策也是最成功的。我们要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继续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国 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人民要始终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开创了新局面，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开辟了新时代。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59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旗)，此外，在杂散居住的地区还建立了1 700多个民族乡。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78%的少数民族行使了自治权，自治地方的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各级政权中享有平等权利，对少数民族参加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代表名额做了专门的规定和特殊照顾。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少数民族的代表数额都超过了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第九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428名，占代表总数的14.36%，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8%的比例。全国各自治地区的行政一把手都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现在我国已有一支250多万人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他们在自治地方的各级机关以至中央党政机关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民族法制已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法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制体系而出现。从1979年开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中，有50多件包含关于民族问题的规定。这些民族法制的形成，对于调动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巨大的作用。

(3) 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得到初步调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解放前，我国民族地区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现在，民族地区已有大中型企业上千个，县以上工业企业数万个，乡镇企业也得到较快发展。1993年与1949年相比，民族自治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23.5倍。目前，民族地区已建立一批新型的现代化城市和多种生产基地，它们已成为民族地区有凝聚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现代化城市的兴起和大中型企业的兴建，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民族地区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4) 对外开放取得了可喜成绩。我国与15个国家接壤，两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绝大部分在民族地区，有30多个民族与周边国家相邻而居。边境口岸多，市场潜力很大。目前，民族地区国家级陆地开放口岸有34个（全国共有43个），地方口岸已达190多个；利用外资逐步增加。

(5)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都有很大发展。全国办起了一批以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为主的大专院校，包括12所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一些重点大学开办了民族班，还兴办了一批民族干部学校和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具有大中专学历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建设人才。民族地区的科技事业发展很快，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受到尊重和保护，优秀的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全国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刊杂志已有100多种。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大大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的医药卫生事业包括民族传统医药有了较大发展。民

族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群众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第三，关于宗教问题。我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不完全统计，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各级宗教团体约3000多个，宗教院校94所。这其中有大量涉及公众利益的宗教事务，需要政府部门依法管理。中央指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做好宗教工作，对保持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江泽民在宗教问题上也强调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指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它包括保护人们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两个方面。我们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我们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要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信这种教或那种教的人都团结起来，大家和睦相处，彼此尊重，把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来。共产党员在工作中要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党员信仰宗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共产党员应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但自己不信教，还有义务宣传无神论。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项工作必须加强，而绝不能削弱，更不能放弃管理。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对正常的宗教活动加以保护，对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加以制止和打击，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江泽民强调指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过去进行的宗教制度改革，在天主教、基督教方面革掉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在佛教和伊斯兰教方面革掉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它使我国宗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宗教界应当在这个基础上，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前进，而不能倒退。

在党和国家正确的宗教政策指引下，我国的宗教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我国，教徒可以按各自宗教的教义及习惯，在寺庙、宫观、清真寺、教堂和个人家庭中进行各种正常宗教活动。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教职人员履行宗教教务得到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各种基本法律中，都有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歧视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公民的相应条文。为了更好地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

和参加宗教活动，更好地保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国务院于 1994 年 1 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两个关于宗教方面的重要专门法规。政府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保证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努力维护宗教领域的团结稳定，把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为我国跨世纪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司法机关对假借宗教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处理，维护公共利益和法律尊严，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我国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在这方面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我国政府在致力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进步，提高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特别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近年来，司法机关依法审理了有关出版物严重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案件，维护了穆斯林的合法权益。我国各宗教团体已同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宗教人士建立了友好联系。近两年，中美两国宗教组织和人士之间的友好交往增多。这些往来，对加强对话，增强了解，消除误解，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党和国家还妥善处理了班禅转世的问题。1989 年 1 月 28 日，十世班禅大师在西藏圆寂。十世班禅大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务院于大师圆寂后第三天作出了《关于第十世班禅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成立了寻访班子，着手进行灵童的寻访工作。中央强调在寻访工作中必须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必须坚持爱国主义，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通过六年多的寻访，特别是同达赖集团的尖锐斗争，到 1995 年 11 月 29 日，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经金瓶掣签认定，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 6 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国务院特准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其坐座典礼于 12 月 8 日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举行，李铁映代表国务院向他颁授金册和金印。1996 年 1 月 12 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了第十一世班禅的拜见。

近几年来，达赖在外国某些势力的支持下，错误估计形势，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一面在国内藏区策划、煽动骚乱，一面乞求洋人支持，妄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因此，西藏僧俗各界旗帜鲜明地同达赖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从各个方面清除其影响，从而实现西藏的社会稳定。江泽民指出："达赖的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达赖集团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达赖喇嘛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而是一个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达赖在与中央政府接触商谈问题上并没有诚意，达赖所作所为的真实目的是企图蒙蔽不明真相的人，骗取国际支持"。

不管达赖集团及国外敌对势力如何歪曲破坏，西藏的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八五"以来，西藏的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 10.2%，1996 年达到 64.76 亿元，比 1991 年翻了一番。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94 年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 62 项援藏工程到 1998 年已完成 57 项。同时，西藏

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社会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西藏共有寺庙1787座，僧尼46000多名，经过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寺庙和喇嘛每天都在从事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都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

（五）依法治国迈开大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中国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有完备的法制来引导、规划和保障。因此，“十四大”以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把法制建设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的要求，他指出：“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订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此后，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1. 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治国方略。江泽民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还指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顺利发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还被明确地载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针提出来，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法学界把它称之为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外界评论“这是中国第三代党中央核心人物关于未来治国方略和政治走向的一次公开宣誓”。它无疑使民主法制建设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2. 加强立法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得到了切实加强。从1979年到1998年八届人大任期届满，四年来，除宪法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法律233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95件，共计328件。国务院颁布了800多个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4200多个地方性法规。这说明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特别是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市场经济立法放在重要位置，五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11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占2/3。全国人大通过的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关于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加强宏观调控的法律和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等，为推进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初具规模。此外，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五次会议期间，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和新刑法，被海内外视为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新的里程碑。刑法原来只有

192 条，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为 452 条，新刑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当三个刑法基本原则，这是一部统一的、完整的、建国以来最完备的刑法典，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3. 加强法制教育，依法治理工作有新的突破和成效。要做到依法治国，保证法律的严格遵循，首先要增强全民法律意识，这是全国上下形成的一个共识。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学法守法用法。五年来，中共中央先后举办了六次法制讲座，每次讲座江泽民都亲自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律知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听法制课的影响下，各级干部学法守法用法形成高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举办了省级领导干部法制讲座。

从 1986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全体公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普及法律常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先后实施了"一五"普法和"二五"普法计划，"三五"普法已于 1996 年正式启动。12 年来，全国有数亿公民，接受了法律常识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很大提高。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领导方式，在工作中更多地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各种事务。依法治理工作正多方面展开，并向纵深发展。依法行政，不仅要用法律来约束被管理者，而且要用法律来约束管理者。全国人大先后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督法、国家赔偿法等，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对权力的运用。近几年，公民开始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公民的法律意识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还要花大力气开展普法工作。

4. 加大执法力度，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严肃执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和国家对司法活动的根本要求。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是执法。"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为此，政法部门把严肃执法、维护法律尊严作为自己的生命线，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在这几年里，人民法院不断加强审判力度，从 1992 年至 1996 年，人民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 283 万件、民事案件 1305 万件、经济案件 571 万件。为进一步保证严肃执法，公正裁判，人民法院全面推进审判方式改革，进一步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依法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示精神，1998 年 7 月 11 日，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著作权纠纷案，把法院庭审情况传进千家万户，这是我国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必然结果，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今后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公开审判是为了加大案件审理的透明度，目的是为了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公正；这有利于从制度上确保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也是对公民进行普法教育的一种有效措施，同时这也对提高审判效率、审判水平和法官拒腐蚀能力，加快司法改革是一个极有力的促进。各级法院坚持走群众路线，主动接受监督，如建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设立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话等，特别是积极支持舆论监督，这样做既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又有利于树立法官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良好形象。

“严格执法，狠抓办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统揽检察工作全局的方针，为严厉打击贪污等犯罪活动，人民检察机关成功地侦破了一批在全国震动大、影响大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据统计，1993年至1996年，我国检察机关立案侦察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23.6万件，其中大案、要案14万件，百万元以上大案1700件；县处级干部贪污贿赂犯罪6900除件，司局级干部犯罪要案390件，省部级干部贪污贿赂犯罪8件。办案中挽回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139.6亿元。这些案件的查处，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充分显示了人民检察机关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法队伍，从根本上保证严肃、公正执法，中共中央决定在1998年对政法队伍进行集中的教育整顿工作。为此，1997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1998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会议对这个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会议指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政法队伍。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政法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队伍。但是，当前的政法队伍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吃拿卡要、索贿受贿、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问题时有发生，群众反映强烈。司法腐败的问题严重影响我们政法队伍的形象，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对其危害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会议强调：解决政法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几方面的工作，要紧密配合，相互促进。中央政法委要求在自查自纠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特别要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的重大案件。总之，要切实抓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全面提高政法干警的思想、作风、纪律和业务素质，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执法。

5. 法律服务业长足发展，法律援助工作取得进展。

作为我国法制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律师工作也得到相应发展。从1993年到1997年9月，全国律师已从4万多人发展到10.2万人，律师事务所从3600多家发展到8200多家。十四大以来，我国律师工作的规章制度体系得到建立和健全，律师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正式颁布实施。1996年律师办理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达70多万件，1993年至1996年4月仅基层法律服务一项累计就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372亿元。此外，政府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与1993年相比，都有了很大发展，服务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为填补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项空白，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1994年1月，司法部正式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旨在为贫者、弱者、残者提供法律帮助。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目前，已有广东、湖南等8个省和重庆、郑州等20多个大中城市以及几十个地、市、县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1997年5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广大群众称赞法律援助是一项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利在人民群众、功在党和政府”的事业。

总之，我国目前初步形成了完善的立法、公正的司法、严格的执法、深入的普法这样一个法制保障体系。

五、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一）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思路与决策

通过改革体制和完善法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法律为武器，不断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这是党和政府特别重视的一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反腐败斗争也是有成效的。但是，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党内、在国家机关中腐败现象还在滋长和蔓延，有些方面甚至相当严重。党内一批干部，包括少数高级干部，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走上了腐败和经济犯罪的道路，这不仅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干扰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而且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深的忧虑。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决心打好反腐败斗争这场硬仗。1993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93年起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1993年8月，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有种种复杂原因。他强调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是绝不允许出现这种后果的。"我们既要看到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把突出的问题解决好。他提出近期内反对腐败要着重做好三项工作，即：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特别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二是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重点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中的案件；三是紧紧抓住本部门、本单位的突出问题，刹住群众最不满意的几股行业不正之风，年内要见到明显成效。在这次会上，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作了题为《适应新形势，深入反腐败，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报告。这次会议确定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对策和当前任务。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后，反腐败斗争正式形成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的格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阶段性成果。

为了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199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五条规定：（1）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2）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3）不准买卖股票。（4）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

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5) 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此后，每年中纪委及国务院都召开会议，及时解决反腐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经过几年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共中央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反腐败斗争的思路。这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查处大案要案、健全制度和严肃党纪政纪结合起来，既防范于前，又惩戒于后，打好一个一个阶段性战役，一步一步把斗争引向深入。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正在找到一条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这就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

1. 领导干部以中央的规定规范行为，廉洁自律的意识有所增强。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针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员干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和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礼品登记、企业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等制度。1997 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重要党规党纪。从 1993 年 1 月到 1997 年 6 月，全国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 26.3 万人（次）在民主生活会上检查纠正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问题；全国党政机关共清理出超标准小汽车 2.1 万多辆；全国有 58.6 万多名科级以上干部检查、纠正了住房方面存在的以权谋私等问题。用公款“吃喝玩乐”的歪风有所遏制，全国党政机关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仅 1996 年就降低招待费近 16 亿元；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三项制度基本建立，1996 年全国有 8.5 万名党政机关干部按规定上交了礼品礼金，折合人民币 5100 多万元，有 95%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申报了个人收入，国有企业中已经实行业务招待费报告制度的约占 82%。

2.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在查大案要案中，锋芒直指“三机关一部门”，即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严重以权谋私案件。从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以来，到 1997 年 6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73.1 万多件，结案 67 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 66.9 万多人，其中开除党籍 12.1 万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 37492 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 2 万余人，厅（局）级干部 1673 人，省（部）级干部 78 人。通过查处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159.8 亿元。查处的大案要案比较突出的有：收贿索贿数额特别巨大的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等 6 名市级领导干部；有重大经济罪行及诬陷、嫖娼行为的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李善有；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贵

州省原计委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及贵州省原公安厅长郭政民；收受大量非法所得的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边少斌；收受巨额贿赂的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原总经理郭子文；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国家科委原副主任李效时。特别是严肃查处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北京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严重违纪违法案，撤销了陈希同一切职务并依法判刑，这是建国以来反腐败斗争所涉及领导干部职务最高的案件，表达了党中央反腐败一抓到底的坚强决心，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

通过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了违纪者，清除了腐败分子，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振奋了党心民心，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3. 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这几年在纠风工作中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治理公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工作成效比较显著，全国共撤除违反规定设置的收费站、检查站 8700 多个，占治理前站卡总量的 58%，达到了在国道、省道上基本上无“三乱”现象的要求；全国共清理出党政机关无偿占用企业资金 19 亿多元，汽车等交通工具 1 万多辆，其他物品 4 万多件；制止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团组 4045 批，共 24900 多人，减少开支 6.9 亿多元，清理出违反规定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人员 71 800 多人，收缴 6500 多万元。中小学乱收费得到初步清理，治理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工作进一步展开；清理预算外资金和“小金库”、治理医药用品购销中收取回扣等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综上所述，在反腐败斗争中，由于思路正确，决策果断，措施有力，从而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也为今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积累了经验。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在有些地区和有些单位还在滋长蔓延，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反腐败斗争离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反腐败斗争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的长期艰苦的斗争，今后还有许多硬仗要打。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要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六、军队建设和改革取得新成绩

自从 1989 年 11 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阔步迈向新世纪。

1.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以及形势的发展，1990 年 12 月 1 日，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向部队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五句话的总要求，强调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中共中央经过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确认国际形势总的是继续趋向缓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继续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同时也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世界一些地区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战争的危险必须保持充分的警惕,绝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要从长计议,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同时要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把两者正确地结合和统一起来。

1993年初,根据世界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和世界军事领域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新形势,中央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定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深化。中央军委用这个方针统揽全军各项建设,坚决贯彻科技强军战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2. 裁减军队员额铸精兵。

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建设的重要特点之一。

80年代中期,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中央军委作出了军队体制改革、裁减员额100万、进行精简整编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和武器系统效能的空前提高,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军队质量在现代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把加强质量建设作为实现我军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方针,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种新形势下,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正式宣布中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使我军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迈进,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3. 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确保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永不变色。

把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使军队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既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在新形势下,我军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江泽民反复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现代化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指挥,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

为此,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组织全军学习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军。十四大以来,总政治部就委托国防大学举办过十多期全军高级干部轮训班和12期宣传理论干部、政治理论教员轮训班。同时,全军有80%以上的干部接受了轮训。二是大力加强军队中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使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全面增强。三是全军部队贯彻落实1993年新修订和颁发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使基层建设得到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部

队建设的全面发展。四是深入开展“四个教育”，保持官兵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在部队形成了热爱祖国、献身国防、无私奉献的思想氛围，涌现了“鼓浪屿好八连”、“深圳特区精神文明好六连”和“模范团长李国安”、“抗洪英雄高建成”、“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特别是在1998年，全军及武警部队30多万官兵，先后投入了伟大的抗洪斗争，在我军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全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律停止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雷厉风行地完成了经营性企业的移交和撤销工作，这对军队建设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4. 坚持科技强军战略，推进我军质量建设。

当前我军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还不相适应，因此，我军建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而加强质量建设则是实现我军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方针。要推进军队质量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关键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这不仅要大力发展先进武器装备，而且要用高技术改进现有武器装备，还要在教育训练、作战指挥、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努力利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增大高科技含量，这样才能全面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从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我军在东南沿海举行的一系列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中，可以看出我军作战能力有显著提高，这也显示了我军实施科技强军战略的巨大威力。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标志，也是未来高技术防卫作战的重要条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国防科技工业和军事装备部门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科技工业和军队装备建设的道路，为推进我国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了加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适应世界上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把国防科工委、总参装备部、总后军械部等单位合并组成总装备部，为解放军第四总部，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总装备部的成立，是我军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是落实科技强军方针的重要举措，对加强我军质量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国防科技研究尤其是尖端科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在战略武器方面，如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的成功；用机动装置成功发射地地固体战略导弹；核潜艇成功进行极限深潜、水下高速航行、大深度发射鱼雷及发射运载火箭等试验。在军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已研制出一批用新型元器件和新技术的装备。特别是100亿次银河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标志我国独立设计制造巨型计算机能力又有长足的进步。

适应装备现代化的需要，全军将士学习高科技知识蔚然成风。广大官兵认识到，要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人的因素仍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因此，全军上下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科技大练兵的热潮，依靠科技提高军事训练质量和水平。目前，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管理知识、能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能驾驭高技术战争的高素质军事人才群体已初步形成。

总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正在不断地向前推进。

第十章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胜利迈向新世纪

第一节　“八五”计划的完成与“九五”计划的制定

一、“八五”计划的完成及其巨大成就

从1991年到1995年的“八五”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995年达到5.76万亿元，提前五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五年来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年均增长4.1%，乡镇企业保持发展势头。工业年均增长17.8%，产品结构调整加快，煤炭、电力、钢铁、汽车、化纤、化肥、家用电器等都有较大增长。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工业取得新的成绩，轻纺产品供应充裕、花色品种增多。重点建设成绩显著，建成投产大中型基建项目840多个，交通、通信和能源建设得到加强。铁路运营里程到1995年已增加到6万公里。投资400亿元、贯穿南北的京九铁路提前两年全线铺通。高等级公路、港口、机场建设发展较快。新增发电装机总量7000多万千瓦。邮电事业迅速发展，电话交换机总容量新增5 800多万门。地质勘探取得新成绩。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缓解了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为今后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力量。

2.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加快了改革步伐。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政体制，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税制，已经基本建立并正常运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初步分开，汇率顺利并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价格进一步放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个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和工作重点发生了五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是从着

眼于搞好每个企业转向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二是从注重调整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分配的政策性调整，转向转换机制和制度创新；三是从主要抓企业自身改革转向配套改革与企业改革同步推进；四是从分别抓改革、管理等项工作，转向注重把改革、改组、改造与加强管理即“三改一加强”有机结合起来；五是从分散经营转向实施大公司战略。这些变化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仍居于主导地位。1995 年，全国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达 4.5 万多亿元，比 1990 年的 1.6 万多亿元增长 1.7 倍。1980 年以来，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年均递增 12.4%，1990 年以来年均递增 17.8%。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占 53.7%、销售收入占 33.8%、增加值占 34.1%、实现利税占 55.2%。国家财政收入有 60%来源于国有企业，城镇社会就业人员近 70%是由国有企业和其他国有单位安置的。在能源、交通、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在冶金、化工等原材料行业，在汽车、机械、电子、石化等支柱产业，国有经济都占有支配地位。涌现出一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优势企业，国家重点抓的 120 家试点企业集团在全国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中，资产、销售收入、实现利税的比重都在 1/4 左右，实现利润超过 1/2。

农村改革及计划、投资、流通等体制的改革，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及住房制度和政府机构改革，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国家基本确定了在城镇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思路。失业保险制度正在进一步完善。经过 17 年的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形成。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活力显著增强。改革的推进，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3. 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八五”期间，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由一般加工工业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总体开放格局。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 1 万亿美元，比“七五”时期增长一倍以上。1995 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序已由 1978 年的第 32 位跃升到第 11 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高达 40%。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1613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1136 亿美元，占 70%，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国内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国际旅游业迅速发展。1995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730 多亿美元，国际支付能力增强。对外开放的扩大，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增进了同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

4. 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八五”期间，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 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0.6%。1995 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接近 3 万亿元。城乡劳动就业不断增加。脱贫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从 1978 年到 1995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5 亿人减少到 6500 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成就。1995 年城乡新建住房 43 亿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扩大。城镇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城乡人民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生活质量提高，正在向小康目标前进。

5.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推动下，科技和教育事业在改

革中继续前进，“八五”期间取得国家级科研成果16万项，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中等职业教育有较快发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迈出较大步伐。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和社会科学都取得新的进步。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得到了加强。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生育成绩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下降到1995年的10.55‰，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同时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取得进展。侨务、妇女、儿童、老龄和残疾人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加强了勤政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进展，安定团结局面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得到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在保卫祖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做出了新的贡献。“八五”时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而实现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

二、“九五”计划的制定

在“八五”计划顺利完成，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时，1995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

1. 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也是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跨世纪宏伟蓝图。

“建议”提出，“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取得显著进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2. 为了实现今后的奋斗目标，《建议》强调，必须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

《建议》提出了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条重要方针：第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第二，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第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第四，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第五，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第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第七，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第八，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第九，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建议》强调指出，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中共中央在90年代作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也是《建议》不同于以往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的最大特色。这两个转变，一个是生产关系的改革，一个是生产力如何发展。前一个转变的根本要求，是深化改革；后一个转变的根本要求，是更好发展。两个转变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抓住抓好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就是抓住了关键。

3.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全会闭幕时发表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十二个关系：(1)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2) 速度和效益的关系；(3) 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4) 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5)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6) 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7) 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8) 收人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9) 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10)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1)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12)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他指出，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要贯彻一个总的思想，就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

在十二大关系中，第一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是包揽全局的首要的基本的关系，也是正确处理其它重大关系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这十二大关系也体现了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思想。第二到第五个重大关系论述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生产力发展问题。第六到第十个重大关系的中心思想，就是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这不仅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的一般规律，也折射出从长期战略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江泽民这个讲话，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我国当前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17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大关系应当坚持的指导原则、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对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胜利实现"九五"计划、2010年奋斗目标以至第三步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针。

4. 为了实现宏伟蓝图，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要加强党性锻炼。1995年9月27日江泽民在全会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江泽民说，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这一点对高级干部尤其重要。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

家，这一点非常重要。随后，江泽民又提出要“三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年11月8日，他在北京市视察工作时指出：要加强领导，首先必须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责任感和工作水平。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应这样做，北京更要起带头作用。江泽民指出：讲学习，历来十分重要。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他说，我再三讲，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少搞一点卡拉OK，少搞一点应酬活动，多搞一点学习。自己掌握的知识多了，学问多了，精神境界也就会高起来。讲政治，对共产党人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搞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就不可能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讲正气，是中华民族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古语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等等，都是讲一个人必须树立正气，必须有正义感。有了一腔浩然正气，才能无所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树立和发扬的最大的正气。大大发扬这种正气，以权谋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邪气就滋长不起来。要教育干部自觉地树立正气，坚决同歪风邪气作斗争。

5. 国务院根据《建议》精神，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1996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个“纲要”。

这个跨世纪的宏伟蓝图经过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次，中国可以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有能力、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第三，中国经过47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条件；第四，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市场，包括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许多基础建设正在起步；第五，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素质不断提高，这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15年，中国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使《纲要》这个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得到实现。

三、实现“九五”计划的良好开局

1997年3月1日至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1996年的工作，指出了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新的一年的任务。

李鹏指出，1996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新的成就，为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开了一个好头。1996年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货

膨胀得到有效抑制，物价涨幅从14.8%回落到6.1%，明显低于预定10%的调控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00多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7%。全年财政收入有较多增加。金融形势平稳，货币发行得到控制。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人民币汇价稳定。农村经济持续全面发展。全国粮食总产量在4800亿公斤以上，工业生产稳定增长。钢产量突破1亿吨，其它工业产品都有不同程度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8.2%，投资结构得到改善，重点建设进一步加强。新开工的国家重点项目投资总额中，中西部地区占43%以上。

1996年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继续扩大。1996年是国有企业改革力度较大的一年，各项试点工作全面展开。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890多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进出口基本平衡。国际旅游业创汇超过1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增长势头，实际到位400多亿美元。同时，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成就。我国体育健儿在第26届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特别是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4300多元，实际增长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00多元，实际增长9%，是近年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达到38500多亿元。关于1997年的任务，李鹏强调指出：1997年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件大事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切实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稳中求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李鹏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199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务。目前国家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自国有企业，有2/3的城镇职工在国有企业就业，在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国有经济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部分国有企业确实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一定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务求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方面取得实效。为此，他提出：一是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二是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使国有小企业焕发生机。三是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推进再就业。四是多渠道增资减债。五是切实加强企业管理。要做好整顿和建设企业领导班子的工作。六是认真抓好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同时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些措施是近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总结。今后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搞好。

会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也审查批准了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中央预算。会议通过了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使我们有了一部符合国情的刑法典。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及《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

与此同时，召开了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

第二节　喜迎香港回归，促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

从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之日起，香港进入了长达12年的过渡期，制定香港基本法就成为过渡期内必须完成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1985年4月10日，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决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同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共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23人。姬鹏飞任草委会主任。7月1日，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

根据基本法的结构，草委会分为5个专题小组。同时，为了尽量吸收香港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经草委会决定，1985年12月18日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由180名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安子介任主任委员。

由于香港基本法是中国第一部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制定的法律，无先例可循，起草委员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可以说，基本法凝聚了全体起草委员的智慧，也集中了香港和内地各界人士的高见。特别是邓小平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多次会见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基本法的原则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委员会共召开9次全体会议，73次专题小组会，又经过在香港及内地广泛征求意见及反复修改，到1990年2月，圆满完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交给的起草基本法的任务。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三个附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关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的决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香港基本法的颁布，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香港在1997年后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以及所实施的制度和各方面政策。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基本法，称赞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

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香港基本法共160条，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法律保证。它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把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全国性法律。具体来说，香港基本法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为此，基本法作了一系列规定，主要是：（一）指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二）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它的权力是中央授予的。（三）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四）按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五）在立法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全国性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决定香港特区进入紧急状态等等。

第二，在坚持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规定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法在《序言》和《总则》中都明确规定，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国家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基本法还着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都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这个规定表明，虽然宪法作为国家主权在法律制度上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制定基本法的依据，从整体上说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但在"两种制度"方面，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上述制度和政策，则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不适用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

第三，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具有高度和广泛的特点，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组成，这体现了"港人治港"的原则。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可依基本法自行制定、修改或废除本地区法律，只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可独立审判，不受干涉，包括不受内地法院的干预和管辖，甚至有终审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独立，财政收入不上缴，也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实行独立的征税制度；维持独立的货币金融制度；不实行外汇管制；保持其自由港、单独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原有的航运管理体制，保持国际和区域航空中心地位不变，等等。基本法还规定，特别行政区除可派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与同香港有关的外交谈判外，还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在非政治性领域内，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还可依法签发特别行政区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实行独立的出入境管理

等等。这就使香港具有足够的对外交往能力，继续驰骋于世界经贸舞台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不但比我国民族自治区大得多，也比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单位（如美国的州）大得多，这体现了高度自治的特点。

为了保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实现，基本法还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的事务。

香港基本法的制定有重大意义：（一）它从法律上洗雪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耻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宿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二）它为1997年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为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它也为以后解决澳门问题、台湾问题，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起着垂范作用；（三）它为和平解决国际间存在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和范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国际意义；（四）基本法突破了许多传统的法学理论，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解决了两种不同法律体系并存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997年7月1日，在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时，基本法将同时生效。

二、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的斗争

在基本法制定后，如何确保香港实现平稳过渡就成为最主要的任务。江泽民在会见香港特区筹委会全体委员时特别强调了香港实现平稳过渡的重要意义。他说，香港的平稳过渡不仅符合600万香港人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对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照顾，但是英国内部还有一些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做着19世纪殖民主义的迷梦。早在1984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联合声明。"他还当面对英国外交大臣说：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以前的过渡时期不要出现人为的混乱。中英在签署联合声明后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原本是好的。但是，从1989年春夏之交后，英方完全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同中方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

1991年6月5日，英方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由港英立法局通过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把这个在英国本土都没有的"人权法"强加给香港。其要害是赋予这个条例凌驾于其他法律之上的地位。这显然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中，只有基本法的地位高于其他法律，其他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的规定。6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英方执意要在香港制定一个将对基本法的贯彻执行产生不利影响的人权法案。"对此，中方表示遗憾，并保留在1997年后适当时候按照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香港的现行法律包括人权法案进行审查的权利"。特别是港英当局还利用这个人权法案的凌驾地位，大肆修改香港的现行法律，共涉及50多个条例，这更是直接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关于"法律基本不变"的规定，它将给未来特区的法治带来混乱。

由于英国政府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磋商合作的政策，所以1992年英国第28任总督彭定康到任后，便于10月单方面提出了所谓香港“政制改革方案”。这违反了三个方面的原则：首先，这违反了联合表明规定在过渡时期的后半段中英双方“有必要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审议为一九九七年顺利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的精神；其次，在基本法对香港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发展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英方打着“扩大民主”的旗号，要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现行政制特色，改变1994/1995年立法局等三级驾构的选举形式，违反了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第三，这也违背了中英两国外长就1997年前后香港政制衔接，特别是1995年立法局选举办法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其目的就是企图在“民主”和“人权”的幌子下，加紧培植代理人，拼凑自己的治港班子，以便将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力延续到1997年以后，使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受英国控制和影响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彭定康的“三违反”、“政改方案”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坚决反对。为了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在中方的一再要求和努力下，中英双方就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问题，于1993年4月至11月进行了长达17轮的谈判，但终因英方的破坏而导致谈判破裂。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英方自行按“政改方案”进行了香港1994/1995年三级政制架构的选举，其结果就是“直通车”没有了。所谓“直通车”安排，是指原来中方为了实现平稳过渡，根据英方的建议，同意如果港英1995年产生的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符合全国人大的有关规定和基本法的规定，其成员也符合一定条件，在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后，可以跨越“九七”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成员。现在，由于港英当局的倒行逆施，使“直通车”成为不可能。这样，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就有权对特区第一届立法机关的建立另作安排。

对于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风雨雨，中国政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适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预委会在工作中贯彻了“以我为主”和“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方针，在两年半中，共召开6次全体会议，预委会下分政务、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及保安五个专题小组，共召开89次小组会议，就香港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事宜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广泛咨询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其中比较系统的书面意见和建议有46份。预委会的成立和运作是继联合声明签署，基本法制定后的又一件大事，它像一部发动机，动员了香港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来关注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情，它把爱国爱港人士更紧密地聚集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之下，形成了维护香港平稳过渡的巨大社会力量，为筹备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好了前期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在过渡时期要支持爱国港人参与管理香港事务，以便发现和培养一大批爱国爱港的治港人才的重要指示，中国政府不但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使香港委员有23人，占总人数的1/3以上，而且由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先后聘请了许多在香港各界和各地区有代表性的人士担任港事顾问与区事顾问，到1994年9月其人数已达141人，他们对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实现平稳过渡提供了大量

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鉴于英方已经破坏了双方原来通过协商达成的“直通车”的安排，1994 年 8 月 31 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了郑耀棠等 32 位人大代表提出的重建香港政制架构议案，决定：按照英方“三违反”方案产生的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将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终止，特区筹委会将根据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基本法的规定负责筹备特区事宜。这将有助于排除影响平稳过渡的消极因素和人为障碍。

尽管英方对香港的平稳过渡设置了种种障碍，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推动下，香港经济能够克服各种人为的消极因素，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已上升到世界第 8 位，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在香港的转口贸易总额中，两地的双边贸易已占近 9 成。到 1996 年为止，经国家批准的香港中资企业已有 1 818 家，其总资产到 1995 年已达 1.3 万多亿港元，其中仅中银集团一家总资产就达 9000 亿港元，净资产近 1 600 亿港元。中资企业在香港的投资已超过 200 亿美元，超过了美日投资，在香港外来投资中仅次于英资占第二位。香港各界人士认为“中国因素”对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随着特区筹建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港人信心的增强，外国金融机构到香港设立据点的事例增多，表明国际投资者看好香港的未来。这些也为香港的平稳过渡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和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防务的规定，为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1996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已经组建完成。邓小平早在 1984 年就指出：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根据基本法，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1993 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香港驻军的组建工作。

为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地区的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香港驻军由陆、海、空三军部队组成。主要编成有步兵旅、海军舰艇大队和航空兵团，总兵力将根据香港地方防务的需要确定，不超过多年驻港英军的规模。香港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必要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请求，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这支部队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进驻香港后，将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这个部队有光荣历史传统，同时又训练有素，军事过硬，既是威武之师，又是文明之师，纪律严明，堪称楷模。香港驻军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在人员素质方面也堪称一流，军官大多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士兵文化程度都在高中以上，这支部队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为了胜利完成驻军任务，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于 1996 年 12 月 30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对香港驻军的职责、驻军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驻军人员的义务与纪律、香港驻军人员的司法管辖做了具体规定。

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建工作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

根据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1995年1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1996年1月26日，筹委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筹建工作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筹委会的成立十分重视。江泽民在会见筹委会委员时指出，要最广泛地团结广大港人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参与到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伟大事业中来，共同维护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稳定繁荣。他强调指出，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全国的一件大事，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征途中的第一站，后面还有澳门问题、台湾问题。在香港问题上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将使祖国统一大业展现非常美好的、广阔的前景。

筹委会由150名委员组成，其中香港委员有94人，占63%。这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港人在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在香港贯彻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决心和信心。筹委会既是一个权力机构，又是一个工作机构。它在成立的一年中，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就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工作。到1997年2月为止，筹委会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下设的6个工作小组共召开31次会议，做了六件大事：

(1) 组建了由400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筹委会在充分吸纳港人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具体产生办法。经过开放报名并经筹委会委员认真提名，选举产生出推委会400名委员，代表了香港各界、各阶层。

(2) 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根据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筹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采纳了更易为广大港人所接受的协商后提名选举的方式。经过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进行资格审查，从公开报名参选的31人中确定8人为参选人，再在推委会全体会议上由推委会委员进行提名，结果，董建华、杨铁樑、吴光正三人成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候选人，此后，筹委会又在香港成功地组织了候选人答问会，由三位候选人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施政主张，并现场回答了推委会委员的提问。12月11日，推委会在香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选举结果是董建华当选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16日，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1次全体会议，决定根据推委会选举产生的人选，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由全部是香港人组成的选举机构来推选香港的行政长官，是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是香港真正民主的开始，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新纪元。一百多年来，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一切权力全部集中于港督一人之手，28任英国港督的任命，从未征询过港人意见。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才给香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发展机遇。这是香港平稳过渡，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有力保证，也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选举成立了由60名议员组成的临时立法会。在“直通车”安排被破坏的情况下，筹委会决定设立临时立法会，主要任务是为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正常运作制定必不可少的法律和参与必要的人事安排，这作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前的一项临时性安排，是体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的最合适的办法。临时立法会由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12月21日，推委会在深圳选举产生了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现任立法局议员中的33人，即大部分议员已当选为临时立法会议员。临时立法会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而得到了香港社会的认同，这就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4）开展了对与香港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有关的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筹委会设立了经济小组，充分发挥港人的参与作用，对与香港政权交接及平稳过渡有关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如1997—1998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金融的稳定、政府资产的交接、大型基建等，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议。

（5）系统研究并提出了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的处理意见。筹委会根据基本法关于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的规定，要求在处理原有法律时尽量少变，同时，对于现行法律中存在的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各种问题，又要区别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处理的办法。经过审查和研究，在香港现行法律共640多项条例和1100多项附属立法中，除了有十几个条例和附属立法以及另有十几个条例和附属立法中的部分条款外，绝大多数的条例和附属立法都将保留下来，将被采用为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即使是《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也将予以保留，不同的是删除了有关凌驾于其他法律之上的条款。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根据筹委会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

（6）筹委会确定了香港回归祖国民间庆祝活动总体方案的大致框架，支持并推动成立了“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积极筹备迎接香港回归的各项民间庆祝活动。此外，为永久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筹委会还决议在香港建立一座香港回归纪念碑。鉴于香港现行教科书中有些内容既不符合历史与现实，也与“九七”后的变化不相适应，同“一国两制”的精神及基本法相抵触，需要进行修改。为此，筹委会通过《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决议》。

此外，在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后，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的工作也在顺利进行。1997年1月24日，董建华公布了第一届行政会议的成员名单。2月20日，国务院根据董建华提名任命了第一届政府的主要官员23名。现任港英政府的主要官员，除1人因是外籍人士而更换外，其他都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官员，并在原岗位上留任。这体现了中央贯彻基本法的诚意和决心，也表明国家希望香港18万公务员队伍保持稳定。

总之，正如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所说的，经过筹委会一年来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香港的平稳过渡有了坚实的基础。他指出：筹委会的工作所以能够取得成效，进展比较顺利，从根本上说，有赖于我们国家的国力增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其次，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作指导，“一国两制”

的方针在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实践中，充分显示了它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再次，是因为筹委会坚持了“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工作方针，广大港人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投身到筹建特区的事业中来，才开创了如今共建特区、喜迎回归的大好局面。

三、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

1997 年 7 月 1 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天，举世瞩目，永载史册。

6 月 30 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于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开始履行香港防务职责。命令指出：驻港部队担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是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任务神圣，责任重大。命令要求他们进驻香港后，要发扬优良传统，把部队建设成为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同一天，国家主席江泽民率领高规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至 7 月 1 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23 时 42 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在仪仗队行举枪礼后，英国查尔斯王子讲话。他说，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仪式标志着香港在 150 多年英国统治之后，根据 1984 年签署的联合声明而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的缓缓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7 月 1 日零点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雄壮乐曲声中，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零时 4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1997 年 7 月 1 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江泽民说，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江泽民指出，香港今日的繁荣归根到底是香港同胞创造的，也是同祖国内地的发展和支持分不开的。他表示相信，有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管理和建设好香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创造香港美好的未来。

零时 12 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

7 月 1 日凌晨 1 时 30 分，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国务院副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主持仪式。江泽民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成立！随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李鹏总理监誓。接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 23 名主要官员、第一届行政会议 14 名成员、临时立法会 59 名议员、终审法院常设法官、高等法院法官 36 人，分批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

接着，李鹏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并且宣布："从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开始实施"。他说，"历史赋予你们重任，香港人民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本着爱国爱港的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基本法，恪尽职守，不负众望。中央人民政府将全力支持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我相信，在祖国大家庭中，香港同胞一定会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接着讲话。他说，这是一个崇高而庄严的时刻：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经历了 156 年的漫漫长路，终于重新跨进祖国温暖的家门。我们在这里用自己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香港进入历史的新纪元。董建华表示，他将以忠诚的心志，坚决执行法律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神圣责任，带领 650 万富于创造精神的香港市民坚定地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道路向前进。

在这同时，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也进驻香港，并于 7 月 1 日零点在香港岛中区添马舰英军驻港总部威尔士亲王军营及其他 13 处军营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从此，我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香港地区执行防务。作为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7 月 1 日零时，五星红旗升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的办公大楼前。下午 3 时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开署仪式。

7 月 1 日凌晨 2 时 45 分，临时立法会举行特区政府成立后的首次会议，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香港回归条例草案》，旨在确认临立会在 7 月 1 日前通过的条例及香港原有法律在 7 月 1 日后的延续性等。这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后临时立法会通过的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条例。这也是董建华就职后签署的第一份文件。香港 18 万公务员人心安定，继续留任为广大港人服务，这是香港平稳过渡中的精彩一笔。

7 月 1 日上午 10 时，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国家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对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 600 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的问候。他郑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政府的一项基本方针，50 年不变。

接着，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发表了《追求卓越，共享繁荣》的讲话。他说，今天是一个全中国普天同庆的日子，是全球华人举杯同贺的日子。在香港举步迈向新纪元的时候，我们怀着无限敬意，追念尊敬的邓小平先生。同时，我们衷心感谢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国家领导层。在过去十几年变化多端的过渡时期，为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为了给

香港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国家为我们做了大量艰巨的任务，使香港成功地实现平稳过渡，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接着，董建华就香港市民关心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房屋问题及老年人福利等民生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

在随后举行的土地基金移交仪式上，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把1700亿港元土地基金证书交给董建华。土地基金的设立和运作，充分体现了中央人民政府对港人的关怀。

下午4时，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成立庆祝酒会。5时，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盛大招待会。李鹏总理在致辞中指出：香港回归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香港已经成为现实。澳门回归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行得通，在台湾也能够行得通。无论在前进道路上有多少困难，祖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香港回归，百年盛事，普天同庆，举国欢腾。在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热血沸腾的中国人民，以各种隆重而又热烈的方式欢呼五星红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高飘扬，爱国主义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个时刻，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中国人自豪!""新界"地区的同胞说："一百年来我们低声下气，当牛做马，尝够了当'二等公民'的滋味。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清末爱国英雄林则徐的后裔凌青赋诗抒怀："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国耻家丑今尽雪，只缘华夏已腾飞。"

7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整个会场洋溢着"洗雪百年耻辱、喜迎香港回归"的炽热之情。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江泽民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后指出，中国近代史昭示我们，要改变贫弱受欺、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就必须奋起抗争，奋发图强。今天，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是香港得以回归的根本原因和时代背景。中国近代史昭示我们，要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就必须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和科学理论的武装。中国近代史还昭示我们，要跟上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就必须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

江泽民说：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喜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6周年纪念日。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美好前程满怀信心。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坚强团结，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我们一定能够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

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澳门回归工作有序进行

中葡联合声明生效后，中葡两国政府友好合作，努力贯彻联合声明。1988年9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此后就着手起草《基本法》。经过长达4年多时间，9次全体会议，72次专题小组会议的讨论，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正式通过，它包括3个附件和区旗、区徽图案，同时通过了关于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这必将对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起着巨大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日益临近，1998年4月底，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钱其琛为主任委员，谢飞、马万祺等9人为副主任委员共100人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这个名单是按照“一国两制”精神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后提出来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澳门委员60人，来自澳门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反映广大澳门同胞的意愿。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筹备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的具体产生办法，筹组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并由推委会产生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筹委会的产生，标志着澳门回归祖国的工作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对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向筹委会全体委员颁发了任命书。澳门特区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5月5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全体委员，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澳门回归祖国的准备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澳门回归祖国，也将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方针，由澳门居民当家作主，依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这一方针将长期保持不变。我们相信澳门人能够管理好澳门。澳门同胞一定能够继续保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创造出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

钱其琛指出：筹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机构，既是一个权力机构，又是一个工作机构。筹备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的一系列事宜，都将由筹委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进行研究，作出决定或提出建议，并加以落实。他在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的筹委会的9项具体任务后，强调指出，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这三大问题一向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它对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未来特区的顺利运作至关重要，筹委会也会对此给予足够重视。钱其琛在比较澳门同香港的特点时说，澳门在地域上比香港小，人口也少，加之中葡两国关系友好，在过渡期

一直良好合作，澳门的过渡理应比香港更顺利些。同时，也必须看到，澳门事务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和社会等领域，有许多问题是我们处理香港事务时所不曾遇到过的。澳门基本法充分体现了澳门的这些特点。筹委会在进行工作时对此也要有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会议讨论通过了筹委会的工作规则，组成了政务、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工作小组并就筹委会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认真讨论。

1998年7月10日至12日澳门特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政务小组、法律小组、经济小组和社会文化小组关于各自任务和规划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筹委会关于加快澳门公务员本地化的意见、关于2000年度澳门财政预算草案编制问题的意见、关于澳门社会治安问题的意见、关于澳门邮票过渡性安排的意见和关于1999年12月20日至31日澳门公众假日安排的决定。会议认为，公务员本地化是澳门过渡期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关系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也关系到未来特区政府的运作。筹委会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促请葡方遵守承诺，加快公务员本地化的进程，在1998年内基本实现司厅级官员本地化的目标。会议指出，澳门社会治安是近期澳门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澳门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对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影响重大。筹委会希望澳葡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加大力度打击澳门恶势力的犯罪活动，以改变治安不靖的状况。会议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由中方依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负责编制澳门2000年度财政预算草案以及通过适当方式参与1999年度财政预算的编制，以利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正常运作，保证澳门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澳门经济的平稳过渡。

钱其琛在闭幕词中指出，组成推选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推选委员会是筹委会的中心任务。筹委会下一步将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按照预定计划完成组建推委会、推选行政长官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筹委会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听取澳门各界的意见，使这项工作做到民主、开放。

1999年4月9日至10日，澳门特区筹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以无记名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185名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其中，工商、金融界60人，文化、教育专业等界50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50人，原政界25人。同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4名具有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也成为推选委员会委员。澳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协商互选方式产生了11名推选委员会委员。至此，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200名委员已全部产生。在澳门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热忱支持下，组建推选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议指出，推选委员会的产生是筹建澳门特别行政区过程中的一件大事。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200名澳门永久性居民组成的推选委员会，推举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是实行"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重要步骤。会议希望推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认真履行自己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不辜负澳门居民的期望和国

家的重托。

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决定，1999年4月23日在澳门举行推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名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人选。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设立推荐法官的独立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机构的徽记、印章、旗帜问题的决定》。这些决定和办法，必将为未来的行政长官组建一个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健全的特区架构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对政权顺利交接和特区顺利进入运作是必不可少的。

此后，根据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办法的有关规定，经过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进行资格审查，按参选人报名时间先后排序，从9位报名参选的人士中，确定了5位符合参选资格，成为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参选人。4月23日，在推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由推委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结果，何厚铧、区宗杰获得推委会20名以上委员的提名，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候选人。在推委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由这两位候选人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施政设想，并回答了推委会委员的提问。5月15日，推委会第三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澳门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选举结果是何厚铧当选。5月20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4次全体会议，决定根据推委会选举产生的人选，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9年12月20日就职。过去，葡萄牙管治澳门400多年，历任总督都由葡萄牙政府派遣。此次由全部是澳门永久性居民组成的推委会民主选出澳门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在澳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开创了澳门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澳门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也标志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澳门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并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充分说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政府在澳门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澳门基本法是完全可以得到落实的，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对澳门顺利回归并保持长期稳定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五、两岸关系的新进展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精髓，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八点看法和主张。（1）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面向21世纪

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 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7) 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8) 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这个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这些主张受到海内外中国人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从而带动两岸关系在1995年上半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然而，由于台湾领导人李登辉于同年6月访问美国，加紧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利用，鼓吹“争取生存空间”，搞“务实外交”，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直接导致两岸关系出现严重挫折和倒退。为了配合李登辉访美，台湾当局在5月底至6月初的十天中，连续举行四次针对祖国大陆的“军事演习”。这种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95年6月以来，海内外的中国人进行了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1995年7月、8月间，人民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及海域上空两次进行导弹、火炮实弹射击演习并获得圆满成功。1996年3月8日至25日，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并先后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进行实弹演习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充分显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这场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必将对遏制“台独”，促进祖国统一的进程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的核心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中国必须统一，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我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

1997年，海峡两岸关系又逐步趋向缓和。为了加强对台工作的领导，全面发展两岸关系，1998年5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对台工作会议。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将台湾分裂出去的图谋。要继续推动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争取在两岸直接“三通”方面有新的进展，进一步加强两岸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要采取积极步骤，推动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两岸政治谈判，早日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当前首先是进行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以解决正式谈判的议题、名义、地点等问题。希望台湾当局，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台湾同胞的长远利益出发，放弃分裂主张，取消限制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尽早与我们进行政治谈判。会议强调，实现国家统一，寄希望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台湾同胞。按照“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满足台湾人民求和平、求稳定、维持现状的要求和愿望，完全符合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努力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对台工作中去。

会议指出，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和澳门问题的即将解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高愿望，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台工作并号召一切主张中国统一的爱国同胞团结起来，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应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邀请，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率海基会参访团一行12人，在上海、北京参观访问。海协会长汪道涵同辜振甫多次见面，就两岸关系、两会交流等问题无拘无束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达到了要进行对话及汪道涵将在适当时候赴台访问等四项共识。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了辜振甫夫妇。通过两会对话，包括政治对话，将为两岸实现政治谈判程序性商谈创造条件，增加共识，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但是，正当海协积极推动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深入开展两岸对话、为改善两岸关系真诚努力之际，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的谬论。李登辉所谓“两国关系论”的要害是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实质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李登辉的分裂言论一出笼，立即激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公愤和同声谴责。7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总统通电话时指出，最近，李登辉公然将两岸关系说成是“国与国关系”，这是他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走出的十分危险的一步，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严重挑衅，进一步暴露了他蓄意分裂中国领土和主权，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本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绝对不容分割。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们一直在积极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争取两岸直接“三通”，推动两岸进行政治谈判。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原因很清楚，台湾岛内和国际上都有一股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势力。如果出现搞“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情况，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

江泽民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李登辉的分裂言论作出反应，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分裂、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我们已经警告台湾当局悬崖勒马，立刻停止各种分裂活动，以免对两岸关系和台湾海峡局势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跨世纪纲领的制定

一、邓小平逝世

正当全国人民在为完成“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努力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邓小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噩耗传来，神州震动，举国同

悲。全国人民为失去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沉浸在极度哀痛之中。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22日，新华社播发《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2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有一万人参加的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江泽民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光辉战斗的一生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并表示了要全面继承邓小平遗志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

《悼词》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指出：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江泽民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和作为毛泽东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

《悼词》指出，在历史新时期的两次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发挥了拨正航向的关键作用。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处于重大历史关头。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标志着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第二次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我们党面临着又一次重大历史关头。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了严峻考验，使中国能够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道路蓬勃发展。

《告人民书》肯定邓小平在新时期，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科学评价毛泽东，成功开辟新道路。一个是邓小平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各个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江泽民指出：邓小平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这正像广大群众说的："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告人民书》指出：邓小平的光辉一生充分表明，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祖国人民也深情地爱戴他。

江泽民在悼词中说，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振兴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他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继承邓小平的遗志，牢记邓小平的教导，坚定不移，满怀信心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同西方有人曾预料邓小平逝世后中国会乱相反，我们国家安定团结，平稳地度过了。这是了不起的。这是因为“今天送小平与过去送毛主席、送周总理的心情不同。尽管都有着无限的悲哀，可那时我们心是悬着的、无着无落的。今天有了小平同志的理论，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我们心里踏实，人民的心里踏实了。”总之，全国人民在庄严、隆重、深情、有序的情况下进行了沉痛的追悼活动，这说明，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中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

二、中共十五大的召开与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2048人，代表党员5 800万人。这次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会议，是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十五大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批准了江泽民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审查并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同时选举产生了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五大的最大贡献就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共分十个部分：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过去五年的工作；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十五大有三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二是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三是确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出新的阐发。

1. 抓住机遇，开拓进取。

中共十五大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展望了下世纪中华民族的辉煌前景。报告概述了20世纪中国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我们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要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有开拓进取这样的精神状态，面对挑战和考验，迎接困难和风险，勇往直前。

2.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是十五大的灵魂。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这可以说是整个报告的画龙点睛之笔。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十五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说明全党在旗帜问题上更加提高了共识，表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坚定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十五大报告深刻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报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二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因为第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作出新的科学判断，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既是一个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各个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

题。三是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报告指出：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这些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念，而只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去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论述的基本根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动摇。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报告从9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和历史进程，指出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要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确立戒骄戒躁、长期奋斗的思想。报告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20年来我们党最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

报告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什么是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它也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世纪中叶，党领导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行动纲领。

4. 围绕基本纲领，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作出了部署。

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要解决好两大课题，一个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一个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报告强调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由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支持、鼓励和帮助其发展。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特别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是全党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5.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

制改革的原则是，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全面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含义，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报告更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十五大选举出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3名，候补委员151名。选举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15名。9月19日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江泽民、李鹏、李长春、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胡锦涛、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尉健行、温家宝、谢非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曾庆红、吴仪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提名，全会通过胡锦涛、尉健行、丁关根、张万年、罗干、温家宝、曾庆红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为委员。全会批准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韩杼滨、曹庆泽、何勇、周子玉、夏赞忠、刘丽英为副书记。

十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新的伟大的里程碑，其重大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十五大的最主要成果。这充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心愿。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无论对中国的繁荣昌盛还是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次，这次大会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经验，进一步强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十五大报告是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三，这次大会充分显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所开创的伟大

事业忠实可靠的继承者和奋发有为的开拓者，能够在任何复杂形势下驾驭全局，团结人民，开拓进取，胜利前进。党的十五大选举产生了跨世纪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说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说明我们党团结一致，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说明跨世纪大业有稳固的政治基础和坚强的组织保证。我们党有了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有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个跨世纪的坚强领导集体，我们的事业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三、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为了开好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1998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举行了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经与党内外协商形成的，拟向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建议国务院将这个方案提交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审议。全会强调，机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搞好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全会全面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和部署是正确的，全党要认真贯彻执行。面对亚洲一些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国内的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有能够驾驭各种复杂局势的中央领导集体。只要全党同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认真解决前进中的突出问题，就一定能够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8 年 3 月 5 日到 19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完成了几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审议并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使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的宏伟任务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选举决定了跨世纪的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为实现十五大提出的战略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审查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

《报告》的主要内容：

1. 五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74772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11%，顺利完成了“八五”计划，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开局良好。通过几年宏观调控的成功，既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1997 年经济增长

8.8%，商品零售价格上涨0.8%，这种“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是多年来没有过的。粮食产量达到49250万吨，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我国已初步形成比较完备的粮食储备体系。工业增加值1997年达到31 75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5.3%，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出现了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格局，长期困扰我们的商品紧缺现象已经根本改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京九、南昆铁路全线投人运营，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顺利截流。陕西到北京的天然气输气管道建成投产。能源、原材料、交通、邮电等“瓶颈”制约也大为缓解，增添了持续发展的后劲。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价格进一步放开，绝大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市场机制对增加供给、调节需求、丰富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等体制改革大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在积极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各地加快了“抓大放小”的步伐。国有工业企业扭亏增盈取得一定效果，利税增加，盈亏相抵，实现利润总额增长11.9%。其他方面如农村经济、社会保障、商品流通、对外贸易、城市住房等的改革都有新的进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展开，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三是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199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3 251亿美元，对外贸易已居世界第10位。出口商品结构明显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5年累计1858亿美元，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64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7%。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国家外汇储备年末达1399亿美元，是历史最高水平，对我国抵御国际金融风波的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继续发展，全国对外开放的地区和行业进一步扩大。四是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绩。五年来取得一大批重要科技成果，其中一些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整体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占全国人口65%的地区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结构进一步调整，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迅速发展。特别是广大干部群众深人学习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五是居民收入显著增加，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元，五年来年均实际增长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2090元，年均实际增长5.4%。城乡居民拥有的家用电器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家庭电视机普及率达到85%。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存款余额达46280亿元。失业保险逐步扩大，330多个城市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人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平均期望寿命达70.8岁。

五年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步伐；特别是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标志着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香港回归以来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关于1998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1998年是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的第一年，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重要一年。这一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齐心奋斗。

在这次会议上新任命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本届政府要做的几件事情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就是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主要是适当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点增加农林水利建设投入，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人，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住宅建设，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稳定和加强农业，保证农业生产有个好收成。加强扶贫攻坚工作，争取1998年再有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积极引导居民消费，拓宽消费领域，特别要重视开拓农村市场。要努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继续深化外贸企业改革，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加工深度，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稳定吸收外资规模，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三个到位"，一个就是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此，要建立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这是实行政企分开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对企业领导人考核、奖惩、任免制度的一个改进。要着力抓好纺织行业的改革和扭亏解困，特别要集中力量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实施再就业工程。二是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金融系统，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和监管职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步伐。三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要真正转变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该交给企业的权力要下决心交出去，不能只在部门之间搞权力转移。要通过"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的办法，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和企业人才的整体素质，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要把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做细、做实、做好。

"五项改革"，一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现在中国粮食的库存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因为现在的投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

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三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这就要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四是医疗制度改革。1998 年下半年将出台一个全国性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来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现行的财税制度是 1994 年改革的，取得了极大成功，保证了每年财政收入以很高的比例增加。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这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必要的收费外，不允许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众收费。

朱镕基强调指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改变“吃饭财政”的状况，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朱镕基、李岚清任正副组长。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经过投票，选出了跨世纪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李鹏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田纪云、谢非、姜春云、邹家华、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佩云、何鲁丽、周光召、成克杰、曹志、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当选为副委员长，何椿霖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134 人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议根据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提名，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根据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提名，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为委员；会议选举肖扬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韩杼滨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根据朱镕基总理提名，决定任命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为国务院副总理，迟浩田、罗干、吴仪、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为国务委员，同时还任命了各部部长等。

在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建国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这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意愿的雄心壮志。要奋斗要发展，就会有困难有风险。但是，任何困难和风险都无法阻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这个雄心壮志不仅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必将胜利地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无往而不胜。”与此同时，召开了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这是一次团结和鼓舞全国各族各界人士向新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的盛会。会议

选举李瑞环为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巴金、钱伟长、卢嘉锡、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钱正英、丁光训、孙孚凌、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经叔平、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为副主席，郑万通为秘书长。

这两个大会的成功召开表明，中国人民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结好本世纪的尾，开好下世纪的头，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第四节　经受考验，总结经验，胜利迈向新世纪

一、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1.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猛烈冲击的初步对策。

从1997年7月开始于泰国，然后波及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到1998年更向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等蔓延，成为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不仅使亚洲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也使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全球股市汇市剧烈波动，世界经济环境日益恶化。

金融风暴对中国造成了强烈冲击，给需求不足的中国又带来了出口下降的严重损害和货币贬值的巨大压力。这时，特大洪水又突然袭来。

面对严峻和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沉着冷静，果断科学决策，成功地驾驭了经济全局。

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就提出“防范金融危险”。1996年8月，江泽民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听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汇报。1997年2月，中央就决定组织力量起草文件和召开专门会议全面部署防范金融风险工作，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原则和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会议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工作的核心，进一步做好金融工作，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会议要求，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会议强调要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步伐，并健全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体系；必须依法治理金融，规范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秩序，严厉惩治犯罪和违法违规活动，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会议指

出，要充分认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金融良性循环创造好的经济环境。

1998年的新年钟声刚刚响过，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江泽民又敲起警钟：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沉着应付，未雨绸缪，做好事态进一步严峻化的准备，以防措手不及。

根据江泽民的批示，春节前夕，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朱镕基部署国家计委牵头进行研究，提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人、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春节后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很快批准并转发了《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5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第七次法制讲座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世界上一些国家曾经发生过的金融风波，给我们以许多深刻的启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同样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从发展趋势看，各国政府越来越注重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他指出，当今世界日益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合作越来越广泛，竞争日趋复杂激烈，金融市场的影响和渗透难以避免。我们只有沉着应付，趋利避害，才能掌握主动权。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最根本的是要把经济工作做好，以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认真研究亚洲金融危机的症结，引以为鉴，搞好金融监管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

2. 加大力度，进一步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

尽管采取了有力的应对措施，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深度和对我国的影响程度，比预料的更为严重。1998年年中，日元对美元汇率创10年来最低水平，引发新一轮金融冲击波；我国年初预计出口增长10%，但到5月份却出现了在持续22个月增长后的负增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严重的洪涝灾害又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运输和生产都受到影响；随着全面买方市场的出现，活跃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这样就使得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减缓的趋势。面对重重困难，中央及时果断地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扩大国内需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大决策。为此，中央又发出了指导性文件。一是调整投资计划，扩大投资规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由原来的10%调整到15%以上。集中力量加快农林水利、铁路、公路、通讯、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拓宽投资领域，加大投资力度。6月份，国务院决定在加强上述领域建设的同时，增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城乡电网、城市经济适用住房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落实建设资金。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调整预算，由中央财政发行1000亿元10年期的长期国债，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并批准本年列入中央预算支出500亿元，将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同时吸引商业银行贷款1 000亿元。四是进行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在长江、黄河上中游封山植树，停止砍伐，进行“坡改梯”，建设干支流控制性工程。对长江中下游实行分类规划，退田还湖，平垸行洪，

提高泄洪蓄洪能力，建设高标准堤防。

正是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第三季度起经济增长稳步回升。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6%，比二季度快 0.8 个百分点，出现了五年多来由降转升的转折点。四季度经济回升的势头进一步加快，全年实现了 7.8%的增长目标。在世界经济增长下降，周边许多国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增长 7.8%，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确实来之不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宽广胸怀。

1998 年，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意想不到的困难，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增 1000 亿元国债投资，加上由其带动的银行贷款等各项投入，按当年完成 60% 的工作量计算，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左右。我们在取得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的成功经验之后，又开始摸索出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克服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1998 年 7 月，朱镕基在山西、内蒙古考察时根据中央已定的政策，明确指出：“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中央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最有力措施”。在扩大内需，努力实现当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注意经济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相互协调，妥善处理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这些都显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经验更加丰富，宏观调控艺术更加成熟。

3. 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促进。

尽管 1998 年我们遇到的困难历史罕见，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但是，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我们还是要深化和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论证，周密部署，继续推进改革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走上前台。5 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就最棘手的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作出了重要部署。到 9 月，国企下岗职工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比例达到 98%，并且领到了基本生活费，全年共有 600 多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针对国内市场粮多、价低，粮食收购企业亏损挂账严重的现状，国务院果断推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市场粮价的进一步下滑，保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初步扭转了粮食收储企业大量亏损的局面。

国务院机构改革引人注目，深得人心。机构改革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管理体系。国务院组成部门从 40 个减少到 29 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也相应做了调整，人员精减近一半。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力度较大的一次，由于精心组织、稳妥推进，机构改革进展顺利。

金融业充分发挥经济核心作用，通过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通过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等举措，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改革了实行多年的贷款规模管理，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改革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两个账户合二为一。审时度势，灵活调整利率。央行分别在3月25日、7月1日和12月7日，3次降息，创下建国以来一年内降息的最高频率。从1996年以来的6次降息，减轻企业利息负担近3000亿元，还促使一部分沉淀于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向投资、消费领域。

多管齐下，利用货币信贷杠杆刺激总需求的作用逐步显现。

下半年，配合财政部增发1000亿元国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又相应增加了1000亿元配套贷款。有数字表明：1998年我国银行中长期贷款中的基建贷款增加2364.6亿元，比1997年多增1227.1亿元。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开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业务，以刺激消费增长。还加大了出口信贷力度，支持外贸企业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对欧美等国家的出口。

除银行间接融资外，证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平稳扩大。如今上市公司已达851家，上市证券近1000只，1998年企业共从证券市场上募集资金838.4亿元。截至年末，广义货币M2为10.45万亿元，增长15.3%，基本实现年初调控目标，比全年经济增长和物价回落之和高10.1个百分点。货币总量与经济发展规模是适应的，货币供给是充足的。

尽管我国政府多次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但是，在日元大幅贬值、俄罗斯金融动荡的阴影下，人民币汇率稳定一度受到怀疑。对此，我国果断加大了对骗汇、逃汇、套汇的打击力度。到年末，人民币坚挺依旧，比1997年末升值9个基本点，人民币资产成为世界上风险最小的币种资产之一。国家外汇储备达1450亿美元，比1997年末增加51亿美元。这大大坚定了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在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同时，我国还大刀阔斧地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5月19日，中央金融工委和金融机构系统党委成立，对金融机构党的组织实行垂直领导，对干部实行垂直管理。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央银行的证券、保险监管职能分别划给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后二者分别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和全国商业保险市场的主管机关。至此，银行、证券、保险三足鼎立，垂直监管的格局初具雏形。岁末，证券法出台。至此，银行、证券、保险三业运作都有法可依。特别是中央银行管理体制实行了重大改革，人民银行撤销了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立9个分行，这有利于摆脱地方、部门的干预，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这些改革对更有效地发挥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保证。

1998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反走私专项斗争。声势浩大的反走私斗争，有力地遏制了走私猖獗的势头，为规范经济秩序、保护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打击骗汇、逃税的斗争也很有成效。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政法部门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与所办各种经营性公司彻底脱钩，党政机关也与所办经营性公司脱钩。

各项改革的推进，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把扩大内需与利用外需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经济效益、调整结构相结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灵活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发展与改革相结合。这些就是这次宏观调控创造的宝贵经验。这使我国成功地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猛烈冲击的考验。

二、战胜特大洪涝灾害

（一）历史上罕见的洪灾与抗洪抢险斗争的伟大胜利已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1998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地方遭受严重的洪水灾害。坚决战胜这场洪水，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的一场重大斗争，也是对中国人民与天奋斗的勇气和力量的一场严峻考验。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同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搏斗，表现出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展示了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熔铸成伟大的抗洪精神。到9月下旬，这场斗争已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在世纪之交在祖国大地上谱写的一曲惊天动地的壮丽凯歌，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

造成1998年洪灾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异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雨量成倍增加，致使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长江发生继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先后出现8次洪峰，宜昌以下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长时间超过历史记录，沙市江段曾经出现45.22米的最高水位。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先后出现三次洪峰。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流域，也相继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此外，生态破坏严重、江湖淤积、水利设施薄弱等，也是造成特大洪水的重要原因。总之，1998年我国发生洪水的江湖之多，洪峰之高，流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历史上罕见的，洪涝造成的灾害是非常严重的。据民政部等5个单位1998年终核定，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2229.2万公顷，成灾面积1378.5万公顷，受灾人口1.8亿人（次），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万间，损坏房屋1 329.9万间，紧急转移安置1 839.3万人。各地估报直接经济损失2550.9亿元。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等省（区）受灾最重。

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广大军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打了一场抗洪抢险的“人民战争”，终于确保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确保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绩，它将作为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一个壮举载入史册。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但有力地维护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发展的大局，而且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信心，它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必将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全部历史过程。

（二）抗洪抢险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原因

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来之不易。胜利的原因主要是：

1. 中共中央正确决策，周密部署，坚强领导，是决战决胜的根本保证。根据长江汛情的发展，中共中央于7月22日提出沿江各省特别是武汉市要严防死守，做到“三个确保”，即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重要城市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把“严防死守”、“三个确保”作为这次抗洪抢险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从珍爱人民生命、保卫改革开放成果出发的，这体现了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党心和民心紧相连，所以，“严防死守”、“三个确保”迅速成为广大军民抗洪抢险的响亮口号和自觉行动。

8月7日晚，当长江第四次洪峰袭来，沙市危急之时，又传来了九江决口的信息以及东北嫩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的情况，在这种极其紧急的关头，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国家防总的工作汇报，作出了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八条决定。中央要求把抗洪抢险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要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不能有丝毫松懈和动摇。作出大规模动用人民解放军投入抗洪抢险、军民协同作战的重大决策。中央还决定，在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的同时，对荆江分洪区要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切实做好分洪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尽量减少灾害的损失。中央提出要动员和组织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抗洪抢险。中央的决定大大鼓舞了抗洪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洪水的信心和决心。8月13日至14日，在长江第五次洪峰袭来的最危急时刻，江泽民亲临湖北抗洪第一线，下荆江，赴洪湖，在武汉作了《夺取长江抗洪抢险决战的最后胜利》的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央发出了决战决胜，誓夺抗洪抢险最后胜利的总动员令。8月16日下午，江泽民向参加抗洪的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同时要求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率领群众，与部队官兵共同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干堤安全。

从这些重大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始终牢牢把握着抗洪斗争的全局，判断准确，果断决策，指挥得当，赢得了抗洪抢险的主动权。党中央领导同志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越是危难关键时刻，越是到最危险的堤段，鼓舞广大军民的斗志，现场指挥战斗。这些都深得全国人民的信赖和爱戴。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与大堤共存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着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赢得了人民的信赖。

2.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和突击队的作用。在抗洪抢险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江泽民主席的命令，先后投入30多万兵力，日夜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110多名将军亲临一线指挥，5000多名师团级领导干部奋勇当先，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广大官兵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战斗在最艰险的地方，成为抗洪抢险的中坚力量。

这次抗洪抢险是抗美援朝以来在东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渡江战役后长江

流域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也是建国后我军抗御自然灾害动用兵力和装备最多的一次行动。截至8月23日，解放军、武警部队已投入兵力433.22万人次，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500多万人，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75万艘次，飞机和直升机1289架次。

在参加抗洪抢险斗争的部队中涌现出大批英雄。特别是高建成、李向群、吴良珠、杨德胜等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人生凯歌。正如江泽民所说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新的历史时期'最可爱的人'。"

3.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这个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和调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从而形成举全国之力去抗击洪水的巨大优势，在关键时候更能够创造出人间奇迹来。

这场斗争有800多万干部和上亿人民参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抗洪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这次抗洪抢险也是对我国综合国力的一次检验。据统计，国家调运的抗洪抢险物资价值高达30亿元，仅编织袋就有5亿多条，救生衣700多万件，编织布和无纺布1663万平方米，数量之大，超过建国以来的历次抗洪斗争。同时，中央下拨抗灾救灾资金达83亿多元，此外，还有大批救灾物资。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努力建设起来的水利工程体系，如全国已建成的8.46万座水库，其中有1285座水库这次拦洪削峰。特别是依靠科学技术指导抗洪抢险，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抗洪抢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同改革开放分不开的。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样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战胜南北夹攻的特大洪水，是难以想象的。

4. 人民群众是夺取抗洪抢险胜利的主力军和真正英雄。这次抗洪抢险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胜利。在这场抗洪抢险斗争中，出现了很多像武汉离休干部王占成那样不顾年迈多病，奋勇抢险的英雄事迹。广大人民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万众一心，英勇顽强，奋力拼搏，他们确实是这次抗洪抢险的主体力量。

面对特大洪水的巨大威胁和袭击，人民群众在惊涛骇浪面前没有惊惶失措。他们舍小家保大家，牺牲局部保全局，表现出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千里长江大堤所以能够抵御八次洪峰，大庆油田和哈尔滨、武汉等城市所以得到保护，是同一些灾区人民果断放弃一些民垸，主动实行分洪，牺牲局部利益分不开的。

各地方、各部门通力合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拼搏，十二亿人民凝聚力空前加强，成为抗洪抢险第一线军民的坚强后盾。全国人民为了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掀起了空前的捐赠热潮。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不分男女老幼，捧出颗颗爱心。捐款捐物行动之快，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统计，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地民政部门共接收捐款35.15亿元，捐物折款37.44亿元。这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表明由于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确实比过去富裕了。尽管这次洪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伟大的抗洪抢险斗争，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精神状态得到了提高和振奋，使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军队同人民的鱼水之情空前加强，全民族的大团结空前巩固，使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收获。

（三）总结抗洪抢险经验，弘扬伟大抗洪精神

江泽民在1998年9月28日《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仅高度评价了抗洪抢险取得的伟大胜利，而且深刻地总结了抗洪抢险的成功经验。他指出：这次抗洪胜利再一次说明，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次抗洪胜利再一次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的业绩；这次抗洪胜利再一次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是我们事业发展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这次抗洪胜利再一次说明，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江泽民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顶住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冲击，捍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成功地经受住一场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1997年以来，我们采取有效措施沉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经济风险的重大考验。这次我们又抵御特大洪水的冲击，继续保持全国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自然灾害风险的重大考验。今后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就完全能够从容应对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

在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现出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

抗洪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扬，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大发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抗洪精神，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革命精神和新时期的创业精神一样，都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激励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三、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的召开及其对宪法的重要修订

1999年3月5日至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九届二次会议。同时政协也召开了九届二次会议。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修订了宪法部分内容。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朱镕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

1999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建议中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1.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和指导思想以及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这样修改：一是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强调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将邓小平理论写入了指导思想，即"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四是在这段中增加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任务加以规定。

2. 关于增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

《建议》中提出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 关于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写入宪法的问题。

在《建议》第三点中提出，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 对农村的经济体制作了明确规定。

在《建议》第四条中提出，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

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5. 关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规定。

在《建议》第五条中提出，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6. 对国家的专政职能作了更明确的规定。

在《建议》第六条中提出，宪法第二十八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修改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对宪法进行修订。这次宪法的修订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工作指导思想在宪法中确立下来。这不仅对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有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二）审议并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十个部分：一、1998年工作回顾和1999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二、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三、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四、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五、认真做好金融工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六、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有效利用外资；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八、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九、努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十、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报告对下述几方面的内容作了深刻的阐述。

1. 1998年工作回顾和1999年工作的总体要求。

报告指出，1998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基本上实现了年初确定的改革和发展的各项目标。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1997年增长7.8%，虽然略低于8%的预定目标，但这是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战胜国内特

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改革继续前进。各项改革的推进，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 1997 年实际增长 4.3%，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 1997 年实际增长 5.8%。

朱镕基强调，我们清醒地看到，前进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市场需求不旺，启动难度较大；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大多数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结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财政纪律松弛，经济秩序比较混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一些地方农民和企业不堪重负；部分群众生活仍然比较困难，社会就业压力较大，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相当突出；某些消极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有些地方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十分重视，正在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朱镕基提出，1999 年政府工作总的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稳定和加强农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努力开拓城乡市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整顿经济秩序，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切实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

他强调，我们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抓住机遇、知难而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争取把 1999 年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2. 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朱镕基指出，综合分析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1999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 7%左右。要实现 1999 年经济较快增长，必须首先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1999 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仍然十分严峻，国内消费需求一时也难以有较大的增长。因此，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势在必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拉动当前经济增长，还可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朱镕基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决不是可以敞开口子花钱，而必须珍惜人民的血汗钱。要强化预算管理，努力增收节支。继续加强税收征管，堵塞漏洞，清缴欠税，做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压缩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保证重点支出。严格财经纪律，规范和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要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全面清理和规范收费，逐步实行“费改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来说，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

其次，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99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继续增加农业投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此，要采取五项措施：一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二是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三是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四是调整乡镇企业结构，推进小城镇建设；五是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要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力争今年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000万以上。

第三，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99年是中央提出的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一年。1999年政府要突出抓好这几项工作：制止重复建设，加快行业调整和改组步伐；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推进政企分开，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整顿和加强企业领导班子；继续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小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大力发展城乡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要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四，认真做好金融工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和世界金融市场动荡、我国经济生活中深层矛盾逐渐显现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好金融工作，对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把握好金融调控力度，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3.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这是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也是本届政府极其重要的任务。当前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一是推动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二是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三是抓紧制定和实施适应新形势的产业技术政策。四是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要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使全国80%以上的人口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300万人左右；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依法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注重提高办学效益。朱镕基强调，振兴教育事业，一要加大改革力度，继续积极改革教育思想、体制、内容和方法。二要更加重视质量。全面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特别是中小学阶段的教育质量。三要更加重视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努力提高一代新人的全面素质。

4.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

朱镕基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政府要加强行政立法工作，强化执法监察，推进依法行政。1999年要着重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依法整顿经济秩序，严厉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他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

职能，转变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要认真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继续抓好大案要案的查处，严厉打击和清除腐败分子。进一步做好廉洁自律工作，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带头遵纪守法，廉洁奉公，领导干部要作出表率。认真抓好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要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机制上、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朱镕基最后说，综观世纪之交的形势，我们面临着历史机遇和新的挑战。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振奋精神，锐意改革，抓住机遇，团结奋斗，全面完成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推向21世纪。

四、庆祝建国50周年，胜利迈向新世纪

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光辉的节日，在这世纪之交，它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为纪念建国5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首都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庆祝活动的具体安排是：9月28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文艺晚会；9月30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朱镕基总理致祝酒辞。10月1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随后进行盛大的阅兵和群众游行，参加者约50万人。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联欢晚会。同时，在北京各大公园和其他活动区举行各界群众联欢活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建国50周年成就展。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参加这次展览。

庆祝建国50周年的活动，将展现共和国50年的光辉成就，展示共和国的国威、军威，展示我军维护祖国安全与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展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满怀信心迈向新世纪的精神风貌。无疑，这次庆祝活动将以其特殊意义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在这世纪之交，纪念建国50周年，回顾过去，我们感到自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到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在这50年中，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经过艰苦奋斗，已经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发展的方向。当然，在这50年中，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有过胜利的欢乐，也有过失败的痛苦，但是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现在，航道已经打开，共和国的巨轮正驶向崭新的21世纪。

展望未来，我们更加充满信心。信心不仅来自于50年已奠定的物质基础，同时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党和国家已制定跨世纪的宏伟纲领，为我们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伟大复兴，将以更加雄伟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第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50年来，特别是2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20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概括为11个方面：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有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社会稳定，安定团结，是完成各项改革和建设任务的基本保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经验。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民团结，社会进步。在国内外复杂严峻的条件下，我们战胜了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1998年我们成功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以及特大洪水灾害的自然界风险的考验，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还应指出的是，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日子、振兴中华民族的盛事，不仅大大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且进一步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团结和稳定为我们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有巨大的精神动力。“振兴中华”、“强我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战胜敌人及艰难困苦、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强大动力。特别需要书写的是，在今天，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1999年5月8日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我人员伤亡，馆舍严重毁坏，粗暴侵犯中国主权，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天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最强烈抗议。北约这一野蛮暴行激起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同胞的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抗议活动席卷全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还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

考，使人们认清了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真面目及其帝国主义本性；认清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认清了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野心。同时，也使人们深切认识到，要更有力地回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把爱国热情化为团结一心、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把对北约野蛮行径的巨大义愤和伟大爱国热情化作强大的动力，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了50年历程，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在跨世纪发展的征途上，无疑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不懈奋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史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经济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即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阳结合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的国情，从而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经过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经过中共二大、三大、四大和早期共产党人的探索，党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和不完整的新民主庄义经济思想，并制定了有关土地政策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策，为后来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经济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一节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经济特点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鸦片战争前，它是一个在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国家。

17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在其初年，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国力也比较强盛，曾经击败沙俄殖民者在北方的侵略和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的骚扰。可是，到19世纪初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已从其顶峰跌落下来，日趋腐朽没落、内部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尽管如此，当时的中国主权完整，仍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经济上，自16世纪即明代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江南丝织、棉织和景德镇的瓷器等行业中，出现了一批使用雇佣劳动的私营手工工场与民窑。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保守的封建意识形态，以及封建国家对内重农抑商、对外闭关自守政策等种种因素的限制，直到19世纪初，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十分微弱。不过，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影响，中国社会

也将缓慢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但是，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从此，中国开始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

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840年6月，号称“海上霸主”的英国为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向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由于清朝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对外屈膝投降，致使中国在这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失败。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政治上逐渐丧失独立国的地位而沦为半殖民地，在经济上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一步一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虎门条约》（843年）、《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等等，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标志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开始。如英国割占香港，开了割地的先例，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允许外国军舰、商船，在中国沿海和通商口岸任意航行、停泊，则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而“协定关税”，又使中国丧失了海关主权和关税主权；“领事裁判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不能由中国政府根据中国法律处理，而要由外国领事按照外国法律处理，这就使中国丧失了司法主权；而且，外国侵略者可以利用这一特权，在中国领土上为非作歹而不受任何惩罚。此外，还有严重危害中国主权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即无论哪一个西方国家掠取了中国任何新的特权，其他国家皆能“一体均沾”。他们还强迫中国开放了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中国的闭关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第二阶段，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速。

西方列强为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和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向他们完全屈服，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在1856—186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先后迫使中国于1858年签订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这一批新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1861—1862年，英、法、美、俄等国公使相继进驻北京，设立使馆。这些外国公使逐步控制和操纵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实际上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外国侵略者还完全把持了中国海关，并在通商口岸设立起一个个由它们

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租界。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还把通商口岸从五个增加到十六个。自此外国侵略者把势力由沿海深入中国内地，如长江流域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地；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如天津、牛庄（今营口），登台（今烟台）等地，从而大大便利了他们进一步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中国对外贸易于1865年第一次出现入超，从1877年起则年年入超，且入超额越来越大。

通过中英《北京条约》，英国从中国割去了九龙司。而沙俄更趁火打劫，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割去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天津条约》还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游历；《北京条约》更准许外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教堂。从此，大批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自由进入全国各地城乡，到处建教堂，无视中国政府的存在。包揽诉讼，肆意破坏中国司法主权。他们还搜集中国情报，积极参与武力侵华和利权攘夺，充当了外国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另一严重后果是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向外国侵略者屈服。经过1860年“祺祥政变”，西太后与恭亲王奕䜣相勾结，打倒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掌握了清王朝中央政府大权，扫除了与外国侵略者勾络的障碍，随即宣布“借师助剿”，正式与外国侵略者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1861年，清政府设立由奕䜣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外交，海防、通商、海关、工厂、铁路、学校等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务，实际上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内阁。中国封建统治者逐渐成了外国侵略者手中的工具。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还在军事上掠夺中国沿边地区，造成普遍严重的边疆危机。如美、日、法先后对我国台湾进行武装侵略；英国侵犯云南、西藏边境；法国侵犯广西边境和东南沿海；俄国则割占我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至帕米尔的大量领土。

第三阶段，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加深。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除了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外，还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辽东半岛后来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夺，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而由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个事实极大地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并由此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首先于1897年11月强租胶州湾，以山东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着，俄国强占旅顺口、大连湾，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以广东、广西、云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强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宣布福建为它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大好河山，眼看都要为帝国主义“瓜分豆剖”了。

《马关条约》还规定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为了偿付赔款，只得拼命搜刮百姓和举借外债，在政治上、经济上更加依附于帝国主义。《马关条约》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两省，也全部向帝国主义开放了。

《马关条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正式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设厂、于是、西

方各国和日本资本家争先恐后地到中国设厂，开矿，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其结果不仅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中国的资源、交通运输业及铁路沿线一部分驻军、司法、行政权也为帝国主义所控制。

第四阶段，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形成。

1900年，帝国主义又以镇压义和团为名，组织八国联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901年，强迫清政府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帝国主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本利共达九亿八千万两，以中国的关税、盐税作担保。这样，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权。

《辛丑条约》还规定帝国主义可以在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口、山海关沿线驻兵，并拆除大沽口至北京间的炮台，使清政府完全置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控制之下。条约还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任何反帝组织。中国地方官若对本地人民的反帝斗争镇压不力，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西太后甚至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放肆地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1911年清政府被辛亥革命推翻后，窃夺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继续卖国求荣。1915年，为换取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当皇帝的支持，甚至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份不平等条约中包括：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东蒙的特权；聘请日本人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以及由中日合办警察、兵工厂、汉冶萍公司等内容。这些条款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中国简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经济特点

（一）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和其他方式，强迫中国反动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索取了巨额赔款，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铁路交通和海关，在中国开设银行、兴办工商业，并通过资本输出控制我国经济命脉，掠夺我国资源，倾销其剩余产品，使我国成为它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的工业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以1936年为例，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财产合43亿美元，其工业资本约占当时整个工业资本的41%，垄断了生铁产量的80%，铁路里程的90%。

（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没有破坏腐朽没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反，它和农村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把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地主阶级凭借其对土地的绝对占有，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地主还兼营高利贷，对农民重利盘剥。

（三）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

辛亥革命以后，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代替了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接着又

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代替了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了大量资财，逐步形成了庞大的官僚资本，控制了国家金融及主要经济部门，成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四）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力量软弱，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民族资本代表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得到较快发展。它对于促进生产社会化、近代化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命脉和商品市场、封建势力又设置重重障碍的情况下，民族资本非常软弱，无法与之竞争，甚至不同程度地依赖他们。

（五）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

由于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各自扶植自己的走狗即各派军阀，实行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使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实际上不统一的状态。加之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的南方与北方，内陆与沿海，内地与边疆，甚至省与省，县与县之间，经济、文化发展都极端不平衡。

（六）劳动人民生活贫困化。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加之连年战争，经济十分落后、混乱，中国人民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这一切，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对中国国情的探索

一、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及北洋军阀官僚买办资本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破坏，革命领导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扶植下，于1912年3月篡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他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拍卖国家主权；对内残酷镇压革命民主势力，实行专制独裁。1915年12月，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即绝望而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几个派系。帝国主义列强各自扶植一派军阀，充当自己的工具。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长期控制中央政府实权和安徽，山东、浙江和福建等省广大地盘，投靠日本。以冯国璋（后期是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割据直隶、江苏、湖北、江西诸省，以英美为靠山。另一派是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割据东北三省，也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此外，还有些非北洋系统的势力较小的地方军阀，如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占据云贵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割占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他们或亲日，或投靠英美。

各派军阀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不给人民一点民主权利，中华民国只不过是块空招牌而已。对外，则在各自主子的支持下，为争夺中央政权和扩大地盘，你争我夺、互相倾轧。从1917年到1924年间，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就有直皖、粤桂、江浙和二次直奉战争，形成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军阀割据统治和长期混战的政治局面，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国长期落后的地方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为扩充实力，军阀们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如段祺瑞，为取得日本5亿日元借款，1918年5月，就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同年9月，又同日本就山东问题秘密换文，对日本侵占山东表示“欣然同意”。

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给中国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

北洋军阀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北洋军阀官僚买办资本。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政府的垮台，洋务派所把持的早期官僚买办资本就转到北洋军阀集团手中，由政治上的不同派别集团把持和支配。如交通系，控制了交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和五族商业银行，经营对日借款及铁路借款等国债，并以国家金融势力扶植他们所办的私人银行。政学系则控制“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银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华北的金融业。江浙资本集团则以“南五行”（中国、通商、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银行）为活动据点。

北洋军阀还向工矿业进行投资。如黎元洪投资山东中兴煤矿，周学熙在天津开设华新纱厂，交通系投资山西同宝煤矿等。他们利用政治权利，在运费、税率方面均享受优厚的特权，能够维持高额利润，以至在工矿业达到垄断地位。1912—1927年，官僚买办资本控制了全国机器采煤量的50%以上、最高达82.8%。

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不同派系的军阀进行混战和割据，造成北洋军阀官僚资本比较分散，但它对于弱小的民族资本，仍起束缚作用。

二、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进一步加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在中国侵略活动中占优势的英、法、俄、德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仍有加无已。主要表现在日、美加紧争夺中国。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为这是它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排挤出中国、实现独霸中国野心的好机会，遂对德宣战，派兵进入山东，取代了德，国战前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地位。1915年，日本又利用袁世凯称帝急需得到它支持的机会，迫使袁世凯签订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怂恿段祺瑞政府参战，给予，“西原借款”，并与之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取得诸如驻军，修路，在战时指挥中国军队等权利。这一卖国协定就是连当时日本寺内内阁都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廿一条”。

美国同日本在对中国的争夺中落后了一步，但它并不甘心让日本独占中国。1917年11月，日美双方在华盛顿经长时间讨价还价后，签订了互相妥协的《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保证它在列强侵略中国的虏获中能得到一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发战争财的美国，迫切需要扩大其在华特权。为压制日本和进一步控制中国，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美国发起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就中国问题签订了《九国公约》。条约虚伪地宣称维护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实际上是确定帝国主义在华“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中国对各帝国主义实行“门户开放”。这个条约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优势，重新出现了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因而条约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各国协同侵略中国的强盗协定。极大地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地位，使四万万被压迫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

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下，迅速地扩张自己的实力。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法国削弱，俄国革命，唯有英国保持了较为强大的实力，因而形成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英、日、美三国角逐的局面。

经济上，大战期间日、美同样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914年，日本输华物资总值1.6亿美元，1919年增至4.47亿美元。5年增加了一倍，跃居外国对华贸易额首位。资本输出也大增。1914年—1921年7年中，日本在中国开设规模较大的厂矿5222家。其中棉纺织业的扩张最为迅速。1919年日本在华锭数，比1913年增加近五倍。美国对外贸易值，1913年只占中国贸易总值的7.5%，1916年增至16.4%，居第三位。日、美的经济侵略，对在大战中颇有发展的中国民族经济构成直接威胁。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各国在“回到市场”的口号下，以更凶狠的姿态，卷土重来。表现在商品输出上，各国对华商品输出不断增加。以1913年各国输华货价净指数为100，1919年就净增为113.5，1920年为133.7，1921年为158.9，1922年为165.8，

1924年为178.6。中国对外贸易出现的入超亦大量增加。1919年入超1.6亿海关两，1921年就增至3.04亿两。帝国主义还大量向中国倾销剩余的农产品。1922年小麦进口入超3，007，712担，1926年入超4，166，703担。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大量倾销，严重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表现在资本输出上；首先是银行势力进一步膨胀。甲午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银行只有8家16个分支机构，到1926年则增加到44家125个分支机构。这些银行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指挥和执行机构，它们通过对北洋政府提供政治贷款，对铁路、矿山进行投资、发行纸币、吸收存款、独占外汇等活动，控制着中国财政金融的命脉，掠夺中国的财富。其次，帝国主义供给北洋军阀的贷款大增。1895—1910年，帝国主义给清政府财政贷款约合2.7亿美元，而1911—1926年，给北洋军阀政府的却达5.2亿美元。仅仅15年，后者比前者多了2.5亿美元。帝国主义给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都是以关税、盐税乃至土地税为抵押的，因而以此控制了中国全部的财政收入，左右了中国政府。再次，增加工矿投资，掠夺中国资源。1919年，外国资本占全国煤矿投资总额的60.6%，1926年升为72.1%。机械采煤量，1919年外国资本控制75.6%，1926年增为78.3%。机械采铁矿业和新法冶铁业产量，1900—1925年全部为帝国主义控制。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大战后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国际垄断组织的分支机构，如1919年瑞士的泛巴公司，1920年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美国的杜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法国的永兴洋行，1921年英国的邓禄香橡皮公司等等。帝国主义通过这些手段和机构，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加紧对中国民族资本和农村经济的摧残和掠夺。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衰落及农村经济的凋敝

中国的民族资本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历程，甲午战争后，才取得合法地位。随后，由于人民的反帝斗争特别是收回利权运动和清末“新政”，中国民族工业在1905年后的几年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设厂高潮。辛亥革命，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扫清了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民族资本再度得到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资本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日、美加紧侵华，但因为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挤压，交战国对物资的巨大需求，又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扩展。据北京农工商部统计，历年间在其处注册的公司，1914年8月以前，共有146家，资本额为0.41亿元多一点，而1914年8月到1920年，新注册公司即达272个，资本额超过1.17亿元。民族资本企业利润猛涨。上海申新一厂，1915年盈利2万元，1917年达40万元，1920年又增至110万元，五年之内增加五十五倍。优厚的利润又转化为资本，民族工业有了空前的发展。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以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突出。1914年到1922年，华资纱厂、布厂由16家增至54家，纱锭由48万余枚增至150余万枚。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有面粉厂123家、其中100家是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并主要是民族工业资本。中国成为

面粉输出国。

但是，民族资本的发展是很有限的，并且存在资金少、结构不合理、重工业增长缓慢的弱点，摆脱不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随着大战结束，列强重回中国市场，封建军阀在列强支持下，连年进行混战，给民族资本以极大打击。从1923年起，民族资本走向衰落。以面粉业、纺织业为例，1913年华资纱锭数的相对比重由1913年的占58.8%，下降到1925年实际只有不足44%，而日本占45.3%，英商占10.7%。面粉则由输出转为输入，战时兴起的华资面粉厂遭到厄运，大厂停工，小厂倒闭。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阻挠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还导致农村经济的凋敝。

战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其中大部分是日用消费品，如1920年进口货物中消费资料就占71.5%。大量消费品进入农村市场，进一步打击了农村手工业，加深了农民对洋货的依赖程度。帝国主义还采用种种办法，迫使农民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原料，使粮食生产缩减，1914年至1919年，棉花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4%，水稻占41%，到1924年，棉花上升为18%，水稻却下降为37%，个别地区棉田量高达70%，水稻只占30%。稻田减少，谷物产量下降，又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倾销商品粮的市场，粮食入超大量增加。小麦1922年入超额为300多万担，1926年则高达416万多担。农产品倾销，形成谷贱伤农，而帝国主义通过商业资本操纵粮价，秋收前提高粮价，秋收后又杀价，广大农民过着吃贵米，卖贱米的日子，生活极其穷困。

在反动政权的庇护下，土地集中到封建势力手中，自耕农，半自耕农大量减少，佃农急剧增加。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官僚，利用他们手中操纵的占耕地面积81%的土地，残酷地剥削佃农。地租一般占收获量的一半，有的高达60%到80%，甚至90%。高利贷剥削也十分严重，一般年利为20%到80%，有的高达100%以上，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地租。

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也是对农民的极其残酷的掠夺。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一般附加税超过正税的数倍，有的地方还预征，四川梓潼竟有由1926年春预征到1957年田赋的现象。经济盘剥之外，农民还被抽丁、拉夫，在军阀混战中、遭兵荒马乱之苦，受烧杀淫掠之害。战祸之外，尚有大灾。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民达二三千万。1926年东三省大旱，安徽大水。在天灾人祸交迫之下，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田地荒芜，中国农村陷于严重的危机，广大农民遭受无穷的灾难。农民的反抗斗争就像一把干草，稍遇烈火，便会熊熊燃烧起来。

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对中国国情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知识分子最先接触西方文化，直接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政治上敏感。辛亥革命后，他们除在政治上继续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外，还在思想文化上向封建意识形态展开进攻，发起了

新文化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十月革命的启迪，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放弃了民主主义立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产业工人由大战前的100万人增加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最进步的阶级。它除具有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的三大特点外，还有自己独特的优点：高度集中，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三重剥削压迫，革命最坚决、彻底；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广大农民有天然的联系，在斗争中容易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中国工人阶级自其产生那天起，就不断进行斗争。1875年到1913年，主要的罢工斗争就有78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工人的罢工斗争日益加强。1916年至1919年5月，共罢工88次。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斗争，摆脱了从前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追随者的身份，以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认识。这些先进分子还透过五四运动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到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出路。于是，他们大力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出版许多通俗刊物，如上海《劳动界》、北京《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用生动的材料、简朴的语言，揭露旧中国的黑暗与腐败，阐明工人阶级必须谋翻身解放的道理。另外，他们还深入工人之中，采取办夜校、集会演讲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此在工人中日益传播开来。

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中国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则为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提供了科学的工具。

1919年5月，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三大组成部分，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的任务，指出唯物史观才是说明过去、现在全部社会学现象的根本原则。不久，李大钊又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中，首次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因此而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他把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冲突，概括成"世界的资产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这种表述虽不很确切，但至少表明他已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症结。

要"改造社会，必须要知道社会的实况，必须钻到社会里去"，"加以如实地调查和研究"。建党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通过深入工人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斗争精神有了初步认识。他们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对中国社会的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考察、剖析。随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与张东荪为首的假社会主义者的论战中，“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了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特别是“把它和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从而使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深入到社会实际的某些具体方面，尤其是已经触及帝国主义经济和我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经济这些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为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如他们指出中国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和掠夺下，正沦为帝国主义经济的，政治的殖民地和万国大战的战场，揭示了中国同时遭到几个帝国主义压迫的特点；发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某些特殊性，出现了把中国资本主义从国标资本主义中划分开来的迹象；发现并阐述了中国农村特殊的生产关系——封建地主经济和农村个体经济的存在，划分出大致相当于地主、中农（自耕农）、贫农（半自耕农）、雇农等四个农村阶级，明了中国农民“怨气已弥漫天空”。他们的认识已在接近真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随着革命实践领域的开拓，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有新的突破。同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砥砺了共产主义者理论思维的锋刃。他们认识到“光有革命的精神”，“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使他们懂得社会的发展“应该有一种过程”。

1922 年 2 月，新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发表了署名励冰的“后序”，指出“支那的现状，政治上乃完全是封建的反动的纷扰的武人政治，社会上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生产”。文章把帝国主义经济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区分开来，指出，在中国“开发交通、工业的资本和工具完全握在几大帝国主义的强国手里”，国内资产阶级“没有经营大工业的资本和技能”，“大生产没开发”。由于克服了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片面性，文章得出了“小资产阶级经济生产”在中国仍占优势的结论。这个结论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在经营方式上的共性，并把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作为中国封建武人政治的经济基础，同时补充说明，支撑封建武人政治的还有“国际资产阶级”。当然，文章使用小资产阶级经济生产的概念，混合了地主经济和农民、手工业个体经济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未能进一步指出封建地主经济是旧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但是瑕不掩瑜，这在中国国情认识上仍不失为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

1922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勉励中国工人阶级要团结全国人民推动革命发展。大会通过的文件着重指出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是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乡村旧式农业和口岸近代资本主义的结合，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去做”。大会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2 年 5 月，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转变，陆续在《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等一系列文件中反映出来。

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

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作了比

较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制定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二大宣言》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了比以往文献更为确切的论述，提出了构成中国社会性质的两个因素：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另一方面，“中国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宣言》阐释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线索，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基本上是建立在“准确地估计具体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之上的。基于这种认识，二大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样，就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发展规律。《二大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的体现，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以后，中国共产主义者进一步对中国社会各种生产关系间互相依存、渗透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和阶级状况，评估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并创办了《向导》、《前锋》、《新青年》等刊物，继续在探索中国国情的征途上攀登。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地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经济政策

一、中共幼年时期土地政策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在其幼年时期，在对中国国情不断了解和进行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逐步提出了党的土地政策和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策，初步奠定了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政策的基础。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实行统治的经济基础。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党的土地政策，并发动了以广东农民运动为起点，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综观党在幼年时期的土地政策演变史，可将其划为三个阶段。

1. 党的成立到大革命初期，是党的土地政策的萌芽期。这一时期土地政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长远考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

二是从当前考虑，只削弱封建剥削，把减租减息作为过渡性的土地政策。

1921年党成立时，便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规定党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土地归社会所有。这个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显然是错误的。

“一大”后，党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理论。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启迪下，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肃清军阀、没收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限制租课率”的主张。7月，党的“二大”宣言，明确地把“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作为最低纲领的一部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也提出并宣传过一些触及土地问题的主张。1921年9月，沈玄庐（当时为共产党员）首先在浙江萧山领导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规定会员“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并宣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筹分配”。1922年六七月间，彭湃在家乡海丰从事农民运动，协助农民建立了农会并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地主“升租吊田”的斗争。1923年6月早稻成熟时，海丰遇特大风雨灾害，农会又开展了减租七成，“至多三成交纳”，无租可交者则免交的减租斗争。湘区党组织则在衡山岳北，领导农民进行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这些斗争，尽管当时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很大，却标志着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开始。他们的实践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土地政策作了必要的准备。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由于党“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因此1924年2月中共中央三届二次扩大会议就土地政策问题作出决议时，要求全党支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政纲，即由政府采用将田地照价抽税和照行收买的办法使农民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亦有消极不足的一面。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从实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高度，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大会认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并把“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作为中国革命的内容。但“四大”仍未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反而规定“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定行减租运动”，这种规定是与当时农民运动形势相违背的。

“四大”后不久，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1925年5月1日召开了广东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省农民协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大会决议：“规定最高限度租额”，“取消押租额，并一切租额外附加送品”，“荒年负租”等。省农代会后，各地农民积极贯彻减租决议。海丰、陆丰、汕头等地农民在平定陈炯明叛乱后，开始实行二五减租，严厉惩办破坏减租、对抗农运的地主豪绅。湖南，在毛泽东领导下，韶山、银田寺一带的农民组织起农会，开展了一系列阻禁平粜及减轻租额的经济斗争。

1925年下半年，在“五卅”反帝浪潮的推动促进下，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7月

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出《告“五卅”运动中为民主自由奋斗的民众书》，明确提出了“限定享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逾额之田地颁给贫农及无田地之农民，限定田租之最高额”等主张。10月，中央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以前历次会议所没有提出的“耕地农有”的土地政策。它指出，党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把实行耕地农有列入自己的政纲，并提出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会议指出：“我们党应当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组织农民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农民书，指明了工农平民得到政权后实行“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并提出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维护农民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包括减租减息在内的最低限度的八项要求，以及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十条办法。这样就把减租减息与耕地农有政策密切地结合起来。耕地农有政策，是对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政策在方向上的肯定，同时又是对其实施办法的否定。尽管这一政策还很不具体和完善，但在当时却是一项比较彻底的土地政策，也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总政策的萌芽。

2. 大革命中期，随着农民运动突飞猛进，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促使减租减息的实现及其具体化，并为向彻底的土地革命转变作准备。

1926年9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提出：“限定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百分之五十”，“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超过二分五厘”，“反对预征钱粮及苛捐杂税”，“要求免除陋规”等。这些规定推动了党的过渡性土地政策的实现，10月2日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减轻租额，佃农所得至少应占收获百分之五十”，“绝对禁止重利盘剥、限制最高利率，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分，”等。于是广大农民，尤其是湖南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倒重租重押重税”的斗争。在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促动下，1926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二十余省区代表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等规定，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

在这大好形势下，192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出台，提出农民政纲九条。其中对土地问题提出：“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由农会合同革命政权的代表规定租课额”，“取消以前关于租佃的和欺压的契约和欠账，禁止重利盘剥”，“规定整个一定的农业税，取消苛捐杂税，废除陋规”等。这个政纲虽还未能提出具体措施，但从这一政纲可以看出，中共已有准备“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入下阶段”的思想。这就是说，中共准备把减租减息逐步转向彻底的土地革命。1926年11月15日，中央局通过了《目前农运计划》，决定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农民运动，同时中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6年12月1日，湖南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三十三个决议案，明确肯定了农民以革命暴力手段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是革命斗争

中所必取的手段。会议还确定了现阶段的具体纲领，提出应根据田亩的性质、大小、肥瘠等，减租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年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大会还要求实现孙中山所说的“耕者有其田”和国民政府所宣布的解决土地问题纲领的诺言，希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最短期间，贯彻‘耕地农有’的政纲”。这次大会后，农民运动在特别发达的县份逐渐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向发展。

3. 大革命后期，湖南农民运动首先进人解决土地问题阶段，但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影响，中共未能完成土地政策的相应转变。

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针对一些与会代表所提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陈独秀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己，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会议接受下陈独秀的这个观点，在农民运动决认案中，把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

1927 年初，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传来中国。国际决议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的那个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目前的中国形势下，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土地政策的唯一阶级。”共产国际的决议是及时的、是正确的，但中共中央依然没有转变态度。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和基层组织的抵制。1927 年 2 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和国际不合，特别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2 月 16 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和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中共湖南区委也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中提出：“现在贫农中流行的思想是‘平均地权’，他们觉得每个农民应该有两亩田的耕种权。”“必须于最近期间使这些贫农能够满足这一低度的要求。”

北伐战争得到了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农民的支持，又推动了这些地方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 年 4 月，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到不可遏止的地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其打击目标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把地主政权打得落花流水，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有些地方的农民还提出了“平均地权”的要求。广东农民则开始采取行动解决土地问题。一是丈田、清查地主虚报多收租的田地面积，改照实际面积纳租；二是插标，对土地插标为记，将田地耕种权重新分配；三是分田，根本否认地主土地所有权。湖北一些农民运动发达的县份亦开始进入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

随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各地农民运动兴起的情况，制定了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1926 年 11 月规定：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庙的土地，归给农民；保证佃户在其所耕种土地上有无限期租佃的权利。1927 年 5 月，中共五大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大会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了“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这一原则。但同时也作出了两项限制措施：第一，

“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第二，“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这在南方大地主稀有而革命军人较多的情况下，就使这个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很不彻底，更何况这个决议案也没有公布，这样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实际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农民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等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开始着手研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施方案，1927年四五月间，土地委员会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作出了《关于协作社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参加这些会时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为：（1）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2）土地没收的标准和解决的办法；（3）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4）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5）征收地税问题。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就是解放农民，废除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增加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改良土地、发展中国工业等；1927年5月6日，土地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多项决议案，决定呈报国民党中央批准。但国民党中央没有批准这些决议案。

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迫切需要实行土地革命以发动群众，但陈独秀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态度对待农民。1927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农民运动策略大纲中指出：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清楚，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这种论调，实际上是取消土地革命。6月30日，陈独秀在党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所谓十一条政纲，其中规定，工农运动“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再次反对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已经走向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首位。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声明中共将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重申：“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然而这个宣言发得太晚已无实现的可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了革命，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

二、中共早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策

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成分组成。综观中共早期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

1.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采取一律没收归社会所有的政策。

1920年1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实现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随后又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宣布，党的经济纲领是“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工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主张没收一切资本归社会所有，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误以为中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同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只是“产业发达的前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罢了。其二，分不清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性质不同。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都一样要盘剥人民。“我们不能说，本国的虎比外国的虎不会食人；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抵抗外国的虎，不必扑杀本国的虎。”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见有掠夺压迫的资产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

但是，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虽主张无论国外、国内的资本一概没收，但其主要矛头是针对外国资本。蔡和森指出：“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共产党》第六号“短言”也认为，那班军阀官僚不过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账房”和“监工者”。陈独秀说，“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似一天”。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的主要统治者是侵入中国的外国资产阶级。

2．二大前后，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对外国资本则是采取没收政策，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政治特权。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为联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在目前条件下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改正协定关税，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可见，中共此时已注意到了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在把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作为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党在目前条件下的主要奋斗目标。这就把外国资本从中国资本中划分出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打击的对象。这时中国共产党还未能把民族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区分开来，因而无法采取相应的政策。

1922年9月发表的《向导·发刊词——本报宣言》一文，使党的最低纲领具体化。文章说：“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是钳制我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文章除分析了公使团，税务司、领事裁判权及外币等帝国主义政治特权对中国的灾难性作用外，还说：“银行团及各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贼，尽量吸取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取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中国共产党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文章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外国资本的政策是反抗外国资本的侵略和经济政治特权。虽然它还很不具体，但却是中国共产党没收外国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政治特权的表现。

3．三大到五卅运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本的政策是在区分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基础上承认民族资本的存在，反对官僚资本；对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政策，是取消外国资本在华的经济政治特权。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4年的国民党广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

这时，中国共产党从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各个部分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人手，逐渐得出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两大部分的正确结论。四大决议案指出：官僚买办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则估计不足。

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正确分析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是：承认民族资本的存在，但工人阶级仍须对其进行经济斗争；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必须采取同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同样的政策。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孙中山“节制资本”的主张。所谓节制资本，即节制私人资本，扩张国家资本，“一切大事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私人独享其利”。孙中山“节制资本”的主张，对于反对外资垄断，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1924年11月，恽代英撰文提出打倒外国经济压迫的方法：“只要收回关税主权，酌加入口关税，取消赔款，核减外债，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够了。”这里没有谈到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恽代英的这种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得到肯定。宣言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的是收回海关，改定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则说得更明显：“就国民革命要求的本身上说，它虽不过只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租界等），并不根本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一切经济机关（工厂、洋行、银行等），虽只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并不没收国内一切生产机关。”这清楚地表明，中共此时已放弃了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政策。

民族资本对外国资本的两面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反对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政治特权而不能也不会提出没收外国资本的主张。中共为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计，在反帝问题上把争取实现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作为策略是正确的，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并会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放弃没收外国在华资本本身是错误的，希望通过罢工斗争而立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更是幼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中，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收回海关及盐政管理权”等作为同帝国主义谈判的最低要求，是不现实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没收其在华资本一样，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才能实现。

4. 五卅运动前后到中共六大。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没收国内外一切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经济政治特权。

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的英勇表现呈鲜明对照的是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这

自然激起了共产党人对于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并由此带来认识上的偏颇。陈独秀撰文认为："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瞿秋白则对资产阶级批评得更厉害，他把资产阶级与反动军阀相提并论，形象地称之为"商阀"，主张"要施行反对军阀商阀的阶级斗争"，"要推翻军阀商阀"。从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很少再提及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是一再强调其妥协性和反动性。

"4·12"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内许多人认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已经告终，工农阶级革命已经开始，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一样，成了革命的大敌。"平民政权"由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1927 年 5 月，中共五大在《政治形势与党的性质决议案》中明确指出："现在的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提出职工运动的新方针是："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在这种"左"的精神指导下，武汉、长沙、广州工人运动向"左"的方向走得更远。他们"提出了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是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无疑，这种"左"倾错误对革命事业是极其有害的。

这时，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军事上进攻、经济上封锁，迫使中国共产党对外国在华资本采取彻底的革命政策。

1927 年初，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必须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的根基"。国际认为，"要达此目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尚不足以削弱帝国主义之地位，必须从经济上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基础"。要求"革命的政府"，"应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鉴于中国共产党有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资产阶级而忽略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倾向，1927 年 5 月，共产国际八大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克服反对帝国主义积极性的缺乏，要没收与国有那些破坏革命的外国和本国企业。但国际也不主张无条件立即没收一切外国在华资本，并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进。

"7·15"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对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中共领导人几乎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八大指示，但又犯了"左"倾错误。瞿秋白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主张将反帝与反本国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喊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左"的口号。瞿秋白犯的"左"的错误时间很短，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三、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工农群众运动和各方面革命工作的发展，预示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迎接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共四大的决议案涉及了党对经济问题的看法，阐述了大革命时期党的经济思想。

中共四大着重分析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情况，并得出结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有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伫的阶级。党的任务是联合农村各阶层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和教会霸占田庄的斗争，组织独立的农民协会，使广大农民群众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那些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

在中共四大前后，党及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分析，是比较一致的。他们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经济，探索革命规律，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的基本原因，只有反帝、反封建，中国经济才能发展。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完整、不成熟但是包含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思想的理论，例如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对中国国情的阐述；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反对买办经济的思想；耕者有其田的理论；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理论等等。

李大钊写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农民问题。他根据翔实的资料分析了农民各阶层的状况和农村土地占有情况，指出了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写道："农民中最多和最困苦的阶级（层）是自耕农与佃农，自耕农较之佃农，进款略多，因此，'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指出："中国的农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们的数目占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农业也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他强调国民革命必需革地主买办的命，就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根——他们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尤其是经济情况的细密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农民经济状况的调查和研究，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1925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革命》半月刊发表。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具体而细致的分析，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他认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有两面性，与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现代工人阶级只有200万人，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还对农民阶级的各个阶层做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农民，半无产阶级和中农，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广大而可靠的同盟

军。他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实际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基本思想，为他后来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展了经济建设。在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同“左”倾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支援了革命战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也随之走上正确轨道并日益完善，为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第一节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

一、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

土地革命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他们在革命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广泛发动和组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曾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因此，无产阶级只有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才有可能进而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势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因为“农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农民所希望的就是：“夺取地主的土地，使他们不再强迫农民服工役。”要使农民积极走上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领导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变，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被触动，土地依然高度集中，封建剥削愈加严重。就土地集中程度而言，土地革命以前，占农村人口14.4%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土

地面积总数的81%，而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0.6%的中农和贫农只占有土地面的19%。

由于大量土地尤其是肥沃的良田集中于军阀、地主、商人高利贷手中，贫苦农民只好从这些人手中租地耕种，而土地兼并者的目的也正在于攫取高额地租。地租从形态上看，以实物地租为主、还有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地租率通常占收获量的5成左右，有的可达6成、7成或9成，一般是南方大于北方。高额的地租显示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强度的经济剥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

除了受高额地租的残酷掠夺之外，农民还受高利贷资本的盘剥，农民大多数每年都借债。此外，农民还受着军阀的军事徭役，各种苛捐杂税的剥削。如此之多的种种不同剥削方式相互结合，使中国广大农民群众迅速贫困化。因此，废除封建剥削关系，改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正是当时中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是由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没变，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没有变，因之“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

同时，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实践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一条：大革命失败也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所致，是“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治纲领，来解决土地问题”。

因此，在汪精卫叛变刚刚五天，改组后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便于1927年7月20日发出了《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把“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大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作为土地革命的口号。党的八七会议，将这一系列土地革命口号演化确立为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它标志着土地革命政策的正式出台。

二、土地革命政策的演变

土地革命政策，其中心是土地没收与分配的政策问题。它由四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土地没收政策；二是土地分配政策，包括分配的区域标准、数量标准。三是地权政策，土地国有还是土地农有？四是划分农村阶级的政策。土地革命政策的运行就是要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最终实现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转变，达到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关系的目的。

土地革命政策的演变经历过四个阶段，推动了两次土地国有高潮。第一阶段，从1927年7月20日党中央发布第九号通告到1928年冬，党的六大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前，即土地革命初期。这阶段，土地革命政策演变的主要内容是从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到没收一切土地；地权方面则主要是实行土地国有；第二阶段，从1929年初党的六大精神传达到各根据地至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即土地革命中期。这阶段，土地政策演变的核心内容是，由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地权方面，土地国有开始向土地农有转变，但在实际中，推行的仍然是土地国有政策。这期间还贯彻了共产国际加紧反对富农的错误政策。但总的方面，此时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形成了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比较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第三阶段，从六届四中全会到瓦窑堡会议前夕，即土地革命后期。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全盘否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即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等一套“左”倾土地政策。第四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前夕到抗日战争爆发。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认真总结了过去“左”倾土地政策的错误，逐步转变了党对富农和地主的政策，为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革命政策作了准备。

（一）土地革命前期的土地政策

1927年7月20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提出“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夺取农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即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随后，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如果只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政策，仍是耕者无其田。于是改“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政策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

在八七会议上，关于土地革命的规定明确提出：“目前只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及中地主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土地归无地的农民，不提出没收小田主的土地，但他们要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对土地革命的地权问题，明确肯定了土地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土地国有制。

综合八七会议文件精神，可以看出土地革命的政策经八七会议被确定为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及公地归佃农及无地农民经营，土地归国家所有。

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时，毛泽东曾提出：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但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议上没有被会议采纳。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赴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8月18日召开的改组后的第一次湖南省委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毛泽东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重提要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的主张。他认为：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多少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就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认为应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发动农民去实行，对被没收了土地的地主应给生活出路。经过讨论，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于是，20会议日以湖南省委的名义向党中央报告了会议讨论意见。

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湖南省委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意见，仍坚持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于8月23日在复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土地问题，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不提出，……不马上提出这一口号只是对小地主的一种策略。”

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草案规定：“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成

的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有；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行使权归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并认为已开始进入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期（早在9月份，中共中央便通过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因此党纲草案明确宣布，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到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确定的是没收一切土地，土地国有蚵政策，与八七会议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和公产土地的规定相比，扩大了没收对象，不仅要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连中农、贫农也一概没收，其后果可想而知，势必“触犯一切富农甚至中农和少块土地的贫民，这就容易混淆土地革命斗争的目标，引起农民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土地革命的对象，不但是反对独占土地的地主阶级，还要反对他自己”。

尽管如此，土地革命一经发动就迅速发展。这样，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夏天，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到实践，都贯彻了没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的政策方针，汇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土地国有高潮。虽然土地国有方案是一种超前方案，但是，由于在土地的经营上是采用地权与使用权相对分离，交农民分散使用（除湘东的醴陵等县外），其消极影响受到制约。同时，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土地革命摧毁农村封建土地制的目标为广大农民认同，所以土地革命的进行普遍受到大多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地区，那里实行的是一切土地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至1928年1月份的不完全统计，海丰县焚烧田契471，888张、租簿58，027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井冈山根据地与琼崖地区贯彻的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民耕种。1928年12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通过的《井冈山土地法》按中央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宣布“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毛泽东后来指出：《井冈山土地法》有几个错误：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②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③禁止土地买卖。闽西永定是平均分配土地交给农民耕种。而湘东的醴陵以及平江、浏阳等地区则主要是土地全部归公，推行“共耕制”。当时，湘鄂赣根据地提出的是“暴动没收一切土地”和“拔界废塍”、“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口号。

总起来说，土地革命前期，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演变的核心内容是从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到“没收一切土地”的转变。在地权问题上总的是实行“土地国有”的政策。

（二）土地革命中期的土地革命政策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总结了前一段土地革命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对实现土地革命的任务提出了正确的策略。改变了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大会认为，由于中国革命仍然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只“没收地主阶级底一切土地”，“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给无少地的农民使用”。“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

契约”。在地权问题上，六大决议的提法尽管前后矛盾，但实际上仍坚持土地国有政策。六大《政治决议案》提出的十大纲领的第七条规定：“没收地主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农民问题决议案》中也说：中国共产党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政纲。”上述这些规定可理解为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但六大的另一个决议即《土地决议案》中又提出：平分土地“可以直接动摇私有制”，我们应该赞成平分土地，土地归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这可视为土地国有。由苏维埃政府平分土地，交由农民使用，其前提是否定一切土地原主的所有权，包括农民原来所有的少量土地所有权，其结果则是直接废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这样，六大对地权的主张实际是先实行苏维埃政府所有，交农民耕种，然后过渡到国家所有，不管是苏维埃土地所有，还是国家土地所有，实质上是土地公有制。从党的六大以后，党中央发布的文件和各根据地实施的情况来看，六大把土地国有区分为苏维埃公有和国家所有，主张目前实行苏维埃公有，仅表明中共中央在批评“左”倾盲动主义和革命遭受挫折的情况下，贯彻土地国有政策的调子比以前略为放低，并又回到原先的犹豫状态中，在实际中仍然实行的是土地国有政策。

六大以后，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各地迅速扩大，土地革命继续展开。根据六大的精神，各地很快采取了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即将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禁止土地买卖、收租和转让。

平分土地实际上已直接导致了对土地私有权的否定，由于平分土地与没收一切土地并无实质性区别，因此，虽然1929年上半年各地土地法或土地决议都规定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如《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29年5月，中共鄂东北特委通过的《临时土地法政纲》规定：“凡地主所有之土地一律没收之，凡豪绅所有之土地一律没收之。”但结果却都是没收、平分一切土地。到1929年秋天以后，闽西与赣西南根据地内开始恢复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1930年2月召开的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所有田地不管水田、旱田一律没收，归苏维埃处理，分配与农民使用”。在赣东北根据地，1930年3月第二届信江苏维埃政府通过的《土地临时使用条例》第二条规定：“苏维埃政府得按照群众的需要，将所有土地分配给群众使用。”这实际上也是实行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中共中央也于同年3月改变六大只赞成平分土地的提法，明令坚决贯彻平分土地政策。这样，1930年春天以后，没收一切土地公有的呼声再次高涨，调子日益上升。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在其影响下，一此地方又重新提出或推行土地共耕制，主张“组织集体农场”；“禁止一切土地买卖租佃典押”；“实行集体生产”等，于是在各根据地形成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贯彻土地国有政策的第二个高潮。

1930年是各根据地大规模地开展土地革命的一年，红色区域内一切土地被没收平分，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正是在第二次土地国有高潮中，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和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一些分配政策也逐步完善。

土地革命前期，土地分配一般以数量标准和区域标准为依据。当时中央提出“土地的分配以土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寡为标准，以年满16岁能独自耕种的人为一劳动单位，每一劳动单位平均使用土地（酌量各地情形决定田数），其余的土地按照各劳动单位所属的4岁以上的人口多寡平均分给于劳动单位使用”。这是以劳动为标准的分配办法。

湘赣边界在制定《井冈山土地法》中提出“（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但实际做法是以人口标准为主。

分配的区域标准，井冈山根据地提出要以乡为单位，遇特殊情况也可以乡或区为单位。闽西根据地提出：“以乡为单位，即以本乡人民现有亲自耕种的土地，作为本乡的土地所有数，归本乡按人口（除反革命分子外）平均分配土地；又用抽多补少的办法（根据各户现耕的土地多少，按全乡每人平均应得的亩数为依据，有多的抽出来，不足的补给他）去实行分配。”

在六大以后，土地分配政策逐步完善。在闽浙赣根据地，以乡或村为单位，按人口和劳动力混合标准平均分配。具体是将土地分为4份，3份为劳动田，1份为人口田，将田地分上中下三等平均分配，但雇农、贫农、中农、红军士兵及斗争中最勇敢的群众优先分好田，土豪地主不分田。鄂豫皖根据地，以人口为主，兼顾劳动力的分配方法，同时提出不反动的豪绅地主家属也分一份土地。湘鄂西根据地，以乡或村为区域标准，以人口为数量标准，无地少地的农民，男女老幼均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子女亦可分到一份土地。在闽西、赣南根据地，规定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及反革命在乡的家属不反动者，有其他职业但不够维持生活者都可酌量分与田地。分田区域标准，闽西先是以乡或数乡为标准，以后取消了数乡标准；赣南规定以乡为单位，有的地方以区为单位或以村为单位。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发现以村为单位有弊端：一是大村不肯拨田于小村；二是单位多，区乡政府不易督促，暗中生出许多弊病；三是村内容易被地富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打土豪。因而这种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而以区为单位太大，群众不了解，地富容易瞒田。“正当的办法是：以乡为单位”。这种方法以后一直坚持下来。在分田数量标准上，按人口和按劳动力分配一直未统一。毛泽东主持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作出规定，“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依乡村总合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采用以劳动力为标准的分配方法。”毛泽东经调查认为：“分田以劳动力为单位的弊病，就是凡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切不能耕种的人，均不够食。贫农劳力多的也抵不住富农，因为贫农不及富农的牛力、农具、资本，并且富农可以租耕孤、寡、老、幼、小脚妇女等人的田。因此，以劳动力为单位只于富农有利。”

关于分田的办法，闽西根据地坚持“以原耕为基础”的“抽多补少”的方法，以后又补充了“抽肥补瘦”的原则。1930年10月，毛泽东肯定了“原耕总合分配”法，即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移得田动的移田，移田不动的移民。以原耕为基础贯彻团结中农政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使贫雇农不致吃亏，原耕总合分配简单易行，因而这种分配办法是较科学的

方法。

在第二次土地国有高潮中，土地革命政策发生了两个大的反复，其一是对富农政策的转变，其二便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出现，引起土地革命政策的逆转。

富农问题一直是土地革命中党内意见分歧的焦点，在“八七”会议上，对待富农，党内就有分歧，有人认为富农和地主一样，有人认为富农和地主有区别。六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基本推行的是中立富农政策，

从1929年9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个变动是由共产国际执委6月7日给中共中央一封《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引起的。这封信批评了中共六大指出的“不要故意加紧反动富农”和以后提出的“联合富农”的口号，说“中国同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

接到共产国际的来信以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了《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承认过去在富农问题上发生了“错误”，决议认为，中国的富农“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12月7日，中央发布通告，指出：“富农领导已经成为阻碍斗争之极严重的危险，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的斗争，肃清富农在斗争中的影响。”

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中央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精神，在根据地得到了贯彻，闽西根据地于1930年6月在长汀南阳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认为富农无论在地租方面，高利贷方面，还是在雇佣劳动方面，抑或是在商业资本方面，富农的剥削比地主更残酷，他们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应当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因此，应该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

南阳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标志着闽西根据地由贯彻党的六大中立富农和削弱富农（即消灭富农半封建性的剥削）的政策转变为执行共产国际“六月来信”的过火打击富农和实际上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这在当日寸的各革命根据地中是有代表性的，也是比较突出的。1930年上半年以后，鄂豫皖、湘鄂赣、左右江等根据地都先后改变中立富农的政策为打击或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如1930年8月，中共广西东兰县委发布的《土地革命问题》，就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后，“即没收富农的土地”。同月，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苏维埃政府也作出了反富农的七条规定：“1. 没收富农土地为苏维埃政府管理之，按照他家庭人口食粮之需要酌量分配一份土地借其使用。2. 从斗争中开除富农。3. 按照富农之所有，酌量征发（金钱、粮食、工具等）。4. 征发手续（略）。5. 加紧贫雇农对富农的斗争。6. 富农子弟可以入学读书，但不得加入学生会。7. 富农子弟可以学工，但不得加入工会。”鄂豫皖根据地反富农也不断升级，先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接着是没收富农的好田留给坏田，再就是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牲畜、房屋、农具，直至“扫地出门”。在打倒富农的口号下，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势必侵犯到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贫农、雇农的生产积极性。如鄂豫皖根据地曾出现“一切土地上的生产，农民不敢要，他们怕是富农，他们不愿意多做工多生产”，致使社会生产下降，土地荒芜，造成根据地的金融

枯竭，给土地革命带来严重的影响。

在共产国际反对富农指示精神的影响下，这个时期各根据地都改变了中立富农的政策。根据土地革命关于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各苏区党组织发动并领导广大农民群众，争取了平分一切土地的基本政策，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同时，富农的出租土地和高利贷也在没收和废除之例，而富农自耕土地、农具、耕牛及其他财产本当保留，但是，因为中国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在南方更是如此，不把富农原比一般农民多耕的土地和好地拿出来平分，就难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因此，在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下，除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外，也没收平分了富农多余（指按平均人口计算的多出部分）的土地、农具等财产，废除了他们的债权。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在给地主分一份土地的同时，也给富农分一份与其他农民同等质量的土地，从而在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同时，也把那些带有很重的封建性和封建剥削的旧式富农消灭了。它不仅彻底地消灭了苏区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又充分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使革命获得了足以战胜强大敌人的基本条件，这是基本正确的，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当时在反富农政策和农民平均主义观念影响下，所采取的打倒富农的错误政策，对已经平分了土地及农具等财产的富农，又进而实行强迫捐款，甚至没收剩余，这就过分打击了富农，特别是当时所作的有剩余即为富农，把富裕中农甚至一般中农都划成富农，把他们当富农打击，在分配时又不考虑中农的利益，把中农的土地也一律拿来平分，这样，打击富农的错误政策就发展到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混淆土地革命中阶级路线的错误。

1930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周恩来在 9 月 24 日传达共产国际决议时，批评说："对富农曾有两种左倾毛病，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不但不应如此对待富农，在目前这样做，更加要动摇中农。"这些批评无疑都是正确的，自从这次会议后，对待富农的政策一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此外，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规定，土地分配以后暂时可；以租借、买卖，这标志着土地革命政策，在地权问题上，开始了由土地国有向土地农有转变。会议认为：目前尚未到整个取消私有制阶段，故不禁止土地买卖。这说明，三中全会允许土地买卖的规定，是中共中央地权政策上的一个新变化。因为中共"六大"以后，虽不再提马上实行土地国有，但却仍然实行土地苏维埃公有制，并明确写上了禁止买卖的规定。三中全会虽仍没有废除土地苏维埃公有制，但宣布土地平分之后可以买卖，这就为动摇土地苏维埃公有制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推进土地国有向土地农有转变过程中，1931 年 2 月 8 日，中央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决议，首次在党内提出了地权农有主张。决议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分定的土地不能轻易重分。"

苏区中央局的决议发出不久，毛泽东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与中央局的决议相比，毛泽东的指示信对农民地权私有政策作了更详细和准确的规定：(1) 土地农民私有，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

的不退”，租借买卖任其自由，“别人不得侵犯”；(2) 田中生产，除交土地税和政府征购外，均为农民私有，任其自由处理，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指示信体现了所有者的土地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的基本精神，是真正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省、县、区苏维埃政府联席会议，接着又于三五月间连续发出布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会议和布告规定：土地“归农民所有，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赠送转让，任其自由，“政府不加干涉”，“今后不再重分”，各县同时把上述规定载入土地决议。是年冬，与江西相邻的湘赣和鄂东地区也推广江西的经验，宣布了土地归农民私有，不再举行分配的决定。因此，可以说，1931年夏天，土地农有政策已在中央苏区大部分地区及湘赣、鄂东南地区得到确认并开始贯彻。但这并不表明，中共中央已完成从土地国有政策到土地农有的转变，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最早提出土地农有主张的苏区中央局，也开始后退。1931年8月，通过的土地决议案，一方面取消了2月决议对土地农有的规定，另方面则特别强调土地国有的宣传。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3年多土地革命的实践，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的许多社会调查和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以及过土地所有权问题的突破；琼崖、鄂豫皖、湘鄂西关于中农土地不动、只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剩余土地的经验；闽西“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的提出及以原耕为基础的分配方法；琼崖、闽西、鄂豫皖初期对待富农的政策，右江、湘鄂西关于农村阶级的划分；各地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等等都为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在这些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指导下，这个时期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获得发展，取得了成绩。但是也应该看到，有些政策虽然曾经是比较好的，但后来却改变了，例如对待富农的问题；有些政策早然正确的提出来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并没有得到贯彻，或在实践上走了样，特别是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以后，又出现“左”的错误，产生了不良后果。

（三）土地革命后期的土地政策

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2月制定颁布了《土地法草案》。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地主不分田；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由苏维埃分配给贫农与中农。《土地法草案》第三条明确规定，没收富农的土地和富农分坏田，对于他们的土地应该没收，“富农被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加反革命且能自己劳动耕种”，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法案》第十四条还要求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重新分田。到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将《土地法草案》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并正式通过，这样就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强令推行，至此，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土地政策的新体系正式形成了，这个政策

的特点，一般通俗表述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关于没收政策，由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扩大为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土地，如1931年12月3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规定：“豪绅地主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以及一切出租的土地，须一律没收。”“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又由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土地，发展成“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关于分配政策，由以无地少地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男女老幼，包括商人、游民、宗教职业者、地主及其家属均可分田，转变为只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地主及其家属、宗教职业者、商人等不分田，富农只能分坏田。如1931年12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条例”就规定得很详细：“豪绅地主及加入了反革命组织和自动领导群众反水的富农的老婆、媳妇、女儿，同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结婚的，不得分配土地。”“豪绅地主及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富农，过去所抚养旁人的或买来的女儿在生活上、教育上与豪绅地主一样的，绝对不分配土地”。“和尚、道士、尼姑、斋公、算八字的、地理先生等封建残余及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神父、本人是以宗教为职业吃饭的，不得分配土地。过去分了的土地应收回”。“凡贫苦工农收容的豪绅地主的子女，不能分配土地”。“豪绅地主及其家属与自动领导反水的富农，全家不得分配土地，过去分配的应收回”。“政府及各革命团体工作人员，如果不是雇农、贫农、中农、失业的工人、苦力与独立劳动者，一律不能分配土地”。凡豪绅地主、富农出身去当白军、靖卫团、保卫团士兵的“不能分配土地”。这样一来，分配面就大大缩小，打击面却在不断扩大。关于分配的标准，由以人口为标准，转变为以人口劳动力混合的标准。为什么要作这种转变，主要是为了反对富农。关于这点，1931年10月，中共中央给赣西南特委的综合指示信里讲得很清楚：“你们在平均分配土地上又发生另一错误，即是按人口分配——三岁小孩都一样分配，这样，一方面是便于富农，因为富农都有老婆和很多小孩……在平均分配原则上主要应当以劳动力为标准，再加以人口原则……这才不是便利于富农而利于贫农。”关于分配方法，由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转变为以阶级成分为标准。如有好些地方“主张富农分坏田，中农分中田，贫农、雇农分好田”。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土地政策的实施贯穿在查田运动中。查田运动以前，各根据地土地分配以一乡或几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匀，按人口平分，其政策就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平分土地，使各人（包括地主、富农）的土地大体相等，实现耕者有其田。比如，中央苏区各地都是按人口平均占有土地。据1932年5月和10月，江西省委及省苏维埃政府报告，各县人均土地虽然不同，但都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兴国等13县人均分地6.5担，除少数地区未报外，令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满意的只是有些地方地主分了田，富农也分了一些好田。因此，中共中央政府训令和八县查田大会决议都说：“只有经过查田运动才能将地主的封建残余势力彻底的肃清，才能使地主不能得到一寸土地，富农不能得到一丘好田，才能将混人苏维埃和红军以及地方武装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洗出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也指出：“应号召群众来一次查田运动，各区乡均须由群众组织查田委员会，实行清查、土地登记和考查，富农分好田的须

收回分给坏田，豪绅地主家属分了田的无条件收回。”可见查田运动一是按“左倾土地政策收回地富分得的土地和好地，二是清洗阶级异己分子，对各根据地已进行过彻底平分土地的老苏区进行土地检查，具体工作是：划分农村阶级、确立地主、富农的阶级成分，然后收回地主分得的土地和富农分得的部分好田。

查田运动尽管早在 1932 年 2 月初就提出来了，但是，强行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政策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受到了来自地方领导与群众的抵制，直到 1933 年上半年，这种土地检查未能全面推广和贯彻，于是，1933 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查田运动，以推动新土地法的全面贯彻，并指令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府及其地方组织直接具体领导。

按照土地革命的一般情况来说，在分配土地之后进行一次复查以巩固成果是必要的。由于各地开展的情况不同，也会有先进与落后地区的差别，对于落后地区和新区重点补课也是必需的。但是，这时开展的查田运动，是以“一苏大”土地法的过左政策为标准的。当时所说的落后地区，事实上正是没有贯彻这种过左政策的地区。因而，这个查田运动，完全是为了贯彻王明的过左政策而开展的一个错误的运动。但是，由于这次查田运动是由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查田运动中一些过左做法进行了抵制。

具体而言，当时中央苏区也属要进行查田运动的地区。查田运动前，土地问题早已彻底解决了。1930 年内，中央苏区多数地方都进行过二次、三次甚至四次的反复平分，到 1931 年春，少数只做了抽多补少，但未执行抽肥补瘦的地方又再次进行了一次平分，实在可以称得上“彻底了”。当时中央苏区的情况是“各地的土地都已彻底的平均了”，整个查田运动的“成绩”也能反映这个情况。如 1933 年 7 至 9 月 3 个月，从地富手中收回土地 317，539 担，其中地主 6998 家、富农 6638 家，用查出的地富数，除没收来的地主、富农的土地数，每户仅有 23 担多，这些地富占地还不足当地 5 口之家，每人 6 担左右的平均占有量。这说明，被查出的地富，他们的土地大致都是一般农民的占有量。冈此，在苏区存在的问题应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地主、富农的错误，可是查田运动的发动者反而认为，中央苏区现在还有 80% 的地区存在富农分了好田，地主分了土地的现象，这是土地果实被地主、富农所窃取。在他们看来，只要地主、富农分了田，土地问题就没有彻底解决，就必须开展查田运动。目标是“不让一个地主分到土地，不让一个富农分到好田”。可以说，这一基本的政策和目标，在整个查田运动中从来就未有动摇过。

这种政策的贯彻和目标的实现，即使其查出的地富阶级成分都是正确的，也因为对他们实行的是不给出路的政策，结果只能逼得地富坚决与革命为敌，客观上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这是因为：（一）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过左政策的结果是造成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二）是造成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由于富农家中有劳动力的分坏田，无劳动力的不能分田或少分田，这就从根本上断了从事雇工经营的路，即从经济上消灭了富农。

由于大批地主、富农劳动力的丧失（逃亡、或被杀），中农又受打击，“人人怕上升为富农，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当时战争又十分频繁，贫雇农要参战、出公差，

而中农不愿也不敢积极生产、做小买卖，这就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工商业，造成根据地经济的严重困难。

尽管如此，这次查田运动因为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而与1932年的查田运动有些不同。第一，运动正式开展之前，先在瑞金叶坪乡进行了试点。第二，运动开展之初，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意见，讲明了政策和方法，强调不要侵犯中农利益，"不使中农弄成富农"，"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果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富农与地主有分别"，不要把"富农弄成地主"，"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并规定"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第三，为了指导查田运动正确开展，毛泽东按照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于1933年10月经中央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两个文件，对如何划分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作了明确的规定，解决了我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在1934年1月于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的正确的阶级路线，第一次把过去所提的"反对富农"等口号改成了限制富农，从而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但是，由于毛泽东当时处于被排挤、被打击的地位，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央的情况下，他提出的那些正确的土地政策，无法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因此，查田运动虽然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绩，并尽量减少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但查田运动毕竟是在王明过左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仍然发生了很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查田运动中，在地权问题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所采纳，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地权认识上的飞跃，是土地农有作为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开始，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准备在整个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开始前夕，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土地革命开展以来，广大农民迫切希望稳定地权。宣布允许土地买卖之后，由于土地农有政策未被确认，各地仍不断发布重新分配土地的决议和条例，以至进行土地的重分，使农民至今仍"不相信土地是分定了"，总"以为现在我耕的田，难保将来不归别人，因此耕种不肯尽力，妨碍生产，妨碍农民利益的保障与发展"。土地苏维埃公有政策的贯彻，以及反复平分土地，动摇了农民在土地革命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已给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现在要全面开展查田运动，如果再不明确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势必引起苏区广大农民的恐慌，给苏区农业生产造成更大的损失。6月1日，中央政府发布查田训令，同时责成土地部发布确定土地农有的布告。布告批评了苏区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以来，苏维埃政府不确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仍将土地反复重分的错误，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为了促进苏区经济的发展和保障农民利益，应对全体农民的土地实行一次全面登记，由政府统一发给土地证，用"土地证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后"他人不得侵犯，政府不得无故没收"。这个布告经中共中央同意颁布，是中共最高领导层首次宣布土地为农民私有，土地农有政策正式开始形成。

（四）抗战前夕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

查田运动到了1934年六七月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逐步丧失，无法继续进行，只好不了了之。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央苏区红军8.6万人进行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于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土地政策的转变创造了前提。

7月，共产国际七大，对组织问题作了一项重大决定，即今后各国共产党可以根据国际的决议精神，独立自主进行决策，这就为中共结合中国国情、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政策创造了又一前提。

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为土地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于是，中央在12月16日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这个决定正确分析了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形势下，“富农也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哪种情形，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因此，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现在已不适当了”。《决定》还总结以前土地革命的教训说：“我们在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常常造成消灭富农的倾向以至影响到中农群众，使他们不安，他们对于发展生产力减少兴趣。”因此《决定》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在革命根据地，“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咱由。……除统一的累进税外，苏维埃地方政府不能加富农以特别的捐款或征发”。这种政策的改变，对于争取富农参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然而，当时对地主的政策并没有及时地改变，仍然说“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

12月下旬，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会后，党中央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6年7月22日，中央根据半年多来形势的新变化，发布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土地政策作了几项重要的改变：对于地主，规定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而且“生活状况很坏的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对于富农，规定“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这个文件正式纠正厂王明路线“地主不分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过左政策，给了地主以生活出路，并且照顾了生活状况很坏的小地主和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利益，从政策上鼓励地主阶级积极参与抗日；对于富农，也从没收他们出租土地的规定变为不再没收他们的土地。这一切，对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进一步推动国民党转向抗日，党中央采取了新的重大步骤。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声明在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党作出四项保证，其中第四项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从此，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土地革命，逐步转变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

三、土地革命政策的总体评价

土地革命政策经历了近十年的演变，推动了根据地农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没收并分配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了根本的变革，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空前解放了苏区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支援了革命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即“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来说，土地政策运行的结果，是成功的。

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中，总的来讲，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开展得要好些，它比较早、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对其他根据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他根据地也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例如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关于中农土地不动，只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多余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的策，这些好的经验，不能不影响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对于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初步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初步形成，是中央和各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整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无庸置疑，土地革命政策既然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它就必然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战争的特殊环境，共产国际的遥控等不利因素均给中国共产党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带来了不良影响，从全党来讲，土地革命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侵犯中农利益。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当时中央和各地的土地法令与文件中，虽然一直强调联合中农，团结中农，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对中农的划分长期没有明确的界限，往往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而加以打击。

其次对富农打击过重。富农作为农村的一个劳动阶层同时一般都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他们与一般农民相比，占有的土地数量较多，质量较好，除自己耕种一部分外，大都把剩余土地出租，且都还兼有很重的高利贷剥削性质，但富农一般亲自参加劳动，与地主有别，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也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个人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的不尽相同，由于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存在与作用，“土地革命后，在农村必然发生新的富农经济”。因此，就算彻底平分土地后，贫富差距同样存在。对新生的富农经济以一定约束，

对富农封建剥削以一定限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企图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防止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使农村经济平衡发展，并把土地革命后改变了贫穷状况的农民当作富农加以打击，这不仅仅是消灭富农经济的问题，而且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幻想。

其三，肉体上消灭地主。地主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对象，是作为一个阶级消灭，而对于地主分子个人则应给予生活上的出路。但是，许多地区在分配土地时对地主采取了没收一切土地财产而不分劳动份地的做法，有的地方还将豪绅地主及其家属统统驱逐出境。对地主的这种肉体消灭政策，只能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

土地革命政策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一定时期的延续性。政策不稳定必然造成群众无所适从，也损害到决策者的威信，这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有深刻教训的。比如在中央苏区，1930年初之前，按规定的主要政策是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土地及公地进行分配，同时又赞成平分一切土地的主张，1930年2月确定没收平分一切土地，方法是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4个月之后，即1930年6月，又规定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同时，又把“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且加上了“何时分田何时得禾”，“分田即分青苗”的规定。政策变化如此频繁，同时又都规定，没有按新规定做的都得推倒重来，这样就直接动摇了土地革命后政府明确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其次，制定政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排除教条主义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搞土地革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苏联的一些经验是应该的，自然的。共产国际在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指导上也是有成绩的，但是学习外国经验和执行国际指示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如果脱离实际，生搬硬套，便是教条主义，必然造成危害。在六大以前，这种教条主义已经存在。由于六大总结了各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所以六大以后一段时间内，土地政策的发展比较正常，土地革命也开展得比较好。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以后，这种教条主义又在富农问题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了王明统治时期，这种教条主义更发展到了高峰。土地革命的过程充分表明，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最后，深入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历史证明，远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共产国际的部分决策者和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又以国际当然代表自居的工明等人往往脱离实际，他们的教条主义思想是贯彻正确土地革命路线的障碍。毛泽东等之所以自觉排除教条主义的干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可能执行正确的策略方针，这是由于他们处在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能深入实际、广泛调查研究。如正确的阶级划分标准，分田方法，没收土地问题，查田的方法目的和任务等。

毛泽东的深入调查研究为我党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客观依据。比如，为了解决赣西南土地斗争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作了大量的调查。1930年10月底，毛泽东在新余县的罗坊，亲自开调查会，详细调查了兴国县永丰区的土地斗争情况，并写了《兴国调查》。11月，毛泽东先后作了《东塘等处调查》和《木口村调查》，并写下了

《赣西土地分配情况》、《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等文件。在上述调查和文件中，毛泽东总结了地方党和群众创造的经验。还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准确地分析丁富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了解到由于经济地位决定，在土地革命深入时，富农中的许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从而在政策上作出了进一步限制富农和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抉择。

再比如，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自从八七会议提出“土地国有”的口号以来，历次土地法都是规定土地归政府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由于长期没有确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土地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此，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政府的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中，肯定了农民土地的私有权“别人不得侵犯”，并实行“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的原则，赣西南和闽西各地随即贯彻了这一原则。这就一方面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地权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允许分田后土地可以租赁买卖，就多一部分劳动力较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民上升为所富农，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我们看到，正是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等对限制富农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正确路线。

第二节　根据地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政策

一、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

在根据地，“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只有首先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更好地支持革命战争，并为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改善民众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和工农民主专政提供物质基础。

自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各苏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苏区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但是，革命解放生产力，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不等于生产的自然发展，要苏区生产力真正得到解放，关键还在于土地革命之后，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来组织生产。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对解放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等个体小生产者无法解决的困难，予以极大注意，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同时，充分发挥工农民主政权的作用，通过国

家财政、信贷的渠道从各方面给农业生产以巨大的支援，毛泽东等调查研究，总结农业生产的经验，为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

（一）组织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政策

土地革命后，苏区农村普遍存在劳动力严重缺乏，耕牛奇缺的现象。劳动力、耕牛本是农业生产的两大重要因素。在当时战争非常残酷的年代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劳动力与耕牛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苏区农业生产。根据赣西南各县调查统计：整个苏区内全部人口中，全有劳力的只占25%，无劳力或缺乏劳力的竟占到75%，四人中只有一个壮丁有充分的力量耕田。所以缺乏劳力原本就是苏区的大问题。

再看耕牛情况，兴国县长冈乡有437家农户，无牛的有109家，占25%多；在有牛的328家中，一家一牛的占50%（但小牛居多，十几元一头）；二家一牛的占15%，三四家合养一牛的占30%；五家以上共一牛的占5%；堪至还有，七家共一牛的。瑞金石水乡无牛的占30%，上杭才溪乡无牛的也占20%。这些材料说明，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25%，同时，在无牛的家庭中，又以雇农最多，在中央苏区大约有70%的雇农缺乏耕牛。1932年苏区粮食歉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劳动力和耕牛不足，造成荒田大量增加。

劳力不足与耕牛奇缺，严重影响了苏区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情况又直接关系到苏区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对于农业生产中的耕牛与劳动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一方面调动半劳力，特别是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购买和保护耕牛，解决生产急需，另一方面则吸取土地革命中期一些根据地的经验实行农业互助合作政策，积极引导、推广和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这既是客观需要，也是群众的迫切愿望。随后，党和政府在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了1929年在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一苏大”召开后，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广泛开展，并于1933年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各地合作社组织纷纷建立，形成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

互助合作运动经历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的逐步发展过程。耕田队的组织是，以乡为单位，成立一个耕田大队，设大队长一人，一般由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大队以下以自然村为单位，设分队（有的地方又叫“中队”）。分队下面再按代表区即感情相好、住处接近的分为若干小组（或小队）其人数三五户、七八户不等。

耕田队的劳动互助，起初以两种形式来体现：一种是专帮助红军家属的，做工不算工钱；一种是群众之间进行劳动互助的，要算工，付钱还工都可以。

劳动互助社是在耕田队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较之耕田队，无论是在合作范围还是经营管理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劳动互助社起初是每村一社，以后改为一乡一社，由社员大会选举三至五人组织管理委员会，公推一人为主任，每村一名委员，以负责日常工作。

劳动互助社的主要任务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和帮助孤老。帮助红属是纯义务的，帮助孤老是只吃饭，不要工钱，一般是每个劳力每月五个工。社员之间互助，则按工日计算工资，其标准由社员大会议决。

综此可以看到，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组织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

助红属与群众互助。

为了克服耕牛缺乏的困难，党和苏维埃政府指示农民组织犁牛合作社。1933 年 3 月和 4 月相继制订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号召全苏区人民“组织犁牛合作社”、大力“发展耕牛运动，”伺时，政府在财政信贷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持。于是广大农民以没收地主的以及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为基础，共同集股买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或犁牛站。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解决耕牛缺乏的办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由于这个办法切合当时农村的实际，又得到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和推广，各地竞相仿效。人股办法是：按社员分田份数，每份一股，有钱的交钱入股，没钱的以谷折钱入股，每股多少由合作社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有牛（或犁）户以牛（或犁）入社，由社根据牛（或犁）的好坏，先予评价，然后扣除其应交股金。犁牛合作社根据农户分得的田亩多少调剂使用。社员所借农具的期限和数量多少，均由委员会根据其田亩担数与耕牛能力大小以适当分配。

除上述三种基本形式外，还有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生产合作社。这些形式，因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只是在部分或少部分地区实行。

农业互助合作政策，在执行中坚持了三个方针：(1) 通过宣传教育，实行自愿互助的方针。苏区各地的合作社，都是劳动群众自愿发起、自愿集股、自愿加人的，有“加入或退出的绝对自由”。第一期未加入的，到合作社对群众的实际利益后，第二三期陆续加入。党和政府在合作社运动中，历来强调：“合作社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经济组织，所以一定要形成一种运动，绝对不可有丝毫的命令、强迫的行为，主要是要从宣传鼓动工作去动员群众自动来入股”。社员数量无限制，准许自由陆续加入，“股金”以家为单位，其一家愿入数股者听便，社员还有“转让其股权于承继人之权”。(2) 坚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兼顾的分配原则。各合作社章程都规定，合作社在红利分配上，除各项开销外，“每期纯利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管理委员及社员奖励金，百分之十为社会公共事业，百分之三十按营业额比例分配给社员”。这种分配原则，既保障了合作社的集体利益，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和社员的公共事业，又照顾了社员个人的利益，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是较为合理公平的。(3) 农业互助合作政策还体现了互助合作的阶级原则。1933 年上半年，苏维埃中央政府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其中《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规定：“加入互助社者以家为单位，凡是农民（贫农中农），农业工人及其他有选举权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可加入，但地主、富农、资本家及其他无选举权的，一律不准入社”。1933 年 3 月，《中央土地部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中强调：“雇农贫农及红军家属等为该犁牛站的基本站员”，“非站员的基本农民群众，如要求加入犁牛站愿出相当入站基金，应可加入。富农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则不让他们加入”。在这里，互助社以贫农、中农和农业工人即雇农为基本力量，地主、富农、资本家无权入社，这种阶级原则团结依靠大多数，基本是正确的。

农业互助合作政策的推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组织地调剂了农村劳力，耕牛和农具，保证了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切实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促进了苏区扩展红军工

作，鼓励了红军的士气；平抑了工价，抵制了牛税剥削，保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增进了贫苦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支援了革命战争。

（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

“民以食为天”，根据地农业生产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是粮食问题，几百万群众用粮，十几万红军需粮，无时不困扰着苏区党和政府，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多次作出了狠抓粮食生产的部署，动员根据地军民“为粮食而斗争”。1933 年 1 月，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土地部联合发出《发展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布告，明确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第一是米谷，第二是杂粮（番薯、豆子、花生、麦子、高粱等），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第五是竹木，第六是木梓，第七是烟叶，第八是牲畜（猪、羊、鸡、鸭等）。这些生产，一半是人民的粮食，一半是工业原料，是发展苏区的基础。”布告将粮食生产列为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可见苏维埃对粮食生产之重视。

苏维埃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极为注意发展多种经营。除粮食生产外，还有计划地积极种植棉麻、烟叶、茶叶、竹木、牲畜等。棉花短缺是当时苏区的一大难题，1933 年中央国民经济部、土地部在《春耕运动大纲》中强调指出：“缺乏棉花是苏区一个大困难……各地政府要赶紧督促实现，要集合种棉经验指导群众。”

在土地部发展多种经营的指示下，1933 年 2 月，福建省各县区土地部联席会议决定：“多种杂粮菜蔬，每家至少要比去年多种二种。”为补粮食不足，“马上要进行多种的是：青菜、包粟、早蕃薯、早芋子、黄瓜、南瓜、豆子、豆果、早粟子、荇菜、茄子、瓠子、接瓜等”。

在各收政府的领导推动下，中央苏区“在杂粮种植方面，1933 年已经超过革命前的水平。”1934 年“杂粮菜蔬，除了那些受敌人摧残的区域，更是普遍的大量的增加。”

由此我们看到，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

（三）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和品种的政策措施

从 1933 年开始，苏区自上而下地制订了农业生产计划。如中央土地部在 1933 年《春耕计划》中提出：每担谷田比 1932 年平均多收 2 斗谷子，即增加 20%。在 1934 年《春耕计划》中又提出：“增加谷类二成生产。”此外，还制订农事活动计划，如开荒、植树计划等。为了促进计划完成，提出在财政、信贷、商业、工业等方面扶持生产。

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 1933 年制定了各种政策，以指导和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1933 年 2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了《开垦荒地荒田办法》，5 月又颁发了《开荒规则指示与开荒动员方法》，规定“凡是工人苦力雇农贫农中农及一切有选举权的群众所开发的无主的荒田荒地，即属于开荒人所有……准许三年不收土地税。”在这种政策下，提高了农民开荒、垦荒的积极性。1933 年“在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消灭了二十一万余担，与闽浙赣合计，共消灭了三十二万担”荒地。

为了搞好农业生产，苏维埃中央政府还组织生产竞赛，实行奖励耕种的政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展开了以春耕、夏种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竞赛。如个人与个

人，区与区，乡与乡，县与县之间的竞赛。对竞赛优胜者，实行奖励，采取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中央政府在《为提前春耕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事》的训令中指出：各级政府务须“定出革命竞赛和奖励办法，谁乡谁人的土地先耕完，河圳先修好，肥料种子先准备好，先播种，先下秧，即由县区政府给以奖励。”主要是授予奖状、奖旗、光荣牌，或苏区刊物表扬，物质奖励一般是奖给种子、农具、耕牛等。

为保障农业稳定发展，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对苏区农业基础建设提出了具体措施：

首先是号召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1928 年 11 月 28 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井泉溪沼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1934 年 4 月，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阐明了水利事业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苏维埃中央政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央土地部在 1933 年 4 月 22 日发布的夏耕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水利：水陂、水圳、水塘，不但要修理旧的，还要开筑新的。缺水地方要在高地开挖水塘，水车未修理好的要继续修好。沿河地乡要设置筒车”。“水是稻田的命脉，无水则人工、肥料都成白费，区、乡政府要组织水利委员会去领导全区、全乡水利的开发”。为此，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在土地部下设立了“水利委员会”，具体领导各县、区、乡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如瑞金县，到 1934 年春，根据九个区的统计，“百分之九十四的田受到水利的灌溉”。

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经营农业中为调节气候和防止水土流失，号召植树造林。早在 1933 年 3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就作出了《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指出：“为了保障田地生产，不受水旱灾祸之摧残以减低农村生产，影响群众生活起见，最便利和有力的方法，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旱灾的发生。”并制定具体办法，要求各级政府执行。

根据地群众响应政府的号召，掀起了群众性的植树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34 年春仅“瑞金植了六十万三千七百多头（棵），兴国三十八万九千八百多头，就是多山的福建，也种了二十一万三千八百多头，并且还种了木梓种一千六百九十斤”。

再次，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就指出：“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业品展览所，都是迫切需要的。”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利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一方面注意宣传科学种田，传播农业生产知识，一方面组织各种农事试验场和研究所，推广农业先进技术。1933 年 9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在瑞金直属县设立厂农事试验场，进行了典型引导。虽然规模有限，但对“供给各地农业上的经验与智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四）群策群力，开展生产竞赛，推进农业生产

在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大力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开展农业生产运动。群策群力，开展生产竞赛，就是当时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

由于苏区青壮年男子大部分都当红军上前线去了，妇女便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政府“用极大的力量发动全体妇女，参加耕作生产”，并在乡苏维埃政府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教育广大妇女群众莳田犁田耙田等主要的生产工作。苏区广大妇女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广大青年组织了青年春耕模范队、共耕突击队等，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根据地，广泛地开展了生产竞赛，奖励先进。“发展生产，以革命竞赛的方式发动个人与个人、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各种生产的比赛，个人或某乡某区某县生产比一般的特别好者，政府可酌情量形奖励，鼓励群众努力耕种”。生产竞赛均先订立竞赛条约，写明竞赛项目的最高标准，到竞赛结束时评出成绩，成绩最好的由政府奖励。奖品包括农具、耕具、种子等。这种用生产劳动竞赛的方法鼓励发展农业生产，表扬先进，树立典型，推广先进经验的办法，对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大力发展军需民用工业和合作社工业的政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多处在贫瘠山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极为落后。现代工业几乎没有，只有在县城和圩镇上才有专业性的手工业和少数手工业作坊。随着革命战争的向前发展，这种分散的、个体的、技术落后的手工业是满足不了战争环境下的军需民用的。为了保证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的物质供应，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就必须大力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党和苏维埃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大力发展军需工业，组织生产合作社，恢复、引导原有手工业的发展的政策，从而使根据地的经济发生了变化，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创办各种公营工业，大力发展军需工业

土地革命开始以后，在根据地处于频繁战争和敌人经济封锁的条件下，为了保障战争的需要和维系新生的红色政权，根据地兴办了以中央兵工厂为主体的一些军需工业。

1927年10月，毛泽东和红四军在茅坪步云山、茨坪等地创办了小型兵工厂——红军修械所，这是根据地最早的军火工业。1931年10月，中央军委兵工厂由中央军委修械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处和红三军团修械所合并而创办。中央兵工厂是中共中央及军委在中央苏区建立的规模较大的军火工厂。除此之外，在中央苏区的兵工厂，还有莲花兵工厂、红四军军械处、闽北兵工厂、赣东化兵工厂等。军需工业中，还有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中央造纸厂等国营工业企业。

在政府投资组织兴办的国营工业中，除上述军工性质的工业外，还兴办了一些出口工业，如1931年，中央钨砂公司的创办，成为当时中央直辖的重要国营企业。

为发展根据地经济和保障工农群众的需要，还兴办了必要的公营民用工业。如中央苏区就有：长汀造纸厂、长汀印刷厂、汀州弹棉厂、长汀樟脑厂、长汀织布厂、瑞金织布厂、于都卫生材料厂、无线电器材厂等等。

各地苏维埃政府还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办起了一些小型民用工业，如兴国有樟脑厂、锅炉厂、被服厂、斗笠厂等；瑞金有纸烟厂、缝纫厂等；宁都有夏布厂、纺织厂、草鞋厂、石灰厂等；于都有铁厂、铁矿、煤矿、造船厂、锅厂、碗厂、农具厂等等。

针对苏区公营工业在部分地区盲目发展的情况，苏维埃政府对公营工业进行整顿，提出将部分公营企业卖给私人经营或租给群众集股的生产合作社经营。毛泽东批评了盲目发展公营工业的作法，指出“进行各种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决不能“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

总之，“一苏大”以前，苏区工业主要是为红军服务的军事工业，到“一苏大”后，便发展成为军需民用的多种工业。这种工业发展的目的也逐渐明确为“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

（二）组织生产合作社，恢复、引导原有手工业的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手工业在工业中比重最大。为了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以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并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手工业，并且用合作社的形式把个体经济的手工业组织起来。

早在1929年，党就确定了在根据地创办生产合作社的方针。提出的政策是：“办生产合作社，由苏维埃出本钱，叫工人来工作”。在创办每一种生产合作社时，党和苏维埃政府首先宣传它的目的和意义。苏维埃明确指出：合作社组织是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和怠工，保障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有力武器。”

为鼓励兴办各种合作社组织，苏维埃在财政、金融、税收、运输等方面采取种种优惠政策。1931年1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暂行税则》规定：“生产合作社经县政府批准备案的得由县政府报告省政府，许可免税。”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分配与信用合作社及生产：合作社的各二十万”在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1934年4月12日，颁布的《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政府并在各方面（如免税、运输、经济、房屋等等方面）来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生产合作社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仅中央苏区内，生产合作社的种类就有二三十种之多，如造纸、织布、织袜、炼铁、铸锅炉、造农具、烧石灰、烧砖瓦、刨烟、缝纫、织夏布、熬硝盐、樟脑、樟油、制陶器、造船、雨伞、瓷器、木器、篾器、染布、制糖、烧木炭、挖煤、石膏等等，从而把以前分散的、个体的手工业用生产合作社组织起来。

随着生产合作社组织的蓬勃发展，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合作社的管理。规定了合作社的性质、组织、分配原则和管理办法，使合作社组织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32年9月19日，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发了《合作社工作纲要》，在合作社性质、入社、退社、股金、分红等方面，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三）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业

由于在苏区工业比重中，是手工业占主体，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业，只是在城镇有少数，当时党和政府对私营工业的政策与私营商业的政策相同，均是采取鼓励、保护的政策，（详见私营商业政策部分）。

三、积极发展公营商业的政策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业是生产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联系不可缺少的纽带。人们通过商品交换，能得到各自所需的商品。

根据地的商业肩负着保障红军物质供给的任务，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了扼杀革命政权，在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封锁，破坏根据地的商业和对外贸易，致使根据地工业品匮乏、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下跌。

由于货物进出口阻滞，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愈益扩大，根据地的军需供应和群众生活发生困难。“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为此，中共中央就必须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沟通内外贸易，活跃物资交流。而根据地的商业是由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构成的。其中，公营商业系指苏维埃政府投资兴办的商业，虽然它在根据地商业中还不占绝对优势，但它与合作社商业配合起来，在苏维埃政权的行政力量和经济杠杆的保护下，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保障军民的供给方面，都起着其他事业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

由于根据地的条件十分艰苦，人力、物力和财力又十分有限，同时，战争军费支出占了苏区财政收入的大部，因此，政府大规模地兴办公营商业是不可能的。当时，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这当然包括公营商业。

苏区兴办的公营商业是从公卖处开始的，当时有两种经济形式：一种是公营的，如茨坪公卖处是由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用打土豪筹得的款子和战争缴获的物资兴办起来的，这种公卖处具有公营经济性质。另一种是集股的，如大井乡等地的公卖处，资金是由群众自动集股凑集的，公卖处到白区购进货物后卖给群众，到年终按股分红，这种公卖处是集体性的。

类似上述公营性质的公卖处，还有公营商店、药店、饭店、粮店和商业公司等。

兴办公营商业的目的是苏维埃政府利用国营经济力量来平抑物价、稳定金融、打击奸商。比如1930年6月闽西苏区成立的粮食调剂局就是针对工农业产品间的价格剪刀差现象，一些奸商乘机囤积廉价购来的粮食，到青黄不接时高价抛售，哄抬粮价的现象设立的。闽西粮食调剂局的成立一度起到了平抑粮价，打击奸商，保障军需民用的目的。在总结闽西粮食调剂局经验的基础上，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3年还成立了粮食调剂总局，为解决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起了很大作用。对此，中央政府粮食调剂总局局长吴亮平说到：“经过了我们党的动员，与各地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努力，在群众的热情拥护之下，我们迅速的解决了粮食的困难，在解决今年（1933年）春夏粮食困难的中间，我们的粮食调剂局起了相当的作用”。

苏区公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联合，利用苏区政府财政、金融、信贷体系，对苏区商业起着支配作用。

合作社是“党与农民群众的连锁”，是苏区经济建设战线中的重要一环，在苏区国民经济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苏区合作社的创办最初是源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奸商的捣乱引起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为此，1929 年闽西特委在确定闽西党对付剪刀差政策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措施便是“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奖励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贷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同年 11 月，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社创立。1930 年 3 月，闽西召开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政策决议案》专门将“发展合作社组织”作为一项重大政策，并具体指出：“一、规定合作社条例予以保护。二、各处合作社要纠正过去照股分红之错误，要照社员付与合作社之利益比例分红。三、各地尽量宣传合作地方，要进一步组织区或县合作社。五、政府经常召集合作社办事人开会，讨论合作社的进行方法。”5 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合作社条例》，发布各地施行。

闽西创办合作社经验推广以后，各苏区亦相继建立了合作社。1931 年 11 月，“一苏大”对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予以高度的重视，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指出：“为着整个苏维埃贸易与保障劳苦人民的利益及改良劳动群众必需品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苏维埃对于合作社，应该以财政的协助与税的豁免，苏维埃应将一部分没收的房屋与商店交给合作社使用，并且为要保证劳苦群众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提倡公共仓库、储藏粮食以便实行廉价供给与接济。”足见苏区政府从政策上的大力扶持。

为了引导各地合作社走上规范化，加强组织管理，苏维埃中央政府于 1932 年 4 月颁布了《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该条例正式宣布“合作社组织为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抵制资本家的剥削与怠工，保障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有力武器，苏维埃政府并在各方面（如运输、免税、经济、房屋等）来帮助合作社之发展。”

正是有了正确政策的引导，合作社商业日渐在苏区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四、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变化

总的说来，根据地制定了保护、奖励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但受到了三次“左”倾错误的干扰。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左”的政策。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分析中国各阶级的革命态度时，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豪绅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而且店东小资产阶级也“必然是反革命的”。这就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都等同起来，其结果势必在政策上一同加以打击。因此，土地革命初期，即执行了所谓“使小资产者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曾出现伤害私人工商业的现象。

1927 年底，井冈山开创初期，“我们曾犯过一些错误，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冈山”。中央还指责井冈山的烧杀太少，行动

太右。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1928年）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者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

广东海陆丰地区，在彭湃领导下，于1927年11月，成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并着手土地革命。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同时还宣布：“没收工厂归工人，由他们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即是混淆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实行一律打倒，把许多小资产阶级也推进了反动派阵营，海陆丰革命政权权存四个月就丧失了。

过左政策的受挫，致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始抵制“左”的影响，逐渐提出了正确的保护私人工商业的政策。

毛泽东早在1926年3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分析认为：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小贩属半无产阶级，其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们的政策应是政治上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政策。

由于中国民主革命是彻底的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对于私营工商业也应剥夺其封建剥削的部分，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

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规定了对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对城乡小商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账簿和废除账目。”

1930年3月25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商人条例》规定：保护商人，不得侵犯商人、骚扰商店，允许商人自由贸易，不限制价格等。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了全党，使一度在苏区实行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中止。李立三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为使民主革命彻底，还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各地烧商店、烧账簿、杀商人、重派款等行为重又发生。比如，1930年7月30日，红三军团攻进长沙时，执行了过左的城市政策：大商店一概实行没收，银行大部捣毁，而筹款工作又是实行派捐和收房租，结果款项的负担落在中小商人，以至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身上，结果是整个城市陷入非常混乱的状态，最后只能撤离城市。

不久，立三路线在苏区受到抵制。1930年10月，峡江会议后，毛泽东给闽赣特委的信中指出：“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从而肯定了以前所执行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但在阶级原则上，突出了保护于革命有利的私营工商业政策。

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为制定、推行

正确的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年12月，“一苏大”通过的《经济政策》就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钓商品市场关系。”随后不久，一系列正确的发展私人工商业的政策也出台了，如鼓励私人投资。1932年1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就颁布了《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以鼓励私人资本的投资。条例规定：“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这个条例的制定和颁布，尽管后来在实践中由于革命战争和“左”倾政策的影响，私人投资兴办企业数量不多，但这一决策本身无疑是正确的。

为了发展苏区的社会经济，充裕苏区的经济实力，苏维埃中央政府除鼓励私人投资外，还允许私人租赁，规定私人资本可以向苏维埃政府承租矿产开采、商店、作坊等，并于1932年8月颁布了《关于矿产开采权出租办法》、《关于店房没收和租借条例》等文告，公诸于苏区工商界，“招商投标”。这些条例颁布以后，在苏区私营工商界引起反响，不少私商纷纷向苏维埃政府投标承租、订立合同、交纳租金，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出现活跃和发展的苗头，但为时不长，到1933年“左”倾中央领导机关迁来中央苏区后，便停止实施了。

不久，“二苏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亦明确规定：“一切苏维埃的商业机关必须尽早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发生多方面的关系。苏维埃政府除以关税政策来调剂各种商品的输出入外，保证商业的自由，并鼓励各种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积极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

在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一方面声称保护私人工商业，奖励私人投资，允许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又反对资产阶级，片面强调维护工人利益，规定过高的劳动条件、工资标准和税收政策，把地主兼营的工商业也加以没收，甚至把商人当土豪打。这就打击了私人商业，使保护私人商业、发展私人商业的正确政策难以贯彻，影响了苏区商业的发展。相反，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都清楚地表明：土地革命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创建苏区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对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实行了保护和奖励政策的。正是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才保障了苏区私营经济的发展与根据地的日益巩固。

第三节 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外贸政策

一、苏维埃的财政管理政策

财政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红军和苏区政府工作人员及革命战争给养与供给的保证，它具体表现为苏维埃国家资财的收入、管理、分配和支出等经济活动。为

了适应苏区斗争和建设的需要，财政建设必不可少。苏区财政工作经历了由军队筹款自给到建立各种税收制度的转变过程，形成了各个不同时期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

土地革命初期，财政工作的起步是确立筹款自给的方针。这一政策的形成是基于将打土豪筹款作为财政收入重要的来源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手段在战争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意义。在政治上，打土豪筹款是开辟新的根据地，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环节。“当时发动群众的主要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债务和苛捐杂税，没收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等。”在经济上，打土豪筹款是打击地主阶级残存经济力量的重要手段。“为了根本消灭地主阶级一切经济上的根据，为了削弱富农的经济势力，用地主罚款富农捐款的方法去进攻他们是完全必要的。”中央财政部在《筹款方法》中认为：“把土豪打完了，财产没收了，又可以消灭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势力，使他们减少反革命的活动，所以打上豪筹款不单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是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必要工作。在财政上，打土豪筹款是财政上舶重要收入。因苏区初创时期，打土豪筹款还是目前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在老苏区固然不能靠打土豪过活，而忽视税收，但又不能借口税收而放弃筹款工作。”根据土地革命时期游击战争和根据地不稳固等特点，党确立的主力红军筹款自给的方针是正确的，因为红军的财政收入由部队筹款自给，既表明了革命所要针对的对象、任务，也给了群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土地革命的深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于是，在苏区实施了征收土地税的政策，使红军的粮食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这一时期粮食来源主要来自土地税的收取，但经费还必须靠筹款。因此，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是坚持军队筹款自给和实行税收并存的财政政策。

当时税收也已成苏区财政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主要有土地税、商业税、公营经济收入等。为根据地提供财政收入的作用日益明显。因而，确立正确的税收政策非常必要。苏维埃中央政府于 1931 年 12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并发布了《暂行税则》，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暂行税则》规定税收种类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 3 种。在当时为促进苏区的工业发展，暂时免收工业品的出厂税。并特别说明政府根据农民的经济状况，征收农业累进税，目的在于：为维护苏维埃政权，为扩大红军、赤卫军等的需要，以及增进群众利益，为设立红色医院，创办各种学校，便利交通，救济失业民众，抚养老残废等需要。

在税收政策上，同样体现着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1930 年 8 月，《中国革命军事土地法》规定“土地税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农业税的负担政策也充分体现了阶级原则。毛泽东在“二苏大”工作报告中指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税收的基本原则，同样是重担归于剥削者”。临时中央政府发表的《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中指出：“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因此，苏区政府对农业税的征收对象及标准、起征点、累进率及减

免办法均体现了党关于农业税负担政策的阶级原则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

财政收入是财政工作的主要方面，而财政工作的另一方面，则是从政策上规定财政支出。毛泽东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所作工作报告中提出："财政上最主要的用途，是用在发展战争方面。"其中，红军官兵的生活费供给是财政支出的最大的项目。在明确财政工作主要任务的同时，党和政府还确立了财政开支的主要内容：除支援战争外，建立和发展苏区经济是财政开支的另一方面。财政开支的重要内容也在于支持公营经济、扶持合作社经济、支援农业生产，同时还要保证必要的文教卫生和社会救济之用。

中共中央和苏区政府在财政支出的方针政策上倡导节省、节约的原则。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提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中央政府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中央政府还要求：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约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同时要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积极的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地自动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为保证财政收入的合理使用，苏区政府提出了严肃财经纪律、反对贪污浪费的原则。"严禁一切浪费，凡未得上级批准而故意浪费者，除依照财政条例惩罚，并责令机关赔偿……对于政府中的贪污腐化分子要以革命纪律来严厉制裁。"这些，对在政治上巩固苏区，扩大根据地的影响，经济上保障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有着重大意义。

为使苏区财政收支规范化，在制度上统一财政，加强管理，苏维埃政府先后建立了统一的财政规章制度。如建立预决算制度，统一税收，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建立审计制度以及建立国库制度等。

土地革命后期，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苏区中止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提出单纯靠征税来提供财政收入的政策。苏区中央局于 1932 年 6 月 27 日通过决议要求"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地迅速行动，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从而改变了苏区所执行的主力红军筹款自给与征取税收并存的政策，红军需用粮款改由政府负责供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在 1932 年的工作报告中说："自东路军向漳州四师以来得到共产党中央之指示，中央政府坚决执行进攻政策，要红军专负作战任务，迅速进攻敌人，为要实现这个任务，我们的财政工作就必须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而做到政府负责供给红军战费，这是苏区向外发展的必须的前提，也就是整个苏区财政工作路线大转变的开始，由七月以后，前后方红军给养已是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

然而，在农村根据地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税收是有限的，是不能完全保障红军给养的，这就需要红军在战争中向苏区、白区的土豪劣绅筹款，单靠税收和地方筹款，在实践中无法保证红军的给养。有鉴于此，1933 年 1 月 11 日，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开展节省运动和加紧筹款以进一步充足战争经费》的训令，恢复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

1943年1月，在“二苏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苏维埃的财政政策进行了阐述，使苏维埃财政政策得到完善，其基本原则有：

第一，苏维埃财政的目的是保障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毛泽东指出：“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

第二，苏维埃的财政建立在阶级和革命的原则之上，有着广泛的财政来源。毛泽东说：因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执行了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其来源有：（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第三，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毛泽东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苏维埃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开始表现出来的。”

第四，苏维埃的财政支出必须坚持节省的原则。毛泽东指出：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泽东的上述阐述，是土地革命时期财政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其基本精神不仅为当时的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还对以后的革命战争时期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财政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二、苏维埃的金融货币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金融政策主要是围绕着两方面的中心任务来制定：一是紧密结合土地革命斗争，摧毁旧政权的金融体系，废除一切封建的债务关系，二是创办苏区金融机构，发行纸币，铸造银元，建立新的信贷体系。

（一）废债、废除高利贷剥削的政策

废除封建债务就是摆脱封建剥削，尤其是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中国农村高利贷剥削很残酷，利率高达30～50%，甚至100%，有钱利、谷利、当利、青苗利等等形式。废除这种封建剥削，是土地革命的一项内容。1928年2月，红军攻下遂川城，起草了《施政大纲》，毛泽东与陈正人把“废除债务”改成“借土豪的钱不要还”。这里突出表明我党的废债政策是破除旧的债务关系，废除封建债务。

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相关的金融政策。“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中宣布要“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进军途中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布告》提出“党的主张……债不要还……外资外债，概不承认”。1929年7月，中共闽西党一大总结废债斗争经验，制定了债务政策，对不同的阶级规定了不同政策。1930年赣西南苏区的二七会议，在废除债务问题上的政策规定和中共闽西“一大”大致相同。

由于豪绅地主是主要打击对象，反映在债务政策上就是“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债约限期缴交苏维埃或农会焚毁”，反之“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缴之债务，不论新旧都要还清”。关于工农穷人相互之间及其与商人之间的债务问题，则规定：“工农穷人欠商家交易之账而非商业高利贷者仍旧要还，

但非本身之账不还，年限太久之账不还。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账，革命以前借的厘金或还或免还，由乡区苏维埃按照情形适当规定，革命以后借的当然要还。”

1930年6月，南阳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8月，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在废债问题上明确规定：“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富农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契约限期交苏维埃或农会焚毁。”

鉴于各根据地对债务问题实行的政策不一，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一苏大”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统一规定：“取消过去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与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各种债务，严禁预征或债务的奴役，应以革命的法律，严防并制止一切恢复奴役与高利贷关系的企图，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交给苏维埃。”正是在废除一切封建剥削关系的基础上，苏维埃中央政府统一了废除债务的政策，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

（二）创设银行，统一货币发行、统一金融的政策

土地革命摧毁了旧政权的金融体系，在废除封建债务的同时，着手创办红色金融机构，发行苏维埃货币，建立新的信贷体系。

苏区最早创办的苏维埃银行是东固平民银行，由黄启绶任行长。平民银行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用油印机印制苏维埃纸币并投放市场。在闽西，1930年11月创办了闽西工农银行，发行了三万张面额为一元、五角、三角的三种苏币，每元价值与光洋同价，而且设立了兑换处。由于工农银行有充足的基金，因而“苏币”的信用很高，币值相当稳定。

1931年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心在苏维埃区域内，重建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创立，毛泽民任行长。同年7月7日开始正式发行统一的新纸币，叫“苏维埃国币”。

随着银行金融业务的扩大，国家银行的规模也迅速发展，人员增至50余人，职能机构不断完善，设有总务处、业务处和国库科、会计科、总务科、营业科、出纳科、发行科、保卫科等。国家银行总行下设江西省分行、福建省分行及瑞金直属支行，还在白砂、南阳、瑞金、兴国、会昌等地设有兑换处、收买金银处，在苏维埃和各军经理部设立了几十个代兑处。与此同时，各地的信用合作社也统归国家银行管理。这样，在中央苏维埃区域，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崭新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根据地也实施了统一的金融政策。

统一货币政策。在旧政权的金融体系下，各根据地残留着形形色色的土著银行、钱庄等，杂钞劣币充斥市场，货币交易混乱。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规定：“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禁止这些银行发行任何货币，苏维埃应严禁银行家利用本地银行实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切企图。”

统一货币发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规定，苏维埃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根据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这一决议，国家银行于1932年7月7日发行了在根据地统一使用的新货币，停止和收回了江西、闽西等地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同时又规定：“苏维埃区域内的旧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

埃须对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币，外来的货币须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

统一借贷政策。取消和废止封建剥削的高利贷以后，根据地内的信贷关系还是存在的，如私人之间，集体对银行、信用社的借贷等。为此，1932 年 2 月 1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借贷暂行条例》中规定："苏维埃的政纲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但"国家银行、信用合作社或私人借贷非高利贷性质的周转和帮助某种生产事业而举行的各种借贷"，"苏维埃政府不加以干涉"。但对这种非高利贷性质借贷的利率有所限制，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过一分。短期利率期终付给，长期利率每周年付给一次或分季付给，一切利息都不能利上加利"。

由于有了较正确的金融政策与方针，较好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及时纠正了一些盲动的"左"倾现象，苏区金融建设为苏区的经济建设起了重大作用，这集中体现在集中资金、支援革命战争、把现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去。而解决现金的办法在于：发展外贸，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工业生产，减少进口，设法开采收集银矿，制造纸币，制止私商富农贮积大批现金，发动群众充实储蓄款，巩固苏维埃金融。

三、苏维埃的对外贸易政策

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指苏区对国民党占领区（白区）的商品交换关系。"当时的所谓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以货换货、以物换物"。

苏区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为了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克服经济封锁给苏区带来的困难。根据地初创时期，敌人就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日益加深，叫嚣要达到使红军"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投"的程度。

敌人的经济封锁，给苏区人民的生活、军队的供给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苏区所需的日用品、食盐、药材、布匹、煤油等因不能进口而匮乏。"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这样，"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 1933 年 2 月召开第 36 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局。中央政府在《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的第十号训令》中指出："扩大对内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

在对外贸易运营过程中，苏维埃中央政府根据各苏区的实际情况，实行了灵活、宽松的对外贸易政策，既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又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出口产品由对外贸易局直接经营（如粮食、钨砂等），但又不统制所有的进出口货物；既以关税调节商品的输出和输入，又绝不实行过早的"对外贸易垄断"。并鼓励各种私商寻找新的商业关系、开辟通商道路，以发展苏区的社会经济。

首先，奖励私人输出与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这是苏维埃政府对外贸易的一项基本政策。毛泽东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对外贸易局与各种商业机关必须更加健全起来。同时奖励私人商业，使他们为输入与输出各种必要商品而努力。"会议批评了外贸的过早垄断，"对外贸易的垄断在目前是错误的。一切苏维埃的商业机关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发生多方面的关系"。

奖励和保护私商进出口商品，在具体措施上，（一）实行优惠的进出口税收政策。为了充裕苏区经济和保障军民日用品和军用品的供给，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2年8月，以"减收半税"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和吸引私商输出和输入商品，并就此发布了第二十号命令，规定："凡是从苏区将出产品如谷米、豆子、菜油、木、烟、纸（粮食不够的地方例外）及一切农产品，以及从白区贩运下列各物来苏区者照其应纳之营业税，一律减收半税。计列减税之进口物品如下：盐、洋油、火柴、棉花、线布、棉布、药品、医药器具，印刷材料、钢铁、兵工厂药料，电话电报材料、手电筒、电池、汽油。"（二）加强出口货物和现金的管理。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实行鼓励、优惠政策的同时，又加强了对出口货物（尤其是粮食出口）和现金的调控和管理，规定了凡去白区的商人，须持有"三证"即保卫部门的护照、出口部门的货物出口特许证，财政部门的现金出口证等三证，方可通行。

其次，贯彻群众路线。苏区党和政府号召军民与敌人作斗争，发动群众到白区买回紧缺商品，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采购和运输苏区紧缺物质。对此敌人防不胜防，哀叹道："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而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而且他们都是道地十足的老百姓，还顺便做着耕作、渔牧、小贩一类事情，怎能容易识破?"

最后，利用矛盾、分化敌人、抓住时机、开展外贸活动。如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中央苏区通过与十九路军的关系，向白区输出钨砂和农产品换回大量食盐、布匹、药材等商品。此外，还利用敌方人员大多贪图财利，常采用贿赂和收买的办法从白区采购物资。

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比如在中央苏区，大宗出口是粮食、钨砂，大宗进口是食盐、布匹。粮食出口"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再如福建"对外贸易工作也得到相当的成绩，如宁化新泉、上杭分局的设立，食盐、洋油的进口，纸（三百余担）及莲子的出口，使苏区特别是汀市，经济较前活跃"。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总结说："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取得到初步的成绩"；"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毛泽东称对外贸易为发展苏区经济的"枢纽"，足见对外贸易的作用之重大。

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外贸建设，由于较少受到"左"倾路线的直接干扰，基本上是健康发展的，具有长远意义。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已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形势决定中共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抗日，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国共合作，有利于全国同仇敌忾团结抗日出发，转变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打土豪以充财政经费、征收地主富农钱财等经济政策，实行了适应抗日民族战争的新的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敌伪的重重包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自己动手，实行了生产自给政策，使根据地实现了丰衣足食。总的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适应了中国抗战的需要，且为中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后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转变

一、政策转变的由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1933年初又进攻华北长城各口，侵入关内，矛头直指北平、天津。1935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脱离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地位。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必将会强烈地反抗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要求国民党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方针，团结一致，进行抗战。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之下，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进行了局部抗战，如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也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以学生为主力军的“一二九运动”把抗日民主运动推向高潮。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大义出发，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的局面，逐步建立了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和国内的新情况，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正式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1937年2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项要求，并作出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别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封电报表明，党的策略路线已开始实行转变，即把"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路线，改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策略路线。

路线决定政策，党的策略路线既然已经转变，当然党的各项政策也要作相应的调整。调整的根本方针是：一切政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党的经济政策同其他各项政策一样，在过去主要是为着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制定的，现在则要求经济政策必须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相适应。所以要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使经济政策适应民族战争的要求，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必须进行调整和改变。

二、土地政策的转变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分配土地的办法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以原耕地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种政策在当时对打击地主、富农的反革命气焰，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但它不适应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情况下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需要。特别是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各根据地对富农、地主基本上是实行反对和消灭的政策，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侵犯了中农利益，造成了社会的混乱。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民族战争日益紧迫，富农开始参加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来，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地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也在不断的分化。为了使党的经济政策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相适应，就必须改变过去的土地政策，以尽可能地团结富农、地主一起抗日。否则就会把地主、富农推到侵略者和反革命的怀抱中去。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1. 对富农政策的改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富农政策的改变是分二步进行的。

第一步，在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从三个方面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一是取消了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政策，提出要联合包括富农在内的整个农民阶级，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二是改变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提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如某一乡村大多数农民要求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应当照普通农民一样，平均分得土地。”三是规定“除统一的累进税外，苏维埃地方政府不能加富农以特别的捐款或征发”。这三个方面的改变，纠正了土地革命后期在富农问题上的过左政策。第二步，在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明确规定：“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至此，党对富农的政策，基本上适应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

2. 对地主政策的改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主政策的改变也是分二步进行。第一步，在1936年7月22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对地主的政策作了二方面的改变：一是改变了过去“地主不分田”的错误做法，规定“对地方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给地主以生活出路”；二是把小土地出租者与地主区别开来，明文规定：小业主、工人等五种人的出租土地不得没收。《指示》明确提出改变土地政策的目的，是“要使土地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性质”。所谓的民族性，就是根据各阶级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全部没收”。同时不问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如何，“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所谓土地政策的人民性，就是把富农、小地主和商人兼大地主等同汉奸卖国贼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区别开来，对他们实行比过去更为宽大的政策。第二步，在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完全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建成而作出的重大让步。

3. 对农民的土地政策。在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后，为了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一是保障农民已分得的土地不受侵犯，确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二是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三是实行减租减息，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其中减租减息乃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初步改革，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根本的土地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改变，适应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需要，同时又保障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提高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三、工商业政策的转变

陕北的经济非常落后，商品经济素来不发达，私人工商业数量不多，规模也很小。在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以前，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有些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随便没收商店和商人的货物，还借口实行赤色戒严，禁止赤白区商人的贸易往来，结果引起商品流通阻塞，根据地经济更加困难，这种自我封锁的自杀政策亟待改变。特别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逐渐变化，有着抗日的倾向，中共必须实行正确的工商业政策，以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以下工商业政策。

1. 在商业方面，实行贸易自由政策。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文件明文规定：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营业。除了粮食及军用品外，苏区钧生产品均可自由输出。

2. 在工业方面，实行投资开放政策。苏区允许国内外的大小资本家来苏区投资兴办各种工业。如 1936 年 8 月，在制定开发盐池和定县盐业计划时，苏维埃政府提出“欢迎国外华侨及国内资本家来投资，以助上述计划之迅速完成”。

3. 取消工商业者所负担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鼓励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1935 年 11 月 25 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布告》明确规定：“把一切工商业的捐税都完全取消，甚至于连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为了鼓励商人进行赤白区之间的贸易，苏维埃银行不仅设法搞到国统区的钞票，以备需要携带现金的出境者随时兑换，而且“为着发动商人输出苏区农产品，与运输食盐出口，银行可给予低利贷款”。

4. 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工商业资本家的人权。长期以来，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在苏区的工商业资本家被当作革命对象，并且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一样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例如“一苏大”、“二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 1933 年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选举法》都明确规定资本家“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1936 年初，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其中规定：“雇佣劳动在，10 人以下，资本在五千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亦有选举权”。1937 年 5 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更进一步规定：除汉奸卖国贼、被剥夺公民政治权利者及精神病患者外，“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上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工商业政策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经济上取消一切捐税。这是针对陕北工商业很少，急需放宽政策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鼓励私人发展工商业的措施；二是在政治上承认工商业资本家拥有一般的公民权，放弃了过去那种政治上打击的政策。以上各项政策，过去苏维埃政权虽在政策条文上有所规定，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在实际上并未很好执行。只有在党的路线转变的大前提下，这些工商业政策才有可能得到实际上的执行。

四、财政金融政策的转变

为了适应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也作出了较大的调整。

1. 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根据地采取没收全部汉奸卖国贼财产的办法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汉奸卖国贼存在的经济基础，顺利开展民族战争。1936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条例》，对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的标准、组织、手续及没收品的处理等问题，都作了详细规定。条例宣布："凡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办的工厂、企业、铁道、矿山、银行及其他一切财产，均全部没收之"，"凡汉奸卖国贼集团所有的公共财产，均全部没收之。"条例规定：没收所得之财产，除各种现洋、钞票、生金、生银、公债、股票、证券和贵重物品、军用品以及整批货品应归公外，"其余应尽量发给当地群众；在城市所没收之物品，除发给城市群众外，并宜注意发给四郊群众"。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从而成为红军和根据地政府过去不曾有的主要的财政来源，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50%。以前，在各个根据地虽有没收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政策，但它是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为政治标准的；而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则是以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为政治标准的，它体现出财政政策是建筑在民族原则之上。

2. 向地主筹款筹粮经历了一个从打土豪到募捐的转变过程。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曾在一段时间内继续采用打土豪的办法，筹措红军的给养。如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的红一方面军就曾发布打土豪的命令。1936年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这一做法。1936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文件规定：大量捐助抗日基金的豪绅地主，政府加以保护，允许其照常安居，不准私人任意侵犯。同年8月，中央局、西北办事处、西北军委联合发布文件，要求老区陕北省筹措粮食采取从"红军公地和向群众购买的办法"。在新区陕甘宁省筹集粮食，除没收土豪劣绅当年地上种的粮食外，同时采取"募捐粮食和购买一部分的办法"。募捐虽然仍带有一定的强制意义，可是它与没收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第一，从量上看募捐只限于地主的一部分财产，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过去对地主是没收全部财产，使他们丧失生计。第二，从质上看，募捐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对地主募捐就是把对抗性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没收则明显是处理敌我矛盾的一种方法。

3. 对富农、工商业者实行"募捐"政策。政府规定在财政上对富农不实行没收和罚款，免除一切税收，只有募捐一项；对工商业资本家，禁止一切没收和征发，不收任何租税，也只有一些募捐。这一时期对富农和资本家的募捐，与过去"左"倾路线影响下的捐款不同，不具有强烈的强制性，主要依靠自动捐助，并且对捐助者给予奖励和表扬。

4. 对基本农民群众，实行完全免除税收的政策。这时陕北根据地取之于农民的主要有二项：一是爱国捐助。政府规定对串民的捐助"要其完全出于自愿，绝对不得带有丝毫的强迫"。二是向农民借粮卖粮。当时红军和政府向农民筹集粮食，不是采取征税

的方式，而是通过宣传动员，向农民群众借粮和卖粮。

5. 实行新的金融政策。一是1937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停止苏票的发行，统一使用法币。二是在借贷方面实行减息，规定最高利息不得超过一分五厘，既照顾农民的利益，也照顾了地主的利益。三是向私人工商业者发行低利贷款，支持他们发展生产。

很显然，中共在这一时期的财政金融政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结合起来。对汉奸卖国贼毫不手软地加以打击，向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作某些和让步，以争取他们对红军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切实保障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调动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各项财政金融政策与党的策略路线的转变是相适应的。

五、政策转变的效果

总的来说，1935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党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既纠正了过去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所实行的各项“左”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又适应了当时民族矛盾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观需要，更加适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党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由于土地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改变，不仅调动丁广大农民阶级革命的积极性，而且争取到了各阶级对抗日的同情，减少了抗日的阻力。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之下，不少开明地主，主动捐助抗日基金。如赤源县五区二乡地主冯汉德，自愿把旧日埋藏的元宝二锭，现洋二百元，献出作为红军抗日的经费。商人们也热情高涨，慷慨输捐。比如延安商人自动捐出过去所藏步枪五百余支，手榴弹多枚，支持人民武装抗日。由于党的经济政策同时顾及了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所以在陕北根据地，确实出现了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集中一切力量用于抗日民族战争的形势。中共经济政策的改变，对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显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党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于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保障农民既得土地利益不受侵犯，扶助农民生产等项政策，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对富农政策的改变，消除了农民尤其是中农害怕发展生产会被打成富农的恐惧心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也激起了工商业者经营工商业的热忱。这时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据有关资料，1936年春，陕北根据地仅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就组织了互助社4100多个，社员达32720多人，妇女生产学习组2839个，组员达19081人。1937至1938年陕甘宁地区耕地增加了60多万亩，牛羊增加到30多万头。一大批工厂如兵工厂、被服厂、石油厂、盐厂等纷纷建立起来。1937年至1938年陕甘宁地区除停止营业的老店重新开业外，新开店铺一千多家。贸易业发展也很快，1937年1至5月进口总值达20多万元，出口贸易达18.7万元。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经济政策的

转变，不仅为后来制定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为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 减租减息政策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主张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务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战争需要出发，及时地主动提出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变为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是一种为前进而后退的必要让步，从而广泛调动了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战事业的向前发展。

一、减租减患政策的提出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中国广大农村经济关系中，封建经济关系仍占绝对统治地位。地主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通过高额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这种封建剥削关系，给广大农民造成极大的痛苦，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如不削弱农村中的封建剥削，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改善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就不可能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不把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抗日战争就难以进行下去。因此，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抗战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时期经济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从上述二方面的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制定了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一项就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这无疑是对国民党一个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侵略者。1937年5月，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中共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土地政策的意图。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率先采取措施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并进一步制定了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甲：凡地主土地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未被没收的，再不没收，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乙、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边区来，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一份的土地和房屋，并享有公民权。丙、出租土地给农民，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不加任何干涉。”这些政策提出后，原来逃离边区的地主、富农、资

本家纷纷返回边区，政府给他们恢复了公民权，分给了应得土地和房屋。1940 年 12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出："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最基本的指导原则，是各抗日根据地制定减租减息政策的主要依据。1942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总结各根据地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其基本的要点是："（一）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也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二、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减租减息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在其他时期的土地政策相比较，不能不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是民族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特殊的土地政策。

首先，在民主革命开始时期，"减租减息"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策略口号，而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口号之一，而不是以前的策略口号的性质了"。从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来说，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达到"耕者有其田"的一个准备步骤，用以团结与教育群众，发动与组织群众、作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一

个前奏。而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减租减息政策是在洛川会议上以纲领的形式，作为党在整个抗战时期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具有战略意义。它明确规定，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减租减息后，战略上就不再前进了。继续深入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那是以后的事。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合作抗日，主动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实行减租减息。这个政策一方面承认农民是抗日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所以，必须扶助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以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这点来说，减租减息政策最基本的精神是发动农民群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承认中国地主的大多数是能够抗日的，尤其是其中一部分开明绅士，他们还赞同民主改革，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农民和地主，两个对立的阶级在抗日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是必要的、可能的。但两者的矛盾依然存在；矛盾的解决只能靠调整的办法、兼顾的办法，使双方都有利可得，都能接受，从而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

第三，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只是对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的初步改革，具有不彻底的改良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只是削弱封建势力，它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它只能在生产方面保障农民的佃权，在分配方面适当地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因此它必然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矛盾的缓和，土地占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又重新上升，农民会逐渐不满足于通过减租减息这种改良的道路，缓慢地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而是迫切要求党改变土地政策，重新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土地问题。因此，抗战结束后，减租减息政策必将要向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转变。

最后，必须指出，尽管减租减息政策带有上述不彻底的改良主义性质，但它是在“军队、政权、群众团体等统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是在根据地内部实行的，而不是在资本家领导的政权下，由地主资本家实行的改良主义，以加强与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政策”。相反，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最基本的政策，是党在农村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当时，全民族、全国人民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抗日，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和实施减租减息的政策，获得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它是一个革命的改良政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所能采取的最适当的土地政策。另外，尽管减租减息是一项改良的土地政策，但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还是要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因为减租减息一深入必然要涉及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因此减租减息政策不可能由党发几道法令就能生效，而必须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才能达到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目的。

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8月至1940年6月，是宣传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提出减租减息的政策口号，并进行广泛的宣传。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会议上、口头上提出二五减租、三七减息（租）、对半减租的号召和政策，而且有的抗日根据地还下达了文件，出了布告，对减租减息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具体规定。比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明文规定："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是由于各根据地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国民党及地主阶级的反对阻挠，各地对减租减息"一般是没有实行的，除个别地区因特殊原因而减外，别的均没有减"。

第二阶段：从1940年1月至1942年底是普遍制定政策和初步实行阶段。这个阶段从党中央到各抗日根据地的党和政府，都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减租减息的法律、法令或条例。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就规定：在土地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并规定丰年减租25%，平年减租40%，歉年减租55%，还规定地主不得借故收回土地和转佃。这一时期，减租减息在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不少地方的干部对"三三制"政策认识不全面，对地主只强调团结，过于迁就，怕同地主搞僵关系，因而放松了减租，没有把减租减息认真的贯彻执行。针对这种情况，1942年1月，中共中央严肃批评了不落实减租减息政策的官僚主义和右倾思想。同年10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再次批评和纠正了干部中间迁就地主放松减租减息的右倾思想，并随之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指出："要保证减租的彻底实行，不能单凭政府减租法令的公布，还必须采取发动群众的方针。"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对减租减息作了具体规定，从1942年冬天开始了"真正的减租"。

第三阶段：从1943年至1945年，是依据法律和条例，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贯彻和执行减租减息阶段。为了保证减租减息政策能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二个有力措施：第一：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党内指示，指出："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指示强调指出："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认真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根据这个指示，各根据地的领导干部，深入实际，对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进行督促检查，从而推动了减租运动的发展。第二：发动农民开展对地主阶级抵制、反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农民

阶级的利益，照顾地主阶级的利益，达到削弱封建生产关系，实现土地制度初步改革以利于抗战之目的。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本质上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相对抗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减租减息开始宣传起，地主阶级就进行抵抗，尤其是到减租减息普遍开展以后，地主阶级特别是顽固分子，为维护其剥削量采取各种办法，如收回租地、假典、提高租额等手段，拒不减租。为了克服地主阶级对抗减租减息所造成的困难，真正落实减租减息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斗力、斗理、斗法”的斗争。所谓斗力，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使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迫使地主接受减租减息政策。很多地方的农会组织，依照政府颁布的法令，合理的调解了许多租佃纠纷问题，保证了减租交租的彻底执行。所谓的斗理，就是说理斗争，通过宣传媒介，造成“不减租减息没育道理”的舆论潮流。有了理，就会得到社会的同情，能大大增强农民群众的斗争信心和勇气。所谓斗法，就是依据法律进行合法的斗争，发动农民到地主家里去谈，说明为了抗日而减租减息的道理。由于政策措施得当，1942 年后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看，1942 年以后，地租剥削量下降了 25% ~ 30% 左右，普遍采取了对农民有利的定租形式，废除了正租外的超经济剥削，取消了高利贷剥削，借贷利息一般在一分以下。

四、减租减患政策的重大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行减租减息政策，虽然是在不改变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产品分配关系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种特殊政策，但它削弱了封建势力，促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并为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创造了前提条件，激发了农民生产与抗日的积极性，同时，又照顾了地主及其他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了依靠群众、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的政策目的。

首先，减租减息政策，在生产关系上减轻了封建剥削，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广大佃农除了按法律条例的规定得到减租利益外，还废除了多年的欠租欠债，很多佃户由终年劳动不够吃穿，变成有了余粮。贫苦农民在生活有了改善的基础上，有了买进土地和扩大再生产的要求和行动，由雇农、贫农变成了不受剥削的自耕农。如陕甘宁边区赤水县二区一乡 15 家佃户，仅 1943 年就减免了 142 石租谷。绥德县杨家塔 13 家地主四年中卖出土地 619 亩，占土地总数的 37%。相反农民大量买地，如来脂印斗区三乡某村 41 户农民，38 户佃农在减租前只有土地 40 垧，到 1943 年、1944 年买入土地 180 垧，每户都增地 4.5 倍。农村中贫农和雇农地位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生产力，普遍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抗日斗争的积极性。

其次，减租减息的政策，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自动组织了农会、减租会、减租保佃会等群众组织、有组织、有领导地同地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揭发批判了一些地主对抗减租减息的丑行，打掉了地主平日的神气和威风，使之不敢小看农民。减租减息实行以后，地主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有些地主开始参加劳动，有的则部分或全部出卖土

地，放弃封建剥削，有的低头哈腰要求参加农会，有的要求投资办合作社，有力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

第三，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减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把减租和保佃紧密结合起来，既减轻了租额又保证了佃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只减租不保证佃权，就失去了减租的意义，就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佃是制止地主威胁农民的重要手段，是使农民敢于进行减租斗争的重要前提。当然，保佃不是使土地永远不变动，而是不许地主收回土地另佃以对抗减租。随着减租的深入，土地所有权有某些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变动的方向是由非生产者向生产者转移。在一定情况下，准许地主卖地，同时，尽力扶助农民买地，无论保佃和土地转移，都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实现耕者有其田。减租保佃后，农民吃了定心丸，生产的积极性充分被调动起来，他们在田中多施肥，勤锄草，精耕细作，修筑水利设施，开垦荒地，生产热情普遍高涨，生产量也在逐年增加。在生产力提高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根据地人民在人力、物力、畜力、财力等方面积极支持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四，减租减息政策，既发动了农民群众，又团结了各抗日阶层，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 1942 年 1 月通过的《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中规定："被迫汉奸的土地不应该没收，以示宽大争取其悔过自新。无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租给农民耕种，候其回家抗日，即发还之"；"凡逃之地主，不论其逃之到何处，其土地不得没收，无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招人耕种并保存其应得地租，代交田赋公粮，原主回家时，将其土地及应得地租一并发还之"；"宗教土地均不变动"。这些政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与支持。使抗日根据地的各阶级、各阶层群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不断巩固和发展抗月根据地，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第三节　生产自给政策

一、中国共产党生产自给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自给，是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坚持持久抗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所采取的战略性措施。

1. 中国共产党生产自给政策的提出，是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的产物。抗日根据地所在的西北地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雨水缺少，物产欠薄，经济落后，加上反动派的剥削，长期战争的破坏，整个西北农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正如林柏渠在 1941 年的一份报告中所说：本地居民"冬天还穿着破单裤，没有毯子，居民把所有供献给军队，也不过是几升小米苍谷，或者是剩下的几头羊子"。经济是政治和军事的物质基础，在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革命政权无法巩固；抗日

战争也不可能长久地坚持下去。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实行，“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财经政策。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把主要的军事力量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的、大规模的“扫荡”和分割“蚕食”，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加上华北各地连年遭受水、旱、虫等灾害，党和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这种情况下，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客观的经济形势逼着中国共产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依靠发展经济，达到丰衣足食。

2. 生产自给、自力更生也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所决定的。按照政策学原理，一个政党的政策必然要与这个政党的政治利益相一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历史的经验表明，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能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心环节。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方针。因为外援的作用，不可能代替自身的革命斗争，而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可以从根本上巩固、发展和壮大自己。没有“自力更生”就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是独立自主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的要求。

3. 生产自给、自力更生的政策，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领导方法所要求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一贯要求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生产自给、自力更生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个体现。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相信广大群众有通过自己动手战胜一切困难的能力。相信生产自给、自力更生的源泉在群众中，只要共产党按照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去组织群众、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就会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4.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思想。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党和军队要动员和领导群众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用来发展经济，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人民的生活，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1933 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强调了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性。1934 年，毛泽东又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的生产自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政策方针，正是这一思想发展的结果。

5. 生产自给、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财经工作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作出的科学决策。当时在如何解

决根据地财经困难的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几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一是忘记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只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这是一种单纯的财政观点，片面看重了财政本身，忽视了发展经济才是财政的基础的道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解决财政困难，反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二是空洞地提出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如建设重工业，搞大军工业、大盐业。这种观点脱离了抗日根据地地处农村环境和战争年代的实际情况。当时当地根本不存在搞大计划的资金、技术、设备、环境，实践中必然要处处碰壁。三是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要施仁政，减轻人民的负担。毛泽东指出：有这种错误观点的同志不懂得"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只有人民支持政府战胜了困难，打败了敌人，人民才有好日子过，这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四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这是国民党的做法。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以 90% 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 10% 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在分析和批判了上述几种错误思想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二、生产自给政策的内容

生产自给是一个内容十分奉富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抗战时期，党和政府财经工作的最大任务就是保障抗日经费的供给。这个总方针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障抗日经费供给的需要，就是要用发展生产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总方针深刻地阐明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辨证关系，财政决定于经济，没有经济基础的财政是无源之水。这个方针还深刻地阐明了发展生产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密切关系。要依靠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而发展生产最直接的目的又是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发展公营经济也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它反映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的规律。

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早在 1938 年 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就在《新中华报》上以社论的形式提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个地区物质供应的自给自足"。1939 年 2 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1940 年 11 月 20 日，中央局在《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提出："在财经政策上已不容我们慢步的走，而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自力更生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确信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志气有能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通过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战胜一切困难，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自力更生政策要求"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

要充分激发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而且要发动各级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全部工作人员，各部队的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各级党、政、军机关、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并带头参加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方面逐渐由改善生活，半自给、完全自给到耕三余一过渡，从而达到克服困难，丰衣足食的目的。自力更生体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气概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尚精神。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正是自力更生的范例，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威力。1941 年至 1942 年抗日根据地发生的财政困难，似乎是难以战胜的。然而依靠群众，依靠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不仅解决了粮食和日用品的需要，而且发展了各项经济事业，从物质基础上为人民革命事业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三，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这是保障财政供给的根本途径。公营经济是指政府、军队、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它是为了解决党、政、军、学人员本身的一部分生活费和事业费的需要，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私营经济是指一切人民群众私人经营的农工商业，它在满足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又可以赋税的形式援助政府和军队，支持革命战争。如果我们忽视私营经济，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的需要也得不到供给，其结果必然是军民交困。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根据地私营经济，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又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的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但是仅仅注意发展私营经济还不能完全解决革命战争的需要。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是被分割的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只靠人民供给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还必须发展公营经济，即部队、机关、学校进行生产，自力更生，逐年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部分或全部自给。只有兼顾到两个方面，才能既达到支持长期抗战，又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第四，在工、农、商各项生产事业中，必须实行以农业为主的方针。由于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在农村，基本的生产者是农民，当时军民生活所需的大部分都是农产品，而且手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农产品，发展农业所得到的实物可以解决当时根据地军民的实际需要，是最可靠的。因此，党和政府提出，无论是私营经济，还是公营经济，都必须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为了突出农业的地位，促进农业的发展，政府除了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强调农业是大生产运动的中心环节外，还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劳动互助组，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

第五，组织起来，集体生产。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求大家一起动手，一方面要求原来脱离生产的战士及工作人员，都尽可能参加生产，另一方面又动员全体人民，参加生产。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关于集体化是改造个体经济唯一途径的理论，采取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集体生产。各根据地先后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劳动组织，这些组织的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私人的收益。由于私人利益的增加，也就增加了整个社

会的财富，增加了对国家财政负担的能力。据估计，进行集体生产的某些合作社，收成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对于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是极为有利的。

第六，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在发展公营经济中，如何处理公营经济内部军队、政府、机关、学校等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各部门中的上级和下级，集中和分散，这一单位和那一单位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根据当时处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劳动力分散，原料分散，交通不便，基本上是手工生产等具体条件，只有分散经营才能发挥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但是，在方针政策和总的规范方面，又必须实行统一领导，以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既调动了各个根据地的积极性，也发挥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解放区生产的大发展。1945 年 4 月，党中央在总结经验时充分肯定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是“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第七，生产与节约并重的方针。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不仅要增加生产，还必须厉行节约。生产与节约是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在生产中使公私财富逐年增加，从节约中使社会财富不致浪费。因此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组织人民扩大生产来保障人民能够丰衣足食；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和克服浪费现象，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节约不是减少必要的消费，而是在于节省根本不需要的开支。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条件下厉行节约更加显得必要。党和政府要求各根据地节约粮食、经费、衣物等开支，进行精兵简政，这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为抗战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资料。

以上各项政策方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一切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相信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正是由于根据地实行了上述政策，根据地军民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保障了根据地抗日经费的供给，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生产自给政策的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生产自给”的经济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2 月。抗日战争头一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根据国共两党的商议，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经费由国民党政府拨给，同时国内外同情敌后抗战的人士也不断给边区以财力物力捐助。所以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财经政策是“争取外援，休养民力”，财政收入的 90%以上来自外援”，政府极力减轻人民的负担，1938 年救国公粮仅征 1 万石，税也只征 27 万元。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中共中央考虑到外援不可靠，于 1938 年 12 月第一次向根据地军民发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个地区物质供应的自给自足”。但在 1938 年底以前，除了一部分军队开始了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劳动以外，还没有普遍地开展生产运动。

第二阶段，从 1939 年 2 月至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这一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

动两次反共高潮，边区遭受封锁，不但国内外捐款不易汇到边区、外援逐渐减少，而且国民党政府应发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也拖延不发。在这样的情况下，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从此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渐开展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政府也相应制定了由依靠外援转到半自给的财政政策。这时党和政府一方面紧缩开支，增加税收，以平衡收支，另一方面开始注意生产建设，以作长期打算。例如1939年的生产投资为140万余元，1940年为190余万元”。不过这一时期根据地所得到的外援，在整个财政中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阶段执行生产自给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到1940年底，仅陕甘宁边区就增加耕地面积30%以上，粮食的生产量增加将近50%，纺线、造纸、肥皂、煤油等公营工厂纷纷建立起来。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亦有较大改善，农村富农增多，而中农成为乡村经济的主要成分。

第三阶段，从1941年初到194r年底的高干会议召开。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日、伪的反复“扫荡”，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解放区进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1940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以边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了“关于自力更生的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1941年后，机关、学校、部队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留守兵团各部展开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其中359旅的成绩最为卓著。经过全旅艰苦努力，1941年359旅开荒种地11200亩，达到粮食自给70%，经费自给78.5%。1942年，种地26800亩，达到粮食自给78%，经费自给90%。1943年达到自给有余，为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树立了榜样。其他各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43年各部队与各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各机关经费的自给部分高达70%。1941年经济建设投资480万元，1942年达7000万，增加了14倍以上，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的重视。通过政策的贯彻实施，既发展了经济，又达到了自给的目的，度过了二年困难时期。

第四阶段，1942年底至抗战胜利。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政策，得到了更全面的贯彻。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在这个正确方针指导下，各解放区经济建设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耕地面积比战前增加79.4%。粮食产量由战前的110万石增加到200万石，增长近100%；工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了30倍，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许多地区达到了丰衣足食。在保障供给方面，我们不仅保证了原来解放区军民的抗日经费的供给，还扩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中共拥有人民军队120万，民兵220万，建立了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的解放区，这些也都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来保障供给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生产自给的政策方针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彻底的贯彻执行，取得如此圆满的成果，其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政策方针本身是正确的；二是党员干部能够带头执

行政策方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发挥了榜样作用；三是政策能及时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行动。从这个政策方针的本身来说，它是抗战时期敌后解放区客观经济形势的产物，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除了自己动手，发展经济之外，别无选择。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建立抗日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了全民族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政策的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支持拥护的。然而，政策的制定，任务的提出，对这个政策的成败只是一个开头，关键的还在于贯彻实施。如果一个好政策制定后，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执行者高高在上，并不身体力行，恐怕也休想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政策在贯彻的过程中还会变形，不仅不能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相反还会导致群众的反感，久而久之就会丧失党的威信和党的政策的效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得力于当时的领导干部，能够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在大生产运动中，上至毛泽东、朱德，下至一般战士、工作人员都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带头生产自给，以身作则艰苦奋斗。毛泽东、朱德等，和大家一样，吃小米饭，穿粗布衣，点小油灯，住土窑洞，许多的中层干部都能做大量的细致深入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大批的基层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和勤俭节约，成为生产劳动和节约的英雄、模范。他们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发挥了巨大的榜样作用。他们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使人民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共产党人与他们是心连心的，从而迸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从前线的战士到后方的小脚女人，从闲游人员到刚刚离开大城市的青年学生，无不以“劳动为光荣”，以空前的热情投入生产劳动。这说明党的政策已化成了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实践中已得到了切切实实的贯彻执行。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日益完善并得到切实实施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政策转变为核心，全面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提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在党的整个经济政策发展史上，是有承先启后的重大转折意义。

第一节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一、解放区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另一方面又玩弄和谈阴谋。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手：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保持高度警惕，从各方面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尽一切可能与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尽力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或者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推迟全国内战的爆发。从由抗战到全面内战爆发这一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势出发，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土地政策时既要考虑到保持、提高大多数农民的革命热情，确立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使党在内战爆发时处于有利地位；同时，又要考虑到为了争取和平，团结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利于孤立国民党反动派。因此，中国共产党没有采取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而是继续执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根据这一原则，中共中央在日本投降后即决定，在一切新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清算运动，在老解放区复查减租减息。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地区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减租减息与生产的指示》，重申："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要求各地"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并指出"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同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再次强调："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而巩固老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各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和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的一段时间，党仍然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是适合时宜的。实行减租减息，既有利于争取和平，又能有效地发动群众，做好自卫战争的充分准备。同时，减租减息是党在农村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因此，不宜过早地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如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会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而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因此，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会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也为消灭地主阶级创造条件。

二、"五四"指示的公布和党的土地政策的转变

（一）"五四"指示的公布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向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的重大战略转变。

"五四"指示在当时公布，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它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形势下，我党为放手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措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日民族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力图维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团结全国人民，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斗。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这种国

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在解放区，地主阶级幻想国民党能打败共产党，消灭解放区，从而恢复他们的封建统治秩序，重新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疯狂地反对我党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农民翻身的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挠农民得到土地；在许多地区，他们甚至同蒋军勾结，对解放区农民的反奸清算斗争实行武装的反攻倒算。这就表明，在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总形势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策动的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地主阶级就其总体而言，不但成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内应。地主与农民之间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就使土地革命问题再度被提到中国革命的突出位置。基于此，我党及时转变土地政策，把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对于打击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对于粉碎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企图，特别是对于最广泛地放手发动解放区的农民群众，打败蒋伞石，建立新中国，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党只有在一亿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土地问题，满足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才能把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充分调动他们发展生产和参战支前的积极性，使解放区人民能够长期支持战争而不觉疲惫，并在斗争中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只有这样，人民解放战争才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我党我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我党中央公布“五四”指示的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

其次，“五四”指示的公布，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群众运动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抗战胜利后，为了进一步肃清敌伪汉奸势力，发展和巩固解放区，我党曾经及时地领导解放区人民（主要是广大农民）开展了一场对汉奸、特务和恶霸地主的控诉清算斗争。当时在河北、山西、热河、山东和苏北、华中等解放区，广大农民纷纷起来控诉和斗争汉奸、恶霸、特务分子，清算他们的罪恶，向他们讨还血债。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广大农民不仅收回了被汉奸、恶霸霸占的土地财产，得到部分经济利益，而且摧毁了敌伪政权，建立了民主政府，组织了农会、民兵等群众组织，在政治上也抬起了头。尤其在清算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强烈要求夺回土地，打碎封建土地制度的枷锁。他们在斗争中自发地创造了许多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的办法，例如：有的地区通过清算控诉斗争，明确宣布，凡汉奸土地，一律没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有的地方规定，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者，佃农有得此种土地之优先权；不少地区还通过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由不法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以清偿负欠，等等。这些现象说明，广大农民迫切要求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运动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减租减息的政策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是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还得束缚群众的手脚？这是摆在我党面前必须回答的一个紧迫问题。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鉴于我党历史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压制农民革命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也鉴于抗战胜利后，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形势，我党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保卫和发展解放区。所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五四”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定地支持广大农民的正义要求。“五四”指示本身所规的解决土

地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当时群众运动中所创造而为党中央所采纳的解决土地问题的适当方法。

(二)"五四"指示的主要内容及其贯彻执行

"五四"指示共有18条，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

"一条批准"就是指第一条："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其基本精神就是坚决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肯定和批准农民的土地要求，运用当时适合运用的一切方法使广大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条是"五四"指示的核心和灵魂。

根据当时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五四"指示又从政策上规定了对各阶层的许多照顾，这就是"九条照顾"：

(1) 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和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2) 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变动时，亦不要打击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

(3) 对于属于地主成分的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对于开明绅士，应有适当照顾，给他们多留一些土地。

(4) 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适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

(5) 凡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对待封建地主阶级与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有原则区别。

(6) 对一切可以教育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应继续和他们合作，以巩固反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

(7) 对汉奸、豪绅、恶霸及其家属，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土地。

(8) 对逃亡地主及其家人等，应让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

(9) 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果实，必须公平合理地分配给贫苦的烈士遗族、抗日战士、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和无地及少地的农民。

关于解决土地的方法，"五四"指示规定，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绝对禁止使用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

"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中央局立即召开各种干部会议，传达"五四"指示精神，部署在本地区贯彻"五四"指示的方法和步骤，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到各地领导和发动广大群众的翻身运动。这样，一场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在各地区先后开展起来。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6年6月在邯郸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五四"指示。会议强调"五四"指示的根本精神是批准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的正义行动，指出批准是主要的，照顾各类人是次要的，批准与照顾不能平列；号召

全区干部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农民的翻身斗争。会后，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为顺利贯彻“五四”指示，推动全区群众运动走向新阶段，特从各级党政军民机关抽调数万名干部，组成许多农民翻身队，赴各地发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的翻身运动，因而掀起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热潮。接着，从1946年秋后起，全区又以填平补齐为主要内容，开展翻身大检查，使土地改革运动走向深入；到1947年春，更进一步开展了深入的土改复查运动。这样，晋冀鲁豫全区的土改运动逐步深入。据1946年底统计，全区已有六百五十万贫雇农分到一千八百万亩土地，二于万农民已从封建压迫下初步获得翻身解放，占全区人口的三分之二。

在东北解放区，中共东北局于1946年7月7日发布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坚决支持农民群众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的要求，并抽调一万二千名干部，组织数百个工作团，深入农村协助农民进行翻身斗争。根据东北地区长期受日伪统治的特点，运动一开始，首先是分配大量敌伪的“开拓地”与“满拓地”给贫苦农民，同时对汉奸特务进行群众性的清算诉苦斗争；继之即分配地主和恶霸的土地，运动乃大踏步向前发展，在全区掀起了分配土地的热潮。到1946年底，东北解放区就有四百二十万贫苦农民分到三千三百万亩土地。各地还初步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等群众组织，给敌伪残余和封建地主阶级以首次打击，对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其他如晋察冀、晋绥、热河、山东和华中等解放区，也都先后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例如热河省，在“五四”指示发布前，那里的反奸清算斗争即已开展，“五四”指示下达后，群众运动更迅猛发展。据热河省委1946年7月的报告，当地农民在两三个月内即已从汉奸、恶霸和地主手中夺回了一百万亩土地。华中解放区，在1946年7月开始实行土地改革，仅运河以东五个分区内即有约七八百万贫苦农民分到了约一千万亩土地。

总之，从1946年5月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贯彻执行“五四”指示，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调动丁广大农民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巩固了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直接推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三）对“五四”指示的评价

“五四”指示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布的一个重要文件，它的贯彻执行起了很好的历史作用。首先，“五四”指示规定从地主子巾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它及时地、坚决地支持和批准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党在革命转变的重要关头，避免重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危险，取得了主动权，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支持了革命战争。其次，“五四”指示详细、明确地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特别是注意吸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注意纠正和防止“左”的错误倾向，注意区别对待，政策界限明确。如具体规定了区别对待富农与地主；区别对待中小地主与大地主、豪绅和恶霸；不侵犯中农利益；保护民族工商业；团结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规定都是正确的，体现了丰富的策略思想。在这些方面，后来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有所不及，这不能不说是后来土地改革中出现某些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

"五四"指示明确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这一基本原则也是以后土地改革取得胜利的保证。总之，"五四"，指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在肯定"五四"指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五四"指示规定的若干政策难免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五四"指示存在某些不彻底性。它没有根本废除减租减息政策，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韵政策，没有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也就是说还不是彻底的土地改革。按照"五四"指示的规定，除直接没收日伪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外，农民主要是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这些和后来实行的献地、土地公债等办法，都是以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前提的，大都是"有偿方式"。这些政策规定，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从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来看，却是不彻底的。按照"五四"指示进行土地改革，不可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不可能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五四"指示虽然是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转变，但还不是全部的、彻底的转变，而只能说是带有过渡性质的政策。

第二，"五四"指示对地主、富农照顾过多。它规定允许地主保留比其他农民更多的土地和财产，对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这样执行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而贪雇农则得地很少很坏，因而不能完全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当然，从当时形势出发，这种照顾有其必要和合理的一面，但从长远看，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就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第三，"五四"指示没有具体规定分配土地的方法。"五四"指示只笼统地指出必须"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但没有明确具体的分配办法；由于照顾过多，再加上干部队伍不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干部、积极分子多分土地，多占财产等情况。

"五四"指示的上述不彻底性，是由当时客观形势和阶级关系的状况决定的。在当时，虽然内战危机十分严重，但全面内战毕竟还没爆发，和平之门尚未最后关闭，群众还不觉得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孤立蒋介石集团，我们在解放区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显然是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刘少奇后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中所说的："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深入，"五四"指示的某些不彻底性和不足之处日益显露出来。要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就需要对"五四"指示的不足方面进行及时的修正。这个任务的完成则是由 1947 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及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来实现的。

三、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一）《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

1947年夏，解放战争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此为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中国革命大发展的形势下，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总结了自“五四”指示颁布和实施以来各地土地改革的经验，肯定了“五四”指示指导下土地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并对“五四”指示中的一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的修正，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中共中央公布施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后来中共中央加注：“本条所称应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大纲》还规定没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大纲》的这些规定，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彻底废除了封建半封建剥削，从而改变了“五四”指示的某些不彻底性，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纲》规定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富农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农（他们是农业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有很重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如果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不能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剥削，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形势，革命力量还处于相对劣势，战争的胜负尚未确定，富农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国民党蒋介石及地主阶级一边的，是反对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的。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打击富农的反动倾向，巩固后方，支持革命战争，对富农必须采取这样的政策。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例如：1948年2月，中共中央规定在新区土改的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第二阶段平分地主土地时，也分配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对富农采取与地主有所区别的政策。新中国建立以后，根据新的情况，在1950年6月发布的《土地改革法》中则规定土改中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的土地一部或全部，对富农的其他土地和财产则予以保护。

第二，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办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土地。

第三，《大纲》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

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四，《大纲》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第五，《大纲》规定组织人民法庭以保障土地改革的实施。《大纲》规定：“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立即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要派的人员组成之。”

（二）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本评价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文件，它吸取了党二十多年来领导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虽然它还存在某些缺陷与不足，但不失为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战斗纲领。它极大地推进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首先，它规定的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原则是正确的，它体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根本方针政策。其次，它纠正了“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如：《大纲》用没收地主土地代替了“五四”指示中提出的用种种有偿方式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规定；用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代替“五四”指示中一般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规定，等等。这些都比“五四”指示前进了一大步，有利于发动群众，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有重大意义。第三，《大纲》吸取了历史上党解决土地问题的成功经验，对许多具体政策作了详细规定。如：对没收土地的范围作了明确全面的规定，除地主土地要没收外，还规定对农村中属于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机关、团体所有的所谓公地也必须没收予以分配。因为这些土地，一般来说，实际上也为地主所占有，或为地主与富农所共有，用来作为剥削农民的手段，因此，必须没收予以分配。又如：对土地分配的区域标准明确规定为基本上“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土地分配方法上规定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在地权上规定土地归个人所有；此外还规定保护工商业等。这些明确的规定对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好的作用。

诚然，《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缺陷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没作明确的规定。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造成混乱，一度出现乱划阶级成分的情况。

第二，在某些政策和策略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如：没有规定不侵犯中农利益和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没有规定明确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中的不同情况没有规定区别对待的具体策略。

第三，《大纲》在分配土地的办法上强调“统一平均分配”，容易助长农民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导致侵犯中农利益和破坏工商业。

第四，全国土地会议对于解放区土改不彻底和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后来一些地区发生“左”的偏差。

随着土地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上述缺陷和不足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以致后来曾一度发生“左”倾错误。毛泽东发觉后，曾集中一段时间和精力

纠“左”，并一再强调政策的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地区的中共中央分局纷纷召开有关的干部会议，贯彻党的土地政策。随后各解放区党的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一个轰轰烈烈的、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形成了一个土地革命的高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到1949年6月为止，全国解放区内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1亿农民获得3.75亿亩土地。贫雇农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农也得到了利益，从而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从而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解放区的人民民主专政。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大促进了解放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也使革命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源泉。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翻身农民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踊跃参军支援前线。自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两年之内解放区共有约160万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政治质量高，素质好，迅速壮大和加强了人民军队。广大农民还以种种方式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支援革命战争。这些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7年7月，全国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里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迎接新的胜利，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负责同志。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深刻总结丁中国革命的经验，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国情出发，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最完备的提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个纲领，将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在我国历史上，这是划时代的大事。

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对待土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作法是实行土地国有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土地国有化的传统作法。他们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完整的土地制度变革纲领，明确提出实行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私有，变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个体农民私有制的方针政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

中国自 1840 年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保存下来，并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极端不合理。尽管各地情况略布不同，但一般说来，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土地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而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左右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却只占土地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这种土地占有情况，迫使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忍受各种封建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大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发动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广大农民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必须争取农民这一广大的同盟军。而要争取农民同盟军，就必须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的土地政策只能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变为农民的个体私有，而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实行土地国有。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陈独秀向地主阶级妥协退让，压制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右倾投降主义作法，也要反对王明教条主义者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实行土地国有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此外，在中国实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土改运动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解放战争时期，正是在党的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经济纲领的指导下，党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军民则完全贯彻“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二、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一般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垄断，然后再发展到国家垄断。而在中国，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不是依靠生产积聚发展起来的，而是利用政权进行公开的掠夺，利用商业投机、通货膨胀以及各种经济统制等办法，榨取劳动人民，排挤和兼并中小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果。它有官营、商营两种主要形式。它从垄断金融、贸易开始，然后伸手到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战时权力，实行“统制经济”，官营工业占国民党统治区工业资本40%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接收了日、德、意在华的巨额资产，加上美国的“援助”，官僚资本发展到顶峰。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部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约占2/3左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掌握了全国钢产量的90%，煤的33%，电力的67%，水泥的45%，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官僚资本还控制着全国的轻工业生产，1947年，仅“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拥有的纱锭数占全国纱锭的37.6%，拥有的织布机占全国机械化织布机的60%。官僚资本还控制着大银行和全国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拥有几十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具有双重的革命意义。一方面，官僚资本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部分，即垄断部分，所以，没收官僚资本，就是消灭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因而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可见，没收官僚资本，“就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超出民主革命的范围”。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起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解放区过去的国营经济与这时的国营经济有不同点。过去的国营经济主要不是靠没收官僚资本，而是靠军队、干部、人民的劳动积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主要是手工业作坊、小型工厂，生产某些军需和民用产品，有轻工业，也有重工业，主要是自给性的。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大多是现代化蚵机器生产，是商品经济，并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各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

级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执行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从历史上看，没收官僚资本经历了一个过程。首先从东北开始。1946年哈尔滨解放时，我们开始没收官僚资本，但没收的数量不大。从1948年至1949年初，经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基本没收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到1949年底，基本没收了长江以南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至此，除台湾等岛屿之外，大陆上的官僚资本先后被没收而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从行业上看，在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金融方面，有为四大家族所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金库系统，国民党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共2400多家，还有官商合办银行中的官股。工矿企业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省、市地方政府以及大官僚经营的工业企业共2858个。交通运输方面，有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的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计有铁路2.18万多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约4.6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个，各种船舶约20多万吨。被蒋介石集团劫持到香港的庶中国、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而回归祖国。商业方面，有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据有关部门事后按固定资产原值估计，我国没收的官僚资本财产约为人民币150亿元左右（按新人民币折算)。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到1949年底，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占41.3%。国营经济拥有全国钢产量的97%、生铁产量的92%、原煤产量的68%、发电量的58%、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铁路和大部分现代交通运输业，控制着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务和国内外贸易。官僚资本的被没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就在我国剥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大、最主要、最集中的部分，使国家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保证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保护民族工商业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将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有其重要原因的。

第一，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要摧毁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雇佣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工商业属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消灭的经济形态。否则，就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混为一谈，就要犯“左”或右的错误。

第二，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扩大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民主革命所面临的敌人力量异常强大，我党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等弱点，但由于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因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我党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就可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是发展旧中国民族经济及解放区经济的需要。首先，这一政策有利于旧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国计民生。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旧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和官僚垄断资本经济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保护民族工业，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以逐步削弱封建生产关系、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也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其次，这一政策有利于解放区的建设和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曾对民族工商业实行罚款、没收等"左"的政策，结果造成根据地内工商业萧条，既给根据地带来了经济困难，又不利于政治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一项重要政策，使解放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四，保护民族工商业是发展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需要。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工商业是新中国经济构成中的一种成分。"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见，我党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不仅是着眼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考虑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发展中国经济的需要。

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保护民族工商业列为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符合中国实际和革命需要的，因而是非常正确的。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为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2 月 28 日专门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3 月，中共中央在批转给各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对新区土改指示的意见》中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意见，应明白规定，不准侵犯工商业，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

在中共中央保护工商业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各解放区先后颁布了保护农村和新收复城市的工商业的政策法规。例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土改中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规定；(1) 地主或旧式富农兼营工商业的人，他们与工商业相连的一切土地财产，同样应受保护，不得没收分配。(2) 地主、旧式富农若已将他的财产转移到工商业经营里面，这种财产不再没收分配；若是为了隐匿资财，冒充工商业，实际并没有经营，这种财产，可由农民告发，经县人民法庭调查，确系属于应没收式征收的浮财性质者，得判决没收或征收，交由乡村农会分配。(3) 官僚资本、战犯及罪大恶极的恶霸的工商业财产，经县以上法庭判决应该没收的，这种财产由政府处理，

不由农会处理。若是这种工商业规模很小，并且在乡村经营，应由区政府处理，其工商业规模较大者，应依情况，分别由县、市、行署或边区政府处理。这些工商业凡属有益于国民经济者，无论是决定交由政府接管或由人民接管，均须保护其继续经营，不得分散或破坏。(4) 地主、旧式富农带技术性质的生产工具（如纺车、织布机、织袜机、缝纫机、轧花机、弹花机等）不应该没收或征收。但当其家庭劳动力不足，又不能雇人经营，并为农民所需要者，其多余的部分，得由乡村农会接受分配之。(5) 在过去复查中，已归农会接受的地主、旧式富农的工厂、作坊、商店，其没有分配的，应说服农民交还原主经营。已经分配了的，均须保持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破坏。如果所没收的工厂、作坊、商店是属于新式富农、富裕中农或其他工商业者所有的，则不论已经分配或没有分配，都应说服农民归还原主，或尽可能设法补偿之。(6) 凡属工商户之间的债务、债权，一概不废除。农民与工商业户之间的赊买、赊卖及农民相互之间的友谊借贷，均一律有效。地主、富农及高利贷者在工商业中的债权，凡是不属于高利贷性质的债权也不应该废除。1948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其中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提出攻城入城部队应遵守如下事项：(1) 必须普遍的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进行党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的教育，对指定的攻城部队，必须在战斗之前专门进行爱护城市、保护工商业及进城纪律教育。对这种教育，必须检查是否普遍，是否深入。(2) 规定攻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攻城部队无论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仓库及私人企业、商店等，均无没收处理之权。相反地，在战斗中及战斗结束后，攻城部队应派出必要的队伍加以保护，禁止任何人擅自进去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3) 厉行奖励与处罚。对遵守工商业政策有功者，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违反城市政策及工商业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据情节轻重，依法处办。(4) 各地党委、政府、农会，尤其是该则附近的县、区组织，不得进城自行逮捕人犯及没收物资，并必须教育当地农民。

1948 年 9 月，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济南战役之前，专门颁布了“约法七章”，其中第二条规定：“本军保护民族工商业及私人资本，凡私人工厂、企业、公司、银行、商店、仓库、货栈等，一律保护，望照常营业。”随后，济南的“约法七章”被广泛采用。1949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又制定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简称“约法八章”），其中第二条规定：“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随后，中共中央和华东局、中南局等都制定了一套接管城市、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保障民族工商业继续经营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人民解放军攻入城市以后，严格按中央规定接受城市，遵守《约法八章》，使城市秩序井然，受到人民群众欢迎。

总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的提出，不仅指明了正确地解决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使社会生产力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道路，而且充分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了各方面（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革命战争，为彻底战胜三大敌人而斗争，直接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第三节　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经济政策

在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的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实行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并提出了我党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经济政策。

一、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至城市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所以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主要是因为：

第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是我党二十多年艰苦奋斗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城市历来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领导乡村，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也是要夺取全国城市。但是，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暂时强大的反动势力占据了中心城市，革命力量不得不由城市转入乡村。从此以后直到 1949 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即在乡村积蓄力量，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强大，已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局面，武装夺取全国大城市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样，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也就提到了我们党的面前。

第二，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的英勇作战，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我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北各个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基本解放，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局面已经奠定。全国性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沈阳等都已获得解放，全国其他的大城市，也将要被解放，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新中国，就必须及时改变党的工作方式，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只有如此，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

第三，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是巩固新生政权，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党面临的斗争中心将会由乡村

转移到城市，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同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都将如此。我们党将面临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巨大任务。因此，就要求党必须学会新的工作方式，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同敌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新生的人民国家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过去，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是依靠和联合农民。随着全国大城市的解放，就迫切需要依靠和联合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都聚集在大城市，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有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充分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发挥工人阶级在建设新中国中的积极作用和领导作用，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使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站稳脚根，逐步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任务。同时，由于现代性的工业企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因此，要迅速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使新中国的建设走上正轨，党就应该及时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城市中现代企业在建设新中国中的重要作用，才能有利于城市支援农村，使城乡密切配合；使工农业密切配合，才能有利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尽快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的局面，使我国稳步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墓于上述原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时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因而是十分正确和非常英明的。

二、中国共产党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经济政策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分析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指出：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全会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的基本经济政策。

第一，关于城市政策。接管城市以后，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应以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作为中心工作。第一是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和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和肃反工作等，都应当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在城市工作中，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共产党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孤立和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这个中心任务，我们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斗争；必须用全力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与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

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就必然地会使我们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第二，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样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国营经济是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第三，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及劳动条件等方面给予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的反抗，限制和反限制将成为新民车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所以，认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或者相反限制太多太死，甚至很快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四，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后，将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改造成为合作社经济，并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其办法是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下的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没有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第五，在对外贸易方面，必须实行统制政策，借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稳步地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第六，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五种主要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它是已终结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与此相适应，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经济形态，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它必将会被社会主义经济所代替。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9月29日，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规定了新中国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关于经济政

策，《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济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关于农林渔牧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保护沿海渔场，开展水产业。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

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准则，它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时期。

第五章　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刚从农村转向城市，刚从军事斗争转向和平建设，将主要精力用于恢复国民经济和探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在总结过去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以及实事求是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恢复回民经济的政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政策实施的结果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52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195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一节　建国初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策

一、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方针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承受下来的中国经济，是一个生产凋敝、交通梗阻、贸易滞塞、投机盛行，物价飞涨的几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担负着双重任务：既要使遭受破坏、极度衰弱的国民经济尽快恢复起来，又要在经济领域中进行变革，建立和发展新型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是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保证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体地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七届二中全会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指出："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我们党"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正是从

这样一个国情出发，全会在分析并肯定了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后得出结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全会还具体地规定了对待五种经济成分的政策。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利用和限制的政策，确定革命胜利后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两个基本政策。七届二中全会还强调对待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为此，七届二中全会确立了五方面的经济政策：(1)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2) 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3) 保护、限制、利用、引导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4) 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缔帝国主义强迫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5) 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和市场。

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国头三年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同时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 (1) 土地改革的完成；(2) 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实现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为了创造这三个条件，必须做好八方面的工作：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在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调整税收，酌情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改善公私和劳资关系；在提高国家行政效率的条件下精简行政机构；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会议还确定了经济建设"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这些政策方针的制定，为建国头三年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二、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策措施

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大致可以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段的主要工作是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后一段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使财政经济状况获得基本好转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酶完成。

1. 没收官僚资本。要恢复经济，首先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以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要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确立其领导地位。中共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接管，征用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企业而建立起来的。在《共同纲领》及《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等文件中规定：对外国的在华财产，只没收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财产。一般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财产均不予没收。但中国共产党坚持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对来被没收的1000多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中

国共产党分别采取了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逐步把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接收过来，成为新中国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对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政策规定，只有查明确实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经营的企业即完全官办的企业，以及四大家族直接举办的企业才进行没收。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严禁侵犯由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不得把民族王商业作为官僚资本没收。在官僚资本企业中，如果有民族资本家的股份，要承认其所有权，不得没收。不仅如此，政策还规定，对于一般国民党人经营的企业也不得作为官僚资本没收；小官僚和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在绎收之列。在接管方式上，总的原则是幂取“原封不动”的过渡办法，并派出军代表到企业去掌握接管工作。所谓“原封不动”就是对于接管企业，“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在当时，“三原政策”对于避免发生混乱和资产损失，对于没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有必要指出的是，“三原政策”的目的是旨在把企业完整地接管过来，不破坏生产秩序。中国共产党在没收官僚资本后，对原官僚资本企业在内部实行了民主改革。改革政策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在企业内部废除旧的管理制度，建立民主的企业管理制度；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生产制度，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和计划管理，使原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脱胎换骨转变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有企业。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和损坏企业的现象，而且原来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基本上保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把中国最大、最主要、最集中的资本转到人民国家的手里，使国家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建立了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统一财经工作。解放前，国统区长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解放初，投机资本家利用国家经济困难之际，乘机捣乱，从1949年4月到1950年先后四次掀起物价大涨风，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稳定市场，控制物价就成了当时恢复国民经济的首要条件。只有先稳定物价，才能扭转经济的混乱局面，才能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而要稳定物价，就必须打击投机势力，控制市场。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首先，明确规定人民币为市场上的唯一通货，严禁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中国共产党每解放一个城市，就发出通告，由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坚决取缔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1949年6月，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其次，人民政府制定与颁发了工商业登记办法。规定对工商业进行普遍登记，凡未经核准的，不得开业。另外还采取了主要物资集中交易；保护国营牌价不受私营破坏，使之成为市场领导价格；政府管理、监督物资采购；取缔投机活动，保护正当私营工商业等具体措施以加强市场管理。其三，实行依靠国营贸易部门控制主要商品，通过集中抛售以打击投机资本的政策。为此，国家加强了对主要工农业产品，特别是粮食、棉花，食盐、煤炭的收购和调运工作，从而聚集了大量的商品物资，为打击投机，稳定物价奠定了物质基础。接着，以上海为中心，在市场上按固定价格抛售粮食和其他商品，给投机资本家以毁灭性的打击。通过以

上政策措施，国家迅速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刹住了涨价风、初步稳定了物价。其四是实行统一财经工作的政策。建国初期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庞大的财政赤字造成过多的货币发行，因此，争取财政收支平衡对稳定物价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早在1949年冬就确定了全国财经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1950年3月，政务院先后通过和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其他一系列决定与条例，规定了若干适合当时我国财经情况的管理体制，(1) 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构和人员的编制，此后增添人员必须按编制批准才能招收；(2) 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仓库存货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3) 厉行节约，规定各类人员的工作定额、生产定额及原材料消耗定额，提高资金周转率；(4) 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外，全部归中央财政部统一使用；(5) 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等一切收入，均归中央财政部统一使用；(6) 为了调节国内的供求关系，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抛售物资、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业务范围的规定与物资调动，均由中央贸易部统一指挥；(7) 国家所有工矿企业分为中央直接管理、暂时委托地方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划归地方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三类；(8) 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并统一管理外汇牌价与外汇调度，一切军政机关和公私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人国家银行；(9) 中财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政府的开支和恢复经济所必需的投资；(10) 中央人民政府制定适当的法律，对不实行上述规定者，给予必要的制裁。上述10项规定，基本要求是实行三个统一，即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统一，以避免财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集中使用的目的。此外，国家还采取整顿税收，发行公债、核实编制等政策措施以增加收入，节约开支。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1950年5月，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被制止，金融物价趋向稳定，从此结束了危害中国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我国财政状况有了初步的好转。

3. 调整工商业。根据七届三中全会及有关文件精神，调整工商业政策的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调整公私关系，就是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和调整负担。在私营工业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收购，把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使其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并通过工缴费和货价使之取得正当的利润。在商业方面，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价格：在经营范围上适当地扩大私营商业经营的商品品种，在保证价格稳定的原则下，国营零售商业紧缩一部分机构，经营的商品由过去的几十种减为主要经营粮、煤、布、食油、盐、石油六种，其他零售业务由私营商业和小商贩经营。价格政策上，在照顾产、运、销三个方面利益兼顾的原则下，适当地调整零售与批发之间、产区与销区之间、季节与季节之间、原料与成品之间的价格比例，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以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调整负担就是在保证国家财政需要的前提下，适当地减轻民负。农业税由原来的17%减为13%，盐税减半，货物征税品种由原来的1136种减为358种。调整劳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在当时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政策规定应用协商的方式解决劳

资纠纷，逐步过渡到比较固定的合同关系，既要反对资本家不承认工人必要的民主权利，又要纠正工人对资本家提出过高要求，使劳资关系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调整产铲关系的目的，就是要逐步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力求产销平衡，以销定产，全国一盘棋。方法是召开各种专业会议，商定产销计划，合理地分配生产任务，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通过贯彻执行上述调整政策，不仅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渡过了难关，而且还使其有了一定的发展。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私营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产值增加 54%，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增长了 20%。

4. 土地改革。七届三中全会把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条件之一。为了搞好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土改总路线的贯彻实施，关键在于正确地划分阶级并正确的制定对各阶级的具体政策。为此，中共中央在公布土地改革法之后，接着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决定》根据新情况和新经验，对原有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作了一些补充规定和说明。把易于混淆、划错的富农与地主、富农与中农的界限作了明确的说明，对小手工业者、手工业资本家、小商、小贩、商业资本家等都作了明确的定性。在科学地划分阶级成分的基础上，土地改革法规定了这次土改的具体政策。①对地主的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征收被地主控制的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土地改革是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消灭，而不是要消灭地主的肉体，因此，对于地主及其家属，愿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者，分给他们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对恶霸和民愤极大的不法地主不仅不分给土地，而且还要绳之以法，进行镇压，这就是在政策上予以区别对待。②对富农的政策是保存富农经济。建国后的土改政策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区别，就在于过去在土改中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而新的土改法规定保存富农经济，即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只对出租大量土地的半地主或富农，才征收其出租的土地。③对中农的政策是团结的政策。中央强调必须掌握好划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政策界限，对富裕中农允许他们有轻微剥削，要使他们敢于发展生产、发家致富，解除农民怕“冒尖”，怕“致富”的顾虑。对土改后发展起来的新式富农，政府也予以保护。④对工商业者实行保护政策。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⑤对贫雇农的政策。贫雇农是土地改革的依靠力量，土改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满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改的过程中，坚持了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自己起来打倒封建势力的方针，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三亿农民共分得七亿亩土地，还分得了耕畜、农具、房屋、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三、恢复国民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及经验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恢复的各种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在预定的时期内达到了政策所规定的目标，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成功地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在预定的三年时间内，我国工农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从工农业主要生产情况看，1952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810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比旧中国历史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154%，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 22%。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48.5%，比解放前最高年产值增加 18.5%。粮食产量达到 3378 亿斤，比 1949 年增加 44.8%，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 9.3%。铁路通车里程比 1949 年增长 11.5%，同时内河航运、民用航空、邮电公路运输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②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财政收支有了很大的增长并达到了财政收支平衡。从 1951 年起，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从 1950 年至 1952 年，财政收入从 65.2 亿元上升到 183.7 亿元，增长了近 2 倍，财政支出从 68.1 亿元上升到 176 亿元，增长了 1.58 倍。同时结束了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物价飞涨局面，自 1950 年 3 月始，物价就基本得到了控制，三年中一直保持了市场的稳定。如以 1950 年 3 月的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 100，则 1951 年为 94.6，1952 年为 93.7。

③把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改造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到 1952 年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在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中，1952 年底，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41。5%，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已占 35.5%。在重工业中，国营重工业比重为 80%，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全部国营，对外贸易约 93% 国营，商业中国营批发商业占 60.5%。金融业中，国营经济也已占居绝对优势。三年内，在进行土改的同时，人民政府逐步引导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向着互助合作的方向发展，组织了一些互助组和合作社，发展了集体经济。在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调整和改组，发展了有利了国计民生的行业，逐渐削弱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一般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绝大部分接受了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甚至订立了长期的包销合同，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初步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④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从 1949 年到 1952 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 70%左右，农民收入增加 30%以上，全团职工就业人数由 900 万人增至 1584 万人，逐渐消灭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此外教育、文艺、体育、新闻出版等事业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恢复经济的政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究其主要

原因：

首先是这些政策的本身是正确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势。中国的官僚资本，在性质上不折不扣地属于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实行国家垄断，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代表反动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只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为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才能够为工业化开辟道路。建国初，久经战乱与灾荒之苦：受尽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严重失业之煎熬的中国人民，生活极其贫困。中国共产党恢复经济，稳定市场和物价，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建国初恢复经济的许多政策措施也都是比较完美的。如"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贯彻政策的工作方式，不仅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能使党的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使党的政策落到实处。

其次是当时执行政策的机构和人员清廉，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众所周知，政策的实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有赖于政策执行者的主观能动，如果政府官员能够做到清正廉洁，勤于政事，令行禁止，各种政策就会得到较好的执行。反之，一旦政策的执行者以权谋私，敷衍塞责，就难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异，哪怕是一种很好的政策，到了贪官劣吏们的手中也会变得面目全非。建国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开展了整党整风，三反五反等运动，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克服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所以建国初期，政策的执行往往是雷厉风行，令行禁止，效率极高，这就保证了党的恢复经济的政策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实行。

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

早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明确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思想。但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当时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明确规定。

建国后到 1952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过渡问题是这样设想的：民主革命胜利后，在我国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集中力量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可以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对资本主义工业实

行国有化，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实行集体化，从而进人社会主义社会。党中央之所以作这样的设想，主要的根据是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中央认为，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约结果，必须以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为条件。由于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大约只占国民经济的10%，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极其落后，尚不完全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因此，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大量的机器设备，到那时就有了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国家就可以发布命令，宣布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和个体农业、手工业集体化。

1952年到1953年，在对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不断加深认识的基础上，党中央对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党中央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酌比例不断增长，非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缩小的时期。因此，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的认识。改变了原来关于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其次，党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在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离不开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造，特别是离不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孤立地进行。因而明确地提出了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思想，改变了原来关于先实现工业化，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张。

第三，在实际工作中，党中央看到，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逐步把资本主义引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和最健全的方针。因而改变了原来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先利用、限制、改造，等到条件成熟时由国家发布命令，宣布企业国有化的设想。

第四，党中央通过经济恢复时期对农业的初步改造，认识到我国农业集体化的途径是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没有农业机械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实现合作化的。改变了原来必须先有机械化才能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设想。

基于上述认识上的进步，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表述为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批准了这条总路线。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又把这条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它规定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保证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顺利过渡。

二、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通过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来体现的。中央原拟通过三个五年计划，来实现总路线规定的目标。我国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总路线泛化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它以计划的形式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相互促进；主要依靠国内的资金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一五计划”首先规定了五年中我国经济建设的三项基本任务。第一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二是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第三是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为了使上述三个基本任务得到切实完成，一五计划又规定了为完成基本任务而必须完成的具体任务。其要点是：

(1) 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以增强国民经济的能源基础；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础化学工业，以增强国民经济的原材料基础；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以增强我国生产工具的制造能力，改变原来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

(2) 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中小型工业企业，以适应城乡人民对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3) 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其潜在的生产能力。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地还是依靠原有的企业。

(4) 推动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以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来初步地改造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对农业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注意发挥单干农民的力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开垦荒地，加强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开展水土保持、保证粮、棉产品、水产品的发展，逐步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

(5)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事业的建设。

(6) 在国家的统筹安排的方针下，按照个体手工业、个体运输业和独立小商业等不同行业的情况，分别的用不同的合作形式把它们逐步地组织起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需要服务。

(7) 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并对它们逐步地实行

社会主义的改造。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扩大公私合营的企业，加强对私营工业产品的加工、订货和收购的工作，并稳步地和分别的使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等业务，建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计划规定五年内把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8) 相应地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培养建设人才。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9) 保证市场的稳定，继续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发展城乡和内外物资交流，对某些工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10) 计划具体地规定了五年中国民经济发展的指标。五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1.1%，平均每年增长8.6%。其中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4.7%，农副业平均每年增长4。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6%。五年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33%，农村社会购买力提高近1倍。

1955年11月9日和12月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命令，将第一个五年计划下达各地和各部，要求各地、各部遵照执行。在这五年中，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一五计划的要求，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一计划提出的各种任务而努力奋斗。到1957年，一五计划规定的任务已经提前并超额完成。在工业化方面，虽然，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远未结束，但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已经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虽然存在着某些问题，但毕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明确地指出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五计划的重点。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强调指出：“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建设。”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后来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进一步宣传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政策。“一五计划”较好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一五计划规定的三个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进行由694个建设项目所组成的重工业建设，以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五年计划中，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工业的占总量的58.2%，而其中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又占工业投资的88.8%，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大体上是1∶9。根据“一五”计划指标，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但其中重工业产值则平均每年增长17.8%。到1957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所占比重将由1952年的39.7∶60.3变成45.6∶54.4。

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置其他事业于不顾，中共在中央1952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对此作了明确阐述。指出：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

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一五”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轻工业、农业、运输邮电、商业等投资占总投资的50.3%。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大体合适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五”计划时期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当时重工业的薄弱已经成为制约轻工业发展的两个主要障碍之一（另一个是农业落后）。当时轻工业设备利用率已经很低，“原料供不上，工厂开了也是白开”。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实施后果看，取得了巨大成就，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五年中，我国工业产值增长1倍多，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上升到43.8%。这说明，5年内在工农业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以农为主的局面。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看，1957年轻工业产值387亿元，比1952年增长72%，所占比重下降为55%；重工业产值317亿元，比1952年增长1.6倍，所占比重上升到45%。这说明，5年内在轻重工业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开始改变了我国工业以轻为主的局面。5年内我国施工的重工业项目共146个，布局基本合理，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个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方针，尽管反映了当时我国迅速形成独立的国民工业体系的要求，但作为长期的指导方针与我国国情是不相符合的。我国是经济技术相当落后的农业大国，在这样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把国家最主要的资金和物资过分地集中于重工业，这就限制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这样以生产消费品和原料为主的轻工业和农业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基本薄弱环节，不可能为重工业乃至整个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金和原料。同时，正是由于轻工业、农业长期发展不上去，因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就缺乏应有的物质基础，难以吸纳更多的重工业产品，不可能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市场。事实上，在“一五”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农、轻、重比例关系不协调的苗头，农业对于工业已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农业和轻工业不相适应的情况进一步暴露出来。所以，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再次强调：“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正确处理好农轻重三者关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秩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并在1959年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最终确立了我们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同时并举的道路。

四、关于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虽然获得了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还是一个经济落后和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农业国，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在建立真正独立的新中国之后，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国投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上述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根据朱德等人提出的“四面八方”思想，概括提炼出16字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将其作为党的基本经济政策。自此，“内外交流”政策遂成为党的经济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在解释“内外交流”政策时指出：“今后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

建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在百废俱兴、工作繁忙之时，用国际关系史上少有的长时间访苏，其中与苏商谈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事宜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该协定，苏联向我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息1%，1963年底以前偿清。在建国初，中国共产党还作出了直接利用外资，即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在中国兴办中苏合营企业的决定。中国先后与苏联签订了《关于在中国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中国新疆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1950年4月5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的社论，对直接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作了详细的解释。社论指出：在我国经济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吸收外国资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它的重要。”“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有条件地吸引外资参加经营企业，以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不但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有利和必要的事情。”在上述思想指导下，1951年，我国又与苏联签订了《关于组织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协定》。“一五”计划也较好地体现了“利用外资”的政策。在“一五”计划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下，还积极地争取利用外援。“一五”期间，苏联共帮助我国新建和改造了154项重要工程。1954年苏联又向我国提供了5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年息2分。

在利用西方国家资金和技术方面，建国初中国共产党曾有在适当条件下利用西方国家资本及在华企业的打算，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种设想不得不中断。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把吸收西方国家资金的重心放在积极争取华侨回国投资方面，实行吸引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1951年，政务院召开华侨投资座谈会，决定成立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及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吸收华侨投资的政策为：根据国家经济计划的需要，照顾投资人的愿望，以国家经营的投资公司为主，采用合作经营或公私合营的形式，并可允许个别

的私资经营，主动引导他们有计划地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1956年底，毛泽东又提出：华侨投资，一百年也不要没收。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三大改造。三大改造的具体政策，我们将在第三、第四节详细论述。

五、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客观评价

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不足。

首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实践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我国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新中国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要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改变我国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那种生产规模狭小，势单力薄，生产落后的状况，否则就不可能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又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必然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上述情况表明，只有进行三大改造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发展。总路线执行的结果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一五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达10.9%，国民收入年增长8.9%，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有很大的改善。

其次，总路线提出的“逐步过渡”的思想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反映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根据这个思想，我们党提出了用和平赎买的方法即用定息的方式改造资产阶级，把改造阶级和改造人结合起来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坚持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三个阶段的政策；在农业、手工业的改造中坚持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逐步过渡的政策等等，成功地为我国开创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由于实践的有限性和认识上的片面性，特别是由于对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某些论断和苏联30年代向社会主义过渡经验的教条式的理解，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贯彻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首先表现为对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时间上要求过急，在目标上要求过高，导致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单一”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偏差。尤其是这种急躁情绪，在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和消极作用。其次，在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过分地强调阶级矛盾，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上，忽视了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去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导致在实践中越来越偏离了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最后使社会主义改造完全脱离了工业化的正常进程，使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三，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我国过渡时期的积极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片面强调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排斥其他经济成分，追求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从而铸成了我国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经济体制。

第三节　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一、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

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革，其情况极其复杂，任务十分艰巨。

土改后的我国农村，基本上是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非常单薄，生产中困难很大，劳动生产率低。个体农户一年盼劳动成果，除了扣除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交纳国家的农业税外，绝大部分用于全家人的生活的消费，所剩无几，不仅不可能持续地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如果长期保持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要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土改完成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但是1953年同1952年相比粮食却只增产1.6%，棉花下降9.9%，1954年同1953年相比，粮食增长仅2.2%，棉花下降9.3%。这固然和自然灾害等因素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单薄的个体经济，无法长期持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无力抵抗较大的自然灾害。唯有组织起来，才能解决缺乏耕畜、农具等困难，才能改变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的局面。由于生产规模小，占有的耕地少而分散，严重地束缚了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的运用。单薄的个体农民是根本买不起新式农业机械的，即使有了新式农业机械也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中资金，使土地连片，才能够谈得上采用新式农业机械和新的耕作技术，以增加生产，减轻劳动强度。以上说明，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势必影响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影响一般在次年就表现出来。1952年农业丰收，1953年工业增长30.2%，1953年和1954年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1954年工业增长只有16.3%。1955年工业增长慢，重要原因是农业连续两年增长慢，导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开工不足，仅棉纱、棉布、卷烟，麻袋这四种产品的减少，就使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低4%。这表明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不

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中的小农经济的地位是极不稳定的，如果让其自发地发展下去，必然要产生两极分化。当时广大农村，高利贷者日益活跃，雇工剥削的现象逐年增长，租典土地的农户不断增加，土地买卖日趋严重，新富农到处出现。如果让两极分化发展下去，广大贫下中农仍将逐步失去生产资料，走向贫困破产的深渊。因此，走互助合作道路，是贫下中农为了避免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产生两极分化的客观要求。

从经济思想和理论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贯主张个体经济走合作化道路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很早就提出了个体经济走合作化道路的主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克服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贫苦"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又指出：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一贯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提出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基础。

在如何改造农民个体经济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如宣布土地国有化、折价收买农民的土地等等，中国共产党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其原因除了考虑个体经济的特点等因素外，历史传统模式所形成的规范，也明显的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领导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实行换工互助，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曾出现过各种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根据地，有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根据地，有变工队、互助组等。这些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组织的建立及其实践过程，不但为农民所欢迎，积累了互助合作的经验，而且也为进一步走上合作化道路准备了条件。

二、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借鉴国外有关经验和教训，在土改完成后，就"趁热打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采取"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办法，确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制定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限制和消灭富农的阶级政策，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互相衔接的三步走的形式，使农民在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中，能比较从容地一步一步地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从而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①"趁热打铁"，"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土地改革完成后，要不要"趁热打铁"，把农民引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在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让小农经济发展了一段时间，到1929年才开始实行农业全面集体化。因此，我国土改后，也要经过一段时间再开展合作化。另一种意见，主张根据

中国农村的客观实际，在土改后“趁热打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把农民逐步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深刻了解土改后我国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决定“趁热打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在1951年9月制定，1953年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指出土改后的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是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是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强调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失时机地引导个体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

②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提出，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要拟定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全面加强党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多次要求各级政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要制定出合作化的发展规划、合作社农业生产的规划和合作社全部的经济规划。党中央还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既不能落后于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也不能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可能的条件，而应切实掌握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纳入正确轨道，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③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针。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要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觉悟。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坚持自愿、互利原则，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对于暂时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下中农也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把他们拉进来。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绝对不能够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去把贫农和中农合并到合作社里去，绝对不能够用剥夺的手段去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在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党注意坚持了自愿互利的原则、积极进行典型示范，并且由国家在财力和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援，绝大多数农民自愿地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④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把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过渡，规划三个步骤。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性质萌芽的、几户或者几十户在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同样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事实证明我们党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办法是适当的。因为这使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实惠，逐渐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可以比较自然地，比较顺利地脱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减少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⑤阶级政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政策是：树立贫农和土地改革后由贫农上升的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领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中国共产党

不但禁止勉强中农加入合作社，而且规定在合作化初期，首先要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一般不吸收比较富裕的中农入社。党的政策又规定，在中农入社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处理入社的生产资料的时候，都不允许损害他们的利益，占他们的便宜。国家在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问题的政策上，从1951年起实行统购统销，并在统购统销中规定了合理的价格。1955年，国家又规定把购粮数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纠正了不适当地多购粮食的错误。对富裕中农，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实行"自愿互利"政策。对地主和富农，在合作化初期禁止他们入社，只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以后，才根据情况，允许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到合作社里进行同工同酬的劳动，以便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上述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村社会各阶层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他们要求入社的呼声越来越高，合作化运动迅速地向前发展。

⑥发展与巩固结合，数量与质量并重。农业合作化运动之所以发展比较顺利，同中国共产党在运动中实行发展与巩固结合，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政策，适时地进行整社工作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指出："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合作社的发展工作要同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互相结合"，"因此，必须在建社以后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不是一年整顿一次，而是一年整顿两次到三次，以便达到不断地提高合作社质量的目的。"针对合作化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偏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上半年和1955年上半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整社工作。通过整社发扬成绩，纠正偏差，做到发展一批，巩固一批，从而避免了农村生产力的破坏。

⑦始终把生产作为中心环节来抓。早在1951年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就明确指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1953年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又指出；"增加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从而使农民能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繁荣看成是不断增进自己物质与文化幸福的主要源泉，这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志。"1955年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一次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作，而实践上一般地说也能做到初级社比互助组增产，高级社比初级社增产，因而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即能够相应地增加收入，从而调动了他们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

⑧对个体手工业也是采取逐步过渡的方法走合作化道路。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一样，是一种狭小、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个体手工业经济，也是提倡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提出了对手工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会议制定了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即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在方法上规定，要采取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法，使手工业者自愿地组织起来。在步骤上要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行改造广在组织形式上，要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再发展到手工业

供销合作社，最后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通过上述政策，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达603万人，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1.7%，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个体经济改造的巨大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是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评价一项政策唯一的标准只能看它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到增产增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个体经济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农业为例，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政策，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合作化运动中，我国农业逐年发展，农民收入逐年增加。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为483.9亿元，1957年增加到603.5亿元；农民的收入如果以1952年为100，1957年则增至127。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在我国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几十年来，我国主要是依靠农业合作化时期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现在我同的农业总产值比合作化初期增长了十多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中国的农业是搞得比较好的。尽管人口增长过快，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用占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4的人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一个有几亿农民的大国中，进行一场涉及到亿万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的极其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革，其任务是多么繁重、复杂、困难。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比较顺利地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农民的两极分化问题，使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把农村中最后一个剥削阶层富农阶层，就地改造成完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不仅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于避免的生产力的下降和社会动乱，而且使农业生产逐步增加，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个体经济的改造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广、经济文化落后、个体经济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进行如此广泛、深刻、复杂的农村社会大变革，工作中难免会出现缺点和偏差。这主要发生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在合作化高潮期间要求过急。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办初级社的高潮，1956年又进入办高级社的高潮，差不多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速度太快。这样一来，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未能贯彻始终，行之有效的互相衔接的三步走形式未能坚持到底。

其次是自愿互利原则未能认真贯彻。由于要求过急、工作就难免粗糙。不少地方采取政治强制或行政手段强迫中农入社，缺少说服教育和示范吸引的办法。如陕西省“有些地方强迫某些暂时还不想入社的富裕中农入社，认为他们的牛大，车好，土地肥，一户能顶几户”。

其三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排斥合理的经营分配方式和劳动方式。由于指导思想上求快求多，求纯求大，组织形式一再改变，忽略了对经营管理形式的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能认真探索适合高级社这种组织形式的经营管理的新制度、新方法，而是一珠的要求整齐划一的高级社形式。因而在一些社队长期存在着下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干多于少一个样的不良现象，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四是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农业合作化那样的偏差，以致影响到手工业产品质量下降，传统产品失传，品种减少，乱裁乱并，撤点过多，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有人提出：既然50年代三大改造是基本正确的，那为什么现在又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认为：中国现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不是对三大改造的否定，而正是在三大改造的基础上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解决三大改造遗留的问题。

首先，目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正是在坚持三大改造的正确方向基础上，纠正三大改造中工作的失误。顺利地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三大改造的主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我们目前的改革开放，正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三大改造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方向是一致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也正是为了纠正三大改造中工作的失误。因为事实证明，单一的经济模式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私营经济的一定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扩大就业、活跃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发展多种经济，正是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自我完善。

其次，当初的改造和今日的发展，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党的总政策而决定的，都是从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目的出发的。因此在基本方面二者都是正确的，客观形势不同，政策自然不同，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变革自己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解放初，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中国人民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同时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加之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起步，这就决定我们必须采取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政策，否则，不仅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要求，而且，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得到巩固都会有问题。三大改造解决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说明当初的改造是正确的。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如果继续实行僵化的经济模式，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正是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出发，而作出的正确决策。

第三，50年代的个体经济、私营工商业同现在的个体经济和私营工商业，有着很大的区别。50年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工商业大多数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当时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还未确立，个体、私营经济在整

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占77.7%，具有左右市场、影响物价的经济实力，对中国社会经济向何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在的个体经济、私营工商业是在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受到国家的严格的调节和控制。所以，在建国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害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就必须采取改造的政策。而且要阻止个体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也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政策。目前的个体经济和私营工商业，它们是国营经济的有益补充，因而必须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

第四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一、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因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首先是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解放初，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落后，财政面临严重困难。新生的人民政权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90%是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现代工业约占10%。在整个工业经济的结构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60%以上，而且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大部分是轻化工业，产品多为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与国计民生关系甚大。商业方面，国营的比重更小，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不仅在批发上比重很大，零售商业绝大部分也为私营。这种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经济恢复和发展任务不可忽视的力量，必须加以利用。否则，不仅会影响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目标的实现，甚者还会导致整个经济的混乱。正因为如此，解放初，党和政府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调整和扶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可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使它有害国计民生的方面不时显露。1950年的物价高涨和“五反”运动中查出的“五毒”行为，反映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消极作用已经相当严重，使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为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经过这场运动，资本主义的不法经营受到了严重打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原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基础上，为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创造了条件。到1952年，我国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5.8倍，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经销等产值，占全国私营机器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金融业已全部公私合营，商业方面也发展了统购、代销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情况表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建国初期国民

经济恢复的需要，而且已经开始具体实施了。

1953年，我国执行“一五”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我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势必会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矛盾。首先，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政治经济上都存在一定的不稳定的因素，不解决会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政治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对现状越来越不满，与资方的矛盾愈来愈大，已不是调解可以解决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企业的生产关系，除了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别无他途。其次，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国家要求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在内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企业大多都围绕利润转。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常常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和比例，影响产供销平衡，不利于经济建设。第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分散落后，适应不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多数是小型分散落后的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在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它们要么完不成加工订货的任务，要么同国营企业抢夺原料市场，要么偷工减料，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事实已经表明：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日益成为国家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障碍，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解决上述矛盾，解放生产力。正如陈云所说：对资改造政策的提出“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作出的科学决策。在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列宁首先提出通过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达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然而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将这些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当时中国在客观上存在着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民族资本实行赎买的可能性。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并普遍地发展了合作经济，因而有可能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除此之外，中国民族资本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首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与国家政权、外国资本没有联系。在历史上，它是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在发展民族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起过进步作用。其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规模小，资金少，力量薄弱，技术落后，这种状况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在其发展中处处受到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挤，因此，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及官僚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同时它的发展又往往离不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依赖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三，上述情况反映到政治态度上，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又具有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同时又有强烈要

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面。

在正确分析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情况和特点的基础上，建国初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进行了两次工商业的调整。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用以调整工商业最合理最有利的手段，是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利用和限制的最有效方式，并初步提出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为了科学决策起见，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率领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听取意见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调查组向中央提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两次扩大会议对该报告进行讨论，经过反复论证，会议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以及和平赎买、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

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资改造的方针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区分两类资本主义，采取不同政策。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划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把官僚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采取没收的政策；把民族资本主义视为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力量，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把官僚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对它采取消灭的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同盟军，对它采取团结的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经验之一。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依然有两面性，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时，对民族资本主义区别对待。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窝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它不仅调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因素”，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消灭了整个资产阶级，使资本家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2. 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虽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作用，但它户数众多，遍布城乡，同广大群众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对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加上中国经济落后，又经过了长期的战争破坏，国民经济支离破碎，满目疮痍。尽管当时政府已经没收官僚资本收归国有，但国家并没有力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承担的经济任务全部接管过来，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中的一些进步人士，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与共产党在政治上长期合作共事，是共产党人的老朋友，解放后，相互之间在政治、经济上团结共事也是有条件和可能的。因此，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

的政策，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0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和 6 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调整工商业的决定，制定了“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的利用政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支援战争，党和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加工、订货等进一步扩大。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性和追逐非法高额利润的欲望恶性膨胀，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日益暴露出来。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实行打击、限制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开展了两次限制与反限制的大较量。第一次较量是解放初期反对市场投机的斗争。从 1949 年到 1950 年资本家乘国家财政困难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先后四次掀起大的物价涨价风。一些资本家通过金融投机哄抬银价，对粮、棉等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同国家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及时地采取了加强金融管理、市场管理、控制主要商品价格等手段，明令禁止金银外汇在市场上流通，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同时人民政府调集大批粮、棉、煤、布、盐等主要物资在各大城市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给投机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人民政府逐步建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管理制度，制定了有关金融、税收、市场、劳资关系等一系列的法令、条例，牢牢控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方向。第二次较量是 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随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私营工商业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消极因素也膨胀起来，出现了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同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五反”运动中，党中央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以后从严；多数人从宽，少数人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其分类标准一般是根据违法所得的数量和坦白交待的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处理。最后定案，基本上是采取工商户自报，工人群众公议，经过协商，由有关部门核定处理。对 4%的严重违法户和 1%的完全违法户进行严肃处理。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再次受到打击，有妙地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一面的发展。到 1953 年，当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和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幸义改造的政策。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当时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由于上述矛盾，私营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生产率都很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因而许多重要工业品供不应求，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合理的发展，就不能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中国就不可能摆脱那种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从上述情况出发，谨慎地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有代价的和平赎买方式，辅以政治思想教育，引导民族资本主义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3. 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进行苏维埃革命和建设中，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列宁看来，落后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必

须经过一个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必须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和方法。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中国的主要经济成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国家采取发放工商贷款、供给私营工业企业原料，委托其加工，收购私营工厂产品，委托私商代购代销等措施，发展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从流通领域入手，控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把它们的活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从而初步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盲目性。1953 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需要进一步改变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逐步向高级形式转变。1953 年春，李维汉带领中共中央统战部调查组到上海等地考察，提出了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主要是通过公私合营形式实现资本主义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见解。李维汉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公私合营这种国家资本丰义较之加工订货等形式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这样的企业中，国家可以掌握经营管理权，工人群众把自己的劳动看成是为国家生产而不是为资本家生产，容易激发生产的积极性。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认公私合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途径。6 月底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李维汉同声报告中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现有的若干问题，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8 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再次明确地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至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上，全党都更加明确了。

4. 逐步过渡的方针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按照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把前述几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分为高级和初级两种。

在 1953 年底以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党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措施，使这些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初级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1954 年起，实行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是年 1 月，中财委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计划会议，制定了 1954 年对资改造的方针：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9 月，国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个别公私合营上来，并对公私合营工作作了具体的规范。企业合营以后，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显示出优越性。这些情况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针对这种情况，1955 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了"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以克服行业中只合营少数大企业和生产经营较好的企业，而中小企业生产得不到安排的矛盾。1955 年 3 月陈毅在"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贯彻统筹兼顾的政策，在扩展合营

的方式上，应采取个别合营与按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有很大的分散性、落后性，除了少数的现代化的大工业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落后的中小企业，如果不按业通盘规划，只对较大的重要企业进行个别合营，不仅使多数的中小企业在经营上更加困难，而且会给扩展公私合营工作造成困难。中央批准了陈毅的报告，制定了按行业进行公私合营的政策。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各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先进行改组、合并，再实行公私合营。1955 年 11 月 16 日至 24 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总结建国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1955 年秋开始，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阶段。至此，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完全形成。它的特点是：企业生产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到质变，循序渐进，既完成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又避免了激烈的社会震动，使生产逐年上升。事实证明，我国采取逐步过渡的政策是成功的，到 1956 年 3 月底，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胜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 赎买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可以通过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并且认为，如果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能用赎买来实行，那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使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得到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赎买的过程中，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

①利润分配。初级形式主要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润按所得税、公积金、工人福利奖金和资本家股息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方的股息红利可占 1/4。这是 1953 年国家所作出的规定。在此之前，1950 年政务院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企业股息不超过 8 厘，股东红利可占到提取税收、公积金和股息后的 60%，从 1950 年到 1955 年资方分得利润共 14 亿元。

②定息。在实行公私合营后，由于生产的发展，企业所得利润也日益增加，“四马分肥”已经不适应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以定息形式代替“四马分肥”。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公私合营企业私股推行定息办法的指示》，指出：“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推行定息办法，是国家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实行定息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使企业的管理权力完全转移到国家的手中，使企业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经营管理，这将有利于工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为企业进一步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在定息年限上中央先规定拿定息的年限为 7 年，后又延长 3 年，每年提取私股资产 5%的年息。在 10 年多时间里，政府为此共付利

息12亿元。

③高薪。对资本家采取高薪不变的政策，以照顾他们原有的生活水平，这也是一种赎买。从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65年，资本家高薪所得共8.5亿元。

6. 对所有制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征，创造性地制定了把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结合起来，在改造所有制的同时，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政策。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实行教育和改造的政策，促使他们接受国有化。"党的这一坚定不移的方针贯穿在我国对资改造的每一个阶段。在1950年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中，党和政府采取打击少数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不法资本家的政策；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揭露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其目的就是要用斗争的手段，教育资产阶级爱国守法，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1953年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一系列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治思想教育，目的也在于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自动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以后，党中央又多次召集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教育他们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明确的政策规定：在企业的改造中，坚持自我改造的方针，让资产阶级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检查，有缺点讲缺点，有成绩讲成绩，把绝大多数工商业者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们安排工作，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并对他们中间的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作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通过这些政策措施，不仅达到了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目的，而且还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三、对资改造政策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中国共产党采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在社会没有发生动荡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至1956年底，全国原有私营工业的99%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私营商业的85%实行了公私合营。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第一，政策的实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实践表明，工商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人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当了企业的主人，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企业经过一定的改革和经济改组，生产设备的潜力得到了发挥。据有关统计资料，公私合营后企业劳动生产率如以1950年为基数100，那么1956年则为314；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1955年增加了32%；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额比1955年这些企业的零售额增加了15%以上。更重要的是对资改造的基本完成开辟了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道路。旧中国搞工业近百

年，积累固定资产128亿元，而新中国到198年工业固定资产已达4100多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总和的30多倍，几种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到1988年，钢由1949年的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由第9位上升到第1位；原油由第27位上升到第5位；化纤由第26位上升到第3位。同时，就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说，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1951—1985年，世界平均是年增长4.9%，发达国家是4.2%，中国是11.5%。事实清楚地表明，对资改造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并把资本家改造过来，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后，工商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首先表现在，资本家虽然在政策上还有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已不能支配。同时，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也丧失了。其次，资本家改变了原来的地位，不能再以企业主的身份来管理企业。在合营的企业中，原来的资本家只拥有“国家给予他们的一般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权，这不是资本家的职权，而是公务人员的职权”。其三，资本家所得定息不是在资本家的资本运动中实现的，而是工人在为国家为人民进行生产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为对资本家进行赎买而生产的一部分特殊形式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领取定息多少已经与企业的利润多少相脱离。这就可以看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达到了“阶级消灭、个人改造”的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资改造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一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别采取没收、和平赎买的政策。二是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创造了逐步削弱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到最后取消其所有权的办法。三是把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在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改造的一个伟大创举。以上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为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中国共产党对资改造政策不可能十全十美，难免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偏差。

中国共产党对资改造政策有失误，主要是说，这个政策不够完善，其中主要有三点：①政策规定改造的界限不清，未能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标准和如何区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独立小工商业的界限。②政策没有分清改造的先后缓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各地、各部门发展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应结合当地实际，根据国计民生的需要，分先后缓急分期分批进行，但有关政策对改造的时间和速度控制不力，从而导致一哄而起。③政策规定改造过于彻底。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实

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应允许一部分工厂或商店不参加合营，让它们作为国营经济的补充而存在，但在改造的高潮中政策的导向是要求全部合营。

中国共产党对资改造的偏差，主要是指政策实行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偏离了原先政策所确定的原则方向。关于行业合营的时间问题，中央计划是在1956年到1957年两年内完成，实际结果却是3个月便基本实现了。由于速度太快许多本应在合营前做的工作，只好放到合营后去做。关于合营行业的问题，中央原规定尽是在重要的行业实行合营，实际结果却是在所有行业实行了命营，从而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造成了经济结构形式的单一化。关于对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的改造，中央原先确定只实行经销代销和合作化，实际结果却把他们带进丁公私合营。关于经济改组问题中央的方针是大部不变，小部调整，实际结果却是过分集中合并。关于对资产阶级改造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原来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要利用私方人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是对资产阶级不信任，让他们坐冷板凳，割断他们同企业的联系，结果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后来演化成我国结构形式单一，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平均主义的经济体制。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的经济政策

1956年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午至1978年的二十二年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探索取得了成果，但由于“左”的原因，我国的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致使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提高。在这一阶段，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和挫折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一节　“大跃进”中经济政策的失误

一、“八大”前后的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照搬照抄前苏联的经验。但是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求。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斯大林错误和苏联经验的重新思考，更迫切地意识到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1956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戕34个经济部门的同志来汇报、讨论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科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讲话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我国经验，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建设、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十个问题，即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

海工业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讲话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所有这一切，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大会指出，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在实际上就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的重大决策。

大会还制定了党在经济、政治、组织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在经济建设方面，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经济体制方面，大会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经营的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工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国家工作方面，大会要求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在党的建设方面，大会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群众路线；要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要健全党的各级组织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崇拜，避免个人专断。

中共八大是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举行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果。

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国内外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国际上继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东欧又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巨大的混乱和损失。国内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不能不引起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1957年2月，毛泽东召集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一般不表现为对抗的性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讲话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指出：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对全国城

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从经济上妥善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以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这些理论和 . 政策的提出，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它对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新的伟大战略转移，对于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中共八大前后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果，在实践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7 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和速度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均发生了严重失误，使探索过程出现曲折。

1. 出振奋人心的“超英赶美”口号

“大跃进”中经济政策的失误，首先是从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酌高速度开始的。而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又是从提出振奋人心酌“超英赶美”口号起步的。当时，“超英赶美”的口号，既是一个政治口号，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号令。它是在 50 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进行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提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 年代前期，由于原苏联的经济高速增长，已使它由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军事强国，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苏联的模式就是一种“跃进”的模式，1957 年 5 月，赫鲁晓夫声称，“在最近的将来”，最迟不超过 1961 年，苏联在肉类、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要超过美国。赫鲁晓夫说：“我们并不想用炸弹摧毁资本主义世界。如果我们在肉、奶和黄油方面超过美国的水平，我们就是向资本主义的支柱发射了一颗重磅炸弹……我们勇于向美国挑战，在某些极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赫鲁晓夫创造的通过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方式动员人民赶超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当时，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以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实践。1957 年 8 月，苏联发射了洲际导弹。10 月和 11 月，又连续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冬造卫星上天，率先进入太空后，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国事的信心大增，与资本主义竞赛的赶超意识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潮。

同年 11 月原苏联隆重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盛大活动。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会上作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的报告。声称我们有一切根

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共产主义的光辉宏伟的大厦正日益清晰地在各族人民眼前显现出来”，“我国人民正在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最高规格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原苏联的这次庆祝活动。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就企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一直有强烈的赶超意识。早在1955年10月，他就说过：“大约10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再加一点，大约50—70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1956年，毛泽东在和冶金部的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还说过：“人家（指美国——作者）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呢？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迫切愿望，也表现出急于求成的心情。所以，他在莫斯科继苏联宣布15年赶超美国的目标后，于1957年11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以爬到年产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钢，岂不是超过英国了吗？在这之前的11月8日，他在同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谈话中，还谈到了按总产量计算15年可以超过英国或法国，8—10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的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竞赛目标，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赶超热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毛泽东的赶超意识给莫斯科加了温，莫斯科的赶超思潮又给毛泽东和中国升了温。这说明，当时毛泽东所追求的目标，并非由毛泽东个人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的产物，同时，这又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毛泽东于11月21日下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25日，《人民日报》即发表社论指出：“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演说中说，在15年以后，苏联将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可以预期，同一时期，或者稍多一点时间，中国可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将在和平竞赛中把帝国主义阵营更远的抛在后面。”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在15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就说明，当时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不仅是毛泽东，而且包括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和地方的领导人，都在盲目地追求某种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目标。

随着“左”倾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形成和逐渐发展，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也越来越提前。

1958年元旦，中共中央明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动员令，“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准备再用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同年3月，在党的成都会议上，提出钢产量可以有两本账，即必成账625万吨，期成账700万吨。接着冶金部认为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还可以设想更快一点，提出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各部门都向中央写了贯彻成都会议精神赶超英国的报告。根据这些报告测算，如果钢产量5年内达到4000万吨，那就可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于是会议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并以7年超英，15年赶美为目标制订了五年计划新指标。同年6月22日，毛泽东根据新的测算，在一个报告的批示中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同年9月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同志的一封信中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仅隔3天，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9月初短短的9个月内，“超英”的时间要求几经变化，越提越急，先提15年，尔后提前到7年、3年，最后竟然要求在1959年一年的时间，除发电量等少数指标外其余都要超过英国。与此同时，赶上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美国的时间要求也一再提前，从30年、20年，提前到15年，最后认为有7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在今天看来，这些口号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当年却是白纸黑字地写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上，出自我们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嘴中。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并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我们满怀信心地相信，中国终归有一天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希望用尽量短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问题在于时间规定得太短了，速度要求得太快了，脱离了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实际。也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长期性认识不足。经过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的挫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才有所认识。1962年1月，在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示：“中国的人中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即是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卑国家英国和美国，不是15年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

2. 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指标

在振奋人心的“超英赶美”口号提出的同时，随着赶超时间的不断提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在不断变化，而且越来越高。

“一五”期间，我们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总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下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突出地提出了速度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说：“我们的任务是：在7年内（争取5年内做到）基本上实

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提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比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指标高得多，工业总产值由年增长13.9%提高到33%，粮食和棉花的增产速度分别从5.9%、6.7%提高到16.6%、24.8%。有的省委书记提出一年"四实现"，即实现农业纲要40条、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有的省要争取5年完成10年规划，即粮食、棉花的产量翻一番，油料的产量翻两番，消灭四害，扫除文盲。还有人表决心，"苦战3年基本改变本国面貌，在7年内实现农业40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5年完成"。某大区负责人表示：全区5年完成纲要40条的主要产量指标，5至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在这种热烘烘的气氛里，毛泽东虽然也告诫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同志必须稳当一点，要谨慎，要留有余地。但是，毛泽东是欣赏这种"大跃进"气氛的。他没有表示不相信上述高指标，反而说，今年如果能增加1000亿斤粮食，700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实际上，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只能增产粮食100多亿斤。可见，当时提出的那些高指标是多么脱离实际！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认为我国正经历着恩格斯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从此，全国务行各业务条战线迅速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热潮。

"大跃进"的浪潮对"二五"计划编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计划服从政治运动的需要，走上了高指标的道路。党的八大提出的较切合实际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编制了新的"二五"计划草案。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这个《意见》对已经抬高的计划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二五"计划《意见》提出：为了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五"期间（1958年到1962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左右，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3%左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7.4倍。到196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要比1957年增长五六倍甚至十多倍。

三年"大跃进"期间各项指标也越来越高。1958年指标，钢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番；粮食六七千亿斤，比上年增长60%—90%；棉花7000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1959年指标：计划要求比1958年卫业产值增长41%，农业产值增长39%；主要工业产品中，钢再翻一番以上，采矿、轧钢、发电、煤炭等设备也要成倍甚至几倍地增长；生铁、原油、化肥等十几种产品产量要增长50%以上；主要农产品中，粮食、棉花等都要增长40%以上。1960年的指标更高：工业产值在上半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再增长29%，农业产值在上年增长16.7%的基础上再增长12%，钢比上年增长38%，原煤增长22%，粮食增长10%，等等。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一个你追我赶的形势已经出现，全国进入了一个打破常规、打破常识的追求超高速度的赶超热潮，其狂热程度、愚昧程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唯心的口号，都成了《人民日报》的标题。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长期是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战胜大于自己十倍甚至百倍的强大敌人，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终于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建国后，我们党保持了这股革命锐气，推动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尤其农业合作化任务的迅速完成，使毛泽东和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法，我们就有了万能的法宝”，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一穷二白”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

其实，列宁早就指出，过去我们是依靠英勇精神“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光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我们要解决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任务了，在这里不能向后看，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任务了”，必须“学会用另一种速度来工作，把工作看作是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的事情”。

因此，搞建设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尽量避免大的波动，力争较高但是平稳的速度。如果脱离国情，只求快速度、高指标，其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欲高反而低。当然，有时可能出现一个短时间的高速度，但必定会很快跌下来。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很不合算的。比如 1958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32.2%，似乎很快，1959 年仍增长 19.5%，也还可以。但 1960 年只增长 5.4%，1961 年猛下降 30.9%，1962 年接着又下降 10.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只递增 0.6%，是建国以来所有五年计划中增长率最低的。搞了三年“大跃进”，却用了五年时间来调整，想快反而慢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和原料，工业能提供多少商品，财政能够积累多少资金，教育能够培养多少科技人才，能源和交通能够承担多少生产能力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搞经济建设，既要力求获得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和速度，更要力戒盲目求快、脱离国情的主观主义倾向。计划必须切合实际，建设必须同国力相适应，这是我们从失误中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二、不尊重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1. 提出工业战线“以钢为纲”的口号

工业战线的“大跃进”，是以钢铁翻番为核心开展的。关于确定钢铁指标的问题，有一个逐步酝酿和形成的过程。

我国原有的钢铁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建国初钢产量只有 15 万吨，经过 3 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57 年钢产量已达到 535 万吨，为 1949 年产量的 33.9 倍。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发展指标到 1962 年计划达到 1050—1200 万吨，比 1957 年增长 16%。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到 1966 年就可达到 2000 万吨左右。这样的发展速度已经是相当快的了，但是后来头脑发热，1957 年毛泽东在莫

斯科会议上，提出我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为了要在15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曾绎设想15年后的钢产量必须达到4500万吨，因为英国当时（1957年）的钢产量为2100万吨，预计15年后将达到4000万吨，为了超过它，我们必须达到4500万吨。为此，我们曾设想过三个5年的安排：第一个五年（1958—1962年）达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1962—1967年）达到3000万吨；第三个五年（1968—1972年）达到4500万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的基数是十分重要的。1958年2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确定钢的年产量为624万吨（第二本账是700万吨），这个指标虽然有些偏高，但还是没有远离正常的轨道。3月成都会议确定为700万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提高到800—850万吨。6月各大协作区召开钢铁会议，对指标仍然有争议。直到6月19日，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年产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意见，提出了1958年翻一番即1070万吨的指标，并作出了号召全党全民为1070万吨而奋斗的决议。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刚批评过苏联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错误，而不久，却又是他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单纯抱住钢的高指标不放，而且还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正如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东欧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所说：世界上就有这么蠢的人，像我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我们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其他东西都可以跟上来。很明显，毛泽东是指望在“钢铁元帅”的带领下，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是一个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在当时基本没有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对国民经济计划努力做到综合平衡，是保障其协调发展的关键。实践证明，没有综合平衡，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但是，为了给“大跃进”找到更充分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便搬用了哲学领域里的“不平衡”论。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要求大家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到经济计划中去，不断用先进的经验，在前进中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并提出“革命的平衡”、“积极的平衡”的观点。其实，当时所谓的“革命的平衡”、“积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主观主义的以钢为纲的高指标平衡方法，即先订好了钢的高指标，然后要各部门向它看齐。

从苏联的经验来看，要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对大量资金的需求问题；二是要同其他生产部类保持合理的比例。只有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社会生产才可能保持平稳发展。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采取的是以牺牲农业来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弊端显著。但实践证明：我们犯了同斯大林同样的错误。

由于钢产量的指标订得过高，现有钢铁生产能力自然显得严重不足。怎么办？大打人民战争！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兴师动众地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到1958年9月，全国已有5000多万人投入到找矿、采矿和炼钢的行列之中，几

乎全国主要劳动力都上了。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都让路，各路大军都来支援。炼铁需要矿砂，大批人力上山找矿；炼钢需要煤，来一个“全民大办小煤窑”；电力供应不足，发动“全民办电”；铜铝缺乏，号召“全民炼铜”，“力争快速发展炼铝工业”；交通运输跟不上，“立即开展一个全民运输运动”，“全民搞运输，保证出钢铁”，“组织亦工亦农亦军的运输大军”（以上都是人民日报社论题目）。这样苦干加蛮干，到年底，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算是完成了翻一番的指标，但其中1/3是不合格的次钢。这种“以钢为纲”所带动的一系列大办，不仅掩盖了许多问题，说假话，说大话，唱高调，搞浮夸，各种歪风邪气上升。而且，由于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发展钢铁，导致交通运输、能源电力全面紧张，轻重工业之间，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矛盾加剧，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主要经济比例出现了失调现象。钢铁等重工业孤军突出，增长过快。本来希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但这位钢铁元帅太大了，占用的设备、资金、原料、运输和人力等过多，它一升帐就把别的不少行业挤掉了。

2. 基建投资膨胀，积累率过高

基本建设投资，指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是以货币表现的基本建设工作量，它可以用来反映基本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比例关系。积累是指把一部分国民收入不用于消费，而是用于扩大生产、建立物质储备和进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

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要积极稳妥，就必须解决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相兼顾，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对此，薄一波同志在“八大”发言中作了精湛的论述。他说，合理地解决积累和消费关系，就是要把集体的长远利益和个人的当前利益结合起来，使之既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根本改善获得可靠的物质保证；又有利于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发挥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指出，积累和消费的界限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积累与消费相适应，才不会因积累增加而影响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消费如果超前，就会延缓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苯系，使经济建设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1958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是根据周总理亲自主持起草，并经过中共“八大”审议并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精神安排的，可以说计划比较稳妥可靠。但是，“大跃进”一来，主观主义盛行，“二五”建议也好，年度计划也罢，统统被抛到一边。当时，上下都搞“两本账”，随心所欲地乱提口号，乱改指标，使经济工作实际处于无计划状态。由于全民炼钢，大办工业，使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积累率提到了极端反常的高度。

1958年全国基建投资269亿元，比上年增长93%，比“一五”计划期间年均投资总额增加一倍以上。结果造成积累率急剧上升，积累率从上年的24.9%，提高到33.9%。职工人数急剧增加，从2450万人增加到4532万人，增加了近一倍。这一年的国民收入，从数字上看是增加了157亿元，但大幅度增加的只是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13.6%，这种情况是建国以来第一次。1959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午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80.7亿元，增长29%，总投资规模达到349.7

亿元。这一年，国民收入只增加157亿元，而积累却增加了179亿元，致使用于消费的部分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比上年减少22亿元。这种情况也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其结果使积累率由上午的33.9%，一下子上升到43.8%，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1960年，全国基建投资总额达到了388.69亿元，比上年增加近40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5%，是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这一年，在国民收入比上年减少1.4%的情况下，积累率仍高达39.6%。"大跃进"期间，三年平均积累率为39.1%，共达人民币1438亿元，比整个"一五"期间的全部积累还多44%。1958年、1959年两年新增国民收入339亿元，其中325亿元用于新增积累，仅余14亿元用于新增消费。

如此高速度、高投资和高积累，必然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从1959年开始，出现某些商品供应紧张。1960年，国家财政收入634.9亿元，支出654.1亿元，财政赤字为19.2亿元。零售商品货源比上年减少8.5%，与社会购买力之间出现74亿元的差额。商品供应特别是农副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全国每人平均年粮食消费量比上年减少46斤，降为327斤；食油消费量比上年减少0.8斤，降为3.7斤；猪肉消费量比上年减少2.9斤，降为3.1斤。各种必需生活用品匮乏，物价猛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下降。

历史经验证明，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必须的，但不能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不能忽视发达国家所探索过的带有一般性规律的经验的东西。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客观的经济规律，不能违背，违犯了就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报复"，这是谁也无法逃避的。"大跃进"期间党的经济政策失误，就在于忽视了对客观规律的研究，没有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党的路线和客观规律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糊涂观念。他们认为路线是个纲，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要以是否符合于党的路线来衡量。再加上，解放前我们党就制定了经过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搞革命和建设都可以由党的主观意志来决定，不需要遵循客观发展规律。这样一来，在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思想指导下，自然就要干出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

另外，"大跃进"期间，党的经济政策失误，还由于在领导方法上背离了传统的调查研究、试点推广等传统作法，导致轻率的号召和领导。这样，往往使领导捕捉不住时机，把决心下错，或者下得不是时候。总之，就主观方面的原因来说，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而导致经济政策的失误。毫无疑问，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二节　反冒进和“八字”方针的制订

一、从反冒进到反“反冒进”

1.“反冒进；是怎么回事

从1956年到1958年，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走过了一段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到“大跃进”约曲折道路。所谓“反冒进”，是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的精神，本来是正确的。1956年，在完成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大好形势下，党内产生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使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现象。导致消费品市场紧张，商业库存下降较多，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当时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较早发现了这种倾向，他们多次建议中央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同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传了这个思想。同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也贯彻了这个精神。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决议指出：如果对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不估计到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错误。党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

实践证明，党的“八大”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所提出的反冒进的方针是富有创造精神的。可惜的是，由于实践的时间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所以反冒进的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

1956年初经济建设上的冒进势头虽然基本上得到遏制，但是并没有完全遏制住，在一些方面还是冒了。到年终决算，出现了1953年以来的第一个财政赤字年度。尤其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编制1957年计划的时候，从各部门、各地方汇集起来的指标来看，仍然大大高于保证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实际可能。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的经济工作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毛泽东强调1956年财政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中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周恩来等人则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在1956年11月10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讨论1957年的计划和预算时，周恩来提出1957年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会上大家都赞成这个方针。11月15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实际上，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不过当时还没有提出批评，而且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在1957年实行这个方针。这样，才使1957年的经济建设比较扎实健

康地向前发展，成为建国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当时也有人认为，反冒进造成了1957年经济发展的“马鞍形”，于是党内发生了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

2. 反冒进连续不断地受到批判和责难

反“反冒进”开始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发生反“反冒进”的“左”倾错误，与当时国际国内连续发生重大事件有直接关系。

苏共20大，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西方国家掀起了新的反苏反共高潮，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先后爆发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当时认为，波、匈等一些东欧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许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对国际共运的这种判断，必然要影响到我党对国内问题的认识。当时受波、匈事件影响，国内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反常现象；1957年又确有少数人借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恶意的攻击。一时间，社会政治气氛重新变得紧张起来。中共广大党员和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改造资本家的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警觉又重新被唤醒了，他们本能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为争夺失去的权力而发起的行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在中央的号令下，在全国全面展开。运动一开始，由于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结果许多对党的缺点错误进行善意批评的人，也被当成右派分子，受到错误处理。面对几十万“右派”分子，中国共产党感到，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取得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完全胜利，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个斗争可能还要延续10年至15年。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次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判断。这样一来，使全党工作的中心又回到阶级斗争上来了，经济建设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刘少奇在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很显然，这样一种建设方针，并不是对建设规律进行认真探索的结果，而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需要”。而这个方针，与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所执行的方针，是截然相反的。为了推行这个“大跃进”的方针，就必须扫清“障碍”。

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起，“反冒进”连续不断地受到批判和责难，先是在党内，后来发展到全国公开批判。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是“一股风”，这股风“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等等。根据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人民日报》先后于11月13日和12月12日发表两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对“反冒进”进行了责难。

1958年1月至5月，毛泽东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1958年1月3日，在党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说：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同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再

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反冒进者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是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来的一股风”。并提出“以后不许提反冒进”。这次会议，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中，不仅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发展，加紧了“大跃进”的发动，而且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损害了集体领导原则，损害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从这时起，有两个不正常的东西在开始形成：一是毛泽东的话只能聆听执行，不能持异议更不能反对；二是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可以纠正，但不能提什么“反冒进”，更不能触动根本指导思想。

同年3月9日，在党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反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同年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武断地认为，1956年下半年的“反冒进”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马鞍形”，即1956年的高潮，1957年的低潮(实际上并不是低潮)，1958年更大的高潮；再一次批判了“反冒进”，对“反冒进”作了公开的否定结论。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检讨。会议还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在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五次讲话，进一步论述了关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连续而又激烈地批评“反冒进”？他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在他看来，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他主张前者，反对后者，甚至提出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

综上所述，党在1956年至1958年中经历了一场围绕着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直至“大跃进”的争论和斗争。历史已经证明：反冒进是正确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反冒进”不仅颠倒了是非功过，而且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回顾这一段走过的弯路，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党在经济建设中缺乏经验，没有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而又片面地强调了人的作用，用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因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在经济建设中，我们既要反对因循守旧的右倾保守，又要反对贪多求快的急躁冒进，因此在对待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必须坚持实事广卡是的科学态度，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什么错误倾向，不能只反右不反“左”。但是“‘左’比右好，‘左’是方向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纠正右倾保守比纠正“左”倾冒进容易些，而纠正“左”倾冒进却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要艰苦得多。困难得多。

二、"八字"方针的制订与执行

1."八字"方针的制定

从1958年起，我党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当时对于困难形势认识比较早的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现1959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春，调入大城市的粮食已经不够销售，有可能发生脱销的危险。于是，李富春即于1960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应当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设想。

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计划时，再一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总理听取汇报后同意李富春的意见，并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两个字。这样，由李富春提出，经周总理加以完善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提出来了。

9月30日，党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说：在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八字方针。也是第一次把这一方针向党内宣布。

党中央在1960年冬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要求全国农村，彻底清醒"一平二调"，彻底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化风"）。这说明我党已经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接着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报告》。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同时对各部门各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报告还指出："要在1961年的计划中，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即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八届九中全会的公报，正式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此，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

由上可见，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过程中指导思想失误，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召

开的，全会着重讨论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确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实际上停止了“左”倾冒进的经济方针，它是我党摆脱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转折点。

2.“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

党中央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确定贯彻八字方针，争取国民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分两步走，即从1960年起把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5年是恢复阶段，后5年是发展阶段。确定分两步走的思想非常重要，这对于防止急于求成，扎扎实实地搞好调整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从实践的情况来看，第一步经过5年时间，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未能实现。

调整国民经济的5年（1961—1965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1年到1962年底。这一阶段以调整为中心，从农业开始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第二阶段是从1963年到1965年。这一阶段是又调整、又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达到并超过1957年的水平，为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一、1961年的调整。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当时中央脱离实际有关，往往根据一些地方片面的、虚假的汇报材料，就贸然作决定、发指示。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中央派出3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当时，毛泽东亲自到广东，刘少奇到湖南，陈云到上海青浦县。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都分别深入基层作调查。3月，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这个条例草案，对进一步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这年秋天，在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主持制订了工业、高教、科学、文艺等行业部门工作条例。这些工作条例，提出了适合我国当时克服困难的具体政策和方法。

在经济体制方面主要有以下内容：（1）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大队，公社不得强行干涉大队的生产经营；明确生产队所有的资金、物资不得无偿强行调用；明确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和小农具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和手工业；集体收入分配严格实行评工记分办法，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取消过去的供给制办法，停办公共食堂。（2）已转为国营工业或公社工业的城乡手工业，凡不利于发展生产和生活的，改为工业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内部实行按劳分配，不强迫接受国家计划。（3）收回一部分原来下放不当的国营企业，重新由中央各部归口管理。（4）经济管理权（包括生产、基建、物资、劳动工资、购销、财务等）上收到中央和中央局。计划上下一本账，不得层层加码。（5）货币发行权归中央。（6）恢复“大跃进”后合并的供销社、合作商店和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在经济政策方面，作了如下一些调整：（1）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2）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将农产品分为三类，实行不同的收购政策。（3）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4）抽调物资支援农业和农用工业；提高基建投资中农业和农用工业的比重。（5）对公社化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的财物、劳力进行清理退赔。（6）

减少职工800万人，共有1000万城市人口回农村。(7)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8)对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平价定量供应，一部分消费品高价销售。

经过一年的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是困难仍很大。"大跃进"的要害、核心，是高指标。以上措施对这个要害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因此，这一年的生产和基本建设指标，仍然是偏高的，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根本扭转。

二、1962年的调整。1962年，是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关键的一年。该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7000多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讲了话。会议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困难作了比较充分的估计，对于"大跃进"中的一些主要错误也取得了一致认识。会上，毛泽东和各级负责人都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于加强党的团结，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向中央报告了二三十亿元赤字的财政状况。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讲了全面的财经工作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的意见。刘少奇同志认为有必要向国务院领导成员作更详细、更充分的报告。随后，陈云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即《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此期间，中央决定恢复财政小组，由陈云任组长。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这两次会议对当时的困难形势作了进一步估计，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贯彻八字方针。9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一方面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仍强调不要因为讲阶级斗争而妨碍当时作为中心工作的国民经济的调整。会后，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全力以赴，排除干扰，狠抓调整经济这一中心工作，基本上没有因为在认识上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不切实际的估计，而在实际工作上阻碍调整工作的继续进行。因而，党的八字方针以及相应的各项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

1962年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1962年的计划指标与1960年的实绩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47%，其中，重工业产值下降57%，钢下降68%，轻工业下降26%。计划放到经过综合平衡的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后，在人为膨胀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就暴露出来了，许多企业任务不足，有的根本无事可干。对这些企业下决心进行了"关、停、并、转"。到1962年10月，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比1960年底减少4.4万个，减少幅度为45%。

(2)压缩基建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同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重点用于农业、农用工业、出口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建设。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3)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精简职工800多万，减少城市人口1000万。1962年继续精简职工1000万，减少城市人口1200万。

(4)进一步调整农村体制和政策。重新规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

制定了有关政策。在财政、金融、信贷、外汇、市场等方面，加强中央的集中管理，开展企业的清产核资、扭亏增盈工作。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

由于采取了以上果断措施，至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三、1963—1965年的调整。1962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按正常情况，应当从1963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当时，中央考虑到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由于有了前二年的调整作基础，后三年的调整进展比较顺利。与1957年相比，1963年经济基本得到恢复，1964年、1965年有了新的发展。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5%，其中，农业增长9.9%，工业增长98.1%，工农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关系、财政信贷收支关系，社会购买力与货源的关系等，都比较正常，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总之，我国的经济工作经过5年时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在1965年已经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综上所述，党在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又在1961年到1965年间，领导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最终使我国国民经济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实践已经证明：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就经济而谈经济。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往往同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紧密相联。只有清除“左”倾思想，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也作些调整，方能清醒地制定和贯彻执行八字方针，顺利地进行调整。否则，调整经济的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调整的实践还证明：为了理顺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在调整的同时，必须要求对工业、农业、商业的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实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总之，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这段历程，我们之所以能顺利地完成对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主要得益于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恢复和发扬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是实现调整任务的根本保证。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左”的经济政策

一、极左经济政策系统化

1.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大批“唯生产力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党曾有较长时间的失误。这个失误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当时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这场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会议期间，彭德怀等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中的一些“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当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指责。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向党、向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人民的事业向6亿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促使毛泽东强化了社会主义时期大搞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认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党内和国内，这种斗争要继续下去。这样，就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扩大到党内，在党内造成了日益紧张的气氛。

由于天灾人祸所致，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为克服困难，中央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三面红旗”试验中一些错误做法的修正。在调整过程中，各地农村出现了某些所有制的“倒退”现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共产风”和“浮夸风”，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否定着“三面红旗”。毛泽东对此十分忧虑，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党内矛盾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他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要警惕和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就把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说成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的矛盾斗争。

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晚年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践。

1963年至1965年，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一律称“四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斗争的矛头错误地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四清”运动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和斗争。1963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尤其是戏剧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以后又两次批示，批评文艺工作，致使一批文艺作品和文艺界代表人物受到错误的批判。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扩大到学术界。毛泽东为此作了多次批示和谈话，对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过火的主张。随着文艺、学术、教育领域批判的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这以后，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明确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至此，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开始理论化和系统化了。到这时，本来正确的毛泽东的阶级观的基本原理就超出了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并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理论”，使“文化大革命”有了完备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和指导思想，必然将政治工作置于经济、文化工作等一切工作之上。毛泽东提出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等都要服从于、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错误，提出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荒谬口号，把广大干部群众积极从事生产的行动，诬蔑为“产值挂帅”、“吨位挂帅”、“替走资派涂脂抹粉”，不断制造全国性的内乱。他们凭借对宣传理论阵地的垄断，宣扬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反科学理论，掀起了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他们公开鼓吹“革命可以冲击生产”，胡说“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唯生产力论”，诬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修正主义口号”，搞生产是“为资本主义创造物质基础”，甚至攻击四个现代化是“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的发财计划”，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生产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其中之一就是它告诉我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甚至政治建设，都有各自的规律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千万不能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能用政治斗争去代替经济建设以及其他一切工作。政治斗争决定一切，甚至用阶级斗争代替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失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对其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却不能代替其他工作。如果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斗争去决定一切，就必然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阻碍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再也经受不起“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建设方式了。

2. 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抓“走资派”

“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是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它反映的是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晚年思想在“革命”与“生产”两者的关系上，有一段演变的过程。在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以前，毛泽东主张阶级斗争服务于生产建设。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关系问题上的论述，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所以，从1949年到1956年革命确实促进了生产，生产不仅没有下降，还在稳步增长。遗憾的是，毛泽东不久即在1957年5月整风反右开始以后，就把阶级斗争从意识形态领域提升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与生产斗争中来，特别注重阶级斗争与生产建设相结合。从1963年开始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并把阶级斗争的矛头由党外指向党内，由党的下层指向上层。这样毛泽东的思想也转而强调生产建设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种逆转，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修正主义”在中国泛滥的危险性估计过分，同时也由于他对革命与生产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陷于主观唯心主义的上层建筑决定论和精神万能论。

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这一错误判断出发，毛泽东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用阶级斗争来推动各项工作。而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极力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经济领域推向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领域，并决定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毛泽东认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已经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并且认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6 年 8 月 8 日，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又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和国家的状况作出这样严重的估计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事实证明根本就不存在。

实践证明，“走资派”是一个随意性很大的非科学概念。但是，毛泽东他所指的“走资派”的含义，可以从他的某些言论中看出来。1969 年 4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了，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是管工人阶级。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至少是大部分，不讲全部的话。”在这里，毛泽东认为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管、卡、扣、罚”等的人就是“走资派”。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的两年，即 1967 年和 1968 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的推动下，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面。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走资派”。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夺权运动，使各级经济指挥和管理机构，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企业的生产指挥系统，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改组，有的甚至被撤消；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挨批挨斗，“靠边站”；大量长期积累的技术档案和统计资料被抢劫或被销毁，国家无法正常行使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造成打击一大片，伤害好人，放纵坏人的恶果，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综上所述，“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党的一个基本方针，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联系，把阶级斗争置于统帅位置，必然使“抓革命、促生产”演变为抓“走资派”。它不仅为“文革”的长期持续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冲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从“抓革命、促生产”发展到抓“走资派”，最终酿成了许多历史悲剧。实践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经济基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取消，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确立并逐步完善，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障碍已经扫除。虽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矛盾，但是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同时，我国社会并不存在某种代表旧

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力量，能够汇成强大的集团，阻碍生产关系的调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抓“走资派”的演变，这是毛泽东晚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重大失误。

3. 从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到“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我国城市曾大肆批判过“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城镇企业实行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而10年内乱中，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建国以来形成的各项经济管理制度、党在经济工作中正确的方针政策，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劳分配原则、利润指标等，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遭到批判，企业内许多必不可少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条例，如《工业70条》、《商业40条》、《科技14条》以及企业管理中的生产责任制、劳动纪律、质量检查、安全操作等都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而加以批判。而无领导、无制度、无管理的“三无车间”却被认为是“新生事物”加以推广。这就造成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生产事故增多、产品质量下降等一系列恶果，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企业工资制度中贯彻按劳分配的一些办法，说成是“物质刺激”，把要求社会主义企业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减少成本、增加盈利，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批判为“利润挂帅”，全部否定和取消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其后果不仅是挫伤了企业单位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还造成了整个经济生活的僵化。

在城市大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同时，我国农村曾发生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现象。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即取消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等。1967年在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恶浪，把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农民从事的饲养、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要求统统“割掉”。把自留地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地”，强迫社员搞“三献一并”（献自留地、宅边地、自有果树、并队升级），林彪、江青一伙不顾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刮集体所有制转全民所有制之风，到处搞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在一些地方把小队核算改为大队、公社核算，实行从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和集体向全民过渡，有些地方将城镇的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合作社以及合作商店都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砍掉，个别保留下来的，也推行国营经济的一套管理制度。这就使我国农村的所有制结构越来越趋向单一化，完全脱离了我国当时实际的生产力水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适应他们“左”倾路线的需要，把大寨作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并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把这一“经验”推向全国。使全国农村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等现象。

综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城市到农村，从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左”倾经济政策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在经济思想方面的错误，主要是在探索如何较快地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超越了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他

晚年在理论指示中提出的限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的思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必然也就畅行无阻了。

4. 从批“专家治厂”，到反对“洋奴哲学”

国营工业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其根本任务是生产。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极力宣扬企业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单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总工程师对企业的技术工作全面负责，被诬蔑为“取消党的领导”、“推行专家治厂”。由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人们思想普遍搞乱，使得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潮乘机泛滥成灾。造成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成本无人过问，劳动纪律松弛，学徒工要求转正，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为正式职工的“造反”浪潮此起彼伏，甚至出现严重违法行为，结果严重损害了经济管理工作，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早在“一五”计划期间，我国依靠苏联援助建成了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63年至1966年又先后从日本、西欧引进成套设备56项，准备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攻击引进设备是“洋奴哲学”、“汉奸行为”，煽动盲目排外的极左思潮，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7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坚持下，我国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有了发展，开拓了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与经济往来，引进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成套设备，有利于我们掌握世界70年代先进生产技术，增强我国的自力更生能力。可是，“四人帮”却把引进技术一概斥之为“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例如，为了迅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改变过去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我们在大力发展我国造船工业的同时，从外国适当进口一些船只，以补充本国造船能力之不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可是，“四人帮”却诬蔑这是“崇洋媚外”。江青一伙蓄意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诬蔑邓小平搞“卖国主义”。再例如，当时我国计划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以加强我国电视工业的基础。但是，江青一伙又寻衅破坏。1973年2月10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别有用心地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我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还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她还要求把蜗牛礼品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并提出“抗议”。江青一伙制造所谓“蜗牛事件”，妄图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加上所谓“洋奴”、“爬行”等罪名。在“蜗牛事件”的影响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迫推迟了几年，其他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工作也都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使已经趋于开放的对外政策又重新导向闭塞，错过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时机，延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综上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批“专家治厂”，到反对“洋奴哲学”，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历史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但决不是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经济。社会主义

经济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而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将愈益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存在于国内，而且必然要发展到国外。正如斯大林所说："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我们再也不能去干"文革"期间所干的那种愚蠢事情了。

二、"文革"中国民经济在某些领域内取得一定进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经济政策，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在"文革"中同"左"倾政策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由于这种斗争事实上削弱或缓解了错误政策的危害，同时，就极左政策的特征说，它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危害，主要来自"过左"、"过激"的破坏，即超越经济生活的客观实际，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干扰经济的正常增长，却不是对它进行直接瓦解。所以，从总体上讲，"文革"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基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并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

1. 粮食产量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 年粮食产量达 28631 万吨，比 1966 年增长 7231 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 12.8%，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由 544 斤增加到 610 斤，增长 12.1%。应当说，这个成绩是不小的。

2. 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运输工业发展迅速。1976 年原油产量达 8716 万吨，比 1965 年增长 5.7 倍，使中国由贫油国一跃成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石油化学工业迅速崛起。冶金工业新建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贵州铝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重要企业。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等一批企业。十年间，建成和陆续建成了成（都）昆（明）线、湘黔线（湖南株洲至贵州贵阳）、焦枝线（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太（原）焦（作）线、襄渝线（湖北襄樊至重庆）、京原线（北京至山西）等一批铁路干线。此外，还建造了一批高水平的公路大桥。十年间，邮电、通信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3. 科技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966 年 10 月第一次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1967 年 6 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 年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 年 4 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 年 3 月又成功地发射了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并回收成功。1975 年 11 月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的又一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此外，在农业科技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当然，以上这些建设成就和科研成果，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因为"文革"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的十年是不同的。"文革"有特定的含义，指的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而从 1966 年到 1976 年的十年中，不仅搞了"文革"，全党

和全国人民还做了其他许多工作。所以，这些成绩决不能归功于“文革”。如果没有“文革”，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一定会更快，所取得的成就一定会更大。

第四节　整顿经济的各项政策

一、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的整顿

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的整顿，实际上是从1971年底开始的，1972年重点实施，延续到1973年。由于指导这次整顿的基本精神是1972年公开提出的，主要的方针、办法也是在1972年出台的，所以，我们统称它为1972年整顿。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持怀疑态度。周恩来在经历了数年“文化大革命”后，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对“文革”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由于时代、环境的局限，当时周恩来虽然没有公开表露过一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他对“文革”的否定，已经在他领导的1972年整顿中充分体现出来。

1972年的整顿，是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入手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进入70年代时，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失控的局面。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物资匮乏，物价上扬，工厂生产停顿。解决经济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所以1972年整顿，首先抓的正是经济整顿。在整顿经济的过程中，主要实行了以下政策：

1. 加强了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了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

1971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的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这三个通知的下发，对于从全局上稳定国民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周恩来明确提出了认真整顿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意见。根据他的意见，由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等7项制度，提出企业要掌握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7项指标。以此为开端，全国的各个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开始恢复生产、健全制度。

2. 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

在企业整顿初皿成效的基础上，周恩来又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他在听取《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经济工作10条）的起草情况汇报时指出：1969年后，“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需要克服。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对此要“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

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要抓，否则就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平均主义问题，"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3. 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9月29日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正式恢复邦交。这前后我国陆续与许多国家建交。外交关系的发展，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1973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原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没争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和斯贝发动机等。

综上所述，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的经济整顿，虽然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竭力反对和阻挠，但周恩来以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以大无畏的精神，高超的斗争艺术，在自己身患癌症的情况下，（1972年5月，周恩来被发现患早期癌症）仍然坚持推行整顿的方针。经过整顿，初步扭转了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使我国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5%，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这次整顿，初步打开了国门，奠定了我国后来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是我们党内出现的第一次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尝试，它为1975年的整顿奠定了基础。

二、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

1975年的整顿，是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开始的，也是1972年、1973年国内形势一度好转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尤其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进行的。

周恩来身患重疾之后，面对"四人帮"的一次次发难，他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现在的地位，以便今后同"四人帮"一伙继续抗衡斗争。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人，便是邓小平。

周恩来对邓小平这位从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结识的老战友是极为了解和信任的。1973年，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周恩来就抓紧时机，安排好邓小平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等人参加，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同年3月周恩来提议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同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并针对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对邓小平作出了"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

价，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197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作出三项意义重大的决定。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10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国务院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格局确定。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根据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正确意见，努力贯彻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1975年2月到10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立即大刀阔斧地着手对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

1975年的整顿是以党的整顿为核心，以铁路的整顿为突破口，对工业、农业、军队、科技、文教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具体政策如下：

1. 整顿铁路秩序、确保安全正点

对经济战线的整顿，是从铁路运输开始的。当时，邓小平根据对全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铁路运输，秩序混乱。徐州、南昌、南京、郑州等地长期运输堵塞，妨碍京沪、京广、陇海、浙赣4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全国铁路日装车量连续下降，严重危及工农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邓小平决定把整顿铁路作为突破口，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整顿。

铁路的整顿，是从1975年2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开始的。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明了解决铁路问题的要点。首先，要根据铁路的特点，重申集中统一，加强铁路部门与地方的协作，采取一致步调，把运输秩序、装车数量搞上去。其次，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杜绝行车重大事故的出现。第三，反对派性，采取讲道理、深入教育等方式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对派性头头，要坚决调离。中央的决定只要为大多数职工拥护，在实践中就能行得通，并能收到显著效果。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经过会议认真讨论，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国鞍照《决定》的要求对铁路进行整顿。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亲临徐州指导整顿，并部署全系统的整顿工作。对铁路职工家属和沿线农民进行深入的动员，宣传中央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恢复和健全了必要的规章制度，批判了派性，严肃处理了极少数坏头头，对全国各条战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月，混乱的铁路秩序得到治理，形势迅速好转，运输畅通，长期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形势改变了。这一年，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86746万吨，比上年增加9773万吨，增长12.7%。列车正点率大大提高。国民经济的混乱状态和停滞下降局面开始扭转。

2. 整顿钢铁工业，扭转歉产局面

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钢铁工业生产混乱，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1974年钢产量比1973年减少410万吨。1975年前4个月，全国歉产195万吨。特别是几家大型钢铁厂，如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四家歉产严重。为了扭转钢铁工业生产下降的局面，1975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议。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对整顿钢铁工业提出了四点要求：(1) 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第一次提出了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要从冶金部到各工厂特别是重点大厂，建立起敢字当头、有指挥能力、团结协作的领导班子。(2) 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3) 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注意解决好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的问题，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 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切实解决纪律松弛、制度不严的问题。

按照邓小平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批示转发了冶金部关于把钢铁生产搞上去的文件。5月钢铁工业座谈会后，冶金部按照文件的要求对钢铁企业进行了整顿。着重解决了钢铁系统领导班子、克服派性、落实政策及建立规章制度等问题。由于狠抓了整顿工作，钢铁生产的局面迅速改观。到6月份，钢铁日产量就超过年计划要求的平均日产水平。

3. 整顿工业和企业，加强集中领导

1975年上半年，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铁路和钢铁企业的整顿工作，解决了铁路、钢铁生产问题，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1974年以来许多地方和企业党组织涣散，生产停顿，工业发展速度下降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为着切实解决整个工业中存在的问题，加快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75年7月，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主持下，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经过修改形成了1975年9月2日稿。文件提出了整顿工业和整顿企业的具体办法和具体措施。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在序言中指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就必须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文件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思想，明确提出“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为了加快工业发展，文件要求：(1) 依靠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万年也要”，不能一概反对，否则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2) 加强统一计划，“无论地方和部门，都要强调全局观念，维护集中统一”，不搞统一计划，或者破坏统一计划，其结果，就是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3)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不能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根据毛泽东关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在自然科学方面“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的意见，文件要求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近外国先进技术，同时增加出口。(4) 建设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对于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技人员，应当给予信任，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5)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

这个文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1961年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70条》的继续和发展。它集中了邓小平1975年初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概括了国务院务虚会讨论的成果和工交战线初步整顿的经验，批判了"四人帮"散布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声行，提出了整顿企业，加快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下发执行。但它的主要精神已经在整顿中逐步得到贯彻执行。

1975年8月，在整顿钢铁工业初见成效的同时，开始了整个工业和经济工作的整顿，突出解决经济生活中乱和散的问题，加强工业和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不少工业部门依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基本精神，制定出各种条例和规定，以四强企业、基建、财务、物资、劳动等方面的管理，使整个工业和经济工作的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4467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工业总产值3124亿元，比上年增长14.4%，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比上年普遍有所提高。

4. 整顿农业，核心是党的整顿

1975年的全面整顿，以农业整顿为终结。1975年9～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以党的整顿为核心，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县委书记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以利于反各方面工作抓起来。鉴于"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肆意歪曲和篡改，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批评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他进一步针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揭露了当时"百花齐放"不提了，相当多的学生不读书以及轻视科学实验等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并得出结论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在各个领域里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深刻阐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邓小平决心迎接挑战，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宣言。他的这一重要思想，成为改罩开放的根本指导原则。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后，中央有计划地组织了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帮助农村社队进行整顿，解决好农村领导班子、落实基层干部政策的问题。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对农村形势的好转是个促进。这一年，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有力地支持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在这期间，邓小平还抓了国防工业、军队、科技等各条战线的整顿。但是，由邓小平主持的已初见成效的全面整顿，被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中断。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正是"四人帮"活动十分猖狂的时候，邓小平不顾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无产阶级政治家临危不惧、遇难奋进的巨大政治勇气。由于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使动乱的局势又安定下来，国民经济由停滞、倒退转为回升。可以说，邓小平领导的1975

年的整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先导。可是，这次整顿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容。同年“月，在“四人帮”进谗言情况下，毛泽东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全国再次陷人一片混乱之中。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

一、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含义

社会主义经济，亦即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或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经济的社会形式。它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有本质区别，也与私人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经济有根本区别。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决定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唯物史观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一切私有制经济有着本质区别：首先，它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主人。其次，它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劳动者联合劳动生产的成果，必然要为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服务，是劳动人民实现根本利益的保证，生产成果的分配必须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最后，它决定了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互助互利、平等合作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尽管由于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不同，处在不同的岗位上，但他们都是以生产资料共同所有者的身份，平等地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都是以社会主人的身份，共同参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与共产主义社会有本质联系的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基本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后者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两个阶段在经济上的共同点，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两个阶段在经济上的差别主要是，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则在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财富涌流的条件下，实行按需分配。尽管中国现阶段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程度还很低，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经典作家们设想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由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

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将会不断成熟，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程度也会不断提高，最终也将实现按需分配，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可见，社会主义经济是与共产主义社会有本质联系的经济，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经济。由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存在的全部经济，而只是其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在整个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经济。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其他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决定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决定着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共同发展，并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

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形成

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中国必须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才能适应已经存在的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此，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中国建立初期，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手工业中的个体私有制。对性质不同的私有制，我国采取了不同的改造途径。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私有制区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实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官僚资本采取无偿没收的政策，而对民族资本则采取赎买改造政策，由此把它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对于个体私有制，则是引导它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1. 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全民所有制经济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国家投资兴建三条途径形成的。

——没收官僚资本。在旧中国，官僚资本依附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垄断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所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即没收了官僚资本所控制的企业，把它变成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使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同时，也为改造民族资本，改造个体所有制经济和投资兴建工业基础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还比较小，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并有一定发展，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必然出现某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问题。例如，建国初期，一些商业资本家利用当时中国粮食供求出现紧张的局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力，破坏城市粮食供应计划；一些工业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也千方百计地摆脱国营经济的

领导，“先私后公”，“假公济私”，将与国家签订的合同内产品投向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以及全国人民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就要求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方针，到1956年底，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壮大了全民所有制经济。

——国家投资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非常薄弱，单靠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造民族资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工业，不可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国家就以原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逐步建立和扩建能源、动力、冶金、基础化工、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打下了物质技术基础；同时，还相应地发展轻纺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中小企业，以满足对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要。从而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2. 改造个体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是通过劳动者自由联合和改造个体私有制的途径建立起来的。个体私有者包括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在农村，随着全国解放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了个体农户土地私有制。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和个体经济的分散、不稳定，农民仍然处于经济贫困的境况。有些农民缺少农具耕作土地，不少农民因还不起债被迫卖房卖地，重新沦为一无所有。同时，分散的农户也无力采用农业机械和新的耕作方式，更难以抵抗自然灾害。于是，组织个体农户走集体化道路，成为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劳动者个体私有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个体劳动者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广大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对他们不能采取“赎买”的办法，更不能进行没收。对个体经济的改造，只能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典型示范、思想教育和国家帮助，引导个体劳动者走合作化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村，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互相衔接的三个步骤和形式逐步实现的。

——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城市和农村的个体手工业、个体商业，实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通过组织建立互助生产小组、供销合作社和集体手工业合作社等，逐步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经济。

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从此，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经济。

三、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国家制度的根本标志之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它决定了我国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根据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是通过社会主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表现出来的。

第一，从量上来讲，要确保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量中占优势。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优势，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中，是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不占优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在初级阶段经济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从质上来讲，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亦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民经济命脉是指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①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如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②自然垄断行业，如森林、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其他重要矿藏的开发和冶炼工业；③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如铁路、海运、航空、城乡公用事业、金融业等；④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国有经济控制了这些部门和产业，就等于代表劳动人民的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体现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支撑，如果国有经济受到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难以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不能得到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会改变性质，从而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不能坚持。二是保证国民经济能够健康地运行，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国有经济是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反映现代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要求的一种经济形式。国家通过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整个经济运行实行调控，可以避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无序竞争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地位的重要内涵。如果没有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的优势是难以持久的，其主体地位也是难以保持的。所以，坚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和主导作用，是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但要有公有资本在数量上的优势，更重要

的还要有赢利和增殖能力的提高等。同样，坚持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也要在保持国有经济相当比重的前提下，注重合理布局，使其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和经济运行整体态势发挥有效的控制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阶段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有量的优势，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还很高。1997 年，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按提供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仍占 75.8%，其中，国有经济占 40%左右。1998 年，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 66.6%。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量中占优势，这是引导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需要。其他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诸如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由它们自身的经济性质所决定，不可能自觉地为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服务，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规范他们的经济行为，限制它们的消极作用，确保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坚持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量中占优势，才能使全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得以实现的基本经济保证。

第二节 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中国是在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国情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进行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回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前进的道路上曾经历的曲折，我们可以确立这样的信念：道路虽然曲折，但是，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能发展中国。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路线，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就会无限光明。

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的曲折，主要是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主观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造成的。主要有以下表现。

1.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过急的偏差。1953 年至 1956 年进行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偏差。对个体农业的改造，有些地方搞得过快、过急，不顾当时农业物质技术基础极为薄弱、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客观实际，简单地进行生产关系大幅度的调整和变革，限制和否定了农民的自利性或利益差别性，过早地勉强进入高级社，实际上推行了平均主义，结果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对个体工商业者的改造也存在过急、过快的倾向，如把某些本

来适合分散生产和经营的产品和劳务，均组织为集体所有制，造成生产经营过于集中，产品成本加大，服务质量下降，经营网点减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同时，手工业改造完成后形成的“大锅饭”，也严重地削弱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存在全部改造、“不留尾巴”、一刀切的问题，抹煞了在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它们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方面。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冒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方面，它们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又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形成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给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1）所谓“大跃进”，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在生产力发展上不切实际地提出高指标和为了完成这一指标所发动的群众运动。高指标突出地表现在，把钢铁看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元帅”，认为只要它一升帐，就能带动其他生产以及各项事业齐跃进。1958年，我国制定钢产量指标要求完成1070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这是不切实际的，不仅实现指标的时间跨度太短，而且当时的钢铁工业根本无此生产能力，交通运输和供电能力也跟不上钢产量翻番的需要，但是，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却要求全国其他行业都要给钢铁工业让路。各地大兵团作战，通宵达旦苦战，大办小高炉，最多时全国有9000万人直接参加大炼钢铁。到年底，钢产量虽然达到1108万吨，但是小高炉炼出来的钢铁却质量差，废品多，合格的只有800万吨。据估计，“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之多。

（2）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农村开展的一场脱离生产力实际的生产关系变革，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达到向共产主义过渡。其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一是组成公社的人多、地多、规模大，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几百户为一社，而人民公社则几千户，上万户。所谓公，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政社合一，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思想指导下，不断扩大公社集体化、公有化程度，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收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运动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大搞“一平二调”。所谓平，就是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实行“供给制”和按“需”分配。所谓调，就是在生产上对各基层单位的劳力、物资、资金，搞无偿调拨，在公社内部搞“穷富拉平”。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按劳分配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这种做法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这一切都给社会生产带来灾难性损失。

3．“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浩劫。在这10年中，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形成了空前的全国性内乱和动乱。当时，“破四旧”、“大串连”、“造反”、“夺权”，从城市到农村，出现“全面内战”状态，造成工人不能正常做工，农民不能正常种地，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所有制关系上，片面强调公

有制的“升级”，把农民家庭副业看做是资本主义尾巴而“割除”；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要求尽量合并扩大规模，“升级”为全民所有制。在分配关系上，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否定物质利益，大搞平均分配，人为地缩小城乡、脑体和工农差别。在交换关系方面，否定商品关系和价值规律，把城乡自由市场称之为“黑市”。在农村搞“社会主义大集”，对农民家庭副业的产品，按照大大低于市场的统一价格，强迫实行“统购统销”。在经济管理方面，批判“管、卡、压”，使工矿企业处于无政府或瘫痪状态。“文革”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灾难。这十年间经济增长时断时续，效率低微，速度下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52 年至 1966 年平均低 2.9 个百分点。据有关部门估算，十年动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5000 亿元，连同“大跃进”造成的损失 1200 亿元，共损失 6200 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 1950 年至 1983 年所增加的固定资产总额。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建国以来的“左”的思想错误，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问题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主观脱离了实际，没有遵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而一旦主观符合了客观，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很快地显示出来。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国前夕的中国，综合国力十分薄弱，加上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工业整体上处于手工作业阶段，农业还停留在主要依靠古老工具的手工耕作的水平上，交通运输设施和工具落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铁路和公路，畜力车和木帆船等古代运输工具仍然大量使用，邮电通信非常落后，相当一部分县乡不通电话，大部分地区信息闭塞，产品严重匮乏，市场规模狭小，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建国以来 50 年的建设，我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1.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过 50 年来的建设，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 1952 年的 679 亿元上升到 2002 年的 102398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增长 7.7%左右。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 3%左右的水平。按世界银行汇率估算，2001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 6 位。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由 1952 年的 19.4 亿美元增至 2001 年的 5000 亿美元以上，居世界第 6 位。2001 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 2122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2 位。中国于 2001 年 11 月 10 日正式成为 WTO 成员国，也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没有一种农产品产量能占到世界第 1 位，钢产量仅居世界第 26 位，发电量仅居世界第 25 位。50 年后的今天，在农业方面，中国的谷物、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猪、牛、羊肉等 10 余种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第 1 位。在工业方

面，仅制造业目前就有10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01年彩电的产量为3936万台，占世界份额的29%；洗衣机产量为1443万台，占世界份额的24%；电冰箱产量为1279万台，占世界份额的16%；空调年产量为1827万台，占世界份额的30%；电风扇和照相机年产分别为7661万台和5514万台，占世界份额都超过50%。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话机年产9598万台，占世界份额的50%；显示器年产为4590万台，占世界份额的42%；钟表年产15万只，占世界份额高达75%。纺织产业以丝为代表，年产72.33万吨，占世界份额的70%；医药行业中，青霉素和土霉素占的世界份额分别为60%和65%；维生素C稍弱，占世界份额的50%。机械装备工业中的拖拉机和集装箱的世界份额高达83%，是中国制造业中世界份额最高的两类产品。此外，中国的煤炭、钢材等采掘和冶炼业的产品产量也早已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

2. 在工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各项指标快速增长。工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119.8亿元增至2001年的3957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增长11.6%。其中，原油产量由12万吨增加到16100万吨；钢产量由15.8万吨增加到11559万吨；发电量由43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1670亿千瓦小时；棉纱产量由32.7万吨增加到542万吨，棉布产量由18.9亿米增加到241亿米。一批标志着中国工业实力的工矿产业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现代冶金设备、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飞机、汽车制造业，大型精密机床制造业，高级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合成材料制造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船舶工业等的建立，都显示着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实力。其中，一批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品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如电子信息与通信设备等产业，已经成为工业中的支柱产业。

3. 在农业方面，实现了农产品供给总量平衡和丰年有余。农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342.9亿元增加到2001的1461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增长3.3%，粮食产量于1996年突破5000亿公斤大关，以后各年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上，比1949年增长3.3倍，人均产量增长1倍，粮食生产和供给基本稳定。棉花产量532万吨，比1952年增加10.75倍，人均产量增长3倍，油料产量2872万吨，比1949年增长9.92倍，人均产量增长3倍，水产品产量为4375万吨，比1949年增长95.77倍，人均产量增长37倍；肉类总产量为6340万吨，比1949年增长27.28倍，人均增长8倍。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特征不断弱化，绝大部分产品已走向市场，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在许多地区，正在发生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经营方式上逐渐形成集约型经营，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反季农业大量涌现，在耕种品种上正在由以单一的大粮作物向面向市场多种经营转变，出现了一大批蔬菜农业、养植农业、果茶农业、花卉农业等。并且逐步形成了由产前、产中到产后的农业服务体系，向农民提供信息、资金、销售等多种服务，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全国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1997年的5124万公顷。建成了大量的防洪排涝、灌溉、发电等

工程设施。到 1997 年底，全国兴建大中型水库 8.5 万座，总蓄水量 4583 亿立方米。1997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也由 1952 年的 18 万千瓦增加到 42016 万千瓦；农用大中型拖拉机由 1307 台增加到 689051 台；农用载重汽车由 280 辆增加到 875571 辆。这些都极大地改变着我国农业过去靠天吃饭的局面，大大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高产稳产提供了保证。

4. 在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方面，各项指标增长较快。铁路营业里程由 2.18 万公里增到 1998 年的 5.76 万公里，增长 1.6 倍；公路里程由 8.07 万公里增长到 2001 年的 169.8 万公里，增长 21.04 倍；2001 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1.9 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仅“九五”时期就新建公路 88770 公里，其中新建高速公路 11449 公里。内河航道里程由 7.36 万公里，增至 110.3 万公里；民用航空开通了数百条国际国内航线。管道运输伴随着石油工业的成长而增加；输油气管道里程由 1958 年的 200 公里增加到 1998 年的 2.31 万公里。通信设备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了以“八纵八横”光缆为主体的省际干线传输网的建设，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5. 人民从总体上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不断增长，消费水平明显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由 1952 年的每人每年 80 元提高到 1998 年的 2973 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 1952 年的 8.6 亿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73762 亿元。在城镇，居民消费中食物性消费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80%降低到 2000 年的 39.2%，在农村，也由 90%降低到 1998 年的 55.6%。与此同时，肉类、禽蛋、水产品、奶制品的消费量不断增长。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加，并不断向高档化发展。到 2000 年底，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彩电达 116.6 台，已经接近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拥有洗衣机 90.5 台，家用电冰箱 86.7 台。1999 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 38.2 台、电冰箱 10.6 台、洗衣机 24.3 台。同时，家用电脑、轿车等高档消费晶也逐渐进入高收入城镇居民家庭，并且拥有量不断上升。到 2000 年末，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汽车 0.51 辆、家用电脑 9.72 台、家用摄像机 1.34 台。居民住宅面积不断扩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2000 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 10.2 平方米。电话普及率大幅度提高，2001 年末，全国固定电话用户达 17900 万户，2002 年上半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超过 1.7 亿，已成为全球移动电话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2001 年全国互联网用户超过 3000 万户。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是成功的和正确的选择，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张“全盘西化”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正如邓小平在 1989 年 6 月深刻地指出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挤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要解决十几亿人的贫困问题，十几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穷困状态。我们必须坚定信念，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

只能靠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

三、重要的历史经验：必须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和坎坷。回顾和总结这一段历史，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

以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主要是因为脱离了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做了简单的教条化的理解，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做过假设性的描述，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指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等特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这些描述做了片面的理解，往往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片面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发展寄托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在实践上，不切实际地违反群众的意愿，搞“穷过渡”，硬是把小集体经济合并成大集体经济，在大集体经济中掺入全民所有制因素，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取消物质利益原则，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好。“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这样，就引发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视发展生产力，导致中国难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忽视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使广大人民群众难以尽快富裕起来。而这些恰恰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正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存在的这些重大失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忽视发展生产力和忽视改善人民生活倾向的纠正，它突破了单纯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弊端，它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要求和根本目的聚合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内在要求，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和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过去，人们往往认为，解放生产力，只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剥削制度或私有制，解放被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后，生产关系就会完全适应生产力的要求，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然而，实践证明，尽管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是，生产关系是本质层面的经济关系，它主要靠人们制定的经济管理体制来实现。一般说来，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是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会逐渐由适应变得不适应。如果经济体制不能反映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那么，经济体制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有一个通过改革来完善经济管理体制，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问题。就是说，仍旧存在经济体制是否束缚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解放生产力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忽视了这一点，就是极大的错误。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以往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必然要求。虽然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公有制加按劳分配，但离开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也不会有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私有制是产生阶级对立、阶级剥削和贫富差别、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不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用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就不可能铲除阶级剥削和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就不可能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社会财富就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中，广大劳动人民就会处于贫困的境地。当然，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必须联系生产力来看待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完全消除剥削关系，要有一个历史过程。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有高有低，这就使得私有制经济和存在一定剥削的分配方式，仍然会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和发展。这种情况，是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它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的优越性所在。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劳动人民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劳动，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归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支配，并按照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来使用和分配。因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多，其结果必然是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富裕水平尽管较高，但是，在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制度上，并非全体成员共同富裕，而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富裕的只是少数私有者。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条件，提供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充分可能。只要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实现劳动者的共同富裕。

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揭示了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实现要以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前提。如果离开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即使是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也只能是少数人富裕，绝大多数贫穷，造成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如果像过去那样，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生产力被束缚起来，得不到快速发展，即使实行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也只能是共同贫穷。因此，我们必须在经济实践中，全面地落实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才能真正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八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提高，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但是，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提供直接适合中国的经验。成功的道路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指导下，中国人民自己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走出来。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实践，中国总结正反经验，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果断地走出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误区，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找到了正确的轨道。本章阐述中国为什么只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走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误区

一、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缺陷

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 1957 年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有 20 年时间，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之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因来说，就是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将社会主义经济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而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运行的主要状态是：①生产效益不高。从宏观看，往往起初投资扩张，“处处冒烟”，重复建设，随后则整顿调整，大力压缩生产。从微观看，投入，往往出现上级批拨的能源、材料短缺告急，经常要求追加；产出，则品种单一，“复制古董”，“多年一贯制”，技术创新缺乏动力，生产效率不高。②流通不畅。城乡、地区之间，物质资源难以横向交换，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③消费品短缺。城市居民住房紧张，购物排队，缺乏选择余地，吃穿用品凭票证定量供应，有限的商品交换无异于政府对居民的实物分配；农民消费品种数量单调，主要依赖于生产队集体内部农产品的分配。

上述状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实行了全国集中统一的、纵向行政性计划管理方式。从部门和地区看，各自执行国家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计划，条块分割，信息不通，这就导

致部门和地方不能发展社会分工，获取比较利益，提高经济效益，还势必滋长本位主义，彼此“割据”，保护“落后”。从生产单位看，政企不分，工厂在管理机构上，要与政府对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决策上，按上级指令或规定组织生产，事事须请示，没有自主权，创新受制约；在资金运用上，“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利润上交，折旧金上缴，难以实行更新再生产；在物资使用上，无须“找米下锅”，依赖上级调拨；在用人上，“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在分配上，国家统一工资标准，平均主义严重，职工吃工厂的，“大锅饭”；在生产指标上，靠上下级之间讨价还价，“落后受保护，快牛遭鞭打”；在经济权责上，缺乏产权约束，对国家投资可以“千年不还账，万年不赖账”；凡此种种，导致工厂自我发展的手脚被捆住，创新无动力、生产低效率。有人说，在这种体制下的工厂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只能说是一个“车间”，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由此可见，这种经济体制，从部门和地区到基层生产单位，从宏观到微观，是把全社会当做一个大工厂来计划组织安排的，这就是体制僵化的关键所在。

人们通常把这种国家“计划调拨”、“大包大揽”和“大锅饭”的僵化经济体制称之为计划经济体制。其实，正如以下将要阐述的，计划经济是可以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共存的，而上述体制的明显特点，则是经济运行的行政性统一调拨，排斥商品货币流通，排斥自发的社会分工，排斥对经济主体的竞争激励，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实质是一种对应于扩大了的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的体制。

所谓自然经济，是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直接需要为生产目的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其生产条件与自然界有直接的联系，生产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因而得名。自然经济投入产出的经济运行，其主要特点是：①社会各成员的生产劳动服从家长或首领的分派，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具有直接的社会性。②产品在社会内部自给自足，社会生产具有封闭性。③产品一般无须交换流通，而通过一定的分配关系，直接进入社会成员的消费，因此，社会经济的运行形态具有产品性。④生产职能一般按最终产品的整体生产划分，生产职能分工具有粗放性和稳固性。因此，自然经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是一种保守、封闭和僵化的经济形态。马克思在谈到自然经济的僵化性时，深刻地指出，“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他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动。”

可以说，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纵向行政管理，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经济运行靠封闭式的调拨分配，整个经济形态仍然具有产品性，因此，把这种经济体制称之为计划产品经济更为确切。

二、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成因

中国经济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初期走入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误区，有主客观两方面

的原因。

从客观上说，中国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克服旧中国遗留的社会经济疮痍满目、一盘散沙的状态，需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管理的经济体制。但是，究竟采取怎样的体制统一管理全国的经济，新中国毕竟缺乏经验。从自己已有的实践看，战争年代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为支援前线采取集中动员的方式，组织人力物力，开展群众生产运动，曾取得明显效果；"一五"期间，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加强工农联盟，采取统购统销等政策措施，取得了成功。从外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看，原苏联建立的是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显示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这些情况，很自然地成了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建立全国统一、实施集中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这种统得过多过死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在中国能实行 20 多年，主观上的原因是不应当忽视的。认真地分析这方面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坚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决心。

其一，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观排斥市场经济，成为寻求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的思想障碍。

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很长时期，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固定观念是排斥市场经济的。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商品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揭示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盲目性弊病。在论述人类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他们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弊病，对未来社会主义做出过对比性的设想，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显然，这些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是十分抽象的原则性设想。这是与他们依据历史辩证法，断言商品生产这种具有自发性的社会生产终将消亡，相联系的；是与他们设想的解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包含的对抗性矛盾的办法，相联系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决不会提出什么是和怎样建设具体国家现存的社会主义这

样的问题，决不会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做出具体设计。但是，对于一个刚刚推翻了剥削制度，缺乏实践经验，迫切需要有正确理论来指导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建：设者来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抽象描述，也会加以高度重视，也难免会把这些设想当做具体实践的首要指导原则。同时，他们也不能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因而很容易把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面而加以排斥。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一开始选择的，就是排斥市场经济的计划管理体制，只是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思想才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在总结1918年至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指出，"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新经济政策引人了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了积极作用。列宁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并制定过利用外资、租让制等市场经济政策。由于他逝世过早，这些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结合起来的经济思想，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原苏联后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斯大林虽然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著作中正确地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仅局限于个人消费晶领域，认为价值规律也仅是在这一范围内起调节者的作用，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不能起调节作用的。他把有计划发展规律当做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认为它将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即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即使要保留一定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市场关系；那也是作为旧社会遗留的"痕迹"来看待的。这种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政治权威的观点，对中国形成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是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的。中国建国初期，把这种观点当做真理来接受并付诸指导实践是不难理解的。

其二，传统的市场经济观排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人们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而加以抵制。

除原始社会末期公社之间偶然交换的商品之外，历史上的商品生产是与各种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以前，当代现存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把市场经济理解为私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或者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语。

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以往的经济学文献通常也是把它与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来解释或者使用的。例如，《现代日本经济事典》指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①私有财产制度；②契约自由的原则；③自我负责的原则；"它把私有制列为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则；世界银行编印的《世界发展报告》，把社会主义国家称做"非市场经济国家"，而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称做"市场经济国家"。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

市场经济概念也是这样使用的，例如，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留着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可见，在传统观念中，市场经济姓“私”，姓“资”，而不姓“公”，不姓“社”。即使有些经济学辞典对市场经济概念做了中性的解释，例如，美国《现代经济词典》把市场经济解释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取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按这种方式来组织社会生产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以前都实行计划管理经济酌体制，因此人们在习惯上仍然容易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

显然，只要在思想上传统的市场经济概念先入为主，对于坚定地确立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人们来说，就不可能允许在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中全面地引入市场经济关系。

其三，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讳言财利的传统观念影响很深，阻碍着人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

建国后人们在较长时期认可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这与中国社会轻视商品货币流通、讳言财利的传统观念是分不开的。尽管说，在中国历史上重视工商贸易的，思想家不乏其人，但是，旧中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和流通很不发达，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维护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的封建保守经济思想就逐步地占据了支配地位。据经济思想史专家分析，中国战国以前，尚不存在轻视工商业的思想。从战国开始，这种思想逐步发展起来。法家创始人、魏国的李悝，重农业而轻工商，主张禁“技巧”（即工艺）；道家经典《老子》，把工艺视为社会祸害而加以否定，并主张与外界隔绝的“小国寡民”为理想社会；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赵国的荀况认为，“工商重则国贫”，提出限制工商业、重视农业才能增加国家财富；到战国末年，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出身于韩国后被招到秦国的韩非，强调农业为本，工商为末，把工商业者指责为五种社会蠹虫之一，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首次鲜明地提出“农本工商末”，这些观点后来成为“重本轻末”、“重本抑末”（即重视农业，轻视、抑制工商业或商业）经济政策的思想来源；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家接过法家“重本抑末”的口号大肆宣扬，于是，这种排斥工商业的思想，加上儒家创始人孔子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财富观、“子罕言利”即讳言财利的伦理观，就成为封建中国儒家经济思想的教条，在中国占支配地位达两千多年。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短时期内是难以消除的。建国后，人们对排斥商品货币流通的经济生活曾习以为常，究其原因，深受这些反映自然经济和封建经济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在自然经济和剥削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些传统观念有利于维护与之适应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那么，当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生产力增长内在规律的推动下需要不断拓展的时代，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就成为阻力了。人类社会必然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人们要适应这种客观经济规律，就要突破自然经济观的束缚，重视商品货币流通。在市场经济遍及全球的时代，更应确

立市场经济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以唯物史观的眼光来看待商品货币流通及其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恩格斯在谈到商人对自然经济社会的作用时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马克思在阐述资本循环理论时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他们以联系的、辩证的眼光分析了社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揭示了这样的真理：当商品交换受到窒息之时，一疏通流通渠道，拓展市场关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商品生产社会或者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运行中的流通与生产这两个环节，同等重要，轻视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的初期，脱离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实际国情，忽视发展商品货币流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产品经济，这就不可能摆脱传统的自然经济轨道，真正发挥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的优越性。这种失误，固然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预想，裁剪现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因为并没有真正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背离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原理。可见，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会阻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与自然经济的联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发展商品货币流通关系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改革传统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场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既是从自然经济跃向市场经济的经济革命，又是从保守的自然经济观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思想观念的革命。

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不等于社会主义

既然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是一种主观性很强、对应于自然经济的管理体制，它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没有内在的联系。否定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既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意味着抛弃对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计划经济。要抛弃的只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保守的经济管理体制。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弄清社会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经济机制和管理体制这几个概念。

社会经济制度是对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概括，通常等同于根本经济制度概念。唯物史观揭示出，人类社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这五大社会历史阶段或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根本区别来划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物质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资源配置方式是指劳动力和各种物质经济资源投入生产和产出的成果进入消费的途

径。资源配置方式是与人的生产社会性的实现形式相联系的。生产社会性是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表述，指的是人不可能孤立地生产和生活，人们之间必然建立相互依赖的社会联系，生产者为别人提供劳动产品，这就是生产的社会联系或者社会性。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存在两种生产社会性的实现形式，即自然经济的直接实现形式和商品生产的间接实现形式，在自然经济的家庭生产中，家长对劳动力直接分工，男耕女织，一家人将资源直接投入生产，相互直接提供产品，进行消费，生产社会性是以直接形式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必须通过市场买卖的交换形式才能间接地将经济资源投入生产，或取得别人生产的产品，生产社会性是以间接形式实现的。这两种生产社会性的实现形式，用现代通行的经济学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主体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方式和间接的市场配置方式。

马克思根据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社会性的实现形式从自然经济的直接形式经过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间接形式，还要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直接实现形式或者说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显然，计划经济的配置方式不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它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而当代的经济实践证明，计划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可以使用，它可以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并存。因此，计划经济不是属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范畴，而是属于资源配置方式范畴，它与市场配置方式是可以并存的。

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一定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相结合，则形成一定的经济机制。“机制”（der Mechanismus）是个外来语，原先指机构、机械装置及其作用过程，后来引伸到生物学，又扩展到经济学。经济机制是与社会物质生产的投入、产出到消费整个运行过程及其控制相联系的概念，主要是指，由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目的、动力和构成经济资源循环运行的各环节所形成的流程，以及这些环节之间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由于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而再生产的循环过程又是与资源的配置方式相联系的，所以，经济机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和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相结合的结果。但是这种结合不是人为臆造的，而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它具有客观性和历史规定性。

上述三个概念表现的客观经济关系或者经济过程，都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现存的社会经济联系和经济运行过程却是受人为建立的一定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制约的。管理体制，就是经济管理主体（从一个社会来说，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就是政府）依据自己对经济机制的认识程度而制定出的经济活动的具体制度、行为规范和法制等，并由此形成一定的经济秩序。显然，管理体制具有人的主观性，它可以反映一定时代社会经济机制的客观要求，但是也有可能违背这种客观要求。一旦发生管理体制不适应客观经济机制的情况，管理体制就必须做出调整，否则，就会导致经济机制运行的低效或者紊乱。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人民是社会经济机制的控制主体，政府代表人民控制整个社会经济机制，具有改革和调整管理体制，使之适应客观经济机制的自觉性。正是由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不能反映客观经济机制的要求，才需要坚决地改革。

明确了以上经济概念，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抛弃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它既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等于放弃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配置方式，实质是要纠正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主观人为因素，通过改革实践，使之符合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客观经济机制的要求。这种经济机制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同时又包容计划配置方式和市场配置方式。

四、对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批判的不同立场

弄清了中国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僵化性，也就弄清了改革的对象，从而明确了，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理解改革的对象和目的的。由于对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批判站在不同立场上，人们往往会提出不同的改革主张。

东欧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科尔内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短缺经济"的分析，曾经对中国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化，垂直等级管理结构，非价格信号起支配作用，指令性计划指标的控制，国家"父爱主义"对企业造成的"预算软约束"、"投资饥饿症"，这些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效率低下、供给短缺的重要原因。应当说，他对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批判是富有启发价值的。但是，科尔内在经济理论分析中，始终没有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也混淆了经济管理体制与客观经济机制的概念。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对经济体制的批判，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无怪乎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他从主张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转向市场优于计划，并公开地倒向了主张私有化，批判社会主义的立场。

如果把经济体制的弊病等同于根本经济制度的弊病，那么必定会得出改革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有一位号称发展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一度在中国内地到处鼓吹产权私有化，他就是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共产主义制度"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他从自己解释的"制度成本"范畴出发，认为在"共产主义国家"，由于因人划定等级地位，个人缺乏自由，缺乏选择权，缺乏竞争，划定权利和实施权利的制度成本高昂，因而经济效率不高，而私有制社会的个人有较大的自由，制度成本则较低，因此，"共产主义国家"只有走产权私有化的道路，才有出路。撇开他的"制度成本"范畴是否科学不说，他是私有制绝对优越论者，他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等同起来的，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从而或明或暗地把改革的实质解释为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经济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极大的破坏力，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把经济体制产生弊病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本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原苏联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逐步淡化社会主义制度，把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等同于私有化的所有制"改制"，导致1991年苏联解

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私有化并没有给原苏联人民带来幸福。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俄罗斯联邦私有化后，1997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较苏联解体以前下降了一半多；原国有企业需要的国家补贴比私有化前更多，这些企业2000年的GDP只有1990年的61%。

可见，弄清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区别与联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改革实践中始终应当牢记，改革经济体制绝不是改变根本经济制度。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才具有基本的前提。坚决地走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误区，正是要寻求到能够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经济体制。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实践的必然选择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经济体制的探索

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当代中国社会的客观经济机制只能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机制，因而必须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正确认识，是经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实践，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苦探索过程，有助于我们明确方向，坚定改革必胜的信心。

事实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从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就开始了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

——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听取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汇报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演讲。他针对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模仿苏联的思想方法，强调指出，中国对外国的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其中就含有不能照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意思。

——在党的“八大”上，陈云针对当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在经济管理上盲目集中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计划体制新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国家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我国的市场，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新概念。

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经济理论界也提出了有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观点。

——针对流行的说法，价值规律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互相排斥的，经济学家孙冶方鲜明地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经济学家顾准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社会主义生产也可以让价格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

——经济学家卓炯强调指出，要重视社会分工对商品经济的重要意义，由此出发，提出商品经济“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

但是，当时在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被看做应当受限制的东西，商品生产、市场流通，被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得不到应有的弘扬，有的科学经济思想还被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

为了解决经济建设中暴露出的投资冒进、比例失调、管理的集权与分权处理不当等问题，党和政府也试图进行体制改革。1957年、1958年曾采取措施，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1970年曾下放中央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权限。但是，这些改革，断断续续，都是局部性的，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大框架进行的，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行政分权上做文章，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事实上，只要排斥商品经济、市场流通，即使想改革，也不可能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自上而下，或者按地区“块块”实行，或者按部门“条条”实行。这种管理框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如果把管理权下放到“块块”，则造成地区之间的分割；如果把管理权下放到“条条”，则造成部门之间的分割。但是，社会化大生产则要求经济单位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协调统一的社会分工，地区和部门各自从本位角度决策，相互割裂，必定会造成这种协调统一的破坏。因此，以往的管理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放（放权）就乱，一乱就收（集中），一收就死（僵化），一死再放”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在改革的实践中确定经济体制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突破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但是，究竟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管理体制，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通过改革实践，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并建立起相应的经济管理体制。

事实上，对于经济管理体制的目标，正是经过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逐步得以确立的。这里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党和政府在改革进程中对经济体制提法的演变：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

段，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 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1992 年初，邓小平再次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些引述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市场经济的提法上，经历了开始在个别场合提出，到正式提法的被改变，直到最终取得全党的认同这样一个艰巨的过程。

从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认识上的重要突破。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自然经济中早已存在，所以，只是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尽管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是还不能从总体上划清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形态与自然经济形态的界限，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扬弃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而“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从社会范围来看的经济，是广义的生产过程，即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或者交换过程）的统一。肯定中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则从总体上认清了中国经济形态的真实现状，这就为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即突破自然经济思想的羁绊，向适应商品经济飞跃，辨明了方向。

从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认识上的又一次重要突破。尽管说，商品经济同市场经济在含义上并无本质区别，两者在概念上只是侧重点不同。商品经济侧重于生产过程，强调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以交换为直接目的；市场经济则侧重于交换过程或流通过程，强调的是生产过程要以市场为媒介，受市场制约，经济资源要通过市场交换来配置。但是，由于市场是流通关系的总和，是整个社会商品生产者在投入产出过程中互为条件、相互依赖而形成的社会分工网络，因此，市场经济在概念上更强调从社会整体来看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强调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说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认识上的重要突破，正是因为一方面看到了市场在当代商品经济的资源配置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已成为全社会经济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另一方面也突破了把市场经济仅仅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狭隘传统观念，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划清了界限。在弄清了商品经济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异同点之后，在概念的使用上，可以把商品经济列入与自然经济对应的社会生产方式范畴，而把市场经济列入与计划经济对应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范畴。

从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目标，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是坚持改革实践，总结正反经验的结果，是正确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的结果。

从改革实践成功的经验来看，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尽快引入市场经济关系：

——广大农民创造性地选择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使中国农业摆脱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这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可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而经营权由生产实践者直接掌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在现存的生产力条件下，显然

比那种连种植的行距和株距都要上级规定的集中管理好得多。

——乡镇企业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之外，异军突起，它们面向市场，“找米下锅”，自寻销路，勇于竞争，顽强生存，被誉为“野火烧不尽”的“草根”工业。这证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可能涵盖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完全依赖计划控制经济，必然压抑生产潜力的发挥，而允许生产者从实际出发，自主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就能更充分地调动和更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资源，促使生产力更快的发展。

——公有制工业企业采取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股份公司制等多种形式实行改革，凡是在企业内部按市场竞争要求，主动改革管理机构，千方百计节约成本，改善劳动用工、分配制度，重视科技人才，重视运用先进科技的，企业一般都越干越强。这证明，公有制企业一旦摆脱了行政干预，成为能面向市场决策的商品生产者，又善于自主经营管理，就会更好地组织和调动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外有压力，内有动力，充满活力。

——从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来看，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好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

——深圳、珠海等特区建设，积极学习国外市场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取得巨大成功。这证明，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自上而下的计划安排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发展时，曾指出，“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他所说的正是市场经济一般的优点。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利用市场经济内含的社会分工制度呢?

从改革实践中取得的教训来看，也必须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曾出现过多次波动，主要表现为投资失控，消费失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在改革中不能处理好搞活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控制的关系，每次宏观经济的失控，往往是同对企业的放权、搞活并存的。总结教训，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经济，势在必行。这里存在着从实践中产生的认识逻辑：搞活公有制企业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缺乏宏观调控，经济生活就会发生混乱；而进行宏观调控，绝不能采取计划产品经济那种行政直接控制、把企业管死的办法，要改变这种办法，就只能实行间接控制，也就是变自上而下的实物控制为价值控制；对企业从价值方面控制，这意味着，要用价值增值的程度（利润率）来评价企业的经营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否定行政性的主观规定价格，以合理的价格体系为前提，才能使企业的利润真实地表现经营效果；而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离不开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因为只有灵敏地反映价值变动的价格（必然地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联系在一起）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的价格，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可见，建立合理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是实现宏观调控和搞活企业有机结合的关键。马克思曾深刻地揭示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要以“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和“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为条件。这说明，商品价格机制是与资本运行机制、劳动力流动机制结合在一起的，建立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涉及建立包括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整个经济资源的市场调节，这也就是说，必须引入市场经济

的资源配置方式，才能真正搞活社会主义经济。

综上所述，经济观念的突破是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必然结果。正反经验表明，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大胆引入市场经济关系，才能形成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体制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存在商品生产，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实践却证实，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商品生产还不能终止，还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可信了？不是的。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事物从来不可能完全吻合，对马克思的理论绝不能采取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态度。中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正好需要结合改革实践，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基本原理，才能得到科学的理论阐释。

1. 唯物史观“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与商品经济这种生产方式结合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客观状况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证明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经济的社会形态仍然是商品经济形态，经济资源仍然要按市场经济的方式配置。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2. 商品货币关系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没有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时，严格地区分了商品货币一般关系与资本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种区分贯穿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之中。例如，在分析货币资本循环机制时，马克思就深刻地批判了来自两个极端的错误。一个是把资本等同于货币，以为资本关系本身可以产生货币的购买职能。其实，资本的职能是价值增殖，而不是等价交换的购买。另一个是把货币等同于资本，以为货币的等价交换关系可以产生出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其实，在这种雇佣劳动关系产生以前，货币关系早就存在了。因此，那种把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确定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市场经济，决不意味着要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3. 商品货币关系可以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合。经济关系是多层面的，商品货币关系是表层的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里层的关系。表层的关系可以与多种里层的关系相结合。马克思指出，“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他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所以，唯物史观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并不是只能与资本主义生产结

合在一起，也不是只能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实践表明，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在一起，这是不值得奇怪的。

4.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存在商品生产，是由于间接的社会分工仍然存在。而这归根到底又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马克思说过，"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有人据此把私人劳动（die Privatarbeit）理解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范畴，进而把商品生产的原因归结为私有制。其实，私人劳动这个词在德语中还有个人劳动的意思，主要指分散的、彼此独立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并不必定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社会的再生产不能靠自由的、直接的社会分工来实现，还只能通过产品交换这种方式，间接地形成社会分工来实现。而只要生产者（个人或生产单位）的生产还不能实现直接的社会性，彼此之间还只能独立生产，相互之间只能通过产品的交换间接地实现社会分工联系，他们的生产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生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国有企业的生产，也不能实现直接的社会性，他们只能面向市场，才能加入社会分工，进行社会性生产，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者。用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实物计划指标安排生产，不能符合由社会再生产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社会分工要求，只会窒息社会生产潜力的发挥，压抑公有制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

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时代的局限，在理论上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商品生产，需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用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当代的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必然会得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与市场经济结合，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一、用唯物史观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要求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多种经济关系和历史、经济因素的统一。必须用唯物史观，才能对其经济特征进行系统、深入的认识。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有可能造成理论上，从而经济决策上的片面性，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实践带来失误。

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的结合上，这是开历史之先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着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将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充满信心，同时，对前进中的艰难险阻，

也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从一般国情来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儒家文化传统深厚；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2.8亿人口中，乡村人口占62.3%，现代生产力、近代生产力与古代生产力并存；中国有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习俗和具有特色的消费需求；中国面积辽阔，东、中、西部地理和自然条件有较大差异，经济发展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和现存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区别。凡此等等，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外国相比的国别差异，国内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全国一盘棋”在运行中，必定是布局疏密不同、发展有先有后。因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统筹兼顾，实施经济政策不能简单化，“一刀切”，只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来看，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单纯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在公有制主体经济之外，还有大量的私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关于这一点，第三章将展开阐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正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它将与推进市场经济的完善结合在一起，逐步走向成熟。我们应当结合经济建设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具体途径，探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规律，而不应当脱离实际，按想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去裁剪现实，那样，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先验主义的误区。

从人类社会市场经济一般的发展来看，与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管理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在理论上也有诸多的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时间还不长。为了建设好中国的市场经济，很有必要认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与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差别。我们不应当照抄照搬这些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而应当采取有分析、有批判的借鉴的科学态度。照抄照搬，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之后尘，只能被甩在时代车轮的后面。既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走出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来。

可见，科学的唯物史观使我们明白，应当从多个视角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只有全面地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唯物史观看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时，在诸多视角中，应当抓住主要的视角，这就是社会经济最深层的经济关系——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与生产力

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这种“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和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层基础。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从中国自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看，维护和建设好这个“基础”，才能使市场经济沿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轨道运行。从与当代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比较来看，维护和建设好这个“基础”，才能使中国的民族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激烈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总之，抓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经济特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方面特征。为了弄清这个主要经济特征，有必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对比的角度，做些展开分析。

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的共性

当今世界的经济，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总体来说，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世界经济仍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还很少。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弄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和差别，是很有必要的。了解共性的一面，有助于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践市场经济的成功管理经验；看到特征的一面，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从国情出发，创新经济体制，免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弊病，更好更快地发展国民经济。

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共性。主要是：

——财富的社会形式是抽象财富。所谓抽象财富，就是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价值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商品和货币都是价值的存在形式。人们劳动的成果只有通过市场，转化为价值，才能成为现实的财富；如果物质产品不能在市场上实现“惊险的跳跃”，变成货币，那么，它就没有社会有用性，就不能成为社会财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获取了价值财富，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质财富。

——财富的创造、流通、分配和消费，通过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来实现。市场主体由生产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中介机构、在市场上从事买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构成。社会化生产以生产企业为基本单位，彼此独立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通过市场交换形成社会分工。面对经济全球化，企业必须面向国内外市场，善于利用国内外经济资源，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才能生存。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市场是经济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现代市场经济都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含商品、金融、生产要素各种市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适应劳动就业、商品交换、货币流通、投资增殖、利用土地和国际贸易等等。现代市场经济都有发达的市场基础设施。如；物质资源流动所需要的公路、水路、铁路、航空和运输设施；经济信息往来所需要的邮电通讯、电脑网络系统等设施；人员流动的交通和服

务设施等等。

——政府组织的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了宏观经济中央调控机构，通过经济规划、一系列经济杠杆、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法治手段，调节市场，引导企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发挥市场竞争的积极作用，减少市场自发调节产生的负面影响。

——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弥补市场自发调节对劳动力造成的损害，保护民族经济的劳动力资源，缓和社会矛盾，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它通过一定的法律和规定，采取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条件，稳定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环境。

——开放型经济。市场经济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来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本质上是开放性的经济系统。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经济都实施对外开放的经济措施，加入国际分工，利用比较经济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普遍地走上了经济国际化的道路。

——经济秩序的法治化。用法治代替人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对稳定经济秩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发达国家都逐步建立起有系统的法律制度，来尽可能地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秩序化。

现代市场经济的这些共同性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应当具有的。这些性质是自然经济所不具备的，也是中国过去的计划产品经济所不具备的，因此，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就应当尊重这些市场经济共性的客观要求，就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创造条件，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但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框架上，是不够的。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资源的一般配置方式，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它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与这些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经济管理经验中，既有一般性的可取经验，又有不可取的、渗透着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东西。如果忽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很可能在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验时，犯照搬照抄外国“模式”的错误。那种用“现代市场经济”概念来掩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征、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观点，是偏离唯物史观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

因此，在弄清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共性的一般框架的基础上，还应当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的特征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根本的发展和完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本质

特征。

——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由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构成的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优势。国有资本的运行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国有资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资本本质上的不同点是，前者是全体劳动者通过自己的代表支配的资本，而后者是总体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支配的资本。

——整个社会经济机制的主动轮是全体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全社会的各个生产过程通过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物质资料不断更新，耗费的价值不断补偿，循环周转，形成社会再生产机制，这种社会机制的运行是由一定的经济主体发动的。这种经济主体好比机械传动中的主动轮。在唯物史观看来，在社会经济机制中，充当主动轮的，只能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和支配者。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个资本家就是这个社会经济机制的一个个“主动轮”。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社会经济机制的主要的主动轮已经不是资本家，而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主动论的变换，必将产生经济机制运行的新特征。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上没有什么差别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按劳分配是分配制度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内部，不存在剥削关系，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成果通过市场证实其社会有用性，并转化为可分配的价值，在做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根据劳动者可分配价值中所提供的劳动贡献，“等劳交换”，多劳多得，勤劳致富。这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凭借私人占有生产条件，就可以按要素（资本、土地要素）所有权获得收入是根本不同的。

——经济运行与发展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在任何现存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把其中的各个层面独立出来加以分析，但是在实际上，各个层面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不可能孤立地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维护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只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合，它也必然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固然，市场经济在商品交换领域，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自利原则、竞争原则、商品所有权原则，但是，这绝不等于说在其他领域，都只能用这些原则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在社会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在每一个企业和单位中，联合劳动和有计划的生产组织要求人们贯彻自觉纪律原则、整体利益原则、互助协作原则、利国利民原则等等；在精神文明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会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商品交换原则和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要求，如反对拜金主义、本位主义，提倡助人为乐、大公无私、全国“一盘棋”精神等等。

由于上述本质特征的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必将显示出许多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现象。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因此，有一些固有的经济弊病。主要是：①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被

称之为经济衰退)。②垄断妨碍企业自由竞争，企业产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③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尽管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代表“总资本家”利益的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力图救治这些痼疾，但是，由于上述基本矛盾始终存在，并仍在继续深化，所以，这些经济弊病仍然顽固地表现出来。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承认，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和个人收入不公平，是发达国家存在的所谓三大“市场失灵”现象。其实，这些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而产生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必然经济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消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也就基本消除与这种矛盾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弊病“基因”，它已经具有了前面所阐述的本质特征，这就决定了，它在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上，必定表现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达不到的健康态势。

——国民经济能够有条件持续、稳定地发展，生产力发展速度高于资本主义。这是由于根本经济制度使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整体利益，使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经济矛盾具有了统一协调解决的前提条件，并且能够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集中一定的经济力量办大事，所以稳定发展有了基本保证，而市场的效率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实际经济建设是靠具体的人们来运作的，高速的经济运行和稳定的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已经有了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现实可能性，可以使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达到成功的目的。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基本表现。

——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内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由于国家政府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能够主动地通过再分配手段调节市场经济自发作用带来某种收入不公，致力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就为逐步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共同致富，创造了条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又一基本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本质特征必定会作为主要的趋势，表现出来。虽然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具体的经济实践中，出现失误是有可能的，但是暂时的曲折不会阻挡历史的趋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上述基本表现必将越来越鲜明夺目。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必将从切身利益的获得中，愈来愈感受到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客观存在。

第九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一国情出发。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人口众多、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必然经历的阶段。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本章主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这个阶段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特征。弄清这些重要问题，才能依据基本国情，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战略、方针和政策，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

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国情，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论断。中国 1957 年以后，有 20 年的时间，经济处于停止和徘徊的状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制定经济政策，指导经济建设，脱离中国的国情，并没有真正搞清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要弄清中国的国情，科学地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必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弄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实际历史阶段。

我国从 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从 1957 开始，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这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当遵循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去认识，同时，还要放眼世界，在国际比较中来认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含义。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性质与生产力还不发达现状的统一。一方面，就根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而言，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大工业的基础，并且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

但是，另一方面，就社会生产力水平或经济发展程度来讲，中国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离开社会主义要求的经济现代化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统一。我们既不能离开根本经济制度的性质来谈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程度来谈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特有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即生产关系基本转变为社会主义之后，到社会生产力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历史阶段。中国大体到21世纪中期，才能走完这一阶段。而在生产力水平已经处于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必经历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关系基本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利用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从1957年算起，经历100年左右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正确理解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才能既同那种否定和怀疑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倾向划清界限，又同那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在经济建设中追求不切实际高指标的“左”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

正确理解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以超过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实现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中，逐步壮大自己的国际市场竞争实力，进一步获得巩固和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错误主张，真正实现了实事求是地、脚踏实地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就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中国真正地显示出来。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性和长期性

事物总是按照客观辩证法运动的，量变到质变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是这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若干个质上逐步提高的历史阶段，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或者第二阶段。

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会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社会的生产力也有一个从不发达到现代化的成长过

程。当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相应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也比较完善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将发生质的变化，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主义新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这种过渡性体现在经济、社会状态上的一系列“转变”和“建立”、“完善”上。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性，在时间上大约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这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及其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是由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决定的。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按照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或者说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国大约要在 21 世纪中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要求。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上百年的长时间，是有其科学依据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应当确立长期奋斗的思想。

在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过渡性时，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建国初期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混淆起来。中国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逐步在全社会占主体地位的时期，是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盟，并处理好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取得了胜利的时期。尽管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表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大力发展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但是，这两个阶段在基本经济制度上仍然有质的区别。在前者，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虽然已占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但是包括土地所有制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尚未在全社会占主体地位，在国民经济并存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仍然存在着争夺经济统治权的矛盾；而在后者，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全社会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归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掌握了主导权和控制权，其他经济成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

的前提下得以发展的，而它们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劳动人民还要通过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的地位，因而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相比，还不能不处于中心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经济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作中心。

当然，也不能轻易断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可以高枕无忧。这是因为，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国际资本主义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经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享他们长期占领的国际市场，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对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西化”、“分化”的图谋，这种外部条件会通过中国国内的消极和破坏因素起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自觉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从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过渡。

三、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

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是科学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制定并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任何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指导社会实践、调节经济关系的规范，都必须符合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符合实际，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物质利益；脱离实际，就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实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只能从这个最实际的国情出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紧密结合的。不能把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停留在抽象的理解上。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不是纯而又纯的，在不发达的生产力的基本状况下，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要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要面向市场，公平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中，从宏观看，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从微观看，单个企业内也有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种状况下，改革的方针、政策就要既促进市场关系成为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又要能在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发挥主体作用的基础上，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相互补益，共同发展。而在体制改革中强调要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归根结蒂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经济制度只能选择社会主义，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健康、持续地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也是中国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不加快发展，就会失去机遇，而甘心落后，就会被动“挨

打”，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实事求是地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经济，才能既有速度，又有效益，保证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中国人口众多，科技文化不太发达；中国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占很大的比重；社会生产力存在传统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现代化的依靠高新技术生产的多层面性；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尤其西部地区的经济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这些情况决定了中国在发展战略上，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适当，讲求经济效益，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路径，就要有一系列的相互配套的经济发展战略，诸如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计划生育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国际竞争战略等一系列战略，以及配套的方针政策。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制定的这些战略，将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使中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基本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

任何社会的经济形态都有它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生产力物质基础。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现存社会的经济形态有其复杂性。基本经济制度是用以描述现存的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状况的范畴。而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则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存的经济形态或基本经济制度，是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现状相适应的。认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状，是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两个基本方面。

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处于相对低下的状态。社会生产力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改造和控制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指的是一国劳动力人均的社会生产力。所谓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虽然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社会生产力比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就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的消费需要来说，依然是低水平的；二是虽然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社会生产力总量已经具有了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国际上经济已经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其主要的表现是：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上仍属于低位次的国家。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统计数据，1998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人均GDP是750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3%，在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760美元）之列，排在世界149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3220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1.9%，在中低收入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080美元）之列，排在世界129位。

——人口城市化水平低，初级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很大。中国近13亿人口，有近8亿在农村，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人口城市化水平到2001年只有37.7%，不仅明显低于1997年高收人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78%，也低于中低收人国家的平均水平42%。据国际劳动组织《劳动统计年鉴1999》的数据，在经济发达国家，劳动者在初级产业就业的比重一般都低于10%，1998年美国为3.1%，日本为5.4%，而中国1997年为48.7%，与印度尼西亚（45.7%）相当。

——现代生产力、近代生产力和农村中以手工工具为标志的古代生产力并存。中国衡量社会生产力先进程度的许多指标，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如人均交通和通信设施、许多行业的人均产品产量、生产中同量产品的能源消耗等，都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又是与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相联系的。尽管说，近加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在理论数学、高能物理、结构化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载人宇宙飞船的发射和回收、银河100亿次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胰岛素的合成，等等，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是，中国具有世界最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为数较少，普遍的是科技水平不高，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科技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是人才短缺。我国科技人员平均每万人中只有150人，而美国在1979年就达到了677.5人，远远超过我国。我国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只有24.7人，大学生和科技人员在每万人中的比例，都属于较低水平，比印度等国还低。据测算，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50%~70%）有较大差距，也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我国冶金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总体上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25~30年，电子工业技术与发达国家相差约15－20年，大部分石化装置所采用的技术仍处在发达国家20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同时并存。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生产力都有很大发展，每个地区和自己的过去相比，都有显著变化，但由于各个地区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不同，有的地区发展快一些，有的地区发展慢一些，这就使得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据资料，1999年人均GDP全国是6534元，其中广东11642.8元，江苏10672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青海为4674元，西藏仅为4125元。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相对应，地区之间人均收入也存在较大的差距。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888.77元，其中上海为10988.90元，广东为9205.60元，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省区除云南、西藏、重庆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9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2210.34元，其中上海高达5409.11元、浙江3948.39元，而西部地区的各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西藏为1309.46元，甘肃为1357.28元。要改变这种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

——贸易结构仍处于不发达阶段，国际竞争力在世界上排位还比较低。贸易结构，是指在进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密集型商品和劳务所占的比重。国际经验表明，贸易结构将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由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为主，向以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为主、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转变。目前，在

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商品比重较高，而在进口结构中，资本密集型商品比重较高。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处于不发达阶段。目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还不高，据有影响的瑞士国际管理研究所出版的《国际竞争力年报2000》，中国在2000年的国际竞争力被排到第31位。贸易结构的不发达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上的低位次，这些都是中国处于经济不发达阶段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的表现。我们应当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来深刻认识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只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上述中国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现状。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实践表明，中国在现阶段不能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而只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长期艰苦奋斗，谋求经济发展、民族生存和解放，而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根本经济制度的革命。中国社会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大工业物质技术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能够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力条件。经过近50多年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已显露出来。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体现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既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产生的标志，又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制度性根源。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进入崭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标志。

但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又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经济，还必须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出，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这就是说，现存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能够适应，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中国相对低下的、多层面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生产工具的性质上的差别（如手工工具与机器的差别），物质生产条件规模上的差别（如一定生产所需投资额数量上的差别），不同产业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上的差别（如交通、邮电和小型制造业的差别），不同行业在经营管理方式上的差别（如铁路、航空业与理发、餐饮业），经济当事人价值取向上的差别（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经营者的所有制选择会有差

别），等等，加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生产的自发性，又是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所有这些情况，都决定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不能是单一的。而非公有制经济能适应规模小、投资额小的经济，有个性化的特点，有适应灵活经营的一面，天然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自发要求，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它们在许多生产领域、一些生产领域的某些方面，能够填补公有制经济的空白，补充公有制经济的不足。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合理地布局，支持和鼓励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好地支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说，在市场经济自发性作用下，在某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难免会与公有制经济发生矛盾，但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两者共同发展是符合全局总要求的，而相互矛盾则是局部的。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正因为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全局要求，国家也就能够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解决它们之间的局部矛盾，保证以公为主，公私兼顾，各得其所。

必须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重要的是要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使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包括外资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全球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的有利条件；而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壮大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服务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于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这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实际走的是“发展全民、限制集体、消灭个体”的路子，结果使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布局分散。到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占80.8%，集体所有制占19.2%；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占90.5%，集体所有制占9.4%，个体所有制仅占0.1%。个体所有制在工业中几乎消除，在农业中也所剩无几，结果造成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城镇就业困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得到调整，越来越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截至1999年底工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来看，公有制经济占59%（其中国有经济占26%，集体经济占33%），非公有制经济占41%（其中个体经济占16.8%，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占24.2%）。已经形成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种良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所有制

经济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国情的，是完全正确的。

三、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则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处于动态发展过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会始终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必定是逐步趋于完善的。判断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完善，不能凭主观意志，而只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依据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只有能够促进生产力更快、更稳定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才是完善的制度。为了防止重犯指导思想的“左”或者右的错误，科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趋于完善，有必要坚持下述原则。

1. 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论的。改革开放以来，就发生过是否允许包产到户、是否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可不可以搞股份制等争论。而这些争论的实质，是用唯物史观还是用唯心史观，来指导中国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符合唯物史观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坚持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统一，坚持生产力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坚持生产力发展与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统一。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改革经济体制，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上，我们就有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2. 采取多种实现形式，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因此，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混合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要通过改革，努力探索它们的多种实现形式，促使它们的绝对量不断增长，并保持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和主导作用。没有它们在绝对量上逐步增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得不到保证。因此，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要着眼于“三个有利于”，把握好调整的度。在一定产业部门，对某些具体企业，从实际出发，对公有资产实行拍卖，把公有资本置换出来，投向别处集中使用，这在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不失为措施之一，但是，绝不能把这种方式看成是改革的惟一方式。更不能错误地认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既然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改革的重点，就绝不能放在公有资本“私有化”上，而应当放在寻求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上，努力促使它们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增长自身经济总量，保持其主体地位的巩固和发展。

3.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坚持鼓励和引导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私营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多样性需要，扩大就业，发展国民经济有重要作用，因此，对它们要采取鼓励的态度，但同时要因地制宜，加强引导。对于某些适合发展中小企业的产业，某些服务行业，某些市场中介组织，可以鼓励和支持私营、个体经济在其中发展。在经济落后地区、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地区，可以鼓励和支持私人投资创业。还可以鼓励个人通过入股、购买债券等形式向公有制企业投资，与公有制经济合股，形成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还包括对这些经济中的经营者实行社会主义法制规范和思想教育，要求新的私产者社会阶层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劳动法》，依法自觉纳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姿态，努力为社会多做贡献。

4. 在市场关系中，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都要通过市场关系来实现。它们存在的理由，要通过市场需求来证实。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和经济比重，也要靠公平的市场竞争才能客观地确定。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指的是流通领域买卖关系中的公平，这种公平竞争的原则，其基本要求是，买卖双方尊重彼此在交易中的平等权、自由权和所有权，这在具体的市场关系中，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企业的社会负担方面，在银行贷款、市场准入等经营条件方面，在税收管理方面，在对外贸易方面，在市场管理的法制方面，等等。在市场关系中，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用市场公平的原则一视同仁，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关系中的优胜劣汰，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各得其所，共同发展。这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范下，逐步建立有助于公平市场竞争的法制规范。有了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规范，就能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进行，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第三节　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渡性经济形式

一、关于过渡性经济形式范畴

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要从本质上明确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而且要从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充分认识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雇工的私营经济（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从本质上可以区分开来的经济成分，往往不是各自独立地或者纯粹地表现出来的。它们往往会交织在一起，形成混合的经济形式。这种状况，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经济形态具有比较明显的过渡性相联系的。也就是说，这种状况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久相联系的。因而，许多的混合经济形式，具有新旧性质的经济交替的过渡性，可以称之为过渡性经济形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因而都具有过渡的性质，也都存在某些过渡性的经济形式，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过渡性无疑是更加明显的。因此，重视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过渡性经济形式，很有必要。这可以使人们进一步克服那种把现存的经济形式看得纯而又纯的主观“幼稚病”。

理解过渡性经济形式这个范畴，有必要重温《资本论》中的两段精彩重要论述。①马克思在谈到机器大工业的产生时指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我们知道，在地质史上，新旧地质时代决不是一刀切似的界限分明的，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之后，还存留许多过去地质时代的东西。②在阐述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历史时，马克思专门阐述了一种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过渡形式，他指出，“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经营者（租地农民）除了提供劳动（自己的或别人的劳动），还提供经营资本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除了提供土地，还提供经营资本的另一部分（例如牲畜），产品则按一定的、各国不同的比例，在租地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里揭示了一种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经济关系。在“分成制”的过渡性经济形式中，一方面，租地农民还没有足够的资本，去从事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还不是真正的农业资本家；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也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地租（即只能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得平均利润以上的农产品部分剩余价值），在他与租地农民之间，分割农产品价值，可能有很多不成规律的复杂情况。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是像黑白界限一刀切似的那么分明的，而是像地质史上的分期那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过去历史阶段的东西会立即消除。在历史跃入新的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新的经济关系与旧的经济关系并存、新的经济关系与旧的经济关系交织混合，这些情况尤其突出。它们必定会在微观经济组织中表现出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会存在过渡性经济形式，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现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过渡性经济形式，这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生产力水平的多层面状况决定的。从微观看，生产力总是现实的、具体的。一定的生产力总是由具体的主客体生产要素结合构成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各种因素参差不齐，处于一定时空中的现实生产力，并不一定是由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生产要素（例如先进的生产关系因素一定与社会化的生产工具因素），彼此匹配，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在现阶段，有些生产条件（例如土地）必须归全民和集体所有，才能保证社会总体生产力的稳定发展；有些生产条件（例如设备或生产工具）必须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才能节约地使用，有些手工操作的工具，则适合于个人方便和灵活的使用，这些情况就使某些生产条件的归属，不仅存在全民所有、集体所有这种所有权关系的客观条件，而且也存

在私人所有的所有权关系的条件；有的地方已经拥有了先进的科技设备，但是却缺乏利用懂得这种先进设备的人才；有的地方有高新技术人才，却缺乏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所必要的资本；一个个生产者，一个个经营管理人才，他们所处的具体经济环境会有差别，他们会受到国内外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个人的价值取向也会有差别；凡此种种，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由具体的人、财、物构成的现实生产力，就会多种多样。与这种具体的、多样性的生产力相适应，在微观生产组织中，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不一定形成某种纯粹“姓公”或“姓私”的经济形式，往往会“公”中有“私”，或者“私”中有“公”，因而经济形式具有过渡性。例如，在一定的时空中，土地的所有权已经归集体所有，但是相当多的劳动工具还是只适合个人操作的手工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只能采取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具体经济形式，而不能采取集体耕作的纯粹集体所有制形式。

过渡性经济形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润滑剂”，因其兼容了新旧生产关系，因而它们是一块可以减轻因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更替而造成的对生产力破坏的“缓冲地带”。他们在社会经济形态更替过程中对社会生产力具有保护作用。认清过渡性经济形式存在的必然性，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实践有重大意义。建国以来多年的实践本身已经证明，脱离了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只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越“公”、越“纯”越好的做法是背离客观经济规律的，已经造成了损害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后果。而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那种以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只能搞私有化的观点，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是极为有害的。正确地实践，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生产要素的具体情况，尊重生产当事人或生产实践者的选择，形成适应生产力的具体生产关系，其中就要允许过渡性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发展。至于具体采用什么样的过渡性经济形式，应该从实际出发。比较哪种形式更好，还应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加以检验。

二、过渡性经济形式的多种类型

我们已经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具有多种成分，主要有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各自会以独资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需要着重阐述的是，除了不同经济成分的独资形式之外，还有大量的不同所有制经济关系混合的具有过渡性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这些经济形式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情况而产生的，决不能忽视这些经济形式。这些过渡性经济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身发展的角度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向更高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经济发展的过渡性经济形式。这主要是社会主义公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经济形式。股份制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制度为前提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由于企业内的生产关系性质，取决于占控制地位的资本所体现的所有制关系，所以，私人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是私有制性质的企业，而社会主义公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则是公有制性质

的企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阐述了由许多单个私人资本构成的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过渡性经济性质。他指出，这种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是与私人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向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这种股份公司中包含的私人资本（私人企业）与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的矛盾，“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可见，马克思把股份制视为从资本主义经济向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经济过渡的经济形式。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股份制这种经济形式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发展，不仅需要许多单个公有资本构成的独立核算的股份公司，而且需要公有资本与私人资本（包括外资）合股的股份公司，而公有资本控股的程度也不能千篇一律。自觉地利用好股份制这种过渡性经济形式，可以充分发挥其推进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向较高阶段过渡。这一类过渡性经济形式，可以容纳发展程度很高的生产力。

第二类，以一定的社会组织存在，自身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性质明确，但是又处在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经济形式。农村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就是这样的形式。在这种经济形式中，土地是由一定人口的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大的机械化设施也归集体所有，在农田水利建设、植物保护等项目上，可以发挥集体协作和现有的机械化力量，这些优越性是消除中国农村两极分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农田管理中的许多项目，还只能使用手工工具，农业生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手工的精耕细作、生产安排的灵活机动性、个人在生产操作中的技巧，如果项项采取大田集体“大呼笼”作业，就不能使农民个人的劳动投入与劳动成果收入对应起来，因而很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采取了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办法，手工农具或小型机械设施则归农民家庭所有，在通常的情况下，由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己经营管理所承包的农田，这就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展现出新的面貌。所以，家庭承包经营制这种经济形式，尽管在土地所有权关系上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但是，在土地的使用权上，却是家庭式的；生产工具也不都是集体所有的，还有一部分农民家庭私有的；在生产方式上，虽然有社会化生产，但是主要由农民一家一户地耕作和个体生产。这就是说，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在所有制关系上，仍存留着私有制的某些关系，在生产方式上，也留有私人小生产的方式，因此，它是一种向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农业集体经济过渡的经济形式。这种过渡性经济形式，会随着农业生产工具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而变化，但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它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的实际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改变的。

第三类，许多劳动者私人小资本的联合与他们的劳动的联合结合在一起，向劳动者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转化的过渡性经济形式。这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经济形式。股份合作制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结合，以劳动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这种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劳动者自愿组成这个经济组织，经济地位平

等，民主管理，从事联合劳动，主要的收入是按劳分配。但是，在这种经济组织中，毕竟有相当多的生产资料是由劳动者的私人小资本入股形成的，集体创造的纯收入中，还要提出一部分用于按入股资本的大小来分配，这部分分配是非劳动收入性质的分配。所以，这种经济组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当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集体的积累资金越来越多，以至超过私人小资本总和很多，按劳分配在这种经济组织中的收入占绝对优势的时候，股份合作制将转化为与劳动者单纯的劳动联合结合在一起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经济。股份合作制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重要的过渡性经济形式，在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往往选择这种经济形式。

上述经济形式既然具有过渡的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就有正向过渡和逆向过渡的两种可能性。所谓正向过渡，即朝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逐步完善的方向过渡。所谓逆向过渡，即朝着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向过渡。如果公有制股份公司的控股公有资本因某种原因退出，或者逐步减少到失去控股地位，那么这种股份公司就转变为私有制的股份企业。如果集体不能在法律的保护下维护好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可能转化为土地私有权，那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就会蜕变为土地私有制。如果股份合作制在经营过程中偏重于按入股资本分配，而轻视按劳分配，又允许股权在企业内部转移，那么这种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将可能转变为少数人持股，而其他劳动者被雇佣的私人合伙制。所以，在经济实践中，应当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加强引导，促使这些具有过渡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向逐步完善的方向过渡。

在具体的地点、条件下，由于构成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千差万别，过渡性经济形式也会多种多样，只要它们能得到当地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就要肯定它，支持和鼓励它的发展。这是因为，处于生产实践第一线中的群众，总是从切身物质利益来判断经济形式或者具体生产关系的合理性的，而群众物质利益的提高，只能依靠发展生产力，所以，大多数群众选择的经济形式，一般来说，总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入理解过渡性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和存在的客观性，有助于人们纠正那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刀切”地推行某种体制模式的片面做法，这对于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地制宜地选择具体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三、用劳动二重性的观点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

过渡性经济形式主要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象表现出来，尽管比较复杂，但是它的经济性质则是由这种形式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点，需要用劳动二重性的观点进行分析。

劳动二重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崭新因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商品生产社会，商品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包含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二重的性质；前者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形成商品的价值；前者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后者体现物掩盖

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商品中包含的这种劳动的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劳动二重性的观点贯彻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思想，客观地揭示了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特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在狭小的社会范围（氏族公社、农户家庭）内进行，有用的产品自给自足，生产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劳动的产品必须经过市场交换，为别人需要购买，产品才能被证实具有有用性，生产劳动才能被证实具有社会性，因此，生产劳动社会性只能间接实现。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真实的社会关系是被商品之间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的。只有从劳动的二重性出发，才能真正透过物与物的关系，弄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真相。马克思正是从劳动二重性出发，才发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商品的特点，才区分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区分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并由此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律，所以，劳动二重性是弄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处在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生产劳动的社会性仍然只能间接实现，所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也必须把握劳动二重性的基本观点。

用劳动二重性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要求我们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或者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就需要运用劳动二重性的基本观点。

对于由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出资者投人的资本所形成的企业法人财产，如果仅仅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是很难分清它的经济性质的。因为在厂房、设备、原材料、产品等实物形态上，它们已汇合成一种社会资本，其使用、支配也社会化了。各方投资形成的实物资产，已合为一体，被统一支配使用。在这个层面上，的确不可能分清资本是谁投入的了，也不可能分清各方投资大小的产权界限，据此，有人称现代股份制经济是“混合经济”，以为在当代已经没有必要区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了。但是，只要用劳动二重性的观点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就不是“混合”的了。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层面来看，各方出资者对资本价值的投入是有明晰的数量边界的，他们各自在同一法人财产中占有的数量，从价值角度看，产权关系是十分明晰的。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股份制企业中的各方出资人正是按股权数额代表的资本价值额，来行使自己的经济权益的，可见，价值关系事实上是界限分明，毫不混合的，那种用“混合经济”来混淆公私所有制经济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第十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主体

任何经济，总是由一定的利益主体（经济实践意义上的主体）控制和支配的经济。经济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实质就是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或者说是主要经济成分意义上的主体），是中国社会整个民族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控制者和支配者。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首先要弄清谁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主体，不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者，而是共同占有社会化生产条件的自主联合的劳动者。本章主要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利益主体的社会性质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组织结构特征。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利益主体的社会性质

一、经济利益主体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关系

利益，中文的词义是“好处”。从16世纪晚期开始，在欧洲各国广泛使用的“利益”或者“多种利益”（interests）这个词，是从拉丁语派生出来的，它被解释为，激发人们自我保存和自我提高行动的基本动力。利益，有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经济利益是物质方面的利益。根据唯物史观，我们可以把经济利益理解为，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质好处，它是人们从事经济行为的基本动力。说到利益，总是与谁的利益、利益归谁这样的问题连在一起的。经济利益主体，就是能支配经济利益的生产，决定经济利益的分配，能够主动获得经济利益者。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利益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以下简称利益）则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体现利益的经济价值究竟是谁创造出来的？人们获取利益的途径和多少，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历来众说纷纭。唯物史观认为，不能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人的利益。即使是私人利益，也不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利益观时所说，“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

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决定人的利益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由它所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利益的物质内容及其达到的程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关系则决定了生产的物质成果的分配关系，从而决定了利益分配的归属。人们是按照自己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获取一定利益的。

在历史规定的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利益的占有和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掌握和控制的，所以，只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能在利益归属中起决定作用，才能够主动地获取利益，才是利益主体。例如，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支配生产过程，他就可以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获取私人利益，而雇佣工人则只能被动地从资本家手中，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生活必需晶。所以，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关系中，能够支配利益的生产、决定利益的分配、主动获取利益的是资本家，雇佣工人则毫无获取利益的主动权。不言而喻，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是资本家。因此，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总是在一定利益主体支配和控制下的，它规定了一定利益主体的社会性质。

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利益主体或所有者要获取利益，必须依赖于掌握和支配现实的生产力。现实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和生产劳动者，所有者和生产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必定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由这种关系的支配者也就是所有者支配、控制的，所以，现实生产力总是归属于一定利益主体的生产力。利益主体要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维护自己支配和控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那种把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割裂开来，撇开利益的归属关系，孤立地谈生产力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就是属于资本家利益主体的“资本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生产力不再归属于私有者，利益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主体，不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者，而是共同占有社会化生产条件的自主联合的劳动者。公有制的利益主体必须维护公有制经济关系，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主体的科学含义，对于明确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动机和目的，明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对于科学地调节和控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也可以说，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

二、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经济利益主体在社会性质上的比较

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来支配和控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同，其利益主体的社会性质也就不同。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适应一定水平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原始公有制度、奴隶主义制度、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些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存在，也都有其必然性和历史作用。这些利益主体的差别，都是由相应的所有制经济的差别所决定的。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并存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因此，在当代中国，也就存在着多元的利益主体，这种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同时并存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内的多元利益主体中，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一类是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利益主体。它们在社会性质上既具有共性，又有差别；在利益关系上，既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关于两类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在第五章再展开分析，这里，重点比较同时并存的两类利益主体的社会性质。

它们的共性在于，都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具有中国民族经济的社会性质。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是一定民族的国家。国家之间的矛盾，体现为民族利益的矛盾。民族经济利益表现为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面对国际经济竞争，中国公、私两类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都是中国民族经济的这种共同的社会性质，就会显现出来。

但是，不能不看到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两类利益主体的差异性。他们即使掌握同样条件的生产力，其社会性质也是有差别的。

1. 私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一般性质。“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私有制有“无数色层”，因而私有制的利益主体也各色各样，有奴隶主、封建地主、资本家、自己参加劳动又同时雇用工人的小业主、个体小生产者等等。他们有的是完全的剥削者，有的既是剥削者又是劳动者，有的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性质有很大的差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个体经济的利益主体，与旧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相比，在性质上已有明显不同。私营、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作为其利益主体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都要向社会主义国家依法纳税，必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因此，他们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是，他们既然身处私有制经济关系之内，就仍然具有私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一般性质。

——他们是生产条件私有产权及其经济价值的承担者。他们以单个的私人资格，享有私有制经济关系赋予他们的物质利益。

——他们生产经营的动机是私人利益。他们依法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条件，以获取主要是自己的私人利益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

——在依法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他们拥有私人决策权。他们是私有制经济机制中的“主动轮”。他们支配和控制属于自己的生产力，在依法纳税和维护职工合法经济权益的条件下，私人有权支配和决定生产以及成果的交换、分配。

——私营经济的利益主体具有一定剥削性质。他们作为私人资本所有者，在获取的税后利润中，包含着对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此，他们对雇佣劳动者存在剥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私营经济利益主体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生产者的社会性质。

2. 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一般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者的利益主体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赋予的一般性质。

——他们是生产条件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及其经济价值的承担者。他们作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以总体劳动者的资格，共同享有他们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所赋予他们的物质利益。

——他们生产经营的动机是联合劳动者的共同富裕。他们依法凭借共同占有的生产条件，以实现整体利益和每个劳动者个人利益的统一提高为目的，在社会化的物质生产条件下，从事经营活动。

——在依法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实行经济民主。他们通过民主决策程序，支配和控制属于联合劳动者的生产力，支配和决定生产及其成果的交换、分配。日常的经营管理，由自己推选的优秀代表实施，但是他们拥有按科学程序监督管理者的权利。

——联合劳动者内部贯彻经济平等的原则。个人与联合体之间实行等劳交换，劳动者个人之间要求各尽所能，开展劳动竞赛，团结互助。

从上述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两类利益主体的差异性比较，可以明白，私有制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主要是满足私人利益。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由于私营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成员经济收入的显著差距。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构成利益主体的联合劳动者内部，存在经济民主和共同利益，所以，只要他们在现存较高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依靠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形成高于私有制经济的生产力，就必定能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促进劳动者的共同富裕。这也就说明，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社会主义劳动者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利益主体的意识。

这里应当指出，我们在概念上，有必要区分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主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主体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前者专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而后者则指整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涵盖的、体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各类利益主体。例如，我们可以说，合法经营的私营经济利益主体，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主体，但是，不能说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主体。

三、全民所有制利益主体同集体所有制利益主体的差别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存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简称集体经济）两种基本形式。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生产经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则是由一定数量联合起来的自然人、劳动者群众，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以满足集体经济利益为目的组织生产经营的经济。公有制经济既然有这两种基本形式，也就有两种利益主体。这两种利益主体都是自主的联合劳动者，但是，他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存在差别，这决定了他们在社会性质上也存在差别，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其一，利益主体作为总体劳动者的性质不同。全民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作为由全体劳动人民构成的总体劳动者，是从全社会来看的整体，因此，它在重视一个个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同时，必定要追求全体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这种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存

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集体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自主联合起来的自然人构成的小范围的总体劳动者，尽管也是一个整体，也追求每个整体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主体相互之间是独立的；在不同的集体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对生产资料占有数量和质量关系上的不平等、生产能力上的高低差距，因而相互之间在享有的物质利益上也会有较大差别。

其二，利益主体的代表者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所有制经济只能由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全体劳动人民的总代表，采取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来组织生产经营，因此，利益主体只能由国家来代表。正因为如此，全民所有制经济又称之为国家所有制经济或者国有经济。到未来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消亡了，国有经济这个概念将失去意义，那时，全体人民都是劳动者，他们的总代表将有新的形式。而集体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代表，则是在劳动者自然人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中产生的行使集体所有权的代表机构。

其三，利益主体的结构关系不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由全社会范围的劳动人民构成，从经济运营和资产使用的角度来看，必定要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机构来管理，并由企业（经营国有资本）和事业单位（占用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组织广大劳动者来经营、使用，因此，利益主体具有覆盖全国的庞大的纵横组织结构关系。集体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内部组织结构，一般来说，也有一定的层次，但是，结构关系覆盖面是小范围的、比较简单的、地方性的。

其四，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方式不同。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联合劳动者，其利益关系的调节，要服从国家所有权机构根据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制定的统一原则来进行。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各企业单位作为商品生产者自负盈亏，存在独立的法人利益，但是，这也要遵循国家规定的物质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对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分配上，则可以由劳动者集体内部民主制定的分配方式来进行。

以上我们所说的利益主体，都是以生产条件的所有制关系来区分社会性质的。现在流行一种从按职业收入来源的角度划分社会阶层差异的观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划分有一定的必要。用职业标准划分处在同一种经济地位中的人们的不同类别和阶层，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不应当用职业划分标准，取代以生产条件的所有制关系来划分利益主体这种更为深入划分标准，须知，只有根据这种标准，才能科学地划分一定的人们在生产条件所有制关系中所处经济地位。这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标准，我们是决不应当将其模糊，更不能将其丢弃的。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

一、市场经济和中国国情对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要求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不是以劳动者个体为本位的，而是以自主联合的劳动者组织为本位的。这种联合劳动者的组织结构，本质上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提出了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中国国情出发，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问题。

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用抽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概念来裁剪现实，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过于简单地理解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组织。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在组织结构上，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社会大工厂内部的联合劳动者关系；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在组织结构上，则参照全民所有制经济，只不过是范围大小不同而已。由于忽视了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客观要求，仅仅从单一的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公有制经济，所以构建利益主体的组织，往往用“越大越公越好”作为检验利益主体组织结构优劣的标准，这就导致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后果。

如果从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也就是从市场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在组织结构和社会性质上，必然与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有较大的不同。

——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要求来看，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结构上，必须既要有助于从整体上控制经济，又要有助于一个个公有制经济单位作为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成为商品生产经营者或市场竞争主体。这就要求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层级性。至少分为两个基本层级，即纵向的对下进行经济控制的管理层和横向的面对市场自主生产经营的企业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对国有经济，强调政企分开，其实质，就是要科学地重构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组织。正如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机构来管理整个国有经济，必然是高成本、低效率的。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的利益主体组织构造具有单一性，一个个国有经济单位其实只是如同在一个大工厂内，必须听命于上级的车间，没有自主经营权；较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存在乡镇政府机构直接管理集体企业的问题，这样势必缺乏活力。

——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国情的要求来看，国有经济的利益主体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在社会性质的内涵上必然有所差别。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国民经济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又被理解为正在向全

民所有制过渡的经济，所以，可以说，国有经济（当时称之为国营经济）的利益主体，就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然而，在明确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国有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差别，从而它们的利益主体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一方面，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区别，决定了不同利益主体社会性质的区别。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排他性角度来看，个体经济所有者、私营经济所有者和集体经济所有者，这些非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它们作为各自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应同时又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因此，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就只能是在全民所有制经济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的自主联合劳动者总体。另一方面，合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与它们相应的利益主体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它们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才能代表这种共同利益，这样，国有经济就不仅涵盖全民所有制经济，而且也涵盖体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利益的经济，国有经济的利益主体也就具有了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自主联合劳动者和中国人民共同体的双重社会性质。

因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国有经济体现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存在性质上有区别的两部分，一是体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二是体现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两部分经济利益都由国家代表，因此，与这两部分利益相联系的经济都是国有经济。为此，有必要把国有经济分为广义的国有经济（体现两部分利益的经济都包括在内）和狭义的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本书以后的阐述中，当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并列地分析国有经济时，应当在狭义上理解国有经济，即理解为全民所有制经济。

狭义国有经济中的自主联合劳动者，他们主要从事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和机械化的农田生产，因此，狭义国有经济的利益主体就是工人阶级。狭义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国人民的民族经济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以存在强大的狭义国有经济为条件，也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形成这样的民族经济，因此，中国人民的民族经济利益主体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二、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可能性

市场经济要求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从组织上划分为一定的层级,既可以作为整体统一管理,又可以作为一个个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这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提出公有制经济的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是否能成为现实。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公有制经济也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就只能走私有化的道路,也就是把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转换为私人利益主体,可见,这里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命运。

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只要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关系分割的一般规则，那么，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上划分为一定的层

级，是完全可以实现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又要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在经济实践中，就不能不建立起一些所有权关系分离的原则，使生产资料所有权利益主体分为一定层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揭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在适应社会化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其内部分割为若干层次的客观现象，阐述了资本所有权关系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理论。

——在产业资本所有权关系中，可以分割为：①资本的单纯的所有权（又称法律所有权），凭借此权可以占有利息收益；②职能资本所有权（又称经济所有权），凭借此权可以占有利润收益；③由职能资本所有权（相对于后者又称支配权，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控制权）控制的经营管理权，被聘用的经理凭借此权可以得到职能资本家控制的管理收入；④由经营管理权监督下的雇佣工人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或操作权，雇佣工人运用此权从事生产劳动，创造价值，只能得到职能资本家支付的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创造的剩余价值则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如果产业资本家用别人的资本经营，在①②之间就是借贷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借贷关系，由后者向前者支付利息；如果产业资本家用自有的资本经营，则由他一人同时享有①②的权益。在产业资本所有权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职能资本所有权这个环节，因为只有它才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占支配和统治地位。

——在资本主义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关系中，可以分割为：①土地的单纯所有权（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法律所有权），地主可以凭借此权获得绝对地租和一定的级差地租；②土地的经营权，资本家向地主租赁土地后，凭借对这块土地经营权的垄断，一般可以获得投资农业带来的平均利润，还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③在土地经营权控制下的农场经营管理权，被聘用的管理者凭借此权可以得到职能资本家控制的管理收入；④由农场经营管理权监督下的雇佣工人对土地的耕作权，雇佣工人运用此权从事劳动，创造价值，只能得到农业资本家支付的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创造的剩余价值则为地主和资本家无偿占有。

马克思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的分割，这种分割是由阶级剥削关系串联起来的。产业资本所有权的利益主体分割为借贷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雇用的经理几个层次；土地所有权的利益主体分割为大土地所有者、产业资本家和雇用的经理几个层次，他们作为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阶级，共同剥削工人阶级。但是，撇开所有权关系的阶级剥削性质，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导致了所有权关系的分割，即使是私人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也需要分割为若干层次，由不同的经济角色来承担；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掌握所有权，却不直接从事经营，而把经营权通过所有权分割的方式，让别人去承担。这就给我们重要的启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权关系也是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进行适当的分割的，与此相应，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上划分为一定的层级，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当然，各层级的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相比，在社会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他们之间不再是用阶级剥削关系串联起来，而是

用一定权责关系规定的协作分工关系串联起来的。

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权关系的分割，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就可以从组织上划分为两个基本层级：一个是作为所有权代表的管理层级，当事人掌握对公有制经济的控制权，从整体上对它们实行统一的间接调控和管理；一个是与经营权联系的生产经营层级，当事人拥有对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管理权和生产经营操作权，可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因此，就可以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三、区分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国有经济利益主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中国国有经济，在内涵上已经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但是其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这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有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决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有国有经济，与中国相比，有何异同？这是一个需要阐述清楚的问题。在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一种闪烁其辞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国有经济的作用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参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主张的提出，是与混淆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国有经济及其利益主体相联系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有较快的发展。据资料，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15%～34%，尽管在此后比重有所减少，但是至今国有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产业资本和大量财产。从现象上和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有经济具有某些共同点。①所有权都是国家的，都由国家管理机构控制；②都对市场经济宏观运行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起一定的调控作用；③都有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方面。认识这些共同点，有助于我们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国有经济的经验。但是，仅仅认识这些共同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的国有经济利益主体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社会性质上具有本质的区别。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这一基本矛盾的产物。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及其利益主体的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当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用存在失业威胁、导致投资失误的不确定性、过度的收入差距、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贪得无厌的精神刺激和“市场失灵”现象等，来说明市场经济的缺陷，并以此解释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和存在国有经济的必要性。比起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些鼓吹资本主义经济是永恒和谐的经济学来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毕竟承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真正把握产生这些弊病的深刻

原因；不能弄清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利益主体是总资本家；对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存在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利益，更是避而不谈的。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国有经济有如下特征：

——它不是为了解决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而产生的，而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前提。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就以国有经济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主导。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国有经济虽然初期也有，但是数量很小，直到20世纪中叶，在对抗性的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才有所发展，但是在国民经济中仍只占较小比重，始终不占支柱和主导地位。

——它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它需要劳动人民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勤俭节约，不断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逐步增长（包括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乃是发展趋势。坚定不移地改革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固然要有助于国有经济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要促使整个国有经济运行适应市场经济，促使国有资产不断壮大。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数量是服从于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利益的，是服从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所以，在这种需要强烈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以适当增大，一旦这种需要减弱，国有经济就可以减少，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小，是按资本家整体利益的需要来调节的。

中国国有经济的这些特征，是由其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是因为其利益主体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

四、国有独资企业利益主体的双重性

研究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关系时，有必要把国有经济利益主体、集体经济利益主体同企业法人利益主体在概念上区分开来。本书后面的章节，将阐述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是法人，它可以有多种所有制经济按一定规则混合构成，因此，是多个和可能是多种社会性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构成的。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法人，它有自身独立的法人利益，因而也就有一个法人利益主体，这个法人利益主体就是全体向企业投资的股东总体，而股东大会选出的董事会则是法人利益主体的代表机构。我们所说的国有经济利益主体、集体经济利益主体，在范畴的意义上，指的是一个特定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是单一的，没有混合所有制的性质。在明确概念的前提下，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独资企业的一种利益主体双重性的现象。

撇开市场经济关系，国有独资企业法人的利益主体就是国有经济的利益主体，因为国有独资企业是单一的所有制经济。但是，一旦引入市场经济关系，国有独资企业尽管仍然称之为独资企业，但是实际上法人利益主体已不应再是单一所有制的主体了，而具有了国有经济利益主体和企业集体利益主体的双重性。这是因为，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国有独资企业作为法人，也必须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独立决策，这就不能不承担决策

责任。这样，在不同的国有独资企业之间，就会产生因主观能动性发挥的优劣而显现的经营效果的差别。这种经营决策的主观能动性产生的效益，表现在许多的方面，例如：①在同等条件下，有的企业经营有方，经营所得的利润，超出国有资本控制权机构规定的国有资本平均盈利，形成了超额的部分，并转化为积累；②企业根据市场竞争的需要，主动从市场融资，通过借入资本，并人企业资本经营，取得盈利，形成了企业的积累；③企业不是通过国家的追加投资，而是利用连续的自主经营积累的资本，促使企业资本不断增值，扩大了企业的积累等等。显然，这种由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产生的较多积累，应当受到鼓励。

在同等条件下，不同的企业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不同，形成的积累就会产生差别，从而企业的经营效益也会产生差别，既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内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种差别就应当在收入分配上有所体现。而只要确认企业总体工人的收入分配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挂钩，企业就会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在同等条件下比其他企业有更多的积累。显然，承认企业之间因主观能动性发挥的优劣而显现的经营效果的差别，就应当肯定在同等条件下企业高出平均积累的差额，与该企业总体工人集体主观努力是紧密联系的。这一差额有必要在国家与企业集体之间分成，这有助于调动企业总体工人这个集体的积极性。这样一来，企业中就有了属于企业集体的资本，国有独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就成为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的结合，国有独资企业法人的利益主体就具有了国有经济利益主体和企业集体利益主体的双重性质。

这里应当强调，在同等条件下企业高出平均积累的差额，不应当全部归企业职工集体。因为，企业职工集体是使用国有资本、在国有资本所有者统一管理之下取得超额利润的，所以这部分利润应当在国家和集体之间分成。正因为如此，国有独资企业内的这种集体资本只能占很小的比例，不必担心国有独资会因此而转变性质，转化为集体企业。因此，即使我们说在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利，益主体有双重性质，国有经济利益主体也是始终占主要地位的。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基本分类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主体 1. 由工人阶级构成的利益主体。这就是狭义国有经济主体，或者全民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他们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授权的管理机构，代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行使自己的权益。从经济利益的界限和经济管理效能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把代表全民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管理机构，与体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利益的利益主体的管理机构区分开来。人民共同体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应当由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来形成；而全民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则要通过对自身经济的管理，取得经济运行的效益（利润）来积累。所以，应当有不同的国家授权的管理机构，各司其职，才能更好地实现各方面的经济利益。

主体 2. 劳动者自主联合构成的集体经济利益主体。这类利益主体由共同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有确定数量的自然人集体构成。他们的经济利益要通过由他们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运营来实现。集体经济的利益主体需要建立一定的机构来代表自己行使所有权权益；机构的大小和形式，是与集体经济的规模和所在的经济领域相联系的。集体经济利益主体的代表机构，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自然人，采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才能真正代表集体的意志，服从集体利益的需要，行使好集体经济的所有权所赋予的各种权利和责任。

主体 3. 国有独资企业中的职工集体利益主体。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这一类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主体是国有独资企业中的职工集体，是附属于国有独资企业的国有经济利益主体的。他们没有独立的利益主体机构，但是，在企业取得超出国有资本平均盈利的前提下，企业法人机构可以根据国有经济利益主体管理机构的统一规定，行使职工集体利益主体代表机构的职权，使职工集体获取应得的经济利益。

弄清社会主义经济利益主体的分类，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上，这有助于弄清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利益主体的新特点；在实践上，则有助于指导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管理机构改革，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明确改革的方向，把握经济利益的归属。值得强调的是：不能把主体 1 与广义国有经济利益主体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后者取代主体 1；应当看到主体 2 与主体 3 的区别；而在国有经济管理中，不应当忽视主体 3 的存在。在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利益主体的，分类之后，以下在分析中，我们将着重阐述主体 1 和主体 2，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

这里还需要指出，全民所有制经济（狭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财产都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两类，经营性财产必须保值增值，具有资本一般性质，所以，本书表述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为了区别与资本家作为主动轮的私人资本，也可以称为国有社本和集体社本）；非经营性财产用于消费，本书将它们表述为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公有资本是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统称。不言而喻，非经营性的公有资产同经营性的公有资本，其利益主体虽然是同一的，但是在管理方式上是有显著区别的。以下我们主要研究经营性的公有资本利益主体，即国有资本利益主体和集体资本利益主体。

第三节　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基本结构

一、公有资本利益主体内部管理层级的划分

公有资本同私人资本的根本区别是资本运行的主动轮不同，前者是自主联合的劳动者，后者是作为资本家的私人。正因为公有资本的利益主体是劳动者联合体，是总体劳

动者，具有整体性，所以，在经济组织上，一开始就需要形成既有利于统一行动的集中管理，又有利于社会分工、发扬劳动者民主权利的管理结构，尤其需要建立起有利于科学管理的上下层级结构。

对于公有资本利益主体来说，虽然主体（联合体）中的每个劳动者都是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都有参加劳动、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但是，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自发地、无序地行使这种权利；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运行主动轮的构成因素，只能通过建立一定的层级管理机构，在一定的管理秩序中，来实现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来行使经济民主管理的权利，通过管理机构来代表自己的所有权权益，形成经济主动轮的力量，推动整个经济的运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管理层级划分，服从于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性高度集中的管理，政企不分、机构臃肿，在社会劳动分工的组织上，有很大的主观性，那样的层级划分显然是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本章第二节已经提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需要从组织上划分为两个基本层级，一个是代表所有权的管理层级，一个是与经营权联系的生产经营层级。这种划分的实质，就是要使利益主体管理层级的划分，或者说从管理角度来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就必须科学地划分公有资本利益主体内部的管理层级。要改变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有必要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要求出发，进一步提出划分公有资本利益主体内部管理层级的一些重要原则。

1. 基层生产组织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原则。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生产社会性仍然只能间接地实现，生产的投入产出，或者说生产的供给与需求，都必须由直接生产者面向市场，自主决策。因此，公有资本利益主体的直接生产组织，凡是独立经营比联合经营更有效率的经济单位，都应当成为面向市场的法人，也就是能自主经营一定规模公有资本的企业。公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应当让公有制企业的职工集体，拥有公有资本的自主经营权，也就是企业法人财产权，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就要求，坚决改变那种公有制经济管理机构与企业政企不分的状况，减少对企业的“多头”管理。

2. 公有资本所有者实行有效控制和监督原则。公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不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但是必须通过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式，对企业经营公有资本实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包括对所控制的公有制企业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实施决定权，对重要人事行使审定和任免权，对每个企业承担经营一定量的公有资本行使资本收益权。这就要求实施这种控制和监督的公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素质、专业水准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具有执行这些职能的权威和能力。

3. 管理成本最小化原则。公有资本数量大，尤其是国有资本数额庞大，所有权代表机构本身还需要划分一定的层级，才能具体地实施管理。管理本身需要花费成本。管理层级的多少，每一层级机构、科室规模的大小，人员安排的优劣，管理效能的强弱

等，都关系到管理成本的高低。要充分认识公有资本运行管理是经济管理，不同于非经营性的行政管理。为此，要有管理经济效益与管理经济成本的比较，以取得同等效益的条件下管理成本最小为原则；要尽可能地按有利于公有资本有效运行的要求，精简层级和机构，在不同层级之间，明晰产权，分清责权，贯彻管理成本最小化原则。

4. 公有资本运营总体效益最大化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资本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立足。有些企业在竞争中亏损、破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公有资本必须追求总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只有实现总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才能证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可以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公有资本利益主体内部的管理机构的设置，必须有利于公有资本从总体上提高运行效率，保值增值。为此，管理机构的设置要有利于公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有进有退"，有利于对公有资本从整体上做战略性调整。这就需要打破行政性的地方"板块"式管理的格局，适应发展区域经济优势的需要，设置跨地方行政管理范围的公有资本管理层级，处理好公有资本运行管理机构与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明白了上述公有资本利益主体管理层级的主要原则之时，还应避免一种错觉，以为公有资本的利益主体就是由这些管理层级机构构成的。决不能忘记，公有资本的利益主体是占有它的全体劳动者，而各层管理机构只是他们实现自己的所有权或经营权的代表者，是他们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应当充分认识，公有资本利益主体的结构，应当既包括管理层级结构，又包括总体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分工结构，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现实的公有资本利益主体。管理机构是总体劳动者权益的代表，处在非管理机构的广大劳动者群众是公有资本利益主体的基础层级，包括基层劳动者群众在内的总体劳动者才是各层管理机构形成的决定者和最终的控制者和监督者。

二、国有资本利益主体管理机构的设置

国有资本面广量大，管理机构的科学设置，是促使国有经济运行适应市场经济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根据上述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原则，设置科学的国有资本利益主体管理机构，应当处理好一些重要的关系。

1. 从同一层面中的经济关系来看，应努力克服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端，通过机构改革，处理好下述关系。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与国有资本管理的关系。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国民经济宏观管理面对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整个国民经济，而不是单一的国有经济；宏观管理的目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健康、持续的增长。国有资本的管理对象则是国有的全部资本，管理的目的是国有资本从总体上保值增值。尽管从国家角度看，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机构与国有资本管理机构都处在最高层面，但是，在管理机构和管理的职能上，仍然有必要把它们两者区分开来，让各自都能集中精力，行使自己特定的职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管理目的。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和经营性国有资本的关系。国家和地方各级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和经营性国有资本，它们都是国有资产，但是两者的管理要求是有区别的。前者属于消费性的资产管理，后者属于生产性的资本管理。前者如政府部门、学校、医院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效益上，属于非经营性管理；而后者则属于经营性管理，与面向市场的投入产出、经济运营结合在一起，必须追求价值增值的经济效益。这种管理性质和管理要求上的显著差别，应当体现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也就是说，两者的管理机构有必要分开。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应当轻装上阵，专门从事经营性的经济管理，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国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与被授权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的关系。在将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机构与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区分开来、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经营性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区分开来的前提下，还必须明确国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与被授权的经营性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简称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的关系。国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是全体劳动人民通过一定合法程序选出的机构，它本身受到全体劳动人民的监督。全体劳动人民只有通过这样的机构，才能实现自己作为个人的经济民主权利，实现对国有资本的个人所有制。但是国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例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机构）自己毕竟不是专业性很强的经营性管理机构，这样的机构需要通过所有权代表机构按法定程序授权建立。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就是这样建立的。它代表国有资本所有者履行出资者职责，享有资本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实施对受资国有企业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其本身的经济行为则受到国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的监督。可以说，有了这样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国有资本利益主体的代表机构才得到了落实。

2. 从上下管理层级的关系来看，也应努力克服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端，通过机构改革，处理好下述关系。

（1）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与企业资本经营的关系。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对企业是“多头”管理，“多龙戏水”（多个部门管一个企业）；企业为了适应自上而下的管理，只得在机构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后果是国有资本整体管理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由于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具有了对受资国有企业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责权，必须防止在新的条件下对企业过多干预。因此，必须通过经济法规，科学界定这种责权的范围，并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确保企业行使法人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

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与其下属投资国有企业三者的关系。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本身不是企业，它对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大企业的出资，虽然强调经济效益，但是并不是直接作为市场主体投资，它所出资的企业，才是直接面对市场的投资主体。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本身是企业，不属于管理机构范畴，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与它的关系是所有者（或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在财会关系上，必须把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与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责权区分开来，使控股公司自主经营，承担国有资本经营者的权益和责任。而控股公司与投资的下属国有企业的关系，是大企业内部的关系，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是经营者内部的层级关系（母子公司之间的层级关系也可以称之为母公司范围内的出资者和经营者关系）。为了减少管理层级，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也可以不

经过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而直接向大型国有企业出资。

(2) 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的关系。国有资本数额庞大，在坚持全民所有制性质、所有权由国家代表的前提下，在管理上有必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中央管理机构和地方管理机构。管理机构划分层级，管理目标是同一的，都是为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本的地方管理机构，是国家授权的机构，代表的是国有资本的国家所有权，而不是地方所有权，因此，要服从国家中央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的统一领导，不宜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即使地方管理机构的积极性与地方利益有一定的联系，也应在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合理的规定。地方有省、市、县，是否还要层层设管理机构，这要依国有资本有效运行要求而定，要坚持减少层级，降低管理成本的原则。

(3) 中央机构与区域经济机构的关系。国有资本的区域经济管理机构也是一种地方管理机构，但是，它却是一种跨行政地域的管理机构，更有利于国有资本的地方管理适应市场经济。例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优势逐步显现出来，这个区域涉及几个省（市），如果有一个跨省（市）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重点管理该区域的国有资本的投入产出运营，就比各省（市）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分别投资或者联合投资，在管理上要有利的多。

总之，国有资本利益主体管理机构的设置，实质是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如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作为利益主体的全体劳动人民，物质利益如何更好地生产和实现。应当坚持实践和探索，努力解决好这个问题。

三、集体资本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

集体资本的利益主体是由自主联合的劳动者自然人群体构成的。规模不大的集体资本利益主体在组织结构上比较简单，最简单的就是集体独资企业中的管理机构和职工群体构成。

比较复杂的集体资本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是在一些集体工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在这些农村集体经济中，除了集体所有的土地之外，既有非经营性的集体资产（如乡镇的医院、学校的资产，某些山、林自然资源等），又有投人工业的经营性的集体资本。有些乡镇或者村一级，已拥有上亿元的集体工业资本，分散在若干企业中，这些经营性的工业资本的运行都要通过市场，参与市场竞争，需要保值增值。毫无疑问，乡镇或者村一级的自然人农民集体，是这些集体资本的利益主体，但是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管理或操作这些集体资本，也必须通过一定的管理机构来推动资本的运行。所以，集体资本的利益主体也存在管理机构的设置，是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否有利于集体资本的保值增值这些问题。

有些国有资本管理机构设置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如非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资本的关系、资本所有权代表机构与被授权的资本管理机构的关系、资本管理机构与企业资本经营的关系等，对于经营性的集体资本管理是同样适用的。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来看，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产生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一些地方往往把乡镇政府机构等同于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而资本所有权机构有索取资本利润的权益，这样一来，在乡镇政府管辖下的集体企业，每年必须承担向乡政府上缴利润的沉重负担，以至难以从事必要的技术更新改造，难以扩大再生产，结果在市场竞争中落入被动艰难的境地。其实，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与乡镇政府机构是性质不同的机构。乡镇政府机构虽然也有一定的经济管理职能，但是它面对的是乡镇地区性经济的秩序管理和环境改善，其经济来源应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上缴地方政府的税收；而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是农民自然人集体所有权的机构，其管理的任务是集体资本的保值增值，其收入应当归农民、自然人构成的农民集体所有，这是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本质区别的。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作为专门的经济机构，只能由集体农民自然人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运用社会主义权利，民主选举产生。

实现了乡镇政府与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的分离，落实了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集体农民就可以通过它来设置从属经济管理机构，或者决定投资开发、新办企业，形成符合集体资本有效运行的利益主体结构。从而，就可以从促使集体资本保值增值，而不是从乡镇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管理、监督资本的运行，提高运行效益；就可以从有利于市场竞争（将利润投入再生产）和增加农民自己收入（将利润转化为农民个人收入）相结合的角度，权衡资本收益的支出，促使集体资本成为集体农民致富之本，逐步地扩大积累。

四、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广大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

上述内容表明，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必定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但是，在这种结构中，管理层级的划分和机构的设置，不能主观随意决定，而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旦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符合这种客观要求，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是由自主联合的劳动者自然人构成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它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首先，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具有客观性的组织分工，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征。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也有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管理结构，但是，它们不可能将基层劳动者包括在利益主体层级范围内，在结构规模上也不可能像国有资本利益主体那样庞大。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本身，就属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范畴，这种组织分工是与属于生产力范畴的人们之间的行业、工种、技术等多种分工交织在一起的。

其次，劳动者在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组织结构中的分工，是一种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分工。固然，公有资本的所有权代表机构与经营权代表机构之间、上下管理层级之间，必须建立市场经济运行和生产经营所要求的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每一层级的劳动者都必须服从这种关系。但是，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系统内部关系的必然要求，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和各类乐器演奏要有一定的分工和位置排列一样。虽然劳动者在组织结构中的层级有高有低，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这是因为，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被遴选人管理层，决定他是否处于管玛者地位的，不是私人占有的资本的多少，而主要是他的素质和能力；所有劳动者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原则上都贯彻按劳分配，以付出的劳动贡献为依据。所以，在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组织结构中的上下层级关系，实质上是社会化生产中的纵向劳动分工关系，这种关系中既不存在经济上的剥削关系，也不同于高低贵贱、人统治人的强制性等级关系。那种把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化管理必定要产生的层级关系，等同于封建等级关系的说法，是牵强附会的。

第三，各层级劳动者的纵横分工是一种联合劳动的协作关系。这种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内部的组织分工，建立在自主联合劳动者实现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个人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冲突。他们通过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结构，团结协作，形成合力，提高经济效益，在实现整体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个人经济利益。每个劳动者都在总体劳动者内部分工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义务和权益，都处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人翁地位。处在合理分工协作中的每个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把个人理解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必须从一定经济机制和生产关系赋予个人的规定性，使个人成为一定经济利益的承担者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经济运行中的每一环节和每一经济层面中的劳动者个人，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个人。

第四，各层级劳动者形成的是一种动态的、充满活力的生产关系。公有制利益主体组织结构中各层级纵横机构之间的关系，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一旦形成，就具有固定性。但是，劳动者个人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的哪个具体经济组织、哪个机构、哪个层级，则不是固定的。这正如种瓜下种，每一挖好的瓜塘，其行距、株距都是固定的，但是究竟哪一颗种子下人哪一个瓜塘之中，则不是固定的。而在私有制经济的组织结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定是固定地处在指挥、监督和统治层级。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在劳动者的分工上，与私有制经济的僵化组织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劳动者在组织结构中的可流动性，使其永远充满活力。

第十一章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要求，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决定了中国民族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社会主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是主体与非主体的关系，它们之间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矛盾。多元的利益主体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必须认识并正确处理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本章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整个民族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并提出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矛盾关系的价值目标、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两者关系的重要性和实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将同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它们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各得其所，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

正如第三章阐述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虽然已经建立起一大批现代化的水利、交通、通信、能源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和钢铁、能源等基础工业，形成了一批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但是，在全社会，尤其在农村，在中西部地区，社会生产领域以手工工具生产为标志的古代生产力和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生产力，依然占很大的比重。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多层次性。古代、近代的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这些生产力依然存在，它们就仍然有同私有制经济关系结合的条件。唯物史观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在中国现存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如果要人为地消除全部私有制经济关系（也就是私有制经济的社会形态），势必窒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决定

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将同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同时也提出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上发生的，是在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发展自己这个基本前提下发生的。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个短期存在的问题，或者以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方要吃掉另一方，在认识上都失之简单化和片面化，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地处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生产关系，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第四章的分析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实质上是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关系。既然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是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那么，能否正确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就关系到能否维护和发展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经济利益。离开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实质内容，来研究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很难深刻认识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相互关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中国经济姓“公”姓“私”都无所谓，看起来似乎很强调发展生产力。但是，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撇开了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撇开了谁掌握生产力，谁就能获得由此带来的物质利益这样的实质内容。在中国的国情下，已经掌握了全社会主要生产力的广大劳动人民，只有正确处理好直接体现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其他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促使自身经济利益持续稳定地增长。

因此，本章的主题，就是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和私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关系，把本章标题表述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主要是考虑到人们的习惯用语，而只要明确这种关系的实质，这样表述也有简洁之处。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物质内容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中，最基本的就是，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它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这里，有必要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含义。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的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公有制经济在物质内容上，包括全体人民和劳动群众集体拥有所有权的自然资源、土地和各种经营性、非经营性的资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

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自然资源和土地的所有权是公有的，是排斥私人所有权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性的公有资产必须同市场经济一般关系相结合，表现为公有资本。公有资本不仅包括国有独资企业的国有资本和集体独资企业中的集体资本，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含义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意味着，在由自然资源、土地和各种经营性资产（资本）和非经营性资产构成的社会总资产中，公有资产占主体地位。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全社会的经营性资本中，公有资本是否必须占优势地位。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自然资源和土地公有就行了，公有资本可以不必在全社会的经营性资本中占优势地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经营性的或者能增值的公有资本在公有制经济中是起着核心作用的，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地位，固然体现在自然资源和土地的所有权是公有的，但是更重要的，应体现在公有资本在全社会经营性资本中占优势地位。只有公有资本保持优势地位，具有保值增值的活力，在经营中不断增长壮大，才能保证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公有权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保证其真正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才能保证其社会主义的公有权益不遭侵蚀，从而才能保证整个公有制经济充满生机。当然，在有的地方，有些产业，在经营性资本中，也可能私有资本占优势。但是，就全国而言，应当保证公有资本占优势。

2. 公有资本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有质的优势。量的优势，体现在，由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构成的公有资本，在全社会经营性资本中占有优势比重。质的优势，体现在公有资本的运营与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相比，具有较强的稳定增值能力，体现在公有资本独资或控股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力。对于国有经济来说，质的优势，不仅要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还必须从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来看。应当通过战略性的调整，来提高国有经营性资本的整体素质，即整体增值能力和市场竞争实力。

3.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即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基础部门、重要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经济通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在非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参股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里必须明白，当代中国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体现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有经济相比，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不宜拿后者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类比中国。中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比后者高，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

4. 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实质上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存多种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我们应当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公有制经济及其公有资本的本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说明全国生产劳动者的大多数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关系中从事生产和取得个人收入分配的，也就意味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是维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这是全国人民形成共同理想、形成强大凝聚力的基础。

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须占主体地位的原因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这不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而是在当代中国的国情条件下，整个中华民族的经济利益实现最优化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中华民族在近代曾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深知社会生产力落后就要挨打。选择怎样的社会发展道路，才能加快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人认为，中国过去长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资本主义不发展，因此，按经济发展规律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很大的认识误区。在当代，决不能离开国际经济环境，孤立地观察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名著中就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人民大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已经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容许中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大众要获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果实，只有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所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实践已经证明，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加快了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更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才能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提高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这是因为，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和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有可能从民族经济的长远目标着眼，最大限度地动员现有经济资源，有计划地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才有能力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有重点地研究和开发现代高新技术，加快发展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带动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才能积聚雄厚的资本，组成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航空母舰”，有力量在国际市场中，与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展开竞争，并发展国防经济，维护民族经济安全。也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稳固了，全国人民才能形成牢固的共同理想，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发扬民族精神，利用好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学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充满信心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快经济的现代化建设。

——这是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获得主人翁地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社会主

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本质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联合劳动，这就能够保证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摆脱被欺压剥削、被强制支配的境遇，通过参与民主管理，真正获得支配自己命运的权益。由于公有制经济以劳动者提供的有效社会劳动作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尺度，实行按劳分配（本书第十八章还要详细阐述），真正平等地分配劳动成果，劳动者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就限制在个人劳动有效成果的差别范围内，从而能够消除私有制经济必然产生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就能保证大多数人享有按劳分配的平等权益，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才能保证国家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保证国家法律能够反映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主义公正，使那些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应有的维护。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这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走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危机的基本条件。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生产者的相互独立、自主经营，生产的社会性只能通过市场间接实现，因而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再生产运行必定具有自发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两极分化必定形成对抗性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力必定与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相矛盾，由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必定使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对这种矛盾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全社会能够形成目标一致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这就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容易取得社会各方面的认同和协调行动，极大地减少社会生产的盲目性；由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有条件消除个人收入的两极分化，因而可以有效地把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控制在非对抗性的范围内，这就形成了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基本条件，能使社会再生产持续稳定地增长。

总之，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中国的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过去，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束缚下，公有制经济曾一度缺乏活力。但是，这并不是像有人宣扬的那样，公有制经济天然不如私有制经济，而是由于公有制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崭新的经济形式，人们对它暂时还缺乏实践经验，还没能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寻求到它的合适的实现形式或者具体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暂时的体制上的弊病，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本质关系不是一回事。经济体制的弊病是可以通过改革来消除的。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体现，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这种优越性必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必须毫不动摇。

第二节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辩证关系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类型和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相互依赖、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为了理解这种关系，有必要弄清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非公有制经济是指在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各类所有制经济，即在性质上不是由自主的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类型。

1. 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经济，简称个体经济。这种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归城乡个体劳动者所有，并以个人或家庭独立生产和经营为主，自食其力。个体餐饮业、个体手工制造业、个体零售商或小型批发商业、个体修理业、个体理发服务业、个体运输业、个体旅馆业等等，这些个体经济遍布全国城乡各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以其分布的广泛性、经营的灵活性、对消费者的适应性、提供产品的独特性，能够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提供难以替代的方便，增强经济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通过其扩大产品流通渠道，促进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润滑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并通过其投入少、规模小、组织简单等特点，起到充分利用社会中各种潜在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作用。个体经济的特征和作用，决定了它们将长期存在。

2. 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简称私营经济。这种经济的特征是，私人投入资本，占有需要社会化生产的生产资料（机器体系），使用并支配众多雇佣劳动者，以私人资本增殖为经营目的，依然存在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私营经济由私人企业主决策投资经营，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本和雇用较多劳动者，实行社会化生产，市场风险由私人承担，盈利在依法纳税之后归私人占有。虽然从企业内部来看，私人企业主与其雇佣的劳动者之间存在经济剥削的对立关系，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在公有资本总量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条件下，私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能增加全社会的投资，也就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能吸纳公有制经济容纳不了的劳动者就业，也就有利于人民群众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模不大的私营经济有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灵活经营的特点，这对挖掘社会经济资源的潜力，将社会闲置资金转化为生产性资本，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化，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对于私营经济，不能仅仅从是否存在剥削关系来判断其存在的价值，而应当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高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大多数人改善生活的大局，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必须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与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所不同，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私营经济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形成

障碍，能够和公有制经济一道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应当把它们当做对抗的力量加以排斥。

3. 外资经济。外资经济本质上也是私营经济，但是这种私人经济的资本所有权归外国国民，不属于中国民族经济范畴。外国投资者要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汇往母国，属于外国国民收入范畴；而国内私营经济即使到国外投资，其资本利润也属于中国国民收入范畴。中国是人口大国，相对于众多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能够利用的物资生产资料越丰富、质量越高，就越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生产资料要通过资本形式来利用，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来看，现有可利用的资本不是已经充足了，而是还很不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有更多的追加资本，又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合理地利用（以不损害民族经济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快。尤其应当看到，合理利用外资，不但能够增加可利用资本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合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引进、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加快中国经济管理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4. 混合型的非公有制经济。这种经济是上述几种私有制经济的派生形式，主要有私人资本控制经营的私人合伙制和股份制。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生产经营只要规模在继续扩大，终将要扬弃私有制固有的那种私有者自己投资、自己管理的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扬弃，一种是转向公有制经济，如公有制经济对私人资本进行赎买，个体经济转向具有过渡性质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等；另一种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扬弃，采取私人合伙制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形式，从而突破私人资本独立经营的狭小规模和突破资本私有者直接经营在管理能力上的局限。私人控股的股份制经济，又可分为外资控股和中国，私人资本控股两类。在这种混合型非公有制经济中，也可以有公有资本参股，不过，即使有公有资本参股，由于是私人资本控股，这样的经济在性质上也仍然属于非公有制经济。

在理解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上，有必要注意两个区别。一是把非剥削性质的个体经济与存在一定剥削性质的私营经济区别开来。但是，不能把当代中国的私营经济等同于旧中国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前者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监督和管理，并依法纳税，是与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相联系的。二是把属于中国民族经济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同非民族经济的外资经济区别开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应当从振兴中国民族经济的大局出发，采取积极支持、鼓励和引导的态度，并依法进行监督和管理。应当认识到，合法经营的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利益主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二、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这可以从下述两方面来理解。

(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1. 这是公有制经济平稳地实现转换体制的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有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磨合过程,在这个"适应期"中,公有制经济自身增长会相对减缓;同时,国有经济在管理体制改革和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会退出一些领域,留下空间。在这些情况下,要保证社会经济总体上持续增长,公有制经济在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实现体制转换,可行的办法就是充分调动社会潜在经济资源,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利用市场经济比自然经济有利于个性发展的条件,调动个人的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变闲置资金为能够增长社会总财富的资本,这样就能让一切闲置的人才、劳动力资源充分地活跃起来,将社会节约的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扩大就业、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繁荣市场、促进全社会经济增长,就可以保证公有制经济顺利转换体制,并在一个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平台上发展自己。

2. 这是公有制经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公有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克服传统体制行政性管理的"惯性",从"面向市长"转向"面向市场"。这只有尽早进入市场环境,参与市场竞争实践,才能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天然的独立性和互不依赖性,发展起非公有制经济,就在公有制经济的外部,营造出自发性的市场经济环境。这就迫使公有制经济在外部压力中加快体制转换,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实践中求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得到锻炼。私营经济的发展、外资经济的引进,加快了市场环境的形成,这对于公有制经济从习惯于听命上级指令的"行政性单位",加速转换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面向市场的现代企业,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 这是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展自身的需要。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可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提供有利条件。

(1) 从生产领域来看,①公有制经济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与之配合。国有资本,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将集中于大中型企业,它们要真正形成低成本、高效益的规模经济,就不能"大而全",而需要充分利用社会分工,抓住核心技术实行专业化生产,这就需要有许多生产一般零部件,或者进行局部组装的中小企业与之相配套,投资量较小的非公有制经济正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间。②公有制经济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控股、兼并等方式,及时吸纳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扩大生产规模。③公有制经济可以借助于私营经济扩大自身。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公有制企业积存一定的尚不足以独立投资或控股投资的闲置资金时,可以把它们作为参股资本,投入经营较好、又急需扩大经营规模的私营经济,这就能使闲置资金成为增值的资本,使公有制经济获得利益。④公有制经济还可以在必要时通过招标等方式,利用海内外私人提供的设计方案、专利技术等知识资源,增强自身竞争力。

(2) 从流通领域来看,公有制经济可以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布局灵活、大小零售点延伸广泛等特点,将公有制的大型批发业和私营小型批发、零售业结合起来,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销售链,加快公有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在经济运行中增强自身增值能力。

（二）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

1. 面对外国资本的竞争，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借助于国有经济的强大，才能作为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得以生存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支持、鼓励和引导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上有人认为，私营经济天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只能靠发展私营经济，甚至要通过所谓“平等竞争”让后者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极为片面的。殊不知，如果没有国有经济提供经济支撑和国防安全保障，没有强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社会安定团结提供保证，私营经济面临强大国际资本的压力，要么只能处于被欺侮的地位，要么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这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了的。所以，非公有制经济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配合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提供支撑。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有经济已经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矿产品、能源等主要原材料，粮食、棉花等战略性物资，市场流通所依赖的交通、信息和金融等基础设施，都需要依靠公有制经济。只有公有制经济通过体制转换，更加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加雄厚的物质支撑。

3. 非公有制经济需要从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中吸取营养，克服自身弊病，求得发展。私营经济从事社会化生产，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决定了其内部管理的专制性和强制性；私有制固有的谋求私利的生产目的，又决定了一些私营企业在遵纪守法和商业道德等方面存在缺陷；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使许多私营经济采取家族制的经营组织，往往对科学管理造成人为制约；这些弊端则会对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很大不利。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则具有遵纪守法和讲求商业道德的组织约束力、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内部管理的民主性、自觉调节和完善管理体制的主动性等优点。私营经济需要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吸取这些方面的营养，才能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长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4. 非公有制经济需要公有制经济发挥主体作用，才能有稳定发展的可能。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受损失的不但是广大劳动者，受到打击也包括中小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这使现存私有制经济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下降到次要的地位。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发挥主导作用，并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在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下运行和发展，只要国家宏观决策不发生失误，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要寻求一个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就应当依靠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服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带动。

5. 从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看，私营经济发展的最终出路是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在对经营性资本的管理上，总是会遇到资本的增殖、生产社会性的扩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资本通过股份制形式，联合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这是克服这种矛盾的过渡性形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仍然会成为

一种私营经济的出路。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过改革，必将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必将焕发出自主联合劳动者利益主体的优势。所以，从发展的趋势来看，私营经济要克服自身的矛盾，有可能通过股份制形式，更多地同资本实力雄厚的公有资本联合，加入国有资本控股的公有制企业，并经过长期的磨合，最终实现由私有制经济向公有制经济的质变。当然，这只能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只有当中国私营经济的能量已经充分释放而衰竭时，这种质变才会发生。

可见，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发展中国民族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在很长的时期内，它们将相互依赖，共同发展。所以，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将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必然存在矛盾

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公私两种所有制经济在生产关系性质上存在对立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经济面对与私营经济并存的格局，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私营经济本身具有资本主义性质，面对强大的国际资本，有的私人经济甚至可能依附外国资本，改变自己的民族经济性质。私营经济利益主体在全社会人口中占少数，私营经济的扩大，意味着剥削性生产关系的扩大、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从生产力控制权、支配权的角度来看，公私两种所有制经济是相互排斥的。私有制经济控制的生产力，其生产成果主要归作为其利益主体的私人支配；公有制经济控制的生产力，其生产成果则归作为其利益主体的自主联合劳动者支配。公有制占有、支配的经济资源排斥私人占有、支配；私有制占有、支配的经济资源也必定排斥全民或集体占有、支配。因此，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在各自的扩展中，必定发生对社会有限经济资源在占有、支配上的矛盾，从而发生在社会总生产成果权益享有上的矛盾，核心的是自主联合的劳动关系与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在经济权益上的矛盾。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矛盾性，存在于社会经济的运行之中。这里，有必要撇开个体、私营经济时有发生的经营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行贿欺诈等情况，因为这些违法行为是可以依法纠正的。应当重视下述在法制上尚未明确规定是非的矛盾关系：

——私营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存在经济资源和市场占有上的竞争。在相同行业这种竞争十分明显，如争夺优质原材料、抢占市场等，关键在专业技术人才的竞争上。对于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才，私营经济可以采取让利的方式，给予特别高的待遇，从公有制经济中“挖人”，而公有制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如果不能着眼于市场竞争，采取灵活性措施，则容易处在不利地位，流失宝贵的人才资源。

——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对公有制经济管理层人员会形成诱惑。在公有制经济中从

事复杂管理劳动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人收入虽然比一般职工高，但是由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毕竟高得有限；而管理规模较小企业的私营企业主，由于可以合法占有剩余价值，个人收入却可以明显高于前者。如果对这种客观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前者就可能产生“吃亏”意识，对公有制经济产生动摇情绪，这对稳定公有制经济的管理队伍显然会带来不利。

——国有、集体经济同私营经济的并存，为一些人损公肥私提供了便利。有些国有、集体经济的工作人员，“脚踏两只船”，身兼公、私两种职业，有的还自己开公司，因为这些人有现有公职之外的“外快”收入，所以主要心思和精力不在公有制经济，而是“胳膊朝外拐”，如“老母鸡下蛋，在自家下两个，外面下八个”，这必定对公有制经济带来明显损失。

——在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存于一个企业的股份制企业，有可能出现私人资本排斥公有资本的情况。现实经济生活中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某企业由若干私人的资本和某乡镇集体经济参股的资本合股构成，由于经营获得的利润较高，几位主要私人投资者为了“肥水不外流”，便向乡镇集体组织提出，要求买下集体股份，使企业完全变为私人合股。而如果集体资本一旦退出，就从可以增值的经营性资本转化为死的资金，这显然会使集体经济受到损失。

凡此种种，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并不是相安无事的，而是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上的矛盾的。一般来说，这些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不能控制这种矛盾的发展，任其盲目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的社会冲突。只有正视和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促进两者和谐共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既具有相互依赖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看不到两者统一的方面，不利于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发展；而回避两者对立的方面；同样会给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或损失。这两种片面性都会阻碍整个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　实现共同发展

一、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就必须弄清，它作为一种调节不同所有制关系的实践，其价值目标是什么，换句话说，它是为谁的经济利益服务的。用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回答，就是为了增进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

这种实践价值目标，规定了处理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促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由现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占全社会的大多数人，因此，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实现调节多种所有制经济关系的价值目标。而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绝不意味着中国要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振兴民族经济的积极因素，不能不依赖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海内外各类私人投资者，他们之所以能够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中国民族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主要支撑作用，是因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如果缺少这种大前提，海内外的私人资本就会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不可能归宿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正因为如此，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不但体现了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的愿望，也是符合海内外各类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实现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护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基本格局。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在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各自都会在不同时期多变的条件下有所变化。有的时期，公有制经济会因某种原因发展慢一些，例如，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展速度会相对慢一些，而私营经济则因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及国家采取支持政策等因素，发展较快；有的时期，公有制经济可能和私有制经济同步增长，都快速发展；有的时候，在国内外多种因素作用下，公有制经济可能增长的比非公有制经济更快。这就是说，所有制结构，即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实际比重，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这就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唯物史观，不能因为历史过程出现的偶然性而陷入认识误区，必须自觉地从历史必然性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不因为在这一时期，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所减弱，私营经济的发展势头较旺，就对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产生动摇；也不因为在另一时期，公有制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排斥的态度，对私营经济的发展人为地设置障碍。

调节所有制结构，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国民经济管理提出的重要课题。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比例结构在不同阶段，决不会固定在一种关系上。从国民经济管理实践方法论的要求来看，调节所有制结构，不应当从主观臆想出发，而应当立足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着眼于全社会国民收入总量持续稳定的提高，在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各自资本绝对量逐步增长的同时，力求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相对量能增长得更快。

二、支持、鼓励与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促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一是支持、鼓励和引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前一环节是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发展；后一环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部或者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内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如何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取得了主人翁地位的劳动人民的权利机构，它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作为国家的职能机构，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即广大劳动人民，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既然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对待非公有制经济就需要采取支持、鼓励和引导相结合的基本方针。

1. 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正如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本身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一样，公有制经济通过政府如何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所以，如何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把以往被排斥的对象，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竞争关系的对象，转化为支持、鼓励的对象，与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认真探索的课题。从在实践中取得的初步经验来看，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从认识上转变观念，科学地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地位。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纠正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私营经济绝对对立起来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深入理解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要防止另外一种不科学的观点，即认为既然要发展私营经济，就不应承认它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关系。其实，这仍然是一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私营经济绝对地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须知私营经济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是客观存在的，私营企业主的资本家性质也是客观存在(尽管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支持、鼓励私营经济发展，重要的不是模糊其经济性质，而在于认真加以引导，加强管理和监督，扬长避短，真正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

二是针对管理上的空白或薄弱环节，采取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切实措施。政府要主动地把私营、个体经济纳入服务和管理范围，为它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进出口贸易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应当在资本信贷、土地使用、项目投标、人员招聘等经营环节上，让私营、个体经济享有同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待遇。要改进政府机关服务方式，减少经营执照审批环节，降低企业创业成本。要维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合法经营形成的私人财产应当受到维护，要坚决制止对私营经济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对待下岗和失业职工、退伍军人、残废人员等自谋职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应给以信贷、税收方面的优待（这种优待当然也应当

给予发展合作经济等集体经济）。

2. 鼓励、支持需要与引导紧密结合起来。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自发性，市场经济所有经济成分的经营单位，都需要从宏观调节的角度加以引导，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市场经济的“失灵”。这种引导同时也是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保护。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经营单位规模小、面广量大、产业进入盲目性大，竞争实力相对较弱，所以尤其需要引导。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来看，公有制经济规模较大、实力较强，一旦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竞争力会显著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引导地撒手让公、私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各个经济领域盲目竞争，很可能造成较大的相互损失，对发展整个民族经济不利，惟有通过积极的引导，使它们投入相应的经济层次，参与资本、实力基本相当的市场有序竞争，才能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从而各得其所、和谐共处，实现共同发展。这种引导是多方面的。

——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

一是从节约和有效使用社会经济资源的角度，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地避免乱上项目、乱铺摊子、重复建设、减少超量的中小企业挤在同一行业过度竞争，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损失。

二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规定市场准入条件。明确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哪些产业和行业，可以自由进入；在哪些产业和行业，可以有条件或有限制地进入；在哪些产业和行业，则禁止进入。

——把私营经济的发展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把私营经济的发展同城镇化发展战略、科教兴市（县）战略、地方特色经济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有的地方从综合管理和区域经济集聚效应的角度，发展工业园、科技园，为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同时也达到规范化的引导和管理的效果。这些经验值得重视。

——加强多方面组织建设。主要是，帮助私营、个体经济建立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增进行业自律，沟通政府同他们经常性联系的渠道，交流信息，共同协商问题，及时解决矛盾；健全和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等组织的功能，通过组织学习、培训和参观等活动，提高私营企业主、个体业主的政治、业务素质，促进他们敬业爱国、守法经营、乐于贡献；建立工会组织，并在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职工群众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劳资两利，推动依法经营。

——促进微观体制创新。现实表明，中国私营经济受自然经济和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家族制管理和专制性管理都比较严重，这显然不利于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不利于提高私营经济的市场经济竞争力。因此，有必要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私营企业主，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跳出狭隘眼界，增强企业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在企业经营中，增进民主管理意识，融入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三、规范市场竞争，严格法治管理

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各自的内部、在相互之间，都存在市场竞争关系，都要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才能发展自己。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等措施的引导，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那种盲目的、恶性的竞争，但是决不是要消除有序竞争；人为消除竞争，也就是消除市场经济，那就不是积极引导，而是又走到否定市场经济的老路上去了。正确地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投资经营，这是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序竞争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使所有的市场主体受到法制约束和必要的工商行政管理。而对于以实现私人利益为生产目的私有制经济来说，因为其主体缺乏公有制经济组织那种严格的内部纪律约束，对它们加强法治和工商管理，尤其重要。

健全法制和工商管理，其内容就是要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经济权益和必须承担的义务，对市场竞争秩序，对市场主体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做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性和行政性规范。重要的有下述方面。

——规范市场主体的合法资格、市场准入条件、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关于这些方面，国家已制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律，不断完善有关法规，将对规范市场主体的类型及其经营资格，合法经营，制止和惩处“皮包”公司、无执照经营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都具有重要作用。

——规范市场主体的交易、竞争行为。关于这些方面，国家已制定《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不断完善有关法规，必将促进市场主体在交易中诚信履行契约、遵守信用原则，依法定价，维护商品用户和消费者权益，必将对公平竞争、控制垄断、制止和惩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欺诈、强制性交易、滥用超经济权利限制竞争、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掠夺性定价、搭售及其他不合理交易、不正当有奖销售、诋毁商誉和串通商标等）、建立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发挥积极作用。

——规范市场主体对国家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关于这些方面，国家已制定《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和有关的行政法规，不断完善有关法规，必将进一步规范各类市场主体依法纳税，制止和惩处各种逃税、偷税、漏税行为。国家还在建立健全关于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不但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

——规范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存在合法范围内的经济剥削，在劳资关系上，国家是通过《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确定合法范围，实行制约的。完善有关方面的法规，对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政府部门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为了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国家已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以法治的方式，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对于发展中小企业，在规划指导、保障权益、资金支持、创业扶持、市场开拓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应当履行的权益和责任，并规定了中小企业应当遵守的规则。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因此，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调节国家与中小企业的关系，规范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将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总之，国家只有加强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引导，并加强法治和管理，才能促进它们依法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促进它们的各类利益主体处理好自己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增进中国蕞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目标下，实现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十二章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占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要巩固和发展壮大，发挥出自己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优越性，就必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现存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经济实现形式。本章在阐述公有制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两个概念区别和联系的前提下，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这种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关系，阐述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土地公有制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所有制实现形式。

第一节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及其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一、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它们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科学地理解它们，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实现有效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1. 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简称所有制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由生产资料（生产的客观条件）所有权归属或产权归属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是经济形态的本质构容。所有制经济这个概念则是指一定所有制或生产关系与处于其中的生产力的总称，例如，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是公有制生产关系及其掌握的生产力的总称。

科学地理解所有制，要把握几个要点。

其一，所有制是经济学范畴，其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不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这里的所有者，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支配者。

其二，所有制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不用于生产，就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他所生产的产品不通过交换进入消费，就不是现实的产品；而正常的生产总是连续地再生产，所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总是与所有者生产、再生产中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使用以及所生产成果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

程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与发生在这种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只是在理论分析时，才可以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单独抽象出来。所以，应当把所有制理解为所有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其三，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是所有制的核心。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或所有制中起决定作用，为此，讲到一定的所有制时，有必要突出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的性质，例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社会所有（自主联合劳动者所有）这样一种所有权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但是，不应该由此产生错觉，以为公有制就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关系这一层含义。事实上，它除了这层有决定意义的含义之外，还应当包括与之联系的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了防止错觉，可以把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本身，称为狭义的所有权关系，而把由狭义所有权关系决定的总和的所有制，称为广义的所有权关系。

其四，所有制或广义的所有权关系是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条件下，所有制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的层次和内容，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私有制与公有制具有根本不同的历史特征；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特征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公有制，原始公有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显著的区别。

其五，应当弄清经济范畴的所有权同法律范畴的财产所有权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经济范畴的所有权为国家法律所维护，就成为法律范畴的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经济范畴的所有权对财产所有权是起决定作用的，财产所有权是经济所有权的法律表现。经济范畴的所有权关系一旦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发生变革，法律范畴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也要随之而变动。经济范畴的所有权和法律范畴的财产所有权都叫所有权，都可以简称产权，但是，在概念上仍有决定与被决定之分、先后之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几乎都不明白或者回避法律上的产权关系是由经济上的产权关系所决定的这个真理，把产权关系看做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法律范畴。因此，他们容易从既定的、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关系来判断所有制是否合理，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产权概念，首先要求弄清由现存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产权关系是怎样的，然后判断法律是否适应经济产权关系。显然，在产权概念上区分经济范畴和法律范畴，这是唯物史观科学方法的要求。本书着眼于经济关系的分析，首先是在经济范畴的意义上使用所有权或产权概念的。

2.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它是所有制本质内容的表现形式。本节第四章已指出，生产资料所有者控制和支配着生产成果或物质利益的发展，这种物质利益关系就是所有制的本质内容，其实现形式就是这种本质内容的表现形式。为了加深对所有制实现形式含义的科学理解，我们可以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的阐述。他指出，“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土地不出租，土地所有权就没有任何收益，在经济上就没有任何价值。”在商品社会中，“地租就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由此，我们可以领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的主要含义是，一定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凭借对生产条件（例如土地）拥有的

所有权，获取经济：价值的途径（如出租土地的途径）和取得收入的形式（如地租形式）。也就是所有权的拥有者获取物质利益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形式。

，3. 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方面的因素，如物质生产条件的性质和规模（机器生产，还是手工生产；投资规模巨大，还是较小等）、产业和行业的特点，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如产权管理操作的复杂程度（产权租赁，还是投资产业）、所有权关系的人格化难易程度（所有权关系中的各个环节的责权落实到人比较容易，还是比较困难）、有关当事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取向等等，都会影响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即使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也会呈现出多样性。一般来说，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表现为，生产过程的运行方式、产权关系（广义所有权关系），在这种运行方式中的组织形式和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形式等。

4. 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成果就由谁占有和支配，这是所有制同所有制实现形式这两个概念联系最明显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两者之间是内容决定形式的关系。不同的内容决定不同的形式，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实现形式上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生产成果的归属根本不同。但是，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形式，同一形式也可以适应不同内容。这一哲学原理也适用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私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在运动过程中都要通过市场流通关节，都要适应市场一般关系，因此，它们在实现形式上，如企业经营体制上往往有相似之处。因此，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必然会呈现差别，但是，也可以有某些相似之处。

5.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属于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现阶段包括全民或集体公有土地和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也需要采取资本一般的形式，公有资本是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公有资本也需要实现价值增值。所以，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是指公有土地和公有资本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或者说公有生产条件的利益主体获取物质利益的途径和取得收入的形式。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经济实践来看，其途径主要是指，公有制利益主体将生产条件投入生产到形成效益的运行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各个环节中产权关系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其收入形式则是指公有制经济运行环节上的各方面利益主体，通过投入社会劳动贡献，获得收入的各种形式。由于与分配关系联系的收入形式是由生产关系中的所有权关系决定的，所以，本章着重阐述与广义所有权关系联系的公有制产权组织形式，经营运行方式和收入分配的形式将在以后的章节阐述。

在理解公有制实现形式时，要注意，不能把公有制性质的形式同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这两个提法混为一谈。按前者，公有制经济可区分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形式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但是，这两种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微观领域，却都可以采取大体相同的公有资本经济运行方式和产权组织形式。

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可以主观随意设计的，它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总是以一定的具体形式来实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需要人们深入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地认真探索和寻求。江泽民指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判断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否合理，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首要标准。在不同的具体主客观条件下，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只有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现形式，才是合理的。如果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是从狭义的所有权概念出发，以为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忽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合理性，公有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本质就会受到损害。新中国建国以来公有制经济走过的曲折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具有不合理性。

——那时，国有经济基本上都是采取"国营"的方式。在产权关系的组织形式上，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政企不分，工厂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均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工厂像一个大企业中的车间，无需直接了解市场，只要按照上级指令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就行了，因此生产单位以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为己任，没有主动改进生产技术的职权，也缺乏扩大生产和积累、提高产品质量的自主权。这种产权关系的实现形式显然不利于促进生产力。

——那时，城镇的大集体所有制形式被称之为"准国营"。大集体经济拥有生产条件的集体产权，本来可以有控制经济运行和分配关系的自主权，但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参照国有经济，这种自主权受到了窒息。

——那时，农村土地公有制追求"一大二公"的形式，背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时期，我国农村采取了合作社的形式。开始是初级农业合作社形式，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年终参与分红。这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属农民个人，并在经济上得到实现，这种形式与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基本上是相符合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后，初级农业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合作社，性质发生了变化。在高级农业合作社里，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共同所有，农民成为合作社的成员，按集体组织统一指挥，参加农业生产。但是，这一时期农村生产力在机械化、社会化方面水平仍然较低，因此，这种大田作业的产权组织形式，并不符合生产力实际水平的要求。1958 年以后，农村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将几十个合作社合并，搞"一大二公"，更是脱离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必然制约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总结社会主义公有制寻求实现形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得出结论，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决不是合理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

生产力状况，这一唯物史观揭示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才是合理的，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公有制无论采取何种实现形式，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确立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选择和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思想。这意味着，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构建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出发。从宏观角度看，在我国，古代的手工生产方式、近代的机器生产方式和现代的信息技术生产方式同时并存；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东、西、中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同一省区，不同地区也存在经济发展的差距，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不平衡等因素，决定了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从微观角度看，具体的公有制企业，应当结合本企业所处产业和行业的特点，构成本企业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实际状况，选择资本的经济运行方式、产权组织形式和具体的分配形式，这样，才能构建起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三、合理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应保证劳动者主体获得物质利益

在保证公有制提高生产力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劳动者获得应有的物质利益，这是判断公有制实现形式合理性的又一重要标准。不管哪一种所有制经济，其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自主联合劳动者。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人。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同时是公有产权的所有者；既然在公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共同所有，那么每个经济单位的劳动者，当然应当是该单位生产资料产权的主人，这在逻辑上、法理上都是站得住的。因此，合理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但应当体现在劳动者拥有参与生产经营管理的民主权益上，而且最终要保证他们获得与生产效益的增长相适应的物质利益上。这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仅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保证作为产权的利益主体的劳动者，实现自身应有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寻求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是寻找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实现形式。无论采取何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要以实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在公有制经济中，公有资本所有权不一定是企业（如国有企业）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企业的主体是自主联合劳动者，因此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由企业劳动者根据企业的资本规模、生产条件、劳动者素质、市场状况等内外因素自主选择，而不应由上级主管部门脱离实际，盲目规定。在企业改革过程中，一些公有制企业从实际出发，自主地选择了企业的产权组织形式，重视经营效益与职工利益的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须知，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实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为中心。公有制企业只有确保劳动者主体的利益，才能有活力，才能发展。处于生产实践第一线（包括科技开发）的公有制经济各环节的劳动者，对生产经营的实际要求最为熟悉，而生产成果又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由劳动者自

主决定和选择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就容易符合客观要求。邓小平在谈到农业生产领域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时，曾说过："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

寻求合理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这有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化，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在经济实践中，它有助于克服主观主义，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公有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保障劳动者主体利益的有效实现。

第二节 现代企业制度

一、现代企业制度为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层面的所有制实现形式，普遍采取现代企业制度这种一般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应当借鉴这种一般的实现形式。这是因为，现代企业制度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创造了产权关系组织形式的条件，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有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1. 现代企业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扬弃。现代企业是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几百年的发展，到 19 世纪后期形成的。现代企业的典型形式是股份公司，它是相对于单个业主制的古典企业而言的公司制企业，它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股份公司制源于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的发展。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发展对股份公司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股份公司制，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其内部形成的一种否定因素。一方面，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因为现代企业的规模经营，已经需要管理专家承担，资本的私人所有者已经没有能力直接管理，因而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实现了分离。另一方面，它又为向社会主义公有制飞跃创造条件。因为企业的资本已经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资本，而是许多私人资本集中在一起，形成社会资本形式。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

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从这些科学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股份公司制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必经之路，为私有制经济向公有制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股份公司制企业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因为投资者或股东，是私人资本家。但是，撇开这种私人所有制的内容，股份公司制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等产权组织形式、现代的经济运行方式等，也就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则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要求的，具有一般的意义。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建立在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下的一种以股份公司制为主体，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企业制度。

2. 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必须改变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条件下，那种由政府高度集中管理的产权组织形式，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满足这些要求是十分有利的。

首先，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关系组织形式是有助于公有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资本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之间，形成规范的既分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有助于国家和政府部门同公有制企业之间实现政企分开，使公有制企业摆脱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行政干预，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自主商品生产者，使公有制企业焕发活力。

其次，股份制可以使公有制企业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集中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加速企业经济增长，这是有助于企业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的。

第三，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在公有资本控股的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不会变为私有制经济。因为股份公司制的产权关系的性质，是由出资者的资本性质决定的，公有资本控股，这意味着资本主体是自主联合劳动者，企业控制权掌握在自主联合劳动者手中，公有制的性质就不会改变。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合乎逻辑的，既有利于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公有制本身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经营，可以吸引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发展优势，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3. 公有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事关社会主义经济巩固和发展的大局。公有制经济要适应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在企业经济这个层面，寻求到适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形式，公有制企业，从整体上说，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大厦的基石，它是否具有活力，是否稳固和厚实，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巩固和进一步发展。而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可以普遍利用的形式，就是现代企业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当高度重视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二、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

要利用好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深入了解其科学的现代含义。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从产权关系角度看，要理解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产权关系和法治条件下形成的企业法人财产制度；从企业经济运行角度看，要理解反映现代企业经济运行规律的法人治理结构。

1. 法人财产制度。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与自然人不同，它是一种社会组织体。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法人的设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法人应当具备四个条件：①依法成立；②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③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④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由于法人可以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所以，企业成为法人，在经济活动中，就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条件，就可以面向市场自主决策。公有制企业，有符合有关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合法登记，就成为法人企业。

企业的法人财产是由出资人投资到企业所形成的全部财产。按照经济上产权关系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企业可以依法享有对它的经营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及经营收益权；同时，承担法人财产制度所规定的民事责任和作为法人财产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民事责任。

现代企业制度对有关法人财产的产权关系，形成了一套规范的、与法制维护相联系的制度，也就是法人财产制度。它主要有以下规范。①维护明晰的产权关系。企业资本的所有权属于投资者，企业则拥有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②维护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一是维护法人财产的整体性。任何出资者投入企业的作为法人财产的资本，不论多少，不论出资者是国家、集体或个人，来自国内或国外，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全部由企业法人统一经营，任何出资企业的资本所有者不得干预法人财产的经营和使用。企业是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拥有依法自主经营企业全部法人财产的权益，并对法人财产享有收益处分权；同时以全部法人财产承担自负盈亏的责任和对出资人的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并依法纳税，承担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二是维护企业法人财产的稳定性。资本所有者一旦通过合法程序向企业投入资本，就不得随意抽出；如果不想作为该企业的投资者，只能将所投资本的所有权转让给其他人，而受让者也不可将资本抽出。也就是说，资本一旦投入企业，资本所有者可以变更，企业经营者也可以变更，但是法人财产权始终属于企业法人。③维护投资者的投资受益权。投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本受益权，并根据公司章程，拥有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④维护投资者对企业法人承担的有限责任。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

2. 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具有法人财产权，就可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但是，只

有在产权组织结构上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才能使法人财产制度得到落实。所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法人内部的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也称公司治理结构或企业治理结构，它是确立企业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等各方面权责关系的一种组织结构。国内外对此有多种释义，例如，美国公司董事协会（NACD）将法人治理结构定义为，确保企业长期战略目标和计划得以确立，确保整个管理结构能够按部就班地实现这些目标和计划的一种组织制度安排。法人治理结构要确保整个管理机构能履行下列职能：维护企业的向心力和完整；保持和提高企业的声誉；对于企业发生各种社会经济联系的单位和个人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主要目的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规范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体现在企业经济运行方面的产权关系，使企业形成有效的经营管理秩序。法人治理结构一般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构成。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投资者或股东通过这个机构来行使资本所有权规定的权益；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按投资额（股票持有额）决定的投票权选举的股东代表组成的机构，它接受股东大会的委托，执行股东大会决议，负责处理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宜，确立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和计划，并监督其顺利实施；经理层的总经理或主要成员由董事会聘任，执行董事会决议，负责组织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他们对董事会和经理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

在法人治理结构中，股东会和董事会代表投资者的权益，着眼于投资如何获得较多的收益，而经营层行使日常的经营权，一般着眼于企业的经营效益。经营层提高经营效益，需要技术改造、扩大经营规模，从而要求减少股东对利润的分配，使利润较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而投资者追求增加收益，一方面要求对经营层形成激励，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又要求从收益中获得较多的利润，这势必受到经营层的制约。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互相激励、互相制衡的机制。这对于提高管理效率，使企业适应市场竞争要求，有重要意义。

一个有效的、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当具备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各层责任和权利关系明确。现代公司往往涉及到多方面权利主体，相互之间经济关系复杂，明确各层主体的责任权限和权利关系，就可以促进各司其责，建立有序的企，业运行机制。二要有激励条件，要能激励和调动各权利主体的积极性，这是现代企业具有活力的主要条件。形成激励机制要注意激励方式的多样性，激励作用的均衡性，及对同一主体实行激励多样性。三要有监督和制衡条件，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各方面相互制约，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激励。当然也要考虑到监督成本不能过大，否则没有经济意义，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四要有信息条件。没有通达的信息条件，有效的监督和激励同样是不可能的。建立法人财产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构建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

三、公有制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

从摆脱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束缚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要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应当符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个基本要求。

1. 产权清晰。这是公有制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基本前提。难点是既要维护公有资本所有权，又要使企业具有自主的经营权，实现公有制主体整体利益与企业局部利益的统一。公有制企业利用现代企业制度来实现产权清晰，主要的途径，一是通过政府经济管理机构改革，从多个行政性的管理部门都可管理公有资本，转变为由一个统一的所有权机构来管理公有资本。二是通过构建资本市场，创造产权明晰的投资方式，取消行政管理部门充当公有资本投资主体的地位，由公有资本出资者机构、公有制企业法人成为投资主体。三是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使企业法人财产权得到维护。四是通过构建经理人才市场，完善经理聘任制，聘用经济管理专家承担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实现公有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

2. 权责明确。这是实现公有制产权关系人格化的必要条件。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在产权关系和生产经营分工关系的各个环节上，由适应岗位职责要求的自然人承担责任，并负责地履行相应的权利。为此，一是应当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二是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通过面向社会、双向选择、严格考核、岗位竞争等方法，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相应的工作岗位上。三是坚持公有制产权关系的基本性质，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建立贯彻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的物质利益激励机制，实现各个岗位人员权责利的统一。

3. 政企分开。这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摆脱政府行政干预，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对于公有制企业而言，实现政企分开，需要政府机构改革与企业改革配套进行。一是要割断政府对公有制企业行政性干预的条件。这需要把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市场秩序管理机构同公有资本所有权、出资者机构分离开来，只允许公有资本出资者机构与所投资的企业，发生垂直的所有权（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关系，而不允许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发号施令。二是企业应当树立自主经营和市场竞争的意识，善于依法维护自己作为企业法人的有关部门经济权益，利用法人治理结构来经营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在政企分开中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既要防止企业缺少所有者监督，国有资产流失，又要防止在出资者机构和企业之间产生新的干预，这是改革实践中需要进一步解决好的问题。

4. 管理科学。这是在形成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条件下，企业要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中心环节。在一般的经济制度形成之后，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完善企业人、财、物等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处理科技开发与日常生产经营的关系，调动各层人员的积极性，严格纪律，形成文明有效的秩序，凡此种种，都离不开科学的管理。因此，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中，科学管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第三节 公有资本的多种实现形式

一、公有资本的概念和它的多种实现形式

生产资料可以分为由特殊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构成的生产资料和作为一般生产资料的土地两类。前者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同后者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有区别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主体占有和控制的前一类生产资料，是经过人的劳动加工的，要通过市场交换的社会形式，才能进入生产过程发挥生产作用，因而这类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简称公有资本。这类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简称为公有资本实现形式。而土地不是劳动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虽然可以买卖、使用权可以转让，但是土地本身不是资本，不能把土地公有制说成公有资本，也不能把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称为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所以，研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有必要把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同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本节阐述公有资本实现形式。下一节阐述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资本分为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资本）和集体资本两类，尽管它们在资本数额上，相差很大，但是从本质上说，体现的都是自主联合劳动者内部的关系，在产权关系上具有共同点。它们在实现形式上，都要利用现代企业制度，在资本的组织形式上，也具有相同之处，差别主要表现在规模和层次上。本节在上一节阐述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重点阐述国有资本实现形式在资本组织形式方面的多种表现，这些表现形式对集体资本也是基本适用的。

国有资本实现形式在资本组织形式的多种表现可以用一个大体的结构图来表示，见图1。

在图1中，可以看出国有资本在政府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结构。同时，反映出国有资本可以采取独资、控股和参股等资本组织形式进入企业，来实现保值增值。读者可以从图中看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国有企业（独资、控股）作为企业法人相互之间投资渗透，而且以参股形式同非国有企业相互混合。所有国有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它们都只与投资者发生经济关系。政府机构中只有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才作为出资者同企业发生产权关系。而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同政府的其他经济管理机构（图中只标出了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则是分离的，其他政府机构不再同企业发生经济管理方面的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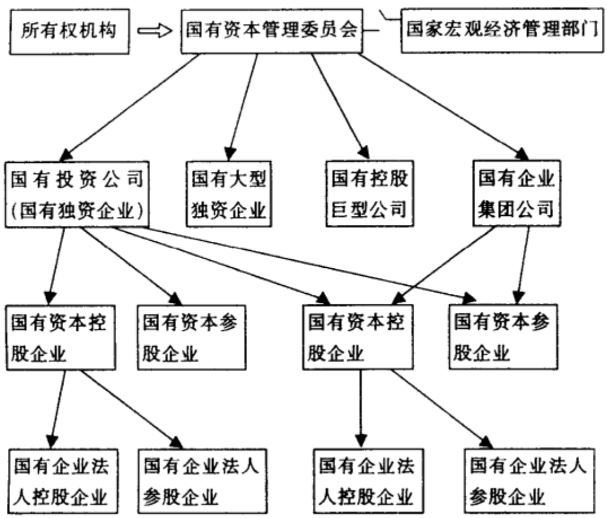


图1　国有资本组织形式框架图

二、公有资本具有多种实现形式的原因

研究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有必要弄清它形成多种实现形式的原因。总的来说，不同生产部门和行业的特点对资本投资质量和规模有不同要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市场经济要求公有资本运动进入市场流通，公有资本要为利益主体实现经济价值必须在运动中保值增值，社会主义国家公有资本数额巨大，这等等因素，促成了公有资本的实现，必须采取多种实现形式，相应地采取多种资本组织形式。以下简要地分析公有资本采取某种组织形式的原因，并对这种组织形式涉及企业体制的特殊问题做些简要说明。

1. 国有资本的独资形式。国有资本独资经营的形式，投资主体只有一个，即国有资本所有权机构委托的出资者机构或者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国有独资形式经营的企业，简称国有独资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重要形式之一。国有独资企业往往承担着国民经济全局的要求所赋予的任务，一些微利或无利而社会又不可缺少的生产，只能由它们承担。我国国有独资企业主要承担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和自然垄断的行业。

首先，在我国，武器一类产品不能是商品，其生产的严格管理，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而军工国防企业必然由国家独资经营；造币工业、新闻广播业也涉及国家安全，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

其次，某些高新技术领域，如航天工业、新材料、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投入巨大，国家独资经营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石油天然气开采、粮食储备、电力、航空等行业，铁路、海港等重要基础设施，关系国民经济命脉，投资量大，主要由国家独资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

第四，自然垄断行业，如邮政自来水等公共服务行业及一些新兴幼稚产业，如果让市场自发调节，只会加大社会生产成本，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国家独资经营有利于全局。

2. 国有资本的股份制形式。股份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主要资本组织形式。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都可以采取控股和参股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实现形式。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公有资本控股形式显然是一种主要形式。这里着重讲国有资本控股形式。

(1) 国有资本控股形式。国有资本控股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绝对控股，即对重点行业的企业，国有资本占 51%以上的股份。另一种是相对控股，即国有资本虽不足51%，但由于股份分散，在公司的股份中，居于相对多数，成为第一大股东，仍可控股，这是国有资本扩大控制力的重要途径。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中，可以将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资本扩充，特别是一些科技含量较高、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可以在控股的条件下，撤出部分国有资本，吸引非国有资本加入，以扩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国有资本控股，对企业具有控制权，可以促成企业内部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股份公司整体具有公有性。因此，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采取国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形式，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地发展。

在实施国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的改革实践中，提出了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是所谓“一股独大”问题，即国有资本在企业中控股，发生了国有资本管理部门对股份制企业新的政企不分。其实，一些地方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并不在于国有资本的控股本身，而在于独立行使职能的国有资本所有权机构及其出资者机构尚未真正落实，法人财产制度尚未得到法律保障。认真抓好政府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在实践上碰到一点具体困难，就提出国有资本不应当在股份制企业控股，那是轻率的，无异于说公有制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当然，还应当在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积极扩展多元主体投资，这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另一个问题是“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的关系问题。党中央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是，“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党委负责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要有职工代表参加；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工会中的党员负责人，可依照党章及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充分发挥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统一决策、监事会有效监督的作用。党组织按照党章、工会和职代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职责”。我们认为，这是正确而可行的。

(2) 国有资本参股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有资本有必要适当集中投资，

以便增强国际竞争力，这样，也就不可能在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实行控股。对于一些竞争力较强、经济效益显著的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资本可采取参股形式，这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本参股，出资者代表进入董事会，在企业中有一定发言权，也可以促进企业更好地遵守法制，依法纳税；可以代表工人利益参与企业的经营和分配，增加对国家利益和企业职工利益的保障。

3. 农村集体资本的多种实现形式。农村集体资本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工业资本。经过近些年来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资本除了采取投资企业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运行方式，有的还采取了以货币形式存入国家银行、以实物形式租赁等方式获取增值。投资企业的集体产业资本和集体商业资本在组织形式上，也有独资、控股和参股等多种形式。实践表明，农村集体资本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产权关系结构方面往往同乡镇政府机构的设置有密切联系；在经济运行方式和资本组织形式上，则同农村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农村工业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价值取向和自主选择有一定关系。例如，有的乡镇、村办企业经过长期实践，集体资本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政府行政对企业干预少，支持企业集体资本的积累和技术更新改造，又产生出集体主义观念强、很有能力的企业家，这些地方，就能坚持集体资本独资、控股的资本组织形式；而有的地方，乡镇政府长期直接管理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感到缺乏继续管理集体资本控股企业的能力，就主张集体资本退出，改为出租或参股到私人企业等方式，来使集体资本保值增值；有的乡镇则考虑经营企业风险很大，也选择租赁集体资本获取利息的方式。

产业资本是各类资本的基础。农村集体产业资本的壮大，对于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必须为独资或控股企业的集体资本，寻求到合理的实现形式。从理论上看，重要的是完善集体资本的产权关系结构，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产权关系人格化。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乡镇政府机构的改革，区分集体资本所有者机构和政府行政机构，促使乡镇财政管理同集体资本运营管理分离，建立农民集体对集体资本管理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制度，可能是实现集体资本产权关系人格化，促进集体资本保值增值的重要条件。

三、集体资本参与的股份合作制形式

股份合作制是集股份制与合作制为一体的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合作制是以劳动联合为基础的经济形式。股份合作制，实行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结合。劳动联合是一切合作经济组织的本质特征，所以，股份合作制在本质上属于合作制经济，基本性质属于公有制经济范畴。股份合作制中的资本联合也可以完全由劳动者的个人资本结合而成。但是，目前中国的股份合作制中，集体资本都占有一定比例，所以，我们把股份合作制也放到公有资本实现形式这一节来分析。

股份合作制不同于股份制，股份制是以资本联合为基础，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取决于控股资本的所有制性质。而股份合作制以劳动联合为基础，虽然劳动者个人的投资在入

股前完全是私人财产，但是，入股后，他同时作为劳动者参加联合生产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体。在股份合作制中，劳动者既是资本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他们不可能脱离劳动而单凭股金获得他人的剩余劳动。因此，只要坚持联合劳动为主，股份合作制就属于公有制性质。股份合作制也不同于私人合伙制。私人合伙制企业的主体是资本联合，少数投资者与企业其他劳动者的关系是雇佣劳动关系，投资者与雇佣工人之间存在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因而基本性质是属于有剥削关系的私有制经济。而股份合作制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

20世纪肋年代，中国的股份合作制产生于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农村，主要是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村的劳动力出现剩余，因而农民自发进行经济联合。最初是几家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通过以资带劳、以劳带资形式，各投人一定资金，合作办企业；合作人既参加劳动，又参加经营管理；企业内部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合作制扩展到了村、乡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了较正规的企业章程和管理制度，股份合作制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人股的形式也多样化了，除货币资本外，也有以个人知识产权、集体所有的机电设备、房产、地产等做价入股的。

当前，在我国农村，以及城市中生产社会化程度尚不高某些行业和部门，股份合作制经济之所以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①它具有股份制的集资机制，而且融资渠道灵活简便，有利于变闲散资金为生产资本，可以有效解决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所需资本和劳动就业问题。②股份合作制产权明晰，职工既是生产者，也是财产拥有者，也是财产管理者，产权与管理权实现有机统一，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主人翁积极性。③股份合作制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劳动联合，实行按劳分配；作为资本联合，实行按资分配。由于职工人股数额差别不是很大，可以较好地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④股份合作制实行民主管理，决策表决时，一人一票，而不是按入股数额的多少投票，这有助于职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形成较强的凝聚力。

股份合作制是一种过渡性比较明显的经济形式。由于按劳分配同按资分配并存，这在利润分配实践中，就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在可供分配的基金一定的前提下，如果以按劳分配为主（或者虽然以按资分配为主，但是企业人员入股数额相差不大，这在分配结果上与按劳分配不会有太大差距），那么，股份合作制的合作经济或集体所有制性质，一般能长期稳定；如果入股数额相差较大，又以按资分配（按入股数额分配）为主，那么，除按劳分配的收入之外，人股多的与人股少的相比，就会占有较多的股息红利，从再生产过程来看，就会出现背离劳动合作性质的趋向。如果出现大股东收购小股东股份，或者小股东退出企业，少数大股东获得管理权，雇用其他劳动者，那么企业就转化为私人合伙制。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可以作为法人投资与其他企业法人合股建立新的企业，或者不断向社会募股扩资，这样，股份合作制企业就会转向股份制企业。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具体因素不同，有不少企业介于股份合作制与私人合伙制之间，这当中有许多过渡性的层次，这是由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的，有些“四不像”的企业所有制形式，只要属于劳动者群众的自愿选择，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有存在的必要。对待他

们，一定要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避免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地要求它们按某一种模式“规范化”。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出现许多具有过渡性质的所有制实现形式，完全是正常的经济现象。

第四节　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一、土地国有制的实现形式

我国土地所有制包括土地国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两种类型，本节分别阐述它们的实现形式。先阐述土地国有制（土地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当代中国，除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和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之外，都是国有制的土地。

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国有制存在地租实现形式。马克思曾阐明，“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换句话说，谁要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取得使用权，便要支付一定的代价即地租，它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价值的实现形式。较长时期以来，人们认为地租这种经济实现形式只是与土地私有制相联系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的确，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之后的自由人联合体经济（共产主义）社会中，私有制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了，土地已归全体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和使用，那时，私有制商品生产社会中的绝对地租、级差地租都将不再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存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地租消失的经济前提，在土地国有制关系中，地租产生的原因依然存在着。①在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和中外民族经济所有权对立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关系归属依然存在。既然存在与外国经济所有权、国内土地集体所有权相区别的、排他性的国有土地所有权（中国全民所有权或社会所有权），其经济价值就应当以绝对地租的形式实现。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土地不可能由“自由人”联合体统一地共同使用，而只能由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外资主体分别使用，因此，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同使用权就必然发生分离，国有土地所有权同土地使用权之间存在明确的经济权益界限，而前者的经济权益就需要采取地租的实现形式。而不同土地的自然力、肥力、瀑布动力等条件、经济区位等存在差别，在市场经济中土地利用产生的效益必定有差别，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在不同土地上经济价值的实现，就必定有差别，因此，就必然存在级差地租的实现形式。③现存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每个国有企业也都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主体，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界定了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界限，国有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体现了社会利益的要求。④国有土地是重要的国有资源，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经济价值的实现规律，在地租的实现形式下有偿使用，有利于国有土地

资源的保护、合理使用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有利于维护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不能用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经济不存在地租的设想来裁剪现实。事实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时，并没有说过不存在地租。按照他们的思想，在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条件下，地租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就会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就可以人为地取消国有土地的地租，相反，土地国有制只有按地租形式来实现，才能使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获得应有的经济价值。

2. 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所有权经济价值的实现规律，促进土地国有制的合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管理机构代表人民管理国有土地，必须努力促进国有土地所有权实现其经济价值，否则，就会造成土地资源滥用和人民经济利益的损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向土地使用者索取高额地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的一般规律，只有遵循这种客观规律，国家获得的地租，才能在促进国有土地可持续地合理使用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获得优化配置的同时，增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租规律，也就是大土地私有权的经济价值的实现规律，包括级差地租的规律、绝对地租的规律、调节土地价格的规律，并分析了垄断地租现象。这些规律和现象是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的基础上发生和起作用的，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这些一般性规律，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就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租规律。我们应当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理解，并通过实践，深入认识当代中国的地租规律及其表现形式。

从实践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至少要经过以下基本环节来实现：①国有土地所有权机构与使用者之间，依法按市场经济要求，明确一定面积、质量（肥力、矿床丰富程度等）和区位的土地，在使用期限内应付的地租价值数额，建立土地出租、承租关系；②土地使用者在合法的使用期内，在规定的土地上从事投资和市场经营活动，获得收益；③使用者依法定期向土地所有权机构缴纳地租；④土地使用期满，或者交还土地，或者重新建立土地出租承租关系。尽管说土地使用者可以依法在使用期内，再向别人出租土地使用权，但是这种二级出租、承租关系中的环节与上述一级土地出租、承租关系是基本相同的。需要强调的一是应当明确土地出租、承租关系是土地市场关系。国有土地所有者机构面对的是众多承租者，他们之间是平等的竞争关系，应当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才能确定谁有资格作为最佳的国有土地使用者。二是应当力求地租数额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地块由土地所有权垄断产生的绝对地租和由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垄断利用产生的级差地租，其数额的高低变动，是由多种客观经济因素决定的，诸如城市经济不同区位的差别、不同土地自然力的差别、土地产品或者利用土地经营的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土地

使用者连续投资的差别状况、宏观经济运行导致的社会有购买力的支付能力的变化状况等等，都会对地租数额的高低变动产生影响。而地租的高低反过来又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过高的地租可能增加经营者的负担，从而阻碍经济发展；过低的地租又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利益流失到土地使用者手中。因此，在地租数额的确定上，不应当人为地主观规定，而应当探索有利于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规律的方式，科学地确定地租的高低。在实践中，土地使用权的拍卖方式或者竞标承租等方式，由于引入了市场竞争因素，对地租的确定，往往能反映多种客观经济因素的作用，一般认为比较合理。

3. 社会主义国有土地地租关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土地所有制采取的地租实现形式，表面上与资本主义地租差不多，但是它们本质上有根本区别，这就是，国有土地收取的地租是属于并服务于全体劳动人民的；正因为如此，国有土地地租关系体现的主要是劳动人民内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以及民族利益同外国投资者的矛盾，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地租那样，体现着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以及这两者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弄清国有土地地租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自觉维护土地国家所有权的经济权益，有效地维护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

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经过建国以来的几次调整，形成了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的实现形式，简称家庭承包经营制。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则通过法定的程序和合同方式，承包给农户，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行承包农户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日常的使用小型机械和手工工具的农田生产经营，由农户自主经营；而有些一家一户难以办好或办不好的事，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农业机械使用，集体资源的开发，以及植物保护、兽医等农牧业社会化服务，则仍由集体经济牵头组织，统一经营。

1. 家庭承包经营制是适应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多数地区仍处于以手工工具为主、以畜力为基本动力的古代农业阶段，部分地区达到使用机械化作业的近代农业阶段，只有极少数地区正在过渡或达到自动控制、信息管理等现代农业水平；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首先，在手工工具为主或部分生产环节以机械为主的生产条件下，农户自主经营，有利于农户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精耕细作，发挥个人农业技术水平，处理农忙农闲关系，合理安排农副业生产，合理调动劳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农民劳动、自投资金同收益相联系，分配上“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农户投资多、劳动数量大、质量高，收入就多，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双层经营使集体投资经营和农户自筹资金经营相结合，有利于发挥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户两方面的积极性，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等需要社会化管理的环节，集体统一经营，有利于国家指导，克服一家一户生产的局限性，增加集体积累，保障集体农民的整体利益。而经常性农业生产活动则由农户分散自主进行，这就使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制，既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又克服了过去集体经济组织集中过多、过死的弊端；既能发挥家庭经营的长处，又可以通过双层经营克服单个农户经营的不足，因而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党的十六大要求"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2. 家庭承包经营制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在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自主联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中，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一份。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归根到底是为了集体组织中的农民获得比个体农民更多的物质利益。只有消除了两极分化，又使农民集体成员获得比单干更多利益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才是合理有效的集体所有制。可见，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并不是脱离农产的，而是通过农民集体收益的增加，最终使每个农民集体成员的收益增加。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在土地集体所有权经济价值的实现上，实行了与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的集体所有制形式不同的实现途径。那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合一，集体大田作业，土地集体所有权经济价值的实现途径是，统一生产、集体收入，再按个人所做的工分将集体收入分配给农民。弊病就在于，那种统一生产方式不能把"蛋糕"做大，农民收益不多，所以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价值没能得到有效地实现。而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价值就通过两个层次的途径来实现。第一层是直接通过农民的家庭经营直接实现，在现存生产力条件下，让集体农民获得一份集体土地的使用权，通过面向市场的家庭经营，直接从土地经营中获得收益，也就是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直接在每户农民中得到实现。第二层是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收取承租农民依法缴纳承包土地的租金（绝对地租）和统一经营获得收益，然后通过一定方式，使集体收益为本集体组织的农户服务或者将利益再返回农户。由于这种实现形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集体农民从两个途径构成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实现形式中获得的收益，比原先明显增多，因此，这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3. 维护集体农民经济权益，依法实行土地使用权流转。从生产劳动方式来看，目前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与小土地经营方式相联系，难以应用规模农业经济的现代技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局限性必然显现出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实现第二个飞跃的重要环节，变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这就要求实行做好农产承包地使用权的流转。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沿海一些地区农村第

二、三产业比较发达，一些农民实现了非农就业，有些农民进城工作，有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的来源，希望将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有的农民富有创业精神，收入增加，希望扩大土地经营面积；有些地方搞经济开发，需要占用农民的土地等。这些情况的出现，要求进一步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使其在长期稳定的前提下，能够满足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要求。从目前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来看，要实现合理流转，关键的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权益和农户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权益。如果以为搞经济开发，就可以侵犯农民的这些土地权益，那就违背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违背了发展经济的初衷。在这方面重要的是严格法治。2002 年，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严格执行，将有利于维护集体农民的经济权益，有利于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

第十三章　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并采取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经济要求的实现形式，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广大劳动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劳动人民整体利益的增长，是同一个个普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增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后者则取决于在服从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个别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实现。社会主义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充分实现，是与完善经济体制和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相联系的。本章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单个劳动者关系的角度，研究处于主人翁经济地位的劳动者，其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过程，并探讨与劳动者实现经济权益紧密联系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与劳动者的经济权益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与劳动者的经济权益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一般都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并促进劳动人民的全面发展。这是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得出的逻辑结论，因为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既然是劳动人民，社会生产实践的目的或者说价值目标，理所当然要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然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仅从全体劳动人民整体利益角度理解社会生产目的还不够，还必须在实践中创造条件，努力让一个个普通劳动者获得经济实惠，才能充分地体现这种生产目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利益主体的劳动人民，是由一个个劳动者构成的，固然只有高度重视整体利益或阶级利益的维护，才能巩固劳动人民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获得的主人翁经济地位；但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如果不能使绝大多数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增长，就会妨碍劳动者积极地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也必定会妨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实现。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增长，是与劳动者获得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联系着的。因此，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实现问题，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不应忽视的课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是解放和发展劳动者。解放劳动者，首先，要把劳动者从一切剥削经济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接着，还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把劳动者从束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不合理的具体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在当代中国，前一解放已经从根本上实现，后一解放则任重道远。发展劳动者，就是要努力创造条件，促进劳动者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劳动者的解放和发展，都要通过劳动者获得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来实现。

二、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基本含义

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是对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经济制度的根本否定。它不是靠人们的主观臆想设计的，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确立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资本家是生产资料所有者，而工人则是除了劳动力所有权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剥削和压迫劳动者、摧残劳动者个性的弊病，做了深刻的批判。主要是：①雇佣工人只是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存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是社会机制的“主动轮”，是“人格化的资本”；而工人只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协作工人，“他们本身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②雇佣工人是被欺骗、被文明地剥削的对象。资本家在自由、平等的劳动力商品买卖关系掩盖下，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③人被物所支配。“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生产资料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④人同劳动成果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异化现象。劳动成果作为别人的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利”；“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⑤人被导致畸形发展。虽然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旧式分工，但是，“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概括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主客体关系，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价值和价值创造力之间的关系，都被颠倒了。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而这种再颠倒的过程，也就是劳动者获得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过程。

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旦建立，与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人翁这种经济地位相应的基本经济权益，也就确立起来。关于这种基本经济权益的内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曾做过不少对比性、原则性的阐述，最主要的就是，劳动者将拥有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和使用权，在生产过程中的民主管理权，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取得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对自己取得劳动成果的支配和消费权等，这些含义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已经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所证明。不过，实践也同时表明，只停留在对这些基本含义的理解上，是不够的。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来看，还必须结合实际，从劳动者个人权益的角度，促进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马克思在阐述劳动者的解放、发展以及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时候，不仅重视它们在劳动者阶级整体上的体现，而且十分重视它们在劳动者个人身上的体现。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把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称为“自由个性”形态。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也就是生产关系），将“消灭旧分工”，“以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这些重要思想，贯穿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因为，在人类社会产生了机器生产之后，“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这就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备了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因而，一旦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变革为社会主义形式，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成为新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已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到从根本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个高度来认识。这说明马克思发现的这一基本原则，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原则涉及到“每一个个人”，那么，不断完善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也必须把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和使用权、生产中的民主管理权、按劳分配的分配权等，尽可能地在普通劳动者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劳动者应获得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当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所得出的逻辑结论，但是，这更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的现实要求；需要我们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这需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环境的营造，一是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

三、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对经济体制的要求

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是体现在生产关系之中的，而具体的生产关系就是劳动者个人所处的经济体制环境。要促使劳动者获得应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就必须从现有生产力水平出发，以每个劳动者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营造经济体制环境。如果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劳动者也就难以获得应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

在物质生产领域内，人的自身发展与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是相统一的。马克思指出，“这个领域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因此，营造有利于劳动者获得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经济体制环境，决不是脱离物质生产对人的客观制约，去臆造人的“自由”，而是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条件下，

力求使具体经济体制有助于劳动者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高度，来促进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实现。这就对经济体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维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和使用权必须体现在，劳动者成为生产实践的主体，取得人支配物的地位。而这种体现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那种主客体关系被颠倒的状况，才能达到。这又要求经济体制环境有助于劳动者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有机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表现出人的聪明和才智。

——创造劳动就业的条件。就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参加生产实践、实现对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拥有使用权的首要环节，也是发展自己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当有利于劳动者实现劳动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人口。

——适应人员的自由流动。劳动者的流动性是大工业和现代生产力提出的要求，也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动力，经济体制应当提供人员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流动的方便，维护劳动者在这种流动中应有的权益。

——形成人道主义的生产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把人当做资本增殖的手段，不惜造成对人身的奴役和摧残。而社会主义物质生产把人类能力的发展当做“目的本身”。这就要求在生产中，根据现有劳动环境和劳动强度，合理安排劳动和休息时间，有针对性地采取安全措施，保护劳动者的健康，促使劳动者在生产中获得“人道的发展”权益。

——建立协作生产劳动的纪律。社会化的生产劳动必须分工和协作，必须有科学、严格的组织纪律，才能保证生产劳动的正常秩序，防止个别或少数人的自由妨碍大多数人的自由，保证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都不受侵犯。

——在社会成员中均衡地分配劳动时间。尽可能地在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中均衡地分配劳动时间，才能根据现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逐步缩短工作日，增加每个劳动者“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发展自己的自由个性。因此，应当尊重劳动者享有平等地承担同样长短的工作日的权益。

——公平地分配生产成果。生产成果的分配，是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基本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的公平，就是对每个劳动者实行按劳分配。本书将在第十八章展开对按劳分配权益的阐述。

——保护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和消费权。劳动者按自己投入劳动所获得的成果，由劳动者自己支配或消费，这是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应有的权益，也是劳动者个人生存和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应当同资产阶级提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针锋相对，提出“劳动所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求经济体制有利于阻止破坏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不同地区的人、后代人和当代人，在生存和劳动的环境上，享有同等的权益，有利于劳动者个人和整个人类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使劳动者终生受到生活保障。应当创造条件，保证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之

后，能安度余生或晚年，这样才能把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个基本原则，贯穿劳动者的终生。

上述一系列的要求，不但是对整个社会的具体经济体制提出的，也是对每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具体企业和单位的具体管理体制提出的。可以说，这些要求的实现程度，将体现着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实现程度。

四、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素质

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实现，不但取决于经济体制环境的改善，也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的大环境下，建设优良的具体经济环境，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者发挥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完善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增进劳动者的经济权益，离不开发展生产力，增长可分配的社会财富，这就需要劳动者提高生产经营的本领，增强责任感；在社会化生产中，劳动者的联合需要纪律、团结，需要相互尊重各自的经济权益；凡此等等，都需要每个劳动者提高自身的素质。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素质，从一般角度来看，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奉质和身体健康素质等方面，即邓小平概括的“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从特殊角度来看，包括各行各业对劳动者要求的专门知识素质；从个别的角度来看，包括每个人的潜在特长和思维能力。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高了，就可以更好地维护和运用已经获得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并且努力创造条件，促使这些经济权益趋于不断完善。

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在其他素质既定的基础上，关键是要树立生产的主人翁意识。有了这种意识，就能自觉地维护公有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履行经济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才能真正作为自主的联合劳动者，实现人支配物的社会主义生产新境界。如果一个劳动者缺乏主人翁意识，仍然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意识，被动地对待工作，那么，他就很难感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劳动者发挥自主性提供的基本条件。在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内并存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抵制私有制意识形态的影响，树立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这对劳动者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广大劳动者都树立了这种主人翁意识，才能真正自觉维护并运用好社会主义经济权益。

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综合素质，重在抓好全民教育。马克思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这个原理对于所有劳动者也都是适用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已把“形成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具有重大意义。

以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核心，营造具体经济体制环境，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实现这些要求，都不能脱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必须以发展社会生

产力为前提。问题在于，不能以为只有生产力的现代化实现之后，才谈得上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确立这样的认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开始就不断地朝着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目标努力，才能使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在现存条件下获得最优的实现。

第二节 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实现过程

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实现的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劳动者处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其经济权益是存在差别的。我们先研究在公有制经济关系中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实现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是同市场经济--般关系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也要结合市场经济的--般权益关系，才能成为现实。必须明白，劳动者作为市场主体拥有的经济权益，同作为自主联合劳动者中的一员拥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流通领域的经济权益，劳动者个人是作为商品货币一般关系的人格化出现的，拥有的是归自己支配的商品的所有权、交换商品的平等权（等价值交换权）、对别人商品的自由选择权，在交换中的公平竞争权。而后者则涉及整个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中的经济权益，劳动者个人是作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联合体主人之一，作为社会主义具体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出现的，拥有的是由联合劳动者赋予个人的、享有主人翁地位的各种经济权益，包括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和使用权，生产经营的民主管理权，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对自己取得劳动成果的支配和消费权等一系列权益。因此，不能认为劳动者拥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权益，也就拥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更不能用市场经济的一般经济权益取代社会主义经济权益。

但是，这两种经济权益又是紧密联系的。劳动者必须拥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权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如果撇开前者，后者也就不能实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行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否定了市场经济关系，这违背了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劳动者也谈不上拥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权益。实践表明，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劳动者难以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和实惠，也就难以实现应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正是由于公有制经济关系必须同市场经济一般关系相结合，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实现过程，就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

其一，劳动者的经济权益是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权益结合在一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是独立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劳动者必须进入一个企业，才能就业劳动，所以，其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实现，将同企业的经营过程联系在一起。

其二，不同企业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实现程度存在差别。不同的公有制企业之间，生

产的主客观条件存在差别，具体管理体制更会有差别，这样，劳动者进入不同企业，相互之间享有的经济权益就难免存在差别。尽管国家在国有企业的劳动者经济权益方面有统一的规定，但是，由于各个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上的差别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劳动者在不同企业获得的经济权益就会有差别。

其三，劳动者对所得劳动成果的支配权拓宽了。由于按劳分配是与货币形式结合的，又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劳动者个人节余的消费基金，就有了转化为增殖资本的可能性，有这种条件的劳动者，可以把劳动成果的消费权益转化为投资权益。这一方面涉及的理论问题，本书将在第十九章阐述。

其四，市场经济固有的拜物教形态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劳动者应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尽管是在公有制经济中。但是，企业经济核算的价格化、优质客观生产要素在盈利中所起作用的显性化、经营成果的利润化、经营效果对市场机遇、市场价格的依赖性等等，这些与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拜物教形态，同样会形成一定的假象，提高物化劳动的地位，而淡化、模糊劳动者的主体作用，导致人们忽视维护劳动者应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因此，加强公有制经济关系本质和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宣传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

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结合市场经济的一般经济权益，并重视市场经济关系的影响，来认识从而促进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实现。

二、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实现经济权益的主要环节

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经济权益是由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结合形成的生产关系赋予的。劳动者个人经济权益的实现，本质上是这种生产关系人格化的过程。根据唯物史观，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当事人，乃是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在个人身上的体现或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这些当事人，“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承担者”。所以，劳动者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过程，就是他在公有制经济的全部活动中，由这种生产关系赋予他主人翁性质，规范他的经济行为和承担的经济责任，并相应地赋予他经济权益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劳动者个人进入公有制经济关系，从事经济活动，并依此经过的一般环节，来理解其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实现过程。

1. 就业环节。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独立经营，劳动者要进入一个企业，才能进入公有制经济。这里，个人和企业之间双向选择方式，是既有助于劳动者展示个性和能力，又符合企业自主经营要求的，因此是最合理的方式。在这个环节中，应打破城乡、地域之间的限制，维护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与企业之间的平等谈判权等权益，才能顺利地实现劳动权。

2. 生产环节。这是能体现劳动者主人翁经济地位，因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主要环节。从企业经济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现在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如：①竞争上岗制度，使职工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后，进一步获得平等地层示个性能

力的权益；②劳动竞赛制度，通过对生产超额、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奖励优秀者，使劳动者的能力得到充分调动；③厂务公开制度，建立职工对企业运营群策群力和监督管理干部的途径，使劳动者民主权益有了充分发挥的渠道；④安全保护制度，使劳动者在生产中人身受到人道的保障；等等。从劳动者角度来看，这个生产环节是检验个人的民主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等主人翁意识的确立程度，检验个人能力及其发挥程度的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给企业的外部压力，将通过内部管理的严格，生产质量和效率要求的提高，转化给每一个成员，促使劳动者将经济责任和经济权益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3. 分配环节。公有制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分配的前提是，生产经营的成果通过市场实现为价值，在扣除成本、国家税收、企业发展基金和其他依法支出的基金之外，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实行等劳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雇佣工人不同的是，在正常经营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收入不是围绕劳动力价值（v）波动的，而主要是取决于企业经营的效益，劳动者的收入包括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分配之和（即v+m中的一部分）。按劳分配或等劳交换，这是劳动者在分配环节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对劳动者个人来说，还要明白，等劳交换，仍未跳出商品交换的狭隘眼界。从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看，在需要时，开展义务劳动是值得提倡的。

4. 消费环节。劳动者要用货币收入在一般市场上购买消费品，如果买到的是假冒伪劣，等于劳动所得的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必须维护市场环节中的消费者权益。这里可以知道，在流通领域维护劳动者市场主体的权益，也就是同时在维护劳动者获得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

5. 再就业环节。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失利而缩小规模、可能需要重组而调整结构、还可能破产，这些都会造成劳动者的失业，这是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是对于非自愿的失业者来说，这是劳动权益的丧失。因此，必须从维护劳动者劳动权益的高度，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就业机制，尽可能地缩短时间，或者把暂时的失业时间转化为劳动者重新就业做准备的培训学习时间，这样，才能维护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这需要建立必不可少的社会就业培训基金。

6. 退休养老环节。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要求给予劳动者养老保障。劳动者在职时为创造社会财富做出了贡献，他在丧失劳动能力离职之后，要求社会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使其安度晚年，这种经济权益是劳动所得权益的延伸。在市场经条件下，要保证劳动者实现这方面的权益，就需要认真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问题。本章在第三节将展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上述分析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是由一系列权益构成的，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多层次、多环节的具体生产关系规范了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内容，也对其个人提出了相应的责任要求。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力不是商品

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涉及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是否是商品？这个问题在理论界颇有争议。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商品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只有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劳动者才能自由流动，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

劳动力商品并不是反映一般的商品买卖关系的范畴。劳动者拥有自己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对于废除了人身依赖关系的社会经济制度来说，是共同点。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动者自己是否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如果劳动者除了自己拥有劳动力，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劳动者自己必然无法直接进行生产劳动，于是，为了生存，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而在既有劳动力所有权，同时又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条件下，劳动者可以自己直接进行生产，这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就用不着出卖劳动力，也就谈不上劳动力是商品。因此，劳动力商品并不是市场经济关系的一般范畴，而是一个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一般的商品买卖关系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但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则是伴随着一极是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另一极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这种生产关系的产生，才出现的。

说劳动力商品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在本质上并不反映平等交换关系，而是反映生产领域中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因为购买劳动力的目的是使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只有在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条件下，购买者才会购买劳动力，劳动力商品才会成为现实。所以，劳动力商品是与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这种关系紧密联系的。劳动力商品一旦卖出，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则，劳动力的使用权就完全归买主，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就完全成为被支配的对象，他又怎么可能获得主人翁的经济地位呢？

其实，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但不利于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恰恰相反，是妨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全面发展的。这是因为，买主购买了劳动力商品，是按照私人意志在生产过程中支配、使用的，他有权把劳动力作为机器的附属品，这就必定导致劳动者的畸形发展，而不利于其能力的多方面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有利于劳动者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全面流动性，但是雇佣劳动这种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却发展了旧的分工和固定化的专业。因此，以为要改变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把劳动力统得过死的弊病，就要论证劳动力是商品，以便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是一种理论逻辑的误区。殊不知，促使劳动力全面自由流动的深层原因是工业化，假如让劳动力成为商品，那就不但不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且那将不是改革经济体制了，而是要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

从政治经济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揭示了劳动力商品这个范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才为创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正因为劳动力是商品，劳动力买卖是生产劳动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的劳动制度才称之为雇佣劳动制度。正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是与其他劳动者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生产劳动的，所以才称之为自主联合劳动。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自主择业、同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决不等于劳动力商品买卖，因为正如上面论述的，劳动者并不是按劳动力价值得到收入的，而是在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参与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等劳交换的（在做了必要扣除的意义上）。因此，不能把劳动者这种就业关系与劳动力买卖关系简单地等同起来。

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有根本区别，它不是雇佣劳动关系，因此，劳动力不是商品。关于劳动力商品这个范畴，我们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理解它。如果轻率地改变它丰富、深刻的经济学内涵，牵强附会地把它加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来，这是不利于改革的，更是不利于劳动者维护自己应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

四、非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经济权益

现在，我们来研究在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中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孤立地看，在这些经济中的劳动者，不享有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因为他们处在私有制经济之中；尤其在私营、外资经济中的劳动者，他们处于被雇佣地位，不是企业的主人，因而不拥有自主劳动者的权益。但是，这样看问题未免片面化、绝对化，并不科学，也不符合实际。应当看到，当代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存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在其中就业的劳动者，是拥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

这并不意味着，私有制经济在中国已经改变固有的本性，私营、外资经济也不存在剥削关系了。而是说，事物是处在相互联系之中的，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非公有制经济是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制约和引导的，其中包括后者通过国家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向前者输入社会主义民主管理方式，赋予劳动者一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这种制约，有助于克服私有制经济的固有弊病，缓和劳资对立，限制剥削程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但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非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发展，也是有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拥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具有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社会角度看，他们同所有劳动者一样，拥有国家主人翁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就拥有整个社会经济民主管理的参与权。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民主渠道，参与国家经济管理。同时，他们并不是只能固定在私有制经济中就业，也可以自主择业进入公有制经济就业，或者自己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经济，劳动就业。

其二，他们在私营、外资企业中，同样受到国家《劳动法》、《工会法》等社会主义法规的保护。在工作时间、劳动环境、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劳动争议、工会组织及其活动等方面，拥有与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同等的权益。

因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劳动者已有明显区别，他们已是拥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劳动者。但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固有的性质决定，他们在劳动成果的分配方面依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剥削，不能享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劳动力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商品性质，他们的劳动仍然属于一定程度的雇佣劳动形式。

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广大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就同样应受到社会的尊重。既然私营、外资经济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固有的弊病，劳动者就要善于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应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减少这些弊病对自己的损害。

第三节　社会保障制度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

劳动者获得社会保障，是劳动者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重要环节之一，这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落实。社会保障制度的一般含义是，为了使社会成员在人生各阶段遇到困难和意外事故等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必要的生活保障，社会采取规范化公共经济措施，对个人提供保险性支持而建立的经济管理体制。

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般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规律作用会导致一些企业破产，企业有机构成的变动会造成对劳动者不规则的排出，这些因素使一部分劳动者失业，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成为正常的社会现象。同时，任何社会都始终存在人的伤残病老、妇女生育等需要特殊照顾的问题。一个社会要保护好生命力，健康稳定地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对这些遭遇艰难困苦的社会成员提供保障。据资料，到1999年，世界上已有172个国家建立了综合和单项的社会保障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某些适应市场经济一般要求的性质，这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它们毕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各国的国情特点，不宜全盘照搬。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它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

1.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自觉维护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只是通过工人阶级为捍卫自己生存权益的长期斗争，只是在资产阶级统治者意识到保护社会的生命力对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重要价值，才着手在资产阶级利益允许的限度内，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某种社会主义因素，因为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

高度发达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的产物，是国家作为总资本家不得不承认生产社会化的产物。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被动的。与此不同，中国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确立之时，一开始就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高度，自觉地建立起初步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当时受综合国力的限制，覆盖面比较狭窄（主要面向国有企业），与低工资配套；同时受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束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方式比较僵化（基金由企业支付，宏观上多头管理）。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一旦发现了这些缺陷，就立即着手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健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是对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的自觉维护。那种把它视为弥补市场经济失灵的被动产物，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的观点，是比较狭隘的。中国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它固然要服务于市场经济运行，但是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权益。

2. 具有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性质。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是一种暂时的应急措施，而是有明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因此，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来看，一是社会保障项目应尽可能满足劳动者多方面的需要。在现有国力的条件下，首先解决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在国力逐步强盛的基础上，还要提高保障项目的标准，例如扩大医疗保险范围、提高养老保险的标准等，并着眼于基本生活质量的提高，把必要的精神文化生活，也逐步纳入受保障的范围。二是社会保障要逐步覆盖全体劳动者。目前，中国城市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正在逐步扩大，但是，农村的劳动者，绝大多数还是依靠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生活保障，还没有建立起对他们的最低生活社会保障。应当努力创造条件，尽快建立起覆盖城乡所有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对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具有重大意义。

3. 体现中国国情国力的现实状况。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要求对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这是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的，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更要求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较高的水平。中国的现状却是：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举世瞩目，但是，目前还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实现工业化，按综合国力还属于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绝对量都不可能太高。②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一些具体环节上，还面临体制转轨，往往各方面立新弃旧都需要投入启动资金，国家财力有限，要尽快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资金就显得不足。③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而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中涉及社会成员最广的项目，需要大量资金。这些具体国情决定了，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总量还很有限，在已经享有社会保障的劳动者中，人均社会保障基金也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项目还不能扩展太多，只能首先抓好关系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最紧迫的项目；在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参与的劳动者成员也只能逐步扩大。然而，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可以体现根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抓好当前社会保障重点项目的制度建设；可以运用代表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权威，通过法制手段，克服市场经济分散经营的状况给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带来的不利；可以充分运用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逐步扩大国家统筹基金在社会保障基金中所占的比重，尽可能减少社会成员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公平现象。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完善

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正在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要求，逐步完善。我们可以通过下页图 2，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进一步完善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社会保障，是相对于个人保障而言的。个人保障，主要是通过个人储蓄性保险（如银行储蓄、到保险公司投保等），或者企业对个人出资保险（为职工办理商业保险）来实现的保障；这类保障通过商业保险途径，只涉及个人及其所在企业，遵循个人和企业自愿原则，具有非统筹性质。而社会保障，则涉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要由国家出面，建立一定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来实现，具有统筹的性质和社会互助的性质，并受到法制的监督，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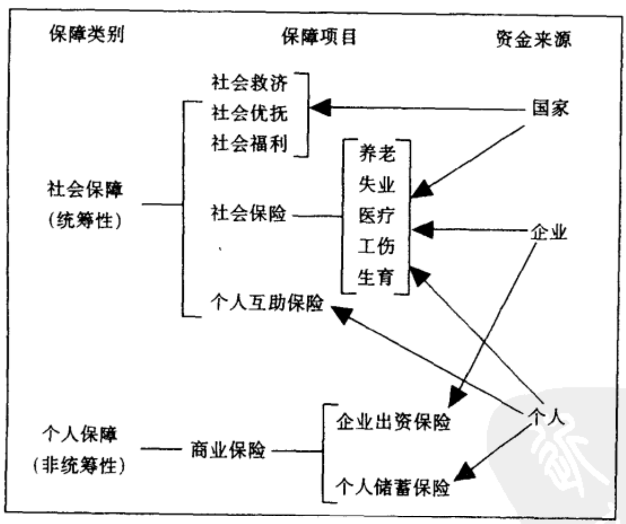


图 2　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图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包括 5 个基本项目：①社会救济，主要是对贫困人群，扶危济困，如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②社会优抚，主要是对那些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牺牲和贡献的特殊社会群体，如荣誉和伤残军人、军烈属等，给予生活补贴、优待照顾。

③社会福利，主要是对那些无劳动能力又失去生活依靠的孤老幼残、精神病人等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和服务保障。④社会保险，这是社会保障中的主要部分，涉及的社会成员面广量大，指的是社会成员在人生各阶段遇到困难和意外事故等情况下，社会可以向他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帮助其克服风险。现阶段，在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五个项目上，正在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保险，其中涉及面最大的是养老保险。⑤个人互助保险，这是一种通过群众个人捐助性的资金筹集开展的对各类困难群体和个人的经济资助，如捐资救灾、扶贫等，由于群众参与面较广，国家提倡，所以，可以做为补充性的社会保险项目。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难点，是社会保险基金的来源和筹集方式。在图 2 中，箭头标出的是基金来源的渠道。目前值得探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各种项目的基金从何而来，应如何筹集才是科学的。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这三项，由国家财政支出，这是共识。个人互助保险由个人自愿承担，也没有争议。有争议的主要是社会保险这个项目。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多，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有其复杂性，需要的基金数额都比较大，因此，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者，谁应在保险基金中占主要比例，占多大比重为宜；在国家这方面，究竟是由市县一级政府来统筹基金的筹集和发放，还是由省级政府或者从全国范围来统筹基金的筹集和发放，这些问题都正在实践探讨之中。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理是需要肯定的，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性质上有原则的不同。商业保险的提供者保险公司是有盈利目的的，而投保者也是市场行为，双方是从互利角度自主选择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个人之间在商业保险项目选择和投保金额方面，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商业保险不涉及社会公平的要求，相反，个人之间在投保金额上存在差别，倒是正常现象。但是社会保险的本质则是，社会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对个人实施必要的经济保障，其目的恰恰在于促进社会公平。而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险所要促进的社会公平，还包含着实现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促进全体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尽管社会保险基金终究来自企业和个人，但是，它的筹集方式与商业保险有原则的区别，它不是自愿性的，也不是多提供者就可以多享受的。从其内在要求来看，它应当主要由政府采取必要的、具有强制性的措施来筹集（例如，可以通过一定种类的社会保险税来筹集资金，促进再分配）；社会统筹主体在级别上，也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国家；社会成员在享受社会保险的权益方面，也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内在要求的实现，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和具体操作等因素的制约，会有一个过程。例如，一些社会保险项目的统筹级别，目前还只能达到市级或省级政府。但是，只要我们对社会保险内在要求的认识是科学的，那么，我们的实践就有正确的方向，就不会盲目地照搬别国的社会保险模式，而一定会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险制度。

三、重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重大课题。难点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广大农民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经济之中，所以，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依靠的是集体经济，是一种集体范围的“土地保障”。但是，实践表明，这种观点比较狭隘，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也是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的，对农民也必须逐步建立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社会经济运行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来看，社会有责任对农民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尽管农民处于一个个集体经济组织之中，但是，他们的经济生活并不是孤立于社会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紧密联系的。建国以来，农民上交农业税，并曾承受压低的农产品计划收购价格，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贡献。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目前农民农业生产收入较低的原因，除了税费负担较重之外（这是可以较快解决的），主要是农业人均生产率较低和农产品销售价格低，这是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农业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联系在一起的。人多则人均产量必定低，造成收入低；这又导致再生产的投入低，农产品质量、品种难以改进，使销售价格受到市场需求的抑制；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价值规律调节农产品价格的作用不能展开。于是，农业生产需要的来自工业的农药、化肥和农机具成本价格上涨了，农产品价格却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这等于农民通过农产品的低价对社会做贡献。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难转移、农产品销售价格受市场抑制，都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与历史形成的城乡和工农差别、国家人口管理制度联系的。所以，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从全社会的角度，综合采取措施解决。对于经济生活遇到特殊困难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障，应当是社会的一种责任。

从农民生活与社会经济运行效益的关系来看，广大农民获得必要的社会保障，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经济必须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城乡市场是相互影响的，农村市场需求不足，势必对拉动供给不利，农村市场繁荣了，总供给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改善，整个社会的市场才能繁荣。中国人口的62.3%（2001年）在农村，农民经济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对于调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拓宽农村市场，扩大国内有购买力的需求，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意义重大。因此，社会投入一定的资金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收益的决不只是农村，而是整个社会。

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当从国情出发。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目前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还只能抓住重点，在某些项目上开展试点。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上，也只能采取适应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适当方式。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关于社会保障的重点专项规划，已提出了近期推动农村基本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在健全初级卫生保障服务体系和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基础上，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农村不同地区的各种保障形式，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保障

需求”。按照这个要求，现阶段将在三个方面积极探索。

1. 完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国家采取措施，对农村五保户、贫困残疾农民、贫困老年农民和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逐步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标准实行差额补助。

2. 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性质，在现有条件下，可以有效地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

3. 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目前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只能实行家庭养老。但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可以探索社会养老保险。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农村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试点，实施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显然，其中的社会保障还是很有限的，农民从社会方面得到的资助，主要取决于集体经济的实力。这个基本原则是适应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集体和家庭双层经营这种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关系的。要在农村逐步推广社会养老保险，必须在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上，促使集体经济的整体实力尽快壮大起来。

第十四章　现代市场体系

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从事经济实践活动，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这对于曾经生活在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者来说，是经济环境的重大改变。实践离不开实践环境，如果经济主体不懂得现代市场经济环境对自己提出的客观要求，势必会在经济建设中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对于已经认识了自己经济地位和经济权益的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来说，必须面向现代市场，认识现代市场，从而驾驭现代市场，取得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生产力、获得自身利益的主动权。本章将围绕现代市场体系及其建设，展开阐述现代市场的基本概念、经济作用，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结构，信用制度和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培育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第一节　现代市场及其作用

一、现代市场的基本概念

市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学范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都使用市场这个范畴。但是，只有以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透过现象，深入全面地理解市场的本质，从而正确认识现代市场。

1. 市场的基本概念。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①。市场不同于生产领域，在市场上发生的是流通关系。所谓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以货币为媒介而形成的商品交换过程。从单个商品角度看，这一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换中完成的：商品—货币—商品，即 W—C—W，其中，商品—货币，是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货币—商品，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买。其实，一个商品的后一形态变化，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态变化，买，同时就是卖。商品流通与商品之间的物物直接交换有重要的区别。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物和物的直接交换主要存在于社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原始社会末期，交换是彼此没有联系的、孤立地、偶然地发生的。自从人类社会在商品交换实践中产生了作为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商品交换就相互联系起来了。马克思说：“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它已形成了不断拓展的商品交换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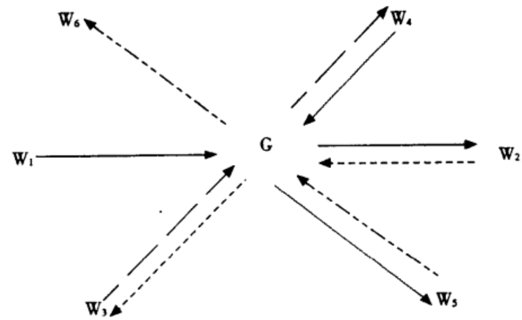


图3　商品的流通

这可以用图3说明。上图告诉我们，W—G—W这个公式，只是流通网络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背后，则是庞大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网络。让我们从 W_1 的交换说起，该商品所有者通过 W_1—G行为取得货币后，需要购买 W_2；但 W_2 商品所有者取得G后，决不会再买 W_1，否则就不必以G为媒介，W_1 和 W_2 直接交换就可以了，所以 W_3 取得G后，是为了买 W_3；同理，W_3 所有者取得货币是为了买 W_4；依次类推，于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形成了不断扩展的流通网络，而流通网络的发展，意味着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分工的拓展，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越来越提高。因此，商品流通不是简单的两个商品之间的交换，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网络。而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则是生产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深刻揭示的，“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关于市场的概念，至少应当把握以下要点。

——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或者说流通领域的各种现象的总表现。人们通常把市场直观地当作商品交换的场所。其实，市场本质上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现代市场，可以没有具体的场所，但是一定有交换关系的存在。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都要面对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商品流通关系，这种网络关系，对于每一个市场主体而言，也就是市场环境。

——市场是以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为中心的。从事交换的企业、组织和个人作为交换行为的实践者，通常称之为市场主体。他们包括各行各业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各个市场主体参与市场交换的目的各不相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资本价值增殖和获得利润，消费者的交换目的则是为了获得消费资料进行消费，满足个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所有市场的场所和物质设施，都是为市场主体的交易或交换活动服务的，离开市场主体交易活动的场所和物质设施，都不具有市场的性质。

——市场是处在时空运动之中的。所谓市场运行，其实是市场主体交换行为和过程构成的运动总状态。这种状态是无数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运动的时空形式的总和。从时间角度来看，商品生产者用货币购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需要花费购买时间；他们将各种

生产要素相结合起来生产产品，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生产时间；产品生产出来后，进入市场（一定地点的市场）进行销售，需要销售时间。购买时间和销售时间之和，是狭义的市场流通时间。这种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的总和，就是企业的资本采取货币资本的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进行循环运行（运动过程）的时间，也就是广义的资本流通时间。在这种运行中，生产资料和产品需要运输，进行空间的位移，这种变动和商品的堆积、保管、储藏又必定要以各种形式占用空间。显然，无数市场主体的运动构成的时空总和，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市场的交换活动具有自发性。亚当斯密曾说，市场和价格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切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都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自发进行。这是他看到了市场关系的自发性。如果有一天，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交换"时代，社会也就用不着以货币为媒介，以间接交换商品的方式，来实现生产的社会性了。正因为市场关系具有自发性，只要社会生产还需要市场，政府就不应当用人为的手段抑制这种自发性，而只能用间接手段，引导市场主体尽可能减少自身行为的盲目性，否则，就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弄巧成拙。

——市场关系本质上是开放的。这是因为商品流通具有开放性。商品流通的两个基本环节买和卖，存在着矛盾：买者不一定能遇上适合的卖者，卖者也不一定能遇上合适的买者；商品生产者卖出商品之后不一定马上就买，买了东西之后也不会马上就卖。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商品生产者"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延长买卖时间，拓展买卖空间，对内引进和对外发展社会联系，也就是拓展市场、开放市场。

——市场是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市场，市场与自发的社会分工相联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并促进市场关系的发展。而市场关系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分工的拓展和细化。正因为如此，市场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市场关系的现代化，反映着社会分工的现代化，从而反映着社会生产的现代化。

2. 市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先后发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商品交换和市场，但这时市场是极为原始的，市场范围和规模非常狭窄，市场直观地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产生后，商品货币关系高度发展，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市场由狭窄的空间概念发展为包括商品交易场所、商品交换活动及其所体现的全部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的功能也高度拓展，成为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要工具。

3. 现代市场是商品经济、商品货币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从世界范围看，市场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紧密相联，市场在形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功不可没。这是因为市场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起着配置经济资源的基本作用。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同样适用于其他经济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现代

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必须受到适度的管理和规范，受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现代市场具有竞争性、开放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有序性，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等待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要认真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包含的人类管理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培育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市场，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合的、有宏观调控的、进行规范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

二、现代市场是发达的竞争性市场

所谓竞争性市场，具有如下特点：①市场主体数量即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数量比较多，相互之间在产品价格、成本、质量、服务等方面形成竞争；②同类商品市场上产品的替代品较多，任何一个供给方都不能完全控制买方的需求和偏好，买方可以在不同的供给者供给的产品中选择；③各种生产要素较易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人为的限制；④具有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规范和秩序。任何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在一定规则和制度下进行的，为保证优胜劣汰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竞争必须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和制度下开展。“公平”、“公正”是竞争的内核，“公开”保证市场竞争主体具有畅通的信息渠道。

竞争性市场的本质是优胜劣汰。社会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这个问题主要依靠市场来回答，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使有限的资源流向使用效率高的市场主体。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功能的发挥，关键在于其竞争性。因为，竞争性是市场活力和一切创新的动力。各类、各个市场主体即商品生产者、消费者、资源拥有者都是独立的、在市场面前是平等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威，惟有竞争是市场的最高权威。竞争可以发生在商品生产者之间，发生在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等等。市场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在竞争的压力下，总会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通过各种创新，最节约地、最有效地使用经济资源。在理解市场的竞争性时，需要注意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过度竞争或者恶性竞争。在某种商品过剩情况下，生产者不是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争取市场，而是普遍靠人为的降价从事竞争，结果导致生产者普遍受损失。这种过度竞争的后果是整个社会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增大。另一种现象是垄断阻碍公平的竞争。自由竞争会促进生产集中，产生垄断，而垄断是妨碍公平竞争的。因此，要保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往往需要采取法治的手段防止市场垄断。

现代市场是发达的竞争性市场。现代市场是商品经济、商品货币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参与市场交换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千千万万、层出不穷；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跨越了地区、国家，市场已成为全球性的、一体化的市场；商品交换的手段和工具日新月异，网络和电子商务使全球

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和高效；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现代市场所体现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建立和维持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既要防止对市场竞争的人为限制和低效率垄断，又要防止低效率的过度竞争。

三、现代市场的系统性和统一性

现代市场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关系体系。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等各种市场，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首先，从企业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商品市场和金融等市场是有内在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生产过程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投入的劳动力、技术、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都要通过货币购买关系，而用于购买的货币资本，一般都要与金融市场即货币、资本市场发生联系，因为发达的信用制度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货币和货币资本，集中在金融机构，而不再留在各个生产者手里。高度发达的货币、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各种生产要素更容易从一个生产部门和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和地点。在市场竞争中，生产者利用金融市场可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同样，商品生产出来以后，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变，既是一个卖的过程也是一个买的过程，这一过程也离不开金融市场而劳动市场又是与消费品市场紧密联系的。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购买各种消费资料，这种购买使用的货币是来自企业，它也是同金融市场联系的。金融市场的状况会通过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影响消费晶市场；反过来，消费品市场的状况，会影响生产消费品资本的运行状况，从而影响货币、资本市场等等。因此，所有市场都存在内在联系，不是孤立存在的。

第二，现代市场的高度竞争性要求各种商品和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具有自由流动性。消除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和地方割据等市场垄断，保护商业自由。自由流通的市场使所有的产品和生产要素联结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统一的市场具有不可分割性，任何人为的分割都会破坏市场的效率，降低市场的竞争性。

第三，现代市场的系统性和统一性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持。现代市场的竞争性和商业自由要依靠法律、制度来维系，如前所述的各种市场垄断的消除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如经济垄断或寡头垄断，虽然能提高市场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避免大量小企业的过度竞争，但过度集中又会破坏竞争导致低效率，故美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反垄断的法案；行政性垄断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实行的垄断，像我国目前某些行业的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等都属于行政垄断，许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产物，这些垄断需要政府转变观念，建立相应制度来逐步消除；还有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劳动力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自由流动，都需要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保证。

四、发挥现代市场运行机制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场经济方式配置资源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市场供求机制、市场价格机制、市场风险机制等协同作用来实现的。这些机制的基本动力，就是市场价值规律。本书第九章将展开对价值规律的论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正是价值规律作用下的现代市场机制，规范、制约和促进着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并通过它们实现各类经济资源在社会范围流动、分配和有关资源之间的有效结合，也就是实现经济资源在社会范围的有效配置。一个个企事业单位、消费者、资源拥有者，在价值规律推动的利益目标驱动下，以分散决策的方式，从事市场经济的交易活动。他们根据市场提供的供求信息、价格信息等各种信息，凭借自己掌握的经验和知识，对未来价格、利润率、利率等变量进行预测和判断，做出生产经营决策、投资决策和消费决策。这种分散决策方式，改变了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那种，信息纵向收集和传输渠道过长的低效率状况，减少了信息的人为扭曲现象。决策主体可以从市场上直接收集到有关经济信息，例如，当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商品价格下降，市场需求大于供给时，则商品价格上涨，于是，价格信息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的信号灯或指示器。在市场经济中信息是横向传递和反馈的，传递速度快，较少被扭曲。这就有助于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每个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经济风险，这就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最终由国家承担风险。在市场竞争中，利益与风险并存的状况，使市场竞争环境更具约束力，有助于生产经营着在决策中减少随意性从而使生产经营更具效率。这些由市场机制产生的作用，正是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优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提高运行效率，就要着眼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建立的是发达的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体系及其相应的机制，而不是传统的小商品市场。星罗棋布的小商品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起零售市场的作用，仅仅依靠分散的小商品市场，是不可能形成有效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机制的。市场越发达，机制越成熟，就越有利于经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下面一节将阐述现代市场体系的含义。要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从经济主体角度来看，还必须要求他们遵守市场机制要求的行为规范。一定要树立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无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还是混合企业，每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竞争者。要明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和利益，靠人为垄断是不能长久获得的，只有靠自己培育市场竞争的实力，优则胜，劣则汰。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主体，都能自觉遵循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现代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必定能趋于优化。

第二节　现代市场体系的结构

一、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

现代市场是一个体系。市场体系是指由各种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的市场，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按一定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它是市场结构、市场机制和市场功能的有机统一。

市场结构是指市场体系内各类各种市场的组成状况及相互关系，可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由于对市场关系本质认识的不同，赋予各种市场的概念也不同。现在，国内理论界普遍借鉴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结构的分类，把市场从交易对象的角度，分为商品（包括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从市场竞争程度的角度，分为竞争性市场和垄断性市场；从市场交易的时序角度，分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从市场区域的角度，分为地方市场、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等。很明显，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有些市场在概念上是不科学的，例如，生产资料本身是真正的生产要素，西方经济学却把它的交换归类于商品市场，而货币资本本身并不进入生产过程，并不是生产要素，西方经济学却把它的借贷列入要素市场。但是，考虑到目前这种分类在理论界和媒体的通行性，以及这种分类对认识市场本质关系妨碍不大，本书也采纳通常的分类法。

在市场体系中，每一类市场都有其特有的功能，各类市场相互交叉、相互依存，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值得强调的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衍生所有其他市场结构的基础，或者说，所有其他市场结构都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展而促成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市场结构的两种基本形态。

二、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是由消费品（包括服务）和生产资料市场构成。

1. 消费品（服务）市场是联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间媒介。完善的消费晶市场一方面能使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消费者获得物质文化生活的各种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生产者经济利益和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通过消费品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信号，生产者可以适时调整消费品生产的品种、数量和质量，增加消费品的有效供给，减少和消除无效供给。完善的消费晶市场既包括初级市场，如集贸市场、小商品市场，也包括批发市场、专业市场、期货市场等中、高级市场。有效的消费品（服务）市场流通渠道多，中间环节少，有利于各类各级市场相互配套，缩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市场主体的流通费用支付，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2. 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也即中间产品市场，是指生产资料作为商品所进行的一切交换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交换关系的总和。生产资料市场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需求主体是生产者，所以生产资料市场是联接（卖方）生产者和（买方）生产者的媒介，一方面使（买方）生产者获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机器设备、燃料、零部件等投入品，另一方面（卖方）生产者通过市场实现其产品价值，并从市场上得到对生产资料在品种、规格、型号、数量、质量等方面的需求信号，以便再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生产资料市场同消费品市场相比有不同的特点，生产资料供求批量大，专业性强，替代性小。完善的生产资料市场必须建立适应生产资料供给、需求特点的市场结构和流通形式，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相配套，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相结合。生产资料市场应是对全国并逐步对国际开放的市场，不应存在地区封锁、部门分割和行业垄断等现象，物流畅通，才能促进高质高效的生产资料普遍地配置到生产环节中来。

三、生产要素市场

生产要素市场是指劳动力、资金、房地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交换关系中各自形成的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离不开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和基础。

1. 劳动市场。它是劳动力供、求双方通过市场相互选择实现各自利益的劳动资源配置方式。劳动市场包括综合劳动市场、行业劳动市场、专门劳动市场等。劳动能力的实现形态即有用劳动是千差万别的，只有建立起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劳动者才可以根据自己的劳动特长自由择业，企业才可以从市场公开聘用需要的劳动力。劳动者（劳动力供给方）之间、企业（劳动力需求方）之间、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形成的市场竞争关系有利于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工资率和实现按劳分配。

2. 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是房产和地产的结合，房产和地产是不可分割的，房产建筑在土地上，地产价值（地租和土地中包括的资金投入）一般融入房产价值中，所以房地产市场是房产市场和地产市场的有机统一，既是房产商品市场，又是土地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房地产市场是房产、地产借以实现其价值的交换场所及一系列交换关系的总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主要包括公有制土地所有权出让和转让市场、房地产开发市场、房地产交易市场。①土地出让市场即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出让方式参照国际惯例，主要有协议出让、招标出让、拍卖出让三种形式。②房地产开发市场即房地产一级市场，指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之间与房地产使用者之间的交易市场。概括地说，这一市场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房产所有权的让渡市场。③房地产交易市场即房地产二级市场，指房地产经过一级市场买卖且投入使用后，房地产产权（包括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再转让市场。房地产市场除了房地产的买卖外，还包括房地产租赁、房地产抵押等多种市场形式。各种类型的房地产市场可以促进房地产产权的合理流动和房地产的开发，满足各类企业经济活动对房地产的需求，并促进房地产资源在社

会范围的有效利用，并形成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产业。

3. 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它们的发育成熟是现代市场体系结构的重要特征。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投入和信息的畅通。已经和即将来临的信息网络经济或知识经济，被国际上称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①技术市场。技术商品是知识形态的商品化，一般表现为软件如工艺、程序、配方、图版，技术资料等。技术商品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技术市场。技术市场是技术商品和科技成果转让、交换关系的总和。技术市场的交换关系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技术市场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起导向性作用，指示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方向，促进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向着高新技术产业、产品流动。②信息市场。信息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信息产业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信息作为信息产业的产品，其生产、传输需投入大量成本，其价值的实现要依赖于信息市场。信息市场按信息的最终用途，可分为三类：一是提供商情的信息市场，二是提供科技信息的市场，三为信息产业提供物质手段服务的市场。发展信息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信息、社会发展信息、国内外市场信息、生产信息、商业信息、财政金融信息、科技信息、环境信息、资源开发信息、人才信息等各种信息，广泛迅速地传播与交流，对于正确进行经济决策，节约和充分利用经济资源，加速经济运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4. 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体现货币关系和资本借贷关系这种金融关系的载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每一个环节都是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表现为货币或货币资本形式）的双重流动。因此，金融关系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市场是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其基本功能是实现货币和资本的借贷融通，加速资金的流动性。目前在国际上，主要是从借贷期限来划分金融市场，即把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①各类金融市场之间是互相交叉和渗透的。

（1）货币市场。货币市场是信用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短期资金融通市场，其功能是提供短期资金，以满足需求者由于生产的季节性或其他原因，对临时性生产或周转资金的需求。货币市场主要包括银行短期信贷、银行同业拆借、贴现、承兑、大额定期存单流通等市场关系。①银行短期信贷，指银行对工商企业的短期信贷关系，利率一般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准，随交易额大小而定。②银行同业拆借，指银行之间为解决短期资金余缺而相互调剂资金的关系。银行在一天营业结束后，轧平当日票据收支差额时，由于存款放款、资金汇进汇出的变化，有的银行出现余额，有的银行出现不足。不足者无法保证第二天正常支付，多余者资金闲置不用，还要支付存款人的利息。因此银行之间进行资金的临时拆借，一方面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盈利水平；另一方面也可解燃眉之急。③贴现，指银行与商业票据、国库券及债券等持有者之间融通资金的关系。票据持有人将未到期票据转让给银行，并向银行贴付一定利息，以提前获得现款；银行则向票据持有人提供了一笔贷款。贴现市场的参与者主要为工商企业、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工商企业通过票据贴现将自己未到期票据提前变现，可以满足短期资金的急需；银行则通过这种票据购买，进行短期资金放款，这种短期放款比一般短期贷款安全性高。中央银行参与贴现，主要是对已在商业银行贴现但尚未到期的票据进行再贴现，通过这

种再贴现，既可以满足商业银行资金周转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此方式实施国家货币政策，通过再贴现率的高低，影响市场的一般利率，以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的。④承兑，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与票据经纪人对承兑票据的买卖关系。承兑是指票据（汇票）持有人要求债务人签字盖章承认到期兑付的行为。汇票只有经过付款人承兑，承兑人保证到期偿付才有法律效应，票据才能在市场上流通，形成承兑市场关系。承兑市场的交易对象主要有银行承兑票据和商业承兑票据。商业承兑票据多用于国内贸易，通常是卖方把商业票据和货物单据一起交给买方，买方签字到期承兑，并指定付款银行，再交给卖方，此时的商业票据即为商业承兑票据。银行承兑票据多用于国际贸易，指银行为帮助进出口商进行国际贸易承担票据到期付款义务而签发的票据。承兑市场一方面可促进国内、国际贸易中资金融通，另外也使其参与者即工商企业、进出口商、票据商及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票据买卖优化金融资产组合，从中获利。⑤大额定期存单流通，指大额定期存款及其存单的交易关系。这种存单与普通存单不同，具有不记名、存单金额固定且面额大，可以流通转让等特点。存单的期限一般在一年以下，三至六个月居多。存单持有人到期可向银行提取本息；尚未到期时可以转让。个人和企业有闲置资金想投资时，这种存单具有很大吸引力。

（2）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指信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长期资金融通市场。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对象是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资本市场又称证券市场。资本市场是闲置基金转化为投资的纽带和桥梁。居民储蓄是资本市场供给的重要来源。证券市场可以为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投资，提供股票、债券等多种形式的选择。在资本市场中，资本的需求者主要是工商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筹措长期资金，筹资的主要渠道是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因此，资本市场的发育和成熟程度关系到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衔接程度。对资本供给者来说，金融投资要具有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特点；对资本需求者来说，则希望需求的资本数额、贷放期限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有较低的利率。成熟的资本市场能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因为它要求企业向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时，必须向广大投资者公开其经营管理状况及财务状况，若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效益低下，企业的信誉度下降，筹资难度就会加大。因此，资本市场的存在有利于资本向产业前景光明、经营管理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流动。资本市场或证券市场按交易对象分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抵押市场；按证券的运动形态分为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流通市场。证券发行市场也称初级市场，是证券发行主体发行新的证券所形成的市场。证券流通市场又称证券交易市场、二级市场，指证券发行后，又进入买卖或转让的流通。证券流通市场和证券发行市场是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证券流通使证券持有者在需要时，能使所持证券迅速变现或购买其他证券，它为投资者购买证券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提供了选择的前提条件。证券市场的健全，也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股份制公司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条件，因为公司的投资者可以对本公司经营状况“用脚投票”，一旦发现经营状况不佳，可以在证券市场抛售所持股票，造成股票价格下跌，公司资本贬值，这就给公司形成必须改善经营管理的外部压力。

第三节　现代信用制度

一、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制度

现代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离不开现代信用制度。信用一词意为信任、相信、恪守诺言等意思。在经济学中，信用主要指以偿还本息为条件的暂时让渡，商品的支付关系或资本的借贷关系，而在等价交换中，平等地交换商品信息也包含着信用关系。因此，现代信用制度渗透在现代市场整个体系的经济关系之中，是市场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和润滑剂。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水平、信用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信用可以节约商品形态变化和资本形态变化的时间，从而加快资本循环和周转速度，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信用可以使私人资本集中起来，变为社会资本，促使生产规模得以惊人地扩大。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二重性："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一方面，信用和金融越来越发达，渗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加快社会经济运行速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世界市场，其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自 1982 年以来，墨西哥金融危机、华尔街股市崩溃、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各种形式、无休止的金融动荡愈发频繁，对经济、社会、政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流通总过程或者说市场经济，是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合理利用或控制市场经济自发性的有利条件，使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制度，有条件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欺诈性。我们要加强对现代信用制度作用和功能的认识，认真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的金融制度中的一切属于科学管理的东西，扬长避短，发挥好信用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制度的主要功能表现为：

第一，为现代市场体系中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信用基础和基本工具。金融市场是以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等信用制度为基础的。正是这些信用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能把社会各方面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提供给众多企业和消费者调剂使用，拓展了货币和资本的融通，使一定时期内，社会的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充分的提高。

第二，加快现代市场经济的循环和周转。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组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环节都是在市场引导和市场调节下完成的。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衔接，任何环节的阻滞都会影响到整个再生产过程的顺畅进行。而现代信用制度为这些环节的顺利运行创造了条件。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可以为生产、分配、交换活动提供资金融通，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消费信用能为及时满足广大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消费提供便利，在一定时期适度扩大社会消费需求，促进社会生产和有购买力需求相互衔接，推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国家信用能在全社会范围内筹集建设资金，用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经济建设项目，从而为宏观经济调控和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创造条件。

二、信用形式

信用形式，主要是指表现借贷关系特征的形式。信用形式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还有保险、信托、租赁、典当等形式。

1. 商业信用。商业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各企业间发生的商品赊销和货款预付的信用关系。商业信用在银行信用出现前几千年就已存在了，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信用形式。商业信用有助于加速产业资本循环。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各企业生产和流通难免出现脱节，有些企业的商品急于销售以免积压，而有些需要这些商品的企业又缺乏资金，如果企业之间只能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金交易方式，势必造成商品销售时间的延长和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而商业信用可促进卖方的商品销售，卖方虽未直接得到现金，但可利用买方签发的商业票据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贴现，因而卖方愿意用商业信用来推销商品。买方如果用商业信用能解决资金不足困难，就无需借助银行信用，只有在买方信用难以被卖方接受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信用活动才需银行介入。赊销这种商业信用形式可以缩短流通时间，促进再生产顺利进行。

2. 银行信用。这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以货币形式提供的信用。银行通过信用将社会闲置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信用提供给货币或资本的需求者。银行信用是以商业信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银行信用能够克服商业信用只能存在于直接进行商品买卖的双方之间这种局限性，可把货币资本借给任何一个需要资金的经济主体，因而具有广泛性的特点；银行信用还克服了商业信用贷放的商品资本在规模和数量上的限制，具有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银行信用所集中的货币资金，信用期限可以续短为长，克服商业信用只能在短期内存在的局限，具有长期性；银行信用还具有间接性、风险小等特点。银行信用在现代信用制度中占据核心地位。一方面，银行信用具有上述的商业信用不可比拟的各种优点，为再生产资金融通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银行信用又为商业信用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因为商业信用所形成的票据大都存在一定期限，持票人在票据到期前急需资金时，商业票据能否贴现关系到商业信用的存在和发展。所以银行信用支持商业票据贴现，意味着商业信用依赖于银行信用。

3. 消费信用。消费信用是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信用，为

消费者消费提供便利及所需资金。主要形式有：企业通过分期付款等赊销方式，对消费者提供信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消费者购买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旅游等消费项目提供消费信贷或为消费者提供信用卡，消费者通过信用卡可以购物。消费信用的发展可促进消费的增长和推动经济的增长。消费信用能使潜在的消费需求提前转化为现实的有效的消费需求，使个别消费者提前享受现时无力购买的消费品，解决个人消费急需时的资金困难。

4. 国家信用。国家信用，即国家作为债务人，向国内外借债形成的一种借贷关系。其主要形式是国债（国库券也属于国债范畴）。国债是通过国家信用筹集财政资金，用于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和调节社会总供求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债一般利息较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一般认为具有较大的投资增值价值。国债对社会总供求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当经济出现衰退时，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转移支付支出、公共工程等支出，可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生产增长；当经济过热有通货膨胀趋势时，财政部门通过发行国债来吸收流通中过多的货币，或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向公众和商业银行抛售国债来减少货币的数量，均可对过热经济和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在国家出面或者起担保作用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国家信用具有重要作用。

三、信用工具

信用工具，指记载借贷关系即债权人权利和债务人义务的票据、债券等凭证。严格地讲，信用工具只是证明债权关系的，但是体现所有权关系的股票中包含较多的信用成分，也可理解为信用工具之一。

1. 本票、汇票、支票等票据和信用卡。①本票又称期票，可分为银行本票和商业本票。是发票人签发的在一定日期及地点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给持票人的一种票据。本票的发票人为债务人，持票人为债权人。商业本票是商业信用的票据，在企业之间发生赊销等商业信用时，由赊购企业签发，承诺到期付款（还本付息）。②汇票是由发票人签发的一种票据，分为商业汇票和银行汇票。其内容是让付款人在指定的到期日，无条件将一定金额付给持票人。汇票发票人一般为债权人，付款人为债务人。商业汇票是由销货方作为债权人签发的，当货物送交购货方时，同时附一张商业汇票，经购货方承认兑付后，销货方将汇票收回保存，到期向承兑方要求付款，承兑人在承兑后必须按期付款，受到法律约束。银行汇票是银行承办汇兑业务时发出的一种汇兑凭证，是承汇银行向另一家银行发出的付款指令，指令其向持票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作为商业票据的本票和汇票，在到期前可向银行贴现或向他人转让。转让前要经持票人背书，明确票据清偿责任，即如果票据承兑人不能按期承兑，票据受让者有权向背书人要求支付款项。③支票是支票存款的存户签发一定金额并委托其存款银行无条件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按支付方式不同，支票可分为现金支票、转帐支票、保付支票、旅行支票等。④信用卡是对具有一定信用的顾客所发行的赋予信用的证书。信用卡可进行购物、一定程度透支等。

2. 债券。债券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债券持有者即债权人有权按期取得债券规定的固定利息，并到期收回本金。债券一般可分为中央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三类：①中央政府债券即国债。是政府为筹集预算资金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债券，国债以国家信誉为还本付息保证，故安全性高。②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为兴办公共事业和发展地方经济需要而发行的债券。③公司债券是公司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和长期建设发展资金而向企业内部和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债券。公司债券的种类有抵押债券、无抵押债券、偿债基金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赎回公司债券、参与公司债券、无息债券等。一般说来，公司债券持有人即企业债权人，债券到期即可要求返本付息，当公司破产时，债权人可先于股东向债券发行公司要求偿还债务，因此，公司债券的风险比股票小。

3. 股票。广义上，股票也可看做信用工具。股票是股份公司为筹资而提供给股东证明其所有权身份和入股金额的凭证。股票的持有者有权参加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参与股份公司的重大决策；具有股份公司盈余分配权，即获得股息，但股息的多少是不确定的，需依赖公司的盈利及分配方案，如果公司亏损，就可能没有股息，如果公司破产，可能连本金都不能收回，所以风险较大。股票持有者不能退股，但是股票可以流动，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转让。

四、加快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用制度的积极作用。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自主联合劳动者的本质联系，加上深厚的中华传统文明和诚信文化，使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信用制度拥有有利的条件。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还不完善。客观因素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本身还不够完善，金融工具尚不丰富，证券市场还不发达；主观因素则是，摆脱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不久，还缺乏现代信用制度的操作经验，也存在思想意识上的社会信用缺失，一些债务人、受托人不能很好地履行诚信义务，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处境艰难，不良贷款包袱沉重，因而，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任务繁重而艰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 WTO，我国必须加快信用制度建设。

——在理论上，要确立社会主义信用制度的科学经济学观念，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般市场信用关系相结合，对信用制度提出的经济要求。要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在提高资金融通速度和效益、消除信用欺诈等副作用上下工夫，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用经济制度。

——在实践中，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施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创新，其中包括加快商业银行体系的建设，提高银行金融运行效率；探索有国家统一控制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满足全社会对银行信用的多种需求；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发挥利率和汇率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努力开发金融衍生品，拓宽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渠道；加快发展证券市场，扩大证券市场规模，消除股票市场分割，加速发展债券市场特

别是公司债券的发展等。要通过法律、制度、道德的多方位建设，提高企业、银行、个人、政府等各个经济主体的诚信意识，维护债权人、委托人的利益，对债务人、受托人要加强监督，促使其严格履行诚信义务、恪守信用。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体系会积聚越来越大的风险，其安全性会降低。因此要积极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尽量减少现代信用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副作用，处理好金融改革与金融、经济稳定的关系。

第四节　培育现代市场体系

一、社会主义经济要求建构统一市场

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开放的、发展的，要求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开放的、统一的市场，才能遵循价值规律，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为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建设和完善开放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是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重要保证。形成开放的、统一的市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全国各地在经济交往上没有地区分割、地区封锁，没有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在流通方面的障碍，没有其他束缚商品、生产要素在全国各地区之间流动的超经济的限制。这是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政治条件。

——在对外开放中，面向世界发展社会分工。各地区在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基础上形成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社会化生产体系。在经济贸易与合作上，在产权明晰、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市场主体自由交换，依法“走出去，引进来”。

——要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系统、交通运输系统和中介组织系统等，保证商品、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顺利地流动。所谓市场中介组织，是在市场经济中，为买卖、供求双方提供媒介服务的机构和组织，按经济活动内容，可以分为：①流通性的，如职业介绍所、信息技术交易所等；②代理性的，如证券公司、招标代理机构等；③咨询性的，如信息中心、咨询服务机构；④鉴证性的，如资产评估、公证和审计机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⑤自律和管理性的，如行业协会、商会、贸易促进会、消费者协会等，这些中介组织形成了完善的系统，市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功能才可以有效地发挥。

——有利于平等的、自由竞争的政策环境和法规。严格法治，才能形成规范有序的统一市场。

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上述条件对于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分析目前存在的差距，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消除障碍，努力把这些条件建立和完善起来。

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建构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中，地方保护主义是较突出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原因很复杂，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其表现往往是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行政性干预。主要是不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特点，不从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和市场供求状况出发，过度投资建设那些技术要求低、投入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造成了各地产业结构雷同，导致各地一些加工业产品长期供过于求和过度竞争；为了本地区利益，对本地区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加以保护，使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和产品因受到保护而不能按优胜劣汰机制退出市场，从而降低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优势，降低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人为封锁本地区市场，阻止其他地区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进入本地市场，为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设置人为障碍，阻碍了全国范围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一定要有坚决的态度和措施。

首先，完善财政和市场管理体制。要分析地方政府产生本位利益驱动强烈的行政干预的客观原因。现实生活中，对低效益加工业过度投资、封锁本地市场、阻止外地优势产品进入，这些政府行为往往与财政体制、市场准入管理制度的缺陷有关，这些都需要深化体制改革来解决。还有必要通过立法界定行政权限等渠道，防止地方本位主义。

其次，科学地制定地方政府官员在任期内的政绩考核指标。要防止政绩考核促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不宜在地方干部政绩考核中，过分重视 GDP 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投资增长率等指标，而应当考察投资效益、本地区产品的国内及国际知名度、本地区产品综合竞争力、市场发育度等，这将防止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种种短期行为。

再次，增强社会分工意识，努力提高地方专业化生产水平。要促进各地区以其自身的资源、技术、人才优势和特点为依托，形成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结构。封闭的地方小市场，以当地产品当地销售为特征，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现代市场则打破地方市场的局限，拓展广阔的市场空间，能充分发挥市场优化社会分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如果各地区、各区域都能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就能从市场分工中获取比较利益，这是有利于克服地方本位主义的。

三、在改革中培育现代市场体系

在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因素中，目前除了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外，还存在着行政性垄断，以及交通等市场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系统较薄弱等因素，需要在深化改革管理体制和发展经济中逐渐克服。

1. 消除行政性垄断，引入市场关系。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每个部门都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拥有部门的经济利益。这种沿袭下来的部门垄断“惯性”如果

不消除，就会妨碍形成统一的竞争性市场。消除部门垄断，就是消除行政性垄断。主要靠通过国有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还需要在国有垄断行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如在规模经济优势较明显的电力、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在某些经营环节和公共服务环节上，引人不同的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开展生产和供给者之间竞争，并在供求之间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关系。

2. 完善市场政策和法规的建设，提高市场公平度。在税收、信贷、市场准人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是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对外开放、加人 WTO 的新形势下，需要给国内外进人中国的市场主体实行“国民待遇”政策；同时，必须形成完善的市场竞争的政策和管理的法规，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

3. 加强交通运输、信息传输和中介组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要进一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运输，发展商品保鲜、冷藏等物流现代技术，拓宽市场的时空范围。要积极发展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加快市场流通速度。要通过培训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途径，积极培育市场中介组织，从整体上降低市场交易费用。

4. 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所有的市场培育工作，都不能脱离经济发展来进行。要把发展经济和建设市场结合起来，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同时，加快消除各种行政权力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干预，让市场规律调节商品经济活动，这样，才能加快形成并完善统一、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十五章　市场机制与市场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现代市场体系，形成有利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广泛的社会分工联系。市场体系是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作用的，而市场机制则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方式。中国国情条件下存在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它们都要通过同一般市场关系的结合，受价值规律制约，进入市场运行机制，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规则及市场管理是否能遵循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促进整个经济运行形成良好的机制。本章分析市场机制的实质、功能及其内容，并阐述市场规则的基本内容和如何加强市场管理。

第一节　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

一、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价值规律是客观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社会有用性，与自然经济不同，必须通过产品的市场交换间接实现；同时，劳动必须通过这种市场关系实现为价值，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生产过程表现为商品价值的创造过程，商品的交换过程表现为市场中的商品流通，在这种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价值规律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它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一切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而价值规律的作用过程，在经济现象上，则表现为市场机制，作用的一般结果则是实现经济资源的社会配置。

1. 价值规律的含义。价值规律，包括商品价值的决定规律、商品的交换规律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表现规律等内容。但是，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商品的社会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按等价值（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是按价值的转化形态生产价格）交换的原则进行。

由于生产的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各个生产者生产同一种商品所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不可能一样，但是在市场上只能按平均花费的劳动时间（或者说中等生产条件下花费的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社会价值量进行交换。就个别劳动来说，不

管在生产单个商品时耗费了多少劳动量（创造多少个别价值），该商品的社会价值只能由同行生产者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就社会劳动或社会总劳动来说，每个部门生产的某种商品总量的价值量，只能由社会总劳动可用于本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来决定，也就是说，在社会分工中，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客观上有一个比例，规定着各个生产部门生产一种商品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从而决定着各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一种商品总量的价值量。这就是价值规律对商品价值决定的含义。

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中是通过竞争和价格的波动实现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但价格与价值并不总是一致的。竞争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供大于求时，价格会低于商品价值；供小于求时，价格会高于商品价值。但从长期或从全社会看，高出的部分与低于的部分会互相抵消，商品的总价格和总价值仍然是相等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并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恰恰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

2.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起作用。既然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必然存在和起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调节社会生产及其分工。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影响商品生产者的物质利益，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收入、支出和盈利。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必然促使企业扩大和缩小生产规模，从而调节经济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配置，形成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这种调节作用，从社会规模上对生产进行宏观调控。

——调节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求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必然影响商品的供求。供给按照与价格相同的方向变动，需求按照与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价值规律就是通过对商品供求关系的调节，从而调节着商品流通。

——促进生产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商品交换的比例是以社会价值为基础的，而社会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社会主义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只有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劳动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使自己的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较多的盈利。这对国家、对企业、对劳动者个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我们应当充分运用价值规律的这一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者面向市场，善于学习，勤奋劳动，勇于创新，敢于竞争，否则就会在国际化市场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遵循价值规律，才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二、市场机制及其运行

价值规律属于经济关系的本质联系，是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机制表现出来。市场内部的诸如商品、服务和各种要素的市场价格、货币价值（一般指纸币体现的含金量价值）、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买者和卖者构成的市场主体等各种因素，它们相互之间，以及整个市场体系中的各类市场相互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这种市场各种因素之间在价值规律作用下的相互联系过程、形成的经济运行程序及其导致的资源配置功能，简称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结果。

1. 一般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市场体系中一系列具体机制的总和，从一般的角度看，主要是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在实际经济中，市场机制总是同一定所有制关系结合着起作用的，但是，只有弄清市场机制的一般含义，才能进一步弄清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特殊表现形态。

(1) 价格机制。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变动意味着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价格机制是商品市场中的基本机制，它体现商品的供求同价格的有机联系和运动。供求变化，引起价格变动；价格变动又会引起供求变化。正是在这种联系和波动中，供求趋向一致，价格与价值趋向一致，使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得到实现。

价格机制作为供求的调节器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调节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市场价格可以调节经济资源的流动与变化。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哪个生产部门的效率高，商品卖出的价格使该部门的生产有利可图，资源就会较多地流人该部门；反之，那个部门的资源就会流出来。这就促成经济资源流向效率高的部门，从社会角度看，就能促进资源实现有效配置。

第二，促进企业改进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同种商品价值的高低决定价格的高低，是反映各个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生产者为在市场上夺取较大的份额，必须在价格上以廉取胜，这就要求设法节约劳动消耗和生产成本，改进技术和经营管理。

第三，引导并调节消费的方向与结构。价格水平的上升和下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调节消费者的需求规模，价格高了，消费者会考虑商品的替代，或购买价低的商品，价格低了，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就可能增加。

第四，调节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商品价格提高或降低，商品生产者可以从中受益或受损，而使消费者利益受损或收益。因此，市场价格的变化调节着市场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

(2) 供求机制。这是一种由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商品的社会价值）发生偏离，导致这种商品的市场供给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或者反过来，由后者的变动引起前者的变化，在这种反复多次的波动运动中，促使供求关系趋于平

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趋于一致的过程。供求机制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是及时为市场主体提供信号，指示方向，并通过其他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一方面，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要，生产这些商品的社会劳动时间中有一部分就不会被社会所承认，这些商品必然要按低于它们实际所耗费劳动的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表现为较低的价格。另一方面，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以高于市场价值的市场价格出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市场价格的涨落，而市场价格的涨落，又会反过来刺激和调节供求的增减。需求按照和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价格上升，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供给则按照和价格相同的方向变动，价格上涨，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供给就减少。这样，逐步促使市场上的供求趋于平衡。可见，供求机制是供求双方矛盾运动的一种平衡机制。

在买方市场即供给大于需求的市场中，供求机制通常能够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①如果供给略大于需求，商品的市场价值是由优等生产条件下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格来调节的，这就使那些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生产者的一部分劳动耗费得不到社会承认，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这就促使这些商品生产者在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努力改善经营管理，积极采用先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②供给略大于需求的状况会使各种市场信号基本趋于正常，它们既能准确地为企业经营活动导向，又能保证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因此，应该建立起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型市场，使供求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3) 利率机制。利率机制是在金融市场中，信贷资金的供求同利息率之间的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运动过程。一方面，利率调节着货币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另一方面，货币资金供求状况的变动，也影响着利率的变动。利率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是多方面的：①利率的高低影响企业利润的变动。企业的存款利息是企业的收入，而企业的借款利息则是企业的支出。一定高度的存款利率和借款利率会促使企业在资金使用上精打细算，讲究资金使用效果。②一定的市场利率会对社会总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起调节作用。这是因为一定的利率往往会造成不同部门投资效益的差别，从而会诱导投资在部门之间流动。实际上，利率机制和价格机制是结合着起作用，调节社会劳动在各部门分配的。③利率水平与价格水平的变动相结合，对宏观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起着调节作用，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作为一种客观的利率机制中的市场利率，它在一定的时点上，具有统一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可以任意地制定统一的利率。市场利率是在金融市场中货币、资本的借贷关系中形成的，只有能够反映货币、资本真实供求平衡关系的市场利率，才是整个社会货币和资本流通状况的真实信号。因此，政府要从克服市场自发性的角度，调节货币和资本的流通状况，就必须尊重利率机制，要首先弄清现存的货币和资本流通中存在的真实问题，然后通过制定货币政策，并运用调节商业银行同中央银行之间的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等经济手段，间接地影响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用这种方法，才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有利于宏观经济运行

的市场利率。前一章已经讲到信用制度，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信用制度是建立市场利率机制的制度保证。

（4）竞争机制。竞争机制是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主体相互之间在市场购买和销售过程中表现出的，在生产技术、资本投入、人才和管理水平、商品质量、服务和信誉、销售市场份额等多方面优胜劣汰的竞争运动过程。既然市场价格变动和供求关系变动关系到市场主体的物质利益，市场主体就必然会对这些市场的变动做出反应，因此，竞争机制是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利率机制等市场各种机制的人格化表现。市场的各种机制都要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才能实现。正常的市场机制排除垄断、排除对市场主体的非经济因素干预，具有竞争性。正如马克思描述的，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竞争包括买者和卖者双方之间的竞争，也包括买者之间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市场主体之间竞争越能得以充分自由地展开，价值规律就越能得以充分的实现。竞争的主要手段，在同一生产部门内主要是以较廉的价格战胜对手的价格竞争，在部门之间主要是争取资本超额利润率的竞争。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和展开的标志是优胜劣汰。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资源流向生产效率高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可以说，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是通过竞争机制来实现的。竞争机制对于每个市场主体而言，都意味着存在亏损、破产、淘汰的可能性，所以有人又从市场主体遭遇利益风险的角度，把竞争机制表述为风险机制。

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先决条件是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经营决策权。因为企业只有独立决策，才有可能根据市场状况决定自己生产方向、从实际出发调节生产规模，从而有可能参与市场竞争。

第二，完善自负盈亏制度。一方面，企业法人应能够在竞争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市场竞争的实质是竞争经济利益，承认企业法人的财产权，这是企业积极参与竞争的动力。另一方面，企业应对自己的经营状况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风险。只有当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利益实体时，竞争机制才能通过触动经济利益这个企业中枢神经，使企业对市场的各种信号产生积极反应，真正变市场的压力为提高生产力的动力。

第三，保护公平竞争，防止垄断。垄断是竞争的直接对立物。行政性分割而形成的市场垄断、地方本位主义的资源垄断，单位本位主义的人才垄断等，都会阻碍市场竞争，必须消除。

第四，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竞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经济地位的平等性，必须相互尊重商品所有权，才有可能平等竞争，市场主体的经济权益需要国家法律来维护，所以，必须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来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

2. 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工资机制。市场一般关系同公有制结合产生的市场机制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劳动市场的工资机制上。工资机制是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的工资变动与劳动力供求变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作用，它是劳动市场的基本机制。工资机制和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机制、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机制相互联系，共同在运行中调节

社会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工资不是像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那样，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在本质上是做了必要扣除（国家税收、企业发展基金和公有资本适度的利润）之后贯彻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的货币表现；体现的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那种表面平等（劳动力商品的等价交换关系）而实际上不平等（剩余价值完全不归劳动者所有）的经济关系，而是一种实际上平等的等劳交换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的工资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资机制不同，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可以用公式表现为：$h = v$，即工人的工资在市场关系作用下，围绕劳动力价值 v 进行上下波动。而在公有制经济中，自主劳动者的工资可以用公式表现为：$h = v + n$，其中 n 是工人创造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工人的工资不但包括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还可以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市场关系对 h 的高低也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直接决定工资，而是通过企业经营效益（这与包括职工参与在内的企业决策有关）好坏来对工资高低起作用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工资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是多方面的。

其一，促进经济发展。这种作用表现在，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因为企业只有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经营，职工的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生产的商品才能尽快有效益地销售，职工才有可能获得较多的报酬。同时，可以促进劳动者努力工作，因为劳动者支出的劳动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劳动者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获得的工资就越多。

其二，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工资发放的总量增加或减少，社会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就会增加或减少。职工个人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能是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减少职工数量的结果，这会减少社会总需求；也可能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这会提高社会的总供给。因此，工资的变动是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联系着的。

其三，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工资机制的这个功能，是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别而实现的。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某一部门或企业的同等职工工资水平高于或低于其他部门或企业时，劳动者从自身物质利益考虑，可以进入或者退出，而在双向选择的劳动市场中，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也有选择优秀劳动者的较大余地，这样工资机制就有利于同等劳动力流向效益较好的部门或企业，这是工资机制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原因。

工资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比较成熟的劳动市场条件。

第一，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劳动者可以自由择业，自由流动，不同部门和企业的工资水平变动，才能对劳动力资源发挥调节的信号作用。

第二，劳动市场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信息系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都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对方的信息，如劳动者方面的技能、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等，企业方面的工资水平、在同类企业中的效益比较等，还有国家的工资收入政策，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公平地双向选择。

第三，就业指导和对劳动者的社会培训系统。在经济区域全球化，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进步的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发挥自己的优越性，主动地加强对劳动者的社会培训，建立职工的再就业机制，力求从劳动者自身方面消除就业的障碍，促使工资机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市场机制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的特点

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在价值规律作用下，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来实现的。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市场上的商品、生产要素供给和需求的变化，通过商品价格、市场利率的变动，引起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变动，从而引导经济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来实现的。这种调节机制是动态的。市场供求关系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趋于平衡；但是市场因素的变化是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当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性越过平衡点时，市场供求关系又会出现不平衡，于是，市场机制又开始新的一轮调节过程。市场机制就是这样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调节经济资源在不同部门、企业之间的分配，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

市场机制在促使经济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过程中，显示出几个特点。

其一，具有物质利益的诱导性。市场体系中的各种机制，都是与市场主体自身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正是市场机制中包含的物质利益关系，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形成了某种诱导。

其二，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是无数市场主体独立决策，在相互的交换、信用关系中间接形成的，价格、利率等市场信号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具有自发性，这使市场机制变动方向的预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其三，市场机制作用的系统性。市场商品价格的变动势必影。向企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出，所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利率机制、工资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体系中的各种机制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机制都不可能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其四，市场机制中的信号传递具有横向性。市场关系是流通关系，不同于直接生产过程和行政管理中的垂直等级关系，市场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之间发生的是平等的横向联系，反映这种横向利益关系的信号才是真实的市场信号，才能使市场机制客观地运行。纵向的、垂直的行政性和指令性的信号，除非能真实地反映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干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使其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不利的影响。

由此可见，我们应当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市场机制的客观运行方式。客观的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但是，只要我们理解了它的特征，就有可能提高它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作用的盲目性。

第二节　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

一、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从市场主体相互利益关系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机制是整个市场机制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作用的效果，也体现在竞争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上。只有实现公平的竞争，才能保证竞争机制，从而整个市场机制的有效实现。在市场体系中，所有市场主体在交换、信贷关系中，经济地位都是平等的，经济决策和市场选择都是具有自主权的，各自的所有权都应受到交易对方的尊重，不容侵犯，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竞争或者正常竞争，形成这样一种维护正常的、公平的竞争秩序，才能使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给国民经济带来繁荣。

但是，一方面，市场机制的运行既然具有自发性，在现实的竞争活动中，一些市场主体就可能出于牟取暴利或其他不良目的，往往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在销售中搭售或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强买强卖，侵犯交易对象的自主权；“走后门”，妨碍竞争对手正常经营，强迫性交易，实行商业贿赂，搞限制自由竞争的垄断，破坏平等交换和竞争关系；假冒伪劣，制造虚伪广告，坑蒙拐骗，盗窃他人商业秘密，侵占交易对象的所有权等。这些是发生在市场主体本身的不良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市场运行的无序性。另一方面，来自市场关系外部的超经济的强制，也可以导致市场运行秩序的扭曲，阻碍公平竞争机制的实现，如地方封锁、行政性的垄断、行政性的定价，粗看起来是人为地建立起一种“市场秩序”，但是却造成流通渠道不畅，市场关系的平等性受到扭曲，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在同一市场不能展开公平竞争，使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起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就必须克服来自这两方面的阻力，建立符合公平竞争要求的市场秩序。

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有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市场机制按市场关系的本性有秩序地运行，除了必须维护市场主体在交换、信贷关系中的各种经济权益，克服上述阻碍公平竞争的阻力之外，还必须保证市场信息传递方便，交易对象的使用性能、品质等信息诚实、公开，流通渠道畅通无阻，竞争规则公开透明等。所谓市场秩序，就是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各种市场规则与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维护市场有序运行，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根本条件。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起来了，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有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市场的一般规则

市场秩序靠市场规则来形成。所谓市场规则，就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有序化、规范化、制度化所要求的，所有市场主体都必须遵守的经济行为规范。它们通常通过一定的法规、公约等形式来确定。市场的一般规则主要包括市场进出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仲裁规则。

1. 市场进出规则。它是指市场主体进入或退出市场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主要内容是：①规范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资格，规定主体进入市场应具备的条件，确认其合法身份；对主体经营的对象在包装、规格、商标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实行标准化，并按国家环保、卫生、质量等一系列标准进行检验，符合规定，才能进入市场。②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功能，明确各市场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项目、经营渠道，并且根据市场进出规则的要求，不能随意变更。③规范市场主体退出市场的行为，主体退出市场，要符合市场退出规则。市场进出规则既可以把那些不应当进入市场的主体及其商品（如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及其销售者）堵在市场之外，又可以防止那些已经进入市场之中的主体及其商品以投机目的退出市场，以便防止垄断，保护市场的有效竞争。

2. 市场竞争规则。它是以法律形式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主要内容是：①保证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主要包括，消除地区条块分割和封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所形成的各种阻碍竞争的壁垒；消除行政性行业垄断，排除各种超经济的特殊待遇，防止非公平竞争因素的发生；维护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市场主体实行公平税负原则和公平价格原则，以确保公平竞争。②规范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禁止非法竞争手段，诸如用欺骗和虚假广告、信息的方式招揽、影响顾客，盗用和模仿别人的商标，强制顾客接受搭售的附加商品，损害别人商誉，散布有关竞争对手的谣言，阻止第三者同竞争对手的正当业务往来，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压价供应，单方面地转移风险，使用行贿、送礼等手段，都属于禁止之列。③主体经营对象的市场信息公开化。商品公开明码标价，商品构成成分、性能、达到的使用效果、质量等级等信息，实行市场公开，严禁假冒伪劣商品。

3. 市场交易规则。它是各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应遵守的准则与规范。应当说，市场进入规则和市场竞争规则已经对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做出了一系列规定，把市场交易规则单独列出，是为了强调对市场交易双方关系行为的法治约束。主要是：①交易公开化，一切交易活动都要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不容许走私贩毒等非法交易。②交换必须遵守法定规则，如经营场地规则、计量器具规则、批发和零售规则等，以形成良好的交易秩序。③诚信经商。禁止囤积居奇，制造市场短缺或涨价风潮。

4. 市场仲裁规则。它是指市场主体在交易中发生争议，市场管理机构对当事人做出有约束力的裁决，所遵循的法律、法规。各市场主体进出市场，开展竞争与进行交易活动，难免发生矛盾和纠纷，它们的协调和解决，不能没有市场仲裁规则，执行这个规则的机构是市场仲裁机构。这个规则必须体现法治原则。

三、重视建立各类市场的特殊规则

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是我国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市场机制的运行中，目前依然存在假冒伪劣产品、恶性降价竞争、招标中的“暗箱操作”、利用经济合同骗买骗卖、商标侵权、广告欺骗、走私贩私等问题，尽管它们经过市场治理已经有明显减少，但是仍然不可忽视。要充分认识，这些问题与市场规则的不健全是有关系的。因此，完善市场规则是完善和发展市场体系的重要方面。在市场体系中，各类市场机制运行有其特殊性，应当针对各类市场实践中发生的矛盾，建立相应的特殊规则，才能更好地完善整个市场体系的规则。

——商品市场规则。着重完善禁止走私犯毒、假冒伪劣商品等方面的规则。同时，要对某些特殊产品做出专门规定，如禁止出口文物；禁止在市场出售野生动物、重要植物、水产、矿产等生物或资源性产品；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禁止淫秽制品、“黄色”服务项目等。要严格对违规者的处罚。

——金融市场规则。要防止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尤其要规范正在发展过程中的证券市场，应制定有效规则，制止大机构操纵股市、恶性炒作、“内幕交易”等过度投机，导致市场过火波动的恶劣行为。

——劳动市场规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市场的规则，关系到维护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赋予劳动者的合法经济权益，必须贯彻国家宪法和劳动法规定的原则。核心是完善体现劳动力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劳动用工关系的合同规则。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劳动安全、社会保障（伤残、医疗、养老等）、辞职辞退等方面，均做出维护双方合法经济权益的规定。对于公有制企业来说，劳动报酬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对于非公有制企业来说，劳动报酬必须遵守国家的收入政策，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房地产市场规则。房地产市场与国土资源管理联系紧密，必须由政府有关部门实施统一管理。有必要分别制定和完善涉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一级市场规则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二级、三级市场规则，以确保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的正常实现。通过完善房地产市场规则，制止凭借行政权力随意“批租”，造成国土资源的滥用，杜绝土地所有权应实现的经济价值流向私人；形成公平竞争的房地产市场，促进土地的有偿转让和有效使用。

——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规则。技术市场关系到知识产权，在涉外关系中，有些知识产权关系到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完善技术市场规则，需要在技术使用价值和技术形成成本价值的鉴定、产权的维护及其期限、各种知识产权的出让价格的确定方式、产权使用收益的分成，以及禁止出口和禁止市场交易的重要知识产权等做出规定。信息市场涉及信息产权的所属和真实程度的鉴定，更重要的是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信息市场本身是现代市场体系中产生的新事物，需要重视实践，在解决发生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

第三节　市场管理

一、用法律手段管理市场

正如体育运动竞赛的规则需要裁判对运动员监督和执行一样，市场规则也必须有专人对市场竞争主体进行监督和执行，这就是市场的管理。市场管理是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在概念上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不同的。宏观调控是国家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管理，是经济总量管理，而市场管理则是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通过其授权的组织机构及其专职人员，遵循市场规则，对市场主体及其经济行为给予引导、监督和执行违规处罚。市场管理是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市场发育固然依赖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不能离开国家的规范性管理。政府管理市场的方法主要有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本节分别对这些主要的市场管理手段进行阐述。

法律手段是市场管理的核心手段。这是因为市场主体具有广泛性、复杂性，而国家制定的法律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相对稳定性和强制性。只有完备的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执行市场规则，才能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形成权威性的约束，才能最有力地整治违反市场规则的行为。

1. 建立和完善规范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法律体系。一是用法律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要求市场主体取得法人资格必须执行法定程序；每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都必须履行市场规则要求的义务，承担相关的责任；同时，每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其符合市场规则的权益都受到相关法律的维护。在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方面，我国已经颁布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律。二是用法律制度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遵守自主、公平、诚信等原则。在这方面，我国已经颁布了《合同法》、《反不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这些法律已经为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实践中，有关的法律制度必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2. 严格司法管理。一是要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建立和完善各种市场管理的司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强和改善执法监督。同时，要发展商会、行业协会，发挥这些中介组织在行业中督促有关成员遵守法规的自律作用，并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公证部门等中介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它们在执法中的监督制约作用。二是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维护国家和广大合法经营者、消费者的经济权益；对于违反国家市场法规的经营者，市场管理的执法机构要依法没收其全部非法收入、视其情节轻重依法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

任。

3. 加强市场主体的守法教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发挥自身优势，依靠广大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群众，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为此，有必要加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加强法治方面的思想教育，增强所有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和遵守法纪的自觉性。

二、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

国家管理市场一般使用间接的方式，因为与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市场关系相比，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或者主观因素干扰客观的市场运行机制，促进市场竞争机制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展开。使用间接的方式，需要运用经济手段。主要是对价格实行控制性管理，以及运用利率、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

1. 对价格的控制性管理。价格的变动对于传递市场供求信息，改变生产要素在部门和企业间的配置比例，调节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实现供求平衡和指导消费等，都有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个别价格必须由企业制定，这是因为直接生产者对生产成本的耗费最清楚，生产者定价，个别价格才有可能反映个别价值的客观要求；而市场价格则应当由大量的个别商品供给者与需求者构成的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这样的市场价格才能反映在市场竞争中确定的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这样来确定商品价格，才能形成反映价值规律要求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但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并不意味着不必监督和控制价格。市场关系存在自发性，它不会自动维护民族经济整体利益；不会自动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在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社会分工方面具有滞后性，也就是它往往以一部分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代价，在发生社会再生产部门间出现重大不平衡时，甚至会以很大部分的浪费为代价，来调整社会再生产。因此，国家有必要在尊重价值规律前提下，对市场价格实行控制性管理，换句话说，国家一般不干预企业自主定价，但是，需要从控制市场自发性，使其不使人民利益受损害的角度，对市场价格实施控制性管理。主要的管理方法是：①规范和监督企业制定价格的行为。在制止垄断价格、倾销价格、恶性降价竞争、人为的价格攀升等方面，发挥管理作用。②控制价格水平。一种是某种行业的价格水平，出现明显的大幅度变动，会影响全局，这就需要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干预；一种是市场价格普遍大幅上涨或者跌落，这往往需要结合宏观调控，综合治理。③根据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考虑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市场状况，国家对极少数商品和服务规定保护价、指导价，甚至直接定价。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国家规定保护性的收购价。对具有经济战略价值的商品如棉花，国家规定指导价。指导价是一种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对具有资源垄断性的商品如邮电、能源、公共交通、自来水等价格，则由国家的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按一定程序和权限定价。④国家对具有全局意义的少数商品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和储备投放制度。为了防止这些商品价格过度波动，可以在供过于求时，用调节基金购买这些商品做一定储备，而在供不应求时，则将储备商品投放市场。

2. 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一是用好税收杠杆。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出

发，可以针对市场一些商品供求失衡的状况，适当运用不同税种和高低不同的税率，开征或停征某种税种，扩大或缩小某些税种的征税范围，或对不同行业的同一税种实行差别税率等办法，达到限制或鼓励某种商品的生产，调节市场关系的目的。二是结合宏观调控用好利率杠杆。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准备金率等手段，可以调节商业银行利率，调节资金信贷，进而调节商品流通。提高利率可以吸收居民手中的消费基金并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达到缓解市场压力之目的；降低利率可以起到刺激企业贷款和引导居民消费的作用。

三、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场

遵循价值规律，要求国家不对市场运行实施行政性的干预。但是，这不是说在市场管理中不能运用行政性的手段。为了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关系，行政性的市场管理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它不是指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定价，不是阻碍市场的自主经营、自主选择、自由竞争。市场管理的行政手段，是指市场管理机构凭借国家的权威，为维护市场秩序，例如制止乱收费、乱加价、乱摊派、不明码标价等，而采取的发布命令、规定、条例等具有约束力的手段，它具有强制性和时效性。在一定情况下，行政手段能够起到经济手段起不到的作用。

用行政手段进行市场管理，要求落实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相应的行政管理规则；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建立市场监测信息网络，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对行政管理范围内的市场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同时，要坚持依法行政，防止滥用职权。

上述各种市场管理手段，需要在实践中综合加以运用。值得重视的是，在市场管理中，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各种管理，还应当发挥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合理的方式，组织群众进行舆论监督和参与市场管理。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维护和执行法制，这是形成健康市场秩序的可靠保证。

市场管理手段是要具体的人来执行的，管理人员的素质关系到市场管理的效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市场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现有管理人员的进修、培训。管理好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类市场，需要管理人员具有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性，牢固的法治意识，在此前提下，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不懂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缺乏有关商品的知识，难以管好各类商品市场；不懂金融理论，特别是国际金融理论，不能管好金融市场；不懂现代科技发展状况和知识产权理论，不能管好技术和信息市场；不懂得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同劳动市场的关系，缺乏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观念，难以管好劳动市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和所有制理论，难以管好房地产市场。总之，尽快培育一支又红又专的，既懂得专业、又懂得管理的市场管理人才，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市场体系及其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

第十六章　国内市场国际化与国际竞争

社会主义经济主体要在市场环境的经济实践中实现自身利益，不仅要从国内经济的角度，弄清现代市场体系及其运行的机制，而且要从世界经济的大视野，弄清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新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内市场日益趋向国际化，而国际市场的新变化，又迅速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本章将从市场经济固有的开放性展开，分析当代中国开放性的市场环境，并阐述如何遵循国际价值规律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开辟多元化国际市场的战略意义和目标。

第一节　国内市场国际化

一、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第十四章已经说到，市场必然具有开放性。在商品生产普遍化了的条件下，在市场竞争中，生产者为了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必然要在各个地区之间乃至国外寻求有利的投入、产出场所；为了实现商品价值，必然要寻找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商品的销售；生产者投资规模的扩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些都决定了市场开放性扩张的发展态势。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引入社会固定资本要实现补偿的因素之后，明确地指出，“必须进行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看做社会总资本运动克服内部矛盾的重要条件。他阐述的这个原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事实上，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市场都是向国际延伸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必然趋于频繁，这必定促使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发展起来，并不断深化。因此，开放性的市场必然具有国际化趋势。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市场的发展是从国内逐步向国际拓展的历史过程。国际市场逐步产生，并与国内市场交融。我们知道，简单的商品流通就“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人类社会发展到15、16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兴起，商品生产普遍化了。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逐步向国外拓展。资产阶级利用市场的对外拓展来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487年葡萄

牙人迪亚思发现非洲好望角，1493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这些事件都与拓展市场空间相关。市场的对外发展不断拓宽社会分工领域，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并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度。到1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世界市场”。

市场的对外拓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半世纪前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力获得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这里讲的社会分工的优点，正是与开放性的、国际化的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像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较快的发展，是与它们利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社会分工制度的优惠分不开的。

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是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开放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它又将促进市场经济各国的市场进一步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资本的流动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增加，推动着各国投资主体面向世界；各个国家和企业在科技与人才的竞争中，引导着许多核心技术和人才的国际化流动；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国民待遇等规则，促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逐步走向秩序化。可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推动着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密切相联。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发展是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只要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就必定形成国际化的市场。也就是说，在现代的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国内市场中既有本国投人的资本、商品和劳务，又有外国投人的资本、商品和劳务，其市场已是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

二、国际化市场的特征和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国内市场已经进人了国际化市场的新阶段。与封闭的国内市场相比较，国际化的国内市场通过国际化的经济循环，大大扩张了市场容量和经济增长空间，从而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也产生了新的市场作用。主要有下述表现。

1. 资源流动的国际化。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实际上拓展了市场交换关系的空间，世界范围的经济资源可以在中国国内市场流进或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和矛盾，一方面，使我国缺乏的资源通过国际经贸关系获得供给；另一方面也会使我国优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使民族经济从国际经贸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效益。

2. 市场规则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市场交易，由于牵涉各国民族经济的利益，势必

要求形成国际市场的规则。这就要求国内市场规则的国际化，例如，中国加入了WTO，国内的市场交易也必须遵守自由竞争原则、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等等。同时，市场国际化也推动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及交易方式的国际化发展，各种商品的检验、包装、售后服务等等，必须按先进的国际化标准，才有可能顺利地开展交易。市场规则的国际化将促使国内市场的秩序，按国际先进的标准得到改进和完善。

3. 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带来了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此会产生所谓“鲶鱼效应”，促进民族企业发奋图强，变压力为动力，在同国际强手的竞争中发展自己。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中国民族企业直接面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商品和高质廉价商品，必须确立国际竞争理念，善于收集国际经济信息，分析世界市场行情，依靠科技进步，自主开发高新技术，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利用国际经济合作，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同时，国家维护民族经济的职能也加强了，既要适应国际市场规则，又要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这对政府发挥好经济职能，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需要国际化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

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必然需要国际化的市场。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创造丰富的物质与文化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这就要求广泛地发展国际经贸往来，利用外国的优良经济资源。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开放的市场体系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单位产品成本最小），并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国际开拓有利于国内产品的丰富。因此，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目的。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通过国际化的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可以充分学习和利用人类社会各种优秀的文明成果。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曾经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利用国际市场交往，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发展国际化市场，并开拓国际市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经济运行的相互联系趋于紧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离不开世界市场。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走封闭式的道路，不能利用全球社会分工的优惠，经济发展必然落后。“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一个系统只有不断地与外界交换信息才能健康地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个宏大的经济系统，必须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充分吸纳全球性的经济资源，扩

充本系统的能源和信息循环，才能在更加广泛的空间发展和壮大自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关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已经顺利地加入了世贸组织，市场的国际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取得重要成就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积极地推进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对外开拓国际市场。

第二节　当代国际市场的新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市场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开拓国际市场，寻找更多的机遇，这就必须深入了解当代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新发展是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联系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本书第十六章将进行阐述，这里主要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推动当代国际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当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推动下，各国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交错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社会分工在全球展开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经济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国际市场获得了显著的拓宽和加深，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都得到空前发展。国际经济往来的时间显著缩短了，在现代国际清算体系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一个鼠标的点击，就可使巨额资金从地球的一端流向地球的另一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WTO 等国际经贸组织推进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跨国投资和国际经济与技术的合作也得到显著的发展，由此导致国际市场的发展出现许多新的变化。

——市场结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方面，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不断增加，使国际贸易结构出现升级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国际化的市场机制向着要素配置领域渗透，金融资本运营的国际化，信息与中介机构的跨国发展，使国际市场更趋活跃而又复杂。仅在金融领域就呈现出国际信贷市场、国际债券市场、国际股票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以及国际期货与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等名目繁多的市场类型。国际市场结构的演进为资源的全球性配置，提供了灵活的手段和渠道，同时也增添了市场动荡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生产经营的国际化扩张，带来国际市场组织的新演变。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与兼并的发展，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贸易，使其成为国际市场“突出”的行为主体，成为国际市场中的垄断力量。目前跨国公司的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产值的 40%，世界贸易的 50%、工业研究的 80%、生产技术的 90%。它们左右着世界技术转让的 3/4 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 90%。

——国际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发展，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起到约束国家部分主权的

作用。一系列国际间双边和多边性自由化合作的协定，本身就是对合作各方经济主权的约束。加入 WTO，意味着一国关税政策受到限制；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意味着国家金融控制权的削减。例如，在欧盟这样一个经济一体化的区域，成员国的关税主权已上交给欧盟总部，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使成员国失去了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制定权；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表明成员国的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可以自由流通，15 个成员国的经济边界已经基本消失；共同财政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各国财政主权的部分让渡；欧元的流通更是各国货币权的"上交"和"分享"。在国际化的国内市场，国家行使经济主权、维护民族经济安全和执行国际经贸规则的矛盾，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国际市场的发展正跨越社会制度的壁垒，逐渐形成统一的全球性市场。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所证实。原先实行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已经和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根本经济制度的差别，并不妨碍各国经济通过世界市场发生联系。那种"冷战"时期造成的世界市场人为分割的状况，已经得到逐步化解。国际市场更加具有全球性意义。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中国将积极促进由社会制度因素造成的世界市场分割的融合。

二、国际贸易结构的新变化

国际贸易结构是指各类商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它是国际市场发展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各国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加深与扩展，国际间的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1. "水平分工型"国际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往殖民地经济模式中的"垂直分工型"（从原材料到产成品之间的纵向分工）国际贸易格局开始向"水平分工型"（不同产成品之间的横向分工）转变。这是与各个国家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各自注重竞争优势的培育相联系的。从 1980 年到 1997 年，无论在中低收入国家还是在高收入国家，商品进出口贸易中，食品、农业原材料、燃料以及矿砂与金属等初级产品的贸易比重，几乎都出现明显下降，而制成品贸易则大幅度上升（表 1）。

表 1　　世界商品进出口的结构变化（%）

项目		食品		农业原材料		燃料		矿砂与金属		制成品	
年份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商品出口结构	中低收入国家	21	11	8	2	30	10	8	5	32	68
	高收入国家	11	7	4	2	7	3	4	2	73	82
商品进口结构	中低收入国家	12	8	4	3	21	8	4	4	57	73
	高收入国家	11	8	4	2	26	6	5	3	53	7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 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年，第 198、202 页。

在“水平分工型”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贸易品种会呈现低收入弹性产品减少、高收入弹性产品增加的结构变化趋势。因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的层次会逐渐提高，食品等低收入弹性的产品比例就逐渐降低，耐用消费品等高收入弹性的产品比例就上升，于是导致国际贸易结构演变的所谓高收入弹性化。耐用品的加工度高，有助于推动社会分工的深化发展，这又引发了许多生产职业和新产品的产生。1949 年，美国劳工统计局《职业展望手册》中，只有 288 种职业统计，而在 1974～1975 年的《职业展望手册》中已经包含了 850 多种职业统计，几乎增加了两倍。这种职业多样化的发展，反映了贸易产品结构更加趋于多样化。这种水平型国际分工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对外扩大开放，在广泛的领域，利用国际市场提供的多样化的产成品。

2. 国际商品贸易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在产成品贸易中，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所占的比例正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而低技术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增长势头则呈现出明显减缓的趋势。在 1980～1990 年期间，初级产品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 2.3%，在 1990～1995 年期间则降为 1.4%。在上述两个时期，高技术产品（精细化工产品、药品、高级电子产品、航空和精密仪器等）贸易量却都以约 12% 的速度在增长；中等技术产品（大部分工业机械、汽车、简单电子产品、化工产品等）的贸易量在上述两个时期的增长率分别为 8.4% 和 5.6%；低技术产品（纺织、服装、运动产品、玩具、简单金属和塑料制品、鞋类等）的贸易增长率分别为 7.7% 和 5.6%；资源型产品则分别为 6.0% 和 5.3%。可见，产品技术的先进程度已经成为影响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对中国这个具有较大科技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挑战，也蕴涵着机遇，我们必须积极实施科技兴贸的发展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把发展科技同国际贸易密切结合起来，力争在“水平分工型”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赢得有利的竞争“席位”，拓宽经济发展空间。

3. 国际技术贸易明显增大。科学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及其在经济中的应用，带动了国际间的技术贸易的发展。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可以给技术出口国带来高额利润收入。对于技术进口国，只要从实际出发，合理利用技术贸易，

也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因为通过购买技术，①可以较快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生产成本；②可以减少自己研究开发的技术风险和经费，意味着资本的节约；③可以通过消化吸收，把引进的技术转化为本国的创新能力，并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的增加。所以，合理进口技术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购买技术、消化吸收及推广应用的总费用约为60亿美元，而发明这些技术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会高达1800~2000亿美元，技术引进推动了日本生产的扩张，1955~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了6.6倍，其中钢铁工业扩大9倍，机械工业扩大18.3倍，汽车工业扩大70多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改造一旦取得成果，就可以作为本国技术或产品出口取得经济效益，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对引进技术的再转让，就获得了218亿美元的高额回报。日本的经验是我们值得借鉴的。近年来，国际技术贸易不断增大，这可以从世界各国申请专利数量的显著增加体现出来，欧洲专利局在2000年接到的专利申请超过12.4万件，比1999年增加约16%。世界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专利交易的正常化运作，标志着技术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遇，借助国际技术资源，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增强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4. 国际间服务贸易得到迅猛发展。一般的服务贸易是指一方提供劳务或服务，另一方支付劳务费的交易。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间的服务交易，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根据提供服务的方式界定范围，包括：①跨境交付，如在美国的律师为在英国的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②境外消费，如消费者到境外旅游、求学；③商业存在，如一成员国的银行或保险公司到另一成员国领土内开设分行或分公司，提供金融保险服务；④自然人流动，如某先生是甲国的律师，他来到乙国后，没有设立事务所，而直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一般认为，商业存在是四种服务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方式。国际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第三产业（其中服务贸易占重要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0%，其中34个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1%，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0%，22个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5%左右。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中约有2/3是由服务业创造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贸易都是以商品贸易为主，但是在近20多年里，国际间服务贸易的年增长率超过商品贸易的年增长率，20世纪末，世界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的总额之比已经达到1:4。当前的贸易结构正在迈人商品与服务贸易并重的阶段，最终可能达到以服务贸易为主、商品贸易为辅的贸易状态。在1980~1996年间，中国和美国之间服务贸易出口收入和服务业就业人口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见下页表2）。服务贸易作为一个新型的贸易领域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应当把握世界经济脉搏，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贸易结构，高度重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这种新趋势，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

表 2　　中美两国服务业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收入（1980～1996 年）

（亿美元，万人）

年份	中国服务出口额	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	美国服务出口额	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
1980	19.0	5444	404.4	6474.8
1981	24.0	5856	499.7	6501.7
1982	25.1	6001	584.2	6741.2
1983	24.8	6516	583.8	6882.4
1984	28.1	7648	648.0	7067.9
1985	30.6	8359	662.6	7252.4
1986	38.3	8811	781.5	7496.7
1987	43.9	9395	877.9	7749.2
1988	48.2	9936	980.4	8036.3
1989	45.5	10129	1129.0	8300.7
1990	58.0	11828	1304.7	8449.7
1991	69.0	12247	1449.9	8450.4
1992	91.9	12979	1565.0	8537.0
1993	111.5	14071	1642.1	8736.1
1994	162.37	15456	1756.1	9025.6
1995	184.30	16851	1894.6	9292.5
1996	201.83	17901	2019.7	9511.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和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有关各期。引自程大中：《服务业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世界经济》，2000/11，P50。

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与贸易管理

在国际市场的新发展中，各国经济不断交融，自由贸易逐渐成为国际间对外经贸政策的主流，但是各国从各自民族经济利益考虑，也都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干预对外贸易，从而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各国实施贸易管理并存，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新特征。正确认识这一特征，有助于我们在开拓和利用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好地维护我国民族经济利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1. 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占主导地位，他们以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基础，在对外贸易中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各国政府对进出口贸易不做限制，也不为其当事人提供各

种优待和特权，以此消除各种贸易障碍，使商品和服务能够在国际间自由地流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他们具有国际竞争的经济优势这个基础之上的，因为国际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必定是生产率高的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多利益，必定是经济资源流向生产率高的地方，这对他们有利。20世纪中期以后，在发达国家推动下，国际自由贸易逐步扩大。在60年代初，OECD国家之间的进口数量限制取消了90%，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在1961年取消了工业品的进口数量限制。1995年，世贸组织（WTO）在1947年形成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基础上成立，在成员国之间确立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原则，使自由贸易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中国已经在2001年正式成为该组织第143个成员国，目前已有144个国家和地区加入该组织，世贸组织成员的对外贸易已经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95%。与此同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区域性经济与贸易联盟的形成，也降低了这些国家平均关税水平，形成更高层次的多边自由贸易方式。许多发达国家在大幅度削减关税的同时，还降低或撤消非关税壁垒，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进口数量限制，放松或取消了外汇管制。但是，在看到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的变化和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需要，是有选择地实施和调整自由贸易政策及其实施范围的，这就导致国际贸易自由化具有不平衡性。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大大超过了它们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化；区域性集团内的贸易自由化明显超过集团对外的贸易自由化；不同种类商品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利用世贸组织和区域经济集团的国际贸易规则，灵活地对外开拓国际市场。

2. 国际贸易管理中的保护主义。各国参与国际自由贸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并不是所谓的全球福利最大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它们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也存在比较优势引起的竞争，它们为了本国利益，并没有完全放弃一定形式的贸易保护，当自由贸易与它们本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们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预，实施贸易保护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行较为系统化的管理贸易制度。所谓管理贸易，就是在对外促进自由贸易，扩大外国市场的同时，政府对本国的国际贸易进行干预、协调和管理，实行对本国经济利益的保护。管理贸易有时也被称之为“不完全的自由贸易”和“不断装饰的保护贸易”，它具有以下几种基本形式。

（1）非关税壁垒。在贸易自由化推进过程中，关税大幅度下调，它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于是，各国纷纷设置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与关税壁垒相比较，非关税壁垒体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同时也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歧视性，受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相对较小。传统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主要包括进口数量限制、外汇管制、国家垄断以及进口许可证、当地含量规定等形式，随着WTO以及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这些形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是又出现新型的非关税壁垒。技术标准、卫生与环保标准以及劳工标准等正成为当代贸易壁垒的新趋向。

（2）管理贸易制度。美国是实施管理贸易制度的主要代表，1974年贸易法案中的

"301条款"授权总统，规定给对美国出口实施不公平待遇的国家进行报复；1988年"综合贸易法"更是以反对一切不公平贸易为由，加强贸易保护，其中的"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分别要求政府，对公平贸易做得不好和对美国知识产权做得不好的国家，进行谈判和报复。在美国，涉及管理贸易的法律已经多达1000多种。这是贸易保护主义新形式。

(3) 单边管理和双边协商。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倾向得到加强，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就更多地借助于双边贸易谈判，有时甚至凭借其经济与政治优势，采取单边贸易制裁的方式，排斥多边自由贸易，以达到他们所谓"公平、互惠"的目的。

(4) 维护本国垄断公司利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代表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当本国跨国公司利益受到威胁时，政府往往以各种借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例如，美国钢铁工业处于衰落状态，多年来政府为保护钢铁垄断组织的利益，就对进口钢铁频频征收反倾销税，近年来则提出要对进口钢铁提高关税。

国际贸易管理中的保护主义客观存在，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为了更方便地打开别中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他们对外国进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与对外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更是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3. 对策：积极参与国际自由贸易与实施国际贸易管理相结合。在上述国际贸易的态势下，我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从维护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利益出发，科学地采取对策，趋利避害，既要积极参与和应对贸易自由化，又要善于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保护自身的利益。

要充分认识，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趋势看，国际贸易自由化是主流。在以往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贸易的增长大都快于世界经济的增长。WTO1998年年度报告认为，"不管该国的发展水平如何，开放的贸易政策都对（经济）增长有益。"这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我们要积极扩大开放，发展对外贸易，要善于利用现存的国际贸易自由规则，冲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设置的障碍，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要充分认识，当今贸易自由化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他们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此，一方面，我们要制定国际贸易战略，增强我国民族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创造条件，到国际市场与强手竞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措施，以维护和促进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应根据本国产业经济的结构及其优劣状态，选择具有综合优势或潜力的主导性产业，进行产业的开放式组合和适度的贸易保护管理政策。

要充分认识，国际自由贸易与实施国际贸易管理两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自由化能给我们拓展市场空间、利用国际资源提供机遇，但是也可能带来民族经济受外国先进商品冲击的风险。而贸易管理固然能发挥维护民族产业的作用，但是过度管理与保护则会起保护落后的作用，最终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有专家指出，"参与世界经济会带来巨大的效益，但需承担某些风险。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越紧密，

它得到的潜在效益就越大。但是，如果政策不适当，它就越容易受到外来冲击的损害"是有道理的。所以，必须把握好扩大开放和贸易管理的关系。应该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产业进行贸易保护，由此促进更多的产业获得健康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实施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同国际贸易管理制度的有机结合。

第三节　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竞争

一、国际价值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弄清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新变化，是为了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民族经济。而国际竞争是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展开的，应当深刻认识国际价值规律及其在国际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1. 国际价值和国际价值规律的含义。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国际价值这个重要范畴，他指出，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算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一个国家的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国际市场中某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是由具有国际水平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的，这就是国际价值规律的基本含义。

2. 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他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一定历史时期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商品国别价值低的产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而商品国别价值高的产业则处于劣势，由此也就形成国际经济关系中一定的贸易结构和国际分工格局。商品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比较的结果，是衡量一国某种产业能否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尺度，它直接显示出各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引导着各国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降低成本；不断寻求更为低廉的要素和更加有效的结合；不断寻找新的更加合适的投资场所和更加有效的企业组织方式，由此不断推进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的演进，也推动着世界经济不断发展。

应当看到，与国内价值规律的作用相比较，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较多地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各个国家对民族产业的保护政策、各民族的信仰与习俗差异等诸多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商品和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流通，由此使国际价值规律的调节与引

导作用受到区域割裂的限制，这些会使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扭曲。

3. 国际价值规律理论的指导意义。国际价值体现了世界市场客观存在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价值在国内价值的基础上形成，它作为国内价值的延伸，使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这种价值的属性得以最充分的展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规律，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是指导国际贸易的科学理论基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俄林—赫克歇尔贸易模型等国际贸易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必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那么，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则是从劳动价值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律和世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真正动力，而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比较，则为各国发展国际贸易，制定国际贸易战略，提高国际竞争力，争取比较经济利益，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国际价值规律理论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民族经济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就必须面向世界市场，从整体上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市场竞争是激烈的，比起国内市场竞争来，竞争对手多、实力强，规则更为严格，这就对我们的商品和服务质量、竞争策略、商务能力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比较优势，必须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此，必须遵循国际价值规律，从多方面提高国际竞争的能力。这里提出若干原则。

1. 价廉物美、以质取胜的原则。以尽量低廉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和性能的商品或劳务，赢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这是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在国际市场，需要更充分地把握这一规则。要确立国际商品意识。从商品价值角度，确立国际价值标准，紧紧把握世界市场与科技发展的脉搏，依靠科技进步，努力掌握和开发制造产品的核心技术，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从商品使用价值角度，研究各国市场，考虑不同国家地理、气候和民族的特点，“细分”各类国际市场需求，生产各具特色、能畅销各类国际市场的商品。要确立科技兴贸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意识、创新意识和品牌意识，切实改进对外贸易商品的质量和性能，积极创造有民族特色的名牌产品。

2. 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全球性的国际竞争，决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全面铺开”，“四面出击”，而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正确处理好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比较优势是指由本国特殊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而形成的产业优势，而竞争优势是指把资源、人才、技术与市场销售服务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产业发展优势。如果说比较优势是一种存量性优势，那么竞争优势则是一种动态的增量优势，它更多地需要人们主观的努力和发现。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利用好自身的比较优势。在资源丰裕、特色明显和技术潜力较强的经济领域，要加大开发力度，提高其市场渗透力和扩张力。同时，要面对动态变化的国际市场，善于调整比较优势，灵活机动地组合好各种比较优势资源，保

持和发展竞争优势。

3. 遵循和利用国际规则的原则。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是建立在一定的国际规则前提下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国际规则意识。因为，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前提。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和一些区域性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并签订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协定。深入了解和掌握这些组织的协作、贸易规则，遵守有关协议和公约，才能自觉和充分地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在国际交往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增强自觉性，掌握主动权。同时，有利于团结更多的国家，谋求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我国民族经济的利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挥有效的作用。

4. 学习和创新的原则。当今知识经济突飞猛进,国际上科技与产品都以更快的频率发生着变革和创新,“快鱼吃慢鱼”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趋向。在这样一种国际竞争态势下,我们必须放眼世界,虚心学习并善于消化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创造拥有民族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上加大力度,不断开拓新产品,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一定要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学习外国不是照搬照套,而是为了超越和创新。

5. 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原则。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强劲的国际竞争对手，应当树立很强的民族经济意识。在维护民族经济整体利益上，政府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实行政企分开，决不意味着可以降低政府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经济职能，问题在于，政府要转变这种经济职能的行使方式，要用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方式，实施对国际贸易的科学管理和必要的保护。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和法制管理同民族企业自主决策、参与国际竞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必将有利于培育和增强我国民族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三、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

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是指一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尽量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只同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市场交易关系。实行“走出去”战略，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形成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贸易新格局，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

1. 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的必要性、可能性。①必要性。激烈的国际竞争决定了中国的企业必须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拥有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才能减少对某个局部市场的过度依赖，才有可能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空间，增加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竞争砝码，在激烈的竞争中减少风险。单边市场倾向，只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市场的萎缩和竞争的失利。开拓了广泛的、产品层次高低不同的国际市场，我国就可以通过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在更广的经济领域获取比较利益，积累资金；就可以广泛地利用国际资沪，借助当代知识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更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开发出更多具有高科技含量和更高附加值的贸易品种，促进比较优势的转化和产业升级，从而推动我国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国际竞争地位。②可能性。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这是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的

基本保证；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现代科技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这些当代世界经济的新态势，则为我们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 我国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具有紧迫性。一个国家对外市场的结构与贸易流向与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比较优势状况密切相关。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还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下游”位置，目前比较经济优势主要还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截止 2001 年底，在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中，70.30%属于劳动力寻找型，26.39%属于市场和自然资源寻找型，3.29%属于购并型投资。这样一种国际分工格局，体现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暂处劣势地位。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区域流向，主要还是指向美、日、东南亚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参见表 3），这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依赖性。这样一种国际市场格局显然对我国具有潜在的不利性，一旦其中的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实施所谓广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与策略，就会对我国经济造成损失。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加入 WTO 的有利时机，积极扩大与欧盟、独联体等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并积极开发中东、拉美、非洲和澳洲等地区的国际市场，加快实现国际市场的多元化。这将有利于我国逐步扭转国际贸易的不利格局。

表 3　　1997～1999 年中国进出口流向国家/地区平均值

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	进出口总值	出口总值	进口总值
日　本	6162641	3130360	3032281
美　国	5511854	3753881	1757973
中国香港	4665522	3980820	684702
韩　国	2344846	773108	1571738
中国台湾	2127197	373870	1753327
德　国	1437739	716990	720749
新加坡	850041	425041	425000
英　国	674993	444157	230836
法　国	610153	269057	341096
荷　兰	596510	499269	97241
俄罗斯	577341	179023	398318
澳大利亚	554790	236691	318099
意大利	505263	258127	24713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7、1998、1999 年数据整理。转引自《国际经贸探索》2002 年第 4 期，第 4 页。

3. 把握机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代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和趋势，决定了我国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具有现实性。尽管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一时还难以形成，但多元化的国际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格局则是长期以来的客观事实，只要我们把握机遇，调整产业结构，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就完全可以实现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的目标。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市场区域多元化，也包括贸易品种和市场交易关系的多样化。而贸易品种多元化是整个市场多元化的出发点，只有不断开发新的贸易品种，改善国际贸易的品种结构，才能充分开拓、巩固和扩大多元化国际市场；市场区域的多元化是“走出去”战略的目标；而发展国际金融、对外投资和服务贸易，可以为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提供有利的条件。在信息网络技术和金融创新工程得到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发展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形式，在交易支付、物流系统等多个方面探索新的市场交易方式，拓展国际市场。

第十七章　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

从上一篇可以明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利益主体必须按照经济实践的价值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促进自己控制的整个民族经济的健康增长和发展，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本章将阐述经济增长的科学含义，探讨经济增长指标及其功能，并在研究促进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

第一节　经济增长及其指标

一、经济增长的基本含义

经济增长，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社会总产品或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指有价值的或通过市场实现的社会总财富的增长，这些增长在国际上通常是用一系列指标，如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增加，或人均产量的增长来反映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经济学界的一般共识是：①经济增长的结果或表现，是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②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各种生产要素在量的方面的扩大和质的方面的提高。③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通常是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的国民总产值或人均国民总产值的增长。

1. 要深入领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基本的科学含义，就应认真学习和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它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规律，包含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按照马克思阐述的有关基本原理，整个社会生产可以分为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社会产品价值结构分为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三个基本部分（分别为c、v、m），那么，两大部类的年产品的价值构成可表示为：

$$\text{Ⅰ}\ (c+v+m)=q_1$$

$$\text{Ⅱ}\ (c+v+m)=q_2$$

社会总产品即为：$q=q_1+q_2$。上式中，q_1为第Ⅰ部类生产的产值；q_2为第Ⅱ部类生产的产值；q为两部类的生产总额。如果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中，各种要素在组合上

发生了变化，形成一定比例关系的结构，社会再生产就可以扩大。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家把 m 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那么社会生产是简单再生产。如果把 m 分为三部分（m/x + m/y + m/z），其中 m/x 用于个人消费，而 m/y 和 m/z 分别作为要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投入再生产过程，两大部类的产品价值结构的组合就转变为：

$$\text{Ⅰ}\ (c+m/y)\ +\ (v+m/z)\ +m/x$$

$$\text{Ⅱ}\ (c+m/y)\ +\ (v+m/z)\ +m/x$$

如果这种新的比例结构能满足两大部类之间的相互价值补偿和实物更新的平衡关系，即：

$$\text{Ⅰ}\ (v+m/z+m/x)\ =\text{Ⅱ}\ (c+m/y)$$

或者从追加资本的角度表示为：$\text{Ⅰ}\ (v+\Delta v+m/x)\ =\text{Ⅱ}\ (c+\Delta c)$

那么，通过两大部类之间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都增加了。由于新组合的全社会可变资本［$(v+\Delta v)\ +\text{Ⅱ}\ (v+\Delta v)$］大于原来的可变资本［Ⅰv十Ⅱv］，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第二年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按新的比例结构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必定会大于第一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第二年全社会的社会总产品价值量，也必定会大于原先的社会总产品价值量 q，也就是实现了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2. 马克思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包含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一般原理。其要点是：

——社会总资本的积累或社会扩大再生产，是建立在单个企业资本积累或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的。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运行机制是无数单个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有机结合。正如每个企业单个产业资本的连续运行，都必须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个并列部分，依次相继不断进行循环和周转，全社会总资本的运行也是按这样的形式运行的。单个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或经济增长是一种运动，全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或经济增长同样是在运动中实现的。

——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本质是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扩大，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从，社会总产品出发。

——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取决于生产要素，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增长，而这种增长又取决于全社会剩余价值中积累与消费的分割（或积累率）。

——社会再生产的扩大与社会生产的结构或经济结构有密切的联系，只有经济结构符合社会扩大再生产要求，总产品价值构成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保证各生产部门在再生产中既实现价值上的补偿，又实现实物上的更新，才能使各部门顺利实现扩大再生产。这种比例关系至少包括，两大部类之间每年相互交换的产品价值之间的平衡，两大部类每年各自用于更新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与固定资本年损耗（固定资本每年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之间的平衡，两大部类各自的剩，余价值产品中转化为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货币储藏价值（当年要卖出的剩余价值产品）与购买追加生产要素的货币积累基金（往年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积累而当年用于购买追加生产要素的基金）之间的平衡。

——必须用劳动二重性的原理来理解社会再生产中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换、相互补

偿过程。为了实现这种补偿，社会每年都要用大量的工作日生产生产资料，所以，在理解社会总产品时，一定要注重不变资本C的补偿。不能丢掉C来研究社会扩大再生产。

——决定社会再生产扩大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映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之间技术构成关系的价值构成关系，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有机构成（c/v）。社会扩大再生产程度的提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有机构成的提高。

——在商品生产社会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交换关系是通过货币流通来实现的，因此，必须结合货币流通的有关规律来研究经济增长过程。

——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不仅取决于货币投资总额，还取决于货币投资以外的各种因素，如对现有物质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程度、对生产中各种潜力的挖掘程度以及资本在流通中周转速度等等。

3. 马克思的社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比较。马克思尽管没有把社会扩大再生产直接表述为经济增长，但是，他的社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理论所阐述的，就是目前人们通常讲的经济增长涉及的内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是西方经济学者提出来的，有通俗简单的一面，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注重应用和数量分析的特点或优点，但是在思想深度上，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揭示上，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社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科学高度。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缺乏唯物史观关于劳动二重性学说的科学指导，因而始终沿袭了斯密教条，即在研究社会再生产中丢掉或忽视了不变资本$\sum c$这个重要部分的存在和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注意从$\sum(v+m)$出发研究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只有从社会总产品$\sum(c+v+m)$出发才是全面的。

第二，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完全撇开了剩余价值率，即m/v，的比例关系，这是他们回避剩余价值剥削关系造成的，因而他们看不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是决定理论上再生产经常陷于困境的一个致命因素。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经济学家发现，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应用价值的经济增长理论或模式，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反而在向它靠近。有学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提出的国际上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及当代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式，与按照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公式得出的数量关系相比较，它们基本是一致的。并认为，最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是以琼·鲁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式。这正好说明了马克思社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理论（即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当然，我们今天还必须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的社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理论，并在如何增强其应用性上下工夫。

4.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概念上的比较。在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概念与经济发展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发展在外延上是比经济增长更广的概

念。经济发展不仅包括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等的变化；经济发展还包括了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低收入家庭营养、健康和教育情况的改善等等。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人认为，发展应该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也有人认为，发展包含四个变量，即两个政治变量——政府能力、人民参政情况，两个经济变量——经济的增长、分配或福利。还有人提出，发展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就是提高他们构建自己未来的能力。不同的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质量。这些见解众说纷纭，有助于我们在概念的对比中更深入地把握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在我国经济学界，目前许多学者也认为，应当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我们在本书中是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分开使用的。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都属于或者主要涉及生产力的范畴，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说明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后者则着眼于从一个较长的过程，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发展既然有较长的时间过程，就不仅要涉及经济或生产过程，还要涉及生产关系、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所以，经济发展是更广泛的概念。

二、经济增长的现代指标

经济增长要通过经济指标来反映，经济的健康成长则是通过科学的经济指标来评价的。指标使用不当，很可能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增长的本质，经济指标指导经济实践的功能也就难以发挥。国民经济增长的状况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由于上述指标通常都是按当年的市场价格计算的，因而在衡量经济增长时，无论使用哪一种指标，都必须剔除物价因素变动的影响，按某一基年为基础，按不变价格进行计算，得出它的实际增长率，或实际人均水平。

1. 我国使用经济增长指标的历史沿革。建国初期，我国主要采用工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总量指标。这在当时为迅速恢复战争带来的损失，使国家实现工业化是十分必要的。但工农总产值的核算范围仅仅局限在工业和农业两个行业，其核算范围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状况。而且，在统计实践中，工农业总产值指标本身包含物质消耗价值，存在较大的重复计算因素，不能确切反映经济效益。此后，我国采用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以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净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国民收入指标扣除了社会总产值指标中的物质消耗价值和重复计算，能够比较确切地反映增产和节约两个方面的综合效益，反映了我国经济工作由重速度向重效益方向转变。但是，这个指标体系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重物质生产部门，轻非物质生产部门，核算范围不全（只限农、工、建、交、商五大行业），因而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逐步确立，我国在经济核算上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 SNA 核算方

法（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这个指标体系在统计上涵盖了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所有部门，其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及其人均的增长率等指标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社会经济统计中处于核心地位。

2. 经济增长的主要统计指标。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1) 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价值的总和。所谓“常住单位”，其内涵与“常住居民”相同。一国的“常住居民”包括：(A) 居住在本国的本国公民；(B) 暂居（一年以内）外国的本国公民；(C) 长期（一年及一年以上）居住在本国的外国居民。也就是说，在一国领土范围内，其居民无论国籍如何，只要符合本国常住居民定义，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价值都可算做本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都是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但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居民来自国外的收入并减去外国居民在本国领土上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是“领土”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国民”概念；国内生产总值是“生产”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收入”概念。只有在经济封闭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才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开放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就会存在差额。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是两个不同但又有联系的指标。显然，在经济开放条件下真正反映一国经济实力的指标，应是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这是属于本国居民的财富。应当注意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对外投资与外国对内投资大体平衡，或者前者大于后者，所以，一般来说 GDP≤GNP；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引入的外资大于本国居民的对外投资，所以，一般来说 GDP > GNP。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上不应该满足于 GDP 的增长，更应争取 GNP 有更快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三种。

——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入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其基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GDP = ∑（各部门的总产出 - 该部门的中间消耗）= ∑各部门的增加值

——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其基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增加值 = 劳动者报酬 + 固定资产折旧 + 生产税净额 + 营业盈余

——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最终使用包括货物和服务的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进出口包括有形的货物进出口和无形的劳务进出口）三部分内容。其基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GDP =（居民消费 + 政府消费）+（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 存货增加）+ 商品出口 - 商品进口
= 总消费 + 总投资 + 净出口 = 总消费 + 总投资 + 出口 - 进口

上述国内生产总值的三种计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一定限度内的统计误差是允许出现的。

目前，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种计算方法中多采用收入法，但其三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

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除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即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言而喻，真正反映一国国民富裕程度的应当是人均 GNP，而不是人均 GDP。

（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社会最终成果的实物量规模的变动情况。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是以价值量来衡量，不同时期价值量规模的变动既包含了数量变动，又有价格变动的因素，不同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对比，首先要消除各种不可比因素，使之成为与基期相适应的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时，首先应对当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消除诸如价格变动、计算口径变动等因素，得到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然后与基期资料相除，得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最后减去基期的 100%，便可得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报告期可比价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可比价国内生产总值）×100% - 100%

关于国际上通行的 SNA 统计指标体系，是否科学，是否完善，在中国理论界是有争议的。我们认为，科学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应能全面、确切地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速度、效益、结构和水平，为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宏观调控服务。但是，SNA 体系仍然沿袭了斯密教条和萨伊的“要素价值论”，因而存在理论上的不科学性，应用这个指标体系，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科学指导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但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对于比较国际间的经济增长是有实际意义的。从经济指标应科学地反映国民经济增长实际状况的要求来看，从经济指标越科学，越能发挥指导经济实践的功能看，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指导下，借鉴国际经验，紧密联系中国实际，进一步研究对经济增长统计指标体系的改进和不断完善是很有必要的。

三、完善并正确运用经济增长的指标

一般认为，统计指标及统计指标体系的功能可分为三大类，即描述功能、评价功能和监测预警功能。描述功能是通过统计的描述指标反映社会经济现实的客观状况，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和结果，提供对社会经济情况的基本认识。评价功能是通过统计的评价指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行为的结果进行比较、评估、评价等。监测预警功能是通过指标数值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宏观运行进行监测，预报国民经济即将出现的平衡状态、可能的突发事件和某些结构性障碍等。但我们认为，统计指标及指标体系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功能或导向功能，即通过一套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使之成为一种航标指示，促使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加合理化、规范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增长和发展。

1. 从导向功能角度分析，GDP 指标存在缺陷。目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

度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衡量经济增长和繁荣程度的指标。但是：①GDP是用市场价值或市场价格计算的，因此，GDP的增加可能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增加所致，也可能是平均价格提高的结果。②GDP衡量的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生产总值，不管是谁拥有这些用于生产的资源，在许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增加本国国民的福利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当GDP增长很大而GNP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③GDP指标还有如下缺点：一是GDP没有将建设性与破坏性活动区别开来。疾病、犯罪，以及自然灾害都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因为医治病患、关押罪犯、修复损失全都需要投入资金。这样，尽管生活质量下降，GDP依然在上升。二是大部分环境资源成本没有计入GDP，因为只有在自然资源的价值进入货币经济，即被消费之后才能衡量其价值。目前的GDP没有将经济活动对水和空气等资源的污染而导致的损失计算在内，GDP实际上鼓励那些对有限资源无休止消耗的做法。三是GDP完全忽视了一切没有标价的由家庭、社区与志愿者等人员提供的服务，只反映了买卖关系中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总价值。由于GDP在指导功能上有上述片面性，这就提出了对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改进的问题。如何使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促进人们采取措施，改变经济增长的错误途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破坏性活动，减少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这成为改进指标的价值取向。

2. 从指导可持续发展角度改进GDP指标。为了使经济增长指标在指导功能上，能促进减少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方面，国际上提出的绿色GDP和绿色GNP，已经受到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高度重视。面对全球范围出现的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对国民经济帐户体系进行了调整，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被理论界称之为“绿色GDP”。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绿色GDP的计算公式如下：

绿色GDP＝传统GDP－（自然资源耗损＋环境污染损失＋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公害的损失＋恢复生态、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投资及环保科技教育投资）

绿色GDP核算有利于真实地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活动的现实效果，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有利于各地资源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但是绿色GDP是在传统的GDP基础上计算出的，也就是限于本国领土范围内，但是，造成自然资源耗损，环境污染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公害损失，还包括国外要素的影响，与之相对应，要恢复生态、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投资及环保科技教育进行的投资，也应包括国外的投入。因此，科学的核算和统计仍有一定困难，且由于GDP本身的局限性，受国外影响部分的数据的取得尤为困难，加之GDP本身就存在不科学性，所以，改进现有“绿色GNP”核算方式，仍然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与绿色GDP提出的同时，国际上还提出了绿色GNP。“绿色GNP”是一种新的衡量一国国民财富的指标，在核算时考虑了三类因素。第一类是传统的人工生产形成的经济增长；第二类是人力资源水平；第三类是自然资源水平。第三类自然资源水平，体现出

对国民财富的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重视。

3. 评价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应当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指标采进行。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人们可以感受得到的，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容易单纯用经济增长的指标来评价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实际上，单纯用经济增长的指标来评价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片面性。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经济发展固然要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进行，但是，经济发展体现一个较长过程经济的连续运行，应考虑其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教育水平、社会保障、人均个人收入等等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在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由于社会只专注经济增长，忽视了教育卫生投入、社会保障的投入、个人收入的相应增长等，那么，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必定会受到制约，从长远看，迟早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发挥经济增长的评价功能时，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其他指标来进行。事实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内外都在研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例如，联合国发展研究所（UNRSID）于1970年提出了包括6项经济指标和9项社会指标在内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分别为：公民出生时的预期寿命、2万人以上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人均每天动物蛋白消费、中小学入学人数总和、职业教育入学人数、每千人中报纸发行份数、每一居室平均居住人数，职业人口中使用电、水、煤气等的百分比，每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农业产量、人均电力消费、人均钢材消费、人均能源消费、制造业在国内总产量中的百分比、人均外贸额、工薪收入者在经济活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目前，在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是英格尔斯指标体系，其中关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用了11个指标，分别为：人均GDP（或GNP)、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成人识字率、在校大学生占同龄人比重、每名医生服务人口数、婴儿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城市人口比重。从这个指标体系中，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增长的指标只是其中的构成部分。因此，应当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分析中，才能确定怎样的经济增长（如，GDP增长速度、人均GDP等）才是真正合理的、适度的。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指标是其中一个构成部分，其权重是有限的，从一个较长过程优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来看，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及其权重，是受到其他指标制约的，所以，要通过综合分析，才能确定其合理性。单纯地从经济增长指标来评价经济发展的优劣，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误导，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视经济增长无可非议。但是，我们一定要科学地评价经济增长，并用好经济增长的导向评价功能。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4.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研究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党的十六大确定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涉及经济发展、民主法制、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目标。其中涉及经济增长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这个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指标，是党中央系统地考虑综合国力和国内外形势后得出的，它的实

现要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这就涉及到各地区如何制定本地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

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完善程度，关系到对经济增长指标合理性的评价。199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等部门先后制定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三套标准，此后一直作为衡量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的尺度，这套指标体系也被称为总体小康指标体系。其中，《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包括5类共16项指标。第一类为经济发展水平，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个指标组成；第二类为物质生活水平，由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居住使用面积、农村居民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人均蛋白质日摄人量、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铺装道路面积、农村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恩格尔系数8项指标组成；第三类为人口素质，由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3项指标组成；第四类为精神生活，由教育娱乐支出比重和电视机普及率两项指标组成；第五类为生活环境，由森林覆盖率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百分比两项指标组成。上述指标体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和反映小康概念的较好尺度，但总体而言，这个指标所包含的内容太少，偏重于物质消费，而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还比较缺乏。因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在研究中，我们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要从本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弄清本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合理性速度。既要考虑地区对全国"翻两番"目标中的贡献，又要考虑本地区经济增长指标在全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这样才能把握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推动全面小康建设的实现。

第二节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增长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握和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克服阻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才能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增长。我们先分析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 影响生产力增长的一般因素。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说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般因素，涉及到许多方面：①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与国民教育的发展程度和科学普及程度相关联；②科技发展水平和在生产中

的实际应用程度；③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内容十分丰富，从企业来说，指生产各环节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组织，这又取决于管理者的指挥、组织能力和水平；④物质生产过程的现代化程度和效能，这取决于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显然，马克思对影响经济增长一般因素的概括是十分科学的。

2. 促进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以马克思揭示的上述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因素为指导，结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加深认识在现代生产过程中，促进生产力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就是说，在促进现代生产力发展或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要把科学技术因素放在首位。正如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个论点是符合当代实际的，值得高度重视，并成为经济实践的指导思想。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从结果的角度来看的劳动过程，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在现实的生产力中，人是起能动作用的因素。要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这是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的真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强调“人本主义”，无非是在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真理，只有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真正活跃起来了，其他各种因素才能发挥现实的作用。应当注意，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与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因为人不是抽象的，是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素质的人。从比较各国、各企业生产的角度来看，作为生产主体的人，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能在生产中发挥最先进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实践中要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人是最活跃的因素统一起来，贯彻到实践中去。

——自然环境是生产力的源泉。马克思把自然条件作为影响劳动生产力增长的基本因素之一，这是十分科学的。今天，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对自然条件这个因素，应有更深入的认识，就是要充分看到自然生态环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我国经济学家张薰华认为，对生产力的认识，应深入到它的出发点，即“源泉”这个层面去认识，要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既要搞开发，又要维护好由自然力或自然环境构成的“源泉”。

3. 科学地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生产要素，如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等客观因素都资本化了，甚至生产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也被西方经济学称为人力资本了。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突出地表现为投资的增长。实际上，许多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都被资本这个因素掩盖了。这是需要注意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资本确实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因为各种要素的投入，要通过资本投入才能成为现实，但是，在认识上决不能产生

错觉，以为资本本身就是生产力的因素。须知资本必须转化为各种生产力的因素，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其一；其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解经济增长的因素，不能停留在狭义生产领域，还必须重视流通领域的作用。“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马克思所说的这个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把流通领域的因素包括进来。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市场满足供求关系的商品储备因素（正常还是不正常）、运输条件（交通便利还是不便利、运载工具容量大还是小）、通讯条件（信息传输速度快还是慢）等等，都通过影响企业循环、周转速度，进而影响企业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各部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全社会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三大部分比例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要看资本的推动力，还应看到资本所掩盖的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生产力因素；不仅要看到直接生产过程中促进生产力提高的各种因素，还要看到流通领域促进经济循环和周转效率的各种有利因素。

4. 重视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和体制因素。生产力不是孤立于生产关系而存在的，在同样的生产、流通条件下，优良的经济制度因素可以使各种生产因素得到很好的组织和协调，尤其是可以使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即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现有的经济条件得到最充分、最科学的利用。在现实经济实践中，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优劣，一定生产要素组合产生效益的高低，都是与具体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具体的经济体制，与生产指挥者、管理者的能动作用有重要联系，属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一。因此，在研究促进经济增长因素时，不能忽视经济体制的分析。

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经济实践中，不仅应当重视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还要注意妨碍或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目前，对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论述，存在不同的认识，可以大体概括为：要素论、结构论、需求论、政策论、技术论、体制论等几种观点。

要素论。要素论重视我国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总量优势。在论者看来，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以及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现在和将来都是还将构成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源泉。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放慢。劳动人口增长放慢，将从两个方面来制约经济的增长：①作为直接因素，将导致供给方面的劳动投入量增长放慢；②在人口结构由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迅速转变的过程中，社会老龄化的发展很有可能带来储蓄率的下降，而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用于投资的资金总量减少，从而成为间接地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如果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有可能成为从供给方面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此外，由于人口众多，我国人均资源拥有水平较低，加之较长时期我们走过了一条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先增长，后治理”的经济增长之路，原来洁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安宁的环境和良好的土地、森林等资源被过度消耗，部分地区以牺牲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资源获得了

经济的暂时增长。因此，资源环境因素将从两个方面制约经济的增长：①因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再生和新的资源的开发速度，或者超过了节约使用资源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导致经济的增长面临资源的强制约；②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过度使用和掠夺性经营导致环境不可自动恢复的破坏，而增加了在未来的环境治理上花费巨大的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构论。在结构论者看来，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中心，结构变化的动态过程就是使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的过程，亦即经济增长的实现过程。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几类主要的结构变动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如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进而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转换；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经济活动从农村向城镇集聚；市场化进程中企业所有制结构向多元化方向调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相互渗透引致市场结构变动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有很多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或者将很难解决，如各地区由于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失当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地区间产业结构的高度类同；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进而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转换而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消化吸收；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食物、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市场化进程中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在公平的原则下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合理调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增强企业竞争力等等，这些结构不合理的因素将阻碍我国经济增长。

需求论。需求论者认为近几年出现的市场疲软对当前经济增长形成明显制约，因此，市场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伴随着市场格局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我国经济已从短缺走向过剩，而且可能成为一种经济常态。市场需求不足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我国经济将转为“市场需求依赖型经济”或需求约束型经济。所以，必须设法克服这种不利影响。但是，有学者认为，市场疲软对目前的经济增长虽然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市场疲软是进一步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并使部分环境得以自动恢复的大好时机。

政策论。政策论者认为，在提高我国经济总体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技术进步、解决市场需求制约问题、环境问题、对外开放节奏问题、地区协调发展问题等方面，关键是解决问题的有关战略和政策是否正确。如果有关政策不合理，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抑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各地政策制定需要因地制宜。

技术论。技术论者将科学技术看做未来我国经济的第一增长点。无论是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还是新的产业领域的开辟，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的落后，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观点强调政府应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使我国尽早进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体制论。体制论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冲破计划经济的种种束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束缚我国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体制因素仍然大量存在，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空间依然巨大，深化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将是决定

性的。

上述观点，都从一定角度分析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某种因素。尽管一些观点难免有片面性，或者其正确程度有一定的时限性，但是，综合这些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不利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利因素的形成，有些是历史原因和现实国情状况决定的，也有些是与主观努力不够相关的。存在不利因素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发现和承认不利因素和问题，并善于利用有利条件和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和暂时困难。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经济规律采取科学措施，就能在现有条件下促进经济实现最佳增长。

三、扬长避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明显改善。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必须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利用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有利因素，克服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扬长避短，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快速增长。

1. 坚持基本国策，继续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许多问题，诸如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都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对人口增长的合理控制，没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状况相协调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地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很困难的。人口问题不只是数量问题，还包括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与分布等问题。要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普及文化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妇女地位、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实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2. 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也较丰富，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剩余劳动力将日益增多，如何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仅涉及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也是农村和城镇居民能否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的大问题。在我国，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应该通过进一步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劳动技能等手段增加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民族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3. 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中国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善于学习和充分利用人类社会已经创造

出的最先进的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党中央提出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战略，贯彻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放眼世界，决心结合中国现有生产力水平，用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又针对较长时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忽视生态环境、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严重教训，强调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十分科学和英明的。

4.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在重视人的作用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具有高出任何私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因为这种制度的本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的团结协作，追求分配的公平。所以，我们通过改革要建立的经济体制，应当充分释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和快速地增长。在中国的国情下，对待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也是对待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真正要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那种对公有制经济丧失信心的态度，是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

第三节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类型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企业或社会（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扩大再生产规模的途径、手段或方式、方法。马克思曾把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从不同角度做过不同类型的划分。从再生产效率提高的角度，他把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和内含扩大两种类型，“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从规模扩大再生产引起原因的角度，他把扩大再生产区分为由积累或扩大投资引起的扩大再生产和不由积累和扩大投资引起的扩大再生产，“一定量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从个别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角度，他把扩大再生产区分为个别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和社会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两者又都有从再生产效率角度来看的内含、外延之分，从引起原因角度来看的由积累引起和不由积累引起之分。他在谈到社会投资引起的社会扩大再生产时，还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用货币投资“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即企业不变，但企业内资本增大了）和用货币资本“来创立新的工业企业”这两种形式。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这些论述，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经济增长状况的科学总结，其基本思想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今天探索科学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理论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讨，对经济增长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的划分。

——按照经济增长的效率高低来分，有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经济总量的增长一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或者说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增加投入，扩大规模；二是提高效率和质量。当经济增长完全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实现时，就是完全粗放型增长。当经济增长完全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来实现时，就是完全集约型增长。在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粗放与集约结合型，即经济增长中既有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又有靠提高产出率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如经济增长中靠增加要素投入取得的份额大于靠提高产出率取得的份额，则是粗放为主型；反之，如经济增长中靠要素产出率提高取得的份额大于靠增加投入取得的份额，则是集约为主型。粗放型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通过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要求在人力资源利用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物质资源利用上不断降低物耗水平，不断降低产品成本。

——按照经济增长的目标或结果所采取的实现方式不同，可分为数量型和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偏重于投入和产出的增长，而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偏重于效率的提高和效益的增加。

——按照经济增长的均衡状况来分，有速度型和结构型经济增长方式。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偏重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结构型经济增长方式注重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合理的投入与产出结构使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

由于后两种划分，也可以分别归于前一种，所以，我国理论界大体上按粗放型和集约型来划分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曾经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一度采取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始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明确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同时，指明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各项经济活动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指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1995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指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指出，“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这充分表明，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已经越来越自觉地注重采取科学的经济增长方式，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

二、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指标

前面已经阐述了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如果要从数量上来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和程度，就必须要建立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及其衡量标准。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国内的研究者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是单指标分析法，二是指标体系分析法。

单指标分析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也即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所做贡献（TFP 贡献率）的大小作为划分两种增长方式的数量标志。这种方法认为，TFP 贡献率大于 50%即为集约型增长，反之则为粗放型增长。进一步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就等同于不断提高上述指标取值的过程。但是，仅仅用 TFP 贡献率这一指标对两种增长方式进行绝对划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在 TFP 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 TFP 贡献率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TFP 贡献率的变动难以同时反映 TFP 和经济增长的变动。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 TFP 与经济增长均为负增长时，TFP 贡献率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其次，经济学界对使用 TFP 贡献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分歧还集中在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具体的测算。目前世界上关于 TFP 贡献率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索洛度量方法；②丹尼森度量方法；③乔根森度量方法；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方教授的方法。使用的方法不同，计算结果就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一样。此外，实际计算过程中不同投入要素计算单位的难以统一，也使得计算结果难以让人信服。譬如在 TFP 的计算中，劳动投入的计量单位往往用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这就难以反映人的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仅仅用 TFP 贡献率来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片面的，有时甚至可能得出不合逻辑的结果。

由于单指标分析的局限性，指标体系分析就成为经常用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法。但指标体系分析同样会遇到选取多少个指标以及最后采用何种方法将多个指标值综合为一个综合评解值的问题。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上，江苏省统计局综合处共选取了 5 个方面的 26 个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上海市统计科学应用研究所共选取了 7 个方面的 21 个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河北省统计局共选取了 5 个方面的 20 个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江苏省委党校共选取了 5 个方面的 25 个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这些指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水平和效果，能使人们较全面地认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但可以想象，由于受到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认识局限性以及目前统计水平的局限，这些指标体系的设计自然还有不断完善的必要。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指标体系分析法通常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份因子分析方法或算术加权平均法来计算综合评价值。

三、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这是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对实践提出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GDP年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从增长方式的过程来看，并不是没有什么缺陷的。据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对各种经济效益指标的分析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下的特征。具体体现在：社会净产值率（国民收入/会总产值×100%）逐年下降；按可比口径计算，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到同期美、日、德、法、英、韩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10%；我国工业资金利税率在总体上趋于下降；从物耗指标看，我国物耗所占比重逐年提高；从能耗指标看，我国每吨标准煤消耗所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及美、日、法、德、英等发达国家的1/3；我国科技进步对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不及发达国家目前的一半。这种情况固然有中国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的客观原因，但是，从主观上看，在现有条件下，追求增长方式优化的意识不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

在经济建设中，只注重追求投资的经济增长，而忽视非投资、挖潜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GDP的增长；各地热衷于铺新摊子，导致各地产业类同和严重的重复建设，一般加工工业能力过剩与基础工业瓶颈制约并存；忽视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投入，造成我国传统行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差，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量大，成本高，国际竞争力趋弱；单纯地抓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造成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在全社会树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识，自觉地利用现有条件，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从全社会的经济实践看，要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需要各级政府和所有的企业共同努力。从企业来说，必须在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内部效率的同时，注意合法经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从各级政府来说，一定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反对地方本位主义，着力于克服单方面追求速度的“政绩”，自觉讲究生产布局，反对重复建设。全社会都要树立“效率”、“效益”、“节约”二“经济”等意识，才能使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社会的共识和共行。

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环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优化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是重要的环节。在实践中，对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有全面的认识。在生产中采用某种技术，并不等于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为任何生产都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实际上，判断经济增长方式是否优化，并不是有没有采用某种科学技术，而是要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是否能在经济实践中不断地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须知，在采用科学技术上也有粗放型和

集约型之分。长期采用传统技术，没有进步和创新，就属于粗放型方式；只有不断开拓创新，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才可以说转向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科技创新，要有科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科技创新本身属生产力范畴，经济体制属生产关系范畴。要通过不断地调整经济体制，发挥科技人才的骨干作用和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科技创新。所以，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时，我们要把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技术决定论”，二是“制度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忽视经济体制的影响或者把经济体制视为外生变量，忽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动态互动。而“制度决定论”则把体制的变化看成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视体制为万能，忽视了经济增长还必须重视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因素和遵循生产力的内在规律。

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有相当差距，面对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取得优势地位，必须抓住机遇，抓紧时间，尽快转变低效率的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在严峻的竞争态势下，我们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要我们遵循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坚持不懈地促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第十八章　公有制企业及其发展

从工业经济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在工业企业。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在公有制企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我国公有制企业的历史性跨越式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成长壮大，就必须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从实际出发，明确企业发展战略，努力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培育竞争优势；从公有制企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坚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发挥联合劳动优势。本章将围绕上述这些内容展开论述。

第一节　公有制企业应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一、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支撑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曾经受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束缚，缺乏自主性和经济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公有制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应当努力解决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必须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才能焕发生机。本章所阐述的公有制企业，包括公有资本独资、公有资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公有制企业之所以必须搞活、成长和壮大，这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支撑，每一个公有制企业都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固然，在市场竞争中，会有一些公有制企业因各种原因破产、倒闭，但是，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当充满活力，逐步增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结合，最终要体现在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工商实体经济的公有制企业这个支撑点上。只有一个个公有制企业充满活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整个国民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促进公有制企业的增强和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党的十六大报告所强调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毫不动摇地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不断增强和发展。

1. 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建国50多年来，国有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形成了能源、采矿、原材料、机械制造、汽车、造船、飞机、宇航、

电子、信息、石化、轻纺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得到增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我国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超过了40%，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一批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跨国经营、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的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重大科技攻关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国有企业的贡献不可分割的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如核技术、空间技术、杂交水稻、银河系列计算机、曙光Ⅰ号计算机、正负电子对撞机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有企业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资金。从1949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4.2%，大大高于世界工业增长4.1%的平均水平。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4.5%。到2002年底，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量达到4.27万亿元，占我国工业总资产的50%。国有企业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2.3%。

——国有企业为中国科技进步培育了大量的人才；“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飞船的发射成功，国有企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有企业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承担了大量的为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有相当部分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部门，而这些部门往往是微利、无利的，没有国有企业在这领域的贡献，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在改革开放的渐进过程中，国有企业服从全局的需要，承担了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而付出了主要成本。价格改革，有一段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的“价格双轨制”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按国家规定的较低计划价格，向全国供应商品，而不得不按较高的市场价格购买自己生产中所需要的商品，这一高一低之间的差额，实际上为整个经济体制的转换付出了较大的成本。在劳动制度改革中，国有企业排出大量传统体制造成的冗员，承担大量的人员安置费用；而许多下岗工人群众，为了体制的转换，牺牲个人利益，这也是巨大的成本支出。没有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群众对改革成本的支出，经济体制的转换，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成功。

这一切表明，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坚和主导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促使国有企业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和产业关联度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国有企业要坚持发挥支配地位的作用；在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国有企业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或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主导国民经济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要控制或影响更多的其他所有制性质的社会资本，更好地引导、带动和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进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是要把国有企业搞好，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要放弃国有企业，更不是要变国

有为私有。

2. 集体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支撑。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其经济总量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1/3，占公有制经济的1/2。集体工商企业也有很大发展，其中的就业人数约为1.5亿，占我国全部就业人员的20%左右。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大力促进集体企业的发展。城乡集体企业面广量大，是我国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且大多为劳动密集型，搞好搞活，对扩大就业十分有利。在集体企业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乡镇企业的巩固和发展，使乡镇集体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理解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充分认识，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性质是有根本区别的。正如本书导论篇和第二篇已经阐述的，中国的国有经济是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是同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同时建立的，建国伊始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其动力正是在于巩固、维护和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这是一种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是促进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在共同发展中越来越强大。这种改革决不是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国有经济作为处理社会基本矛盾的调节器，使国有经济在数量上做伸缩性的调节。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从长远看是发展和壮大国有资本总量。如果面对计划产品经济体制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暂时困难，就对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模糊起来，甚至丧失信心，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二、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国内工业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从严重短缺转向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在加入了WTO之后，随着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我国企业面临的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的相对过剩。在这种态势下，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制企业，必须尽快把自己塑造成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才能有效地应对严峻的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

1. 善于利用现代企业制度提供的体制条件，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本书第六章阐述，公有制企业应当利用现代企业制度，来实现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对于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而言，合理的企业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充分的条件。体制本身不是万能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是为公有制企业排除政企不分的行政干预，适应市场经济自主经营，理顺公有制产权关系，创造了管理体制的有利条件；但是并不意味着公有制企业一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市场竞争力。要真正成为具有竞争力的

市场主体，还需要下工夫，认真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运行的规律，弄清自己企业所处产业发展状况，其他同类企业的竞争力状况，原材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状况，根据本企业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和资金状况，制定一整套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战略与策略，培育竞争的实力。只有公有制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增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落到了实处。

2. 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运行的规律。公有制企业要培育自身的竞争实力和竞争能力，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中企业经济运行规律，实行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等科学经济学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市场对企业提出的要求，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对于公有制企业树立科学的经营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科学地经营必须树立面向市场的经营意识。根据劳动价值论和商品理论，只有社会或者市场需要的产品，才是商品，才有使用价值，企业的劳动和物质耗费才具有社会有用性。市场需求，这是企业生产的前提。

——科学地经营企业必须树立同种商品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平均成本和平均利润的概念。这是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价值规律，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要求。企业只有在这些方面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取胜。

——科学地经营企业必须树立资本循环与周转或者再生产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也就是说，企业的产业资本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每一种形态都同时并存，相继依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作连续不断的循环运动。明确这些道理，企业的经营才会克服重生产、轻流通，或者重流通、轻生产的片面性，才会从三个循环的角度，合理地安排人财物各种资源，促进企业在再生产中不断壮大。

——科学地经营企业必须树立节约流通成本的思想。资本循环理论揭示出在资本的时空运动中，企业不仅在劳动直接生产产品时间内要消耗生产费用，还要在非劳动加工时间消耗流通费用（买卖谈判、簿记、保管、运输等费用）和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非生产费用（生产职能中断、原材料或产品储备等费用），后两者都是在非劳动加工产品时间中资本运动或流通中的成本耗费，可以称为广义的流通成本。这种成本难以避免，但是它们是非生产的，应当尽可能节约，才能降低产成品的总成本，增加资本的利润。

——科学地经营必须树立提高资本运动速度的思想。资本的周转理论揭示出，同量资本，周转速度越快，每年周转次数越多，资本因劳动加入而增殖的时间就越长，资本的年利润率就越高。所以，科学地经营，就必须千方百计提高资本的周转速度。

——科学地经营企业必须树立在动态中经营资本的思想。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揭示出，每个企业的资本运动，都要经过一定的生产、流通时间和相应的空间，企业资本是在这种时空中发生形态变化的。要使资本充分起到增殖的作用，就需要对各种形态的资本，根据其占据的一定时空，做合理的分割，使其形成一定的比例；如果时空关系发生变化，各种形态的资本比例，也要发生变化。而且，资本运动经过的生产期间与流通期

间的长短构成变化，会产生游离资本；市场距离、供求关系、价格等外部因素的变动，会影响企业内部各种形态资本构成的变动；资本在运动中，固定资本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会出现分离，由此会出现折旧基金的沉淀现象；等等；只有深刻认识所有这些资本在运动中的变化规律，才可以在资本经营中掌握主动权。

——科学地经营必须树立市场风险意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理论还揭示出，企业资本在运动中，不仅有市场竞争的风险，还会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风险，企业为了应对市场风险和多种意外，必须有准备金、保险金等等，才能有备无患，保证连续不断地再生产。

从上述马克思关于资本运动的科学论述，我们可以领会到，企业资本运动的规律，有着丰富的内容，需要公有制企业结合自己的实践，深入探索。当代企业比马克思时代的企业，已经更为复杂，我们有必要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深化对现代企业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更好地把握公有制企业经营的主动权。

3. 树立国际市场竞争意识。在培育公有制企业竞争力上，必须强调企业要树立国际竞争意识，正如第十六章已经阐明的，当今中国国内市场趋于国际化，所以，讲市场竞争，也就是国际市场竞争。必须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企业是我们的强劲对手，他们在竞争理论上，已经有多年的研究。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度弄清现代企业资本运行的规律，又虚心借鉴当代国际市场竞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自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成功经验，加上善于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那么，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提高。

三、公有制企业的竞争目标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提高竞争力，其竞争的目标也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单位，它又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这两者能否统一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1. 利润最大化目标具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目的的一般性。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企业所追求的惟一经济目标。利润（即经济利润）等于总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西方经济学家指出，不管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找到利润最大化的策略有多么困难，也不管经理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动机有多么强烈，一个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最终必将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实现利润最大化被认为是企业生存竞争的基本准则。西方经济学家得出的这个结论，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目的的真实反映。但是，如果撇开企业实现的利润归谁所有这个问题，那么，利润最大化具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目的的一般性。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企业的资本运营都要参与竞争，都要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差额及其大小。社会主义企业也同样必须如此，其劳动耗费和劳动占用表现为生产的总成本，总销售收入与生产总成本之差即为企业的盈利。盈利越多，说明经营效益越好。因此，利润最大化同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必须追求的直接经营目标。

2.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具有两重性。如果引入企业利润归谁所有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企业就不同了。后者的利润归投资者私人所有，而前者投入的是公有资本，利润的所有者不是私人，而是自主联合劳动者，这样，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就同时具有了另一层社会目的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生产目的是体现生产性质的一个经济范畴，它具有显著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特征。不同的生产目的，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本质。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表现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即以最小的预付资本取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其目的则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自主联合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

3. 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区分为社会与企业两个层次。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既然作为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就有企业自身的利益。因此，虽然企业利润不归私人投资者所占有（暂时撇开私人入股的情况），但是其利润也不是全部归社会所有的，其中一部分要归企业本身占有，这样，企业的生产目的就有了两个基本层次，即社会生产目的和企业生产目的两个层次。前者是为了满足全社会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后者是满足企业范围劳动者的利益和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其“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社会生产目的的基本规定性，体现和决定了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本质和大方向。这是第一层次。还有第二层次，即企业自身的生产目的这一层次。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有制企业都是相对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他们在决定生产什么和不生产什么、扩大哪些产品的生产和减少哪些产品的生产时，不能不考虑企业的自身利益。在上述两个层次中，社会生产目的体现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企业自身生产目的则体现企业的局部利益。这两个层次的利益关系属于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4. 企业的社会生产目的和企业经营目标两者具有统一性。这体现在，①两者的实现都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前提。企业利润的实现，意味着社会和企业的目的都能实现；企业如果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利润，无论是企业和社会，都不能获得利益。）②在企业实现的利润中，必须兼顾公有资本投资者（社会）和企业经营者（企业）这两方面的利益。如果利益全归企业，社会方面的利益需求就难以实现，而如果利润全部上缴，企业就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及时进行技术革新改造，不能扩大生产规模，就难以持续健康地运行。所以，企业生产目的与社会生产目的统一在对企业实现利润的合理分割上。对于公有制企业来说，它除了像私营企业按规定上缴税收之外，在利润上存在公有资本投资者与企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分割，这是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存在的不同点。无论从企业角度，还是从公有资本所有者或国家角度，都应正确处理好这种辩证关系。

5. 社会生产目的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也会有矛盾。从企业角度看，利润最大化同时兼有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社会生产目的与企业利益是统一的；但是，从社会

角度看，社会生产目的的内容十分广泛，企业利润最大化不可能涵盖社会生产目的，甚至企业在争取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还会与社会生产目的发生某些矛盾。例如，一些公有制企业在局部利益驱动下，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给环境和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尽管这些企业的利润也按规定上缴给公有资本出资者；但是，它们却同时违反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目的。解决这种矛盾，国家既要从社会生产目的出发对公有制企业的企业行为做出必要的法制约束，又要教育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确立符合社会生产目的要求的全局观。

综上所述，社会生产目的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全社会自主联合劳动者的总体利益与企业联合劳动者的局部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无论从企业角度，还是从公有资本所有者或国家角度，都应正确处理好这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过程中，必须自觉地从属于社会生产目的并以它为归宿；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国家有关部门片面强调社会生产目的，而无视企业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的倾向，否则，就难以充分调动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难以真正把企业塑造成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节　培育企业竞争优势

一、确立企业发展战略

竞争优势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取得绩效的核心和源泉。对于公有制企业来说，面对国内外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前所未有。随着改革的深入，公有制企业（极少数以实现社会生产目的为惟一目标的企业除外）都将承担起自我发展的责任，都将接受国内外市场的“优胜劣汰”。为此，公有制企业研究并确立自己的竞争与发展战略，面向市场竞争力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下面，我们首先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因为一个好的发展战略，是企业经济运行优化的基本前提。

1. 企业发展战略的概念。“战略”一词原是一个军事术语，意为关系战争全局的重大谋划。后来，战略的涵义逐渐被普遍化了。一般地说，战略是指带有全面性、决定性的重大谋略和计划。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经济战略学家安绍夫（H. I. Ansoff）出版《企业战略论》（1965）一书以来，企业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逐步得到广泛使用。一般认为，企业发展战略就是企业在分析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及其总体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与这个发展方向相一致的企业未来产品、市场目标和资源分配等，所做出的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的谋划。企业发展战略正确与否，关系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兴衰成败。企业发展战略的失误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根本性失误。发展战略正确，企业就能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提高应变能力，逐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反之，发展战略失误，企业就会在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甚至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可见，正确的发展战略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克敌制胜的关键。

2. 企业发展战略应遵循企业成长规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企业理论，总结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壮大的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企业发展的规律，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借鉴。该理论发现，企业成长过程是存在生命周期的。企业的成长过程可以划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长期、成熟期、衰变期和蜕变期等六个主要阶段。处在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发展战略并不相同，因此，企业应针对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明确战略对策。例如，蜕变期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质变阶段，这时，企业面临两种前途，要么衰亡，要么蜕变。摆脱衰亡，实现企业蜕变，通常有三类具体形式，即①经济形态蜕变：企业应在法律形态变化（如从独资企业变成多元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从有限责任公司变为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组织形态变化（包括企业兼并、企业合并或分立等）、收缩经营领域（如一些实行横向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公司收缩战线，出售一些子公司，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和中坚公司等）、公司重组（包括公司的全部或部分债权人或股东的权力、经营范围，公司章程、治理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做出正确选择。②实物形态蜕变：企业应及时进行技术改造，包括企业的自我改造和引入外资的技术改造等，以便适应新的要求。③产品形态蜕变：企业面对市场竞争，或者放弃原来的经营方向，转向别的事业或产品；或者改变经营重点。如果企业在进入蜕变期后，能在上述各种形式上都做出符合企业实际的正确判断和选择，那么，这个企业就能焕发活力，进一步成长壮大。与蜕变期相似，企业成长的其他阶段也都对企业决策提出了特殊要求。企业应该在发展战略上，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决策，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 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市场竞争战略。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是企业，成长发展的前提，因此，应当把确立企业发展战略的重点放在研究和确立企业的市场竞争战略上。所谓企业竞争战略，就是企业面对存在多个竞争对手的市场，确定对自身形成有利地位的长期性、全局性的谋划。企业竞争战略可分为一般竞争战略和特殊竞争战略两大类。

（1）企业的一般竞争战略指各类企业都应实施的战略。主要包括下属战略。

——公司增长战略。该战略可以分为市场扩张、同心多元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和复合多样化等几种类型。①市场扩张战略的核心是企业追求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实现现有市场份额的增长。②同心多元化战略是一种增加与现有产品或劳务相类似的新产品或新劳务的增长战略，它是在新产品或劳务能充分利用本企业现有的专门技术、技术经验、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等基础上建立的多样化战略。企业在行业处于上升时期，采用这种战略会获得高协同效益和特殊知识经验的优势地位。③纵向一体化战略即企业沿着生产经营过程向前或向后建立新业务的扩张战略，其中，向前一体化即建立企业自销业务，向后一体化即建立企业自供业务。④横向一体化是指对市场上经营相同或相关业务的企业的兼并战略。⑤复合多样化战略即通过合并、收买和合资，使企业增加与现有业务很不相同的新产品或新劳务的增长战略。

——低成本战略。该战略要求企业的全部成本都低于竞争对手。

——产品差异战略。即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产品设计、生产技术、售后服务和商标形象等各方面都与众不同，从而在行业中稳获超额利润。

——重点战略。指的是企业把经营的重点目标放在某一特定消费群体，或某种特殊用途产品，或某一特定地区上，从而为某一特定经营目标服务。

(2) 企业的特殊竞争战略，主要包括同类企业从自己实际出发争取竞争优势的战略。主要包括下属战略。

——无差别产品生产企业的战略。这种战略主要从事采矿、冶金、造纸、石油、化工、煤炭等一类无差别产品生产的企业应采取的。主要是着力在价格、产量、成本和盈利能力之间形成一种最佳关系；那些仅仅运用改变企业产品价格或扩大销售、增加市场份额的一般方法，并不如通过销售合同、向前一体化或建立协作关系等方式控制销售，通过向后一体化控制成本更能获得成功。

——处在产业成熟期或衰退期中的企业竞争战略。在这种阶段，企业致力于对自己的基本经营业务或经营主线进行积极的再投资，比他们把资产重新疏散到其他不相关的行业进行多种经营，有更大的成功和发展机会。在再投资中，加强现代生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并改善销售系统，可以使单位产品降低成本，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4. 积极实施企业竞争战略的创新。上述一般竞争战略和特殊竞争战略常被视为“传统企业战略”。传统企业战略从总体上看，是渐进式增长战略而不是创新开拓性（包括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两个方面）战略，且大多属于中短期发展战略。面临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变化莫测的消费需求和加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际企业理论界又总结企业竞争经验，主张超越传统企业竞争战略，实施“创新开拓型企业战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基本类型。

——产品再造型战略。它要求企业的目标市场虽然未发生变化，但是可以运用最新技术，生产出投放市场的新一代产品。

——产品发明型战略。它要求企业发明市场上从未有过的新产品，并进入别的企业从未进入过的市场。

——市场转移型战略。它是指企业将现有产品投入其他企业尚未进入的最新市场。如果市场前景看好，企业可以调整自己的市场营销组合，或者通过建立营销网络进一步拓展市场。

——市场创造型战略。它是指企业在新兴市场上投放别的企业已经在成熟市场上经营的产品，企业可以不必从头开始技术创新，而通过购买生产许可证、联营或兼并其他企业的方法，直接获得生产该产品的能力。

——纯粹全方位发展战略。它是市场创造战略与产品发明战略的组合，要求企业将向一个新兴市场推出其他企业从未生产过的全新产品，并要求企业在正确预测潜在生产需求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来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

以上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和现代企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每一个公有制企业都处在纵横交错的复杂市场关系之中，因

此，每个企业都应当开动脑筋，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一企一策，制定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战略，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经营机制

如果说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是着眼于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那么，这种生存和发展是需要通过日常的企业经营机制来实现的。

1. 企业经营机制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按照本书第二章关于经济体制、经济机制的概念区分，流行的企业经营机制概念，其实是一个具有主观性的企业经营体制范畴，因为经营总是与人的管理、决策等主观因素相联系的。如果要把企业经营机制当做一个客观范畴，那么，确切的说法，应称为企业运行机制，或企业的资本运动机制。考虑到当前企业经营机制这个概念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我们在本章中用企业经营机制替代企业经营体制这个概念。企业经营机制（这里即经营体制）是人们根据对企业资本运动机制提出的客观要求建立的，是可以根据企业客观运行机制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所谓企业经营机制，是指以一定所有制关系和经济机制为基础，在特定企业体制下，企业内各种经济关系和各种生产要素按一定原则有机组合并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方式。

企业经营机制具有如下主要特征：一是系统性。企业由许多个分支系统组成，企业运行机制也是由各个子系统的内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如企业动力机制、约束机制、成长机制、决策机制等。二是规则性。企业的经营机制与企业的各种行为或各种业务活动不同，后者是企业经营中局部的、随机性的现象，而企业经营机制则是企业内部各种经济关系和各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企业内部形成的、具有规则性的制度。三是功能性。企业经营机制必然产生出自身的各种功能，如动力功能、发展功能、约束功能和决策功能等。

2. 努力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公有制企业作为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企业经营机制，具体地说，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努力。

——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动力机制。企业动力机制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激发企业内部不同主体的利益动机，使他们有机地结合，形成合力，转化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推动力。现代企业制度规定了企业内部的三类利益主体，即投资者、经营者和职工。前者阐述的公有制企业经营目标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关系，对说明如何处理这三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是完全适用的。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三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动机，能否形成合力，不但需要处理好积累基金与收入分配基金的分配、科技开发投入与正常生产的资本分配、可分配收入中按资分配总额同按劳分配总额的分配、经营者收入总额与职工收入总额的分配等，涉及物质利益分配的关系，还必须注重培育精神动力，即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动力机制的范围，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优势，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经营者和职工的利益激励，第二十四章将具体阐述。

——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发展机制。发展机制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自我调节、自我积累

和自主技术创新功能上。①自我调节功能。企业在经营中会经常面临种种不确定的外部变量，如原材料价格的变动、资本利率的变动、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同类产品生产技术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产品价格变化、同类产品替代品的变化、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规模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和市场竞争强度的加剧，等等，这一系列不可控变量的变化，构成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因此，企业必须面对市场，选择生产什么，确定生产多少，增强自我调节功能，根据市场信号主动调整生产规模和产品结构，才能在市场波动中稳定发展。②自我积累功能。拥有充足的发展基金是企业自我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发展基金主要不能依靠借贷（如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而是要依靠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企业必须遵循资本运行的规律，在盈利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前景分析，预期资本运营效益，综合处理好积累与分配等多方面的关系，确定合理的积累率，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地扩大再生产。③自主技术创新功能。要通过体制创新，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开发核心技术。

——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约束机制。其内容包括：①在公有资本所有者利益、其他各类投资者利益、企业职工利益、企业家（经营者）利益和企业法人利益之间，建立相互制约机制。②建立财务约束机制。关键是严格法人财产制度，保证企业法人占有、使用和处理所有者投入的资产的法定权益，建立起自负盈亏的财务约束机制。

——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决策机制。决策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心环节，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得失。企业决策就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和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多种可行方案中进行优化选择。科学的决策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的失误。为此，企业必须在决策程序，包括调查研究、民主评议、预案比较与选择、试点与推广、投票风险责任制、一般决策权与特殊情况下的紧急决策权的关系等等方面，做出科学的规定。有了科学的决策机制，公有制企业就可以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从而使公有制的优势和潜力更充分地发掘出来。

三、建立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

在企业的经营机制中，与市场竞争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要发挥好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功能。这需要通过建立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来保证。

1. 技术创新概念。在经济学中，创新（innovation）作为一个有确定含义的概念，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1912 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所谓“企业家”，其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向市场体系内引进“新组合”；而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经济社会不断地实现着这种“新组合”。创新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①引入新的产品或提供产品的新特征（产品创新）；②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工艺创新）；③开辟新的市场（市场创新）；④获得新的供给来源（资源开发和利用创新）；⑤实现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体制和管理创新）。可见，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其含义是很丰富的，它既包括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也包括

把已经发明的科学技术引入企业之中并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在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之后，现代技术创新理论又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国内外各家之说，我们认为，技术创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指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广义的技术创新则包括从最初的发现，直到最后商业上的成功以及新技术的扩散。因此，所谓技术创新（从广义上说）是指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设想的产生（获取）、研究开发、应用于生产、进入市场销售并实现商业利益以及新技术扩散过程在内的一切技术经济活动的总和。

2. 用系统方法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从上述技术创新的概念可以看出，技术创新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它有着自己的内在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和调节机制等。我们应当从多方面入手，建立起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真正形成自己的优势。

——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以及创新速度的快慢、创新规模的大小与激励机制提供的动力相联系，都需要建立一套激励系统来保证，主要包括：①产权激励。发明创造可以使企业多获得利润，这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企业规定技术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可以从这种利润中获得必要的收益，就可以激励创新。企业应当尊重科技人员和职工的这种产权。要遵守专利制度，自觉维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给他们以合理的报酬。②市场激励。从总体上说，在国家完善知识产权法制的前提下，市场激励机制就在于它能自发地促进企业创新。应当变市场竞争压力为技术创新动力，通过取得科技优势，降低产品个别价值，争取在市场公平竞争中赢得更多利润。③政府激励。这是一种非市场激励。对于一些基础性或关键性产业的重大技术创新，由于投资大，风险也大，一般是企业本身力量难以承担的。对此，政府往往通过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或者通过发展风险投资基金、政府采购以及与企业共同投资开发等方式，推动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活动，有科研能力的企业应善于利用这种机遇，争取承担任务，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④企业激励。企业激励是技术创新的内部激励手段。公有制企业必须通过建立一定的关于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必须保证企业股东能自主地选择那些懂得抓技术创新的企业经营者。国家在考核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业绩时，也应把企业的研究开发潜力、设备更新速度作为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企业技术创新的决策机制。其主要含义是建立一种善于捕捉并牢牢抓住技术创新机会的决策机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体系越来越复杂，技术创新投资量往往很大，竞争风险也很大，因而对技术创新决策的准确性要求越来越高，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成功与失败。承担决策的现代企业家也由个人发展为群体。企业家应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应当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掌握科技信息，既要有风险意识，又要有科学态度，要善于从本企业综合素质的实际出发，选择技术创新项目，确定实施方案。

——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机制。技术创新的调节，就是引导创新者确定创新领域；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规范创新者的行为；根据创新活动的进展，调节创新目标与实际创新路径之间的偏差，并调整创新行为。依据技术创新活动的内在规律，技术创新的

调节主体一般就是技术创新主体本身。由于技术创新存在着多种模式，因而创新主体和调节主体也往往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应当树立技术创新调节意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

第三节 重视发挥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作用

一、公有制企业中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必须增强企业竞争力，这需要充分发挥包括管理者、科技人员在内的企业总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公有制企业中，劳动者不仅是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是企业的主人；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这是公有制企业的优势所在。而在资本主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中，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雇佣劳动“成了工人的惟一职业”，占支配地位的只能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

公有制企业采取股份制形式后，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实现过程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然而，不管有多少改变，只要公有资本占支配地位，企业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性质不变，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就不会改变。这是因为，尽管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体制变化了，但是，工人仍然可以通过一定民主程序参与对企业的管理。有人认为，在股份制企业中，只有股东才是企业主人，如果劳动者没有股份，那么就不可能是主人，只能是雇佣劳动者。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不应忽视，广大工人是公有制企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公有资本所有者的组成部分，这是他们拥有民主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依据。其实，股东也并不必定就是企业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私人股份制企业中，尽管一些工人可以持有本公司股票，可是一般公司中 90% 以上的股东由于持股比例太小，无缘参加公司股东大会，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即使工人成了股东，也不可能成为企业的主人。有人认为，中国劳动者就业的渠道已经采取劳动市场配置方式，实行了劳动合同制，也出现了劳动者失业现象，劳动者似乎也成为雇佣劳动者了，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须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联系的劳动市场和合同制，本质上并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这种劳动市场体现的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等劳交换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经济中那种劳动力商品买卖的雇佣劳动制度是有根本差别的。劳动合同制则体现了处在主人翁地位的劳动者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如果只强调主人翁权利，而忽视了主人翁义务，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翁。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出现公有制企业破产，劳动者的下岗、失业，这只是说明破产企业总体工人的经营不适应市场，工人暂时不符合一定企业的要求，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作为公有生产资料主人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变。当他们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适应市场和企业要求，实现再

就业，仍然可以成为企业直接的主人。

认清企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就应当在实施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理直气壮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就是把股份制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公有制企业比私有制企业更具发展潜力的关键所在。

二、发挥自主联合劳动的优势

发挥工人主人翁地位的优势，提高公有制企业竞争力，就必须发挥自主联合劳动的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劳动者的联合劳动，在形式上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但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的实质没有改变。这种联合劳动的优势，体现在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分工协作劳动的自觉性及其规模的扩大。

1. 自主联合劳动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相比，更有利于分工协作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达到较高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社会分工制度带来的优惠。恩格斯指出："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马克思证明，"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资本强制下的企业工人的分工与协作是分不开的。然而，这种在资本家统治监督下的分工协作，对于雇佣劳动者来说，是被动的，是受到压抑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社会化生产劳动是劳动者自己支配的，与劳动者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同样的社会化生产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效率。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取代了被迫劳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这决定了劳动者在企业中可以更协调地分工与协作，有利于发挥联合劳动的潜力。虽然在公有制企业中，劳动者之间有职务上的区别，职责上的分工，经营管理者在收入分配上与普通劳动者存在差别（这是复杂劳动与普通劳动的差别造成的），但是，相互之间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济上也不存在剥削关系，大家的生产目的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这是管理者和职工团结互助，提供分工协作效率的基本原因。

2. 公有制企业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分工协作，其规模有条件超过资本主义企业。分工协作是社会化生产的普遍现象，而联合劳动是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的独有现象。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者劳动的基础是资本家占有和控制资本，而资本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目的是自己的私人利益。如同亚当·斯密对"经济人"描述那样："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基础上，工人的分工协作被局限在企业本身的范围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劳动者不仅可以在企业内部有效进行联合劳动，而且可

以在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通过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资者，起战略性控制、协调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促进多企业之间，自觉、有效地实现高水平的协作，因而有条件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既有利于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必须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独立经营。但是，这并不影响发挥社会主义自主联合劳动的优势；而只要善于发挥这种优势，就可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创造出比资本主义企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生产主体的角度来看，公有制企业一定不能忽视发挥自己固有的联合劳动的优势。

三、重视发挥普通劳动者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发展的灵魂，公有制企业要提高竞争力，离不开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其他多方面创新。创新，不仅要发挥管理、科技人员层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企业普通劳动者这支重要力量。

在生产、技术、科学的关系中，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的发展是遵循生产—技术—科学形式，即生产的发展，带动技术的创新，从而又带动科学的发展，这其中，许多的创新主体就是普通劳动者，例如，第一次产业革命被称为"工匠的革命"。虽然今天社会发展变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形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创新更多的是由专门的科技人员完成，必须高度重视科技人员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然而，非专职科技人员的普通劳动者，也仍然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力量和生力军。①企业生产一线的工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刻了解生产中某些技术、工艺的欠缺和不足，完全有可能在他们知识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一些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②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的技术革新、发展创造等等，在生产中的具体应用，必须要依赖于广大的一线工人。一方面，这些新的技术和发明必须要为工人群众所掌握，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可能真正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才能在生产中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技术、发明要真正适应生产的客观需要，科技人员也需要向一线工人了解实践需要，这样才能不断改进技术，适应生产，更有针对性地创新。

实践证明，劳动者创新精神的激发，是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由普通工人进行重大技术革新的事例屡见不鲜。20世纪50年代前期，鞍钢工人张明山发明了反围盘轧机的附属设备，对消灭轧钢工人的职业病，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做出了重大贡献；鞍钢机械厂工人王崇伦发明的万能工具胎，扩大了牛头刨床的使用范围，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纺织女工赵梦桃，在断头打结方面，发明了新的打结技术；倪志福发明了群钻。这些在全国都引起极大反响。六七十年代电业工人创新带电作业，使劳动业率大大提高。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创新能力，一方面鼓励劳动者创新，另一个方面对成绩优异者给予巨大荣誉、嘉奖。对于前述鞍钢工人的事迹，国家邮电部曾于1954年专门发行过一套邮票，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劳动者创新精神的

充分肯定。建国以来涌现出的一批批劳动模范，是劳动者创新能力的充分证明。

要看到，现代有些资本主义企业，处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也是鼓励劳动者创新的。如日本有的企业常常向工人征求意见，如果工人能提出有利的建议，还会受到奖励。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更应当重视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激发劳动者的创新精神。企业应当对劳动者的创新活动创造条件，经常开展技术革新竞赛的活动。对于有贡献者应给予奖励，既要在思想上激励劳动者的创新活动，也要在物质利益上让创新者得到实惠。近年来，第一汽车制造厂对于有突出贡献者给予小汽车、提高工资等奖励，这种对创新精神的激励是值得肯定的。

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公有制企业要有竞争力，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在社会主义股份制企业中，工人阶级仍然是必须全心全意依靠的力量。

1. 企业经营者要团结和依靠企业广大职工群众。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在外部环境相同的条件下，好的企业经营者往往可以使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兴旺发达；一个差的企业经营者又会使一个好端端的企业走向破产。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其实，在公有制企业中，企业经营管理者也是总体工人的一员，作为管理和指挥劳动者，他们不但要有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素质，还要具有公有制企业的赋予的特殊素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应当自觉依靠企业广大职工劳动者，因为管理者个人的能力再大，也要要通过总体工人的联合劳动才能实现。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好企业只能靠少数经营者；如果要依靠多数劳动者，由于每个人都是为了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意见很难统一，结果会导致“管理成本太高”。其实，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说人人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西方经济学中的自利“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反映了资本家的生产目的而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活动同样追求经济利益，但这种追求不是以损人利己、处处只考虑个人利益为条件的，正如本章已经阐明的，公有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助于劳动者在各自岗位上的经济活动形成“合力”。所以，企业经营只有依靠广大劳动者，才能体现公有资本的要求。公有制企业经营者要自觉接受广大职工监督，要紧紧依靠职工群众。

2. 公有制要维护自主联合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要求劳动者发扬主人翁精神，必须维护自主联合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实行厂务公开制度。一定要创造条件，让广大职工依照有关法律和法规，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厂务公开是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方针的必要途径。实行厂务公开，有助于职工群众对经营管理人员及其决策实施有效的监督，较好地实现主人翁的地位，有利于保护、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

极性，增强其责任感，对促进企业的改革、巩固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厂务公开的主要内容有：①企业重大决策问题，包括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生产经营重大决策方案，改革、改制方案，职工裁员分流等；②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重要问题；③涉及职工切身利益方面问题，包括劳动合同签订，职工工资奖金分配，购房售房等等；④与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厂务公开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制度化。应建立以企业工会作为工作机构的厂务公开领导小组，与企业经营管理层建立规范化的信息联系。要认真落实职工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企业重要事项要向职代会报告，落实好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审议权、通过权、决定权和评议监督权。

第二，加强对企业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劳动者要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增强主人翁意识。公有制经济观念的淡薄、现代科学管理知识的落后、知识文化水平的不足、创新意识的缺乏，这些状况都会阻碍职工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并给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企业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①要增强企业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有的职工不理解劳动合同制，把自己当做雇佣劳动者；有的提出按酬付劳，消极对待工作，这些糊涂观念，只要及时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完全可以纠正的。②要制度化地，组织文化学习和生产技能培训。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基层职工的技术操作，要真正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就要成为学习型企业，不但经营者自己要坚持学习，而且要有计划地增加培训资金投入，把培训职工纳入企业经营中不可缺少的内容。③要对企业劳动者进行现代市场经济知识教育。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这是前无古人的新事物，广大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懂得现代市场经济知识，才可以更好地实施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益，才能加深对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和管理。总之，劳动者素质提高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才能真正实现，这对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

第十九章　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工业企业实力的增强标志着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增强。但是，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农村经济是对应于城市经济而言的。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必须加快农业经济自身的增长与发展，走向农业现代化，也有赖于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本章从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入手，分析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探讨如何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第一节　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增长

一、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

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国情特色突出地表现在农村经济中。

1. 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远大于产值比重，农业经营规模狭小。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部门从业人员减少是必然趋势，农业产值比重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同比例下降。但在我国，由于建国后的较长时间，工业化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城乡分离的道路（包括改革开放后的“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城市化道路），使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下降，严重滞后于产值比重（见下页表4）。2001年，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到16%以下，而从业人员比重还维持在50%左右。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经营规模狭小。据资料统计，我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1985年为10.61亩，由于农村劳动力增长，1998年下降为8.87亩；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1985年为3.76亩，1998年下降为3.62亩。农业经营规模远小于人多地少矛盾更为突出的日本。

表 4　　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变化

年代	农业产业	
	产值比重	就业比重
1952	50.5	83.5
1978	28.1	70.5
1990	27.1	60.1
1995	20.5	52.2
1997	18.7	49.6
2000	15.9	50.0

2. 在农村经济中，第二、第三产业占重要地位，第一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自寻出路，创建了乡镇企业，这使农村经济中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迅速增大。1980 年，在农村经济总量中农业占 74.5%，非农业占 25.5%，到 1995 年转变为农业占 22.8%，非农业占 77.2%。乡镇企业经济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一大特色。2000 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 64%，占全国国民经济增加值的 30.4%。从 1978 ~ 1997 年，乡镇企业投入的“补农建农资金”累计达 1580 亿元，2000 年全国乡镇企业支农建农资金总额在 167 亿元，农民收入的 1/3 以上来自乡镇企业。这固然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说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经济本身的发展水平较低。

3. 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所有制形式看，在农村经济中既有农业方面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工业方面以集体资本控股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集体经济，又有私人合伙制、私人控股的股份制等私营经济，还有外资经济。到 2000 年，中国农村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达 219.7 万个，即全国 86.6% 的乡（镇）、90.7% 的行政村都建立有相应的组织。1997 年，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总量约 20000 亿元，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达 9 899 亿元，占农村固定资产总量的 59.5%。在农村经济总量中，农村集体经济的贡献率大体保持在 45% 左右。在浙江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比重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它们对增强经济的活力起到重要作用。

上述这些特点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引领农民奔向共同富裕方面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本身发展的艰巨性。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从国情出发，寻求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

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农业在广大农民贡献大量剩余劳动，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保持了年递增3.2%的产出增长速度，并维持了农业自身的缓慢前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称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走上加快发展的轨道。

1. 我国农业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创造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成绩。

——农产品长期短缺的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变。目前，我国人均谷物、棉花、油料、肉类、禽蛋、蔬菜和水产品产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主要农产品总量中，中国约占1/3。中国的谷物、棉花、水果、肉类、禽蛋和水产品6类产品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在世界谷物增产总量中，中国占38%；在棉花增产总量中，中国占45%；在肉类增产总量中，中国占42%；在禽蛋和水产品增产总量中，中国分别占67%和52%。中国农业增长迅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2000年，我国农业增加值达到14 212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比1952年的342.9亿元和1978年的1018.4亿元增长了3.7倍和1.77倍，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3%和4.7%。

——农业生产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传统以粮食为主，其他各业处在从属的、副业性地位的结构已经改变。现在，在粮食增长的同时，多种经营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从农、林、牧、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看，农业（种植业）比重不断减小，畜牧业、渔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55.7%、3.7%、29.7%和10.9%，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相比，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了24.3个百分点，畜牧业、渔业则分别上升了14.7%和9.3%。种植业内部，已经从以粮食为主，转变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全面发展。粮食作物由1990年的占总播种面积的76.5%下降到2001年的68.1%。随着农产品流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高效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结构有望继续调整优化。

2.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的状态，还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保障和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份额中，农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0.2%，来自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35个百分点。

——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农村经济提供了满足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所需要的粮食和副食品，在满足自身消费的同时，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并提供了粮食、棉花、油料等大量的轻工业原料。连续多年的农业丰收，主要农产品供

应充足，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扩大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农村是国内工业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农村经济对于工业品的需求既包括消费品，也包括生产资料。我国乡村有近8亿的人口，是巨大的潜在购买力。农村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我国的市场内需，在我国社会零售总额中，目前农村实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已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0%左右。可以带动农用工业发展的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在增长，1999年农民人均生产经营费用现金支出已达到470.7元。今后，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在扩大市场需求方面的贡献一定会更大。

——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和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建国后，我国农村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形式，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据统计，1950~1978年，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资金，年均净流出额约为155亿元，整个80年代每年约1400亿元，1990~1998年，每年约1500亿元。有人估算，除开税收，20世纪最后30年，在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的农民剩余劳动总贡献达8000亿元。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有一亿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国家创造外汇。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是我国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200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到156.2亿美元。

——其他社会公益贡献。正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产品供给比较充裕，国家才有条件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才有条件实施退耕还林（草）、移民建镇、生态环境保护等关系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3.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存在许多困难。在充分看到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要冷静地认识到，长期以来，我国在处理城乡经济发展和工农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比较偏重于前者，所以，农村自身的积累明显欠缺，这导致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国民经济总体来说，已显得滞后，“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困难，即农业生产力水平过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经济与城市的差距拉大，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目前是农业大国，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落后的农村经济汪洋大海上的绿洲，大海风浪一起，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和稳定的发展。

三、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任务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任务发生了变化，由主要靠增加产量解决温饱转变为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人民小康的需要；农业的增长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发

展不仅受到资源约束，而且受到市场的约束，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 WTO，农业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调整发展方向。要大力推进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新阶段的中心任务。

1. 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①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市场约束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近些年来，农民卖粮难、粮食企业亏损、粮食压库等现象严重存在，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农业经济粗放式发展、产品质量不高、品种单一、加工度低，以及农产品流通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②中国“人世”的成功加大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外部压力。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的逐步开放，农产品将面临国际化市场的竞争。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集约化程度较低，平均成本较世界水平要高，国内主要粮食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农业经济的粗放型经营方式，提高农产品质量，这就必须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

2.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是：①调整农产品结构，促进农产品改进品种和提高质量。发展优质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加快实现我国农产品的优质化和专用化。②调整农业经济的内部结构，促进农业经济内部协调发展。逐步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扩大畜牧业、养殖业等在农业中的比重，优化农业内部的产业链。③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大力发展高科技农业、高价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沿海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中部地区要发挥粮食生产优势，优化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发展加工转化和产业化经营，把粮食产业做优。西部地区要加大退耕还林步伐，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④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⑤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必将增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展现新的局面。

第二节 在统一市场中发展农村经济

一、农村经济与统一市场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不断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过程，是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过程，是实施科教兴农的过程，也是农村经济新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把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之中，即转变以往城乡分离的发展模式，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形成开放性的农村经济，在全国统--的市

场体系中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农村经济只有进入到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中，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现存的半自然经济状态，有条件走现代化的道路。

1. 确立在城乡统一的大市场中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观念。现代农业要求生产专业化、现代化和经营规模化，农村市场发育程度过低，从根本上阻碍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顺利转化。我国目前农产品“小而全”现象严重，区域之间的相对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没能形成气候，农产品市场经常处于“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无序、混乱的过度竞争之中，不时发生“增产不增收”、“多了砍，少了赶”等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现象。究其原因，症结还是在流通不畅。从国际市场竞争角度来看，我国传统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国外发达的现代农业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如粮食）丧失竞争力，进口急增，也使我国具有价格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难以逾越国外的技术壁垒，出口受阻。因此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只有在国内城乡统一的大市场下求发展，才能使我国农业在面对任何外来经济冲击与风险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自主性，才能使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农村经济进入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有利于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畜牧业发展、深化农产品加工，在城乡的良性互动和贸、工、农一体化发展中，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2. 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纳入统一市场。形成统一市场有五层含义：①突破农业内部各业间的分隔。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种植、养殖结构。②突破产业间的分隔。延伸农业产业链，形成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紧密相联的产业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由过去单纯的生产环节，向产前和产后延伸，拉长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③突破城乡分隔。改革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④突破地区分隔。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努力改变农业生产半封闭、半自给自足、农产品“小而全”，商品率低的状况。调整农业区域布局，积极促进农业的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促进农产品商品化。⑤突破国内外分隔。积极应对中国加入 WTO 后农产品商品化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国际分工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眼光经营发展农业经济，发挥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和农业技术；依靠科技进步，创造农业方面的民族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调整农业产业和品种、品质结构，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按国际化标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二、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

中国农产品供应已由过去的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加上入世后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原有的农产品政府定价的流通体制（尤其是大宗农产品如粮棉的流通体制）已不适应，建立统一的市场配置方式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成为必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价格改革。农产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从计划定价转为市场

供求关系定价，价格变动直接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流通体制的改革必须十分稳妥。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渐进价格调整，目前，农产品价格已经基本上实现在国家调控下，由市场形成和决定。但是，在中国加入 WTO 的新形式下，农产品价格还面临逐步与国际市场价格并轨的问题，因此，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还涉及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强农业经济国际竞争力等一系列问题，任务还十分艰巨。从流通角度看，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好。

——完善有利于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立和健全以批发市场为中心、连接各个专营市场、期货市场和零售市场的国内农产品市场体系；并且，中央级的国内农产品大型批发市场要逐步与国际大型批发市场、期货市场等建立联系；形成高效运行的信息传输网络，使农产品价格的调节及时反映国际性市场供求的变动。

——完善大宗农产品的宏观调控体系。为了减轻及更有效地防止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对国内的不良影响，国家应不断完善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宏观调控体系，对大宗农产品的储备、吞吐调节以及市场价格的监测与管理等应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有更规范的法规政策。

——促进形成有序的竞争性农产品市场。增强农产品市场的竞争性，有利于发挥流通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要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逐步放开国内粮棉油购销市场和进出口领域，在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流通领域，引进有序的竞争，提高生产和经营的效益。

——建立农产品生产的支持和保障体系。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相对经济效益较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农产品居于弱势。但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不可能在农产品上依赖进口。因此，在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中，应当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国家农业支持和保障体系，使民族农业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受到必要的保护。

三、促进农民进入市场

在完善统一、竞争和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并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纳入统一市场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促进农户进入市场。

1. 我国的农户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主要表现在：①在目前的生产刀水平条件下，绝大多数农户还是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复合体”。农户既是投资主体，也是经营管理主体，还是劳动主体。生产专业化程度低，大部分农户生产五种以上农产品。农产品商品率低，1992 年，农户自给性生产占 45.51%，农产品的综合商品率为 54.49%。②农户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还未能直接面向市场。这表现在投入生产要素的方式（例如难以从金融市场获得贷款）、重要农产品的政府垄断性收购、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不畅等方面。③农户生产经营规模的小型化。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但是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尚未在实践中形成规范的条件下，土地的规模经营受到制约。小型化的农业经营存在着自给性趋向，难以走向

完全的商品生产，其产品数量的狭小和品质的落后，运输成本相对过高也阻碍了农户向专业化商品生产的转化。因此，我国的两亿多农户走向专业化商品生产，还面临许多困难。

2. 促进农民成为市场主体的途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与推进农民成为市场主体不是绝对矛盾的。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并不妨碍农产的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从而也不会阻碍土地逐步实现规模经营，这方面下一节将展开论述。这里先从总体上概述促进农民成为市场主体的主要途径。

——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适度，是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一个过程、农业资本的投人目前还有一定限度这些涉及国民经济全局的因素考虑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应用先进农业科技，促进农产品提高品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有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就有利于使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商品生产轨道。

——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在农户自愿基础上，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合作经济组织，如新型合作社、农业行业性协会等，可以克服农户独立经营规模小、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的弊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和依靠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进入市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维护农户作为经营主体和财产主体的权益，不搞土地和财产“归大堆”，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坚持进人和退出自由，不搞行政强迫命令，坚持“民办、民管、民利”等原则。

——帮助农户建立有利于流通的信息网络，保证农产品市场信息通达、真实、传递快速和发布及时。要大力发展农民联合自助的流通组织，如各类专业协会等，帮助农产增强市场经济意识，了解市场需求，普及科技知识，提高进入市场的本领。要给有实力的农民组织的农业企业以直接出口权，使它们也能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国际市场发展自己。

第三节　向现代农业转化

一、适度规模经营

农村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农业经济现代化。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上述过程，实际上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中国农业逐步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农业经济现代化是指农业的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一般应具备生产过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增长方式集约化、经济循环市场化、生产组织社会化、生产绩效高优化、生产劳动者知识化等特征。根据中国农业

和农村现在生产力的水平，农业经济现代化必须走适度规模经营、科技兴农和农业产业化的路子。我们首先阐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1. 农业必须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在目前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指通过农户土地使用权的依法流转，适度地提高土地的经营规模。之所以只能适度，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因为经营规模过大，需要资金的投入量也大，同时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富余劳动力也多，这些要求都是现有条件难以立即达到的。尽管是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它比起一家一户经营土地，也可以节支增效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农业走出困境的正确选择。其主要优点有以下方面。

——有利于科技推广，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成本下降。目前我国农业物质成本投入高达全部生产投入的4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产出却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小规模经营，难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土地生产率，降低单位产量物质成本。

——有利于农田的机械化操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用农业机械生产，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手工农业劳动，这会明显降低单位农产品的劳动成本。如小麦机播可以节约种子，实行机械条播可增产20%以上。研究表明，在许多农产品生产上，由于大量使用劳动力，我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已变成劳动成本过大的劣势。而要促进机械化生产，就需要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有利于节约管理成本，降低单位农产品成本。在管理费用相同的条件下，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产出增加，分摊在单位农产品上的管理费用就会下降。一个农户能经营多大的土地规模，这一般取决于农业技术、植物保护、运输等服务社会化发展的程度，以及个人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一个种田大户经营20～30，亩田，甚至更多一些，他耗费的管理劳动与他经营5～6亩田是差不多的，但是单位农产品上的管理成本将节约好几倍。

2. 努力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产品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的形式从投入方面来讲就是土地规模经营，即通过扩大农户土地的经营面积，形成一定的农业规模。从产出方面讲，农业规模经营的形式是指产品规模经营。

——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就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现阶段全面推行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仍不成熟，据估计，按一户经营20～30亩的适度规模，我国农业劳动力至少要转移出来3/4，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所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只能逐步进行，首先在有条件的地区如非农产业比较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或者形成种田大户，或者由若干农户自愿合作，形成土地规模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

能力；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只有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才能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真正使农民获得利益。

——推进产品规模经营。就是要发展农业社会化生产，促进社会分工，显著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生产效率。实践证明，在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上，面向市场，确立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通过龙头企业或农业合作组织，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联合起来，并提供社会化服务，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经营，形成相对集中、具有规模经济的专业化生产基地，这是一种适合国情的农产品规模经营的有效形式，既能较充分地发挥农民的生产潜力，又能较快地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推进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二、大力发展与推广农业科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教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已经由20世纪70年代的27%，增加到90年代初的30%、1996年的39%、90年代末的42%。但是，同发达国家的60%~80%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1995年，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在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0.2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4倍。发达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之比为1:100，而我国目前则为1:1200。我国农业要缩小差距，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和应用农业科技。

1. 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业科技的应用具有地域性、周期性的特点。要把握这种特点，明确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优化专业结构，使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的科技力量配置科学合理；优化布局，逐步改变农业科研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建立以生态类型区为基础的新型科研组织体系；自主创新，尽快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机构；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外先进农业科技和管理经验。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由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组成。科技创新体系要有利于创造民族的农业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的农产品，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要抓好基础研究，尤其是抓好基因工程、光合作用机理、杂交优势机理和生物固氮等方面的研究，为农业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良好基础；突出应用研究，努力解决严重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技术难题；加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大对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在农业中应用与产业化方面的支持力度；针对我国在21世纪将养活16亿人口的需求，抓好超前研究与技术储备。

2. 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逐步建立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企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庞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农业科技服务管理体制，完善对农业良种、植物保护、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科技信息传输体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针对农业产业化对技术的需求，组织农业科技部门筛选最先进而适用的农业高新

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作为推广科研成果的突破口。积极实施国家科技部门提出的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大成果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大力推进农村的科技进步，引导农业经济上水平、出效益。

3. 增加科教兴农的投入。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重点农业科研基地和重大农业科技工程的建设。发挥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探索合理的方式，吸引社会对农业科技产业化的投资。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

所谓农业产业化经营，指农业生产面向市场，实现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走向社会化生产的一种新型经营方式。在中国广大农村，其主要方式是农户之间或者“龙头”企业与大量农户之间，在供产销等生产经营环节上，在明晰各自产权条件下的联合生产。农业产业化使农民的封闭式生产迈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它是农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1.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组织载体。目前可分为纵向一体化经营和横向一体化经营两个基本类别。①纵向一体化经营，最典型的模式是“龙头企业 + 基地 + 农户”。纵向一体化经营，主要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广大农户，由独立经营的农户按“龙头企业”的要求以及提供的条件（如统一的优良品种、生产规格）提供农产品原料，由“龙头企业”实行农产品的批量加工和统一销售。显然，这种组织载体使分散的农户有组织地进入了市场经济，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利于农户增加收入。但是，“龙头企业”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和较先进的技术设备，目前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龙头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纵向一体化经营的普遍推行，受到一定限制。②横向一体化经营，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直接组织起来，形成“集团军”式的产供销自主联合体，共同进入市场的形式。它可以是自愿组建的农业合作社，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较为松散的农民协会。他们在运作过程中，既可以向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购销等产前部门延伸，也可以向农产品销售、加工等产后部门延伸，还可以给生产的中间环节提供系列化服务。横向一体化经营无需以龙头企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它的兴起却对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起到重要作用。在横向一体化经营中，参与其中的农户成员在利益关系上具有共同性，因此，它在广大乡村特别是落后的农区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有助于农业由弱质产业变为强势产业。

2. 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化有助于把亿万农户组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对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增强农业产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都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必须加大力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挥不同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确定农业产业化支柱产业项目。在东部地区，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项目，使农业产业化经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粮棉油主产区，积极发展粮食加工、棉花加工、油脂加工、饲料加工等项目，在牧区和大中

城市郊区，积极发展肉类加工、乳制品加工等项目，使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支柱产业优势；进一步推进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形成更大范围的规模效益。

——发挥重点“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示范作用。实施必要的产业政策，支持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起带头作用的“龙头企业”，进一步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发展壮大。他们在提高农产品加工深度，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民族品牌，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起示范作用，将促使农业产业化更快发展。一批重点龙头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将成为提高我国农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作用。目前，我国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100 多万个，其中比较规范，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有 10 万多个。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是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要进一步明确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制定有关的法律和规章，促进它们依法组织经营，更顺利的发展壮大。

——改革农业管理体制，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家政府已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改进管理方式，建立了由国务院多个有关部门参加的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制度，吸收多方面意见，制定有关扶持政策，协调有关工作，推进全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各地区正在遵循国家统一部署，进一步结合本地实际，深化改革。随着各地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管理、指导和服务等方面工作的优化，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必将展现出新的面貌。

第四节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

一、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意义

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乡村人口众多，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机械化作业的同时，合理地安排农业生产中排出的富余劳动力。由于中国城镇的发展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现在的城镇和城镇工业经济对人口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只能吸纳部分的乡村富余劳动力。如果大量的农民工都涌向大中城市，势必给交通运输、城市住房、环境、卫生、用水、秩序管理等方面带来很大的压力，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显然，在有组织地规划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同时，在农村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是促进乡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一条适合国情、成本低廉、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而健康发展的道路。这就意味着，要高度重视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依靠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尽快地减少依赖土地生存的乡村人口。因此，要解决好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个三者相互联系的“三农”问题，一定要在着眼于提高农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加快发展非农产业。在

农业生产收入尚不能完全提高农民个人收入的阶段，发展农村工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对于尽快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农村非农产业的主要组织载体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异军突起。它在资金上起到“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作用，同时也大量地吸收乡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近几年，中国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农民收入的1/3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利用较少数量的资本和较低层次的技术，把仍然处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吸引到了工业化的大潮流中，改革开放20多年间，共有1亿人转到了非农产业。乡镇企业为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乡镇企业的经济增长率在“八五计划”期间年平均达到42.27%。但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增长势头明显放慢。主要原因：①体制障碍。大部分乡镇企业是靠集体经济起步的，集体所有制在促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集体所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也是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原先乡镇政府是充当集体所有者所有权代表的，因此也就产生了类似于传统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的现象。乡镇政府对企业行政性干预的缺陷，随着乡镇企业数量和资本的增长，越来越显示出来；乡镇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角度，提取集体企业利润，使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企业缺乏技术更新改造资金，竞争力难以提高。这说明，工业资本的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需要通过改革，尽快适应市场经济。②农村工业经济起步比较迟，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科技、资金力量比较薄弱，在市场竞争和全国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不少乡镇企业处于弱势，这说明，要使乡镇企业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就必须从依靠科技进步、资金融通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已经进入“二次创业”的新阶段。为了再现乡镇企业的辉煌，有必要加强引导，积极扶持。

——引导体制创新。完善所有制结构，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促进乡镇企业产权主体和投资主体向多元化方向转变；巩固和发展农村产业资本（工商业资本）的集体所有制。通过改革乡镇政府机构，分离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和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改革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分离政府财政收支和集体资本经营收支；落实集体资本产权关系人格化（经营管理各个环节责任、权益落实到岗位）等措施，使集体产业资本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实现形式。

——引导乡镇企业适应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信息沟通，宣传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乡镇企业面向市场，从企业现存技术、资金和人才实力出发，选择市场进入方向。从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出发，制定依靠科技进步、人才流动、资金融通等方面的必要的支持政策，促进中小乡镇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产业结

构调整中配套发展。

——引导乡镇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引导企业增强竞争战略意识，强调依靠科技进步，把新增投入用于加快技术设备更新改造步伐，从过去“引进技术”为主转向“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并重，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质量；提高企业人员素质，重视和增加对科技、管理人才和职工的培训投资；把发展乡镇企业同建设小城镇结合起来，形成企业群集聚效应，降低交通、能源等成本。乡镇企业只有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了，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

三、农村非农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壮大乡镇企业，需要重视非农主导产业的培育。目前中国多数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科技水平、整体人员素质比较低，管理水平也比较落后，如果盲目地选择非农产业的投入方向，不但生产成果在质量、成本等方面缺乏市场竞争力，而且还会因为这种盲目的发展，造成不同地区的重复生产，同行业、同产品过度竞争，生产能力过剩。所以发展非农产业，必须对产业投入方向进行科学的选择；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劳动力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量力而行，抓住有条件发展的主导产业。所谓非农主导产业，就是在当地能对经济发展起支柱作用，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非农产业。

目前适合做为农村非农主导产业的主要有：①农副产品加工业，这适合绝大多数地区。它们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资源禀赋优势，流通成本较低；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扶持、推广对象，融资比较方便；对技术的要求不太高，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同农业的关联度大，便于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和促进农业增长和发展。②农村社会化服务业，这适合所有地区。由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所以这个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可以先从一些低层次的行业入手，如供销服务、科技信息服务与推广等，再逐步向其他高层次领域渗透。③有特色的第三产业，这适合某些具有资源优势，包括某些人文优势或区位优势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人文、自然景观资源，发展旅游业等特色产业。④发展城市工业的配套产业。这适合靠近工业发达的大中城市的农村地区，可以主动适应城市经济的辐射，为大中型企业生产配套的零部件等。⑤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合非农产业已具一定规模的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正在逐步消退，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而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已有一定规模，有实力逐步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选择非农主导产业不在于多，而在于强，在于大，在于优。主导产业一经确定，就要兴“龙头”，建基地，深入进行技术和体制创新，协调相关产业发展，达到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地方政府应当致力于改善非农主导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为支持当地非农主导产业的脱颖而出，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

第二十章　推进经济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之下，自觉地推进实现经济现代化。前两章分别阐述了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从长期看，城乡、工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而经济现代化就是要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前提，这是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略和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上，加快经济现代化的步伐，必须把握国情现状，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明确科学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本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并在前两章的基础上，阐述经济现代化战略包括的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科教兴国等战略。

第一节　从国力出发推进经济现代化

一、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是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早在20世纪的50年代建国初期，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概念。而国际学术界讨论现代化问题，大体也在这个时期。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不但包含现代化的一般含义，而且要求从国情出发，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的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含义，是在党的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在实践中逐步明晰的。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用“小康”社会这个新概念，来描述在20世纪末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1982年，邓小平提出，为实现这个目标，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以后又多次阐述这个思想，并提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再发展30到50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在总结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正式明确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5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

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经济现代化是这个伟大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深入地理解现代化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科学含义。

1. 现代化的含义。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般认为，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展开。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一开始，人们几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经济方面，甚至产生了现代化即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观念。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社会变革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性的变化时，就开始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来认识它，并且使用一个全新的概念，即现代化，来概括这个进程，而与此相关的理论，称之为现代化理论。在唯物史观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现代化标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现代化总是以世界上发展处于前列的一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主要标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生产力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马克思曾深刻地分析过大工业的革命性的技术基础对人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终将导致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

2. 现代化的标准。为了正确评价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学者们设计出各种现代化标准。目前对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化标准，主要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指标：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 000美元以上；②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5%以下；③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45%以上；④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70%以上；⑤识字人口的比重——80%以上；⑥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10%以上；⑦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500人以下；⑧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⑨婴儿死亡率——3%以下；⑩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0%以上；⑪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显然，英克尔斯的这个指标反映的是经济社会文明程度的一般标准，虽然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应当努力达到的指标。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应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完善和完备，全民族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等内容，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标准。这是更全面的现代化要求。

3.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任何现代化的推进都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建设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从社会生产力角度考察的现代化过程，它决定着现代化过程的其他方面。在理论研究中，不少人用工业化来替代现代化，对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不作区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经济现代化在整个社会现代化中处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当代的经济现代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包括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而且包括国民经济的信息化。工业化是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

中逐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变革过程，它以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就业中的份额连续下降，而工业及其他产业份额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逐步渗透到生产的各个层面，生产组织也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革。根据唯物史观，经济现代化作为不，断变革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包含着不同的核心内容。20世纪中叶，以高新技术创新为显著特征的科技进步不断发展，引发了一场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在诸多方面对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类社会开始了经济信息化的进程。所谓信息化，就是指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当代虽然还没有出现完全实现经济信息化的国家和地区，但从整个世界来看，产业结构演变中新兴的信息产业正在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并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信息化可以看作是经济现代化继工业化之后的又一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工业化和信息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4.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含义。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曾经主要是推进国民经济工业化。但是，在我国工业化未完成之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进入了信息化阶段，这对我国经济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标准提高了。但是，必须看到，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信息化进步，也为我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机遇。信息化在加快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范围的资源重新配置的同时，也促进了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我们可以根据经济信息化的发展趋势，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装备，跳过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某些阶段，节约巨大的研究开发投资及宝贵时间，直接发展信息经济，在较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发展信息化，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从而加快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工业化，这仍然是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但是，信息化可以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中国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的工业化路子”。

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成功经验

工业化作为人类经济变化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实，它们的一些成功经验，是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的。目前，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一类是英、美、法等在“二战”以前已实现工业化的欧美国家；另一类是“二战”以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1. 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18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产业革命，此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到20世纪初叶，欧洲和北美各主要国家相继发生了产业革命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至今在世界经济中一直保持先进地位。这些国家尽管国情不同，但几乎都与英国经历了同样一个工业化过程。研究促成这个过程的因素，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现代化。

——完善市场制度，发展社会分工。在生产方式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逐步成为工业化国家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而市场竞争又被逐步规范化，形成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分工制度的发展，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推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完善产权制度，形成市场经济秩序。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有序化是分不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要求完善经济制度，其中包括市场经济一般的产权制度。为了形成有序的市场经济制度，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国家出面，健全法制，形成《公司法》、《反垄断法》等一系列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协调了市场法人主体之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重视科学技术，推动技术创新。工业化的本质特征就是手工工具生产转变为机器体系生产，就是技术革命或技术创新。正是科技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启动和实现，都有着技术革命的背景。目前美国的“新经济”，也是与信息技术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这告诉我们，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极其重要因素。

2.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二战”以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工业化进程，其工业化具有突变性和跳跃性特点。它们促进工业化的经验也很值得重视。

——国家规划经济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着强烈的赶超意识，希望借鉴先进工业化国家形成的工业化基本模式，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缩短工业化时间，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为此，他们没有完全依赖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而是重视了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发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从国情出发正确选择工业化战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根据本国自然资源条件或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以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扩张，带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它们都相继实行出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以加工后的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等出口品，替代传统的农业和采矿业等初级产品出口品。这些国家和地区面积小，资源少，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采取这种工业化道路，是比较实际的。

——重视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本。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技术是两种相当缺乏的生产要素。由于后进国工业技术落后，缺乏早期工业化国家那样的雄厚资本积累，而依靠现存农业经济向工业提供资金积累也很有限。如果在注意维护民族经济权益的条件下，善于利用国外资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就可以使工业化直接在较高的平台上进行，节约自己从头开发技术的成本。针对这种状况，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引进资本、先进技术的措施，实践证明是有积极意义的。

尽管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进程存在牺牲别国利益和本国工人阶级利益等不可避免的弊端，但是，上述经验具有一般意义，对中国现代化是很有启迪价值的。

三、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才启动工业化进程，是典型的后起国，现代化的进程只能从现存国力出发。固然，我们要充分利用现存的和潜在的有利因素，如优越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革成功能提供的体制保障、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广阔国内市场、有利于投资增长的较高储蓄率、科学技术在一些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然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我们更应重视国情中存在的制约因素，从而更冷静地实施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制约因素有以下方面。

——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存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和有碍于现代经济发展的自然经济观念，有学者指出："农本主义思想（重农抑商）、整合意识、不重视科学技术、浓厚的家庭观念等，这些都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现代化的进行"。

——人口过多。我国存在着严重人口过剩问题，而且人口素质总体水平比较低。这极大地制约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人口数量过多，导致人均自然资源缺乏，我国主要自然资源如水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及很多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都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人口的迅速增长耗费了大部分新增的国民收入，导致资本积累速度缓慢，社会生产力提高缓慢；投资不足又造成劳动力过剩，失业人数居高不下。而经济落后又制约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影响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

——庞大而落后的农业。马克思所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甚低，技术落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状况制约着工业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各个区域资源禀赋、发展基础、人力和技术条件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何统筹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是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不利影响。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产业技术含量低，处于不利地位；占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遏制战略，使我国许多产业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美国等西方大国还在政治上推行霸权主义，经常将种种经济限制用做其实现政治企图的重要手段，这使得我国工业化、现代化面临严峻的考验。

深刻理解这些制约因素，可以使我们认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艰巨性，居安思危，崇尚科学精神，振奋民族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奋图强。

四、"三步走"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是对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谋划。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加强发展的稳定性，减少发展中的曲折，加快发展速度。"三步走"战略，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战略。这个战略立足我国国情，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

严格的科学性和充分的可行性。

——它体现了远大目标与求实精神的统一。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国情。“三步走”的战略，一方面明确了中国要摆脱贫穷、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必须确立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从国情国力出发，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它体现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科学态度。经济的全球化的趋势，对中国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加快发展的机遇。“三步走”的战略，充分估计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确了中国到本世纪中叶的目标不是最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要求我们抓住机遇，扎扎实实，加快发展，分阶段地实现这个目标。

——它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统一。“三步走”战略中，不仅提出国民生产总值的要求，而且明确提出了“温饱水平”、“小康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直接关系人民生活改善的目标，更为具体地体现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

——它体现了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经济指标，用它衡量经济现代化水平，符合国际通行标准，这避免了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以几种主要产品作发展指标的片面性。“三步走”的战略明确了经济现代化过程每一步应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坚持了国民经济发展中速度和效益统一。

目前，“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前两步已经顺利实现，而且原定于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任务，在1995年已经提前完成。现在我国正在实施第三步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践证明，“三步走”战略是正确的战略抉择，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发展战略，中国必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三步走”的发展总战略，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现代化；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等。以下几节分别阐述这些具体战略。

第二节　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现代化

一、城镇化与工业化

城镇化是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过程的中国表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产业革命后，城市得以迅猛发展，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这是因为工业化过程要求生产资料、劳动力等要素相对集中，而这些要素在地理上集中到一定程度，就表现为城市的扩张，这

个过程就是城市化。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其中包含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的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城乡分裂的老路，生产要素不能只向少数大城市集中，在工业化进程中，全国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理论界一般把城市化表述为城镇化。城镇化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由农村不断向城市或城镇集中，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具有集聚效应，会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理论界称之为外部经济效应）。由于各种行业集中到城市，必然促进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这使企业或者行业生产的辅助性和服务性投资大大减少，产品质量也会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通用性，使企业既能得到比分散布局下更完备的能源、交通、通讯、供排水等等服务，又降低了成本；城市本身是一个既包括商品市场又包括要素市场的大市场，而且交通和通讯便利，可以促进交换关系和社会分工关系在地理上更广、更快地扩展；城市拥有各种学校和科研机构，拥有各行各业的熟练劳动力，这使企业更容易得到更多的智力和人力资源；现代城市中有各种中介机构和媒体，使企业能有效地享用各种信息资源。因此，城镇化具有促进工业化外部经济效应。

但是，从国外经验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两者并不是会自动地相互适应。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城市化水平（人口向城市转移）低于工业化水平，而到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水平开始超过工业化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一开始就出现了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水平的现象。后者称之为“过度城市化”或“超城市化”现象。这会造成城市人口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失业、环境污染、空间狭窄、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设施不好、治安状况混乱等问题日益严重，这都严重地影响了健康的城市化进程，从而也制约了工业化的推进。

由此可见，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展中存在相互制约关系。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科学地处理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努力使他们相互促进。

二、中国城镇化的现状与发展战略

在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中，中国必须主动地实施城镇化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1. 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我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1）改革开放前，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在工业化过程中，我们把大量资本积累集中投向生产性建设方面，因国防需要等原因，又有相当一部分分散投向边远地区，许多城市基础设施却因资金短缺而得不到建设，致使城市承受人口、就业压力的能力弱小，城市功能也不能充分发挥。为了减轻城市建设压力，不得不实行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制度，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城市福利制度等。这种限制城市规模扩大的工业化方式，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合理流动，使得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

(2) 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市场机制渐渐成为工业化进程的运行基础，开始推动城市化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及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另一方面，以乡镇企业崛起为标志的农村工业化推动了农村小城镇建设，有些是乡镇企业移向原有的小城镇和集镇，有些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建立新的城镇，这就出现了农村城镇化的趋势。这样，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一批城市群、城市带逐渐形成，城市的服务功能和辐射能力增强，农村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这种城镇化是由市场化推动的，符合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城市第三产业不发达，就业容量有限；城市基础设施不能适应需要，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等；城市潜在失业人口依然比重较大；城市管理水平不高。城市化水平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都不能适应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要求，所以，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

2. 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加速城镇化，是推动我国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加速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选择一条正确的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大体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集中型，以发展大城市为主，通过工业化集中大城市的过程，使得农村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转移，如日本、美国、英国等。二是分散型，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通过中小城市工业化的过程，吸引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如法国、瑞士等。这两条道路，是由这些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等综合因素决定的。符合一国国情的城市化模式不一定适合另一国。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进程是在城市和农村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因此，我国城市化必须采取城镇化形式，发展战略只能是集中型城市化和分散型城市化的有机结合，即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以内涵发展为基本思路，构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乡镇”网络体系，组合成“形散实聚”的城市群。实现这种城镇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重视城市的规划工作。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科学的规划能够使得城市建设事半功倍。要从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建设相互结合的角度，从布局上确定好城市功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建筑布局、设施布局和生态布局等。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拓城建筹资渠道，增加资金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把充分发挥城市的各种功能同适当地扩大现有城市的人口容量有机结合起来。

——鼓励多种形式的城镇发展。中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差异大，城镇形式必然是多样化的。应本着节约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注重效益的原则，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

——采取区域性城镇化发展战略。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必须重视特点。东部地区应在现有大城市的基础上，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中部地区应大中小城市并重发展；西部地区则可重点发展大城市，使之成为辐射力较强的新的经济发展中心，完善区域性中心功能城市，发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三、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现代化

当代中国经济仍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说，如果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中国就不可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乡镇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化，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向人们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加强小城镇建设，不仅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能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农村工业化进程，还能将现代化的思想观念、技术信息、管理经验传播到广大农村，从而全面推进农村现代化。目前，小城镇建设已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①相对于农村工业化水平，小城镇的发展明显滞后；②相对于硬环境建设，小城镇软环境（文化设施）建设明显滞后；③布局不合理，规划水平不高；④仍然存在体制和政策的制约，现行户籍制度等还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困难，积极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

——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首先要做好市域和县域的城镇体系规划,依据当地实际科学合理地规划小城镇布局;其次要科学制订小城镇规划,综合部署小城镇规划区内的土地、空间资源以及各种建设,做到统筹兼顾,整体布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最后在规划中要注意布局紧凑,节约土地,特别要加强乡镇企业的合理布局,防止和减少污染。

——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投入力度。逐步改变小城镇建设投资主体单一的局面，形成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投资建设小城镇的多元投资机制。

——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农村土地使用的法规。一方面逐步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建设用地管理，维护农用耕地，防止土地资源浪费。

——改革现行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积极又稳妥地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逐步实行以职业和居住时间来划分小城镇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

——强化小城镇的区域中心功能。发挥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作用，促进其带动周边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

第三节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现代化

一、经济现代化与优化产业结构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总量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紧密联系的。总量的增长依赖于结构的优化转换。所谓优化产业结构，是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国民经济各产业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协调发展，并满足不

断增长和变化的市场需求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产业结构合理化。它是指，产业结构由不合理向合理发展的过程，即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对初始不理想的产业结构进行变更、调整，促进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使一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它是指，随着科技水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代表现代产业技术水平的高效率产业部门比重不断增大，朝阳产业不断增加，夕阳产业或被淘汰或被改善创新，这样一种产业结构向高一级演进的过程。主要标志是技术集约化、产品加工度提高化和高附加值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合理化为高度化提供前提，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推动产业结构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合理化。因此，在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以产业结构高度化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

二、关于产业结构演化的现代经济思想

产业结构的优化存在着客观规律。国际上经济学家们对发达国家的产业演变过程，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值得重视。

——配第—克拉克定律。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 17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若干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认为随着经济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的分布，在第一产业将减少，在第二、三产业将增加。克拉克认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出现收入的相对差异造成的。人们总是由低收入的产业向高收入的产业移动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越小。

——库兹涅茨提出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继承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关于产业结构演变的观点主要是：①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在大多数国家，农业劳动力都存在减少的趋势。②第二产业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是上升的，但是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增加不大或基本不变。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第二产业吸收劳动力能力下降，但对人均国民收入仍有增加。③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在各国几乎都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只是略有上升且不一定连续，这说明第三产业有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般说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三个产业中，相对比重是最大的。

克拉克和库兹涅茨主要是以欧美国家在工业化以及工业化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的资料作为分析基础的。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呈现出

新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及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继续下降，但进入70年代后这种趋势似有减弱。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都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保持着上升的势头，其比重都在50%以上。这种趋势的背景，是与信息产业的兴起，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技术相联系的。

上述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和外国工业化进程显示的实际状况，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就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劳动力有减少的趋势，第二产业的发展将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存在扩大的趋势，可以吸收更多劳动力。

三、调整产业结构需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产业结构，需要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来形成，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机制的自发性所造成国民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太低。目前，与相近收入水平国家的一般模式和亚洲国家相近发展阶段的一般情况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大概要高10～2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大概要低出10～20个百分点。

——三大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过大。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某一产业中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比，它可以用来评价产业结构的合理程度。目前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一、三产业。1997年，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5.62倍，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别。这反映了三大产业的配置格局存在不合理。第一产业大量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劳动生产率偏低。

——农村非农产业结构不合理。在农村非农产业内部，工业比重过大，为农村商品生产服务的交通运输和商业服务业比重过小。农村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又与全国工业部门结构存在着相似性。

——工业结构升级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重化工业的阶段已基本完成，另一方面以消费品工业高速扩张为重心的加工高度化进程也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消费品工业继续扩张，而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没有得到很好发展，这就影响了工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主要表现在汽车、家电产品等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存在低水平分散投资和重复性建设。

上述产业结构不协调、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缓慢，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相联系的，因此，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中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四、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在完善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体系过程中，必须树立经济全球条件下的国际竞争意识，以现代化的理念指导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加工度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促进工业结构升级。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①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紧紧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节能降耗，防治污染和提高劳动率，加快改造传统产业。②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力度、产业比重和技术水平，为各行各业提供先进技术设备。③加快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丰富产业结构内容，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实现产业生态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要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统一，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淘汰那些设备陈旧、高物耗、高能耗、污染严重的产业部门和环境负效应严重的产品；要推广节约资源、环境负面影响小、经济效益高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要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要提倡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观念。

——加快信息产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要从国情出发，抓住战略重点；要坚持信息服务业、信息技术和设备制造业共同发展，优化信息产业内部结构；要加强信息产业的立法维护工作。

——综合实施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产业政策。要把实施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区域经济结构政策结合起来，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保障并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速度，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支柱产业尽快成长，促使城乡之间、经济区域之间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下的产业结构。

第四节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对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探索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一直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力图弄清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均衡发展理论。它属于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发展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在整个社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均衡布局工业生产力，通过产业部门的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实行区域经济平衡增长。但是，从

实际上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具有推动所有地区平衡发展的丰裕资金，这种战略很难实施。

——非均衡发展理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必须从这种常态出发。他们提出的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有法国经济学家郎索瓦·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发展极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逊提出的区域增长差异呈倒"U"字型变动趋向的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屠能的农业区位论发展而来的"梯度推移理论"等。主要的战略主张是，重点发展某些区域，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通过"扩散效应"来带动地区的发展。

——"集中的非中心化"发展理论。这由美国经济学家劳艾德·罗德温提出的。这是一种试图吸收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两者的长处，而提出的区域经济综合发展理论。主张一方面利用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优点，在核心区域保持一定程度资源的集中；另一方面在区域边缘创造新的核心区以形成新的增长区，从而促使区际之间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技术上和经济上协调。

上述理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探索。它们尽管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属于西方经济学，但是包含科学的成分，有助于我们深人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然而，各国区域经济的状况都具有特殊性，即使我们理解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不够的，还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二、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重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强内地建设，但是发挥沿海优势不够；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投资向中西部和最不发达地区倾斜；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投资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通过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如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等，带动全国的发展。优先发展沿海的战略使得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原因，地区差距扩大了，沿海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而中西部地区则发展得更慢一些。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从长期看，会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需要，相互牵制，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制度属性决定共同富裕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些就决定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能照搬外国的发展战略理论，必须从国情出发，确立"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异"的方针，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考虑我国各地区的地理方位、行政区划、经济发展梯度等因素，我国政府在1985年，正式划分出三大经济地域，做为规划生产力布局的依据。

——东部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12个省、市、自治区，除北京外都有海岸线。

——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9个省、市、自治区，它们都没有海岸线。

——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西藏等10个省、市、自治区。

按照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念，既要有重点地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关系，协调主导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东、中、西部区域社会分工的合理格局，形成国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从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必须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进程。为此，国家政府及时地提出了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这个战略，对于扩大内需，对于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重视市场配置方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实施国家对西部地区经济倾斜政策的同时，要遵循市场规律，探索通过市场配置方式，加大对西部地区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投入。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加强公路、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以及电网、通信、广播、电视和水资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是实施西部经济大开发的重要条件。振兴西部地区，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本地各级各类人才；另一方面要制定优惠政策，稳定人才，吸引人才。

——重视保护环境和资源。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十分低下，再加上近年来森林资源乱砍滥伐的现象不断发生，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因此，开发西部地区要十分重视保护环境，这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

——积极调整和优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要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具有发展前景的特色和优势产业。

——加速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西部地区落后与自然经济观念、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是有联系的。因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扶持

或发达地区扩散效应的带动，而要积极主动地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市场经济意识，改革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吸引人才、投资，促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经济环境。

第五节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一、科技进步与教育在经济中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三步走”的总战略中，科教兴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科教兴国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推动科技进步；二是发展社会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素质。这是由科技和教育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1. 科技进步的作用。所谓科技进步，是指人们依据对客观世界的深化认识，创造出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手段的进步。科学与技术是既有区别而又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总结，是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技术则是指生产实践的知识和手段。科学进步是技术进步的先导，技术进步又为科学进步提供实践基础，两者不可割裂。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诸因素中的第一因素。邓小平深刻地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现代生产力中，科学技术含量已占很大比重，按照“余值法”的测算结果，当代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有60%～70%靠的是科技进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5%左右，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差距。

2. 教育的作用。科学技术要由人创造出来并由人来掌握的，所以科技进步是和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一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教育不仅是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手段，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及道德素质，离不开教育。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它要求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讲信用，讲道德，遵纪守法。因此，无论从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还是提高人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规范来说，教育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十分自觉地发展教育。

二、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提高本国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一大法宝，以促进形成科技成果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也应运而生。一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国家政府部门同社会团体、单位和个人构成的组织网络和制

度，其活动目的是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

1. 科技创新体系的一般特征。世界各国的科技创新体系，都是由政府参与构建的。尽管各具特色，但是具有一些共同特征：①网络性，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个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任何一个网结点都能将新的知识和创新扩散出去；②合作性，在科技竞争的基础上，提倡合作，促进社会各方共同加快科技创新，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收益；③联系性，构建广阔的联系网，有利于参与者进行合作研究开发、人员交流、专利交叉授权等多种多样的联系。

2.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追赶世界先进科技和信息化发展的步伐，并注意把科技创新与科技产业化紧密结合起来。1986 年，制定《高新技术研究开发计划纲要》(即 863 计划)，拉开了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的帷幕，接着，先后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和《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加快了构建的步伐。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方向，体现在下述方面。

——创新主体多元化。科技创新包括形成新思想、新发明，到产品设计、试制、生产、营销等一系列环节，涉及许多领域。因此，要调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以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核心力量的，包括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等有关组织和热爱科技的群众在内的多元主体，构成科技创新体系的多元化主体体系。

——创新过程网络化。要借鉴科技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逐步改变传统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然后到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那样一种线性流程。要努力在国家统一规划下，构建起一个宏大的网络式的科技创新系统，使这个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环节之间，都可以发生相互作用和反馈，促进科技知识和科技应用的创新信息，能方便地、迅速地在各种创新主体之间，按需要流动，从而最快地出成果、出效益，并减少决策失误和创新风险。

——创新目标效用化。尽快改变科研成果与经济效益相脱节的状况，在科技开发和科技产业化方面，重视市场需求，确立企业的核心主体地位。

三、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开发人才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在事业发展方面，基本实现普及 9 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消除青壮年文盲，国民平均教育水平已提高到 8 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4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1%；各种形式的在职培训、继续教育、再就业培训、业余文化技术学习等成人教育蓬勃发展，、培养出大批熟练劳动者和各类专业人才；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国情下，造就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国民教育体系。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事业还明显落后。1995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在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大学生毛入学率已高达 46.9%。而我国到 1999 年，从业人员中文盲率仍占 10%左右，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70%左右，尤其

是大专以上的占不到4%。每百万人中科技人员的比重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因此，从经济现代化的要求来看，要将劣势人力资源转向相对优势，我国教育事业所面临的任务十分紧迫而繁重。加快教育发展步伐，必须明确战略方向，主要包括下述方面：

——坚持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国要提高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科技水平的发展，而且有赖于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准的提高，增强凝聚力。因此，要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摆到重要的位置，渗透到科技文化教育之中。在学校教育中，要把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巩固和加强基础教育，发展高中和高等教育。国民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而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本手段。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把普及义务教育落到实处。同时，为了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必须加快发展高中和高等教育。要根据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变化，科学地调整教育的层次、科类、专业结构，使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结构协调一致。

——突出重点，加强专业学科建设。努力使国内现有一流大学及重点学科专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它们成为国家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核心基地，培养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摇篮。

——发展信息化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加速建立覆盖全国各级教育的信息化网络，充分利用现有师资资源，拓展教育面。突破学校教育的狭隘眼界，构建终身教育框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逐步构建新的开放式教育体系，为终身教育提供新途径。

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战略。在明确上述科技和教育发展战略方向的前提下，必须扎扎实实，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

——继续深化科技和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促进应用型科研机构向科技性企业的转化，以利于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分类改革社会公益性科研机构，更大程度地发挥科研人员的潜力；遵循市场经济运行和科研发展的规律，改革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管理方式，提高投资效益。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完善分级管理，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分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调动各级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大力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办学；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完成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加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以促进科技、教育和经济的紧密结合为目标，加强科学研究体系、技术开发体系、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的建设，为促进产学研结合、为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化的全过程提供技术、信息、管理和投融资服务；加强科研基础条件的建设；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各级财政切实加大科教投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大幅度增加全社会科技和教育投入。在科技投入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新的投融资机制、保险机制、科技信贷机制和信用评估机制。在教育投入方面，重点是充分利用财政、金融、信贷等手段，提高教育融资能力。

——完善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政策法规。在科技方面，制定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完善知识产权法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革和完善优秀科技成果奖励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在教育发展方面：完善教育法规体系，加大教育执法力度；建立社会对教育的评估监测机制，加强教育质量监督；积极推行教师聘任制和全员合同制，改革分配制度，激励教师工作积极性；利用国际、国内两个教育市场，提高人才培养效益。

第二十一章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应避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曾经走过的过度耗费经济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等弯路，也要总结自己人口过快增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训。这就需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积极、主动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地发展的同时，坚持计划生育，有效使用和节约资源，维护生态环境，促进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本章在阐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意义的基础上，阐述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实现发展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地位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及含义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关生产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的农林业实践中，就有秸杆粪便还田、封山育林、封山禁猎、封湖禁渔、休耕轮作等成功范例。然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科学思想，却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家发现在全球出现严重生态失衡、能源短缺、粮食危机、毒品泛滥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才明确地提出来。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受联合国环境与开发署的委托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初次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简称 SD，可持续包含着“能支撑的”、“可承受的”含义）做了重要说明，把它解释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解释在最概括的意义上，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接受和认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以大会精神为指导，制定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世界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于是，可持续发展原则开始逐步应用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实践之中。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确立的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存，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总体的、长远的、并持续实施的规划和措施。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有必要相互配合，才可以达到促进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1.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文革”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党中央就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先后提出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有直接联系的重大措施。十一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抓农业要注意保持生态平衡；同时，要求工矿企业认真解决污染问题，防止对水源、大气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的损害。1980 年 9 月，党中央发表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指出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和人民生活带来一系列危害。1982 年起，在邓小平关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题词的倡导下，我国确定了植树节，形成每年的义务植树活动。1983 年，我国政府宣布，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2 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于 1994 年在全世界率先提出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实践了对“里约热内卢宣言”的承诺。1997 年，中共党的十五大，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同时被明确为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目前，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认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深入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也需要每个人的自觉参与。所以，人们有必要深入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内涵。它主要包含下述相互联系的实践指导原则。

一是资源享用的公平性原则。资源享用要满足“跨代平等”或代际间的公平，使人类代代都能持续利用经济和自然资源而健康地生存发展，给世世代代传人以公平的发展权；还要满足“同代平等”，使当代不同国家的人能公平地利用资源。目前，发达国家过多地使用世界资源，以致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因经济技术落后，在生产中过多地耗费资源，这些都会影响可持续发展。因此，当代人过多地耗费资源，或者全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状态是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

二是生存基础的整体性维护原则。人类共有的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整体，这是人类整体生存的基础。人类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系统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人类必须有可以健康生存的生态空间，才能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这就要求人们的各方面局部利益服从维护生态环境这个整体利益。获取民族的、地区的、个人的局部、个别的利益，都要以不危害人类的整体性生存基础——生态环境系统为前提。

三是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原则。在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人们消耗自然界中的物质必须予以补偿，才能使自然对人类的生存具有长期的承载能力。因此，人们必须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否则，在再生产过程中，就会遭到资源短缺的惩罚。

四是人与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和谐相处原则。作为自然人的人类只是生物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遵循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的平衡规律，才能维护健康生存的生态环境。

人类必须与动植物和谐相处，而不能肆意地捕杀动物和滥砍滥伐林木，人与自然界生物之间需要和谐共处，才能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系统。

五是人类人口增长的自我控制原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消费的“人口”数量大于从事生产的“人手”数量。“人口”的过度增长，增加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加重自然对人类承载力负担的主要因素，也是扩大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重要原因，要使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人类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二、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如果在发展中不能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又盲目地、甚至浪费式地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片面地追求发展速度，那么，经济上的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健康的，也是与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共同富裕和共同利益的目的相违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广大劳动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要求。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可是，也存在许多有碍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国人口数量增长过多。中国面临着人口增长高峰。据人口学家预测，中国人口到2010年将达14亿，到21世纪中叶，人口总数将接近或达到16亿左右时才有可能实现零增长。①庞大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人口规模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带来一系列后果。②人口过快增长抵消经济发展成就。我国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约1/4被增加人口消耗掉，减少了资金积累，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阻碍教育和科技水平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快提高。③人口过快增长导致劳动力增长过快，给劳动者就业造成很大压力。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固然与体制改革使企业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显性化有关，劳动力增长过快也是重要的原因。④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在我国总人口中，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7%，这给社会保障带来很大压力。这些情况表明，控制人口增长已成为我国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中国人均资源偏低。我国虽素称地大物博，但是人口庞大，人均占有的资源量并不多，许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水资源只及世界平均的1/4，人均林木储蓄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但是，我国在同种生产中资源消耗率却较大，资源利用率偏低。我国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钢材相当于法国的7倍，美国的6倍，英国的5倍，德国的4倍，日本的3倍；能源利用率，发达国家一般都在50%以上，我国仅30%。这固然有我国科技和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的原因，但是也与人们在生产中不注意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关。增强全体国民节约和有效利用资源意识，已是当务之急。

——生态环境破坏的现状不容乐观。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我国曾经为增产粮食而变草原为耕地，乱砍滥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沙尘暴、水灾频频出现；而为增加所需农产品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又造成食物污染日趋严重，直接危害人体健

康；过量人口挤占动植物生存空间，使物种减少，生态食物链失调；过量人口的生活、生产排泄物破坏土质、水质和大气质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据资料，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到1%；全国七大水系，有近一半河段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的垃圾处理率不足3%。尽管我国这些年来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但是，总体上看，生态环境依然具有脆弱性，必须大力维护。

这些存在的问题，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中国要真正加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就一定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利条件

上述问题是客观存在，但是，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经过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并不是不可解决的。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利条件。这是中国可以实现减缓人口增长速度，少走或者在今后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靠保证。

——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助于全社会协调行动，更好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控制人口增长，节约和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都要靠全社会协调行动，要求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形成人们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人们能够比较自觉地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共同参与，协调行动。

——按劳分配的分配关系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有助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实现良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中，经济的良性循环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它可以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创造物质条件。而经济的良性循环取决于社会总供给与有购买力的总需求的平衡，这种平衡又取决于全社会生产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与他们产出成果的基本对等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剥削关系造成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这就造成生产过剩危机，因而其制度是阻碍经济良性循环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本质上是劳动付出与劳动成果之间的等劳交换关系（在做了必要扣除的意义上），这就为经济的良性循环创造了前提。随着社会共同富裕程度的提高，社会对生态建设的投入也必然增多，必然有助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实现良性循环。

——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助于实现社会的长期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政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够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战略目标，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充分调动和组织人民，分清轻重缓急，集中物力和财力、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定的各项任务，因而有能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和持续发展。

第二节　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以人为协调主体的系统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人和自然（各种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制约关系，而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动物，他对自然起能动的作用。因此，在由人和自然构成的大系统中，人处于主体地位。但是，这不等于说，人可以为所欲为地盲目增长自身数量、盲目开发资源、任意宰割自然。这是因为，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源泉。一旦这个源泉遭到破坏，人的生存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它必须尊重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人必须正确地在人和自然构成的大系统中，正确地起协调主体的作用。

1. 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唯物辩证法，很早就发现，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部名著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是存在客观规律的，违背它人就要受惩罚。

为了认识这个客观规律，需要根据唯物史观，从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世代持续得以满足谈起。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之一是，依靠生产劳动，不断创造出维持生命和自身发展能力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但是在生产过程中，人必然要对自然发生作用，耗费资源或者影响生态环境。人的另一基本生存条件是，保证人处于能生存的生态环境中，但是人口的增长和人的消费活动都会对生态环境发生负作用。综合起来，从人世代持续生存的角度看，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表示为：

人的原始生存条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物质生产劳动（对自然的作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变化（生存条件变化）→人类生存：人口生产和消费（对自然的作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变化（生存条件变化）→物质再生产（对自然的再作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再变化（生存条件再变化）→人类的再生存：人口再生产和再

消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再变化（生存条件再变化）……。

在上述发展过程中，生产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它要在改变自然界现存物质的形态的过程中，消耗人类可利用的物质资源。于是，就提出了能否对所消耗的资源进行补偿，或者，当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减少后，能否用其他资源替代的问题，这实质是围绕生产而发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循环过程。而人的所有活动（生产、生育、消费等）都会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某种负作用，有可能缩小生存的自然空间，降低生态的质量，于是，又提出了维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这种对生态空间的缩小、降低与维护、改善，也是物质性的运动，这实质上是围绕生态环境产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过程。显然，人类生存条件的持续满足，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在生产、生态环境上，都要实现相互补偿、相互促进的良性物质循环，这是一种规律。马克思曾把“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称之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讲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实现良性循环的客观要求。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就是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人们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就是自觉遵循这一基本规律。

2. 人必须正确发挥人与自然之间协调主体的作用。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持续协调发展，有赖于人们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在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发挥好协调主体的作用，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如果物质生产采取高耗、低效、粗放型生产方式，任意排污，忽视安全，掠夺性采矿、捕捞、用地和砍林，重复建设等；人口生产采取盲目生育、轻视教育的方式，铺张奢侈、乱抛垃圾等，就会超量消耗、毁损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生存基本条件，导致人与自然之间恶性循环，阻碍可持续发展。反之，如果实行低耗、高效和清洁的集约型生产；实行人口计划生育，采取适度、节约和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消费方式；并对这些过程中受损的自然物质资源设法补偿或替代，对被污染的生态环境予以补救和改善，就能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要走人与自然之间实现良性循环、和谐发展的道路。从中国国情出发，有必要明确在人口、资源和环境三个主要方面采取措施，做好工作。

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必须高度重视人口对经济、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压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首要的是控制人口规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应力求控制在15亿~16亿以内，同时，要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只有抓住人口这个中心环节，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1. 必须坚决贯彻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继续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宣传和教育，促进群众婚育观念的转变；要以农村为重点，加强计划生育、妇幼保健人员的培训，努力改善计划生育的服务质量，把计划生育与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紧密结合起来，把实行计划生育和帮助群众致富紧密结合起来，做好基

层的计划生育工作；要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努力增加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要逐步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2.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必须坚持优生优育，禁止近亲通婚，避免早婚、早育、超生和近亲通婚等现象的发生，提高人口质量。为进一步提高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必须认真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在本书第二十章已经阐述。这里进一步强调，要重视基础教育，尽快消除文盲，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增加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的现状，尤其要把向农村育龄妇女宣传优生知识与向普及科学知识结合起来。要努力将保护环境和改善生态，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等可持续发展知识纳入城乡居民普及教育中，提高广大群众的人口意识、资源意识、环境意识。

3. 解决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正如第七章提到的，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尤其是知识分子老龄人口，是值得开发的智力资源；他们生活状况是否有保障，影响着在职劳动者的情绪和生产积极性；老龄人口的文化素质通过家庭教育，影响着儿童的成长。所以，做好老龄人口的工作，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关系到人口素质的提高，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要在全社会弘扬尊老养老的道德风尚；开展老年人的教育活动（如书画、电脑教育等），发挥老年人的社会积极作用；利用离退休协会等，组织身体健康的老年学者专家，为社会提供智力服务。要加快建立和逐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老年社区服务网络，形成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

三、节约资源，综合利用

中国人均资源偏低，必须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经济和社会长期持续的发展留有余地。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

——进一步做好资源调查工作，为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建国以来，我国在地质普查方面，做了艰苦的调查、勘探工作，查明了大量的矿产资源，掌握了主要的单项资源的资料；组织土地资源调查，对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类型、分布等进行科学评估；组织对森林资源的定期普查工作；对气候、水文进行多年的连续监测；对海岸带及其资源进行勘察和研究，这些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但是，许多资源的蕴藏状况仍有待于发现，自然资源的调查工作还远未完成。勘探工具和方法的改进，为进一步深入勘察资源创造了条件，还要继续深化资源调查工作，摸清家底。

——节约利用自然资源。我国节约自然资源的潜力很大，节能大有潜力可挖。由于许多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管理经验不足，对许多资源的利用效率都不高。这就要求我们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管理，挖掘潜力。要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运输和消费体系，减少资源消耗，并提高资源利用率。

——加强资源的培育和养护。在自然资源中，有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无法用人工方法增加其供给量；也有相当一部分资源是可再生的，通过人工培育和养护，可以有效增加其存量。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必须严格节约使用。而对可再生的资源，也决不可以有丝毫浪费。事实上，目前问题比较严重的是，由于人们的滥用或者无知的破坏，许多可再生资源已经处于衰竭状态，比如一些珍稀动植物已濒临灭绝，一些地方的森林荡然无存，草原正在退化为沙漠，相当令人痛心。可再生资源的更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决不可因为其可再生就不加节约和维护，必须未雨绸缪，加强保护。除了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树立全民保护资源意识外，还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各种法规，用法治保护资源。

——促进资源替代使用。这包括生产中的资源替代和消费中的资源替代。当一种相对丰富、相对廉价的资源能够替代某种相对稀缺、相对昂贵的资源时，这种替代就可以使稀缺资源延长可供利用的时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在生产中用一种物质替代另一种物质的方法。所以，要积极依靠科技进步，研究资源替代，最大程度地节约稀缺资源。

——促进产品延长使用周期。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方便的售后服务，使其易于维护和修理，用这些办法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可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减少废物，也就可以更好地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对于具有多种用途的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中的共生矿、伴生矿，一定要综合管理，设法综合开发、综合加工，努力发挥各种资源的利用潜力。要避免进行单一的某种资源的开发，而把其他有用资源作为废物摒弃。同时，对于生产和生活中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也要努力加以利用，提高废旧物资的回收、综合利用率，变废为宝。

——善于利用国外资源。我国固然是资源大国，但是，资源的种类、各种资源的数量，与别国相比，既有相对丰富的，又有相对短缺的。因此，要善于利用国际资源。应当用国内相对丰富的资源及其制成品，到国外换取国内紧缺的资源及其制成品。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严格限制或禁止国内稀缺资源的出口。对于从国外换回的重要战略资源，要节约使用，注意保持必要的储备。

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生产建设必定会排出“三废”（废物、废气、废水），不能不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我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力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一定要让各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生产与自然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必须积极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改善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减少高能耗、高污染工业的比重，大力发展节能、少污染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要通过结构调整，坚决淘汰那些消耗高、性能差、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落后生产方法，如

土法炼焦，汽油和柴油发电，土法炼有色金属，土法生产硫磺等，淘汰那些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小钢铁、小皮革、小印染、小造纸、小电镀企业等。在基本建设领域，要重点支持社会公共设施中的供排水治理污染项目。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调整产品出口结构，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和能源含量高的产品出口。

——建立和完善生产建设中的环境保护制度。如建设工程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三同时”制度，即所有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和同步投入运行；工程建设项目中的环境保护责任制等。

——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清洁生产。企业要树立清洁生产意识。清洁生产是对生产过程和产品采取整体性的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以尽量减轻生产过程及其产品对人类和环境的可能危害。推行清洁生产，可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产品设计、工艺过程和技术，妥善处理废物，充分利用能源和资源。清洁的工作和劳动环境，还有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仅能取得良好的环境效益，还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要积极推行国际环境管理标准，即 ISO14000 标准。让更多的企业创造条件，按照这一国际标准建立和实施环境管理体系。

——实施产品环境标志制度。环境标志可以表明一种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要求企业产品通过国家环保管理部门的检验，获得环境标志，这既有利于消费者在购物时做出有益的选择，又可以促进企业从扩大产品销路的角度，主动保护环境。

——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要加强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宣传与教育，增强人们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使“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理念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对环保设施建设的投入，社会各方面应密切配合，有效实施国家制定的统一综合治理规定。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环境保护法，依法保护环境。

第三节　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一、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

市场经济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它不可避免的自发性，又会对可持续发展形成障碍。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矛盾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化。

1. 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负效应上。外部性是伴随着自发的生产或消费活动而产生的，它可以是积极的影响，即

产生外部经济性，当生产者或者消费者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给他人带来有利影响，而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并未从中得到补偿，这种现象就是生产或消费的外部经济性；它也可以是消极影响，即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当生产者或者消费者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给他人或者社会带来损失或额外支出费用，而他人或者社会又不能为此得到补偿，这种现象就是生产或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生产和消费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源耗竭、环境质量下降、人体健康受损等就是属于外部不经济性或者说外部负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不可避免存在自发性，资本运营的利益驱动机制促使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容易导致生产者只从自己利益出发，过多消耗经济和自然资源，污染环境，而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性，也往往造成社会生产过剩、企业破产而浪费资源。市场经济中的消费信贷、为竞争而追求华丽的包装等，也会导致过多地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所以，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是存在矛盾的。

2. 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统一性。市场经济固然有自发性，但是它是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相比，它具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优点。如本书前面所指出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经济体制，它所产生的价格扭曲、资源浪费、效率不高等问题，不利于社会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也不利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市场经济能促进经济发展，也就能够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累资金；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和各层经济成员明晰产权，也就有利于把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职责和权益落实到经济主体和成员；市场经济有利于在竞争中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科技进步，也就有利于创新用于计划生育、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工具、新设备；市场经济在各种生产上，都会形成市场壁垒，只要把环保标准纳入市场准入条件，普遍提高由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标准形成的壁垒，就会有效地控制资源的滥用和环境污染。因此，市场经济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外部性产生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负效应，但是，它也存在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许多优点。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优点，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既要遵循可持续发展规律，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要尽可能地克服它们起作用时发生矛盾的一面，而充分利用两者可以统一的一面，这就需要尽可能地采取不妨碍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经济手段，把促进可持续发展同维护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结合起来，真正推动经济朝新型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1. 实施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要与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要把环境保护产业纳入重点发展的产业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浪费资源或损害环境的产业发展；要规定鼓励采用和限制禁止采用的技术，防止运用破坏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技术；地区产业政策要促进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

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建设，节约社会资源的消耗。要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贸易政策。鼓励企业继续提高技术水平，努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尽量减少资源性产品出口。

2. 建立含有保护环境和控制资源浪费的价格体系。要改变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排除在外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在促进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的同时，应加强资源核算，使商品的价格真正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即包括生态环境成本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的资源的实际成本。坚决改变某些自然资源低价甚至无价的状况，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

3. 建立消耗资源与污染环境的社会成本合理支付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把资源消耗和污染环境，都看做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社会成本支出，应当收回社会成本，来补偿失去的资源或者弥补、改善被污染的生态环境。在市场经济中，这种社会成本一般会大于企业内部成本或者个别成本。企业独立经营，往往只考虑这种个别成本，它造成的外部不经济的社会成本，却不加考虑。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是把自身利益建立在社会受损的基础之上。因此，这就需要解决社会成本“内部化”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企业造成外部负效应的社会成本，理应转给企业自己支出，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每个企业把保护环境当做自己的责任，与自己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对消费者而言，也同样有一个外部社会成本“内部化”的问题。如何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实现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关键。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贯彻“污染者支付原则”，即 PPP（Pollution Pay Principle）原则与“污染者和使用者支付原则”即“P（u）PP”（Pollution and User Pay Principle）原则。PPP 原则就是指污染者应当承担治理污染源、消除环境污染、赔偿受害人损失的费用。目前实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近年来，一些国家还进一步把资源利用纳入到这一原则中，提出了 P（u）PP 原则，“污染者和使用者支付原则”要求对资源的定价反映资源开采和利用的全部社会成本，尤其要把资源的耗竭成本即使用者成本纳入到资源的价格体系中，由此纠正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和低效率配置，以促进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更好地保护环境。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原则，把它应用到制定和实施有关的政策中。

——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这是对于目前生产还难以避免的污染排放，用经济手段加以控制的制度。由政府管理部门以满足环境质量要求为依据，规定一定时空范围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这一范围内，对不同企业规定允许排放量，并发放排污许可证，同时，允许企业在市场上出售或购买许可证。如果许可证的购买者购买到较多的排污权，就可以在生产中排放较多污染物，但排污权出售者则由于卖出了自己的一部分污染权，它就必须减少污染物排放。这样，总的排污量没有变，总的环境质量就可以得到控制。这样的排污许可证交易，有助于刺激企业降低生产过程的排污水平。目前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中，都对排污申报做了规定。《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则对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做了规定。同时，国家环境管理部门也对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排污许

可证交易进行了试点和推广工作。当然，具体措施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不断完善。

——实行环境损失赔偿和罚款。罚款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这是补救和纠正外部不经济性的一种法治方法，目前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广泛用于解决环境资源外部不经济性和污染损失赔偿纠纷。赔偿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补救性的手段。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刑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污染损害的法律赔偿责任。在有关具体法规中，还对不按时缴纳排污费、不按时完成限期环境治理、擅自拆除和闲置污染处理设施等行为，做出罚款规定。

——建立治理和保护环境的居民排污费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促使消费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方法。在城市，政府在加大对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财政投入的同时，有必要向居民收取必要的排污费，这有助于增强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和责任，同时也可以加快环保设施建设。例如，我国城市自来水的水价长期以来低于成本，依靠政府补贴维持，尽管一直宣传节约用水，但收效有限；现在逐步提高水价，其价格包括了处理废水的成本，这就使城市处理污水的资金有了可靠的保证，对城市的环境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建立促进环保的税费制度。如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和综合利用资源的产品，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对那些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污染的产品，如矿物燃料油、润滑油、不可回收容器、包装纸、电池、杀虫剂等，收取一定的费用，这项收费会导致产品价格上升，减少产品的销售量或消费量，从而迫使生产者控制污染，节约资源。

在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环境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应用经济手段的局限性。例如，排污收费能够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即认为交了费就获得了合法的排污权。收取排污费，如果费用标准偏低，人们就选择交费而忽视治理污染；实行超标排污收费，并不能鼓励那些达到排放标准的企业继续努力降低排污量。此外，如果在执行中不能做到对所有排污者一视同仁，而采取所谓"协议收费"的话，则将造成企业付出的环境成本不同，会造成企业的不平等竞争，并对保护环境不力的企业有利，从而实际上怂恿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因此，我们在运用经济手段，加强环境资源管理时，不能简单化，要以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为目的，认真选择经济手段的具体类型和实施方法。

三、运用政策法规促进可持续发展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广大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这是人类社会跨代平等的需要，因此，对于难以靠市场经济手段解决的对可持续发展有显著破坏的问题，仍然需要靠国家采取法治和行政手段来解决，这包括如下方面：

——建立健全法制，促进可持续发展。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一系列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法规，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土地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等，为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后，一方面要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要求，进一步

完善有关法律体系，明确实施细则；另一方面，要坚决依法管理，严格执法。要强化有关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提高装备水平，加强执法力度，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使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

——加强必要的行政管理。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政府在规划、指挥、协调和监督方面，起着必不可少的重要行政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把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贯彻到其中的各个关节，就离不开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自上而下地督促各级政府负责全局工作的领导，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并把他们管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纳入“工作政绩”的考核范围。

——推行可持续发展评价制度。我国已经推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对于控制环境污染起了积极的作用。要总结经验，把评价制度逐步推广到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评估制度，不但可以为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而且可以有效地监督社会的方方面面参与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为可持续发展尽职尽力的责任感。

总之，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在全民中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既要运用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手段，又要采取合理有效的非经济手段，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切实践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从而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十二章　经济国际化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只有积极地应对国际经济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拓展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国际空间，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逐步赶超经济先进的发达国家，因此，必须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本章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背景，阐明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含义及其实践价值目标的基础上，着重阐释这个战略的基本内容和战略实践的几个重要环节。

第一节　经济国际化战略及其价值目标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

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尽管说，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决不可忽视，当今它是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主导作用的，这决定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性，也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认清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特征，在对外开放中才能科学地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

1.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逐步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所谓经济国际化，就是指一国生产和交换已经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在国际交往中实现经济循环。而经济全球化，则是指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发生了经济国际化现象才形成的。它标志着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已经进入一个较高的阶段。应当说，从开放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即从15世纪开始，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开始了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共产党宣言》就做过这样的描述，“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而且每天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

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却给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已经出现的一个世界性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图景。然而，直到凹世纪二次大战以后，才出现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随着旧殖民主义被推翻，各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力图摆脱原来的依附型（殖民控制与压迫型）经济状态，越来越多的国家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往来。另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支撑。原子能、电子技术、光纤通讯等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大大改进了国际经贸往来的信息传输、货物运输和人员交通的条件和方式，“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逐步形成，推动着工业社会朝着信息化社会过渡，加速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际交往的紧密。作为对世界经济新现象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一词开始在国际理论界出现。应当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趋向前进的客观过程。

2. 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性。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比较有影响的，如世贸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它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这是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造成。”19跖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了一次题为“全球化与自由化”的讨论会，该会文件将全球化概括为，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本书第十六章曾经提到，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发展的信息与科学技术推动下，各国经济日益密切地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地流动，世界经济日益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定义，实质上都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阐述的。其实，这只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必须看到，这种社会生产力方面的经济全球化是同全球的社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如果忽视这另一方面，那是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当代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化生产过程及其交往范围的拓展，不可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孤立地进行，它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展开的，因此，它具有两重性。国际上存在着“反全球化”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导致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引发的。

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左右。这种主导地位，可以从号称世界经济秩序“三大支柱”的多边经贸组织的运作机制中得以体现。三大支柱性国际经贸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他们对构建国际经济秩序、调节国际经贸争端确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然而，这三大组织实际上都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甚至由他们所操纵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由各国认缴的基金份额所决定，所缴基金多，享受权益就大，投票权也多。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掌握着18%的投票权，而通过决议必须达到85%的票数，这就意味着美国

掌握着一票否决的权利。在世贸组织，尽管该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它的贸易自由化体制对于经济落后、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要受制于发达国家；世贸组织仍然沿袭了“原则中有例外，例外中有原则”的灵活应用的特点，更是为发达国家主宰世界贸易格局提供了便利。这种大国主导和操纵的格局，决定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有利于大国利益；多边经贸组织的交往行为中，灌输和贯彻着发达国家的意志和主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观点，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面临弱肉强食的困境。

4. 清醒地认识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表明，中国对外开放面对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两重性的国际环境。它在促进资源的国际流动，为各国经济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带来很大风险。正如中共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这是十分正确的判断。这就要求我们面对现实，趋利避害。一方面，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因为自我封闭不可能吸收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文明成果，更谈不上充分合理地利用国际经济资源，结果只能是落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主动利用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把它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立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保持高度警惕，树立经济安全意识，防止世界经济中的破坏性因素如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促进改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对外经济关系的体制改革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实际国情和民族经济利益，而不能盲目地追求“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乘风破浪，更快地发展自己。

二、经济国际化战略及其价值目标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决定了我国必须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它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它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步进入国际化的历程。可以说，从这时起，我国已经开始提出，并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是逐步展开的，经历了经济特区试验——开放沿海城市——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的梯度式的推进，2001 年 11 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入了新阶段。

1. 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含义及其作用。作为发展战略的经济国际化，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民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战略实践过程。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战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它要求在中央政府领导下，通过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的对外开放，获得社会主义经济和民族经济利益。

——积极发挥政府在经济国际化战略实施中的主导和统筹作用。中央政府在国家经济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起着领导、协调和统筹的重要作用，统领全国各地的对外开

放，以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和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核心展开工作。在出口贸易方面，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为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融资、税收、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引进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在进口贸易方面，引导民族企业利用世贸组织中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的相应条款，例如幼稚产业的保护条款、国际收支保障条款、进口商品的选择性限制条款等，减缓国外进口产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在经济法制建设方面，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执法公正与效率，营造良好的对外开放经济环境。

——依靠科技进步，坚持科教兴国，促进民族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当代的国际竞争是科技与人才的竞争。要从舆论导向方面，大力增强自主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意识，从经济政策、资金投入等方面鼓励科技创新，组织力量攻克科技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难关，积极创造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和国际名牌产品。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增强民族经济实力。“引进来”，包括合理利用外资，引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国外企业、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走出去”，包括对外投资，积极促进商品和劳务出口，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

——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交流和合作，发展与国际多边经济贸易组织的关系。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坚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统一，在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实力的基础上，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实现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改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

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对于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使我国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合理利用国际分工，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促进经济现代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把41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按贸易战略分成强外向型、中等外向型、中等内向型和强内向型四种类型，经过对1975～1989年相关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总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水平与他们对外开放的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参见表5）。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国际化战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增强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自觉性。

表5　　1975～1989年不同贸易发展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

战略类型	GDP年平均增长率	总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
强外向型国家	8.05%	3.2%
中等外向型国家	4.35%	0.85%
中等内向型国家	3.35%	-0.2%
强内向型国家	2.25%	-0.5%

资料来源：参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中国的WTO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2. 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特征和价值目标。作为战略实践的经济国际化，它不只是体

现经济资源的国际配置这种客观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体现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对外开放的经济实践，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它不仅要说明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还要说明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主体在对外开放实践中能够获取经济利益的程度。我国经济国际化战略时间的价值目标可以体现为“两个推进”：

——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国际化将与工业化、现代化互相交织，相互促进。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可以促进全国人民树立国际竞争意识和民族经济自强意识，利用国际先进科技成果和现代化生产管理经验，大大加快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现代化的步伐，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推进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实践主体的主要社会成分，是自主联合劳动者。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国际化战略实践的价值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利益主体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如果把经济国际化等同于“与国际接轨”，而忽视了战略实践的价值目标，那就会在风云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失去正确的方向。为此，在经济国际化实践进程中，要教育各级干部和群众必须牢固树立争取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和民族经济利益的价值目标观念。

三、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相结合

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环境，我国要追求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和民族经济利益，在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过程中，就必须运用科学的战略方式，这就是要把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结合起来。比较优势战略，就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遵循国际价值规律，充分利用本国相对优势资源，扬长避短，促进本国经济增强实力。赶超战略，就是抓住国际竞争的核心是人才和高新技术的竞争这个核心，有计划地调动国内人才和资源，组织力量，积极借鉴、消化当今世界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培育自主的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发展越来越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逐步缩短并最终超过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根据这种要求，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有必要通过下述三个途径培育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利用国际产业转移机遇，促进我国产业发展。国际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许多产业会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快了这种进程。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将本国的比较优势同国际产业转移密切结合起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深化产品的加工程度，提高产业的先进水准，加快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应该科学认识承接发达国家转移产业的战略意义，首先，这些产业从国际比较而言虽然谈不上先进，但是在我国还是较为先进的；其次，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的需要出发，一些国际转移的产业从技术上看虽然不算最先进，但是，只要比较适合我国劳动力资源素质的现状，有助于吸纳大批人员的就业，较快地带动产业连锁发展，促进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开发，从而可以加快我国积累发展资

金，只要在环保等方面不会给我国带来危害，那就是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产业。再次，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可以同时学习这些产业中蕴涵的国外优于我国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这对于遵循产业高度化的演进规律，追赶和掌握更先进的技术是有利的，因此，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可以促进本国经济形成许多新的增长点。

——发愤图强，加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开发的力度，努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如果说承接国外产业的转移只是“跟着别人跑接力”，那么，用自主知识产权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开发，则是与别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要达到这一国际竞争的前沿境界，必须在科技和教育上花大工夫，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积极创造中国民族产品的国际品牌和国际名牌，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市场。为此，①要合理使用资金，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大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上的资金投入。在重要的先进核心技术上，要集中国内优势科技力量，刻苦攻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确实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神州5号”载人飞船的上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②要努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科技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形成能自我投入、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良性循环。③要加强与国外先进科研企事业机构的交流，虚心学习他们先进的科技理念和方法，借鉴他们选题的思路和攻关经验，提高我们研究和开发新产业的能力。只要能在某些高新技术获得突破，并使之产业化，就能带动许多优势产业的兴起，它们将成为我国超越发达国家的重要“撑杆”。④要积极地培育国际化企业。企业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基本主体，只有培育出一大批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跨国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与发达国家的企业争高下。

——积极寻找潜在的优势资源，开发具有本国特色又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中国作为古老文明的国家，具有许多潜在的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只要合理地有效地开发，就可以形成自己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我国在自然景观、人文历史、中医、体育等诸多方面，都有独占的优势，可以开发出许多旅游、服务、卫生等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垄断地位，完全可以成为赢得国际市场竞争的“杀手锏”。

以上三种途径，分别可以概括为经济国际化战略实施中的“紧跟方式”、“竞赶方式”和“超越方式”。三种战术都有各自不同的基础，同时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紧跟方式”，主要依靠本国的现存资源，选择吸纳合适的国际转移产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产业，它可以比较快的速度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带动产业的扩张和技术创新。“竞赶方式”，主要依靠培育本国的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尖端先进技术，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超越方式”，主要靠利用我国的综合资源：从科技、人文和环境等多个方面，挖掘和发挥好各种潜在的资源优势，形成具有本国独特优势的产业，增强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相信，这三种方式的有机搭配，可以促使我国经济以“四两拨千斤”的速度和态势，极大地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尽早赶超发达国家。

第二节　合理利用外资，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一、利用外资的战略意义

合理利用外资，是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加资本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形成生产过程必须使劳动力、科学技术和其他物质资源有机结合，而资本在这一结合中发挥着纽带作用。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可以启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货币资本是短缺的，而与现代先进科技相结合的生产资本更是短缺的，要突破这种短缺的“瓶颈”，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本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利用外资，可以促进就业，积累资金；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利用外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动本国产业发展；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从而促进整个经济增长和发展。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验，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都表明，利用外资，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但是，必须看到，外资的引入具有两面性的影响。它在带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风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外资毕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输出，它是冲着高额利润而来的。①外资企业会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通过挤占市场而排挤我国的民族企业，并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也会通过民族企业的倒闭而造成新的失业。②外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和本性，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从而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经济波动的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经济高涨的同时，亚洲、南美的许多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国家却屡遭危机袭击，足可见证利用外资具有风险性的一面。而巨额外资所获取利润的汇出，对引进外资国家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更是构成一种“纯粹的漏出”。③在科技方面，外商决不会自动地将核心技术拱手相让，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为了实现垄断利润，仍对我们实行高新技术封锁。曾经有人提出，可以用市场换先进技术，然而实践的结果却是，市场“换”去了，得到的却是外商淘汰的技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主要强调引进外资的优点，而不讲或者很少讲利用外资的风险性，显然是十分片面的。实际上，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外资引入是有风险性的。即使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世界银行，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承认外资大量流入可能给一国带来的许多不利影响：①储备不断增加；②汇率有上升的压力；③对本土金融系统带来压力；④资金流向突然变化构成风险；⑤限制决策机构执行政策的能力。因此，这份研究报告建议发展中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资金大幅度进出带来的冲击。所以，我们利用外资必须坚持合理有效的原则。要强调利用外资的根本目的在于振兴中国经济，不能满足于 GDP 的增长，而应当追求 GDP 的增长；不能只看到引进外资可以给地

方政府带来税收，还要看到，外资拿走了利润，有可能挤占民族企业的市场，充分认识外资的两面性影响，采取合理的对策，利用外资才能达到获得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和民族经济利益的目的。

二、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各种贷款，一类是外商直接投资。此外，还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方式吸纳了一部分国外资金。总结实践经验，要合理和有效地利用外资，应当重视以下方面：

——利用外资要与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相结合。在与外商交流、接触和合作的过程中，要强调主动地研究、学习和消化外国投资者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善于通过外商了解国际市场，并学会自己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须知即使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设在我国，高新技术的所有权仍然是外国人的。只有利用参与交流、研究和开发的机会，自力更生，刻苦钻研，艰苦奋斗，才有可能从旁领悟，然后独立地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真正改变我国制造的高新技术产品中所谓“没心没肺”（指产品是我国生产的，但是核心技术的产权是外国人的）的状况。利用外资，在学习先进上，应当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精神。

——合理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引进外资应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应积极利用外资发展我国急需发展的产业。要引导外资投人交通、能源、城建、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以改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利用外资发展信息产业，促进产业的信息化改造，提高经济发展的信息化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可以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资本，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相对优势，促进扩大就业。

——积极拓宽引进外资的方式和渠道。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拓宽引资渠道，积极利用国外证券市场融资，推动电信、石油、石化等大型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境外上市。注意学习国际上利用外资的合理方式，可以采取独资引进或股份合作的渠道，也可以采取 BOT 方式、经营合作或技术合作协议等方式。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外商投资的“硬环境”；加快涉外经济法制化建设步伐，改进和完善外资引进管理程序，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大教育与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素质，通过职业和外语培训、法制教育以及国际化经济环境与文化教育等多种形式，大力培养多层次的各类人才，满足吸引外资在人力资源素质方面的需求。

——切实加强利用外资的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遵守 WTO 的基本原则，结合国情，制定和完善法制，创造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公平竞争环境；制定合理的引资标准，包括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防止技术落后、不符合环境标准的投资项目，进入我国，使引进外资符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应控制虚拟经济领域的外资引进，尤其要限制国际游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机冲击。有的国家将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比例确定为1:0.7，超过1:1的比例，则加以控制。这说明，对国际游资

冲击的负面作用不能掉以轻心。

三、全面拓展对外经济与技术交往

全方位地开展对外经济与技术交往是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又一重要环节。要贯彻“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不断发掘自身的潜在优势，拓宽国际经济活动空间，拓展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必要遵循下述原则：

——在对外贸易上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国际学术界通常把外贸发展战略区分为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进口替代是指，一国通过税收、投资等方面的优惠待遇，鼓励国内企业生产或者对外商提供的材料、样品加工、装配本来要从国外进口的制成品，鼓励外商在国内投资办企业，直接在本土生产制成品。进口替代中的本国制造，有利于保护民族经济，但是，高度的保护而限制市场竞争，容易使受保护行业在长期缺乏国际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失去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的动力。出口导向是指从增加出口出发，采用免税、补贴等优惠待遇，鼓励本国生产出口制成品，占领国际市场。显然，出口导向有利于民族经济面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完全靠出口有国际竞争力的制成品带动整个经济各个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出口导向对国际分工依赖性很大，国际市场供求的波动，会给国民经济的运行带来风险。因此，我国在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上，有必要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我国的服装、家电、钢煤等产量都居世界首位，有色金属、房间空调器、手表等产品也位居世界前列，其中家用电器在美国、香港、日本及西欧等市场都已创造和保持着明显的优势，从而完全可以按照出口导向战略进一步发展；而我国的汽车、机械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行业还处在“幼稚”的状态，汽车行业几乎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机械工业制造技术及设备与国外还存在 15～20 年的差距，自主开发新产品的力量还十分薄弱，新开发产品的技术有 75%来自国外，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只能算刚刚起步，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适当的保护，以利于我国完善既参与国际分工，又有相对独立性，可以经受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的产业体系。

——确立全球贸易战略，创建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格局。国际市场多元化，有助于减少国际市场风险，广泛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目前我国超过 70%的出口份额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和港台地区四个市场，对拉美、东欧、独联体等市场的出口虽然有增长，但所占比例仍然较小，可见广阔的国际市场还有待于开拓。要加强对出口企业的金融支持，增强它们的市场开拓能力；要加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制，加强出口市场的信息和法规咨询服务，以提高市场开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营造公平竞争氛围，支持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鼓励他们到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

——积极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传统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导致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商品结构。从目前来看，这有利于扩大就业，解决相当一部分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然而，这种较为单一的出口结构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十分不利的，以低科技含量的初级产品来换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

品，既会被发达国家大量以不平等的方式获取垄断利润，又会失去发展现代高科技产业的许多机会，从而不可能改善贸易条件。所以，必须积极地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开发新的产业，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产品质量。

——确立“国际大经贸”的战略理念，发挥我国经济主体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联合优势。要突破狭隘的、单一的、各自为战的外贸观念。政府应发挥在对外经济往来中的引导和协调作用，促进工业、商业、金融、服务、科技等领域的经济主体，在对外经济中，加强合作，形成规模经济，联合对外，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多方面的协作对外，也有助于在更广的国际空间选择对外经贸交往的伙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

——积极开拓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扩大对外劳务合作。海外承包经营项目，不再局限于单个商品的出口或单纯外资的运用，它涉及到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全要素组合的多个方面，所以海外工程承包既有利于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开拓国际市场，又能有效地增加劳务输出，对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较大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努力组建和培育集科研、设计、施工、生产、销售和金融于一体的大型集团公司，努力提高海外工程承包的层次，参与国际工程承包的国际竞争。

——把对外经济与技术交往与自身的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密切结合起来。在对外经济与技术交往过程中，不但要善于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还要善于研究和学习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一般性的组织形式，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例如，借鉴现代银行的管理形式，促进金融体制创新，提高金融管理效率；借鉴现代公司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提高国有企业运行效益；借鉴技术贸易与各种咨询服务的经营形式，促进科技与信息咨询的产业化发展，等等，通过体制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完善适应经济国际化的政府涉外经济管理。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应深入了解和掌握 WTO 等国际经济组织的经贸协定和各种游戏规则，了解和把握各国的政策趋向，引导企业朝着有利的方向和领域，开展国际竞争和合作。政府在对外经贸的管理过程中，要加强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互相协调，注重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外经贸活动的综合经济效益。

第三节 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化与中国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中的区域经济集团化

我国在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和正确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国际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促进社会主

义经济和整个民族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当今的世界性潮流。国际经济的区域集团是由若干个国家和地区，出于维护和发展本国的经济利益，通过协议方式结成的紧密程度高低不同的国际区域经济联合体。20世纪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集团中，从而在全球呈现出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它也被称做区域一体化或国际经济集团化。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必须充分认识和利用这一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

按照集团内各国联系的紧密程度，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可分为这样五种类型：地区性合作开发组织、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s）、关税同盟（Custsoms Unions）、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s）、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s）。当今世界比较典型的区域集团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目前国际经济区域集团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区域集团呈现加速发展与扩张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产生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60年代出现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70年代出现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80年代出现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90年代又出现三国集团、南方共同市场、东南亚共同市场、亚欧经济共同体等，区域市场的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许多国际区域集团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不少集团的成员国在增加，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等成员国都在逐年增加。

——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呈现一定的交叉性发展的趋势。不少区域集团互相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国家和地区往往会参加多个区域集团，例如墨西哥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又是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组成的三国集团的成员。

——国际经济区域集团的联合呈现出进一步高级化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内部的合作，从地区性合作集团依次向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方向发展。东盟在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地区性合作组织，现正向自由贸易区过渡；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正在由关税同盟向共同市场过渡；而欧共体则已经由共同市场发展为一个由超国家的委员会统一管理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这种演进过程反映出国际经济合作的紧密程度正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二、中国在区域集团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化，使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经济关系出现复杂的情况，区域集团与世界经济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集团中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集团内部的成员国之间，都存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不可能置身于国际区域经济之外，也不可能回避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关系，只有充分认识自身在这种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有所作为，既发展自身经济，又对发展世界经济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在国际经济多边关系和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容量，是世界市场不可低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国都是有利的出口场所，这有助于我国发展所在的一定国际区

域内的双边或者多边国际经贸关系，也有助于我国同世界任何地区的国家发展互利互惠的国际经贸关系，这是我国加入有关区域集团或者有关区域集团吸纳我国的有利条件。

其次，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助于稳定国际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这是因为，我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和较为完整的经济结构，为进出口贸易的变化带来巨大的市场回旋余地。当有些国际区域市场的行情剧变，对有关区域集团及其成员国的经济运行带来不利时，如果它们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国际经贸关系，就可以缓和这种不利，所以，中国市场可以成为稳定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世贸组织第一任总干事鲁杰罗曾经说，中国这个世界第五大贸易国参加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带有根本意义的，如果 21 世纪的国际贸易体系不能包括中国，就不具有普遍性。这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多边关系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过程中，国际地位正在不断上升。

2. 中国在区域经济集团化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位次跃居世界前十位，中国已经被认为是世界经济重要的增长源。中国于 1991 年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APEC18 个成员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4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 56%，区内贸易占世界总贸易额的 46%。该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而中国经济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中，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事实上，中国与日本、美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核心。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东盟产生了积极影响，东盟国家把中国看成越来越重要的国际经贸关系伙伴，目前，中国和东盟之间正酝酿自由贸易区，将逐步形成灵活多样的经贸合作架构。中国的对外经贸活动在欧洲和其他区域集团也起着重要作用。1999 年 5 月 18 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分别在两国首都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明确指出，中国是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德法两国、欧盟以及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对外经贸关系决策中，已经把中国放在重要的考虑对象范围。我国在世界贸易活动中的作用还将不断增强

三、遵循“共赢共存”的原则，发展多边经贸关系

面对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化，我国在发展双边和多边国际经贸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科学地认识中国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从有利于提高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必须遵循“共赢共存”的原则，积极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多边经贸关系。同时，也需要广泛地同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贸关系。

1. 遵循“共赢共存”原则，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认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必须承认三个事实。①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高新技术人

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产业结构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国需要合理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人才和高新技术；发达国家需要中国便宜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把中国作为推销产品的广阔市场、转移淘汰产业的场所。因此，从社会生产力角度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中国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进程。②发达国家会以各种方式推行霸权主义，造成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例如，发达国家会利用自己在多边国际经贸组织中的有利地位，制定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经贸规则，迫使发展中国家就范。这是由这些国家代表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这又必定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的不利。这个事实决定了，我们在与发达国家发生经贸关系的过程中，必须树立高度的民族经济利益保护意识和国家经济安全意识。③发达国家经济先进，实力雄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控制、占有市场的主要份额、在产业关联中的带动作用以及国际经贸关系的涉及面广等许多方面，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它们经济的发展，固然主要是为了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但是在客观上，对于世界经济和与之有经贸往来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发达国家已经与世界各国形成广泛的国际经贸关系，它们经济的发展，会有利于别国国际经贸关系的拓展，一旦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也会给别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

因此，由这些事实决定，我们不但不应当拒绝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际经贸关系，而且应当努力排除来自发达国家和来自本国的意识形态造成的障碍，努力扩大同发达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关系。一方面，要把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根本经济制度的对立性，同国家之间在经贸关系上的互补性两者区分开来，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共存，经济上可以互补；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要与发达国家实现经济上的互补，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行为，在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中，赢得我国应当获得的经济权益。例如，在 WTO 中，我国必须充分利用该组织中关于成员国之间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原则维护本国的经济权益，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地解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争端摩擦。应当明白，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实力占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取得同它们“共赢”的成绩，就是实质上的相对胜利。

2. 广泛地同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尽管说，从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看，中国经济同单个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互补性上不如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综合起来看，我国与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在经济上同样有很强的互补性，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处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对中国设置某种障碍的时候，广泛发展同其他各国的经贸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大力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贸关系，对于实现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共赢”，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利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协作，与霸权主义做斗争。例如，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发达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强调有利于发达国家占领国际市场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和东盟等发展中国

家就主张，要把不同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合作置于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同等重要的地位，亚太经合的模式要承认亚太地区经济多样化的现实，经济合作应当具有灵活性并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等，这些主张都被该组织采纳。这说明，在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中，广泛地同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不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十三章　国民收入的分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年复一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这是通过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来实现的。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也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广大劳动人民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控制者和调节者。本章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实际出发，在阐明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与特点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分析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以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等分配关系问题。

第一节　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与特点

一、分配关系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是指社会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创造的社会价值财富，即全社会每年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C）之后，劳动者当年新创造的价值［∑（V+M）］。国民收入的分配，就是指每年这部分新创造的价值如何在全社会进行分配。由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决定，当代中国社会的国民收入分配与资本主义社会在性质上是有显著区别的。我们应当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分配关系的科学原理，并用以指导不断改进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分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生产资料和社会成员即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分配。马克思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就这层含义看，分配关系就是生产的主客观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权关系和社会分工关系。另一种是社会生产劳动的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国民收入的分配指的是后一种含义上的分配。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整个国民经济是经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环节运转的。作为国民收入的分配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它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克思

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分配的历史性质和生产决定分配的关系：①分配的方式由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方式就是社会成员按什么方式和原则去取得他们在生产成果中所应得的份额。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着他们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什么方式参与生产，也就以什么方式参与分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生产过程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进而决定了生产成果的支配权和分配控制权。②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出的社会有用成果。没有这种成果，也就不可能有分配；生产多少，才能分配多少；生产什么，才能分配什么。

不过，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分配并不只是消极地被生产所决定，没有分配，就没有生产消费或再生产，它对生产有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过来对生产起决定作用。对此，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就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可见，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是辩证的。对分配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起决定性的反作用，是决不应当忽视的。如果分配关系不适应生产关系，就会对再生产起负面作用；只有适应生产关系的分配关系，才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当全社会生产成果（价值财富）的分配适应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分配的形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发展的要求时，就会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全社会来看，国民收入的分配是对整个社会当年全部生产成果的分配，它涉及国家和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行业的企业、集体组织、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涉及对各社会阶层物质利益关系的调节，如果能够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分配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就能调动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反之，则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给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造成不利。

二、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

国民收入分配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条件，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分配对生产发挥积极作用的角度看，国民收入的分配具有如下功能：

——补偿功能。国民收入的分配发挥着补偿生产中劳动耗费的功能。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耗费脑力、体力，这种耗费必须得到补偿，才能继续投入再生产。国民收入通过一定方式进行个人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如果能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就可以补偿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是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获得不可缺少的劳动力人身条件。这种补偿，同社会总产品分配中补偿所消耗的物质资料一起，共同保证着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社会主义的分配保证劳动者个人收入的逐步增加和社会福利的逐步

增进，这必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与发展。

——激励功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调节恰当，分配形式采取合理，可以产生对生产劳动者的激励功能。在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曾经在个人收入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不利于发挥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必须改革分配制度。如果生产劳动者能够随着生产效益的提高和合理的分配获得稳定增长的个人收入，就必定能从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中得到激励，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积累功能。国民收入的分配承担着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功能或积累的功能。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源泉。这部分价值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积累基金的多少和投资效益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的进步程度。积累基金中有一部分通过分配形成用于预防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这些社会后备基金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不间断进行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只有从国力出发，遵照“一能吃饭，二能建设”的原则，合理地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才能真正发挥好国民收入分配的积累功能。

——保障功能。国民收入的分配具有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功能。社会的安定团结离不开社会公共管理、国防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需要社会扶助，这些方面的开支需要国民收入来提供。因此，社会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用于非生产领域的这些方面的需要。这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保障功能。

——调控功能。国民收入的分配还具有调控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的功能。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需要国家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之间的关系。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生产和生活以及国民经济中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科学的调控，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上，就是要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年地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的特点

当代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既不同于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具有自己的特点。

1. 从国民收入的成果看，进入分配领域的生产成果，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价值成果或价值财富。用于分配的不是一般的物质财富，而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社会财富，这是与自然经济社会不同，也是与计划产品经济时代不同的地方。未经市场实现的产品，不具有社会有用性，不是现实的价值财富，不能用于分配。这就是说，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的国民收入成果，都是经过市场实现的价值。国民收入的分配，必须以市场为中介，它排斥由行政性计划来分配国民收入，这是一种市场化

的国民收入分配。

2.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体来看，具有法人财产权的企业成为企业收入分配的主体。国家不再直接规定企业收入分配，国家只是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对全社会的个人收入分配进行控制和调节。这是同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显著不同的地方，那时，企业获得的利润收入都要纳入国家计划统一分配；"八级工资制"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统一规定的，企业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法人的企业有权在依法缴税之后，自主控制利润分配和职工个人收入分配。企业的收入分配是与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实现的经济效益挂钩的，不同企业之间在生产规模的发展变化和个人收入分配上，会出现明显差别。

3. 从国民收入分配主体的社会性质来看，与资本主义经济有根本差别。同样是市场经济中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分配的主体实质是掌握企业控制权的私人资本家，贯彻私有制的按资分配和对工人实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雇佣工资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分配的主体实质是代表自主联合劳动者的企业董事会机构，除了贯彻市场经济一般要求的按资分配（即按投资的股份分配，与私有制不同的是，公有资本的股份收入归自主联合劳动者所有）之外，对企业成员的个人收入分配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样是国家作为全社会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主体，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既然代表"总资本家"和主要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使用税收调节杠杆和制定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之时，其出发点是维护"总资本家"的利益；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国家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最高机构；在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和政策制定上，必定要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促进共同富裕为出发点。

第二节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体

国民收入作为生产的成果，要经过一定的分配渠道，才能进入个人消费领域。这种分配过程分为两个基本的环节：一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在所有直接参与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这种领域内部的分配，叫做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经过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可以称之为原始收入。再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进一步在全社会分配国民收入的过程。本节阐述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分析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关系，必须回答，谁来主持、控制这种分配关系？也就是必须弄清，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体是谁。正如上节所述，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

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分配关系的特殊社会性质，也决定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主体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因此，控制和支配国民收入分配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以利润、利息、地租的形式被剥削者无偿占有，工人只能被动地以工资的形式得到补偿劳动力消耗的份额。这种分配关系反映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我国实行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是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是直接生产者，又是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这就决定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支配权和控制权属于劳动人民，国民收入的分配必须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促进共同富裕。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民收入的分配必须按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这几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原则来进行。同时，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还必须处理好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使这种分配关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防止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控制权属于广大劳动人民。这意味着，国家通过经济杠杆、经济政策和法治手段，控制和调节包括非公有制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分配关系，虽然公有制企业同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分配关系的性质有明显区别，但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配关系，都要服从于国家统一规定的收入分配的法规与调节政策。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存在着统一的、控制全局的主体，即社会主义国家，或全社会的总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肯定这一主体的前提下，应当看到，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存在区别，实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体就有社会性质的区别。在公有制企业中，分配的主体是企业总体劳动者；在私营企业中，分配主体则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但是，即使是私营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也是受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即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和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企业分配主体。

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多样化

在存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多种所有制企业，大量企业是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成的产权清晰，财产混合的股份制企业等复杂状况下，我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简要列举如下：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①依法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税收部门,形成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由国家统筹安排,在全社会范围内使用;②以利润形式上缴投资该企业的国有出资部门;③以企业基金形式留归企业支配,用于企业发展生产和集体福利等支出;④以劳动收入形式分配给企业成员。

——集体所有独资工商企业。这类集体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①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形成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②以合作基金形式上缴集体经济主管机构，形成统一支配的集体收入；③以企业基金形式留给企业，用于企业发展生产和集体福利等支出；④以劳动收入形式分配给企业成员。

——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其创造的国民收入除用于缴纳税金、支付职工劳动收入、提留公积金和公益金外，其余以股息形式分配给投资者，形成股东的个人收入。其中，在可用于个人收入分配的基金中，公有资本控股企业如何合理地确定按股分配总额和按劳分配总额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企业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

——实行租赁、承包经营的企业。其创造的国民收入除用于缴纳税金、上缴租金或承包利润、支付职工劳动收入外，其余全部留给企业，归企业自行使用。

——农村集体农业经济。农村实行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以承包农户为主体进行的。在初次分配中，农户创造的国民收入分解为四部分：①以农业税形式上缴国家，形成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②以公积金、公益金形式提留给集体，用于发展集体生产、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集体福利等支出；③以管理费形式提留给乡村政权组织，用于行政管理开支；④以个人收入形式留归农户，由于农民自己安排使用。在这种初次分配中，必须保证农户自身的收入随生产力的提高逐年增长，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国民经济的大局出发，一定要防止地方乡镇政府从扩大财政开支出发，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

——私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国民收入是企业总体劳动者创造的，如果企业主参加管理劳动，那么，他从事的管理劳动，也纳入总体劳动者的劳动。但是，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一般会显著高于他的管理劳动收入，他的收入是包括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也就是存在无偿占有的剥削关系的。私营企业中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三部分：①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形成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②以工资形式分配给企业职工，形成职工的个人收入；③以企业主收入形式归企业主支配。国家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总体主体，要通过法规、政策、教育等多种手段，控制和引导私营企业主处理好企业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倡节俭个人享受性消费，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外商投资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①以税金形式（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方的投资还要上缴利润）上缴我国，形成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②按外方投资比例分配给外方投资形成的利润，作为他们的资本收入；③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公司职员，形成职员的个人收入；④以企业基金形式留在企业，用于企业发展。

——个体经济。其创造的国民收入分解为两部分：①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形成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②剩余部分形成个体劳动者的个人收入。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分别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企业收入、投资者生产要素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四种原始收入，成为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前提条件和出发点。

三、公有制经济中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注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国家财政收入、公有资本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仅反映了必要产品价值V和剩余产品价值M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反映了企业与国家、集体对剩余产品价值M分配的比例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几者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定的矛盾。如果剩余产品价值提留过多，就会挤掉劳动者为自己劳动的必要产品价值，影响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劳动者个人收入增长过快，剩余产品价值就会减少，就会影响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国家建设。如果在企业的剩余产品价值中，国家财政收入和公有资本收入收取过高，企业基金就会减少，就会影响扩大再生产；但是企业基金所占的比例过大，又可能使国家财政收入和公有资本收入减少，难以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些对于劳动者的长远利益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制定正确的税收、工资和利润分配政策，正确处理和调节劳动者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关系，与生产力有直接的联系，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国民收入增加了，可分配的“蛋糕”大了，才能有利于提高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基本的原则是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初次分配关系要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来看，公有制经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①要按照法人财产制度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坚决制止政府机关采用非规范的收费、摊派、集资办法，干预企业经营；坚决纠正地方政府擅自越权减免税，制止国家税收流失。②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强化企业内部分配的自我约束机制。目前在国有企业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一些具有垄断性的行业的职工，存在不合理的额外收入，许多属于国家所有的超额利润被分配给了个人，导致行业之间苦乐不均，这是需要纠正的。应明晰和规范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责、权、利关系，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的保值增值与管理者、职工个人收入的总额挂起钩来，建立相关的考核指标体系，实现在促进公有资本保值增值意义上的按贡献分配。③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法制化建设，完善税收体系。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公平纳税，是促进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重要条件之一，完善税收制度和相应的法制极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的法制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大量的个人收入还游离于法制监督之外。因此，要积极推进“费改税”，在坚决取消一切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的同时 严肃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依法治理偷漏税行为，促进收入分配尽快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第三节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

国民收入是由物质生产领域创造的，但它要在社会范围内使用。因此，国民收入在物质生产领域进行初次分配之后，还必须在全社会进行再分配。所谓国民收入再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之后又在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在内的全社会进行分配。经过再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叫做“派生收入”或“最终收入”。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它是保证非生产部门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除了生产部门以外，还有文教、卫生、行政、公安、国防等非生产部门。这些部门虽然不创造国民收入，但是对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保障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国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满足这些部门的各项业务开支，并支付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收入。

——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的发展和积累具有一定自发性。由于自然的、历史或社会的原因，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会出现不平衡状况。为了促使各生产部门之间形成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合理的比例关系，促使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国家有必要对各部门、各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合理使用。

——它是保证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项目建设的需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项目，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公共消费所不可缺少的，但因耗资巨大，企业一般都难以直接投资兴建，如铁路、公路、港口、桥梁、通讯卫星系统的建设等。这些项目大都需要国家投资兴建，这就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筹集建设资金。

——它是建立社会后备基金和社会保证基金的需要。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多变，经常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为了应付自然灾害和各种突发事件，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必要的社会后备基金。同时，劳动者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证基金，以及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基金，除企业、个人负担外，有一部分也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保证基金来解决，这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是缓解分配不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地区和居民的收入会因主客观多种因素而出现较大差别。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

义。为了遏制收入差别扩大的趋势，防止两极分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

——它是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努力发展对外友好往来，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开展外事活动，这需要必要的资金。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所需要的援外资金，也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建立。

总的来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物质生产领域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关系，调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调节整个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它是社会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径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包括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国家的自觉调节。国家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控制主体，它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起着控制、调节和引导再分配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国家财政手段和通过调节市场等途径来进行。

1. 市场调节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主要包括：①市场交换中的非生产性劳务收支。非生产性劳务收支，是指国民经济中的非生产性劳务部门的劳动者向社会提供非生产性劳务来满足居民生活的需要，接受劳动服务的公民则要用自己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支付劳务费用。从本质上说，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通过这种交换，改变了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比例，实现了再分配。非生产性劳务部门通过再分配得到的收入，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该单位职工工资、管理费、提留基金、投资者的利润收入、上缴国家的税金等。随着市场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第三产业的扩大和在该产业投资者收入和劳动者劳动收入的增加，非生产劳务收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②市场价格变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价格的变动，对国民收入再分配起着自发调节的作用。价格变动不能增加或减少国民收入总量，但可以改变国民收入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比例。如农产品价格提高或工业品价格降低，可以相应增加农民的收入；消费品价格上涨会减少居民的实际收入；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则会引起国民收入在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转移。但是，价格变动幅度过大，一般会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因此，国家有必要尽可能控制物价的稳定。

2. 国家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自觉调节。

首先，通过国家财政手段来进行：①国家预算。国家预算是指国家制定的年度财政收入计划，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它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最主要渠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机关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形式把生产部门和企业的劳动者创造的应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起来，形成预算收入。然后通过预算支出有计划地分配到各个方面，以满足经济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国防建设、国家储备以及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与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过低，制约着我国财政再分配作用的发挥。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开始实行分税制，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全国财政收入出现了趋于增长的局面。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991 年的 14.6%增加到 2000 年的 1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1994 年的 29.79%增加到 2000 年的 52.2%。目前，国家正致力于分税制的进一步改进，如科学地划分政府事权与支出范围，进一步改进收入的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地方政府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等，这些政策措施将改善国家预算的再分配功能。②财政转移支付。就是政府按一定方式把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转移给受益者。它表现为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即财政付出了资金，却无任何直接所得。目前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有两类：一是政府把一部分财政资金支付给单位和个人，如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支出等；二是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财力补助等。政府通过国家预算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均衡各地方政府财力状况，加快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缓解分配不公，体现社会公平，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应有的功能，必须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中央财政的专项拨款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其效能。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专项拨款效益考核指标，生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约束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上的主观随意性，防止把专项拨款“当饭吃”或挪做他用。二是要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合理地使用转移支付资金。多年的实践表明，对经济落后地区人民直接送钱送物的“输血”办法，往往只能解决眼前之急，治标而不能治本。只有把转移支付资金改善生态环境，建立生产经营条件，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其“造血”功能，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走向致富之路。

其次，经济杠杆的调节。经济杠杆是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可以直接操纵的经济手段，如税种、税率、中央银行准备金率、利息率等。运用经济杠杆，可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关系。在税收方面，如征收个人所得税，就是把个人初次分配所得的一部分，转移到政府，由政府进行再分配。实行个人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税收随着纳税者收入增加而提高，高收入者负担的税收较高，因而可以减轻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中收入悬殊的程度。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把一部分所得税金转移给低收入或无收入的人，可以有助于社会公平。在银行信贷方面，银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可以使社会上一部分暂时闲置的资金得到有效利用，通过利率的变动，会使一部分国民收入在银行、企业、个人之间实现再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将日益加强。此外，各类保险费、补贴也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它可以使个别单位和个人在初次分配之后，从社会得到--定的补偿。

三、正确处理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最终用途上归结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积累基金包括扩大再生产基金、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和社会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是积累基金的主要部分，包括生产部门新增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是指用于非生产性用途的住宅、医院、幼儿园、学校、体育场馆、娱乐场所以及道路桥梁等公用事业的建设基金。社会后备基金，是指为应付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和临时性需要（包括对外援助）而进行的物资储备和财政后备。积累基金来源于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消费基金是指用于满足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那一部分基金，包括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社会消费基金是指用来满足社会成员公共需要的基金，包括用于保障社会生活安定和国家安全的国家行政管理基金和国防基金；用于文化事业、科教事业、医疗保健事业的文教卫生基金；用于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的社会保证基金。个人消费基金是指用来满足社会成员个人消费需要的基金，这是消费基金的重要部分。消费基金来源于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和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综上所述，可以把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表示为图 4。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积累和消费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积累意味着劳动者公共财富的增长，它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扩大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奠定物质基础，同时，消费基金的合理使用，有利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增长，为增进积累创造着主观条件；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是一个既定量，因而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此多彼少，互为消长，这就是它们的矛盾。这种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本质上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企业法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在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反映。应当认识到，这是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正确处理好这种矛盾，对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国民收入
  - 积累基金
    - 扩大再生产基金
    - 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
    - 社会后备基金
  - 消费基金
    - 社会消费基金
      - 国家行政管理基金
      - 国防基金
      - 文教、卫生基金
      - 社会保障基金
      - 其他社会基金
    - 个人消费基金

图 4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在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都有所增长。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按照这个要求，必须在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兼顾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增长，使积累基金能够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消费基金能够保证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果一方增长，另一方不增长，或者一方增长过快，一方增长过慢，都会影响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安排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次序时，应当先安排好人民生活，再根据可能安排积累。

2. 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总额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总和。国民收入的生产量是积累和消费分配的基础，积累和消费的规模及增长速度受国民收入的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制约。如果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总额超过了国民收入总和，积累和消费分配的增长额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额，就会出现积累基金或消费基金的膨胀，或者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双膨胀。这必然会打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市场供应紧张，引发通货膨胀，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国曾连年出现国民收入的“超分配”。据有关部门估计，1986年约为500多亿元，1987年为500亿元左右，1988年为1500亿元左右，1989年以后才逐渐减少。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在安排生产和人民生活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加以防范。

3.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必须与国民收入的实物构成相适应。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是国民收入的价值，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国民收入的实物。积累基金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它的价值数额和支出结构，必须与市场能够提供的追加生产资料实物的数量和构成相应适。消费基金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它的价值数额和支出结构，必须与市场能够提供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和构成相适应。否则，就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和人民生活应有的改善。由此可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安排，最终要受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及其分部类比例关系的制约。

4. 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内部的比例关系。积累基金按照使用可分为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两部分。生产性积累主要用于生产性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非生产性积累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在一般情况下，生产性积累所占的比重应当大于非生产性积累所占的比重。因为生产性积累多，社会生产发展快，人民生活改善的物质条件也就雄厚。但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非生产性积累也是必不可少的，也需要相应增加。因为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此外，在生产性积累中，还要正确调节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以及各个生产部门内部的投资比例。消费基金内部的比例关系也应当正确处理。在消费基金总量既定的条件下，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也是此长彼消关系。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必须使个人消费基金在整个消费基金中占较大比重，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社会消费基金不宜增长过快，其中的国家行政管理基金应当逐渐减少，文教卫生基金和社会保证基金应随着国民经济的

发展而逐渐增加。

5. 确定合理积累率，讲求积累效益。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定时期内社会扩大再生产或积累水平的高低，可以用积累率来反映。积累率就是积累基金同国民收入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积累率=\frac{积累基金}{国民收入}\times 100\%$$

积累率的高低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在国民收入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如果积累率高，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基金的数额就大，国民经济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反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就慢。但是，积累率的确定应有一个合理的界限。在正常情况下，积累率的最高界限要以保证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的消费水平不降低为原则；积累率的最低界限，要以保证新增就业人口平均资金和技术装备的需要为原则。合理的积累率要在这种最高限和最低限之间的可行区间内，考虑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通过宏观调节来确定。积累率是否合理，应由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来检验。积累效益是衡量积累率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积累效益好，说明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适当；积累效益不好，则说明国民经济运转受阻，积累率过高或过低。积累效益通常是以百元积累资金新增国民收入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积累效益=\frac{新增国民收入额}{积累额}$$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当积累率保持在25%左右时，积累效益比较好。当然，这是经验数据。在科技不断发展，国民经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条件下，积累率不可能固定不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像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那样事前安排积累率，但是，可以不断地总结逐年通过宏观调节市场所形成的作为结果的积累率，为下一步制定科学的宏观调节政策，促进形成合理的社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创造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合理化，需要采取一系列配套的宏观调控手段，这是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条件下有显著区别的。本章在这里提出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主要是强调，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必须确定科学的目标，在微观上处理分配关系的时候，应当具有全局观念，考虑分配关系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

第二十四章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价值，应获得的经济利益，最终要通过合理地分配自己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来实现。我们从前一章知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适当扣除积累基金、社会消费基金之后，剩余的部分才能用于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这种个人收入分配的平等权利关系就是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形式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有很大的区别。本章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必然性，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及其在公有制企业中实现按劳分配的多种形式。

第一节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一、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提出了有关思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是清晰地阐述了这个原则，他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做了各项必要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会来。"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有这样几个特点：①公有制的形式是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②每个生产者的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③直接以劳动量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尺度；④分配的主体是社会。显然，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设想的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国已经存在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这是没有疑问的。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实行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原则具有必然性。

——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劳动者个人收入的来源只能是劳动。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共同所有，不允许任何人凭借公有的生产资料来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因此，劳动成果的分配只能依据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来进行。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个人收入只能以其提供的社会劳动为依据。并不是任何公有制都必须实行按劳分配，无论是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还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都不实行按劳分配。恩格斯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产品的数量。"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比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得多，却远远低于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在这种劳动尚未成为人生"第一需要"，而"仅仅是谋生手段"的公有制经济中，人们要生存必须付出劳动；要想生活好一些，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劳动者除了以自己提供的劳动作为个人收入分配的依据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因而，劳动的质与量，便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惟一依据。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和公平观念决定，按劳分配是合理分配个人收入的惟一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存在劳动者之间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等旧社会遗留的旧式分工，人们必须"奴隶般地"服从这种分工，还不可能人人达到自由全面地发展。与这种分工相联系，人们的劳动便存在着质与量的重大差别，创造的劳动成果也会有相应的重大差别。同时，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平等观念根深蒂固，等量劳动交换，成为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公平观念。所以，付出的劳动与个人收入体现的劳动之间的等劳交换（在做了必要扣除之后），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就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惟一公平的分配原则。

二、按劳分配的内容、性质和作用

按劳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个人收入分配范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在整个分配关系中起基础性作用。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应当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实践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为此，必须从理论上弄清按劳分配的丰富内涵。

1. 按劳分配的内容。按劳分配指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根据劳动者提供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个人收入的分配。分配的对象，不是全部劳动成果，而是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和有关社会基金之后的劳动成果。所以，按劳分配不包括分配属于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不但不分，还要逐步用劳动成果追加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尽管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有些劳动者在个人收入的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可以在个人消费之外，将节余的个人收入进行生产性投资，转化为个人所有的资本（股

票形式)，但是，那属于个人已经获得的个人收入用途的转换，并不属于按劳分配范畴。就按劳分配的对象而言，是决不包括公有的生产资料的。

2. 按劳分配的性质。按劳分配原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分配关系上的实现，体现的是在分配领域中社会主义原则。一方面，按劳分配否定了不劳而获，体现了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经济平等的权利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成果的分配是由资本家支配和控制的，雇佣工人的个人收入只是出卖劳动力的收入。"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在市场上进行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等价交换，这种平等是表面的，实际上他们在生产中被迫为资本家生产大量剩余价值，不得不忍受不平等和剥削关系。而按劳分配完全不同，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者是为自己、为社会进行劳动，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种实际上的经济平等权利关系。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剥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以劳动者本身提供的社会劳动作为衡量个人收入平等权利关系的同一尺度，又会产生个人之间收入的相对不平等。因为劳动者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体力和脑力上存在差别，不同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劳动在质和量的方面往往不相同，必然形成他们在个人收入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于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来说是平等的，但是对于劳动能力有差别的劳动者来说，却是不平等的。即使劳动者个人收入相同，由于劳动者供养的家庭人口不同，也会形成家庭人均收人的差距，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按劳分配"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这种相对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这种相对的不平等才能消除。当然，按劳分配这种相对的不平等，与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那种具有剥削性质的不平等是根本不同的。

3. 按劳分配的作用。

首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劳分配把劳动者的收入与他们的社会劳动成果直接相联系，可以促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努力提高劳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劳动者要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就必须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劳动成果。因此，按劳分配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使劳动者更好地学习，掌握先进技术，提高劳动技能，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按劳分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以自主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使劳动者个人的收入与自主联合劳动产生的总成果联系在一起，要求劳动者发扬民主权益，积极贡献个人力量，在促进总生产成果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收入，这就有利于劳动者理解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人翁地位，巩固自主联合劳动者之间的团结，树立劳动致富光荣，不劳而获可耻的观念，杜绝不劳而获，因而可以真正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和根本利益，调动最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三、鼓励一部分人依靠劳动先富起来

按劳分配是以承认不同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别为前提的，劳动能力的差别，必然带来收入的差别，这是不可避免的。实现按劳分配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劳动者的“各尽所能”，即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尽自己的能力提供社会劳动。劳动者都能尽自己的能力提供社会劳动，个人收入在数量上就不可能绝对相等。要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必须要反对和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要求取消一切差别，人人平均分得相同份额。平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的要求，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口号往往是“均贫富”。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平均主义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平均主义思想从来就不是先进阶级的思想，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进步作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默认不平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它是否定平均主义的。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严重，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状况，这是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的。在现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搞平均主义只能导致个人普遍缺乏进取心，积极性，在客观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不反对平均主义，就不能坚持按劳分配，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应当鼓励一部分劳动者先富起来。这不但是指在同一单位，应当鼓励一部分有特殊劳动技能，肯干苦干的人依靠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而且也是指，要承认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因社会经济因素带来的个人收入差别。应当看到，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教育环境存在差别，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多层次性，因而各公有制经济单位的总体劳动者主体因素在文化、科技水平上存在差别，生产的设备等客体因素也有规模大小、质量优劣、技术高低之分，不同经济单位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同的。先进生产部门、先进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先进的部门和企业较多），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必然相应地高于较落后的生产部门、企业和欠发达或贫困地区。所以，各公有制经济单位的总体劳动者在同样时间提供的社会劳动成果是有差别的，这样，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上，就会存在较大的个人收入差距。承认这种差距，从总体上说，有助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果不承认这种现实，搞地区和单位之间的平均主义，是不利于发挥分配关系激励功能的。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们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应用。

社会主义最终是要实现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要他们起劳动致富的示范作用，同时，要发挥先富的劳动者带动、帮助其他劳动者尽快走上致富之路，“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起来”。这里，我们是从按劳分配角度来阐述的。就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而言，它还包括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自己投资办企业，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对于这样富裕起来的人，同样应当引导他们为共同

富裕做贡献，如鼓励他们捐助公益事业等。正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所以，国家一方面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合法经营收入，承认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再分配等手段，防止和纠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

一、市场经济有利于按劳分配的实现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已不存在商品生产，他阐述的按劳分配是排除了商品货币关系的。但是当代中国依然是市场经济形态，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我们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实行按劳分配的。

前面已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实施按劳分配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是排除了商品生产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中不可能存在按劳分配。这是值得商榷的。按劳分配是否存在，并不是取决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作为个人收入分配关系，它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只要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客观必然性，按劳分配就有存在的必然性。实际上，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是不矛盾的，它恰恰是更彻底地贯彻了市场经济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也就是把流通领域的平等交换贯彻到了个人收入分配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按劳分配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原则同按劳分配原则是统一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不排斥按劳分配，而且比起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有利于按劳分配的实现。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一般制度是一种适应社会分工不断发展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制度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种制度越完善，劳动的社会性质越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内部的分工越能得到拓展，科学技术越能得到促进和利用，从而越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须知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之所以比较快，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有什么优越性，而是因为“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将不可避免地使个人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这种观点无意中把市场经济一般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混为一谈了。其实，前者作为流通一般关系，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总是与生产环节，从而总是与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必然地产生两极分化趋势，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却能在“做大蛋糕”基础上，为缩小收入差距创造条件。这是因为，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流通领域的经济平等关

系，才能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与加深，劳动者的个性能力才有更多发挥提高的机会和条件；有规范、统一的资源市场配置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自主选择职业和自由流动的权利，劳动者才有可能寻求最有利于施展自己才能的工作岗位；有规范的市场竞争制度，价值规律才能充分展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得到客观的社会评价，得以充分地调动；有完善的信用制度，企业才能灵活机动地经营，不断改善参与市场竞争的自身条件，缩小企业集体劳动者之间的经济效益差距；有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一般制度，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国家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提供的帮助，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收入水平；凡此种种，说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一般制度有助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上，为实现按劳分配的平等原则创造条件。

二、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中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与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都是显著不同的。它主要有以下特点：

——按劳分配的劳动成果，是价值财富。按劳分配的对象不是由一个社会中心自上而下统一分配的使用价值产品，而是经过市场实现的价值产品。每个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只能直接把个人的劳动加入他所在企业的总体劳动，形成企业总体劳动的产品，企业产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为价值，再进行各种扣除，形成可分配的基金，企业才能根据按一定方式测算的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付给相应的货币额，作为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因此，劳动者按劳分配取得的个人收入，必然要受到市场状况的制约。企业面向市场经营，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好，劳动者的收入就能提高。

——直接支配按劳分配的是公有制企业，而不是国家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收入分配是由企业自主进行的，国家通过收入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但是不直接对劳动者进行个人收入分配。这就产生多种效应。①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面对的市场状况必然影响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价值实现程度。不同企业的劳动者，即使提供了等量的个人劳动，却不一定能够获得等量收入；劳动者即使获得等量货币收入，也会因消费品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发生不等量的消费。②虽然各公有制企业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但是各企业没有统一的分配标准。各企业只能根据自身经营的效益，确定本企业分配标准，这显然是有差别的，这就造成同等能力的劳动者在不同企业个人收入存在差别。③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不仅与本人提供劳动的多少有关，而且和本企业经营状况相联系。这有助于促使劳动者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者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收入政策对不同公有制企业的按劳分配起调节作用。不同公有制企业在收入分配方面，受到国家收入政策的制约，因为国家必须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考虑，对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个人收入水平以及个人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和控制。所以，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在贯彻按劳分配的过程中，都要执行国家的收入政策。当然，有关政策和管理的不完善，也会不利于

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导致不同企业之间劳动者收入出现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例如，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电力、电信部门，其工作人员的工资按公务员发放，而奖金则按下属企业发放，导致个人收入明显超过正常，这就是收入政策和管理方面的不恰当造成的。

三、按劳分配的多种劳动计量方式

按劳分配要依据劳动者所提供并实现的社会劳动来进行。但是，现阶段在许多行业和工种，直接计量劳动者社会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往往难以准确地具体操作。这就需要各个公有制单位从实际出发，寻求适合本单位的间接的劳动计量方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少企业和单位通过实践，创造出许多简便而适用的劳动计量方式，较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

——按能力计量劳动的方式。在正常情况下，能力强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的劳动所形成的价值一般要高于能力较弱的劳动者，因而能力强的劳动者按劳分配的收入也高于能力较弱的劳动者，所以，可以在确定每个劳动者能力的基础上，实施按劳分配。关键是劳动者能力如何考核。一般采用的方法是根据劳动者的学历、学位、职称、级别等因素，确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博士高于硕士，硕士高于学士，本科高于专科，会计师高于助理会计师等等。这样的划分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应当注意，学历、学位、职称、级别等，仅仅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可能性指标，重要的是这种可能性必须转化为现实性。因此，这类分配可将收入分为两部分，即一部分考虑到学历、职称；另一部分，还要根据现实表现考核。

——按岗位计量劳动的方式。不同的劳动岗位，要求不同质甚至不同量的劳动。因此，劳动岗位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个人投入的社会劳动量的多少。用这种方式计量劳动的，一般来说是较特殊的岗位，它们要求劳动者有较特殊的才能，或是工作经验，工作态度。有的岗位无法直接计算成果。如铁路检查钢轨隐形裂纹、暗伤的工作岗位，要求检查员有丰富的经验，但不可能要求每天要查出有多少暗伤。在确定这类岗位的劳动量时，应当进行岗位之间的比较，还要考虑到符合岗位要求的劳动者的稀缺度，因为这种稀缺往往同这类岗位劳动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有关，对于较稀缺的劳动者，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

——按最终贡献计量劳动的方式。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岗位，劳动者的劳动具有多样性、综合性，以劳动者的最终贡献来计量其付出的劳动比较符合实际。如公有制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劳动就是综合性的复杂劳动，而且责任重大，具有高风险性，不宜用通常的方式考核他的有效劳动，较好的方式是考核经营者管理的企业在一定时期（例如一年）公有资本的增值程度，因为反映增值程度的利润率，是企业经营效益的综合性指标，可以体现经营者每年的有效劳动贡献。还有些劳动者，比如科研人员，可以按其科研成果对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程度给予劳动报酬。

——按劳动成果计量劳动的方式。有些工作的劳动成果很容易计量，对劳动者的劳

动进行考核，就应主要看其最终劳动成果。比如销售人员，现在不少企业对他们的收入分配是以销售量考核劳动量的，采取基本工资加提成的方式，如每月销售 100 件产品，完成基本定额，可得基本工资 500 元；每增加销售一件产品提成 2 元，即每月销售 200 件产品，可得工资 700 元。以这种方法实施按劳分配，可以较好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

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公有制单位，都应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适当的方式，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合理考核计量，才能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三节　按劳分配的多种形式

一、社会主义工资形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有经济及城镇集体经济的企业中，对一般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主要采取工资形式。同样是工资形式，社会主义工资与资本主义工资在本质上有根本区别。资本主义工资本质上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一部分，另一部分即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它体现的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工资，体现的则是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关系。劳动者直接获得的工资，虽然只是其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在同样条件下，这部分价值，不仅包括劳动力价值的价值额，还包括高于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额，而扣除的未直接分配给个人的另一部分剩余价值额，留在企业，或上缴给集体、国家，最终也是用于满足劳动者共同需要的，因而，这是劳动者个人获得劳动报酬的一种等劳交换关系，本质上不存在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工资也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两种基本形式。

——计时工资形式。它是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劳动量及收入的依据，根据劳动者劳动时间长短支付相应的工资。计时工资首先要根据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来确定工资级别，然后再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支付工资。但是，计时工资级别一经确定，在较长时间内将保持相对稳定，因此，计时工资难以准确及时地在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熟练程度方面反映劳动量的变化。同时，计时工资是一种事先确定工资的方式，难免造成一些人按酬付劳，而不各尽所能，所以，一般采取奖金和津贴形式来弥补计时工资的不足。一般地说，奖金是超额劳动报酬；津贴是一种特殊工作的补贴，如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环境中的劳动，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有不利的影响，给以必要的补贴才是公平的。

——计件工资形式。它是根据劳动者完成的产品数量和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支付的报

酬。计件工资可以比较准确反映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量，因为在劳动成果中已包含了劳动的复杂程度、劳动强度、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这些计量劳动的基本因素。计件工资可以完全不考虑学历、职称、工龄等，有计量比较方便的优点。因此，凡是劳动成果适宜计件的，按劳分配都可以采取计件工资形式。

按劳分配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社会主义积极性，各尽所能为前提的，在实践中，还要注意把按劳分配与加强对劳动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因为等劳交换原则，毕竟属于商品交换的平等范畴，不能使人跳出斤斤计较的狭隘眼界；而在实际的劳动计量中，也很难做到十分精确，所以，在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采取具体工资形式的同时，仍然要大力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还要探索同一定工资形式相配合的工作制度，比如，实行计件工资，当一个劳动能力很强的劳动者在半天内完成了别人要一天时间才能加工的产品，而剩余的半天时间，企业没有产品可提供给这位劳动者加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弹性工作制，即容许劳动者可以干别的工作，或到劳动市场再去寻求一些工作，这就更能体现各尽所能的要求，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二、公有资本控股企业中劳动者的收入分配

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占控制地位，所以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中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但这些股份制企业与国有、集体独资企业不同，还必须要考虑到投资者（股东）的利益。这里有两种情况。

1. 公有制控股，同时职工在本企业参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股东的企业。这类企业中的职工个人收入结构，是按劳分配收入加股息收入。企业根据经营状况和发展的需要，在扣除国家税收、企业发展等基金之后，在可作为收入分配的基金中，重要的是要确定其中按劳分配基金与按资分配基金（即全部股息之和）之间的比例。一般来说，在企业获得利润，经营效益提高的前提下，只要能保证公有资本股息收入不低于或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就首先应当保证按劳分配基金有一定的增长。这样，在可分配基金中，以按劳分配收入为主，以股息收入为辅，才能鼓励劳动者积极劳动，既能促进劳动者提高个人收入，又有利于保持公有资本和职工参股者有稳定的股息。只有在企业急需资金，需要动员本企业职工筹集资金，购买债券追加投资的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高追加资本的利息，因为此时，追加资本可以有利于企业的盈利。但是，这只是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在这类企业中，国有资本或集体资本获得的股息，按规定上缴国家或集体出资机构。

2. 公有制控股，外资或其他私营业主参股的企业。这类企业同样也要根据企业经营状况来确定职工劳动收入与股东股息的比例。这里必须要兼顾职工利益与股东利益。这类企业中的非公有制股东不是本企业职工，他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股息。所以需要由股东代表与职工代表协商，确定职工收入与股东分红的大致比例。公有制控股企业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在企业正常经营获得盈利的条件下，确定可分配收入

比例时，一方面，应参考同类股份制企业的股息率，使股东的收益不低于同类股份制企业，同时，要保证按劳分配基金能够随效益的提高而相应地增长。在企业经营状况不甚理想时，可分配收入比例应当向劳动者倾斜，首先保障劳动者的收入不低于同类股份制企业的劳动者。如果在这类企业中，因某些原因，例如为了吸引含有高新技术的外资，股息率不得不定得较高，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来保证职工的按劳分配收入，那就是，在国有资本或者集体资本得到的股息收入中，根据实际情况，提取一部分，加进按劳分配收人基金中来，这同样可以保证职工的收入实现按劳分配。因为公有资本股息的实质，是企业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处理是完全合理的。

在公有资本控股企业中，理论界探讨较多的经营者或者企业家的收入报酬问题。如前所述，经营者可以按最终贡献计量劳动的方式，计算其劳动收入。这意味着，我们是把公有制企业的从事企业家职业的经营者纳入复杂劳动者范畴的，也就是本质上不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这对公有资本控股企业的经营者同样适用。在改革实践中，目前一些公有控股企业对经营者实行结构收入，一般由基本工资、津贴、一定量的期权性股权收入三个部分构成。基本工资这部分收入以能够满足经营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尺度，津贴收入取决于每年企业经营的好坏，第三项被认为是风险收入。对第三项收入，值得深入探讨。一个企业的经营，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显示出管理的效果。所以，对经营者在保证基本工资、根据逐年考核结果给以适当津贴的基础上，采取几年后再进行一次综合性考核评价，确定报酬（超出基本工资和津贴的部分，再给以补偿报酬）的方法，是合理的。经营者的劳动是复杂劳动，收入高于一般职工，也是合理的。但是，把公有资本股权转给企业家作为激励，并不妥当，因为这会改变经营者作为劳动者的经济性质，使他的收入中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正确的做法，应当根据几年一次的经营的实际绩效，用好奖金激励和荣誉激励。看来，对经营者的激励方式，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者的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股份合作制企业主要存在于农村非农经济中。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企业组织形式，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主要包括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两个部分。股份合作制的个人收入分配，在确定可分配基金之后，也要分成按股分红的基金和按劳分配的基金两部分。在职工人人持股，并且持股数额大体相当的情况下，这两部分比例的大小对职工个人收入影响不是很大；如果偏重于按股分红，则对劳动素质高的劳动者不太有利，所以，一般还是应当向按劳分配倾斜，因为这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在职工持股不均衡的条件下，如果偏重于按股分红，则显然对占有较多股份的职工有利，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按股分红基金和按劳分配基金两部分的比例，一定要利用股份合作制在企业重大决策表决上的“一人一票”（这是有劳动合作决定的）的特点，发扬民主，做出符合企业大多数成员利益的决策，才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一般来说，向按劳分配基金倾斜，更符合股份合作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它有利

于鼓励多劳多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现实中，股份合作制联合资本的构成，大体由集体资本投入的集体股、本企业职工个人投资形成的个人股构成。集体股是由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的投资形成的。从理论上说，集体资本的股息收入，应当在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收回之后，以一定的方式，如追加集体资本、增加集体福利、扩大集体公益事业和增加个人收入等，返回给构成集体的自然人。目前，集体资本的股息收入如何合理地返回集体自然人，仍是值得在实践中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这部分收入，往往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混淆起来。而乡镇政府与农民自然人集体民主选举的集体资本所有权机构在性质和职能上都是不同的。应当设法让集体中的农民自然人通过收回的集体股息，感受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实践中，股份合作制的集体股、个人股的比例，个人持股数量的差别，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有的企业集体股比重较大，有的则较小；有的企业把个人股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营层的股份，一部分是普通职工的股份，有的前者占主要比重，也有的后者占主要比重；有的企业职工并不是人人持股，有的企业介于股份合作制与私人合伙制的企业性质之间；在企业的决策投票制度上，也有多种情况，有的企业实行“一人一票”，也有的企业由于经营者持股比重大，实行“一股一票”，等等。这就使劳动者的收入呈现多种多样的情况。由于股份合作制本身是一种具有过渡性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收入出现复杂的形式并不奇怪，这正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就应当予以肯定。不过，股份合作制要保持集体经济的性质，有利于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坚持收入分配决策上的“一人一票”制。

四、集体农业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形式

我国农村在农业经济上，实行的是集体统一经营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农户以合同的形式确定自己与国家、集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根据合同，集体将土地承包给农户使用，规定农户应上缴给国家和集体的任务，承包农户在完成了这些任务，其余部分归农户自己。这被农民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形成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以劳动者个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农户的结合劳动者形式出现，同样贯彻的是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如果缴给国家和集体的部分是固定的，那么劳动者劳动投入越多，家庭自留部分越大。即使缴给国家和集体部分随着农业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也可以不断增长。这种分配方式把劳动成果与劳动收入紧密结合起来，责、权、利明确，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方式不仅存在于种植业中，也存在于林、牧、副、渔业中。在农村集体经济中，有必要处理好集体经济与农户经济的关系，要防止乡镇政府机构以集体的名义规定农户上缴各种费用，增加农民的不合理的负担。必须明确，集体增加的收入，扣除国家的税收，归根到底是为每个集体成员服务的，集体所有权经济价值的实现，最终要体现在构成该集体的自然人获得经济利益上，所以，决不能把农户利益同由农户构成的集体利益割裂开来。

第二十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按要素分配

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然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占主体地位，这就决定了，在社会收入分配关系中按劳分配关系为主体；既然同时要求发展个体、私营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这就决定了多种收入分配关系的并存。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与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相联系的一种普遍的收入分配关系，这就是按要素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如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都是与市场经济一般关系相结合起作用一样，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也是同按要素分配关系结合起作用的。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应当区分按要素分配关系与公、私不同所有制经济相结合体现的不同性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与不同性质的按要素分配的关系；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合理地实施按要素分配方式。

第一节　按要素分配与市场经济

一、按要素分配的含义

所谓要素，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指的是构成生产过程的各种因素。最简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就是生产劳动和生产资料。从这种角度来看的生产要素，也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要素。作为主观因素的劳动必须同作为客观因素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现实的生产过程，生产出物质财富。马克思批判了那种在物质财富创造中，只看到劳动的作用，而忽视物质生产条件作用的错误观点。他强调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并充分肯定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祖鼻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现代的社会化生产过程十分复杂，生产要素包括有管理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在内各种劳动者的劳动、劳动组织结构、应用于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工艺流程、各种生产设备和工具、原材料、土地和生产所处自然环境等，但是仍然可以归结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基本方面。这里是撇开生产关系来看的生产要素。

显然，按要素分配这一表述中的“要素”含义，已经超出了生产力本身的范畴，因为上述意义中的要素，无论是劳动还是物质生产资料，它们本身都不是有肉体、有思考能力的人，它们本身不会提出分配生产成果的要求，能够提出分配要求和决定分配关系的是人（或组织起来的人），是与生产要素有关的人（或组织人起来的人）。因此，按要素分配中的“要素”，只能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者提供者所提出的要求”这样一种含义去理解。事实上，通常的按要素分配的表述，往往不知不觉地已经把涉及生产关系范畴引了进来，例如，把要素表述为劳动、资本和土地，其中的资本要素，就已经是资本关系的范畴。为了科学地理解按要素分配，必须纠正两个常见的误解。

其一，把按要素分配理解为，投入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本身按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参加生产成果的分配。这样一来，生产要素本身就成了有生命的人了。这种从字面含义理解的按要素分配，并不符合实际，因为生产成果并没有分配给要素本身，而是分给了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者提供者。所以，按要素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者提供者之间分配生产成果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唯物史观看来，这种分配关系，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本节“二、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关系”中，我们将阐明按要素分配是与市场经济这种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本章标题及以下的论述所说的按要素分配，都应当从这种实质含义来理解，否则容易陷入认识的误区。而如果明白了实质含义，那么，按要素分配的表述，也有简洁的好处。

其二，把按要素分配的对象或生产成果理解为物质财富或者使用价值。这样一来，按要素分配的财富就成了没有一定社会形式的财富了，从而按要素分配就成了永恒不变的非历史的分配关系了。唯物史观揭示了这样的真理，财富是人类劳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东西。不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财富具有不同的社会形式。在自然经济社会，在原始共同体、庄园经济和独立农户中，财富的社会形式是劳动产品的自给自足。在商品生产社会或者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则是劳动产品作为价值而相互交换。只有市场需要、通过交换能够实现的有用劳动产品或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才具有价值；换句话说，劳动产品只有实现为价值，才是有意义的、现实的财富，才能作为现实的生产成果进行分配。马克思把价值称之为“抽象财富”，把商品和作为货币的金分别称之为“抽象财富的独立存在”和“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的可以作为分配的财富是价值。作为抽象财富的价值才是分配的对象。人们通过商品生产和流通获取了价值这种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货币），才能占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财富，才能有分配的对象。在市场经济中，利润、利息、地租、股息、工资这些收入分配形式和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形式，无一不是价值这种抽象财富的货币形式。如果有意义的财富仍然是使用价值，分配的也是使用价值，那只能意味着又回到自然经济的实物生产和分配时代。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从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那么，人们的财富观念就应当坚决地更新，从使用价值财富观念转换为价值财富观念。

因此，按要素分配的一般含义，就是按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者提供者所提出的要求，分配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财富。如果明白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要素分配的对象只能是价值财富，那么，要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与财富创造的关系，就应当研究人们与创造价值财富的关系，而不是研究人们与创造使用价值财富的关系。如果明白了这种含义下的按要素分配，实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那么，就应当确立这样的认识，即使已经弄清了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与价值（抽象财富）创造的关系，也仍然不能立刻说明如何进行按要素分配；只有弄清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才能使按要素分配得到清楚的阐释。撇开生产关系来解释按要素分配，势必陷入理论上的混乱或误区。

二、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关系

按要素分配关系是与市场经济一般关系相联系的范畴。市场经济必然包含着按要素分配的关系，其中有隐含在经济规律作用过程中的，也有表现在外部的。

1. 隐含的按要素分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按同一社会标准生产市场价值的关系和按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关系，隐含着按要素分配关系，这体现在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过程中。

(1)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同一部门的不同企业，在主观要素（劳动）相同的条件下，客观生产要素好的企业可以创造较多的市场价值，获得超额利润，这里，隐含着按要素分配关系。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种商品的社会价值（市场价值）以社会标准（市场标准）的使用价值为前提；而社会标准的使用价值又是具体有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有用劳动是以社会标准来衡量的具体劳动。同种商品不同企业的生产劳动者，在同样时间的具体劳动过程中，有用劳动的程度不一定是相同的，因而创造的社会价值不一定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在具体劳动过程中，往往包含无用劳动的耗费，或者因生产出废品，凝结在其中的劳动是无效的、白费力气的，因而不创造价值；或者因生产出次品，达不到标准商品的要求，因而不能算做同档次商品的社会劳动耗费；或者因与生产市场标准商品所花的劳动时间相比，属于过多的劳动消耗，等于是劳动的虚耗。可见，具体有用劳动与具体劳动决不是等同的概念。在同种商品的生产中，不同生产者在同样时间的具体劳动过程内，他们劳动的有用程度会因其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可以显示出他们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主观生产要素相同的条件下，这种差别就是由客观生产要素造成的。例如同样一个劳动者锯钢管，用普通的锯条，既容易造成断面不光洁出次品，又会因经常折断需要更换而增加劳动中的无用耗费时间；而优质钢做的锯条，成品率高，可连续地使用不折断，能提高同一劳动时间在社会标准下的有用劳动程度，也就有利于在同样的劳动时间提供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量。因此，马克思指出，同一部门生产刀特别高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这里的价值就是指社会价值。假定单个商品中的原料是相同质量的，那么，劳动者在同一时间能提供较多按社会标准的有用劳动耗费，

或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那就是由于所使用的先进生产工具、设备这种客观生产因素，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先进的客观生产要素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优良吸收器。现代化生产过程使用信息技术、高科技工艺流程、新材料这些现代客观生产要素制造商品，相对于传统生产方式，在同一时间更能大大减少无用劳动，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成分，对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率特别高的企业，按市场价值标准，扣除成本和平均利润，可以获取超额利润。在主观因素相同的条件下，这种超额利润是由于先进客观要素作用的结果。这种超额利润显然是归于使用客观生产要素的企业方面的。

这里有必要强调：①假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不存在市场经济关系，实行按劳分配，那么，即使不同企业的客观生产要素有差别，只要总体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相同，企业间总体劳动者的报酬就应当相同，所以，不同企业同样素质的劳动者劳动收入分配不存在差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企业是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那么分配就要按市场标准实现的市场价值成果来衡量，就必定存在占有先进客观要素的企业，其同样素质的劳动者能获取更多利润的情况。所以，即使在企业内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同企业同样素质的劳动者，其劳动收入也会存在高低不等，这是由于隐含了企业之间的按要素分配关系造成的。②占有先进客观要素企业的劳动者获得的较多收入（市场价值），仍然是该企业的生产劳动者社会必要劳动的凝结。先进客观生产要素本身并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价值，它的作用是比起其他企业，减少了生产劳动者同一劳动时间中的无用劳动消耗，提高了市场标准的有用劳动程度，从而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成分，为同一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提供有利条件。在市场价值中不包含任何客观生产要素的自然物质原子。③由先进客观生产要素带来的更多的利润归谁所有，这完全取决于企业中人与人之间决定分配关系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客观生产要素本身。如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超额利润归资本家所有，如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则归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所有（再通过一定规则，在企业内按劳分配到个人）。

（2）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客观生产要素不同的各个企业，也隐含着按要素分配关系。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到分配的实现过程来看，企业要在内部进行收入分配，首先要使生产成果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为社会价值，并取得利润。在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客观情况下，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市场中，彼此都是作为法人财产所有者对待的，它们相互之间，只能是竞争利润的关系；而反映市场经济平等关系的公平竞争观，只能是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这样，就导致了社会总利润（本质是社会总剩余价值）在不同行业的企业法人之间的分配，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平均利润规律，也是社会总利润的分配规律。这种经济规律的作用是隐含着按要素分配关系的。这是因为，使用先进客观生产要素的企业，一般来说，是投资量大，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的企业，他们可以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把有机构成低的行业的企业生产的利润（剩余价值）转移过来，这种转移，就是拥有先进生产要素企业实施要素占有权权益的结果，当然，这也是统一市场中参与竞争的企业都认同的结果。因此，市场经济的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过程，是隐含按要素分配关系的，这种关系是由市场经济的资本所有者

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决定的。

2. 表现在外部的按要素分配。这就是凭借对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通过市场取得收入的分配关系。

（1）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获取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经营的。构成企业现实生产的生产要素都要转化为不断增值的企业法人经营的资本。企业中的法人资本，不论是由公有资本，还是由私有资本，还是由两者混合构成，都要在市场中进行的形态变化的运动，才有活力，才能增值，作为资本载体的企业才能持续扩大再生产。企业法人资本通过市场的增值部分，在内部分配之前，总是首先归企业的法人，这是由市场经济一般关系决定的。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的社会公正，人们将资本投入企业，凭借资本所有权，就可以从企业法人资本增值中获取相应的利润（超出投资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形式的收入。本来，只有实际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职能性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才有权获取资本收入，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不直接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非职能性银行资本，从资本运动中独立出来。职能资本所有者只要向银行资本所有者借入资本从事资本经营，就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在归还资本的同时，将获得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利息，付给银行。从银行角度看，它是凭借对资本的单纯所有权（不必从事商品生产销售），获取利息形式的收入的。于是，这又形成了一种由市场经济决定的社会公正，人们可以凭借资本的单纯所有权，以贷出使用权的借贷方式，就能够以利息形式获取收入。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一种死劳动或者物化劳动，其本身不创造价值，但是由于存在市场经济的上述一般关系，人们就可以凭借资本所有权，投资而获取利润，贷出资本而获取利息。至于获取的利润和利息究竟如何归于谁个人，则要看投资者和贷出资本者拥有的资本是私人资本，还是公有资本。

（2）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获取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可以凭借土地的所有权获得绝对地租收入，凭借垄断经营权（或垄断使用权）获得一定的级差地租收入。其实，土地本身不会按照人们的各种需要，有目的生产使用价值产品。土地本身也决不会创造价值。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土地只有通过人们的生产劳动，生产出社会财富，才具有经济价值。如果不使用土地，不投入劳动，不能从土地中生产出财富来，那么，土地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但是，从土地生产出的财富归谁所有，则是由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土地所有制）决定的。如果生产劳动者本身就是土地所有者，从土地生产出的财富，就归生产劳动者所有；如果生产劳动者不是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所有权是归非劳动者所有的，那么，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非劳动者，就要首先占有从土地生产出的财富。所以，土地的经济价值，实质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土地所有者凭借占有的土地获取了一定社会形式的财富收益，他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才具有经济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基本社会形式是市场价值，土地所有权实现经济价值的形式，或者说获取收益的社会形式，同自然经济条件下是不同的。由于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投入土地，资本是要获取平均利润的，土地经济价值的范围只能是在平均利润之上的超额利润；由于土地的非匀质性和相对于市场要求的差异性，不同地块在位置、肥力、矿藏丰度等方面，必定产生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等级差别，从而土地产品（商品）实现为市

场价值、转化为土地收益就会出现等级差别；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必定产生在优良地块经营权的垄断性；这样，就使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具有了市场经济的特点，这就是说，凭借单纯土地所有权，就能获取绝对地租收入，凭借在优良地块的经营权，就能获取级差地租收入。至于获取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究竟如何归于个人，则要看拥有土地所有权和优良地块经营权的是国家（全民所有者）、集体，还是个人。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土地所有权已经取消，绝对地租不能归于私人，但是企业法人或者私人，在租赁土地经营的期限内，有可能获得级差地租。

可见，上述隐含的按要素分配和表现在外部的按要素分配，都是由市场经济一般关系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市场关系这个层面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这种分配，与要素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是没有关系的。

三、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按要素分配

市场经济一般关系（市场主体之间按市场价值、市场生产价格标准的比较关系、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法人所有权关系和市场竞争关系）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总是与一定所有制关系相结合的，同样，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的按要素分配关系也总是同一定的所有制经济关系相结合的。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存在两种性质的按要素分配。

1. 上述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关系。这种关系由价值规律平均利润规律和地租一般规律决定，发生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法人之间，或土地所有者和企业法人之间。这里的法人，是撇开企业内部生产关系性质的企业总体生产者组织，提出按要素分配要求的，是在市场关系中相互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拥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既然公有制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是以生产成果在市场上实现为前提的，而这种实现过程与价值规律、平均利润规律和地租一般规律作用下的市场竞争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必须承认在按劳分配之前，企业法人已经参与了价值规律、平均利润规律和地租一般规律作用下的按要素分配；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要同经营权分离，才能让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适应市场经济有效地生产经营，那么，就必须承认，企业只有在凭借法人财产权参与竞争平均利润之后，企业内部才能实施按劳分配。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在内部实施按劳分配之前，实际上已经参与了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可见，按劳分配关系实际上是与这种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关系相结合的。不言而喻，这种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可以同公、私不同所有制结合。

2. 本质上是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私人按要素分配。这种分配关系不具有一般性质，它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私有权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提出这种按要素分配要求的，是拥有资本、土地、技术、专利等客观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私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土地实行公有制，也就不存在土地私人所有权，但是，除了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仍然存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这些经济成分中，除土地之外的生产要素仍然是私人占有的；即使在公有制经济中，从现阶段全局利益出发，

对于一些特殊的生产要素，如特殊人才的某种能力、专利（如中医祖传秘方）也需要承认其私人生产要素所有权，才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存在这些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权关系，就会存在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私人按要素分配。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他们只要向各种生产或服务过程提供了自己私人所有的要素，就要凭借自己对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权，要求在一定经济形式下索取的一定量的价值财富，如利润、利息、地租等。这是因为缺乏他提供的生产要素，生产就无法进行，或者说，生产就不能取得一定的效果，这就使他们提出这种要求，成为一种社会公正。这种要求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是否在他们获得的市场价值财富中提供了自己的劳动贡献无关，即使他本人参加生产劳动，他也有理由在他的劳动收入之外，再要求获得一份他提供的生产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收入，因此，这一种按要素分配要求权，实质上是一种凭借私人占有的要素所有权，对生产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索取权。

四、不能用拜物教观念理解按要素分配

上述两种按要素分配，都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第一种性质的按要素分配，由市场经济一般关系决定；第二种性质的按要素分配，由要素的私人所有权关系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存在市场经济一般关系，又存在包括私营、外资经济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上述两种性质的按要素分配就都会存在。在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在分配关系中按劳分配方式为主体的前提下，承认按要素分配，其实就是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的市场经济关系和私人所有权经济关系。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往往会被假象所掩盖。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一般关系，人与人之间因社会分工而交换劳动的关系，被表现为物质本身之间的交换关系(商品拜物教现象)；人们的劳动包含等同抽象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被表现为物质的自然属性（货币拜物教现象)；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被表现为资本这种物化劳动本身产生利息、利润等形式的收入（资本拜物教现象)；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被表现为土地这种自然物质本身产生地租形式的收入（土地拜物教现象)；这种种经济假象，就会客观存在。直观地反映这种假象，就是马克思所比喻的拜物教观念。如果陷入拜物教观念的盲目性，就不可能弄清经济关系的实质，甚至会曲解经济关系。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是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表现为取得非劳动收入的按要素分配。资本家凭借资本获得利息或利润，地主凭借土地获得地租，成为天经地义的经济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为了否定价值财富和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替表面文明的剥削制度做辩护，竭力鼓吹资本、土地这些客观生产要素本身就能创造价值财富，因而理所当然地要分配价值财富。他们炮制各种理论，把劳动力所有权与资本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相提并论，把它们并列在一起，说成是同等性质的要素所有权。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生产三要素论”，即资本、土地和劳动“协同创造”

价值，因而可以“三位一体”，和谐共处，参与收入分配，分别获取利润、地租和工资。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说成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和谐的经济关系。这种被马克思称之为萨伊教条的理论，一直沿袭到如今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理论上的错误，与他们根深蒂固的拜物教观念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萨伊教条。他指出，“三位一体公式”抹煞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历史形式，把资本（属于生产关系领域）、土地（属于自然界本身领域）和劳动（属于人类具体有用劳动的一般领域）这三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人为地并列在一起；把本身不创造价值的客观生产要素，也视为价值财富和剩余价值的源泉；这种理论只是直观地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表面的拜物教假象，只是把普通人很熟悉的表面的经济关系，加以教条式的、系统的、有利于剥削阶级的辩护性的解释，是一种庸俗经济学。

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按要素分配关系的客观存在，丝毫也不意味着，萨伊教条在理论上有什么科学性。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萨伊教条的错误，才能弄明白按要素分配关系存在的客观原因，才能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弄清在分配关系领域，如何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促使分配关系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从而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总而言之，我们决不应当撇开生产关系，尤其不能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谈按要素分配，只有从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包括市场经济一般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理解按要素分配，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与按要素分配的辩证关系

一、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一般的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

如果撇开市场经济一般关系，把社会主义经济理解为抽象的、纯而又纯的、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那么，必然排斥任何按要素分配。但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离不开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与市场经济一般关系有机结合，并且还要与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样，在社会主义经济与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按要素分配之间，就会产生出两种基本关系。一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与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私人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分析第一种关系。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两者具有不可分隔的统一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遵循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规律，这就意味着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隐含的按要素分配关系的结合。另一方面，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不同所有制经济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代表全民所有制经济利益的国家和代表集体经济利益的集体经济组织，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能不凭借土地所有权取得土地要素收入；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不能不凭借资本法人所有权（又称公有资本经营权）参加市场经济活动和市场竞争，取得资本所有权收入分配，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表现在外部的按要素分配的结合。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从这种统一性的角度来看，直接获得这种按要素分配收入的主体，是国家、集体或者公有制企业法人组织，而不是个人。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虽然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并不直接决定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分配，但是它会使之受到间接的影响。例如，比较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不同企业中的劳动者个人收入，假定这些企业生产过程的主观条件，即劳动者的素质及其付出的劳动同等，那么，如果劳动者个人处在拥有先进客观生产要素的企业内，就有可能因为该企业客观生产条件的优越，总体劳动者能获得较多的按要素收入，而获得比其他企业同等的劳动者多一些的个人收入。这样，在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内部，就会与按劳分配关系发生矛盾。对于国有经济来说，为了促进内部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更符合按劳分配原则，这种因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而产生的个人收入差距，应当通过内部的再分配政策来进行调节。

由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内部，主要实施按劳分配原则，而由市场经济一般性质决定的按要素分配的主体，并不是直接是个人，因此，只要在社会上大多数企业都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公有制企业，即使会出现因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造成的劳动者个人收入差距，在公有制经济内部收入政策的调节下，全社会的个人收入差距也不会拉得太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统一性的一面。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实践中，实施按劳分配原则，必须首先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

二、社会主义经济与私人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与私人按要素分配之间，也存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1. 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本身排斥非劳动收入。社会主义经济是自主的联合劳动者的经济，在个人收入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一般来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是不允许不劳而获的，如果发生这样的现象，那就是对自主联合劳动者利益的侵犯。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是排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私人按要素分配的。

第二，私人按要素分配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层劳动者产生负面影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对从事复杂管理劳动的管理层劳动者，也是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否则就会

造成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尽管说，对管理者的复杂劳动的计量，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中可以采用一些形式上的“按要素分配”，如给以一定的股份期权作为报酬，但是，从根本上说，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贯彻的主要是按劳分配原则，这有助于加强公有制经济内部劳动者的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但是，与非公有制经济横向对比，在公有制经济中的管理层劳动者的收入，一般不可能超过私人企业的“老板”，这是因为，私人企业主的收入，在他参加管理劳动的条件下，不仅有复杂劳动的收入，而且还包括其私人生产要素所有权带来的非劳动收入。私人“老板”收入高于公有制经济的管理层的总经理、董事长，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就有可能对公有制经济的管理层带来负面影响，使有些有糊涂认识的人产生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动摇。有人会认为“自己的企业”那么大，“自己经营的资本”比私人企业主多，个人收入却比他们低，在公务消费方面还要受到公有制纪律的约束，“吃亏了”。而以这种不良心理参与管理工作，势必对公有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不利。

第三，私人按要素分配的扩大化，不利于社会再生产的稳定运行。私人按要素分配，允许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取得非劳动收入，这会使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向他们无偿的转移，导致全社会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真理。如果从全社会来看，私人按要素分配关系取代按劳分配，占了分配关系的主导地位，那么，个人收入的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将破坏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总体的供求矛盾。在社会再生产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实质是一定时期内（通常以一年为研究的时期）社会总产品内部（为简明计，这里撇开对外经济关系）的无数部门的企业相互之间，实现使用价值更新和价值补偿的关系，市场上的总供给和市场上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其实都来自这一时期的社会总产品。导致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无非有两种情况，①各个部门的产业结构没有形成相互更新、补偿所需要的比例关系；②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不合理，由此出现了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这两种情况会连锁反应，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不合理。在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情况下，有一些部门往往因市场缺乏购买力而缩小规模、转产或破产，这又势必对与之有关联的部门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将导致整个社会再生产均衡的被破坏，发生危机。所以，供求关系的实质是收入分配关系，而后者又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那种因个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没有必然性，但是，如果过分发展私人按要素分配关系，冲击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造成全社会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化，那对社会再生产的运行是肯定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如果用按要素分配取代按劳分配，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

2. 社会主义经济与私人按要素分配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本身，都离不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私人按要素分配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那么，承认私人按要素分配关系，在一定范围给以合法的地位，就势在必行。为了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

更多愿意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把他们私人拥有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发展民族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来，就必须在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内，以及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对于特殊经济和科学技术人才的政策范围内，实施或者一定程度地实施私人按要素分配。

在社会主义经济与私人按要素分配的关系上，既要承认两者之间的矛盾，又要承认劳动的统一，那么，如何使两者的矛盾不至于破坏两者的统一呢？这就是哲学上讲的对立统一关系实现的条件问题。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这一唯物史观揭示的基本原理看，关键在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和私人按要素分配两者关系的基本条件。

由于发生在初次分配中的私人按要素分配，必定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它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存在明显的对立性，而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利方面，只能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才能显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私人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对立性的一面。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实践中，实施私人按要素分配政策，应当注意防止对社会主义经济从整体上造成损失。

三、正确实施按要素分配，促进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价值目标

从上述分析可以明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与性质不同的两种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同的。因此，在经济理论上，不能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按要素分配混为一谈；在经济实践中，应当根据经济关系的所有制性质，实施相应性质的按要素分配。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质的按要素分配，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却不能与私人按要素分配直接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从根本上说，私人按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相互排斥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只能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某些经济环节、在对少数人采取特殊经济政策的意义上，实行一定程度的私人按要素分配。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实践中，盲目地在自己内部扩展私人按要素分配，结果必定造成自身的瓦解和变质，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私人按要素分配，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私人所有权经济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对于依法经营的非公有制经济来说，实施私人按要素分配，是其内在要求。国家只能在外部通过税收、法规等方式对这种分配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却不能在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中对它人为制止，强制推行按劳分配，硬要那样做，就无异于强行变“私”为“公”，势必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压抑拥有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私人参加生产建设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关系，正确实施按要素分配，实质上是要选择好、调整

好分配关系，使分配关系及其结构，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其结构，也就是要更好地从分配关系这个层面，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实施按要素分配是不能脱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价值目标的，这个价值目标，简要地说，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这是前面的篇章已经阐明的。

四、按要素分配与效率、公平的关系

在经济实践中，着眼于实现“三个有利于”的价值目标，正确实施按要素分配，需要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如果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单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要求来处理分配关系，就会简单化地把私人按要素分配视为绝对不合理。为了在经济实践中防止这种“左”的错误，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工作方针是有必要的。既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内实施私人按要素分配，就会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形成从公有制角度来看的收入不公，对于这种不公，只能从兼顾公平的角度，采取合理的再分配办法来调节。

效率，是生产力范畴；而公平，在经济学上就是平等，是生产关系范畴。在既定的生产力状况下，注重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调节分配关系，从而调节生产关系，可以有助于避免陷入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指导经济工作的主观片面性。须知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仅从抽象的公平角度调节分配关系，就把公平变成了一种按书本原则设计的主观的东西，就会失去生产力的客观依据。如果可分配的蛋糕做不大，那么，侈谈公平分配也就没有实际意义。因此，针对“左”的错误而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助于人们着眼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寻求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

但是，也要防止一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误解，就是以为效率和公平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东西。其实，从客观经济过程来看，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总是由一定的经济利益主体支配下的生产力，也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只是人们在做经济分析的时候，才可以将他们从概念上划分开来。所以，一定效率的生产力总是与体现一定公平状况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简要地说，一定的效率与一定含义的公平是统一的，两者并不是一种可以在时间上割裂为先后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从实践的角度提出的工作方针，但是决不意味着，在经济实践中，可以先把孤立的、不与任何含义的公平结合的生产力发展起来，把效率提高起来，然后，再来进行脱离生产力的公平分配。这种情况是不符合现实经济生活的。因此，在理论上，有必要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基本观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生产关系必定造成个人收入两极分化，由此必定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采取再分配的办法来调节初次分配造成的个人收入不公，借以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允许的一定程度的公平，缓和阶级矛盾，也缓和市场的供求矛盾，以便实现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己

的经济学家，把这种调节方式理论化，认为这样就可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虽然这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再分配理论，从再分配调节形式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借鉴，但是，他们调节的结果总是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为他们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公平原则（资本家之间平等地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中轴线的，当效率（他们观念中的效率实质是资本家的利润率）很高的时候，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税率、税种增加税收等形式，从资本家手中拿走一部分利润，用福利计划和失业补助等形式转移给社会的低收入者，但是，这种再分配调节的力度，绝对不能超过基本的效率（资本家必须获得的利润率），一旦再分配形成的公平影响到基本的效率，则又会再做调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率与公平替代的理论，来处理中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个人收入不公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科学原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私人按要素分配关系在全社会比重的增加是成正相关关系的，而私人按要素分配关系又是由非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要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固然需要通过适当的再分配方法进行调节，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控制好所有制经济结构。只有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更好地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使之优越性得以越来越大地发挥，使其主体地位越来越巩固，并在全社会的比重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地扩大，个人收入的差距，才会在全社会个人平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趋于缩小，才会促使社会主义公平更充分地实现。

第三节　私人按要素分配的性质和形式

一、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私人按要素分配

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私人按要素分配，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私有权关系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来说，私人按要素分配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上，按资分配是很明确的；在经济性质上，尽管私人按要素分配具有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中国总的收入分配制度中的构成部分，但是其占有剩余价值，属于非劳动收入，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上节已经提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某些经济环节、在对少数人采取特殊经济政策的意义上，也是需要实行一定程度的私人按要素分配的。这是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本节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研讨。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实施的私人按要素分配，同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实施的私

人按要素分配，两者具有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与私人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收入的性质都是非劳动收入。

但是两者在性质上又有重大的区别。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人按要素分配，主要的生产要素不但归私人所有，而且生产过程也是由私人控制的，收入分配在扣除国家税收之后，也是由私人支配的，私人对分配过程起决定作用，在私人收入中是包含剥削性质的。而在公有制经济中的私人按要素分配，虽然私人提供了生产要素，但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生产要素却不是私人的，控制生产过程和决定分配关系的是代表自主联合劳动者的管理者，私人凭借私人生产要素所有权获得多少收入，私人本身并不能决定，而是由公有制经济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来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的要素所有权收入尽管是非劳动收入，但是，却不能简单地归于与私有制经济等同的剥削性质的收入。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限度内，其内部的私人按要素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可以理解为一种有利于提高总体劳动者收入的非劳动收入。这就是说，由于吸引私人生产要素的加入，促使自主联合劳动者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和总收入水平提高了，从而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在此前提下，自主联合劳动者在分配时，从总劳动收入中，给予提供生产要素的私人一份必要的非劳动报酬，这无论对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还是对公有制经济中的其他劳动者，都是有利的，给予他们的较高收入，具有奖励性质。

因此，不能把两种性质不同的私人按要素分配，混为一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把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劳动收入的私人按要素分配，作为剥削性质的按要素分配加以排斥，这对发展公有制经济本身是不利的；而在公有制经济中随意地参照私有制经济，推行剥削性质的私人按要素分配，那必定会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的私人按要素分配形式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需要利用哪些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劳动收入的私人按要素分配形式，以及怎样利用好这种性质的私人按要素分配等，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这里分析一些主要的形式。

1. 按资本所有权分配的形式。这是一种个人投资获得收入的形式，包括投资股票取得股息和红利、投资债券取得利息、储蓄存款取得利息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获得的个人劳动收入，一般是作为消费基金的。在个人消费基金有节余的条件下，如果让它们静止在那里，那么，不但需要增加保管费用，还可能会因多种原因而损耗；如果能够促使它们转化为生产基金，这显然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办法是采取个人自愿投资的形式，与此相应的，就有必要以私人按要素分配的形式，给以报酬。个人投资取得的要素所有权收入，从劳动者个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劳动收入，但是，这只是一种劳动收入以外的补充性收入，这与食利者收入（完全的非劳动收入）和剥削收入在数量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在经济性质上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劳动着的投资收入，都是通过一定的中介（银行、证券市场等），将许多劳

动者的这种投资集中使用，产生增值，才能取得这种收入。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调节，是许多劳动者分散节约的个人消费基金，通过市场环节，向一定程度集中使用的生产基金的转化，有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劳动者以这样的投资形式，将闲置消费基金转化为社会生产基金，有助于调动社会生产的物质潜力和劳动潜力，客观上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一种贡献。虽然投入这些资本的劳动者本人，没有在使用这种生产基金生产出的新价值产品中投入劳动，这些资本作为死劳动，也不会成为新价值产品的组成部分，新价值产品是使用这些投资的其他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但是，社会从这些新价值成果中提取一部分给这些投资者，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对他们节约个人消费基金，支持国家建设的一种鼓励。实际上，给他们的投资回报，只能是因此而新增加的价值产品的一部分，而全社会广大劳动者，都可以从新增加的价值产品中获得经济利益，否则，社会就谈不上利用了这种形式的投资。所以，他们的这种非劳动收入，是一种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劳动收入的非劳动收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劳动者个人投资取得的要素所有权收入，体现的是社会经济利益与个人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

2. 按特殊人才才能的分配形式。这种私人按要素分配形式，主要是允许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事业单位，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之间的市场竞争中，让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获得超出按劳分配范围的特别高的报酬。例如，某集体皮鞋制造企业，从国外引进设计师，付以年薪 100 万元，这就属于私人按要素分配范畴。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竞争。掌握某种绝技、拥有特殊的科技才能等人才，不同所有制经济都会把他们作为竞争的对象。私有制经济的“老板”，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获取更多的利润，情愿向特殊人才赠送所谓“剩余索取权”，让他们分享利润。而特殊人才的特殊知识和科技本领本身并无阶级性，假如公有制经济不主动地争取利用，就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对特殊的人才也只是一般地实施按劳分配原则，像对待一般的劳动者那样，那么，除了公有制经济自己培养的、思想觉悟很高的之外，不少特殊人才就会流向非公有制企业去。这是因为，在一个人才可以自由流动、人才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拥有特殊知识和科技本领的人才，是有理由凭借自己拥有的这种特殊生产要素，提出个人对收入分配的高要求的。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从公私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考虑，对特殊人才实施超出按劳分配关系的特殊分配政策，给予他们必要的包含非劳动收入的优厚待遇。这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更好地使用人才的。应当明白，给予特殊人才特别优厚的待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特殊人才一个人本身就能创造特别高的价值，而是因为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一旦一个生产的联合体加进了这样的人才，就会由于其特殊的才能贡献，如设计出特别畅销的产品、创造出特别节约的工艺流程、提供了某项独特的应用技术，使这个联合体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周转速度显著地加快，生产潜力可以得到十分有利发挥，从而获得充分的利润。可以打个比方，一定斤两的面粉，只能做出普通的馒头，但是加入适量优质酵母和技术，就可以蒸出体积很大、很可口的松糕，这是酵母粉和特别技术的作用造成的。虽然松糕本身仍然是面粉，但是整个结构优化了。所以，特别优秀的人才，其能力的发挥，可以使企业

总体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创造更多的新价值。在这种条件下，考虑市场对特殊人才的竞争，给予特殊人才超出按劳分配的优厚待遇和报酬，显然对总体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也是有利的，是会被大家充分理解的。由于这种优厚的个人收入，是与特殊人才拥有特殊知识和科技本领相联系的，而不是按他们实际提供的复杂劳动提供的，所以，归于私人按要素分配的范畴。这种特殊的分配政策，是在市场经济竞争规律的作用下不能不采取的。尽管说，这种经济政策实施的对象是少数特殊人才，但是，这对公有制经济来说，又是一项各类企业需要注意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应当忽视的。

3. 按知识产权的分配形式。这是一种私人凭借提供的某种技术专利、知识产权（如中医药的祖传秘方）获得非劳动收入的形式。公有制企业和私人双方可以根据自己对这类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的分析和判断，通过一定的合法程序，或者采取一次性买卖的方式，或者采取要素资本化的方式，即折算成股份的方式，给提供这类生产要素的私人获得报酬。技术专利、知识产权作为客观生产要素，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是，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使用可以起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使企业因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获得超额利润。某些特殊专利和知识产权在没有解密之前，利用它们制造的产品，具有独创性，在市场上可以按垄断价格销售，使企业获得高额利润。从这些超额利润或高额利润，提取一定的比例支付给技术专利、知识产权的提供者，这也是一种有利于提高其他劳动者劳动收入的非劳动收入。实施这种形式的私人按要素分配，对于公有制经济增强市场竞争力，显然是有利的。

三、规范私人按要素分配

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实施的、具有剥削性质的私人按要素分配，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实施的、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劳动收入的私人按要素分配这两者之间，没有天然的屏障。因为他们都是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提出的分配要求。

在公有制经济中实施私人按要素分配，要做到能够同时有利于提供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就需要把握一定的限度。否则，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使其发生性质上的蜕变，转化成剥削性质的按要素分配，使公有制经济遭到重大损失。例如，对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私人投资，如果对利率定得过高，就会使这些投资者过多地占有社会其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还会助长不劳而获的心理；又如，特殊人才总是少数，如果把公有制经济中一般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都当做特殊人才，按特殊能力给予他们报酬，即实行私人按要素分配，而不是对他们实施按复杂劳动给予报酬的按劳分配，这就不但使按特殊人才才能的分配形式失去政策意义，还会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产生出一批享受非劳动收入的特殊阶层，这只会对公有制经济产生腐蚀作用；再如，对技术专利、知识产权提供者的回报，本该根据利用它们所取得的效果，从中提取适当的报酬比例，如果忘记了支付给它们的报酬的真正来源，随意支付高额报酬，很可能造成公有资本“合法的”流向私人手中。所以，应当对公有制经济中实施私人按要素分配做出比较严格的规定，规定私人按要素分配的范围和支付报酬的限额。

私人按要素分配终究是建立在劳动创造的价值财富的基础之上的。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应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私人按要素分配只是一种补充。要认真研究对复杂劳动实施按劳分配的计量方法，拉开较复杂劳动和较简单劳动之间在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决不能用私人按要素分配方式替代对复杂劳动的按劳分配方式。既要从实际出发，在一定范围大胆地实施私人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又要防止滥用私人按要素分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中不能完全排斥私人按要素分配，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加深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过渡性质的理解。在现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纯而又纯。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寻求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形式，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十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消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在直接生产环节中生产出产品；经过市场流通环节实现其社会有用性，成为可供分配、使用的社会财富；再经过分配环节，进入消费，才能真正实现生产的目的。人们的消费活动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生产过程得以实现，并且又反作用于生产。合理的个人消费，对再生产有积极作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消费，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环节之一，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本章根据唯物史观揭示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从居民的个人消费和政府的消费两个角度，阐述如何以科学合理的消费，发挥好消费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积极作用，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第一节　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

一、生产和消费的规定性

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与消费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人们在从事任何物质生产活动时，都要耗费一定的劳动力，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备，即要消费掉一定的生产资料，才能生产出一定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生产直接也是消费”。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以吃、穿、住、用、行等为条件，这些方面的消费生产着人自身（包括人的身体和意识），因此，“消费直接也是生产”。

但是，作为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同环节，生产和消费又有着各自的规定性。生产中的消费，是生产消费，其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与生产不同的消费，是指人把产品当作生活资料来消费，是非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也称生活消费（社会、集体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生产的结果是人的生产劳动的物化，而消费的结果是生产所创造的成果或物的人化。所以，生产和消费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对立的，有区别的。本章以下所说的生产，指的是生产消费的生产；而所说的消费，除了专门注明是生产消费，都是指生活消费或个人消费。

人们的消费过程具有二重性，即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消费过程的自然属性，一是指人们消费各种消费品，用来满足自己生理的或心理的需要，如通过吃、喝摄取各

种营养维持自身生理和健康需要，通过穿衣着装进行保暖或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通过旅游活动满足自己消除工作紧张情绪的需要等。二是指人们消费活动的许多方式是由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特点决定的，如肉、禽等要烧熟之后才吃，这种饮食方式与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生产关系是无关的。三是指人的消费活动往往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相联系，这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无关的。

消费过程的社会属性，指的是消费活动与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所表现出的性质。马克思揭示了消费的社会属性，他指出，“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消费的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下，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消费方式、消费水平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直接受制于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个人收入分配的状况。不同社会阶层、不同集团的消费者之间形成一定的消费关系，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阶级可以使用高档的奢侈性消费品，而雇佣工人消费的水平一般以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生活必需品为限，其消费只是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从属于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目的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劳动者的消费关系建立在按劳分配这种个人收入分配的平等权利关系的基础上，消费属于劳动者自身的再生产，服务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不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体制的合理与否也会对消费的方式、质量产生不同影响，如我国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人们在许多方面的消费要凭粮票、油票、副食品票、布票等供应，带有明显的供给制特征；而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则逐步转向人们自主选择的市场消费方式。消费的社会性质还表现在，消费的内容和方式会受到反映不同生产关系要求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广大劳动者追求有利于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消费，而精神空虚的剥削者、食利者则往往追求奢华糜烂的消费。

二、生产决定消费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决定消费。马克思说：“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

第一，生产为消费创造对象。人们生活消费的对象即消费资料都是由生产部门生产出的，如果没有生产，消费就无从谈起。马克思说，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不言而喻，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以生产部门提供的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物质产品为前提的。

第二，生产提供消费的方式。马克思指出，生产所提供的消费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

都是生产所生产的”。现代消费方式与传统消费方式差异极大，小汽车、飞机代替了徒步行走和人力车、马拉车，高楼大厦代替了低矮平屋，归根到底其进步得益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第三，生产创造消费的主体。马克思说，“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并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社会，人们消费的只是十分简陋而直接的东西，用以满足自身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部门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界不能直接产生的消费品。许多人开始并不懂得这些消费品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对自己有用的，也不懂得如何消费这些物品，但是，在接触这些新产品之后，人们了解了这些从未见过的产品的有用性，便逐步产生了对它们的消费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些新产品的消费主体。各种艺术品创造着有艺术情趣和审美能力的群众，这些群众成为消费和欣赏艺术品的主体之后，他们又会对艺术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马克思指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因此，生产越发展，产品越是创新，消费的主体也越广泛。

以上情况说明，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必须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为前提。离开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凭空是谈不上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优化消费方式和改进消费观念的。

三、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并不总是被动的，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了目的，生产的产品就不会成为现实的产品，从而生产自身也就不是现实的生产。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消费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如中共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消费对生产的影响或反作用主要在以下方面：

第一，消费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前提，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马克思这里的生产是指人类和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在任何社会，消费都要保证作为生产的主观条件劳动力的再生产。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水平，劳动力都不可能被机器设备完全替代。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即体力和脑力（智力）的总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不仅要使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得以维持，再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且要促进劳动者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开拓出劳动者在文化、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潜质使劳动者总体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强有力的主动轮。劳动者的全面发展要有相应的物质、文化生活提供保证。健康的体魄来源于科学合理的营养和良好的生态生活环境，健全的人格来源于知识、精神产品的滋养，文化、科技、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来自于

发达的教育。因此，转变消费观念、提高消费水平不仅是消费本身的问题，更关乎劳动者人的素质提高和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第二，消费能产生新的社会需求。马克思指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生产为新产品创造出新的消费主体，消费主体一旦形成和扩大，又会在消费过程中对这种产品提出改进的要求，以便获得更满意的消费需求，或者由一种消费举一反三，产生出其他的新的消费需求。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从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到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等，任何一种需要必须通过消费来满足，较低层次需要通过消费满足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又要通过新的消费来实现。可以说，人的需要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新的需要永无止境。这样，不仅推动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成为生产永不枯竭的一种推动力。

第三，消费是生产的最终实现。从社会经济运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来看，要实现其连续不断的循环运动，每个环节都不能断裂。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土地、生产资料等各种生产要素，它们的结合，形成产品，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为社会有用的商品；又经过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分配，才能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只有生产的产品真正进入了这些消费，才能证明生产过程得到了最终的实现，生产才是现实的生产，否则，只是可能性意义上的生产。也只有生产的产品真正进入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生产才能持续地进行，才能实现再生产。

第四，在一定条件下，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对生产供给的增长有决定性作用。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社会生产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消费基金又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它们形成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他们的需求量和需求的结构比例关系如何，对于社会再生产有重大影响。在社会总产品一定的情况下，只有它们的需求量达到一定程度，它们内部形成的合理比例，才有助于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的变化会影响生产供给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生产供给的增长要依赖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当社会生产的消费品供给遇到销售困难时，如果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能及时扩大，那么，不但消费品本身的再生产不能持续进行，而且，还会使得为生产消费品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再生产也不能持续进行，进而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消费需求，就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我国当前出现的消费品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的情况来看，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大多数人的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才能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

第二节　居民的消费

一、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居民消费的主体

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决定了劳动者处于当家作主的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领域中，起控制、主导作用的，是广大劳动者；在个人消费领域中，起控制作用和主导作用的，也是广大劳动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所有者，其个人收入的来源、多少是有区别的。他们构成不同的消费群体，有不同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要求。私营经济的企业主通过合法经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可以取得较高的个人收入，他们的个人消费在消费费用的支，出、消费品的档次、消费的目的等方面，与完全通过按劳分配取得收入的劳动者相比，是有明显差别的。但是，私营企业主这样的高收入群体，在人口数量上，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劳动者，尽管从他们的民族、性别、年龄、职业、个人爱好等等方面，可以分为各种各样的消费群体，但是，从个人消费基金的来源以及由此决定的消费水平来看，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消费群体，他们在当代中国的消费群体中，占主要地位，并且起着主导的作用。广大劳动者个人消费的消费品占全社会消费晶总量的主要部分；由广大劳动者的平均个人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决定了我国市场上有购买力需求能达到的基本高度；广大劳动者消费的价值目标对消费物品和消费服务提出的要求，对社会再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也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消费，应当把重点放在占主要地位的广大劳动者的消费上。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社会阶层的人们，其个人消费主要是与家庭消费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一般把人们的个人消费称之为居民消费。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与家庭消费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①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资料的获取只能按劳分配，消费资料的占有只能实行个人所有制，而不是按需分配，不是社会所有制。劳动者获得的消费资料不仅要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还要承担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老人和孩子的需要；②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家庭，为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其经济收入差异客观存在，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也各不相同；③只要社会性的消费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消费过程中伴有的各种劳动，如洗衣、做饭、赡养老人、照顾病人等，这些劳动就主要还得依靠家庭成员而不是主要依靠社会来提供。在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居民消费中，不言而喻，劳动者的居民消费是占主体地位的。以下所阐述的消费，就以属于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消费的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

二、消费方式的历史特征

任何社会，消费主体的消费活动，都要采取一定的方式。消费方式，就是人们消耗生活资料或者个人消费资料的方法和形式。在唯物史观看来，消费方式是历史的范畴，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精神消费的方式是随历史条件发展而变化的，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一定的生产关系制约的。社会生产力越进步，科技越发达，生活资料越丰富，消费方式越多样化；在一定生产关系中不同地位的消费主体，其消费的方式又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劳动者消费的居民消费的方式，具有以下历史和国情特征：

——消费方式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消费方式与消费的对象、消费的工具相联系，它们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样是穿衣服，当生产力发展到能生产出羽绒衣、羽绒裤，冬天穿它们就比过去穿厚厚的棉衣、棉裤轻松得多；同样是吃顿饭，出现了批量生产的盒饭，许多人在一起吃饭时，就可以很卫生地实行分餐制；同样是住房，能够盖高层建筑，就腾出了土地空间，可以绿化环境，人们可以把享用住房与享用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同样是替代步行的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只能供几个人一起消费，乘坐时只能局限在座位上，速度很不规范，行使距离受到牲畜体力限制，而出现了公共汽车、地铁、火车、飞机和轮船等，可以同时供许多人一起消费，人们可以到按时到达很远的地点。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目前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中国大多数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方式的改善，显然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那种希望属于劳动者消费的居民消费达到像发达国家所谓中产阶级家庭那样，都能有家庭小汽车，显然是脱离现实的，而积极发展公共交通工具，则是比较符合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的。

——消费方式与市场经济关系结合。从居民消费基金的来源看，消费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前者用自己的个人收入消费，后者借别人的收入消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消费信用制度，即可以用租赁的方式租用住房、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或者分期付款、抵押贷款等方式，购买它们。后面这种信贷消费方式的实质，是一部分暂时没有消费能力的人，通过金融机构中介，借出其他人的存款提前消费。这对借款者来说，可以提前满足消费的需求；对社会来说，只要贷款的总额不超过存款总额，就意味着社会的闲置基金得到了利用，这对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促进社会再生产是有利的。因此，消费信用制度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当利用，不应当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排斥在外。我国居民消费可以在居民住房、医疗、教育等大宗消费项目上积极实践。但是，在宣传上应当实事求是，要遵循消费信贷规律，不宜盲目鼓吹“高消费”，因为，整个消费信贷的规模，是受到信贷基金总额限制的，对于全社会来说，是不可能“寅吃卯粮”，“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

——消费方式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从消费主体的角度来看，消费方式可以分为个人消费方式（家庭消费方式）与集体消费方式。前者满足个人或个别家庭的需

要，又可以称为个别消费方式；后者满足许多人和许多家庭的集体需要，又可以称为公共消费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是个别消费，但是公共消费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能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公共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出的要求，有重要意义。公共消费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个人消费基金的投入，大家共同使用某种商业服务的消费品，例如，中国人多地少、可耕地十分宝贵的条件下，在城市发展适应公共消费方式的交通工具，例如公共汽车、地铁，比起容易造成交通堵塞的私人小汽车，就符合居民消费者的共同利益。一类是用社会消费基金建立的满足共同消费的消费品，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等，这类消费品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本身的要求，值得高度重视，当然，这类公共消费方式，要依靠发展生产力，提供足够的社会消费基金才能逐步扩大。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求的个别消费方式，主要是指消费基金由社会提供，消费主体则是因人而异的个人，主要指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养老保险、劳动安全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消费。这种类型的个别消费方式，也应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拓展。

——消费方式体现中国的民族和传统特点。消费方式受到历史文化传统、民族习惯、地方风俗以及人们的年龄、性别、个性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口众多，有56个民族，有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消费方式千姿百态，形成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只有尊重这种多样化，才有利于发挥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弄清当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历史和国情特征，有助于在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它们，来实现由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居民消费的价值目标，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消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合理消费

社会生产过程要通过消费才能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目的，最终要体现在作为劳动者消费的居民消费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需要通过居民消费来实现，这样，居民的消费过程就有了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规定的价值目标。符合这种价值目标的消费过程，就是合理的消费。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个人消费方式，所以，引导居民消费合理化就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工作。合理的消费提出了下述要求：

——从总体来看，消费水平应当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有购买力的需求相符合的合理的消费水平，是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畅运行的消费水平。这就要求人们，既不能脱离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消费基金过分追求高消费；也不能为了扩大积累、增加未来消费，而过度牺牲目前消费。因为，追求短期的高消费，会减少积累基金，影响科技进步和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追加投入，而过度地把消费基金闲置下来，也会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造成社会生产的过剩。社会的总消费水平是居

民的个人消费水平的总和。促进总消费水平的合理化，要求引导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合理化。居民个人消费水平是与个人收入和消费支出相联系的。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支出受到家庭成员个人收入、消费倾向、储蓄倾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消费倾向既定时，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支出水平也相应提高；在收入既定时，消费倾向越高，消费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而消费倾向又与人们的消费心理、消费观念、对未来收入和消费的预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把居民的消费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需要从多方面正确引导。在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既要说服居民破除传统消费观念，不要过分节衣缩食；又要教育人们，不要铺张浪费。现有消费水平基础上，还要采取适应市场经济的方法，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例如，推进居民住房商品化，就有利于居民自主选择住房，进行多样化的室内装修，这就有助于提高居住消费的质量。

——促进消费结构优化。最基本的消费结构由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构成。一般来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存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如果按吃、穿、用、住、劳务消费等来划分，一般趋势为，“吃”在消费结构中比重会逐步下降；“穿”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然后趋于稳定，甚至略有下降；“用”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逐步上升，特别是高档用品，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支出增加较快；“住”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在一定时期呈上升趋势，一定时期以后，住宅消费的比重又会下降；劳务消费，特别是精神文化消费、旅游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不断提高，反映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层次的提高。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居民收入水平有提高的趋势，在提高生存资料档次、质量的同时，应当引导人们科学地处理享受资料同发展资料之间的关系。要求人民不追求短期的高消费和铺张浪费，主要就是指，在个人收入提高之后，不应当偏重于扩大个人的享受性消费，而应当注重扩大个人的发展性消费，例如，增加子女的教育投资、个人技术培训、购买电脑和学习资料的投资等。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一方面，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教育服务，扩大发展性消费资料的生产；一方面，引导人们改善消费结构，扩大个人的发展性消费；这必将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促进整个民族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合理的生产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合理的消费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理论界用“绿色消费”来比喻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绿色消费”包含以下四层含义：①人们消费一定的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小，即经济地消费；②在一定的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最少，即清洁地消费；③消费的结果不危害消费者或他人的健康，即安全地消费；④消费的结果不危及人类后代的需求，即可持续地消费。“绿色消费”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短缺、森林覆盖率不高、生态环境建设任务繁重的国家，更有重大意义。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教育，引导居民消费自觉地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轨道。例如，自觉抵制食用野生动物，不随意丢弃消费垃圾，不使用、不购买造成环境污染的物品，节约用水，爱护公物，爱护花草树木等。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改变居民落后的消费方式，尤其对贫困、边远地区的居民消费，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研

究，在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要引导这些地区的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保护生产环境。

——形成健康的消费价值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居民的消费既是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过程，也是劳动者自身全面发展和个性特点培养的过程。合理的消费必须着眼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口素质主要包括身体素质和精神文化素质两大方面。身体素质的提高，包括人均寿命的延长、身高增高、体质的增强等方面，这些需要人们从食物消费中，摄取均衡合理的营养、积极的体育运动和医疗卫生的保障等才能实现。引导合理的消费，就应当在人们提高收入的条件下，引导人们确立科学的饮食观念，讲求因人而异的均衡的营养结构，改变以为大鱼大肉就是营养的传统的饮食观。要大力开展全民性健身运动，要充分发挥现有体育运动基础设施的作用，促进体育公共消费。要持续地通过各种途径教育人们抵制不利于健康的消费如抽烟、喝烈性酒等。合理的精神消费，应当有利于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这要求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影视节目、图书、杂志、报刊等精神产品，应当强调科学意识的教育功能，要成为人们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向导，而不应当把他们办成茶余饭后的消遣品，更不能让它们成为传播落后和腐朽意识形态的、低级趣味的精神鸦片。要通过合理的精神产品消费引导，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第三节　政府的消费

一、政府是社会消费基金的消费主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是消费环节的一个重要消费主体。政府是由各级政府的许多机构、部门和人员组成的。政府在行使其职能的过程中，要花费大量的开支费用。政府开支既包括支出政府工作人员薪金和各类补助、建造办公大楼和办公设施的费用及办公用品、公务费用、市政工程的建设费用等，也包括各类政府出面的财政转移支付费用。政府消费，是政府开支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它不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属于个人消费范畴）和政府控制支出、但并不用于本身消费的转移支付支出、政府直接投资的项目支出等，它是指政府用于与自身发挥职能作用有直接联系的各种支出的消费。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一样，形成对最终产品的购买，同样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消费体现社会消费。政府消费不同于居民消费。居民消费是居民的个人行为，居民个体消费行为与个人收入相联系，属于个人消费基金。而政府消费是一种政府行为，消费的来源是社会消费基金。社会消费基金使用数额的大小，对于社会再生产有直

接的影响。

由于政府消费属于非生产性消费，其社会消费基金是社会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所以，总的来说，在同等条件（政府工作量一定）下，属于政府消费的基金耗费越少越好。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行使职能的，这种职能的实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消费是否适度、合理，以符合人民利益为判断标准。节约政府消费开支，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弘扬正气，对于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腐败，具有重要意义。而必要的政府消费，例如用于信息化办公的消费，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从而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管理，又具有主要推动作用。这里，把握合理的政府消费，关键在于政府的自我严格要求，同时，也需要建立必要的人民监督机制。

二、政府采购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消费是建立在购买消费品的前提下的。同样的消费，如果购买不恰当，或价格太高，或购买重复，或过于奢侈等，都会造成虚耗。而政府消费作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不单纯是一种消耗性消费，它对社会再生产是有重要影响的，因此，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促使政府的购买行为科学化就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国规范的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的主体可以是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也可以是政府指定的专门机构，如香港特区政府下设专门的政府物料供应处，有些国家还设立了监督政府采购工作的机构。我国 2003 年 1 月 1 日已经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法律规定：政府采购应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该法对政府采购当事人、采购方式、采购程序、采购合同、质疑与投诉、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做出了详细的法律规定。

实施政府采购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①有利于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政府采购制度，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将原来各单位的分散购买，变为集中采购和规范采购，质优价廉，可大大节省各单位采购费用。②有利于保证采购质量，政府采购单位可以购到质量有保证、价格合理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保障政府有效地行使职能。③政府购买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发挥政府消费和支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推进保护国内产业（政府主要采购民族经济的产品）、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中小企业等政策的实施。④有利于减少政府腐败和权钱交易。政府采购广泛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可以明显提高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强化对政府采购的法规、制度约束，加强廉政建设。政府采购制度的执行，关键在于监督。总之，政府采购制度是一种科学的规范政府消费的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健全。

第二十七章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从事经济实践，促进经济增长的。从全社会看，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通过市场中介构成的经济运行，以及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都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层开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自主联合劳动者的经济，因此，它一经形成，就与宏观调控联系在一起。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宏观调控始终存在，但是，职能转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需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科学地发挥调控职能。本章围绕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个主题，阐述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社会主义特征，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与目标，以及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

第一节　现代市场经济包含宏观调控

一、市场调节的缺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调节为经济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市场调节比起计划产品经济体制那种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调节，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但是，市场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把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当作“洪水猛兽”，也不能把市场调节奉若神明。对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弊病，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他们称之为“市场失灵”或“市场失败”。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体现在下述方面：

——市场调节难以解决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关系问题。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单个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自身发展目标。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例如，企业排放废物造成环境污染等，这种社会损失一般无法通过市场价格体现出来，因而无法通过市场调节的自发作用来纠正和补偿。对于基础设施、城市卫生、消防、国防等与公共利益联系的产品，由于对投资者无利可图，市场难以调节它们的供给。此外，有些产品如麻醉品、武器、黄色书刊等，往往在市场关系中有藏身之地，经营者可因其大获私利，但公共健康、社会安定和社会风尚则会受到侵害。

——市场调节难以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市场交易不仅包括等价交换的简单流通，而且包括与不同所有制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资本流通，在价值规律作用下，本身还包括按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关系。市场调节的结果，是优胜劣汰，生产力的强者受益多，弱者获利少，劣者被淘汰，因此，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市场调节本身能促进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它是以淘汰落后企业为前提的，它不可能促进个人收入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平等，肯定会造成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还会造成个人收入两极分化。

——市场调节难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平衡关系是通过供求差额所引起的价格波动来进行的，价格波动的信号引导经济资源流向供给稀缺的商品生产者，从而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供求关系趋向均衡。但是，这种均衡是在无数企业和消费者独立决策、自主竞争中实现的。企业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一般只关心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市场信号不能确定供求的具体数量，这往往会造成企业行为短期化，而追求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无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可能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无序发展。所以，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和滞后性。局部的不均衡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常态，在一定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还会出现失衡现象。

——市场调节难以保证自由竞争的持续性。市场竞争是市场机制实现有效配置资源的促进因素。但是市场的自由竞争会导致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产生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抑制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妨碍效率的提高。

归结起来，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每个生产者从市场接受价格信号，反馈到生产过程，调整产品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这中间有一定时间差。在社会范围内，通过市场调节，变动既定的生产部门的结构，则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在这种自发调节的过程中，难免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损失。要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就需要一个社会中心，采取科学的具有预见性的宏观调节。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被迫产生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存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但是，它的产生是被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结合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把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弊病推向了极致，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自 1825 年起，每隔大约 10 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1929 ~ 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生产大幅度下降，大量工人失业，生产设备闲置，金融秩序崩溃，无数产品积压，人心惶惶，仿佛世界到了末日。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代表总资本家利益的国家，终于不得不出面干预市场绎济运行。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机制是完美无缺的，可以保证经济的不断增长，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时，也有人改变传统观点了。尽管他们出于维护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立场，不可能承认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但是，它们发现市场

调节并不是万能的，仅仅依靠它来调节经济运行是有缺陷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现实的基本经济矛盾推动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指导，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都普遍出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微观干预，也有宏观干预或宏观调控。

——美国的国家干预。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美国政府采取直接投资设厂或低息贷款使私人企业正常生产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则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加世纪 70 年代初，尼克松政府面对石油危机冲击，采取冻结物价、工资的强硬措施。80 年代的里根政府为遏制经济衰退，进行大规模减税。90 年代克林顿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大刀阔斧的增税减支，缩小赤字以增加投资，与此同时提出明确的产业政策，对高科技产业实行倾斜政策。

——德国的国家干预。德国在能源、交通、邮电、公用事业和某些福利事业中，保留着相当范围的国家干预；很多大企业中有各级政府的股份；煤炭、钢铁企业是接受国家补贴的；铁路的亏损由国家负担等。

——日本的国家干预。政府采取“经济计划 + 产业政策 + 行政指导”的方式干预经济，主要是：国家制定指导性经济计划，确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并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间接干预；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确保经济发展重点；制定产业政策，规定产业发展目标，确保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一定时期里限制外国投资，控制进口，保证民族企业的利益；实行所谓行政指导，对民间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韩国的国家干预。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根据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经济政策，促进国内产业集团发展，使经济增长的势头长久不衰。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保持到 90 年代初，创造了“汉江奇迹”。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弊病，即使是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结合在一起的，也可以通过国家的经济干预和宏观调控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可见，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有助于克服市场调节自发性弊病的。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出现，使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分工的优点，得到更充分发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本身就包含着宏观调控。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自觉建立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自主联合劳动者的经济，因此，它形成伊始就是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对全社会的经济统一管理和计划调节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一开始因主观认识陷入误区，实行了计划产品经济体制，采取了僵化的行政计划管理手段，排斥了市场调节。但是，一旦在实践中明确了客观的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就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自觉地实行职能转换，逐步向对应于市场调节这种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的宏观调控转换。因此，这是已经存在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一种自觉的转

换。必须充分认识，国家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不但不可以削弱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而且应当面对市场调节的优点和它的自发性弊病，更加重视建立和完善崭新的、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宏观调控体系。尤其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市场经济正处在逐步成长过程之中，更加应当重视自觉地加强宏观调控。

——我国的市场发育状况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市场发育程度起点很低。尽管历经 20 多年的改革，但是市场体系的发育仍然不够健全。因此，一方面，要求国家从全局出发，制定政策，培育健全的市场体系，促进其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还要随时克服市场调节可能发生的消极作用。同时，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然有上下左右一系列利益关系需要调整，因而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加强宏观调控。面临着国际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这就要求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使社会生产在规模和结构两方面，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动态演变。但是，市场机制在调节长期生产规模和结构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方面仅靠市场自发调节，将延缓我国经济结构质量提升的速度，不利于提高发展速度。为此，必须通过宏观调节手段，把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调节促进社会分工的优势结合起来，挖掘潜力，扬长避短，有步骤地抓重点、抓薄弱环节，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协调各方面的优势，才能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高速增长。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加强宏观调控。消灭剥削，走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只会导致个人收入的差距，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要克服收入分配的不公，朝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国家就必须从宏观上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从而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对市场调节发生的收入不公，则通过税收手段、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手段进行调节。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自觉地促进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统一，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的优点。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行政计划管理，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根本区别。

1. 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行政计划管理的原则区别。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由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制度；国民经济各层次决策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并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实现；管理手段以垂直的行政组织领导为主，经济信息的横向传递缺乏通道。这种行政计划管理方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是不适应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结构不断复杂化、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和人民生活需求不断提高的一系列要求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

宏观调控以市场为中介，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宏观调控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行。市场是国民经济运行中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结合市场配置方式。因此，国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宏观调控体系都建立在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宏观调控既要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

——计划经济手段的运用适应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否定计划经济手段本身，但是对其运用的方式有重大的改变。国家计划主要是，规划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重大战略。计划是通过咨询、比较、论证等科学的程序制定的，既定性又定量，具有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国家对微观经济基本上使用指导性计划，主要是通过产业发展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经济法规、有关经济信息披露等，发挥国家计划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作用。

——宏观管理以间接方式为主。国家不再像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样，既要管整个经济的总量和结构，又要管企业的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调度，而是对企业实行间接调控。就是说，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企业微观活动，而是综合运用各种宏观政策和经济杠杆对市场进行调节，让市场引导企业按宏观调节的方向活动；调控的内容主要是协调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但是不排斥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的实施。

2. 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存在宏观经济调控，都以市场为中介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在计划调节手段与市场调节手段上也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是，由于两者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国家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社会性质根本不同，它们的宏观经济调控必然存在原则区别。主要是：

——宏观调控实践的价值目标根本不同。现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总资本家并主要代表垄断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国家的宏观调控必然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则是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政策必须满足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宏观调控手段运用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同样的宏观调控手段，受到不同社会生产目的的制约，会有不同的运用方式或对某些手段运用的程度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在使用何种手段时，首先考虑总资本家的资本运行效率（即利润率），在此前提下，才会为缓和社会对抗性的基本矛盾而考虑社会公平，这种公平是以满足资本运行效率为前提的，一旦影响了这种效率，有些促进公平的调控手段就会停止使用。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宏观调控，但是仍然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始终无法消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在使用调控手段时，是以维护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准绳，权衡利弊的，这就可以做到客观地选择和组合调控手段。例如，为了促进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国家可以在宏观上对中西部采取倾斜的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给予重点支持；为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可以通过宏观控制，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增加科技教育投入等等。

——宏观调控理论的科学性不同。发达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是从凯恩斯主义演变而来的，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依然沿袭着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斯密教条”，也就是在对社会再生产的认识上具有片面性，把第一部类 IC 不变资本这一块丢掉了，表现在实践上，一个明显的表现，就在国内生产总值（CDP）这个综合性的指标中，丢掉了流动不变资本的价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设计的政府、企业、居民和市场之间的投人产出流程，实际上只有一般商品流通，是掩盖了资本流通的。所以，尽管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在增量调控的手段和政策研究上，有一些反映客观要求的科学成分，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总的来看，它是有根本缺陷的。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面对宏观经济问题，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的原因之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尽管目前尚不成熟，但是，它建立在马克思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基础上，这个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出发，充分认识到，社会再生产要从社会总产品［$\sum(C+V+M)$］出发，全社会各企业的生产耗费既要实现价值补偿，又要实现实物补偿；各部门、企业的产品既要满足全社会的个人消费，又要满足全社会的生产消费；各部门、企业的资本构成的全社会总资本运动，既包括简单商品流通，又包括资本流通。建立在这种对社会再生产规律全面认识基础上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显然比只建立在对一般商品流通认识上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要科学得多。尽管说，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应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把它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宏观经济指标和调节手段，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但是，按照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不断联系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深入研究，是能够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它必将指导中国的国民经济更健康稳定的运行和发展。

第二节　宏观调控的对象与目标

一、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直接干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所有企业都是自主经营的法人主体。国家进行调控，是为了既克服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又发挥市场调节的优点，促进无数企业生产者和个人消费者，自主决策，独立经营，自我积累，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偿的有机整体，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更快地增长和稳定地发展。因此，国家调控的对象不能是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也不是直接决定市场中的各种商品的价格，否则，就又回到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了。国家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是市场关系中的经济总量。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对象的市场经济总量，最基本的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我们把总供给理解为由全社会各类生产者提供的社会总产品价值（包括第一部类ⅠC 不变资本价

值），把总需求理解为全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社会总产品的有购买力的需求，社会总需求一般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价值总量上的大体平衡，实现产品实物形态供求结构关系的平衡，以及产品价值形态供求结构关系上的大体平衡，这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避免大起大落的基本条件。要实现这种平衡，必然涉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各产业部门发展的规模、水平及其比例关系（经济结构）等问题。所以，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涉及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许多方面，也涉及市场上许许多多商品的供求关系的变动。

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通过调节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促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纳入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目标的。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就形成一种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那种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行政干预方式，而是形成一种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基本管理方式。总之，国家宏观调控的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总量，经济总量是涉及全社会的、宏观性的，所以称之为宏观调控。

二、宏观调控的目标

我国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构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持续稳定地增长，促进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是总的目标，它是由若干相辅相成的子目标构成的。

——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宏观调控首先要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形成相对最优（在现有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增长幅度、相对稳定的发展速度（逐年经济增长幅度波动不大）。这就需要调节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如果总需求过大，会发生经济过热和物价过快上涨，甚至出现通货膨胀；如果总需求不足，会出现生产过剩，生产能力闲置，失业增多等状况。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优化结构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才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我国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态势，因此，逐步扩大消费需求或者说扩大内需，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立足点。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领域、各环节的构成及相互制约的关系，主要是指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结构、产业内部的企业结构等。宏观调控就是要不断地促进各层次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的优化，是指它的各层结构的成分和相互关系朝着有利于科技进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发展的变动，朝着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变动。我国国民经济还存在一些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方面，如农业落后于工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落后于加工业，第三产业落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加工业技术水平较低等。因此，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

——促进稳定物价。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而物价水平和社会再生产的稳定、人民生活质量的好坏紧密

相关。宏观调控必须促进物价稳定。稳定物价是指从总体上相对地稳定一般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不发生物价普遍的大起大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经济结构的比例关系比较平衡的条件下，也会存在由复杂的市场因素造成的某种或某些商品供求关系的暂时变动，从而这些商品价格的波动，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出现因投资过热等因素造成经济结构重大失衡、货币（纸币）投放量失控，引起社会物价的总水平全面波动或者通货膨胀，这就不但给人民生活带来危害，而且也会导致国民经济的运行的紊乱。所以，必须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促进价格总水平的相对稳定，尤其要避免通货膨胀。

——促进充分就业。就业是我国劳动者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劳动者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裁员，或企业破产暂时失业，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必须促进他们的再就业，使每个劳动力资源都能得到充分利用，每个劳动者都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从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应当人人都能就业，这是充分就业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解释。国家的宏观调控，要为社会主义的充分就业创造条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数量大，要实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任务相当艰巨，但是，应当树立信心，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代表全体劳动者利益的调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计划生育国策的贯彻落实，以及推进再就业工作经验的积累，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能够逐步实现的。

——促进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协调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促进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我国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个人收入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决定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是社会主义公平关系占主导。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由于独立经营的企业生产主客体条件的差别，即使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收入分配上，也仍然会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中难免包含不合理因素；尤其是本身就会产生个人收入两极分化的私有制经济还在发展，所以，个人收入差距的自发性拉大，难以避免。这就需要国家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先富带动、帮助后富，克服分配不公，防止出现不应该有的个人收入两极分化现象。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资金流出与流入的平衡；二是物品进口与出口的平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国际收支平衡对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影响越来越大。能否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整体的稳定与发展。例如巨额顺差，意味着外汇储备过多，造成资金闲置，导致对外汇价上涨，使出口处于不利的国际竞争地位；相反，持续的巨额逆差反映一国资本的流出或国际储备的减少，将会削弱一国的对外支付能力，甚至陷入债务危机。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必须使外汇收支差额和偿债率保持在适当水平和限度内。这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

第三节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是由宏观调控实践的主体及其在国内外一定的经济态势下采取的调控手段和调控对象等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几个分系统。

——经济信息系统。主要包括信息统计子系统、金融信息子系统、科学技术信息子系统、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信息子系统等。

——经济决策系统。它以宏观调控主体机构为核心，其根本任务是根据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和确定宏观调控的总量目标，制定实现目标的方针、政策，并选择运用实施方案和步骤。经济决策系统就是参与这一过程的组织体系。民主化、科学化是宏观经济决策正确有效的保证。

——经济控制系统。它是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按照拟定的方案，对国民经济各环节运转实施调节的系统。主要是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调节手段，及时调控偏离目标的经济活动及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合理行为，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运转。

——经济监督系统。是指国家通过各种监督机构和运用各种监督手段，对人们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经济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督和审察。它是宏观调控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保证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必不可少的管理环节。监督系统主要包括审计监督、财政监督、信用监督、统计监督和行政监督等。

以上四类系统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彼此耦合，构成宏观调控的有机整体而发挥作用的。努力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其整体功能最优化，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

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与完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涉及政府的机构改革、国家经济职能的转变、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与公有资本所有权机构的分开、公有制经济管理的政企分开、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确定和市场体系的完善等诸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配套进行，尤其需要企业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培育和国家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配套进行。这是因为，只有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才会有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单元，国家的经济管理才有可能解脱政企不分，转向面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只有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国家的宏观调控才有发挥作用的直接对象。同时，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又

决不可能在公有制企业完全成为市场主体和现代市场体系已经完善之后再去建立，那样必定会出现国民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是伴随公有制企业逐步获得自主经营地位和市场体系逐步形成这样的过程，经过政府管理机构的调整及其管理职能的转变，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公有制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确定，全社会统一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市场调节作用越来越增强，这就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同时，也对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为了促进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彻底摆脱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羁绊，需要对国家政府的职能进行如下梳理：

——把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的管理职能区分开来。政府的经济管理面向全社会多种所有制经济，实施对全社会的经济管理职能；而国有资本是独立于非公有资本和外资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之本，它的管理是为了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两者的职能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的管理应当由专门的所有权机构和出资者机构（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来管理，有必要把国有资本管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在职能上区别开来。

——把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同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区分开来。国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包括依法治国，保障国内社会治安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对外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从事外交活动等；公共服务职能包括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发展公共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这些职能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但是，他们在管理方式上，与经济管理是存在差别的，应当各司其职，不能全部纳入经济管理的方式。区分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同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可以促使国家政府的职能得到更全面有效的发挥。

——在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中，把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同其他经济管理职能区分开来。从上一节宏观调控的目标可以知道，宏观调控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其职能在于调节经济总量，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和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种经济职能是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它与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微观干预方式是不同的，后者需要各级政府对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需要明细的法规等手段，干预的对象是微观市场主体；而前者只能由国家机构，从全社会的高度，进行总量分析，需要对全局和局部、长远和当前、国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反复权衡，做出决策，并全面实施。因此，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必须由专门的机构及其配套的组织系统来承担。

由此看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关键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尽快形成专司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心机构，这种机构必须从过去那种业务职能重叠、日常事务式管理中解脱出来，并在主体机构明确的基础上，形成职权明确、运行有效的组织系统。不过，还应当强调的是，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必须坚持用科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做为调控实践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一个渗透了科学灵魂的宏观调控体系，才是真正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二十八章　宏观调控的主体与基本手段

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是由宏观调控主体运用一系列调控手段展开的。宏观调控主体是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中心。有效的宏观调控，要求这个中心发挥权威性的指挥作用，并能科学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本章在上一章的基础上，阐述宏观调控主体的地位，组织结构，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并着重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运用。

第一节　宏观调控的主体

一、明确国家宏观调控的中心

健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关键，在于确立宏观调控的主体。上一章已经提到，宏观调控体系包括信息、决策、控制和监督系统，这个系统的统一指挥中心，就是宏观调控的主体。

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全局性、系统性，面向全国统一市场，因此，全国只能有一个设在中央政府的调控中心。人们常说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这是比较笼统的，因为我国作为大国，政府是分层次的，有国家政府，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政府，市、县、区、乡镇等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都不能充当宏观调控主体的职能。而即使是国家政府，正如上一章所述，它的管理职能也是多方面的，只有符合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的专门机构，才能成为宏观调控中心，作为宏观调控实践的主体。其他的国家政府机构，尽管也承担覆盖全社会的管理责任，但是，并不承担宏观经济的调控职能，所以，不能充当宏观调控的实践主体。

必须明确，宏观经济调控中心是整个宏观调控体系的指挥机构，对构成宏观调控体系的各个分支系统的调控指令和措施，都是由此发出的，正因为如此，只有这个中心才称得上宏观调控实践的主体。它总揽全局，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起令行禁止、综合协调的作用，具有指挥的集中性和权威性。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威性体现在，一旦宏观调控目标经代表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批准之后，其他的任何个人和部门机构都不能干预它的日常决策和调控职能。明确了它的指挥地位和权威性，才有可能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否则，如果缺乏指挥主体的权威性，其他政府机构或者个人可以凭借一定的权力，干扰

宏观调控主体的决策，那么，就容易使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带上主观随意性，难以形成对宏观经济的科学调控。

二、宏观调控主体的组织构成

具有权威性的宏观调控主体，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保证。

首先，应当有一个负责的、精干的、高效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必须由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有丰富经济管理实践经验的专家构成，他们的专业知识应当涉及经济理论及其应用的诸多方面，他们之间必须有十分明确职责分工，明晰的权利和责任。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赋予这个领导班子的管理权威，并对其进行监督。

其次，宏观调控主体在领导班子之下，设有一套专门的职能机构。他们的设置，是与某方面的宏观调控职能相适应的。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机构，财政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机构，金融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机构，产业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机构，收入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机构，国民经济运行的信息统计和监督机构，有关的法规制定和实施机构等。

第三，宏观调控主体必须把调查研究同管理信息化结合起来。宏观调控主体的领导机构和职能机构是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挥机构，必须把握全局真实经济信息。虽然宏观调控是总量调控，但是这决不是说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数据就可以了。数据的可靠性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所以作为宏观调控的指挥机构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作为决策依据。经济运行的时效性特点，要求整个机构必须及时获得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并进行综合分析，迅速形成决策意见或者关于宏观调节的重大决定，反馈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所以，它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管理信息化，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监管的有效性。

三、宏观调控与地区经济调节的结合

宏观调控主体只能设在国家中央政府，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

一般来说，宏观调控能做的是，保持全国经济总量平衡和主要经济关系的大体协调，统筹规划和协调全国性及跨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建设；制定正确的政策，并运用中央直接掌握的财力、物力，引导全社会资金的合理投向，帮助建设和调控全国性的大区域性的中心市场，促进各地区经济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制定全国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协调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整体利益的涉外经济活动；确立并维护统一的国家税收制度和中央银行统一调控的全国金融货币制度；制定并监督执行全国性的经济法规和市场规范；确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等。

但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地区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文化、民族、宗教、地理和历史各个方面差异都很大的国家。粗线条的宏观调控不可能完全照顾到各地区的这些差异。从这种国情出发，必须注意发挥地方政府对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支持、配合作用。地方政府在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执行国家统一调控部署和手段的前提下，应当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地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中观调节”，以弥补宏观调控的空档，从而提高政府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总体效益。

这种“中观调节”，主要是统筹规划和组织地区性的重要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促进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合；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动员地方财力、物力和人力，形成地区经济特色；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等。这里必须强调，这种“中观调节”是对中央宏观调控的补充，是在遵守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和总措施下进行的，而且也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应当把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中的作用，与那种阻碍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地方本位主义，严格区别开来。

第二节　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

一、计划手段

宏观调控主体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主要是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下分别阐述。

计划手段是宏观调控主体从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出发，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旦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付诸实施，并以此作为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弃了行政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但是，这并不等于排斥计划手段，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生产部门存在比例关系，要求在发展中形成动态的均衡，这就不能没有计划调节。只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节不应当是指令性的，而应当主要是指导性的；不应当是直接管到企业的，而应当是粗线条的，具有总体规划性的；因而一般是中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宏观经济计划主要通过计划的编制、执行和检查三个环节来实施。

——编制计划是计划调控的前提。它在全面、准确收集经济信息和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遵循经济规律，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在此基础上进行计划决策。计划决策主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重大比例关系、重大项目建设、地区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科技发展、人口、就业等方面提出指导性的计划目标。

——计划执行。指计划编制后选择达到计划目标的措施和手段，并使之最终实现。计划执行需要配套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

——计划检查。有关职能机构对各方面执行计划过程中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审计，并及时反馈信息，促进计划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实现。

二、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经济政策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它表现为由宏观调控主体机构颁布的有关条例、规定。经济政策是引导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趋向宏观调控目标的指针。关于经济政策，将在本章第三节详细展开阐述。一类是经济杠杆手段。经济杠杆是可以由宏观调控主体操作，影响市场总供给、总需求关系变动和相关经济总量变动的经济参数，如财政系统的税率、中央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率、国际收支系统的汇率等。这些经济杠杆，同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密切关联，它们的变动会广泛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应当把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和带有行政干预性质的主观设定的"经济杠杆"区分开来，例如，也可以把价格作为一种"经济杠杆"，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价格可以由调控主体来规定，这无异于违反市场价格是在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客观规律，所以，价格不是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一般来说，宏观调控主体操作经济杠杆，是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实施经济政策服务的。经济杠杆主要有以下三种，它们有着各自的调节特点：

——财政系统的杠杆。主要是预算分配和税收的税种、税率等。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一种方式，是按照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宏观调控主体可以通过税收手段促进不同经济主体公平纳税，调节税种和税率控制收入水平的变动，影响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预算分配则可以通过科学地支出财政收入，重点支持某些地区、某些产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中央银行系统的经济杠杆。中央银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机构。它是通过调节利率、信贷规模和信贷结构来调节货币和货币资本的供应量，从而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中央银行操作的经济杠杆主要是：①存款准备金率。按照法律规定，各专业银行都必须把自己所吸收的存款按一定比率存人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可以在宏观调控主体授权范围内，通过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率，来减弱或增大各专业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收缩或扩大信贷规模。②再贴现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叫做再贴现率。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贴现率的升降，可以控制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数量，从而控制社会的信贷规模。③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以调节货币流通量的活动。

——国际收支系统的杠杆。主要是汇率，它是指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人们把它称之为一国货币用另一国货币表示的价格，因此汇率也叫汇价或外汇行市。汇率杠杆之所以能成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是因为汇率的升降能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变化，从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本国货币对外币汇价的降低，可以起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本国货币对外币汇率上涨则对出口不利

而有利于进口。为了发挥汇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应当根据国内物价水平的对比和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目标来确定人民币的汇价和对汇价进行合理调整。

三、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国家法规的借助和运用。经济法规包括一系列关于经济活动的法律、法令、规定等。法律手段的内容包括经济立法、经济司法和经济仲裁。

——经济立法。它是根据宏观经济调控主体的建议，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遵循国民经济稳定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制定的有关经济法规。如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国民经济计划法、统计法等；用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经济合同法、商业法、价格管理法等；规范财政金融领域经济关系的财政法、税法、银行法、外汇管理等；用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矿藏法、土地法、能源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用于规范对外经济关系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等。

——经济司法。它是指检察机关或法院依照经济法律规定，对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的活动。经济案件，主要包括经济纠纷案件、涉外经济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法律规定的制度、程序指检察、审理案件的范围，经济案件的诉讼程序、审判程序和审判制度。

——经济仲裁。它是指仲裁机关对经济活动中的双方当事人发生争执时，依法居中调解或裁决。我国经济仲裁制度分国内经济仲裁和涉外经济仲裁，包括对我国一方同外商或外国的企业、组织之间经济、贸易、运输海事等方面发生争议的仲裁。

法律手段具有强制性、约束性、规范性，它可以避免主观随意性，防止个人意志和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具有其他调控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律手段的运用，一方面可以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各类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形成法制化的统一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可以有力地惩处各种经济犯罪行为，维持市场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这些都可以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四、必要的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指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依靠行政机关，用政权的力量对国民经济运行直接进行干预。它采取发布命令、指示、条例等形式，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直接引导和控制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权威性、垂直性和强制性。行政手段的运用属于纵向垂直管理，一般情况下，它与市场经济运行有矛盾；但是，当市场经济运行出现某种紊乱的先兆，或者出现某种异常因素干扰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等情况时，宏观调控主体在准确把握症结的前提下，运用行政手段，可以较迅速地解决问题。尤其在特定的时期，例如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期，如果需要对国民经济运行做出重大调整，使用行政手

段，就可以更好地实现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迅速动员社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服从全局的需要。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绝对地排斥行政手段，而把它作为经济手段的重要补充。为了科学地使用行政调控手段，必须正确划定它的运用条件和范围，防止滥用。

第三节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配套运用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

在宏观调控的各种手段中，经济手段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主要手段，其中经济政策是实施经济杠杆的依据，对于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作用最为经常和广泛，本节拟进一步阐述。宏观经济政策是由多种政策构成的，每项政策的实施方法各有特点，在调控目标上各有侧重，又互相制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经济政策及其杠杆的应用需要合理搭配，综合运用，才能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总体积极效应。

1. 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根据宏观调控的目标而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处理财政分配关系的一系列准则和方法的总称。科学地制定和运用财政政策，对于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充分就业，促进物价稳定、收入分配的公平，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具有重大意义。财政政策主要由财政收入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和预算政策等组成。

——财政收入政策。它主要是指调节税收渠道和税收量增减的政策。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宏观调控主体可以通过改变税率、起征点、增减税收项目、免税、退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调节市场需求和供给状况，控制国民经济运行。一般说来，税收调节采取“逆经济周期规则”，即在“经济过热”（往往信用膨胀、社会投资量过大）时，政府增加税收，使个人与社会消费、投资及总需求水平得到控制；在经济发展势头趋弱时，减少税收，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居民增加储蓄，使总需求水平上升。

——财政支出政策。它主要是指财政支出方向和增减财政支出数量方面的政策。在国家财政收入实力允许的前提下，宏观调控主体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投资社会公共工程，购买商品和劳务，必要的转移支付（如支持贫困地区建设）以及举借国内外债务等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一般来说，当经济运行过热、通货膨胀严重时，削减财政支出水平，减少转移支出，缩减公共工程，公共事业建设项目等，可以控制投资过热，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当经济运行趋向衰退时，则采取相反措施，扩大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财政预算政策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关系重大，由于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大，因而一个国家的财政预算对整体经济是扩张还是收缩，是稳定还是波动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财政预算政策。财政预算是国家政府财政部门筹集、分配和监督预算财政资金的管理活动。作为宏观调控的财政预算政策，则是宏观调控主体根据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目标，对财政预算管理活动提出的方法和行为准则。大体可分为三类预算政策：一种是平衡预算，即财政收入与支出相抵，大体平衡，这是比较稳健的预算方式，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另一种是盈余预算，即收入大于支出，有所盈余，这是一种紧缩型财政预算，在经济高涨或过热时，这种预算可以增加税收或减少政府支出，起到调节的作用；还有一种是赤字预算，即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这是一种扩张型预算，在经济发展缓慢时，这种预算可以减少税收或扩大政府开支，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指出，无论是赤字预算还是盈余预算，都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如果使用过度，都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后果。

2.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指宏观调控主体处理国民经济运行和稳定货币关系的管理方法和措施，它是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行为准则。货币政策的手段如前面所述，是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控制的法定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实施货币政策，就是中央银行依据宏观调控主体的意图，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稳定货币币值，调节货币流通量或供应量，影响社会的投资总量和消费总量，稳定市场价格水平，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实现均衡。

运用货币政策，需要针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在通货紧缩时，总需求不足时，可以通过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调低贴现率、买进政府债券等，以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市场利率，增加银行贷款，从而刺激消费支出和投资增长，使社会总需求水平提高，促进经济加快增长；反之，当发生通货膨胀时，则需要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吸收储蓄；调高贴现率以减少消费和投资，使总需求下降；卖出政府债券以回笼货币，把抬高的物价水平降下来。可见，货币政策也要“逆向而行”，交替采取扩张和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效应，往往涉及货币币值的稳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经济增长的幅度和国际收支状况，因此，运用货币政策要考虑它对宏观调控目标的多方面影响。在实践中，货币政策往往不是单独使用的，而是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配合使用的。

3. 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国家指示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发展目标，调节各个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构变化的政策措施的总和。宏观调控主体通过产业政策，可以改变资源在产业中的分配，调整社会供给结构和总量，协调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良性运行。产业政策主要有：

——产业结构政策。它是产业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当代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实施产业政策是为了确定、支持、鼓励那些产业发展，限制那些产业发展，调节资源在各部门的流向，协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各部门、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要求，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产业组织政策。它是指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调节企业规模经济发展，增强市

场竞争活力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和。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包括促进市场有效竞争、抑制垄断和防止过度竞争政策。引导企业间的联合，促进规模经济的合理发展，增强民族经济的总体竞争力，也是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用内容。

——产业技术政策。它是指导民族产业和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科技研究、应用与开发的一系列措施。我国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高度重视产业技术政策的运用，尤其要鼓励、支持自主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

——本国产业与国际产业关系的政策。它是指政府对民族产业在进出口和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维护、支持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须高度重视维护民族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民族产品品牌和名牌，促进增强民族经济竞争力。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合理的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外经济互利互惠，防止崇洋媚外，禁止诸如对环境有害的外资项目侵害民族经济利益。

产业政策本身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政策体系，其规划设计必须有整体观念和系统思想。它的实施运用，也要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配合运用，如国家财政应将税收结构和预算分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对应；调整产业结构要求中央银行系统制定差别利率，对战略重点发展的产业项目提供贷款优惠等。

4. 就业政策。就业政策是国家为实现充分就业而做出的一系列规定和采取的措施。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既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又保证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就业权利，调动一切劳动者的积极因素。中国实现充分就业面临人口众多的实际困难，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迎难而上。为了促进充分就业，要合理规划，进行就业和再就业指导；在现有条件下，挖掘财政潜力，运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调节社会生产，促进就业量增加；运用产业政策，引导发展既有利于应用先进科技，又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社会总资本量的增加，促进就业量的增加；有步骤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等。

5. 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进行调节的一系列措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涉及国家的税收和各经济主体的资本、土地等要素所有权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这个层次上，就国家税收和各经济主体的总收入之间的关系来看，收入政策与税收政策具有相似的意义，即可以通过调节政府财政收入，进而调节政府财政支出，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就各经济主体收入相互关系来看，收入政策可以调节不同经济主体的收入结构，进而调节社会总需求及其结构，例如，用一定方式控制要素所有权收入的增长幅度，就会影响再生产的投资需求增长；提高或者控制劳动者工资收入总水平，就可以提高或者控制社会消费需求的水平；对不同的经济主体实施有差别的个人收入政策，则会起到调节消费需求结构的作用，例如，实施一定的收入政策，规定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收入水平，那么，原先低收入者只能买低档商品，现在工资水平提高后，也可以买得起某些高、中档的商品，这就引起市场总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而还会影响总供给结构的变化。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收入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已经形成的初次分配的格局下，运用一定的方式，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不合理的个人收入差距。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在分配关系上没有抽象的公平，分配关系的公平实质上就是分配关系应当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的所有制关系相适应。如果把效率理解为一定水平的生产力，那么，效率与公平两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促进个人收入公平的实质，就是要促进个人收入分配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往往不能自动地适应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要求，要克服这种弊病，不能没有宏观调控主体对于国民收入调节再分配，包括促进个人收入实现公平的收入政策。主要的就是，对那些不合理的过高个人收入进行抑制；对合法的个人高收入，鼓励用于生产性投资，控制奢侈性的个人消费。应当认识到，体制转轨过程是全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在此期间，高收入者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享受到利益调整优惠的，而一些下岗、失业的工人则为体制转轨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因此，可以对高收入者征收"支持再就业专项税"，借以增加再就业基金，扩大再就业，使下岗、失业工人获得稳定收入。要十分重视提高农民收入，通过税费改革，减少农民负担，并配合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措施，扩大农民增收渠道。我国在已经形成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只有提高大多数人有购买力的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6. 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对外经贸政策是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和先进技术，发挥国际经贸比较优势，维护民族经济权益和经济安全，促进民族经济提高整体竞争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我国已经加入 WTO 的条件下，对外经贸政策要全面、灵活地利用国际规则。主要政策含义是：

——科学地调节进出口。运用 WTO 的有关条款，支持出口企业对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支持出口企业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根据有关规定和实施程序，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用好保障措施，防止本国产业受到损失。

——加强对国际融资的监管。在间接利用外资领域，控制外债总量，使之与偿还能力相适应。在直接利用外资领域，结合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对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分别做出明确规定；鼓励外商把获得的利润在我国进行继续投资，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

——稳定汇率。汇率的稳定有利于货币币值的稳定、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有重大意义，所以，要把稳定汇率作为政策取向。稳定汇率需要调节涉及国际收支的商品服务贸易、资本的国际转移、外汇储备等诸多项目，还需要实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加以配合。一般情况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利用国家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进行吞吐调节。面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激烈国际竞争，我国保持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有利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宏观经济健康运行。

二、配套运用宏观调控手段

在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调控手段是沟通调控主体和调控对象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围绕宏观调控的目标，宏观调控主体需要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调节涉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方方面面，影响、制约、规范和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纠正国民经济运行对良性循环轨道的偏离，实现持续健康地发展。

从上述各种宏观调控手段的特点和作用效应可以知道，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每一种手段都有其相对侧重的目标取向和积极作用；但是，每一种手段又都不是万能的，其作用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且有些调控手段在产生从某一目标来看的积极效应的同时，又可能产生从另一目标来看的负效应。例如，为了达到扩大劳动就业的调控目标，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运用税率杠杆实施减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等财政调控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的使用，有可能引起货币资本和货币投放市场的数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这就对稳定物价的调控目标产生负面效应。又如，为了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可以运用货币政策，通过调节中央银行系统的经济杠杆，提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贴现率等，控制货币和货币资本的市场投放，但是，这又可能限制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减少就业，这又会对扩大就业的调控目标产生负效应。所以，面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状况，有必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认真地选择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任何一种调控手段，都要研究实施的分寸；应当充分估计所使用的调控手段实施效应之间的互相影响。只有对所选择的调控手段合理地搭配，合理地配套实施，实现他们在运用程度上的最佳组合，才能发挥他们的互补功能，减少它们相互抵触的方面，形成宏观调控的最佳综合效应。这是属于结合实践专门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宏观调控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1993~1996年经济“软着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配套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1993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运行发生经济过热，经济结构失调，通货膨胀率过高，经济秩序混乱，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国家针对这些问题，先后实行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宏观经济政策，最终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

1993年6月，宏观调控有针对性地展开。

首先，在整顿经济、金融秩序方面，国家政府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制止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限期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坚决制止和严肃查处各种乱集资行为；同时，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加强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等。

第二，在制止经济过热方面，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灵活利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

储蓄存款，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限期完成国库券的发行任务；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等。

第三，在推进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强化央行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由于调控措施坚决，金融秩序混乱局面较快得到控制，但是到1993年底，经济过热，投资膨胀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仍未得到抑制。

1994年，国家针对我国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实际，把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确定为控制总需求，以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其主要措施是，继续紧缩银根，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在坚持紧缩的大前提下，1994年上半年，央行针对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在调控操作上不搞"一刀切"，而是采取灵活的措施，提出固定资产贷款严格控制、流动资金贷款区别对待、粮棉收购资金保障供应的三项原则，从而避免了因紧缩银根而制约宏观经济正常的增长。这样，到1994年底，经济增长虽然仍然偏热，但开始已有所回落，经济增长由1993年的13.5%降至1994年的12.6%；投资膨胀得到明显抑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降到7.8%，比1993年回落了近31个百分点。但是，财政状况恶化的状况依然严峻，当年财政收入增长为20.0%，而财政支出的增长为24.8%，财政赤字急剧扩大。通货膨胀也仍在继续攀升，由1993年的13.2%上升到1994年的21.9%。1994年，在总量开始趋于平衡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仍居高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受上一年不利因素的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加上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调整，汇率的改变，改革税制导致的价外税出现，以及居民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种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共同推动了社会零售商品物价指数的上升。

1995年，国家政府继续坚持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确定为，治理过高的通货膨胀。措施是，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继续控制国家银行信贷投放规模和现金发行的同时，开始把货币供应量纳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促使货币供应的增长明显下降；并适时提高贷款利率，通过利率杠杆，调节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在财政政策方面，在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1995年又采取了各种增收措施，使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回升，财政支出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国债发行顺利，有效地缓解了财政收支的矛盾。从总体上看，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开始对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持续3年的高通货膨胀涨幅终于回落，1995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4.8%，实现了物价指数增长15%的宏观调控预期目标。从紧的财政政策和宏观财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收支逆差的局面，当年财政收入增长19.6%，支出增长17.8%，实现了财政收人的增长大于支出的增长。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10.5%，仅比1994年下降2.1个百分点。

1996年，国家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对宏观经济继续进行微调，既坚持控制最终需求，又适当启动关系到未来发展的投资需求，主要是：

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使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在严格管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的同时，重点满足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的投资需求；保证对农业的信贷资金的投入，其投入量必须占当年新增贷款的10%以上；同时，逐步停办保值储蓄，先后两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放开同业拆借利率，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经济滑坡。在上述措施的作用下，1996年，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仅为6.1%，涨幅比上年回落8.7个百分点；社会需求增长基本适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比上年增长18.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9.4%，外贸出口由降转升，利用外资继续扩大，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国民经济增长平稳回落到适度快速区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7%，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这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宏观调控机构，是有能力控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的。在宏观调控中，只要遵循社会再生产或者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的权威性，依靠由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自觉性，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来，中国同样要借鉴和使用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的宏观调控手段，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着自身的优越性，只要发挥好这些优越性，就可以把一般的宏观调控手段运用得更加有效，并能创造出更有特色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手段。

第二十九章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的健康运行和发展，除了在经济领域本身需要科学的宏观调控之外，还离不开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的，是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维护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项工作是覆盖全社会的，因而也属于国家宏观管理的内容之一。本章主要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对待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拜物教观念的科学态度，并论证社会主义市场价值观对发展市场经济、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作用。

第一节　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特征

一、经济基础离不开意识形态的维护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都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国家为核心的各种政治法律设施；二是“社会意识形式”的上层建筑，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各种思想观念和理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产生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意识形态也会变化发展。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重大反作用。对应于一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不但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还要同与自己经济基础相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维护、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作为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它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关系构成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主体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并存的还有非公有制。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

性，既有与主体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有与主体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非社会主义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尤其不可忽视的，还有国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些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敌对的。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各种思想意识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坚持和倡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摒弃和批判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意识形态。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关系总是与思想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不存在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纯粹的经济关系。尽管说，经济理论研究可以暂时舍去意识形态，把经济关系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处理各种经济关系时，总是在一定意识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研究现实的经济时，结合意识形态研究，可以更加全面、深刻。有一种观点主张，经济学家不应涉及意识形态，这是值得商榷的。其实，由于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利益关系，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渗透着意识形态。例如，有的人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鼓吹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不相容，论证私有制经济最有效率，实际上就是在经济理论的外衣下，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信心。由于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就有相对的独立性，就能长期地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发生影响，所以，无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客观上存在的作用与反作用，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尤其应当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地盘还不大，资产阶级私有制意识形态和千百年来遗留的旧的思想意识、传统习惯势力仍很强大，在这种历史现权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护的。

二、精神文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

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精神文明就是人类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糖神文明包括思想道德方面的文明和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文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有机结合的经济形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它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护。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充满生机。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与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惟有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以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为前提，而它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文明来维护和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总体工人或者自主联合劳动者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思想道德方面看，劳动者有很强的公有制主人翁意识，就会努力工作和劳动，爱护公有财产；从文化科学知识方面看，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就有利于依靠科技进步，创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两者兼备，就能促进公有制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公有资本保值增值。这突出地体现在企业总体工人的组织者或企业家身上。公有制的企业家，是公有制经济的代理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如果他自觉地适应这种人格化要求，就会树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谋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他就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努力促进企业的公有资本保值增值。但是，如果一个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面对多种所有制的经济环境，从个人利益出发，去与私营企业主比个人收入，他就会产生个人收入比别人少、吃亏了的心理（因为公有制企业家的收入，原则上是劳动收入不包含剩余价值），会产生纪律约束太紧（自主的联合劳动必须有共同遵守的纪律），不如私营企业主可以个人说了算的心理。这些心理一旦产生，就会动摇他对公有制经济的信念和工作责任心。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是不能当好公有制企业的领导者的。所以在选择公有制企业的领导者时，要有意识形态标准。要选择那些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担任公有制企业领导者。

——从全社会来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共同理想与目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存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两者在指导思想上却存在很大差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扬赚钱是人生的目的，“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劳动者共同劳动，共同追求物质利益，最终是为了共同富裕。在全社会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确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共同利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一方面努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促进全民族文化知识素质的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受到人民群众自觉地维护。反之，如果只抓经济建设，不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黄赌毒死灰复燃，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滋生蔓延，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然受到损失和破坏。因此，决不能撇开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来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文明，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

从市场关系层面来看，市场经济的交换领域和一般流通层面的经济关系，必然产生并要求平等意识、自立意识、自由意识、竞争意识、开拓意识、效益意识等，这些意识与自然经济形态必然产生的封闭意识、小农经济意识、僵化保守意识相比，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产生的依赖思想、地方本位主义、“唯上”意识、“行政命令”意识等相比，有助于增强人的自立自强精神、创新拼搏精神，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这是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相统一的。但是，市场交换和一般流通产生的这些观念意识，并不是适合任何经济层面的。这些观念意识与生产领域的社会化生产所要求的协作观念、计划观念、整体观念、纪律观念等是存在矛盾的。如果用等价交换、自主决策等观念意识来对待公有制经济和社会化生产，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就不利于形成生产组织的凝聚力和整体合力，从而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矛盾的一面。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层面来看，公有制必然产生并要求全局观念、协作观念、互助观念、共同利益意识、共同理想等观念意识，这是有助于形成生产组织的凝聚力和整体合力，从而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但是，如果把这种观念意识扩大到流通领域，则会对人的自主选择、自由竞争、自我发展等设置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相矛盾的。

如果只看到市场经济观念与公有制经济的观念的矛盾，就阻止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显然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通过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来发展。而如果只看到统一的一面，忽视矛盾的一面，就会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实上，我们只能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促进精神文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是促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统一，努力克服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这就必须努力克服市场一般流通领域产生的观念和生产领域的公有制观念两者之间的矛盾，促进它们在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实现结合。这就离不开思想教育。也就是说，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通过经常的思想教育工作，逐步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学会用不同的思想观念适应不同经济层面的要求，在生产领域内部，自觉服从指挥、服从分工、团结互助、共同奋斗；面对市场，则用于自立自强、自主决策、敢于竞争。这样，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流通一般关系的结合。

第二节　科学地对待商品拜物教

一、市场经济与商品拜物教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无法回避，就是如何对待商品（货币）拜物教。由于市场经济必然产生拜物教观念，人们又往往把商品拜物教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就把发展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完全对立起来。要促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统一，就有必要科学地对待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用以说明商品形式给人以虚幻假象的一种比喻。商品形式一旦产生，就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商品关系的实质是人类劳动交换关系这个本质。它把包

含在商品中的社会性劳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自然属性，反映成物的物质性质，从而把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社会劳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成物与物的关系。人们对商品的这种错觉，马克思比喻为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只要存在商品关系，就必然存在商品拜物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商品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间接地实现其社会性，或者说，只有通过交换实现为抽象的人类等同的劳动，才能实现其社会性。因此，商品拜物教观念生产的根源在于个别的（独立的）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产生的基础是商品生产。货币产生后，商品内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包括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变成了商品和货币外在的对立，货币成了社会财富的代表，使人们对物的盲目认识变成了对货币的崇拜，形成了货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货币只不过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所以，"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今天，商品拜物教主要表现为货币拜物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改变商品生产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形式，仍具有拜物教性质，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拜物教观念产生的条件仍然存在。①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劳动虽然不是私人劳动，但也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加入企业总体工人的劳动，同样要通过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才能成为社会劳动，所以，劳动关系也就为物的关系所掩盖。②价值规律仍然自发地起着基础性作用，个人或经济单位在社会总的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中，仍然被一种具有自发性的市场力量所支配，"看不见的手"仍然存在。所以，人们产生商品拜物教的观念也是很自然的。在当前的条件下，社会的多数群众还是直观地看待商品交换关系的，难以科学地认清商品形式的本质，因此，商品拜物教观念仍会相当广泛地存在并发生作用，这构成社会心理的重要方面。

二、区分商品拜物教观念与拜金主义

商品拜物教观念是对商品形式本身拜物教形态的直观反映，它属于社会心理层面，应当把商品拜物教观念与拜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区分开来。

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产生于商品生产，产生于商品货币关系，而不是私有制本身。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作为一种意识，没有阶级性，只是一种对商品和货币形式陷于盲目性的观念。但是，拜金主义、资本拜物教则不同，它们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求金欲，相信"钱能通神"，认为货币本身能生出更多的货币。它们追求的不是作为财富象征的商品货币，而是作为资本的货币。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万能之物。货币的经济特征决定了，人们只要拥有货币，就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使用价值。在简单流通领域，人们拥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消

费。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货币成为资本的存在形式之一，“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惟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是 aurisacra fames（万恶的求金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资本不仅成为致富的惟一对象，而且是致富的惟一目的。货币资本投入的惟一目的就是增殖、赚钱。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实质是通过无偿地占有工人在生产领域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借贷资本或资本主义的生息资本之后，剩余价值的来源，就完全被掩盖了。“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间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观念已经完成。”拜金主义就是对资本拜物教观念的通俗表述，就是一种盲目地以为钱能生钱的货币资本追求欲。可见，资本拜物教是与体现剥削关系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是体现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意识形态。万恶的求金欲——拜金主义，使金钱成了一切社会道德的原则和标准。金钱使黑白、美丑、是非等一切价值判断被颠倒了。“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马克思还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拜金主义必然导致金钱与权力相交易。拜金主义（资本拜物教）已经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极端利己主义相联系，它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白，商品（货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形成的基础及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形成的基础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所以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贯穿于一切商品经济中；而后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拜金主义观念长期存在，加上国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拜金主义观念。这种观念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们要批判拜金主义，并在制度上予以制止。对受拜金主义影响而出现的贪污盗窃、制假贩劣、坑蒙拐骗等行为，要坚决打击。要以正确的理论揭示拜金主义的根源及危害，教育人民唾弃拜金主义。

三、承认和合理利用商品拜物教观念

教育人民唾弃拜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不等于简单地否定商品拜物教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那么，现阶段的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便有其现实性。应当明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并非总是消极的，它注重商品的可交换性和社会有用性，这对于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益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应当合理地利用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有助于商品生产者研究市场对自己产品使用价值的需求，从而促进生产者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是与商品、货币相联系的。要提高生活水平和个人消费质量，人们重视商品、货币是很正常的。邓小平曾经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要求承认个人的合法经济权益，承认人们在遵守法律与一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样有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对于奖励先进，要改变过去那种认为货币奖金奖励会助长拜金主义的观念，把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起来，这对适应人们的社会心理，促进人们争做贡献有重要意义。利用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也可以引导人们客观上为社会做贡献。例如，发行各种彩票，购买者主要是为中奖而参与，购买的人越多，结余的部分越多，可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积累资金。同时，在当前，鼓励人们合法地挣钱，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

但是，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作为尸种普遍存在着的社会心理，毕竟具有盲目性、自发性，这种观念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合理利用这种观念的同时，要教育人们认清其局限性。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主要在经济领域，在非经济领域则不适用。要教育人们决不能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对待政治、文化领域的社会关系，决不能只用金钱来衡量人们行为的社会价值。还应当注意，商品（货币）拜物教观念如果任其广泛而自发地发展，很容易"升格"为拜金主义，这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邓小平指出，"每个人都应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这里讲的道理是十分深刻的。

第三节　用社会主义价值观维护公有制经济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从思想观念角度来看，必须引导人们树立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价值观。价值观是哲学范畴，它指的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实践目的的选择及其意义的评价。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的影响，社会经济制度在其中起核心作用。人的价值观对人的行为起着导向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就会有怎样的态度和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是由无数独立和相对独立的、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构成的，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各自的利益出发，进行经济实践活动，展开市场竞争；同时，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决定，广大的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要促使市场主体和各行各业的人们把自主的经济行为同实现共同利益、发展的共同目标统一起来，离不开确立共同的价值观。而形成这样的价值观，离不开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就是价值观导向。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各单位的领导机构，都有权利和义务做好价值观导向工作。

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坚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导向，才能克服竞争主体之间容易产生的离心力，增强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凝聚力。应当看到，市场经济可以与多种所有制结合，在市场经济中，尽管有市场经济一般的、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也必然会出现代表不同所有制经济要求的价值观，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价值观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价值观是存在对立性的。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描述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那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人人都只为自己打算，"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立的打算。"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核心。这种价值观当然是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起破坏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引导人们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确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实现个人权益，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

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必然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引导工作，使人们在日常的经济实践中，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自己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为了促进人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有必要引导人们在下述关系上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的关系。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价值规律要通过市场主体的竞争起作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经济，也排斥了市场竞争。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人们必须树立竞争观念，敢于竞争、善于竞争。但是，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人民共同富裕。因此，在引导人们树立竞争观念的同时，还要树立协作观念。不但每一个企业内部不能没有协作，就是竞争对手之间，也不容许采取尔虞我诈的态度，应当发扬在竞争中先进带后进，这样才有可能减少盲目竞争带来的损失。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国内民族企业相互之间，更要在相互竞争求上进的同时，团结一致，相互协作，才能形成合力，同强手如林的国际垄断资本展开竞争，维护和争取社会主义经济和民族经济的利益。

——正确处理自由自主和遵纪守法的关系。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自由选择、自主决策，这样才能充分展开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自由自主观念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但是，企业内部形成总体工人，形成集体生产力需要每一个成员遵守联合劳动不可缺少的纪律；全社会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需要人们依法经营，遵守法制。所以，必须引导人们把自立自强与自我约束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自利与利他的关系。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忽视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左"的做法甚至将人们的正当个人利益当做个人主义。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可以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理直气壮地获得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互助互利，这是共同理想与共同富裕在人际关系上的要求。这就要求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必须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实际上，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决定了，每个人的利益是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联的。不损害社会、集体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基本前提。所以，应当引导人们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

——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一部分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必然现象。人们追求个人、家庭富裕，是合理的价值取向。但是，也要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个人诚实劳动获得的市场实现的价值财富中，也难免包含着按要素所有权分配的成分（本书在第二十章做了分析），用等劳交换这种社会主义的平等权利观来衡量，也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不公平。更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才有利于实现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市场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运行。因此，要引导人们确立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先富起来的人们能够自觉依法纳税，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帮助因各种原因经济困难或贫穷的人们。

三、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

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要坚持和发展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中，必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建立在自主联合劳动基础上，它在实践中自觉地吸收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以实现共同富裕、共产主义为最终价值目标。在广大群众中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国际上霸权主义横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长期存在的客观态势下，大力地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利于人们识别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各种传统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观，自觉抵制腐朽、有害的思想观念。例如，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分工的优越性说成私有制的优越性，鼓吹市场经济只能同私有制经济相结合，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如果让这种观点蔓延开来，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像原苏联已经发生过的

那样，被人以“改革”的名义所吞噬。而当人们接受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就能看清这些错误观点的危害性，确立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核心。但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可能在普通意识中自发地产生，也不可能采取强制的手段压服人们形成，它只能通过科学的教育方法，让人们从实践的感受中，从获得的利益中逐步确立。应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教育。重要的是抓好先进的典型，让人们从典型的公有制企业和先进的个人身上看到，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求把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在联合劳动中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可以付诸实践的，是与发展市场经济相统一的，是可以给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都带来利益的。总之，一定要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牢固树立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坚定信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地取得成功。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结合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文明建设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人类社会的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三个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也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来保证。

事实上,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经济。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也必然要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物质利益问题,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阶级必然要运用政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在全社会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就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来保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是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要努力发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势，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优势要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看，有必要认真探索和实践在经济生活中贯彻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从宏观经济运行看，要依靠人民群众，完善经济法制，严格执法，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企业经济来看，要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从农村经济来看，要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扬集体农民的经济民主权利，促进提高农民收入；从经济管理制度来看，要建立领导既能灵活有效地指挥，又受到制约和监督的权利运行机制，实现组织监督、群众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有效结合。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结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书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这主要是为了说明，研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不能只单纯地关注经济领域的，还需要结合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等有关联的方面来研究，才能得出更清晰、深刻和全面的结论。

第三十章　努力实现光辉的前景

我们已经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成的历史条件、基本经济制度的节征，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含义及其如何科学地认识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正确推进、控制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及其经济发展。作为经济理论，我们力图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做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但是，历史在前进，这些理论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经受检验，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将面临许多新的考验。作为本书的终篇，有必要阐明，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前进的道路会有曲折，但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景必定是光辉灿烂的。

第一节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

一、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

时代在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跨人 21 世纪。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认清这个历史方位，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1. 中国已经进人社会主义，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几十年前，中国人民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的伟大革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性选择，是符合实际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几十的社会主义实践又进一步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我们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共产主义，中国只有遵循社会发展的这个必然规律，才能减少前进中的误区、减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痛苦，求得在现存条件下更快的发展。假定中国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其他的什么道路，中国社会迟早也要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但是，那经历的曲折和困难肯定要多得多，从而经过的时间肯定要长得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必定意味着要经受更多更长期的那种在旧中国的痛苦。背离社会

主义方向，中国没有出路。

2. 当代中国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是先进的，中国的生产力与它们相比，处于劣势地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它们的根本经济制度是先进的，因而中国要以它们的根本经济制度为未来的方向。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确实比起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文明、进步，并且还有延续的余地，这是由于它们在私有制经济范围内，利用科技革命的成就，促进经济增长，从总体资本家利益角度调节生产关系，缓和国内经济矛盾并经常向国外转嫁矛盾的结果，也与它们吸取经济危机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经验有关。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毕竟是大势已去的陈旧制度。正如健壮的老猴子不可能像人的幼儿那样先进一样。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对抗性的固有矛盾并没有解决，垄断资本对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依然存在，生产扩大与消费不足导致的危机仍在加深，财富增长与贫困失业这种两极分化始终在发展，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南北差距的拉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国家垄断的高级阶段，正在腐朽和衰亡。因此，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为目标，是极其短视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作为前进的方向。再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历史上走不通的道路，今天更加走不通。原苏联、东欧开始讲社会主义改革，后来发生根本经济制度的剧变，结果连年国家动荡，通货膨胀，国力衰退，社会两极分化，广大人民生活明显下降。这个教训够深刻的了。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有光辉的前景。

3. 现阶段必须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然而，中国毕竟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因此，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只能适应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在实现形式上，还必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经济还必须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因此，任何超越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凭主观愿望追求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都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把握自己正确的历史方位，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现阶段中国必须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才能在可能的条件下获得更快的发展；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论和持续发展论的统一，遵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中国必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却可以在人们自觉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加快。既然历史条件决定，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靠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那就必须从国情出发，依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条件，积极利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人类社会中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优秀成果，逐步实现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可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上就是要在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东

方大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速度上超过资本主义，从而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

1.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要靠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达到现代化的高水平。从理论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生产力落后，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还不相称；如果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相比，生产力就显得与社会主义的要求更不相称，因为抽象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理应高于资本主义。所以，当代中国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做为中心任务。从中国国情现状来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大国，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不面临诸多的困难。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就将成为空谈。而经济发展了，就能增强社会主义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因此，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邓小平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刻地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这正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要求。

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尽管说，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已经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还很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经济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扭转；人口增长、人口老化和就业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压力；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依然承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科技压力，这种种问题说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到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近期就是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我国已经胜利地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现在正向这个第三步目标迈进。中共党的十五大把第三步目标，又分为新的三步，即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中共党的十六大根据这个新的三步目标，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丰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容，不仅要求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而且同时要求民主和法制更加完备，全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健康素质更加提

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这就把经济发展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更充分地体现了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征，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

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决不能搞教条主义，决不能搞全盘西化，而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分析中国国情，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建设的新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关系方面存在多元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过渡性（不同所有制经济并存、竞争、交融和渗透），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存在多层性（同一地域现代、近代和古代生产力并存）、差别性（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生产力水平差异明显），这些特点加上人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只能是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本”中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有别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应当充分认识，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强调。

1. 在生产关系方面，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经济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要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健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落实公有资本管理责任制，完善工人阶级处于主人翁地位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农村，必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在社会生产关系上，中国决不走私有化的道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使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2. 在生产力方面，坚持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一要把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性任务与向信息化发展科学地结合起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努力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坚决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二要把工业化、现代化同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结合起来。在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三要坚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东、中、西部经济的各自优势和特色，加强区域经济的交流和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和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四要坚持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振兴民族经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上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3. 在经济实践方法方面，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在结构调整、科技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提供的机遇，发展自己；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要因地制宜，“一企（企业）一策”，不搞“一刀切”；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要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合法劳动先富起来，促进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中国化，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只有方向明确，方法对头，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

第二节　居安思危　坚定信念

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中的艰巨性

认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也就认清了中国的光辉前景。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是“乌托邦”。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处在人类社会走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史前时期”的大转变初期，面对的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旧势力和传统观念。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前进的道路决不会是平坦的。我们应当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艰巨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增强优患意识，居安思危，这样，才有利于在实践中掌握主动权。艰巨性可以从下述方面来看。

1. 从国际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发展设置障碍。当代世界，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尽管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发展提供了利用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的机遇，但是，“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攫取超额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他们希望中国成为赚取利润的大市场，却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他们强硬的竞争对手，因而决不会拱手奉送核心科技。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那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技、经济乃至军备等方面的优势，争夺发展中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削弱对

方竞争力；采取环保标准、反倾销规则等手段，制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并利用自己控制的多边国际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设置障碍；用附加条件的资本贷款，趁人之危，迫使发展中国家实施对自己有利的“改革”；诸如此类，同样将对我国造成不利和损失。而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造成重要商品（如石油）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这种种不确定因素，对于已经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我国经济来说，增添了外来的风险，威胁到我国民族经济的安全。特别是一些推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依然采取“冷战”思维方式，亡我之心不死，继续对我国实行各种“遏制”，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时而干预中国内政，威胁我国主权安全。这些无疑增加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艰巨性。

2. 从中国国情看，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条件居于劣势。劳动力人口资源占有量少，据资料，1999 年我国总劳动力人口 7.51 亿，占世界总量的 26%，但是只占世界上自然资源的 9.6%、资本资源的 9.4%、知识技术资源的 1.85%；大部分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数的 1/4。而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按每百万人中平均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工程师人数计，日本为 4909 人，瑞典为 3826 人，美国为 3676 人，澳大利亚为 3357 人，而我国为 454 人。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差距更大，目前一半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水平，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 0.05%。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性发展，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在经济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任务十分艰巨。尤其要充分认识中国人口多的国情，它决定了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外国决不可能稳定地供给这么多人口所需要的粮食。2000 年中国农村仍然有 3400 万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可见，中国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何况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其艰巨性是可以想见的。

3. 从国际经济竞争手段看。要赢得优势也有艰巨性。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中只能运用自身经济制度允许的手段，而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损人利己的手段。①不能采取所谓“原始积累”的手段。原始积累是相对于正常积累而言的，其本质含义是，用超经济的包括暴力的手段，集聚资本，加速积累；而正常积累则是通过资本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获取的剩余价值资本化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初期，通过国家对外进行殖民主义侵略、对内强行剥夺农民等暴行，把用这种手段积聚起来的资本，称之为祖先节欲而形成的所谓“原始积累”，可见，这是一个具有辩护性的经济学概念。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只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才使用原始积累手段，这种超经济的手段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使用过，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霸权主义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基地、用偷盗经济情报展开国际竞争等，都属于原始积累的范畴，只不过这些手段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不是主要手段罢了。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却不能使用这类超经济的手段去欺诈、剥夺别的国家和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经济是劳动人民的经济，公有资本积累的惟一来源就是自己的劳动。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原始积累，这可能是对原始积累科学含义的误解。②不能采取不平等交

易和向别国转嫁经济矛盾的手段。资本主义经济往往用抬高先进工业产品垄断价格，压低原材料价格的不平等交易，剥削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经济发生矛盾或危机时，往往对外发动战争转嫁矛盾。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上自始采取平等互利的态度，对外不取不义之财。因此，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只走“正道”，不走“邪道”，这与那些动辄靠霸权主义、靠“邪道”发展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竞争中要赢得优势，必定会增添艰巨性。

面对上述客观存在的种种艰巨性，中国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上。惟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抓住机遇，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才能赢得比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更快的发展速度。

二、正视经济建设中困难的长期性

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必定胜利的信念，要有同困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这是因为，造成困难的一些矛盾将长期存在。从总体上看，以下三个矛盾将长期存在。

1. 国内外敌对阶级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纯粹是经济问题。国内外敌对阶级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仇视中华民族的自主独立，仇视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停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搞垮社会主义经济。只要国际资本主义存在，这种敌对行动就不会停止。对此必须有长期斗争的准备，正如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2. 国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历史毕竟还不长。处于腐朽、衰亡大势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凭借几千年私有制关系的传统习惯势力，凭借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经济秩序，在综合国力比较态势上，还强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资本主义世界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得不总结教训，调节生产关系，包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在增进人民福利、管理社会经济的某些做法，这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固有基本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了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在国际经济竞争推动下，在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下，促进了以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这使资本主义经济又形成了新的增长动力；在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的条件下，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并未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他们发展经济的要求，正好给国际垄断资本提供了投资的广阔场所，并且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原材料市场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这又造成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较快发展的条件。由于这些主要的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腐朽、衰亡的趋势在深化，但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们的经济比起中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还会占较大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市场上，我国民族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遇到困难的长期性。

3.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客观经济规律与我们认识程度的矛盾。怎样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伴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始终。因为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前无古人的，世界上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惟有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最终获得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成功。这个实践过程，由于上述长期性的存在，也必定是长期的。毫无疑问，我国已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是，这是从党和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的角度来说的，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劳动人民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今后发展道路上的一切细节。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社会实践在发展，一些原先尚未认识的、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矛盾今后会显示出来；随着国内外新情况的出现，一些从未有过的新问题会产生出来。中国生产力的多层面性、社会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性和复杂性、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别性、人均资源的短缺性，这些历史上形成的种种国情，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会不产生出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从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上，提出科学的应对措施。没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打算，是不可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的。

三、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曲折性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崭新的制度，前进中难免会有挫折。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曾经陷入过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误区，甚至出现过“文革”那样的曲折。对此，国内外敌对势力大肆渲染社会主义“失败论”，妄图动摇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前进中的挫折并不可怕，问题在于对待挫折的态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推陈出新（从传统的公有制推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破旧立新（破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崭新实践，难免会有曲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改革的成效显示迟缓，这就是一种曲折。事实上，改革遇到困难最大的是国有经济，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怀疑国有经济能否搞好的所谓“信心危机”。由于国有经济是劳动人民赖以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柱，所以这种“信心危机”又是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对国有经济信心的动摇，突出表现在，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方向的国有企业“改制”（全民所有制性质不变或者基本不变的企业体制改革），偷换成私有化的“转制”（转化为私人或私人合伙、控股企业）。在改革的实践中，就是刮“出卖”风，把大批企业的国有资本出卖给私人，不但出卖小型亏损企业，而且出卖经营较好的

中型国有企业。某些人认为，把国有资本买给私人，还能收回一些钱，以后还能收税，不赶快卖掉，将来亏损还要大。这充分反映出对国有经济丧失信心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蔓延，又导致了国有资本的流失，加剧了职工的失业，助长了腐败。因此，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在国有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动摇信心，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很大的盲目性，要害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经济，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丧失了信心。其实，国有经济在改革中遇到一些挫折，这决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同市场经济根本对立的。国有经济受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束缚最紧，是所谓重"灾区"，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困难也最多，这是很自然的，是不值得奇怪的。解决难题是要付出代价的艰苦的，但是，只要存在解决难题的现实可能性，通过积极的努力和科学的方法，胜利的取得就是必然的。既然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中的主导部分，既然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而实践证实，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坚持搞活国有经济的信念就决不能动摇。既然公有制只有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才能焕发活力，那么，我们就应当认真地研究促进这种有效结合的方式、方法，不怕暂时的挫折。应当不断地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应当从存在的问题中不断发现解决问题的手段，这才是对待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遇到曲折的正确态度。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有强大生命力，前途光明，但是会有曲折。须知，考验人们是否有坚定信念的，往往不是在顺利的时候，而是在遇到曲折的时候。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决不能放松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而极为重要的是教育好各级干部。只要手中有权的各级干部坚定信心，百折不挠，就能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困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节 发挥自身优势

一、发挥科学经济理论的优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业，前景必定是灿烂的。只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到达光辉前景的时间。从主观努力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取得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重要的有科学经济理论的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优势。自觉地发挥这些优势，而不是放弃这些优势，才能真正解决好"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

1. 我们拥有科学理论的优势。伟大的经济实践需要科学的经济理论来指导。由一

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已为实践证明，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表述，这是当代世界最科学的思想方法。用这个科学思想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经济理论。它没有狭隘的剥削阶级偏见和私利目的，代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经济实践中，以客观的、发展的（或历史的、联系的）、全面的（或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的眼光，观察客观经济现象，获得感性认识，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加工过程，从经济现象深入到经济本质，并通过本质和现象的中介环节，弄清一定经济现象和现存经济形态的来龙去脉，从而获得符合客观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形成经济建设的实践方法，并且通过不断深入的实践，检验和发展认识的真理性。这样的唯物辩证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是那些戴着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有色眼镜”观察问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能具备的。贯穿这种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无疑是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我们在认识论和实践方法论上拥有的强大优势，也是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前景必然实现的精神动力。

2. 在经济实践中发挥科学经济学的优势。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并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同时，善于运用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借鉴外国经济学的一切科学成分，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经济问题。

（1）发挥科学经济理论的优势，要求用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经济问题。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经济环境决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将长期遇到各种困难。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本身孕育着解决矛盾的方法。当前，就有一些所谓棘手的问题。但是，只要善于发挥我们的理论优势，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是完全可以找到。

——搞活国有企业。一方面，要破除所谓私有制经济天然适应市场经济论。马克思的科学经济理论早已揭示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在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扬弃私有制。所以，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正确的路径，决不是消极地搞私有化，而是纠正历史形成的体制弊病。另一方面，要针对国有企业发生效益低、负赢不负亏等问题的原因，坚信股份制既然在扬弃私有制，也就必定能够与公有制结合，从而使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促成国有经济运行新机制。

——制止重复建设。实践越来越表明，重复建设是与行政干预（投资主体错位）、地方本位主义、市场准入缺乏规范和产业政策不完善、缺乏宏观调控预警机制等因素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分工只能通过市场交换间接地实现，因此，必须排除行政性的“计划社会分工”这种主观性做法，努力完善社会主义统一、竞争、开放和有序的市场体系。只要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措施，消除上述因素，重复建设这个“老大难”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扩大就业。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市场流通关系本身并不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失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的致命性弊病。中国人口多、国有企业在体制转轨

时期排出积压的冗员，这两个因素会增加失业，但是这都不是根本经济制度的弊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这些因素造成的失业，固然需要支持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但是从长远看，"治本"的办法是，着眼于计划生育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的体制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能解决的失业问题。

——克服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地揭示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既然属于分配关系中的问题，就需要从现实生产力水平出发，着眼于调节生产领域的所有制关系，促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初次分配关系来解决。就分配抓分配，只能是一种"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因此，克服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体，从而按劳分配关系占主体，这是实现收入公平，克服两极分化的根本条件；同时要看到，只要私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就会存在两极分化的可能，因而必须运用好再分配的手段。可见，基本的途径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好个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政策。

——提高农民收入。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农业劳动的农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①农业劳动生产率低阻碍了农民人均增收，这又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例如机械化水平低、科技应用水平低）、资金投入不足、农业人口多等有关；②农民的负担较重，这又与工业品价格上涨幅度比农产品快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农民上缴的税收和有关费用被规定得相对较高有关。这一低一高，导致了农民增收减慢，甚至收入减少。而主要矛盾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所以，围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采取农业人口城镇化、发展农业机械化、规范土地承包经营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并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乡镇政府财政制度、促进工业支援农业等相互配套的综合措施，是能够逐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

——解决银行呆账。银行出现不良呆账，不能就事论事，只把问题归结为银行管理体制本身，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银行私有化上。而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来解决。要明白货币经济运行状况是由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决定的，银行呆账固然与银行体制不良造成的信贷失误有联系，但是，呆账和三角债的形成，主要与实体经济运行的不均衡有关，所以，把改革银行体制、完善信用制度同改善宏观调控、克服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良信贷的问题。

上述针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提出的原则性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是有助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我们应当自觉地发挥这种科学经济理论的优势。

(2) 善于借鉴外国经济学的一切科学成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它要吸收人类社会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具有科学性的经济思想来丰富自己。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作为人类社会从事市场经济实践的一个历史阶段，它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思想资料。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些国家从微观蓟宏观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资料，汲取其中的一切科学成分，对于我们科学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且不说西方社会仍然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思想、发展中国家有站在维护民族经济立场研究经济取得的成果，即使是西方主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公共福利、战略贸易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等方面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管理，也是有科学价值的。因此，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优势，决不应当排斥学习和研究外国经济学；也只有善于学习和消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才能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真理性，更好地发挥其固有的优势。当然，在借鉴外国经济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固有的主观性（利己“经济人”的假设）、表面性（具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土地拜物教观念）、片面性（沿袭至今的斯密教条，在社会再生产中丢掉了不变资本 C；不区分一般流通与资本流通）、静止性（沿袭至今的萨伊三位一体教条，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和谐社会）和辩护性（掩盖剩余价值来源），这样，才能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3. 自觉抵制照搬照抄外国经济学的倾向。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反映，在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其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弊病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产生了一种倾向，就是把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张用西方经济学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这种倾向成为现实，后果就是放弃科学经济理论的优势，这是值得警惕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扬弃，但是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扬弃，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经济理论来替代它，而决不应当照搬照抄外国经济学，尤其不能照搬照抄资产阶级经济学，放弃我们的理论优势。

当代国际上流行一些影响较大的经济思想。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它们，但是，一定采取辩证分析和扬弃的态度。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有影响的国际思潮，以下几种值得充分注意。

（1）趋同论。这种经济思想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将取长补短，形成一系列相同的特征，并孵化出一种既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思潮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管理体制上与社会主义的某种共性，但是，却不能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上的根本区别，不能理解前者必然替代后者的客观规律。受这种思潮影响，在我国，一些传媒一度流行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模式的观点，滥用“与国际接轨”这个术语。殊不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中的内部关系等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是不能接轨、趋同的。

（2）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是资产阶级右翼学者阐述的经济思想，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它把私有制看做经济活动取得效率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积极地鼓吹私有化；强调市场自发运行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主张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无视对民族经济保护；宣扬最优的经济体制在美国等等。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国际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论述，这对于处于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产生影响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这种经济思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影响是十分有害的。理论界有的观点主张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实质是指私营经济）最有活力、民族经济概念已经过时、土地私有化才能解决农民增收等等，都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根本对立，公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思想，我们要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就必须坚决地扬弃其有害的观点。

(3)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这种经济思想在国际上为左翼学者所阐述，并且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于原南斯拉夫、原匈牙利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它认同社会主义，否定市场经济只能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市场经济不可能相容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市场机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等积极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有启发性的意义。所以，这种经济思想引起中国理论界的重视。但是，对这种经济思想，也要有分析地借鉴，不能照抄照搬。要看到，市场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上，依据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机制，主要理解为市场配置方式，忽略了市场配置方式总是同一定的所有制经济关系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经济机制，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机制是有区别的；在所有制经济关系上，它注重现象形态而忽视本质内容，没有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国有制经济同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国有制经济区别开来。因此，不应当把市场社会主义等同于建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则，就会忽视后者的科学性，不能发挥其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特有理论优势。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并自觉地发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优势，一定要注意防止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观点替代、修正、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二、发挥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优势

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在扬弃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促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结合。后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中国只有充分发挥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势，才能赢得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看不到这一点，以为惟有发展私营经济成分，才能加快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是很大的认识误区。须知，中国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作为前提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本的在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不着力于调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潜力，那就是主次不分，贻误大局。

认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一定要在概念上，把具有主观性的经济体制同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制度区分开来。改革经济体制，决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本身缺乏优势，而是因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具有主观性，

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脱离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也脱离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从而压抑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优势的发挥。一旦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实现有机结合，并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就能够体现出自身的优势。须知，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民族资本主义也是落后的，而私营经济的分散性、自利性和固有的剥削性，使它们不可能真正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要尽快地学会、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切有用的成果，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不能不依靠国内已经形成强大实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只有通过体制改革，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中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发生过的种种灾难。因此，深刻认识并善于发挥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至关重要。这种优势体现在许多方面。

1. 自我调节生产关系功能的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经济主体获得自身利益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一致性，因而经济决策具有最大的民主性，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性，一旦发现经济体制和实现形式上存在缺陷，有条件从人民利益出发，主动地进行自我调节。我们要深刻认识公有制经济的这种自我调节功能，发挥好这种优势，善于主动发现问题，发扬民主，尊重实践，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不断总结经验，自我完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2. 全国一盘棋的优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实践主体的价值目标具有利益共同性决定的。善于发挥这种优势，有利于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滋生的分散主义、地方本位主义，加快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城乡、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从现有综合国力出发，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尤其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处理好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从全局实际出发，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对经济发展辩证法的遵循，有利于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

3. 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决定的总效率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定，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阐述的这个优势，我们理解，就是公有制经济特有的分工协作优势，因为存在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决定，各方面就会同心同德去做，因而会产生总体效率；而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各种私有制集团存在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牵制，这就难以形成合力。社会分工包括垂直分工关系和水平分工关系两个方面，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客观要求，才能起促进作用，但是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把社会分工制度主观化了，这使公有制经济的分工协作的效率优势受到了窒息。其实，市场经济的效率也在于分工制度，其优势在于这种分工制度具有客观性，但是同时有具有自发性的弊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企分开，企业自主决策，有助于公有制经济纠正旧体制造成的那种人为的主观分工（自上而下的分配资源，组织生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可以放弃自身的总效率优势，相反，必须利用这种优势来克服市场经济固

有的自发性弊病。尤其要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资本所有者、出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纵向分工关系，并不等同于私有制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在政企分开之后，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由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决定的分工协作关系，因此，在面向市场决策，形成决策的过程中，公有制企业之间，上下之间，在各自明确责权利的同时，仍然需要在中央的领导下，水平协调，上下负责，用社会主义的分工协作的自觉性，减少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产生的决策的盲目性。善于发挥这种特有的优势，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超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效率。

4. 自主劳动者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广大劳动者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这种优势需要激发、组织和调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由于企业管理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用工实行在市场配置方式下的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就业制度，社会上雇佣劳动观念有所抬头，这种认识误区必须纠正。应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广大劳动者树立主人翁意识，明确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双向选择用工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联合劳动者从整体利益出发建立的自主管理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有本质的区别；让公有制企业的领导者增强社会主义观念，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自觉与资本家那种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管理作风划清界限，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样处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中，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资本统治人，而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人支配资本，这决定了后者有利于发挥出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一定要善于发挥这种优势。

5. 共同富裕的优势。“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共同富裕，这是公有制在分配关系上的表现，这个优越性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成良性循环机制，避免资本主义经济无法避免的生产过剩。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竞争，地区、城乡之间的生产力差异，会给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分配带来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如果盲目地扩大，必定会带来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并进而带来社会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为缩小差异创造了条件，这是因为，它可以较方便地从大局出发，采取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区域合作、扶贫支援等方式，促进共同富裕。善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势，就能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三、发挥中华民族精神的优势

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优势。

1. 中华民族精神的含义。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昂扬向上和品格高尚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是强大的精神动力。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境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为贵”的善良品格，崇尚和谐、“协和万邦”的博大胸怀，“厚德载物”的道德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坚强意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刻苦精神，“勤则不匮”、“戒奢以俭”的勤俭风尚，经世致用、躬身实践的务实态度，凡此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江泽民在中共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做了精辟地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千百年来，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正如党的总书记胡锦涛所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经艰险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与社会主义精神相融合，又增添了新时代的光彩。诸如，毛泽东阐述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邓小平阐述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要求，革命和拼命、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压倒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坚持革命乐观主义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五种精神”；江泽民阐述的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六十四字创业精神”；以及广大群众赞誉的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航天”精神等等，都是新时代民族精神的体现。经济建设要人来行动，人总是有一定精神的，不是有这种精神，就是有那种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人民必须树立新时代的民族精神。

2. 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强大优势。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争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扬弃悲观的、媚外的、骄奢的、浮躁的种种消极情绪，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1) 树立民族经济概念，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经济关系是物质利益关系，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民族经济利益。维护民族经济利益，这是爱国主义精神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应当深刻地认识到，国内市场国际化，经济全球化，都不可能消除民族经济的自身利益；“引进来，走出去”，对外开放，正是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利益。中外合资、合作，从使用价值或实物形态角度来看，财产混合，似乎不分你我；但是从资本价值角度来看，则产权清晰，外国投资越多，其占有的利润也越多，即使这些利润仍在中国资本化，所有权也不是中国人的。所以，所谓“民族经济概念过时”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牢固地树立民族经济概念，对于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于中国国民自主经营的各个企业，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加强民族经济

内部的团结，消除“内耗”，同心协力，在世界市场中赢得对国际垄断资本竞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2) 在发展国际经贸关系过程中，自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现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下，我们应当发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充分利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趋利避害，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中，加快自身发展。①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深刻认识当今世界经济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环境必然存在不稳定性，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风险性，保持高度警惕，自觉防范金融安全。

(3)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我国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对待这种客观事实，任何消极情绪只会使这种弱势更弱，惟有振奋民族精神，才能创造条件，变弱势为强势。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讲求科学态度的前提下，最重要的就是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可以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从事生产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潜力，减少成本的耗费，在竞争的客观条件较差时，这就显得格外重要。在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勤俭节约，减少浪费，可以变超量的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增加更多的积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所以，要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必须强调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所谓艰苦奋斗已经过时，高消费才能拉动经济高速发展，那是从表面看问题得出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也是与党的基本路线关于艰苦创业的要求相违背的。

(4)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优势的态势下，发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极为重要。巩固和扩大中国民族经济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必须依靠拥有先进的人才资源、核心技术、经营体制和足够的资本投入，但是，“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作为垄断资本人格化的外国竞争者决不会无条件地用自己的人才、技术、资金，去培育自己的市场竞争对手，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学习发达国家，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但是决不能有任何依赖外国的思想。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依赖思想是不会成功的。想用市场换技术，换回的最多是二等技术，失去的却是民族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想加快经济发展而过量地依靠外资，不但引起民族企业破产，而且背上重大的债务包袱，导致国内经济危机；想利用国外教育为本国培育人才，却因国内经济上不去而导致人才流失；这些痛苦的事实说明，要取得国际竞争的优势，关键要依靠自力更生。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统一，要立足国情，自强不息。下工夫提高国内教育质量，培养有国际水准的高级人才；科学地组织力量攻克难关，创造更多中华民族拥有的高新技术知识产权；扎扎实实地创新经营理念，形成更多的中华民族产品的国际市场品牌；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在发展国际分工的同时，避免“溶入”受制于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分工结构；总之，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才能真正增强民族经济的竞争力。

我们坚信不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发挥好科学经济理论的优势，发挥好社会经济制度的优势，发挥好伟大民族精神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景，必定灿烂辉煌！

第三篇

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

第一章　起步：科学社会主义经济观的确立与对工农经济斗争的领导

1917年至1927年，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及社会主义经济观，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本观点，并领导工农群众开展经济斗争的十年。定向，是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的主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们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十月革命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用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中华民族解放和富强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观，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一大"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在正确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经济国情的基础上，中共"二大"确立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并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一步的经济分析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

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实践，主要是对工农经济斗争的领导。建党之初到1923年底，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开展争取工人经济权利的经济斗争。1924年1月国共合作建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又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领导了更大规模的工农经济斗争。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观的确立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懈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的发展富强之路。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与历史的原因，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科学社会主义经济观。党的"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经济观的正式确立。从"一大"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工农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先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

(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840年到1842年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也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开端。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便不懈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经世致用的良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间，这种努力从未间断。中国社会不同阶级、阶层都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自己的设想，实践过自己的主张。

鸦片战争后，以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就提出要向西方学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对强国御侮的道路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提出了“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姚莹、包世臣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议会政治，并对当时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然而，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提出了学习西方、改革内政的主张，但由于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实践，更不敢触及封建制度，因而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强盛起来。

1851年至186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以实现一个人人共享太平的平等社会为理想。1853年3月，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绘制了太平天国革命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但《天朝田亩制度》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社会，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能实现的。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写下《资政新篇》，描绘了一幅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蓝图。但这些思想和主张，不是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没有任何实际联系，也不反映当时农民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也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内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了“自强”、“求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开展“洋务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活动。“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中法战争以及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改良方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次尝试。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103天里，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主张，先后颁布了几十道变法诏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走向富强。这些新政措施虽然并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操纵清政府实权的守旧派，极力反对和破坏变法维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王朝，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彻底的革命纲领，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未能依靠和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辛亥革命很快也因大权旁落而以失败而告终。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探求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艰难历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先进中国人心目中的救世良方。然而，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顽固性，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以及资产阶级势力的软弱，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民主制，都遭到了失败。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走不通，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要由新的先进阶级来领导。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阶级、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但由于各自的阶级局限，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表明，中国的发展，要由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来领导。

中国的发展要有新的先进思想作指导。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武器是不断发展的，包括平均主义、改良主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思想与理论在实践中或者失败，或者不彻底，这表明，中国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先进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作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二）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发展要由新的先进的阶级来领导，这一新的阶级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工人阶级。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产生的先进生产力，是从欧洲移植到中国的工业生产力。从人类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看，古代中国本来是可以产生工业生产力的。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的，在当时，导致18世纪末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条件，在中国都已经存在。从生产力发展趋势的角度看，中国应该是最先出现工业生产力的国家之一。但是，14世纪以后，中国生产力发展出现停滞趋势，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欧洲迅速发展，逐渐将中国抛到后面。在中国已经产生的先进生产力萌芽没有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代表这种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在欧洲，市民阶级以及以后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依次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推动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但是，在中国，传统的、保守落后的地主阶级始终是统治阶级，它从根本上制约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成长。在欧洲，由于先进生产力有了阶级代表，得到培育和发展，最终发展成为工业革命。而在中国，先进生产力因素则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备受限制。因此，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仍是以手工劳动为基本特征的小生产。

鸦片战争后，先进生产力因素由西方输入中国。最早的机器工业是“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企业。到甲午战争爆发以前，“洋务派”共设立了大小24个军工企业，同时在交通运输业、采矿业等领域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在民族资本方面，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民族资本创办的机器工业企业已经有130家左右。上述几乎所有企业采用的机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可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因素，是从西方移植进来的。

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惊醒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不再将机器等先进的生产力因素看成是有伤统治秩序和社会风尚的“奇技淫巧”，而是“强国富民”的工具。事实上，各个阶级都试图掌握和发展这种先进生产力。但是，一些阶级的实践归于失败，一些阶级的愿望流于空想。

伴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先进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但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后又大权旁落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的历史先后证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肩上。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它具有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革命性、组织纪律性等无产阶级的共同优点。同时，中国工人阶级还具有自身特有的优点：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其工资之低、工作时间之长、劳动条件之恶劣，远甚于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更强的斗争性和更彻底的革命性。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分布集中，在地区分布上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等大中城市，在行业分布上集中于纺织、造船、矿山、航运等行业，在企业分布上集中于少数较大的企业。这种集中性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和团结、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形成局部强大的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得中国工人阶级易于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更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承担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但是，要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自觉代表，中国工人阶级还必须掌握先进的理论，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得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阶级和最先进的理论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发展要有新的先进的思想作指导，这一新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便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而且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成一种潮流。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结束部分的译文。5月，《新青年》出版了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的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把《新青年》改组为自己的机关刊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社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马尔西的《资本论入门》、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并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员宣言》全译本。随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相继翻译出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大钊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编译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论文。北京小组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自己领导的群众团体，并通过这个团体收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外文书籍，编辑、刊印有关论著，组织讨论会和演说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前后，毛泽东等相继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新民学会的集会和通信中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1921年春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宣传辩证唯物论观点，讲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在筹建过程中，王烬美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冬，又成立了励新学会，并出版《励新》半月刊，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把《群报》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1年1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社由上海迁到广州，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年2月，沈玄庐主编的《劳动妇女》在广州出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

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信仰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已经是一批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比以前也有明显增加；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被翻译成中文；在内容上，已经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介绍。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确立

（一）在论战中选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在与胡适改良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论证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性，在理论上选择和确立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遭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责难与反对。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改良主义，反对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武器，反对用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根本解决”，主张用平稳方法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早期共产主义者与胡适改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评。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次有关中国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否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进行彻底改造的争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也在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前途。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揭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两大原理，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大都市发生的产业一天多一天，失业的无产者阶级也一天多一天”，其结果，“大家联合起来，和资本家作战，和资本家竞争。——这样发达的资本家，他们自己却产生了可以致其死命的敌人——无产阶级。”即在“资本主义的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最终，“他的发展境界，就是他的灭亡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

其次，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揭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依据。李大钊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腐朽的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在经济组织没有改善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也就是说谋求中国社会的改造，首先必须根本变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制度”。

第三，从十月革命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高度，寻求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世界历史依据。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后，“世界的经济组织，即已经资本主义以致社会主义”，世界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并因此得出结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剥削阶级，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性的论证是充分的、科学的，这一论证，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确立社会主义经济观的基础。

(二）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确立社会主义经济观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如果说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早期共产主义者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而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则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确立社会主义经济观。

1920年9月，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讲演中，罗素攻击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宣扬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罗素的主张得到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响应。张、梁先后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提出要依靠绅士、商人和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张、梁的错误言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纷纷发表文章，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其中，以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判”两篇文章最为深刻有力，影响较大。不仅论证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确立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观。

李达在文章中揭露了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批判了梁启超借口中国经济落后和缺少劳动阶级，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认为：中国新式生产机关少，需要开发生产事业，但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势必如欧美那样招来经济恐慌、人民失业，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则不会出现这种危险。李达还驳斥了梁的改良主义主张，明确表示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指出，俄国的革命运动采取了劳农主义的方式，“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

针对张、梁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论调，陈独秀指出：“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经济制度要渐渐国际化，“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陈独秀还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流派分为五种，逐一进行分析、比较，批判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指出中国应该像俄国共产党那样，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探索，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途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探索结论，归纳起来包括下述几点。首先，应效法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创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前提。蔡和森指出，“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惟一制胜的方法”。其次，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没收一切生产手段——土地、大工厂、资本——和交通工具为国有……以建立共产社会的经济基础。”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对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途径，根据资本规模、性质的不同，分别作了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具体形式，早期共产主义者观点比较一致的主要是下述几点。第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在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上，瞿秋白通过研究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实践，认

为社会主义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即包括国立的、集体的（包括市立的和工人协作社）等多种形式，而且，不排斥私人的经济层次。第二，社会生产目的不再是满足个别人的需要，而是“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保证“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第三，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会再受资本家的奴役，这时候人人都劳动，资本家也成为劳动者。第四，在分配方面，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即“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动相等的份”。第五，从生产的组织形式看，生产必须集中统一领导，“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各职业的单位非绝对服从中央权力不可。”在生产组织的具体形式上，李大钊设想设立农部委员会、工部委员会等国家执行经济职能的专门机构，对经济发展实行计划管理和专业管理。陈独秀则设想由“公的机关”来“统计调节和直接经营”社会主义生产。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途径，早期共产主义者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后，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成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瞿秋白结合苏联经验对中国这一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论述。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工业建设。“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大工业”，必须“迅速地自主地开发中国大工业”，这是经济落后国和半殖民地所应当走的道路。其次，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落后国家要迅速发展工业，“必须和暂没倒的外国资本家相利用”，“以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第三，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瞿秋白在考察苏联不同类型的企业之后，认识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不同的所有制之间应该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同时，主张发展集市贸易，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他认为，设置贸易市场，为人们进行商品交换提供了机会，大多数劳动人民会受许多方便利益。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方向的确立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的基本纲领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党的第一个基本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开始，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方面，即要“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④立即“没收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资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并把它们转交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为此，早期共产党人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第一步，“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第二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即效仿俄国十月革命，不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用革命手段消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早期共产党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确立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经济国情了解不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不够，早期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尚不成熟，因此，企图超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达到社会主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本点的初步形成

（一）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及基本经济国情的科学判断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这一进程，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寻找中国的发展之路，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及经济政治特征，并没有科学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经济国情的认识上，也是错误的。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由于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地看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提出用十月革命的手段打倒中外一切资产阶级，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并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对中国基本经济国情和社会性质逐渐获得了正确的认识。

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应当“正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国便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观点。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基本经济国情作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宣言》回顾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八十年来，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侵占了中国的许多通商口岸，强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并派驻军队，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被破坏。外国的资本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经济生命的神经系已为帝国主义所掌握。在中国境内，三分之一的铁路为外国资本家所有，其他的铁路也由外国帝国主义者协订和管理；外国资本家开设工厂，开采矿山，开设银行，操纵中国的金融。中国三万万农民日趋穷困，数千万手工业者逐渐成为失业的无产阶级，国家和民众的经济生活都陷人极恐慌的状态之中。此外，帝国主义还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他们在中国建教堂、设学校，出版报纸，奴化中国人民。

《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经济国情。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宣言》还对当时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的人侵，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来了。"除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外，中国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进人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决不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压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而，"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哪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人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纠正了中国"一大"关于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认识，并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二)"两步走"革命战略的确立

如前所述，中共"一大"时，共产党人不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经济国情缺乏正确的了解，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也对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缺乏全面的理解，认为十月革命后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同步进行的国际革命整体，中国革命理应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大"后，也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从而也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点。

1920 年 6 月，列宁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阐明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他把民族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要求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革命过程中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争取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途，"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经过 1922 年 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了解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学说，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不能空谈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不再主

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解决中国社会革命问题。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接着民主革命的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正确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这个社会中，“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基于这种分析，中国“二大”宣言除了重申“一大”所提出的最高纲领以外，还着重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初步结合的体现，并为继续深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纲领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革命规律，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同时也为早期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经济斗争指明了方向。

从“一大”到“二大”的一年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经历了由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反复强调中国现阶段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作中心由反对资本家阶级为目的的工人运动转向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在此后的工人运动中，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更为突出。二是强调反封建，提出中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必须进行“农民土地革命”，实行“没收土地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本点的开始形成。

（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分析

中共“二大”关于中国经济国情和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以及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的确立，是对中国，革命的正确的历史定位。那么，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和组织阶级力量来进行政治经济斗争，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的经济分析，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待革命的立场、态度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专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指出：大商人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有民族革命的要求，但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经济地位不稳定的小商人、手工业者和生活不安定的知识分子，也希望有一个民族民主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多来自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

者。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得出结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着重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代表了当时党内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最高水平。关于无产阶级，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原因就在于其经济地位低下。工业无产阶级"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农村无产阶级（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经济地位的低下，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最强。

小资产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按照经济地位的差异，毛泽东又将这一个阶级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因为其经济地位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部分人也想发财，但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其难以如愿，他们对革命抱中立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第三部分是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虽然平时对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到革命高潮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中派参加革命，其右派也会附和革命。

半无产阶级主要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商贩等。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之别。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也要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每年农业收成，自己可得一半，辅之以其他劳动，可以勉强维持生活，因而其革命性要强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另一部分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向地主交租之后，所得无几。他们是农民中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苦的，很容易接受革命主张。小手工业者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资料，但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且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店员、小商贩的经济地位也与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也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革命，故对于革命宣传也很容易接受。

毛泽东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受到外国资本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迅速发展，危及到其利益时，又怀疑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只能是一个幻想。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着手，分析了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雏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结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基本点：第一，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对象，在经济上也是打击的对象；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要争取的力量，在政治上要团结他们，在经济上也要保护、照顾其利益；第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必须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并在斗争中为他们争取经济利益。以这些基本思想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后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实践的起步与开端

在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经济工作实践。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工作，主要是领导工农经济斗争，即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为争取和维护自身经济权益而斗争。国共合作建立前，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开展争取工人经济权利的经济斗争。1924 年 1 月，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领导了更大规模的工农经济斗争。

一、对工人运动中经济斗争的组织与领导

（一）建党初期领导工人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工人运动，并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发动和组织工人为争取合法权利和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 年 8 月，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入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举办工人业余学校和出版校刊，对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帮助各地工人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为了使全国务工会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又及时地提出了召开全国劳动大会的主张，并在会议通告中把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作为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

1922 年 5 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要求劳动立法以保障劳工利益案"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组织的总通讯机关，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从一开始就获得了领导地位，这对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工人运动及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统一起了重大作用。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在分析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工人运动的各项原则和方针政策。决议指出：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工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生活的运动。工会在领导工人进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等经济斗争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必须坚持集体契约和同工同酬的原则。中共“二大”还把废除包工制、八小时工作制、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工厂保险、保护女工和童工、保护失业工人等改良工人待遇的斗争作为党当时的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规定了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并把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为党领导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指明了方向。在这一决议案的推动下，全国的工人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罢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不仅争取到了一些正当的政治权利，也为工人阶级争取到了正当的经济利益。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是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在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劳动立法运动的推动下，全国的工人罢工斗争迅猛发展起来，大小罢工达100多次。从经济斗争的角度来看，其中最重要的罢工是1922年4、5月间的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罢工，9月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0月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

1922年4、5月间爆发的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一次较典型的以争取工人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罢工斗争。1922年3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启汉的组织领导下，日华纱厂正式组建了上海浦东纺织工会，积极酝酿进行罢工斗争。4月，浦东纺织工会代表日华纱厂工人，先后两次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算还工人所有的存工（即平时和节假日加班所积存的工作日）、赔偿损失等五项要求。经过两次罢工斗争，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22年9月爆发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为成功的罢工斗争。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3000多工人实现了大罢工，并发表罢工宣言，向路矿当局提出承认工人俱乐部、不得随意开除工人、不得殴打工人、发还欠饷、增加工资等17项条件。经过激烈斗争，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开除工人须公布正当理由，不能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抚恤因公伤亡者；不得殴打工人；增加工资；发还欠饷；津贴俱乐部等。基本上满足了工人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罢工胜利后，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1922年10月，开滦煤矿4万多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下举行的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唐山

地区工人运动十分重视，先后派邓中夏、罗章龙；王烬美、邓培等到唐山开展工作，筹建工会，发展会员。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开滦煤矿工人于10月16日联合向矿局提出分等加薪等六项要求。这次大罢工虽然没有达到原来提出的要求，但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待遇。

在罢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不仅争取到一些正当的政治权利，也为工人群众争取到一定的经济利益。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努力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直接利益，同时，工人阶级作为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其经济利益也体现着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二）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工人经济斗争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斗争之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工人群众的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但争取经济权益也始终是工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劳动运动议决案》，11月，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又通过《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提出了恢复工人运动的计划，“先行选择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铁路、海员、矿工，集中我们的力量，加以切实的各个组织或整顿。”并为此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建立，为工人运动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1924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名义，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十分重视工人的劳动权利和经济利益，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规定：组织职业介绍所，介绍工人就业；学徒不开夜工；设立工人医院；开办工人夜校等。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领导，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会后，工人运动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7月，广州沙面工人罢工的胜利，标志着工人运动的复兴。

在广东工人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各地工人运动和工人经济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在南方，1924年8月，苏州1万多名机纺工人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浙江余姚盐工为反对盐运官吏设立公仓，危害盐工利益举行大罢工；苏州铁机丝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木机工人举行同情罢工；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汉口8000多人力车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其后，又有广州排字工人罢工，武昌裱糊工人罢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上海闸北三星毛巾厂工人反对减少工资举行罢工，浦东码头工人为增加工资而罢工，上海平和洋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在北方，中国共产党营救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后被直系军阀所逮捕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并恢复了京奉、京汉、胶济、正太、京绥、陇海等铁路工会组织。随后，北京、唐山、沈阳等城市和胶济铁路工人相继举行罢工斗争。这些罢工多是经济斗争，其中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胶济铁路工人罢工以及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影响最大。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大会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提出必须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为各种具体的群众的利益而奋斗”。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经济斗争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会议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这次大会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决议指出，“劳动者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人劳动者手中之后”，但在现阶段“我们不否认改良劳动待遇条件，提高工人生活程度”斗争的意义。决议详细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要求：（一）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这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二）8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8小时以上，只能往下少，不能往上增加。同时要注意在工作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工资不能减少；（三）反对一切虐待；（四）改善女工、童工的生活；（五）实行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六）取消包工制。大会还强调，全国总工会要具体指导所属各业工人，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争取这些权利，去从事为获得这些权利的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从1926年秋到1927年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人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声势迅猛发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准备了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工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工人群众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如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和收回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的斗争，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斗争。

在湖南，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应仍随时随地作经济斗争，以逐渐改善其生活状况。”并提出了工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制定劳动保护法保护工人合法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额；禁止雇用童工；男女工资平等；实行劳动保险；救济失业工人等。大革命高潮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各工会进行的经济斗争就有108次。经济斗争的结果是，湖南有20万工人平均增加工资20%到25%。

武汉地区工人群众为改善生活，进行了较多的经济罢工。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4月，工人罢工达300余次。在这些斗争中，罢工工人都提出了经济要求，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等。工人群众开展的这些经济斗争，大都取得胜利，有的工厂废除了封建性的工头和包工制，有的工厂实行8小时制，绝大部分产业工人、店员、手工业厂工人都不同程度的增加了工资。

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在一开始是比较务实的，但是在工人运动迅猛发展中，长沙、南昌和武汉等大城市，特别是武汉，也曾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是经济主义倾向，未能正确地贯彻劳资两利的原则，对民族工商业（包括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照顾不够。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的要求过高，工资增加

过快过多，劳动时间缩短也过多，超过了资本家的承受能力。罢工斗争中，甚至一度发生过擅自封闭工厂、商店，强制雇工，没收工厂、商铺，给资本家戴高帽子游街等个别情况。这种“左”倾错误阻碍了武汉地区经济发展，在社会上、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影响了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而且，这种’“左”的错误成为根据地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历史源头。

二、对农民运动中经济斗争的组织与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经济斗争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认识的深化，对农民问题也逐步重视起来。1922 年 6 月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把“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它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的征税”作为党当前的奋斗目标。中共“二大”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并对中国农民的经济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摆脱贫苦状态的惟一办法就是革命。“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6 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分析了农民生活愈加困难的现实，指出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团结小农佃户及雇工，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以保护农民利益，推进国民革命。这是共产党制定的第一个有关农民运动的专门决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实践上重视农民运动的开展，把宣传和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提上了自己的议事日程，并为领导农民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提供了依据。

这一时期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有以下三次，主要都是从事经济斗争。

浙江萧山县衙前镇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的农民运动，1921 年 9 月，在沈玄庐（时为共产党员）领导下，召开衙前农民大会，正式成立农民协会，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展了抗捐减租斗争，发动 1000 多人举行减租抗税请愿示威，要求“三折还租”。这一斗争波及萧山、绍兴、上虞等县的 80 多个村庄，他们以衙前为榜样，建立农民协会，进行抗捐减租斗争。

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1922 年 6 月，共产党人彭湃便开始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1922 年 10 月，成立赤山农会。在赤山农会的影响和彭湃的推动下，海丰许多乡村都建立了农会。1923 年 1 月 1 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彭湃当选为会长。海丰总农会“所采取的政策：一是对付田主；二是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彭湃起草的《海丰总农会临时章程》和《农会利益传单》等文件，将农会的作用概括为 17 条，其主要方面，都是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如防止田主升租；防止勒索；防止内部竞争；凶年呈请减租；救济疾病；救济死亡；救济孤老；救济罹灾；共同生产；便利金融等。广大农民看到农会是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都纷纷加

入农会，海丰总农会很快发展到6万多会员，并影响到附近各县，陆丰、紫金、惠阳等县也相继成立农会。1923年5月，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会员有13万多人。广东省农会的纲领主要是争取农民的经济利益。在斗争中，农会也领导农民维护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如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以“同盟非耕”对抗了地主加租易佃的阴谋等等。1923年7月，海丰受暴雨洗劫，农作物损失90%，农会又领导农民进行了减租斗争。而地主与官府勾结，派兵包围并强行解散了总农会，农民的这次斗争遭到失败，农会转入地下。

此外，还有1923年5、6月间刘东轩、谢怀德领导和发动的湖南衡山岳北农民运动。他们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展平粜及阻禁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会员一度达10余万人，但年底即被反动政府镇压。

（二）北伐前对广东农民运动中经济斗争的领导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为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我们应当要求国民党实行废除额外苛税并禁止大地主对于贫苦佃农之过分的剥削。”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再次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在农民运动的奋斗目标上，大会不仅重申了5月扩大会议的有关规定，而且提出了“以官地分给贫农”的主张。并指出在领导农民进行经济斗争时，“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捐杂税，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特别强调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指出：“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而为目前之自救计，农民也有最低限度的要求，在经济方面的要求是：由农民协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反对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用地方公款办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等等，这次会议不仅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长期奋斗目标，也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过渡要求，为农民运动中的经济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规定了正确的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广东的农民运动，首先恢复并发展起来。1925年5月召开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也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了减租和抗捐等经济斗争。

1924年8月，广宁县恢复农会，秋收时农民就提出减租的要求。11月农会发动减租运动，地主以武装镇压。在彭湃等人的建议下，广东革命政府派军队前往支援农民的斗争，农民的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与此同时，惠阳、海丰、陆丰等县也都开展了减租运动，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1925年秋，高要农民又发动减租，又遭地主豪绅的武装镇压，广东革命政府派兵援助，国民党区党部也给予支持，减租斗争取得了胜利。广大农民不仅要求地主减租，对一些苛捐杂税也进行了抵制。1924年10月，东莞、雷边、锦夏等乡农民进行反对虎门要塞司令及联团所抽取的三十余种苛捐的斗争。

在广东农民运动的推动下，湖南、湖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开始恢复发展，并开展了

一系列经济斗争。1925 年春，毛泽东回到湖南，发动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很快就建立了 20 多个秘密农会，领导农民进行了平粜阻禁等斗争。1925 年湖北大旱，绝大部分县受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的抗租斗争风起云涌，在斗争中各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也有发展。此外，在南方的江西、广西、四川，在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农民运动都有所发展，并开展了一些经济斗争。

（三）北伐后对农民运动中经济斗争的领导

随着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农民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右的倾向。1926 年 9 月 1 日，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批评了农民运动中右的倾向，强调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争取自身权益的经济斗争。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中共湖南区委所接受。1926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湖南区“六大”，强调农民参加政治经济斗争，并提出了 38 条农民运动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其中经济方面的要求有 24 条。这是农民运动中对于农民经济要求最为完整最为详细的表达。12 月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将中共湖南区“六大”提出的 38 条要求扩大为 40 条，并将国民党联席会议规定的减租 25%，提高为最高可以减至 30%。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等，一齐向农民进攻。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陈独秀也指责和限制农民运动。1926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观点，经济方面，在农民已经以平均佃权为口号实际提出土地要求的时候，会议仍强调农民的要求只是减租减息，而不是土地问题。

1927 年 3 月，毛泽东在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在经济上政治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行动纲领，明确指出农民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农民经济斗争也得到普遍加强。

这一阶段农民的经济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平粜、阻禁，协议谷价，限制和禁止谷米出境。(2) 减租、减息。(3) 农民协会组织力量，清算了旧农会的款项、社会积谷以及地方公产公款，对侵吞公款公产者，除退赔之外，还处以罚款。

特别突出的是，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进行土地革命。1927 年 3 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名义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起草的对农民宣言，已明确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中共湖南区委也把土地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1927 年 4、5 月间，湖南一些地区的农民协会成立了区乡土地委员会，“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首先是清丈土地，这一方面是使交租和田地面积相当，同时也是为解决土地问题作准备。其次是播标即重新分配土地耕种权。清丈对佃农有利，无田可耕的农民便要

求标田。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前奏。在此基础上，一些地方开始分田，将田地依照人口进行分配，如在宝庆，“农民收了两千多张田契，都用火烧了，闹到后来，不但农民要求分田，就是地主们也自愿将田拿出来让大家分。”但这只是个别地区。

湖南农民运动猛烈发展的同时，湖北、江西以及其他省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1927 年 2 月湖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全省 69 个县中有农民协会的县就有 40 余个，会员 50 余万。农民组织起来后，立即进行了减租减息、反对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权等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减租减息已普遍实行，有的地方干脆不交租不付息。罗田、黄冈、阳新等县的农民还提出了分配土地要求，少数地方已清丈田亩、登记土地，并重新分配土地。北伐军进军江西后，江西的农民运动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到 1927 年 2 月召开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农民协会已发展到 15 个县，会员达 30 斤。农民进行了包括减租减息、选举乡村自治机关在内的经济政治斗争。此外，北伐后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福建等省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三节　起步阶段经济理论探索与经济工作实践的特点与经验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探索和经济工作实践都处在起步阶段，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也积累了初步的领导经济斗争的经验。

一、起步阶段经济工作的特点

（一）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工农群众进行经济斗争。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27 年 7 月国民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广大工人、农民进行争取工农群众的经济利益的经济斗争。

这一时期以经济斗争为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代表，其历史使命是带领广大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而在当时，直接的目标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共“一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中共“二大”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这一阶段的革命任务，决定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因此，党在经济工作方面，就是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开展经济斗争。这样，一方面可为工农

群众争取经济利益，动员群众，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另一方面，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打击。

经济斗争的组织形式是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经济斗争，主要是通过工会、农会来进行的。动员组织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斗争的任务，单靠共产党员是很难完成的，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以他们为骨干组织各种形式的工会、农民协会，这样才能更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中，不仅组织了大量的工会、农会，而且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开了第一次到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革命时期又召开各省的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在工农经济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工农运动，主要内容在工人运动中是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在农民运动中是减租、抗捐、平粜阻禁直至土地革命。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先后爆发工人罢工斗争187次，参加人数30万以上。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更是迅猛发展，工人罢工斗争规模更大，参加的人数更多，农民运动的范围更广、更深入。在工农运动中，广大工人农民争取到了更多的经济利益，罢工工人的经济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农民的减租、抗捐、平粜阻禁斗争也取得明显成效。

（二）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从1921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基本内容，包括与北洋军阀、国民党右派的政治斗争，争取工农经济利益的经济斗争，反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的思想斗争，领导武装斗争等。相对而言，经济斗争在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于政治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因为，只有政治斗争的彻底胜利，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完成，才能从根本上争取到工农群众的经济利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员第一个决议就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指出："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根本任务是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即完全打倒剥削奴役工人的资本制度，并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工会在领导工人进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等经济斗争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进行劳动立法运动；必须把反对某个工头或雇主的斗争，变成反对整个剥削阶级的斗争，变成真正的阶级的行动。"工人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奴役工人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议决案还强调："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关于《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指出："工会的责任是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扩大他们的眼界，使日常的斗争问题，都和

工人最切身的利益联结起来……这样日常的争斗，应发展而且能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提出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争斗”。1925 年 5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再次强调：工人阶级“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

在工农运动的实践中，经济斗争也是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立即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并为此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柏当程度上是经济斗争。但是，工农群众的经济斗争必然遭到反动统治者的镇压，因此，政治斗争随即出现。“如工人的罢工，本是经济的斗争，但是资本家一利用军警来干涉，便转成政治的斗争了。”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的每一次罢工斗争，都既提出了政治要求，也提出了经济要求。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政治斗争的特点突出出来，工农群众在进行争取自身经济利益斗争的同时，投入国民革命运动，有些是先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而后才组织进行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斗争，甚至主要只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如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既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斗争，减租、抗捐，甚至重新分配土地，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斗争，如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夺取乡村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改造团防，建立农民自卫军。而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汉口、九江工人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等．则主要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三）通过统一战线开展经济工作

1921 年至 1923 年，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了工农运动中的经济斗争，1924 年 1 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经济斗争则主要是通过统一战线来进行。

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国共合作的实现。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强调工农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开展工农运动的重要性，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提出：“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并明确规定：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国民党“一大”后，从国民党中央到各级党部均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而这些机构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里。总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进一步所确定的新的劳工政策，以及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各级工人部农民部中担任负责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开展工农经济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工人运动和工人经济斗争方面，国民党“一大”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领导下，首先统一和整顿了广州的工会组织，随后，孙中山以广东军政府大元帅的名义发布的《工会条例》，对广东和全国工人运动及工人经济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24 年 7 月，在中共领导下，广州沙面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得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坚决支持，英法沙面租界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的一切政治经济要求，补偿了罢工工人的薪金。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国民

党上海执行部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组织领导了这一反帝大风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中，共产党坚持了同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方针，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就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组成的，其中，国民党员10人，共产党员3人。除少数国民党右派外，国民党及广东革命政府对罢工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为了支援罢工，广东革命政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经济上打击英帝国主义；为了解决罢工经费和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在经济上给予积极的支持，"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是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1万元"；组织"广东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开展经济斗争。

北伐开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通过了《工人运动方针案》，重申坚持孙中山扶助工运的政策，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初，积极领导支持了当时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如对武汉英美烟厂工人、两湖海员要求改善待遇罢工斗争的支持，对汉口、九江工人群众收回英租界斗争的领导等。但国民党毕竟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除了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外，其对工人运动的支持领导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工人运动真正起来之后，他们又心怀恐惧，有所防范，国民党右派甚至叫嚷工人运动"罪在不赦"，要"依法究办"。

在农民运动和农民经济斗争方面，国民党"一大"成立的农民部以共产党员林伯渠为首任部长。1924年5月，国民党中央又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这是一个国共两党合作指导农民运动的组织。在共产党员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办了六届，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在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下，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农民经济斗争迅速发展起来。1924年11月，广宁县农民发动的减租斗争遭到地主武装的镇压时，广东革命政府派铁甲车队和卫士队支援农民的经济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1926年9月7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重申要"竭力为农民改良其经济状况，当遵先总理之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务使农民能自由使用田地，同时政府当援助农民奋斗，使其能减低借贷之利率，及免除不合法之盘剥。"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又颁布了一些支持农民运动的文件和法律，国民党人尤其是国民党左派都能较好的执行。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其不可能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因而农民运动和农民经济斗争的实际领导，便落到共产党人身上。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

二、起步阶段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本经验

（一）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国情是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基本情况的总称。毛泽东指出："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科学认识中国国情，正确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及科学社会主义经济观，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

本点的基本依据，早期的共产党人在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观的过程中，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把握，就走过了一段弯路。而在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了中国国情之后，才在确认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点。

如前所述，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都在不断地探索中国的发展之路，但他们的探索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中国的先进分子立即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俄国，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走社会主义的路。但是，中国是否具备走社会主义之路的条件，就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所谓中国是否具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即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是否具备，从根本上说，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的情况，如何估计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阶级觉悟和革命性的问题。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一切产业的社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的经济基础，而中国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基础，因而，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要比一些发达国家“加倍困难”，中国人应该知道这一点是中国的“短处”。但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又认为，中国现阶段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等于中国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中国已经有了社会化的大工业，有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队伍，而且由于尖锐的阶级对立，因而中国革命必然要爆发。无产阶级可以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再“借着政治的优势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还以俄国为例，说明工业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靠社会主义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力。他们还认为，是否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不在于主观理想、知识程度以及道德程度，而在于“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以及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程度”。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这种分析，虽然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但从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确立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上来说，是正确的。而从当时工人阶级应该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来看，早期共产主义者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没有科学的把握，其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显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提出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从而提出了一个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纲领。

“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对中国基本经济国情和社会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正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经济国情的基础上，中共“二大”形成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正确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点。

（二）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自己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并没有为共产党人如何领导中国革命提

供具体的公式、现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才能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指导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中共“一大”提出的党的纲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没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中国是一个外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有封建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如中共“一大”所判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开展革命斗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革命过程中，又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能解决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一大”后，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引入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

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初步结合的体现，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进程的科学把握，并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本点的提出及对中国革命道路、规律的进一步深入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章　摸索：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经济革命道路的确立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初步展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二次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通过什么样的道路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这一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课题。独立地探索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基础土，进一步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从而正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领导根据地人民初步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实践。

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时期：1928年到“六大”，土地革命初步展开。“六大”到1930年，土地革命开始深入发展。1931年到1934年红军长征之前，是“左”的错误统治经济工作的时期。1934年到1936年，随着红军的长征和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经济革命道路的确立

大革命失败标志着“二次革命”道路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力图把握中国社会经济特点、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特点，进而在理论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革命理论，确立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革命道路。

一、对中国社会经济国情认识的深化

早在大革命时期，党的“二大”已经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分

析，确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在许多方面又变得模糊起来，随之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重新产生了疑问。正如李维汉回忆的，“六大”前，“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还没有统一认识，有待于澄清和解答，否则便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六大”正确揭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性质之间的关系，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和强大的思想武器。而参加这次大论战又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国情的认识。

（一）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

大革命失败前夕，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少数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又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认识。于是，中国国内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4年下半年也经历了一场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论战的双方主要是以托洛茨基观点为指导思想的动力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思潮派。论战主要围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这三种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农村社会经济性质问题展开，争论的核心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定位问题。论战的实质和落脚点则是中国向何处去，要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

以严灵蜂、任曙为代表的托派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出发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观点。他们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现在发展到了摧毁封建经济，支配全国生活，可以实行非资本主义运动的程度”；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认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中国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国经济”，因此对二者应“一视同仁”、“一并计算”；认为“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了。”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应该直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同时又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发达，还缺乏革命的基础。针对上述种种谬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新思潮派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分析，一一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们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封建半封建的经济占支配地位，中国资本主义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经济中占压倒优势，中国农村现存的仍然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因此，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二）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特点认识的深化

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及特点，考察各种经济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系统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们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的市场，与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它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认为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占得大的区域，在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压倒的势力，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且，“民族工业的破产（丝业，棉业，面粉业，烟草业，火柴业，北方的纱业），成了目前普遍全国的现象。”因此，中国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独立地发展，相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有依附关系，也根本不可能统治全国的经济生活。关于农村经济的特点，张闻天指出，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使商品经济在中国农村得到了急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只是加紧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剥削”，而这种剥削，“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生产方法，还是手工的而不是机器的，还是封建式的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

（三）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科学判断

通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科学定位和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特点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他们认为：“就整个中国经济关系来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领了领导地位，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确已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因此，“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

中国共产党人还指出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特性。由于在中国封建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都不可能取得支配地位，因此，“目前中国的经济是在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期中，其特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理论深化，对于确立中国正确的革命道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正如张闻天在分析了中国农村经济状况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后明确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我们称做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经济特点和性质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的。在这一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

认识，没有把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区别开来，没有认识到民族资本代表的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主张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打倒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当然，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明确地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经济革命道路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党曾经遇到来自"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在与这些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新民主主义一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道路。

（一）"二次革命论"的破产

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特点及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但是由于他过分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低估工人阶级的力量，因而认为"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于是机械地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否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基于这种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应该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工人阶级壮大以后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样一种"二次革命论"思想的指导之下，他主张国民革命中一切工作以国民党为中心，放弃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放松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性的警惕，认为党当时的主要任务只是一般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言反对土地革命，压制工农武装运动。这一错误理论的实践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使革命陷入危机之中。大革命失败和国共合作破裂，已经证明"二次革命论"的破产。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前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以后，这种理论被实践证明是反动的。

（二）"一次革命论"的失败

1927年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是，在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左"倾错误开始发展。党内一部分人对革命形势作出了盲目乐观的估计，强调中国革命的"不断高涨"和"无间断性"，主张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

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次扩大会议后，在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各地发动了多次武装暴动，但由于多数暴动并不具备条件，带有盲动主义性质，遭到失败，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由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和中央的及时纠正错误，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得到了纠正。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发生的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加上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的观点的影响，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又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和"已经形成"。这就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 年 6 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准备武装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为此，李立三制订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了"暴动、暴动、再暴动"的口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李立三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刚刚复兴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六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1931 年 1 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理论对党的统治。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过"左"理论。在革命形势上，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强调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工作重点上，否认敌人对城市和乡村统治的不平衡性，坚持城市中心论，忽视农村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在革命方式上，不切实际地强调"以罢工为主要武器"；在社会性质与革命任务上，片面夸大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对封建经济基础严重估计不足，模糊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主要任务；在革命的力量上，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是工人、贫雇农、中农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性质上，把反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为民主革命的任务，片面夸大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中的全面推行，使党的力量遭受了惨重损失。到 1932 年底，国统区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党中央被迫于 1933 年 1 月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经济革命道路的确立

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破产。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探索一条新的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不仅确立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整体革命战略，而且确立了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经济革命道路。

在白色恐怖的严重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逐渐开拓了通过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和工农兵政府，并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初步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人对根据地经济结构、各种经济成分在根据地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整个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前途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1933 年 4 月，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分析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时，认为革命根据地经济包括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小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国营企业等几部分，初步说明了根据地经济构成的雏形。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对根据地的经济结构也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部分组成的。"并指出，"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经济，不待说，现在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他不仅认识到根据地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还指出了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前途是"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因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苏维埃政权不仅不可怕，而且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应在政府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倡和奖励它们的发展，利用它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还没有明确指出根据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他们事实上已经实实在在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并将这种探索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确立并走上了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革命道路。

三、开展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三个方面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大力开展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根据地建设。他们认识到，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依托和物质保障，土地革命成果也无法巩固，革命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要取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开展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

1. 开展经济工作是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保障的需要。

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因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面前党的紧急任务》中提出了"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可见，党已经认识到，只有开展经济工作，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去最大限度地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才能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2. 开展经济工作是供给和改良根据地军民生活的需要。

"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是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革命根据地处在白

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之中，敌人力图“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而且，奸商反动派也趁机作乱，这就使根据地的生存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危机。为了巩固已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改良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必须同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根据地投机奸商不法分子作经济斗争，“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3. 开展经济工作是巩固革命根据地，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需要。

经济建设不仅是为革命战争提供保障的需要，供给和改良革命根据地军民生活的需要，是开展根据地其他工作，巩固根据地，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确保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需要。例如，增加财政收入，活跃物资交流等方面的经济工作，不仅是巩固根据地，保障革命战争胜利的需要，而且是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巩固工农联盟，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为将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创造优势和前提的需要。

（二）经济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地位

由于革命根据地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与封锁之中，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建立工农专政的新政权，这决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经济工作不处于党的工作的中心位置，但由于经济工作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性，经济工作在党的工作中不能不处于重要位置。

一方面，经济工作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即革命战争。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那时还没有开展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工作。后来随着实际斗争的需要，党在根据地开展了一些经济工作，但“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经济建设的规模、财政投资的方向、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都必须根据战争的需要与可能，量力而行。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另一方面，经济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强调革命战争是党的中心任务，并不是否定经济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性。即使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党就认识到“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的重要性，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因此，党和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着重讨论和开展经济建设工作。

（三）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确立了经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从新民主主义经济革命和战

时经济的角度，明确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1. 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反映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方面，就是“为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及国内封建残余而斗争。”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核心就在于取消农村经济中的一切封建剥削，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同时，将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实行国有，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

2. 支持和鼓励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为将来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前提和优势。

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因此，党从各方面积极推进这两种经济的发展。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告诫全党：“我们应该有系统的来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应该经过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为将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创造前提和优势。”

3. 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党在根据地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鼓励资本家发展工商业。1931 年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苏维埃政府对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尚保留旧业主手中而不实行国有，但由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及工厂委员会实行监督生产。”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强调指出，在红色根据地内，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内的私人经济要提倡和奖励，要允许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优势。

4. 经济建设应当为革命战争服务。

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应当为革命战争服务，明确了经济建设的内容、方向和目标，从而防止了党内把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摆正了二者的位置。同时，党还对认为只有等到革命战争结束后有了和平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和离开革命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严肃批评。这就使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服务成为党开展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总之，党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影响并决定着这一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发展，对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很多思想在今天还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由于战争环境下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党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也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表现在往往是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力量对比变化等方面，而不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制定自己的经济方针，因而还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等。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初步展开

在上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与经济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工作。主要包括实行土地革命，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物资交流；建立新型的财政金融，保障革命军队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支援革命战争等内容。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党一方面初步积累了开展经济工作、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为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成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推进土地革命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从战略上真正认识到了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把工作重心转向开展武装斗争和领导农村土地革命。

（一）实施向土地革命的战略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并初步提出了土地革命斗争只有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三者有机结合的过程中才能顺利进行的基本思想。1927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布农字第九号通告《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到土地革命的新阶段，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必须领导农民用武装夺取政权，并依靠这一政权来进行土地革命。最早体现党关于土地革命这一重要思想转变的是八一南昌起义。这是党把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起义一开始就是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明确规定起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实现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起义军在行军途中，讨论和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沿途向农民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并在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为中央制订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提供了经验。“八七”会议上，中共又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提出要发动农民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思想。会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干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

作为生产关系领域的一场伟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摹本任务是通过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重新分配，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消灭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这一基本任务又包括两个相关的政策环节，即没收剥削阶级所有的土地和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广大农民群众。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原则，即没收土地的对象是谁，怎样没收，分配土地的对象是谁，按什么标准分配，分配后的土地

属于谁等等问题。在制订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过程中，经过实践的摸索，党初步形成了土地的没收与分配政策。1928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这是中共中央最早制定的比较具体的土地法。

1. 土地革命政策

(1) 关于土地没收的对象。

《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通告指出，土地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因此应该实行完全对准封建剥削的没收政策。没收一切土地，意味着把农民也放在了土地革命对象之列，而且必然会侵犯一部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利益，这是不利于土地工作的开展的。

(2) 关于土地的分配政策。

通告规定："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由苏维埃支配——凡是能耕种的都可以分到土地"；"土地的分配以土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寡为标准。以年满十六岁能自耕种的人为一劳动单位，每一劳动单位平均使用土地（酌量各地情形决定亩数），其余的土地按照各劳动单位所属的四岁以上的人口之多寡均平分给于劳动单位使用"；"土地之分配暂以一乡为单位，由乡苏维埃自己分配，区苏维埃指导帮助之。"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依据各个根据地实践探索的经验，制定了分田的数量标准、区域标准、质量标准，为土地分配提供了政策依据，各根据地一般采取的是以乡为单位，以人口和劳动力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并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3) 关于土地的所有权政策。

通告也强调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

土地国有是列宁根据苏联的国情提出来的，当时也具备实行土地国有的条件。但把这一主张照搬到中国就不一定正确了。因为中国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特别是农民土地私有观念浓厚，实行土地国有既不适合国情，也不具备条件。在民主革命阶段，土地革命所要解决的是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是立即实现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但是由于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和当时实际工作经验的不成熟，中共中央还是制订了这样的政策。这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问题上的模糊态度。

(4) 关于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问题。

1927 年 11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对农民这个阶级作出了具体的划分，指出："农民分做三种：一、佃农，二、自耕农，三、半佃农。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对于贫农和小农，认为是"每年收入不够维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对于富裕农民的规定，认为他们是"重利盘剥，剥削雇佣劳动，出租耕牛及农具，强租贫民田地，或者将自耕所余田亩出租，兼营农业，商业或农村副业"。对于地主阶级，认为中小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比大地主更厉害。同时，把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土豪乡绅不加区别地归为农村中的剥削者之列。这说明党已经开始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活状况、剥削关系及剥削手段上找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但是对自耕农与中农、富农之间的关系还搞不清楚，对

中农与富裕农民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还缺乏比较明确的界定，过于笼统和抽象，在执行中难以从质上作出判断和从量上作出分析。

2. 领导根据地土地革命

“八七”会议召开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阶段。从“八七”会议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了井冈山、海陆丰、琼崖、醴陵、永定溪南等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首先，从组织上加强对土地革命的领导。

土地革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必须从组织上加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组织性强这一自身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了顺利地开展土地革命，1928年5月，毛泽东等领导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着重讨论了在湘赣边界如何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并选举了以毛泽东任特委书记的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具体指导土地革命工作。大会以后，在特委领导下，边界各县、区、乡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从组织上加强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边界各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到1928年7月，宁冈全县，永新县和莲花县的大部分地区，遂川的一部分地区，都普遍分了田。此外，其他根据地如海陆丰、琼崖、湘东醴陵、永定溪南等地区在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领导下，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土地革命。

其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土地政策、法规。

关于怎样开展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熟练掌握其规律和方法的。为了正确地指导土地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在调查研究、试点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土地法规，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

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土地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摸索出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组织官兵进行社会调查和分田试点。根据了解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写下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这些调查初步掌握和分析了湘赣边界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村阶级关系，为土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对没收范围、分配土地的方法及数量标准和区域标准、土地所有权、手工业工人及红军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均得分配土地等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

在海陆丰，彭湃等人在没有土地分配的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深入农民群众中作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没收土地案》，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办法。

在琼崖，最早实现土地分配的乐四区苏维埃政府经过实践摸索和分田试验，制定了《乐四区土地问题临时办法》，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政策。其中，关于土地的没收，没有没收一切土地，而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及公田。关于分田的质量标准，规定：“田产分配以肥瘦为标准，由苏维埃政府制定之（因肥瘦不易分别）”，“各家依以前耕种之田

分配外，余数抽出，不足者补之（视肥瘦而搭配）”。

由于经验不足，加上受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土地问题上一些过“左”政策的影响，各根据地土地革命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左”的错误，如没收一切土地，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实行土地国有、共耕制等。例如，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实行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的政策。对此，毛泽东后来曾指出这部土地法的几个原则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错误。

一些根据地在社会经济组织上出现了“左”的做法。例如，琼崖根据地组织了若干农业合作社和类似于集体农庄的经济组织。有一个乡曾以“破除一切私有观念”为理由，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这种超前于当时实际生产水平和条件的过“左”做法。醴陵地区也采取了共耕制的办法。

此外，一些根据地还提出和实施了“左”的对待工商业的政策。如琼崖根据地提出杀尽一切反动派，工厂归工人等过“左”口号，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也在更广阔的区域内得到深入发展。1929年初到1931年初是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了土地革命政策，改进了领导土地革命的工作方法。

1. 对各项土地政策的完善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二是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这些原则为各个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六大”在土地问题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在如何对待中农、经济上如何对待富农的土地财产，以及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特别是作出了不分给地主土地，肉体上消灭地主的错误的决定。但是，总体上看，“六大”推进了党的各项土地政策的发展和完善。

（1）土地没收政策的多样化。1929年以后，各根据地开始执行“六大”制订的土地没收政策，但有些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在实践中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例如在毛泽东领导的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仍然执行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

（2）土地分配政策的发展具体化。一是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各根据地基本上执行的是以乡为单位分田的标准。同时，针对实际中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原耕总和分配”的办法，即“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采取了按人口和按人口、劳动力混合两种分田的数量标准。毛泽东领导的赣西南、闽西地区主要采取前一个标准，赣东北、湘鄂西、左右江等地采取了后一标准，即“每一劳动单

位分全份，非劳动单位分半份。”或在保证不能劳动的人分得一份维持生活之需的土地后，使有劳动力的人多分半份。三是在分田质量标准上，提出了“双抽”原则，即“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四是在法律上规定给地主家属一份土地。

（3）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明晰化。在1931年以前，党在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文件上一般都规定了土地公有、农民使用、禁止买卖。这一原则造成了地权的不稳定，农民不能安心生产，影响了根据地农业的发展。党在实践上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目前革命阶级中，尚未到整个取消私有制度时，不禁止土地买卖和苏维埃法律内的租佃制度。”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在《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中指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热烈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目前，“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尚未到实行的阶段。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惟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这就正式解决了土地革命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标志着从土地国有到土地农有的转变。

（4）阶级划分标准的科学化。这一时期仍然坚持以收入和生活状况划分阶级，但也开始强调把剥削关系作为区分阶级的依据。在划分农村阶级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富农、界定富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如何区分富农和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问题。

“六大”《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规定：“农民之中，照他们的经济状态及土地多少，分为几种小阶层（富农、中农、小农及最小农）。”对如何具体划分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1930年5月1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土地暂行条例》。这是在各根据地中关于划分农民阶级的一个最早的文件。为了正确地区分富农与地主、富农与中农，毛泽东在1930年5月作了寻乌调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在《土地问题与富农策略》的通告中指出，划分富农应“以剥削关系来决定”。为了防止把中农的阶级成分划错，毛泽东在1931年4月2日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强调指出：“特别是要说清楚：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1931年8月2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不仅强调了富农与中农的区别，而且还提出把劳动不劳动作为区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正是在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划分标准逐渐走向科学化。

2. 加强对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领导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曾受到“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在实践中逐渐得到纠正。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领导新开辟的广大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六大”的土地政策。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农民问题的信》，要求中

国共产党立即开展“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从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了《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指示的决议》，号召全党“必须坚决进行反富农斗争”。这样，“左”的富农政策在赣西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等地区得到了贯彻执行。这些地区都实行了没收富农按人口平均分配额以外多余土地的政策，即没收的土地中，既包括富农出租的土地，也包括富农雇工经营的土地，甚至一部分自耕的土地。在打倒富农的口号下，许多地方没收了富农土地，不分给土地；有的地方只给富农坏地；有的地方还驱赶富农上山开垦；有的地方甚至杀害富农。虽然各地在贯彻这一“左”的政策时还是有所抵制的。但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对“左”的富农政策的抵制还是有很大局限的。

1930年5月，李立三在上海组织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暂行法》，试图用“过早的办法”在当时的“苏维埃区域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纲”。这部土地法提出了许多过“左”的主张。如“禁止一切土地的买卖、租佃、典押”；“大规模的农场，不得零碎分割。应组织集体农场、生产合作社等实行集体生产”；“不耕种土地的人，不能享受土地的使用权”；红军士兵尚未分有土地者，“俟全国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再行决定分与土地”等等。当组织集体农场、实行集体生产的主张在鄂豫皖、湘鄂赣、赣西南等根据地的地区试行时，由于这些做法严重脱离实际和群众，遭到当地农民的普遍反对。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提出“没收土地归农民”，“不禁止土地买卖和在苏维埃法律内的佃租制”，实际上否定了土地国有。各根据地先后贯彻了这些指示。如闽西根据地1930年12月颁布的《租田条例》中规定，不能耕种土地的人、无法生活者可以出租田地。湘鄂西根据地1930年10月通过的《土地革命法令》规定，分配后的土地“不禁止买卖”。同时，中共中央还修改了《土地暂行法》，纠正了“组织集体农场”和“实行集体生产”的错误政策，一些地区的集体农场也随之陆续解散。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前一时期已经进行过土地分配的湘鄂赣、闽浙赣、琼崖等地区领导开展土地革命的工作，还在新开辟的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及尚未开展土地分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了土地革命。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在由井冈山向赣南进军途中，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党部的《共产党宣言》。宣言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发布了“十条政纲”，其中第七条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1929年4月，毛泽东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起草了《兴国土地法》。根据“六大”精神，进一步改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和错误，明确规定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29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对各阶级的没收分配政策。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到1930年春，闽西苏区的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五县纵横三百多里的土地内，有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到1930年6月，在赣西南实行分配土地的地区，已遍及吉安、吉水、永丰、广昌、宁

都、万安、安福等20个县的一部或大部地区。

1930年5月1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对农村的阶级划分及没收分配土地的政策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右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1929年6月，中央鄂东北特委，制定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一个土地法——《临时土地政纲》。1929年11月底至12月底，新成立的鄂豫边特委分别召开了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群众运动决议案》和《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两个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的颁布促进了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得到深入发展。1930年上半年，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鄂豫皖根据地，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边区政府相继成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0年底，实行土地分配的地区从开始的黄安、麻城两个县城发展到黄陂、孝感（以上为鄂属）、光山、罗山、商城（以上为豫属）、六安、霍山、霍邱（以上为皖属）等10余个县。

从1927年9月鄂西暴动到1929年夏以前，湘鄂西的土地革命尚处于宣传土地革命政纲的准备阶段，没有实行土地的分配。为了更好地指导土地革命，1930年9、10月间先后召开了湘鄂西特委第二次紧急会议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大纲》和《土地革命法令》，进一步规定了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条例。这两次大会后，湘鄂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得到了普遍开展。到1930年底，实行土地分配的地区已由开始的监利、石首、江陵、沔阳四县扩展到潜江、华阳、鹤峰等县。

党在领导各根据地革命的过程中，大胆探索，因地制宜，创造出了一些解决土地问题的新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在领导赣西南、闽西地区的土地革命时，根据这些地区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对“六大”决议作出了灵活的变通。如在对待地主的问题上，提出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坚持了给地主生活出路的做法，在分田上第一次提出了“以抽多补少为原则”，在没收土地范围上坚持“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没收一切土地”虽然与中央精神不相符合，但却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出的灵活调整。因为这些地区自耕农少，而且他们的土地也不够自己耕种，这些自耕农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地少地的贫农都赞成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分。这样做虽然事实上把富农按人口平分后的多余土地（包括雇工耕种和自耕的土地）都拿来分掉，超越了民主革命阶段主要反封建剥削的任务，但却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适应了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

邓小平、张云逸在领导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制定出自己的土地政策。右江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5月11日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中对农村阶级划分、土地分配问题作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该条例第一次明确指出：“‘自耕农’、‘佃农’均不能成为成分的标准，因自耕农或佃农之中，均有富农、贫农、中农之分”，不能以此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关于土地分配的方法，提出“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生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暂用每一劳动单位分全份，非劳

动单位分半份之方法处理之”。这样做既与“六大”按人口平分地精神相一致，同时又结合土地质量进行分配，可以避免肥瘦不均。

湘鄂西特委在领导土地革命时也体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如在分田的数量标准方面，规定以人口为标准，但“有耕种能力之男女可得全份（红军虽在外应以有耕种能力看待），否则得半份。绝不完全以耕种能力及生产工具为标准”。这种分配标准，既照顾到广大贫民对土地的要求，又兼顾劳动力素质的差异，使有劳动力的人多得半份土地，不能劳动的人分得一份维持生活水平的土地，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做法。关于对待中农的政策，强调“中农土地不动”，“富裕的中农亦须尽可能的不侵犯其利益”，“土地有余时，还可分给非富裕的中农一点”。这显然比“六大”的规定要更明确更具体。同时还提出“如果在中农很少的地方，失地及少地的农民群众要求将一切土地平分时，党可以赞成之”。这虽然会侵犯少部分中农的利益，但却能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关于对富农的政策，规定只没收富农多余出租的土地，而保留其雇工和自耕土地。这与“六大”精神是一致的，但已经把“六大”的原则规定变成了具体可行的办法，既限制了富农，又有利于富农经济的保存与发展，是对富农政策的一个创新。关于土地所有权，“六大”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鄂西特委在土地法令中明确规定“土地不禁止雇佣耕种，不禁止买卖”。关于农村阶级划分标准，在“六大”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作出了一些尝试。如第一次把中农分为富裕和非富裕两种，强调要严格区别富农和富裕中农这两种经济成分。这样就减少了把富农当地主，特别是把富裕中农当富农的错误发生。

（三）土地革命中“左”的全局错误与查田运动的曲折

1.“左”倾土地政策的全面推行及其危害

1931年初至1934年秋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时期。在土地政策方面，他们全盘否定“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经济出路”、“给地主生活出路”等正确原则，强令推行一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

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土地法草案》规定：地主土地被没收之后，“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并规定这种政策应在苏维埃区域和新夺取的疆土内“立即施行”，各个苏区已经分配的土地如不符合该规定，必须按照“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重新没收并分配。1931年4月中旬，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派出四中全会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推行过“左”的土地政策。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平分一切土地”等“左”倾政策的强行贯彻，给苏维埃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搅乱了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贫雇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些错误，各地也进行过一些抵制。例如，湘鄂西特委在接到“关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指示后，立即提出意见，认为“平分一切土地”就等于“没收一切土地”，因此表示“不能执行”。中央根据地在收到《土地法草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富农并不是分给坏田，而仍然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从1931年底到1932年上半年，中央和各地经过努力，部分地纠正了侵犯中农

利益的错误，部分地纠正了对富农打击过重的错误，暂时地纠正了驱逐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出境的错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它坚持了“六大”关于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并把它具体化、法律化。但是，它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也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以法律手段，强令各地执行。它规定，在已经分田的地区，“如不合本法令者须重新分配。”从而，查田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2. 查田运动的曲折推进

查田运动就是在分配土地后进行清查土地的群众运动，检查土地分配是否正确合理，进而深入解决土地问题。由于封建半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根深蒂固，革命最初阶段上贫雇农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不足，党对土地革命经验的缺乏，加上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土地革命工作不能不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查田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无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在要不要查田的问题上并没有分歧，但是他们对于查田出发点的认识却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一时期王明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毛泽东虽然作为查田运动的主要负责人领导了查田运动，但不能不受到王明路线的干扰和影响，这就使得查田运动的过程显得比较曲折复杂。总的说来，查田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1年初至1933年初是查田运动的第一阶段，也称作检查土地运动。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左”倾冒险主义者立即命令各地进行“土地检查”，按照“左”的土地法令去检验土地的没收与分配情况，全面贯彻“左”倾错误的土地路线。但这一时期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展起来。

1933年初，“左”倾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人中央根据地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的土地政策。2月1日，临时中央通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第2号训令，号召各根据地“重新分田”和查田，并特别强调：在分田和查田中，“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于是，查田运动转人第二个阶段。

1933年春到1934年3月是查田运动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陆续发表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等重要文章阐明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性和查田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通过调查研究，先试点再全面展开的工作方法，并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因而运动开展得比较健康。

关于查田运动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查田运动的基本目的是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势力。“为了最后的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铁一般的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切冒充中农、贫农的地主和富农清查出来，没收地主分到的土地，收回富农分得的好田换以坏田，从而使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在贫农、雇农和中农基本农民群众手里。

关于查田运动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指出：“查田运动是查阶级。”“查阶级是查地主

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这就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开展查田运动的目的完全区分开来。

关于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毛泽东指出，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为了正确贯彻这条阶级路线，必须正确地划分阶级成分。为此，1933 年 6 月毛泽东还专门写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

毛泽东还规定了查田运动的步骤和工作方法，他指出，查田运动分为讲阶级（做宣传）、查阶级、通过阶级和没收分配 4 个步骤。每个步骤都要充分发动群众和信任群众，实行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查田运动迅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开展起来。到 1933 年 8 月，查田运动就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出现过很多过"左"的东西。如查田查阶级事实上成了一种竞赛，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越多，哪个地方就被称赞为阶级斗争的模范。出现上述严重"左"倾的错误，很明显一方面是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某些做法的影响，如查田运动与肃反相结合，进行过火斗争，搞所谓查阶级竞赛；另一方面也与当时还没有科学的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有关。

对于查田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及时做了总结。继《怎样分析阶级》后，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偏向。1933 年 10 月 10 日，这两个文件经临时中央政府通过，正式公布（公布时《怎样分析阶级》改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和纠正查田运动中出现错误的依据。

文件颁布后，各地在实践中纠正了错划阶级的错误，使查田运动取得了进一步的成绩。查田运动查出了一批隐藏在贫农、中农队伍里的地主、富农，清除了一批混进党政机关的地主富农，巩固了工农民主政权。纠正了一些受王明"左"倾土地政策影响而错划漏划的阶级分子澄清了阶级阵线。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支援了革命战争。

但是，正当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在纠正了过去发生的"左"倾错误而得到健康发展的时候，"左"倾冒险主义又出来干扰。他们把毛泽东提出的查田运动的路线和政策，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号召全党集中力量"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1934 年 3 月到 7、8 月间查田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

1934 年 3 月 15 日，"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的训令（中字第一号），从根本上否定了临时中央政府 1933 年 10 月 10 日通过的《决定》及贯彻《决定》后查田运动中纠偏取得的成绩。训令批评《决定》是用"'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用百分数的计算来代替阶级斗争"，并认为这是"给了地主富农以许多反攻的机会"，因此应"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还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方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这样，就等于下令不准纠正"左"倾土地政策所造成的错划阶级成分，使查田运动由反"左"倾急剧发展到反

右倾，出现了巨大的反复。原来一些已经纠正的错划成分被当作翻案又翻了回去。1934年6月以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查田运动无法再进行下去，不了了之。红军被迫撤出各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得不告一段落。

查田运动是土地革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开展查田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受王明“左”倾土地政策的干扰，运动也出现过严重失误。查田运动的过程及结果说明，当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以及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得到较好贯彻时，查田运动就顺利发展，虽然有错误但也能及时纠正。当“左”倾错误在查田运动中占主导地位时，查田运动就出现失误甚至反复。由于客观环境与条件的限制，查田运动始终没能突破“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

（四）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转变土地政策

1934年秋到抗战初期是党的土地政策转变时期。1934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形势的变化要求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把各阶层的力量最广泛地聚集到抗战的旗帜下来。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前一时期的土地政策。

1. 对待富农、地主政策的转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为政策转变创造子前提条件。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为土地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党的土地政策的转变，是从对富农政策转变开始的。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历史上土地革命的经验，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形势下，“富农也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哪种情形，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同时，过去“长期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经验，更告诉我们在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常常造成消灭富农的倾向，以致影响到中农群众，使他们不安，他们对于发展生产力减少兴趣。”因此，在白区，“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在苏区，“对于富农，我们只能取消其封建式剥削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等的自由”。决定还明确规定对待地主与富农有区别，对待白区的富农与苏区的富农有区别，对待地主、富农出身积极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本身有区别，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政策。193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再次重申了对富农的政策。“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这说明党已经开始改变“富农分坏田”的政策。

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改变了对地主的政策，对富农的政策也有了新的发展。对于地主，规定“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要

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而且"生活情况很坏的地主"的土地不应没收。对于富农，规定"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这就比没收出租土地的规定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又提出"如果在基本农民要求之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土地也应拿出一起平分"，说明这一政策转变还不彻底。还规定"商人兼大地主时，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这又体现了党区别对待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原则。

1937年2月10日，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时，作出四项保证，其中第四项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向国民党作出让步，但是这种让步也是有限度的，"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这就保障了苏维埃区域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至此，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所确定和实施的土地革命方针已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方针。

2. 确定"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善农民生活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后，共产党又面临着如何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为此，党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1937年4月，陕甘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在解决回苏区的豪绅地主要收租还债问题时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提出："以后交租的办法，可由地主与农民双方决定，但应比以前要减轻些，借债方面的利息，最高利息不得超地一分五厘，以前农民借地主的债，如果利息超过本钱或与本钱相等的则不再付利，没有超过本钱的，酌量减轻。"1937年6月，中共中央在"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有关改善人民生活条款中提出：要"修订并实行土地法（指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引者注），整理田赋，改良租佃制度，减轻地租，禁止地租以外之其他要素，并保证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之最后实现。""整理农民债务，减轻利息，禁止高利贷，规定最高利率。"1937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正式把减租减息作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是在抗日这一大前提下，调节农民与地主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和关系的最恰当的政策，虽然对于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只是一种改良性的政策，但却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渐进性的改革，为抗战胜利后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奠定了基础。

二、初步展开其他经济工作

土地革命和整个革命的胜利，还取决于巩固的根据地和坚实的军事经济基础，取决于党开展扎实、具体、有效的经济工作。早在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是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已开始进行一些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等同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尽可能坚持经济发展正确路线，将经济建设引向健康方向。

（一）在工业中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初步探索

“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在革命根据地，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几乎没有现代工业，边区的工业基本处于一种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必须把这样一个“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为此，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这一基本方针，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工业。

1. 创建国营工业，探索工业管理经验

所谓国营工业是指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务级政府直接经营，属于苏维埃政权所有的工矿企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的重要经济形式。根据地薄弱、分散、个体、落后的小手工业难以担负起革命战争庞大的军需和后勤任务，必须兴办各种必需的可能的军需工业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根据地的国营工业正是适应这种客观要求从军需工业开始起步发展起来的，同时，也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建立了一些可能的和必要的民用工业。

最早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国营工业是莲花兵工厂。1927 年下半年，莲花县农民武装成立了修械所，1930 年上半年就发展到 800 多人，成立莲花兵工厂，下半年发展到拥有一个子弹厂，一个兵工厂。能造子弹、六〇炮和炮弹，月产子弹 12 万发，炮弹 3 万～5 万发，小炮 6 门，有力保障了军需所用。但在土地革命初期，在军事上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是紧要任务，还谈不上全面的经济建设，国营工业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是微小的。直到 1931 年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由于根据地巩固扩大和红军的发展要求苏维埃政府发展自己的工业企业以适应战争需要，这时苏区的国营工业才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 1933 年苏区经济建设大会之后，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国营工业主要有，1931 年成立的中央兵工厂、中央印刷厂、中央军委被服厂等，此外，苏维埃政府还兴办了一些出口工业和民用工业，如：钨矿厂、樟脑厂、纸张厂、纺织厂等等。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尽管苏维埃政权的财政非常困难，但为了满足红军和群众对某些工业的需要，仍拨出大批资金来发展国营工业。1934 年 2 月，中央国民经济部在汀州投资 10 万元建立了中华织布厂，同时投资 20 万元建立了中华纸业公司。在此之前还投资建立了中华樟脑厂、卫生材料厂、通讯材料厂、粮秣厂等等。但正当国营工厂大发展时，受到了“左”倾干扰，许多地方曾一度出现不考虑客观条件，不顾苏维埃政府当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制订一些庞大工业计划盲目发展国营工业，造成了经济中的极大被动。

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建立国营工业后，开始探索国营工业的管理体制。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国营工厂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制度，政委决定厂里一切，实行供给制。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后，苏维埃政府逐步改革国营工厂的管理，实行工资制。根据工人技术水平高低划分成不同等级，如：中央印刷厂的工人最高工资是每月

18元，中等是14元。赣东北国营工厂还组织了工厂生产管理委员会，让工人参加国营企业管理，行使主人翁的权力。这种组织管理形式的产生，极大激发了工人工作热情。1933年4月，中央国民经济部设立了国家企业管理局，总供给部设立军事工业局，加强了对国营工厂和军工企业的领导和管理。

尽管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对国营工业的领导，但由于经验不多，制度不健全，又处于战争环境之下，国营工业的管理上仍然很混乱。"原料与工具没有人负责保管，兵器仓库非但无锁而且无门。"为了改进管理中的不足，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来加强对国营工业经济工作的管理。最为突出的是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亲自颁发了第一个国营工厂管理条例，即《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创立了以厂长负责制为特征、经济核算制为核心的企业管理的雏形，对改善国营工厂管理首创性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改变了当时国营工厂管理上的混乱状况，使管理工作走上正轨，推动了国营工厂健康发展。临时中央政府还派出突击队，帮助国营工厂整顿、落实管理条例。

在今天看来这些经济管理方法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在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在国营工业建立不久的情况下，提出这些管理措施，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而且许多重要原则至今值得借鉴和思考。

2. 全面扶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业中手工业占最大比重。为了恢复发展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以保障革命战争需要，在发展国营工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着手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并且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临时中央就采取了全面扶持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政策，并将之作为解决工人就业、恢复发展苏区工业生产的主要措施。

早在1929年，党就确定了在根据地办生产合作社的方针。毛泽东曾经指出："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号召"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开展合作社运动，成为最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主要一环。"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由于根据地不稳定，也缺乏办社经验，所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较慢，只建立了少数几个合作社，而且其中许多还是由苏维埃政府出资或没收来的工厂、作坊交给工人群众集体经营。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由于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从税收、租金、运输、房屋等各方面全面扶持合作社的发展政策。1933年8月中央苏区还召开了南部和北部经济建设大会，号召各级政府开展合作社运动，加强对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苏区出现了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兴国等17县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76个，社员32761人，股金达到58552元。其他苏区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也较快，规模大小不一，涉及部门有：造纸、织布、炼铁、造农具、烧石灰、缝纫、熬硝盐、制陶器、造船、雨伞、木器等等达30余个，极大丰富了根据地的经济内容。

党和政府注重运用制度手段规范合作社的组建与管理，例如：苏区政府颁布了各种

规章条例。1932年4月12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合作社系由工农劳动群众集资所组织的，富农、资本家及剥削者均无权组织和参加"，"合作社之社员不仅兼股东，并且是该社的直接消费者、生产者、借贷者"，"每个社员其入股之数目不能超过十股，每股金额不能超过5元，以防止少数人之操纵"等八项条例。同年9月19日，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合作社工作纲要》，较之前述条例内容更为完备，各项政策更为明确，规定"社员无论股金多少，都只有一个表决权"，红利分配原则是"至少将红利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公债金不分散"，"再抽出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为文化基金"等等。1933年9月临时中央还制定了《生产合作社标准章程》，较之以前各种章程条例或纲要，在组织原则、社员权利、民主管理、盈利分配原则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至此各地手工业生产合作就有了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章程可以遵循，并依之进行整顿，使各地生产合作社成了名符其实的由工农群众按自愿原则，合股集资组织起来，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自产自销、自负盈亏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有力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由于党和政府积极领导并重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苏区工业生产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合作社的正确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而且从财政、信贷上给予大力支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较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促进了苏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还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例如：中央农具合作社1933年4月成立，仅一个多月就生产禾刀5000把，镰刀800把，以及其他一些农具，质量好且价格便宜，很受农民欢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发展极大促进了苏区经济建设。

3．"左"的错误对私营经济发展的制约

如何对待私营工业的问题，是在革命根据地扩大、特别是占据了一些城镇之后才遇到的一个问题。对私营工业是保护还是消灭成为一个时期党内斗争的一种体现。革命根据地的私营工业大多以手工业为主，从民主革命性质上看，私营企业主属于团结对象，从发展苏区经济角度出发，应该保护私营工商业并允许其发展。但从党的"阶级立场"，尤其从发动工农参加革命需要出发，又希望提出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这种矛盾状态与矛盾心理下，容易产生"左"的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打击破坏私营工业。

这一时期，三次"左"倾错误都在对待私营工业这个问题上犯了同样错误，对私营工业一次又一次打击。瞿秋白一度实施盲目烧杀政策；李立三实行没收政策；王明则一方面承认私营企业存在的必要性，认为"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又制定过"左"的劳动政策，打击了私营工商业。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制定了《劳动保护法》，规定：童工工作时间是4小时，成年工人8小时，而且工人做革命工作时照发工资。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则更"左"，除了工作时间上机械限定8小时外，还规定工人必须享有服装、住房或住房津贴、免费医疗等物质福利；工人参加社会活动"无论时间之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等等。王明等人甚至还经常煽动工人搞同盟罢工，以达到提出的苛刻要求。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革命根据地，仅有的一点私人经济，在"严厉"的《劳动法》压制下，逐渐走

向倒闭和消亡。一些资本家、私营业主因经营困难而逃跑。例如，成都温昌桂夏布厂1931年还有50部机子、80名工人。1932年因夏布销不出去生产开始下降。苏维埃政府不准业主解雇工人，而且还要增加工人工资。资本家实在难以支持下去，只好逃跑。这种情况导致根据地私营企业越来越少，大量工人失业，劳资、师徒矛盾激化，严重影响苏区经济建设。

尽管党对待私营工业上出现错误，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的一派同这些错误一直斗争着。毛泽东早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十分注意党对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一贯主张保护私营工业、鼓励私人投资。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全面阐述了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指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认为“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毛泽东说过：“在民族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主资本家发财”。面对日益暴露出的“左”倾错误带来的不良后果，中共其他一些领导人，例如陈云、洛甫等也开始审视并努力纠正过“左”的经济政策。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在敌人经济封锁之下，工业生产品极端缺乏与昂贵”，目前，“不能不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甚至应该采取种种办法，去鼓动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他还根据实际情况在中央苏区提出修改《劳动法》，认为劳动政策的正确与否应该通过实际来判断，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苏维埃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正是在他积极主张推动下，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新的劳动法，修改废除了某些过高的福利要求和脱离根据地实际的条款，具有较强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左”的错误在经济上所造成的危害。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私营工业的发展是有限的，而且，新劳动法颁布后立即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又转人长征，对私营工业恢复并没有发生效果。到土地革命后期私营工业几乎绝迹。

（二）开展贸易，初步探索培育、利用和驾驭市场的经验

在根据地的经济斗争中，商业贸易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一方面，商品流通一旦受阻，工农业生产就会衰退停滞，另一方面，敌人为了实现其扼杀革命政权的目的，不仅实行军事“围剿”，而且进行经济封锁。为了打破敌人封锁，沟通内外贸易、活跃物资交流、克服工农业生产品的剪刀差，“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同时“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以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全面开展了贸易工作，初步探索了培育、利用和驾驭市场的经验。

1. 设立市场和改造市场

在旧中国偏远的农村，商品流通极端落后。集市数量少，条件差，且操纵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他们剥夺人民的工具。为了繁荣根据地经济，促进商品流通，中国共产党利用、改造和新建了墟场这一农村商品交换场所。

在井冈山根据地，首先改造利用了草林旧墟场。“草林是遂川较大的墟场之一，过去有一唐江，二营前，三草林，四大治之称。”毛泽东带领队伍进入草林之前，墟场基本为市镇中土豪劣绅占据垄断。毛泽东带领队伍进入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和革命政策，对墟场进行改造，镇压肃清了把持墟场的大土豪和“靖卫团”，打掉墟场周围的税卡，取消了苛捐杂税，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有买有卖，市场异常活跃繁荣。每逢一、四、七逢墟，四面八方的群众提篮挑担，络绎不绝地到草林墟场做买卖，不下2万余人。草林墟场一天天繁荣也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

其次是在1928年6月，苏维埃政府在湘赣交界处的宁冈县南部的大陇镇，新建了大陇红色墟场，而且在墟场还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和组织人员来管理墟场贸易活动，保护中小商人，鼓励他们来经商贸易。每逢二、五、八赶墟，公买公卖，秩序井然。大批白区商人甚至农民也来墟场做生意，这有利于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活跃商品流通。

随着革命根据地扩大和土地革命深入，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福建、江西等地农村墟场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活跃起来，为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2. 发展公营商业，建立市场宏观调节机制

公营商业是指苏维埃政府投资兴办的商业，由苏维埃政府领导、归苏区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合作社商业则是由群众集资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它们主要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兴办的公卖处，公营的各种商店、药店、饭店，在对外贸易中建立起来的对外贸易局、采办处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等。

首先，设立公卖处，成立各种形式的公营商店、药店、饭店等等。为了克服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生活困难，减少奸商的中间剥削，1928年5月，井冈山根据地在茨坪兴办了最早的一个公卖处，这是公营商业的雏形。公卖处有些是用打土豪筹得的款项购买货物，属于公营性质的商业，有些是群众集资的，属于合作社集体经济性质的商业。其货物大多是苏维埃政府通过自己或发动群众直接从白区筹办来的，“进价比较便宜，出价当亦不贵。”深受军民欢迎。

在井冈山根据地，除了创办公卖处外，还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了一些公营或是合作社形式的店铺。1928年7月在宁冈县大陇红色墟场创办了一个公营商店，经营各种杂货，价格公道，对活跃市场、稳定物价起了积极作用。类似这种商店在江西、闽浙赣、福建等省都相应建立了一些，如1933年闽浙赣苏区这样的商店“大约有三十多家”。1928年初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在茅坪滩头村还设立了一个工农药店。除了为红军医院提供药材外，群众有病也到这里捡药，生活特别困难的贫苦农民经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批准还可以免费捡药，极大方便了人民群众。同时，在许多地方，党和政府还出资兴办了工农“红色饭店”等等。

这些公营商业都是党和政府在经济困难状况下创办的，虽然实力、规模、数量都有限，但在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保障革命战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设立粮食调剂局和各种形式的商业合作社。旧中国存在着“工业品特贵，农

产品特贱”、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现象，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现实原因，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工农剪刀差加剧的趋势。根据地农产品运不出去，靠外边供应的工业品又进不来，农民为了获得自己必须的日用消费品，只有贱卖粮食，工农产品这种极端不平等交换，使农民吃亏很大，以致出现常有“农民有田不耕种的现象”，加剧了工农矛盾。

根据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1929 年 9 月，中共闽西特委专门发出通知指出：“调剂剪刀（差）现象是苏维埃当前急务。”1930 年 6 月，在闽西根据地最先成立了粮食调剂局，随后其他根据地也相应建立，其做法就是：新米谷登场后，由调剂局以高出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向农民买米谷，然后储藏起来，等到青黄不接时再按市价的九五折卖给农民，从中得到的差价用以弥补米谷损耗和管理费用。粮食调剂局通过购、销、调、存业务，打击了奸商，平抑了粮价，保证了军需民食，有时还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以换回食盐、布匹、药材等必需品供给军用、改善人民生活。

党和苏区政府在成立粮食调剂局时，为防止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商人的中间盘剥，还鼓励群众组织各种合作社商业，如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购买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党和政府对合作社的积极支持态度和正确领导，极大发展了合作社经济，很大程度上配合支持了公营商业的活动，打击了少数商人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对经济市场的破坏和垄断。正是在党的积极领导推动下，合作社商业在各根据地的发展十分迅速。1934 年 2 月与 1933 年 8 月经济建设大会前比较，消费合作社的社数、社员数和股金分别由 1933 年的 417 个，82940 个，91670 元上升为 1934 年的 1140 个，295993 个，322525 元，粮食合作社则分别由 1933 年的 457 个，102182 人，94894 元上升到 1071 个，243904 人，242097 元。虽然这些统计数据还不完备，但已经可以明确看到合作社特别是消费合作社在迅速发展。这对于缩小工农剪刀差，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促进苏区商业繁荣起了明显作用。

3. 拓展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无论是建立粮食调剂局还是成立各种合作社商业，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以及工农剪刀差等问题。还必须打破对外贸易封锁，让农产品能出去，工业品能进来。张闻天指出：“苏维埃政府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王明也说“要使苏区的商品流通兴旺起来，首先就要坚决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为打通赤白贸易通道，设立了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机构，确立了鼓励贸易自由的政策原则。

1930 年，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决定在沿信江各县建立对外贸易处，疏通赤白贸易。1930 年，为了加强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联系，党中央在闽西根据地的永定县建立了“武装通讯社”。除主要负责武装传送重要文件和护送往来同志等任务外，还承担起根据地军需民用物资的输送工作，如：输送布匹、食盐、西药、军用修械器材等。有时还直接通过党在白区开设的秘密商店和利用白区的商人购进物资。为了加强对进出口贸易的领导，在赤白交界处还建立了“货物登记处”和“物资转运站”，甚至是赤白交易所。

苏区的对外贸易不仅依靠外贸机构的专业人员直接在边界圩场进行或到白区秘密进

行，更重要的是积极鼓励帮助边沿地区的群众和商人进行贸易。据赓雅《赤区经济封锁的现象》一文记载：赣南、赣西各县偷运食盐的方法，“有些是把纸张或棉衣服先用盐水浸过并晒干，然后带进赤区，又用沸水把它含蓄着的盐质盐味，煮出食用。灰色区域或赤区的农民，来城市购买肥料人粪，粪篓便桶中，也会暗藏着盐包或盐盒；或把便桶制成两截，底截较浅于上截，即藏食盐。”不少苏区运用武装力量直接从事或保护对外贸易，甚至常用贿赂、收买敌方人员方法进行贸易交换。

党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为打通赤白贸易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苏区对外贸易的巨大成绩。打破了敌人妄图用经济封锁来困死红军和苏区的阴谋。

无论是公营还是合作社商业，虽然还不能成为根据地经济生活的主体力量。但在粉碎敌人经济封锁，保障基本的军需民用，支援革命战争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而且为以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准备了条件和经验。

4. 大力发展私营商业

在革命根据地，私营商业的发展同私营工业一样受到“左”的错误的打击。列宁曾说过：“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一些领导人错误对待私人经济的态度无疑是帮助了敌人，加紧了自我封锁和扼杀。但同时党内也有一些领导人一直在同这些错误斗争，以积极态度引导私营经济的发展。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1928 年他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中就提出了要争取中小商人问题。1929 年 1 月在他起草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又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的话。1929 年 3 月红军打下长汀后，他起草的红四军党部《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的文告中又强调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对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概不没收。”1934 年，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还说到“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到了土地革命中后期，中共其他领导人，像张闻天、王明等人在吸取、对待私营经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也开始批评以往“左”的做法。1933 年，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就指出：“有好些地方苏维埃机关对商业问题都有过不正确的态度，在许多苏区内，有时甚至把商业机关没收了，农民有时把往来的货物没收而彼此瓜分了。这种情形自然要使商业发生困难。”提出要保护私人商贸自由。张闻天也指出，对于私人贸易，“还应该利用‘利诱’与‘让步’”。

这些都说明党在经历了一些错误后开始积极纠正和引导私营商业的发展。苏区先后颁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保证商业自由》，《商人自由贸易问题》等一系列保护私营商业的政策，这无疑是有利于其发展的。但由于前期“左“的错误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 1927 年到 1930 年各地烧商店、烧账簿、杀商人、重派款等行为时有发生，对私营经济打击过重，虽然后来积极改正，但成效并不大，只有个体小商贩、小商业者经营的私营商业有所恢复。

（三）领导财政工作的初步探索

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职能而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财政活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资财的收入、管理、分配和支出等经济活动。建立财政，是红色革命根据地产生后开始的。革命政权需要财政的支持。战争进行中所需大量的物资供给需要财政解决。毛泽东早在1931年11月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在苏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向富农征税；免收商业出入口税和工业的出入税，以发展苏维埃区域的经济。12月又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实行财政统一，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国家财政机关按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税则征收。1933年8月，毛泽东在苏区中央政府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关于财政的思想，初步奠定了党和政府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

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没有条件全面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土改尚未进行前，主要是采取打土豪筹款办法解决红军给养问题。这是靠强制的政治力量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土地革命初期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在建立了比较巩固根据地政权并进行土改后，则以土地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33年，毛泽东提出从发展根据地经济上找出路，要求"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把"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作为"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随着土地革命深入和经济建设展开，一些取之于民，取之于己的财政收入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多渠道开辟财政收入来源

革命根据地财政收入是工农民主政权运用所掌握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力量筹集一切可能动员的经济力量，支持革命战争、保障供给的重要手段。虽然毛泽东指出过：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但在土地革命的战争年代，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靠发展经济取得税收以外，也来源于一些非经济收入。

首先，向剥削阶级筹款。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就曾明确规定打土豪筹款是红军三大任务之一，打土豪成为初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党中央还制订了打土豪筹款的专门政策，规定："筹款的重要对象是地主豪绅，除没收其财产、田地、房屋、器具外，还可以罚款"，"对地主是消灭他的经济力量，对富农是削弱他的经济力量，因此，地主的钱应该筹个干净，富农的钱则只能捐他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要求城市资本家商人捐款，规定："没收财产的原则不要应用到商人及资本家的身上"，实行"大商多捐，中商少捐，先捐大商，后捐中商"的原则。对剥削阶级筹款的政策是正确的，其实施保证了革命初期财政收入来源，也削弱了封建经济基础。

其次，积极开展取之于民、取之于己的税收工作。打土豪筹款是与根据地经济基础不稳定、土地问题未完全解决的情况相适应的。由此形成的收入不能保证财政基础的稳

定，是暂时的非常措施。而赋税则是定期征收、固定、经常、及时的收入，它可以使苏区财政建立在可靠基础上。随着革命根据地扩大、巩固和土改的深入，建立稳定税收工作就应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

开展税收工作首先必须整顿税收，也就是要在废除国民党新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的同时，建立新型的统一累进税制度。1932 年 7 月，临时中央政府公布了新修改的《暂行税则》和《土地税征收细则》，规定税收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都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等等。这样各行各业就有规可依地进行征税。在实际执行中，农业税征收得并不多。因为农业税只对主要生产物（谷、麦）征税，而对农副产物则不予征税，而且为了照顾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农业税规定只能从维持必需生活费为开始征收标准，不足者免税。工商税也是在经济恢复之后才开始酌量征收。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尤其是从 1933 年起，国营工商业有很大发展。仅中央苏区，据不完全统计，到 1934 年 3 月就有 32 个国营工厂，还有几千工人的铝矿公司，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对外贸易局，创办了中华商业公司等等。仅 1933 年 1 月至 8 月国营企业的收入就有 107188 元，反映了财源上已有了“取之于己”的良好开端。

可见，无论是农业税，还是工商业税，党的税收都是建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十分注重经济建设对于税收的基础性作用，体现了通过党和政府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指导思想。

第三，发行公债。为筹集革命战争经费和经济建设基金，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来获得财政收入，如：向群众借粮、捐献、发行公债等等。前两种方式属于战争状况下不得已偶尔所采用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发行公债对增加财政收入的意义。1932 年 6 月，为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临时中央决定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 60 万元。1933 年 7 月，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 300 万元。这些公债的发行，对保障红军作战需要，吸收群众零散资本扩充根据地经济建设资金具有重要作用。发行公债不仅是党在战时创立的一个非常措施，也是至今经济建设中集中财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2. 开展节省运动，加强对财政支出工作的领导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官兵的生活费和战争费用是根据地财政最大的支出项目。革命根据地部队供给标准十分低，例如：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四军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生活费；县、区以上的政府工作人员供给标准一般低于红军部队；乡以下工作人员则是自带伙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入还是不够支出。尤其是随着敌人“围剿”的加剧，军费开支激增，仅 1933 年 9 月至 1934 年 1 月就增加了 40%～45%。这种状况下要求党和政府实行精打细算的、节省的财政支出方针。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号召下，在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群众性的财政支出节省运动。

节省运动首先是从节省各级机关经费开支开始的。到 1933 年，除继续节省政府机关经费开支外，还展开了节省个人开支，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支援革命战争的运动。

例如，以前机关晚上办公，每个办公室一盏灯，为了省油，晚上改为集体办公，许多人共用一盏灯，一般开会在月光下进行。“为了节省粮食，保证红军给养，每人每天减少食米二两”，“甚至还有许多政府工作同志愿意自带伙食为政府工作，国家企业与工厂，公开提出免发或少发工资问题。”在党的积极号召组织之下，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开展节省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仅1934年各根据地节省交到金库的数额就达到了560多万元。在节省财力、物力支出同时，根据地各机关、部队、工厂企业等单位还普遍开展了精简人员、节省人力运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成了节俭的一种方式。节省运动的展开，极大减少了财政支出方面的浪费和损失，使有限的财力得以集中，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

3. 建立统一的财税体制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财税收入有了经常性的来源，但依然是入不敷出，收支不平衡。除了实行节俭的财政支出外，客观上还需要改变过去各根据地财政自收自支的现象，实行统一财政管理，最合理地管好用好有限的财力、物力。

财政是国家的命脉，财政工作做不好，直接影响到军事和行政，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运转。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财政各自为政，管理混乱。1931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财政部，任命邓子恢为部长。而且还颁布了中央政府第一个财政法规，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条例规定，实行统一税收，一切税收概由国家财政机关按颁布税则征收；统一收支，一切收入概应随时转送或直接送中央财政部或相应银行；还建立预决算制度，实行统一记账簿和记账单位。而且还建立健全了各级财政组织系统，明确了其隶属关系。同时，为了切实贯彻条例，1932年2月，人民委员会还发布命令，要求各苏区都进行财政检查和整顿工作。此后，临时中央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统一的规章制度，如国库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等，使原本混乱财政管理工作得到理顺并日益走上了正轨。

财政的统一管理，对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供给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有限的财政收入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并且，还培养了一批财政工作人才，积累了丰富工作经验，对后来乃至建国以后财政工作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初步建立新的金融制度和体系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的金融工作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摧毁旧金融体系，建立新金融制度。

在根据地，摧毁旧的金融体系是一项紧迫的经济工作。首先，要摧毁高利贷资本体系。在旧中国，资本主义借贷关系不发达。封建性的高利贷资本统治着广大农村，其利率往往高达30%~50%，甚至100%以上，成为贫苦农民的重负。因此，废除高利贷剥削就和平分地主土地一样，成为党在土地革命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动农民最有效口号之一。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就明确提出：“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各地暴动后，都不同程度废除了高利贷剥削。其次，要取缔伪币在根据地的流通和使用。在根据地新的金融体系建立以前，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和地方旧银行、商会遗留下来的杂钞劣币仍充斥根据地市

场，这些杂钞劣币受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断贬值，给根据地商品流通、军队供给带来很多问题，造成现金外溢，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要摧毁旧的金融体系，必须创立新的金融体系。尽管在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各根据地就建立了银行，发行了货币，但一开始金融体系是不统一的，各根据地自行建行，各管发行，金融体系管理混乱。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苏区的金融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统一发展的道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建立了统一的金融组织机构

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各苏区都设有银行，但彼此独立，名称也各异，如“工农银行”、“农民银行”、“贫民银行”等。为了贯彻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有关统一货币制度和统一金融组织的决定，1932年初，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之各地原有的银行改为国家银行在各省的分行或支行。随后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国家银行组织系统中最高权力机关是管理委员会，与之并列的还有审查委员会，由财政人民委员部派若干人组成，形成一种监督机制；总行，和分行都设有保管科、出纳科、营业科、总务科、会计科、国库科外，总行还设有发行科，专门发行国家流通货币，国家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分离，直接受临时中央政府领导，各分行受同级政府领导，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方针任务政策的确定均由苏维埃政府统一决定，银行资金一部分由苏维埃政府拨给。统一而独立的国家银行的设立及其组织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根据地金融组织体系的形成。

2. 统一货币发行与流通

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前，各根据地银行各自发行货币，不仅省级、县级银行发行纸币，甚至连信用合作社也发行流通券，市面流通货币极不统一，一个根据地内多种类纸币同时流通，这不仅不利于流通，也不利于加强金融管理。因此，统一货币发行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规定，只有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1932年7月正式开始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名义发行纸币，与中央苏区不相连接的其他根据地可以分行的名义发行纸币，其他支行机构均无发行货币权力。这样就保证了苏区金融市场上纸币流通的统一，货币流通市场趋向规范和统一。

党和政府力图根据货币发行规律发行国家纸币。在开始阶段，纸币发行是以根据地拥有基金的多少来决定其发行星的，这一举措保证了纸币能随时兑换现金，稳定了币值。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苏区不根据银行的基金数量，不按货币流通规律，单纯按财政需要发行纸币，结果造成纸币贬值。尤为突出的是，从1933年起，因为敌人的第四、五次“围剿”和经济封锁加深，通货膨胀严重，战争形势恶化，根据地也不断缩小，赤白贸易中断，财政来源几近枯竭。党和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也受到“左”的错误干扰，纸币信用开始出现危机。

3. 发展信用合作社及开展其他金融业务

信用合作社是在党的鼓励号召下群众集股组织起来的一种金融机构，经营存贷款、贴现、代理公债发行还本等业务，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一个有力助手。1930 年 3 月，闽西根据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问题决议案》中提出，要“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吸收乡村存款”。随后，信用合作社在闽西根据地发展起来。土地革命后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信用合作社发展，认为它是“解决群众缺乏资本的主要办法，而且也是同城乡高利贷做斗争的有力武器”。1933 年，临时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发行 300 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中，拿出十万支持信用合作社，以帮助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党对金融事业领导还表现在积极扩大银行业务，新增代理国家金库和开展信贷等活动，使苏区根据地的金融工作有一个全面展开发展的机遇。

党和政府对信用合作社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在党的推动支持下信用合作社也确实有所发展，但同其他合作社相比，其发展因战争局势恶化，苏区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过重而缓慢得多。

第三节　摸索阶段经济理论与经济工作实践探索的成就与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是领导革命战争，还是开展经济工作，都是一个伟大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和经济工作的伟大开端。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工作中形成的特点与经验不仅对后来战时经济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建国以后的平时经济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摸索阶段经济工作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成就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实践是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在农村展开的，因此呈现出明显的战时经济工作特色和开创性的特点。在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经济国情的认识，开创了独立领导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探索成就。

（一）开创了注重调查研究的经济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之始。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还强调，任何一个领导者，非但“在决定任务之前须要做一番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即使在正确的任务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断的调查研究”。张闻天也论述过：“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许多问题的争论不决，闹不清楚，许多事情的办不通，办不好，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一番切实的调查研究。”土地革命开始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对于党来说，对农村实际状况都是不十分了解的。怎么样开

展土地革命？怎样领导经济工作？这都需要党的领导者深入实践做一番调查研究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一时期党内一些领导人接连犯“左”的错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改变了的革命环境和实际完全不做调查研究，仍然把以往做城市经济工作的方法搬到农村根据地，甚至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大量用于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实践，而以毛泽东为突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则能够在探索中努力寻求到正确的经济工作理论，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以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作为领导经济工作的基础。

为了解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从1927年到1934年，毛泽东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进行深入的调查，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根据调查研究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这些调查研究对当时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以及进行土地革命的具体情况都作了周全详尽和深入的分析，不仅成为毛泽东在领导各项工作中“发言权”的基础，而且促进了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例如，毛泽东起草制定的党的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就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订出来的，以后土地法的几次修改也是毛泽东在不断调查研究之后根据调查的结果进行的。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例如，张闻天在经历了初期脱离实践犯“左”的错误，1933年进入苏区之后，也开始注意调查研究。他先后写过《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等四篇文章，从理论上强调要改变旧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那种浮在上面的领导为深入下层的具体领导。在实践上，他也亲躬厉行，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果敢地提出修改《劳动法》，纠正了许多不利于苏区经济发展的劳动政策。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土地革命时期，党在独立领导经济工作的开始阶段，就重视调查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方法，这为党后来开展经济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开创了党独立领导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没有独立领导经济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独立领导经济工作。但进入土地革命之后，形势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国共合作破裂，成为交战双方。另一方面由于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赤白交战，环境恶化，要在敌人“围剿”封锁中存在下来，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只能靠自己去解决一切给养问题。因此，独立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以筹措经费，就成为各地红军和政府时刻不能中断的工作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开创革命根据地初期，党只有领导工农经济斗争的经验，而没有任何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红军给养经费基本依靠军事和政治手段，即打土豪，剥夺剥削者的财产取得。但是随着根据地的稳定和扩大，必须要打碎旧有的经济统治秩序，建立起一套独立的新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十分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依靠自身力量来推动根据地经济

发展，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基本实现了在革命战争环境中自力更生的经济要求。

（三）实现了经济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

从1927年起，革命客观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避开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同农民相结合，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党的工作重心也随之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然而“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从农村为突破口寻找革命成功的道路。因而这种革命客观形势和性质也就决定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就是土地革命，以动员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经济。

党把土地革命作为各项经济工作的中心，首先是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结果。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以农业为主体，尤其是革命根据地所在区域基本是落后偏远的农村。因此党领导军队进入农村后，在经济工作上基本以开展土地革命为经济工作中心。其次，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切封建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赖以统治的根基。要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打倒封建专制制度、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挖掉它的基础，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能否获得土地是农民能否起来的前提。同时只有进行了土地革命，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经济，解决全社会的生活问题，才能积极供给战争之需要的物质基础。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十分强调对农业经济的政策倾斜，甚至提倡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1933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还发出训令，号召广大干部参加农业生产，要求他们要尽可能的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耕田。工农红军除了打仗也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苏维埃政府还从经济和物质上对农民在生产上给予扶持。农村经济工作在这一时期党的各项经济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特点。

（四）初步探索出战时经济工作特点

土地革命时期是革命战争的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显示出战时经济工作的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法明显带有战时宣传鼓动性，以政治性的鼓动宣传来推动经济工作的展开。主要是“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比较多少巩固的苏区简直很少，它们大多是带有临时性质。红军占据了某一区，可是又不得不旋即退出，再向前进到别一区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不能实行比较经常的经济政策。”因此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占据一个地方之后，多半是“向民众立刻指证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生活状况，与他们在旧统治之下的生活状况有何等显著的差别”。从而激发鼓动民众起来进行经济斗争，响应党的经济主张，推动经济工作在根据地的开展。虽然这种经济工作方法是在战时革命形势不稳定下所采用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但对于日后在革命战争条件下开展经济工作开创了先例。

其次，党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国营经济和其他经济事业主要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经济和私营经济根本就不能及时保障革命战争的庞大军需和后勤要求，这要求建立国家经营企业。只有国营的以军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机构才能适应战时所需。在土地革命中后期，也出现一些民用企业，但许多都是为军队所需服务的，如：被服厂、草鞋厂、通讯材料厂等等。虽然以军工企业为主体的国营经济并非经济发展的有利模式，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却是有效的经济工作方式。

最后，军队直接参与经济工作和建设。党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工农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主张工农红军一要打仗，二要做群众工作，三要参加经济建设。一到驻地，要一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一面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军队忙时打仗，闲时参加生产。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军队给养，减轻人民负担；另一方面又将军队力量全面发挥出来，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后的历史事实已证明，党开创军队参与经济工作和建设的经验方法为以后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五）有力支持了土地革命战争

这一时期党在根据地开展的经济工作，有力支持了土地革命战争。打土豪筹款和政府筹款保证了红军的军费，多方筹集军粮，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应。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对于红军所需军费和物资，采用了打土豪筹款的方针。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湖南茶陵县城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打土豪筹款”的口号，并把它规定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共中央也肯定了打土豪筹款是解决红军供给问题的根本来源，提出了红军自给自养的任务。

第一次反“围剿”前，红军为准备反“围剿”所需经费，进行了紧张而有计划的筹款活动。攻占吉安后，红军筹款13万元。此外，红军还分两路到白区打土豪筹款，一路到樟树等地筹款20万元，一路到抚州等地筹款40万元。基本上保证了战争需要，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主力红军抓紧时间进行紧张的军费准备。1931年1月1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发出“胜字”第四号命令，要求红军一方面注意训练，一方面在原地尽量分散筹款。18日，当得悉敌军准备再犯根据地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又发出“胜字”第五号命令，命令红军移师建宁、广昌一带，用最大的力量筹足3个月的给养44万元。第二次反“围剿”一结束，1936年6月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就提出“要筹足一百万元作为第三期作战费用”。随即将红军分散到黎川、建宁等地发动群众，一面分配土地，一面筹款。到6月20日，红军即筹款32万元，其中红一军团17万元、红三军团15万元。到7月初，筹款数目又增加了许多，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通过打土豪筹款，红军筹集了比较充裕的战争经费，保障了红军将士的供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总结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积极评价了红军筹款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这是使红军能在中央区支持八个月之久（即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7月），取得第二次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支援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还通过政府筹款的方式筹集军费。第一次反“围剿”前，1930年11月17日，江西省工农兵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决定：第一，迅速集中现金

60万元；第二，采取绝对统一办法加强预算管理，只准留一个月办公费，其余现款一律上解；第三，节省杂费并尽量减少办公费，全力支援红军。11月20日，又发布《筹集现金、准备给养、节省经费、争取阶级决战最后胜利》的通告，强调筹集经费、节约开支，准备反"围剿"战争。27日，又决定创设江西工农银行，并发行钞票100万元，以充裕的经费，保证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为了筹集反"围剿"战争所需经费，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了发行公债的措施，于1932年6月、10月先后两次发行公债总计180万元。

筹集军粮，保障红军的粮食供应，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反"围剿"战争中，军粮的筹措工作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根据地的地方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反"围剿"前，根据地政府就特别强调要集中粮食，要求各地做到"红军一到就有饭吃"。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就派出许多政治工作人员到各县、区筹集粮食，为第二次反"围剿"作准备。1931年1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还专门就红军粮食给养问题发出通知，规定"红军到达何地，即由该地政府迅速将粮食付与红军，此项粮食可将当地收土地税、或粮食调剂局的谷子先行付出，并将数目报县级，以便向本政府核算。"1931年4月，中共闽粤赣省委为了解决红军缺粮的困难，发出《赶快采办粮食供应红军的紧急通知》，提出了筹措军粮的一系列措施：第一，在各县、区的重要交通要道成立粮食站。粮食站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粮食的集中，红军来时，做到及时供应。第二，由县、区苏维埃政府筹措一笔款子，派专人到各地收买谷米，其中包括从白区购买。第三，必要时向富农借粮食。第四，发动群众节省粮食，把省出来的粮食便宜卖给粮食站，供给红军。通知发出后，很快完成了筹措军粮的任务。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随着扩大红军运动的开展，粮食需求量更大。为满足红军需求，6月2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7月24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又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经过根据地全体军民的努力，24万担粮食的紧急动员和60万担借谷运动迅速圆满地完成，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军粮供应。

二、摸索阶段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经济工作的摸索时期，这一时期党在经济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对后来各个时期的经济工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开展领导经济工作必须时刻反对"左"的错误

"左"倾思想的影响不仅危害到革命，也极大影响到党的经济工作。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阶段，也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这一阶段接连发生了李立三、瞿秋白和王明的三次"左"倾错误，不仅对整个革命事业而且对党的经济工作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都不同程度受到"左"倾错误的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领导经济工作是在同“左”的错误斗争中展开的。

在土地革命初期，党内出现过严重“左”倾错误的过激行为。例如，在瞿秋白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的影响下，一些根据地乱打土豪，消灭富农经济，对小资产阶级小商人也实行过度捐款、打击，甚至是肉体消灭。这种政策严重打击了根据地脆弱的经济基础，将自己推向“自杀”状态。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批党的领导人不懈地同这些“左”的思想作斗争，并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加以修正错误，才慢慢使根据地经济工作向着正确的方向上健康发展。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在一程度上说，“左”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方法与“左”的革命路线和军事路线一起构成以后根据地大量丧失的根本原因。因此，开展经济工作，必须时刻反对“左”的错误，时刻警惕“左”的错误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和干扰。这一点，时至今日，这都是一条不可忘记的教训和警示。

（二）开展经济工作必须正确对待外国经验

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一切都在曲折探索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外国经验是应该的。但不从中国现实的具体情况出发，教条主义地搬用外国经验又是极其有害的。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工作的经验之一，就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之下，必须正确对待外国经验。

党的“六大”以前，在对待农民土地问题上已出现教条主义，但“六大”总结了各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其后一段时间内，土地政策的发展是比较正常的，土地革命也开展得比较好。但从1929年9月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后，土地革命中就开始出现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共产国际根据苏联在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地主，他们用更加束缚和更加残酷的剥削形式去剥削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在农村里，富农分子照例到处都是公开地站到反动势力方面，来反对农民群众和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接到信后就表示，过去错误宽待了富农，决定开始加紧推行反对富农的政策。在经济上向富农征派，在政治上打击富农。而且还借鉴苏联办集体农庄经验，主张“组织集体农场”，“实行集体生产”，对雇农“不必分与土地”，如分与土地，“须让他们集合起来，组织集体的农场”等等。这些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经验做法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极大破坏了农村土地革命开展。正如毛泽东1930年11月在峡江主持召开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讨论土地问题时所指出的，“中国农业经济主要的形式是小农经济”，“因此土地革命不是马上把这些分割极小的经济单位，集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农场的生产，这是经济条件所不许可的。”当然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这种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到王明时期便发展到高峰，其危害也发展到极端。土地革命的过程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都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别国的经验，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取得真正胜利。正确对待外国经验不仅是土地革命时期，也是今后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应牢牢记住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经济斗争、经济革命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围绕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

经济斗争、经济革命与经济建设三者有机柏结合是这一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又一大特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党的经济工作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而是将经济斗争、革命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工作的开展。因为，当时所处的经济建设环境是一个建立在落后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包围和分割的、处于频繁的战争状态的农村根据地。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要想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必须摧毁旧的经济统治，尤其要对广大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经济战线的斗争和革命。

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毛泽东十分重视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订了关于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斗争的战线、方针和政策，指导根据地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领导根据地民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不仅把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和粮食分给农民，而且将他们的土地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废除苛捐杂税，从而解放了农村被束缚的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热情。在城市里也领导打击没收奸商霸市的豪绅，保护中小商人，整顿市场的斗争，还开创了为革命根据地独立生存所必需的经济事业。这些经济斗争为开展根据地党的经济工作准备了前提条件。反过来说，经济建设搞好了，革命根据巩固增强了，又有利于党推进进一步的经济斗争和经济革命，从而把根据地经济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十分明确地强调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事业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来进行。毛泽东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党内那种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工作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一种观点则是“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要等到战争结束后，有了和平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是错误的；而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也是错误的。

（四）及时实施经济工作战略性转变

形势决定路线，路线决定政策。从大革命时期转变到土地革命时期，从土地革命时期转变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政府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及时转变经济工作的路线与政策。党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上体现出政策与策略上的灵活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及时转变革命路线，正式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将革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党的经济工作也由过去注重发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转向农村，转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转向土地革命，转向反封锁的经济斗争。到了土地革命后期，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

大对华侵略的华北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经济工作思路和政策，加快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转变。这一转变必然带来经济政策的变化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转变。例如：在工业方面主张实行投资开放政策，"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来投资各种工业。"在商业方面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在税收上"把一切工商业的捐税都完全取？肖，甚至于连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对富农不实行没收和罚款，也免除一切税收。等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经济政策的改变及时适应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反映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灵活性和艺术性。根据形势及时转变工作思路，这也是我们党在开展经济工作中一条重要的经验。

第三章 展开：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确立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全面展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党。伴随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在经济工作方面也走向成熟，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战时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和战时经济工作模式。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展开，是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1939年，国内外人士不断给边区以财力物力的援助，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施“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在财政上减轻人民负担，为经济建设打下基础。第二阶段，1940年~1942年，解放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人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全面展开。第三阶段，1943年~1945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大生产运动更加深入展开，根据地经济困难形势逐渐缓解，抗日根据地经济发生巨大变化。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纲领的确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转变，不仅要求党全面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以团结根据地和全国各个阶层参加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的时期。

一、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认识的深化

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首先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即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有正确的判断。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些基本经济国情的认识。

（一）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剖析

通过20世纪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一切大论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但是，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并非一致，特别是1931年王明等人掌握领导权后，对中国社会性质产生了一系列错误认识，使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因此，对中国社会性质正确的认识，既要不断深化，还要在党内进一步统一。为此，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人作了大量理论工作。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再次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

1939年至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及其演变过程。

毛泽东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外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世界各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和压迫，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也是阻碍中国独立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的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由此，中国走了一条崎岖的道路，即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的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总结了六大特点：第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第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在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第六，由于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特点，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在经济上，必须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

（二）对根据地社会性质的分析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分别在华北、西北、山东和大江南北建立了十几个大的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比，社会经济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了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性质，为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最重要的是没有帝国主义经济的统治，没有半殖民地性质。在这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权被取消。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各项方针来建设根据地，这就使得“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根据毛泽东的分析，根据地社会经济性质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在经济上实行了节制资本、保护工商业和实行平均地权的方针，使工商业和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使得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大为减弱，农村土地关系、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地主经济逐渐削弱，贫雇农经济迅速上升。产业方面，公营、私营企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工商业。

根据地社会经济性质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政治上建立了地方性质的联合政府。当时，在解放区，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联合政权。即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的名额各占1/3，这种经过民主选举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根据地社会经济性质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首先，解放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因而具有民族性；其次，解放区的文化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而具有科学性；再次，解放区文化是为占人

口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因而是具有大众性的。它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抗战时期，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并存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而由于正确认识了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性质，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成了当时中国最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经济形态，为夺取政权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模式。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确立

在上述对社会经济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第一次重大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确立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围绕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今后应走向何处，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一个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弄清这一问题，可以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可以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同时，也可以澄清党内的糊涂思想，统一全党认识。

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特别是革命性质问题，尽管早在中共二大时，就初步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出现过“左”和右的偏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同于过去的旧式民主革命。1939年5月，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五四运动已经使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12月，毛泽东与张闻天、李维汉等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命题，明确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批驳顽固派反共谬论的同时，丰富和完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向全国人民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和纲领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过程中的历史性飞跃。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其基本内容包括：

首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现状后认为，在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抗战的特殊条件下也允许封建地主经济存在。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所谓“私人经营则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劳动人民个体经营”。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人民个体经济这样四种经济形态。

关于国营经济，毛泽东认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即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由国家统一经营，建立国营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使私有资本经济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毛泽东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政权，因此，其“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性的彻底的民主革命，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强调，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国营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分析了合作经济的性质。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②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合作经济是必要的，毛泽东在后来写的《论联合政府》中，认为这种合作经济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第二，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毛泽东从中国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需要论述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抗战时期，为了团结各阶级抗战，中国共产党并不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并保护地主土地私有。但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应该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说：“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

第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这就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反映这个革命发生的经济基础也会发生变化，其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上去。毛泽东当时说得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头的。”

从上面分析可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十分丰富，比土地革命时期大大前进了一步，不仅补充、完善了原有思想，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形成。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经济纲领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

为了指导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实践，抗日战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经济纲领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

（一）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提出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共产党就战时财政经济方面，提出了基本主张，要求“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同时，还确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根据变化了的时局和国情，适时地调整经济政策，表现了灵活性和策略性。

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分析了抗战的形势，更加详细地论述了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1938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全民族的任务，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他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十大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即：“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第二，有计划的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从小规模的急需的部分开始，逐渐发展改进；吸收政府、民间与外国三方面的资力；并从政治上动员工人，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质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这些，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三，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国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在新的姿态下发展起来。在战区注意保护农具牲畜以及手工作坊，保证被隔断区域的经济自给。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同时，注意发展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钱出钱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第八，厉行廉洁运动，改订薪饷办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规定大体上平等的薪饷制度。第九，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第十，恢复与发展战区的邮电交通。”

这十大战时财经政策，是建立在反侵略战争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中

国是弱国，要支持长期战争面临着诸多困难，战胜这些困难，其重心在于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战争供给而效力，要组织和发动广大人民参与生产，支持战争，必须实行必要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改革。十项战时财经政策，正是反映了这一改革的要求。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提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作为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方针。

第一，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确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并引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段话："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者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家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认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这一经济纲领包含的意思有：凡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必须由国家经营；对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大资本、大企业，必须采取没收、剥夺的办法，将其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还从中国工业化的角度论述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土地改革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分流，进入城市，而且，土地改革会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对工业品的需求也会提高，使工业品获得广阔市场。土地改革是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第三，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存在与发展。对待不操纵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态度十分明确，即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因为中国还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之下，与它们相比，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进步的经济形态，因此，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三）经济建设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一指导思想是以"经济决定财政"为理论依据的。即首先是

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社会财富，增加物质基础，进而满足人民的需要，达到完全自给。发展经济，既要发展民营经济，也要发展公营经济，毛泽东说："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他要求大力发展民营企业，采取适当的步骤和办法，帮助人民发展自己的经济。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不能什么东西都向人民要，否则，人民负担不起，要发展公营经济，发展军队和机关的自给经济，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需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二，以农业为主体，全面发展解放区经济。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认为"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的生产，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发展之"。要求各级政府将精力"主要是放在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上，而不是放在商业上"。这一基本指导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当时形势和中共所处环境的科学分析，其一，当时正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粮食是战争所需要的最大供给，发展农业，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地处农村，以农业经济为主，发展农业生产是壮大根据地经济的主要途径；其三，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应优先发展农业。正如李富春所说："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第一等任务，是发展整个经济的先决条件。"

以农业为主体，但并不排斥工业和商贸业，整个根据地建设中，工业和商贸业也占有重要地位。发展工业，既是为了解决工业品自给自足，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也是为了使中国迈向工业化道路所必须的。发展商贸业，则是为了活跃商品流通，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必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是从抗日战争实际出发而提出的，它的基本特点是：着眼于抗战，以满足战争需要为出发点；着眼于人民利益，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原则。因此，这一指导思想是有效的、切实的，也被后来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全面展开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纲领、经济政策和经济方针的指导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展开了全面的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

一、发展农业生产，推进农业制度变革

在边区和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从两个方面推进农业的发展，一是通过军民大生产运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一）根据地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及政策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批示中提出："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遵循着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来进行。"这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是从当时形势出发，力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克服困难，达到自给自足之目的；另一方面是从长远目标着眼，使农业的发展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结合起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具体政策。

第一，实行减租减息。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土地是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的问题，超过了是属于地主还是属于农民的问题。为了团结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国民众参与抗战，中国共产党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减租，一般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减息，一般减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这一政策的实行，团结了地主阶级中的爱国人士和开明人士，同时也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

第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即从根据地现有的农业技术与农民生产知识出发，帮助农民对于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具体来说，如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鼓励从事秋开荒，秋翻地，鼓励农民多锄一二次草，推广先进经验，在边区中小学开设农业常识课，对一些环境污染进行科学治理，等。

第三，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从各方面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粮价，使农民恢复元气，愿意增加耕具，积极生产，促进农业发展。

第四，采取移民政策。即从土地少的地区向土地多的地区移民，使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口大量增加。如延安1937年只有3万多人，1942年达7万多人，安塞1937年只有2万多人，1942年达4万多人。

第五，实行农贷政策。帮助农民购买耕牛、农具，如1942年陕甘宁边区发放农贷400多万元，使农民购买耕牛2600多头，5000多件农具，对农民的帮助很大。1943年发放农贷690万元，1941年发放1260万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发展。

第六，奖励开荒。毛泽东提出："我们应在一切有荒地的县、区、乡组织农民多开荒地，以期增加粮食。"在这一政策鼓励下，根据地人民积极垦荒，使耕地大量增加，如陕甘宁边区1942年耕地为28万多亩、1943年多达77万多亩，抗战八年间，晋察边区扩大耕地面积达180多万亩。耕地的扩大，使得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第七，推广植棉。帮助棉户准备棉种、肥料、学习技术、制造轧花机供给棉农，组织棉花合作社，奖励优秀棉农等，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第八，实行农业累进税。1943年，中国共产党提议各级政府实行农业累进税则，即"依一定土地量按地分等计算税率，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质与量计算交税数目"。这样避免了摊派和不公平现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上述8项政策的提出和施行，使农民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使解放区农业迅速恢复

和发展起来，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大生产运动的展开

由于日本侵略者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再加上华北地区连续发生水旱、虫灾等自然灾害，使得1941年到1942年间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严重境地。为了战胜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巩固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其中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整风运动是为战胜困难奠定思想基础，而大生产运动则是为了奠定物质基础。

早在1938年秋天，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即开始从事生产。当困难时期到来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号召，军民同时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在边区的军队、学校、机关开展起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针对有些人认为军队参加了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学校和机关参加了生产，就不能学习和工作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边区各部队提出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展开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运动。使昔日野狼成群的荒原，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在领导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领导、发展生产的具体方针，主要有：根据人力物力分散的特点，生产和供给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使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所发展，军民生活都得到改善；大生产运动包括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把党政军的劳动力和人民的劳动力都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等等。

通过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经济困难，使解放区经济趋于恢复和繁荣，增加了军民的收入，改善了军民的生活，大大巩固了解放区，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农业合作化的初步探索

中国农村本来就有劳动互助的习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组织过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抗战时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大力号召农民实行劳动互助。毛泽东认为：“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非常需要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农民自愿组织的变工队、扎工队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大量出现。变工是自耕农之间的劳动协作，扎工是雇农共同劳动的一种形式。在一些人口密集的乡村，还组织了一些劳动互助社。

在1943年以前，合作社几乎都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并由党和政府的干部来领导，

农民在其中没有多少权力和主动性，像政府的机关。中国共产党发现问题后，立即进行改正。第一，合作社不能过大，城镇和行政村不能作为生产单位，以自然村为单位；第二，“至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通过群众，选拔那些受群众尊重、生产积极、有能力的人担任。”这样，便将传统的互助协作方式改造成新型的农业互助组织。

合作社管理的关键在于分配标准的制定，特别是人工与资金、畜工之间换算的标准。刚开始，将劳动力视为主要的分配依据，这样不能调动富裕农民的积极性，直到1943年，中国共产党鼓励富农参加互助组，并认为互助组的成功必须以维护私有制为前提，既以劳动力作为分配的依据，也以资金、牲畜、农具作为分配的依据，这对于提高生产发生了很好的效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种劳动互助的组织形式已经超越了过去传统的民间互助形式。不仅组织的数量上有了空前发展，而且内容上和组织形式上也都发生了变化，不仅成为长期的固定组织，而且有了领导人，有了劳动纪律，劳动的计算也趋向严格和公平。这一时期互助合作社，总的来说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之上的农民集体劳动组织，虽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或者有较多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只是少数而已。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四）开展学习英模运动

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进农业建设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民中开展了生产竞赛和学习英模运动。毛泽东号召：“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领导着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

劳动英雄生活在群众中，对解决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能找到有效办法，能带动群众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将劳动英雄比喻为传奇中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表明了他对生产及农民的重视，学习英模运动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各级政府都在其所在地区掀起学习英模运动。各地也涌现出很多英模人物，如吴满有就是一个典型。

吴满有，延安吴家枣园人，土地革命前是一个难民，在分得土地后，努力生产，积极劳动，成为一个富农，他不但自己富裕起来，而且带领群众把他所在的吴家枣园建设成边区有名的模范乡村。吴满有不但粮食打得多，公粮交得多，而且在拥军优抗等政治活动中处处带头，成为一个农村好党员。边区政府发现这个典型后，大力进行表彰，称“吴满有的方向”是“边区农民的方向”，掀起了一个学习吴满有的运动。在“吴满有运动”的推动下，边区许多农民努力生产，很快由贫农上升为新式富农或中农。也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量英模从普通农民中产生，受到党和边区政府的表扬、鼓励和训练，他们来到延安参加劳动英雄大会，将新的观念、新的情感带回生产中去，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些英雄，去领导广大农民去改造发展农村的社会与经济。

二、发展根据地工业的进一步探索

（一）大力发展公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都处于北方农村，几乎没有工业基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仅有一些小作坊和盐池、炭窖等，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为外来纺布的涌入而销声匿迹。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办起几个小规模的印刷、被服、军需等工厂，职工总共才几百人。

自1939年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始重视工业建设，创办了一些公营企业，如新华光学厂、光华制药厂等，公营工厂的职工增加到近千人。1941年，边区遭到更严密的封锁，中共中央又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号召，各地更加注重工业投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银行对工业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和贷款。

刚开始，工业建设盲目性很大，各地一哄而起，缺乏统一规划，表现出无政府状态，而且很多企业资本不够，原料供应不足，技术人才缺乏，不能支持持续生产。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很快制订了“巩固现有公营工业，发展农村手工业”的方针，对公营工业进行整顿、调整、合并，开始实现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

为了解决企业原料不足问题，中央号召尽量自己动手以解决。为解决技术人才问题，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要求党员纠正不愿参加技术工作的现象，服从分配，到经济和技术部门中去工作。中央强调挖掘自身潜力，要求“立即登记各种技术人才，汇报经建部，并不得隐瞒不报。”然后由经建部安排到各公营工厂担任技术员。同时，广泛争取、吸纳各地技术人才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如在上海经营机器厂的沈鸿，是一名优秀的机械技师，带领7名工人来到延安后，受到重用。还有像化学工程师钱志道、电器工程师陈振夏等，来到延安后，都被委以重任，将他们“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工业建设中，也提倡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激发工人们的生产热情，如学习赵占魁运动，就是生动一例。赵占魁是边区农具厂看炉工人，他勤恳努力工作，爱护工厂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团结全厂职工，成为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模范，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掀起了学习赵占魁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工业建设。

（二）保护鼓励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工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了“公私并进，公私两利”的原则，党以很大精力领导私营经济，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要促进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首先要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正当利益。194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

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合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提出要"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等政策，还要保证除汉奸以外的一切私人资本家的人权、政治、财政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对于有些地方劳动政策过"左"的现象，毛泽东也提出了批评，他强调："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增加工资。"

其次，要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私人资本家发展企业。如政府对私营工厂实行投资、贷款、订货等措施，保证他们有资金来源，有原料来源，有产品销路，有利润可赚，从而使私营工厂得以与公营工厂同时发展。同时，政府还从公营工厂抽调技术人员到私人企业中去指导技术，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私营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公营工厂的繁荣，使得抗日根据地工业建设蓬勃发展，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制药、肥皂、皮革、陶瓷、石油、煤炭、工具制造等各种与人民生活相关的产业兴建起来，改善了人民生活，为解放区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发展商贸业的进一步探索

（一）发展商贸业的政策与措施

商业贸易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发展边区商业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政府有效地组织商业贸易，给边区经济生活带来了无限生机。

解放区商贸业基本政策是：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对外实行统制。即在边区内部，以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为主，同时保护正当的私营商业，但限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取缔奸商，反对投机倒把。对外实行管制贸易，在根据地政府贸易部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以税收和行政手段对出口货物加以控制，禁止一切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必需品的输出，奖励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多余物品的输出。这一政策经过了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刚开始，根据地对出口管理严格，而对进口的管理则比较松懈，同时硬性规定不利用伪币，使自己陷入被动。1941 年，中国共产党试图对商业贸易实行管理。5 月 1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关于贸易局工作的决议》，要求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商业政策，……反对私人垄断资本，同时也不赞成国家资本或权利来垄断或统治，……一方面达到输入平衡，一方面防止市场操纵，妨碍自由，但又非放纵自由。"这就是说，既要反对"垄断"，允许贸易自由，又要反对放纵自由，对商业贸易实行一定程度的管理。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是减少了入超，支援了财政，减缓了金融波动和物价上涨的势头。1942 年，边区政府进一步提出实行商贸统一管理，并相应地逐步建立了商业许可制，公私商业管理制，商业情报制等制度，并确定商贸业的任务就是为人民的消费与生产起集中的组织与调节作用，"一切离开这个任务的方针就是危害新民主主义的错误方针。"这样，根据地商贸业逐步走上了正确轨道。

为了促进商贸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主要有：

第一，建立领导商贸的组织机构。抗战前，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贸易局，领导商业贸易，后来撤销。随着商贸业的发展，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贸易局。1942年12月，为了更好地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贺龙、陈云分别担任办事处正副主任，同时撤销贸易局，成立了物资局。物资局的任务是：管理与加强商业贸易、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协助财政保证实物供给，辅助国民经济之发展。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和物资局领导下，边区商贸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44年，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

第二，调整公营商业。调整的基本原则是，"在商业为辅的方针下，按照不违反贸易政策，不做投机生意的原则，按照各系统各单位精简后情形，实行商店的合股经营和疏散经营，取缔违反政策的商业，关闭无利可图的商业。"

第三，发展合作商业。边区政府为调剂民生，维持贸易，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合作商业，如采取发放贷款，调低税收，稳定物价，打击伪钞等，帮助各地建立小型的消费合作社，运销合作社，再使各个小合作社联合起来，逐渐将商业集零为整，使之成为有实力的合作商业。

第四，保护私营商业。根据地商业全部为中小商人经营，行商小贩占绝大多数，坐商虽不少，但多属农商兼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以运销方式进行商业活动。为了扶植、发展私营商业，边区政府规定：小贩行商只要不违背政策法令，均可在领取营业证和通行证后在边区境内自由买卖。同时，对一些无本经营的小商贩，由贸易局专门发放一次无利小本贷款，不取利息，扶助小商贩的经营。这样，边区私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第五，实行灵活的外贸政策。外贸一般实行统制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也采取灵活办法，如为了团结私商，建立了抵押贷款和期买期卖等办法，外商将货运进口岸，若暂时不能推销，可将货物抵押给贸易局，贸易局向外商贷给相应数量的货币，并帮助采购所需的商品。同时，还成立了物品信托交易所，买卖双方都可委托交易所购买和推销商品，价格由交易所秉公议定。另外，还用廉价货物和给予贷款的办法扶助小商。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繁荣与发展。

（二）商贸业的繁荣与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商贸政策的正确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商贸业获得长足发展，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促进物资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公营商业稳步发展。公营商业经过调整后步入良性循环，规模逐渐扩大。如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下属的南昌公司就有12个分公司；下属的盐业公司建立了123个骡马店；下属的延安光华商店，1941年资本达160万元，营业总额达893万多元，利润达114万多元。再如晋察冀边区，仅北岳区1942年就有公营商店24家，资金达193万多元。公营商业已成为解放区商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合作商业发展迅速。合作商业是劳动人民集体投资组织商品交换的一种集体所有制商业，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指导下，发展异常迅速。仅陕甘宁边区，1937年有消费

合作社 130 家，到 1941 年，4 年时间，就增加到 155 家，而且人员、股金增加幅度大，到 1944 年，全区消费合作社猛增到 3699 家。再如晋察冀边区，仅北岳区，1938 年有消费合作社 14 家，社员 5000 多人，而到 1939 年就激增到 13000 多家，社员 6 万多人，到 1940 年，合作社又增加了 6000 多个。曲阳一个县，就有混合合作社 113 个，消费合作社 153 个。这些合作社在便利交换，抵制商业资本过分剥削，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私营商业得到柏当发展。由于执行了内部贸易自由，扶植、发展私商的政策，私营商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如延安的私营商店，1938 年有 40 家，1939 年发展到 149 家，1940 年增加到 320 家，1943 年发展到 473 家。私营商业的发展，对活跃经济，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支援抗日战争，巩固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在反经济封锁斗争中发展对敌贸易

1939 年夏，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商品奇缺，物价不断上升。在严密的封锁下，边区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困难。

刚开始，由于根据地商贸业处于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也缺乏做经济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缺乏对敌经济斗争的经验，不懂得用贸易的方法去占领市场，因此禁止同敌人贸易，这套办法很快被证明对根据地是不利的。

1940 年，边区商贸业有了初步经验，逐步走向充实和成熟。这一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黎城会议，提出了“在晋冀鲁豫边区范围内征收出入口税，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不久，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也发出《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提出“以边区所有易边区所无的原则，与边区内外商人合作，发展对边区之外的贸易。”1941 年 5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也作出《关于贸易局工作的决定》，提出“保护自由贸易，作有计划的输出和输入”的政策，即“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这样，各抗日根据地都十分理智地看待对敌贸易，并尽量做好这一工作。

首先，有计划组织商品输出。边区输出品主要是食盐和土特产。1943 年 7 月 11 日，中共西北局发出了《关于改进食盐统销的指示》，允许群众驮盐，经盐业公司登记后可自由运出。这个指示的发出，打开了盐和土产品自由输出的大门，但由于限制走私的措施没有跟上，走私一度泛滥，10 月，西北局又作出禁止食盐输出的决定，实行专卖与统制政策，由贸易局、盐业公司组织商品输出。这样，不仅打乱了敌占区实行的物资统制配给制度，活跃了边区经济，提高了边币对伪币的比值，对稳定边区金融，平抑物价也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保护了边区重要物资，不使资敌。

其次，在游击区、敌占区设置各种形式的商店或商业小组。一是设立经由敌占区、游击区通到边区巩固区的过渡店，以二三人组成，深入游击区、敌占区，办理收货、发货、定货及买卖货物的业务，起着交易所的作用；二是由设在靠近游击区的商店派出两三个人员，到敌占区或游击区办理推销采购，将工作展开出去；三是利用敌占区或友区的商店或商人，替边区办理入口贸易，把他们变成边区出入口的起点或终点。这些形式都由公营商店完成，主要业务是对外办理出入口和对内调剂市场、平抑物价，其所经营的货物主要是粮食、棉布、食盐、火柴、军需品及其他军民所必需的商品，一般不进行

零售。同时，各根据地还有计划向敌占区和游击区派出干部。这些干部到敌占区后，创办贸易商行、货栈、粮店等商业机构，为根据地采办紧缺物资，输送经济情报，进行对敌贸易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加强对财政金融业的领导

（一）促进财政金融发展的方针政策

要坚持长期的战争，需要巨大的财政支付，当时根据地饱经战争的消耗，需要恢复，因此，一要发展经济，二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尽量做到合理负担，实行“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采取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相配合的办法，即“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既照顾到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需要，取之合理，用之得当。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强调节约，开源与节流并重。

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柏继废除了抗战前的各种苛捐杂税，确立新的税制。如工商税方面，采取有钱出钱，钱多多出的原则，政府收税，一般税率都较低，只占总收入的1%～5%，同时，还执行奖励生产发展的原则，对工业投资，合作社股金，水利投资只征收收益税，而不征收财产税，对一些急需发展的自给工业以及家庭副业实行免税。

抗日根据地财政税收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之于当时革命事业的急需方面，用之于人民事业方面。正如林伯渠所说，在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开支中，“保卫边区的军费占第一位，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费占第二位，……至于行政经费则尽量缩减，另外，还尽可能地投资于经济建设。”

为了管好财政，边区政府实行了财政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规定“实行统筹统支，确立预决算与会计制度”，作为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保证财政收支，维护财经纪律，巩固根据地具有决定性意义。

抗战后期，财政管理方面又出现新的问题，一些地方花钱大手大脚，不遵守财经制度，不执行预决算制度，有的甚圭任意扩大预算数目。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各根据地相继建立审计制度，边区政府成立审计委员会或审计署，并向各专署派出审计员，代表边区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进行审计。审计制度的建立，对于坚持财政制度，克服本位主义，发展经济起到了很好作用。

为了适应财政经济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根据地金融事业也建立起来。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1938年，晋察冀边区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解放区成立了北海银行。1939年，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了冀南银行。1940年，晋绥边区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不久，华中解放区也先后成立了淮南银行、淮北银行、盐阜银行、大江银行等，后合并为华中银行。

银行与货币政策，是金融政策的重要部分。边区政府确定：“银行的任务是调剂金融，发展生产，因此它在事业上，应大量吸收存款，对工业、农业、对外贸易三项积极

放款及投资，并多设分行及代办处，来健全边区的汇兑网。”①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边区各地银行在统制金融、调剂金融、流通资金、代理国库、筹划财务、支付财政贷款、扶持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地还建起了一批信用合作社。

边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保护法币，不使法币窖藏或逃避，因此，停止法币在边区境内流通。同时发行地方钞票，对巩固边币，则采取加强准备，限制发行数额的办法。

（二）发行边币与统一边币市场

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稳定金额，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克服财政困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抗日根据地银行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即边币。由于各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封锁分割与独立作战的缘故，各地的军需民用都由当地自筹，地区之间甚至没有物资交流，财政收支是独立的，因此各地发行的货币是不同的，但发行方式与政策都是一致的。

为了保证边币的发行，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第一，确定边币独占发行，各根据地政府都发出通告，规定边币为市面惟一的交换媒介，禁止法币、杂钞市面流通。持有法币、杂钞者，必须在交易前，先到兑换机关兑成边币，否则不能使用。第二，人民有正常理由，需要携带法币或杂钞出境者，随时可以持边币到银行换取法币或杂钞。第三，人民有愿储藏法币者，听之。但不得投入流通界，致被敌伪吸收。并广泛宣传，向人民说明边区金融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吸收法币，而是防止敌人吸收法币，来套买我国的外汇，扰乱我国的金融。第四，以法币作边币的基础。因法币在金融上势力最大，要巩固边币的信用与地位，必须借重法币力量，以打击杂钞、伪钞。因此，边区政府规定边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一比一，与其他各钞则照市价。第五，严禁奸商私运法币、现钞出境。第六，禁止伪钞入境或流通。

边币发行之初，信用度并不高，流通范围有限，和法币、银元、杂钞、土票等同时流通，货币市场是一种混合市场。中国共产党除了用政权力量强制推行外，还从政治上着眼，在群众中广为宣传，使群众认识到：使用边币关系到稳定根据地金融和粉碎敌人进攻；边币发行有充足的基金作保证；中国人不应花日本人及汉奸政府的钞票等。同时，从经济上着手，向市场提供充足的商品。另外，有计划地发行边币，避免在部分地区局部膨胀的现象，从而保证了边币在全局的稳定。

边币发行后，为了形成统一市场，必须实行对敌货币斗争。各根据地都广泛开展了打击伪币的行动。1942 年以后，由于法币币值猛跌，敌伪利用大批法币向根据地掠夺物资，造成根据地大批物资外流，物价飞涨。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排挤法币伪钞，建立独立自主的边币市场的方针，除用行政手段禁用法币伪钞外，还通过输出物资吸收法币伪钞，然后将其逐渐压价和排挤。仅半年之间，就将法币和伪钞的比价压低五六倍，使边币值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开展了打击日伪掠夺银元的斗争。当时，日伪以倾销商品为表象，达到掌握银元，再以银元吸收边区粮食和主要物资，扰乱边币市场目的。各根据政府采取了坚决措施，打击敌伪活动。如晋察冀边区 1940 年 5 月发布公告，规定：“白银绝对禁止流通”，“白银绝对禁止出境”。否则以汉奸论处。在政府强制行动下，这一斗争很快取得胜利。

通过一系列斗争，边币信用度不断提高，逐渐摆脱对法币的依赖，成为抗日根据地内独立自主的一元化货币，统一的边币市场逐渐形成。

（三）实施合理负担的农村税费政策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村经济，经济主体是农民。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保护农民经济利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农村的税收政策几经变化，经过反复实践，终于形成了以合理负担为基本原则的农村税费政策。

1937年～1938年，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相继废除了抗战前的各种苛捐杂税，确立新的税制。农村中，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叫作“救国公粮”。救国公粮主要是按土地的产量累计征税，并且实行统一税制，降低税率，一切税收除一次统征外，没有附加和重征。一般来讲，税率都很低，有的地区征收救国公粮的同时，还保留了田赋制度，按占有土地的面积加征土地税，但由于土地大部分操在地主富农手里，这种办法实质上是增加地主、富农税负，一般老百姓负担都比较轻。负担情况如下表。这种轻税收政策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宁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1940年～1942年，边区经济发生困难，而过去征收的救国公粮也存在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主要问题是负担面太窄，不利于广泛动员人民的财力和物力战胜困难，支援持久抗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提出并实行了新的税制，即统一累进税。农业统一累进税的基本精神是：

第一，征收内容分为财产税与收入税两种，土地财产和农业收益均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税本，从而把财产税和收入税融合起来，统一起来。在收入税的计算中，要从总收入中扫除一定比例的生产消耗，这样就适当地增加了地主的负担，给农民以应得的照顾。

第二，采用累进税制。办法是将税分为若干等，从低等到高等累进率不断提高。这就使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税率的负担，使负担更加合理。

第三，规定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但免征点定得比较低，使农民中除少数极贫者外，都要缴纳税收。而累进最高率的规定，则避免地主负担过重。

累进税率是按人们收入多少而纳税，累进，就是钱多的人纳较多的税、钱少少纳税，这是合理的。另外，这种税是直接税，是向财产所有人和收益人征收，不转嫁于任何人。

农业统一累进税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征税办法，它使人民负担更趋向合理，使边区税收制度向成熟方向发展。但由于当时处于困难环境下，税收的量上有所加重，人民的负担不能不有所增加。再加上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在执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过程中，为了完成各项任务，对原来一些规定及程序置之不理，使得在农业税收征收上一度出现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很快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着手改进。

1943年～1945年间根据地开始重新修订农业统一累进税。修订的要点（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是：第一，增加免税的财产和收入项目。凡不雇工、利用农闲进行的家庭副业与经政府批准的合作社，其财产与收入完全免税。第二，土地所有人负担土地税，地主之地租收入及经营农业者之收入，征收收入税。矫正了过去收入税与收入脱节，财产

税与财产脱节之弊，使负担更加公平合理。第三，缩短等级距离（12 等改为 16 等），缩小累进率，使累进税更合理。第四，免税点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升降取消，使每一地区的免税点达到一致。

新修订的税收办法，明确规定了各阶层的最高负担限度，如贫农不得超过总收入的 10%，1943 年改为不超过 5%。这就比过去更加切合实际。同时，在执行过程中，随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使之不断完善。新的税收办法受到农民的欢迎，人民负担减轻了，政府的税款上来了，生产也得到了发展。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理论探索与理论总结

如何在战争状态下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前探索的重要内容。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实践，但毕竟所费精力不多，积累经验有限，尚不能形成成熟的理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工作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开始趋向成熟。

一、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发表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战胜侵略者的基础，因此将经济建设确定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更是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在理论上进行了很多可贵探索和系统总结。

1941 年和 1942 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工作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主要内容有：

第一，关于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着重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批判了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和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方针。他说："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第二，关于发展农业。毛泽东认为边区各项经济发展，农业极为重要，应该以农业为主体。他总结了过去抗日根据地农业发展的原因，在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党重视农业，发出开展生产的号召，动员广大人民参加生产等。他还提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八大措施，他说："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

提高技术与准备，实行累进税——这八项，就是我们在1943年可以做，必须做，并会切实有效的农业政策。”

第三，关于发展自给工业。毛泽东认为，发展根据地经济重要的在于发展公营经济事业，而发展公营经济事业重要的在于发展公营自给工业。他提出了搞好公营工业的一系列改革计划，如增加资本，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建立经济核算制度，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充实与扩大纺织厂，整理造纸厂，增加煤油生产等。

第四，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毛泽东认为，在政府、军队、机关三部分公营经济中，军队所经营的公营经济是最主要的，因为它在解决经济所需中，既是最迅速，又是最大量，“他们都以极少的资本，落后的技术条件，发展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与商业，有些还开设了规模较大的纺织及造纸工厂。”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后，毛泽东还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如要求减轻民负，休养民力；应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应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从事生产；选择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比较强的干部去管理生产和供给工作；为鼓励生产人员积极性，应允许从他们生产结果中支出相当部分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厉行“军民兼顾”的原则，坚决不允许损害人民的利益；生产与教育不可偏废；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计划的完成等。

第五，关于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毛泽东认为，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是直接为着自己解决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的，其重要性仅次于军队。他在总结了过去机关学校从事生产事业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今后施行的各项方针，如：调整与发展各种手工业；发展畜牧业；发展运输业；整理商业；改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执行统一领导；一切农工畜运商业实行企业化；一切生产机关、学校，均应实行群众化；下达各机关学校的生产任务等。

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阐述的这些经济思想，不仅指导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而且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系统探索和总结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理论。

二、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的经济思想

1944年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党的经济工作经验，进一步阐述了一系列带有全局性和总体性的经济工作与经济建设理论与指导思想。

第一，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经济思想要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展经济工作所处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搞经济建设就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毛泽东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仅而是很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毛泽东所提出的，

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

第二，搞经济建设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广大人民是生产力的创造者，要发展生产力，必须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地处农村，而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他说："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这样，"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第三，搞经济建设要自力更生。也就是说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资金来源发展民族经济，毛泽东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第四，搞经济建设，必须爱惜人力物力，要有长远规划。经济建设需要人和物，这是基本的条件，由于根据地处于艰苦环境，人和物都十分欠缺，因此，不能大手大脚，随意浪费。而且要有总体安排和长远规划。毛泽东说："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

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思想，已经超出了对具体经济工作的探讨，而是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探索，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与经济建设基本指导思想的理论探索与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工作的理论思维达到了新的境界。

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伴随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逐步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它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者先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中国与欧洲先进的工业国存在极大差别。党的"二大"已经认识到，中国"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远。"中国经济生活仅仅是处在"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是变动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使得中国各个阶级、阶层与日本帝国主义形成了最尖锐对立的矛盾。一是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状况，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情上迥然不同。因此中国当时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也团结他们发展其经

济。毛泽东说："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根据毛泽东的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也不是受帝国主义剥削的殖民地经济，同时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它不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也不允许操纵国计民生的垄断资本存在，而是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各得其所，都能安居乐业，不论贫富都受保护，都能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改善生活，真正符合各阶级利益。正如林伯渠所说的那样，历史要求我们推翻封建，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资本主义是必然要发展且需要它发展，只有迅速发展才能医治我们历史上的经济创伤。企图超过此阶段是不许可的。然而历史又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加与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不可能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因此，经济建设要求在于有益广大民众，不可能容许再有操纵国民生计的大私有财产，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如何促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还提出了建立合作社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提出了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的途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列宁更是提出了合作社的发展等于社会主义发展，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入口的思想，列宁说："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我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吗？"可以看出，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是把建立合作社作为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手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地处广大农村，发展经济主要是发展农业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认为用合作社方式，可以把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发展，毛泽东说："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很显然，毛泽东对合作社，强调的是对生产力的作用，而不是其发展趋势，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当时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立即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虽然也肯定了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但主要是将其作为组合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的一种形式。没有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词句，而是灵活运用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理论全面而且系统，涉及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的方针政策，涉及到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成熟，而且，这一理论中的诸多重要思想不仅适用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工作，也适用于未来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

第四节　展开阶段经济工作方法、经济模式及其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成熟的时期，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形成系统的战时经济工作方法和战时经济模式的时期。这些方法和模式不仅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成功展开，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经济工作方法和经济模式的选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展开阶段开展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了相对比较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经济工作的开展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加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所有这些，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大力探索经济工作的方法。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成功的经验。

（一）开展经济工作必须注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开展经济工作，搞经济建设，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能够完成的，必须发动广大民众参与，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建设服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工作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和成功的经验。

首先，实施民主的经济政策，调动各个阶级、阶层的积极性。1943 年，中共中央公布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认为应该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全国工人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施了这样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工作中照顾了农民，也照顾了地主，照顾了工人，也照顾了资本家，充分地调动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积极性。

其次，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注重同时发展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公营经济即政府、军队、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工商业，民营经济是一切私人经营的农工商业。发展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轻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发展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根据地人民生活，同时以租税形式支持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毛泽东强

调照顾好这两方面的利益，他提出了处理两者关系，调动其积极性的基本原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和供给。"诚然，公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但它毕竟只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光调动公营经济的积极性还不够，必须大大提倡和促进包括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这样，公营经济、民营经济密切联系、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二）开展经济工作必须注重动员群众

群众动员，典型引路，组织起来等方式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参与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经济工作方法的又一显著特征和成功经验。

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是如此，经济工作也是如此。广大人民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认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党的政策一旦为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占根据地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有着不可估计的经济创造力量，只要把这一伟大力量发挥起来，其作用是无可限量的，怎样发挥呢，群众动员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实践群众动员的典范。当陕甘宁边区面临经济困难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在目前严重的困难面前，"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动员会激发了群众的热情，根据地军民都积极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

典型引路。经济工作是广大人民的实践活动，为了推动这种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注重深入群众的实践，在群众中发现典型、宣传典型、以典型引路。朱德对典型的作用十分重视，他说："有了这批积极分子，就有了团结群众的核心，在他们的影响下，使全体群众更积极地行动起来。"陕甘宁边区通过一年的劳动竞赛，在群众中涌现出了数百个劳动英雄，如以吴满有为代表的劳动英雄，以刘建章为代表的合作社英雄，以赵占魁为代表的工业劳动英雄，以杨朝臣为代表的退伍残废军人劳动英雄，有运盐英雄刘永祥，畜牧英雄贺保之，植棉英雄郭秉仁等。通过树立这些典型，让群众向他们学习，更加激励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如林伯渠所说："劳动合作，劳动英雄，模范村以至模范乡，这就是边区人民生产大进步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标志。"

组织起来。根据地经济建设是以农业为主体，而农业建设的直接劳动者是农民，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怎样才能改变这现状呢？毛泽东说："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即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这样，就"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样一支劳动大军参与根据地经济建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解放区的经济繁荣。

（三）经济工作必须与民众利益结合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经济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经济工作的开展与民众利益结合起来，这也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战时财政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不仅强调要通过发展经济来保障供给，而且强调在要求人民支持军政财政，供给军粮时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不顾人民的利益，对人民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是国民党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不能承袭。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边区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帮助人民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尽量给人民带来利益。如陕甘宁边区仅 1942 年在农业方面就投资 1000 多万元，用于兴修水利，制造农具，购买耕牛种子，因而受到农民极大欢迎。以延安地区为例，发放耕牛与农具贷款 158 万元，帮助农民购买耕牛农具，还发放植棉贷款，使得当地增开荒地 10 万亩，增收棉花 87 万斤。这就使经济工作与民众利益结合起来，尽量照顾到了人民利益，人民虽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所得大于所失。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国共产党号召部队,机关参加生产,通过生产,既解决了自己的一部分需要,又可少向人民要钱要粮,毛泽东说:"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

（四）自力更生，因地制宜，是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抗战要靠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也要靠自力更生。当时，根据地经济基础极其贫弱，再加敌人的不断扫荡与顽固派的封锁，依靠外面的接济完全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坚持抗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毛泽东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自己动手来解决经济问题。"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群众开展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思想的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认为，主张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外援，外援愈多，对我们的帮助会愈大，我们应当主动去争取外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外援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依赖外援，主要靠自己的努力，靠群众的力量克服面临的困难。不放松力争援助，但不依赖外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关于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辩证法思想。

为了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给自足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与抗日根据地的环境紧密相联的，由于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必须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是粉碎敌人从经济上毁灭边区的阴谋的惟一保证。因为边区实现了自给自足，敌人的封锁政策自然无效。而边区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经济上得不到任何援助，要坚持抗战，只有依靠自给自足。同时，边区有广大农村，丰富的资源，

众多的人口，固有的技术，这是实现自给自足的条件。因此，建立自给自足经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要自力更生，必须因地制宜，一切从现实所具备的条件出发。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例如，根据根据地地处农村的环境，当时最大的需要是粮食这一客观现实，提出了以农业为主体，全面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方针，认为这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第一等任务，是发展整个经济的先决条件。"在工业方面，注重发展小型工业，特别是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且注意力又放在日用品的生产方面。这都是从当时根据地的条件，因地制宜而提出的正确主张。

（五）必须注重保护和利用资本主义

利用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经济工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成功的经验。从政治上说，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团结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经济上说，则有利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与它们相比，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进步的经济形态，利用这种进步的经济形态，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相反保护、利用资本主义，并促进其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日救国的经济主张中强调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而且在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提出了"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政策，并在实践中在投资、贷款、订货等方面采取了公私平等的措施。根据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根据地经济的繁荣。

二、战时经济斗争艺术与战时经济工作方法的成熟

（一）战时经济斗争艺术的初步形成

经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前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经济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斗争艺术。到抗战时期，敌我经济斗争异常激烈，特别是抗战最后两三年，这种斗争更加尖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进一步积累对敌经济斗争经验，形成了较成熟的战时经济斗争艺术。

第一，发展经济，增强对敌经济斗争的物质基础。敌人的经济封锁造成了抗日根据

地的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要战胜困难，必须开展一系列经济建设，奠定强大的战胜经济困难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说："为了对付敌人'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只有进行生产，才能创造丰富的物资，才能使根据地实现自给自足，而只有实现自给自足了，才能增强对敌经济斗争的实力，处于主动地位，才能更好地实现对敌经济斗争，才能最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第二，以经济的方法开展经济斗争。经济有经济的规律，经济斗争有经济斗争的特点，不能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代替经济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经济的方法开展经济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统制对外贸易。除重要物品由政府专卖出口外，其他货物免税自由出口；入口货物，除奢侈品、迷信品外，凡抗战所需、人民生活所需，都准许入口，自由买卖。对出入口货物的检查各级政府直接负责，对有些物品则在交纳出入口税后准予进出口。这对调剂市场，争取出入口贸易平衡，起到了很好作用。也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与商品倾销图谋。其次，开展物资争夺战。为了掌握物资，冲破敌人的封锁，中国共产党派出大量优秀人员到敌占区、游击区办商店，设货栈，吸收边区所需的物资，然后再想法运回边区。同时，利用市场价格规律，用少数物资换回多的物资，用不必需的物资换回必需的物资等。再次，开展对敌货币斗争。为了稳定边区物价，促进经济繁荣，各根据地发行了边币，边币发行后，收兑伪币，并将伪币投到敌占区购回物资。同时，针对敌人收兑群众手中的法币，根据地采取了打击伪币、保护法币的政策，准许法币在根据地通行，但禁止出境。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变换手法，从收兑法币到驱逐法币，把大量法币投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用来掠夺物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排挤法币，禁用伪币，将法币打回敌占区，既换回了大量物资，又提高了边币的币值。

第三，军事斗争与经济斗争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对敌经济斗争中，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有时也运用军事斗争配合。如冀中白洋淀盛产芦苇席，1941 年日寇设卡低价强收芦苇席，不准他人购买。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了争夺这一资源，解决群众疾苦，首先在军事上进行打击，摧毁敌人一些据点，然后发出布告，减低粮价，提高苇席收购价格，群众皆大欢喜，均向根据地出卖芦苇席。

（二）新民主主义战时经济工作方法的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时经济工作经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战时经济工作方法趋于成熟。其成熟性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了成型的经济工作基本方法。毛泽东在谈到领导方法问题时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就是从实际中来，在普遍工作的情况下，必须深入具体的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进行重点领导，详细研究，找到规律和经验，再推广到一般，去指导多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就是从群众中来，即深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到群众中去实践，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其次，形成了系统的战时经济工作方针政策体系。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经济工作中，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方针，每一条方针都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于将财政问题的解决立于努力发展生产这一坚实的物资基础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强调解决经济困难必须着眼于自力更生，不能依赖外援；“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要求发展经济必须照顾到各方面利益，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共同努力。促进解放区经济繁荣；“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旨在使公营经济发展中既能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又能防止盲目性，做到计划统一，经营合理；“组织起来”提出走劳动互助合作的道路，找到了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以农业为主体”强调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既适应了解放区经济的现实条件，也体现了农业是工业基础的精神；“生产与节约并重”要求既要开源，也要节流，生产节约两不误。这些丰富的经验无不是从实际中来，从群众中来，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经济工作方法的累累硕果。

第三，形成了定型的经济工作领导体制。领导工作方法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下级机关的负责人负起责任来。毛泽东说：“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的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领导工作是一个系统，每个环节都必须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

第四，形成了经济工作领导队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批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和经济工作者（包括科技人员、管理干部）。各解放区都建立有专门的领导机构，每个机构都有专门的负责人，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策、方向上的领导，具体的事务，则是由专门的经济领导干部、经济技术干部去执行。这就使整个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能正常运行。

三、展开阶段的战时经济模式及其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领导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营工业的领导。整个抗战期间，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抗日根据地公营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产量、生产效率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解放区公营工业处于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此缺乏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苏联办企业的一些办法，再加处于战争期间，所以，当时的公营工业无不打上计划与战争的烙印，具有计划经济模式和战时经济模式的一些特征。

第一，重视经济发展的计划性质与阶段性。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当时边区发展工业，原料、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这就需要减少浪费，使工业能均衡发展，这就需要相当缜密的计划。林伯渠当时就强调：“工作中心已转到国防建设方面来了。如果说，过去工作多带有流动的性质，常采取突击的方式，那么现在则更固定些。计划应有经常性。”为了应付战争，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边区资源，促进工业发展，边区政府要求提高计划性，使得工业发展融入计划经济的模式中。

第二，实行供给性生产。当时公营工厂进行生产不是为了商品和利润，而是供给本部门的需要，工厂的一切费用，采取本部门报销制，由于是供给性生产，因此不搞经济核算。由于不搞成本核算，也不计算盈亏，工厂关心的只是完成任务，至于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市场需要、是否盈利，那可以全然不管，因此，生产中出现浪费现象，产品成本高出私营工厂很多。同时，由于生产与管理费用凭预算拨款，结算凭单据报销，工厂就无多余资金作临时必须的周转，使生产受到影响。另外，工人的劳动报酬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和津贴制，即按统一的供给标准，由公家供吃供穿，再发很少一点津贴，使得时间一长，工人的积极性很难提高。

第三，管理机关化。由于公营工厂是部队机关学校办的，工厂就变成这些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工厂的大小问题必须请示主管机关解决，这就束缚了工厂的手脚，养成了对上级的依赖性，失去了主动改进管理，改革技术，扩大经营的积极性。由于工厂是机关的组成部分，其内部管理完全是机关的一套模式，与机关内部机构相对应，工厂内设置许多类似机构，造成机构庞杂，冗员众多，办事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工厂的生产。

对以上这些弊端，中国共产党发现后，一度进行整理，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过批评，并建议公营工厂建立经济核算，组织管理上实现一元化领导。各根据地也发布命令，要求各公营工厂实行领导一元化，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工厂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反对贪污浪费，节省生产成本等，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人们形成的观念难以彻底转变。因此，公营工业发展中所形成的计划经济和战时经济的一些特点并没得到根本改变，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已有了计划经济的雏形。

计划经济雏形的出现，在当时已显现一些弊端，但在战争年代，这种计划经济有利于动员资源的优势，有利于在短时期内筹集物资，战胜困难，应对战争。它的作用是主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计划经济雏形发展成为定型的模式，其弊端便明显暴露出来。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与战争相适应的发展计划和体制的积极作用开始弱化，粗放发展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管理体制的潜力逐步耗尽，这种封闭半封闭的忽视市场的供给式生产逐步走到末路，它带给新中国的是经济建设的挫折和教训。

四、经济工作对敌后抗战的有力支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为敌后抗战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保障了抗战军需物资的供给、抗战军费的筹措。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军需物资的绝大部分是根据地自力更生生产的。1938年到1939年间，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卫生、器材、纺织、制革、农具、石油、造纸等7个公营工厂，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97个，职工达7000余人。山东解放区工业，到1945年，已有公营工厂88个，职工3000余人。其他抗日根据地公营工厂也迅速发展。各抗日根据地除建立军民兼顾的工厂外，还建立了一大批直接生产军用品

的兵工厂。抗日根据地工商业的发展，保障了抗战军需物资的供给。在各根据地，军需的机械、矿产品、纸张、被服等一般物资，绝大部分都能自给或半自给，枪械、弹药等军火也绝大部分自给。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保障了边区部队军粮和副食的供应。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陕甘宁边区部队1939年开荒23136亩，1940年开荒20680亩，1941年开荒14794亩，粮食产量逐年增加，部队粮食、办公费大部分自给，蔬菜全部自给。冀鲁豫边区部队1940年开始进行农业生产，1943年每人种地3亩，自给一季粮食。晋绥边区1944年全军开荒166000亩，打粮20000石，蔬菜基本上自给。晋察冀边区部队种地70000多亩，收获粮食15000石，蔬菜基本上自给。

抗日根据地的军费，主要是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财政和金融的渠道筹措，如恢复田赋、征收统一累进税、征收救国公粮、发行救国公债等。1938年到1941年间，晋察冀边区为了满足财政急需，恢复征收田赋，仅冀中区1938年就征收田赋600万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20%，政府收入的增加，扭转了晋察冀边区军费紧张的局面。征收统一累进税，纳税面扩大到70%～80%，使抗日军费有了可靠的来源。救国公粮是抗战时期各边区农业税的形式之一，也是边区财政最主要的收入之一，农民有粮出粮，便于交纳，减少运输，便于军需供给，这种形式受到农民的拥护，广大农民踊跃交纳。征收救国公粮，初步解决了军队和脱产政府工作人员的吃粮问题。一些边区银行发行公债，弥补了抗日军政费用的不足。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支出，遵循“用之得当”、“保障供给”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将绝大部分财力用于抗战军事方面，保障了抗战所需经费。如陕甘宁边区1944年财政支出中，军费占44%以上。1938～1944年，晋察冀边区平均每年军费开支占边区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最高的一年（1938年）达到93%。

抗日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保护和争取了大量抗日军需民用物资，这也是边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首先，稳定了边区的物价。如在山东解放区，由于停用法币，市场流通的货币量减少，各地物价下降，为根据地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次，边币的币值提高。以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区为例，北海币与法币的币值比1943年夏季为1：1，到年底升为1：5；北海币与伪币的币值比1943年上半年为7：1，到下半年则为1.5：1。最后，保护和夺取了大量物资。随着货币斗争的胜利，大量法币、伪币被排挤出边区，这不仅保护了边区的物资免遭劫夺，而且从敌占区夺取了大量物资，完全弥补了初期法币伪币夺取根据地物资所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边币的信用得到确立，流通范围得到扩大，不仅完全占领了边区市场，许多游击区也成了边币市场，就连一些敌占区的人民也乐于接受边币。

根据地工商业的发展，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财政金融工作及对敌货币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保证了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财力、物力基础。特别重要的是，边区经济的发展，大大调动了边区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积极性，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保证了抗日部队的充足兵员。

第四章　扩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经济工作的扩展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党的经济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经济工作的主题是经济拓展与经济建国。具体来说，一是在新老解放区继续实行反封建的农村土地改革。二是逐步开展城市经济工作，拓展经济工作新的领域。三是在理论上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从1945年8月～1946年5月，党的经济工作是在各解放区仍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2）1946年6月～1949年3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由和平建国转变为战时经济的思想，将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党的城市经济工作展开。这一时期，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初步形成。（3）1949年4月～1949年10月，党的经济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党的经济工作以接管和管理城市为主，同时不放松农村经济工作。党进一步探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并经过《共同纲领》予以法律上的确立。

第一节　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与经济工作内容的变化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抉择：和平建国和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和平建国局面的出现，同时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形势剧烈的变化下，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经历了由支持抗日战争向和平建国的转化，以及由和平建国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党的经济工作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党面临的中心工作

抗战胜利后，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制止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任务。

（一）战后国内政治形势及主要矛盾的变化

抗战胜利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向何处去？是和平建国，还是诉诸于武力？是民主；还是独裁？中国将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不仅坚持了持久抗战，而且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壮大了自身力量。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在抗战中成立并发展起来的中国民主同盟以及抗战胜利前后成立的一批民主党派、团体，是国内民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主张改革中国的政治，和平建国。

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顽固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企图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使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行动上，大肆抢占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运送兵力抢占战略要地，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内战，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但是，当其内战还未准备好的时候，就打出“和谈”旗号，以掩盖其内战阴谋。

上述情况表明，战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在由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制止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成为这一斗争的主要内容，也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任务。

在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坚决保卫人民胜利的成果，作好武装自卫的准备；同时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决定与国民党谈判，力争实现国内和平。中国进入争取和平民主的新的历史阶段。

（二）对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估计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开始的6个月左右的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党在这一过渡阶段内的任务是：在国统区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其中，新区的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府和组织生产运动，对于争取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946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共10项内容，其中第八项为财政经济改革，主要是：(1) 确定预算决算制度，并平衡收支，取消苛杂，改革税制，收缩通货，稳定币制，国家支出之最大部分，应保证用于经济建设、文化事业。(2) 为促进中国工业化，定期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吸收对发展经建有关之各方面代表人士参加。决定经建方针，规定计划，废止现行统制政策，实行经济民主与企业自由，防止外国独占资本之操纵国民生计，严禁官吏利用其权势地位，从事投机垄断，逃税走私，私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的活动。(3) 实行农业改革，扶助农民组织，推行全国减租，适当地保证佃权并保证交租，严禁高利盘剥，国家

银行应扩大农贷数量，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供给农具、耕牛及种子，发展合作事业，开垦荒地，建设水利。(4) 实行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这是一个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财政经济改革方案。基本被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所采纳。

面临新的形势，中共估计到中国将进入一段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政协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即于2月1日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同时强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求各地"在三个月至十个月内放手发动群众，完成新旧解放区的减租，以巩固我党在解放区的群众基础"，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二、经济工作向和平建国方向的转化

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的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是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阶段。党的主要任务，一是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二是力争和平建国局面的实现。相应地，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也必须围绕这一政治任务而展开。

（一）继续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为了调动解放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确立党的群众基础，巩固新解放区，同时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结成统一战线，以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继续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夕就宣布：减租减息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明确提出："目前我党的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指示指出：我党当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此，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共十项内容。其中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就有减租、生产、财政、救济等四项。对于"减租"则进一步强调指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下达后，各解放区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开展了大规模

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和复查减租运动。

（二）新区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

新解放区是指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日发动反攻后，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复的大量失地。其中有新收复的，也有是在原解放区基础上扩大的。这些地区解放后，日伪残余、汉奸地主仍有一定的势力，广大农民群众仍然遭受压制。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从老解放区调派大批干部，奔赴新区。抗战胜利后，党中央陆续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大军和2万名富有经验的干部，奔赴东北新区，开展群众斗争。

新解放区的群众斗争从反奸清算开始。所谓"反奸清算"，就是惩办清算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控诉汉奸恶霸压迫剥削农民的种种罪行，清算被其霸占、掠夺的土地和财产，转嫁的敌伪负担，额外剥削等。在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支持下，广大新区群众性的反奸清算斗争迅速开展起来。这一斗争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逐步深入：

一是充分发动群众，召开群众性的控诉大会，控诉汉奸恶霸为虎作伥、为非作歹、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

二是清算，就是将汉奸恶霸对农民的盘剥进行清算，还给农民，使群众获取看得见的利益。经过控诉、清算斗争，群众不仅得到部分经济利益，如收回被汉奸敌伪人员霸占的土地财产，索回被掠夺讹诈贪污的款项等；而且摧毁了伪政权，建立了民主政权；他们组织控诉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工会、农会等群众性的团体，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是没收和分配日伪霸占的土地。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1946年初，各解放区分别颁布条令，没收日、伪、大汉奸的一切土地，并要求在春耕之前，分配到农民手里。各地党组织和民主政府，派遣工作队，依靠群众积极分子，通过农民自治会等组织，首先对敌伪土地、农民人口和缺地状况等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群众评议，将敌伪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没收与分配敌伪土地，不少佃农、雇农、赤贫获得土地，上升为自耕农，劳动农民获得初步的利益，农村阶级关系也开始变化。广大的新区群众被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政治觉悟程度大为提高，为新区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四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广大新区虽经反奸清算和没收日伪土地，但其生产关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大量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劳苦大众仍然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因此，减轻封建剥削，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之所在。另外，1946年春季，广大新区又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民生产和生活陷人困境，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十分迫切。1946年春广大新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在政策和方式上，既不同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也不同于上述的反奸清算。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是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在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基础上进行的；而此时的减租减息并没有特别强调保障地主的地权和财权，当运动深入开展后，农民要求取得地主的土地，有的地区不同程度地触动了地主的土地。这种触动也不是没收，而是有偿地赎回农民被迫当出的土地，或以土地清偿的方式偿还对农民的非法剥削等。此时的减租减息与反奸清算也有明显区别，主要采取说理、算账退租，订立减租合同，是一种"和平"的方式，是在改善农民生活的前提下保证农民交租交息，以团结中小地主和其他对抗战有功的人士，共同建设解放区。而反奸清算则是

"批斗"清算，是敌我斗争。

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形成了高潮。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两种倾向，有的新区分配了地主的土地，斗争超出了减租减息的范围。有的还未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存在"空白村"。对此，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4 月 11 日发出指示，进行及时的纠正。

减租减息斗争的开展，削弱了封建地主的剥削，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房屋和粮食，生活初步得到改善。广大农民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大大提高了保卫和建设解放区的积极性，奠定了党在新区的群众基础。

（三）老解放区的减租复查

老解放区就是在对日反攻前建立的解放区。这些地区自 1942 年以来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就是减租不彻底。具体表现在：一是减租后出现反复。少数地主减租后又夺佃，以种种理由抽回佃出的土地。二是改定租为活租。少数地主为多收租子，违背租佃法令。三是明减暗不减。少数地主，诱胁佃农，应付区上的检查时，要佃农说已经减了，实际上并没有减。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地主的破坏。他们使用种种手段，如哄骗、威胁、拉拢的手法，来抵抗减租减息的真正实行，如利用民主运动反对村干部，挑拨制造群众中的宗派斗争，收买拉拢干部，挑拨干群关系；打入政权内部维护其利益等。二是农民有各种顾虑。如"变天"思想，依靠地主的思想，情面关系，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三是部分干部存在麻痹思想，发动群众不充分，工作不深入。

各老解放区在短时间内，找出了减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后，认真贯彻党的指示，制定具体措施，切实做好查减工作。首先，抓干部的教育，这是查减工作的关键。有的老区不重视查减工作，认为没什么问题；有的则担心运动过火，出现枣手束脚的情况；有的则工作简单，态度粗暴，有的干部把"放手"误认为放任自流，不注重在政策上对群众进行领导。针对这些情况，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风，召开座谈会，研究政策，检讨经验，使干部认识到查减工作的重要性，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有的地方在查减工作中还整顿了农会，使农会干部真正为农民谋利益。其次，充分发动群众投入到查减中来，这是进行查减工作的基本条件。如涉县在过去的减租工作中，全县 158 个村庄，有 52 个村庄从未发动过，67 个村庄发动不充分。这次查减工作基本上都发动起来了。从 1945 年 12 月 8 日至 1946 年 1 月 25 日的 47 天中，据不完全统计，共解决租佃、债务、增资案件 7905 件。第三，减租保佃。在查减工作中，许多地区强调了保护租佃权的问题。陕甘宁区的甘泉县首先具体明确规定了减租保佃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教育佃农认真检查减租执行情况。晋绥宁武县南屯等村，在查减运动中与地主订立减租保佃办法，明确规定因减租中被地主夺去的土地，仍退还给原佃户；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取消佃户对地主土地上的一切额外负担等。第四，将查减工作与生产紧密联系起来。1946 年初，为了不误春耕农时，各地要求查租与生产联系进行，把查租所得之实利迅速组织到生产中去，以查租促生产。

老解放区开展的减租查租工作，巩固了抗战时期农民所得的胜利果实，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对于争取和平民主和进一步巩固解放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由和平建国向战时经济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并没有改变，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内战部署，并在东北大打，在关内不断制造军事冲突。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在这一由争取和平建国到全面内战爆发的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也发生了转变，即由“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

(一)《五四指示》的发布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的党内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坚决支持、肯定和批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方法，领导广大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迅速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五四指示》共有18项条款，其基本内容主要是：

1.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是有偿获取。鉴于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五四指示》指出：解决土地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除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之外，对于一般地主的土地，则沿用减租减息以来农民所创造的多种方式。主要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及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里获取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2. 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界限是：(1) 对于属于地主成分的抗日军人、抗日干部的家属及开明绅士等，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2) 对于中小地主应与大地主、恶霸有所区别，对其生活应予相当照顾；(3) 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4) 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5) 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果实，必须公平合理地分配给贫苦的烈士遗属、抗日战士、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和无地及少地的农民；(6) 在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对待封建地主阶级要有原则区别，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7) 区别边沿地区与中心地区。对于我政权不巩固的边沿地区，一般不要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土地，就是减租减息也要谨慎办理。

3. 解决土地问题的工作方法是：(1) 坚持群众路线。“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2) 团结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对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3) 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加强党员干部的政策观念。“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

是乡区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纠正已发生的“左”的和右的偏向。(4) 注重组织建设。“在运动中及土地问题解决后，应注意巩固与发展农会和民兵组织，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提拔干部，改造区乡政权，并教育群众为保卫已得的土地和民主政权而斗争。”

《五四指示》的最大特点，就是过渡性，即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向没收分配地主土地过渡；由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一方面，《五四指示》坚决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另一方面又从当时的形势着眼，在内战十分危机而尚未全面爆发、和平之门并没完全关闭的情况下，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而是提“耕者有其田”，通过减租等形式，从有偿获取地主土地，向没收地主土地过渡。这既支持了农民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行动，又有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争取社会舆论，维护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五四指示》是适应客观历史条件的正确的政策。

(二)《五四指示》的贯彻执行

中共《五四指示》在党内下达后，各解放区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减租以来的经验，学习、掌握新的政策精神，转变观念，统一认识。在此基础上，各解放区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措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般的方法是：

一是没收敌伪公地及大汉奸、恶霸地主、土匪窝主的土地。如东北解放区，除继续分配日伪的开拓地、满拓地外，对于大汉奸，其土地在300～500亩以上的，要没收分配；对于勾结汉奸惯匪、藏匿枪支、阴谋不轨的地主，作为土匪窝主，彻底清算，其坐地分赃谋得的土地、财物，全部没收分配；对于不法地主，发动群众斗争算账，直至分配土地。这一点各解放区普遍实行。

二是以清算的方式取得地主土地。对于一般的地主土地，采取算账的方式，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负担等，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名义下，转移、折算或出卖到农民手里。

三是以征购的方式获得地主的土地；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中，对征购作了明确规定：地主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由政府以法令征购之，地主的工厂、商店、矿山不得征购；征购的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作为地价交付地主，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由获得土地的农民负担一部分，农民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分十年或二十年还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或不要农民出地价，全部由政府的财政收入调剂。

四是开明绅士、中小地主的献田。献田是地主无偿地将土地献给农民，作为农民获取土地的一种辅助方式。运动初期，各解放区都有一批著名的开明绅士献出土地，其中不乏有在解放区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在各地党政军干部中，也有不少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志说服家庭，献出土地。华东中央局1946年9月发出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要求动员、鼓励抗工属与中小地主献田。

从1946年5月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有2/3的地方实行了《五四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转变关头，取得了主动，实现了对农

民的领导权。到1946年10月，全解放区已有30万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三四百万人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土地改革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巩固了后方，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得到有力的保障。

但是，由于战争环境、时间紧迫等因素，土地改革出现不平衡的现象。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定》中指出，解放区大约还有1/3的地方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不彻底，出现右的倾向；少数地方则出现对地主扫地出门、侵犯中农、侵犯地主工商业等“左”的偏向。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势在必行。

（三）解放区生产运动的开展

生产，是党在争取和平民主阶段的三大任务之一，是保卫和巩固解放区的重要手段。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中指出：“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务使有一个新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的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又指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1946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各解放区纷纷制订措施，提出要求，开展了大规模群众生产运动。

首先，贯彻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方针。1945年底至1946年初，各解放区党委在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之际，依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了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方针。

其次，各级党和政府对生产进行积极引导和帮助。一是发放贷款，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到1946年底，各解放区共发放贷款160.6亿元法币，其中仅晋察冀就贷出60多亿元法币。贷款主要用于农业，其次是工商业。二是政府帮助解决生产工具、耕牛等困难。晋绥边区政府采取购买与调剂的方法解决新区耕牛与农具缺乏的问题。1946年春在兴县、晋中等40多处，先后举行骡马大会，以便利耕畜的交换，边区生产委员会还令各地贸易机关及合作社贷款给群众，从外地购买耕牛。三是注重科学种田，改进生产技术。如太行行署在春耕运动中提出“加强科学指导”的口号，要求干部不仅组织群众生产，还要学会技术，对群众进行生产技术的指导。西北局将改进农业技术作为边区生产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专门组织有关单位举行农业技术座谈会，总结、推广好的经验。

第三，组织农民发展农村变工队、互助组等组织。为解决劳力、牲畜不足等问题，老解放区已经普遍实行了各种方式的互助合作。1946年春耕前，各地对互助合作进行了整顿。新区的互助合作组织则刚建立起来。在老区的影响和带动下，广大新区的互助合作组织，如变工队、扎工队、换工队等纷纷建立，在生产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扶植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为使解放区的工业、矿业、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级政府大量贷款扶植工人复工。为恢复发展私营企业，政府设法为其购买原料、提供物质、订购产品，在原料与产销问题上给予切实的照顾。为使解放区工商业得到发

展，政府还实施轻税和免税政策及奖励政策。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于1946年3月28日通过《工商业营业税办法》与《土货暂行奖励办法》规定，棉毛纺织业及纸业、榨油业等“减半征收”；纯系供给性的公营工厂、群众性合作生产事业、不以赢利为目的者，“全部免税”。1946年8月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法令，公布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暂行办法，规定凡在边区境内创设棉纺、毛纺、平板玻璃、电气、钢铁、机器制造、农具制造及其他重工业原料工业者，享受全免营业税、所得税2~5年，在资金，原料及成品运输、推销等方面遇有困难时，边区各级政府予以援助。解放区的工人还开展了增资运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成立各种行业工会，保障工人利益。

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农业方面，粮食、棉花等农作物普遍获得丰收。1946年太行、冀南两解放区，产棉自给有余。在山东，1946年棉产量比1945年增加63%，在纺织方面，全年生产布匹500多万匹，全省军民穿衣可以自给。在东北解放区，1947年比1946年扩大耕地50%以上。解放区工业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46年10月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重工业发展水平恢复到战前的82%，轻工业发展水平恢复到战前的90%，部分已超过战前水平。商业方面也呈现出活跃的新气象。张家口市战前有商店2352家，敌伪统治时减少到1981家，战后到1946年4月就增至2716家。解放区的生产运动，为巩固解放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物质基础。

第二节　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进行的经济理论准备和经济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党一方面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另一方面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开展了各项经济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确立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完成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进入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阶段。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各项经济政策。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确定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即“没

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大经济纲领的理论依据主要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封建的土地制度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的劳动人民，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穷落后的根源，也是中国国家的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基本的障碍。因此，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进行土地革命，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

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萌芽，抗日战争时期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经过20年的积聚，已经有了价值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因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的理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殊国情上产生的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是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生长出来的，他们也受到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政权的压迫和损害。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毛泽东指出：对于这些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

为了切实实行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阐述了党的具体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的方针。

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毛泽东总结了自全面内战爆发十八个月以来，党的土地改革的经验，指出了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毛泽东说，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针对土地改革中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为了巩固地联合中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政策。如平分土地时，必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应注意某些中农的需求；不要错划中农的成分；在农会和政府中要吸收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等。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对其中为数不多的政治上存有反动倾向的右翼分子，应当向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相中等资产阶级。

毛泽东规划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没收官僚资本后，使其成为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控制全国经济命脉。使个体农民朝着集体化方向发展。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使其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

这次扩大会议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即"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为指导，遵循"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领导开展了大量的经济工作。

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深入进行

全面内战爆发一年后，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根本性转变，在解放区，打碎封建的生产关系，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既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愿望，也是形势发展的要求。

（一）《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及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

为适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总结前一段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今后更彻底的土地政策，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会议详细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总结了自《五四指示》发布和实施以来各地土地改革的经验，分析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及今后土地改革的方向，于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颁布的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土地法大纲》共有16项条款，其主要内容是：

1. 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这四个"废除"表明，它是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纲领，与《五四指示》的"有偿方式"相比，是一个彻底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2. 实施土地改革的机构。"大纲"规定："乡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成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行政机关。"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农民群众的权利，保障了农民的根本权利。

3. 平分的原则。一是土地平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受，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二是财产平分："乡农会接受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三是土地分配的区域标准："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

的行政村为单位”。

4. 土地分配后持有人的权利。“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

5. 保护工商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并保护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及其他资财等“归政府管理”，以免分散和破坏。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把中国的土地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高潮。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各解放区相继召开土地会议，贯彻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各项政策。各解放区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1947 年底到 1948 年春，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很快在各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

在老解放区，凡是过去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废除、土改基础较好的地区，均实行抽补、调剂政策，即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近补远”的办法，以解决贫雇农土地不足的部分。在新解放区，也套用老解放区或半老解放区的做法，迅速开展了平分土地和浮财的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取得巨大的成就。在解放区，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推动了革命政权的建设，巩固了解放区，从而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通过土地改革，打碎了几千年以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情绪高涨，解放区经济得到发展，为打败蒋介石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土地改革，农民群众正经济上、政治上得到解放，从而焕发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成为人民解放力量的源泉。

（二）在纠正“左”倾错误中完善土地政策和改进土改工作方法

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打击面过宽的“左”倾错误。到 1947 年底，一些地方甚至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是阶级划分标准混乱。由于当时党对于划分阶级的标准没有给予充分的说明和具体的政策指导，加之群众运动高潮中出现的非理性因素，实践中出现了阶级成分划分上的偏差。一些地方为了多分浮财，地主富农越划越多，有的地方达到 20% 至 30%。

二是侵犯中农的利益。把中农或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或地主，侵犯其土地和财产。搞绝对平均主义，把高于平均水准的中农时土地抽出来平分。

三是侵犯部分工商业。有的地方，把农村的做法照搬到城市，认为工商业者也是财主。把地主、富农的兼营工商业的部分、甚至已转化为工商业者的，也加以清算没收。

四是提出“左”倾错误口号。把片面的孤立的贫雇农路线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提出“彻底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甚至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这类严重原则性错误口号，其结果是贫雇农自己受到孤立。

五是乱打乱杀。在“平分”高潮时期，有的地方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恶霸和非恶霸不加区别，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斗争。有的不分大中小地主、党外人士、开明绅士，一律不给生活出路，“扫地出门”。对于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进行清洗。

六是新区土改过急。在土改条件不具备的新区，急于搬用老区、半老区做法，造成混乱和损失。

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除党的政策上不完善的因素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就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滋生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农民中普遍、长期地存在。一旦农民被充分发动起来，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形成高潮，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加以正确引导和政策上的教育，群众的自发情绪就会增长，导致平分一切社会财富的绝对平均主义。加之在当时整党运动中强调的是反右倾，一些人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思想指导下，放任了群众中过火的行为，加快了“左”倾错误的泛滥。

这次“左”倾错误来得猛，纠正得也很快。《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不久，中共中央即派人到各地了解情况，发现了土改中的大量的“左”倾错误，即着手纠正。

1947 年 11 月 29 日，为纠正划分阶级时业已出现的“左”倾错误，中央把 1933 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根据新情况修改后重新下发，详细规定了划分成分的具体标准和办法。1947 年召开的党的“十二月会议”，详细讨论了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以及纠正的办法。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党从理论上、政策上和实践上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与此同时，党的土改政策和策略进一步发展、完善。

根据“十二月会议”精神，毛泽东于 1948 年 1 月 18 日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其中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具体政策从 12 个方面作了说明。主要是：

（1）批判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指出，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提出对于三种人要避免任何冒险政策：一是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二是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三是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

（3）提出四种区别对象：一是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二是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三是对大、中、小地主加以区别。四是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加以区别。

（4）严禁乱杀。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必须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党内指示，明确了具体的政策界限，弥补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不足之处，正确指导了已兴起的土改高潮，有力遏止了已经出现的“左”倾的错误做法，对于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奠定了政策基础。各地在实践中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进行大力纠正。

1948年春，党中央、毛泽东接连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批示、指示，进一步阐述党的土改政策和策略，采取有力措施，继续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至1948年春夏，各地所发生的“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对这一时期党的土改工作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是对党的关于土地改革理论、政策、策略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首先，强调改进党的工作方法。“讲话”在充分肯定晋绥分局一年来土改工作的成绩及出现的“左”倾偏向后，从党的工作方法的高度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自此，“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指导思想树立起来，党的工作方法特别是经济工作方法得到改进。

其次，强调树立正确的政策观念，批判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这就从理论上为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定了性。

第三，完整地提出了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总结，它正确地规定了土地改革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明确规定了土改的方法、对象，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土改的直接目的，即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党第一次从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高度所作的科学概括，标志着党的土地改革理论和政策的成熟，对当时及今后党的土地改革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及时纠正了曾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党的土地改革工作全部走上正轨。到1948年10月，大约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到1949年10月，约有1.6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大约有1亿左右的贫雇农从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手里取得了约3亿多亩的土地。土地改革的进行，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解放城市经济工作的开展

抗战胜利后的两年间，中国共产党曾占领和接管一些城市。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城市阶段。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党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占领和接管城市后，如何管理城市，如何开展城市的经济工作，这对于长期处于农村工作环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

（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城市经济工作的新任务

早在抗战后期，毛泽东就要求全党，准备到城市做工作，要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对占领城市及城市工作做了部署。194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的工作的指示》，要求新解放的城市立即建立县市政权，并尽可能吸收当地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与进步人士参加；成立人民自卫军，协助军政维持秩序。对敌伪公有财产及大汉奸的企业，应成立统一的接收机关暂行管制，以便研究情况，分别处理，部队机关的各个单位不得乱没收；对于伪币应挤其外流，使用根据地本币；在较大城市中，必要时成立粮食管理机关，召集粮商，研究粮食需要与来源，协助粮运，疏畅粮源；对公用事业及财经机关的原有人员，尽量争取，照常工作；对于税收，除去其苛杂部分外，一般地暂时照旧征收。为解决将来根据地内军火与工业生产的困难，需搬运必需的机器及重要材料到根据地。搬运的原则：估计我们可以久占的区域不搬；估计难于久占者，属于敌伪公产可以搬运；属私人企业者则购买；英美投资的重要企业（例如开平煤矿）则不应破坏，我所需要之器材应与其洽商或买或捐不加强迫；搬运器材时均须与该企业工人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一指示适合当时的实际，为党的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

正当解放区军民举行全面反攻，收复失地，准备夺取敌占大城市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迅速占据了几乎全部大城市及主要交通要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改变了原夺取大城市的计划，把工作中心仍放在农村，放在土地改革上，以巩固根据地。

虽然如此，从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到抗战胜利后的两年间，中国共产党曾占领并管理过张家口、邯郸等几十个城市。按照党的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在城市中建立革命政权，没收敌伪财产，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等，取得一些经验。但是，在这一阶段，从总的情况看，党的注意力偏重于战争和农村工作。由于占领的城市不多，有的还难以保住，因此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都比较原则，对于城市工作经验没来得及进行系统总结和及时的推广，对部队和机关也没有充分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因此，在城市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侵犯工商业、损害工厂设备的“左”的做法和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城市的经济工作是一项新的任务。

（二）接管石家庄工作经验的总结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攻克和收复了大批城市，管理城市的任务摆在面前，城市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在这一形势下，中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城市，用很大的精力总结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1947年1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所攻占的第一个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如何接收和管理这座城市，中央工委十分重视。中央吸收了收复井陉、阳泉和张家口的经验教训，训令部队及民兵干部，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不准自由拿取物资。但是，主要来自农民的人民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一些人，往往还以游击战争的观点和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城市，把农村工作的一套办法照搬到城市。在收复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由于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仍有不少士兵乱拿东西，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先是搬取公用物资，后来就抢劫私人财物；太行、五台、晋绥各机关派遣万余人员前来抢购物资，搬拆机器零件；四乡农民也准备进城。这一混乱状况如不立即制止，后果难以想象。中央工委及石家庄政府发现上述情况后，有针对性地采取强硬措施，及时进行了制止。

194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写了《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上报中共中央。这些经验主要是：

一是必须明确认识到收复石家庄过程中曾发生的错误的性质，“是一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毫无相同之点。”“这种情形，如不立即纠正，让其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

二是必须明确城市工作的方针，即“我们工作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入城工作的干部和士兵，“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如鞋袜衬衣牙刷等日用品，有计划地分配，慰劳攻城部队士兵及城市工作人员。

三是由市政府发出布告：除政府及公安局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委派人员组织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控诉，代表人民申冤报仇，惩治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

四是由市政府召集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聘请若干工农商学各界参议员，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市政府咨询机关，并筹备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大会。

五是工厂筹备复工或迁移；工会开办工人学校，训练干部；工资一般不能增加，只保证实际工资不继续降低并发给大部实物。

石家庄经验受到中央高度重视。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高度重视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在攻占城市后，应以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指示对于“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为了做好城市工作，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5万以上的，要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上报中央。

(三) 党的城市工商政策的制定及完善

由石家庄经验开始，中央以相当大的精力关注城市工作，制定城市工作政策，总结城市工作经验，开展城市经济工作。

中共在制定城市政策时，首先解决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工商业的问题。1948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工商业政策》，明确指出，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高度，纠正严重破坏工商业的错误。

在领导方针上，提出“一个预防”、“两个区别”：即“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教育工人群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

在领导方法上，要求中央局、分局必须以各种方法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保持密切的联系；利用报纸作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重要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明确划清允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指示特别强调党的政策对于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的重要性。

1948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指出，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其经济地位，“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1948 年 4 月 5 日解放军再度攻克洛阳。4 月 8 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面而详细地规定了党的城市政策：(1) 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2) 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3) 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4) 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5) 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6) 有计划地处理粮食和燃料问题，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7) 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8)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9)

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

以上各项政策，不仅适用于洛阳，也基本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因此这个电报同时下发给其他前线和其他地区的领导同志。

到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已发展到夺取大城市的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城市的作用更加重要。可以说，没有城市生产更多的军需产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战争，没有铁路的运输，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防止破坏城市，破坏工商业，严格遵守党的工商政策，尽快地恢复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共在进一步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军事管制”的形式。194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即在占领城市初期，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组织军事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担负保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指示明确规定了攻城、入城部队及后方党政军民机关关于爱护城市、保护城市工商业等方面应遵守的事项。军事管制的实行，使城市工商政策的贯彻、落实有了重要的保障。自此以后，新攻占的城市一律实行军事管制。

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解放了一批大城市，党中央就大城市的特点，进一步就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如何接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资本、私营工厂复工，如何恢复电力、解决金融物价、解决税收、妥善工资问题等等，发布一系列指示，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城市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在夺取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党的工作中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做好城市工作，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解决的问题。

（四）城市经济工作的开展

在占领相接管城市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城市的经济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党在城市的工作，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抗战胜利后人民解放军最早解放的一批城市，如烟台、张家口、临沂、长治、安东、旅大等，由于日伪的严重破坏，复工生产中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缺乏资金与原料。中国共产党采取得力措施，如向企业发放敌伪没收的财产，发放工商贷款，帮助企业解决恢复所必须的资金、原料及产品的销路等问题，使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如烟台是个拥有近20万人口的城市，在日伪统治下，倒闭了800家商号，经济一片萧条，许多工厂基本处于停产状态。烟台解放后，人民政府将过去敌伪没收合并的企业，如张裕酿酒公司等的财产发还原主，并明令取消敌伪的一切苛捐杂税及统治政策，同时大量发放工商业贷款，为企业的恢复创造条件。另外，政府还为私营工商业调剂原料，推销产品。实施这些措施后，工厂得到迅速恢复。

没收和接管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政策，也是新解放城市经济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抗战胜利后，党主要在华北的一些新解放的城市接管了小量的官僚资本。接管中，由于受过去游击战争习惯的影响，打乱、分散资财的现象普遍发生。1948年2月鞍山解放后，没收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当时的做法仍然是将原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等400余人撤走，并遣散近千名职

工。这种做法不利于城市生产恢复和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1948 年 3 月攻克洛阳后，毛泽东在给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阐明了对官僚资本接管的明确界限。11 月，解放军攻克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大本营沈阳，陈云领导接管工作时制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禁止乱搬乱调和分散物资。同月，毛泽东在同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谈话时指出：接收官僚资本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1949 年 1 月天津解放后，中央下达指示：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有机构，如原企业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愿意继续服务者，应令其担任原有职务；对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奖励、劳保等制度，亦应照旧，不得取消和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需要加以改良的，须等到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进办法，绝不是草率拟订办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入被动。1949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华东局拟订的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指出：军管会接收企业、工厂和资财后，应迅速分别交给各适当的负责机关管理和经营，如将市政工业及其他若干工商业交市政府管理经营，其他工商业则组织若干公司来负责经营，否则很难开工营业。总之，严格区分官僚资本界限、不要打乱分散、完整接管、迅速复工，成为党没收官僚资本的基本原则。

在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有序地进行。党和政府严格地区分官僚资本的界限，对属于国民党各级政府及大官僚经营的一切工厂、银行、铁路、矿山、商店以及其他企业，进行了有准备有步骤的没收工作。军管会接收企业、工厂和资财后，迅速交给市政府及其组织的公司管理和经营；对于那些人民政府一时来不及收管的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的企业，则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人民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那些原管理人员已逃跑，处于停歇状态的企业，则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然后由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管理经营这些企业。没收工作进展顺利。

194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进一步规定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应采取“不要打乱旧机构”和“保持原职原薪制度”的政策，为没收官僚资本后的迅速复工、经营提供了保障。

到 1949 年底，人民政府共没收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 2858 家，银行系统 2400 余家，铁路 2 万多公里，机车 4000 多台，以及一大批商业企业。没收官僚资本后，党和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国营经济。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党在革命过程中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的经济政策，是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在解放战争中，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城市严格地执行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从总的方面来看，就是贯彻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具体来说：

一是保护工商业的财产不受侵犯。在新解放的城市中，曾一度发生侵犯工商业的现象。中央发现后，及时予以纠正，坚决保护工商业的财产不受侵犯，并引导工人和资本

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

二是帮助解决私营企业的困难，鼓励私人经营，适当地照顾私营厂商的利益，对于遭到破坏或营业困难的工厂企业，政府在税收、价格等方面加以扶助。并适当调整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因公营企业处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要扶助。在工资政策方面则贯彻“劳资两利”的原则，既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分剥削，又反对忽视工厂具体条件要求过分提高工资的过“左”倾向；既做到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又使工商者有利可图。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私营工商业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是引导工商业资本家朝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发展，而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如提高工业利润，鼓励发展机器制造、纺织、木制、化学等行业；对于烟酒、化妆、迷信品业等，则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等方面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措施；对于有害的如鸦片烟馆等则予以取缔。另外，要求私人工商业按政府的法令行事，获得正当利润，而不能非法牟取暴利。对于一些投机商人或者买空卖空，扰乱市场者，则要教育甚至打击，以使正当的私人工商业得到有利的发展环境。

四是提倡如公私合营、租赁等多种发展私人工商业的方式。这在东北较早实行。哈尔滨 1946 年 4 月解放后，市委作出的《恢复与发展工商业之具体办法》提出：提倡公私合办、提倡工人分红制、由政府出租工厂机器组织工人合作经营、出租房屋机器予工商业家或供给原料及运输条件等四项办法。1947 年 10 月中共东北局批准的《1948 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规定：“凡公营工矿业，目前无力经营者，在政府法令规定下，允许长期租给私资经营、私人集股经营或公私合股经营。”这些政策规定，大大激发了工商业者的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哈尔滨 1946 年 4 月解放时有私营工商业 6347 家，到 1948 年 6 月发展到 26539 家；1946 年有公私合营企业 6 家，1947 年底增至 23 家。1948 年私营工业中由政府委托加工的有 2790 家。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新解放城市的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四、新民主主义经济向全国的推进与经济工作重心转移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形势下，解放区不断扩大，分散孤立的地区逐渐连接成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在向全国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经济工作由过去分散向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转变，势在必行。党抓紧开展了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以充足的物资支援全国战争，为建立全国政权作了准备。随着大城市的占领，城市已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桥头堡，党的经济工作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

（一）统一财经工作

关于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问题，中共中央考虑得较早。从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前后就开始了准备工作。1947 年 5 月，华北各解放区召开财经工作会议，

提出今后要逐步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统一，并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在中央领导下统一规划和规定。华北财经办事处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筹备统一货币的工作，同时逐步建立财政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为统一财政金融奠定基础。1947 年 11 月，石家庄解放，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各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过去的分割状态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1948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的成立，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1948 年 7 月初，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董必武任部长，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实现了财政工作在组织领导上的统一。9 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随即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此后，华北财经委员会相继召开华北工商会议、金融贸易会议，研究解决统一华北各区的货币、物资交流等问题，制定金融、贸易、工商税收等政策，并发出《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华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逐步走向统一。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大解放区，如华东、西北等区都相继举行财经会议，统一了各区内部的财经工作。各解放区开始着手财政上的统筹调拨和统一领导，这就为以华北为主全面统一财经工作准备了条件。1948 年 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财经统一问题指出，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这就为财经的统一指明了方向。1948 年 12 月，各解放区联合财经会议召开，标志着全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正式进入全面统一阶段。统一财经的具体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财政税收的统一。首先是改革和统一农业税。农业税占解放区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由于老解放区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有一定的发展，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遂将原有的“统一累进税制”改变为“比例税制”。1948 年 12 月，华北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了有免税点的比例税则，规定凡常年产量十市斗之土地为一标准亩，所有农业人口，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扣除一个标准亩，作为免税点，然后按各户的标准亩数征收一定数量的农业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制时的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定，如按常年产量计税和各种优待减免办法等则予以保留。其次是征收各种工商业税，如出入口货物税、酒税、纸烟税、交易费、工商业税等。随着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工商业税收有较大的增长，但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高。例如在晋察冀，1948 年工商税仍只占总收入的 10%左右。解放区的工商业税比国民党统治区要低得多。解放区的工商业税和农业税一样，也体现了促进发展生产的原则。当然，因战争环境、交通困难，财政税收工作的统一还需要一个过程。

二是统一金融。各解放区大都建有银行，基本任务是发行货币、扶持生产。但是由于过去处于分割、封锁状态，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并不相同，有的一个大解放区就会有几种不同的货币。1947 年 5 月，华北财经会议以后，晋察冀边币与冀南币、北海币之

间，建立了汇兑关系和兑换所。到 1948 年，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并连接成片，货币的统一成了迫切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各根据地的具体条件，党和政府采取了逐渐统一的步骤，即先使各大解放区内的货币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然后再逐步统一。如在东北地区，长城币和关东币停止发行，三种货币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要通货货币，并逐渐收回长城币和关东币。在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币、冀南币混合流通，晋察冀边币停止发行，以冀南币为主要通货货币。在华东地区，华中币停止发行，统一流通北海币。在西北地区，陕甘宁边币停止发行，以西北农民币为主要通货。在中原解放区，统一流通中州币。各大解放区内货币的统一，是全国货币统一的第一步。1948 年 12 月 1 日，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并从即日起发行人民币，以此统一解放区的货币，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工作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与此同时，各解放区组织动员群众，迅速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使人民币逐渐占领了货币市场。金融货币的统一，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正统一货币过程中，党又制定了以调节货币发行数量为中心的货币政策，做到既保证战争供给的需要、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

三是对外贸易工作的统一领导。这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指解放区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和解放区对外国的贸易。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是推销各种剩余土产，采购各种军用器材，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一部分民用必需品。1948 年 8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中指出："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我们的对外贸易必须步调一致。"报告提出了"三统一"：一是统一税则税率，共同的进出口计划。二是统一领导。会议决定在天津、济南等地外围，分别成立出入口管理委员会，在中央财经部领导下，吸收各地代表参加，其任务是掌握出入口的方针政策，商讨出入口的共同斗争计划，调解各地区间关于出入口的纠纷。各地区亦各自成立出入口管理委员会或出入口管理局，来统一领导各该地区的对敌经济斗争（包括对外贸易、外汇管理及出入口税等）。三是统一军用器材的采购工作，除在天津外围已成立统一的采购公司外，在胶东增设统一的采购委员会，受中央财经部及华东财办的双重领导，统一采购计划和分配采购物资。

1949 年 2 月 1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提出：立即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事宜；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目前国家尚不能经营的某些贸易，可在国家管制下允许私人经营。决定对对外贸易的计划、政策、办法作了一系列的规定。所有这些，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在农村聚集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经济工作以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为主要内容。1949 年前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大城市的阶段。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被摧毁，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一历史转变的关头，党的工作重心也要随之发生变化。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北坡

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在全会的报告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的城市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也就是党的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七届二中全会在阐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时候，也形成了党的城市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首先，处理好城乡关系。全会认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但是决不可以丢掉乡村，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紧密地联系起来。

其次，城市工作的依靠力量。全会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毛泽东批评了那些认为城市工作仅依靠贫农群众或依靠资产阶级的糊涂思想。

第三，全党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会认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第四，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即经济工作为中心。全会指出，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我们建设的目的，是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样，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第五，城市的其他工作要为生产建设服务。全会强调指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七届二中全会为党的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指明了方向。全会还为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勾画了蓝图，并作出了各项政策规定。这对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的胜利。

第三节　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

党的经济工作的实践发展，促进了党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中，党对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不间断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框架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发展方向的完备的理论形态。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及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这一探索也在不断深化。从 1947 年 12，月会议开始，经过 1948 年 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东北提纲”的提出，以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最终形成。

（一）1947 年 12 月中央扩大会议

1947 年 12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制定各项行动纲领。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并深刻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雏形。

关于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性质，即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因此，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用了较大篇幅论证其必要性。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次，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不危险，因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第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经济的构成：(1) 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 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 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在这里，毛泽东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放在第一位，并突出它的领导地位；个体农业逐渐向集体化方向发展，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中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这三个方面组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雏形。

（二）1948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进一步说明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论述国营经济、公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时，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来说明的。

在政治上，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后，新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样的政权下，“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国营经济和公营经济和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国营经济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来的，“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这就是说，没收而来的官僚资本已经属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全民所有了。从所有制上看，它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

毛泽东还指出了合作社的性质：“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质。”

同时，毛泽东指出：从整体来看，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我们要“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初步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渡性。

这次会议从理论上论证了国营经济、公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其性质的依据。从本质上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姓“社”不姓“资”，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东北提纲”

“东北提纲”即 1948 年 9 月 15 日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东北局关于东北经

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该提纲于11月6日经中央修改后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分发全国务解放区，并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

由于抗战胜利后，除了几个大城市外，东北基本控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手里。因此，东北解放区无论是农村的土地改革还是城市经济工作的开展，都进行得比较彻底。东北的国民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即已成为完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因此，分析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及其构成，认识其特点、性质，并提出基本的经济建设方针，以为全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经验，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在这一情况下，"东北提纲"应运而生。

"东北提纲"根据东北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状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五种成分所构成，这就是："(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的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提纲指出："正确认识这五种经济成分的社会性质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并认识每一种经济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发展的趋向，乃是正确地解决我们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也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从经济战线上把握住正确的路线，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国民经济的正确领导。"

这是一个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与上述党的"十二月会议"提出的经济模式比较，这一模式中的经济构成更加丰富，除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外，增加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将合作社经济与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划分开来，成为两种独立的经济形式。这就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具备了5种经济成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完备形态。

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由于东北解放区比较早地提倡并采取租赁制、加工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践的结果，"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而在东北农村中，已经部分地出现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城市开始出现手工业合作社。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应该有步骤地加以引导。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主要是指小农经济，在数量上还占优势，经过较长时间的教育与斗争，可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因此，"东北提纲"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与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形式，是对东北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的总结。

"东北提纲"认为，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以发展卤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及自然的半自然的经济，使之向合作社发展，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人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和投机操纵的经济。"提纲指出："只有实现这条路线，才能顺利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地、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东北提纲"构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理论，是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探索的重要里程。

（四）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北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在经济上，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报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一是强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先进性，对中国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和地位。二是进一步强调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三是阐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要采取利用和限制的双重政策。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四是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不如此，"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通过上述分析和论述，毛泽东勾画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七届二中全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构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不仅强调了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明确指出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性质，这就使五种经济成分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加了。二是明确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三是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

（五）《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在第四章中，全面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正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

《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这就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

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五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就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完整的蓝图。

《共同纲领》分别对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政府对其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相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共同纲领》还对发展工业、交通、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一一作了政策性规定。

由于《共同纲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因此，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构想的实施，也就具备了法律保证。《共同纲领》的规定，标志着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构想的正式确立。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殊国情，探索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对其内容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构想的基本出发点，到对五种经济形态的分析，及至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其内容十分丰富。

（一）经济模式构想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以及在这一特殊国情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定的经济状况。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的经济状况，这就是："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指出："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构想的基本出发点。

从中国现代性工业占国民经济10%左右这一点出发，毛泽东论证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虽然现代工业占的比重小，但是它却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就成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10%的现代工业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毛泽东从民族资产阶级所处的地位、政治态度以及中国的经济状况出发，阐述了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其存在和发展，同时又要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但决不可以限制得太大太死。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因此“限制相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从中国大约90%左右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论证了这一落后的经济形态还将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今天，在今后一个柏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毛泽东强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同时，毛泽东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正是由这一基本的国情出发，毛泽东提出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

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完整地提出五种经济形态是在“东北提纲”中，经过七届二中全会再到《共同纲领》，对这一经济形态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性的规定至于完备。

关于国营经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而形成的国营经济，虽然在国民经济中听占比例不大，但已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居领导地位。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营经济

"是城市无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经济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支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和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有利武器"，应该"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

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社有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正确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应扶持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应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使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应"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植其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等。国家与资本家订立合同，国家提供一定的条件，资本家在生产或交换活动中获取一定的利润。这样就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一种形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这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的方向"。

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具领导因素，起决定作用，又有其他多种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很长时间内可以并存和共同发展，以促进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是前人从未提出过的创造性的构想。它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等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产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的，向着社会主义经济方向发展的过渡阶段的经济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必经之路。

（三）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方向

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况，将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奋斗的根本目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论述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后，明确指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使中国的现代工业在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而分散落后

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到90%。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胜利后如何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一个先进工业国？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必经之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是在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后而建立的新型的生产关系。从本质上看，这一新型的生产关系，“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条件。”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

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自身的规定性，又决定了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的方向性。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里，国营经济虽然在数量上所占比例较小，但是却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新民主主义国家将发展国营经济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共同纲领》规定，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是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基础和支柱。

合作社经济是“国家经济的最可靠的和有利的助手”，是“经济上的同盟军”，而国营经济也是合作社经济最有力的领导力量，合作社和国营经济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业，占了现代工业中的第二位，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国家允许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存在和发展，这是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重要力量。

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占90%，如何对待这部分经济成分，是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关键。首先，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后，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购买力随之提高，工业品的消费也就会增加，进一步促进工业的发展。其次，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里，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现代化和集体化，这不仅使生产力大为提高，而且将为工业化提供广阔的市场。广大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某种形式的联合。这种经济形式去掉了私人经济的盲目性，以国家的需要出发，在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之下为国家服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同样是工业化方向的重要力量。

总之，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方向，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则使这一模式的构想变为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新的历史征程。

第四节　扩展阶段经济理论探索与经济工作的特点与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4年时间，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相中国人民经历了由民族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再到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转变，党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前进，由此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和经验。

一、扩展阶段战时经济工作的特点

战争时期的经济工作最大的特点，是解决好战争与生产的关系。打仗需要有物资作基础，后勤为保障，这就必须发展解放区的生产，以生产服务于战争；而解放区生产的发展又与解放区的巩固有关，这就有赖于战争的胜利进展作保障。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一）发挥群众运动的优势和特点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党更具备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运动开展经济工作的条件。

发挥群众运动的优势和特点来开展党的经济工作，主要表现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上。每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党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之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通过群众运动，使农民自身获得解放。毛泽东在1945年11月7日发出的党内指示指出："减租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说明了土地改革中群众运动的重要性。群众运动的优势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群众参与性强，参与面广。由于土地改革是要改变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打碎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是关系到广大农民经济上翻身、政治上解放的大问题，因此，经过发动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后，广大群众压抑多年的怒火喷发出来，积极参与各种斗争。如1945年冬至1946年春开展的反奸清算斗争，各老抗日根据地派出大批干部赴新解放区，放手发动新解放区的群众，开展斗争。各新解放区群众积极参与，在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忱。在反奸清算运动中，群众既是参与者，也是受教育者。通过控诉，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斗争朝着清算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日伪土地方向发展。《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东北嫩江省从1947年12月开始，不到一个月，即发动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三，80%以上的村庄和贫雇农卷入了斗争。

二是声势浩大，对敌震慑力强。在反奸清算斗争中，由于那些大汉奸恶霸危害深涉

及面广，斗争开始就具有广大群众性，声势浩大。华中区 1946 年初一个半月就有 40 万群众参加斗争。江苏淮安市就有 3 万群众参加控诉公审 2 名大汉奸。减租减息开展后，往往是几十个村联合起来对大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形成了一场村与村联合、城乡联合、各阶层联合的群众运动。《五四指示》下达后，东北解放区在两个月内就有 1.2 万名干部下乡，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通过斗争，农民群众扬眉吐气，汉奸恶霸、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

三是斗争彻底，见效快。无论是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还是直接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群众性的斗争都进行得很彻底，农民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如土地、财物等。如清算斗争，农民采取算账的办法，即用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如大斗进小斗出），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负担，清算霸占吞食，清算人权侮辱等，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赔、偿损失的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里，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1947 年 7 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各根据地普遍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土地改革后农民焕发了空前的生产、参军、参战、支前的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巩固了根据地，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二）经济工作适应于战争的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是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决战时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需要后勤物质做保障。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经济工作和战争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进入战时经济状态。以土地改革，为战争打下物质基础；以生产支援前线。

抗战一胜利，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力争和平民主局面的形成，同时作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自卫战争，保卫解放区，党中央决定在解放区开展减租和生产，并把减租和生产作为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向党内发布指示，指出："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1945 年 12 月 15 日发布的《1946 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关于生产一项指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使 1946 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以减租促进生产，以生产支援前线。从 1945 年底到 1946 年春，各新老解放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在减租基础上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农村变工队、互助组等组织，及时发放农业和工业的贷款，以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

全面内战爆发后，为巩固新解放区，必须作持久打算，支持长期战争，解放区各级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财经工作方针，对财经工作实行由和平建设体制到战时经济体制的转变，做到既满足战争的物资需求，又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农村则贯彻《五四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恢复发展生产，自力更生，支援战争。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全国性的反攻开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制定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1947 年 9 月 1 日，毛泽东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指出："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展生产，

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从 1947 年底到 1948 年春，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减租、生产和土地改革运动，推动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军需物资的供应。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使广大翻身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生产运动中，大量增加了粮食、棉花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大力恢复纺织业和其他手工业，有重点地恢复建设机器工业、矿业，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保证了解放区人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也保证了战争一般军需物资的供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在一个时期内，人民解放军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运动。如 1946 年 11 月，东北局发出《关于部队机关生产的指示》，要求一切部队，除有重要作战任务的兵团外，都要明确规定自己的’生产任务；制定具体生产计划，规定从 1946 年下半年起，做到菜金自给或大部分自给，并生产 2 个月以上的粮食，晋察冀军区也发出指示，规定了军队的生产任务。部队的自给性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队自身的需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各解放区军事工业的发展，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对军火、武器装备的需要。1947 年 12 月，华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召开了全国解放区第一次兵工会议，制定了发展兵工生产的方针，即为革命战争服务，以自力更生为主，坚持实事求是，既照顾目前需要，又要作长期打算，扩大兵工生产，组织民用工业品生产，补助国民经济。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各解放区军事工业迅速发展，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以东北解放区为例，1945～1949 年间，东北军事工业一共生产手榴弹 4995799 枚、子弹 28067768 发、掷弹筒弹 229280 发、炮弹 3054958 发、地雷 3896 个，各种火炮 3153 门，爆破筒 30744 个，各种枪支 10676 支。此外，还制造了通讯器材、机器等多种军需物资。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各项经济工作的开展,还激发了广大人民参战支前的积极性,大量的支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这一点,在三大战役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统计如下。

三大战役中农民支前人力物力统计表

	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民工	160 万人	225 万人	154 万人
挑子		42000 付	
担架	13800 付	73900 付	20000 付
小车		410900 辆	20000 辆
大车	6750 辆	3070 辆	3800 辆
牲畜	30000 头	6300 头	10000 头
船只		13630 只	
粮食	7000 万斤	57000 万斤	31000 万斤

资料来源：王其坤主编：《中国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3 页。

（三）经济工作与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紧密结合

加强党的建设，是党的各项工作的保证，经济工作同样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经济工作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与政权的巩固与建设紧密结合。

一是把土地改革与整党同步进行。抗战胜利以来，党的队伍得到很大的发展，到1947年已经发展到270万人，这是党进行一切工作的领导和核心力量。但是，在激烈而复杂的土地改革中，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逐渐暴露一些问题，如有的党员阶级观点模糊，包庇、袒护地主、富农；有的党员利用职权多分多占土改果实；有的干部强迫命令，脱离群众；有的基层党和政府的组织不纯，领导权被地主富农所把持。针对这些情况，为了坚决彻底实行土地改革，1947年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提出了整党的任务，并在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过程中，开展整党。党中央制定一系列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并把整党看作“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规定了土改和整党方针政策和具体任务，提出自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各区要“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此后，大批干部深入乡村，以“完成全部土地改革、整党建设和准备春耕的工作”。

二是土地改革和农村的政权建设互为支持。解放区建立民主政权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而只有农民被发动起来了，积极地参与，土地改革才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获得土地后，不仅经济上翻身，政治上也获得解放，当家作主，又巩固和加强了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在土地改革中建立的农民大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是农村基层政权的好帮手。土地改革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既奠定了经济基础，又提供了干部队伍。在土改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许多人被充实到乡村基层政权。在土改结束的工作中，大量培养和训练干部，以使他们掌握领导生产、建设政权、执行政策等方面的领导能力。在土地改革中所诞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又使新民主主义政权有了最好的组织形式。

三是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建设是巩固城市政权的前提。在占领和接管城市后，党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接管城市后应立即开始城市建设，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工作还没有上正轨，甚至许多工业陷入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四）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无论是土地改革运动还是城市经济工作，都取得很大成就，运动总的说是健康的、成功的。但是也发生过偏差和错误，不过与以往各历史时期相比，这些偏差和错误发生的时间短，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其主要原因是党能够及时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错误，纠正偏差。

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主要是“左”倾错误，特别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从1947年10月到12月“左”倾错误达到高潮。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地表现，但以晋绥地区更为严重。主要表现是侵犯部分中农利益，侵犯和破坏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的“扫地出门”，新区急性土改、乱打乱杀等。中央发现这些错误后，采取有力措施，大力进行纠正。

首先是总结经验，完善政策。1947年11月29日，为纠正划分阶级时业已出现的“左”倾错误，中央把1933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根据新情况修改后重新下发，详细规定了划分成分的具体标准和办法。1947年召开的党的“十二月会议”，详细讨论了解放区土改出现的“左”倾错误以及纠正的办法。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批判“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针对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等“左”倾错误，从12个方面对土改运动的具体政策作了严格明确的规定。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一时期党的土改工作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并从改进党的工作方法，树立正确的政策观念，批判绝对平均主义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完整地提出了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48年春，党中央、毛泽东接连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批示、指示，进一步阐述党的土改政策策略，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这一过程中，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得到及时纠正，土地改革运动步入正轨。

其次是改变或取消某些“口号”。“平分土地”是《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明确规定土地分配的一项政策，也是这次土改中最具号召力的一个口号，它对于发动广大农民投身土地改革运动，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确实起到很大作用。但在实践贯彻中，各地平分土地的做法却五花八门，有的地方甚至“全部打乱彻底平分”。这种方法不是以是否消灭剥削而是以是否平分土地为衡量的标准，与党的土地改革是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的目的是相违背的，因而出现了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导致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滋长泛滥。党在纠正“左”倾错误过程中，党及时修正这一口号的内涵，并最终取消这一提法。党的“十二月会议”后，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规定，“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老解放区的新富农“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取消了“打乱平分”的办法。在1948年2月22日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政党工作》的指示中宣布：老区半老区土地已经平分或大体平分了的地区，不再平分土地。毛泽东于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判了绝对平均主义后，中共中央于5月1日发布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口号》中，不再提“平分土地”。此后，毛泽东在几个有关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改提“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1949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华中局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正式取消平分土地的提法。另外，针对一些地方的群众把土地改革的重点集中在斗地主、分浮财、挖地财上，以至出现乱斗乱打的现象，中央对“分浮财”、“挖地财”的口号也不提倡了，要求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上。

在城市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主要是把农村工作的一套办法照搬到城市，以至出现一些侵犯工商业、损害工厂设备的“左”的做法和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中共中央发现后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写了《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上报中共中央，指出收复石家庄过程中曾发生的错误的性质“是一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毫无相同之点”，提出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党中央立即将石家庄的经验下发介绍给各地，指导和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面而详细地规定了党的城市工商政策，把党的城市工作纳入正轨。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进一步规定了接管城市时不打乱企业、完整接收的原则。这些政策规定，保证了接管城市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二、扩展阶段经济理论探索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重视理论建设的政党。解放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探索，并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由于这一阶段处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和新中国建立的前夜，党不仅有农村经济工作经验，而且有了城市经济工作的实践，因此，党对经济理论的探索也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一）连续性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说明。但是，解放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大不相同。特别是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有怎样的经济结构，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党在实践的基础上，加紧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并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特点。

首先是探索时间上的连续性。从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开始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到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东北提纲”的发展，再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形成，及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以法定形式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连续召开重要会议，不间断地进行探索，终于使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形成完备的形态。

其次是理论内容上的连续性，经历了五次阶段性的发展与深化：第一次，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分析了三大经济纲领的依据及党的基本政策，规定了新中国经济的构成：（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三个方面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雏

形出现了。

第二次，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理论上探讨了其性质的依据。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次，1948年9月，“东北提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小的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东北提纲”认为，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发展，其发展的路线应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发展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的商品经济及自然的半自然的经济，使之向合作社发展；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蓝图。

第四次，在1949年4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七届二中全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构想的发展，主要是强调了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明确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性质；明确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趋于完备。

第五次，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并规定了五种经济成分的运行机制，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一规定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并使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构想的实施，具备了法律保证。

（二）批判性

党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探索的这一批判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农业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

所谓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曾出现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特别是1947年10月至12月的土改中，如平分一切土地、破坏王商业，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等口号。上升到理论上，这些观点都可以归结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正因如此，土改一度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对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农村流行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

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毛泽东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了由土地改革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而导致的党内一度出现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

1948年7月27日，新华社信箱发表经毛泽东审阅过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简称《问答》），从理论上集中批判了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性，揭示了其危害性，并指明了经过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发展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前景。这对于清除党内一些人存在的糊涂观念，对于正确地执行党的经济政策，坚持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问答》说明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革命的与反动的两重性质。即“从农民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这方面来说，这是革命的方面，正确的方面”。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的反动方面、错误方面，就是它在主观上梦想超越这个反封建主义的界限，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一切平分称为“共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这就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因为这样平均的结果，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及一部分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广大工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向上积极性，必然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

其次，说明了土改后小农经济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土改后，农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分化，绝不能永远保持“平均的小农经济”。农民在分得土地后，由于生产条件、经营能力等的差异，有的逐渐富裕起来，其中有小部分可能进行剥削而成为新的富农。而另外有些农民逐渐地穷困下来，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能不受人剥削而变为新的贫农或雇农。“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即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允许这种竞争，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农业经济广大地发展起来，所以这种私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有其一定的进步性。

第三，指出了农民解放的道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后，实行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在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组织变工合作；另一方面，政府在生产上给以财政投资及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这样就使大多数努力生产的农民可能保持中农的地位，生活则步步向上。同时，工业则可以利用农村因发展变工合作及提高技术而过剩出来的劳动力，获得广大的工业后备军。因此，“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其他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其他人民，经过另一个阶段的历史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二步。”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消灭一切的贫困，才可能最后来解放农民。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容许不劳而食，也决不容许偷懒的人与积极劳动的人取得同样的报酬与享受同样的待遇。

第四，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

但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制造大批供给农民使用的农业机器，并因此将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转变为集体农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没有工业的大量发展，没有大量的成千成万的农业机器供给农民使用，并使农民有可能团结于集体农场之中，而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那只能．是反动的幻想。

第五，绝对平均，只会导致绝对贫穷。《问答》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看成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人民的历史。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是从发展生产力这一个基本点出发的，绝不是为分配而分配。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财产的贫雇农，此后必须努力生产，依靠变工互助的劳动提高自己的经济情况，决不能还等待什么分配又分配。"必须知道，如果不努力生产，广大地发展生产力，即使按照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采取冒险办法，而把社会上一切阶级一切阶层的土地财产按绝对平均的方法分配了，那也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长期吃用的。所得的结果，一定仍然是大家的一场贫困。"所以，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关于发展生产的观点，在土地改革后，特别对于贫农和雇农进行发展生产的教育，使大多数农民都能生产发家，都能过富裕生活，乃是共产党员在农村中的根本任务。

由于及时批判了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党内清除了思想障碍，党树立了牢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观念，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预见性

党在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对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转变，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并经历由宏观到具体的认识过程。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论述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并指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共七大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式写进了党章，指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的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这些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基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中共关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转变的具体设想逐步发展趋于成熟，并预见了转变条件、途径和时间等。

首先，预见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转变的根本的政治条件。就是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并建立二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并引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预见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转变的先决条件。就是大力发展具

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废墟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其基础是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还比较薄弱。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才能有效地发挥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确立以后，才能引导其他经济成分逐步地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和转变。

第三，预见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转变的关键。就是逐步引导在国民经济中占90%以上的小农经济向现代化集体化方向发展，使其具有充分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对于广大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不如此，“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第四，预见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转变的途径。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转变，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经历一个发展的阶段，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实现转变。这一过程和途径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使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都得到充分发展，并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内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条件成熟后，再实现转变。

第五，预见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转变的时间。新民主主义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毛泽东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也指出：在经济上，“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如果我们“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会使“共产党失去农业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和转变的预见，说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这对于正确指导和推动党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建设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实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转变，作了理论的和思想的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经济工作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践阶段。

第五章　转制：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道路的探索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最终取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制度。1949年到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开始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构建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与计划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成功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因素被消除。

完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转变，基本完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制，是这一阶段党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

1949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工作从多方面展开。从生产力角度看，经历了从恢复国民经济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转变；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历了从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到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并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建设道路，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果和初步的理论成果。

一、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指导思想

在长期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在经济工作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实践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

并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一）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根本方针

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趵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即"四面八方"方针。这一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旨在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强调国家调剂五种社会经济成分，使不同的经济之间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因此，是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指导思想。

公私兼顾，即正确处理公营经济主要是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是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核心问题。公私兼顾，首先必须发展公营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最进步的经济成分，必须尽量发展国营经济，巩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在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也要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包括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所经营的经济以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必须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私营经济。"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

公私兼顾又不是"公"、"私"完全一样对待，而是先公后私。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担负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任，也是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因此要重点扶持。对私营经济则要扶持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

公私兼顾又是与劳资两利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必然要剥削工人阶级。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就允许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一定的剥削。建国之初，中国经济尚不发达，资本家多开工厂，发展生产，减少失业，对国家是有利的。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受益，对工人阶级当然有利。1949年刘少奇在与天津工商界人士座谈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是要真正做到劳资两利的。"他还说：资本家剥削工人是事实，在"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刘少奇天津讲话虽然个别言辞如"剥削有功"不妥当，但基本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为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正确处理"四面八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朱德也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

“这种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和实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方针,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

（二）恢复国民经济的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向大会作了《为争取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

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物价趋向稳定，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毛泽东强调：“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毛泽东强调必须做好八项工作，即：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全国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救济灾民及失业者；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加强党的建设，进行全党整风，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这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绝大部分都是经济方面的工作或与恢复国民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建国头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行动纲领。

在为进一步解释和说明书面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他指出，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民族资产阶级不满意我们，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一批小手工业者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毛泽东强调不要四面出击，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也不反对我们，这样我们的敌人就孤立了。可见，“不要四面出击”不仅明确了全党的主要任务和主攻方向，是解决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总方针，也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策略方针。

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恢复国民经济的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对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证我国稳步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

（一）革命转变的理论构想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日起就已明确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明确，整个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紧密衔接，决不容许也不可能两步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又不急于实现两个革命的转变。毛泽东指出，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发展，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空想。刘少奇也认为，民主革命任务彻底完成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建国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写进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去，刘少奇、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全体会议上解释了不必明确写进去的原因。刘少奇说："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周恩来也说："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在这个共同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1949年9月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回答党外人士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时，曾经指出大概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1950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主张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国家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稳步地前进，只有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提出，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要有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这是建国初期毛泽东有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又一重要构想，这一构想就是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分开进行，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完全成熟之后，再从容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构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全党的共识。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始终把握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趋势，以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依据，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道路，并在探索中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

1.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中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建国之初，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曾有过“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设想·但在全国性的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毛泽东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中国绝不能停留在这种状态，不能任由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更不能指望在这种基础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惟一的选择，就是在土地改革以后趁热打铁，依靠广大农民，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从195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开始，经过几年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1955年逐步形成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开展农业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农业合作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中密切联系、互相促进的两个基本部门，社会主义再生产不能长期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大工业和私有制的小农经济相互矛盾、柏互脱节的基础上。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劳动力，都要求农业生产有一个大发展。而不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就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产量低的矛盾，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其次，农业合作化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他们要求摆脱贫穷，共同富裕。只有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才能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

农业合作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了抗战前的最高水平以上，生产结构得到调整，工业生产设备制造能力大大提高，而且政局稳定，社会清明，人心向上，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在国际上，帝国主义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受到了挫折，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强大，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为国内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并不富裕，“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中国共产党也有能力领导好农业合作化，在长期的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善于领导农民的特点和优势，有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的经验，加上有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为农业合作化奠定的政治基础，以及强大的国营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就一定能够领导农民搞好农业合作化运动。

第二，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其主要之点是：

坚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事实上证明合作社比较单干户以至互助组有巨大的优越性。”既强调抓好农业合作化，又要求不失时机地搞好农业生产，

保证农业的增产，使农民看到合作化的实际好处，通过增产增收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又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所有制变革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同带有自发倾向的个体农民的联系，有利于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可以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在与农民和资产阶级同时并存的两个联盟中，国家一方面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以控制资产阶级，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把工业品卖给国家，进而迫使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利用与资产阶级的暂时性联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并换取更多的农副产品，用以解决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通过这两种联盟的相互作用，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改造。

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能用没收农民土地的办法搞合作化。“在处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上，有两条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就是自愿的原则和互利的原则。”对于那些暂时还不愿入社的人，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只能引导、说服教育，使之自觉自愿地走上合作化道路。

采取循序渐进的“三步走”步骤，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第一步，按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几户或十几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在初级社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大型的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社。

实行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毛泽东指出，在合作化运动中，首先要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树立其在合作社中的领导地位。巩固地团结新老土中农，并根据自愿原则吸收他们入社。在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内，有条件地、分期分批地吸收原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入社，并在集体劳动中改造他们。

这些具体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上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在理论上则构成中国共产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重要内容。

个体手工业者同个体农民一样，是小私有的独立劳动者。因此，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是一致的，即通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化的道路，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由于手工业又有许多与农业不同的特点，故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又采取了一些与农业合作化不同的方针政策：采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通过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法，提高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愿地组织到手工业合作社中来。在方法和步骤上，从供销社入手，采取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步骤，即通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小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逐步地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部分，并采取不同的

政策区别对待。建国之初，对官僚资本采取没收政策，而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政策。1953 年 6 月，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调查报告《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正式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问题。此后，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在中国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的依据、方式、途径等问题，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理论。

第一，关于和平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可能性方面来说，一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两面性。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二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为和平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巩固的工农联盟，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陷入孤立地位，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必要性方面来说，和平改造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国初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曾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和平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能有效地避免社会经济秩序发生大的震荡，从而避免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和平改造也有利于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利用其掌握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第二，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其主要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列宁提出，在一个经济落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是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就采用了公私合办、出租、委托经营、公私合营、订货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并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到 1953 年开始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已比较成熟，有了明确的内容。

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联系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把私人资本主义在生产经营上纳入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轨道；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是这二步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是一种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实行逐步过渡的方针。为此，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低级形式在工业方面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有经销代销；高级形式有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行逐步过渡，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实质上就是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谓和平赎买，就是国家有代价地变革资本主

义所有制，是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毛泽东提出，和平赎买不是一次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赎买，而是工人阶级在以后十几年的生产过程中，仍然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以此作为和平改造的代价。在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不同阶段的和平赎买形式。在加工订货阶段，企业生产的原料由国家供给，资本家拿加工费。如按产品成本计算利润，资本家取得的利润约占五分之一左右，资本家的剥削受到了限制。在单个企业公私合营阶段，按照“四马分肥”原则进行企业利润分配。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又改为让资本家拿定息，即把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估价折算成股份，国家每年按股份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润，以定息的形式支付，其余利润由国家支配。

第三，对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坚持改造企业与改造人相结合，改造个人与消灭个人所属阶级相结合。在把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同时，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改造阶级成员的方式达到从整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一方面，对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工作安排，人尽其才，发挥其生产管理方面的长处，并在生活上“包到底”，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致因改造而下降。

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初步理论探索

（一）适时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年。

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课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要求党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改造的步伐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也进行了三年时间，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是不足的。1953年开始“一五”计划建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号召过学习苏联，并在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基本上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索和寻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希望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后来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盖子，也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是不赞成的，但同时也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重要的意义。”

在1956年初，中国共产党即已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当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好、又快、又省的方针政策，反映了党把注意力转移到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上来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先后找了32个部委的负责人谈话，听取汇报，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外出调查，在京汉、粤汉、沪杭、沪宁、津浦铁路沿线找地方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从1956年2月中旬起，毛泽东又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找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经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来汇报情况、讨论问题。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汇报会。在此期间，中央又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一些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报书面汇报材料。在对经济建设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统一了认识。

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表明，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到了全党的面前。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最初理论成果。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过去几年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对今后建设工作中需要着重处理好的十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十大关系”中前五个方面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利益，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也要关心群众，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第二，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决不能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要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增加资金积累，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第三，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但是必须同时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使我国有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第四，调整经济管理体

制。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也应当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给工厂一点自主权，使各个生产单位都有相对独立性。第五，处理好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我们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二）党的“八大”对探索成果的集大成理论总结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对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果进行了集大成的科学理论总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正确地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根据对新形势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成果，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和决定性的胜利。这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第二，坚持了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一五”计划建设过程中，1955年的计划偏于保守，财政上出现了过多的结余，而1956年的经济建设又出现较小的冒进，引起财力、物力供应的紧张。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坚持了这一方针。“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八大”规定的经济建设方针，对进一步掌握、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提出了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陈云根据我国商品生产不发达、生产建设及人民生活对产品需求十分复杂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三主三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按照计划生产，但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和作为国家市场补充的自由市场。“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采纳了这一意见。

“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是正确的，对中国共产党进一

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全面开展经济工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节 成功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1949年到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矛盾十分尖锐、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改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经过艰苦努力，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全面计划经济建设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改组社会经济结构，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一）新的工作着重点的确定及对建国初期经济形势的分析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迅速开展经济工作，恢复国民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七届二中全会在作出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同时，也针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和中国南北方情况的不同，对党的工作任务的重点作了不同的规定。在人民掌握了政权并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北方大多数地区，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同时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1949年6月，刘少奇明确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1950年，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刘少奇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建设在新中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劳动人民还很穷困，他们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这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要使中国人民从穷困、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就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各种民主改革，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中解放已有的生产力。第二件事情，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工具，发展一切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刘少奇认为："当着我们去做好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好第二件事情。现在第一件事情已经或者差不多做好了，第二件事情也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不久以后，就要更大规模地有全面计划地来进行，而且要永远继续下去，因为生产是更基本的，永远需要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工作任务的规定到刘少奇关于革命建设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已经着手逐步将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七届二中全会还决定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等中央经济工作领导机构。1949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设立，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陈云为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等为副主任。“中财委为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工商业，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拟定和准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着重点，要求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建国前后，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的一系列讲话和报告中，对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给予了充分的估计。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战争的摧残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与抗战前的最好年份相比，1949年重工业生产下降70%，轻工业生产下降30%，民族工业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许多工矿企业关闭，400万城市人口．失业。农业生产也比抗战前下降25%，新解放区有3亿多农民因未进行土改而尚未获得土地，加上1949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4000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交通运输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内外贸易、城乡交流受阻，市场物资匮乏。此外，财政金融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由于财政赤字过大，不得不靠增发货币来弥补，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

对于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充分估计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解决困难的指导思想。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着眼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并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措施。12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在财经问题上的基本情况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

（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从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从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的角度来看，没收官僚资本又是为完成中国共产党“两步走”革命战略奠定经济基础。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国民党各级政府所经营的企业和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小官僚和地主一所办的工商业以及官僚资本企业中民族资本主义成分，都不在没收之列。官僚资本占旧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运输业资本的80%左右。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水泥产量的45%，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官僚资本还掌握着大银行、全国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以及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并控制了轻工业生产。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有制一样，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46年解放哈尔滨时，中国共产党就运用人民民主政权的力量，开始没收官僚资本。其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各级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部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商

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厂、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官僚资本企业（其中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的日、德、意各国在华企业），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到1949年年底，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达2858个，拥有生产工人75万多人。1951年初，政务院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清理了隐藏在一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和其他应没收的财产。这样，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就彻底地被剥夺并转变为新中国的国有资产。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明确了处理官僚资本经济机构和国民党政权机构的原则区别，规定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政权机构应该加以彻底的破坏，要打碎它，而对官僚资本经济机构，则不是打碎它，而是改造它的生产关系，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对官僚资本企业，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不打乱原来的技术组织和生产管理，而是把它完整地接收下来，先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一政策的实施，保证了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工作的顺利进行，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企业设备被毁坏的现象，并且使原来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基本上都保留下来，继续为新民主主义生产服务。

没收官僚资本，使国营经济直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国民经济的改组和恢复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实施“两步走”的革命战略，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物质条件。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和完成土地改革

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重大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有1.2亿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还有3.1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未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并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说明，阐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所作的报告。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土地改革的新政策。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制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法改变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即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动，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地主限制了没收其财产的范

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其土地的标准。实行新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运动的阻力，还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为保证土地改革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中共中央决定，从1950年冬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进行土地改革。中共中央要求，在全面进行土地改革之前，县以上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要先选择少数地区作为土地改革的试点，总结经验，集训干部，在此基础上，开展全面的土地改革。

从1950年冬开始，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推进。各地的土地改革一般经过了四个阶段：首先，派出土改工作队，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组织阶级队伍；其次，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分清敌我，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揭发和清算，把恶霸和不法地主分子交人民法庭公审；然后，将地主的土地、家具、耕畜和多余的房屋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地主也同样留得一份，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最后，进行复查，整顿和加强农村政权，引导农民发展生产。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解放的台湾省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摧毁了农村封建势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贫雇农为主的广大农民已成为农村中新生人民政权的柱石，从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工农联盟。

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一）与投机资本进行经济斗争，夺取市场控制权

新中国成立前后，面临着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党和政府还没有完全取得对经济特别是市场的控制权。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首先遇到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要控制市场，稳定物价，扭转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状况。

当时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由于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庞大，1949年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950年占41.1%；为了稳定社会，人民政府对国民党留下的几百万军政和公教人员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样，连同自己的军政公教人员，国家需要供给的脱产人员达900万人，行政费用也很大；恢复生产和交通运输需要投资；几千万灾民和失业者需要救济。人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不够支付浩大的费用，1949年国家支出中有三分之二的赤字，为此，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人民币的发行额，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增加约10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8倍。在这种情况下，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投机资本便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短短10个月中，就出现过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波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即有名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针对当时银元投机猖獗的情况，各大城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和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的货币。但投机商对政府的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市场。在上海，投机商的活动尤为猖狂，银元的黑市价从人民币1400元涨到2000元以上。为打击投机资本，1949年6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军管会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238人逮捕法办，沉重地打击了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

在打击了金银外币投机之后，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等物资，以哄抬物价，甚至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气焰十分嚣张。"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经济领导权的斗争"。谁掌握了市场，谁就掌握了经济上的领导权。为了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整治金融市场，稳定物价，打退投机资本的进攻，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陈云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召开了有五大区领导干部的财经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四项办法，即：精简节约；在新解放的乡村抓紧征粮，新解放的城市抓紧征税；发行公债；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的需要。针对投机资本家大量囤积粮食、棉纱的情况，会议也进行了布置，决定进行"米棉之战"。在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地一致行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棉花、棉布和煤炭，择机抛出；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收紧银根。1949年11月25日，当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这一抛（抛售物资主要是纱布）一收（收紧银根），资本家两面挨'耳光'。"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

"两大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投机资本，各地市场从1949年11月25日起趋向稳定，到12月初物价上涨风告一段落。打击投机资本斗争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市场上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

要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还必须平衡国家财政收支。而平衡收支的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建国以后，全国在地域、交通及物资交流与币制等等方面已经统一，但公粮和税收大多还由各大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而国家支出的大部却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这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下去，势必又要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引起金融物价的波动，给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以可乘之机，严重地影响人民的生活，妨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因此，党和政府决心采取重大的步骤来转变这种局面。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当时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特点，说明了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了十项决定，其主要内容是：统一国家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同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

政经济工作的通知》，指出："过去各解放区被分割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全国在地域、交通及物资交流与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对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作统一的管理和有计划的使用，则非但不利于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工作，且将严重地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与妨害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对这种不统一的局面，"必须切实地加以转变"。并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

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通知，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各大军区都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贯彻执行《决定》的各项具体措施。同时，政府又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整顿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财政收支很快就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统一起来。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长期以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标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表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已经开始确立，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政治上是坚强的，而且在经济斗争和经济工作上也是具有高超艺术的。

（二）调整工商业，顺理公私关系

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50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85%。私营经济在满足人民需要，帮助商品流通，促进城乡交流，吸收职工就业，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

1950年春夏之交，国家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的问题。表现在商品滞销、生产减缩、关店歇业增多、失业人数增加等。私营工商业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的消失；二是从前依赖外国市场和面向达官贵人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失去了市场；三是占城乡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购买力低；四是有些私营工商企业管理落后，人浮于事。

为了克服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1950年夏，中共中央先后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定。1950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并指出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纠正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阐明了调整工商业的必要性、调整的内容和有关政策。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调整公私关系的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使私营经济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对私营工业，采取加工订货，并在原料供应、资金供给等方面实行公私大体平等的原则。对私营商业，国家划分公私经营的范围。国营零售商业紧缩了一部分机构，把经营货物的品种由过去的几十种减为主要经营粮食、煤炭、布匹、油类、食盐、生产工具等少数重要物资，扩大了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并调整价格政策，使私营零售商有利可图。调整劳资关系主要是

遵循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既要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权益，又要保障工人的权益。当时提倡“劳资团结，渡过难关”，适当降低了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同时，政府做好失业救济和安置工作。此外，还调整了产销关系，由政府统一制定产销计划，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之间趋于平衡。

经过全国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获得了迅速发展。公营工业总产值 1950 年比 1949 年增长了 148.8%，商业零售额 1951 年比 1950 年增长了 133.2%。私营工商业也渡过了难关，得到了发展，1951 年与 1950 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 39%，商业零售增长了 36.6%。全国 29 个城市失业人数由 1950 年 6 月的 166 万，减少到 1951 年 7 月的 45 万。这就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从 1949 年到 1952 年底，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内外贸易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到 1952 年下半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2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 810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三年中平均递增 21.1%。这一年钢产量达到 135 万吨，原煤 6449 万吨，粮食 3278 亿斤，棉花 2607 万担。农田水利建设投资 8.25 亿元。交通运输方面，三年共修建铁路 3000 多公里，铁路通车达 24500 多公里，公路通车达 126600 公里。

三年间，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初步形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1949 年到 1952 年，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34.7%上升到 56%；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比重由 9.5%上升为 26.9%；社会主义商业的比重也由 1950 年的 14.9%上升为 42.6%；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统一管理。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30.1%上升到 1952 年的 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 17%上升到 26.6%。可见，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量的发展，而且有性质的变化和质量的提高。

到 1952 年，人民物质生活明显改善和提高。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职工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全国职工人数 1952 年达 1580 万人，比 1949 年增长 97.5%，职工平均工资比 1949 年增长 70%左右，农民收入一般增长了 30%。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1952 年同 1949 年相比，全国学生总数增加了一倍多，从 1952 年 6 月起，国家对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还有科学研究事业、新闻出版事业、电影广播事业和各种群众文化活动都有很大发展。

第三节　领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1953 年到 1956 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确立

（一）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将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先进的工业国，将新民主主义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经过建国头三年的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完成，国家的政治、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已经巩固，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包括各民主阶层、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统一战线也进一步扩次，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业已形成。这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保证。同时，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在一些方面实际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完全有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济上，经过三年恢复，中国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到 1952 年底，钢产量已达到 135 万吨，发电量达 73 亿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 41.5%，现代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 64.2%，职工人数 1600 万。掌握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手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物质基础。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已经同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往来也日益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已获得了保障。这就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我们能够将主要的精力和财力用到建设上来。

（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已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要经过一个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当时，中共中央曾经设想，建国后还要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条件成熟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2年，在建国头三年实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认识到，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增长的时期，恢复国民经济阶段的许多措施本身已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如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政策；土改后农村中的互助组、合作社等，都已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谈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之后中央书记处又经过多次讨论并研究了苏联的经验。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庆祝国庆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2月，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中宣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的或“左”的错误。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总纲》。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简称为“一化三改”。“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改造非社会主义工业，建立一个基本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使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成为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农业、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把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路线。它要求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资和技术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三大改造是总路线的“两翼”。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途径，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

题。通过学习和宣传，广大干部和群众明确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具体道路，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列宁认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主要是社会主义、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三种经济形态。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利用国家政权，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改造小农经济，把广大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资产阶级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态度，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的政策，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国家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仍是一个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农业国。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7%，还没有大型机器制造工业，更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和国防工业。五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19.1%，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占1.5%。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占71.8%。这种情况表明，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工业和商业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只有改变上述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复杂的经济结构，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反映了改变中国工业不发达和私有制占绝对优势状况的客观要求。

第一，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夙愿。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各部门，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实现工业化，便没有巩固的国防、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就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建国头几年，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以增加社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积累建设资金，培养建设人才，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又有惟利是图、投机取巧、生产无政府、破坏统一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建设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随着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展，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各项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以及和本企业职工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以适应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

第三，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客观要求。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力已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仍然是分散的、落

后的小农经济，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对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建设资金和商品市场日益增大的需要。同时，个体农民，特别是土改中刚刚获得土地的广大贫下中农，为了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也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另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因此，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而且也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体手工业的情况和个体农业的情况相类似。

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把解放初期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为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惟一经济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大改造的组织和领导

（一）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和领导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农村迅速开展起来。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属劳动者私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过程中，对农民的这种私有制原则上不能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而应通过示范引导和提供社会帮助，引导其走合作化道路，逐步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就及时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路线、方针和办法，要求各级党委根据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各地农村普遍发展临时和常年互助组，少量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发生了急躁冒进的情况。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纠正。1953 年 3 月 8 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缩减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要求各大区将原定计划压缩，并转发《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彦合作社发展中的盲目冒进偏向的指示》等文件，很快纠正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总结农业生产互助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认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要发展互助合作，以提高农村的生产力。决议指出，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决议发表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进入到重点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到 1954 年底，初级社发展到 48 万个，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增产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但在大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再次出现了发展过急过猛的急躁冒进倾向，加上 1954 年国家向农民多购了 70 亿斤粮食，致使全国农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状况。

1955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省区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规划：凡是基本上完成发展计划的应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

固；未完成计划的地区，应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计划过高的可报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适当收缩；对仓促铺开的地区，应进行整顿。到6月底，全国农业合作社65万个，同4月相比，减少了2万个。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的基调是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观点，而且会后批判不断加温，到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和随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而达到高潮，这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前进。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出现了整乡、整区、整县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

从1956年春起，农业合作化运动转入到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6月，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各地根据这个章程对已经建立的高级社进行整顿和巩固，并继续发展高级社，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已达1.17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至此，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例如推进过急，方式过于简单。但是，总体上看，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使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并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1月，在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号召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议指出：手工业合作组织必须根据生产需要和手工业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式，由群众自愿地组织起来，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三种组织形式：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后，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5万个，人数近150万。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中，手工业改造的速度也加快了。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同年底，手工业合作社已有9.91万个，人数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和领导

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建国之初接收大城市起就已开始了。当时将私营企业中的战犯、汉奸、官僚股权收归国有，实行公私合营；统一财经管理、平抑物价时，为取缔投机倒把，人民银行与私营银行、钱庄开始实行联营，随后又实行公私合营。实际上就已经拉开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序幕。

从1950年到1953年，是实施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1950年工商业合理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由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这就是把私

营企业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到 1952 年底，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收购产品的产值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 56%。从 1953 年 10 月起，国家陆续对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及棉纱、棉布等人民必须的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对煤炭、钢材、生铁等重要工业原料实行计划供应，使其脱离自由市场。这样，国家不仅从供销两头卡住了私营工业，同时也排挤了私商，在商业领域出现了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它的生产和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它的利润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的剥削。

从 1954 年到 1956 年，国家资本主义进入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阶段。公私合营又分为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步。1954 年 1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拓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决定在几年内首先分期分批将雇工 10 人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到 1954 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户已有 1764 户，占全部私营工业的 1%，但因为是大户，产值却占 33%，职工人数占 23%。公私合营后，企业由公私双方共有，接受国家的领导，由公私双方代表共同负责经营管理，企业的生产基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生产的目的由追求利润变为以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主；企业利润仍按"四马分肥"原则进行分配，资本家的剥削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这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内部进行合作，因而企业已经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

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大户进行了个别企业的公私全营后，为数众多的小户发生经营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私营工业遇到的货源问题无法克服。第二，农业合作化高潮掀起后，工农联盟的巩固，割断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处境孤立。第三，企业内部资本家和工人更加对立。私营企业的工人和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人比较，本来就有政治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在生产不景气、工资无保障的情况下，更是希望早日实行公私合营。1955 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资本主义企业通盘规划，统一安排，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进行联营合并。同年 10 月，毛泽东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谈话，并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共中央于 11 月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决议。同月，全国工商联首届执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经营困难和党的政策的双重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敲锣打鼓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不少城镇申请公私合营者川流不息，日夜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先批准公私合营，把清产核资、改组企业、安排生产、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工作，放到后面去做。1956 年 1 月 15 日，北京第一个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 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完全由国家统一支配，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纳入国家计划，资本家对企业的支配权只表现在领取私股的固定利息上（一般年息为 5%）。定息自 1956 年 1 月起计算，原定 7 年，后又延长 3 年，到 1966 年 9 月停止支付。据统计，1956 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 24.2 亿元，国家每年支付定息 1.2 亿元。定息

是资本家凭借原有的生产关系占有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仍是资本家的剥削收入。但在这些企业里资本家不只是退出了生产领域，他所能得到的以定息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同原来的企业断绝了联系，整个企业已归国家所有，已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了。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过程中，也出现了缺点和偏差。主要是时间过于仓促，工作不够细致，只采用公私合营这种惟一的形式；把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卷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混淆了劳动者和剥削者的界线；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

（一）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至1956年底，中国约有1.17亿农户和500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7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200万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直接转变为国营商店。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国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4.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0.1%以下，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由21.3%上升为92.9%。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41.5%上升到54.5%，集体所有制工业由3.2%上升到17.1%，公私合营工业由4%上升到27.2%，私营工业由30.7%降到0.04%，个体手工业由20.6%下降到1.2%。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已达98.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经济由16.2%上升到34%，合作社经济由18.2%上升到30.1%；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经济由0.4%上升到28.3%，私营经济由65.2%下降到7.6%。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92.4%。这表明，几千年以来以生产关系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以生产关系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此前，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

社会主义改造，也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过"一五"计划建设，国民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较大成就，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基础工业得到加强，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开始大批建立起来，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这一切，都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伴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人剥削人的制度基本上已经被消灭，原来的地主、富农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其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和生产的主人，在劳动过程中建立了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表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方面。可见，到1956年，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二）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这种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首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设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由社会根据统一计划来配置资源这样一种有计划的经济形态所取代。这种设想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建设的时候，曾经号召“学习苏联”，而苏联模式，就是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再次，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财力物力十分有限。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客观上需要国家运用集中统一的计划手段组织生产。事实上，国家计划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经济恢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手段。

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规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可见，《共同纲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构建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1950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开始形成中央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51年3月，政务院又作出《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提出“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比中央统收统支增加了灵活性。1952年1月，参考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中央颁布了《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规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程序、编制办法、基层计划单位、物资供应办法等。1952年年底，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是一个与政务院同级的经济工作机构，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相中长期计划。1953年年底，又撤销了大行政区机构，大型国营企业陆续收归中央工业部直接领导，工资管理集中到中央劳动部。1953年11月和1954年9月，中央先后决定对粮食、食用植物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统

一调拨、管理的产品由主要工业品扩大到主要农产品。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推进，与逐渐趋于单一的公有制相适应，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也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但由于有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在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很多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对不同的经济成分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对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对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在计划管理上作不同的要求；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采取直接计划，下达指令性指标，对各种小商品，采取间接计划，实行市场调节。同时，注意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如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农业生产，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不同经济形式的关系。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为辅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形成。

第四节　制定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推进“一五”计划建设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和一系列战略方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一、从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一）确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的思想。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并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工业化设想：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用三年时间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创造条件；三年准备之后，从 1953 年起进行十年工业化建设。1953 年确立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约三个五年计划 15 年时间），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

就是要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状况，使我国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提纲还强调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意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就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1954 年 2 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式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

（二）从实际出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并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

第一，以重工业作为工业化建设的重点，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将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一方面，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苏联从重工业建设开始，用十多年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以重工业为重点又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轻工业相对说来还有一些基础，由于设备利用率还很低，生产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农业的发展正当时主要只能靠农民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资金投入。而中国的重工业基础则十分薄弱。1952 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35.5%。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获得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就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为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农业的发展提供装备。为此，"一五"计划 58.2%的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 88.8%又是用于重工业建设。

强调以重工业为重点，必须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在发展重工业时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在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规定了要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之间要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毛泽东指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的观点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较多些和较快些，而且由于保持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这就透彻地说明了中国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

第二，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充分利用沿海工业。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合理调整工业布局，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经济不仅十分落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东南沿海集中了现代工业的 70%以上，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工业很少。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为此，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首先，"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一五"计划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

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同时，要继续适当发展和充分利用沿海工业。毛泽东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刘少奇也强调："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总之，是要做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

第三，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从长远来看，积累与消费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为了逐步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善人民生活。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又需要积累大量资金，这与增加消费，满足人民眼前利益又构成矛盾。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和国家建设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调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全国人民必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服从国家建设的长远根本利益，而对眼前生活改善的幅度作必要的限制，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另一方面，也要求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要求慎重决定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决定了积累的多少高低。党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及一系列战略方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的经济发展战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党对"一五"计划建设的领导

（一）"一五"计划的制定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已经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为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织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一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计划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1951年，中共中央即开始着手"一五"计划编制的准备工作。1952年，中共中央正式成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聂荣臻等人组成的"一五"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1954年4月，为更好地领导"一五"计划编制工作，中共中央调整"一五"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吸收邓小平、邓子恢等人参加，并以陈云为组长。8月，小组接连召开17次会议，审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一五"计划草案（初稿），对草案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和修改。随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又在广州，用一个月的时间再次对计划草案进行审议修改。1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

计划草案。7月，“一五”计划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的中心是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把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发展轻工业、农业、商业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力求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一五”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重工业的占36.2%，用于轻工业的占6.4%，用于农业的占7.1%，其余用于国防建设、运输、邮电、商业、文教卫生等。这样的安排基本上是适应国家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国家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

(二)“一五”计划的组织与实施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周恩来在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保证“一五”计划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充实工业建设第一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成为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内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纷纷投身国家经济建设的热潮之中。1953年，全国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保证全面地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紧急通知》，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运动在工业战线蓬勃展开。1954年，全国总工会又在全国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广大农民努力增加生产，以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五年间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已经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的428个，部分投产的109个。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83.9亿元，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年增长18%。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

604亿元，完成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年增长3.7%，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20元，比1956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职工人数从1952年的1580万人迅速增加到2451万人，1957年职工年平均工资637元，比1952年增加30%。

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五节　转制阶段党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从1949年到1956年，经过短短的7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国民党遗留的烂摊子的基础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党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形势复杂，矛盾众多，百废待兴，任务繁重。面对这种情形，中国共产党头脑清醒，目标明确，始终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建设的重大胜利。

七届二中全会在作出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同时，也对党的工作任务的重点作出了规定。毛泽东指出，在人民掌握了政权并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北方大多数地区，"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刘少奇也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必要的国防建设外，其他各项都要配合经济建设"。

建国之初，党面临的任务繁多：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镇压反革命、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等。党在进行这些方面工作的同时，始终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就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当时的中心任务。

建国初期各项政治运动的开展，都是紧紧围绕着经济恢复工作，各项重大政策，都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并把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引导到发展生产上去。如土地改革运动都安排在每年秋收后进行，避免了土地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冲击。没收官僚资本，也是将官僚资本企业按系统完整接管下来，先实行监督生产，再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样，在迅速接收几千个官僚资本企业的

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企业设备毁坏的现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建国初期各种政治运动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妨碍经济工作，反而成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强大动力。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的改造是整个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经济建设工作，社会主义改造也主要是经济改造工作。在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工业化建设是总路线的主体，"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也十分注意避免对生产造成冲击。由于政策适当，所有制的改造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大的消极影响，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始终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工作要遵循经济规律，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在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工作中，按经济规律办事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和经济建设速度的把握上。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但在改造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是 1955 年夏季以后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转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当时，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在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认为，合作化运动应该与工业化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现有农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较多，应该着重巩固现有合作社。毛泽东则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思想右了，是对合作化不积极，并在 7 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其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推进。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速进行。到 1956 年底，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样，原来预计 15 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了 4 年时间便完成了。这种速度显然不能说是正常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掌握得是比较好的。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在开始"一五"计划建设的时候，党特别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如开始拟定"一五"计划的时候，根据 1950～1952 年的经验，最早提出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 20% 以上，农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 7%。后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反复测算，并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认识到 1950 年、1951 年的高速度是带有

恢复性质的速度，要在恢复以后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保持同样的高速度，是不现实的。又鉴于1953年和1954年连续两年农业生产因受灾不能完成当年计划的情况，最后确定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4.3%。这一速度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后，毛泽东把注意力移到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并把合作化问题上的反对右倾保守转用到经济建设上来，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的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基建投资过大、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信贷突破计划、农业急于求成的偏差。"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主持实际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在察觉了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后，开始采取措施反冒进。1956年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将影响1956年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主要指标作了压缩。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6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决定按5%削减国家预算，其中基建投资由147亿元减至140亿元。9月，党的"八大"正式通过了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并肯定了他对"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估计和反冒进的措施，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实践证明，这次反冒进效果是好的。正因为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了局部的比例失调，才使经济建设沿着正常健康的轨道发展，到1957年顺利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反冒进中提出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和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更是经济建设中应永远遵循的正确方针。

三、正确处理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本国道路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必须把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结合起来。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在开始"一五"计划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学习苏联。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对如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没有充分的准备。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苏联模式也适应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重点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因而，在当时学习苏联模式就成为一种必然。

但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都适合中国。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1955年底，毛泽东在党内首先提出了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刘少奇等直接领导了历时几个月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并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

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许多共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毛泽东更是在各种场合阐述对待外国经验应该有的辩证态度。他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正是基于这种科学态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了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本国道路的关系，既借鉴苏联经验，也有自己的独创。如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安排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注重综合平衡。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调节机制、市场结构以及微观企业管理模式等方面，有诸多创新。这些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想宝库。

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道路

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柏结合。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采用和平“赎买”办法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运用于中国实际，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运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资产阶级。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去实现他们的设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多次阐述过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思想，并提出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赎买”。但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并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甚至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内战。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只能采用暴力手段，将资本家的企业全部没收。列宁的和平“赎买”主张也未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区别对待。对官僚资本手口官僚资产阶级采取没收和专政的办法，而对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则用和平赎买和团结教育改造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由此出发，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道路，即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了联盟的条件下，在统一战线内，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第六章　曲折："左"的主体错误的形成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转变过程的基本完成。在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后，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中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的前夕，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近十年的艰苦而曲折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和探索过程具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7年1月到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前。在这一阶段，经济工作基本上执行了党的"八大"路线和"八大"规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二阶段，从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和开始批评"反冒进"、酝酿"大跃进"，到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前。这个阶段，党在经济工作中连续犯了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反对实际并不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继续"大跃进"等一系列严重错误。第三阶段，从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前。这个阶段，虽然纠正错误是限定在坚持"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范围之内，纠正得很不彻底，但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总的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第四阶段，从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的发出。这个阶段，经济工作中实施"八字方针"，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的试验。但"左"的错误不断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在这十年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其间也经历了曲折。探索与曲折，是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的主线。

第一节　“左”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党的工作重心偏离经济工作

（一）工作重心偏离的轨迹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工作为重心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随后又多次讲到，“现在处在转变时刻，由阶级斗争到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党的工作不仅在实践上偏离了经济工作这个重心，而且在理论上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工作重心转向阶级斗争构建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由于在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关系上，是前者决定后者，主要矛盾判断的变化最终必然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全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工作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去。

1959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当彭德怀提出如何正确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若干经验教训的意见时，毛泽东认为这一举动是所谓路线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错误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从而使经济工作降为“纲”下面的“目”。由于毛泽东在会上采纳了刘少奇的意见，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从而使全会结束后的经济调整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使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在实践中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

实践。到“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党的工作重心实际上就全盘转移到了阶级斗争方面。

（二）工作重点问题上的二元论

党的工作重心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不能顺利实现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在工作重点问题上的二元论指导思想。

毛泽东从1956年底起，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国内的阶级状况、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提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不进行这样的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因此，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这段话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工作重点的观点。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工作重点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

关于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毛泽东在1959年冬曾这样说过：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个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庐山会议上也还是进行这个革命，是这个革命的继续，而且斗争是很尖锐的，如果不在这次会议上把彭德怀那条路线打下去，我们的总路线就不能巩固，那是不行的。从这段话可见，毛泽东所持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来说就是反右派运动和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因此，毛泽东上述关于工作重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同时抓经济工作。这种工作重点问题上的二元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长期得不到真正转移。

二、经济工作“急于求成”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急于求成”指导思想的形成

早在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出现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已开始关注如何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当年12月，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工业化的速度和规模，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同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召集有关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加快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为了加快农业的发展，毛泽东于1955年11月中旬主持起草了《农业十七条》，后发展为《农业四十条》。他认为，形势已经到来了，本来可以快一点办好的事，不要慢慢来。在此前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稍后补充了一个“省”字。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将“多快好省”的口号公开向全国发表出来。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把“多快好省”作

为领导方法加以强调；并号召各级组织要成为社会主义促进派。

上述这些情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把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的愿望。但是，由于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要求过大过高，1956年初，开始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发现此问题后，积极加以纠正，要反冒进。毛泽东对此不满。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1957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当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而毛泽东却认为，1956年的经济工作，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与会者大都认为1957年的经济建设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赞同周恩来提出的方针。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反冒进进行了明确的指责。由于毛泽东的不满和指责，周恩来这一反冒进的主要主持者，也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自己对反冒进的态度。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认为1956年的“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从而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正式地批评说，去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促进委员会，表示要“复辟”这三个东西。对“反冒进”愈益升级的错误批判，使人不敢再行提出对急躁冒进错误的异议，而且直接助长了党内早已存在的急于求成情绪。此后，无人再提反冒进；相反，“跃进”口号却逐渐喊了起来。“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几乎只剩下了反对保守的内容。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变成了党的指导思想。党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首先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重大失误。

(二)“急于求成”指导思想的发展

八届三中全会后，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急剧地发展起来。

首先，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的工农业在最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超英口号的提出，不仅表明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党内已占主导地位，而且还使这种思想有了具体的发展目标，这就是片面追求钢产量的增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大炼钢铁运动的发动。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后的不长时间内，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赶超时间又一再提前：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赶上美国；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6月，毛泽东在薄一波《两年超过英国》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9月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的信中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直到“大跃进”运动遭到惨重失败后，才放弃了这些口号。

第二，“大跃进”理论的主要内容得以形成。1958年初和1958年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旨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会议。这些会议，急剧地发展了八届三中全会形成

的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狠批“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大跃进”理论。关于开展“大跃进”的必要性，一是认为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颠覆危险的国际环境，“如果我们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安全就不能认为有充分的保证”；二是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薄弱，“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不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就不能认为是巩固的。”

关于开展“大跃进”的可能性，当时认为，“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情况下，我国6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苏联的援助，有丰富的资源，一定能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跃进”的发展。

关于实现“大跃进”的方法，一是认为必须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鼓起广大群众“跃进”的干劲；二是认为必须实行积极的平衡，“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跃进”的发展。

第三，确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强调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国进入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完全能够达到一个极高的速度。基于上述认识，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不切实际的任务。八大二次会议还把过去党内曾发生过的关于速度和方针等问题的分歧和争论，错误地归结为“快些好些”和“慢些差些”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不同领导方法的斗争，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历来主张“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按照当时的解释，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同时强调建设速度的快慢决定于主观努力的程度，而总路线则是“开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钥匙。”八大二次会议把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错误程度。

三、对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

（一）超越阶段的“空想论”

在“左”的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超越阶段的空想成分越来越多。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其超越阶段空想论的产物。这一时期毛泽东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空想成分主要表现为两个急于过渡：

1. 急于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向单一的公有制过渡。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于所有制结构的认识还是较为清醒的。他曾经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可以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他批评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太早，认为在中国这样的政策可以搞得时间更长一些。但是，在“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他的认识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取消，而且连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毛泽东不断地批评了各级干部中存在的急于过渡的倾向，但仍然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大集体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继续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进一步表达了要尽快地将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思想。

2. 急于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之后，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不大讲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了。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一些办法和实验，也可以考虑先由一个省进入共产主义。到这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甚至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当时盛行的“共产风”，其实质是急手过渡到共产主义。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毛泽东虽然带头降温、煞风，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性问题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只要几年就可以实现，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当时已开始准备这一过渡。吃饭不要钱是在创造过渡条件，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人民公社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当时毛泽东和许多干部都接受趁穷之际过渡可能有利、不然就难过渡的主张。在武昌会议期间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问题，认为我们在10年之后可能进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这些思想完全改变了反右派斗争以前党中央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正确认识，不仅是要超越社会主义的某个阶段，而且是要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二）混淆社会发展阶段的“大过渡”论

所谓“大过渡”论，是指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看成过渡时期的理论。这是理论界的一种通俗说法。“大过渡”论是相对于“小过渡”论而言的。所谓“小过渡”论，是指斯大林的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视为过渡时期结束，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苏联是按“小过渡”论来划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宣布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也是按“小过渡”论来划分的。

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终点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就生产关系而言，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之时，就是过渡时期终结之日。这在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时是清楚的。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反右派斗争以前也一直这么说，尽管在党的文件中没有明确表述。但是，在 1957 年 10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说法，指出：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1959 年 8 月，在毛泽东修改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稿中写道："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此外，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说：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才对，要好好研究。还说：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实际上，毛泽东引证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革命转变时期"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把它理解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一种误解。但从此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同意关于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大过渡"观点的。1963 年 6 月 14 日，这种观点被正式载入由他亲自主持制定并经他修改定稿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中，建议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他的认识就完全由"小过渡"论转变为"大过渡"论，完全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等同起来了。

四、四个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

（一）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定

早在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最初的构想。毛泽东指出：新中国建立以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而使中国稳定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3 年底《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解释总路线规定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时，提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1954 年 6 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同年 9 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周恩来在同一个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以上论述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最早表述，主要体现了对物质文明的要求。在195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者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则反映了现代化包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到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这个提法又被"现代科学技术"所代替。周恩来庄严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从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正式确立。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时间表的制定

对实现四化战略目标所需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人的估计经历了长——短——长的变化过程。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在同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把时间延长到75年。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时将这个时间进一步延长到100年。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不切实际地提出，中国要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958年6月21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把赶超的时间作了提前，改为"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是要求在1962年提前实现建成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为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显然是一份过急的时间表。

经过"大跃进"的曲折，在痛定思痛后，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接着，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二届三次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英国和法国要花费三百年的时间所做的事情，美国花费二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要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就一定能够做到，而且要做得比他们好得多。"这个时间设想，基本上是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

在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后，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为了实现四化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

的前列。随后，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尽管存在着要求过高过急的毛病，但是有步骤分阶段的思想是可取的。

第二节　错误地发动和推进“大跃进”

一、“大跃进”的推动方式

（一）反右开道和党内斗争的政治运动方式

1.“大跃进”的发动是靠反右开道的。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小脚女人”，发动了反对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强调反右倾的结果，是导致1956年上半年的经济工作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急躁冒进偏差，造成了相当紧张的局面。周恩来、陈云等及时地提出反冒进的主张；调整了经济计划，才缓和了紧张局面。党的“八大”也改变了原来片面强调反右倾的精神，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动，党内的“左”倾思想急剧地发展起来。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会后，又在党内外大批右倾思想。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在批判右倾保守的同时，第一次提出“大跃进”口号。

批判反冒进是推动“大跃进”的有效手段。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说反冒进犯了方向性错误，泄了6亿人民的气。他把“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的距离。在不断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浮夸风、高指标开始泛滥。各地你追我赶，层层加码，兑相炮制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将“右派言论”同“反冒进”思想联系起来，将反右派斗争同批判“反冒进”视为同一条“路线斗争”，这一观点从南宁会议贯穿到成都会议。这样，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同“大跃进”运动就结合在一起了。在5月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大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求“拔白旗”、“插红旗”。这就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切对“大跃进”的异议、怀疑都可列入“阶级斗争”的范围，作为敌对阶级的“动向”，迫使那些即使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们，也不能不参与到“大跃进”中来。可以说，“大跃进”运动从发动到高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大跃进”第二个回合的发生是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结果。

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一直致力于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工作中“左”的错误。就在庐山会议按原定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彭德怀于 7 月 14 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在小组会上得到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的明确支持。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他认为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这样，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正式认定“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斗争。300 多万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干部和党员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倾”斗争打断了在经济工作上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左”倾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反右倾”斗争以后，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二）“积极平衡”与两本账的经济计划方式

“大跃进”运动也是通过制定高指标来推动的，而高指标是通过所谓“积极平衡”的经济计划方式制定出来的，“积极平衡”的经济计划方式又是以毛泽东的“不平衡”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的。

“一五”建设时期，虽然出现了 1956 年上半年的冒进，但总体上看是注重综合平衡的。中国共产党“八大”总结了“一五”期间的成功实践，以及 1956 年坚持反冒进的经验，确立了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此后，陈云又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八大”提出的综合平衡方针，但是很勉强。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计划经济平衡问题时说，计划经济是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在毛泽东看来，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打破平衡。

“反右派”运动后，在批判反冒进的同时，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不平衡”。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根据这种观点，自然就可以任意打破平衡，搞人为的不平衡；“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

根据毛泽东的“不平衡”论，《人民日报》于 2 月 28 日发表《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认为“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支持新生事物和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这就是积极的平

衡，否则，就是慢与差的消极平衡。只有冲破旧的平衡，达到新的平衡，事物才能前进。从此以后，计划工作中不断地出现层层加码的高指标，“打破平衡”、“积极平衡”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高指标风漫天而起，一发而不可收拾。

与“积极平衡”相联系的是两本账的计划方式。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要求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的制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账，在地方是期成的。这种三本账制度，是造成“大跃进”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薄一波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所说的：“两本账或三本账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账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大跃进’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

（三）“小、土、群”和“全民大办”的群众运动方式

如果说在决策层面是通过批右倾的政治运动方式推进的，在基层实施层面，则是靠群众运动方式来推动的。在基层，大规模开展群众性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而“小、土、群”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又将“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

1957 年 9 月党中央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后，全国各地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实际上吹起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大搞人海战术。195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指出：最近“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大自然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在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在某些工程建设上（如农田水利建设）可以采用类似群众运动的方式、大会战的方式进行。但总的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是很难奏效的。随后把“大跃进”推向高潮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当年钢产量要完成翻番的任务。而原有的大中型钢铁企业生产能力及交通运输、煤炭电力的供给能力显然是不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于是党中央决定采取发动群众、土洋结合的方式。1958 年 9 月，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江苏、上海的一些地方和企业的过程中，在谈到钢铁生产时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7 月，全国投入钢铁生产的劳动力仅几十万人，8 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 月间竟达到 6000 万人以上。

大搞群众运动炼钢铁不但要多投入人力，而且相应地要搞小高炉、小转炉土法炼钢炼铁的群众运动，即“小土群”。8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一年之内建成小转炉 200 座，以形成年产 1000 万吨钢的能力；建成 13000 座小高炉，以增加年产 2000 万吨钢的生产能力。10 月 7 日至 9 日，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会，介绍了天津新兴钢厂土法炼钢的基本经验。3 天后，又在河南商县召开土法炼钢现场会，推广土法炼钢。自此，全国掀起土法炼钢的高潮。

为了满足大炼钢铁的需要，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方面都采取“全民大办”的办法。为解决钢铁战线上煤炭不足的突出问题，煤炭部提出，一方面，原有的大煤矿应进一步增加生产；另一方面，要求“全民大办小煤窑”，采取“小、土、群”的方针，“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矿对分散的土高炉”，全国一时办起10万多个小煤窑。这样，全国到处都摆开大炼钢铁的战场，各行各业从党委书记到广大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大中小学师生，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夜以继日，奋战在矿山和炉旁。结果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炼出一堆堆废钢废铁。同时冲击了各行各业的正常工作，特别是农村，由于“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人民公社组织的出现

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变动的设想是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负责人在“大跃进”运动中萌生的。1957年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相适应，这就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利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并社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一些地区即开始进行并社的试点工作。

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这就突破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名称的限制，实际上提出了给农村主要的合作经济组织另找名称的问题。当时，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于是出现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为了让青年农民学习农业技术，一些地方的农村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时，介绍了中央领导人最早关于这个问题的酝酿情况：“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这就把人民公社的基本轮廓及其远景清晰地勾画出来了。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有些地区进行了办公社的试验，采用的名称各种各样。“六

月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才选定了‘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7月1日出版的《红旗》1958年第3期，刊登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指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第一次公开提出人民公社的名称。7月16日《红旗》第4期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其中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就向全国人民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

8月6日，毛泽东视察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这些地方的消息在报刊上突出宣传后，各地竞相仿效，试办人民公社。8月底，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布后，人民公社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到9月底，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二）人民公社组织模式的基本特点和思想渊源

人民公社组织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具体说来：第一，人民公社规模大、管得宽。原来的高级社一般只有一二百户，而人民公社平均每社有4600多户，多者达万户以至有2万户以上。人民公社实行乡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组织，而且实行四社合一，即把供销、信贷、手工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合并在一起。这样就把一个乡范围的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作全部集中到公社。公社不仅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的生活（食堂、医院、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等等）。第二，扩大公有制和提高公有化程度，消灭私有制残余。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来生产社的小集体所有制扩大为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当时认为是大集体、小全民）。在公社化过程中，社员的自留地、自家牲畜、自营的成片果树以及一些较大的生产工具等都被收归公社所有；社员的家庭副业、小商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都被取缔。第三，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毛泽东把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在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把工资制、加班费、脑力劳动工资多、体力劳动工资少等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提出要考虑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供给制一般是供给口粮，实行吃饭不要钱。这部分被认为是体现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至于工资制，名曰“按劳分配”，实际只有象征性的一点，而且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第四，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体劳力按军事编制组成班、排、连、营等单位，在公社统一指挥调动下，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社队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等。第五，缩小商品交换、扩大产品分配。公社成立后，产品直接分配的部分扩大了，商品交换的比重缩小了。过去许多通过商品流通的产品，

现在变为自产自用，在社内直接分配了。

上述特点表明，初期的人民公社组织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模式，不是由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它的产生有着极为复杂的思想认识根源。第一，把马、恩、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化或作了错误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常把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列宁 1919 年 12 月在第一次全俄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称："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这些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很多是根据西欧发达国家当时的情况提出的，还有些具体设想属于推测之词。把这些照搬到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社会中来，必然会成为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论。另外，当时党的领导人对马、恩、列的一些深刻思想也作了错误解释，并从中引出"左"的作法，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误解是形成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等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因。

第二，受西方历史上乌托邦思想的影响。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受到过包括欧美和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1919 年春夏，他曾与蔡和森等青年一道，计议在长沙岳麓山进行建设"新村"的实验，还详细描绘了"新村"的蓝图："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从人民公社的模式中，可以隐约看到他早年曾考虑过的"新村"计议的某些设想和轨迹。事实上，在酝酿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变动之初，空想社会主义确实对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产生了影响。毛泽东 1958 年 8 月 21 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谈人民公社时也讲过：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第三，受到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表现形式也有多种多样。毛泽东 1958 年 8 月 24 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时，就是联系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道而谈起来的。u 月 3 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吃饭不要钱时，又讲了五斗米道的传人，张陵的孙子张鲁的故事。12 月 10 日，毛泽东批示编印了《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发给即将召开的武昌会议的与会者参阅。毛泽东在批语中对五斗米道的某些纲领作了通俗的解释，对"义舍"解释说："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为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对"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解释说："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12 月 7 日写的另一条批语还指出：《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在对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革命战争作了评述之后，批语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第四，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毛泽东 1958 年 8 月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我们过了 22 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我们的军事共产主义，是生活平等，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22 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战争时期不是劳动力统一调配吗？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

三、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第一次尝试

（一）"放权"与"收权"：改进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与曲折

党中央酝酿改进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始于 1955 年。当年，毛泽东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所到各省的负责人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着地方与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下放权。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回京后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讲到经济管理体制要改，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特别是主张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点利益，使企业在实施经营、发展经济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思想从理论上开了尝试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先声。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国务院于 1956 年 5 月和 8 月间召开全国体制会议，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并于 8 月起草出《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

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和改进体制工作的统一领导，党中央于 1957 年初成立了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改进体制问题上，五人小组着眼于下放管理权限。1 月 27 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地方同志提出的"分权"要求，陈云作了明确的答复："有些企业的管理权要下放，财务要下放，利润也要下放"。"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所以应当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同时，五人小组又重视综合平衡工作，重视全局和局部的协调问题，避免权力下放后出现混乱现象。9 月 24 日，陈云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发言，着重讲了四点：（1）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2）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3）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4）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但执行一年以后，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

1958 年，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党中央决心加快和扩大管理权限下放的步伐。4 月 11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中要求把中央各部门所属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质的企业外，原则上一律下放给地方管理，而且要求雷厉风行，以跃进的速度完成此事。6 月 2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通知将 9 个工业部门的 880 多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并要求在 6 月 15 日前，完成全部下放企业的交接手续。"大跃进"前，中央各部所属企、事业单位共有 9300 多个。"大跃进"期间，其中的 88%都下放给地方，仍属中央各

部管理的只剩下1200个。与此同时，中央还把财贸、物资、劳动、计划等方面的管理权也大幅度地下放地方，各地又效法中央，层层下放。一时间下放之风吹遍全国。

由于企业下放过猛过快，加之当年下半年开展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不仅打乱了企业间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而且出现了各地大上基建项目，大量增加职工，以及平调国营企业设备、材料的问题，从而导致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尽管党中央在作出下放企业决定的前后，也曾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全国和地方的平衡工作，生产资料必须按计划统一调拨，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但管理混乱和经济失控的半无政府状态的局势并未得到控制。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59年3月11日，国务院决定将有关全局性的34个企业由地方收归国务院有关部领导。4月28日，又批准21个企业由地方收归国务院有关部领导，24个企业原由地方管理改由国务院有关部与地方双重领导。从此，中央又逐步上收企业的管理权。这样，以下放企业管理权为中心内容的改进体制的工作，又以上收企业管理权而告结束。

（二）“两参一改三结合”：改进微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

“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推进了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中心的改进微观经济（即企业）管理体制的探索。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较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他认为，“私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建立起劳动者、管理者之间真正平等互助的关系。如何建立起这种关系呢？毛泽东提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就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思想。

1960年3月，毛泽东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的指示中，正式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微观经济管理模式，从此，中国许多大型企业把它作为一种制度陆续试行。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成都量具刃具厂委员会写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文和刘少奇为此所写的编者按。文章主要介绍了成都量具刃具厂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的经验。编者按则强调：“凡是条件已经具备的厂矿企业，应当推广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经验，条件尚未具备的厂矿企业，则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不久以后也能推广。”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企业干部学习“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说：“……成都量具刃具厂执行和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的经验，是近两年来我国在企业中贯彻执行党所确定的企业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典型总结。”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签发的中国第一个《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正式肯定了这种制度，并且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此后，它就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四、"大跃进"时期的经济工作方法的理论总结

(一)《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历来都非常注意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问题。1958年,为了适应加速经济建设步伐的需要,毛泽东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了总结,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智慧,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毛泽东在前言中写道:"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政治情况的需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为"大跃进"作准备的,因而从总的倾向看它明显带有"左"的印记。

《六十条》推动了"大跃进"的到来和浮夸风的出现。首先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指标。例如:"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5年或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原规定12年完成);各地方工业产值,争取在5年或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提出生产计划中央和地方共三本账的办法,助长了脱离实际,盲目提高指标,为层层加码大开"绿灯"的错误做法。其次,将"不断革命"的观点和要求引入经济领域,成为"大跃进"的思想理论武器。《六十条》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接着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于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这种"不断革命"的观点,鼓吹事物经常处在一种人为的不停止的变化状态之中,要求经济生活也像打仗一样由政治挂帅,边建边破,快速而跳跃地发展,乃至运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等方法,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后果了。此外,《六十条》中强调的"大权独揽",第一书记挂帅,造成了在"大跃进"时期,从上到下,层层独断专行的不良作风,导致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

虽然《六十条》提出的有关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任务、方法和理论原则中包含着不少错误的东西,但同时也包含着许多正确的内容。只不过这些正确的东西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有的并没有能真正实行,有的在执行时走了样,甚至走到反面。例如,"一切经过试验"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方法。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一切经过试验",被抛之于九霄云外。人民公社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无不是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情况下,立即在全国全面地铺开的。又如,"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然而,1958年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过分夸大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经济、脱离技术的"左"的错误。再如,毛泽东在《六十条》中提出,领导干部每年要有4个月离开办公室,到下面作调查研究,增加感性知识。这也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正确的经济工作方法,但在"大跃进"运动中并没有真正实行。

（二）《工作方法十六条》

1959年4月，针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左"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他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工作方法有问题。于是，他先在讲话中提出"工作方法九条"，之后又作了补充，总结了"工作方法十六条"。他提出的工作方法主要有："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要当机立断"、"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多数人"、"要历史地看问题"、"要解放思想"等。《工作方法十六条》是为纠"左"而提出的，因此许多内容至今看来仍有价值；但由于纠"左"只涉及到工作中的具体缺点，而没有触及指导思想，因此这些内容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的痕迹。

关于"多谋善断"和"当机立断"。"多谋善断"是针对"大跃进"中有些领导干部少谋武断而言的。毛泽东指出："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谋就是要同人商量。多谋，就要与多方面的人商量，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看各方面的材料、各种方案。除了多谋之外，还需要"多思"，"善思"，即对谋得的各种意见、方案、材料加以科学的抽象，加工制作改造，从而作出正确的决断。善断，不仅包含断的正确与否，而且还包括时机。对于"当机立断"，毛泽东解释说：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时候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关于"留有余地"。1958年的高指标，弄得很被动。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他认为，这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因为指标订得很高，实现不了，就挫伤群众积极性，在国内外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因此，我们订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一点积极性。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虽然明确地把"留有余地"作为工作方法提出，但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出现高指标。因此，要留有余地，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关于"波浪式前进"。针对"大跃进"以来一些人头脑过热，犯有直线性的毛病，毛泽东把"波浪式前进"列为一条工作方法。他说：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不能老是翻一番。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

第三节　调整时期党的经济工作

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经济工作路线一定程度上的恢复

(一) 联系经济建设实际学习经济理论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在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掀起的“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和结构，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混乱。为了帮助各级干部纠正错误认识，使他们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毛泽东号召他们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宣部主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毛泽东在11月9日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毛泽东还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读书”。7月2日，他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毛泽东的这番计划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1959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的负责人组成了学习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本人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尽管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早已突破了斯大林著作和苏联教科书的框框，但是，应该承认，在4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从这两本书中受到了教益，初步懂得了什么是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等等。结合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

作，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离实际更近了一些，也使实事求是的经济工作作风和路线开始有所恢复。

（二）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60年代初重新提倡调查研究，试图通过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来解决农村实际存在的问题。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强调指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在1960年底至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都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后，不但要亲自抓典型，而且要组织和指导广大干部去搞调查研究，教会许多人作调查研究。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三个调查组，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任组长，到广东、湖南、浙江3个省的农村去调查。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还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这实际上是向全党领导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为根据实践标准来纠正过去决定的错误开辟了道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是这段时间实际经济工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重要转变的思想前提。

4月25日，毛泽东又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要他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利用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地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这样，从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河南等省，邓小平、彭真直接组织5个调查组到北京市顺义县、怀柔县农村进行调查。这一时期，毛泽东收到各地送来的许多调查报告，为了交流情况，他批转了一些报告和信件。他在5月14日给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信中说：“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中共中央于6月15日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除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4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此后，

更多的领导同志深入城乡基层单位进行典型的调查。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逐步接近客观实际，从而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创造了先决条件。

二、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领导

（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工作方针的提出和执行

1. 从六字方针到八字方针

1960年7~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李富春针对“大跃进”导致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状况，提出了整顿工业企业的建议和“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会后，李富春进一步把整顿工业企业的六字方针，推及为制订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国家计委将六字方针写入了提交国务院审查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8月30日，周恩来审议上述报告时，在“巩固”之后加了“充实”二字，使六字方针变成“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几天后，周恩来又将“整顿”改成“调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使之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这意味着实际上停止了“大跃进”的方针，国民经济将转入调整的轨道。

2.“必须退够”和“伤筋动骨”的决策

八字方针出台后的半年多，农村形势明显好转，而工业调整效果不大，计划指标虽不断降低，但总的说来只是小幅调整，始终没有一下降到“底线”。原因在于党内对形势的观察与实际情况尚有距离，许多人还是没有认识到必须“后退一步”才能调整，因而决断起来显得犹豫徘徊。李富春看到问题所在，及时提出了计划指标要退够的主张。他在8月的中央会议上说：“退够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所谓退够，就是要根据各行业务企业的现有综合生产能力和原材料、燃料供应等各方面的可能，来全面安排生产任务，并且要着重抓质量、品种，讲究经济效果。”8月至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采纳了李富春的主张，郑重告诫全党：“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

到1961年底，经济方面开始出现有所好转的迹象，但总的来说，经济困难的局面还是很严峻的。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克服困难，中央于1962年初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但因规模太大不可能具体地部署经济调整工作。因此，会后不久，又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粮食减产、基建规模过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困难因素，认为应充分地估计困难，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他接着提出六条解决措施。陈云的讲话得到刘少奇的赞赏和与会者的同意。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强调指出：调整计划实质上是放慢工

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速度，以便真正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因为农业和市场问题是关系5亿多农民和1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今年的计划要先把农业和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搞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后再搞基本建设，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会议强调必须退够才能完全摆脱被动局面，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

3. 作出再用三年调整的决策

八字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到1963年上半年已经见了成效。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市场供应明显改善，财政收支情况良好。面对这种形势，有些领导人认为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不必再提八字方针了，有些人甚至认为目前的形势是由八字方针转变为新的“大跃进”的开始。1963年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1963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但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吃、穿、用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整个工业系统，特别是基础工业的调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企业还需要大力整顿。基于这样的分析，会议确定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把1963～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1966年再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再用3年调整的决策，对于统一干部思想，防止形势稍有好转就想大干快上的“左”的倾向，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有重要意义。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经济政策和措施

1.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经济政策措施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3月和5月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有关的经济政策。在所有制关系方面，明确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并决定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分配关系上，取消过去实行的部分供给制，严格实行评工记分和按工分分配的办法；5月，又明确规定停办农村公共食堂。同时，坚决退赔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和劳动力；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从增产农机具、化肥、农药、增加农业贷款等方面，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1962年2月，中共中央对农村政策又作了进一步调整，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一般实行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30年不变。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规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各项有关政策。

2. 加强对国民经济集中统一管理

为了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用于最需要的方面，1961年1月，中共中央规定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

三级，两三年内更多地集中到中央、中央局。所有生产、基建、物资、收购、劳动、财务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货币发行权归中央，不允许赤字预算。同时，降低企业利润留成比例，并对其使用方向做了严格规定，此项资金一律不得用于计划外基本建设。为了加强银行管理，控制货币发行，1962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规定收回几年来银行下放的一切权力，对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

3. 缓解供应紧张局面的经济措施

(1) 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这是缓解供应紧张局面的一项根本性措施。1961年上半年，党中央要求各级机关把现有人员减少1/3到1/2，动员那些"大跃进"时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同时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就食"，以减轻城镇粮食供应的负担。到1961年年底，职工人数减少了872万，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人左右，但城镇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1962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精简职工850万人。这样，1961年和1962年两年内共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2) 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减轻市场需求的压力；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从国外进口粮食和其他一些急需物资，增加市场的供应能力。(3) 国家对于占职工生活支出总额的50%至60%的粮食、棉布等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办法，同时对一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4) 改进商业工作。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规定》要求，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产品收购合同制度；恢复供销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等。这些政策规定，对于增加流通渠道，活跃城乡市场，改善供应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 开展清仓核资工作。1962年，对于工商企业的储存物资和流动资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核定。清仓的结果，清出了超过合理储存的物资150亿元，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

4.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196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排1961年第一季度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通知》，要求1961年第一季度的基本建设，除原定的855个项目外，其余项目坚决停工；855个项目中，除煤炭、木材、运输、矿石等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也要缓建；一律不得安排自筹资金的建设项目；除已有材料的校舍、宿舍和民房外，其他非生产建设一律停工。1962年，为了压缩国家计划外基建规模，中央规定：基建单位订货必须持有银行签署的证明，银行贷款不得用于基本建设；建设项目须经审批，动工兴建之前必须先落实资金、物资、施工力量等；所有正在施工的计划外工程，一律停止施工。由于采取以上坚决措施，基建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

5. 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大力压缩工业战线

为了改变"大跃进"以来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废弛、生产秩序混乱的局面，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1961年8月至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要求国营工业企业普遍试行。对工业企业的调整，主要采取了关、停、

并、转的措施。随着工业生产指标的大幅度压低，很多企业任务不足，有的甚至无任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按照经济合理、拉长短线、保留骨干的原则，大刀阔斧地对工业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

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探索

（一）两种劳动和教育制度的试行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是刘少奇提出来的。1957 年上半年，刘少奇在南方五省的调查中，许多学生和青年不能继续升学读书与工农业生产急需大量有文化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从矛盾中看到了中国劳动和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设想。他先是提出要少用固定工，多招亦工亦农的临时工；后于 1958 年又进一步提出要有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和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另一种是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从 1958 年起，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的劳动和教育制度在全国一些地方进行试验，后来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就逐渐处于自流状态，大部分没有坚持下来。

1964 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前进，刘少奇又重提“两种制度”的设想，使之更加完善。从 1964 年下半年到 1966 年初，刘少奇在视察各地、召开有关会议、会见外宾、召集有关部门汇报工作等场合，30 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进一步指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有一部分是结合的，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又是学校制度。”提出要把这种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和每个大城市着手试验和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

1965 年，刘少奇在倡导半工（农）半读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设想，即“社来社去”和“城来社去”。“社来社去”就是学生来自农村，从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后去农村当社员。“城来社去”就是学生来自城市，从半工半读学校毕业后去农村当社员。在 1965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会议上，刘少奇要求今后新办的半工半读、社来社去的学校，要办到农村去、实行劳动建校。同年 12 月，在第一次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上，刘少奇要求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 1966 年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重点试办“城来社去”、“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这次会议还提出，城市学校的毕业生，除一部分在城市升学或就业外，大部分要上山下乡。刘少奇认为半工半读教育在大力推广前，要有实验和总结经验的过程，要 5 年实验，10 年推广。在这两次会议前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进行半工半读的试点工作。各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进行了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制度的实验和试办。

（二）试办托拉斯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试办托拉斯，在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上进行了一次新的尝试。1960 年上半年，组织托拉斯的问题就已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确

提出，并且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间取得了共识，但恰逢国民经济大调整，没有具体实施。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工交企业中试办托拉斯的工作才被提上日程。1964年6月，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随后，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正式决定：除已建立起来的烟草工业公司、盐业公司和华东煤炭工业公司完全按照托拉斯的办法进行管理之外，再试办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等9个托拉斯。实践证明，首批试办的中央和地方的托拉斯大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试办托拉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开始注意借鉴和学习国外资本主义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邓小平在1960年提出"要走托拉斯道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进步的组织管理形式，机器设备利用得比较合理，搞得比较快。"1963年9月，中央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指出：可以考虑用像托拉斯这类生产、交换和科学实验的综合性的组织形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0月，刘少奇指出："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1964年在草拟试办托拉斯方案的时候参照了国外的作法。

试办托拉斯，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试图改善偏重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方式，并实行政企分开。1963年9月，中央组织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指出："管理工业企业，主要是用经济办法，而不能片面地依靠行政手段。"托拉斯就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刘少奇多次谈到托拉斯组织起来以后，国务院各部职能将有明显的变化，可以提高经济管理的水平与效益。托拉斯管理工厂，管实际工作；部则管计划工作，搞综合平衡，做政治工作，监督托拉斯。这是政企分开的一种新设想。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也肯定了建立托拉斯的设想，同时指出，"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企业"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同年6、7月间，周恩来在讨论托拉斯问题的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托拉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来办，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来管理。公司的企业职能逐步扩大，行政职能就要逐步缩小，行政的职能转化为经济的职能。"

四、经济工作中的新分歧与经济工作政治化趋势

（一）经济工作中出现新分歧

1962年上半年，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党内又逐渐出现新的分歧。这时的分歧来自中央最高层，主要是毛泽东跟中央一线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不同。

首先是对于经济形势的估计有差异。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下定切实调整工业的决心之后，毛泽东在会上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当时中央最

高领导层对这个估计没有不同看法。1961年底，在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也估计：经济上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了。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比较乐观。然而，与此同时，中央一线领导人从财政等部门的报告中，了解到当年有四五个个亿的财政赤字，经济形势不是到了谷底，而是在继续下滑，原来对困难的估计远远不够。随后召开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强调当时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要把困难估计够。“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却说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并认为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这表明，毛泽东依旧坚持他的看法，不同意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分析。

其次是对农村生产关系调整的思路不一样。毛泽东认为农村生产关系从公社、大队为核算单位退回到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这是调整的底线，再不能往后退。1961年春天，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向毛泽东请示试行“包产到户”时，毛泽东虽然同意试验，但态度十分勉强。在毛泽东看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包产到户”，已经不是农村生产管理体制的问题，而是维护不维护集体所有制、坚持不坚持集体化方向的问题。1961年11月，中央下发的文件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农业集体化，不许任何形式的分田单干。但到了1962年，随着许多地方悄然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中央一线领导人逐渐赞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在内部讲话都积极支持，邓小平引用民间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表明了对“包产到户”的赞成，刘少奇还在内部提出要起草让“包产到户”合法化的文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更是在一些场合力主实行。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都向毛泽东面陈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意见，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二）批“黑暗风”和“单干风”：分歧处理方式的政治化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呈现紧张态势。在毛泽东看来，紧张的国际环境反映出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反过来，他又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观察国内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党内存在的种种分歧。这样一来，经济工作中认识和主张的分歧，同当时的国际背景联系起来，就被认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在国内的反映。于是，毛泽东就展开了对“黑暗风”和“单干风”的批判。在1962年7月至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关于国内形势，他说：现在有些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他反复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讨论的重点变了，阶级斗争问题成为主题。与会者联系各地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前一段对形势的估计，讨论阶级斗争的问题。讨论的基调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讲话定下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处在强

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做某种程度的检查，承认前一段对困难估计多一些，看得严重一些。

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继续展开了对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的批判。对所谓“单干风”的批判，把对“包产到户”的责难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挂起钩来，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分析，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单干，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并认定“包产到户”反映了富裕农民甚至地主残余的利益和思想，严厉批评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全会之后，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指责为成立“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而予以撤销，“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的改革试验也被迫中断。对所谓“黑暗风”的批判，主要认为“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形势实事求是的估计，是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毛泽东批评说这是在困难面前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是不懂马列主义。总之，八届十中全会批判“黑暗风”、“单干风”，把经济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这就使得经济工作中分歧的处理方式政治化了。

（三）“四清”和“五反”经济工作目的的政治化

八届十中全会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实践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阶级斗争带有工具性质，是服务于某个目标的手段。此后的阶级斗争则带有目标性质，它本身成了主题；经济工作相反成为达到阶级斗争目标的手段。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四清”和“五反”中的前三反本来属于经济领域的工作，在这里却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1963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由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本主义的根子、修正主义的根子。

“四清”、“五反”运动同建国初期的运动有很大不同，不是强调先搞典型调查，摸清情况，再从实际出发决定运动的方针和政策，而是首先对干部，特别是工作队员进行阶级教育，在思想上拧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这样，运动的做法和效果就不一样了。由于首先肯定了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重，阶级敌人活动很猖狂，那么下去一搞就必然会抓出一批所谓的“阶级敌人”。当时流行的说法叫：“不搞不知道，一搞吓一跳”。1964年5月至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各地反映上来的片面的、表面的、夸大了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会议提出，要彻底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实际上已把运动的重心放到整党内干部上。1964年底，毛泽东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蹲点报告中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查清楚，才知道。”毛泽东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来源是上边。随后，在另一个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

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批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这实际上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通过“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根子，毛泽东认为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不仅是现实的、严重的，而且已经迫在眉睫。为了防止这种弥天大祸，毛泽东苦思冥想，后来终于找到一种防止之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第四节　曲折阶段经济工作的特点及经验教训

一、曲折阶段经济工作的特点

（一）十年经济工作总体上属于探索性质

毛泽东认为，建国头七年党的经济工作基本照抄了苏联的办法。于是，在社会经济改造基本完成之时，他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任务。1957 年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近十年时间，党的经济工作就是围绕着这一探索任务展开的。在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之后，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农业与工业关系的思想，把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特别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上升为实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到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以前，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误入“大跃进”的轨道。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回顾说：“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办法，但没有提其他的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的这番话，完整地反映出“大跃进”兴起的脉络。这就是说，从不满意苏联建设速度和方法开始，经过寻找与比较，终于提出了一套不同的做法和方针。而这一整套方针，正是中国“大跃进”的理论根据与现实基础。由于这样的原因，毛泽东才对中国自己的这个“大跃进”兴奋异常。他说，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出现了”。他认为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经

济建设道路。但是，实践证明，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这样的探索，既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对探索失误进行了初步的纠正。但这种纠正只限于具体工作，当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从指导方针上提出反“左”问题，要求从根本上总结教训时，毛泽东发动“反右倾”，从而中断了反“左”的进程。

庐山会议后新的“跃进”运动的开展，使国民经济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承认，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另一方面表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1962年1月30日的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调查它，研究它。”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确立“调整”八字方针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才把党的经济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

（二）曲折阶段经济工作基本上在“左”的主导下进行

1957年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逐渐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对此，邓小平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多次说过：“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陈云也曾经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情况比较好些，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否定了党的“八大”确立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为主要内容特征的“大跃进”运动。这些“左”倾错误反映到具体的经济工作当中，就是追求高指标，大刮浮夸风，盲目瞎指挥，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就是贬低知识分子，大搞群众运动，全民大炼钢铁；就是打破“消极平衡”，实行所谓“积极平衡”，“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就是盲目建立协作区，大刮“下放风”。

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党发动了以“共产风”为特征，旨在“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反映到具体的经济工作上，就是盲目扩大基层经济组织的规模和权限，提高和扩大公有制的程度和范围，消灭私有制残余；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

化的“左”倾错误的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逐渐形成。受此影响，1957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也由经济工作一步一步滑向阶级斗争的轨道。虽然在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没有达到支配党的工作全局的程度，但是，它作为推动经济工作的手段确实深深地影响甚至左右了党的经济工作的进程。党的十年经济工作是在经济上急于求成和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主体错误下进行的，这是十年经济工作走向曲折的根本原因。

（三）十年经济工作反映了党和人民的良好愿望

十年经济工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一开始就遇到曲折，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良好动机。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过去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闹革命，驱列强，尽管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目标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愿望：使我们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富裕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大山之后，中国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但国家的落后面貌没有改变。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仍面临着强大的内外部压力。一方面，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拒绝承认中国，而且仍然对中国虎视眈眈。另一方面，在国内又面临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经济欠发达造成了强大的内外部压力，才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强烈的赶超愿望。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毛泽东、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然而，好的动机并没有带来好的效果，客观实践与主观愿望之间出现巨大反差。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想得太简单太容易了，这不仅表现在“苦战三年”的口号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系列美好的憧憬和宏大的规划之中。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仿佛只要苦战3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任务的迅速完成，使中国共产党人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法，就有了万能的法宝。此外，把“一穷二白”看成是中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是导致低估中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的认识原因。

二、曲折阶段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一）社会经济改造完成后应坚定不移地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

们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决议正是党的工作着重点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移的标志。

然而，这次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不坚决的。“八大”召开后一个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头脑中刚刚松弛了的阶段斗争这根弦又重新开始绷紧起来。1957 年上半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致使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风吹草动使毛泽东轻易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在 10 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的这个错误论断得到了八届三中全会的赞同，并在次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得到了正式批准。对社会主义矛盾认识的改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大改变，它为党的工作重心由经济建设滑向阶级斗争的轨道提供了根本性的依据，致使党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延缓了 20 年时间。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二）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10 年间，尤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例子很多。例如：在“大跃进”运动中，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然而，搞建设毕竟不同于打仗，不同于搞土改，归根到底是为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跟战争、土改所要求解决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正是由于经济工作具有不同于其他工作的特殊性，所以经济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如果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就会受到它的惩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以及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遭受到的严厉惩罚。

又如，“大跃进”运动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具体表现。高指标，大都是没有客观依据完全凭主观想象出来的。像 1958 年提出两本账的计划方法，使得计划指标层层加码，随意翻番。浮夸风，就是虚报产量的假话、大话、空话成风。农业领域的“浮夸风”始于 1958 年 7 月，《人民日报》7 月 23 日发表了河南西丰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卫星”亩产达到 3660 公斤的消息。8 月 13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田亩产 36900 多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一万多斤。工业领域的“浮夸风”始于 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9 月 17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放了一颗生铁高产卫星，全省土高炉的生铁产量比老

钢铁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生铁日产量还高。10月1日，《人民日报》又宣传9月24日这天，出现了8个土高炉日产生铁万吨以上的省份。瞎指挥，最典型的就是推行深耕。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称赞了长葛县深翻土地的做法，随后，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现场会，推行其深翻土地的“经验”。各地农村掀起了所谓“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运动。结果，深耕地，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1丈2尺深的，土层太薄的田地借的“客土”也被雨水冲走。土壤的质量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相反遭到了破坏。事实证明，这种盲目无条件深翻耕地是违反科学的瞎指挥。“共产风”主要表现为“一平二调三收款”。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中指出：“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违背价值规律造成的严重恶果。

当然，在这10年间，主要是在1957年前9个月、郑州会议后9个月纠“左”和八届九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期间，经济工作大体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1957年，由于遵循了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基建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规律，使该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纠“左”期间，毛泽东提出要“压缩空气”，降低钢铁指标，也是尊重经济规律的表现。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对基建指标“伤筋动骨”，同样反映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使国民经济得以顺利走出低谷。这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正面经验。

（三）经济工作要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实现“大跃进”的目标有物质条件方面的限制，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以成为克服物质方面障碍的巨大力量。所以毛泽东在宣布“15年赶上英国”时，认为是有相当根据的，即中国人是想努力的。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把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经过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焕发出的冲天干劲，看作是实现赶超目标的最可靠的根据。由此也就决定了“大跃进”的显著特点：精神力量的绝对化和群众的最广泛参与。在发动“大跃进”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都把全民参与作为实现赶超目标的前提条件加以强调，都把“精神”、“气概”、“干劲”等主观的东西当作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因素加以倡导。人民群众的蓬勃的革命精神，也感染了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后来，邓小平回顾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处于这种热火朝天的气氛中，也就难免“头脑发热”了。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搞经济建设，发挥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党在经济工作中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中第二条说：“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力争高速度》的社论说：“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着非常伟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开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钥匙。”《人民日报》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

加以肯定和提倡，并大批所谓条件论，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结果导致主观主义作风盛行。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四）经济工作不能超越阶段与国情

在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的问题上，1957年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著名观点。1958年6月，“以钢为纲”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实际上否定了“八大”总结“一五”期间经济工作经验教训得出的经济建设要考虑“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重要结论。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铁产量指标为1070万吨，在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的基础上骤然增长100%。这就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的钢铁生产能力。因此，也就严重地脱离了国情，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这是对国情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大跃进”时期，经济建设超越国情的失误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给后几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教训不能说不深刻。

十年经济工作中，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严重地超越了阶段和国情。1958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试图在短时期内实现所有制的不断变革——由高级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再由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而准备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对北戴河会议决议中农村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时间作了这样的解释：“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进入全民所有制的问题，即大约两个五年计划时间内进入，一部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进入，大部分在第二（三）个五年计划内进入。”也就是说，过渡的时间限于10年以内。那么，到1962年为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到1967年为止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农村人民公社能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水平呢？毛泽东是这样设想的：“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1960年，或者略长一点的时间内，农村人民公社实现每年每人能够分配到150元到200元。”很显然，这是以低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所有制过渡，即“穷过渡”。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谈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明显地超越了阶段和国情。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的时候，才应当变革生产关系。而我们这些年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不停顿地去变革生产关系。正如邓小平所提出的，其后果是：“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在灾难面前，不得不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实际上是对生产关系变革超越阶段和国情错误的修订。

（五）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国际国内政治风向跑

1958年的“大跃进”，是1957年整风、反右派和随后的“反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回应，“大跃进”本身是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跑的结果。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已经把国民经济搞得“筋疲力尽”，可是1960年仍不顾当时面临的巨大困难，掀起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继续大跃进”带来的严重挫折，更清楚地显示了经济决策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带来的恶果。1959年底，1960年春，经济决策跟

着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风向走。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实际经济工作，也跟着做出一系列“反右倾，鼓干劲”的决策：工业方面，重搞三本账，高指标，名目繁多的“大办”。农业方面，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等那一套。财贸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反“瞒产”，高征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和发动“继续大跃进”这两个错误虽紧密相连，但导致错误的认识根源毕竟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涉及的是怎样评价“三面红旗”的问题，后者涉及的则是对当时的实际经济情况的估价问题。如果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对前一个错误已无力抵制，那么，如果还能坚持把“路线斗争”同实际经济工作分开，后一个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缩小的。遗憾的是，庐山会议后并没有坚持把“路线斗争”同实际经济工作分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1960 年 6 月下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策划几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又发生苏联政府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和终止合同的突然事件。国际政治斗争加剧，使一些人不能冷静下来考虑问题，又提出要炼“争气钢”，要在当年炼出 2000 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跑，越跑离实际越远。

接受庐山会议“反右倾”同时发动“继续大跃进”的教训，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后，就有意识地注意到防止政治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这以后虽然批判“黑暗风”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批判而停止“八字方针”的执行。政治斗争的弦虽然越绷越紧，但经济指标不再随风涨了。在工作部署上，也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政治斗争不影响生产，例如在 1963 年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规定：运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耽误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前后历时 4 年的“四清”运动虽然也给工农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但同反“右倾”斗争比，影响小得多；因此，调整期间 5 年的经济工作，又为经济决策不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六）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集体和民主领导

1956 年毛泽东虽然对反冒进不满意，但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对集体决议还是尊重的。国民经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也得到了顺利的贯彻。然而，1957 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反冒进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不适当的、过火的批评。这场批评的对象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上纲上线；而被批评者欲辩不能，只好不断地做自我批评。党的集体和民主领导原则因此被破坏，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局面开始形成。其结果是导致“大跃进”的发动因党内无人敢于反对而畅行无阻。

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就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中央主席写信，这是完全正常的。按党章规定，这是每一个党员都有的权利。但毛泽东却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向党“下战书”，目的是为了“争取市场，组织队伍”。这样的政治判断，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

"大跃进"时期，强迫命令、瞎指挥成风，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人民群众中，民主生活都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党员和群众，都没有发言权，更不能说不同的、反对的意见，以致酿成了大的错误，并且得不到及时纠正。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结合经济工作中的这个教训、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实行不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如果在人民内部不实行广泛的民主，干部和群众就不敢讲话，正确的意见就集中不起来，就不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很重要的就是要在党内实行民主。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他指出，凡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邓小平、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也都讲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党的领导人抓住违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经济工作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历史经验说明，能不能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党的经济决策是否正确，党的经济工作是否能够顺利进行。

然而，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经济工作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教训。

第七章　挫折："左"的错误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挫折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党内形成了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目的，利用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直接酿成政治上的灾难，思想上的混乱，组织上的破坏，经济上的浩劫，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这十年中遭到最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对1967年至1976年这10年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是全面的、持续的、自始至终存在的。由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在"文革"十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呈现出复杂纷繁的形势，带有一定的起伏性，总的趋势是三起三落。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制定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带来的严重困难，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仍然保持上升发展的好势头；但是，自从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之后，出现了逆转的趋势，1967年和1968年，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全国经济建设陷入全面混乱，呈现一种明显下降的态势。1969年至1973年，由于党和人民的艰苦努力，经济逐步回升；但是，1974年大搞"批林批孔"运动，又使经济形势重新恶化。经过1975年的全面整顿，国民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而1976年发动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经济建设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重新陷入混乱和倒退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主要方式，全面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方法，力图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而使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方式打上了浓厚的"左"的烙印。

第一节 “左”的主体错误及其在经济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革”期间，党内“左”的主体错误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理论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发展到极“左”。

一、“左”的社会经济理论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错误的经济指导思想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经济指导思想错误方面的发展。1958年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致使“左”的经济思想急剧膨胀。1962年全国经济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毛泽东又急于抓阶级斗争。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左”倾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上升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十年动乱中不断升级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理论依据。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十年期间曾经被反复地宣传，并且写入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按照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必须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然而，十年“文革”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二）“五七”指示构思的理想社会模式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想通过这场政治大革命，对中国的社会来一

番彻底改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起一个样板，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1966年5月？日，毛泽东在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时，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写了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信中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工人、农民及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等，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工厂工人“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在晚年力图改变社会现状，构想的一个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纲领提出来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逐步缩小社会分工，并为最终消灭社会分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五七指示”希望各个单位、各个行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革命化大学校。其成员也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做工、能种田、能打仗、能写文章，这些人就是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培养的“新人”。

二是逐步缩小社会商品供应的范围和数量，通过自然经济加指令性计划的途径来组织社会生产。“五七指示”提出，通过办革命化大学校，可以逐步限制和缩小商品经济，各行各业都可以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以及一部分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鼓励和提倡自给自足。并通过这种自给自足的途径来消灭商品经济。

三是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实现社会公平。“五七指示”设想，只要把全国都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社会就可以给每个人提供均等的接受教育和劳动就业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做工、务农、学军、读书，这样就可以逐步缩小和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五七指示”所追求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蓝图，从认识上况，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从实践上说，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用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模式来裁判生活。这是毛泽东把人民公社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这种思想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这种“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发展。

（三）理论问题指示及其社会经济理想

1974年，毛泽东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表了一系列指示。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

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集中起来，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下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实际上，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把“资产阶级法权”误解为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法权，并把它的范围扩大到分配关系以外，把社会主义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的一切不平等现象，甚至某些合理差别都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并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寻找论断来印证自己的看法，把本来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进而把“资产阶级法权”等同于资产阶级。这同他设想的消灭了一切不平等的“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他一方面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又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性来进一步论证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想通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建设一个他所构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是脱离社会主义现实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四）批判苏、南“修正主义”中出现的“左”的经济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当中国的国民经济遭受困难的时候，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听从他们的指挥棒。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顶住了苏共的压力。于是，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利用他们党和东欧五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台，大肆攻击、诬蔑中共，从而导致中共与苏共之间爆发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对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中共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修正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存在一些“左”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对“文化大革命”前后党内“左”的主体错误及其在经济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首先，认为南斯拉夫存在相当多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是否存在，当作判断一个国家是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根据。这种观点实际上否认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客观必然性，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看成只能是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

其次，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的企业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三，把利润和竞争当作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这样，就把利润和竞争机制与资本主义划了等号，中国的国营企业就不能利用这些正常的手段了。

第四，把物质利益原则看作是与按劳分配相对立的修正主义政策。这就否认了社会

主义经济中的物质利益原则和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合理的差距，把按劳分配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实际上为实施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制造了理论根据。

总之，当时党内基于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对南斯拉夫率先冲破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积极意义缺乏清醒地理解，对苏联开始实行的一些社会主义改革措施抱有怀疑，因而反对南共的“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把苏共的政治路线变化简单地与中国实践对照，提出了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依据，使在这场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左”的思想观点，对后来党的经济指导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

二、“左”倾错误下的经济理论混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的理论的发展，企图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思想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指导思想。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政治需要，迎合并利用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错误思想，在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造成了经济理论上的极大混乱。

（一）批“唯生产力论”，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

“唯生产力论”本是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种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为第二国际的考茨基。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必去进行革命斗争，只要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后才能谈得上革命。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把“唯生产力论”硬套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方面，他们公开否定党的八大路线，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实质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为代表的党内抓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为其篡党夺权扫清障碍。被极“左”势力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康生，在1966年底提出，“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唯生产力论’。”以此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条理由。“四人帮”提出，“唯生产力论”就是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埋头生产，不问路线，便于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攻击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时，诬蔑他主张发展生产就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实现现代化之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同时，极力鼓吹唯心主义的“上层建筑决定论”。他们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始终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实际上，他们是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为名，来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根本性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进而篡党夺权。

（二）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歪曲

1974年底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后，“四人帮”即把理论宣传工作的重点

集中于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是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因此，“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是在近代作为封建等级特权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相对封建特权来说，具有自由、平等和法律化的特征，是先进的、合理的。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进一步分析，它又是虚伪的、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在平等自由表面形式下，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由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本质。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以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商品经济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经济内涵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所反映的是剥削关系，资本家按照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购买，劳动力；而社会主义经济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由于工人阶级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虽然仍然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着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但这种不平等是相对于共产主义而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如果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否定了剥削，又是最大的平等。

“四人帮”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字面上的“资产阶级”词意，采取形而上学的手段，抓住事物表面的现象而曲解事实的本质，蓄意混淆上述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性质内涵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界限，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所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一律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和“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他们就完全把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歪曲和丑化为资本主义关系。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代表，打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大旗，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攻击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张春桥提出，“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按劳分配属于资本主义“旧事物”、“旧痕迹”。这样，“四人帮”把按劳分配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等同于资本主义因素，从而完全篡改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还进一步认为，按劳分配必然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必然会进一步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产生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按劳分配的外衣下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的情况，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快地产生出来。”据此，“四人帮”鼓吹要对按劳分配加以限制，“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四人帮”把按劳分配当作资本主义因素，制造理论混乱，在“文革”中造成了平均主义泛滥成灾的恶果，在分配中，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轻干重、干好干坏都一样，使消极懒惰习以为常，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三）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

“四人帮”从其政治目的出发，把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对价值规律进行全盘否定。他们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都同商品交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姚文元说，“不限制商品交换，完全听价值规律起作用，发展下去就是高薪等等，资本主义泛滥。”他们认为，凡是热衷于抓生产、抓业务的人，就是热衷于商品生产，也就是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热衷于抓经济、抓生产，所以，邓小平就是搞资本主义。

“四人帮”打着“反资本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用封建主义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点来批判商品经济，他们的理论是一种比资产阶级学说更落后的宗法制自然经济意识的翻版，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四）鼓吹贫穷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其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而“四人帮”为了表现他们“左”派的“坚定立场”，竭力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他们把社会主义与贫穷等同起来，认为一旦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提出：“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是‘臭豆腐’，闻着很臭，吃起来却很香”；在“文革”中这些东西已经被批判，但走资派却总不死心，总是想办法贩卖这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这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四人帮”不仅在物质方面大搞贫穷，而且还在精神方面大搞贫穷。大肆散布“富则修”、“富则资”、“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等谬论，并用野蛮手段迫害知识分子和劳动模范，力图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都处于落后状态，便于他们实行“愚民政策”。可见，“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叛，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讽刺，是对人民利益的一种损害。

三、经济工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地位的下降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1961年到1965年，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5年的艰苦调整，终于迎来了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的局面。但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打乱了经济发展的良好进程，“左”倾思想发展到支配

全局的程度，经济工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的地位退居其次。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贯穿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据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统帅经济建设，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当时，这一指导方针的具体提法叫做“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提法最早见于1966年7月2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可见，当时“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提出，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冲击和破坏，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自毛泽东在1967年7月视察华北、华中、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时，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后，其意义就发生了变化。10月18日，《人民日报》以“最高指示”的形式，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予以公布，即成为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二者既不能对立，也不能并列，其中革命是统帅，是带动一切工作的前提和推动力。但是，“文革”时期的革命，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其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斗争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改革所谓“管、卡、压”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然而在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内根本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企业也不存在“管、卡、压”的规章制度。所以，这样的革命一旦开展起来，必然搞错革命对象，混淆是非和敌我界线。在“文革”期间，革命的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斗，社会主义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马列主义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天下大乱。这样的“革命”越是轰轰烈烈，生产越是冷冷清清。“革命”并没有发挥统率生产、指导生产的作用，反而代替了生产，冲击了生产。

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指导思想，贯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主线，企图通过大抓阶级斗争来带动经济的发展，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1974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着重强调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工作中仍然反复地、不断地批判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97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毫无根据地认为“走资派还在走”，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样，经济建设作为“其余”的内容之一，仍被置于从属的地位，随时可以受到阶级斗争这个“纲”的冲击。“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经济建设的结果，只能是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经济工作的严重冲击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经济工作受到全面的、持续的干扰和破坏。其中，1967~1968年、1974年、1976年是党的经济工作和国家经济发展遭受挫折最严重的时期。

一、“文革”对党的经济工作的全面冲击

作为一场波及党和国家全局的政治动荡，“文革”对党的经济工作的冲击是全面和深刻的，涉及到党的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组织机构、制度等方方面面。

（一）各级经济工作领导干部受到冲击

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也导致了它在方式方法上的根本错误。“文化大革命”提出要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向走资派夺权”，造成了全国性的长时间的混乱和破坏，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革”初期被卷人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领导的信赖，他们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林彪、江青一伙就是利用了这种极端错误的方法滥施淫威，致使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无辜受到诬陷和迫害。如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33人中，除了有3人去世外，遭到诬陷的达20人之多，约占总数的67%；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194人，除了有病和去世的31人之外，遭到诬陷、“靠边站”的就有96人，占总数的59%；仅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在“文革”中因冤案而死的就达到9804人。由于使用“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向走资派夺权”的方法开展运动，结果“走资派”的范围扩展到上自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班组长。总之，只要是沾了一点“权”的边的人，都是“当权派”，“当权派”就是“走资派”，都是夺权的对象，都要被打倒。

（二）经济管理机构陷入瘫痪

在夺权、武斗、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中，各级经济指挥与管理机构，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企业生产指挥系统，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改组，有的甚至被撤销。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被剥夺了从事正常领导工作的权力，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学者、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遭到打击迫害。大量长期积累的技术档案和统计资料被抢劫或被销毁，国家无法正常行使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本为主管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但由于“文革”开始后其机构受冲击

被打乱，工作基本上陷入停顿，工作一度无人负责。1967年9月，设立了国务院工交办事组，也只是为了研究应付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中急需调度的有关事宜。在全国来说，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工作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计划管理和经济管理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发展失去控制。

本来，第三个五年计划只有一个概略的纲要，但从1966年起还是开始付诸于实施。同年年底，也对196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作了安排，但由于局势混乱，无法层层召开会议布置下去，直到1967年2月下旬，除上海以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布置安排。1967年的形势发展已表明，这个计划根本无法贯彻执行。1968年甚至连年度计划都未能编制，成为建国以来惟一没有制订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年份。

（三）否定正确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曾经制定和实行了不少正确的方针政策，到“文革”前，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已得到比较正常的、迅速的发展。但是“文革”一开始，在“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狂风越刮越大，“大批判”的狂潮汹涌而来，在经济领域把我们党制定并行之有效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扣上“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管、卡、压”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错误的批判。

一是否定按照生产力的要求调整生产关系，鼓吹“穷过渡”。林彪、“四人帮”把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生产关系，如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在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等，统统诬蔑为“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要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同时，又鼓吹脱离生产力要求的“穷过渡”，不顾生产力水平低下，强行使集体所有制加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把农村生产小队核算单位提升为大队核算，再把大队核算提升为公社一级核算。

二是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原则，鼓吹“政治挂帅”。极左势力把提倡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都斥为“利润挂帅”，认为是以利润为目的，以利润为动力，以利润为中心，是要人们追逐利润，不要革命。他们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散布搞革命“可以停工停产”，“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等政治第一的极“左”观点。

三是否定物质利益原则，鼓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极“左”势力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贬为是搞“物质刺激”，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工人群众，“腐蚀工人阶级”，是“产生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鼓吹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四是否定对经济工作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鼓吹分散主义。极“左”势力把加强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必要集中统一领导诬为“条条专政”，“扼杀地方积极性”，鼓吹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

五是否定发展中外经济交往，鼓吹闭关自守。极“左”势力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说成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爬行主义”，鼓吹闭关

自守、盲目排外的蒙昧主义。

(四) 否定合理的经济管理制度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五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完备、比较合理的规章制度，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科技十四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它们都是对党的经济工作经验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规律，对保证国家经济决策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曾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合理的经济管理制度都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批判。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的批判。1967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的批判文章。该文认为，《工业七十条》关于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企业的根本任务是完成生产计划的规定，是"抹煞阶级斗争"，鼓吹"生产第一，政治第二"；关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总工程师对企业的技术工作负全部责任的规定，是"摆脱党的领导"，是"走资派篡夺企业领导权"，推行"专家治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关于强调按劳分配，企业有权选择工资奖励形式的规定，是鼓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提倡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强调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是推行"利润挂帅"，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要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认为是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是提倡"崇洋媚外"，推行"爬行主义"。总之，把《工业七十条》诬为"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要"批倒批臭"。

(五) 国民经济秩序完全失控

由于"文革"运动全面展开，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闹革命"，生产第一线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劳动纪律松散，加之武斗频繁，煤、电等能源生产下降，交通运输紧张，造成大批工矿企业停工停产或半停产。1967年初，全国60多座水泥窑停产13座，马鞍山钢铁厂有3座高炉、2座平炉停产。到7月份，全国钢铁厂中除本溪钢铁厂、太原钢铁厂外，其他钢铁企业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到11月份，全国32座大型高炉已有14座停产。内蒙林区也因武斗，木材无法外调。特别是由于交通运输紧张，煤炭供应困难，又影响到基础工业，祸及其他经济部门，一系列连锁反应使整个国民经济都难以正常运转。

总之，"文革"动乱把"左"倾错误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冲击了全国的经济工作，造成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派性等歪风邪气猖獗一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二、"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三次大挫折

（一）1967～1968年的第一次大挫折

1966年是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在前5年调整后的良好经济形势基础上，196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继续显示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比上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几乎所有的工业品技术经济指标，都创出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文革"的政治动乱打断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使生产指挥系统难以正常调度，各地业务部门受到冲击，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工业、交通运输业生产能力开始下降。

1967年年初，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夺权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武斗急剧扩张和升级。一直到1968年底，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运动的冲击下，国民经济全面衰退。首先是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306亿元，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又下降4.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都连续两年减产。第二，交通运输严重阻塞，货运量大幅度下降，使粮食、煤炭、石油、木材等重要物资的运输受到严重影响，给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困难。第三，基本建设和经济效益连续下降。1967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比1966年下降35.3%，1968年比1967年又下降17.6%；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两年。第四，国民收入连年减少，财政收支状况恶化。1967年国家财政收入为419.4亿元，比上年减少25%，并出现财政赤字22.5亿元，1968年国家财政收入比1967年又减少13.9%。第五，市场商品短缺，供应紧张，凭票凭证限量供应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第六，对外经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盲目排外的极左思潮盛行，导致引进的项目都无法实现合同规定，建成项目也不能正常生产，引进的机器设备长期闲置，损坏严重。

（二）1974年的第二次大挫折

1969年，随着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先后建立，夺权、武斗在大部分地区基本终止。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此后各项工作虽然仍在"左"倾方针指导下进行，但由于政治局势渐趋稳定，国民经济也开始出现恢复的形势。1969年全国生产状况逐渐好转，基本上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1970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已基本上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的主要指标。1971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四五"计划，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96%，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棉花外都有较大增长，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8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9%。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自取灭亡。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努力调整国民经济，使1972～1973年的经济持续发展，工农业总产值1972年比上年增长4.5%；1973年比1972年增长9.2%；1973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338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

68.7%，比1972年提高13%。1973年国家财政达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但是，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冲击了好转的经济工作。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别有用心地大批“周公”、“宰相”、“现代大儒”，含沙射影地把周恩来主持工作期间所实行的纠正“左”倾错误的政策和有效措施诬蔑为“复辟”、“倒退”。从中央到地方，不少老干部被诬蔑为“复辟势力代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又受到批斗、攻击，不能正常领导和组织生产。

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国民经济形势出现逆转和恶化：一是工农业生产下降，大部分产品生产未能完成国家计划。197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4007亿元，为计划的95.6%；主要工业产品除原油外都没有完成计划；主要农产品除粮食外，其他经济作物大部分也未能完成计划。二是交通运输严重堵塞，秩序混乱。1974年铁路货运量7.87亿吨，为计划的92%，比上年减少3.3%；津浦线、京广线、京包线、昆贵线经常堵塞，致使山西、河南的煤炭和其他物资不能及时外运，不少工厂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况。三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益低。1974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47.71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上年的68.7%降为63.4%，当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比计划少86个。四是商品短缺，市场供应紧张。1974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同零售商品的货源差额有18亿元，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五是财政收支状况恶化。1974年国家财政收入比1973年减少3.29%，并且出现赤字7.7亿元。

（三）1976年的第三次大挫折

1974年国民经济重新恶化的状况，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和四届人大进行组阁篡权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毛泽东于1974年10月4日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整顿，扭转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197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和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好水平。到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5%。国民经济摆脱了停滞倒退的局面，经济形势有了新的转机。

邓小平实行全面整顿的主张和措施，实质上是在比较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恢复党的行之有效的正确政策。这不仅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而且为毛泽东所不能容许。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认为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刮右倾翻案风。“四人帮”更是乘机诬蔑邓小平是“复辟资本主义”，向邓小平发起猛烈攻击。1975年底，一场由“四人帮”控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文革”期间的政治、经济形势第三次急转直下，使1975年刚刚有了明显好转的国民经济再次受到严重挫折。按原定的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总产值要比上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8.2%到9%，农业

生产总值增长4%。但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实际完成4536亿元，比计划少5.5%到6%。其中工业总产值3158亿元，比计划少7.1%到7.9%；农业生产总值1378亿元，比计划少1.4%。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都没有完成计划。铁路运输再一次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1976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总额达177亿元，比1965年增加了2倍。生产形势恶化导致财政枯竭，国库空虚，1976年财政赤字达29.6亿元。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的局面。

第三节　“文革”时期党内健康力量对经济工作的艰难维持

在“文革”十年期间，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为维护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限制“文革”运动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竭尽努力进行了正义的斗争。在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肆虐横行的情况下，他们无法从全局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毕竟在艰难的环境中使“文革”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使遭受严重损失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或某些方面取得宝贵的进展。

一、“文革”初期的“抓革命，促生产”

（一）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动乱的抵制

从1966年6月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为了维护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党内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各种方式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抵制。

1966年6月底，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担心运动会影响工业生产，特地写信给在南方的毛泽东，对生产下降、质量下降、事故增多、计划完成不好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2日发出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对工业生产和外贸方面出现下降及基本建设施工速度迟缓等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要求“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7月22日，中央又发出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指出，“文革”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地专级以上党政机关，在开展“文革”的单位，也要指定人员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抓科研，保证当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上述两个文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革”开展的范围，维持了生产建设部门及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但此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就失去了领导权，后来更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林彪在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号召“打倒一切”。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们纷纷冲出校门，使红卫兵运动由城市学校扩展到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对全国城乡生产建设带来了第二次大冲击。

时逢秋收、秋种、秋购的三秋大忙季节，为了防止事态蔓延和恶化，中央于9月14日连发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中央7月2日和22日两个通知仍然有效，并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或组织各级指挥机构，确保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各有关单位和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那些单位去串联，影响他们的生产和工作；已经开展“文革”的单位，要用业余时间搞运动，未开展“文革”的单位可推迟进行。9月份，中央还要求在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群众组织，不要再进行内外串联。

上述这些措施是在周恩来和新上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主持或坚持下采取的，起到了抵制“文革”开始以来对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第二次冲击的作用，保证了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维护了全国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的相对的稳定。

进入1967年，从上海开始的“一月风暴”迅速向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蔓延，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被冲击，被打倒，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在“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文革”运动从学校、机关、文化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以及一些部队单位，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使经济建设受到很大破坏。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进行抗争。1967年2月11日、16日，在两次政治局委员碰头会上，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由于这种抗争实际上是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又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这些老同志围攻。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全国的经济领导工作，实际上是周恩来等少数中央负责人在极度困难复杂的环境中勉力支撑。

（二）周恩来艰难维持经济秩序

在“文革”初期，随着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被打倒，历史把周恩来推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周恩来忍辱负重，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消除动乱。对于重大原则问题，他一方面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方面对林彪、江青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时，周恩来、陶铸力主使“抓革命、促生产”作为第14条写进《决定》。9月初，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协助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同志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时提出要求：“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革命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10月初，根据林彪的提议，中央批转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此后，全国很快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工农业生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此，周恩来极为焦虑，他一再对国务院有关同志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他特别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次日，这篇社论发表，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开宣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应当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涉入工农业生产领域的汹涌势头面前，这篇社论却敢于顶风而立，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

在“文革”初期，周恩来积极利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尽力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减少“文革”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

首先，尽量设法将“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周恩来在许多场合，对抓紧工农业生产和科研业务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他针对农业生产指出：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种也是“大事”之一。他针对工业战线指示说：现在工业方面已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计划难以完成，还要影响明年计划，影响整个“三五计划”的实现。他针对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业务状况，特别强调：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又要进行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要大抓“三大革命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是对科学院的最大考验。1967年，当“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严重冲击生产秩序时，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在2月和5月两次开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并于3月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各地迅速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特意强调，“不论需要不需要夺权或者已否夺权的地区，都应该这样做。”

其次，坚决反对借“革命”之名破坏生产建设的极“左”倾向。1967年6月，周恩来向国防科工委造反派严正指出：不能任“打、砸、抢、抄、抓”的歪风发展下去，这样做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顾大局的极左思潮。7月25日，他针对钢产量急剧

下降的情况，严厉批评鞍钢两派代表：你们两大派相互“压”的结果，不是把派性组织压垮了，而是把钢铁生产压垮了！随后，周恩来在许多场合强调：要反对极“左”倾向，其表现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不相信领导、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第三，强调“抓革命”的积极作用应体现在生产上，生产是检验一切革命的标准。1967年，正当“全面夺权”深入进行时，周恩来即向造反派指出：搞革命，就要使工作有起色。生产是检验我们各项工作成绩的最好标志；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6月下旬，在接见国家机关及出席全国订货会议代表时，周恩来说：愿做真正的革命派，就要“抓革命、促生产”，眼下首先要保证把订货会议开好。10月29日，周恩来在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期间更加明确地提出：空喊“革命”而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革命与业务要联系起来、结合起来。1968年2月2日，在接见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的代表时，周恩来再次强调：每个部门一定要把革命跟业务、跟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只抓“革命”，不管工作。

二、“九·一三”事件后的经济整顿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从而为周恩来能够在后来一段时间内着手纠正“文革”的错误、进行经济整顿创造了条件。

（一）批判极“左”思潮

“九·一三”事件之前，处境艰难的周恩来就一直在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减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不懈的努力。

“九·一三”事件以后，人们纷纷从思索中开始觉醒。周恩来抓住这一历史契机，把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自1971年底至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破坏党的经济工作的各种罪行。通过批判极“左”思潮，1972年经济工作的方针、任务、建设重点以及具体安排等，比前几年有了较大的改变：一是删除了“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等论点；二是强调发展农业、轻工业，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三线建设改为第三位；三是提出要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工业建设；四是要求下决心控制基建规模和职工人数；五是要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六是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要求把岗位责任制、考勤制、技术操作规程、经济核算制等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七是要求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周恩来特别强调对极“左”思潮要批透。他在1972年8月1日的讲话中指出：一些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在后来外交部召开的外事会议上，他再次强调，“极左思潮不批透，还会犯错误”。1972年8月，他在接见回国述职的大使时明确提出，要批判林彪鼓吹的“空头政治”，政治挂帅一定要挂在业务上，各级领导干部要打消顾虑，理直气壮地抓业务、抓生产、抓管理。为了肃清

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影响，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国家计委于1973年2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强调要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基本建设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要控制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加强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管理；集中物资分配调度的权力，建立企业统一生产指挥系统；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政治和业务的统一；管好大中型企业，坚持按劳分配等。这个文件虽然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没有正式发下去，但它还是对恢复生产秩序，加强经济计划、企业管理，以及发挥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解决“三个突破”问题

在“九·一三”事件以前，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计划追求高指标，再力口上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从而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三个突破”问题。

“三个突破”是指：1971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4000万吨。而1971年的计划数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4850万人，工资总额296亿元，粮食销售量3870万吨。三项指标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实际达到：职工人数5318万人，工资总额302亿元，粮食销售量4275万吨。“三个突破”的主要原因，从浅层次看，是1970年以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从深层次分析，则与当时强调“以备战为纲”，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的指导思想有因果关系。高指标和高积累不仅影响了城乡人民生活，也带来了国家财力、物力的进一步紧张。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加上地方工业盲目发展，造成了职工人数急剧增多，使得工资支出总额和粮食销售量控制不住，相继而来的是货币发行量的突破。

“三个突破”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首先，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减少了农业劳动力，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其次，短期内大量增加新职工，导致职工整体素质下降。其三，职工人数大量增加，既导致了工资总额的增长，超计划发行货币，又加剧了粮食供应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其四，加剧了农、轻、重比例的进一步失调。

“九·一三”事件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从1972年至1973年，采取了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第一，控制基本建设规模。1972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18.36亿元，并适当调整了投资结构，增加了农业投资，减少了重工业投资和国防工业投资。第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的通知》，强调劳动工资管理权限在中央，要求各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都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核定。第三，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主要采取如下措施：（1）大力发展粮食生产。（2）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的供应。（3）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4）在丰收地区多购一些粮食，以丰补歉。（5）核减不合理的粮食销量，争取购销平衡。第四，调整“四五”计划纲要，降低计划指标。主要内容是：（1）大力加强农业，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的投资。（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73年大中型建设项目比上年减少280个。（3）压缩国防和行政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2年的

25.2%降低到4%。(4)精简职工，把1972年超过国家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争取减下500万人。(5)改变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调整“四五”计划指标。

经过两年的努力，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个突破”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市场供应情况有所好转。这些都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整顿企业管理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针对全国的企业管理混乱的状况，提出要整顿企业，加强管理，重视产品质量，重视发挥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七项制度，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经济核算制；规定企业要抓七项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指标。虽然这个文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周恩来还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管理混乱的局面。1971年12月，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4、5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像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通过大力整顿，使许多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改进。

1972年10月，国务院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会议拟订的整顿企业管理、扭亏增盈的措施有：(1)加强经济核算，搞好清产核资，健全企业管理的各项制度，加强成本管理。(2)确定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资金数额、原材料来源和协作关系，落实企业的生产计划。(3)改进国家对企业亏损的管理制度，对亏损企业实行计划补贴、逐级负责、限期扭转的办法。(4)严格财经纪律，对违反财经纪律和工作严重失职使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以至刑事处分。

通过上述整顿，企业管理工作得到加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1973年5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5种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工业企业上缴利税346.4亿元，比上年增加18.6亿元；工业产品质量也有所提高；全民所有制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3.3%。

（四）调整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党在农村的正确政策。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造成很多地方单打一地发展粮食生产。全国农村普遍存在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开始着手纠正农村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业六十条》仍然有效，要求各地必须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要生搬硬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简便易行的劳动计酬办法。《指示》强调，社队办集体福利事业，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许任意增加脱产人员。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

1973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党的经济工作的罪行，特别是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等等。这对刹住农村“穷过渡”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和经济整顿的重要意义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经济整顿，从根本上说是党内健康力量长期以来不断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可以说，从“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到“文革”中的“打倒一切”，从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一大二公”的“左”的指导思想到各个领域里极“左”思潮泛滥，其核心都是一个“左”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并付诸经济整顿实践，具有深刻的重要意义。

首先，这是“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集体纠“左”的继续和发展。例如，“三个突破”问题固然与“文革”中林彪一伙的恶劣影响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严重偏差，即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这种偏差，正是“文革”前党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未予根本纠正的结果。自 60 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曾是党中央集体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差的成功之举。70 年代初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解决“三个突破”，则是党内健康力量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再次努力，是“文革”前党中央集体纠“左”的继续和发展。

其次，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继续和发展。1966 年“文革”爆发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分别采取多种方式，力图将这场运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尽可能减少“文革”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在这些努力失败不久，1967 年 2 月叶剑英、谭震林等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又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周恩来以“九·一三”事件为契机，领导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向极“左”思潮展开了深入的批判和斗争，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文革”以来，老一辈革命家坚持恢复党的领导、保护广大老干部的这种强烈的愿望，成为 1967 年 2 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

第三，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对经济工作实行有效领导的一个开端。自“文革”一开始，“革命”就与生产发生尖锐冲突，“革命”破坏生产的情况日益严重。尽管中央多次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严重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只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煽起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进而彻底改变经济工作混乱的局面。这也是党内健康力量与

林彪、江青集团反复斗争的一个焦点。1971年底以来，经过批判极“左”思潮和经济整顿，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国家开始建立起较为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这也是“文革”中首次进行的大规模“抓生产”之举，是党对经济工作实行有效领导的一个开端。

第四，党内健康力量在斗争中得以发展壮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集体已基本失去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能力，林彪、江青集团更加为所欲为，到处伸手扩张势力，党内健康力量被严重削弱。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后又有邓小平）等主持党政军工作。这表明党内健康力量正逐步将党政军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后来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保证。周恩来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大力推荐了相当一批党政军重要领导骨干出来工作，从而使他在1974年病重住院之后，能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内健康力量，继续进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第五，为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对“文革”前17年各条战线的工作都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周恩来对于17年各项工作成绩的肯定，无疑是对“文革”发动论点的否定。这就为重新调整党的各项政策，恢复被“文革”否定的前17年的正常工作和合理规章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应当说，从1972年的初步整顿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都是以此为基本依据的。

第六，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方式方法。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纵观全局，采取了为当时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式方法。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再如，周恩来首先从经济领域入手批判极左思潮，联系实际解决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问题，也是一条重要经验。这些方式方法成为后来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全面整顿的重要借鉴，使全面整顿取得巨大成效。

三、1975年邓小平领导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

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和经济整顿，并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发展出现转机，但毛泽东仍然要坚持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提出当时的任务仍是反右。江青集团乘机大反右倾回潮，并借“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周恩来，致使已趋向稳定的形势又急剧恶化，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逆转和挫折。这种状况，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对江青之流借“批林批孔”进行反周篡权活动进行了严厉批评。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整顿。

（一）全面整顿的决策

1975年1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2月份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延续8年，“四人帮”仍在兴风作浪，国家仍动乱不

休，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邓小平不避艰险，力挽狂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决然地从大抓整顿入手来扭转局势。在当时还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邓小平根据四届全国人大确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毛泽东的正确指示，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1975年的整顿，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决策。因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惟有贯彻执行这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8年“文革”以后的混乱局面。从另一方面看，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是“四人帮”。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整顿工作，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四人帮”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

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的混乱局面，从1975年2月到10月，邓小平先后主持召开了解决全国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他在这些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全面整顿”的决策思想。其主要原则是：第一，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实行全面整顿。第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第四，科研和教育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列。第五，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反对闭关自守。

（二）抓薄弱环节，整顿铁路交通秩序

全面整顿首先是从铁路开始的。在“文革”中，铁路运输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自“批林批孔”以来，徐州、郑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运输堵塞，严重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大干线的通畅。1975年2月，全国铁路日装车数与实际需要相差1.2万车。

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问题不解决，必将影响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为此，1975年2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会上邓小平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薄弱的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包括三条方针：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他强调，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的新头头再调离。

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赴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重点整顿。经过一二个月的整顿，起到了显著效果。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路段全部疏通，全国20多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数达到5.4万车，创历史最高水平，煤炭日装车达到1.8万车，是5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全国铁路货运量由上年的下降5.3%变为增长12.7%。问题最严重的徐州铁路局21个月没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国家计划。全国铁路系统整顿所取得的成效不仅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同时为其他工业

部门的整顿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整顿钢铁生产秩序

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全国钢铁生产形势一片混乱。1974 年钢产量比 1973 年减少 410 万吨，1975 年前 4 个月，全国钢铁欠产 195 万吨。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铁路整顿告一段落后，邓小平立即着手进行钢铁工业的整顿工作。5 月 8 日至 29 日，中央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 4 条办法：(1) 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2) 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3) 必须认真落实政策，要特别注意把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 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6 月 4 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冶金部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报告要求：加强各级党委对钢铁工业的一元化领导，抓好关系到全局的重点企业；采取坚决措施，整顿那些问题多的重点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表彰先进，树立正气；加强企业管理，整顿企业秩序，同各种破坏企业生产秩序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冶金工业部要帮助各地党委抓好重点企业，国务院应立即充实和加强冶金工业部的领导班子。经过近 1 个月的整顿，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太钢等企业逐步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 7.24 万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量。

（四）整顿工业和农业

在抓好铁路运输和钢铁生产的同时，邓小平还抓了工业生产的全面整顿。7 月 17 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国务院要求在首先把钢铁生产抓上去，继续抓好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同时，要坚持“不挤不让”的原则，抓好轻工市场；不要拼设备，要注意安全生产，关心群众生活；加快重点基建工程的进度；坚持计划用电，节约用电，降低原料、燃料消耗；搞好综合平衡，有计划地控制长线产品的生产；切实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从 7 月中旬起，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这个文件从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统一计划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这个文件，是继 1961 年《工业七十条》之后再一次系统总结党领导工业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试图系统地纠正工业战线“左”倾错误的重要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工业二十条》未能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但是，通过各种范围的讨论，仍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推动整个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业生产呈上升趋势，自 1975 年 3 月以来，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许多产品产量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

在对工业整顿的同时，也对农业进行了整顿。由于“文革”期间农业生产遭到很大

破坏，发展缓慢，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农业要整顿的正确主张。1975年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强调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农业“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会后，全国抽调百万名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为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文件，重申积极发展集体养猪，鼓励社员家庭养猪方针，强调不能把社员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批判。通过这些整顿措施，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五）对科技、教育的整顿

科技、教育界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重灾区，许多知识分子被歧视、打击甚至当作专政对象，科研和技术工作普遍处于瘫痪状态，教育秩序十分混乱，教师靠边站，学生厌学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些状况，同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求极不相适应。

在科技整顿中，中央选择中国科学院为突破口，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耀邦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坚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经过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9月26日，胡耀邦向国务院作汇报时，整理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其中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重申党的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政策，比较系统地清理“左”的错误。邓小平充分肯定这个《汇报提纲》，他指出：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对有水平的人要爱护和赞扬，发挥其作用；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技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汇报提纲》许多指导性的正确意见，在全国知识界广为传播，对科技教育工作的整顿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教育整顿方面，邓小平强调，要使科技事业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人科技大学，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教育部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座谈会、教师座谈会、汇报会，积极着手教育领域的整顿工作。整顿中批判了“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错误，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积极落实选取数理化好的高中生人科技大学。通过整顿，调动了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也普遍提高。

（六）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功绩

邓小平领导的国民经济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从而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邓小平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紧紧依靠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看准时机，有力地解决问题，在较短时间内使全面整顿获得可喜的成果。不仅促使当时的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而且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第一，全面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由于邓小平实行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四人

帮”的反对，同时也为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所不能容许。尽管全面整顿最后夭折于1975年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已成为“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的前导，从思想和组织等方面为之做了重要准备。

第二，全面整顿是改革开放的尝试。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比较快的发展道路。1975年的整顿就是这种改革的尝试。邓小平回顾：“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第三，全面整顿中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探索。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本身就是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产物，包含了反思和探索。邓小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酝酿。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

第四，全面整顿体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一系列讲话和思想，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和巧妙灵活的领导艺术。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使1975年的全面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的气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革”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的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革”前10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60年代前期整顿、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指导整顿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成了形成邓小平理论的起点，这恰好反映出了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同时又是发展者。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方式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经济工作方面未能遵循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仍然热衷于用群众运动来搞建设，力图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而使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方式打上了“左”的烙印，并在实践中受到挫折。

一、以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建设

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全国扩展。毛泽东希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以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建设就成为“文革”时期经济领域的主导方针。

（一）突出政治、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政治的内涵本来是十分丰富的，但毛泽东晚年却认为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都不可能搞好。”在“文革”期间他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样一来，政治就成了向“走资派”夺权，成了可以冲击生产的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最早的舆论就是从宣传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一切开始的。1966年1月1日，中共中央期刊《红旗》杂志发表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社论指出，突出政治，就要在各条战线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政治要统帅经济，而不是经济统帅政治。1966年1月，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观点。他还强调，突出政治“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提出来的根本措施。”于是，全国经济工作的一切领域都无不打上“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的烙印。

在“文革”期间，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宣传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当时虽然也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革命、政治永远是第一，是首要的，是根本性的；而经济、业务则永远处于服从、次要的地位。因此，经济建设不断遭到冲击，经济理论的研究几乎不复存在，也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现象。

（二）“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造反有理”的口号风靡一时，全国的社会和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以至后来发展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天下大乱”。毛泽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出发，自“文革”一开始就对社会严重混乱状况采取肯定态度，认为这表现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湖北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天下大乱，达

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毛泽东认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十分相信"文化大革命"这个形式："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他认为党内的黑暗面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要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再一次论述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认为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但是，事实上，"天下大乱"始终没有达到"天下大治"。其根本原因是违反了中国的国情，这种大乱并没有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这场政治运动并没有推动经济建设，而是破坏了经济建设。同时，"天下大乱"又为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条件。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旗号，骗取毛泽东的信任，组织反党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这样，不仅"天下大乱"达不到"天下大治"，而且更加剧了"天下大乱"。十年动乱导致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就是历史的证明。

二、盲目的经济管理体制变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左"的错误和政治动乱的影响及干扰下，受到很大冲击和破坏。1970年后，又经历了一场以向地方盲目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变动。

（一）下放大量企事业管理权限

1961年，为适应经济调整的需要，国家曾采取了一些强化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随着调整任务的完成和经济形势的好转，有些方面开始考虑下放权力，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文革"初期，由于全国一片混乱，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不得不搁置了一段时间。1970年由于两个因素，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再度提上了日程。一是提出"以战备为纲"。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根据战备需要，全国划为十个协作区，建立自成体系、各自为战的工业体系，这就需要给地方下放更多的权力。二是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再度抬头。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党内一些人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滋长起来，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认为要实现大上快上，必须给地方放权。

1970年，一场以向地方放权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变动在全国展开，主要内容是下放中央各部委对企业的管理权限，试行基本建设、物资分配、财政收支大包干。国务院于3月5日拟定了《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部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部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门为主；正在施工的各直属基本建设项目也按此精神下放地方管理。下放工作要

求在年内完成。

根据《通知》要求，在很短时间内，包括鞍山钢铁公司、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等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统统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还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在工交企业下放的同时，商业部门把所属一级批发站全下放给省，省属二级批发站则下放给专区。外贸部所属企业也实行了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下放后的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由10533个减少至1674个，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原来的42.2%降到6%。

针对调整时期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的状况，适当下放一部分企业归地方管理是必要的，但这次下放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导致了诸多问题。一是不加区别盲目放权，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下放了，实际上地方管不了，仍得由中央代管，造成多头多层管理，人、财、物、计划各环节相互脱节，降低了企业管理效率。二是下放过猛过急，组织工作跟不上，原有的协作关系打破了，新的协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使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在1971年、1972年再度下降。

（二）实行财政、物资和基建投资大包干

随着企业下放，为了扩大地方权力，实行了财政、物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

财政收支大包干就是在国家统一预算下，对省、市、自治区试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或者全额分成、收入留成的方法。其目的是试图以大包干为原则，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体制虽然扩大了地方财权，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分配吃大锅饭的问题，同时还在某些方面造成财力分散，增加了国家财政预算平衡的困难。

物资分配大包干，即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实行大包干后，一方面调整和减少了国家统一分配和中央各部管理的物资种类，另一方面将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工作移交地方管理。中央统一分配的物资，从1966年的579种减少到1971年的217种，减少60%以上。这种包干办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在物资平衡、分配、供应方面的机动权力。但是由于管理分散，也给地区间物资调度带来一定困难，物资紧缺时，往往不能保证必要的调出，影响了重点生产建设任务的需要。尤其是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和管理体制相互脱节，更造成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基建投资大包干，即按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其投资、设备、材料都由地方统筹安排，调剂使用。地方投资权的扩大，促进了地方小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行业规划和强有力的计划指导，这些地方小工业有些办得合理，也有相当多的带有盲目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

（三）简化税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

"文革"否定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经济杠杆的作用遭到限制和排斥。这样，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税收制度、银行信贷管理制度以及劳动工资制度都被尽量予以简化。

建国初期，中国采用的是复税制，即同时课征两种以上的税收制度。1970 年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改变国营企业的工商税收制度，一个行业一般按一个税率征收。1972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决定合并税种，简化税目、税率，并把一部分税收管理权下放地方。这样，就大大削弱了税收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简化信贷制度主要是合并机构，下放权力，改变信贷方式，简化利率种类，调整利率水平等。调整后，城镇集体经济和国营企业实行统一利率。贷款存款利率分别降低了 3%和 2%。与此同时，一些优待利率也取消了。这样，利息的调节作用被进一步削弱了。

简化劳动工资制度主要是使企业用工形式趋向单一化。1971 年国务院决定把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大批转为固定王，使临时工在职工总额中的比重由 1976 年前的 11.2% ~ 14%降到 6%，强化了单一的固定工制度。这种变化，实际上助长了“铁饭碗”思想，也增加了国家安排劳动就业的压力，1970 ~ 1972 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增加了 1200 多万人，是建国以来第二次职工人数的大突破。

三、群众运动式的农业学大寨

（一）大寨经验的演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农村经济建设是与“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大寨大队地处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东南海拔 1000 多米的山区，是农村合作化以后涌现出来的一个山区建设的先进典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大寨人凭着镢头和箩筐，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平整田面，改良土壤，使粮食亩产量由 1952 年的 237 斤逐步提高到 774 斤。1963 年 8 月，大寨大队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社员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抗灾夺丰收的胜利。1964 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同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总结了大寨的三条基本经验：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各地农村因地制宜，努力改善生产条件，起到了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大寨这面旗帜和“农业学大寨”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作为在农村推广“左”倾政策的工具，使农业学大寨运动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大寨大队和所在的县、地、省的某些负责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否定了大寨原先的经验，认为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主要问题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二是不适当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三是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四是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在“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已不是一般的学先进的生产运动，成了用强

制手段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的根本经验变为“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各地都以大寨一套“左”的做法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因而产生了许多错误。对农村经济造成极大的干扰和破坏。

（二）“以粮为纲”的片面发展方针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这是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但在“文革”期间，多种经营遭到扼杀，粮食生产被突出到不恰当的位置。大寨在生产中片面追求“以粮为纲”，不注意发展多种经营，而且还借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限制多种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基本上就成为粮食生产，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既不能大规模地转移到搞经济作物，转移到林、牧、渔业，转移到社队工、副业上去，又不能自由流入城市。这使单位耕地负载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平均每亩耕地上所投入的劳动力人数，1966 年为 0.13 人，1976 年为 0.16 人。另据统计，在“以粮为纲”方针的指导下，发展农业生产大多放在增加粮食产量上。1966 年，全国粮食产量为 21400 万吨，棉花为 233.7 万吨，油料为 386.4 万吨。1976 年这三项的产量分别为 28631 万吨、205.5 万吨和 400.8 万吨。除了粮食产量增长较快外，油料产量增长缓慢，棉花产量则下降了 12%。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 69.3%，林牧副渔业仅占 30.7%；在种植业产值中，粮食作物占 70%，其他经济作物仅占 30%。这就使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

（三）违背自然规律的战天斗地

大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曾有三战狼窝掌、人造平原地的壮举，兴修的一些水利工程也确实发挥了抗旱保丰收的功效。但到后来，则把这种经验绝对化、极端化，搞“拼死拼活”的疲劳战术，甚至提出“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和大自然作斗争，就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一样，要有胆量和勇气”。在这种思路的鼓动下，他们不顾可能性，不惜投入，非要围河造地，开山造田，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情况、耕作习惯有很大差别。大寨大队生产上的一些具体作法，在一些地方被不切实际地照搬，出现了围湖造田、垦草造田、劈山造田、毁林造田等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豪迈”壮举。比如为了学习大寨炸平山头造平原的做法，素有“千湖之乡”的湖北省，原有千亩以上的湖泊 1065 个，被围掉 1/2 左右，致使水面减少了 3/4。陕西省镇巴县原来森林覆盖率达到 60% 以上，林茂粮丰，毁林开荒后，不仅林产品产量下降，而且水、旱、雹灾频至，全县粮食产量锐减。内蒙古伊克昭盟开垦草原后，草原沙化，风沙南侵，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盲目学大寨的结果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损失惨重，浪费巨大。

（四）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文革”期间，大寨大队的劳动计酬制度被当作惟一正确的社员收入分配模式在全国推广。其具体作法是“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平时由记工员登记社员出勤天数，年终结算时，先确定出劳动力的标准工分，然后召开社员大会，先由社员自报，再民主评议，最后审查公布。劳动者获得的工分，只与劳动能力和出勤天数联系，不反映在生产

过程中的实际劳动支出；工分等级差别小，固定不变，社员间工分差别不大，所得实际收入大体是平均的。此外，还将社员个人的思想觉悟作为评定工分的依据，又使社员的工分同劳动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脱钩。大寨式记工法的特点在于平均主义，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却被赋予"巩固集体经济"、"防止两极分化"的特殊含义。

（五）推进"左"的农村经济政策

大寨在"文革"期间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导致一些"左"的政策在农村盛行。他们认为：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和"单干倾向"，必须割掉卡死，不准农民搞编织、采集、家庭饲养（每户只准养一猪、一羊、一鸡、一兔）；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泛滥"，是"黑市"，必须要"管紧、管严、管死"。他们还借"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批判"以钱为纲"，限制社队搞副业生产。这些"左"的政策在农村实行，实际上是堵住了广大农民由穷变富的路，堵塞了城乡交流，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造成一些干部主观蛮干瞎指挥，引申出许多错误的过火行动。

在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问题上，大寨认为核算单位"大比小先进"，"大比小革命"，盲目地强调积极过渡，实际搞了"穷过渡"。"文革"初期，昔阳就在全县实行了大队核算，后来又在大寨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大寨的代表人物还想搞全县的全民所有制，他把这种做法叫做"穷过渡，富还债"。到 1977 年，晋中地区大队核算的单位达到 71%。同年 10 月，全国有 7.7%的大队实行大队核算，并决定再选 10%左右先行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农村生产队为了避免或减少公社或大队平调其资财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纷纷杀猪砍树，吃光分净储备粮和公积金，使集体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和破坏。一些地方核算单位扩大后，人为地拉平了原各核算单位的收入分配水平，无偿地剥夺了部分农民的劳动果实，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军事化的"三线"建设

（一）"三线"建设的意义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南大门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在中印边境，自 1962 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之后，双方互存戒备，战争状态尚未解除。在东南沿海一带，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在中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苏联陈兵几十万，气氛也很紧张。面对这些现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威胁在增大，为了国家的安全，作出了进行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的决策，并把"三线"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自此，开始了 10 多年的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为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二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

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省区腹地为“小三线”。

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要立即进行勘察设计；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不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

“三线”建设于1965年开始，1966年大规模展开，它对于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基本建成了战略后方的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通过建设，“三线”地区已能成批生产各种常规武器装备、配套车辆、多种型号的军用飞机和大型运输机、国内支线客机，战略武器的研制、生产和试验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为大西南和大西北战略性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为抵御外部战争威胁做了必要准备。这对于增强中国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创造一个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有重要的长远的作用。1991年4月江泽民视察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指出：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进一步的认识。

第二，显著地改善了中国工业布局，使之逐步趋向合理。旧中国留下的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资源与生产相互脱节、生产与需要发生背离的严重局面，经过“三线”建设，有了显著改善，中国工业布局得以在较大规模上展开，很快建成了一批重要项目，还建成了一些新的工业中心。

第三，推动了内地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明显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三线”地区地处中国腹地，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运输不畅，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从1964年以来，国家在这些地区集中投资，建成了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交通邮电项目，形成了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中心的专业化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点的新兴工业城市，基本建成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等5条铁路干线，形成了西南地区新的交通骨干网络，为该地区矿产资源的初步开发和工业布局的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繁荣，形成了一批以工矿企业为主的中心城镇，使一些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落后面貌。

（二）“三线”建设的代价

由于“三线”建设的时期与“文化大革命”基本同步，在当时国防形势恶化、“左”的指导思想极度膨胀，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复杂环境中，“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脱离国情、国力，急切而又过分突出地进行的问题，使此期间的经济建设转向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轨道，当时的经济计划实质上成了备战计划，经济布局实质上成了军事布局。在这种背景下，“三线”建设规模越铺越大，战线越拉越长，以至超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诸多影响。可以说，“三线”建设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本建设投资效益为代价的。

其一，1967年—197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通过提高积累率、紧缩人民生活来实现的。1967年～1976年的平均积累率为30.1%，最高的1971年达到34.1%。积累率高势必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二，1967年～1976年是中国基本建设投资的一个高潮时期，但“三线”建设过分突出战备的因素，忽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投资效益低下，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三线”工程的有些项目，不讲资源的合理运用，不顾产业结构配置是否合理，取消基建审核程序和成本核算，加上“靠山、分散、隐蔽”的错误布局方针，导致一些现代化企业远离城市，远离交通要道，分散在深山沟里，生产协作与管理都十分不便。“文革”10年间，投资效益大幅度下降，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59.6%，大大低于“文革”前的80.7%。

（三）“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

由于“三线”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要求过急，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短期不易解决甚至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一是由于急促上马，隐患较多。当时各级“三线”建设指挥机构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仓促上马，全面铺开。有些项目甚至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以至有的工程建在断裂带上，有的建在溶洞和煤矿采空区上，有的建在河滩上，建成投产后，经常受到洪水、塌方、泥石流的侵袭，损失严重，浪费惊人。为了追求速度，有些工程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施工中又不能遵循科学规范的要求，严重忽视质量，致使工程建成后，遗留问题甚多。

二是投资比例不协调，影响老工业基地的更新改造。由于强调“三线”建设，当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把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摆在突出的位置。10年累计重工业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49.9%，交通投资占17%。这些投资集中于西南、西北经济落后地区，回收期长、效益低，造成了国民经济全局一定程度的被动。由于沿海地区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安排，原有的工业基地得不到更新改造投资，导致“文革”结束后，一些沿海老工业基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影响了其工业基础作用的充分发挥，沿海港口的建设亦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三是由于盲目追求自成体系，带来诸多问题。很多“三线”企业为了独立生存，不得不搞“大而全”、“小而全”，拿出资金建设商店、学校、医院、及一些文化设施，自成体系，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使用，重复建设，降低了资金使用率，增加了成本。同时，由于管理不善，组织工作、服务工作又跟不上，职工生活存在困难，职工亦不能安心工作。这些遗留问题，有的长期没有妥善解决。

第五节　“文革”时期经济工作的深刻教训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内“左”的主体错误的发展，使党的经济工作处于“左”的指导思想之下，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遭到严重挫折，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个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严重偏离了党的宗旨，损害了党的先进性，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一、“左”的主体错误下难以保证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

“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这一个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作重点——经济建设，就难以得到保证，取而代之的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基本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

从“文化大革命”深刻的教训中，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但早已结束了反动阶级的统治，而且已经结束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政治和社会前提已经具备。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产品，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有效地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也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二、教条主义制约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把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是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文化大革命”前后，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中，提倡“立竿见影”、“走捷径”，提出所谓“三十字方针”，实际上是鼓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把学习运动引向歧途。“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批“唯生产力论”、否定按劳分配、否定商品经济等，都

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成发展的基本设想，是以建立在有较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为前提的。由于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自身所需要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这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但是，在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所以，在制定政策时，往往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调阶级斗争、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过早地提出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都是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表现，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因此，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彻底摈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用于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

三、社会动荡情况下难以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正确地估计和把握国内形势，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政治上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上的正常发展。像"文革"那样，夸大阶级斗争的形势，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全局性的阶级对立，一切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国家整体处在阶级斗争之中，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社会动乱此起彼伏，就不可能从时间上和空间上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不可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即使有再好的愿望也要落空，再好的计划、方案也无法实施。"天下大乱"只能乱了自己，政治冲击一切首先冲击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以，国内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还应该对国际形势有正确地估计和把握。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和成效同国际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能正确估计和把握国际形势，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动荡。当20世纪60年代前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紧张情况时，毛泽东过于严重地估计了战争的危险性，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从而把备战放在了第一位，并且把经济建设的安排纳入备战的体制。这种由于对国际形势估计的偏差所导致的经济建设方针上的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国防为主的内地建设中，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追求高指标的毛病一犯再犯，许多项目仓促上马，互不配套、不讲质量、粗制滥造的现象普遍发生，资金、动

力、原材料和人员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十分低下。又由于内地基本建设上得过猛，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遗留下不少严重问题。

当今世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互相支持，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扩张，完全有可能推迟乃至制止战争。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不能片面地夸大战争的危险，干扰经济建设。

四、闭关锁国只能导致经济落后

10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内乱，必然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再加上“四人帮”一伙把一切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都视为资本主义，因此，当时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基本上遭到否定排斥，给开展国际经济交往造成了严重障碍。1966～1971年，中国对外贸易下降。从1972年起，由于“三线”建设的需要，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另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缓和并走向正常化，从而使技术引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讲，“文革”时期，中国经济是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是远离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而孤立运行的。这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做法，使中国失去了利用国际分工条件参与国际经济交流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大好机会，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应该吸取的一条深刻教训。

五、自给自足只能导致封闭、倒退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设计的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鼓励和提倡自给自足，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向地方下放企业管理权限、建立战备协作区、发展地方“五小”企业等方式，促使地方实现自给自足。这实际上是违反了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的原则，违反了商品经济的规律。特别是采取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方法，不恰当地强调地方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既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也不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大变动，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不是着眼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相反，结果造成了这次改革在方式、方法、步骤方面一系列不利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如盲目下放权力，既削弱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权，又助长了地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乱和散；部分物资划归地方管理以后，在建立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政策鼓励下，地方政府对完成国家调拨指标的态度消极，不愿按国拨价把物资转给外地；实行中央和地方之间收入分成措施后，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大量发展创利高的企业，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税收权限下放以后，地方税务部门为了扶持本地经济，随意减免税收，加重了国家

财政困难。这样一来，地方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形成了封闭式的地方经济，加剧了国民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企业经济效益下降，1976 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 1965 年的一半，亏损企业占 1/3 以上，亏损额高达 73 亿元。

可见，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违反了商品经济发展规律，违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起不到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造成重复建设的极大浪费，影响经济秩序，导致封闭和倒退。这也是“文革”期间经济工作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六、党对经济工作一元化领导方式的失误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得各级党委和行政机构都陷入瘫痪。从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开始，经过 20 个月的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全国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是实行“军、千、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数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邓小平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党通过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在经济工作方面出现了许多瞎指挥等现象，结果是干扰和破坏了经济建设。党对经济工作一元化领导的方式，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必须坚决改变这种体制，实行党政分工，党不能包办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和生产指挥工作，才能使国民经济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的经济工作和国家经济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虽然这期间国民经济有若干进展，但这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斗争得来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成就要大得多。在这十年中，党和国家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所在。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地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教训，继续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第八章　转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探索的启动

任何一次历史灾难，都是由巨大的历史进步来补偿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1977、1978年两年的徘徊，自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系统地纠正全党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探索，又一次构成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探索是在全面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涉及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道路、经济运行机制、对外开放等诸多重大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探索又是主动、全面的探索。

1977～1991年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1977、1978两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民经济开始迅速恢复，但是中国共产党未能全面清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与决策又出现新的失误。1979～1984年为第二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新起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起步。1984～1988年为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最大成果。1988～1991年为第四阶段。在“治理整顿”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实践中面临严重的困境，在理论上遭遇诸多难题的困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与探索处在不进则退的临界点上，处在前进方向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第一节　经济理论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与探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是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理论的探索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重新得以确立，经济理论上也开始拨乱反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经济理论上开始拨乱反正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实践方面出现的“左”的错误主要源于经济理论上的错误。为了将经济工作纳入正确的轨道，就必须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在经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

（一）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为经济工作的展开创造了政治条件

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长期无法走上正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探索不断遭受挫折。“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带到了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政治障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急切盼望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中共中央也顺应民心，采取了许多结束混乱局面的措施。1977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运动。围绕这一运动，着重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在组织上，清除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盘踞在中央各部门、地方的各级经济领导部门和企业中的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领导权，平反昭雪他们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使许多在极“左”路线下遭受迫害的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恢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久经考验和经验丰富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职务，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指挥系统和领导系统得到重建和加强。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作出拨乱反正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这样，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逐渐得以恢复，为党的经济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经济工作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不久，面对党内外纷纷提出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错误的强烈要求，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严重妨碍着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进程，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抵制和斗争。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力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

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还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等人也公开发表文章，强调了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性。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以及有关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为真理标准讨论准备了思想条件。

1977年8～10月间，少数思想较活跃的理论工作者已经逐渐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发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正式拉开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这场讨论获得了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从1978年8月初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军队其他各大单位，或以集体名义，或以主要领导个人名义，纷纷表态，表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各级党校和理论研究单位也纷纷组织和开展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以此为标志，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普及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垮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转变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思想条件。

（三）开始经济理论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虽然在政治上恢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但是进入1977年时，国民经济总体形势相当严峻，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恢复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与规章制度，1977～1978年两年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但是，由于党未能全面清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经济工作又出现新的失误。首先是脱离国情，继续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在1977年8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切实际地把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规定为新时期的总任务。在实践中不断强调加快建设速度，追加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国外引进规模。其次是在经济工作中继续推行“左”的政策，这突出地表现在农业方面，不少地区继续推行“左”的农业政策。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鼓动蛮干，不讲实效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另一条是继续推行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推行“穷过渡”。

1977年和1978年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坚持“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已有长期的历史，它有巨大的行

为惯性。其次，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群众从长期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1977～1978年国民经济恢复较快，有一部分干部对于顺利发展的一面看得较多，而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矛盾估计不足。助长“左”的思想继续发展。最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不仅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而且在经济建设的决策上急于求成，盲目地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不能实现的高指标。

1977年和1978年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决策失误再一次证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党的经济工作，需要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转变，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展开对“四人帮”极“左”经济理论观点的系统批判，澄清了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来面目。这不仅对1977、1978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为实现中国经济历史性转折准备了理论前提。

二、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工作的转移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又适时地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策性意见。

华国锋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作了一定的贡献。他虽然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与实践，但面对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他关心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其他领导人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因而，在怎样发展生产、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问题上又与他人并不一致。他想在不改变“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而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同志，则认为必须先清理“左”的错误，才能实现工作重点的真正转移。

1978年9月，为实现历史性根本性转变，邓小平适时地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策性意见，当时党内许多老同志对“以经济工作为重点”普遍表示支持。同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会议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作了三点分析：第一，两年多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接近结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初步实现。第二，广大人民面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以及同经济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我们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第三，复杂的国际形势，也要求我们通过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来增强国力，以应付不测事件的可能发生。正是因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全党就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指出，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性决策，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经济政策。一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从党的“八大”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才真正开始得以顺利转移。

三、提出科学定位中国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了正确轨道，如何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必须弄清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1979 年 9 月，在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叶剑英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它不成熟，不完善”。1980 年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这些论述，虽然未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关于这个理论的基本内涵，已经有了明确的论断。

1981 年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出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1982 年党的“十二大”的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6 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了这个历史阶段在经济上的规定性，并且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关于理想和道德建设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来。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开始引起党内外的注意。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 8 个月，即 1987 年 2 月，邓小平指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8 月，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在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 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十三大”上，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三大”总结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集中全党的智慧，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生产

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使全党对基本国情达到了科学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据此，“十三大”确立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任务。这说明党对中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经济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科学判断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历史时期国情探讨和认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经验教训后获得的对国情认识的新高度、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冲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科学地开展经济工作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与方法论基础。

其次，为解放思想，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特定阶段，那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应该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都必须符合这种实际，不能也不必拘泥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或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这样就为解放思想，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和理论依据。

第三，为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反过来，这一论断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渐进探索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演进过程，始终围绕着改革的目标取向而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中国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但是朝什么方向改革，怎样进行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意见。主要分歧在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和改良，还是通过引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总体上看，1977～1991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探索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确立了四个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

第一个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模式。1978年7、8月份，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就提出了要按经济规律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领导地

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的问题。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论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时认为，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还应该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陈云1979年3月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也强调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作用。这样，"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开始成为官方提法和经济改革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从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仍局限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认为计划经济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第二个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1979年以后，经济改革实践的迅猛发展，要求改革的理论要有新的突破。为此，决策层和理论界开始酝酿为"商品经济"正名。1984年9月9日，国务院领导人在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由此奠定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基调。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

第三个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模式。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为什么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邓小平的此次讲话奠定了党的"十三大"的基调。"十三大"提出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又朝着市场导向型经济体制迈出了一大步。这一表述已经非常接近市场经济的总体轮廓了，这为理论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改革的目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四个模式实际上是重提"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从1989年到1991年，是中国新旧经济体制对峙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新旧体制因素的共同作用，改革实践进退维谷，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锋几近白热化状态。一时间，"市场经济"、"市场化"和"市场取向"等提法，都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理论禁区。尽管邓小平仍然一再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但是官方文件上已经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运行机制改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目标取向的认识又退回到改革的初始阶段的水平。

五、经济发展战略：从"两步走"到"三步走"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继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把实现"四化"作为中国新时期的重要历史任务，并且提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战略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中国

的现代化建设必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历史过程。1979 年 9 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 30 周年的讲话中，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所有这些表明，党中央已经认识到，在本世纪内我们不可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实现这一任务的时间必须拉长，中间要分为几个阶段。

1979 年 12 月初，邓小平在会晤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具体化为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000 美元的水平，进入小康状态。1980 年 1 月，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一次提出："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把中国式的现代化规划为前后两个十年即"两步走"来完成，邓小平指出："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千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

邓小平的上述战略构想被党和政府所采纳，成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1981 年 11 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确认了这一战略目标。1982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两步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1984 年到 1987 年间，党的领导人开始研究和探讨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在确定了 20 世纪末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后，邓小平密切关注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1984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道，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后，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984 年 10 月 6 日，邓小平对新设想又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此后，邓小平一再提到这个设想，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长期目标和布署的构思越来越具体、清晰，并把第一步的"翻两番"分解为解决温饱问题和实现小康两步。这样"两步走"战略就发展成为"三步走"战略。

1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实现了历史的突破。这次会议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步骤等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党的经济工作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确定对外开放的方针

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十几年，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深入发展的时期，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国际分工空前深化。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却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重新睁眼看世界，才发现自己已远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后面。面对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始摈弃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封闭型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建设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决策。1980年6月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稿人访华团时，向外界宣布，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他说：“我们在国际上实行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往来，特别注意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包括吸收外国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历史性转折的开始。

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此后，对外开放逐渐被当作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技术交流。”1982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中国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从而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地位。

第二节　探索国民经济发展新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开始探索国民经济的发展道路。从1977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民经济发展新道路方面，先后经历了1977～1978年的“洋跃进”、“新八字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新路子的提出与实施、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等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探索中的又一次重大失误：1977～1978年的“洋跃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本来应该用一定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使国民经济达到基本平衡。可是由于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1977、1978年，党的的经济工作出现了又一次失误，即“洋跃进”。

与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相类似，"洋跃进"是从高指标开始的。从1976年冬季开始，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石油、煤炭、钢、化工的产品产量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77年1月，中共中央要求到1980年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77年4月，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华国锋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197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认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按照这种错误的估计，各部门、各地区都开始为新的跃进进行筹划，提出高指标，制定大计划。1977年11月24日到12月11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长远规划问题，国家计委伺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1978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汇报要点》，连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一起下达，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1978年2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提出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照《纲要》的规划，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从1978年至1985年的8年间，在全国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将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纲要》基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指标订得过高，基建投资安排过大，许多项目没有经过综合平衡就草率决定。这个《纲要》虽然没有公布和下达，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起了作用，不失为"洋跃进"的纲领性文件。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集中研究了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规模扩大和引进项目增加的需要，国务院不得不一再追加基建投资。1978年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总规模由年初的332亿元，追加到415亿元，实际完成了501亿元，比上年实际完成数增加118亿多元，增长31%。基建投资规模的急速扩大，使已经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因此更加严重，从而给经济发展，特别是1979年、1980年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新的困难。对此，中共中央在1978年底开始觉察，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最终促使"新八字方针"的提出，从而制止了"洋跃进"的持续与蔓延。

二、探索经济发展新道路的开始："新八字方针"的制定与贯彻

针对"洋跃进"带来的经济比例失调与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当时，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虽然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一些重大的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没有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待妥善解决。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

的转折，即从急于求成的经济工作转向实事求是的经济工作，中国经济发展也开始从急于求成错误支配下的老路转向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更好地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任务，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对全国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弄清楚了在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带来的影响，看清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性。通过深入调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全国经济状况的认识逐步趋于一致。从1979年开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研究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方针和办法，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曾多次就经济调整问题发表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3月21日～23日开会讨论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作了《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的讲话。邓小平也在会上提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政治局的多数支持，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这次会议是经济建设上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确定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次重要会议。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分析、酝酿和准备，1979年4月5日～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李先念代表中央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他在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经济恢复取得的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头两年经济工作的失误，详细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情况，阐明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和方针任务。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并明确指出要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

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把落实此项方针当作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战役。

1979～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一系列调整措施，主要有：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关系；加快发展轻纺工业，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协调起来；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使建设规模同钢材、水泥、木材、设备和资金的供应能力相适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比重；对企业进行整顿和调整。另外，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在1979～1980年，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有利于调整的改革。

1979～1980年的调整初见成效。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向协调合理的方向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有所增加，国民收入继续有所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是这些成效只是初步的。从1979年到1980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从中央到基层的许多

负责人，对调整的必要性认识不深刻，对调整的方针执行不得力，更多地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形势中好的一面，而对困难的一面认识不足。由于对调整的认识不够统一，在行动上犹豫观望，措施不力。调整工作进行得不够顺利。国民经济发展中仍然潜伏着严重危险。

为了扭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于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讲话中指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不是耽误。邓小平在会上发言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该退的不退或退不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他明确指出，这次调整，不是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相反，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这次会议肯定了这些正确意见，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

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成效显著，国民经济在进一步调整中前进。但是，潜在的危险未被完全消除。国家财政收入连续三年下降，地方和企业自有资金增加，造成了资金过于分散的局面，使国家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进行必要的重大项目的建设。1981年仍有财政赤字。基本建设方面，国家预算投资有较大压缩，但没有控制住预算外投资，基建规模仍然过大，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情况相当严重，比例失调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扭转。特别是许多方面的经济效益很差，生产、建设、流通领域的浪费现象惊人。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要摆脱这种状况，要求人们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新路子的提出

1981年11月，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分析了国民经济的形势，研究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鉴于国民经济中的潜在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有必要再用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不仅要迅速达到经济全局的稳定，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求得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健康发展。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党和政府提出中国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个条经济建设方针，是建国32年以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比较全面地纠正过去"左"的错误的产物，是进一步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这条新道路同以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相比，具有崭新的内容，即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特点。提出这条新路子，标志着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四、探索宏观调控方法，治理经济过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交替，另一方面，经济体制也在交替。在这种双重交替中，必然出现诸多摩擦与冲突，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又避免宏观经济失衡，党和政府开始探索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

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是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在1979、1980年的经济调整中，由于放权让利改革的实施，各地小企业遍地开花，阻碍了经济调整目标的实现。这种状况迫使改革步伐作了相应的收缩。1985年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展开后，宏观经济运行开始出现过热，经济运行中的深层矛盾日渐积累。1985年初，由于上年第四季度大量资金投放开始发生作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沿海开放城市外资项目利用逐渐铺开，使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增长进一步加快。1985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和零售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2.9%、35%和5.6%，增长幅度超过上年第四季度，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针对经济过热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以紧缩银根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紧缩经济。紧缩措施从第三季度开始逐渐产生效果，过热的经济逐步降温。1988年上半年，中国在加快改革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呈加速之势。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1985年第三季度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季度。第二季度又达到17.6%。1988年上半年，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加重，物价涨势迅猛。1988年随着价格改革"闯关"的实施，宏观经济秩序紊乱加剧，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时地分析了形势后，于1988年9月下旬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认为，中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突出的是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会议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和政府以稳定市场、稳定金融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提出了治理整顿要达到的具体目标。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到1989年年底，治理整顿初见成效。一方面社会总需求有所控制，物价涨幅回落；另一方面市场疲软，工业生产下滑，经济生活发生困难，而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治理整顿过程中的进一步暴露。这表明治理整顿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了经济形势，于1989年11月上旬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会议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3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经过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3年的共同努力，到1991年，治理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过热明显降温，基本恢复正常增长，供求失衡矛盾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市场供应充足，秩序明显好转，居民消费心态趋向正常，产业结构“瓶颈”矛盾有所缓解，人民继续得到实惠。但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矛盾没有明显改善，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经济总量平衡基础脆弱，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增大。

在治理整顿期间，党和政府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运用经济手段，并围绕着治理整顿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总的来看，主要是恢复和采用旧体制下的行政手段，用直接控制来代替间接控制。实践证明，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经济工作中，运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只能在短时期内解决经济生活浅层次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矛盾的解决有待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新的思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既是治理整顿最后攻坚阶段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超越治理整顿阶段的一项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当治理整顿作为一个特定阶段结束之后，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仍然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因此，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表面上是治理经济过热，实质上是探索国民经济发展中如何做到速度、效益、结构三者协调统一。

第三节　全面改革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探索

977～1991年，党对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在治理整顿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度搁浅，但是随着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的不断成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越来越明确。这一时期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在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开辟了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经济体制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实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如何改革传统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设想。这些设想和探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经济体制改革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分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在极力扭转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局面，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对改革传统经济体制也作出了大胆、可贵的探索。

1978年7～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在总结建国28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思想主张。如

此深刻、大胆的思想主张，已不是李先念个人的一般设想，而是当时中央部分领导成员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重大谋略。李先念的讲话后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针的确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李先念1979年4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弊病很多，非逐步改革不可”。“必然要对计划、物资、财政金融、劳动工资、价格、税收、基本建设等方面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在进行这些局部改革的同时，要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做好准备，提出比较全面的改革方案，经中央批准后，到条件成熟时再着手准备”。1979～1980年间经济工作的重点虽然重在调整，但在李先念的具体主持下，仍然进行了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调整物价、实行基本建设投资拨改贷、改变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多项改革措施。

陈云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作用的领导人之一。陈云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理论修养，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才能是党内外公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建议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由陈云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陈云在领导经济调整的同时，对经济体制改革也予以了极大关注。1979年3月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陈云又指出，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根据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了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此后，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陈云预计，在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的这个预计是很准确的。改革中，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在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以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虽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陈云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与发展，在党的“十四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在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最富创造性、最有影响力的论断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第一次论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提出的。他

在谈话中明确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第二次论述，是在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柏结合”。第三次论述，是在1982年10月14日，他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总之，李先念、陈云、邓小平等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代表了当时党的高层领导人对改革传统中国经济体制的认识和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时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会议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正式迈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79年4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步骤作了原则规定。会议确定，鉴于在最近几年内，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城市改革只能在局部领域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改革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此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在局部范围展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仅因为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同时也因为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式迈开了步伐。

二、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尊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物资；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对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等。实行这些政策与措施，实际上是开始纠正农业方面的“左”倾错误。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对《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修改后的《决定》提出，社队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决定》对联产到组责任制形式的肯定，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恢复或建立提供了政策支持。

随着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又重新出现或恢复。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执行省委“借地渡荒”决定的同时，率先恢

复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以及小岗村所在的县委和地委领导，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支持了小岗人的大胆尝试，从而使大包干得以幸存，并很快走向全国。

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责任制，是中国农业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显示了巨大作用，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它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长期以来受"左"倾错误观念的束缚，包产到户一直被视为分田单干，甚至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而受到批判。长年的批判斗争，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谈"包"色变的社会心理。这就决定了围绕着农村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有争论和斗争。

1979 年初，新华社、《人民日报》对安徽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了连续报道，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肯定了他们的经验。这些报道激起了强烈反响，对各地落实农村政策和进行农村改革，起了巨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正当安徽农村改革势如破竹，热火朝天进行之时，1979 年 3 月中旬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围绕包产到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80 年 1、2 月间，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会议，又引发了对包产到户的公开批评。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很快遍及全国，到处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中，农委和农业部反对得最厉害。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陈云等几位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态度，对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消除人们对包产到户的畏惧心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邓小平几次谈话精神，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中共中央于 1980 年 9 月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激烈争辩，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会议纪要。会后，这个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次会议对包产到户的认可和支持，打碎了 20 多年来包产到户等于单干、等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枷锁，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也使党在理论和农村政策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自发、初步推行阶段，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又加速了责任制的推行。它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这种经营形式究竟是解决困难的权宜之计，还是发展生产的长久之策？它是仅仅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形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几年农村改革实践的基础上，1980 年 10 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放宽农业政策，并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将这个《纪要》作为 1982 年中央 1 号文件批转全党。《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责任制、联产到劳、包产到组到户和包干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

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要坚持两个“长期不变”，即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纪要》还对“双包”责任制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从理论上作了说明和阐释，对“双包”责任制的作用及优越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个文件的制定和下发，对于肯定和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巩固和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有着重要意义。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第2个中央“1号文件”，即《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总结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认识成果，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据此，文件进一步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这种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到1983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进入高潮，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5%；1984年更达到98%，其中绝大多数实行了包干到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行，改变了人民公社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平均主义严重、吃大锅饭的弊端，冲击着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随着农村中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党和政府决定对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从1979年8月开始，四川、安徽、吉林、辽宁、广东、浙江、河北等省开始进行人民公社改革的试点。在几年改革试点的基础上，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正式提出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要“实行政社分设”。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从此，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在中国成为历史。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由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毫无自主权的劳动力，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全面增长。1979~1984年的6年间，农业平均增长速度达9.4%，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推进提出了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

三、以城市为中心推进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时，同样也走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农村，这一时期有关城市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还处于局部的、小范围的试验阶段。以城市为中心推进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

到1984年，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冲破了人民公社的旧体制，使中国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农村经济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农民生活大幅度提高，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已初步解决。这就又一次在全国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形势迫切要求加快城市改革步伐。同时，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全面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也积累了经验。

城市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也提出了内在要求。前几年对城市经济体

制的改革还是试点，是局部的和探索性的，长期以来形成的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企业缺乏活力的经济体制的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企业经济效益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种种浪费和损失还很严重，城市经济的潜力也尚未挖掘出来。只有坚决地对城市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繁荣和发展城市经济，才能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完成“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

历史发展对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迫切要求的同时，也为它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要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国民经济调整已走上正轨，第六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提前完成，为全面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党和政府对改革中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革开放的初步实践和成就，使更多的人看到改革带来的变化和好处，改革成为亿万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1984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一致认为必须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步伐，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根据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原则，在理论上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规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样就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起来，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全面改革现行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依据。《决定》根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强调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结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决定》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其充实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它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世界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邓小平在会上评论这个《决定》时说：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它将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成功。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决定》的通过，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入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开始启动。

1985 年起，城市综合改革全面展开。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关系复杂，要顾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1985 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宏观控制，紧缩银根，努力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力争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慎重初战，务求必胜”。

首先，加快了城市综合改革。1985 年 3 月 6 日至 13 日，国家体改委在武汉市召开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以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当前的新情况、

新问题，保证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主题，着重讨论：（1）如何进一步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2）如何综合利用经济杠杆，保证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3）如何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内外关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会议要求，要在改革方向、目标上坚定不移；在改革方法、步骤上稳扎稳打，谨慎认真，把继续搞活企业同加强宏观管理结合起来。这次会议，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

其次，1985年开始推进以计划、价格和工资改革为中心。这次以计划、价格、工资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以往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进行调整的做法，开始转向让价值规律更多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开始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着更具有实质性变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使得中国进入了新旧体制交替的重要时期。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经济运行出现了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共同作用的局面，经济活力大大加强了。但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原有体制的弊端不可能完全消除，新体制还有待于建立、完善，两者必然产生矛盾和摩擦，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为此，在“七五”时期，党和政府先后采取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措施。

一是采取对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实施“巩固、消化、补充、完善”方针的措施。在总结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在“七五”的前两年，即1986～1987年，改革的重点是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从宏观上加强、完善间接调控体系，为今后改革迈出决定性的步子做好准备。因此，“七五”计划的头两年，宏观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没有出台大的措施，主要是执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的方针。

二是在价格改革上实行突破，推进价格改革闯关。实行价格改革，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性的环节。1985年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时，曾经制定了价格改革方案。但因抑制总需求未取得预期成效，引起物价总水平较大幅度上涨，价格改革措施未能全部到位。1986年和1987年为稳定经济，价格改革未出台大的措施。但在价格改革放慢的同时，通货膨胀的势头未完全得到遏制。实践证明，绕开价格改革，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从1988年第二季度起，中央最高决策层作出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的决定。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提出了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的统盘方案，决定实施价格改革闯关。理顺价格以促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也是必要的。由于1988年中国经济处在趋热的过程中，价格闯关客观上加剧了经济过热进程，因此，这次价格闯关的时机选择不当，被迫搁浅。但是，这次价格闯关为后来的价格改革积累了经验。

四、“治理整顿”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停滞和逆转

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治理整顿，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治理整顿期间，一方面，由于十年改革使中国经济体制内部已经形成强劲

的制度创新力量，由企业和地方政府扮演主角的局部改革没有停止。另一方面，由于关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所引起的思想混乱，由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改革进程一度受到影响。在治理整顿时期，虽然中央一直把深化改革和治理整顿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上，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特别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初期，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不得不实际上把工作重点放到治理整顿方面，而改革的步伐则明显放慢，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暂时的徘相或倒退。为了迅速控制正在蔓延的混乱现象，将国民经济的运行纳入正常的轨道，过多地动用了行政的、强制性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计划体制时期的一套宏观经济控制的做法。

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由乱到治的过程，使一些人产生了一种误解：经济混乱和经济过热现象是由传统计划体制的削弱引起的，而恢复使用过去惯用的行政干预的手段并迅速产生效果，似乎也证明了还是计划经济具有较大的优越性。一些人主张放弃“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目标模式，在改革中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对于“十三大”关于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提法，有的人提出了质疑，报刊上也不再使用。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献中也代之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更为严重的是，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使得人们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一些人主张改革开放每一项措施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这种政治争论突出反映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断定“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这种认识上的转向趋势，标志着“左”的思想开始抬头，由此导致的思想僵化成为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受到某种程度的干扰和动摇。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第四节　全面实施国民经济的对外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国民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党和政府选择了由点到带，由沿海到内地，由地理开放到体制性开放的对外开放推进路径。首先，创办经济特区，作为沿海对外开放的“点”，在此基础上，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海南岛，形成沿海开放带。其次，大幅度扩大对外开放区，将对外开放政策从沿海扩展到内地。第三，在地理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的基础上，1986、年，正式向“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申请“复关”，开始迈向体制性对外开放的进程。

一、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与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和地方都积极思考，寻找对外开放的突破口，研究对

策。这时，人们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设置经济特区的作法值得借鉴。这些经济性特区，一般都是从本国（地区）内划出一定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用减免关税等优惠办法吸引外商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和投资，以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1979 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省委提出建议：广东应当拿出一个地方率先对外开放。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并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

对广东省委的这一重要建议，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和支持。邓小平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省的这一要求。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的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于 1980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和措施。会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次会议还采纳了与会者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80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同意会议《纪要》，从而也就认可和正式确认了“经济特区”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比“出口特区”更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表明中国要办的特区是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而不是单一经营工业的出口加工区；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只是在经济上采取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去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形式。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经济特区大胆探索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成为改革的试验区。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初，对其实行优惠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特征。国家允许在经济特区实行与内地有区别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特区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实行以市场取向为特征的体制创新和“特事特办”的改革先行的原则。主要内容包括：经济特区建设以吸引外资为主，探索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经济特区的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外，经济特区注重改革的超前性，如外资政策、土地出让权政策、服务领域的商业零售、外资银行、保险等对外开放政策都是先在特区试验，取

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为了统一认识，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曾多次主持召开会议，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设置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981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试办特区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是列宁关于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理论和实践，和历史上的“租界”、“殖民地”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就初步统一了对经济特区的认识。

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地区

成功创办经济特区，产生了强烈的政策示范效应，进一步统一了党内对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认识。邓小平 1984 年 2 月视察经济特区，充分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指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放沿海城市的大胆决策。随后 1985 年、1988 年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进一步扩大开放地区的系列决策。“治理整顿”期间，中央又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进一步扩大经济特区范围的重大决策。

1984 年 4 月，中央政府决定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广州、湛江、北海等 14 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形成了从南到北沿海开放地带，敞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至此，由经济特区而至沿海城市，由沿海城市而至沿海开放地带，由沿海开放地带而向内地扩散的开放格局，已显现其轮廓。

1985 年 2 月，国务院决定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地区的 61 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88 年 4 月 7 日，国务院决定再一次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这次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共有 140 个市、县，其中包括杭州、沈阳、南京 3 个省会城市。1988 年 4 月 13 日全国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成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至此，中国形成了北起辽宁南到海南，成线连片的沿海开放地带。这一开放地带，分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地区 3 个层次，包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291 个市县，人口达 2 亿。

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从表面上看，治理整顿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放慢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此前五年的快速发展相比也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但是，在治理整顿后期，党和政府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

首先是决定开放开发上海浦东。上海是世界闻名的都市，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开发开放浦东，对于发挥上海的优势，促进长江流域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进一步扩大经济特区范围。1991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扩大汕头经济特区的范围，面积从 52.6 平方公里扩大到 234 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海南、深圳的第三大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区的扩大，不仅对理顺原汕头市与特区的关系、加速汕头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广东东部及内地广大腹地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有重要作

用。这时，中国经济特区的总面积已达到3481.5平方公里，比1981年增加了100多倍。经济特区面积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第三是探索实施对外开放的新形式，包括增设保税区，建立生产资料保税市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1990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在批准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开放开发和发展规划时，也同时批准建立外高桥保税区，这是中国批准建立的第一个保税区。199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天津港保税区和深圳的沙头角和福田保税区。1991年5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第一个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实践证明，保税区的建立，有利于开展对外贸易，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出口创汇，提高生产和管理水平，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扩大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对外开放另一个新形式。1985年7月，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市政府联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深圳科技工业园。此后，国务院于1988年5月批准建立了北京中关村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同年8月，火炬计划颁布实施，各地政府批准兴办了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至1990年年底，全国各地兴办的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共37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和风险资本方面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三、实施沿海开放地区外向型发展战略

实施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将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机整合起来。1987年理论界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重工业高级化都因资金有限而受到制约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的观点，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又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获得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这种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循环关系的思路，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肯定。同时，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8年初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对这一发展战略表示完全赞成，提出要大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为了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国务院于1988年3月4~8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沿海各地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要抓住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有利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内地让出部分原料和市场，要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鼓励现有企业采用“嫁接”办法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横向经济联合。

1988年3月初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沿海各省市以及内地的一些省市积极行动，迅速研究、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和规划。3月23日，国务院又作出《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决定扩大沿海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审批权限，下放外贸企业审批权，改进对进料加工出口的海关监管，在沿海地区开放直辖

市设立外汇调剂中心等，进一步激发了各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积极性，形成了各级干部“想外向、干外向”的局面，使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成了1988年上半年相当多省市经济工作的中心。

1988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这表明经过1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将中国经济的发展纳入了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中。

四、申请“复关”：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重大举措

要真正实现经济的对外开放，除了在地理上和经济交往层面上实行对外开放以外，还必须在体制层面上实现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获得国际经济体系的身份认证，因此，中国适时提出了恢复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的创始成员国资格的问题。

中国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23个创始国之一。1950年5月5日台湾当局退出该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承认过此次退出的合法性。1965年1月21日，台湾当局申请以观察员资格出席“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大会获得批准。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秘书处根据凡属政治性质的问题服从联合国大会决定的原则，于同年11月撤销了台湾当局的观察员资格。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政府没有提出恢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中国加强了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联系，并于1986年7月11日，正式向“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提交了要求恢复中国缔约国合法地位的申请。1987年5月14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理事会专门成立中国问题工作组，审议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1989年年初进人磋商加人议定文本的实质性阶段。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中国的“复关”进程暂时搁浅。中国“复关”的搁浅不仅延缓了中国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也再次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以对外开放为推动力。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世界经济体系需要中国，因此，中国“复关”进程搁浅只是暂时的。

申请“复关”，表明中国在加快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更加成熟，对如何将中国经济融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有着更加理性的选择。

第五节 转折阶段党的经济工作特点与经济工作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77～1991年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迅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到90年代初，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的经济工作具有鲜明的特点，也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值得深入总结。

一、转折阶段党的经济工作的具体特点

1977—199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是在全面总结党的经济工作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展开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工作必然呈现出诸多相对于以往时期而言不同的特点。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党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进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建设的发展，都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矛盾和困难。特别是当改革深入发展，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可以借鉴的经验之时，党内党外产生了各种疑虑和困惑时，就需要党不断解放思想，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解放思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经济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社会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

在中国，进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供借鉴，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自己探索。这样的探索必然需要探索者最广泛地动员群众的参与，自觉地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作到了这“两个尊重”，而且将这“两个尊重”有机结合起来。

例如，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特别强调尊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开始尊重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首创。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责任制，是中国农业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但是在“双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中，人们在认识上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上是分田单干。针对这些思想疑虑，中共中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广，耐心地引导各级干部破除“左”的思想束缚。正因为如此，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才得以普遍推广和逐步完善。此外，在创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中，无论是理论层面的创新，还是改革方案的制定，具体经济改革政策的出台，党和政府都强调尊重实践和群众的创造，让实践检验真理，将实践证明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东西加以总结和推广。

（三）实行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的改革推进方法

改革具有探索性质，不可能先有预定的模式，必然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和自下而上的路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每前进一步都会涉及到既定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可能遇到困难和阻力。因此，从改革开始，党和政府就强调，推进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对于重大的改革措施，要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不断扩大的办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是通过先进行小范围的试点以后，通过总结经验，上升为政策以后逐渐向全国推广的。在工业体制改革过程中，也是先选择少数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承包制试点，再逐步向全部企业推广。在城市综合体制改革中，先选择若干城市进行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逐渐总结和完善经验，向大部分城市推广。对外开放的许多措施，首先是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验，成功以后再向内地推广。

实践证明，这种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的改革推进方法，减少了改革风险，增加了纠错机会，把改革目标的坚定性和战术上的渐进性统一起来，把全局政策上的慎重性和局部试验上的开拓性统一起来，把不怕犯小错误的自信和避免犯大错误的稳妥统一起来，是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成功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没有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大的震动的主要原因。

（四）实施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战术选择的成功，更取决于战略和道路选择的成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国家选择的经济体制转轨战略可以分为采取休克疗法的“大震动”战略和“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中国党和政府从改革一开始就选择渐进式的改革战略。

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渐进式”战略和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原因。从

主观上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某些修补和改良，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的变革。既然是一场革命，对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这就必然要循序渐进，不能贸然激进。从客观操作层面上看，改革作为一场根本性变革，必然要对原有的经济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这个过程也需要逐渐获得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决定了中国必须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略。从客观上看，国情的复杂性、改革的艰巨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也要求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略。

到 1991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与道路的渐进性特征已经明显凸现出来。从部门上看，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再推进到整个经济体制领域；从步骤上看，改革和开放先在生产队、企业、城市和经济特区等点上突破，再向全国面上推广；从切入点上看，改革先致力于“增量式”改革和“体制外”改革，即发展个体经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国有制经济，从而为存量改革即“体制内”改革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从领域上看，改革先从经济体制领域展开，再根据实际推进到行政体制领域和政治体制领域。

实践证明，采取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战略和道路，虽然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而且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因此，改革的过程会长一些，但是，这条道路既保证了改革的推进，又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得到了社会普遍的理解与支持；既促进了经济体制的变动从而社会的转型，又保持了社会稳定；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启动了脱离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进程。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

（五）注重结合国情学习外国经济发展经验

早在 1977 年 9、10 月间，针对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就多次谈到：我们不但要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管理方法。从 1978 年起，我国开始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政领导人很少出国访问，特别是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访问的状况。仅 1978 年这一年，就有 13 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 21 次访问了 51 个国家。1978 年 4 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出访西欧国家的前夕，邓小平要求他们详细地做一番调查研究，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放眼世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警醒起来，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差距。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增加，不仅使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使党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了比较直接和全面的了解，对加速现代化建设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有了愈加迫切的认识，同时也使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1978 年 7 月到 9 月，国务院召开了务虚会，专门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几位出访回来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随后，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其中之一就

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国际上通行而又对我有利的方式，把世界上主要先进技术拿过来，缩短我们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有利条件和特长，通过世界市场，同国外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且通过对外贸易检验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为了借鉴国外经济特区的作法，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1980 年 9 月底至 11 月初，江泽民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以及深圳、厦门两特区负责人组成的 9 人小组，前往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 6 国的 9 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并在途经日内瓦时同联合国有关专家进行座谈。这是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国外经济特区的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仅在创办经济特区、建设保税区等涉外经济领域注重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及主要做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企业管理、股份制改革等方面，也注重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这些先进经验和作为与中国实际结合，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改革方式。

二、转折阶段党的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

1977～1991 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尽管在初期经历了曲折，但是，伴随思想路线的端正和正确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确立，党的经济工作迈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上最为成功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开展经济工作的经验。

（一）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正确确定发展的道路、阶段和战略

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始终没有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中来。邓小平深刻总结了 20 多年以来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沉痛教训，指出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邓小平就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即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过程中和“六四”风波以后，仍然坚持将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正因为如此，这一期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受到任何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没有再走弯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因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了，另一方面同党和国家正确解决了发展的道路、阶段和战略等问题是分不开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反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 100 年。这是最基本的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因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因而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正确确定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的同时，还必须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早在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在全面分析中国国情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部署。“三步走”战略是在总结以往经济发展战略急于求成的教训，并深刻分析全球经济发展大趋势及我国基本国情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宏伟气概和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实践证明，这个战略目标是宏伟的，已经成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行动纲领。

（二）深化改革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1977～1991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由此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改革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全面进步的动力。

这一时期，新的经济体制在成长、壮大，旧的经济体制在削弱，但依然存在，国民经济中出现了新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局面。体制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新旧体制并存也导致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摩擦与冲突。从体制转换的过程来看，新旧体制并存及其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上述弊端的存在，主要是受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局限性的影响。历史的经验证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总结这个阶段改革的经验，提出新的经济体制模式，把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与稳定，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中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经济建设与发展是中心，是目的。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稳定是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三者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这一根本战略思想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之后，逐步提出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既然要发展经济，要推进改革，同时还要保持稳定，自然在客观上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改革、稳定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正确处理三者关系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在城市只是进行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和做思想理论准备，经济发展速度比较适当，同时注意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稳定进步，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呈现出开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总的看是比较协调的，但由于改革开始向城市全面推进，加大整个改革力度时，经济增长速度偏高，社会需求出现过旺状态，1984年底和1985年上半年不得不出台一些抑制总需求的措施，影响了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80年代后期，改革和发展中都出现了一些急于求成的倾向，在通货膨胀压力相当大的情况下，还试图全面推进价格改革，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速

度，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结果出现宏观经济波动，由此成为导致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果断决定进行三年治理整顿，维护了社会稳定。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有成本。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避免带来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震动。改革和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也会出现矛盾，相互制约。如果缺少统筹兼顾、相互协调，这个矛盾就会激化。

坚定地把改革推向前进，又兼顾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充分考虑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可能，确定改革的方式、进程、顺序、时机、力度，尽量降低和消化改革的成本，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减少震动；在建设的安排上，考虑改革的需要，为改革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改革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这是 1977 ~ 1991 年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一项经验教训，也是今后必须坚持的。

（四）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在全党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断打开新局面，开拓新境界，令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开始由党的一元化领导走向党政分开，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把握、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等方面，党不再或很少干预政府日常的、具体的经济事务。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改革的政治保障上，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把全党的工作中心从抓阶级斗争转到了抓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在改革的整体布局上，强调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强调改革的渐进性。在改革的原则方针上，吸取历史的沉痛教训，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急于求成，既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又慎重决策，讲究改革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改革的配套条件上，一是处理好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以改革促增长，以增长保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把蛋糕做大，大大减少改革的阻力和成本。二是与开放相结合。在改革的逻辑顺序上，一般来说，先从比较容易进行的、震荡不太大的地方、产业和部门入手，然后再实施改革攻坚。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呼唤着对计划与市场的再认识

在中国，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早在 1980 年，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拟定的一份文件就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认

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肯定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提出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这就比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深入了一步。

但是1989年“治理整顿”期间，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的困境，理论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倒退的倾向。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也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经济工作的思想与步伐。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呼唤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呼唤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第九章　创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面创新与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

在党的经济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发展出现徘徊与局部逆转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思想解放，加快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要求。在邓小平谈话精神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发展与实际工作的推进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理论与经济工作实践全面创新的时期。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主题是，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全面创新经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的主旋律。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和改革方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对外开放方面，大力推进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启动了中国经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经济发展战略与道路方面，明确提出和推进了科教兴国、“两个根本性转变”、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工作方法与能力方面，大力推进经济工作体制的创新与经济工作能力的建设。伴随经济工作实践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理论上也全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一系列理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 1992～1996 年间，一方面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目标，开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体系、推进计划、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的探索；另一方面成功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第二阶段，即 1997～2002 年间，一方面围绕推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正规避国际金融风险、启动内需、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方面采取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促使经济发展摆脱内需不足的制约，进入新一轮发展期。另一方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完善国内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第三阶段，2003 年，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始启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进程。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面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以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波折引起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疑虑。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题。199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为经济工作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

一、确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9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标志是确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一）突破“计划”与“市场”冲突论

早在1991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就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东西，社会主义都应该采用。”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主要是指现代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与实践探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姓社姓资”疑虑的科学回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谈话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唤起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打破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开始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开始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在实践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型特征进一步明显，开始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共中央高层立即组织学习和贯彻。1992年2月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南方谈话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也为“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3月9～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完全赞同和接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决定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认识飞跃，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阐述，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和实施方略，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总体设想和具体规划。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在借鉴的基础上全面创新经济体制，指出，“要转变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提倡积极探索，敢于试验。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勇于突破陈规，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这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引入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还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上，开创性地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市场经济一般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内在统一，为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十四大”以后，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改革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探索和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特别是在计划与市场上“姓社姓资”的问题解决后，在推进所有制的改革进程中遇到了“姓公姓私”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其实现形式，如何认识股份制，如何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等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引起人们新的困惑，制约改革的推进，需要中国共产党做出回答。

1997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创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的含义，正确把握公有制的主导作用，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表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稳定存在和持续发展下去，这种格局也将决定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和状况。

“十五大”以后，改革开放快速推进。到世纪之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探索。2002 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2003 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二、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观点。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按照这一理论，通过三大改造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 1979 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在理论上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在实践上，则通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体现这三个方面的特征。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冲击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认识。但是，长期存在的思维方式的惯性使人们认为上述三个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作为改革的底线加以固守。因此，虽然实践不断要求人们突破这种认识，但是直到 1991 年，人们在认识上都没有突破这种底线。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突破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思想藩篱，以此为契机，到 2003 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方面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

（一）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把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之中，正式地改变了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论模式。世纪之交，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方面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证明这一理论突破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首先突破将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思想束缚，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以引入市场机制为基本导向的。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引入，不仅没有削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反，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而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思想方法上突破了“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将市场经济当作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人类文明的成果，社会主义作为建立在一切优秀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先进制度没有理由不采用市场经济体制。

将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和基本经济制度中排除掉，并没有削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只是剔除了长期以来附加在社会主义之上的僵化观念。因此，这种排除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与完善的。1992 年以来，社会主义与现代市场经济开始实质性融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

（二）突破了将单一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必然要求人们修改关于公有制的认识。1979 年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在公有制问题上的认识存在两个基本观念。一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好，因此，全民所有制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公有制形式；二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是不相容的。1979 年以来，这种观念开始改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些观念局限。例如，虽然承认社会主义应该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但是，非公有制在功能上只具有对公有制经济的拾遗补缺的补充性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只是具有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工具性作用，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范围和程度上应该受到限制。

从党的“十四大”开始，伴随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理论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认识。党的“十四大”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这就突破了把单一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大二公三纯”传统模式，改变了过去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相容的观点。但是，总体上看，一直到“十五大”召开之前，还只是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当作一个

"重大方针"，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重大发展。一是打破将公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当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将所有制结构当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围之内。

二是在公有制经济含义的认识上取得了突破。"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就大大地拓展了对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视野，突破了仅仅从生产资料归属的角度来认识公有制的局限，形成了从由谁出资的角度来认识公有制的新的视角。

三是在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方面取得突破。传统的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制控制地位的认识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其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可见，"十五大"强调的主要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质量和控制力。

四是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形式。"从而打破了公有制经济形式单一化的理论。在股份制理论方面，"十五大"进一步突破了"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理论。这不仅为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指明了方向，也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合，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的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三）突破单纯强调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理论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分配原则。在实践中，一方面，由于缺乏实施按劳分配的充分条件，实际分配中往往采取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形式，严重制约了分配的效率和公平。另一方面，由于单纯强调按劳分配，排除了其他要素在社会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阻碍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改革开放的实践冲击了这种分配理论。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出现了各种所有制投资主体组合的混合经济形式，要求分配方式与之相适应。针对这种现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式的同等富裕与共同富裕理论，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与政策。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人们在劳动技能、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别，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等原因，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上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可能实现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这种合理的差距的存在，对于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突破了单纯强调按劳分配的传统分配理论。1992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四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分配制度上第一次提出要考虑其他分配方式与效率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重大突破。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这就将包括按劳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结构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第二节　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确立了到 20 世纪末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到世纪之交，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2003 年开始，又启动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工程。

一、确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总体规划

党的“十四大”在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十四大”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继作出一系列部署，并抓紧制定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行动纲领。《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行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

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可见，这一《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是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经过近10年的改革，到21世纪初期，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鉴于此，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决定》还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

二、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加快步伐。1992年6月，国务院制定并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草案)》。9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认真贯彻执行（条例）的通知》。《通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企业经营的重点是落实企业自主权；企业要充分运用《条例》赋予的自主权，主动地进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竞争。《通知》还要求，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上来，把贯彻落实《条例》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以此为指导，上海、广东、天津、山东等一些省市进行了国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十四大”报告将国有企业改革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突出重要地位。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明确要求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制度的同时，又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向企业制度改革推进的方向。此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了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微观基础的新阶段。

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陆续确定，首先在1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和资产重组的试点；集中力量首先抓好1000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国有骨干企业，对其资产实行监管；发展跨地区、跨行业、工技贸结合的企业集团，首先组织56户企业集团进行试点。在试点企业广泛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通过转换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进行资产重组，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展开后，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领导。1995年5月到6月，江泽民先后对江苏、上海和东北三省进行考察，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重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当前深化企业改革，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要重点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要抓紧解决政企不分；二是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三是尽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解决好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1996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召开的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市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座谈会上，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结合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和经验，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八条方针，即：(1)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3) 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4) 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一般国有小型企业，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5) 加快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形成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6) 搞好国有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切实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的建设，严格企业内部管理，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机制，做好企业的各项基础性工作，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7) 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重点是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促进政企职责分开，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8) 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国家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革的着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搞活每个企业转向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工作重点从减税让利转向制度创新；从主要抓企业改革转向企业改革与配套改革同步推进；从分别抓各企业经营转向实施大公司战略。为此，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十五大"报告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并明确提出"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十五届一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

到20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度上进行创新。一是建立稽查特派员制度，在实行政企分开，放手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同时，强化政府对企业的监督。二是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有关精神在大型国有企业的贯彻落实，成立了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负责管理大型国有企业和加强国家控股企业中党的领导。

为实现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1999年9月22日，十五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后一个时期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探索国有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作了部署。

根据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一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中央有关国企改革的精神，国务院制定了具体措施并组织各部门具体实施，使国有企业改革和摆脱困境的措施逐步到位并取得重大进展。从1998年到2000年，中央确定的及各地选择的2700多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多数都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列入520家国家重点企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有430家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占83.7%。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加，到2000年底，1997年亏损的6599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70%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比1997年的806亿元增长1.97倍；国有小企业也实现利润48.1亿元，结束了连续六年净亏损的局面。许多长期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开始走出低谷，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基本实现了"十五大"提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脱困的三年目标。

但是，到2002年，尽管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作出了努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国有企业体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突出的是政企不分、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政府的出资人职能没有分开、政府对国有资产多头管理等。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通过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建立国有资产部门对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等制度，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通过现代产权制的建立，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所有这些，指明了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三、引导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了关于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新突破。党的"十四大"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将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内容写入总纲，同时在宪法中规定了“在法律规定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为进一步鼓励、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的新观点，从根本上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地位，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明确要求，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消除非公有制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1992 年以来，党和政府不仅确立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思想，而且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根据“十四大”精神制定的《劳动法》，进一步扩大私营企业的劳动用工自主权，允许私营企业跨地区、跨国境招工，在人才、劳动力市场上打破区域限制，允许自由流动。同时允许私营企业建立户籍档案制度，使其有权为其招来的劳动力、技术、管理人才以及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办理户籍关系，以切实保证私营企业雇工的稳定性。党的“十五大”通过确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保护私营企业主的合法权益。为了给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法律地位，1999 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包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通过根本大法来鼓励、扶持和保护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以来，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十五大”精神出台了鼓励、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关政策，在市场准入方面，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除国家明令禁止经营行业和商品外，都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并且不限经营规模、不限发展比例等；在经营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的批准，采购能源和原材料，进入国际市场方面以及贷款、税收和征地、部门服务和政治地位等方面进一步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做到一视同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资产社会化、管理规范化和经营国际化方向发展，并在科技信息沟通、社会保障、无形资产评估、法律保护等方面，给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在“十四大”以来正确政策的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据统计，到 2000 年底，全国注册的工商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达 3000 万户，从业人员达 7000 万人。尤其是私营企业发展较快，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01 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达 202.85 万户，从业人员 2713.86 万人，注册资本 18212.24 亿元。非公有制资产已经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存量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1992年以来，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目标，党和政府大力推进了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

（一）构建统一、规范的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是市场体系的基本内容。1992年以来，为了构建统一、规范的商品市场体系，党和政府主要在下述方面采取了措施：一是大力推进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同时通过联合、兼并、股权置换等多种产权重组形式组建企业集团。国有商业企业开始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的竞争主体。二是放宽市场准人，鼓励非国有、非公有经济和外商进人流通领域，真正形成在流通领域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市场格局，从而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三是随着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接轨步伐的加快，坚持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了流通的产业化进程，并利用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现代化的流通方式，为中国流通企业经营业务向跨国化延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四是随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商品市场建设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逐步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同步发展，各种市场相互促进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市场体系。

（二）大力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

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因而，要素市场的培育是培育市场体系的主体内容。1992年以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培育生产要素市场的力度。

首先，完善资本市场。一是逐步形成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通过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逐步完善各类市场，包括期权市场和股权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等。二是推进经济的货币信用化进程，逐步形成了债券市场、回购市场、股票等专业市场体系。三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让银行体系有效地发挥其功能。通过商业银行的企业化经营，真正实现货币商品化和资金市场化；同时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通过建立健全的机制来尽力减少金融市场风险。

其次，构建和拓展劳动力市场。自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以来，劳动力市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96年以后逐步实行国家政策引导扶持，社会提供帮助服务，鼓励和推动劳动者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就业的政策。到2001年，全国已有近4万个由各种渠道、各个部门主办的各类型和各层次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正在形成。

第三，全面启动房地产市场建设。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房改全面启动。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务院作出了《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指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并具体提出了城镇住房改革的基本内容。为了引导房地产市场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市场管理的法规，基本形成了房地产法规体系，推动了房地产市场运行及管理步人法制化的轨道。

第四，大力推进技术市场的发育。党的“十四大”以后，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文件在阐明中国技术市场发展的形式和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培育和加快技术市场发展的任务。在199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决定》阐明了技术市场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进步及与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明了中国技术市场的发展方向。为维护技术市场的秩序，规范技术交易的行为，国家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把放开、搞活和扶植、引导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放活技术市场主体，放开技术市场要素，拓宽技术市场范围，扩大技术市场功能，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使技术市场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衔接起来，逐步与国际技术市场接轨。

（三）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

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是市场体系的核心。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格新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价格改革的任务：“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理顺少数由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取消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平抑市场价格。”为此，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进一步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二是推进政府定价和指导价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三是完善价格宏观调控体系的调控机制、增强政府调控价格的能力。四是加快与国际价格体系的衔接。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基本形成了由市场自主决定价格的机制。

总体上看，1992年以来，市场体系的构建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市场体系还不够统一，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现象依然存在；市场秩序尚不够规范，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严重存在。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强化市场的统一性，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这标志着市场体系的建设进入了以统一和规范为重点的新阶段。

五、建立和完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

健全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按照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提出的“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的精神，对如何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宏观调控的内容体系，包括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加

强经济法制建设，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审计、统计、监察及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作用。此后，还对政府机构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在综合部门中新组建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旨在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中重大问题的协调，并把专业经济部门划分为三类，一类改为经济实体，不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一类改为行业总会；还有一类是保留和新设的部门，主要职能是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完整地阐明了建立宏观调控体系问题。《决定》指出，宏观调控的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采取经济办法，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要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1994年起以财政、税收改革、会计、外汇体制等为重点，对严重滞后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改革和实行复式预算制度；在外汇体制方面，实行汇率并轨。经过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施，计划、金融、财政等主要调控部门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初步建立起来，逐步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逐渐集中到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上来。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进一步改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作了周密的部署，标志着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从建立阶段推进到完善阶段。

六、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探索

收入分配制度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征的，重要内容，收入分配格局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格局的公平性与效率。党的“十四大”以来，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党和政府除了按照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以外，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第一，推进了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是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从1997年起，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后来又逐步出台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并提高了三条保障线和其他社会优抚、救济对象的保障水平。二是调节个人所得税。三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1997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做好粮食收购工作、减轻农民负担等有关措施，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环境；国家多次大幅度提高粮、棉等大宗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通过“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四是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进行调整。

第二，进行财政分配关系的改革。根据“十四大”关于“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

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的精神，1992—1993年国家先后在辽宁、浙江、重庆、武汉、新疆等地进行了分税制的试点。1994年，财税改革方案正式出台，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按照税种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入。二是税收改革。为了与“分税制改革”相配套，从1994年开始，中央对税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涉及到以建立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度，统一所得税制度，并逐步进行了其他税种的改革或调整。

第三，改革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通过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在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政分配上划清了国家与企业以及国家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不同的权益关系，是对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实现市场调节工资、企业自主分配、国家宏观调控的分配制度。进入“九五”时期以来，针对企业工资分配存在的问题，中央适时地出台了理顺企业分配关系的有关政策法规，一方面使企业工资改革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使企业分配秩序得到整顿，分配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从1995年开始在深圳、成都、北京等地进行工资指导线制度试点工作的展开，为进一步深化企业工资改革探索了新路。

七、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的保证。“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之后，党和政府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力度。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关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及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决定》还把发展商业性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这一框架的形成为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指明了方向。根据上述精神，劳动部于1994年初起草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逐步走向深入。

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失业下岗问题、养老问题、公费医疗问题等矛盾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中逐步发展。首先，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1998年3月，在劳动部基础上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制定法规，监督、规划和协调工作，履行政府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职能。其次，建立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到1998年年底，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实行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第三，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第四，确立了失业保险制度。逐步建立起覆盖城镇全部职工、基金三方合理负担、救济与再就业紧密结合，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新型失业保险制度。在社会保障主体部分不断完善的同时，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商业保险也逐步成为重要补充。这样，在全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总体上说，这一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加强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标志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入提高与完善阶段。

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伴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日益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下决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十四大”报告强调：“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党中央、国务院计划从1993年开始，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机构改革。

1993年3月，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党政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这次会议讨论的机构改革方案，对不同的行政管理层次提出了不同的改革要求：“国务院的机构改革，重点在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一部分专业经济部门转变为行业管理机构或经济实体。”“省、省辖市两级的机构改革，注重加强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和社会管理职能。县、乡两级的机构改革，则侧重加强服务体系的建设。”全会强调：这次机构改革和以往不同，就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逐步向这个目标前进。全会要求，这次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总数，要减少25%。

根据十四届二中全会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全国展开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机构改革。1993年机构改革以前，国务院共有工作部门70个，其中部委41个，直属机构19个；改革后，国务院有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共59个，其中办公厅一个，部委40个，直属机构13个，办事机构5个。国务院非常设机构也进行了大幅度精简，由原来的85个减为26个。这次改革在综合部门中新组建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旨在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中重大问题的协调，并把专业经济部门划分为三类，一类改为经济实体，不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一类改为行业总会；还有一类是保留和新设的部门，主要职能是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

这次机构改革的最大特点，一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二是以转变职能为重点，提出政企分开是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这次改革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这次改革仍没有彻底解决政府机构的诸多弊端，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仍非常突出。

1997 年 9 月，“十五大”提出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的新任务。会议指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必须通盘考虑，专门组织力量，抓紧制定方案，积极推进。”“十五大”报告中确定了此后一段时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要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要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

党的“十五大”之后，党中央又一次抓紧解决政府机构改革这一重大问题。正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在 1998 年 2 月召开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总目标：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干部队伍，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根据以上的目标，1998 年 6 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就机构改革制定了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方案”，对国务院组成部门进行了大幅度精简，同时对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以及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进行了相应调整。这次机构改革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大、难度最大的一次改革。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建设过程中，按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机构，实现一步到位难以做到。因此，这次改革重点是解决当时突出的矛盾，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总体上看，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着政府对经济具体事务干预过多、政府机构设置不够精简、中央与地方之间责权不够明晰等问题，特别是重大疫情的爆发突出了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继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协调、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这标志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逐渐向深层次推进。

九、大力加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992 年以前的立法，基本上是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线的，在规范企业组织和行为、规范经济秩序、经济管理以及涉外经济活动等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展。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选择尚不确定，改革开放还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因此，市场法制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1992 年以后，市场法

制建设进程开始加快。"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强调"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1993年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这突出表现在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指导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规范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劳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和规范基础产业发展、改善环节方面的法律。

到2001年，中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仅从"十五大"到2001年间，除宪法以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84件、有关法律的决定117件、解释2件，共403件；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部门发布行政法规913件。这些法律，大多数涉及市场经济的运作。

但是，与市场经济对法治化的要求相比，已有的法制建设在产权法律制度、市场交易法律制度、执法和监督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要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加强产权法律、市场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加强执法和监督。这标志着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向法治化方向进一步推进。

十、以对外开放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1992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启动了新一轮对外开放进程。这一期间，中国加大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力度，并最终达到了目标，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这一进程反过来加快了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1986年7月11日，中国正式照会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秘书长，要求恢复成员国席位。1994年4月15日，中国同其他122个缔约方，签署了实施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最后文件。1997年3月6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正式谈判开始。到2001年9月，中国已经同全部要谈判的国家达成了协议。2001年11月，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国入世议定书。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十几年的努力变为现实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又给一国经济结构及体制带来巨大压力。1992年以来，党和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压力，不断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来说，党和政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第一，改革现行外经贸管理体制，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一是按照世贸组织的

要求逐步消减关税，使之最终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二是减少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证。三是清理对外商投资的法规政策，使之符合“国民待遇”的原则。

第二，实施促进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调节体系，增强国民经济对抗冲击力。通过完善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广泛运用资本市场实现企业跨地区重组；通过鼓励优秀企业兼并劣势企业，发展专业化协作；通过鼓励国内企业与外国大公司联合或被兼并，从而更新产品和生产工艺、设备；通过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结合，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第三，推进金融改革，加快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按企业化经营的要求转换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确立效益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同时，大力化解不良资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此外，通过进行综合性银行的培育，发展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业务于一体的国际性金融集团，以增强与国外金融集团抗衡的能力。加强中国中央银行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银行的监管，以发挥其融资、筹资和为国内商品生产和流通服务的作用。

第四，通过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适应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宏观管理体制。按照世贸组织透明度原则，改革外资审批制度，严格依法办事，确保审批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逐步形成“服务式”管理。

第五，完善法制，加快与国际经济法律接轨。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础，包括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制度，充分尊重和保护产权制度，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国家的宏观管理制度等；通过调整修改中国的现行法律法规，使之符合国民待遇和世贸组织有关法律法规等。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以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体现的市场经济体制原则为参照，不断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是成功地利用外部压力促进国内体制改革的范例。

第三节　运用宏观调控艺术，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原有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渐失效，而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形成，如何在实现体制转换的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面临的一个极其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情况面前，沉着应对，灵活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保持了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一、治理经济过热，实现经济“软着陆”

1992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由于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还没有消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从1993年开始，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

1992年开始，党中央就提醒全党，要防止新的经济过热。4月4日，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提醒大家注意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要防止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要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管理效能。

从1992年10月至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经济发展中突出问题的政策措施。1992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参加的经济情况通报会，提出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注意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保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1993年3月7日召开的十四届二中全会指出，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控制投资规模，管好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这两个闸门，调控国家财政收支，保持重大经济比例的基本平衡，按经济规律办事。4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会议指出，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要在重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同时，适当运用行政手段。要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的建设，缓解“瓶颈颈”制约。随后，江泽民先后在上海、西安、大连、广州主持召开部分地区经济工作座谈会，统一大家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反复强调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是我们领导和组织好经济发展与改革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的文件，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下的宏观调控全面展开，也标志着“软着陆”的启动。文件制定了16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经过几个月全国金融和财税的全面整顿，加上对开发区、房地产、在建项目的清理和整顿，到1993年底，经济混乱局面得到控制，并初步抑制了经济过热。

在宏观调控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使宏观经济管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决定，推出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价格等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大改革措施。

这一时期从整顿金融、财税秩序入手的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在解决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旧体制的阻碍作用日益严重，深化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途径。因而，1994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国务院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大好形势、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与指导的政策和措施：一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建立起分税制基本框架，国税局和地税局两套税务机构组建工作基本

完成并已开始运转；流转税体系进行重大改革，简化税率，统一规范，确立了增值税的主体地位；分别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调整了资源税等税种。二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从1994年4月1日起，开始按照新外汇体制运作，成功地实现了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并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趋于市场化。取消了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对国际收支进行宏观调节。三是外贸、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向前进。1994年外贸管理体制进行了取消外贸指令性计划，公开配额管理、扩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等改革。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中央银行增加了间接性经济调控手段的运用，强化了货币供应的调控能力，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成立，基本实现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专业银行逐步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

1994年在经济改革整体推进过程中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过热的势头进一步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由于有效供给不足和前一时期投资需求膨胀滞后的原因，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物价上涨过快，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过快的现象。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共中央提出，一方面要增加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中共中央在制定“九五”计划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写进“九五”计划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政策部分中。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宏观调控取得圆满成功，国民经济进入良性运行状态，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江泽民在199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宣布，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经济较为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92年的14.2%逐步回落到1996年的9.6%，平均每年回落1个多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由1994年的21.7%下降到1996年的6.1%，共回落了15.6个百分点。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2.1%，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标志着“软着陆”的成功实现。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金融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已显得日益重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金融稳定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地位，通过稳定金融，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从1992年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高潮。但是，由于人们认识的误差，一些地方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当成了过分追求高速度、上项目，盲目设立开发区和投资房地产等。到了1993年上半年，金融业出现了违章拆借、非法集资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运行的环境，影响了改革开放的继续扩大。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从1993年上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金融业加强治理整顿，并把它作为加强宏观调控的切入点和主要措施。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金融的整顿工作提出了以下措施：一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二是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三是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大增加储蓄存款。四是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行为。五是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六是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七是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为了落实中央六号文件的精神，1993年7月5日至7日，中央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统一思想认识，端正思想作风，推进金融改革。

通过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和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治理整顿工作很快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开始进行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一改革方案，国务院于1993年12月25日作出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银行、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建立金融市场、改革外汇体制、正确引导非银行机构稳健发展和实现金融管理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1997年夏，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是长期以来存在的政府行政干预信贷，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信用关系被扭曲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二是国有专业银行没有真正形成自我约束、自主经营的机制，在内部控制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三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还很不规范，法制不健全。四是金融监管薄弱，监管体系很不健全，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机制不完善。五是金融秩序仍然比较混乱。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一旦金融活动失控就会危及整个经济运行。

199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做好防范金融危机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会议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工作的核心，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深化和加快金融改革，进一步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引导金融业健康发展。会议要求，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隐患，增强防范和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总体上看，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党和政府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一是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把中国人民银行由原来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改为按经济区跨省设置分支机构。全国成立20个金融监管办事处，由各分行直接派员，对辖区内的金融业进行检查监督，并处理突发事件。1998年，成立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委员会，配合银行按经济区跨省设置分支机构，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二是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改变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调控方式。在1994年放开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管理的基础上，1998年1月起正式取消四大国有独

资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管理体制。三是加快国有独资银行商业化步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按经济区划和业务量来确定其数量、规模，精简机构和人员，实行垂直领导，统一管理，分级经营，统一核算。同时，还改革了存款准备金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货币工具的改善，增加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把过去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合并，称“准备金存款”。为了保证商业银行存款支付和资金清算，于1999年建立专门负责收购和处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四是规范和稳定证券市场。通过证券法的颁布执行来约束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各类中介组织规范运作，守法经营，通过严格的市场监管，以保证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以防范金融风险，并通过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来积极培育规范的机构投资者。同时，还采取了宏观手段，包括努力增加出口；调整外资政策，更加积极地利用外资；积极扩大内需；严厉打击走私等措施。

面对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党和政府冷静分析，沉着应对，采取果断措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方面，国民经济运行良好，改革和发展各项指标基本实现。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而且稳中有升。这不仅是亚洲经济的一个“奇迹”，而且是全球经济的“亮点”。

三、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

经济结构能否得到及时调整和优化，是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从战略的高度分析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虽然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并没有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是出现“高增长、低效益”的格局，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地优化。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应当着力提高第一产业即农业的质量，稳步增加产量；继续发展第二产业，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出现了明显变化，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但在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的情况下，经济结构中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结构不合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无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处于较低水平；地区结构不合理、城乡结构矛盾的突出不仅影响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影响到社会稳定，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针对各种结构矛盾的相互交织，党的“十五大”提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总的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挥各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结构调整进入攻坚阶

段，“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制定“十五”计划，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新技术革命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为着眼点，培育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经济结构展开了全面调整。

一个符合现代经济成长规律，符合小康社会建设要求，同时又有利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但是，正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仍然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尚未完成，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第四节　制定和实施面向新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经济带入新世纪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面向新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与计划。

一、“九五”、“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制定

根据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是第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中长期规划，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确定了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并阐明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纲要》提出：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今后15年，必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条方针：(1)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3)实施科技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4)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

(5) 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6) 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7) 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8) 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9)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九条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以来17年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指导中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指导方针。

"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到1995年，"九五"计划顺利完成，在此基础上，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经济发展跨世纪远景目标的提出、"九五"计划的完成以及"十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跨世纪经济工作战略。这是新世纪党的经济工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战略保证。

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制定人才强国战略

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国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中国经济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长远的根本大计。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等西方国家依靠科学技术的优势，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向世人展示了高科技在现代战争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同年4月，江泽民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竞争已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我们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要下决心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5月23日，江泽民出席中国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向全党发出了"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号召，并强调这一转移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具有同等重要的战

略意义。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要作为全党的共识进一步确定下来。1993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 20 世纪末中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到 20 世纪末，中国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建设好一批重点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促进经济建设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转移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在 1995 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在反思传统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因素做出了新的判断，对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了新的选择，把科技进步当作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把加速科技进步真正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

《决定》发布后不久，1995 年 5 月 26 ~ 30 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在这次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作出的重大部署”，“是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正确选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使生产力有一个新的解放和更大的发展”。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相关政策中，都要真正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确立下来，并提出了面向 21 世纪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建议。科教兴国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97 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并强调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特别强调：“要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形成我们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的步伐。这对于我国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对加强技术创新和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作出决议，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

科教兴国，重在落实。中共“十五大”以来，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新阶段。1999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提出，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进

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

199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是：通过一个中心环节来推进其他工作。"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始终把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合作为关键，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首先，从组织领导入手，加强了对科技、教育、经济这三者在改革、发展上的组织协调。199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朱镕基任组长，李岚清任副组长。其次，进行了重点部署。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相继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进行了具体的部署。第三，通过全面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新型科技和教育体制。1997年江泽民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上批示：必须改革科技体制，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加强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科技成果更快更好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以"党管干部"的方式来管理人才。2002年底，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党管人才"的原则；2003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明确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原则。人才强国战略既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是科教兴国战略的纵深发展。

三、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党中央关注的另一个战略问题。鉴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问题。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题》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并承诺履行会议文件。会后不久，国务院就组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实施《21世纪议程》的行动方案。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地提出中国在第三步发展战略中要实行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6年7月，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指出：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针对生态恶化的现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投资几千亿元，实施六大林业重点工

程，从根本上改善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投资之巨为历史所罕见。

党的“十五大”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这一国情，提出要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把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在1998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和环保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指出，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关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繁衍，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不仅本世纪最后这几年要抓得很紧，下个世纪也要抓得很紧，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抓得很紧。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有关部门制定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制度。

1999年1月，根据中共中只有关精神，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了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奋斗目标，规划了优先实施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制定了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措施。

为了使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1999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江泽民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环境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并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把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作为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加快了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立法的步伐，制定和进一步完善了一系列环境法规，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与措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促进了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制定和稳步推进。在污染防治工作方面，加快污染由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把环保计划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强化各级政府对环境的监督管理，并逐步增强城市环境建设的投人，通过加强环境科研，发展环保产业，以科学技术来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各级政府以解决流域、区域和城市环境为重点，大规模开展了环境污染治理，结合压缩过剩生产能力，关闭淘汰了一大批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到1999年，全国23万家有污染的工业企业，81%实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达标；淮河、辽河、海河和太湖、滇池、巢湖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城市环境治理和保护取得明显进展；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的污染防治初见成效。

但是，长期形成的资源环境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因此，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这标志着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认识的深化。

四、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进入世纪之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将实现的时候，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源于邓小平 1988 年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到 20 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沿海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

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党中央就开始酝酿规划，并相继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要从“九五”开始，更加重视支持内地发展。1997 年 3 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使重庆成为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这是加快西部发展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五大”强调：“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的联合与合作。”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这样，中国共产党便逐步地形成了西部开发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区域协调发展，并以此为指导，对经济工作作了相应部署。

西部开发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为此，国务院采取了在西部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和移民开发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加大投入，加快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1998 年以后，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国家将更多的财力直接用于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1998 年国家增加的财政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占 62%，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地区。

1999 年以后，党中央将西部开发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摆到更突出的位置。6 月 9 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999 年 9 月 22 日，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 年 1 月，国务院专门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朱镕基总理任组长，温家宝副总理任副组长。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精神，朱镕基总理先后赴西部 6 省区实地考查和调研，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工作重点：一是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

“十五”期间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时期。2000 年 10

月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了专题阐述，其基本思路是：（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一批交通、水利、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实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2）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改善西部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3）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业，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优秀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深度加工，加快培育旅游业，努力形成经济优势。（4）发展科技教育，做好人才培养、使用和引进的工作，实行干部交流，推广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5）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有重点地推进开发。（6）国家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增加建设资金的投入。加大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7）加快西部地区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活力。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国务院明确规定西部地区开发的目标是：力争用五到十年的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0世纪中叶，将西部地区建设成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从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等方面，对如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了具体规划。

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到2001年的三年多来，西部大开发取得重要进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好势头，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和人才开发工作力度加大，对内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走上新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关于建立小康社会的思想提出后，一直是指导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六五”计划、“七五”计划和党的“十三大”都对小康问题作了具体设计。到1990年，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又正式作出了奔小康的战略决策，这样，奔小康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曲。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初步提出了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规定了到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并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表明“我国还是处于小康阶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共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十五大”还根据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及其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21世纪新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对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总体规划，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小康社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此后，党中央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中都继续发展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2000年，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要求和任务。党的"十六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全面部署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体制基础的全面改革。这就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起来。具体来说：

第一，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党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较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这十几亿人口的大多数，约有8亿是在农村。可以说，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和农民实现全面小康的任务也最为艰巨。农村不仅有3000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还有6000多万人没有稳定地解决温饱。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

第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指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物质文明；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处理好发展、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就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使党的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实现。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为了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这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要完成发展和改革的艰巨任务，必须有一个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必须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第四，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求加快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还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文明和有利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进入了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节　创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特点与经验

1992～200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是一个跨世纪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时期。经过十年多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经济市场化、开放化、现代化和法治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启动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人民生活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总结执政经验特别是经济工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总结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等创新性经济理论。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构建面向新世纪的经济工作战略与规划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世纪新时期的经济工作战略思路，包括新世纪“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安排、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安排等。在全面总结、创新和拓展经济工作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凝聚成丰富的新鲜的经验。

一、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特点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在前10多年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探索的历史使命。时代将两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199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展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始立足时代的要求总结党的执政理论，经济工作被提升到执政党建设的高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领导中国跨入新世纪的任务，经济工作成为跨世纪的主题之一。这种时代特征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具有诸多特点。

（一）经济工作地位进一步提升

197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经济工作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领域。但是，如何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高度认识经济工作的地

位和内涵，还是一个留待探索的问题。199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集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进一步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角度提升了经济工作的地位，丰富了经济工作的内涵。

首先，“三个有利于”标准拓展了党的经济工作的探索空间。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发达国家共产党组织纷纷改弦易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探索和发展，经常伴随着右的和“左”的干扰，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姓社姓资”的视角看待这些变化，导致改革开放难以迈开步子。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拓展了党的经济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探索空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判断改革成败有三条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条，实质上就是发展生产力。因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离开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办不到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经济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地位，依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即经济工作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同时，“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改变了把生产关系、政治态度、意识形态等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标准的思维方式，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观。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经济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突出地位。

到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乃大势所趋，中国虽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信息化、网络化更使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知识创新力度加大；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质，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从国内环境看，进入新世纪，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进入了全局性的整体推进时期，任务艰巨而复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对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做出了更加全面、系统、深刻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州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他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突出重要地位。"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三个代表"中的基本方面。这就将发展生产力，从而将党的经济工作放在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

第三，"第一要务"的提出明确了经济工作在执政党建设中的价值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十分重视执政的要务问题。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鲜明地提出，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代表全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世纪的奋斗目标，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将发展当作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从执政党建设的高度肯定了经济工作的价值意义。如果说1979年提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标志着经济工作开始成为党的工作重点，而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则标志着将党的经济工作上升到执政兴国的角度予以确认，将经济工作与执政党的建设，与执政兴国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使经济工作的地位具有了不可动摇的性质。

（二）注重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1992～2001年间，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跨世纪的时期，这需要党中央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战略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集中精力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战略问题。这一时期，党中央注重制定跨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并着力推进这些战略的实施。

首先，注重战略的全面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与实施的经济战略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分别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后呼应，互相衔接，分别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战略推进方略。在经济发展方面，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未来15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完整的战略构想。

其次，注重战略跨世纪的衔接性。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到21世纪初期，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到201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两个战略阶段衔接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纲要》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也是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跨世纪蓝图。《纲要》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纲要》重点放在"九五"计划，同时着眼于21世纪前十年的发展，提出了轮廓性的远景目标，使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战略衔接起来。

第三，注重战略的细化和具体化。为了将这些战略的实施落到实处，党中央注重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经济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西部开发、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人才强国等战略。正是这些具体的战略，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宏观战略的实现。

第四，注重抓战略的落实与实施。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经济战略的实施。一是加强战略实施的组织领导。例如，为了切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3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李鹏任组长。为了协调科技与教育的发展，1998年6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朱镕基任组长。为了切实实施西部开发战略，2000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二是抓战略的实施方案。例如，为了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1994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了《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包括农业、能源与环境、交通运输、原材料与资源、信息与通信、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等7个领域共35项关键技术。这些关键技术对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2001年5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又宣布了"十五"计划高技术产业重点，包括高速宽带信息网络、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软件产业等战略性领域。为了发展教育，1999年2月24日，国务院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批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了跨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施工蓝图。

（三）驾驭复杂经济工作局面的能力逐渐增强

如前所述，1992~2003年间，中国共产党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开展经济工作的。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能力形成挑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各种挑战，经济工作能力逐渐提高。

首先，驾驭宏观经济运行的艺术逐渐成熟。"软着陆"的成功实现就是突出的例子。1992~1993年间，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高速度，同时，由于旧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完善，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新的过热现象。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发现上述问题，并果断采取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到1996年，经过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发展过快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大起大落，同时又实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这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现，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和艺术。具体来说，一是认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1992年4月4日，在经济过热只是出现苗头时，江泽民就写信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要在深化改革上下狠功夫，避免只在规模上做文章，以防止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1993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向当地负责同志谈到：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二是在党内统一对经济形势判断的认识。1992年10月到1993年6月，中央两次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向各地、各部门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通报宏观经济中正在出现的新问题。要求各地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统一，做到

既要加快发展，尽力而为，又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避免大的起伏，避免大的损失，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趋于一致，为中央和国务院采取进一步的宏观调控措施准备了条件。三是协调行动，采取统一的措施。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文件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16条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从全局出发，从长远的持续发展出发，协调行动步伐。四是在宏观调控手段上实行创新，即避免历次宏观经济紧缩中主要采取行政手段的方法，针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同时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以经济手段的效果以及保证中央政令和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在当时实施的16条措施中，有13条主要强调的是运用经济手段。五是正确处理宏观经济调控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党中央认识到，尽管有宏观经济过热，但经济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好的形势来自改革，保持和发展好的形势又必须深化改革。要不失时机地加快改革的步伐。因此，在治理经济过热的过程中，要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采用新思路、新办法，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把改进和加强宏观管理，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

其次，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逐渐增强。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97年夏天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亚洲经济，而且影响波及全球。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货币对外贬值50%以上，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的货币对外贬值10%～20%，俄罗斯连续发生四次金融危机，卢布暴跌。而中国不仅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且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堪称亚洲经济的“奇迹”。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容应对，采取了坚定而合适的应对策略。具体来说，一是党和政府高层高度关注和警惕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这场危机刚爆发，党和政府就多次研究如何应对的问题，而且将这种应对提高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予以认识。二是慎重决策，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这场危机中，人民币承受巨大的贬值压力。一派观点基于保证出口增长的需要主张人民币贬值，但是，经过反复论证，中央高层认识到，人民币贬值必然带来港币贬值，从而加剧亚洲地区的货币贬值，必然使已经出台的汇率改革的成果大打折扣，损害外商投资利益，因此，人民币贬值得不偿失，代价高昂。中央决定人民币不贬值。实践证明，人民币不贬值，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促进亚洲经济走出困境，都具有重大意义。三是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1998年初，面对不断加剧的金融危机，中央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对，埋头苦干”的应对总方针，制定和实施了扩大内需，积极扩大出口，适当增加进口等重大决策。下半年，针对国内需求对经济拉动力度不够，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中央又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经济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

第三，成功处理了港澳回归中的经济问题。香港、澳门回归，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事，处理好港澳回归中的各种问题，关系到香港和澳门的未来发展，如何处理这些

问题，也是对党和政府能力的考验。在港澳回归过程中，经济问题的处理是关键性的。在香港回归之前，港督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提出了不少跨越1997年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承诺，例如排污工程跨越1997年，大量的工程投资关系到199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财政能力。同时，伴随香港的回归，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大型工程如果不协调，也会造成损失，不利于两地经济发展。因此，妥善处理经济问题，对于保持政策连续性，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3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下专门成立了经济专题小组。经济专题小组依据确保政权顺利交接和香港长期繁荣的原则，先后召开21次专题会议，完成了退休保障问题、香港政府资产分布管理及交接、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编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土地基金的交接、香港与邻近地区基建衔接和香港与内地贸易统计等8份课题研究报告，完成了12份建议和意见。在政府资产移交等与1997年政权移交相关的财经事务，新机场建设、联系汇率等对平稳过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以及"九七"后两地经济往来政策方面提出了诸多决策建议。1996年3月25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经济小组成立，并对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经济小组提出了上述意见与建议进行逐项研究，分别建议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处理或提交特区政府。决定在经济小组下设债务清理、大型基建、财政金融和香港经济发展方向等四个专责小组开展工作。到1997年5月，经济小组召开多次会议，为香港政权交接中经济问题的处理以及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的经济工作奠定了基础。到6月底，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根据经济小组的工作建议与意见，先后就政府资产移交等重大经济问题的处理签署文件。完成了香港政权移交中的经济工作。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处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关系。1998年5月5日，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与此同时，启动和完成了澳门回归中的经济工作。

（四）在经济工作中始终关注群众利益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992～2003年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推进，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利益关系对各项改革措施的敏感程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将经济工作与关心人民群众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突出任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三个代表"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而且在经济工作中切实履行这一思想。

首先，关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比较多的下岗职工，其基本生活遇到困难。党中央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党中央多次强调，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几十年来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时刻关心他们，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1998年5月14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制定企业富裕人员下岗分流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措施。会议指出，这项工作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一定要有保证。资金由政府、企业和社会承担。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

工作的通知》，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并力争每年实现再就业的人数大于当年下岗职工的人数。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各级政府要努力扩大就业，从税费减免、小额贷款、社保补贴、就业援助等10个方面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扶持。

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先后为下岗职工建立起“三条保障线”：一是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费；二是三年后未就业者转为享受失业保险；三是失业保险满两年仍未就业者，可以按规定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通过加强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其再就业服务中心，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大力推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1998—2000年间，全国累计有210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其中130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证。

其次，始终高度关注农民收入问题。一方面，从点上看，关注扶贫开发问题。1993年，全国农村尚有8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尽管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不到9%，但扶贫开发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缓解以致彻底消灭贫困，不仅关系到逐渐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而且关系到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共同富裕以及为全国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1994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从1994年到2000年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6年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和全社会切实做好工作，确保实现在20世纪末期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1999年中央再次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

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99年，全国592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347元。到2000年，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2001年5月24日，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的成就与经验，讨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年—2010年）》，部署21世纪头10年的扶贫开发工作。

另一方面，从面上看，关注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问题。1996年以后，在实现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增速放慢。为此，“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将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一时期，主要采取了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这些措

施，种植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畜牧业发展步伐加快，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能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给予“三农”问题极大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包括“放开粮食收购市场，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国家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等。

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多年来农民负担过重、增收困难以及税费制度不合理而进行农村税费改革。2000 年 3 月 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和农村教育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大幅度降低了农民负担，初步规范了农村生产关系等。

第三，注重构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体系。2003 年，中国经历了一次“非典”疫情的袭击。在严峻挑战面前，党中央总揽全局，沉着应对，果断决策。中央财政先后拨出 50 亿专款用于防治“非典”；成立了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依法进行管理；颁布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建立完善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制度与信息发布制度；明确提出防治“非典”与经济建设两手抓的方针。抗击“非典”的胜利，一方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亲民爱民、开明开放、务实高效、坦诚负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积累了丰富的抗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2003 年底，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可能影响人民生命健康的禽流感爆发，中央和政府及时启动应急机制体系，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五）重视调查研究和经济决策的科学性

1992～2003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经济工作特别是制定重大决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调查研究和咨询论证，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首先，强调战略规划的前期调查研究。例如，1993 年上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着手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项工作以开展调查研究为先导。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共 300 多人组成 16 个专题调研组，分赴各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为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作了充分的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在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多次听取汇报，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并多次召开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座谈会，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在党内外多数同志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规划取得统一认识的基础上，1993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党中央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决定》。再例如，“九五”计划和未来远景规划的制定，早在 1993 年就已经开始酝酿。1994 年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家计委要求各地计委及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并委托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全面系统地研究“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划问题。1995 年 3 月，在中央直

接领导下，成立了起草小组，同时，中央组织了15个调研组，分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调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建议》草案经过近5个月的反复修改，逐渐臻于成熟。在“九五”计划即将完成的时候，党中央就开始筹划新的战略部署。2000年春，国家计委发布国家即将研究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信息，并向有关研究机构下达“十五”计划重大研究课题，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利用信息网络，设立“十五”计划献计献策专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在计划制定过程中，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听取各部门汇报。经过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共识。

其次，实行重大决策出台前的民主协商制度。到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形成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出台前及时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听取意见的制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150余次，其中，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有82次。在协商中，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与采纳。

第三，充分发挥各类咨询机构在重大决策中的咨询作用。为了整合学术力量提供决策咨询，199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等有关政策研究部门联合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决策科学研究会，这是中国首家专门从事政策科学研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为各级决策部门提供政策与决策咨询的全国性学术团体。1994年6月，成立了中国工程院，这是全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和咨询性学术机构。1994年12月22日，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等单位组织的全国软科学工作会议召开。1986年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以来，全国的软科学工作者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长江拦门沙综合治理工程等重大工程的决策。江泽民在接见会议代表时指出，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软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决策的重要环节，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及时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1992年到200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在全面创新，形成明显的阶段性特色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构成对未来经济工作的启示。

（一）在经济工作中要善于抓战略机遇

在日益复杂与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开展经济工作，必须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把握机遇。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机遇意识的政党。1992～2003年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实现了十年的快速发展。而在21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又抓住了新的战略性机遇。

1992年以前，治理整顿的结束和“七五”计划的完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周边一些国家加速发展的势头，在对中国形成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这一时期，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尚未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些人提出了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些人则由于思想顾虑，在行动上不敢改革，不敢开放，不敢发展。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中国势必丧失一次大好的发展机遇。

1991年年后，党中央就召开一系列专题座谈会，研究加快改革和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就是好机会。要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此后，党中央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统一了全党抓机遇的意识与行动。到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好时机。根据“十四大”的精神，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确立了抓住国际国内有利时机，在整个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指导思想。为此，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将“八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的6%调高到8%~9%。

正是由于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这次机遇，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方面中不断开拓新的局面，实现了初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小康社会这两个目标。

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又认识到，21世纪头20年，将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这20年间，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国际环境为中国提供了众多回旋的空间和机遇、，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有利于中国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继续工业化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加速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更加有利于中国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骄不躁，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发工作。

（二）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经济工作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开展经济工作，不断学习，提高全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改进经济工作方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1992~2001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不断通过加强全党的学习，增强了全党开展经济工作的能力，提高了经济工作的艺术和水平。

首先，加强全党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

平。1993年10月4日，中共中央主办第一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1995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党员中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学习活动的意见》。中央还组织编写《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一书，对全党学习加强理论指导。“十五大”召开以后，中共中央举办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研讨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完整、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运动。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后，又在全党开展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实践证明，这些学习活动对于统一全党认识，提高领导水平，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学习法律知识。199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举办法制讲座，听取关于“国际商贸法律制度及其关贸总协定”的法律知识讲座。从此，党中央开始不定期举办专门的法制讲座。内容涉及“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等，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学习法律知识，带动全党形成了自觉学法用法、增强法制意识的风气。

第三，学习财经专门知识。2000年1月12日至19日，针对财税工作中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需要对国内财经政策做出较大调整的需要，中共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为了更好地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新要求，中共中央于2002年2月举办省部级干部“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

第四，学习现代科技知识。为了提高领导干部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能力，中央组织编辑出版了《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读本），1994年2月6日，江泽民为该书作题为“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序言，他强调，加紧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干部要从事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高度来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增强学习自觉性。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到200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举办了12次科技知识讲座。

实践证明，在党内开展学习理论、法律知识、经济知识以及现代科技知识，直接提高了全党应对入世挑战、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应对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本领，提高了全党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改进经济工作领导方式

1992～2003年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相应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工作领域上看，逐渐从微观经济领域和具体经济事务退出，主要对宏观经济进行战略指导；从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上看，逐渐从主要运用计划、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指导经济工作转向主要运用经济与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中，党的经济工作无疑要继续推进和深化这种转变。具体来说：

首先，依法开展经济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模式的同时，也逐步认识到法制建设对于这一过程的重要性。1995 年 1 月 20 日，在中央举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讲座上，江泽民强调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这就明确地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要逐步从依靠政策转向依靠法律，要依法治国，同样，要依法开展经济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逐步推进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市场法制建设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而且改变了党的经济工作的方式，即将党的经济工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党和政府已经确立 2010 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这一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的目标，因此，党的经济工作方式也将进一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其次，党和政府开展经济工作的领域与方式上的区别应该逐渐明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政府在经济工作的领域与目标上是统一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命题就说明了这种统一性。但是，一方面，执政党的重要工作还在于执政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经济工作只是其工作的一个主要层面。另一方面，政府是有届别的，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没有届别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工作方面的着眼点客观上是有差别的。因此，作为执政党，必须逐渐明晰党和政府在经济工作的领域与方式上的区别。

1992～2003 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即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行政等方式，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实践中，党主要致力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创新，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与实施战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战略推进方略，对于具体的经济工作，主要是通过党的建议的方式影响政府的决策，并因此变成政府的具体方针和政策。这种转变不仅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这种区分将进一步明晰。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经济工作方法要适应国际通行规则。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已经承诺按照国际经贸规则办事和逐步开放市场，这要求党和政府的经济工作必须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在经济工作中必须依法办事。20 世纪 90 年代，党和政府已经在转变管理经济的方式，增强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性，提高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的能力方面作出了努力。

21 世纪前 10 年，中国将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且，伴随“入世”保护期的结束，国际经济体系对中国党和政府经济工作方法的规范性要求将进一步趋向严格，如何进一步转变经济工作方式，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紧迫课题。正如江泽民在省部级干部“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上所指出的，加入世贸组织，要求我们各级

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办法有一个大的改进。要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合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为规范和法律体系。要把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要求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正确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和壮大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作为政府调控和管理经济的主要任务。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健全法制、诚信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第四，在有关经济工作的制度上进一步创新。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为了加强党对重要领域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例如，1998 年 6 月，为了保证金融机构建立垂直领导的体制，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委和金融系统党委；1998 年 7 月，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领导干部管理制度，成立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1998 年 9 月，首批 21 名国务院任命和派出的稽查特派员陆续进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进行实地稽查。2000 年 8 月，为了健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督机制，加强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国务院派出的 15 个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进驻 16 家国有重点金融机构，同时，中央金融工委也向 5 家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金融机构派驻了监事会。这些制度创新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实践中也显示出成效。但是，伴随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推进，建立规范的现代产权制度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将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在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完善上述制度，将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经济工作方式探索上面临的课题。

（四）新时期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观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着片面理解经济发展内涵的误区，主要表现在将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结构的升级、经济成果分配的公平以及经济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种认识导致了 1979 年以前经济工作的诸多失误。

这种认识在 1992 ~ 2003 年间开始改变。一方面，党和政府逐渐将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优化的整体过程。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对 1992 年以后的经济过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适时启动了“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措施。另一方面，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例如，1994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社会发展会议。会议研究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认为社会发展是实现小康水平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 2010 年以前社会发展工作重点，包括通过计划生育和发展教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环境保护、使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就业，促进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消除贫困，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已经确立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经济、文化全面协调的新的发展观，他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党的“十六大”则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确立为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

但是，从整体上看，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中，推进全面协调的发展还只是破了题，尚未完全启动。首先，到 20 世纪末期，在具体经济工作的战略上，还主要是实施差异发展。例如，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为主，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为主，在地区发展的格局上，强调的是东部发展为主。其次，在现实的具体工作中，一些地区的党和政府部门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追求产值，追求近期政绩，而忽视全面的经济发展，忽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短期化倾向。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真正坚持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还是一个有待于党和政府解决的艰巨任务。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通史

第一篇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第一章　解放前夕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残破状况

第一节　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经济形式也是十分落后的。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封建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又分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经济构成的，其中帝国主义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经济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形成的。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帝国主义经济、封建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是进步的经济形式，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得不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没有走通。

1927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中出现了新民主主义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

第二节　解放前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残破状况

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一种十分落后的经济形态。就是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榨掠夺和连续12年的战争摧残破坏，到1949年解放前夕，已经处于崩溃状态之中。1949年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处于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其经济破产情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在工业生产方面，到1949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最高年产量大大下降（表1）。

表1　　1949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比较

产品名称	单　位	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1949年产量	
		年　份	产　量	产　量	为最高年产量的%
纱	万吨	1933	44.5	32.7	73.5
布	亿米	1936	27.9	18.9	67.7
火柴	万件	1937	860	672	78.1
原盐	万吨	1943	392	299	76.3
糖	万吨	1936	41	20	48.8
卷烟	万箱	1947	236	160	67.8
原煤	亿吨	1942	0.62	0.32	51.6
原油	万吨	1943	32	12	37.5
发电量	亿度	1941	60	43	71.7
钢	万吨	1943	92.3	15.8	17.1
生铁	万吨	1943	180	25	13.9
水泥	万吨	1942	229	66	28.8
平板玻璃	万标准箱	1941	129	108	83.7
硫酸	万吨	1942	18.0	4.0	22.2
纯碱	万吨	1940	10.3	8.8	85.4
烧碱	万吨	1941	1.2	1.5	125.0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1941	0.54	0.16	2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279页、242页～248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由表1中可见，工业产品产量是普遍下降的。其中生铁和钢下降最多。1949年生铁产量仅及最高年产量的13.9%，钢产量仅及17.1%。

在农业生产方面，1949年与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农业产值下降了两成以上，主要农产品产量也都大幅度下降（表2）。

表 2　　1949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比较

产品名称	单　位	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1949 年产量	
		年　份	产　量	产　量	为最高年产量的%
粮食	万吨	1936	15000	11318	75.5
棉花	万吨	1936	84.9	44.4	52.3
花生	万吨	1933	317.1	126.8	40.0
油菜子	万吨	1934	190.7	73.4	38.5
芝麻	万吨	1933	99.1	32.6	32.9
黄红麻	万吨	1945	10.9	3.7	33.9
桑蚕茧	万吨	1931	22.1	3.1	14.0
茶叶	万吨	1932	22.5	4.1	18.2
甘蔗	万吨	1940	565.2	264.2	46.7
烤烟	万吨	1948	17.9	4.3	24.0
大牲畜年底头数	万头	1935	7151	6002	83.9
猪年底头数	万头	1934	7853	5775	73.5
水产品	万吨	1936	150	45	3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158 页 ~ 164 页、177 页、178 页、181 页、185 页。

从表 2 看，粮食产量由 15000 万吨下降为 11318 万吨，下降了 24.5%；棉花由 84.9 万吨降为 44.4 万吨，下降了 47.7%；黄红麻由 10.9 万吨下降为 3.7 万吨，下降了 66.1%；茶叶由 22.5 万吨下降为 4.1 万吨，下降了 81.8%；大牲畜由 7151 万头下降为 6002 万头，下降了 16.1%；猪由 7853 万头，下降为 5775 万头，下降了 26.5%。

此外，农具、肥料减少了 30%，水利失修，水旱灾荒严重，1949 年全国农田受灾面积达 1.2 亿亩，灾民 4000 多万人。

二、交通运输严重破坏

铁路有上万公里线路、3200 多座桥梁和 200 多条隧道遭到严重破坏。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没有一条全线通车，机车有 1/3 无法行驶。公路通车不到原有线路总长度的 80%。上海港可航驶的轮船只有 14.5 万吨。航空方面，飞机、器材以及驾驶人员都去了香港。

三、国民党统治区中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投机倒把盛行，工厂停工破产，人民失业，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残破崩溃之中

国民党由于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政府财政恶化，大量增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从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上涨了4万亿倍。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再加上长期战争和交通阻塞，使得城乡内外交流严重滞塞，城市物资极端缺乏，有的地方出现物物交易，大批商人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炒买炒卖黄金、银元等，使得金银、物价猛烈上涨，许多工厂停工倒闭。1949年4月，上海1000余家机器工厂，开工的不到100家。1947年—1948年间，天津机电修配业由363户减为216户，倒闭了144户。在昆明，1947年，国营工厂有13家，倒闭了5家；省营工业有19家，倒闭了6家；商办工业45家，倒闭了26家。在青岛，1948年1400多家工厂中，只有1/4是半开工，其余的全都停工了。由于大量工厂停工倒闭，失业人口大量增加。1946年，上海产业工人失业者30万人，北平失业人口70万人，成都失业工人10万，重庆失业工人6万，昆明失业工人5万。

到解放前夕，失业人口更是大量增加。解放前夕，天津失业工人11.3万人，其他城市也充满了失业人口。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如中纺天津分公司，平均工人工资，1948年9月，可折合玉米面347.27斤。到10月份，就只能折合玉米面49.18斤，下降了85.66%。冀北电力公司工人工资，1948年9月折合玉米面482.2斤，10月份只折合玉米面75.66斤，下降了84.32%。成都国民小学教师的薪水，每月拿不到100万元，平均每小时只合4000元（每月工作约250小时），而当时的物价，寄一封平信要5000元，吃一碗茶要二个或三个4000元，在上海吃一个烧饼要五个4000元。结果成都800多名小学教师不得不忍饿罢教，上街游行请愿。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民生活更为悲惨，沉重的地租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以及抓兵抓夫，压得喘不过气来。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们，没有粮食，乱找东西充饥，“广东老百姓，吃竹米以后全身肿胀”，“湘人饿死300余万”。

总之，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整个经济运行被严重破坏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经走向崩溃的深渊。

第二章 肃清外国在华特权势力，没收官僚资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28年的革命斗争，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经济已经遭到很大破坏，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需要有一个对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为：(1) 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之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进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等。(2) 立即着手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进行了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另外，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调整工作。在完成了以上工作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也取得了根本的好转。

第一节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立即着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主要是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首先是收回海关；其次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当其特权被废除后，剩下的经济、文化事业，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仍允许其继续经营。不过，1950年12月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禁运封锁后，我国立即宣布对其在华财产实行管制，在华存款实行冻结。

一、收回海关主权实行对外贸易管理

海关是主权国家的门户和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国家行政机关。旧中国的海关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把持，成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有海关的城市，立即将海关收回，并进行改革。

中央人民政府收回海关后，1949年10月25日设立海关总署，由政务院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全国海关。对原来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东西，一律予以废止；对验估、检查、统计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术方面的东西，吸收过来加以改造。

旧中国洋货泛滥，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和农业。新中国成立后，除收回海关外，立即实行对外贸易管制，执行独立自主的外贸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性质。主要措施有：建立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机构（在没收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家的进出口企业的基础上），确立对外贸易的统治地位；建立和加强海关工作，对进出口贸易实行监督和管理；重要进出口货物由国家统购统销；私营进出口企业，必须向国家外贸管理机构登记，服从管理；规定货物进出口须经许可后才能办理相关手续；任何人不得经营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进出口业务一般采取结算方式，外汇由国家统一管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与发展贸易关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及其实施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初期，外资企业共有 1192 个，职工 12.6 万人，资产 12.1 亿元。主要为英美两国所有，两国共占 89%。英资企业 400 多家，资产 6.9 亿元，约为战前的 1/3。美资企业资产 3.9 亿元，约为战前的 1/2。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外国在华特权的丧失，因而其在华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也相继失去，又加上歇业和撤走的不少，剩下的也大多是生产下降，经营不利。如英资企业颐中烟草公司上海各厂卷烟产量，1937 年占全国卷烟产量的 59%，而 1950 年上半年则仅占 5%。英商怡和纱厂的棉纱产量不及战前的 1/5。战前居于垄断地位的开滦煤矿，建国后，煤的产量仅占全国煤产量的 12%，并因成本过高，不得不依赖中国政府的包销来维持。建国后，美商歇业撤退的较多。如 1949 年底，美国在上海的五大银行（花旗、大通、美洲、运通、友邦），都陆续歇业。有的企业出售或委托他人代管。到 1950 年底，全国尚存外资企业 135 家，连同分支机构仅有 200 多个单位。

关于肃清外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

“帝国主义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

随着各大城市的先后解放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方针政策，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管理。这时候，帝国主义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还剩下 1000 多家，主要是属于英美垄断资本集团的。这些企业，过去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在

中国的特权发展起来的，现在特权被废除了，它们就失掉了依靠。因而这些外国资本企业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基本上已变成单纯经济性的投资”，人民政府对于这些企业按照上述方针进行了处理。

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管制和监督是通过法令进行的，并没有对每一外资企业进行管制和监督。中国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外资企业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对守法的外资企业，中国政府尊重其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这些外资企业可继续在中国经营或者歇业、出售、转让、委托他人代管甚至新开设企业等。

不但如此，中国还同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国家恢复和发展了贸易关系。1949 和 1950 两年间，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曾一度恢复和发展。1950 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 1936 年。中国的公私贸易机构还同在华的外国工商业者陆续订立了各种贸易合同及加工订货合同。但是，后来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外国在华企业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

三、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和我国政府对待外资在华企业的政策

1950 年 12 月 14 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公报说：“美国政府今天已采取措施，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之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颁布章程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在另有通知以前驶往中国港口。”中国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12 月 28 日，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

管制与征用不同。美国企业被管制后，其资产与经营权仍属原企业主，他们仍可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为此，我国政务院还颁布了《关于美国企业及个人存款申请动支的规定》）。

1951 年 5 月 18 日，美国通过其操纵的五届联大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英、法等国投票赞成，并公布对华禁运货单。我采取对应措施。7 月 18 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征用已被管制的美孚、德士古、中美三家美资石油公司除其总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办公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所存油料。其他没有被征用的美资企业仍继续生产和经营。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其结果却使许多外资企业不能维持下去，特别是那些依靠进口商品和原料的企业。1951 年 5 月—7 月，美国的一大批企业宣告歇业，英、法等国也有同样情况。歇业的美商企业有：赞多洋行、华泰洋行、远东洋行、吉利洋行、万国商业机械公司、大昌实业公司、伊士敏轮船公司、亚尔西爱胜利公司等。上海解放初，英商在华企业有 98 家，到 1951 年只剩下 60 家。联合国对中国禁运决议后，又有一大批企业歇业，如英国源和公司、香港物产保险公司、谏当物产保险公司、泰勒顿物产保

险公司、锦降洋行、合众纸行、上海汇丰银行青岛支行等。其他国家歇业企业：如瑞士罗德洋行、罗门图书馆、新瑞广告公司、联邦德国意泰林纳洋行、挪威道尔行公司、波兰华北印字馆、印度天成洋行等。

1952年4月和5月，英国政府曾两次照会中国政府说，英国公司和厂商在中国遭遇到最大困难，几乎全部准备申请结束业务，其原因乃中国国营机构业务日益扩大。7月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政策，指出，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政府和人民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一切遵守中国政府法的外侨外商，都可得到各级人民政府的保护。但在华英商的困境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而是英国政府管制禁运所给予的苦果，当英国公司厂商陷于不能不收缩倒闭的困境时，中国各级政府曾采取贷款、供应原料等办法来帮助他们，但英国政府的管制禁运措施却日益扩大。中国政府重申，只要外商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各级中国政府仍当予以保护。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反映了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外国在华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的郑重立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外资企业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是英美等国封锁禁运造成的。

总之，建国初期，许多在华外资企业难于维持而采取了自动歇业、放弃经营、请求转让出售或出租等形式。如1953年底到1954年初，歇业的有：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中孚洋行、瑞记公司、万泰公司、安利公司、懋利公司等；法国华懋公司、百多洋行；瑞士礼惠洋行、长丰国际运输公司；葡萄牙瑞昌洋行、安德兄弟印刷公司；丹麦籍中国爱克司光行等。采取出售企业方式的有：荷商渣华邮船公司上海公司，出售轮船；两家美国企业出售给中国私人，出租形式的有，英美烟公司所属首善印刷公司汉口大智门厂，出租给益民公司；哈尔滨老巴夺厂，出租给哈尔滨烟酒公司。采取转让形式的有，颐中烟草公司转让给上海烟草公司等。又英资企业开滦煤矿自动放弃经营，呈请由中央燃料工业部代管。这是商品经济中的正常经济行为，至于中国政府对外资在华企业采取征用方式，均为事出有因。如前述美国对我宣布禁运并操纵联大通过对华禁运决议严重损害我国权益时，上海市军管会宣布征用了已被管制的美孚、德士古、中美三家美资石油公司。1951年4月7日，英国政府无理征用我在香港修理的中国交通部所属永灏轮，将其移交英国海军，我国政务院4月30日则发布命令，征用在我境内的英国亚细亚公司的全部财产（其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办公处除外），并征用其全部存油。1952年7月，英政府又伙同美国掠夺我留在香港的飞机，8月，我上海市军管会征用英国联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1953年初，英政府掠夺我广东水产局在香港的5艘渔轮，3月，我广州市军管会征用英国在广州的太古公司码头仓库及西堤楼全部财产。不过，应该看到，我国政府采取这种方式是极个别的，只对极少数企业采取过这种形式，这也是在中国的经济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时被迫采取的一种对应措施，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中国政府对外资在华企业的基本政策是，凡是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外资企业，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对守法的外资企业，中国政府尊重其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

关于外资企业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变化情况：据中央工商管理局统计资料，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在华外国资本企业从1192家减少到563家；职工由12.6万人减少到

2.3万人；资产由12.1亿元减少到4.5亿元。其中英国资本的企业由409家减少到223家，职工由10.4万人减少到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减少到3.1亿元；美国资本企业由288家减少到69家，职工由1.4万人减少到1500人，资产由3.9亿元减少到1600万元。

第二节 没收官僚资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的同时，还立即进行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

官僚资本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特殊资本形式，它是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和个人垄断资本（个人官僚资本）。应该说官僚资本早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产生，北洋军阀时期形成军阀官僚资本，只是到1927年国民党上台后，才发展成"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除垄断性外还具有封建性、买办性，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因此，没收官僚资本，除了没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外，主要是没收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个人官僚资本。

关于官僚资本的情况，1946年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产（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省）的80%以上（如不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省则占67.3%）。又据计算，1947年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提供的工业产品占国民党统治地区全部工业产品的比重为：电78%，煤80%，石油和有色金属100%，钢铁98%，机械72%，水泥67%，烧碱65%，硫酸80%，盐酸45%，化学肥料67%，纱锭60%，机制纸50%，机制糖90%，漂白粉41%，出口植物油70%。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2/3，全部工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它垄断了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属产量的100%，水泥产量的45%，纱锭37.6%，织布机60%，糖90%。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59%。在全国3489家银行中，为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有2448家。铁路航运方面，铁路公路占100%，轮船吨位占45%以上，在商业方面有十几个全国性的大垄断组织。

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规定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和政策。在1949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地规定了没收的办法："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

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这样，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城市，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就立即进行。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原来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政、银行、商店和其他企业，就转到了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手中。据统计，1949年，被人民政府没收的官僚资本工矿企业2858个，有生产工人75万多人。其中发电厂138个，采煤、采油企业120个，铁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炼钢厂19个，金属加工厂525个，化学加工厂107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个，食品企业844个。在交通运输业中，有铁路20000多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4000多辆，各种船舶20多万吨。有关铁路和船舶修理制造的工厂约30个。在金融业中，原“四行二局”以及其他官营银行2400多家，没收其全部财产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其中有商股的中国银行，经过整顿改组，成为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专门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在商业方面，接收的有，原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大的贸易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1951年1月，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其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对于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也进行了没收。同年1月，人民政府又发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对隐匿在一般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进行了广泛的清理工作。至此，没收官僚资本工作已经完成，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就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要来源。

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属于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但是，官僚资本，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收官僚资本，把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这样，就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超出民主革命的范围”，而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空前壮大起来。据统计，1949年，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41.3%（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26.2%）。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49%。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中的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

《共同纲领》中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

领导力量。"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一般情况下，是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的财产进行剥夺实行国有化之后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作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而产生的。

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过程并不完全是这样。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而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根据地中已经产生。1927 年，在革命根据地中出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最初在革命根据地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不是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或者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而是为了革命的需要，由根据地中的军民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来的。

由于革命根据地中条件十分艰苦，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所以国营经济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规模上都比较小。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一些中小城市被解放，接收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解放区里的国营经济才逐渐扩大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没收了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没收官僚资本是新解放城市军管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在总结 1949 年前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由军管会先完整地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只是所有制改变（当然，所有制改变是最重要的），还不能把它们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企业，还要逐步在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 彻底改革企业的领导机构，由政府派"军事代表"进行监督和间接管理，然后由国家委派厂长（或经理）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2) 彻底打破旧企业残留下来的压迫和奴役工人的制度（如搜身制、包工头制等）；(3) 清除隐藏在企业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4) 改善职工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5) 根据按劳分配原则，逐步调整工资，改善职工生活等。

除了以上几项改革外，在工厂管理制度方面，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是与管理民主化相结合的。1950 年 2 月中财委在《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中强调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在工厂中进行民主改革的中心环节。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或经理）、副厂长（或副经理）、总工程师（或主任工程师）及其他生产负责人和相当数量的工人、职员代表组成，由厂长（或经理）任主席。工厂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上级企业领导机关规定的生产计划及各种指示，结合本厂实际情况，讨论和决定一切有关生产和管理的重大问题，如生产计划、业务经营、管理制度、生产组织、人事任免、工资福利等，并定期检查并总结工作。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如厂长（或经理）认为与该厂利益抵触，或与上级指示不合时，有权停止执行。但须立即报告上级，请求指示。

企业民主改革中，还确定了党、政、工、团的分工。企业的基本任务是在国家计划安排和指导下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因此，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是实行厂长负责制，中国

共产党在企业中主要负责政治思想领导，对企业中生产行政工作进行保证和监督；工会负责教育和组织职工搞好生产，积极参加生产竞赛，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注意改善职工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青年团负责对团员和青年工人进行教育，发动他们参加生产竞赛、组织学习、开展体育活动等。

民主改革的结果，大大发挥了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为生产改革打下了基础。

生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健全企业管理机构，建立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责任制度；实行计划管理，使企业生产计划适应国家计划；逐步制定合理的生产定额；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清产核资，建立经济核算制等。

在企业中建立经济核算制，首先是认真登记企业的资产，划清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其次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创造生产新记录运动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新的定额，执行严格的预算制度，以及建立和加强企业的计划统计工作等。

此外，还在企业中采用新技术，废除落后的生产方法方面进行改革。如在国营煤矿中推行三段长壁、矸石充填法，以代替高落式和方柱式的采煤方法；在纺织部门中推行郝建秀工作法等。

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肃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甚至封建制的残余，巩固了企业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发挥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改进经营管理方法，更进一步发挥了工人阶级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1 年中有 238 万工人参加了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运动，1952 年参加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职工更多，他们不断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运动中，生产上的各种定额标准不断提高，旧的定额标准迅速被打破，新的定额标准不断出现。例如：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电力设备利用率提高了 82%，国营煤矿的总回采率从 30%提高到 75%，煤矿工人的全员效率从 0.33 吨提高到 0.62 吨……机器工业中学习了高速切削法和多刀多刃切削法，使各种机床的生产能力普遍提高了 4 倍～5 倍。每个纱锭的产量，1952 年比 1949 年增加 15%，每台布机的产量增加 26%。每一细纱工人看管的纱锭自 250 枚增至 800 枚，每一织布工人看管的普通布机自 4 台增至 24 台，自动布机自 10 台增至 32 台。各工业部门新产品的生产不断增加……产品的产量急剧上升，生产成本则逐步降低。

在朝气蓬勃的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无数的劳动英雄，在各个生产部门继续创造出新的生产记录、新的工作法和新的技术发明，如赵国有、潘长有、马恒昌、苏长有、郝建秀等，他们的技术创造和新的工作方法不仅替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财富，而且通过普遍推行他们的先进方法和技术，使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促进了各部门工业的发展速度。

第三章　土地改革的完成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完成

进行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这项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区内已经实行，新中国成立后，这项任务需要继续完成。完成土地改革，一方面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条件之一。

在近代中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农村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是近代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困落后的根源。不改变这种土地制度，农村生产力就无从发展，广大农民群众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行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就是要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从 1927 年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就开始了。但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土地政策在具体做法上有某些不同。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对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作了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导下，各解放区在 1947 年以后，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已在 1.45 亿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改革任务仍然继续进行。

1950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全会还将土地改革法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讨论通过，并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指导了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也明确指出，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土地改革法中还对土地的没收、征收以及分配等方面都作了规定。这些规定贯彻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和坚决团结中农这两条基本原则。土地改革法中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以及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对于地主也分配一份土地（与农民同样）。对地主的其他财产，包括地主所兼营的工商业在内，则不予没收。土地改革法中，还规定了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对待富农的问题，土地改革法中和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规定不同，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即：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征收其出租土地。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分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因为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革命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民主革命已在全国取得胜利，这时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已经从支援解放战争以取得革命的胜利，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形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团结，富农的政治态度也有所改变。因此，在土地改革中，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人民政权在政治上的稳定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实行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争取富农在土改中采取中立的立场，使土地改革的打击面由农村人口的8%左右，减少为3%～4%，这样，就使地主阶级更加陷于孤立。另外，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也可以更好地贯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消除农民（主要是中农）在发展生产中的某些顾虑，因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土地改革法中还规定了保护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以及在原耕者基础上用抽补调整的方法来分配土地，并适当地照顾原耕农民等政策。

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共占全国农业人口数的90%以上。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以外，全国3亿农业人口地区只有3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几千年处在封建制度剥削压迫下的农民群众翻了身，他们由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同时，土地改革的结果，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一）农民获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因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土地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70%。全国受益农民连

老解放区在内，约有3亿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土地改革以后，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8%左右。”这样，2000年来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剥削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被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势力被彻底打垮了。在农村中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民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95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28.8%，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8.5%。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4.8%，1950年—1952年，粮食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2.9%。粮食产量，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为2774亿斤，1949年是2263.6亿斤，1951年增长到2873.7亿斤，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52年更达3278.2亿斤，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1%。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许多地区，中农比重大大增加，贫雇农比例大大下降。

（二）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广大农民已成为农村人民政权的支柱，因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工农联盟。

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农民在农村中已树立起真正的优势，农民协会威信很高，农民真正掌握了农村政权，农民成了农村真正的主人。

（三）土地改革也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土地改革后，农村普遍成立了识字班、读报组等，成年男女参加冬学。195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已有冬学25万处，常年民校有15万处。农民业余学校入学人数，1951年已达1400万人。小学校数和小学生人数也有显著增加。从1952年冬季开始，在农村广泛开展了识字活动和扫除文盲工作，在土改后的农村中掀起了新的文化高潮。

第二节　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农民（小农）的问题上，一直认为，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提高农业生产、避免分化，从而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惟一正确道路。所以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就不失时机地把他们组织到互助合作组织中来。

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农民分得土地后，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从而中农成为农村中的主要阶层。在许多地区，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过去的20%上升为80%左右，贫雇农则由70%左右，减少到10%左右，而且在逐年减少中。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小生产的个体经济。

中国共产党要把刚刚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的农民立即引导到互助合作组织中来，还有理论依据。这种理论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认为，土地改革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这种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必须积极地正确地进行领导。

土地改革后，农民的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决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的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所以共产党在这方面坚持了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

但是，农民个体经济是一种小生产的商品经济，这种经济的自发发展，会产生分化现象；同时农民进行分散经营，也会发生许多困难。因此，要避免过大的分化现象出现，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克服困难，迅速地增加生产，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2年革命战争中，在老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土地改革完成后，共产党就及时地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如江西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陕北的变工队；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的互助组。当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个别地产生了，不过没有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积极地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1951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1953年2月中央通过为正式决议）。决议肯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决议指出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到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决议也指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在《决议》的指导下，农村中农民的个体经济有了发展，而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50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10.7%，到1951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19.2%，其中互助组430余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400多个。1952年，由于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农村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增产节约运动，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这时，全国各地普遍组织了互助组。1952年全国共有互助组803万个，参加的农户为45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在老解放区，组织起来的农户一般占农户总数的65%以上；在新解放区，一般占25%左右。全国各地成立的农生产合作社近4000个）。每个互助组平均5.7%户，比1951年平均4.5户增加了1.2户。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发展中，出现了三种形式：

（一）简单的劳动互助组。特点是，规模小，一般为三五户，也有七八户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农忙就集体耕作，农闲就分散。这种互助形式，以劳力、牲畜或生产工具为中心，互相帮助，共同劳动，没有正式的计工制度，只是大体上等价交换。

这种形式在老解放区从开始就是最大量的形式，在新解放区也适合于农民固有的习惯，所以发展较快，数量也较大。

简单的劳动互助组，适合于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这种形式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克服土地改革后农村劳动力、畜力和农具的困难等起了很大作用。

（二）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一种形式较高的形式。这种互助组规模较大，实行劳力、畜力、农具全面互助，除农业外并结合副业实行常年互助。有某些简单的生产计划；并逐步地把劳动互助和提高生产技术相结合，有了某些技术上的分工；有的互助组还逐步地添置了一部分公有的农具和牲畜，积累了少量的公有财产。另外，有比较完全的计工、清工制度。土地改革后，在一些简单的劳动互助组织已有基础的地区，在生产和生活都得到某些提高之后，这种常年的互助组织为许多农民所要求，因而，参加这种常年互助组的农户逐年增加，除老解放区外，1950 年约占组织互助组农户数的 3%左右；1951 年达 10%；1952 年达 25%。在老解放区，一般则达 25%以上。

（三）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生产合作社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通常是在较好的互助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合作社一般有 10 户 ~ 20 户，也有的达 40 户 ~ 50 户，最多的有 80 户 ~ 90 户。这种形式，一般是由于常年互助组，有了某些公共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有了某些分工作业，或兴修了水利，或开垦了荒地，就引起了在生产上统一使用土地的要求。于是就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打破地界，组织了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四章　稳定物价与统一财经工作

第一节　新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

新中国的诞生，令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但在建国前后一段时间，我们在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是非常严重的。

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一是在新中国诞生过程中所产生的。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剥削和连续十二年战争的摧残，加上国民党败走时的疯狂掠夺和破坏，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经济已经千疮百孔。这具体表现为：

——工农业生产远低于解放前最高水平。

我国农业原来的生产水平就比较低，由于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民承受沉重的地租、赋税，使全国广大农村土地荒芜，农具、肥料普遍减少，1949 年，绝大多数农作物产量和大小家畜的数量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下表是主要农作物总产量的变动情况：

单位：千市担

农作物名称	解放前最高年		1949 年产量	1949 年为解放前最高年%
	年　份	产　量		
粮食作物	1936	2773962	2161900	78
稻谷	1936	1146820	972894	85
小麦	1936	465893	276169	59
杂粮	1936	1034622	715988	69
薯类	1936	126627	196849	155
大豆	1936	226133	101723	45
经济作物				
棉花（皮棉）	1936	16976	8888	52

农作物名称	解放前最高年		1949年产量	1949年为解放前最高年%
	年　份	产　量		
黄洋麻	1945	2174	736	34
烤烟	1948	3572	858	24
甘蔗	1940	113034	52843	47
甜菜	1939	6575	3810	58
花生	1933	63415	25364	40
油菜籽	1934	38144	14681	38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表中显示，和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作物的产量下降了22%，除薯类增长外，稻谷、小麦、杂粮都是下降的。大豆下降55%。经济作物普遍下降，其中棉花产量下降48%，烤烟下降76%。

畜牧业也普遍下降。下表是1949年大小家畜数量的变动情况：

单位：千头

家畜名称	解放前最高年		1949年产量	1949年为解放前最高年%
	年　份	产　量		
大家畜	1935	71506	59776	84
牛	1935	48268	43936	91
马	1935	6485	4875	75
驴	1935	12151	9494	78
骡	1935	4602	1471	32
小家畜				
羊	1937	62520	42347	68
猪	1934	78530	57752	74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表中显示，和解放前最高年相比，大家畜的数量下降16%，小家畜数量下降26%—32%。

旧中国工业基础本来薄弱，又经过战争破坏和国民党的掠夺，1949年和抗战前的最高年份比，工业产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业生产大约降低70%，轻工业生产降低30%。下表是主要产品产量下降的情况：

	1949年为1936年%	1949年为解放前最高年%
全部总产值（包括个体手工业）	49.9	
电力	113.5	72.3
原煤*	78.3	50.0
原油	98.5	38.1
生铁	31.1	13.9
钢	38.2	17.1
水泥	52.9	28.8
棉纱	84.0	73.6
棉布	56.4	56.4
机制纸	-	65.5
面粉	52.8	52.8
食糖	48.1	48.1

*原煤、棉纱、面粉不包括个体手工业的产量。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7页。

表中显示，和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工业产品产量普遍下降，其中重工业产品产量下降比率最大，钢铁生产下降了80%以上。轻工业产品也普遍下降。出现这种情况，和过去国家垄断资本企业经营的腐朽性有密切联系。以资源委员会的产品产量为例。国民党政府接受了大批敌伪产业，但生产的恢复却很慢。“除电力、煤比抗战时有较大增长外，钢铁则到1947年才恢复到战时后方的水平。机械、电器因美国货大量涌进，发展甚微；有些所谓新产品仅是进口原件，按原图纸装配而已。新辟事业，炼铝未能开工，水泥产量仅及日本人统治时期的18.7%，糖恢复34.7%，碱、化肥恢复的均不及50%。”

——交通运输能力破坏严重。

铁路有上万公里线路、3200多座桥梁（总延长155公里）和200多座隧道（总延长40多公里）遭到严重破坏。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几乎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的，机车则有三分之一因破损无法行驶。公路，尽管已抢修26284公里，但1949年底能通车的仍不到原有线路总长的80%。水运，国民党败退时劫走了招商局的海轮、江轮、油轮、拖轮、驳船等125艘，计26万多载重吨，占其轮驳总吨位的70%左右。我们接收的轮驳只有115000载重吨，约占其原有总吨位的30%，而且绝大部分是小船和坏船。国民党败退时总计劫走了300多艘船舶（60余万载重吨），而且大肆破坏沿海、内河的许多船舶、码头、仓库和航道，仅内河被沉没的大小船舶就有430多艘。空运，原民航所有的飞机、驾驶员、器材，全部被劫往香港。由于工农业生

产被破坏和交通瘫痪，加上敌人的封锁，使城乡和内外交流滞塞。上海在1949年5月人民政府接管时，接管下来的粮食只够半个月消费，煤只够使用一个星期，私营棉纺厂的存棉约1.32万吨，只能维持一个月生产，其它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存底也都很少。

——投机资本活跃。

国民党所实行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国家垄断资本带头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使旧中国经济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一是出现了大量专靠投机倒把而追逐暴利的商人。据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统计，全市工商业户共为11万家。其中商业就有93064家。这些商户中，很多是以投机为目的而开设的。例如纱号在抗战前为60家，1948年增加到360家，布号抗战前为210家，1948年增加到2371家，分别增长了5倍和6倍多；但同期上海的纱锭拥有量，只增加1倍多。二是形成了大批从事投机活动的银行钱庄。解放前夕，上海市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包括银行、钱庄、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职业性的黄金、美钞、银元贩子等，人数达20—30万人。平津两市200家行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上海非法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存放款额平时约为私营行庄的30%—40%，而物价波动、银根紧、利息高时，则上升为2—3倍。三是由于“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许多正当的工商业家也用其绝大部分精力和资本，从事囤积居奇，贪取暴利。这样，整个市场便为投机势力所控制，不时兴风作浪。

上述困难，有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国民经济的恢复）；有的可以解决得快一些，也要花一段时间（如恢复交通运输能力）；有的则必须迅速解决（如打击投机资本）。否则，就会加剧新中国所面临的困难。

新中国诞生过程中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的财政支出猛烈增长，财政收入则有待于恢复，入不敷出，赤字很大，暂时不得不靠发行通货来弥补，结果，造成币值下跌，物价上涨。

当时，国家财政支出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是：第一，大军南下，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区，接着向西南和华南进军，需要大量的军费支出，必须保证。中央货币发行的方针是，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第二，除保障军队和公职人员的供给，对收编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和接收下来的机关工作人员也要“包下来”，全国军政工教人员近900万人；第三，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事业严重破坏，1949年遭受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据当时统计，全国农田受灾面积1.2亿亩，灾民约4000余万人，其中重灾区2800万亩，约有700万灾民等待救济；第四，开始重点恢复交通和工业，也需要增加开支。但财政收入远赶不上支出的增长。经过长期战争的老解放区的公粮负担已经很重，不能再增加，在新解放区，仅仅有一部分地区开始征收公粮。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工厂停工减产，城乡交流阻塞，物资短缺，工人失业，税收有一个整理和恢复的过程，征税也很少。用于恢复交通运输和生产的投资短期间还不能提供利润。支出飞快增长，收入增长缓慢，出现了巨额赤字。1949年，除东北地区财政赤字较小（占支出的5.5%）以外，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65.9%。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人民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3万亿元（注：人民币旧

币面值。中国人民银行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币，代替旧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增长160多倍。”钞票发多了，物价亦随之高涨，1949年曾多次出现大的物价波动。

按照当时的货币发行量，本来不应该引起那么大的物价波动。之所以会集中在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物价猛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城乡阻塞、商业和金融投机以及一般人民对纸币的不信任心理，使人民币进入市场和建立自己的阵地遭受了严重阻碍。在广大新区农村，由于封建势力盘踞，国民党残余势力骚扰，人民币下不了乡，仍然盛行银元交易和物物交换。在大城市，投机势力利用人民币立足未稳的机会，掀起银元、黄金和美钞的涨风，引起物价剧烈波动。从上海解放到1949年6月9日的短短13天中，上海的金、银和商品价格直线上升，物价总指数上涨2.7倍以上，其中黄金上涨2.1倍，银元上涨2倍，米上涨2.2倍，纱上涨1.5倍，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流通。1949年一年，国家银行的存款，经常不到货币流通数量的三分之一。从国家银行流出的货币，汇集在若干大城市游离冲击，通过“地下钱庄”或其他形式的黑市拆放，落到投机家手中，成为他们抢购囤积、破坏市场、助长物价波动的力量。

当时，扰乱市场的主要是民族资本。有些资本家认为，共产党不懂经济，人民政府控制市场能力有限，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于是，便肆无忌惮地在市场上兴风作浪。

一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较量不可避免了。

第二节　较　　量

1949年到1950年初，在我国，出现过四次大幅度的物价上涨。

第一次，是1949年4月。当时北方农业处于青黄不接季节，又值春旱不雨，粮食供应比较紧张。4月21日，毛泽东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进军以前，借征一部分公粮，筹措军费，加大了财政开支，到4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数量比1月底增加近4倍。投机商人认为有机可乘，便大肆抢购套购粮食，引起粮价急剧上涨。4月上旬，冀中灾区由粮价带头，物价普遍上涨，涨势很快蔓延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和冀南地区。根据华北地区15个市场的统计，4月份的物价和1948年12月份相比，上涨了2.14倍。为了平抑物价，政府疏通粮食运输，从东北地区调运大批粮食进关，使济南等地小麦陆续运津，掌握粮食和其他物资，在国营贸易公司下分别建立粮食、花纱布、百货、山货等专业公司，并在北京、天津建立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和零售店，直接供货。如天津市除掉直接供给机关、工厂、学校和合作社的粮食以外，不到20天售粮5000多万斤，售布253000匹，售纱2000多件。同时，设法吸收游资，紧缩通货，开办“折实储蓄”，保证存款者不致因物价波动遭受损失。到5月中旬，物价涨风在京津、华北各地陆续平息。

第二次，是1949年7月。这次涨风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解放以后，军事进展一日千里，支援全国解放的进军需要更多的财力物力。同时，新解放的大部分地区，地方财政支多收少，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因此，人民币的发行比过去增加更快。7月底，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旧人民币），为1948年底发行额的15倍多，而且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上海是中国投机资本的中心，投机势力哄抬物价的活动特别猖獗，增加了这次涨风的剧烈程度。

6月初以前，上海的投机资本主要是进行金融投机。为了同金融投机作斗争，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宣布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同时举行群众性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宣传活动，并于6月10日查封了证券大楼，依法惩处了一批金融投机的操纵者。通过这些措施，金银、外币被逐出流通领域，不再与物价挂钩，上海市场被称为"黄白绿世界"的历史宣告结束。但是，投机资本并不甘心，他们投机活动的重点很快转向大米、棉纱和煤炭等主要商品。投机商人首先冲击棉纱市场，哄抬纱价。6月21日到25日，纱价上涨34%。接着，转向市场紧缺的粮食和煤炭。6月25日到30日，米价上涨69%。7月中旬开始，投机商人夸大农村灾情，扬言政府手中存粮不足，引起人心恐慌，从7月11日到16日6天内，米价上涨96%。16日，又冲向棉纱市场。为了投机谋利，资本家不惜借取黑市高息贷款。7月16日上海日拆暗息升至35‰（折合月息105%），80%的黑市放款被用于粮食投机。这种循环抬价，使上海7月份物价总指数比6月份上涨了1倍以上。上海在解放以前，和北京、天津的物价是隔离的；解放以后，南北连成一片，恢复了商品货币流通，上海和京津物价必然趋于拉平。加上上海投机资本北移，在京津大量抢购物资，使京津物价也急剧上涨。两地物价指数7月底比6月份上涨3倍以上。

为了制止粮食、纱布价格猛涨，政府从华东各省和中原、华北、东北调运粮、棉、煤、盐等物资支援上海，使上海纺织业于7月份全部开工。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及时采取了下列措施：一是通过国营贸易公司抛售物资，调节市场供需，扩大货币回笼。国营贸易公司在7月份的第一周中抛售的棉纱、棉布分别占市场成交量的81.4%和76.9%；第三周抛售的面粉占市场成交量的44.9%；第四周抛售的大米占市场成交量的55.7%。7月份抛售食糖数量占市场成交量的41.33%。二是控制支出，整顿收入。主要是动员各机关厉行节约、紧缩预算、控制货币投放，同时整理了货物税和地价税。三是加强市场管理，对集中交易的商品批发市场采取了统一交易时间，实行成交登记和当日交割等制度。四是实行大米配售。为了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国营粮食公司从6月份开始，就向产业工人、公教人员和学生供应平价米，每人每月15公斤，7月份又扩大了配售面。这些措施，使投机势力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市场游资有相当一部分又回到了国家银行。7月下旬以后，物价涨势开始缓和。8月份，批发物价指数上涨幅度下降为13%，9月份为17%，成为当时涨幅最小的两个月。其中工业原料价格上涨较多；棉纱、棉布因届销售旺季，9月份平均价分别较7月份上涨28.7%和30%；粮食因新谷登场，价格回落，籼米9月份平均价比7月份下降27%，粳米也下降了9.4%；食油、面粉等食品价格也均有所下降。从8月开始，北京、天津的物价也下降了。

第三次，1949年11月。由于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华南迅速进军，军费开支增大，公教人员增多，秋收后收购粮棉，人民币累计发行10月底比7月份增加3倍以上，11月底更增加到6倍多，但物资供应显著不足。投机商人又乘机哄抬物价。这次涨风也是从上海开始的。当时投机势力首先利用海口被封锁、进口原料中断的特殊环境，把五金、化工等进口商品的价格不断往上抬。接着纱价、粮价也猛烈上涨。物价指数每天上涨10%—30%。到11月25日，上海物价比10月上旬上涨了3.3倍，其中棉纱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米价上涨3.3倍，造船工业所需五金材料上涨5—6倍。在物价波动中，私营金融业和“地下钱庄”异常活跃。“地下钱庄”的拆放金额平时只占私营金融业拆放总额的30%—40%，在物价波动时，它们用黑市高利率大量吸收游资，拆放金额竟大于金融业平时拆放总额的2—3倍。由于投机利润增加，投机资金求过于供，黑市利率直线上升。自10月20日至11月24日，每千元每天利息由12元逐步提高到90元，最高达到160元。与此同时，票据交换也日趋频繁。10月份上海票据交换张数和票据交换金额比9月份分别增加了32.7%和66.8%。11月上旬增加的幅度更大。天津物价上涨是粮食带头。武汉受上海影响，是纱布带头。10月15日以后，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出现了全国物价猛涨。以7月底为基期，到11月10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四大城市的物价，平均上涨了3.2倍，24日上涨到3.7倍。

这次物价上涨持续时间长，覆盖面积大，已非一两个城市所能平抑。上海在物价涨风刚刚开始的时候，曾经采取在批发市场上大量抛售物资的措施。10月和11月初，国营花纱布公司连续平价抛售棉纱和棉布。结果，上海纱布价格低于其他城市，大量游资便涌入上海，10月—11月汇入上海的钱款比汇出数量多202亿元（旧人民币），在外地游资的冲击下上海的纱布价格又抬高了。与此同时，上海粮油公司也曾抛售粮食以压低粮价，但到11月7日米价也压制不住了。7日一天抛售大米5.8万多石，相当于平时市场成交总量的两倍以上，8日每石大米仍由4.8万元（旧人民币）涨到5.7万元（旧人民币）。到16日，以每石7.5万元（旧人民币）抛售近5万石，米价仍猛升到9.8万元（旧人民币）。在国营公司平价抛售时，私商则乘机低价购入，只进不出，坐待高价。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全国的投机势力，单从上海一地看，抛售数量已经不小，但从全国来看，还不足以平抑涨风。为了平抑全国物价，必须周密部署，选择适当时机，全国一致行动，才能战胜投机势力，刹住涨风。

11月1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分析了市场上商品和货币流通状况，认为在物价已经上涨两倍的情况下，稳定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应以全力稳住。当即作出统一的战略部署：

“（一）以沪津两地七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二倍或二点二倍。

（二）东北自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须每日运粮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十一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二亿一千万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二十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二十天。

（十一）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迟三十日）完成；预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

根据中财委的部署，各地加紧调运物资，把粮食、纱布、煤炭等调集于重点地区。从 11 月 15 日到 30 日，每天从东北调运 1000 万至 1200 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天津先后从东北调集粮 6000 万斤，准备布 35 万匹，纱 5000 件。上海准备布 110 万匹，纱 28000 件。汉口准备布 30 万匹，纱 8000 件。西安准备布 40 万匹。同时，政务院规定，所有国有企业收入现金必须于当日存入中国人民银行，除特殊批准者外，一律暂停贷款。以往贷款按约如期收回，暂停支付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缓发地方经费，推广折实储蓄等以收紧银根。这一规定使人民银行存款总额迅速增加，加上储蓄存款，很快掌握了全国存款总额的 80%，在金融市场上确立了领导地位。经过上述准备，国营经济在市场上全面进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决定提前行动。

11 月 25 日，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当时市场高价大量抛售粮食、棉布，同时，催征税款，进一步紧缩银根。结果，第二天物价就开始回落，连续抛售十天，物价下降了 30%—40%，即回到相当于 7 月底物价的 2 倍多（以后又调整到相当于 7 月物价的 3.2 倍）。一场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几天之内就平息下去了。

这场斗争，使投机资本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错误的估计，以为人民币将和金圆券一样一路下跌，物价上涨的速度一定会超过利息，因而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市场日拆暗息升到 80‰—100‰。许多工厂主也宁肯借债开支，不肯卖货。及至物价下跌，他们便急于抛货还债，但愈抛愈贱，存货愈不易脱手，只好举新债，还旧债。因此，物价虽然下跌，银根仍紧，利息仍高。由于资金周转不灵，有些企业不得不宣告破产。仅上海市粮食批发商就倒闭几十家。国营贸易公司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投放货币

大批购进物资，充实了调节市场物价的力量。

第四次，1950年2月。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但军费开支未减，政府负担的公职人员数目扩大，财政赤字还需要靠增发通货来弥补。1949年12月份增发人民币1万亿元（旧人民币），到2月1日，累计发行4.1万亿元（旧人民币）。物价则在政府控制下比较平稳地上升，以12月底为基期，1月上旬平均上涨30%。按照计划，政府准备让物价到春节（2月16日）前继续上升30%。但由于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被毁，一时全市工业除有自备电力的工厂以外，大部停工，人心动荡，投机商人只购不售，在春节前后又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物价涨风。上海、天津、汉口、西安等15个大城市25种商品批发物价指数，2月底较1月上升了一倍。

对制止这次物价波动，政府在1949年12月就预先作了安排，从中南和西南等地调3.5亿公斤粮食到上海。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事先就调集资金，抢购囤集物资，准备在春节开市时与国营经济作一次大的较量。但是，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春节开市第一天国营公司挂出牌价还是和春节前一样，而且粮食、纱布、食油等商品一律敞开供应。开始时投机资本仍想背水一战，借钱抢购粮布。他们抢购了三天，"第三天他们钱光了，买的人就少了。我们知道市场上没有钱了。因为货币是我们发行的，市场上有多少货币是算得出来的。第四天他们一看不对，想出卖，我们不收。抢购了三天，他们资金用光了，国家还是敞开供应。他们慌了，开始向外抛存货，但是没有买主。"在这次涨风中，投机资本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失去了操纵市场、左右物价的能力。相反地，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却牢牢地掌握了市场和物价的领导权。3月份，全国物价涨风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的物价3月份比2月份下降了15%。较量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胜利和投机资本的失败而告终。

第三节　"不下于淮海战役"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1950年度财政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财政预算，它的收支项目如下表：

项　目	比　重%	项　目	比　重%
财政总收	100.0	财政总支出	100.0
其中：公粮收入	41.4	其中：军事费	38.8
各项税收	38.9	行政费	21.4
企业收	17.1	国营企业投资	23.9
清理仓库收	2.4	文化教育卫生费	4.1

项　　目	比　重%	项　　目	比　重%
其他收	0.2	地方补助费	2.3
		东北公债还本付息	0.1
		总预备费	9.4

资料来源：《中央财经政策法令汇编》第1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编，1950，第90-91页。

从财政收入看，公粮收入仍占第一位，占全部收入的41.4%。当时，全国农民平均负担占其农业总收入的19%以上，在老解放区占农业总收入的21%，负担还比较重；各项税收占第二位，占38.9%。按抗战前多种资料统计，税收的比例应高一些，但因大城市解放不久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税收人员少，缺乏经验，一时还做不到；由于生产尚未恢复，企业收入比重占的也不大，只有17.1%。从财政支出看，军费占的比重最大，占38.8%，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是完全必要的；行政费占第二位，占21.4%，主要是公教人员的生活费和公杂费，当时，脱产的军政公教人员已达900万人；经济建设投资占支出的23.9%，主要用于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工业、农业和铁路；文教卫生费用占4.1%，如果把文教卫生人员的开支加进去可达6%。按照概算，财政收入总额相当于财政支出总额的81.3%，赤字为18.7%。解决赤字的办法，一是靠发行公债，可解决赤字的38.4%，二是其余61.6%还得靠向银行透支，即增发通货。1950年概算虽然还有赤字，但和1949年的巨额赤字相比已经有了根本区别。概算显示，我们的国家，主要不是依靠发行通货，而是依靠各种税收、国营企业利润、清仓收入和公债收入等来满足军事、行政、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等方面开支的需要了。

概算是符合实际的，但要完全落实，还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从1950年1月份的财政金融形势看，财政支出超过了概算中所预定的数字，而财政收入则并未按概算收齐。如果照此继续下去，财政收支概算就有被冲破的危险。为了转变这种局面。从2月13日至25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了全国财政会议。在会上详细分析和讨论了全国财政、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情况和平衡财政收支问题的可能性及条件，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这是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历史性会议。从此，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经营到基本上集中统一的新时期。3月3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及其他有关决定，是全国财政会议的结果。《决定》要求，结束已往财政经济管理上的分散经营，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克服财政上的困难，稳定金融物价，并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条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

在战争期间，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是分散经营的。各个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作统一的政策领导，只有在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两年，才有可能在各区之间作少数军用品和物资的调拨。这在当时是和被敌人分割的环境相适应的，曾获得了极大成绩。从1949年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财经工作已经逐渐走向统一。例如，除东

北地区外，人民币已经成为全国的通货，财政支出的机关基本统一了。上海、武汉解放以后，对税则、税目、税率，国营工厂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的采购，外汇使用的分配，内地贸易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路、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收费管理等，也陆续实现了统一规定、计划和管理。但就整个财经工作来说，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经营的，因为只统一了财政支出，尚未统一财政收入。针对这种情况，陈云于 1950 年 3 月指出："目前到了新的时期。公粮大部已征收起；统一的税则、税目、税率已经公布；因为大陆已解放，税收也比去年多。放在面前的问题是，继续停留在去年那个阶段上，还是前进呢？全国财政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答复说：要前进，不能停留。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也就是说，虽然分散经营的成分仍然有，但主要的将是统一管理。这种改变，是适应目前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关内币制等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情况的。"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是财政收入。

在收入方面，国家的主要收入中，公粮除 5%—15% 地方附加外，均须按中央规定的税则、税率征收，并在征收后半月全部交公粮库。税收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每日结算解缴中央金库。国营企业均需按时纳税，并将利润及折旧金的一部分，按企业隶属关系如期分别交中央或地方金库。以上收入，没有中央财政部正式支拨命令，不得动支。政务院决定，成立陈云为主任的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物资仓库，集中清理后，均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

在支出方面，统一全国编制与供给标准，改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杜绝虚报冒领现象。政务院决定，成立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全国编制委员会，负责制定和颁布统一的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的编制和供给标准，核实现有人员。军队和地方都要按照编制和供给标准编制预算，经批准后按时支付现金。编余人员由全国编制委员会统一调剂使用，不经批准，不得自行增添人员。国营企业投资、文教社会事业费的支付，严格按照中财委批准的各期支付数量按期支付。

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

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和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关业务范围的规定与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非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各地贸易机关不得改变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规定的业务计划。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

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

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增设分支机构，以代理国库。外汇牌价与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应受处罚。它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使用转账支票经人民银行汇拨。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以后，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国内市场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统一了财政收支，加强税收工作，发行公债，紧缩开支，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对缩减，出现了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经过整顿，各项收入均迅速增加。1950年的城市税收，第一季度占全年该项收入的16.5%，第二季度占20.6%，第三季度占23.3%，第四季度占38.6%，全年超过原概算的62.9%，在整个国家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为第一位。公粮征收，尽管新区社会秩序尚未恢复，残余敌人不断公开或秘密进行破坏，经过各方努力，仍超过原概算4%完成任务。国营企业利润及上交折旧增加也较快，超过原概算18.4%，上升为国家财政收入第三位。其它收入也超过41.6%，只有清仓收入因原概算偏高，未达到指标。1950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较原概算超出了31.7%。支出则相对缩减。军政公教人员的开支，由于精兵简政和统一编制，统一供给标准，使行政费支出比原概算减少4.5%。这一年，国防费与社会事业费增加较多，分别超过原概算21.8%和54%。从而使财政总支出超过原概算的14%。但因总收入的增加超过总支出的增加，加上发行公债9000万分（实物计算标准。每分按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之大米（天津为小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财政赤字逐步减少。第一季度财政赤字占支出总数的43%，第二季度占40%，第三季度降至9.8%，第四季度更降至6.4%，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

由于统一了物资调度，使国家将所有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原料和机器等，从分散的状态中集中起来，不仅能够供应正常的市场需要，而且具有了战胜任何投机者的能力。国营贸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全国设立了4000多处批发与零售机构，批发机构回笼货币，稳定批发价格；零售店则保证粮食、煤炭、纱布、食油、食盐、石油等六种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国营贸易还领导着城乡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又获得了政权机关对市场进行严格管理与交通运输部门对大量物资转运的配合，在市场上便成为主动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力量。

由于统一了现金管理，原来存在国营企业机关等手中的巨额资金急速地流向国家银行。同时，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往来普遍推行了转账制度，进一步节约了现金使用，减缩了货币流通数量，降低了银行提存准备率。上海市在1950年2月份现金对转账的比例为1:15.7，4月份为1:30，5月份为1:48；天津市4月底现金对转账的比例为1:13，5月底为1:30，其他各大城市情况大致相同。国家银行的提存准备率，3月份为存款总数的24.3%，5月份降至16.3%，6月份又降至15.4%。与此同时，银行存款大量增加。1950年5月，国家银行存款总额比2月增加4倍，从这个月起，银行存款总额经常保持在市场流通货币数量的3倍以上。至此，金融市场日趋稳定，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日益扩大。据统计，上海市在1949年物价比较平稳时期，每元人民币每月周转30至45次，1950年3月已降至15次；天津市从3月1日至20日的20天中，每元人民币仅周转8次。金银外币价格下跌和外汇牌价挂低。1950年3月以后的几个月中，国家银行收兑了流通在各大城市的各种外币的75%以上。人民币已经开始大量流向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

1950年，由于统一了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平定了2月份投机资本所鼓动的物价涨风，从4月份开始，物价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以3月份全国批发物价总指数为100，4月份降到75.1，5月份再降到69.2，即降低了约30%。经过调整工商业，7月份物价开始回升，全年物价出现了基本稳定的局面。下表是1950年全国批发物价总指数（以1949年12月份为100）：

月份	指数	月份	指数
1月	126.6	7月	166.8
2月	203.3	8月	173.6
3月	226.3	9月	177.8
4月	169.9	10月	185.8
5月	156.7	11月	193.3
6月	155.8	12月	193.2

资料来源：《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郭瑞楚，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56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7月以后各月物价升降幅度不是很大，最高也不超过8%。这表明，在我国，由投机资本操纵的旧市场，已经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新市场。新中国在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国民党残余势力破坏捣乱、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制止了旧中国连续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确是一个重大胜利。毛泽东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稳定物价，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场严重的较量。在较量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发挥了伟大作用。刘少奇在总结这段工作的经验时曾经说：“中国的财政经济，在历史上是没有统一过的。国家财政收支，在过去数十年中也没有平衡过，反动政府每年必须发行巨额的钞票和举借巨额的内外债才能过日子。中国的金融物价也是十二年来没有稳定过的，人民必须在通货膨胀的损失中付出巨额的资金。但是人民政府在战争尚未结束与发生灾荒及帝国主义封锁等情况之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些重大的措施，并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是任何反动政府都不能做到的，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建国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成立了由陈云主持的集中统一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效地指挥了财经统一、稳定物价的斗争。当时，我们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投机资本作斗争，必须深谙市场经济运动规律，主要通过市场，用经济办法去夺取胜利。为此，必须有一个综合掌握和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的统一的有权威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平抑1950年第三次物价涨风时，陈云运筹帷幄，从各地调集了大量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一声令下，在全国大城市一齐抛售，使投机资本措手不及，充分显示了人民政权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威力。上海的工商界代表人物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其次，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壮大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国家掌握了同投机资本作斗

争的足够的经济力量。周恩来说过："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使得许多大的企业不断地集中，给我们的国家准备了集中的生产组织。这样，旧社会中的某些事物一旦到了人民的手中，便立刻变成了积极的力量。"当时，国营贸易掌握了雄厚的物资后备。国营商业控制煤炭供应的70%，棉纱的30%，棉布的50%，食盐的66%。1949年通过税收，国家已经掌握了200亿斤粮食。有了这个基础，在物价涨风中，国营贸易公司就可以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地大量地抛售物资，缓和物价涨势，打击投机资本。例如，在1950年2月的涨风中，国营公司集中抛售的物资在上海市场上所占的比重是：大米占97.5%，面粉占100%，棉布占96%，食油占60.5%。因此，除棉布一项因价格偏低，国营公司把价格提高8%以外，其余都保持原来的价格水平。经验证明，凡是国营贸易公司控制的比重大的物资，在价格涨风中，就不容易大幅度波动。比如煤和食盐就不曾带头涨价，而且价格总是低于一般物价，就是证明。

1950年10月1日，陈云在总结建国以后第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经验时，曾经强调，应当充分认识人民政权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伟大作用；应当充分估计中国经济的潜在力量。他说："一年的事实证明，恰当地估计中国人与物两方面的潜力，在人民政权的保证下，我们有极大的创造性的成就的可能。"

第四节　调整公私关系

财经统一，物价稳定，壮大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却遇到了暂时的困难。

1950年3月，物价下降以后，全国各地市场普遍出现了粮食、纱布等重要消费品供过于求的现象。3月下旬，北京市粮食交易所上市量是7000多万斤，成交量只有1000多万斤，占上市量的14%多。面粉上市28万余袋，成交2万余袋，成交仅占上市量的7%强。3月份上海商品市场的总成交量只有1月份和2月份的30%左右，4月份更少，如棉布市场4月份只有4天有少量成交，其余均无交易。由于商品供过于求，市场价格下跌，私营商业的货价普遍低于国营公司的牌价。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私营工厂商店因资金周转不灵、经营亏损被迫关厂歇业。上海市申请停业的工厂，1950年1月为159家，2月为161家，3月为243家，4月为389家，5月增加为502家。当时上海的工厂总数约为12000家，在5个月中，停业的达1454家，占12%以上。4月份的工业产量，火柴不及1月份的六分之一，面粉、卷烟、玻璃、毛纱只及1月份的20%—30%或60%—70%。申请歇业的商店，1月份为363家，2月份为349家，3月份为796家，4月份为1567家，5月份增至2947家。当时上海的商店有10余万家，5个月中歇业的达6000多家，占6%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等十个大中城市，1950年第二季度私营

工商业开业 5903 家，歇业 12750 家，歇业户数超过开业户数 6847 家。全国私营工业 5 月份主要产品产量同 1 月份比较，棉布减少 38%，绸缎减少 47%，毛纱减少 20%，卷烟减少 59%，烧碱减少 41%，普通纸减少 31%。

私营工商业遇到困难，有多种原因。

第一，由于物价稳定，投机资本失去了活动舞台，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上出现了暂时的供过于求。连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使整个社会的产销关系和供求关系陷于混乱，脱离常轨。本来全国人民的购买力是下降的，市场上商品却求过于供，呈现一片虚假繁荣。原因是大量投机商人专靠投机倒把谋取暴利；为投机服务的银行钱庄助纣为虐；许多工商业者被引上投机市场；连一般市民为避免货币贬值的损失，也竞相抢购囤积。在这种情况下，除有一部分粮食、棉布等商品被市民分散保存外，大量商品囤积在投机商人和工商业者手中，并未被社会所消费。一旦物价稳定和银根收紧，这种虚假购买力便立即消失，市场由抢购囤积一变而为竞相抛售（据说上海市场上曾出现囤积十年以上的 1937 年出厂的龙头细布）。那些囤积多、负债多的投机商人难免就要破产。不过，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时，陈云就指出："目前的不正常的滞销状态一定会过去，原因是货物的囤积量并不多。社会上棉纱存量估计有五十万件，而社会需要量约为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件。"事实上，全国的商品销售情况，在 3、4 月并不曾停止，从 5 月份起已经开始显露初步好转的景象了。

第二，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带来工商业结构的调整。解放以前，上海有 177 家银楼，436 家旅馆，700 多家酒菜馆，180 多家高级服装店，还有许多银楼、首饰店、舞厅和赌场，这些大多是靠通货膨胀、商业投机和为豪门富户的特殊消费而发展起来的。解放以后，取消了帝国主义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又打击了投机资本，豪门富户的消费减少了，军政人员基本上还过着消费水平很低的供给制生活，整个社会风气趋向俭朴，这些行业自然要走向衰落。当时，上海的 700 多家酒菜馆停歇了 200 多家，177 家银楼转业或停业的 166 家，其他如古董店、大旅馆、大舞厅、大时装店等，也都日趋清淡和缩减了。

第三，由于长期处于战时分割状态，适应军事上的需要，许多地方各自设立了许多工厂。全国解放以后，分割状态已经消除，便出现了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也有些行业盲目发展，生产能力超过了实际需要。上海的卷烟工业共有卷烟机 919 台，月生产能力达 36 万箱，当时实际销量只有 4.5 万箱，仅占生产能力的七分之一左右。这样，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行业内部的竞争，一些管理基础差、产品质量低的企业难以维持下去。

第四，有些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落后。由于旧中国的工商业的生存主要靠投机而不是靠生产，许多工商业的组织机构十分臃肿庞大，而工作效率很低。一些所谓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某一家族所有，亲戚同乡盘踞企业的行政部门，拿高薪而不干事。因此，开支庞大，成本高，效率低。在物价稳定、企业转入正常经营以后，入不敷出，便陷于破产困境。

第五，政府在稳定物价过程中，银根收缩过紧，有些税收偏高，推销公债时间较急，以致货币回笼过于集中，造成工商业资金周转不灵和市场商品滞销。同时，国营贸

易前进的步子也快了些。华北地区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经营的粮食、棉纱、棉布、煤炭、食盐等主要商品量占80%左右；对其他日用必需品，经营也较广，普遍设零售店，甚至摆摊、上集、赶庙会、游乡入户推销商品。从而增加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陈云在总结这一段财经工作的经验时说："今年发了一万万分公债，对回笼货币、稳定物价，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一次搞得太多了，如果分几次搞，可能好一点。一下发这么多，而且和税收等挤在一起，这种办法不妥。根据现在的通货情况，这样集中的大量的回笼货币也不适宜。对于尾欠，能交者就收，不能交者就停。二期公债，今年不发。"薄一波在回顾这一段工作情况时也说："1950年2月，全国财政会议曾估计'四路进兵'（即收税、收公债款、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从发现问题，到开始投放货币，犹豫了25天，这就加重了银根紧张的程度。同时，由于没有谨慎地区别投机资本的活动和正常的工商经营活动，采取区别对待的措施，而是简单地一棍子打下去，使得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活动也连带受到了打击。"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暂时困难，引起了工商界人士的疑虑和不安。有人认为，这些困难是人民政府有意制造的，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变了，要提早实现社会主义。于是，有的等待观望，消极经营；有的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停工歇业，解雇职工；有的弃厂潜逃，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与此同时，在党政干部中也产生了某些"左"的情绪。如有人认为，当时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要求不加区分地限制和排挤私营工商业；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等等。在经营范围、税收和价格政策、原料供应、银行贷款等方面，没有全面贯彻执行公私兼顾的方针，也增加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

由于部分私营工商业关闭歇业，给社会造成了新的失业现象。据统计，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失业工人超过百万。这种情况，不仅激化了劳资矛盾，也使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贫民对政府失望和不满，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调整公私关系已势在必行。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听取和批准了中财委主任陈云《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财委六个月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但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而在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务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努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为了详细了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确定落实调整工商业的措施，1950年5月8日至26日，中财委召开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上海、天津、北京、武汉、重庆、西安、广州七大城市的工商局长外，还有天津市副市长周叔瞍、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中财委委员章乃器、俞寰澄，以及中央贸易、银行、劳动、税务、轻纺、私营企业管理局等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听取了各地工商业的情况和参加会议的私营工商

业代表人士的意见，讨论了调整工商业、克服稳定物价以后工商业困难的具体措施。陈云在综合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五点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办法：

"一、重点维持生产。在华东，最重要的是纺织工业，拟采取国家拨给原料、私营工厂加工的方式。部分工业，如机器制造工业、橡胶工业及一部分造纸厂，拟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的办法。"

"二、开导工业品的销路。分两方面：一是以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二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于出口的工业品出口。

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

四、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

五、重点举办失业救济。"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着重研究了调整工商业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条件。他说："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他要求，"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批评了当时党内已经出现的"左"的情绪，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他还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毛泽东特别强调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会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便全面展开。

为了调整工商业，有关部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6月—9月份先后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其中有盐业运销会议，粮食加工会议，百货产销会议，煤炭产销会议，火柴工业会议，橡胶工业会议，毛麻纺织工业会议，纱布染织业加工会议，卷烟工业会议，进出口贸易会议，金融业联席会议等。这些会议，有公私代表参加，共同研究本行业内的公私产销协调问题。通过协调，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和渡过困难。

调整工商业，包括三项内容：（一）调整公私关系；（二）调整劳资关系；（三）调整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质上是调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即一方面，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方面，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能够发展。

在调整工商业工作中，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扩大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

对资本主义工业，人民政府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对它们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以解决它们在原料、资金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困难，帮助其维持和恢复生产。

政府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在解放初期已经出现，但比重不大，调整工

商业以后，比重迅速扩大了。以上海市为例，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加工订货的范围、品种、数量都增长很快。以1950年下半年与1949年同期相比，私营棉纺、织染工厂为国营花纱布公司代纺棉纱的数量增加17倍多，代织棉布增加8倍多；国营百货公司的收购金额（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增加了40倍。由于加工订货范围的扩大，同国家发生加工订货关系的私营厂数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其中造纸、搪瓷行业同国家建立了全行业的加工订货关系。棉纺工业在私营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当时开工的39家私营棉纺工厂中，有37家部分或全部承接国家加工订货任务。全国的情况和上海差不多。1950年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所占的比重从1949年的11.5%上升到27.3%。占全国私营工业生产总值比重将近三分之一的棉纺业，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

——调整价格和经营范围。

由于物价大幅度下降，部分商品的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国营贸易公司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使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现象。例如，有的地方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差额很小；有的地方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相同；有的地方零售价格低于批发价格，致使私营商业无利可图，不能正常经营。为了纠正这些不正常现象，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特电令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立即调整零售价格。通令指出，在确定零售价格时，必须根据零售成本（包括批发价格、运费、杂费、税用和损耗等）及合理利润比例来规定，以便使私营零售商能获得合理利润。

各地国营贸易公司收到贸易部通令后，即先后将主要商品的批发与零售价格作适当的调整。例如，上海市五家国营贸易公司，6月5日至12日，先后调整了米、油、盐、糖、布等五种主要商品的零售与批发价格。调整后，私营商业批购转售已可获得较多的利润。粮食的批发与零售价格曾经两度调整，零售米价与批发米价每担差额从5000元扩大为12000元。食油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的差价于12日由2.5%提高到6.5%。食糖批发与零售价格间的差额，于10日从原来的10%—15%提高到12%—15%。布匹批发价一周间也经过两次调整，龙头细布由4日的25万元一匹降至12日的24万元。牌价的调整使零售商的经营转为有利。南京市各贸易公司分别把布、百货、粮食的批发与零售价格的差额从4%调整为10%。西安市百货公司于6月20日将该公司经营的将近600种商品全部调整了价格，使批发与零售价的差额从5%以下提高到10%—15%。为了给私营商业以出路，国家在保证市场稳定的条件下，适当收缩了一些国营商业机构，规定国营零售商店主要经营粮食、煤炭、纱布、食油、食盐、石油等6种人民日用必需品，以稳定零售市场价格，制止投机商人扰乱市场为限。国营批发公司的责任主要是回笼货币和稳定批发价格。根据这一规定，上海国营商业紧缩了一部分机构并减少了一部分经营品种。例如，该市土产公司自1950年8月起撤销了49家特约经销处，将土产零售业务全部让给私商经营。交通运输业也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合理安排运输任务，使私营运输公司的水陆运输能力得到利用。进出口贸易，国营贸易公司除办理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只经营进口物资中的工业器材、军用器材、调剂供求稳定市场所必需的民用器材和一部分主要出口物资，其余进出口商品，均归私人经营。在国家经营的部分中，

还采取合同的方式委托私商代购代销，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调整税收。

在保证国家财政需要和合理负担的原则下，适当调整和减轻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具体措施有：(1) 税种：决定薪资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暂不开征，地产税和房产税两种合并为一种，即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规定的14种减为11种；(2) 税目：对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和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387种市场急需产品，全部或部分免征货物税。全部免征者，有陶器、石灰、土制砖瓦、自来水笔零件、钟表零件、留声机零件、汽车及汽车零件、土硝和蜡烛等；一部免征者，有橡胶制品、玻璃制品、五金类、电料类、自行车零件、矿产品、皮革和植物油等。同时，对部分工业品的货物税合并征收。如把棉织品合并在棉纱内征收，把毛织品合并在毛纱内征收，共减少税目391个。这样，就使原来的1136个税目减为358个；(3) 税率：工商业所得税在维持原税率的情况下，提高了起征点和最高累进点，使累进级数增加，累进幅度缩小；(4) 退税：为了鼓励出口、争取外汇，对在国外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

——调整劳资关系。

1950年3月以后，私营工商业严重困难，劳资争议案件增加。为了调整劳资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于4月底公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用协商的方法，解决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各种问题。根据这个精神，在各地工会的推动下，私营企业纷纷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由劳资双方直接见面商议克服困难的办法。一方面，责成资方积极改进经营，精简冗员，节省开支，降低成本，反对他们无理解雇工人，抽逃资金，制造停工歇业；另一方面，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负担更多的劳动任务，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主动对工资、福利作出让步，为维持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作出了很大牺牲。在此期间，政府对工人的失业救济和安置作了大量的工作。

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精神，中国人民银行逐渐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1950年6月底，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广州、西安七市共向私营企业贷款近3000亿元（旧人民币），比1949年底增加3倍以上。同时，适应物价稳定情况，迅速降低利率，6月底比2月底下降90%以上。”私营行庄的利率也降低了。

1950年9月，调整工商业的任务基本完成。

在调整工商业期间，广泛开展了城乡物资交流。在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和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的公私关系座谈会上，许多人反映，东西卖不出去，特别是各地生产的土特产要求向外推销。会后，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当时，实际上并不存在工业品“过剩”，而是不足，只要几亿农民的土特产品有了销路，工业品就有了宽阔的市场。1950年秋季农业丰收，各地农村粮食、棉花、丝、菜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显著恢复，各种小土产、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都不同程度的增产，开展城乡交流的客观条件已经比较成熟。这件工作是在国营企业的组织领导和带动下，紧密依靠农村供销合作社，并团结私商共同进行的。银行、运输部门给予大力配合，使许多滞销的土特产品迅速打开了销路。华北地区是最早举办土产会议的，自1950年冬至

1951年春，全区总值50亿斤粮食的土特产品即基本销完。

1951年4月，陈云在总结1950年的财经工作时说："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1950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私营工商业歇业减少，开业增多。下表是1950年4月到10月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开业和歇业的变化情况：

单位：户

类别		4月份	6月份	8月份	10月份
工业	申请开业	5	13	90	158
	批准开业		4	14	192
	申请停工	389	158	62	25
	申请紧缩	40	82	39	15
	申请复工	5	29	93	82
商业	申请开业	57	196	786	1162
	批准开业		116	137	1895
	申请歇业	1567	790	235	133
	申请紧缩	39	98	55	23
	申请转业	11	63	35	50
	申请复业	11	142	115	44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孙怀仁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0月份和4月份相比，工业申请开业户从5户增至158户，申请停工户从389户减至25户；商业申请开业户从57户增至1162户，申请歇业户从1567户减至133户。另据上海、北京、天津等10个大中城市统计，1950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开业的共有32674家，歇业的只有7451家，开业户比歇业户多25223家。

私营工业生产逐渐恢复，产量逐月增加。下表是上海市1950年4月至12月主要工业品产量指数的变化情况（以1月份产量为100）：

产品名称	1月份	4月份	8月份	12月份
棉纱	100	94	106	176
毛纱	100	75	104	319
面粉	100	19	98	127
化学胶	100	59	87	161
颜料与染料	100	61	160	113
玻璃	100	60	221	292
水泥	100	113	247	413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8—1985年），孙怀仁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以1月份产量为100，12月份绵纱产量为176，毛纱为319，面粉为127，化学胶为161，颜料与染料为113，玻璃为292，水泥为413。

市场活跃，交易量增加。根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四大城市市场成交量统计，10月和4月相比，面粉增加了54%，大米增加了2.9倍，棉纱增加了1.3倍，棉布增加了2.3倍。据重庆市对8种主要商品成交量统计，7月比6月增加37%，8月比7月增加24%，9月又比8月增加86%。有的工商业者认为，市场繁荣情况是抗战以来十余年所没有的。

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全国七大城市公私合营和私营行庄，10月份和4月份相比，存款余额增加80%，放款余额增加1.5倍，汇出入总额增加近3倍。据全国十大城市私营工商业税收统计，1950年第3、4季度比1季度分别增加了90%和80%。

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条例》的总则要求，“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的规定，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鼓励并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这里所说的私人企业，是指私人投资经营从事营利的各种经济事业，其组织方式包括独资、合伙和公司。《条例》和旧的公司法不同之处是：（一）“为克服盲目生产，调整产销关系，逐渐走向计划经济，政府得于必要时制定某些重要商品的产销计划，公私企业均应遵照执行”；（二）“企业应切实执行政府一切有关劳动法令”；（三）“企业的财产和营业受充分的保护，经营管理权属于投资人；但与劳资双方利益有关者，应由劳资协商会议或劳资双方协商解决之。”这几个方面，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条例》还对核准与登记、企业对内对外关系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五章 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

第一节 三大运动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争取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此，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镇压反革命。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以后，又加上了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较量的任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毛泽东称它们为三大运动。

三大运动都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动员范围之广，参加人员之众，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些运动，并没有脱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这个中心，相反地，它们是始终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因此，不仅运动成效显著，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一、土地制度的改革

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主要内容。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更大的范围内领导和发动解放区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在新中国建立以前，老解放区已有1.2亿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的26.7%）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建国以后，由于广大新解放区残敌尚未肃清，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城市工作又很繁重，1949年冬到1950年春只在华北的城市近郊和河南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大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把不合理、不合法的租地押金退还农民），为实行土地改革准备条件。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把土地改革的完成列为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需要创造的第一个条件。全会要求全党，认真地有步骤有秩序地完成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并于30日公布实行。

新区的土地改革和过去老区土地改革，情况已经根本不同。过去老区的土地改革，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谁胜谁负还不明朗的条件下进行的，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尽量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动员农村的人力物力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统一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全国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的条件下进行的。土地改革除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尽快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新区的土地改革，在坚持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前提下，对具体政策作了若干重要修改。

第一，对富农由征收多余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中国的富农阶级约占农村人口的5%左右，他们主要是雇工经营，有的还出租部分土地，兼放高利贷，是农村的资产阶级。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五四指示》，曾规定土地改革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实际并未实行。1946年7月到1947年10月，华北、山东和华东许多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时，由于战争紧张残酷，人民的力量处于相对劣势，富农倾向于地主阶级，反对土地改革和人民革命战争，群众将富农的多余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没收了。中共中央1947年10月10日颁发的《土地法大纲》肯定了这种做法，规定可以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老区的土地改革，是按照这一规定进行的。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面对城市郊区的土改，毛泽东重新考虑对富农的政策。1949年1月，他指出："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5月3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作出了《关于北平管辖区土地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只征收富农之出租土地，对其自耕和雇人耕种之土地，其耕种权与所有权一律不变。实践证明，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有许多好处：（一）有利于早日恢复农业生产。首先是有利于稳定中农的生产情绪。他们说："富农都不动，我们还顾虑什么？"同时，富农的生产工具、资金及其他生产条件都较一般农民优良，保存富农经济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二）有利于孤立地主。土改前，富农和地主惶恐的心情是相同的。一般富农认为自己一定是土改的对象，一般农民也是这样的看法，但当土改一划清阶级界线，富农知道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和地主不一样，就开始远离地主，情绪趋于安定；（三）坚决地保护了中农。过去在土改划阶级中最感困难的是区别剥削分量是否超过25%的问题，即富农和中农的界线问题，因而很容易把中农划成富农。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可保证中农不受侵犯；（四）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中共中央总结了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并广泛征询了各大区中央局的意见，在《土地改革法》中对富农的政策作了新的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已出租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

第二，对地主只没收他们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和《土地法大纲》是不同的。《大纲》曾规定没收其他财产（实际上是没收一切财产）。不予没收的其他财产，除地主兼营的工商业过去已规定不予没收外，还包括现金、衣物等（通常叫浮财或底财）。根据过去土改中的经验教训，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这些财产，往往引起地主隐藏分散这部分可以转移的财产和导致农民对这部分财产的追索，以致发生混乱现象，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影响土地改革的顺利和健康进行。《土地改革法》规定，把这部分财产留给地主，可以使地主依靠这些财产维持生活，或者投入工农业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有好处。

第三，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标准。在土改前的中国农村，有一些因缺乏劳动力或从事其它职业（如工人、教职员、自由职业者）而出租少量土地的人，即小土地出租者。对此，《土地法大纲》中没有规定专门的政策，在过去土改中常常出现把小土地出租者的少量出租土地也予以没收分配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着手制定对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1950 年 2 月颁布的经政务院批准的《河南省土地改革条例》中，首次提出，对小土地出租者其土地数量在当地每人平均数 150%以下者，不得没收，并允许其继续出租。《土地改革法》提高了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标准，规定：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 200%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 2 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 4 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同时，还规定：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生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 200%，亦得酌情予以照顾。这种小块的出租土地总数，不超过全国耕地总数的 3%—5%，而且小土地出租者中有一些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给他们多保留一部分土地，由其继续出租或自耕，既能起到一定的社会保险作用，又有利于团结他们，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切实团结和保护中农。《土地改革法》根据历史经验，明确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少数中农附带出租的土地，也不予征收或没收。同时，在土地分配办法上，改变了过去以乡为单位把地主的土地、公地以及其它土地打乱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而是仅仅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公地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政治上对中农也给予照顾。农会组织积极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领导工作，并规定在各级农会领导成员中要有三分之一是中农。

第五，城市郊区所有没收和征收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政府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根据城市郊区土地关系的特点和《土地改革法》的精神，1950 年 11 月 10 日，政务院颁布了《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条例》规定，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与一般农村不同，将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为了维护分得国有土地农民的利益，《条例》还规定：凡使用城市郊区国有土地从事耕种者，除依法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外，一律不再交地租；国家为市政建设及其它需要收回农民耕种的国有土地时，应给耕种该项土地的农民以适当的安置，

并对其在该项土地上的生产投资（如凿井、植树等）及其它损失，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对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由市人民政府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保障农民对该项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根据工业及其他建设事业的需要，国家可以自由而合理地使用郊区土地，减少征地的困难。同时城市郊区一般人多地少，非农业人口比重大，没收土地归国家所有后，非农业人口不再争着分地，有限的土地就可以集中由农民使用，这对发展郊区农业也是有利的。

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土地改革法》和有关法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运动的发展是健康和顺利的。到 1953 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这是因为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更加丰富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也更为有利了。”经过土地改革，全国有 3 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约 7 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 700 亿斤粮食的地租，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 60%—70%。

经过土地改革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统计资料，全国土改前后各阶级占有耕地的变化情况是：

土地改革前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

	各阶级人口的比重（%）	各阶级占有耕地的比重（%）
合　计	100.00	100.00
贫雇农	52.37	14.28
中　农	33.13	30.94
富　农	4.66	13.66
地　主	4.75	38.26
其　它	5.09	2.86

土地改革结束时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

	各阶级人口的比重（%）	各阶级占有耕地的比重（%）
合　计	100.0	100.0
贫雇农	52.2	47.1
中　农	39.9	44.3
富　农	5.3	6.4
地　主	2.6	2.2

资料来源：《中国的土地改革》，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0 页。

表中显示，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 4.75%的地主，占有 38.26%的耕地；占农村

人口 52.37%的贫雇农，只占有 14.28%的耕地。土地改革结束时，占农村人口 2.6%的地主，占有 2.2%的耕地；占农村人口 52.2%的贫雇农，已经占有 47.1%的耕地。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表明，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已被彻底消灭，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变为现实。

二、镇压反革命

为了保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并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10 月，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

全国解放以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但国民党在大陆还遗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据当时粗略统计，遗留和潜伏下来的政治土匪约 200 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 60 万，各种特务分子约 60 万，总计 300 多万人。对于反革命分子，人民政府已经进行过清理和镇压。比如，在城市，勒令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登记，通令取消各种反动会道门，并破获一批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杀、关、管了一批特务、土匪；在新区农村，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对盘踞在湘西、桂西和贵州等地的土匪进行了围剿，初步打击了反革命势力和稳定了社会秩序。但反革命分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阴谋破坏工厂矿山、铁路桥梁，抢劫仓库、粮站，烧毁民房，扰乱社会秩序；造谣惑众，组织暴乱，袭击、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 年广大新解放区有近 4 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半老区不断发生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事件，威胁农民退还土地、粮食、牲口、农具，赶农民搬家。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干部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及其危害性却认识不足，没有切实贯彻《共同纲领》中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许多地方发生了过于宽大的偏向，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说政府“宽大无边”。针对这种情况，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在运动中，人民政府十分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为反革命分子布下了天罗地网，使他们完全陷于孤立。1951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全国性高潮以后，1951 年 5 月，中共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过程中，强调要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

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在大陆上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都被基本肃清，在全国范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这一方面支持和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生产建设所必需的条件有许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消灭破坏人民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有许多惨痛的经验已经证明，如果不消灭反革命分子，我们就不能或者很困难进行建设。"

三、抗美援朝

正当我国人民从各方面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帝国主义就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扬言"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插足中国的领土台湾。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结的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直逼朝鲜北方，战火有烧到中国东北边境的趋势。9月30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美国过分低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决心和力量。10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全面地估量国内外形势，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并深入地分析了出兵作战的必要性和取胜的可能性，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根据政治局的决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渡过鸭绿江，赴朝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从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6月10日，连续进行了五次大的战役，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在这种情况下，从1951年7月开始，双方举行停战谈判。停战谈判谈谈打打，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年之久，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美国才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国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于：（一）军费和与战争有关的费用迅速增加，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又接近二分之一；（二）帝国主义的"禁运"、"封锁"，使我国许多土产的出口和必需的工业原料及设备器材的进口受到严重阻碍；（三）时局紧张，人心浮动，社会游资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资金争购市场短缺物资，使部分物资，特别是进口工

业器材、纱布等工业品、粮食及金银美钞价格上涨，投机资本蠢蠢欲动。在华北与华中黑市纱价每件曾高过牌价200多万元（旧人民币），即高过牌价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纱布厂商便减少或停止成品出售。茶叶商、油盐店也争相收购，颇有牵动整个物价上涨之势。由于人民政府领导全国纱厂增产棉纱，并对纱布市场进行了适当的管理，棉纱风潮才没有爆发。

根据形势的变化，在1950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对1951年财经工作的方针，作了及时调整，从和平的恢复经济转到服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在会上，陈云对财政工作做了部署。他指出："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现在争执之点，在于何者是第二，何者是第三。这种争执，在过去各个时期未曾发生过，也不会发生。我以为第二应该是维持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要大乱；第三才是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的支出。"为什么要把市场列在第二？他认为，首先，在过去的各个时代，市场物价问题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现在不同了，我们已占有全国大、中、小城市，全国交通已经恢复，财经已经基本上统一，而且城市经济已有了一些基础。半年来物价稳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好的作用。因此，凡是对于市场物价稳定有影响的，我们应该慎重地来考虑。"其次，"我们的经济还无巩固的基础，还很脆弱，物资储存也很少。如果敌机来轰炸，可以随时引起物价风潮。我们手中无物资，平抑不了涨风，政治上很不利，而且会影响军事。"因此，必须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财政上求得平衡，金融稳定了，物资供应发生问题，运输发生问题，市场物价还要波动。但是，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平稳便有了基础。带投资性的支出列在第三，就是说，要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

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保持了在抗美援朝期间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下表是1950年到1952年的国家财政收支总额：

单位：亿元

年　份	总收入	总支出	收支差额
1950	65.2	68.1	－2.9
1951	133.1	122.5	＋10.6
1952	183.7	176.0	＋7.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395页。

表中显示，1951年结余10.6亿元，1952年节余7.7亿元，这在战争期间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保证了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以1950年价格为100，1951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12.2，1952年为111.8。

第三，国民经济全面回升。在抗美援朝爱国热潮的推动下，全国人民迅速投入支援前线的爱国增产运动。由于土地改革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和抗美援朝开始后军需订

货大增，全国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上升。以上海市为例，1951年和195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54%，农业总产值增长7.6%。

第二节　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以后，一直到1952年，我国人民主要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和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前述三大运动，都属于这个范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向，但在《共同纲领》里并没有写进社会主义前途。刘少奇在解释为什么不写时说："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这可以代表当时党中央的看法。

不过，实际上，我国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的同时，已经开始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了。这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有充分的反映。比如，《纲领》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合作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这些规定，是以解放区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建国以后很快就开始进行了。虽然当时在采取某些步骤时，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下面，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

第一，私人资本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

最早大量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向私人资本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当时，主要是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经营上的困难，资本家是欢迎的。同时，国家为了掌握货源，稳定市场，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也要向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加工、订货和收购它们的产品。

1950年3月以后，物价趋于稳定，资本主义工商业遇到了严重困难。在调整工商业过程中，国营商业部门扩大了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各地国营专业公司曾大量收购私营工业的滞销产品。根据天津市信托、百货、蛋品、粮食、石油、油脂六个国营公司统计，1950年1月至8月份对橡胶、颜料、纸张、文具、烟草、针织、蛋品、纱布、油料、五金电料、化工等业的收购总值共达3475万元，其中收购私营产品占76%。1950年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所占的比重已达27.3%（1949年为11.5%）。从占全国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将近三分之一的棉纺业来看，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即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1951年1月政府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此后私营棉纺厂的生产，就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1951年，伴随城乡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显著发展。与1950年相比，

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11%，职工人数增加11.4%，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11.9%，从业人数增加11.8%，批发额增加了35.9%，零售额增加36.6%。1951年私营工商业全年盈余估计37.17亿，比1950年增长90.8%。资本家说，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形势好转以后，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便力图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开始拒绝接受加工订货。当不得不接受加工订货任务时，他们就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办法大肆偷工减料，欺骗国家。同时，普遍偷税漏税，有的则盗窃国家资财，或向国家干部行贿，收买“坐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很快“三反”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和国家干部廉政为民的本色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影响深远。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当时叫“打老虎”）阶段，由于对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并按部门人为地规定分配打“虎”任务，也出现过一些过大的偏差，但很快作了纠正。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1952年1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团结工人阶级、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开始的，对资产阶级震动很大，对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个时期，一部分经济部门的工作几乎停顿，国营企业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冲击；资产阶级惊恐不安，大批私营工商业停业、半停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2月22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表现了暂时的但又是显著的停滞现象：（1）一季度税收估计将减少一半，好多税局已经垮了；（2）贸易额减少很多，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来的30%，工业器材仅及15%；（3）许多私营工业无事可做，有的有意用不发工资或要公家贷款维持的办法抵抗“五反”运动；（4）工商停滞造成工人失业，也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有两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或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5）特务已乘机兴风作浪。邓小平在电报中建议，中央应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入手，启动市场，减少失业工人，缓解城市贫民的困难。毛泽东复电同意，并适时地调整了“五反”运动的部署。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指示》规定，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

"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同时，对"五反"定案、补交漏税和退回违法所得的工作也规定了一系列合理的从宽的政策，并决定县区乡当时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在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引下，运动后期发展比较健康。以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市为例。由于准备充分，3月25日开始后，5月基本结束，根据中央规定的"五反"定案处理的基本原则，经过工商业者自报互评、职工群众的集体审查和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的批准，工商业户"五反"审查定案的结果是：守法户占39.23%，基本守法户占45.49%，半守法半违法户占11.92%，严重违法户占2.92%，完全违法户占0.44%。基本上达到了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

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在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由彭真所作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说明稿》中作了如下的概括："除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完全违法乱纪的大贪污犯和工商界中一部分完全违法的大盗窃犯以外，这种斗争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于违反共同纲领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对于一部分堕落腐化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劣作风的斗争；是按照共同纲领和国家法令进行合法的私人工商业经营道路对于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经营道路的斗争。简单讲，除了对大贪污犯和大盗窃犯的斗争以外，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两种作风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带来了暂时的市场停滞。为了维持市场，国家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1952年3月到6月，上海市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收购达57000多亿元，比1951年同期增加1倍，占私营工业营业总额的81.5%，关系工厂也从1951年的3000多家增至7000家左右，天津市的加工订货占私营工业营业额的62%。1952年上半年北京市9个国营公司的加工订货比1951年同期增加1.1倍。当时有人称之为"人工呼吸"。为了使私营工商业积极接受加工订货，陈云还提出，加工订货的工缴费要按照生产成本、市场价格和社会需要来定，利润率可以是10%、20%，也可以是30%。只要不违反国家规定，订的价格适应购买力，也可以不受30%的限制。商业利润不应该高于工业利润，个别的也可以超过30%。工缴费提高推动了加工订货的发展。下表是1949年到1952年加工订货的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年　　份	1949	1950	1951	1952
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	68.28	72.78	101.18	105.26
其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产值	8.11	20.98	43.21	58.98
—占总产值%	11.88	28.83	42.71	56.04
自产自销产值	60.17	51.80	57.97	46.28
—占总产值%	88.12	71.17	57.29	43.96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工两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9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2年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的产值已从1949年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11.88%上升为56.04%。这就是说，私营工业的一半以上已经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

在全国解放初期，我国也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当时的公私合营企业，主要来源有三。第一个来源是，由有官僚资本投资和有敌伪财产的企业经过清理、整顿、改组而成的。1951年1月5日，政务院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办法》规定，进行清理的公股及公产（包括贷款、垫款及设备等）包括：(1) 国民党政府及其国家经济机关、金融机关等在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2) 前敌国政府及其侨民在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3) 业经依法没收归公的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等在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解放后人民政府及国家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对企业的投资，亦应转作公股，合并处理。经过清理以后，一些比较重要的企业，应予没收接管的股权又占相当比重的，和资本家协商，国家派干部参加管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不重要的企业，则将没收接管的股权撤出，转为私营。当时实行合营的企业，由于原来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比重较大，公股比重也比较大。少数公股比重较大的企业（主要是公用事业和矿业），经公私协商同意，交由国家统一管理，给予私股以固定的股息。第二个来源是，“五反”运动以后，将资本家违法所得转为公股实行合营的。1952年4月，薄一波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谈到违法资本家的退财补税问题时写道：“上海退补金额将达10万亿元（不包括罚没），即使打七折，仍有7万亿元。而全市私营资本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总值约50万亿元，1951年除所得税及抗美援朝捐献以后的盈利额为5万亿元（均为旧人民币）。资本家要退补这样大的数目，无论如何一下是拿不出来的。建议采取三种办法解决，即现款偿付20%左右；退而不出转为公股20%左右；其余60%左右记账分期偿还。”党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五反”运动以后一批新的合营企业就是这样建成的。第三个来源是，一部分财务发生困难的大工厂，由于要求国家投资，也实行了公私合营。如水利化学工业公司。下表是1949年到1952年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情况：

年 份	1949	1950	1951	1952
户数	193	294	706	997
职工人数（万人）	10.54	13.09	16.63	24.78
总产值（亿元）	2.20	4.14	8.06	13.67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2.0	2.9	4.0	5.0
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的全部产值的%	3.1	5.4	7.4	11.5
资本额（亿元）	1.3	2.4	3.28	5.37
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的全部资本额的%	9.0	15.0	16.1	24.5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1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2年，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有997户，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但其资本额已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全部资本的24.5%。这就是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资本跨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在此期间，还实现了私营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解放前，私营银行、钱庄数量很大，1949年连同分支机构共有1032家（不包括东北地区）。解放后，政府对私营银行、钱庄，一方面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限制其投机活动；另一方面，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疏导其资金，使之用于正当工商业的放款，并且逐步组织它们联合放款，联合经营业务。以上海市为例。1950年上半年，全国物价稳定以后，私营金融业曾出现成批倒闭现象，从2月到6月，先后有93家行庄停业清理。同时，也出现了大型银行要求公私合营和中小行庄组织联营的重要变化。由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商业储蓄和新华信托银行组成的“小四行”，由于官僚资本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解放初期即改组成公私合营银行。1950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人民银行洽谈公私合营问题，不久，浙江兴业、国华（属“南四行”）和金城、大陆、中南等银行（属“北五行”）以及“川帮”中的聚兴成、和成等银行也纷纷提出合营要求。人民银行总行经中财委和政务院同意，支持这些私营银行的合营要求，分别接受了这些银行中应予没收的官僚资本股票，派出了公股董事。但由于公股比例较小，国家还需要发挥这些银行在国内外机构、人员、资产、信用联系等方面的作用，当时对外没有正式宣布为公私合营。1950年3月底，一部分基础较好的中小行庄，为了争取社会信用，维持和发展业务，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开始酝酿组织联营集团。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到1950年7月，已有46家私营行庄和信托公司分别组成了4个联营集团。后来，这4个联营集团又合并为两个联营管理处，并接受国家银行委派的干部参加管理。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由于被揭发出来的私营金融业违法现象严重，加上内部机构庞杂，资力薄弱，经营落后，行庄的社会信誉已经动摇，调剂资金的作用日益缩小。以吸收储蓄和私营工商业存款为例，1950年6月到1952年12月，国家银行

所占比重由58.6%上升为92.8%，私营银行和钱庄所占的比重由41.4%下降为7.2%。这些行庄普遍亏损，经营困难。为了摆脱困难，资本家纷纷要求把行庄交给国家实行全行业的联合管理。适应这一情况，国家于1952年12月对私营银行、钱庄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业务。私营金融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交出了经营、财务、人事权，国家定期发给他们股息；对其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物质上给予某些照顾；对一般私方人员和高级职员，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予以留用。对于全体职工，则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样，就基本上完成了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农业开始实行互助合作。

改革土地制度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激发了农民前所未有生产积极性。”当时，农村曾经出现“古树开花”的新气象。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对黑龙江、吉林、松江、辽东4省10个县16个村屯的调查，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经济发展颇为迅速。具体表现为：

——1950年的农业生产量已超过战前的最高产量。如黑龙江省白城县的胜利、新发、新立三个村，总产量超过1943年的22%；松江呼兰腰堡村超过1944年的18.09%。单位产量绝大部分村屯也都超过了1943年的水平。如松江呼兰孤榆村单位产量超过1943年的6.75%，腰堡村超过13.19%，又如辽东省凤城县的小堡村、小堡屯，单位产量超过1943年的37.5%。

——车马大量增加。白城县胜利、新立两村，1943年大车35台，犁杖84付，耲耙34张，小农具56件；1950年大车99台（内胶皮轮大车1台），犁152付，耲耙49张，小农具1484件。黑龙江肇州县发展村1945年车34台，耲耙49张，1950年车68台，耲耙98张。牲口增加情况如下：白城县3个村，1943年马、骡159匹，牛76头，驴50头；1950年马、骡126匹，牛72头，驴278头。凤城县西小堡屯，1945年马、骡6匹，牛40头，驴16头；1950年马、骡11匹，牛59头，驴35头。

——农民余粮增多。吉林榆树解放村536户，土地1217.75垧，1950年余粮（扣除公粮、人畜食用、种子）为1046680斤，占总产量的47%，内有余粮100石以上者两家，40—50石者10家，20—30石者20家，10石左右的178家，3—5石者286家。吉林磐石团结村227户，土地479.74垧（水田半垧），余粮595000斤，占总产量三分之一以上，平均亩产余粮2621斤。黑龙江肇州发展村336户，1948年余粮208.8石，1949年余粮202.6石，1950年余粮957石，余粮户占总户数的56.63%。吉林永吉蒐登站17户调查共余21376斤，占农业收入的14.7%。松江呼兰腰堡村214户，余粮户有151户，余粮383200斤，占总产量18%，内有余粮50石以上的1户，30石以上的两户，20—25石的6户，8—15石的4户，1—5石的102户。白城三村有87户有余粮，占总产量的26.6%，占总户数的27%。

——购买力随农副业发展亦提高。白城新发村以1948年的购买力为100，1949年为168%，1950年因受旱，降为142%。辽东清原四道城场购买力以1948年为100，1949年为175.2%，1950年为207.4%。

生产发展的结果，使中农成为农村主要阶层。白城三个村，中农占该三村总户数的63.8%，人口的67.3%，劳力的69.5%，畜力的87.5%，土地的75.7%，大车的86.4%，总产量的76.8%。

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农民生活改善以后，在农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中都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反映：

(1) 在农民群众中，少数经济上升比较快的要求买马拴车，其中许多人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苦恼。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他们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他们还没有看出组织起来的好处，心怀苦闷，影响到生产积极性。

(2) 那些经济虽然上升，但因车马不够拴一付犁杖的农民，虽对某些换工插犋违反自愿两利的缺点有意见，但他们仍愿参加变工，因为不参加地就种不上。但他们有些人希望在变工组把自己发展起来，将来买马拴车，实行单干。他们之中，特别是经济条件较差的，仍有农业社会主义平均思想，有人欠了别人600斤粮食，还说：我虽欠你粮食，但过不几年，还不是一同和你走人"共产社会"；甚至看到别人买马，他说，将来走人社会主义，你还不是一样没有马?!

(3) 在农村党员及村干部中，问题也多，有些党员开始雇长工，如桦川孟家岗有6个党员雇了长工，要求退党；开通一个屯子21个党员，明年有8个准备雇工，群众也有7个准备雇工，合计占全屯户数的5%。再如延寿村干杜青山，因马多想雇"劳金"扩大经营，但又觉得党员不应剥削人，结果把马分散，参加互助组，说自己好好工作，生产上自己不准备发展了。

也有的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马买车拴单犁，怕他们单干。有的不让农民单干，强迫参加互助组。

当时，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允许不允许富农经济发展?

刘少奇认为，应当允许发展富农经济。1950年1月23日，他所签发的中央组织部答复有关党员雇工问题的信中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同日晚，在和安子文谈话时还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

1951年，中共山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围绕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发生了争论。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

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以后，互助组涣散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因此，主张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因素。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3月，山西省委又提出，为扭转互助组的涣散现象，省委计划在长治专区各县，每县试办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支持华北局，并在印发山西省委报告时写了一个批语。批语的全文是：“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并不是否定农业走集体化的道路。他的主张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当允许富农经济发展，不要害怕两极分化。他认为，用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是空想。只有工业发展了，有了机器，才能建立集体农庄，实现农业集体化。

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泽东这样做并非出于偶然。在新区土地改革中，毛泽东主张保存富农经济，认为这对农业发展有好处，而且说过“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一类的话。但在实践上这一政策并未认真贯彻执行。由于允许个别省区征收富农的土地，不少地方把富农经济搞掉了，只有华东和西北某些省份没有征收。对此，毛泽东感到高兴。1960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说：“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情况不好。我们认为，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从1950年起，到1955年，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有争论。砍掉合作社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同时他还说：“教科书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是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这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发展富农经济的，他认为，应当在农村没有发生分化的情况下，依靠贫下中农，“趁热打铁”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自然要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

这场争论，加快了在农村推行互助合作的进程。

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同年12月由中共中央批发到县委和区委，组织实行。《决议（草案)》指出：

——“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提出不能忽视和粗暴

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党是坚持了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各地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随着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的要求，而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和复杂的形式，但是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第二种形式是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一种形式较高的形式。它们中有一部分开始实行农业和副业的互助相结合，有某些简单的生产计划，随后逐步地把劳动互助和提高技术相结合，有某些技术的分工。有的互助组并逐步地设置了一部公有农具和牲畜，积累了小量的公有财产。”“第三种形式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或称为土地合作社。这种形式包括了第二种形式中在有些地方已经存在的若干重要的特点，即如上述的农业与副业的结合，一定程度上的生产计划性和技术的分工，有些或多或少的共同使用的改良农具和公有财产等等，但带了比较扩大的形式。因为有了某些公共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有了某些分工分业，或兴修了水利，或开垦了荒地，就引起了在生产上统一土地使用的要求。”

——“根据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必要性，党在目前对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应该有下列三个方面”：“一、在全国各地，特别在新解放区和互助运动薄弱的地区，有领导地大量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二、在有初步互助运动基础的地区，必须有领导地逐步地推广第二种形式（即比简单的劳动互助有更多内容的常年互助组）。”“三、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即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问题，总的说来有两种不同的错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决议（草案）》初步设计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框架，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上是按照这个设计进行的。

《决议（草案）》下发以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决议（草案）》既反对右倾的错误思想，也反对“左”倾的错误思想，但重点是反对右倾思想。

1952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草案》认为，第一，东北地区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自发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日益严重。“不仅高利贷、雇佣、土地买卖逐年有所增长；并且有一少部分农户退出互助合作组‘单干’，有1%左右的农户已成为新富农。发展较快的如肇源7区18个村调查，富农已占农村户数的1.8%，人口的2.6%，土地的3.9%，耕畜的6%，车辆的7.7%。富农经济在目前比重虽小，但因为它适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规律，故在农民中影响颇大。目前新富农经济的特点，在于混在互助组内，并采取着化整为零，多种多样的剥削方式。有些党员，区村干部已变为富农。而最为危险的则是不少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对富农经济的发展熟视无睹。有的同志认为农民自发势力与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而任其自由发展；让资本主义因素在互助组内无节制地滋长，致使若干互助组瓦解变质。这种任富农经济自由泛滥，而不加适当节制的观点与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是目前主要的偏向。”第二，东北地区已经“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普遍而大量的发展了互助合作经济。”“互助合作内容与形式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扩大，由初级向中级、高级逐步发展着，1951年还出现了少数以使用新式马拉农具或改良农具与土地统一经营为基本内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凡是互助合作有基础，群众在生产上有此要求，并有坚强的骨干可以直接掌握领导的地方，即应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有步骤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那种强调条件不成熟，不去有步骤地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右倾思想，必须批判和克服”。第三，“各级党的组织在进行整党教育中，必须使每个基层组织，每个共产党员，明确地认识今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合作化，必须谨慎而又积极地引导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反对党内对互助合作工作的放任自流的右倾思想，反对那种认为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富农发展是必然的与不可怕的，因而就可以任其自发发展和分化；甚至认为发展富农可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就忽视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等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其实质就是放弃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这种右倾思想不肃清，农业合作化是根本谈不到的。”

1952年8—9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检查如何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当时，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鲁言在会上讲话时说，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下达后，下面干部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信心提高了，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谈到目前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与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仍须加强”。

1952年秋，农村开始进行整党。这次整党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明确农村中经济发展的方向，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政策——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老区，还批判了互助合作中的“右倾思想”。“农村党员干部经过整党集训普遍学习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件，同时批判了某些党员干部滋长着的‘雇长工’

'单干''放高利贷'等右倾思想和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不用领导的错误看法，使农村中的党员和干部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组织起来是农业生产上的第二个革命，是土地改革后革命工作的继续，重视了对组织合作互助工作的领导。"

在此期间，报刊、广播大量报导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成功经验。秋天，由农业劳动模范为主组成的中国农民代表团从苏联参观回国，集中地宣传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于是，在中国农村就出现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热潮。

下表是1952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的增长情况：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全国总农户	100.0	100.0	100.0
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	10.7	19.2	40.0
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			0.1
高级社			
初级社			0.1
农业生产互助组	10.7	19.2	39.9
常年组			10.1
季节组			29.8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史敬棠等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89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2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比重，从1951年的19.2%上升到40%，其中常年互助组达到10.1%，农业生产合作社为0.1%（社数超过3600个）。发展快的东北地区，组织起来的农产已占总农户的68.73%。

第三节 国民经济全面恢复

1952年，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完成，国民经济全面恢复。

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并有结余。而这是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环境下取得的。由于财政收支平衡，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就可以逐年增加国家建设投资。1950年，在我国财政概算的总支出中，国家建设支出只占28%，1952年已增至50%以上。国家建设费用大量增加，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保证了交通、水利事业的兴办，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下面，分别考察一下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情况。

一、工　业

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和1949年相比，增长144.9%，年平均增长34.8%。下表是1952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恢复与发展的情况：

产品名称	产　量	为1949年的%	为解放前最高产量的%
钢	134.9（万吨）	853.8	146.2
生铁	192.9（万吨）	765.5	107.1
原煤	6649（万吨）	205.0	107.4
发电量	72.6（亿度）	168.4	121.8
原油	43.6（万吨）	360.3	135.8
水泥	286（万吨）	433.3	124.9
硫酸	19.0（万吨）	475.0	105.6
纯碱	19.2（万吨）	218.2	186.4
烧碱	7.9（万吨）	526.7	658.3
化肥	18.1（万吨）	670.4	79.7
金属切削机床	1.37（万台）	868.1	
棉纱	362（万件）	201.1	147.8
棉布	38.3（亿米）	202.6	137.3
卷烟	265.0（万箱）	165.6	112.3
糖	45.1（万吨）	226.6	108.9
原盐	494.5（万吨）	165.7	126.2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932—933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2年和1949年相比，钢增长753.8%，生铁增长665.5%，原煤增长105%，发电量增长68.4%，水泥增长333.3%，硫酸增长375%，烧碱增长426.7%，金属切削机床增长768.1%，棉纱增长101.1%，棉布增长102.6%。除化肥外，所有工业产品产量都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幅度大都为10%—50%，最高的超过5倍以上（如烧碱）。

由于工业增长迅速，1952年，在整个工农业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30%上升为41.5%。在工业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227%，年平均增长48.5%；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114.8%，年平均增长29%。由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两者之比已由1949年的27:73，变为36:64。重工业基础加强了，企业又对原有的生产

技术、工艺流程进行了改革，使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比如钢铁工业，旧中国钢轨、优质材都需从外国进口；1952年，钢铁企业已能生产多种普通钢板、钢材和无缝钢管，生产机械工业急需的某些优质工具钢、矽钢片、薄钢板，并能轧制钢轨。恢复时期建成的成渝铁路，使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钢轨。旧中国的机械工业，绝大部分只能搞修配，经过恢复时期短短的三年，已经可以制造成套的纺织机械、多种工作母机、矿山设备和3000千瓦发电机组，等等。

在工业恢复与发展过程中，国有工业的发展十分迅速。下表是国有工业的增长情况：

年　　份	1949	1950	1951	1952
以1949年为100	100	167	257	387
以前一年为100	-	167	145	157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2年，国有工业比1949年增长287%，平均每年递增56%以上。由于国有工业迅速增长，国有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比重显著上升。1949年，在工业总产量中占43.8%，到1952年，已占60%以上，其中在重工业方面占80%左右，在轻工业方面占50%左右。

二、农　　业

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48.5%，年平均增长14.1%，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有显著增长。下表是1952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

产品名称	产量	为1949年的%	为解放前最高年的%
粮食	3278（亿斤）	144.79	109.27
棉花（皮棉）	2607（万担）	293.25	153.53
花生	4632（万担）	182.65	73.04
油菜籽	1864（万担）	126.98	48，87
黄麻、洋麻	611（万担）	825.68	281.57
甘蔗	14232（万担）	269.34	125.91
甜菜	957（万担）	251.18	145.44
烤烟	443（万担）	515.12	124.09
大牲畜（年底头数）	7646（万头）	127.39	106.92

产品名称	产量	为 1949 年的%	为解放前最高年的%
其中 牛	5660（万头）	128.81	
其中 马	613（万头）	129.57	
其中 骡	164（万头）	111.56	
猪（年底头数）	8977（万头）	155.45	114.31
羊（年底头数）	6178（万头）	145.88	98.82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29--930 页。

统计资料表明，和 1949 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 44.79%，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 9.27%；棉花产量增长 193.25%，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一半以上。其他主要农作物产量均有大幅度增长，除油料外，都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1952 年和 1949 年相比，大牲畜增长 27.39%，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 6.92%，猪、羊均大幅度增长，猪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

农业生产增长，主要是由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政府根据各地的生产成本，规定最低收购价格和棉粮、麻粮比价，保证了农民的收益；积极发放农业贷款，也起了促进作用。尤其是水利建设，作用最为明显。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重点，一是水利，一是铁路交通。三年中，人民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共约 7 亿元，占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 10% 以上。全国 4.2 万公里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整修。一些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开始了全流域的根本治理。长江、黄河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防御措施。1951 年，根据蓄泄并重的方针，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治水工程——根治淮河工程正式开工，9 月即完成第一期工程。在治理水患的同时，防止旱灾的工作也着手进行。三年中共举办现代化的灌溉工程 358 处，其中较大型的如引黄（河）灌溉济卫（河）工程部分完工，扩大灌溉面积 48 万亩。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内直接参加水利工程的人员有 2000 万人左右，完成土方在 17 亿以上。由于兴修水利，减少了受害面积，增加了灌溉面积。据统计，1949 年全国水灾面积为 1.2 亿亩，1950 年降为 7000 余万亩，1951、1952 年进一步降为 2000 多万亩。同时，扩大灌溉面积约 8000 多万亩。1952 年可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上升为 19.6%。还有 1。8 亿多亩农田改善了水利条件，免除了旱灾的威胁。

三、交通运输

为了支援战争、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供应城市生活必需品，建国前后人民政府重点抓了铁路运输的修复工作。关内地区铁路自抗日战争以来，大多残破，主要线路如纵贯南北的津浦、京汉、粤汉等路，横贯东西的陇海、浙赣等路，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没有全线通过车，加之国民党逃跑时肆行破坏，国内铁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完整的。在器

材、设备和经费等方面都有不少困难的条件下，人民铁道的职工和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不顾严寒酷暑，冒着敌机轰炸和土匪的骚扰，仅1949年一年，就修复铁路8300多公里，修复桥梁2715座，总延长9万多米。到1950年，修复的线路已达14089公里，原有铁路基本畅通。

1950年下半年，开始兴建来睦、成渝、天兰等新的铁路线。

来睦铁路从广西来宾到睦南关，全长403公里。这条路，国民党13年没修成，人民政府1年就修成了。

成渝铁路从成都到重庆，全长505公里。这条铁路的兴建，在旧中国喧嚷了半个世纪，四川人民被欺诈去巨额"铁路捐"、"修路捐"等几十种捐税，并曾为之流血，但依然是地图上的一条虚线。四川解放后不到半年，人民政府就拨巨额资金修筑起来，并在两年内完全通车。

天兰铁路从天水到兰州，全长355公里。此路属陇海铁路的最西一段，蜿蜒于秦岭山麓，从1914年就已起修，全线一直没有完成。1952年8月天兰铁路铺轨完成。从此，陇海铁路才名副其实了。

这样，到1952年底，修复原有铁路加上新修的1263公里铁路，全国通车里程已达24518公里，接近于解放前最高年份。

在此期间，人民政府还积极进行了公路、航运和民用航空的恢复与发展。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80768公里增长到1952年的126675公里，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内河通航里程由1949年的73615公里增加到1952年的95025公里；民用航空解放初没有航线，1952年已达13123公里；载重汽车由1949年的3.2万辆增加到1952年的4.4万辆；轮驳船载重量由1949年的37万吨增加到53万吨，公路、水运的货运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四、商业和对外贸易

首先考察商业。下表是恢复时期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情况：

年　份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	以1950年为100	以上年为100
1950	170.6	100	
1951	234.3	137.3	137.3
1952	276.8	162.3	118.1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0年至1952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是逐年增加的，1952年比1950年增长62.3%。同期，农副产品采购额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也大幅度增长。1952年，全国农副产品采购额为129.7亿元，比1950年增长62.1%；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为14.1亿元，比1950年增长93.2%。整个国内市场欣欣向荣。

在此期间，国内商业发展的特点是：

——国营商业迅速发展，并确立了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据统计，1952 年底，已建立粮食、土产、花纱布、百货、盐业、茶叶、油脂、工业器材、石油、煤建等 28 个专业公司，33282 个国营商店，拥有 53 万职工。国营商业的商品批发额占全国商品总批发的 60%，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额的 34.4%，并掌握了粮食、棉花、纱布、煤炭、食油、食盐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商品的供应。国营商业系统，已经担负起领导组织国内外贸易和稳定市场的重任。

——在党和政府的倡导和扶助下，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到 1952 年底，全国基层供销合作社由 1949 年的 22817 个，增加到 35096 个；社员由 1384 万人，增加到 14796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29.4%；职工由 89000 人，增加到 100 万人；拥有股金 23900 余万元，零售网点 7900 多个。供销合作社一般以比市价低 5%左右的价格供应社员生产和生活资料，又以适当的价格收购农民的农副土特产品。1952 年，供销合作社的零售额为 49 亿元，约占市场零售总额的 19.64%；收购农副产品额为 37 亿元，约占国家对农副土特产品收购总额的 60%。合作社已经成为国营商业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重要渠道。

——私营商业在扩大商品流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统计资料显示，在恢复时期，1951 年，私营商业的商品批发和商品零售额都有显著增长，私营商业从 1950 年的 402 万户增至 450 万户，批发额从 1950 年的 80.4 亿元增至 109.4 亿元，零售额从 1950 年的 101 亿元增至 132.8 亿元。1952 年，"五反"以后，商品批发和零售额均有所下降，但零售总量仍高于 1950 年。私营商业是保持市场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分散在农村的人数众多的小商小贩，他们走乡串巷，收购和推销农民的农副土特产品和贩运工业品下乡，是农村商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初步开展。这三年，国营贸易机构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了 1350 多个机构（1952 年底统计），并扶助这些地区私营商业共同来恢复和扩大商业网，使少数民族地区贸易获得进一步发展。国营贸易机构首先提高了各区域主要产品如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改变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产品与一般商品交换比价长期的不合理现象。如青海西宁，羊毛每百斤与布匹的交换率：解放前为 25 尺，1951 年 12 月已提高到 303 尺；与茶砖的交换率：解放前为 1.5 封，1951 年 12 月为 14 封；与小米的交换率：解放前为 375 斤，1951 年 12 月为 1312 斤。由于价格合理和大量收购，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收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也促进了畜产品和其它土特产品的发展。

其次，考察对外贸易。下表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情况：

年　份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	以 1950 年为 100	以上年为 100
1950	41.5	100	
1951	59.5	143.2	143.2
1952	64.6	155.5	108.6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55 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1.5亿元，已经超过“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任何一年；1951年比1950年增长43.2%，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8.6%。这些成就，是在帝国主义者对我实行“封锁”、“禁运”的环境下取得的。

建国初期，尽管国民党的军舰、飞机在东南沿海骚扰，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在195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中占三分之二。1950年12月，美国对我冻结资金，加强封锁，特别是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我禁运案，增加了我对外贸易的困难。我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额陡然下降。1952年，进口绝对值由1950年的8.2亿元降至0.9亿元；出口绝对值由6.7亿元降至0.7亿元，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进出口值比1950年减少了近90%。

“封锁”、“禁运”加速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转移。1949年起，我国已开始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向。这一年，在我国出口贸易额中苏联居第三位，进口贸易为第五位。1950年以后，苏联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已占第一位。1950年，我国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总值在全部贸易额中占26%，1951年增至61%，1952年增至72%。这对于打破“封锁”、“禁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我国努力在东南亚突破贸易“封锁”，积极发展对香港、澳门的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努力开拓日本、西欧、拉丁美洲的民间贸易和政府贸易。1951年，我国从资本主义国家购进货物的总值仍比1950年增加19%。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上，我国先后与英国、法国、瑞士、西德、荷兰、比利时、意大利、锡兰、芬兰、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工商业家签订了总值达22400万美元的贸易协议和易货合同。接着，又与日本工商界代表签订了贸易协议，总值达6000万镑。同年，我国还与锡兰、芬兰、印度等国政府和智利工商界代表签订了贸易协议和易货合同。

我国对外贸易的恢复与发展，宣告了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政策的破产。

在恢复时期，伴随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

——农民生活明显改善。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约增长20%。其中粮食消费383斤，略高于1950年；食油3.4斤，肉11斤，棉布13.7尺，都比1949年增长50%左右。不少农民开始盖房，添置生产资料。自行车、暖水瓶、搪瓷面盆、胶鞋、雨靴等日用品已普遍进入农民家庭。

——城市就业人数增加，职工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全国解放时，城市失业人口达400多万人，到1952年，约有一半失业人员重新获得了职业，其他人员也得到了一定安置。这一年，全国职工总数达1580.4万人，比1949年增长近1倍。职工的工资大幅度增加。1952年，全国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比1949年增长60%—120%。全国国营厂矿以实物计算的直接工资，1952年比1949年平均增长70%左右。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也有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已高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据统计，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每一职工（包括家属在内）的年平均消费额为140元左右（按1957年价格计算），1952年增加到189.5元，增加35%左右。城镇居民储蓄1952年比1950年增加5.5倍。除提高工资水平外，职工的劳动保险、集体福利事业也陆续举办起来。从1950年起，

先在全国拥有职工10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中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并在公教人员中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到1952年，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达330万人，比1949年增长4.5倍；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达400万人。此外，国家和各产业部门根据安全生产的方针，陆续制订和公布了一些有关劳动保护的规章制度，并且拨付了一些劳动保护专款，使职工的劳动条件有较多的改善。1950至1952年，新建住宅面积共1462万平米，使一部分职工的居住状况有所改善。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健康水平逐步提高。1952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9.1万人，比1949年增加63.2%，比解放前最高年增加23.2%；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63.6万人，比1949年增加177.7%，比解放前最高年增加66.1%；普通中学在校学生249万人，比1949年增加139.7%，比解放前最高年增加66.4%；小学在校学生5110万人，比1949年增加109.5%，比解放前最高年增加115.8%。在各类学校中，工人、农民子弟的比重迅速增加。1952年，工农成分的学生，在初等学校占80%以上，在中等学校占60%左右，在高等学校占20%以上。除正规学校外，工矿、企业加强了技工培训，城乡业余教育也有很大发展。1949年到1952年，电影院由596个增加到746个，文化馆由896个增加到2448个，公共图书馆由55个增加到83个，博物馆由21个增加到35个，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在恢复时期，卫生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1952年底，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达18万张，比1949年增加114.7%，比解放前最高年增加172.7%。1952年和解放前相比，产院的床位数增加了1.33倍，儿童医院的床位数增加了50%，妇幼保健所（站）增加260多倍。霍乱、鼠疫等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

1952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以《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为题讲话时说：“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

第六章 各项经济事业的恢复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1952年底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这一期间，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国民经济各方面，无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内外贸易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第一节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解放前我国的工业生产十分落后。抗日战争前，现代工业产值在全部生产总值中只占10%左右，小农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的生产占90%以上。在这样少的工业生产中，帝国主义投资兴办的工业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工业占统治地位，民族资本工业所占比重很小。从工业生产的结构看，工业生产中，70%以上是生产消费资料的轻工业，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不到30%。不仅如此，就是已有的这一部分重工业，也是残缺不全，各部门之间互不衔接，大多是采矿和生产原料的工业，机器制造业很少，主要是一些修理和装配工业。另外，工业规模很狭小，技术水平也很低下。

就是这样一种落后的工业基础，又经过了十几年战争的破坏，特别是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在逃跑时破坏了。到1949年建国前，工业生产比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大大降低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并使它们成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开展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矿业的生产一般都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不断增长，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工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较快；工业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表 1

	1949 年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一、绝对值				
工业总产值（亿元）	140.2	191.2	264.0	349.0
其中：手工业	32.4	50.6	61.4	73.1
二、指数				
以 1949 年为 100	-	136.4	188.2	244.9
以上年为 100	-	136.4	138.2	129.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16 页～18 页。

（一）工业总产值迅速增长。由表 1 可见，1952 年工业总表产值比 1949 年增长了 144.9%，即增长了近 1.5 倍。1950 年—1952 年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34.8%。1952 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绝大多数超过了战前（1936 年）的最高水平。1952 年工业总产值也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水平，比 1936 年增长了 22.5%，比 1949 年增加 77.5%。其中，轻工业增加 114.6%，重工业增加 229.7%。3 年平均，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14.1%，轻工业每年递增 29%，重工业每年递增 48.8%。可以看出，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二）现代工业比重增加，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在工业生产中，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升了。1949 年现代工业总产值为 79.1 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56.4%。到 1952 年增长为 220.5 亿元，所占比重上升为 64.2%。

解放前我国工业落后，重工业极不发达，在工业生产中，轻工业占很大比重，解放后这种情况发生变化，随着工业生产的增长，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发生变化。轻工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重工业有所提高，1949 年轻工业产值为 103 亿元，1952 年增长为 221 亿元；重工业产值 1949 年为 37 亿元，1952 年增长为 122 亿元。两者的比例关系 1949 年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 73.6%，1952 年下降为 64.4%，重工业则由 26.4%上升为 35.6%。

（三）主要产品的产量迅速增长，并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工业生产中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恢复和发展的情况详见表 2。

表 2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恢复与发展

产品名称	单位	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1949 年产量		1952 年产量		
		年份	产量	产量	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	产量	为 1949 年产量的%	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
原煤	亿吨	1942	0.62	0.32	51.6	0.66	206.3	106.5
原油	万吨	1943	32.00	12.00	37.5	44.00	366.7	137.5
发电量	亿度	1941	60.00	43.00	7L7	73.00	169.8	121.7
钢	万吨	1943	92.30	15.80	17.1	135.00	854.4	146.3
生铁	万吨	1943	180.00	25.00	13.9	193.00	772.0	107.2
水泥	万吨	1942	229.00	66.00	28.8	286.00	433.3	124.9
平板玻璃	万标准箱	1941	129.00	108.00	83.7	213.00	197.2	165.1
硫酸	万吨	1942	18.00	4.00	22.2	19.00	475.0	105.6
纯碱	万吨	1940	10.30	8.80	85.4	19.20	218.2	186.4
烧碱	万吨	1941	1.20	1.50	125.0	7.90	526.7	658.3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1941	0.54	0.16	29.6	1.37	856.3	253.7
纱	万吨	1943	44.50	32.70	73.5	65.60	200.6	147.4
布	万米	1946	27.90	18.90	67.7	38.30	202.6	137.3
火柴	万件	1947	860.00	672.00	78.1	911.00	135.6	105.9
原盐	万吨	1943	392.00	299.00	76.3	495.00	165.6	126.3
糖	万吨	1946	41.00	20.00	48.8	45.00	225.0	109.8
卷烟	万箱	1947	236.00	160.00	67.8	265.00	165.6	112.3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220 页 4229 页、249 页制作。

由表 2 可见，主要产品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和 1949 年的水平，其中钢、生铁、金属切削机床、化肥等增长最快。1952 年比 1949 年，钢增长了 7.5 倍多，生铁 6.6 倍多，金属切削机床 7.6 倍多。另外，在工业产品的品种方面也有很大增加。如钢，解放前所能生产的钢只有不到 100 种，1952 年则能生产 400 种了。还有许多新的工业产品如冶金设备、发电设备、大型车床、机车、民用钢质船舶、电影放映机、缝纫机等，解放前都不能生产，现在都能生产了。

（四）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除了恢复和调整原有的一些工业外，还设计和建立了一些新的厂矿，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装备，推广了先进经验，这样，国营工业中一些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普遍地得到了提高。

比如，炼钢工业，解放前我国的钢铁工业十分落后，炼钢能力小于产铁能力，轧钢

能力又小于炼钢能力。建国后，在恢复时期，对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加以调整，并采用先进技术，所以到恢复时期结束时，我国已经能够生产钢板、钢材、无缝钢管等。我们已经能够为机械工业高速切削法、多刀多刃切削法所用刀具提供良好的钢材，能够制造矽钢片，为电机制造开辟了广阔前途。制造薄钢板成功，对汽车工业提供了条件。此外，我们自己已经能够轧制钢轨，并用自己轧制的钢轨铺路。在恢复时期修成的成渝铁路，全长505公里，就是用自制的钢轨铺成。

中国的机械工业原来也是十分落后，旧中国的机械工业，实际上多半是一些机械修配工业。建国后机械工业发展很快，1951年上半年，已经能够制造成套的纺织机械。建国后新建成的5个棉纺织厂和一个亚麻纺织厂，其中有4个棉纺织厂是用自制的纺织机械装备起来的。此外，机械工业还生产了许多种工作母机和矿山用的机器以及3000千瓦的发电机等。在机械工业中，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恢复和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京第一机床厂是由敌伪时期十几个修械所合并起来的。在1949年，这个厂只有几百人和百余台老机床，产品只能生产水车、测量用的钢标和火车上水用的水鹤等。到1950年，就能够生产水泵，后来又能生产牛头刨。从1952年起，已经能够生产出比较精密的万能铣床了。

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还可以从表3中看出。

（五）社会主义工业迅速扩大，所占比重不断增高。1949年社会主义国有工业的产值为36.8亿元，到1952年增长到142.6亿元（增长了2.9倍）。在工业总产值中它所占的比重也迅速上升。1949年社会主义国有工业占26.2%，1952年上升为41.5%。

关于恢复时期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增长情况及其所占比重变化情况，见表4。

表3

	1949年	1952年
钢铁工业		
高炉利用系数[①]（吨/立方米昼夜）	0.62	1.02
平炉利用系数（吨/平方米昼夜）	2.42	4.78
煤炭工业		
回采率[②]（%）	63.1	76
电力工业		
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2330	3800
发电标准煤耗率（公斤/度）	1.020	0.727
其中：公用电厂（公斤/度）	0.961	0.685
纺织工业		
棉纱每千锭时产量（公斤）	16.60	19.64
棉布织机每台时产量（米）	3.516	3.988
每件纱用棉量（公斤）	205.85	198.97

① 高炉利用系数是大中型高炉的数字。

② 煤炭工业回采率是大中型煤矿的回采率。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97页。

表 4　　工业总产值中各种经济类型的变化

年份	合计	全民所有制工业	集体所有制工业	公私合营工业	私营工业	个体工业
一、绝对额（亿元）						
1949	140	36.8	0.7	2.2	68.3	32.2
1950	191	62.5	1.5	4.1	72.8	50.3
1951	264	90.8	3.4	8.0	101.2	60.1
1952	343	142.6	11.2	13.7	105.2	70.6
二、比重（%）						
1949	100	26.2	0.5	1.6	48.7	23.0
1950	100	32.7	0.8	2.1	38.1	26.3
1951	100	34.5	1.3	3.0	38.4	22.8
1952	100	41.5	3.3	4.0	30.6	2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194 页。

由表 4 可见，五种经济类型的工业生产都有较大的提高，但它们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却不相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所占比重由 1949 年的 26.7%上升到 1952 年的 44.8%；半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工业由 1.6%上升到 4%；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则由 48.7%下降为 30.6%；个体手工业由 23%下降为 20.6%。

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立即决定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到 1952 年，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49 年建国时，我国农村经济已经残破不堪。自从抗日战争以来，我国农村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摧残蹂躏下，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49 年全国农业生产较抗战前下降了约 25%；棉花减少将近一半；耕畜较战前减少 16%；主要农具犁、耙等减少 30%；一般农家积肥减少 30%以上；商品肥料减少 50%。由于耕畜、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再加上人力的减少，所以生产水平逐年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面临的这种残破的农村经济境况，如果不加以根本改变，不但严重地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而且也不能发展工业，不能改变中国穷困落后的面貌，不能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在建国之初，人民政府就决定首先进行农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

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农民的积极努力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

全国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并超过了抗战前的最高生产水平（茶叶、蚕丝因破坏过于严重，1952年尚未完全恢复）。

从表5、表6、表7、表8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恢复情况。

表5　　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年　份	绝对数（亿元）	指数（%）
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以1949年为100
1949	326.0	100
1950	384.0	117.8
1951	420.0	128.8
1952	484.0	148.5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49页表制作。

表6　　粮食和棉花产量

年　份	粮食产量（亿斤）	在粮食产量中			棉花产量（万担）
		稻谷	小麦	薯类	
解放前产量最高年份	2774	1147	466	127	1698
1949	2263.6	973	276	197	889
1950	2642.5	1102	290	248	1385
1951	2873.7	1211	345	280	2061
1952	3278.3	1369	362	327	2607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62页、163页表制作。

表7　　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数*（%）

年　份	粮食产量	在粮食产量中				棉花产量①
		稻谷	小麦	杂粮	薯类	
以解放前产量最高年份为100						
1949	77.9	84.8	59.2	69.2	155.1	52.4
1952	111.8	119.3	77.6	99.6	257.5	153.5
以1949年产量为100						
1952	142.8	140.7	131.1	143.9	166.0	292.9
平均每年增长速度						
1950—1952	12.6	12.1	9.5	12.9	18.4	43.6

①《伟大的十年》，107页注：每亩产量按播种面积计算，薯类按四斤折一斤计算。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62页、163页；（伟大的十年），106页制作。

表 8　　粮食和棉花每亩产量　　单位：斤

年　份	粮　食	其　中				棉花每亩产　量[①]
		稻谷	小麦	杂粮	薯类	
1949	137	252	86	101	187	21
1950	159	281	85	118	215	24
1951	168	300	100	118	225	25
1952	176	321	98	136	251	31

①《伟大的十年》，107 页注：每亩产量按播种面积计算。薯类按四斤折一斤计算。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71 页、172 页，《伟大的十年》，107 页制作。

从以上数字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农业总产值来看，1952 年比 1949 年增长了 48.5%。粮食和棉花产量都已经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52 年，粮食产量为 3278.3 亿斤，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为 2774 亿斤，1952 年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了 11.8%。棉花产量，1952 年是 2607 万担，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为 1698 万担，1952 年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了 53.5%。粮食和棉花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粮食产量为 12.6%，棉花产量为 43.6%。粮食和棉花的亩产量也在迅速增加。粮食亩产量，1949 年是 137 斤，1952 年增长为 176 斤；棉花亩产量，1949 年为 21 斤，1952 年为 31 斤。

此外，在农作物中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在迅速提高。见表 9。

表 9　　大豆和主要技术作物产量

年　份	大豆（亿斤）	花生（万担）	油菜子（万担）	甜菜（万担）	甘蔗（万担）	烤烟（万担）
1949	102	2536	1468	381	5284	86
1952	190	4632	1864	957	14232	44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163 页、164 页。

在农业中使用机械的情况也不断增长。1949 年农业用拖拉机有 401 台，1952 年增加为 2006 台。

3 年中，全国牲畜亦有显著增加。解放前大家畜最高年产量为 7151 万头，1952 年大家畜头数为 7646 万头，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猪的头数，解放前最高年头数为 7853 万头，1952 年为 8977 万头，也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新中国成立后 3 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人民政府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结果。

（一）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旧中国，由于封建主义制度普遍存在，农村中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农民终年劳动，所得收入大部分被地主阶级剥夺，农民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

维持，自然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摧残破坏，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建国后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二）人民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扶持，人民政府发放农业贷款，制定合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实行合理税收和奖励等措施，极大地保护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恢复时期的三年里，人民政府发放的农业贷款逐年增加，通过大量农业贷款，农民增购了各式农具、水车、化肥等，这就及时地帮助贫苦农民解决了生产资料缺乏的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合理的价格政策，特别是制定了对农产品的合理收购价格，鼓励农民按照国家的计划种植各种农作物。比如对棉、麻、烟等工业原料作物，人民政府按照各地的生产成本，规定了不低于定比值的收购价格，来保证农民出售产品的合理收益。此外国家贸易部门和合作社还在农民播种之前，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向农民进行预购，供给农民以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减少农民在生产上的顾虑。收获季节，新的农产品上市时，国家贸易部门又及时地开展收购工作，稳定农产品的价格。人民政府还通过税收政策来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培养和奖励劳动模范的政策，带动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

（三）人民政府积极领导农民战胜自然灾害，对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旧中国，由于反动政府长期统治，山林破坏，河堤失修，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三年来，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同时，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兴修小型水利防旱抗旱运动。三年中，人民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1950 年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经费最多一年的 18 倍；1951 年相当于 42 倍；1952 年相当于 52 倍。三年中直接参加水利工程的人员有 2000 万人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完成土方在 17 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挖掘 10 条巴拿马运河或 23 条苏伊士运河。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现代化建筑工程。由于进行了水利建设，从而基本上解除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所受洪水灾害的严重威胁。1949 年全国水灾面积在 1 亿亩以上；1950 年减少为 6000 万亩左右；1951 年为 2100 万亩左右；1952 年 9 月减为 1600 余万亩。水灾面积大大缩小。三年中还把水害变为水利，截止到 1952 年 6 月，华北地区灌溉面积比 1949 年增加 1 倍。三年中全国共扩大灌溉面积约 4950 余万亩。另外，有 18400 余万亩农田因为增加和改善了水的供给而得免于旱灾。同时，对病虫害也开展了规模巨大的防治运动。三年中共动员了 12000 多万人，在 54000 多万亩耕地上进行了艰巨的防治病虫害工作，减少农产品损失折成粮食约达 300 亿斤以上。

（四）开展了群众性技术改进工作和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三年中人民政府积极贯彻农业科学技术与农民生产经验相结合的方针，使农民的生产技术有了初步改进。积肥、施肥、选种、浸种、防治病虫害等已形成群众性运动。三年中全国施肥面积增加了 15%，施肥量增加了 30%。粮食作物的优良品种已经推广播种 2 亿多亩，棉花优良品种已经占棉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很多农场和先进农民全面改进栽培技术；同时对整地、

施肥、选种、播种、中耕、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也都取得了不少先进经验。因此，3年当中出现了不少丰产的典型。如1951年山西省曲耀离创造了每亩棉田产籽棉912斤的新记录；河北省杨振儒每亩水稻产1620斤等。

此外，经济恢复时期，在农村还热烈地开展了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节　交通运输业和国内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后交通运输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建国之初，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城乡间以及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立即着手进行交通运输事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在交通运输业中铁路的恢复和建设十分重要。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国铁路员工的艰苦努力下，已经修复了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的一些铁路，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建国后，铁路的修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当时全国的主要路线，像津浦、京汉、粤汉等纵贯南北的铁路线，以及陇海、浙赣等横贯东西的路线等，均遭到破坏，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在山海关以内的铁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完整的。在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全体铁路员工积极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1949年一年内，就修复了铁路8300多公里，修复了2715座长90000余米的桥梁。到1950年，经过重新修复的路线已达14089公里，修复的桥梁长达90.5公里。中国原有的铁路基本上畅通了。铁路的畅通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不仅修复了旧有的铁路，而且还开始兴建新的路线。到1952年，已新建了三条铁路线，即来睦路、成渝路和天兰路。三条铁路共长1263公里。

来睦路是从广西的来宾到睦南关，全长403公里。这条路国民党政府修了13年没有修成，人民政府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修成了。

成渝路是从四川的成都到重庆，全长505公里。这条路在旧中国，从清王朝筹筑起到西南解放前40多年来，历届的反动政府都借此名义向人民收取了不少捐税，但连一根钢轨也没铺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从1950年6月动工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建成通车了（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西南地区物产丰富，成渝铁路修成后，对西南地区工农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土产品的外运，起了很大的作用。

天兰路是从甘肃的天水到兰州，全长355公里。西北地区高山峻岭，地势险要，修筑铁路十分困难。天兰路全部工程蜿蜒于秦岭山脉，六次经过渭河河流，多次穿过山洞

(其中一个隧道长度有 2 公里)，修筑起来自然是相当困难的。天兰路是陇海路最西边的一段。陇海路从 1914 年就开始修建，全线一直没有完成。只有到解放后，陇海路才名副其实地完成了。

建国以后，除了修复和新建了一些铁路路线外，对一些原已毁弃的旧路线也进行了重修工作。如锦承线的一段（金岭寺到承德线）、建平（原名叶柏寿，在辽宁省境内）至赤峰（在内蒙古境内）、杏树屯至城子疃线（辽宁省境内南部）、牛心台至田师傅线（辽宁省东部）以及哈尔滨至长春的复线等，共 602 公里。

建国后，由于人民政府大力进行铁路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因而铁路通车里程大大增加。1949 年，铁路通车里程为 2.18 万公里，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增加到 2.29 万公里。旧中国交通路线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交通比较落后。建国后经过修复和新建了一些路线，情况已经开始改变。

在铁路运输业务方面也不断提高。如：集中表现铁路工作效率的车辆周转时间，1950 年为 3.34 天，1951 年缩短为 3.22 天，1952 年上半年平均达到 2.9 天；货物机车每日走行公里，1949 年为 278 公里，1951 年提高为 374.6 公里，超过中国铁道历史最高记录 254 公里的 47.5%，1952 年上半年又提高到 416.6 公里；货车平均牵引总吨数，1951 年比 1950 年提高了 8.6%，超过中国铁道历史最高记录 48.6%，1952 年上半年又比 1951 年提高了 11.9%。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了人民铁道建设的发展和工作的提高。1949 年铁路货运量为 5589 万吨，1952 年增加到 13217 万吨，增加了 136.5%。从 1950 年起，人民铁道大力进行物资调运工作，煤、粮、盐、棉花、钢铁、木材、矿石等主要物资的运输，都超额和提前完成了计划，对稳定物价起了很大作用。1951 年，虽然运输任务比 1950 年增加了 80%，但也同样超额和提前完成了全年运输计划。由于铁路畅通，城乡物资交流空前活跃起来，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对全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起了很大作用。

人民政府在修复和新建铁路路线的同时，也进行了公路的恢复和新建工作。到 1952 年，公路通车里程已由 1949 年的 8.07 万公里增长到 1952 年的 12.67 万公里。

解放时航运事业曾经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掠夺，解放后不仅进行了修复工作，而且进行了一些新辟航运的工作。因此，通航里程大大增加。如内河通航里程，1949 年为 7.36 万公里，1952 年增加到 9.50 万公里。

民用航空事业也在迅速发展，建国之初 1949 年没有通航，到 1950 年，航线里程就有 1.14 万公里，到 1952 年则增长为 1.31 万公里。

交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货物运输量大大增加起来，1949 年现代运输的货运总量为 16097 万吨，到 1952 年则增长为 31516 万吨。货运量的增加，大大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二、国内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此

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口号。发展国内贸易，扩大商品流转，恢复和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的完成，不仅在经济上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所必须，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条件。

恢复和发展国内贸易，扩大商品流转，首先是发展国营贸易和合作社贸易，团结改造私营商业，建立新的贸易网。

建国之初，由于战争的破坏，城乡物资交流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时一些投机资本，乘物资供应困难、物价波动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疯狂地追逐暴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在城市中一方面积极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同时也积极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在农村则积极建立和发展合作社商业，加强对工农业产品的收购、调运工作，从而掌握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以保证市场供应，并配合行政力量，打击投机势力，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

1950 年 3 月，国家实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后，物价逐渐趋于稳定。这时因通货膨胀而存在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一些大、中城市中出现了货物滞销现象。于是国营商业又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在城市中用收购存货、加工、订货等办法，解决正当私营工商业销售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在农村大量收购农产品、副产品，扶助合作社，鼓励私营商业参加城乡交流，从而解决了土产品滞销的问题。这样，就使城乡关系逐渐恢复正常。通过以上措施，城乡物资交流逐渐恢复起来，市场情况也转向活跃。

由于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国营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不同业务范围内设置的国营贸易专业公司，由 15 个增加到 28 个。这些专业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地方性的零售公司、信托公司已遍布全国各地。

在城乡物资交流中，合作社贸易在国营经济的扶助下，也迅速发展起来。到 1952 年 12 月底，全国城市消费合作社零售网计有 79000 余个，农村供销合作社 34000 多个，社员人数达 14100 余万人。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国营商业在批发商业中已占绝对优势；在零售商业中，1952 年，社会主义商业已占 42.6%（1950 年只占 14.9%）。

以上情况说明，国营商业已开始取得了领导地位。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商业起了积极作用：（1）为扩大商品流通和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服务。建国初期，私营商业在整个商业系统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据 1950 年统计，在全国 4073000 个商业机构中，私营商业有 402 万个，占总数的 98.7%；市场上的零售业务主要由私营商业来承担。1950 年私营商业占纯商业零售总额的 85.1%。1951 年全国土产品商品价值约为 44 亿元，其中 24.6 亿元的土产品商品收购任务是由私营商业来完成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只经营了 19.4 亿元的土产品。（2）私营商业的一些经营管理方法还可以加以利用。私营商业多经营零售商业，分布面广，接近消费者，特别是小商小贩，在农村中还兼搞短途运输。私营商业有一些好的经营方法，如了解顾客需要、经营商品对路、货源及时等，还有送货上门、代营修补等，对顾客十分方便。私营商业对商品的鉴别、保管、整理等都有一套专门知识，对货源、货物的季节性、消费者的习惯以及商品流通路线、精打细算、培养商业技术人员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经验，所有

这些，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此外，建国初期，私营商业拥有五六百万从业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有两三千万人。维持私营商业，就可以维持这一大批人的生活，这对于解决整个社会就业问题也是有好处的。

当然，私营商业还有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的一面。它们往往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破坏国民经济，影响市场物价和物资供应。对于私营商业的这种消极作用，人民政府通过国营商业对其加以限制，使它们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社会主义商业在商品零售额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长，而私营商业则逐年下降。1950 年，社会主义商业在全部商品零售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14.9%，私营商业所占比重为 85.1%；1952 年，社会主义商业所占比重则增长为 42.8%，而私营商业所占比重则下降为 57.2%。

私营商业虽然在整个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不断缩小，但是在绝对量上还是有所增加的。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私营商业的户数，1952 年底较 1949 年增长了 18%。私营商业的销货额在东北地区，1952 年比 1949 年增加了 69%；在北京地区增加了 84%。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人民政府执行了正确的商业政策，国内商品流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50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170.6 亿元，1952 年增长为 276.8 亿元。农副产品采购额 1950 年为 80 亿元，1952 年增长为 129.7 亿元。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 1950 年为 7.3 亿元，1952 年增长为 14.1 亿元。市场上商品销售额的不断增长和城乡物资交流的不断扩大，对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外贸易方面，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我国的对外贸易几乎年年入超。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就开始扭转了长期入超的情况，出现了出超。

在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方面，解放前进口货物中，各种消费品如烟、酒、化妆品等数量很大；建国后，在进口货中这些奢侈品几乎绝迹，占很大比重的是为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在出口货物中，虽然主要的仍然是农副产品，但已不同于旧中国，它不再是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出口，而是为了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换回外汇以及我国建设所必要的进口物资而出口。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内市场的繁荣，我国的对外贸易也逐步发展起来。1950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41.5 亿元，1952 年则增长为 64.6 亿元。随着贸易额的增长，进出口贸易额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在进口贸易额构成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所占的比重（以进口总额为 100），1950 年，生产资料占 87.2，消费资料占 12.8；1952 年，生产资料则占 90.6，而消费资料占 9.4。在出口贸易额构成中，1950 年，工矿产品占 9.3，农副产品加工品占 33.2，农副产品占 57.5；1952 年工矿产品占 17.9，农副产品加工品占 22.8，农副产品 59.3。

以上情况表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完全成为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第三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在旧中国，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生活，他们经常处于失业、贫困、饥饿和疾病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业人数不断扩大。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建国后，在人民政府的努力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已有 220 万人重新获得了就业机会，另外还招收了许多新职工。到 1952 年，全国职工人数已达 15804000 人，较 1949 年增加了 780 万人，为 1949 年全国职工人数 8004000 人的 197.5%。安置失业人员数目达 148 万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了。

（二）职工工资收入得到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完全一致。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职工工资收入不断增加。1952 年，全国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比 1949 年增加了 60%～120%。全国职工平均工资，1952 年比 1949 年增加了 70%。在私营企业中，职工的工资也有所提高。1952 年，全国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增加了一次工资。据统计，国营企业职工，1952 年所得工资，比 1951 年一般增加了 10%～36%；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增加了 15%～31%；文教工作者、高等学校教师的工资提高了 18.6%；中等学校教师工资提高了 25.5%；初等学校教师工资提高了 37.4%。

（三）农民收入有了增加。旧中国的农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推翻了三座大山，特别是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翻身得解放，由土地的奴隶，变为土地的主人。在土地改革中，约有 3 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约 7 亿亩土地。土改后，农民不再受地主剥削，原来需要向地主缴纳的 3000 万吨地租粮食，现在完全变成了农民自己的收入。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业产量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生活不断改善（1949 年，农业总产值为 325.9 亿元，1952 年增加到 483.9 亿元）。据 1951 年在山东 29 个典型县，103 个典型村，1739 个典型户的调查，农村每户平均每年收入为 415 万元，除生活费用、生产投资及其他支用外，平均每户剩余 275000

元，每人平均剩余51000元（人民币改革前）。这种情况在解放前是不可想像的。

（四）劳动保护和其他物质福利事业的创设。在旧中国，工人是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资本家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劳动条件和身体健康。如在采矿业中，矿坑里经常发生瓦斯爆炸、冒顶、洪水淹没等灾害，工人生命根本没有保障。1935年山东洪山第一矿透水淹死了工人800名；1939年河北井陉北矿煤尘爆炸，死340人；1943年东北本溪大斜井瓦斯爆炸，死1600人。除矿井事故外，各工厂中伤亡事故也十分严重。至于因设备简陋，影响工人身体健康，那更是普遍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重视职工的劳动保护和身体健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规定：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卫生设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条例草案》，1951年5月1日起在铁路、邮电、航运三个产业部门以及100人以上的工矿企业中实行。劳保条例中，对工人的生育、衰老、疾病、创伤、残废、死亡等方面都作了规定，免除了职工在这些方面的忧虑，减轻了职工的困难，使职工在劳动保护和身体健康等方面得到了保障。1952年煤矿伤亡人数比1949年减少75%；电业方面1952年比1949年伤亡人数减少62%。

据统计，到1952年12月底止，全国享受劳保待遇的职工，已达330万人（1949年只6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约在1000万人以上。此外，搬运工人也实行了本行业的《疾病伤亡暂行补助办法》，享受的人数达407900多人。其他如公路运输、银行、合作社、农场、水利、商业等部门的职工，也都订立了劳动保险合同。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条例若干修正的决定》，把劳动保险实施的范围扩大到工、矿及交通事业的基本建设单位和国营建筑公司，在待遇方面也作了适当的提高。这一切都说明，党和人民政府对职工生活的关怀。

此外，实施劳保条例的企业事业单位一般都设有医院或诊疗所。各大行政区和工会，还办了疗养院、休养所、养老残废院和孤儿院等。职工有病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和休养。如北戴河海滨设有煤矿工人休养所，从1952年6月到9月，有近1000名工人前往轮流休养。松花江畔有东北电业职工疗养所，各局、厂的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一批一批地轮流到这里来休养。建国后医院和疗养院的床位数不断增加。1949年，全国有病床8.4万张，1952年增加到18万张。

人民政府对女工的特殊困难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女工有产假56天。不少单位都办起了托儿所，较大的工厂为了方便女工照顾婴儿，还设有哺乳室和婴儿室。建国后妇幼卫生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妇产科医院，1949年全国有80家，1952年增加为98家；产院床位数，1949年有1762张，1952年增加为4052张；妇幼保建所（站），1949年只有9所，1952年增加到2379所；经常性托儿组织，1949年有300个，1952年增加为2700个。

在住房方面，解放前，一般工人的居住条件都非常差，宿舍破烂不堪。建国后，人民政府对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十分关心，不断建造新的住宅供职工使用。1950年新建住宅面积为251万平方米；1951年增加为460万平方米（当年新建平方米数）；1952年

新建平方米数为751万平方米。职工居住条件的改善，可以铁路职工宿舍为例。解放前，自有铁路以来的80年中，共建造职工宿舍32万平方米；而1951年，国家投资新建的宿舍就有233000平方米，1952年又增加了100余万平方米。

（五）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劳动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教育方面，1952年，全国的大、中、小学生总数已达5443.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866万人（1949年为2577.6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的学生数多2871.9万人（解放前最高年学生总数为2571.7万人）。1952年大学生已达19.1万人；中等专业和普通中学学生为314.5万人；小学生5110万人。

在全国学生人数中，工农和工农子弟受教育的人数大量增加。解放前，工农和工农子弟能够受教育的人很少，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更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农本身和工农子弟受教育的人数大量增加。1949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比为：1951年19.1%，1952年20.5%。工农成分的学生在中等学校学生总数中所占比重，1952年为56%~57%。在初等学校所占百分比更高，1952年为80%。此外，人民政府还创办了许多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等，来培养工农子弟，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

为普及文化，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党和人民政府还在各地设立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目不断增多。如文化馆，1949年全国有文化馆896个，1952年则增加为2448个；公共图书馆，1949年全国有55个，1952年增加为83个；博物馆，1949年有21个1952年则增加为35个。

文化出版事业也得到了发展。1950年出版的报纸份数为79750万份，杂志3530万册，图书27460万册。1952年出版报纸增加为160900万份，杂志20420万册，图书78570万册。

以上是建国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大致情况。

总之，建国后，中国劳动人民在旧中国那种贫困落后、愚昧无知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上面我们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情况，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工农业生产已经得到恢复并达到和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在交通运输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内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已经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民收入不断增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三年中，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种反动的生产关系被废除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调整，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空前发展和壮大起来，并成为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成分；农民和手工业个体经济也有很大发展。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完成，为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政府又制定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贯彻执行。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195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人民政府又制定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时期。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党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1953年由毛泽东提出的。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结束。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结束时，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虽然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但是这种生产水平仍然是十分低下的。从工业水平来看，1952年我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6.7%，而苏联是45.2%（1928），波兰65.5%（1949），捷克斯洛伐克75%（1948）。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品产量，1952年，钢产量：中国2.37公斤，苏联164.1公斤，美国538.3公斤，日本81.7公斤；发电量：中国2.76度，苏联553.5度，美国2949度，日本604.1度；棉布：中国5.4米，苏联23.6米，美国55.4米。如从总的工业产量看，如表1所示。可见，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是十分落后的。当时我们还不能自己生产汽车、拖拉机、飞机、重型机器、精密机器等，国防工业也十分落后。

表 1　　1950 年中国与外国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比较

产品 \ 国别	中国	美国	苏联	日本	法国	印度
原煤（万吨）	4300	50838	26109	3975	5253	3282
原油（万吨）	20	26671	3788	29	15	25
发电量（亿度）	46	3887	912	449	330	51
钢（万吨）	61	8785	2733	484	865	146
水泥（万吨）	141	3872	1019	446	742	266
棉布（亿米）	25.2	9L7	38.9	12.9	11.5	33.6

资料来源：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86)》;《中国统计年鉴（1984)》制作。

中国工业如此落后，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规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

中共中央认为，当时已具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首先，我国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后，社会上出现了多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局面。据统计，1952 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 19.1%；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占 1.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 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 6.9%；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 71.8%。这种情况表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已占相当的比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由于没收官僚资本而来，它把解放前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的 80% 变成了国营经济，全国的银行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1952 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已占 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 60%。这表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掌握国民经济命脉。这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首要条件。

其次，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就是采取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对私营工商业的合理调整过程中，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形式当时是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销售上的困难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但也必然加深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联系，这样，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对它们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及时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把它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这也是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因素。

第三，已经积累了土地改革后农村开展互助合作的经验。土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后，积极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道路，这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一种新观点：即不用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完成，只靠统一经营和协作（互助合作组织），也可以增加生产。这也是中共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基本因素。

第四，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经济制度对中国有重大的榜样作用，这也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因素。

以上四点是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条件和因素。

1953 年 8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在 1954 年 9 月，又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接受，把它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一方面规定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同时也规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而这两方面的任务又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大工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就不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来改造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

旧中国是一个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到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虽然一些主要产品产量都已经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但是就整个经济水平来看，仍然非常落后。根据这种极端落后的状况，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工业，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因此，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把它作为我国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中共中央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因为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才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才能供给农业以现代化的农业机器，供给农业以充足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才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使国防得到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才能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共中央还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必须解决所有制问题，即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当时在私有制

形式方面，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另一种是农业、手工业中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规定了对这两种私有制，都是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

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合作化的办法来实现。建国后，我国完成了土地改革，结果小农经济广泛出现。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小农经济的农户占地少、经济力量薄弱。他们无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难于实现扩大再生产。从具体情况看，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他们仍有很多困难。如仍缺乏牲畜或其他生产资料，缺乏劳动力，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更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至于在农村中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以及采用新的生产技术等方面，只靠个体农民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同时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这种小农经济很难提供可以充分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农产品，因此对这种小农经济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 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具体的道路就是经过互助合作走上集体化。

进行农业合作化，要遵循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同时要实行典型示范，逐步推广。其发展过程是：从农业生产上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开始，然后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条件成熟时，再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关于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与个体小农一样，因此，对它也是通过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过，由于个体手工业是一种小商品经济，它与市场联系较多，因此对其改造宜从流通着手，先是组织供销小组或供销合作社，然后逐步发展，组织生产合作社。

中共中央还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必须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对官僚资本采取剥夺的办法，实行没收，使其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则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即赎买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对待民族资本问题，宪法中第十条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它的性质和作用是由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来决定的，特别是由国家的性质来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产阶级国家直接控制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只是它不是归某一个资本家所有，而是归整个资产阶级所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完全不同了。它虽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已经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限制和监督。它是根据无产阶级国家的需要而组织和发展的。国家就是通过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民族资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然后逐步将其改造成为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

在我国，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初级形式在工业方面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方面是经销、代销。高级形式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种赎买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利润分配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前，赎买采取按比例分配利润的办法，资本家可以得到企业盈利的1/4左右。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实行定息制度，即在若干年内按对资本家核定的资产，每年付给5%的股息。这时资本家的企业，除了资本家还拿定息外，就完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了。国家的对资改造工作也就完成了。

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资本家）的改造相结合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通过这一方针，将民族资产阶级由剥削者的身份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以上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主要内容。那么，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需要多长时间呢？“我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有1.1亿多农户的小农经济（1955年7月），有很大数量的手工业，而且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很艰巨很繁重，也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完成这个过渡时期的总任务，除了恢复时期的三年以外，大概还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即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人民政府接受了这条总路线，并根据它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二节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人民政府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

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总任务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的基础上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于1952年底胜利完成。195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1949年466亿元，1952年为810亿元），其中：现代工业增长了178.6%，农业

增长了48.5%。1952年，工业和农业的主要产品的产量，除个别的以外，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和国内外贸易等也有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在国民经济改造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在政治方面，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日益巩固。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实行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情况。那就是：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还只占43.1%，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产值只占35.5%。同时，当时对我国资源情况还不清楚，资金不足，缺乏建设干部，没有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这些都将给建设带来困难。另外在农业经济中，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资本主义工业产值还占工业总产值的30.6%）等。

我国就是在这样条件下，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围绕着这些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进行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建设，其中又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这里包括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些都是我国重工业的新建设。这些新建设的逐步完成，将改变我国国民经济原来的面貌。

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中小型的工业企业。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潜在的生产能力。此外，还要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的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

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44000万元，折合黄金70000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可想像的。在总投资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是4274000万元，占支出总数的55.8%。其中工业投资2485000万元，占基本建设投资额的58.1%。可见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当然，工业部门以外的其他各部门的发展，也都照顾到了。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这种比例关系是根据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决定的。而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需要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在农业方面，要推动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的发展，以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来初步改造小农经济。计划到1957年，参加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农

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其中东北各省和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合作化的规模可能达到农户的半数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对农业进行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手工业方面，对个体手工业者，要用合作社的形式把他们逐步地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计划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人数，1957年将达210万人，比1952年的21.8万人，约增加8.6倍。

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它们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扩大公私合营的企业，加强对私营工业产品的加工、订货和收购的工作，并稳步地和分别地使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销业务。树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计划规定五年内把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之中。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对财政收支、发展城乡和内外物资交流、文化教育以及改善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等方面都规定了具体任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生产和商品流通在五年内所要达到的基本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工农业生产基本指标

单位：亿元

	1952年	1957年	增长百分比	平均每年递增（%）
工农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	827.1	1249.9	51.1	8.6
其中：现代工业所占比重（%）	26.7	36		
工业生产总值	270.1	535.6	98.3	14.7
其中：生产资料所占比重（%）	39.7	45.4		17.8
消费资料所占比重（%）	60.3	54.6		12.4
手工业生产总值	73.1	117.7	61.0	9.9
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产值	2.5	31.9	11.8倍	67
农业生产总值（包括副业在内）	483.9	596.6	23.3	4.3

资料来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28页～29页制作。

在商品流通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1957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52年将增长80%左右。其中国营商业增长132.2%，合作社国营商业增长239.5%。到1957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将占54.9%，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将占24%，私营商业将占21.1%。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各项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如表3所示。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也作了具体规定，如表4所示。

表3

	1952年（%）		1957年（%）	
国营工业	52.8	三项合计所占比重61	61.3	三项合计所占比重87.8
合作社营工业	3.2		4.4	
公私合营工业	5		22.1	
私营工业	39		12.2	

资料来源：同表2。

表4

产　品	1952年产量	单　　位	1957年计划产量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发电量	72.6	亿　度（千瓦/小时）	159	219
原煤	6649	万吨	11298.5	170
原油	43.6	万吨	201.2	461
生铁	190.0	万吨	467.4	246
钢	135.0	万吨	412.0	305
钢材	111.0	万吨	304.5	274
烧碱	7.9	万吨	15.4	195
电动机	91147		135515	149
金属切削机床	13734		12720	93
棉纱	361.8	万件	500	138
糖	24.9	万吨	68.6	276
盐	346	万吨	593.2	171
卷烟	265	万箱	470	177
棉布	11163.4	万匹	16372.1	147
粮食	3278.3	亿斤	3856.2	117.6
棉花	26.1	亿斤	32.7	125.3

资料来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一节制作。

此外，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运输、邮电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等方面的基本指标也作了具体规定。计划还规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五年内，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文化

教育卫生部门的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约增长33%；五年内，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农民生活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农村人民的购买力，1957年将比1952年提高近1倍。

以上计划中所规定的内容，实现以后，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奠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第二篇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第一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节　计划的编制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在有些方面（如基本建设、工业）和地区（如东北），已经逐步实行计划管理。195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通报提出，要确立“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求加紧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2月19日，朱德在全国工业会议上着重讲了编制五年计划问题。他说：中国工业要走上计划经济。中央已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从1951年开始的，到1955年7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前后经历了五年时间，并五易其稿。

第一次，是1951年，在陈云组织领导下，由中财委试编的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征得苏联的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初步设想。

第二次，是1952年，由中财委编制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8月，中财委颁发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中提出，今后五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文件中对经济建设的重点、工业的速度、工业的地区分布和主要指标都作了初步规定。与此同时，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赴苏，一则争取苏联的援助，一则征询苏联政府对我“一五”计划的意见。周恩来在苏期间两次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主要对计划中工业速度过高提出了建议，认为20%的增长率有些紧张。他说：“我们制定五年计划要留有余地，因为各种因素不可能都考虑到。往往有各种原因会影响到某一方面。”对苏联援助，斯大林说：“我们应当知道：全部项目中需要我们提供多少项目。必须经过计算。在送交的材料中没有这种材料。因此我们不能发表最后的意见。我们至少要两个月时间进行计算，然后才能说出：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什么。”斯大林还建议：

"有必要公布各项发展计划，让人民对建设规模有清楚的认识。应当有数字，不要只公布基本方针。""应当有统一的计划，既包括民用建设，也包括军事建设。"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率代表团在苏逗留9个月，主要是落实援助项目，同时同苏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征询对"一五"计划的意见。

第三次，1952年底、1953年初，陈云根据苏方提出的一些意见，组织中财委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52年底成立）的力量，对"一五"计划进行修改。当时，苏联援助的项目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未能拿出一个完整的计划草案。

第四次，1953年6月，是由国家计委编制的。这次编制，吸收了苏联国家计委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如把工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降至14%—15%，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等。

第五次，1954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八人工作小组，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在陈云主持下，4月初就拿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初稿。8月，在陈云主持下，八人领导小组连续举行了17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同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又聚会广州，用一个月的时间，共同审议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同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作了适当修改，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一五"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二是建立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首先考察第一方面。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指导方针。这种选择，虽然也参考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主要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和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但是，应当看到，解放前的水平是极端落后的。我国在1952年的工业水平，不仅落后于苏联1928年的水平，也落后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中国1952年是26.7%；苏联1928年是45.2%；波兰1949年

是 65.5%；捷克 1948 年是 75%。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品产量，我国远远落后于苏联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2 年，钢：中国是 2.37 公斤，苏联是 164.1 公斤，美国是 538.3 公斤，日本是 81.7 公斤；发电量：中国是 2.76 度，苏联是 553.5 度，美国是 2949 度，日本是 604.1 度；棉布：中国是 5.4 米，苏联是 23.6 米，美国是 55.4 米。工业水平落后，还表现在，我们没有汽车、飞机、拖拉机、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制造业，也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1954 年 6 月，毛泽东在谈及社会主义工业化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正是从这样一个实际出发，当提出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党中央就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1951 年 2 月 18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编制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就主张以重工业为中心。同年 12 月 22 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编制 1953 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探、设计和施工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要求在五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使 1957 年工业生产比 1952 年提高 1—1.5 倍。"1954 年 9 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对这一方针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

以苏联援助的 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充分体现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据薄一波统计，这"156 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为 150 项，其中在"一五"期间施工的有 146 项。"这 150 项施工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 44 个，其中航空工业 12 个、电子工业 10 个、兵器工业 16 个、航天工业 2 个、船舶工业 4 个；冶金工业企业 20 个，其中钢铁工业 7 个、有色金属工业 13 个；化学工业企业 7 个；机械加工企业 24 个；能源工业企业 52 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 25 个、石油工业 2 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 3 个。"这些"工程"，绝大部分是重工业。"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

"一五"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没有忽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相反地，比较恰当地安排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

一、工业和农业的比例

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270.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35.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14.7%；农业及副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483.9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96.6亿元，增长23.3%，平均每年增长4.3%。两者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对农业生产的增长，最初安排也比较高，平均每年递增7%，主要是对当时经过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及农村互助合作的有利条件估计过高，而对限制我国农业发展的许多不利条件则估计不足。后来在修改计划过程中，考虑到1953、1954连续两年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都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的实际情况，又做了适当的调整。最后确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较最初方案减低38%，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增产计划也都相应调低。

与生产计划指标相适应，基本建设投资工业部门为248.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8.2%，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为32.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7.6%。在这32.6亿元中，扣除林业部的木材工业投资等约8亿元，加上工业和其他各部对农业、水利、林业的投资约2.2亿元，五年内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方面的投资只有26.8亿元，农业投资显得比较低。但如果加上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其他支出28.4亿元，国家拨出的军垦费3亿元，农村救灾费10.6亿元，以及五年内国家增加的农业贷款15.2亿元，则国家在五年内直接和间接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支出将共达84亿元。同时，初步估算，五年内农民自己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总额约为100亿元，五年内用于农业的全部资金还是不少的。

“一五”期间，农业投资比例安排的比较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农业合作化对农业增产的作用估计比较高。当时的考虑是，“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

“一五”计划执行结果，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两者的速度之比是4:1，比计划规定的比例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农业增长落后于工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市场上农业供应的副食品趋于紧张；二是农业供应轻工业的原料（主要是棉花）不足，影响轻工业生产的增长。

二、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

计划规定，工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递增17.8%，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递增12.4%。与此相适应，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这既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也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轻工业的比例规定得比较低，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重工业不发达，相对说来，轻工业比较发达。1936年，工业中生产

资料的生产占28%，消费资料的生产占72%。1949年，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比重下降到26.4%，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重上升为73.6%。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在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比重也只有35.5%（相当于俄国1913年的水平），消费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为64.5%。按照"一五"计划，到1957年，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将提高到45.4%，相应地消费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将下降到54.6%，但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仍然低于消费资料生产的比重；二、轻工业生产能力有很大的潜力，资金也有很大的后备力量。"因为除去国家预算拨款外，可以投资于轻工业的，还有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的公积金，有地方工业的投资，还有社会游资可吸收"。我国的私营企业，轻工业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根据1954年的统计，在全国133962户私营工业总产值中，消费资料的生产为77.96亿元，占75.39%。消费资料的生产又集中于纺织、食品两大行业，二者的产值占全部消费资料生产的76.26%。由于私营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城市，生产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1954年，全国轻工业的设备利用率，油脂工业约为40%，卷烟工业约为30%，面粉工业约为54%，最高的是纺织工业，国营工厂达96%；三、原料供应不足。陈云在谈到"一五"期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时说："目前轻工业的增产，主要还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原料问题。轻工业的原料，一方面来自农业，如棉花、油料、甜菜、甘蔗等；一方面来自重工业，如薄钢板、铝、化学产品等。在这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工厂开了也是白开。"当时，我国的轻工业原料80%以上依赖于农业生产，农业增产或减产对轻工业制约最大。以1955年工业生产为例，由于1954年农业生产减产，农产原料供应不足，致使1955年比1954年棉纱减产63万件，棉布减产1900万匹，卷烟减产16万箱，麻袋减产646万条，当年轻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仅维持上年水平。考虑到上面的因素，应当说，"一五"计划所规定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是比较适当的。周恩来曾说："第一个五年由于我国的轻工业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计划规定轻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11.2%，在执行过程中略有增加，这样的比重是适当的。"反映轻重工业比例适当有两个重要标志：第一，"一五"时期合计的消费品货源（与主要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发展相联系的）为2066.8亿元，而消费购买力（与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引起的劳动者货币收入增长相联系的）为1958.3亿元，前者超过后者108.5亿元，前者为后者的105.5%。第二，"一五"期间各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最低年份（1956年）为零，最高年份（1953年）为3.4%。

三、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

当时，重工业部门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

国防工业突出，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的。1956年，周恩来说："当我们开始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朝鲜战争还在进行，那时候设想，应该加紧发展的不仅是重工业，国防工业也要平行发展。一九五三年停战以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又出现台

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这也是很自然的。”但实际情况是，1956年军事工业（包括军事科研）投资仍由1955年的5.93亿元增加到11.31亿元，只是到了1957年才下降为7.37亿元。这说明，降低国防工业的比重并不是很容易的。

“一五”期间，能源供应比较紧张。1952年，我国能源的构成是，煤炭占能源生产总量的96.7%，石油占1.3%。“一五”期间，对能源构成有所调整，1957年煤炭降至94.9%，石油提高到2.1%。”我国的石油工业，受当时资源的限制，基本建设投资不可能增加很多，但电力、煤炭工业应当高一些。“一五”期间，冶金工业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的18.6%，机械工业占15.4%，而电力和煤炭工业却各占11.9%，显然比重是低了。这是煤、电供应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

1952年，我国铁路运输在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全部货物周转量中比重达88%以上。为了适当减轻铁路运输的负担，“一五”计划期间对水运和公路运输规定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即使这样，到1957年，铁路运输在全部货物周转量中的比重仍占80%左右。

“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和1952年相比，铁路货运量增长85.9%，货物周转量增长101%；客运量增长51.3%，旅客周转量增长59.5%。铁路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的发展速度大体上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较1952年增长51.1%，工业总产值增长98.3%，铁路货运量增长的速度大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小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在工业产品中，绝大部分要通过铁路运输才能完成其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而在农产品中，占主要地位的粮食却只有10%通过铁路运输。

在开始编制计划时，本拟多修建一些新的铁路（1952年打算修建10000公里）。但由于新设的厂矿多在旧线附近，旧线运输负担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加重，同时，新修铁路的造价也比预计的要高。于是便决定：一方面，要修建新的铁路，把西南、西北以及新的工矿区、森林工业区同其他地区联结起来；另一方面，根据运输量不断增长的需要，对现有铁路进行必要的加强和改造。据此，五年内铁路建设的投资分配是：用于新建铁路方面的是41.7%，用在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方面的是32.7%，用于购置机车车辆方面的是21.5%。五年内新建铁路20余条，共4084公里。从计划执行结果看，铁路运输是一直比较紧张的。如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货物周转量只增长13.8%，显得分外紧张。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比例关系看，“一五”期间大体上是平衡的，但是一种紧张的平衡。陈云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

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为了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陈云提出，必须保持下述三个方面的平衡：

——财政收支平衡。估计“一五”期间企业利润和税收可能超收一些，财政收入会有某些增加，但不可能大量增加。因为如果税收增加过多，会使物价大涨，实际工资降低。但军政费用不能再减，工业投资也不能减少，还要保存一定数目的预备费，只能做到收支平衡。从执行结果看，“一五”期间财政收支还是平衡的。

——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编制计划时，预计两者是不平衡的：1957 年生活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总额，可达 460 亿元，社会购买力则将增至 500 亿元，供应和需要之间差 40 亿元。“差额发生的原因有二：一是投资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但不可能很快生产出东西，将来生产出来的，大部分也不是消费品。二是为了保证供应，不得不实行农产品计划收购，这样农民就保存很多货币，而不能保存很多实物。”“解决这个差额的办法：一是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增产，这是最根本的；二是努力在农村中推销工业品；三是增加农产品出口，进口轻工业原料，如毛条、人造丝、橡胶等，经过加工向农村推销，这对回笼货币的作用很大；四是发行公债和提倡储蓄；五是适当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如烟、酒、糖等消费品可以涨点价，而某些农产品可以降点价。”执行结果比预料的要好，1957 年生活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总额为 521.5 亿元，社会商品购买力为 488.2 亿元，两者基本平衡。

——电、煤、木材等若干种主要产品的供需平衡。

其次，考察第二方面。

“一五”计划的第二稿，提出保证我国向社会主义前进，但没有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是陈云在 1954 年初编制第五稿时加进去的。

1952 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2 年 9 月 24 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 10 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 32.7%，国营占 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 5 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 年以后如此，10 年以后会怎么样，15 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同年 10 月，刘少奇率我党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他受毛泽东的委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我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其内容和毛泽东的讲话基本一致。斯大林在接见代表团时，表示赞同我党的意见。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

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显然改变了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设想。当时的设想是，建国后继续搞一段时间（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而现在的说法是，从1952年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的看法的改变，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初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

一是经过稳定物价、"三反""五反"和调整工商业，1952年，对资本主义工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值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6.4%；公私合营工业的资本额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全部资本的24.5%，私营金融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表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二是1951年，毛泽东支持了中共山西省委逐步地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到县委和区委组织试行。《决议（草案）》规定，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主要有三种形式：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表明，个体农民已经开始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看来，这两件事，对于毛泽东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赴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主要是调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5月，写成《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在6月15日第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由毛泽东提出的、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进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根据这个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并且认为，"一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

第二节　在曲折中前进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5年7月通过时，已经执行了两年半。1957年，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超额完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基本建设方面，五年内，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50亿元，其中经济和文教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493亿元，超过计划427.4亿元的15.3%。

五年内，在实际完成的国家投资总额中，工业部门占56%，农林水利部门占8.2%，运输邮电部门占18.7%。在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占85%，轻工业占15%。

五年内，由于进行基本建设而新增的固定资产达460亿元，其中新增工业固定资产达200亿元。

“一五”期间，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在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921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帮助我国建设的68个工程项目，到1957年底，有64个已经施工建设，有27个建成投入生产。由于这些重要项目的投产，我国建立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初步改变了解放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

——在工业生产方面，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

1957年，工业中的生产资料生产比1952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25.4%，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6%提高到1957年的48.3%。

由于数量众多的重要建设项目投产，生产能力增加，原有企业的生产也有显著增长，使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上升。下表是主要工业产品的计划完成情况：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57年计划产量	1957年产量
钢	万吨	412.0	535.0
生铁	万吨	467.4	593.6
原煤	万吨	11298.5	13000.0
发电量	亿度	159.0	193.4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57年计划产量	1957年产量
原油	万吨	201.2	145.8
水泥	万吨	600.0	686.0
硫酸	万吨		63.2
纯碱	万吨	47.6	50.6
烧碱	万吨	15.4	19.8
化肥	万吨		63.1
金属切削机床	台	12720.0	28000.0
棉纱	万件	500.0	465.0
棉布	亿米	54.6	50.5
卷烟	万箱	470.0	445.6
糖	万吨	68.6	86.4
原盐	万吨	593.2	827.7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6—37页。

《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4—89页。

统计资料表明，到1957年，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原定的计划目标，有些产品超过的幅度还比较大（如钢、生铁、原煤、发电量等）。只有石油、棉纱、棉布、卷烟没有完成原定计划，原因主要是，原料不足、销路不畅或资源没有探明。“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百年来所达到的水平。

——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24.8%，平均每年增长4.5%。

“一五”期间，1953、1954年和1956年，农业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于国家尽可能从政策、财力、物力等方面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为农业增产计划的完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包括：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趋于缩小；实行优惠的农村税收政策（1957年全国农业税额为29.67亿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5%，比1952年的5.9%下降0.4%）；增加国家用于农业的资金；增加农用生产资料的投放数量；扩大农田水利建设规模，等等。加上国有农场的发展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到1957年，粮食、棉花都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下表是主要农业产品的计划完成情况：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57年计划产量	1957年产量
粮食	亿斤	3856.2	3901.0
其中：稻	亿斤	1635.4	1735.6
小麦	亿斤	474.5	472.8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57年计划产量	1957年产量
大豆	亿斤	224.4	201.0
玉米	亿斤	1095.9	428.8
薯类	亿斤	426.0	438.4
棉花	亿斤	32.7	32.8
黄麻洋麻	亿斤	7.3	6.0
烤烟	亿斤	7.8	5.1
甘蔗	亿斤	263.5	207.8
甜菜	亿斤	42.7	30.0
油料	亿斤		83.9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页。
《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143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7年，粮食总产量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1.2%；棉花总产量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0.3%。烤烟、甘蔗、甜菜等虽未完成原定计划，总产量都比1952年有所增长，产量下降的只有黄麻洋麻（即黄红麻）。

畜牧业在“一五”期间也全面增长。下表是牲畜数的计划完成情况：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57年计划产量	1957年产量
马	万匹	834	730
牛	万头	7361	6361
骡	万头	197	168
驴	万头	1395	1086
绵羊	万只	6872	5343
山羊	万只	4432	4515
猪	万头	13834	1459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8页。
《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

统计资料表明，山羊和猪超额完成了计划。大牲畜和绵羊未完成计划，但除驴以外，数量都高于1952年。

——在运输邮电方面，适应工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有迅速发展。

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1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一倍；内河航运里程达14.4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长51.6%。与此相适应，现代化运输的货物运输量也大幅度增长。下表是“一五”期间运输计划的完成情况：

运输方式	单位	1957年计划数量	1957年数量
铁路	万吨	24550.0	27420.0
汽车	万吨	6749.3	8373.0
轮驳船	万吨	3686.4	5377.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4—95页。

《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9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7年，铁路的货物运输量达27420万吨，汽车达8373万吨，轮驳船达5377万吨，均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邮电建设也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在商业方面，随着生产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商品流通相应扩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276.8亿元增至1957年的474.2亿元，增长71.3%。主要消费品的零售量，1957年比1952年的增长情况是：粮食23%，食用植物油35%，盐31%，糖87%，棉布19%，胶鞋82%，机制纸54%，卷烟75%。

"一五"期间，我国的商业通过采购工农业产品，供应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物价，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195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52年增长62%。在进口贸易构成上，生产资料占93%，消费资料占7%。在出口贸易构成上，工矿产品的比重从1952年的18%上升到1957年的28%。

——在科学、教育和出版、广播、电影、戏剧等文化艺术事业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教育为例，"一五"期间各种学校的在校学生的人数都有显著增长。下表是1957年和1952年相比，在校人数的增长情况：

单位：万人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小学
1952年	19.1	63.6	249.0	5110.0
1957年	44.1	77.8	628.1	6427.9
1957年为1952年的%	230.8	122.4	252.2	125.8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0—171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7年的在校人数和1952年相比，高等学校增长130.8%，中等专业学校增长22.4%，普通中学增长152.2%，小学增长25.8%。

——在人民生活方面，在"一五"期间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1955年8月，国家决定全部实行工资制，取代过去实行的供给制制度。1956年4月份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工资制度的改革，并且确定1956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55年提高13%左右。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超过原订计划。当时，实行的是低工资制，为了保障职工生活，国家对职工的生活福利给

予了极大的关注。“一五”期间，国家投资新建职工住宅9454万平方米，按低房租供职工居住；为职工支付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共达103亿元。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生活也大为改善。1957年和1952年相比，农民收入增长27.9%。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新中国经济史上，这个时期，也属于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但由于我们缺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当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和急躁冒进的倾向已经开始抬头，五年期间，还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下表是1953—1957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情况：

项目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工业总产值：总额（亿元）	450	515	534	642	704
比上年增长（%）	30.3	16.3	5.6	28.1	11.5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亿元）	90.44	99.07	100.36	155.28	143.32
比上年增长（%）	107.6	9.5	1.3	54.7	-7.7
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亿元）	222.9	262.4	272.0	287.4	310.2
比上年增长（%）	21.3	17.7	3.7	5.7	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01、417页。

统计资料显示，1953年到1957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是起伏比较大的。

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90.44亿元。比1952年增长107.6%，远远超过财政收入增长21.3%（“一五”期间增长最多的一年）的幅度。增长过快的原因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尚未签字，还存在战争威胁；1952年农业大丰收，为工业和基本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使一些部门和地方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他们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计算自己的力量，不顾客观可能性，在建设中到处铺摊子，追求大规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有关部门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曾进行过三次削减，规模依然偏大。同时，1953年在编制国家预算时，由于缺乏经验，把1952年的结余也全部列入预算收入，并用作当年的投资。“国家预算的结余资金，是以上年度预算执行中由于增产节约，收入超过支出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它作为金库存款存放在国家银行，是国家财政后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备还不充足的情况下，增产节约而节余的资金，应该是补充后备的资金来源，一般不宜再动用。”因为当国家预算发生结余的时候，工业、商业部门会相应地增加一部分物资库存，同时它们也就相应地向银行增加一部分贷款增补流动资金的不足。结果，结余的物资存在工业、商业部门，结余的资金也通过信贷渠道流到工业、商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把这部分资金全部用作投资，就会犯“一女二嫁”的错误，加剧财政的紧张状况。为了解决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带来的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这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

算的紧急通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通过增加生产，扩大收购和销售，加速资金周转和做好税收工作等来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坚决削减军事、经济、文教、行政一切可以削减、可以推迟的事业拨款，精简军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节约粮食，坚决保证财政部提出解决赤字的具体方案的实现。中共中央指示下达后，在全国展开了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国家计委也对1953年计划进行了调整，压缩支出，增加收入，使经济情况迅速好转。1953年，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并略有结余。

1954年，基本建设总投资99.07亿元，比上年增长9.5%，低于财政收入增长17.7%的速度，经济稳步发展。这一年在计划执行过程中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因遭受水灾有较大幅度的减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市场消费品供应；基本建设因图纸、设备不能按时供应和某些单位对重点工程准备工作做得不够，不能全面完成计划；工业生产的供产销之间不平衡；上半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社商业前进过快，某些地方出现私商从业人员难以安排和城乡交流不畅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当年9月，全国第一次计划会议上，国家计委在提出1955年的控制数字时指出：（一）继续贯彻重点使用投资的方针，抓紧重点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二）考虑到1954年供产销不平衡比较突出，农业减产对工业将有较大影响，适当降低1955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工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巩固为主。（三）为弥补大水灾造成的损失，提高1955年粮食和棉花的控制数字。（四）在社会商品零售额方面，要正确安排公私比重。国营商业特别是合作社商业在国内零售商业中继续执行“总的踏步、着重改造”的方针，当年前三个季度前进过多的地方应通过扩大经销代销范围的办法适当后退。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保证了1954年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一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6.3%。

1955年，基本建设投资100.36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3%，低于财政收入增长3.7%的速度。工业总产值也只增长5.6%。基本建设规模偏小，有两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1953和1954年，农业连续两年遭受自然灾害，1954年，粮食仅增产71亿斤，棉花减产219万担，在安排基本建设规模时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主观原因是，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决定要求，在基本建设方面，除了新建的主要厂房、主要设备以及其他主要的生产性和技术性工程须按现代化标准设计、施工和安装，并保证其进度和质量外，其他次要和附属的各种建筑工程能削减者削减，不能削减者也须降低设计标准和工程造价。非生产性的建设，必须严格控制，削减非急需建设项目，降低设计标准和工程造价。根据对3280个较大的建设单位的统计，节约的资金达10亿多元，比原投资计划减少了16.1%。这中间有些不应该削减的投资也削减了。这一年，由于过份地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放慢工业发展速度，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出现了暂时过剩现象，消费品商品也出现“过多”问题。由于缺乏经验，我们采取了出口建筑材料和商品“泻肚子”的办法来解决虚假的“过剩”，也是不恰当的。

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陡增至155.28亿元，比上年增长54.7%，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增长5.7%的幅度。从1955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出发，1956年有必要也有可能提高工

业建设的速度。一是1955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的基数比较低，1956年，财政上有较多的结余，物力上有一定的储备；二是1955年农业丰收，其中棉花产量从1954年的2130万担，增至3038万担，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四是“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1956、1957年到货，也促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

但是，1956年的基本建设规模还是过大了。在经济建设中再一次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而且来势甚猛。这次急躁冒进，和1953年不同。1953年主要是各部门、各地方领导人的急于求成，带有很大的自发性，纠正起来要容易一些。1956年的急躁冒进则主要来自毛泽东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和他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所形成的压力。纠正起来就难得多了。

1955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接着1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又批判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据薄一波回忆，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曾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讲话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并且说，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12月27日，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则直接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序言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专业会议，在毛泽东批判右倾保守和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的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规定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为此，就得多上基本建设。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是：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12.4%。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又增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

694个。建成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500多个。正像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周恩来是赞成的。但他身处实际工作的第一线，直接感受到由于建设规模扩大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1956年初已经发现，不能只反右倾保守，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提出来的。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说：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经过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的努力，1956年度的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147亿元。

5月，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我国经济建设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在报告稿中加了这样一段话："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6月20日，根据会议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这篇社论，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冒进的注意和重视。至此，急躁冒进的势头基本上被遏止住了。

1956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亿元，造成资金供应紧张；二是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引起钢材、木材、煤炭和机械设备供应紧张；三是职工人数增长过多和职工工资总额增长过多，助长了消费品的供不应求；四是出现财政赤字18.3亿元。财政赤字，引起银行货币投放增加，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底增加17亿元。货币流通量增加，需动用相应的物资来保证，当年商业库存比上年减少17亿多元。这就是急躁冒进付出的代价。

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143.32亿元，比上年减少7%，而当年的财政收入却增长7.9%。在开始编制计划时，国家经济委员会汇总的国务院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

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共计243亿，比1956年的计划多103亿元。周恩来认为，这说明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他提出，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应明显低于1956年的实际水平，并且强调，把过高的投资额压下来，是1957年全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经委最后定案为110亿元。11月10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在会上，周恩来联系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和我国“一五”计划与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总结，提出1957年应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当时，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方针。由于有正确的方针作指导，这一年的综合平衡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一)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归还了上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元，新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元。基本上达到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保证了物价稳定。(二)工农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三)农业产值比上年增加20多亿元。(四)商品货源大于当年社会购买力，保证了市场供应，并补充了上年挖掉的国家物资储备。

“一五”期间的曲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把它归纳为五个问题：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过去四个年度计划的安排，大体上也是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有可能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应该指出，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

但是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

在这个时期中间，也曾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以致同有关方面脱节。”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

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

“这几年来，国家储备的物资虽然还不很多，可是对于保证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一九五六年的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曾经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应该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正象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一九五五年某些物资略有多余的时候，就不适当地出口了一部分；到了一九五六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又感到这些物资的严重不足。”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

这些经验教训，不仅完全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是宏观调控必须遵守的原则。

1957年1月18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讲话从理论上概括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6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观点。陈云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他主张：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些主张，和周恩来的总结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我国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建国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逐步形成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

1949年到1952年。

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被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全国解放以后，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壮大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接着统一了财政经济工作，集中掌握了现金和物资，确立了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比重比较大，从全国来看，占支配地位的还是市场经济。国营经济主要是通过调节市场供求，体现其领导地位。

当时，东北地区的经济（主要是工业交通）已经实行计划管理，全国只是开始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这个时期，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根据计划经济的需要，建立中央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机构。1949年9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原有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指导财经各部门、人民银行及海关总署等一切有关经济部门的工作。简称“中财委”。中财委内设财经计划局、技术管理局、财经统计局、私营企业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局、合作事业管理局、财贸人事局、编译室等业务部门。在中财委之下，设立了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总行、海关总署。中财委及各部委制定的组织条例反映出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接近于苏联，大于旧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

除了中央政府加强了经济管理职能外，地方政府也加强了经济管理职能，并在地方政府内设立与中央各经济部门相对应的经济管理机构。

——1950年5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试编出《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概要》是在汇总各部的专业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计有1950年的粮棉增产、水利建设、林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地质调查及探矿、棉纺工业、造纸工业、铁路运输及修建、航务公路建设、邮电建设、粮食供应、花纱布供应、食盐产销、文教卫生费及社会事业费等20多项事业发展的概括要求，并统筹安排了各方面的投资。1951和1952年也编制了这样的计划概要。

——1952年11月，中财委下达1953年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贸易控制数字。其中包括：工业总产值、公私比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重、主要产品产量、铁路货运量、国营贸易国内收购商品总值、销售总值和零售额、国营外贸出口和进口总值的增长幅度。同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

——从1951年2月开始，着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事前文已经论及，兹不赘述。

1953—1955年。

1953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一时期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缩小市场经济的范围，加快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一，对重点建设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一五”计划基本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

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要实现这个任务，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1952年，尽管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但经济力量仍然是很薄弱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都很有限，不能充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需要。要使得有限的经济力量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就需要适当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具体做法有：

——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的财政体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举凡关税、盐税、烟酒专卖收入，以及中央和大行政区管理的企业收入、事业收入等，都属于中央的固定收入。此外，还有按税种划分的中央固定收入、中央同地方的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的调剂收入。对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范围，其中中央经营的基本建设投资属于中央财政支出，由财政部拨款。

——在物资分配方面，从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实行计划分配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平衡分配（称统配物资），专用物资由各主管部门平衡分配（称部管物资）。

——为了支援重点建设，从全国调集了1万名优秀的干部走上基本建设第一线，又从文教、科研部门和原有企业中抽调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充实新建单位。与此同时，国家有计划地抓紧人才培训。

——基本建设项目以中央各部门为主进行管理。当时地方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任务，除积极支援国家在当地建设的少数重点项目外，主要是管农业，以及抓农业合作化、对私有制的改造，保证完成农副产品采购和调运，稳定市场物价，安排好人民生活等。地方的基本建设，主要是搞一些农林水利、城市公用事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但项目仍须由中央各部指定，设计施工任务由国家下达。对重点建设项目，中央各主管部门从人、财、物的调度到设计施工（有不少部有自己的施工队伍）、生产准备的安排，都一抓到底。

第二，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

到1952年，国营经济已经壮大并在现代工业中占优势，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有了发展，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还有60%的农户和97%的手工业者从事个体劳动。适应这种经济状况，在“一五”计划的前三年，实行的是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和当时苏联实行的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亦即直接计划）是有区别的。

对国有企业和生产国家安排的产品的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国家向这些企业下达指令性生产指标（包括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工总数、年底工人达到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其中工业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由各主管部按计划供应，享受国家调拨价格，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收购或调拨。在财务上，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利润和折旧基金全部上交，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所需要的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生产需要

的流动资金由财政部门按定额拨给，季节性、临时性的超定额部分由银行贷款解决。企业只有少量的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这种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50年代的体制。

对一般公私合营和私营工商业、运输业，供销合作社商业以及一部分手工业，则实行间接计划。国家主要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和经济合同，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法，把它们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它们所需的生产资料由国营商业部门估算需要，按商业牌价组织供应。对花色品种繁多的小商品的生产经营一般不列人国家计划，国家主要通过控制原材料和销售，从市场供求关系上进行调节。在工业方面，1952年实行间接计划部分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5%左右。有的城市间接计划的比重比较大，例如，上海市1955年实行间接计划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

在农业方面，国家主要靠价格政策、农贷政策、预购合同、税收政策等加以调节，促使农民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安排生产。1953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当时，价格政策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从1950年到1952年，由于棉花价格有了提高，加上预购、商品供应、税收等方面对棉农的照顾，棉花生产恢复得很快。棉花产量从1952年的889万担增加到1952年的2607万担，播种面积也从4158万亩扩大到8364万亩，已经能够满足纺织工业和民用的需要。为了防止盲目扩大棉田，中财委于1953年4月1日发布了新的棉粮比价，由上年的8：1调整为7：1，降低了棉花收购价格。执行新的棉粮比价后，1953年棉田面积较上年减少594万多亩，棉花减产257万担，棉花又少了。为了扭转这种状况，1954年3月3日中财委决定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规定1954年棉粮比价为：1斤棉花在河北、山东、晋中、豫北相当于小米7.5斤至8.4斤；陕西、河南、晋南相当于小麦6.12斤至8斤；湖北、江西、湖南相当于二级米7.4斤至8.4斤；江苏、浙江、安徽相当于中籼米7.4斤至8.4斤。东北、西南由当地财委自定。于是，棉田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除1954年和1956年因灾减产外，棉花产量陆续上升，1957年达到3280万担，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

第三，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1953年，我国开始"一五"计划的建设，城镇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长，这一年，城镇人口达7826万人，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同时，农村因种植经济作物或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而缺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人。这样，到1953年年底，国家供应城乡粮食的人口就近两亿人，使国内粮食纯销售量由上年的467.8亿斤猛增到613.2亿斤，增加31.1%。但是，粮食的收购量却减少了。我国农民的粮食商品率本来就不高，土地改革

后，粮食产量虽有增加，但因农民生活改善，粮食消费有所提高，而且有余粮也不急于出卖，以致粮食的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私商乘机囤积粮食，扰乱市场，有余粮的富裕农民也等待高价，不肯出售。陈云说："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由于粮食供应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发生混乱，个别地方出现群众排队争购粮食的现象，粮价也开始上涨。

对于粮食严峻形势的到来，陈云早有预见。1952 年 1 月，在他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即已指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但由于一些地方的同志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1952 年的试点方案实际上没有执行。

1953 年，全国粮食形势进一步严峻，毛泽东要中财委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陈云为解决这个问题，曾考虑多种方案，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向中央提出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的建议。这个建议，当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 11 月 23 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下达执行。

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主要内容是：（一）生产粮食的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二）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储存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但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三）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粮食部门领导；（四）所有私营粮商、私营粮食加工厂，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或自购原料、自销成品，但可在国家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理销售粮食或从事粮食加工；（五）城市居民凭证供应粮食，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和一般农村的缺粮户，采取由上级政府颁发控制数字和群众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确定需要供应的数量，使真正缺粮户能够买到所需要的粮食，又能适当控制销量，防止投机和囤积；（六）对于熟食业、食品工业等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等供应旅客膳食用粮和其他工业用粮，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有计划地予以供应，不准私自采购和转售粮食。

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同时，对食油、油料也实行了统购统销的办法。1954 年 9 月，国家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最担心的是农民反对。一下子把自由交换取消，余粮都卖给国家，虽然国家出钱收购，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也会不满意，甚至影响生产情绪。为了使农民易于接受，当时，一是控制征购粮食的数量，远低于农民两年来拿出来的粮食

数量；一是价格公道，全国各地的统购价格，大体维持当时的收购牌价。

但是，在实行过程中，还是产生了不少问题。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比较仓促，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对1.1亿多农户粮食生产的余缺情况一时难以摸清，只能规定一些执行政策的原则，一时还拿不出具体办法。当时，主要是采取政治动员、由上级政府颁发控制数字、发动群众民主评议、上级核定，来完成统购任务和进行粮食统销。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强迫命令比较严重。由于办法不够完善，在农村分配粮食购销任务上，也难免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有的该购的没有购足，有的购了过头粮，有的该销的没有销，不该销的反而销了。同时，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国家又多派了70亿斤统购任务，使农民一时感到"购粮无底"、"增产无益"，影响了发展生产的积极性。1955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出现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在市镇粮食供应上，由于制度不严，供应偏宽，粮食销售超计划过多，浪费现象也相当普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全国派出几十万干部到城乡各地整顿统销工作，使粮食销量迅速恢复正常。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其基本内容是，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定产：根据各农产的土地质量和自然条件，结合经营条件，按正常年景评定单位面积常年产量。产量评定后，自1955至1956生产年度起，在正常年景下三年不变，新垦荒地自开始收获之年起三年不计产量。定购：农业社和农户按照一定的标准留下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后有余粮的，国家收购其余粮的一部分（一般不超过80%—90%）。如果因灾减产，要相应减少统购数量或增加统销数量。定销：对农村缺粮户按照规定的用粮标准分别核定粮食供应量，根据"何时缺粮、何时供应"的原则，评定各户开始供应的时间和分月供应计划，由国家粮食机关统一发给粮食供应证，"凭证、按月、定点、定量"供应。为了鼓励按照国家计划种植经济作物的缺粮户的生产积极性，规定这些农户的口粮、饲料用粮标准应不低于当地余粮户的用粮标准。

实行"三定"以后，农民心里有底了，可以更好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国家也可以摸清农村粮食产需情况，避免收购过头粮和供应混乱的现象，比较合理地进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

粮食和油料、棉花和纱布的统购统销，最明显的效果是，缓和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保证了国家需要和人民生活的供应，稳定了市场和社会秩序。从中国当时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基本上排除、代替了私商（主要是批发商）对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的经营，在这些领域切断了城乡资产阶级的联系，实际上大大缩小了市场经济的范围。由于对粮食、油料、棉花等农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是带有指令性的，也使农业生产进一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至于说，通过统购统销，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加速工业化资金积累，当时并没有这种考虑。但统购统销持续的时间比较长（1953年到1985年），工农业产品

价格又没有及时调整，实际上，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我国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巨额资金，这是始料不及的。

对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并没有改变以国营商业为领导、合作社商业为助手，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商业结构。在此期间，除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以外，国家对私营商业也作了统筹安排。国家通过价格政策和规定经营范围，给私营商业以活动的余地，使之为沟通城乡交流服务。因此，流通还比较活跃，物价也比较稳定，市场繁荣，人民满意。

1956年以后。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国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比重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私营经济则由6.9%下降到0.1%以下；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占93%。

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和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41.5%上升到54.5%；集体所有制工业由3.2%上升到17.1%；公私合营工业由4%上升到27.2%；私营工业由30.7%下降到0.04%；个体手工业由20.6%下降到1.2%。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已占98.8%。

在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中，1956年和1952年相比，（1）商业企业商品批发额：国营商业由60.5%上升到82%；合作社商业由2.7%上升到15.2%；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由0.5%上升到2.7%；私营商业由36.3%下降到0.1%。（2）商业企业商品零售额：国营商业由19.1%上升到38.3%；合作社商业由23.5%上升到30%；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国营经济由16.2%上升到34%；合作社经济由18.2%上升到30.1%；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经济由0.4%上升到28.3%；私营经济由65.2%下降到7.6%。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92.4%。

在铁路、公路和水运货物周转量中，1956年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由95.8%上升到99.3%，公私合营经济仍是0.7%，私营经济原占3.5%，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说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已经基本上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56年以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直接计划的部分大大增长，间接计划部分相应缩小。1954年撤销大行政区以后，大型国营企业陆续收归中央各工业部直接领导。到1957年，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从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9300多个，户数约占中央和地方管理工业企业总户数的16%，产值占49%。1953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是115种；到1956年，已增加到380多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对农

产品采购，计划部分一般也占采购总额的70%左右。

——计划分配的物资比重扩大。"一五"前期，物资分配供应，有中央管理和市场供应两个渠道，相应地也有国家调拨和市场两种价格。1956年以后，在物资管理上绝大部分采用调拨的办法，通过商品流通的部分已微乎其微。1953年，计划分配的物资是227种，1957年已增长到532种。非计划分配的重要物资，品种、数量都大为减少。通过商业部门向非申请单位供应的钢材占全国钢材供应总量的比重，1953年为35.9%，1956年下降到8.2%。

——劳动工资管理高度集中。在劳动管理方面，1954年以前，是在中央统一政策指导下，以大行政区管理为主。当时，不论是国有企业或是私营企业，都可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限度内自行增减职工；企业招工可以对职工进行考核，并可择优录用，也有辞退职工的权力。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以后，劳动管理权逐渐集中到中央。1955年，停止从社会上录用新职工。必须增加新职工时，须经主管部门批准。结果，企业的劳动力都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不能择优录取，无权拒绝接受，从而形成了企业职工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制度。在工资管理方面，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也集中到中央政府劳动部门。1955年，将供给制一律改为工资制，统一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1956年，进行了全国工资改革。这次工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工资分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统一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分别按产业规定工人的工资等级数目和工资等级系数，统一制定或修改技术等级标准，实行等级工资制；对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实行职务或职称的等级工资制；职工工资标准、职工定级、升级制度均由全国统一规定，地方、企业无权决定。

1956年以后，国有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已经形成了生产单一计划，供应统一调拨，销售统购包销，财政统收统支，劳动统包统配的体制，农业和手工业也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这表明，市场调节已经逐步被取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第二章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并规定了具体的改造任务。计划要求，五年内，“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对私营资本主义商业也要“逐步地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一节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道路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怎样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在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之后，就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生了比较固定的联系，而在它们中间就逐渐渗入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样，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加，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削弱，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两个发展阶段。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已绎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订立合同，在企业外部，即在流通过程建立了联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控制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两个环节，因而造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依赖。资本主义企业进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后，就在生产和经营方向、活动范围、剥削程度、产品价格和市场条件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这些企业的盈余，按“四马分肥”的原则分配，即企业的盈余，按照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基金和资本家的利润（包括股息和红利等）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本家不能再得到全部盈余，而只能得到盈余的1/4。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已经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的剥

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生产和销售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虽然如此，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它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生产盲目性等特点，因而还需要进一步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公私合营，它又经过了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合营两个阶段。

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　就是在原有的私营企业中加入国家的公股，并由国家派干部负责企业的领导和管理。这时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联系，就由企业外部进入到企业内部，从流通领域进入到生产领域，从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已经不是资本家单独占有，而是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支配权、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等，实际上已转到国家手中。资本家的私股虽然仍是资本，但已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再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而是逐步地向国营经济看齐，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服从国家计划要求为指导方针；工人虽然还没有最后摆脱被剥削的地位，但已开始成为企业的主人；在利润分配方面，虽然仍然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但由于企业是公私共有，资本家只能按照私股所占的比例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部分，而不能像在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占有企业盈余的 1/4。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这些都说明，公私合营企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了。由于这些变化，因此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潜力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再加上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建，所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进一步提高了。

但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它还承认私股的所有权，企业内部也还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造，即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资本家的赎买由分配利润制度改为定息制度。即资本家按照合营前的资本总额，在一定年限内，每年领取 5%的定息。定息仍然是一种剥削收入。但在实行定息制度后，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之外，对企业的生产资料已无权过问，企业的生产资料完全由国家统一使用和支配，企业的管理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国家计划进行。资本家虽然在企业中也安排了工作，但他已不是资本家的身份了，工人完全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成为企业的主人。所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企业，除了资本家还拿定息之外，已经和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差别了。

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从 1956 年初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是，1955 年冬，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资本主义同农村的经济联系，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 1 月，继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资本主义改造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到 1956 年底私营工商业全部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第二节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了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具体执行过程是：

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加强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国家开展了有计划地扩展加工订货工作。从1953年7月份起，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对一些主要物资和工业原料进行控制。如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煤、铁、钢材、铜、硫酸、烧碱、橡胶、羊毛、麻、油料、烟叶等重要原料实行按计划控制和供应；对进口原料加强管理；对国家未统一控制的原料由各地政府根据加工订货计划掌握平衡，等等。由于国家掌握了工业原料并对原料实行统一分配，因此，国家就可以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对各种经济成分进行全面的生产安排。这时国家对私营工业的产品绝大部分已经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特别是加工订货的形式，更为普遍，很快从一些主要行业扩展到一般行业，从大城市扩展到小城市，从大型企业扩展到中小型企业。

加工订货普遍实行后，国家加强了计划管理和合同管理。加强加工订货工作的计划性，督促私营工业严格遵守合同，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数量、时间来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任务。此外，国家还进行上缴货价的核算工作，督促私营工业改善经营管理，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中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及国家对私营工业企业的加工订货发展情况，如表1。

表1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国家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产品价值①（亿元）	8.11	20.98	43.21	58.98	81.07	81.21	59.35
指　数（%）	100	259	533	727	1000	1001	732
国家加工、订货等产品价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比重（%）	12	29	43	56	62	79	82

①1955年国家加工、订货等产品值比1954年减少较多，是由于自1954年起、大批私营企业已实现了公私合营，这些转变了经济类型的企业的数字已不包括在私营工业的统计范围内。如按可比部分计算，1954年国家加工、订货等的产品值较1953年增加19.3%，1955年又较1954年增加1%。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由于国家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等数量迅速增长，这部分产品价值占全部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2%，上升到1955年的82%。如果从大型工业来看，这一

比重更高，达91%，而私营工业自产自销部分却不到其全部生产的9%。这种情况说明，几年来私营工业的生产已经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除了私营工业外，国家还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对私营运输业和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私营运输业，包括轮船、木帆船、汽车、畜力车、人力车等行业，这些行业大部分是个体经济，只有轮船和部分汽车运输业是资本主义经济。对私营运输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要求运输业能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安排。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交通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对运输业要实行"三统管理"，即统一货源、统一调度、统一运价。在组织形式方面，将一个运输线上的私营户组织起来（轮船业），成立联合管理处，由政府派干部进行领导，实行财务统收统支，业务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汽车运输业则组成联营社，成立车队管理委员会，由国家派干部驻队，对车队实行监督和指导，车队实行统一管理，分户记账，各计盈亏。

在商业方面，对批发商、进出口商和零售商采取不同的改造形式。对批发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国内的一些大的私营批发商，已经被国营商业代替了。对于其他一些批发商，国家因为已经控制了主要商品的货源，所以对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和方式，这就是"留"、"转"、"包"三种。"留"就是让一些批发商继续经营批发业务。具体办法是在国营商业领导下，由国营商业委托它们代理批发。"转"是把原批发商的经营和人员转到其他经济部门。"包"就是包人员，就是把私营批发商吸收到国营企业中来，使他们能发挥所长为国营商业服务。

私营进出口商也是经营批发业务的，它们与国外市场及国外厂商有广泛联系，并有对外贸易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熟悉国外市场行情。但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国家掌握并经营的。建国初期，我国就实行了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政策。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私营对外贸易商业已经很不重要了。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后，重要的出口物资已经实行统购，进口物资也实行有计划的进口。因此随着国营外贸事业的发展，私营外贸业则逐渐淘汰和转业。这时，一些私营外贸人员被国营外贸公司吸收，另一些还能勉强维持的私营外贸商，则以委托经营和公私联营两种形式让它们继续维持下来。委托经营和公私联营是国家对私营进出口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级形式。

对私营零售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因为零售商直接和广大群众相联系，从业人数又多，成员也比较复杂，又比较分散，所以对零售商的改造工作，既要逐步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逐步改变其所有制，又要充分发挥它们在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使之能维持其经营。党和政府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对它们采取了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在步骤上采取逐行逐业进行改造的办法。改造的形式有：批购（即批购零销，私商以现款向国营商业批购商品，然后零售出去，赚取批零差价的收入）；经销（私商经销国营商业指定的商品，取得批零差价的收入）；代销（受国营商业委托代销商品，取得规定的代销手续费）；专业代销（与代销不同，其全部货源都由国营商业供给，无自营业务）。

国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逐步发展的。1953年下半年发展最多的是批购形式。1953年11月开始，国家对粮食、食用油料、棉花、棉布等陆续实行统购统销，国家掌握了全部货源，经营这些商品的私商即全部纳入经销和代销形式。

从1954年起，社会主义商业不论在批发方面或零售方面，都占有统治地位，私营商业大大削弱。这种情况，从1953年以来全国商品流通中公私比重的变化上可以看出（表2）。

同一时期私营商业变化情况如表3所示。

表2

年　份	1953	1954	1955
批发方面	100	100	100
国营和合作社商业	62.9	89.3	94.8
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化商业	0.5	0.5	0.8
私营商业	30.3	10.2	4.4
零售方面	100	100	100
国营和合作社商业	49.4	67.5	67.3
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化商业	0.3	6.4	15.2
私营商业	50.3	26.1	17.5

资料来源：同表1。

表3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5年较1953年减少（%）
户数（万户）	414	314	295	28.7
其中：坐商（万户）	150	113	86	42.7
从业人员（万人）	608	446	390	35.9
商品销售额（亿元）	223	133.8	120.1	46.1
其中：批发额（亿元）	81.4	29.6	14.4	82.3
零售额（亿元）	141.6	104.2	105.7	25.4
资本额（亿元）	19.2	14.2	10.1	47.4

资料来源：同表1。

由表2、表3数字可见，1954年社会主义商业无论在批发或零售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私营商业受到极大的削弱。1954年7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商的指示》，执行的结果，更促进了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迅速发展。到1955年8月底止，全国私营商业中已有71万户（占私营总户数的24%），112万从业人员（占私商从业人员总数的28.7%）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化轨道。

以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发展阶段的情况。

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的性质和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国家有计划地发展公私合营经济是从 1954 年开始的。1954 年 9 月国家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了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任务和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经营管理、盈余分配等各方面的原则，这标志着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发展起来了。到 1955 年，公私合营工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按总产量计算，1955 年较 1949 年增加了 31.7 倍，即平均每年增长 78.8%。建国后历年来公私合营工业发展情况，可从表 4 中看出。

表 4

年份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公私合营工业户数	193	294	706	997	1036	1744	3193
职工人数（万人）	10.54	13.09	16.63	24.78	27.01	53.33	78.49
总产值（亿元）	2.20	4.14	8.06	13.67	20.13	51.10	71.88
指数（%）	100	189	367	623	917	2328	3274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2.0	2.9	4.0	5.0	5.7	12.3	16.1

资料来源：同表 1。

公私合营工业的迅速增长，表明私营工业已陆续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如以公私合营工业和私营工业总产值为 100，则 1949 年公私合营部分为 3，1952 年为 11，1953 年为 13，1954 年为 33，1955 年为 50。就是说，到 1955 年底，已有相当于总产值一半的私营工业企业被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了。1955 年，在总产值中，公私合营部分占 50%，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占 41%，而私营工业自产自销部分只占 9%。下面我们看一看，历年来工业中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发展变化的情况。如表 5。

表 5

年　　份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全部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私合营工业	3	5	7	11	13	33	50
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	12	28	40	50	54	53	41
私营工业自产自销部分	85	67	53	39	33	14	9

资料来源：同表 1。

1955 年底虽然已有相当于总产值一半的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但是中共中央当时认为，改造的过程仍然需要加快。1955 年底，私营工业还有 89000 户（其中 60%的企业仍是 10 人以下的小户）没有实行公私合营。为了加快对私营工业的改造，从 1955 年上半年开始，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贯彻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生产安排、市场安排以及按行业归口安排的原则，进而发展到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全

行业的安排和调整。这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为主，发展到以高级形式为主；从过去的一个厂店实行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就大大扩大了改造的规模，加速了改造的进度。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前3年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壮大，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因而，到1955年末和1956年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高潮。1955年下半年，上海、天津、北京等许多地区在全行业安排生产和经济改组的基础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1月，全国已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城（即占全国70%的城市）都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没有实行合营的私营企业已经很少了，这种情况由表6可以看出。

表6

	1956年1月31日止			3月31日止			6月30日止			12月31日止		
	户数	职工人数	总产值	户数	职工人数	总产值	户数	职工人数	总产值	户数	职工人数	总产值
1955年底原有私营工业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已批准公私合营的企业	77.3	80.5	88.7	88.2	90.4	94.7	97.3	97.7	99.1	98.7	98.8	99.5
尚未合营的私营企业	22.7	19.5	11.3	11.8	9.6	5.3	2.7	2.3	0.9	1.3	1.2	0.5

资料来源：同表1。

1956年底，完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已达1955年底私营工业户数的98.7%，而尚未合营的私营工业仅有1.3%，私营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55年底的16%，迅速下降为1956年底的0.5%，同一时期内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却由全部工业的16%，上升为32.5%（不包括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所得股息红利，就由“四马分肥”办法改为“定息”制度。

1956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重要问题的决定》和《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1956年7月28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中，规定了对私营企业进行清产估价和实行定息制度。根据这些文件指示的精神，政府开始了对私营企业的清产核资、经济改组、企业改造、生产安排、人事安排以及实行定息等一系列工作。

定息，是把资产阶级所有的生产资料估价折成股份，每年按照股份分给资本家固定的红利。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定息办法规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即年息5%。个别需要提高的企业，可以超过5厘。过去早已采取定息办法的公私合营企业，如果它们的年息率超过5厘，不降低；如果年息率不到5厘，提高到

5厘。这就是说，资本家的定息，一般是年息5%。另外，在公私合营企业里，资本家不仅定期拿到股息收入，而且还领取较高的薪金。据1956年对73个投资在50万元以上的资本家的薪金调查，平均每人月薪在500元左右，少数高达2000元以上。

实行定息制度后，资本家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只能表现在定息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既不能直接掌握，也不能变卖。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完全由国家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来安排。另外，在实行“四马分肥”的时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是与企业的利润大小成正比的，当企业生产增长、利润提高时，资本家分得的股息红利也相应提高。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所得的股息就是固定的了，无论企业利润如何提高，资本家只能按照他的资产数目每年得到5%的固定的定息收入。这样，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就仅仅表现在定息上了。除此之外，这种企业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关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种经济成分变化的全部情况，可从表7看出。

表7　　1949年—1956年我国工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变化情况

[以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为100]

	社会主义工业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其中		资本主义工业（自产自销部分）
			公私合营	加工订货	
1949年	34.7	9.5	2.0	7.5	55.8
1950年	45.3	17.8	2.9	14.9	36.9
1951年	45.9	25.4	4.0	21.4	28.7
1952年	56.0	26.9	5.0	21.9	17.1
1953年	57.5	28.5	5.7	22.8	14.0
1954年	62.8	31.9	12.3	19.6	5.3
1955年	67.7	29.3	16.1	13.2	3.0
1956年	67.5	32.5	32.5	—	—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32页。

由此可见，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国家对私营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已经大大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只规定，“私营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私营的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公私合营”）。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及定息制度的实行，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已与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没有多大差别，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已经基本上转为国家所有。它标志着，在工业中社会主义已经取代了资本主义。

在商业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发展很快，特别是1954、1955两年，比以往有显著的进展。不过，这一时期的改造方法，基本上是一户一户个别进行的；改造的形式也主要是经销、代销、批购零售等，公私合营的极少。1955年8月底，全国公私合营的商店只有440户。从1955年第4季度开始，随着全国农业合

作化高潮的到来，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即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到1956年第1季度，全国省辖市以上的私营商业也基本上实行了公私合营，或组成合作商店（小组）；广大农村的私营商业，也有60%以上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合作化的轨道。1956年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已由1953年的49.9%下降为4.2%，1957年更进一步下降为2.7%。国家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国家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情况，如表8所示。

表8　　1950年—1957年我国商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变化情况

（以商业企业商品零售额为100）

年	社会主义商业	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	私营商业
1950	14.9	0.1	85.0
1951	24.4	0.1	75.5
1952	42.6	0.2	57.2
1953	49.7	0.4	49.9
1954	69.0	5.4	25.6
1955	67.6	14.6	17.8
1956	68.3	27.5	4.2
1957	65.7	31.6	2.7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34页。

另外，对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中也顺利地完成了（表9）。

表9　　1949年—1057年我国运输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变化情况①

（以货物周转量为100）

年	国　营	公私合营	私　营
1949	88.5	—	11.5
1950	95.3	—	4.7
1951	94.7	—	5.3
1952	95.8	0.7	3.5
1953	95.8	1.3	2.9
1954	95.3	3.1	1.6
1955	94.8	4.6	0.6
1956	99.3	0.7	—
1957	99.7	0.3	—

①本表不包括木帆船、畜力车、手推车等非机械化运输。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35页。

国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是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在对企业改造的同时，对资本家也采取教育的方针，逐步地使他们由一个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对人改造的同时，国家对资本家还作了妥善的安排。资方人员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予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证他们的生活。这种对资本家给予定息，或者予以各种安排、照顾，都是赎买的形式。国家就是通过赎买，对资本主义企业和对资本家本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获得成功的。

第三章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及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还规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计划中也规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达到的具体目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以及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的道路进行的。在改造的过程中，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逐步过渡。

第一节　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是，"为着克服分散的个体经济的落后性，提高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地和有步骤地在自愿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把贫农和中农联合起来，发展农业合作化……根据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和各地方已经达到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到 1957 年参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3 左右。其中，东北各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其他老解放区，合作化的规模可能达到农户的半数左右。"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党在农村工作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促进农民联合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肯定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由互助组到初级形式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也就是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决议特别提出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重要作用，指出了它是"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形式"。它"日益变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因此，党中央号召，"必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以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前发展。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具体领导下，1954 年，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很快。1954 年 3 月底，全国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95000 多个；到夏季，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111400 多个；到 10 月初，全国发展到 229000 多个。秋收后，全国大批建社，到年底止，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 497000 多个。1955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高潮，到秋收分配时，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634000 多个（其中高级社 529 个），入社农户 1692 万户。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在初级农业合作社里，土地仍然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牲畜和大农具一般也是为农民所有。不过，在合作社中也有了公有财产。这种公有财产，其中一部分是社员入社时缴纳的股份基金；一部分是合作社的公积金。

在初级社里，土地、牲畜和大农具虽然仍为私人所有，但却不是分散使用，而是归合作社集中统一使用，因此，合作社就可以组织集体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生产。

在劳动力方面，参加初级社的社员的劳动，是合作社总的集体劳动的一部分，归合作社统一调配。因此，合作社对劳动力可以组织大规模的协作。

在农业合作社的产品分配方面，对社员入社的土地、牲畜和大农具等，也分得一份报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社员的私有观念不能一下子消除；同时也是为了调节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关系，在合作社生产发展时，不但贫农可以增加收入，即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中农也能增加收入。另外，这样做也可以照顾一部分分了土地但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生活的困难。总的来看，这样做使社员可以自然地由生产资料私有制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产品分配方面的具体做法：首先在合作社的总产品中扣除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剩下的就是合作社的总收入。在总收入中一部分是用于向国家交纳的税款和社内公积金；另一部分则用作劳动报酬、土地报酬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报酬，在合作社总收入中用于劳动报酬的部分，应按照社员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多和劳动好的多得，劳动少和劳动差的少得，即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在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已经有了公有财产，土地、耕畜、农具等虽然仍然是私有财产，但是已经由社里统一使用，社员从事集体劳动，劳动力也由社里统一调配、统一组织，社员的收入是以按劳分配为主。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土地、耕畜、农具仍为社员私有，并且还通过对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取得一份收入。这是私有经济的因素。因此，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决议》中指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当时条件下具有的优越性：(1) 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解决互助组中难以解决的一些矛盾，特别是关于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2) 实行土地统一经营，能够因地种植，而且比互助组更能够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进行较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分业的劳动，合理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因而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 集中经营也就有更大的劳动力量和经济力量，能够更多地和更好地利用新的农业技术，便于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因而可能有效地逐步扩大农业的再生产。(4) 由于能够更多地节约劳动的时间和更多地节约劳动力，所以能够更好地发展副业的生产，并从而加强农民的经济地位。(5) 由于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所以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对于劳动和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6) 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有力量保证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因而也就能够更有效地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活动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作斗争。(7) 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逐步地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因而

也就能够在供、产、销方面更容易地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而便于逐步地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在当时情况下，初级农业合作社，在一些主要农作物的每亩产量上，比个体农民有所增加。据 12 个产稻谷的主要省份统计，每亩稻谷多产 10%；据 9 个产小麦的主要省份统计，每亩小麦多产 7%；据 8 个产大豆的主要省份统计，每亩大豆多产 19%；据 9 个产棉花的主要省份统计，每亩棉花多产 26%。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下实现的。中共中央当时认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有很大优越性，但是仍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经济之间的矛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但是土地仍然是社员的私有财产，这必然会妨碍土地的合理利用。另外，社员仍然保留对牲畜、农具的私有权，这也会影响对牲畜、农具的更合理使用。再有，土地、牲畜和农具等因为仍归私人所有，还要分取一部分报酬，这也就不能不影响另一部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由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存在着这些矛盾，所以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及其他条件成熟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需要逐步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土地逐步地取消报酬；对于社员交来统一使用的别的生产资料，按照本身的需要，得到社员的同意，用付给代价的办法或者别的互利的办法，陆续地转为全社公有，也就是全体社员集体所有。这样，合作社就由初级阶段逐步地过渡到高级阶段。

由初级农业社转变为高级农业社时，必须贯彻社员自愿互利原则；社员交出生产资料后，应保证不降低收入，而且一般能够增加收入。对于转为高级社后，收入减少或者有其他困难的社员，社里应该给予照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社员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以后，对于不能担负主要劳动的社员，合作社应该适当地安排适合他们的劳动，如果他们在生活上有困难，合作社应该给以适当的照顾；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应该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社员私有的耕畜、大型农具和社员经营家庭副业所不需要而为合作社所需要的副业工具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要按照当地的正常的价格议定价款的数目，分期付给本主。付清的时间一般是三年，至多不超过五年。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社）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组织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

中共中央积极组织领导农业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到 1955 年下半年出现了高潮。据统计，1955 年 6 月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63.4 万个，1955 年 10 月底，发展到 128 万个，入社农户 3813 万户；11 月底为 158 万个，入社农户 4940 万户；12 月底达到 190 万个，入社农户 7545 万户。每社平均户数，10 月底为 29.9 户，11. 月底为 31.2 户，12 月底为 39.6 户。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重，10

月底为32%，11月底为41.4%，12月底则达63.3%。

在这一时期，全国也试办了相当数量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底，全国共有高级社17000多个，参加的农户为47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每社平均户数达到275户。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初级社大批转向高级社的发展是从1956年开始的。在这一年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总社数是逐月减少，但高级社的社数却逐月增加；入社农户继续增加，特别是参加高级社的农户比重大大提高。见表1。

表1

	1956年1月底	1956年6月底	1956年12月底
全国合作社数（万个）	153	99	76
其中：高级社社数	13.6	31.2	54
入社农户户数（万户）	9555	11171	11783
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比重（%）	80.3	91.9	96.3
其中：参加高级社农户所占比重（%）	30.7	63.2	87.8

资料来源：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运动史料》下册，990页、991页，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62。

由表1可见，到1956年12月底，入社农户户数已达1178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户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农业合作化已经基本上实现了。

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又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继续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达到的目标。《纲要》要求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平均每亩年产量，要达到400斤、500斤和800斤，棉花平均每亩年产量，要达到60斤、80斤和100斤（皮棉）；《纲要》还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要赶上和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纲要》还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项工作，在12年内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如何解决富农问题呢？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富农是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则采取由限制富农剥削到逐渐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党通过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来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当农业合作化到来时，消灭富农阶级的条件成熟了。国家对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办法，是吸收富农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富农的具体情况，允许他们在完全放弃剥削的条件下参加到合作社中来，有的可以立即取得社员资格，有的则须经过一段时期的集体劳动，由社员大会批准入社。对过去的地主分子也是采取类似的办法，让他们参加到合作社中来。富农分子和地主分子，通过在合作社和社员们一起进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富农参加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就消灭了。

第二节　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生产满足城乡居民需要（尤其是农具和农民日用品）以及供应出口贸易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手工业生产总值为73.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8%。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7364000人。

中国共产党认为，个体手工业和农民个体经济一样，是一种十分落后的生产形式，它们分散经营，规模狭小，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同时手工业个体经济是一种小商品经济，任其自发发展会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党对个体手工业历来的政策，就是提倡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积极扶持手工业生产，引导手工业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49年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为88000人，到1952年增加为228000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手工业合作社还只是在试办阶段。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逐步地把手工业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国营工业的得力助手。""手工业生产的合作化，应该根据手工业者的自愿和可能的接受程度，经过各种低级的形式，逐步地过渡到较高级的形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还规定，手工业生产增长和手工业合作化发展的具体任务："五年内，手工业总产值将有很大的增长，由1952年的73.1亿元上升为1957年的117.7亿元，即增长61.0%，平均每年递增9.9%。在手工业总产值中，合作化手工业的产值1952年为2.5亿元，1957年将上升为45.5亿元，即增长17倍……在手工业总产值中，个体手工业的产值1952年为70.6亿元……1957年个体手工业的产值将增长为72.2亿元，增长2.3%。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1952年为21.8万人，1957年计划达到210万人，即约增加8.6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就是按照计划中所规定的，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逐步过渡的。具体的发展道路，是从供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到生产合作，即从手工业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手工业供销小组是通过向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购买原料、推销成品或者接受加工订货组织起来的，是手工业合作化的低级形式。手工业者加入供销小组后，仍然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独立生产，自负盈亏。成立手工业供销小组，并没有改变个体手工业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不过，它已经同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联系，本身也有了若干公共财产的积累，带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

手工业供销小组进一步发展就是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在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中，最初，生产工具仍归社员私有，分散生产，只是统一领取原料交付成品；后来随着生产的

发展，在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部分开始集中生产；也有的按照生产技术，进行简单的分工协作。这样，手工业供销合作社逐渐向生产方面转化。在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中，还从所得的利润中抽取一部分，用来购买一些生产资料。所以，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比手工业供销小组又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

不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终究还只是在流通领域中活动，个体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仍然阻碍着生产技术的运用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必然要进一步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社员的生产资料已经折价归合作社所有，进行集体生产，公共积累也更多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实行统一经营，统一计算盈亏。合作社的收入，除向国家缴纳税金外，合作社内还要提取一部分作为公积金和公益金，其余在社员中间以工资或劳动分红的形式实行按劳分配。在初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社员私有的生产资料还没有转为合作社所有，而是用租借或入股分红的办法由合作社统一使用。这时，合作社还需要从收入中支出一部分，以租金或红利的形式付给占有生产资料的社员。不过，由于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工具一般都比较简单，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比较容易，所以，低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存在的时间不长，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手工业合作化也提前完成了。1952 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从业人员为 22.8 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 3.1%；个体手工业者从业人员为 713.6 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 96.9%。到 1956 年，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增长到 603.9 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 71.7%；而同年，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只有 54.4 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 8.3%。再从生产总值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手工业生产总值到 1957 年要达到 117.7 亿元。在实际执行中，1956 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117 亿元），1957 年达到 133.7 亿元。（u 以上情况表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手工业合作化的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

第三节　国家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国城市和乡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小商小贩。这些小商小贩一般都是一些小本营生，规模小，资金少。他们或摆摊售货，或肩挑叫卖，一般都不雇用店员，由自己和自己的家属一起劳动；或者只雇用极少数辅助人员。所以小商小贩，按其经济性质应该属于个体劳动者。

小商小贩的数量，据 1955 年 8 月调查，全国不雇用职工和只雇用 1 人的零售小商店和摊贩共 278 万户，从业人员 336 万人，资本额 48384 万元，占私营零售商总户数的 98.24%，占从业人员的 91.82%，资本额的 61.81%。从营业额看，小商小贩占私营零售商 1954 年全年营业额的 77.14%。

中国共产党认为，小商小贩散布于广大城镇和乡村，他们对于城乡商品流转和满足城乡居民商品需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他们是一些私有者，他们在商品流通中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商品市场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而具有较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党和国家对小商小贩是采取改造的政策。具体做法是：对小商小贩中的一部分人，根据国家的需要，直接吸收他们为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的工作人员；对一般小商小贩则根据自愿原则，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下，通过各种合作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补充和助手。

一、国家对城市摊贩改造的组织形式

（一）经销、代销。这种形式多用于国营商业掌握货源的一些行业，如棉布、食油、烟、酒、盐、茶等。这种经销、代销户，直接与国营商业建立业务联系，价格上服从国家统一牌价，业务上受国营公司直接领导。

（二）联购分销。这种形式的特点是，联合进货，分散经营，各负盈亏。小商小贩联购分销可降低进货成本，节省劳力；国家也可通过这种形式加速商品分配，并把摊贩销售额初步纳入国家计划。

（三）联购联销。这种形式的特点是，联合进货，统一经营，共负盈亏，按劳付酬，资金分红，有的并有公共积累。这种形式比联购分销更进一步，可以改善经营管理，培养集体主义思想。

（四）联营组、合营组或合作社、合作商店等。各个城市名称不同。这种形式的特点是，资金入股，工资按劳取酬，有劳动返还金，有资金分红（若为平均入股，资金则不分红），有公共积累。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对这种组织进行领导和指导。这种组织自己内部也建立了各种制度，如分工制度、盘存制度、财务制度、考勤制度、会议制度等。

国家对农村中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主要是通过农村供销合作社进行。1954 年供销合作社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供销合作社“在国营商业领导机关的领导下，扩大有组织的商品流转，领导农村市场，逐步实现对农村私商的改造，并代替资本主义商业在农村的阵地，逐步切断农民与城市资本主义的联系”。1955 年 1 月，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了农村私商改造工作会议，对如何安排农村市场和改造私商作了决定。

二、对农村中私商改造的组织形式

（一）合作商店。这是同行业或业务相近的小商小贩，根据需要，在自愿原则下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农村合作商店是在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下，实行资金入股，统一经

营、统一核算，按期在盈余中提取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公共积累。合作商店的盈余，主要是按公积金、公益金、奖励金、股金分红、劳动分红（实行固定工资者无劳动分红）几个项目来分配，参加合作商店的店员，一般收入要稍高于未组织起来的同行业人员。

（二）合作小组。这是一个地区、同一行业或业务相近的小商小贩（营业额较小者）自愿组织起来的组织。合作小组也是受供销合作社领导，从供销合作社进货，但经营是分散的。合作小组的经营方式，有联购分销、代购代销、自购自销等。

（三）代购代销。这种形式是小商小贩与供销合作社订立合同，向其交纳一定的保证金，按供销合作社规定的价格，代购或代销供销合作社指定的商品，赚取手续费。代购代销主要是经营日用必需的零星商品，如油、盐、火柴、煤油、针线等。

（四）合营。是供销合作社与私商实行合营。在合营的形式下，一般是供销合作社派干部，出少量资金或不出资金参加到私商企业里去领导经营，也有的是将私商企业合并到供销合作社里来。采用这种形式的私营商业，一般都是比较大的，或是技术性、加工性、服务性的商店。这种合营企业在盈余分配时，要提取一定的公积金。

（五）经销。即小商小贩按计划以现款向供销合作社进货，再按规定的价格销售，赚取差价。这种形式比较简单，小商小贩参加这种形式后，其业务就初步被纳入供销合作社的计划之中。

以上是国家对城市和农村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形式。

三、国家对小商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

国家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步骤进行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对小商小贩进行了安置。1953 年国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由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贯彻，以及国家对粮食、棉布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发展很快，小商小贩停业歇业的很多。这时，国家对小商小贩进一步作了安排，国家一方面开展批发业务，满足小商小贩货源供应；同时采用经销、代销形式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 年下半年，大批的小商小贩被纳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以及经销、代销中来。1955 年 8 月，在 390 多万私营商业人员中（其中 90% 是小商小贩），纳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以及经销、代销中的占 27.2%。

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是从 1956 年开始的。1956 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推动了城乡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高潮。1956 年年初，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中，很多小商小贩也纷纷提出要求参加公私合营。1956 年 2，月 8 日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中作了这样的规定，“对于为数极大、分布极广的小商店，如果它们要求公私合营，政府可以批准它们的要求。但是，这些小商店的经营方式，仍然应该继续保持目前的代销、代购、经销的自营的方法……各地在改造坐商期间，对摊贩和肩挑小贩如果还来不及进行组织和改造，都应该暂缓进行这项工作。”根

据这个决定的精神，各地一般都是先批准小商小贩参加公私合营，但仍然保持经销、代销等经营方式。

另外，国家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1956年三四月间，还初步总结了改造小商小贩的经验。认为，对小商小贩的改造，一方面要注意在政治上、经济上改造他们；但另一方面还应注意保持小商小贩便利群众购销的特点，应该采取多种改造的形式。如对有些商贩实行定息合营，把他们并入公私合营商店，实行定股定息，独立核算。对另外一些宜于集中的商贩，可把他们组织到合作商店中来；对一些分布较广、与居民有密切关系、经营日用零星商品的小商店，则采取代购、代销和经销的形式。

从改造小商小贩的工作过程中看，当时改造的形式比较普遍的是代购、代销、经销。这些形式发展较多，是因为它适合于小商小贩原来分散经营和便利群众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存在了，代购、代销和经销，都和社会主义经济发生联系，基本纳入国家的计划。国家根据需要，也逐步将代购、代销和经销形式中的部分改组为合作商店。

参加代购、代销和经销形式的小商贩，一般都组成合作小组，这种合作小组只是统一组织货源（向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进货），销售仍归各户自己进行（销售价格按国家规定价格，只收取批零差价），盈亏也由各户自己负责。这样组织起来的好处是，可以使小商贩和社会主义商业发生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可发挥其分散经营满足群众需要的特长。

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区别是，合作商店不但统一进货，而且销货也统一，还统一计算盈亏。合作商店组成后，能克服资金分散所造成的进货方面的困难，能够合理调整商业网和组织商业劳动，扩大经营能力。不过也有缺点，就是太集中了，销售点减少，群众往往感到不便，同时组成合作商店，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就要直接具体领导，所以合作商店没有合作小组发展得多。

国家对小商小贩的改造工作，到1956年底，已经取得很大成果。1956年底，在全国332万私营商业人员中（绝大部分为小商小贩），已经改造的有282.4万人，占85.1%，其中吸收进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有22.4万人，占6.7%；实行定息合营的有70.6万人，占21.3%，参加合作商店的有72.2万人，占21.7%；参加合作小组的有100.1万人，占30.2%；批准公私合营未实行定息的有17.1万人，占5.2%，未改造的有49.4万人，占14.9%。未参加改造的，多为不经常经营，经营地点太分散，或在山区、边远地区不宜组织起来，或经营较好不愿参加的。从以上数字看，到1956年，国家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

前文论及，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开始，并于1952年冬，掀起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热潮。

据农业部农政司调查，由于互助合作组织的大量发展，对当年防旱抗旱、春耕播种等工作和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一）组织起来的农民，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爱国增产运动的组（社）共有100多万个，不少地区由于互助组的挑战竞赛，带动了广大农民的竞赛热潮；（二）在春耕防旱和防治病虫害方面获得了很大成效。1952年全国兴修及整修小型渠道74300条，塘坝圩堤等166万处，打砖井405000眼，共扩大灌溉面积2290万亩，超过1951年扩大水田面积2倍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绝大多数是组织起来合作兴建的。由于组织起来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春耕播种及时完成。当年春天以来全国范围内麦蚜、蝗虫、棉蚜等病虫灾害为害面积很广，由于各地群众组织起来，在“打早、打小、打了”的方针下，基本上消灭了虫害；（三）刚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组织起来解决了新翻身户缺乏耕畜农具和口粮的困难，保证了增产运动的顺利开展。

但是，这一年，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在新区和互助合作基础较差的地区，主要是：打击单干农民，强迫编组，满足于形式主义的作法。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以后，不在农民中进行保护农民所有制的政策宣传，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而是盲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并把土地改革的思想和作法搬到互助合作运动中来。例如，华东地区在组织互助组时，曾严重地出现追求百分比，强迫命令和打击单干农民的倾向。在互助组内则强调满足贫雇农利益，侵犯中农利益，损害了在新区农村占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老区和组织起来的面比较广的地区，主要是：轻视初级互助组，提倡土地、耕畜、农具公有化，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违反中央有控制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而贪多贪大。华北地区不少地方在办社中存在着“宁多勿少、宁大勿小”，“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的思想，因而违反自愿原则，胡乱地多办社、办大社。有的地方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是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盲目

追求公有化的现象也很严重。如长治地区新建的千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76%将牲口、农具等全部归社公有，有的甚至连棺木寿材、老羊皮袄也归了社。在办社过程中，违反互利的原则。中南地区反映，牲畜折价入社，但长期不付价（金额太大，社员一下子吃不消），等于变相归公，群众说是“软共产”。社员存款许多社也不给利息，或者利息比银行低。

由于互助合作运动急躁冒进，引起群众的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华北地区不少地方一冬无人拾粪，副业生产无人搞，场里、地里庄稼无人收拾，牲口无人喂（甚至有饿瘦、饿死者），有的地方发生了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现象。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1953年的春耕生产。

1953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任命邓子恢为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为副部长。毛泽东给农村工作部规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邓子恢对毛泽东规定的任务是完全拥护的，在他主持农村工作部工作以后，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但是，他也认识到，把亿万农民从个体经济引向集体经济，是有它的特殊困难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农村经济贫困，农民文化水平落后，历史上没有合作传统等，都是困难。因此，他认为，过急不行，必须稳步地循序前进，即按照《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普遍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起来面比较大的老区，适当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邓子恢还认为，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一切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中一切的工作，一切的组织，一切的制度等等，都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而农村工作部成立时，所遇到的问题恰恰是由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急躁冒进，已经严重影响到1953年的春耕生产。因此，他主张，应当及时纠正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

农村工作部的主张当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

195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听取了农村情况的汇报以后，决定对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进行整顿。当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五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30%左右。希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把原订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报告中央。

3月14日，中央批复《中南局关于召开全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会议的报告》。批复中说：“中央同意中南局送来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一切才结束或结束土地改革不久的地区，都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端正地贯彻各项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以解除群众对发展生产的疑虑、和组织临时性互助组，以克服农民

在土改后所遇到的生产困难，而不宜过早过多的举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将自己的精力吸引在这一次要方面。"

3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指出："为正确地组织领导农民，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必须提醒同志们，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不要忘记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任何急躁冒进的方针都会挫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将损害春耕生产工作，因此都是极有害的。"

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了中央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偏向的精神。

中央的指示和对中南局的批复，都是邓子恢代中央草拟的，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当年4月1日，毛泽东还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等三个文件汇编成册，作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印发全党，并在按语中说，这三个文件"提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的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号召各级党委指定一定时间组织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

经过学习和贯彻中央文件的精神，结合检查和安排春夏季生产，对互助合作组织进行了一次普遍检查和初步整顿，全国农村出现的在互助合作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倾向，到1953年6月基本上得到了纠正。7月份，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纠正冒进倾向的结果，农民生产情绪已趋安定，原部分地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混乱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的任务顺利完成。干部认识了盲目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社轻组的错误认识。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并有发展。"

当时，也有人反对纠正互助合作问题上的急躁冒进。比如，陈伯达就曾向毛泽东反映，农村工作部的反冒进变成了"冒退"。

1953年4月13—23日，邓子恢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引导几亿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的设想，讨论了改造小农经济的长期部署和当前措施。会议期间，他在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毛泽东曾对他说：允许富农经济存在，不是不加限制。互助合作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增加，也就是限制富农发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富裕中农怕"冒尖"，我才高兴。毛泽东对于"确保农民私有制"的说法，也提出了批评：保护是可以的，"确保"是不可能的。这些话，实际上是批评邓子恢的。

邓子恢在会上原原本本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但在作会议总结时，还是结合谈话，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邓子恢认为，"互助合作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自流等待，一种是急躁冒进，在全国

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他列举了五点理由来论证互助合作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一）搞互助合作与战争动员不同，不能限期完成任务，和土改不同，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二）互助合作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去建立，这包括：一切为了增加生产，根据生产需要，必须根据群众的觉悟，根据干部的领导能力；（三）我们要从现在的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现状出发。对于农民小私有者，一方面要改造他们，一方面又要适应他们，适应就是为了便于改造，过急不行；（四）要从工业化的进度出发。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打下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集体化速度须与之相配合；（五）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地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邓子恢认为，当时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状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巩固党在农村已经得到的阵地。为了使农民安定下来，邓子恢提出要解决以下五个问题：第一，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在发展互助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相对地固定负担；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第二，必须切实把互助合作办好，做出好的榜样来。第三，农村中新的建设工作要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第四，要设法增加农民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第五，发展贸易合作，加速城乡物资的流转。

他着重讲了第一个问题，在讲到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时他说：“今天的问题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对“四大自由”，邓子恢也作了解释。他说：“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但关于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则应有正确的处理。”他认为，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要提倡自由借贷。“我们要搞信用合作社，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到最后消灭高利贷。”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我们要尽可能帮助贫苦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商品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领导和节制下。总之，“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有利于按总方向前进。”

邓子恢的总结报告，和毛泽东同他的谈话，显然并不完全一致。但不是农村发展方向上的分歧，而是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农村互助合作发展步骤上的分歧，而毛泽东当时却把它看作是农村发展方向，即走什么道路的分歧了。

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毛泽东赞成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接着他说，农民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组进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10月15日，他在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时说：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

毛泽东的谈话，否定了由邓子恢提出并于10月4日得到中央同意的"当前农业生产互助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的主张，把重点转向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廖鲁言主持下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在会上，廖鲁言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大家认为毛泽东"对这一次会议的指示是切合时宜的，完全拥护"。认为"今春农村工作会议纠正了各地互助合作运动中当时存在着的程度不同的急躁冒进倾向，是有成绩的。但同时各地在纠正急躁冒进倾向之后，都轻重不同地产生了小心拘谨与稳步而不前进的现象"。毛泽东的指示"恰切而及时地纠正了这种现象，把今后运动引向积极发展。"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11月4日，毛泽东再一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这次谈话，直接对1953年春开始的纠正急躁冒进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

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

廖鲁言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这个谈话为会议作了总结。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改变了主要着眼点是发展互助组的方针，明确强调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会后，12月16日中央通过的第二个互助合作决议，也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发展到80万个左右，那时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总农户的20%左右。

在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以后，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社论。12月28日，中央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加强了农业合作化的宣传。1953年底和1954年初，农村再一次出现了互助合作运动的热潮。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1954年农业社发展到3.58万个，而实则1954年春已达9万多个。

1954年4月2日至18日，邓子恢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应该当作农村工作的中心，也应该当作生产运动的中心。据此，修订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的原订计划。确定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把原计划1957年发展到80万个提高到130万个或150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由原定占全国总农户的20%提高到35%左右；合作化的耕地占全国总耕地的40%以上；其中，东北和晋、冀、鲁、豫4省及其他老解放区，合作化的程度都达到50%以上，并争取在平原及高产量地区、经济作物区和城市郊区取得先一步合作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大约在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6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

在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推动下，1954年夏，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新建了12万多个，连同原有的近10万个达到22万个，互助组也有很大发展。

同年10月10日至30日，邓子恢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再一次修订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根据各地计划，把4月间提出的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的数字，提高到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这个计划，中共中央也批准了。

当时，一再修改计划的依据是：原建的10万个社90%以上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已为群众所公认。但这和实际情况有相当的距离。实际情况是，1954年，由于农业合作化发展过快，工作简单粗暴，加上统购统销购了“过头粮”，农民同党和政府之间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

在迎接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不少地区再次出现了急躁冒进偏向。一些地方盲目订大计划，多建大社，多建高级社，有的提出要“百分之百合作化”。有的地方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强迫农民入社，宣传“单干就是犯法”，“不入社就是资本主

义”。部分已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作价过低，或虽折价充公实际无法兑现，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由于热衷于办新社，只顾建设不顾巩固，有些老社则出现了涣散和垮台现象。1954年夏季，长江、淮河地区和河北遭受几十年罕见的水灾。粮食没有完成生产计划，但收购粮食的计划不仅没有削减，还多购了70亿斤（一说100亿斤），并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有些地方违法乱纪，逼死了人。这一切都引起了农民（包括农村干部）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满，他们生产情绪低落，生产力开始遭到破坏，突出的是牲畜的大量出卖和宰杀。

据商业部1954年12月发出的《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反映，第四季度以后，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市场均有发现。如热河省出现过大批宰杀耕牛，山西北部牲口向绥远倒流，四川农民养小猪数字大减。

中共中央华南局的报告也说，在购粮运动后期（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杀猪杀鸭，猪价陡降。中山县之张家边乡一个乡即杀死母猪70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60万元到100万元1担的正常价格陡降至14万元（旧人民币）。

农民生产情绪低落，生产积极性不高。春耕生产资料准备很差，耕畜普遍减少，农具添修不多，生产中的主要肥料——厩肥，由于猪牛羊的减少，比往年减少，水利、治虫计划也都没有完成。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勤率大大降低。

1955年1月4日，邓子恢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工作简报的形式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并提出两项建议。简报认为，现在全国办起来的38万个新社（老社尚有10万个），没有人帮助这些社克服初建时的种种困难。此时正赶上全国搞统购统销，部分农民抵触情绪很重，此种情绪和他们怕“归公”的思想顾虑结合在一起，就出现比较普遍的不愿搞生产的现象。为了使合作化健康发展，简报向中央提出两项建议：一项是制订一个全国性的章程，目的是明确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使干部不致乱立法，群众不致乱猜疑；一项是发个《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主旨是当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离60万个计划不远了，除新区一些地方须发展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外，整个运动须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工作阶段。随着简报附上了他主持代中央起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和《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草稿。中央政治局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草稿，略加修改，于1月10日作为中央文件发出。《通知》宣布，当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经过修改，也于1月10日由国务院发布全国，希望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加以试用，并在试用中提出修改意见。

同年2月，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会议集中研究了农村情况和粮食购销问题，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由毛泽东签发。《紧急指示》指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说来，它实质上是农民群

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紧急指示》提出，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粮食年度内的粮食征购任务减为900亿斤（后又减低两次），并实行粮食"三定"制度，同时再把农业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紧急指示》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和所采取的措施，和邓子恢的简报内容是一致的。

在签发《紧急指示》以后，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告诉他，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30%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此次谈话后不久（三月份），毛泽东听取邓子恢等汇报农村工作。当汇报到农村情况时，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农村工作部协助各省采取措施，进行整社工作，重点是浙江省。中共中央上海局2月9日报告说：到1月中旬，浙江省合作社已从1954年秋的2016个社发展到41883个社，扩大了20多倍。由于摊子很大，问题很多，必须踏步一个时期，以便集中力量做好巩固和整顿工作。但在此以后，浙江省的合作化并未踏步巩固，反而更迅速地发展到5.3万多个社，并且还有近万数的自发社，入社农户接近全省农户的30%，少数地区的合作社竟比1954年增加50倍。这种大发展，大多数是由于某些干部盲目追求合作社数字，搞强迫命令造成的，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在鼓动入社时有的干部公开宣布，入了社粮食可以少派征购任务，不入社则要多派。许多地区为了办社，要求土地联片，对于不入社农民的土地，要强制兑换，这就更侵犯了个体农民的利益。宣传上甚至用"入不入社是走毛泽东道路，还是走蒋介石道路"来恐吓农民，迫使许多农民勉强入社。有的农民说："合作社就是死路一条，我也要入了。"这种情况和粮食紧张交织在一起，就使农村更为动荡。当时除农村工作部直接派人去了解情况外，中央财委、中央纪委和中央政法小组也都向中央反映了大量"紧张情况"的材料，并且要求中央能帮助浙江省采取措施，迅速缓和这种紧张局面。

为了解决浙江省的问题，3月24日，经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邓子恢和在京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共同研究，根据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已经议定的意见，拟定了《对浙江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电文的主要精神是：停止发展，进行适当收缩，全力巩固，消除由于发展过猛、违犯自愿互利原则所造成的后果。

中共浙江省委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意见。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于5月上旬取得了初步结果，全省共收缩1.5万个社，巩固下来的4万个。5月8日，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向中央农村工作部电话汇报说，在各专区许多乡区内，宣传了互利、自愿合作政策，进行整社，效果是好的。好的社，社员满意，信心提高了，并未动摇，更有条件帮他们办好了。问题大的社，很快解决了问题。农民由社转组或转为单干经营，解除了顾

虑，增加了肥料和插秧株数。进退两难的社员有的，为数不大。全面宣传政策的主要效果有：（1）唤醒了干部，过去干部不知政策过“左”侵犯中农的害处，听到群众意见后，知道了。（2）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有些贫农原以为合作社是要合伙平产。有些中农以为是二次土改（发现了去年老社，分红有按人口分的，今年先吃中农投资，后吃贷款的风气也逐渐发展）。消除这种误解对社会生产和合作化会有极大好处。（3）端正了合作政策，有利于粮食战线。中农怕露富，有钱都用于买粮食。解决合作政策思想后，有所好转。

4月21日至5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前，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会议确定，当前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当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了农村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他分析了形成农村形势紧张的因素：（1）最为突出的是粮食统购统销中发生的问题；（2）城乡对私商改造太快太猛；以致城乡间“大通小塞”，影响近几个月财政、税收，城市一些人失业，部分农民特别是贫农减少收入；（3）最根本的因素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主要是生产合作）出了毛病。在毛泽东询问访问匈牙利的情况时，他还谈了苏联、匈牙利两国农业合作化过急的教训。对邓子恢关于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未置可否。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又约邓子恢谈话，提出“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对于毛泽东的警告，邓子恢在做大会总结报告时没有反映。

1955年5月6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首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他说：“正是因为我们发展了几十万个社，就是去年我们在农村当中建立了几十万个社会主义据点，初步地建立了农村合作化的阵地，是我们今后合作化很重要的依靠。把社办好了，我们就在农民当中扩大了党的教育，扩大了党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农村的紧张形势的本质和造成紧张的原因。他说：“本质是工农关系的紧张，中贫农关系的紧张。”造成紧张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小生产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抵触情绪的表现，也是农民小生产者两重性不可避免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我们在政策上、工作上有毛病。“计划上有些地区大了一点，因此就免不了出偏差。政策上，对互利、自愿政策贯彻不够，甚至违反互利政策和自愿政策。工作上的行政命令作风，缺乏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相当普遍的。”“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是少数省份，少数县份，也有一些地方还有自流，但是我感觉干部中的冒进情绪是带普遍性的。”产生冒进情绪，“第一个原因，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小生产的本质认识不足。实际上农民对社会主义不是那样容易接受的。”“第二个原因，对合作化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对把合作社办好，对增产的艰巨性认识不足。”“要把合作社办好，真正增产，内部团结好，样样上轨道，样样制度化，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最后，提出了今后的方针政策：（1）要求一般停止发展；（2）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3）少数的省县要适当的收缩；（4）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个体农民。会后，邓子恢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报

告，同意在当年春65万个社的基础上，到19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

这时，毛泽东对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已经越来越不满意了。5月5日，他向邓子恢发出警告。5月9日，又约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谈话，周恩来在座。他说：下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原定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接着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党内也有一批干部反映农民这种情绪，不赞成搞社会主义，并提到上海局柯庆施说，党内有30%的高、中级和基层干部反映中农的情绪，不赞成搞社会主义。5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省市委书记开会。会上有的省委书记反映，中央农村工作部建议收缩合作社，引起了农村干部和群众很大不满。毛泽东在讲话时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虽然重申"停、缩、发"三字方针，但重点是强调"发"。会上，有些省委书记重新自报了1956年春耕前大幅度发展合作社的计划，毛泽东高度重视，并要求与会的各省发展合作社的数目都比上年翻一番。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约邓子恢谈话，提出在1956年春耕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个，即比原有的65万个社增加一倍。但邓子恢坚持100万个的原订计划。理由是，上年由11万个社一下子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下年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那就超出了现有的办社条件许可的程度。为此和毛泽东发生了争论。7月11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谭震林、杜润生，重申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并严厉地批评了邓子恢等人。但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方针的变化，发生在5月，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五月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突然。杜润生在回忆这一变化时说："1955年的事情，从毛泽东同志本人说变化并不突然，他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完成了两个革命转变的思路。""这是战略性的，不会轻易改变。上边三字方针（即"停"、"缩"、"发"）只是战术性措施，因此和我们之间的一致也是暂时的一致。后来他亲自下去看，第一件事就是看到铁路两旁的麦子长得很好，他就认为说农民种田不积极是不准确的，麦子长得半人深，这么好的麦子，还能说老百姓种地不积极？第二件事，上海的柯庆施向他上报了些重要情况，最核心的是领导干部有三分之一对合作化是消极的，而这些同中央农村工作部控制过紧有关系，农村部散布消极思想，从而影响了下面。这正符合毛泽东的看法。于是他把南方各省市的第一书记召去，开了一个会，调子就变了。"

7月份，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不断升温，已把他们之间的争论，上纲为两条路线的分歧。7月29日，他在对农村工作部的《农业合作化最近简情》上批示，要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观点，并说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

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前他调阅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报告针锋相对地批评了邓子恢。

（一）报告一开头就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二）“问题是能不能巩固。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究竟能不能巩固呢?”

“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 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 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三）“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 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 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四）“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

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五）“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六）“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后，邓子恢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对当前情况的分析是欠全面的，采取小发展而不是大发展的方针是比较消极的。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除了对情况分析欠全面以外，主要是由于对占农村60%以上的老贫农和下中农的合作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党在农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对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示范作用估计不足，而对运动所产生的缺点则估计过分。邓子恢的自我批评是真诚的，毛泽东在报告中所阐述的农业合作化中阶级政策的观点，特别是对待中农政策的观点，确实说服了许多人。8月1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邓子恢的争论已经解决了。”

但是，事实上对邓子恢的批判并未结束。

八九月间，毛泽东为十几个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写了批语。其中肯定了安徽省委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性。

8月26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撰写通知，把修改后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并请他们印发给各级党委，直发到农村支部。修改后的报告，增写了四、六、七部分。在第六部分中强调：“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他说，占全国农村人口60%—70%的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第二种错误思想是，“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这仍然是批评邓子恢的。

8月下旬，邓子恢把他准备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检讨的发言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批语中批评他脑子里隐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只愿意接受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影响。并且说：“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至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

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所以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开幕。会上的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批评者中有相当多的人衷心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也有人虽然不完全同意但不得不表态的。“有些人还用特意搜集的尖端的个别事例，或把传闻和推想当作事实，加以渲染，说明各地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不断高涨，对上半年‘停’、‘缩’如何不满以至痛恨，只有富农、富裕中农才听说‘坚决收缩’后如何‘兴高采烈’，等等。”248篇发言中，包括邓子恢的检讨。他对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对自己“思想上的右倾”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浙江有些地方强迫解散合作社的全部责任。

10月11日，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题，为会议作了结论。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他在结论中，首先讲了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其次，为在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作了总结。他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些观点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社容易巩固难”；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毛泽东认为：“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最后，毛泽东认定，邓子恢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说坚决收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绝大部分增产的情况，以及许多农民群众要求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

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以前（9月份），毛泽东已着手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这本书收集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办社实例共121篇，绝大部分材料是1955年1月至8月的，一少部分是1954年下半年的，毛泽东为该书写了序言。在会上印发给与会的中央委员和省、市、自治区委及地委的负责同志征询意见。会后，12月重编，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重编时，经过增删、扩大到176篇，并重新写了一篇序言，在104篇材料上加了按语。

在第二篇序言中，毛泽东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

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在许多按语里，依然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有些话说得更加厉害了。比如，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的按语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中的按语中写道："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按语鼓励办大社，办高级社。在《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右倾机会主义批判的升级，使党内急躁冒进的情绪空前增长。六中全会的决议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规划了合作化运动的速度：

"第一，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先进的地方，合作化程度在 1955 年夏季已经达到当地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大体上可以在 1957 年春季以前先后发展到当地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八十，即在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类地方主要是华北、东北各省，还有其他一些省份的一部或大部。

第二，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合作化程度在 1955 年夏季已经达到当地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或者百分之二十左右，大体上可以在 1958 年春季以前先后在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第三，在互助运动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还很少的地方，实现合作化需要更多的时间。这类地方主要是某些边疆地方。"

"各省、市和各自治区的党委在制订合作化规划的时候，应该注意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即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决议》否定了原来要求 1958 年春达到入社农户占 50% 的规划，改变为在比较先进的地方 1957 年春季以前、全国大多数地方 1958 年春季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并提出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社。这样的指标已经够高了，但是，各省、市和自治区的规划很快突破了这个指标。实际运动的发展，又把省、市和自治区的规划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下表是 1955 年 10 月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数（千个）	参加社的户数（千户）	占总农户的比重（%）	每社平均户数（户）
6月底	634	16921	14.2	26.7
10月底	1277	38133	32.0	29.9
11月底	1583	49396	41.4	31.2
12月底	1905	75452	63.3	39.6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史敬棠等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90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5年10月以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到12月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数从6月底的63万多个增加到190万个，人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从14.2%增加到63.3%。其中高级社已发展到1.7万个，人社户占总农户的4%。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使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摆上议事日程。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则要求在1956年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以作榜样，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1956年春，各地农村争先恐后，大力兴办高级社。许多刚刚建立不久的初级社，立足未稳，有的还没有经历一个生产季节，就合并、升级转为高级社了。下表是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农业生产合作社数（千个）	参加社的户数（千户）	占总农户的比重（%）	每社平均户数（户）
1月底	136	36519	30.7	268.5
2月底	235	61028	51.0	259.9
3月底	263	65818	54.9	250.1
4月底	288	69840	58.2	242.2
5月底	303	74720	61.9	246.8
6月底	312	76874	63.2	246.4
7月底	313	76539	63.4	244.4
8月底	334	80145	66.1	239.9
9月底	380	88269	72.7	232.0
10月底	412	94851	78.0	230.1
11月底	488	100863	83.0	206.5
12月底	540	107422	87.8	199.0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史敬棠等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90—991页。

统计资料表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 1956 年 1 月到 12 月，社数和参加社的户数是逐月上升的。1 月底共有 13.6 万个社，参加社的有 3651.9 万户，占总农户的 30.7%；到 12 月底，已发展到 54 万个社，参加社的达 10742.2 万户，占总农产的 87.8%。原计划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用 15 年左右时间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 4 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1957 年，高级社的发展进入扫尾阶段，少数没有实现高级合作化的地区继续发展高级社。到这一年的年末，全国高级社总数达到 75.3 万个，入社农户共计 11945 万户，占农产总数 96%以上。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实现，把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同时，在农村消灭了富农经济。

在旧中国，富农经济不发达。经过土地改革，富农在农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大大削弱了。1954 年末，富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 2.5%。根据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四个省的材料，土地改革以后原有富农继续维持剥削的约占富农总户数的 30%—60%。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新富农，但数量不大。据 1953 年对东北三省几个典型村的调查，在 2054 户农户中，出现了 16 户新富农，占农户总数的 0.78%，其中最高的达 4.6%，最低的只有 0.41%。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实行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制定以后，党对于富农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在社会上允许富农雇工经营，督促与监督富农遵守人民政府的劳动、税收和物价等政策"，并限制其雇工剥削、商业投机和高利贷活动。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便由限制富农剥削转到消灭富农经济。

我国消灭富农经济的具体做法，和苏联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强制剥夺富农财产不同，是接受富农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劳动中改造他们。《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对于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要求入社的问题，在 1956 年内应当开始着手解决。解决的办法是：（1）表现较好，勤劳生产的，可以允许他们入社，做为社员，并且允许他们改变成分，称为农民。(2) 表现一般，不好不坏的，允许他们入社，做为候补社员，暂不改变成分。(3) 表现坏的，由乡人民委员会交合作社管制生产；有破坏行为的，还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4) 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无论是否已经取得社员的称号，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都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5) 合作社对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在社内的劳动，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6) 地主富农的子女，如果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他还是年龄不满十八岁的少年儿童和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或者在土地改革以前，他就参加劳动，并且在家庭中居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人不应当当做地主富农分子看待，而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做为社员，称为农民，并且根据他们的条件，分配适当的工作。"关于富农分子入社情况的材料较少。根据各地评查入社情况的统计，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在老解放区，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 50%左右，候补社员占 4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 10%左右；在晚解放区，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 20%左右，候补社员占 6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 20%左右。

我国农村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四年时间，而且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以后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当时，贫农和下中农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一片欢腾；各级干部由于有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压力，怕当“小脚女人”，你追我赶，互相攀比，结果，步子越走越快，连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很难控制了。有一位外国学者曾这样描绘这一过程：“到1956年底几乎全部建立完全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举，更多地是由于党组织对运动的热情贯彻，而不是由于毛泽东的规划。中国整个农村的干部对毛泽东的发言及肃反运动（应为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压力作出反应，最后得出了‘宁左毋右’的结论。从7月的发言直到1955年底为止，中国经历了一个循环，即毛泽东和党中央突出目标，各省超额完成这些目标，中央往上调整它的目标，各省再次超额完成。甚至在那年年底，毛泽东预计将再花三至四年才能基本上完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级阶段，但是在1956年，各地再次大大地超过他的目标。不管怎样，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曾在1955年谨慎地提出的分阶段发展的政策被放弃。全部农产的1/4以上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而没有先组成互助组，一个越过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广泛趋势总的说已经出现了。虽然毛泽东继续在1955至1956年秋冬对‘左’的过头行为提出了警告，但他主要是为这种迅速进展而欢欣鼓舞。”这个描述还是比较客观的。

按着原来的设想，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得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新途径。但在高潮中，这些步骤完全被打乱了。互助组被忽视，初级社急于升级，1955年下半年建立的初级社，绝大部分在3个月至9个月时间内就都升级转入高级社。到1956年12月底，基本上只剩下高级社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

这种模式，有两个不可克服的弊病：一是集中统一管理，基本否定分散的家庭经营（家庭经营部分只有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集体劳动，许多人出工不出力。二是分配上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两者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高级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这些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引起广大社员的不满。

于是，在一些地方发生了社员退社或要求退社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退社风潮。1956年12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反映：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社内，出现了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力少、人口多的户，还有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减少收入而引起的，也有的是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内劳动过分紧张，引起社员不满；社干部作风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另外，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伤害了社员对社的感情。对此，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上写了如下的批语：“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

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

1957年上半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退社现象。当年7月，毛泽东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赴浙江省去做调查，重点调查了仙居县。这个县的农业社大多数解体了。据该县县委介绍，散社的主要原因是：“（一）浙江发展农业社前后折腾得比别省厉害，先说是发展快了，冒进了，‘左’了，坚决把农民不自愿和没有办社条件的社收缩后，农村情况很快稳定下来。刚刚稳定了，很快又说收缩错了，右了，成了小脚女人走路，这样过去的‘左’又对了。由于干部都怕说右，结果成了旧‘左’和新‘左’，就新冒进的更厉害了。就是在这样‘左’、右折腾的情况下实现合作化的。（二）全面实现合作化既来得这样快，党的许多重要政策根本来不及贯彻执行，如耕畜农具绝大多数没有作价就归进大堆，这是社员们特别是富裕中农，最有意见的，说这是‘共了产’。同时，社组织规模又很大，浙江人口居住集中，小的社有一两百户，中等的社几百户是多数的，上千户的社也有一部分。摊子这样大，人口这样多，造成劳动派工很混乱，出现大量窝工浪费，农活做的质量就更谈不上了；加上管理不好，牲畜喂的瘦了，农具丢失损坏了，都没人管，也管不了。所有这些缺点，都使社员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找社干部，干部说没办法解决；向上级反映，乡县领导说，全县都合作了，哪能管得过来；这样求告无门，摆着问题又解决不了，就使社员对农业社很失望。（三）到秋后分配，多数社没有建立起比较合理的记工制度，有的是不分劳动好坏强弱，按日记工，有的甚至连日工也未记录，分配是按劳动人头平均分配的。这就使很大部分社员比他们入社前减了收入，特别是富裕中农比入社前减得更突出。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有些社员就恐慌起来说：‘一年减收，还勉强过得去，明年再这样，就要饿肚子了！’所有上面这些情况，使农民感到农业社是靠不住了，怎么办？对农民来说，别的出路是想不出来的，就只有回到他最熟悉的家庭单干老路。于是在一些富裕中农带头下，就发生了闹退社散社，一个村开了头，别的村也跟着来，退社成了一股风。”据农村工作部了解，当时广东、广西、江西、江苏、四川、湖南、河南、山东、辽宁等省都发生了轻重不同的类似情况。陈正人把仙居县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没有认真研究和解决农业合作化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是把这些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于同年8月，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一场两条道路的大辩论，重点是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此以后，实际上取消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上关于社员有入社退社自由的规定。

第二节　全行业公私合营

前文已经讲到，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主要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同时，公私合营在工业中开始发展，

在私营金融业，已经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想。1953年春，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5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建国后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呈现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之上，仅次于国营经济，居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其中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在价值分配上，其大部分已为国家和工人阶级所掌握，企业新生产的价值，首先分为工人的工资、企业的利润和国营企业利润三个部分，三分天下工人阶级有其二；而后企业利润又分为国家的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四马分肥，工人阶级得其大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已经不是单纯为资本家生产，同时是为国家生产。"报告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对于这个调查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肯定了这个报告。在6月15日第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随后决定，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就把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改变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了。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他在谈话要点中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在此以前，对私营商业拟采取排除的办法）"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同月，国务院制订并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由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实行合营的工业企业，是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条例》还规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清产核资应当包括企业原来的全部实有财产，以防止资产分散，对企业原有财产的估价，应当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管

理，对于企业原有实职人员，一般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才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合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财务、劳动、基本建设、安全卫生等方面，应遵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机关的规定执行，工资制度、福利设施等应参酌企业原来情况、生产情况和国营企业的有关规定，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合营企业每年的利润，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1954年1月，中财委召开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前，李维汉草拟了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提出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完成公私合营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基本上赞成这个计划。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中财委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确定了“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针，并安排了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计划。计划先将500个规模较大的私营厂矿（产值17亿元）转为公私合营。同时，对公私合营的许多具体政策，如清产定股、私方代表的地位和职权都作了规定。1954年3月，党中央批发了这个文件，认为文件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和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的方针是正确的和适当的。

1953年和1954年，公私合营企业发展很快。到1954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户数已增至1746户，虽然只占当年全国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总户数的1%强，但职工人数为53.3万人，占全部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职工总数的23%；产值50.86亿元，占全部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产值的33%。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5%上升到1954年的12.3%，而私营工业则由38.6%降为24.9%。私营工业总产值下降了21.1%，而在1953年以前是逐年上升的。

在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进程中，有一批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实行了合营。1954年有905户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转变为793户公私合营企业。从上海、天津两市来看，私营工厂500人以上的企业共92户，其中有45户实行了合营；100人以上的712户，其中有121户实行了合营。上海的安达纱厂、大隆机器厂、正泰橡胶厂、大中华橡胶厂、三友实业社等，天津的北洋纱厂、恒源纺织厂、华北化工厂等，都是该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

这个阶段，属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一批大企业合营以后，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小企业便发生了困难。1954年下半年起已突出的表现出来。部分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12月，国务院八办和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一开始，就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当时认为，如果不首先安排好私营企业的生产，不但工人不满，资本家惶惶不安，连扩展公私合营也无法进行。于是会议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生产的安排问题。

12月31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

首先，分析了私营工业的困难及其原因。他指出：“现在私营工业生产中最突出的

问题，就是有若干种行业（不是全部行业）设备有余，工人有余，任务不足，原料不足。这些行业是：机械制造，医药和医疗器材，针织，成衣，食品（面粉、榨油、罐头），制革，文具和印刷，木材加工（特别是东北）。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着国营与私营的矛盾，上海、天津与其他地区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有些行业的困难是盲目发展造成的。"造成盲目发展的原因，一是抗美援朝大量的加工订货刺激了生产，二是由于扩大基本建设而增加加工订货，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三是国营商业部门的加工订货有很大的盲目性。"

其次，明确了调整私营工业生产的方针。"就是要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下，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盲目性，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要把上述四种工业都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重点是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解决工业生产中的矛盾：一、公私之间的矛盾，"国营能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的，就让出一部分。""这种做法，可能会使社会主义工业比重的增长速度在这一两年内慢一些，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一两年。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使私营工业逐步顺利地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二、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应该是奖励先进，照顾落后，淘汰有害（如坏药）。"三、地区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维持上海、天津，照顾各地。"

最后，根据上述方针，采取下列具体措施：第一，通过逐行逐业分配原料、分配生产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要利用原有工业设备，控制新建和扩建，控制国家基本建设的投资。第三，私营工业的生产，要提倡提高技术，淘汰落后。第四，根据需要和可能，用各种形式来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既要有临时的办法，又要有长远的办法。第五，减少盲目加工订货。第六，对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第七，要扩大私营工业的出口品种，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第八，要加强国家对私营工业的业务领导。第九，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国营，不管私营的倾向；另一种是私营工业自己不想办法，坐待国家给办法的倾向。

1955 年 4 月，中央批转了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指出，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应采取个别合营与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并批评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某些思想偏向，如只注意发展国营经济，放松对私营工业的领导；只强调排挤限制的一面，忽视改造的一面，等等。报告根据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分散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即在合营过程中，着眼于整个行业，对公私各种关系作出统筹安排，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经济改组。报告强调指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但要照顾到其他成分，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某些方面一视同仁，反对资

本主义无计划的盲目发展，逐步将各种经济纳人国家计划的轨道。

经过1955年上半年对各种经济成分实行统筹，全面安排，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摆脱了生产和经营的困难。与此同时，公私合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下表是1953年到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的扩展情况：

年份	1953	1954	1955
户数	1036	1746	3193
职工人数（万人）	27.01	53.33	78.49
总产值（亿元）	20.13	50.86	71.88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5.7	12.3	16.1
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全部产值的%	13.3	33.0	49.7
资本额（亿元）	6.93	14.0	18.75
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全部资本额的%	29.2	54.2	69.8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8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5年同1954年相比，公私合营工业户数从1746户增至3193户；职工从53.33万人增至78.49万人；总产值从50.86亿元增至71.88亿元。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已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全部产值的49.7%，资本额则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全部资本额的69.8%。

1955年，国家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加，在范围和方式上也由点扩展到面。以前，公私合营的企业一般多在沿海省市发展，到1955年，边远省区和较小城市也有了较快发展。以前，实行合营的一般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到1955年，很多中小工厂也通过改组、合并等方式，实行了公私合营。从1955年9月份起，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势头。到11月，上海轻工业中就有棉纺、毛纺、卷烟、搪瓷、面粉等8个行业整个行业实行公私合营；重工业的船舶、轧钢、机器、电器等13个行业，也已经或正在进行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天津的造纸业，北京的面粉、电机、制药等9个行业，广州的缝纫机业、油漆业，杭州的丝绸业等整个行业都先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同时，国家对商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对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批发商业开始。据1953年底对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的调查，私营批发商有3.6万户，从业人员近19.8万人，资金4.6亿元。私营批发商业户数不算多，但资本额比较大，对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建国初期的几次大的物价波动和1953年市场供求矛盾的激化，都是由批发商带头掀起的。1953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采取多种措施限制私营批发商的活动，并实行代替私营批发商的政策。8月份，纠正修正税制的错误做法，恢复了私营批发商的一道营业税。9月，恢复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采购工作的统一管理，使私商不能插手大

宗交易。特别是1953年11月国家实行粮食和食油的统购统销，1954年9月又实行了棉布的统购统销，凡属统购统销物资实际上都由国家控制商品的批发环节。接着，国家又扩大了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范围，在城市对煤、铁、钢材等重要工业原料实行计划供应。这样，原来经营这些物资的大批发商，便逐步被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代替。据不完全统计，1954年各城市共处理批发商11813户，从业人员72295人，资金14302万元。

对私营批发商，是采取“留、转、包”等不同形式进行改造。“留”，是在国营商业领导下，继续经营，并根据需要，国营商业委托它们代理批发。“转”，是把批发商的资金和人员转到其他经济部门，主要是转到生产部门。“包”，是指对无法经营的批发商从业人员，连同资方实职人员在内，如果他们没有别的谋生之路，他们自己又愿意，经过训练，服从国家调配，可以由有关国营公司和合作社依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工薪待遇，吸收录用。在改造私营批发商过程中，除了“留”下来的以外，“包”的形式是主要的，“转”的户数不多。从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底，上海市共对48个行业、4353户批发商分期分批进行改造。改造的结果是：歇业3957户，占总户数的91%；转业91户，占2%；继续维持、转零售、转经批、代批的共305户，占7%。

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出现了批购、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但属临时性的，限于少数商品，户数也不多。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尤其是私营大批发商基本被代替以后，私营零售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才大量发展起来。1953年下半年，发展最多的还是批购形式，发展范围也只限于棉布、百货、新药、化工等几个货源已为国家基本掌握的行业。当年11月起，国家对粮食、食用油、棉花、棉布等陆续实行统购统销，由于国家掌握了全部货源，便把经营这些商品的零售商全部纳入了经销和代销形式。在此以后，猪肉、煤、茶叶、煤油、盐、烟、酒等行业也陆续在全国或大部分地区内实行了全行业改造。这时批购形式依然广泛使用，但在某些地区已退居次要地位，实行全行业改造的，大都纳入了经销、代销。

1954年入秋以后，由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和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加快了步伐，使私营商业的经营发生了严重困难。1954年7月13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示分析了1953年以后市场关系的根本性质的变化，指出：“我国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国营商业对整个市场的统一管理和对私营商业的领导和监督，已经日益加强和巩固。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为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前提，使整个商业工作更进一步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是非常有利的。但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也必不可免地使商业中的公私关系日趋紧张，使私商的经营发生困难。目前大城市中有十余万从业人员的私营批发商，因为得不到货源而没有买卖可做。集镇的私商，因为主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由国家扩大收购，营业额已经日益缩小。在城市中，由于粮食和食油的计划供应，减少了私商的销货量，还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扩大了经营范围，再加上不适当地过多地扩大了零售额，私营零售比重迅速下降，私营零售商已经惶惶不安。在城乡交流方面，由于农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私商难于下乡，合作社对一般土产

一时又无法全部经营，因此某些次要农业品和农业副产品也存在着阻塞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目前私商困难的具体表现。中国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大（座商和摊贩共有七八百万人），对他们盲目地加以排挤，一律不给安排，不给生活出路，势必增加失业人口，造成社会混乱。这是必须防止和纠正的。”指示认为，解决私商困难，已经不能再采用1952年调整商业的办法，“目前正确的方针，必须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根据上述情况，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和安排，作了如下具体规定：

“第一，对私营批发商。以零售为主而兼营批发的，一般的转为零售商。专营的批发商或以批发为主而兼营零售的，其中凡能继续经营者，让其继续经营，凡为国营商业所需要者，可以为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凡能转业者，辅导其转业；经过上述办法仍无法安置者，其职工连同资方代理人可经过训练，由国营商业录用。”

“第二，对城乡私营零售商。除一部分必须和可能转业的以外，一般的应逐步地把他们改造成为合作商店或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国营商业应该采取分配货源、搭配热门货、调整批零差价、逐步统一公私售价等办法，保持私营零售商一定的营业额，使他们能够维持生活。”

“第三，对私营进出口商。基本上应按照对私营批发商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同时，国营对外贸易机关应尽量采取联营、经销、代进、代出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私营进出口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他们能在国营对外贸易机关的领导和管制之下，发挥其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四，为了畅通城乡交流，活跃初级市场，各地应根据情况采取如下的具体措施：（一）广泛建立国家领导的没有私营粮商参加的粮食交易市场。（二）举行初级市场的物资交流会。（三）组织货郎担子为合作社代购代销。（四）为解除互相封锁，取消某些乡、镇人民政府所规定的不适当的市场管理办法。（五）对一般小土产，可以组织公私联购，或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后按比例批给私商。”

“第五，为了缓和私营零售商营业额下降的趋势，在一九五四年旺季到来以前，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营业额，一般地应停止在目前的水平。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的公营零售额，则可以有进有退，但在前进时，对该地区该行业的私商仍须根据上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分工的原则，分别加以安排。”

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指示》重申《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指示》的精神，并进一步具体化了。

从这一段期间的总的情况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前进的快了一些。中央提出，对公私工业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对商业要控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营业额，给私商留出一定的营业额，不仅是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在转变生产关系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也是为了稳步地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无形中有了压力。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毛泽东在作结论时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他说，这次会议是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面很广，也涉及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实际上是要求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和农业合作化不同。党中央内部不存在快和慢的争论。改造的进度实际上也比农业合作化快。到1955年上半年，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大型企业有93%实行了加工订货，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的产值占其总产值的58%；在商业中，大中城市的商品零售额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占22%，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25%左右，农村集镇经销、代销占10%，纯粹私营的占18%，批发商业私营只有9%了。在流通领域，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商业已占绝对优势。

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据陈叔通分析，在高潮面前，资本家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工商界的进步分子，他们比较了解政策，看清国家和世界的前途，愿意全心全意地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实际行动中作出了贡献；第二种人明知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社会主义道路不得不走，但对资本主义的经营恋恋不舍，希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不干扰，同时并存，以致触及本身利益就摇摆不定；第三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心存不满而采取消极抗拒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各种消极抗拒的态度，自总任务宣布以来，抽逃资金，消极经营，即使企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也仍保持一贯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知唯利是图。其中第二种是大多数。他们对待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内心充满矛盾，怕变革，怕斗争，怕共产，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1955年10月27日、29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座谈。他针对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动荡和恐惧心理，作了两次重要讲话。讲话阐明了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劝大家要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的讲话稳定了资本家的情绪，鼓舞了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一届二次会议。陈叔通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工商业者应该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飞跃的速度在繁荣富强起来，国家的前途就是我们个人的前途。我们的道路是光明的，是广阔的，工作是做不完的。""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为了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统一起来，我们相信，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会愿意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接受改造，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11月21日，会议通过决议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同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集中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陈云在会上提出六点意见。第一，"要对

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如果只是国营这一部分有计划，私营部分没有计划，那就不能说是有了全面的计划”。“统筹安排的范围是很广的。国营与私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需要统筹安排”。第二，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我们是在有资本主义工业的情况下进行统筹安排的。资本主义工业，一般说来是分散的，小厂、落后厂占大多数’。“因此，改组非常必要，不改组就不能安排”。第三，“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全行业合营比之单个工厂合营，是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不仅合营的速度快，而且质量高。所以说质量高，就是全行业合营打破了厂与厂的界限，这是一个进步。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第四，“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实行定息有很大好处。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这样，资本家得到了好处，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资本家暂时保存了他的资产价值，这个资产的所有权还是他的，但是不能变卖，只能拿到定额利息。工厂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了国家手里。资方人员参加一部分管理，这是一种什么管理呢？他仅是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一样，不能像从前那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管理工厂了”。第五，“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很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有几十万户的私营工厂，有几百万户的私营商店，还有几百万户摊贩，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把他们纳入计划。专业公司是我们组织私营工商业的一个重要方式。”第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 年 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文件），确定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便奔腾而来。

据报载，在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一届二次会议以后，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和资本家都热情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市，到处可以看到“庆祝批准公私合营”的大红横幅和耀眼的金黄“喜”字，到处是工人和资本家组织的报喜队。许多被批准公私合营，或者被批准筹备公私合营的私营工厂和商店都张灯结彩，举行庆祝仪式。在首都北京，1956 年 1 月 1 日开始，也出现了公私合营的高潮。各个区日夜锣鼓喧天，爆竹连声不断，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在街上游行。1 月 10 日一天，全市有 17963 户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 50 多个中等城市都相继实现了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至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快地实

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确实出乎人们的预料。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预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搞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1956年底，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下表是1956年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情况：

私营工业改造情况

	户数（千户）	职工人数（千人）	总产值（百万元）
1955年底原有私营工业	88.80	1310	7266
1956年已经改造的私营工业	87.93	1296	7257
1. 实行公私合营的	64.23	1075	6545
2. 转入地方国营工业的	1.00	23	98
3. 划归手工业改造的	15.60	117	299
4. 其他（主要转为公私合营商业）	7.10	81	295
改造面（%）	99.00	98.9	99.6
1956年底尚未改造的私营工业	0.87	14	29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9页。

私营商业改造情况

	绝对数			比重%		
	户数（千户）	从业人员（千人）	资本额（百万元）	户数	从业人员	资本额
总计	2423	3138	841	100	100	100
1. 已改造部分	1991	2824	785	82.2	85.1	93.3
转入国营、供销社者	147	224	—	6.1	6.8	—
公私合营	401	877	601	16.5	26.4	71.5
其中实行定息的	281	706	554	11.6	21.3	65.9
合作化商业	1443	1723	184	59.6	51.9	21.8
其中合作商店	581	722	104	24.0	21.8	12.4
2. 未改造的私商	432	494	56	17.8	14.9	6.7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0页。

统计资料表明，到1956年底，占私营工业总产值99.6%的企业已经完成了所有制改造，主要形式是公私合营；占私营商业资本额93.3%的商店已经完成了所有制改造，其中公私合营部分占资本额的71.5%。与此同时，私营饮食业、服务业和运输业也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不少企业出现了新气象。由于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包括不少私方人员），加上国家在计划上统筹安排，生产有了显著增长。据统计，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比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约32%。上海市新公私合营工厂总产值达到42.89亿万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旧人民币），比1955年增长40.6%，高于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36.5%的速度。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是一场群众运动。在高潮中，一批资产阶级中的积极分子带头合营，少数抗拒改造的资本家不敢公开反抗，多数人感到大势所趋不太勉强地交出了企业，但内心深处是痛苦的，甚至有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在高潮中，整个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反抗，是因为："（1）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2）经过'三反''五反'，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了反对无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3）政府对他们合营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作了适当的安置。"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为使资本家安心接受改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资本家作了妥善的安排。

——清产定股。定股，就是对资本家实行合营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核定私股股额。在个别公私合营阶段，定股工作是按户由国家派工作组到企业，会同资本家共同进行的。在高潮中，一个地区一次批准公私合营的户数很多，定股工作采取了在企业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业评议、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核定的方式。清产定股的原则，仍然和个别合营时一样，即"公平合理，实事求是"。为了在改造高潮中使资本家摆脱财务处理上的牵累，有利于改造，政府对清产定股还提出"宽"和"了"的方针。"宽"就是对财产的清理估价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一般都从宽处理（如企业的公积金，原是社会积累，但一般作为私股投资处理）。"了"就是对企业原来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能够在公私合营时了结的，都尽量了结（如企业在困难时拖欠工人的工资，国家帮助劳资双方协商了结）。清理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企业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共为24亿元。其中，工业17亿元，商业、饮食和服务业6亿元，交通运输业1亿元。

——定息。国务院1956年2月8日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定息办法中，曾经规定息率是1—6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陈云根据许多方面的意见，提出息率应当简单一些和放宽一些。后来确定，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即年息5%。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仍然可以超过5厘。过去早已公私合营，如果超过5厘，照旧支付；如果不到5厘，提高到5厘。各地定息的结果，超过5厘的占全部定息户的2%稍多一些，其余全部定为5厘。大中资本家原来对定息是"坐三（厘）望四（厘）"，对此决定喜出望外。当年12月，在全国工商联召开会议期间，陈云又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定息七年不变，

如果七年后工商业者在生活上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一个尾巴。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算，国家每年为定息付出的资金约为1.2亿元，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

实行定息，有两点好处：一是有利于生产改组。定息以后，可以统筹运用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再受各行各业盈亏不同的障碍；二是有利于突破企业、行业的界限，统筹运用各个企业的积累。缺点是，“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的利润所得同企业脱钩，使资本家不关心原来企业的经营好坏了。”

——人事安排。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陈云就指出，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在合营过程中，他又指出：“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不懂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

对私营企业原有在职私方人员，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安排了他们的工作。“量才使用”，就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经验、政治态度，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贡献等情况，安排工作职位，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适当照顾”，就是对于一部分年老体弱或其他原在企业里著有劳绩、目前丧失工作能力的，安排以比较适宜的职位，或者本人退休、吸收他家庭中其他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参加工作。根据1957年的统计，全国拿定息的71万在职私方人员和10万左右资本家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据几个大城市的情况，大体是：安排直接参加生产经营的占60%—65%；安排为管理人员的占35%—40%。上海市1956年2月开始进行人事安排，到10月份大体安排就绪。全市公私合营工商企业共安排51760人，其中工业为25847人，商业（包括饮食、服务业）为25913人。在工业方面，安排了经理5636人、厂长8617人、科长599人、股长295人、车间主任1451人、工程技术人员75人、工段长62人、生产组长171人，其余8941人大部分安排在厂部各科室，一部分安排在各车间。在商业方面，安排了经理2487人、科长和股长1113人，其余22313人大部分安排在各区店，一部分安排在各专业公司。在人事安排中，原来在企业中担任实职的私方人员，全部得到安排，绝大多数维持原职，其中204名代表性人物还被安排在政府新成立的市级各专业公司担任经理、副经理等职务。对资方实职人员除了安排为各厂及专业公司的行政人员外，对工商界具有较大代表性的人物，国家还安排他们在人大、政协和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可以用“赎买”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当时，还没有这种实践。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两次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一次是1918年上半年，提出要对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但被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打断了；1921年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重提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多大成果，“新经济政策”就结束了。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些缺点和失误。

第一，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间过于短促。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本来是准备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按行按业、分期分批地来进行的。高潮到来，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在全国各地一次批准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后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由于步子太快，许多该做的工作来不及做，做了的也比较粗糙。在高潮中，陈云就指出："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合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实现公私合营，需要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等，而这些工作都还没有做。我们先批准合营，等于把要做的工作放到后边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出现种种失误。

第二，在合营过程中，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上海市在高潮中，把22602户私营企业改组合并为16768户公私合营工厂，一下子合并了5834户。在经济改组中，由于有关部门对经济改组的目的、范围不明确，对原有产销关系了解不透，又缺乏经验，没有一套完整的办法，因此，公私合营工厂分别由工业专业公司归口领导之后，对怎样把归口的行业管理起来注意得比较多，对怎样保持原有的协作关系考虑得不够；同时，由于有些干部存在贪大求快的冒进思想，以及只图自己管理方便，不顾人民需要的倾向，有些不应该合并的厂合并了，有些厂虽然应该合并，但未作充分准备就匆忙合并了，加上商业部门统购包销范围的扩大，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例如，协作中断，货不对路，质量下降，花色品种减少，等等。商业网点的合并也过多。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3月，陈云指出："公私合营以后，要进行企业改组。企业改组并不是都要并厂并店。"他主张并错了的，要分开来，退回去。他说："今年年初以来得到了一条经验，就是公私合营以后，工厂和商店不能大合并，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微加以改造，稍微加以合并。也就是说，大部不变，小部调整。"并且说："大部不变，小部调整，不是短时期的，在十年以至十多年中，这种局面要维持下去。"2月，国务院已经发布《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决定》指出，私营工商企业"在批准合营以后，一般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仍然应该按照原有的生产经营制度或习惯进行生产经营。""企业原有的经营制度和服务制度，例如进货销货办法、会计账务、赊销暂欠、工作时间、工资制度等等，一般在半年以内照旧不变。""企业原有的供销关系要继续保持，原来向那里进货销货的，仍旧向那里进货销货；进货销货的双方，必须密切合作。""各企业之间原有的协作关系，例如加工、修理、供应配件、零件等等，必须继续保持，不得随意变动。"同时指出，私营工商业"必须保持产品质量和经营品种，对于已经降低了质量的产品和已经减少经营的品种，必须迅速恢复。"《决定》和陈云的讲话，制止了盲目合并的趋势，但对合并错了的，调整起来就比较难了。《决定》中的一些措施，也未完全付诸实施。

第三，公私合营的范围过宽，把一大批个体工商业者也带入了公私合营企业。当时，陈云就说："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二万户，雇店员的不到一万户，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不雇店

员的商店本来是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他们人数很多，铺子很多，如果一律采取对待资本主义商业那种方式，对营业是不利的。”他主张：“这种小铺子可以向两方面发展，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还有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比如雕刻，如果这种人也组成合作社，进货是统一的，销路是统一的，那他的手工艺品就做不好。北京的馄饨担怎么办？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莲心粥怎么办？对他们应该很宽很宽。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是挂个牌子，报个名，登记一下就算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的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但实际没有完全这样做。个体工商业者参加公私合营以后，便和“资本家”一样待遇，拿的定息却微不足道，于是多数人开始不满意了。对此，毛泽东曾经表示：“现在资本家当中大体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对定息没兴趣。一个月拿几毛钱，他们要求放弃定息，摘帽子入工会，享受劳保待遇。我看也可以放弃吧！”但没有付诸实施。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才获得解决。据统计，1956 年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和以前单个合营的工商业者，共计 86 万人。1979 年 11 月 12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报告》确定，共有 70 万人被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恢复劳动人民的身份。

第三节　手工业合作化

手工业，在我国历史悠久。它包括依附于农业的手工业、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厂。合作化的对象，主要是个体手工业。

解放以前，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官僚资本压迫、现代工业排挤和战争的破坏下，我国的手工业日趋衰落。据对全国重点省市的 18 种手工业产品估算，自抗日战争到 1949 年全国解放时止，手工业有 47%遭到破坏。解放以后，由于物价稳定，市场统一，国家基本建设展开，对外贸易发展，人民购买力增长，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以 1949 年手工业总产值为 100，1950 年为 118.2，1951 年为 143.4，1952 年为 170.8，1953 年为 213，1954 年为 244.1，五年增长 1 倍多。在此期间，虽然有些行业没落了，有些为机器生产所代替，但绝大多数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对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决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1950 年 7 月，中财委召开中华全国合作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提交会议讨论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法（草案）》中明确规定，在市民和工人中组织消费合作社，农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城乡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刘少奇强调，手工业合作社“主要是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尽量不采取开设工厂的方式。”

1951年6月，召开全国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当时，手工业合作还没有多大发展。根据1950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300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26万人，股金151万元，县以上合作总社附设加工工厂651个，估计基层社附设加工工厂约在4000个左右，另外合作社通过供销业务也带动了一些手工业和副业生产。会议反映，“在合作社干部中间，关于手工业问题是存在着一种过‘左’的思想和情绪，认为手工业无前途，再有三、五年即将完全为大工业所代替，所以不必搞，没有必要。对供销兴趣大，对生产兴趣差；搞生产也是愿搞大的，不愿搞小的；原意搞加工工厂，不愿搞合作社。”针对这种认识，会议阐明了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批评了忽视手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同时，总结了组织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拟订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这次会议，推动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个体手工业的合作化还处于重点试办、典型示范阶段。在此期间，只对同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棉织、针织、铁木工具等行业，重点试办手工业合作社，数量不多。对于一般行业，则从供销入手，通过供给原料，收购成品，组织生产合作小组。这种形式在当时是主要的。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以后，我国手工业合作化进入了普遍发展阶段。

这一年的11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朱德代表党中央到会作了题为《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个体手工业经济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为集体所有制”。“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三种组织形式：

一是手工业生产小组。它是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低级形式，也是手工业者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它不改变手工业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每个成员各自保持其独立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自负盈亏。一般由推选的组长代表小组，统一向国营企业或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购买原料，推销产品或接受加工订货。小组可以解决组员分散经营的困难，避免商业资本的控制和剥削。

二是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它是从个体手工业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生产资料仍归社员私有，一般还是分散生产，自负盈亏，合作社的主要活动是统一向供销合作社或国营企业购买原料，向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或国营企业推销产品，承接

加工订货。它和手工业生产小组不同之处是，有的在生产过程中的部分环节开始集中生产，有的按照生产技术，进行简单的分工协作，并用业务经营中获得的利润，购置了一部分公有的生产工具。

三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它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也是主要形式。根据生产资料公有程度的不同，分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把自己的主要生产工具、设备等生产资料全部折价归社，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的财产，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领取工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生产资料还没有全部归集体所有，保留部分的私有制，实行工具入股，按股分配收入，仅以收入的一部分实行按劳分配。这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

会议认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应当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1954 年 6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发布了《加强手工业工作的领导》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手工业视为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迅速设立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并帮助手工业合作社逐步建立各级联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同年 11 月，国务院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各级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了手工业管理机构（局、处、科），加强了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

1953—1954 年，手工业合作化发展很快。截至 1954 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小组达 41000 多个，比 1953 年约增加 8 倍多；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 113 万多人，比 1953 年约增加 2.7 倍。在手工业的各行业中，组织起来比较多一点的行业是：金属制品业，木器业，棉针织业，麻、毛、丝纺织业，各种手工艺品业，砖、瓦、砂、石、石灰业，采煤、采矿业，缝纫业，竹、柳、棕、藤、草编织业等。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总产值 1954 年为 11.6 亿元，比 1953 年约增加 1.1 倍左右。

手工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也暴露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主要是手工业和大工业、手工业和农副业、手工业合作社和手工业个体户之间，在供产销方面的矛盾。“手工业逐步走向合作化后，劳动生产率一般提高 20%—30%，生产社内部发生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老社与新社、组织起来的与未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者在供销方面也发生某些不协调现象。随着农村手工副业的发展，也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发生矛盾；资本主义商业改组中商业资本家及小商贩转入手工业，以及城市妇女、贫民参加手工业生产，形成手工业人员的增加，产生了新起的手工业与原有的手工业的矛盾（如缝纫业到处盲目发展）。加之有些地区机械执行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推销原则，形成人为的限制，打乱原有的供销规律，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供产销脱节现象。同时国营工业（国营和地方国营）在供产销平衡中，新建、扩建中，对手工业又缺乏统一安排，以致发生不少困难。”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1954 年 12 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手工业合作化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确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会议决定，1955 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是：把手工业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继续摸清楚，分别轻重缓急，按行业

拟定供产销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安排计划，以便有准备、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改造；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社（组），每一县（市）要分别总结出主要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顿社的系统的典型经验，为进一步开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奠定基础。在上述两项工作的基础上，从供销入手，适当地发展新社（组）。

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手工业和农副业、工商业的分工管理和几个政策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是：独立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此次会议认为，农业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除特殊行业外，一般以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附属小组为好。雇佣 10 人以下的工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在试点。手工业合作化的重点应该是独立手工业者。

（二）根据独立劳动者都参加主要劳动，有手艺，他们和学徒的关系是师徒关系；雇工的不多，有一些雇工的和雇工是主要劳动和助手的关系，而不是剥削关系，会议否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路线应该“依靠手工业工人，团结独立劳动者”的提法。会议认为，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引导手工业劳动者在自愿原则下，逐步改变个体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并根据需要与可能改变小生产为大生产，这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

（三）对农村副业和农业兼营商品性生产的手工业，在农业和农副业未分化以前，一般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领导但应贯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并最好各计收入、盈亏，以保证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在手工业较集中、农业兼营商品性手工业，农户收入以手工业为主要来源的地区，可以组织手工业和农业的混合社，并以手工业联社领导为主；手工业和农业也可以分别组社，社员可以跨社。

（四）对雇佣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的工厂手工业小资本家的改造，由手工业联社负责。在吸收他们加入手工业合作社时，必须掌握：（1）资本家放弃剥削，参加劳动；（2）让他们参加较大的和基础巩固的手工业合作社，并须经社员大会通过；（3）入社后，将他们分散编入不同的生产组内，并不让他们担负领导职务；（4）生产资料及其他所需固定资产，除折价入股部分外，多余部分可以存款计息，利息大小由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商定；（5）接收小资本家入社的合作社，要继续对这些小资本家进行思想改造，并对他们提高警惕。

（五）1954 年各地手工业生产联社领导的生产社（组），产品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销售的占 70%—80%；原料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供应的占 50%左右，大大节省了手工业生产社的资金和人力。因此，不搞手工业联社的商业网。基层生产合作社或上级联合社可以设立自己的供销业务批发机构和门市部。

（六）手工业劳动者协会是地方性的组织，由县（市）手工业管理机关指导。参加联社的协会，手工业管理机关可以通过联社进行指导。

这次会议，强调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和当时调整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是一致的。前文提到，1954 年 12 月，陈云在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讲话中，曾把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作为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之一。他说：“手工业合作社是一

定要发展的，但要防止产量超过需要，并注意原料是否有保证。要防止新的手工业基地排挤老的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

实际上，1955年手工业合作化还是发展得很快的。这一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20928个，比上年增加近1倍；从业人员97.6万人，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11.9%；产值13.01亿元，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12.9%。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农业合作化稳步前进是“小脚女人走路”，接着，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批判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在农村很快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带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形势逼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加快速度不可了。

同年12月5日，党中央召开座谈会，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同时，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于12月21日到28日，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上着重批判不敢加快手工业合作化步伐的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中央手工业管理局领导认为，领导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的原因有：对总路线的实质认识不清，对“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领会得不全不透，因而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表现摇摆不定；对于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给手工业改造带来的有利条件认识不清；对手工业合作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巩固的这一主流方面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甚至夸大缺点的方面，以致在干部中造成“发展容易巩固难”的错觉，很多地区出现只巩固、不发展的脱节现象。会议要求，在1956和1957年两年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拟定的规划。总的要求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到全国手工业人员总数的70%，1957年达到90%，1959年到1960年全部组织起来。但这个规划很快被突破了。

1956年1月，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汇同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全国兴起。首先是北京市，采取全市按行业一次批准合作化的办法，在1月11日、12日两天之间，有53800多个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加上在此以前入社（组）的手工业者36000多人，全市手工业者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紧接着，天津、南京、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在几天之内也先后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到2月20日，全国已有143个大中城市（约占全国大中城市的88%）和691个县的手工业全部或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到1956年6月，除某些边远地区，全国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下表是1956年底，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状况：

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情况　　单位：%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一、手工业者人数	100	100	100	100	100
合作化手工业	3.1	3.9	13.6	26.9	91.7
个体手工业	96.9	96.1	86.4	73.1	8.8
二、总产值	100	100	100	100	100
合作化手工业	3.5	5.6	11.2	19.9	92.9
个体手工业	96.5	94.4	88.8	80.1	7.1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周太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年份	社数（个）	社员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	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
1952年	3280	3	3.4
1953年	4629	3.5	5.3
1954年	11741	6.7	8.2
1955年	20928	11.9	12.9
1956年	74000	73.6	86.2

资料来源：《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第21册，第517页。

统计资料表明，到1956年底，合作化手工业人数占手工业者总数的比重从1955年的26.9%上升为91.7%；合作化手工业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5年的19.9%上升为92.9%。这一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社数达到74000个，社员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73.6%，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86.2%。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一部分分散在农村的个体手工业者和约1000多万农村兼营手工业的人员参加了农业合作化；一部分同私营工业协作关系密切，而从业人员又很少的手工业行业，如火柴、西药、碾米等，随同私营工业进行改造；另一部分半工半商、工商界限不甚分明的行业或商业性较大的服务行业，如鞋帽、豆腐、糕点、屠宰等，则随同私营商业进行改造，到1956年底，共有48000多户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公私合营。

至此，基本上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手工业产品的品种有所减少，质量有所下降，生产还是有了比较大的发展。1956年，全国手工业总产值达117亿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合作化手工业社（组）每人平均年产值为1702元，比1955年增长33.5%。随着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断扩大，社员个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相应地改善了。1956年，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达4.3亿元，90%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工资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66%，劳动条件也有很大改善，并举办了各种福利事业。

但是，手工业合作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也有一些失误。

第一，手工业合作化的时间过于短促。这突出表现于1956年上半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段时间。从前引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手工业合作化主要是在1956年这一年基本完成的（人数的2/3、产值的3/4），工作难免粗糙。“在高潮中，因某些行业改造范围划分不清，不是无人负责改造，就是多头进行改造，搞得较乱。如上海市18万个体手工业者中，划归工业、商业部门改造的有7万人。江西省规定除城镇的手工业归手工业部门改造外，城镇以下的手工业，不问专业、兼业或技术高低一律划归农业部门改造，该省个体手工业者28万人中，划出了14万人。河南、广西、河北等省都有类似情况。”

第二，有些同志对手工业小而分散，经营灵活，产品多种多样，同人民群众关系非常密切的特点认识不足，片面强调大社和集中经营的优越性，不顾条件地合并办大社，盲目地推行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结果，造成不少手工业产品供销失调、协作中断、生产下降、品种花色减少和社员收入减少。从社的规模看，1956年上半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的平均人数为50.9人，比1955年平均人数45.8人增加11%，有些省市远远超过此数。如浙江、山东、安徽、河北、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省市平均人数达54—140人。河北省石家庄市1955年底原有98个社（组），社（组）员4607人，高潮中又新发展5800多人。但不仅社数没有增加，反将市区内88个社合并为31个，其中100—200人的社有8个，200—500人的社有8个，500—1000人的社有4个，最大的服装社竟达1400人。这样大的社，是很难经营得好的。

第三，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面过宽。个体手工业通常一门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绝大部分是夫妻、父子的连家铺，有些虽然雇用工人或学徒，也只是在生产上起辅助或帮手作用。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十分薄弱。据1953年对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地86811户个体手工业户的调查，平均每户只有资金851元，其中90%以上的手工业户资金不过300元左右。在这些资金里，家具设备和工具占50%以上。根据这种状况和手工业的特点，相当大的一部分手工业者应长期保持个体生产和个体经营，是不需要合作化的。“如果说，农业合作化高潮追求千篇一律的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化形式，是为了消灭小块土地私有制的话，那么，在手工业方面过分追求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没有必要的。”“大部分个体手工业者凭手艺吃饭，没有多少生产资料，而且有些行业只适宜分散生产、独立经营，不适宜于集中。”

针对上述情况，1956年2月，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中指出：“参加合作的个体手工业户，必须保持他们原有的供销关系，一般应该在一定的时间内暂时在原地生产，不要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手工业中的某些分散、零星的修理业和服务业，应该长期保留他们原有的便利群众、关心质量的优点。某些具有优良历史传统的特殊工艺，必须加以保护。某些适合于个体经营而自己又不愿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户，应该维持他们原有的单独经营方式。”3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说：“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

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3月30日，陈云明确指出："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并错了的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盲目集中合并组成的手工业合作社，很大一部分改成了合作小组。这对提高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

第五章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没收了官僚资本，并采取措施积极消除外国在华特权势力。但是只是这两项还不能解决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党和政府又进行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第一节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和采取的坚决措施

一、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遭到严重摧残破坏的处于崩溃状态的经济烂摊子，如何使这个被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能够迅速恢复起来，是人民政府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人民政府分析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其中最严重的，是物价飞涨和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两大问题。

（一）物价飞涨。建国初期，物价波动十分厉害。1949 年 4 月、7 月、11 月和 1950 年 2 月，全国各地区曾发生 4 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第一次是 1949 年 4 月，华北地区物价首先上涨，波及山东、苏北和华中。以华北地区批发物价为例，1948 年 12 月为 100，1949 年 3 月为 261，5 月猛升为 380。第二次是 1949 年 7 月，由于敌人封锁上海，加上严重的台风水灾，投机分子大肆活动，投机对象从金银、外币转到粮食、纱布上来。上海从 6 月 27 日起到 7 月 30 日，共波动 33 天，批发物价指数 7 月比 6 月上升了 1 倍半以上。第三次是 1949 年 10 月中至 11 月。10 月中旬投机分子首先从上海、天津掀起一场物价大波动，波及华中、西北，延续时间达 1 个半月之久。投机对象由五金、化工原料等进口商品发展到纱布、粮食。到 11 月 25 日止，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比 10 月上旬上升 2.26 倍；同时，其他城市物价也上升了 3 倍—4 倍。第四次是 1950 年 2 月。2 月 6 日（春节前 11 天）国民党轰炸上海，电厂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工厂停工，纱布大减产，又值春节将至，投机分子乘机抢购，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据 15 个城市 25 种主要商品统计，批发物价指数以 1949 年 12 月为 100，1950 年 1 月为 126.2，2 月为 203.3，3

月为226.3。又据统计，全国12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以1948年12月为100，则1949年1月为153，7月为1059，11月就上涨到5376。北京市物价指数1949年5月份和2月份相比，上涨了171%。1949年11月，上海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涨价20%～30%。上海1949年6月—1950年2月，批发物价上涨了约20倍。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是：

1. 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投机倒把盛行引起的。早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由于发行法币过多，已经引起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困难，财政赤字大量增加，因而大量增发钞票进行弥补，结果进一步引起通货膨胀。1937年6月—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倍，同时期物价指数上涨了85000多亿倍。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这种情况在建国初期仍未停止。在一些大的城市中大宗交易多用黄金、银元，或以物易物（农村中则使用银元）。大批投机商人乘机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炒买炒卖黄金、美元和银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结果引起金银价格暴涨。金银价格暴涨又反过来带动了一般物价的上涨。

2. 生产下降，交通阻塞，物资供应缺乏，也是造成物价飞涨的原因之一。1949年建国前，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1949年工业产值较抗战前1936年下降了50%，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重工业下降了70%，轻工业下降了30%。农业方面，1949年，粮食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20%左右，耕畜下降了16%，农具损坏了30%。水利破坏，连年受灾。1949年受灾面积为12000万亩，灾民4000万人。此外，生产停滞，交通运输遭到极大破坏，城乡物资交流滞塞等，也是造成物价飞涨的原因。

3. 国家财政困难是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解放初人民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也是全国财政状况最困难的一年，为了收拾接收下来的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人民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不得不增发货币，货币发行过多，自然对物价上涨产生影响。

（二）国家财政困难。建国前，不仅金融物价十分混乱，国家财政也极度困难。引起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人民革命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仍占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1949年占一半左右）。另外，人民政府还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人员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这样，连同我们自己的军政人员大约有900多万人，这900多万人全部要由国家供养。此外，交通、工矿企业也需要重点恢复，众多失业人口亟待救济，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财政支出。这样，就使得国家财政开支巨大，而国家收入则由于国民党政府造成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状态，一时难以恢复，因而收入有限。这样，1949年建国时，人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十分困难的。当时国家财政只有相当小米303亿斤的收入，而财政支出却达570亿斤。在财政支出中有2/3的赤字不能不靠增发纸币来弥补。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生产恢复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物价上升的局面。

以上是人民政府在解放之初，所遇到的最主要的两大难题。

二、人民政府采取的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措施

针对以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尽一切可能用极大的力量来进行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以便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

恢复这样一种被破坏了的混乱的经济，必须首先打击投机势力，稳定市场物价。经过调查了解，物价剧烈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投机资本乘国家暂时困难，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追逐暴利的结果。如上海解放后，投机资本家以“证券大楼”为指挥部，利用几千部电话和专设的对话电话和分布的各据点进行联系。一些银元贩子，也在到处造谣，结果在10天左右的时间，将银元价格哄抬了近2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上海从5月28日解放起，到6月9日，13天内，物价就上涨了2.7倍，黄金上涨了2.1倍。在北京，投机资本家在物价上涨中，利用国营粮食公司对私商每出售面粉一袋，可向公司购进小麦66斤的规定，大量套购国家的粮食。有个“粮老虎”在11月11日一天，由他的面粉厂抛售面粉678袋，这些面粉大部分又由他的联号买回，用这种办法套购了国家的大批小麦。他还用空头支票进行场外交易，指挥各联号相继提高面粉售价，并先后囤积了粮食50万斤，面粉438袋。结果使得面粉和粮食价格猛烈上涨。

物价剧烈上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混乱。所以，必须设法把物价稳定下来，物价不稳定，其他经济恢复工作根本无从谈起。

稳定物价，实质上是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投机资本家手中夺取市场的领导权问题。国家首先在城市中积极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在农村积极建立和发展供销合作社，加强工农产品的收购调运工作，以掌握工农业产品，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与此同时，着手建立市场管理制度，用行政措施和经济力量相配合，坚决打击投机势力。

人民政府对稳定物价打击投机活动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金融管理。在国民党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下，金银外币是市场物价波动的先驱。根据这种情况，首先迅速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金融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规定私营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监督和管理；在物价高涨和国营贸易公司集中抛售物资时期，银行相应地实行短期通货紧缩，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贷款投放；严禁买卖金银、收兑外汇以及对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等。此外，还大力吸收存款，吸引社会游资，缓和社会多余购买力和游资对物价的冲击。

人民政府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同时，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银元金钞投机的斗争，同时还公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宣布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举办折实存款，挂牌收兑金银外币。在上海，为了稳定币制、物价，制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封闭了金银外币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并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恶分子200余人逮捕法办。在武汉抓获银元投机首要分子200余人。另外，

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对一般私营银行钱庄，加强管理与监督；对专门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等非法信用机构则严格取缔。广州就取缔了地下钱庄 87 家，金银兑换店 377 家。

经过这些措施，基本上制止了金钞投机活动。私营银行钱庄业务也基本上纳入国家银行的控制之下。

（二）控制主要商品，通过抛售商品打击投机活动，平稳物价。首先，对重要物资短缺容易引起投机的特点，成立专业性的经营紧俏商品的国营商业机构，如全国性的粮食、花纱布、煤炭、土产、油脂、猪鬃、蛋白等专业公司，通过这些公司来集中掌握大量的紧俏物资，加强国家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其次，迅速扩充国营和合作社的零售网和代销店，直接供应一些紧俏商品，如煤炭、食油、食糖等商品，并规定合理的零售价格。另外，由国营商业机构进行全国性的物资大配套，缓和物资供应紧张状况。此外，国营贸易部门还在适当时机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来打击投机势力，平抑物价。

国家加强主要工农产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实行对外贸易的管理，迅速聚集大量的物资力量。如粮食，通过征收公粮，国家掌握了大量余粮。此外，国营商业还控制了煤炭供应量的 70%，棉纱的 30%，棉布的 50%，食盐的 60%，这是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

在几次物价涨风中，国家均抓住时机，集中大量抛售物资，使物价下跌，给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以沉重打击，把涨风压下来。同时国营商业也在市场有利的情况下，把物资收购进来，这样利用市场吞吐政策，壮大国家经济力量，取得市场的领导权。

例如在 1949 年 11 月涨风中，从上海开始，先是工业原料、五金、化工产品价格上涨，接着棉纱、粮食价格猛涨，每天涨 20% ~ 30%，各大城市也跟着上涨，投机活动甚为猖獗。上海国营商业部门，从 10 月 10 日到 11 月 10 日一个月中，抛售棉纱 2 万件，棉布 30 万匹，粮食更多。11 月 7 日一天抛售粮食 911 万斤，相当于平时交易量的 10 倍以上。但涨风仍未制止。于是，中央经过周密研究，全面布置各大城市调集主要物资一起行动，11 月 25 日进行大量抛售，26 日物价回落，囤积居奇者措手不及，受到严重打击，涨风被制止下来。

（三）加强市场管理。主要措施是：公布工商业登记办法，普遍登记，未经核准不准开业；严格管理市场交易，建立交易所，主要物资集中交易；运用行政力量管理市场价格，保护国营牌价不受私营破坏，成为市场领导价格；管理采购，把大量物资采购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取缔投机活动，对投机分子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少数反动的哄抬物价的资本家则给予打击，依法制裁，对正当私营工商业则加以保护。

事实证明，既有经济力量又加上行政管理力量（政治力量），不但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物价，而且还巩固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引导私营工商业走上正当的道路。

人民政府为了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发展经济，除了采取以上积极措施打击投机势力稳定市场物价外，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活跃城乡经济、调整对外贸易、收购物资增加储备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等。

在活跃城乡经济方面，国营商业起了重大作用。从 1950 年到 1952 年 3 月，人民政

府及中财委曾多次发出有关推销农副产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的指示，各级政府还采取具体措施，认真贯彻。主要是：恢复旧的和开辟新的土特产商业渠道；恢复和建立新的集市和庙会；组织农民群众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等。国营、集体商业组织还相应地设立推销机构，划出资金对农村土特产品进行收购和推销。一般在专区以上设立专门的土产收购公司，设立货栈，县设立综合经营土产门市部；同时，还鼓励私商下乡开展购销活动，并从税收、运输、贷款等方面给以优惠，使他们在价格上有利可图。

为了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交通运输工作十分重要。党和人民政府除了使国家的铁路、交通部门进行有计划的运输以外，还发动群众组建土产运输公司、联营公司，发展交通网络，组织人力、畜力和各种车、船等交通工具运送土特产品。与此同时，还召开各地各级物资交流大会。参加交流的有国营、集体商业，还有私营商业和广大农民群众。1952 年全国各地召开的物资交流会达到 7738 处次，成交额达 16.38 亿元，约占全国各级交流大会成交总额的 1/2。

在对外贸易方面，建国初期，我国的对外贸易仍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对我国实行禁运、封锁、经济制裁，迫使我国对外贸易转向以与苏联、东欧国家为主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得到了发展。1950 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41.6 亿元（11.3 亿美元），1952 年增长到 64.6 亿元（19.4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 20.2 亿元（5.5 亿美元）增长到 27.1 亿元（8.2 亿美元）。

收购物资，增加储备，是为了应急需要。人民政府为了打击投机资本，采取行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手段，一方面严禁黄金、银元和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取缔交易所大楼，惩办严重违法分子；另一方面把收购来的大批重要物资，适时地、集中地投入市场，从而很快地使市场物价平抑下来，并掌握了市场的领导权。在此以后，党和政府仍然继续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公私厂家收购诸如粮食、棉纱、煤炭、食用油等重要物资。特别是粮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中财委明确规定，一切应调出粮食的地区必须如数调出；一切要粮的地区不应多要，必须把应付市场的机动调拨权归于中财委。这样，实行统一调度，全国主要地区的粮食市场才能保持稳定。另外，在加强对粮食的收购、管理，统一调度的同时，国家还对棉花、棉布以及酒、烟、纸张等其他重要物资，也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这样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它保证了国家能储备起必要的物资以应付市场的需要。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稳定市场物价的根本措施。生产不恢复和发展，没有生产出足够的物资来供应市场，市场物价是不会稳定的。为了使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当时处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仍挤出部分资金支援重点建设，如兴修农田水利和恢复交通运输事业等。这样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从根本上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

第二节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为了确保物价稳定，人民政府还实行了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使物资力量集中起来保证财政收支的平衡。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各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分散管理的，这种管理方法适合当时的情况，但建国后就不适应了。建国后，全国经济和市场已经统一，资本主义经济还在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不再统一起来，仍然各地区分散管理，势必加剧市场无政府状态，便于资本家从中投机牟利，国家就不可能灵活地调动国家所掌握的现金和物资，不能保证对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

鉴于这种情况，人民政府于 1950 年 3 月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基本内容有三项：

（一）统一全国收支。重点是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不经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付命令，不能动用。这样就保证了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使国家的收入能集中地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保证军事上的供给和进行经济恢复工作，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规定各地国营贸易机构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使国家掌握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原料和器材等，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统一调拨。这样可以调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1950 年，中央贸易部还及时将大批粮食调往灾区和大城市，解决灾区和大城市人民缺粮的困难。国家手中掌握了粮、棉、布、煤、盐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为稳定市场物价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要稳定市场物价，必须对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进行控制。为此，中央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也由其统一管理。人民银行开展了大量吸收存款、回笼货币的工作。另外，国家银行还实行统一现金管理及转账制度，要求所有属于国有但是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而各单位之间的财务往来，则使用转账支票进行结算，以减少货币流通。这样，原来留存在国家企业和国家机关手中的巨额现金即迅速集中到国家银行手中，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从而减少了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并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的资金。市场货币流通量顿时大量减少，物价因而也降了下来，而银行存款额大量增加。银行存款额常在市场货币流通量的 3 倍以上。所以实行全国现金统一管理，对稳定当时的经济，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三种统一的同一结果是避免了财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这种效果对于扭转困难的财政经济局势起了重大作用。

另外，为了稳定金融物价，还必须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而平衡财政收支的关

键，在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增收主要是整顿税收和发行公债两项重要措施。整顿税收的重点是城市，城市的税收整顿是废除苛捐杂税、平衡税负、核实税额、催缴税款等。经过以上整顿措施，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发行公债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也可以回笼社会上多余的货币。节支方面，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对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加以减缩，军政、公教人员的待遇严格控制。为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广大工作人员继续过着艰苦的供给制或低薪的生活；同时，机关和部队还要尽可能进行一些生产，以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仅西北地区的节支运动就使军费和行政费减少了20%左右。

由于实行了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还从1950年起又加强了征收工商业税和农业税的工作，发行了3亿元公债，同时大力节约开支，特别是节约国家机关经费的开支，因此，国家的财政收支很快就接近了平衡（并且经受了抗美援朝的考验）。到1951年，国家财政已有余额10.6亿元，1952年继续有余额7.7亿元。在国家财政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中，企业收入只占13.4%，而各项税收占75.1%，农业税占29.3%；1952年，企业收入所占比重增至31.2%，各项税收下降为53.2%，其中农业税更下降为14.7%。这说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国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资调运工作，在各大城市储备了大量的粮食、棉花和棉布等。由于现金管理和转账制度的实施，原来留在机关和国营企业中的现金和流通领域中的大批通货，源源流回国家银行，很快地缩减了货币流通量，从根本上扭转了通货膨胀的局面。所以从1950年3月开始，物价出现了下降趋势。1950年的批发物价指数，以3月份为100，4月下降为75，5月更下降为49。6月以后，政府又采取各种措施，使物价下降趋势停止下来。同年12月份物价回升到85.4。这样就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了。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结果建立起来国家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稳定市场物价，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管理体制只是刚刚建立，还有待于逐步完善。

第六章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有了飞速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

第一节　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表现如下：1957 年工业总产值已达 704 亿元（包括手工业产值），比 1952 年增长了 128.6%。从 1953 年到 1957 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 18%。

手工业产值 1957 年为 133.7 亿元，比 1952 年手工业产值增长了 82.8%，平均每年增长 12.8%。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及手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43.1%，增长到 1957 年的 56.7%。

中国共产党规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1957 年工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 1952 年增长 210.7%，平均每年增长 25.4%。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35.5% 提高到 1957 年的 45%。机器制造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5.2%，提高到 1957 年的 9.5%。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已经开始改变。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1957 年工业中消费品生产比 1952 年增长了 83.3%。1953 年—1957 年，消费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12.9%。

在"一五"计划规定的 46 种主要产品中，生铁、钢、钢材、水泥、纯碱、烧碱、内燃机、蒸汽锅炉、汽轮机、水轮机、发电机、机床、客车、汽车轮胎、棉纱、棉布、抗菌素等 27 种产品的产量，在 1956 年已经达到计划规定的 1957 年的水平。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变化情况，可见表 1。

表 1 中数字表明，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下面我们再看一看主要产品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表 2）。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邑经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表 3）。

表 1　**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

产品名称	单位	1949 年	1952 年	1957 年	1957 年比 1952 年增长的百分比（%）
钢	万吨	15.8	135.0	535.0	296.3
生铁	万吨	25.2	193.0	594.0	208.0
原煤	万吨	3243	6649	13000	96.0
发电量	亿度	43.1	72.6	193.4	166.4
原油	万吨	12.1	43.6	146.0	234.9
水泥	万吨	66	286	686	139.9
木材	万立方米	567	1120	2787	148.8
硫酸	万吨	4.0	19.0	63.2	232.6
纯碱	万吨	8.8	19.2	50.6	163.5
烧碱	万吨	1.5	7.9	19.8	150.6
化肥	万吨	2.7	18.1	63.1	248.6
青霉素	公斤	—	46	18266	397.1 倍
金属切削机床	台	1582	13734	28000	103.9
动力机械	万马力	1.0	3.5	69.0	19.7 倍
电动机	万千瓦	6.1	63.9	145.5	127.7
发电设备	万千瓦	—	—	19.8	—
机车	台	—	20	167	735.0
汽车	辆	—	—	7500	
民用船舶	载重量万吨	—	1.6	5.4	237.5
棉纱	万件	180	362	465	28.5
棉布	亿米	18.9	38.3	50.5	31.9
纸	万吨	22.8	54.0	122.1	126.1
卷烟	万箱	160.0	265.0	446.0	68.3
食用植物油	万吨	44.4	98.3	110.0	11.9
糖	万吨	19.9	45.1	86.4	91.6
原盐	万吨	298.5	494.5	827.7	67.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84》，220 页～229 页；《伟大的十年》，84 页～89 页；《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执行结果的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59），6 页～7 页资料制作。

表 2　　各种主要产品产量平均每年增长速度（%）

	1950 年—1952 年	1953 年—1957 年
钢	104.2	31.7
生　铁	97.1	25.2
原　煤	27.0	14.4
发电量	18.9	21.6
原　油	53.3	27.3
水　泥	63.1	19.1
木　材	25.5	20.0
硫　酸	68.1	27.1
纯　碱	29.7	21.4
烧　碱	74.0	20.1
化学肥料（不包括硝铵）	88.6	28.4
青霉素	—	231
金属切削机床	105	15.3
动力机械	51.8	81.5
电动机	119	17.9
机　车	—	52.9
民用船舶	—	27.5
棉　纱	26.1	5.2
棉　布	26.6	5.7
纸	33.2	17.8
卷　烟	18.3	11.0
食用植物油	30.4	2.3
糖	31.3	13.9
原　盐	18.3	10.9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90 页～91 页。

表 3　　1953 年—1957 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

	中国	英国	美国
工业生产指数	18.0	4.1	2.8
钢	31.7	5.7	3.9
生　铁	25.2	5.9	5.0
原　煤	14.4	下降	0.4
发电量	21.6	7.8	9.1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96 页。

与旧中国相比，更加大大超过了。旧中国从 19 世纪末叶起开始创办现代化冶金工业，到 1949 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钢的年产量才达到 15.8 万吨，其中最高年产量也只有 92.3 万吨；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7 年钢的年产量已达到 535 万吨，为 1949 年的 33.9 倍，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 579.6%。旧中国从 19 世纪末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到 1949 年，原煤产量才达到 3243 万吨，其中最高年产量不过 6188 万吨；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到 1957 年已达 13000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了 300.9%，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了 110.1%。旧中国，从 1882 年外商在上海设立第一个电厂起，到 1949 年，67 年的时间，发电量才达到 43.1 亿度，其中最高年产量不过 59.6 亿度；而新中国，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57 年，发电量已达 193.4 亿度，比 1949 年增长了 348.7%，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了 224.5%。旧中国从 1850 年外商在中国开始设立机械修理工业起，到 1949 年，花了 100 年的时间，才使机床产量达到 1582 台，其中最高年产量不过 5390 台；而新中国，仅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不到 10 年，1957 年，机床产量就达 28000 台，比 1949 年增加了 16.7 倍，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了 419.5%。

关于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计算单位	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1957 年产量	指数%（以解放前最高年为 100）1957 年
钢	万吨	92.3	535.0	579.6
生　铁	万吨	180.1	593.6	329.6
原　煤	万吨	6188	13000	210.1
发电量	亿度	59.6	193.4	324.5
原　油	万吨	32.1	145.8	454.2
水　泥	万吨	229	686	299.6
硫　酸	万吨	18.0	63.2	351.1

	计算单位	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1957年产量	指数%（以解放前最高年为100）1957年
纯　碱	万吨	10.3	50.6	491.3
烧　碱	万吨	1.2	19.8	16.5倍
化　肥	万吨	22.7	63.1	278.0
金属切削车床	口	5390	28000	519.5
棉　纱	万件	245	465	189.8
棉　布	亿米	27.9	50.5	181.0
卷　烟	万箱	236.3	445.6	188.6
糖	万吨	41.4	86.4	208.7
原　盐	万吨	391.8	827.7	211.3

资料来源：同3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但工业品产量方面大为增加，而且还生产了许多种我国从来没有的新的工业产品。在钢铁工业方面有：高级合金结构钢、特殊仪表用钢、矽钢片、造船钢板、锅炉用无缝钢管、50公斤的重轨等重要钢材。1957年钢材品种已达4000种。钢材自给率在1957年已达86%。机械工业方面有：飞机、载重汽车、客轮、货轮、容量1.2万千瓦的成套火力发电设备、1.5万千瓦的成套水利发电设备、容积1000立方米的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200多种新型机床、自动电话交换机，以及全套纺织、造纸、制糖等设备。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在1957年已达60%以上。在化学工业方面，已能生产化学纤维、各种抗菌素等产品。而这些产品在旧中国都是要从外国进口的。

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技术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1957年，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7.5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2倍；工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的职工达到1019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66%；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1957年比1952年提高了61%；平均每年提高9.9%。

5年内，12个工业部门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了29%，平均每年降低6.5%。

第二节　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在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的建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增大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主要指国营工业，还有一部分合作社工业，不包括手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增长情况，1952年是44.8%，到1956年增长到71.6%。资本主义工业1952年占30.6%（包括自产自销部分和加工订货部分），1956年，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除资本家还拿定息外，与社会主义工业实质上已无大差别，所以，1956年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已不到0.04%。

二、工业基本建设规模扩大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50亿元，折合黄金57000万两以上，其中国家对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427.4亿元的15.3%。5年内，在实际完成的国家投资总额中，工业部门的投资占56%（农林水利部门占8.2%；运输邮电部门占18.7%）。5年内，在实际完成的国家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占76%；消费性建设的投资占24%。

工业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5年内，国家对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达250.2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42.5%。就是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乎国家投资的一半，是用于工业建设。5年内，由于进行基本建设而新增的固定资产达到492.18亿元，其中新增工业固定资产达到200.64亿元。在工业建设中，重工业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的投资占87%；轻工业的投资占13%。在农、轻、重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占36.1%；轻工业占6.4%；农业占7.1%。

5年内，按照规定建设项目，除有个别调整外，绝大多数都已建成，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建设项目。5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10000个以上，其中：黑色金属312、电力599、煤炭600、石油22、金属加工1922、化工637、建筑材料832、造纸253、纺织613、食品和其他约5000个。

5年内，在施工的10000多个工矿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有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有109个。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68个工程项目，到1957年底，有64个已经施工建设，有27个已经建成投产。这900多个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它们的建成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初步基础。

在一些新建的大型工矿企业单位中，电力工业有：富拉尔基热电站、阜新电厂、抚顺电厂、太原第一热电站、大连热电站；煤炭工业有：鹤岗东山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辽源中央竖井；石油工业有：东北石油二厂、玉门矿务局；黑色金属工业有：鞍山

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厂；有色金属工业有：抚顺铝厂、通化铜矿；机器制造工业有：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还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化学工业有：大连化工厂、大连碱厂。在轻工业方面，造纸工业有：佳木斯造纸厂、广州造纸厂；食品工业有：包头糖厂、北京果酒厂；纺织工业有：北京国棉一厂；乌鲁木齐七一厂、哈尔滨亚麻厂。建筑材料工业有：牡丹江水泥厂、哈尔滨水泥厂等。

三、大批新建和扩建企业投入生产，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批新建和扩建企业的投入生产，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旧中国不可望的一些技术要求特别复杂的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部门出现了。五年计划规定的新增工业生产能力的计划，大都超额完成了。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的生产能力（以设计的年产能力计算）为：铁矿开采 1643.4 万吨，炼铁 338.6 万吨，炼钢 281.6 万吨，轧钢 165 万吨，采煤 6376 万吨，发电（以发电机容量计算）246.9 万千瓦，天然石油 131.2 万吨，人造石油 52.2 万吨，合成氨 13.7 万吨，纯碱 19.2 万吨，烧碱 8.1 万吨，原盐 151.3 万吨，水泥 261.3 万吨，金属切削机床 8704 台，载重汽车 3 万辆，纱锭 201 万枚，织布机 55000 台，机制糖 62 万吨，机制纸 25 万吨。

生产能力这样迅速的增长，在旧中国是不可想像的。旧中国经历了 60 年才建设起不到 200 万吨的炼铁能力，不到 100 万吨的炼钢能力；经历了将近 70 年，才建设起不到 190 万千瓦的发电能力。新中国五年中新增加的炼铁能力和炼钢能力，即等于旧中国 60 年的 1.5 倍和 3 倍；新增加的发电能力也大大超过了旧中国 70 年的总和。以旧中国发展比较快的纺织工业来说，从 1890 年到 1949 年的 60 年中，只建设起 500 万枚纱锭；而新中国从 1949 年到 1955 年，6 年新增纱锭即为 152 万多枚，为旧中国 60 年建设纱锭数的 30%多。可见生产能力增长之迅速。

四、工业技术水平提高

旧中国工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重工业极为薄弱，1936 年仅占工业总产值的 28%，机器工业仅占工业总产值的 22%。一般工业设备简陋，多用手工劳动。全部高炉有效容积在 100 立方米以下的占 79%。煤矿工业除个别企业提升、排水及巷道运输采用机械外，全部用人力。纺织工业，1936 年动力织布机仅 8 万台，只占全部织机的 1%强。另外，操作方法也极端落后，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如铁矿中，帝国主义采取“洞式开采法”，掠夺我国富矿。煤矿采用落后开采方法，平均回采率在 40%以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期间，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主要表现在：

（一）工业设备和工人技术装备程度的增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4年，我国已经建成了一些新型的、现代化的设备。如电力工业，1955年已建成一座高温（510℃）、高压（100大气压）热电站，到1956年6月，单机容量在25000千瓦以上的发电设备已占全国发电设备容量的22%，单机容量在12000千瓦以上的则已占46%。煤炭工业已建成年产能力达300万吨的海州露天煤矿，能力达90万吨的辽源中央竖井、鹤岗东山竖井等。钢铁工业1956年已建成自动化高炉5座，建成辊径为1150厘米每年处理钢锭能力为350万吨的初轧机。机械工业已建成沈阳风动工具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等新型自动化工厂。

工人技术装备程度（平均每一工人装备的工业用固定资产）也相应提高（表5）。

其中，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等部门提高最快。

表5　　　　单位：元

	1952年	1955年	1955年比1952年%
平均每一工人装备工业用固定资产	5656	6835	120.8
其中：煤炭工业	5029	5417	107.7
石油工业	24945	27785	111.4
钢铁工业	9251	13302	143.8
有色金属工业	3192	6480	203.0
机械工业	4750	6035	127.1
化学加工工业	8120	11114	136.9
橡胶工业	4725	10688	226.2
建筑材料工业	2431	3641	149.8
造纸工业	9528	10306	108.2
纺织工业	4806	5107	106.3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67页。

（二）工业的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全国平均每一工人占有机械的总能力，1952年为2.1千瓦，1955年提高为3.0千瓦。煤炭工业中机械化程度提高情况发表6。

表6

	1952年	1956年
采煤纯机械化程度（%）	17.9	38.03
装煤机械化程度（%）	—	12.93
运煤机械化程度（%）	69.62	92.32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68页。

钢铁工业中，机械化高炉产量占全国生铁产量比重：1952年为43.8%，1955年已达59.1%。此外有色金属工业、金属加工工业、森林工业、纺织工业等部门机械化程

度都不断增长。

（三）技术经济定额逐步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工业部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逐步提高，情况如表 7。

表 7

	单位	1949 年	1952 年	1957 年
钢铁工业				
高炉利用系数①	吨/立方米·昼夜	0.62	1.02	1.32
平炉利用系数	吨/立方米·昼夜	2.42	4.78	7.21
煤炭工业				
回采率（%）②		63.1	76	81.9
电力工业				
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小时	2330	3800	4794
发电标准煤耗率	公斤/度	1.020	0.727	0.604
其中：公用电厂	公斤/度	0.961	0.685	0.573
建筑材料工业				
水泥窑每平方米小时产量	公斤			22.60
机械工业				
金属切削机床利用率（%）		—	58.8③	64.8
纺织工业				
棉纱每千锭时产量	公斤	16.60	19.64	20.67
棉布织机每台时产量	米	3.516	3.988	4.075
每件纱用棉量	公斤	205.85	198.97	193.56

①高炉利用系数是大、中型高炉的数字。

②煤炭工业回采率是大，中型煤矿的回采率。

③为 1953 年数字。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97 页。

此外，基本建设的技术力量在 5 年中也有了迅速的增长。到 1957 年我国已能设计一些比较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程，如年产 150 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 240 万吨原煤的煤矿，年产 7.5 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设备总容量 100 万千瓦的水电站，65 万千瓦的火电站等。这些都明显地反映出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五、工业建设地区分布逐步合理，资源勘探工作有了巨大进展

在旧中国，工业地区分布极不合理，多偏重于沿海地区，内地工业很少。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国家对工业投资在地区分配上作了适当的安排。情况如下：

（一）沿海地区新建企业适当减少，内地新建企业适当增多。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三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内地的投资就比在沿海投资为大（表8）。

表8

	1953年—1955年合计	其中①	
		沿海	内地
总计	100	44.5	52.4
其中：工业	100	44.7	55.3
建筑业	100	47.6	47.0
地质勘探	100	22.5	76.2
交通运输	100	29.3	52.1
农林水利	100	37.7	62.3
文教卫生	100	55.4	44.6

①沿海与内地的比重相加，不等于100，因为少数单位的部分投资不便按地区划分。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03页。

由表8可见，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三年，全国半数以上的投资是用于内地各项建设事业。这样，沿海地区新建企业相对减少，投资比重下降，增长速度缓慢；相反，内地则新建企业增多，投资比重上升，增长速度较快。如从工业增长速度看，见表9。

表9

	定基指数（以1950年为100）					1953年—1955年平均发展速度（以1952年为基期）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沿海	119.8	278.3	479.5	596.9	667.2	142
内地	259.7	462.3	861.3	1222.8	1444.3	155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04页。

沿海工业投资比重逐年下降和内地工业投资比重迅速增长，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沿海和内地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开始发生变化（表10）。

表10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工业总产值	100	100	100	100
沿海工业产值比重	73.0	71.7	69.7	68.1
内地工业产值比重	27.0	28.3	30.3	31.9

资料来源：同表9。

内地投资比重增大，逐步改变着国民经济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

（二）主要工业部门投资的地区分配，尽量和原料、燃料产区相适应。如国家对黑色金属工业投资，主要集中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三年，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三省黑色金属工业的投资占全国的81.7%，就是因为这里是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据1955年年末统计，辽宁地区集中了全国 $A+B+C_1$ 级铁矿储量的44.5%，锰矿储量的23.2%。

再如棉纺织工业的投资分配，主要在产棉区。1953年—1955年，河北、陕西、河南、山西等主要产棉区的棉花产量接近全国半数，而原有棉纺织企业产值（包括北京、天津）只占全国1/6。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国家在这些地区新建和改建了许多棉纺织厂，投资达57000万元，占全国73.2%，因而其产值比重已接近全国的1/3。

工业投资接近燃料产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注意到这一点。我国原有的煤炭、电力工业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华北地区，1954、1955两年，这两个地区的煤炭、电力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分别为84.4%和66%。为充分利用原有的燃料动力资源，1953年—1955年这两个地区全部工业投资比重占全国的70%，与此相适应，煤炭、电力工业的投资也各占83.7%和59%。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工业建设地区分布方面，除了注意到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以及投资地区接近工业原料和燃料产地以外，还适当地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发展，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西藏、昌都等地，投资中以交通运输和工业建设比重为大。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资源勘探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探明矿产资源是正确规定工业建设的先决条件。旧中国的地质勘探工作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资源勘探事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从1952年起到1956年止，5年来完成钻探进尺876万米，超过解放前半个世纪钻探总进尺的50倍以上；完成槽探989万立方米；完成各种比例尺的地质测量176万平方公里。1957年继续进行勘探工作。到1957年底，已经探明我国煤矿储量约为544亿吨，铁矿储量约56亿吨，石油、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储藏量都有很大增加。地质资源的勘探工作跟不上建设需要的情况，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大量进行地质勘探的结果，证明我国的各种矿产资源是极其丰富的。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个问题，除了表现在以上五个方面外，工业生产的飞速增长也是重要的表现之一。

第七章 “一五”时期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与我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各项经济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关于工业生产飞速发展的情况，已在上章中详细阐述。这里着重谈谈农业发展的情况。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在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农林水利的投资额达41.9亿元，其中用于水利的部分为25.5亿元。为了支援农民发展生产，5年内国家在供应大量农业生产资料的同时，还发放农业贷款78亿元。这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曾遭到很大的自然灾害，在5年中，只有1955年是丰收年，其余几年都是平年或歉收。1956年，灾情比较严重，但产量并没有减少，反而比丰收的1955年多产154亿斤，达3650亿斤。这是“组织起来的全国广大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自然灾害作了艰苦的斗争，获得了重大的胜利”的结果。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还是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3.5亿元，比1952年农业总产值483.9亿元，增长了24.7%，比1949年农业总产值325.9亿元，增长了85.2%。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

	绝对数（亿元）	指 数（%）		
		以 1949 年为 100	以 1952 年为 100	以上年为 100
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				
1949 年	326.0	100	67.4	
1952 年	484.0	148.5	100	
1953 年	499.0	153.1	103.1	103.1
1954 年	516.0	158.3	106.6	103.4
1955 年	555.0	170.2	114.7	107.6
1956 年	583.0	178.8	120.5	105.0
1957 年	604.0	185.3	124.8	103.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84》，132 页；《伟大的十年》，104 页数字制作。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农作物产量有了很大增长。粮食产量，1957 年达 3900.9 亿斤，比 1952 年（产量 3278.3 亿斤）增长了 19.0%；比 1949 年（产量 2263.6 亿斤）增长了 72.3%；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2774 亿斤）增长 40.6%。棉花产量，1957 年为 3280 万担，比 1952 年（产量 2607.4 万担）增长 25.8%，比 1949 年（888.8 万担）增长 69%，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698 万担）增长了 93.2%。5 年产量合计与解放前收成较好的 1932 年—1936 年 5 年比较：粮食增加 4100 余亿斤，约增加了 32%；棉花增加 7600 余万担，约增加了 1.2 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和棉花产量，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粮食是 3.7%，棉花是 4.7%。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棉花产量增长的具体情况，可见表 2。

表 2 粮食和棉花产量

	粮食产量（亿斤）	在粮食产量中				棉花产量（万担）
		稻谷	小麦	杂粮	薯类	
一、绝对数						
解放前最高年	2774	1147	466	1034	127	1698
1949 年	2263	973	276	716	197	889
1952 年	3278	1369	362	1030	327	2607
1953 年	3336	1425	366	1014	333	2349
1954 年	3390	1417	466	985	340	2130
1955 年	3678	1560	459	1099	378	3037
1956 年	3854	1649	496	1068	437	2890
1957 年	3900	1736	473	1053	438	3280

	粮食产量（亿斤）	在粮食产量中				棉花产量（万担）
		稻谷	小麦	杂粮	薯类	
二、指　数						
以解放前最高年为 100 1957 年	140.6	151.4	101.5	101.8	344.9	193.2
以 1949 年为 100 1957 年	172.3	178.4	171.4	147.1	222.3	369.0
以 1952 年为 100 1957 年	119.0	126.8	130.7	102.2	133.9	125.8
平均每年增长速度（%） 1953 年—1957 年	3.7	4.9	5.5	0.4	6.1	4.7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145 页、146 页表；《伟大的十年》，105 页、106 页表制作。

一些经济作物产量，也有很大增长（表 3）。

表 3

	大豆（亿斤）	花生（万担）	油菜子（万担）	甜菜（万担）	甘蔗（万担）	烤烟（万担）
一、绝对数						
1949 年	102	2536	1468	381	5284	86
1952 年	190	4632	1864	957	14232	443
1957 年	201	5142	1775	3002	20785	512
二、指数						
以 1949 年为 100 1957 年	197.1	202.8	120.9	787.9	393.4	597.3
以 1952 年为 100 1957 年	105.8	111.0	95.2	313.7	146.0	115.6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 1984》，147 页表；《伟大的十年》，109 页表制作。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亩产量）也有很大提高。具体情况见表 4。

表 4　　粮食和棉花每亩产量　　单位：斤

年	粮食	其中				棉花每亩产量
		稻谷	小麦	杂粮	薯类	
1949	142	252	86	101	187	22
1952	183	321	98	136	251	31
1953	183	336	95	132	246	30
1954	184	329	115	129	231	26
1955	197	357	115	140	251	35
1956	196	330	121	135	265	31
1957	204	359	114	139	278	38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107 页。

1957 年，我国已经有 65 个县、市分别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提出的亩产粮食 400 斤、500 斤、800 斤的要求；有 56 个县、市分别达到了亩产棉花（皮棉）60 斤、80 斤、100 斤的要求，即提前十年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任务。而广东省的澄海、潮安、揭阳……福建省的龙溪……湖北省的孝感，四川省的郫县等 11 个县，粮食亩产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 1000 斤。湖北省的麻城、广济，浙江省的慈溪，甘肃省的敦煌，河北省的石家庄等 5 个县、市，棉花亩产已经达到 100 斤以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还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的主要河流上建成了许多大型水库，如安徽的梅山、佛子岭，河南的南湾、薄山、白沙、板桥，河北的陡河，北京的官厅等。工程浩大的根治黄河的主要工程——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也于 1957 年 4 月开始施工。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在防洪蓄水、灌溉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主要水库见表 5。

表 5

水库名称	地　址	建成年月	水库容量（亿公方）
官厅水库	北　京	1954 年 5 月	22.70
佛子岭水库	安徽霍山	1954 年 10 月	5.82
薄山水库	河南确山	1954 年 12 月	2.92
南湾水库	河南信阳	1955 年 12 月	9.32
梅山水库	安徽金寨	1956 年 4 月	22.75
陡河水库	河北唐山	1956 年 12 月	1.34
白沙水库	河南禹县	1957 年 8 月	2.74
板桥水库	河南汝阳	1957 年 8 月	4.18
石门水库	湖北钟祥	1957 年 7 月	1.23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59 页。

5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195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67.745万亩。5年内，共增加灌溉面积21.809万亩，相当于1952年全部灌溉面积的69%。增加最多的一年是1956年，这一年新增的灌溉面积达11870万亩，占5年合计的一半以上，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1957年达235.866万亩，复种指数由1952年的131%，提高到1957年的141%。此外，5年内还改造洼地易涝面积19446万亩，水土保持初步控制面积达203503平方公里。

5年来，农业用拖拉机台数也不断增加。1952年只有2006台，1957年则增长为24629台，增长了11.3倍。

畜牧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得到了发展，1957年大牲畜繁殖头数为8382万头，比1952年（7646万头）增加了9.6%，已经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7151万头）。1957年猪的头数增加很快，为14590万头，比1952年（8977万头）增加了62.5%，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几乎一倍（解放前猪的最高年产量为7853万头）。羊的头数，1957年为9858万头，比1952年（6178万头）增长了59.6%。畜牧业和农业的关系十分密切。畜牧业可为农业提供肥料来源，猪粪尿是农田很好的肥料，一般养猪一头，可肥田2亩~3亩；畜牧业还可为农业提供动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农田基本上是靠畜力来耕种的；此外，畜牧业还为运输提供畜力。

5年内，增加了海洋渔业设备，积极地发展了淡水养殖，1957年水产总量达312万吨，比1952年增长87%。

在林业建设方面，广大群众积极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5年内，造林面积达21102万亩，其中营造用材林9320万亩。1956年造林面积扩大最多，这一年扩大了8600万亩，从而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造林计划。

营造防护林，主要是为了防御风沙，保护农田。防护林的地区主要在东北的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南东部、陕西北部、甘肃地区河西走廊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东北西部的防护林（即辽宁的昌图、彰武、康平、新民等县）建立起来后，可以挡住从内蒙古吹来的风沙。陕西省榆林地区是一个大风沙区，解放后当地人民即开始营造防沙林带，到1957年已经郁郁葱葱，能够抵挡风沙的侵袭了。

第二节 交通运输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运输和邮电建设的投资为90.1亿元，占同一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6.4%，其中铁道投资59.2亿元，占投资总额的10.8%。

大规模进行交通建设的结果，使旧中国交通落后的面貌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到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已达29862公里，比1952年（24512公里）增长了21.8%，比1949年（21989公里）增长35.8%。公路通车里程为254624公里，比1952年（126675

公里）增长 101%，即增长了 1 倍多，比 1949 年（80768 公里）增长了 215.3%，即增长了 2 倍多。5 年内，新建铁路 33 条，恢复铁路 3 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 10000 公里。工程巨大、穿过高山峻岭的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集二铁路，都已先后建成。宝成铁路是从陕西省的宝鸡到四川省的成都。铁路全长 680 公里。沿线到处是高山深谷、悬崖绝壁和纵横交错的河流。需要打通秦岭，横渡灵官峡，要穿过剑门山区，跨过渭河、嘉陵江、白河和涪江 19 次。要通过 280 条隧道，九百多座大、小桥梁，盘旋着登上秦岭。过去李白说，蜀道艰难，“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自从宝成铁路修通后，“难于上青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了。

在修建新铁路的同时，还加强和改造了现有铁路的技术设备，修建了许多复线，增加了通过能力。武汉长江大桥提前 2 年建成了。长江自古称“天堑”，江宽、水深、流急，地质情况复杂，河床沙层极不稳定，修筑大桥十分困难。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也做过勘测和设计，但一直没有建成。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建成了。从此南北贯通，天堑变通途。

在公路修筑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海拔高、工程艰巨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也都相继通车。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之间也修建了许多简易公路。

在水路运输方面，1957 年全国内河航运里程已达 144000 万多公里，比 1952 年（95000 多公里）增长 51.6%，在内河航行里程中可通轮船的里程为 39000 多公里，比 1952 年增加 28.5%。

在空运方面，1957 年，航空线路长度已达 26400 多公里，比 1952 年（13000 多公里）增加了 103.1%，即增加了 1 倍多。1956 年，我国民航飞机已能飞越世界屋脊，完成北京到拉萨以及拉萨到印度的试航任务。

民用航空除空运客货外，还可完成航空摄影、防治病虫害、森林调查、护林防火等航空任务。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运输路线增加的情况，详见表 6。

表 6　　单位：公里

	铁路营业里程	公路通车里程	内河通航里程		民用航空航线里程
			合计	其中：可通轮船里程	
一、绝对数					
1949 年	21989	80768	73615	24182	—
1952 年	22900	126675	95025	30508	13123
1953 年	23800	137103	95025	—	13971
1954 年	24500	146138	95025	—	15243
1955 年	25600	167282	99938	31685	15511

	铁路营业里程	公路通车里程	内河通航里程		民用航空航线里程
			合计	其中：可通轮船里程	
1956年	26500	226318	103619	38304	19082
1957年	26700	254624	144101	39194	26445
二、指数					
以1949年为100 1957年	121.4	315.3	195.7	162.1	232.2①
以1952年为100 1957年	116.9	201.0	151.6	128.5	201.5

①此数是以1950年为100计算的。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273页表；《伟大的十年》，127页～128页表制作。

交通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大大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现代化运输的货物运输量迅速增长。1957年货物运输量达80365万吨，比1952年（31516万吨）增加255%，即增加2倍半。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也大为提高。1957年客运量为63821万人，比1952年（24518万人）增长了260.3%，即增长了1倍半多。旅客周转量，1957年为496.3亿人公里，比1952年（248.4亿人公里）增长了近1倍。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货物运输量及货物周转量迅速增长的情况，详见表7。

表7　　货物周转量及货物周转量指数　　单位：亿吨公里

年　份	货物周转量总计	铁路	公路	水运	
				合计	其中：远洋运输
1949	255	184	8	63	
1950	454	394	9	51	
1951	631	516	11	104	17
1952	762	602	14	146	41
1953	990	781	23	186	37
1954	1203	932	29	242	70
1955	1320	982	34	304	66
1956	1591	1204	44	343	77
1957	1810	1346	48	416	75
（以1952年为100）					
1949	33.5	30.6	57.1	43.2	
19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57	237.5	223.6	342.9	284.9	182.9

资料来源：据《中华统计年鉴（1984）》，285页、286页表制作。

在邮电建设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取得了很大成就。1957年邮路总长度已达222.26万公里，比1952年（128.98万公里）增长了72.3%；电信线条长度，1957年合计为209.4万条公里，比1952年（88.2万条公里），增长了137.4%；其中长途电信，1957年达61.1万条公里，比1952年（36.5万条公里）增长了67.4%。在邮电业务总量方面也有较大的增加。1957年邮电业务总量为2.94亿元，比1952年（1.64亿元）增长了79.3%。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邮电事业发展情况，详表8。

表8

	邮路总长度（万公里）	电信线条长度（万条公里）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合计	长途电信	市内电话	县内电话	
一、绝对数						
解放前最高年份	74.8	56.1	46.8	9.3	—	—
1949年	70.6	57.6	29.2	7.5	20.9	0.97
1952年	129.0	88.2	36.5	11.1	40.6	1.64
1953年	151.5	102.9	45.6	13.0	44.3	1.98
1954年	164.0	113.8	48.7	15.2	49.9	2.19
1955年	173.9	127.2	51.2	17.4	58.6	2.38
1956年	181.1	185.6	56.4	21.6	107.6	2.98
1957年	222.3	209.4	61.1	23.1	125.2	2.94
二、指数						
以解放前最高年份为100 1957年	297.2	373.3	130.6	248.4	—	—
以1949年为100 1957年	314.9	363.5	209.2	308.0	599.0	303.1
以1952年为100 1957年	172.3	237.4	167.4	208.1	308.4	179.3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293页、296页表；《伟大的十年》，138页～193页表制作。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乡村邮电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全国大约只有59%的乡镇通达邮路，到1957年，全国基本上乡乡通邮了（通邮乡镇占乡镇总数的99%）。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也相应地扩大和发展起来。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74.2亿元，比1952年（276.8亿元）增长了71.3%。其中各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是：全民所有制商业，1952年占34.4%，1957年

上升为62.1%；集体所有制商业，1952年没有，1957年占16.4%；合营商业1952年占0.4%，1957年占16%；个体商业1952年占60.9%，1957年占2.7%。一些主要消费品的零售量，1957年比1952年增长的百分比是：粮食23、食用植物油35、盐31、糖87、棉布19、胶鞋82、机制纸54、卷烟75。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商业通过采购工农业产品、供给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物价等一系列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1957年，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农副产品采购额达217.5亿元，比1952年（140.8亿元）增长了54.5%，5年内，采购农副产品总额达962.7亿元。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对农副产品进行采购工作的同时，也积极通过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村各种生产资料。1957年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额为32.6亿元，比1952年（14.1亿元）增长了131.2%。5年内；共供应农村生产资料达142亿元。5年内，供应农村主要农业生产资料情况：化肥592.5万吨，农药43.5万吨，农药机械289.7万架，双轮带铧犁164.5万部，动力机械53.5万马力。这样多的生产资料投入农村，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粮食和其他几种主要商品（食用植物油、棉布、棉花等）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5年内，国家征收公粮1666亿斤，收购粮食2690亿斤，两者合计占粮食总产量（折成去壳粮）的28%，扣除销售给农村的部分，国家实际向农民征购的粮食为2592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16.6%。

我国的市场物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是稳定的。不过国家为了缩小解放前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计划地提高了一部分农产品的采购价格，而农村市场上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则基本上没有变动，这样，就大大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的差额，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如1957年全国农产品采购价格就比1952年提高了22.4%，而同年全国农村工业品零售物价则和1952年基本相同（只增长了1.6%）。具体情况见表9。

表9 物价指数

（以1952年平均价格为100）

年份	全国批发物价指数	全国零售物价指数	全国农产品采购价格指数	全国农村工业品零售物价指数
1953	98.7	103.2	110.1	98.5
1954	99.1	105.5	113.8	100.2
1955	99.7	106.3	113.2	101.4
1956	99.2	106.3	116.6	100.4
1957	100.1	108.6	122.4	101.6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153页表。

根据计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农产品采购价格的提高，农民约多增加收

入 110 亿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贸易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957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 104.5 亿元，比 1957 年（64.6 亿元）增长了 62%。在贸易构成上，1957 年我国进口贸易额构成，生产资料占 92%，消费资料占 8%。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充分利用对外贸易来进口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在出口贸易额构成上，工矿产品的比重逐渐增多。1952 年工矿产品出口额在全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为 17.9%，1957 年则提高为 28.4%。工矿产品在出口贸易额中所占比重的提高说明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

第三节　我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能够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业人员数目扩大了

建国初期，国民党政府曾经遗留给我们大量的失业人员，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些失业人员已经逐步就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生产的发展，不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安置，而且就业人数大大增加。

1957 年，全国职工人数已达 2450.6 万人，而 1949 年只有 800.4 万人，1952 年也只有 1580.4 万人。1957 年全国职工人数比 1949 年增加了 206.2%，比 1952 年增加了 55.1%。在全国职工中，女职工人数增长更快，1957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77.8%，即由 1952 年的 184.8 万人增长到 1957 年的 328.6 万人。关于全国职工工人数增长情况，详见表 10、表 11、表 12。

表 10　　职工队伍日益扩大　　单位：万人

年份	年末人数	较上年增加人数	较 1949 年增加人数
1949	800.4	—	—
1952	1580.4	298.9	780.0
1953	1825.6	245.2	1025.2
1954	1880.9	55.3	1080.5

年份	年末人数	较上年增加人数	较1949年增加人数
1955	1907.6	26.7	1107.2
1956	2423.0	515.4	1622.6
1957	2450.6	27.6	1650.2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159页4160页。

表11　　职工队伍日益扩大

年份	指数（%）		
	以1949年为100	以1952年为100	以上年为100
1952	197.5	100	123.3
1953	228.1	115.5	115.5
1954	235.0	119.0	103.0
1955	238.3	120.7	101.4
1956	302.7	153.3	127.0
1957	306.2	155.0	101.2

资料来源：同表10。

表12　　女职工人数的增加

年份	人数（万人）	指　数（%）		
		以1949年为100	以1952年为100	以上年为100
1949	60.0	100	—	—
1952	184.8	308.0	100	—
1953	213.2	355.3	115.4	115.4
1954	243.5	405.8	131.8	114.2
1955	247.3	412.2	133.8	101.6
1956	326.6	544.3	176.?	132.1
1957	328.6	547.7	177.8	100.6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161页。

二、职工工资不断提高

从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又提高了42.8%。1952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6元，1957年平均工资提高到637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年平均工资增加情况见表13。

表 13

年份	每平均工资（元）	指数（%）		
		以 1952 年为 100	以上年为 100	实际工资（元）（1952 年为 100）
1952	446	100	—	100
1953	496	111.2	111.2	105.8
1954	519	116.4	104.6	109.2
1955	534	119.7	102.9	112.1
1956	610	136.8	114.2	128.0
1957	637	142.8	104.4	130.3

资料来源：根据《伟大的十年》，191 页；《中国统计年鉴（1984）》，460 页制作。

三、整个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仅一般职工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般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见表 14。

表 14　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

年份	居民消费水平（元）		
	全国居民	农　民	非农业居民
1952	76	62	148
1953	87	69	181
1954	89	70	183
1955	94	76	188
1956	99	78	197
1957	02	79	205
	指数（以 1952 年为 100）		
1952	100	100	100
1953	107.7	103.2	115.0
1954	108.2	104.4	115.0
1955	115.1	113.4	117.9
1956	120.0	115.0	123.7
1957	122.9	117.1	126.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454 页。

四、职工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不断增加

与职工工资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家对职工的生活福利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先后在全国厂矿企业的职工中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学校等部门的公教人员中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这样就免除了广大职工在旧中国时代无法解决的由于生育、衰老、疾病、残废、死亡等所带来的困难。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为职工支付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共达 103 亿元。1957 年，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达 1150 万人，比 1952 年（330 万人）增长了近 2 倍半，比 1949 年（60 万人）增长了 18 倍多。详见表 15、表 16。

表 15　　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

年份	绝对数（万人）	指　数（%）	
		以 1949 年为 100	以上年为 100
1949	60.0	100	—
1950	140.0	233.3	233.3
1951	260.0	433.3	185.7
1952	330.0	550.0	126.9
1953	483.0	805.0	146.4
1954	538.0	896.7	111.4
1955	571.0	951.7	106.1
1956	741.7	1235.0	129.8
1957	1150.0	1916.7	155.1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193 页。

表 16　　全民所有制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

年　份	劳保福利费（亿元）	相当于工资总额的%
1952	9.5	14.0
1957	27.9	1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460 页。

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1957 年为 657.2 万人，比 1952 年（400 万人）增长了 64.3%。

5 年内，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1957 年、医院、疗养院的床位为 36.4 万张，而 1952 年只 18 万张，1949 年更少，只 8.4 万张。1957 年病床数比 1949 年增长了 333.3%，即增长了 3 倍多。

5 年内，医疗预防网迅速扩大，1957 年已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都有诊所。卫

生技术人员也大量增加，1957年有190.8万人，比1952年（104万人）增加83.5%。卫生技术人员增长情况见表17。

表17

	卫生技术人员总数	其　中			
		西医师	医士	护士	助产士
一、绝对数（万人）					
1950年	78.0	4.1	5.3	3.8	1.6
1952年	104.0	5.2	6.7	6.1	2.2
1957年	190.8	7.4	13.6	12.8	3.6
二、指数（%）					
以1950年为100 1957年	244.6	180.5	256.6	336.8	225.0
以1952年为100 1957年	183.5	142.3	203.0	210.0	163.6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191页。

职工住宅建筑面积也逐步扩大。国家投资新建的住宅面积，1952年累计额为1462万平方米，到1957年增长为100916万平方米。

城乡居民的储蓄额也不断增长。如以1950年储蓄额为100，则1952年为655%，1957年达到2119.4%，1957年储蓄额比1950年增长了20倍多。

五、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44.1万人，比1952年（19.1万人）增加了130.9%。1957年中等专科学校在校学生77.8万人，比1952年（63.6万人）增加了22.3%，比1949年（22.9万人）增加了239.7%。关于在校学生增加情况，详见表18。

表18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小学
一、绝对人数（万人）				
解放前最高年份	15.5	38.3	149.6	2368.3
1949年	11.7	22.9	103.9	2439.1
1952年	19.1	63.6	249.0	5110.1
1953年	21.2	66.8	293.3	5166.4
1954年	25.3	60.8	358.7	5121.8
1955年	28.8	53.7	390.0	5312.6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小学
1956 年	40.3	81.2	516.5	6346.4
1957 年	44.1	77.8	628.1	6427.9
二、指　数				
以 1949 年为 100 1957 年	376.9	339.7	604.5	263.5
以 1952 年为 100 1957 年	230.9	122.3	252.2	125.8

资料来源：根据《伟大的十年》，170 页～171 页表改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共毕业学生 26.9 万人，中等专科学校共毕业学生 84.2 万人。65 年内，普通中学共招生 875 万人，小学共招生 8800 万人。此外，群众办学、业余文化学习以及扫盲工作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国的教育事业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他们的子弟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了，各种学校在校学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在高等学校中，1952 年，工农成分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重是 20.5%，1957 年则上升到 36.3%；中等专科学校中，工农成分学生，1952 年占 57.1%，1957 年占 66.6%；普通中学中，工农成分学生，1952 年占 56.1%，1957 年占 69.1%。

1957 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共有 500 多个，研究人员 2 万多人，比 1952 年增长 2 倍以上。5 年内，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目不断增多（表 19)。

表 19　　单位：个

年　份	文化馆	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1949	896	55	21
1952	2448	83	35
1953	2441	93	49
1954	2392	93	46
1955	2413	96	50
1956	2584	375	67
1957	2748	400	72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181 页、191 页。

此外，5 年内，出版、广播、电影、戏剧等文化艺术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提高。1957 年全国农民的收入，比 1952 年提高了 27.9%。5 年内，农业税的征收额一直稳定在 1953 年的水平上，由于农业生产不断增长，而农业税额不变，这样，农民的负担相

对地减轻了；同时，国家适当地提高了若干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供应农村的工业品价格则比较稳定，这样也使农民得到了不少收益。在价格指数上，如以1952年平均价格为100，则1957年全国农产品采购价格指数为122.4%，而全国农村工业品零售物价指数则为101.6%。

总之，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比较大的提高。

第八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发展小结

第一节　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无论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留下的经济任务或是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值得记取。

一、及时地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留下来的经济任务

即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和进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改革。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这项任务的完成，无论从稳定新建立的人民政权，或是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在政治上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经济上，旧的生产关系，如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官僚资本的统治、地主阶级在农村中对土地的占有和对农民所进行的封建剥削等，并没有消除。如果不及时地消除这一反动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另外，通过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特别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把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也就使得人民共和国掌握起国家的经济命脉，而这一点正是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以及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所以，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立即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

二、进行了全国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和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

解放前各地解放区被分割成许多块，各解放区内的财政金融制度极不统一。解放后，各地解放区连成一片了，就需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财政金融制度。另外解放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起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这种经济本身也要求中央进行统一的领导

和管理。因为只有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使国营企业从生产到流通，有机地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作用。还有，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是百废待兴，而国营经济力量又很薄弱，国家的财力、物力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来解决国民经济恢复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会拖延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而且还会影响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当时中央决策，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一使用。当时各地也都能从全局出发，支持中央的统一工作，于是中央将税收、公粮、现金和物资管理等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国家调动了全国的财力、物力打击投机倒把势力，稳定城乡物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是突出的例子）。当然，这种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是适应当时的经济情况建立的，地方的机动权力太小，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地发挥。

三、正确对待和处理了民族工商业

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取得政权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时，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对待官僚资本主义采取没收的办法，使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则采取另外一种政策，即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区别对待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建国初期，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许多矛盾，如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中国共产党通过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等措施和斗争，解决了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恢复时期仍有两重作用，则对其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给予充分发挥的机会，但对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方面，则加以限制和进行必要的斗争。如国家通过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划定经营范围以及开展加工订货等途径，使其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有所发展，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协助国营商业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私营企业也得到了合理的利用。另一方面，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方面，政府则采取另外一些具体措施，如在价格和税收政策方面加以限制，以及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进行斗争，来限制和制止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所有这些做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得又快又好，与我们正确对待民族工商业所起的积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四、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各项工作任务的中心环节来抓，因而在较短的时期内，把残破的国民经济恢复起来，并稳定了刚刚建立的民主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的民主革命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当时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还在激烈地进行。一些刚解放的地区，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整党整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直到“三反”、“五反”等运动和斗争一个接一个，但我们的工作，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环节来抓。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是经济烂摊子、国民经济已经残破不堪，如果不及时地进行恢复，努力发展生产，人民的吃穿用就得不到起码的保证，社会生活就不可能稳定，刚刚建立的共和国也就不可能稳固。所以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决定在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紧紧盯住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生产恢复发展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紧密依靠工人阶级迅速恢复生产，人民政府还派出大批干部到生产战线去学习管理城市、管理生产。在农村中，新解放的地区并没有立即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在清匪反霸的同时，允许地主继续经营原来的土地，并收取一定的地租。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以后条件具备进行土地改革时，也是在改革和生产两不误的原则下进行。

正是由于人民政府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来保证这一方针的实施，因而使国民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另外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不仅改变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而且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也比较快，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如 1952 年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比 1949 年增长 3.1 倍；私营资本主义工业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却在迅速下降。1949 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部工业产值（不含个体工业）中占 34.7%，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 9.5%（包括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资本主义工业占 55.8%。到 1952 年，社会主义工业占 56.0%，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 26.9%，资本主义工业只占 17.1%。在商业（零售）方面，1952 年社会主义商业零售额比 1950 年增长 4.1 倍，在全部零售商业中，社会主义商业所占比重从 1950 年的 15%上升到 1952 年的 42.6%，合作社商业占 0.2%，私营商业占 57.2%。

由上可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得到彻底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第二节　1953年—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从1953年起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根据这条总路线的要求，人民政府又制定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既进行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五"期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探讨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有益的。正如周恩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

一、经济建设方面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执行结果，比较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进行了921个限额以上项目的建设，其中包括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中的135个项目进行了施工，并在内地兴建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为了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五"时期经济建设总的方针是以重工业为建设重点。这一方针，从当时国内国际环境来看，是必要的。特别是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在当时条件下，技术上也是先进的，因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我国工业化的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不过，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一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建设方针，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将会和计划体制一起，越来越制约和限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五"执行的情况基本上是好的。年度间虽然稍有起伏，但大体上是平衡的。

"一五"期间工农业生产增长情况（速度与上年比较）如表1。

表 1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	农　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53	14.4%	3.1%	26.7%	36.9%
1954	9.5%	3.4%	14.3%	19.8%
1955	6.6%	7.6%	平	14.5%
1956	16.5%	5.0%	19.7%	39.7%
1957	7.9%	3.6%	5.7%	1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25 页。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在工农业净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动，如表 2。表中数字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净产值。

表 2

年份	农　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49	84.5%	11.0%	4.5%
1952	74.7%	14.5%	10.8%
1957	62.3%	18.6%	19.1%

资料来源：薛暮桥：《艰苦创业 40 年》，载《经济管理》，1989（9）。

如按一般产值见表 3。

表 3

年份	农　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49	20.0%	22.1%	7.9%
1952	56.9%	27.8%	15.3%
1957	43.3%	31.2%	25.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27 页。

二、经济建设中要贯彻量力而为原则

“一五”期间，国家经济建设得以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贯彻了量力而为、循序渐进、重点建设、稳步发展的方针的结果。据“一五”计划期间的经验，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的规模须与财力、物力相适应。制定计划时，要注意量力而为，并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即留有余地。这样，经济建设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我国“一五”计划中所规定的经济建设基本任务和各项指标，基本上是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这主要表现在国民收入积累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具体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一五”时期国民收入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

年份	国民收入使用额（亿元）	消费额（亿元）	积累额（亿元）	积累率（%）
1953	722	559	168	23.3
1954	765	570	195	25.5
1955	807	622	185	22.9
1956	888	671	217	24.4
1957	935	702	233	24.9
合计	4117	3124	998	24.2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32 页数字计算。

“一五”时期国民收入、积累、财政收支、基建拨款的比例见表 5。

表 5

年份	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	基建拨款占财政支出（%）
1953	23.3	31.4	32
1954	25.5	35.1	34.2
1955	22.9	34.5	32.9
1956	24.4	32.6	45.7
1957	24.9	34.2	40.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35 页。

“一五”期间，我国国民收入积累率大体上保持在 20%～25%之间，基本建设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 35%～40%（1956 年偏离）之间是适当的。这种比例关系既能保证经济建设的进行，又能兼顾人民生活的提高。从而使国民经济比较稳定地向前发展。

三、进行重点建设也要照顾到一般

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后，国家的经济力量仍然十分薄弱，财力、物力仍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经济建设工作必须有重点地进行。当时经济建设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以苏联援助建设的 156 项为重点。156 项中国防军工项目占相当比重，这因为是当时美国侵略朝鲜影响我国安全，从国际环境考虑安排的。但 156 项中，大部分还是民用项目，主要是煤炭、电力、机械、冶金、石油和化工，轻工业安排较少。

有了建设重点，国家就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来进行。5 年内，国家财政收入共集中 1300 多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总额的 1/3。平均每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33.56%。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是 588.47 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 531.18 亿元，

占90.3%；国家预算外的投资57.29亿元，占9.7%。“一五”期间，基建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6%。5年中国家掌握的统配和部管物资由1952年的227种增加到532种，它们占物资总量的比重达70%～80%，保证了重点建设的物资需要。在建设人才方面，当时比较缺乏，但国家还是抽调优秀干部充实了工业建设部门。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1月至1954年9月，就有16.3万多名干部从其他部门转到工矿部门。另外，还加紧培养训练，使建设所需人才基本上得到了保证。

“一五”期间，搞重点建设但并不是不顾一般，而是把重点和一般很好地结合起来，搞好综合平衡。如重点集中于能源、冶金、机械制造等；同时也采取措施促进交通运输、农业、轻纺工业的发展。另外投资集中于骨干大型企业，但也照顾到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等。

四、维持农、轻、重协调的比例关系

“一五”期间，国家重点进行了工业建设，而且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并没有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如果某一部门过分落后或者过分突出，就必然会影响其他部门的发展，引起比例关系的失调，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不能协调地、正常地发展。“一五”计划文件中明确指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还是比较协调的。

（一）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一五”时期，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工业总产值为18%。两者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虽然差距较大一些，但还是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大，工业比重小。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比重大大上升，农业比重大大下降，但相对来说，农业比重还是比较大。如1952年，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仍占56.9%，工业占43.1%。1957年农业下降为43.3%，工业占56.7%。这样，农业增长速度虽然较工业慢，但每年平均增长4.5%的速度，还是基本上可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

（二）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关系方面。在1952年—1957年期间，重工业产值增长了210.?%，轻工业产值增长了83.3%，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前者为25.4%，后者为12.9%。这种情况，既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轻工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至于轻工业得到适当的发展的具体情况，可以用“一五”期间消费品的供应和销售情况来证明。消费品主要由轻工业来生产，“一五”期间，与主要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相联系的消费品货源为2066.8亿元，而消费品购买力（大体上是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为1958.3亿元，两者相差108.5亿元。这说明轻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是适合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展需要的。

（三）从重、农、轻三者综合比例关系看。"一五"期间，重、轻、农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重工业是25.4%，轻工业12.9%，农业4.5%，全部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国民收入是8.9%。这种比例关系大体上是协调的。重工业发展较快，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农业和轻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基本上保证了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所以三者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工业发展过快，一些农业较慢）。

五、其他各种关系，如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注意新建企业，而且也要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因为现有工业企业仍然是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是新建企业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的重要来源。在这方面，"一五"时期进行工业化建设时，做得也是比较好的。据全国工业总产值大体计算，1957年，在新增加的产值中，由原有企业增产的约占70%左右，由新建和重大改建企业增产的只占30%左右。再从基本建设投资看，"一五"时期新建项目投资为271.62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6.2%，改建、扩建项目投资为309.24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6%。此外，"一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中还有对现有企业进行更新改造及其他措施的投资，这部分投资是逐年增长的。1953年为1.15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1954年为3.61亿元，占3.5%；1955年为4.88亿元，占4.6%；1956年为5.56亿元，占3.5%；1957年为7.91亿元，占5.2%。这就为发挥现有企业潜力提供了财政保证。

处理好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五"时期，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也比较好。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发展极不平衡，工业多集中于沿海地区，而内地则很少工业。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一五"期间，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需要加强内地工业的发展。但在注意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沿海地区的工业。从投资比例来看，"一五"期间，沿海地区包括工业在内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1.8%，内地占47.8%。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有472个分布在内地，占总额的68%，有222个分布在沿海地区，占32%。这种安排既加速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1952年—1957年，内地地区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0.0%，沿海地区工业为17%。这种比例关系，进一步改变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六、1953年的"小冒进"和1956年的"冒进"问题

整个"一五"期间，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总的来说，发展比较正常，编制"一五"计划中规定的各项指标，总的说来是适当的，是体现了量力而为的原则

的。但有的年度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差，这主要是1953年的基本建设中“小冒进”和1956年基本建设中的“冒进”问题。

1953年的“小冒进”，是1953年基本建设规模偏大。1953年包括工业在内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比1952年增长了107.6%，作为基本建设投资来源的国家财政收入却只比上年增长了21.3%；作为基本建设三大材料的钢材、水泥和木材只分别增长了38.7%，35.7%和42.3%。另外，与工业生产建设发展相联系的消费品购买力增长25.8%，而这种购买力赖以实现的消费品货源只增长了18.7%。这种情况表明，工业生产特别是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其他方面跟不上，特别是财政方面。为了解决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而带来的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1953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9月，全国总工会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竞赛，保证全面地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的紧急通知》。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工业生产建设计划的实现和国家预算的平衡。

1953年的“小冒进”以后，1954年在工业建设中遇到了困难。主要是工业设备和原料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供产销发生不平衡现象。另外，1953年又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原料减少，救灾费用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资金紧张。政府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推进了1954年的生产建设，使生产仍然得以稳定地发展。到1955年，1954年生产建设上所遇到的困难，在1955年仍然存在，自然灾害在1955年仍然继续发生。因此，在生产建设方面开始压缩削减，而且压缩削减得比较多。结果，财政上出现了许多结余，建材方面也出现了过剩现象。有人称这种情况为保守现象。可是到了1956年则又发生了“冒进”。

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为54.7%（1955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00.36亿元，1956年猛增为155.28亿元），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只有5.7%。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与此相联系的职工人数也大大增加，1956年计划新增加职工84万人，实际增加了230万人，超过计划146万人。工资总额增长也过快，195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比上年增长了37%，而以生活资料为主的轻工业生产却只增长了近20%。这种情况使得国家的物资供应紧张，国家财政出现赤字（18.3亿元）。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当时到处有缺口，物资供应紧张。因此1957年不得不放慢速度。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除了动用历年财政结余16.5亿元外，还向银行透支了1.8亿元。再加上这年信贷也出现了差额，所以货币的发行量增加了。与1955年相比，1954年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6.9亿元。市场上供需矛盾增加，商品供应紧张。1956年社会零售商品货源与当年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就达25.6亿元（当年消费品购买力增长21.3%，而消费品货源只增长2.6%），因而不得不动用国家的商品物资库存约20亿元。

当然，这种“冒进”只是局部性的。如基建投资多支出的15亿元~20亿元，实际上只相当同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6%；社会商品零售货源与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25.6亿元，也只占当年社会商品购买力的5.3%；动用的国家库存物资20亿元，也只占很小一部分，当年仅商业部门库存物资就有200亿元~300亿元。但是，这里的

经验教训，还是值得认真吸取的。这种忽视量力而为原则、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比较顺利的时期，往往不顾客观条件，贪多求快，因而出现"冒进"偏差。实际上，1955年夏季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影响下，已经出现了这种只注意需要而忽视可能的急躁冒进情况。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956年6月，李先念在《关于预算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同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同时中央还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来纠正冒进的倾向。如1956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原规定增长的21.7%，压缩下调为19.7%；粮食增长，由9.1%下降为5.4%；棉花由增长18%，下降为17%。另外，对农业中过大的生产投资和非生产性开支，也加以削减。在压缩增长速度的同时，政府还号召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经过这些措施，纠正了一度出现的冒进倾向，使国民经济沿着积极、稳妥、可靠的道路发展。

七、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一）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指出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改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胜利。另外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也创造了不少经验。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和赎买的政策，这是一种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减少了很多阻力，使改造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从改造形式上看，成功地创造了由低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再由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形式（在高级形式中，又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由初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形式，使资本家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改造）。另外还创造了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进行的形式，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使其从剥削分子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避免了由于资本家的反抗和破坏而产生的阻碍，没有使社会发生什么震动和不安。

在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方面，有步骤地将其组织起来，从初级的互助合作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逐步地把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的公有制。

（二）《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缺点，主要是，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原来规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期间来完成。但具体改造工作，只是几年就完成了，这里就有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的问题。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1953年起，到

1956年上半年，就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显然是过快了。另外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连小商小贩也都组织起来，个体经济完全被消灭了，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而经济却十分落后。在这种条件下，小商小贩以及一些个体手工业者（甚至一些小的私营工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他们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还是社会所需要的，过急地把他们都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和经营，既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又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对生产和生活都是不利的。至于对小坐商和小摊贩实行公私合营更是不妥当的，可以继续让他们实行代购代销，以发挥作用。所以，在改变过去的旧制度时，应当慎重地对待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法，对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形式，应当保留，或者适当地保留一段时间，不要过急地加以改变。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也有要求过急、实行过快过早的情况。本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规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间是15年，即用3个五年计划来完成。但实行的结果，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1955年—1956年高潮时期）就完成了。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时，为了更好地实现总路线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规定，中共中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来又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主要是提倡农民组织起来；另外也指出了农民组织起来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文件和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是要把我国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放在既稳定又健康的发展基础上。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最初几年里进行得还比较正常，到195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3.4万个，参加的农户数为1692万户，占全国农户的比重为14.2%（1953年为0.2%）。但是，到了1954年冬和1955年春，有些地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不断发生。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提出了“停、缩、发”的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停（停止发展）、缩（实行收缩）、发（适当发展）的方针。《通知》的精神是强调要控制合作社的发展，着重巩固已有成果。根据《通知》的精神，各地采取措施，贯彻了“停、缩、发”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平稳发展的趋势。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就要到来”，并批判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他还把那些认为合作化运动应该整顿巩固的同志，说成是“小脚女人”，批评他们走得太慢了。同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报告，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下面一些具体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情况：1955年6月，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是63.4万个，到10月底发展为127.7万个，到12月底更达190.6万个。参加户数，12月底已达754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达63.3%。到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已基本完成，1956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178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亿多，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农业合作社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出现高潮，到1956年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地完成了。对于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搞得过急过快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这项工作（指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著者）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有的同志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曾经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改造似乎提得过早，特别是1955年以后跑步前进。形式上是出于群众自愿，实际上是政治压力压上去的。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数，1954年还只2%，1955年上升到14.2%，都是初级社，1956年跃进到96.3%，其中有87.8%是高级社了。初级社除按劳分配外，还有土地分红，是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合作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完全按劳分配，土地已从农户所有变为合作社公有了。

过急的并社和合作化的升级，带来许多新问题。如合作社规模过大，干部管理水平一时跟不上；财务管理上出现混乱现象；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更由于高级社是统一组织劳动生产，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因而使社员的副业生产有的受到影响，出现衰萎现象。而所有以上情况都会影响到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点从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据统计，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指数（以上年为100），1953年为103.1，1954年为103.4，1955年107.6，而1956年比1955年增长速度就下降了，为105，1957年更下降为103.6。从绝对数字看，1953年农业总产值为510亿元，1954年为535亿元，1955年为575亿元，1956年为610亿元，1957年下降为537亿元。

第三节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反思

我们前面谈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出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现在提出“反思”，就是反过来回想一下这一段历史，分析一下这一段历史，在已经经过了40多年的今天，特别是经过了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确定的我们的社会将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观这一段历史，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下面分几个问题来分析。

一、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出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立即提出。在《共同纲领》中只谈到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没有提社会主义问题。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一再告诉大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比较遥远的事，当前应该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建设。如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谈到何时实现社会主义时，就说：搞社会

主义要十五年左右时间。1951 年 5 月，刘少奇解释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方针时也说：我们在十年经济计划完成后，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还说，十年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在 1952 年下半年到 1953 年期间。1952 年 8 月，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 38 次会议上提出了国家要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年 9 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后来他又讲到什么是“过渡时期”时说，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从 1952 年 8 月就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而不是等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再采取什么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 年 4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了这一条总路线。看来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

经过 40 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过早了。40 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不但允许存在，而且还可以发展，它们在当前的“四化”建设中仍具有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现在如此，40 年前更应该是如此。因此，现在反思来看，当时还是维持和坚持《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原则比较好，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过早了，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这个问题，薄一波在回忆中说道：“纲领（指《共同纲领》）中没有写社会主义，也没有写‘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当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这是一个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当时毛泽东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搞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等条件成熟后，再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的发展说明，当时的这一设想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如果按《共同纲领》坚持十年二十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仍难免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但有可能避免那些由于急于求成而遭致的曲折。”

二、关于对资改造问题

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意味着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经济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解放前，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到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相反地，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认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当然，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提法。

建国后，毛泽东与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时，也没有提到消灭资本主义问题，他还要求全党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他说，只要私营工商业有利于人民利益，就允许它们发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时，更是鼓励资本家放手经营，他说，他

们经营得好，对国家有利，对经济建设是有功的。《共同纲领》中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提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单位，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到些福利……国家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

但是，到1951年当山西省委提出，在常年互助组基础上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借以动摇私有制基础时，而刘少奇与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的做法是空想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却公开支持并发展了山西省委的意见，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这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转而要消灭私有制，在思想认识上的公开表示。因此，当1953年李维汉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调查报告时，毛泽东立刻同意了李维汉的意见，紧接着就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40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提出对资改造是过早了。因为我国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包括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普遍存在和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从这方面看，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对资改造也是过早了。

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是解决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惟一正确道路，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走合作化道路。另外，为了防止小农经济在发展中出现分化现象、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应该积极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邓子恢在建国初期，他作为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虽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有上千年历史，个体变集体，小生产变为大生产，决非朝呼夕至之事。因此，他主张，引导小农走合作化道路应该采取适当过渡形式和步骤，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他认为，一般应该经过四个阶段：即一要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提高；二要有国家工业化的帮助；三要随着农民文化素质提高而提高；四要按照群众运动规律办事，由低级到高级。

在这方面他和毛泽东的看法有矛盾（毛泽东的看法是群众起来后，应该鼓气，“乘热打铁”，促进合作化快速发展）。因此，当1953年农村出现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合作社时（即“小冒进”），邓子恢提出稳步前进的方针，并缩减农村互助合作发展计划（即“反冒进”）。毛泽东知道后，批评了邓子恢，说他的“反冒进”是错误的，要求加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并要邓做检讨。但是邓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自我批评。

后来，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很快进入了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的阶段。1954年秋

到1955年1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又一次大幅度发展，再次出现急躁冒进倾向。1955年3月，经过毛泽东同意，中央发出“停、缩、发”三字方针，4月20日又发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指示。但到1955年5月，当毛泽东看到农业形势好转时，就又改变了原来的“停、缩、发”三字方针，又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幅度发展起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5万个）。1956年春，毛泽东又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由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和其他领导同志都认为这样发展太快，提出发展到100万个，毛不同意，责成邓增加数字，邓则认为许多地方条件不成熟，不宜增加。为此，毛泽东对邓子恢大加批判，说邓的“思想要用大炮轰！”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时；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犯了右倾思想错误。10月又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样，不用几个月的功夫，农业合作化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关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进行反思，历史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利用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对中国的小农经济，搞农业合作化不一定是好形式，特别是急于求成的搞法。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农村改变了过去的人民公社所有制下的集体生产形式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9年3月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改为“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却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这种形式还要维持很长一段时期（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又规定，农村土地个人承包制四十年不变）。另外，这种形式在“四化”建设中，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大工业的发展也是相适应的。这样，再反过来看农业合作化问题，就可以看出，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并不是成功的方式，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如此。

第九章　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节　七年总结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此，开始进入了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这一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刘少奇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一共谈了32个部委(包括国务院直属局)。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也亲自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时，有时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也在座。4月下旬，又听取了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市委的汇报。汇报期间，正值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2月24日，赫鲁晓夫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共中央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明确表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共产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这后一点，对汇报特别重要，大家可以比较客观地来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了。毛泽东早就讲过，要以苏联为鉴戒，现在，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调查研究、集体讨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吸取苏联的教训的基础上，1952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讲话中，毛泽东分别论述了十个方面的关系。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毛泽东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看，这个论断大体上符合实际。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之比是4:1，虽然工业增长速度稍快了些，两者基本上是协调的。在此期间，轻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2.9%，重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25.4%。1957年，轻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64.5%下降到55%，重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35.5%上升为45%，基本上是合理的。在此期间，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不仅大大加强了原有工业部门，而且建立了过去中国所没有过的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农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这和苏联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一段期间，农业总产值多数年份是下降的或者增长缓慢，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却很快，农业和工业增长比例经常在1:10以上。农产品产量下降。1953年，谷物产量只有8250万吨，低于沙皇俄国1913年8600万吨的水平。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也长期失调。和1913年相比，1956年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67倍，消费资料生产只增长12倍。一直到60年代中期，才被迫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速度，逐步使两者接近起来。东欧许多国家照搬苏联经验，也采取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由于重工业增长过快，影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曾使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陷入困境。例如，匈牙利在"一五"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是10:1，结果，不得不中途改变计划。

总结国内外经验，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且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这个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后来没有付诸实施。"大跃进"用的恰恰是前一种办法。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毛泽东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

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我国的海岸线很长，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份。根据1952年统计，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沿海各省（市）的工业产值占70%以上（上海、天津两市即占30%以上）。这些地区，在全国主要轻工业产品产量中的比重是：棉纱占82.6%，棉布占88.3%，火柴占72.2%，机制纸占69.8%，糖占67.5%，面粉占63.6%，食盐占77.1%，卷烟占64.2%，胶鞋占83.2%。在全国重工业产品中，有些产品所占比重也很大，例如钢占85.5%。在“一五”期间，沿海地区作为主要工业基地，担负着为国家建设供应物资设备、培养技术干部和积累资金的重大任务，同时，对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生产指标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计划指标计算，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新建和重大改建企业的产值只占16%，原有企业的产值占84%左右，其中70%以上在沿海地区。但是，在“一五”初期，却对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在沿海不建新厂，对有的城市甚至有维持与缩小的考虑。以上海市为例，1955年2月，曾提出紧缩人口与加强战备的方针。当年，市区人口比上年减少36.1万多人，轻纺工业投资比1954年减少将近一半，工业生产出现解放以来的首次下降。据统计，1955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52年的19.8%下降为17.4%；同期，占沿海地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三市七省）的比重，从32%下降为28.8%。说明上海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比全国慢，也赶不上其他沿海地区。

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应当抓住这个时机，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好好地办工业，不能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他认为：“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他认为这不会妨碍内地工业的发展，相反地，“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毛泽东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论述，解放了沿海地区的生产力。根据这个精神，上海市委在1956年提出“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上海市对工业积极改造，扩大生产，加上其他有利条件，195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比1955年增长34.3%，比全国增长28.2%的幅度大6.1%。同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也从1955年的17.4%回升到18.2%。沿海其他省（市）的工业也有新的发展。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在谈到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

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新的战略方针的提出，和34个部委的汇报有密切关系。国家计委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反映："由于当时国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1954、1955年又加台湾海峡局势紧张，1956年初，我国在酝酿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长远规划中，曾经有过一种设想：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目标，要求在1961年达到满足战时最大需要量。按照这个设想，在1956到1959年的4年中，每年必须建50个大型国防工业工厂。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后经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达到最大需要量的时间推迟到1964年，满足最大需要量的产品，30%靠战时动用民用工业部门生产，70%靠国防工业生产。这样安排，仍然非常紧张。由于进度安排快，高峰期集中，投资、材料、设备、技术力量远不能满足需要。国防工业的加快，又影响到电站、钢铁、化工、石油、民用机械等的建设也跟着加快，甚至连轻工业部门的酒精、橡胶、甘油等的生产也得加快，从而导致整个工业部门全面紧张。"这对新的战略方针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毛泽东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毛泽东着重讲了国家和工厂的关系。他强调工厂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当时，我国的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照搬苏联的办法，实行直接计划。国家下达指令性指标，主要生产资料由各主管部门按计划供应，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收购或调拨。企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支出全部由财政拨款。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只有开支200元到500元的机动权。这种体制，严重地束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关于企业和工人的关系，毛泽东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据劳动部统计，1955年同1952年比较，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41.8%，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提高14.7%，生活费指数提高7.3%，实际工资提高6.9%，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

增长的幅度。轻工、纺织这两个为国家提供积累较多的部门，职工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毛泽东认为，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

关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苏联从1933年开始，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这种办法带有征税的性质。集体农庄必须首先完成义务交售任务，才能把剩下的农产品在农庄内部分配或者在市场上出售。义务交售的价格很低，数量也很大，一开始，义务交售占粮食总收购量的80%，后来比重有所缩小，1952年仍占25%。由于价格远远低于价值，农民在出售农产品以后收不回成本，无力扩大再生产，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集体农业生产长期增长缓慢。

毛泽东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没有实行义务交售制。1953、1954年对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按照正常价格收购的。由于在实行统购统销以前，已经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并相应地提高了花生、茶叶、生猪、甜菜的价格；取消了粮食、棉花、花生、烤烟的季节差价，采用全年的最高价格，农民收入还有所增加。对工农业产品交换，解放以后，我们一直采取缩小"剪刀差"的政策。农产品价格逐年有所提高（只有1955年略有降低），工业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某些农业生产资料、工业器材和医药的销售价格还有所降低。1955年和1950年相比，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约缩小18%。但是，在粮食问题上1954年我们也犯过错误。因此，毛泽东说："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毛泽东强调："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他要求"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这一要求，后来并未完全做到。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34个部委的汇报反映，中央对地方国民经济计划、事业指标和财政收支，管得过多、过细、过分集中，束缚了地方的积极性。"一五"期间，基本建设项目中绝大部分直属中央各工业部门管理，投资和建设任务由中央各工业部门直接安排。在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中，属于中央项目的占79%，属于地方项目的仅占21%，同期国家投资约占

基本建设总投资的90%，这表明基本建设拨款大部分集中在国家预算内和中央手中。1953年以后，全国划分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市）三级财政。当时，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范围，按照主次轻重以及集中和分散的不同情况，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大体比例。地方收多于支者，上缴中央，地方收少于支者，由中央补助。50年代初财权高度集中，地方财政结余是用来抵补地方下一年度支出的。从1954年起，虽然提出地方财政收入结余，不再上缴，在制度上准许地方可以在下一年度动用上年结余，实际上并未做到。"一五"时期的绝大部分资金集中在中央手里。这个时期的财政总收入中，中央占80%，地方（包括省、县两级）只占20%；在财政总支出中，中央占75%，地方占25%。对这种状况，地方很不满意，认为中央束缚了他们的积极性。

财政部每年下达预算指标，中央各主管部也下达自己的指标和要求，收支科目列得很细。虽允许地方作"类与类'、"款与款"之间的调剂，但调进者举手欢迎，调出者多方抵制，最后还得请示各自的上级。地方调剂权事实上是很有限的。省一级的财政收入只有三项：5%的农业税附加、3%的总预备费、自筹部分资金，三项收入数额都不大。省级财权除了这三项外，与中央级的预算单位没有什么区别。县和乡更没有什么财权。这就形成县要钱向省要，省要钱向中央要，对调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提出地方结余不上缴，这有利于鼓励地方增收节支，多办一些事情。但由于地方实际上很难行使调剂权，遇到调剂项目时，就请示中央主管部，等主管部答复下来时，时间已晚，该花的钱年内已花不出去了，只好作为年终节余，上缴中央。这种体制不仅限制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而且意味着许多该办的事情没有办。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说："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还说："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毛泽东主张："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毛泽东说："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我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已在解放区开始实行。新中国成立后，在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有

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完全符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

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和文化却长期落后。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发展。1956 年上半年统计，农业产量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平均增加了将近半倍，牧业区的牲畜头数平均增加了将近 1 倍，并且建立了 423 个现代工业企业。从来没有一所小学、一所医院和一所商店的少数民族中，有了学校、医院和商店，交通闭塞的西藏高原，修通了公路，开辟了航空线。但是，尚未改变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说："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主要是让民主党派监督执政的共产党。当时，邓小平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曾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他主张，要扩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因为"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他还说："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这个阐释，是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的。

八、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说："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在这里，毛泽东总结过去肃反的经验，并接受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教训，肯定了以

下几个问题。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他说：“斯大林不知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

九、是非关系

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论十大关系》讲话，总结了我国在建国后 7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实际上包含了建国前 28 年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泽

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这篇讲话，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得出了若干规律性的认识。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遗产。正如1975年邓小平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第二节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是成功的。在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决议还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通过了根据这个方针制定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能够顺利通过，来之不易。

据薄一波回忆，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问题。各部汇报自己的设想。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000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8.6%，"二五"9.9%，"三五"10.1%，15年平均年增长9.5%。10月5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同年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远景，形成《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作为中央通知发给上海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十七条》提出，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达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800斤。同时提出，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耕地面

积达 18 亿亩左右。照此面积计算，1967 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 6000 亿斤，而是 10632.8 亿斤了。毛泽东在 12 月 27 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如果增加 200%，和上面计算的数字就差不多了。

1956 年 1 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把《农业十七条》扩展为 40 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 月 25 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开发表。《四十条》保留了《十七条》的粮、棉单产指标和增加耕地面积指标。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公布和在经济领域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迫使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 1955 年夏季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1 月 14 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的 1967 年的指标是：粮食 9500 亿斤（加上大豆实为 1 万亿斤）；棉花 1 亿担；钢 2400 万吨；原煤 33000 万吨。不少部门还把原定 1967 年实现的指标，提早 5 年，改为 1962 年实现。

各部在修改远景计划设想的同时，对原定的"二五"计划方案也作了修改。1955 年夏，在北戴河汇报时的 1962 年的指标是：粮食产量 4600 亿斤，棉花产量 4300 万担，钢产量 1100 万吨。修改以后，粮食产量增加到 6400 亿斤，棉花产量增加到 7000 万担，钢产量增加到 1200 万吨。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对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满意的，并主张 1962 年把钢搞到 1500 万吨。这样的指标，显然是过高了，它超过了实际的可能。7 月 3 日至 5 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报送的计划草案。周恩来认为，合作化后，虽然农业增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水、旱灾害总要起作用"。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要受影响"。周恩来和陈云主张，把钢产量降下来。钢少搞些，别的就都可以少些。经过 3 天的讨论，周恩来强调："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7 月下旬，计委编出新的方案。8 月 3 日至 16 日，周恩来、陈云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这个方案，并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提交给中央。

国务院提交给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1962 年的粮食产量指标是 5000 亿斤，棉花产量 4800 万担。同 1955 年北戴河汇报时的产量指标相比，粮食只增加 400 亿斤，棉花只增加 500 万担，相差不大；钢产量是 1050 万—1200 万吨，也比较接近。这些指标，被毛泽东采纳了。毛泽东当时为什么采纳了这些指标呢？可能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听了 34 个部委的汇报，他对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充分体现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1957 年 4 月，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十大关系。"

第二，1956 年 1 月第三次全国计划会议，制定了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主要问题是考虑需要多，对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研究不够，把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职工工资和增放农业贷款的盘子打大了。结果，出现了财政赤字、货币供应

量增加，商品库存减少，使国民经济各方面都处于相当紧张的局面。毛泽东不能不考虑这一事实。

第三，8月17日，苏联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约见我在莫斯科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转达苏联政府对我“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积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从“一五”的22%跳到“二五”的26%，对这个飞跃感到惊奇；“二五”投资比“一五”增长两倍，太大了；苏联因金属材料供应很紧张，而且还有工人罢工问题，对中国要求供应设备的生产很难保证，所提具体项目尚在研究，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困难。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我党中央复信，认为我“二五”计划草案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紧张的，而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性，来很谨慎地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复信明确表示，中国要求苏联在“二五”期间为109个新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将尽量予以满足，但所需设备，要从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某些项目1960年开始供应），更早地供应设备是不可能的。对这个因素，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是实事求是的。下面，是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的主要内容。

《建议》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以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步骤，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为保证上述基本任务的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采取如下的方针和部署：

（一）根据现在国内和国际条件及总的趋势来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下同），比1952年增长51.1%，预计执行的结果，可能增长60%以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新建和改建的企业陆续投入生产，原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的进一步发挥，私营工业在公私合营和国有化以后的设备潜力的发挥，农业和手工业在合作化以后的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要求在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计划（系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计划。下同）增长75%左右，工业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手工业。下同）比1957年计划增长1

倍左右，农业产值比1957年计划增长35%左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资料工业的增长速度仍然将高于消费资料工业的增长速度，要求1962年生产资料工业和消费资料工业各占50%左右。

（二）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厉行节约，1962年的国民收入，有可能比1957年增加50%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正确地处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稍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达到的水平（1956年为24.4%），以便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且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国营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将比第一个五年有较大的增加。财政支出必须同财政收入相适应，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并且保持一定的后备力量，以便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同时应当相应地增加信贷基金，保持信贷收支的平衡。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在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加速进行。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为着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第一个五年的35%左右，提高到40%左右。这样，第二个五年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可以比第一个五年大约增加1倍左右。在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的比重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58.2%提高到60%左右；农业、林业、水利投资的比重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7.6%提高到10%左右，以保证国民经济中两个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发展。

（三）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标志，因为重工业是建立我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的基础，也是完成我国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

要求1962年主要的重工业产品大约达到如下水平：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62年计划产量	1957年计划产量
发电量	亿度	400—430	159.0
原煤	万吨	19000—21000	11298.5
原油	万吨	500—600	201.2
钢	万吨	1050—1200	412.0
铝锭	万吨	10—12	2.0
化学肥料	万吨	300—320	57.8
冶金设备	万吨	3—4	0.8
发电设备	万千瓦	140—150	16.4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6—6.5	1.3
原木	万立方公尺	3100—3400	2000.0
水泥	万吨	1250—1450	600.0

（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应当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地加速轻工业的建设，以适应广大人民对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并且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

要求 1962 年主要的轻工业产品大约达到如下水平：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62 年计划产量	1957 年计划产量
棉纱	万件	800—900	500.0
棉布	万匹	23500—26000	16372.1
盐	万吨	1000—1100	755.4
食用植物油	万吨	310—320	179.4
糖（包括土糖）	万吨	240—250	110.0
机制纸	万吨	150—160	65.5

（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原则，在内地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各地区经济逐步走向平衡发展。但是在内地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地、充分地利用并且适当地发展近海各地原有的工业，这不但是为着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是为着支援内地的建设。在工业基本建设中，应当注意大、中、小型企业的相互配合，并且在地区上做到适当的分散。

（六）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协调，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首先保证粮食的增产，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同时保证主要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大豆等的增产，推动轻工业的发展。在农业发展中，还应该鼓励多种经营，使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和农家副业等都有较大的发展，保证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求 1962 年主要的农业产品大约达到如下水平：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62 年计划产量	1957 年计划产量
粮食	亿斤	5000 左右	3631.8
棉花	万担	4800 左右	3270.0
大豆	亿斤	250 左右	224.4

要求 1962 年主要牲畜的数量大约达到如下指标：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62年计划数量	1957年计划数量
牛	万头	9000左右	7361
马	万头	1100左右	834
羊	万头	17000左右	11304
猪	万头	25000左右	13834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贯彻执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整顿和巩固自己的组织，培养和选拔各类干部，加强经济管理和生产组织工作。应该在兼顾国家需要和农民福利的原则下，合理地安排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并且在不影响合作社集体生产的条件下，适当地给社员以必要的个人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容许农民经营适合于个人经营的各种农副业，以进一步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副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应该防止盲目并成大社，以免造成经营管理和生产组织工作上的困难，影响农业生产。

（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应该相应地发展运输和邮电事业，进一步建设新的铁路、公路和通讯线路，开辟水运和空运航线。同时应该有计划地加强和改进原有的运输和邮电设备，充分利用和适当发展民间运输工具，改善运输的组织工作，努力提高运输和通讯效率。

（八）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应该继续改进和调整商业网，进一步扩大商品流通，加强工业品、农产品的采购工作和供应工作；同时应该继续稳定物价，对不合理的价格逐步地加以调整。在工业品采购中，推行按质分等论价和在部分产品中实行选购办法，以督促落后工厂改进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

五年内，随着人民购买力的增长，要求196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57年计划增加50%左右。

继续实行粮食、油料、棉布等的统购统销和棉花的统购政策，以保证合理分配。统购商品中属于农民的自留部分和非统购统销的商品，应该容许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自由买卖，以扩大商品流通和便利人民的需要。应该在国家市场以外，有计划地保留和适当发展一些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并且补充国家市场的不足。

（九）在完成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应该对公私合营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妥善进行人事安排；并且根据条件成熟的情况，逐步实现公私合营企业的国有化。同时必须保存和继续发扬这些企业原来的优点，保证品种的不断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由于小厂、小店比较机动灵活，容易适应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在经济改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不要过分集中。对那些社会需要或者经营合理的小型工业企业应该保留下来，不要盲目并厂，以免削弱各方面的协作配合。商业更应该采取多样的经营方式，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领导下，保持适当的分散经营；要在城市居民区和农村中保存

适当数量的小商小贩，以便利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不宜过分集中，某些行业还应该适当分散，并且容许一部分手工业者、特别是特种手工艺品的生产者继续独立经营。农民兼营的而其产品又在本地销售的手工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农民个人经营，或者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

（十）应该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重工业的技术改造，迅速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重大改建的机器制造、冶金、化学、电力、石油、煤炭和无线电等主要的工矿企业，应该根据可能条件，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努力掌握这些新技术，以便把我国的工业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原有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其原有的生产潜力，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某些落后设备，提高原有企业的技术水平。一切新建、改建和原有的企业，都应该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条件，有效地和有计划地推广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生产方法，以迅速增加生产。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的技术改进，应该着重扩大水利灌溉和加强防洪排涝措施，试制和推广适合当地使用的各种改良农具，增产肥料，改进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和畜种等。同时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在国营农场、垦荒区和若干技术作物区，适当使用拖拉机耕种。

（十一）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应该积极地和有重点地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继续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在我国开始建立原子能科学、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作，并且在其他主要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以便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许多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接近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大力培养建设干部，努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继续派遣高等学校毕业生和教师到国外去学习我国缺乏的学科，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业余的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以便更多地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同时注意发展工人技术学校，并且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培养技术工人。

（十二）应该正确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都应该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国家计划，充分地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广泛地动员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社会主义建设尽可能快一些发展。

应该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各地方行政管理权限的扩大，一方面可以使地方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更大地发挥积极因素和生产潜力；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中央各部门集中力量，更多地进行全面规划，研究方针政策，掌握主要业务，加强工作检查，组织经验交流，因而又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

（十三）为了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工作，逐步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

（十四）应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正确地处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职工工资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地处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合理地安排劳动力，逐步地消除城市中的失业现象。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五年内工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各提高50%左右。五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将增力口600万到700万人。

应该在保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工资，五年内工人和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25%—30%。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以外，应该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争取做到一般社员能够增加收入，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五年内，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农民的全部收入可能增长25%—30%。

（十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增加资金积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增产节约的原则，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

（十六）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援助，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因此我国在发展国民经济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协作，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来往，以便实现各兄弟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援。

应该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我国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技术交流，以利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和经济发展。

建议着重指出："为了编好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区在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时候，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有利条件，反对那种看不到各种潜在力量、低估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右倾保守的偏向；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困难，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

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没有付诸实施，很快就被批判反冒进、"大跃进"所否定了。但它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文件，应该载人新中国的史册。

第一，这个文件，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七年经济建设，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保证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果完全按这个建议去做，就可以避免"大跃进"的挫折，使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第二，这个文件，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所阐述的思想和党的八大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对这五条都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案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第三节　可贵的探索

党的八大和八大前后，即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我们党思想活跃，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获得了许多成果。这些成果，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科学文化上的。这里，主要谈经济上的成果。

一、试图调整所有制结构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完全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陈云。如前所述，1956年1月，他就主张，对一部分不雇店员的小铺子，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1956年3月，他明确指出，夫妻店公私合营以后，要采取经销、代销的办法。他说："夫妻店担心进不了社会主义，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因为老百姓还要买小杂货、油盐酱醋，还要吃大饼、油条、馄饨、汤团。"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体经济会长期存在的。他在党的八大发言时，已经超出商业和手工业的范围，提出应该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同时，在理论上作出这样概括："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这里讲的是工商业，实际上也包括农业。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概括，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里是不曾有过的。

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根据八大的精神对所有制结构作了一些调整。在城镇，分散了一部分过于集中的小手工业和小商业，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也有所恢复和增加。在农村，允许一部分生产资料如鱼塘、菜地、果园、桑园、成片林木等可以暂不入社，归原主经营；允许社员家庭饲养一定数量的大牲畜；增加了社员的自留地，由原定一般不超过当年人均土地5%，增加到不超过10%；允许副业生产等采取大公经营、小公经营和个体经营等多种方式。这就使一度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国民经济增加了比较多的活力。

政策放宽以后，个体工商业户有了明显地增长。以手工业为例，上海市在9月份只有个体户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就增加了1100多人。武汉市在合作化高潮以后，只剩下个体从业人员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其他如天津、北京、青

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城市和地区，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有了成倍的增长。由于手工业生产比较简单，加上自由市场开放以后，购买原料比较方便，那些在合作化高潮以前已经歇业的手工业户纷纷复业了。一些失业或无业的城市居民和家庭妇女也从事手工业生产了。原来在农村从事副业生产的农民也转为专业的手工业者。有些新参加合作社的独立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看见单干有利可图，也退社单干了。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无害的事情。

但是，有些干部感到不安，甚至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11 月，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会议情况时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但又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所谓地下工厂，绝大部分是自发产生的个体手工业户和手工工厂。针对这一反映，12 月初，毛泽东找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谈话，讲了下面的意见：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

谈话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保留个体经济，也可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即"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比陈云在八大的发言更进一步了。这个主张立即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1956 年 12 月 29 日，刘少奇在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说："现在自由市场一开放，有很多作小生意的，私商也有一些。有一些资本家，他们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这个问题，过去没有研究过。最近，毛主席在工商联会议上说，要使地下工厂变成地上工厂，承认它，加以管理，只要它不违法。""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看你的花生好不好，看你的猪肉好不好。"1957 年 4 月，周恩来也说："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

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

至此，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初见端倪。但是，由于理论上不彻底（如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性质），很快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打断，终于又回到单一的公有制上去了。

二、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设想

1956年，在我国基本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暴露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这首先是从公私合营企业暴露出来的。企业合营以后，“一是工厂都愿意生产得多，生产得快，如果产品的样式多，经常换机器、原料，生产的就会少，就会慢。所以，有些工厂总是怕麻烦，只生产大路货，只管自己生产的方便，不顾消费者的需要。二是没有利润的刺激了，东西造好了是这样，造不好也是这样。”于是普遍出现了商品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的情况。陈云认为，产生这种弊端的根源在于统购包销制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一是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包销。好的，国家要，不好的，就不要。二是优质优价。好货好价钱，质量好的价高，不好的价低。这些都是市场调节的办法。1956年6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指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结果，“就是许多工厂由于已经包销，它们就不像自销时那样关心商品的质量。因为加工费是按成本加成的方法来核算的，因此许多工厂不热心于降低成本。六年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对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它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方法，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在定息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应该考虑采取新的更加完善的办法。”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主要是把由商业部门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办法，改变为由工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来管理这些企业的生产购销。工业专业公司接替商业部门管理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购销任务以后，商业部门与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之间的加工订货关系，将采取下列三种形式：一是继续统购包销；二是商业部门按照质量好坏和市场需要情况，对工厂产品进行选购；三是商业部门选购剩下的商品，工厂可以委托商业部门代销或者自销。同时，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内部的上下之间、地区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货关系。陈云说：“实行这种办法是否会出毛病呢？毛病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是一件新的事情，以前没有实行过。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我看要试一下，摸索一个时期，也许可能从中找出一条好的出路来。”

在党的八大发言时，陈云关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必须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他认为，为了改变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办法，并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些错误，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

施。其中，有关市场调节的措施有：

第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陈云说："应该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订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这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大体恢复一九五三年冬季以前的办法。"1953年冬季以前的办法，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办法。

第二，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的规定和办法。"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土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变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为了适应自由收购和自由贩运的需要，工商管理办法中今天已经不适用的部分，都必须加以改变。银行汇款支付办法中，那种'买醋的钱不准买酱油'、汇到甲地的款不准在乙地使用的机械限制的办法，必须改变。税务、运输、邮务部门过去为了制止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在税收方面和运输货物、邮寄商品方面的限制办法，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变，来活跃商品的交流。"

第三，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陈云说："目前在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在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因此我们对于下列三种情况，不要因为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而有所恐惧。这三种情况就是：（一）由于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的产品的价格，要适当地提高。应该看到，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在某些消费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下，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二）消费品中的新产品，因为初制的时候成本高，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应该允许它在初销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提价，等到成批生产而成本降低以后适当降价。在现在某些消费品品种规格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能鼓励消费品新品种的增加。（三）对于一部分小土产放松市场管理而改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后，在实行的初期，价格也会提高，因而就不能不在城市中相应提高销价。……应该看到，由于自由采购、自由贩运，一部分小土产在城市销售价格方面的上涨，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上涨的程度，我们仍然是可以约束的。这种价格上涨将促进小土产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

第四，适当变更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方法。"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但是国家计划对这些产品规定了每年的产值，对日用百货的生产部门，规定了降低成本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缴利润额。……国家计划既然规定了这些指标，并且层层下达，工厂的产品又是由商业部门包销的，因此，工厂的生产就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的需要，却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

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

最后，陈云从理论上概括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的这些主张，当时已经被党的八大所接受。在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

"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并且合理地调整物价，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

陈云是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但是，他的上述设想，已经冲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找到了一条利用市场调节的新路。这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但这些设想并没有变为现实。原因是，1957 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八大制定的路线，实行了一套"左"的政策。在理论上把市场调节等同于资本主义，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在实践上，由于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供求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也没有可能实现陈云的设想。

三、形成改进经济体制的决议和规定

改进经济体制，首先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来的。1956 年 5 月到 8 月，国务院根据讲话的精神召开全国体制会议，形成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草案确定了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的几条原则：（一）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二）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业和事业，应尽可能交给地方管理。（三）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地改进，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四）中央管理的主要

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由各部门下达的办法。（五）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给地方留一定的调剂幅度和机动权。会议还提出，体制的某些重大改变，在步骤安排上应稳步进行，决定1956年着手准备，1957年试办，到“二五”计划期间全面实施。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向全党宣告了这些原则和实施的步骤。

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委托陈云组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包括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落实这一决议。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上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11月14日，一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原则批准了这三个规定，自1958年起施行。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指出，“现行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缺点。一个是有些企业适宜于交给地方管理的，现在还由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同时，地方行政机关对于工业管理中的物资分配、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等方面的职权太小。另一个是企业主管人员对于本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工业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中的业务管得过多。这两个主要缺点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主管人员在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了纠正这两个缺点，国务院规定：

第一，适当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作的权限。这包括：（一）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作为地方企业。一切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都实行以中央各部为主的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加强地方对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领导和监督；（二）增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于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以内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关为本企业生产经营所申请分配的物资，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有权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需要的缓急，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剂；各个系统的企业，都要服从这个调剂。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的企业所生产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如果生产数量超过了国家计划规定数量，超过计划的部分，当地政府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提成，自行支配使用，但是原定的品种计划不能改变。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超过计划的产品，除了中央指定的少数企业和少数产品品种以外，地方政府也可以按照中央批准的比例分成；（三）原来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现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全部利润的20%归地方所得，80%归中央所得。所有地方政府参与利润分成的企业，上述规定的二八分成的比例，三年不变；（四）在人事管理方面，增加地方的管理权限。凡是属于中央各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都按照地方企业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的所有干部，在不削弱主要厂矿领导力量的条件下，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二，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这包括：（一）在计划管理

方面减少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责。在生产计划方面，把国务院指令性指标由12个减为4个，即：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其余8个指标，在一般情况下，都作为非指令性的指标。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于地方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在保证完成指令性指标的条件下，在国务院核定的地方投资总额以内，可以对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等等方面进行调剂。（二）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企业的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实行全额分成。分成的基数根据各工业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领取的四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用、新种类产品试制费用、劳动保护费用、零星购置费用），加上企业奖励基金，再加上40%的超计划利润，把各部所领取的这三笔收入与工业部门在同一时期所实现的全部上缴利润，以部为单位，分别算出比例，作为各工业部的固定分成比例。以后年度预算中，国家不再拨付四项费用和企业奖励基金，所有这些费用，统由利润固定分成中解决。分成比例确定以后，三年不变。取消现行的某些不合理规定，例如大修理不准“变形”、“增值”等规定。企业的事业费在保证完成计划的条件下，可以由企业在事业费总额内的项目之间调剂使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在上级规定的权限内，可以由企业增减或者报废。（三）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除企业主管负责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着眼于划定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确定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使地方有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来安排自己特殊的支出，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地方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规定包括：（一）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分为：地方固定收入。原地方企业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原已划给地方的七种税收及地方其他零星收入，全部划归地方；企业分成收入。凡属各省、直辖市用上述固定收入解决正常年度支出不足的，划给企业分成收入，即将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和虽然仍属中央管理但地方参与分成的企业的利润20%，分给企业所在省、直辖市，作为地方收入；调剂分成收入。凡属各省、直辖市用上述的地方固定收入和企业分成收入解决正常年度支出还不足的部分，再用不同比例的调剂收入来补足。调剂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农业税和公债收入。固定收入超过正常年度支出的，余额按一定比例上缴；固定收入加企业分成收入超过支出的，也按一定比例上缴。三种收入全部划给地方仍不够支出的，差额由中央拨款补助。（二）计算地方正常年度支出，应剔除重大灾荒的救济、堵口、复堤和国家计划的大规模移民垦荒等特殊性支出，也不计算地方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地方国营企业与公私合营企业的70%的流动资金。这些，都由中央拨款。（三）分成的计算方法和分成比例三年不变。（四）地方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收入超过支出，地方可以自行安排使用。地方预算的年终结余，全部留给地方，由地方在下年度安排使用。地方除了用中央的拨款举办基本建设以外，还可以用自己的收入举办一部分基本建设。（五）使地方得到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是这次财政体制改进的主要目的。但是，地方由于改进财政体制而多得的收入，应该有一个限度，它的原则是使地方可以有适当数量的机动财力，同时又能够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六）为

了适应民族自治区的财政经济发展情况，在计算民族自治区正常年度支出的时候，只扣除重大灾荒的救济、堵口、复堤和国家计划的大规模移民垦荒等特殊性支出，不扣除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划给民族自治区的收入，除了地方固定收入仍然全部划给自治区，企业分成收入同样按照全国20%的分成比例分给自治区以外，在自治区的各项调剂收入，也全部划给自治区，作为自治区收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包括以下的内容：（一）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商业机构的设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地方商业行政机构和企业管理机构，原则上实行合并。（二）中央各商业部门设在生产集中的城市或者口岸的采购供应站，实行以中央各商业部门领导为主、地方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行政机构设置的采购供应站，实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业行政机构领导为主、所在地政府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三）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除了某些大型企业，地方认为管理有困难的以外，其余全部移交给地方，由地方商业部门直接管理。（四）商业计划指标，国务院每年只颁发四个指标，即：收购计划、销售计划、职工总数、利润指标。同时，允许地方在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总额的执行中，有5%的或上或下的机动幅度。（五）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实行与地方全额分成。除了粮食经营和对外贸易的外销部分的利润以外，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都和地方实行二八分成，就是以利润中的20%归地方，80%归中央。（六）商品价格管理的分工。在农、副产品方面，凡是属于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由中央各商业部门统一规定，但是在非主要产区则委托地方政府根据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价格水平来管理。对第三类物资的价格和由地方确定为本地统一收购的物资的价格，由地方政府管理，但是应参照中央各商业部门掌握的价格水平，并且每年由中央规定一次价格升降的幅度。在工业品方面，除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调拨的物资和各工业部所管的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收购价格以外，所有其他工业品的收购价格，按照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原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品在市场的销售价格，主要市场和主要商品由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价格，次要市场和次要商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订价原则自行订价，并且注意同毗邻地区协商。（七）实行外汇分成。为了鼓励地方积极完成国家的出口计划和争取若干工农业产品超额出口，中央将所得外汇，分别给地方一定比例的提成。

第十章　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及其反复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党中央曾有所发现和察觉，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但是，庐山会议后所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和新的“大跃进”，使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断，国民经济又重新陷于严重比例关系失调之中。

第一节　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的初步纠正

一、关于对人民公社的整顿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到1959年七八月份庐山会议期间，党中央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并纠正所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提议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有了某些转变。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发展”。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着重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等问题；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共产风”，并提出1958年12月到1959年期间要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全力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要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检查整社工作，并对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

根据以上会议所纠正和解决的问题，以及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如下。

（一）纠正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主张“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前，曾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例如，有人把人民公社与全民所有制等同起来，认为劳动力、产品可以无偿调拨；有人混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认为中国在一两年内可以实现共产主

义；有人还错误地主张要废除商品生产，认为废除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废除家庭，就是共产主义等等。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和主张，毛泽东提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等。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中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现在全国农村已经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决议》还指出，这两个过渡，都必需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候离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将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至于离产品极大丰富、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这些目标，还有更长一段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宣布人民公社应“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提出“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以上会议还确定了人民公社权力下放，实行三级（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三级核算、以生产队（其规模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的体制等。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存在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所有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他批评了否认生产队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力，任意上调生产队的财产到公社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现象；指出各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拟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规定草案》）。《规定（草案）》中除了规定了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外，还规定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要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可以有合理的差别。还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仍归社员个人永远所有。

（二）明确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废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主张统一调拨劳动力、资金和产品，即实行产品调拨制度。会议指出，这种主张是十分错误的。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废除商品生产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不能避开一切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应该利用它们，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也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大队与大队之间、大队与公

社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以及公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都只能是商品交换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会议还明确指出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性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以无政府状态进行的；有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等经济杠杆的积极作用，是错误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建议广大干部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理论界也开展了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以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些对于澄清混乱思想，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三）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规定（草案）》中规定，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可以有合理的差别，就是说，要纠正平均主义、“共产风”、吃饭不要钱等混乱现象。为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还具体规定，工资制应把评工记分和评定工资级别结合起来，供给制应有所限制，有的公社还实行“定工吃饭，旷工交钱”的办法，对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和老人、儿童则仍然实行供给。1959 年人民公社夏收分配时，还规定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占收入的 60%左右。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的三包责任制和奖惩制度；推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在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中，工资部分要占 60% ~ 70%左右，供给部分约占 30% ~ 40%。这些措施虽然还说不上是完全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但对于纠正吃大锅饭、什么都包下来的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四）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恢复自留地制度和集市贸易。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员的自留地被取消了（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也不许私养家畜、家禽，集市贸易也被取消了。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和混乱现象时，对上述问题也做了纠正，明确规定：对猪、鸡、鹅、鸭实行集体喂养和社员个人喂养并重的方针；恢复自留地制度，社员自留地数量仍按高级社章程规定，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面积的 5%；鼓励社员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水边路旁闲散土地种植庄稼、树木；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归社员私有，收益归社员支配。

为了促进人民公社多种经营的发展，便利社员交换和调剂商品，规定人民公社生产队生产的国家计划收购和供应的第一类物资、国家统一收购的第二类物资以及国家规定有交售任务的第三类物资，在完成国家任务之后，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卖。至于社员个人生产的产品，也可以在集市上出卖。

综上所述，在“大跃进”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产生的错误和混乱现象，通过以上方针、政策和措施，得到了一定的纠正、澄清和解决。平均主义和“共产风”受到了抵制和遏制，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二、调整国民经济高指标，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

“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制定了完不成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由于高指标，造成了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并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针对这种经济形势，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曾多次召开重要会议，采取措施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进行纠正。

（一）调整过高的经济指标。在“大跃进”中错误地制定了过高的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在实践过程中发觉根本完不成，于是开始调整。从 1958 年 11 月武昌会议开始，到八届六中全会、1959 年 1 月北京会议以及 4 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上，多次对过高的经济指标进行了调整。

在 1958 年 11 月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压缩空气”，要把过高的指标压下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对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 2700 万吨 ~ 3000 万吨，降为 1800 万吨 ~ 2000 万吨，生铁由 4000 万吨降为 2900 万吨；机床由 30 万台降为 13 万台；原煤则由 3.7 亿吨提高到 3.8 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由 500 亿元降为 360 亿元。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对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又做了调整：钢产量由 3000 万吨下降到 1800 万吨，其中好钢为 1650 万吨；基本建设总投资由 360 亿元减为 240 亿元 ~ 280 亿元，限额以上项目由 1500 个减为 1000 个左右；原煤仍为 3.8 亿吨；粮、棉等农作物仍维持原来的高指标 10500 亿斤和 1 亿担。这个计划草案经全会通过，由 1959 年 4 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

这个计划虽然在主要指标方面，比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增长速度仍然过高，甚至比 1958 年还高。例如，工业总产值 1959 年定为 1650 亿元，比 1958 年增长 41%；农业总产值 1220 亿元，增长 39%；钢产量要比 1958 年再翻一番以上，生铁等十几种产品均比上年增长 50% 以上；至于各种机器设备产品更是成倍甚至几倍地增长。所以，这个压缩计划仍然很高，是很不彻底的。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对一些工业产品产量指标又做了调整：钢的产量指标由 1650 万吨，重新确定为 1300 万吨；钢材由 1150 万吨降为 900 万吨；原煤由 3.8 亿吨降为 3.4 亿吨；铜由 11 万吨降为 9 万吨；水泥由 1300 万吨降为 110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由 260 亿元 ~ 280 亿元，减为 240 亿元；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 1092 个减为 788 个；其他工业产品指标都有所下降。

国民经济计划中主要产品产量指标定得过高，不仅完不成任务，而且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失调。例如，煤、铁、钢材的生产互不适应；很多设备的制造和供应不配套；电力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跟不上需要；在钢铁生产上使用人力、物力过多，影响到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等。

（二）中央在降低生产指标进行经济调整时，也考虑到对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这期间毛泽东曾经讲了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方针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次序，

过去是重、轻、农，现在应该农、轻、重，要安排好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还讲到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根本问题，一定要搞好农业、工业内部的平衡，搞好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另外他还讲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统一领导、中央集权，已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经济调整的主要原则是：(1) 安排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注意解决轻工业和市场的迫切需要；(2) 先生产、维修，后基本建设；(3) 在工业生产中，先满足维修和配件、备品的需要，后满足主机制造的需要；(4) 在基本建设中，要照顾重点，兼顾一般；(5) 保证出口和援外的需要；(6) 要留有余地，适当充实库存。

除了根据以上原则调整工农业生产外，还采取了以下主要经济措施：

1. 积极安排日用必需品和副食品的生产。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日用必需品和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因此必须采取妥当的措施，积极安排恢复生产。具体做法是，安排工业生产时，拨出一部分原材料生产日用必需品，保证需要。对一些原来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已经改行的，令其恢复原来的生产。其他凡在“大跃进”中不适当转厂、转产的地方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的手工业合作社，要进行重新改组，使其返回本行。同时还让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对农村中的手工业者，帮助解决原料和产品销路问题，使其增加手工业产品的生产。

对于副食品生产，在农村中鼓励发展副食品生产。在大中城市要使其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以保证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另外，在生产中还要实行公私并举方针，既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也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禽、家畜和进行其他副食品生产，以促进副食品和家畜、家禽生产的发展。

2. 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市场供应，特别是控制粮食销量。一是“大跃进”中，由于各地使用预算外资金和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扩大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多招收了大量职工，加上商业中实行了预付贷款和赊购商品的办法以及补贴土钢、土铁的大量亏损等因素，使社会购买力急剧膨胀；二是又由于转产、转业向大集体和全民所有制过渡，造成原来的产业结构、产品生产结构的改变，日用品生产减少。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当时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1959 年全国社会购买力超过社会商品可供量约 50 亿元左右，1959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为了缓和这一紧张情况，中央决定除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外，必须大力压缩公用开支和社会购买力，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严格控制农村贷款，控制和压缩粮食和食油销量，以及鼓励和动员城乡群众存款储蓄等。具体做法是：

(1) 要求一切机关、部队、企业和事业单位，大力节约公用开支，除特殊情况外，从 1959 年 6 月起，暂停拨发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行政费用，使 1959 年公用开支不超过 1958 年的水平。

(2) 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1959 年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要比 1958 年的 4532 万人，减少 800 万人～1000 万人，从而减少工资开支 15 亿元～18 亿元，并不再增加工资，同时还要调整和压缩社办工业。

(3) 严格控制农村贷款。各地农贷一律不再增加，在产品预购定金必须控制在指标范围内，不得突破。

(4) 停止实行商品赊购和预付款办法。

(5) 控制和压缩粮油销量。压缩粮食销量 1/10 左右。继续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适当降低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在农村，号召农民省吃节用，提倡菜粮混吃、稀干搭配，提倡少食用、多储备、以人定量、粮食归户、节约归己。继续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办法三年不变。食油供应，在农村除特殊地区外，一律停止供应，以保证城镇居民用油以及出口和工业用油的需要。

3. 加强企业管理，适当收回下放过头的经济管理权。“大跃进”中企业管理方面出现大量混乱现象，产品质量下降、人身和设备事故也不断发生，因此必须进行整顿，加强管理。1959 年 6 月中央要求各部门、各地方认真抓企业管理工作，对那些不适当地取消厂长职权、企业缺乏统一指挥、合理的规章制度被打破、企业内部结构混乱等现象，发动干部和工人进行讨论揭露，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审查、修订和补充，保留好的规章制度，有问题的规章制度报上级管理机关决定。

在“大跃进”中，不适当下放给地方的过头的经济管理权力，也考虑逐步收回。如 1958 年 6 月中央曾经下放给省、市、自治区审批招收职工的权力，经过“大跃进”，认为不合适。1959 年 1 月，中央通知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 1959 年的劳动计划必须报经中央审批后才能执行，收回了审批权。

4. 清理财政信贷资金。“大跃进”以来，各地方和部门擅自挪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进行基本建设或者用于其他开支的情况相当严重。为此，中央决定，必须对财政信贷资金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划清基本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的界限。凡过去挪用的资金都应当用财政款项归还银行和企业。由地方财政结余和企业留成收入负担一部分。

总之，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通过多次重要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和解决。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当时的错误比较严重，而且问题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前提下去认识和解决的，纠正、解决问题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大跃进”，因此所能解决的问题自然是有限的。例如，经济指标问题，虽然降低了一些完全脱离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但降下来的指标仍然偏高；提出反对“共产风”和平均主义问题，但公共食堂、供给制仍然存在；批评一些人头脑过热，但又指责有些人爱冷不爱热，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强调气可鼓不可泄等。这样，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彻底纠正“左”的错误。不过，无论如何，中央还是开始察觉到了错误，并开始设法纠正了。

第二节　反右倾运动和新的“大跃进”

一、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和问题，但是从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纠“左”转向了反右，使“左”倾错误又继续发展起来。

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会议最初的议题是总结经验，调整指标，纠正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指出，当时的经济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还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应当反过来，应当重视农业，应当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还指出，先安排好市场，后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提出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方面安排好，这是关系到6.5亿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提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另外鉴于许多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大了解，他提出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总结经验，认识客观经济规律。

会议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国内形势时，有人发言指出，1958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国民经济要发展综合平衡，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地生产。还有人发言说，不能共农民的产，要让农民致富，要让农民搞家庭副业，兴家立业。食堂办不好，暂时都垮了也不是坏事。彭德怀在小组中多次发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大多数人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少数人认为错误已纠正得差不多了，再纠会泄干部和群众的“气”。

7月14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直接向党中央主席陈述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万言书”。信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仍然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所有制问题混乱、大炼钢铁浪费了人力和资源，以及1958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等。第二部分，提出了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问题。信中指出，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比例关系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乡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至于产生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体会不深；主观上则是我们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犯了不实事求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

"左"的错误。"大跃进"中，不少同志"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很不满意，认为"自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不满，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最后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这样，就又掀起了一个"反右倾"的政治运动，并把"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党政机关和基层干部中去。

二、庐山会议后"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和1960年上半年的"新跃进"

（一）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大跃进"时期，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方针路线，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开始纠正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到1959年七八月份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左"的错误又重新继续发展起来。1959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当年的经济计划指标：（1）工业方面，钢产量由1800万吨（包括土钢）下调为1200万吨（不包括土钢）；原煤产量由3.8亿吨下调为3.35亿吨；其他工业品产量指标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工业总产值由1650亿元下调为1470亿元。（2）农业方面，粮食产量由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棉花产量由1亿担调整为4620万担；其他农产品产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农业总产值由1220亿元调整为738亿元。（3）基本建设方面，投资总额由270亿元调整为24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由1092个调整为788个。

这个调整过的经济计划指标，仍然是偏高的。但是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斗争的影响下，指标又一再上调，并要求尽快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提前两年实现原定的"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例如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1959年10月又决定增加到311.6亿元（原来已调整为248亿元），限额以上的施工项目增加到1000余个（原来已调整为788个），而实际执行结果，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共达344.6亿元，比追加计划又增加了33亿元。

在工交生产方面，当时把六七月间指标合理削减而形成的所谓"马鞍形"说成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的结果，当时号召"第四季度继续鼓足干劲"，"争取大大提前和超额完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指标"。"既要确保今年继续跃进，又要为明年的'开门红'和'满堂红'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既要实现工业生产的全面高涨，又要为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积极生产各类技术装备，实现农业和工业共同跃进"。"在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我国主要工业产品

以比10年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等等。结果，到年底通过挤掉其他产品的生产，才勉强完成了钢、煤等主要工业产品指标。

在农业方面，1959年灾情严重，受灾面积达2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8。但1959年10月中央决定，这一年农副业总产值比上年的增长速度要由原定的10%左右，力争提高为15%，实际上1959年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下降了13.6%。

另外，1959年夏末，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时，提出的“生产小队的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和“小自由”、发展个人副业、取消生活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等调整措施，都被说成是“右倾的歪风邪气”，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各地深入彻底地进行揭发和批判。这样，“左”的错误在农村中更加发展了。

（二）1960年上半年的“新跃进”。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反右倾”，并决定继续“大跃进”，而且估计1960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在这种“左”的情绪支配下，1960年上半年新的“跃进”出现以下特点：

1. 制定了新的更高的生产指标。1960年3月在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报告1960年计划时，提出：工业总产值在1959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增长29%，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增长16.7%的基础上增长12%；钢产量（不包括土钢）从1335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增产38%；原煤产量从3.4亿吨增加到4.25亿吨，增产25%；粮食产量从5401亿斤增加到5940亿斤，增产10%；棉花产量从4820万担增加到5300万担，增产10%；生猪从1.8亿头增加到2.4亿头，增产33%；秋收运输货运量从5.4亿吨增加到7.2亿吨，增加33%；汽车货运量从3.4亿吨增加到5.4亿吨，增加59%；基本建设投资（预算部分）由267亿元增加到325亿元，扩大了21.7%。由于1959年估产偏高，同后来核实的数字比较，1960年计划指标的增长幅度更高。例如工业总产值要增长41.6%，农业总产值要增长77%，其中粮食要增长74.4%，棉花要增长55%。这样高的指标显然是脱离实际的。

2. 农村又大办公共食堂，城市办人民公社，“共产风”更为严重。本来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七八月份庐山会议前，在整顿人民公社时，也整顿了公共食堂。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可是在“反右倾”斗争中，1960年上半年又在农村中大力推广起来。1959年3月，中央还发出指示，在农村要求有80%的人到食堂吃饭，在粮食管理上，改变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规定“统一用粮指标到户，食物到堂”。

同时还重新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由于粮食分到食堂，所以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据报道，1959年4月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中94%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河南省参加公共食堂的社员达99%。

1960年3月，中央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在城市中试验组织各种形式的人民公社。到7月底，全国大中城市中已建立起10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77%。大办城市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共产风”，当时还大办城市街道工业和各种集体生

活组织，如公共食堂、托儿所等。这些组织的建立，大都是依靠平调，侵犯了不少个人的住宅、财产和权利。城市人民公社把人民生活包起来，统一管起来，对人民生活包得过多，统得过死，商业渠道更加单一化了。

3. 大办"小洋群"、"小土群"，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1960年上半年"新跃进"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全国兴起"小洋群"和"小土群"。庐山会议后，认为发展工业首先要发展煤炭和钢铁，而发展煤炭和钢铁生产，必须发展煤、铁生产的"小洋群"和"小土群"。当时提出凡有煤、铁资源的县市都要搞以煤、铁生产为中心的"小洋群"和"小土群"基地，有条件的人民公社也要尽可能地搞一些"小土群"的采煤、采矿、炼铁企业，并把发展"小洋群"和"小土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当时还提出什么"五小成群"，即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办小有色金属矿、小化工、小水泥、小水电等等，于是这种"小洋群"、"小土群"在各地兴起。据当时报载，21个省市的统计，共有职工1820万人，其中"小洋群"有686.6万人，"小土群"有318万人，合计为1004.6万人，占职工总数的55.2%。

1960年上半年"新跃进"的一个特点是大搞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央要求用高速度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进而向自动化、半自动化发展。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一个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高潮，从单项技术革新到全工段、全车间、全企业以至全行业的技术改造；从工具、设备、生产法的改革发展到新产品和原材料的技术革新，还有综合利用等。这次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成果，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也出现了不少偏差，主要是浮夸不踏实、乱改，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以及盲目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等。例如当时曾提出要求在1960年内将工业交通部门的四化程度，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提高到40%、70%或者更高一点。当时提出推广的203项重大技术革新项目中有1/4是不成熟的。

总之，庐山会议后，特别是1960年6月的上海会议，仍然坚持甚至提出更高的不合实际的计划指标，搞"新跃进"，使"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因而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陷于极大困境之中。

三、"新跃进"的后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错误地进行"反右倾"运动，继续提高指标，搞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再加上农业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因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的比例关系失调。

（一）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明显的后果之一，是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如农业总产值1957年为537亿元，1959年下降为475亿元，1960年又下降为415亿元，1961年更下降为405亿元。其中粮食产量，1957年为

3900.9亿斤，1960年下降为2870亿斤，减少了1030.9亿斤，即减少了26.4%。棉花产量1957年为3280万担，1960年下降为2125.8万担，1961年又下降为1600万担，1962年更下降为1500万担，1960年比1957年减少1054.2万担，下降了35.2%。油料作物产量，1957年为8391.9万担，1960年下降为3881万担，减少了4510.9万担。生猪存栏数也由1957年的14590万头，下降为1960年的8227万头。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下降，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如1959年全国农田受灾面积为2亿亩，1960年受灾面积增加为3.7亿亩。但受灾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幅度与实际粮食产量下降幅度相比，只占1/3左右。所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左”的错误影响下造成的。

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自然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失调现象。如从1957—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即增长1.34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1957年的537亿元，下降到1960年的415亿元，即下降了22.7%。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例由5.7:4.3变为8: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随着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农业发展较慢，本来就有不相适应的情况，现在农业急剧下降，更加突出了工业、基本建设超过农业负担的畸形发展，这就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困难。

（二）工业、交通比例失调。“大跃进”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因而造成了工业、交通内部许多生产环节之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1. 原材料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比例关系失调。“大跃进”过程中，为了实现“以钢为纲”，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不顾一切逼着煤、矿石、运输等部门也要大干快上，新厂来不及建，就催逼老厂拚命增产，因而造成资源不断强化开采和机械设备超负荷运转严重损耗破坏的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供应，比例关系还是严重失调。

工业生产各部门之间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这种关系遭到了破坏，生产就不能正常运行。比如在“一五”期间，每新增加1吨炼铁能力，就要新增4吨铁矿开采能力和1吨炼焦能力。但1958—1960年，每新增1吨炼铁能力，只能新增2.2吨铁矿开采能力和0.8吨炼焦能力。为满足钢铁翻番的需要，加强了焦煤、采矿、电力、运输、原煤等部门生产的发展，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如1960年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炼钢能力已达到1700万吨，而机械化、半机械化的采矿能力只能满足冶炼1200万吨钢的需要；在重点矿山中由于强化开采，设备损坏，大约有1/3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

从煤炭生产来看，为了适应大炼钢铁的需要，产量由1957年的1.31亿吨，提高到1960年的3.97亿吨，三年中增加了2倍多。但仍然不能满足钢铁冶炼的需要。应该指出，这几年煤炭产量的增加，其中1/4是靠原有企业强化开采、拼设备增加的，矿井本身生产能力受到很大破坏。从1960年7月起，全国重点煤矿的产量就开始直线下降（1960年原煤产量为3.97亿吨，1961年下降为2.78亿吨，1962年进一步下降为2.20亿吨）。1961年11月，许多企业因缺煤而停工、半停工，不少地区因缺乏煤炭发生砍伐树木、拆烧旧屋甚至抢煤事件。

另外，从矿石开采看，1960年计划生产钢1840万吨，根据矿石品位情况，有关部门提供需要9600万吨以上的铁矿石、2800万吨辅助原料，而全国铁矿和辅助原料核定能力，到1962年才达到3600万吨和1000万吨，实际能力更低，与计划相差甚远。为了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只有强化开采，结果到1960年底，铁矿掘进（剥离）欠账2731万米，设备完好率仅36.8%，可见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基础工业之间比例关系失调情况的严重性。

2. 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关系失调。在“大跃进”过程中，尽管投资兴建了一些铁路、公路等，但与工业发展需要相比还是不能适应。1957年—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生铁产量增长3.6倍，铁矿石产量增长4.8倍，煤产量增长2.03倍，但全国货运量三年仅增长1.2倍，落后于煤、铁增长的需要。1960年全国货运量（包括民间运输在内）为25.5亿吨，但正常运输能力只有21亿吨，主要靠超载多拉，使用农村劳动力突击短途运输。即使如此，这一年仍有大约30%小铁矿的矿石和2000万吨煤炭积压在矿区运不出来。由于过度使用车船，车船损坏程度十分严重。1961年全国汽车完好率仅为60%，这不能不使运输能力大幅度下降。在突击运输中，农村中最多曾动员了1000万劳动力参加，这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三）轻重工业之间，农、轻、重之间比例失调。在“大跃进”过程中，由于“以钢为纲”，整个工业形成以钢铁为中心、以生产资料工业自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畸形结构，而轻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动力、运输能力、木材和钢材等原材料，则经常得不到供应，因而使得部分原来为市场生产日用消费品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不得不转产，有的生产电机设备，有的改为为重工业服务。因此，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这几年重工业产值成倍增长而轻工业产值只增长47%，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1957年为317亿元，1960年增长为1090亿元；而轻工业总产值1957年为387亿元，1960年为547亿元。如以1952年为100，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1957年为310.7，1960年上升为1035.5；而轻工业总产值1957年为183.2，1960年只为269.5。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957年是55:45，1960年变为33.4:66.6。一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品，也因重工业过分挤占或安排不够而供不应求，如电池、灯泡、民用锁、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发卡等小商品。

至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也因农业歉收，生产下降，原料供应来源受到很大影响。如以棉花和油料为原料的棉纱和食油的生产能力，1957年—1960年，分别增长了1%和4%，而同一时期，棉花和油料的生产分别下降了36%和54%。由于轻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农业可能提供的原料之间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状态，因而造成了轻工业品生产的大幅度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供应的紧张。

这里顺便谈一下农、轻、重之间的关系问题。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952年是56.9:27.8:15.3，1957年是43.3:31.2:25.5。这种比例关系，1957年虽然农业仍然偏高，但与1952年相比，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但是到了1960年，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则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21.8:26.1:52.1。这反映了重工业突出发展与农业、轻工业不相适应的情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农、轻、重关系趋于正常，其比例1984年是35:30.8:34.2。）

（四）基建规模过大，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大跃进”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43.3亿元，1958年为269亿元，1959年349.7亿元，1960年更增加为388.6亿元。1958年—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007.41亿元，比“一五”期间五年基本建设投资额588.47亿元，多418.94亿元（约71%强）。

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增加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积累增加过大则消费部分必然减少，结果造成积累率过高，消费率降低。在“一五”期间，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只占24.2%；而1958年—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和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的积累额为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的积累额999亿元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都是建国以来最高的。另外，这一时期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基建周期加长，投资效果很差，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缺物资，就是缺资金，长期不能投产，投产率大大降低。195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为26.4%，1960年降低到9.8%。

另外从积累创造的效果看，“一五”期间每百元积累新创的国民收入平均为35元，经济效果较好。但1958年—1960年，每百元积累所新创的国民收入，分别只有55元、19元、0.4元。这种新创国民收入不断下降的情况表明，经济状况正在不断恶化。

基本建设投资过多，积累率过高，使消费率降低，而且基建投资又多集中于生产性建设上，忽视了非生产性建设。如住宅建设投资，1957年为12.8亿元，但1958年—1960年三年间平均仅为12.4亿元。再加上农业大幅度减产，轻工业生产下降，因而人民的消费水平严重下降。在“大跃进”年代里（1958年—1960年），人民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1957年—1960年平均每人的消费量，粮食全国下降了19.4%，其中大中城镇下降了1.7%、农村下降了23.7%；猪肉全国下降了69.9%，其中城镇下降了69.8%、农村下降了72%；棉布的人均消费量，1957年—1961年，全国人均下降了58.6%，其中城镇下降了55.3%、农村下降了61.5%。这些都是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五）财政支出浩大，信贷膨胀，社会需求与社会供应比例失调。在“大跃进”过程中，一方面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建设扩大过速，职工增加过快，政府财政支出浩大，连年出现财政赤字；信贷也失控，信贷膨胀，结果引起社会需求与社会供应之间发生严重失调现象。

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求，特别是基本建设扩大的需求，国家一方面通过财政、信贷聚集资金，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也不断地更大幅度地增长。

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1957年为310.2亿元，1958年为387.6亿元，1959年为487.1亿元，1960年为572.3亿元，但财政支出增加幅度更大，1958年—1960年分别为409.4亿元、552.9亿元和654.1亿元，收支不平衡，结果连续三年出现赤字，分别为21.8亿元、65.8亿元和81.8亿元，财政赤字三年共计169.4亿元之多。这样大数目的财政赤字是建国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

在“大跃进”的过程中，银行信贷也发生大规模失控现象，信贷数额大幅度增加。在银行信贷工作上，重放轻收，甚至提出“需要多少，贷给多少”，于是银行贷款大幅

度增加。如银行对工业贷款，1957年为33.4亿元，1958年增加到91.9亿元，1959年又增加为258.3亿元，到1960年更增加为399.6亿元，增长了近11倍；银行对商业的贷款，同期也从216.4亿元增加到342.4亿元、495.3亿元和506.3亿元，增长了1.3倍多。

财政赤字和银行贷款过多，而农业、轻工业生产又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来平衡。结果从1958年起连续三年投放大于回笼，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1%。这是1950年统一财经工作以来所没有过的。

这时，社会需求增长引起社会购买力急剧增加，结果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社会需求与社会供应之间矛盾加剧。社会购买力增加情况：1957年为488.2亿元，1958年为578.8亿元，1959年为675.1亿元，1960年增长为716.7亿元，三年增长了46.8%。而同期，由于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造成市场上商品可供量大大下降，出现严重不足情况，特别是吃、穿的商品更是严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动用库存物资，1960年粮食和花纱布等主要消费品的库存数比1957年底大大减少（动用了1/3），但1960年社会购买力仍大于零售商品货源，差额约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商品供应不足，造成物价上涨，1960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59年上升了3.8%，这是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最高年上涨率。商品供不应求，物价上涨，结果居民的消费量大大减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如此严重失调，以至造成全国性的经济困难，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党和国家才不得不下决心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第十一章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和执行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全国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之中。为了摆脱困境，使国民经济能转向正常发展的轨道，党和国家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第一节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与初步执行

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求1961年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全会主要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央对“八字方针”作了解释，指出：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巨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调整，指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大力加强农业战线，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压缩重工业生产，大量精简职工，使积累率由40%下降到20%以下。巩固，指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肯定已有的成绩，并使其向纵深发展。充实，指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以便收到更大的经济效果。提高，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1961年的国民经济安排是，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

种、后数量，以便在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维护设备，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就由“以钢为纲”、全面“大跃进”，转向了调整，使纠“左”的工作继续进行，使失调的国民经济得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初步执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有一个逐步认识、完善和全面贯彻、落实的过程。“八字方针”的重点是调整，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下降、财政经济情况恶化等严重情况。贯彻执行“八字方针”，首先具有恢复经济的性质，其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

但是，在1961年9月以前，由于没有彻底清算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加上情况不明，因而对整个经济的困难严重程度，特别是对压缩工业生产建设规模、降低发展速度等问题，认识还不一致，因此在贯彻“八字方针”的最初阶段，主要是抓了恢复农业、调剂市场、精简职工等方面的工作，对坚决削减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指标方面，没有做太多的工作。

（一）恢复农业。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是从农业开始的。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同年11月，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961年3月和5月，讨论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发到全国农村讨论试行。同年12月，在《十二条》的基础上，中央又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可概括为：

1. 调整人民公社所有制和分配关系。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公社对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只能协商和建议。组织生产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原则。对生产小队所有和支配的资金、物资、农具、设备、林木和牲畜等，公社和大队都不得调用。凡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平调的各种财物，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以及小农具等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不得侵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在收入分配方面，取消供给制，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目前收入分配，实行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规定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一般应占可分配收入的65%，歉收的社队可占可分配收入的70%左右。对于公共食堂，直到1961年5月才明确规定停办。

2. 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1961年粮食征购量为809亿斤，比1960年的1021亿斤，减少了212亿斤。对农业税进行适当调整，使全国平均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

（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从1957年的11.6%，降到不超过10%。

3. 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1960年国家开始对主要产粮区实行超购加价奖励办法，全国平均加价5%。1961年1月，规定在产区收购时，应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量，增产多的要适当的多留一些。同时，提高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粮食20%、油料13%、生猪26%、家禽和蛋37%。部分省市还对烤烟、麻、茶叶等农产品收购价作了调整，调高幅度一般达30%～50%。同年4月，又决定对收购棉花、油料、烤烟、麻类、茶叶、糖类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励粮食的政策。如每收购1担棉花，奖励35斤粮食；每收购1担花生仁、芝麻或烤烟，奖励粮食20斤。另外，还决定对一、二、三类产品实行不同的收购政策。对一类产品（粮、棉、油）继续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二类产品（猪、牛、羊、鸡、蛋、烤烟等24种产品），则允许上市出售，自由定价。

4. 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主要是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如增拨钢材、木材、毛竹等物资，组织手工业和部分工业企业，全力修复、赶制中小农具、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增加化肥、农药等的供应，以及加强支农工业的建设等。另外，还要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大力支援农业。

（二）加强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中共中央1961年1月作出了关于调整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决定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在最近两三年内，将经济管理大权更多地集中到中央，所有生产、基建、物资、劳动、收购、财务工作都要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必须集中力量，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各部；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指挥。凡属需要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在计划内应该调出的物资，各部门、各地方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货币发行权归中央，财权要集中，不许有赤字预算。

（三）调整城乡关系，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减轻农村供应压力。减少城镇人口，规定在1960年底12900万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到1961年底，职工减少872万，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这项措施使国家一年可少供应城镇商品粮30亿斤～40亿斤、生活用煤200万吨～300万吨、蔬菜15亿斤，国家可少支出工资20亿元。当时要求各级机关裁并机构、减少层次，使现有人员减少1/3～1/2。并要求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特别是1958年以来从农村招收的职工，凡是能回农村的，都动员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四）努力稳定市场，调剂供应。主要措施是：

1. 大力压缩集团购买力。1960年8月，决定在今后5个月内，压缩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部分的20%左右，全国压缩约5亿元。1961年初，又决定从1960年的75.3亿元，压缩到40亿元～50亿元左右。财政金融部门先后对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事业单位采取了暂时冻结存款和预算拨款中预扣经费的办法。到1961年底，社会集团

购买力已压缩到49.4亿元，比1960年减少26亿元。

2. 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一方面在燃料、动力、原材料和设备的分配上，优先保证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需要；另外，还组织力量生产和试制化学纤维、塑料、玻璃纤维等新型工业原料，以补充农业原料的不足；同时还注意原材料工业中一些短缺品种产品的生产，以适应日用轻工业品生产发展的需要。

3. 对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实行高价政策。在对粮食、棉布等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采取坚决稳定的政策，即实行平价定量供应外，为了调剂人民需要、回笼货币和增加财政收入，对部分消费品有计划地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如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等。1961年3月，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高价饭馆，后来又陆续对一些商品，如自行车、钟、手表、酒、茶叶、针织品等的一部分实行高价。据统计，1961年和1962年两年，共售出高价商品74.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38.5亿元。这样，既保证了职工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又调剂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回笼了货币。这一政策的实施，缓解了市场的紧张状况，大家是满意的。

4. 开通商业流通渠道，改进和加强商业工作。积极恢复"大跃进"以来被撤销或合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在商品流通中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对农副产品收购大力推广合同制度。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之间实行选购商品制度，国营商业加强经济核算，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度，改善经营管理。

这些措施很快取得了成效，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市场供应得以改善，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的差额大大减少，在市场供应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基本上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第二节　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的展开

一、贯彻"八字方针"中的分歧与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初步贯彻过程中，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主要表现在恢复农业生产、压缩社会购买力、缓解市场供应紧张状况等方面，但在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的调整进度缓慢，成效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形势和"八字方针"的认识不一致，有些干部虽然想调整，但怕政策多变，不敢大胆执行；有些干部则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些受"反右倾"影响较深的人，则仍然坚持大上，反对后退。这样就使得中央的"八字方针"和调整计划难以实现。当时的情况是，基建规模虽有所压缩，工业发展速度也有所放慢，但生产指标仍然很高，基建规模仍然过大。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要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12月3日再次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大事情，是一个政治性的任务。结果，为了“保钢”，而挤掉了其他。1961年4月，基本建设规模曾进一步压缩，由167亿元缩减为129亿元，大中型项目由900个缩减为771个，但是这样的建设规模仍然超过当时国力的可能。由于调整方针贯彻不够，生产下降幅度较大。1960年工业总产值为535.7亿元，1961年下降为330.7亿元，1961年比1960年下降约39%，约有1/3的企业发生亏损。1961年第一季度在25种重要工业产品中，除食糖外，其余产品的生产水平分别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了30%～40%，一般只完成全年计划的10%～20%，是建国以来最低的。到了七八月份，工业生产下降趋势仍继续发展，尤其是关系到经济全局的煤炭，日产量只有44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0%，大批企业由于动力供应不足，不得不被迫停产。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1961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起草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其主要内容为：所有工业部门和企业，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近三年必须以调整为中心，要以最大决心把工业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必须坚决后退、退够。在工业管理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要集中力量抓煤炭的数量和质量、抓钢材的品种和质量，对一些没有原料、材料来源或是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而又短期不能改变的企业，必须实行关停或者关闭一部分。努力增加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稳定市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和“八字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定措施对扭转工业被动局面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打下了基础。

1962年1月2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各地干部共7078人），大会发扬民主，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讨论了当时颇有争议而及需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确定了1962年经济工作任务。

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会议否定了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认为1958年以来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因此，这些缺点和错误决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大跃进”以来的主要缺点错误是：(1) 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 在农村工作中，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了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犯了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错误，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手工业和商业工作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3) 中央对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严重滋长。(4) 对建设事业发展要求过急，对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估计过高，城镇人口增长过快，造

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农业生产水平极不相适应，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

会议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踏实地做好调整工作，必须抓紧1962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会议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各项国家计划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不经中央批准不得擅自变动；所有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必须纳入计划，按规定审批程序办理等。

会议还对1962年的经济建设工作做了原则安排，即：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积极增加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坚决实行精兵简政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认真做好商业工作，改善市场状况；制止通货膨胀，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轻工业生产指标；改进企业管理工作，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作为首要任务；彻底清查物资，以及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等。

扩大中央工作会议虽然没有彻底清算党内“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没有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但对统一全党对形势、任务的认识，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仍具有积极的作用。

1962年2月，中央又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调整经济问题。发现当年财政有很大赤字，商品供应与社会购买力之间差距很大。实际上是，1958年—1961年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年年有赤字，估算当时财政赤字至少30亿元（后来核实是50亿元），实际上是挖了商业库存，涨了市场物价，用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并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也欠了债。当时的经济形势相当严重。粮食1961年比1957年减产约800多亿斤，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通货膨胀，城市钞票大量流向农村，而国家却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货币，国家职工实际工资减少很多，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会议提出克服的办法是把今后10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恢复阶段，后一阶段为发展阶段。要减少城市人口，精兵减政，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中央财经小组根据会议精神，对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做了进一步调整，提出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情况，提出必须对国民经济作大幅度调整。1962年主要调整规划是：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1400亿元下调为1300亿元；农业总产值由450亿元调整为420亿元；工业总产值由950亿元调整为880亿元；原煤由2.51亿吨调整为2.39亿吨；钢由750万吨调整为600万吨；粮食由3014亿斤调整为2890亿斤等。城镇人口减少2000万，职工精减1000万（不包括1961年已减的872万）；预算基建投资由1960年的301.75亿元减为60.25亿元，基建项目由1800多个减为10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由1960年的96000个，减为52300个。同时要求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农业；充实与发展某些化纤和轻纺工业；

重工业方面保证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原子能技术的研制。

会议还指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来。今年（1962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照顾维修、配套，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要搞短线、搞综合平衡，生产才能协调、配套，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计划指标必须可靠，必须留有余地。

1962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批准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的根本精神就是必须坚决退够才能前进。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做好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综合平衡。会议肯定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对当前国民经济重要情况的分析意见和改进措施，指出这些措施是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最积极的措施。

经过上述一系列会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决心更大了，任务更明确了，措施更果断了。这样，有力地推动了“八字方针”全面地、深入地贯彻。

二、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的全面展开

为了贯彻“调整必先退够”的方针，中央采取了若干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一）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大跃进”期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规模过大，上马项目过多，尤其是计划外项目遍地开花，结果大量资金、物力、人力被浪费，经济效果大大降低。基本建设的特点是周期长，一般要在较长的时期内占用大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而不能提供任何有效产品，因此必须量力而为。一旦搞得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就会使大量资金、物资停滞在建设工程上，挤了其他部门的生产，特别是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滞塞了整个生产过程。同时基建战线过长、规模过大，也会使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失去平衡，为支援基建投资，财政支出过多出现赤字，增发钞票，又会造成通货膨胀影响市场，因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是如此。因此，调整基本建设战线，就是要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在基本建设方面后退、退够，直至达到与国家财力、物力能够负担的能力相适应的地步，国民经济才有可能转入良性循环。

压缩基本建设战线，首先要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额为388.69亿元，1961年削减为127.42亿元，约减少了2/3，1962年又进一步削减为71.26亿元，即在1961年的基础上削减了55%。这样小的规模是1953年以来所没有的。

基本建设的施工项目也大大减少。1960年基本建设施工和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为1815个，1961年减为1409个，1962年更减为1003个，比1960年减少了812个。

随着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基建项目的缩小，积累率也相应降低了。1960年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积累39.6%，1961年下降为19.2%，1962年更下降为10.4%。这样，国家可以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农业和轻工业。

在大力压缩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也对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进行了压缩。1960年基本建设预算外投资额为86.94亿元，占投资总额的22.6%，1961年虽然三令五申要其压缩，但结果仍有33.4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27.2%。1962年压缩为11.01亿元，占投资总额的15.5%。

"大跃进"以来由于权力下放，预算外投资不断增多，这部分资金来源复杂、名目繁多，用自筹资金增加的项目拉长了基建战线，冲击了国家投资项目。为了限制地方利用机动财力和银行信贷资金搞基本建设，从1961年起，先后将一度下放的财权、银行权集中上来；取消了企业利润留成办法，实行企业基金制度，缩小了企业财权；从行政管理上对自筹资金的基建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坚决削减，建设项目必须纳入国家计划，严禁兴建楼堂馆所等。还有从建设规模上加以限制，规定自筹资金只能搞解决吃穿用的小型项目，凡搞大中型项目，必须报中央批准。由于采取以上措施，1962年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压了下来，压缩为11.01亿元。

在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过程中，除了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削减基建工程项目外，做好停建和缓建项目的善后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停建项目一般是当时生产上不十分急需的，或属于原材料、动力、燃料和运输等条件在两三年内不能解决的，或者属于地区分布不合理、重复建设的项目。缓建项目一般是在当时生产上还是急需的，原材料、动力、燃料、运输等条件上没有问题，只是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不能继续施工的项目。对停建和缓建项目，应该慎重处理并做好善后工作。主要是：妥善处理安排好停建、缓建单位职工的工作；清理和调剂设备、原材料；维护和管理好下马工程及保留在停建、缓建单位的设备和原材料；清理好停建、缓建单位的拖欠贷款等。

采取以上措施后，经济效益大大提高。1961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8%，1961年上升为74.5%，1962年更上升为79%。另外，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了投资方向，也为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创造了条件。

（二）降低工业生产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

1.进行"关、停、并、转"，缩短工业战线。这次在工业方面进行了调整工作，主要是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和调整工业内部结构。首先是降低工业生产指标。1962年5月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整报告中的指标是：同1960年的计划指标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59%，重工业总产值下降了63%，钢产量下降了68%；除原油略有增产外，原煤、木材和发电量等短线产品产量因采掘等原因，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也下降了26%。

随着工业生产指标的降低，工业企业过多、能力过剩、人员过多的矛盾突出出来，于是不得不采取"关、停、并、转"的措施，对工业内部进行调整，这实际上也是对工业的大改组。具体做法是：首先摸清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以及农业和市场的需要

的基础上，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一律关闭停办；一时原料供应不上任务不足的企业，适当合并或缩小规模，或者转产急需的支农产品、市场紧缺日用品、机修备品配件；原轻工业企业改向的，限期恢复生产；对因任务不足，适合转产短线产品的企业，可按实际需要改变原来的产品方向；裁并的重点是中小企业，对骨干企业则予以保留。要分批制定“关、停、并、转”计划，并做好善后工作。“关、停、并、转”是工业战线的一次大的改组工作，为了促进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1962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银行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控制信贷，紧缩银根，加强监督。这个决定使那些经营不善，靠贷款维持的企业不得不主动停产关闭。为了避免生产供应脱节，主管部门加强领导，及时转移关、停企业原来的生产任务。物资部门限期缩小或停止煤炭、电力物资的供应，财政部门停、减流动资金的供给，粮食部门也停、减粮食供应，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企业调整计划的实现。

工业企业内部大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62 年冶金、化工、建材和机械工业分别比原有企业数目减少 70.5%、42.2%、50.7%和 31.6%。钢铁、水泥和机械工业中的 17 种长线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都减少了 50%左右。而煤炭、石油、烧碱、化肥、聚氯乙烯、搪瓷制品、自行车、合成洗涤剂等 14 种短线产品和拖拉机、内燃机、交通运输车辆的生产能力，都保留下来并得到充实和加强。总之，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调整了工业企业内部的结构，使之更为合理，对工业面向农业、面向市场、面向短线进行改组方面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并提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2. 充实急需加强的薄弱环节。由于降低了大部分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减少企业数目，缩短了工业战线，从而腾出了一定数量的财和物，这些财和物可以用来充实急需加强的薄弱部门和环节。首先是加强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为了缓和市场供应，在调整中国家优先保证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所需要的燃料、电力、工业原材料、设备等；并集中生产了农村急需的中小农具和日用工业品、建设了支农工业项目，积极试制、生产了农业生产资料和轻工业所需的原料，使市场上一度紧缺的日用品的供应逐步得到缓和，农村中急需的中小农具也基本上得到满足。

3. 加强设备修理和矿山地质勘探。对农用机械、汽车、矿山机械和其他一些短线产品生产企业的设备，集中力量进行修复；对其他企业的设备、厂房、锅炉和邮电交通部门的线路、道路进行整修、更换等；对矿产资源加强地质勘探工作，使采矿与剥离关系渐趋合理，使矿产资源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充分利用，并努力解决石油奇缺的困难。

4. 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在对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的过程中，也认真抓了生产秩序的整顿和企业的管理工作。1961 年 9 月，中央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暂行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要求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如厂长责任制、技术责任制、财务责任制等。职工人人有专责，保证产品质量，保证设备工具经常处于良好状态，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产品产量和品种，扩大积累。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尚未走上正轨，未能全面贯彻，在以后开展的清仓核资、扭亏为盈，以及增产节约运动中结合进行。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企业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1961 年、1962 年两年来，仅所增加的钢材和机械设备品种，就比 1960 年分别增长 8%

和 18.7%。石油已能生产出 178 个品种，占工农业、交通运输常用品种的 96.7%。重点钢铁企业生铁合格率，1962 年也由 1960 年的 86.6%提高到 98%。

（三）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调整国民经济，农业是重要的一环，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1. 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中心，是缩小基本核算单位和实行灵活的管理方式。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低，经营规模小，在管理体制上不宜过大，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如果太大，会发生许多问题，影响生产的发展。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曾由管理区实行经济核算，公社统一负责盈亏。1959 年 4 月，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单位（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明确提出"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同时提出将一部分生产权下放到生产队，但分配权仍留在大队。由于生产权、分配权的分离，问题很多。1961 年 9 月，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应该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1962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决定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普遍改为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规模大体相当于过去的初级社，平均每队约二三十户人家。这种制度至少 30 年不变。这样，就把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了。1962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中明确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大队都不得抽调，生产队对生产管理和收益分配有自主权。这样，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人民公社内部算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关于经营管理方式，《农业六十条》中规定，生产队中可划分固定的或临时的作业小组，建立严格生产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当时有人曾提出，实行包工到作业组，零星小活可以包到个人，有些可以包产到户，但有人担心这样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2. 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再次明确社员自留地和经营副业制度。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同时，也要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具体做法是：首先，取消了群众意见最大的公共食堂，废止了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生产队逐步制定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按定额计分，无定额的工作采取评工记分办法，一律同工同酬。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按时记入工分手册，定期公布工分账目，年终按社员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口粮在收获后一次分配到户，由社员自行支配。公积金、公益金应严格控制在可分配总收入的 3% ~ 5%与 2% ~ 3%以内，其使用应该经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中央再次明确规定，社员可以耕种集体分配的自留地，并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农业六十条》规定，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 5% ~ 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山地和荒坡地的地方，可分配给社员自留山，由其经营。有条件、有需要地方还可拨给社员适量的饲料地。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上的产品收入均归社员所

有，由其支配，国家不征农业税，不纳入统购范畴。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不仅可以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也可以饲养大牲畜。允许社员从事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也可以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社员在其房前屋后或其他指定地点，还可种植桑树、果树和竹木。社员家庭副业产量收入完全归社员个人所有，商业部门可通过加工订货、议价收购和供应原料、收购产品以及订立合同等经济办法，鼓励社员将产品卖给国家。社员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后，除有特殊限制者外，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3.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业生产。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泛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但高征购却不停止，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民的口粮都发生困难。中央采取措施以减轻农民负担，尽管国家财力维艰，仍不断降低农业税实际征收率，并决定按新的水平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1961年6月，农业税税率从1957年的11.6%降为10%，1961年征收额计划为240亿斤，比1960年减少98亿斤，1962年又减为215亿斤，大体上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

另外，还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这也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措施，是关系全局的大事。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1960年底在1.3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城镇人口，1961年内至少减1000万人。1962年5月，又决定在1961年底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基数上，1962年、1963两年内继续减少职工1000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减职工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以来从农村招收的新工人。中央采取妥善办法安置被精减人员，因此精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63年6月，基本上完成原定任务。自1961年1月开始，在两年半时间内，共精减职工1940万人，减去新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同时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精减了职工和城镇人口，大大增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减少了国家工资开支和商品粮的供应，对恢复农业、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在精减城镇人口的同时，又严格控制和合理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2年以来，城镇人口大量减少，但粮食平均月销量反而较前几个月有所增加。1962年7月，中央指示各地立即对城镇粮食销售进行普遍检查，在保证人民最低粮食需求的条件下，严格控制，合理压缩，严格粮食管理制度，堵塞虚报冒领、浪费粮食漏洞。同时大力节约工业用粮，也进口一些粮食，以弥补国内粮食不足。1961年、1962年共进口粮食1073万吨，这对缓解粮食供应紧张，减轻农民负担，弥补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起了一定作用。

恢复和加强农业生产，也是大调整中的一件重要工作。首先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国家增拨了钢材、木材、毛竹、桐油等以制造中小农具。1962年以来，铁制小农具生产达10亿件，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国家又增加了化肥、农药、农机的生产量与供应量。例如，农用化肥1958年产量为19.4万吨，1962年增长为46.4万吨；拖拉机1958年为1000台，1962年增长为7100台。1962年与1960年相比，化肥供应量增长了61%，拖拉机增长50%，排灌机械增长41%，农用汽车增长53%，农用电力增长

153%。其他如煤、油的供应也都有较多的增加。

另外，国家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各项开支的同时，对农业的投资仍尽力给予安排。农业投资在整个基建投资中的比重，1958年、1959年为10.5%，1963年增长到24.6%。银行还增发农业贷款，1962年发到社队的各项贷款累计达54亿元，约占当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值的1/3。国家还有计划地调整农产品价格。从1960年11月开始，国家陆续大幅度提高粮食和一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62年同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32.3%，其中粮食36.1%、经济作物14.7%、畜产品31.6%、其他农副产品40.9%。另外，国家还规定了农副产品的奖售换购政策。1961年4月，实行奖售政策，收购棉花、油料、烤烟等10类经济作物时，奖售粮食。1962年鉴于粮食困难，减少了一些奖售粮食的品种，增加了奖售工业品的品种。这一年实行奖售的农副产品为169种。另外对超购的以及农民自己留用的农副产品用工业品进行对等的自愿换购。1962年和1963年，还对粮、油、烟叶等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用化肥、棉布、卷烟等价值总额大致相等的商品进行计划外换购。国家调整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的实施，使农民收入增加，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四）进一步改进财政、银行管理体制，稳定市场。财政、金融也是国民经济大调整的重要环节。财政、银行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资金活动的中心和枢纽。进一步加强财政和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对平衡财政、信贷，缓和市场供应紧张状况，推动和监督各部门经济的调整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都会起重大的作用。为此，1962年3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强调银行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把国家的票子管紧。该文规定：收回几年来银行工作下放的一切权力，对银行业务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的领导；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严格划清银行信贷和财政资金的界限，银行贷款不许用作财政性支出；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等。1962年4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规定要量入为出，严格实行收入按政策、支出按预算、追加按程序的原则，坚决制止一切侵占国家资金的错误做法，重申不许挪用财政资金的十道禁令，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坚决维护应当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加强财政监督，并彻底扭转企业大量赔钱的状况。

1962年还开展了清仓核资、清理拖欠贷款和扭亏增盈等项工作，对有效地、合理地使用国家资金，争取国家财政支出平衡，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市场方面，为了稳定市场物价，1962年3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号召一切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必须厉行节约，并坚决压缩集团购买力。1962年4月，中央又作出了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这样，社会集团购买力有所下降。1960年城镇集团购买消费品为75.3亿元，1961年压缩为49.4亿元，1962年又进一步下降为39.8亿元。

国家还尽力发展和组织日用工业品、手工业以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到1962年，市场上原来供应不足的商品，如铁锅、铝制品、搪瓷制品、合成洗涤剂、电灯泡、暖水瓶、炊事用具、小百货和小五金等，已基本上能满足需要。商品供应方法也得到改

进。例如，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优先得到供应；城市和工矿区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则坚持定量平价供应等。

继续实行高价商品和高价饭馆的经营，以活跃经济、调剂人民生活。自1960年冬农村恢复集市贸易、城乡恢复合作社商业以来，在大中城市中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农贸市场和实行高价经营的商品、高价经营的饭馆。这些新的商业渠道对搞活商品流通，加速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对外贸易工作。在出口方面，大大减少主要农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用进口原料加工的出口商品；在进口方面，对粮食、化肥和一些短缺的原材料，因为需要增加进口数量，在外汇方面力求平衡，由于出口有限，因此必须合理地使用外汇，分别轻重缓急确定进口次序，这就是：(1) 粮食；(2) 化肥、农药、油脂；(3) 加工后可出口换汇的商品和化工原料；(4) 工业原材料和尖端技术、国防需要的器材、设备等。由于正确掌握了对外贸易方针和合理使用了外汇，因此这几年外汇收支一直保持顺差。这对于支援工农业生产，稳定市场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第十二章　五年调整

第一节　逐步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报告讲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的情况，同时，指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农业许多产品都减产了；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有些权力下放得偏多过下，有些制度破而未立，有些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干部队伍不纯，等等。据此，他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3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全会根据1960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对1961年计划指标作了一些调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167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减少103亿元；当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定为900个，比原设想减少300个，比上年实际减少700个；钢指标由2010万吨调低到1900万吨；煤由原计划的4.25亿吨调高到4.36亿吨；粮食由原计划3900亿斤调高到4100亿斤，棉花仍为3200万担。这还是一个"跃进"计划。按后来查清的1960年的实际产量，1961年的粮食产量要增长60%多，棉花要增长46%，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它表明，全会虽然通过了"八字"方针，由于大家认识不一致，有些情况还没有弄清（如粮食、棉花产量），落实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削减不下来就是证明。

但是，从"大跃进"转变为调整，毕竟是一个方针性的转变。在新的方针的指导下，1961年，调整工作还是在许多方面逐步展开了。

第一，调整农村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于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条例》共计10章，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人民公社社员代表大会

和社员大会；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社员家庭副业；社员；干部；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条例》重申了《紧急指示信》中的一系列规定，并有新的发展，有些规定更具体了。"从后来的反映看，其中解决得比较好的，是社队规模问题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一是社队规模缩小了。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9月6日的报告：《六十条（草案)》下发后，各地调整了社队规模，调整后，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总数55682个，比调整前增加30478个；大队708912个，比调整前增加225098个；生产队4549474个，比调整前增加1561306个。社队规模缩小，对减少社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有利的；二是社员家庭副业单列一章，把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开放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写进条例，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缓解了农民怕政策多变的恐惧心理。《六十条（草案)》下发后，中共中央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修改，在5、6月间的北京工作会议上又通过了修正草案。修正草案的重要修改有：把原草案规定的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的办法也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把原草案中关于社员分配供给与工资三七开的规定取消，改为无论包产收入和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这两大修改，弯子转得比较大，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重新倡导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提高粮价。鉴于粮食的紧张状况，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粮食价格小组。1月15日，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报告》。《报告》提出，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1960年已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实行加价5%的政策不变。同时，提高油料、生猪、家禽和蛋的价格。其中，油料提高13%，生猪提高26%，家禽和蛋提高37%。部分省市还对烤烟、麻、茶叶等农产品收购价作了调整，调高幅度大多达30%—50%。4月，又决定对收购棉花、油料、烤烟、麻类、茶叶、糖料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励粮食的政策。如每收购一担棉花奖励35斤粮食，每收购一担花生仁、芝麻或烤烟奖励20斤粮食。

——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1961年粮食征购量为809.4亿斤，比1960年减少212亿斤，占当年粮食产量的比重由1960年的35.6%下降到27.4%。同时，适当调整农业税税率，使全国平均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正税加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从1957年的11.6%下降到不超过10%。按新税率计算，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比上年减少98亿斤，减少29%。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桐油等物资，组织手工业和部分工业全力修复、赶制中小农具、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千方百计增加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为了发展氮肥工业，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组长的化肥小组。5月16日，陈云为小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1962年到1964年的三年内，氮肥厂的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的部署应该是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20万到2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同时提出，要进口重要材料。

通过这一系列调整，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1959年，陈云就提出精简工人的建议，并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但反右倾以后，各地又开始招收职工，使精简职工的措施受阻。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示》强调，必须坚决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的劳动力。县和人民公社要切实整顿和精简县社兴办的工业、多种经营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田间生产的力量；城镇也必须精简和动员一批从农村招收的工人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去。但是，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在执行中步履维艰。为了快一点解决这个问题，以陈云为组长的五人小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4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5月21日至6月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发表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讲话。讲话指出：

解决面临的粮食紧张问题，有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第一，会把粮食高产的队、社、县、专区和省的积极性打下去。""第二，牲口要继续大量死亡。""第三，经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第四，粮食进口要增加。"

"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城市人口过多有困难，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有困难。从全局来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这次会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的几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2000万人以上，年内减少1000万人。当时计算，如果全国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人，一年可减少供应城镇商品粮30亿—40亿斤，国家工资少支出20多亿元。由于决心大，措施得力，到1961年底，城镇职工减少了872万人，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人左右。这不仅缓和了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也有利于农业休养生息。

第三，网开一面，稳定市场。1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讲话。讲话中提出，一要进口粮食。他说："如果有4百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他在另一次会上还说："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二是出售高价糕点、糖果。他说："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

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现在出售糕点，就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这样做，“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他还主张，先把进口的糖和麦子用于制造高价糕点和糖果。他说：“现在进口的糖也好，麦子也好，以后的猪肉也好，要集中使用在机动的方面，自由买卖的方面。”当时，国家对占职工生活支出总额50%—60%的粮食、棉布等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是实行平价定量供应的办法。1961年初，全国各大中城市逐步开始供应高价糖果和糕点。2月，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一切大中小城镇。3月，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高级饭馆。1962年3月，增加针织品、自行车、手表、闹钟、茶、酒和高级副食品等七种新的高价商品。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回笼了50多亿元人民币，制止了物价全面上涨，也满足了部分人民生活需要。

第四，加强国民经济集中统一管理。1961年1月，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把财权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1月20日，中央决定调整经济管理体制，除了重申财权要集中外，还强调中央要收回重要物资的管理权和分配权，货币发行权归中央；规定国家下达的劳动计划，各地不许突破，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等工作，上下一本账，不得层层加码。同时，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1958年以来，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

第五，制定了一批工作条例。“大跃进”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混乱现象。为了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继《农业六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陆续制定了一批工作条例和规定。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明确指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纠正了“大跃进”以来，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合并、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升级过渡、关闭自由市场等错误做法。从而为积极恢复已撤销或合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提供了政策依据。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我国的手工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在这三种所有制当中，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它对于大多数手工业来说，最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过多地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于生产反而不利。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规定重新肯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手工业存在的必要性，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急于把集体性质的手工业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

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聂荣臻6月20日《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

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请示报告》针对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界限：第一，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建议"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竞赛。"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直接结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国家的科学计划中，应该占首要地位。"然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是十分宽广的，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观点。"第四，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不能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关于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保密项目越来越多，用人圈子越来越小。"这要加以解决。第六，保证科学研究时间问题。"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第七，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党组织在研究机构做好领导工作的主要标志，就是充分调动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大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多出研究成果。"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两个文件时批示："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

9月16日，中共中央颁发《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条例的主要内容为：（一）规定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五定"、"五保"。"五定"是：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五保"是：企业对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二）限制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生产行政工作干预过多，禁止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引申到车间、工段和科室；（三）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四）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载人条例；（五）明确规定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六）规定企业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七）重申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八）规定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力集中在厂部。工业七十条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拥护。但也有人不满意，认为反映"大跃进"不够。试行以后，效果是好的。

经过上述各方面的调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按计划完成，市场紧张状况开始缓和，各条战线的混乱情况也逐步改变。但是，由于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指标仍然过高，而又没有修改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注定是不可能完成了，"大跃进"的后果也日益暴露出来：农业，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轻工业，从1960年起连续下降；重工业，从1961年上半年也开始下降了，而且下降的幅度很大。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在1958年、1959年两年大跃进以后，在1960年春就应及时地进行调整，主动地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指示》规定：（一）所有工业部门和企业，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近三年必须以调整为中心，要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必须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二）在工业管理中，要改变过去一段时间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最近两三年内，就全国来说，要把工业管理的权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包括中央局）一级，对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统一安排；就地区来说，也必须把权力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一级。（三）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抓煤炭的数量和质量，抓钢材的品种和质量。凡是没有原料、材料来源的企业，凡是消耗过多、质量低劣、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而又短期不能改变的企业，必须实行关停或者关闭一部分。（四）努力增产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稳定市场。

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1961年的指标作了很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到78亿元；社会购买力由720亿元降为650亿元；商品供应量由670亿元改为600亿；钢产量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煤产量由4.36亿吨降为2.74亿吨；原木产量由3905万立方米降为2167—2119万立方米；棉纱产量由450万件降为250万件；粮食产量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报告还提出了1962年的计划指标：钢产量750万吨；煤产量2.5亿吨；粮食产量2900亿斤。至此，计划指标调整得比较符合实际了。

调整已进入决定性时刻，但是在党的干部中认识还很不一致。有人等待重新"大跃进"，有人怕说右倾，不敢大胆进行调整，有人采取观望态度，也有人有埋怨情绪。为了集中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于1961年12月10日至1962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中央、省、地、县委书记，重要厂矿企业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超过7000人，也叫七千人大会。

会议首先讨论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报告回顾了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着重指出："1958年以来，我们党在中国人民中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党全民大大提高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鼓足了干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的成就。"在肯定成就的同时，列举了这几年工

作中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中所讲的缺点和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概括出来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所反复批评过的，因而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刘少奇在1月27日讲话时，对书面讲话有所发挥。例如，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但是，他明确指出："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在场，并几次插话，对讲话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主要是讲民主集中制。在讲话中，他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自我批评态度诚恳，大家听了深受感动。他在讲话中还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大跃进"的狂想。

七千人大会是成功的。它对全党统一对当时形势任务的认识，加强团结，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陈云曾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第二节　大幅度调整的战略决策

七千人大会结束不久，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家预算、经济形势和如何调整问题。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故通称西楼会议。

会议在讨论中发现，当年财政预算中实际上存在50亿元的赤字。这表明，经济形势的困难程度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得多。据此，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在会上，陈云就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会后，根据刘少奇的建议，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过一次）。他在讲话中指出：

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有：“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这几年的建设规模是怎样铺开的呢？除了1958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趋势如何？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采取哪些办法来克服困难呢？

“第一点，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现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我们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

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第二点，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安排。”

“第三点，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去年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1962 年和 1963 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

“第四点，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

“第五点，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这一条是根本大计。”要抓好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现在，国家必须进口粮食来补充口粮，如果要保经济作物，还要多进口一些粮食。”“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对商品粮的主要产区，应该多供应化肥。”“三是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第六点，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

陈云的讲话，对于统一高级干部的认识，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楼会议以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统一管理经济工作。

3 月 7 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在会上，他讲了七个问题。

第一个是长期计划问题。“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第二个问题是，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第二要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根据实际可能，能多给一点就多给一点。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他。”“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

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

第三个问题，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

第四个问题，物资管理制度。“总的说，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生产过程也是物资的调度过程，如果无权调度物资，也就无法统一指挥生产。”

第五个问题，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计委、经委、农办要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

第六个问题，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

第七个问题，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陈云的两次讲话，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指明了调整的方向。从1962年开始的大幅度调整，基本上是按照陈云的思路进行的。

4月，在周恩来主持下（陈云因病休养），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共中央写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报告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几项重大措施：第一，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规模。同时，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和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出口需要的工业项目继续建设并按时投产。第二，除砍掉十万个小高炉外，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和那些原料、燃料、动力供应不上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第三，继续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精简职工850万人，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对大幅度调整作出了若干重要决策。

——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报告建议1962年减少城镇人口1300万人，精简职工900万人。会议讨论后决定改为：在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简职工1000万人以上。

——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年初，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已压到67亿元，比1961年减少近一半。会议讨论后决定压到46亿元，是1953年以来最低的（实际执行中，又增加到67.6亿元）。

——降低重工业产品的指标。1962年的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到20%。其中，煤产量从2.5亿吨降为2.39亿吨，钢产量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

——大刀阔斧地对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指出："我们就必须下定决心，有计划地保住一批工厂，缩小一批工厂，合并一批工厂，关掉一批工厂，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从而把工业生产战线和设备维修战线真正缩短，把力量集中起来，更好地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为以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从 1961 年 9 月庐山工作会议决定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调整后退起，到这次中央常委会议止，历时 9 个月，终于下定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退够。这一重大战略性决策的作出，成为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转折点。

1962 年上半年，还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

一、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至少 30 年不变。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最早发现的。1961 年 1 月 8 日，他在杭州听取江华、林呼加汇报时曾说："有的生产队太大了，可以把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现在的生产队可以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实权放到队。" 9 月 29 日，他给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中央的指示，是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才作出的。指示列举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好处：第一，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二，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第三，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第四，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未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毛泽东认为，农村政策调整到此已是终点，不能再越雷池一步了。

当时，全国许多农村的农民为摆脱困境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1962 年上半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已超过 20%，安徽省达到 80%（那里叫"责任田"）。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他在一次报告中说："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的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农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产到户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样，没有区别；没有包产到户的，自留地搞的特别好。因为包产到户了超产是他的，责任心强，肥料也多。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也不同程度地支持包产到户。但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始终不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有关包产到户的建议。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他认为包产到户更加没有必要了。1961 年，中共安徽省委搞"责任田"时，毛泽东曾表示过同意试点。到了 1962 年 12 月，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他便向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

再搞“责任田”了。

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3月2日至26日，文化部、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向与会者和科学工作会议的人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报告中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陈毅在讲话中说：“不能够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他提出要“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受到与会者的极为热烈的欢迎。3月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经过12年锻炼的我国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恩来的报告，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毛泽东虽然不同意，当时也没有表示反对。因此，大家把它看作是党中央的意见。明确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重大调整。它对于贯彻执行科研、高教、文艺等条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加快对党员、干部和群众甄别平反。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甄别平反工作，是1961年5、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1961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明确规定，要对干部、党员甄别平反，并且说：“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准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在这以后到1962年上半年，甄别平反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发展很不平衡。为了推动这一工作的迅速地深入地展开，1962年4月中共中央便发了上述通知。

由于中共中央重视，邓小平亲自部署这一工作，甄别平反取得了全面进展。到1962年8月，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已甄别党员、干部365万人，甄别群众370多万人，总共甄别平反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

由于政策和措施得当，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见效很快，1962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

第一，农业生产力开始恢复，农业生产水平上升。1962年，农村劳动力、农具的拥有量，已恢复和超过1957年的水平，大牲畜也开始回升，改变了连年减少的情况。耕地增加600多万亩（主要是一些基建项目停建、缓建后退还的）。化肥、拖拉机和排灌机械的供应量，同1960年比，都有显著增长。粮食生产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50亿斤。油料生产达到3684万担，比上年增加13.8%。生猪年末头数已恢复到1亿头，比上年增加2400万头，结束了连续四年下降的局面。从地区看，全国已有1/4的县，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

第二，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善。1962年，农业总产值430亿元，比上年增长6.2%，工业生产总值850亿元，比上年降低16.6%。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年的4:1改变为2:1。在工业生产中，重工业产值455亿元，比上年下降22.6%，轻工业产值395亿元，比上年下降8.4%。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例，由上年的42.5:57.5改变为47.2:5.8。

第三，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货币流通量有所减少，市场物价逐渐下降。1962年，财政收入完成313.6亿元，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年末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减少15%。这一年，市场商品供应仍比较紧张，但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了35%。

第四，城乡人民的生活略有改善。1962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水平同1957年相比，粮食下降19%，猪肉下降57%，棉布下降47%，但同上年相比，粮食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棉布增加2.5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回升。

全国经济形势刚刚好转，毛泽东在1962年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到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按原定计划是讨论农业、城市、财贸等方面的问题。8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后，会议的议题就改变了。他在讲话中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

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北戴河会议从8月6日开始，经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到全会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人，根据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集中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所谓"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所谓"单干风"是指包产到户（主要批判邓子恢）；所谓"翻案风"主要是指6月彭德

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申诉信，也兼及甄别平反的“一揽子”做法。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作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9月26日，即八届十中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发表了一次讲话，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观点。9月29日，发表全会公报。公报中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这段话，毛泽东曾作过较大修改。把阶级斗争延伸到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对这个时期阶级斗争存在的必然性的分析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告诫，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使“左”的东西又有所抬头。当时的直接影响有，纠正“单干风”，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批评“翻案风”，使甄别平反工作陷于停顿。但是，调整工作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受批判“黑暗风”的影响不大。会上，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建议，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不再向下传达。9月24日，他在讲话中说：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根据这个精神，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

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继续调整的。

在继续调整的方针的指引下，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工业生产稳步上升；在农业生产初步恢复的基础上，市场供应状况有明显改善，一些原来凭票证或定量供应的商品，减少了票证或者敞开供应；集市贸易价格继续有所下降；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货币流通量也进一步减少。国民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十中全会又提出抓阶级斗争，还要不要继续执行调整的方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1963年7月3日，李富春在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9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列举过去两年调整收到的成效，指出我国经济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同时指出，在农业方面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必须用很大的力量解决吃穿用问题。还必须有一段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李富春的报告。毛泽东同意李富春继续调整的意见，他说，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认为，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形势发展十分有利，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1) 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粮食在几年内还要进口，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的恢复，需要花很大的力量，穿的也很紧张；(2) 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基础工业，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维修和更新等方面，要继续进行大量工作；(3) 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要花大力进行整顿。尤其是亏损企业为数还不少，要进行工作加以改变。(4) 外债还没有全部偿还，还有1.6亿卢布的苏联债务，要到1965年才能还清，到那时，才有可能用较多的外汇进口建设所需要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5) 开展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6) 在国际上反修斗争，也要经过几年工作才有可能争取一个新的局面。会议从上述分析出发，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过渡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一）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二）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基础上提高50%左右；（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如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应力争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填平补齐，使之成龙配套，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走上正常的轨道。

会议对三年以后的任务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继续调整三年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抵制了由于形势稍有好转就急于大干快上的错误倾向，加快了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进程。

第三节 成 就

1963年到1965年，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这段期间，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对矿山、工业企业进行填平补齐，加强设备维修和技术改造。自1961年下半年起，各个矿山利用加工工业后退的时机，集中力量加强掘进和剥离工作，归还了欠账。到1965年，除非金属矿山外，煤矿、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辅助原料矿以及化学矿山、建筑材料矿山都先后达到了采掘（采剥）关系基本正常，开拓、准备和可采数量基本达到规定的要求。在此期间，着重解决了大型精密设备和进口设备的修理和关键配件的供应。到1964年底，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矿山的设备完好率达到80%左右，一般的设备完好率达到85%—90%，载重汽车完好率1965年达86.2%。1963年以后，还有计划地对“大跃进”中仓促建设和投产的新企业、新基地进行了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了促进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三四年内，把基本折旧费用从国家财政收入中划出，由企业支配。

——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企业经过整顿，1963年底，工业可比成本比上年下降了9.5%，工业亏损额减少了一半多，亏损最多的煤炭部门也减少亏损额约1/4。到1965年，全部工业亏损额只有4.9亿元，基本上消灭了经营性亏损。工业利润则逐年增加，1965年的工业产值利税率达39.8%。1963年，商业企业的亏损额也比上年减少约1/3，过去长期亏损的猪、禽、蛋、菜等也减少亏损89%。

——增加职工工资，提高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1963年4月，中央决定拿出近9亿元给部分职工增加工资。主要是：提高40%职工的工资级别；提高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把西南、中南和华东原属一、二类工资区的地方提高为三类工资区，成都、重庆、贵阳、长沙等原属三类工资区的城市提高为四类工资区）；适当调整过低的工人工资标准；适当扩大计件工资范围，改进奖励制度，整顿和改进津贴制度。无论新老基地，都注意到适当解决职工住宅不足、文教卫生设施不适应建设发展需要的问题。1963—1965年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由“二五”的13.2%上升到17%。

——调整部分商品的价格。1963年，把农村的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到同收购价格持平；把城乡销售的工业用粮的价格提高到不亏本的水平；对各地棉花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0%。同时，适当调高蚕茧、畜产品、木材和绸缎的价格，调低家禽、蛋品、海带、金笔、收音机、塑料制品等价格。重工业产品价格也有升有降。

——试办托拉斯。60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提出，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经过调查研究，1964年6月，国家经委党组拟出《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在讨论这个报告（草稿）的会上，周恩来指出，托拉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来办，按照经

济规律的要求来管理。公司的企业职能逐步扩大，行政职能就要逐步缩小并转化为经济职能。文件于7月17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参照执行。当时，首先成立的是烟草工业公司，8月，又试办11个托拉斯，其中9个是全国性的，3个是地区性的。9个全国性的托拉斯的管理范围和所属企业的情况是：烟草公司和医药公司具有全行业性质，集中管理全国所有的烟厂和药厂；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仅限于管理原有的中央直属企业；其余6个（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除管理原有中央直属企业以外，还上收了数量不等的地方企业。托拉斯试办的时间很短，有的（如烟草公司）很快显示出经济效益，有一些则矛盾重重，其中主要矛盾是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由于缺乏经验，组织托拉斯主要是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办法，上收企业过多，权力过于集中，也加剧了各种矛盾。因此，1965年没有扩大试点。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964年9月，中央决定把19个非工业部门（即农业、林业、水利、气象、水产、文教卫生、交通运输、商业、城市建设等）属于地方管理的基本建设投资，划给一笔资金，由地方统筹安排。拨给地方的基建投资，在1964、1965两年都占预算内投资的20%以上。

以上这些措施，对继续调整都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到1965年，全面调整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过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他在报告中庄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65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超过1957年的水平。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223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33亿元，工业总产值1402亿元，同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0%，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10%，工业总产值增长98%。主要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

（一）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比较协调。下表是1961年至1965年农业和工业比例关系的变化情况：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上年为 100）		占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1961	97.6	61.8	34.5	65.5
1962	106.2	83.4	38.8	61.2
1963	111.6	108.5	39.3	60.7
1964	113.5	119.6	38.2	61.8
1965	108.3	126.4	37.3	62.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20 页。

统计资料表明，农业总产值经过三年下降，1962 年开始增长，1965 年增长 8.3%；工业总产值经过两年下降，1963 年开始增长，1965 年增长 26.4%。1965 年，农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 1961 年的 34.5：65.5（1960 年为 21.8:78.2）改变为 37.3:62.7。这样的比例已经比较协调了。

（二）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产值比例比较协调。下表是 1961 年到 1965 年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变化情况：

年份	轻重工业总产值指数（以上年为 100）		占工业总产值%	
	轻工业总产值	重工业总产值	轻工业总产值	重工业总产值
1961 年	78.4	53.4	42.5	57.5
1962 年	91.6	77.4	47.2	53.8
1963 年	102.3	113.8	44.8	55.2
1964 年	117.8	121.0	44.3	55.7
1965 年	147.7	110.2	51.6	4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20 页。

统计资料表明，轻工业总产值经过三年下降，1963 年开始增长，1965 年增长 47.7%；重工业总产值经过两年下降，1963 年开始增长，1965 年增长 10.2%。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从 1961 年的 42.5:57.5（1960 年为 33.4:66.6）改变为 51.6:48.4，两者比例趋向于协调。同时，各工业部门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如采掘工业的掘进（剥离）与回采，机械工业内部的主机与配套、制造与维修，经过调整，也逐步趋于合理，并且建成和开发了大庆油田等几个大油田，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

（三）农业内部的结构有所调整。下表是 1960 年到 1965 年，农业总产值构成的变化情况：

年份	农业（作物栽培）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
1961	81.2	1.7	7.9	1.9	7.3
1962	78.9	1.7	10.3	1.8	7.3
1963	76.1	1.9	13.3	1.8	6.9
1964	76.0	1.9	13.9	1.7	6.5
1965	75.8	2.0	14.0	1.7	6.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1 页。

统计资料表明，在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作物栽培）的比重，从 1961 年的 81.2% 降至 1965 年的 75.8%；林业和牧业的比重均有增长，其中牧业从 1961 年的 7.9%增至 14%，增加将近 1 倍。经济作物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四）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趋于正常。下表是 1961 年到 1965 年，积累率的变化情况：

年份	国民收入使用额（亿元）	积累额（亿元）	积累率（%）
1961	1013	195	19.2
1962	948	99	10.4
1963	1047	183	17.5
1964	1184	263	22.2
1965	1347	365	27.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5 页。

统计资料表明，1962 年以后，国民收入额是逐年增长的，1965 年达到 1347 亿元。相应地积累额也逐年增长，1965 年达到 365 亿元。积累率从 1961 年开始大幅度下降 (1960 年是 39.6%)，最低的一年（1962 年），只有 10.4%。高积累率固然不正常，这样低的积累率也是不正常的。1965 年，积累率恢复到 27.1%，就比较正常了。

（五）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下表是 1961 年到 1965 年的财政收支状况：

年份	总收入	总支出	收支差额
1961	356.1	367.0	-10.9
1962	313.6	305.3	+8.3
1963	342.3	339.6	+2.7
1964	399.5	399.0	+0.5
1965	473.3	466.3	+7.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45 页。

统计资料表明，1962 年以后，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结余。财政收支平衡，

为市场物价稳定创设了前提。在最困难的1961和1962年，曾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高价供应，并扩大了凭票凭证供应的范围。随着商品供应的增加，这些临时措施已陆续取消。全国零售物价和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回落，到1965年只相当于1957年的109%和159%。由于生产恢复、市场供应增加，许多农产品调高了收购价格，职工提高了工资，城镇闲散劳动力和待业青年利用多种形式、广开门路，绝大多数得到安置。这表明，我国人民已经渡过了困难时期，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五年调整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但调整之路殊不平坦。1962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和党中央强调抓阶级斗争以后，使后三年的继续调整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1963年开始，在城乡开展“四清”运动。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搞“四清”（清账、清库、清工、清财）的经验。他在会上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并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为了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于20日发出。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有：

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是正确的。这些事实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因此，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立场，克服这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党中央认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地彻底地清查一次。这是一次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

部的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

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中央认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决定（草案）在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批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一段话，集中地表达了毛泽东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战略意图。运动展开以后，在具体政策上作过若干调整和变化，但这个意图始终没有改变。

由于运动一开始，阶级斗争的调子就定得很高，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并不符合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因此，运动试点铺开以后，就发生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过宽的偏向。有的地方乱打人、捆人；有的地方乱搜查、乱扣帽子；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逃跑、自杀的事件。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做出明确规定。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规定（草案）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以防止打击面过宽。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下发全国城乡。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分别派了大批工作队，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工作队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下到农村和企业，按图索骥，到处发现严重的阶级斗争。一个时期，各地党委争相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这里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那里的集体经济和国营企业已经“和平演变”。中共中央把这些报告批发下去以后，下边的“左”倾情绪越来越严重了。当时，影响最大的文件有：

（一）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说：“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

（二）9月1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农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

（三）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同时，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些文件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了。1964年6月到9月，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修改后的后十条充分反映了上述文件的精神。修正草案认为，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是，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根据这种估计，便改变了原来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明确提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必须在扎根串连、充分发动群众以后，证明他们确实能够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取得贫下中农群众信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好的或基本上好的基层组织，才能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这实际上是重复使用在土地改革中曾经出现过的"搬石头"的错误做法。运动一开始，基层组织和干部就被抛在一边，变成审查对象了。

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以后，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运动越搞越"左"，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越来越宽，不仅打击了那些有缺点错误的干部，而且打击了许多好干部，工作队所到之处，几乎都"烂掉"了。

1964年12月15日到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农村"四清"中的一些做法，如大兵团作战，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等，并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指出，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文件纠正了后十条修正草案的一些错误做法，明确规定，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这些规定，对纠正一些"左"的做法，解放大批干部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文件出现了一个新的观点，第一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时，这个观点并没有引起大家普遍的足够的重视，但是，它表明，在毛泽东胸中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阶级斗争的风暴——"文化大革命"。

城乡"四清"运动，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工作。一是在运动中扩大了打

击面，特别是在1964年下半年，由于政策上越来越"左"，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二是农村"四清"运动是从批判"单干风"开始的，在运动中集中批判"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是"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使"左"的政策再次泛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被"纠正"了。对城市集市贸易采取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认为管理宜紧不宜松，范围宜小不宜大，凡可以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替的都应采取积极措施，逐步代替。对农村集市贸易也越管越死。三是在工业企业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科学实验、为名为利等所谓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使刚刚恢复起来的被"大跃进"破坏了的生产秩序再一次陷于混乱。这些，都对经济调整产生了消极影响。

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的县、市已有694个，占县、市总数的32%。其他地区，普遍展开了面上的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四清"已无法进行。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便结束了。

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即由以解决吃、穿、用为中心转入以备战为中心。

1963年8月20日，邓小平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是低水平）。""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这个意见，成为正在酝酿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

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听取计委领导小组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了一个思想，认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显然提高了国防工业的地位。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据此，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这个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

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这是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家计委重新修改了"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草拟了"三五"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

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当时提出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为9%，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共850亿元，1970年粮食达到4400亿—4800亿斤，棉花4400万—4800万担，钢1600万吨，原煤2.8亿—2.9亿吨，原油185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铁路货运量7亿吨。9月18日到10月12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计划。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指引下，加快了三线建设。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其中钢铁工业14项、有色金属工业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工业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10项、纺织工业12项、轻工业8项、铁道工程26项、交通工程11项、民航工程2项、水利工程2项。还有农业、林业、邮电、商业、广播、教育事业等项目。这一期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工厂有49个。

三线建设，对改变我国工业布局、开发大西南和大西北起了积极作用，但这个决策有重大失误。由于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在三线建设部署上要求过急，摊子铺的过大。由于片面执行"靠山、分散、隐蔽"以及"进洞"的方针，不顾交通运输和各项配套设施，带来的是，投资效果差，甚至造成严重损失。有的项目虽然建成并形成生产能力，但由于生产任务不足，互不配套，不能正常生产；有的成为半拉子工程，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也有少数不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根本没有形成生产能力，只好搬迁和报废。

第十三章　“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教训

“二五”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在最初几年里，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从1961年起，开始调整经济，特别是后三年，调整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总结这段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吸取不少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以便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作为借鉴。主要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方面。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一条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国家掌握了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经济，人们对客观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了，人们可以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来改变和完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这种改变和完善，只能在客观的生产力发展确实提出要求时才是正确的。如果不考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那在实践中一定会碰壁，有时会碰得头破血流。我国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企图过早地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关系变革过快，曾于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进行了某些必要的整顿，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划小，把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从公私合营企业中划了出来等等。应该指出，这些做法是正确的。当时，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条件下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本来应该把这种局势稳定下来，使之不断巩固和完善。但是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扩大集体经营规模和提高公有化程度，在农村急于并社，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城镇中则急于把各种合作组织、公私合营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急于消灭个体经济。以为只要集体经济的规模扩大了，公有化程度提高了，发展速度就会加快。另外，工矿企业纷纷取消计件工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食堂制。这种改革看起来似乎很“先进”，很接近“共产主义”，其实这种急于过渡的做法完全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有人估计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时，曾

说："至少30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3000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制定了纠正的政策。特别是关于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将人民公社从统一核算改为"三级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制度；发还自留地、恢复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由于实行了以上措施，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这充分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必须在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共存，集体经济规模不宜过大，发展速度不宜过快。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超越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只凭主观愿望，急于提高公有化程度，甚至想提早过渡到共产主义，那就必然要遭到失败，要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

二、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必须从国情出发

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稳步前进，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急于求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任何人都希望能够加快速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尽早地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国家。但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能脱离客观条件，不能脱离一定的国情，否则不适当地夸大主观能动性，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明显的例证。

1958年的"大跃进"，从主观愿望来看，是想尽快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追上世界先进国家，这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认为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的积极性，有了拼命苦干精神，生产就可以几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甚至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可以很快地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单凭主观想像的唯心主义思想。主观能动性，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决定经济发展速度的，是客观的物质条件和客观的经济条件。如果不顾这种客观条件，超越客观可能，制定过高的指标来进行经济建设，则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坠入失败的深渊。

实际上从当时我国的客观条件看，建设速度不宜过快。因为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人口多，耕地少，工业交通基础差，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科学技术也很落后。这是我们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的基本国情，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特点会给经济建设带来多大的困难和限制。根据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我国的建设速度不能够太快，不能急于求成，企图"一天等于20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国三年"大跃进"，不但没有带来高速度，反而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1962年调整时，下决心对工业和基本建设进行"伤筋动骨"的关、停、并、转和停建、缓建的措施，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安排不仅不要增长，而且要退够，退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1963年经济回升后，中央仍然清楚地看到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作出继续调整的决策，结果生产持续增长，到

1965年工业生产较大幅度地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

从“大跃进”到以后的调整，这一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土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有很大的艰巨性，经济建设速度不能过快，只有认识这一点，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循序渐进，稳步前进，在稳中求快，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三、坚持综合平衡、发展国民经济

“大跃进”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这是忽视了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坚持综合平衡的缘故。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分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按照国民经济内在的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

“大跃进”中，强调“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上是忽视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例如，只顾积累，忽视消费；只顾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只顾建设，忽视市场和人民生活等等。结果造成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破坏了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内部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大跃进”时提出的所谓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所谓“算死账”，也是无视综合平衡的一种表现。当然，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是决不能因为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听任经济自由发展。只有承认不平衡，通过综合平衡的方法进行控制、调节，经常地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不断在新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样，国民经济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大跃进”时提出的反对所谓“消极平衡”、“算死账”，实际上是提倡计划留有缺口，不要算账，不算账自然无法搞综合平衡，而没有综合平衡，必然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混乱和失调。

经济调整时期，重新强调综合平衡。在编制计划、安排资金和分配物资时，强调以农、轻、重为序；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先安排市场和当年生产，有余力再安排基本建设；基本建设先填平补齐；生产先保证品种和质量等。通过这样的安排，才扭转了当时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

从“二五”时期的经验看，发展国民经济、做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还要瞻前顾后，不能只看当年。经过这样的平衡，速度可能定得低一些，但却是扎实可靠，可以持续增长的，因而实际上速度不会慢而是会快一些的。

四、重视市场的作用和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实行计划经济，用计划来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等。但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情况下，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市场是不可缺少的，加之我国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更需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

在“大跃进”中，一方面计划不全，没有综合平衡，没有真正的计划指导；另一方面，是国营商业包揽一切，加上一平二调、供给制、“共产风”等，更取消了商品交换，窒息了市场机制。

1961 年后，在加强计划管理的同时，恢复了多种经济成分，并设法活跃市场经济。在商业方面，也开通了多种渠道，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在部分大中城市中也开设了自由市场，国家收购农副产品采取灵活的办法，对粮、棉类农产品继续实行统购统销，对较重要的二类农副产品参照计划价格实行派购、议购；对三类农副产品，农民则可自由销售。这种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活跃了农村经济和城乡交流，改善了城市供应，对于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的。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也是总结“大跃进”运动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经济效益是任何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原则，它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用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劳动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社会财富，增强国家实力，迅速积累建设资金，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大跃进”中却根本不重视经济效益，一味地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强调高速度，只求多快，忽视好省。为了赶速度，大办消耗大、质量差的小企业，大搞人海战术的群众运动，大破规章制度，废除经济核算制等。结果是废品、次品大量增加，不少工程报废，物资严重积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国家在经济调整时，除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还下决心停办一切消耗高、质量差的企业和建设工程，精减机构，精减职工，切实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重建各种规章制度，这些都是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举措。正是这些正确的措施，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事实证明，只有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真正的高速度。

第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第一节 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是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并且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两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它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目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党内政治状况的认识都出现了偏差。1963年9月以后，在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中，毛泽东确认，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已经复辟。根源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种错误判断，直接影响到他对国内党内政治生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也出现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因此，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的修正主义”问题，1965年秋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在中国找到一条反修防修的道路，便断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要搞掉睡在身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在这次会议上还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的批判，停止和撤销了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二是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另设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这两个决定表明，毛泽

东开始在组织上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障碍，要依靠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类人来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次会议，使“左”的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便席卷而来。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以前，江青、康生等人已经把会议的信息散布到社会上，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展开对中共北京市委的攻击。5月14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出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市委。5月30日，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社论，要求“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并且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泽东批示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配发了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造党委的反，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很快，学校的动乱就开始了。许多城市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掀起了以校长、党委书记、教师为对象的“斗黑帮”的浪潮，到处出现乱揪乱斗的现象，使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陷于瘫痪。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由于工作组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反映给毛泽东，他极为不满，严厉指责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7月28日，中央决定把工作组撤销了。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打乱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严重威胁生产和经济建设。为了防止影响工业生产，6月底，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6月30日，他们写信报告给在外地的毛泽东。信中说：“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他们建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7月2日，毛泽东复信同意通知下发。通知说：“一切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必须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力争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所有工矿企业一哄而起。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生产建设遭到损害。”通知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遗憾的是，通知下发刚半个月，毛泽东就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集中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通知已经没有人听，更

不要说执行了。

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给予热烈的支持。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责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8月7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并且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大字报虽未点名，这个司令部明显的是指刘少奇等主持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因此，大字报出来以后，全会的小组讨论便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文件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其成员和代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文件根本未提党组织和文化革命小组等组织的关系，实际上是不要党委领导了。文件中也提到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但在盲目的、自发的群众运动面前，谁还会注意这些！

周恩来最关心的是生产建设遭到破坏。因此，他和陶铸力主在决定中加上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但这些话也没有多少人听了。

8月18日，在北京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上，毛泽东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的袖章，表示他坚决支持红卫兵造反。林彪在充满杀气的讲话中，则号召“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在林彪讲话的鼓动下，从8月20日开始，首都一些红卫兵便走上街头，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焚书、抄家、砸商店、改街名、烧戏装、毁文物、打人、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横冲直撞，无所不为。首都一闹，其他地方闻风而动，有的比北京闹的还厉害。这种严重破坏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却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

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学生，总共约1100万人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

面对社会动乱，周恩来为了稳定交通运输等要害产业，于9月2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通知规定，各铁路管理机关“必须指定必要的人员，组成专门的领导班子，切实负责管好各项运输生产工作。铁路分局和分局以下单位，可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展的单位，应当讲清道理，说服群众，暂时停止进行，集中全力保证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凡是生产任务很重，暂时不宜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说服群众，适当推迟进行。不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或推迟进行的单位，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完成机车、车辆的制造和修理任务，并保证完成冬运防寒的准备工作。”“在车站和列车上，不要打人，不要搜查；任何人不要对旅客进行政治审查；不要拦截列车和阻止列车的正常运行，全力保证列车按规定时刻运行。”

9月7日，周恩来和陶铸起草《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要求广大工人、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劳动者“应当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工作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使工农业生产出现更新的面貌，更大的繁荣。”社论还指出，各单位的领导人要适当地分工，分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

9月14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业五条）两个文件同时下达。文件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国防工业项目和新工矿区，无论已建成的或正在建设的，都是国家的机密，更应说服其他单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不能随便进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收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城市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应动员下乡，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

《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和中央两个文件的下达，对抵制社会动乱给工农业生产的冲击，使社会生产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引起了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不满。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天下大乱，以便在乱中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大乱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的。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上，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荒谬的概念，为10月9日到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所肯定。陈伯达在会上说："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这个错误路线的及其代表人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浪便在全国掀起。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宣布取消运动由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就合法化了。在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党委普遍遭到冲击，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陷于无人负责、难以运转的瘫痪、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威胁，经济形势日趋恶化。

对于这种形势，周恩来和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同志忧心如焚。他们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顶住压力，继续坚持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10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客货列车晚点现象比较严重，在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阻止列车开行的事件，严重影响了列车秩序。通知提出"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严禁强迫铁路延长列车运行区段"，"不准用各种借口妨碍铁路职工执行职务"等措词严厉的要求。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的题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在城市生产单位搞文化革命，同学校搞文化革命，条件是不完全一样的。为着闹文化革命，学校可以暂时停课，搞内外大串连。而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却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个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社论要求城市生产单位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工农群众可以向上级，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决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连。"

正是这篇社论发表的同一天，在上海市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事件的起因是，11月初，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未予支持和承认。11月10日，王洪文带领两千多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便煽动工人卧轨断路，造成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30多个小时。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前去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却擅自签字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活动是"革命行动"。11月16日，毛泽东竟批准了张春桥的做法。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由产业工人组织"造反"和"串连"，工矿企业"停产闹革命"的活动，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混乱进一步升级。

11月13日，陈伯达等人草拟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其中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11月16日，国务院召开工交企业座谈会，讨论这个文件，遭到与会各地、各部门负责人的强烈反对。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主持座谈会的谷牧整理出一份《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文件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批分期，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这个文件被毛泽东否定了。他说，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批分期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

12月4日到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际上是对座谈会进行围攻。12月6日，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攻击他用生产压革命，并指名批评了《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同一天，林彪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完全否定了工交座谈会的意见，指责工交系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同刘少奇、邓小平联系起来，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刘、邓的影响很大。”他提出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于每一个领域。”

12月9日，重新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由中共中央批准下达。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当天下达。这两个文件，虽然也有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产品质量，坚持文斗，不要武斗等规定，但其基本精神，是要求工矿、农村和学校、机关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文件只提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提党的领导；肯定了成立群众组织、实行“四大”和大串连；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等等。从此，“文化大革命”便合法地进入工交、财贸、农业、科研等领域，使“停产闹革命”很快风靡全国。

周恩来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曾对在国务院协助他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但是，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已经越来越影响经济工作，它从许多方面给生产带来干扰和破坏。

——1966年9月到11月的大串连高潮中，造成交通运输紧张，加重了各级财政负担。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先后涌到北京，并纷纷奔向各地串连，使铁路、公路、水运的客运量急剧增加。由于坚守“革命第一”的原则，只好牺牲货运量，先满足大串连的需要，结果，使不少物资积压待运。到1966年底，仅铁路积压的货物就高达1000万吨。大串连的交通和食宿费用均由财政开支，各级财政究竟花了多少钱很难统计。有材料说，红卫兵串连的直接开支和间接损失（阻碍运输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达75亿—100亿元。”大串连一直持续到1966年底。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

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从12月21日起，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外地的师生也照此办理。此后，大串连的浪潮才逐渐平息。

——鼓动合同工、临时工“造反”。1966年11月8日，由极少数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在北京成立，宣称要造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并在江青支持下，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1967年1月2日，“全红总”强迫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负责人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主要内容是：“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一）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二）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联合通告》公布以后，“全红总”的头头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通知各分团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一股歪风，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一些单位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1961年到1963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补发工资。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周恩来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放到运动后期。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2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一场风波慢慢平息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生产指挥系统不能正常调度，原有生产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开始受到影响。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机械工业在制品大量减少，设备维修完不成计划，协作关系中断，直接对下年生产发展造成危害。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开始下降，1966年新增固定资产比1965年减少20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1965年的93.6%下降到70.4%，大中型项目的投产率由1965年的22.9%下降到18.1%。

尽管有许多干扰和破坏，但由于（一）1966年动乱主要还是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第四季度开始才直接影响到经济领域；（二）周恩来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住经济工作的关，这一年，国民经济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7.3%），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第二节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7年和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展开，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面。

1967年1月初，上海市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支持这个夺权行动，他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文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行动，并发出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旗》杂志预言“‘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的策动下，山西省（1月14日）、贵州省（1月25日）、黑龙江省（1月31日）、山东省（2月3日）的造反派组织也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省、市人委的党政财文领导权，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但往后的夺权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文化大革命”自身带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夺权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大联合”，造反派要联合起来；二是“三结合”，革委会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参加。“文化大革命”恰恰在到处破坏这两个条件。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互相对立的两个或几个造反派组织，都想以自己为中心夺权，寸步不让，无法实现“大联合”；许多原来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则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领导干部刚刚被这一派造反组织“结合”，立即又被另一派组织所打倒，也无法实现“三结合”。为了保证夺权早日实现，196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的困难，军队弄不清楚谁是左派。结果，支左部队介入以后，普遍出现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情况，在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纠纷和冲突。不少地方出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并酿成流血惨案的事件。

这种动乱的形势，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忧心。他们挺身而出，对中央文革小组倒行逆施的做法进行了抗争。在1967年2月11日、16日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激烈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说他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

乱了，还要搞乱军队；不要党的领导，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是形而上学，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像这样涉及国家体制的大问题，不经政治局讨论……老一辈革命家义正辞严，使陈伯达一伙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场斗争，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三个原则问题：（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三）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这些问题，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使毛泽东无法接受。

2月18日，毛泽东在听了王力、姚文元的汇报以后，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地指责了这些老同志。接着，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又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生活批评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他们的围攻。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3月，林彪、江青一伙得寸进尺，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击复辟资本主义二月逆流”的浪潮，想乘机把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统统打倒。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4月30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五一节”登上天安门，同首都人民共庆佳节。于是，“反击二月逆流”的恶风暂时停息下来。

由于“大联合”、“三结合”困难重重，全面夺权受阻，毛泽东便寄希望于“革命大批判”。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发动了对刘少奇的攻击，并想由此制造一个从多方面攻击“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但是，毛泽东用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的意图并未实现，相反地，却出现了更大的动乱。7、8月份，连毛泽东也感到失控了。

——7月20日，武汉市发生围困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王力和数十万军民游行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形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6月到8月初，在中央文革成员煽动下，北京和外地上千个造反组织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围困中南海（号称“揪刘火线”），冲击国家最高领导机关。

——8月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造反派以外交部名义向我国驻外机构滥发造反指示，并制造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涉外事件。

——夏季以来，许多地方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车船、档案机要文件，破坏铁路交通等违法事件。

面对失控的局面，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8月底，他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还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7月中旬到9月下旬，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等地。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指示中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同时，对一些“左”的政策也做了某些纠正。如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斗私、批修，要拥政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个指示发表以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许多地方有所缓和，各地都解放了一批干部。

但大错已经铸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使1967年国民经济的形势急剧恶化。

第一，经济指挥和管理机构基本瘫痪，国民经济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夺权以后，从上到下原有的一套经济指挥和管理系统失灵，大批有经验的干部“靠边站”，计划管理和经济管理已经难以为继。1967年的年度计划安排，是在1966年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交会议上讨论的，中央一直没有审批。1967年头几个月事态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计划已根本无法实现。6月，在全国生产供应会上被迫宣布，当年计划指标如果确实完不成，可以顺延到第二年。订货工作由于同样原因，也不能按原计划规定的指标进行。由于各级经济委员会和业务部门陷于瘫痪，使日常的生产调度和业务工作难于集中领导。1967年9月设立的国务院工交办事组，主要是研究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中急需调度的有关事宜，实际上所起作用不大。

第二，“革命大批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理论上的混乱，使许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被废弛，无政府主义猖獗。1967年4月以后，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把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科技十四条、高教六十条，以及企业管理中的生产责任制、劳动纪律、质量检查、安全操作等规章制度，都冠以“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加以批判。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总工程师对企业的技术工作负全部责任，被诬为“取消党的领导”、“推行专家治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多创税利，被批判为“利润挂帅”、“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工资制度中贯彻执行按劳分配，被说成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是资本主义货色。此外，还把“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洋奴哲学”等一大堆帽子，扣在经济部门和企业的头上。结果，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成本无人过问，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普遍下降。

第三，交通运输阻塞，煤炭生产下降，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交通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原来就十分紧张，1967年1月份比计划少运煤380万吨。2月份平均日

装车数只有3万多车。4月底，一些铁路沿线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平均日装车数直线下降，7月中旬只有2.9万多车，9月份下降到1.9万车，为计划日装数的46%。京广线长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区，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东北长春、四平地区等许多路段，因武斗不能通车，或断续通车，有的地区白天通车，晚上不通车，还有的地区路轨被拆掉，水塔被破坏，时常发生抢劫货车和军车的事件。水运、公路运输也并不安宁。大连曾有8条船被抢，1967年7、8月份，各个港口有100多条船不能卸货，有些短途运输也停止了。交通运输阻塞，对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广泛的影响。煤炭生产在"一月夺权"以后，由于生产指挥瘫痪，大规模武斗和工人大量离开生产岗位，节节下降。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1月份平均日产量只有45万吨，2月上旬，减到40.3万吨，中旬又减到38.8万吨。军事管制以后，继续下降，8月15日，降至22.8万吨。直到1967年12月，煤炭部各直属矿务局日产水平只及正常水平的50%左右。煤炭生产下降，使煤炭供应十分紧张，对用煤部门不能按计划供应，库存普遍下降到正常周转所需的水平以下。1967年第四季度，铁路运输和发电用煤，分配数为原计划的75%左右，中央工业、地方工业分配数为原计划的60%左右，冬季取暖用煤只能供应一半。煤炭供应困难，铁路运输紧张，直接影响到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部门，进而影响到其他部门，使整个国民经济都无法正常运转。从7月上旬到9月，钢的平均日产量由3.54万吨下降到1.2万吨，只为计划产量的26%；发电量从平均每日2.23亿度下降到1.6亿度，为计划日产量的60%。

第四，许多企业停工停产。1967年初，因煤炭供应不足，全国就有一批企业停工停产。如全国唯一的车轮轮箍厂1月份已停产，全国60多座水泥窑停产13座，马鞍山钢铁厂有3座高炉、2座平炉停产。到7月份，全国钢铁厂中除本溪、太钢两个企业较好外，其他钢铁企业，如鞍钢、马钢、武钢、湘钢、重钢等，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到这一年的11月份，全国32座大型高炉已有14座停产，4套大型初轧机有2套停开，29套主要成品轧机有14套停开。

1967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工农业总产值完成2104亿元，比上年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13.8%，农业总产值增长1.6%。从产品看，钢产量下降32.8%，煤炭产量下降18.3%，棉纱产量下降13.6%，铁路货运量下降21.6%。粮食和棉花产量大体上维持上年水平。这一年，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只完成原计划的64.5%，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1966年的70.4%降到50.6%。劳动生产率比上年下降19.2%。由于生产下降，收入减少，当年财政收入只完成计划的68.8%，比1966年减少24.9%，赤字高达22.5亿元。这一年，农业生产形势稍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农村分散，受"全面内战"影响的范围较小。另一方面，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保证当年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要求在春耕之际，要认真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3月7日，发出通知，规定在春耕大忙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要抓好春耕生产；6月1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保证做好夏季粮油征购和分配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夏季粮油征购和

分配工作中贯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及时收购，及时安排，合理负担，藏粮于民，计划用粮，节约用粮；8 月 21 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农业办公室召开北方九省农业座谈会，强调要建立健全生产领导班子，大胆抓生产；9 月 13 日和 25 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秋收秋种之际不要武斗或离开生产岗位，等等。

1968 年，整个国民经济仍处于动乱当中。这一年，是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唯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

1968 年初，周恩来曾试图通过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刹住派性、无政府主义的歪风，但没有成功。4 月 27 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评论员文章，公开为派性辩护，说什么“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是为了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这样一来，“围剿派性”便进行不下去了，派性和无政府主义重新猖獗起来。

从 1967 年冬到 1968 年春，由于“文化大革命”制造动乱，破坏社会经济稳定，中央文革清除了王、关、戚，干部和群众中怀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日益增长。在北京，有人否定“一月夺权”，否定反“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上海、北京出现了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2 月 13 日，外交部 91 名干部（多数是驻外大使和司局长）贴出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要求陈毅回部主持工作。群众中出现的这些动向，使林彪、江青等人深感恐慌。

为了遏止这种倾向，1968 年 3 月下旬，在毛泽东支持下，中央报刊和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反对“右倾翻案风”，重点是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与此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

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前一个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滥，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若干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如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出现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等恶性事件。陕西全省也连续出现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等性质相同的事件。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曾于 7 月 3 日、7 月 24 日，连续发布《布告》加以制止。在此期间，一些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也迅速升级，他们动用武器，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惨案。

面对动乱的严重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措施有，对一

些问题严重的省市实行军事管制，组织工人、解放军指战员进驻学校。如北京市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至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各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两年来，全国的大学和许多中学，虽然经中央三令五申要复课闹革命，但是始终不能实现。工人和解放军进驻以后，开始进行恢复学校秩序的工作。当时，遇到一个难题：大量的中学毕业生怎么办？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经验。文章在编者按中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接着，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1600多万人。

上海一月夺权以后，经过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时间拉得这样长，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在夺权过程中，由于派性、无政府主义猖獗，实际上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大联合”，“三结合”也困难重重。经过20个月的夺权斗争，到1968年9月，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原党政主要负责人当中，已有60多人被中央文件或报刊定性为“敌我矛盾”，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安插在各地的“代理人”。能“结合”的领导干部很少，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由于造反派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许多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

1967、1968年两年大动乱，使我国国民经济遍体鳞伤，到1968年已跌进“谷底”。

一、工农业生产继续下降。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亿元，比1967年又下降4.2%，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2.5%，工业总产值下降5%。主要工农业产品，粮食减产4%，棉布减产2%，钢减产12%，发电量减少7.5%，化肥减产32.4%，木材减产14.1%。原油、煤炭由于新的油田、煤矿投产，有所增加。

二、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继续下降。1968年，铁路完成货运量10.32亿吨，比上年下降6.9%，公路货运量下降10.4%。基本建设投资全年共完成104.1亿元，比上年下降20.8%，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率只有45.9%，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一年。

三、国民收入继续减少。1968年，国民收入1415亿元，比上年下降6.5%（由于人口增长，人均下降8.4%）。财政收入完成361.3亿元，比上年减少13.9%，由于大幅度缩减支出，才保持了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

四、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1968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737.3亿元，下降4.3%，人均消费只有132元，下降3.7%。两年中，粮食、食用植物油、猪肉、鲜蛋、水产品、棉布、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重要消费品的社会零售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1968年，城乡居民棉布定量供应指标，全国平均每人只有9尺，比1967年减少4.6尺。

文教、科学、卫生、新闻、体育等部门的工作也无不遭到严重的损害。

第三节　“三个突破”和新的经济调整

1969年，国内政治局势逐步趋于相对稳定。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召开作准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会议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赞同毛泽东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错误结论，组织围攻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攻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投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把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宣布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党的历史说成是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大会通过的党章，竟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次代表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了，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九大前后，武斗减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年多以来的混乱状况很不满意。这就促使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逐步有所恢复，经济也开始回升。

早在1968年底，周恩来就提出编制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969年初，计划起草小组草拟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2月，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讨论这个纲要（草案），并把它交给各地代表带回，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

《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了五项主要任务：第一，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2000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第二，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用于农业的钢材由前两年的83万吨增加到160万吨；第三，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建设，力争3到5年改变北煤南运状况；第四，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

和计划生育；第五，继续狠抓交通。1969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是：粮食比上年增长6%左右，棉花增长10%左右；钢1600万—1650万吨，原煤2.75亿—2.8亿吨，原油1850万—2000万吨，发电量980亿—1000亿度，铁路货运量5.8亿吨。

这个《计划纲要（草案）》的指标显然过高了。1969年的实际情况是：粮食比上年只增长1%，棉花比上年还下降11.7%；钢1330万吨，原煤2.66亿吨，原油2174万吨，发电量940亿度，铁路货运量5.3亿吨。"除原油外，都低于《纲要（草案）》的数字。但是，由于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经过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努力，1969年的工农业生产毕竟开始回升了，基本上刹住了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虽然这种回升，主要属于恢复性质。

1969年，加强战备对经济建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东北边境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6月间，黄永胜等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会上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他们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34%。

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订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次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实际上是以备战作为中心任务。会议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一文件经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批准。这个计划草案规定：要加快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着手进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试点工作；搞好企业下放，争取年内完成。

1970年，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了几项主要措施。

——稳定农村政策。"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在农村的一些主要政策遭到破坏。比如，全国一些地区发生强迫扩社并队现象，任意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的发展，许多地区提出"向棉田要粮"、"向菜田要粮"、"向蔗田要粮"等错误口号，不仅挤掉经济作物，而且围湖填塘，造地种粮，破坏自然生态；有些公社、大队向生产队派粮、派款，无偿抽调劳动力，搞"一平二调"，甚至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为了稳定农村政策，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有1200多人参加的北方地区（14个省、市、自治区）农业会议。会议认为，《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对于中央早已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要提倡社会主义协作，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但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会议也强调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肃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余毒，但着眼点是抵制极左思潮对农业的冲击，稳定农村

政策。这对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加速内地和战备后方（即三线）建设。这是继1965年三线建设第一个高潮之后的又一个高潮。197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完成额中，内地建设为197.98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7.1%，其中三线投资为163.13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5.3%。

根据备战的方针，对基本建设项目的施工，分别轻重缓急进行了排队。排队的原则是：第一，狠抓投产项目，急需的、容易的先上，力争把那些能够很快建成投产的项目抢建起来；第二，狠抓有关布局和备战的骨干项目；第三，狠抓薄弱环节和配套项目；第四，瞻前顾后，有重点地安排一批同今后发展规划相衔接的建设工程。按照上述原则，确定在1970年优先抢建的重点项目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42%（不包括后来追加的），内地抢建项目投资占全部抢建项目总投资的80%。

——加快地方“五小”（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的发展。国家财政规定在以后5年内安排80亿元专项资金，由省、市、自治区掌握，重点使用，以扶植“五小”工业的发展。新建的县办“五小”工业，在二三年内所得的利润，60%可以留给县；对于暂时亏损的“五小”企业，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可以由财政给予补贴，或者一定时期内减税免税；对资金确有困难的“五小”企业，银行或信用社要给以贷款支持。毛泽东很欣赏“五小”工业，1970年11月，他曾对外宾说：“我们通过实践提出搞‘小、土、群’，后来一扫而光。现在又搞起来了。”1970年，全国有近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了手扶拖拉机厂、小型动力机械厂和各种小型农机具、配件厂，有90%左右的县建立了自己的农机修造厂。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地方小钢铁厂的炼铁能力比上年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和合成氨，比上年增长60%—70%；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已占全国水泥、化肥总产量的40%。南方各省的煤炭产量比上年增长70%左右。在一些过去不发达的省区，还建立了一批纺织、榨糖、日用化工、小五金和小百货等轻工业工厂。“五小”工业大发展，增加了社会产品供应，但由于要求太急，盲目性很大，不讲经济效益，也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

——中央企业、事业单位大规模下放。1970年初，全国计划会议上，在批判所谓“条条专政”的情况下，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案，决定大规模下放中央企业、事业单位。实际上，企业下放工作，从1969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在1969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讨论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在条块关系上倾向于“以块块为主”，并拟定分批下放的名单。根据这个设想，凡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向全国的关键性企业、事业单位，暂时仍由各部直接管理；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设到厂矿去。1970年6月，中央指示：在落实国家计划的工作中，国务院各部、委要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确定各部、委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外，一般都应下放；大多数完全下放给地方，少数实行双重领导，其中多数地方为主，少数中央为主；下放工作在1970年内，应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完毕。截至当年9月底，中央工交9个部共有企业、事业单位3082个单位，已下放2237个，约

占总数的73%。其中完全下放给地方的1412个；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814个；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的11个。经过这次下放，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把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大型企业在内的2400多个单位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进一步下放到市、县。中央各部所属的民用企业只留下700个左右，其中，铁道部340多个，水电部190多个，其他部门所留企业甚少，一机部连一个直属企业也没有了。1965年，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2%，1976年，下降到6%。商业部门也再次实行政企合一，撤销了全国和省两级公司，商业部直属企业全部下放，并且逐级下放。对这次下放，周恩来曾多次指示，不能像1958年那样把厂矿统统下放，要一步步放。这个告诫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由于下放过多、过猛、过急，带来不少问题。一是权力下放后，中央和地方权责分工不清，依然是各关心各的。将大批产销面向全国的大工矿企业下放到地方，实际上地方也管不了，仍得由中央部门代管，形成企业多头领导；二是仓促下放，打乱了原有协作关系；三是企业下放后，中央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没有跟上，地方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倾向不断发展，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相当严重，造成很大浪费。

由于采取了某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1970年的经济发展较快，工农业生产在上年恢复的基础上，有大幅度的增长。工农业总产值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1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工业总产值20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7%。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4779.1亿斤，增长13.7%，棉花4554万担，增长9.5%；钢1779万吨，增长33.5%，原煤3.54亿吨，增长33.1%，原油3065万吨，增长41%，发电量1159亿度，增长23.3%，铁路货运量6.8亿吨，增长28.3%。

这一年，国民收入达到1926亿元，比上年增长23.3%、财政收入662.9亿元，增长25.8%，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55.2亿元，增长53.5%，地方自筹资金比上年增加20.5亿元，增长1倍以上。

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

1970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基本上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1970年的经济进展中也潜伏着许多矛盾，主要是：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1970年计划安排的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28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7%，执行中一再突破原定计划，全年共追加投资50亿元。加上地方自筹资金，全年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总额达295亿元，比上年猛增109亿元。当年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409个，比计划安排多296个。建设规模扩大，积累率也急剧上升，由上年的23.2%提高到32.9%，造成了人力、物力的紧张；内地建设过快过急，对沿海发达地区的投资限制过多过死，不仅影响沿海工业本身的发展，反过来也削弱了对内地的支援；重点过重，挤了农业、轻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1970年，农业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8.4%，轻工业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3.7%，都低于1966年。非生产性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11.7%，其中住宅建设只占全部投资的2.6%，都是建国以来比例最低的。这些矛盾，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1971年到1975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第四个五年计划，在1970年初就已经开始编制。1970年2月至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纲要（草案)》根据毛泽东关于经过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的设想，不切实际地确定1975年钢要达到3500万吨至4000万吨（比1970年增长106%—135%)，生产能力要达到4000万吨以上。与之相适应，规定1975年原煤要达到4至4.3亿吨，原油7000至10000万吨，发电量2000至2200亿度，铁路货运量9至10亿吨，粮食6000至6500亿斤，棉花6500至7000万担。据此，电力、轻工等部门先后提出比1975年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燃料工业部也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的口号，要求到1972年江南九省实现煤炭基本自给。其它各行各业也都酝酿着要大上、要翻一番。

为了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从1971年开始，对经济管理体制也做了一些变动，这主要有：（一）实行财政收支包干。即在国家统一预算下，对省、市、自治区试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或者全额分成、收入留成的办法。这种办法，扩大了地方的财政权限，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方便了地方统筹安排。但在执行中发现，收入打不准，不稳定，苦乐不均；超收归地方，短收不能保证上交，还要中央补贴，实际是“包”而不“干”。1972年预算执行结果，全国十四个地区超收，地方分得9.3亿元，十五个地区短收21.8亿元，不仅不能上交，还要中央补贴8亿元。这自然难以坚持下去。1976年又改为“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实际上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办法，只是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扩大了，机动财力增加了。（二）物资分配包干。1970年，随着企业下放，提出试行物资分配包干，即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的物资平衡、分配、供应方面的权力，有利于地区内物资的统筹安排和合理使用，但是，由于物资管理上的分散，造成地区间物资调度困难，影响重点生产建设任务的需要，特别是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相互脱节，造成难以克服的矛盾。1972年，统配部管物资由1966年的579种减为217种，其中统配物资从326种减为49种，部管物资从253种减为168种。大量物资的分配权层层下放，打乱了原来的协作关系，削弱了物资的统筹安排和综合平衡，给各部、各地区的企业单位生产建设计划的安排带来了不少困难。1973年，统配、部管物资又增加到617种。1976年起，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供应工作不再移交地方管理。（三）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即按照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投资、设备、材料由地方统筹安排，调剂使用，结余归地方。同时决定将企业上缴财政的折旧基金全部下放给地方，用于技术改造和综合利用，实际上大量挪用于基本建设。这种办法，只对少数项目进行了试点。（四）简化税收，扩大地方管理权限。1970年开始，简化税种、税目、税率。将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等五种税合并为一种工商税。合并后，对国营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所得税。同时，把部分税收管理权限下放地方。地方有权对当地新兴工业、“五小”工业、社队企业以及综合利用、协

作生产等确定征税或减免税。由于税收管理权一再下放，结果政出多门，造成混乱，不得不再次强调适当集中。1977年为加强税收管理，国务院作出规定，凡税收政策的改变，税法的颁布和实施，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权力都属于中央。此外，与企业的管理权、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相适应，在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时，还提出了计划的制订，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在地区和部门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计划的设想。但是，由于下放的大批大中型企业产供销面向全国，经济联系面广，生产技术复杂，地方无法安排，生产计划不得不仍由中央各部负责安排。结果，计划管理上"条条为主"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块块为主"的局面也并未形成。

1971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70年底，根据《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精神，编制了1971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要求：狠抓内地和国防工业建设；大办农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要大打矿山之仗；发展科学技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71年的计划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7%，工业总产值增长1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指标是：粮食4900亿—5100亿斤，棉花4800万—5000万担，钢2000万—2100万吨，原煤3.6亿—3.7亿吨，发电量1300亿—1350亿度，原油3900万—4000万吨，棉纱1000万件，铁路货运量7.3亿—7.5亿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0亿元。财政收支各705亿元。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270亿元，比上年增加15亿元。大中型项目1168个，其中新建112个，改、扩建137个。新增职工140万—156万人，职工人数达到485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296亿元，比上年增加23亿元，其中调整工资部分增加11亿元。1971年的计划指标又过高了。

1970年底，经济方面有些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如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不能适应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的需要，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紧张，产品质量下降，设备失修，事故增多，等等。按理，1971年应该对计划作一些调整，把指标降低一些，但是，不仅没有及时调整，反而推出了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原因是，(一)《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就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按照这个纲要（草案）来安排，指标必然过高；(二）当时由林彪一伙把持下的军委办事组统管整个国防工业，不顾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建规模。民用方面也为追求翻番任务而到处铺摊子。

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基本上还是完成了。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4%，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98.4%，比上年增长3.1%，工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7%，比上年增长14.9%。财政收入完成计划的105.6%，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计划的97.5%。但由于指标过高，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和重工业生产急剧膨胀，出现了"三个突破"：一是到1971年底，职工总数达到5318万人，突破了5000万人；二是由于职工人数猛增，使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大大超过计划。原计划1971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96亿元，实际执行结果达到302亿元，超过300亿元；三是原计划1971年粮食销量为794亿斤，

实际执行结果达到855亿斤，突破了800亿斤。“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一）挤掉了农业劳动力。1970年和1971年两年新增加的职工中约有600万人是从农村招来的。另外，由于各地大搞会战，1971年常年参加会战的民工最多时达到1000万人；（二）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1971年全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只有11924元，比全国计划要求低4%，比上年下降1%。这一年全国有16个省、自治区的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70年下降，其中有9个省是增加职工在20万以上的地区；（三）增加了货币投放，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据统计，1971年和1972年两年共增发货币27.6亿元，超计划发行12.6亿元。其中用于发放工资和各种补贴的费用占了很大部分。1971年社会商品购买力比上年增加12.2%，而同期零售商品货源却只增长5%，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三个突破”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社会经济状况更加不稳定。

1970年至1971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林彪不顾毛泽东多次说过的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利用宣传“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毛泽东察觉了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批评了投靠林彪集团的陈伯达。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责令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上检讨。4月29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九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毛泽东巡视南方时同一些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点名批评了林彪，使林彪集团陷于极大恐慌之中。9月初，他们密谋在毛泽东南行的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计划破产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于9月13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1971年9月，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奉命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当时，抓了几件大事。

第一，“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很有进展。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反，他说：一“‘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为陈毅恢复名誉。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发表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重申，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且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3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作了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

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第二，结合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批判极左思潮。"九·液三"事件后，毛泽东说过，林彪是极左。1972年6月28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从1971年到1972年秋，在批林过程中，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的讲话和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普遍存在着顾虑，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初步澄清了一些是非，并开始纠正几年来"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混乱。

第三，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管理遭到严重破坏，用人无定员、劳动无定额、岗位无专责、效率无考核、质量无检查，在工矿企业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与会者的要求，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这个文件，针对经济中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重点是整顿企业管理。文件规定，要恢复和健全7项制度，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明确企业要抓7项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指标。这个会议纪要由于张春桥从中作梗没有下发，但受到企业普遍欢迎，实际上成为在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会议提出下列措施：（1）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包括搞好清产核资，健全财会、统计、定额管理、计量验收、原始记录等制度，并加强成本管理和定期检查生产计划、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2）为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创造条件。通过整顿，确定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资金数额、原材料来源和协作关系，落实企业的生产计划。做到生产指标、物资指标、资金指标互相协调；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7项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奖励基金，用于职工集体福利、修建宿舍和对先进生产者必要的奖励。（3）改进国家对企业亏损的管理制度，对亏损企业实行计划补贴、逐级负责、限期扭转的办法，不能亏多少补多少。各省、市、自治区和主管部所属企业的亏损总额（不包括粮食、外贸企业），要求在1973年比1972年减少30%—50%。亏损超过计划的，各级财政自求平衡，不能用减少上缴的办法来弥补。（4）严格财经纪律，对违反财经纪律和工作严重失职，使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要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情节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第四，整顿经济管理。为了清除极左思潮的流毒，克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1973年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通知》。文件提出经济工作必须遵守的十条原则：（1）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

合平衡，主要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平衡，反对各行其是。(2) 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所有基建项目，都要按基建程序办事，没有批准计划任务书不准列入计划；没有计划不准施工。(3) 严格控制增加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都无权擅自增加；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力都要服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统一调动，要把 1972 年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在两三年内，职工总数不再增加；一切企、事业单位都要实行定额定员。(4) 加强资金管理、严格财经纪律。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要区分管理；工资总额超过计划的，银行有权拒付；企业贷款逾期不还，银行有权停发新的贷款；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交纳税款和利润。(5) 加强物资管理，反对分散积压。主要物资的分配调度权集中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物资分配不要留缺口；严格执行订货合同；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要反对那种对积压物资自己不用，也不愿调出的本位主义。(6) 所有企业都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日常生产活动要有专人负责。企业要做到操作有规程，质量有检查，消耗有定额，经济有核算，出勤有考核，安全有保障。(7) 大中型企业不能层层下放，下放企业的产品改变方向，要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地方“五小”企业要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8)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行考工晋级制度；对于计时工资加奖励和计件工资等办法，可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9) 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给予批评教育，违法乱纪的，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10)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政治和业务的统一，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不抓生产就是失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3 月 6 日，国家计委将《通知》发到计划会议征求意见。28 个省、市、自治区同意文件的观点，认为这些规定切中时弊，经济战线很需要这样一个文件，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下发，唯当时上海领导人反对。由于张春桥作梗，文件未能下发。

第五，纠正农村“左”的政策。1971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农村中存在着分光吃净，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指示要求：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工分分粮相结合的办法，或者大多数社员拥护的其他办法，做到既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困难户的一般标准口粮；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搬照套；社队办集体福利事业，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许任意增加脱产人员，队、社干部的补贴不能超过《六十条》的规定；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干部要带头偿还欠款；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从 1972 年 1 月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宣传这个指示的精神，强调要抓紧落实各项农村政策。

第六，进行新的经济调整。1972 年初，周恩来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当时由于抓批林整风，以及其他方面的干扰，问题解决得比较慢。1972 年，职工人数又超过计划增加

183万人，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比上年增加292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比上年增加38亿元；粮食销售量达917亿斤，比上年增加62亿斤。1973年2月，周恩来听取情况汇报后指出："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的不合适的再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从1972年起，特别是1973年，先后采取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新的调整。这些措施主要有：

——控制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72年，国家投资比上年减少14.2亿元，自筹资金增加了5.5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上年减少8.7亿元，并适当调整了投资结构。农业投资增加了3.7亿元，重工业投资减少21.4亿元，若按管理系统划分，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减少最多，减少了31.3%。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了150个。基本建设中使用的民工人数也大为压缩，从1971年的1100万人减少到370万人（1972年9月数字）。

——加强劳动工资管理。1972年后，国家再次强调劳动工资要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下达职工计划的同时，一律要下达职工工资总额计划；各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都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核定，并送当地人民银行；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以及违反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付。

——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商业部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确定采取如下措施：（1）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2）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的供应；（3）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1972年新增职工超过国家计划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要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4）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5）核减农村不合理的销量，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

——调整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1973年1月，全国计划会议重视"三个突破"问题，检查和总结了前两年综合平衡工作，讨论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的调整问题，并在7月提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1975年钢产量指标从3500万—4000万吨下调到3000万吨。钢的指标一降低，其他就松动了。它使1973年的计划安排和调整取得了主动权。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和在各个领域纠"左"的努力，遭到江青集团的反对。在1972年下半年以后，批"左"和反批"左"的斗争日趋尖锐。7月14日，周恩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周培源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张春桥却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

底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拟同意"，江青却提出应批林彪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也改变了他6月的看法，支持江青集团的批极右。这个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判断，打断了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但是，尽管困难重重，经过1972年，特别是1973年的调整，"三个突破"基本上还是得到了控制。1973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5758万人，工资总额35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6%和4.1%，大大低于前两年平均每年递增8.5%和11.2%的速度。由于农业丰收，粮棉供应和市场情况有所好转。这一年，粮食销售量956.2亿斤，比上年增长4.3%，而粮食收购量达到968.1亿斤，则比上年增长25.6%，加上进口粮食89.5亿斤，使1973年年末粮食库存比上年增加93.5亿斤。

进入70年代以来，毛泽东、周恩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及时对外交工作做出了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使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局面。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同年9月，日本政府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口额连续几年下降，引进工作到1968年已告中断。1972年，恢复了中断几年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等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这些设备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24万吨，化肥400万吨。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8月6日，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的批示，提出《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估价约合4亿美元，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也经周恩来批准。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们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后来，又追加了一些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加上国内生产和改造的设备，共兴建了26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1973年和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认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已定。"针对江青集团挥舞的"洋奴哲学"的棍子和极左行为，他指出，在外贸工作中，"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

就做一次‘洋奴’。”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于这样针锋相对地提出问题，是很难得的。

经过新的调整，1973年，国民经济状况较前两年有明显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其中农业增长8.4%，工业增长9.5%。粮食达到5299亿斤，比上年增长10.2%；棉花5124万担，增长30.8%。在工业产品中，钢达到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油5361万吨，增长17.4%；原煤4.17亿吨，增长1.7%；发电量1668亿度，增长9.4%；棉纱1084万件，增长4.3%。铁路货运量8.31亿吨，增长2.8%。国家预算内投资完成265亿元，加上预算外投资共完成321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627个，建成投产的有168个，新增固定资产232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7%，比上年提高1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06亿元，比上年增长8.1%。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进出口总额109.8亿美元，扣除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因素后比上年增长34%，是“一五”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收入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财政收支平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并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大会选举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为中央委员。但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也有不少人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王洪文、康生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使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势力得到加强。

第四节　1975年的整顿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于1974年初，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十大前后，他在多次谈话中讲过，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18日，他把江青主持编辑的一份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74）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批林批孔”运动便开始了。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主要是想借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因为“九·一三”以后，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人越来越多，他非常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江青一伙则别有用心，他们妄图利用这个题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制造天下大乱，在乱中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江青集团所控制的写作班子写了大量的批孔和批儒评法的文章，影射攻击周恩来。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在前一个时期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正确的

政策措施、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吹捧吕后是法家，是伟大的女政治家，为野心家江青上台制造舆论。江青等人还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的典型。

“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全国形势再一次陷于动乱。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刚刚重新工作的老干部又受到冲击，江青一伙在各地的帮派势力则乘机搞所谓“二次夺权”，使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1974 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登上海港务局的《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大字报，直接冲击生产。接着，什么“不做定额的奴隶”、“不做制度的奴隶”、“不做平方米的奴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到处出现，企业的领导哪里还敢抓生产！受这股逆流的冲击，在全国重新出现了不上班、不劳动、搞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的混乱局面，破坏了刚刚稳定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

——1974 年 1—5 月累计，全国重点煤矿欠产 835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6.2%；钢欠产 188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9.4%；化肥欠产 185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3.7%。由于煤炭生产下降，使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铁路货运量 1—5 月欠运 2100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2.5%。当时主要是卡在津浦线上的徐州、京广线上的长沙、京包线上的包头、贵昆线上的贵阳，由于这些区段不畅通，所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 1/3 左右，分别影响整个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地区。

——1974 年 1 月份以后，在“要当码头的主人，不作吨位的奴隶”口号影响下，许多港口不敢再抓装卸和疏运吨位指标，劳动效率大幅度下降，船舶停港时间不断延长。1 月份以后，全国在港船舶数量经常保持在 240—250 艘，其中超过一个月的船有 40 多条，最长的超过 100 多天。国轮停港时间更长，有的长达半年以上。

——1—5 月，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5 亿元，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25 亿元，出现 5 亿元的赤字。

——由于整个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全国工业总产值 1—5 月份仅完成全年计划的 35.7%。年初在安排 1974 年市场供应计划时，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就留有近 40 亿元的差额，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生产形势日益恶化，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了。”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不愿重新出现社会大动乱。他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曾一再提出批评。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党中央于 4 月 10 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通知还说，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

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通知对制止混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未使整个工交生产根本好转。

10月6日，国家计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北京召开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议提出：（一）今冬明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扩大冬种面积，抓好化肥、农机等支农产品的生产；（二）轻工业第四季度要在第三季度生产水平的基础上，增产40亿元以上的产品，对轻工业生产所需的燃料、电力、原材料和运输要优先安排，“不挤不让”，同时，要求商业部门拿出20亿元商品投入市场，外贸部门拿出5亿元库存商品转为内销；（三）在第四季度，统配煤矿的平均日产量要达到76万吨以上，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万吨；（四）确保京广、津浦、浙赣、京包等铁路干线的畅通，争取第四季度平均日装车5.3万—5.4万车，重点是把山西存煤抢运出来；（五）要努力增加财政收入，节约支出，国家的总预备费和各部门掌握的待分配投资和费用、地方的预备费和机动财力，基本上不再动用。这些任务和要求是有针对性的，想借此扭转工业生产的萎缩状况。但由于前三个季度计划完成的很差，“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没有平息，1974年大部分计划指标没有完成。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95.6%，比上年仅增长1.4%，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5%，比上年增长4.2%，工业总产值完成93.2%，比上年增长0.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中，农产品除粮食和黄、红麻完成计划外，其他主要经济技术作物均未完成计划，大部分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都没有完成计划。与上年相比，棉花减产4%，钢减产16.3%，原煤减产1%，棉纱减产8.4%。铁路货运量下降5.3%，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5.3%。这一年，财政收入仅完成计划的92.1%，财政赤字7.7亿元。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在酝酿国家机构和人事安排期间，江青一伙加紧了活动。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对此事极为不满。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率先发难，对邓小平搞突然袭击，逼迫他对所谓“风庆轮事件”（“四人帮”制造的借国产风庆轮远洋航行攻击周恩来和国务院的阴谋活动）表态。邓小平据理抗争，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18日，“四人帮”经过秘密策划，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失败了。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

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重新展示了 1964 年 12 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会议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在四届人大期间提出的"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抓住问题最大的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作为突破口，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决心扭转"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1975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要多讲大局，大局就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解决铁路的办法，一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对铁路工作，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二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现在铁路事故惊人，说明没有章程了，也没有纪律了。"所以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纪律性一定要加强。"三是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同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会后，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各铁路局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调离了一批派性严重又不肯改正的派头头，逮捕了一些破坏铁路运输的坏人，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 4 月份，仅一个月的时间，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 20 个铁路局，有 19 个超额完成装车计划，南昌铁路局虽未完成计划，情况也有好转。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 5.4 万车，为历史最好水平，煤炭日装车达到 1.8 万车，5 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铁路整顿立竿见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赞扬。

5 月 8 日至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先后有 17 个省、市、自治区和 11 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会上，铁道部部长万里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当然还不能说是懒的、散的。""现在，在干部中有一

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指清查“五一六”）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在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或建立起来。”根据钢铁工业座谈会的精神，冶金部对钢铁企业进行了整顿。到6月份，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太钢等企业逐步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万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1975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7月17日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47.4%，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在此期间，对于军队、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都大力进行整顿，分别取得明显的成绩。

为了全面整顿工业，从7月中旬起，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这个文件极为重视。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时，他说：“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并对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了几点意见。（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出口产品，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一个大政策，等中央批准了再办。”（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用非所学，原来学的技能没有发挥出来，要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看来企业里面问题不少，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是企业管理秩序不好，设备完好率差。特别是重工业，问题更突出。要考虑今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集中整顿一下企业管理秩序，加强设备维修，为明

年的生产打好基础。”“企业里浪费惊人，也是普遍现象，要好好整顿，争取利润多上缴一点。”（五）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这也包括品种、规格在内。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地抓一下不可。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文件由原来的14条改写成20条，主要内容包括：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的发展。不能把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整顿企业，首先要整顿党的领导。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所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改变“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调整“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整顿企业管理，严格遵守制度；要落实党的政策。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凡是被戴上“保守派”、“站错队”等帽子的，一律摘掉；要划分“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界限，凡是以“造反”和“反潮流”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当党员、要做官的，一律不给，而且要批评。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发展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干部、工人、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个文件切中时弊，在征求各地意见时，受到普遍欢迎。

7月，中央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9月，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提出：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在搞好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邓小平充分肯定这个文件。9月26日，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汇报时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

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在这一段期间，毛泽东是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的。1975 年 9 月 27 日、10 月 4 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这次座谈会要议议整党这个题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意的。”他说：“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对于邓小平主持下在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四人帮”从一开始就是阻挠和反对的。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说，有人说他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是“复辟纲领”，此话就反映了“四人帮”的声音。在毛泽东看来，整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只能靠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因此，他支持整顿。但是，他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又不能不依靠“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因此，在 1974 年 12 月 26 日，他在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以后，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谈话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毛泽东的这一段话表明，他要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要依靠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 年 3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4 月 1 日，又发表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这两篇文章，任意歪曲、肢解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在理论上对毛泽东的错误观点做了一些解释。但其用心并不在理论，而是企图通过反对“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等口号，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扼杀方兴未艾的全面整顿。

毛泽东不赞成反对“经验主义”。4 月 23 日，他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

项。”同时，他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活动。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批评他们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告诉他们不要搞四人帮。5月底和6月初，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对“四人帮”进行批评，王洪文、江青做了一点检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对北京大学一位教师谈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谈话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四人帮”立刻抓住这个题目在报刊上掀起了一个所谓评《水浒》的运动。这时，江青又猖狂起来，她扬言“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开展评《水浒》，是毛泽东批准的，但他没有支持江青的胡言乱语。

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抑制，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主要产品产量，粮食增长3.3%，棉花减少3.3%，钢增长13.2%，原煤增长16.7%，发电量增长16%。铁路货运量增加12.7%。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45亿元，比上年增加17.6%。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上年增加4.1%，支出820.9亿元，仍有5.3亿元的赤字。市场供应状况有所好转，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9.2%。

正当全面整顿逐步铺开的时候，形势发生了逆转。1975年11月，毛泽东突然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转向发动以批邓为主要目标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狰为纲，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的政策和理论，而邓小平则要通过全面整顿，系统地纠正这些政策和理论，在此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1975年7月4日，邓小平曾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邓小平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条，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实际上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全面整顿，纠正“左”的政策和理论，是不可能以反修防修为纲的。所以，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这一点，“四人帮”早已发现，毛泽东也很快察觉到了。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也只有一个纲，就是阶级斗争。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初从北京清华大学开始，逐步扩及全国。中共中央认为，这场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1月15日，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1月21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命华国锋为

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谈话重申阶级斗争是纲。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但同时指出："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的这些谈话表明，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

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经过十年动乱，人们已经尝尽了"文化大革命"的苦果，而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则给干部和群众带来了信心和希望。所以，"批邓"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尽管华国锋号召"转好弯子"，许多人弯子还是转不过来。

"四人帮"多行不义。他们限制干部群众悼念周恩来，在"批邓"中颠倒是非，制造了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公然说"老干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这一切，都激怒了广大干部和群众。1976年清明节前后，终于在全国各地爆发了有众多群众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在北京，4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抗议的群众达200多万人。这次抗议运动，实质上是一次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

4月4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4月5日，集聚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宣布：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所控制的报刊大肆攻击邓小平，同时，涉及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24万多人丧生，损失重大。"四人帮"却于8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社论，并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8月，"四人帮"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邓力群等起草的文章）诬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动批判运动。这时，跟从他们进行批判的人已经不多了，相反地，从这些材料中，使人们增加了对坚持正确方针的邓小平的了解和信任。有一位老工人听别人读文件之后说：就是应该这样，早这样办，

工厂早就好了。"四人帮"搬起石头却打了自己的脚。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幸的一年。继周恩来逝世以后，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并公开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以此诬蔑和打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矛盾已经不可调和。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一片欢腾。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终于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世界上进行新的技术革命和"经济起飞"的时期，许多国家就是在这个期间国民经济成倍增长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的。而中国则长期陷于动乱当中，使我国同某些国家之间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最大的损失。

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由于坚持全局性的"左"的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几起几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主要表现为：

（一）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70年以后，积累率一直很高。我国在"一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三五"时期平均为26.3%，"四五"时期增为33%，其中1971年高达34.1%。在国民收入总额增长较慢，而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必然影响人民的正常消费。在积累基金中，用于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的非生产性积累的比重，"一五"时期为40.2%，"三五"和"四五"时期却分别降为25.5%和22.4%。

（二）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一五"时期占36.1%，"三五"、"四五"时期却分别达到51.5%和49.6%。因此，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从1966年到1976年，重工业由32.7%上升到38.9%，农业由35.9%下降到30.4%，轻工业由31.4%下降到30.7%。在工业和农业内部，比例也不相适应。

（三）工农业生产与交通运输的比例严重失调。"一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7.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28倍），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1.38倍，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1.24倍。从1966年到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将近1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25倍），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不到77%，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只增长28.2%。

（四）经济效益全面下降。集中表现是，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由"一五"时期的35元，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26元和16元。在工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由1966年的34.5元，降到1976年的19.3元。在商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由1957年的20元，降到1976年的9.7元。在基本建设方面，固定资

产的交付使用率，由“一五”时期的 83.7%，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 59.5%和 61.4%。

（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除 1971 年调整一次工资外，再未动过。从 1966 年到 1976 年，平均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 4.9%。农民的平均收入，在这十年中也基本上没有增加。由于农村急于过渡，生产中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而农副产品价格又卡得很死，广大农民终年劳碌，收入很少，不少农民难得温饱。

在此期间，我国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如原油产量迅速增长；一些工程艰巨的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就，主要是依靠“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人才、技术，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主持下，不断排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才取得的。如果不发生“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十五章　“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与破坏

1963年—1965年三年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1964年4月国家计委曾拟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初步设想》（简称《三五计划初步设想》）。“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1) 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 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商业、文化、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应该说《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如果按照这个“设想”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执行下去，我国的经济是会迅速发展的。但是，1966年5月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工作重点完全脱离了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原来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受到了批判，使经济建设工作遭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生产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严重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虽曾对国民经济进行过两次调整，但都遭到了夭折，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经济根源

一、1966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本来是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当时的经济形势很好。1961年—1965年，针对“大跃进”等错误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实施，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1966年上半年的形势更好。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0.3%，钢增长20.7%，原煤增长12.6%，原油增长28.4%，发电量增长20.3%，棉纱增长15.6%，化肥增长41.8%；基本建设完成得很好，国家预算内投资额增长21%，全部

和部分建成的大中型项目增加 83%，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 11.6%，财政收入增长 15.7%，财政收入大于支出 14 亿元，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都创出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早在 1964 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曾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即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根据上述战略设想，从 1964 年开始，研究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本应于 1962 年完成，但因发生了“大跃进”等的错误，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完成。此后连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在此期间中央开始着手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1964 年 4 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初步设想》。其中规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按农、轻、重的顺序，要求在“三五”期间大力发展农业，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兼顾国防建设，加强基础工业，相应发展交通运输、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事业。后来由于美国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据此，1965 年 9 月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简称《提纲（草案）》，将“三五”时期的基本任务，从以解决吃穿用为中心，改为以战略为中心，突出强调内地建设，要求逐步改变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尽快把内地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使之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后方。当时提出的重要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五年平均增长 9%。到 1970 年达到 2700 亿元～2750 亿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五年共 850 亿元；粮食产量 1970 年达到 2200 亿公斤～2400 亿公斤，棉花 4400 万担～4800 万担；钢 1600 万吨；原煤 2.8 亿吨 2.9 亿吨；原油 1850 万吨；发电量 1100 亿度，铁路货运量 7 亿吨。这个《提纲（草案）》，尽管由于当时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形势的严重性，因而在计划安排上强调内地建设，但从总的方面来看，着重改变工业地区布局，加快内地基础工业建设，特别是从当时看，还是必要的，而且主要指标也是留有余地的。

在上述空前良好的经济形势下，如果“三五”计划能够付诸实施，完全可以把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但是，“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给经济发展造戌极大的损害和破坏。

二、“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经济根源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有其经济根源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道：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还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睡在我们身边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从《五一六通知》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要清除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以及各种文化界内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政权，方式是通过群众运动大揭大批。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十六条》)中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见，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党、政、军以及各界的领导权，这些人自然是要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把被"篡夺"的权力夺回来。

这场错误的反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怎样发展来的呢？从经济上分析，是有其根源的。1956 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当时中共"八大"经过研究，曾提出和制定了比较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确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这时党内有的领导人却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1956 年的"反冒进"，本来是正确的，但却被指责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是"右倾"，是"促退"。结果只能提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根本抛开了中共"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和经过反复讨论制定的"二五"计划草案，而提出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大肆泛滥。结果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恶化等恶果接踵而来。后来经过"调整"，纠正"左"的错误，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但是，1959 年庐山会议后，把纠"左"视为右倾，并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样就又开始了"新跃进"，结果高指标、瞎指挥再度更猛烈地蔓延开来，国民经济又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

严重的经济困难教育了人们，于是被迫再度进行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又恢复发展起来。但是，这时"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并没有彻底纠正，仍然把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做法当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对一些地区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及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等做法，都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

外，还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对立起来，也看做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注意利润指标，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以及恢复奖金制度等，都被看做是“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是“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等。在这种情况下，因而导致了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及“大锅饭”的盛行。

“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还把一些持正确主张的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持有这种观点的领导人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初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这些，就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动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诱因。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与破坏

一、从“造反有理”到“夺权斗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上分别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各地掀起了“造反”浪潮。在政治上造成陂大混乱，在经济上也带来了极大干扰和破坏。

由于全国大串连，阻塞了交通运输，许多货物积压运不出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许多生产指挥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商业、外贸、邮电、金融等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1967年和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国民经济急剧恶化。

二、“革命大批判”的开展

开展“革命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手段。开展“革命大批判”是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而达到“夺权”的目的。但是，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实际上是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做错误的、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批判无视事实，颠倒是非，无限上纲，而且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际工作上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极其恶劣的影响。运动中所批判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批判所谓“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鼓吹“穷过渡”。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在领导我国进行经济建设方面，曾经制定和实行了不少正确的方针政策，当然也有

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到“文化大革命”前，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已经得到比较正常的、迅速的发展。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许多东西都被诬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并进行错误的批判。比如，党和政府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在农村中坚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等，都被诬蔑为“刮单干风”，是“复辟资本主义”，应统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还鼓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搞所谓所有制升级：把农村生产小队核算单位提升为大队核算，再把大队核算提升为公社一级核算；强迫社员搞“三献一升”（献出自留地、宅边地、自有果树，并队升级）。据统计，江西省有2/3的自留地被没收，1/4的大队由小队核算升为大队核算。有些地方还将城镇的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中的合作社和合作商店，都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大加砍削。集市贸易几起几落，到1976年，几乎完全关闭。供销合作社也于1975年正式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

这种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农村中强制扩社并队，轻率地改变核算单位，使集体经济又一次遭到破坏。许多社队的储备粮、公积金等，又一次被分光吃净。另外，取消自留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减少了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供应，引起了市场紧张，影响了人民生活。随着个体和集体商业、服务业、手工业的缩减，集市贸易的关闭以及个体商贩的取消，商业服务网点大大减少，基本上形成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流通渠道日趋单一。这样，一方面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市场的紧张和吃饭、穿衣、修理等方面的困难，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应该指出，批判所谓“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列宁的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述。列宁的上述理论是在1920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提出来的。当时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政权很不巩固，经济情况很不稳定，农村中富农的政治、经济力量很大，他们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十分猖獗。当时小农经济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小生产必然会追随富农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列宁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上述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1966年的中国，与当时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比较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并居于领导地位。在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小农有少量自留地，经营一点家庭副业，允许一些小手工业存在，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在一些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会活跃城乡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把这种小生产的经济活动诬蔑为“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并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统统割掉，是一种极“左”思潮，这只会使整个经济陷于僵化，束缚小生产的积极性，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极其不利的。

（二）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说成是“衰亡着的旧事物”，是“资本主义因素”，是“资产阶级权利”，它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必然产生资本主

义和资产阶级，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林彪、江青一伙还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基础。关于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确实提到过“资产阶级的法权”（后来译成“资产阶级权利”）问题。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劳动的互相交换原则，它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权利”，即仍然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原则。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中，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人们各尽所能地进行劳动，但还不能根据各人的需要来分配消费品，而只能根据各人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消费品的分配，即从社会中分配到等量的消费品。这种实质上的劳动互换原则，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它与根据各人的需要，进行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同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消费品的分配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的原意。

“四人帮”却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按劳分配原则，即等量劳动互相交换的消费品分配原则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且引申到所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去。林彪、江青一伙还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他们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因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宣扬商品制度、货币交换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内容，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

林彪、江青一伙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他们提出这种说法的政治目的，是为了把一些按照劳动分配得到收入较多的人，打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借此再度打倒一批老干部。

（三）对合理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进行批判和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比较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如《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科技十四条》等）对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规章制度却被视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批判。最突出的是对 1961 年中央颁布的《工业七十条》的批判。《工业七十条》中规定：国营企业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有权自主地使用国家交给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有权与别的企业订立经济合同，有权选择工人的工资奖励形式，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及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搞好企业民主管理等。他们把这些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关、卡、压”，是“摆脱党的领导”、“走资派篡夺企业领导权”等，公开鼓吹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大搞无政府主义。另外，他们还把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提倡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盈利，诬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利润挂帅”，鼓吹“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和经营管理。他们还把加强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斥之为“条条专政”、“扼杀地方积极性”，因而盲目地下放企业管理权，大搞自成体系、各自为政、

分散主义，给经济工作造成很大的混乱。他们还把在坚持自力更生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诬蔑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鼓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蒙昧主义。

“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不仅在理论上造成混乱，而且在经济上造成极大的破坏，它使经济指挥和管理机构陷于瘫痪，一些正确的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交通运输阻塞，煤炭生产下降，许多企业停工、停产等。

三、“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来对国民经济的破坏

两年的动乱，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国民经济全面衰退，使国家和人民受到巨大损失。首先是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7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2306 亿元，比上年下降了近 10%。1968 年又进一步下降为 2213 亿元（在 1967 年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4.2%），只有 1966 年（2534 亿元）的 87.3%。其中，农业总产值 1967 年为 924 亿元，比上年略有增加，1968 年则为 928 亿元。工业总产值 1967 年为 1382 亿元，比 1966 年下降了 242 亿元（1966 年为 1624 亿元），1968 年更进一步下降为 1285 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粮棉大体上持平外，大都连续两年减产。粮食 1967 年为 4356.4 亿斤，比 1966 年略增一点（1966 年为 4280 亿斤），1968 年则下降为 4181.1 亿斤，比 1966 年减产 98.9 亿斤。棉花两年持平，1967 年为 4707.9 万担，1968 年为 4708.6 万担，略高于 1966 年（1966 年为 4673.5 万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钢 1967 年为 1029 万吨，比 1966 年减产 503 万吨（1966 年为 1532 万吨）；原煤 1966 年为 2.52 亿吨，1967 年下降为 2.06 亿吨，减少 0.46 亿吨；原油 1966 年为 1455 万吨，1967 年下降为 1388 万吨，1968 年增加为 1599 万吨；发电量 1966 年为 826 亿度，1967 年下降为 774 亿度，1968 年更下降为 716 亿度；木材 1966 年为 4192 万立方米，1967 年下降为 3250 万立方米，1968 年更下降为 2791 万立方米；农用化肥 1966 年为 240.9 万吨，1967 年为 164.1 万吨，1968 年更下降为 110.9 万吨；棉纱 1966 年为 156.5 万吨，1967 年下降为 135.2 万吨，1968 年又下降为 132.7 万吨；棉布 1966 年为 73.1 亿米，1967 年下降为 65.6 亿米，1968 年更下降为 64.3 亿米。

此外，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也连续下降。如货运量，1966 年为 13 亿吨，1967 年下降为 11 亿吨，1968 年更下降为 10.3 亿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额 1966 年为 209.42 亿元，1967 年下降为 140.17 亿元，1968 年更下降为 113.06 亿元。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7 年比 1966 年下降 19.2%，1968 年又比 1967 年下降 7%。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1966 年为 70.4%，1967 年只有 50.6%，1968 年更下降为 45.9%。

随着生产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国民收入也连续两年在减少，1966 年为 1586 亿元，1967 年下降为 1487 亿元，1968 年更下降为 1415 亿元。这两年生产上的损失是巨大的。据估算，1967 年和 1968 年这两年，工农业总产值共损失达 1100 亿元。

两年“文化大革命”除造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外，还引起财政收入减少，市场

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下降。1966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 558.7 亿元，1967 年下降为 419.4 亿元，比 1966 年减少 139.3 亿元，减少了 25%。1968 年更进一步下降为 361.3 亿元，比 1967 年减收 58.1 亿元，减少了 13.9%。1967 年还出现了 22.5 亿元的赤字。1968 年只是由于大幅度缩减支出（比 1966 年支出减少 181.8 亿元）才基本保持了收支平衡（只有 1.5 亿元的差额）。

此外，这两年由于生产下降、交通运输滞塞、市场供应日益紧张、奖金制度被取消等，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教育、科学、卫生、新闻、体育等部门也无一不受到严重的损害，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第十六章　两次经济调整及其所受挫折

经过两年"文化大革命"，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1969年国内形势略趋稳定，经济开始出现恢复的趋势。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仍在发挥作用，特别是突出抓备战，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备战后方，要求各经济协作区自成体系等，国民经济仍然得不到正常的发展，追求高指标更造成了"三个突破"。

第一节　新的经济调整及其所受挫折

一、1969年、1970年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恢复

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的政治大动荡，导致社会经济连年下降。1969年随着国内局势略趋稳定，国民经济开始恢复。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了九大，此后各项工作虽然仍在"左"倾方针指导下进行，但是由于政治局势渐趋稳定，武斗之风渐趋平息，社会生活、生产秩序开始恢复，因而经济也开始出现恢复的形势。

1968年底，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着手编制起草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简称《计划纲要（草稿）》）。1969年2月，中央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了这个（《计划纲要（草稿）》），并把它发给各地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这次年度计划的制定，一方面由于当时强调批判"消极平衡"、"利润挂帅"等所谓经济领域中的"修正主义黑线"，另一方面也为了向党的"九大"和建国20周年大庆献礼，表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计划纲要（草稿）》中的指标，绝大多数定得过高。但是1969年的经济计划，毕竟是党和国家为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结束国民经济发展的无计划状态，而把国民经济重新置于计划经济的轨道上所做的努力，因此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69年国民经济开始回升。首先是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613亿元，超过了1966年（1966年为2534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948亿元，超过了1966年（910亿元）；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也略微超过了1966年（1624亿元）的水平。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情况是：粮食4219.4亿斤，比上年增长10%，虽然还未超过1966年，但已很接近，为1966年的98.6%；棉花4158.6万担，比上年减少，并未达到1966年的产量水平（4673.5万担）；棉布82.1亿米，比上年增长27.7%，比1966年增长12.3%；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仍未超过1966年（1532万吨）；原煤2.6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比1966年增长5.6%；原油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比1966年增长29.4%；发电量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比1966年增长13.9%。

货运量，1969年为123923万吨，比上年增长26.2%，仍未达到1966年（131454万吨）的水平。财政收入，1969年为526.8亿元，比上年增长45.8%，收入大于支出9000万元，但仍未达到1966年558.7亿元的水平。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投资1969年为181.6亿元，虽比上年有所增长（上年为103.79亿元），但仍未达到1966年的水平（1966年为188.3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达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比1966年（为732.8亿元）增长9.4%。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1969年比上年提高2.5%，比1966年提高2.7%。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平均工资1969年为618元，比上年降低0.5%（上年为621元），比1966年下降2.8%（1966年为636元）。

由上可见，1969年国民经济比上年略有增长，虽然与1966年相比，大部分产品和国家财政收入等还没有达到1966年的水平，但说明国民经济是有恢复和上升趋势的。

1970年，政府在1969年经济初步恢复的基础上又采取了稳定农村的政策、内地建设铺开、加快地方“五小”工业的发展，以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下放企业）等措施，国民经济比上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工农总产值达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1966年为2534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工业总产值达20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也都有较快的增长，如：粮食23996万吨，比上年增长13.7%；棉花4554万担，增长9.5%；钢1779万吨，增长33.5%；原煤3.54亿吨，增长33.1%；原油3065万吨，增长41%；发电量1159亿度，增长23.2%。

此外，货运量1970年为150359万吨，其中铁路货运量68132万吨，比上年增长28.3%。国民收入1926亿元，增长23.3%，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1966年为1586亿元）。国家财政收入662.9亿元，增长25.8%；基本建设投资272.73亿元，比上年增加91.13亿元。

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中，除部分农产品如棉花、花生等，产量尚未达到1966年水平外，其他农产品和大部分工业品都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

1970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1965年9月方案）相比，基本上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

1970年，国民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 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1970年基本建设投资中，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12.6亿元，比上年增长55.7%；国家预算内投资272.73亿元，比

上年增加 83.13 亿元。基本建设规模骤然扩大，使积累率急剧上升，1969 年国民收入中积累率为 23.2%，而 1970 年则提高到 32.9%。这样大的基建规模和这样高的积累率，都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所难以承担的。积累率高，但是建成投产率却降低了。1969 年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是 18.1%，1970 年下降为 16.7%（1965 年是 22.9%）。1970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 1969 年增加了 457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农村中招收来的，形成与农业争劳力的情况。

2. 内地建设过快，摊子铺得太大，超过国家经济承担能力，与整个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如从基本建设计划安排上看，在全部预算内投资和大中型项目中，内地建设均占 60%左右，这个比重是历年来最高的。重点过重，挤了农业、轻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同时过于强调抢时间、争速度，也给内地建设本身带来问题，工程质量得不到保证，有些项目在建成后，不得不推倒重建。

3. 企业下放问题很多。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下放企业并没有达到扩大地方权力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目的。企业放下来了，但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办法并未改变，因此收效不大。另外，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在事先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在不长时间内，把一大批中央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到地方，实际上是一哄而下，放下去后，中央和地方权责分工不清，特别是将大批产销面向全国的大的工矿企业下放到地方，实际上地方也管不了，还得中央部门代管，反而形成多头领导。另外，由于匆忙下放，也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影响工业发展。还有，盲目下放企业，也使地方形成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倾向；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现象严重，也造成很大浪费。

此外，由于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经济效益也普遍下降。

二、高指标造成“三个突破”

1971 年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简称《四五计划》），《四五计划》是 1970 年初开始编制的，由于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在所编制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简称《纲要（草案）》）中强调，在“四五”期间，要狠抓备战，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备战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当时特别突出“备战”，提出“要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集中力量建成战略后方，要求各协作区都要自成体系等。因此，《纲要（草案）》仍然是一个急于求成的计划，它追求生产上的高指标，片面强调高积累，过分突出建设重工业，忽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严重脱离实际。《纲要（草案）》还具体规定：在“四五”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12.5%，五年内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1300 亿元，1975 年达到：粮食产量 6000 亿斤～6500 亿斤；棉花 6500 万担～7000 万担；钢 3500 万吨～4000 万吨，原煤 4 亿吨～4.3 亿吨；原油 7000 万吨～10000 万吨；发电量 2000 亿度～2200 亿度；铁路货运量 9 亿吨～10 亿吨。

在《四五计划》制定后的1970年，在经济上，已经发现计划中所制定的一些指标过高，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不能适应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的需要，交通运输和电力紧张，基建项目上得过多，产品质量下降，设备失修，事故增多等。根据以上情况，1971年的年度计划本应加以修改和调整，但仍然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1971年计划要求，狠抓内地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大办农业，加快农业机械化过程，狠抓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大打矿山之仗，发展科学技术，努力超赶世界先进水平等。这个年度计划的中心，自然是要保证完成《纲要（草案)》中所提出的高指标。

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虽然大部分都按原计划完成了，但是却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情况，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所谓“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

1971年年度计划完成的具体情况是：工农业总产值为348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上年为313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4.2%（上年为2080亿元)；农业总产值1107亿元，比上年也增长了4.6%（上年为1058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情况：粮食25014万吨，比上年增长1018万吨；棉花4554万担，比上年减产17.2万吨；钢2132万吨，比上年增长353万吨；原煤3.92亿吨，比上年增长0.38亿吨；原油3941万吨，比上年增长876万吨；发电量1384亿度，比上年增长225亿度，以上均超额完成原计划（棉花除外)。货运量168132万吨，比上年增加17773万吨，其中铁路货运量为76471万吨，比上年增加12%（上年为68132万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8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9%（上年为272.73亿元)，为计划的104.7%。国家财政收入744.7亿元，支出732.2亿元，分别为计划的105.6%和103.8%，做到基本上收支平衡，略有节余（12.5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929.2亿元，比上年增长71.2亿元。

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虽然使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1）农业增产速度较慢，农产品不足问题比较突出。(2）轻重工业发展比例不协调，重工业1971年比1970年增长29.9%，而轻工业只增长6.2%。轻工业发展相对过慢，造成市场消费品紧俏。(3）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规模过大。当年计划安排的国家预算内投资已比上年增长许多，在建设过程中又追加两次基建投资，于是已经偏大的基建规模再度加大。1971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为1692个，比计划多524个。许多地方、部门还盲目上计划外的项目，于是挤设备、挤材料、挤资金，造成各方面紧张。1971年用于内地建设的投资占全国预算内投资的55%，在三线建设中，又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错误方针，施工难度加大，费用过高，建成后生产经营困难重重，造成巨大浪费。(4）积累率提高。1971年积累率为34.1%，上年为32.9%；而且积累额中生产性积累的比重过高，达76.2%，影响了人民生活。(5）不少产品质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等。

以上情况导致了“三个突破”的发生，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造成

以上“三个突破”的主要原因是，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1969年为357亿元，1970年增加为618亿元，1971年又增加为684亿元。积累率不断提高。1969年是23.2%，1970年提高到32.9%，1971年更提高到34.1%。1969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00.83亿元，1970年增长为312.55亿元，比上年增加111.72亿元，1971年更增长为340.84亿元，比上年增加28.29亿元。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使职工人数猛增，1971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达5318万人，比1968年增长1148万人，比1966年增加1384万人。职工人数急剧增加，使得工资支出和粮食销售量失去控制，原计划全国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工资总额1971年为296亿元，执行结果达到302亿元；原计划粮食销售量1971年为794亿斤，执行结果达855亿斤。

“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农村中抽掉劳动力过多，影响农业生产；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也使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城镇职工人数猛增，增加了货币的投放，加重了商品粮和消费品供需之间的矛盾，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使整个国民经济又出现比例失调现象。

三、1972年、1973年的经济调整与遭受的挫折

（一）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由于当时的中心是“批林批孔”，加上其他干扰，因而“三个突破”在1972年仍有发展。1972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达5610万人，比上年增加292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340亿元，比上年增加38亿元。粮食销售量达927亿斤，比上年增加43亿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增加进口粮食外，还挖了国家粮食库存，当时叫“窟窿”。棉花也因生产下降，挖了库存。另外对外援助支出高达51.5亿元，比上年增加13.9亿元。针对当时出现的“三个突破”、“一个窟窿”问题，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国务院，从1972年起，特别是1973年，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措施是：

1. 控制基本建设规模。重申大中型项目必须经国家批准，不得随意扩大基建规模，不准动用生产基金、银行贷款或向企业摊派搞基建。1972年国家的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了18.36亿元。自筹资金方面，1971年为58.07亿元，1972年为63.57亿元，1972年增加了5.5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972年比1971年减少了12.86亿元。另外，还适当地调整了投资结构。农业投资增加了3.7亿元，重工业投资减少了21.4亿元。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了150个，对基建中使用的民工人数也进行了压缩。

2. 加强劳动工资管理。在劳动工资方面，重申劳动工资的大权在中央，各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都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核实，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的职工以及违反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付工资款项。

3. 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商业部提出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工作，压缩不合理的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在丰收地区多收购一点粮食，核减农村不合理的销量，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等。

4. 调整计划中的高指标。对原定《纲要（草案）》进行了修改，降低了一些指标：工农业总产值比原来降低了6.2%，粮食产量降低了500亿斤～1000亿斤，棉花产量降低了1500万担～2000万担，钢产量降低了500万吨～1000万吨（从3500万吨～4000万吨下调到3000万吨），发电量降低100亿度～300亿度，棉纱降低100万件～200万件等。

根据调整后的《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拟定了197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1973年的国民经济。这些措施是：（1）大力支援农业。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的投资，比上年增加19%，用于农业的钢材增加30%。（2）缩短基建战线，压缩国防和行政开支，精简职工，把1972年超过国家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人口回农村去。争取上述几项减下500万人，并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

经过以上措施，"三个突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增长速度逐年减慢。1973年，全社会粮食收购968亿斤，粮食销售近956亿斤，达到国内粮食收支平衡。

国务院不仅大力解决"三个突破"问题，还在1971年底到1972年秋期间，先后在计划、交通、科学等会议上提出了批判极"左"的错误做法等问题；还抓了教育、科研、计划生育等工作，提出了指示意见。另外，还提出了要对企业进行整顿。（1）要恢复和健全七项制度，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2）明确企业要抓七项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和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指标。针对受林彪"左"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而不执行国家计划或随便冲击国家计划的企业，任意中断协作关系，以及许多地方乱上项目等无政府主义现象，提出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文件，规定：要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基本建设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要控制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加强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管理；集中物资分配调度的权力，建立企业统一生产指挥系统；管好大中型企业，坚持按劳分配等。这个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没有正式发下去，但它还是对恢复生产秩序、加强经济计划、企业管理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还强调要纠正农村中的"左"的政策，纠正林彪一伙在农村鼓吹的"穷过渡"、大搞"扩社并队"以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把发展多种经营当做"重副轻农"、"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倾向"等错误。重申了农村人民公社《农业六十条》仍然有效，农村工作要认真按《农业六十条》办事，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的好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劳动计酬办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在1973年初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还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林彪一伙在农村强令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的罪行，为刹住农村"穷过渡"的歪风做了不懈的努力。

另外，还抓了教育和科研工作，努力肃清林彪一伙在这两个领域所散布的一系列反动言论和进行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活动。

在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尽管“四人帮”进行干扰和破坏，但由于坚持了整顿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措施，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又对“左”倾错误做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因此1972年、1973年两年的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工农业总产值32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农业总产值1226亿元，比上年增长8.4%，工业总产值2741亿元，比上年增长9.5%。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粮、棉、麻、糖、烤烟的产量都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一年。粮食达到5298.7亿斤，比上年增长10.2%；棉花5123.5万担，比上年增长30.8%；钢为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4.17亿吨，比上年增长1.7%；原油536亿吨，比上年增长17.4%；发电量1668亿度，比上年增长9.4%；·棉纱196.7万吨，比上年增长4.3%；棉布87.1亿米，比上年增长4.3%；铁路货运量83111万吨，比上年增长2.8%；基本建设国家预算内投资完成282.2亿元，外加预算外投资共完成338.10亿元；施工项目1627个，建成投产的168个；新增固定资产232.26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7%，比上年提高13%；1973年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铁矿开采1154.6万吨、煤炭开采1835万吨、发电机组容量400.1万千瓦、石油开采1027.1万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1%；197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109.8亿美元，扣除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因素后，比上年增长34%，是建国后“一五”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国家财政收入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财政收支平衡。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1973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55元，比上年增加8元。可见，在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下，1973年经济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新的调整虽然使国民经济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部分地区重点煤矿没有完成计划、运输还是相当紧张、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和投资效果差、一些企业亏损严重，企业管理方面存在问题以及一切经济工作都受着“左”倾错误的冲击等。

（二）“批林批孔”运动使经济重新恶化。1973年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和对经济进行调整，因而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是“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特别是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国民经济又重新恶化起来。

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批判，但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8月30日又召开了党的十届一中全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相互勾结，结成反动的“四人帮”，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4年1月所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他们篡夺最高权力的重要一步。

“批林批孔”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具体表现在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上。

1. 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大部分没有能完成国家计划。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007亿元，只完成计划的95.6%，仅比上年增加40亿元，即增长1%。其中工业总产值2730亿元，比上年下降11亿元；农业总产值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4.2%。大部分工业产品未完成计划。钢2112万吨，比上年减少410万吨，只为计划的78.2%；原煤4.13亿吨，比上年减少0.04亿吨，为计划的96%；原油6485万吨，比上年增长21%，为计划的101%；发电量1688亿度，比上年只增20亿度，为计划的96.4%；粮食5505.4亿斤，比上年增长3.9%，为计划的102%；棉花4921.5万担，比上年减少202万担，比上年下降8.13%；其他经济作物大部分未完成计划。

2. 铁路运输堵塞，船舶停港时间延长。1974年铁路货运量为17.9亿吨，比上年减少5851万吨。当时津浦线上的徐州、京广线上的长沙、京包线上的包头、贵昆线上的贵阳，所通过列车比正常情况少1/3左右，分别影响整个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地区。由于铁路干线受阻，致使山西、河南的煤炭和其他物资不能及时外运，当时上海煤炭告急，只好把大同、开滦的煤炭绕道由大连上船运往上海。港口情况，1973年一些港口曾试行定额制度，结果只用32天就完成了全年的任务（上海港）。有的港口实行计件工资制（广州黄浦港）到年底不仅补足了前9个月所欠的任务，还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但是1974年以来，由于"批林批孔"的冲击，在"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口号影响下，劳动效率大幅度下降，船舶停港时间不断延长，国轮停港时间有的长达半年以上。港口压船严重，造成很大损失，也影响外贸开展。例如，1月份外贸租船等待泊位一项就损失租金186万英镑。

3. 财政出现赤字，市场供应紧张。1974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783.1亿元，比上年少收入26.6亿元，仅完成计划的92.1%。支出为790.8亿元，比上年少支出18.5亿元。由于支大于收，这一年财政赤字为7.7亿元。这是从1967年以来所没有的。市场供应方面，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消费品不仅品种减少，连数量也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农副产品供应非常紧张，一般日用品也供应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第二节　全面整顿给经济带来的转机与所遭受的挫折

一、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所进行的经济整顿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1974年的经济恶化状况，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提出了"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3日—17日，第四届全国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报告提出，今后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关键的十年，国务院将根据两步设想的目标制定十年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大会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这次会议重新提出四化宏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工作。大力扭转"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邓小平首先抓了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问题。相继召开了铁路会议、冶金会议、国防工业会议、军委扩大会议和农业、科技等会议，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整顿。

（一）对铁路运输的整顿。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整个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自"批林批孔"以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铁路运输堵塞，严重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大干线的畅通。1975年1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为4.3万车，与实际需要相差1.2万车。邓小平下决心首先解决铁路运输问题。2月25日召开了全国各省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的大局，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现在有人只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种思想是大错特错的；当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薄弱环节是铁路运输，铁路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等。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3月5日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强调实行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铁路职工由铁道部统一调配；要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如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及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铁路职工要一切听指挥，做好本职工作，对派性严重、经批评教育不改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应及时调离，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整顿铁路秩序，任何妨碍铁路正常工作、破坏铁路运输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严重的要严肃处理。

按照上述中央的指示精神，各铁路局进行了认真的整顿。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调离了一批派性严重又不肯改正的派头头，逮捕了一小撮破坏分子，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使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到4月份，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铁路局超额完成装车计划，南昌铁路局虽未完成计划，但情况也有好转。全国铁路日装车量平均达到5.4万车，为历史最好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通过这些坚决果断的措施，有效地解决了铁路问题，也推动了钢铁、煤炭、国防工业等整个工业战线的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二）对工业的整顿。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工业生产一度混乱，生产下

降，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尤以钢铁工业为甚。1974年钢产量比1973年减少410万吨。1975年前4个月，全国未完成钢的生产任务195万吨。鞍钢、武钢、包钢、太钢4个大钢厂欠产严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央于5月8日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要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问题：(1) 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各级干部都要敢字当头，要找一些打不倒的人进领导班子。(2) 坚决同派性做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3) 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执行规章制度，宁可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

邓小平的讲话，虽然是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的，但对于当时的各项工作，对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冶金部对钢铁企业进行了整顿，到6月份，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太钢等企业逐步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万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经过狠抓整顿工作，1975年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有了明显好转。3月份以来，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全年计划完成情况是：原油49.8%、原煤52%、钢产量42.2%、木材51.3%、铁路货运量48.9%、全国工业总产值完成47.4%、全国财政收人完成43%。

1975年6月16日国务院又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对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如当前经济生活中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在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办法，对国家计划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减少。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远洋航运、重要的科研设计单位、专业施工队以及大油田和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等，要由中央各部为主管理，其余可由地方管理，但不能层层下放。物资管理体制上，物资部门管通用物资，各部管专用物资。财政体制上，推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大中型企业的折旧基金，中央集中20%～30%。还要整顿软、懒、散的班子，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当顾问。在企业中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等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大中型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不得超过职工总数的18%，中小企业不得超过10%。此外，务虚会还就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

国务院还委托国家计委起草了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975年8月18日国务院在讨论这个文件时，邓小平讲了《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他在谈话中，就工业支援农业、引进技术设备、企业科研工作、企业管理秩序、产品质量、规章制度、按劳分配原则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文件由原来的14条改为20条（即《工业二十条》)。《工业二十条》是一个对工业生产进行治理整顿的重要文件。国务院各有关单位，还先后起草了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政

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工业二十条》对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起了重大影响作用的。

（三）对农业的整顿。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当时的农业生产也遭到很大破坏。“四人帮”一伙继续鼓吹“穷过渡”，大搞“一平二调”，生产上瞎指挥，分配上“一拉平”。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因此，社队组织管理混乱，很多社队分配不能兑现，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以上情况，邓小平提出农业要整顿的正确主张。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强调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农业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为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还专门发出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的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批判。通过这些整顿措施，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四）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整顿。在这期间，邓小平还抓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整顿工作。中央选择了中国科学院作为突破口，坚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经过短期整顿，取得了显著效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提出：要在短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鼓励科技人员钻研科学技术是不对的，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要充实、加强专业科研队伍和科研机构，不要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时又指出：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面，对有水平的人要爱护、赞扬、发挥其作用，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解决科技人员生活中的困难，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在教育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要使科技事业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入科技大学，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讲话和《汇报提纲》，使科技文教部门的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此外，邓小平还抓了军队和国防工业的整顿工作。

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的方针，实际上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所搞乱了的各条战线，从而恢复党的正确路线。这期间，邓小平的整顿方针和措施，虽然多次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但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因而全国形势又出现明显好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工农业总产值为4467亿元，比上年增加460亿元，增长11.9%；其中农业总产值1343亿元，比上年增加66亿元，增长4.6%；工业总产值3124亿元，比上年增加394亿元，增长15.1%。主要产品产量：粮食5690.3亿斤，比上年增加184.9亿斤，增长3.3%；棉花4761.6万担，比上年减少159.9万担，减少3.3%；钢产量2390万吨，比上年增加278万吨，增长13.1%；原煤4.82亿吨，比上年增加0.67亿吨，增长16%；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加1221万吨，增长18.8%；发电量1958亿度，比上年增加270亿度，增长16%；棉纱210.8万吨，比上年增加30.5万吨，增长16.9%；棉布94亿米，比上年增加13.2亿米，增长16%。铁路货运量8.9亿吨，比上年增加1.02亿吨，增长12.9%。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了335.58亿元，加上地方自筹，总规模达409.32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539

个，其中当年新建项目90个，全部建成投产项目167个。新增固定资产261.69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107.5亿元，增长9.2%。进出口贸易总额147.5亿美元，超过任何一年水平。国家财政收入815.6亿元，支出820.9亿元，财政赤字5.3亿元。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158元，比上年增长3元。

总的看来，1975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是好的。尽管还存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过高（33.9%，比上年高1.6个百分点，接近1971年34.1%的水平）、财政上略有赤字、职工人数增长过快（197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为6426万人，比上年增长419万人）等问题。这说明，继周恩来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经过整顿，国民经济又开始出现了转机，开始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1975年是“四五”计划结束的一年。按照调整后的《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检查，计划执行结果如下：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104.5%、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主要产品产量：粮食完成103.5%，棉花完成95.2%，钢完成79.7%，原煤完成109.5%，原油完成110.1%，发电量完成103.1%，棉纱完成96.8%，铁路货运量完成98.7%。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下限的101.6%，财政收入仅完成98%。另外，在计划表列的51种主要经济指标中，有25种未完成计划；30种主要重工业产品指标，有18种未完成计划；表列11种轻工业产品指标，有4种未完成计划。总之，“四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中，虽然“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多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在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努力进行整顿、调整、不断纠正“左”的错误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取得了不小成绩的，他们的整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振兴经济的新希望。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国民经济发展再次受挫

当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和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1975年11月又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再度遭受挫折。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所采取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措施，说成是“右倾翻案风”，把对各方面工作进行的整顿，诬蔑为“复辟”。还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当做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

“四人帮”炮制了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公式。妄图以此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在经济上，他们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搞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是“唯生产力论”。他们还诬蔑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出口石油是“卖国主义”，引进技术设备是“崇洋媚外”，加强企业管理是“管、卡、压”，搞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等。

“四人帮”不仅积极开展所谓大批判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且还到处煽动资产阶

级派性，层层揪斗所谓“走资派”，使得各级经济机构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斗、打倒，许多法令、章程、制度被废除，使得各级经济机构再次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之中。这时铁路交通也被搅乱，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在1976年，一年共发生全局性大堵塞12次，使京广线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国各路局比国家计划少装1400多万吨货物，少运煤炭1100万吨，造成12个省、市煤炭供应紧张。全国共有十几条铁路干线处于不通畅的严重局面，共少运物资4600万吨，造成不少地区缺煤少电，相当一批工厂停工减产，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四人帮”加紧进行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使得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面临崩溃边缘。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元，比上年只增长1.7%（69亿元），大大低于计划要求（7%～7.5%）的速度。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378亿元，只比上年增长2.5%（35亿元），比计划要求低1.5%。工业总产值为3158亿元，比上年只增长1.3%（34亿元），比计划要求低6.9%～7.7%。主要产品产量：粮食5726.1亿斤，比上年只增长0.6%（35.9亿斤），完成计划的99%；棉花4110.9万担，比上年减少13.7%（650.5亿斤），完成计划的79%；钢2046万吨，比上年减产14.4%（344万吨），完成计划的79%，低于1971年水平；原煤4.83亿吨，只增长0.2%（0.01亿吨），完成计划的101%；原油8716万吨，增长13.1%（1010万吨），完成计划的低限指标；发电量2031亿度，增长3.7%，完成计划的96.3%；棉纱196万吨，减少7.1%（14.8万吨），完成计划的88%；铁路货运量8.4亿吨，比上年减少5.5%（4889万吨），完成计划的93%。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10.93亿元，加上地方自筹投资376.44亿元，比上年减少32.88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58.9%，比上年下降5%。全部建成投产大中项目85个，比上年减少82个，是建国后投资效益最差的一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339.4亿元，比上年增长5.3%；进出口贸易总额134.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引进项目长期不能建成投产或正式投产后达不到设计能力。职工人数，1976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为6860万人，比上年增加434万人，超过计划304万人。另外，企业管理混乱，亏损严重，国家财政收入减少。1976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776.6亿元，比上年减少39亿元，支出806.2亿元，财政赤字29.6亿元。另外，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还出现了严重失调现象。以上情况充分显示出国民经济出现衰退趋势。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得国民经济处于严重恶化状态。1974年—1976年这三年间，国民经济曾经出现了两起两落。1973年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经济出现转机，出现好转上升形势，但由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破坏，又使已经上升的国民经济重新衰落下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衰退下来。据统计，1974年—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与国民经济正常情况相比，工业总产值损失1000亿元，财政收入少收入约400亿元。

第十七章 “农业学大寨”运动、三线建设及经济体制的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所搞的种种阴谋活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另外，农业中强行推广大寨“经验”、突出三线建设以及以向地方盲目下放权力为中心内容的经济体制大变动等，也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一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与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一、“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广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农业学大寨”本来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号召。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山区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先进典型。大寨是1953年办起的初级社，1956年转为高级社，1958年后成为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全队80多户，400多口人，800多亩耕地。原先自然条件很差，土地贫瘠，七沟八梁一面坡。合作化以来，大寨的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八字宪法”，使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先进典型。“大跃进”时，许多地方发生浮夸风，大寨大队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好作风，战天斗地与自然做斗争，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因此，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当时总结大寨的基本经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寨的基本经验在全国推广后，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大寨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背弃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成为林彪、“四人帮”推行“左”倾路线的样板。大寨的政治挂帅原则，已变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丧失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大队搞的农田水利建设、高空运输索道架设、喷灌滴灌工程修建、农业机械的添置等，都是国家支援的。大

寨大队共接受国家和外单位的财力、物力支援达84.46万元，按1976年大寨的户数和人口计算（83户，480人），平均每户达1万余元，人均1750余元。此外，他们搞的“西水东调”也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工程。

大寨的做法得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赏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全国鼓吹，掀起“学大寨”浪潮。大寨大队搞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其他地方也搞核算单位升级。如晋中地区1977年已有71%的大队搞了大队核算。另外，山西全省多数大队仿效大寨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代耕，绝大多数集市贸易关闭。大寨的记工和分配方法也被广泛推行。大寨大队的不顾客观自然条件搬山造田、偏废多种经营，也在一些地区照搬，如有的地方围湖造田、填塘造田，在山区毁林开荒，在牧区毁草种地等。这种做法严重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劳民伤财，不但经济效益极低，而且生态平衡也遭到破坏。此外，不少地区还在政治上推广大寨的阶级斗争天天抓的经验，整天批斗，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林彪、“四人帮”借学大寨推行其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党在农村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干部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给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它使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偏重粮食种植，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和副业的种植和生产。另外还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农产品商品性不高，生态环境恶化，农民生活下降。

二、开展大规模三线建设及其不利影响

三线建设早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进行了。解放前我国的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偏重于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西北和西南地区则比较落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曾将沿海工业内迁至大西南，对西南地区经济建设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解放前我国整个工业比较落后，所以抗战时期内迁的那点工业也是有限的。解放后，党和国家曾考虑合理安排我国的经济建设布局，既考虑国防安全，又兼顾结构协调、经济合理，并在60年代初期、中期已开始对三线地区进行投资建设，而形成了战略后方基地。

所谓三线地区是相对于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及其内伸的一、二线地区而言的，主要包括京广线以西、长城以南的11个省区。三线建设的方式，一是投资新建，二是内迁沿海地区老企业，并以搬迁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扩建。三线建设也是我国沿海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向腹地的一次大推移，也是我国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落后地区的传播和扩散。

三线建设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合理的、应该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定以备战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特别是林彪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因而不顾国力负担，不顾经济综合平衡，突出备战，确定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经济建设方针，使得经济建设实质上转向了半战争状态，使经济布局变成了军事布局，从而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三线建设的过程大概是：从1964年8月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是第一阶段。60年

代初期，党和国家过分严重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战争危险，在1964年8月，曾讨论决定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保证；抓紧修好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新建项目都放到内地，沿海能搬的项目也要搬迁，要调整第一线。1965年4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据此修订了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经济建设由调整时期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转到了以备战为中心。三线建设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初期到1969年底，经济秩序比较混乱，三线建设难以大规模进行。从1970年起，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局势的严重性，备战工作提到首位，林彪一伙更趁机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制定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要求迅速扩大军工生产，建设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在这种形势下，《“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战备后方，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备后方。三线建设的主要项目就是这一时期搞起来的。1973年，中央采取调整政策，着重解决基建战线过长，三线建设过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问题，降低了军政费用的支出比重，并改组了国防工业的领导，才逐步将三线建设转入了正常状态。

从60年代中期起所进行的三线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的。主要是：基本建成了战略后方的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改善了国防工业的布局，显著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使之逐步趋向合理。如三线地区建成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湖北十堰汽车厂；新建了四川渡口、贵州六盘水等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发电厂。还建成了一些新的工业中心，如包括云贵川在内的西南机械工业基地，以机床、轴承制造为特色的汉口工业区，以仪表、低压电器、农机、轴承制造为特色的天水工业区，以仪表、机床制造为特色的银川工业区，以及黔西大型煤炭电力基地等。另外，三线建设还推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建成了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交通邮电项目，形成了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中心的专业化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点的新兴工业城市；基本建成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以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的、机械、电子、化学工业相配合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建成了川黔、成昆、湘黔、襄渝、贵昆5条铁路干线，形成了西南地区新的交通骨干网络，改变了交通闭塞的状况。工业、交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批以工矿企业为主的中心城镇，一些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也受到影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落后面貌。

但是，三线建设是在林彪一伙“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又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1）林彪一伙的“左”的指导思想，使三线建设脱离国情、国力，造成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要求过急的状况。（2）工业布局不是以经济技术合理、交通便利为标准，而是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因而布局不可能合理。（3）盲目追求自成体系，不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造成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难以形成生产能力。由于选址定点匆忙，厂区布置不当，有些项目虽花费大量投资建成，但缺水、缺

电或交通不便，因而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有的因与城市或矿区建设不配套，生活服务公用事业跟不上，生产内部不衔接，辅助部分上不去，短期内很难形成综合生产能力。(4) 农轻重、老企业与新企业、老基地与新基地、生产与生活等比例关系不够协调。三线建设主要突出重工业、军事工业，挤了轻工业和农业。由于过分强调内地建设，内地占用资金过多，影响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投资新建企业比重过大，影响到老企业、老工业基地的更新改造。三线建设是靠山、分散、隐蔽，工厂建好，但交通和生活设施跟不上，影响到职工的生产情绪。(5) 经济效益差。三线项目许多未经充分准备，认真进行可行性论证，就仓促上马，全面铺开，许多项目甚至于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有不少项目地处山区，需要搞大量的防洪工程和厂外管线、道路和社会服务等设施，增加了投资，扩大了成本；加之管理不善，组织工作跟不上，职工不安心，浪费很大，经济效益较差。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体制的变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大的变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左”的错误和政治动乱，使经济体制遭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到 1970 年，又开始了一场以向地方盲目下放权力为中心内容的经济体制的大变动。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经济体制的冲击和破坏

“文化大革命”中开展了所谓“革命大批判”，把许多有关经济体制的正确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理论观点等，都当做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因此对经济体制的冲击很大。如在农村中，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局部地区试行的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等批判为“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同时，又搞“穷过渡”，搞所有制升级。在企业管理方面，把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倡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盈利等，统统诬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利润挂帅”。鼓吹“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和经营管理。运动中还把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腐蚀工人阶级”，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全盘否定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极力鼓吹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革命大批判”运动还把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斥之为“条条专政”，“扼杀地方积极性”，而大搞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把严格责任制，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公然鼓吹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煽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还特别提出了对《工业七十条》的批判。这个条例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把《工业七十条》中规定的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又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有权自主地使用国家交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有权与别的企业订立经济合同和有权选择工人的工资、奖励形式等，说成是“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企业”，并荒谬地把社会主义企业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等。运动中还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斥为“摆脱党的领导”，“让‘走资派’篡夺企业领导权”。此外《工业七十条》中关于建立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搞好企业民主管理等都遭到批判，全都被否定了。对坚持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关系、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诬蔑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鼓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蒙昧主义。

这种错误的批判，颠倒是非，否定了党和政府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直接损害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把经济体制引向歧途。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篡党夺权，竭力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全面混乱。运动中层层揪斗“走资派”，搞垮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管理机构。另外，社会生产秩序也搞乱了，重要规章制度被废弃，而且随意更改，造成很大混乱。在农村则大搞生产资料所有制“升级”、“过渡”，改变核算单位，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把供销合作社改为全民所有制国营商业，人为地使经济结构单一化。所有这些都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

二、盲目下放权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 年前，经济体制已经受到很大冲击和破坏，到 1970 年又开始了一切向地方盲目下放权力的大变动。

扩大地方权力，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让地方有更多权力，办更多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不过要根据每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对扩大地方权力也要适当。1961 年后，适应调整任务的需要，强化了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着调整任务的完成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也会影响地方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为此，1964 年权力下放已经开始。1966 年 3 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又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陷于严重动乱，经济体制改革暂时搁置起来。

到 1970 年，经济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当时，一方面“以备战为纲”，强调各地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另外，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的思想再度抬头，因而认为必须向地方下放权力，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才能实现以上目标。在《“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中重申了毛泽东的指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并要求各省力争做到煤炭、钢铁、电力、农

机、轻工产品等自给自足。与此相适应，要求将原来直属中央各部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统一管理，并扩大地方的投资权、招工权、生产计划权、物资分配权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一切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动在全国急速推行开来。

适当地下放权力是对的，但是实行起来，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过急、下放的面过宽。如将包括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2600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冶金工业部原有直属钢铁企业70个，除两个独立矿山外，包括鞍山、本溪、包头、太原、武汉、马鞍山等大型钢铁厂在内，全部下放给地方，或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其他部也下放了大批直属企业。随着工业企业下放，商业部也将所属一级批发站全部下放给省，省属二级批发站下放给专区。外贸部在各地的企业也全部下放给地方，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各部直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下放给地方管理。

不加区别地大批下放企业造成以下后果：（1）下放过多，将一些显然不该下放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下放了。结果，地方管不了，不得不仍由中央代管，继续按“条条”下达生产计划、物资供应，地方实际上主管劳动和资金，造成中央、地方多头、多层管理，人权、财权、物权、计划权相互脱节，使企业形成“多头领导”，办事难的情况更加发展，企业管理效率进一步降低。（2）下放过急过猛，组织工作没有跟上，打乱了原来的协作关系，新的协作关系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来，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以维持，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大大降低。197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1969年提高了10%，而1971年、1972年则分别比前一年下降了0.2%和1.5%。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及1965年的一半，亏损企业达到1/3，亏损金额达到73亿元。盲目下放企业是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之一。

三、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企业的隶属关系为转移的。企业隶属关系变了，相应地，计划的上报下达、资金的上缴下拨、物资的集中分配以及劳动力的安排等，都要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确定下放企业的同时，就规定了财政、物资和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大包干”，以扩大地方的财权、物权和投资权。

财政收支“大包干”，是在国家统一预算下，对省、市、自治区实行的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贴补）、结余留用或者全额分成、收入留成办法。1971年全国开始实行“财政收支包干”体制。国家财政收入除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和海关收入归中央外，其余全部划归地方。国家财政支出除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基本建设、国防战备、对外援助、国家物资储备等支出归中央外，其余也全部划归地方，由地方统筹安排。各地方的预算收支经中央综合平衡，核定下达。收入大于支出的，按包干数额上缴中央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由中央财政按差额数量包干给予贴补。在执行中，超收或结余都归地方支配使用，超收或超支由地方自求平衡。

上述办法执行后取得一定效果，但矛盾很多。(1) 收入打不准、各地区往往在实际执行中不一致，地区间机动财力相差过于悬殊，苦乐不均；(2) 就一个地区看，有的年份超收多，有的年份超收少，甚至短收，机动财力不稳定，不便于地方统筹安排。(3) 超收全部归地方支配，短收的还要中央补贴，实际上是包而不干。(4) 有些地区把财政包干指标又层层包到地区和县，造成地方机动财力过于分散等。

1973 年又再次修订财政体制，在一些地区试行"财政收入固定比例留成"办法，即财政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这一办法的缺点是收支不挂钩，收入短少了，支出仍按原定指标，结果造成花钱在地方，平衡在中央。因此，这一办法没有推广。

1976 年又改为"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地方多收不多支，少收则要少支，既保证地方机动财力，又可使收支挂钩。

以上是自 1970 年后财政体制几度变更的概况。财政体制的几经变动，基本一点即试图以"大包干"的原则，寻求解决中央与地方间财权关系的适当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包干式的财政体制虽然扩大了地方财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方便了地方的统筹安排，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问题，因而能调动的积极性是有限的，相反，在某些方面又造成财力分散，增加了国家财政预算平衡的困难。

关于物资分配"大包干"。建国以来，国家对重要物资一直实行由中央统一分配，以部门管理为主的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对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央管得过多、过细、过死，层层申请，层层批准，影响效率；同时也不便于地区内和单位间的物资调剂，做到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合理使用。1970 年随着企业下放，也提出了试行物资分配"大包干"的办法，即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这种办法，调整和减少了国家统一分配和中央各部管理的物资种类，将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工作移交地方管理。但是由于大量物资分配权层层下放，组织工作没有跟上，致使原有协作关系被打乱，削弱物资的统筹安排和综合平衡，给生产建设造成了困难。因而 1973 年又将统配、部管物资增多（1966 年统配、部管物资为 579 种，1972 年减为 217 种，1973 年又增加为 617 种），基本上已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

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工作移交地方管理问题，由于许多下放企业的产品是面向全国，生产计划仍由中央各部安排，而中央各部制定计划时不知道地方能给企业多少物资，地方分配物资时又不知道中央给企业安排多少生产任务，因而生产任务与物资供应的衔接发生困难。并且，这些企业的所需物资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且协作面广，地方也管不了，所以不得不仍由中央各部代管，称之为"直供企业"。因此，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供应工作从 1976 年起就不再移交地方管理了。

实行物资"大包干"办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在物资平衡、分配、供应方面的权力，有利于地区内物资的统筹安排和合理使用。但是，由于物资管理上的分散，造成地区间物资调度困难，特别是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往往不能保证必要的调出，影响重

点生产建设任务的需要。特别是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互相脱节，造成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物资包干办法实际上没有全面贯彻。

除了物资包干外，还试行过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办法等。

四、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批判，否定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提倡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和排斥。1970年在经济体制变动中，又对税收制度、信贷制度和劳动工资制度作了某些改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简化税收制度。1957年以前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相适应，我国实行的是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比较有效地发挥了税收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1958年实行税制改革，使税收制度简化。1970年改变国营企业的工商税收制度，试行了一个行业一般按一个税率征收。1972年扩大试点，合并税种，把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税种合并后，对国营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所得税。简化税目、税率，多数企业可以减化到只用一个税率征收。一部分税收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地方有权对当地新兴工业、“五小”企业、社队企业以及综合利用、协作生产等确定征税和减免税。

税收是重要的经济杠杆，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而税收又是主要通过不同的对象确定不同的税种、税目和税率，以发挥其调节作用。这次税收制度的变动，将过去行之有效的复税制进一步简化，基本上成了单一税制，大大削弱了税收这一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税收管理权的一再下放，也导致管理混乱，减少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二）简化信贷制度。包括合并机构、下放权力、改变信贷方式、简化利率种类、调整利率水平等。1970年曾将中国建设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不成功，1972年又恢复原样。1970年还提出下放信贷管理权，实行农村信贷包干，一定一年的信贷管理办法。1971年底又决定全面调整银行利率，简化利率种类，降低利率水平。调整后，城镇集体经济和国营企业实行统一利率，贷款利率一般降低30%左右，存款利率一般降低20%左右。同时取消某些优惠利率，简化利率种类，降低利率水平，结果使利息这一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被进一步削弱了。

（三）简化劳动工资制度。我国工资制度不仅形式单一，而且存在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现象。但是，就是这样的工资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左”的错误思想的冲击。随着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批判，1969年将企业综合奖改为附加工资，相应地将原规定按计划完成情况提取奖励基金的制度，改为按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职工福利基金。与此同时，也取消了计件工资制度。这就使我国的工资制度进一步单一化，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体制的变动实际上使“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和原

有体制上的弊病，不但没有克服，反而有所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盲目下放权力是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变动的主要内容，它的指导思想是追求高指标，各个地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做法上是大哄大嗡，仓促从事。结果是国家对宏观经济失去控制，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这次权力的下放，仍然是局限于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的变动，基本上没有涉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企业管得过细、过死，统得过多，企业缺乏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的状态并没有改变，相反，由于瞎指挥，强迫命令盛行，使企业更加处于无权的地位。

另外，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端，是过多地依靠行政办法，很少使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这次经济体制的改革，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制度，使这些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更加削弱，甚至被取消了。由于各种规章制度一概被斥之为“管、卡、压”，或被废除，或名存实亡，各级经济管理机构被冲击、被夺权，因而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管理职能也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

第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与某些领域中的进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了“三起三落”，即：196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经过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而急转直下；经过调整，1969年—1973年经济又出现恢复和上升的转机，但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1975年经过整顿，又有了新的起色，但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受到新的挫折。

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的灾难，它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是严重的，损失是巨大的。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所遭受的严重挫折

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使得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后来经过调整，到“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走上正轨。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经过调整已经改善的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又遭到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轻重关系再度失调。“文化大革命”前农轻重三者的关系比较合理，1965年三者的比例为37.3:32.3:30.4。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加强备战”口号下，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比工业落后，农轻重关系发生变化。1976年三者比例关系为30.4:30.7:38.9，即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65年的30.4%上升为1976年的38.9%，而农业由37.3%下降为30.4%，轻工业由32.3%下降为30.7%。

（二）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由于过分突出钢铁和机械加工工业，轻工业被排挤，发展缓慢，明显落后。1976年与1953年相比，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3.5%，轻工业则只为8.8%。两者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为51.6:48.4，1976年则为44.2:55.8。重工业片面发展，轻工业相对落后，设备陈旧，产

品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三）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间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不仅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在重工业内部也由于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忽视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造成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失调。1966年—1976年，我国重工业产值中，加工工业的比重由50.5%上升到52.8%，而原材料工业却由38.3%下降到34.9%。机械工业盲目发展，不少产品不合规格，质量差，有的产销不对路，造成大量积压。

（四）工业发展与交通运输之间的比例关系不相适应。"文化大革命"前，交通运输业已经不太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突出发展重工业，突出内地新的铁路线的建设，忽视运输繁忙地段的旧铁路线的改造，使铁路运输能力越来越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京广线以东地区的铁路运输能力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1966年—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1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5倍，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不到77%，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只增长了28.2%。如果把这种比例关系与"一五"期间的关系进行对比，更可以看出它的不合理性。"一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7.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28倍，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了1.38倍，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1.24倍。可见，"一五"期间，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交通运输能力与工业发展不相适应，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部门的发展。如"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运力不足，晋煤大量积压，难以及时运出，加剧了能源供应紧张，影响了许多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五）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关于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比较协调的时期是"一五"期间，积累率平均为24.2%。在"大跃进"时期，曾经相当紧张，1960年积累率高达39.6%，后来经过调整，1965年下降到27.1%。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累率不高，不过从1970年超积累率上升，一般都在30%以上，其中1971年为34.1%，1975年为33.9%。积累率增长较快，但国民收入增长却较慢，如1963年—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14.7%，而"三五"期间降为8.3%，"四五"期间更下降为5.5%。"文化大革命"期间，积累率高，国民收入增长缓慢，人口却急剧增加（由1966年的7.4亿人增长到1976年的9.3亿人），在这种情况下，高积累率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正常消费。而且，在积累额中用于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非生产积累的比重也不断下降，1966年为31.1%，1976年下降为20.7%（"三五"时期、"四五"时期平均为25.5%和22.4%）。这明显地表明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

二、经济效益全面下降

"文化大革命"期间，企业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又加上内地建设中错误地强调了靠山、分散、进洞，以致经济效益普遍下降，投入多，而产出少。最集中地表现为，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下降："一五"时期为35元，"三五"时期下降为26元，"四五"时期更下降为16元。在工业方面，1965年—1976年，全民所有制独立

核算工业企业每万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润由20.9元下降为12.1元；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由29.8元下降为19.3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由98元下降到96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由39.8元下降到29元；每百元产值实现的利润由21.3元下降到12.6元。实现利润和税金减少，但是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和成本却不断增加。1965年—1976年，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由25.5元增加到36.9元；每百元销售收入成本由69元增加到74.8元。在商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由1957年的20元下降到1976年的9.7元。1966年—1976年，其中有5年经营利润比上一年减少。到1975年，每销售100元商品，占用资金达61.16元，比1957年多占用15.98元；资金周转率下降到1.63次，比1957年少0.58次；而费用水平则上升到11.66%。在基本建设方面，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率，由"一五"时期的83.7%降到"三五"时期、"四五"时期的59.5%和61.4%。另外，亏损企业不断增多，如商业系统，1976年与1966年相比，商业部系统独立核算单位增加了35%，而亏损单位却增加了1倍多，亏损单位的亏损金额则增加了2倍多。

三、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1949年—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是"三起三落"，总的趋势是在徘徊中缓慢发展，有些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社会总产值："三五"时期为9.3%，"四五"时期为7.3%，1976年下降为1.4%（1976年比1975年增长1.4%）；工农业总产值："三五"时期为9.6%，"四五"时期为7.8%，1976年为1.7%（1976年比1975年只增长1.7%）；农业总产值："三五"时期为3.9%，"四五"时期为4%，1976年为2.5%（1976年比1975年只增长2.5%）；工业总产值："三五"时期为11.7%，"四五"时期为9.1%，1976年为1.3%（1976年只比1975年增长1.3%）；国民收入："三五"时期为8.3%，"四五"时期为5.5%，1976年为—2.7%（1976年比1975年负增长2.7%）。

以上指标表明，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在明显下降，1976年则更是大幅度下降，国民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2.7%。我们再拿"文化大革命"10年与"文化大革命"前3年（经过调整后的国民经济）相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就更为明显。如1963年—1965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5.5%，而"三五"时期、"四五"时期则分别下降为9.3%和7.3%。工业生产，1963年—1965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为17.9%，而"三五"时期、"四五"时期分别只有11.7%和9.1%。

四、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混乱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冲击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国家计委受到严重冲击，计划工作几乎停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关被冲击，计划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因此，所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只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提纲，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也仅是一个纲要（草案），也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强调备战需要，把许多经济权力下放给行政机关。1970年批判所谓“条条专政”，把包括许多大的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管理，并要求各省尽快实现主要产品自给。这虽有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地方工业，但却造成了不少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地区分割、自成体系的现象。在地区之间，不能按照经济合理原则，发挥各自的优势，组织分工协作，甚至以封锁抵制竞争，保护落后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而不少由中央下放的大企业，由于原来的面向全国的产供销关系被割断，地方又无力解决，经营更加困难，不得不改为中央直供企业，形成多头领导。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穷过渡”，急于向更高的所有制过渡，在农村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经营副业，关闭集市贸易，在城镇取消个体经济，因而流通范围越来越小，流通渠道越来越少。供销社并人国营商业后，城市的集市贸易也全面封闭，从根本上排除了市场的调节作用。

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上，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对按劳分配，取消企业奖金、计件工资和农村中的工分制，助长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

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而也影响到人民的生活。1966年—1976年10年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只有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其他年份从未调过。1966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年工资为636元，而1976年下降为605元，1966年—1976年，平均工资下降了4.9%。实际工资也下降了，如以1952年为100，1966年为120，1976年则下降为112.1。再从生活消费品的人均消费量看：粮食1966年为379.14斤，1976年为380.56斤，几乎没有增加；食用植物油1966年为3.52斤，1976年下降为3.19斤；猪肉1966年为14.08斤，1976年为14.76斤，没有什么变化；煤炭1966年为208.75斤，1976年下降为191.15斤。

此外，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0年合计达1600多万人，给职工增加不少负担。加上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设、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没有增加，许多轻纺产品质次价高，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商业网点、服务行业大批并缩，城市人民生活困难与

不便更是与日俱增。农民平均纯收入10年来没有增加，农村中广大农民终岁勤动，而收入很少，不少地区甚至求一温饱而不可得。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某些领域中的进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四人帮”执行一套极“左”路线，使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但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千方百计地在进行辛勤的劳动，因此“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国民经济的某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

农业机械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化肥、农药使用量上升，并建成了一批农用水利工程。如农业机械总动力，1965年拥有1494万马力，1976年增长为11733万马力；农用大中型拖拉机，1965年为72599台（混合），1976年增长为397000台（混合）；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1965年为3956台，1976年为825000台；农用排灌动力机械，1965年为55.8万台，1976年为426.2万台；联合收割机，1965年为6704台，1976年为14233台；农用载重汽车，1965年为11063台，1976年为48739台；农村用电，1965年为37.1亿度，1976年为204.8亿度；实际机耕面积，1965年为23369万亩，1976年52369万亩。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全国机耕面积扩大，1976年有1/3的耕地实现了机械耕种。机电排灌面积也扩大了，1976年机电排灌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53.9%，比1965年增加了1倍多。1976年农用化肥量达524.4万吨，比1965年增加2倍，每亩耕地化肥施用量达7.8斤，比1965年增加了2.1倍。另外，农田水利方面，建成了一批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的工程设施，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其中部分在“文化大革命”前动工的，也相继建成并发挥效益。

由于上述比较有利的条件，因此农业生产还是上升的。农业平均发展速度仍然达到3.9%。粮食产量也有增长，1965年为3890.5亿斤，1976年增长为5726.1亿斤，增加了1835.6亿斤。如按人口平均计算，1965年粮食产量为544斤，1976年增长为615斤。其他农作物总产量也有一定增长，但按人口平均则没有增加，棉花、油料还减少了。棉花人均1965年是5.9斤，1976年减少为4.4斤；油料人均1965年为10.1斤，1976年减为8.6斤。

二、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

10年中石油工业发展突出，一些石油资源被进一步探明。大庆油田形成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型企业。山东胜利油田和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规模。我国原油产量1965年为1131万吨，1976年增长为8716万吨，增长了6.7倍。随着原油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973年引进并先后施工建设的13套大型化肥装置，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357万吨、尿素580万吨。同时引进的北京、上海、辽阳、四川、长春等地的大型化工、化纤装置，也先后开始安装建设。

在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此外一些先进技术工程，如武汉钢铁公司1.7米轧钢机工程（设计能力为热轧钢板300万吨、冷轧钢板100万吨、硅钢片7万吨，全部采用外国先进技术，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特点），于1975年正式施工，1978年全部建成投产。此外，在机械工业方面，还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四川大足汽车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和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站。湖北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由国外引进设备建设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建设。

三、交通运输和电信等方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有计划地修建了一些沟通西南、西北的铁路，联结成都与昆明、株洲与贵阳、襄樊与重庆的成昆、湘黔、襄渝铁路先后建成投入运行。这些铁路的修建十分不易，有的穿越重山峻岭，跨越深谷大河，有的要通过沼泽地、永冻层、地震带和盐湖等，地形险峻，地质复杂，施工极其困难。如成昆铁路全长1099公里，穿越大小凉山、碧鸡山和横断山脉的隧道有427座，总长度为341公里，跨越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以及深沟大涧的大小桥梁有991座，总长度为93公里。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占全线长度的40%。此外，华北地区还继续修通了京原线（北京至山西原平），建设了通坨线（北京通县至河北坨子头）。从河南焦作到湖北枝城的焦枝线，也于1970年7月建成。太焦线（山西五阳至河南修文）、枝柳线（湖北枝城至广西柳州）也全面动工，于1979年完工。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线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0米），也于1968年完工（1959年动工）。此桥比武汉长江大桥长4倍，两列对开的列车只需6分钟即可顺利到达对岸。

此外，1974年还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河北秦皇岛的我国第一条长距离的输油管道，接着又建成了秦皇岛至北京、山东临邑至南京的输油管道。在邮电通信方面，1976年建成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同轴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自

治区的微波通信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座卫星地面站。

四、科学技术方面

核技术迅速发展，继1964年10月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1966年5月9日又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次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精确命中预定目标。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重173公斤）。1971年3月3日发射一颗重212公斤的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在运行中成功地发回了各项科学试验数据。1975年11月26日，我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在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够回收卫星的国家。这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这一时期还研制成了一大批重大新产品和成套设备：完成了三万吨模锻水压机等9套大型成套设备，第二汽车厂冷加工成套设备，年产700万吨大型金属露天矿设备，年产15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成套设备，年产300万吨井下煤矿设备，250万吨炼油厂成套设备，年产合成氨6万吨、尿素11万吨的化肥设备，20万千瓦~30万千瓦水力和火力发电成套设备，33万伏高压输变电设备和2.5万吨级的轮船等。在农业方面，还研制成功了籼型杂交水稻良种，比一般水稻良种可增产20%左右。

五、工业生产建设有一定进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但是在广大职工努力下，10年来工业生产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表现在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和工业产品产量的增加方面。“文化大革命”正值“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时期，在这两个五年计划内，累计用于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为1519.48亿元，包括工业在内的更新改造和其他措施的投资745.48亿元。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共1083个，新增固定资产907.68亿元。同时期，新增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为：炼铁1971.5万吨，炼钢1250.6万吨，煤炭开采14926万吨，发电机组容量2603.6万千瓦，石油开采6881.2万吨，天然气开采132亿立方米，合成氨673.6万吨，化肥576.54万吨，化学纤维13.63万吨，棉纺锭416.3万锭。到1975年底，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到2209.3亿元，为1965年的2.38倍。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工业品产品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见下表。

1976年与1965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较

产品	单位	产量	
		1965年	1976年
钢	万吨	1223	2046
原煤	亿吨	2.32	4.83
原油	万吨	1131	8716
发电量	亿度	676	2031
生铁	万吨	1077	2233
水泥	万吨	1634	4670
汽车	万辆	4.05	13.52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3.96	15.70
化学纤维	万吨	5.01	14.61
布	亿米	62.8	88.4
糖	万吨	146	165
自行车	万辆	183.8	668.1
缝纫机	万架	123.8	363.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242页、243、244页、245页、248页。

1976年工业总产值达31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了172.6%，平均每年增长9.5%。在工业生产中，石油、石油化工和电力工业发展迅速。到1975年底，累计建成的原油生产能力达7812万吨，为1965年的5倍；原油加工能力达6764万吨，为1965年的4.8倍。10年间，我国相继建成了一些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和华北油田等。原油产量大幅度增加，1966年原油产量为1455万吨，1976年增长为8716万吨，平均每年增加726万吨，年增长率为19.6%。石油工业的发展为石油化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现代石油化工从无到有，逐步成长，改变了单纯以电、石油和粮食生产有机化工产品的原料发展路线，确立了煤、油、气并举发展化学工业的原料发展路线，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化肥工业和化学纤维工业得到突出的发展。

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仍然寻找一切可能，坚持工作，尽可能减少由于内乱带来的破坏与损失，也就是说这些成果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同时，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工作所打下的基础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当然如果没有这场十年浩劫，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工作还会快得多，建设成就也会大得多，这是无可置疑的。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从1966年开始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才告结束的、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它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精神和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和损失，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有哪些教训应该记取呢？当然，首先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灾难，应该绝对防止它的发生。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做教条来奉行，或者用歪曲了的所谓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必然要遭到失败。“文化大革命”中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就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本来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如果掌握不好、运用不当，在实践中不但不会取得积极的效果，反而会遭到失败。“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完全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的一种极“左”思潮。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时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调动一切直接的或间接的积极因素，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当时把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夸大为全局性的阶级对立，提出一切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就必然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一些不是阶级敌人的人，当做阶级敌人来进行斗争。发动一场向所谓“走资派”夺权的“全面内战”，使许多人错误地被当做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并被打倒，从而使全国陷入动乱之中。这样，既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也对国民经济形成一种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即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和歪曲为按劳分配本身即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制定了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理论”。另外，还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机械搬用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把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1920年），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还很不巩固，小农经济尚未改造，富农还有很大经济实

力，而且投机活动十分猖獗的情况下提出的观点，运用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基本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而根据这些错误的“理论”制定的城乡经济政策，必然是极“左”的，脱离我国实际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这些错误“理论”进一步推广，并在实际中“运用”。他们把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当做“修正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当做“走资派”打倒；他们取消个体经济，关闭集市贸易，压制集体经济，而国营经济又往往不计成本，不注意经营管理；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这些措施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挫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事实说明，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就曾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在国家计划统一领导下，灵活运用价格、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的作用，搞活国内市场，加强企业管理，加强经济核算等。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坚持科学管理制度

现代化的大生产需要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是由现代化大生产本身特点决定的。因此，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特别是企业中一定要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完善的管理制度。“文化大革命”前，在调整经济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管理方法和规章制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被当做资本主义的“管、卡、压”、“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条条专政”等遭到批判，当做“修正主义”的“黑货”被废除了。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盛行，经济管理混乱，企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产品质量下降，成本增高，事故增多，经济效益很差。

事实证明，现代化的大生产没有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是不行的。我国经济技术比较落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和改进管理制度，重视和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管理经验，改进我国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培养管理人才，实现管理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改变生产力布局，应持慎重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国际形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经济建设转移到加强国防上面来，以备战为中心，大搞三线建设，企图加快内地建设，改变过去的生产力布局，结果使国民经济失去平衡，使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当然，生产力的地区布局是否合理，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我国由于历

史原因，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现代工业大部分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的内地经济则比较落后。为了开发内地资源，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防止敌人入侵的威胁，注意加强内地的工业建设，逐步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力地区布局，是必要的。

但是，应该了解，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它必须经过全面的、慎重的考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注意发展内地工业，也应兼顾到沿海工业；注意国防也应兼顾经济建设；注意经济建设也应注意到国家财力等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强调备战，对加强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因而造成了只片面强调加快内地建设，未能兼顾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内地省区又片面强调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未能多注意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各地区间的协作关系；内地建设中也过分突出国防工业及其有关的重工业，忽视了对轻工业、农副业、商业、文教卫生、职工住宅等必要的安排；另外，许多建设项目又因执行了“靠山、分散、进洞”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错误方针，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由于以上缺陷，因而10年内地建设中，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建设了不少骨干企业，但总的来看，经济效益很差。许多企业由于建在深山沟里，交通、职工住房和服务设施等没有跟上，工厂虽然建成了，但原材料跟不上，职工生活设施没有安排好。因而不少工厂的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一些职工也因生活条件太差，千方百计想离厂而去。另外，内地建设要求过急，也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遗留下来不少严重的问题。

过急地进行内地建设所得到的教训是，要改变地区布局，应对其艰巨性、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要看到我国内地由于经济基础差，交通不便，建设条件和投资效果都不如沿海地区，因而要根本改变地区的布局，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只有在加强内地建设的同时，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注意发挥内地资源优势，加强有关地区、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注意军工与民用相结合，努力做到综合平衡、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地区布局。

四、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在现代的世界，国际间交往日益频繁，要建设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是对的，但是决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特别是经济建设，在任何时期都需要国际之间的交往，只有开展国际交往，发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才能从技术发达国家取得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企业的经验、发展经济的资金，从而加快本国的经济建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与美国、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对我国经济建设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四人帮”却把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当做“崇洋媚外”来批判，诬蔑为“卖国主义”、“爬行主义”，结果给开展国际经济交往造成了严重障碍。

实践证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立足点放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是对的，但是绝不

能搞闭关锁国。因为社会化的大生产本身不仅需要国内扩大的交换和市场，而且需要扩大的国际的交换和市场。只有发展国际交往，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平等交换，发展自己的长处，补充自己的不足，才能加速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同时在国际交往中，也可充分发挥我国的优势，争取有更多的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迅速学会开展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本领，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以便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先进的经验、技术，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注意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对人口的控制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普遍诬蔑为"臭老九"，许多科学家、学者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挨批斗，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教育战线所受打击更大，"停课闹革命"，一些老教师被批斗，因而使正常的人才培养无法进行。我国的高等院校直到 1977 年才重新招收正规大学生，结果，不仅少培养大学毕业生约 100 万人、中专毕业生约 200 万人，而且在我国科技队伍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 10 年以上的空白，在人才队伍的接续上造成很大的困难。

实践证明，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战略问题，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把人才培养问题放到重要地位上。在重视物质资源的开发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智力的开发、人才的培养。我国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包括对原有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对年轻科技人员的培养和使用等，迅速造就一批高质量的建设人才。只有这样，才能部分地挽回"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损失，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充足的、合格的科学技术人才。

在人口方面，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注意控制人口。60 年代时曾经提倡过计划生育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项工作却无人过问，结果造成人口失控，盲目增长，10 年增加了近 2 亿人。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口增长过快，每年增加的国民收入必然要过多地消耗在维持新增人口的需要方面，既限制了积累的增加，也影响到全部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给劳动就业、文化教育（升学）、医疗保健、住宅、交通和城市公用设施等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人口问题上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人口增长过快，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劳动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如果不注意控制人口，不但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必须把坚持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基本国策，长期地坚持下去。

第三篇

社会主义经济的曲折发展

第一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第一节　1957年下半年

邓小平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

1957年上半年，党还在继续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震动了全世界。1957年6月18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社论中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讲话指出：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找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要靠人民民主专政。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还联系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关于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在总结了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在国际方面，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接着，在东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当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起因之一，同样是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处理好。《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是以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理论基础的。文章着重指出，"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在国内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逐渐大量显露出来。1956年下半年，由于受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加上社会主义改造过急和经济建设中的冒进，使许多城市粮食、肉类和日用品供应紧张；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在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共约1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达1万多人。对于新出现的这种情况，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是缺乏准备的。他们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毛泽东说："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办法来对待新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迫切需要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

于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便成为1957年全党整风的主题。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提议，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充分体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

这次整风，是开门整风。整风之前，已有一些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

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根据这一指示，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从5月15日到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此期间，各部门的党组、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在座谈会上，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攻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比如，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党天下”，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主张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说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把人民民主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等等。对这些言论，毛泽东特别警觉，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进攻。5月15日，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并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这篇文章，“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反右派运动，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就开展起来了。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1958年夏季才完全结束，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运动严重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反右派运动，对党的指导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认为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段话明显地强调了阶级斗争。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便提出修改主要矛盾的问题。当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还是作了如下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理论根基，开始走上阶级斗争为纲的歧路。

第二，从反右派运动，引申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据此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1957 年 7 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写道："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这里，实际上包含了按政治思想划分阶级的思路。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是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同年 5 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中央工作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报告说："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这样，就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列入了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畴。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曾经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本来是正确的。但毛泽东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仍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反右派以后，他的观点就更加鲜明了。他曾说，反右派以后，"对知识分子戴上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在这一理论误导下，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实行了二十多年"左"的政策。

第三，把农村在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1957 年 7 月，毛泽东说："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同时提出，迅即由中央发一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7 年秋冬到 1958 年春，在农村普遍就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是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同时进行的，政治压力很大，名为辩论，实际上是压服。农村许多需要解决的矛盾，都被两条道路的斗争所掩盖了。由于在辩论中把主要锋芒对着富裕中农，助长了农村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潮，为在农村推行"左"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1957 年下半年，开始批判反冒进。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对1956年所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毛泽东说："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他提出要恢复被扫掉了的这三个东西。这一篇话，很明显是批评周恩来、陈云等人的。

会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批评反冒进。11月13日，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中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2月12日，在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中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这两篇社论，公开宣布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的论点。毛泽东对11月13日的社论很称赞。1958年5月26日他在写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2月，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

动。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2000—3000万人，11月份6000—7000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1亿人，拉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庆祝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并举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和64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庆典和参加两个会议。

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当众宣告，通过和平竞赛，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受其启发，毛泽东在征得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同意以后，在11月18日的64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也提出，15年后中国的钢产量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在致词中说：“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样，就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告了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口号是鼓舞人心的。从此，赶超英国便成为“大跃进”的目标。

第二节　1958年“大跃进”

从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的准备阶段。为了从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为“大跃进”扫除障碍，毛泽东从1958年初开始，紧锣密鼓，连续召开了几个会议。1月，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杭州会议和9省2市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3月，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在这些会议上，曾经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的年度计划，讨论过工作方法，等，但会议的重点是批评反冒进，而且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反冒进的性质是在1956—1957年这个时期关于建设规模、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方针性错误。反冒进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宣称：“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早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印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部分按语，并且写了如下的说明：“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批评“反冒进”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大跃进”的理论。这些理论，集中地反映在南宁会议前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上。举其要者就有：

——关于不断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

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对技术革命的任务，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作过解释，这就是：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器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无疑是正确的，基本上符合八大确定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强调不断革命，主要不在于完成技术革命的任务，而是继续批评反冒进，推动“大跃进”，争取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个意图，有些省、市很快就领会到了。1958年2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在关于传达和讨论六十条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思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这个体会是符合毛泽东的观点的。

——关于平衡和不平衡。毛泽东说：“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他批评反冒进没有正确处理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是消极平衡。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社论指出，有两种平衡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社论联系1956年的实际，认为当时有一些人“因为他们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党和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这篇社论比较准确地阐明了毛泽东的观点。其实，平衡就是平衡，本无所谓积极平衡或消极平衡。提出积极平衡的用意，无非是号召人们使平衡服从于主观主义的高指标，或者按长线平衡，其结果，打破了旧的平衡，新的平衡也不存在了。这实际上否定了八大确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关于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说：“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

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毛泽东认为，反冒进也是用的这种方法。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一个时期就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和错误。谁讲缺点和错误，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大跃进”中浮夸风猖獗，却受不到应有的抵制，就是这种观点带来的不良后果。

——关于大权独揽。毛泽东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这里所谓分散主义，是批评国务院的。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曾批评国务院，制定五年计划，不让他参与和设计。他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要使“大跃进”畅通无阻，他必须掌握经济的决策权。南宁会议以后，周恩来被免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职务，财经决策实际上由毛泽东直接掌握了。接着，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柯庆施等跟着鼓吹个人迷信与盲从。这样，就使得全党特别是中央领导内部的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日趋不正常，实际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了。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不仅为“大跃进”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提出了一些高指标和“左”的政策。这包括：

（一）南宁会议上提出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准。根据会议精神，薄一波在报新的1958年计划草案时已经提高了指标，并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但在成都会议上又作了大幅度提高。把南宁会议和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确定的指标，作为中央的第一本账，又搞了一个高指标的第二本账。按照这本账，和1957年相比，1958年工业总产值要增长33%，农副业总产值要增长16.2%，财政收入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1.5%，钢增长35.5%，生铁增长35.5%，煤炭增长30.1%，发电量增长29.3%，粮食增长16.6%，棉花增长24.8%。中央批准的国家经委党组的报告说：“从这本账看，南宁会议的反对保守、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精神，已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已经驰入“大跃进”的轨道。

（二）南宁会议上提出，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

则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还要求全国普遍开展农具改革运动，“在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

（三）成都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四）成都会议作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认为残存的个体经济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要求对其进一步实行严厉的限制和改革措施。

（五）南宁会议上已经提出改变农家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要求在几年内从倒四六、倒三七（即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0%—70%），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80%）。据此，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意见》。

（六）成都会议讨论了计划、工业、基本建设、物资、财政、物价、商业和教育等方面的管理问题，决定把大量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

1958年5月5日到2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规定召开的。这是一次“大跃进”的会议。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谭震林所作的《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阐述这条总路线时指出，它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条总路线，是“大跃进”的总路线。《人民日报》社论解释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充分体现了总路线的精神。

会议肯定了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反冒进的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在修改报告时，毛泽东加了一段话："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在会议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都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反冒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5月2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这里所说的新的基础就是"大跃进"，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在中央领导内部就只有一种声音了，谁怀疑"大跃进"，就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就有被当作"资产阶级白旗"拔掉的危险。

在会议期间，各工业部门的党组纷纷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贯彻成都会议精神，赶超英国和美国的工作报告，提出了本部门的赶超计划和工作设想。例如，冶金等部门提出，在今后五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内，我国工业建设在生产水平上赶上或超过英国，15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轻工业部提出，造纸在1962年超过英国，1972年赶上美国；纺织工业部提出，1962年在棉纱、棉布上超过产量最高的美国；化学工业部表示，化肥产量5年超过美国；煤炭部提出，煤的年产量两年超英、10年赶上美国。李富春在会上作了题为《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是关键》的发言。发言中说："按照初步设想的指标估算，1962年工业总产值大约为2300—29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26%—32%；1962年农副业产值大约为1200—1370亿元，比1957年增长80%—110%，每年平均增长13%—16%。很显然，这是一个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的高速度。""只要我们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上述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账，我国就完全有可能在196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在1972年或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毛泽东同意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提法。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指标继续拔高。

6月中旬，冶金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的新指标。6月22日，毛泽东批示："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

与此同时，李富春向中央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认为"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要点》提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2000万吨，

争取达到2500万吨；农业方面，争取粮食超过6000亿斤，棉花产量超过6000万担。这个指标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6月17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估计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达4700亿斤，棉花产量可达4400—5000万担，钢将达1000万吨。“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以外，生铁、钢、原煤、铜、铅、原油、水泥、化肥、金属切削机床、棉纱等等，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同时他还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100万吨，即翻一番。

实现“大跃进”，当时主要寄希望于地方。在几次会议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生产计划实行两本账制度，都是为了加重地方的任务和责任。体制下放，普遍发展地方工业，原意是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现在已成为推动“大跃进”的重要措施。1958年春，中央决定把许多经济权限下放给地方。在八大二次会议后，6月初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后来，又进一步提出，除了协作区，凡是有条件的省，也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6月初，中央指示在十几天内就要把中央各部门绝大部分的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完毕。从6月初到6月15日止，中央工业部门就匆匆忙忙下放了880多个单位，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已有80%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大办工业的运动。为了让地方放手大干，除了允许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发行地方建设公债外，6月底还决定今后劳动力的招收、调剂，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管理，1958年的招工计划经地方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报经中央批准。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按1958年9月规定，大部分大中型建设项目都由地方、各部自行审批，决定后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备案，这就为1958年职工队伍和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开了绿灯。

从6月中旬开始，刚成立的各大协作区先后召开了农业协作会议。华东协作区首先提出，该区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1200亿斤，比1957年增长69%。此后，其他各大协作区也纷纷跟进。湘、鄂、赣、粤、桂五省区协作会议估计，春收作物和早稻增产1倍多。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年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加4000多亿斤，增长一倍以上。

高指标带来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从6月开始，各地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人民日报》连续予以报道：

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亩产2105斤；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5103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等11个队小麦亩产8585斤；

6月26日，江西省贵溪县早稻亩产2340斤；

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亩产36900斤；

9月18日，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中稻亩产130434斤。

在放出这些离奇的高产“卫星”的同时，报刊上批判“条件论”、“农业增产有限论”，大肆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等唯心主义观点。有的科学家也受到这股浮夸风的感染，撰文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

对这些浮夸数字、假“卫星”，当时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是相信了的。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当中他就曾经预言：“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现在，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竟变为现实了，不能不感到高兴。当时，他曾对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几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

由于浮夸风和对农业发展形势极端错误的估计，当时认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业在逼工业。于是，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便提出各级党委今后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业方面来。

北戴河会议是8月17日至30日举行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1959年和195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1%，农业总产值增长44%。钢产量达2700万—3000万吨，粮食产量8000亿—10000亿斤（低于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党组的上报数字10000亿—12000亿斤）。《决定》提出，在1959年计划的基础上，准备在1960年使粮食产量达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粮食产量达到15000万斤或者更多一点。在1958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这次会议，通过并公开发表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1150万吨，在北戴河会议以前就定下来了。但到开会时发现，任务十分紧迫。钢产量1—8月共生产450万吨，剩下的4个月时间，需要生产600多万吨。这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时，连毛泽东都担心完不成，曾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表达他的心情。薄一波向毛泽东建议，把“1070”写在公报上，压大家完成任务，也反映他有些信心不足了。不过，当时已经没有退路。一是农业“大跃进”的浮夸数字煽起了人们的狂热，认为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在会上，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和大钢铁厂党委书记都担保完成任务）；二是7月31日到8月3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毛泽东告诉

他 1958 年中国要生产 1070 万吨钢，赫鲁晓夫不大相信，陪同赫鲁晓夫来访的曾担任过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也说恐怕实现不了，并表示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这些看法，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听进去，相反地，为了证明中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非下决心完成任务不可。毛泽东曾经说：1100 万吨钢少一吨都不行。

为了完成这一紧迫任务，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实行第一书记挂帅。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农业问题已经解决，要求第一书记从现在起把工作重点转到工业上来，抓工业主要是抓钢铁。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个星期检查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9 月 5 日，中共中央召开电话会议，进一步提出从省、地、县到乡，各级第一书记都要亲身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作战的要求。

——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强调要大搞群众运动。他说：“资产阶级和苏联的一些人，说我们在工业方面搞群众运动是‘游击习气’、‘农村作风’，其实我们这一套正是正规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戴河会议以后，一个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当时测算，在 1958 年的最后三个月里，现代化高炉炼出的铁只能满足钢产量翻番的 1/4，大部分供应炼钢用的铁只能靠小高炉、小土炉。8 月份，《人民日报》发表《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提出在发展地方钢铁工业中，应以兴建小的“土”的炼铁炉、炼钢炉为主。当时建的小高炉和土高炉，大的只有十几米高，小的容积只有一立方米。1—8 月全国已经建成小高炉、土高炉 24 万多座，参加人数几百万人。到 9 月底，小高炉、土高炉激增至 60 万座，不但工厂、公社、部队、学校、机关也建起了土高炉和炼铁厂。10 月底，增至 6000 多万人，年底则达到 9000 多万人。当时，不仅炼铁和炼钢大搞小（小转炉、小土炉）、土（土铁炼钢）、群（群众运动），在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方面也搞起了“小土群”，出现了全民大办地质、全民大办小煤窑、全民大办交通运输、全民大办水利等热潮。

对大型的现代化企业，也提倡大搞群众运动，叫做“大、洋、群”。9 月，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的几个钢铁厂后，对当地干部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为了大搞群众运动，便号召广大职工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打破过去办工业的一套正规化的做法，提倡所谓“革命的正规化”。许多企业在改革规章制度过程中，把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而一脚踢开。有些企业把计划、设计、技术检验、技术安全、设备动力、工艺等重要科室统统撤销，管理人员下放当工人，有关管理权限下放给车间、工段或班组，甚至推行所谓“无人管理”、“工人自我管理”等无政府主义的做法，对现代企业管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和农业一样，大炼钢铁也放“高产卫星。”据《人民日报》披露，9 月 14 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 14000 吨，提前超额完成了 9 月份 9000 吨的生产计划。

河南省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9月29日，是中央确定的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和两个日产5000吨钢、一个日产4000吨钢的省。这些“卫星”有许多是虚假的。

———一切为了保钢。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完全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交通运输、煤炭、电力等部门的生产都达不到钢铁翻番的要求。于是便孤注一掷，全力保钢。在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上，已经确定了机械制造、主要原材料、电力、交通运输的工业生产排队原则，要求首先满足冶金设备和冶金工业增产的需要，其次满足制造发电设备的需要，再次满足主要机床的需要，然后才可以顾及其他工业部门。规定除供机械铸铁所需的生铁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炼钢，把大炼钢铁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提出“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口号。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在这里，什么平衡、比例都不讲了。

经过几千万人的日夜苦干，1958年12月19日，正式宣布提前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共生产1073万吨。年底钢产量1108万吨，生铁产量1369万吨。在1108万吨钢中，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产量中，土铁达416万吨，占30.4%。绝大多数土钢、土铁质量很差，含硫量大大超过冶金部的规定，很难加工和使用。”

土法炼铁，成本高，经济效益极差，对资源破坏严重。一吨生铁的成本，大高炉是100元，小高炉是345元，国家的调拨价是150元。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产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当年，财政补贴达40亿元，亏损则在50亿元以上。为生产土铁、土钢，过量开采煤炭和矿石，滥砍滥伐大量树木，砸掉了许多铁锅和铁器，这些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1958年秋，农作物普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但由于9月以后开始全民大炼钢铁以及其他各种“大办”，过多地抽调农村的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3818万人，而且减少的大多是壮劳力。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估计，农产品有10%左右未收回。生猪、大牲畜、水产品等产量也都比1957年下降较多，在城镇人口大量增多的情况下，市场供应情况开始紧张。

由于工业生产“以钢为纲”，其他工业“停车让路”，1958年下半年，轻工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例如，8、9月份，东北三省因电力不足，减去了轻工业电力负荷的2/3，使纸张减产10万吨左右。轻工业产品产量降低，品种减少，直接导致了1959年

春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紧张。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推动下，1958 年一些基础工业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同 1957 年相比，煤产量由 1.31 亿吨增加到 2.7 亿吨；发电量由 193 亿度增加到 275 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 2.8 万台增到 8 万台。但这些数字有浮夸，有的是靠拼设备和简易投产取得的，并没有牢固的基础。算总账，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大跃进”的第一个回合就失败了。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

建立人民公社是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大社开始的。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在高潮中，各地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作了一些改变。有些地区把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大社，并且扩大了经营范围；有些地区自动打破社界、乡界以至县界，进行大协作；有些地区创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组织等集体福利事业……。这种自发的、只是在某些地区出现的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成都会议上，他重新提出了他在 1955 年讲过的并大社的主张。4 月 8 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作为中央意见正式下达。

成都会议以后，全国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5 月下半月，辽宁省把 9272 个社合并为 1461 个社，基本上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 2000 户左右，最大的 18000 户。接着，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也相继完成并社。河南省由 38286 个社合并为 2700 多个社，平均每社 4000 户左右。北京市郊区农村，由原来的 1680 个社合并为 218 个社，平均每社 1600 户。

各地并起来的大社，初期叫法多种多样。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合作农场，有的叫国营农场或共产主义农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毛泽东选定的。

公社的名称，马克思、恩格斯都用过，但作为未来社会的组织的构想，主要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1958 年，毛泽东建议干部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演说中称赞罗伯特·欧文对公社的构想。毛泽东选定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和恩格斯的演说可能有直接联系。

5 月 19 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发言。在发言中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陆定一的讲话表明，毛

泽东和刘少奇对人民公社已经胸有成竹了。

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撰文，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说它“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在报刊上第一次出现人民公社的名称。7月16日，陈伯达在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中，则披露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构想。他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根据这个构想，刘少奇指示，在河北省徐水县搞了“共产主义”试点。

8月4日至5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安国县。在徐水，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在安国，说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8月6日，到达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到达山东省，当该省省委书记在汇报中提到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报道以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响彻全国，各地就纷纷办起人民公社来了。

1958年8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开幕。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多次发言，谈对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他说：

——办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鼓励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当然实行工资制度和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部分地区一两年或两三年，大约一半以上的地区需要有四五年。

——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我们的军事共产主义，是生活平等，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但是，进城后，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把薪金制说得神乎其神。进城后搞薪金制虽也不可避免，但缺点是把它说得神乎其神。我就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变懒了，发明创造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

——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

三、“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

四、“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斤斤计较小事。”“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

五、“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段话是毛泽东加的）“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决议》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并且把人民公社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构想。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在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通过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人民公社比原有的农业社具有更伟大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把农业社转为人

民公社。9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并配以题为《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的社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由嵖岈山附近2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同志向他们讲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办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八月间，陈伯达派《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到该社，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共同研究写成了这个简章（草稿），并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他得到了这个东西，“如获至宝”。简章（草稿）包括：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公社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盈亏由社统一负责；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等等。《红旗》杂志编者按说，发表这个简章（草稿），以供研究和参考，由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还不懂什么是人民公社，除了北戴河《决议》以外又没有什么文件可以遵循，这个简章（草稿）就成为一种模式了。

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此时人民公社化运动已进入高潮。高潮时间很短，前后仅一个多月。下表是（见下页）1958年8月到12月底人民公社的发展状况：

	8月底	9月上旬	9月中旬	9月下旬	12月底
人民公社（个）	8730	12824	16989	26425	26578
参加公社的农户数（万户）	3778	5979	8122	12194	12325
参加公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	30.4	48.1	65.3	98.0	99.1
平均每个公社农户数（户）	4328	4662	4781	4614	4637

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页。

统计资料表明，到1958年9月下旬，人民公社已发展到26425个，参加公社的农户12194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8%，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公社化这样快的实现，和当时采用的先搭架子、上动下不动的做法有直接联系，实际上，绝大多数公社只是挂了一块牌子。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刮了一场强烈的“共产风”。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无偿调拨人民公社的人力、物力、财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全民大炼钢铁、各种“大办”同时进行的。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特别是县联社）最方便国家无偿调拨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9月份5000万人上山炼铁，主要是农民上山。当时，各地动员了人民公社大约20%畜力车、手推车，30%的木帆船，参加大炼钢铁的运输，完成的货运量约占这一年全国货运量的20%左右。组织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参加公路、铁路建设，全国新建的15万公里公路，大约有2/3是由人民公社修建的。据山

西省反映，1958年秋季农副产品收购总额42000万元，县级扣留了18000万元，公社级扣留了3000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钢铁亏损，县和社办工业投资，县社举办的水利工程投资，购买了一批农业机械，以及修公路、小铁路等投资。无偿调拨农民和农村集体财产究竟有多少？很难算清。1961年8月2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央的报告说，“大跃进”以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达250亿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第二，公社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动力和财产。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统负盈亏，人力、物力和财力即归公社统一支配，可以任意调拨。搞水利、深翻地等，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大规模地无偿调拨劳动力。办工业和公共食堂等集体福利事业，向社员无偿调拨房屋、粮食等生活物资。有些公社还按照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办法，把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无偿的转为公有了。公社向生产队、社员究竟无偿调拨了多少财产，也无法统计。这里，有一份湖北省麻城县公社向生产队退还财产的清单。计有：现金320万元，拖拉机8台，抽水机5部，动力机49部，其他小机器143部，各种运输车子744部，各种小农具2697件，耕牛1025头，生猪9019头，小家畜3589只，蜜蜂2192箱。这些财产，有生产队的，也有社员的。

第三，“一大二公”的公社所有制，造成生产队（原高级社）之间的平均主义，穷社“共”了富社的“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原有的高级社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社员收入水平均有差别。这种收入之间的差别通常相差1倍左右，最高的达到2—3倍，低的也有40%—50%。公社化以后，小社并成大社，原来合作社所有的一切公有财产都交给公社，穷社和富社的收入就拉平了，必然降低富社社员的收入。这是富社最不满意的。这种否定生产队所有制的做法，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一段时间，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出现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开始时从中央到公社都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但收效甚微。

第四，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否定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当时，有条件实行工资制的公社并不多。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刘子厚在郑州会议前向毛泽东汇报，说河北省在1958年秋收后，人民公社分三类情况：一类是吃饭都没有保证，要求国家救济；二类是能管社员吃饭，但发不出工资；三类是除管吃饭外，能发一点工资，有一个月发几角钱的，有发一元钱的，有发两元或三四元的。一些地方能发工资的社，也是发一两个月就难以为继了。初期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形式是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供给制，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实物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在物资极端缺乏的革命战争年代确实起过伟大的作用，当时，生活平等，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大家不计较个人待遇，全心全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国内外的朋友们看了，都衷心地敬佩。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一直怀念着这个年代，甚至希望能回到这个年代去。因此，他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首创的吃饭不要钱很感兴趣，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供给制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欣赏供给制，还因为他在理论上陷入了误区，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也译为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理解不正确。他把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

等”看成是资本主义，认为只有实行供给制，才能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就是根据这个讲话撰写的）。

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在1958年秋收以后立即显示出来了。1958年1月1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广东省新会县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广大社员和部分基层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干劲不足，普遍出现了出勤率、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显著下降的现象。“大泽公社在发放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1）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2）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3）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4）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现象在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礼乐公社发放工资后10天左右，出勤率普遍降了五、六成。礼东管理区领工资的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礼乐公社去年担肥下田时是互相追赶，争先恐后，而现在则是互相让路、等待，再不争先恐后了。原来每天可送200担的，现在只送50—60担；过去能担100的，现在则担50斤；过去一人挑的，现在二人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记者分析，“主要是分配比例不合理。该县过去的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比例一般都是6:4和7:3。供给部分过多，因而减收和保收的社员积极性不高。一般社员也认为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都一样，因而抱着‘按酬付劳’的态度；而那些过去能做轻微劳动，现在因未能评上劳动等级而生活又有保障的老人和少年，大都不愿出勤了。”新会县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它表明，违背按劳分配原则，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第五，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各种托儿组织340多万个，幸福院15万所。在集体财产非常薄弱的条件下，办这些集体福利事业，只能靠平调农民的房屋、粮食、蔬菜、炊具、家具、用具等生活物资来完成。办公共食堂，说是可以节省粮食、烧柴和劳动力，实际上极大地浪费粮、油等物资和时间（吃饭排队）。尤其在一些吃饭不要钱、办大食堂、号召“敞开肚子吃”的公社，浪费更大。仅仅两三个月时间，就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供应紧张，农村到处吵着要粮，有的地方开始饿死人了。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为强迫命令、刮“共产风”提供了方便。

“共产风”一词，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概括出来的。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的。

“共产风”的风源，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9—10月间，许多地区公开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日程，或者宣告人民公社已经是全民所有制。例如，河北省徐水县提出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山东省寿张县计划两年后实现共产主义；山东省范县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河南省一些公社宣布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在许多地区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情况下，非刹车不可了。

1958年10月中旬以后，毛泽东视察天津、河北和河南，并派专人下去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原来对人民公社的一些设想是行不通的，受到农民的坚决抵抗。于是，下决

心调整政策。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党中央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6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许多意见。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泽东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在审议《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时，毛泽东批评这个文件也避开商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

1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带领与会同志阅读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边读边议。9日，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毛泽东在讲话和读书的谈话中，针对这些混乱思想，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必须分清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中，曾经设想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实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是按劳分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设想的时间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了的时候多。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不愿意划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第二，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保留按劳分配制度。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社会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如等级森严、上下之间和干群之间的猫鼠关系等要破除，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必须保护。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了理论准备。

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在研究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的同时，主要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并通过了《关于人

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决议》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成就，认为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在理论上划分了几个界限。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

二、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

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要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

四、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五、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向前发展，社会产品愈是丰富，分配给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也必然愈是丰富。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这是一种误解。应当向群众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在当时大家的头脑热得发昏的情况下，能鲜明地划清这几条界限是很不容易的，它对澄清干部当中的混乱思想，制止"共产风"，起了重要作用。

会上还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根据毛泽东在会前的酝酿和"压缩空气"的指示，《决议》中的钢产量从北戴河会议的指标2700万—3000万吨降为1800万—2000万吨。但粮食产量的指标没有下降，还增加了500亿—2500亿斤。《决议》说，1959年，"争取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但农村的“共产风”并没有被制止，加上当时对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缺乏认识，在整社过程中又不适当地开展反对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造成农民的严重不满，使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视察了河北、山东、河南、天津等地，经过调查研究，他认定，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结构，即从公社所有制退回到以生产队（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指出：

“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一的伺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队为基础，当时有两种主张，有的省主张以生产队（原高级社）为基础；有的省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础。毛泽东赞成前一种主张，他说：“‘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

郑州会议以后，各省、市、自治区迅速召开五级、六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落实会议精神。安徽省反映，县委书记80%以上感到毛泽东的指示及时英明，很多人说：糊涂一秋，苦恼三月，现在得到了解决。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作准备。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

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

4月2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凝聚了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克服“左”的做法的成果。主要内容有：

（一）各地人民公社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时候，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二）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县联社、公社向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调出的机器、农具和运输工具，都要清理出来，如数归还；公路、铁路、工厂、矿山和其他基本建设占用的土地，除了公社自己兴办的由公社合理调剂以外，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征用土地办法的规定办理，不能够无代价随意占用；公社把某些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粮食、猪、羊和其他农牧产品，调给别的生产队、生产大队，或者调到公社的，这些账都应当结算清楚，由公社或者调入者的单位归还实物或者作价归还现金，现在还不起或者一次还不清的，可以延期或者分期付还；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中饲养的原属社员私有的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除了能够退回的退回以外，其余的都要合理作价，由集中饲养的单位负责还清价款。在算账中间，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在财务上的问题，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性质，划清贪污和非贪污的界线，分别加以处理。

（三）人民公社化以来，银行从公社收回的贷款，有一部分是没有到期而收回了的，应当一律退回。原来高级社所欠的贷款和私人所欠的贷款，都应当是谁欠谁还，不能一律以公社为单位扣还，凡是从公社统一扣还了的，也应当一律退回。

此外，对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工资制和供给制、农村劳动力的安排等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邓子恢出席了八届七中全会。会后，4月中旬，在他主持的夏收分配会议上讨论了人民公社夏收分配政策。5月26日，主要根据他在会上讲话的内容，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指示》要求，夏收分配应当进一步体现基本队有制和部分社有制，妥善处理国家、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夏收分配应该实行少扣多分，分给社员的部分应当占收入分配的60%左右，并且使90%以上社员的所得高于1958年夏收分配所得，最低限度要不少于1957年夏收分配所得。在夏收分配当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所占的比例，要适当调整，必须力求做到工资部分占60%到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到40%左右。要通过夏收分配，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必须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这个文件是很及时的。

在全国夏收分配会议上，邓子恢发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很不好。一是1959年的夏季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1.1亿亩，即减少20%，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

缺乏底肥，农业生产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二是夏粮、油菜籽的征购刚开始，便出现进度很慢、远达不到要求的苗头。三是副食品供应紧张，市场上鱼、肉、蛋脱销。为挽救危局，他建议中央：(1) 发个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强调一下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5、6两个月必须以抓农业为中心；必须加强麦田后期管理，保证增产；并尽量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2) 宣布恢复人民公社化以来取消的自留地制度，发个关于给社员一定数量自留地以利发展养猪的指示。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5月7日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接着，邓子恢又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于6月11日发出。《指示》建议，各县用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群众公布四件事：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内，这些家畜家禽养大了，卖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不管社员喂猪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只要他愿意要，都应该给他。自留地数量仍按原来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的5%，也不少于5%为原则。应该肯定这种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林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由社员负责经营培护，其收益也完全归社员自由处理。《指示》特别申明，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经过这一系列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除政社合一、三级所有外，基本上恢复到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从天上落到了地下；算账退赔，对制止“共产风”起了不小的作用；陆续恢复了人民公社化以前的行之有效的一部分农村政策，使农村有了活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了。毛泽东对纠正“共产风”是坚决的，但是有限度的。他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的，并没有放弃从八大二次会议以来所形成的以最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从而争取早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战略构想。1959年3月9日，他在关于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问题的《党内通信》中说，开了会，“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这可以表达他当时的心境。

第四节　巨大挫折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在1958年底，特别是1959年春天，就显示出来了。1959年上半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

当时的困难，主要表现为粮、油、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普遍紧张。

1958年底，已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缺粮。1959年4月底5月初，湖北、河北、广东三省省委向中央报告：湖北省从春节到4月，闹粮之风，此伏彼起，越是“红旗”县越厉害。全省有170多万人口的重灾区，春荒相当严重。拥有200多万人口的武汉市曾一度出现粮食供应紧张。河北省有30多个县缺粮，严重的有10个县。广东省城镇只有几天库存，崖县、南雄、罗定、钦县有10930人患浮肿病，饿死134人。到4月底，全国油脂库存降到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6亿斤。到6月底，国库周转粮的库存不足340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26亿斤，比历史上最好的1956年6月底减少87亿斤，下降到5年来同期的最低点。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和工矿区供应的粮食，都是随到随销，许多地方挖了库存。5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食用植物油供应四处告急，国家无法面面兼顾，今后4个月基本停止农村供应。上海市的猪肉供应定量4月下旬由每人每月12两降为6两，5月份以后连6两也无法满足供应。浙江省1至5月份猪肉、家禽、鲜蛋的供应量，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60%—85%。

生活日用品的供应，也出现了全面紧张的状况。2月4日，轻工业部党组向中央报告：“纸张、缝纫机、保温瓶、食糖、乳制品、搪瓷面盆、搪瓷口杯、胶鞋，（去年）二季度末已开始感到供不应求，而现在更加紧张。原来认为不紧张的甚至还有富裕的产品，如肥皂、火柴、皮鞋也已出现了脱销，京、津、沪对肥皂采取了限购办法，河北某些地方对火柴也实行了限购。日用陶瓷也十分紧张，沈阳、唐山、广东都曾出现买不到饭碗的问题。”

工业生产的情况也不好，党的八届七中全会除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外，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基本上保持了八届六中全会拟定的计划指标：钢产量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煤确定为3.8亿吨。基本建设投资有所下降，由原来的360亿元减为260亿—280亿元，限额以上项目由原定1500个减为1000个。会上，毛泽东得知陈云在武昌会议上曾向胡乔木提出不要公布四大指标时（胡乔木未报告毛泽东），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他在讲话中曾说服那些坚持高指标的同志：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

1800万吨钢，仍然是难以完成的高指标。1959年以来，钢的日产水平一般在3万吨左右，赶不上计划要求的进度（日产4万吨左右）。为了把钢产量突击上去，4月2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7月15日以前，要集中力量打一个钢铁战役：到5月15日为止，日产量搞到4万吨；5月16日到6月15日，搞到4.5万吨；6月16日到7月15日搞到5万吨。按照书记处的部署，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中央工交各部门，组成了4个工作组，分别到东北、华东、华北、华中4个钢铁重点地区去协助地方进行检查督促。但是，这场战役失败了。7月份钢的日产量只有31300吨，仍处于过去几个月的水平。

面对这重重困难，陈云说话了。4月30日，他写信给中央财经小组，就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提出下述意见：

一、粮食要省吃俭用。“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我们如果有了十亿元的猪、鸡、鸭、蛋、鱼，有一部分做了菜，经过各种加工，合起来就可抵上十四五亿元的商品。现在，烟酒饭铺，差不多都是国营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可以成为国家一个很大的货币回笼力量。”“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必须从生产入手，定出有效办法。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而在目前，国营饲养场和人民公社集体饲养的经验还不很多，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

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特别是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由于改变为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不能单独生产和经营，大量的小商品停止生产了，现在应该组织它们重操本行。”

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对去年过多地招收了的一千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

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当工业和商业都需要运输的时候，各地马车、手推车、木帆船等运输工具，应该尽先安排商业的需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对 1960 年的计划方法，他提出，“拟定明年的工业生产指标，要根据今年年底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必成数。”“所谓根据现有企业综合设备能力拟定生产指标，这就是说，不仅要计算主要部分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整个企业和行业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比如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不仅要计算高炉、平炉、转炉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采矿、炼焦、耐火材料和轧钢的设备能力。不仅要计算本部门内部的设备能力，而且要计算有关配合部门的设备能力，如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设备能力。总之，要加以综合计算。”

信中所提出的缓和市场紧张的措施，是符合实际的，体现了陈云一贯主张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编制 1960 年的计划方法的建议，则是对 1958 年“大跃进”的主观主义做法的纠正。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 1959 年的钢铁指标也不放心，他委托陈云做进一步研究。陈云和中央财经小组听取了冶金部的 6 次汇报，经过认真的计算和分析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轧钢等方面的生产能力和运输条件后，于 5 月 11 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提出 1959 年钢的生产指标降至 1300 万吨，钢材降至 900 万吨。5 月 15 日，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 900 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 1300 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但就全局看来，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为了使计划不再变动太多，我认为以 900 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毛泽东同意陈云和中央财经小组的建议。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 1959 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并批准国家计委《关于 1959 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方案安排和组织下半年的生产建设。紧急指示，除了重申削减钢和钢材产量指标外，又决定原煤由3.8亿吨降到3.4亿吨，铜由11万吨降到9万吨，铝由8万吨降到7万吨，水泥由1300万吨降到1100万吨，木材由4600万立方米降到3800万立方米。国家计委向中央的报告，对物资分配计划提出了调整的主要原则：(1) 尽可能地安排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注意解决轻工业和市场的迫切需要；(2) 先照顾生产、维修的需要，后照顾基本建设的需要；(3) 在工、业生产中，先满足维修和配件、备品的需要，后考虑主机制造的需要；(4) 在基本建设中，既要照顾重点，也要兼顾一般的要求；(5) 保证出口和援外的需要；(6) 尽可能地留有余地，适当地充实库存。这些原则都是正确的。

1959年上半年，经过几度调整，工业生产的指标比较接近实际了。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以前，6月12日到13日，毛泽东曾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建议把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实事求是的。李富春、李先念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提出把1959年的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毛泽东在会上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我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

参加庐山会议的，有中央负责同志（常委中陈云、邓小平因病未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和工交、财贸各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体制、协作区关系、公社食堂、学会过日子、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团结、国际（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加的）等19个问题，让大家讨论。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说：

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

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不难看出，他认为：1958年有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搞综合平衡；现在形势在好转，明年五一节可以完全好转。因此，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总路线要坚持，15年内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在这个前提下，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左"的错误。

会议开始时，多数人认为，应当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继续纠"左"，对刮"共产风"、浮夸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讲多快不顾好省等缺点错误，应切实纠正。也有人提出不该办人民公社，应当改变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等做法。有一部分人旗帜鲜明地维护总路线，说"大跃进"没有破坏按比例发展规律，不是"得不偿失"。他们认为，"左"的错误纠正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出现了右的错误。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谈话，对下一段会议和起草会议纪要作了安排。他在讲话时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说，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毛泽东的讲话，明显地支持了后一部分人的观点，并认为前一部分人的观点右了。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彭德怀非常忧虑。他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观点出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认为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指出，1958年基本建设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1959年继续"大跃进"，以致发生了失调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农村公社化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经过武昌、郑州、上海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在全民炼钢铁中有失有得。信中说，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同

时，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跃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有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信中建议，系统地总结一下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1960年回忆时说："庐山会议根本没有重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以来在经济建设上许多无根据的计划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因为1958年秋以来，农村遭到不必要的破坏，又加上天灾，所以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轻重工业之间，工农业之间，工矿企业本身之间都存在着比例失调。""如果在1959年即进行调整，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当然主要调整的还是工农业的比重，以及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因为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这也就是我7月14日给主席写信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是不满意的。7月16日，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给与会同志。当时，很多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看法，只觉得有些提法不够恰当。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则明确表示肯定和支持这封信。一些坚持"左"的错误的人则不同意彭德怀的信和发言。认为对成绩肯定的不够，对问题讲的太多，太严重，不是鼓劲而是泄气，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有人说，信中有很多刺，是影射毛泽东的，危及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这些同志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讲话中还严厉地批评了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观点，并且说了这样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到现在我也不放弃。毛泽东讲话以后，小组会

"一边倒"，变成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会。

7月26日，毛泽东写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此信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写给毛泽东的)。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评论》为彭德怀等人定了性，会上批判右倾的温度越升越高。许多与会者抓住他们信和发言中的个别措词无限上纲，说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是"反党纲领"，"配合帝国主义反动派向党进攻"，"要逼毛主席下台"。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了反党集团。算历史旧账，说彭德怀等人在历史上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怀疑他们有国际背景（理由是彭德怀、张闻天在会前出访过苏联和东欧几国)。林彪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出于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顾全大局，彭、黄、张、周等都违心地在会上作了检查。

8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开始，毛泽东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他说六中全会决定的1959年的指标是高指标，还是经过人大常委会改了好。第二是路线问题，他说，我们反了几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全会开了半个月，根据毛泽东定的基调，对彭、黄、张、周等进行了是非颠倒的批判和斗争。8月16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书记处书记和总参谋长、张闻天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接着，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这次运动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65万人。

"'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个论断，把庐山会议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申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与此相联系，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无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的后果是，加剧了"左"的错误，一场新的大跃进又开始了。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决议》要求，在1959年一年的时间里，就要在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方面，完成和接近完成原定1962年实现

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同时提出，在从1958年算起的10年内，就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并且要大大提前完成1956年到1967年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会后号召全党和全国，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新的大跃进，是和反右倾结合进行的，比1958年压力更大。有些刚刚开始弄清的是非又颠倒过来了。比如，“大跃进”的一个主要错误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红旗》杂志却发表题为《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的社论，说“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土法炼钢、炼铁本来是“得不偿失”，《人民日报》却发表了题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的社论，说完全不是“得不偿失”，而是所得极大。1959年的工业生产，在6、7月间有所下降，是因为根据八届七中全会的决定压低了钢铁等生产指标。在全国工业生产会议上却说，这个“小小马鞍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吹冷风，使人们泄了气、松了劲。在这种气氛下，高指标、浮夸风重新大肆泛滥。

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8月26日，周恩来向人大常委报告：工业方面，钢产量由1800万吨（包括土钢）调整为1200万吨（不包括土钢）；原煤产量由3.8亿吨调整为3.35亿吨；其它工业品的产量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工业总产值由1650亿元调整为1470亿元；农业方面，粮食产量由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棉花产量由1亿担调整为4620万担，其它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农业总产值由1220亿元调整为738亿元；基本建设方面，投资总额由270亿元调整为24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由1092个调整为788个。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很高的，同后来核定的上年实际产量相比，钢产量增长50%，原煤增长24.1%，粮食增长37.5%，棉花增长17.4%。但这些计划指标刚经过调整，从中央到地方就开始加码了。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农业部党组的报告中提出，要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0%左右的计划之外，再增加33.5亿元以上的产值，使1959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5%，“使农业在特大的旱涝虫害的侵袭之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10月16日至28日，全国工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当前工交战线的任务，就是要把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按照这个精神，会议要求，在第四季度里，要使工业总产值完成486亿元，保证全年完成1600亿元，比上年增长37%；钢完成47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50万吨；生铁完成73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200万吨；煤炭完成9700多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1500万吨。

10月23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向中央提出，今后几个月内，要重新开工230个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使基建项目又恢复到1000多项。11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家建委的报告，确定追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13.6亿元。加上原定计划248亿元、上年结转投资20亿元、各部门与地方自筹资金30亿元，总额达311.6亿元，比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数字增加63.6亿元。

经过反右倾，鼓干劲，重工业是增长了，比上年猛增48.1%。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4%；原煤产量达到3.69亿吨，增长36.6%；发电量、生

铁、机床和硫酸等重要工业产品都比上年增长40%以上。农业生产却大幅度下降。1959年，农业总产值完成475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3.6%，其中粮食总产量为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下降15%；棉花产量3418万担，比上年减产520万担，下降13.2%；生猪、黄红麻、烤烟、油料、糖料等农产品分别比上年减产13%—22%。粮食减产了，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173亿斤，增加14.7%。这一年，农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消费量由上年的402斤下降到366斤，农民吃不饱的现象多处发生。城市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的供应也相当紧张。由于基本建设大上和职工人数大增，1959年财政赤字高达65.8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3.5%。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失调比1958年更加严重。

但是，党中央对1959年的经济形势却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宣布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在1959年提前3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号召，已经胜利地实现。说"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60年代的连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1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1月7月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认为，1960年应继续"跃进"。会议确定的1960年的主要指标是：钢1840万吨，煤4.25亿吨，粮食6000亿斤，棉花5500万担。会议还提出8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把城市人民公社也试办和推广起来。

3月3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开幕。会议通过了1960年的生产指标：工业总产值增长41.6%（按核实后的1959年数字计算）；农业总产值增长77%；钢增长38%；原煤增长22%；粮食增长74.4%；棉花增长55%；生猪增长两倍多。这样的高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却尤嫌不够，大会刚结束，中共中央就批准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钢产量指标三本账的计划以及煤炭部、铁道部和冶金部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联合报告。冶金部提出的第二本账钢产量是2040万吨，第三本账是2200万吨。为了配合完成钢产量的第三本账，煤炭部提出，全年煤炭产量争取达到4.62亿—4.7亿吨，铁道部提出，铁路货运量争取达到7.8亿—8亿吨。5月10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家建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第二本账的安排》的报告，其中的主要指标是：钢2040万吨，煤4.62亿吨，铁路货运量7.6亿吨。根据这个安排，1960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提高到47.6%；基本建设投资增至382亿元；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增加83个，总数达980多个。5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把第二本账作为党内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第一本账，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立即抓紧时间，组织执行，并以此为准来安排和检查工作。"

面对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只好采取1958年用过的老办法。一是全力保钢。196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大抓煤、铁、矿、运，全力发展钢的生产，力争上半年达到950万—1000万吨的产量，以确保全年2040万吨任务的完成。8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要求采取削基建，保生产，削一般，保重点的方针，尽最大的努力完成钢、铁、煤、运等生产任务。为了扭转第二季度工业生产下降、钢等主要工业

产品的生产普遍完不成任务的情况，8月14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但这一切措施都收效甚微，最后只好把全年钢产量降到第一本账的水平。二是大搞“小洋群”、“小土群”。4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4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的文件。会议认为，钢产量要增加，就必须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上半年的钢产量要力争达到950万—1000万吨。要贯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由小到大的原则，大办“小土群”、“小洋群”。在当前，必须以煤、铁为中心，以交通为先行，使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五小成群”。

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继续“大跃进”的同时，城乡重新刮起了“共产风”。这主要表现为：

一、在农村人民公社，加快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过渡，大搞“一平二调”。1959年12月，举行浙、皖、苏、沪4省市座谈会，根据谭震林的意见，讨论了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问题。会议认为，上海条件较好，大约要3年到5年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5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过渡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就实现社基本所有制的条件来说，第一，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人年平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第二，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了优势；第三，穷队赶上了富队；第四，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根据这种安排，各省开始试点。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名种大办一齐上，都要向生产队平调；为了扶持穷队赶富队，不但在农业贷款、抽取公积金等方面照顾穷队，而且无偿调拨富队的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根据对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的调查，公社的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一个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全公社算了一笔账，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包括分配未兑现的）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0件，耕牛84头，木料等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6件。简直是无所不刮。

二、大办公共食堂。庐山会议以后，在“反右倾”过程中，批判解散食堂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各地又开始恢复和发展食堂。1960年3月6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认为，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并提出了把社员自留地转交给食堂的问题。毛泽东批示：这篇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当时，据14个省市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已达农村总户数的88.9%，人数占总人数的88.6%，河南省达99%。

三、广泛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肯定了城市人民公社将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但认为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突然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放手发动群众试验组织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全国城市要在上半年普遍试点，下半年全面推广。中央指示下达以后，各个城市纷纷办起人民公社。据

全国总工会统计，到7月底止，全国190个大中城市里，已经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人口5500多万人。城市和农村不同，有企业，有机关，有学校，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把这些单位组织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它比农村人民公社更富于空想，因此，多数只是挂了一块牌子。当时，办了许多街道工业和各种集体生活组织，包括公共食堂、托儿组织。办法是，把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小商小贩转人城市人民公社；平调个人和国有企业的住宅、财产，在城市，刮了一场“共产风”。

1960年上半年开始的新的“大跃进”和“共产风”的错误，比1958年春夏之间的错误更为严重，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更大。

1960年年初，党中央对经济形势颇为乐观，认为1960年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但从第一季度开始，国民经济就开始滑坡了。

——钢的日产量下降。1959年第四季度为5.38万吨，1960年第一季度为4.98万吨，4月上旬为4.84万吨，此后，继续下降。到了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种。

——粮食形势严峻。1960年的夏粮比上一年大幅度减产，夏收之后收购不快，1—7月累计征购了244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26%。粮食库存减少，调拨不灵，5月以后，各应调出粮食的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而粮食的销售量却大为增加。据统计，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人库仅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加上6月底以前库存减少数，使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100亿斤。5月份开始，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的大工业城市调人的粮食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北京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辽宁10个主要工业城市只够销八九天，上海大米已经没有库存，天天告急。根据上述情况，中央决定，立即压低城乡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农村缺粮更为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过大，1960年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37.1%，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

——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许多人患了浮肿病、肝炎和妇女病，人口非正常死亡率增高。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

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已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文章回顾了建国以来、主要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建设工作，指出“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并认为这次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

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这表明，毛泽东的头脑开始清醒了。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单方面地决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和我国签订的343个建设合同和合同议定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了所有物资设备的供应。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我们要走自力更生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给我们的援助不要忘记。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同时，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要讲3年5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后面这一段话，显然是针对1960年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说的。

会议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

8月30日到9月5日，周恩来分四次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当时，李富春等对计划安排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意见，即应以“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安排经济工作，以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把“整顿”二字改为“调整”，并加上“充实”二字，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强调，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1961年，农业增长速度安排10%左右；工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字增长23%左右；国家预算内投资安排275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字减少20.3%。指标虽然降低了，但仍然过高。

把农业放在首位，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调整农村政策，刹住“共产风”。为了全面纠正“共产风”，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于11月3日发向全党全国。《指示信》规定和重申：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无偿调用的劳动力，必须彻底清理，给以补偿。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管理区或者生产大队）是基

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做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的过死，不要乱加干涉。绝不能削弱队有经济来发展社有经济。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一般应该占总收入的65%左右，扣留部分占35%左右。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达到农村人口的40%左右，其中整劳动力占三分之二。

（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只许卖给国家收购机关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必须坚决保证社员每天睡足8小时。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毛泽东对《指示信》是同意的。11月5日，他在代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指示信》受到地方党委的拥护，有些省委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庐山会议以后吹起的新的“共产风”在某些方面被遏止了。

在此期间，中央和毛泽东对农村问题的解决比较坚决，但对钢铁生产仍然坚持高指标。尤其在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毛泽东认为，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坚持10年要搞到1亿吨。下面的干部也很气愤，大家咬着牙也要炼“争气钢”。12月3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大事情，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经过突击，1960年钢产量终于达到了1866万吨。但是，它加重了1958年以来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财政经济状况困难的局面。

一、农业继续大幅减产，粮食供应严重不足。1960年，农业总产值完成415亿元，比上年下降12.6%；粮食产量为2870亿斤，比上年下降15.6%；棉花产量为2126万担，比上年下降37.8%（粮棉总产量都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3405万担，比上年下降50.9%，其他很多农产品也大幅度下降。1960年收购原粮1024亿斤，但供求矛盾仍很尖锐，当年粮食销售大于购进124亿斤，国家粮食库存比1957年减少236亿斤，有些城市和地区出现粮食脱销。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农村留粮减少。

二、重工业继续“跃进”，轻工业出现倒退。1960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9%。轻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下降9.8%，棉纱、棉布、食糖、卷烟等不少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都比上年大幅度下降。

三、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196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88.7亿元，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31%，是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

四、国家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1960年，国家财政赤字达81.8亿元。年末，货币流通量达95.9亿元，比上年增加27.7%，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比上年增加9.2%。按计划价格销售的商品供不应求，扩大了凭票凭证供应的范围，9月份已达30多种。集市贸易的商品价格猛涨。

五、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更加困难。1960年，零售商品货源比上年减少8.5%，与社会购买力之间出现74.8亿元的差额。商品供应特别是农副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全国每人平均全年的粮食消费量比上年减少了46斤，降为327斤；食油消费量比上年减少了0.8斤，降为3.7斤；猪肉消费量比上年减少了2.9斤，降为3.1斤；棉布由24尺下降到不足21尺。

实践表明，继续“大跃进”已经精疲力竭，非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不可了。

不容否认，在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期间，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也取得了许多成就。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来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2/3以上。由于1961年到1964年，基本上没有开工新建大中型项目，这些项目绝大部分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1950年到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这三年增加的比重为：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盲目冒进，结果欲速不达，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挫折，出现了全面比例失调。

第一，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比例失调。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占24.2%，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比较合适。1958年到1960年，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积累率陡然上升。下表是1957年至1960年积累率的变化情况：

年份	国民收入使用额（亿元）	积累额（亿元）	积累率（%）
1957年	935	233	24.9
1958年	1117	379	33.9
1959年	1274	558	43.8
1960年	1264	501	3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资料表明，1958年到1960年期间的积累率，最低是33.9%，最高达43.8%，平均39.1%。三年的积累额共计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额多44%。积累率过高，导致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实际可能。

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带来的是，建设项目投产率大幅度下降，投资效

果越来越差（从1958年到1960年，每100元积累新创造的国民收入分别为55元、19元、-0.4元）；消费基金减少，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收入下降。

第二，工业和农业比例失调。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之比是4:1，工业增长稍快，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已经有些不协调。1958年到1960年期间，“以钢为纲”，大力发展工业，挤了农业，两者就更加不协调了。下表是1957年到1960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情况：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上年为100）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1957	107.9	103.6	111.5	43.3	56.7
1958	132.2	102.4	154.8	34.3	65.7
1959	119.5	86.4	136.1	25.1	74.9
1960	105.4	87.4	111.2	21.8	78.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0页。

1958年至1960年，工业总产值迅猛增长，三年增长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2.7%，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则由5.7:4.3变为7.8:2.2，严重的失调了。

当时，最突出的是，粮食产量从1957年的3900.9亿斤降至1960年的2870亿斤，减少了26.4%。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影响到农业生产全面下降。1957年到1960年，棉花下降35.2%，油料作物下降54.8%，猪的存栏数下降43.6%。

第三，工业部门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失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在三年“大跃进”期间，两者的比例严重失调了。下表是1957年到1960年轻重工业比例的变化情况：

年份	工业总产值指数（以上年为100）		占工业总产值%	
	轻工业总产值	重工业总产值	轻工业总产值	重工业总产值
1957	105.7	118.4	55.0	45.0
1958	133.7	178.8	46.5	53.5
1959	122.0	148.1	41.5	58.5
1960	90.2	125.9	33.4	66.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0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8年和1959年，轻工业产值增长也比较快，但从1960年开始就下降了。下降的原因，一是为保钢，挤了轻工业的原料和运输，一是农业全面减产，棉花、烟叶等轻工原料供应不上。结果，1960年轻重工业的比例从1957年的55:45变为

33.4:66.6。轻工业比重下降，造成市场供应的严重困难。

除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以外，重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采掘工业远远落后于冶炼、加工工业的需要。交通运输业落后于工业，货运量增长不能满足煤、铁增长的需要。1960年，大约有30%的铁矿石和2000万吨的煤炭积压在矿区运不出来。

第四，财政收支、信贷收支不平衡。“一五”期间，我国的财政收支，除1956年，都是平衡的。在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期间，财政收支都是不平衡的。下表是1957年到1960年我国的财政收支状况：

单位：亿元

年份	总收入	总支出	收支差额
1957	310.2	304.2	+6.0
1958	387.6	409.4	-21.8
1959	487.1	552.9	-65.8
1960	572.3	654.1	-81.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

统计资料表明，1958年到1960年期间，财政收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增加的幅度不小，但支出比收入增长的更快，三年累计赤字169.4亿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迫使银行大量发行通货。1957年年末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则高达125亿元。通货膨胀带来物价上涨。许多商品国营商店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价格高于国营牌价几倍甚至十几倍。

1958年到1960年，是建国以来，人民生活最困难的三年。市场上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奇缺；口粮标准过低，多数人吃不饱饭；加上长期的紧张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专家们计算，人数共达1700万人。

这是一场预想不到的大灾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主持下由党中央轻率地发动的。

“大跃进”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就必须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怎样走法呢？主要是大搞群众运动。既然革命战争、土地改革、三大改造，都是靠群众运动取得成功的，建设依靠群众运动也一定能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而这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在‘大跃进’发起的年代，人们确实是以前所未有的‘冲动’，以一种近乎圣洁的真诚，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业化试验。困难是有的，但人们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它们完全可以被克服。例如，基础薄弱，可用亿万人的劳动热情去弥补；缺少尖端技术，可以‘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代替之。甚至对于‘超高’的速度，人们也认为，只要打破框框，敢想敢做，是不难达到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基础上：我们找到了一条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找到了一整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方针。即使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否定这种动机的历史真实性。”

人民公社化运动则主要是“大跃进”的产物。

从主观原因来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结果，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在体制上，是同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盛行分不开的。不批判反冒进，可能不会出现“大跃进”（实为大冒进），没有庐山会议，“大跃进”也不会持续三年之久。

第四篇

1950—1969年中国实施的重大项目

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开创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清政府的一批洋务派官僚开始办一些新式工业。据近代经济研究中对1872－1911年中国工业的统计，历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可见中国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在1895年以后起步的，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百余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中，中国本土战乱不断、战火不息，工业建设举步维艰。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零星的工业企业、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其标志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它是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与里程碑。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十九年。其中建设的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五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十二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二十三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五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十二年、英国二十三年、法国二十六年所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近千个工业建设项目，也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旧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有限的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弱，近百年来始终没有工业基点。微弱的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

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局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部分造船厂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69 514万元，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646265万元，占32.9%；西部地区392098万元，占20%。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户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等。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他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形成第一次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并且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也为中国工程设计、技术、施工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20世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逐渐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这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截止1960年底，“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156项”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第一章 行业分布

“156项”工程实际施工的150项分布在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轻工、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等14个行业，这些行业有属于国民经济基础的能源原材料产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行业；有代表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机械制造产业，如机械、船舶行业；有代表当时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科技产业，如航空、航天和电子行业；有加强国防实力的兵器行业；还有与人民生活联系密切的医药和轻工行业。实施的150项工程项目包括44个军事工业企业和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军事工业包括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民用工业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由援建项目的构成可以看出，除了3个轻工业和医药项目之外，几乎全部是重工业。

在150个建设项目中，“一五”期间施工的有146项，除“一五”期间全部建成投产的49个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期限、完成投资和新增生产能力比较准确外，1958年以后建成投产的项目，就有很多项目和国内安排的建设内容、投资交织在一起了。例如，鞍山钢铁公司原协定的建设规模为年产生铁250万吨，钢320万吨，钢材250万吨，建设期限为1952~1962年，总投资为22.8亿元。1958年“大跃进”时期，把鞍钢规模扩大为“双五百”(500万吨铁，500万吨钢）投资增加8亿元，建成时间为1964年；以后又继续搞“双六百”、“双七百”、“双八百”。截至1982年底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1.4亿元，形成生产能力为“双七百”。现在还在按“双八百”的能力，用技措费进行技术改造。又如包头钢铁公司，原协定的建设规模为年产铁160万吨、钢150万吨，建设期限为1957~1962年，全部投资10亿元，“大跃进”之后，又扩大建设规模为年产铁313万吨，钢316.5万吨、钢材270万吨，投资增加5.6亿元。截止1981年底共花25.8亿元投资，只形成年产铁270万吨、钢250万吨、钢材150万吨的生产能力。再如抚顺铝厂原协定一、二期工程年产铝锭3.9万吨，建设期限为1952~1957年，全部投资为1.96亿元，这一目标还没有完成，接着又搞三、四期（国内部分），规模扩大到10万吨，于1965年全部建成，以后又进行填平补齐。其他行业如军工、电力、机械等，也有类似问题。故我们所考察的计划安排投资与实际完成投资，均以两国签订的协定和苏联设计的内容为准，实际完成投资不包括以后所增加的建设内容和扩大的建设规模的投资。

根据1983年国家计委《“一五”156项建设情况》以及《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提供的资料反复核对，实际实施的150项建设项目的设计总投资为202217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为1961335万元，为设计总投资的96.8%。计划安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在民用、军工行业之间的分布以及它们内部的分布情况可从下表反映出来。

表1　　实际实施的150项总投资额在民用、军工工业的总体分布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民用项目	1612530	79.7	1586050	80.9	798689	74.4
军用项目	409648	20.3	375285	19.1	274939	25.6
合计	2022178	100	1961335	100	1073628	100

表2　　106项民用项目投资额在各行业的总体分布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钢铁工业	548530	34.0	566344	35.7	264377	33.1
机械工业	259357	16.1	283588	17.9	165702	20.7
电力工业	316804	19.6	224496	14.2	112833	14.1
有色工业	195238	12.1	200869	12.7	92294	11.6
煤炭工业	133079	8.3	145804	9.2	81101	10.2
化工工业	107043	6.6	108323	6.8	49299	6.2
石油工业	33223	2.1	36885	2.3	16335	2.0
轻工工业	9719	0.6	10199	0.6	9613	1.2
制药工业	9537	0.6	9542	0.6	7135	0.9
合计	1612530	100	1586050	100	798689	100

表3 44项军用项目投资额在各行业的总体分布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兵器工业	216531	52.9	196195	52.3	144073	52.4
航空工业	88267	21.5	91915	24.5	85288	31.0
电子工业	56612	13.8	47523	12.7	34337	12.5
船舶工业	34700	8.5	30711	8.2	2300	0.8
航天工业	13538	3.3	8941	2.4	8941	3.3
合计	409648	100.0	375285	100.0	274939	100.0

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形成了以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大型钢铁综合企业为核心的多项重要工程，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大型工业企业及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交通工程。围绕这些重点企业，兴建了一系列配套工程，形成规模巨大的工业基地，如鞍山钢都、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城等等。这些项目的绝大部分是中国新兴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中，国防工业占有一定的比重。因此，"156项"工程的建设，极大地填补中国工业的空白，改善了工业的部门结构，提高了工业建设的自力更生能力，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下面对每个行业的建设情况作具体阐述。

第一节 煤炭工业

在1950～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对煤炭工业的要求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提供必需的煤炭燃料。规定：到1957年，原煤产量达到11298万吨，并保证钢铁工业对炼焦洗精煤的需要。同时，为了逐步解决全国工业偏集于北方和沿海，在生产力布局和国防上的不合理状态，煤炭工业建设的部署要力求使生产接近消费地区，减少远距离运输，并按照钢铁工业、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主要用煤部门的需要，对煤炭的地区产需平衡和品种平衡，做出比较合

理的安排。根据这个要求，煤炭工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原有矿区，对矿井进行适当的改建或扩建，发挥其潜力，扩大生产能力，并且在这些矿区适当建设一批新矿井；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开始建设新的煤炭基地，以增大煤炭生产的后备力量，逐步改善煤炭工业的布局，适应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根据这个战略部署，煤炭工业在“一五”期间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阜新、鹤岗、阳泉、淮南、峰峰、萍乡、焦作、枣庄、新汶、鸡西、通化、辽源、贾汪等15个老矿区。同时，开始了平顶山、包头、潞安、鹤壁、中梁山、兴隆、轩岗、汾西、山丹、石嘴山等10个新矿区的建设。在这些新老矿区中，开工建设了一大批新矿井。其中，总建设能力在100万吨以上的16个矿区，都是储量丰富、煤质优良，是这一时期建设的全国重点煤炭基地。平顶山、潞安、包头、鹤壁、汾西、轩岗等6个新矿区，主要是为保证武汉、包头、太原等钢铁基地炼焦用煤而建设的；淮南、新汶、贾汪、枣庄等矿区主要是为解决缺煤的华东地区的用煤而建设的。此外，在东北的本溪、鹤岗、北票、阜新，西南的荣昌、广元，西北的铜川，中南的萍乡等矿区，为了解决地区用煤平衡，也建设了一些新矿井。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煤炭工业有25项，占项目总数的1/6。煤炭工业实际实施的25项是：大同鹅毛口立井、双鸭山洗煤厂、平顶山二号立井、辽源中央立井、抚顺西露天矿、抚顺东露天矿、抚顺胜利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龙凤矿、城子河九号立井、城子河洗煤厂、阜新海州露天矿、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新邱一号立井、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峰峰中央洗煤厂、通化湾沟立井、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铜川王石凹立井、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兴安台二号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兴安台洗煤厂、山西潞安洗煤厂。除辽源中央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阜新平安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等5项为续建项目，抚顺西露天矿、抚顺胜利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龙凤矿等4项为改建项目外，其余16项都属于新建项目。

从1950～1957年的七年间，煤炭工业的25项陆续开始施工。1950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3项：辽源中央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鹤岗东山一号立井；1952年开工的项目有2项：阜新平安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1953年开工的项目有4项：抚顺西露天矿、抚顺胜利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龙凤矿；1954年开工的项目有2项：阜新新邱一号立井、双鸭山洗煤厂；1955年开工的项目有3项：城子河九号立井、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通化湾沟立井；1956年开工的项目有3项：山西潞安洗煤厂、兴安台二号立井、抚顺东露天矿；1957年开工的项目有8项：城子河洗煤厂、兴安台洗煤厂、大同鹅毛口立井、平顶山二号立井、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峰峰中央洗煤厂、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铜川王石凹立井。

历经六年时间，煤炭工业的25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5年竣工的项目有辽源中央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2项；1956年竣工的项目有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1957年竣工的项目有阜新海州露天矿、阜新平安立井、抚顺胜利矿、抚顺老虎台矿4项；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抚顺龙凤矿、阜新新邱一号立井、双鸭山洗煤厂、通化湾沟立

井、山西潞安洗煤厂5项；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抚顺西露天矿、城子河九号立井、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城子河洗煤厂、兴安台洗煤厂、峰峰中央洗煤厂、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7项；1960年竣工的项目有平顶山二号立井1项；1961年竣工的项目有兴安台二号立井、抚顺东露天矿、大同鹅毛口立井、峰峰通顺三号立井、铜川王石凹立井5项。

煤炭工业的25项中，建设周期最长的是七年，最短的是两年，平均建设周期四年。具体情况是：阜新海州露天矿建设周期为七年；抚顺西露天矿建设周期为六年；鹤岗东山一号立井、辽源中央立井、阜新平安立井、兴安台二号立井、抚顺龙凤矿和抚顺东露天矿建设周期为五年；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阜新新邱一号立井、城子河九号立井、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大同鹅毛口立井、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双鸭山洗煤厂、铜川王石凹立井和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建设周期为四年；通化湾沟立井和平顶山二号立井建设周期为三年；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山西潞安洗煤厂、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和峰峰中央洗煤厂建设周期为两年。

煤炭工业的25项计划安排投资133079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4580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109.6%；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81101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55.6%。详见表4。

表4　　煤炭工业25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构成情况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阜新海州露天矿	15285	11.5	19472	13.4	19472	24.0
抚顺西露天矿	16800	12.6	19091	13.1	6526	8.0
抚顺东露天矿	15000	11.3	12807	8.8	5032	6.2
铜川王石凹立井	5640	4.2	8372	5.7	50	0.1
阜新平安立井	6700	5.0	8334	5.7	8334	10.3
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	6710	5.0	7178	4.9	7178	8.9
兴安台二号立井	5640	4.2	7178	4.9	818	1.0
峰峰通顺三号立井	5640	4.2	6640	4.6	76	0.1
鹤岗东山一号立井	5400	4.1	6512	4.5	6512	8.0
大同鹅毛口立井	5600	4.2	5840	4.0	168	0.2
辽源中央立井	6000	4.5	5770	4.0	5770	7.1
抚顺胜利矿	4200	3.2	4200	2.9	4200	5.2
阜新新邱一号立井	3380	2.5	4056	2.8	2400	3.0

项目 \ 构成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抚顺老虎台矿	3790	2.8	3862	2.6	3862	4.8
山西潞安洗煤厂	3200	2.4	3254	2.2	370	0.5
城子河九号立井	3000	2.3	3184	2.2	2847	3.5
平顶山二号立井	3100	2.3	3156	2.2	720	0.9
双鸭山洗煤厂	1900	1.4	3113	2.1	2110	2.6
抚顺龙凤矿	2800	2.1	2860	2.0	2537	3.1
通化湾沟立井	3000	2.3	2587	1.8	286	0.4
峰峰中央洗煤厂	3100	2.3	2486	1.7	188	0.2
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	3187	2.4	1682	1.2	923	1.1
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	1500	1.1	1486	1.0	472	0.6
城子河洗煤厂	1500	1.1	1480	1.0	150	0.2
兴安台洗煤厂	1007	0.8	1204	0.8	100	0.1
合计	133079	100.0	145804	100.0	81101	100.0

煤炭工业的25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18项，“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有7项为100%，它们是：阜新海州露天矿、阜新平安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辽源中央立井，表明它们都是“一五”时期全部建成的。其余依次为：城子河九号立井89.4%、抚顺龙凤矿88.7%、双鸭山洗煤厂67.8%、阜新新邱一号立井59.2%、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54.9%、抚顺东露天矿39.3%、抚顺西露天矿34.2%、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31.8%、平顶山二号立井22.8%、兴安台二号立井11.4%、山西潞安洗煤厂11.4%、通化湾沟立井11.1%、城子河洗煤厂10.1%、兴安台洗煤厂8.3%、峰峰中央洗煤厂7.6%、大同鹅毛口立井2.9%、峰峰通顺三号立井1.1%、铜川王石凹立井0.6%。详见表5。

表 5 煤炭工业25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
双鸭山洗煤厂	1900	3113	163.8	2110	67.8
铜川王石凹立井	5640	8372	148.4	50	0.6
阜新海州露天矿	15285	19472	127.4	19472	100.0
兴安台二号立井	5640	7178	127.3	818	11.4
阜新平安立井	6700	8334	124.4	8334	100.0
鹤岗东山一号立井	5400	6512	120.6	6512	100.0
阜新新邱一号立井	3380	4056	120.0	2400	59.2
兴安台洗煤厂	1007	1204	119.6	100	8.3
峰峰通顺三号立井	5640	6640	117.7	76	1.1
抚顺西露天矿	16800	19091	113.6	6526	34.2
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	6710	7178	107.0	7178	100.0
城子河九号立井	3000	3184	106.1	2847	89.4
大同鹅毛口立井	5600	5840	104.3	168	2.9
抚顺龙凤矿	2800	2860	102.1	2537	88.7
抚顺老虎台矿	3790	3862	101.9	3862	100.0
平顶山二号立井	3100	3156	101.8	720	22.8
山西潞安洗煤厂	3200	3254	101.7	370	11.4
抚顺胜利矿	4200	4200	100.0	4200	100.0
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	1500	1486	99.1	472	31.8
城子河洗煤厂	1500	1480	98.7	150	10.1
辽源中央立井	6000	5770	96.2	5770	100.0
通化湾沟立井	3000	2587	86.2	286	11.1
抚顺东露天矿	15000	12807	85.4	5032	39.3
峰峰中央洗煤厂	3100	2486	80.2	188	7.6
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	3187	1682	52.8	923	54.9
总体情况	133079	145804	109.6	81101	55.6

煤炭工业的25项建设总规模是：洗煤1210万吨，采煤1935万吨，油母页岩70万立方米。洗煤1210万吨的具体分布情况、实际完成的生产能力和"一五"时期新增生产能力，详见表6。

表6　　　　　　　　煤炭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情况

项目＼新增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山西潞安洗煤厂	洗煤200万吨	同规模	
峰峰中央洗煤厂	洗煤200万吨	同规模	
双鸭山洗煤厂	洗煤150万吨	同规模	
城子河洗煤厂	洗煤150万吨	同规模	
兴安台洗煤厂	洗煤150万吨	同规模	
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	洗煤100万吨	同规模	
抚顺胜利矿	洗煤90万吨	同规模	90
抚顺龙凤矿	洗煤90万吨	同规模	50
抚顺老虎台矿	洗煤80万吨	同规模	80
阜新海州露天矿	采煤300万吨	同规模	300
抚顺西露天矿	采煤300万吨	同规模	
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	采煤150万吨	同规模	150
阜新平安立井	采煤150万吨	同规模	150
兴安台二号立井	采煤150万吨	同规模	
大同鹅毛口立井	采煤120万吨	同规模	
峰峰通顺三号立井	采煤120万吨	同规模	
铜川王石凹立井	采煤120万吨	同规模	
辽源中央立井	采煤90万吨	同规模	90
鹤岗东山一号立井	采煤90万吨	同规模	90
平顶山二号立井	采煤90万吨	同规模	
城子河九号立井	采煤75万吨	同规模	
阜新新邱一号立井	采煤60万吨	同规模	
通化湾沟立井	采煤60万吨	同规模	
佳作中马村二号立井	采煤60万吨		
抚顺东露天矿	油母页岩70万立方米	同规模	
总体情况	洗煤1210万吨，采煤1935万吨	洗煤同建设规模，采煤1875万吨	洗煤220万吨，采煤780万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煤炭工业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35.55亿元。开工建设的新矿

井共194处，设计生产能力7537万吨；建成投产矿井205处，设计生产能力6376万吨；恢复矿井38处，设计生产能力1134万吨；改建扩建矿井103处，净增生产能力2536万吨。同时，为了保证钢铁工业对于炼焦洗精煤的需求，又新建和恢复洗煤厂24处，年处理原煤能力2275万吨。

煤炭工业"一五"期间基本建设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在上述建设项目中，属于苏联援建的"156项"之内的有25项，属于国家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的有150项。1954～1957年间，平均不到十天就有一处新矿井破土开工。五年中建成投产的新井设计能力，超过了旧中国从1878～1942年的六十四年中形成的矿井总生产能力。

"一五"期间，煤矿建设的速度也很快。据统计，从开工到投产的建设周期，大型矿井是四年零八个多月，中型矿井是三年零三个多月，小型矿井是两年零七个多月。年产300万吨的阜新海州露天矿，只用四十二个月就建成投产；年产90万吨的淮南谢家集二矿、三矿，工期也分别只有二十八个月和二十四个月。而且，这些煤矿的建设质量比较好，投产后达到设计能力也比较快。据有资料可查的31处矿井统计，一年达产的有8处，占25.8%，两年达产的有12处，占38.6%，经济效益是好的。

大规模的煤炭工业建设，有效地提高了主要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从1952～1957年，联合采煤机（康拜因）、截煤机、风镐、爆破落煤的比重由49.1%提高到96.3%；人工手镐落煤由50.9%降低到3.7%。联合采煤机、截煤装煤机、爆破装煤的比重，由7.9%增加到12.6%；人工装煤由92.1%降低到87.4%。回采工作面，各类输送机和自动滑落运煤的比重，由69.62%提高到92.62%；人工运煤由30.38%降到7.98%。井下平巷，电机车、钢丝绳牵引和自动滑行运输的比重，由77.80%增加到85.16%；人工和牲畜运输由22.10%降低到14.84%。地面铁路装车，煤仓、输送机、装车机、溜煤眼和溜槽的比重，由65.06%增加到90.78%；人工装车由34.94%降到9.22%。随着采、装、运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企业管理工作的改进，劳动生产率也有明显提高，全员效率由1952年的0.661吨/工提高到1957年的0.978吨/工，提高了48%。

由于煤炭工业建设周期较长，从投产到达到设计能力，需要几年时间，"一五"期间新建的矿井大多数在当时还不能充分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因而"一五"期间的煤炭增产，主要还是依靠老矿井。在1957年的煤炭总产量中，老矿井产量占80%；五年中增加的产量中，67%产自老矿井。老矿井的增产，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改建、扩建外，全面生产改革也是重要因素。开滦煤矿就是通过全面生产改革使产量从560万吨提高到800多万吨的。

第二节　电力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电力建设方针是"以火电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为着适应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新工业地区建设

的需要，必须努力发展电力工业，建设新的电站和改造原有的电站。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以建设火力电站为主（包括热力和电力联合生产的热电站），同时利用已有的资源条件，进行水力电站的建设工作，并大力进行水力资源的勘测工作，为今后积极地开展水电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

自1951年起，中苏签订了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大型工程的协议之后，开始在阜新、抚顺、富拉尔基、西安、郑州、重庆、太原、吉林等地扩建、改建或新建了一批骨干电厂，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规模电力建设的开始。"一五"期间投入6000千瓦以上的火电机组达89台共141.05万千瓦。其中1957年一年就投入了40台机组，共56.05万千瓦。这一时期，单机容量6000千瓦就列为大机组。第一台苏联供货的6000千瓦机组于1953年在西安坝桥投产，第一台国产6000千瓦机组于1956年2月在安徽淮南电厂投产。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火电有23项，共136.5万千瓦，其中70.2%在"一五"期内发电，阜新和抚顺电厂的2.5万千瓦和5万千瓦机组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投产，1953年开始建设的富拉尔基电厂2.5万千瓦机组蒸汽参数上升到90大气压（9.12兆帕）、500℃，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台高温高压机组，标志着火电建设技术水平的提高。

水电建设方面，根据电力建设方针，要为今后积极地开展水电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1953～1955年进行了第一次水能资源蕴藏量估算，得出全国水能资源蕴藏量为5.4亿千瓦。1956年1月联合召开水力、水利资源普查会议后，又开展了广泛的水能资源普查工作，于1958年第二次统计得出全国水能资源蕴藏量5.8亿千瓦。1954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组成黄河规划委员会，编制了黄河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拟定了梯级开发方案，选定了三门峡和刘家峡水电站作为第一期工程。此项规划于1955年7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批准。接着进行了淮河、海河、辽河、珠江等流域规划，资水、沅水、汉江上游、岷江上游等梯级开发规划，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的水电开发规划。1956年，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对长江干支流综合开发进行了规划。在水电建设方面，1953年完成了丰满水电站的恢复和改建任务，使该电站的装机容量由13万千瓦增加到55.4万千瓦。同时建设了一批中型水电站，包括四川龙溪河的狮子滩等4个梯级电站，福建古田一级，浙江的黄坛口，江西的上犹江，广东的流溪河，以及河北的官厅，辽宁的大伙房，安徽的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等水电站。此外，还在新疆、西藏、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建成几个小型水电站。1957年11月在北京北海公园内举办了全国水电建设展览会，展出了中国水能资源分布和水电建设成就，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指示和题词。

到1957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01.90万千瓦，为1949年的6.25倍。1957年的水力发电量为48.20亿千瓦时，为1949年的6.79倍，发展相当快。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电力工业25项，占"156项"重点项目总数的1/6。这25项是：阜新热电站、抚顺电站、重庆电站、丰满水电站、大连热电站、太原第一热电站、西安热电站（一、二期）、郑州第二热电站、富拉尔基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吉林热电站、太原第二热电站、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户县热电站、

兰州热电站、青山热电厂、个旧电站（一、二期）、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宋家河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株洲热电厂、成都热电站、洛阳热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北京热电厂。除阜新热电站、抚顺电站、丰满水电站、大连热电站、吉林热电站、青山热电厂6项为扩建项目外，其余19项均为新建项目。

从1951～1957年的六年间，电力工业的25项陆续开始施工。1951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阜新热电站、丰满水电站2项；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重庆电站、西安热电站（一、二期）、郑州第二热电站、富拉尔基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抚顺电站6项；1953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太原第一热电站1项；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个旧电站（一、二期）、大连热电站2项；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太原第二热电站、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兰州热电站、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洛阳热电站、吉林热电站、青山热电厂8项；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户县热电站、株洲热电厂、成都热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北京热电厂8项；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包头宋家河热电站1项。

历经六年时间，电力工业的25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3年竣工的项目有郑州第二热电站，1954年竣工的项目有重庆电站，1955年竣工的项目有富拉尔基热电站和大连热电站；1957年竣工的项目有5项：西安热电站（一、二期）、抚顺电站、太原第一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和株洲热电厂；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8项阜新热电站、个旧电站（一、二期）、太原第二热电站、兰州热电站、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洛阳热电站、吉林热电站、成都热电站；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5项：丰满水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青山热电厂、北京热电厂；1960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户县热电站、包头宋家河热电站；1969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即三门峡水利枢纽，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最后一个竣工的项目。

电力工业的25项最长的建设周期是十三年，最短的是一年，平均建设周期近四年。具体情况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周期为十三年；丰满水电站建设周期为八年；阜新热电站和乌鲁木齐热电站建设周期为七年；抚顺电站和西安热电站（一、二期）建设周期为五年；太原第一热电站、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户县热电站、青山热电厂和个旧电站（一、二期）建设周期为四年；富拉尔基热电站、吉林热电站、太原第二热电站、兰州热电站、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宋家河热电站、洛阳热电站和北京热电厂建设周期为三年；重庆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和成都热电站建设周期为两年；大连热电站、郑州第二热电站和株洲热电厂建设周期为一年。

电力工业计划安排投资31680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2449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70.9%；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12833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50.3%。具体构成情况详见表7。

表 7　　电力工业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三门峡水利枢纽	167000	52.7	69324	30.9	7909	7.0
吉林热电站	9551	3.0	11200	5.0	6835	6.1
兰州热电站	11000	3.5	10850	4.8	7190	6.4
丰满水电站	9372	3.0	9634	4.3	8439	7.5
北京热电厂	7936	2.5	9380	4.2	525	0.5
户县热电站	8510	2.7	9188	4.1	4896	4.3
青山热电厂	10478	3.3	8987	4.0	5313	4.7
太原第一热电站	8046	2.5	8871	4.0	8871	7.9
抚顺电站	9016	2.8	8734	3.9	8734	7.7
阜新热电站	6550	2.1	7450	3.3	5274	4.7
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	6800	2.1	6872	3.1	4189	3.7
富拉尔基热电站	6772	2.1	6870	3.1	6870	6.1
洛阳热电站	6700	2.1	6797	3.0	5229	4.6
西安热电站（一、二期）	6380	2.0	6449	2.9	6449	5.7
太原第二热电站	5401	1.7	6180	2.8	2113	1.9
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	5887	1.9	6120	2.7	4055	3.6
包头宋家河热电站	6504	2.1	5538	2.5	694	0.6
成都热电站	5180	1.6	5033	2.2	925	0.8
个旧电站（一、二期）	3800	1.2	4534	2.0	3132	2.8
重庆电站	3064	1.0	3561	1.6	3561	3.2
乌鲁木齐热电站	3270	1.0	3275	1.5	1981	1.8
佳木斯纸厂热电站	2530	0.8	2975	1.3	2975	2.6
大连热电站	2800	0.9	2538	1.1	2538	2.2
株洲热电厂	2249	0.7	2165	1.0	2165	1.9
郑州第二热电站	2008	0.6	1971	0.9	1971	1.7
合计	316804	100	224496	100	112833	100

电力工业的25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16项，"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有9项为100%，表明它们都是"一五"时期全部建成的。其余为完成投资在100%以下的项目，详见表8。

表8　　电力工业25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 \ 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个旧电站（一、二期）	3800	4534	119.3	3132	69.1
北京热电厂	7936	9380	118.2	525	5.6
佳木斯纸厂热电站	2530	2975	117.6	2975	100.0
吉林热电站	9551	11200	117.3	6835	61.0
重庆电站	3064	3561	116.2	3561	100.0
太原第二热电站	5401	6180	114.4	2113	34.2
阜新热电站	6550	7450	113.7	5274	70.8
太原第一热电站	8046	8871	110.3	8871	100.0
户县热电站	8510	9188	108.0	4896	53.3
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	5887	6120	104.0	4055	66.3
丰满水电站	9372	9634	102.8	8439	87.6
富拉尔基热电站	6772	6870	101.4	6870	100.0
洛阳热电站	6700	6797	101.4	5229	76.9
西安热电站（一、二期）	6380	6449	101.1	6449	100.0
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	6800	6872	101.1	4189	61.0
乌鲁木齐热电站	3270	3275	100.2	1981	60.5
兰州热电站	11000	10850	98.6	7190	66.3
郑州第二热电站	2008	1971	98.2	1971	100.0
成都热电站	5180	5033	97.2	925	18.4
抚顺电站	9016	8734	96.9	8734	100.0
株州热电厂	2249	2165	96.3	2165	100.0
大连热电站	2800	2538	90.6	2538	100.0
青山热电厂	10478	8987	85.8	5313	59.1
包头宋家河热电站	6504	5538	85.1	694	12.5
三门峡水利枢纽	167000	69324	41.5	7909	11.4
总体情况	316804	224496	70.9	112833	50.3

电力工业的25项建设规模是：装机298.65万千瓦，实际形成装机213.65万千瓦的生产能力，其中，"一五"时期形成装机120.35万千瓦的生产能力。实际新增生产能力比设计建设规模少85万千瓦，是由于三门峡水利枢纽淤沙严重，建到25万千瓦后停建，没有达到设计110万千瓦的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为总装机298.65万千瓦，具体情况见表9。实际形成装机213.65万千瓦的生产能力的具体情况是：除三门峡水利枢纽比设计建设规模少85万千瓦外，其余24项新增生产能力同设计建设规模。

"一五"时期形成装机120.35万千瓦生产能力的具体情况是：

表9　电力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情况

项目 \ 新增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万千瓦）	形成生产能力（万千瓦）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万千瓦）
丰满水电站	42.25	42.25	36.25
三门峡水利枢纽	110	25	
阜新热电站	15	15	12.5
抚顺电站	15	15	15
青山热电厂	11.2	11.2	5
吉林热电站	10	10	5
户县热电站	10	10	5
兰州热电站	10	10	5
北京热电厂	10	10	
洛阳热电站	7.5	7.5	5
太原第一热电站	7.4	7.4	7.4
包头宋家河热电站	6.2	6.2	
富拉尔基热电站	5	5	5
太原第二热电站	5	5	
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	5	5	
成都热电站	5	5	
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	4.9	4.9	2.4
西安热电站（一、二期）	4.8	4.8	4.8
个旧电站（一、二期）	2.8	2.8	1.6
大连热电站	2.5	2.5	2.5
重庆电站	2.4	2.4	2.4

项目 \ 新增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万千瓦）	形成生产能力（万千瓦）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万千瓦）
佳木斯纸厂热电站	2.4	2.4	2.4
乌鲁木齐热电站	1.9	1.9	0.7
郑州第二热电站	1.2	1.2	1.2
株洲热电厂	1.2	1.2	1.2
合计	298.65	213.65	120.35

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电力工业和全国其他行业一样，建立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出一大批有能力、懂技术、能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骨干力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8年发电量275.31亿千瓦时，比1957年增加近82亿千瓦时，增长42.39%；1959年达到422.89亿千瓦时，又比1958年增加147.58亿千瓦时，增长53.61%；1960年达到594.24亿千瓦时，比1959年增长40.52%。三年平均增长率是46%。发电设备容量1958年达到628.81万千瓦。比1957年增加165.31万千瓦，增长35.7%；1959年达到953.67万千瓦，比1958年增长324.86万千瓦，增长51.66%；1960年达到1191.83万千瓦，比1959年增加238.16万千瓦，增加24.97%；三年平均增长率是37%。在新增的设备容量中存在发电、送电、配电不成比例，而且很多工程的尾巴很大，但经过以后几年的调整、填平补齐，都形成了生产能力。到1965年全国发电量达到676.04亿千瓦时，比1957年增加482.69亿千瓦时；装机容量达到1507.63万千瓦，比1957年增加1044.13万千瓦。

第三节　钢铁工业

钢铁工业的基本建设是钢铁工业实现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旧中国基本上没有遗留下什么像样的建设钢铁工业的专业技术队伍。新中国从50年代初开始，就不得不集结与培养一支建设钢铁工业的，包括基本建设甲方（即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科研等各方面的队伍，目前已形成了完整的基本建设体系。钢铁工业的基本建设是从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改建鞍钢开始的。当时，国家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并于1950年3月同苏联签订了改建鞍钢的议定书，由苏联援建。1951年7月，鞍钢成立了设计处；1952年3月以后，鞍钢又陆续增设了12个基本建设方面的职能机构，并组建一批专业化施工单位。

1951年10月，苏联交付鞍钢初步设计。设计提出，建设铁矿山三座，采矿能力

950万吨，精矿粉410.2万吨，烧结矿400万吨，富铁矿80万吨；炼焦炉14座，年产冶金焦280万吨；高炉九座，总容积7274立方米，年产生铁252.5万吨；平炉炼钢车间三个，24座大型平炉、1座小平炉，年产钢322.5万吨；初轧机二套，年开坯能力310万吨；大型钢材、钢轨50万吨，中小型材65万吨，线材、中厚板、带钢等133万吨；此外还有再加工品、可锻生铁异型管、铁管及异型材等。1952年2月，东北人民政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这项设计。接着，开展了由苏联引进技术装备的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七号高炉"三大工程"的建设。鞍钢这"三大工程"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是宏伟复杂的。它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全国57个大中城市、199个企业的大力支援，经过鞍钢建设者们的顽强奋斗，施工质量好，建设速度快，深受全国人民的赞扬，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表彰。

"一五"计划时期，鞍钢仍然是国家建设的重点，五年中建设的投资为15.45亿元，占同期钢铁工业总投资的40.73%。完成主要项目39项，其中包括两座矿山、四个选矿厂、两个烧结车间、六座高炉，以及第一炼钢厂改造工程，还有第二炼钢厂的恢复与改建、第二初轧厂和第二薄板厂的建设等。

"一五"时期的新建钢铁项目还有武钢、包钢、吉林铁合金厂、热河钒钛厂、吉林电极厂；改建项目有本钢的工源厂区、太钢、西南一〇一厂（重庆钢铁公司前身）、马鞍山铁厂等。钢铁建设项目总共有245个，其中大型20个、中型34个、小型191个，基本建设投资共达37.93亿元。到1957年底，钢铁工业基本建设职工队伍有38.7万人。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钢铁工业的7项是：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吉林铁合金厂、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热河钒钛厂。除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为改建项目外，其余5项为新建项目。这些项目都是打基础的大项目。特别是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基地的兴建，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的新纪元。富拉尔基特钢厂（北满钢厂）的兴建，对提供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合金钢材料，也具有重要意义。铁合金厂和碳素厂的兴建，奠定了合金钢生产和炼铝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了以上苏联援建的骨干项目外，"一五"计划中确定改造、扩建的限额以上的钢铁工业重点项目还有河北龙烟铁矿、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北大冶特殊钢厂、四川重庆特殊钢厂和大渡口钢铁厂、山西太原钢铁厂、河北唐山耐火材料厂、贵州遵义锰矿。限额以下的项目有：天津钢厂、河北唐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厂、上海第一钢厂、上海第二钢厂、上海第三钢厂、上海新沪钢厂、上海亚细亚钢厂、抚顺钢厂、大连钢厂、上海和山东两个耐火材料厂等23项。按计划规定，"一五"计划期间新增炼铁能力280万吨，炼钢能力226万吨，轧钢能力152万吨。

从1952~1956年的四年间，"156项"中钢铁工业的7项陆续开始施工。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鞍山钢铁公司；1953年开工的项目有3项，它们是本溪钢铁公司、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吉林铁合金厂；1955年开工的项目有2项，它们是：武汉钢铁公司、热河钒钛厂；1956年开工的项目有1项，即包头钢铁公司。

历经十年时间，钢铁工业的7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吉林铁合金厂1956年竣

工；本溪钢铁公司1957年竣工；富拉尔基特钢厂、热河钒钛厂1958年竣工；鞍山钢铁公司1960年竣工；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1962年竣工。

钢铁工业计划安排投资54853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56634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103.2%；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264377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46.7%。具体构成情况见表10。

表10 钢铁工业7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鞍山钢铁公司	228000	41.6	268500	47.4	163620	61.9
武汉钢铁公司	147000	26.8	131206	23.2	26000	9.8
包头钢铁公司	101760	18.6	91877	16.2	7149	2.7
本溪钢铁公司	31700	5.8	32137	5.7	32137	12.2
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	30 170	5.5	31 684	5.6	27667	10.5
吉林铁合金厂	5400	1.0	6 300	1.1	6300	2.4
热河钒钛厂	4500	0.8	4640	0.8	1504	0.6
合计	548530	100.0	566344	100.0	264377	100.0

钢铁工业的7项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计划占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5项，“一五”时期完成投资计划的有2项，其余的在“一五”时期只完成了部分投资计划。详见表11。

表11 钢铁工业7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
鞍山钢铁公司	228000	268500	117.8	163620	60.9
吉林铁合金厂	5400	6300	116.7	6300	100.0
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	30170	31684	105.0	27667	87.3
热河钒钛厂	4500	4640	103.1	1504	32.4
本溪钢铁公司	31700	32137	101.4	32137	100.0

项目 \ 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
包头钢铁公司	101760	91877	90.3	7149	7.8
武汉钢铁公司	147000	131206	89.3	26000	19.8
总体情况	548530	566344	103.2	264377	46.7

钢铁工业的7项建设总规模是：生产铁670万吨、钢636.6万吨、钢材360万吨。“一五”时期新增生产能力为铁337万吨、钢200.6万吨、钢材173万吨。新增生产能力详见表12。

表12　　　　钢铁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情况

企业名称 \ 新增能力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鞍山钢铁公司	生铁250万吨、钢320万吨、钢材250万吨	同规模	铁127万吨、钢184万吨、钢材134万吨
本溪钢铁公司	生铁110万吨	同规模	铁110万吨
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	特钢16.6万吨	同规模	钢16.6万吨
吉林铁合金厂	铁合金4.35万吨	同规模	铁合金4.35万吨
武汉钢铁公司	生铁15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	同规模	
包头钢铁公司	生铁160万吨、钢150万吨	同规模	
热河钒钛厂	钛镁7000吨、钒铁1000吨	同规模	
总体情况	铁670万吨、钢636.6万吨、钢材360万吨	同规模	铁337万吨、钢200.6万吨、钢材173万吨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钢铁战线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创业，不怕困难的精神，提前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成就：

产值计划规定1957年钢铁工业产值为33.1亿元，实际达到46.5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52年（12.6亿元）的370%，平均每年增长29.8%。

1957年，按产量统计，全国生产了铁矿石1 937万吨，生铁594万吨，钢535万吨，成品钢材436万吨。同1952年比，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5.2%、25.2%、31.7%、31%。主要产品产量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计划，成绩是突出的。

从品种上看，1952年全国能冶炼的钢种170个左右，1957年增加到372个。1952

年，可生产的钢材规格约 300～400 个，1957 年增加到 4000 个。

主要设备利用系数和五年计划规定的钢铁工业 8 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部完成和超额完成。

五年中，生产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从 1952 年的人均 5950 元，提高到 1957 年的人均 10088 元，平均每年增长 11.1%，全员实物劳动生产率也从 1952 年的人均 7.09 吨钢，提高到 1957 年的人均 13.16 吨钢，平均每年增长 13.2%。

利税和成本 1952 年钢铁工业利税只有 4.5 亿元（其中利润 4 亿元），1957 年提高到 12.6 亿元（利润 10.7 亿元）。可比产品成本五年内年年有较大幅度降低，各年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降低率，1953 年为 5%，1954 年为 6.5%，1955 年为 7%，1956 年为 14.4%，1957 年为 5.2%。

五年中基建投资完成 37.93 亿元。新增生产能力：采矿 1552.8 万吨/年，炼铁 311.35 万吨/年，炼钢 263.56 万吨/年，轧钢 154.14 万吨/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钢铁工业建设所积累的经验是丰富的。人们对“一五”计划时期的稳定、高速增长，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都感到满意，认为这是钢铁工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第四节 有色金属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加快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设立有色金属管理局，同时在中南地区成立了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在西南地区成立了西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由于有了比较系统的组织领导，就为组织起一支建设和生产技术队伍创造了前提；加之，当时面临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急需大量有色金属，某些有色金属产品又是重要出口物资，这就大大加快了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恢复和发展的步伐。

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到 1952 年，全国有色金属大小矿山和工厂都先后恢复了生产。当年生产的 8 种有色金属达 7.4 万吨，是 1949 年 1.33 吨的 5.5 倍，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12.3 倍，钨、锑、锡等有色金属的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出口创汇额的 31%，此外还生产了黄金 3925 公斤。有色金属工业在恢复中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创造和总结了自己的管理方法，改善了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953 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五”计划时期。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在“一五”计划期间，有色金属工业由全面恢复转入大规模开发建设。改造和扩建了一批老企业，新建了一大批有色金属骨干企业和事业单位，使新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谱写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对“一五”计划期间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方针，并确定冶金、燃料、机械、电力等工业为“一五”计划时期重点发展行业，同时，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决定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基本建设工程为“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在这些重点建设项目中，属于有色金属工业的有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碳素厂、洛阳铜加工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江西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3个钨矿、云南锡业公司、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等13个。后来，由于资源、建设方案等方面的原因，有3项未能实现。1953年国家还及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铜、铝等常用有色金属和能换取外汇的钨、锡、钼、锑、汞等产品，进一步明确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重点。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一五”计划的胜利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撤销了各大行政区的工业部，把干部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中央各工业部门。调到重工业部的省、地、县3级干部达8700多名。1952年撤销东北人民政府，王鹤寿调任重工业部部长，吕东、赖际发任副部长。在重工业部内成立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4个工业管理局。高扬文任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局长，李华、王逸群、孙鸿儒等任副局长。有色金属的重要工厂、矿山和工作部门都增添了一批新的领导力量。

在实施“一五”计划的整个过程中，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注。1955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等详细听取了有色金属矿山开采、选矿、冶炼情况的汇报，对有色金属工业的工作作了肯定和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原有的有色金属厂矿加快了改造、扩建的步伐，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一大批新建的有色金属骨干企业拔地而起，整个有色金属工业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色金属工业13项，占项目总数的近1/10。有色金属工业实际实施的13项是：抚顺铝厂（一、二期）、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吉林电极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云南锡业公司、江西大吉山钨矿、江西西华山钨矿、江西岿美山钨矿、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除抚顺铝厂（一、二期）为改建项目外，其余都是新建项目。

从1952～1958年的六年间，有色金属工业的13项陆续开始施工。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抚顺铝厂（一、二期）2项、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2项；1953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吉林电极厂；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1955年开始施工的有株洲硬质合金厂、江西大吉山钨矿、白银有色金属公司3项；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杨家杖子钼矿、江西西华山钨矿、江西岿美山钨矿3项；1957年开始施工的有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1958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2项，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

历经十年时间，至1962年有色金属工业的13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5年竣工的项目有吉林电极厂1项，1957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抚顺铝厂（一、二期）、株洲硬质合金厂；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3项：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云南锡业公司、杨家杖子钼矿；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3项：江西大吉山钨矿、江西西华山钨矿、

江西岿美山钨矿；1961年竣工的项目有东川矿务局1项，1962年竣工的2项是：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会泽铅锌矿。

有色金属工业的13项最长的建设周期是七年，最短的是两年。建设周期七年的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建设周期六年的是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建设周期五年的是抚顺铝厂（一、二期）、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建设周期四年的是云南锡业公司、江西大吉山钨矿、云南会泽铅锌矿；建设周期三年的是江西西华山钨矿、江西岿美山钨矿、云南东川矿务局；建设周期两年的是吉林电极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

有色金属工业计划安排投资19523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00869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102.9%；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92294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45.9%。具体构成情况见表13。

表13　　有色工业13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40531	20.8	44697	22.3	12342	13.4
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	30000	15.4	32681	16.3	23074	25.0
云南锡业公司	29483	15.1	25883	12.9	15043	16.3
东川矿务局	19398	9.9	20300	10.1		0.0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17000	8.7	17550	8.7	559	0.6
抚顺铝厂（一、二期）	18226	9.3	15619	7.8	15619	16.9
杨家杖子钼矿	9346	4.8	11387	5.7	6726	7.3
吉林电极厂	7712	4.0	6976	3.5	6976	7.6
江西大吉山钨矿	5500	2.8	6723	3.3	3528	3.8
会泽铅锌矿	5000	2.6	4885	2.4		0.0
江西西华山钨矿	5700	2.9	4782	2.4	1836	2.0
株洲硬质合金厂	3525	1.8	4695	2.3	4695	5.1
江西岿美山钨矿	3817	2.0	4691	2.3	1896	2.1
合计	195238	100.0	200869	100.0	92294	100.0

有色工业的13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8项，“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100%有3项，详见表14。

表 14 有色工业 13 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株洲硬质合金厂	3525	4695	133.2	4695	100.0
江西岿美山钨矿	3817	4691	122.9	1896	40.4
江西大吉山钨矿	5500	6723	122.2	3528	52.5
杨家杖子钼矿	9346	11387	121.8	6726	59.1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40531	44697	110.3	12342	27.6
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	30000	32681	108.9	23074	70.6
东川矿务局	19398	20300	104.6		0.0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17000	17550	103.2	559	3.2
会泽铅锌矿	5000	4885	97.7		0.0
吉林电极厂	7712	6976	90.5	6976	100.0
云南锡业公司	29483	25883	87.8	15043	58.1
抚顺铝厂（一、二期）	18226	15619	85.7	15619	100.0
江西西华山钨矿	5700	4782	83.9	1836	38.4
总体情况	195238	200869	102.9	92294	45.9

有色金属工业的 13 项建设规模与形成生产能力相同，经过十年的建设，形成了铝锭 3.9 万吨、铝 0.12 万吨、铝材 3 万吨、石墨制品 2.23 万吨、硬质合金 500 吨、钼精矿 4700 吨、锡 3 万吨、钨矿采选 5026 吨/日、电铜 3 万吨、硫酸 2.5 万吨、铜材 6 万吨、东川矿务局采选 2 万吨/日、铅 1.5 万吨、锌 3 万吨的生产能力。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15 有色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情况

项目＼新增能力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抚顺铝厂（一、二期）	铝锭 3.9 万吨，铝 0.12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	铝材 3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吉林电极厂	石墨制品 2.23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株洲硬质合金厂	硬质合金 500 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杨家杖子钼矿	钼精矿 4700 吨	同规模	2000 吨

项目 \ 新增能力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云南锡业公司	锡3万吨	同规模	1.65万吨
江西大吉山钨矿	采选1600吨/日	同规模	
江西西华山钨矿	1856	同规模	
江西岿美山钨矿	1570	同规模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电铜3万吨，硫酸2.5万吨	同规模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铜材6万吨	同规模	
东川矿务局	采选2万吨/日	同规模	
会泽铅锌矿	铅1.5万吨锌3万吨	同规模	

经过“一五”计划时期大规模经济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已初具规模，产量由1952年的7.4万吨，上升到1957年的21.45万吨，还具有10万～15万吨的后备生产能力。在有色金属工业的起步和创业中，逐步建设起了勘探、设计、施工和科研队伍。

第一，建设了一支独立的地质勘探队伍。中国的有色金属地质勘探队伍是在三年恢复时期由苑子纪等组建的，先后创办了地质专科速成班，建立了地质调查室和调查队。到“一五”计划期间逐步发展壮大，成立了地质勘探公司和地质科研院所。普查找矿、物探、化探、测量和工程地质、化验分析等一整套门类齐全的地质工作队伍也相继组成，并积极开展工作，为有色金属工业作出了贡献。

第二，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勘察设计队伍。1953年由刘学新等组织、调集各地的设计人员、厂矿的生产技术人员，并招收社会上的零散技术人员，在北京成立了有色金属管理局设计公司，开始了有色金属工业工厂矿山的勘察设计工作。1955年，设计公司改组为有色冶金设计院，李华任院长，并设沈阳、长沙分院和昆明办事处（即以后的沈阳铝镁设计院、长沙和昆明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前身）。这支队伍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设计技术，提高了业务水平。

第三，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基本建设施工队伍。“一五”计划时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把基本建设放在经济工作首位的指示精神，在张潭等的组织下，调集力量充实基本建设施工队伍，开始了有色金属工业工厂矿山的基本建设施工工作。这支队伍紧紧围绕“一五”计划时期有色金属工业的重点工程建设，在物资、技术、人才、装备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投产了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第四，形成了一支有色金属的科研队伍。“一五”计划期间，由于生产建设的需要，充实了北京有色金属综合试验所，成立了选矿设计研究院（即矿冶研究院的前身），由陈健任院长，并在一些大企业组成研究所。这些科研院所完成了生产建设所急需的大量课题研究试验工作。到“一五”计划后期，遵照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要求，编制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的有色金属部分，并开展了研究工作。这一时期，

在一批老专家的指导下，还分别研究出钛、铍、锂、锗、锆、铟、硒、碲、镓、钨、钼、铌、钽等13种稀有金属的提取工艺。

第五节　机械工业

旧中国机械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工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虽制造过一些产品，但主要是为进口的机器从事维修和装配业务，属于修配性质的工业，而且在解放前夕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新中国成立时的机械工业，大多数工厂设备残缺，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建设一批骨干机械企业，发展自己的制造力量。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即决定筹建一批由国内自行设计的重大项目。1950年初，决定在沈阳筹建电机厂（后改在哈尔滨建设），在山西筹建太原重型机器厂（该厂1951年10月破土动工，1953年初辅助车间即部分投产）。1952年决定在上海筹建锅炉厂、汽轮机厂和发电机厂。为适应建厂的需要，还抽调技术力量，筹备组建工厂设计机构。

从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机械工业部门迅速组织生产，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支援抗美援朝提供机械设备、配件、器材等，同时着手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条件。从恢复时期开始，中国即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提请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一批重要项目。到"一五"时期，在苏联援建项目的"156项"中，属于机械工业的有24项。另外有民主德国帮助设计的项目2个和引进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技术自行设计的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在这批项目中，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在老厂基础上新建）、沈阳电缆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项目，相继在1950年、1951年、19.52年成立了筹备组，进行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沈阳风动工具厂在1952年即开始建设。1949～1952年，国家对一机部系统累计投资2.7亿元。

"一五"时期，中国机械工业的建设是以发展冶金设备、发电设备、运输机械、金属切削机床为重点，适当发展电机、电器、电材、炼油化工设备和农业机械。重点建设了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73个。除上述苏联援建和民主德国帮助设计的28个项目外，其余项目是中国自力建设的。分行业叙述如下：

重型矿山机械工业　过去是空白，"一五"时期集中力量新建三个大型企业。即苏联援建的以生产大型轧机、冶炼设备、锻压设备和大型铸锻件为主的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简称第一重机厂），自行设计的以生产轧机、锻压设备、大型起重设备为主的太原重机厂，苏联援建的以生产矿井提升和洗煤设备为主的洛阳矿山机器厂。此外，还重点改造了一批老厂，包括以生产破碎、球磨机和大铸锻件为主的沈阳重机厂，以生产工矿车辆、炼焦设备为主的大连工矿车辆厂（现名大连重机厂），以生产桥式起重机为主的大连起重机厂，以生产履带挖掘机、卷扬机为主的抚顺挖掘机厂，以生产轧钢润滑设备和地质钻机为主的太原矿山机器厂等。在工程机械方面，建设了苏联援建的沈阳风

动工具厂。

电机电器工业 新中国成立前，只能少量生产低压小功率一般产品。“一五”时期重点建设了苏联援建的哈尔滨三大动力设备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发电机厂），引进捷克斯洛伐克技术以生产1.2万千瓦以下的火电机组为主的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发电机厂），苏联援建的西安4个电器设备和电材工厂（开关整流器厂、电力电容器厂、高压电瓷厂、绝缘材料厂），还有苏联援建的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电碳厂、沈阳电线电缆厂、湘潭电机厂直流电机车间和自行设计建设的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高压开关厂、沈阳低压开关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武汉锅炉厂等。

机床工具工业 过去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老式机床和工具，“一五”时期重点建设了苏联援建的以生产立车、龙门刨、龙门铣、卧式镗床等重型机床为主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和一批产品专业化机床厂，包括苏联援建的沈阳第一机床厂（车床）、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立车）、沈阳第二机床厂（立钻、镗床）、上海机床厂（磨床）、无锡机床厂（磨床）、北京第一机床厂（铣床）、济南第二机床厂（龙门刨）、南京机床厂（六角车床）等。工具方面，新建了苏联援建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和民主德国设计的郑州砂轮厂（现名第二砂轮厂），中国自行设计的成都量具刃具厂。

交通运输设备 “一五”时期汽车行业重点建设了苏联援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和自行设计的北京汽车附件厂（现名北京汽车厂）。机车车辆行业重点建设了大同机车厂、长春客车厂和株洲货车厂，改建齐齐哈尔货车厂和大连机车车辆厂。造船行业重点建设生产各种军用舰艇和民用船舶的江南、沪东、渤海、武昌、广州、大连等造船厂。

农业机械 过去没有基础，新建了苏联援建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并开始建设自行设计的天津拖拉机厂。

石油化工机械 开始建设苏联援建的以生产炼油化工设备和石油钻机为主的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建设自行设计的以生产各种采油设备为主的兰州通用机械厂。

轴承方面 新建了苏联援建的洛阳轴承厂，建设和扩建了哈尔滨轴承厂和辽宁省瓦房店轴承厂。

仪表工业 开始建设民主德国设计的西安仪表厂。

内燃机 新建了苏联援建的洛阳柴油机厂和陕西兴平柴油机厂。扩建了自行设计的上海柴油机厂、天津动力机厂等。

上述重点项目，都在1956年前相继开工建设，到1957年底，共完成投资27.44亿元，全部建成投产的有40项，包括第一汽车厂等苏联援建的7项和引进捷克斯洛伐克技术的3个动力设备厂。尚未全部建成的项目，由于大多数都是利用老厂扩建的，因此，在“一五”期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机械工业24项，占项目总数的1/6强。机械工业实际实施的24项是：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长春第一汽车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沈阳第二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滚珠轴承厂、兰州石油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

容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富拉尔基重机厂、哈尔滨碳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湘潭船用电极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除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沈阳第二机床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4项为改建项目外，其余都是新建项目。

从1952～1957年的五年间，机械工业的24项陆续开始施工。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沈阳风动工具厂；1953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长春第一汽车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仪表厂4项；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沈阳电缆厂、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洛阳滚珠轴承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5项；1955年开始施工的有沈阳第二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富拉尔基重机厂4项；1956年开始施工的有洛阳拖拉机厂、兰州石油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厂、哈尔滨碳刷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8项；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2项：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和湘潭船用电极厂。

历经十年时间，机械工业的24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4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沈阳风动工具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1955年竣工沈阳第一机床厂1项；1956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长春第一汽车厂、哈尔滨仪表厂；1957年竣工1项，沈阳电缆厂；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5项：沈阳第二机床厂、洛阳滚珠轴承厂、西安电力电容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哈尔滨碳刷厂；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7项，分别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兰州石油机械厂、富拉尔基重机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湘潭船用电极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1960年竣工4项：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西安绝缘材料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1961年竣工1项，西安开关整流器厂；1962年竣工1项，西安高压电瓷厂。

机械工业的24项最长的建设周期是六年，最短的是一年。平均建设周期三年零四个月。建设周期六年的是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西安高压电瓷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建设周期五年的是西安开关整流器厂；建设周期四年的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滚珠轴承厂、西安绝缘材料厂、富拉尔基重机厂；建设周期三年的是长春第一汽车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仪表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兰州石油机械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建设周期两年的是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西安电力电容厂、哈尔滨碳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湘潭船用电极厂；建设周期一年的是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机械工业计划安排投资25935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8358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109.3%；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65702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58.4%。投资具体构成情况详见表16。

表 16 机械工业 24 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 \ 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长春第一汽车厂	56000	21.6	60871	21.5	60871	36.7
富拉尔基重机厂	30000	11.6	45849	16.2	10792	6.5
洛阳拖拉机厂	35130	13.5	34788	12.3	13750	8.3
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	8040	3.1	14981	5.3	7913	4.8
武汉重型机床厂	12700	4.9	14612	5.2	8507	5.1
兰州石油机械厂	15622	6.0	14381	5.1	2454	1.5
西安开关整流器厂	11930	4.6	12164	4.3	2555	1.5
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	14980	5.8	12042	4.2	8529	5.1
洛阳滚珠轴承厂	10610	4.1	11306	4.0	9508	5.7
沈阳电缆厂	7730	3.0	9031	3.2	9031	5.5
洛阳矿山机械厂	8869	3.4	8793	3.1	5989	3.6
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7281	2.8	7005	2.5	417	0.3
沈阳第一机床厂	5650	2.2	6043	2.1	6043	3.6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5900	2.3	5565	2.0	5565	3.4
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	4890	1.9	4356	1.5	2916	1.8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4896	1.9	3869	1.4	234	0.1
西安高压电瓷厂	3857	1.5	3228	1.1	795	0.5
沈阳第二机床厂	3000	1.2	3188	1.1	1968	1.2
哈尔滨仪表厂	2790	1.1	2494	0.9	2494	1.5
西安绝缘材料厂	2767	1.1	2455	0.9	941	0.6
沈阳风动工具厂	2180	0.8	1893	0.7	1893	1.1
哈尔滨碳刷厂	1473	0.6	1662	0.6	1580	1.0
西安电力电容厂	1312	0.5	1510	0.5	795	0.5
湘潭船用电极厂	1750	0.7	1502	0.5	162	0.1
合计	259357	100.0	283588	100.0	165702	100.0

机械工业的 24 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 100%的有

11 项，低于 100%的有 13 项，“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有 6 项为 100%，表明它们都是“一五”时期全部建成的。具体投资执行情况见表 17。

表 17　　机械工业 24 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
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	8040	14981	186.3	7913	52.8
富拉尔基重机厂	30000	45849	152.8	10792	23.5
沈阳电缆厂	7730	9031	116.8	9031	100.0
武汉重型机床厂	12700	14612	115.1	8507	58.2
西安电力电容厂	1312	1510	115.1	795	52.6
哈尔滨碳刷厂	1473	1662	112.8	1580	95.1
长春第一汽车厂	56000	60871	108.7	60871	100.0
沈阳第一机床厂	5650	6043	107.0	6043	100.0
洛阳滚珠轴承厂	10610	11306	106.6	9508	84.1
沈阳第二机床厂	3000	3188	106.3	1968	61.7
西安开关整流器厂	11930	12164	102.0	2555	21.0
洛阳矿山机械厂	8869	8793	99.1	5989	68.1
洛阳拖拉机厂	35130	34788	99.0	13750	39.5
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7281	7005	96.2	417	6.0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5900	5565	94.3	5565	100.0
兰州石油机械厂	15622	14381	92.1	2454	17.1
哈尔滨仪表厂	2790	2494	89.4	2494	100.0
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	4890	4356	89.1	2916	66.9
西安绝缘材料厂	2767	2455	88.7	941	38.3
沈阳风动工具厂	2180	1893	86.8	1893	100.0
湘潭船用电极厂	1750	1502	85.8	162	10.8
西安高压电瓷厂	3857	3228	83.7	795	24.6
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	14980	12042	80.4	8529	70.8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4896	3869	79.0	234	6.0
总体情况	259357	283588	109.3	165702	58.4

这些重大项目的建设投产，使新中国的机械工业从无到有地建立了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石油化工设备、冶金矿山设备、工程机械等制造业，扩大和加强了机床工

具、机车车辆和造船工业。沿海老工业城市的机械工业得到迅速提高，并初步形成哈尔滨、洛阳、西安、兰州等一批新的机械工业基地。

机械工业的24项建设规模与形成生产能力相同，经过十年的建设，形成了高中压锅炉4080吨/年、解放牌汽车3万辆、车床4000台、量刃具512付/1032吨、各种风动工具2万台/554吨、各种电缆3万吨、电汽仪表汽车仪表电度表、汽轮机60万千瓦、各种机床4497台/1.6万吨、机床380台、拖拉机4.5万台、滚珠轴承1000万套、石油设备1.5万吨、各种电瓷1.5万吨、高压开头1.3万套整流器60万千瓦、各种绝缘材料6000吨、电力电容器100千伏安6.1万只、矿山机械设备2万吨、汽轮发电机60万千瓦、轧机、炼钢、炼铁设备6万吨、电刷及碳素制品100吨、滚珠轴承655万套、电机11万千瓦、化工设备2.5万吨的生产能力。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8　　机械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情况

新增能力 / 项目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	高中压锅炉4080吨/年	同规模	
长春第一汽车厂	解放牌汽车3万辆	同规模	同规模
沈阳第一机床厂	车床4000台	同规模	同规模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量刃具512付/1032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沈阳风动工具厂	各种风动工具2万台/554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沈阳电缆厂	各种电缆3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哈尔滨仪表厂	电汽仪表汽车仪表电度表	同规模	同规模
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	汽轮机60万千瓦	同规模	
沈阳第二机床厂	各种机床4497台/1.6万吨	同规模	
武汉重型机床厂	机床380台	同规模	
洛阳拖拉机厂	拖拉机4.5万台	同规模	
洛阳滚珠轴承厂	滚珠轴承1000万套	同规模	
兰州石油机械厂	石油设备1.5万吨	同规模	
西安高压电瓷厂	各种电瓷1.5万吨	同规模	
西安开关整流器厂	高压开头1.3万套整流器60万千瓦	同规模	
西安绝缘材料厂	各种绝缘材料6000吨	同规模	
西安电力电容厂	电力电容器100千伏安6.1万只	同规模	
洛阳矿山机械厂	矿山机械设备2万吨	同规模	1万吨
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	汽轮发电机60万千瓦	同规模	

项目 \ 新增能力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富拉尔基重机厂	轧机、炼钢、炼铁设备6万吨	同规模	
哈尔滨碳刷厂	电刷及碳素制品100吨	同规模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滚珠轴承655万套	同规模	
湘潭船用电极厂	电机11万千瓦	同规模	
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化工设备2.5万吨	同规模	

经过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的建设，中国机械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奠定了机械工业的制造基础。1957年一机部系统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2.6倍，平均年增29.5%；主要产品产量比1952年分别增长几倍到几十倍。(见下表)

表19　　“一五”时期一机部新增产品产量情况

产品名称	单位	1952年	1957年	1957年比1952年增加的倍数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1.37	2.8	1
冶金设备	万吨	0.02	1.38	68
矿山设备	万吨	0.18	5.29	28
起重设备	万吨	0.7	3.18	3.5
石油设备	万吨	–	0.59	
发电设备	万千瓦	0.54	19.7	35
汽车	辆	–	7904	
轴承	万套	117.9	1060	8
内燃机（商品屋）	万马力	4	69	16

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设备的自给率也大为提高。当时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工程所需的设备，由国内分交供应的比重，按重量计为52.3%，按金额计为45.9%。其中鞍山钢铁公司分别为49%和43%，武汉钢铁公司分别为58%和54%，第一汽车厂分别为62.4%和65.6%，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分别为53.5%和44.6%。从全国来说，“一五”时期国家建设所需设备的国内自给率为60%以上。

第六节 石油工业

新中国建立前，石油炼制工业十分弱小。全国仅在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有几个规模很小的炼油厂，不但技术装备落后，而且多数又遭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有的形同废墟，有的只能勉强维持部分生产。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时，陕西的延长油矿炼油厂和甘肃的玉门炼油厂虽未遭受破坏，仍在坚持生产，但规模很小；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已开始恢复工作，但大部分尚未投入生产。所以，到 1949 年底，全国原油加工能力仅 17 万吨，当年实际加工原油（包括人造石油和进口原油）11.6 万吨，石油产品品种只有 12 种，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四大类产品产量仅 3.5 万吨，当时国内消费的石油产品 90%以上依赖从国外进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石油炼制工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燃料工业部，领导石油工业部门从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组建科研设计队伍，组织和恢复生产。1951 年 10 月，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与商业部石油公司联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第一次全国石油展览会。朱德为展览会剪彩并致词。展览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王震、彭真等领导人先后到会参观，并指出发展石油工业的意义。从 1949 ~ 1959 年的十年间，根据当时原油生产状况和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对石油产品的迫切需要，石油炼制部门一面修复、改造和扩建原有老厂，一面依靠国内力量和从苏联引进技术和装备，建设了几个新的炼油厂，同时加强科研设计力量，从事新产品试制工作，使中国石油炼制工业迅速得到初步的发展。

在苏联援建的“156 项”重点项目中，石油工业 2 项，占项目总数的 1/75。石油工业实际实施的 2 项是：抚顺第二制油厂、兰州炼油厂。抚顺第二制油厂属改建项目，兰州炼油厂属新建项目。

从 1956 ~ 1959 年，历经三年时间，石油工业的 2 项全部建成。石油工业的 2 项都是 1956 年开始施工，1959 年竣工的，建设周期为三年。

石油工业计划安排投资 33223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36885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 111%；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16335 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 44.3%。具体投资构成情况见表 20。

表 20　　石油工业 2 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兰州炼油厂	18223	54.9	19385	52.6	10705	65.5
抚顺第二制油厂	15000	45.1	17500	47.4	5630	34.5
合计	33223	100.0	36885	100.0	16335	100.0

石油工业的 2 项的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全部高于 100%，即：兰州炼油厂 106.4%、抚顺第二制油厂 116.7%。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兰州炼油厂为 55.2%，抚顺第二制油厂为 32.2%。

表 21　　石油工业 2 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
兰州炼油厂	18223	19385	106.4	10705	55.2
抚顺第二制油厂	15000	17500	116.7	5630	32.2
总体情况	33223	36885	111.0	16335	44.3

石油工业的 2 项的形成生产能力与建设规模相同，经过三年的建设，形成了炼油 170 万吨的生产能力。具体情况是：兰州炼油厂炼油 100 万吨；抚顺第二制油厂页岩原油 70 万吨。

表 22　　石油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情况

项目＼新增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兰州炼油厂	炼油 100 万吨	同规模	
抚顺第二制油厂	页岩原油 70 万吨	同规模	
合计	炼油 170 万吨		

总的来说，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 1959 年，中国石油炼制工业在恢复生产和初步发

展中，成就是巨大的，速度是快的。

表 23　　1949～1959 年石油炼制工业主要指标

项目	1949年	1952年	1957年	1959年
原油加工能力（万吨）	17	99	245	579
实际加工原油量（万吨）	11.6	53.3	176.6	395.6
石油产品品种数（个）	12	38	140	309
汽、煤、柴、润产品总量	3.5	25.9	108.9	229.5
石油加工损失率（%）	16.25	12.97	4.63	
石油产品自给率（%）	10	—	—	40.6

尽管由于当时处于初创时期，基础差、起点低，加上原油产量不足，石油产品的自给率只从 1949 年的不足 10%提高到 1959 年的 40.6%，未能根本扭转石油产品严重短缺的局面，石油炼制的技术水平也不够高，但是在短短十年内取得上述成就，仍然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尤为重要的是，十年艰苦创业所取得的初步经验，十年恢复和发展所建设起来的生产企业和取得的技术成果，以及初步形成的生产、科研、设计、施工、教育等方面的队伍，都为 1960 年以后中国石油炼制工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准备了物质、技术和人才的条件。

第七节　化学工业

1953 年，国家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化学工业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地发展化学肥料，相应发展酸、碱、染料等工业，加强化学工业与炼焦、石油、有色金属工业的配合。"在此期间，重点建设了新的化工基地，主要是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和建设的 156 个项目中的 11 项，形成了吉林、兰州、太原三个化工联合企业的雏形；发展了基本化工原料的生产；对上海、天津、大连、南京、沈阳、锦西、青岛等地的老厂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并且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化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为了加强对化学工业的领导，1956 年 5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任命彭涛为部长。

吉林化工区由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吉林热电厂组成，是一个以煤、焦和焦化副产品为原料的化工基地。吉林化工区的建设规模是空前的。吉林肥料厂的设计能力为年产合成氨 5 万吨、稀硝酸 7.7 万吨、浓硝酸 1.5 万吨、硝酸铵 9 万吨、甲醇 0.4 万吨。吉林染料厂的设计能力为年产 7 种还原，冰染染料 0.29 万吨；苯酐、二萘酚、H 酸等 14 种中间体 0.8 万吨；硫酸等 6 种无机化工产品 5 万吨。吉林电石厂的

设计能力为年产电石 6 万吨、碳氮化钙 1 万吨。化工区的建设得到了全国的支援。国家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从各地调集了 3 万名职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这支队伍在艰苦的条件下，顶着凛冽的寒风，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松花江畔，出现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事迹，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模范人物。化工区从 1955 年 4 月开始施工，经过二年半时间基本建成，于 1957 年 10 月 25 日举行了开工典礼。

兰州化工区由兰州肥料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热电厂组成。这是为改变我国化学工业布局在西北建设的化工基地。兰州肥料厂设计能力为年产合成氨 5 万吨、硝酸铵 8.2 万吨、浓硝酸 12 万吨、甲醇 0.87 万吨、四氮六甲环（乌洛托平）0.3 万吨。兰州合成橡胶厂设计能力为年产丁苯橡胶 1.35 万吨，丁腈橡胶 0.15 万吨，聚苯乙烯 0.1 万吨。1956 年肥料厂和合成橡胶厂同时开始建设，从全国各地调集的 1 万多名施工人员，战斗在黄河之滨，历尽艰辛。1958 年 11 月肥料厂建成投产。1960 年 5 月，合成橡胶厂丁苯橡胶装置建成投产，因为原料粮食、酒精供应困难，不久停产。1961 年底，建成我国第一套以炼厂气为原料的乙烯装置。

太原化工区由太原肥料厂、太原化工厂、太原制药厂、太原热电厂组成。太原化工厂的设计能力为年产六六六农药 0.2 万吨、滴滴涕农药 0.15 万吨、烧碱 1.36 万吨、液氯 0.5 万吨以及军工原料等。太原肥料厂设计能力为年产合成氨 5.2 万吨、硝酸铵 9.8 万吨、浓硝酸 3 万吨、甲醇 1.55 万吨、甲醛 1 万吨。太原制药厂原设计能力为年产磺胺噻唑 750 吨、磺胺脒 160 吨、氨苯磺胺 310 吨。后改变设计方案，建成磺胺、维生素、解热药等品种的综合性药厂。太原化工厂 1956 年开始建设，1958 年 7 月投产。太原肥料厂 1957 年建设，1961 年投产。太原制药厂 1958 年建设，1960 年 1 月投产。1958 年 6 月又建成山西磷肥厂（即以后的太原化学工业公司磷肥厂）。

在苏联援建的“156 项”重点项目中，化学工业 7 项，占项目总数的 1/20。化学工业实际实施的 7 项是：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太原化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太原氮肥厂、兰州氮肥厂。化学工业的 7 项全部为新建项目。

从 1954～1957 年的三年间，化学工业的 7 项陆续开始施工。1954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 2 项：吉林氮肥厂、太原化工厂；1955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 2 项：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1956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 2 项：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1954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 1 项，即太原氮肥厂。

历经六年时间，化学工业的 7 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7 年竣工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 2 项；1958 年竣工太原化工厂、吉林染料厂 2 项；1959 年竣工 1 项，是兰州氮肥厂；1960 年竣工的兰州合成橡胶厂、太原氮肥厂 2 项。

化学工业的 7 项最长的建设周期是四年，最短的是二年，平均建设周期三年零一个月。建设周期四年的是太原化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建设周期三年的是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太原氮肥厂、兰州氮肥厂；建设周期二年的是吉林电石厂。

化学工业计划投资 107043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108323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 101.2%；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49299 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 45.5%。具体投资构成情况见表 24。

表24　　化学工业7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吉林氮肥厂	24000	22.4	25722	23.7	25722	52.2
兰州氮肥厂	25180	23.5	23317	21.5	5066	10.3
太原氮肥厂	19000	17.7	19500	18.0	208	0.4
太原化工厂	11000	10.3	11670	10.8	5730	11.6
兰州合成橡胶厂	12340	11.5	11664	10.8	1000	2.0
吉林染料厂	10500	9.8	11461	10.6	6584	13.4
吉林电石厂	5023	4.7	4989	4.6	4989	10.1
合计	107043	100.0	108323	100.0	49299	100.0

化学工业的7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4项，低于100%的有3项，具体投资执行情况见表25。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有2项为100%，它们是：吉林氮肥厂100%、吉林电石厂100%，表明它们都是"一五"时期全部建成的。其余依次为：吉林染料厂57.4%、太原化工厂49.1%、兰州氮肥厂21.7%、兰州合成橡胶厂8.6%、太原氮肥厂1.1%。

表25　　化学工业7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吉林染料厂	10500	11461	109.2	6584	57.4
吉林氮肥厂	24000	25722	107.2	25722	100.0
太原化工厂	11000	11670	106.1	5730	49.1
太原氮肥厂	19000	19500	102.6	208	1.1
吉林电石厂	5023	4989	99.3	4989	100.0
兰州合成橡胶厂	12340	11664	94.5	1000	8.6
兰州氮肥厂	25180	23317	92.6	5066	21.7
总体情况	107043	108323	101.2	49299	45.5

化学工业的7项建设规模与形成生产能力相同，经过6年的建设，形成了合成氨

15.4 万吨，硝酸铵 9.8 万吨的生产能力。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26 化学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情况

项目 \ 新增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吉林染料厂	合成染料及中间体 7385 吨	同规模	
吉林氮肥厂	合成氨 5 万吨，硝酸铵 9 万吨	同规模	
吉林电石厂	电石 6 万吨	同规模	
太原化工厂	硫酸 4 万吨，烧碱 1.5 万吨	同规模	
兰州合成橡胶厂	合成橡胶 1.5 吨	同规模	
太原氮肥厂	合成氨 5.2 万吨，硝酸铵 9.8 万吨	同规模	
兰州氮肥厂	合成氨 5.2 万吨，硝酸铵 9.8 万吨	同规模	
合计	合成氨 15.4 万吨，硝酸铵 9.8 万吨		

经过化工战线广大职工的努力，1957 年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主要化工产品有了成倍增长，硫酸达到 63.2 万吨，增长 2.3 倍；纯碱达到 50.6 万吨，增长 1.6 倍；烧碱达到 19.8 万吨，增长 1.5 倍；合成氨达到 15.3 万吨，化肥（标准化肥）达到 73.63 万吨，增长了 3 倍；轮胎达到 88 万条，增长 1.1 倍；抗生素（即抗生素）达到 34.62 吨，增长 11.5 倍。农药和其他一批化工产品，从无到有，农药达 6.5 万吨，硫铁矿（按含硫 35%计）149 万吨，磷矿（按含 P20530%计）31 万吨。化学工业总产值达到 26.53 亿元，增长 2.4 倍。工业布局除沿海仍占主要比重外，内地的比重开始上升。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基本上适应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第八节 医药工业

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成立后，加强了全国医药工业的领导和统一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 1953 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医药工业。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规模较大的抗生素、磺胺药等新厂，以解决主要药品的自给问题；各大行政区和省市也根据本地需要新建或扩建一批药厂；还对老厂适当投资，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扩建，挖掘生产潜力。1956 年成立化学工业部，医药工业划归化工系统。

华北制药厂和太原磺胺厂，都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华北制药厂是一个大型医药联合企业，1953 年开始筹建，由抗生素厂、淀粉分厂、玻璃分厂组成。

抗生素厂和淀粉分厂分别由苏联保健部和食品工业部负责设计，提供成套设备。玻璃分厂由苏联转包给民主德国负责设计并提供设备。设计能力为年产青霉素和链霉素85.6吨、葡萄糖3362吨，淀粉1.49万吨，以及玉米浆、玉米油和为抗生素生产配套的各种玻璃瓶。总投资7400万元。轻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集中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全国轻工、医药系统选调干部和老工人支援该厂，医药工业管理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兼任筹备处主任和厂长，在现场指挥建设。经过充分准备，于1955年破土动工，1958年6月建成投产，形成固定资产7200万元，投产当年即实现利税1.27亿元，为建设投资的1.7倍。在建设过程中和建成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到该厂视察。

这个大型医药联合企业建设周期短，投资省，见效快，为建设医药企业积累了经验。它的建成，扭转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建厂以来，通过选育高产优良菌种，改革生产工艺，综合利用资源，使发酵单位和收率不断提高，产量增加，成本降低，质量改善。到1983年，抗生素年产量已达1802吨，品种增加到69种，累计上缴利税35亿多元，并向各地新建的抗生素厂输送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成为我国发展抗生素工业的重要基地。

太原磺胺厂（即现太原制药厂）于1953年开始筹建，由苏联负责设计。第一期工程的主要生产车间和公用工程于1959年建成。1957年，鉴于磺胺药的许多品种，在国内已有大量生产，化学工业部决定改变原设计方案，建设包括新磺胺药、维生素、合霉素等品种的综合性化学合成制药企业，改由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设计；并作为第二期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建设。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医药工业2项，占项目总数的1/75。医药工业实际实施的2项是：华北制药厂、太原制药厂。医药工业2项全部为新建项目。

从1954~1958年，历经四年时间，医药工业的2项全部建成。医药工业的2项都是1954年开始施工，1958年竣工的，建设周期为四年。

医药工业计划安排投资953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9542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100.1%；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7135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74.8%。具体投资构成情况见表27。

表27　　医药工业2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华北制药厂	8037	84.3	7626	79.9	6775	95.0
太原制药厂	1500	15.7	1916	20.1	360	5.0
合计	9537	100.0	9542	100.0	7135	100.0

医药工业的2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1项，低于100%的有1项，即太原制药厂为127.7%，华北制药厂为94.9%。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是：华北制药厂88.8%、太原制药厂18.8%。

表28　　医药工业2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太原制药厂	1500	1916	127.7	360	18.8
华北制药厂	8037	7626	94.9	6775	88.8
总体情况	9537	9542	100.1	7135	74.8

医药工业的2项建设规模与形成生产能力相同，经过四年的建设，形成了青霉素、链霉素等115吨、青霉素、链霉素等115吨的生产能力。

表29　　医药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情况

项目＼新增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华北制药厂	青霉素、链霉素等115吨	同规模	
太原制药厂	青霉素、链霉素等115吨	同规模	

到1957年底，我国医药工业已初具规模，共有国营药厂43个，公私合营药厂138个；六大类化学原料药总产量达到2196吨，比1952年增长23.9倍；针剂产量7.3亿支，片剂产量272亿片，分别比1952年增长2.65倍和4.55倍；总产值15.33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比1952年增长3.29倍，平均每年增长26.9%。

1958年，医药工业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生产青霉素、金霉素、维生素B_{12}等产品为主的四川抗生素厂动工兴建。1959年3月，太原制药厂第二期工程开始施工，1960年建成。各地还根据需要重点建设了一批中、小型药厂，其中有上海第二制药厂、武汉抗生素厂、福州抗生素厂；河南省制药厂建设了新厂区（后改名开封制药厂）；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制药厂、延吉制药厂，也在这个时期建成。

许多药厂都组织了新产品研制小组。一些生产制剂的小厂开始研究生产原料药。专业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大专院校相结合，试制成功了一些技术难度较大的产品，如上海通用药厂、华联药厂等在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配合下，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个甾体激素产品黄体酮。这时期还研制成功抗生素、新磺胺药、维生素、解热药、抗癌药等一批

新品种。此外，还研制生产了多种为原料药配套的化工产品。

第九节 轻 工 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轻工业的生产水平是很低的。当时全国轻工业系统的总产值仅有48.4亿元，按同年的全国人口5.4亿人计算，每人年平均产值还不到9元。在当时的轻工业总产值中，包括了大量手工业产品的产值，真正属于现代工业生产的轻工业产品的产值比重就更小。主要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多数也是很低的。不仅比工业生产先进的国家低，而且也大大落后于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在三年恢复时期中，轻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年平均递增速度达到31.4%，主要轻工业产品产量有了成倍增长，接近以至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随着轻工业生产的发展，新产品、新品种日益增多。如造纸工业生产的卷筒新闻纸、感光纸、绝缘纸、油毡原纸，制革工业生产的工业用轮带革和纺织工业用的皮辊、皮圈革，文教用品工业生产的打字机、计算机等等。在增加产量和扩大品种的同时，产品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总之，在短短三年的时间，新中国轻工业的生产建设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有了发展。这一成就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是以建设重工业为中心，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大，轻工业投资的比重小，轻工业投资比重又比纺织工业要小。按照当时的计划安排，在按工业管理部门分类中，轻工业部投资只有6.9亿元，占整个工业投资的2.6%，在工业中按两大部类的投资分配，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只有29.8亿元，占工业总投资的11.2%，与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比例为1：8。

当时，对轻工业投资安排较少，除了由于重工业的基础很薄弱，亟须扩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外，还有以下因素：（1）在轻工业中私营企业比重大，一般占80%左右，许多轻工业行业、企业的设备利用率比较低，原料供应不足，生产潜力比较大；（2）在消费品生产中，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产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依靠手工业生产来补充；（3）在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积金和私营企业的盈利中，逐年有一部分可以投入扩建和新建的项目使用；（4）轻工业企业的建设同重工业比，周期比较短，投资比较少，收效比较快，如果在执行中发现某些行业生产能力不足时，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追加建设任务。

轻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虽不是建设的重点，但是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它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这是因为：（1）轻工业品必须满足人民增长着的需要。当时轻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生产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有些行业生产能力有余，另一方面却是有些产品在数量上或在品种、规格、

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要，有些社会需要的产品还不能生产。五年计划提出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划比1952年增长80%左右，要求轻工业生产增长必须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相适应。(2) 轻工业还要配合重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如重工业需要的工业技术用纸，新闻、出版单位需要的新闻纸和凸版印刷纸，酸碱工业需要的盐等。(3) 要积极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积累建设资金。轻工业积累资金一般具有更多更快的特点，它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中负有重要的任务。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分配给轻工业的投资比较少，轻工业只能抓住几个重点行业来建设。当时，国家确定轻工业的建设重点是造纸、制糖、制盐三个行业。实际执行结果，轻工业部系统（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五年内完成投资14.6亿元，其中上述3个重点行业占了60%。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轻工业仅1项，即佳木斯造纸厂。佳木斯造纸厂1953年开始施工，1957年竣工，建设周期四年。计划安排投资9719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0199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104.9%；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9613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94.3%。

佳木斯造纸厂形成生产能力与建设规模相同，经过四年的建设，形成水泥纸袋5万吨、铜网6万立方米的生产能力，其中，"一五"时期形成水泥纸袋5万吨的生产能力。

轻工业的基建任务完成较好。五年计划规定限额以上的施工项目34个（后又追加23个，合计为57个），其中规定建成29个，实际建成36个，超过计划7个。造纸、制糖、制盐行业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全都按期完成。五年完成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如下表：

表30

项目	1953～1957年基建投资额（亿元）	比重（%）
轻工业部系统	14.6	100
纸、糖、盐合计	8.7	60
其中：造纸	3.8	26
制糖	4.1	28
制盐	0.8	6

由于"一五"时期轻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较好，基本建设新增的生产能力大都超过了计划。在重点行业中，造纸工业5年新增生产能力24.9万吨，超过计划新增生产能力9.5万吨的1.6倍；机制糖新增生产能力62万吨，比1952年的生产能力提高1倍以上；制盐工业新增生产能力151.3万吨；其他轻工业行业增加的生产能力，主要有自行车50万辆，缝纫机7.4万架，皮革24.5万张，日用搪瓷、日用陶瓷、玻璃瓶罐、保温瓶、自来水笔、乳品、罐头、酒精等行业的生产能力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酿酒行业中的贵州茅台、山西杏花村和浙江绍兴等几大名酒厂，也都通过扩建改造新增了生产能力。

第十节 航空工业

1951年4月18日，为适应空军建设，根据中央决定，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局，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修理工作，由段子俊任局长。同时指出：航空工业是具有高度技术性、政治性的一项新工作，“应尽大力予以援助，并及时进行监督指导”。同年7月，政务院任命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兼任局长，由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任副局长。到9月，空军按照中央决定向重工业部移交修理工厂的工作全部完成。至此，航空工业局接收空军划归的工厂16个，兵器工业局划归的工厂2个，共18个，职工近万人。全国人民和人民军队渴望已久的航空工业终于在新中国的怀抱里诞生了。

航空工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修理前线急需飞机的同时，积极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从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实施目标和具体方案。1951年12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议研究确定，航空工业开始执行三至五年内试制成功苏联雅克—18（Як—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5比斯（МИГ—15ЯИС）喷气式歼击机，并投入成批生产的计划。1952年春夏之际，周恩来、陈云、聂荣臻、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又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航空工业建设的部署问题。李富春强调，要积极创造从修理过渡到制造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即：整套的技术资料，整套的技术装备，必须的生产面积，保证原材料供应和有关工业部门的配合发展。陈云指出，飞机工厂严格地说就是精密机器的制造厂。由落后到先进，由简单到复杂，才合乎客观规律，急躁是不行的。飞机是由零件组成的，一定要把制造零件的基础打好，否则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他还特别强调，把航空工业建设放在优先地位，不会犯原则性错误。1952年5月，由聂荣臻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对创建时期的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7月，周总理对航空工业一年多来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重申了航空工业的发展方针、原则和基本建设规划，并进一步作出轻型轰炸机工厂建设的安排。8月，为了加强对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的领导，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国防工业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同时任命王西萍为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分党组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精心筹划，构成了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大纲，揭开了由修理走向制造的序幕。

1953年5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41个重点项目（以后增加到“156项”）的协定。其中，航空工业有12项，包括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构成了航空工业的第一批骨干企业，也是航空工业“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重点。

整个建设是按照确保飞机制造的进度、尽快发挥投资效果的要求，分梯次展开的。从1953年起，首先建设南昌飞机厂（制造活塞式教练机）、株洲航空发动机厂（制造活塞式发动机）、沈阳飞机厂（制造喷气式歼击机）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制造喷气式发

动机)。其中，除沈阳航空发动机厂是依靠老厂支援建设的新厂之外，其余三个厂都是由原来的修理厂改扩建而成的。这几个主机厂建成以后，从1956年起，建设重点转移到配套的辅机厂，即机载设备厂，主要有西安的飞机附件厂和发动机附件厂，陕西兴平的航空电气厂和机轮刹车附件厂、宝鸡的航空仪表厂等。

所有上述各类工厂，技术先进，设备精良，成为当时国内高级精密的机械加工企业。其投资和建设难度都比较大，因此国家特别给予重视。“一五”计划期间，航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有充分的保证，设备基本上是从苏联成套购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部门对航空工业建设关怀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在建设急需设备而国外又供应不及的时候，经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批准，特许打开国家储备仓库让航空工业挑选。沈阳航空发动机厂一次就选用设备553台。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都亲自组织领导当地航空工厂的建设。邵式平还担任南昌飞机厂建厂委员会主任。焦若愚多次召开会议，检查、督促和协调建设进度。为保证沈阳飞机厂试飞跑道的施工力量，沈阳市曾削减当年市政建设工程量的1/3。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是航空工业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这批骨干企业在建设中充分利用多数厂址坐落在大、中城市，地质、水文情况清楚，交通运输便利，以及生产产品对象明确，并有定型的图纸技术资料等有利条件，果断地采用一边设计、一边建设、一边生产的做法。厂房建成一部分，就验收一部分，使用一部分。设备也是一面安装，一面验收，一面投入生产。差不多所有大型厂房，都是土建、安装和生产交错进行。施工队伍和工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协同，日夜奋战。加以当时又实行以老带新、老厂包建新厂的办法，有效地缩短了建设周期，提高了投资效果，迅速形成生产能力。

航空工业列入“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12项是：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辽宁410厂、辽宁112厂、江西320厂、湖南331厂、陕西113厂、陕西114厂、陕西115厂、陕西212厂、陕西514厂、陕西422厂。黑龙江、辽宁、江西的6项为改建项目，陕西的6项都是新建项目。

从1953～1955年的三年间，航空工业的12项陆续开始施工。1953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6项，它们是：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辽宁410厂、辽宁112厂、江西320厂、陕西114厂；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6项，它们是：湖南331厂、陕西113厂、陕西115厂、陕西212厂、陕西514厂、陕西422厂。

历经九年时间，航空工业的7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5年竣工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1956年竣工湖南331厂；1957年竣工辽宁410厂、辽宁112厂、江西320厂、陕西114厂、陕西113厂、陕西212厂6项；1958年竣工陕西422厂；1962年竣工的有陕西115厂、陕西514厂。

航空工业的12项最长的建设周期是七年，最短的是一年，平均建设周期三年半。具体情况是：陕西115厂、陕西514厂建设周期为七年；辽宁410厂、辽宁112厂、江西320厂、陕西114厂建设周期为四年；陕西422厂建设周期为三年；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陕西113厂和陕西212厂建设周期为两年；湖南331厂周期为一年。

航空工业计划安排投资8826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91915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104.1%；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85288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92.8%。

航空工业计划安排投资88267万元的具体安排情况详见表31。

表31　　航空工业12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辽宁112厂	16396	18.6	20268	22.1	17976	21.1
辽宁410厂	18807	21.3	19502	21.2	19502	22.9
江西320厂	9680	11.0	8936	9.7	8936	10.5
黑龙江122厂	7514	8.5	7167	7.8	7167	8.4
湖南331厂	5693	6.4	5893	6.4	5893	6.9
陕西514厂	5597	6.3	5597	6.1	2470	2.9
陕西114厂	4860	5.5	5066	5.5	5066	5.9
黑龙江120厂	4330	4.9	4240	4.6	4240	5.0
陕西115厂	3799	4.3	4209	4.6	4209	4.9
陕西113厂	3465	3.9	4014	4.4	4014	4.7
陕西422厂	3788	4.3	3890	4.2	3501	4.1
陕西212厂	4338	4.9	3 133	3.4	2314	2.7
合计	88267	100.0	91915	100.0	85288	100.0

航空工业的12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8项，低于100%的有4项。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有8项为100%，执行投资具体情况见表32。

表 32　　航空工业 12 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投资执行情况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辽宁 112 厂	16396	20268	123.6	17976	88.7
陕西 113 厂	3465	4014	115.8	4014	100.0
陕西 115 厂	3799	4209	110.8	4209	100.0
陕西 114 厂	4860	5066	104.2	5066	100.0
辽宁 410 厂	18807	19502	103.7	19502	100.0
湖南 331 厂	5693	5893	103.5	5893	100.0
陕西 422 厂	3788	3890	102.7	3501	90.0
陕西 514 厂	5597	5597	100.0	2470	44.1
黑龙江 120 厂	4330	4240	97.9	4240	100.0
黑龙江 122 厂	7514	7167	95.4	7167	100.0
江西 320 厂	9680	8936	92.3	8936	100.0
陕西 212 厂	4338	3133	72.2	2314	73.9
总体情况	88267	91915	104.1	85288	92.8

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正确的决策，以及全国经济建设高潮的有力推动，使航空工业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丰硕成果。五年共建成企事业单位 42 个，平均每年建成 8 个以上。其中，工厂 19 个，学校 19 所，仓库 4 座。原定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提前一年完成。12 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有 8 个提前一年到一年半建成，4 个按期建成。完成的项目经国家验收，质量全部达到"良好"。工厂建成后迅速投产，使固定资产投资动用率达到 82.7%。到 1957 年底，航空工业拥有建筑面积 355 万平方米；金属切削设备 11160 台，是 1952 年的 5.5 倍；职工 10 万人，是 1952 年的 3.3 倍。所有这些，使航空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只能进行飞机修理的比较小的行业，变成了具备成批制造活塞式教练机和喷气式歼击机能力的新兴产业，成为国家重要的高级精密机械制造部门。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成就。

第十一节 电子工业

作为军民结合的电子工业归属国防工业，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50年代初期，电子工业处于萌芽阶段，产品很少，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还没有被普遍认识，而在长期战争环境中，人们对军用电子装备的重要性却有深刻的体会，归口国防工业系统，可以得到部队和国防工业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有利于通过国防建设带动电子工业的发展。因此，归属国防工业以后，并没有改变电子产品军民两用的性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始终是电子工业的发展方针。

电子工业归属国防工业以后，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加强了对全国电子工业的规划和统一领导，从体制上解决了建设投资渠道问题。同时，苏联和民主德国援建的工程项目也正式被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为电子工业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准备了条件。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为了改变电子工业严重落后的面貌，1953年，第二机械工业部确定电子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建设无线电基础工业和一些缺门工业，把电子管厂和无线电元件厂的建设放到优先位置；为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急需，要建设一批雷达工厂和为航空配套的飞机电台及导航设备工厂；在民用工业方面，主要建设自动电话交换机工厂。同时，相应地建设科研和教育事业，以奠定电子工业发展的基础。

第二，用现代化先进技术，逐步对原有电信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改建工作。

第三，对私营电信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将电子工业的建设摆到了重要位置，共投资5.55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1.1%，列入苏联援建的重点建设项目的有10个9，它们是：北京774厂、北京738厂、陕西853厂、陕西782厂、四川784厂、四川788厂、四川715厂、陕西786厂、四川719厂、山西785厂。除北京774厂为改建项目外，其余都是新建项目。

从1954~1957年的三年间，电子工业的10项陆续开始施工。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1项，是北京774厂；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5项，它们是：北京738厂、陕西853厂、四川715厂、陕西786厂、四川719厂；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5项，它们是：陕西782厂、山西785厂；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5项，它们是：四川784厂、四川788厂。

历经六年时间，电子工业的7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6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是北京774厂；1957年竣工的项目有4项，它们是：北京738厂、四川715厂、四川719厂、陕西782厂；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它们是：陕西853厂、陕西786厂；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是山西785厂；1960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它们是：四川

784厂、四川788厂。

电子工业的7项最长的建设周期是三年，最短的是一年，平均建设周期两年零四个月。具体情况是：陕西853厂、四川784厂、四川788厂、陕西786厂和山西785厂建设周期为3年；北京774厂、北京738厂、四川715厂和四川719厂建设周期为两年；陕西782厂建设周期为一年。

电子工业计划安排投资56 612万元，实际完成投资47523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83.9%；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34337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72.3%。具体投资构成情况见表33。

表33　　电子工业10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北京774厂	7274	12.8	7901	16.6	7901	23.0
陕西786厂	8426	14.9	7327	15.4	7015	20.4
山西785厂	6498	11.5	7221	15.2	1384	4.0
陕西853厂	7718	13.6	6741	14.2	4927	14.3
四川784厂	6227	11.0	4143	8.7	1353	3.9
四川715厂	5546	9.8	3749	7.9	3749	10.9
四川788厂	4722	8.3	3332	7.0	899	2.6
陕西782厂	3595	6.4	2434	5.1	2434	7.1
北京738厂	2789	4.9	2411	5.1	2411	7.0
四川719厂	3817	6.7	2264	4.8	2264	6.6
合计	56612	100.0	47523	100.0	34337	100.0

电子工业的25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2项，低于100%的有8项，"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有5项为100%，投资具体执行情况见表34。

表 34　　电子工业 10 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山西 785 厂	6498	7221	111.1	1384	19.2
北京 774 厂	7274	7901	108.6	7901	100.0
陕西 853 厂	7718	6741	87.3	4927	73.1
陕西 786 厂	8426	7327	87.0	7015	95.7
北京 738 厂	2789	2411	86.4	2411	100.0
四川 788 厂	4722	3332	70.6	899	27.0
陕西 782 厂	3595	2434	67.7	2434	100.0
四川 715 厂	5546	3749	67.6	3749	100.0
四川 784 厂	6227	4143	66.5	1353	32.7
四川 719 厂	3817	2264	59.3	2264	100.0
总体情况	56612	47523	83.9	34337	72.3

“一五”计划时期，全部电子工业共完成建筑面积 171.8 万平方米，新增固定资产 3.8 亿元。建成的项目，一般建设周期短，工程质量好，经济效益高。如北京电子管厂总投资为 1.028 亿元，建筑面积 141 895 平方米，其中厂区面积 68181 平方米，职工 5 200 人，机械设备 5 717 台（套）。1954 年 6 月开工兴建，1956 年 6 月交付国家验收投产，工程质量总评为优等，一次试车即生产出合格的电子管，投产两年以后便回收了全部投资。成都宏明无线电器材厂、北京有线电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的投资回收期分别为一年、两年、三年。

这一时期的建设特点，一是统一规划，重点明确，全国一盘棋，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属于“156 项”的重点建设。当时，除资金、物资集中用于重点建设外，中央还按照统一部署，特地从各省市选了一批有较高文化和丰富经验的优秀领导干部支援电子工业重点项目的建设。二是尊重科学，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认真进行技术经济方案论证，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较为充分地做好了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三是除老厂、老所给予支援部分技术和管理骨干力量外，积极进行生产人员的培训以及技术资料的消化和各项生产的准备工作。四是城市建设同工厂建设同步进行。重点建设地区，如北京、西安、成都电子工业区的建设，都成立了总甲方，负责组织厂外工程建设。五是科研、教育事业的建设同工厂建设配套进行，实现了生产、科研、教育全面发展的好形势。“一五”计划期间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以后电子工业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第十二节 兵器工业

根据1953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苏联援助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其中为兵器工业建设16个项目。1956年4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又签订了补充援建协定，其中兵器工业有6个项目。这些项目既有新兴行业也有补缺配套的工程，其中包括坦克、高射武器、航空武器、水中兵器以及配套的弹药、引信、火炸药和军用光学仪器等。这批项目工程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建设投资额多，任务十分艰巨。

1952年秋开始，组建了基本建设管理、勘测、设计和施工等专业机构，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建设工作。

新厂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3~1954年为建设前期工作阶段；1955~1959年为全面施工阶段；1960~1963年为工程收尾阶段。

"一五"计划期间，兵器工业的骨干工程建设全面展开。这次大规模建设，是在二机部统一领导下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

在编制计划任务书、选择厂址中，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对每一个项目都根据产品纲领、生产组织或工艺特点，以及原材料和能源流向、交通运输等因素，精打细算，核实占地面积、投资总额、建设期限和经济效益，进行了认真分析，制定了最佳方案。选择厂址从战略布局、地质、水文、地震、交通运输和通信条件、水源和电源及半成品供应网络、排污排水、地方建筑材料、劳动力来源以及职工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等，全面衡量对比，最后确定厂址。为了选择厂址，选址人员跋山涉水，一个点一个点查勘，甚至跨越几个省，十分艰辛。如坦克制造工厂的厂址选择，起初把主机与发动机两个具有相互依存性的工厂定点在原材料丰富，能源充足，交通方便的包头。经过进一步考察，该地区常年风沙较大，不适宜发动机生产。经过多方比较，把发动机厂转到相距不远、交通方便的山西大同，选址中三易其地。

水文、地质、气象资料，是工厂设计的重要依据。803厂筹建组会同勘测人员，顶着烈日，沿河道步行百余里，察勘地形和古建筑，走访老人，了解水文、地震等第一手资料。447厂的选址用了一年时间，对厂区及其周围作了全面的勘测，实测面积达133平方公里，钻孔155个，钻孔深度达1927米，广泛地收集到了有关气象、水文、矿产、土壤、交通、工业、建筑材料、地震等方面资料150份。

工程设计则严格按照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进行。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规定：苏方承担技术设计和初步工程设计；中方除了为苏方工程设计提供必要的资料外，还负担厂区施工图设计以及厂前区、生活区和室外工程的设计。兵器工业的工程设计队伍是一支年轻的专业技术力量，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指引下，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保证了工程施工的需要。

这批骨干项目大部分建在西北大孔性土壤地区，具有遇水湿陷的特性，勘测设计人员认真研究，找出了处理方法。大孔性土壤经过处理后，不但保证了工程质量，而且为国家建委编制《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二机部勘测公司在太原市兰村水厂的勘测定点，不但为新建企业用水提供了保证，而且为太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可靠的主水源，获得山西省的好评。

经过两年紧张的前期工作，1955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施工。尽管这些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比较充分，又有苏联专家指导，但作为第一次进行如此大规模建设，困难还是很多的。突出的问题是新建项目多，工程量大。兵器工业根据国家国防建设的部署，运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分期分批施工建设。以坦克和航空配套项目为重点，纵向排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一批一批地进行建设。西安地区建设工程比较集中，有8个大型项目。根据总的配套要求，结合地区施工条件，优先安排了为航空工业配套的项目。列入第一批施工的847厂，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设备1300台，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957年末建成投产，试制成功了航空火炮，保证了中国喷气式歼击机的配套需要。包头地区优先安排了617厂的建设，这是一个超大型企业，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主要设备5000多台，其中有中国第一台16吨模锻锤以及2000吨水压机等重型锻压设备，投资2亿多元。土建工程和安装工程十分庞大艰巨。由于厂址地处塞外，建设条件差，施工难度更大。但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全面施工，前后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就把一个大型工厂建成了，首次试制成功了中国的主战坦克，并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大典中，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在建设兵工新厂的同时，国务院狠抓了相关的交通、能源、原材料以及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与新厂统筹规划，配套建设，同步施工。使这些新厂建成后立即发挥应有的能力。为了统一管理新厂建设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工作，二机部在新建工厂集中的地区设立了总甲方办公室，有力地促进了与工厂建设有关的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在建设生产性设施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做到了生产与生活并举，实现了同步建设。这一系列同步建设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也是成功的经验。

1956年，在中国“156项”骨干工程的建设全面展开之际，国民经济出现了“过热”倾向。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适当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合理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国防工业的投资重点是新兴的航空和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面临投资减少的形势。是放慢建设进度，还是保证重点放慢一般？经过认真分析，选择了后一条道路。1957年调整了工程项目，撤销了2个项目，其产品分交其他工厂承担；压缩了6个项目的建设规模；缓建了1个项目。经过调整，兵器工业的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趋于协调，保证了总的建设步伐。到1959年末，这批新型企业大部分基本建成和全部竣工，设计和施工质量优良，建设效果好。加上经过技术改造的老企业，初步构成兵器工业生产体系，使武器装备的生产完全立足于国内。

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中断援建合同。当时兵器工业有两个项目正在全面施工，11个项目正进行设备安装，收尾工程繁重。苏联撤退专家，给兵器工业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兵器工业建设者继承和发扬老兵工优良传统，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继续建设。743

厂制造炮弹的关键设备——专用水压机成套设备，苏联停止提供，太原重型机器厂和沈阳重型机器厂勇敢地承担了制造任务，他们密切配合，精心设计，精心制造，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提供了符合要求的全套设备。

三个火药和炸药厂建设规模都比较大，专用设备也多，苏联中断设备供应后建设困难更大。兵器工业采取了分别轻重缓急、分期建设的办法，于60年代初就把重点生产线基本建成，其余工程延迟到60年代中期收尾建成。845厂地处秦岭脚下，为预防洪水与干旱，设计建成了大型梯级排洪工程与涝河水源工程，经受了特大洪水冲击的考验。805厂的工程设计，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对废水废气设计了行之有效的治理工程。

第二批协议中的三个军用光学仪器厂建设，也是在苏联中断援建协议，停止提供设计图纸与设备后，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208厂由第五设计院负责施工设计，他们认真审核了苏方的技术设计，并根据新的情况修改了原设计方案。如：为提高熔炼车间的负荷能力，把5吨桥式吊车改为10吨钳式吊车；用于石英粉碎的球磨机干磨改为水轮碾湿粉碎，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218厂主厂房采用了双曲扁薄壳屋盖的新型结构，在设计上有所创新。三个光学厂也是到60年代中期全部收尾竣工的。

苏联援建的24个项目，建设中虽然撤销了3个项目，调整了6个项目的规模，但从建设内容来说，基本上保持了原来24个项目的基本内容。这些项目累计投资21亿元，建筑面积近400万平方米，主要设备1.9万台。山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兵器工业16项，占项目总数的1/9强。兵器工业实际实施的7项是：山西616厂、山西743厂、山西245厂、山西763厂、山西908厂、内蒙447厂、内蒙617厂、陕西847厂、陕西248厂、陕西803厂、陕西844厂、陕西843厂、陕西804厂、陕西845厂、甘肃805厂、山西884厂。兵器工业16项全部是新建项目。

从1953～1956年的三年间，兵器工业的16项陆续开始施工。1953年开始施工的是山西743厂；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11项：山西763厂、山西908厂、内蒙447厂、陕西847厂、陕西248厂、陕西803厂、陕西844厂、陕西843厂、陕西804厂、陕西845厂、山西884厂；1956年开始施工的有山西616厂、山西245厂、内蒙617厂、甘肃805厂4项。

历经七年时间，兵器工业的16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7年竣工陕西847厂、陕西248厂2项；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7项：山西743厂、山西763厂、山西908厂、陕西803厂、陕西845厂、山西616厂、内蒙617厂；1959年竣工5项：内蒙447厂、陕西844厂、陕西843厂、山西884厂、山西245厂；1960年竣工陕西804厂、甘肃805厂2项。

兵器工业的16项最长的建设周期是五年，最短的是两年，平均建设周期三年零四个月。具体情况是：山西743厂和陕西804厂建设周期为五年；内蒙447厂、陕西844厂、陕西843厂、甘肃805厂和山西884厂建设周期为四年；山西245厂、山西763厂、山西908厂、陕西803厂和陕西845厂建设周期为三年；山西616厂、内蒙617厂、陕西847厂和陕西248厂建设周期为两年。

兵器工业计划投资216531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96195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90.6%；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44073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73.4%。

兵器工业计划安排投资216531万元的具体安排情况详见表35。

兵器工业的16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1项，低于100%的有15项，“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有2项为100%，具体执行情况如表36。

表35 兵器工业16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 \ 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内蒙617厂	28073	13.0	27748	14.1	20577	14.3
内蒙447厂	18673	8.6	27720	14.1	16857	11.7
陕西845厂	27930	12.9	27573	14.1	18820	13.1
陕西844厂	19706	9.1	17878	9.1	10905	7.6
山西245厂	15 342	7.1	14849	7.6	13913	9.7
山西743厂	16073	7.4	14189	7.2	9636	6.7
陕西843厂	11000	5.1	10122	5.2	8093	5.6
甘肃805厂	16437	7.6	8437	4.3	3544	2.5
山西616厂	11885	5.5	8073	4.1	7682	5.3
山西908厂	9144	4.2	6499	3.3	5476	3.8
陕西803厂	8440	3.9	6234	3.2	5680	3.9
陕西804厂	9414	4.3	6178	3.1	4473	3.1
山西763厂	7113	3.3	5992	3.1	4688	3.3
陕西248厂	6740	3.1	5686	2.9	5686	3.9
陕西847厂	6832	3.2	5569	2.8	5569	3.9
山西884厂	3729	1.7	3448	1.8	2474	1.7
合计	216531	100.0	196195	100.0	144073	100.0

表 36　　兵器工业 16 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内蒙 447 厂	18673	27720	148.4	16857	60.8
内蒙 617 厂	28073	27748	98.8	20577	74.2
陕西 845 厂	27930	27573	98.7	18820	68.3
山西 245 厂	15342	14849	96.8	13913	93.7
山西 884 厂	3729	3448	92.5	2474	71.8
陕西 843 厂	11000	10122	92.0	8093	80.0
陕西 844 厂	19706	17878	90.7	10905	61.0
山西 743 厂	16073	14189	88.3	9636	67.9
陕西 248 厂	6740	5686	84.4	5686	100.0
山西 763 厂	7113	5992	84.2	4688	78.2
陕西 847 厂	6832	5569	81.5	5569	100.0
陕西 803 厂	8440	6234	73.9	5680	91.1
山西 908 厂	9144	6499	71.1	5476	84.3
山西 616 厂	11885	8073	67.9	7682	95.2
陕西 804 厂	9414	6178	65.6	4473	72.4
甘肃 805 厂	16437	8437	51.3	3544	42.0
总体情况	216531	196195	90.6	144073	73.4

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项目全部竣工投产。这批项目的建成，填补了中型坦克、大中型口径高射炮、大口径炮弹、特种引信和火工品、航空火炮和弹药、水中兵器、防化器材、军用光学仪器等装备的空白，增加了火药、炸药的生产能力，使兵器工业进入了国际 50 年代中期水平。

第十三节　航天工业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

代”，航天技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当时我国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威胁之下。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把国防现代化建设摆在突出的地位。

在当时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为了把我们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首先取得突破，党和国家决定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为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专门听取了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意见。如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曾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了刚回国不久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关于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党中央果断作出的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指出了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的主攻方向，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航天工业2项。航天工业实际实施的2项是：北京211厂、辽宁111厂。前者为新建项目，后者为改建项目。

1953年、1954年，航天工业的2项陆续开始施工。辽宁111厂是1953年开始施工的，北京211厂是1954年开始施工的。

历经四年时间，航天工业的2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辽宁111厂于1956年竣工，北京211厂于1957年竣工。航天工业的2项的建设周期都是三年。

航天工业计划安排投资13 53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8941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66%；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8941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100%。

航天工业计划安排投资13 538万元的具体安排情况是：辽宁111厂7181万元，占53%；北京211厂6 357万元，占47%。

实际完成投资8941万元的具体情况见表37。

表37　　航天工业2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北京211厂	6357	47.0	5502	61.5	5502	61.5
辽宁111厂	7181	53.0	3439	38.5	3439	38.5
合计	13538	100.0	8941	100.0	8941	100.0

航天工业的2项的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都低于100%，即北京211厂86.6%、辽宁111厂47.9%。但“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2项都为100%，表明它们都是“一五”时期全部建成的。

表 38　　航天工业 2 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北京 211 厂	6357	5502	86.6	5502	100.0
辽宁 111 厂	7181	3439	47.9	3439	100.0
总体情况	13538	8941	66.0	8941	100.0

1958 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一方面开始进行导弹研制基地和发射场的建设，一方面开始仿制苏联 P－2 近程地对地导弹（工程代号为"1059"）和几种战术导弹。仿制工作的开展，加速了我国掌握导弹、火箭技术的步伐。

1960 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从反面激发了我国导弹研制人员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他们刻苦学习，边学边干，克服工艺技术、器材设备以及火箭燃料等方面的重重困难，把仿制 P－2 导弹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第十四节　船舶工业

1950 年 5 月 18 日，毛泽东主席在致斯大林的函中提出，为了更快地巩固中国国防，加强中国海军建设，请苏联政府给予经济援助。函中具体提到，为建造护航驱逐舰、大型猎潜艇、基地扫雷艇、远航鱼雷快艇、装甲艇等，请许可输入材料、发动机、辅助机器和武器，在中国船厂建造。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根据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的指示，海军对购买舰艇的计划作了调整。

1952 年 4 月，中国政府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罗舜初等赴苏，与苏联指派的海军部代表商谈用贷款方式购买一批海军战斗舰艇及成套材料和设备。经多次协商，苏方同意将部分舰艇及其建造技术有偿地转让给中国，在中国船厂进行装配建造。1953 年 6 月 4 日，中苏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六四"协定。协定规定，在中国船厂建造期间，苏联向中国派遣技术专家给予指导，并接受中国造船人员在苏联工厂进行培训。

在苏联援建的"156 项"重点项目中，船舶工业 4 项，占项目总数的 1/37 强。船舶工业实际实施的 4 项是：辽宁 431 厂、河南 407 厂、陕西 408 厂、山西 874 厂。船舶工业的 4 项都是新建项目。

从 1956～1958 年的两年间，船舶工业的 4 项陆续开始施工。1956 年开始施工的项

目有3项，它们是辽宁431厂、河南407厂、陕西408厂；1958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有1项，是山西874厂。

历经十年时间，船舶工业的4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60年竣工：辽宁431厂、河南407厂、陕西408厂；1966年竣工山西874厂。

船舶工业的4项最长的建设周期是八年，最短的是四年，平均建设周期五年。具体情况是：山西874厂建设周期为八年，辽宁431厂、河南407厂、陕西408厂建设周期为四年。

船舶工业计划安排投资347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30711万元，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88.5%；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2300万元，"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7.5%。

船舶工业计划安排投资34700万元的具体安排情况见表39。

表39　船舶工业4项投资额的具体构成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山西874厂	10000	28.8	14378	46.8		0.0
陕西408厂	6700	19.3	6386	20.8	400	17.4
辽宁431厂	10000	28.8	5610	18.3	1753	76.2
河南407厂	8000	23.1	4337	14.1	147	6.4
合计	34700	100.0	30711	100.0	2300	100.0

船舶工业的4项建设中，实际完成投资占it划完成投资的比重高于100%的有1项，即山西874厂，为143.8%；低于100%的有4项，它们是：陕西408厂95.3%、辽宁431厂56.1%、河南407厂54.2%。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完成投资的比重是：辽宁431厂31.2%、陕西408厂6.3%、河南407厂3.4%。山西874厂是"一五"以后开工建设的。

表 40　船舶工业 4 项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投资的执行情况
（按实际完成占计划安排投资比重排序）

项目 \ 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安排投资的比重%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万元）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占实际投资的比重%
山西 874 厂	10000	14378	143.8		0.0
陕西 408 厂	6700	6386	95.3	400	6.3
辽宁 431 厂	10000	5610	56.1	1753	31.2
河南 407 厂	8000	4337	54.2	147	3.4
总体情况	34700	30711	88.5	2300	7.5

到 1959 年，上述各型舰艇都已基本建成。“六四”协定补充协议中规定转让给中国建造的后续舰艇，也于 60 年代初全部建成。据统计，到 1960 年，船舶工业管理局系统共建造 6 种型号的舰艇 116 艘，连同其他各种军用舰艇在内，共计 484 艘。

第二章 地区布局

为了改变旧中国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并且考虑国防的要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的上海、天津、广州、无锡、青岛、沈阳、抚顺、本溪、鞍山、大连一带，其中尤以上海最为突出。1949年，上海一市的工业产值即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5%以上。有限的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武汉、太原、重庆等少数大城市。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弱，近百年来始终没有工业基点。西北工业最集中的两个城市——西安和兰州，其工业较之东北各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点相差悬殊。如1949年，兰州市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0.034%。这种状况既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因而，在最后施工150个项目中，相当一部分安排在了内地诸省。“156项”中实际实施的150项具体分布在17个省、区、直辖市，其中，辽宁、陕西各24项，各占实际实施总数的16%；黑龙江22项，占14.7%；山西15项，占10%；吉林与河南各10项分别各占6.7%；甘肃8项，占5.3%；四川6项，占4%；河北、内蒙各5项，分别各占3.3%；北京、云南、湖南、江西各4项，分别各占2.7%；湖北3项，占2%；安徽、新疆各1项各占0.7%。

按地区域统计，计划投资，实际投资以及在“一五”期间完成投资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实际实施的150项在17省区市的投资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情况 省区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辽宁	459537	22.7	507521	25.9	354246	33.0
黑龙江	189161	9.4	216483	11.0	141344	13.2
陕西	182744	9.0	171403	8.7	112057	10.4
河南	261604	12.9	159704	8.1	46705	4.4
内蒙古	160897	8.0	159003	8.1	49332	4.6
湖北	170178	8.4	154805	7.9	39820	3.7
吉林	136558	6.8	145510	7.4	132772	12.4

省区＼投资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甘肃	146614	7.3	139736	7.1	42718	4.0
山西	133531	6.6	131880	6.7	63073	5.9
云南	57681	2.9	55602	2.8	18175	1.7
河北	28077	1.4	28264	1.4	12732	1.2
北京	24356	1.2	25194	1.3	16339	1.5
江西	24697	1.2	25132	1.3	16196	1.5
四川	28556	1.4	22082	1.1	12751	1.2
湖南	13217	0.7	14255	0.7	12915	1.2
新疆	3270	0.2	3275	0.2	1981	0.2
安徽	1500	0.1	1486	0.1	472	0.0
合计	2022178	100.0	1961335	100.0	1073628	1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17 省、区、市按照计划安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以及"一五"时期完成投资的排序基本上是一致的，辽宁省是这三方面投资最多的省份，所占比重分别为 22.7%、25.9%和 33%；其次投资比较多的省份是黑龙江、陕西、河南、内蒙古、湖北、吉林、甘肃和山西，这 8 省的计划安排投资达 1381287 万元，占 68.4%，实际完成投资 1278524 万元，占 65%；"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为 627821 万元，占 58.6%。

表 2　　　实际实施的 106 项民用项目在 17 市省区的投资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省区＼投资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辽宁（20 项）	407153	25.2	458702	28.9	311576	39.0
黑龙江（20 项）	177317	11.0	205076	12.9	129937	16.3
河南（9 项）	253604	15.7	155367	9.8	46558	5.8
湖北（3 项）	170178	10.6	154805	9.8	39820	5.0
吉林（10 项）	136558	8.5	145510	9.2	132772	16.6
甘肃（7 项）	130177	8.1	131299	8.3	39174	4.9
内蒙古（3 项）	114151	7.1	103535	6.5	11898	1.5
山西（7 项）	53747	3.3	57231	3.6	17820	2.2
云南（4 项）	57681	3.6	55602	3.5	18175	2.3
陕西（7 项）	40396	2.5	43366	2.7	16481	2.1

省区＼投资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河北（5项）	28077	1.7	28264	1.8	12732	1.6
江西（3项）	15017	0.9	16196	1.0	7260	0.9
北京（1项）	7936	0.5	9380	0.6	525	0.1
四川（2项）	8244	0.5	8594	0.5	4486	0.6
湖南（3项）	7524	0.5	8362	0.5	7022	0.9
新疆（1项）	3270	0.2	3275	0.2	1981	0.2
安徽（1项）	1500	0.1	1486	0.1	472	0.1
合计	1612530	100.0	1586050	100.0	798689	100.0

表3 实际实施的44项军工项目在11省区市的投资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省区＼投资额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陕西（17项）	142348	34.7	128037	34.1	95576	34.8
山西（8项）	79784	19.5	74649	19.9	45253	16.5
内蒙古（2项）	46746	11.4	55468	14.8	37434	13.6
辽宁（4项）	52 384	12.8	48819	13.0	42670	15.5
北京（3项）	16420	4.0	15814	4.2	15814	5.8
四川（4项）	20312	5.0	13488	3.6	8265	3.0
黑龙江（2项）	11844	2.9	11407	3.0	11407	4.1
江西（1项）	9680	2.4	8936	2.4	8936	3.3
甘肃（1项）	16437	4.0	8437	2.2	3544	1.3
湖南（1项）	5693	1.4	5893	1.6	5893	2.1
河南（1项）	8000	2.0	4337	1.2	147	0.1
合计	409648	100.0	375285	100.0	274939	100.0

通过“156项”工程以及为其配套项目的建设，我国工业布局迅速展开。由于一个重点项目，可以带动所在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城

市建设，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因而，“156项”在各省的布局，极大地促进该省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辽 宁 省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建设的重点为重工业，重点建设的省份则为辽宁。为了合理利用辽宁和东北地区已有的工业基础，国家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基本上完成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新建、改建，其中包括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和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辽宁是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辽宁担负着建设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的光荣任务。

为了迅速完成辽宁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国家在辽宁投入了巨额的资金。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辽宁的基本建设不仅规模大，而且在投资的分配和使用上，认真执行了大力改造原有经济基础和集中力量进行重工业建设的方针。五年间国家在辽宁共投资65.1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1.8%。其中：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为46.4亿元，占同期全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8.5%。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投资为43.6亿元，占同期全国重工业投资总额的20.5%和全省工业总投资的94%。重点发展冶金、机械、化工、建材以及煤、电、油等能源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绝大部分用于改建、扩建，也搞了部分新建，分别占全省投资总额的73.1%和25%，对辽宁工业的半殖民地畸形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根本改造。为了迅速完成鞍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在投资分配上，注意了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中部城市群和阜新煤、电基地的建设，这五个市的基本建设投资达49.4亿元，占全省总投资的76%。其中：鞍山市占29.3%，沈阳市占18.6%。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省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即大中型项目）共有175个，其中工业建设项目98个，占同期全国工业大中型项目的10.6%。在重工业建设项目中，属于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24项安排在辽宁建设，是项目数与投资额最多的省份。辽宁的24项包括冶金4项、机械4项、航空和造船4项、煤矿8项、电力3项、石油1项。这24项重点工程列为全省基本建设重点项目中的重点，在重工业总投资中这些重点工程的投资占65%以上，完成这些重点工程对把辽宁建设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宁的24项包括钢铁工业2项（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有色金属工业2项（抚顺铝厂、杨家杖子钼矿），煤炭工业8项（阜新新邱竖井、阜新平安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东露天煤矿、抚顺老虎台斜井、抚顺西露天煤矿、抚顺胜利斜井、抚顺龙凤竖井），电力工业3项（抚顺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大连发电厂），石油工业1项（抚顺石油二厂），机械工业5项（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

具厂、沈阳电缆厂、大连造船厂），国防军事工业3项（112厂、410厂、431厂）。与国家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辽宁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730个。改建扩建了抚顺钢厂、大连钢厂、沈阳冶炼厂、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锦州铁合金厂、沈阳第三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水泵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玻璃厂、大连玻璃厂等。“一五”时期，辽宁新建和扩建的这些工业项目，总投资达46.41亿元，占全国同期工业建设投资的18.5%，占全省经济建设投资总额的71.3%，其中重工业建设投资达43.6亿元，占全省工业建设总投资的93.9%。

从1950~1956年的六年间，辽宁的24个项目陆续开始施工。1950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阜新海州露天矿；1951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阜新热电站；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抚顺电站、抚顺铝厂（一、二期）、沈阳风动工具厂、鞍山钢铁公司、阜新平安立井；1953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本溪钢铁公司、抚顺龙凤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西露天矿、抚顺胜利矿、辽宁112厂、辽宁410厂、辽宁111厂、沈阳第一机床厂；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大连热电站、沈阳电缆厂、阜新新邱一号立井；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沈阳第二机床厂；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抚顺第二制油厂、抚顺东露天矿、杨家杖子钼矿、辽宁431厂。

历经十一年时间，至1961年辽宁的24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4年竣工沈阳风动工具厂1项；1955年竣工沈阳第一机床厂、大连热电站2项；1956年竣工辽宁111厂1项；1957年竣工的项目有10项：阜新海州露天矿、抚顺电站、抚顺铝厂（一、二期）、阜新平安立井、本溪钢铁公司、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辽宁112厂、辽宁410厂、沈阳电缆厂；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5项，它们是阜新热电站、抚顺龙凤矿、阜新新邱一号立井、沈阳第二机床厂、杨家杖子钼矿；1959年竣工2项：抚顺西露天矿、抚顺第二制油厂；1960年竣工2项鞍山钢铁公司、辽宁431厂；1961年竣工的是抚顺东露天矿1项。

辽宁的24项计划安排投资45953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507521刀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354246万元。这24项的投资安排，实际完成情况以及在“一五”期内完成投资的情况，详见表4。

表4　　辽宁省24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鞍山钢铁公司	228000	49.6	268500	52.9	163620	46.2
本溪钢铁公司	31700	6.9	32137	6.3	32137	9.1
辽宁112厂	16396	3.6	20268	4.0	17976	5.1
辽宁410厂	18807	4.1	19502	3.8	19502	5.5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阜新海州露天矿	15 285	3.3	19472	3.8	19472	5.5
抚顺西露天矿	16800	3.7	19091	3.8	6526	1.8
抚顺第二制油厂	15000	3.3	17500	3.4	5630	1.6
抚顺铝厂（一、二期）	18226	4.0	15619	3.1	15619	4.4
抚顺东露天矿	15000	3.3	12807	2.5	5032	1.4
杨家杖子钼矿	9346	2.0	11387	2.2	6726	1.9
沈阳电缆厂	7730	1.7	9031	1.8	9031	2.5
抚顺电站	9016	2.0	8734	1.7	8734	2.5
阜新平安立井	6700	1.5	8334	1.6	8334	2.4
阜新热电站	6550	1.4	7450	1.5	5274	15
沈阳第一机床厂	5650	1.2	6043	1.2	6043	1.7
辽宁431厂	10000	2.2	5610	1.1	1753	0.5
抚顺胜利矿	4200	0.9	4200	0.8	4200	1.2
阜新新邱一号立井	3380	0.7	4056	0.8	2400	0.7
抚顺老虎台矿	3790	0.8	3862	0.8	3862	1.1
辽宁111厂	7181	1.6	3439	0.7	3439	1.0
沈阳第二机床厂	3000	0.7	3188	0.6	1968	0.6
抚顺龙凤矿	2800	0.6	2860	0.6	2537	0.7
大连热电站	2800	0.6	2538	0.5	2538	0.7
沈阳风动工具厂	2180	0.5	1893	0.4	1893	0.5
合计	459537	100.0	507521	100.0	354246	100.0

辽宁的24项分布在沈阳、抚顺、阜新、鞍山、本溪、大连、杨家杖子、葫芦岛8个城市。分布在沈阳的有7项，它们是：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辽宁112厂、辽宁410厂、辽宁111厂。分布在抚顺的有8项，它们是：抚顺东露天矿、抚顺电站、抚顺龙凤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西露天矿、抚顺胜利矿、抚顺第二制油厂、抚顺铝厂（一、二期）。分布在阜新的有4项，它们是：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阜新热电站、阜新新邱一号立井；分布在鞍山、本溪、大连、杨家杖子、葫芦岛的各1项，分别是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大连热电站、杨家杖子钼矿和辽宁431厂。

8个城市在计划安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和“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上的排序基本上是一致的。计划安排投资的排序情况实际完成投资的排序情况和“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上的排序详见表5。

表5 辽宁省24项投资在8个城市的分布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鞍山	228000	49.6	268500	52.9	163620	46.2
抚顺	84832	18.5	84673	16.7	52140	14.7
沈阳	60944	13.3	63364	12.5	59852	16.9
阜新	31915	6.9	39312	7.7	35480	10.0
本溪	31700	6.9	32137	6.3	32137	9.1
杨家杖子	9346	2.0	11387	2.2	6726	1.9
葫芦岛	10000	2.2	5610	1.1	1753	0.5
大连	2800	0.6	2538	0.5	2538	0.7
合计	459537	100.0	507521	100.0	354246	100.0

辽宁省24项中有20项为民用项目，4项为军工项目。20项民用项目计划安排投资407153万元，占88.6%；实际完成投资458702万元，占90.4%；“一五”时期完成投资311576万元，占88.0%。4项军工项目计划安排投资52384万元，占11.4%；实际完成投资48819万元，占9。6%；“一五”时期完成投资42670万元，占12.0%。

表6 辽宁省24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民用项目	407153	88.6	458702	90.4	311576	88.0
军工项目	52384	11.4	48819	9.6	42670	12.0
合计	459537	100.0	507521	100.0	354246	100.0

表 7　辽宁的 20 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抚顺东露天矿	油母页岩 70 万立方米	同规模	
抚顺龙凤矿	洗煤 90 万吨	同规模	50 万吨
抚顺老虎台矿	洗煤 80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抚顺西露天矿	采煤 300 万吨	同规模	
抚顺胜利矿	洗煤 90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阜新平安立井	采煤 150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阜新海州露天矿	采煤 300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阜新新邱一号立井	采煤 60 万吨	同规模	
大连热电站	2.5 万千瓦	同规模	同规模
抚顺电站	15 万千瓦	同规模	同规模
阜新热电站	15 万千瓦	同规模	12.5 万千瓦
抚顺第二制油厂	页岩原油 70 万吨	同规模	
抚顺铝厂（一、二期）	铝锭 3.9 万吨，铝 0.12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杨家杖子钼矿	钼精矿 4 700 吨	同规模	2000 吨
沈阳风动工具厂	各种风动工具 2 万台/554 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沈阳电缆厂	各种电缆 3 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沈阳第一机床厂	车床 4000 台	同规模	同规模
沈阳第二机床厂	各种机床 4 497 台/1.6 万吨	同规模	
本溪钢铁公司	生铁 110 万吨	同规模	铁 110 万吨
鞍山钢铁公司	生铁 250 万吨、钢 320 万吨、钢材 250 万吨	同规模	铁 127 万吨、钢 184 万吨、钢材 134 万吨

辽宁省 24 项中有 12 项是第一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大连热电站、本溪钢铁公司、抚顺电站、抚顺铝厂（一、二期）、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沈阳第一机床厂、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阜新热电站、阜新新邱一号立井、鞍山钢铁公司；有 9 项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抚顺龙凤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西露天矿、抚顺胜利矿、杨家杖子钼矿、沈阳第二机床厂、辽宁 112 厂、辽宁 410 厂、辽宁 111 厂；有 2 项是第四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抚顺东露天矿、辽宁 431 厂；有 1 项即抚顺第二制油厂是第五批口头协议项目。

第一批项目计划投资 337217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383 807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275095 万元；第二批项目计划投资 8232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87797 万元，其

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66736万元；第四批项目计划投资250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8417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6785万元；第五批项目计划投资150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7500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5630万元。它们分别占的比重见下表8：

表8　　辽宁省24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投资执行情况 / 批次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一批项目	337217	73.4	383807	75.6	275095	77.7
第二批项目	82320	24.4	87797	22.9	66736	24.3
第四批项目	25000	30.4	18417	21.0	6785	10.2
口头协议项目	15000	60.0	17500	95.0	5630	83.0
合计	459537	100.0	507521	100.0	354246	100.0

经过五年的团结奋战，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到1957年底，国家安排的24项重点工程中10项（本溪钢铁公司、阜新平安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大连发电厂、抚顺铝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重点工程、鞍钢17项工程中13项工程和省市安排的436项工程相继建成投产。

到“一五”计划结束的1957年，辽宁重工业基地已初具规模，改变了殖民地工业性质和畸形结构。(1)钢铁工业，形成以鞍钢、本钢、抚钢、大钢为主体的钢铁生产体系。1957年，全省铁矿石开采、生铁、钢和钢材生产能力分别达到1400万吨、540万吨、412.5万吨和294.4万吨，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生铁、钢和钢材产量达到417万吨、338万吨和239万吨，分别占全国同年产量的70.6%、63.2%和57.5%。解放前只能生产普通碳素钢和一般机械用钢，1957年已能生产耐热钢、耐酸合金钢、不锈钢、高级弹簧钢、滚珠钢、矽钢片及航空、汽车、化学和国防军事工业需要的特殊钢等270多种。(2)有色金属工业，解放前只能生产少量的铜、铝、铅、锌等普通金属，1957年不但这些产品的产量普遍增长，而且掌握了提炼铋、镉、钼等12种稀有金属的生产技术。(3)煤炭工业，形成以抚顺、阜新、本溪、北票四大煤矿为主的煤炭生产基地。抚顺被誉为全国的“煤都”。新建的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年生产能力达300万吨，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露天煤矿。1957年，全省原煤开采能力达2586万吨，原煤产量达2284万吨，占全国同年产量的17.9%。(4)电力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在抚顺发电厂安装了当时全国最大的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这一时期，全省电力工业装机容量超过本省解放前装机容量的总和。1957年全省装机容量达94.2万千瓦，发电量达52亿度，占全国同年发电量的26.9%。(5)石油工业，形成以抚顺石油一厂、二厂、三厂和锦西炼油厂（石油

五厂）、锦州炼油厂（石油六厂）、大连石油七厂为主的石油生产和加工基地。1957年，全省原油产量达56万吨，占全国同年产量的38.4%；原油加工能力达130万吨，占全国的1/3以上。(6) 化学工业，形成以大连化工厂、沈阳化工厂和锦西化工厂为主的基本化工原料生产基地。1957年，全省硫酸、纯碱、烧碱产量达到32.1万吨、30.7万吨和9.8万吨，分别占全国同年产量的49%、37.1%和49.5%。(7) 机械工业，形成以沈阳、大连为中心，包括抚顺、锦州、本溪、营口、丹东等市，能够生产机床、矿山设备、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机车和船舶的基地。机床行业，从解放前主要从事修配，发展到能够生产精密度较高的机床、重型车床、六角车床和多轴自动车床。1957年，全省各种机床产量达7627台，占全国同年产量的28.3%。矿山设备行业从无到有，1957年已能成批生产650毫米辊径的轧钢机、75平方米烧结机、大型卷扬机、1立方米电铲和各种破碎机。输变电行业，从解放前只能生产小容量的变压器，发展到能够配套生产多种规格的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行业，1957年已能成批生产气压机、鼓风机和较大型水泵。机车和船舶制造行业，1957年能够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成功生产负载较大的"和平"型蒸汽机车60吨货车、120吨钢锭模车、100吨铁水车、40吨保温车、50吨烧结矿车和4500吨油轮、500吨货轮。(8) 建材工业，形成以沈阳、大连、本溪等地为中心的，以水泥和平板玻璃为主要产品的建材生产基地。1957年，全省水泥、平板玻璃生产能力分别达到316万吨和281万标箱；产量达到249.7万吨和210.6万标箱，分别占全国同年产量的36.4%和45.6%。(9) 国防军事工业形成以沈阳为中心的兵器和军用航空工业基地。

同时，工业结构和布局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59%，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52年的72.8%上升到1957年的86%，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57.8%上升到1957年的73.4%。生产力布局趋向合理，形成了以沈阳、鞍山为中心的中部工业地带和以大连为中心的丹东、营口、锦州等沿海工业城市，形成首尾相连、比较集中的工业城市群体。

"一五"时期，辽宁重工业基地的初步建成，为辽宁工业发展和支援全国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陕　西　省

新中国建立前，陕西只有两百多个工业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半机械半手工操作的中小工厂，设备陈旧，技术低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为了尽快发展内地工业，把陕西作为新工业区之一，直接投资进行建设。当时全国的建设重点是由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其中在陕西安排了24个，为全国第二位。

安排在陕西的24个建设项目包括7个民用项目，17个军用项目。7个民用项目是：煤炭工业1个（铜川王石凹立井）、电力工业2个（西安热电站一、二期、户县热电

站)、机械工业4个(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厂)。17个军用项目是:陕西113厂、陕西114厂、陕西212厂、陕西115厂、陕西514厂、陕西422厂、陕西853厂、陕西782厂、陕西786厂、陕西847厂、陕西248厂、陕西803厂、陕西844厂、陕西843厂、陕西804厂、陕西845厂、陕西408厂。陕西的24项全部是新建项目。

从1952~1957年的五年间,陕西的24项陆续开始施工。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西安热电站(一、二期);1953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陕西114厂;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陕西212厂、陕西514厂、陕西422厂、陕西113厂、陕西115厂、陕西786厂、陕西853厂、陕西847厂、陕西248厂、陕西803厂、陕西844厂、陕西843厂、陕西804厂、陕西845厂;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厂、户县热电站、陕西782厂、陕西408厂;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铜川王石凹立井。

历经十年时间,至1962年陕西的24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7年竣工的项目有7项,它们是西安热电站(一、二期)、陕西114厂、陕西212厂、陕西113厂、陕西847厂、陕西248厂、陕西782厂;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6项,它们是陕西422厂、陕西786厂、陕西853厂、陕西803厂、陕西845厂、西安电力电容厂;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它们是陕西844厂、陕西843厂;1960年竣工的项目有4项,它们是陕西804厂、西安绝缘材料厂、户县热电站、陕西408厂;1961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它们是西安开关整流器厂、铜川王石凹立井;1962年竣工的项目有3项,它们是陕西514厂、陕西115厂、西安高压电瓷厂。

就投资额分析,陕西是排在辽宁和黑龙江之后,是排名第三的省份。

陕西省的24项计划安排投资182 74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71 403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12057万元。详见表9。

表9　　陕西省24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情况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陕西845厂	27930	15.3	27573	16.1	18820	16.8
陕西844厂	19706	10.8	17878	10.4	10905	9.7
西安开关整流器厂	11930	6.5	12164	7.1	2555	2.3
陕西843厂	11000	6.0	10122	5.9	8093	7.2
户县热电站	8510	4.7	9188	5.4	4896	4.4
铜川王石凹立井	5640	3.1	8372	4.9	50	0.0
陕西786厂	8426	4.6	7327	4.3	7015	6.3
陕西853厂	7718	4.2	6741	3.9	4927	4.4

投资构成情况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西安热电站（一、二期）	6380	3.5	6449	3.8	6449	5.8
陕西 408 厂	6700	3.7	6386	3.7	400	0.4
陕西 803 厂	8440	4.6	6234	3.6	5680	5.1
陕西 804 厂	9414	5.2	6178	3.6	4473	4.0
陕西 248 厂	6740	3.7	5686	3.3	5686	5.1
陕西 514 厂	5597	3.1	5597	3.3	2470	2.2
陕西 847 厂	6832	3.7	5569	3.2	5569	5.0
陕西 114 厂	4860	2.7	5066	3.0	5066	4.5
陕西 115 厂	3799	2.1	4209	2.5	4209	3.8
陕西 113 厂	3465	1.9	4014	2.3	4014	3.6
陕西 422 厂	3788	2.1	3890	2.3	3501	3.1
西安高压电瓷厂	3857	2.1	3228	1.9	795	0.7
陕西 212 厂	4338	2.4	3133	1.8	2314	2.1
西安绝缘材料厂	2767	1.5	2455	1.4	941	0.8
陕西 782 厂	3595	2.0	2434	1.4	2434	2.2
西安电力电容厂	1312	0.7	1510	0.9	795	0.7
合计	182744	100.0	171403	100.0	112057	100.0

陕西的 24 项分布在西安、兴平、宝鸡、铜川、户县、渭南 6 个城市。分布在西安的有 14 项，它们是西安热电站（一、二期）、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电力电容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高压电瓷厂、陕西 113 厂、陕西 114 厂、陕西 248 厂、陕西 786 厂、陕西 803 厂、陕西 804 厂、陕西 843 厂、陕西 844 厂、陕西 847 厂。分布在兴平的有 4 项，它们是陕西 212 厂、陕西 422 厂、陕西 408 厂、陕西 514 厂。分布在宝鸡的有 2 项，它们是陕西 782 厂、陕西 115 厂。分布在户县的有 2 项，它们是陕西 845 厂、户县热电站。分布在铜川、渭南的各 1 项，分别是铜川王石凹立井、陕西 853 厂。

6 个城市计划安排投资的依次排序情况，实际完成投资的依次排序情况和"一五"时期完成投资的依次排序情况详见表 10。

表 10　　陕西省24项投资在6个城市的分布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地区＼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西安	105129	57.5	93880	54.8	68036	60.7
户县	36440	19.9	36761	21.4	23716	21.2
兴平	20423	11.2	19006	11.1	8685	7.8
铜川	5640	3.1	8372	4.9	50	0.0
渭南	7718	4.2	6741	3.9	4927	4.4
宝鸡	7394	4.0	6643	3.9	6643	5.9
合计	182744	100.0	171403	100.0	112057	100.0

陕西省的24项中有7项为民用项目，17项为军工项目。7项民用项目计划安排投资4039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43366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6481万元。17项军工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4234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28037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95576万元。

表 11　　陕西省24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类别＼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民用项目	40396	22.1	43366	25.3	16481	14.7
军工项目	142348	77.9	128037	74.7	95576	85.3
合计	182744	100.0	171403	100.0	112057	100.0

表 12　　陕西的7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西安热电站（一、二期）	4.8万千瓦	同规模	同规模
户县热电站	10万千瓦	同规模	5万千瓦
西安高压电瓷厂	各种电瓷1.5万吨	同规模	
西安开关整流器厂	高压开头1.3万套整流器60万千瓦		同规模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西安绝缘材料厂	各种绝缘材料6000吨	同规模	
西安电力电容厂	电力电容器100千伏安6.1万只	同规模	
铜川王石凹立井	采煤120万吨	同规模	

陕西省的24项有1项为第一批确定的项目，即西安热电站（一、二期）；有20项为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厂、铜川王石凹立井、户县热电站、陕西212厂、陕西113厂、陕西114厂、陕西115厂、陕西786厂、陕西782厂、陕西853厂、陕西847厂、陕西248厂、陕西803厂、陕西844厂、陕西843厂、陕西804厂、陕西845厂；有3项为第四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陕西514厂、陕西422厂、陕西408厂。

第一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6 38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6449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6449万元；第二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60279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49081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99237万元；第四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6085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5873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6371万元。它们分别占的比重见下表：

表13　　陕西省24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批次＼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一批项目	6380	3.5	6449	3.8	6449	5.8
第二批项目	160279	87.7	149081	87.0	99237	88.6
第四批项目	16085	8.8	15873	9.3	6371	5.7
合计	182744	100.0	171403	100.0	112057	100.0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先后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工业企业28个，其中国家重点工程项目12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职工总数达到15.4万人，比1952年增长56.8%。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11.47亿元，比1952年增长139.3%；平均每年增长19.1%，比全国的平均速度高出6个百分点。

新中国建立前，陕西最大的工业部门是纺织工业，只有纱锭8.83万多枚，布机1000多台，而且机器陈旧。到1957年，全省新建并投入生产的就有7个现代化的纺织厂，这些工厂都装备着当时最新式的机器，纱锭增加到42.4万枚，布机增加到1.1万多台，在咸阳和灞桥形成了两座纺织城。煤炭工业在陕西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生产方法很落后，全部人工开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的黑腰带——渭北煤田的建设突飞猛进，那里沉睡的山谷和垂死的旧矿井都勃然苏醒。人民政府除对铜川一些旧矿井进

行改建、扩建、部分采用机械开采外，还着手建设新型的现代化矿井。如铜川矿区三里洞煤矿，就是西北的第一座现代化矿井。该矿建设周期三十五个月，1957年7月1日正式投产，年产煤60万吨，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全矿区七八年的煤炭总产量。新中国建立前，陕西几乎没有机械制造工业，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已有好几个大型机械工业企业投入生产，一些原有的机械修配厂也被改建成制造工厂。到1956年底，全省拥有的金属切削机床比1949年增加27.6倍，锻压设备增加40倍。许多类型的机器，甚至精密的工作母机都能自己制造了。西安周围众多的国防军工企业已初具规模。电力工业发展也很迅速。西安新建的第二发电厂比原有的第一发电厂发电量大4倍多。宝鸡、铜川等地也建立了新的发电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还建立了许多过去没有的工业企业，如搪瓷、油漆、印染、农业机械、金属结构、仪表制造等。全国电器工业基地之一的西安西郊电工城，也拉开了建设的帷幕。当时已建成投产的西安电力电容器厂，不仅陕西前所未有，在全国也是第一。

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许多新的产品试制成功了。据不完全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新的工业产品达142种，其中有支援农业的双轮双铧犁、谷类条播机、摇臂收割机；有供地质勘探用的地震仪、钻探机、磁强针；有供建筑业用的起重机、搅拌机、电动机、皮带运输机，还有其他机械、石棉制品、耐火材料以及许多人民生活用品。纱布、针织品、搪瓷制品、油漆、热水瓶等不少产品质量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陕西安排建设的24项重点工程开工22项，到1957年基本建成投产15项。这些建成项目，尤其是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和兵器工业，规模大、设备精、技术先进，在当时是国家工业的支柱企业，其产品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7个大中型纺织企业（含恢复时期安排、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成的2个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加上恢复时期建成的2个大中型纺织企业，形成了一个从纺织到印染的完整生产体系，成为当时全国一个新的纺织工业基地。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筑材料等基础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陕西开始改变了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陕西经济同全国经济的差距有所缩小。1952年陕西人均国民收入75元，全国为人均104元，差距为29元，到1957年，陕西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124元，同全国的差距缩小为18元。1952年陕西人均社会总产值118元，比全国平均数低58.6元，到1957年提高到211元，差距缩小为38元。工农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4%上升到1957年的2.6%，其中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3.1%提高到1957年的3.5%；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7%提高到1957年的1.62%。

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建设也存在一些弱点，主要是“骨头多肉少”。具体表现为大中型骨干企业多，小型企业少；中央企业多，地方企业少；重工业多，轻工业少；生产性建设多，生活性建设少；工业企业建设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少。这些弱点，给以后陕西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

第三节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在执行“一五”计划中，强调积极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工业建设摆在重要地位。把保证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保证重点建设项目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作为重要任务。在建设过程中，做到了有重点地投放人力、物力和资金，即国防工程、国家重点工程及国营工业工程在先，地方工业、城市建设及其他福利事业的基建在后，体现了先国家后地方，先生产后生活的顾大局思想和创业精神。在“一五”计划第一年（1953年）的年度计划里，国防和工业工程的基建投资比重在整个基建工程中，原黑龙江省占61.2%，原松江省占70.67%，充分保证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中心任务。在施工中，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和劳动纪律，大力推行了作业计划管理，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和反浪费斗争，加速了工程进度。

苏联援建的“156项”在黑龙江省安排了22项，是项目数第二多的省份。黑龙江的22项包括20个民用项目，2个军用项目。20个民用项目是：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城子河九号立井、兴安台二号立井、双鸭山洗煤厂、富拉尔基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富拉尔基重机厂、哈尔滨碳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佳木斯造纸厂。2个军用项目是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黑龙江省的22项中，属于续建的有哈尔滨滚珠轴承厂、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3项；属于扩建的有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2项；其余17项都是新建项目。

从1950~1957年的七年间，黑龙江的22项陆续开始施工。1950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鹤岗东山一号立井；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富拉尔基热电站；1953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佳木斯造纸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双鸭山洗煤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佳木斯纸厂热电站、城子河九号立井、富拉尔基重机厂；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兴安台二号立井、哈尔滨碳刷厂；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

历经十一年时间，至1961年黑龙江的22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4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它是哈尔滨量具刃具厂；1955年竣工的项目有4项，它们是鹤岗东山一号立井、富拉尔基热电站、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1956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它们是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哈尔滨仪表厂；1957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它们是佳木斯

造纸厂、佳木斯纸厂热电站；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4项，它们是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双鸭山洗煤厂、哈尔滨碳刷厂；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5项，它们是城子河九号立井、富拉尔基重机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1960年竣工的项目有3项，它们是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1961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是兴安台二号立井。

黑龙江的22项计划安排投资189161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16483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41 344万元。

计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以及“一五”时期完成投资的情况，如表14。

表14　　黑龙江省22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富拉尔基重机厂	30000	15.9	45849	21.2	10792	7.6
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	30000	15.9	32681	15.1	23074	16.3
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	30170	15.9	31684	14.6	27667	19.6
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	8040	4.3	14981	6.9	7913	5.6
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	14980	7.9	12042	5.6	8529	6.0
佳木斯造纸厂	9719	5.1	10199	4.7	9613	6.8
兴安台二号立井	5640	3.0	7178	3.3	818	0.6
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	6710	3.5	7178	3.3	7178	5.1
黑龙江122厂	7514	4.0	7167	3.3	7167	5.1
富拉尔基热电站	6772	3.6	6870	3.2	6870	4.9
鹤岗东山一号立井	5400	2.9	6512	3.0	6512	4.6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5900	3.1	5565	2.6	5565	3.9
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	4890	2.6	4356	2.0	2916	2.1
黑龙江120厂	4330	2.3	4240	2.0	4240	3.0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4896	2.6	3869	1.8	234	0.2
城子河九号立井	3000	1.6	3184	1.5	2847	2.0
双鸭山洗煤厂	1900	1.0	3113	1.4	2110	1.5
佳木斯纸厂热电站	2530	1.3	2975	1.4	2975	2.1
哈尔滨仪表厂	2790	1.5	2494	1.2	2494	1.8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哈尔滨碳刷厂	1473	0.8	1662	0.8	1580	1.1
城子河洗煤厂	1500	0.8	1480	0.7	150	0.1
兴安台洗煤厂	1007	0.5	1204	0.6	100	0.1
合计	189161	100.0	216483	100.0	141344	100.0

黑龙江的22项分布在哈尔滨、富拉尔基、鹤岗、双鸭山、鸡西、佳木斯6个城市。分布在哈尔滨的有10项，它们是：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哈尔滨碳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分布在富拉尔基的有4项，它们是：富拉尔基热电站、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富拉尔基重机厂。分布在鹤岗的有4项，它们是：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兴安台洗煤厂、兴安台二号立井。分布在佳木斯的有2项，它们是：佳木斯造纸厂、佳木斯纸厂热电站。分布在鸡西的有2项，它们是：城子河九号立井、城子河洗煤厂分布在双鸭山的有1项，是双鸭山洗煤厂。

6个城市在计划安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和“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上的排序是一致的。详见表15。

表15　　黑龙江省22项投资在8个城市的分布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分布 / 地区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哈尔滨	84813	44.8	89057	41.1	63712	45.1
富拉尔基	66942	35.4	84403	39.0	45329	32.1
鹤岗	18757	9.9	22072	10.2	14608	10.3
佳木斯	12249	6.5	13174	6.1	12588	8.9
鸡西	4500	2.4	4664	2.2	2997	2.1
双鸭山	1900	1.0	3113	1.4	2110	1.5
合计	189161	100.0	216483	100.0	141344	100.0

黑龙江的22项中有20项为民用项目，2项为军工项目。20项民用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77317万元，占93.7%；实际完成投资205076万元，占94.7%；“一五”时期完成

投资129937万元，占91.9%。2项军工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1 844万元，占6.7%；实际完成投资11407万元，占5.6%；"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1407万元，占8.8%。

表16　　黑龙江省22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投资分布 / 项目分类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民用项目	177317	93.7	205076	94.7	129937	91.9
军工项目	11844	6.7	11407	5.6	11407	8.8
合计	189161	100.0	216483	100.0	141344	100.0

表17　　黑龙江的20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双鸭山洗煤厂	洗煤150万吨	同规模	
兴安台二号立井	采煤150万吨	同规模	
兴安台洗煤厂	洗煤150万吨	同规模	
佳木斯纸厂热电站	2.4万千瓦	同规模	同规模
佳木斯造纸厂	水泥纸袋5万吨，铜网6万立方米	同规模	水泥纸袋5万吨
哈尔滨仪表厂	电汽仪表汽车仪表电度表	同规模	同规模
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	汽轮发电机60万千瓦	同规模	
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	汽轮机60万千瓦	同规模	
哈尔滨碳刷厂	电刷及碳素制品100吨	同规模	
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	铝材3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量刃具512付/1032吨	同规模	同规模
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	高中压锅炉4080吨/年	同规模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滚珠轴承655万套	同规模	
城子河九号立井	采煤75万吨	同规模	
城子河洗煤厂	洗煤150万吨	同规模	
富拉尔基重机厂	轧机、炼钢、炼铁设备6万吨	同规模	
富拉尔基热电站	5万千瓦	同规模	同规模
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	特钢16.6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鹤岗东山一号立井	采煤90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	采煤150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黑龙江的22项中有14项是第一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兴安台洗煤厂、佳木斯造

纸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城子河九号立井、城子河洗煤厂、富拉尔基热电站、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黑龙江120厂、黑龙江122厂；有6项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双鸭山洗煤厂、兴安台二号立井、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发电机车间、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哈尔滨碳刷厂、富拉尔基重机厂；有2项是第三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佳木斯纸厂热电站、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第一批项目计划投资122852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35439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11390万元；第二批项目计划投资58883万元，实际完成投资74200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26745万元；第三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742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6844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3 209万元。它们分别占的比重见下表：

表18　　黑龙江22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投资执行情况 / 批次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一批项目	122852	64.9	135439	62.6	111390	78.8
第二批项目	58883	31.1	74200	34.3	26745	18.9
第三批项目	7426	3.9	6844	3.2	3209	2.3
合计	189161	100.0	216483	100.0	141344	100.0

1956年，重点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全省已有14项重点工程竣工并部分投人生产。哈尔滨市动力之乡区、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及用先进矿山设备装备起来的鸡西、鹤岗、双鸭山等新型矿区已初具规模。黑龙江省已由一个原来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变为拥有相当强大的机械工业、煤炭工业、森林工业和轻纺工业的省份，地方工业原来产品少、成本高、设备陈旧的状况也有明显改变，发挥了为国家积累资金，支援重工业建设的作用。“一五”计划期间黑龙江省向国家上缴利润等于国家给地方工业投资的3倍多。

第四节　山　西　省

根据山西的具体条件，国家的“一五”计划确定将山西逐步建设成为围绕包头钢铁基地的重工业区，将太原、大同建设成为两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五年内，中央各部在山西共兴建52个限额以上项目和40个限额以下项目。其中限额以上项目包括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项目中的项目。

根据国家“一五”计划向山西提出的具体任务，山西从 1953 年开始编制本省的“一五”计划，并经 1955 年 9 月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山西省的“一五”计划，向全省人民提出了关于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的 13 项具体任务。其中，增加经济建设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是其主要内容。五年内，国家对在山西建设的 52 个限额以上项目和 40 个限额以下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 17.93 亿元，国家对山西地方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总拨款额为 6.86 亿元，其中用于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3.5 亿元。五年内，山西地方工业总拨款额为 1.41 亿元，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 1.4 亿元，占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40%；山西地方工业要新建和扩建限额以下项目 130 个，限额以上项目 5 个，其中包括新建年产 15 万吨的磷肥厂 1 个，5 万纱锭的纺纱厂 1 个，改建晋华纺织厂、西山煤矿、富家滩煤矿等。

“156 项”建设项目中在山西安排有 15 个项目，这 15 个项目包括 7 个民用项目，8 个军用项目。7 个民用项目是：潞安洗煤厂、大同鹅毛口立井、太原第一热电站、太原第二热电站、太原化工厂、太原氮肥厂、太原制药厂；8 个军用项目是：山西 785 厂、山西 616 厂、山西 743 厂、山西 245 厂、山西 763 厂、山西 908 厂、山西 884 厂、山西 874 厂。山西的 15 项全部是新建项目。

从 1953～1958 年的五年间，山西的 15 项陆续开始施工。1953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太原第一热电站、山西 743 厂；1954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太原化工厂、太原制药厂；1955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太原第二热电站、山西 763 厂、山西 884 厂、山西 908 厂；1956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山西潞安洗煤厂、山西 785 厂、山西 245 厂、山西 616 厂；1957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大同鹅毛口立井、太原氮肥厂；1958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山西 874 厂。

历经十三年时间，至 1966 年山西的 15 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7 年竣工太原第一热电站 1 项；1958 年竣工的项目有 8 项：太原化工厂、太原第二热电站、太原制药厂、山西潞安洗煤厂、山西 908 厂、山西 763 厂、山西 743 厂、山西 616 厂；1959 年竣工有 3 项：山西 884 厂、山西 785 厂、山西 245 厂；1960 年竣工太原氮肥厂 1 项；1961 年竣工大同鹅毛口立井 1 项；1966 年竣工是山西 874 厂 1 项。

山西的 15 项计划安排投资 133531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131880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63073 万元。投资及实施情况如表 19 所统计。

表 19　　山西的 15 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太原氮肥厂	19000	14.2	19500	14.8	208	0.3
山西 245 厂	15342	11.5	14849	11.3	13913	22.1
山西 874 厂	10000	7.5	14378	10.9		0.0
山西 743 厂	16073	12.0	14189	10.8	9636	15.3
太原化工厂	11000	8.2	11670	8.8	5730	9.1
太原第一热电站	8046	6.0	8871	6.7	8871	14.1
山西 616 厂	11885	8.9	8073	6.1	7682	12.2
山西 785 厂	6498	4.9	7221	5.5	1384	2.2
山西 908 厂	9144	6.8	6499	4.9	5476	8.7
太原第二热电站	5401	4.0	6180	4.7	2113	3.4
山西 763 厂	7113	5.3	5992	4.5	4688	7.4
大同鹅毛口立井	5600	4.2	5840	4.4	168	0.3
山西 884 厂	3729	2.8	3448	2.6	2474	3.9
山西潞安洗煤厂	3200	2.4	3254	2.5	370	0.6
太原制药厂	1500	1.1	1916	1.5	360	0.6
合计	133531	100.0	131880	100.0	63073	100.0

山西的 15 项分布在太原、大同、侯马、潞安 4 个城市。分布在太原的有 11 项，它们是太原第一热电站、太原第二热电站、太原氮肥厂、太原制药厂、太原化工厂、山西 908 厂、山西 884 厂、山西 785 厂、山西 763 厂、山西 743 厂、山西 245 厂；分布在大同的有 2 项，它们是山西 616 厂、大同鹅毛口立井；分布在侯马、潞安的各有 1 项，分别是山西 874 厂、山西潞安洗煤厂。

4 个城市计划安排投资的依次排序情况是：太原 102846 万元，占 77%；大同 17485 万元，占 13.1%；侯马 10000 万元，占 7.5%；潞安 3200 万元，占 2.4%。

实际完成投资的依次排序情况是：太原 100335 万元，占 76.1%；侯马 14378 万元，占 10.9%；大同 13913 万元，占 10.5%；潞安 3254 万元，占 2.5%。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的依次排序情况是：太原 54 853 万元，占 87%；大同 7850 万元，占 12.4%；潞安 370 万元，占 0.6%。

表20　　山西省15项投资在4个城市的分布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地区＼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太原	102846	77.0	100335	76.1	54853	87.0
侯马	10000	7.5	14378	10.9		0.0
大同	17485	13.1	13913	10.5	7850	12.4
潞安	3200	2.4	3254	2.5	370	0.6
合计	133531	100.0	131880	100.0	63073	100.0

山西省的15项中有7项为民用项目，8项为军工项目。7项民用项目计划安排投资5374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57231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7820万元。8项军工项目计划安排投资7978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74649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45 253万元。

表21　　山西省15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项目分类＼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民用项目	53747	40.3	57231	43.4	17820	28.3
军工项目	79784	59.7	74649	56.6	45253	71.7
合计	133531	100.0	131880	100.0	63073	100.0

表22　　山西的7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大同鹅毛口立井	采煤120万吨	同规模	
山西潞安洗煤厂	洗煤200万吨	同规模	
太原化工厂	硫酸4万吨，烧碱1.5万吨	同规模	
太原制药厂	磺铵1200吨	同规模	
太原氮肥厂	合成氨5.2万吨，硝酸铵9.8万吨	同规模	
太原第一热电站	7.4万千瓦	同规模	同规模
太原第二热电站	5万千瓦	同规模	

山西省的15项有3项为第一批确定的项目，即山西潞安洗煤厂、太原化工厂、太原第一热电站；有10项为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大同鹅毛口立井、太原制药厂、太原氮肥厂、太原第二热电站、山西245厂、山西616厂、山西743厂、山西763厂、山西884厂、山西908厂；有1项为第三批确定的项目，即山西785厂；有1项为第四批确定、在“二五”开始施工的项目，即山西874厂。

第一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2224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3795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4971万元；第二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9478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86486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46 718万元；第三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649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7221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384万元；第四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00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4378万元，第四批项目投资全部是在“二五”时期完成的。它们分别占的比重见下表：

表23　　山西省15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投资执行情况 / 批次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一批项目	22246	16.7	23795	18.0	14971	23.7
第二批项目	94787	71.0	86486	65.6	46718	74.1
第三批项目	6498	4.9	7221	5.5	1384	2.2
第四批项目	10000	7.5	14378	10.9		0.0
合计	133531	100.0	131880	100.0	63073	100.0

到1957年，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山西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1.3亿元，相当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投资总额的9.5倍，新增固定资产15.6亿元，其中，太原新增固定资产5.32亿元，相当于从1892年太原有了近代工业开始到1948年56年所积累的固定资产的4.8倍。在此期间，开始建设了山西第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一些新的工业部门也从无到有建设了起来。原有的太原钢铁厂经过扩建，使冶炼特种优质钢的能力大大提高。重型机器厂的建成，使山西的机械工业摆脱了只能修理、装配的落后面貌，而能为国家生产大型的技术装备，成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主导力量。太原已经形成相当可观的工业基础，包括：由炼铁、炼钢、冷铸、铸造、耐火材料组成的钢铁冶炼工业；由制造冶金、起重，、采矿、钻探、电气等设备和精密仪表组成的机械制造工业；由机械、化工、电子、仪表组成的国防工业；由发电厂、热电厂组成的现代化电力工业；由各种轻重化学生产部门组成的化学工业；由手工采掘变为机械化采掘的煤炭工业；由纺织、印染、造纸、橡胶、玻璃、食品等行业组成的轻工业系统。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太原初步建设成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大同、阳泉等地的工业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

"一五"时期山西重工业项目的建设，使山西工业技术基础得到加强，工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16.45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8倍，平均每年增长23.1%。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8.1%，生活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4.5%。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幅度都比较大。1957年与1952年比较，钢产量为26.37万吨，增长1.87倍；原煤产量为2 368万吨，增长1.38倍；金属切削机床为235台，增长93%；棉布产量为6046万米，增长46%。

第五节　吉　林　省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把吉林省作为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五年期间为吉林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8.4多亿元，建限额以上的工程109项，其中属于苏联援建的全国"156项"重点建设工程的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肥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碳素厂、吉林热电厂、西安煤矿中央竖井、丰满发电站（扩建工程）等。这些重点工程对奠定中国汽车制造和化学等工业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毛泽东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建厂工程奠基典礼。1953年下半年，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碳素厂、吉林热电厂、西安煤矿中央竖井和通化湾沟煤矿也相继开始兴建。吉林化肥厂、吉林电石厂、吉林染料厂于1955年第二季度破土动工。

1953年初，当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之前，中共吉林省委向全省发出号召：要"从生产物资供应、劳动力调配、加工订货、交通运输以及副食供应、文化生活上大力支援重点工程，及时解决重点工程需要，保证重点工程加速进行。"全省各部门和重点工程所在地的党委和人民政府，按照中共吉林省委的要求，广泛开展了对重点工程建设的支援活动。中共吉林市委于1954年3月22日召开会议，成立了市基本建设办公室，专门负责支援化工区等重点工程建设工作。该市物资部门召开物资会议，调剂重点工程所需要的物资；市地方工业负责解决重点工程所需要的砖、瓦、沙石；市五金公司负责重点工程所需要的五金器材的加工订货；市交通部门负责公路、桥梁的补修、改修，以适应重点工程建设的运输需要；市百货、粮食、劳动、邮电、蔬菜、文化、卫生等部门，都制定了具体支援重点工程的计划，全市形成了人人关心重点工程，处处支援重点工程的局面。中共长春市委按照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质量优良汽车和培养汽车建设人才的决定》，加强了对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领导，组织全市人民从人力、物力上进行了大力支援。

在吉林省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在苏联的援助下，奋战三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起37万多平方米的厂房，于1956年7月13日，成功地生产出第一批载重汽车。毛泽东把这种汽车命名为"解放牌"。1956年10月1日，解放牌汽车奔驰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10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开工典礼。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孔祥祯在会上宣布，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移交生产。该厂投资总额为6.5亿元，生产能力为年生产载重汽车3万辆。到1957年6月2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提前189天完成了"一五"计划期间的4000辆解放牌汽车的生产任务。到12月27日，共生产汽车8772辆，超过原计划的两倍多。

继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之后，吉林化肥厂、吉林电石厂、吉林染料厂也提前完成了建厂任务。1957年10月25日，吉林"三大化"（吉林电极厂、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工厂举行开工生产典礼，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其投产剪彩。"三大化"是新中国第一个化学工业基地，它的建成投产，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

在实际实施的150项中，吉林有10项，是项目数第五多的省份。吉林的10项都是民用项目，它们是：辽源中央立井、通化湾沟立井、丰满水电站、吉林热电站、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电极厂、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长春第一汽车厂。除丰满水电站、吉林热电站为扩建项目、辽源中央立井为续建项目外，其余7项都是新建项目。

从1950~1955年的五年间，吉林的10项陆续开始施工。1950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辽源中央立井；1951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丰满水电站；1953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长春第一汽车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电极厂；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吉林氮肥厂；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吉林热电站、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通化湾沟立井。

历经九年时间，至1959年吉林的10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5年竣工辽源中央立井、吉林电极厂两项；1956年竣工长春第一汽车厂、吉林铁合金厂两项；1957年竣工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两项；1958年竣工3项：吉林热电站、吉林染料厂、通化湾沟立井；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是丰满水电站。

吉林省的10项计划安排投资13655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45 510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32772万元。投资计划及实施情况如表24所统计。

表24　　吉林省10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情况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长春第一汽车厂	56000	41.0	60871	41.8	60871	45.8
吉林氮肥厂	24000	17.6	25722	17.7	25722	19.4
吉林染料厂	10500	7.7	11461	7.9	6584	5.0
吉林热电站	9551	7.0	11200	7.7	6835	5.1
丰满水电站	9372	6.9	9634	6.6	8439	6.4

项目 \ 投资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吉林电极厂	7712	5.6	6976	4.8	6976	5.3
吉林铁合金厂	5400	4.0	6300	4.3	6300	4.7
辽源中央立井	6000	4.4	5770	4.0	5770	4.3
吉林电石厂	5023	3.7	4989	3.4	4989	3.8
通化湾沟立井	3000	2.2	2587	1.8	286	0.2
合计	136558	100.0	145510	100.0	132772	100.0

表25　　吉林的10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丰满水电站	42.25万千瓦	同规模	36.25万千瓦
长春第一汽车厂	解放牌汽车3万辆	同规模	同规模
辽源中央立井	采煤90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吉林热电站	10万千瓦	同规模	5万千瓦
吉林铁合金厂	铁合金4.35万吨	同规模	铁合金4.35万吨
吉林电极厂	石墨制品2.23万吨	同规模	同规模
吉林染料厂	合成染料及中间体7385吨	同规模	
吉林氮肥厂	合成氨5万吨，硝酸铵9万吨	同规模	
吉林电石厂	电石6万吨	同规模	
通化湾沟立井	采煤60万吨	同规模	

吉林的10项分布在吉林市、丰满、长春、辽源、通化5个城市。分布在吉林市的有6项，它们是吉林热电站、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电极厂、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分布在丰满、长春、辽源、通化的各1项，分别是丰满水电站、长春第一汽车厂、辽源中央立井、通化湾沟立井。

6个城市在计划安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和"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上的排序基本上是一致的。计划投资和实施投资情况详见表26。

表 26　　吉林省 10 项投资在 5 个城市的分布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地区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吉林	62186	45.5	66648	45.8	57406	43.2
长春	56000	41.0	60871	41.8	60871	45.8
丰满	9372	6.9	9634	6.6	8439	6.4
辽源	6000	4.4	5770	4.0	5770	4.3
通化	3000	2.2	2587	1.8	286	0.2
合计	136558	100.0	145510	100.0	132772	100.0

吉林省的 10 项全部为民用项目，这些项目中有 9 项是第一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丰满水电站、长春第一汽车厂、辽源中央立井、吉林热电站、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电极厂、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有 1 项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它是通化湾沟立井。

第一批项目计划投资 133558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142923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132486 万元；第二批项目计划投资 300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2587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286 万元。

表 27　　吉林省 10 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投资执行情况 / 批次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一批项目	133558	97.8	142923	98.2	132486	99.8
第二批项目	3000	2.2	2587	1.8	286	0.2
合计	136558	100.0	145510	100.0	132772	100.0

吉林省在“一五”计划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1957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35.8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40.7%，平均每年增长 7.1%。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汽车、基础化学、铁合金、碳素制品等重工业为主的经济骨架。从 1952 ~1957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 112.7%，平均每年递增 16.3%。“一五”计划期间，全省试制成功的重要新产品有 600 多种，如汽车、化工新产品等。1957 年国营企业劳动生产率比 1952 年提高了 61%。

总之，“一五”计划期间，吉林省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生产

迅速发展，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到处呈现奋发向上、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堪称新中国建立以来吉林省最好的时期之一。

第六节 河 南 省

在旧中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全国70%以上的工、业偏于沿海地区，而广大内地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制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沿海老工业区与积极建设内地新工业区相结合的方针。河南地处中原，铁路交通方便，矿产资源和农产品极为丰富。国家从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出发，确定河南为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当时，安排在河南的有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滚珠轴承厂、矿山机器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两个热电站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焦作中马村矿、平顶山二号井9个民用项目，另外还有1个军用项目（河南407厂）。限额以上（即大中型项目）694项中，安排在河南的有250多项。洛阳、郑州、新乡、平顶山、三门峡、焦作等是当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

当时，河南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低，缺乏经验，要同时兴建许多现代化工厂，不论在干部、技术人员的调配、建筑材料的供应，以及保证建设人员的生活资料供应和文化卫生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困难。为了胜利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建设任务，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全省人民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坚决完成“一五”计划的思想动员，深入宣传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组织全省人民大力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为了加强工业战线，从农村和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转入工业。五年中，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基本建设大军。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同吉林省一样，河南也有10项，是项目数第五多的省份。河南的10项包括9个民用项目，1个军用项目。9个民用项目是：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平顶山二号立井、郑州第二热电站、洛阳热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1个军用项目是河南407厂。河南的10项全部是新建项目。

从1952～1957年的五年间，河南的10项陆续开始施工。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郑州第二热电站；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洛阳滚珠轴承厂；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热电站、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洛阳拖拉机厂、河南407厂；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平顶山二号立井、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历经十七年时间，至1969年河南的10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郑州第二热电站1953年竣工；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热电站1958年竣工；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洛阳拖拉机厂1959年竣工；河南407厂、平顶山二号立井1960年竣工；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1962年竣工；三门峡水利枢纽1969年竣工。

河南的10项计划投资26160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59704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46705万元。投资计划及实施情况如表28。

表28　　河南省10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三门峡水利枢纽	167000	63.8	69324	43.4	7909	16.9
洛阳拖拉机厂	35130	13.4	34788	21.8	13750	29.4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17000	6.5	17550	11.0	559	1.2
洛阳滚珠轴承厂	10610	4.1	11306	7.1	9508	20.4
洛阳矿山机械厂	8869	3.4	8793	5.5	5989	12.8
洛阳热电站	6700	2.6	6797	4.3	5229	11.2
河南407厂	8000	3.1	4337	2.7	147	0.3
平顶山二号立井	3100	1.2	3156	2.0	720	1.5
郑州第二热电站	2008	0.8	1971	1.2	1971	4.2
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	3187	1.2	1682	1.1	923	2.0
合计	261604	100.0	159704	100.0	46705	100.0

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建设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本着依靠老城市，建设新城市和城市建设为工业建设服务的方针，积极地进行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从而迅速地形成了一批工业城市。

“一五”时期，洛阳市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1953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亲自带领国家计委、建委和苏联专家组成的联合选厂组，到洛阳选择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轴承厂等厂址。根据地形、地质、水源、水文及交通条件，考虑到战备的要求，将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的7个项目安排在洛阳。这些全国有名的大型企业在“一五”时期陆续动工兴建。此外，还兴建了一批地方中小型工业。为了动员全省力量支援在洛阳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共河南省委于1954年8月发出了《关于加强洛阳市工作给洛阳市委的指示》、《河南省支援洛阳工业基本建设方案》等文件，动员各方力量尽力支援洛阳的工业建设，把支援洛阳基本建设作为全省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由省工业厅组织洛阳周围各县尽力生产砖、瓦、灰、砂、石、小五金等的供应，基建需要的干部和工人由省劳动厅和洛阳专区负责调配。在交通运输方面，由郑州铁路局保证按时调拨车辆和完成装卸任务；在物资供应方面，由商业厅在洛阳建立食品公司、油脂门市部、五金商店、加油站等，保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由于全省各条战线的大力支援，洛阳市各项重点建设进度快，周期短，经济效益好。年产1.5万台54匹马力的

拖拉机厂，仅用四年就建成投产；年产1000万套轴承的洛阳滚珠轴承厂，只用三年时间就建成投产。这些工厂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全市的轻工业、手工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洛阳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变为以机械工业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城市。

“一五”时期，国家在郑州市也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基建投资达5.4亿元，1953年10月24日郑州电厂建成投产；1957年11月，郑州、洛阳、三门峡电力网开始送电。从1953~1957年间，郑州国营一、三、四、五、六棉纺织厂相继兴建，拥有40多万纱锭，从此郑州便成为国家和省重要纺织工业基地。此外，还新建、扩建了一些机械厂、建材厂、卷烟厂、电池化工厂以及食品厂等。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兴建的郑州纺织机械厂，在“一五”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纺织机械厂。

除洛阳、郑州两市是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外，国家在新乡、平顶山、焦作、三门峡等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一五”时期，新乡市大规模地发展了轻纺工业和机械工业，从而成为豫北的综合性工业城市。1953年在平顶山地区找到了储藏丰富的煤田，1955年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汇集于此，摆开了矿井建设的战场。一座以煤炭工业为主的新城在河南地区崛起。“一五”时期，国家给焦作的基建投资1亿多元，主要建设项目有中马村矿、焦西矿、朱村矿、王封矿等，中马村矿井是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到1957年工业企业发展到52个，年产煤248万吨，发电量近8000万千瓦，成了全国有名的无烟煤基地。由于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材工业的发展，使焦作成为豫北的另一重要工业基地。

河南的10项分布在三门峡、平顶山、郑州、洛阳、焦作5个城市。分布在洛阳的有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热电站、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河南407厂；分布在三门峡、平顶山、郑州、焦作的各1项，分别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平顶山二号立井、郑州第二热电站、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

5个城市在计划安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上的排序差别较大，原因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发电装机110万千瓦，由于淤沙严重，只装到25万千瓦后就停建进行整治，少用投资9.8亿元。详见表29。

表29　　河南省10项投资在5个城市的分布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地区＼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洛阳	86309	33.0	83571	52.3	35182	75.3
三门峡	167000	63.8	69324	43.4	7909	16.9
平顶山	3100	1.2	3156	2.0	720	1.5
郑州	2008	0.8	1971	1.2	1971	4.2

地区 \ 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焦作	3187	1.2	1682	1.1	923	2.0
合计	261604	100.0	159704	100.0	46705	100.0

河南省 10 项中有 9 项为民用项目，1 项为军工项目。9 项民用项目计划安排投资 253604 万元，占 96.9%；实际完成投资 155367 万元，占 97.3%；“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46558 万元，占 99.7%。1 项军工项目计划安排投资 8000 万元，占 3.1%；实际完成投资 4 337 万元，占 2.7%；“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147 万元，占 0.3%。

表 30　　河南省 10 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分类 \ 投资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民用项目	253604	96.9	155367	97.3	46558	99.7
军工项目	8000	3.1	4337	2.7	147	0.3
合计	261604	100.0	159704	100.0	46705	100.0

表 31　　河南的 9 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郑州第二热电站	1.2 万瓦	同规模	同规模
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	采煤 60 万吨		
平顶山二号立井	采煤 90 万吨	同规模	
洛阳拖拉机厂	拖拉机 4.5 万台	同规模	
洛阳矿山机械厂	矿山机械设备 2 万吨	同规模	1 万吨
洛阳滚珠轴承厂	滚珠轴承 1 000 万套	同规模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铜材 6 万吨	同规模	
洛阳热电站	7.5 万千瓦	同规模	5 万千瓦
三门峡水利枢纽	110 万千瓦	25 万千瓦	

河南的 10 项中有 2 项是第一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郑州第二热电站、焦作中马村二号立井；有 4 项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平顶山二号立井、洛阳拖拉机厂、

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有2项是第三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热电站；有2项是第四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河南407厂。

第一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5195万元，实际完成投资3653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2894万元；第二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57709万元，实际完成投资58043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29967万元；第三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237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4347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5788万元；第四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750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73661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8056万元。它们分别占的比重见下表：

表32　河南省10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投资执行情况 / 批次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第一批项目	5195	2.0	3653	2.3	2894	6.2
第二批项目	57709	22.1	58043	36.3	29967	64.2
第三批项目	23700	9.1	24347	15.2	5788	12.4
第四批项目	175000	66.9	73661	46.1	8056	17.2
合计	261604	100.0	159704	100.0	46705	100.0

“一五”时期，由于国家把河南作为建设的重点，使河南的工业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发展了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基础工业，建立了包括新式机床制造、拖拉机制造、冶金、矿山设备制造和重要有色金属加工等新的工业部门，为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15.6亿元，比1952年增长93%。

在基本建设方面，“一五”时期全省共完成基建投资21.06亿元（中央投资16.87亿元，地方4.19亿元），其中生产性建设16.95亿元，占80.5%，非生产性建设4.1亿元，占19.5%。按部门分，农业投资占20.6%，轻工业占11.7%，重工业占40%，交通运输、邮电占13.4%；商业、粮食、外贸占4.5%；文教、卫生、科学占4.1%；城市建设占2.7%，其他占3%。这个时期的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安排比较恰当，建设规模同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基本适应。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控制在24%，地方基建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4.7%，突出了重点工程的建设，严格控制计划外工程，保证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河南在“一五”时期共施工项目2099个，其中大中型项目258个；全部或部分投产项目1714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06个。五年间新增固定资产16.26亿元，动用系数平均77%，平均建设工期为一年零十个月，基本建设投资效果比较好。通过基本建设，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新增69509万元。其中机械工业26936万元，纺织工业14008万元，煤炭工业13496万元，电力工业10289万元。

第七节　甘　肃　省

甘肃是经济落后的省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甘肃各族人民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努力发展生产，到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各项主要指标已恢复或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逐渐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由于原来的经济基础薄弱，技术力量落后，使得地方工业不能适应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供求矛盾尖锐，农业基础脆弱，全省整个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甘肃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编制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一五"计划期间，甘肃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省区之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其中属于国家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有8项，项目数名列第七。甘肃的8项包括7项民用项目和1项军用项目。7项民用项目是：兰州炼油厂、兰州热电站、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1项军用项目是甘肃805厂（银光化学材料厂）。属于全国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甘肃有119项。这些项目的建成，将为甘肃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1955年和1956年两年间，甘肃的8项陆续开始施工。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兰州热电站、白银有色金属公司；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甘肃805厂。

历经七年时间，至1967年甘肃的8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它是兰州热电站；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4项，它们是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氮肥厂；1960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它们是兰州合成橡胶厂、甘肃805厂；1962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甘肃的8项计划投资14661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39 736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42718万元。投资计划及实施情况如表33。

表33　　甘肃省8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40531	27.6	44697	32.0	12342	28.9
兰州氮肥厂	25180	17.2	23317	16.7	5066	11.9
兰州炼油厂	18223	12.4	19385	13.9	10705	25.1
兰州石油机械厂	15622	10.7	14381	10.3	2454	5.7
兰州合成橡胶厂	12340	8.4	11664	8.3	1000	2.3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兰州热电站	11000	7.5	10850	7.8	7190	16.8
甘肃805厂	16437	11.2	8437	6.0	3544	8.3
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7281	5.0	7005	5.0	417	1.0
合计	146614	100.0	139736	100.0	42718	100.0

甘肃的8项分布在兰州、郝家川、白银三个城市。分布在兰州的有6项，它们是：兰州热电站、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氮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分布在白银和郝家川的各1项，分别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甘肃805厂。

3个城市在计划安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和“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上的排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具体情况详见表34。

表34　　甘肃省8项投资在3个城市的分布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地区＼投资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兰州	89646	61.1	86602	62.0	26832	62.8
白银	40531	27.6	44697	32.0	12342	28.9
郝家川	16437	11.2	8437	6.0	3544	8.3
合计	146614	100.0	139736	100.0	42718	100.0

甘肃省8项中有7项为民用项目，1项为军工项目。7项民用项目计划投资130177万元，占88.8%；实际完成投资131299万元，占94%；“一五”时期完成投资39174万元，占91.7%。1项军工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6437万元，占11.2%；实际完成投资8437万元，占6.0%；“一五”时期完成投资3544万元，占8.3%。

表35　　甘肃省8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类别＼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民用项目	130177	88.8	131299	94.0	39174	91.7
军工项目	16437	11.2	8437	6.0	3544	8.3
合计	146614	100.0	139736	100.0	42718	100.0

表 36　　甘肃的 7 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兰州热电站	10 万千瓦	同规模	5 万千瓦
兰州石油机械厂	石油设备 1.5 万吨	同规模	
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化工设备 2.5 万吨	同规模	
兰州炼油厂	炼油 100 万吨	同规模	
兰州合成橡胶厂	合成橡胶 1.5 吨	同规模	
兰州氮肥厂	合成氨 5.2 万吨，硝酸铵 9.8 万吨	同规模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电铜 3 万吨，硫酸 2.5 万吨	同规模	

甘肃省 8 项中有 6 项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兰州热电站、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甘肃 805 厂；有 1 项即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第三批确定的项目；还有 1 项即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是第四批确定的项目。

第二批项目计划投资 98802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88034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29959 万元；第三批项目计划投资 40531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44697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12 342 万元；第四批项目计划投资 7281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7005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417 万元。它们分别占的比重见下表：

表 37　　甘肃省 8 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投资执行情况 / 批次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二批项目	98802	67.4	88034	63.0	29959	70.1
第三批项目	40531	27.6	44697	32.0	12342	28.9
第四批项目	7281	5.0	7005	5.0	417	1.0
合计	146614	100.0	139736	100.0	42718	100.0

“一五”计划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关心甘肃的工业建设，对一些重要建设项目，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多次亲临现场，听取汇报，检查指导，确定建厂方针和方案。为了尽快地把兰州建设成国家重点工业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制定了“调配技术力量支援兰州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的正确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一方面从苏联、联邦德国等国家以及上海、沈阳等国内工业区调运了大量的现代技术设备支援甘肃。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干部等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甘肃，组成一

支浩浩荡荡的工业建设大军。同时，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大批企业也迁至甘肃，如上海市建二公司、浙江省管道队、上海自来水厂管道队等相继并入甘肃省城建局，上海搪瓷厂、热水瓶厂、胶鞋厂等纷纷搬到甘肃。据统计，五年内全国各地支甘的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约6万人，他们为甘肃工业经济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永登水泥厂以及兰新、包兰铁路等许多大中型建设项目，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汗水。

"一五"计划时期，甘肃共兴建工矿企业1574个，属于限额以上的项目146个，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制造为支柱的工业结构，为甘肃的工业奠定了基础。大中型企业的竣工投产，保证了甘肃主要工业部门"一五"计划生产指标的完成。到1957年，社会总产值达到29.8亿元，年均增长11.59%；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5.56亿元，年均增长8.9%；国民收入达15.1亿元，年均增长8.4%，比1952年增长51.5%；财政收入达2.04亿元，年均增长12.8%，比1952年增长82.8%。

五年内，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4.35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5.73亿元。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极大地提高了甘肃省企业的生产能力。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年均增长率达19.4%，到1957年底，工业总产值达6.35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143%。各主要生产部门都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制定的目标。这一期间，甘肃省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央所属企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由26.56%提高到51.52%；地方工业也有了较快发展，产值达3亿元，比1952年的1.8亿元增长了60%。在所有制结构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增长了4倍多，达4.77亿元，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增长了47倍，达1.23亿元。工业内部的结构也开始有所变化，年重工业产值达3.7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9.38%，轻工业产值达2.5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62%。

总之，"一五"计划时期甘肃省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生产迅速发展，市场比较繁荣，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到处呈现出奋发向上，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第八节　四　川　省

基础薄弱的四川工业，经过三年的恢复，到1952年底，工业总产值达到16.08亿元，比1949年增长1.2倍。但工业和交通落后的状态远未改变。

"一五"期间，国家"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694项限额以上项目分别有6个和16个在四川。加上其他重要工业、交通项目，总计为93个。国家对工业、交通、邮电的基本建设投资共18.24亿元，占全省基建投资总额的68.1%。建设的重点是能源工业和交通事业。

在能源工业方面，大量投资用于电力工业的开发和建设。被列入“156项”苏联援建工程的重庆电站、成都热电站就是在这时建设的。“一五”期间，采取“水火并举”方针，使电力工业获得很大发展。电力工业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庆电厂第一期工程，于1952年11月正式动工兴建，装机为两台1.2万千瓦机组。1954年4月和7月，两台机组相继竣工。1957年开始，重庆电厂又进行了扩建，增装了机组。它是西南地区第一座具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火力发电厂。重点项目之二成都热电厂第二期工程，于1956年4月动工，装机为两台2.5万千瓦机组，1958年建成投产（以后又进行了扩建）。重点项目之三重庆长寿龙溪河梯级电站于1954年8月动工兴建，它由狮子滩、上洞、回龙寨和下洞4个梯级电站组成，总装机容量10.45万千瓦，到1957年3月，狮子滩水电站建成投产，当年全省发电量比1952年增长1.7倍，比1949年增长3.6倍。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四川省有6项，项目数名列第八。四川的6项包括2项民用项目和4项军用项目。2项民用项目是：重庆电站、成都热电站。4项军用项目是四川784厂、四川788厂、四川715厂、四川719厂。四川的6项都是新建项目。

从1952~1957年五年间，四川的6项陆续开始施工。1952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重庆电站；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四川715厂、四川719厂；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成都热电站；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四川784厂、四川788厂。

历经八年时间，至1960年四川的6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4年重庆电站竣工；1957年竣工四川715厂和四川719厂竣工；1958年成都热电站竣工；1960年竣工有四川784厂和四川788厂。

四川的6项计划安排投资2855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2082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2751万元。详见表38。

表38　　四川省6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成都热电站	5180	18.1	5033	22.8	925	7.3
四川784厂	6227	21.8	4143	18.8	1353	10.6
四川715厂	5546	19.4	3749	17.0	3749	29.4
重庆电站	3064	10.7	3561	16.1	3561	27.9
四川788厂	4722	16.5	3332	15.1	899	7.1
四川719厂	3817	13.4	2264	10.3	2264	17.8
合计	28556	100.0	22082	100.0	12751	100.0

四川的6项分布在成都、重庆两个城市。分布在成都的有5项，包括1个民用项目和4个军工项目，即成都热电站和四川715厂、四川719厂、四川784厂、四川788厂；

分布在重庆的是重庆电站。

两个城市的计划安排投资情况如表39。

表39　　四川省6项投资在成都、重庆的分布情况

投资分布 / 地区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成都	25492	89.3	18521	83.9	9190	72.1
重庆	3064	10.7	3561	16.1	3561	27.9
合计	28556	100.0	22082	100.0	12751	100.0

四川省6项中有2项为民用项目，4项为军工项目。投资比例如表40

表40　　四川省6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投资分布 / 类别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民用项目	8244	28.9	8594	38.9	4486	35.2
军工项目	20312	71.1	13488	61.1	8265	64.8
合计	28556	100.0	22082	100.0	12751	100.0

表41　　四川的2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成都热电站	5万千瓦	同规模	
重庆电站	2.4万千瓦	同规模	同规模

四川省的6项中有1项是第一批确定的项目，它是重庆电站；有4项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它们是：四川715厂、四川719厂、四川784厂、四川788厂；有1项是第三批确定的项目，即成都热电站。

第一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3064万元，实际完成投资3561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3561万元；第二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20312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3488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8265万元；第三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518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5033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925万元。

表 42　　四川省 6 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批次＼投资执行情况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一批项目	3064	10.7	3561	16.1	3561	27.9
第二批项目	20312	71.1	13488	61.1	8265	64.8
第三批项目	5180	18.1	5033	22.8	925	7.3
合计	28556	100.0	22082	100.0	12751	100.0

“一五”期间，四川还建成或开始兴建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后改名宏明无线电器材厂）、锦江电机厂、新兴仪器厂、内江糖厂、四川化肥厂、乐山磷肥厂、成都机车厂、江油水泥厂、马尔康和黑水森林工业局等。中国第二座现代化精密机具制造厂——成都量具刃具厂也于 1956 年 5 月破土动工，同年底，该厂第一个现代化工具车间建成投入生产。在此期间，改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有天府、永荣、曾家山和威远煤矿，重庆特殊钢厂，綦江铁矿，重庆水泥厂，重庆电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机床厂等。

第九节　河　北　省

河北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要“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使河北的资源优势得到发挥”。河北省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开发早，开采量大，煤种齐全，炼焦煤储量比重大，担负着供应全国冶金、电力等工业用煤的任务。河北的电力工业有一定基础，并具备建设大电站的条件，在河北进行电力建设，是保证北京、天津有强大的电力供应基地的必要条件。河北平原盛产棉花，50 年代初棉花产量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 1/4。因此，在计划中确定“煤炭、电力、纺织作为工业建设的重点”。

“一五”期间，河北省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19.22 亿元，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为 85%。工业系统投资占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的 64.4%，其中重工业投资增加较多，所占比重由恢复时期的 24.4% 上升到 45.9%。

煤炭工业作为基本建设重点，投资达 3.37 亿元。新建了兴隆煤矿，对开滦煤矿的 4 对矿井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并恢复了被淹多年的马家沟矿，在峰峰煤矿新建了 6 对矿井和 2 座大型洗煤厂。到 1957 年，全省煤矿矿井建设规模达 777 万吨。新井的建设规模大、速度快、效益好。一般建井工期不超过三年，吨煤投资不到 50 元（包括投产后的达产工程）。为了适应煤炭基地建设的需要，还建设了张家口煤矿机械制造厂，为形成

从地质勘探到设计、施工、生产和机械制造等配套的煤炭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1957年全省原煤产量达到1520万吨，比1952年增长52.5%，年递增8.8%。

用于电力工业的基建投资为2.28亿元，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4个，作为国家"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石家庄热电厂一期工程，于1957年12月建成投产。这个时期还扩建了唐山发电厂、下花园电厂、保定发电厂、架设了峰章送电线路等。在南部地区形成了峰峰电网和石家庄电网，北部的唐山、张家口和北京、天津陶成了京津唐电网。到1957年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0.98万千瓦，比1952年增长近1倍，平均年递增14.6%；发电量达到9.76亿度，增长1.3倍，平均年递增18.26%。

河北纺织工业在"一五"时期得到了大发展，为形成规模较大、门类齐全、生产技术具有一定水平的纺织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根据国家纺织工业部规划，开始兴建石家庄、邯郸两大纺织基地，用于纺织工业的投资为2.834亿元。从1953年起，先后动工兴建石家庄国棉一、二、三、四厂、石家庄印染厂和邯郸国棉二、三、四厂。1955年还新建了石家庄华新纺织厂（后改为石家庄国棉五厂）。到1957年底，全省总计新增棉织机1.39万台，棉纺锭44.72万枚。1957年，全省棉纱产量25.86万件，比1952年增长2.74倍；棉布3.12亿米，增长60.8%。

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河北省安排了5项，项目数名列第九。河北的5项全部是民用项目，它们是：峰峰中央洗煤厂、峰峰通顺三号立井、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热河钒钛厂、华北制药厂。河北的5项都是新建项目。

从1954～1957年三年间，河北的5项陆续开始施工。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华北制药厂；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热河钒钛厂；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峰峰中央洗煤厂、峰峰通顺三号立井。

历经七年时间，至1961年河北的5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8年竣工有华北制药厂、热河钒钛厂2项；1959年竣工有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峰峰中央洗煤厂2项；1961年竣工有峰峰通顺三号立井1项；

河北省的5项计划安排投资2807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8264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2732万元。详见表43。

河北的5项分布在石家庄、峰峰、热河三个城市。分布在石家庄的有2项，是华北制药厂和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分布在峰峰的也有2项，它们是峰峰中央洗煤厂、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分布在热河的有1项，是热河钒钛厂。

表43　　河北省5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华北制药厂	8037	28.6	7626	27.0	6775	53.2
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	6800	24.2	6872	24.3	4189	32.9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峰峰通顺三号立井	5640	20.1	6640	23.5	76	0.6
热河钒钛厂	4500	16.0	4640	16.4	1504	11.8
峰峰中央洗煤厂	3100	11.0	2486	8.8	188	1.5
合计	28077	100.0	28264	100.0	12732	100.0

表 44　　河北的 5 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	4.9 万千瓦	同规模	2.4 万千瓦
华北制药厂	青霉素、链霉素等 115 吨	同规模	
峰峰中央洗煤厂	洗煤 200 万吨	同规模	
峰峰通顺三号立井	采煤 120 万吨	同规模	
热河钒钛厂	钛铁 7000 吨、钒铁 1000 吨	同规模	

三个城市在计划安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和“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上的排序基本上是一致的。详见表 45。

表 45　　河北的 5 项投资在 3 个城市的分布情况
（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分布 / 地区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石家庄	14837	52.8	14498	51.3	10964	86.1
峰峰	8740	31.1	9126	32.3	264	2.1
热河	4500	16.0	4640	16.4	1504	11.8
合计	28077	100.0	28264	100.0	12732	100.0

河北省的 5 项全部是第二批建设的项目。“一五”时期，以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原材料的采掘加工基础工业发展也很快，扩建龙烟铁矿，改造唐山钢厂，新建寿王坟铜矿，为河北冶金工业起步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开工兴建的“156 项”重点项目之一的华北制药厂，已成为全国抗生素生产基地。“一五”期间，新增生产能力为：发电机组

15.58万千瓦，煤炭开采能力285万吨，铁矿开采能力247万吨，炼钢能力3.5万吨，棉纺44.72万锭，织布机1.39万台。1957年全省完成工业总产值24.75亿元，比1952年增长79.21%，年平均增长12.4%。

1957年形成的以资源优势为基础的煤炭、纺织、冶金、建材4个行业的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9.9%，为以后发展成为河北省的优势工业奠定了基础。实践表明这个时期确定的发展战略和主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上重点突出，有步骤，有章法，收效是明显的。河北省是资源大省，努力发挥资源优势，对支援北京、天津乃至全国工业建设起着重要作用，为全国经济战略布局的展开作出了贡献。

第十节　内蒙古自治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大批干部转入了工业部门，巨额资金投入了工业基本建设。五年投资总额达4.76亿元，其中属于中央各部投资的为3.76亿元。建设项目中，有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大兴安岭森林采伐基地，有连接中、蒙、苏三国的集（宁）二（连）铁路，通往西北的包（头）兰（州）铁路，有电力、煤炭能源工业，以及包头糖厂，海拉尔、集宁两个肉类联合加工厂等一批轻工业。

苏联援建的“156项”建设项目内蒙古安排了5项，与河北项目数一样，并列第九。内蒙古的5项有3项民用项目，2项军工项目。3项民用项目是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宋家河热电站、包头钢铁公司；2项军工项目是内蒙447厂、内蒙617厂。

从1955~1957年三年间，内蒙古自治区的5项陆续开始施工。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内蒙古447厂；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包头钢铁公司、内蒙古617厂；1957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包头宋家河热电站。

历经五年时间，至1960年内蒙古自治区的5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8年竣工的项目有2项，是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内蒙古617厂；1959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是内蒙古447厂；1960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是包头宋家河热电站；1962年竣工的项目有1项，是包头钢铁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的5项计划安排投资16089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59003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49332万元。详见表46。

表 46　　内蒙古自治区 5 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包头钢铁公司	101760	63.2	91877	57.8	7149	14.5
内蒙古 617 厂	28073	17.4	27748	17.5	20577	41.7
内蒙古 447 厂	18673	11.6	27720	17.4	16857	34.2
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	5887	3.7	6120	3.8	4055	8.2
包头宋家河热电站	6504	4.0	5538	3.5	694	1.4
合计	160897	100.0	159003	100.0	49332	100.0

内蒙古自治区的 5 项全部分布在包头市。

内蒙古自治区的 5 项中有 3 项为民用项目，2 项为军工项目。投资比重上表 47。

表 47　　内蒙古自治区的 5 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投资分布 / 分类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民用项目	114151	70.9	103535	65.1	11898	24.1
军工项目	46746	29.1	55468	34.9	37434	75.9
合计	160897	100.0	159003	100.0	49332	100.0

表 47　　内蒙古的 3 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	5 万千瓦	同规模	
包头宋家河热电站	6.2 万千瓦	同规模	
包头钢铁公司	生铁 160 万吨、钢 150 万吨	同规模	

内蒙古自治区的 5 项有 4 项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钢铁公司、内蒙古 447 厂、内蒙古 617 厂；有 1 项是第三批确定的项目：包头宋家河热电站。投资情况详见 49。

表49　　　　内蒙古自治区5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批次＼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二批项目	154393	96.0	153465	96.5	48638	98.6
第三批项目	6504	4.0	5538	3.5	694	1.4
合计	160897	100.0	159003	100.0	49332	100.0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基础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经济的发展。1957年全区发电量为9186万千瓦小时，比1952年增长了5倍；原煤产量达217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2倍。乳制品、皮革、毛纺等畜产品加工业，机械工业、建筑材料工业也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57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6.33亿元，比1952年增长2.93倍，平均每年递增31.5%。工业迅速发展，使自治区的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铁路里程达1 589公里，其中正线830公里。集二线于1954年全线通车。包兰铁路于1957年底铺轨300多公里。包（头）白（云鄂博）、包（头）石（拐）铁路也先后全线通车。此外，还修筑了伸人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铁路9条，长611公里。在公路建设和运输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57年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3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长1.7倍；内河航运通航里程达829公里，成为交通运输方面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蒙古的工业、交通建设，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得到了蓬勃发展。这首先是由于国家及兄弟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关怀、支持、帮助的结果，同时也由于自治区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在“为农牧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国家大工业服务”的方针指导下，自治区除了大力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外，对地方工业建设做出了正确的安排，既有重点，又做到统筹兼顾。

第十一节　北　京　市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北京安排了4项，项目数名列第十一位。北京的4项是1项民用项目和3项军工项目。民用项是北京热电厂，军工项目是：北京774厂、北京738厂、北京211厂。除北京774厂属改建项目外，其余3项都是新建项目。

电子工业是“一五”时期北京建设的重点。在北京属于“156项”的3个军工项目中，有两项是电子工业项目。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在北京建立无线电零件厂和电子管厂。1956年和1957年，苏联援建的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有线电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援建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在北京东效酒仙桥地区建成投产。加上

1950年迁建北京的北京广播器材厂。从此北京有了两个大型基础元器件厂和2个大型整机厂，使北京一跃成为全国电子工业重要生产基地。到1957年，北京已生产25种管型的电子管近500万只，各种电子元件近700万只，电子管收音机开始出口。

1956年建成的“156项”中的北京电子管厂（774厂）1956年正式投产后，位居亚洲首位。六七十年代，774厂仅上缴国家的利税便达10多亿元。被誉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的摇篮”。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北京电子管厂基础上先后与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厂商合资兴办了七家合资企业，在和日本合资的四家企业中，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业绩十分突出，成为中日合资企业的典范。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公司拥有25%的股份。1993年4月，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京东方）正式成立，1997年6月该公司B股上市，注册资本近4.9亿元人民币。

“156项”建设的国营北京有线电总厂（即738厂）于1957年建成投产。曾研制生产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第一部自动电话交换机和第一台银行自动柜员机（ATM)。该厂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C&W)，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集通信、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开发、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一类企业，连续四年成为全国电子百强企业。至2000年，拥有3000余名高素质的员工，总资产16.84亿元，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设有技术开发中心、培训中心和销售服务中心，共有13个职能部室，10个分公司，3个后勤服务单位，并投资建立了9个中外合资企业。销售服务中心下辖27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驻外销售中心，为顾客提供售前售后服务。

根据《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国防工业总体布局的需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首都国防工业开始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建设起一批军工科研所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形成了北京国防工业的格局。为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航空工业，立足于国内资源，建立中国的航空材料体系和发展飞机制造技术，1955年8月，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北京航空材料和航空制造工艺研究所建成(即211厂)，为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211厂发展成为首都航天机械公司（首都机械厂)，成为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所属的综合性军工企业。并是中国最大的真空炉制造商，专门从事真空系列炉的开发、研制、制造、销售工作，自1979年生产出第一批真空炉至2001年，先后自行设计制造了7个系列70多个型号规格的真空系列炉600多台，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远销美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朗及港台地区。其还与香港中星行共同投资在廊坊开发区建立了廊坊航星包装机械有限公司，1996年通过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

从1954~1956年三年间，北京的4项陆续开始施工。1954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北京774厂、北京211厂；1955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北京738厂；1956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北京热电厂。

历经五年时间，至1959年北京的4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1956年竣工有北京774厂；1957年竣工的有北京738厂、北京211厂；1959年竣工的是北京热电厂。

北京的4项计划安排投资24 35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5194万元，其中“一五”时

期完成投资16339万元。详见表50。

表50　　北京市4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北京热电厂	7936	32.6	9380	37.2	525	3.2
北京774厂	7274	29.9	7901	31.4	7901	48.4
北京211厂	6357	26.1	5502	21.8	5502	33.7
北京738厂	2789	11.5	2411	9.6	2411	14.8
合计	24356	100.0	25194	100.0	16339	100.0

北京的4项中有1项为民用项目，3项为军工项目。分类投资情况见表51。

表51　　北京4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分类＼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民用项目	7936	32.6	9380	37.2	525	3.2
军工项目	16420	67.4	15814	62.8	15814	96.8
合计	24356	100.0	25194	100.0	16339	100.0

北京的4项中有1项为第一批确定的项目，即北京774厂；2项为第二批确定的项目，即北京211厂和北京738厂；有1项为第五批口头协议项目，即北京热电厂。投资顺序见表52。

表52　　北京市4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批次＼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第一批项目	7274	29.9	7901	31.4	7901	48.4
第二批项目	9146	37.6	7913	31.4	7913	48.4
第五批项目	7936	32.6	9380	37.2	525	3.2
合计	24356	100.0	25194	100.0	16339	100.0

随着50年代国际上半导体技术的兴起，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北京774厂）成

立锗半导体管试制小组，当年制出锗二极管和锗三极管。1958 年，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成立半导体试制组，拉制出了纯度在 99.99%以上的硅单晶。1964 年在北京电子管厂组建年产 300 万只锗低频小功率管生产线，1965 年建成，当年产量 20 万只。北京市 1958 年成立电工研究所，1959～1960 年先后用自制的单晶炉拉制出了合格的锗单晶和硅单晶。1958 年 8 月 1 日，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协助下，北京有线电厂试制出中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03 机）。1959 年试制出第一台 104 机，1961 年实现 104 机国产化。原第四机械工业部王诤部长曾说："103 机、104 机是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21 机是北京有线电厂为主设计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在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帮助下，1965 年底通过样机鉴定。北京市无线电制造厂 1960 年接产清华大学研制的"555"型小型电子模拟计算机，这是北京市地方电子工业生产的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

根据《1956 年至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国防工业总体布局的需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首都国防工业开始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建设起一批军工科研所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形成了北京国防工业的格局。1958 年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由苏联专家帮助建成的中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使科研领域扩大到原子能应用研究。发展航天工业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北京国防工业重点建设任务之一。早在 1956 年，国防部就在北京建立了导弹研究院。从 1958 年开始，相继兴建了总体设计及发动机研制、火箭发动机试验、空气动力研究、控制导引系统研制等 4 个重点工程项目。1960 年基本建成了较完整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体系，构成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基地。1964 年在此基础上，组建成运载火箭、空防导弹、海防导弹 3 个研究院。1968 年 2 月，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空间技术研制单位的基础上，组建了空间技术研究院，它与运载火箭研究院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航天技术的研制中心。

第十二节　云　南　省

被列为"156 项"中的云南的 4 项全部是民用项目，它们是：个旧电站（一、二期）、云南锡业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云南的 4 项都是新建项目。

1954 年和 1958 年两年，云南的 4 项开始施工。1954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个旧电站（一、二期）和云南锡业公司，它们都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1958 年开始施工的项目是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它们都是第四批确定的项目，"二五"期间开始施工的。

历经八年时间，至 1962 年云南的 4 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个旧电站（一、二期）、云南锡业公司 1958 年竣工；东川矿务局 1961 年竣工；会泽铅锌矿 1962 年竣工。

云南省的 4 项计划安排投资 57681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55 602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18175 万元。说见表 53。

表 53　　云南省 4 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云南锡业公司	29483	51.1	25883	46.6	15043	82.8
东川矿务局	19398	33.6	20300	36.5		
会泽铅锌矿	5000	8.7	4885	8.8		
个旧电站（一、二期）	3800	6.6	4534	8.2	3132	17.2
合计	57681	100.0	55602	100.0	18175	100.0

云南的 4 项有 2 项建在个旧，1 项建在东川，1 项建在会泽。建在个旧的 2 项是个旧电站（一、二期）、云南锡业公司；建在东川的 1 项是东川矿务局；建在会泽的 1 项是会泽铅锌矿。

三个城市在计划安排投资和实际完成投资上的排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安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见表 54。

表 54　　云南省 4 项投资在 3 个城市的分布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分布 / 地区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个旧	33283	57.7	30417	54.7	18175	100.0
东川	19398	33.6	20300	36.5		
会泽	5000	8.7	4 885	8.8		
合计	57681	100.0	55602	100.0	18175	100.0

云南的 4 项中有 2 项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有 2 项是第四批确定、在“二五”时期开始施工的项目。第二批确定的项目是个旧电站（一、二期）、云南锡业公司，第四批确定的项目是东川矿务局和会泽铅锌矿。

第二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 33283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30417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18175 万元；第四批项目计划安排投资 24398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25185 万元，第四批项目中的云南的 2 项都是“二五”时期开始施工的。

表 55　　云南省 2 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批次＼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二批项目	33283	57.7	30417	54.7	18175	100.0
第四批项目	24398	42.3	25185	45.3		
合计	57681	100.0	55602	100.0	18175	100.0

“一五”计划期间，云南各族人民群众经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始终保持了饱满的社会主义热情。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加强。这些，使得云南“一五”计划得以提前和超额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光辉成就。主要表现在：

——到“一五”末期的 1957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7.44 亿元（1952 年不变价），超额 6%完成了“一五”计划规定的指标；与 1952 年相比，增长 91.3%，比计划增长多 10.8 个百分点；年平均递增 13.9%，比计划多 1.4%百分点。

——1957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 11.17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207.5%，年平均增长 25.2%。全省较好地完成了国家安排的有色金属生产任务，1957 年，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共达到 2.41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27%。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能源、交通、建筑、建材、机器制造等业的全面发展。五年中新建大、中、小型地方工业企业 350 多个。对原有的企业，不少进行了扩建改建，初步形成了全省地方工业生产体系。钢、煤、电力、水泥、原盐、卷烟、棉布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有的成倍增加。过去不能生产的磷肥、新式农具、农药等开始生产，填补了空白。从来没有工业的边疆民族地区，“一五”期间出现了近百个新兴工厂。“一五”时期，还初步摸索积累了社会主义管理生产的经验，培养造就了人才，为以后的工业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十三节　江　西　省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156 项”重点工程有 4 项在江西陆续兴建，其中大型军工企业洪都机械厂（江西 320 厂）的兴建，使江西成为全国新兴的飞机制造基地。1954 年 7 月，在总设计师陆孝彭、苏联专家和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架飞机飞上了蓝天。毛泽东为此亲笔写信嘉勉：“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工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地方基本建设提前 13 个月、超额 4%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新建、扩建 169 个地方重点项目，其中主要有江西棉纺织厂、江西造纸厂、江西拖拉机厂、江西第一糖厂、南昌柴油机厂、萍乡钢铁厂等 20 个大、中型骨干企业，1957 年竣工投产的有 12 个。

江西省列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4项是3个民用项目和1个军工项目。3个民用项目是大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岿美山钨矿；1个军工项目是江西320厂。江西的4项建在4个地方，大吉山钨矿建在虔南，西华山钨矿建在大庾，岿美山钨矿建在定南，江西320厂建在南昌。除江西320厂属改建项目外，其余3项都是新建项目。江西的4项全部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

从1953~1956年四年间，江西的4项陆续开始施工。江西320厂1953年开始施工；大吉山钨矿1955年开始施工；西华山钨矿、岿美山钨矿1956年开始施工。

历经六年时间，至1959年江西的4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江西320厂1957年竣工；大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岿美山钨矿1959年竣工。

江西的4项计划安排投资2469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5132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6196万元。详见表56。

江西的4项建在虔南、大庾、定南、南昌四个地方，因而，这4项的投资情况也就是这四个地方的投资情况。江西的4项中有3项为民用项目，1项为军工项目。3项民用项目计划安排投资1501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6196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7260万元。1项军工项目计划安排投资968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8936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8936万元。

表56　江西省4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 \ 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江西320厂	9680	39.2	8936	35.56	8936	55.2
江西大吉山钨矿	5500	22.3	6723	26.75	3528	21.8
江西西华山钨矿	5700	23.1	4782	19.03	1836	11.3
江西岿美山钨矿	3817	15.5	4691	18.67	1896	11.7
合计	24697	100.0	25132	100.0	16196	100.0

表57　江西省4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分类 \ 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民用项目	15017	60.8	16196	64.4	7260	44.8
军工项目	9680	39.2	8936	35.6	8936	55.2
合计	24697	100.0	25132	100.0	16196	100.0

表 58　　　　江西的 3 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江西大吉山钨矿	采选 1600 吨/日	同规模	
江西西华山钨矿	采选 1856 吨/日	同规模	
江西岿美山钨矿	采选 1570 吨/日	同规模	

五年内，全省新增加的年生产能力为：电力 8.73 万千瓦、煤炭 119 万吨、机制纸 6698 吨、棉纺纱锭 5.74 万枚。1957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 12.5 亿元（按 1952 年不变价计算），比 1952 年增长 114.8%，年平均递增率为 16.5%，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十四节　湖　南　省

“156 项”重点建设工程在湖南安排的 4 个项目包括是 3 项民用项目和 1 项军工项目。3 个民用项是株洲热电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湘潭船用电极厂；1 个军工项目是湖南 331 厂。除湖南 331 厂属改建项目外，其余 3 项都是新建项目。

从 1955～1957 年三年间，湖南的 4 项陆续开始施工。株洲硬质合金厂、湖南 331 厂 1955 年开始施工；株洲热电厂 1956 年开始施工；湘潭船用电极厂 1957 年开始施工。

历经四年时间，至 1959 年湖南的 4 项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湖南 331 厂 1956 年竣工；株洲热电厂、株洲硬质合金厂 1957 年竣工；湘潭船用电极厂 1959 年竣工。

湖南的 4 项计划安排投资 13 217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14255 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12915 万元。详见表 59。

表 59　　　　湖南省 4 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项目＼投资构成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湖南 331 厂	5693	43.1	5893	41.3	5893	45.6
株洲硬质合金厂	3525	26.7	4695	32.9	4695	36.4
株洲热电厂	2249	17.0	2165	15.2	2165	16.8
湘潭船用电极厂	1750	13.2	1502	10.5	162	1.3
合计	13217	100.0	14255	100.0	12915	100.0

湖南的4项有3项建在株洲，1项建在湘潭。建在株洲的3项是湖南331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株洲热电厂；建在湘潭的1项是湘潭船用电极厂。

两个城市在计划安排投资和实际完成投资上的排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安排投资和实际完成投资的情况见表60。

表60　湖南省4项投资在2个城市的分布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地区＼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株洲	11467	86.8	12753	89.5	12753	98.7
湘潭	1750	13.2	1502	10.5	162	1.3
合计	13217	100.0	14255	100.0	12915	100.0

湖南的4项中有3项为民用项目，1项为军工项目。投资分布详见表61。

表61　湖南省4项投资在民用、军工项目的分布情况

分类＼投资分布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民用项目	7524	56.9	8362	58.7	7022	54.4
军工项目	5693	43.1	5893	41.3	5893	45.6
合计	13217	100.0	14255	100.0	12915	100.0

表62　湖南的3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株洲热电厂	1.2万千瓦	同规模	同规模
株洲硬质合金厂	硬质合金500吨	同规模	同规模
湘潭船用电极厂	电机11万千瓦	同规模	

湖南的4项有2项属第二批确定的项目，有1项属第三批确定的项目，1项第四批确定的项目。第二批确定的项目是株洲硬质合金厂和湖南331厂；第三批确定的项目是株洲热电厂；第四批确定的项目湘潭船用电极厂。详见表63。

表 63　　湖南省 4 项投资的立项实施情况

投资执行情况 / 批次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第二批项目	9218	69.7	10588	74.3	10588	82.0
第三批项目	2249	17.0	2165	15.2	2165	16.8
第四批项目	1750	13.2	1502	10.5	162	1.3
合计	13217	100.0	14255	100.0	12915	100.0

这些骨干企业的建设，使湖南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五年内，新增发电机组容量 4.81 万千瓦，煤炭开采 223.6 万吨，炼铁 7.24 万吨，炼钢 7100 吨，磷肥 1.38 万吨，棉纺锭 5.52 万锭，棉织机 1524 台，机制糖 2400 吨，机制纸 9100 吨等。其中采煤、发电、织布机等的新增生产能力超过了 1952 年原有生产能力，炼钢、制磷肥等企业则填补了湖南的空白。这些骨干企业的先后建成和投产，为国家工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株洲硬质合金厂的产品，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保证了国家建设需要，还向国外出口，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硬质合金厂；湘潭电机厂经过扩建，五年内制造了 138 种新产品，为北京、鞍山、大同、石家庄、玉门、新疆等地的钢铁联合企业、电站、矿山、棉纺厂等数百个建设单位，提供了大型电机和电器成套设备；长沙机床厂五年内制造了 18 个新品种的机床 1400 多台，供应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等数十个建设单位；衡阳矿山机械厂制造的各种矿山机械，装备了中南地区许多有色金属矿山；鲤鱼江等炼焦厂的焦炭，大量供应武汉钢铁公司和中南各有色金属冶炼厂等。此外，湖南地方工业还以大量铅、锌、钨、锑、汞等产品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针的贯彻，使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57 年和 1952 年相比较，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 74.4%下降为 65.9%，工业产值则由 25.6%上升到 34.1%；在工业内部，重工业由 28.8%上升为 39.9%，轻工业由 71.2%下降到 60.1%。这说明重工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国民经济各部门开始协调发展。

第十五节　湖　北　省

"一五"计划时期，湖北省是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投资的省份之一。在这个时期，国家把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中的 3 项安排在武汉，即武汉钢铁公司（简称武钢）一期工程，武汉重型机床厂（简称武重）和青山热电厂一期工程。随后，国家又在武汉安

排了武汉锅炉厂（简称武锅）、武昌造船厂（简称武船）、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以及武汉长江大桥等工程，并在黄石市安排了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和部分矿山建设工程。这些项目的建设，关系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对湖北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中共湖北省委加强了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全省从农村、从各行各业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城市和工厂企业工作，特别是充实武汉市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干部力量。

中共湖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建设中，实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优先保证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当时全省各方面都制订了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具体措施。国务院也经常派人来现场解决各种问题。重工业建设是"一五"计划时期经济建设的重点。在工业部门基建投资总额中，重工业占86%。在这期间，国家安排在湖北的重点工程先后开始施工，其中有的全部建成、有的部分建成投入生产使用。武钢是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焦化、耐火材料等一系列厂矿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于1954年开始筹建。在完成繁重的施工准备工作后，1957年4月8日主体工程正式破土动工。1958年9月13日一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武重以生产重型和超重型机床为主，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重型机床厂，1956年4月正式开始兴建，1958年9月建成投产，比预定计划提前18个月。武锅是生产电厂锅炉和工业锅炉的大型工厂，是发展电力工业的"龙首"，1956年开工兴建，当年和次年就有部分车间建成投产。武汉长江大桥，是横跨万里长江的第一座铁路、公路双层大桥，正桥全长1156米，于1955年9月动工兴建，1957年10月15日即建成通车，历时仅两年零一个月。这座大桥的建成，实现了世世代代人们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愿望，将武汉三镇联为一体，沟通了国家的南北交通。

"一五"计划时期，湖北省在优先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前提下，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发展地方工业。以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地方工业发展，以地方工业的发展服务和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因而全省地方工业，尤其是武汉、黄石、沙市、宜昌等城市的地方工业，在"一五"计划期间也有较大发展。武汉市的机械加工业、建筑工业和橡胶加工业等行业，就是在为武钢、武重、武汉长江大桥等大型工程的建设服务中开始发展起来的。除了新建工程以外，全省还有许多改建、扩建工程。国家还从外地迁来一些工厂（例如武汉市天一印染厂、沙市热水瓶厂等）。

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在湖北安排民用项目，项目数名列第十五位。它们是：青山热电厂、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湖北的3项有1项是扩建项目，2项是新建项目。扩建项目是青山热电厂；新建项目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湖北的3项都建在武汉市，它们都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

1955年，湖北的3项开始施工，历经七年时间，至1962年全部建成。具体情况是：青山热电厂、武汉重型机床厂1958年竣工；武汉钢铁公司1962年竣工。

湖北的3项计划安排投资17017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54805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39 820万元。详见表64。

表 64　　　湖北省 3 项投资构成情况（按实际完成投资排序）

投资构成 / 项目	计划安排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一五”时期完成投资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绝对数（万元）	相对数 %
武汉钢铁公司	147000	86.4	131206	84.8	26000	65.3
武汉重型机床厂	12700	7.5	14612	9.4	8507	21.4
青山热电厂	10478	6.2	8987	5.8	5313	13.3
合计	170178	100.0	154805	100.0	39820	100.0

表 65　　　湖北的 3 项民用项目形成的生产能力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形成生产能力	其中“一五”时期形成生产能力
青山热电厂	11.2 万千瓦	同规模	5 万千瓦
武汉钢铁公司	生铁 150 万吨、钢 150 万吨、钢材 110 万吨	同规模	
武汉重型机床厂	机床 380 台	同规模	

“一五”计划期间，湖北的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由 1952 年的 30.1% 提高到 1957 年的 43.1%。冶金、机械工业发展较快。在工业总产值中，冶金工业产值由 1952 年的 3.2% 提高到 1957 年 4.8%；机械工业产值由 8%提高到 12.6%。解放前湖北省重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已开始转变。这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六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从 1953 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新疆工业发展进入新时期。五年内，新疆用于工业部门的资金 4.07 亿元，占同期全疆投资总额的 27.77%。其中，重工业投资 3.32 亿元，占投资总额的 22.7%，轻工业投资为 7484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5.1%，又先后兴建了一批现代工业企业，使全疆工业企业增加到 1396 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到 260 个。工业总产值增加到 4.45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54 倍，年均增长率为 20.05%。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增加到 3.37 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 32.16%提高到 75.67%；重工业产值增加到 1.5 亿元，所占比重由 23.65%上升到 33.59%；轻工业产值增加到 2.96 亿元，所占比重由 76.35%下降到 66.41%。集体所有

制工业企业产值由184万元增加到8526万元，所占比重由1.07%提高到19.14%。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由两个发展到35个，产值由5万元增加到1 328万元。个体手工业产值由1.09亿元下降到984万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职工增加到4.7万多人，年工资总额和人均工资分别由1952年的1469.5万元和849元增加到5.3亿元和1117元。

"一五"计划时期，新建和扩建、改造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新建的有乌鲁木齐苇湖梁发电厂和乌拉泊水电站。前者装机容量为2×3500千瓦，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后者装机容量为3×800千瓦，二者组成新疆第一个电网——乌鲁木齐电网。同时，全疆各地兴建了100多个小火电站、9个小水电站和一批地方国营小型煤矿，还兴建了有色金属选矿厂、和田丝绸厂。克拉玛依油田、新疆水泥厂和年产21万~30万吨煤的康苏、三道岭、苇湖梁新矿井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兴建。新疆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和水磨沟水泥厂得到扩建，提高了生产能力。

乌鲁木齐热电站是第一批确定的新建项目，于1952年开始施工，1959年建成。乌鲁木齐热电站计划安排投资327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3275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1981万元。经过7年建设，乌鲁木齐热电站按计划建设规模建成，形成了装机1.9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其中"一五"时期装机0.7万千瓦。

第十七节 安徽省

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安徽省有1项：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是第二批确定的项目。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1952年开始施工，1959年建成。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计划安排投资15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486万元，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472万元。

经过七年建设，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按计划建设规模建成，形成洗煤100万吨的生产能力。"一五"计划时期，淮南煤矿积极抓老矿扩建改造，并进行采煤方法的改革，推行长壁或台阶式采煤法，提高了煤炭的回采率。同时，大规模开发建设新井。中共淮南市委把煤矿基本建设放在首位，提出了"全市保煤矿，煤矿促全市"的指导方针，要求各行各业都要支持煤矿。到1957年底，先后建成投产五对矿井，总设计能力390万吨，连同原来的三对老矿，淮南矿区已有八对矿井。到1957年，全省原煤年产量达到504.25万吨，其中，淮南矿区原煤产量达到492.9万吨，比1952年增加236.6万吨。

第三章 企业发展

"156项"重点项目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我国工业的落后面貌，使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156项"重点项目是特定历史时期，由国家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建设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和建设祖国的巨大任务的在建设的过程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们学习了前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选择了高度集中的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推动下，我国完成了"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否认商品经济，否认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否认企业的独立自主地位，因而，随着我国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总量的增长、产业结构的复杂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企业的一系列弊端就会暴露得越来越明显。1956年，我们就意识到，国家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对国有企业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导致企业活力不强，不利于经济发展。于是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1957年、1970年两次把中央各部所属企业下放给了地方，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形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从1979年起，我们对国有企业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1979~1982年实行了利润分成制度，1983~1986年实行了"利改税"制度，1987~1990年实行了利润承包经营责任制，结果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91年开始着力推行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其内容仍局限在全面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长期以来是围绕隶属关系下放、让利或放权进行的，搞了几十年都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没有把国有企业搞活。1993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后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有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壮大自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理论上不断总结。以下10个行业属于"156项"的近70今企业（其中有的企业是当时的数个项目合并而成的）的个案情况，反映了国有企业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煤炭工业

1. 峰峰矿务局

峰峰矿务局是实行局长负责制的全民所有制特大型煤炭企业，是中国重要的主焦煤生产基地之一。峰峰局是一个有百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区，早在1889年清朝后期，当地人就开始兴办小煤窑。解放前煤田长期遭受国内外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开采条件落后，煤炭生产能力很低，1949年原煤产量仅有52万吨。解放后，从1949年10月成立峰峰矿务局以来，经过“156项”建设的发展，煤矿在恢复、改造、调整、新建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全局职工认真发扬“艰苦奋斗、实干拼搏、勇于献身、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经过三十八年的努力，现已建成一个以煤为主、洗煤、化工、机制水泥、钢铁等多种经营，综合配套，协调发展的特大型煤炭联合企业。1987年，全局共有所属单位30个，其中工业生产单位25个。有13个生产矿井，一个在建矿井，设计能力771万吨，核定能力960万吨，1987年原煤产量达到了1149万吨；有2座大型洗选厂、3座矿井洗选厂，洗煤能力670万吨；有2个工程处、1个建安公司、1个机械总厂、6个多种经营全民附属厂以及2个医院、3所学校。共有职工86358人，工程技术人员1576人。企业固定资产总值达9.21亿元。峰局煤炭地质储量雄厚、煤种齐全、质量优良。现已探明地质储量35亿吨，主要有肥煤、焦煤、贫煤、瘦媒、无烟煤等。焦煤和配焦煤占地质储量的75%。原煤灰分在18%～26%之间，每千克发热量在25.2千焦以上，含硫量一般为1%以下，为优质主焦煤，适用于炼焦、发电、动力、化工等行业。经深度加工，主要生产品种有精煤、中煤、煤泥、洗沫煤、洗原煤等。质量稳定，深受用户欢迎。精煤品种主要生产12级焦精煤，灰分11%以下，水分12%以下，含硫量0.80%以下，发热量31.9千焦。特别是马头洗煤厂生产的12级焦精煤，1985年荣获了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产品主要供首钢、武钢、包钢、鞍钢、湘钢、马电、邯电等全国重点钢铁和电力企业。同时销往江苏、辽宁、广东、北京、上海等省市以及纺织、铁道等中央各部属企业。按照中长期发展规划，峰局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加快新井和老井技术改造步伐，扩大生产能力。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47095万元；工业净产值20832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8523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10542万元；产品销售收入71952万元；年末职工人数86358人；全员劳动生产率4796元/人·年。

2. 潞安矿务局

潞安矿务局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中部，全矿区横跨长治、潞城、襄垣、屯留三县一市。现有石圪节、五阳、漳村和王庄四对生产矿井，一座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常村煤矿正在兴建。矿井总设计能力480万吨。1987年实际生产煤炭880多万吨，1988年计划生产煤炭1000万吨。

潞安煤田储量丰富，煤质优良。20世纪30年代，西欧矿业专家、学者曾考证，“世界五大洲矿产以中国为最，中国以山西为最，而山西潞、泽两处煤质之良，煤苗之旺殆环地球矿山所不及”。潞安矿务局1959年1月正式建局。所辖煤田属沁水煤田东部边缘中段，南北长134公里，东西宽20公里，总面积2000平方公里。现开发的潞安矿区，煤种齐全，灰分、挥发分均在16%左右，硫分0.5%以下，发热量达33.6千焦/千克，胶质层厚度为49毫米，煤质牌号有焦煤、贫煤、瘦煤等，以焦煤为主。主要产品有：块煤、混煤、末煤、洗精煤和各类用途需要的特殊加工的煤炭产品，适用于炼焦、发电、动力、钢铁和化工生产，用途宽广。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拥有400多个长期用户。另外还有发电、机修、水泥、火药和林产品。

至1987年，全局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了100%，综采机械化程度达到了95%以上。“六五”期间，该局共有10队（次）年产100万吨以上，占全国的1/4；“七五”以来，该局有10队次年产达100万吨以上，占到全国的1/3。王庄煤矿综采一队，自1985年以来，连续五年年产突破100万吨，1987年又以年产170多万吨的成绩，打破了苏联综采队1986年创造的165.4万吨的世界先进水平。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26011万元；工业净产值13318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7634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7205万元；产品销售收入28627万元；年末职工人数23935人；全员劳动生产率10149元/人·年。

3. 阜新矿务局

阜新矿务局位于辽宁省阜新市。东距沈阳182公里，西距锦州118公里。新义铁路纵贯矿区，市内外公路相连，交通方便。

该矿务局含煤面积600平方公里，有阜新、沙海两大含煤组。1987年末，全局煤炭地质储量906亿吨，可采储量4.6亿吨。煤种为长焰煤，间有少量气煤，多为半亮型，有脂肪光泽，粘结性不强，发热量25.2～29.4千焦/千克。最宜于工业运用。

阜新煤田早期开发，始见官方记载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近代开发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先期以民办煤矿为主，多用手掘方法开采；1914年，日本帝国染指阜新煤矿，办起以“中日合办”为名的煤矿，1927年后，奉天矿务局在阜新开办官办煤矿。阜新煤田开发经营形成民办、官办、“中间合办”并存格局。1933年，日本侵略者强占阜新，1936年满洲炭矿株式会社阜新矿业所成立，垄断煤田开发，实行掠夺式开采。1944年产煤427万吨。1946～1947年，由国民党政府经营，两年产煤202万吨。

1948年阜新解放。1949年10月1日阜新矿务局成立。经两年完成恢复工程，1951年开始大规模建设，截止1968年，先后建成8个煤矿。形成年产千万吨能力，为全国主力煤炭生产基地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矿务局有新邱露天煤矿、高德煤矿、海州露天煤矿、五龙煤矿、平安煤矿、王营煤矿、东梁煤矿、艾友煤矿、清河门煤矿9个生产矿，计有两座露天、三对竖井，九对斜井，另有一对在建井。年设计生产能力1142万吨，核定能力1052万吨，洗选加工能力1067万吨。1987年产煤1104万吨（其中：机械化采煤量占53%）。所产煤炭由国家统一分配，超计划部分自行销售。约70%供给辽宁地区内的中

直企业，25%以上供给省内工业与民用，4%左右供给省外地区。辽宁供给沈阳铁路的机车用煤、省内电厂用煤中，阜新煤分别占70%、60%。

到1987年，该矿务局已形成煤炭生产、地质勘探、矿建施工、土建施工、工程设计、机械修造、安全培训、职工教育、学校教育和医疗卫生相配套的综合经济实体，技术力量较雄厚，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388名，其中取得高级职称者395人。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38103万元；工业净产值9250万元；固定资产净值83695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10021万元；产品销售收入59562万元；年末职工人数89215人；全员劳动生产率4012元/人·年。

4. 抚顺矿务局

抚顺煤矿是全国闻名的大型煤矿之一，具有八十多年开采历史的综合性联合企业。在世界经济史上很早就享有较高声誉，素有煤都之称。它位于辽东半岛经济开发区腹地沈阳市的东侧，距沈阳45公里，与沈吉铁路相通，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优越，交通运输十分方便。

该矿蕴藏着多种有益矿藏，有煤炭埋藏量8.4亿吨，油母页岩埋藏量35.6亿吨，天然气埋藏量91.5亿立方米。抚顺煤为气煤和长焰煤，煤质疏分低，挥发分高、发热量大，是冶炼工业良好的配焦煤和工业用煤，还有煤精和琥珀两种特产，可做药材和工艺品。

1987年，该矿区有职工16万多人，固定资产原值17.6亿元、动力机械总能力99万千瓦。有各类专业科技人员5094人，其中高中级技术力量1079人，有一个露天矿，两个井工矿，5个辅助工厂和运输部、供电部、林业处各一个，有总医院、精神病院、干部学校。技工学校、职工工学院等五个事业单位，另外还有53个集体企业公司和831个独立核算厂点。

该矿经营范围较广，主要为煤炭开采和煤炭洗选加工，年煤炭开采能力达到840万吨。现有煤炭产品品种160多种，精煤和块煤占88%，销售范围极广，市场地位优越。其他经营项目多达几十种，主要的有：(1)油母页岩炼油、瓦斯发电、砂石采掘；(2)煤制品加工；(3)工矿车辆、井下防爆电机车、电动机制造；(4)钢铁冶炼压延加工、生产轴承钢、多种环锭；(5)工业设备、铁路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机车汽车修理；(6)矿产地质勘探；(7)土木房屋、矿山工程建筑设计；(8)电力通信线路、天然气馁汽污水管道及大型整体安装；(9)民用炸药、雷管及爆破器材；(10)铁路客货运输；(11)电话通讯；(12)蒸汽热水供应；(13)金属结构件加工；(14)林木产品种植采伐；(15)矿山灾害救护；(16)卫生防疫、医疗保健；(17)电子表打火机和各种针织衫；(18)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培训等等。在以上各项经营范围以内，凡工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设计任务书编制、工程施工、安装调试、矿床、水文、工程地质的勘察与评估等等，该矿都可向外界提供服务。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矿区年工业总产值为5.7亿元，其中优质名牌产品年产值达1.4亿元，占全部产值的25%，共有优质名牌产品16种，龙凤矿的二级精煤获得国家优质产品金牌，灰分低于6%，年出口精煤21万吨，出口创汇506万美元，远销朝鲜

和香港。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57304万元；工业净产值21532万元；固定资产净值88133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15147万元；产品销售收入80534万元；年末职工人数168133人；全员劳动生产率4351元/人·年。

5. 通化矿务局

通化矿务局是吉林省最大的煤炭企业，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区的浑江市，矿区素有"立体自然宝库"之称，现有煤炭地质储量48686万吨，是全国焦煤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现隶属于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

该局建于1948年12月，1949年产原煤36万吨。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全局努力恢复旧矿井投入大规模建设，到"一五"末期，共新建和改建矿井8对，平均年产达到78万吨。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里，该局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尤其在"大跃进"中，造成矿井采掘关系失调和管理混乱状态，后经三年调整，生产基础才起于稳定。"十年动乱"使该局同全国一样遭受浩劫。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煤炭生产秩序虽遭破坏，但广大职工仍然坚持战斗在千尺井下，为发展煤炭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全局已拥有11个主要生产矿厂，15对正规井口，1987年末设计能力438万吨/年，核定能力423万吨/年，年产原煤500万吨以上，主要煤种有焦煤、气煤、瘦煤、无烟煤。建局40年来，共为国家生产煤炭1.34亿吨。目前，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水系、综采、高档机采，已在一批重要矿井投用。现有4座洗煤厂，设计能力390万吨/年，主要洗煤品种有甲级精煤、乙级精煤、混煤、末煤等。原煤和洗精煤产品重点供应辽、吉两省的冶炼、发电和民用，重点用户有鞍钢、通钢和浑江发电厂等。其他产品有水泥、混凝土制品、生铁、塑料制品、焦炭等百余种。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0265万元；工业净产值223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3734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4876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9 897万元；年末职工人数47909人；全员劳动生产率2190元/人·年。

6. 鹤岗矿务局

鹤岗矿务局是国家特大型重点煤炭企业之一，已有七十二年开发历史。矿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南麓的鹤岗市。煤田范围南起峻德，北抵梧桐河，南北走向42公里，东西宽6公里，面积252平方公里，煤炭储量30亿吨。该矿区1917年由旧中国官方开发，1931年为日本侵略者占有，曾遭到掠夺式开采。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和人民政府接收了矿山，是年12月成立了鹤岗矿务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156项"重点项目中的2项，即鹤岗矿区的东山竖井（后改名为新一煤矿）和兴安台竖井为重点，在鹤岗、鸡西、双鸭山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五年期间，在这3个矿区完成的建筑面积共达69万平方米。鹤岗矿区的东山竖井（后改名为新一煤矿）于1950年9月20日由鹤岗建井公司破土动工，1955年5月21日建成投产，设计能力年产原煤90万吨。兴安台竖井，是年产150万吨原煤的大型矿井之一，1952年由鹤岗建井公司破土动工，1956年7月建成移交生产。在这两个

大型骨干工程的带动下，不仅又新建了10多对矿井，而且还改建了10对矿井。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矿基本建设，1957年的原煤产量比1952年提高1倍以上，仅鹤岗矿区五年内原煤产量就等于解放前28年黑龙江省煤炭产量的总和。特别是新建的双鸭山和鹤岗两个洗煤厂，水平可与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洗煤厂相比，为中国洗煤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矿区的建设，双鸭山也从一个人烟稀少的荒山，建设成为黑龙江省的一座煤城。

经过“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的建设，以鹤岗、鸡西、双鸭山为中心的煤炭基地初步形成。此后直至1956年，由于国家投资重点转移，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煤炭建设的主要力量用在解决采掘比例的失调，重点煤炭基地的建设没有更多的发展。

1976年以后，除了调整不合理的采掘比例以外，进一步加强了以鹤岗、鸡西、双鸭山为中心的煤炭基地的建设。

（1）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矿井。鹤岗矿务局自行设计的峻德竖井，设计能力为年产150万吨（可采储量为26258.8万吨），建设总投资9067万元。1975年8月动工，1981年11月建成移交生产。双鸭山矿务局新建的双阳煤矿一、二井，投资8227万元，设计年产煤能力90万吨，1985年正式投产。新建新安煤矿和东保卫煤矿，投资分别为6917万元、283万元，设计年产煤量分别为90万吨、30万吨，1986年可全部投产。在这期间，还对兴安台矿井进行改扩建。一期工程完成后新增2个采区、4个工作面，使矿井能力由150万吨提高到320多万吨，提高72%。二期工程完成后，生产能力可达420万吨。1978年，矿区冲破生产长期徘徊在700万吨上下的局面，一举突破千万吨大关。1979～1983年，又以平均每年90万吨的速度递增，五年累计比国家计划增产原煤459万吨，煤炭产量从1972年的占全国第十位跃居到1983年的占全国第四位。与此同时，七台河矿务局将老矿区5个矿井改建成四对皮带井。到1983年第一期工程已经结束，由原来22对小斜井集中为7对矿井，矿井核定能力282万吨。矿区年产量由1975年前徘徊在150万吨左右，上升到1983年的436万吨，增长速度在东煤公司所属各矿占第一位。东部新区煤田已开工1对立井，建成后的产量还将大幅度增长。煤炭部把七台河矿务局誉称为“壮年矿”。

（2）矿井机械化程度有明显提高。自1979年起先后进口综合采煤机27台，联合掘进机9台，可缩皮带机46台，滚筒采煤机26台，吊挂皮带机4台。黑龙江省采煤机械化程度由1975年的26.7%提高到1983年的69.9%；装载机械化程度提高到50.1%。1983年，鸡西矿务局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88.14%，其中综采机械化程度达到30.4%，装载机械化程度达到68.61%。双鸭山矿务局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89.35%，其中综采机械化程度达到28.51%，装载机械化程度达到50.3%。

经过四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到1987年，全局拥有8个生产矿，13处自然井（包括1处露天）。其中有建国后建设的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土井——新一竖井；东北第一大井工矿——年产330万吨的兴安煤矿；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在技术改造中不断发展，实际年生产能力已近300万吨的南山竖井和150万吨能力的峻德竖井、矿井总设计能力1002万吨，核定能力1243万吨。建国以来共生产原煤3亿多吨。1987年生产煤

炭 1600 万吨，居东北各矿务局之首，列全国第四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

1978～1988 年，鹤岗矿务局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加快了老矿挖潜、革新、改造的速度、促进了煤炭生产的飞速发展。煤炭产量自 1978 年破千万吨大关之后，平均每年以 70 万吨的速度递增，1985 年实现了 10 年翻番。企业经营状况实现根本好转。自 1981 年以来，全局出现了亏损连年下降，效益逐年提高的趋势。1981～1983 年累计为国家减亏 2150 万元。1984 年实现扭亏为盈。1985～1987 年，累计为国家上缴利润 1.05 亿元，是东北四省（区）实现盈利最多的矿务局。

“六五”以来，煤炭综合利用开始起步，1985 年建立了全国煤矿第一个自营煤气公司，日供煤气 2 万立方米，使 2 万多户居民受益；建成了蓄水量为 3000 万立方米的细鳞河水库。矿区一期工程 5 万千瓦的热电厂将于 1988 年 12 月建成发电。矿区医疗事业、职工生活福利事业都基本与煤炭生产建设的发展相适应。科研、教育不断发展。矿区已初步形成了大中专、中小学、职工培训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通过科研和引进、消化、吸收、创新，1987 年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53 项。煤炭生产建设已大量采用电子计算机、价值工程、目标管理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和方法。集体经济和多种经营纳人现代化矿务局建设的总体规划，实现了煤炭生产建设与多种经营事业同步发展。1987 年多种经营集体企业拥有职工 5.8 万人，网点 655 个，完成产值 2.6 亿元。

1987 年，鹤岗矿务局按照全国煤炭工业发展的要求，重新确定了今后七年现代化矿区建设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以煤为主，多元发展，依托优势，辐射内外，优化结构，科技兴局”的战略思想。煤炭产量规划 1990 年达到 1700 万～1750 万吨，1995 年力争达到 2000 万吨；原煤入洗，1990 年达到 1 027 万吨，1995 年达到 1960 万吨，入洗比重为 95.7%。“七五”计划期间，矿井在建能力 550 万吨，投产能力 400 万吨，矿井设计能力达到 1321 万吨。“八五”计划期间，矿井在建能力 240 万吨，投产能力 240 万吨，矿井设计能力达到 1519 万吨。企业利润，1987 年以后每年盈利 2 300 万元，集体经济多种经营产值 1990 年 4 亿元。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保证矿区配套系统和各项事业都有相应的发展，力争 1995 年把鹤岗矿区建成高效率、高效益、高效能、高质量，两个文明同步，生产生活配套的“生产机械化、质量标准化、管理现代化、教育系统化、生活优裕化”和“企业目标新、经济结构新，技术手段新、企业形象新、队伍素质新”的具有中国和鹤岗矿区特色的“五化五新”现代化新型煤炭工业城市。

1987 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 64 811 万元；工业净产值 26897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204444 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 14230 万元；产品销售收入 86 841 万元；年末职工人数 105656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4306 元/人·年。

7. 焦作矿务局

焦作矿务局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我国无烟煤主要生产基地。

焦作煤矿历史悠久，自 1898 年英商福公司在焦作建矿开采迄今已有九十年历史。解放前，由于英、日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式开采，煤田遭到严重破坏。1949 年 9 月正式建局时，只有王封、李封两个矿，设计能力 105 万吨/年。焦作煤矿经过改造和挖潜，使老矿焕发了青春。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恢复了焦西矿，新建了朱村矿、小马

村矿、韩王矿、冯营矿、焦东矿和演马庄矿。70年代中马村矿投产，80年代建成九里山矿，全局设计能力达到522万吨/年。

焦作矿区地处中原，北依太行，南临黄河，东与新乡市毗连，西同山西省接壤，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20公里，总面积1300平方公里，其中含煤面积971平方公里。新焦、焦枝、太焦三条铁路相汇于焦作。新焦铁路与京广线相接。通过新（乡）菏（泽）铁路直达石田港，焦（作）枝（城）铁路在洛阳同陇海线相交，直达长江重镇枝城与枝柳（州）铁路相连。太（原）焦（作）铁路北达太原与同蒲、石太线相连，公路成网，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十分方便。矿区储量丰富，目前探明的地质储量为37.8亿吨。其中，已开发利用6.42亿吨，可供建井的精查储量9.22亿吨，可采煤层有三层，总厚度9~10米。焦作无烟煤以其中灰（17%~18%），低硫（0.3%~0.4%）、高发热量(29.4千焦/千克以上)，高固定炭、高灰熔点、机械强度大、热稳定性好等特点而著称于世。20世纪初，英国曾把焦作煤称为“香炭”，运至伦敦供皇宫使用。1932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各产煤国代表会议上，焦作粒煤被公认为优于所有欧洲煤炭。目前，煤炭产品主要有：无烟块煤、无烟粒煤、无烟精煤、无烟末煤。是化工、冶金、建材、民用的上乘原料和燃料，每年国家统配400万吨。调运18个省、市，远销日本、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全局现有三座现代化洗煤厂，两座在建洗煤厂。年人洗能力310万吨。洗煤厂能够精选加工多种规格、质量的煤炭产品，并以其精良的设备，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完善的质量检测系统，保证其规格质量符合用户需求，以优质的服务、稳定的质量，信守合同，交货迅速而取得较高的信誉。除煤炭外，矿区还有丰富的硫铁、高铝土、瓦斯和地下水等资源。

矿务局对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实行投人产出总承包后，坚持“以煤为主、深度加工、综合利用、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二十四字办矿方针，在发展煤炭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集体经济，开办了水泥厂、矸砖厂、砖机厂、化工厂、砺矽铁厂、罐头厂、时装厂、毛巾厂等31个专业生产厂和综合生产车间，主要产品有矸砖、水泥、水玻璃、电石、矽铁、速凝剂、石墨电极、结晶硅、油毡、烧碱、毛巾、橡胶件、高压开关柜、低压配电瓶、动力配电箱、无熟料水泥、玻璃马赛克、人造革、香烟滤嘴棒等500余种。其中：景茂时装厂生产的服装，远销美国、法国、西欧等14个国家和地区。1987年多种经营生产厂创产值2054.8万元，实现利润202.44万元；集体经济创产值3730.4万元，实现税利80.57万元。安置待业青年935人，待业子女安置率为94.8%，先后分别被国家经委、原煤炭工业部命名为多种经营、集体经济发展先进局。

焦作矿务局在深化改革中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1)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层层落实总承包指标。(2)对重点基本建设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工程项目费用包干,工程、工期包干等,收到良好效果。(3)在改进和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方面,本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对基层单位让利放权的原则。(4)实行机电设备租赁制,由过去无偿占用,改为有偿租用,提高了设备利用率、完好率和折旧率。(5)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允许矿、厂、处自行补充招收农民轮换工,待业青年临时工。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9800万元；工业净产值4.44.6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7783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6023万元；产品销售收入32 344万元；年末职工人数61490人；全员劳动生产率2990元/人·年。

8. 王石凹煤矿

位于铜川市东南9.5公里南鳌村，因煤田地质勘探时定名为“王石凹”故矿名从之。铜（川）——王（石凹）铁路通至矿井工业广场，全长12.5公里。铜（川）——东（坡）公路，蜿蜒曲折的从矿井北侧通过。矿井设计年生产能力120万吨。

矿井初步设计由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提出，西安煤矿设计院承担技术设计。铜川煤炭建筑工程公司施工，1957年12月开工，1961年11月建成投产，建井工期四年。1957～1966年完成基建投资4103.5万元。其中建安工程投资2482.5万元，占60.5%；设备费1149.3万元，占28.0%，矿井平均吨煤投资34.2元。完成井巷掘进40776米，万吨掘进率339.8米；完成房屋建筑78574平方米，万吨建筑率654.8平方米。

1961～1990年累计生产原煤2261.19万吨，平均年产原煤75.4万吨。1979年矿井最高年产量为133.3万吨。三十年中，年产百万吨以上有十一年。1977年始，连续九年年产量均在百万吨以上。

1990年底，全矿共有职工6303人，其中工人5730人，占90.9%，井下工人3211人占50.9%。

第二节　电力工业

9. 太原第一热电厂

太原第一热电厂是华北电力系统的重点企业之一。位于太原市西南郊，距市中心14公里。厂区占地面积56公顷，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1987年拥有职工2297人。

太原第一热电厂于1953年正式开工建设，1955年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是国家“一五”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该厂经过四期工程建设，装有7台汽轮发电机，10台燃煤钢炉，装机容量18.6万千瓦，锅炉蒸发量1425吨/时。具有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供热量6200万亿焦耳的生产能力。一、二期工程装机容量7.4万千瓦，采用苏制全套发电设备，三、四期工程安装两台5万千瓦发电机组、一台1.2万发电机组，全部采用国产设备。汽轮发电机采用自然循环冷却方式，在厂前区700米处建有一座占地5平方公里、蓄水1800万立方米的冷却水库，是迄今国内火力发电厂拥有的最大人工冷却水库。

太原第一热电厂历经三十余年的建设发展，在企业内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生产管理系统管理方法，企业素质不断加强。投产至1987年，共发电315.2亿千瓦时，创造产值相当于国家投资的13倍多。1978年以来，该厂经过企业全面整顿，深化内部改革、实行厂长负责制、开展企业上等级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

的提高。

为了缓解山西中南部地区严重缺电的局面，充分利用太原第一热电厂得天独厚的煤水资源条件，经国家批准该厂扩建第五期工程，列为1987年新开工项目，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之一。五期扩建工程安装两台国产亚临界30万千瓦发电供热机组，是迄今国产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汽供热式发电机组，锅炉设备由波兰进口。此项工程已于1987年11月23日正式开工，1989年底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1992年全部工程竣工。1989年，该厂总装机容量将达到78.6万千瓦，生产能力增长三倍以上，既为电网提供大量电力，还可向太原市大部分地区实行集中供热。五期扩建后，企业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当时，有关部门按照能源部安排进行六期扩建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拟扩建两台30万千瓦发电机组。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8696万元；工业净产值2756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592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408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 725万元；年末职工人数2297人全员劳动生产率38930元/人·年。

10.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系管理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和电力生产的企业，担负着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防洪、防凌、灌溉和发电的任务。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我国在黄河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以防洪为主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控制黄河流域面积68.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92%，工程始建于1957年，1960年基本建成投入运用，因泥沙问题，其后进行了增建泄流排沙设施和打开8个施工导流底孔的改建，并安装了5台总容量为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经过增建和改建后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的原则，采取“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调水调沙，控制运用，水库淤积得以控制，年内冲淤基本平衡，为在多泥沙河流上兴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在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灌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伏秋大汛进行控制下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下游防洪负担和漫滩淹没损失，三门峡水利枢纽已成为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冬春凌或根据黄河下游封河情况，利用水库调节河道水量，避免了“武开河”，保证了下游凌期安全；结合防凌进行春灌蓄水，每年在枯水季节，及时地向下游3000万亩农田、沿河城镇、中原和胜利油田提供了用水；从1973年12月第一台机组发电以来到1987年，累计发电120亿千瓦时，缓和了中原电网的供电紧张状况。

1980年以来，发现了黄河泥沙对泄流建筑物造成严重的磨损和气蚀，为了解决这一影响枢纽正常运用和工程寿命的问题，配合有关单位试验成功了特种深水围堰，解决了泄流建筑物改建中的关键性技术难题，开始了底孔的改建，这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与此同时，开始进行多泥沙河流发电机组抗磨损、气蚀的研究工作；利用原有空余机坑，进行扩装两台75万千瓦机组的准备工作。随着黄河治理与开发的进展，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将改建、管理、运用得更好，发挥出更大的效益。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3157万元；工业净产值832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9540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315万元；产品销售收入3153万元；年

末职工人数 1 834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27940 元/人·年。

11. 佳木斯发电厂

佳木斯发电厂是以发电为主、供热为辅的电热联产企业，装机容量为 29.8 万千瓦，是黑龙江省东部电力网的主力电厂之一。该厂始建于 1938 年，由伪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独资兴建。装机容量为 2.25 万千瓦（3 台单机容量为 7500 千瓦的中温中压复转式发电机组），1941 年 12 月 27 日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

1954 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苏联引进第一座列车电站安装在佳木斯发电厂，汽轮发电机容量为 400 千瓦。同年 10 月开始安装。1955 年 5 月正式投产发电。1957 年 2 月该列车电站迁往河北省。

1957 年 5 月，国家投资 33 万元对电厂进行了第一、二期扩建，新装 2 台容量为 1200 千瓦中温中压汽轮发电机组。1959 年 3 月，新装机组先后投产发电。

1960 年 2 月和 1976 年 4 月，国家又先后投资 220 万元和 10296.2 万元，对电厂进行了第三期和第四期扩建，共安装 1 台容量为 1.2 万千瓦，2 台容量为 25 万千瓦中温中压机组，2 台容量为 10 万千瓦高温高压发电机组，使全厂装机容量一跃增至 32.05 万千瓦，成为省东部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1983 ~ 1986 年，该厂投资 150 万元又将原伪满时期安装的二台发电机组全部拆除，改建供热设备装置。先后将 2 台容量为 1.2 万千瓦、2 台容量为 2.5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改为供热机组，1984 年 10 月 15 日开始向市区的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生活区供热，供热面积为 150 万平方米。发电厂还担负着佳木斯地区和市区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年发电能力为 20 亿千瓦时，年供热能力为 150 万百万千焦：承揽 5 层以下楼房等各种工业与民用建筑、大中型工业水、生活用水深井的设计与施工；粉煤灰综合利用与开发；经营金属喷涂、机械加工与修理、机动车辆修理、打气、补带、喷漆、充电、铆焊、铸造等。该厂还设有钢厂，生产发电厂磨煤机所用的钢球和磨煤机波浪瓦。该厂还建有制氧站。年产氧气 300 万立方米，氧气纯度高于国家标准。

1987 年以来，佳木斯发电厂进行了 2 台 10 万千瓦发电机组的建设工作，逐步扩大生产能力，两台发电机组分别于 1989 年和 1990 年投产发电，为振兴佳木斯发挥龙头作用。

1987 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 11032 万元；工业净产值 3 252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12 881 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 408 万元；年末职工人数 2452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37950 元/人·年。

12. 富拉尔基发电总厂

富拉尔基发电总厂是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动力能源基地，也是东北电力网重要火力发电企业之一，担负着东北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供电任务。富拉尔基发电总厂实行“一厂两站”的管理形式，领导热电厂、二电厂，是一座规划装机容量为 140 万千瓦的大型火力发电厂。

富拉尔基热电厂是我国第一座高温高压热电厂。总装机容量为 15 万千瓦，年供热能力 5955 百万千焦。二电厂是国家“六五”计划期间 70 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总装机

容量为60万千瓦。热电厂五期扩建工程于1981年12月开始前期准备工作，将装机5万千瓦，二电厂二期扩建工程于1985年8月1日破土动工，4号机组于1987年11月25日并网发电，比预定工期提前十三个月。4号机组的投产发电对该省及东北地区电力紧张的状况起到了缓解作用。目前5号机、6号机正在紧张施工中。热电厂主要发电设备是苏联进口的2.5万千瓦机组；二电厂主要发电设备是国产的20万千瓦机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是哈尔滨三大动力厂生产的定型配套产品。总厂发电能力目前已达到95万千瓦。富拉尔基发电总厂自建厂以来，供热和供电范围逐步扩大。1966年，全年供热量达3081百万千焦，1967年10月开始供给该厂北楼住宅区采暖供水。1968年开始向黑龙江化工厂供汽，供汽量达160多吨/时，除供生产用汽外，还供生活采暖热水5000多吨，截止1984年末，富拉尔基区已形成供热四大系统，即第一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钢厂、富拉尔基区热网站和富拉尔基发电总厂。富拉尔基区已基本实现热网化。有供热主干线51公里，采暖面积223万平方米。总厂的供电范围已由齐富安地区和附近18个县、旗扩大到北安市和哈尔滨市。1987年，热电厂有6千伏直配线23条，有35千伏高压输电线路3条，有110伏高压输电线路2条向齐齐哈尔市和大庆市地区供电。1972年12月，热电厂与新华发电厂联网后，组成黑龙江省西部电力网，西部电力网直接受黑龙江省调度局指挥和调度。1981年11月30日，发电总厂与东北主网并网。1983年11月6日，发电总厂与北安电网并网。1983年11月26日，富大哈线投运行，使二电厂增加了向哈尔滨及东北主网的送电能力。形成了西部电力网与哈尔滨、丰满、长春、沈阳电力网联接起来的东北电力网。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22370万元；工业净产值4045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5546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2471万元；年末职工人数4650人；全员劳动生产率52339元/人·年。

13. 丰满发电厂

我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丰满电站始建于1937年，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为掠夺我松花江水利资源，扩大侵略战争，由日本水利电气建设公司兴建的。1937年秋，电站破土动工。从此，几万名中国劳工被投入了苦难的深渊。今天丰满的“万人坑”就是历史的见证。1940～1942年是水电站大规模的施工阶段，浇筑混凝土约100万立方米。1942年大坝蓄水，1943年2月2台厂用机先后发电，同年3月、5月第一、四号主机也开始发电，先后向长春、哈尔滨和沈阳送电。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丰满获得了第一次解放。当时整个水电站坝体混凝土浇筑仅182.2万立方米，完成了89%，安装工程完成了50%，由于施工质量低劣，使大坝处于严重的危险状态。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丰满，将大部分发电设备和筑堤设备以战利品的名义运回国内。1946年5月国民党占据了丰满，1948年3月国民党撤退时，曾派兵破坏电厂，当时值班的值长张文彬智保电厂，使电站未遭大的破坏。解放后，党领导水电工人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抢修发电设备，先后恢复了向长春、哈尔滨、沈阳和吉林送电。

1950年初请苏联专家前来丰满进行调查，当时丰满大坝千疮百孔，部分坝段距设计高程相差15米之多，坝基坝体渗漏十分严重，根据苏联专家建议，1950年抢在洪水

期之前，开展了千余名职工修筑坝体大会战，两个多月完成了浇筑混凝土 57360 立方米的任务，从此大坝达到了基本稳定，如今已安全运行了五十余年。

在改建、扩建时期，除对大坝采用加固和防渗漏的技术措施、全面展开溢洪道改进和溢洪闸的安装工程外，从 1953 年起，开始机电安装工程，七、八、六、二、五、三号水轮机组先后投入运行，至 1960 年丰满发电厂 8 台主机全部安装完毕，至此，丰满水电站第一期工程全部结束，总装机容量达 55.375 万千瓦，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丰满发电厂处于东北电网南北联络的枢纽地位，也是东北电网的主力电厂之一，担负着供电、调峰、调频、调相、事故及检修备用等任务。混凝土重力坝与坝后钢筋混凝土厂房之间，是 220 千伏的变电站，由 8 回 220 千伏的高压线路，将电力送往东北电网。

解放以来，丰满发电厂为东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到 1987 年底，该厂累计发电量达 652 亿千瓦时，创造总产值 41.5 亿元，相当于现有固定资产的 14 倍。

长期的技术改造实践，不仅造就了一批技术骨干，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丰满发电厂作为全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为我国水电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堪称为“中国水电的摇篮”。解放以来，先后为官厅、古田、大伙房、桓仁、云峰、三门峡、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新安江、新丰江、西津、龚咀、丹江口、白山、葛洲坝等 20 多个大中型水电站输送和培养了 2000 多名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如今他们都已成为我国水电事业的中坚力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旅游业日益兴盛起来，雄伟宏大的拦江坝，高耸入云的输电塔，山明水秀的湖光山色构成了一幅富有神奇般的画卷，吸引了大批观光的游客。

1987 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 15281 万元；工业净产值 13 569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9907 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 193 万元；产品销售收入 3426 万元；年末职工人数 1308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107383 元/人·年。

14. 包头第一热电厂

包头第一热电厂位于昆都仑河西岸的包钢厂区境内，与包钢的平炉、高炉毗邻，是 50 年代初苏联援建工程，直接为包头钢铁工业基地供电、供热和对内蒙西部电网供电。1959 年 9 月 1 日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以后又经过三期扩建，现在全厂装机总容量达到 31.2 万千瓦，为目前内蒙西部电网最大的主力发电厂。1987 年 7 月 18 日参加华北地区电网联网。

该厂直接隶属于内蒙电力系统统一领导，生产上受内蒙电管局直接调度。全厂 1988 年有固定资产 2.67 亿元。有发电锅炉 7 台，汽轮发电机组 6 台，主变 4 台。其中 1～4 号机组和 5 号炉为苏制设备，5～6 号机组为国产机组。1987 年，全厂有职工 2153 人，其中生产工人 1568 人，管理人员 108 人，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 116 人；蒙族和少数民族职工约占职工总数的 5.3%。该厂在建厂初期由于设计不尽合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放弃管理，给企业经营、安全生产带来了很大的被动，遗留了大量的问题。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1983 年该厂进行了全面企业整

顿，推行各种经济责任制，完善了生产经营管理。从1984年以后，产值、产量、利税连续实现“三同步”增长。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2402万元；工业净产值494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4784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627万元；产品销售收人2341万元；年末职工人数2136人；全员劳动生产率55960元/人·年。

15. 包头第二热电厂

包头第二热电厂是内蒙古自治区建成投产的第一座高温高压火力电站。1956年建厂，1958年投产，历经三期工程建设，到1970年形成5台机、6台炉20万千瓦装机容量，年发电量13亿千瓦时，年供热量4200000百万千焦。

包头第二热量厂作为内蒙西部电网的主力电厂之一，承担向内蒙西部电网供电，同时向内蒙第一、第二机械制造厂供热的生产任务。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为合理利用能源、减少城市污染，1986年开始对包头市青山区进行集中供热。

1986年，自治区政府针对内蒙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自筹资金2.49亿元，扩建两台10万千瓦机组，该工程于1987年3月1日开工，第一台机组将于1988年底投产；第二台机组将于1989年投产，随同安装2.5万千瓦背压机，全厂总装机8炉8机42.5万千瓦容量。

到1987年底，全厂计有固定资产原值1.3亿元，净值0.42亿元。年工业总产值1亿元，上缴税金及内部利润2500万元左右。全厂有职工1890人，生产工人1400人，管理干部274人，平均技术等级5级。全厂设10个生产车间，30个职能科室。该厂1988年拥有管理、热机、电气、化学、土建、自动控制、金属监督、机械加工等各类专业高级工程师14人，工程师（含经济师、会计师）50人，其他技术人员250多人。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8498万元；工业净产值338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157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407万元；年末职工人数1890人；全员劳动生产率46885元/人·年。

16. 阜新发电厂

阜新发电厂隶属能源部东北电业管理局直属管理，系全民所有制大型企业。是东北电网主力发电厂之一，担负着电网调峰、调频任务。1987年有职工2999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40人；全厂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28433.7万元；现有9台汽轮发电机组和15台工业蒸气锅炉，小时生产蒸气总量为2595吨；动力机械总能力为566427千瓦，全厂总装机容量55万千瓦，年发电量为38亿千瓦时。同时还分别以抽汽供热和循环水供热两种方式，向阜新市区和阜新矿区供热，年供热量17584兆焦（耳），供热面积为100多万平方米。

该厂始建于1936年日伪统治时期，装机容量为16万千瓦，称阜新发电所。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发电设备受到严重破坏，丧失了发电能力。1946年国民党接管了阜新发电厂，安装了两台1 00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条件极差，所发电量仅能维持附近“官家”照明之用。1949年3月18日阜新解放，阜新发电厂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阜新电力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土法

上马，用 60 天时间安装了 1 台 14 万千瓦和 1 台 0.1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当年发电 1 161 万千瓦时，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1950 年 1 月阜新发电所改称阜新发电厂。

从 1950 年起，该厂被列为全国“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工程。1952 年 9 月 25 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台 2.5 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投产发电，毛泽东主席曾电贺嘉勉，为该厂的历史写下光辉一页。此后经三期扩建至 1961 年 4 月全部竣工，成为当时中温中压和高温高压综合性全烧煤式的全国最大火力发电厂。

1978 年以来该厂认真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了“一长三师”的领导体制，坚持挖潜、改造的方针，不断加强企业管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局面。

1987 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 21236 万元；工业净产值 9262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5313 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 679 万元；年末职工人数 3188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59405 元/人·年。

17. 大连发电总厂

大连发电总厂是东北电网南端主力热电厂。占地 7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拥有电站锅炉 10 台、凝汽式汽轮机 3 台、抽汽式汽轮机 4 台，总装机容量为 25 万千瓦。年发电量 19 亿千瓦时，年供热量 900 万百万千焦。担负着大连地区 50%的电能生产和为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大连钢厂等供热和大连甘井子区 182 万平方米的居民住宅供暖。

大连发电总厂是原大连第一发电厂、大连第二发电厂、大连第三发电厂于 1979 年 3 月合并组成。多年来，由于对外供热价格不合理，加上近年来燃料、原材料调价的影响，1983 年供热亏损 1792 万元，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着重扭亏，从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入手实行配套改革，推广和应用现代化管理等手段，使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安全生产记录也有创新。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1985 年、1986 年在热价无法调整的情况下，二年共增利 2125 万元。1987 年重点抓了能源管理，实行综合省煤节电措施和供热减亏，1987 年综合经济效益比承包指标增加利润 1287 万元。

大连发电总厂实行“一厂多站”管理体制，生产、经营有别于传统管理。总厂下属 4 个集体企业，经过创业都增强了实力，具备较强的设备安装能力。其中热力机电工程公司还生产定型产品，主要有高、低压开关柜等，其中镉、镍电池盘颇有名气。4 个集体企业共有职工 1499 人，基本上解决了总厂职工的待业子女的就业问题。1987 年 4 个集体企业生产总产值 4089.4 万元，总利润 670.8 万元。

1987 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 13586 万元；工业净产值 5362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10972 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 867 万元；产品销售收入 12824 万元；年末职工人数 2911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39541 元/人·年。

18. 抚顺发电厂

抚顺发电厂地处市中心，占地面积 336485 平方米，为东北电业管理局直属的老企业，迄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

该厂始建于 1908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经过恢复时期，特别

是经过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扩建，抚顺发电厂得到迅速发展，1952～1959年期间，先后共进行了6期扩建工程，共装设130吨/时中温中压锅炉9台，40吨/时锅炉3台，5万千瓦汽轮发电机3台，2.5万千瓦汽轮发电机1台，1.2万千瓦发电机3台。至此，该厂共有锅炉12台，总发电量为28.85万千瓦，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1987年该厂实际发电能力为24.5万千瓦，主要担负东北电网的调峰任务。从1958年开始，该厂由单一发电向热电联合生产转变，供热能力逐年提高，经过多年技术改造和安装背压汽轮机，分别于1970年和1981年又向市热力网供汽和利用循环水向市区供热采暖，供热面积达230万平方米。根据“七五”期间市区增加供热面积的要求，计划新装2台130吨/时锅炉及1台2.33万千瓦抽汽式汽轮发电机，满足市区新增200万平方米的供热要求。目前，锅炉已进入安装阶段，年末达到供热。

该厂建厂以来，为我国的电力工业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从1949～1985年9月，全厂累计发电量为5437.63万千瓦时；供热量为118227.7百万千焦。不但为国家输送强大电力，同时也为电力工业输送了大批人才、共为部、局及电厂等输送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计2532人1979年以来，抚顺发电厂连年超额完成各种经济指标，连续二年获省、市、局文明工厂和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企业称号。1987年被东北电业管理局命名为先进企业。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101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750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569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1 647万元；年末职工人数2994人；全员劳动生产率26736元/人·年。

19. 重庆发电厂

重庆发电厂位于山城——重庆，始建于1952年，该厂拥有1.2万千瓦机组8台，5万千瓦机组4台，20万千瓦机组2台，总装机容量69.6万千瓦，日发电量最高可达1 600万千瓦时，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重庆发电厂是分七期工程建设的：第一期工程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助建设的重点工程，设计容量为2台1.2万千瓦机组，1952年破土兴建，1954年竣工投产，装机容量为2.4万千瓦；第二、三、四、五期工程是扩建1.2万千瓦机组6台，1957年动工，1960年竣工投产，装机容量增至9.6万千瓦；第六期工程是扩建5万千瓦机组4台，1958年动工，1969年竣工投产，装机容量增至29.6万千瓦；第七期工程是扩建20万千瓦机组2台，亦是国家列入“务期必成”的建设项目，1983年动工，分别于1986年、1987年竣工投产，装机容量增至69.6万千瓦。经过几期扩建，特别是20万千瓦机组的扩建，对缓和川东地区乃至四川电力紧张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庆发电厂除主营发电外，还兼营对外制作加工、承接小水、火电站安装、土建修缮和进行粉煤灰开发、循环水再利用等项目的开发利用及其他综合服务工作。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4270万元；工业净产值2530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4438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764万元；年末职工人数3194人；全员劳动生产率44902元/人·年。

20. 青山热电厂

该厂是一座高温发电厂，位于武汉市青山区苏家湾，毗邻武汉钢铁公司，1955年破土兴建，经六期工程建设、安装汽轮发电机组11台。总装机容量67.4万千瓦。现有各种专业技术人员452名。自1957年8月第一号机组开始发电以来，到1987年共为国家发电516亿千瓦时、供热220625 350百万千焦，创造工业总产值364333万元。

建厂以来，对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个单位的40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过专业技术训练和辅导。自1963年以来，该厂先后派出10多批工程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参加了国家电力部门的援外专家组，分别赴柬埔寨、毛里塔尼亚、马里、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帮助开展电力基本建设和技术交流活动。1966年3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亲切接见了该厂援柬工程技术人员。1987年，该厂又一次承担了巴基斯坦贾姆肖罗电站的人员培训和商业运行工作。

1986年，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在改革中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不断加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0年成功承担武汉钢铁公司1.7轧机试车66%的电力冲击负荷，获原电力部“科学技术贡献奖”。1986年获华中电管局授予的“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湖北省经济工作部、省经委、省工交财贸金融办公室联合授予的“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1987年、1988年先后在全国、省、市企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交流依法治厂的先进经验，在坚持企业生产电力的同时，该厂大力开展第三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其下属的水泥厂和劳动服务公司兴旺发达，食堂、剧影院、卫生所、招待所、幼儿园、子弟学校、职工学校等生活后勤服务设施齐全，职工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9956万元；工业净产值4539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1 040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8730万元；年末职工人数3145人；全员劳动生产率52843元/人·年。

21．洛阳热电厂

洛阳热电厂1954年开始筹建，1957年第一台机组发电，前后经过三期工程建设，到1981年全厂装有6炉8机，锅炉蒸发量1170吨/时，额定发电容量18.5万千瓦时，供热量为300吨/时。为了适应电力生产发展的需要，1986年8月洛阳热电厂与新建的首阳山电厂合并成立了洛阳发电总厂。

1988年9月，省电力局决定撤销洛阳发电总厂，恢复洛阳热电厂和首阳山电厂建制。

洛阳热电厂是河南省最早建设的一座高温高压电厂，在河南电力生产中发挥着骨干作用，担负着豫西地区农业生产用电和洛阳市工业、民用集中供热的任务。

洛阳热电厂建厂投产发电以来至1987年，设备运行时间最长的已达23万小时，超过了设计的一倍多。为了彻底改变设备严重老化状况，确保安全生产，从1985年起，对主要设备进行了恢复性大修，保证了机组安全稳发多供，并于1988年1月5日实现了建厂对多年来安全生产656天的最高纪录。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8649万元；工业净产值2168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516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746万元；产品销售收入8741万元；年末职工人数1914人；全员劳动生产率40518元/人·年。

22. 郑州热电厂

郑州热电厂是能源部所属河南省电力工业局直接领导下的一个财政预算内的中型热电企业，主要产品是电力和热力。1957年10月第一台机组投产。经过四期扩建，共拥有8台汽轮发电机，9台蒸汽锅炉，装机总容量为131万千瓦。根据省电力局决定，1979年4月、1982年4月原郑州火电厂（3台机、3台炉、装机容量18万千瓦）和原郑州电力配件厂先后合并到郑州热电厂。1981年为缓和日益增长的热负荷供需矛盾，将4号机改为背压机，增加供热量100吨/时，总供热能力达294吨/时。1987年发电量完成63219万千瓦小时，供热量完成50578201百万千焦，分别超年计划的26.4%和14%。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5392万元；工业净产值4790万元；固定资产净值2474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331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619万元；年末职工人数2279人；全员劳动生产率23657元/人·年。

23. 灞桥热电厂（西安第二发电厂）

灞桥热电厂位于西安市东郊户、灞河两河交汇处东南，是陕西省建成的首座中温中压热电厂。其中一、二期工程为"一五"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1950年2月，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电业会议，提出当年的基本方针与任务是"保证安全发供电，并准备有重点地建设两、三年内工业生产所需的电源设备"。这次会议决定，在西安建设新的发电厂，由燃料工业部订购设备，并邀请苏联专家到西安勘察厂址。新厂的筹备工作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西北电业管理总局负责。同年8月西北电管总局组成20余人（包括苏联专家3人）的勘察队，进行选址、测量和钻探工作。1952年4月，根据在西安、咸阳、任阳等地选点勘测的结果，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新电厂的厂址问题会同国家财政委员会作了研究。考虑到西安作为陕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灞桥厂址距西安市区仅约8公里，且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已由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西京电厂征购土地700余亩，西安解放后，此地产已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接收等条件，决定在西安灞桥建设一座中温中压热力发电厂——西安第二发电厂。

电厂筹建初期，曾设想直接利用附近的户、灞两河水源。后因考虑到两河有枯水、丰水期且水量不稳定，遂决定结合水源分布和苏联专家意见，采取深井与浅井相结合的水源方案。根据初步设计及锅炉型号，确定将铜川煤作为生产用煤。铜川煤矿为当时全省最大的煤矿，储量达58.6亿吨，距厂址148公里。经由陇海铁路灞桥车站铺设铁路专用线，可将原煤直接运入厂内。

西安第二发电厂一期工程主体由苏联电力设计院莫斯科分院承担，成套设备由苏联供给。铁路、公路、水源、福利设施及公用建筑设施由国内完成。工程规模为安装苏联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两台，锅炉3台，总装机容量1.2万千瓦。1952年2月，电厂筹建处正式成立。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任命西北电管总局局长陈志远兼任筹建处主任。并决定由西北建筑公司201队承包主建筑工程，设备安装工程以东北火电工程公司第一工程队为主，西北火电工程公司为辅。8月，将铁路专用线工程交由西安铁路分局

机械筑路队施工。

1952年11月14日，西安第二发电厂正式破土动工。当时，施工条件十分艰苦，运输工具严重不足。主要设备及建筑材料，都是用汽车、马车在一条临时便道上运进现场的。在冷却水塔施工中，缺乏大型起吊工具，工人们因陋就简，采用独脚扒杆的办法吊装大型构件。开工不久，就进入了隆冬季节，给施工造成更大的困难。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工人们采用了材料加热、蓄热和暖棚法，坚持继续施工。整个冬季共完成钢筋混凝土工程量2544立方米，烟囱基础工程682立方米，为陕西电力建设冬季施工开创了先例，积累了经验。1953年9月，西北电业管理局任命申凤玺为西安第二发电厂厂长。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发电剪彩典礼。10月15日，1号机组移交电厂，投入生产。11月18日，2号机组也通过72小时试运，正式并网发电。整个建设过程仅用了一年时间。该期工程由于进度快、质量好，获得了西北工业部颁发的锦旗和银质奖。

西安第二发电厂是陕西电业史上首座中温中压热电厂。从此，陕西电力工业迈入了中温中压机组发电的新阶段。为西安的市政生活和纺织、国防工业提供了急需的热能和动力。

由于西安地区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西北国棉三、四、五厂和西北第一印染厂相继投产，电力、热力供应日趋紧张。1953年11月，开始筹备二期扩建工程。1954年12月，成立了二期工程筹建处。二期的主体工程由苏联火力发电设计院莫斯科分院设计，附属工程由国内设计，主设备由苏联提供。二期工程规模为3台1.2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5台锅炉（第5台锅炉缓建）。分别列为3、4、5号机和4、5、6、7号炉。土建、安装分别由西北建筑工程总局一公司五工区和燃料部西北基本建设局第三十一工程处承担。

3号机组的发电时间由原计划的1956年10月提前到6月；4号机组也于1956年12月正式投运，比原计划提前近半年。5号机组1957年9月装竣，由于供货厂家代表回国，试运推迟。11月该机组试运成功，并网发电。

随着二期工程的建成，陕西第一个热力网在西安市东郊形成。西安第二发电厂的一、二期工程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8年2月，该厂改名为灞桥热电厂。

根据西安地区电力负荷需要，1958年8月，该厂又开工建设三期工程。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各行各业一起上，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经有关各方共同研究，提出简易发电的方案。采取清仓查库、挖掘潜力、发动职工自己动手制做附属设备（如发电机保护盘、380伏厂用保护盘等），以及采取一些更新改造措施。1958年12月，完成安装，通过72小时试运。由于未按基建程序办事，且汽轮发电机通流部分被机械杂物击伤，至1960年3月，在一年多的生产中仅运行了2271小时。期间，被迫停机大修三次，到1963年9月才正式签证验收。1960年6月，开始安装7号发电机组并同时进行其他未完工程。同年11月，机组并网发电。至此，三期工程已经全部完成。

1967年兴建了9号锅炉。该炉系国内1960年制造的75－40－450型卧式旋风炉。由于是在国内尚无经验并缺乏国外有关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设计制造的，存在许多不完善之

处，且不适应铜川贫煤煤种，后拆除。1985年3月开始筹建的四期工程，为国家“七五”计划内大中型建设项目之一。由西北电力设计院设计。设计规模为1台2.5万千瓦供热式背压机组和1台220吨/时高温高压锅炉。根据工程设计，拆除7号机组和9号锅炉。四期工程在厂区原有范围内布置，充分考虑新老厂房衔接。原厂区为三列式布置，经多次扩建，主厂房前后已定型，可供扩建余地有限。为避免新建的输煤栈桥与邻厂的车间相碰，采取了与主厂房垂直偏角0.75度布置。汽机房、除氧间不扩建，新机组安装在原7号机拆除后的位置上，采取纵向布置。土建、安装工程分别由西北电建四公司和一公司承担。此外，该厂为补充户河东岸水源地供水不足，经西安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又在沿河西岸的安邸、郭渠、牛寺村一带开发第二水源。

1988年12月，新机组正式投产，列为8号机组。至此，灞桥热电厂实际装有7台汽轮发电机组和9台锅炉，总装机容量8.5万千瓦，供热能力312吨/时，年发电量4亿多千瓦时。通过灞（桥）水（沟）、灞（桥）豁（口）一二回、灞（桥）新（房）、灞（桥）纺（织城）、灞（桥）韩（森寨）6条35千伏线路向外送电。

截至1990年底，国家共向灞桥热电厂投资1.12亿元。建厂38年来，全厂累计发电量129.59亿千瓦时。

24. 户县热电厂（西安第三发电厂）

户县热电厂位于户县城南6.5公里。东邻主要供热用户惠安化工厂，东北3公里为户县余下镇。该厂是在第二发电厂一期工程建成后不久，于1954年元月开始筹建的。也是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陕西电力史上第一座高温高压热电厂。

“一五”初期，西安地区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电力和热力供不应求。1954年元月，国家初步确定在西郊工业区附近建设一座大型火电厂，并组成西安第三发电厂筹建处。1954年3月，苏联专家组来西安，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先后对西安的西郊，咸阳的秦渡、肖家村等处踏勘，初步确定西安西郊枣园村以北为第三发电厂厂址。1954年5月，第三机械工业部845厂（惠安化工厂）确定在户县城南建厂，需电力两万千瓦、蒸汽185吨/时、热水1.67太焦/时。为此，国家计委决定，将西安第三发电厂改在845厂附近建设。经选厂人员再次踏勘，确定在户县城南6.5公里，距845厂680米处建设电厂。为了收集厂区周围的水文、气象、地质资料，苏联专家和中国技术人员曾住在当地一座破庙里，早出晚归进行野外勘探。

一期工程由苏联电站部莫斯科火电设计分院设计，北京电力设计分院向苏方提供工程全部设计资料；厂外工程由国内设计，并由845厂和西安第三发电厂组成“户县工业区”总甲方，统筹安排委托厂外工程。将原计划在1957年后建成的2号机组提前到1957年底完成。该期土建工程由建筑工业部西北第三工程公司承包；安装工程由电力部西安基建局第三十二工程处承包。1956年元月18日，主厂房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不久，建设者们及时发现水文地质方面一系列问题。如：地下水位上升对混凝土的侵蚀，地质构造上沙质粘土中夹杂有岩石颗粒之扁豆体和夹层，建筑物可能产生不均匀沉陷问题等。在中共西安市委的大力支持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及时采取了措施，消除了隐

患。建设者们合理安排施工场地，比原设计缩短了两公里临时铁路，减少了混凝土浇灌的运输路程。他们还就地取材，选用涝河滩的石料，比取自莲花寺的石料降低成本60%。安装工程开始后，由生产检修人员组成工地代表小组，会同乙方依照工程质量要求，进行全面检查监督，认真进行了分段、分部和分项验收。

为使电厂的运行、检修人员尽快熟悉设备，保证机组投产后的安全运行，在施工期间，苏联专家们抽出时间给电厂的技术员和工人上技术课，介绍检修和运行经验。机组试运过程中，全体运行人员自始至终参加，不仅及早熟悉了设备系统和设备性能，而且及早发现施工中存在的缺陷，把事故隐患消灭在正式投产之前。

1957年12月，1号机组建成发电；翌年3月，2号机组正式投产。两台机组相继投入，保证了845厂试生产的用电用热，并将剩余电力送达关中电网，保证了西安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市政建设用电。一期工程的完成，标志陕西电力工业进入了高温高压机组发电的新阶段。发电煤耗率也比中温中压机组减少约1/3。

1958年3月，西安第三发电厂改名为户县热电厂。1959年，开工兴建二期工程。由西安电力设计院设计，规模为1台5万千瓦的苏制汽轮发电机组，列为3号机组；1台苏制锅炉，列为5号炉。该期工程除汽机房采用单框架形式外，其余均在一期基础上延伸扩建。由陕西省纺织建筑公司承担土建、陕西省电业局火电工程处承担设备安装。一期工程中的3、4号炉与二期工程同时安装。1960年2月，3号机组正式投产。3、4、5号炉分别于1959年4月、11月和1961年1月投产。因当时国家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3号炉减少了一套制粉系统，给以后的生产造成很大困难。5号炉在安装时因无钢板材料指标，采用混凝土浇筑的冷风道。同时，将已安装好的3、4号炉送风机冷风道拆下，作为5号炉的热风道，被拆掉的两台炉冷风道也改作了混凝土风道。

三期工程为1台国产5万千瓦发电机组。由西安电力设计院设计。陕西省电力纺织建设公司第三、四工程处，西北电力建设局第三工程公司先后负责承建。1961年11月，开始安装。1962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决定缓建。1965年恢复建设。翌年元月建成投产，列为4号机组。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三线建设"的发展，负荷增长很快，电力难以平衡。经国家计委和水利电力部批准，又开工兴建四期工程。四期工程由西北电力设计院设计。工程规模为1台民主德国产5万千瓦汽轮发电机和1台200吨/时锅炉，分别列为5号机和6号炉。1968年10月开工，1970年8月投产。因汽轮机凝汽器冷却面积不够，端差温度超过设计值，出力仅达到4.6万千瓦。至此，户县热电厂共安装汽轮发电机组5台，装机容量20万千瓦；锅炉6台，总蒸发量1050吨/时，供热能力260吨/时。该厂共有输电线路7回。其中，35千伏线路两回，供户县地区负荷；110千伏线路5回，分别与西安南郊变、阿房变、庄头变和高官峪变联通。在110千伏母线上接有惠安化工厂的线路7条，均是电缆出线。全厂年发电量约15亿千瓦时。是一座以发电为主，电热联产的中型电厂。

截至1990年底，国家共向户县热电厂投资1.24亿元。全厂占地面积90.35万平方米，其中发电生产建筑面积75.32万平方米。1990年底，全厂职工总数1639人，其中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105人。建厂三十四年来，累计发电量365.21亿千瓦时。

25. 西固热电厂

西固热电厂位于兰州市西固工业区黄河南岸，濒临黄河。一期工程规模为4台2.5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4台230吨/时锅炉。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二期工程规模为2台5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1台220吨/时锅炉，三期工程建设规模为2台220吨/时锅炉，主机设备仍由苏联成套供货。

四期工程建设规模为2台5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2台220吨/时锅炉，除8号汽轮机由苏联供货外，其余主设备均由国内生产。

西固热电厂总规模10炉8机，装机容量30万千瓦，供汽能力为850吨/时。厂区占地面积37.72公顷。

1953年3月，开始电厂前期工作，成立兰州新电厂筹建处，隶属西北电业管理局。8月成立兰州新电厂选厂委员会，10月由国家计委领导的兰州工业基地勘察工作开始。1954年9月该工程初步设计由苏联送到中国。10月由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主持，会同部设计司和设计管理局对初步设计进行了审查。1955年3月技术设计由苏联运交国内，5月在北京由电业管理总局召集有关单位进行审查。1955年冬破土动工。一期工程（4×2.5万千瓦）生工艺系统由苏联电站部负责设计，福利区、厂前区、铁路专用线等由国内设计单位配合设计。二、三、四期工程共20万千瓦（4×5万千瓦），均由西北电力设计院设计。土建施工由西北建筑工程公司兰州第三工程处承担。电力部西安基本建设局第三十三工程处（今西北火电建设一公司）负责设备安装。1957年11月第一台2.5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1970年工程全面竣工，总投资2.44亿元，千瓦单位造价813元。

生产区总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锅炉房高40米，机炉厂房跨度分别为25米和27米，为封闭式厂房，内装10台锅炉和8台汽轮发电机组。两个高100米的烟囱耸立在厂区中央，主厂房以北为燃运、化学分场，以西为机修、材料库房等辅助生产建筑，以南为主控制室及升压变电站。

生产用水由工业区西固水厂统一从黄河提取，通过水厂一次沉淀处理后送入电厂循环水系统。当洪水时尚需经电厂二次沉淀池处理后再送入循环水系统。电厂一、二、三期工程生产运行系统的循环水是一次循环，耗水量很大。在第四期工程中，新建了两座机力冷却塔，于1967年相继投入使用后，生产用水量大幅度下降，既可降低水费支出，也可减轻洪水季节对水厂的压力。为确保进入锅炉水质，在一期工程设计有一套100吨/时出力的蒸发器装置。二、三、四期扩建工程再增设1套100吨/时的蒸发器装置。灰场设计在厂区东北约2.5公里的黄河滩地，沿黄河筑堤挡灰，灰水经沉淀后清水流入竖井经管道排出。

在一期工程建设中，烟囱施工使用内脚手架施工方法，40天达到100米高度，比原计划提前20天，主厂房仅用6个月就交付安装。锅炉安装中，在缺乏起吊设备的条件下，土法上马，1号炉从立钢架到大汽包就位，仅用了34天，2号炉用了14天，3号

炉用了6天又14小时，4号炉经采纳合理化建议，改进组合方法，减少升高次数后，仅用了3天零8个小时。在机组安装中，4号汽轮机从台板就位到扣大盖共历时9天，突破了当时全国为20天的先进纪录，具备全套起动条件只用了27天。

二期工程施工中，无专用起吊机械，在100吨行车上架设把杆，吊装钢屋架取得成功，为提前安装机组赢得了时间。

四期工程投产前后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秩序较乱，在8号机本体油管道安装时，将未开孔的法兰垫装上，造成轴承断油烧坏乌金大瓦；8号机给水泵安装了不合格的“0”型密封圈，在试运中抱轴停转，造成第9级动、静叶烧毁，损失颇大。

西固热电厂筹建之初，缺乏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都是刚从大、中专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边干边学很好地配合了国内外设计和施工工作，完成了筹建任务。在生产人员准备上，电业管理总局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定数量有生产运行经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其中部分人员赴苏联同类型发电厂学习。新工人进厂后，先去国内类似电厂培训，在掌握本岗位技能后经考试合格上岗，较好地完成了1号机组投产任务。

西固热电厂投产不久“大跃进”开始，在“反保守”、“捣陈规”的口号下，许多电力生产秩序受到破坏，生产事故不断发生，最终导致了震惊全国电力系统的“7·31”事故，挫折和教训极为深刻。“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水利电力部提出“一厂变一厂半”超铭牌运行的口号时，西由热电厂吸取“7·31”事故的教训，采取谨慎的态度，通过科学试验后，仅仅在1号汽轮发电机上动了小手术，在汽机喷嘴排上打一个孔以扩大进汽通流面积，在发电机转子上进行开槽通水以冷却转子。最高负荷可达4.2万千瓦（铭牌出力为3万千瓦），平时并不超带负荷，只在上级领导检查时带一下。后因各地都有烧毁发电机事故的发生，上级不再要求超铭牌运行，西固热电厂便很快将设备恢复原设计，进行正常生产。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国务院、电力部和西北电管局等上级领导重视下，西固热电厂开始设备恢复性整修，1963年6月底组织了首次公用系统大检修，与主要热力用户出动700余人联合进行，历时7天完工，使设备、系统的泄漏点大为减少，逐步使生产恢复正常，并培养出了一支作风比较过硬的职工队伍，为甘肃新建电厂培养了一批骨干。至1990年底，三十三年累计发电430亿千瓦时，供热414200000百万千焦，总产值34亿元，相当于建厂总投资的14倍，为甘肃省兰州市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6. 乌鲁木齐电站

位于乌鲁木齐北郊的苇湖梁发电厂（乌鲁木齐电站）的建设，揭开了新疆现代化火力发电厂建设的帷幕。该厂是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第一期工程于1952年5月破土兴建，设备由苏联进口，负责土建施工的是新疆军区工程处工兵团和原二军六师十六团指战员。他们克服了缺乏技术力量、缺乏大型施工设备等严重困难，人拉肩扛，搬运了3000多吨钢材和机器，用人推绞盘和卷扬机起吊了十数吨庞大笨重的气包等设备。至1953年末，完成了土建施工和安装任务，经国家验收合格，第一期工程两台机组（2×2500千瓦），于当年12月和1954年1月先后发电。经过1956～1958年二期扩建工程（3×6000千瓦）、1959～1960年三期扩建工程（2×1.2万千瓦）、1964～1966年四期扩

建工程（1×1.2万千瓦），该厂总装机达到5.9万千瓦。这几次扩建，全部采用国产机组，并且是自行设计、施工安装的。这个厂的建成和投产，标志着新疆第一个现代化中型火力发电厂的诞生，是新疆电力工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厂从60年代中期以后，担负乌鲁木齐地区供电系统全部负荷，到70年代中期，担负乌鲁木齐地区主要负荷，以后，变为担负部分负荷和调峰，对乌鲁木齐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培养电力人才，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节　钢铁工业

27.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祖国的钢都”，有悠久的历史。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以来，在废墟上迅速恢复发展。1949年到1988年，鞍钢累计生产铁17688万吨，钢18214万吨，钢材11263万吨。实现利税总额累计429.6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鞍钢总投资的7倍。钢铁生产规模基本形成了800万吨的水平。是全国最大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是世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

鞍钢位于辽宁省中部的鞍山市，北距沈阳89公里，南距海港城市大连307公里。纵贯东北大平原的哈尔滨至大连的铁路和公路穿过鞍山市区。大连港和营口港与鞍山邻近。鞍山地区铁矿资源十分丰富。市区南面有西鞍山、东鞍山，形似马鞍，鞍山因此而得名。市区东部，有小岭子、大孤山、眼前山、关门山、齐大山等十几座蜿蜒连绵的铁矿山；市区东北70公里处的弓长岭铁矿，把鞍山与本溪的铁矿山连在一起，形成了全国最大的铁矿区。据勘探，鞍山地区铁矿储量达84.4亿吨。鞍山地区的铁矿除弓长岭矿区有富铁矿外，以贫铁矿为主，地质学界称之为“鞍山式铁矿”。

鞍山地区周围还有丰富的其他矿产资源。鞍山地区丰富的地下矿藏，早已被中国人民发现并采掘和利用，从鞍山北郊战国遗址中出土的大批铲、锄、镰等农具和铁锅、铁镞等铁器，表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和铁的质量已达到较高水平。秦汉时期，在鞍山一带设有官办的铁厂、百户所，开始成批生产农具和铁器。经过魏晋南北朝和唐朝，鞍山冶铁业有所发展。到了辽代，鞍山冶铁业相当昌盛，300余户官工奴隶从事冶铁，并以铁缴纳赋税。元代，在辽阳设置铁冶提举，专门管辖鞍山一带冶铁业。明初，最大的铁厂建在天成山，即今鞍钢弓长岭铁矿一带。只是到了明代后期，鞍山的冶铁业才逐渐衰落。清王朝以辽东是它的发迹地为由，严禁在这个地区开矿冶铁。

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对鞍山地区的钢铁资源大肆掠夺。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租借旅（顺）大（连），经营铁路，并夺得了开采鞍山铁矿的特权。1916年，成立了所谓中日合办鞍山振兴铁矿无限公司（简称振兴公司）。同年，日本积极筹建“鞍山制铁所”。1919年4月，1号高炉开始出铁。日本于1933年5月，把原拟建在朝鲜新义州的制钢所迁到鞍山，合并了鞍山制铁所，并称昭和制钢所。抗日战争爆发

后，日本加紧侵略和掠夺，再三要昭和制钢所实施“增产计划”。到日本投降时止，昭和制钢所的年设计能力已达生铁 170 万吨、钢锭 108 万吨、钢材 49 万吨，是东亚第二大钢铁企业，仅次于日本的八幡制铁所。二十六年中累计产铁 1186 万吨、钢 548 万吨、钢材 327 万吨。其大部分被运往日本，用于制造军火，进行侵略战争。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昭和制钢所，中国工人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生活极为悲惨。

1945 年“八·一五”光复后，苏联红军进入鞍山，拆走了大部分设备、器材。1946 年 4 月 4 月，国民党军占领鞍山。同年 10 月 1 日成立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但在国民党占领的近两年时间内，仅修复 1 座平炉，生产了 9500 吨钢。

1948 年 2 月 19 日，鞍山解放，鞍钢从此回到人民的怀抱。

解放初期，鞍钢杂草丛生，设备破坏严重，物资器材散失，生产全面瘫痪。

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派柴树藩、郝希英等到鞍钢主持工作。并指示要保护工厂，保护好原有技术人员。1948 年 12 月 26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任命李大璋为经理，杨春茂为监委，郝希英、王勋为副经理。并组建 4 个处、9 个部和 29 个厂矿。同时还起用了解放初期接管时留下来的 140 多名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日本技术人员 104 名）。为了解决恢复生产最为缺少的物资器材问题，中共鞍山市委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群众性的献交器材运动，广大职工纷纷响应号召，全市有 1 万多户居民献交各种器件 21 万件。在 1949 年 2 月 20 日的庆功会上，有 139 人为此立功受奖。炼铁厂老工人孟泰爱厂如家，勤俭节约，在恢复高炉时，回收和再生器材 300 余件，并将拣到的千种材料万个零件储存在被誉为“孟泰仓库”里，供生产所用。他荣立了一等功，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

与此同时，鞍钢积极制定工厂恢复规划，开展了恢复生产的立功竞赛活动。1949 年 4 月 25 日，一炼钢厂 2 号平炉首先出钢。6 月 27 日，修复后的第一座高炉——2 号高炉出铁，7 月 9 日，鞍钢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到 1952 年，已陆续修复和建设了 4 座铁矿山、6 座焦炉、3 座高炉、8 座平炉、6 套轧机及相应的辅助生产设备。累计生产生铁 211 万吨、钢 191 万吨、钢材 109 万吨，上缴利税 4.22 亿元，开始为国家做出贡献。鞍钢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党和国家提出了“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党和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 500 多名地、县级干部，并从中南、华东地区招聘了 2000 余名工程技术人员。

1950 年，中国和前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议书》，确定到 1960 年的生产规模为生铁 252 万吨、钢 322.5 万吨、钢材 248 万吨。其中“一五”计划时期的重点工程 37 项，包括闻名全国的“三大工程”，即中国第一座自动化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 7 号高炉。“三大工程”的建设，是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下，于 1952 年下半年开始的。为了集结建设力量，中央从全国 47 个主要城市 70 多个单位调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鞍钢，并得到全国 57 个城市的 199 个企业的支援。经过艰苦努力，终于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建设任务。1953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诞生了；11 月 30 日，中国第一根大型钢轨问世了；12 月 19 日，中国又一座现代化大型高炉出铁了。“三大工程”的建成，振奋了鞍钢，鼓舞了全国。

“一五”计划期间，鞍钢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5.45亿元，为恢复时期建设投资的7倍多。1955年根据综合平衡，鞍钢又提出年产铁557万吨、钢417万吨、钢材432万吨的扩大设计方案，扩建了大孤山、东鞍山、弓长岭3个铁矿山，新建东鞍山浮选、东鞍山烧结厂等项工程，提高了鞍钢技术装备水平。到1957年末，除轮箍轧机等10套轧钢设备由国家调出易地建设外，按原设计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形成。“一五”计划期间，五年鞍钢累计上缴利润和税金25.55亿元，为同期国家给鞍钢投资的1.65倍，为中国重点工程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从50年代后期起，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加上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鞍钢生产建设出现大起大落。1958年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鞍钢钢产量计划由1957年的291万吨跃进到450万吨，一面拼设备，一面在大型企业搞“小洋群”，兴建了141座小高炉、37座小转炉及各种土炉子。虽然1958年钢产量达392万吨，1960年创561万吨新记录，但是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主要产品质量下降，设备磨损严重，原燃材料消耗升高，成本超支，积累减少。1961年，钢产量猛跌到295万吨，1962年降到了1957年的水平。

1960年初，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鞍山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对此作了指示，宣告“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报告和批示中提出《鞍钢宪法》的五项原则，即：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被作为当时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

1961～1966年，鞍钢广大职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全部超过历史水平，在全国同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7号高炉的经济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66年，鞍钢的产值达到25亿元，产钢506万吨，铁461万吨，钢材267吨，上缴利税13亿（其中利润11.5亿元），成为鞍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

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鞍钢生产急剧下降，生铁、钢、钢材年产量，分别比上年下降32.5%、42.5%、41.4%，利税总额仅为上年的1/3。“文化大革命”给鞍钢造成严重的灾难。

1978年以来，鞍钢的各项工作开始进入全面振兴的新时期。企业由单纯追求产量产值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了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全面稳定提高。1981～1985年的“六五”计划期间，共开发71个新钢种，296个新品种，其中高压锅炉管等32个品种的质量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优质钢材占钢材总产量的比重，从1981年的12.8%提高到1988年的73.28%。“七五”计划期间能耗指标连续五年达到一级企业标准，夺得全国钢铁企业节能的金牌。从1986年起连续五年获国家一级节能企业称号。从1982～1986年，连续五年实现利税递增10%以上，1988年达24.41亿元。

鞍钢先后与国家实行了利润分成和利改税办法，及“三包、两保、一挂钩”为主要内容的总承包。在企业内部，全面落实承包经营责任制，普遍扩大基层厂矿、单位的自主权。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改革领导制度、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从1986年起，鞍钢提出了“发展主体，壮大两翼”的方针，并遵循“扬长补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原则，利用鞍钢资源、人才、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优势，开展多种经营和横向联合，先后同东北、西北、华北、西南等地区的500多个企事业单位签订了总值达2.9亿多元的843项横向经济联合合同。建立了一批可靠的原料、能源供应基地，为企业的技术改造开辟了多种资金渠道；使鞍钢从封闭型经营转向开放型经营，从单一的产品结构转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开拓了新领域。

鞍钢是个老企业，既有日伪时期的老设备，也有50年代前苏联援建的设备。20世纪80年代后，鞍钢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了有顺序的技术改造。改造的重点是：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钢材品种，降低物资消耗，改善环境保护和补还生活欠账。技术改造的特点，一是依靠自筹资金，不向国家要投资；二是改造不停产，不减产，在改造的同时实现增产增收；三是技术改造与大中小修结合，大修大改，小修小改，逢修必改；四是采取措施，认真推行经济责任制，调动公司和厂矿两个积极性。“六五”计划期间，计划投资12.47亿元，实际完成12.95亿元。规划项目159项实际开工174项，竣工及部分竣工139项。主要项目有：东鞍山矿移动排土系统的建成；弓长岭选矿重磁选，齐大山选矿浮选、磁选的改造；炼钢系统有7座平炉改为顶吹氧气平炉，第三炼钢厂已改造成为大型转炉炼钢厂；第二炼钢厂建成设计能力年产75万吨的3台连铸机，结束了鞍钢没有连铸的历史；3.5万立方米制氧机、化工硬质沥青、一初轧厂可控硅变电及速度控制装置、无缝石油管加工数控机床、涂层钢板机组等5项引进设备顺利投产；鞍钢自行设计的9号高炉内燃式热风炉、平炉电除尘、中板厂加热炉等新技术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由于设备状况的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五年累计新增固定资产4.97亿元，增加经济效益4.2亿元。“七五”计划期间，1986年完成技术改造投资3.51亿元，竣工和部分竣工225项；1987年完成投资5.67亿元，计划竣工的17项工程和其他13项扫尾工程全部完成。1988年完成技术改造工程41项，实现投资14.87亿元。“七五”计划期间的重点改造项目有：齐大山矿红矿选矿工艺改造工程、球团工程、新烧结工程、11号高炉改造性大修工程、大板坯连铸机工程、50万吨线材工程等，它们的竣工投产使鞍钢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88年，在鞍钢22万名职工队伍中，有一支31640多人的门类齐全、专业配套的科技大军。1988年与1978年相比，企业年工资总额由17718万元上升到53698元，增长203.1%。职工年人均收入由824元增长到2495.6元，增长了204%。鞍钢住宅建设总投资81723万元，新建住宅面积377.52万平方米，十年来新增职工住宅是过去三十年住宅建设总面积的170%。医疗设施，总床位达4751张，有各级医务人员7097人。鞍钢全民职工3周岁以上幼儿全部入园。

1989年12月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正式批准鞍钢为国家一级企业。1992年11月经国家批准，鞍山钢铁公司更名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并以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为核心企业，组建成立鞍钢集团。到1993年末，鞍钢共有全民所有制职工20.8万人。下属10个二级公司，178个厂矿、院、所，有铁矿山6座，辅料矿山5座，烧结机14台，球团机1台，大型焦炉17座，633～2580立方米高炉10座，200～300吨平炉13座，150～180吨转炉3座，板坯连铸机1套，小型方坯连铸机2套，圆坯连铸机1套，

初轧机2套，各类成材轧机28套，以及相应的采、选、焦化、耐火、机械、动力、运输配套设备。设备总重量121.007万吨，固定资产原值267.3亿元，净值156亿元。1993年，鞍钢工业生产总值为109.83亿元，生产钢851.42万吨，生铁837.48万吨，成品钢材611.02万吨，利税46亿元。

28. 包头钢铁公司

包头钢铁公司（以下简称包钢），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起来的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全国重要的稀土生产基地。它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河畔，北倚阴山，南濒黄河。

包钢筹建的历史发端于白云鄂博（蒙古语为富饶神圣之山）矿产资源的发现。1927年7月，中国地质工作者及中、瑞（瑞典）两国科学家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丁道衡在考察途中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即今主矿）。1934年，地质工作者何作霖在研究白云鄂博岩矿标本时，发现其中含有两种稀土矿物。1944年，地质工作者黄春江发现了白云鄂博东方矿体和西方矿体群（即今东矿和西矿）。但是由于旧中国贫困落后，无力开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初，白云鄂博被列为国家地质普查的重点项目。经241地质队三年的艰苦勘探证实，白云鄂博矿确是一座巨大的铁矿。1953年初，国家决定在包头地区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同年4月4月，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成立包头筹备组，6月改名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1954年5月1日正式成立包头钢铁公司。包钢是50年代前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根据两国政府协议，前苏联承担了包钢建厂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部分施工设计，提供了一期工程的大部分成套设备，并派来专家进行具体的技术指导。

1954~1956年，重工业部从直属建设工程公司和鞍山冶金建筑总公司等单位，为包钢调集和组建了一支基建施工队伍，建设高潮时达6万多人。1957年7月，包钢开始了以白云鄂博铁矿和机械总厂工程为中心的原料基地和附属、辅助生产设施的建设。1958年4月4日，3号、4号焦炉和1号高炉先后破土动工，黄河水源地、厂区运输、铁路枢纽、动力管网等建设工程也全面开工，经过十六个月的紧张施工，1号高炉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出铁。1959年10月15日周恩来亲临现场为包钢1号高炉出铁剪彩。1960年5月1日，1号平炉也炼出了第一炉钢。在包钢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关键时刻，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百个单位，积极支援包钢，形成了一个全国支持包钢热潮。特别是鞍山钢铁公司不仅为包钢代培了人员，还直接输送了大批技术、业务生产骨干。

包钢在生产建设上，走过的是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除“左”的政策干扰和前苏联片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包钢建设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外，还遇到了因原料特殊而带来的一系列技术难题。白云鄂博矿山是一座世界罕见的巨大的多金属共生矿床（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岩矿中含有71种化学元素，167种矿物。已探明的储量为：铁矿石9.57亿吨，稀土氧化物1.35亿吨，铌氧化物738万吨，其中稀土储量居世界之冠）。由于矿物种类多，矿石结构复杂，嵌布粒度细，特别是含氟、磷平均高达6%和0.8%，并含

有钾、钠等元素，而成为国内外没有先例的难选、难烧和难于冶炼的矿石。建厂时由于对白云鄂博矿的特殊性认识不足，设计中没有考虑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随后又采用了富矿直接入炉冶炼，中贫矿暂时堆放的建设方案，推迟了选矿、烧结等重点工程的建设，颠倒了建设程序，也造成了矿山挖富堆贫，采剥失调，增加了包钢原料过关的困难。1964～1966年，选矿第一、二系列和4台烧结机等原料系统的重点工程才先后建成投产。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产受阻，亏损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包钢又增建了1座高炉、2座转炉，进一步加剧了原料和冶炼的矛盾。

1978年以来，包钢贯在生产上依靠技术进步，组织技术攻关，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1978年结束了连年亏损的历史。1979年钢、铁产量双双突破100万吨大关。1984年利润超过1亿元，提前一年完成"六五"计划的产值、利润指标，使包钢由一个年亏损亿元以上的大户，跨进了年盈利亿元以上的行列。1985年钢、铁产量达到双150万吨，1987年又双双突破200万吨，钢材产量突破了100万吨。1988年与1977年相比，生铁产量提高了3.46倍，钢产量提高了2.93倍，钢材产量提高了3.27倍。1983～1988年的五年中上缴利税达8亿多元。

党和国家对包头共生矿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十分重视。1963～1987年的24年中先后为此召开了14次全国性会议。在钢铁生产发展的同时，包钢稀土和铌的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截至1988年，包钢的稀土、铌产量已发展到70多个品种，200多个规格。除氯化稀土、氢氧化稀土外，还有单一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和稀土中间合金，初步形成了由粗到精较为完整的稀土、铌生产体系。1988年与1977年相比，稀土精矿折合氧化物量增长了1.7倍，各种稀土冶炼产品折合氧化物量增长了1.6倍。现在包钢的稀土产品产量已占全国稀土总产量的70%以上。这些产品除畅销国内市场外，还行销到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和新加坡等国家。

通过技术攻关，包钢稀土、铌的生产工艺有了大的改进。1978年以来，连续取得了稀土选矿工艺、碱法分解包头稀土精矿生产氯化稀土工艺和全萃取分离单一稀土氧化物工艺等3项重大突破。氟碳铈精矿品位达到70.34%，收得率为28%。碱法分解稀土精矿的分解率提高了2%～4%，稀土收得率提高了8%～10%。萃取单一稀土氧化物工程已建成投产，可同时生产99%～99.95%的7种稀土产品和1种稀土富集物，解决了稀土深加工的初步问题。在利用高炉渣冶炼稀土合金的基础上，用稀土精矿造块脱铁直接冶炼稀土合金，简化了工艺，提高了质量，节约了能源，在稀土火法冶炼工艺流程改革方面闯出了新路。在铌的生产上，利用钢渣冶炼铌铁，年产量已达到500多吨。包钢在环保科研和环境治理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1978年以来，包钢用于治理环境的投资达6658万元。特别是主攻了包钢在生产中排出的氟气、酚水和烟尘三大污染源，使之得到了有效治理。烧结机4套湿式净化塔系统改造使用后，保证了大气含氟落地浓度由治理前平均0.093毫克/立方米降到1988年0.0058毫克/立方米，低于平均0.007毫克/立方米的国家卫生标准。焦化厂含酚废水经过治理后，1988年总下水的含酚浓度为0.177毫米/立方米，大大低于0.5毫克/立方米的国家排放标准。

1979～1988年十年中，包钢通过企业全面整顿，不断深化改革，强化企业管理，注

意人才开发，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生产经营逐步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1980年以后，国家对包钢先后实行了“上缴利润定额包干”、“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和“两保一挂”的经济政策，使包钢初步走上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道路。1981～1988年包钢的利润留成达4.18亿元，其中生产发展基金为1.99亿元。加上企业基本折旧费用、国家返回资金、自筹资金、银行贷款和地方财政拨款，使包钢得以完成13个基建配套项目和274个技术改造项目，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实力。

1993年，包钢的钢产量达到308.03万吨，生铁291.1万吨，成品钢材198.8万吨，稀土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工业总产值达到33.33亿元，实现利税18.1亿元。年末拥有固定资产原值54.16亿元，净值35.41亿元，设备总重量26.26万吨，职工人数105120人。

经过四十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在一片荒滩上平地起家的包钢已形成年产250万吨钢、铁的综合生产能力。截至1988年末，总投资为39亿多元，其中自筹资金14.8亿元。到1988年末已形成固定资产原值30.75亿元，净值21.26亿元。设备总重量26.4万吨。主要产品有：重轨、大型工字钢、大型槽钢、大口径无缝钢管、焊接钢管线材、生铁、焦炭，以及稀土产品和铌铁等。在国内60千克/米重轨、75千克/米重轨、石油套管、矿用液压支柱钢和大型钢板桩等都是包钢最先试制出来的，填补了中国钢材品种的空白。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包钢职工队伍也已经成长起来。截至1988年末，包钢共有在册职3274480人，另有集体所有制职3230462人。全公司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1493人。包钢的职工队伍由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藏、苗、彝、壮、朝鲜、满、侗、土家、哈尼、高山、拉祜、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和汉族等20个民族组成。其中蒙古职工为1975人。在历史上以游牧著称的蒙古等少数民族中，已造就出一大批掌握现代生产技能和科学技术的钢铁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与各级领导干部。

现在，包钢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企业。包钢的诞生，使原是皮毛集散地的包头变成一新型的工业基地，促进了内蒙古西部地区机械、煤炭、电力、交通、建筑和建材等行业的发展，对于开发边远地区资源、发挥边远地区优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9. 本溪钢铁公司

本溪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本钢），位于辽宁省东部的本溪市。这里煤铁资源丰富，是沈（阳）丹（东）、溪（本溪）辽（阳）等铁路及公路的交汇中心，运输方便，为发展钢铁工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本钢是一个有历史悠久的老企业。它始建于1905年，是日本财阀非法开采的本溪煤矿。1911年中日合办，1911年10月增营采矿制铁，改称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1915年和1917年1号、2号高炉分别投产。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企业为日本占领。1935年，电炉钢开始试生产。1941年，成立“本溪湖特殊株式会社”。1941年和1942年，分别建成3号、4号高炉。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铁354万吨，特钢1.1万吨，产品大部分被运往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进驻本溪，10月8日成立本溪市民主

政府，11月3日民主政府接管本溪湖煤铁公司，改名为本溪煤铁总公司。1946年5月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本溪。在国民党统治的两年多时间里，高炉没流出一滴铁水，只生产了465吨钢。

1948年10月30日，本溪山城再获解放。东北行政委员会接管本溪煤铁有限公司。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开展了献纳器材、抢修设备、增产节约、创造新纪录等运动；实行民主管理，迅速恢复了生产。南芬铁矿排除井下积水，抢修设备，不到半年就开始生产。1949年7月4日，2号高炉开始生产。7月15日本溪煤铁公司举行开工典礼。同年10月1日，1号高炉也恢复了生产。1949年共产铁44884吨，钢23372吨。1952年完成了恢复时期的任务，生铁产量达29.1万吨，特殊钢2.1万吨。

1953年，经重工业部批准，3月2日分别成立本溪钢铁公司和本溪矿务局。

本钢在"一五"计划期间，被国家列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本钢进行了改造和扩建。主要项目是将3号、4号高炉炉容由758立方米扩大到917立方米。围绕高炉改造，采矿、选矿、烧结、炼焦和发电等都作了相应的改造。南芬铁矿由井下开采改造为露天开采，于1956年建成年产能力470万吨的大型机械化露天铁矿，使公司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2亿元，生铁产量达到80.2万吨，特钢8.8万吨，特钢材6.3万吨。

1960年8月4日，本溪地区遭到两百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灾害。本钢除2座发电厂外全部停产。广大职工与洪水搏斗，进行了紧张的抢修和恢复工作。8月中旬，工源厂区的高炉、焦炉、电炉相继恢复生产。1961年，本钢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经过调整，到1966年，生产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工业总产值达到3.37亿元，利润1.48亿元，生铁产量160万吨，钢产量14.5万吨。1966年，本钢担负了援建西宁钢厂、西北耐火材料厂和宁夏石嘴山钢铁厂的机修分厂的任务。1969年3月，冶金部决定将本钢炼钢厂（主要生产特殊钢）的设备搬迁到西宁钢厂，搬迁设备1080台（套），总重量为4614吨，支援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骨干986人。从1970年起，本钢炼钢厂又开始恢复改造和扩建，到1979年12月形成了年产20万吨生产能力的特殊钢系统。

1970年4月4日，国家建委、冶金部等有关部门与本钢共同研究，确定了本钢"三二二"的改造方案（即年产300万吨铁，200万吨普钢、20万吨特钢），从此，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扩建。5月15日，本溪市万余人参加歪头山铁矿大会战，打响了"三二二"改造的第一战役，于1973年初全部建成投产。1970年7月，在本钢第二炼铁厂兴建炉容2000立方米的5号高炉，1972年1月9日投入生产。

1972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三支队、第二支队先后参加本钢改造的建设。4月4日，第二炼钢厂动工兴建，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3台大型氧气顶吹转炉，于1974年11月竣工，设计能力年产钢坯173万吨的1150毫米板坯初轧机于1975年8月试车成功。1974年11月，年轧制能力159万吨的1.7米热连轧机动工兴建，1979年投产。本钢形成了冶炼和轧制普通钢的系统，生产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本钢遭受了一场浩劫，使企业陷于半瘫痪状态。到1976年，焦化厂4座焦炉有3座被烧垮。第二炼铁厂3座高炉有2座濒临停产。从1974年起，本钢连续三年未完成国家计划。

1978年以后，本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展了全面整顿，采取10项经营管理措施，加强了企业管理，特钢年产量达到20万吨的设计能力。1980年，生铁产量第一次突破300万吨的设计能力，达到310万吨。1983年11月，国家计委批准，从1981～1987年，1.7米连轧机生产的利税（计5.7亿元）不上缴，作为普钢系统配套改造的资金。1984年，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本钢开始向二级厂矿放权，在三个单位试行厂长负责制，继续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1985年，制定出《本钢经济体制改革若干规定》，广泛开展横向联合和多种经营。1986年以来，本钢深化改革，实行经济效益与工资基金总额挂钩，同时实行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开展了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进一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1949～1988年，四十年间，本钢共生产生铁6765.2万吨，其中铸造生铁2560万吨；钢1769.7万吨，其中特殊钢509.6万吨。同时，还承担了齐齐哈尔钢厂、西宁钢厂的建设任务。向齐钢、西钢、包头、酒泉、济南等32个钢铁企业支援了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1.4万多人，支援的设备总重量5万多吨，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基地的作用。

1988年底，本钢有职工152150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98287人，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13992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8亿元，企业（包括矿山）占地总面积41.71平方千米，房屋建筑面积521.6万平方米，设备安装总重量36.74万吨。有采矿、炼铁、炼钢、轧钢等50个生产和辅助厂矿及科研、文教、卫生、生活福利等事业单位。本钢有大型露天铁矿2座，石灰石矿和黏土矿各7座，高炉5座（有效容积4850立方米），75平方米烧结机1台，焦炉6座，电炉12座，变压器总容量46000千伏安，120吨氧气顶吹转炉3座，1.15米板坯初轧机1套，1.7米连轧机1套，热电厂装机总容量12.8万千瓦。

1990年工业总产值为33.07亿元，生产钢237.11万吨，生铁274.82万吨，成品钢材128.37万吨，实现利税5.83亿元。1993年工业总产值达35.45亿元，生产钢256.64万吨，生铁305.57万吨，成品钢材195.30万吨，实现利税22.14亿元。1993年末，拥有固定资产原值94.28亿元，净值58.19亿元。设备总重量36.58万吨，职工人数100736人。

1992年10月，“本钢集团”正式组建，它是跨地区、跨行业、多种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集团。

30.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占地面积33.48平方千米（未包括1986年合并到武钢的武汉市原冶金企业）。它紧靠长江和京广铁路，水陆运输便利。武钢从1955年开工兴建，截至1988年底，建设总投资为95亿

元，设备总重量为45万吨，厂房建筑面积为219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62亿元。全公司有二级厂矿单位57个，职工12万多人（不包含市区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大型钢铁基地。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发展钢铁工业，并改善工业布局，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就开始酝酿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建立一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并邀请中外专家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和研究。从1952年起，新基地的资源勘探、资料搜集、厂址选择等项工作相继展开，有关人员前后选点23处，最终于1954年选定武汉市青山区一带为武汉钢铁公司的厂址。

武钢的第一期工程建设，于1955年8月开始施工。这是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由前苏联帮助设计并提供主要设备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第一期建设工程按年产150万吨钢的规模设计，其主要装备有：4座65孔焦炉，4台75平方米烧结机，2座高炉（容积分别为1386立方米和1436立方米），2座250吨和4座500吨平炉，此外还有初轧机、大型轧机和中厚板轧机各一台。创业初期，缺乏现代化的施工机械，施工条件比较困难，而建设工程量浩大，土石方就要挖5 202万立方米，设备安装量达13.10万吨，任务十分艰巨。但是，从全国汇集到武钢的各路建设大军，克服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紧张战斗，确保工程项目的工期和质量。武钢一期工程，由于准备工作充分，炼铁、炼钢工程建设于1960年提前完成，质量达到标准。但是，由于当时片面强调高速度以及对外关系上的原因，某些基建程度被打乱，一期工程中的轧板厂等项目未能如期建成，二期工程的3号高炉和6号平炉匆忙上马，造成钢锭无法轧钢，生产体系不能成龙配套。

新基地建设初其规模之后，武钢进入一面生产一面继续扩建的阶段。1958年9月13日，1号高炉出铁，标志着武钢正式投入生产。毛泽东专程到武钢，观看了1号高炉流出的第一炉铁水。并指示武钢职工再接再厉，把武钢办成大型综合性的联合企业。1959年，2号高炉、1号子炉、2号平炉、2号平炉先后投产，职工积极性高涨，生产发展较为顺利。但是，在“大跃进”中，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使企业工作陷入被动。1962年，武钢贯彻调整方针和《工业七十条》，生产建设出现了转机。由于抓了管理，生产稳步上升。1963年武钢结束了长期亏损的局面，开始盈利。1964年之后，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明显提高，钢锭合格率达到了98.5%的历史最好水平。1965年，武钢开始以形成200万吨钢综合生产能力配套扩建，主要设备和工程项目有7座平炉（2座250吨，5座500吨）和3座高炉（1座为1386立方米，1座为1436立方米，1座为1513立方米），还有程潮、金山店等矿山。原计划三年内建成，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致使扩建工程拖延了近十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使武钢的生产也遭到严重的损失，据推算，武钢损失钢400万吨，铁400万吨，钢材320吨，折合产值50亿元，利润17亿元。

1.7米轧机工程是毛泽东、周恩来于1972年6月8日批准引进并建在武钢的。这项工程包括引进的“三厂一车间”4个主体工程和相应的辅助设施，共计143个项目。其中热轧带钢厂和硅钢片厂的成套设备由日本引进；冷轧薄板厂和连铸车间（属第二炼钢厂）的成套设备由联邦德国引进。工程建设总投资为39.7亿元，其中引进设备费用为6

亿美元。1.7米轧机是70年代世界先进技术，具有大型化、高速化、连续化和自动化的特点，主要生产作业线分别由电子计算机、信号装置、仪表和工业电视进行自动控制，热轧连续轧钢机最高轧制速度为23.3米/秒，冷轧最高轧制速度为31米/秒。1974年9月，1.7米轧机工程破土动工，建设的高峰阶段，现场施工队伍达10万多人。这项工程规模巨大，挖掘土方总量达3519万立方米，浇灌混凝土169.6万立方米，安装设备11.64万吨，工业建筑达91.4万平方米，大体相当于武钢过去二十年建设工作量的总和。经过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努力，在联邦德国、日本专家的帮助下，在全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于1978年四季度基本建成，仅用了四年时间，是中国冶金工业建设史上的一个壮举。1.7米轧机工程的兴建和投产，不仅给武钢的生产增添了活力，而且也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1.7米轧机投产后，武钢的产品结构大大改变，品种逐渐增多，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从1980～1986年，1.7米轧机轧制的钢材由年产83万吨上升到307万吨，每年平均增长24.32%，其中薄板由年产50万吨上升到165.7万吨，每年平均增长22.07%。武钢1.7米轧机生产的钢材占公司全部钢材的比例，由1980的44.7%上升到1986年的75.99%。这些短线产品的增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轻工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还使国家减少了进口，节约了外汇。热轧、冷轧、硅钢的合格率和成材率，均达到了设计指标。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还开发了一些新品种，如热轧的A高、10钛、09铜磷稀土，冷轧的合金镀锌板、低铬纯化锡板等等。这些产品，国内外市场都很需要。1.7米轧机投产后，武钢每年利润递增1亿元以上。对1.7米轧机引进技术，国家有关部门和武钢做了许多消化和移植工作。在投产后的五年中，武钢对1.7米轧机系统引进的全部专利和技术诀窍，组织了大量的消化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热轧厂工程师与工人一道，针对日本提供的数学模型只能轧制日本生产的钢坯，而轧制武钢自产钢坯命中率低的问题，反复进行了研究和试验，修改了数学模型，采取新的工艺，终于解决了轧制国产钢坯的重大技术难题。

1971年中央提出了武钢形成钢铁年产各400万吨能力的设想，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直未能实现。1981年，国务院批准武钢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并拨款1亿元，武钢自筹资金6.4亿元，共计7.4亿元用于“双400”改造和1.7米轧机工程收尾配套。这样，才使武钢有条件在“六五”计划期间实现钢铁各400万吨的生产能力。

“六五”计划刚开始的头两年，由于武钢建设一直不配套，管理跟不上，因而面临不少困难，工作和生产比较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湖北省和冶金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到武钢帮助工作。学习首钢经验，实行“三个百分之百”（即制度规程必须百分之分地执行，违反制度规程必须百分之百地登记，百分之百地进行处理）的严格考核。接着建立以经济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开展基础工作的全面整顿。1984年进一步发展以各种承包形式为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1985年提出以方针目标管理为中心，以承包经济责任制为基础，建立专业系统管理。1986年下半年，公司抓了“三全一化”（即全面质量管理、全员设备管理、全员安全管理，管理和作业标准化），使基础管理工作不断深化和提高。在抓整顿的基础上，武钢积极进行了5项内部改革：一是改革领导

体制。公司和二级厂矿单位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后，从1985年开始，普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二是改革人事制度。1984年，武钢开始对干部实行分级管理，把科级干部的任免、审批权限下放到二级厂矿，并对干部实行任期制。在干部选拔上，采取公开招聘、群众推荐、民主选举等方式，广开才路。三是改革劳动制度。从1984年开始，逐步试行多种用工制度，对新招的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对井下等艰苦岗位的工人试行轮换制，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职工，厂矿可以酌情除名或辞退。四是改革分配制度。实行以承包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制，联产计奖，实行部分工资、奖金浮动和百元产值工资或奖金包干，实行职务工资和工人岗位工资。五是扩大厂矿自主权。公司逐步放宽二级厂矿的机构设置、职工晋级、对外承包等权限，调动了基层的积极性。

武钢在“六五”计划期间的生产建设有较大发展。1985年，钢铁年产达到了双400万吨的目标。1986年，1.7米轧机全面超过设计能力。从1981～1985年，全公司的钢产量每年平均增长7.45%，钢材每年平均增长12.36%。全公司产品质量稳步提高，1980年全公司的产品优质率为6%，1985年提高到62.5%。在80项可比经济技术指标中，有半数以上创全国同行业的一流水平（即列一、二、三名）。从1985年3月以来，二炼钢厂的连铸比一直保持100%，实现了全连铸，创国际先进水平。“六五”计划期间，武钢实现利税40.5亿元，五年超计划增利8.2亿元。1993年10月，武钢集团成立。它是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为核心企业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

从1958年投产至1988年，武钢累计生产生铁6329万吨、钢5381万吨、钢材3680万吨，其中1.7米轧机生产的钢材占1238万吨。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3.79亿元，产钢474万吨、产铁450万吨、成品钢材406.88万吨，实现利税17.85亿元。产品行销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十几种产品外销出口。其中焦炭、生铁、大中型钢材曾先后外销到前苏联、罗马尼亚、朝鲜等10多个国家，并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提供高铜重轨20多万吨，辅轨2000多千米。1.7米轧机生产的热轧带钢、冷轧薄板、镀锌板、镀锡板、冷轧硅钢片等产品还进入了国际市场。1993年各项指标均有提高，工业总产值达40.88亿元，产钢523.96万吨，产铁545.07万吨，成品钢材462.17万吨，实现利税31.78亿元，年末职工人数为139 393人。

31. 吉林铁合金厂

吉林铁合金厂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始建于1953年，1956年建成投产，是我国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厂家，为冶金工业部铁合金技术开发中心和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吉林铁合金分公司所在地。1986年7月，以吉林铁合金厂为主体的哈达铁合金集团成立，目前有成员厂9家。

建厂以来，经过改造和扩建，工厂生产规模有很大发展，生产技术、管理水平显著提高，现已成为兼有工厂设计、设备制造、科研试制、情报咨询和技术服务能力的铁合金生产厂家，先后荣获了吉林省六好企业、冶金部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全国管理优秀企业、国家一级计量单位、全国经济效益先进单位、全国“六五”技术进步全优奖、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国家级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

吉林铁合金厂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有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合金化学成分稳定，杂

质含量低微，物理状态洁净美观，产品的企业标准和实物质量被国家认证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深受国内外用户的欢迎。产品供应全国各大钢铁公司、特殊钢厂和机器制造业，部分产品出口罗马尼亚、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荷兰、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全厂10种主要产品全部评为优质品。其中：钼铁、75%硅铁、激炭铬铁、硅锰合金荣获国家银质奖；高炭铬铁、硅铝合金、中低碳铬铁、高炭钙铁、中低炭锰铁、钨铁评为冶金部优质产品。此外，工厂还生产真空铬铁、钢铁、氯化锰铁、氮化硅铁、钛铁、工业硅、含锡硅铁和多种复合合金及氧化钙粉剂、硅钙粉剂、硫化铝粉剂等产品，并可根据用户要求生产特殊产品，研制开发新产品。

吉林铁合金厂，1990年生产能力达32万吨，逐步建成中型铁合金厂整套设计、大型铁合金电炉整套机械设备、自动控制设备、部分电气设备、设计制造和安装基地；建成全国铁合金技术开发、经济开发、业务咨询和情报科研中心；建成以铁合金为依托的跨行业的现代化冶金企业。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57608万元；工业净产值1225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4617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11218万元；产品销售收入47549万元；年末职工人数7702人；全员劳动生产率47057元/人·年。

第四节 有色金属工业

32. 会泽铅锌矿

会泽铅锌矿位于云南省会泽县者海镇。矿区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系，山脉走向北东，矿区东面为牛栏江峡谷切割，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海拔1570~2800米。矿区主要矿山是：矿山厂（氧化铅锌矿石基地）；麒麟厂（硫化铅锌矿石基地）。矿区交通比较方便，以石咀（距矿部一公里）为中心，东连川滇公路干线及贵昆铁路宣威站；南经雨碌、功山可至昆明；西通会泽、东川；北达鲁甸、昭通。会泽矿山厂自明代开发至1949年，土法生产几百年，其间官办、官督民办、官商合办等经营方式交替出现。明、清时期产量现无资料可考，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共生产净铅5668.5吨，蒸馏锌3844.7吨。

会泽铅锌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开始建设、发展起来的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至1990年已形成年产铅锌3.5万吨，锗产品含锗10000公斤，工业硫酸2.4万吨的采、选、冶综合生产能力，现有19个产品，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锗生产和出口基地，全国有色金属行业中，生产经营规模最大50家企业之一。

建矿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65年）是艰苦创业的阶段。1950年2月，据云南省工业厅派员到矿山厂调查，当时矿山厂全部用土法采、炼，设备很简单，仅有一台柴油机，一台汽车引擎，一台手摇钻，一台压风机，都废置未用……土炉大部已坏……工人大多数回家

务农，只有职工32人。1950年4月，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部派军事代表接管滇北矿务局保管处矿山厂。接管后，边剿灭土匪，维护矿区治安；边恢复土法生产，维持矿区附近亦工亦农的群众生活。1951年1月5日成立会泽铅锌矿，直属云南省工业厅领导，逐步建立管理机构，继续发展土法生产。同年10月，报请云南省工业厅修建矿山厂至长麦地公路（称铅锌公路），与川滇公路连接。1952年10月，会泽铅锌矿改属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领导。1953年8月，第一座日处理60吨原矿，炉床面积1.4平方米的半水套开顶式炼铅鼓风炉投产，成为云南省采用鼓风炉炼铅的开端。

1953年11月，中央有色局西南分局地质勘探公司302地质勘探队成立，对会泽铅锌矿矿区开展地质找矿和勘探工作。1954年5月，苏联专家技术援助组布希科夫、斯切尔金等专家一行6人首次到矿，对矿区地质勘探、矿山开拓、采矿及冶炼等技术问题提出建议。根据苏联专家建议，于1954年5月10日停止土法炼铅，结束了矿区延续五百多年土法炼铅历史。专家认为会泽矿山厂是一个大型铅锌矿床，应集中力量，探明地质储量。据此，中央有色局从全国各地（主要是东北）调集钻探机45台云集矿山厂，高峰时期同时开动40台钻机。当时铅锌公路尚未全线通车，数百吨勘探器材，分别运到黄梨树和会泽城后，化整为零，用小木船、畜力车，人扛马驮，翻山越岭运抵现场。大批勘探职工到矿，生活设施一时跟不上，在滴水成冰的严冬，仍住简易工棚，凭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中共会泽铅锌矿委员会的领导下，克服工作、生活上的重重困难，于1956年2月提前9个月提交了《会泽铅锌矿储量计算报告书》（第一期）。同年9月，冶金工业部决定会泽铅锌矿改为会泽矿务局。由于苏联和国内科研单位对矿山厂氧化铅锌矿石进行的可选性试验的结论是：回收率低，药剂单耗高，为“难选矿石”。1957年2月冶金工业部决定：“会泽矿务局选矿技术问题一时不能解决，基本建设尚不能进行……撤销会泽矿务局，成立会泽矿务局筹备处”，这是会泽矿务局第一次“下马”。

1958年3月，由苏联莫斯科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的烟化炉试验工厂在会泽矿务局建成。矿务局党委决定成立烟化炉试验车间，由局党委副书记任试验车间主任兼支部书记，调集全局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共214人，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技术工作组指导下进行试验。5月1日开始，7月13日结束，这是国内首次用烟化炉挥发富集铅锌的工业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解决了氧化铅锌矿难选的问题，并填补了我国烟化炉冶炼技术的空白，会泽矿务局的基本建设随之全面展开，从而第二次“上马”。1959年，为“大炼钢铁”，其他项目纷纷“下马让路”，同年4月冶金工业部决定：会泽矿务局停止基本建设，第二次“下马”。

烟化炉试验过程中，发现矿石中的稀散金属锗也随铅锌挥发富集于烟尘，烟尘含锗0.025%～0.03%，富集比6～8倍。1958年6月，会津矿务局化验室科技人员用化验锗的方法（重量法）从烟尘中提取了金属锗0.3克，7月1日向中共建党37周年献礼。当年共提取金属锗74.5克，是我国从铅锌矿石中提取锗的先驱。矿务局党委在执行冶金工业部“停止基本建设”决定的同时，针对国家急需半导体材料锗，决定在烟化炉试验车间的基础上成立试验炼厂，以锗为主，综合回收铅锌。当时，建厂房缺砖瓦，搞生产

无设备，必不可少的硫酸，省内无货源，也无运力从省外运来。面对重重困难，全局职工不畏艰险，知难而进，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因陋就简，建“干打垒”的厂房；用手工自制提锗设备和蒸汽锅炉；自建硫酸车间，用雨碌黄铁矿生产硫酸；自建燃料车间，开硐挖煤供烟化炉吹炼。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国第一个从铅锌矿石中提取锗的工厂诞生了。生产能力为年产锗精矿含锗 300 千克，1960 年投产，当年产锗精矿含锗 139.11 千克。

国家极为重视会泽锗小批量生产成功，1960 年 12 月会泽矿务局迎来了第三次“上马”。这是会泽矿务局建设历程中最关键的转折，也是全国以伴生有益元素带动主金属“上马”建设的第一个企业。1965 年会泽矿务局冶炼厂建成投产。

第二阶段（1966～1977 年）是“大动乱”的岁月。“文化大革命”在会泽矿区始于 1966 年秋，由于多种因素形成的滞后现象，会泽铅锌矿 1966 年基本上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当年产粗铅 3336 吨，电锌 3656 吨，还原锗 2414 千克，实现利润 506 万元。同年 11 月 27 日会泽铅锌矿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成立，随后生产被迫半停产或停产。1967～1977 年的十一年间，年平均产粗铅 1700 吨，电锌 3030 吨，还原锗 1 623 千克，均低于投产后第一年（1966 年）的水平，十一年累计亏损 3770.88 万元，上缴税金 942.47 万元，税利相抵尚亏 2888.41 万元。“大动乱”的岁月里，会泽铅锌矿的广大职工，特别是科技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在完善工艺技术和改进生产设备等方面，迈着艰辛的步履进行探索并获得可喜的成果。“铅、锌、锗生产工艺的革新与改造”和“湿法冶炼中离子交换除氟氯工艺”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奖状。1977 年 10 月，湿法炼锌空气氧化代替高锰酸钾氧化应用于生产后，每吨锌片的高锰酸钾单耗由 15 千克降为 2 千克，每年可节约 60 万元。展示了科技人员社会主义觉悟所转化的抗风暴顶逆流的巨大力量。

第三阶段（1978～1990 年）是改革开放的年代。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会泽铅锌矿经过“拨乱反正”，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1978 年铅锌产量突破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当年盈利 279 万元，扭转了连续七年亏损的被动局面。冶金部 1977 年批准会泽铅锌矿年产铅锌 1.7 万吨基本建设填平补齐规划，1799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经济调整中决定：会泽铅锌矿基本建设销号，不再投资。在此情况下，会泽铅锌矿并未停步不前，而是通过重点技术措施和银行贷款继续建设，使生产持续发展。1982 年铅锌产量超过 1.5 万吨，1984 年提高到 1.7 万吨，1985 年达 1.8 万吨，当年实现利润 920 万元，再创历史最好水平。

在中央有关部、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和中国银行昆明分行的支持下，会泽铅锌矿利用外汇贷款，自借自还，开发建设麒麟厂硫化铅锌矿工程。经过五年准备，1985 年 1 月开工，历时三年，1987 年基本建成，总投资 8215 万元。1988 年试生产，产品符合设计要求，当年创工业产值（1980 年不变价）1 442.3 万元，产品销售收入 3422 万元，实现税利总额 600.31 万元。1989 年在完善工艺的基础上，创工业产值 30878 万元，产品销售收入 7554.3 万元，实现税利 2141.79 万元。1990 年再创工业产值 3224.1 万元，产品销售收入 8323.34 万元，实现税利 1998.70 万元。截至 1990 年已偿还

贷款5349.46万元。麒麟厂硫化铅锌矿工程建成投产，进一步增强了会泽铅锌矿的实力。1990年铅锌产量达到31742吨，工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8022.97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8083.9万元，实现税利4000万元。会泽铅锌矿已形成氧化铅锌矿和硫化铅锌矿两个生产系列，采矿、选矿、冶炼、硫酸工艺配套，具有年产铅锌3.5万吨、锗产品含锗10000公斤、工业硫酸2.4万吨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1982年2月，开始以改善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全面企业整顿。通过企业整顿，经济责任制逐步完善、落实；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得到加强，提高了各项专业管理水平；矿和车间两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下降，文化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提高，结构趋于合理。同时，通过试点，1985年全矿推行以“定产联利，综合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的内部经济责任制，获得了显著成效。当年产品产量、上缴税金、实现利润、劳动生产率、锌冶炼总回收率、锌电解电流效率、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和万元产值能耗等技术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1986年，推行矿长负责制和矿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矿内进行干部制度改革，逐步破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聘任（委任）制和专业技术职称（职务）评聘制。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和实施《企业法》后，以矿长为中心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党委的政治核心地位和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完善。1988年，会泽铅锌矿与云南省冶金工业厅签订了三年（1988～1990年）承包经营责任合同，使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目标迈进了一步。1988年底，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1990年末全矿职工共交纳风险金406万元，进一步增强了全矿职工的风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七五”期间，矿内开展了“达标升级”活动，将国家考核企业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结合各基层单位的工艺特点进行分解，制订分档次的“内部升级标准”和“升级基础条件”，每年年末考核，考核结果与单位的工资总额挂钩，成效显著。1990年8月，会泽铅锌矿获云南省“省级先进企业”称号。

1990年职工人均年收入3 353.75元。会泽铅锌矿所在地已形成生活服务网点齐全、教育文化机构配套、医疗卫生设施完善、农贸市场活跃，对外交通方便、社会秩序安定的欣欣向荣的矿区集镇。

33. 东川矿务局

东川矿务局为大型的铜矿山采选联合企业，最终产品是铜精矿。

东川铜矿床资源的开采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云南通志》记载，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后汉时期（公元83～171年）就已开发，而且冶炼、铸造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16世纪中叶以后的明末清初，东川铜业进入初盛时期，年平均产粗铜约3000吨；在乾隆三年到咸丰八年（公元1738～1858年）为鼎盛时期，年平均产粗铜达6000吨左右，尔后逐渐衰退，到1949年，粗铜的年产量仅20吨了。

解放后，东川铜矿获得新生，被国家列为“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重工业部在1952年组织301地质勘探队，并在第二年成立了东川矿务局，在苏联专家的支援帮助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探，截止1989年累计投入地质勘探事业费10294万元，掘探矿坑道263.4公里，打钻探工程量26.12万米，精探工程量48.64万立方米，取样

化验16.8万个。期间共发现矿点143个，其中汤丹、因民、落雪、石将军、滥泥坪、白锡腊、新塘和一、四棵树等8个矿区作了重点勘探，于1955年、1956年两次提交了地质勘探报告书，为国家储委审批认可。至1990年，累计探明铜金属储量350万吨，其中：表内281万吨，表外69万吨。在勘探铜金属的同时，还探获有铁矿5000吨（平均品位34%）；伴生银1480吨，金21吨，锗110吨，镓164吨和钴220吨。

1958年开始基本建设，到1977年先后建成因民、滥泥坪、落雪、汤丹马柱硐4个采选厂和相应的机修、汽修、供电、运输、科研、物资储运；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辅助设施，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986亿元。从1979年开始到1989年底又投入维持简单再生产资金2.3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4.015亿元，净值2.3亿元；建成8个选矿系统。设计选矿生产能力为日处理矿石13300吨，矿山采出矿生产能力为日采出矿石12900吨，年生产精矿含铜量28450吨的规模。由于1960年投产时为简易投产，各生产矿段的建成时间不一，并由于生产三十年了，资源逐步消失，其矿山采出矿能力日益萎缩，经过多次核定都不能达到设计能力。1986年全国第二次工业普查核定为7300吨/日，年产精矿含铜15866吨。

截止1989年底，累计生产精矿含铅30万吨，付产精矿合银量95吨，共消耗地质储量45万吨；累计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不变价计算13.24亿元；累计采出矿石量4470万吨，矿山掘进量117.37万米，剥离土石方455万立方米。

表1　　东川矿务局矿山生产能力变化表

生产能力 / 项目	单位	设计能力	1977年核定能力	1981年核定能力	1986年核定能力	选矿设计能力
采出矿能力	吨/日	12900	11500	8900	7300	13300
出矿品位	%	0.847	0.829	0.788	0.782	
原矿含铜量	吨/年	3671	31642	23144	18846	
精矿含铜量	吨/年	28450	25782	19244	15866	

东川矿务局生产经营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60~1966年）为青年期。在本期内，由于矿山建设程度不足，简易投产，遗留问题很多，生产难以正常，后经过基本建设填平补齐，到1965年生产经营状况才有所好转，产量大幅度上升，并由亏损转为盈利。第二个时期（1967~1978年）属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虽经全局职工艰苦努力，在产品、产量、质量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有所上升及提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下，生产秩序极不正常，产值、产品产量随政治经济形势大起大落，生产两次濒临停产状态，亏损猛增。本期内共亏损8762万元，年平均亏损730多万元，使全局亏损总额突破亿元大关，高达11715万元。第三个时期（1979~1989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东川矿务局大力整顿生产秩序，推行企业内部经济承包责任制，使产量跨上年产精矿含铜15000吨大关，实现了扭亏为盈，整个阶段内消灭了亏损年份，并出现了逐步上升的好势头。从1978年亏损748万

元，1979年盈利48.5万元到1983年盈利384.4万元，共盈利1461.32万元。1984～1989年，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东川矿务局制订了“以铜为主，多种经营，联合开发，搞活矿山”的生产经营方针，1985年以来，产品产量，质量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年产精矿含铜量跃上了16000吨的台阶。与第一个时期比较，产量由年均生产4301吨上升到16211吨，提高3.77倍；选矿回收率由75.59%上升到84.43%，平均提高8.84个百分点；精矿品位由14.36%上升到24.89%，提高10.53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也相应地提高1.9倍：成为东川矿务局生产经营的最佳时期。但是，这个阶段，原建设的生产矿段的资源逐年消失，国家没有投人建设新矿段的资金，自有资金又十分短缺，生产能力得不到补充而日趋萎缩，且长期受产品经济的束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国家政策又由上交利润改为上交税金，企业实难承受外部条件剧烈变化带来的压力，东川矿务局又由盈利转为亏损。其主要原因是产品价格几十年不变，而各类原材料、燃料、动力和设备及备品备件的价格却成倍上升，加之指令性计划过重，占总产量的73.3%（在1987年前，全部为指令性计划，按国家统配价交云南冶炼厂），形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局面，因而造成东川矿务局亏损总额达11811.55万元。1998年，由于国家价格政策有所松动，对铜精矿含铜价格在国家统配价的基础上实行上浮23%的云南省定价，使东川矿务局的生产经营效果有所转机，从1987年亏损1 307万元变为盈利110万元，1989年盈利上升到829万元。

东川矿务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现有持续工程不足以弥补消失的生产能力，生产逐年萎缩。东川矿务局是一个生产三十年的老矿山，已经进入晚期开采，生产能力不断消失，产量日益萎缩，至1989年底，全局原有16个生产矿段，生产能力已全部消失的有6个，部分消失的两个。到1990年保有的生产能力仅有4700吨/日，原铜10913吨，实际年产精矿含铜只有9200吨，根据规划计算，有矿段的生产能力还将继续下降，1995年的精矿含铜产量将下降到6620吨，到2000年则只有1600吨的能力了。为了保住东川矿务局现有产量，从1987年开始筹划建设六项持续接替工程，在之后五年内必须建成投产。六项工程可增加持续能力5800吨/日，精矿含铜13553吨/年，这样，全局产量大体可维持在现有水平上，但到1997年后产量仍将大幅度下降。这样的年产量与东川矿务区丰富的铜矿资源是不相称的，也不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为此亟待对汤丹资源进行开发，这是保持东川铜生产的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解决东川矿务局生产能力日趋萎缩的关键途径。

（2）资金短缺、紧张。①自提更改资金不能弥补建设持续接替工程的投入。东川矿务局每年可提技改资金2000万元左右，在上交两金（国家重点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后，可使用的部分只有1542万元，45%用于接替工程建设，五年只能自筹资金3084万元；按现行政策实行保量限价3000吨，每年可筹集资金1050万元，五年为5250万元；每年上级给以维简补贴250万元，五年1250万元，合计可筹集9584万元。而六项持续工程需资金14907万元，减去已投人的之后尚缺口5000万元。加上开发汤丹矿资源，按分期建设的方案预测，减出自筹部分外，还缺口1亿元，总计缺口资金1.5亿元，由于东川矿务局长期经济效益差，没有建立生产发展基金，因此，没有别

的资金来源。②流动资金极其困难紧张。进入1990年后银行贷款达3173万元，7月末达到3590万元，到11月底突破4000万元，而资金支付仍然感到很紧张。其主要原因是：首先，国家自1988年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企业与原来预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所需要的资金相比感到紧张；第二，各种生产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一涨再涨，加重了企业资金的需求总量。1990年比1989年，接到国家调价文件的就有钢材、煤焦、炸药等等，上涨幅度都大于23%。具体见表2。第三，贷款长期被云冶拖欠。到目前，云冶拖欠15007/元，有色总公司占用调剂使用1450万元，致使东川矿务局的正常结算无法支付。拖欠外单位及应缴的各种税金2000余万元，只好采取一保工资，二保材料，三保电费的支付办法，银行贷款有增无减，贷款利息支出比去年预计增加50%～60%。

表2　　东川矿务局原材料、燃料、动力、运力价值上涨统计表

品名	单位	单价平均上涨金额	总计上涨金额（万元）
1. 电	元/千瓦时	0.025	375
2. 运力			161.5
其中：公路	元/吨公里	0.14	149.5
铁路	元/百吨公里	2.40	12.0
3. 物质	元/吨		316.6
4. 燃料	元/吨	71.68	50.75
合计			903.85

(3) 经济经济效益差，职工队伍难以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扭亏为盈，但是由于资源丰度差，长期全部承担指令性计划（1987年以前全部产品为指令性计划，1988年及其以后指令性计划占了73.3%）。价格背离价值，加上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过大，致使生产成本上升幅度也大。带来企业的经济效益差。

①沉重的社会负担，由于东川矿务局地处高寒山区，无城镇作为依托，企业办社会的现象突出，每年支付737万元。A. 医院：全局医护人员657人，年支付费用227.2万元；B. 法庭、公安、共有145人，年支付费用45.8万元；C. 煤厂：共有煤厂9个支付煤贴70万元；D. 学校：共有中学6所、小学15所、技校1所，具有教职员工866人，学生7654人，电大1所，年支付314.5万元；E. 维护铁路、公路：每年支付80万元左右；F. 治理泥石流等：每年支付120万元左右。

②由个经济效益差，企业盈利水平低，奖金和福利都很差；职工收入水平是有色昆明公司系统中最低的一家，与东川矿务局所处的艰苦环境极不相称，因而带来了职工队伍的严重不稳，特别是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和特种技术工人。七年中共调出专业技术干部920人，占技术人员总数的31.15%；另有39人采取三不要（不要户口、党团介绍信、调出介绍信）跑到其他单位工作。这严重削弱了东川矿务局职工队伍的技术素质，加之这些年来分配到局的大中专学生少，致使年龄和专业组成结构更不合理，技术干部

队伍严重青黄不接。见表3。

表3

项目	单位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当年调出数	人	221	446	478	438	484	411	332
其中：干部	人	187	128	164	161	128	141	111
专业技术干部	人	78	106	145	142	113	124	106
所占比例	%	89.7	82.8	88	88.2	88.3	87.9	95.5
技术工人	人	134	318	314	277	356	270	221

③设备陈旧老化，生产效率难已提高。东川矿务局现有设备5539台（套），绝大部分都是些高耗能、笨重等五六十年代的产品属三四十年代的技术，解放前生产的占3%，50年代生产的占27%，60年代生产的占62%，七八十年代生产的仅占8%。这些设备急待更新，如东川矿务局原有的汽车，绝大部分都是解放CA10和CA10B型，现在国家决定在1974年以前购置的要一律强制报废，共需资金约800万元，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也是难以办到的。

④自然灾害严重，职工生活水平低。东川矿务局地处泥石流多发地区，每年都要支出120万~150万元的费用作为泥石流工程治理。1984年5月因民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121人，损失1000余万元，直接损失542万元，是影响东川矿务局正常生产和工作的因素之一。据统计，1990年全局职工月平均生活费低于45元的家庭有5 304户，占全局总户数的2/5，其中，最低的仅为16.4元/人月；1980年以前退休的职工生活水平更低，每月生活费在35元以下的占离退休总人数的34.7%，最低的只有10元/月人。在住房和文娱生活上也是低水平；全局职工平均住宅面积按建筑面积计算仅6.7平方米/人，还有1040户职工是住在五六十年代建成的干打垒和简易住房和危房中（全局共有259幢，约26万平方米的危房）。

⑤地方与中央企业的关系协调难。近些年来，东川矿务局与东川市人民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部分工作难以开展，例如：农民在东川矿务局生产矿段中乱挖矿石和生产采场放炮后抢拣富矿，严重干扰了正常生产，对安全生产造成威胁；矿区农民阻止企业为持续生产而新开的工作面和原生产矿段的正常出矿、出碴；东川市从1986年以来，每年要东川矿务局按国拨统配价供给市冶炼厂500吨精矿含铜，造成东川矿务局经济损失每年达407万元；修复为泥石流冲毁的铁路60万元左右和公路约20万~30万元，长期治理泥石流每年支出45万~50万元，等等，这些都加重了东川矿务局的经济负担。

34.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白银公司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直属企业，地处甘肃省中部、兰州市以北90公里处的白银市，是新中国首批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大型铜生产基地。1951年开始勘探，1954年9月正式建厂，1956年开始大规模建设，1959年矿山投产，1960年6月14

日炼出第一炉铜。截止1987年底，累计生产电解铜81.88万吨，黄金10687公斤，白银390吨，硫酸342万吨，硫铁精矿3024万吨，氰化盐和选矿药剂35.7万吨，上缴利润和税金30.3亿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经三十多个寒暑春秋，白银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加工、科研以及化工生产的特大型联合企业，主要产品及其年生产能力为：电解铜4万吨；电解铅、精馏锌3万吨；硫酸37.5万吨；氟化盐（冰晶石、氟化铝）、选矿药剂2万多吨；铜、铅、锌、镍及其合金的板、带、箔、管、棒、线、型等有色金属加工材5.65万吨；以及黄金白银、精硒、硫酸铜、硫铁精矿、贵金属、机械加工动力运输等都有相当的规模。有55种产品被评为省部级优质产品，其中冰晶石、精硒、纯铝板、H62拉杆天线套管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产品畅销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冰晶石、氰化铝、乙基黄药异丁基黄药等还远销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外享有良好的声誉。

该公司有雄厚的科研力量和在生产技术上的实际应用。近十年，该公司取得较重大的科技成果110项，其中获国家发明二等奖的1项，获甘肃省科技成果奖的17项，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成果奖的12项。著名的“白银炼铜法”是公司独创的一种熔池熔炼新技术，代表了火法炼铜的方向。这项成果已作为专利、向国外进行技术转让。在矿山开采上创造了独具特色“扩帮延深”、“短沟横向采矿”等采矿方法，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目前，该公司已进入甘肃省一级企业行列，并被评为国家一级计量单位。

1986年后，白银公司加紧建设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年产15万吨铅锌的西北铅锌冶炼厂、年产10万吨铝的白银铝厂（一期5万吨）和日采选1000吨的厂坝铅锌矿，总投资达12亿元，于1989年建成投产。1990年，该公司的有色金属生产能力可达到27万吨，硫酸产量45万吨；1995年，有色金属将达到32万~34万吨。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47873万元；工业净产值15012万元；固定资产净值57399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21319万元；产品销售收入47619万元；年末职工人数31246人；全员劳动生产率18458元/人·年。

35. 抚顺铝厂

抚顺铝厂始建于1936年，是中国铝工业的发源地，也是镁、硅、钛等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该厂位于辽宁省抚/顷市西部，全厂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厂区内占地面积73万平方米，共有职工10400人。设备总重量为3.3万吨，有各类专业人员2000多人，其中中级技术职称的500多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100多人。该厂人才济济、技术力量雄厚，从1954年恢复生产以来，共完成了2600多项科研课题，其中有43项填补了国内空白。11项赶超了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科研基础和试验基地。

该厂主要以生产铝、镁、硅、钛为主，还生产与铝冶炼相匹配的阳极糊、预焙石墨块、氟化铝、冰晶石等产品，并生产和研制精铝、高纯铝、高纯镁、高纯钛、高纯银、高纯钙等几十种高纯产品。20世纪80年代，企业优化了产品结构，深化了产品的深部

加工，使铸造铝合金、变型铝合金、铝型材、铝带卷等一大批新产品脱颖而出，使抚顺铝厂成为新老产品结合，生产和加工结合的新型企业。

抚顺铝厂生产的铝、镁、硅、钛、冰晶石等产品均为国家优质产品，分别获得国家金质奖和银质奖，还有6063铝合金、镁合金牺牲阳极等18种产品获省、部优质产品，这些产品不但畅销国内，还远销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46200万元；工业净产值1367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5027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4820万元；产品销售收入42250万元；年末职工人数11454人；全员劳动生产率2855元/人·年。

36. 株洲硬质合金厂

株洲硬质合金厂于1954年3月筹建，1958年建成投产，曾用过长江冶炼厂、601厂等厂名。厂区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1987年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4216万元，年末职工人数7528人，其中大中专毕业生1938人，专业技术人员2178人。全厂设有6个分厂、7个行政部室和党委工作部、厂工会。该厂主要生产“钻石牌”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稀有金属产品，是我国最大的硬质合金生产企业和出口基地企业，也是世界五大硬质合金厂家之一。

到1987年止，该厂累计生产硬质含金4.5万多吨，上缴利税14亿多元。硬质合金由原设计的7个牌号、500种型号规格发展到46个牌号、32000多种型号规格，为冶金、机械、地质、煤炭、石油、化工、电子、轻纺以及国防军工部门提供了各种切削工具、拉抻模具、地质矿山以及耐热耐磨耐腐蚀零件等不同用途的产品。1960年，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20世纪80年代，该厂从瑞典引进新的技术装备，建成了一个年产300吨硬质合金生产分厂，该分厂生产的产品达到甚至超过瑞典1984年质量水平。到目前为止，该厂的仲钨酸铵产品获国家金质奖，YT14硬质合金刀片，YT05硬质合金刀片，YT5硬质含金刀片、YG20C硬质合金冷墩模、STQ固体电器钽给、粉冶态铝合金项头、YG拉制模获国家银质奖，还有21项产品获得部优产品称号，32项产品获湖南省优质产品称号，两个系列13种产品获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金龙奖。主要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连续五年保持100%，另外，冶金矿山潜孔钻具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研究，黑钨精矿萃取制取仲钨酸铵、矿用牙轮钻头分别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一、二、三等奖。“六五”期间共开发了90项新产品，满足了国防军工的急需，填补了国内13项空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用户满意率达99.96%。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21386万元；工业净产值7360万元；固定资产净值7368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6483万元；产品销售收入20712万元；年末职工人数7528人；全员劳动生产率24824元/人·年。

第五节 机械工业

37. 第一汽车制造厂

中国的汽车制造工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建设的。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制造厂。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多方案对比，195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设在长春市郊。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毛泽东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题词。

“一五”计划期间，全国人民对中国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的建设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五师全体指战员，华东、中南、吉林、长春各建筑公司的职工齐集施工现场，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高质量高速度地进行了土建安装施工。全国80多家厂矿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10多个工业部门为生产汽车提供了400多种协作产品，70多个工厂为一汽培训生产技术工人。经过三年建设，到1956年7月15日，一汽正式试车投人生产，是当时建设速度快、质量好、投资效果显著的建设项目之一。“一五”计划时期，一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2亿元，基本建设竣工面积75万平方米，工业建筑41.1万平方米，宿舍39.9万平方米。安装了上万台机器，铺设了30多公里长的铁路和8万多米长的管道，制造出2万多套工艺装备，在13个基本生产车间和辅助生产车间，完成了复杂的生产准备，并生产出各种汽车零件，成功地装出了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在此基础上，又试制成功了“红旗”牌高级轿车。为满足国防需要，研制了CA30越野车，并于1958年试生产。一汽的建成，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

经过不断改扩建，到1985年末，一汽累计基本建设投资达12.4亿元，厂址占地面积达1421.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8.2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面积117.4万平方米，生活用建筑面积160.8万平方米。从“二五”计划时期到1985年，主要经过了如下几次扩建。

1962年国家批准在一汽建设越野车生产基地，设计规模为年产越野车3000辆，另加20%备件。自1963年5月开工到1965年第三季度建成，新建面积3.49万平方米，新增工艺及起重设备693台，完成基建投资1981万元。

1973年4月，一汽“红旗”牌轿车厂房扩建工程的扩初设计获得批准。经过两年零五个月的建设，到1975年9月建成投产。总占地面积42.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3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4.6万平方米，是建厂以来较大的一次扩建，建设规模为年产“红旗”牌轿车300辆。至此，结束了中国汽车工业单一品种的历史，在中国汽车型谱上增加了三大系列。

与此同时，又进行了年产6万辆能力的填平补齐基本建设，共投资6727万元。到

1971年，载重汽车的生产能力已达年产6万辆，比原设计翻了一番。

1978年以后，一汽的基本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82～1983年，连续两次改进产品结构，开展了轻型系列产品的研制，发展了各种变型车和专用车。在多次改进汽车结构的基础上，一汽又设计和试制了第二代产品——CA141型载重汽车。1982年通过厂内第二次鉴定，1983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整个换型改造总投资额为3.6亿元，新建工业建筑13.6万平方米，老厂房改建约7万平方米，合计达20万平方米。此外，还有职工宿舍等生活设施48万平方米。新增设备5 788台，老设备搬迁5866台，总计11654台，工装制造21 870种（套）及非标制造近2000台，同时还要改造70%的老设备，整个工程量非常之大，引进项目达21项。

1985年9月，根据国家控制基建的情况，一汽提出“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一次规划、分期实现”，与吉林、长春两市四个地方汽车工业企业实行了横向紧密联合，由“一汽集团”统一规划开发轻型车，并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及为行业配套服务，新建、扩建及技术改造一批专业厂。

三十多年中，在建设一汽生产基地的同时，还建立和逐步完善了一汽汽车研究所的建设，使一汽不仅是全国的汽车生产基地，而且还是全国汽车工业最大的科研实验基地之一。研究所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拥有各种测试、试验、加工设备和各种仪器仪表，是国内第一个具有汽车产品设计、科学研究、制订标准和技术经济分析能力的科研单位。

一汽的建成和发展，带动了吉林省机械工业的发展。在一汽建设的同时或稍后一些时间，国家又相继投资建设了一批大、中型行走机械企业，有铁道部长春客车工厂、吉林柴油机厂、长春拖拉机厂、四平联合收割机厂等。

自建厂以来至1985年止，一汽已累计生产各种汽车126万多辆。1985年底全国社会汽车保有量中，约有43.4%是一汽生产的解放牌汽车，或用解放牌汽车底盘装配的各种专用汽车。

1999年，曾经连续七年汽车产销位居行业之首的一汽集团公司在市场大竞争中绩再次夺魁，生产汽车33.2万辆，销售32.7万辆的成全年实现利润2.5亿元，增幅达到121%。1999年，一汽相继向市场投入47种中重型车（底盘），18种轻型车（底盘），并开发出12个环保型发动机。在轿车方面，他们坚持名牌产品，开放发展，为红旗轿车匹配了日本尼桑发动机，形成了以红旗V6、V8为标志，包括红旗华冠，红旗浪漫之旅、红旗吉星等适用于公务、商务、出租及私家用车的全新系列产品；捷达轿车加快技术创新步伐，率先在全国推出了带自动变速箱、安全气囊的都市先锋轿车；加装三元催化反应器的绿化环保车；捷达前卫二阀车等。而奥迪A6高级轿车的成功下线，又为高档轿车进入市场打开了新的大门。这些新产品的推出不仅提高了一汽的竞争实力，而且形成一连串的市场旺销热点，解放重型系列车全年销售24731辆，同比增长134%，红旗系列轿车全年销售18310辆，同比增长64%；捷达轿车取得了销售增长26%的好成绩，而奥迪轿车销量的增幅达到了35%。与此同时，海外市场开拓取得新进展，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0%多。2002年，面对入世后新的挑战，一汽提出了“创建适应入世要

求的新一汽”的新的奋斗目标；就是观念、管理、素质、成本与资本结构同国际接轨；技术、产品、资金逐步与已经国际化的中国市场相适应。2002年1月份销售了32608辆车，销售收入59.1亿，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38.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是于1993年4月由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辽宁精密仪器厂等国有企业通过定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股份制企业。

在“一五”建设期间，沈阳第一机床厂被定为车床和专门化车床生产厂，列入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项目投资为6113万元，在前苏联援助下进行了全面改建，新建厂房2.87万平方米，改建旧厂房4万平方米，安装配备各类设备2032台，引进和仿制前苏联产品IB65（C650）1000毫米普通车床，建设成为生产400～1000毫米普通车床和专用车床国家重点机床厂，具有多品种大批量生产能力。沈阳第二机床厂（后改为中捷友谊厂）被定为生产孔加工机床，生产钻床和镗床的工厂，也列入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但因情况变化，改由我国自己进行改建和技术改造，并推迟一年，到1958年才开始对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建、项目投资1468万元。沈阳第二机床厂是按照生产50毫米的上转塔六角车床产品发展方向进行改造的，项目投资916万元，改造内容是扩建转塔六角车床生产车间、工具和齿轮车间，增添设备414台。1954年仿制成功IK36（C365L）和IK37（C385L）型转塔车床。1955年在111C车床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试制成功C618K型普通车床。

到1957年底，三家机床厂共有1272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475人；固定资产原值11932万元，净值9107万元，主要生产设备2514台，其中金属切削机床1879台。主要产品有普通车床，转塔六角车床、管子加工车床、立式车床、摇臂钻床和卧式镗床等58个品种，全年机床产量6624台，占全国金切机床总产量的23.7%，其中车床4071台，占车床总量的35.6%；钻床产量1929台，占全国钻床产量的68.2%，镗床产量137台，占全国镗床总量的29.5%；今年完成工业总产值5334万元，实现利润3114万元，三家企业在当时是全国机床行业十八家骨干企业，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水平，产品品种，产量和质量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1958～1979年，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一厂、三厂的机床生产呈现亏损状态，直到1966年才逐步恢复到1957年水平。1972年以后各厂恢复生产管理机构和必要的规章制度，生产初步走上正轨，新产品开发研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普通车床、钻床、镗床、专门化车床全部实现交新换代，开发出CA系列、摇钻、镗床系列等名牌产品，同时开始研制了数控机床机床一厂研制全机能数控车床，机床三厂研制数控转搭车床为主，中捷友谊厂研制数控卧式镗床。

1979～1985年是沈阳机床工业重要发展时期，主要产品有数控车床、数控镗床、铣镗加工中心、普车、转塔车床、立、卧式多轴自动车床，高精度车床、精密丝杠车床、曲轴车床、凸轮轴车床、管子加工机床、活塞环车床、异形仿形车床、液压多刀半自动车床、摇臂钻床、卧式键床、个标镗床、立式多轮机床等共20大类240多个品种。生产管理方面采用电子计算机和成组技术，增强企业对产品的适应能力，为实现现代化管

理创造条件。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使全行业工艺制造水平普遍提高，产品关键零部件的制造水平已由60年代步入80年代水平。在此期间，在党中央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各厂经历生产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开始按照市场需要开发产品和组织生产，调整产品结构，瞄准国外市场大力开发和生产出口创汇产品。

"八五"期间国家和地方对三个厂发展数控机床一条龙项目；给予大力支持；五年间先后投入近5个亿，使数控机床有了飞速发展，开发了数控机床产品50多种，数控机床有了一定的生产批量，在工艺上具备了开发和生产数控机床的能力。"九五"期间，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筹建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争取世界银行贷款，"三改一加强"的方式发展沈阳机床工业，1995年获得世行贷款，进行工业改革项目的实施项目累计投入资金10.15亿元，其中，世行贷款4.7亿元，并于1993年4月由中国享有盛名的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辽宁精密仪器厂等国家骨干企业共同发起，组建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在1994年前的产品结构是，"以普通机床为主导产品，数控机床为辅助产品的产品结构格局"，在产品开发上采取"以老养新"的政策，即以普通机床生产为主，重点开发数控机床。公司从1994～1999年起重点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向以数控为本，普通机床为辅的产品结构方向调整，大力发展数控机床，尤其发展市场需要的高技术含量的数控机床。

公司组建国家级技术中心，承担世行贷款项目中的设计咨询课题，全新设计了7种高技术含量、高水平的数控机床，它们与公司自行开发的数控机床、加工中心一起，共有23台机床在1999年北京国际机床展览会展出，引起了世界机床制造业界的重视。利用世行贷款，技术引进的项目，大多是近期的先进技术，如：激光切割机，高速加工中心率削中心，数控刀架等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引进先进技术思想，派出30多名技术人员到国外培训，先进设计技术，多次邀请国外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培训，扩大了全公司技术人员获得先进的产品设计方法，大大增强了新产品开发力度，公司从1996～1999年共开发新的数控产品45种，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到1999年底，公司"八五"、"九五"技术改造项目累计投资近14亿，使公司的工艺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是于1993年4月由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辽宁精密仪器厂等国有企业通过走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股份制企业。1996年6月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正式在深交所上市发行，发行额度5400万股，股本21582万元，募集资金213847元。1997年通过送配股，公司现在股本为34091万元，其中国家股为54.4%，法人股为5.9%，流通股为39.7%。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完成了内部改组工作，打破了原生产制造事业部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按照"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实行专业化"的原则，重新组建成为7个事业部。其中组建三个装配事业部（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中捷瑶臂钻床厂），两个工艺专业化事业部（银焊件厂、铸造厂）一个零件事业部（齿轮制造厂）、一个专门生产数控系统的事业部。通过改组避免了重复改造，公司朝着规模经营发展。在资本优化方面，采取了"精化主线，放开辅线"对一些企业服务性资产进行剥离，组建四个公司，从事第三产业，

这为公司降低成本，长期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十五"期间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上的主要发展思路是"一个中心，三个重点提高"，即以实现高、中、低档数控机床产业化为中心，重点发展高速、高效、复合化数控机床，提高产品水平；重点提高数控机床批量制造水平，重点提高数控机床批量生产的质量保证能力，实现普及型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规模化生产，把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成为国际知名中国最大的数控机床开发制造基地。数控机床发展总目标是：创20种代表"沈阳机床"形象的数控产品品牌，到2005年实现年产各档数控机床3600台，其中：一是瞄准汽车、摩托、军工等行业的发展需求，实现如激光切割机、高速铁别加工中心、高速卧式加工中心等高档数控机床年产200台；二也是瞄准汽车、摩托、石油、工程机械、船舶、军工等行业的发展需求，实现中档数控机床加TH5940、CKH、SSCK等（普及型）年产600台；三是实现CAK.CKJ数控机床2800台，实现机床产量数控化率52%，产值数控化率88%。产品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目标为：公司计划开发新产品60种，全部为机电一体化产品，可为重点行业服务如汽车、摩托、石油、工程机械、船舶等产品40种，产品水平将达到国际90年代水平。

表4　　沈阳第一机床厂"一五"以来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年份	产量（台）	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1956	2460	4748	1380
1957	3411	5937	1454
1958	6895	12158	3752
1959	4048	9674	2655
1960	6434	12251	3507
1961	553	2202	-29
1962	1291	3467	281
1963	1883	4364	590
1964	2364	4652	811
1965	2771	5921	876
1966	4102	7535	1220
1967	2015	3320	-408
1968	2410	3828	-340
1969	7798	12572	1838
1970	9008	15853	2886
1971	7016	14892	2359
1972	5117	11180	1461

年份	产量（台）	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1973	4226	9288	1267
1974	4526	11376	1284
1975	4778	12880	1736
1976	4860	13966	1917
1977	3205	8995	1346
1978	3577	11020	1391
1979	4551	12325	1654
1980	5304	12778	1539
1981	5631	12295	979
1982	5895	12785	826
1983	5776	13306	852
1984	5968	15069	1315
1985	5296	16897	1823
1986	5293	18770	2300
1987	5670	20246	1942
1988	6006	21934	2033
1989	6077	20036	1005
1990	4425	20351	204
1991	5420	20878	340
1992	6033	25000	674
1992	6304	30000	2601
1994	4929	29500	3404
1995	4072	27463	2376
1996	3765	30000	402
1997	2802	23000	2802
1998	3253	22800	906
1999	3145	25104	2002

39. 沈阳电缆厂

"一五"期间，沈阳电缆厂被国家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过三年的紧张改造，于1956年9月正式投产，成为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改造后的沈阳电缆厂在生产规模、产品品种、工艺制造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厂占地面积25.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职工人数3900多人，设计年生产总导体3万吨。投产两年后，实现年产总导体4万吨，产品品种增加到32种，15000多个规格，生产的主要产品有裸电线、橡塑绝缘电力电缆、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通信电话电缆、电磁线等。除五个大型车间外，还有铜铝导体熔铸、压延和拉伸两个半成品车间，一个制造包装盘具的生产车间，主要生产流水线都采用了机械化、自动化的装备，全厂拥有大、中、小型专用机械设备1700多台，形成了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综合性电线电缆制造厂，成为当时全国电线电缆行业最大的企业。从项目建成到1986年的二十九年间，沈阳电缆厂先后向全国矿山、冶金、石化、电力、煤炭、国防等工业部门，铁路、交通、邮电事业，以及农业建设等行业部门和亚洲、非洲、欧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总导体为96万吨的电线电缆产品，累计上缴给国家的利税达到21亿元，相当于建设时总投资的26倍，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沈阳电缆厂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先后从比利时、美国、英国、意大利、芬兰、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引进了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线和大型单机30条/台。完成国内较大规模项目9项，实际完成总投资约4.5亿元。年生产能力增加到20亿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提高了生产装备水平、产品档次和产品质量。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各类电线电缆企业的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初期的几十家，到1999年止全国各类电线电缆企业已发展到7000多家，电线电缆产品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使该厂生产设备出现严重的开工不足，企业效益逐年下滑的趋势。企业历年经营状况变化见下表：

表5

年份	1949	1953	1956	1970	1978	1985	1990	1995	1999
产值	545	6568	7253	25685	33030	56011	93063	85098	67704
销售收入					26556	51212	79789	91925	48113
实现利润					4 921	10569	5625	208	−33612

改革开放以来，沈阳电缆厂在一手抓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的同时，对企业内部机制进行了改革。建立和完善了经济责任制，实现了经济指标由上至下的层层分解和由下而上的层层负责，使企业经济运营质量得到提高；改革了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和经营机制，调整了生产关系，通过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使各级经营者责、权、利得到了有效的统一，进一步调动了广大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和完善了全面的经济核算考核体系，形成了以总会计师为首的厂、车间、工段班组三级核算体系，确保了企业经济核算的完整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实行奖惩严明，效益和利益相一致的奖励分配原则，彻底打破了“大锅饭”。经过上述的一系列改革，使沈缆的经营模式在全国率先从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改革后的198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61446万元，实现利润12522万元，分别比历史最好年度增涨100%、112%。通过实行

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调动了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目前，企业正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进行分立重组工作。

沈阳电缆厂建厂以来隶属关系变化如下：

1948 年　东北电业管理局

1949 ~ 1952 年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电器工业管理局

1953 ~ 1956 年　一机部电器工业管理局

1956 ~ 1957 年　电机制造工业部电气材料工业管理局

1958 ~ 1959 年　一机部第八局

1960 ~ 1964 年　一机部第七局

1965 ~ 1967 年　一机部东北电力机械制造公司

1968 ~ 1970 年　一机部

1971 ~ 1989 年　沈阳市机电工业部

1990 ~ 1993 年　沈阳市机械工业管理局

1994 年以后　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公司

1999 年企业基本情况：

(1) 资产，经营情况：沈阳电缆厂 1999 年资产总额 228652 万元，销售收入 48113 万元，利润 - 33612 万元，税金 863 万元，创汇 1042 万美元。

(2) 产品情况：（主导产品能力及水平，1999 年产量、产销率、国内市场占有率等）

表 6

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	水平	1999 年产量	产销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
钢芯铝绞线	32600 吨	国际先进	8737 吨	84.5%	约 3%
电力电缆	17000 公里	国际先进	1794 公里	87.4%	约 2%
控制电缆	6200 公里	国内先进	884 公里	92.3%	约 1%

(3) 技术来源及水平、设备来源及水平、运行状况

以上三种主导产品的技术来源均为企业自主开发，设备来源除局部附属配套设施自制外，主要生产线及单机均为引进设备，其水平为国际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水平（个别为 90 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引进生产线及单机目前运行情况良好。

(4) 以销售收入估算，沈阳电缆厂 1996 年、1997 年、1998 年在同行业中的排名分别为第 2、第 3、第 4 名。

企业"十五"发展前景及思路：国家"十五"期间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大火电、大水电、核电及西部大开发的总体发展战略，为电线电缆行业的发展带来前景。但是，冗员多、包袱重的沈阳电缆厂要想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只有走资产重组、转换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路。中央领导同志视察辽宁时对沈阳电

缆厂发展极为重视，提出了“分立重组，下岗分流，减负增效”的指导方针，为此，该厂今后的发展思路是以资产重组为突破口，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为重点，以市场为导向，加速产品结构调整，降低经营成本，力争在“十五”期间重振沈缆形象，发展成居国内一流的电线电缆企业。

表7　　历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表计量　　单位：万元

统计时间	经济指标		
	工业总产值	实现利税	实现利润
1949	545	130	82
1950	3234	1116	833
1951	4100	1260	905
1952	4765	1486	891
1953	6568	1720	1105
1954	5229	1059	439
1955	4489	87	63
1956	7253	583	200
1957	16157	3275	1833
1958	30669	10198	7531
1959	34688	12016	9202
1960	32720	10832	7904
1961	8948	1887	1134
1962	8476	2405	1639
1963	11797	3397	2231
1964	16216	4819	2728
1965	19225	1478	889
1966	21494	3	3
1967	11898	6	6
1968	8574	548	188
1969	22854	4647	2667
1970	25685	6910	4322
1971	28208	8188	4744
1972	29208	9107	5440
1973	31693	9405	6122

统计时间	经济指标		
	工业总产值	实现利税	实现利润
1974	33463	9650	6407
1975	30281	9576	6423
1976	31823	8770	5723
1977	26743	6422	3767
1978	33030	8108	4921
1979	35798	8962	5473
1980	37844	9568	5897
1981	31295	5843	2925
1982	32873	6236	2937
1983	36058	6764	3223
1984	43146	10683	6410
1985	56011	17102	10569
1986	73450	19978	12216
1987	86078	21077	12642
1988	59315	11350	5025
1989	87292	22297	9590
1990	93063	11818	5625
1991	100010	10861	3937
1992	106015	9335	2844
1993	116600	10162	2001
1994	100055	4407	805
1995	85098	2735	208
1996	90003	214	6605
1997	70106	220	3179
1998	71006	-3982	-5480
1999	67704	-32749	-33612
合计	2028843	291969	153361

注：工业总产值统计口径是1990年不变价。

40. 沈阳凿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风动工具厂）

沈阳凿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沈阳市机械工业管理局，是在辽宁省首批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试点中发起成立，并于1997年3月完成转制的股份制公司，其前身系国有大中型企业——沈阳风动工具厂。该公司始建于1937年，其前身为日本满洲金属株式会社。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55年1月建成并正式开工生产，是全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生产凿岩机械和风动工具的专业化企业。

1949年按上级指示；我国第一台凿岩机在沈阳汽车总厂（沈阳风动工具厂前身）诞生，为建设我国气动工具制造行业打下基础。1950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同年批准苏联援建方案，1955年正式建厂，诞生了我国第一家气动工具制造厂，结束了我国气动工具依靠进口的历史。1955年至于1957年的上半年，用两年半的时间就上缴国家利润2081万元，全部收回了国家对风动工具厂的扩建总投资。1958年贯彻民主管理，批判了机构庞大臃肿，分工过细，精简了管理干部压缩了管理机构。在业务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强车间一级管理下放了七权。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和修改了所有的规章制度。

"二五"期间；1961年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学习齐齐哈尔管理经验，实行新的管理方法。1963年在一机部第五机械管理局的指导帮助下，进行了企业技术整顿，完善了产品的技术管理、计划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使企业面貌为之一新，经一机部五局检查验收合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使企业管理逐步走上正轨。1979年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面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顿，狠抓经营作风的转变，加强企业管理，使企业经营工作由生产型逐步向生产经营型过渡。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对工厂进行了全面整顿。在经营方面，重点整顿和完善了经济责任制，改进了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各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1983年1月企业五项整顿第一批验收合格，并荣获辽宁省质量管理奖和沈阳市企业管理先进单位称号。在企业整顿基础上工厂的经营管理，重点抓了经济责任制的落实；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力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使企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和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1984年被列为沈阳市首批贯彻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1997年企业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由原沈阳风动工具厂整体改制为沈阳凿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公司资产总额46848万元，其中：固定资产12963万元，流动资产26093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1600万元；实现利税1267万元，其中：利润125万元，出口创汇119万美元。现有年产各类气动凿岩机50000台、液压凿岩机150台、凿岩钻车300台、气动工具30000台的生产能力。1999年主要产品产量：气动凿岩机28765台、液压凿岩机14台、凿岩钻车87台、气动工具11735台。产品销售率为106.6%。该公司产品主要服务于建筑、铁路、交通、矿山、水电、市政工程及农田灌溉等领域。产品共58个系列103个品种，行销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47个国家和地区。主导产品气动凿岩机类产品居国内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达46%。液压凿岩机类产品为国内独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惟一生产该类产品的专业厂家。钻车类产品达国内先进水平，市场占

有率36%。农业节水灌溉设备是我国农业跨世纪的新型农用机械。1998年该公司从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分别引进多种型号、规格的卷盘式喷灌机，目前已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并被确定为辽宁省“3655”工程定点生产厂家。

公司拥有主要生产设备717台（套），其中：金切机床511台（套）、热处理设备20台（套）、锻压设备34台（套）、铸造机械18台（套），设备利用率44%。主要设备有：日本产加工中心、光电跟踪切割机、各类高精度磨床；德国产易卜森热处理炉、2500吨高能螺旋压力机、曲面磨床；国产或合资企业生产的各类数控机床及各类检测设备。

改革开放以来，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保持和扩大了在国内同行业中的领先优势。公司“七五”期间主要技术改造项目共六项，累计投资额为10734万元；其中国家批准的重点项目3个，投资8659万元；地市级项目3个；累计投资2075万元。其中，“八五”技改项目获部、省、市优秀项目奖。

建厂初期，该厂以气动工具类产品为主，经过“七五”、“八五”技术改造，引进瑞典ATLAS公司全套液压凿岩机生产制造检测技术。通过引进消化同行业先进技术，现已具备了生产各类液压凿岩机、凿岩钻车、液压冲击器等液压类产品的生产能力，近年为适应市场需求，开发研制出农用节水灌溉设备，并积极与汽车行业配套，为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开发跨行业产品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管理方面，公司已由传统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逐步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示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公司从1993年开始至今多次进行用工制度改革，已经形成了“引进人才靠招聘，上岗工作要竞争”的用工新制度。1995年《劳动法》颁布以后，为了适应《劳动法》要求，公司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并于1996年1月与全体员工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1998年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分流安置措施，共分流安置人员292人。1999年公司实行了“以销定产、以产定员”的劳动用工管理办法，并实施了“模拟三资、减人增效”的方案，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司制度。公司“模拟三资”企业管理、学“亚星”经验等改革措施已经初见成效。

根据国家“十五”计划及2010年发展规划，国家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为该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机遇。国家搞好国有企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和发挥效力，为该公司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该公司产品的发展战略是“巩固气动、提高液压、调整钻车、扩展外围”。“巩固气动”即不断提高气动凿岩机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努力扩大产销规模，巩固国内市场占有率在50%以上。同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点，以质量、价格的优势，大规模地挺进国际市场。“提高液压”就是发挥国内独家引进技术的优势，加大液压凿岩机的销售力度，并且继续开发系列产品，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加快合资合作步伐，使液压冲击器在规格、档次上适应各类用户的需要，扩大市场覆盖面；“调整钻车”就是以露天采矿为主调整钻车类产品的结构，增加品种，提高性能和质量，形成规模优势，占领市场；“扩展外围”就是开发研制适销对路的跨行业产品。继续开发引进各种类型、不同规格的农业灌溉设备；扩大产销规模；跟踪汽车项目，力争挤进汽车零部件

制造行业；扩展公司的服务领域，使公司经济工作形成多点增长，齐头并进的新局面。

表 8 历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资产	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	利润	税金
1955	2865	1517	741	0
1956	2761	3520	795	90
1957	2812	3772	1090	91
1958	2890	6181	2026	-158
1959	3163	7473	2665	210
1960	3478	8847	2662	208
1961	3767	3215	951	85
1962	3640	3249	723	83
1963	3559	2566	651	71
1964	3622	2625	647	77
1965	3635	3762	543	74
1966	3623	4462	831	85
1967	3547	1263	-16	18
1968	3977	1358	-40	16
1969	4135	3127	177	54
1970	3977	5113	452	88
1971	4145	6455	1244	306
1972	4110	6538	1042	291
1973	4323	6871	1273	150
1974	4807	7320	865	130
1975	4855	7078	739	140
1976	5185	6379	647	126
1977	5195	3836	137	83
1978	5303	4847	274	104
1979	5324	4949	299	97
1980	5400	5006	298	97
1981	5412	4388	115	80
1982	5445	4610	164	85

年份	资产	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	利润	税金
1983	5586	5375	253	150
1984	6202	6077	551	196
1985	6773	7290	843	381
1986	8494	7301	904	215
1987	9799	7117	322	229
1988	10536	7732	285	280
1989	11944	7969	163	405
1990	14625	7875	165	567
1991	17023	7302	256	604
1992	19074	7703	258	827
1993	24054	11501	681	1292
1994	34531	11903	659	1490
1995	38649	10287	153	1130
1996	41782	10000	180	1174
1997	46542	10001	103	1109
1998	47186	10703	122	1023
1999	46848	11142	125	1141
合计		277605	28018	14994

41. 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整流器厂、西安电工铸造厂）

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是研制高压、超高压交直流输变电设备的大型联合企业，是我国输变电行业实行计划单列的国家级企业集团。西电公司的建设和发展，大体上是经历了奠基、扩建、改型等三个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了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一机部与陕西省政府投资分别建设了西安变压器厂、西安电缆厂、西安电气控制设备厂（后改为微电机厂）。1959年7月，中央政府批准成立西电公司。从1966～1978年，建成了西安整流器、西安微电机、西安电炉、电子计算技术应用等一批研究所，新建了西安电器设备制造厂，对西安变压器厂、西安电缆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高压电瓷厂以及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西安电瓷研究所等进行了扩建和技术改造，使公司生产与科研规模逐渐扩大。从1983年起，对公司内部的经营机制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革，建立了销售、进出

口、物资供应、劳动服务、建设等一系列专业公司，兴办了西古光纤光缆、深西电机制造、太平洋绝缘材料、力得利等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了公司教育委员会，统一管理从学前教育到职业高等教育的12所院校。

公司在深化内部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多种专业化管理体系，发挥了整体优势。注意运用价值规律。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工业总产值1982年比1981年增长38%，1983年比1982年增长14%，1984年比1983年增长14%，1985年比1984年增长28%，1986年比1985年增长18%；上交利润1982年比1981年增长28%，1983年比1982年增长30%，1984年比1983年增长18%，1985年比1984年增长10%，1986年由于原材料涨价等外部因素增加成本6500多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经济效益比1985年仍然增长17%，1985年、1986年连续两年绝对利润数名列全国机械行业第三位。从1959～1985年，西电公司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80.4亿元，上交税利23.5亿元，为固定资产原值的4.26倍。

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经济战略思想指导下，积极引导企业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在国内发展多方位的联合，已和全国220多家企事业单位结成各种形式的联合体，成为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企业集团。由于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大，大大增强了企业的适应力和竞争力，从1979～1986年，参与国内外输变电站工程投标活动40多次，有11次以价格合理列为中标第一名，1980～1982年承包的泰国泰美伦纺织公司变电站及变电所工程，由于产品质量高、价格低、服务周到，赢得了用户的信赖，在尼泊尔输变电工程国际招标中，力挫十几家国际企业强手，夺得工程两项标书中的第一名。在积极引导企业向外向型转变的同时，广泛开展对外合作，合资经营，开发与创办了一批小型外向型企业，在深圳经济特区与港商合资兴办的深西电机公司，成为深幼；规模较大，技术先进，经济效益较好的外向型企业之一，1986年9月正式投产，生产罩极电机250万台，产品全部外销，在香港市场取得了信誉，并已打人美国市场。

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企业集团。为了扩大劳动就业，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从1978年起到1986年年底，创办集体所有制工厂28个，国内股份制企业17个；合资企业4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国内股份制企业，对公司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公司共有全民所有制生产厂11个，根据国家计委、建委和统计局划分大、中、小型企业的有关规定，西安高压开关、西安变压器电炉、西安高压电瓷、西安电力整流器、西安电力电容器、西安绝缘材料、西安徽电机、西安电缆等8个生产厂，固定资产原值均为2000万以上，因而被列为大型骨干企业，西安电器设备、西安电工铸造、长城电工机械等3个生产厂，固定资产原值为800万2000万，因而被列为中型企业。

目前，公司拥有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干企业11个，集体所有制企业28个，中外合资企业4个，国内参股控股企业17个，联营企业17个，技术经济协作联合体106个，设有500张床位的职工医院一所，组成统一科研、生产、经营、教育紧密结合的经济实体型企业集团。公司11个全民所有制生产厂，均有其代表本企业特点、能力和水平的主要产品，有7个生产厂生产高压、超高压交直流输变电设备及其配套产品，有4个生

产厂分别生产微型电机、通信电缆、绝缘材料、电工机械等。生产输变电设备的生产厂，可为国家提供年需量的30%的成套设备，随着公司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扩大，对市场的适应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每年开发的新产品近100个，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能力近1000万美元。

42. 西安高压开关厂

西安高压开关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3年选址，1954年筹建，1956年动工，1960年基本建成，1964年动用验收，现已发展成为我国生产高压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高压防爆电器、高压电流互感器等4大类、56个品种、364个规格的高压电器及配套件的大型现代化企业，是我国高压开关制造业的骨干厂之一。

西安高压开关厂的建设，是由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西北办事处直接领导的，1953年初开始搜集建厂资料，同年10月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电工局副局长肖陈人与苏联专家库内林、沙赫夫、布尔采夫等亲临西安选点定址，确定将原计划在西安建设的高压开关厂与水银整流器厂合建成一个开关整流器厂。1954年成立开关整流器厂筹备处，3月3日国家计委批准西安开关整流厂计划任务书，确定建筑设计总面积为384400平方米，年生产高压断路器13000台，水银整流器60万千瓦，各种高压隔离开关44501组，电流互感器3814台，成套配电装置4290台。5月苏联电器工业部国家动力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完成工厂初步设计，1955年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同年7月上级批准技术设计书，1956年3月正式破土动工，建筑工程部西北第二建设工程公司承担施工任务。1957年，一机部提出“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的要求，6月份进行小批产品试制。1958年部分厂房建成，开始生产苏型110千伏少油断路器、负荷开关、户内隔离开关、水银整流器等。1960年，主要生产厂房全部竣工。1964年，由一机部副部长白坚、陕西省委书记王林、副省长惠世恭、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一机部八局局长周建南、西安市副书记颜志敏、省建委副主任郭一民、省机械局副局长兼西电公司经理贾晓东等组成国家验收委员会，对45项建设工程进行了验收评定，有12项工程评定为优，28项工程评为良，4项工程评为可，1项工程评为劣，对963台设备安装工程的评定结论是：优337台，良460台，可126台。全厂建筑安装工程总评为良。依据上述评定结果，同意验收，从此，西安开关整流器厂正式全面投产。

西安高压开关厂的生产与技术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957～1960年，贯彻执行“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的原则，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生产苏型和仿苏型产品，当时产品主要是少油断路器、户外隔离开关、双柱式隔离开关、空气开关、水银整流器等。型号和规格比较单一，电压等级也较低，设备最大电压等级为110千伏级。1961～1967年，进行扩建与改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发展。1960年，苏联政府撤销对我技术援助的合同，迫使工厂技术干部走自行设计的道路，1962年设计了110千伏级、1500安、4000兆伏安空气断路器，1964年试制成220千伏、1500安、8000兆伏安空气断路器，1965～1967年，研制成330千伏级。开式组合电器，使我国高压电

器进入了330千伏级。与此同时，工厂进行了扩建与改造。1965年6月根据一机部指示，将整流器、电工铸造两个车间从开关整流器厂划出，分别成立西安电力整流器厂、西安电工铸造厂，原厂名更名为西安高压开关厂，同年11月高压电器研究所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电压、强电流试验基地投入使用，标志着西开厂的生产技术进入了新的阶段。从1966～197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生产急剧下降，1968年成为亏损企业，亏损额234万元。但是广大职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发研制新产品，1970年试制成10种新产品，220千伏少油断路器试制成功，从此彻底淘汰了仿苏产品。1972年试制成GW4－60隔离开关，1974年制成110千伏级全封闭组合电器，为我国第一条330千伏输变电线路提供了整套设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恢复和建设性两次整顿，开展了创建六好企业活动，完成了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产值、利润、税收逐年增长，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新品开发不断取得新进展。4种产品被评为陕西省优质产品称号，其中一项评为部优产品。SW6－220（Ⅰ）型少油断路器荣获1982年国家银质奖。1979年成功地制造了500千伏级空气断路器和500千伏级高压隔离开关。1980年11月与南斯拉夫动力投资公司合作生产245千伏六氟化硫高压开关，在国际电工产品权威性机构——荷兰凯马试验站一次试验合格。1985年与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达成合作生产六氟化硫高压断路器协议。投产后的产品受到用户的好评。目前西安高压开关厂主要生产500千伏级高压开关设备，按品种分为防爆配电装置、电流互感器、高压隔离开关、少油、空气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等五大类、58个品种、342个规格的产品，年配套能力为150万千瓦，1986年工业总产值12714万元，实现利润4666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从1956～1985年，国家对西安高压开关厂的投资总额为13968万元，其中厂房建筑投资11930万元。建筑面积113072平方米，其中生活福利设施建筑面积136835平方米，现有16个车间，其中成品车间5个，辅助车间11个，另外还有集体所有制和联营企业10个，截至1985年底，全民所有制职354215人，集体所有制职工2957人，有干部764人，占职工总数的17.7%，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88人，占干部总数的77%，工程技术人员507人。在全民所有制职工中，工人2704人，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1560人，辅助生产工人1144人。工人平均技术等级为3.3级。设有技工学校一所，1985年在校学生389人。固定资产原值4940万元，净值2405万元，流通资金5 345万元。对多年来，为国家累计生产10～500千伏级调高压开关及其配套件11万多台套，累计工业总产值15.5亿元，上交利税53000多万元，约等于国家建厂投资的12倍，产品遍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并远销亚、非、拉、美及欧洲22个国家和地区。

43. 西安高压电瓷厂

西安高压电瓷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帮助我国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中的两项工程基础上建成的，现已发展成为我国电瓷、避雷器行业重点骨干企业。

西安高压电瓷厂筹建机构于1953年6月在湖南省湘潭市成立，定名为"中南电瓷厂筹备处"，1954年4月2日，根据国家计委指示迁至西安。1954年5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西北办事处通知原筹备处改为"西安高压电瓷厂筹备处"，后又由

一机部电工局正式定名为西安高压电瓷厂。

西安高压电瓷厂建厂设计计划任务书，由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和电工局曾维廉局长于1954年2月提出，经国家计委1954年3月4日批准。由苏联建设部建筑设计管理局第三设计院进行技术设计，配合国外设计的是一机部设计总局第四设计分局，建筑工业部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配合进行了主厂房上建工程部分设计。技术设计规定生产规模为年产高压电瓷10996吨，避雷器30000只。生产产品107种，其中电瓷产品98种，避雷器产品9种。年工业总产值为2549万元。

西安高压电瓷厂于1956年3月动工兴建。1958主要公用建筑设施、动力系统和辅助车间竣工。1958年第四季度第一条生产线开始局部试生产，1959年主要工程完工。第一条焙烧隧道窑建成并投入试生产。1960年，工厂基本建成投产。当年生产高压电瓷5344吨，避雷器43 721只，完成工业总产值1582万元，实现利润272万元。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建厂收尾工程拖延时间较长，1964年12月方经国家动用验收委员会批准验收，实际完成建厂总投资3401.41万元，为建厂总预算3603.36万元的96.06%，国家验收委员会对建厂工程总评为“良”。1966年，生产达到设计水平，生产高压电瓷8972吨，避雷器116356只，高压熔断器27724只，完成总产值2 585万元，实现利润676.1万元。

为满足国家电力工业建设迅速发展和输变电设备向超高压、大容量方向发展的紧迫需要，西安高压电瓷厂在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等方面进行了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从1958年一机部批准首批扩建任务起。经主管部批准的技术改造大中项目共18项。已竣工发挥投资效益的13项，其中60年代竣工的有年产1200吨的金刚砂厂房和年产16万只避雷器的生产线改造，70年代竣工的有棒型生产线和3号隧道窑工程，80年代竣工交付使用的高强度瓷生产线、油纸电容套管生产线、碳化硅避雷器生产线等工程。另外，还新建了两座80立方米抽屉窑和高压试验站等。

西安高压电瓷厂重视产品开发，围绕高电压、高性能、高强度的发展方向，投产以来开发品产品552种，其中部、局管新产品95种，原技术设计中的107种规格的产品，已有90%被新产品代替，产品电压等级，已由投产初期生产110千伏及以下、仿苏型产品为主，发展为成套生产500千伏及以下高压电瓷、避雷器和110千伏及以下高压熔断器等。悬式绝缘子已发展到30吨级，防污型和高强度大棒型、充气式空气断路器局强度瓷套，油纸电容式变压器套管和电抗器套管，线路型和电站型碳化硅磁性避雷器与氧化锌避雷器等均已发展到500千伏级。现有产品共49个系列、730个品种、970种规格。其中，高压电瓷为37个系列，632个品种，831种规格；避雷器为11个系列、91个品种、124种规格；高压熔断器为1个系列、7个品种、15种规格，产品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相当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国际水平的电瓷产品品种已占20%以上，避雷器产品品种已占26%。

西安高压电瓷厂经过扩建和技术改造，生产规模逐步扩大，装备水平逐渐提高。1985年末，全厂占地面积370605平方米。其中厂区面积为294045平方米，福利区面积为76560平方米。全厂房屋建筑面积178915平方米，其中：工业生产用987平方米，非

工业生产用80134平方米。年末固定资产原值4981万元。共有机器设备1400台，机械设备复杂系数8647个，电气设备复杂系数5054个。其中，主要生产设备495台，内有进口设备刀台，精、大、稀设备32台，制瓷专用设备116台，瓷件烧成窑8座，起重运输设备121台，金切设备110台，动能设备79台。拥有生产500千伏及以下高压电瓷、避雷器和110千伏以下高压熔断器的较为先进的成套技术装备。

1985年末，全厂有职322521人（含合同制职工54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35人，管理人员293人，工人1693人，学徒工16人，服务人员215人。

西安高压电瓷厂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推动科技进步和生产发展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科技方面，先后有42项成果荣获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其中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5项，陕西省科技大会成果奖5项，国家计委、机械部、铁道部等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6项。

西安高压电瓷厂为国家重点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大量特殊需要的产品。从1970年到1972年，为我国第一条330千伏刘（家峡）—关（中）—汉（中）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提供了10吨、16吨悬式绝缘子；为海军提供了特殊用途的30吨悬式绝缘子和高频高压套管。1979年起，为平武、锦辽、晋京、葛洲坝等国内首批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提供了500千伏电站型、线路型避雷器，高强度律型支柱绝缘子，油纸电容式变压器套管和电抗器套管等，“六五”期间，西安高压电瓷厂填补国内空白，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的产品有多种，其中高压电瓷25种，避雷器7种。

截止1985年，西安高压电瓷厂累计生产50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高压电瓷139426.68吨，其中线路电瓷72406.26吨，电器电站电瓷67020.55吨。工业总产值60844.2万元，利润税金总额20253.6万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5倍多，产品除满足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西电公司内部配套外，还远销世界五大洲的41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高压电瓷2004吨，避雷器10174台。

1978年以来，按照机械工业12项工作整顿要求，进行了企业整顿。1985年工厂实行方针目标管理，当年利税总额达1521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1986年进一步加强了两个文明建设，经上级检查验收，授予了“文明工厂”称号。西安高压电瓷厂坚持“三上一提高”的方针，把提高产品质量摆在首位。加强了全面质量管理，完善了质量检测手段，加强了计量工作，1985年经省、市计量T作升级检查组评审，定为二级计量单位。在质量方面，贯彻了国际标准，制定了内控标准，有满足330千伏产品出厂试验的全套设备，出厂一产品已有16个品种28种规格的产品达到了国际标准，有9种产品荣获优质产品称号。其中10千伏加强式针式绝缘一户获国家优质产品银牌奖，悬式绝缘子、油纸电容式变压器套管、断路器瓷套荣获部优产品证书，铁道律型绝缘于和油纸电容式变压器套管荣获省优质产品称号。1983年西安高压电瓷厂被评为西安市提高产品质量先进企业。

西安高压电瓷厂建厂以来，发挥了高压电瓷、避雷器重要生产基地和科研基地的双重作用。但是，1961年和1968年两次出现生产大幅度下降，总产值分别只有788万和634万元。当年分别亏损160万元和68.2万元。前者是受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后者是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所致。投产后前17年平均年总产值为17547元，粉碎“四人帮”后的十年，平均年总产值为3130万元，与前十七年平均总产值比，增长了75.7%。

44.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是我国电力电容器制造的骨干企业。它的建设是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53年7月，成立了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筹备处，1954年3月30日，由国家计委批准计划任务书。

根据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协议，工厂生产部分的设计是由苏联电器工业部国家动力工业设计院负责承担的。技术设计年生产能力为100万千伏油浸纸介质电力电容器。厂区占地面积43400平方米，建筑物占地面积9868平方米，全厂建筑面积15109平方米，建筑系数为0227，道路面积6005平方米，绿化面积21000平方米，铁路专用线50米。工厂主要设备由苏联提供，部分设备国内自制。同时还引进了具有当时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测试设备和仪表，规定职32，总数为714人，总投资额1342万元。

1954年4月2日，一机部电器工业管理局决定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厂址在西安市西郊，定名为西安电力电容器厂。1956年4月，主厂房动工兴建，1956年6月15日，一机部任命王廷栋任厂长，冯勤为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8年7月，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生产体系建成并具备开工生产条件，1958年7月，经国家正式批准动用验收。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的建成和投产，为我国电力电容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建厂初期，对职工进行了技术培训，1954年到1956年先后派出三批人赴苏联谢尔普霍夫电力电容器厂实习，与此同时在国内也进行了职工培训。1956年到1959年期间，苏联先后两批派专家共4人来厂帮助工作。

1957年开始试生产，1958年3月试制出1337台质量良好的并联电力电容器，当年生产电容器39.77万千伏，试制新产品23种。1959年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量达到129万千伏，超过原设计水平。

1960年试制成功了30多种新产品，产品产量达到237万千伏，其中6项产品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随着生产发展，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的科学技术也不断发展进步。1961年，自行设计、并采用国产原材料制造了38个品种、111个规格的电容器产品。1962年，完成了17项多种新产品，1963年，自行设计制造出我国第一台50万伏标准电力电容器，1966年，研制成功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电压等级100万伏标准电容器，为我国独立发展超高压电容器产品创造了条件。1977年试制成功380千伏、500千伏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经一机部鉴定，确认为国内先进水平，1978年以来试制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我国第一台1100千伏标准电容器，MYF1O－120脉冲电力电容器。在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先后获得西电公司级以上科技成果奖35项，其中获国家创造发明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国家新产品奖1项，全国科学大会颁发的科技成果奖1项，国家科技奖2项，机械工业部科技成果奖9项，省科技成果奖5项，西安市科技成果奖4项，西电公司科技成果奖11项。1979年，西安电力电容器厂从美国麦克劳——爱迪生公司引进了移相电容器、高低压全膜与膜纸大容量并

联电力电容器制造技术，使生产能力增加了30%以上，产值和利润大幅度提高。

在“六五”期间，新建了高压成套车间、高压试验室、电容器研究室、冷冻机房等，1982年投入生产，为我国三条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线路提供电容式电压互感器78套。采用聚丙烯薄膜、十二烷基苯硅油、二芳基乙烷、异丙基联苯新介质试制成功了50多种新型电力电容器，电压等级已由110千伏、220千伏、330千伏提高到500千伏；单台容量从原来10千伏发展到100千伏、200千伏、334千伏。经一机部批准，厂成立了电力电容器研究所，概是本厂科研、情报、新品开发、测试等项工作的科研机构，也是全国同行业的技术归口单位。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投产以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产量、质量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品种不断增加。1985年底，累计生产各种电力电容器5631万千伏，完成工业总产值88380.4万元，实现利税28400万元，为国家总投资的25倍。产品已由建厂时的6个系列12个品种，发展到20个系列300个品种。产品以体积小、容量大、性能好、寿命长等特点，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畅销29个省、市、自治区。部分产品远销25个国家。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稳步上升。1984年，BW、BWF两个品种，1985年OWF、TYD、BWF三个品种均达国际标准。上述五个产品品种产值占1985年总产值的61.9%。

1985年底，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038万元，净值1350.5万元。全厂占地面积113505平方米。其中，厂区占地面积68270平方米，生活区占地面积45235平方米。建筑面积93109平方米。其中，厂区建筑面积44085平方米，生活区建筑面积48934平方米。全厂有27个科（室）和6个车间。全厂共有职工1434人，其中全民固定职工1408人。

45. 西安绝缘材料厂

西安绝缘材料厂是我国制造绝缘材料的主导工厂之一。1953年筹备，1954年设计，1955年破土兴建，1958年基本建成并开始试生产，1959年正式承担国家生产任务，1964年国家验收。后又几经扩建、改建和整顿，截止1986年，西安绝缘材料厂已发展成我国技术力量较为雄厚、设备齐全、规模大、品种多的综合性的大型现代化企业。产品遍及全国，并远销55个国家和地区。

建国前，我国没有电器绝缘材料制造工业。1950年，哈尔滨电机厂建成了绝缘材料车间，1956年独立为哈尔滨绝缘材料厂。为适应我国电器工业、电讯工业和航空工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把发展绝缘材料工业作为苏联帮助我国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3年1月，厂址选在上海，并以“上海绝缘材料厂筹备处”名义开展工作。后又经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厂址改在西安市西郊，12月，西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划定西安绝缘材料厂的厂界在西安电力电容器厂以北，南北宽280米，东西长350米。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协议规定，西安绝缘材料厂由苏联电器工业部国家动力设计院设计。7月，绝缘材料厂筹备处由上海迁来西安，更名“西安绝缘材料厂筹备处”。8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西安绝缘材料厂设计合同，8月25日一机部电

工局编制出《西安绝缘材料厂计划任务书》，12月22日一机部计划局通过了审查。1954年3月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西安绝缘材料厂计划任务书》，于1955年2月动工兴建。

西安绝缘材料厂的土建工程，是在一机部西安办事处领导下由西北第二建筑公司承包施工，概算总投资为3042万元。12月8日，一机部批准《西安绝缘材料厂技术设计》，1957年4月10日，电机制造工业部批准《技术设计预算》，投资为2 767.3万元，1958年9月，主要生产车间竣工并投入试生产。1958年6月26日一机部同意西安绝缘材料厂增建硅有机车间，投资250万元，年产硅漆400吨。1959年元月，西安绝缘材料厂正式承担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1961年5月2日，陕西省机械工业局批准成立西安绝缘材料研究所。1962年同意西安绝缘材料厂产品使用“友好牌”商标。

1957年电机部批准西安绝缘材料厂组织设计，定员为1677人，其中工人1217人，工程技术人员179人。1955~1958年，西安绝缘材料厂相继派厂长及部分职工分赴苏联、哈尔滨、沈阳等地实习，并从东北老厂调入技术骨干近300人。1964年12月18日，一机部副部长白坚等代表国家对西安绝缘材料厂进行动用验收，结论是：建设速度快，工程质量基本良好。

西安绝缘材料厂属机械行业二类配套厂，不生产整机或原料，只生产配件——绝缘材料。生产特点具有明显化工性质。品种繁多、规格复杂、生产周期短，工艺性、配套性强。西安绝缘材料厂为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多次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在发展品种，提高生产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先后试制成功硅有机产品、复合制品、胶纸电容套管芯、印刷电路板等新产品，“六五”期间，研制成聚芬本亚胺纤维纸、自熄酚醛覆铜箔板、引拔制品等效益产品。引进了英国引拔成型机，联邦德国的立、卧式上胶机等关键设备后，使年生产能力增加1000多吨。

1986年，西安绝缘材料厂拥有全民所有制职工1984人，集体所有制职工269人。全厂占地面积205145平方米，其中厂区154949平方米，福利区50195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81 552平方米，职工住宅建筑面积59174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为4292.8万元，净值1908.5万元。拥有机械设备1132台，其中主要生产设备有20吨锅炉、1600吨油压机、砂轮锯床及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387台。生产五大类绝缘材料6750吨，其中层压制品4490吨，云母制品150吨，浸渍纤维制品250吨，油漆1500吨，复合制品360吨，另有蒸汽锅炉6台，装机容量90吨/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西安绝缘材料厂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开展产品更新换代和升级创优活动。截止1986年，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品种，已由建厂初期的四大类20种，发展到五大类138种，优质产品有国家银质奖1个．部优产品4个，省优产品1个，市优产品8个，合计11种24项，在国内行业中名列前茅。因此，西安绝缘材料厂获西安市质量管理奖，通过了西安市经委TQC达标验收。

1986年，西安绝缘材料厂总产量达4479.36吨，总产值达6219万元，创造利润1120万元，上交国家利税1235.1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0 580元，工人劳动生产率为51920元。西安绝缘材料厂从1958年试生产到1986年底，累计完成工业总产量

85113.6吨，完成工业总产值135844万元，上交国家利税28622.4万元。相当于原建厂投资的12倍。经济效益为国内和行业中上等水平。

46.西安电力整流器厂

西安电力整流器厂的前身，为西安开关整流器厂生产汞弧整流器的一个生产车间和研制开发新产品的整流器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3年开始筹建，1956年破土动工，1958年主厂房水银整流器厂房建成并投入生产。1965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根据中央推行专业化和协作的指示精神，批准成立西安电力整流器厂。为了完善生产条件和开发新产品，经第一机械工业部和西电公司批准，从1966年2月至1985年年底共新建大小工程多个。对硅元件车间进行超净改造，改造面积964平方米，其中装配式空气洁净室为425平方米，辅助洁净区为534平方米，包括空调机房、清洗腐蚀间、气体净化间、物资消化、两次更衣和两次空淋等，洁净度比改造前提高了一万倍。投资83万元，1984年交付使用，是目前国内硅元件生产中最大的超净装置。改造后，投产的可控硅200安、整流500安以上的元件，提高了质量和水平，一次合格率比过去提高了8.9%，改善了生产条件，为发展生产，提高元件生产水平，增加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同时还投资42.8万元，对205试验站进行了技术改造，经过一系列的新建和技术改造后的西安电力整流器厂由原来生产仿苏水银整流器，发展成生产20个系列500多个规格的电力变流装置与五个系列的大功率可控硅整流元件，进而生产填补国内空白的直流输电线路晶闸管换流阀以及静止无功补偿装置。为朝鲜、泰国、巴基斯坦等22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产品，现已成为全国变流装置品种最多功率最大的变流装置生产厂之一，成为产品应用领域最大的电子电力器件与装置的生产科研基地和我国变流行业的直流和高压直流输变电产品的生产基地。

全厂占地面积8916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1466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2261.6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059.6万元。1986年有7个车间，23个科室，2所学校和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全厂工业设备原值为888.4万元。205试验站是国内最大的低压直流试验站，试验设备比较齐全，试验手段比较完善，从而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

至1986年，该厂为国家制造水银整流器157.3万千瓦，约占全国自制汞弧整流器的90%以上。西安电力整流器厂从水银整流器试制到淘汰，是我国水银整流器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它为我国化工、冶金、交通等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从1963年10月第一只大功率硅整流管在西安电力整流器厂诞生，到1973年3月汞弧整流器停产，西安电力整流器厂完成了硅变流装置与汞弧整流器的新陈代谢，使硅变流装置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西安电力整流器厂还为国防现代化作出了贡献。1964年以来多次为国防科研提供高精度稳压、稳流电源等装置，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从1964年以来，西安电力整流器厂的产品为国家填补空白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有12项。西安电力整流器厂在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中提高了产品质量，从而使优质产品不断增加。1980年，ZP—200安硅整流元件获陕西省优质产品，1984年，KGYA100/2440X2、250/3060X2稳压电源获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1985年，KGCA20-90/50-190KB隔爆型晶闸管充电装置获陕西省

优质产品，ZP－200安整流管、KP－500安晶闸管在1966年第二季度经中国电力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突击抽查全部合格，是抽查的20个同行业厂中惟一合格的厂家。西安电力整流器厂不但对出厂产品负责实行三包，同时负责对用户科技人员的实习和培训，从1981～1985年共举办各类用户技术培训班16期，培训技术人员1090人，接受用户来厂实习250人。

西安电力整流器厂从1965年到1986年，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3924万元，商品产值45333万元，电力整流器457.57万千瓦，19589台（套），自动化元件1300000只，试制成功新产品327种，上交利润税金总额16458万元，上交给国家的利税总额相当个西安电力整流器厂1986年末全部固定资产原值的7.25倍。

47. 西安电工铸造厂

西安电工铸造厂前身是西安开关整流器厂的铸造车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一个组成部分。厂房主体工程由苏联电器工业部国家动力设计院列宁格勒设计分院设计，1956年动工兴建，1961年正式启用。

1965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根据国务院推行专业化协作的指示精神，决定将西安开关整流器厂的铸造车间，划出成立西安电工铸造厂。西电公司制订了具体分厂方案，划定了厂区范围，确定了生产任务和技术服务方向，明确了基建、财务、机构、管理和生活服务设施等。9月15日正式宣布西安电工铸造厂成立，为西电公司直属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

西安电工铸造厂经过扩建改造，至20世纪8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个以满足西电公司主机内配为主、面向全国服务的中型专业化铸造厂，生产多种牌号的普通扶铸铁、球墨铸铁、可锻铸铁、铸铜、铁铝和高强度铝合金铸件，并为用户提供有色铸件机械加工服务。

西安电工铸造厂装备和工艺比较先进，主导产品均已采用国际标准，具备机械性能、磁力探伤、型砂试验、导电率测定、水压试验和化学分析，金相分析、光谱分析等检测和理化分析手段。西安电工铸造厂还是全国可锻铸铁情报网西北五省、区暨晋、蒙分网的网长单位和西安市铸造学会的挂靠单位，也是全国机械行业有铸造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在全国铸造行业和学术活动中有一定的影响。

工厂占地面积67955平方米，建筑面积48702平方米，其中生产建筑面积为26296平方米，职工住宅18721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985万元，职工总数915人。有四个生产车间、两个生产工段和一个辅助车间，一个铸造工艺研究室。主要生产设备204台，年产可锻铸铁件1000吨、铸铜件540吨、铸铝件792吨和有色铸件机械加1600吨以上的生产能力。另外还与外单位联合兴办了联营、协作分厂，现亦已形成年产972吨普通灰铸铁件和200吨分马力电机机壳和端盖的生产能力。西安电工铸造厂职工队伍具有良好的文化技术素质，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职工总数的43.6%，已评定初级、中级技术职称的各类专业人员有80人，有66名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管理、技术和科研工作。

西安电工铸造厂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建厂、动乱、整顿、发展的曲折过程：

1965年9月工厂成立，生产管理方面沿用原西安开关整流器厂的有关规章制度，

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分厂时，工厂占地面积57677平方米，主厂房建筑面积11900平方米，厂区房屋及建筑物固定资产为45万元。主要生产设备111台（套），固定资产2438万元。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了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由于广大职工发扬了主人翁责任感，一方面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作斗争，一方面组织力量对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使生产能力逐步扩大。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工厂在扩建和技术改造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如扩大了灰铸铁干模作业区生产面积，制造并安装了第三条机械化铸造生产线，对原灰铸铁第二条机械化铸造生产线进行了改造，将265/254大造型机更换为Z145造型机，扩大了铸工运输机台面，另外还将露天落锤栈桥间改建为机修厂房，将铁屑打包间平房改建为机壳生产厂房，采用了工频感应电炉和电磁阀半自动控制新工艺，自行设计并制造了一部分非标准设备，扩建了空压站等，使工艺线路更加合理，生产能力逐步提高。

1983年以来，按照市场对铸造件需求变化，工厂调整了产品结构和生产组织，1985年，将已停产的铸铁车间改造为铸铝车间；原有色车间改为铸铜车间；将钢帽厂房改成有色铸件机加工厂房，同年，把铸铁件和分马力电机机壳生产，扩散到分厂和协作厂，原机壳车间改建成高强度铸铝生产厂房，安装了铸铝熔炼设备，保留了铸铁熔化设备和生产手段，对各车间生产任务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需要。

西安电工铸造厂，是为西电公司各主机厂配套用各类铸件的专业化协作厂，至1986年，克服了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职工工资福利偏低的困难，为国家创造工业总产值12078万元，商品产值12886万元，上交税利721.9万元；为主机厂提供铸铁件29782吨，可锻件13983吨，铸铜件6415吨，铸铝件5466吨。工厂产值利润率5.98%，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为7368.7元/人。在生产经营方面，有七个亏损年度，累计亏损额为328万元，十三个盈利年度，累计盈利764万元，盈亏相抵，共为国家创利436万元，平均每年创利21.8万元。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正确贯彻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经济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率为6.8%，利润总额平均递增率为29%，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产值增长速度。

48.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简称兰石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的两个项目——兰州石油机械厂和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合并而成的制造石油钻采机械和炼油化工设备的大型骨干企业。工厂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金城，今甘肃省省会兰州市西郊七里河区，黄河南岸。主要任务是为我国发展石油、化工工业提供新的技术装备，为国家机械制造业培养人才，为国家“四化”建设积累资金。

新中国建立以前全国石油化工机械工业发展十分缓慢，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下，石油机械完全依靠进口，只有甘肃机器厂（现兰州通用机器厂）一家生产过少量配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府陆续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没收工作的完成，全国有11个工厂成为第一批国营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厂。但是这些厂只能生产一些农业、农副

业生产品加工及工厂企业恢复生产用的各种配件。石油工业所需钻采设备，还几乎是全部依靠苏联供给。

1952 年，根据我国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于 1952 年 5 月 9 日编制的五年发展方针中，曾提出了"将石油局之修理厂加以组织，成立一个石油业机器制造厂"的设想。同年 8 月 5 日，一机部一局提出了《建设石油机械制造厂意见书》。初步估计：石油机械每年成品重量约 31000 吨，其中包括钻杆 10000 吨，钻铤约 4100 吨，井架约 3850 吨。此后，我国政府确定在兰州建立石油机械厂。据此，西北军政委员会 1952 年 11 月 24 日发出通知，决定在甘肃省兰州市筹建兰州石油机械制造厂。1953 年 5 月 15 日中苏签订的贸易协定及 1953 年 8 月 20 日和苏联签订的合同中规定，将兰州石油机械厂年产钻采设备调整为 15000 吨。

我国确定建设兰州石油机械厂的同时，全国大型炼油厂的设计工作也在进行筹备，与之相配套的炼油化工设备生产基地也就相应地被提了出来。建国前，我国的炼油化工设备全部依赖国外提供，国内只进行一些小的修配及使用厂家进行一般性的维护保养，要为新建的大型炼油化工企业提供成套设备，仅仅依靠建国后刚刚改造的几个小厂，能力是远远达不到的。为了适应这一形势，1954 年 10 月 25 日一机部一局向一机部计划司正式提交了"关于建立炼油化工设备厂的初步意见书"。1955 年 3 月 12 日中国和苏联正式签订了新 15 项 405/2 号合同，其中包括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年产炼油化工设备 25000 吨。

为了尽快实现在靠近我国石油基地（当时为甘肃省玉门）的兰州建立与之相应的钻采机械制造基地，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从 1952 年年底，开始积极地筹集工作人员，并于 1953 年 1 月组织了筹建班子。1953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带领中央专家工作团来兰州，在确定兰州市城市性质和发展规模及工业布局方案时，于同年 12 月 13 日同意兰州石油机械厂建在兰州七里河区，1954 年 2 月 22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予以正式批准。1955 年 7 月 23 日，国家建设委员会以建午字第 37 号电报批准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建在兰州石油机械厂两面预留地带。1958 年 4 月 16 日，兰州石油机械厂与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合并，厂名为"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

工厂是按照国家批准的技术设计任务书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生产的产品有 50 多种，年设计产量为 41500 吨。全厂占地面积 139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9 万平方米，拥有万名以上职工，2000 多台设备，3 个商品制造分厂，5 个毛坯分厂，4 个辅助车间，10 个动力站房及铁路、公路运输系统。厂部设有经济计划、生产经营、技术开发、质量管理、人事教育五大体系，25 个职能处室。兰石厂生产的石油钻机，占国内钻机总数的 80% 以上。从辽阔的平原到浩瀚的海洋，从黄河之滨到大江南北，哪里有油田，哪里就有兰石厂生产的钻机；哪里有大中型炼油化工厂，哪里就有兰石厂生产的炼油化工设备。各类石油化工机械产品除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远销欧美、南亚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截止 1987 年底，共实现利税近 10 亿元，是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 4 倍多，被甘肃省评为一级企业。

整个建厂过程，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周恩来总理于1970年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接见了兰石厂代表，勉励兰石厂职工要为中国石油机械工业作出贡献。

早在建厂开始不久，一机部陆续从全国12个省市67个企业中，抽调1600余名年富力强、技术精湛的专业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兰石厂建设。上海、杭州、广州、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玉门油矿等地41个老厂，为兰石厂产前上岗培训了300多名分配来厂的大、中专毕业生和技术工人，使他（她）们成为兰石厂开工生产中的技术骨干力量。承担工厂技术勘测与技术测量、厂区土木建设、工厂设备安装工程的一机部一局西北勘测队、建工部七局一公司、一机部第三机电安装公司二处等单位的广大职工，头顶蓝天，脚踏坟滩，战酷暑，斗严寒，为兰石厂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兰石厂的建设与苏联的援助是分不开的。在兰石厂筹建初期，苏联专家就来到兰州帮助选择厂址，指导建设。苏联提供了全套工厂设计图纸和主要产品图纸、工艺资料及各种定额资料。提供了4000吨水压机等大型设备共150台，价值近人民币2600万元。苏方对兰石厂和中方配合设计的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共同派出的四批实习、考察人员给予热情的接待，为兰石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资条件和经验。

工厂创建初期，陇海铁路刚刚通车，兰州市只有20多万人，工厂筹建处设在市区的一院子房里，居住条件拥挤不堪，通往七里河工地只有一条坎坷不平积土盈尺的马车道，全市只有一辆用卡车改装的公共汽车，职工上下班来往10多公里全靠徒步奔走。生活用水要直接从黄河拉，一桶水要倒掉半桶泥。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来自祖国各地的开拓者没有留恋繁华城市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心甘情愿扎根西北黄土高原，忘我地战斗在沟壑荒坟的旷野上。建厂三十多年来，来自祖国各地的一批又一批职工，战胜了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等一系列困难，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起了我国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基地。

1979年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兰石厂打破了多年的封闭状态，采取派遣人员出国考察学习，邀请国外和港、台地区客商来厂参观等形式，开展技术交流，技术服务，洽谈贸易，先后从美国、西德、英国、日本等国引进了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结合“六五”改造规划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造。与此同时，工厂逐步转变观念，从过去的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从抓产值产量转向“三上一提高”（上质量、上品种、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从主要为国内市场服务转向既为国内又为国外市场服务，并按国际标准进行生产，从而提高了生产活力，扩大了销路。许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开创了生产经营的新局面。尤其1985年，利润达7666.3万元，销售税金达1700.3万元，创建厂以来经济效益最好水平。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投产三十多年来，为我国的石油化工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装备，成为国内最大的石油钻采机械和炼化设备生产基地。1987年有固定资产原值30211万元，净值15923万元：从投产到1987年，累计完成产品产量674454.95吨，实现利税总额97735.88万元，是国家固定资产投资22765万元的4.29倍。在石油钻采机械方面，共生产石油钻机25种、948台、133674吨。生产国内抽油机21种、国外市场7个规格8642台、145284吨。其中228型抽油机和SL200——*型水龙头于1983年、1984年分别

获得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LST—＊型水位自动调节器被评为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ZJ45J钻机被国家经委评为技术开发优秀新产品，并被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DS—45电磁涡轮刹车1987年获甘肃省优质产品称号，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作出了贡献。在炼化设备方面，从1960年到1987年共生产炼化设备194808吨。其中400立方米球形贮罐（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设计、四川工业设备工程安装公司安装）荣获1984年国家银质奖。8336～8339原油浮头式换热器、150立方米卧式贮罐被评为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生产的产品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截止1987年，提供的石油钻机占全国油田钻机拥有量的80%左右；提供的抽油机占全国机械系统抽油机生产总量的65%；提供的炼化设备占全国炼化设备制造行业产品总量的30%。部分产品还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菲律宾、阿根廷、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基斯坦、朝鲜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49. 哈尔滨锅炉厂

哈尔滨锅炉厂是以生产配套5万、10万、20万、30万、60万千瓦发电机组锅炉为主导产品的电站锅炉及配套辅机阀门和石油、化工容器、核能设备制造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4年破土动工，1957年正式投产。

建厂三十多年来，生产、技术有很大发展。从建厂初期只能仿制苏联的中压锅炉发展到目前能够批量生产各种型号的超高压锅炉。特别是从1981年引进美国CE公司亚临界控制循环锅炉技术到1986年9月提前完成国产首台具有当代世界水平的高参数、大容量60万千瓦锅炉的试制任务，标志着工厂的设计制造能力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产品产量由建厂初期的年产13.3万千瓦发展到1987年的225万千瓦。到1987年底，已累计生产电站锅炉428台，产量占全国总装机（包括进口发电设备）容量的1/3，居全国同行业之首。还研制了24万吨尿素合成塔、CO2汽提塔、催化裂化装置等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石油、化工容器，装备了19个省、市的20多个炼油厂和30多个化工厂。此外，还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制了全国首台核低温供热装置，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发展城市供热开辟了新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该厂不断深化内部配套改革和强化企业管理。1986年、1987年两年先后被评为国家一级标准化企业、国家一级计量单位，荣获全国推进技术进步全优企业奖、部级质量管理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成为全国首批国家二级企业之一，同时获得二级节能企业称号。1987年，该厂取得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颁发的ASME制造许可证，证明了工厂已完全具备按国际先进标准制造动力锅炉和常规、特殊压力容器的能力。按ASME标准设计并制造的产品已经打入国际市场。

该厂的产品质量持续稳定提高，曾连续7次获得全国同行业联合检查第一名。其中10万、20万千瓦锅炉的可用率达到全国最高水平；30万千瓦锅炉在全国首次电站设备招标中独中三标；60万千瓦锅炉的试制成功荣获新产品开发奖。共14项大中型产品被评为国家、部和省、市优质产品。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32764万元；工业净产值100043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1740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23636万元；产品销售收入35457

万元；年末职工人数9434人；全员劳动生产率32237元/人·年。

50. 武汉重型机床厂

武汉重型机床厂是国内最大的制造重型机床和超重型机床的骨干企业。“七五”期间被列为国家重点技术改造企业。

1987年，该厂有职329877人，占地面积125万平方米，拥有主要生产设备1727台。设有理、化、声、热、力及长度计量测试中心，还有一个具有二十五年历史，专门从事产品开发、科研和全国重型机床专业归口工作的重型机床研究所。

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该厂生产的产品从建厂初期的5大系列、17个品种，发展到10大系列、130多个品种，生产的各种立车、龙门镗铣床、铣镗床、滚齿机、卧车、轧辊磨床、回转工作台等行销国内28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外18个国家和地区，先后为能源、交通、冶金、矿山、航天等部门建设及出口提供了230多种、8000多台产品。到1987年底，累计工业总产值11亿元，上缴利税2.5亿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80年代以来，该厂坚持把产品开发放在首位，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加速新产品开发，平均每年推出10种以上新产品，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先后研制成功了XK2120/5数控龙门镗铣床、CK5240A数控双柱立车、W032铝锭双面铣床、TK6916数控落地铣镗床、XK2116数控龙门镗铣床、CH5116数控切削加工中心等新产品，这些产品大都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多次受到国家、省、市的嘉奖。同时，该厂与联邦德国席士——弗罗里普公司合作生产的DKE系列高精度立车、FB系列数控落地铁镗床和TDV系列回转工作台深受用户的欢迎，已成为国内外同类产品竞争的佼佼者。

1988年该厂荣获武汉市承包经营先进企业称号，市优秀管理企业奖，连续三年荣获武汉市新产品开发先进单位称号，荣获机械电子工业部“六五”时期技术改造优秀单位称号，被评为湖北省先进企业和出口创汇先进单位，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

80年代中期以来，该厂以抓管理上国家一级企业为总目标，以厂长负责制为中心，以进一步推行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为重点，不断完善配套改革的措施，使企业经营机制更趋完善。同时，依靠科学管理和技术改造两个翅膀，使产品向数控精密重型机床、加工中心、柔性加工系统发展，迅速跨人世界一流水平，以迎接新的挑战。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8045万元；工业净产值288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760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7537万元；产品销售收人7559万元；年末职工人数9877人；全员劳动生产率5910元/人·年。

51. 哈尔滨汽轮机厂

哈尔滨汽轮机厂是“一五”期间“156项”重点项目中的两项，是一座专门制造大型调峰、冷凝及供热式电站汽轮机、燃气轮机及其它动力装置的工厂，是中国大型骨干企业之一。

该厂从仿制苏联25兆瓦汽轮机开始，到设计制造了第一台100兆瓦、200兆瓦、300兆瓦及600兆瓦汽轮机组，投产三十年来共提供328个品种不同型号的电站汽轮机，

占全国国产机组装机容量1/3，产品遍及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的近百个电厂，其中部分产品远销欧亚地区，特别是三缸两排气210兆瓦汽轮机，在巴基斯坦有6国7家公司参加的国际投标中中标，标志着大型汽轮机已进入国际市场。

该厂的主要产品有：（1）25兆瓦、50兆瓦、100兆瓦、200兆瓦（两排汽和三排汽）、300兆瓦、600兆瓦冷凝式电站汽轮机。（2）从25兆瓦到200兆瓦的各种类型热—电联供汽轮机；（3）风量为760～900标准/分和压比9以下的四个风机系列。成套供应包括工业汽轮机、轴流风机、齿轮箱、电动发电机、烟气轮机及自动同步离合器在内的轴流风机机组；（4）2.5、5万马力和12兆瓦及以下功率的工业汽轮机；（5）2兆瓦～20兆瓦燃气轮机和烟气轮机；（6）粮油食品机械：日处理植物油料50吨、100吨及100吨以上的油浸出设备、植物油精炼设备等；其他产品功率20兆瓦以下、速比10以下的行星减速器；各种齿轮箱；各种压铸件、铸钢件、铸铁件等。

该厂有技术人员将近1400名，其中，高中级工程师800余人。工厂配备了从美国、联邦德国、瑞士和苏联进口的20余种60余台先进的检验仪器和设备，如电子扫描显微镜、三坐标测量仪、图像分析仪、X射线衍射仪、X光和钴60探伤设备等。为了适应300兆瓦、600兆瓦大型汽轮机和1000兆瓦核电站汽轮机的制造要求，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陆续从美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家购置了数控轮槽铣床、数控落地镗铣床、转子车床、数控龙门铣床以及围带车床等，尤其是从联邦德国购置的DH－12型高速动平衡及超速试验设备，凡经该设备做过高速动平衡及超速试验的汽轮机转子，其振动均能达到优秀标准。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6491万元；工业净产值5476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4886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23589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6892万元；年末职工人数10313人；全员劳动生产率15990元/人·年。

52．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于1955年1月正式建成投产。主要生产标准刃具、通用量具和精密量仪三大类产品，生产品种近百、规格超千，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型精密工具制造骨干企业之一。

1987年，该厂有17个生产车间、分厂，近7000名职工（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30人，管理人员885人），占地面积62.5万平方米（其中生产面积29.2万平方米），拥有1640台主要生产设备（其中金属切削机床1216台），固定资产原值10914万元，净值3761万元。

建厂以来至1987年，该厂累计上交利税4亿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10倍，先后试制成功了新产品254种。1958年以后不断开发了技术密集型的量仪产品，填补了国家空白，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机械工业系统新产品开发“春燕奖”、“金龙奖”；开拓了国内外市场，提供了经济效益。在此期间，还以成套技术和干部援建和分迁了成都量具刃具厂等5个工具制造企业，为我国工具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一定贡献。

20世纪80年代，该厂曾有26种产品分别获国家、部、省三级优质产品，其中：量块获国家金质奖，千分尺、百分表、万能齿轮测量仪获国优银质奖，直、锥柄麻花钻、

机用丝锥、扭簧比较仪等9种产品获部优质产品，万能渐开线检查仪、千分表、手铰刀等13种产品获省优质产品。1987年该厂优质品产值达5 325万元，占全厂工业总产值的71.6%，居同行业首位。

该厂根据工具市场的预测和工厂经销战略，抓住国际货币汇率变化的有利时机，立足国内，开拓国外，在继续巩固西欧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东欧和北美市场，并不断扩大出口品种，使出口品种由原来的6种激增到15种，出口产值由1986年的1 234万元猛增到1987年的2654万元，由同行业出口产值第四位跃居第一位，1987年被国家机械委批准为“出口基地企业”。

1978年以来，该厂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加速改造、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生产、销售、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持续同步增长，1987年被国家机械委正式批准为国家二级企业。

该厂在技术改造上重点发展了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大型精密量仪、电子数显量具和磨制、涂层刃具等中、高档产品，以生产高质量、高水平的产品更好地满足了社会需要。

1987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工业总产值9282万元；工业净产值3536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761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用额3647万元；产品销售收入9611万元；年末职工人数6974人；全员劳动生产率10772元/人·年。

第六节 石油化学工业

53～56. 吉林化工区（吉林染料厂、吉林化肥厂、吉林电石厂、吉林热电厂）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在吉林省的11个重点项目中，吉林市占了7项。7项中有4项集中在吉林市松花江北岸建设。当时，中共吉林省委和吉林市委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对此非常关心和重视，建立了吉林市人民政府支援重点工程工作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仅1954年，就为重点工程解决了351万平方米的建筑用地，翻修了77607平方米的道路，在松花江增加了3个渡口、4个码头，有力地保证了重点工程备料运输任务的完成。

坐落在吉林市松花江北岸的吉林化工区，是“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我国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吉林化工区的建设规划是由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业部化工管理局组织设计处和研究室制定的，由苏联派专家援助建设。这个化工区包括吉林染料厂、吉林化肥厂、吉林电石厂（简称三大化）和供应三厂蒸汽和电力的吉林热电厂。

吉林染料厂是1953年开始动工兴建的，到1962年全部建成，厂区建地面积为80公顷，厂房建筑用地17公顷。形成了生产对硝基氯化苯、阴丹士林、乙萘酚等多种染料近6000吨的能力。吉林化肥厂是1954年4月破土动工的，1957年10月竣工投产，生产能力为年产合成氨8万吨，硝氨16万吨。吉林电石厂的前身是吉林化工厂，经过改建、扩建，到1962年形成了年产电石6.35万吨的能力，并能生产焦炭等多种产品。据统

计，“一五”计划期间，这3个大型化工建设项目先后共挖土石方300万立方米，耗用红砖2.3亿块，安装设备3万多台、高中压管道和管件1万多吨，铺设上下水管线150余公里。为了把长达100米，重达100吨的硝酸排气筒安装就位，在施工装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工人们大胆创新、采取了在地面上逐节焊接，然后凭四个据点的卷扬机和推土机的协同动作，整体吊装一次成功并安装就位。凭着这么一股坚韧不拔的劲头，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染料厂和化肥厂。

1958年，在三大化工企业的基础上，成立了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吉化公司），并开始了二期扩建工程的建设。到1965年二期工程完成时，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都有了成倍增长。阴丹士林翻了一番，合成氨为原设计能力8万吨的4.5倍，电石从5万吨增加到7.5万吨。

从1970年起，吉化公司开始了由以煤为原料向以石油为原料的转变。1970年新建的吉化公司炼油厂于1978年建成投产，实际完成基建投资1.5亿元。同时，从1976年开始，新建吉化公司石油化工总厂，安装新装置10套，设计能力为年产11.5万吨乙烯、8万吨丁苯橡胶等产品，至1982年建成，累计完成基建投资15.2亿元，各套装置一次试车成功。从此，吉林省的化学工业由单纯的煤化工转向了以石油化工为主。

吉化公司的建成和发展，为吉林省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吉林省相继建成了四平联合化工厂、吉林市石井沟联合化工厂、吉林省长山化肥厂、吉林市第四化工厂等一批大中型骨干化工项目，还建成了一批小型化肥、农药、橡胶加工、涂料等项目。

57. 兰州炼油厂

在甘肃省兰州市西郊的黄河之滨，坐落着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炼油厂——兰州炼油厂。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由苏联设计和提供设备。这个厂的建成投产，标志着中国炼油工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诞生不久，为了改变石油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国家在筹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时，根据当时探明的石油资源集中在西北的情况，决定在兰州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炼油厂。这座中国首次兴建的规模较大、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燃料——润滑油型炼油厂，原设计16套生产装置，年加工原油100万吨。一年的加工量比旧中国四十二年的原油总产量还多，建成后可缓解石油产品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

1952年，厂址勘探队跋山涉水，用了一年多时间，调查了14个区县，先后对10几个厂址的水文地质和交通情况进行细心勘测和反复比较，最后确定在兰州西固地区建厂。1956年，国家为了建设兰州炼油厂，从上海、大连、玉门等地抽调人员组建起工程建设队伍。他们怀着“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雄心壮志，先后汇集到兰州，揭开了建设兰州炼油厂的序幕。同年4月29日，兰州炼油厂正式破土动工。兰州炼油厂工程总投资1.7亿元，设计单元100多个，最高的装置构筑物达73米，单体设备中最重的有170多吨，工艺管道长达860公里，并排敷设最宽的地方有70多米，土方工程量达200万立方米。在当时的条件下，建设兰州炼油厂这样大的工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参加建厂的广大职工和石油部第二安装公司，建工部三局一公司、五公

司，七局二公司等兄弟单位的职工，以英雄的气概，夜以继日地加紧工程施工。当时，职工们住的是自己盖的土坯房、铁皮房、竹板房，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大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为能亲自参加建设自己的炼油基地而感到自豪。

在建厂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工程全面铺开，结果战线拉长，力量分散，拖延了大量收尾工程。1958年将工程项目按轻重缓急进行排队，按系统、按单元集中力量施工，安排一批，完成一批，投产一批，主攻方向明确，提高了施工速度和效率。在施工组织方面，一是实行了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并组织了与之相适应的包括多工种在内的混合班组；二是扩大预制和装配范围，推行工厂化施工，实行整体吊装；三是由甲乙双方联合成立指挥部，实行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使施工速度大大加快。由于广大建设者的创造性劳动和全国上百家厂矿的协作支援，1958年9月，兰州炼油厂一期工程胜利竣工，比原设计提前了一年零三个月，建厂总投资比国家预算节约5.57%。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兰州炼油厂的电脱盐、常减压、热裂化、氧化沥青等5套装置分批投入试生产，生产出汽油、煤油、柴油等6种油品。

兰州炼油厂出油的喜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接待了来自大西北的客人。叶剑英元帅对报喜的代表说："我们空军、海军都需要大量的油料，希望你们炼出更多更好的油品。"投产初期，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亲临视察，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还为兰州炼油厂开工亲笔题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亲切关怀，如春风化雨，成了鼓舞全体职工前进的巨大力量。

兰州炼油厂投产不久，便遇上了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由于苏联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国内各种石油产品非常紧缺，特别是军用油品的生产和供应更为紧张，急需增加油品产量，扩大油品品种。另一方面，职工生活也面临很大困难。兰州炼油厂7000多名职工中，由于营养不良，有1400多人患肝炎，2000多人身体浮肿，工人们正常倒班都难以坚持。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兰州炼油厂党委通过组织职工学习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领会精神，分析形势，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职工们说：千困难、万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咱们勒紧裤带也要炼出争气油。表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

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兰州炼油厂根据石油部提出的"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坚守阵地，保证生产"的要求，及时作出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决定，动员全厂职工大搞农副业生产，千方百计改善生活，保证炼油生产。他们先在厂区空地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鸡，继而又在永登、甘南、靖远等地开办了农牧场。在坚持工业生产的同时，把三班倒改成两班倒，抽出2000多名职工奔赴务农场及四川若尔盖、甘南、青海等地，在气候十分恶劣的草原上，采草籽，收青稞，打野物。靠着这种不怕苦，不怕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厂共收获粮食100多万斤，蔬菜590多万斤，改善了生活，增强了职工和家属的体质，保证了炼油生产。

三年困难时期，蒸汽、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给生产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当时，厂领导一方面教育群众，克服和防止"有汽就干，没汽就散"的消极思想，一方面组织职工开展节约用汽、用电的活动。在工作布置上，采取"蒸汽大来大开，小来小开，不来就

组织练兵和维护设备”的做法，千方百计，坚持生产。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职工队伍非但没有垮下来，而且经受了锻炼。为了加紧生产国家急需的一系列石油产品，兰州炼油厂按照石油工业部提出的“石油产品三年过关，五年立足国内”的奋斗目标，顶着生产上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掀起了改革原设计，采用新工艺，研制新产品的热潮。当时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的徐今强提出：国家需要什么油，我们就要生产什么油。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集中全厂主要技术力量成立了石油炼制研究所，组织了各种攻关小组，从解决当时国防急需的“三航”、“两剂”入手，开始了积极发展新产品的科研攻关。

在研制、生产新产品中，兰州炼油厂以军用油为突破口，带动普通油的质量和品种。主攻目标选准了质量要求高、技术比较复杂的特种润滑油（20号航空润滑油）。苏联专家在建厂初期曾断言：用玉门原油，在兰州炼油厂不可能生产出这种特种润滑油。兰州炼油厂的科技人员，敢于探索和创新，他们进行了500多次试验，取得了6000多个数据，初步摸索出了比较成熟的方案，并投入了试生产。副总工程师毛鹏飞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吃在车间，住在车间，日夜奋战，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摸索出了成熟的工艺方案，终于在1962年生产出了质量合格的20号航空润滑油，及时保证了国家的急需。兰州炼油厂先后研制成功了航空汽油、航空煤油、电缆油、压缩机油、轧钢机油等一批新的石油产品。到1962年底，全厂生产的石油产品由原设计的16种达到70种。

“两剂”（即石油添加剂和催化剂）是炼油工业不可缺少的两大材料。没有高质量的催化剂，就不能发展石油的深度加工，就生产不了高质量的航空汽油和车用汽油；没有添加剂，就没有现代的润滑油工业。当时，兰州炼油厂催化裂化装置生产航空汽油需要的硅铝小球催化剂，只有美国、联邦德国、苏联等少数几个国家生产，中国只能从苏联进口。1960年以后，为使小球催化剂的生产立足于国内，石油部决定动员全国科研、设计和生产力量，在兰州炼油厂建造一套小球催化剂装置。参加建设的职工团结战斗，日夜苦干，用了一年多时间，在1964年5月建成了国内第一座小球催化剂装置。经过两个多月的试运转，在当年秋季，生产出第一批国产小球催化剂，结束了依赖进口的历史。1966年元旦前夕，兰州炼油厂又建成硅铝微球催化剂装置，生产出了第一批流化催化裂化装置使用的微球催化剂。

在60年代初，中国油品使用的添加剂也是从苏联进口的，价格昂贵，条件苛刻。1960年10月，兰州炼油厂成立了三分厂，开始进行石油添加剂的研究和试生产。参加试制攻关的人员先建起了一个简易的露天装置，经过390次试验，摸清了添加剂生产的规律，为大批生产创造了条件。1964年，兰州炼油厂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了大型浮游多效添加剂装置，为添加剂的生产奠定了基础。经过试生产，拿出了一批质量合格的添加剂产品，改变了从国外进口这种添加剂的局面。1963年12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我国石油产品已基本自给》的消息，宣告了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这振奋人心的成就，包含着兰州炼油厂职工的心血和汗水，是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

1962年，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和新疆原油产量的增长，兰州炼油厂加工的原油从

原来由玉门供应转为由大庆、新疆供应，因而运费比过去提高了50%以上。仅此一项，生产成本就比上年超支5000万元，工厂从开工以来年年盈余将转为亏损，计划亏损达2600万元。厂党委提出了“争取少亏本，力争不亏本”的奋斗目标，发动职工献计献策。生产部门分析各种原油的特性，编排了多种生产方案，从中找出经济效益最好的方案，为合理利用各种原油、提高收率找出了途径。针对原油运输过程中损耗较大问题，厂里组织调查小组万里跟车作调查，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查清了原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为降低成本、提高综合商品率创造了条件。同时，全厂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核算活动，采取了班组、车间、厂部三级经济核算制度，坚持做到“日核算、旬检查、月分析”，“先算后干”。厂部主要领导在每天召开的调度会上，都要讲评各单位“日核算”的情况，眼睛盯着经济效益指挥生产。全厂还积极开展了群众性的“节一”（节约一滴油、一度电、一滴水、一寸材料等）活动，组织职工采取多种措施，如推行端面密封等方法，降低了机泵的泄漏率。机械厂有个老工人积极修复报废的合金刀具，每年给国家节约上千把新刀具，节约工具费2万元，受到石油部的表扬。与此同时，还注意搞好综合利用，变无用为有用，把家属组织起来，回收废油、废蜡膏，制成凡士林、油毡等产品供应市场，增加经济收入。

经过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1962年全厂年终决算时不但没有亏损，反而实现利润631万元，向国家上交利润475万元。1963年7月，兰州炼油厂被国家经委推荐表彰为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厂长贾庆礼受到周恩来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亲切接见。

1978年以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兰州炼油厂勤俭办企业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全厂有计划地开展了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在节能降耗上下功夫。1985年和1978年相比，全厂加工原油的总损失率由2.447%降低为2.29%，相当于节约原油12.3万吨；平均加工每吨原油的能耗降低了39.76%，合计节约金额达1721.2万元。同时，建立健全内部经济责任制，实行内部利润、内部资金指标、内部定额费用等考核制，开设“内部银行”，使用内部本票，进一步加强厂部、车间、班组三级核算和三级分析制度，改善了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1985年和1963年相比，全厂原油加工量由100万吨增加到250.8万吨，增长了1.5倍，利税总额由8438.7万元增加到4.16亿元，增长了3.9倍。在原油和运输成本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平均加工每吨原油实现的利税仍由83.8元增加到165.86元，增长了1倍。

1959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给兰州炼油厂题词中指出：“力争石油生产的量多、质好和品种齐全，以逐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多年来，兰州炼油厂的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把周总理的指示铭记在心，博采众长，融合提炼，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质量管理办法。努力深化质量意识，始终把眼睛盯在产品的质量上。1966年，385号罐的变压器油因保温不合要求发生变质现象，厂长贾庆礼召开现场会议，带头作深刻检查，并把事故油样分装小瓶，贴上“莫忘教训，牢记对革命负责”的标签发给各单位领导，在全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78年，发运到新疆某部队的70号车用汽油在贮存中发生沉淀，党委书记王金堂亲自去新疆调查处理，由于领导在产品质量上的态度严肃，在全厂

广大群众中逐渐形成了在质量上自觉从严的好传统、好作风。

从1980～1985年，累计组织质量管理小组2684个，召开车间、分厂和厂级发表会638次，取得成果1184项，直接经济效益达到3209万元。先后有9个小组被评为全国优秀小组，18个小组被评为省级优秀小组，34个小组评为部（总公司）级优秀小组，772个小组被评为省局级优秀小组。高铝分子筛微球催化剂质量攻关小组，经过两年努力，使这种催化剂的活性、抗重金属污染能力等主要质量指标达到国际同类催化剂的水平，使每吨产品的成本降低了24.6%，1981年和1983年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兰州炼油厂原设计为年加工原油100万吨的单一炼油厂。1958年9月建成投产以后，经过不断的改造扩建，逐步发展成为以炼油为主，兼有化工生产、机械仪表制造、建筑安装和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企业。全厂原油加工能力提高到300万吨，炼油化工装置由原设计的16套扩大到48套。20世纪60年代初期，兰州炼油厂研制开发了以“三航”（航空汽油、航空煤油、航空润滑油）、“两剂”（炼油催化剂、石油添加剂）为代表的一系列石油化工新产品和滑阀、气动Ⅱ型仪表为主的炼油机械、仪表产品，为中国石油产品立足国内、实现全部自给出了力。70年代以后，又研制出一批质量较好的润滑油、润滑脂和催化剂、添加剂，以及具有先进水平的烟气轮机、Ⅲ型仪表、钻采仪表和在线质量自动分析仪表，为满足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和引进装置、设备、车辆的需要作出了贡献。至1987年，全厂累计生产的石油化工产品品种达到281种，比原设计的16种扩大了17倍。在120多种主要产品中，有3个品种获国家金质奖，8个品种获国家银质奖。从投产到1985年，兰州炼油厂累计加工原油3890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149.78亿元，实现利润和税金56.93亿元，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部固定资产原值的12.37倍。兰州炼油厂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培养锻炼了一支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的职工队伍。投产以来，先后向其他炼油企业、兄弟厂矿输送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8000多人，被人们誉为中国炼油工业的基地和摇篮。

58. 抚顺石油化工公司

抚顺石油化工公司（简称抚顺石化公司），建立在辽宁省抚顺市。它是在1982年3月经国家经委批准，由抚顺石油一厂、石油二厂、石油三厂和抚顺市化学纤维厂、化工塑料厂联合组成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原名抚顺石油工业总公司。1983年划归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领导后，改名为抚顺石油化工公司。

抚顺是中国著名的煤城，其煤层上部伴生的油母页岩资源丰富，储藏量有50多亿吨，含油率为6%～10%。20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东北后，出于侵略、掠夺的需要，1925年开始利用抚顺西露天矿的油母页岩进行干馏制取页岩原油的研究，开发了内热式干馏技术，并取得工业化试验的成功。1930年抚顺页岩油工业从此起步，但发展速度缓慢。1928年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抚顺煤矿（抚顺矿务局的前身）正式筹建西制油厂（石油一厂前身），以西露天矿的页岩为原料，生产页岩原油。1930年，这个厂的东部干馏车间四部80台干馏炉建成投产，接着又建设西部干馏车间三部60台干馏炉，于1942年建成。上述设备设计年产页岩原油26万吨。与此同时，相继建

设了常减压蒸馏装置和热裂化、釜式焦化、石蜡、柴油酸碱精制、合成润滑油等炼制加工装置，最高年产量是1943年，产页岩原油25.7万吨。在建成石油一厂之后，又以东露天矿油母页岩为原料，计划建设年产页岩原油50万吨的抚顺炭矿东制油厂（石油二厂前身）。但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只建成页岩破碎设施及三部60台干馏炉，仅进行了两部40台炉的试生产。1944年产油4万吨，原计划建设的蒸馏、焦化、石蜡、柴油酸碱精制等加工装置均未建成。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8年10月抚顺解放之前，在国民党统治的三年中，石油一厂总共生产的页岩原油还不到2万吨；石油二厂、三厂全部停产。这期间，各厂都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石油二厂、三厂，厂区变成了废墟，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进行抚顺石油工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1950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工业会议，决定抚顺为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重点地区之一，批准抚顺各油厂开始恢复建设，并拨给资金，调配工程技术干部，有力地加快了恢复生产的进展。到1952年，石油一厂全部恢复了页岩干馏和硫酸、硫铵、釜式蒸馏、热裂化、釜式焦化、柴油酸碱精制、石蜡、润滑油等装置，当年生产页岩原油22.61万吨，产品主要有汽油、柴油、石蜡和润滑油。1953年恢复了常减压蒸馏装置，1954年热裂化装置由非残油式改为残油式生产流程，提高了处理能力。

1950年石油二厂开始恢复生产。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工厂恢复工作一度中断，到1952年重新进行。1954年5月，第一部干馏装置20台干馏炉恢复生产，接着第二部、第三部干馏装置共40台干馏炉也于同年10月相继恢复生产。1955年，生产页岩原油17.1万吨。由于页岩原油在加工精制过程中损失很大，产品中又含有大量的硫、氮化合物，难以炼制出优质石油产品。为此，在积极恢复石油一厂、二厂页岩原油生产的同时，对石油三厂加氢装置也抓紧开展了恢复工作。石油三厂是一座受到严重破坏、已停工四年的工厂，又缺乏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技术干部，熟练的技术工人也很少，给恢复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因此，1950年首先广泛招聘技术人才，随后于当年6月正式开始加氢装置的恢复工作。经过一年的奋战，1951年6月第一套高压加氢装置恢复生产。用这个厂与抚顺研究所共同研制的催化剂，以石油一厂经碱洗的1号页岩轻柴油为原料，进行加氢试生产，当年生产汽油3000吨。1953年和1956年，又先后恢复了第二套和第三套高压加氢装置，从而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石油高压加氢工厂。

在恢复生产的同时，国家便着手进行扩大页岩油生产能力和建设加工装置的准备工作。1956年，国家计委批准了石油二厂扩建工程计划，即建设年产页岩原油60万吨的页岩干馏装置及相应的加工装置和辅助装置。1958年，国务院批准该厂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建设铂重整、柴油加氢精制、接触焦化等装置，生产喷气燃料等优质石油产品。1959年12月，新建的四、五部干馏装置共40台干馏炉投入试生产，六七部干馏装置工程已部分完工；此外，加工装置亦已开始施工，引进国外的加工设备也已订货。但由于苏联停止援建项目，东露天矿被迫停建，四五部干馏装置因页岩供应不上，被迫于1961年停产，随之六七部干馏装置和加工炼制装置工程也被迫停工。但是，依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建成投产了配合页岩干馏装置扩建而建设的硫铵结晶装置、年产8万吨硫

酸装置和8.7万千瓦热电厂。

石油一厂在全面恢复生产后，展开了扩建页岩干馏装置的工作。1956年11月建成投产第八部24台干馏炉，1958年产页岩原油48.3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在页岩干馏气体中，每立方米含有15～25克轻质汽油组分（又称轻质油）。为了回收利用这部分资源，增产轻质石油产品，1957年石油一厂和石油二厂分别采用油吸法工艺流程，建设投产了轻质油回收装置，年产轻质油分别为7万吨和2.5万吨。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群众对页岩干馏生产进行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在页岩利用方面，将入炉页岩的块径下限从20毫米降到8毫米，使页岩利用率由60%～65%提高到80%。炉型结构方面，在干馏炉顶部增设预热段，成为有预热、干馏、气化的三段干馏炉，使处理能力提高了30%。由于提高了干馏操作技术，又从干馏气体中回收轻质油，使采油率由60%～65%提高到75%以上；每吨页岩油耗页岩由360吨降到25吨，干馏炉的设备运转率由72%提高到95%。到1959年，石油一、二厂共有页岩干馏炉224台，年产页岩原油72万吨，轻质油9万吨，硫铵18万吨；产值2.7亿元，利税1.3亿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页岩油工业基地之一。

1960年以后，抚顺西露天矿进行调整，页岩产量下降，页岩原油的产量也随之下降，1966年产油48.1万吨。1977年以后，石油一厂只有东原油车间80台干馏炉、石油二厂原油车间只有40台干馏炉维持生产，生产页岩原油23万吨左右。

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中国石油工业历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抚顺石油工业大发展的新起点。从1962年起，抚顺石油工业由单一的生产页岩原油向加工大庆油转变，并不断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改造老装置，建设新装置，扩大加工能力，提高加工深度，逐步建成了大型炼油企业。石油一厂1960年开始试炼大庆原油，1962年起西蒸馏装置全部加工大庆原油。为了适应大庆原油高速增长的形势，1964年石油一厂对西蒸馏装置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原油日处理能力由1160吨提高到1500吨。1962年，石油二厂开始大规模扩建，1963年建成投产了年处理能力为50万吨的北蒸馏装置，1964年经过技术改造，使年处理能力达到75万吨。1964年，该厂建成投产年处理能力为100万吨的南蒸馏装置，第二年便对这套装置进行技术改造，使处理能力达到200万吨；1966年再次进行了改造，使年处理能力达到250万吨。到1966年，抚顺各炼油厂原油一次加工量达到363.86万吨（包括页岩原油48.1万吨），其中石油一厂95.13万吨，石油二厂268.73万吨。

1971年以前，大庆原油都是用油罐车经铁路运输的。1971年大庆油田的长距离输油管道通到抚顺，连接了石油一、二、三厂，为进一步提高这些厂的原油加工量、扩大生产能力创造了条件。在输油管道即将接通抚顺的前夕，各炼油厂便开始改造现有装置。1970年，石油一厂改造了西蒸馏装置，使年处理能力达到75万吨。石油二厂也在北蒸馏装置采用浮阀加筛孔复合塔盘等措施，使年处理能力达到220万吨。至此，石油二厂的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到了470万吨。输油管道建成投用后，石油一厂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在原东轻质油装置的基础上，于1972年改建投产了年处理能力200万吨的常减压蒸馏装置（即东蒸馏装置）。经过后来对装置的填平补

齐，这个厂的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到每年300万吨。1971年，石油三厂建成投产了年处理能力为120万吨的常减压蒸馏装置，加工大庆原油，直接为加氢提供原料。到1972年底，石油一、二、三厂的原油加工能力合计达到890万吨。以后，在进行以节能为中心的历次技术改造中，各装置的处理能力又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逐步达到920万吨。1976年原油实际加工量为782.6万吨，1980年达到841.7万吨，比未炼大庆原油以前的1959年增加了11倍。

到1985年，抚顺石化公司石蜡产品品种已发展到精白蜡、全精炼蜡、半精炼蜡、食品蜡、食品包装蜡等16个牌号。由于质量优良，在国内、国际市场都十分畅销，全年产量达到14.73万吨，其中出口3.35万吨。

1978年以来，抚顺石油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抚顺石化公司成立以前，石油一、二、三厂属于石油部领导，化纤厂、化塑厂是地方企业，虽然都在抚顺市，但由于条块分割，在生产上相互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各厂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潜力不能充分挖掘，油气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宏观经济效益不能进一步提高。公司成立后，充分发挥公司和所属工厂两个积极性，不断加强厂际之间生产要素的结合，协调厂与厂之间的联系，搞好综合平衡，从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经济效益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85年原油加工量比1980年虽然减少了55.1万吨，降低了6.5%，但实现利税比1980年增加2.98亿元，增长5.6%，平均每年增长6.3%。

自1982年公司成立以来，由于充分发挥联合的优势，统筹安排工程项目，集中使用建设资金，深度加工能力提高，平均每年增产80万吨，四年累计增加利税5.46亿元。1985年，汽、煤、柴、润和溶剂油、石脑油的产量占全部石油产品产量的66.27%，比1980年提高5.62%；燃料重油产量占全部石油产品产量的29.9%，比1980年降低7.8%，增产了市场急需的汽、煤、柴油等轻质石油产品。

1978年以后，抚顺各炼油厂进一步加强了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各种产品的质量标准尽可能采用了国际标准。1983年配合企业的整顿验收，公司对各厂标准化工作机构也同时进行了充实、调整。1984年，公司紧紧抓住审核、把关、定向工作，组织各厂对所有产品的质量标准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对一些标准进行了复审修订，使全公司消灭了无标准的产品。石油三厂3814催化剂采用国际标准后，选择性、稳定性超过了从国外进口的同类产品。从此，国内不但不再进口这种产品，还可以出口外销。化纤厂丙烯腈采用国际标准后，优质品率提高了10%。化工塑料厂的颗粒白土为国内首创，对照国际标准后，产品的质量得到了公认。1985年4月4月，抚顺石化公司和所属的石油一厂、二厂分别被评为抚顺市采用国际标准的先进单位。经过多年努力，抚顺石化公司所属企业中已有14种产品荣获国家质量金、银牌奖，27种产品被评为部（总公司）级优质品，23种产品被评为省级优质品。在车用汽油产量中，80号以上的高辛烷值汽油已占42.7%。抚顺石化公司生产的汽油、石脑油、柴油、全精炼蜡、半精炼蜡和石油焦等产品，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和港澳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约180万吨，为国家创汇4亿多美元。为了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抚顺石化公司正在深圳特区与外商合资建设厂点，建立窗口，销售产品，培养人才。

1985年，抚顺石油化工公司有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延迟焦化、催化重整、加氢裂化、石蜡和各种油品精制等炼油装置43套，年加工原油能力920万吨。其中，化工、化纤装置有催化剂、硫酸、硫铵、活性白土、丙烯腈、腈纶纤维等18套；公用系统有动力锅炉、热电厂、工业水源、污水处理等装置51套；还有建筑安装公司、设计院、职工大学等下属单位。公司总占地面积500多公顷，拥有职工5.01万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109名；固定资产原值12.89亿元，净值7.17亿元；主要产品有汽油、石脑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石蜡、石油焦、石油苯、甲乙酮、防冰剂、炼油化工催化剂、活性白土、丙烯腈、腈纶短纤维等63种150多个牌号。1985年工业产值为22.89亿元，实现利税11.35亿元。从1949年到1985年，抚顺石油工业累计向国家上缴利税130多亿元，约相当于固定资产净值的20倍，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

第七节　轻　工　业

59. 佳木斯造纸厂

佳木斯造纸厂是“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全国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自1950年选择厂址、勘测设计，1952年成立建厂事务所，1953年福利工程开始兴建，1954年生产性工程动工。后经扩建、续建，以及挖潜改造，历经近50年的发展，佳木斯造纸厂成为我国轻工业支柱企业。

1952年7月16日，经原东北人民政府轻工业管理局批准，成立“东北人民政府轻工业管理局佳木斯建厂事务所”，负责建厂筹备工作。1953年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根据建厂筹备工作需要，决定将原属东北轻工业管理局领导的建厂事务所划归中央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领导，更名为“中央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佳木斯建厂管理处”。1957年，经轻工业部批准，正式更名为“国营佳木斯综合制浆造纸厂”。从1953年初施工单位进入现场，到1957年末历经四年零五个月的建厂施工，于1957年4月试运投产，10月建厂与试车工作基本完成。同年11月15日，国务院批准组成验收委员会对佳木斯造纸厂建厂工作验收。11月23日，国家验收委员会签署了《国营佳木斯综合制浆造纸厂验收签订书》，佳木斯造纸厂正式投入生产。

1958年初，轻工业部根据当时国家电器工业用电容器纸需求量增加以及佳木斯造纸厂大幅度缩短制浆蒸煮时间等情况，决定扩建。扩建项目为：建设一座年产1万吨的硫酸盐浆板生产系统及年产5440吨电容器纸车间；安装芬兰瓦尔密特公司制造的日产200吨新闻纸机及扩建相应的制浆、化学系统配套工程。1959年10月浆板系统试车，1960年200吨纸机安装完成，试车投产。其后，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工程停建，整个系统未能全部竣工。第一期扩建工程未能形成生产能力。

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根据国家建设需要，轻工业部决定扩建改造工程，

建设了新的蒸煮、洗造、蒸发、燃烧、苛化等生产工序及新的供水系统，但由于设计和设备的原因，仅能形成年产11万吨机制纸生产能力。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管理混乱，加之热电供应不足，碱回收能力不平衡，造成生产被动局面，以致有八年完不成国家下达的机制纸产量计划。1973年为了解决生产不平衡问题，提出填平补齐，挖潜增产4万吨纸袋纸/年的计划方案，经轻工业部批准，该工程1976年6月动工，直到1984年才全部移交投入生产。

1978年之后，前期填平补齐挖潜项目在1985年发挥出生产效能，年产达到15.6万吨。为进一步改造原有落后的技术与设备，增产国家紧缺的工业用纸，从1983年开始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改造的重点是3号造纸机，其一期改造从1983年着手进行准备，1984年10月16日至11月14日，仅用28天即告完成。二期改造从1986年10月5日至23日完成。经过一、二期改造后的3号造纸机，就整机衡量已达到80年代初世界先进水平。3号机改造的同时，还从美国、日本、奥地利、芬兰、意大利、联邦德国引进10项先进技术设备，对1号、2号造纸机，减回收、制浆、发电、制网等系统进行了技术改造，经济效益显著。工厂还与原苏联合作进行年产85000吨强韧牛皮挂面箱板纸技术改造。该工程于1990年11月动工，1995年投产，工厂纸及纸板产量达到26万吨。

佳木斯造纸厂经过近四十年扩建、续建和技术改造，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具有制网、发电和碱回收系统的综合性制浆造纸企业。在册职工12000余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7800多人。厂内设12个分场，33个处室。还有工业公司、建筑工程公司、劳动服务公司、雪松工贸公司等4个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单位。全厂占地面积174公顷，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共有各类设备3546台套，总重量36000吨。拥有固定资产原值62亿元，净值3.3亿元。有生产能力18万吨，造纸网18万平方米。

从建厂投产至1992年，佳木斯造纸厂共向国家提供机制纸和商品浆381万吨，累计上交利税262亿元，相当于建厂初期总投资的20倍。1983～1992年这十年，累计生产机制纸163万吨，上交利税9.2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44亿元，分别为前二十八年的75%，55%和124%。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利润以年递增14%的幅度增长。1992年达到1.34亿元，比1982年增长3.7倍。连续五年在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排序中榜上有名，并名列全国造纸行业之首。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职工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职工平均收入由1982年的1115元，提高到1992年的4481元，十一年间，共建职工住宅61276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由原来的2.5平方米增加到6平方米，兴办和新建闭路电视台，《佳纸厂报》、综合体育场、工人文化宫、雪松歌舞厅等文化体育场所，使职工安居乐业，企业凝聚力越来越强，职工素质进一步提高。11年来通过各类培训班，培训职工5万余人次，519名职工取得中级技术合格证书，96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培育了“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佳纸精神，并以此为精神动力，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敢于打硬仗，善于打硬仗的职工队伍。工厂连续六年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第八节　航空工业

60.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集团公司）前身为国营112厂，是国家“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成立于1951年6月29日，是中国航空工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家一级企业，企业占地面积为632万平方米，其中厂区占地面积为394万平方米。

沈飞集团公司走过了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经过五十年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修理阶段（1951～1956年）沈飞集团公司在抗美援朝烽火中组建，当年全厂职工697人；工业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设备232台。为了满足朝鲜战场上空军作战的需要，工厂进行了边建设边生产，在50年代共修理空军作战飞机1200余架。（2）仿制生产阶段（1956～1964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沈飞集团公司被列为全国“156项”重点项目之一，到1956年止，国家先后投资1.7亿元人民币，建成工业生产面积20万平方米；机动设备4700多台（套），员工人数已达到17600多名；已经具备了仿制生产的能力。随着1956年7月19日“歼5”的试飞成功，说明我国已经开始掌握喷气式飞机的制造技术，它标志着公司已经完成了建厂初期由修理走向制造、学习制造技术的历史使命，进入了掌握新型飞机制造技术，组织正规成批生产的新时期。（3）自行设计、自行制造阶段（1964～1980年）1969年“歼8”机试飞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自行设计、制造高空高速歼击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此，结束了生产仿制时期，掀开了我国航空歼击机制造业的新的一页。（4）以航空为本，建立军民结合，军工第一，民品为主，走向世界发展阶段（1980～2000年）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沈飞集团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在80年代初已经积聚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物质基础，有一支宏大的科技管理队伍，设备配套齐全，拥有世界上先进的机械加工设备和一批先进的新工艺新材料生产线。在保证军品生产的情况下大力开发民品，到90年代公司大力发展“歼8”系列飞机研制和批生产，还开发了民用产品，调整了生产结构，在民品开发中有各型系列的大客车、轻型越野车、铝合金系列产品、全钢抗静电通路地板产品和烟草机械系列产品等，对外贸易开发了民机零部件转包生产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生产厂家签订了供货合同。1999年出口创汇已达到1315万美元。到2000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和开发，沈飞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军、民品收入为84.8亿元，出口创汇1 480万美元的军民结合型的企业。

沈飞集团公司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大型骨干企业，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研制生产了20多个机种数千架飞机，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歼击机的摇篮”。与此同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军工第一、航空为本、民品为主、走向世界的方针，成功地实施并完成了军转民、内

转外的战略转变，依托航空高科技，不断开发新产品，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公司产品结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前基本以军工产品为主。同时，也研制开发了一些民用产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主要产品有：改装长途公共汽车（58、59型），共计1404辆（1957~1963年）；万能铣床（58型），共计生产203台（1958~1961年）；此外还有叶片泵等产品。80年代以来围绕国民经济建设，大力开发民用产品，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实施军转民、内转外，艰苦创业。二十年来，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全面出击到重点突破，由低水平重复到占领制高点发展历程。1980年，民品产值比1979年就增长6倍；1990年突破2亿元，比1979年增长近70倍；2000年预计突破6亿元，是1979年的200倍。出口产品产值，2000年预计突破1400万美元。军转民、内转外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军转民，内转外"的战略转变中，先后组建了汽车有限公司、轻型越野车厂、通路地板厂、烟草机械厂、铝合金结构工程公司和仓储物流设备公司等民品专业厂。目前，除航空类产品外，已形成了批量较大、技术含量较高的六大系列支柱民品。即以沈飞客车为代表的汽车系列产品，以铝合金工程为代表的轻金属结构系列产品，以档案装具、回转库和立体库为代表的仓储设备系列产品；以抗静电全钢通路地板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和民用飞机零部件为代表的外贸系列产品。先后与美国、英国、瑞典、德国、加拿大、以色列、日本等7国家13家公司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转包生产民用飞机零部件累计成交额达5亿多美元。

总之，沈飞集团公司的产品结构，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及时调整优化，先后经历了军品，军品为主、军民结合，军工第一、民品为主，航空为本、军工第一、民品三产全面发展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形成了军品、民品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协调发展的较为合理的产品结构。

改革开放前后，沈飞集团公司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组织管理结构，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经理负责制。公司内部模拟事业部管理方式。在经营方式上，划小核算单位，采取承包经营责任制。从1994年以后，组建了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逐步形成了母子公司体制，并组建了沈飞民品工业有限公司和三产事业部等。

1999年末资产总额为30.7万元，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5.5亿元，实现利税3277万元，其中实现利润1526万元。1999年末总人数为28401人（包含离退休人员10963人，下岗人员2人），在岗正式职工人数为17148人。其中，工人8693人，专业技术人员3062人，管理人员2166人。1999年劳动生产率15065元/人。

目前，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 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严重不足。沈飞集团公司自70年代末期以来，自有流动资金一直维持在国家核定的14691万元，仅占1998年末流动资产135672万元的10%，而沈飞集团公司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1998年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20272万元，而1980年仅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6486万元），流动资金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不得不靠高额举债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为此付出了高额的利息支出（1998

年末短期借款为 49782 万元，全年财务费用为 6099 万元），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滚动发展。(2) 沉重的技改债务负担。为了增强企业发展后劲，近年来，沈飞集团公司相继进行了干线、民机、通路地板、仓储物流设备、波音 737－700 民段等项目改造，建成或即将建成数条先进的生产线。由于这些项目的资金来源都是通过银行贷款解决的，现已形成了沉重的技改债务负担，1998 年末长期借款为 43008 万元。据统计，2000 年将要归还长期借款 7400 万元，2001 年将要归还长期借款 14400 万元，2002 年将要归还长期借款 18100 万元。1998 年长贷利息为 2652 万元，占总成本费用的比例为 2.2%。(3) 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由于历史的原因，沈飞集团公司仍然承担着繁重的社会职能，每年需要数千万元的社会负担费用支出，其中，1997 年支出 2039 万元，1998 年支出 2363 万元，使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资金显得更加捉襟见肘，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步伐。

表 9　　企业历年主要经济指标：建厂以来累计实现利润、税金等数额　　单位：万元

年份	工业总产值（不变价）	利润总额	税金	资产总额
1949	55			
1950	59			
1951	231	6.5		
1952	797	48.7	1.1	
1953	1800	－59.6		
1954	2424	－122.6		
1955	3058	－33.1	22.3	
1956	7482	114.1	2.2	
1957	16911	1476.9	1.4	
1958	24764	4321.1	60.5	
1959	11582	1064.6	149.1	
1960	1850	－141.8	37.5	
1961	3499	－579.4	2.4	
1962	7436	－54.3	3.2	
1963	9867	648.6	18.3	
1964	18916	1842.5	2.3	
1965	33913	1659.3	2	
1966	39972	2119.8		
1967	16573	207.6	0.3	

年份	工业总产值（不变价）	利润总额	税金	资产总额
1968	10334	-456.1		
1969	43 809	825.4		
1970	67879	1155.5		
1971	67974	-447		
1972	19988	362		
1973	30370	375.7		
1974	36380	752.9		
1975	31823	484.3	3	
1976	31569	512.8	0.8	
1977	34400	53.4	0.2	
1978	32984	930.2	2.3	
1979	34890	1218.8	7.9	
1980	20144	1461.4	32.6	
1981	14977	1051.5	59.7	
1982	19459	1961.5	103.1	
1983	23142	2 106.1	106.9	
1984	26000	2145.2	154.6	
1985	26845	2544.9	369.8	
1986	27127	1547	396.8	
1987	27554	1825	666	
1988	30709	2772	989	
1989	41359	2080	848	
1990	49175	2558	837	
1991	57626	3456	1217	106354
1992	75638	4851	1287	115692
1993	86968	3231	2058	125578
1994	112108	3395	2202	178370
1995	115813	1793	2255	196287
1996	116005	2081	2124	269470

年份	工业总产值（不变价）	利润总额	税金	资产总额
1997	113127	1216	1869	287911
1998	119667	1623	1426	298085
1999	120045	1526	1751	307686
2000	130000	1050	1950	305000
合计	1997077	64561.4	23019.3	305000

61.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辽宁410厂）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所属的航空喷气发动机制造公司，位于沈阳市东部的东塔脚下，秀丽的南运河绕厂而过。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前身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1年创建的东三省兵工厂，在日本统治时期为“奉天造兵所”，日本投降后1946年改为国民党兵工署“第九〇工厂”。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部沈阳兵工总厂，后改为中央兵工总局“五一工厂”，第323厂。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及1954年第二机械工业部赵尔陆部长批准，从1954年6月1日起，在原323厂厂址上扩建410厂，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建设，于1956年5月正式投入生产。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怀该厂的建设与发展，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曾多次来该厂视察工作。

建厂以来各历史时期的生产经营情况简述如下：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厂～1957年）。工厂始建于1954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计划之一，是由苏联专家帮助建设的。1956年5月试制成功维卡－1爱大型（BK－L）发动机，即涡喷工发动机，并经国家试车委员会验收鉴定合格进行批量生产。1957年底，试制成功维卡－1阿型发动机，并进入批量生产。工厂内部实行两级管理，即厂级和车间级管理，并设有四师一长，即总设计师、总工艺师、总冶金师、总检验师和生产长。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工厂发展发生了一大起伏。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工厂的生产建设有了一个新的发展。1959年元旦仿制成功涡喷一型发动机，仿制成功红旗一号导道发动机。从而开创了航空发动发展的新局面。1960年，贺龙元帅来沈视察工作，提出“一刀两断”，整顿产品质量。工厂开展了第一次整顿产品质量运动，经过一年的整顿，到1962年，工厂实现了产品优质过关。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工厂经过整顿产品质量运动，生产发展比较正常。工厂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在此期间，工厂还担负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抽调大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到内地工厂工作，为发展航空工业做出了新贡献。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和“四人帮”死党毛远新的直接插手，工厂沦为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户”。工厂各项工作都受到极大损失，产品质量严重下降，质量事故多次发生。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1972年工厂开展了第二次整顿产品质量运动。涡喷六发动机寿命由一百小时延寿到二百小时，并由国家定型委员会正式验收定型。在科研生产方面，工厂从1966年仿制成功涡喷七发动机后，又改型研制了涡喷七甲。1966年8月11日，经叶剑英副主席批准，工厂开给自行设计的涡扇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到年底试制成功一台，后又转入株洲331厂研制，直到1972年又转回该厂研制。1966年3月，工厂“四清”运动结束以后，根据三机部的指示，工厂与606所合并成立了黎明机械制造公司。公司成立了经理部、政治部和社会服务部，并包含了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厂内部也改为三级管理，即：公司，工厂，车间管理。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公司机构实际上没有发生作用。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工厂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于1978年2月开始，以整顿产品质量为中心，全面整顿企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工厂八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并于同年8月起进行涧喷十五发动机的测绘仿制工作。1979年3月，工厂整顿产品质量运动经三机部检查，验收合格。工厂被三机部和辽宁省委命名为大庆式企业，并被树为航空工业排头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厂正在努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为航空工业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1979年7月，根据三机部的命令，工厂与606所合并成立国营黎明机械公司，12月正式宣布。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六五”期间，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形式下，公司认真贯彻保军转民的方针，积极调整生产结构和服务方向，在保证完成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品生产，建立了自行车、洗衣机、铝型材门窗、煤气表、工业燃气轮机、汽车增压器等民品生产专用线。通过全面整顿企业，加强了生产指挥系统，强化了经营决策和销售服务机构。组建了15个经济基本独立、生产相对封闭的军品厂、民品厂和大集体企业，还采取联合生产、合资办厂等方式，在深圳、厦门、上海、北京、武汉、西安、新疆等地建立了四十多个横向经济联合体，使公司由单一军品批生产结构，发展为：科研与生产结合：制造与修理结合；军品与民品结合，工业与贸易结合的结构，形成了既能进行军品自行研究和预研，又能进行民品研制；既能进行军品与品种批量生产和修理，又能进行民品大批量生产；既能进行工业生产，又能开发国内外贸易。企业开始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开拓型的转变。

1986年，公司进一步下放经营管理权限，下属13个工厂独立核算、自负或自计盈亏，对外银行开户，对内实行经济承包，初步完成了由集权管理向分权管理的转变。公司坚持“航空为本”狠抓科研新机工作，为航空产品开发后继机。公司大力开发民品，产品由“四大支柱”发展为铝型材挤压及铝门窗、自行车、洗衣机、摩托车及摩托车发动机、燃气轮机、增压器，煤气表和化纤备件等“八大金刚”。民品本值达1.7亿元，占总产值的68.6%。军民品创优工较大发展，涡喷七甲整机创部优，主要民品都获省

或部优质产品证书，公司也进入全国大中型企业推行全面质量合格单位行列。公司集体经济也提高到新水平，年产值达2300多万元，利润250多万元，产品已达158种，集体经济工作开展走上与公司共同繁荣的轨道。

第七、第八个五年计划（1986～1995年）。“七五”公司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初期，军品任务大幅下降。但公司的民品生产经营状况良好，铝型材挤压销量达4171吨，摩托车及发动机在1990年产销量分别达到11500辆、11541辆和26500台、27519台。铝型材制品在1986年也达到年产345376平方米的最好水平。民品占总产值的比重：（产值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1991年公司通过评审成为国家一级企业。此时，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受机制和产品结构的影响，加之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公司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从1994年开始出现亏损。公司的经济步入低谷。

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九五”初期是公司最困难的时期，巨额亏损和沉重的负担使企业回天乏力，1998年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企业实行“三项制度”改革，一举实现政策性扭亏。1999年经营状况进一步好转，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2658万元，实现工业增加值19958万元。沈阳黎明公司认真贯彻国家及省、市关于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目标的指示精神，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扎实推进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契机。1999年6月1日，正式组建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

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公司积极探索接生产要素分配的实现办法。打破了等级工资制；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对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生产工人实行了岗位效益工资，特别对科技人员加大政策倾斜，科技人员人均提高工资3000多元/年；设立了高级技术专家和高级技术能手津贴，被评聘的专家人均津贴2400～9600元/年。改革用人用工制度，建立竞争机制。在生产和管理工作中实行了定编、定岗、定员和“末位调整”的淘汰制度。对一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设置了每年5%～10%的调整比例。

1999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2658万元，实现利润48万元；实现税金1743万元，出口创汇实现1397万美元。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2000年3月末拥有资产总额达251528万元。其历年主要经济指标见下表。

表10　　企业历年主要经济指标单位：万元

年份	工业总产值	总资产	利润	税金
1956	7675		177	0
1957	13611		1030	6
1958	16390		2446	37
1959	11372		1218	125
1960	9145		-37	39
1961	10098		-220	7
1962	15157		455	8

年份	工业总产值	总资产	利润	税金
1963	15486		1006	13
1964	17644		1484	14
1965	19443		3274	5
1966	25200		2775	1
1967	6717		-1511	0
1968	7182		-2272	0
1969	16295		-706	0
1970	38230		1531	0
1971	27325		2549	1
1972	15009		362	0
1973	19014		1691	1
1974	19047		1306	1
1975	17679		533	2
1976	15352		123	3
1977	14601		263	1
1978	19704		655	2
1979	23633		1253	6
1980	25360		3820	17
1981	17988		2315	117
1982	18555		2807	240
1983	20506		2442	386
1984	27992		2562	446
1985	28584		3429	585
1986	26114		1045	464
1987	28693		2299	837
1988	30109		1639	1237
1989	33910		2129	1433
1990	36080		2592	1259
1991	53847		1823	1318
1992	50323		82	1660

年份	工业总产值	总资产	利润	税金
1993	55477	129390	774	2090
1994	52155	138178	-4315	966
1995	49159	136008	-9383	789
1996	63140	190372	-5633	1976
1997	51846	207494	-3462	1229
1998	58072	224369	109	2285
1999	73149	248061	65	1726
合计	1202068		26524	21332

第九节 电子工业

62. 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京东方）成立于1993年4月，1997年6月B股上市，注册资本近4.9亿人民币。其前身北京电子管厂，开工于1956年，是我国“一五”. 期间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被誉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的摇篮。”

目前，京东方的产品由网络视讯、一卡通系统软件与机具、新型真空与微电子器件、精密电子零件与材料四大类组成，分别由相关的事业部门和专业化子公司负责经营，众多产品均通过UL、FCC、CE、TCO等多项国际认证，旗下企业都已通过ISO 9000系列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多项产品与技术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京东方北京科技园区是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开发区中一区五园的一部分，享受国家及北京市一系列优惠政策。该园区紧邻机场高速公路和亚洲最大的商住区望京新城。京东方华东科技园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是中国最大的VFD生产基地。京东方深圳基地位于深圳市八卦岭工业园区。

京东方的下属企业主要有：

(1) 北京日端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7日，是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子管厂）和日本端子株式会社共同兴办的中日合资企业。合资企业以生产各种高质量的端子和连接器为主。注册资本200万美元。投资方的甲方——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子管厂）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电子元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80年代后，该公司先后与日本、新加坡、台湾的厂商合资兴办了七家合资企业，在和日本合资的四家企业中，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堪称中日合作的典范。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公司拥有25%

的股份。投资方的乙方——日本端子株式会社是一个专业生产端子、连接器、压着机及其他相关产品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61年，目前在日本拥有三个工厂、九个协办厂、九个营业所，生产品种多达8000余种，年营业额约为12亿元人民币。该公司已取得ISO 9001、美国的UL、加拿大的CSA、德国的TUV认证。公司的加工设备、附件、检测仪器、模具和原材料全部由日本引进。主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均在日本培训6个月。公司自1996年10月4日开工后，先后取得了美国的UL、加拿大的CSA、德国的TUV认证，1997年7月获ISO 9002认证。

(2) 北京旭硝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简称BAE公司)，是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北京电子玻璃厂与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丸红株式会社、共荣商事株式会社共同兴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开业。主要生产为国内、外彩色显像管和显示器件生产厂配套的低熔焊料玻璃粉和电子枪用支架玻杆，是国内同类产品的最大生产厂家。几年来，在原有引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收了日本在生产、技术、经营中的管理经验，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产品的品种，产品质量完全达到了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同类产品的技术标准，产品不仅行销国内主要彩色显像管和显示器件生产厂家，而且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地区。

(3) 北京东方半导体器件厂，是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厂。其前身是原北京电子管厂一分厂。北京东方半导体器件厂集近四十年半导体器件及零件设计、制造、应用之经验，已成为我国高频微波半导体器件、功放组件和精密电子零件研制、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现在已形成十几大系列，200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军、民用电台、雷达、单边带通信、微波中断、地缆、卫星通信、电视发射机、差转机，调频广播和遥感测量、测控、电力、民用家电等领域。北京东方半导体器件厂依靠高水平的技术力量，训练有素的职工队伍和严密的质保体系，保证了北京牌高频、微波半导体器件和功放组件质量优良，性能稳定可靠。其中3DA76、3DG32G荣获国家银奖。3DA193等11种产品获部优、市优称号。北京东方半导体器件厂拥有超净厂房3000平方米，从国外引进了关键工艺、设备和测试仪器。现有职工300人，工程技术人员占23.4%，其中高级工程师12名，教授级高工2名，为提高该厂半导体器件的性能指标和质量水平及开发功放组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1998年初鉴定的硅高频大功率晶体管3DA038（工作电压50V，输出功率250W）填补了我国不能生产工作电压50V晶体管的空白。北京东方半导体器件厂正在进行硅高频及微波功率晶体管贯军标生产线的工作。年底即可完成这项工作。这将大大地提高该厂产品质量的保证能力，更好地为军工服务。为市场提供质量更好的产品。

(4) 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BNC)，是京东方与世界著名的电子枪生产商——日本日伸工业株式会社合资兴建，一期投资1000万美元，1997年2月投产。公司生产和管理者54人。从事电子枪及其零件的生产与销售，注册资本560万美元。产品电子枪部件是电子枪的主体部分。电子枪是彩色显像管（CRT）和彩色显示管(CMT）的心脏。BNC目前为北京松下国产化配套。BNC和旭硝子、东方冠捷（显示器)、BMCC是东方电子CRT和CMT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项目的投产，基本改变

电子枪零部件2/3依赖进口的格局，并对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发挥可靠的保障作用。

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发展成为集科、工、贸、金融、物业、服务于一体的企业集团。公司一直致力于高质量电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创建多家优质电子信息网络、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新型电子元器件合资、合作企业，包括：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北京旭硝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冠捷电子有限公司、中经贸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京东方软件与系统集成公司等，并与世界多家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63.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C&W）其前身是国营北京有线电总厂（国营第738厂），1957年建成投产。曾研制生产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第一部自动电话交换机和第一台银行自动柜员机（ATM）。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集通信、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开发、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一类企业，连续十三年成为全国电子百强企业。

作为信息产品的供应商和服务商，兆维集团公司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以顾客最高满意度为目标，以提供技术领先、品质卓越的信息产品为本职。现已具备程控交换机、计算机、通信电源设备、机箱、工装模具、塑料制品、印制板生产线，主要生产线已通过ISO 9002认证，公司还致力于无线通信产品（本地无线环路系统、微蜂窝系统），背投影大屏幕彩色电视机、SVCD和DVD等高科技数字视听产品的研制生产。集团的主产品HJD04数字程控交换机，是北京市首批公布的名牌产品。

兆维集团公司拥有3000余名高素质的员工，总资产16.84亿元，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设有技术开发中心、培训中心和销售服务中心，共有13个职能部室，10个分公司，3个后勤服务单位，并投资建立了9个中外合资企业。销售服务中心下辖27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驻外销售中心，为顾客提供售前售后服务。

兆维集团公司十分重视对外合作，创造条件，抓住机遇，高起点引进外资。企业先后分别与德国西门子、瑞典爱立信、日本松下电工、美国NCR、美国优利等建立了九家中外合资企业，还与国内其他企业组建了“巨龙集团”、“华鑫集团”等各类体制的企业若干家。

面对跨世纪的挑战，兆维集团公司将通过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并举的方式，到2000年，兆维集团公司的销售收入将达到60亿元以上，成为投资结构多元化，经营范围多样化，经营地域国际化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

第十节　航天工业

64.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211厂）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即国营211厂），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所属的大型骨干企业，承担着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试验总装任务。

211厂的前身是1910年清政府在南苑开办的中国第一家飞机修造厂。解放后定名为空军11修理厂。1951年6月划归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定名为国营211厂，开始修理苏式各种螺旋桨机。此时，全厂实有人数365人，厂房破旧，使用价值低，其工业总产值仅181.9万元。1953年，根据国务院命令，决定将该厂改建为米格—15型喷气式歼击机修理厂，被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前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211厂在1953年开始建设前，工厂仅占地15公顷，生产面积7122平方米，设备218台。职工总数500人，生产任务量少，技术能力差。1954年修理螺旋桨式飞机，大型仅14架，中小型10架。为此，国务院责成211厂要在1955~1957年间全部完成改扩建工程。1954年10月3日改扩建工程破土动工。11月13日，二机部批准了第四设计院与前苏联第216专业设计处共同配合进行的《211厂扩建初步设计》。设计书规定，改扩建后的211厂其生产能力为年修米格15比斯型飞机530架，米格15型170架，以及零备件两套（每套86项，共340架份），一套用于修理，一套供给空军。按初步设计规定建筑面积98557平方米，其中新建75542平方米，改建23015平方米，建住宅10276平方米，全厂总占地面积为77.35/公顷，设备2221台，其中切削534台，成型205台，全厂电容量5420千安伏，用水量3000吨；在生产组织上设立车间26个，全厂职工人数需6137人。按国务院规定，1954年建厂开始到1956年年底完成投资5189.6万元；1956年到1957年总投资额为5502万元。1954年12月援助我国的苏联专家卡巴诺夫等17人陆续到厂。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工厂一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一面进行修理喷气式飞机的生产、技术、组织准备工作，并完成了部分飞机的修理任务。1956年工厂已建设成为年修700架喷气式歼击机的大型航空修理企业。1956年年底改扩建工程基本结束。全厂已配备了机械设备1727台，其中336台是进口的；全厂铺设各种管线73248米，铁路289米；全厂职工总数为7747人；固定资产总值为3871.8万元，改扩建前仅为439.3万元（1954年）；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94.7元，商品产值769.5万元，工资总额452万元，上缴利润21.2万元，成为年修700架喷气式歼击机的大型航空修理企业。1957年1月7日~1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对211厂改扩建工程进行了全面验收。全厂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总评为"优"，同意交付使用。

1957年4月工厂开始设计北京牌大轿车。该项目是参照苏制吉斯-155型汽车设计的。7月1日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辆北京牌大轿车试车成功。1958年自行设计制造了乌米格15高级喷气教练机和"首都一号"轻型运输机，并试飞成功。

为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58年6月，211厂奉命划归国防部五院辖属，并决定在现有基础上筹建中国第一座运载火箭试制总装厂；1959年2月国防部五院决定，211厂划好一分院领导，随后工厂按照"8102"工程设计方案开始了大规模地改扩建工程建设。扩建总面积为84963平方米，全厂职工已达6032人，固定资产净值4700万元，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包括生活区），从此正式开始了仿制"1059"近程火箭任务。

1960年10月22日，我国第一枚近程火箭总装完成，于当年11月5日发射成功；

1962年3月21日，自行设计试制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在发射试验中发动机起火，火箭坠落。1964年6月29日经过修改设计后的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随后又相继发射了两发均获得成功。1966～1969年冬，先后试制成功了中程火箭、中远程火箭；1970年春，完成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试制总装任务，同年4月用长征一号火箭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1975年工厂生产总装的长征二号火箭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送入预定轨道。

1978年以后，工厂迅速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胜利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三抓任务”。即：1980年5月，远程火箭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试验成功；1982年海上水下发射试验成功；1984年4月，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轨道。80年代初，211厂贯彻执行“军转民”方针，在保证军品型号任务的同时，大力开发民品。到1985年已开发研制民品系列产品达50多项。其中瓦楞纸板生产线系列、真空热处理炉系列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技术水平。金属波纹软管膨胀节、纺织倍捻机、塑料异型材等民品都已占领市场份额，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4年211厂率先在沿海经济开发区兴办合资了企业。在深圳开办了“远东机械公司”，在厦门开办了“厦门守联公司”。这两个公司已初具规模，成为在沿海地区的窗口企业。1993年后，又在廊坊经济开发区兴建了两个企业，一是与香港中星行合资兴办的廊坊航星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总投资400万美元，甲乙双方各投资200万美元，厂房于1995年竣工，设备安装完毕，7月份正式投入运营；二是1995年初投资3500万元兴建首都航天金属波纹管厂，于1997年竣工交付使用。

1995年按照一厂两制、四业并举的格局进行了机构调整和三项制度改革。实现了军品、民品分线管理，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成回路。民品集团、动力分厂、首航科工贸集团先后宣布成立。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如：劳动用工制度，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工资制度的改革，实行了岗位系数工资制；干部制度的改革，动态管理实行聘任制。这些改革成效显著，基本上形成了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分配有升有降的激励竞争机制。职工队伍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劳动纪律得到加强，经济效益逐年增长，职工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全厂大局稳定，企业发展健康向上。

几十年来，企业在大力发展军品的同时，发挥航天高科技的优势，积极开发和生产民用产品，努力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早在1957年就设计生产了“北京牌”大轿车，先后参加了建国九周年庆典和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

1978以来，在党中央“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指引下，企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过不懈的努力，陆续研制开发了一批品种配套、性能优异、适销对路，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和一定竞争能力的民品，形成了以包装机械、工业电炉、金属波纹管、PVC塑料型材和纺织倍捻机5个系列支柱产品，在市场上创出名牌。产品多次获得国家奖励，部分填补了国家空白或远销国外。

此外，企业还开发生产了一、二类压力容器、密切圆减速器，设计制造出国内第一条冰箱侧板生产线和洗衣机箱体生产线；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医用旋转式伽玛刀的生产加工；成功地研制了空间反物质探测器（AMS）结构。著名科学家丁肇中教授称赞：

"中国航天工人的技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80年代中期，企业民品不断向外扩展，先后在深圳、厦门、广州等地建立了5家合资联营企业。1998年、公司民品实现总产值13395万元，销售额12644万元，出口创汇182万美元。三产作为企业的新兴产业，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企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雄厚的科研生产能力。目前，企业占地面积112多万平方米，工业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现有职工15700多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000多人。企业拥有80多个专业、240多个工种以及4500多台（套）各类设备，具有锻造、铸造、焊接、铆接、热表处理、机械加工、压力加工、特殊加工和总装测试等综合加工能力。特别是"八五"以来，企业狠抓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引进了一批国外先进设备。先后建起了4000平方米的数控加工中心，全部数控设备实现了DNC控制，正向柔性化、集成化方向扩展；3400平方米的现代化理化检测中心，配置的金相、化学、有机、力学及无损检测等专业仪器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4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火箭总装厂房；改扩建民品生产厂房新增面积18000多平方米，自行设计制造了几千项工艺装备和非标设备。企业尤其重视运用高科技进行技术改造，在计算机管理、网络技术特别是CAD/CAM一体化等方面取得很大发展，使设计、生产加工能力达到一个崭新水平。企业先后有150多项工业科技成果获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航天总公司科技成果奖。

65.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沈阳111厂）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沈阳111厂）是"一五"时期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11厂前身是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第三厂。它始于张作霖1920年建立的东三省航空处。1931年日本侵占奉天（沈阳）后，改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隶属的工厂。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了"满飞"工厂、东塔机场和国民党空军38厂，编为空军东北修理总厂第三厂（鲁班部队第三中队），1951年4月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1952年8月，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领导。1958年归属第三机械工业部建制。1959年2月23日，111厂改为410厂五分厂，启用新光机械厂为第二厂名。1961年4月14日，恢复国营第111厂。1965年4月1日，工厂划归第七机械工业部建制。1970年6月22日复归三机部领导。1976年10月26日，转归第八机械工业总局领导。1981年10月，111厂又划归第七机械工业部建制。1983年6月，工厂划归航天工业部。1993年6月，工厂隶属于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划归中国航大机电集团公司。2000年2月28日改制为沈阳然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

"一五"期间基建投资2289万元，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投资751万元。"一五"以来，该厂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1951～1960年，为发动机修理阶段。1951年建厂隶属重丁业部航空工业局，拥有设备586余台，职工5169人，厂房建筑面积36189平方米，从事航空发动机修理工作，1953年修理各类型号航空发动机1713台，初步具备了中型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规模，为修理转入制造打下了基础。到1957年末，工厂实有发动机修理能力为1500台。

1961～1965年，进入航空发动机生产研制阶段。1961年工厂恢复111厂建制后，隶

属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局领导，结束了航空发动机修理，进入导弹发动机试制生产的新阶段。1963年开始成为各型号导弹发动机的生产基地。

1966～1970年，进入发动机批生产阶段。在此期间工厂隶属辽宁精密机械公司领导，1970年又移交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三级部），1970年各型号发动机产量728台，利润总额461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4309元/人。

1971～1975年，液体海防型号发动机全部进入生产阶段。海二发动机设计型号、红旗、上游四种型号发动机全部投入批生产，红箭—73发动机开始研制、同时还开始了对固体发动机红五、靶弹5号、上游2号的研制。

1976～1980年，进入固体、液体发动机齐头并进阶段。工厂从1976年隶属于第八机械工业管理局领导，固体、液体发动机生产齐头并进，1976年发动机产量近800台，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的1970年。1980年在全面贯彻中央“调整、改单、整顿、提高”的总方针指导下，工厂调整产品结构，生产出液氮容器和液氮泵等民品。

1981～1985年，是军民相结合阶段，民品生产取得明显成效。从1981年起隶属七级部，1983年改为航天工业部，由于全厂全面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使民品生产获得了较大发展，相继建立了煤气瓶生产线和液氮容器生产线，生产持续增长，工业总产值和利润再创历史最好水平。同时取得海一、海二、液氮容器、研磨膏国优“银牌奖”。

1986～1990年，进入汽车发动机建线阶段。工厂在军民品生产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为工厂的生存和长远发展，继续开发了小型汽车发动机，并开始建设生产线。1987年工厂第二厂名改为沈阳新光动力机械公司，实行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体制。

1991～1995年，生产步入低谷阶段。自1990年起工厂开始了近年的亏损，步入了历史的低谷，由于汽车发动机建设周期长，投入大，加之新的会计体制的实行，企业一下进入了恶性循环。从1993年开始隶属于航天工业总公司。

1996～2000年，是生产恢复和发展阶段。长达十年的汽油机投入，终于在1997年开始了回报，该产品的生产规模、生产能力不断增大，由于汽油机的拉动，公司于1998年一举摘掉了连续几年亏损的帽子。1997年～1999年连续三年以每年70%的速度递增，1998年当年盈利124万元，1999年盈利167万元，2000年产值和收入计划“双五亿”，利润计划500万元，主导产品汽油机计划产销4万台，这是新光历史从未过的指标，步入了以产值和收入为考核标准的大型企业行列，到7月份为止，汽油机已经达到23440台，产值已经完成41964万元，完成年计划的84%，主营业收入完成36362万元，为年计划的72%，总量指标大幅度增长。从1999年7月1日开始，公司隶属于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在跨人新千年之际，工厂改制为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以致力航天、发展新光为己任，上规模、上品牌、上效益，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公司从50年代开始，为我国航空、航天动力装置的研制和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多个航天史的第一，先后援建了420厂、531厂、064基地、304厂、7414厂及江北机械厂等，被誉为“中国航空、航天动力装置摇篮”。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公司认真贯彻国家“军转民”的战略决策，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在确保军品生

产任务的同时，大力开发民用产品，产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已形成以汽油机及配件、胶体磨、压力容器、超低温容器系列、液化石油气钢瓶、爆破片等产品为主体的民品结构，建成了相应的生产线，具备了雄厚的生产能力、公司以这些产品为龙头，组建了多个生产经营实体。公司在大力发展现有民品的同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研制和储备了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成果。主要包括油田用气发生器、491QE电降型汽油机、4G6水泵、机油泵、特种铁路罐车及大型低温容器系列、二步法封头旋压机组等民用产品，分别取得了成果鉴定或产品鉴定。

1987年，该公司投资4750万元，建设一条现代化汽油机生产线，然后，又陆续投入1000多万元的技术改造资金，1998年香港华晨投入3000万元资金，因此，整个汽油机生产线共计投入近亿元。现在初见成效，2000年计划汽油机产销4万台，市场占有率40%，汽油机产值近5亿元；1987年投资1 751万元。建设了另一条民品压力容器生产线，于1991年10月份验收，2000年计划产值1300万元："九五"期间，为给航天三菱公司的动力配套，投资5214万元，进行了动力系统增容，建设了66KV变电所一座，空压站一座，锅炉供给系统以及液化气站等，除此以外，公司储备了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并结合产品进行了人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1300万元，建设4G4水泵、机油泵生产线；投资1500万元，建设油田用气发生器生产线：投资1144万元，建设二步法旋压机约生产线：投资1965万元建设军品研制中心厂房。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支撑该公司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力量，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增加，贡献率不断提高，企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另外，公司逐年加大了科技投入，从1996年的88万元，到1999年达到1022万元，有力地保证了企业产品开发、技术攻关等科研事业的发展。

2000年，公司有资产135455万元，2000年1~7月份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41964万元，为年计划的84%；累计实现主营业收入36362万元，为年计划的72%；实现利润712万元，实现利税2221万元。公司现有产品为航天产品、汽车发动机及配件、胶体磨系列产品、压力容器系列产品、爆破片系列产品、煤气瓶以及油田用气发生器等，主导产品为汽车发动机，当初设计生产能力为2万台，现在由于多年的技术改造投人，年生产能力已达到5万台，1999年汽油机产量为26500台，销售量为25522台，产销率为98%，国内市场占有率为40%。公司主导产品汽车发动机的生产技术来自于日本3Y和4Y生产技术，处于国内90年代先进水平，处于国际80年代先进水平。新建生产线上的设备具有国内90年代先进水平，原有设备还处于五六十年代水平。

公司管理手段先进，有一整套的管理标准和规章制度。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先后有八种产品获国家银质奖，有三种产品获国家飞龙奖，有8种产品获航天工业部和辽宁省优质产品奖。主导产品491Q汽油机技术性能先进，质量可靠，先后获得"中国航天标志产品"、"中国航天十佳民品"、"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和"沈阳市名牌产品"称号。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工艺装备先进，检测手段完善，设备精良，门类齐全，拥有设备2000余台套，其中加工中心等大型高精度设备百余台套，水、风、电、气、暖自成体系，有专门的铁路专用线。计算机已应用于产品设计、控制、测试及企业

管理的各主要环节。在生产方面具有极强的机械加工能力，在真空钎焊、真空热处理、真空深冷及强力旋压、冷挤压和温热挤压、薄壁铸造、非金属加工、金属热喷涂等先进技术的成熟应用方面，是该公司的技术专长，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理化检测方面，该公司是国家级送出口商品检验认证单位。公司具有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多种专业产品设计制造许可证，是国家轻型汽油机生产定点厂；有 AR2、CR1、CR2、DR5 各级压力容器制造：一、二、三类压力容器设计；液化气体铁路罐车设计；液化气体罐车设计；液化石油气钢瓶制造；爆破片制造；铝合金和不锈钢装饰工程设计、制造、安装等多个许可证；企业具有进出口自营权。企业还拥有热处理、表面处理、锻造、铸造等特种工艺专业生产厂和非标设备制造及工具、模具、刃具、量具制造专业生产厂。

在技术开发上，公司有较强的技术开发优势，具备较强的新产品设计、仿制和批生产能力。公司设立了技术中心，下设空间技术研究所、汽油机研究所、粉碎机械研究所、压力容器研究所、爆破片研究所和旋压研究所等多个开发机构，负责进行新产品的设计。仿制和老产品的优化升级，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和经验。

公司 2000 年的产值和收入为双 5 亿，步入以产值和收入为考核标准的大型企业行列，公司的主导产品处于国内 90 年代先进水平、国际 80 年代先进水平。

表 11　　公司历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工业总产值	利税总额	产品销售收入
1951	33		
1952	91	143	2152
1953	1013	163	2148
1954	1401	140	3729
1955	1653	539	4438
1956	1141	114	3554
1957	2009	960	4491
1958	3072	2496	6319
1959	601	567	1943
1960	182	316	740
1961	192	-29	197
1962	628	109	964
1963	653	121	1508
1964	845	53	1324
1965	1371	139	1510
1966	1818	162	1037
1967	659	-137	790
1968	528	-265	601
1969	1602	302	1356

年份	工业总产值	利税总额	产品销售收人
1970	2819	463	1605
1971	3684	779	1840
1972	1279	248	1209
1973	1030	56	732
1974	1373	270	1047
1975	1368	162	1059
1976	1624	370	1256
1977	1314	135	989
1978	1074	101	828
1979	1316	46	1032
1980	1890	101	1356
1981	1822	101	990
1982	1947	186	1621
1983	3326	297	2222
1984	5684	514	3048
1985	7039	1023	4208
1986	7973	640	5200
1987	9747	668	5982
1988	8360	805	5925
1989	9093	836	6471
1990	8517	-1198	7280
1991	8522	-1492	8012
1992	13920	865	9383
1993	10661	-2024	12544
1994	15096	122	14021
1995	16658	244	15777
1996	10749	-2019	10174
1997	21323	-1074	17777
1998	28115	803	26433
1999	47972	9220	41878
2000	5000	3500	50000

第四章 总结与启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电力、内燃机、重化工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西方国家疯狂地掠夺全球领土——西方文明的“帝国时代”来临了——一方面其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而爆发了世界大战，另一方面遭到压榨和奴役的边缘国家开始觉醒并发生民族主义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新中国诞生了。经过数十载战火硝烟考验的胜利者——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不惜余力地实现一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工业化夙愿，通过崭新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富强起来。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封锁，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成友好同盟；他们超越了工业化的准备阶段，在社会剩余产品率还很低的情况下超前起步建设重工业；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实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节衣缩食，用稀有矿产品和农产品去国外交换技术和设备。经过亿万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无数牺牲，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建成了以“156 项”建设为核心的近千项大中型工业项目，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这样一段成绩伟大、代价巨大的历史，我们在将其载入史册之际，有必要全面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找到对今后发展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从 1950 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 1969 年最后一个项目竣工投产，“156 项”中实际实施的 150 项，历时十九年全部建成。与 1953 年签订协议时的计划比较，整整推迟了十年。其中的原因，既有制定计划时对困难估计不足的因素，也有计划实施过程中，政策与体制失误造成的延迟，还有国际环境与中外关系变化带来的冲击。实践表明，在 20 世纪后半叶国内外动荡的环境中，能够争取到数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能够渡过中国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多么不易！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的完成，形成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与其他千余工业建设项目相配套，在中国初步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自主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156 项”重点项目的建设及其取得的成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成的，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如果没有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解放初期国民经济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就不可能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我国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否认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现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评价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当然，在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成之际，中国本应与时俱进，按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时调整经济体制

和政策。但是在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中，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对经济体制认识上的僵化，使我国于1956年、1965年和20世纪70年代多次与改革机遇失之交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不活，改造、创新的动力不足，以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改革的考验，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充满活力的新机制。

以“156项”为核心的这批国有企业，在共和国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不仅成功地构筑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为我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奠基石。经历五十年的风雨沧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一些企业面临着产品结构老化、冗员与离退休职工增多、企业包袱沉重的困难，致使经济效益普遍不好的状况；一些资源性企业，如煤炭、有色金属行业，这些行业存在明显的生命周期，由于资源枯竭，出现了长期亏损甚至已经倒闭。一些属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或者由于改革的偏差、或者是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在亏损的边缘挣扎。但是，还有一些企业，由于成功地实行了经营机制的转换，进行了企业再造，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它们在现在的国民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是丰富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一、企业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

1. 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156项”建设获得成功的基础。

1949～1952年，全国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边打（朝鲜战争）、边稳（市场）、边建（恢复经济），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在遭遇西方国家“禁运、封锁”的困境中，网开一面，引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设备与技术，在巨大的国防压力下，开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工业化建设。1952年底，在资金、物资、技术力量严重不足，地质资料、统计资料基础极端匮乏，现代管理经验近乎从头学起的条件下，选择了能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正如当时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云所言，这样的选择是反复权衡的结果。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项目的建设。当时的做法确有很大风险与牺牲，又确有其必然性。由于这种选择总的来看利大于弊，并且未雨绸缪，以至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基本适合中国的国内外环境，使当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51～1955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期间，计划的制定者，抱着慎审的、高度负

责的精神，在统计基础薄弱、信息交流不便的条件下，反复修订所规定的各项指标以及每个项目的年度计划，使各项计划指标基本上和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相适应的。在地质资料缺乏、设计能力严重不足、成套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技术施工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156项”建设项目的确立，也经历了1950～1955年的多次调查、协商与修订。因而，在具体执行中，取得了较好的结果。1958年以后，急于求成的思想压倒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指针的方针、政策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与可能，在“大炼钢铁”普遍开花的同时拖延了重点建设项目；经过1961～1965年的调整，才基本上完成了“156项”建设，但是时间已经延误了近十年。“文化大革命”1978年底以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由于这些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基础，什么时候坚持这一原则，我们的工作就会取得成功；否则就会失败。

2.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在困境中得到发展的力量源泉

新中国建立初期，不仅物资条件恶劣，而且管理技术人员奇缺，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都不高。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战胜重重困难，建设前人从未做过的大工业，需要广大职工的自觉和觉悟，经济建设的力量源来自广大职工高度的责任感与创造性地发挥积极性。

当时，广大工人阶级刚刚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提高，福利待遇的明显改善，是蕴藏在他们身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的重要原因。

在劳动竞赛、比学先进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以厂为家、以工地为家，有着无私奉献精神、勤奋工作的英雄模范。广大职工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自觉节约材料，降低成本。这种主人翁的精神，是“156项”建设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工人群众的这种主人翁精神，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年中，虽然工资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而职工仍然坚守岗位并保持着旺盛的生产积极性的奥秘所在。工人群众的这种主人翁地位，还是我们的体制存在多种弊端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生产仍能有所发展、效率有所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泽民同志曾一再指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和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原则，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3. 重点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同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矛盾很大，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不思进取，而是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围绕“156项”建设，五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实际实施的结果是：五年

内施工的工矿企业达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单位有921个，并已有537个限额以上单位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限额以上工矿建设单位开工，平均每周就有两个限额以上工矿建设单位投入生产。五年内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达197亿元，为旧中国原有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54%。

然而，当时的国力承受不了这样的规模和速度。以至1956年国民经济一度出现全面紧张。为此，陈云于1957年1月，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并且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削减非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点建设。

在财力方面，国家将“一五”时期财政总收入的19.1%，集中使用于重点工程建设。在物资方面，国家采取集中管理的办法，将70%～90%的钢材、水泥、木材等重要的物资优先供应重点工程建设。在人才方面，国家从各条战线抽调上万名优秀干部，充实加强工业部门和重点企业的领导，同时通过动员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对口归队和组织短期培训、轮训、出国学习等方式，以及从高等学校培养等途径，以壮大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从而使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然而，对于“一五”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加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投资饥渴症”缺乏有效的遏制机制。因此，当对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升到政治路线衡量，对发展速度只考虑需求不考虑可能时，形成了以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也影响了重点项目的建设。工作中的失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都对“156项”的继续建设带来损失，拖延了时间。以至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差的时期之一。

4. 艰苦创业的精神要长期坚持

在“156项”建设过程中，对于国家的大量投资，建设者们注意精打细算、周密安排。为了用有限的资金办更多的事，为国家节约资金，开展了全面的、经常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同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作斗争。在财力、物力十分紧张的条件下，尽力压缩非生产性建设，削减可建又可不建的项目，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努力加强计划、设计、管理、核算、验收等工作，尽可能降低工程造价，从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投资。比如兰州炼油厂、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热电厂和化工厂4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第一期工程建设中就为国家节约9000多万元。“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的工业建设大军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抢时间，争速度，使多项工程建设都提前完成。如白银公司的建设者们，在滴水贵如油的郝家川，抢风天，夺雨天，战暑天，硬是把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而且工程质量达到优等。铁路建设者们在兰新、包兰线上的奋战，公路建设者们在群山起伏、悬崖绝壁的“阴平道”上艰苦奋斗等等，都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又快、又好、又省”以及“勤俭建国”是“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建设的基本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工业建设者们的基本精神风貌。勤俭建国的基本原则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我国“一五”计划各项指标的胜利完成。

5. 正确处理国外援助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人类在创建物质文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相互交往是极其自然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促使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互通有无（贸易），交流生产经验（科技），争夺资源（战争）。近代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十分清楚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将一切民族都卷入工业文明中，迫使一切民族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新中国刚刚建立，就被几乎整个西方世界列入了“封锁、禁运”范围。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帮助中国建立“156项”，尽管基本是互通有无、等价交换的性质，却理所当然地被正值困境中的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作“无私援助”了。

整个50年代，在“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中，苏联政府和人民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施工设计，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供应新产品技术资料等方面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援助。另外有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还直接参与了工程建设工作。对此，陈云曾经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的合同，并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苏联撤走专家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

从建设“156项”开始，我国人民就边学边干，既派出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的学校、工厂学习；又在施工现场刻苦学习。因此，当1960年苏联政府突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时，我国有可能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的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并且先后独立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自力于世界之林赢得了不可或缺的实力。

由于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国方能全面完成“156项”建设。

6. 在以计划为主配置资源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一五”时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最好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我们正处在探索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市场、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尚未完全排斥，“一五”计划还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采用以计划调节为主，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市场调节的做法，适应了20世纪以来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8～19世纪以蒸汽机的出现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一次世界科技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化伴随着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产生了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清楚地描述了这种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市场化现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开始的以发电机、发动机、内燃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产生了生产力新的飞跃，推动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绝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被卷人西方资本市场，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由于电力的应用，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崛起。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为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赶超战略及相适应的计划经济模式。它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全国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国家重点发展的地区和部门，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使苏联由原来欧洲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经历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到1935年末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仍然要实现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传统工业化，二是要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新挑战，实现新技术革命带动的更高一层的现代化，两者同时并举并联为一体。1953~1978年，中国进行了传统的工业化建设，为适应国家集中全国力量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任务的需要，“一五”期间，我国由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计划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代中国这一层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也就是“156项”建设取得了较好效益的体制上的原因所在。

此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虽然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动向有所觉察，但始终未能深刻认识和确立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计划模式与更高层次的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始终没有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能找到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新体制。计划经济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传统工业化粗放发展的需要，却已愈来愈不适应新的技术革命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以后，西方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同工业化初期阶段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计划体制的弊端便凸现出来；我们却把市场、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限制；对外实行封闭半封闭计划模式；加之政治动乱等因素，使我国与世界的差距大大拉开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历史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时期，也是我们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期。

这些经验不仅对“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156项”建设期间的经济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轻工业与为农业服务的工业投资比重偏低，粮食生产没有完成计划指标；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设置不清醒，改造基本完成后没有及时汲取经验教训，纠正偏差；长期将市场机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对于企业的发展要依靠市场与研究、依靠技术与设备的更新改造缺乏认识，使企业对人才和创新的需求失去了紧迫的要求，这种企业模式及其衍

生的管理观念束缚了几代产业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全面的总结经验教训。

二、存在的问题

以“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布局的结构与基础，装备了工业部门的各个部门，取得了举世注目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应看到，“156 项”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成绩是辉煌的，地位与作用也都举足轻重；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存在以下不足或失误。

1. 部分项目布局和选址不够合理

当时工厂选址不得不考虑政治和国防因素，提出了要“远离沿海，背靠苏联”的原则。除东北地区以外，企业全部布局于京汉（北京—武汉）铁路以东。对于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缺乏考虑。因而，许多厂没有选择到最佳位置。一些厂址甚至选在了交通闭塞的山沟里，给以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以石化为例，世界上各国石化企业都主要集中在沿海，这样既可以减少运输成本，还可以减轻对铁路、公路的压力。而当时我们将石化企业（兰州炼油厂等化工厂）布置在我国的几何中心兰州市，它们的原料油来自玉门、克拉玛依以及 60 年代以后的大庆等地，原料产地与石化企业的距离非常远，对铁路和公路造成了很大压力。

另外，在布局和选址中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也考虑不周。一般而言，对环境有污染的大企业一般都布置在城市的下风口或河流的下游，而“156 项”建设的一些企业却安置在城市的上风口或河流的上游。如位于兰州市西固区的兰州热电站、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氮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就是这种情况，它们既处在兰州市的上风口，又处在黄河的上游，对城市和河流都造成了很大的污染。

2. 在三门峡水库修建过程中盲目放弃中国水利专家的正确意见

“156 项”中，投入建设的 150 项里教训最为严重的是三门峡水库工程。

1957 年 6 月，苏联专家已设计好三门峡水库，当时除受淹的陕西省外，举国上下一片喝彩。毛泽东同志号召百家争鸣，中央召集了全国专家 70 人讨论二门峡水库工程，会上只有黄万里一人坚决反对在三门峡建坝，他在会上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辩了 7 天。因为是苏联专家定的，会上大部分人不说话。随之就开始了对黄万里的批判。

黄万里反对建二门峡水库的理论依据主要是：(1) 黄河的泥沙主要来自中游山陕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不可能解决自然冲刷下来的泥沙，正是这些泥沙冲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因挟带泥沙而认为黄河是害河，前提是错误的。黄河在郑州以下是黄河淤积段，淤积段泥沙沉降是不可避免的，指望建三门峡水库拦住泥沙，解决下游河道淤积问题，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2) 凡在河流淤积段上建坝都会使坡降减速，加甚淤积，决不可行。郑州以上黄河原为冲刷段，由于地质史上三门峡的抬升和潼关一带沉降为地堑区，故峡县至龙门及渭河全改为淤积段。三门峡水库恰建在这

一特殊淤积段上，大坝如建成，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特别是渭河河床抬高将淹没关中平原的大片良田，不过是把下游的灾情推到中游，于整个治河之事无补。这坝修不得。(3)“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最后这一条与会者全都同意了，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主持施工的“水利专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6个施工泄水洞全部堵死。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开始关闸蓄水。同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撤离。一年半的时间里，15亿吨泥沙都游积在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随后，渭河两岸，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土地盐碱化，泥沙占了水库大量库容，淤积不断向上游延伸，1964年咸阳河段已淤积3米，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以后为了保西安又不得不降低水库水位。1965年大坝改建，在大坝上多处穿孔，以泄泥沙，1967年后把被堵施工排水洞每个以人民币1000万元的代价将其重新打通。还拆掉了刚装上的15万千瓦的高水头发电机代之以5万千瓦的低水头小机组。由于改建二门峡水库没有完全采纳黄万里的意见，泥沙在库区貌似达到了冲淤平衡，实际上库区上游黄、渭河的淤积问题只是放缓，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此后，“筑坝拦沙让黄河清”的初衷无人再提。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还涉及到29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十几次迁移。

因此，水利电力部党组于1965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1954年以来，十年治黄，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前六年迷信洋人，当我们自以为对治黄最有把握的时候，实际上是最无知识的时候。后四年离开了洋人。三门峡一修好，淤积迅速发展，我们仓促应战，确实很苦恼。……在黄河上，碰了十年的钉子，办了不少蠢事，这才使我们一点一点地，开始认识黄河的规律。

3. 国防工业比重较大，对轻工业和支援农业的工业投资不足

“156项”工程立项之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除了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外，还不断对我军事挑衅，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国防安全因素是考虑的重点。在“156项”工程中，军工项目有44项，占了较大比重。而这些军工项目大部分分布在中原腹地——陕西、山西、四川达29项，占全部军工项目的66%。这些军工厂按现代战争要求设计，因此，国防所需的各个兵种的武器和装备均在立项之内。这里集中了当时最科学、最先进的军工企业，配备了一批技术精湛，工作高度负责的科技人才，曾为我国的国防安全和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国防工业占的比重较大，国防工业与地方工业的衔接与转换协调不够，使得国民经济的负担长期相当沉重。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甚至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一五”计划规定，在五年内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5.9%，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4.1%。

我国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这样大，而轻工业投资所占比重比较小。这在当时是从国

情需要出发的。因为旧中国只有一些轻纺、制糖、制油等轻工业，受长期战争破坏，仅有的少量重工业已被破坏殆尽，已有的轻工业受原料等影响尚开工不足。因此，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重中之重，认为它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确定了这样的投资比例。而苏联的工业结构中轻工业的比重也很低，品种与质量也不具优势。所以在"156项"中重工业之外的只有一个造纸厂和两个医药厂。

然而，我们把片面发展重工业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长期固守，造成了经济结构中农、轻、重比例失调。农、轻、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轻工业和农业相对落后必然制约重工业的发展，这一点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

4. 未将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上升到提高竞争力的地位加以重视。

"156项"重点项目基本上是从苏联引进的20世纪40年代的设计、工艺和成套设备。中国在引进技术、设备的同时，也引进了苏联的企业管理模式。"156项"建立以后的几十年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我更新改造的权利，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对人才创新的激励。长期重复制造"古董"，和靠计划分配产品。这种企业的管理模式及其衍生的管理观念束缚了几代产业的发展。由于这个基础，我国的研发资金投入相对一直很低，发明和创造精神自然受到限制。

改革开放后，从80年代末到1995年，我国的研发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但未升反而连年下降，使本来很低的研发费用与总产值之比（R&D/GDP）由0.7%降到0.48%，而发达国家则高至2.6%～2.8%，瑞典甚至高达3.6%以上。尽管到1999年我国R&D/GDP值上升到0.71%，但R&D费用也只有韩国的2/7、日本的1/39和美国的1/52，使科技含量大的产品发展比较缓慢。当日、德、美等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分别占国家总研发投入的80%、67%和53%时，我国只在10%～15%。国家无力大投入，企业又急功近利，没有将精力放在创新上，而是放在技术引进和购买设备上。由于忽视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我国的国际竞争力1999年降到第29位后，又在2000年降至第31位。其中，科技竞争力由1998年的第13位，到1999年降为第25位，2000年又降至第28位。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无关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三、新形势下企业发展与改革的经验教训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建国初期建设的"156项"为代表的大部分国有企业，积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开拓市场，狠抓内部管理，转换经营机制，在内部的改革和公司制改造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为企业的发展与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促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

首先，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对国有经济重新进行产业定位，并确定优先发展序列，通过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重组，充实和加强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支配和主导作用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解决现阶段国有经

济布局过散、战线过长的问题，优化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和结构，使国有经济在产业布局上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次，结合国有企业的行业特点、现实条件和分工协作联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市场机制作用，以控股和参股、购并、联合、委托经营等方式，实施企业间关联性重组。通过同行业生产同种同类产品和技术相关的企业间的横向重组，提高行业企业的集中度，形成一批行业内实现规模经营和在产品、技术、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大企业、大公司；通过分工协作，上下游、产供销企业之间的纵向重组和横纵结合的企业重组，形成一批跨行业、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以此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的行业布局结构和企业结构，促进国有经济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使国有企业在重要的产业、行业、部门领域真正发挥其主导性、支配性作用，充分体现其控制力。

2. 通过资产重组与流动，实现投资本体多元化，加大公司内部改制力度

为了让企业的资产合理流动起来，通过资产重组使国有资产得到增值，一些企业积极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运作。

如沈阳航天新华集团（沈阳111厂）在汽油机这一产品上实现与香港华晨公司合资合作，成立了沈阳新光华晨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之后，1999年又运作完成了6个有限公司，即公司控股的新光博龙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新光旋压成型有限公司、新光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新光超微粉碎有限公司、新光安全系统公司和新光华旭铸造公司和公司参股的由职工占大股的新光低温容器制造有限公司。通过重组资产，建立了资产连接纽带，培育了多元化投资主体，优化了国有资本结构，促进了航天新光集团公司的发展。

又如兰炼、兰化均是我国“一五”时期“156项”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1958年投产至今的四十多年里，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实现利税近200亿元，出产品、出技术、出经验、出人才、出效益，分别被誉为新中国炼油工业和石化工业的“摇篮”，是甘肃省经济的支柱企业。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加速，“两兰”老企业的弱点逐步显现出来，体制和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加剧，相继陷入亏损的境地。“两兰”同处兰州市西固区，仅一路之隔，厂内有3条物料管线相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兰”自成体系，自我发展，重复建设比较严重，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装置得不到满负荷运行。兰州炼化公司、兰州石化公司通过合并，重组为新的中国石油股份公司兰州石化公司，新组建的兰州石化公司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均超过百亿元，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将担负起保障西部原油出路畅通，西北地区成品油、化工产品最大生产商以及成品油进入川渝、拓展西南地区市场基地的重任。“两兰”合并重组，大大降低了成本，仅通过优化存量资产、实现内部原料互供，每年增加的效益有可能超过10亿元。

3. 推进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建立符合社会大生产要求、适应市场经济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依法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来综合性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如

沈阳航天新华集团按照十五大精神，从 1998 年开始着手进行公司制改造工作，公司制改造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运作的，在机制上、体制上、管理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明确了法人治理结构，决策层和经营层分开。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三者依《公司法》产生，行使相应的职责和权限，形成了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2) 调整和完善了公司的组织结构。改制后以资产为纽带和科技产权关系组建了集团公司，既有以军品为主的企业核心层，又有以控股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为主的紧密层，还有公司参股和租赁等形式的半紧密层和较稳定的松散层协作公司，增强了母公司竞争、运营、抗御风险和投资等能力。

(3) 科学地设定了集团内部管理机构。根据公司的总体经营目标，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科学合理的分解管理职能，对现有公司管理层的职能部门进行了重新划分，将公司原有 20 个职能部门精简到 13 个。

(4) 全体职工一律实行竞聘上岗。这次改制后，公司内全员下岗，聘请专家按劳动“四要素”：劳动技能、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对公司现有的数百个岗位重新测评。本着公平性原则，各类人员竞聘上岗，由过去的许我干，到我想要干，这是个观念上质的转变。

(5) 打破公司连续几十年等级工资制，推行岗位系数工资制，彻底进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还计划逐步引入劳动服、技术股、管理股、贡献股概念，鼓励职工持股并分得红利，让职工感受到自己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真正成为公司的主人。通过这次改制，引入了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

4. 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加快改革步伐调整发展思路。

“156 项”企业是我国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建立的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国有经济通过这些大中型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所谓重要部门、关键领域、大中型企业都是历史范畴，是依据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的。在当时十分经济落后的情况下，“156 项”所涉及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遍及 14 个行业，当时是必要的。

20 世纪中叶，特别是 6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曾经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脱离生产力水平，僵化地认为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比重越大越好、国有制的数量越多越好。使国有企业发展到了国民经济的几乎全部行业和部门。国有企业战线太长，分布太广，企业内部搞大而全、小而全，有相当比重资产闲置，没有发挥效能，导致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加之条块分割，盲目投资带来的重复建设，进一步影响了国有经济的效益和活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环境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搞好整个国有经济。要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方针。1997 年，党的十五大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方针，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

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国有企业要按照这一方向，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快改革步伐，调整发展思路。首先，要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第二，要顺应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努力在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保证国有经济改革沿着正确方向不断有所前进的最重要的条件。第三，坚持通过存量资源的流动重组，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任何一个国有企业，都不可能在原来的资源配置结构维持不变的条件下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搞活国有资本是搞活国有经济的关键。而要搞活国有资本，就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重新调整经济资源的配置结构，包括资产、土地、劳动力等各种经济资源都需要优化组合。资源重组与企业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资源重组实际上是企业真正进入市场的洗礼，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才有可能形成清晰的产权关系和权责关系，才有可能建立起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第四，实现富余人员分流，是当前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的关键，也应当成为检验这项工作是否取得实际成效的尺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156项”工程所形成的企业，正在新世纪全球化的风浪中经受改革和发展的考验。

纵观“156项”重点工程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它们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以“156项”为核心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就没有我国现代工业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会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以及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它们构造了国民经济的栋梁和支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批“一五”时期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国有企业中的大部分企业，正在积极创新，锐意改革，又努力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156项”重点项目发展的历程也是我国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发展成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历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它们承担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而且为国家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56项”建设，代表了新中国建设的一个时代。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纪念它，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成就和不足，更重要的是了解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全面地认识我们的历史，以在把握未来时更加自信与确切一些。

“156项”建设的成就和历程，将永载共和国史册。

第五章　“156项”建设大事记

1949年

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五条规定：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1950年

2月14日　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其中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建设的由苏联帮助建设与改造的企业达19项。

又据中财委1952年2月9日向中央的报告，两年来，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42个，其中东北30个，关内6个，新疆5个，内蒙1个。东北30个项目中，电力、钢铁、煤炭、制铝等20个，机械、化学、造纸等10个。关内是太原、重庆、西安、郑州4个电站、太原肥料厂及染料厂，新疆是几个电厂和医院。在42个项目中已作出初步设计并已批准的有15个。总投资额，仅就关内、东北36个项目估算，共需34亿元，其中国外订货占30%。

9月29日　中苏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在新疆乌鲁木齐成立。

1951年

2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通报提出要确立“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关于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张以重工业为中心。关于五年计划的编制经周恩来提议，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参加成员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19日朱德在全国工业会议上着重讲了编制五年计划问题。他说五年计划不但必须研究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的配合，还要与苏联、东欧等国相配合，使我们的订货纳入他们的计划。

6月29日　国营112厂（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建成。

12月　中苏双方批准铝厂初步设计任务书，设计任务由全苏铝镁设计院列宁格勒

分院承担。

1952年

1月9日　中财委颁发《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决定将建设单位分为“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两种；限额以上又分为甲、乙两类，限额以下分丙、丁两类。并规定了各种事业基本建设的限额。

2月9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党组关于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工厂初步设计的审查报告。

3月19日　抚顺制铝厂保管处更名为抚顺铝厂（即301厂）。

8月　×中财委颁发《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

10月10日　中财委颁发1953年对35种重要物资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办法（试行草案）。凡需用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企业部门，均应按照其生产计划与基本建设计划以原材料、燃料、电力的消费定额，核算其全部需要量，逐级审核汇总，分别由中央各部及大区财委、计委向中财委统一申请并负责供应。

10月22~23日　陈云在中财委会议上讲话指出：目前我们基建中的主要矛盾是任务十分繁重，而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必须迅速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建立和充实设计施工机构，配备坚强的领导骨干、先进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工交部门必须确立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决心调集人员建立各部的专业设计和施工组织。

11月15日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

11月17日至12月8日　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决定地质工作要有个大转变，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探明一定储量。

12月15日　全国统计工作会议。要求加强统计工作，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建立科学的统计制度。

12月23日　中财委提出：到明年第一季度，应该抓紧三个环节进行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勘察设计；组织与训练施工力量；进行工程材料的准备与运输。当前工作的重点是设计。

12月31日　基本建设投资原计划15亿元，因基本上没有设计及施工计划，加以缺乏经验，实际完成10.4亿元，计划没有完成。

本年度　中国第一个大型轻加工厂成立建厂机构，定厂名为哈尔滨铝加工厂，代号101厂。

1953年

1月1日　东川矿务局成立。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

3月30日　李富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中国五年计划问题。1952年8月，以周恩来

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原则确定后，周恩来、陈云等先行回国，李富春和若干助手继续与苏联领导人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的具体细节。前后历时8个月，对每个项目都进行了比较详细周密的研究。

3月辽宁省抚顺发电厂扩建的5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

4月25日　我国第一台自动化大型水力发电机组（7.25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在吉林丰满电厂安装成功，27日开始送电。

4月28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工业、运输技术人员的现状和培养办法》。

5月15日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五一五协定”)。《协定》规定，对上述项目，苏联负责完成各项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在施工过程中给予技术援助，帮助培养这些企业所需干部，并提交在上述各企业中组织生产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中国政府组织现有企业生产一部分供“141”项所需配套用的和辅助性的半制品、成品和材料；完成建设上述企业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的20%～30%的设计工作。

同日，以协定议定的形式规定苏联对中国35个国防工业项目保证完成各项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为了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互相配合及需要，并根据苏联政府派来我国的五个综合专家组对发展各该部门工业远景计划的研究，1954年10月12日，苏联政府又增加设计和帮助建设15个项目。中国并聘请了北京市规划顾问，铁道设计与施工专家。至此，中苏共签订了156个苏联援助我国的建设项目。

5月21日　李富春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上介绍商谈五年计划的几点体会。其中谈到：学习苏联，以求达到自力更生。苏联对我们的技术援助是从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设计到新产品的制造。但我国建设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需要担负地质勘察，供给设计基础资料，选定厂址，制定设计任务书，担负20%～30%的设计工作和30%～50%的设备制造，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建筑安装，组织现有企业生产配套用和辅助性半制品、成品和材料，培养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掌握生产。

7月1日　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竣工投产，该矿于1950年1月开始施工，建设规模年产原煤300万吨；建设周期三年半，投资1.9亿元，吨煤投资65元。

8月1日　政务院下达《关于1953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基本方针仍是“集中使用，重点配备”。配备的重点是基本建设的施工、设计方面和高等学校的助教、研究生。

8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9月7日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的决定》。为了使建筑工程部集中力量执行工业建设任务，决定将该部担负的国防工程任务，移交军委有关部门；一般民用建筑企业的管理，移交地方。同意建筑工程部报告中提出的整顿队伍的意见，以

现有8个建筑工程师及一部分较有基础的企业为骨干，组织一支具有良好政治素质与高度技术的工业建筑队伍。

9月17日　国家计委会同中财委初步确定了1954年国家财政预算方案。决定发行6亿元公债，做到财政收支平衡。1954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拟增加4%，重点在重工业及知识分子。

9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颁发195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指示》，指出了1953年经济工作出现的六个问题，提出编制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方针。首先要坚定不移的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经济比重和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从各方面积累资金，适当提高经济建设投资比重，优先保证工业建设。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为：经济建设拨款72亿元，较1953年略低。重点保证"141"项中续建的28个项目和新开工的12个项目。

10月9日　我国西北第一座现代化自动火力发电厂　西安第二发电厂建成发电。该厂于1952年11月动工兴建。

10月16日　中共中央做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11月8日　中共中央同意国家计委关于有新厂建设的城市中组成城市规划与工业建设委员会的建议。

11月20日　国家计委批准成立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

12月9日　我国决定发售6亿元公债。

12月26日　鞍钢三大重点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八号高炉系统工程历时九个月至一年零三个月，于10月份和12月份相继竣工投产。

12月　三年来我国派遣出国的实习人员共计354人。

12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食国务院专家组到郝家川（白银厂）实地视察。

12月　中苏两国政府换文，苏联将制造喷气式飞机米格15（含发动机）和教练机雅克18（含发动机）的制造权转让给中国，并提供成套技术资料和样机。

12月31日　这一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80亿元，完成计划的107.7%比上年增长83.7%。建成或部分建成的重大项目有38个。其中重要的有：鞍钢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八号高炉，海州露天煤矿、抚顺、西安、乌鲁木齐、郑州发电厂，丰满水电站，黄河的引黄济卫工程，河北省的独流减河工程及官厅水库的主要工程等。新建的七条铁路已铺轨589公里。由国家投资完成的房屋建筑面积300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200万平方米。这一年，人民生活也有一些改善，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了7.7%，其中农民提高3.2%，非农业居民提高15%。

1954年

1月13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钢铁公司赴苏实习团《关于实习经验的报告》。指出，一切苏联设计的和供给设备的新的重要企业，凡不能掌握新的操作技术者，主管部门必须正确及时地挑选人员成批成套地组织赴苏学习，以便保证新建企业及时、顺利地

进行生产。1954年赴苏实习生约有1300人。

2月吉林化工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开始建设。

5月12日　李富春在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论述了“141”项工程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作用。这141个建设项目全部建成需要140亿元投资，建成以后将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6月10～28日　建筑工程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会议明确了：(1) 城市建设必须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2)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建设应把力量集中在141项所在地的重点工业城市，以保证这些重要工业建设与生产的主要工程项目上面。

6月30日　陈云向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对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估计中谈到：五年中，工业生产速度的增长主要靠原有工厂和自己设计的工厂，这些企业增加的产值约占全部增加产值的75%；新建和改建的工厂增加的产值仅占25%。工业基本建设方面，在“141”项工程的建设全面铺开后，全国支持的力量会更加分散；而在“一五”后两年基本建设大规模铺开，会遇到更多困难。因此，有些项目（包括“141”项）要推迟。轻工业目前主要问题是缺少原料。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轻重工业投资1:7.3的比例，仍维持不变。重工业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这种状况目前无法改变。

7月26日　南昌教练机制造厂（现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洪都机械厂）制造的首架国产飞机试飞成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参加剪彩。试飞员为24岁的段祥录和刁家平。8月1日，毛泽东兴奋地签发了给全体职工的嘉勉电。

8月3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于4月份提出的《关于1953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基本情况及195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和《195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提要（草案)》。其中指出：基本建设以“141”项工程的建设和准备工作为中心，更有效地集中地使用资金。基本建设投资76.2亿元，占56.6%（其中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建设投资占86.3%，生产资料的占13.7%）；农林水利投资5.9亿元，占7.8%；交通运输邮电部门投资15.2亿元，占20%。12月26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家计委根据上述精神和各地区、各部门对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的修改。其中包括：基本建设投资由76.2亿元增加为78.3亿元，限额以上项目由418个增加为437个。

9月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在甘肃兰州成立。

9月9日　政务院第224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

9月15～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承认五种经济成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化学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

9月20日　第一次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55年计划控制数字，其中指出：继续贯彻重点使用投资的方针，抓紧重点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1955年计划投资88.79亿元，比上年预计完成增长25.9%。中央8个工业部计划投资50.6亿元，比上年预计完成增长43%。“141”项工程中，有30个继续施工，有35个开始施工。中共中央10月

13日和11月10日先后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和《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的报告》。关于1955年的计划，中共中央强调指出：1955年国民经济各方面，特别是“141”项工程为骨干的工业建设必须达到五年计划所要求的进度和速度，同时还要克服1954年水灾所造成的困难，这就使1955年国民经济各方面，尤其是国家财政收支颇为紧张，农业生产发展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矛盾也将扩大。

10月12日　中苏两国签署《对1953年5月15日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议定书》，并签订协议，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

10月19日　抚顺铝厂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批铝锭。

10月29日　中共中央通知讨论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提出，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41”个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基础。

10月根据苏联政府建议，中国政府决定停止试制米格15，改为试制米格17及其发动机。

11月8日　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薄一波任主任，王世泰、孔祥祯、孙志远、安志文等任副主任。

12月20日　我国煤炭建设重点工程之一的抚顺老虎台矿扩建工程完工投产。

12月31日　当时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太原热电厂建成发电。它于1953年10月24日动工兴建。

12月31日　1954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74.98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完成计划的95.7%。在继续施工与当年新施工的411个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中，有39个建成投产。新建铁路铺轨831公里，新建公路3662公里。国家兴建的房屋建筑面积477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 327万平方米。但新增固定资产计划和某些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计划没有完成，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81.3%。

1955年

1月6~8日　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确定1955年计划方针是：全国平衡，统筹安排，增产节约，重点建设。针对经济建设要求有更多的资金而国家财力又有限的情况，会议要求增收节支，保持建设规模和国家财力的平衡。国家财力应主要用在保证重点建设，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和标准。4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李富春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指出：解决国家资金积累的缓慢同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的矛盾，最主要的办法是“在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和在保证建设事业的条件下厉行节约”。要求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必须分别编入计划，按规定经一定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在建设速度上，必须作全盘的合理安排。一切工作必须坚决地降低造价，今后三年在原有预算标准的基础上，至少降低造价10%。

1月18日　我国第一座精密机械工具制造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建成投产，该

厂建设于1953年5月开工，建设周期一年半，投资5500万元，生产各种量具、刃具1000吨。

1月沈阳风动工具厂建成投产，设计规模为凿岩机、风动工具万台，6050吨。该厂1952年兴建。

3月15日　重工业部召开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指出，重工业部过去两年中完成了五年计划草案中26%的任务，还有74%的任务要在今后三年完成。1955年工业建筑和设备安装的工作量，比1954年增加一倍以上。根据基建规模扩大和技术日趋复杂的情况，会议认为，今后重工业部基本建设部门的基本任务是：改进基本建设单位及建设安装企业的组织和工作方式，使它们从过去适合于民用建筑及一般的工业建设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走向更适合于担负复杂的工业建设，并努力争取全面完成国家建设计划，保证建设工程按期投产。

会议指出，一些单位在执行国家计划中存在保守倾向和本位主义；有些干部对重工业建设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实际工作中缺乏通盘筹划，缺乏按期完工的计划观念，因而许多工程未能按计划要求投入生产，在计划、设计、施工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浪费现象和违犯财政纪律的现象。今后必须首先加强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通盘筹划和相互协作，使地质、设计、科研、施工、生产准备等各部门，都按着统一的计划和进度协调地进行工作，保证按期使固定资产投入生产。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十分注意合理地动用国家资金，掌握国家投资计划，加强投资效果的分析，纠正和避免投资使用上的浪费现象。

4月8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同意计委党组《关于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基本情况和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1955年基本建设的特点是基本建设任务大。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为98亿元，比1954年增长31.5%，占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总投资额的22.9%。当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1079个，其中苏联为我国设计的有91个。为保证1955年计划的完成，建议各级党政部门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和国营企业部门如同对待法律一样来执行国家计划，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企业部门也应逐步做到这点。

5月12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重工业产品价高利大问题的报告》。由于解放前重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从国外进口，解放后，西方国家封锁禁运、抗美援朝和各地开展基本建设，重工业产品供不应求；加之这几年成本有所下降，税金又较轻工业少，因此，重工业产品价高利大问题普遍存在。如钢铁产品的平均利润率为57%，机械产品的平均利润率为37%，重化工产品平均利润率为38%。为此，中央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方案，即1956年和1957两年，重工业各部门调拨价格每年下降5%～10%，经过两三年后基本上达到合理的比价。9月，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提议国营工业主要产品的出厂价格比1955年总的平均降低6.2%，总降低额8亿元。

5月兰州化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热电站开始建设。

7月4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指出，在基本建设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的，同中央历来强调的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我党一贯的艰苦奋斗作风不相容的，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决定》要求，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生产用的必需设备和国外设计的厂房投资除外）和各种费用，必须在现有计划的基础上，再削减15%~20%。要求各经济部门改善经营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加强财务成本工作，节约资金，杜绝浪费，降低成本，增加上缴利润。严格遵守老企业、老单位增收不增人，新企业、新单位增人从老企业、老单位多余人员中调配和优先录用复员退伍军人的原则。

7月1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颁布关于《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和预算文件审核批准暂行办法》的通知。指出，按照管理程序严格审核批准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和预算文件，是国家统一管理基本建设工作、保证工程质量、节省建设资金、避免浪费现象的一项重要制度。

7月30日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同意李富春副总理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工业是建设的重点，占总投资的58.2%；农林水利占7.6%；运输和邮电占19.2%。五年内，我国限额以上的基建单位共有1600个，其中建成1271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6000多个，绝大多数可以建成。运输方面五年内新建铁路干线和支线共4000公里以上，加上恢复改造，共增加约1万公里。农业和水利方面新建国营机械化农场91个，建设13个大型水库，并开始进行黄河的治本工程。五年内房屋建筑面积约1.5亿平方米。

8月8日　黄河规划委员会根据国家批准的黄河综合利用技术经验报告，上报"黄河三门峡水力枢纽（包括水电站）设计任务书"和"初步设计编制工作分工"两个文件，作为治黄的第一期工程。三门峡水力枢纽工程确定1957年开工，1961年竣工。水电站分两期修建，第一期装机容量为40万千瓦，第一台机组投入运行的时间确定在1961年的一季度。水电站总的装机容量约为100万千瓦。后来，由于含沙量太高，水库淤积，1969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造第2次会议决定，放弃原设计高坝蓄水方案，改为径流发电，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5×5万千瓦），1973年12月第一台机组投产，1978年12月26日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发电。至此，全部工程竣工。

8月26日　我国第一座高温高压热电站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正式投产。

9月15日　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厂动工兴建。

9月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并于10月4日经中央批准。为了保证五年计划的完成，《报告》要求各部门和各地方提出的1956年计划"应该在可靠的基础上订得更积极些，尽可能地超过控制数字所规定的指标。"1956年计划控制数字中提出：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为112.7亿元，施工的

限额以上厂矿建设单位为555个（包括新开工的161个），其中年内建设完工的162个。鉴于前三年共完成计划总投资额的51%左右的情况，为了保证五年计划的完成，并避免建设任务过多地集中到1957年，《报告》要求，各部门不仅应达到控制数字的指标，而且应该把那些在五年计划内有条件提前施工的建设单位提早施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51亿元，商品的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还存在一定差额。

9月　我国第一座大型立井——鹤岗东山煤矿移交生产。

10月4日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编制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及其报告。中央指示：鉴于有些经济部门1955年预计完成的主要计划指标有可能达不到"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当年水平，同时，"一五"计划又只剩下两年的时间。因此，各部门、各地方在编制1956年度计划草案时，必须具体地分析情况，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发掘潜力，克服困难，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计划指标，努力争取实现。

11月19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关于基本建设工程设计任务书审查批准暂行办法》的通知。《暂行办法》规定了设计任务书的审查和批准权限。

11月29日　中央同意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修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请求报告》。其中提出：由于贯彻厉行节约的方针，削减了非生产性工程的投资和降低了工程造价，减少了投资。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额计划由97.9亿元，修改为91.7亿元。

11月　沈阳冶炼厂在冶金系统首先研制出硒。

12月29日　中国第一座新型工作母机制造厂　沈阳第一机床厂开工生产。该厂1953年动工兴建。

12月31日　1955年基本建设效益较好，当年完成投资93亿元。投资额比上年增加2.6%，但由于基建造价降低，按实物计算的工作量则增加了15%。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到86.2%。当年施工的741个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建成投产的有102个，投产率为13.8%。由于开展节约运动，降低了非生产性建设的设计标准，根据1955年对3280个较大的建设单位的统计，节约资金达10亿多元。存在问题：由于经验不足和前两年农业歉收，基建规模安排得小了一些，在节约运动中，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投资。同时，基建计划变动次数多，下达迟，对完成计划也有影响，使后两年任务更为繁重。

1956年

1月10日至2月7日　第三次全国计划会议。国家计委提出1956年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148.5亿元，比控制数字增加31.9%，一年之内要完成五年计划的总投资额的36.95%。

1月　云南锡业公司试炼一号锡（纯度99.9%）成功。

2月22日至3月4日　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若干年内设计、建筑、城市建设的初步规划以及改进基本建设工作的基本措

施。会议拟定了《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发展建筑工业的决定》、《关于加强设计工作的决定》等草案。5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下达。

2月22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其中指出，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在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新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计划既要积极又要可靠的指示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精神编制的。基本建设总额147.35亿元，增长70.6%。鉴于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快，当年要完成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35%左右。报告指出，设备和建筑材料的供应同需要还有相当的差额，资金、技术力量和人民负担能力也有限度。

3月28日 内蒙古第一座热电厂——包头第二热电厂破土动工。该厂第一台机组（2.5万千瓦）于1958年7月建成投产。

4月6日 中国和苏联政府签订经济合作协议，规定建设55个新的工业企业，作为对于根据以往签订的中苏协定正在建设中的156个项目的补充。

4月14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度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的补充报告》。国务院指示指出：1956年度物资供应情况是很紧张的，钢材和水泥的供应情况尤为严重。各有关部门应该从努力提高生产、节约使用等方面来缩小物资供应和需要之间的差额，并且尽可能解决品种和时间方面的矛盾。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必须根据现在已经确定的分配数目，核实需要，精打细算，降低消耗定额和克服某些人为的紧张现象。

4月25日 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

5月 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建成投产。该厂1954年4月兴建。

5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

6月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委托各部、委、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批设计任务书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以往经验和基本建设项目逐年增多的情况，限额以上基本建设工程的设计任务书如全部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查报国务院批准，难免发生误时误事的现象从而影响设计工作的进度。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的提议：设计任务书的审批主要根据建设工程的资源、协作配合条件等审批其规模和设计能力，以便及早设计。至于建设项目的审批及其建设进度、总投资、分年投资等问题，应该在审查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时确定。

6月18日 李富春在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谈《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他提出，根据过去三个年度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6年计划的预计，“一五”计划所规定的任务，能够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但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和某些生产指标的增长速度规定得低了一点；在基本建设方面，对于勘察、设计、供应设备和材料、组织施工等环节的衔接和平衡注意不够，全面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6月21日 薄一波在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今年是国民经济趋于全面高涨

的一年》的发言。认为1956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建筑材料和设备不能满足基本建设的需要，以致许多工地发生停工待料和不能按期开工的现象等。为了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应进行如下工作：在基本建设方面，国务院已将原定147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削减为140亿元。应在保证重点工程建设的条件下，对设计、设备、建筑材料和施工力量进行全面的平衡和安排。1956年各部门对钢材的使用，应完成在生产上节约4%和在基本建设上节约2.5%的要求。

6月23日　王鹤寿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执行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中的情况和问题》发言。指出1956年基本建设在规模加大、速度加快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工作很不协调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建筑安装工程的施工期限可以大大缩短，而地质、设计、设备制造、材料供应等工作都赶不上建筑施工的要求。主观原因在于有些建设单位计划安排不周，对有些重要的条件缺乏周密的考虑，对于那些可能影响施工进度的不利因素没有给以必要的估计。为此，他要求根据设计、建材、设备供应的时间和可能，对所有的工程建设的季度、月度计划进行部分调整。首先保证重点工程和关键性的工程的顺利进行。

7月6日　我国第一座用自动控制的高温高压热电厂　吉林热电厂第一台锅炉和透平发电机投人生产。

7月　黑龙江兴安台10号立井建成投产，该矿1952年8月开工，建设规模年采原煤150万吨，建设周期不到4年，投资7200万元，吨煤投资48元。

7月15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该厂于1953年7月15日开工兴建，建设规模为年产载重汽车3万辆，建设周期三年，投资6.3亿元。

7月15日　我国第一对自己设计施工的淮南煤矿谢家集二、三号大型矿井正式投产。

7月17日　白银有色金属矿山进行第一次大爆破。

8月2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关于1956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的问题和对于下半年材料及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批准钢材、钢管及钢材再制品的分配调拨计划的调整。并指出，根据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和此次对下半年的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的分配调拨的情况，1956年基建的投资总额和建设项目已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因此要求各部门、各省市、各自治区在保证重点建设的前提下迅速作妥善的安排。国务院还对钢材、水泥、木材的增产节约、市场供需、出口等问题作了指示。

8月　沈阳电缆厂建成投产。该厂1953年6月兴建。

8月　沈阳飞机厂试制的喷气式飞机歼5试飞成功。9月通过国家鉴定验收。

9月15日～27日　中共八大召开。会议规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等等。

9月24日　李富春在会上发言，指出，在过去的计划工作中，最主要的缺点，就

是我们的计划工作还不全面、不准确、不灵活和缺乏远见。

10月15日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电子真空企业——北京电子管厂正式开工生产。

11月6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严格审查与批示控制1956年基本建设的紧急指示》。指出，由于1956年对基本建设控制不严，发生了分散使用投资的偏向，引起财政和建筑材料供应紧张的局面，许多已经开工的基本建设工程不能正常施工。这种情况必须改变。1957年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将大大低于1956年，而且必须有重点的集中使用。

11月10日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谈了《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指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告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第一，从生产指标方面看，今年的多数指标都接近了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第二，基本建设投资超过了计划数字。设计项目中，苏联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是完成了，但有一部分没有完成；我们自己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也都完成了，但有些是不应该设计那么多的。第三，从预算上看，我们订得比较稳当一点更好。

11月24日 国家经委召集各部负责人开会，确定1957年外汇指标：（1）1957年的外汇控制数字原确定为65亿元，一般贸易订货为38亿元。根据最近发生的情况，外汇控制数字需降为58亿元，一般贸易为28亿元。主要原因是：①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因此，猪肉的出口计划由16万吨降为5万吨；食用植物油由32万吨降为25万吨。②历年来外汇都有节余，但1956年不但没有节余，而且借苏联的外债还需要偿还。（2）外汇指标削减后，只能根据国家建设和照顾市场的原则分配，即保证成套设备的进口，减少军事订货，略加一般贸易的外汇，其他则维持去年水平。

11月28日 国家经委召集各部、委、办负责人和经委主任、副主任、局长会议座谈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薄一波对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中的基建投资、物资分配、外汇等问题作了说明。会议确定：（1）由于1957年财政收入只有308亿元，基建投资再增加是不可能的：主要材料仍很紧张，钢材、木材等还有很大差额；进口外汇也只能达到49亿元，无法再增加。因此，各部要求增加投资、材料、外汇均是不现实的。（2）各有关方面要按照党的二中全会确定的骨头与肉相结合的方针，把1957年基建计划安排好。要合理地、积极地、节省地使用投资；该下马的项目就坚决下马，不该上马的坚持不上；下马要切实可靠，上马要十分慎重；要打消1958年增加投资的想法。（3）今后的计划工作，先由各部进行具体平衡，然后再由经委综合平衡。

12月17日 国务院批转《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1957.4.12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国务院决定恢复和开办小煤窑）

本年度 沈阳冶炼厂在冶金系统首次研制成功碲。

12月31日 1956年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48亿元，比上年增加55亿元，即增加59.1%；当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91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为121年，投产率为13.2%。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上年的86.2%降低到75.4%，是"一五"期间最低的一年。

1957年

1月18日　陈云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

2月22日～3月11日　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决定适当压缩基本建设。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定为111亿元，较上年减少了20.6%，同财力、物力基本平衡。会议总结指出，在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有了较多增加后，由于生产、财政特别是建设物资的紧张，1957年需要对基本建设进行适当的收缩和重新安排，这就产生了如何“下马”以及“下马”后的设备积压和劳动力剩余等问题。

6月5日　在苏联帮助下，我国设计了第一座水力采煤的开滦唐家庄矿，该矿年产量为60万吨。1958年7月31日建成投产。

6月11日　辽宁省阜新煤矿一座年产150万吨的大型矿井——平安竖井建成投产。

7月1日　薄一波向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为上年的79.4%。适当调整了若干部门的投资比重，加强了薄弱环节。主要是：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比重，减少了纺织、食品、机械制造工业等设备能力暂还有多余的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生产能力不足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保持了农林水利的投资比重，增加了地方投资的比重，相应地减少了中央部门的投资比重。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591项，其中计划竣工的219项。

7月17日　中国第一座生产高压、中压火力发电锅炉及船用锅炉的现代化工厂——哈尔滨锅炉厂首期工程建成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约3万吨重的电站设备。

9月19日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制造自动电话交换机的工厂——北京有线电厂正式开工生产。

10月5日　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建设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这是我国第一座制造无线电器材的综合性工厂。

10月15日　中苏两国政府协议决定，苏联对中国无线电工业部门建立四个研究所给予技术援助和技术资料。苏方指定695号无线电通令负责帮助我方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34号无线电零件研究所负责帮助我方北京无线电零件与材料研究所；160号电子管研究所负责帮助我方北京电子管和半导体晶体管研究所；244号雷达研究所负责帮助我方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

10月　吉林化肥厂一期工程投产。10月25日吉林化工区三个化工厂——肥料厂、电石厂、染料厂正式建成，提前投入生产。

10月23日　我国第一个化学工业区——吉林化工区初步形成。该区包括吉林化肥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三个基本化学工厂和一个高温高压热电厂。该区从1951

年开始筹建，由苏联有关专家帮助设计。

11 月 21 日　西北无线电厂（后改名长岭机器厂）建成，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11 月 23 日　佳木斯综合纸浆造纸厂正式开工生产。该厂于 1954 年 8 月 10 日破土动工。

12 月　沈阳第一机床厂制造 C868 型二级精密丝框车床成功，成为中国机床工业制造高精度机床的开端。

12 月 4 日　国家计委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其中提出：保证重点的方针仍很重要，不能百废俱兴分散力量。第二个五年的重点是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一方面发展农业机械，另一方面要以发展太阳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为重点。某些方面要少做，才能保证重点方面多做。具体要注意三点：（1）生产性的多搞，非生产性的少搞；（2）基本能建设要多有所为，事业费要少有所为；（3）军、政费要减。

12 月 31 日　复杂无线电收讯设备制造厂建成，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12 月 31 日　1957 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效，初步展开了新的工业布局。五年完成基本能建设投资总额 550 亿元，其中国家投资 491.1 亿元，超过原计划的 15.3%。五年内基本能建设投资总额中，用于工业部门的占 52.4%（其中用于重工业的占 88.9%，轻工业占 11.1%）。五年新增固定资产达到 460.3 亿元，其中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 200.6 亿元。五年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 1 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有 921 个，比计划增加 227 个。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 156 个重大建设项目，到 1957 年底有 135 个已经施工建设，有 68 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此期间能建立我国前未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高级金属钢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等。在我国中部地区建立一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基本能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1957 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 93.4%，大中型项目投产为 26.4%，都为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

1958 年

1 月 11 日　化工部决定成立太原化学工业公司，统一领导太原化肥厂、太原化工厂、太原制药厂、第二化工建筑公司。

3 月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自行设计钻深为 1800 米的中型钻机。

3 月　南昌飞机厂制造的运 5 飞机经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定型，投入成批生产。

4 月　株洲硬质合金厂建成投产，开始生产钨粉。

5 月　哈尔滨电碳厂建成。该厂 1956 年动工兴建。

6 月 7 日　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后改名宏明无线电器材厂）建成，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6月26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517厂的代表，视察了该厂制造的我国第一台拖拉机。

6月　我国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在石家庄建成投产。从此，我国青霉素和链霉素基本达到自给。

6月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验收投产。该厂1956年1月兴建。

6月　武汉重型机床厂投产。

6月　大型电子元件厂——国营第715厂在成都竣工投产。

6月30日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建成，正式投入运转。

7月1日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滚珠轴承制造厂——洛阳轴承厂建成投产。该厂1955年5月兴建。

7月　太原化工厂建成投产。1955年动工兴建，主要生产硫酸、烧碱等。

8月8日　长岭机器厂试制成功无线电低空高度表。

9月26日　武汉重型机床厂建成投产。该厂1956年4月兴建。

9月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与哈尔滨工龄研究所共同研制建成中国第一条年产270万件M4－6手用丝锥的自动生产线。

9月　武汉钢铁公司部分投产。该公司于1955年8月开工建设，至1963年累计投资13.3亿元；新增能力：铁矿开采320万吨，选矿290万吨，烧结224万吨，炼焦225万吨，炼铁150万吨，钢170万吨。

9月　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轧制出1X200X200～400毫米BT5钛合金板，生产出中国第一批钛加工材。

10月　洛阳矿山机器厂建成投产。该厂1956年兴建，规模为年产矿山机器21607吨，建设周期4年，投资8800万元。

10月　哈尔滨汽轮机厂建成投产。该厂于1955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规模为汽轮机60万千瓦，船用汽轮机50万千瓦，建设周期3.5年完成投资1亿元。

10月　兰州氮肥厂建成。该厂于1956年3月开工建设，规模为合成氨5万吨，建设周期2.5年，投资2.5亿元，实际能力达到7.5万吨。

10月　洛阳热电站投产。该站于1956年6月兴建，规模一期为7.5万千瓦。建设周期两年零四个月，投资6800万元，千瓦投资906元。

11月25日　黄河机器制造厂建成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试制成功精密跟踪炮瞄雷达。

12月4日　锦江电机厂建成，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12月10日　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工程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该厂1955年兴建。

12月25日　617厂试制成功第一辆中型坦克。

12月　哈尔滨锅炉厂制成当时中国最大的电站锅炉，每小时能生产39个大气压的过热蒸汽240吨，过热温度摄氏450度，效率高达91%。

本年度　沈阳冶炼厂建成中国第一台0.96平方米圆形半水套镍鼓风炉，以硫化镍

精矿为原料，新建100吨电解镍试验车间。

本年 国营第784厂，即成都成套雷达制造厂，在成都建成投产。

1959年

1月 设计能力为日处理矿石2460吨的大型采选联合企业大吉山钨矿建成投产。

5月1日 包钢一号平炉出钢。

6月 兰州炼油厂投产。

7月 中国第一台高温高压双汽25000汽轮机在哈尔滨电机厂试制成功。这台机是依照苏联产品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成的。

7月14日 北京电子管厂试制成功1000千瓦大型广播发射机用8种大型电子管。

9月8日 株洲选煤厂建成投产。该厂是波兰援建的。

9月 吉林染料厂建成投产。

9月 邯郸马头洗煤厂（河北峰峰洗煤厂）建成投产。

10月31日 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规模为年产54马力履带工拖拉机1.5万台，11月在洛阳举行了落成典礼。

12月6日 锦江电机厂试制成功843型测高雷达，经国家鉴定，投入生产。

12月8日 北京有线电厂试制成功50JZBX－1型交换机，并投入生产。

12月 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建成投产。该厂1956年6月兴建。

本年度 株洲硬质合金厂开始生产工业钨、钼条。

本年度 抚顺301厂采用6000安培电解槽进行工业规模生产金属锂。

1960年

1月 哈尔滨汽轮机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1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

3月 哈尔滨锅炉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高压每小时410吨蒸汽的锅炉。

4月 西安仪表厂建成投产。该厂1956年兴建，是民主德国设计的项目之一。

5月18日 大众机械厂建成投产。

6月 河北峰峰三号立井建成投产。该矿于1957年11月兴建，总规模为120万吨，建设周期3.5年，总投资4100万元，平均吨煤投资34元。

7月16日 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决定召回苏联专家。7月25日，苏方没等我方答复，又迫不及待地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将撤回其在华的全部专家。据有关部门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项目共有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建成了103项，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之中。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有800多人。苏联单方面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的背信弃义行径，严重地扰乱了我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加重了经济困难。

8月14日 就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后的形势，聂荣臻副总理勉励国防部五院，

更好地发挥中国专家的积极性，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导弹的研制工作。

12月 西安绝缘材料厂建成投产。该厂1955年兴建。建设规模6000吨，建设周期6年，投资2500万元。

12月 西安电瓷厂建成投产。该厂1956年兴建。

12月 洛阳矿山机器厂制成中国第一台5米双筒卷扬机。该机自重175吨，在500米左右的深井里可以一次提升8~10吨原煤。

1961年

8月3日 北京电子管厂与三机部精密机械研究所、一机部机械研究院共同研制成功电火花仿形线切割机。

1962年

4月 日太原氮肥厂投产。

该年 兰州合成橡胶厂投产。该厂于1958年2月兴建，规模为丁苯橡胶13500吨。投资1.2亿元。

本年度 株洲硬质合金厂批量生产高纯钼条。

本年度 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合作，试制出中国第一根纯钛无缝管。

1963年

12月 中国自制的第一台6.3米重型立工车床，在武汉重型机床厂试制成功。

本年度 武汉青山热电厂建成投产。

年底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形成成铜采选冶炼综合生产能力1.5万吨。该矿于1954年11月开工建设，至1963年底完成投资45527万元。

1964年

1月20日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套11万伏和22万伏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9月 以8000吨车轮模锻水压机为主体设备的整体锻轧火车轮生产线在马鞍山钢铁公司车轮轮箍厂建成投产。这是中国第一条火车车轮生产线。参加这项工种设计、制造的有太原重型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192个单位。

12月 第二砂轮厂建成投产。该厂1956年兴建，是民主德国设计项目之一。

1965 年

年初 在我国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向我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总共14.06亿新阳重型机器厂等192个单位。

12月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建成。该厂1956年10月兴建，建设规模为年产石油化工机器设备41510吨，建设工期十一年半，完成投资1.7亿元。

1966 年

山西874厂竣工。

1969 年

三门峡水利枢纽竣工。1973年12月第一台机组投产，1978年12月26日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发电。至此，全部工程竣工。它是150项实际实施的项目中最后竣工的项目。

第五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国民经济

第一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经济建设中“左”的失误的出现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总的方面看，从此我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1978年两年中，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恢复，但是由于没有清算“左”的错误思想，因此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又出现了“左”的失误。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举国欢腾，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地投人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上来。党和国家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澄清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思想，开始对“左”的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在1977年3月召开的计划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工作“十个要不要”的全国性大讨论，即：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不要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要不要抓好经济核算，增加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又红又专，为革命钻研业务和技术等。这些问题，现在看来非常简单明了，但在当时弄清这些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经过对这“十个要不要”问题的讨论，对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

1978年，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在经济问题方面，围绕着以下问题进行：(1) 批判“四人帮”鼓吹的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重新肯定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并论证了计件工资、奖金制度都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有效形式。(2) 揭露“四人帮”诬蔑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目的，肯定了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阐明发展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

项基本任务。(3) 批判了“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既保护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新的资产阶级”的谬论，澄清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误解，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发展商品生产。(4) 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要给企业、社队必要的自主权，要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等。

通过一系列的讨论和批判，在经济领域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得到了初步的澄清，改变了“干部不敢抓生产，劳动人民不敢生产”的局面，因而对改进实际经济工作，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重建生产指挥系统，抓好交通和工农业生产。“四人帮”被打倒后，着重解决了各级组织中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清查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解放了被打击、被迫害的干部，使他们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生产指挥系统重新建立起来，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由于“文化大革命”，交通运输事业十分薄弱。1977 年 2 月召开了全国铁路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严重堵塞问题，大抓铁路装车量，并克服管理混乱现象。经过整顿，日装车量从 1977 年 3 月开始回升，1978 年铁路货运量突破 10 亿吨 (11 亿吨)，创造历史最好水平。水运货运量和港口吞吐量也创历史最好水平。交通运输的恢复和畅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经济工作上，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恢复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发展支农产品的生产，优先保证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电力。重工业要抓好原材料、燃料和电力的生产。基建方面，要压缩基建投资，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1977 年 4 月—5 月，召开了全国冶金工作会议和工业学大庆会议。强调要搞好生产，要抓企业整顿，恢复规章制度，健全领导班子，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1978 年 4 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三十条》)，对企业整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企业的任务、基本制度和工作方法都做了具体规定。强调企业是生产单位，要以生产为中心，要通过整顿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于这些会议精神和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工业部门和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开始恢复。

在农业方面，四川、安徽两省 1978 年初都制定了关于农村的经济政策，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减轻社员的负担，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开展多种经营，允许发展家庭副业。这些规定对农村经济的恢复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三) 疏通流通渠道，恢复和发展国内外贸易。1978 年 4 月—7 月召开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重新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强调财贸工作要坚持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反对闭关锁国，要发展对外贸易，提高财贸工作水平。财贸部门恢复和制定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管理制度以及计划管理、财务管理、物价管理等制度和方法，并恢复了一些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物质利益相结合方面的有效做法。流通领域疏通后，市场紧张状况开始好转，外贸事业也有所发展。

(四) 局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破坏很大，粉碎

“四人帮”后还不能马上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就一些重大问题做局部性调整。如加强了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重新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使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现象得以迅速解决。对于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问题也做了一些调整。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由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其他大中企业则由地方或以地方为主进行管理。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部分企业收了上来；对部分财政、税收、物资的管理权也收了上来。为了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企业中恢复了奖励、计件工资和企业基金制度等。

（五）稳定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1977 年 7 月 26 日，国家计委转发了商业部《关于商业、粮食系统检查和整顿市场物价中提出的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1978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当前市场物价问题的通知》。这两个文件，都强调要稳定市场物价，认真检查和整顿部分消费品质量下降变相涨价问题；加强粮油价格管理，稳定蔬菜购销价格；加强对饮食、服务业以及煤炭的价格管理；农副产品的收购要贯彻政府的价格规定，不得任意提高或降低；坚持执行国家的牌价，坚持计划价格，反对自由价格，凡利用价格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要严加打击；认真安排好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等。

二、1977 年、1978 年国民经济的恢复

通过以上措施，1977 年、1978 两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工业生产方面。1977 年工业生产开始上升，工业总产值为 372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3%（1966 年为 3262.2 亿元），1978 年更增长为 4230.8 亿元，比 1977 年又增长 13.5%。1978 年 80 种主要产品产量中有 65 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煤炭突破 6 亿吨（6.18 亿吨），比上年增长 12.4%；原油突破 1 亿吨（1.04 亿吨），进入世界主要产油国行列；发电量突破 2500 亿度（2566 亿度），比上年增长 14.4%；钢产量突破 3000 万吨（3178 万吨），比上年增长 33.9%；铁路货运量突破 10 亿吨（11 亿吨），比上年增长 15.5%。轻工业也有所发展。1978 年布的产量为 110.3 亿米，比上年增长 8.7%；糖产量为 227 万吨，比上年增长 24.7%。基本建设投资，1978 年完成 550.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基本建设中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978 年为 1723 个，比上年增加 290 个，其中全部建成投产的 99 个。总之，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增加了生产能力，多种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物资消耗和产品成本都有所下降，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利润增力口。

（二）农业方面。1977 年、1978 年两年中，虽然不少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农业仍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农产品产量有较大的增长。如粮食产量，1977 年为 5654.5 亿斤，1978 年增长为 6095.3 亿斤，比上年增长 7.8%。棉花生产恢复得也较快，1977 年为 4097.5 亿斤，1978 年增长为 4334 亿斤，比上年增长了 5.8%。油料产量 1977 年为 8034.8 万担，1978 年增长为 10435.8 万担，比上年增长了 29.9%，超过了历史上

最高年产量（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是1956年的10171万担）。

（三）贸易方面。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77年为1432.8亿元，1978年上升为1558.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8%。进出口贸易额也有所增长，1977年为148亿美元，1978年增长为206.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9.5%。另外新技术的引进和设备进口，这两年增长得也比较快。

（四）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如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1976年为605元，1978年上升为644元。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按当年价格计算，1977年为165元（其中城镇居民361元、农民124元），1978年增长为175元（其中城镇居民为383元、农民132元），比上年提高了6.1%。

总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社会经济已经初步恢复，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混乱状态，遭受十年浩劫的中国经济，开始起步了。

第二节　经济工作中"左"的失误的出现

一、经济工作中"左"的失误的出现

"四人帮"被粉碎后，广大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发挥出来，因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的领导华国锋（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对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地估计形势，特别是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错误，未能认真清理，因而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的高指标。1977年11月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具体目标是：第一步，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78年—1980年），要建成全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六五"期间，各项生产建设规模要有较大的发展，基本上建成六个大区，极大地改变现在经济落后状态，显著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第三步，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现代化，在各个生产技术领域，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水平。1978年3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重提"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修订的1976年—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规定了各方面的高指标。如工业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并要求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2.5亿吨等。一些主管部门也相继制定了庞大的发展计划。这些大的方案、计划，大大超过了我国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承受能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当时的领导认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大的革命运动。要求1980年全国1/3的县要建成“大寨县”。不顾客观条件、不讲实效地要求“学大寨”，盲目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到处搬用大寨经验，大搞水平梯田、人造小平原。这种一刀切、不顾条件、不讲实效的盲目蛮干的做法，严重浪费了人力、物力，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不顾客观规律，继续强调提高人民公社公有化水平，大搞核算单位升级。1977年11月，确定全国要选择10%左右的生产大队实行统一核算，为所有制的进一步过渡创造条件。

提出所谓要限制“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把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都当做“资本主义倾向”加以限制和打击。此外，为了推行农业生产建设和所有制过渡，继续不断强调“在农村深入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促大干”等。结果，在思想上、政策上造成严重混乱，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不断出现。

（四）强调要在短期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提出了“苦战三年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的口号。1977年1月，国务院又转发了《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给各地区、各部门。报告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根据这一要求，四年内，大中型拖拉机需要增长60%，化肥年产量需要增加1倍。根据当时我国工业状况看，这样高的指标，显然是无法完成的（据估计，实现中等标准的机械化，每亩耕地约需300元投资，而当时我国每亩耕地平均年积累才不到6元）。而且，从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应当着重清除“左”的错误，让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同时又发挥生产的积极性，而不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是不现实的，是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是一种“左”倾思想的表现。

（五）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当时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继续照搬过去提出的在短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因此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积累率越来越高。如1976年积累率为30.9%，1977年提高到32.3%，1978年更提高到36.5%。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1959年、1960年两个最高积累率的第三个高积累率。基本建设规模也过大，1976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76.44亿元，1977年增长为382。37亿元，1978年更增长为500.99亿元，比上年增长31%。已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978年为1723个，比1977年增加290个。基本战线越来越长，基本规模越来越大，大大超过了国力所能承担的限度。特别是仍然偏重工业，而忽视其他部门，尤其是非生产性建设。

另外，在引进技术设备方面，也是过急过多，超过了实际的需要和国力的承担能力。本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是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追赶先进国家的必由之路。但是引进必须考虑本国的消化能力，以及配套能力和能源供应等，即要考

虑与国力相适应，注意综合平衡，讲求实效。但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则没有这样考虑，而是大量引进，既缺乏认真调查和可行性研究，又对国内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估计过高。在引进的项目中，大部分是能源消耗大的钢铁、化工项目，煤炭、发电、石油等项目少，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更少。有的项目引进后，能源消耗过高，使业已存在的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由于引进项目过多、花费太大，加重了国家的财力负担，加剧了比例关系失调状况。

二、经济工作中“左”的失误所造成的后果

经济工作中“左”的失误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一）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失调。

1. 积累和消耗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由于安排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因而造成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耗比例关系失调。如前面谈到的，1976 年基建投资为 376.44 亿元，1977 年增长为 382.37 亿元，1978 年猛增为 500.99 亿元。积累率 1976 年为 30.9%，1977 年增长为 32.3%，1978 年更提高为 36.5%。1977 年和 1978 年积累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11.2%和 30.7%，而国民收入 1977 年比 1976 年仅增长 8.9%和 13.8%。积累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得国家财力紧张。例如，基建规模过大，也带来了物力的紧张。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人民的吃穿用还没有很好地安排，职工的福利、住宅、城市建设、环境保护、文教卫生等长期以来积压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这样高的积累率势必要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挤了人民的消费，加剧了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

2. 工农业、农轻重之间比例失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四人帮”等破坏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而国民经济的恢复首先要恢复农业、要发展轻工业等。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做，而仍然是大力发展重工业，结果造成农业与工业以及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1976 年—1978 年，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由 1976 年的 30.4%下降为 1977 年的 28.1%，1978 年更下降为 27.8%，而工业则由 1976 年的 69.6%上升为 1977 年的 71.9%，1978 年更上升为 72.2%。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所占比重，1976 年为 44.2%，1977 年下降为 44%，1978 年更下降为 43.1%，而重工业则由 1976 年的 55.8%上升为 1977 年的 56%，1978 年更上升为 56.9%。

轻工业发展缓慢，不论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内部发展也不平衡，特别是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不协调更为扩大，能源工业与其他工业的发展也不适应，能源工业破坏性的开采造成油田产量递减。能源供应紧张，更影响许多工厂的开工生产，由于发电能力短缺，有 20% 左右的工业能力发挥不出来。

在交通运输方面，由于运输能力不足，华北、西北、西南的煤炭，西南的磷矿，西北的硫铁矿运不出来，造成严重积压，沿海港口吞吐能力不足，装卸疏运困难，外轮等泊时间长，造成巨大损失。

（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经济效益差。“文化大革命”造成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许多弊端，还没有清除（如经济单位缺乏自主权，许多经济技术指标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企业经济效益很差。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大锅饭”等局面没有改变，企业管理混乱，在建设、生产、流通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都比较低。1978年底，全国有1/3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好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还低1/3）。此外，流通领域中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

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左”的失误继续出现的原因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继续存在所造成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后，还会出现“左”的失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当时经济发展的困难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粉碎“四人帮”后，确实存在着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利条件，如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障碍被除掉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等。但是，当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长期以来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有待调整、人民生活中不少实际困难长期未得到解决、被破坏了的经济计划管理和企业管理有待恢复和健全、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有待改革等。但当时对这些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只看到顺利发展的一面，因而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

（二）“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彻底清理。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不符合我国国情、背离客观规律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三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后本应及时彻底清理，但是并没有这样做（当然在粉碎“四人帮”后，也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彻底清除“左”倾指导思想），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妨碍了对经济的实际情况的研究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这就有可能重蹈过去错误的覆辙。邓小平说：“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

可见，“四人帮”被粉碎后，在经济工作上，仍然产生“左”的失误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根源的。这一次“左”的失误与1958年的“大跃进”的“左”的错误相比，也有某些类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是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国力的承受能力，只凭主观愿望，以大干快上为宗旨。如果1958年的“大跃进”是以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为号召，这次“跃进”（姑且也称为“跃进”），则是以夺回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

尽快实现现代化为号召。其次，都是制定高指标来“跃进”。1958 年“大跃进”制定的经济指标一提再提，并且“以钢为纲”，结果造成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严重下降；而这次“跃进”也制定了高指标，并过分强调发展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而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造成农轻重比例关系更加失调。至于搞高积累，压缩人民消费，两次“跃进”都是共同的。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一再出现，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从领导者的主观愿望看，都是好的，都是要使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但每次都是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次因时间较短，1978 年 12 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错误被及时纠正，损失较小），结果反而“慢”了。我们应当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发展。

第二章 伟大的转折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全面纠正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方针，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新的指导方针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并开始对被搞乱了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

第一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国民经济发展新的指导方针的确定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认真地、全面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指导方针。从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能够沿着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已不适用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从1979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察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所有这些在我国的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

全会对经济发展问题作出了如下决策。

一、对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必须进行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进行妥善解决”。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

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必须在几年中认真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 1979 年、1980 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修改后提交五届人大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

二、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必须加以改革。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减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提高工作效率。

三、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具体措施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障，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 1971 年—1975 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

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 1979 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 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 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 1979 年和 1980 年要降低 10% ~ 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消费者以适当的补贴。

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村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并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全会还指出，城乡人民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各种决策，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节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制定及其实施

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制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的基本思想。1979 年 4 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进行具体贯彻。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决定用三五年时间把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等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同时着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继续整顿现有企业。会议指出，按经济规律办事，使国民经济能够真正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道路。会议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新的“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所谓调整，即坚决而逐步地把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工业和农业、农轻重以及工业各部门比较协调地发展；使积累与消费保持合理的比例，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所谓改革，即积极而稳妥地全面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所谓整顿，即继续整顿现有企业，特别是一部分管理混乱的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所谓提高，即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生产水平、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在这次工作会议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曾就调整问题写信给中央或发表谈话，提出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和进行经济建设应遵循的原则。他们指出，应看到林彪、“四人帮”对经济破坏的严重性，虽然经过两年调整，但重大比例关系仍然严重失调，

必须尽快进行调整，要有一个调整时期；前进的步子要稳，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经济发展必须有综合平衡；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讲实事求是，要根据国情办事；搞生产不能仅注意数量，也要重视质量和品种；搞经济建设，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决策；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经济部分等。他们的这些意见，一方面使调整经济的决策在思想上逐渐成熟，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今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出了方向。

二、调整经济的主要措施

中央工作会议还就这次经济调整工作，确定了以下主要措施。

（一）调整农村政策，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关于农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作出决定，今后要继续贯彻执行。另外 1979 年 4 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 25 项政策和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维护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改革农业管理制度。重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侵犯其利益；反对对生产队进行“一平二调”，要保障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纠正强行并队与急于过渡的倾向，减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数量。改革农业计划制度，使生产队有较大的自主权与灵活性。

2. 改善农业结构，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指导农业生产。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农作物内部的比例关系，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以便全面地、正确地、完整地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同时，建立大批经济作物与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实行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举方针，纠正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错误。

3. 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支援。首先，增加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1978 年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比重为 10.6%，1979 年提高到 11.1%。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支援农业的资金额也增加了，1979 年比 1978 年增长 18.2%。其次，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79 年，提高粮、棉、油、麻、猪、牛、羊、蛋、水产等 18 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之后，1980 年又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 1979 年提高了 20.1%，1980 年又提高了 7.1%。这样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此外，国家还减免了部分社队的税收，两年一共 45 亿元。以上两项合计，农民由此增加收入 300 亿元。与此同时，国家还降低了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价格，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粮食负担较重和较困难的地区，国家减少了 50 亿斤粮食的征购任

务。国家对农业的这些支援措施，大大鼓舞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此外，从1980年起，农业中出现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专业队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使劳动者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有效地使农民劳动的数量、质量与劳动成果挂起钩来，进行合理的分配，改变了以往经营管理、劳动、分配等方面集中过多的状况，纠正了生产上瞎指挥和平均主义，有力地提高了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

（二）调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加快轻工业的发展。过去工业中的比例关系是重工业发展过多、过快，而轻工业发展则相对太少、太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具体措施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改善轻工业的生产和流通条件。1980年国家决定对轻工业实行六个优先原则，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以及交通运输等六个方面优先。这些"优先"使1980年轻工业系统所需要的原料，如铜、铝、锌，比上年分别增长8.7%到43.3%。生产缝纫机所需要的铁增加25%；造纸用的木材增长70%，纺织用的碱增长18.8%。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技术措施资金、银行贷款等比1979年增加15%。用于进口轻工业所需原料的外汇比1979年增加1倍。

2. 大力支持集体企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轻工业的特点之一是集体企业和小商品生产多。过去对集体企业重视不够，这次加快轻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注意保护集体所有制企业，其财产不得平调，并帮助解决这些企业中职工的政治、经济待遇问题。对小商品生产，注意稳定队伍，加强管理机构，开辟原材料来源，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销售形式。

3. 重工业的发展要考虑轻工业和市场的需要。1979年和1980年两年，机械工业生产的产品中，重工业设备比上年减少5.9%和6.5%，而轻纺专用设备却增加45.3%和25.5%。重工业中的军事工业，其中一部分也可以利用来生产日用工业品，为满足市场需要服务。重工业中的军事工业，技术装备好，科研技术力量强，生产潜力很大，充分利用其剩余的生产能力、边角材料和一些库存物资，生产一些工艺相近、产品对路的日用工业品，使轻工业迅速增加了生产能力，解决了市场的需要。1978年，军工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产值占军工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5%，1980年上升到21.6%。

4. 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加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一部分产品实行自产自销。长期以来，对工业品的生产，主要是抓产量和产值，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应该扭转这种情况。各级轻工部门和企业在增加产品产量的同时，要把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作为中心环节，加强技术基础工作，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在一些主要行业应建立质量检测中心。另外，还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扩大适销对路产品，截长线，补短线，增加高档、名牌产品等。

轻工产品在产品销售方面，长期以来都是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流通渠道单一，往往产销脱节。为了加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作用，对一部分产品允许实行自产自

销。许多轻工部门和企业，在加强同商业部门的联系、改进生产的同时，要认真对市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工业品自销工作。自销范围主要包括超产部分、商业计划选购多余部分、商业计划收购的提成部分、新产品、自筹原料生产部分等。此外，还举办展销会、商品供应交流会、看样订货会，以及厂店挂钩等。这样做，既保证了国家计划的完成，同时也增强了为消费者服务的观点，更有利于企业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改进生产。

（三）在人民生活方面，逐步偿还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提高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比重，改善人民生活。在农村，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部分地区和社队的农业税收和统购、派购任务，使农民得到好处，生活得到改善。在城市，增加职工工资，增加就业，调整部分地区工资类别，发放职工副食补贴。企业中还实行奖金制度，扩大职工住宅建设，增加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及城市建设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

（四）压缩基建规模，使之与钢材、水泥、木材、设备、资金供应，以及能源、交通能力相适应，同时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投资比例，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调整投资比例，压缩基建规模，1978年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为79.1%，1979年下降为69.8%，1980年又下降为64.3%。另外，还清理了基本建设在建项目，停建、缓建一部分大中型基建项目。1979年完成基建方面国家预算内投资418.57亿元，1980年降为349.27亿元。

此外，国家还有计划地放慢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了工业产品和产品结构，控制了长线产品的生产，增产一批适销对路的产品，关停并转了一批消耗高、质量差、货不对路、长期亏损的企业。加强煤炭、电力、石油、运输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建设，努力改变能源、交通落后状况。电力工业方面，搞好现有设备的配套和完善，加快新电站的建设，加强现有煤矿矿井的掘进和剥离，增加交通运输量。基本建设投资方面，加快对薄弱铁路区段的技术改造，提高运输能力。

三、新“八字方针”的实施以及所取得的成果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1979年和1980年贯彻新“八字方针”取得了成效，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一些重要的失调的比例关系开始向着协调的方向发展，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方面。农业增产幅度较大，增产面也比较宽。1979年，我国农业获得丰收，农业总产值达1584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6%，1980年虽然遇到自然灾害，但农业总产值仍达1646亿元，比1979年仍增长3.9%。粮食产量，1979年为6642.3亿斤，1980年受灾面积达6.7亿亩，产量仍达6411.1亿斤。棉花产量，1979年为4414.7万担，1980年增长为5413.47担，以上年增产22.6%。

农业生产结构也有改变。各地贯彻了“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1980年全国粮

食播种面积是 17.5 亿亩，比 1970 年减少了 3.5%，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 16%。许多县还建立了商品牛、山羊以及土特产品、副产品大型生产基地，因而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1980 年，农林牧副渔各业总产值比 1976 年增加了 23.5%，其中农业比重稍有下降，牧业有所提高，副业上升显著。

（二）工业方面。1979 年工业总产值为 4590.7 亿元（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 年增长为 499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1979 年，轻工业比上年增长 9.6%，重工业增长 7.6%；1980 年轻工业比上年增长 18.4%，重工业增长 1.46%。1980 年与 1978 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 43.1%，上升为 47.2%；而重工业所占比重则由 56.9%，下降为 52.8%。这表明，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改善。在主要工业品的产品产量方面，也有大幅度增长。在 17 种主要产品产量中，有 6 种 1980 年比 1979 年增长 20%以上，有 9 种增长 10% ~ 20%，另外，自行车、缝纫机、钟表、卷烟、服装、家用电器等日用消费品的产量，1980 年都比 1979 年增长 16%以上。

（三）基本建设方面。在基建投资中，轻工业投资比重有较大提高，用于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建设等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所占比重有较大增加。1978 年，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为 20.9%，1979 年提高为 30.2%，1980 年更提高为 35.7%。另外，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趋向合理。积累率，1978 年为 36.5%，1979 年下降为 34.6%，1980 年更下降为 31.6%。

（四）市场商品供应与人民生活方面。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市场商品供应量增加。如 1979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18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1980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2190 亿元，比 1979 年增长 18.9%。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城乡居民年均消费水平，1978 年为 175 元，1979 年增加为 197 元，1980，年更增加为 227 元。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平均工资，1978 年为 644 元，1979 年增加为 705 元，比上年提高 9.5%；1980 年又增加为 803 元，比 1979 年增长 13.9%。据抽样调查，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1978 年为 133.5 元，1979 年增加为 160.17 元，比上年增长 19.9%；1980 年又增加为 191.33 元，比上年增长 19.5%。农民平均消费水平，1978 年为 132 元，1979 年增加为 152 元，比上年增长 15.2%；1980 年又增加为 173 元，比 1979 年增长 13.8%。此外，政府积极安排就业，使就业人员增加以及城乡人民储蓄增加等，都说明人民生活的改善。

以上情况表明，1979 年和 1980 年国民经济调整是有成效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向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再调整

一、新“八字方针”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初步贯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纠正过来，长期在经济建设中形成的“左”的错误也很难立即清除掉，同时在调整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因此，1979年、1980年的调整工作虽然使经济形势出现好的转折，但也存在不少潜在的危险和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基本建设规模没有压下来。1979年和1980年的调整，本来是想把基建规模压下来，特别是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但结果不但没有压下来，反而增加了不少。不但国家直接安排的项目增加了，而且地方、部门和企业的基建项目也增加过多。按照计划规定，国家预算内的基建投资1978年要降为396亿元，1979年再降为360亿元，1980年再降至240亿元。施工的大中项目，要从1978年的1700个降到1000个以下。但是，实施的结果，并没有减下来，实现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1979年为418.57亿元（计划规定为360亿元），1980年为349.27亿元（计划为240亿元），大大超过了计划指标。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也没有减下来，1979年为1610个，1980年只压到1106个(超过计划规定的1000个以下)。此外，自筹资金的基建项目大大增加，基建项目预算外的投资，1978年为83.62亿元，1979年为104.91亿元，1980年竟增加到209.62亿元。这样，基建的规模自然更扩大了。1978年，基建投资额为500.99亿元，1979年增加为523.48亿元，1980年更增加到558.89亿元，大大超过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基建投资规模扩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引进的项目过多。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都属于大型或超大型的，结果每一大中型项目投资数目都很大。此外，基建规模大，但投资的经济效果并不佳。如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1979年为9.7%，1980年下降为8.3%。在22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中，有14种产品都比年下降了。

（二）财政支出过多，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国家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逐步偿还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努力增加城乡人民的收入。但在执行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税收、安排就业、提高工资、发放奖金等都超过了预定的计划，结果使国家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财政出现赤字。1979年财政赤字高达170.6亿元，这是建国以来财政赤字的最高额。1979年和1980年，财政赤字主要靠向银行借贷和透支弥补，结果银行增发了130亿元的货币，使货币流通量已接近经济危机的临界点。货币发行大大超过正常时期货币的需要量，结果引起物价上涨。据统计，1979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涨了2.1%，1980年又比1979年上涨6.3%，其中副食品上涨

13.8%。这不能不使居民生活受到影响。

（三）工业改组整顿进展不快，能源交通紧张。1980年，全国关停并转了几千个企业，而同时又新建投产了2万多个企业，新投产的企业大多数是盲目发展起来的小型加工工业，因而加剧了本来就很紧张的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矛盾。工业改组和整顿进展较慢，企业经济效益不高。能源、原材料仍然十分短缺，1980年能源产量又比上年下降（能源生产总量，1979年为64562万吨，1980年下降为63721万吨）。运输也十分紧张，1980年货运量比1979年下降7522万吨，下降了3%，其中铁路运输量减少614万吨，减少了0.5%，公路运输量减少5539万吨，减少了6.8%，水运减少553万吨，减少了1.3%。

二、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的决策

以上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经济虽然经过了1979年和1980年的调整，但经济中的问题仍然不少，潜在的危机仍然存在，特别是财政赤字过大，银行发行货币过多，使得物价上涨，已经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不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政治局势的稳定。为此，1980年12月，召开了全国省长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对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总结过去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是主体方面的错误，这次虽然对国民经济做了调整，但潜在的危机仍然存在，必须做进一步的调整。会议作出了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经济上进一步调整的决策。

经济上进一步调整的总的要求和主要任务是：稳定经济，调整结构，挖掘潜力，提高效益。

稳定经济，就是要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在此基础上实现信贷收支平衡，稳定市场物价，使人民生活水平不再下降。调整结构，是该退的方面坚决退够，该前进的方面仍要继续前进。凡是社会需要，客观条件许可，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生产建设任务，仍要坚决完成。继续抓好消费品的生产，继续加强农业，进一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节约和开发能源，解决消费品供不应求和燃料动力不足的问题。挖掘潜力，即主要对现有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生产水平，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提高效益，是要彻底摒弃以往经济工作中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益、低消费的老路，代之以从我国国情出发，速度适当、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会议决定，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调整。经济调整的近期目标是：要实现“两个平衡、一个稳定”，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物价稳定。长期目标是，克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新道路。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控制基建规模。1981年3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强调基本建设必须实行

高度的集中统一，全国基建规模由国务院确定，基建计划审批权集中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总投资在1亿元以上的大项目要报国务院批准。1981年，基本建设国家预算内投资减少为251.56亿元，比上年减少97.71亿元，减少28%，1981年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为442.91亿元，比上年减少115.98亿元，减少20.8%。这是1979年开始调整以来基建规模真正得到压缩的一年。此外，国家还停建缓建一批项目，1981年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压缩到742个，是多年来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最少的一年。

（二）加强财政信贷管理，稳定市场物价。1981年1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要求努力增加收入，坚决压缩支出，压缩超储积压物资，节约流动资金，大力节减事业费和行政经费，严肃财经纪律。经过努力，198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089.5亿元，支出1115亿元，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5亿元减为1981年的25.5亿元，基本上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平衡。1982年国家财政总收入1124亿元，总支出1153.3亿元，收支相抵，仍有29.3亿元赤字，财政收支也达到基本平衡。在银行信贷方面，1981年银行货币投放减少，收支情况良好，各项存款都在增加，基本上实现了平衡。1982年财政信贷情况继续好转。

为了有效地控制市场物价，国家除尽力争取财政收支平衡和银行信贷平衡外，还采取一些具体的断然性措施，以控制物价。1980年12月和1982年1月两次决定，凡由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在全国各地的零售价格一律执行国家规定，不得任意提高。在城镇中的各种议价商品的零售价格只能降低，不能提高。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1981年的物价基本平稳，1981年上半年市场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不到1%，下半年调整了一些商品价格，全年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涨2.4%。1982年国务院又发布了《物价管理暂行条例》，按商品对国计民生影响的大小，分别规定国家定价、国家规定范围企业定价和集市贸易价格。1982年9月，国务院又将160种三类小商品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工商企业协商定价。这对于鼓励生产，满足消费方面起了好的作用。总之，1981年、1982年两年中市场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

（三）工业方面，要坚决退够。要改变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停止一批重工业的能源消耗很高、积压严重的长线产品的生产，增加轻工市场急需产品（如积极为工业提供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和扩大出口的产品的生产。同时还采取“重转轻”、“军转民”、“长转短”等形式，调整产品结构。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增加市场上急需的轻工业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另外，其他各业也要积极支持轻工业的发展。例如，重工业中可以将一部分闲置的厂房、设备、场地、人力划给轻工业；计划、物资、财政、银行等部门也要对轻工业给予优先照顾等。

（四）农业方面，要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完善和稳定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中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比较普遍，1981年底全国农村中90%以上的生产队已经建立起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种生产责任制把劳动者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继续因地制宜促进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改变长期以来比较单一经营粮食种植业的状况，同时促进农业中自给或半自给的农业生产向专业化、社会化的商品

生产转变。

三、继续调整国民经济所取得的成果

自1980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以来，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调整，扭转了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市场充裕，物价稳定，人民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些充分证明继续调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具体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国民经济得到了均衡、稳定、协调的发展。从1980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来，经济发展一直是稳定的、协调的，完全结束了由于片面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情况。“六五”期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左右（“六五”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为11%，国民收入为9.7%，工农业总产值为11%），这个速度是合适的，这是“一五”时期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再从比例关系看，由于认真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坚决把农业搞上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以及加强煤炭、石油、电力运输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结果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现在，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大体上各占1/3如1985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农业占34.3%，轻工业占30.7%，重工业占35%）。在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大体上各占一半（1985年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轻工业46.7%，重工业53.3%），根据经验，这种比例关系基本上适合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工业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六五”期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8%，国民收入增长率为9.7%，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1.5%，三者大体同步增长，经济效益比较明显。特别是国家财政收入，“六五”期间，其他各年均有赤字，1985年财政总收入为1866.4亿元，支出为1844.8亿元，收支顺差21.6亿元，消除了赤字。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但经济效益较低，走的是一条高速度、低效益的路子。在实际工作中只注重产值、产量，不重视产品质量和社会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重解决产品适销对路的问题以后，又着重抓了企业扭亏增盈的问题，使工业生产与实现利税同步增长。“六五”末期，又进一步把工业生产、实现利税与国家财政收入同步增长作为奋斗目标，因而取得了以上成果。

（三）全民、集体、个体经济共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经济工作中强调多种经济成分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限制集体经济，排斥个体经济，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扶持集体经济，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广大城乡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全面增长的形势。在城镇劳动者中，集体所有制职工由1980年的2425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3324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由1980年的81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450万人，

两者在城镇劳动者中所占比重由23.8%上升到29.4%。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所占比重，1980年为78.7%，1985年下降为70.4%；集体所有制工业的比重，1980年为20.7%，1985年上升到27.7%；个体工业，1982年占0.1%，1985年上升为0.4%；其他各种经济形式（全民与集体合营、全民与私人合营、中外合营企业及个体企业）1980年—1985年由0.6%上升到1.5%。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1985年集体所有制占37%，1980年占11.9%。个体经济和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的比重1985年占22%（1980年只占3.9%）。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不仅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而且开拓了就业门路，“六五”期间，安排待业人员3500多万人，因而也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四）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业中，“六五”期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普遍实行，在农业产量方面，虽然许多地方遭受了自然灾害，但农产品产量仍然稳步增长，只1985年略有下降。如粮食产量，1980年为32056万吨，1983年为38728万吨，1984年增长为40771万吨。1985年，许多地方遭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和国家有计划地调减了粮棉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仍然达到37911万吨。棉花，1980年为270.7万吨，1983年为463.7万吨，1984年增长为625.8万吨，1985年为414.7万吨。1985年虽然粮棉减产，但各种经济作物仍全面增产。1980年为769.1万吨，1983年为1055万吨，1984年增为1191万吨，1985年继续增长为1578.4万吨。烤烟，1980年为71.7万吨，1983年为115.1万吨，1984年为154.3万吨，1985年继续增为207.5万吨。农业总产值不断增加，1980年只为2223亿元，1983年增长为2884亿元，1984年更增为3390.7亿元，1985年继续增长为3873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种植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84年的58%下降到1985年的49.8%。林、牧、副、渔产值所占比重，由1984年的42%上升到1985年的50.2%。

农村乡镇企业有很大发展。1984年乡镇企业总收入为1268.15亿元，比1983年增长36.6%，1985年为1827.41亿元，比1984年又增长44%。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1984年为3848.09万人，1985年增加到4152.14万人，比上年增长7.9%。

（五）工业方面。“六五”期间工业总产值，1981年为5178亿元，1983年增长为6164亿元，1984年为7030亿元，1985年达到8295亿元，比1984年增长18%，比1980年增长66%。其中轻工业总产值，1984年为3484.16亿元，1985年增长为4113.45亿元，增长18%；重工业总产值，1984年为3545.69亿元，1985年增长为4181.06亿元，比上年增长18%。轻重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84年为47.4：52.6，1985年为46.7：53.3。这种比例关系大体上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提前两年达到和超过“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指标。例如，钢产量，1984年为4347万吨，1985年为4679万吨，比上年增长7.6%，比1980年增长26%；原煤产量，1984年为7.89亿吨，1985年增长为8.72亿吨，比上年增长11%，比1980年增长40%；原油产量，1984年为11461.3万吨，1985年增长为12489.5万吨，比上年增长9%，比1980年增长17.9%；发电量，1984年为3770亿度，1985年增为4107亿度，比上年增长8.9%，比1980年增长37%；水泥1984年为12302万吨，1985年增长为14595万吨，比

上年增长18.6%，比1980年增长82.8%；平板玻璃产量，1984年为4190万箱，1985年增加到4942万箱，增长了17.9%；布产量，1984年为137亿米，1985年增长为146.7亿米，比上年增长7%；糖产量，1984年为380万吨，1985年增长为451万吨，比上年增长18.7%，比1980年增长45%。

（六）基本建设方面。"六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981年为422.91亿元，1983年为594.13亿元，1984年为743.15亿元，1985年增为1074.37亿元，比上年增长44.6%，比1980年增长92%。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中施工项目，1984年为821个，1985年增加为961个；建成投产项目，1984年为113个，1985年为121个。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增大，1984年占40.3%，1985年提高为43.1%。新增固定资产，1984年为533.28亿元，1985年增为733.16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7.5%；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1984年为13.8%，1985年为12.6%；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1984年为71.8%，1985年为70.5%。基本建设投资结构有了进一步改善，重点建设加强，如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科技教育方面的投资比重增大了。

（七）城乡市场和对外贸易方面。由于实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改革流通体制，国内市场空前繁荣。1984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3376.4亿元，1985年增加为4305亿元，比上年增长27.5%，比1980年增长了1倍。"六五"期间国内市场的特点是：除了部分紧俏的耐用消费品以外，零售商品货源比较充裕，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商品的质量、花色、品种、式样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家用电器畅销不衰。1985年同1980年相比，电视机销售量增长了4.1倍，电风扇增长7.6倍，录音机增长18.9倍，洗衣机增长57.2倍，电冰箱增长59倍，在商品流通中，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调整了商品结构。尤其是个体商业增长很快，1985年比1984年增加近1倍。此外，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后，鲜活商品上市量增加，质量提高。

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六五"期间，我国的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198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9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比1980年增长84%；出口额27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进口额42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4%。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多年依赖进口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进口量大幅度减少；发展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大量增长，特别是国内紧缺的钢材、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化纤、木材等物资的进口，增长尤为显著。我国出口贸易额在世界上所占位次，已由1980年的第28位上升为1985年的第16位。在吸收外资方面，1985年实际使用外资4.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9.3%。1985年9月底，已设立中外合资企业1881家、中外合营企业3408家、外商独资企业104家。

（八）财政状况好转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六五"期间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1985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866.4亿元，比上年增加355.5亿元；财政总支出为1844.8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消除了赤字。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为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1985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为407元，比1984年提高了23%，比1980年提高了79%（1980年为227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

每年增长速度，“六五”期间是8.8%，其中农民是10.1%、非农业居民是5.6%（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一五”时期为4.2%，“二五”时期是-3.3%，1963年—1965年为8.5%，“三五”时期为2.1%，“四五”时期为2.2%，“五五”时期为4.8%）。职工平均工资，1985年为1148元，比1984年增长174元，增长了18%，比1980年增长了51%。1985年安置就业人数达813.6万人。1985年城市新建职工住宅面积1.25亿平方米，比1984年增加16.8%，比1980年增加35.9%。农村新建住房面积7亿平方米，比1984年增加1亿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城市1985年为6.7平方米，1984年为6.3平方米，1980年仅有5平方米；农村1985年为14.7平方米，1984年为13.6平方米，1980年为9.4平方米。

另外，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1980年为12.9%，1985年提高为17%。这对于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以上成果表明，继续调整的政策是正确的。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因而促使国民经济能够协调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三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试行

——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早在50年代中期曾经提出过。以后，也曾多次进行过尝试。但由于仅仅是管理权的“放”和“收”，没有抓住经济体制本身的症结所在，因此未能进行本质的、有效的改革。真正的、大规模的、比较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基本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具体领导了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

第一节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总体设计

一、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所谓经济体制，主要是指某种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或经济管理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国家具有进行经济管理的特殊职能，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领导和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方法。

我国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以下特征：(1)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绝对支配地位；(2) 国家机关和行政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实行决策并进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经济活动以纵向联系为主；(3) 经济发展按计划进行，实行指令性计划，计划层层下达，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运行主要依靠计划调节，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实行实物指标管理，不重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经济杠杆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 在分配关系中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等。

这种集中型的经济体制是在建国后“一五”时期形成的。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我国

历史条件的因素使然，即解放前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对经济实行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与管理，而这种制度在解放后继续实行；另外，主要是50年代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

当时这种经济体制，对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我国原来的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发现存在的缺陷和弊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直接管理企业，政企职责不分，由于政府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处于无权地位，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主动性，缺乏应有的经营自主权，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应负的经济责任，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企业按国家下达的各项指令性指标进行生产，产品大都由国家的商业部门、物资部门和外贸部门统一收购和销售。企业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企业利润也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补贴。企业干部归地方管理，劳动力由劳动部控制。这样，企业的相对独立性被否定，企业不能按社会经济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活动，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完善企业内部结构和机能，也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改变产品的型号、规格，更不能独自扩大产品的品种等。总之，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上，都缺乏应有的权力，对亏损也谈不上什么责任。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消极的个体，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动力。

城镇的集体企业，虽然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名义上是归集体所有，但支配权实际上还是操在国家的各级地方主管机关的手中。国家主管机关对所管辖的集体工业企业、有权像对待国营企业那样向它们下达指令性经济指标和生产计划，并统一分配劳动力。地方主管机关还有权对它们进行调整、改组、合并、转产等。集体工业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基本建设等都需要经地方主管机关的批准。利润的分配和使用，属于区以上的集体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由地方主管机关统一支配和使用，街道所属企业，其利润的相当部分或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也要上缴给地方主管机关。即使留给企业的那部分利润，其使用也不从企业需要出发，而是要从整个地区的需要出发，实际上也是由国家、地方主管机关统一支配使用。所以，城镇的集体企业也差不多变成国家、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了。

在农村中，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实际上生产队也没有自主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甚至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由上面来规定，所以生产队没有什么积极性。

（二）按行政部门和地区系统管理经济，造成条块分割严重，自成体系，割断了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这种体制过分强调垂直领导，因而造成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互相封锁，阻碍了合理的经济联系。同时由于切断了横向的内在的经济联系，也就迫使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自成体系，阻碍了综合利用和专业化协作。而不搞综合利用，必然造成大量浪费。另外，横向经济联系被切断，自成体系，还造成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重复建设、重复生产，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同时这种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管理的体制，割断了企业之间横向内在的经济联系，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不能直接见面，因而造成企业之间办事困难，降低

了企业活动的效率。

(三) 实行自上而下指令性计划制度，管得过死，忽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这种单纯依靠指令性计划组织来调节经济活动，必然会使产销脱节、产需脱节，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这种体制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制定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下达，地方和企业必须根据上面下来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不能根据实际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和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往往造成损失和浪费。国民经济是错综复杂的，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企业越来越多，企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产品的品种、规格更是不计其数，而且技术条件与社会需求又在经常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只靠一个计划中心，很难适应这种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企业所需生产资料，大部分由国家统一调拨，企业的产品由国家和国营商业统一购销，这样，生产者与消费者不能见面，往往造成产需、产销脱节，许多产品不适销对路，造成积压。需要的产品因生产不足而脱销。即使已经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况，企业也无权根据市场的需要而转产，因而造成大量浪费。

(四) 在分配上大包大揽，统收统支，搞平均主义，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体制在计划上是大包大揽，财政上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企业的纯收入和基本折旧基金）全部或大部上缴。企业发展生产、职工福利等开支，则向上申请，由国家拨给。国家对企业无偿供给固定资产和大部分流动资金，而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效果可以不负任何经济责任，企业职工的劳动生产也与物质利益不挂钩，而且企业还不得随便辞退职工，企业不管盈亏如何，职工工资都得照发，职工没有任何积极性，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随处可见。

(五) 在对外关系上基本上是闭关自守，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以上是原来的经济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这些缺陷和弊端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投入多、产出少、浪费大、经济效益低，限制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旧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而对旧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正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不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来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办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是要适应我国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变过去政企不分，以行政隶属关系为主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组织管理机构，逐步使国营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把

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理顺企业所有者（国家）、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并可采取承包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形式。

（二）在农村，贯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使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以分户（家庭）经营为主（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由农户承包使用）。不过，在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仍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群众又愿意保留的地方，仍可保留原来集体经营形式。

（三）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横向经济联合应遵循“扬长避短、形式多样、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把联合的决策权交给联合体。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把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建设成为多功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过去那种排斥市场机制、实行指令性计划、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调控体制，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要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到间接控制为主的、更全面的宏观管理方面来。总之，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体制。

（五）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式，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如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资独营经济等。这些所有制经济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形式而发展的，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发展，可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使它们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特殊利益以及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分配状况，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经济收入同经济效益密切联系的经济利益体系，既要克服平均主义，使有利于善于正当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

以上几个方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方面的目标要求。当然，在具体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和矛盾，因而经济体制的改革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第二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一、农村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邓小平说过："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

怎样进行改革呢？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总的发展方向，是改变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项改革是逐步推行的，改革本身是农民的伟大创造。

我国旧的农村经济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没有经营管理自主权，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农民利益受到侵犯，没有生产积极性。

从1979年以来，对这种集体的农业经济经营管理组织形式，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最后确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如下。

（一）安徽、四川首先进行农村经济改革。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又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1987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谈到农村改革，他说："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产量低而不稳，特别是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农村经济体制成为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1958年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安徽、四川两省尤为严重。

1977年11月，在当时任中共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主持下，起草通过了省委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简称《六条》）。主要内容是：（1）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2）加速生产发展。（3）尊重生产队自主权。（4）减轻生产队和

社员负担。(5) 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6) 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如果是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在安徽省制定《六条》不久，当时作为四川省省委书记的赵紫阳也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与安徽省的《六条》差不多。特别是肯定了四川农村不少地方已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这两个文件虽然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但不幸的是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这使得本来就十分穷困的安徽省农村，无异是雪上加霜。秋后大批农民离家到外地乞讨，特别是凤阳人到外地乞讨的最多。

1978年9月，万里主持安徽省省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渡过灾荒。”于是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项大胆决策，既调动了农民生产自救渡过灾荒的积极性，同时，也诱发了农民自发地“包产到户”的决心。

（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秘密协议。1978年特大灾荒，凤阳县许多人都外出讨饭了，没有外出的小岗村农民感到与其坐等饿死，不如大胆来个“包产到户”，即使坐班房甚至杀头也在所不惜。于是在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黎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没有外出的20户农民（其中有两户单身），聚在一起，开了个秘密会议，决定包产到户，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书是这样写的：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

关廷珠	关有德	严立苻	严立华	严国昌	严立坤
严金昌	严家芝	严友章	严学昌	韩国云	关友江
严立学	严俊昌	严美昌	严宏昌	严付昌	严家其
严国品	严友申				

这20户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了手印或盖了图章（17个手印，3个图章），这是他们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写下的，当时能够有这样的胆量和行动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签了保证书后，接着就抓阄分了牲畜、农具，并丈量了土地，一个早晨就分完了。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搞了“包产到户”，把土地分了，这就把人民公社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冲破了。

小岗村的秘密传开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首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

于农村政策的文件，即《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虽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仍“不允许包产到户”，将“分田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在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仍“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因特殊需要，边远地区除外）。

社会舆论也有人公开反对，引起很大争论。直到1980年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仍然对“包产到户”进行批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上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批评“分田单干”是“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等。

关于“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才一锤定音，解决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还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他还强调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邓小平的讲话对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对“包产到户”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邓小平讲话后，1980年9月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称“75号文件”）。“75号文件”虽然还有折衷倾向，但它在推广包产到户方面已打破旧的僵化观念，是建国以来党中央第一次接受用“包产到户”办法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该年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纪要》，才把包产到户肯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这是一个认识上的大突破。文件下达后，也给农村干部和农民吃了定心丸，各种责任制形式普遍发展起来，特别是包产到户形式。

（三）“包产到户”形式的效果。农村“包产到户”的推广，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如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1967年1月初到本年2月22日，该县有9900人外出要饭，沦为乞丐，到了3月18日更达到18000多人。1978年任凤阳县县委书记的陈庭元说，凤阳有近110万亩土地，而40万农民却吃不饱饭。1969年3月，凤阳县37%的农户由干部率领到外地讨饭。1976年12月到1977年4月，凤阳县仅861人外出乞讨，所得22000元现金和17600斤粮食，这个收入超过了他们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一年出工的所得。

后来，省委“借地种麦”又把百姓安置在土地上，小岗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结果1979年获得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来没有向国家交过1斤粮食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

生产靠贷款），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1979年小岗村卖给国家粮食24994斤，超过政府计划的7倍，卖给国家的油料24932斤，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倍。

据凤阳县县委书记吴庭美介绍，整个凤阳县的情况是："1956年到1978年，我们这么一个农业县，100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力卖给国家粮食9亿6000万多斤。但是吃国家的返销粮，吃了13亿4000万斤。就是这么一个100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动力的县，22年没给国家贡献1斤粮食，倒吃国家4亿斤粮食。"

但自实行"包产到户"后，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产量达4亿400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49%。卖给国家粮食8900万斤。这个数字相当于过去26年凤阳县卖给国家的粮食的总和。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吃上了饱饭，所以当时安徽省流传着"要吃米，找万里"的谚语。

除安徽省外，四川省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四川位于中国内陆腹地，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七八十年代人口达9000多万。由于人口激增和政策失误，使得"天府之国"的四川省饱受饥饿之灾。如何解决将近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摆在四川领导面前的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

当时任四川省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1977年上半年，"走遍川西平原、长江两岸及边远山区的三十多个县市，做实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摸索增产粮食的办法。"他从农业生产组织管理入手，冲破"左"的束缚，制定了农村政策的《十二条》，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1978年夏收获得大丰收，多年吃不饱的农民吃上了饱饭。因此当时在四川流传着后来风靡华夏的那句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

四川的粮食产量年年增长。1977年比1976年增产60亿斤，1978年又比1977年增产40亿斤，两年共增产100亿斤，等于农业人口每人增产124斤。农副业总收入1977年比1976年增加12亿元，1978年又比1977年增加11.5亿元，农业人口人均收入达到71.9元，人均口粮1977年比1976年增加66斤，1978年又比1977年增加58斤，两年共增124斤，达到493斤。这就是说，每个农民一年可多吃124斤粮食，这意味着8000万人口免于饥饿。（四川省农村人均口粮，1976年为369.1斤，1979年为522斤，增加152斤。四川省人均口粮水平1976年比全国人均口粮低40斤，1979年则高于全国人均口粮34斤。）

包产到户普遍推广以后，到1980年末，中国农村农业收获情况大大改变：仍然坚持人民公社的地方，产量不增不减；实行包产到组的地方，增产10%～20%；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30%～50%。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人员调查，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一般都提高了50%以上。

由上可见，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很得利于安徽、四川这两个省的"试点"作用，正如前面我们所引邓小平1987年所说的："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过程。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首先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而农业生产责任制又曾经出现过多种形式。

1. 包工到组。由生产队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完成的作业数量和质量以及完成后应得的报酬，包给作业组，生产队根据承包者完成任务的好坏，分别给予奖惩。这种形式虽然没有过去所实行的评工记分的缺点，但其自身也有不足之处，除了定额繁琐难定外，主要问题是包工不包产，农活质量难以检查和保证。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联系产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2. 包产制。主要是包产到组，生产队将一定生产项目包给作业组去完成，作业组对产量（或产值）承担责任，产品交生产队统一分配，作业组完成任务，按规定取得报酬，超产得奖，因管理不善受罚。

包产到组责任制把责、权、利结合起来，对解决作业组之间的平均主义，发挥社员的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责任制形式，生产队仍是基本核算单位，包产以内的实物和现金仍实行统一分配，社员之间的劳动报酬如何公平分配仍是问题，于是在探索中又出现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形式。

包产到户，一般是以社员（户）为单位向基本核算单位承包一定的生产任务，劳动成果中包产部分，由基本核算单位统一分配，超产部分的全部或部分作为奖励分给承包的社员（户）。

包干到户，户是基本核算单位，将土地、牲畜、农具等固定到农户（有的是固定给作业组，称包干到组），农户除独立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外，还负责完成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公共积累任务，全部产品中除了交征购粮和集体提留公共积累及其他费用外，剩下部分全部归承包农户所得。这种形式具有方法简便、利益明确直接，而且多劳多得比较实惠等优点，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非常欢迎。

3.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种形式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社员特长。擅长经营农业的劳动力，按其能力大小承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等业的劳动力，则按其能力的大小分包各业。各业的包产，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分别包产到组、到户、到劳（劳动力）。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受奖，减产部分受罚。

以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为基础的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责任制形式，它是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以分户经营为主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它的特点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仍归集体所有，在一定合同期限内，固定承包给农户保管、使用。劳动力如转移到其他行业，允许将土地转让给别人承包，但不准买卖、出租或抛荒土地，不准在承包土地上盖房、取土或筑坟。承包期满，集体有权调整土地。承包农户除了应缴纳农业税以及征购合同规定的产品外，还必须完成提留任务。集体（基本核算单位）对承包户上缴的提留收入统一进行分配（包括五保户、困难户、烈军属的优待和照顾工作，合理支付干部的补贴，投资农田基本建设和扩大生产经营项目等）。因此，这种联产计酬责任制不同于分田单干的个体经济，它应该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农业生产责任制。

由上可见，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过程中：包产到组责任制形式出现比较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都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管理方式。文件下达后，各地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包产到组的形式，几个月内，全国约有1/3的社队实行了这种形式。1978年，安徽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后，包产到户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到1980年11月，全国已有15%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从1980年底到1982年，是包干到户责任制获得突出发展的时期。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性质，于是“双包”，特别是包干到户责任制发展更为迅速。到1982年6月，全国农村已有67%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1982年11月—1985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阶段。1982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制定了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被作为中央文件发布，极大地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进一步发展。包干到户、专业承包等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1984年，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原则前提下，各地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承包期一般都延长到15年以上。生产周期或开发性承包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的承包期更长，有的长达50年以上。1985年发布中共中央1号文件，重申“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政策稳定，农民心中踏实，更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当前农村的一种基本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越性。

1. 它适应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能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根据我国农业生产力的状况和我国（与前苏联）农业集体经营的经验教训，采用家庭承包的小规模经营方式，有利于发挥家庭生产经营的长处，调动农民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农户自筹资金经营相结合。承包农户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在较长时期内不变，这样就会推动农户利用自筹资金，在土地上追加投资，添置属于承包农户所有的各种生产资料，从而可以发挥出更大的经营效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3. 实现了农民的自主经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享有经营自主权，这样，直接生产者可以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安排农活和组织生产，合理支配和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以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卷人市场，因而农户的自主经营尤为重要。）

4. 实现了劳动收入和农户自投资金收益相结合。承包农户所收获的农产品，根据承包合同规定，完成上缴国家农业税和集体提留任务以后，其剩余部分就是农户的所得。剩余归已的部分中，既包括农民的劳动所得，又包括农户投人再生产的资金所带来的收益，同时还包括农户维持再生产的基金。这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体现了多劳多得，又体现了农户多投资多得，避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利地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鼓励农民在生产中追加投资，进行精耕细作，搞好集约式经营。

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也有利于打破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二、实行政社分设（人民公社解体）

自 1958 年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以来，实行的是"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这种公社管理体制，将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使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公社实际上具有直接支配集体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活动的权力，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切活动，都要听从政权组织的指挥，人、财、物、产、供、销，一切都由行政机构控制，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权被否定，变成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更被完全抹煞。同时，公社干部由国家委派，领取固定工资，只对上级负责，农业集体经济经营情况如何、生产增收或减收，对他毫无直接利害关系，他既不承担责任，也不影响个人收入。但他却大权在握，因此很容易出现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现象。另外，这种体制还很容易使公社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使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社会化的发展受到很大束缚。

实际上，就是以"队为基础"的集体农业生产制度，也早已严重束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了。有的学者研究，如果将 1952 年的农业生产率定为 100 的话，则 1978 年仅为 71.1，而最高的年份也只为 92。这种情况表明，经过 20 多年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大大下降。高于 1952 年生产率的只有 1955 年（104），而这一年正是实现大规模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前夕，也是农业中以独立家庭为经济单位存在的最后时刻。

由上可见，从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这种高度集体化的农业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

中国改革政社合一体制是逐步进行的。从 1978 年 8 月开始的两三年时间，政社合一体制的改革处于试点阶段。1983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草案）》中明确指出，人民公社体制要进行改革，要实行政社分设。所谓政社分设，首先是将人民公社中的政权职能分离出来，转给新建立的乡人民政府，乡人民政府成为农村的国家行政机构，而人民公社则变为单纯的经济组织，不再是农村的基层政权单位。撤销原来作为一级行政机构的生产大队，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生产队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是原来三级组织中的基本核算单位，而是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集体经济组织。

人民公社制度的彻底解体，是由于在农村中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底，我国农村约有80%的农户实行了包干到户。这样，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基本上解体了。1983年，有12702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8%。1984年，又有39830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1985年，所余的249个人民公社也宣布解体。至此，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解体了。

第三节　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

流通领域是联系生产、交换和消费的重要环节，农村流通渠道更是实现工农产品交换，进行城乡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因此，进行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对疏通农村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活跃城乡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变单一的商业流通渠道

农村流通领域的改革工作，主要是改单一渠道的流通为多渠道，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支持集体和个体商业的发展，改革农副产品的购销体制。调整农副产品收购和运销政策，减少统购派购，允许一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浮动，允许集体或个体经销。

在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下，农村原有的商业流通渠道主要是以统购统销制为中心形成的流通渠道。农村商品流通的经济组织，主要是国营专项商品经营机构，如商业局、物资局、农资局、粮食局、食品公司、蚕茧收购站、水果收购站、药材公司等；还有综合商品经营机构，如供销社。但是，自从农村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后，这种单一的流通渠道就与农村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势不相适应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单位由生产队变为承包户，农村商业服务对象，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也由面向生产队改为面向千家万户农民了。另外，农村市场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农业多种经营和农业专业化的发展，许多原来不进入流通的产品也进入了流通领域。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富裕起来，农民手中多余的产品要拿出去交换，同时对消费品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也都大大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商品流通渠道，根本不能适应。为了搞活农村商品流通以适应社会主义城乡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应实现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商业经济形式并存的方针，发展国营、集体和个体多种商业经济形式、多种经营形式，实现多渠道的流通。198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宣布，完成统购派购任务的农副产品，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经营，并允许农民走出县、省，采用机动车、船长途贩运。这样，就有力地推动了多渠道经营方式的发展。目前，除了粮棉油产品、重要工业原料、出口物资以及主要副食品仍然基本上由国营商业

和合作社经营外，国家定购和计划收购有余的农副产品，特别是放开的肉、蛋、奶、蔬菜、水果等产品以及小山货、土特产品、鲜活商品等，则多数已由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经营了。一个多层次、多成分、多渠道的农村流通体制已经逐渐形成。

二、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

进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除了改革单一流通渠道外，对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也是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统购统销是我国农副产品流通的基本政策，也是主要的流通体制。在统购统销体制下，农副产品只能由国家收购和销售，然后才能进入流通领域。同时，农副产品的价格自然也就由国家制定。这种价格一般都低于市场价格。这种统购统销政策在我国实行了很长时间，从50年代起一直到1978年，它虽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由于低收购价格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对这种统购统销体制进行改革，其具体措施如下。

（一）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的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从1979年3月起，国务院陆续提高了粮食等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24.8%，销售价格在一段时间维持不动，由国家给经营部门以财政补贴。从1979年11月1日起，猪肉等副食品价格相应提高，政府发给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

从1979年起，逐步恢复了粮、油等农副产品的议价收购。允许国营商业按照国家规定的浮动范围，在市场上议购议销。从1981年下半年起，又明确规定了议购议销范围，限于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统购派购任务以后允许上市的一类、二类农副产品，一类、二类产品中重要工业原料、畜产品，大中城市及工矿区的大宗蔬菜、中药材（包括34种中药材）不搞议价。

（二）缩小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范围，扩大议购议销比重。60年代规定属于统购范围的一类物资，品种有粮食、棉花、油料和6种重要药材；属于派购范围的二类产品有烤烟等83种（其中中药材61种），其他则属于三类物资。但后来统购派购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无所不包了。

1979年，国务院有关部门，重新规定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范围，并重申了三类产品和二类产品完成派购任务后，都可以自由上市。1980年底，规定一类统购产品有粮食、棉花、油料和木材，二类派购产品有127种（其中中药材54种、水产品21种）。

1983年起，国务院又陆续将一些二类派购产品改为三类，实行自由购销。到1984年底，属于统购、派购品种只剩38种（其中中药材24种）了。但是，上述改革措施，并未彻底解决原有农副产品购销体制与农村商品经济的矛盾。因此必须对流通领域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进行彻底改革。1985年1月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任务。规定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

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如粮食、棉花改为合同定购后，由商业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的粮食，国家统一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各省在保证不突破粮食收购价格总水平的条件下，可以对品种差价、质量差价做合理调整。定购以外的粮食，农民可以拿去自由上市出售。如果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国家仍按统购价敞开收购，以保证农民的利益。定购棉花，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棉花，允许农民上市自销。

生猪、水产品、牛羊肉、禽蛋、蔬菜等副食品，取消派购后，销售价格也同时放开，实行自由上市，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对某些副食品也逐步放开价格。不过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致因副食品涨价而下降，国家对城镇居民发给一定金额的价格补贴。

（三）国家对一些农副产品取消统购，放开价格，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木材放开价格后，实行议购议销。但对按平价交售木材的林场，国家给予一定的无偿投资。中药中四个品种（甘草、厚朴、麝香、杜仲），只能由国家指定的商业公司收购。烟草仍实行由国家统一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并指定国营商业公司统一经营。

彻底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消统购派购，使农民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取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后，又获得了产品销售上的自主权。同时也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农村种植结构有了很大调整，调减了粮食和棉花的种植面积，扩大了油料、糖料、麻类等经济作物和蔬菜的种植面积；农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牧业和渔业生产，获得突出发展。农村中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也丰富了市场供应。总之，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和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发达。

三、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生产粮食，“以粮为纲”，因而挤掉了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使农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自然资源受到破坏，农民负担沉重。因此，发展多种经营，是使我国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所提出的政策和措施中，就提到了农村中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济问题，要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等。1981年3月，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多种经营问题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和向中央的《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都谈到了进行多种经营的问题。《汇报提纲》提出发展农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因地施种，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逐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除了抓紧粮食生产外，还要十分重视发展多种经营。要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把我国的农业结构和粮食结构逐步改变过来。

为了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各地在保证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了农作

物内部的比例关系，做好自然和经济资源调查，做好农业区划工作。在此基础上，初步调整了生产布局，增加了经济作物面积，大力发展养殖与社队工副业生产。为了更好地落实“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1982年1月，国务院决定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管理办法。另外，为要发展多种经营，就要有多条渠道经营与之相适应。1983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组织多渠道经营的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为，在保证国营商业的主导地位和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作用的同时，允许多渠道经营。为了减少派购品种，将商业部管理的一类、二类农副产品由46种减为21种。对实行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均由国家指定的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统一收购经营。要千方百计扩大农副产品的推销，以促进农副产品生产持续发展。另外，还要加强市场管理等。

在1982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和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草案）》中，都提到发展多种经营问题。强调要坚持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适宜种粮食的耕地保证种粮，但要适当安排耕地种植经济作物；不宜耕种的土地，要还林还牧还渔。允许农民对完成交售任务后剩余的农产品进行加工销售。

发展多种经营，需要发挥集体、个人两个积极性。在坚持集体经济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同时，放宽政策，发挥作为公有制辅助成分的家庭经济的作用，扩大自留地，积极扶持家庭副业，积极组织和扶持专业户、重点户，如种植专业户、种田专业户、食品加工专业户、建筑运输专业户以及个体工商户等，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

第四节　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它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它与城市工业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并逐渐成为整个工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乡镇企业，是指农村的乡、村、生产队、联户、私人等单位或个人创办的各类企业。乡镇企业原来叫社队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很不发展。1970年，社队两级企业总产值仅272亿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得到较大的发展。1980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增长为528亿元。

一、乡镇企业特点

乡镇企业有以下特点：（1）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生产积极性高。（2）与农业联系密切。农业可为其提供原料、劳动力等；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可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和一定的技术；工农可紧密结合，协调发展。（3）经营灵活。乡镇企业一般规模较小，

生产技术比较简单，便于适应市场变化。(4) 职工亦工亦农，生活待遇要求不高。(5) 产品成本比较低。所有这些使乡镇企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1981年5月，国务院对社队企业的发展进行调整、整顿和改革。(1) 调整产品方向。乡镇企业应结合自己的特点，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大力发展消费品、原材料、能源生产等。(2) 组织联合，建立各种专业公司。联合企业和同行业联合的发展，使分散的乡镇企业趋向适度集中。(3) 进行规划，避免盲目发展。要根据当地资源、社会需要，有计划地发展。(4) 进行技术改造，培训技术管理人员以及推广以承包经营为中心的责任制等。

经过调整，乡镇企业得到了新的发展。1981年，社队企业总收入达687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62亿元。1982年总收入增长为72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646亿元。1984年后，乡镇企业又有新的发展。1984年发展到606万个，从业人员达5206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4%，总收入达1537亿元。同年，乡镇企业生产的硫铁矿347万多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3.2%；生产丝织晶2.9亿米，占全国总产量的24.7%；建材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建材工业总产值的53%。1985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2728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4%，就业人员增加到6000万人。

在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中，有两支突起的异军：一支是江苏南部的乡镇企业（苏南模式）；一支是浙江南部的家庭工业（温州模式）。苏南地区利用长江三角洲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经济、技术力量，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其中无锡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和武进县是典型代表，被称为“苏南五虎”。仅无锡市所辖的一个郊区三个县，一年产值就超过50亿元。浙南地区则是发扬历史上形成的手工业和商业传统，走出了一条以家庭工业及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雇工经营和合股经营的扩大经营形式，以专业市场为纽带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子，特别是温州市的试验，开创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新途径。此外，全国各地，如闽南、广东等地，也都兴起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乡镇企业。

所以，1987年邓小平在与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曾高兴地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用“异军突起”来形容乡镇企业的崛起，真是太形象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不仅发展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开拓了一条农村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还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发展乡镇企业的作用

乡镇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 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农业要实行现代化，能够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武装改造，必须有现代化工业的支援。但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又不相同，耕作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只靠大中型企业是不行的，而发展乡镇企业，为各地农村制造、修理、保养适合当地需要的小型农机具等，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有很大帮助的。另外，乡镇企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也可为农业现代化所需资金

提供重要来源。

（二）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中国现有人口11亿多人，其中8亿是农民。在8亿农民中，农村劳动力有3.3亿人，剩余劳动力1亿多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增加，到本世纪末，估计将达到2亿多人。这样多的剩余劳动力怎样安排？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出路。乡镇企业发展了，就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如1985年乡镇企业已吸收劳动力60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0%。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将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三）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乡镇企业是农民群众自己的企业，它的收入除用于企业本身扩大再生产外，就是支援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用于农民集体福利事业和增加社员个人收入）。如1983年，全国乡镇从业人员工资和利润返队分配总额达200多亿元，占当年社员人均分配收入的30%以上。另据统计，1978年—1989年10年间，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共为3828亿元，占同期农户净收入增量的75%。

（四）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乡镇工业），构成整个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大部分从事工业生产，这些乡镇工业不仅数量大，而且分布的部门和行业也比较广。乡镇工业按部门分有：冶金、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建材建筑、森工、纺织、造纸、缝纫、文教用品、皮革等类。很多产品已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乡镇工业不仅根据当地资源就地取材进行加工销售，而且许多乡镇工业已经为大工业生产配套产品、从事来料加工、以小补大等，成为全国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为数众多的乡镇工业的出现，也改变了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的经济格局。所以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已成为整个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组成部分。

总之，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党的方针政策是：首先贯彻“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并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有步骤地调整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搞好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其次，应重点发展能利用当地原材料和资源的农副产品加工和建筑材料等工业，大力发展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产品，并发展为大工业配套服务和出口创汇产品，促进乡镇第三产业的较大的发展。第三，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参加或组建企业集团，并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结合起来。第四，对有条件进行外贸进出口的乡镇企业，鼓励其参加国际竞争。第五，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

以上农村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多种经营的开展、政社分设、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等，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新道路，促进了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章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

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发展是一个试验和探索的历史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经验。因此，在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在城市中也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和探索，并实行对外开放。

第一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模式是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过了十几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历史过程才提出来的，而在改革的初期，只是针对旧的经济体制的弊端，采取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逐渐改变旧的计划体制。这些具体改革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主要的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经济管理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实际上是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和生气活力。所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应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增强企业的活力。这样，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就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了。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10月开始试点工作。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并可组织来料加工；（2）企业可以销售商业、物资、供销部门不收购的产品；（3）企业可以试制新产品，并可自己组织展销。（4）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按工资总额和计划利润指标，进行计划内利润留成和超计划利润留成，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5）折旧基金留归企业部分由40%提高到60%。（6）流动资金试行全额信贷，有的企业经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可以利用外资对外装配加工等。以上改革内容，首先在四川重庆钢铁

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械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南充钢厂六家企业开始。到1979年初，四川省试点企业已扩大到100家，并制定了14条扩权办法。以上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79年5月，国家有关部门也在京、津、沪等地选择一些企业进行试点工作。

为了加强对扩权试点工作的指导，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五个文件，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选择企业试点。到1979年底，全国扩权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家。到1980年又发展到6600家。这些企业占全国国营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40%和利润的70%。商业系统扩权试点企业8900个，占商业系统独立核算单位的50%。通过这些实验性的改革，使企业在责、权、利方面得到初步结合，特别是企业利润分配由过去的企业基金制度改为利润留成制，使企业经济利益与经营成果初步挂起钩来。

随着国家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在总结前几年扩权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84年5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简称《扩权十条》），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劳动人事、工资奖金和联合经营10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初步改变了企业只按国家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求，不关心产品销路，不关心经营成果的状况，开始树立和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服务观念，使企业的活力得到初步增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增产增收，国家和企业都增加了收入。

二、全国推行经济责任制

为增强企业活力必须进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这是一项重要措施。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把责（经济责任）、权（经济权力）、利（经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的实行，可以把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和职工收入的增加。

经济责任制要求企业的主管部门、企业、车间、班组和职工，必须层层明确在经济上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建立和健全企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各项专责制和岗位责任制，并采取一定的考核和奖惩办法，它要求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关系，把企业、职工的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有奖有罚，克服平均主义。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解决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关系，解决好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

贯彻经济责任制，企业所应遵循的原则是：(1) 必须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要组织生产，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2) 保证产品质量；(3) 努力降低生产成本；(4) 职工收入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长；(5) 要有奖有罚；(6) 要把贯彻、完善经济责任制与技术改造结合起来，要统筹兼顾、加强领导等。

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在分配方面主要有三种类型：(1) 利润留成；(2) 盈亏包干；(3) 以税代利，自负盈亏。具体形式有：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适用于增产增收潜力较大的企业）；全额利润留成（适用于生产正常、任务饱满、利润较稳定企业）；超计划利润留成（适于任务严重不足，利润大幅度下降企业）；利润包干（适用于潜力较大的微利企业）；亏损包干（对亏损企业实行“定额补贴、亏损不补、减亏留用或分成”等办法）；以税代利，自负盈亏（适于管理水平高、生产稳定、有盈利的大中型企业）。另外，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由统负盈亏改为自负盈亏，并确定一个合理的课税所得额为基数，增长部分按一定比例减收所得税，税后利润大部分留给企业。

1981 年和 1982 年，工业企业普遍推行了经济责任制。企业内部实行经济责任制，把每个岗位的责任、考核标准、经济效果同职工的收入挂起钩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 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增产增收；(2) 促进子企业的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得到了改善和加强；(3) 比较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平均主义问题，使按劳分配原则得到进一步的贯彻；(4) 进一步改变了对企业统收统支、捆得过死的状况，使企业有一定的机动财力，可用于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兴办集体福利设施，改善生活条件；(5) 不仅对一线生产工人落实了经济责任，而且对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业务人员和辅助人员等都有明确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6) 促进了工业的调整。

总之，经济责任制的推行，为工业企业在管理体制改革上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三、实行利改税制

改变利税制度，也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的有力措施。从 1980 年开始，我国曾在 400 多个工业企业中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工作，效果较好。试点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明显地超过了总产值的增长，特别是实现利润和上交税费的增长，大大高于总产值和销售收入的增长。而且在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部分中，保证了大部分以税金和资金占用费的形式上缴国家，企业所得也增加了。试点结果表明，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金的方向是正确的。1983 年 4 月 24 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决定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即税利并存制度。在企业实现利润中，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然后对税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从 1983 年 6 月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

根据规定，凡是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其所实现的利润按 55% 的税率交纳所得税，其税后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上缴国家部分，可根据企业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递增包干上缴、固定比例上缴、缴纳调节税

和定额包干上缴四种办法。有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缴纳后，由企业自负盈亏，国家不再拨款。对税后利润较多的企业，国家收取一定的承包费，或者按固定数额上缴一部分利润。对于亏损企业，继续实行“定额补贴、超亏不补、减亏分成”（国家政策允许的亏损）的政策。凡属经营不善造成的亏损，责其限期整顿，在规定限期内，经财政部门审批后，适当给予亏损补贴，逾期不补。

第一步利改税是税利并存。企业缴纳税利后，留用的利润要建立五项基金，即新产品试制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这五项基金必须分别管理、分别使用。一般说，前三项基金不得少于全部留利的 60%，后两项基金不得高于留利的 40%。1983 年实行利改税第一步的国营工业企业共 26500 家，为盈利企业总户数的 94.2%。1983 年全国实行利改税的国营企业新增加的收入，以税金和利润形式上缴国家的部分约占 70%左右，企业所得约 30%左右。其中用于职工奖励基金的部分约为 8%。

第一步利改税实行后，企业的大部分利润以所得税的办法上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基本上纳入固定轨道，减少了过去那种争基数、争留成比例的现象，比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原则。不过，利改税第一步仍有一些问题，主要是企业纳税后的税后利润，还须在国家与企业间进行分配，因而还不能真正体现企业的盈亏责任制。同时，利税并存，企业所得税和税后利润的分配，仍然是按照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分配，因而行政干预自然存在。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央决定自 1984 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其基本内容是：将国营企业应当上缴国家财政的利润按 11 个税种向国家交税，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安排使用。具体办法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按 55%的比例税率缴纳所得税，然后再按照企业不同情况，征收调节税。对国营小型企业则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缴纳所得税。

实行利改税制是解决国家和企业在分配关系上的一条新的、正确的、有效的途径。它通过设置税种、税制进一步改善税制，可以充分运用税收的调节作用，更好地调节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时利改税后，税率固定，企业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它既能使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均衡入库，又能使企业心中有数，有更大的压力和活力，来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以争取更多的收入。另外，实行利改税后，还可减少部门、地区对企业过多的行政干预，国家也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利用税收杠杆，调节生产与分配，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文化大革命”时“左”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人为地搞生产资料所有制升级，消灭个体经济，使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越来

越单一化，结果生产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调整所有制结构，允许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实行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体一起上的方针，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也发展起来。国家在支持城镇个体工商业发展的同时，还允许个体劳动者（包括待业青年和其他人员）根据生产需要申请合作经营，也可以按平等互利原则与国营经济组织联营。集体企业在遵守国家法令的前提下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企业还可按照自愿组合、自负盈亏、民主管理、职工集资、适当分红、集体积累、自主分配的原则，自主经营管理。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从社会劳动者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如 1978 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为 15 万人，1982 年发展为 107 万人，1984 年更增加为 339 万人；农村集体和个体劳动者，1978 年为 30250 万人，1982 年为 33278 万人，1984 年增加到 35368 万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 1978 年为 7451 万人，1982 年为 8630 万人，1984 年为 8637 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1978 年为 2048 万人，1982 年为 2651 万人，1984 年增加到 3216 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增长快，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大力支持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结果。

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分布在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科研文教卫生等行业。在支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之间的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联合经营，使整个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五、改革流通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旧的流通体制是一种按行政区、行政层次统一收购与供应的单一的流通体制。这种流通体制的商品流通渠道少，流通环节多，流通网络不健全，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而且给人民生活也带来许多不便，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流通体制的改革，是要建立一种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建立和发展以社会主义国营商业为主体，以城市为中心的集体、个体、联合体等多种商业形式的流通体制。

国营商业改革，要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区别行业特点和企业规模，实行多种管理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业经营者。中心城市的贸易中心，要坚持开放服务原则，进一步突破行业、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界限，通过相互渗股而组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定分配的批发企业，发展多种批发方式，进行灵活经营。同时还要加强商业网点、设施的建设，减少流通环节，建立和发展多种商品流通渠道。恢复货栈贸易，积极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恢复城乡集市贸易，开展工业产品的自销，并

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等。

国营商业与供销社实行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农村供销合作社是集体商业组织，要在社员自愿原则下，继续扩大吸收社员股金或采取集资形式兴办企业。要充分利用遍布城乡的网点、人员、资金和设备等有利条件，逐步建立起生产、加工、运销等多功能的服务体系，并要从提供信息、原材料和推销产品等方面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各级供销社要积极发展跨部门、跨地区的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横向联合，发展多种流通方式。对于某些产地比较集中的产品，可组织专业企业联合集团，组织产销联营。在大中城市要逐步发展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使产区与销区直接贸易，积极推行分购联销或联购分销的经营方式。

关于生产资料的流通体制，长期以来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调拨分配方式、“条块分割”的封闭式的体制。其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的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委平衡分配，称为统配物资；其余的工业品生产资料分为三类，一部分由省、市、自治区安排生产和销售，大部分由企业自销。这种体制的缺陷是，国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造成产销脱节，流通渠道单一，流通环节多，物资流通不畅，周转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家不断缩小指令性计划分配物资的范围和品种，适当放宽了自销权力，因而扩大了市场交换的范围和品种，一些重要物资如煤炭、钢材等也进入了市场，逐步开放了生产资料市场。工业消费品则分别采取子统购统销、计划收购和订购、选购等多种购销形式。1984 年末，全国已建立工业品贸易中心 1254 个，建立生产资料贸易中心 96 个，下放工业品二级批发站 489 个，初步形成了多种渠道的商业流通网络。

六、改革计划、财政体制

（一）计划体制的改革。我国计划管理体制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宪法》中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实行计划经济，需要建立一套以计划管理体制为主体的经济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涉及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它制约着其他各种经济管理体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生产队和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前提下，有权自主地、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国家同时减少了收购、派购农副产品的种类和比重。在工商业方面，也推行了经济责任制，通过扩权，使企业在计划安排、产品购销、利润分配、资金运用等方面比过去有了较多的权力。许多企业实行利改税、利润分成或利润包干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城乡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有些商品价格放开，一部分计划分配物资由物资企业经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此外，在财政体制上、价格体制上等也进行了改革。所有以上情况，都涉及到计划管理体制，促使计划体制也进行了改革。

我国原来的计划管理体制的缺陷，主要是统得过多，计划太死，日用品生产比较单调，人民生活不够丰富多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计划管理体制改为指令性计划、

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计划管理形式。指令性计划，过去叫直接计划，即计划执行单位必须坚决执行的计划。指导性计划，过去叫间接计划，即不是必须坚决执行的计划。市场调节，在“一五”期间和60年代调整时期实行过，其他时期均被忽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属于计划调节的范畴，市场调节是计划调节的补充。

指令性计划适用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适用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根据需要，对粮食及其他重要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示。对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改进，就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对大多数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要将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并努力提高指令性计划的科学性。

指导性计划适用于全民所有制的大量中小型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其他经济形式的企业，国家对这些企业下达指导性计划，并不强制执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必要时辅之以行政手段来促进计划的实现。计划执行单位对指导性计划有权结合社会需要和本单位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使计划更切合实际。

市场调节主要适用于各种各样小商品和农副土特产品。这些产品国家不作计划，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进行调节，国家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工作进行管理。

对计划管理体制初步改革如下：

1. 端正计划指导思想，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的原则，在制定计划时力求速度和效益统一。

2. 重视中长期计划，开始健全计划体系。

3. 注意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改变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减少指令性实物指标；允许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社会需要编制生产经营计划，逐渐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4. 重视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通过调整价格发放银行信贷、健全税制、实行财政补贴等经济办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产品质量的提高、科技进步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如提高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对这些农产品连续高产起了很大作用；调整油菜子、烤烟的收购价格，实行浮动价格，调整奖售办法等，对这些农产品的按计划生产起了促进作用。对一些轻工业，如烟酒、棉布、化纤织物和部分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也作了有升有降的调整，结果，打开了销路，减少了积压，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一部分小商品价格放开，产品生产和供应都有所改善，人民生活也较为丰富多彩。对电子、化工、机械等行业的部分产品实行了浮动价格。信贷方面对部分基建和挖潜、革新、改造的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将流动资金的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企业必须还本付息，承担经济责任，因而提高了企业认真经营的意识。

（二）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体制与财政管理的关系十分密切。财政体制规定财政分级管理的根本原则，划定各级政府之间、国家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职责、权力以及财政收支的范围。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政关系，对于调动各方面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体制的发展过程大体是：由革命战争时期的分散经

营到1950年高度集中，再由高度集中逐步过渡到在中央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分级管理，多年来，虽然也有统得过死的时候，也有分得过散的时候，但始终是沿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前进的。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在财政上曾采取若干措施，加强管理和增收节支。1978年为了调动地方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在部分省市实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的体制。1979年又在大部分省市实行“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体制。财政体制的系列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1978年底开始，对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办法，各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办法和盈亏包干办法；

2. 从1979年起对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办法；

3. 从1979年起对基本建设单位进行由财政拨款改为贷款试点；

4. 从1980年起，国家对省、市、自治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5. 从1980年起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农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试行预算包干办法；

6. 从1980年起对少数城市和少数企业进行利改税的试点和税收制度上其他一些改革的试点。1983年4月，利改税改革全面展开，从税利并存逐步发展到以税代利，使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更趋稳定。

以上改革办法比较全面，不但改进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而且重点放到改进国家与企业的财政关系上（关于财政体制上，国家与企业关系具体体现在从国营企业的基金制度到各种利润留成制度再到利改税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前面已谈，此处从略）。在中央同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这种体制的具体做法是：把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支出按隶属关系划分。凡是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大于地方财政支出的，按一定比例上缴中央财政。在这类地区，作为调节收入的工商税全部归中央财政。凡是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小于地方财政支出的，不足部分从调剂收入（工商税）中划给一定比例进行调剂。凡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工商税）全部留给地方，收入仍然小于支出的，其不足部分再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贴。分成比例和补助定额确定以后，分级包干，五年不变。地方在这个范围内，自己安排收支，自求平衡。此外，根据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情况，对这两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缴（广东）和定额补助（福建）”的体制。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仍然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

这种体制打破了过去那种统收统支、收支脱节的局面，扩大了地方的财权，体现了责任和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调动了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

不过，这种财政体制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包而不干”，地方只负盈不负亏，地方如发生亏损，由中央财政来解决；(2) 收支基数的核定、包干比例的确定，由于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在客观上也很难做到公平合理；(3) 实行利改税制后，企业留利大量增加，但国家财政集中的企业纯收入比例却下降较多；(4) 国家预算收入

中，地方占60%～70%，中央占30%～40%，而财政支出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相差不多，中央财政入不敷出；(5) 此外，预算外资金大量增加，亟需控制；(6) 第二步利改税后，财政收入结构变化，也要求预算制度相应改革；(7)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要求完善税收体制等。因此，从1985年起，国务院又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体制。

这种新的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有：(1) 按第二步利改税后的税种设置，划分各级财政收入，其中包括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财政共享收入三大类。(2) 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3) 根据财政收入的范围，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凡地方固定收入大于地方支出的，定额上交中央；地方固定收入小于地方支出的，从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中确定一个分成比例，留给地方；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方还不足以抵补其支出的，由中央定额补助。地方多收入可以多支出，少收入就要少支出，自求收支平衡。

这种新的财政体制由于实施条件还不成熟，所以，1985年、1986年在一些省市中实行了过渡性的财政体制，即：除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划归中央外，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加在一起，和地方财政收支挂钩，确定一个分成比例；多数省市仍实行总额分成办法；广东、福建仍实行财政大包干办法；民族自治区则在确定中央定额补助数额后，继续实行每年递增10%的特殊体制。

七、推动经济联合，实行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试点

1978年，国家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和其他一些省、市先后开展了工业改组试点工作，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建立各种企业性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并按照经济合理原则，结合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组织按产品或按工艺的专业化协作，发展经济联合，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为了实现工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工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1979年企业的改组和联合逐步开展起来。其形式有：(1) 围绕优质名牌产品组织专业化协作；(2) 围绕发展消费品特别是名优和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对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改组和联合；(3) 围绕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提高经济效益，组织不同部门的重点企业进行联合；(4) 加工企业与原材料产地之间、生产企业与科研单位、国营与集体企业之间、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与比较落后的企业之间、沿海与内地，可实行联营、合营或者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进行联合。联合要从生产需要出发，坚持自愿、平等互利原则，打破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组织原材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等形式的联合体。

此外，还组建了一批全国性公司，如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等。这些公司成立后，对制定规划，统筹安排全行业主要工厂的科研、生产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改组联合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1981年以来，我国部分城市还进行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首先在沙市、常州开展，后来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哈尔滨等一些大城市和省辖市也展开了试点

工作)。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是指对城市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方面进行配套改革。具体做法是：

(一) 简政放权，搞活企业，促进生产的发展。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搞活企业为中心，首先抓了简政放权，扩大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二) 敞开城门，搞活流通，增强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在搞活企业的同时，各综合试点城市加快了流通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敞开城门，逐步形成一个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网络型的流通体制。

(三) 试办资金市场，以发放债券，建立短期资金拆借市场，开展同城和异地商业票据结算、期票贴现业务等方式，提高资金融通效益，利用有限资金更好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 发展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协作，通过实行技术有偿转让和开放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科技人才的横向交流等。

(五) 实行市带县体制。原有经济体制割裂了城乡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为了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组织经济的作用，实行了市带县体制。这就是将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市与所在地区合并，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把城乡经济联系起来管理，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大体上一致起来，以促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市带县体制有利于打破部门封锁和实行条块结合、城乡结合，一些试点城市与所带县形成了联合生产、商品流通、科技、人才、信息、交流和资金协作等多种网络，加快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六) 建立不同类型的以若干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经济区的建设，对于合理布局生产力，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吸纳功能，具有重大意义。1982 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并先后设立了上海经济区、山西能源基地和东北能源、交通三个规划办公室。1984 年又对经济区进行调整，上海经济区调整后其范围包括整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和上海市，共有省辖市 32 个、地区 17 个、市(地) 辖市 16 个、县 285 个，土地面积 51 万平方公里，人口 19700 万人。几年来，上海经济区在组织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生产、科研合作、小区规划和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其他经济区也开展了地区间的联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较好地发挥了中心城市和经济区的作用。

(七) 对科技、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在科技方面，加强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使科技更好地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对科研领导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国家修订和颁布了《发明奖励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等以鼓励科技的发展；实行专利制度和技术有偿使用，建立和开放技术市场，科研机构试行对外有偿合同制、对内课题承包制和科研基金制，成立一些科研生产联合体，创建人才交流和技术服务机构等。此外，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促进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也是提高我国科技水平的一个方面。在教育方面，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在职职工教育培训和在职干部的培训等，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需要。

第二节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

改革前的旧经济体制，是一种封闭的经济体制。在对外关系方面，片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忽视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结果把自己封闭起来，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十分密切，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产力走向国际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外开放已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了经济较快地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新加坡、韩国和巴西等，在近一二十年来，充分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大力推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也迅速地发展了本国经济。

可见，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同时发展本国的经济，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经济上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现代化生产需要多种多样的资源和技术，只有通过国际市场，才能扬长避短，发扬优势，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如美国生产的大型波音747客机，是由6个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1.5万家中小企业协作生产的。也就是说，只有实行开放政策，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才能做到这一点。(2) 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可以不走或少走弯路，争取时间，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起步。如日本1950年—1970年的20年间，引进和推行技术专利的费用约为60亿美元，如果关起门来靠自己，仅科研、试验、设计等所需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就约需1800亿美元~2000亿美元，为引进和推广费用的30多倍，而且还要花很长时间。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及时赶上，抓住时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我们会永远落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可能要拖很长很长时间。

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关系，具体内容是：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三资”企业），发展旅游工业、劳务出口、劳务合作以及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内地城市，发展对外贸易等。

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措施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措施和做法，自1978年确定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后，几年来迈了三大步：第一步是1980年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第二步是1984年开放沿海14个城市和海南行政区；第三步是1985年又开放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福建两省自然条件优越，工农业有一定的基础，又是著名的侨乡，吸引侨资、外资，加快经济建设十分有利。另外，两省毗邻港澳台，交流条件便利，有发展对外经济和贸易的良好条件。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两省在对外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扩大其对外经济工作中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其优势，以加速经济建设。具体措施是：.

1. 两省可以实行财政、外汇定额包干（如在财政方面，广东省实行定额上缴，福建省实行定额补贴包干，五年内增加的财政收入全部留给地方使用）。

2. 物资、商业流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作用。如在物价方面，省有权调整地方产品的价格；属国家统管的商品价格，如地产地销部分，省可以根据生产成本自行核定、调整。

3. 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工作中，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如在计划方面，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生产、技术改造、基建、财政、物资、外贸、商品流转、劳动工资、科技、文教卫生、旅游等方面的计划，均可以省为主制定。

4. 试办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另外还考虑在汕头、厦门也开办经济特区。

5. 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期限，暂定为五年，即1979年—1984年。

通过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实施，两省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因而经济建设发展较快，对外经济工作进一步打开局面，人民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兴办经济特区。

1. 经济特区的设立及其特殊经济政策。开办经济特区，国外早有先例。最早的是16世纪在意大利热那亚建立的自由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特区遍布亚、非、拉和北美、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名称多种多样，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对外贸易区、自由关税区、免税区、免税仓库、出口加工区、自由出口区、投资促进区、自由工业区、科学工作园和科学技术园等。各国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并不相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是为了吸引国外资金，发展对外贸易或转口贸易，以促进本国和本地区商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设立出口加工区的，是为了吸引和利用外资和技术，利用国内外的原材料资源，进行产品加工，然后再把产品外销。科学工作园和科学技术园，是为了吸引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新技术的研制，开发新产业和新产品等。

我国的经济特区是指国家在某一地区内划定以市场经济为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

行更加开放的政策的特定的地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所以特区是我国进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基地，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窗口，沟通国内外信息、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向外界介绍我国的对外政策的窗口，也是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多种类型经济形式的实验场地。

我国开设经济特区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省委报告，同意这两个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地处南海之滨，地理位置优越。深圳与香港接壤，珠海地连澳门，汕头、厦门是天然良港，有着百年开埠通商的历史，又是著名的侨乡，都具备建立特区的良好条件。

党中央、国务院规定了兴办经济特区的方针，即：建设资金来源，以吸收外资为主；经济形式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实行"四个为主"方针的目的，是为了使特区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牧、渔相结合的外向型生产基地，成为吸引外国和港澳游客的游览区、现代化的新型城市，成为向我国内地输送现代化设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管理方法的基地和窗口。

党中央、国务院还规定了经济特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特区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靠引进和利用外资，产品主要供出口，某些产品经批准可在照章纳税后，部分内销。特区内的经济形式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以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综合体，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

2. 经济特区内对投资外商的优惠待遇。

(1) 税收方面。根据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三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深圳特区的外资企业一般从投产开始免征1年~3年的所得税；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商所分得的合法利润，汇出境外免征所得税。1984年11月，国家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其中进一步规定，对特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在征收所得税上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总之，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所享受的优惠待遇，比我国内地的中外合资企业所纳所得税要低一半（内地中外合资企业应纳所得税税率为30%，另外还有地方所得税，两项共33%）。

另外，对进口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免税、减税，或按低税率征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特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暂行规定》中，对工商统一税的征收，根据不同情况作了具体优惠规定。

在出口产品方面，在《暂行规定》中规定，特区企业出口的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

或者另有规定的少数产品外，都免征工商统一税。如果产品在本特区内销售，特区政府可确定对少数产品照征或减征外，其他一律不再征收工商统一税。“三资”企业生产的先进技术产品，经批准可以有条件地部分进入内地市场销售。

个人所得税方面，对在我国境内工作的外籍人员、港澳和台湾同胞、华侨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缴所得税减半征收。港澳、台湾和国外储户在特区银行存款所取得的利息，在1995年以前免征个人所得税。

(2) 土地使用方面。1981年11月《深圳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外商经过申请批准后，可在深圳特区取得土地使用权，但禁止买卖、出租和擅自转让。土地使用年限，根据行业、项目、资金收回时间的长短和营利难易等而不同。土地使用费用标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使用年限而不同，如每年每平方米工业用地为10元~30元、商品住宅用地为30元~60元，旅游建筑用地为60元~100元，商业和饮食业用地为70元~200元等。每三年调整一次。1984年2月，深圳政府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费调整及优惠减免办法》规定，大大降低特区土地使用费标准。新规定为：工业、仓储用地每年每平方米1元~1.6元，商品、住宅、招待所用地5元~9元，旅游建筑用地12元~18元；商业、宾馆、酒楼用地13元~21元，种植、畜牧、养殖用地0.2元~0.3元。

此外，还有新的优惠办法。如新建企业按上述土地使用费标准缴纳20%~30%；填海增辟的土地，免缴土地使用费10年；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项目，免缴土地使用费5年，然后再减半缴纳3年。技术特别先进的可免缴土地使用费。华侨、港、澳、台胞捐资兴办的企业免缴土地使用费5年，之后减半缴纳。

(3) 经营管理和劳动工资方面。外商来特区投资，在投资方向、投资数量和企业经营管理、劳动工资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如投资部门、投资形式和数量等皆可自行选择。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按中外双方协议或合同办，在经营管理上，完全自主经营。企业还可根据生产和经营的需要，雇用或辞退职工，可自主选用本地和内地职工，也可自主选用外国人、港澳同胞、华侨职工。工资制度、工资奖金形式及奖惩办法等皆可自行决定。外商投资企业用工手续简便，费用低廉。如深圳特区，用工每人每月工资为500港元~600港元，总水平只相当于香港工人的30%~40%左右。

(4) 外汇管理优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收汇和经营业务收汇，允许全部保留现汇。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和以进养出的企业，可以保留部分现汇，结汇后的外汇额度允许使用。

(5) 为客商及其家属在特区的居留和出入境方面提供方便。客商到特区访问、考察、旅游、洽谈业务或投资设厂，出入境手续十分简便。各口岸都设有“专用通道”，方便客商往来。深圳特区还有往返多次有效的出入境签证，口岸检查机关优先放行。

(6) 国家给予特区更多自主权。国家对经济特区的管理，通过总体规划、经济合同、税收、信贷等手段进行，特区在商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在使用外资建设项目审批权限方面，比内地宽得多。

3. 经济特区建设的初步成果。经济特区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

大成就。1979年—1985年，广东、福建两省通过外引、内联和银行贷款等多种形式筹集资金，首先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深圳和珠海。从平整土地起，建设公路，接通电力，建设电讯工程，开辟水源，兴建厂房、仓库、商业大楼、办公用房、居民住宅和服务设施等，为兴建特区创造必要的投资环境。另外，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按照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办“三资”企业，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与内地省市和部门进行广泛的经济技术联合，发展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使特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深圳经济特区，东邻大鹏湾，西接珠江口，南面以深圳河为界，紧邻香港新界，北傍梧桐山，面积327.5平方公里。深圳原来不过一边陲小镇，人口稀少，工业落后，产值不过几千万元。深圳被划为经济特区后，首先进行了“七通一平”工作，即通车、通水、通电、通电讯、通航、通排污、通煤气和平整土地。工作完成较好。市区建成总长70余公里的6条主干柏油马路，供水、供电齐全，通讯条件大为改善。到1985年全市人口已达71.65万人，特区人口47万，建筑道路203公里，地下管道913公里，共建设了6个工业区、14个住宅区和一批商业区、旅游区、仓库区、文化教育区。全市已建成2000多幢高楼，18层以上的就有130多幢，其中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53层，为当时国内最高建筑。另外，还建成了蛇口、赤湾、东头角等四个海运港口和一个直升飞机场。开通了1.1万门程控电话，可直拨香港、日本、美国和内地27个城市。建成新工厂750多个，工业企业800多家。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26.7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30倍。1985年工业产品销售额20多亿元，其中41%出口。此外，商业、饮食、服务、旅游等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85年，外贸出口达5.17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40多倍。职工人均月工资比1980年提高1.5倍。

珠海特区，南面毗邻澳门，在拱北海关两侧。原定面积为6.7平方公里，1983年6月底经国家批准，调整为15.16平方公里。珠海特区的建设，也是先搞“七通一平”，然后进行交通、能源和电信建设。1985年除扩建了原香洲码头外，还新建了九洲码头(可停泊万吨货轮)和直升机场。区内修建了骨干公路，建成了变电站，并建成拥有6000门程控数字和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开通与港澳和全国十多个城市直拨电话。与此同时，还建成了一批工业厂房、职工宿舍、商业用房和宾馆、酒楼、商场等。还利用珠海丰富的旅游资源，建设了十多个各具特色的旅游度假胜地。从1980年—1985年11月，珠海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8.16亿元，房屋等竣工面积200万平方米，改善了投资环境。

在工业建设方面，首先发展外向型工业。重点为轻纺、食品饮料、建筑材料和电子等工业企业。此外，还利用有利条件发展供应出口的畜牧饲养、海产养殖和水果、鲜花等生产，增加了出口创汇能力。

汕头特区，在汕头市东郊龙湖一带，原面积为1.67平方公里，1984年11月，经调整为52.6平方公里。汕头特区建设起步较晚，1982年才开始动工，但效益比较明显。汕头建设按照出口加工区的模式进行总体规划。分为5个小片区，到1984年已建成两

个。1984又扩大特区发展，分成龙湖和广澳两大片区，龙湖片区重点建设轻型加工工业、水果蔬菜和水产品三大基地，广澳片区主要兴建石油化工工业和石油后勤基地。到1985年后，修通汕头市与特区之间的公路，完成0.77平方公里的“五通一平”工程，开辟了1.5平方公里的水产养殖基地和农业试验区，修建了一座3000吨级集装箱和散装两用码头及港口设施，建成两个变电站，扩大了水厂。另外还建设了厂房、仓库及其他配套设施。打通从汕头市到广澳十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路基，改善了交通、能源和通信状况，扩建了汕头机场。经过以上建设，投资环境大大改善，经济效益大大增加。

厦门特区，最初特区面积为厦门岛的湖里地区的2.5平方公里，1984年5月确定扩大到全岛，包括鼓浪屿在内，面积为131平方公里。厦门特区建设起步较晚，1984年前进行了湖里区建设，建造了一批工业厂房、商品楼房、宾馆、酒楼和商场，新建了国际机场、东渡码头。引进了万门程控电话，开通了通往香港地区、日本、美国等国和国内24个大中城市的直拨电话。还建立了保税仓库和保税工厂，以经营电器、钢材和日用轻工产品的储存和加工改制复出口业务。

加强了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除建立新的工业企业外，也对老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在内联方面，已同中央11个部委和20个省市及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进行横向经济技术合作。

1985年，厦门市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1倍，进出口贸易额比1979年增长了3倍多。出口结构从农副土特产品和轻工产品为主，发展为化工、机械、建筑材料、电子产品等8个大类2000多种产品。

总之，我国4个经济特区从开创以来，几年中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改善了投资环境，根据各自的特点，开展了外引内联工作，从而使经济高速发展。

（三）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1984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经济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又作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后来又决定开放海南岛。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以来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

上述14个城市地处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海南岛物产丰富，四周环海，水上交通便利。这些地区既有外贸条件，又有与广大腹地经济协作的网络。海南岛更接近港澳，都是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好地区。这些城市和4个经济特区以及海南岛，从南到北，联成一线，形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这些地区开放后，对于进一步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援和带动内地经济发展，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国家对14个开放城市实行对外开放的主要政策是：(1) 扩大这些城市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放宽利用外资、引讲技术和建设项目的审批权（500万美元～3000万美元）。(2) 对外商在这些地区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如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或属技术密集型企业，征收所得税可按15%的税率；国外投资所需物资可予免税；对技术先进、国内短缺商品，允许一定比例内销（必须按一定手续办理），以及给予外商

洽谈业务出入境方便等。(3) 在有条件的城市，可划出一定区域，开办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区内可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以吸引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技术、知识密集型项目和新兴工业项目；鼓励设立"三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科研机构等。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可发展为国际转口贸易基地。

海南岛开放后，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可有较大的自主权。具体政策如下：(1) 扩大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审批权（500 万美元以下），重要矿产资源报经国家批准后并可与外商合作开发。对外商来洽谈生意者，给予出入境方便。(2) 利用外资，进口所需设备、器材、生产资料等，可免征关税。(3) 实行出口核定基数包干办法，收汇与广东省对半分成，（海南岛成为省之前）海南行政区组织的超计划出口，收汇全部自用。(4) 外商来海南岛投资，给予优惠待遇："三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头两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起，按 15%征收；投产后 3 年内对缴纳工商统一税有困难的，可酌情减免；"三资"企业外商所得利润汇出时，免征所得税。

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在国际上引起了良好的反映，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界人士纷纷来到这些城市和地区考察和洽谈业务，使这些城市和地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

（四）开辟三个沿海开放区。4 个经济特区、14 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相继开放后，1985 年 2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决定开辟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

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包括三省一市，即江苏、浙江、安徽省和上海市。这一地区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合肥、芜湖等城市和那些富饶的农村地区。

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五个城市及周围的城镇和农村。

闽南三角地带，包括厦门、漳州、泉州三个城市及周围的城镇和农村。

这三个地区沿江临海，交通便利，工业基础好，商品经济发达，信息灵通，科技文化水平高。国家对上述经济开放地区，给予扩大自主权和优惠政策待遇。具体如下：(1) 适当扩大利用外资对老企业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的审批权。(2)"三资"企业属于生产性、科研性的项目及能源、交通、港口、技术知识密集型项目，投资在 3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税收上予以优惠。(3)"三资"企业投资经营所需进口的设备仪器，为生产出口产品所需进口的原料、零配件、包装材料和外籍从业人员进口的自用安家物品及交通工具等，免予征收关税。(4) 扩大经营外贸的自主权。(5) 根据需要，在开放区内，可发行专项债券或股票，中国银行对有发展前途和创汇能力的项目，优先提供优惠贷款等。

开辟三个经济开放区，是要把这三个地区建成以外向型为主的创汇经济区，要按照"贸、工、农"的顺序来安排生产结构，要按国际市场需要调整生产、安排生产。沿海经济开放区自 1985 年创办以来，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果，三个开放区已经建立起较大的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 300 多个，工业品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初步

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有层次、有重点，由沿海向内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步推进的地域开放格局，使之成为吸收、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传递经济信息的基地，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开放式的富庶地区，从而带动内地，使内地与沿海共同发展，以更快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三、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

为了更好地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也对外贸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我国原来的外贸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主要是：(1) 出口贸易完全由外贸专业公司所统制，国内出口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隔离，不了解行情、信息，难于生产适销对路、有竞争能力的产品；(2) 外贸行政部门对外贸经营干预过多，管得过死，外贸专业公司和出口生产企业缺乏必要的自主权；(3) 专业外贸公司实行统购包销、统支统收、统负盈亏的财务管理办法。出口生产企业、进口商品使用者和外贸经营单位，对财务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吃国家财政的“大锅饭”。

这种政企不分、独家经营、吃“大锅饭”的体制必须改革，否则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形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对外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初步改革阶段，改革的重点是：(1) 扩大地方外贸经营权，开辟新的外贸渠道。各专业外贸总公司按照改革部署，下放了部分经营权，除国家统一经营的商品外，其他商品由地方经营，盈亏纳入地方预算，贸易外汇全额留成。(2) 为了贯彻工贸结合、产销见面的方针，国务院决定建立出口联营、出口协作，扩大部分企业的外贸权限。(3) 对出口商品实行分类经营：一类出口商品，由国家专业外贸公司统一经营，统一成交；二类出口商品，由国家、地方交叉经营；三类出口商品，完全由地方经营。

1984 年 9 月，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具体如下。

1. 简政放权，政企职责分开，实行外贸两级管理。政企职责分开，一方面外贸行政管理权集中到经贸部，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实行经贸部与各省、市、自治区经贸厅(委) 的两级管理；另一方面，外贸企业摆脱了行政部门的束缚，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为经济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

2. 加强工贸结合、技贸结合，密切出口生产企业和外销部门的关系。

3. 实行进出口代理制。由外贸企业代生产、订货部门办理进口或出口业务，收取一定的费用，财务盈亏由出口商品企业和进口商品用户自负。用户可根据各外贸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选择，自由委托；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也可以自行组织进口。出口方面，基本上实行代理制，但有关国计民生、国家统一监控、竞争性较强的大宗出口商品，原则上仍由各类外贸专业总公司经营。实行进出口代理制，有利于出口生产单位、进口使用单位。外贸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工贸结合、技

贸结合。

4. 在外贸计划体制上推行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新体制，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的范围，允许外贸企业跨地区收购。

5. 坚持统一联合对外原则，国家委托外贸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政策、法规、各种经济手段对外贸进行宏观管理，实行外贸统一联合对外，以防止某些部门、企业在国内抬价抢购，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使肥水流入外人田。

6. 相应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适当调整人民币的对外汇率。一方面，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适当限制进口，以缓和我国外汇紧张状况。

7. 部分地区、部门试行外贸经济责任制。1985 年开始，外贸总公司接受向经贸部承包的出口创汇计划、出口成本以及盈亏三项经济指标后，再将这三项指标分解包给各外贸专业分公司，各分公司又把具体承包任务落实到科室、班组和个人。这样可改变外贸单位不包盈亏，吃国家财政“大锅饭”现象，把职工个人收入与本单位完成计划任务的情况挂起钩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出口创汇，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发展。

第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新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两次大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于1981年12月明确提出了今后国家经济建设应该走的新路子，即发展速度合适、经济效益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并提出了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新任务，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所有这些，对以后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第一节 国民经济发展新道路的探索

一、经济建设10条方针的提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现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也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时中共中央又对经济建设实现“四化”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探索。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提出了搞建设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路。他的这一思路得到了党内外理论界和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和高度重视。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根据同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认真分析了我国的经济形势，研究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指出，除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外，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稳步前进、健康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会议据此提出了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

经济建设10条方针概括起来是：(1) 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2) 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3) 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益，加

强能源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4) 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5) 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的改组；(6) 讲究生财、聚财和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7)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能力；(8) 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9) 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10) 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这 10 条经济建设方针，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特别是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经验总结，也是纠正过去“左”的错误的产物。它的特点是：(1) 要求做到经济发展速度应服从效益，争取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实在的发展速度；改变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忽视经济效益的偏向；(2) 农、轻、工合理地、按比例地发展，改变过去不顾经济规律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方针；(3) 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主要以内涵扩大生产的方式为主，主要力量用于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上，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建设新厂、铺新摊子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方式；(4) 使积累和消费保持适度的比例关系，在安排人民生活基础上安排生产和建设，改变过去那种用抑制人民消费的办法来不适当地扩大积累；(5) 在对外关系上，要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国外的经济交流，改变过去关闭或半关闭的对外关系；(6) 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改变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改变过去那种脱离生产力的现实状况，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追求所有制升级，追求“纯而又纯”的错误的“左”的做法。

总之，这 10 条经济建设方针，比较全面，既强调加快农业，又要求安排好消费品生产和重工业协调的发展，同时要解决能源、交通、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等问题，还要对企业进行整顿并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效利用资金，并安排好生产和人民生活。10 条方针的中心是要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方面的经济效益，彻底改变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但是低效益的错误方针，开辟一条稳定、协调发展的高效益的经济发展道路。

1982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个总任务的战略目标是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1 年的 7100 亿元（1981 年实际完成 7580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2800 亿元左右。实现这个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可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在今后 20 年内，经济发展要以农业、能源、交通以及科学教育为战略重点，具体的战略步骤分两步走：从 1981 年—1990 年，前 10 年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1991 年—2000 年后 10 年，争取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前 10 年的主要经济工作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整经济结构，集中资金，加强农业、能源、交通建设，推动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以及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

在理论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我国的国民经济就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沿着新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具体实践，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成为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各项工作（包括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 1981 年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又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对确定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二阶段，但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阶段并未作过设想。早在 1952 年—1953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曾设想大约需要经过 15 年左右的过渡时间。但是，1956 年就宣布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而自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只过了两年，在 1958 年，又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并发出这样的号召。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还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到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这种"左"的不顾客观条件只凭主观愿望的理论指导下，掀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有制变革、大刮共产风等运动，其结果只能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和国民经济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中"左"的路线继续贯彻，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这些历史教训，深刻地批判了"左"的错误，重新确定了一条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在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又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彻底摆脱了"左"的思想的羁绊，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1) 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2)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尚处于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处理问题和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说明我们今后的发展，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尚处于初级阶段这告诉我们，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否则就会脱离我国的最基本的国情。"左"的和右的错误的认识根源，主要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即一方面，如果不承认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不承认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

会主义道路，就会犯右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直接建立起成熟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犯“左”的错误。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和指导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以下经济特征：

（一）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主导、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主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还不够高，而且全民所有制本身还要实行所有权和经营使用权的适当分离。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因此必然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和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这些经济形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的、不平衡的和水平较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多方面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实行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主导、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经济体制，从而也就否定了过去所谓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因而要搞“穷过渡”，急于搞“所有制变革”的“左”的指导思想。

（二）在分配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既然存在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因而按劳分配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除此之外，也还存在着非劳动的收入。非按劳分配的收入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个体劳动收入。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是依靠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和经营所得，是劳动收入。

2. 资金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投资于股票和债券取得的收益，如股息、红利和利息，以及银行存款所获得的利息。

3. 资本分配收入和劳动力价值收入。私营业主投资开办企业及“三资”企业中外商投资所得利润，是资本分配收入。私营企业中职工收入，是出卖劳动力所得，是私营企业主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

4. 风险收入和机会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经营得好，收入多，其中包括风险收入。如能捕捉住有利的机会从而获得较多收入，其中就包含着机会收入。

从按劳分配本身看，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的实现也是不完全的和不充分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者联合劳动和生产经营成果，还受资源条件、使用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产品价格合理与否以及地理位置等各种非劳动因素所制约。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会引起不同企业职工收入的差别。至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由于受各种

客观条件的影响，不同集体企业之间，劳动者分配收入，会有较大差别。

（三）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又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首先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商品经济不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很难发展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同时并存，因此既要大力发展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又要允许和鼓励发展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或不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如个体性质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等，从而形成了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时并存、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格局。

（四）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租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同时又要提倡先富帮后富，鼓励和带动更多的人和地区走共同富裕道路。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决定的。但是共同富裕并不是说要所有社会成员和所有地区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富裕起来，这样会产生平均主义。应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样会鼓舞和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走向共同富裕。另外，我们要提倡先富帮后富；同时，我们保护合法收入，对过高的收入要通过税收等形式加以调节。对违法经营牟取暴利的行为，要依法坚决取缔。

（五）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商品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需要贯彻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为重要。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人们必须学会有效地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形式和手段，而且还须将两者结合起来，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特别是在计划调节过程中，必然要充分利用各种与商品经济相关的价值形式和市场机制。

此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制还要不断地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它使人们对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同时它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三、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首先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的。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的国情认识不清，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方针，使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符合实际。我国的国情是，我国尚处于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仍然十分低下，而且人口众多。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85年只有310美元，而同年美国为16690美元，加拿大13680美元，日本11300美元，前联邦德国10940美元，波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分别达到2050美元、2070美元和1950美元。

在人口方面，1984年我国已有超过10亿多的人口（103475万人）。我国不但人口数众多，而且增长很快。其增长的绝对数量大。如1985年底全国人口比1949年就增长了5亿多人，而且自然增长率比较高，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这20多年里，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74%，1962年—1970年为27.06%，1970年以后才逐渐下降。

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国现有人口和社会拥有的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不相适应。1984年我国有4.7亿社会劳动者，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劳动力数量的总和。但是和生产资料的拥有量却不成比例。以工业来说，按90年代中期我国劳动力的平均装备水平，装备一个工人大约要1万元的固定资金和生产技术资金，而从1952年—1976年，平均每年所增加的固定资金只有200亿元，这些资金即使全部用来装备新吸收的工人，也只能吸收200万人（占应吸收人数的10%）。

在农业方面。农业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我国土地面积约144亿亩，但耕地面积却很少，只有15亿亩左右。按10亿人口计算，人均耕地只有1.5亩，如按劳动力计算，1984年农业劳动者32538万人，则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面积只有5亩左右。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区还要少，有的只有0.5亩左右。而世界人均土地面积约为50亩，人均耕地面积约为5亩左右。我国无论人均土地面积或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劳动力多而耕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从自然资源看。我国虽然国土面积辽阔，自然资源总量比较丰饶，但人均占有资源并不多，和世界相比，我国对一些主要自然资源拥有状况如下：国土，世界拥有量为2205亿亩，世界人均拥有量为49亩，我国拥有量为144亿亩，人均拥有量只14.4亩；林地，世界拥有量697.5亿亩，人均15.5亩，我国183亿亩，人均1.8亩；草原，世界513亿亩，均11.4亩，我国43亿亩，人均4.3亩；淡水，世界486000亿立方米，人均10800立方米，我国25630亿立方米，人均2563立方米；煤（地质储量），世界141570亿吨，人均3146吨，我国14650亿吨，人均1465吨；石油（地质储量）世界4230亿吨，人均94吨，我国300亿吨~600亿吨，人均30吨~60吨；水能（总储量），世界49.5亿千瓦，人均1.1千瓦，我国6.76亿千瓦，人均0.676千瓦；铁矿（探明储量），世界3915亿吨，人均87吨，我国468亿吨，人均46.8吨。

而且许多资源因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与物质生产水平落后，尚未进行勘探或者勘探出来还未加以利用。这些资源大部又蕴藏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开发利用困难颇多。如我国南方7亿亩农区草山、草坡，只利用了1/3，内地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大部分没有开发。据估计，我国铁矿的最终开采利用率只有16.5%~22%，石油的最高采取率只30%，煤矿平均日采率是40%，小煤窑为20%，有色金属、矿山采矿损失率占40%。

我国自然资源人均占有少，开发利用不够，但因技术落后，生产消耗却比较大。如能源是我国严重短缺的资源，但我国对能源的利用率却很低。据统计，1980年我国每亿元国民收入的能耗高达16.34万吨（标准煤），而同年美国为9.8万吨，日本为3.74万吨，我国分别比美国、日本高0.67倍和3.5倍。

在人力资源方面。虽然我国人口数量多，劳动力资源充足，但总的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比较差，同时由于人口过多，给衣、食、住、行、就业、教育等各方面造成很大压力，限制了国力的提高。

国家物质技术基础、科技和管理水平方面。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我国的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10亿人口，8亿在农村，农业人口比重高，人均耕地面积少，农业机械化水平比较低；工业部门积累能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却比较低，人均国民收入有限，每年新增国民收入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不多，在一些贫困地区，还要解决温饱问题。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的工业和手工业同时并存，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的比重。

我国的科技状况发展也很不平衡。我国已有少数项目具有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但普遍的却是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在一些主要科学技术领域大约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年左右，现有人才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也比较落后。在管理方面，水平也比较低，我国的管理体制和经营制度还很不完善等。

以上是我国在经济方面的基本国情。根据这样一种基本国情，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应该具有以下主要内容：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过，不应该只是一种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与一定数量的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包括中外合资、合营经济），还有一些外资私人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在经济体制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如价格、税收、利润信贷、工资等）。

（二）经营方式和分配制度。总的方面是统一经营和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具体是：在经营形式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实行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结合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与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使劳动组织更符合我国农业生产力状况和农业生产特点，也使按劳分配能得到更好的贯彻。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企业内部，使责、权、利结合起来，在明确企业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的前提下，主要采取承包的办法，即把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层层分解，承包到车间、班组和职工个人，

企业按反映承包数量、质量、效果等综合性的指标进行严格考核，从而比较准确地计量和反映各车间、班组和职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际付出的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大小，使按劳分配有比较准确的依据。

（三）对外关系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并不排斥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积极学习和吸取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因此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并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具体国策给予高度的重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要在自力更生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兴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并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内地城市，发展对外经贸事业，逐步将我国的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

（四）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进行经济建设要兼顾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两个方面，改变过去长时期片面强调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倾向。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时，首先要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但同时又要使经济得到发展，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在总结历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将引导我国的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二节　“六五”计划的完成

从1976年—1980年是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我国正进行拨乱反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等工作，因此，经济发展不快。1981年—1985年是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六五”计划完成较好，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六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

编制“六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首先要求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率和人民生活提高很慢的状况，贯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10条方针，贯彻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20年内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要求5年内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以及要求在普遍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文化建设费用逐步增加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所以，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

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

“六五”计划中还规定5年内要完成的各项指标。这些指标表明，它是一个经济效益要求高、建设重点突出的计划，同时留有余地，比较稳妥。因此，“六五”计划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的五年计划。

“六五”计划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982年12月10日）通过，批准执行。

二、“六五”计划完成情况

“六五”期间，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因而全面地、胜利地完成了“六五”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社会总产值1985年达16309亿元，比“六五”计划规定数字超过6009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91%（1980年为8531亿元）。5年平均每年增长11%（计划规定4%，“四五”期间为7.3%，“五五”期间为8.3%）。其中工农业总产值，1985年达13336亿元，比1980年增长88%（1980年为7077亿元），5年内平均每年增长11%（“四五”期间为7.3%，“五五”期间8.3%）。国民收入，1985年6822亿元，比“六五”计划规定数字，超过2372亿元，比1980年增长8.5%（1980年为3685亿元），5年内平均每年增长9.7%（计划规定是4%，“四五”期间为5.5%，“五五”期间6%）。计划规定这几项指标，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都已超过。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提前1年～2年实现“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指标。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繁荣，对外经济活跃，财政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科教文化卫生事业也有新的发展，实现了计划要求。

（一）工业生产方面。工业生产在调整、改革中前进。轻重工业比例趋向协调，生产速度逐年加快。198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829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超过“六五”计划规定1985年应完成指标（6050亿元）的37%，比1980年增长66%。5年内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8%（计划规定4%，“四五”期间为9.1%，“五五”期间为9.2%）。

“六五”期间，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比较协调。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快于同一时期重工业增长9.6%的速度。产品结构也得到初步调整，轻纺产品花色品种显著增加，市场畅销的日用消费品成倍增长。重工业扩大服务范围，如农业、轻工业和出口提供的产品有较大增加。能源生产也由5年前的停滞状态转为持续稳定的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六五”期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多数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规定的指标。如：钢产量，1985年4679万吨（比计划规定3900万吨多779万吨），比1980年增长26%（1980年为3712万吨）；原煤产量，1985年8.72亿吨（比计划规定7亿吨多1.72亿吨），比1980年的6.20亿吨，增长41%；原油产量，1985年12490万吨（比计划规定年产1亿吨多2490万吨），比1980年的10595万吨，增长19%；发电量1985年4107亿度，比

计划规定3620亿度多487亿度，比1980年的3006亿度增长37%。轻工业中耐用消费品增长较快，如电视机1985年达1667.66万部，计划规定700万部（1980年才249.20万部）；录音机1985年1393.1万台，计划规定450万台（1980年只74.3万台）；电风扇1985年3174.6万台（1980年723.7万台）；家用电冰箱1985年为144.81万台（1980年只4.9万台）；家用洗衣机1985年887.2万台，计划规定350万台（1980年只24.5万台）。不过也有一些产品未完成计划，如缝纫机、自行车、布、纱、原盐等。这是因为这些产品供过于求，在年度计划中作了削减。

（二）农业生产。"六五"期间，国家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从多方面扶植农业生产，加上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总产值1985年为3873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计划规定农业总产值2660亿元，增加1213亿元，增加了46%，比1980年增长74%。5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7%（含村办工业），大大超过"五五"期间增长5.1%和"四五"期间增长4%的增长速度。主要农产量，粮食1985年达37911万吨，比计划规定1985年36000万吨增加1911万吨，增加5.3%，比1980年增长18.3%（计划规定增长12.3%）。棉花1985年414.7万吨，比计划规定1985年360万吨，增加54.7万吨，增加15.2%，比1980年增长144万吨，增长53.2%（计划规定增长33%）。油料1985年1578.4万吨，比计划规定增加528.4万吨，比1980年增加了53.2%。粮食"六五"期间平均年产量为37064万吨，比"五五"期间平均年产量30529万吨，增长21，4%；棉花"六五"期间平均年产量为432.16万吨，比"五五"期间平均年产量223.68万吨，增长93.2%；油料"六五"期间平均年产量1205.32万吨，比"五五"期间平均年产量547.38万吨，增长120%。此外，糖料、烤烟、黄红麻等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大幅度增加，林业、渔业、牧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1985年计划规定猪、牛、羊肉产量为1460万吨，实际完成1760万吨，比计划增加300万吨。水产品产量，1985年计划规定为510万吨，实际完成705万吨。

（三）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运输邮电部门改革管理体制，初步打破国营"独家经营"的局面。同时，国家增加对运输邮电事业的投资，加强技术改造，并针对铁路运输负担过重，公路、内河航运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的情况，逐步调整运输结构，提高了运输能力。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运输、沿海港口吞吐量以及邮电业务总量，都提前1年~2年达到"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指标。1985年货运量总计为270570万吨，比1980年增长12.5%其中铁路货运量130708万吨，比计划规定12亿吨增加10708万吨，超计划增加8.9%，比1980年增长17.5%（计划规定10.5%）；货物周转量，8126亿吨公里，超过计划规定1526亿吨公里，超计划增加23%。水运货运量，1985年49965万吨，比1980年增长17%，水运货物周转量，1985年7584亿吨公里，比1980年增长50%。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1985年为31154万吨，比计划指标26000万吨增长19.8%，比1980年增长43%。"六五"期间民用航空运输总周转量为13.3亿吨公里，比计划指标8亿吨公里，增长66%，比"五五"期间总周转量5.1亿吨公里，增长161%。1985年邮电业务总量29.60亿元，比计划指标23.7亿元增长25%，比1980年增

长22%。

（四）基本建设方面。“六五”期间，共完成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10.09亿元超过“六五”计划规定投资总和2300亿元的48.3%，更新改造投资合计1495.22亿元，也超过“六五”计划规定的投资总和1300亿元的15%。“六五”期间基本建设新建项目投资额共1591.87亿元，比“五五”期间多300.86亿元，改建扩建投资总额1622.96亿元，比“五五”期间增加712.17亿元。“六五”期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520个，比计划规定400个多120个，“六五”期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为12.5%，“五五”期间为7.4%。但属于“六五”计划内的项目只有236个。列人计划的21种新增生产能力，有发电装机容量、煤炭开采、原油开采、水泥、机制糖、棉纺锭、原盐、合成氨、磷肥、乙烯和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等12种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六五”计划，其余9种未完成。

“六五”建成投产的项目和单项工程中，属于能源、交通的约占1/3。包括一批重点煤矿、洗煤厂、电站、油井和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等交通设施。我国第一座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第一期工程，经过7年建设，已投人生产。

企业更新改造步伐加快。5年内完成更新改造项目20多万个。冶金、机械、电子、轻工、纺织等行业已由过去搞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到以搞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

（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六五”期间，由于农业、轻工业连年增产，商品货源充足，加上集体、个体商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初步形成多种经济形式的多渠道商业网络，商品供应量逐年增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980年的2140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4305亿元，比计划指标2900亿元增长48%（如扣除这5年物价上涨因素，则增长26.8%），比1980年增长101%。“六五”期间社会商品零售额平均每年增长15.22%（计划规定7%），其中，农村商品零售额平均每年增长16.3%（计划指标7.5%），城镇商品零售额平均每年增长13.8%（计划指标为6.3%）。

“六五”期间，城乡集市贸易获得突出发展。1985年全国城乡集市有61337个，比1980年的40809个增长50%；1985年集市贸易成交额705亿元比1980年的235亿元增长了3倍。1985年全国城乡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达1145.5万个，比计划指标440万个增长160%，比1980年增3.7倍（计划指标增长1.2倍，从业人员1985年3138.2万人，比计划指标1600万人增加1538.2万人，比1980年1395.9万人增长125%）。

在对外贸易方面，在“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六五”期间全国进出口总额为2524.3亿美元，比“五五”期间进出口总额1260.3亿美元增加1264亿美元。1985年全国进出口总额为696.1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了84%。“六五”期间出口总额，共1200.9亿美元，比“五五”期间出口总额561.3亿美元，增加639.6亿美元；进口总额1323.4亿美元，比“五五”期间进口总额599亿美元，多466.4亿美元。

“六五”期间，前4年的进出口总额共1828.2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927.3亿美元，出口总额900.9亿美元，出超26.4亿美元。1985年由于部分出口国际价格下跌，

以及国内需求增加，影响出口货源，进口额为273.6亿美元，出口额为422.5亿美元，人超额达148.9亿美元，没有完成计划指标。

“六五”期间，吸收国外投资工作日益广泛展开。到1985年底，已建立一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批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项目35个。我国新兴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出口，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业务不断扩大。已初步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六) 财政收支方面。“六五”期间国家财政总收入共6830.8亿元，比“五五”期间总收入4960.7亿元，增加37.7%。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1982年，我国扭转了财政收入连续3年下降的趋势而开始回升。1984年财政收入达到1502亿元，提前实现“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指标。但由于同期财政支出过大，特别是基本建设拨款，行政管理费等支出剧增，国家财政仍然入不敷出。因此“六五”期间前4年，总收入为4964.4亿元，总支出为5107.2亿元，4年累计财政赤字为142.8亿元。“六五”前4年由于入不敷出，只好向银行透支和借款，银行存贷差额达203亿元，靠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1984年末，全国货币流通量比1980年末增加1.3倍。1985年财政收入增加为1866.4亿元，比上年增长24.2%，财政支出1844.8亿元，收入相抵，尚余21.6亿元。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有余。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预算外资金也大幅度增加，1985年达到1430亿元，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项资金合计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

(七) 人民生活方面。经济调整初期，一方面生产发展速度放慢；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改善长期偏低的人民生活，新增国民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增加消费。1982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有可能兼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率虽然有回升，由1981年的28.3%，回升到1985年的33.7%，但由于国民收入增长快，用于增加消费的绝对额比过去多，所以人民生活还是有不小提高。1985年全国居民每人每年消费水平为407元，比1980年的227元增长79%（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为51.5%）。“六五”期间，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8.8%（“五五”期间为4.8%），其中农民10.1%，非农业居民5.6%。

“六五”期间，城乡人民收入共同增长，农民由于生产发展和农副产品提价，收入比城市职工增长更快些。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1985年为398元，比1980年191元增长108.4%（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为89.8%）；职工收入，平均每年工资额1985年为1148元，比1980年的762元增长56.7%（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为22.9%）。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有些居民的生活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但仍有少数农户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一些低收入负担重的职工生活还有困难。

“六五”期间，城镇住宅共建成6.5亿平方米，农民住宅32亿平方米。按计划口径计算分别超过计划85.7%和28%。“六五”期间城乡居民居住面积，1985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抽样调查）为6.7平方米，比1980年的5平方米增长了34%，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1985年为14.7平方米，比1980年的9.4平方米增长了56.4%。

“六五”期间，人民生活提高还表现在储蓄的增加上。1985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余额1622.6亿元，1980年只399.5亿元。在文化方面，1985年每百人拥有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分别为6.7部、23.1部、3.5部，而1980年则只分别为0.9部、12.1部、0.5部。

（八）科学技术和文教卫生方面。"六五"期间科学技术和文化卫生教育等各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1985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316.7亿元，比1980年的156.26亿元增长1倍多，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12.9%，上升为1985年的17%。"六五"期间，有900多项科研成果的创造发明经国家批准，一批科研成果并被应用到生产中去。全国高等学校，1980年为675所，1985年增加为1016所，高等学校在校生，1980年为114.4万人，1985年增长为170.3万人。培养研究生的单位，由1980年的586个，增加到1985年的740个。全国研究生在学人数，1980年为21604人，1985年增长为87331人，增长了3倍多。中等学校在校生，普通中学在校生有所下降，由1980年的5508.1万人下降为47067人，但职业中学和农业中学的在校生大量增加，由1980年的45.4万人增加为1985年的229.5万人。这反映了随着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对技术专科的学生需要量的增加。

三、"六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

"六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六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过去比较有十个方面的重大变化。这就是：

（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六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均衡、稳定发展的新局面，改变了过去时高时低、大起大落的状况。虽然从每一年看，速度并不特别快，但主要指标的平均增长速度却比过去高。如表1所示。

表1　　"六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情况

	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	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1953年—1978年平均	7.9	8.2	6.0
"六五"期间平均	11.0	11.0	9.7
1981	4.6	4.6	4.9
1982	9.5	8.8	8.3
1983	10.3	10.2	9.8
1984	14.7	15.2	13.5
1985	16.5	16.8	12.3

资料来源：《"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7页。

（二）主要比例关系基本协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到1982年，工业和农业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以及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等

有了明显的改善，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状况。1983年—1985年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各项主要比例关系仍然保持基本平衡。如表2所示。

表2　　1978年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情况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		在工业总产值中		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	
	农业（%）	工业（%）	轻工业（%）	重工业（%）	消费率（%）	积累率（%）
1978	27.8	72.2	43.1	56.9	63.5	36.5
1982	33.6	66.4	50.2	49.8	71.2	28.8
1983	33.9	66.1	48.5	51.5	70.3	29.7
1984	35.0	65.0	47.4	52，6	68.8	31.2
1985	34.3	65.7	46.7	53.3	66.3	33.7

资料来源：同表63—1。

1984年、1985年轻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受重工业产品调价幅度大于轻工业的影响，如按可比价格计算，轻重工业的比例仍基本上各占一半。不过这两年积累率偏高，对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是不利的。

（三）经济效益有较大提高。“六五”期间，经济工作从过去单纯追求速度开始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宏观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1980年前28年平均为3.5%，“六五”期间提高到平均6.1%；每百元积累新增加的国民收入由过去28年平均的21.8元，提高到“六五”期间平均的39.3元；每万元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消耗的能源由1980年的16.2吨降低到1985年的12.9吨。国内财政收入（不包括国外借款），从1982年起，已经扭转下降停滞的趋势，比上年增长6.7%，1983年增长11.7%，1984年增长21.1%，1985年增长25.2%，都超过了同年国民收入的增长。1985年国内财政收入达1837.2亿元，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要求，改进了连续6年出现赤字的状态。

（四）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六五”期间，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鼓励和扶植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全面增长的繁荣景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比重上升。在城镇劳动者中，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由1980年的2425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3324万人，个体劳动者由81万人增加到450万人，两者所占比重由23.8%上升到29.5%。在工业总产值中，集体所有制的比重由20.7%上升到27.7%，个体工业占0.4%，其他各种经济形式（全民与集体合营、全民与私人合营、中外合营、华侨和港澳工商业者经营的工业等）占1.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比重由84%下降到58.6%，其他集体所有制比重由12.1%上升到18.9%，个体经济和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的比重由3.9%上升到22.2%，新增加的合营经济的比重为0.3%。

（五）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共完成

5330亿元，投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1) 由搞外延性扩大再生产为主开始转向内涵性的扩大再生产。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及其他投资的比重上升，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下降，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改建、扩建项目投资比重上升，新建项目投资比重下降。如表3所示。

表3　　“六五”期间基建投资项目由过去的外延性转为内涵性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		在基本建设投资中		
	基本建设投资比重（%）	更新改造及其他投资比重（%）	新建项目投资比重（%）	扩建改建项目投资比重（%）	其他投资比重（%）
1953年—1980年平均	80.3	19.7	55.0	39.6	5.4
“六五”期间平均	64.0	36.0	46.0	47.0	5.7

资料来源：《“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9页。

(2) 从片面强调生产性建设转为兼顾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多年来欠账的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和住宅建设得到了加强。又从这五年看，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达到42.6%，似乎过高了一些，但这带有补“欠账”的性质。如从1953年以来的33年总体来看，经过“六五”期间的调整后，生产性投资的比重由前28年的79%下降到72.1%，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由21%调整到27.9%。如表4所示。

(3)“六五”期间后两年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能源、交通邮电、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比重偏低情况，更新改造投资仍嫌不足。

表4　　“六五”期间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调整情况

	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	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	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的比重（%）	住宅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1953年—1980年每年平均	79.0	21.0	2.7	2364
“六五”期间每年平均	57.4	42.6	7.7	8463

资料来源：《“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10页。

（六）对外经济交流迅速开展。“六五”期间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由封闭型经济开始转向开放型经济，在对外贸易和技术经济交流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381.4亿美元发展到1985年的696亿美元；我国出口额在世界中的位次由第28位上升到第16位。从1979年—1985年通过各种形式实际使用外资217.9亿美元，建立中外合资企业2343个，中外合作经营企业3822个，外商独资经营企业121个，引进国外技术1万多项。此外，“六五”期间还在8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建设各类工程项目的合同2681项，成交额48.8亿美元。

（七）横向经济联系加强。“六五”期间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协作

与支援，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1981年—1985年全国各地区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达成经济技术协作项目七万多项，其中，1985年达成协作项目4万多项，超过前4年协作项目的总和。协作的内容，逐渐由以物资协作为主，转向技术协作、经济联合和技术、资金、人才、物资四位一体的协作。在全协作项目中，属于技术协作的项目占一半以上，经济联合项目约占1/10，部分省、区、市还进行了人才交流的协作，加速智力开发。协作的形式也由一次性、临时性的协作，逐步转变为长期、稳定的协作，出现了城市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体、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联合体、技术市场和咨询服务网络等新形式。这对搞活经济，促进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都有积极作用。

（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差别缩小。“六五”期间，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改变了过去多年停滞的状态。特别是农民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更快。5年来，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年递增率为15.8%，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年递增率为11.4%。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3.7%，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每年平均增长6.9%。农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由1978年前26年的1.8%提高到“六五”期间的10.1%；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由3%提高到5.6%。前者快于后者，差距缩小。

（九）重视了智力开发。“六五”期间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科学文教事业和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增长，在财政支出和基建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如表5所示。

表5　　“六五”期间科研文教投资比往年增长情况

	科研文教事业费		科研文教投资	
	总额（亿元）	占财政支出%	总额（亿元）	占基建投资总额%
1953—年1980年每年平均	56.3	9.5	9.4	3.6
“六五”期间每年平均	23．4	16．9	59．2	6．7

资料来源：《“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11页。

1985年全国高等学校达1016所，比1980年增加341所；1981年到1985年共培养出高等学校毕业生153.5万人，平均每年30.7万人。1985年全民所有制自然科技人员782万人，比1980年的528万人增加254万人。5年内完成重大科研成果3.4万项，经国家批准的创造发明937项，都比过去有显著发展。

（十）人民体质增强，体育运动成绩优异。

以上是“六五”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通过这些变化，可以明显看到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而这一切都反映了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四、“六五”计划胜利完成的原因

“六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10个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和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4条。

（一）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六五”期间开始扭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注意了各项重要比例关系的协调发展，注意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狠抓了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扭亏增盈，降低消耗，注意质量和品种，提高了经济效益。经验证明，片面强调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往往造成极大的浪费。只有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经济发展才有更坚实的基础，国家和人民也才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二）农村改革的成功，农村经济的繁荣。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农村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六五”期间，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和一系列新政策的实施，在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了专业户和各种经济联合体，改变了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并开始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使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5年来农业持续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市场、资金和劳动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都活了。经验证明，加快农业的发展是保障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实行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正确方针。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活力的新体制。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式市场逐步形成，国营企业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在企业内部开始建立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开始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港口城市和地区，扩展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的活跃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共同发展。经验证明，封闭的、僵化的经济模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只有改革和开放，才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四）正确处理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近几年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原则，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到一定的地位，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积累的做法。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成为生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生产的发展又为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条件。经验证明，片面强调生产建设，忽视人民生活，主观上想快一些，结果是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实际上反而慢了。因此，只有兼顾生活和生产、消费和积累，经济才能有持续、协调发展的保证。

总之，“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计划的绝大多数指标都

是提前完成的。不过，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发展相对慢了一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六五”期间，我国虽然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但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还注意不够；在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对提高经济效益方面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然存在，在着重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方面注意不够。特别是“六五”后期，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社会总需求急剧膨胀，刺激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加剧了能源、交通的供需矛盾，原材料供应也由缓和趋向紧张。同时，有些企业片面追求产值、利润的思想有所抬头，有些产品质量下降。这种状况不利于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进步。

第六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发展与对外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无论在农村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经济空前高涨，正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城市围绕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了广泛的试验和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由于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已趋于合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年好转，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事业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全面展开的新阶段。《决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方向、性质、目的、任务以及全面推行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决定》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形式。《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统一的。

《决定》还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改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管理制度、管理方式和方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的基本任务，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对国有企业，必须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适当分开，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明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形式，发展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横向联合。在分配问题上，逐步建立起企业内部、企业与部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建立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制度、劳动制度、干部管理制度，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经济技术交流等。此外，对计划管理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旅游体制、科技体制等方面都要进行改革。

在《决定》的指导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了。

二、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就。

几年来，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进行了改革，即遵循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使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所谓所有权同经营权的分离，就是指在保持国家对全民企业财产所有权的前提下，赋予企业以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使企业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从而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改善，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是改革的方向，但分离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还要依据企业的产业性质、企业规模和技术特点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小型国营企业可以采用租赁经营方式，大中型国营企业则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同时也可试行股份制。

（一）租赁经营制。是在评定企业实际资产的基础上，承租人与国家（主管部门）签订租赁合同，成为国家资产的经营责任者。在租赁期内，企业承租人根据合同规定，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经营，不受原行政隶属关系的制约。当然企业也必须根据合同规定完成向国家缴纳承租租金和利润指标的义务。租赁经营中，企业不但要负盈，而且要负亏，要承担经营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承租者，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为了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必定会积极进行经营，成为市场的有力竞争者，从而获得更多收益。承租人签订合同后，就要对企业财产负责，同时要承担风险，企业的经营成败与承租人和职工的个人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实行租赁经营，有利于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挖掘企业潜力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由于目前

我国个人财产数量有限，承担风险的能力也有限，因此，这种形式一般适用于小型国营企业。

（二）承包经营责任制。一般适用于大中型国营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一般是，(1) 用招标、招聘等竞争性的方式，产生企业经营者和承包指标，并用合同和公证等法律形式，确定国家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确定经营者的责、权、利。(2) 在企业内部实行全面的聘任制或岗位合同制，并据此重建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3) 这种责任制还把对经营者的奖罚与企业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避免掠夺性经营、短期化行为等倾向。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特点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这种经营责任制体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联系又可适当分开的原则，用合同形式明确规定企业主管部门与企业承包经营者和职工集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它有利于把企业的经营成果与职工的个人收益直接挂钩，坚持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更好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把巩固和完善全民所有制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结合起来；通过招标投标、招聘选举等多种办法产生承包人，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经营，从而有利于确立承包经营者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减少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有利于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推动技术进步，调整产品结构，增产增收，精打细算，提高经济效益。

承包经营责任制有 5 种主要形式：(1) 两保一挂。即保上缴国家税利，完不成包干指标，要用企业自有资金补足；保技术改造项目的完成；工资总额与现实税利挂钩。(2) 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即上缴利润按一定比例逐年递增。(3) 上缴利润基数（或纳税目标）包干，超收分成。(4) 微利、亏损企业的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5) 行业投入产出包干。即把大企业与国家财政的分配关系用承包办法确定下来，促使行业多收多得，用于行业发展，国家不再投资。

租赁经营和承包经营，是探索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的形式。试行的结果效果很好。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的租赁经营，是 1984 年下半年开始的。据沈阳、武汉等 6 城市 1986 年末初步统计，小型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有 5735 家，占 6 城市国营企业总数的 6.5%。实行租赁经营的企业，过去一般都属于亏损企业或微利企业。试行结果表明，这种方式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生产发展速度加快，经济效益也显著提高，国家税利收入大幅度上升，职工收入也明显提高。

承包经营，据 1987 年 6 月统计，全国实行承包经营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有 4046 家，占全国大中型企业总数（7814 家）的 51.8%。实行这种经营制度的大中型企业中，1 年承包期的有 1783 家，占承包企业总数的 44.1%；实行 2 年～4 年承包期的有 2263 家，占承包经营企业总数的 55.9%。这种承包制，经营者与职工的责、权、利明确，企业承担风险（歉收自补）；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或减亏包干，都能有效地保证国家财政增收。有的把固定资产增值和技术改造任务也列入承包项目中，初步克服了企业的短期化行为。通过试行，承包的形式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盈利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超额分成；一类是亏损企业，实行亏损包干或减亏分成。

承包经营制的实行取得很好的效果。如吉林省承包经营实行较早，1987 年上半年

全省财政收入在连续4年递增19%的基础上，又增长15.8%。北京市1987年上半年实行“两保一挂”（即保上交税利，保技术改造任务，工资同经济效益挂钩）的企业，实现利税比面上企业增长8%，上交利税增长27.7%。广东、黑龙江、山西等省实行承包后，1987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20%左右，大大高于全国各地增长6.8%的水平。

（三）试行股份制。在实行两权分离、搞活企业、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问题上，对国营企业除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外，还试行了股份制。1985年第4季度，首先在广州市3家大中小型工业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沈阳市是先从集体所有制开始试点，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再在小型国营企业中试点。其他一些地方，还试行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联合投资形式的股份制，吸收企业内部职工或向社会招股形式的股份制等。全国试行股份制企业的数量，广州试行股份制的全民工业企业有12家（全民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0.29%，占全民所有制企业总数的1%；沈阳试行股份制的工业企业70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1.36%，其中全民企业4家，占全民企业总数的0.57%，集体所有制企业66家，占集体所有制企业数的1.51%。北京、上海试行股份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分别占全民企业总数的0.062%和0.023%。

试点企业情况说明，股份制是一种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开的形式。

1. 股份制企业性质仍是公有制企业。因为股份制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企业、个人等不同利益集团，而个人参股的情形在我国只占很小比重。另外，股份制企业一般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这种领导体制下，企业有权独自决策，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国家只能通过自己的股东代表，在董事会内以平等地位同集体、个人的股东代表和企业职工代表商讨问题，企业除按法律向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外，不再接受法律以外的任何干预。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排除了政府部门和行政性公司的干扰，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2. 由于股份制企业内部存在着不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对企业行为有一定约束力。经营者会对企业资金的使用、生产的经营和管理，采取审慎态度，同时利益分配时，也会考虑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和处理好短期、长远的利益关系。因而股份制企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当时，理论界对股份制的认识还不一致，对股份制的具体做法也还缺乏经验，试行股份制的一些客观条件，如价格、计划、财税、金融、人才、立法等方面，也还不具备。所以对股份制仍然处于试验和探索的阶段。

三、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服务业，适当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只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还不能完全适应城乡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因此，必须在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个体服务业和适当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经济体

制改革深入地发展，促进了集体和个体服务业的发展。到1986年末，全国服务业网点已有160.9万个，从业人员369.9万人。其中，除供销社外的集体所有制网点13.8万个，从业人员107.6万人（其中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网点8612个，从业人员14.9万人；国营转集体所有制的网点1386个）；个体网点141.1万个，从业人员189万人。城镇居民住宿难、理发难、在外吃饭难、洗衣难、修理难等问题，已有所缓和。

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也得到发展。1978年有10多万户，1986年增加为500多万户。个体工业户的生产经营，弥补了大工业企业生产的不足，协助了工业的发展。个体商户的经营，也补充了大商店经营中的一些空白，活跃了经济，丰富了市场的商品供应，方便了居民的生活。

四、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

几年来的计划体制改革，继续针对原体制过多、管得过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投入产出不挂钩等弊端，进行进一步改革。具体如下：

（一）缩小生产、流通领域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下放计划管理权。在农业方面，对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工业方面也减少指令性计划范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由1984年的120种减少到1986年的60种。流通方面，国家统配物资，由1984年规定的256种减少到26种。小商品和计划外产品都由市场调节。

有些地方还开放了钢材等专营市场，把企业自销的钢材、国家和地方投放的钢材以及各单位超储或不适用的钢材，通过有领导的市场进行交易，促进了计划外钢材的流通。对统配煤炭，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产需双方自主订货，执行统一指导限价，取消了财政补贴，初步理顺了经济关系。水泥、木材、有色金属等重要生产资料也都程度不同地开辟了多种形式的流通渠道。

（二）改革投资体制，下放了投资审批权。国家计委审批的生产性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限额，由1984年的1000万元以上，提高到30007元以上，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原则上由各省市自行审批。1985年将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拨改贷），变国家投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另外，投资方式也由国家高度集中转为社会分散。投资主体由一元化（国家）转为多元化（国家、地方、企业），增强了资金使用的效益观念。

（三）对一些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及一些企业集团实行计划单列。这些城市被赋予相当于省级的经济管理权，使这些城市和企业集团可以越过省（区）和直辖市，同国家计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直接对话，有利于它们摆脱条块束缚，增强活力，促进跨地区、跨部门和跨所有制的经济协作和联合，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政企分开，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

（四）扩大部门的投入产出包干。1981年国家对石油工业实行全行业投入产出包干，取得很好的效果。以后又先后对冶金（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石化、电力等部

门也实行了不同内容的投人产出包干责任制。1986年国务院又批准对铁道部实行投入产出、以路建路经济责任制。这种部门包干责任制对加快生产发展，提高投资效益，促进资金良性循环都收到较好的效果。由于注意部门内部挖潜改造，于是变单一生产型为生产经营型，增强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了过去向国家争投资、要项目的现象。

（五）计划管理方法的改革，支持企业、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规定在国家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内，国家、部门、地区都要预留一定额度，用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联合建设项目。联合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产品，利润和企业留成的外汇，原则上按项目投资比例分配。

五、流通体制的改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流通体制的改革也有新的进展。

（一）积极恢复和发展个体、集体商业。1980年起，恢复和发展个体和集体商业先从饮食服务业取得成效后，逐步扩展到各个行业和小商品批发。1983年，供销社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到198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所占比重下降为39.4%，集体所有制商业（包括供销社）占36.4%，个体占16.3%，合营占0.3%，农民对非农民居民零售占7.6%。流通领域内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1986年全国城镇集市贸易市场已有6万多个。城镇居民在集市上购买的食品支出占食品类总支出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16.8%，上升到1986年的36.4%（其中鲜菜、家禽已占到73.5%和68.8%）。

（二）扩大市场调节比重和范围，增强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目前，全国已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开放的全国性市场。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范围大大缩小，市场调节的比重与范围扩大。1979年商业部直接计划管理的商品188种，1986年减少为23种。长期以来实行的44种票证除粮油等外，基本上取消了。

商品流通环节也减少。原属商业部的一级站和省属的二级站都已下放中心城市，批发零售不再受级别的限制。工商企业之间、农商企业之间和商商企业之间的联合经营发展起来，大批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饮、服、修的网点普遍建立，流通渠道畅通，流通领域搞活。1986年，全国已有贸易中心2200多个，城乡农贸市场6万多个，社会商业网点1099万个（1978年只有125.5万个），其中个体网点908万个（1978年仅17.8万个）。

（三）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新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冲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传统观念，生产资料的市场已经出现。1986年生产资料市场的试点城市有6个，1987年发展到79个。生产资料流通体制出现新的变化，即生产资料分配体制改革。1980年国家统配、部管的物资品种达837种，其中国家统配256种，1987年分别减至581种和26种。其中重要原材料由国家统配部分所占比重减少，如钢材由74.3%降至47.1%，煤炭由57.9%降至47.2%，木材由80.9%降至27.6%，水泥由35%降至15.6%。企业产品自

销权扩大，企业间的自主购销和地区间的物资协作有了较大发展，已由单纯以物易物发展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物资协作。生产资料流通已由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发展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等多种流通方式。

生产资料的价格开始逐步放开。城市物资企业开始从分配调拨型转向经营服务型。物资交易市场和经营网点有较大发展。1987 年上半年，全国已有物资经营网点 3.2 万多个，物资贸易中心 644 个。其中经营计划外物资商品的大型物资贸易中心 386 个，1986 年销售总额达 174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65%，其中钢材销售量增长 102%，汽车增长 89%。国家投入市场的重要生产资料已占物资总量的一半以上。

(四) 放开小型商业企业改革。即根据企业不同情况，对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实行了“改、转、租、卖”。到 1986 年底，实行“改、转、租”的国营小型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企业有 5.7 万家，占国营小型商业企业的 60%，其中实行租赁经营的占 12%。目前商业企业租赁形式有：个人租赁、合伙租赁、集体租赁和企业租赁（甲企业租赁乙企业）。

大中型商业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少数地方已大面积推广。如北京市，已有 85%的大中型企业搞了承包经营。承包的形式有：“两保一挂”；基数承包（1 年或几年）；抵押承包（按承包利润或租赁费交纳一定抵押金）；资产上缴利润率承包；目标利润承包；递增包干；企业经营责任制（或资产经营责任制）；亏损承包（或减亏分成承包，限期扭亏承包）。承包制的实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北京市承包的 267 个大中型商业企业中的 50 个企业统计，1987 年 1 月—5 月完成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6.1%，实现利润增长 23.5%。

流通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市场交易兴旺。1986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4950 亿元比 1978 年的 1558.6 亿元增加 2.2 倍，平均每年递增 15.5%，比改革前 1952 年—1978 年平均年递增 6.7%，高 8.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约高 4%。

六、价格体系的改革

我国的价格体系，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如政府的补贴等）及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许多商品的价格很不合理，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如粮油的售价低于收购价格，城市公用事业收费背离价值，住房费用低于成本等等。价格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是各种不同商品的比价、差价和供求关系构成的价格网络，它影响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当然，更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价格体系的改革，党和政府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

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后，价格体系也在必改之列。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按照“调改结合”的方针进行的。就是合理调整价格，逐步放开价格。价格改革前 6 年是以调整价格为主，后来，逐步放开价格。农产品放开价格多于调整价格，工业品则调整价格多于放开价格；垄断性的商品和收费则只调不放，小宗商品和收费只放不调。具体如下：

(一) 农副产品价格改革。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决

定。为了使农民增加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一项重要措施。从1979年—1982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包括牌价、议价、加价和市价），共提高41.6%，平均每年递增9.1%，其提高幅度之大，超过建国后任何一个时期（如1950年—1978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共提高117.4%，平均每年递增2.8%）。4年间，农民共多得差价收入746亿元，每个农民平均增收92.3元。与农副产品收购提高的同时，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及部分日用工业零售价格降低，因而使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进一步缩小。1982年与1978年相比，农民出售同样数量的农副产品，可以多换回1/3以上的工业品。

1985年粮棉实行合同收购制。合同价是由原来的统购价和超购加价按一定比例加权平均计算。同年，还放开了猪肉、牛肉、羊肉、禽、蛋、鱼、蔬菜等副食品的价格。这次放开，物价上升幅度较大，国家给城镇居民以物价补贴，农民收入增加。

（二）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1979年后，生产资料中的原材料价格改革，一方面调整部分产品的价格，如原煤价格从每吨14.52元提高为32.32元，铸造生铁从每吨150元提高到285元，统配水泥由每吨40元提高到90元；另一方面，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样，就形成了“双重价格”，即价格的“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格有时会高1倍~2倍。这种“双轨制”价格在当时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作用，但也带来许多问题（如给“倒爷”带来可乘之机）。

（三）消费工业品的价格改革。对消费工业品价格改革是对一些产品提高售价，另一些则降低。如提高了棉布、铝锅、自行车等的价格，降低了化纤布、手表、收音机、电子产品及其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升降相抵，净提价5%左右。逐步放开小商品的价格。

（四）交通运价和旅游服务收费作了局部调整。铁路运价提高21.6%，200公里以内的铁路短途运价每吨货物加价4元，100公里以内的铁路客运票价提高了16%。水路运价、航空运价也作了适当调整。

综上可见，轻纺工业品价格，国家管理大部分，小部分放开；主要品种价格，仍由国家管理；部分一般品种价格放开，小商品价格则全部放开。重工业产品实行“双轨制”价格。指令性计划产品实行国家牌价，指导性计划产品必要时实行浮动价格，计划外商品实行市场价格。农产品价格是上述两种做法兼而用之。总之，通过价格改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方式，价格形式基本上已有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基本上适应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价格改革大大缩小了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市场的商品供应。

七、财政体制改革

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长期以来实行统收统支，造成政企不分、条块分割、资金使用不讲效益等弊端。具体如下：

(一) 将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由“统收统支”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这是一种“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它调动了地方增收节支理财的积极性，有利于各地根据各自财力因地制宜，统筹安排本地区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1985 年国务院又决定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按税种划分可为今后彻底的分税制积累一定的经验，保护了地方开辟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进一步增长。

(二) 建立区 (城区)、乡级财政管理体制，调动其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在充分调动基层政权生财、聚财、用财积极性的基础上，促进城区和乡村经济的发展。

(三) 开展社会集资，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开展社会集资，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是积累资金的好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统收统支逐渐改变为利润包干、利润分成和以税代利，因而归地方和企业的资金逐年增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多，城市职工工资经过几次调整，货币收入也增加 1 倍多。这样，社会上闲散的资金增加了 (据 1986 年抽样调查测算，城乡居民手中的现金有 1000 多亿元之多)，这就为社会集资提供了物质基础。从 1984 年起，我国社会集资金额每年约有几十亿至上百亿元，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缓解了资金供求的矛盾。目前，社会集资的方式有：股份集资、合伙经营、集资联营、信用借贷、以劳代资、利用商业信用等。

(四) 经过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较好地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强化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调动了各地区、部门和企业增产增收和理财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增收。

八、金融体制改革

为了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筹集融通资金、引导资金流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调节宏观经济发展方向的作用。为此，在金融体制上也进行改革。具体如下：

(一) 积极建立以中央银行体制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相配合的新的金融体系。1983 年 9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执行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这样，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又执行政府管理金融的职能。与此同时，又恢复和建立了几个大的银行，即工商银行 (主管城市业务)、农业银行 (主管农村业务)、中国银行 (主管外汇业务)、建设银行 (主管长期投资和贷款业务) 以及投资银行 (主管世界银行转贷业务)。1986 年 7 月，又成立交通银行，计划将它办成既办人民币业务，又办外汇业务的综合性、股份制银行。此外，还先后设立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各地信托投资公司和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各地也陆续建立了一批城市信用社 (为城市集体和个体经济服务)，农村信用合作社继续发展。

目前，全国除中央银行和四大专业银行外，已建立起信托、投资机构 50 多家，农

村信用社5万多个，城市信用社1000多个。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新型金融体系正在形成中。

（二）建立初级资金市场，促进横向资金融通。各城市银行系统普遍利用资金运营中的时间差、地区差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头寸余缺，开展了同业拆借活动，初步改变了资金纵向分配、条块分割的局面，开始建立起纵横交错的资金融通网络。有的地区还办起了以资金拆借、票据贴现、证券交易、外汇额度调剂为内容的多功能、跨地区、综合性的金融市场。1986年，城市间融通资金达300亿元。

（三）运用多种信用方式和信用工具，改进结算办法，加速资金周转。许多城市建立了票据交换清算中心，一些地方还试办了个体户支票、保付支票、旅行支票、活期储蓄支票、储蓄旅行支票、农副产品定额转账支票、个人信汇、直达电汇、定额汇票和抵押贷款、金融租赁、补偿贸易、委托放款、卖方信贷等新业务。加速了资金的流转，缓解了一些企业资金短缺的矛盾。

（四）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建立了经济补偿制度。

（五）对外金融往来和合作迅速发展。1980年恢复了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5年5月，我国正式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基金组织。1986年3月，我国正式成为非洲开发银行的成员。最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又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中国银行设在国外的分支机构，已由1978年的184个，增加到1985年的310个，并与世界上152个国家和地区的1235家银行建立了业务代理关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保险公司建立了再保险关系。

（六）经济建设资金由财政渠道为主，转为信用渠道为主。在每年投向生产、建设、流通的资金中，由财政渠道开支的，已由1978年的76.6%下降为1986年的31.6%，由银行渠道解决的，已由1978年的23.4%，上升为1986年的68.4%。从价值上看，从1978年的187亿元，上升为1986年的1692亿元。

另外，中央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加强了。加强了宏观控制，控制信贷规模，调整利率，抑制过旺的需要，控制货币发行，防止通货膨胀和消费基金失控。1986年，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同财政体制改革密切配合，强化了经济手段的调控作用，对扭转投资膨胀、消费膨胀和通货膨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九、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工资、奖金分配制度的改革，在1984年以前，主要是补偿性的调整工资和恢复奖励制度，扩大企业在奖金分配上的自主权。1984年以后，企业大部分实行奖金随经济效益浮动。一部分大中型国营企业试行了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挂钩浮动。具体情况：1984年，随着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税利增加的前提下，发放奖金可以不“封顶”，并采用超额累进办法征收奖金税，各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可用于发放奖金，也可用于实行浮动工资升级。

1985年，少数企业试行工资总额与上缴利润挂钩。上缴利润增长1%，工资总额可

相应增长0.3%~0.7%，要征收工资调节税。1986年，在国家规定工资总额和政策的范围内，把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奖金分配权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决定分配形式和办法，并降低奖金税率。

工资制度改革后，企业的工资总额（包括奖金）要与企业的经营效果——上缴税利挂钩。上缴税利多，可按比例多提工资和奖金。企业实行经营责任制后，生产经营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使工资、奖金的发放直接与每个职工的劳动成果相联系，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原则，改变过去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

工资改革。使职工的工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44元，1986年上升到1414元。9年中工资增加120.3%，扣除物价因素，增长53.2%，平均年递增5.5%。由于城镇就业面扩大，城市人口每人平均生活费收入已由1975年的316元，增加到1986年的828元，增加16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收入增加80.5%，平均每年递增7.1%。

劳动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制度，是"统包统配"的"铁饭碗"制度。1986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4项暂行规定：即企业新招收的工人实行合同制；企业招收工人要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对职工实行待业保险；企业可以辞退违纪职工。1986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已招收合同制职工560万人。劳动制度的改革，促进劳动者的合理流动，促进劳动力管理的社会化（如劳动力调节社会化，职业培训社会化，劳动保险社会化，职工生活服务社会化等），促进劳动关系法律化。

对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离退休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十、科技教育体制改革

1985年中央先后通过了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调整、改组科研机构，全面改革科技拨款制度，对独立科研机构，按照技术发展类型、社会公益服务类型和基础研究类型等，分别实行合同制、包干制和基金制的经费管理办法；将一批科研机构下放到企业办，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和充实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发展多型式、多层次的科研、生产联合体，逐步实现科技、生产一体化；建立科技咨询公司，提供科学决策；建立技术市场，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1986年统计，全国已有技术贸易机构5000多个，转让技术成果8.7万项，转让交易额20.6亿元，比1983年的3000万元增加了67倍多。

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调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高等学校助学金制度，实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实行教师聘任制；扩大高校管理自主权，出现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办学和投标协作形式。

改革促进了科研、教育和生产的结合。从1983年起，全国许多重点科技项目采取

联合攻关方式，科研、高等院校和工厂企业结合进行。到 1986 年，技术成果转化率已达 80%，已获得直接经济效益 127 亿元，总的投入产出比为 1：5。

第二节 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事业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对外开放事业获得了进一步开展。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具体情况如下。

一、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

（一）我国从 1980 年上半年开始接受外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贷款起，到 1986 年底，已与外国签订的官方贷款协议累计金额 289 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 207 亿美元。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修建基础设施、进口成套设备、开发资源、改善高校办学条件等。如利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的贷款，修建了秦皇岛港、石臼港和京秦、兖石铁路，增加山西、山东煤炭外运能力近 3500 万吨。这种贷款利息率低、偿还期长，对我国十分有利。

（二）建立了数目可观的外商投资企业，引进了大量外资。到 1987 年上半年，我国已批准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即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共 8516 家，合同投资额为 191 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为 74.3 亿美元。在引进外资中，我国十分注意外资流向，不断进行调整。如 1979 年—1985 年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投向工业、农牧渔业、交通、通信等行业的占 45%，1986 年上升为 76%。这种外资流向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短线生产的发展、现有企业改造以及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十分有利的。

（三）发行债券，积极在国外债券市场上筹集资金。在国外债券市场上发行债券是吸引外资的一个渠道。从 1982 年—1986 年，我国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及福建省信托投资公司等，在国外共发行了 13 批债券，筹得资金 10.3 亿美元。1987 年 10 月，我国财政部又在西欧债券市场上发行债券 10 亿马克。由国家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国债，这是头一次在国外发行的国债。所筹资金将用于重点建设项目。又我国还在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中，利用外国银行团，即外银辛迪加的贷款。

（四）合作开发，进行能源基地建设。从 1980 年开始，我国陆续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 37 个共同勘探、开发海上油气资源的协议。在不长的时间中，外商已投入 2.4 亿美元，在 42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作了勘探，发现含油构造 47 个。除交付给我方详细的勘探资料、资源评估报告外，与日本石油株式会社合作的渤海埕北油田、与法国道达尔公司合作的莺歌海北部湾油田，已投入生产。据专家估计，今后十几年中，为勘探我国海洋石油资源，尚需投资近 200 亿美元。此外，我国还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在山西安太堡

合作开发了平朔露天煤矿。

（五）引进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企业。几年来，我们不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1986年，我国引进先进技术达1.6万项，开办了7700多个中外合作、合资、独资企业。这些引进项目，如果能全部达到设计要求，可增加产值1000亿元。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使我国的部分产品质量大大提高，有的产品替代了进口产品，有的还打入了国际市场。除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外，还引进了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有的厂还聘请了外国专家帮助工作。

（六）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许多企业通过对国外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高了我国的技术水平，缩小了我国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电子产品达到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的，已由1982年的15%提高到1986年的30%以上。通过合作经营、合作生产、联合设计等多种形式，将技术引进和利用外资结合起来，使我们既引进了技术，又培养了人才，还学到了先进的管理技术。使我国的管理水平有很大提高。

二、沿海开放城市与经济特区的建设

（一）沿海开放城市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沿海地区经济向“外向型”发展。我国沿海开放城市在继续完善交通、邮电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使外商投资所需的“软环境”，也不断得到改善。上海、广州、青岛、福州、烟台等市先后成立了外商投资工作领导小组或外经工作领导小组。加强高层次的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减少外商来华投资的手续和困难。有些城市还成立了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中心和物资服务公司，为外商投资提供各种服务，受到外商欢迎。

我国先后开放的上海、天津、大连、广州等14个城市，按照“工贸”结合、“贸工农”结合的方针，发展了外向型的创汇工业和创汇农业，已取得明显效果。上海市外贸部门先后与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10多个省市的工业企业合作建立工贸联营的出口企业240多家，共提供出口货源10亿多元，创汇3亿多美元。其他一些开放城市也组建了一批工贸联营（结合）的出口企业或出口加工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在按照外向型经济要求调整工业结构的同时，也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提高了创汇农业的比重。1986年，14个开放城市交售给国家的农副产品总额达178.7亿元，比开放前的1983年，增长52.1%，其中外贸收购农产品增长66.9%。

（二）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几年来，经济特区的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

1.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撤销和压缩“中间”环节，初步改变了机构重叠、官商不分状况，扩大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如深圳蛇口工业区按照精简、高效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原则，设立工业管理委员会，不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业务经营。管委会对直属13个专业公司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定任务、定人员、定成本、定流动资金、定利润，授予人权、财权和经营管理权。对合资、独资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厂长）负责制，企业的经营方针、生产、财务、销售以及人事劳动等，都由企业董事

会全权负责，自主经营，政府只是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杠杆进行监督和调节。

2. 重视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的作用，由于特区的产品主要供给出口，与国际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而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变化直接影响特区的生产，因此，特区的经济改革十分重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改革了价格体制。目前特区内主要有三种价格形式：（1）计划价格。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品，坚持实行计划价格，由市政府统一订价。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供求情况，这类产品的范围将逐步缩小。（2）浮动价格。由市订价，但允许企业在一定幅度内浮动。（3）自由价格。根据市场供应关系随行就市。

特区还特别注意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如信贷关系。特区努力开拓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新门路，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开发性建设。如深圳市工业发展服务公司，采用"滚雪球"的办法，用1800多万元贷款建成了7500多万元的工程，并运用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在利息上运用本身资金，加速周转，加强了利息观念，改变了一方面积压资金，一方面又要付高利息到银行借钱的情况；同时，还注意提高资金回收率。蛇口工业区，除道路、公共设施外，其他生产企业的投资都开始陆续回收，回收率达22%。

3. 改革流通体制。实行工贸结合，内外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多渠道组织出口的办法，疏通流通渠道，并敞开大门，以优惠的条件吸引全国各地来特区做生意，做到货畅其流。

4. 改革工资制度。特区企业可根据自己企业的特点，自行确定工资形式，实行职务工资、浮动工资，使职工工资收入同企业的经济效益、个人贡献联系起来，激励了职工学技术、学文化、学业务的热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在干部任用上，试行"选举聘用合同制"，干部要通过推荐、组织考核、民主选举、组织聘用相结合的办法产生。专业技术干部实行公开招聘制。

经济特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有效地吸收利用了大量外资，扩大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如到1986年底，深圳特区已累计与外商签订协议3074项，协议投资总额35.8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11.9亿美元（到1989年底，深圳特区累计已同35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签订利用外资合同6922项，协议投资总额皐计54.9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27.34亿美元。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6年深圳的工业产值达35.6亿元，400多种自产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出口额达7.25亿美元（到1989年，深圳的工业产值已达116亿元，有600多种自产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出口额1989年达69.14亿美元，其中含来料加工产值10.63亿美元。外贸出口额每年平均以72.5%的速度递增。深圳在国外兴办技工贸综合经营的企业，到1989年已有70多家。它的出口创汇基础打得比较牢，后劲比较强，目前正逐步向四个方面转变：一是来料加工为主，逐步转变为自行设计、生产为主；二是从转手贸易逐步转变为"外接单、内生产"和发展"两头在外"或"三头在外"，逐步形成进料—加工—增值—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三是从主要收购内地产品出口逐步转变为自己大办实业，实行工、农、技、贸相结合，自产产品出口为主；四是从间接远洋贸易逐步转向直接远洋贸易）。

总之，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不久，已由一个落后的小镇一变而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

市了。

此外，经济特区通过深入改革，进一步了解了国际市场行情和科技信息，掌握了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探索和积累了经济体制经验从而为内地提供有益的借鉴。经济特区实行外引内联政策，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如深圳，1989 年已先后与国家 40 个部委（总公司）和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签订内联项目 6000 多项，协议投资 70 多亿元，实际投资总额 18 亿多元，采取多种形式联合兴办了 2900 多家内联企业，1989 年内联工业产值达 20.22 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发展。

三、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1984 年 9 月，国务院批转了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后，外贸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1. 下放外贸经营权，调动地方、部门特别是企业的积极性。到 1986 年，全国已有各类省级以上外贸企业 1100 多家，广东、福建有外贸企业 1200 多家；已确认出具证明允许产品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 513 家。经贸系统经营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 2/3，地方、部门和企业（包括“三资”企业）占 1/3。

2. 多种形式的工贸、技贸、贸工农和进出口结合的试点发展起来。其中有经济特区开设的外贸窗口，有生产企业组织的专业性出口联合体，有外贸专业公司同地区（部门）、企业组成的工贸、技贸、贸工农结合的出口联合体，有以引进技术带动出口的技术进出口公司，有生产企业直接出口等。这些试点中，大多数是成功的。由于产销直接见面，提高了我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3. 外贸经营方式多样化。由过去收购、统配，发展到现在的代理、收购、联营和进料加工、来料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多种形式。

4. 缩小了全国指令性出口计划，减少了总公司统一经营的商品；外贸财务实行分级管理、核定成本、独立核算，减亏分成等制度；外贸企业审批、发放进出口许可证、配额管理制度，由一级管理转为两级管理制度等。

（二）外贸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

1. 进出口额有了较大的增长。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984 年为 535.5 亿美元，1985 年为 696 亿美元，1986 年达到 738.6 亿美元，比改革前增长 2.4 倍。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从 1978 年的 0.75%，上升到 1986 年的 1.46%；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地位，也由 1978 年的第 32 位上升为 1986 年的第 15 位。在进出口总额中，出口额 1978 年为 97.5 亿美元，1980 年增至 309 亿美元，增长了 216.9%；进口额，1978 年为 108.9 亿美元，1986 年增至 429.2 亿美元，增长 294.1%。

2. 进出口贸易结构发生很大变化。1978 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 53.5%，1986 年，初级产品比重下降为占出口总额的 36.41%，而制成品出口比重大大增加。1986 年我国已能出口大型成套电站设备等技术性较高的工业制品，不过劳动密集型商

品的出口仍占相当的比重，这有待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才能改变。

3. 与我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增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60年代后，我国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关系有所发展。1972年中美建交后，两国贸易来往增多，但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贸易关系却大大低落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国实行了开放政策，与我国建立贸易的国家也大量增加。目前与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与地区已有170多个。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恢复和发展起来。目前和我国贸易关系比较紧密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港澳、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此外，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北欧的一些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往来。

4. 积极向海外发展。我国在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同时，还积极向海外发展。到1986年末，我国在海外已开办合营、独营企业261个，分布在5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合营企业总投资额77亿美元。我国还有50多家公司经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已同10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近4000项承包工程和劳务项目合同，合同总额达65亿美元。每月平均有5万人次在国外执行劳务合同。

发展对外贸易关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我国产品出口的增多，可以换回大量外汇，并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进口我国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重要的物资，更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接受海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出口，既获得了大量外汇资金，同时又把我国的建筑工程队伍、项目管理人员推向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培养、锻炼了人才。

第三节　全面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1984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总的看来，可以说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具体有：

一、促进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农、轻、重的协调发展

在一、二、三产业中，第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增长。1980年一、二、三产业的比重是：30.8：48.2：21，1985年改变为：29.8：44.5：25.7。农、轻、重的关系，1978年为27.8：31.1：41.1，1986年改变为：34.1∶31.5∶34.4。轻工业增长较快，9年来平均年增10%以上，消费品成倍增长，品种也大大增多。重工业降低了以能源为主的物资消耗。能源、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现象开始缓解（电力除外）。不过，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能源、原材料工业发展仍赶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机械、电子工业不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以及消费品的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仍有不协调之处等。

二、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1952年—1978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7.9%，其中最高年增长32.7%，最低年下降33.5%，分别偏离平均速度+24.8和—41.4个百分点；1979年—1986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10.1%，其中最高年增长16.5%，最低年增长4.6%，分别偏离平均速度+6.4和—5.5个百分点。说明改革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大大提高。

三、促进了宏观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按照社会总产出（国民收入）占社会总投入（社会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劳动者报酬）的比重计算，1978年为34.4%，1986年为36.5%，提高了2%。具体地说，从“一五”开始的1953年—1978年的26年中，国家用于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邮电运输业、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的总投入（即固定资产原值）每增加1倍，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国民收入只增加0.2倍；而改革后的8年，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0.96倍，国民收入却增加了0.9倍，即每增加1倍的投入，产出的国民收入增加0.94倍。

与此同时，每增加1倍的收入在其他方面产生的效果，前26年与改革以来的8年差别也很大。社会总产值从增加0.36倍增加到1.25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从提高0.05倍提高到0.94倍。

很明显，我国前26年投入多，产出少，人民生活改变慢；最近8年投入少，而产出多，人民生活改善快。

四、促进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1986年比1978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长了95%，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8%，部门、地方、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增长了3.8倍。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只1121亿元，1986年增加到2220亿元，加上各部门、各地区和国营企业拥有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的1670亿元财力，1986年我国总财力为3890亿元。也就是说，改革8年来，我国国家财力增加了一倍半。此外，我国的电力、钢、煤炭、石油的产量，分别从占世界的第7，5，3，8位，上升到第5，4，2，5位。

五、促进了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

1986年与1978年相比，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24元，8年共增加了290元，比1949年—1978年29年的增加额还多出200元。8年来，农村贫困户减少，温饱、宽裕和小康户增加。商品性消费增加，食品消费占生活消费的比重下降，农民居住

条件也有明显改善。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从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86年的828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160%（农村人）和80%（城市人）以上。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提高到2300亿元。8年共安排城镇人口就业约6000万，待业约从5.3%下降到2%。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缩小，由1978年的1：2.9下降为1：2.3。消费质量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耐用消费品的家庭拥有量，据抽样调查，1986年每百户城市居民拥有洗衣机60台、录音机52台、照相机12架、冰箱13台、彩电27台。总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第七章　治理整顿方针的推行与“七五”计划的完成

自从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但是自从1986年以后，特别是1987年和1988年两年，社会经济中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党和政府及时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方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展。1986年—1990年是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

第一节　通货膨胀的出现与治理整顿方针的提出及初步实行

一、1986年—1988年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是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到1987年就非常明显了。1987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1986年上涨了7.3%（其中12月份比1986年上升9。1%），城镇上升9.1%，农村上升6.3%。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1987年比1986年上升8.8%，有的大城市上升突破10%。1988年，通货膨胀继续发展，物价上涨更猛，1988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了18.5%，城镇上升了21.3%，农村上升17.1%。

物价大幅度上涨，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遏制通货膨胀，不仅经济无法稳定和发展，各项改革也无法深入下去。

形成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太多，规模过大，超过国家承担的可能；消费需求过旺，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增长；国家财政支大于收，信贷规模过大，货币发行过多。在供求总量不平衡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调，农业发展滞后，有限资源过多地投入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在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加剧了能源、原材料和

运输能力的紧张程度。另外，一些单位和个人为谋取私利，非法倒买倒卖，层层盘剥，制造和出售伪劣商品，更推动了物价上涨，加剧了经济秩序的混乱。

导致上述情况的产生，是同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很快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新机制分不开的。但与此同时，在指导工作上也有缺点和失误。总的看来，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急于求成之倾向，忽视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在指导上对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攀比发展速度等现象，注意防止不够，纠正不力。在改革上，注意综合配套不够，未能及时加强管理、监督和抓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特别是在价格改革中，没有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在通货膨胀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稳定金融、控制物价的有力措施，又放开、调整了一些商品价格，以至加剧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在许多地方诱发了抢购商品和储蓄下降。

二、1988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方针的提出及其措施

针对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的严重情况，1988年9月26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方针，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消除经济过热，遏制通货膨胀。

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具体为：（1）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当1989年实际投资规模的20%，对重点产业采取倾斜政策，对涉外项目采取保护政策，切实调整投资结构，把全社会的投资规模真正管起来；（2）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特别要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3）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办好保值储蓄，开辟多种渠道，包括出售公房和发行股票、债券，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4）把1989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些。

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1）坚决刹住乱涨价风；（2）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3）确定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坚决制止高价抢购粮、棉和生丝等产品的“大战”；（4）加强宏观监督体系，强化计划、银行、财政、税收、海关、铁路等部门的宏观控制职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5）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等。

解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问题，一方面要抑制总需求的膨胀；另一方面要用很大力量来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轻纺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以及紧俏产品的生产。压缩的基本建设腾出来的能源、原材料、运输能力等，要用到这些方面来。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消费品，要减少出口，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特别要解决好粮食和“菜篮子”的问题。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整顿方针及措施，经过半年时间的实行，取得了初步成效：（1）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面，截至1989年2月底，全国已经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8000个，可压缩今后几年的投资647亿元，占全部项目剩余工作量的12%；（2）信贷规模得到控制，储蓄增加，金融趋向稳定，银行两次提高储蓄利

率和开展保值、有奖储蓄业务，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逐步回升；（3）集团购买力得到压缩，专项控制商品由19种扩大到32种，1988年零售额比1987年下降9.1%；（4）开展全国性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中，共查出应上交财政的违纪金额74.1亿元，已上交56.5亿元；（5）流通领域初步整顿，截至1989年1月底，已撤并公司17092个，占党政机关所办公司24187个中的80%；（6）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基本上保证了国内市场的供应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

总之，经过半年来的工作，经济过热开始降温，物价上涨势头有所减弱。但所取得的成效仅仅是初步的，距离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第二节　治理整顿方针的继续执行

一、治理整顿的目标和措施

对1986年—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经过政府治理整顿，已取得初步成效。到198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仍然提出贯彻治理整顿方针。这次会议报告中所提出治理整顿的目标是：（1）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2）遏止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上涨速度进一步下降；（3）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4）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5）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和；（6）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1989年11月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进一步提出了治理整顿的目标。主要是：（1）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要求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2）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相适应；（3）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除财政赤字；（4）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6%；（5）改善产品结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6）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

治理整顿的重点仍然是压缩社会需求。具体措施：

（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9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比1988年压缩920亿元，减少21%；1990年、1991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要维持在甚至低于1989年的水平。要砍掉一大批在建项目、不仅要砍掉一大批楼堂馆所和非生产建设项

目，还要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建设项目。就是一些该上的项目，也要根据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的可能，区别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要优先安排好农业、煤炭、原油、电力、铁路和一些原材料工业的建设项目。加强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特别是严格控制计划外的投资活动。对银行贷款要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并实行差别税率，促进投资结构的改善。加重地方和各行各业开发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责任。

（二）坚决控制消费需求过快增长，坚决压缩、控制社会集团消费。1989 年社会集团购买力要在 1988 年基础上再压缩 20%。严格控制工资总额增长，坚决制止滥发奖金、实物和擅自扩大津贴、补贴发放范围，大力提倡鼓励人民储蓄。在压缩社会总需求的同时，必须努力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缓解市场供求矛盾。坚决纠正几年来盲目提倡高消费的错误做法，务必使消费基金的增长低于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加强对工业基金的管理，改进和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继续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专控和非专控商品的购买。

（三）紧缩金融和财政，继续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货币发行。要千方百计稳定金融，切实加强对各行各种贷款的计划管理，控制全社会的信用总规模。要在紧缩资金供应总量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信贷结构，根据新的情况，采取必要的灵活措施，按照产业政策有重点地解决某些方面资金困难的问题，以利于促进生产的稳定增长。但不得用于扩大基建规模和增加消费基金。

在努力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切实加强税收征管。严格清理各种税收减免优惠政策。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1990 年、1991 年的财政支出（除国防费用等）都大体维持 1989 年的水平。

中央银行要管住票子，控制住信贷总规模。

（四）逐步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在控制消费需求的同时，要改进和完善工资奖金制度，逐步克服职工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切实加强对某些公司人员、某些从事第二职业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和部分个体工商户收入的监督和控制。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推行个人应税收入申报制度，改进和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管工作。

（五）整顿流通秩序。(1) 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公司，解决一些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非法倒卖、牟取暴利问题。(2) 切实加强物价和市场管理，确保 1989 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去年。严格财经纪律。(3) 整顿和改进重要商品的流通方式，对重要生产资料，除专营的外，都应按规定进入市场，公开交易。专营商品非国家政策允许的单位、个人，一律不得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倒卖计划内的商品和物资，从中牟利。对于粮食、棉花、蚕丝、生猪等紧缺的农副产品，既要防止地区间互相封锁，又要防止地区间抬价抢购。对计划外自销生产资料，实行公开销售制度，即实行资源数量公开、价格公开、销售对象公开、结算方式公开，严禁私人从事重要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国家规定的最高限价，必须严格执行。重要消费品流通领域的批发环节，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发挥主渠道作用，禁止私人从事长途批发业务。

逐步解决生产资料“双轨制”问题。要结合价格调整，先对统一分配的煤炭的价格，变“双轨”为“单轨”，以及逐步增加取消“双轨制”的品种。对于短期内难以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商品，通过适当提高计划价格、严格控制需求和加强管理自销价格的办法，逐步缩小两种价格的差距。

坚决制止和纠正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

二、治理整顿与调整经济结构

在治理整顿中，要认真调整经济结构。

（一）切实加强农业，争取粮、棉、油料有好收成。发展农业，一靠执行农村政策深化改革；二靠推广和发展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三靠增加农业投入，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具体是，提高合同定购粮食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8%，自1989年4月1日实行），合同定购外的粮食实行市场交易，价格随行就市；也适当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增加农业的资金投入，支持国家和地方的商品粮、棉、糖等生产基地建设，支持农业资源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支持搞好“菜篮子”工程。积极推广适用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继续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但乡镇企业要根据国家宏观要求和市场需要进行整顿，改善经营管理，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统配煤矿建设，扶持引导地方煤矿继续健康发展。石油工业，一方面努力寻找新油田，同时搞好老油田的生产，因地制宜发展火电、水电，开发核电。在原材料工业方面，积极调整钢铁工业产品结构，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增进经济效益。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工业、森林工业，认真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地质勘探工作。积极发展以铁路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提高运输系统的综合效率。加强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等。

（三）严格控制加工工业发展规模和速度，使其与农业、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的增长相适应。要调整加工工业结构，控制和压缩加32212业的重点：（1）高耗能、高耗原材料、高用汇、低水平和严重重复生产的一般加工工业；（2）助长高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业和产品。同时积极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改善企业组织结构，充分发挥现有机电制造包括军工在内企业的巨大潜力，努力生产能增加有效供应的产品，增产能出口创汇和替代进口的产品。

（四）充分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要健全和加强大中型企业的基础工作，改善经营管理，进一步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素质，发挥职工积极性，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增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能源、原材料和运力供应的可能，按照经济效益高低来对大中型企业合理分配资源的原则，确定必保的企业名单，从能源、原材料、运力和资金等方面优先保证这些企业的需要。制止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减轻企业负担。

（五）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一要立足于农副产品和当地原材料的加工，不同大工业争原料和能源；二要发挥劳动密集和传统工艺的优势，积极发展出口创汇产品；三要为大工业配套和服务。各地区要认真整顿乡镇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消耗高、质量差、污染严重以及与大企业争原料、争能源、而效益又很差的乡镇企业。促进乡镇企业改进结构，改进经营管理和经营作风，提高技术，提高效益。

此外，在治理整顿中，还要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及确保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等。

三、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

（一）治理整顿与经济体制改革。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中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并不脱离改革。治理整顿期间，深化和完善改革的重点：(1) 要根据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稳定、充实、调整和改善前几年的改革措施；(2) 要根据治理整顿时期应当多一点计划性的要求，适当加强集中，这种集中是在发挥地方、企业正当积极性基础上的适度集中，而不是那种否定地方和企业必要自主权的过度集中；(3) 要在继续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逐步建立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深化和完善改革，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继续坚持完善和发展工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对承包基数和递增包干比例过低的企业，适当提高其基数和比例。积极探索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关系的多种承包形式，并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试点。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强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

抓好大中型企业的招标承包，积极推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积极推行并完善企业工资总额与实现利税、上交利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原材料消耗等多个指标挂钩形式和办法。继续实行和完善厂长负责制。要通过引进竞争机制，优化管理人员结构，优化劳动组合，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继续发展和改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稳定试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小型工商企业可以继续推行租赁经营，有的可以公开拍卖。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要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不过，要特别运用经济手段。

2. 积极深化计划、投资体制改革。计划部门要加强和改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使计划能够调节和指导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并着重加强对预算外资金、对消费基金、对非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经营方向和行为的引导和调节，促进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协调，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实行合理的投资倾斜政策和改革投资体制，以利于引导和加强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投资，促进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3. 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总规模。中央银

行要对专业银行实行归口领导和管理。要特别重视发挥银行的调控作用。充分利用利率、再贷款、准备金率和备付金等经济手段，控制货币发行，调节信贷规模和结构，引导经济健康运行。各级政府要支持银行的工作，不要干预银行的具体业务，更不能强制银行发放贷款。继续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发展短期资金市场，组织好资金拆借和其他多种形式的资金通融，为生产和流通服务。要进一步稳定和增加城乡居民储蓄，增加货币回笼。

4. 逐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继续进行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的试验，逐步向税利分流的方向发展。目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偏低。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调整分配结构，适当集中资金。在财政包干体制未改革之前，对有上交中央财政任务的省、市，应分别不同情况，适当提高上交中央的比例。中央对地方某些专项补贴要适当减少。

5. 逐步改进分配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现行工资制度要继续进行改革，逐步完善。企业要推行和完善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制度，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坚决保护合法收入。尽快建立和完善个人应税收入的申报制度，进一步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工作，以调节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情况。

6. 改进物资管理体制，适当提高重要物资国家统一分配的比重。原有企业上调国家统配物资的基数不能减少，基数低的要适当调高，新投产的企业，要按国家投资的比重上调产品；企业的自销产品，要划出一块由国家导向，定点定量供应，以保证国家重点生产建设的需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国家统配物资分配计划的落实和订货合同的兑现。

7.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稳妥地继续推进价格改革。适当集中物价管理权限，加强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商品价格的管理。努力保持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本稳定。已经放开价格的商品，要继续放开，但必要时可对其中某些商品实行最高限价或提价申报制度。

8. 改进计划体制，适当增加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比重，完善指导性计划的实施办法。适当上收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由中央审批，并根据产业政策适当调整某些行业的投资限额，同财政、投资、物资、外贸等体制的改革相配合，进一步明确中央和省、区、市的计划管理权限，并改进和完善对大中型企业、企业集团的计划管理办法。进一步理顺计划、财政、银行三个部门的关系，发挥计划部门进行综合平衡，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综合协调经济杠杆的作用，使计划、财政、银行之间紧密配合，按照治理整顿的要求，统一步调和行动。

（二）治理整顿与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不变的方针。治理整顿并非不要对外开放，相反地，它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扩大对外贸易和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使对外开放与治理整顿互相促进。

1. 坚持执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促进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沿海地区应及时调节产业结构，不断提高经济

素质，努力增加“两头在外”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利用“以进养出”、“三来一补”等多种与外商合作的形式，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沿海地区也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2. 积极发挥出口生产，坚持内外销统筹兼顾的原则，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控制和减少资源性产品、初加工产品的出口，积极增加机电产品等工业制成品以及深度加工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发展创汇农业产品的出口。大力更新花式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信守合同，改进推销服务，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外贸企业要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挖掘潜力，提高资金使用率。

3. 外贸进口要严格禁止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进口。把有限的外汇用于进口工农业生产和国家重点建设急需的原材料、农用生产资料、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上。凡是国内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电设备，都要积极采取措施组织生产。要积极发展进口替代，加快国产化的进程。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扩大边境贸易，协调发展旅游事业，积极开拓国际承包劳务市场，提高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经济效益，努力增加外汇收入。

4. 继续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加强同国外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认真执行有关涉外经济法规。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已建成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发挥其示范作用。更加积极地吸收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外商直接投资，多办一些利用我国现有企业进行改造的合资、合作企业。积极争取长期低息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加强对外债的借、用、还的管理。

第三节　“七五”计划的完成

一、“七五”计划的制定

1986年—1990年是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务院早在1983年就着手进行“七五”计划的拟定工作。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国务院根据《建议》又对计划安排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反复进行综合平衡和各种计算。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报告》，并将计划付诸实施。

“七五”计划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

放的基本方针，以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扎实稳妥的步骤，促使我国经济走上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效率和效益的良性循环轨道。

(一)“七五”计划规定的主要任务。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规定如下：

1. 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5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2.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

3.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上述三项任务，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任务。“七五”计划中还规定完成以上任务所要实现的具体经济目标：

1. 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方面。工农业总产值：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按照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16770亿元，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6.7%。其中，农业总产值1990年达到3530亿元，比1985年增长21.6%，平均每年增长4%（包括村以下工业为6%）。工业总产值1990年达到13240亿元，比1985年增长43.4%，平均每年增长7.5%（不包括村以下工业为7%）。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按照1985年价格计算，达到11170亿元，比1985年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7.5%。其中，第一产业平均每年增长4.2%；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长7.7%；第三产业平均每年增长11.4%。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能源由1985年的12.9吨标准煤下降到1990年11.4吨标准煤。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8%。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六五”期间的73.6%提高到75%。

2. 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方面。国民收入：1990年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9350亿元，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5年内，消费基金总额为30070亿元，平均每年消费率为70%；积累基金总额为13150亿元，平均每年积累率为30%。居民消费水平：1990年全国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517元，平均每年增长5%。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每年增长4.2%，农村居民平均每年增长5.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5年内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为12960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8960亿元，集体所有制单位1600亿元，城乡个体投资2400亿元。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5000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49%），更新改造投资2760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87%），其他投资1200亿元。5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将新增6000亿元以上。

3. 产业结构方面。继续保持农业全面增长促进轻工业和重工业稳步发展，加快能源、原材料工业发展，适当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生产增长，把交通运输和通信的发展放到优先地位，大力发展建筑业，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到1990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情况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23.9%，下降为21%；轻工业由38%上升到39.4%；重工业由38.1%，上升到39.6%。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比

重由1985年的21.3%上升到25.5%，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由78.7%下降为74.5%。

4. 科技、教育方面。抓好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抓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重要科技成果，在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新技术攻关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到1990年，争取40%左右的主要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技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逐步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5年内，全日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比“六五”期间增长1.1倍，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增长70%，毕业研究生增长3.5倍。发展多种形式成人高等教育，加强对在职干部、工人和农民的培训。

5. 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面。5年内，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平均每年增长7%，1990年达到83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8.1%，进口平均每年增长6.1%，利用外资重点是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以及机械电子等行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出口创汇能力和实行进口替代。技术引进重点放在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上，优先引进有助于扩大出口能力与发展替代进口产品的技术和设备。

6.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即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围绕以上三个方面，配套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7. 财政、金融、物资等方面。1990年国家财政收入达2567亿元，5年合计为11194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4376亿元。1990年国家财政支出为2567亿元，5年合计为11194亿元。支出与收入平衡。5年内，其他信贷、物资、外汇等方面保持基本平衡。

8. 人民生活方面。5年内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情况，到1990年，平均每个农民的纯收入为560元，比1985年增长41.1%；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1900亿元，比1985年增加545亿元。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平均每年增长4%。

（二）实现“七五”计划的重要原则和方针。为了全面实现“七五”计划的各项任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以下重要原则和方针：

1. 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与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

2. 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

3. 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

4. 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5. 恰当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加快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

6. 把建设重点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

7. 把科学、教育事业放到重要战略地位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

8. 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把国内经济建设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

9.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10. 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11. 在各项事业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二、“七五”计划完成情况

“七五”计划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认真遵循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新的成就，完成了“七五”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总的情况。经济实力增强，国内市场供应充足，对外经济活跃，财政增收，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发展。“七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均超过“七五”计划的要求（“七五”计划规定，5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7%，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7%），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求成过急，造成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国民经济的某些方面过于分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

（二）农业生产方面。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增长，基本完成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90年，农业总产值7382亿元，比1985年增长25.3%，平均每年增长4.6%，超过40%的计划指标。

在主要农产品生产中，粮食生产前3年徘徊不前，后两年连续刷新记录；1990年，棉花、糖料生产扭转连年的徘徊局面，超过“七五”计划指标；油料大幅度增产，但仍低于计划要求；肉、禽、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等连年增产。“七五”时期主要农副产品平均年产量，除棉花、黄红麻外，均比“六五”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数字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农产品平均年产量　　单位：万吨

品　种	“七五”时期	“六五”时期	“七五”比“六五”增长百分比（%）
粮　食	40622	37064	9.6
棉　花	404	432	-6.5
油　料	1446	1205	20.0
甘　蔗	5054	3775	33.9
甜　菜	1061	789	34.5
黄红麻	64.0	89.5	-28.5
烤　烟	200	158	26.6
蚕　茧	44.7	33.9	31.9

品　　种	"七五"时期	"六五"时期	"七五"比"六五"增长百分比（%）
茶　　叶	51.6	39.7	30.0
水　　果	1678	930	80.4
猪牛羊肉	2185	1463	49.4
水 产 品	1042	569	83.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关于"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载《光明日报》，1991－03－14。

林业和绿化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七五"时期，人工造林总面积超过4亿亩。科技兴农有了良好的开端。优良品种、模式化栽培、配方施肥、地膜覆盖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已显示出巨大的生产潜力。在畜牧业生产方面，由于推广良种繁殖，进行科学饲养，疫病防治，使用配合饲料，畜禽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农业物质装备水平有所提高。1990年末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达到3886亿元，比1985年末增长82.4%；农业机械总动力达2854亿瓦特，比1985年增长36.5%；化肥施用量增长46.8%，农药、塑料薄膜等使用量也均有所增加。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仍然较低。突出表现在：（1）耕地大量减少，1990年末全国耕地面积比1985年末减少1854万亩；（2）有效灌溉面积、机耕面积近两年虽然有所恢复，但还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水土流失、沙化碱化的情况仍在发展；（4）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依然薄弱。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9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6253亿元，比1985年增长87.8%，其中，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非农业产值增长1.6倍，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0年的54.6%。"七五"时期，乡镇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2200万人。

（三）工业生产方面。工业生产增长较快但波动较大。199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23851亿元，比1985年增长85.1%，平均每年增长13.1%，超过计划增长7.5%的目标，是继"一五"、"六五"之后，第三个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发展不平稳，出现了明显的起伏，前3年经济过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6.7%，后两年进行治理整顿，宏观紧缩出现了市场疲软，速度明显趋缓，年均增长8.1%。"七五"时期，重工业年均增长12.2%，轻工业年均增长14.1%。从所有制看，全民所有制工业年均增长7.3%，集体所有制工业年均增长17.6%，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独资经营的工业年均增长74%。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由1985年97.7%下降到1990年的91.4%。

列入"七五"计划的28种工业产品产量，有23种产品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汽车、家用洗衣机、家用电冰箱等因受市场需求制约，1990年控制了生产；原油、木材受资源限制，没有完成计划。"七五"时期主要工业品平均年产量，均比"六五"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表2所示。

表 2　主要工业品平均年产量

产　品	单　位	“七五”时期	“六五”时期	“七五”比“六五”增长百分比（%）
化学纤维	万　吨	132	65.4	101.8
纱	万　吨	445	331	34.4
布	亿　米	179	146	22.6
机制纸及纸板	万　吨	1215	691	75.8
电视机	万　台	2265	897	152.5
家用洗衣机	万　台	882	443	99.1
家用电冰箱	万　台	506	46.8	981.2
原　煤	亿　吨	9.87	7.33	34.7
原　油	亿　吨	1.36	1.10	23.6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5390	3552	51.7
钢　材	万　吨	4623	3142	47.1
木　材	万立方米	6066	5585	8.6
水　泥	亿　吨	1.95	1.11	75.7
化　肥	万　吨	1705	1336	27.6
汽　车	万　辆	51.6	27.3	89.0

资料来源：《关于“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工业生产能力扩大，技术水平提高。到 1990 年底，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 14000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1 倍。建成了一大批重要工业基础设施，平均每年有上百个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竣工投产，一些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逐年扩大。通过技术引进和加快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我国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为国民经济生产技术装备的机械工业，平均每年开发新产品达到上千种，基本上依靠国内的力量，为能源、交通、原材料、尖端科学等十几个部门提供了上百种高水平的成套设备。

但是，工业结构失衡、地区结构趋同的状况没有明显好转，经济效益低下问题日益突出。1989 年和 1985 年相比，在全国重点企业考核的指标中，有 48% 的质量指标下降，52% 的消耗指标上升。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由 23.8 元降至 16.8 元，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由 11.8 元降至 6.3 元。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七五”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到 19746 亿元，超过计划指标，比“六五”时期增加 11749 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 12502 亿元，比“六五”时期增加 7172 亿元；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 2771 亿元，增加 1759 亿元；个人投资 4473 亿元，增加 2818 亿元。

投资结构调整有一定进展，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增加，比重上升。“七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用于能源、原材料工业和运输邮电设施方面的投资

6514亿元，比“六五”时期增加4030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六五”时期的46.6%上升到52.1%。“七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7348亿元，比“六五”时期增长1.2倍，更新改造投资完成3976亿元，增长1.7倍，更新改造投资占的比重由“六五”时期的28%上升到31.8%。

重点建设步伐加快，取得一批新成果。“七五”时期，国家安排重点建设项目306个，总投资规模达2955亿元。已建成投产项目121个，主要有：山西大同、古定，河北开滦和山东兖州矿区的4个年产原煤400万吨的矿井，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的湖北葛洲坝水电站，建成投产4台32万千瓦机组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20万千瓦的山西大同第二电厂一期工程和上海石洞口一电厂，6条50万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年产纯碱60万吨的唐山碱厂，扬子、齐鲁、大庆、上海4大乙烯工程，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中英合资上海耀华玻璃公司的浮法玻璃生产线，大同至秦皇岛煤码头三期工程。另外，北京亚运会工程、北京图书馆、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中国科技情报中心、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等一批科学文化设施项目也相继建成投产。

新增一大批生产能力，增添了经济发展后劲。“七五”时期，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为16400亿元，建成投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532个，限额以上更新改造项目354个，全民所有制单位建成小型基本建设项目和更新改造项目各20多万个。“七五”时期，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煤炭开采12374万吨，发电装机容量4628万千瓦，石油开采7752万吨（含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炼铁665万吨，炼钢512万吨，铁矿开采2342万吨，化肥124万吨，塑料87万吨，水泥1862万吨，机制纸28万吨，机制糖58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运营里程2307公里，新建公路18092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3740万吨。

建筑业施工力量增强，技术水平提高。1990年全社会建筑施工队伍达到2400多万人，比1985年增长16%；建筑业技术装备进一步加强，设计施工技术有新的突破。如岩土工程技术、工程结构抗震技术、桥梁与隧道的设计和施工技术、大型结构与设备安装技术、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技术等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建筑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的局面仍未扭转。

地质普查勘探工作取得新进展。“七五”时期完成钻探工作量共4689万米，新发现或新证实为工业矿床的矿产地1369处，取得重大新进展的勘察矿区1015处。新探明储量：煤炭1113亿吨，铁矿石21.8亿吨，天然气2738亿立方米，石油勘探也取得新的突破。

（五）交通运输和邮电。“七五”时期，运输基础设施有所改善，运输能力增强，运输量全面增长。1990年末，铁路复线里程占营业总里程的比重，由1985年的19.2%提高到24.4%，其中主要干线复线率已达90%以上。新增电气化铁路里程2790公里，铁路电气化里程占营业里程的比重达13%。公路质量不断提高，高速公路建设开始起步。沿海港口新增吞吐能力1.38亿吨。

1990年，各种运输工具完成的货物周转量26322亿吨公里，比1985年增长45.3%；旅客周转量5612亿人公里，比1985年增长26.6%。为减轻铁路负担，组织水陆运输合

理分流，运输结构有所调整。在货物周转量中，铁路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44.8%下降到1990年的40.3%；公路所占比重由9.3%上升到13.1%，水运所占比重由42.5%上升到44.3%。

“七五”时期地方办交通积极性增强。1985年我国只有10个省、区、市拥有49条地方铁路，正线长2934公里。1990年末，已有16个省、区、市拥有64条地方铁路，正线长4454公里。地方航空公司从无到有，已形成一定的运输能力。个体运输得到较快发展。

邮电通信事业发展迅速。1990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80亿元，比1985年增长1.7倍，平均每年增长22%。传真、用户电报、特快专递等新兴邮电业务成倍增长。市内电话建设由于多渠道筹措资金发展迅速，“七五”时期增加301万户，增长1.37倍。但运输邮电发展同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相比，仍不适应。

（六）国内商业和物资供销方面。“七五”时期，国内市场变化较大。前3年市场波动较大，后两年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销售已基本趋于正常，商品供应比较丰富。199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8255亿元，比1985年增长92%，平均每年增长1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3.4%。

从各种经济类型的商品零售额看，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增长86.4%，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40.4%下降为39.3%；集体所有制增长64.4%，所占比重由37.2%下降为31.9%；合营经济增长2倍，所占比重由0。3%上升为0.4%；个体经济增长1.4倍，所占比重由15.3%上升为19%；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额增长1.7倍，所占比重由6.8%上升为9.4%。

市场物价前4年涨势较猛，由于采取有效措施，1990年市场物价相对平稳。“七五”期间各年物价变动情况如表3所示（以上年价格为100）。

表3　“七五”期间各年物价变动情况

指数＼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	106.5	107.3	118.8	118.0	103.1
零售物价总指数	106.0	107.3	118.5	117.8	102.1

随着物资体制的改革，主要物资国家统一分配的比重明显下降。钢材国家合同供货量占当年生产量的比重，由1985年的49.7%下降到1990年的30.8%；煤炭由45.2%下降到42.1%；木材由29.7%下降到26.4%；水泥由16.4%下降到10.3%。

（七）对外经济和旅游业。进出口贸易取得突破性进展。据海关统计，“七五”时期进出口总额4864亿美元，比“六五”时期增长92.7%。其中，出口总额2325亿美元，增长93.7%；进口总额2539亿美元，增长91.8%。进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进口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大幅度下降，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比重由1985年的49.4%上升到1990年的74.5%。

利用外资增长较快。“七五”时期我国实际利用外资460.9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3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141.7亿美元。到1990年末，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累计达2.9万项，投产开业的企业已超过1万家。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很大发展。我国已同129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承包劳务合作业务。“七五”时期，共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11219份，合同金额101亿美元，实际完成营业额70亿美元。

国际旅游业稳步前进。“七五”时期，前来我国的国际游客达1.33亿人次，比“六五”时期增长1.4倍；旅游外汇收入97.2亿美元，增长96.3%。

（八）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科技事业有了新发展。“七五”时期我国共取得国家级科学技术成果14139项，是“六五”时期的1.5倍。“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合同已完成90%以上。在生物技术、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技术、超导材料的理论研究等领域的某些科技成果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星火”计划项目取得明显成效。“七五”时期，“星火”计划累计完成项目1.4万项，为农村培训技术管理人才650万人。

“七五”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资助科研项目16504项，资助金额6.44亿元。

“七五”时期，高等院校共有35400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和评审。

科技队伍进一步扩大。1990年末全国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432万人，其中自然科学技术人员1097万人，比1985年增长40%。全国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的科技机构5820个，比1985年增加1130个。

“七五”时期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266.8万人，比“六五”时期增长73.8%。国内培养毕业研究生15.8万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6927人，获得硕士学位的14.1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92.2万人，增长31%。培养农业职业中学毕业生389.5万人，增长2.4倍。

人口文化素质提高。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我国平均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由1982年的62人增加到1990年的142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由678人增加到804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由1789人增加到2334人。全国文盲半文盲率由20.37%下降到15.88%。

基础教育得到进一步普及。成人教育稳步发展。文化事业在整顿中保持繁荣。

卫生事业继续发展，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疾病防疫工作取得新的成效，但城市住院难等问题依然突出，农村医疗条件还比较落后。

体育事业发展较快，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九）人民生活和人口。城镇就业继续扩大。“七五”时期安置待业人员2070万人。全国职工人数增加1631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实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增加1020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增加250万人。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1990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2150元，比1985年增加

1002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2.5%。如包括工资外收入和就业面扩大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1%。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2%。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实际增长3.1%。人民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平均寿命等生活质量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一些贫困户。

城乡储蓄大幅度增加。1990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7034亿元，比1985年末增长3.3倍。

城乡居住条件继续改善。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7.1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7.8平方米，比1985年分别增长36.5%和21.1%。

1990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比1985年增加848万人，年均增长1.55%。

第四节　建国4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到1990年“七五”计划完成，我国建国已经40年了。40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已经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有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4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一、国民经济总体实力的加强

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制造业增加值是两个反映一国总体实力的通用综合指标。建国40年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这两项指标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如国民生产总值，1950年为380.6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8.95美元，到1987年则达到5295.2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37%（这一时期美国的增长率为3.17%，日本为6.98%，印度为4.01%，都不及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89.84美元，平均增长率为5.44%。1988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又增长为5868.6亿美元。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更快。如用人民币计算，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3588亿元，1989年就增长为15789亿元，1990年更增加为17400亿元。1979年—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7%。

国民收入也是一项反映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1952年我国国民收入为589亿元，1978年为3010亿元，1989年增长为13125亿元，1990年更增长为14300亿元。

我国制造业的情况。以工业生产为例。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为349亿元，1978年增长为4237亿元，1989年更增长为22017亿元，1990年更达到23851亿元。1989年工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5995.1%。1953年—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1.7%，1979

年—199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2%（1951年—1986年发达国家工业平均增长速度只有4.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9%，世界平均为4.4%。中国工业生产年增长率分别高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7.3、5.6、7.1个百分点）。

国家财政收入也是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1952年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为183.7亿元，1978年增长为1121.1亿元，1990年更增长为3244.8亿元。1953年—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7.8%，1979年—1990年平均每年增长9.3%。在国际储备方面，1980年我国拥有国际储备25.5亿美元（不包括黄金），1989年增长为179.6亿美元。同期1989年印度的国际储备只有38.6亿美元。1989年我国的黄金储备为1267万盎司（35.9万千克），印度为1045万盎司（29.6万千克）。

在基本建设方面，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52年仅为43.56亿元，1978年增长为668.72亿元，1990年更达2926.83亿元。1953年—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11.6%。1950年—1990年累计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25775.6亿元。到1990年已有4584个大型项目建成投产。工业建设方面，1989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了52倍左右。农业水利方面，1989年新修堤防总长度约17万公里，兴建水库8万多座。

二、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

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是反映一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工业生产方面，我国钢产量1952年仅有135万吨，1978年增为3178万吨，1990年更增为6604万吨；原煤产量1952年为0.66亿吨，1978年增为4.18亿吨，1990年更增为10.8亿吨；原油产量，1952年44万吨，1978年增为10405万吨，1990年更增为13810万吨；发电量，1952年为73亿千瓦/小时，1978年增为2566亿千瓦/小时，1990年更增为6180亿千瓦/小时；此外水泥、硫酸以及农用化肥、化学纤维、布、糖、电视机等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大大增加。

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速度很快。如钢产量，1952年只有135万吨，到1990年，仅用了不到40年时间，就提高到6604万吨。化肥产量，1949年只有0.6万吨，到1989年，仅用了39年时间，已达到1802.5万吨，占全世界化肥总产量的11.5%。达到这个水平，美国用了50年时间。1989年我国煤炭产量已达10.54亿吨，是解放前的32倍。目前世界上原煤产量能过10亿吨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而美国由6亿吨上升到10亿吨用了70年时间，而我国仅用了10年时间（我国1978年煤产量为6.18亿吨）。

在农业生产方面，40年来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大增加。如粮食产量，1952年为16392万吨，1978年增长为30477万吨，1989年40775万吨，1990年更增为43500万吨。棉花产量，1952年130.4万吨，1978年216万吨，1989年378.8万吨，1990年450.8万吨。油料，1952年419.3万吨，1978年521.8万吨，1989年1295.2万吨，1990年达1613.2万吨。此外，甘蔗，猪、牛、羊肉等的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

中国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很快。粮食产量，1989年为1952年的248.6%，棉花为290.5%，油料为308.9%，甘蔗685.7%，猪、牛、羊肉为687.2%。平均每年增长速度，1953年—1986年，粮食2.5%，棉花2.9%，油料3.1%，甘蔗5.3%，猪、牛、羊肉5.3%。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加，使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所占位次大大提高。如1949年—1989年间，我国钢产量由占世界第26位上升为第4位；煤产量由第9位上升为第1位；原油产量由第27位（1950年位次），上升为第6位；化肥产量由第33位，上升为第3位；化学纤维由第26位（1960年位次），上升为第4位；布产量由第3位上升为第1位；电视机由1978年的第8位，上升为1989年的第1位。谷物产量由1957年的第3位，上升为1989年的第1位；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第4位，上升为1989年的第1位等。

三、交通运输和能源事业的发展

建国40年来，全国交通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铁路营业里程由建国初期的2.18万公里，增加到1989年的5万多公里。不少线路铺设了双轨，全部铁路干线实现了内燃机车或由电气机车牵引。在公路运输方面，到1989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增加了12倍。民用航空，到1989年，已开通了378条国内国际航线。沿海港口设施和吞吐能力大大提高，新建和扩建了100多个万吨级泊位。由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货运量大大增加。1952年全国货物周转量为762亿吨公里，1978年提高到9829亿吨公里，1990年更提高到26322亿吨公里。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1952年为1440万吨，1978年增为19834万吨，1990年更提高为48219万吨。

在邮电通信方面，全国邮路和农村邮路总长度由建国初期的70.6万公里，增加到1989年的491.54万公里，增长7倍左右。其中航空邮路29.15万公里，增长200多倍。长途电话和电报电路成倍增长。邮电业务总量，1952年仅1.64亿元，1978年增为11.65亿元，1990年更增为81.65亿元。

在能源方面，1952年能源生产总量为4871万吨，1978年增长为62770万吨，1990年更增为104000万吨。1989年能源生产总量为1952年的2087.6%，从1953年—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8.6%。

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建国4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市场商品供应量的增加，我国国内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在国内贸易方面，社会商品购进总额，1952年为175亿元，1978年增为1739.7亿元，1989年更增长为7606亿元。1953年—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10.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2年为276.8亿元，1978年增长为1558.6亿元，1990年更增长为8300.10亿元。从1953年—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8.1%。以上数字表明我国国内贸易的

发达，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对外贸易方面也有很大发展。195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19.4亿美元，1978年增长为206.4亿美元，1990年更增长为1154.4亿美元。1953年—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11.6%，1979年—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16.6%。

五、科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989年全国城乡已建立了各级学校115.3万所，在校学生人数大大增加。1952年高等学校人数为19.1万人，1978年增为85.6万人，1990年更增为206.3万人。研究生培养单位由1962年的173个增长到1987年的755个。研究生人数，1952年在校人数2763人，1978年增为10934人，1988年更增为112776人。40年来培养的科技人员不断增加。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总计为42.5万人，1978年增为434.5万人，1989年更增长为1035.1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23.4倍。科学成果不断涌现，有些领域科学技术水平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六、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国40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40年来，城乡人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52年为57元，1978年提高为133.6元，1990年更提高为629.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1957年为235元，1978年提高为316元，1990年更提高为1387元。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为445元，1978年615元，1990年提高为2140元。(2)消费水平的提高。全国居民消费水平，1957年76元，1978年提高为175元，1990年更提高为713元。从1952年—1990年，农民消费水平从62元提高到519元，非农业居民从1952年的149元提高到1448元。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储蓄的增加上。1952年我国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为8.6亿元，1978年为210.6亿元，1990年更上升为7034亿元。城镇储蓄，1953年为12.2亿元，1978年增为154.9亿元，1990年更增为3734.8亿元。农户储蓄，1953年为0.1亿元，1978年增为55.7亿元，1990年更增为1412.1亿元。全国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1952年为1.5元，1978年21.9元，1990年提高为615.2元。

居住条件的改善也反映了我国人民生活的提高。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提高的幅度更大。1978年农村平均每人住房面积为8.1平方米，1990年提高为17.8平方米。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1978年为3.6平方米，1990年提高为7.1平方米。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也有明显提高。1988年我国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0岁，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等收入国家为65岁），比印度高

12岁。1978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32%，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为56%）。1989年我国平均每一医生负担人口数为1000人，也超过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为2390人），更少于印度（印度为2520人）。1986年我国人均日摄取食物热量为2630千卡，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855千卡），高于印度（印度为2238千卡）。

总之，建国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第八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与经济的高速增长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1985年起，中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也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速增长，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旧体制摩擦加剧，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激化，导致1988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88年9月起，中国经济进入了治理整顿的阶段。

第一节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一、以计划、价格和工资改革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迈开重大步伐

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关系复杂，要顾及到各方面的承受能力。80年代前期，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初步的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工农业生产增长很快，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为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但同时，1984年年底，经济增长出现过热势头，货币投放过多，经济运行趋于紧张，使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难度。

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1985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宏观控制，紧缩银根，努力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力争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慎重初战，务求必胜”。

1985年出台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一）实行以计划体制为重点的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改变宏观调节方式

根据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务院于1984年10月批准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暂行规定》，并于1985年开始试行。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搞活”，行政机关简政放权，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

权。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需要实行指令性计划外，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多地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法规。并力争使各种经济杠杆相互协调，更好地实现宏观管理目标。

在农业方面，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对粮食、棉花、油料、烤烟、黄红麻、生猪、二类海水产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收购和调拨规定指令性指标，通过自下而上地签订收购合同加以落实，超计划部分放开。其他农产品除另有规定外，实行市场调节。

在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对国家统一分配调拨的煤炭、原油及油制品、钢材、卷烟、军工等重要产品，以及对重点物资的铁路货运量、部直属水运货运量、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实行指令性计划。各部和省可对本行业或地区少数重要工业产品下达指令性计划。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和供货合同的前提下，超产部分可以自销；国家下达指导性计划的产品，由企业按照国家计划指引的方向，自行安排生产销售；国家不下达计划的产品，实行市场调节。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国家只对预算内拨改贷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的基本建设，以及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安排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实行指令性计划，并放宽预算内建设项目审批权限，简化审批项目手续。

在劳动工资方面，国家对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下达计划指标，企业可以根据完成计划的情况和经济效益的好坏，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增加或减少工资总额。

在文教卫生方面，对研究生、高校本专科、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毕业生分配人数，由国家或地方下达指令性指标。各高等院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接收委托培养或联合招生。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改革科研单位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由国家财政给予支持的同时，一般技术开发和近期可望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工作，逐步推行技术合同制。科研机构应尽量在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取得收入，以便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研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并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后，指令性计划范围缩小，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扩大。国家和各级地方、部门着重抓好全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外汇的平衡，安排好经济发展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发展重点、地区布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和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以五年计划为主要形式，简化年度计划，制定中长期规划；同时编制行业规划、地区规划和若干个专业规划，建立起长、中、短期计划与专项规划相结合的计划体系。

围绕计划目标，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有计划地及时调整价格、税收、工资、财政补贴等，使其成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有效手段。

1985 年，国家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初步出台了各种措施。根据经济形势和产业

政策，及时对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某些政策作适当调整，并运用减免税手段，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服务。

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从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以便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的权力和责任，更好地体现责、权、利相对应的原则。它的实施，使全国财政体制逐步走向统一化，并开始改变了过去按企事业单位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办法，为过渡到完全分税制的体制创造了条件，对以后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将有较大的适应性。

在金融体制方面，通过前几年的改革，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所组成的金融体系。为了打破下达资金管理中的“供给制”和“大锅饭”，从1985年起，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原则，以调动专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积极性。国家初步利用利率杠杆，调控国民经济。

1985年以计划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开始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向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的间接管理转变。

（二）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1979至1984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改变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和长期以来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1984年年底开始的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其重要内容是增强企业活力。但是，只有在比较合理的价格体系下，在平等的竞争环境中，企业的经营效果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价格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更加明显，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国正在进行的计划、财政、税制、金融以及工资改革，也需要价格改革的配套。《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项决定同时规定了价格改革的任务、方针、原则。1984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着手制定的价格改革方案，到1985年年初正式确定，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1985年的价格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

在农产品价格改革方面，取消了对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将粮食的统购价、超购加价改为按“倒三七”比例计价，简化了计价办法。将农村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到与收购价格持平，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国家在农村高价收购、低价出售的不合理现象。调整农村粮食销价后，国家在农村销售的粮食减少，解决了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难题。

放开生猪等鲜活食品的价格，是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重点。从春季开始，各地相继放开生猪价格，购销价格上升30%左右。长期以来，大中城市统购包销、管得很死的蔬菜价格，也于1985年春起陆续放开。

在铁路运输价格方面，提高了100公里以内的硬座票价和200公里以内的货运等短

途运价，初步改变了铁路短途运价与公路运价、水运价格比价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公路、水路为铁路分流，有利于运输结构的调整。调价前后5个月比较，全国短途客运量下降18.7%，短途货运量也有所减少，铁路货物运输平均距离明显增加，这有利于发挥铁路运输“长、重、大”的优势。

在工业品方面，放开了计划外重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扩大了煤炭的地区差价和质量差价，部分轻工业产品改为企业定价。放开计划外重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对发展短线产品，改善燃料、原材料价格偏低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为国民经济提供了新的核算标准和市场信息，有利于投资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调整。工业生产资料的“双轨制”价格，在实行初期为理顺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过渡办法。更多的生产资料真正进入市场，过去很难或无法获得计划物资的乡镇、私营、个体企业，由此得到迅速的发展。

（三）工资改革

中国多年来形成的一套工人、干部工资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需要。它的主要弊端是：在管理上过于集中，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太少，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解决好职工收入与企业经营效果、个人贡献挂钩的问题，企业之间、职工之间的平均主义越来越严重。同时，价格改革措施出台后，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国家虽给予适当补贴，仍不足以弥补。工资改革与价格改革同时出台，有利于缓解价格改革引起的震动。1985年的工资改革，将机关、事业与企业单位的职工工资纳入不同的分配轨道。前者将由国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财力情况直接进行调整，后者的工资增长由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决定。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废除50年代建立的等级工资制度，实行以职务工资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其主要内容是：把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和年功工资3个部分。在结构工资中，职务工资是按照职工所担负的职务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责任大小等因素确定，占据主导地位。基础工资是维持劳动者生存的需要，不论职务高低实行同一标准。年功工资是对职工劳动贡献积累的补偿，随职工工龄的增长递增，居次要地位。这种结构安排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

企业工资改革的原则是将职工的收入与职工个人的贡献和企业的经营效果挂钩。但由于改革措施尚未配套，企业尚不具备在平等基础上竞争的条件，其经营效果不能真实地反映职工和经营者的能力程度，由此，企业工资改革远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复杂得多，只能逐步前进。1985年，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奖励基金随同本企业经济效益浮动的办法。大约有1800万职工进行工资总额同企业生产成果或经济效益浮动的试验。如煤炭行业中试行了吨煤工资含量包干办法。有大约15%的大中型企业试行了工资同上缴利税一起浮动的办法，并在新标准基础上，安排了升级。同时，扩大了企业在工资奖金分配上的自主权。许多企业根据各自的特点，在企业采取了承包工资、分解工资、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百分奖励等多种形式和办法。

（四）加快城市综合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其复杂性是事先难以预料的。为此，在其初始阶段，中国政府除采取全国统一措施外，还选择了一些城市，给它们以更多的自主权，进行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以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在1984年之前，国务院批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有3个。1984年以后，国务院以及各省、自治区又陆续批准了一批进行综合改革的城市，到1985年年底，已有61个城市进行综合改革的试点。

1985年3月，国家体改委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任务，推动城市总体改革的深化。1985年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与搞好企业内部改革相结合，增强企业活力。各城市对中央放权的政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能擅自修改，另搞一套。许多城市对扩权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对行政性公司进行调整和整顿，以解决放权过程中的"中梗阻"问题。在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方面抓以下环节：转变企业经营思想；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权分级管理；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加速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大力推行现代化管理；进一步落实各级经济责任制。一些城市在搞活中小企业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如进行集体、个人租赁经营、企业破产倒闭暂行办法、股份制等方面的试点。二是进一步发展经济横向联合。如以企业联合为基础，出现了一批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促进了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化；从组织名优产品和重点产品联合生产入手，打破不同隶属关系的界限，积极推动部、省属企业与地方企业的联合，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联合，生产企业与科研单位的联合；发展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横向联合，促进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开放式、网络型经济结构的形成。三是开始发挥城市多功能作用，开放消费资料市场，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技术市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四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着手进行城市经济管理机构改革，综合运用经济杠杆，加强和改进宏观管理。

（五）扩大对外开放

继1984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和海南岛后，1985年国务院又决定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洲，继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开放地区，加速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新开放的沿海地区都是我国工农业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它们连同原来开放的4个地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沿海从南到北形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在这一地带，通过进一步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这样做，既可以使沿海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在全国最先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开放式的文明富庶地区，而且通过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同内地经济的横向联系，从技术、人才、物资、信息等方面进行联合与协作，使内地与沿海的优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和繁荣。这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内地，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

1985年，以计划、价格、工资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以往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进行调整的做法，开始转向让价值规律更多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着更具有实质性变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使得中国进入了新旧体制交替的重要时期。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经济运行出现了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共同作用的局面，经济活力大大加强了。但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原有体制的弊端不可能完全消除，新体制还有待于建立、完善，两者必然产生矛盾和摩擦，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

这些问题和困难在1985年的突出表现是，中国政府在年初开始的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各项措施见效缓慢。在这种形势下，为避免大的震动，已制定的一些改革方案，特别是价格改革的方案未全部到位。即使如此，当年仍出现了8.8%的较大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其中，3%左右是由于价格的调整，5%左右是由于放开价格造成的物价上涨。后者既有合理的部分，也有因需求过旺拉动的因素。而放开价格的部分下游产品居多，上游产品价格计划部分较大。因此，由需求拉动造成的物价上涨，不仅不能使价格体系趋向合理化，反而造成上游产品价格差位复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与发展在近期不仅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制定怎样的改革战略和如何更好地协调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引起了中国政府和理论界的关注。

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已出台的改革措施

在总结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1985年年底到1986年年初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7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今后5年改革的总体战略步骤和近年改革的内容要求，以及经济发展和改革相互协调的方针。

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互协调，即是说经济发展要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推动经济改革顺利开展，这是“七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但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10年和21世纪前50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为此，整个“七五”期间经济发展和基本建设要适度，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在第7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争取在今后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

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建立健全间接调控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是：在“七五”的前两年，改革的重点是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从宏观上加强、完善间接调控体系，价格改革不再采取大的措施，落实扩大企业自

主权的各项规定，减轻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负担，增加它们的活力。“七五”后3年，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完善间接控制，搞好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完善税制，改革金融体制。

按照“七五”计划的部署，1986~198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围绕着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抑制需求、改善供给服务，贯彻“巩固、消化、补充、完善”的方针，以便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使改革在今后迈出决定性的步子。在贯彻这一方针的同时，国务院所属方案办公室着手拟定“七五”时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内外贸为重点，并包括企业经营机制配合进行的改革方案。

1986年，在企业改革方面，主要是进行企业内部的改革。一是普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二是实行多种形式的企业经济责任制。对部分大中型企业试行经营承包、投人产出包干和税后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对国营小型工商企业，实行了租赁或经营承包，其中国营小型商业企业的租赁经营发展很快。三是改革企业劳动制度，改招固定工为合同工，规定厂长有权辞退违纪职工，把企业内部工资奖金的分配权下放给企业，并制定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在1987年，企业改革出台了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对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经营承包的经济责任制。这是在资源配置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资源配置效益不能显著改善的情况下，通过企业承包，进一步向企业放权让利，以期进一步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微观经济效益。1987年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已达到78%，大中型企业达到80%，其中一些省市已达到85%以上。

在价格改革方面，1986~1987年没有出台大的改革项目，只对少数突出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调整。关于农副产品，减少了多种经营门路不多，而发展粮食生产有潜力地区的粮食合同定购任务，适当调整个别地区、个别粮食品种的粮食价格；努力稳定蔬菜等副食品价格。关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对为上年副食品价格改革让路，以及突出不合理的生产资料的价格进行了调整。包括水泥、超产煤炭、部分有色金属、冶金产品、石油产品、化工产品以及新闻纸等，还扩大了指导性价格和市场价格的范围。在工业消费品方面，经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开放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中长纤维布、80支以上棉纱以及其他7种工业消费品价格。

在工资改革方面，又解决了一些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是这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进行的一项工作。1986年3月10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展和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问题，提出要通过横向经济联合促改革，出效益。同月23日，国务院发出《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局、国家工商局据此相继分别制定了有利于推动横向联合的具体暂行办法。到1986年年底，全国建立起来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有3万多个，形成了24个横向经济联合网络，组成了一批像一汽集团和二汽集团一样的实行国家计划单列的大型企业集团。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横向联系的发展，各类要素市场逐步发育。在资金市场方面，国家通过财政渠道分配的资金相对减少，金融机构支配的资金相对增加。1986年

年初，由于收缩银根，企业资金普遍感到紧张。各专业银行挖掘资金潜力，积极发展同业拆借业务，发展了资金短期市场，当年提供了160亿元资金。1987年，全国金融系统累计拆借资金2000多亿元。金融系统还发行了各种债券、股票，并在一些城市开办了有价证券转让业务和票据的贴现。资金市场的发育，对于缓解资金短缺，有一定效果。在生产资料市场方面，由于国家统配的物资逐步减少，进入市场流通的物资迅速增加。钢材、木材、水泥、煤炭、机电产品等重要生产资料市场已开始形成。1986年国家在全国21个大中城市中试点推行河北省石家庄市对计划内中转供应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内外同一销价、差价返还”的办法。到1987年，有58个城市计划内中转供应的物资实行这种办法。为了解决钢材供求紧张的状况，从1986年起国家还先后在6个重点城市和20个省、自治区的66个城市逐步建立起钢材市场。到1987年，已在130个大中城市建立起钢材市场。由于科技体制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科技市场和劳动市场也开始形成。

三、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价格改革闯关

1986和1987年，宏观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没有出台大的措施，主要是执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的方针，并进一步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增强激励机制，以增加产出，提高效益，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旧体制摩擦加剧，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十分突出，集中表现是1987年物价上涨指数突破计划控制幅度，而且呈逐月加速趋势。

考虑到通货膨胀问题比较严重，1987年9月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决定把紧缩财政、货币，控制需求，稳定物价，增收节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作为1988年经济工作的方针。与此相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以搞好企业承包经营、深化企业改革为中心，同时进行计划、投资、物资、外贸和金融等体制配套改革。会议还提出，搞好企业承包经营，推动“双增双节”，是1988年中国经济进一步稳定、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关键。

但是此后不久，由于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从1988年年初起，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坚持把稳定经济放在首位的方针，改革的步伐也大大加快。

1988年前3个季度，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台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对外开放

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把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以开放进一步促进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决策。随着农村改革和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要特点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这对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一支新的生力军。但乡镇企业的发展面对着城市相同产业在市场、资源等多方面的竞争，迫使其不断提高有机构成。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农业资金外流，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为了解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矛盾，理论界提出了国际

大循环的理论，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以获取城市工业结构高级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鉴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劳动费用低的地区转移，以及中国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交通方便，基础设施比较好，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科技开发能力比较强的优势，中国政府决定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即在沿海1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包括：利用人力资源丰富、费用低廉、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的优势，在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出大进，避免与内地争原料；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进一步搞活企业，充分发挥乡镇企业主力军的作用。

1988年2月全国省长会议讨论决定实施沿海发展战略。3月，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对此作出部署。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步伐，不要贻误时机。沿海地区和一些内地省份相应制定了本地区的计划，积极行动起来。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在1988年上半年成为许多省市经济工作的重心。

为与沿海发展战略相配套，国家于1988年上半年出台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一是推行以外汇承包为核心的外贸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1)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及上缴基数、出口收汇基数内人民币补贴基数和外汇挂账数额。外汇增收部分由中央和地方实行倒“二八”分成，在此基础上自负盈亏。(2) 进一步放开外贸经营品种、经营范围。除一些重要的外贸商品继续由中央所属公司统一经营或由中央与地方联合经营外，其余商品由地方公司经营。(3) 各外贸进出口总公司的地方分支机构与总公司脱钩，作为企业法人，下放地方管理，财务上与地方财务挂钩。二是扩大沿海地区对外向型经济的管理权限。扩大沿海地区吸收外资的审批权，下放外贸企业审批权，改革对进料加工出口的海关监管，沿海地区在开放的直辖市设立外汇中心。三是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区范围，这次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共140个市、县，其中包括杭州、沈阳和南京3个省会城市。

（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进行物资、财政、投资体制等配套改革

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条例》，规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的原则、内容、基本形式和有关政策。交通、建筑、农林、物资、商业、外贸等行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也照此条例执行。这个条例的颁布，统一规范了承包经营的办法，推动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广、完善。

改革物资管理机构，促进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1985年后，国家统一分配调拨的生产资料已大大减少，但部门和地方分配的物资还不少，与旧的物资调拨分配体制相适应的机构仍然存在。1988年结合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取消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物资的职能，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直接分配到使用企业。这样做，削弱了主管部门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也为克服物资流通中的条块分割，促进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改革投资体制。为了克服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调节的重大长期的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不稳，同时在使用上又存在按条块分配、投入产出不挂钩、投资效益低下的弊端，从1988年起，中央管理的基本建设决定实施基金制。即将国家财政的建设性预算支出，作为固定资金渠道，构成基本建设资金，与其他财政支出分开，实行专款专用。组建国家专业投资公司，以向国家承包建设任务的方式经营本行业中央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

推行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在早几年已经开始试点。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将现行住房实物分配的办法逐步转变为由职工通过商品交换的渠道购买住房或租房，实现住房商品化，促使住房建设资金步入良性循环，以增加建房资金，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条件，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并克服住房分配上的不正之风。1988年年初，国家决定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提出大体在3年或更多的时间在全国分批推行，促进了住房改革先后在一批城市展开。

实行财政大包干。到1988年，1985年开始实行的“一定三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办法已到期。其间，由于价格改革，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地区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广泛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1988年第一季度，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特别是那些上解比例较大的地区财政收入出现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现象。为了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国家决定在原有体制基础上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对全国除西安、广州两市外的3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分别实行6种不同的财政包干办法。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与旧体制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财政收入较上年新增部分让地方得到更多的好处，以此调动地方特别是那些上解比例较大地区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在实行财政大包干后，连同企业承包经营、大包干、贷款切块包干和石油、冶金、铁路等行业相继实行的包干，形成了从微观到宏观收入分配的包干体系。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产权制度和相应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产生的兼容新旧体制的结合体。在有利可让的情况下，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但让利毕竟是有限度的。当让利余地已经很小，最终要求通过宏观资源合理配置、微观实现要素最佳组合来提高经济效益以增加各经济主体利益时，“包干”办法中包含的旧体制的弊端便日益显露出来。

（三）价格改革闯关

实行价格改革，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性的环节。1985年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时，曾经制定了价格改革方案。但因抑制总需求未取得预期成效，引起物价总水平较大幅度上涨，价格改革措施未能全部到位。1986和1987年为稳定经济，价格改革未出台大的措施。但在价格改革放慢的同时，通货膨胀的势头未完全得到遏制。1985到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上涨指数分别为8%、6%和7.3%，总上涨幅度为22.8%。其中，国家有计划调放价格的因素分别为3%、1.3%和2.3%，占物价上涨总幅度的比例约为1/3，大大低于由于受需求拉动影响引起的物价上涨幅度。由于

受到国家控制的价格多属于上游产品，放开部分多属于下游加工产品，因此在价格总水平上涨过程中，上游产品在调整后重新回到谷底。

这种扭曲混乱的价格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造成许多矛盾和问题。一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产业发展缓慢，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影响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成效与进展。三是价格双轨制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权钱交易，少数人暴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实践证明，绕开价格改革，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面对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抉择困难重重。中国政府和理论界曾强调，经济改革需要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为了稳定经济，曾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但由于现行体制的缺陷，在经济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当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抑制需求时，由于缺乏要素存量调节机制，增量调节能力也在减弱，会因总量投入减少造成产出滑坡；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需要较多增加投放，这又会造成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国民经济宏观政策在稳定物价和保持较高速度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紧缩难以到位，出现膨胀——紧缩——膨胀的循环。结果价格改革未能取得进一步进展，而预期价格改革的宽松环境也难以成为现实。

从 1988 年第二季度起，中国最高决策层作出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的决定。5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会议提出，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性阶段，现在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开的问题摆在面前，这些难题拖得越久，解决起来就越难。改革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抓住历史给予的有利时机，迎着风浪前进，坚决又稳妥地将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好。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按价值规律理顺价格。会议提出了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的统盘方案。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前后，价格改革加快了步伐。到 7 月底，国家相继出台的价格改革项目包括：提高粮食、油料、蚕茧、黄红麻、甜菜、茶叶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煤、电、油等能源价格；放开猪肉、白糖、大路菜和鲜蛋 4 种主要副食品价格，试行改暗补为明补；向上浮动彩电价格，扩大棉纺织品上浮价格，放开和调整部分烟酒价格，下放部分工业产品价格的管理权限。

理顺价格以促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上述各项改革出台措施也是必要的，但时机不当。1988 年年初，因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指导方针的变化，紧缩放松，资金投放增加，物价上涨呈加快趋势：1 月为 9.5%，2 月为 11.2%，3 月为 11.6%。4 月后，价格改革措施过于集中，价格放开后，在需求拉动下，物价加速上涨，6 月达到 16.5%，7 月上升到 19.3%。经过前几年物价较大幅度上涨，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大大增强。从 2 月起，少数城市便出现抢购风潮。8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此时，正值提高部分中高档卷烟和粮食、酿酒价格措施出台，在宣传上又反复强调居民对价格改革有很强的承受能力，价格改革要攻坚闯关。广大居民以为新的价格改革会像名烟名酒价格一样大幅度上涨，引发了全国性的兑款抢购风潮。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作出了治理经济

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改革创造良好经济环境的决策。价格改革再次搁浅，以待时日。

第二节　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与国家的宏观调控

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1985～1988年中国经济连续4年高速增长，国力进一步增强。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旧的经济调节手段正在逐步减少，功效减弱，新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还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对称，对新的调节手段反应不敏感，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大。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投资与需求双膨胀的势头未能得到有效抑制，最终在1988年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1985年年初的经济过热与双紧政策的实施

经过80年代初的调整，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得到缓解。1984年经济发展势头很好。6月，经国务院批准，追加了自筹投资和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外汇的使用有所放松。下半年，在酝酿下年金融改革和工资改革时，决定各专业银行可以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以1984年实际贷款数额为基数核定；在实行企业总工资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工资改革方案时，工资总额以1984年的实际数额为基数核定。一些金融单位为增大基数，突击发放贷款；一些企事业单位为增加工资基数，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和各种名目的补贴，致使全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信贷规模和消费基金急剧增长。1984年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19%，其中第四季度就占全年增加额的38%；银行贷款总额比1983年增加28.9%，其中12月一个月的增长额就占全年增加额的48.8%。货币投放量超过计划160亿元，比上年增加49.5%，其中第四季度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同期增加146%。信贷失控进一步刺激了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402.8亿元，增长22.8%（按当年价格计算，以下关于投资增长速度都是按当年价格计算）。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7%，工业总产值增长16.3%，农业总产值增长12.3%，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高的。但市场供应仍很紧张，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供应紧张，高档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供应不足。社会零售物价上涨指数在连续两年稳定在2%以下的情况下开始回升。为缓和市场供求的矛盾，各地竞相引进家用电器装配线，致使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国家外汇结存急剧下降。

1985年年初，由于上年第四季度大量资金投放开始发生作用，农业调整产业结构和沿海开放城市利用外资项目铺开，使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1985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凡年度增长速度均包括村办工业，月度、季度、半年的增长速度指乡以上工业，下同）、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和零售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2.9%、35%和5.6%，增长幅度超过上年第四季度，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

随着经济过热问题暴露，1985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省长会议，在安排价格和工资改革时，研究了国家经济形势。会议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上年第四季度。为了巩固好的经济形势，要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加强宏观控制和管理，逐步把目前的超高速度降下来，并为此进行了统一部署。2月12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对外汇使用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3月，又作出加强外汇管理的决定。2月7日和28日，国务院相继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紧急通知》和《关于节俭行政经费的通知》，要求1985年社会集团购买力比1984年压缩20%，行政经费削减10%。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和《关于坚决制止就地倒卖活动的通知》。这些措施虽对克服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现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还不足以遏制经济过热势头的发展。第二季度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3.2%，超过第一季度的增幅。5月份因价格改革出台措施比较集中，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增长9.3%。

为了保证物价工资改革的顺利进行，防止出现物价出现大的波动，使经济保持稳定，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控制货币的发行量。为此要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盲目增长，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和现金投放，从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预算外投资的规模，坚决压缩行政经费开支和集团购买力。在坚决控制货币投放的同时，进一步抓好消费工业品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速货币回笼。1985年4月、6月、9月又3次召开省长会议，统一认识，抓紧落实。从4月起，以紧缩银根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紧缩经济。

紧缩银根，控制货币发行。确定1985年贷款总规模为710亿元。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资金管理办法。专业银行必须按照规定如数按期交存应上缴人民银行的资金，不得截留占用；人民银行总行对所属分行和各专业银行总行的信贷计划、信贷差额、现金投放和回笼计划，按季度进行控制和一定范围的检查；加强对乡镇企业、专业户向农业银行、信用社贷款的控制，严格对低息优惠贷款利率的管理；两次提高城乡居民定期存款利率，相应提高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确定在1400亿元以内。重申严格按计划办事，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地区、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必须按计划执行，不得自行扩大。明确1985年不再追加指标。各级银行不得发放计划外固定资产贷款，各部门、各地区不得用银行贷款以自筹资金名义扩大投资规模。除建行外，其他银行不得办理自筹基建存款和贷款。对"五不纳入"（"五不纳入"的具体内容详见本书第五章）基建项目进行清理。除中小学外，其他"四不纳入"要进行控制，下达建议数，纳入投资总规模。利用外资安排的基建和技改项目，要经批准后才能对外谈判。

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势头。对1984年奖金的发放严格按规定缴纳奖金税。下达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工资总额计划和行政事业单位调资控制指标，实行总量控制。

鉴于第一季度工资增长过快，要求银行先以3月份为基数对工资性支出进行控制，随后再根据副食补贴和工资改革的需要增加现金支付的额度。在实行工资与上缴利税挂钩的国营企业开征工资调节税，对事业单位等也开征奖金税。

加强对外汇使用的管理，努力增加出口，争取外汇收支平衡。对地方、部门使用自有外汇的进口贸易，由国家下达进口用汇指标，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为严格控制重复引进、盲目引进和多头对外，对进出口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未取得进口许可证，一律不得自行进口，并对小轿车等一些商品征收进口调节税。在控制进口规模的同时，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出口创汇：一是调整人民币汇价；二是适当调高地方、部门和企业外汇留成比例，以提高出口创汇的积极性。

除上述措施外，还在8～10月份开展税收、财务信贷大检查和清理整顿公司，堵塞财政收入流失，制止税收和信贷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解决流通领域中的政企不分、以权谋私等问题。

紧缩措施从第三季度开始逐见成效，过热的经济逐步降温。工业的过高增长速度从7月开始回落。8月比上年同期增长17.5%，已降到20%以下，12月降至10.2%。投资规模初步得到控制。零售物价上涨幅度由第二季度的8.8%上升到10.1%后，年底才有所下降。

198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5%，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1.4%，国民收入增长13.5%，是一个高速增长之年。在生产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市场活跃，财政状况好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年初经济过热的势头有所降温。但从全年看，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然过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8%，超过上年增长的幅度，消费基金在前几年有较大增长基础上仍有巨大的膨胀压力；二是经济结构问题突出，粮棉等农产品产量下降令人担忧，能源、原料工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经济效益未有根本好转；四是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全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8.8%。另外，在经济紧缩中，基本上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老办法，控制总量时难免出现"一刀切"的情况。以上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有些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克服，但一时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有些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稳定发展。

二、"软着陆"，经济增速迅速回升与再度紧缩

鉴于1985年在经济过热的环境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种种矛盾，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制定"七五"计划建议中指出，"七五"期间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建议同时强调，必须保持适当的速度，进行必要的骨干项目的建设，使经济发展有后劲，使人民的收入不断有所增加。为此，"七五"期间

的经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要着重控制社会总需求，解决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搞在短期内削减建设投资的"急刹车"，以避免损失和震动，而是在1986年和1987年两年基本上保持1985年的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七五"后3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

根据"七五"计划的精神，1986年和1987年，国家在新的形势下尝试改善宏观调控办法，用"软着陆"的方式解决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调整结构以增加和改善供给；在从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生产上尽量放开，在力求经济稳定的同时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

为了实现投资规模两年踏步的设想，国家计划198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安排2280亿元，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1570亿元，都略低于1985年实际完成水平。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增加40亿元，主要用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农业和智力开发等方面，自筹投资规模要求比上年减少。为实现这个计划目标，国务院发布《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的若干规定》，要求坚持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均须纳入全国和分部门、分地区的投资计划，根据不同情况加以管理。在严格控制新建项目的同时，1986年对在建项目进行了清理，停建缓建了一批不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到年底，共停建项目589个，缩小规模202个，共压缩投资77.5亿元。1987年，计划安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70亿元，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1950亿元，略低于上年实际完成水平。为进一步改变在建规模过大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国务院提出了"三保三压"的方针。即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为了调整投资结构，通过发行重点建设债券，从地方、部门、企业集中了100亿元预算外资金，用于计划内的重点建设。同时扩大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改进预算外投资建筑税办法，对所有建设工程开征土地使用税。此外，鼓励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联合投资建设能源交通项目，按投资比例分享产品和利润。这些经济办法进一步扩大了重点建设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般加工工业项目，特别是计划外项目的膨胀。

1986年和198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的势头减缓。这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8.7%和16.5%，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7.7%和14.4%，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分别增长9.5%和12.6%，都大大低于1985年的38.8%、41.8%和44.6%的速度。

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整投资结构，加速重点项目的建设。1986年和1987年，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部门的投资分别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51%和52.7%。1986年国家按合理工期组建的190个大中型项目，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一大批重点骨干项目的进度加快，重点电厂的投产机组、煤矿井巷进尺、铁路正线铺轨、港口投产泊位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年内全国建成大中型项目97个，单项工程165个，其中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项目和单项工程209个，占79%。1987年国家按合理工期组建的206个重点建设项目超额9%完成年度

计划，建成大中型项目102个，单项工程193个，其中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部门项目占80%。在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中，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原油开采、新建铁路复线以及铁矿石、水泥、乙烯等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特别是国家重点电厂建设，两年完成1473万千瓦装机任务，使两年发电量以21.2%的较高速度增长。基础产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986年和1987年，投资膨胀的势头虽然有所减缓，但是未能实现国家预定的要求，投资规模过大仍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严重障碍。这两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8%，未能实现"七五"前两年投资踏步的要求。投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9.9%的速度，也超过工业增长30%的速度，和国家财力、物力仍不相适应。198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在建总规模近8000亿元，对下年投资规模造成极大压力。国家投资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虽然有所加快，但是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占投资比重尚未达到国家"七五"计划的要求，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薄弱的问题继续存在，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因此，继续控制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的任务仍很艰巨。

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国家在继续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从工资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消费基金管理等方面，抑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调节收入差别，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包括：坚持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农业的增长，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总水平基本不动，只对不合理的比价作必要的调整；坚持职工收入的增加要与生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除解决1985年工资改革后存在的遗留问题和工资类别问题外，不再实行新的升级措施；考虑到原有的改革需要补偿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上缴利润挂钩的试点暂不再扩大；严禁用奖励基金以外的资金搞新的津贴、补贴，对工资、奖金过高的单位，严格按规定征收工资调节税或奖金税。并通过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对城乡个体户依照十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调节社会各类人员的收入。在控制消费基金的同时，积极发展储蓄，引导居民消费基金分流。

为了贯彻"七五"计划"软着陆"的精神，1986年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在安排当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当前，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在紧缩银根、控制货币投放上，也有"一刀切"的问题。今年要继续解决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既要继续加强宏观控制，又要注意改善宏观控制；既要把膨胀的需求加以控制，又要改善供给；既要把超高速度降下来，又要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既要控制总规模，又要注意调整结构；在货币投放上，既要紧缩控制货币发行量，又要合理供应，满足生产与流通的需要。

在1985年年底工业生产增幅回落后，1986年年初工业增速进一步下降，1月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5.6%，2月为0.9%。由于前两年工业高速增长，许多企业盲目生产的产品滞销，加上企业补偿自有流动资金不足，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新建扩建企业没有相应安排一定比例流动资金等因素综合影响，在上年货币流通量增长24.7%、贷款增长22.1%（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1%、工业总产值增长18%的幅度）的情况

下，工业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为了支持工业的增长，3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用电传指示各地银行适当放松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控制，并提出“稳中求松”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政策。但在执行中，实际上是整个工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全面放松。到6月底，工业流动资金贷款额比年初增长238亿元，占全年计划增长额的95%。工业流动资金贷款放松后，整个贷款也随之全面放松。第四季度，在货币控制已偏松的情况下，12月又出现了年终突击贷款的现象，各项贷款增加了616亿元，相当于1～11月贷款额的56%。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工业生产速度从第二季度开始回升，9月超过10%，12月达到17.3%，全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7%，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1%。

1986年国民经济在“软着陆”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货币政策也由紧缩到扩张，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令人担忧的情况。1986年银行各项贷款增加1836亿元，增长29.2%。其中，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增加620亿元，超过年初计划的1.5倍，比上年增长38.7%；商业流动资金贷款增长16.8%；农业贷款增加312亿元，增长40.3%（乡镇企业贷款占农业贷款总额的64%）；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不包括建行）增长44.6%。到年底，现金净投放230亿元，比上年增长23.4%。贷款及货币投放增加有一定合理因素，如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生活货币化程度增加，拨改贷后企业流动资金主要来源由财政拨款改为贷款，等等。但货币投放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说明在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积压严重，效益低下。超发行的货币经过一段时滞，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1986年第四季度，全国物价指数上升趋势已经明显呈现，这预示着1987年物价走势令人担忧。

1987年年初，鉴于上年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仍保持和高于1985年的水平，特别是第四季度膨胀不亚于1984年同期规模，财政出现70多亿元的赤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采取“压缩过热空气”、“三保三压”和“双增双节”的方针。为此，召开省长会议、全国经济会议加以贯彻。3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要求从严控制贷款，坚决把货币发行量控制在计划范围之内。

1987年前3个季度，“压缩过热空气”的方针贯彻得不够坚决。上半年货币回笼没有完成计划，第三季度投放进一步增加。1986年第二季度以来货币扩张经过一段的时滞，已开始在市场物价上明显表现出来。从年初起，物价上涨幅度大体呈现逐月增大的“步步高”势态，几乎每月都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到8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8.4%。7、8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提出实行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并通过9月全国计划会议、体制改革会议、11月全国省长会议及银行、财政等专业会议大力贯彻执行。从10月起，为了紧缩银根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比例、提高中央银行对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收农村信用社存款、压缩乡镇企业贷款等一系列措施，到第四季度货币投放得到控制。当年现金发行量为236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长19.4%，增幅比上年低3.9个百分点；年末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9%，增长幅度低于上年9.5个百分点，货币投放速度明显低于上年。

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9%。工业总产值增长17.7%，是进入80年代以来仅次于1985年的高速增长之年。国内市场适销和出口创汇的轻纺电子产品增产较多；支农产品生产明显回升，增长约在二成以上；能源、原材料工业稳定增长，发电量增长10.3%，钢材增长8.2%，硅钢片、带钢等紧缺品种增长20%以上。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11.4%，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8%，农作物产量大多回升，粮食产量已接近历史最高产量的1984年，棉花比上年增长19.9%，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突破50%。外贸出口增长较快，进出口逆差大幅度缩小。居民收入和消费继续提高。

1986年和1987年，国家用"软着陆"的方式调整国民经济，物价上涨幅度有所回落，国民经济在"软着陆"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在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总供给，国民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如前所述，1986年和1987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未能实现两年踏步的要求。两年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基本得到控制，但由于预算外资金难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又大幅度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87年比1985年增长43.2%，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9.9%的幅度。在投资扩张的同时，国民收入以各种方式向个人倾斜，集团购买力连年猛增，消费基金膨胀的势头也继续发展。这两年职工人均货币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5.8%和9.8%，高于劳动生产率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虽然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职工人均实际工资增长并不多，但由于这几年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和实物收入，职工工资收入并不能反映全部收入状况。1986年和1987年，在国家统计的职工实际工资增长并不快而城镇居民消费又有较多增长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却分别比上年增长31.8%和33.2%，说明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局面仍在发展。

总需求是通过货币供应表现出来的。货币发行一般通过两个渠道，即财政发行和银行贷款。1986年和1987年国家硬赤字为70.5亿元和79.6亿元。年末贷款余额又分别比上年增长28.5%和19%，大大高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1%和10.9%舶速度。进入199年后，物价涨幅逐月增加（详见表1），1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5.0%，4月超过6%，5月超过7%，7月达到8%。9月和10月有所下降，是由于各地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国庆，加强了物价的控制，以及部分城市从这个时候起对猪肉、鸡蛋、食糖等重新实行限量、限价和凭证供应，人为地使物价上涨势头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11月又出现反弹，12月达到9.1%。1987年的物价走势预示着1988年仍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表1　　1987年1～12月全国零售物价比上年同期上升幅度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上升幅度	5.0	5.1	5.5	6.5	7.6	7.8	8.0	8.4	7.9	7.6	8.5	9.1

资料来源：吴敬琏主编《1987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55页。

物价连续3年较大幅度的上涨，不仅给改革和发展带来许多矛盾，也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1. 造成部分居民实际收入下降。这几年中国物价上涨的重要特点是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幅度高于零售物价总指数。如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7.3%，而食品类价格上升10.1%，其中鲜菜类和肉、禽、蛋类食品价格分别上升17.7%和16.5%。在居民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较高，食品类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变化影响更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1987年全国城镇居民中，实际收入下降的占调查总数的46%。其中赡养人口并未增加，名义收入没有下降，而单纯因生活费用价格上涨所导致的人均实际收入下降的占调查总数的21%，收入下降，消费也随之下降的占10%。这引起了城镇居民的强烈反应。

2. 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产量在1984年达到高峰后（油料是1985年），几年徘徊不前。1987年粮食总产量比1984年低433万吨，棉花总产量低201.3万吨，油料比1985年低50.6万吨。肉、禽、蛋的生产曾因价格放开，一度增长很快，终因粮食生产徘徊，饲料供应紧张，议价粮价格上涨过快，难以稳定增长，猪肉产量和年末生猪存栏数开始下降。加之几年人口的增长，1987年人均粮食产量由1984年的392.8公斤下降到371.4公斤，棉花由6公斤下降到3.9公斤，油料由1985年的15公斤下降到14.1公斤。农产品的生产状况及其供应的紧张，导致农副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并成为影响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的重要因素。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上涨7.3%，食品类价格上涨影响总指数上升4.7个百分点，在总指数上升中占64%。农业再度成为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重要问题。

基础工业、基础设施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加工工业的状况继续发展。交通运输量虽然超额完成计划，但却是建立在交通设施超负荷和带病运转基础上的，且仍不能满足客货运的需求。1986年和1987年一次性能源生产年均增长3.3%，大大低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年均增长9.5%和9.0%的速度。（详见表2）进入1982年以来，中国能源生产弹性系数连续4年保持在0.7左右，而1986年和1987年则下降到0.4以下。煤炭生产在经过前几年放开小煤窑、短水快流出现短暂时期较高增长后，再难以为继，这两年年均增长仅为3.1%；原油生产前两年增长速度都在8%以上，这两年增幅分别下降为4.6%和2.6%；发电量虽在两年中增长了21.1%，但仍大大低于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由于缺电，许多企业“停三开四”，不少项目建成后不能投产，全国因此每年损失工业产值2000亿元。能源生产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一步步加剧。原材料工业这两年增长速度不低，分别为10.7%和13.8%，但因加工工业增长更快仍不能满足需求。以钢为例，1987年产量达到5628万吨，比1985年增长19.8%，仍不能满足需要，当年还进口钢材1000多万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仍是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

表 2　　1987 年与 1985 年相比能源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　　单位:%

	一次性能源					发电量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	工业总产值
	总量	原煤	原油	天然气	水电				
增长幅度	6.7	6.4	7.4	7.4	8.2	21.1	19.9	18.7	31.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第 31、33、48、440、469 页计算。

3. 经济秩序较为混乱。经过几年的改革，中国进入了新旧体制交替的阶段。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但同时，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仍保持了对一部分重要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权力。由于经济管理体制处于过渡阶段，市场调节与行政调节结合部界限模糊，加之行政权力缺乏监督，行政管理缺乏透明度，使得“寻租”活动迅速蔓延开来。地方、部门、企业在改革中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具有强烈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冲动，但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对各利益主体发生的从局部利益出发损害全局利益的行为缺乏有力的制约。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在通货膨胀下产生的巨大差价（据估计，价差、汇差总计上千亿元，甚至数千亿元），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官倒”以及依托于“官倒”的“私倒”，在短期内聚敛巨额财富，成为暴发户，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三、改革与经济增长同时加速，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鉴于 1987 年前 3 个季度的金融和物价形势，1987 年 9 月召开的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把“紧缩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作为安排 1988 年计划的总方针。会议认为，1987 年的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不稳，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已成为整个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物价不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全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没有控制住，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总供给。不解决这个问题，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并把这种总量平衡建立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物价上涨的趋势就扭转不过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就会遇到很大困难。1988 年为稳定经济，稳定物价，要大力增加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的生产供应；保证重点建设，压缩一般性的建设，停建一批无效益的项目和楼堂馆所；从紧安排各项财政支出，准备连续过几年紧日子，缓解国家财政的困难；从紧安排各项银行贷款，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具体的宏观控制目标是：货币增发量控制在 170 亿元（后增加到 200 亿元）左右；财政赤字低于 80 亿元；市场零售物价指数低于 1987 年；外汇结存略高于 1987 年；农业生产速度保持 4%，工业生产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长 8%；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略高于 1987 年水平。

1987 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精神，提出的 1988 年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稳定经济，深化改革，以改革总揽全局。会议强调，保持经济稳

定发展，是长期的战略方针。稳定经济和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说要依靠深化改革。明年，要在深化改革的同时，继续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进一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和消费基金的增长，努力做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防止盲目追求过高速度的倾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1988年的经济工作方针在执行中发生了变化。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经济生活的种种矛盾，人们对于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如何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看法。关于1987年的经济形势和1988年的经济工作方针，理论界有人提出，通货膨胀在近期对中国没有形成威胁；有人认为实行“双紧”方针难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还有人提出国家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实现国民收入的强制性储蓄，为基础工业积累一部分资金，为一部分没有其他附加收入的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提高工资，以此来重新分配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些意见受到决策者的重视。1988年2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提出，1987年的经济形势相当好，全面好，批评有的人把经济形势看得过于严峻，也不同意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观点。他认为1987年物价上涨主要是蔬菜等副食品价格上涨过猛，是这些食品供应不足引起的，与银根松紧无关。蔬菜与猪肉的生产上不去，重要的原因是在价格改革上过分谨慎，调动不了农民的积极性。因而解决物价问题的主要出路，是下决心逐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促进生产的发展，同时给城市居民发食品补贴，把过去购销倒挂暗补的钱拿来补给市民，就可以安定民心。他还提出，宏观指导方针不能只注意稳住物价一头，而必须兼顾物价与增长两个方面，以后不要再提“双紧”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1988年年初起，经济工作方针只强调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而实际上放松了对财政信贷的控制，没有坚持把稳定经济放在首位。

1988年上半年，中国在加快改革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呈加速之势。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1985年第三季度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季度。第二季度又达到17.6%。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出口增长幅度大于进口，外贸逆差减小。

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尤为明显。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初步实施，进一步发挥了沿海地区的优势，吸引外资速度加快。“三资”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加速了这一地带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江苏、福建、山东、广东4省份，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达到24%～31%。新的财政包干办法，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增加了留利，也进一步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当然，由于在很热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多项改革在短期内迅速铺开，有些改革措施本身就具有过渡性，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没有跟上，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在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有的地区、部门没有量力而行，盲目铺摊子，加剧了业已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有的地区没有充分估计自身的优势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出现“大进”不能“大出”、或光出不进的局面。外贸经营权下放后，有的企业不顾国内物资平衡，盲目增加出口，出口了一些国内市场紧缺的重要物资，如生铁、镍和镍材等。审批外贸企业掌握不严，批准了许多“皮包”公司，助长了抬价抢购的不正当活动，干扰了内外贸的正常秩序。新的财政包干办法是以进一步向地方让利来刺激地方的积极性，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

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继续下降。地方盲目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地方之间封锁割据等问题有所扩大。企业承包经营实际上仍是软预算，增加的留利，大部分用于职工的分配，加剧了国民收入向个人的倾斜。

1988年上半年，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趋重，物价涨势迅猛。尽管进入1988年以后工业生产增长较快，社会供给进一步改善，但社会需求增长更快，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上半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总供给增长17.2%，社会总需求却增长31.4%。总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上半年，国内财政支出达94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出现较大赤字。(2)银行贷款明显增加，现金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货币投放增加。1988年年初贷款的规模就迅速扩大，3月份比上年同期多增加68亿元，到6月底，各项贷款累计增加556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3.5倍。银行现金支出增长45.9%，快于收入增长的40.7%的速度，收支相抵，净投放88.6亿元（上年同期回笼83亿元)。货币投放增加，有外汇占款、金银占款增加，企业承包合同兑现，以及农副产品收购增加等正常因素，但是，投放这么多，显然也有不正常因素，主要是消费性现金支出增长过快。(3)社会商品零售增长大于购进增长，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过快。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高于商品购进增长2.2个百分点，社会集团购买的消费品比上年同期增长19%。(4)各地所上项目较多，预算外投资增长20.9%。货币的超量发行，导致了物价的上涨。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1月比上年同期增长9.5%，3月达到11.6%，6月进一步达到16.5%，半年平均上涨13%。此时物价上涨的特点是，90%以上的商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涨价。不仅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居高不下，日用工业品也竞相涨价，成为推动整个物价水平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更大。据统计，到3月，工业企业购进的主要原料、燃料和动力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3.8%，其中化工类产品上涨29.3%，木材纸浆类产品上涨21.2%，农副产品类上涨15.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也很快，上半年化肥价格上涨19.3%，农药及农业机械上涨21.2%，农膜上涨57.6%。

物价上涨，使城乡居民生活开支加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上半年，由于物价上涨，影响城乡居民多开支310亿元，加上服务项目价格上涨，影响城乡居民多支出327亿元。其中，城镇居民多支出137亿元，平均每人每月多支出10多元，如扣除5月、6月两个月的物价补贴，人均每月多支出8元多。

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各地市场上抢购风此起彼伏。此次抢购风新的特点是：(1)参加抢购的人多面广；(2)抢购的商品从过去的紧俏日用品转向用以保值的高档商品；(3)抢购款从手用现金转向从银行取款，有的还提取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大规模的抢购风潮，导致主要商品库存减少。6月末，29种主要消费品库存中，有20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食糖下降42.3%，肥皂下降34.5%，洗衣粉下降33.8%，食盐下降20.2%。

在通货膨胀已日趋严重的情况下，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加速价格改革。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前后，原定的价格改革措施加快了出台的节奏。这

些措施集中出台后，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6月已比上年同期上升16.5%，7月又进一步上升到19.5%。当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时，尽管会议强调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不仅担心政府是否具有稳定物价的手段和能力，甚至怀疑政府稳定物价的诚意和决心，担心新一轮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触发了突击提款、大量抢购的全国性风潮。

从8月17日开始，福州、天津、上海、重庆、成都、北京、西安发生抢购风潮，尔后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和乡镇。抢购范围广，品种多，主要集中于价值高、易保存的工业品，部分地区还抢购粮食、食油。抢购来势迅猛，商品销售量大幅度提高。8月全国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8.6%，比上月增长了7.5%。主要商品零售量同上年同月相比都有大幅度增长，有的商品甚至超过1倍多。据有关部门统计，这次抢购风潮，抢购了约60亿元商品。商品抢购风潮伴随着挤兑银行储蓄存款。近几年来，中国居民银行储蓄存款连续大幅度上升，而当年8月份城乡储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62.8亿元。这次抢购提款，人们不仅动用活期存款，而且提取定期存款，反映了社会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

在全国性的抢购风中，银行现金投放增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进一步加剧了物价上涨。8、9月间，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超过20%，达到23.2%。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也继续大幅度上涨。据不完全统计，1~9月，15种生产资料计划内外销总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18.5%，比消费资料上涨指数还高。其中，煤炭上升18.5%，钢材上升20.9%，木材上升26.5%，铜铝上升40%，烧碱上升49.3%。

在通货膨胀中，流通秩序更加混乱。特别是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多头插手经营，中间环节越来越多。据统计，全国共有各类公司29万多户，包括分支机构为近48万户，其中将近40%是1986年下半年成立的。各种外贸公司5000户中，有2000家是1988年成立的。不少单位不顾国家有关规定，违法经营，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差价，就地倒卖，层层加价，牟取暴利，不仅搞乱了流通，而且败坏了改革的声誉。

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是中国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外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求大于供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过去近30年间，在传统体制下，决策权高度集中，对于需求和资金的供给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当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时，也会产生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但只要政府作出决策，就可以迅速控制需求与货币供给。进入80年代，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速度加快，资金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在以放权让利为重要特点的改革中，企业获得了较大经营和分配的自主权，但预算没有硬化，权力与约束机制不对称。企业在分配向个人倾斜、忽视自我积累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加留利，又千方百计争投资，争贷款。地方在实行财政包干后，为了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往往积极支持地方企业的争资争贷行为，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中央银行不独立，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快速增长与稳定之间摇摆不定，导致货币连年超量发行，需求过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薄弱，人民日用消费品供应不足，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改革

开放以来，市场开始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但价格体系还不合理，政企没有完全分开，各市场主体的产权关系尚未理顺，相应的政策法规尚待建立健全。总之，市场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国家指令性计划大大减少后，相应的管理制度没有跟上，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法律手段并辅之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经验还有待于积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结构加速转换需要国家加以宏观指导的情况下，一方面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还很多，另一方面一些必要的干预手段却被削弱。如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79年的31.9%降低到1988年的21.2%。由于行政支出具有刚性，价格补贴等支出又不断增加，基建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又从1979年的40.4%降低到1988年的23.4%，因而削弱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能力。在产业结构中，一方面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另一方面，在加工工业的发展中，由于地方割据，相互封锁，竞争不充分，导致重复建设，以小挤大，地区结构雷同，产品质量差，名优产品少，积压与供不应求并存的结构矛盾十分突出，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种经济深层次矛盾所造成的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中矛盾积累的结果。仅就当年情况而言，这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1.3%，工业总产值增长20.8%，总供给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在需求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5%，略高于1987和1986年，但大大低于1985年38.8%和1984年33.9%的增幅；职工名义工资比上年增长23.1%，高于1984年以来各年的增幅，但也只比1984~1986各年多1到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78.6亿元，略低于1987年；年末银行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6.8%，低于1984~1987年28.8%、33.6%、28.5%和19%的增幅。1988年各层次货币量增长与1984年以来各年之比较，除现金流通（M_0）量因居民储蓄意愿下降甚至挤兑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外，其他各层次的货币增长均低于前几年的平均增长水平。总的来看，1988年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进一步发展。而仅就当年而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与前几年相比并不显得十分突出。但却发生了全国性的兑款抢购风潮，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从上年上升7.3%骤然增至18.5%，职工费用价格总指数、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幅度也都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1988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因不仅是当年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问题，而主要是几年来超量发行的货币集中释放的结果。如表3所示，1984年以来，各层次货币量增长很快，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的幅度。以1987年与1983年相比，各层次货币量都成倍增长，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55.1%的增速，也高于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的94.5%的增速。说明货币投放、需求增长高于供给增长的速度，且超发行的货币远未被物价的上涨吸收而积累起来。而几年间积累起来的货币在1988年集中地释放，则是当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群众心理和实际承受能力估计过高、价格改革时机的选择不当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表 3　　1984～1988 年各层次货币量增长情况　　单位：%

	1984 年较上年增长	1985 年较上年增长	1986 年较上年增长	1987 年较上年增长	1988 年较上年增长	1987 年比 1983 年增长	1988 年比 1983 年增长
M_0	49.5	24.7	23.3	19.3	46.7	174.5	303.5
M_1	39.8	10.9	25.4	17.2	19.8	127.8	172.9
M_2	42.2	17.4	33.1	24.6	18.8	176.1	228.1
国民生产总值	14.7	12.8	8.1	10.9	11.3	55.1	72.6

注：《中国金融年鉴》是从 1992 年开始建立《货币概览》栏目系统公布有关资料的，不能满足本书考察期的要求。本表是根据各年《国家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66 数字计算的，各层次货币的内容与《中国金融年鉴（1992）》不完全一致。本表中 M_0 为现金流通量，M_1 为 M_0 + 企事业机关单位的活期存款，M_2 为 N_1 + 储蓄存款及汇兑在途资金。

综观 1985～1988 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首先要看到，这 4 年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 4 年。与 1984 年相比，1988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50.5%，年均增长 10.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41.7%，年均增长 9.1%；工业总产值增长 92.7%，年均增长 17.8%；全国居民人均年消费水平增长 33.3%，年均增长 7.4%。总之，1985～1988 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发展速度最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的时期。加上 80 年代初期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到 1988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这样，就为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与冲突，在经济运行中充满了矛盾。1988 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这些矛盾的集中反映。面对着通货膨胀严重的形势，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是必要的。但在紧缩中，如果不能结合改革，形成国有企业的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机制，形成存量调整的机制，60 年代那种强制性的关、停、并、转又难以做到，那么紧缩就不能很好地取得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成效，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依然存在，难以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第九章　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

鉴于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决定从1988年第四季度起，在今后几年的时间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88年第四季度到1989年第三季度，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严格控制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混乱的流通秩序，使经济过热趋缓。1989年第四季度到1991年年底，在继续贯彻紧缩总方针的同时，适当调整紧缩力度，着重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增加有效产出，解决市场疲软、工业生产滑坡的问题，以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到1991年年底，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国民经济经过短时期的萧条后恢复了正常的增长速度。短短几年的调整，只是初步缓解了经济生活中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初步治理整顿

一、治理整顿的决策和治理整顿初期的紧急措施

（一）治理整顿的决策

鉴于全国相继出现抢购风潮、物价上涨过猛和群众大量提取银行存款的情况，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召开了第十二次常务会议。会议讨论了市场和物价形势，作出6项决定：（1）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决定的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提出的改革目标，是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明年作为实现5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2）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决定；（3）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3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的幅度，以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4）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抓紧清理整顿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把今年的信贷和货币发行控制在国家要求以内。（5）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6）各级政府要组织好市场供应，严格市场管理，认真整顿市场秩序。并于当日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管理工

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时地分析了形势后，于1988年9月下旬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认为：当前，中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突出的是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能从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更需要从工作上加强管理和控制。必须充分认识到遏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下最大的决心，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向的前提下，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在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为理顺价格创造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否则，不但价格改革很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损害我们1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治理整顿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首先确保明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这是明年一切工作的中心。根据这一目标，会议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

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具体措施是：1.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压缩500亿元，大体相当于1988年实际投资规模的20%，只能多压，不能少压。要对基础产业采取倾斜政策，对涉外项目采取保护政策，合理调整投资结构。2.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3.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办好保值储蓄，开辟多种渠道，包括出售公房和发行股票、债券，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4.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1989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些。在抑制总需求膨胀的同时，要用很大力量来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努力发展农产品、轻纺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紧俏产品的生产。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必需品要减少出口，保证市场供应。特别要解决好粮食和“菜篮子”问题。

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其一，要坚决刹住物价上涨风，坚决制止一切违反国家规定哄抬物价的行为，非法涨价收入必须上缴国家财政。其二，要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所有公司，除极少数经国务院批准行使一定管理权的以外，都必须限期同党政机关脱钩，依法经营，否则就吊销其营业执照。其三，要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对流通秩序混乱的重要产品，尤其是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有的要实行专营，有的只许在国家统一市场上交易。其四，要加强宏观监督体系。必须坚持在中央集中统一指挥下，强化计划、银行、财政、税收、海关、铁路等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发挥这些部门的监督作用。其五，要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

（二）治理整顿初期的紧急措施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政府以稳定市场、金融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稳定市场，遏制物价上涨，稳定民心。国务院继8月30日发出紧急通知后，又于10月24日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内容包括：采取坚决措施稳定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以及已实行定量供

应的大城市定量供应的猪肉价格一律不动，大城市的大路菜实行计划价格不能放开，大中城市要由市长负责，保证“菜篮子”价格基本稳定；同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工业品，要安排好生产和供应，对这些商品的价格要按管理权限，分别进行整顿，严格管理；对已放开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大中城市应选择一批比较重要的品种，实行工商企业提价申报制度。坚决制止农用生产资料乱涨价，对实行专营的化肥、农药、农膜核定综合零售价格，公布执行，并进行价格大检查。严格执行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的最高限价，对石油、铜、铝、紧俏钢材等实行统一经营，严禁倒卖；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可按地方审批临时价格的规定暂停执行。整顿城市公用事业和服务行业收费。严肃物价法纪。

稳定金融。主要措施包括：1. 提高储蓄存款利率，稳定居民储蓄存款。1988 年 9 月 1 日和 1989 年 2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居民定期存款利率，并于 1988 年 9 月 10 日开办了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对 3～8 年的定期储蓄存款，在当时利率的基础上，按照储户收益率不低于物价上涨幅度的原则，由人民银行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零售物价指数，按季公布全国统一的保值贴补率；许多地方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有奖储蓄。2. 控制贷款规模，紧缩银根。1988 年 8 月和 9 月两次作出决定，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严格金融管理，控制货币发行。各地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整后的贷款计划和货币发行计划严格执行，不得突破。银行的货币和信贷在核定的指标内，重点保证农副产品、外贸出口产品的收购、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流动资金、国家计划内的重点建设项目合理资金的需要，以及群众提取存款的现金支出，积极支持农副产品和适销对路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对国家计划外项目，非生产性项目，自筹固定资产项目，倒买倒卖、抢购囤积物资的企业和公司等 10 个方面不予贷款。专业银行之间拆借资金，最长不得超过 3 个月。从 10 月起，各级各类信托投资公司一律停止发放贷款或投资，一律停止拆出资金，并坚决清理整顿信托投资机构。努力挖掘资金潜力，按照 1987 年年底企业流动资金占有水平加速资金周转 3%的要求，采取先扣后调的办法由各专业银行扣回企业的贷款。严格控制现金支出。认真落实国务院颁布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对各单位的现金库存进行检查，超过核定现金库存的必须限期送存银行；加强银行柜台监督，对支付现金严格审查。10 月，在全国开始组织开展信贷大检查。

清理在建项目，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8 年 9 月 24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随后，又发出《关于全面彻底清查楼堂馆所的通知》，决定开展一次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清理工作，大幅度压缩投资规模，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要求清理停建的项目主要包括：国家计划外项目；非生产性项目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所需资金、材料和生产所需燃料、动力、运输条件不落实的，或市场不急需的，或属于高耗能的、全国原材料平衡不足的等项目。

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是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国务院于 1988 年 10 月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 1987 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1988 至 1989 年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 20%，按照下达的控制指标，逐级核定，层层落实。并将原 19 种专项控制商品扩大到 29 种，严禁购买彩色电视机、国产 13 种名牌卷烟和进口烟、国

产13种名牌酒和进口酒。为了控制工资性现金支出，要求从10月起，各单位的消费基金一律维持在8月的水平上，超过部分银行不支付现金。

加强市场管理，对重要生产资料和商品实行专营。1988年8月和9月分别作出加强棉花和粮食营销管理的通知。决定棉花由供销社统一经营，关闭棉花市场；大米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经营，同时逐步建立粮食批发市场，有秩序、有组织地进行市场调节。9月28日作出决定，对化肥、农药、农膜销售实行专营，由供销社和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统一归口经营。11月11日国务院在强调钢铁企业必须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和整顿钢材市场的同时，决定对市场紧俏的薄钢板、冷轧硅钢片、镀锡钢板、镀锌薄钢板等实行专营，对部分计划外钢材实行定点定量供应。1989年2月1日决定对彩电实行专营。另外对已由生产主管部门管理的467种物资进行清理整顿，制定新的管理办法，其中少数短缺原材料、燃料中属于重点企业生产部分，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

清理整顿公司。198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流通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着重解决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问题。此次清理整顿的重点是1986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在此之前成立的公司，凡问题严重的，也要进行清理整顿。在清理整顿中，除国务院直接授权极少数公司承担某些行政管理工作外，取消其他所有公司的行政职能。各级行政机关和群众组织不得用行政经费、事业费、专项拨款、预算外资金和银行贷款开办公司。已经开办的公司，要限期在财物上与机关脱钩。已向公司投入的资金，一律作为国有资产，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各机关不得向公司收取资金和实物，用于本机关的财物开支和职工的福利开支。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不得到公司（企业）兼职，已经兼职的，限期辞去公司职务，或辞去党和国家机关职务。各类公司必须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依法纳税。严格公司审批手续。

（三）紧急措施的效果

以上各项紧急措施实施后，到1990年年初，开始有所收效。

居民储蓄逐渐回升。1988年9～12月城镇居民储蓄存款由8月净减26亿元迅速回升到净增23亿元、53亿元、50亿元和91亿元，12月储蓄率已达25.5%，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信贷规模得到控制。1988年9～12月银行贷款规模比上年同期少增加400多亿元。从全年看，年底贷款余额只比上年增长16.8%，低于前几年的增长幅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受到限制。截止到1990年2月底，全国已经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8万个，可压缩今后几年的投资647亿元，占全部项目剩余工作量的12%。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幅度过大的势头有所控制。1988年县以上单位集团消费比上年增长1.8%，增长幅度大大下降。清理整顿公司也初见成效。

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下降，回旋余地很小，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不足，这次经济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作为资金的“总闸门”的银行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来实施的。紧缩信贷是中间需求的紧缩，要在最终需求上表现出来，还要经过一个阶段的时滞。1988年的紧缩银根是从第四季度开始的，第四季度为收购农副产

品以及企业准备来年生产的生产资料，增加货币投放是必需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紧缩的力度。且在银行抽紧银根后，企业大量经济活动进行现金交易，将现金收入用来支付工资、奖金、集团消费和购买生产资料，逃避银行结算和监督，拖欠应偿还的欠款、银行贷款和国家税收。因此，中间需求虽已紧缩，但最终需求过旺的势头短时间内还难以得到抑制。1988 年 9 月至 1989 年 2 月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32.6%；第四季度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26.1%，大大超过 1～9 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16%的速度。零售市场仍很旺盛，1988 年第四季度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27.4%，1989 年第一季度还维持在增长 22.6%的高水平上，其中 3 月为 24.6%，比 2 月还反弹 4.6 个百分点。在最终需求的拉动下，1988 年最后 3 个月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比上年同期）都在 26%以上，1989 年 2 月达到最高点，为 27.9%。

二、治理整顿具体目标的提出及各项措施的全面实施

（一）治理整顿具体目标的提出

为了继续搞好治理整顿，1988 年年底和 1989 年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与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 1989 年计划和经济工作方针按照继续紧缩的精神进行了安排。会议提出了治理整顿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即用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实现以下目标：

1. 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2. 遏制通货膨胀，使 1989 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 1988 年，1990 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

3. 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

4. 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

5. 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的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

6. 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实现了这些目标，就能使我国经济的素质和效益明显提高，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了实现治理整顿要达到的目标，1989 年计划的宏观控制目标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使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 4%，工业生产增长 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比上年压缩 20%以上；国家预算赤字和货币发行量都要低于上年；通过切实控制需求，增加和改善有效供给，使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上年。

（二）治理整顿各项措施的全面实施

根据上述精神，1989 年的经济工作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展开的。

坚决压缩社会总需求。1989年计划安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比上年压缩920亿元，减少21%，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规模压缩510亿元，减少19%。压缩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关键是清理在建项目。不仅砍掉了一批楼堂馆所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还停建缓建了一批生产性的建设项目；一些应该上的项目，也根据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的可能，区别轻重缓急，重新加以安排。1989年3月国务院制定颁布了治理整顿时期具体的产业政策。按照投资的产业序列，在基本建设中，适当压缩了电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机械、住宅和其他非生产性建设，适当增加了农业、铁路、煤炭、教育等行业的投资；涉外项目原则上保留，但也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加以区别，推迟了一批项目的建设进度；技术改造中新建和单纯扩建的项目基本上都停建缓建了，主要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和地方煤矿、节能节材、市场紧缺、出口创汇的项目。减少银行特别是非银行机关的投资贷款。对银行投资贷款，一律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城乡集体和个体经济银行基本不给投资贷款。

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坚决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控制消费需求的重点，一是坚决压缩和控制社会集团消费，要求1989年全国社会集团购买力在上年的水平上压缩20%。二是严格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通过加强对工资基金的管理，来改进和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使职工工资增长真正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通过整顿和加强企业自有资金的管理与监督，制止滥发各种补贴和实物；按照国家的规定，征收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三是健全个人应税收入的申报制度，进一步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工作，以逐步缓解收入差别悬殊的矛盾。四是通过压缩投资规模、整顿公司、关停并转企业和优化劳动组合，清退压缩近几年从农村进城的基建包工队、农民临时工和计划外用工，严格控制从社会招工中补充自然减员。五是采取增加居民储蓄、推行住宅商品化等多种措施，引导购买力分流，吸收和推迟一部分当前的消费需求，以利于稳定市场。

努力调整结构，增加有效供给。首先是力争农业有个好收成。1988年年底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提出加快农业发展的要求和相应措施。1989年各地农村广泛发动组织农民积极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整修和建设水利工程，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要求农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要求认真贯彻合同订购粮食与平价化肥、柴油和订购金“三挂钩”的政策，增加挂钩化肥的供应数量；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棉花、油料分别提高了16%、20%和6%～7%，并取消粮食“议价转平价”的任务，使农民通过增加进入市场议价销售粮食的数量获得更多的收益；在资金投入方面，中央安排的农业支出比上年预算增加了20亿元，地方支农资金也有所增长，并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以期形成农业发展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

其次是支持交通、通信、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产业的发展，并采取扶持先进、讲求效益、区别对待、保证重点的原则。积极发展以铁路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高运输系统的综合效益。煤炭工业加强统配煤矿的建设，继续扶持、引导地方煤矿健康发展。石油工业在努力寻找新的储量和不断开发新油田的同时，主要是通过在老油田挖

潜，保持原油产量的稳定增长。电力工业在加强重点建设的同时，坚持多方办电的方针，增加电力生产能力。原材料工业通过积极调整结构，限制能耗高、效率低、污染大的企业的生产和建设，在调整中适度发展。

最后是严格控制加工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通过控制贷款、财政手段和其他各种办法，控制和压缩长线滞销、质量差、过多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的一般加工工业，对那些没有正当原料来源、重复建设的家用电器厂、易拉罐厂、小棉纺厂、小毛纺厂、小烟厂、小塑料厂、小铝厂等，坚决关闭一批。努力增加名优产品和市场紧缺、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

（三）治理整顿的初步成效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到1989年年底，治理整顿初见成效。

国民经济继续增长，控制社会总需求取得明显成效。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4.4%和3.7%。投资规模得到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138亿元，比上年下降8%，压缩359亿元。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2535亿元，下降8%。如扣除涨价因素，全社会投资实际工作量压缩20%。消费需求有所控制。1989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261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6%，扣除物价影响，下降3.2%（在城镇居民中，还有一部分难以统计的“隐性”收入，如果把这部分包括进去，实际收入下降会减少些或收入略有增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02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5%，扣除涨价因素，实际收入水平亦有所下降。在供给增加、需求压缩的情况下，社会总供求矛盾缓解。据测算，当年社会总供给为1639亿元，社会总需求为17687亿元，供求差率由上年的16.2%下降为8%，由于市场物价上涨已将差额部分吸收，因而当年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

货币投放得到控制，物价涨幅逐月回落。1989年前3个季度信贷紧缩，银行实行了保值储蓄等多种措施，使银行货币收支状况有所改善，货币投放明显减少。全年现金发行210亿元，比计划少190亿元，明显低于上年680亿元的水平。年末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年末增长9.8%，大大低于上年增长46.8%的幅度。1989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17.8%，略低于上年，但物价变动趋势是涨幅逐月下降。（详见表1）2月达到最高点，为27.9%，3月起涨幅转为下降，7月已低于20%，9月后降至10%以下，12月降至6.4%。月环比指数前5个月涨势逐步趋缓，后7个月逐月下降。

表1　　1989年各月与上年同期相比零售物价上升幅度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上升幅度	27.6	27.9	26.3	25.8	24.3	21.5	19.0	15.2	11.4	8.7	7.1	6.4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90）》，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Ⅱ-51页。

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有所缓解。1989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5%，基本实现国家计划。基础工业产品生产3月以后逐月上升，全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6.1%；原煤产量突破10亿吨大关；钢产量超过

6000万吨，进入世界4大产钢国之列；10种有色金属、硫酸、纯碱、化肥、钢材等主要原材料产品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农业取得较好收成。粮食产量40755万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副食品生产比较好，猪牛羊肉产量增长6%，其中猪肉产量增长5.2%，水产品增长8.6%，蔬菜、禽蛋、水果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主要经济作物因种植面积缩小而产量下降。交通运输有新的发展，年货物周转量比上年增长7.4%。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工农业增长比例，由上年的5.33：1调整到2.74；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由上年的0.44上升到1.6；货运增长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比例，由上年的0.67：1上升到1.95：1。

三、经济紧缩中的市场疲软与工业滑坡

一年多的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成效，1989年国民经济总体上还是上升的，但其走势出现了由热到平然后趋缓的过程。

这种趋势首先是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1989年第一季度，受上年经济过热的影响，市场商品供应紧张，多数商品销售旺盛。3月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6%。从4月开始，涨幅逐月回落。6、7月多数商品销售转为平淡。从8月起，多数商品销售由平转滞，市场出现明显的销售疲软，8～12月，连续4个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负增长。从全年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8.9%，扣除涨价因素，实际下降8.9%。农村消费市场比城市更加疲软，全国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仅比上年增长5.2%，扣除涨价因素后，实际下降14%左右。在各类消费品中，穿、用商品的销售量降幅大于吃的商品，尤其是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降幅最大。

抑制过旺的消费需求，这本是紧缩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但是，消费过于紧缩，市场疲软，与对群众在抢购风潮中所表现的购买力估计过高，对大幅度物价上涨所消化的购买力估计不足，对分流购买力估计偏大有关。对耐用消费品调价过高也抑制了正常消费。另外，农贷资金被挪用，农产品收购打白条，限制了农村购买力的增长。

从第二季度起，生产资料市场多数物资供应也从紧张趋于缓和，第三季度市场出现疲软。全年全国物资系统生产资料销售额比上年下降0.8%，如扣除涨价因素，实际下降18.2%。但不同的产品、品种情况差别很大，有些物资品种供过于求，滞销积压，同时部分物资品种仍然供不应求。生产资料市场是紧缺与滞销并存。

在市场由平转衰的同时，工业增长速度也随之迅速回落。与上年同期相比，1989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0.8%，但从月度看，增幅从4月已开始逐月下降。下半年回落加快，7月增幅为9.6%，8月为6.1%，9月猛降至0.9%，10月出现了负增长，以后稍有回升，11月增长0.9%，12月增长3.4%。从所有制看，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速度最低，但增长速度回落幅度也最小；集体所有制工业、乡镇工业、其他类型工业增长速度高于全民所有制，但增长速度回落幅度也更大。从部门或产业看，工业生产速度的滑坡因受到不同产销率的影响而有所差别。全年轻工业总产值增长8.2%，低于重工业增长8.9%的幅度，这是近10年少有的。而在重工业中，基础产业稳步发展；重加工业

如机电工业则下降幅度很大，如机械电子工业系统的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25.2%降至2.4%。

市场疲软，工业生产滑坡，造成社会、经济生活产生许多困难。

1. 企业经济效益恶化，财政困难加剧。由于商业销售下降和工业速度放慢，加上经营管理没有改善，工商企业经济效益明显降低。1989年，预算内国营工业实现利税仅比上年增长0.2%（其中利润下降18%，税金上升16%）；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37亿元，增亏1.2倍。可比产品成本上升22.4%。1989年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系统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37.9%；亏损企业增亏43%。工商企业效益下降，使得当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企业亏损补贴增加153.3亿元，直接影响财政收支平衡。1989年财政赤字92亿元，突破了74亿元的年度赤字预算。

2. 就业压力增大，部分居民生活发生困难。据统计，当年12月末全国全民和城镇集体企业停产半停产的职工达65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6%，致使一部分职工收入下降，生活困难。80年代末是中国城镇需就业人口增加的又一个高峰。近10年来，中国通过发展城镇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口。但在1989年的紧缩中，城镇集体、个体、私营经济也不景气，停工歇业较多。据统计，城镇集体职工比上年减少54万人，个体劳动者减少11万人。这就加重了就业的困难。1989年年底，城镇待业人员已达到378万人，待业率由上年的2%上升到2.6%。在农村，各类乡镇企业减少了20多万个，职工减少了179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也十分突出。

压缩经济过热空气，放慢工业发展速度，遏制物价大幅度上涨，是为了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混乱，并在调整中压缩长线，拉长短线，改善结构，增加有效产出，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经过一年的治理整顿，各部门、各产业增速回落幅度的差别反映了经济结构在紧缩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调整。由于在经济紧缩中投资规模受到限制，增量调整力度减弱，结构调整的速度更取决于存量调整的能力。1988年，乡镇企业，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内的其他类型工业下降幅度最大，亦即调整幅度最大，且在调整中，要素较易进行重组。这些经济成分虽然下降幅度大，但在政策、贷款条件很差的条件下仍能保持较高的速度，也说明它们在调整中更能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而在现行体制下，在工业总产值中占56%的国营企业尚未形成存量调整机制，在市场萧条中产品积压，占用大量资金，无法通过要素重组形成新的有效生产能力，导致整个经济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速度缓慢，不仅加剧了经济的困难，而且对增加资金投放造成巨大的压力。

从1989年的经济运行状况看，通过一年的治理整顿，一方面社会总需求有所控制，物价涨幅回落；另一方面市场疲软，工业生产下滑，经济生活发生困难，而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治理整顿过程中的进一步暴露。这表明治理整顿已到了一个新的关键阶段。

第二节　进一步治理整顿

一、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决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了经济形势，于1989年11月上旬召开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会议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3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即：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求相适应；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在着力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6%；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

根据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199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继续坚持和改进总量控制的同时，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来。进一步降低通货膨胀率，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计划控制在低于上年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规模与上年持平，并切实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从严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国家预算赤字低于上年水平。1990年计划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工业总产值增长6%，农业总产值增长4%。根据治理整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八五”计划建议的精神，1991年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在坚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改善经济秩序，坚持总量平衡的同时，进一步强调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积极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正常循环和适度增长。当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工业总产值增长6%，农业总产值增长3.5%，在执行中争取超过；合理安排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和物价总水平，并保持投资规模和消费需求适度增长；努力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各项改革，进一步扩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二、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与启动经济、调整结构

根据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1990～1991年的经济工作是围绕着以下工作进行的。

（一）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努力稳定金融，平衡财政收支

1990～1991年经济工作的总精神仍是坚持“双紧”方针，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但根据市场情况，适当调整了紧缩的力度，并着力调整投资和需求结构。在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规模在1989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1990年又下降3.8%；1991年增长较快，实际投资规模比上年增长9.1%，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7.7%的增幅，但明显具有恢复性质。从总体看，这两年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在投资结构上，一方面计划安排对国家确定的重点行业和部门进行倾斜，一方面压缩一般性加工项目的建设，不搞新的楼堂馆所。同时，改征收建筑税为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差别税率，率差高达30个百分点，以引导建设资金的投向。在消费基金方面，在经济紧缩时期，国营企事业和行政机关普调了一次工资，同时对集体企业的职工收入加强了管理，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也得到加强。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房改试点加快，个人金融投资领域的初步开拓，对于消费基金的分流和向生产基金的转换开始发生影响。

在治理整顿期间，稳定金融、改善财政的工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紧缩银根后，企业产品大量积压，“三角债”扩大，生产滑坡，效益下降，亏损增加，财政增收困难加大，资金紧张。进入治理整顿新时期后，一方面内债已进入还债高峰，外债还本付息又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清理“三角债”，启动工业，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则要求适当增加资金投入。为了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避免发生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开源节流、增收节支、融通资金的任务就十分艰巨。在财政方面，狠抓工商企业的扭亏增盈，提高了商业零售环节营业税税率，大力加强税收征管工作，清理拖欠税款，增发专项债券，有上缴任务的省市适当提高上缴比例或减少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补贴。另外，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减少补贴和外贸体制改革取消外贸亏损补贴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的负担。在金融方面，一是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继续对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从严要求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活动统一纳入全社会信用规划，进行总量控制。二是督促并积极支持工商企业抓好清仓利库，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三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方便储户，吸收储蓄存款，特别是比较固定的长期存款。四是在整顿的同时努力完善和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发挥金融市场集资、融资的作用。

通过两年的努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基本平衡，在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的同时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二）启动经济，保持工业生产的适度增长

经过一年的经济紧缩，1989年下半年，市场销售下降，工业生产增速也大幅度回落。市场疲软、工业滑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从1989年第四季度起，中国政府多方启动市场，促进工业生产的回升。1989年前3个季度严格控制贷款发放，1～9月仅新增贷款601亿元。从第四季度起开始放松了贷款紧缩力度。第四季度增加贷款1251亿元，为全年贷款增加额的67.5%，超过前几年第四

季度平均贷款增加额约300亿元，使当年年底贷款余额和广义货币比上年增长幅度均已超过1988的增幅。然而贷款急剧增加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原因是1989年第四季度贷款增加主要是扩张中间需求，即增加商业和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在最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启动中间需求难以奏效。伴随着银行贷款增加，一方面是产成品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企业资金仍然紧张，企业间“三角债”扩大。据统计，1989年银行新增流动资金贷款中有56%转化为库存。到年底，市场和工业生产仍处于低迷状态。

1990年和1991年为启动经济进一步扩大资金投放。这两年银行年底贷款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22.2%和19%。最初仍主要是增加流动资金的投放，用于国家确定“双保”的大中型企业生产资金，以及外贸进出口和商业物资部门的收购资金，发挥商业部门的蓄水池作用。随后转向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为保证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上年实际规模，调整年初计划，追加投资450亿元，主要用于计划内重点项目、企业技术改造、城市中低档职工住宅建设和以工代赈的水利和公路建设。1991年又进一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计划安排比上年增长14%。除国家财政增加投资外，银行增加了固定资产贷款。从1990年3月起开始增加固定资产贷款投放，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逐步到位，使固定资产进度加快，到年底固定资产贷款余额比上年年底增长26.5%。1991年投资贷款增长进一步加快，年底余额比上年增长35.6%。两年都大大高于1989年13.9%的增幅，也高于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幅度。配合全国性的清理“三角债”，发放启动资金。1990年的重点是带动大中型骨干企业收回贷款，清理“三角债”1500亿元。1991年又注入贷款306亿元，在结合限产压库解欠流动资金的同时，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欠款，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清理“三角债”1360亿元。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适度引导市场消费和投资，人民银行于1990年4月、8月和1991年4月3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以利于增加消费，扩大生产和销售，启动市场。

从1990年4月起，适当放松了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控制力度，全年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了6.2%，1991年又增长19.7%。随着资金的注入、“三角债”的清理，企业资金困难的状况有所缓解，开工增加，以及固定资产建设进度加快和政策性的调资，1990年和1991年职工工资总额有较大幅度增长，分别比上年增长12.7%和12.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6%和7.1%），有利于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但随着物价的稳定，城镇居民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储蓄倾向加强，而农村居民因多种原因收入增长缓慢，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消费回升的速度。总的来看，社会集团消费需求的回升高于居民，城镇高于农村。

（三）努力调整结构

1. 集中力量办好农业，争取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有一个好的收成。具体措施主要有：

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1990年中央掌握的基本建设中，用于农业的投资比上年增长30%，财政支农资金增加17.7亿元，地方政府也拿出一定财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1991年国家又安排了多项资金用于农业的开发建设。（1）国家财政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增加20多亿元，新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10亿元；（2）农业贷款

增加100多亿元；(3) 农业发展基金投资16亿元，从乡镇企业新增税收中提取10亿元作为粮食发展基金。另外，乡镇企业“以工补农”资金比上年增加11.2%；用于农村的各项事业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15.5%。农民劳动投入大幅度增加，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努力恢复和提高原有水利设施的效益。

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自1989年国务院发出《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通知》以来，各级政府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的自觉性和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大大增强。1991年，国务院又明确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国家在基层的事业单位的性质，提出了积极兴办经济实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随着“丰收计划”、“菜篮子工程”、“温饱工程”等科教兴农项目的扩大和实施，加快了实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在继续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努力完善和发展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建立健全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科技、供销等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同调动农民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结合起来。

增加粮食储备，推进市场体系建设。1990年国家开始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安排收购专储粮食200多亿公斤，1991年继续扩大投资，增加储备指标，专项储备粮已达300多亿公斤，这对缓解1990年以来出现的卖粮难、储粮难，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粮食生产，保证市场和粮价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91年国家还提高了城镇居民的口粮销价，并在建立郑州全国小麦批发市场和区域专业市场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搞活农产品的流通，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多种交易形式，逐步发展农产品期货交易，向着形成长期稳定的购销渠道、市场联系和合理分工，以及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乡镇企业一度因经济和政策环境恶化，发生很大困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乡镇企业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各级政府由此加深了对发展乡镇企业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了对乡镇企业的引导、扶植，一些地区还明确要求清理不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落实有关扶持乡镇企业的各项政策，逐渐形成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大气候。乡镇企业也根据适应“两个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结构，逐渐走出困境，重新得到较快发展。

2. 在努力启动市场的同时，积极调整工业结构。(1) 增加全民所有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加大增量调整力度。通过投资倾斜政策，改变了1985年以来全民所有制投资比重下降的趋势。1990年和1991年全民所有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从1989年的61.4%提高到6.6%和6.7%。(2) 对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实行“双保”。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选择了234个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影响，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比例大，经济效益好，出口创汇多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1990年计划工业产值中占全国大中型企业产值的46%，上缴利税占预算内工业企业上缴利税总额的35.2%，决定对这些企业实行“双保”的倾斜政策。按照“双保”的要求，这些企业保证向国家上缴利税385亿元，上缴统配原煤2617万吨、原油1.36亿吨、发电量3671亿千瓦时、钢材2617万吨、化肥1386万吨、汽车8.06万辆、

发电设备695万千瓦。国家和地方对这些企业所需能源、原材料、运输和资金等主要生产条件，优先保证供应，使它们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优先发展。(3) 引导企业努力开发新成品、新品种，增产名牌优质产品、市场紧缺产品、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特别是扭转前一段工业企业开发新产品围绕着城市消费浪潮的偏向，努力增产适应农村市场适销的消费品。(4) 围绕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增加出口创汇和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能力，推广一批科技成果，并增加资金，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

3. 利用价格回落的时机，出台了一系列价格改革措施。提高了粮、棉、油、糖料、油脂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进一步理顺工农产品和农业产品内部比价；从1989年年底开始着手进行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提高了计划内原油、部分钢材、化工产品、煤炭和纺织品等19大类产品的价格；各地也相继调整了一部分地方产品和服务费用价格。1991年又相继调整了钢铁、水泥、原油、铁路货运等价格。通过价格改革，生产资料计划内外价格差距缩小，有的实行了并轨。上游产品和服务费用价格的高调，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继续整顿市场秩序，努力搞活流通

在清理党政机关办理的公司取得一定成效后，各部门对各类公司进一步进行了全面整顿。金融系统着重清理了各种直接和间接从事金融活动的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性公司。外贸系统着重清理了1988年以来新成立的各类外贸公司，商业系统和物资系统重点清理了批发市场。其他如交通运输、邮电系统、旅游系统等，也都整顿了各种违法经营或不具备条件的各种公司。在整顿公司的同时，明确划分了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从事批发和长途贩运的范围，对计划外自销的生产资料，强调公开销售制，做到货源数量公开、价格公开、销售对象公开、结算方式公开，重要生产资料继续规定最高限价，初步扭转了市场混乱的局面。

在整顿市场秩序的同时，努力搞活流通。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发挥主渠道和蓄水池的作用，努力做好农副产品收购工作，做好主要商品的购销和地区间的调节工作，特别是采取多种形式，开拓农村市场，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允许一部分集体、个体商业经营某些小商品的批发业务，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对过去已经放开而这两年又管起来的商品，区别情况，有的继续加强和改善管理，有的继续放开价格，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在市场销售持续疲软的情况下，一些地区为了摆脱市场疲软造成的经济困难，强化地区产品的收购和销售，以图保护地方经济的发展，致使地区封锁现象日趋严重。为此，1990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

（五）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1989年春夏之际政治风波后，中国发展对外经济环境一度急剧恶化。中国政府积极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不利因素，克服暂时困难，努力扩大对外开放。按照优化出口结构，内外销兼顾的原则，减少短缺的资源性产品出口，利用国内市场疲软的有利时机，挤出适销对路产品，扩大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轻纺产品也向着精加工、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企业与外贸部门密切配

合，适应国际市场变化，更新花色品种，提高品种质量，改善产品包装，改进服务，严格信守合同，维护对外信誉，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为了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对汇率和外贸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合理是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1979年以来，中国多次对汇率进行微调，但是由于国内物价的不断上涨，抵消了汇率调整对增加出口的刺激作用。1989年年底，利用通货膨胀受到遏制、物价涨幅回落之机，中国政府较大幅度下调了人民币汇率，这对于此后两年出口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解决多头对外，对内抬价收购，对外低价竞销等一系列问题，适当调整了进出口产品的分类范围和经营分工，统一进出口和联合经营的品种适当增加，统一对外，以避免盲目竞争，防止肥水外流。1991年国家还对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即取消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建立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使外贸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度的轨道。这次改革改变了外贸长期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吃大锅饭的局面，为外贸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稳定和完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区的基本政策，努力办好现有的三资企业，并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改进投资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着眼，1990年4月中国政府作出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外商到浦东投资的优惠政策，有关开发和开放工作逐步展开。

1990～1991年，经过多方努力，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继续发展。199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其中出口增长18.2%，进口下降9.8%，在连续6年入超以来，首次出现出超87.5亿美元；1991年进出口总额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5.8%，进口增长15.2%，出超81.2亿美元。国际旅游业务走出低谷，回升较快，非贸易收入增加。国家在这两年外汇结存连续增加，为进一步扩大进口、迎接偿还外债高峰打下一定基础。外商投资也逐年增加，两年协议资金185.7亿美元，实际利用78.5亿美元，续建和新建了一批项目，这些“三资”企业产品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于中国出口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出口增长幅度高于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这对于启动工业回升，保持国民经济一定的发展速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两年的进一步治理整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平衡，物价增幅大大回落，1990和1991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分别比上年上升2.1%和2.9%，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在采取了一系列启动经济的措施后，疲软的市场从复苏走上正常增长。1990年1～5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2.6%，6月出现微势回升，到第四季度市场销势明显加快，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0%。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2.5%，扣除物价因素，实物量略有增长。1991年市场销售进一步回升，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3.4%，扭转了市场疲软的局面。工业生产在经过1990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零增长之后，从第二季度起增速回升，第四季度达到14.2%（因为是在上年第四季度低速增长基础上的，仍属低水平的增长），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7.8%。1991年

工业进一步复苏，增长速度加快。全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7%，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整个国民经济已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1991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经济工作的重点将在保持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效益。从此，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　治理整顿的成效与局限

一、治理整顿的成效

经过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3年的共同努力，治理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经济过热明显降温，基本恢复正常增长

治理整顿前的1985年至1988年，经济处于日趋过热状态，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7%，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8%。经过治理整顿，已经改变了经济过热的局面。1989年和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4.4%和4.1%，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8.5%和7.8%，属于偏低水平。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7%，工业总产值增长14.5%，经济增长速度已恢复到与现有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正常增长水平。

（二）供求失衡矛盾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

1985年到1988年失衡，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按上年计算）的平均差率为11.8%。治理整顿以来，由于采取了紧缩信贷，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投资规模，控制集团消费，加强税收等多管齐下的强有力紧缩需求的政策，有效地控制了社会需求的过快增长，促进了供求关系的改善。1989年供需差率缩小到8.7%，1990年缩小到7.6%，1991年进一步缩小到4%，3年平均为6.8%，已处于基本正常范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的涨幅，1989年从上年的18.5%回落到17.8%，1990年进一步回落到2.1%，1991年为2.9%，实现了治理整顿的要求。

（三）市场供应充足，秩序明显好转，居民消费心态趋向正常

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善，国内市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是市场商品供应充足，花色品种增多，消费者选择余地扩大，部分商品出现了有限的买方市场。二是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清理公司取得了明显进展，各种违法违纪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三是居民消费心态稳定。由于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商品货源充足，居民购买行为趋向合理化，市场销售逐渐从过热转入疲软，又从疲软趋向基本正常。3年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8.9%（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物量下降）、2.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物量略有增长）和13.4%，其中1991年的增长幅度已进入基本正常范围。

（四）产业结构“瓶颈”矛盾有所缓解

在治理整顿期间，由于处于长线的一般加工业受到一定限制，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产业部门较受重视，继续有所发展，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得到缓解。国家对基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上升。1991 年与 1988 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1.2%，而基础产业投资的增长快于全部投资的增长，所占比重提高。其中，农业投资增长 60.2%，占全部投资比重由 2.3%提高到 2.8%；能源工业投资增长 48.3%，所占比重由 23.4%提高到 26.4%；运输邮电业投资增长 52.7%，所占比重由 11.5%提高到 13.4%。由于增量调整的进展，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特别是与工业增长之间的比例失调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国家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农业获得好收成。3 年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4.8%，1991 年与 1988 年相比，粮食产量增加 4121 万吨，棉花产量增加 152.6 万吨，油料产量增加 318 万吨，糖料产量增加 2231.3 万吨，分别增长 10.5%、36.8%、24.1%和 36.1%。这为改善市场供应、稳定物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9 年到 1991 年工业与农业增长速度之比由 1985 年到 1988 年的 4.64：1 改变为 2.25：1，工业与一次性能源增长速度之比也由 4.01：1 改变为 3.61：1，工业与交通运输业增长速度之比没有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有所松弛。

（五）人民继续得到实惠

治理整顿虽然压缩了一些过快的消费需求的增长，人民的收入与消费有过短时的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和恢复正常增长，城乡居民继续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1989 年全国居民实际收入与消费平均水平有所下降，此后这种状况得到改变。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 1990 年比上年增长 8.6%，1991 年进一步提高 6.6%，3 年来平均年提高 12.1%；乡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这两年分别增长 1.8%和 2%，3 年来平均年增长 2.2%，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1991 年比 1988 年增长 9.6%，其中农民人均增长 5.2%，非农业居民增长 14%。3 年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89 年年末比上年年末增长 35.4%，1990 年增长 36.7%，1991 年增长 29.5%，年末余额达到 9110 亿元。人民手存现金和购买各种债券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二、治理整顿成效的局限性

3 年的治理整顿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只是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浅层次矛盾，国民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

（一）国民经济结构矛盾没有明显改善

在治理整顿期间，能源、原材料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基础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虽然有所缓解，但这是建立在国民经济以及加工工业低速增长基础上的，一旦经济恢复了正常增长，基础产业滞后的问题又突出起来。如 1985～1988 年工业总产值与煤炭、电力增长速度之比为 3.83：1 和 2.08：1，而 1989～1990 年下降为 1.65：1 和 1.21：1，煤炭供应紧张状况缓解，拉闸限电的现象也减少。但 1989 年和 1990 年煤炭、电力

的生产并未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年均增长速度仅为5%和6.8%，低于前4年年均5.6%和9.6%的增长速度，只是由于这两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的速度大大低于前4年的年均17%，煤炭、电力供需紧张的矛盾才有所缓解。1991年工业总产值增速恢复到正常水平，达到14.5%，而原煤生产因前两年供需矛盾缓解导致投入增速下降，仅增长0.6%，电力生产增长9.1%，工业生产与能源、动力生产增速差距进一步拉开。特别是在下半年工业增长进一步加快时，部分地区拉闸限电增多，煤炭、电力供需矛盾又紧张起来。农业虽然连续几年获得较好收成，但尚未建立起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在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搞活农副产品流通、增加科技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等方面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在农业增产的同时，由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乡镇企业发展及其发展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等多种原因，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之比为2.05：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为2.7：1，1991年分别扩大为2.18：1和3：1，这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总之，城乡、农业内部诸多方面的关系远未理顺，有些问题更加突出。农副产品供需矛盾缓解、集贸市场价格下落只是暂时现象，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仍需进一步加强。

在治理整顿初期，紧缩政策的实施曾使一批加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但由于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尚未形成破产机制，难以通过要素流动形成新的有效生产能力，在工业生产严重滑坡的同时却保留了原有的产业格局。此后，为了启动经济又普遍向企业注入大量流动资金，1991年工业生产已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但一方面主要加工产品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很低，有相当部分仅在50%左右；另一方面，全国超过正常库存的商品已超过1000亿元，库存量比正常库存多1倍以上，洗衣粉、纸等日用消费品和电风扇、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积压严重。治理整顿未能取得紧缩优化的成效，存量调整进展不大。

（二）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全国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1988年为20.53%，1991年下降为11.88%，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由8.5元下降为3.12元。在治理整顿期间受到政策倾斜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由1988年的20.6%下降为1991年的11.8%，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由25.8元上升为31.7元，可比产品成本上升36.8%。全民所有制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企业资金利润率由1988年的2.8%下降为1991年的－2.16%，全部资金周转天数由112天上升为158天。特别是在1991年经济增长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经济效益仍无提高。全国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与上年相比又下降0.34个百分点，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下降0.21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也下降0.6个百分点，可比成本上升4.8%，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0.6%，亏损面近30%，工业产值高增长同经济效益下降形成明显反差。

（三）经济总量平衡基础脆弱，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增大

1.在治理整顿后期投资规模上的较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开工的小型项目

增加较多，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又有抬头之势。199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全民所有制投资增长24.3%，大大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增加投资本是启动经济的手段，且这种增长虽具有恢复性质，但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结构不合理、筹资成本高的情况下，投资的过快增长又可能成为诱发新的供需失衡的因素。

2. 财政依然困难，赤字猛增。在财政收入方面，由于已有的债务负担已很沉重、经济运行效益低下、管理漏洞引起大量税源流失以及体制等一系列原因，收入增长有限；在支出方面，由于各种补贴居高不下以及机构庞大等原因，呈刚性增长。治理整顿3年期间，财政赤字分别为呢 .3亿元、139.6亿元、202.7亿元，到1991年年底，财政已向银行透支、借款累计1000多亿元。

3. 治理整顿后两年贷款规模偏大。为启动经济，从1989年第四季度起增加贷款，1989年到1991年年年底贷款分别比上年增长17.6%、22.2%和19%。特别是新增贷款从1990年第二季度后连续20个月保持20%左右的增幅，导致1991年贷款变现率迅速提高，现金发行高达533亿元，比上年增长20.2%，增大了通胀的压力。1991年物价总水平已呈逐季上升之势，第四季度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幅度超过4%，38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全年平均上涨8%。

与中国政府在几年前提出的治理整顿的目标相比较，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货膨胀受到抑制；经过一个时期的市场疲软、工业滑坡后，经济增长也已恢复到正常水平。但物价上涨水平的急剧回落，是通过加强物价管制和猛烈紧缩银根实现的。经济的复苏，也没有经历要素重组、结构优化、技术更新的过程，而是通过大量投入资金实现的。由于企业缺乏自我约束和自我积累机制，效益低下、结构不合理等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在原有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基础上，依赖于资金投入重新扩张。因此，随着资金的投放，社会总需求大于有效总供给的局面又会重新出现，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不断增加。如果不解决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就可能走上高投入、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经济紧缩、经济萧条的循环。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有的是在传统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下长期形成的，有的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治理整顿期间，中国政府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运用经济手段，并围绕着治理整顿在改革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有所进展，但总的来看，主要是通过恢复旧体制的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特别是在治理整顿初期，出台的几十条应急措施，大多数是重新采取行政手段来代替经济手段，用直接控制来代替间接控制。在指导思想上也一度提出：在中国，只能适当发挥市场调节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全部转变为市场经济；过分强调市场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治理整顿期间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证明，运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只能在短时期内解决经济生活浅层次的矛盾，而深层次矛盾的解决有待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新的思路。

第十章　中长期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在1985年胜利完成“六五”计划的基础上，从1986年起我国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7个五年计划。1990年12月，在“七五”计划即将完成、通货膨胀得到抑制、物价趋于平稳、治理整顿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全面分析了90年代国内外形势，又提出了今后10年和“八五”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宏伟蓝图。制定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贯彻

一、“七五”计划的编制过程和主要出发点

（一）“七五”计划的编制过程

早在1983年就着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以下简称“七五”计划）的拟定工作。计划从开始酝酿到编制完毕，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3年到1985年年初，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展开充分的讨论，并作了初步的论证和预测。第二个阶段：从1985年4月到9月，在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和充分听取党内外各方面的意见，形成了一个建议草案。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检验这个建议草案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实际，中共中央除了在北京举行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老中青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等207人参加的为时一周的大讨论外，还把这个建议草案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的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同样的讨论会，提出修改意见。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第三个阶段：从1985年10月到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对整个计划安排作了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反复进行综合平衡和各种计算，并且广泛征求各部门、各地方的意见，正式编制出“七五”计划草案，提请人代会审议批准。与此同时，开始了关于“七五”计划报告的起草工作。报告从初稿形成后，中间经过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负责同志的多次审阅和讨论，征求了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和直属机关负责同志的意见，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才将报告连同“七五”计划一道提请大会审议。经过人代会的认真讨论，报告和计划都作了多处的重要修改，使之更加完备。从“七五”计划及其报告的酝酿、讨论、起草、修改和最后定稿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七五”计划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凝结着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是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产物。因此，“七五”计划较之过去我国几个五年计划都更加完备一些。

（二）“七五”计划的主要出发点

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七五”计划是在进一步分析当时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从“六五”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实现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要求出发的。

如本书第4卷所述，中共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为了实现到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六五”时期我们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六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都已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使全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农业、轻工业迅速发展，逐步摆脱了长期落后的局面。“六五”期间，农业总产值（不包括村办工业）平均每年增长8.1%，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5%，超过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9.9%的速度。在工业内部，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从1980年到1985年，我国原煤产量由6.2亿吨增加到8.5亿吨，原油由1.06亿吨增加到1.25亿吨，发电量由3000亿千瓦时增加到4073亿千瓦时，钢由3700万吨增加到4666万吨。随着工农业生产稳定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5年社会总产值由1980年的8648亿元增加到1455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1%；国民收入由3688亿元增加到6822亿元，平均每年递增9.7%。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成就。“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530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880亿元。建成投资大中型项目496个，其中能源、交通项目103个。5年内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950万千瓦，采煤能力8000万吨，原油开

采能力5000万吨，铁路通车里程1500公里，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1亿吨。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步伐加快，共建成投产项目20多万个，一些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社会扩大再生产由长期以来的以外延型为主开始向以内涵型为主转变。

国家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由于1979年和1980年连续两年出现财政赤字，财政收入下降，使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难。随着生产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改善，从1982年起，财政收入扭转了连年下降的趋势而开始回升。在以后的两年中，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连续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到1985年，财政收入达到1829亿元，重新出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形势。

科学技术研究、智力开发和文化事业取得新成果。“六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科技、文教方面的经费共1172亿元，比“五五”时期577亿元增长1倍。5年中共取得重要科研成果33000项，经国家批准的创造发明奖937项。其中一部分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85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达到170万人，比1980年的114万人增长40%。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已有明显改善，普及初等教育的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和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蓬勃兴起，已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各项事业，也都有了新的发展。

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六五”期间，由于生产发展，效益提高，我国城乡人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9%，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除个别地区外，全国城乡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并已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

对外开放打开了新局面。“六五”期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迅速扩大，基本上改变了长期闭关锁国的状况。进出口贸易5年合计总额达到2300亿美元，比“五五”时期翻了一番。5年内全国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外资156亿美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1万多项。通过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使我国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六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六五”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七五”时期的前进铺平了道路，为90年代经济振兴创造了良好条件，“七五”计划就是在“六五”计划的基础上，根据实现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的要求制定的。其指导思想就是既要瞻前，发展“六五”的大好形势，又要顾后，为“八五”、“九五”留有后劲；既要承上，顺应好势头，继续完成上一计划期留下来的任务，又要启下，为90年代经济振兴和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打好基础。

二、“七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建设方针

（一）“七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根据“六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七五”计划对今后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了全面的部署，其基本任务有以下3项：

1. 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七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抓好3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此，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进一步从外部和内部采取措施，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企业真正具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完善企业的行为机制，加强企业的自我约束。

（2）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逐步完善市场体系。要继续减少国家统一分配调拨产品的种类和比重，完善农副产品订购制度，积极发展跨地区、跨部门的商品流通，不断扩大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与此同时，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3）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以直接控制为主转向以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为此，要继续改革计划体制，确立新的计划管理制度。要适当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把计划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到主要运用经济政策和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工资等经济杠杆全面管理与调节宏观经济的轨道上来。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制度，继续加强经济法制与监督。

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经济活动的三个层次。第一个方面，是微观经济，即企业活动的层次；第二个方面，是宏观经济，即国家经济活动的层次；第三个方面，是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重要结合点，即各种市场中间的层次。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整体，其目标就是要使经济体制转到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模式上来。“七五”计划规定，三者必须配套进行，使之相辅相成，决不能孤立地突出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2. 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如果说第一个任务是推进改革，那么第二个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建设，要促进“七五”期间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此，“七五”计划规定，5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其中农业增长4%（加上村办工业为6%），工业增长7.5%（扣除村办工业为7%）；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

7.5%。实现了这个增长速度，到1990年，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167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3倍；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11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

为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重点建设，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强化智力开发。"七五"计划规定，5年内用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5000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49%；用于更新改造的投资2760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87%；用于科学、教育、文化等事业费201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计划要求推广一批效益好的科技成果，在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新技术攻关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争取有4%左右的主要工业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的水平。计划规定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5年内共培养近500万高级专门人才，比"六五"期间增长1倍。

3.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根据今后5年生产发展的可能，计划规定，全国农民的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平均每年增长4%；5年内，要通过各种渠道广开就业门路，使需在城镇就业的3000万劳动力基本得到就业。到1990年，全国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将由1985年的404元提高到517元，平均每年增长5%，基本上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步。

上述三项基本任务是紧密联系、互相结合的。体制改革是发展经济的动力，加强建设是发展经济的物质基础，改善人民生活是发展经济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任务。因此，"七五"计划要求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与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七五"计划规定5年间的工作部署大体可以分为前两年和后3年两个阶段。前两年，在经济建设方面，要着重解决"六五"后期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问题，同时努力增加和改善供应，以消除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不稳定因素；在体制改革方面，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在进一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积极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的同时，着重从宏观上加强和改善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后3年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和生产建设的深入发展，全面完成"七五"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

（二）"七五"计划的主要建设方针

为了全面实现"七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就经济建设来说，主要的方针有以下几条：

1. 坚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特别是在"七五"期间坚持这条方针尤为重要。因为，一方面"六五"后期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所造成的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又迫切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而形成这种环境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标志就是使社会供求总量保持基本平衡。正因为这样，在"七五"期间，我们必须从继续控制总需求和改善供应两方面下手，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逐步趋于

平衡，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促进改革和建设健康地向前发展。

2. 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在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质量与数量、效益与速度的关系。“七五”计划在确定合理、适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要求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5年内经济效益要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各行各业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都要有明显的改善，并具体规定了增加新品种、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和节约流通费用的各项指标。

3. 坚持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需要，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七五”计划从我国各个产业的现状出发，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要求今后5年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1) 继续坚持依靠政策和科学，并进行必要的物资和资金投人，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粮食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全面稳定发展。(2) 积极努力扩大消费品工业的生产领域，在继续抓好日用必需品生产的同时，努力增产名牌产品和优质产品，发展新品种和新产品，开辟新的生产门类，并积极发展民用建筑业，推行城镇住宅商品化。(3) 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工业的重点工程。(4) 加快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逐步改变第三产业同第一、第二产业比例不协调的状况，提高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4. 坚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果。鉴于1984年和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78.6%）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增长（28%）的不正常状况，“七五”计划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基本建设宏观管理，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规定“七五”前两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能大体保持1985年的水平，后3年再适当增加一些，但也不能增加太多。在严格控制投资规模的同时，又要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努力提高投资效益，继续增加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适当增加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的投资，相应压缩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以便控制投资总规模和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

5.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放在重要战略地位，更好地发展科学、教育事业。“七五”计划要求，大力开发和普遍推广科研成果，集中力量进行科研攻关，积极开拓新兴技术、高技术领域，继续加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七五”计划规定，要根据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发展教育事业，改革教育体制。要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

6. 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把国内经济建设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七五”期间，要根据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扩大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其他经济技术合作的规模，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计划5年内全国进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7%。其中，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8.1%，进口额平均每年增长6.1%。要通过各种形式，尽可能多利用一些外国资金；通过多种方式和多种渠道，加强国外技术和智力的引进。

7. 坚持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七五”计划要求，消费的提高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量力而行，5年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基本上要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步；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引导居民消费需求方向，使消费结构的变化符合我国的社会性质、资源条件和民族特点；要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继续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同时要注意解决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8. 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七五”期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大力发展各项文化艺术事业，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使它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文明的、健康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七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及其反思

（一）“七五”计划的超额完成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超额完成了第7个五个计划，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七五”期间，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在计划、投资、财政、金融、劳动工资等方面深入进行了改革，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格局，促进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度增长，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全国形成了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许多重要经济指标均超过了“七五”计划的要求。

1. 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到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7382亿元，比1985年增长25.3%，平均每年增长4.6%，超过4%的计划指标。其中，种植业产值年均增长3.2%，林业产值年均增长0.2%，牧业产值年均增长6.5%，副业产值年均增长11.3%，渔业产值年均增长12.7%。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非农产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199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6253亿元，比1985年增长87.8%，其中，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非农产值增长1.6倍，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0年的54.6%。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七五”期间共吸收农村劳动力2200万人。

2.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到199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23851亿元，比1985年增长85.1%，平均每年增长13.1%，超过计划增长7.5%的目标，是继“一五”、“六五”之后，第三个高速增长时期。“七五”时期主要工业品平均年产量，均比“六五”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原煤年均增长34.7%，原油年均增长23.6%，发电量年均增长51.7%，水泥年均增长75.7%，钢材年均增长47.1%。工业生产能力扩大，技术水平提高，一些产品和产业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3. 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步伐加快。"七五"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到19746亿元，超过计划指标，比"六五"时期增加11749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12502亿元，比"六五"时期增加7172亿元；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2771亿元，增加1759亿元；个人投资4473亿元，增加2818亿元。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投资结构调整有一定进展，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增加，比重上升。"七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用于能源、原材料工业和运输邮电设施方面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六五"时期的46.6%上升到52.1%；用于更新改造的投资比"六五"时期增长1.7倍，其所占比重由"六五"时期的28%上升到31.8%。一大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建成投产，经济的薄弱环节有所加强，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增添了后续力量。

4. 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七五"时期我国共取得国家级科技成果14139项，是"六五"时期的1.5倍。经国家批准的发明奖846项，自然科技奖237项，科技进步奖2330项，星火奖261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合同已完成90%以上。在生物技术、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讯技术、超导材料的理论研究等领域的某些科技成果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1990年，已有76%以上的县普及小学教育，多数城市普及了初中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技术培训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初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体系。5年中共培养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266.8万人，研究生15.8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92.2万人，为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各项事业也取得了新的成绩，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5. 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到1990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过渡；少数地区已经实现小康；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少数地区，人民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1990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2150元，比1985年增加100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实际增长2.5%；如包括工资外收入和就业面扩大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平均实际增长4.1%。城镇就业继续扩大，人民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平均寿命等生活质量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

（二）对"七五"计划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1.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从上面引用的数据可以看出，"七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六五"期间实际达到的速度降低了不少。为什么要降低？"七五"计划报告主要考虑了经济生活中下列各种内在因素的变化与要求：(1) 今后农业的发展不能主要依靠由体制改革所激发起来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而是将越来越多地需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又需要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突变，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2) 就工业来说，"六五"后两年的过快增长，主要是受过大的投资需求的刺激，靠进口大量原材料支撑的。这种情况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3) 目前能源、原材料供应仍然很紧张，交通运输能源严重不足。(4)"七五"期间对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提出适度的要求，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注意

力进一步引导到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上来。(5)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条件，只有经济的适度增长，才能避免经济关系的过分紧张，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这5条理由确实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不看到它或不正视它是不对的。但现在看来，制定“七五”计划时也存在思想不够解放、赶超意识不够强烈的问题。没有真正认识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如果不在经济大局稳定的前提下，争取发展得更快些、效益更好些，就有可能被发达国家永远抛在后面。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群雄逐鹿，捷足者先登。我们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强手林立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把“七五”计划的经济增长率定得更高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至少有3条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 “六五”计划完成得很好，为“七五”计划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2)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全面展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大削弱，市场机制的功能作用日趋加强，经济的新型增长机制逐渐形成，为“七五”期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体制条件，特别是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效将会加快经济发展；(3) 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速度加快，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技术国际化、投资国际化，为“七五”期间加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承认，我们对这些因素估计不足，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突破了原来的计划框框。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不是6.7%，而是11.3% (其中农业总产值为4.6%，工业总产值为13.1%)；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不是7.5%，而是7.8%，均超过“七五”计划目标。

在“七五”期间，我们觉得有些同志，包括一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内，有一种忽视速度的倾向，似乎高速度必然带来低效益。当然，好大喜功，不顾效益，脱离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我们过去也曾经几度吃过超高速度的大亏，应当引以为戒。但是，不适当地降低速度，也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会引起不良后果。只要条件允许，经过努力，就要力争经济迈大步，即使一时出现局部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也不必大惊小怪，惊慌失措，可以暂时放慢速度加以调整，待形成新的大体协调和平衡后，再继续前进。也不能认为，速度降低了就一定会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速度与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不是成反比例的。例如1986年1～4月，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仅比1985年同期增长4.2%，但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税利却下降了1.6%，可比产品成本上升4%，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长34%。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90年1～8月工业总产值仅比去年同期增长2.6% (预计年增长5%～6%)，但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56.8%，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102.4%。在这里，速度与效益都下降了。只要指导思想正确，措施得当，要求严格，合理地加快速度是可以同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同步进行的。因此，我们要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加快发展速度，又要在加快发展速度中讲求效益。

2. 关于计划任务与实现计划的对策统一问题。制定计划不仅要提出恰当的方针任务和计划指标，还要指出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使计划任务和实现计划的对策统一起来。

现在看来，两者存在某些脱节现象。这表现在，在制定“七五”计划的过程中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制定方针任务和主要指标方面，而对实现计划的重大对策（包括经济政策、管理体制和基本措施等）的深人研究和贯彻落实是不够的。如应该掌握哪些政策界限、数量界限和经济实力，以保证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又如加强宏观调控需要具备什么经济条件、调控体系、组织保证和实践经验？等等。这在计划中基本上没有切实回答，有些问题（如体制改革计划能否实现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至是心中无数的。这样，就使计划执行与计划要求在一些重要方面相背离。例如，“七五”计划要求前两年采取踏步的方针，从多方面压缩社会总需求，但由于措施不力，执行的结果是，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都相当高，社会总需求同总供给的差额日益扩大而不是缩小。又如，计划要求把坚持提高经济效益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并规定了若干具体指标，但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执行结果很不理想，企业亏损大幅度增加，全国工业产品可比成本逐年上升。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国家计划部门不仅要制定出科学的可行的计划，还要采取相应的计划对策，特别是要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注意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新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组织国家计划的实施，切实把计划制定同计划执行统一起来。决不能计划归计划，执行归执行，形成计划与实际“两张皮”。

第二节　1991～2000年奋斗目标的确定和“八五”计划的编制

一、20世纪最后10年奋斗目标的确定

在“七五”计划即将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的情况下，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全面估量国际形势和我国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过认真的审议和讨论，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的纲要》。

十年规划总的要求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根据这一战略目标，今后10年（1991～2000年）的基本要求是：

1. 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20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按照这个目标要求，到2000年，以1990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1100亿元，10年内平均每年增长6%；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1%。

2. 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3. 发展教育事业，推进科研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21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4. 初步建立适应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5.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全。

实现了上述奋斗目标的要求，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出现多方面的重大变化：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在世界位次由目前的第8位进一步上升，成为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产业结构明显改善，生产门类更加齐全，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有较大提高，而且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将逐步形成一批新兴产业；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将有进一步提高，产业的生产技术达到或接近世界较先进的水平，在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材料、航天航空、超导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人民生活将发生由温饱上升到小康的阶段性变化，人民的健康水平、营养状况、平均寿命和识字率等生活质量指标，达到或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将逐步趋向成熟，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机制的企业体制建立起来，全国统一的开放、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得以建立，从而使社会主义新的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秩序安定，社会风气更加健康向上，人民的意志和民主权利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总之，到20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取得全面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中国将以新的姿态进入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十年规划提出了今后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1. 按照国民经济逐步现代化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的位置，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

2. 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

3. 继续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使我国经济成长逐步转到主要依靠科学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4. 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5. 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6.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7. 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上述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在具体实施中将大体上分为前5年和后5年两个阶段。前

5年即“八五”（1991～1995年）计划时期，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九五”（1996～2000年）时期的发展打好基础。后5年即“九五”计划时期，要在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产力布局、提高经济素质和理顺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全面实现到20世纪末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八五”计划是和十年规划远景结合起来、根据实现20世纪末战略目标的要求编制的。较之十年规划，“八五”计划部分具体一些，规定的指标多一些，但重点也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任务、政策以及改革开放的总体部署上。“八五”计划规定，在5年内，必须正确处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八五”头一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要继续进行整顿，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在转入正常发展以后，还要完成治理整顿留下来的某些任务，在整个“八五”期间，都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现实条件的可能，在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深化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促进治理整顿和经济发展，把已经确定的任务和措施落到实处。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基本任务

1. 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八五”计划要求，今后10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避免出现大的波折，最重要的仍然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特别是保持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的各自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排，都要量力而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生活消费的增长要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要防止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避免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适度、稳定增长。经过反复研究和综合平衡，“八五”计划规定：按1990年价格计算，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250亿元，比1990年增长33.6%，平均每年增长6%；农业总产值达到8789亿元，比1990年增长18.9%，平均每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达到32700亿元，比1990年增长37.1%，平均每年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1995年比1990年增长53.9%，平均每年增长9%。这个增长速度是以协调比例关系为基础和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因而是积极的、稳妥的。

2. 突出抓好经济结构调整。“八五”计划要求今后5年要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业，积极发展建筑业，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使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与加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扭转，使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的倾向得到抑制。

3. 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地、有重点地推行现有企业技术改造。计划规定，“八五”期间国家要选择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一批重要产业，作为技术改造的主体和突破口，努力使这些企业和产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各地区、各部门也要抓好一批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技术改造，带动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的重点，要放在节约能源，减少原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扩

大名、优、新产品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防止污染上来，并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与此同时，要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加强重点建设，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

4. 在努力发展生产，全面厉行节约，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步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并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补贴，逐步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八五"计划规定，力争国内财政收入5年内平均每年递增6.1%；国内财政支出，5年内平均每年递增5.7%。5年累计，收支相抵还存在一定差额。但一定要努力增产增收、节约开支，把财政收支差额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要保持合理的信贷规模和结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防止通货膨胀。

5. 进一步推动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使之更好地为调整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服务。"八五"计划规定，5年内，要重点围绕农业技术、资源勘探、大型成套设备研制、能源技术、交通技术、原材料技术等重点课题展开科技攻关；要大面积地推广和运用投入少、效益好、见效快的科技成果，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注意跟踪世界新技术发展进程，努力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成果，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科技进步的基础在于教育。"八五"计划要求，要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要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到优化教育结构、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上来。5年内，力争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地区普及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占全国人口30%以上的地区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力争培养各类全日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1100万人，比"七五"时期增长30%；高等教育要合理调整结构，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在基本稳定现有规模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充实、配套和加强，下大力量努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八五"计划规定，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继续多方面、多渠道地筹措教育资金，提倡和支持社会办学，逐步充实和改善办学条件，继续深入开展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各类教育的管理和办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6. 更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智力，巩固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八五"期间，要进一步发展出口贸易，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和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上来，促进由初加工制成品为主向深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在坚持外汇收支平衡的前提下，要保持适度的进口规模，合理调整进口结构，把有限的外汇集中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要立足于现有基础，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智力等方面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优势，除办好已有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外，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重点搞好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要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并结

合本地优势，合理确定发展的方向、重点和布局，发挥各具特色的产业，逐步形成合理的地区分工。

7. 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妥善安排劳动就业。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继续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防御能力。

（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主要任务及其措施

"八五"计划按照在今后1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运行机制的总要求，围绕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今后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10项主要任务：

1.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八五"计划规定，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在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同时加强对它们的正确管理与引导。

2. 改革企业体制。"八五"计划围绕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规定5年内要从6个方面改革企业体制：（1）进一步落实已经颁布的增强企业活力、健全企业约束机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从资金、物资和经济政策等方面支持国营大中型企业，逐步创造使大中型企业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的条件；（2）继续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和企业，继续积极进行"利税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制度的试点，并进一步完善试点办法；（3）完善企业折旧制度和留利制度，同时建立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制度；（4）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推动企业改组、联合、兼并；（5）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禁止在法定的税费以外，随意向企业收取费用；（6）深化企业领导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改革企业内部的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留利分配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等。

3.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八五"计划规定，5年内要进一步完善消费资料市场，扩大生产资料市场，同时，要努力发展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产市场和劳务市场等，逐步使它们与商品市场的发展相适应。要努力消除各种形式的关卡壁垒，改变地区封锁、条块分割的状况，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

4. 改革价格体制。"八五"期间，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的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市场调节价的价格行为，健全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调整某些重要生产资料价格，适当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对供求大体平衡的一般加工产品、供求弹性比较大的商品和耐用消费品以及非生活必需品，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同时，区别不同产品的具体情况，通过并轨、缩小差价等措施，逐步取消一些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

5. 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八五"计划要求，5年内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财政包干体制，同时，在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积极推行分税制的改革试点。国家预算实行复式预算

制，分开经济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经济性预算坚持平衡有余，不打赤字，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建设性预算，要保持合理规模，收支差额通过举借内债外债来弥补。要逐步理顺税制结构，强化税收管理，严格以法治税，充分发挥税收在增加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6. 改革金融体制。“八五”计划要求，今后5年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总规模；要健全中央银行的垂直领导体制，加强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领导与管理；要继续鼓励居民储蓄，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各类债券和股票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逐步实行社会金融资产多元化；要稳步发展金融市场，鼓励资金融通，在有条件的大城市稳妥地进行证券交易所试点，并逐步形成规范化的交易制度。

7. 改革工资制度。“八五”计划规定，要逐步建立工资总量调控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工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增长；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继续克服平均主义，建立起全面反映职工劳动质量和数量的工资制度；要调整工资收入结构，限制和减少实物分配；要改变奖金、津贴和工资外收入的混乱状况，加强工资管理，逐步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分级分类管理、企业自主分配的体制。

8. 改革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八五”期间，要逐步改变低租金、无偿分配住房的办法，促进住房商品化过程；要以改革和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和待业保险制度为重点，带动其他社会保险事业和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优抚等事业的发展。同时，努力改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继续推行合作医疗保险。

9. 改革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八五”计划提出，今后5年计划工作的重点，要逐步放在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预测、规划、指导和调控上，正确引导经济运行的方向，努力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以及主要比例关系和结构的协调。要改进计划管理的形式和方法，加强和改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制度，特别是搞好财政、信贷、外汇、重要物资的各自平衡和它们之间的平衡。要合理调整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市场的不断发育，进一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投资体制方面，今后5年内要改革按生产能力和投资额划分项目审批权的办法，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该严格控制发展的，实行相对集中管理；该支持和鼓励发展的，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项目审批权限。为了重点建设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计划规定，建立煤、油、电、运专项开发基金，在预算中列收列支、专款专用，加强使用监督，并采取发行债券、股票等经济办法，吸收和筹集建设资金。进一步完善投资包干责任制和项目建设的招标制度，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10. 加强经济调控体系建设。“八五”期间，要逐步建立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配套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特别要加强间接调控体系的建设，更好地运用价格、税率、利率、汇率等手段调节经济的运行，以促进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要按照保持全国经济的统一性和灵活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对各层次事权、财权和经济调控权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明确划分，努力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提

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并适当扩大地方政府运用经济杠杆的权限。积极建立科学的经济决策体系，重视政策、咨询、研究机构的作用。加快经济法制建设，促进经济调控的规范化、制度化。

第十一章　投资体制全面改革与投资发展

1985～1991 年是中国全面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和投资发展模式转换的重要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改革，传统的投资体制被突破，极大地调动了投资者增加投资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改革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摩擦，投资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高速发展到压缩调整、再到启动增长的曲折过程。

第一节　全面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与投资高速增长

一、全面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 1985 年以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在流通与分配领域，城市投资体制的改革还处在试点阶段。从 1985 年开始，中国进入全面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时期。其主要措施如下：

（一）下放投资审批权限，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扩大企业投资自主权

我国原有的投资体制最大的弊端在于国家统得过死，企业没有投资自主权，使得我国企业长期处于被动状态，不能根据市场变化和生产扩大的需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更缺乏提高投资效益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从 1985 年起，中央扩大了企业投资的如下自主权限：

下放投资项目的审批权。资金限额从原来由国家计委审批 1000 万元以上提高到 3000 万元以上；报国务院审批的限额由原来 1 亿元以上提高到 2 亿元以上；经国家计委批准了总体改造规划的大型骨干企业，其单项工程可不再报批。

放宽对地方、部门自筹投资的计划管理权限。自筹投资计划先由各地区、各部门自下而上报数字，经国家综合平衡后，再下达控制规模，并允许在执行中有 10%的浮动。同时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对当年使用的自筹投资要做到提前半年存入建设银行。

简化项目审批手续。过去，国家计委对大中型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初步设计

及概算、开工报告书等都要审批，现在简化为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开工报告书，其他各项都下放到部门和地方审批。另外，对少数大型工业和基建集团项目试行计划单列；对部门、地区和企业用自筹投资安排的技术改造，实行指令性计划。

（二）实行财政拨款改贷款，开辟多种投资融资渠道，增加投资来源

在中央统收统支的传统体制下，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资金来源除少量的自筹资金和留用的折旧基金外，90%以上是单一的预算拨款，国家对预算资金实行无偿使用制度。投资融资渠道单一严重阻碍了社会储蓄资金向投资的转化。财政资金无偿使用助长了企业争投资、争项目而不注重投资效益的提高。伴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1985年以后，国家进一步改革了投资资金管理体制。

实行财政拨款改贷款。国家决定，从1985年起，预算内投资按照有偿使用原则，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不仅要求正常盈利的项目按期还本付息，对一些行业盈利水平低、还款能力差以及非生产经营性项目，也要求把建设单位与建设银行在资金管理上的领拨关系，改变为借贷关系，以加重建设单位使用资金的责任感。所不同的只是对后者国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豁免部分或全部本息的偿还。

开辟多种融资渠道。银行除了保证工农业生产流动资金的贷款需要外，可以发放技术改造投资贷款和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开放和发展证券市场，通过发行国家债券、建设债券、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筹措资金，鼓励创办中外合作、合资和独资企业，利用国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三）推行投资包干责任制

投资包干责任制是为了加强建设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责任，对国家计划确定的建设项目，按照建设规模、投资总额、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和主要材料消耗负责全面包干建设，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一种经营管理制度。建设单位一般应对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工期、质量、主要材料用量和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等5个方面为主要内容进行包干。由建设单位偿还贷款的项目，其包干结余，全部留给建设单位，其中50%用于归还贷款；建设单位不负责归还贷款的项目，其包干结余，自己留成50%，其余50%交给还款单位，用于归还贷款。为了保证建设单位顺利实现投资包干责任制，国家规定建设单位的主管部门要做“五保”：保建设资金，保设备、材料，保外部配套条件，保生产定员配备，保工业项目投资试车所需的原材料、燃料供应等。

（四）推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

国家规定，从1985年起，除了国家保密工程和特殊工程外，凡经国家和省、自治区、市批准的建筑安装工程，都可以实行招标投标，持有营业执照的国营建筑企业和集体所有制施工企业都可以通过招标投标承揽工程任务。在招标投标过程中，由若干个施工企业参与投标，由建设单位择优人选。谁的工期短、造价低、质量高、信誉好，就把工程任务包给谁，由承包单位与发包单位签订合同，一包到底，按交钥匙的方式组织建设。由于有选择，有比较，有竞争，促进了承包单位加强经营管理。

（五）发展投资市场中介组织

1986年，国家计委成立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和建设银行共同成立了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其任务是对新上大中型项目先进行评议，然后才批准列入年度计划。一些部门和地区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市场中介组织。

二、投资体制改革的成就

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投资体制，给投资领域带来了重要的变化。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

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投资领域形成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城乡个人多种投资主体同时并存的格局。其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全民所有制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而集体所有制和城乡个人的投资比重上升。（详见表1）

表1　投资主体结构的变化　单位：%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全民所有制单位	66.1	65.5	63.1	61.4
集体所有制单位	12.9	13.0	15.0	15.8
城乡个人	21.0	21.5	21.9	22.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77页。

（二）投资来源多渠道

伴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融资渠道的拓展，投资领域形成了国家财政投资、银行贷款投资、企业自筹投资和利用外资多种融资渠道同时并存的格局。其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国家财政投资的比重逐步下降，而银行贷款投资、企业自筹投资和利用外资的比重逐步上升。（见表2）

表2　投资来源渠道的变化　单位：%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国家财政	16.0	14.6	13.1	9.1
国内贷款	20.1	21.1	23.0	20.6
利用外资	3.6	4.4	4.8	5.7
自筹及其他	60.3	59.9	59.2	64.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77页。

（三）投资决策多层次

简政放权使得投资决策由过去单一的中央集中决策转变为多层决策，现有中央决策、部门决策、企业集团决策、全民企业决策、集体企业决策和私人决策等。到1968年，由中央集中决策和计划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大约占1/3，由部门、地方决策和计划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约占1/3，其中由部门和地方决策的又被层层下放。

（四）投资方式多样化

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和投资决策多层次带来了投资方式的多样化。除了保留自上而下的的纵向投资方式外，出现了部门间、地区间和企业间的横向投资方式；除了独资、合作和合营投资外，还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共处的股份投资；除了直接投资方式外，出现了间接投资方式；除了产业投资外，出现了证券投资和不动产投资；除了国内投资外，还出现了国际投资。

（五）投资目标多重化

在实行上述改革以后，国家投资在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的同时，开始兼顾投资的经营目标；地方投资在追求政绩目标的同时，兼顾到社会福利、缓解就业压力的目标；企业则在比较利益的导向下，在盈利、福利、政绩、就业、竞争能力等多目标中相机选择。

（六）投资调控直接与间接并存

投资除受国家计划的调节以外，市场机制也开始对投资发挥调节作用。其表现为：企业自主投资决策的部分基本上是受市场调节的，企业投资什么，投资多少必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投资的实施过程引入竞争机制，施工企业已在经济上独立于建设单位，并且必须通过竞争才能取得施工任务；政府投资也开始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

三、投资体制改革促进了投资高速发展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农副产品计划价格的剪刀差，将农民创造的经济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然后以上缴利润和税收的方式，直接从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初级分配中获取高额积累。因此，政府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据统计，1953～1984年，中国积累总额高达19715亿元，占累计国民收入使用额的30%。同时，全民所有制经济累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即达12740亿元。但是，投资的效益不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仅为70%左右，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还有近20%闲置。改革调动了部门、地方和企业增加投资的积极性，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以前的30%以上，逐步下降为1988年的21.6%，中央财政用于投资的资金极为有限，每年仅为400多亿元。但是，由于部门、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扩大，全社会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1984年的1832.87亿元扩大为1988年的4496.55亿元，其中增幅最高的首先是利用外商投资，其次是国内贷款投资，再次则是企业自筹及其他投资。（详见表3）

表 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年度电位为%　　1988/1984 为倍

	1984 年	1985 年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8/1984 年
投资总额	28.2	38.8	18.7	20.6	23.5	2.43
国家投资	23.9	-3.1	8.1	7.9	-15.3	0.96
国内贷款	47.3	97.4	25.1	31.0	9.4	3.54
利用外资	6.2	29.5	44.5	32.7	45.1	3.6
自筹及其他	27.6	41.6	17.9	19.1	33.5	2.6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第 477 页。

（二）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部门行业投资及住宅投资大幅度增加

在 1979～1984 年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就已有明显提高，但主要用于增加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能力，如纺织和食品加工等。1985 年以后，用于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投资得到了进一步增长。(1) 加工工业投资从以增加生活必需品生产能力为重点发展到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重点，其标志是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投资的大幅度增长。(2) 第三产业投资的迅速增长。“五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为 33.9%，1988 年提高到 44.5%。(3) 居民住宅投资继续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居民住宅投资的比重约占 25%。

（三）投资地区分布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形成了新的增长极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沿海地区投资的比重由“五五”时期的 45.6% 逐步提高为 1988 年的 57.2%，而且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和上海等地。1988 年，东部地区工业部门的资金利税率为 23.45%，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资金利税率分别为 18.08% 和 16.93%。投资向东部地区倾斜有利于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基础，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投资的效率。同时投资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地区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可以对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也有利于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四）投资效益得到了初步改善

我们用回归模型估计各个时期的平均投资比综合效益系数。这比目前官方用指标法准确。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既受基期水平的影响又受报告期水平的影响，而模型则取决于整个时期中各个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规模。设 r 为一定时期的投资效益系数，$\&Y_t$ 为各年度经济增长量，Tt 为各年度的投资水平，则 $\&Yt = rTt$，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可得各时期平均投资效益系数。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改革后投资综合效益系数有了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在投资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1984～1988 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达 8.1%。

表 4　　各时期平均投资效益系数

时期	1953～1958 年	1959～1969 年	1970～1977 年	1978～1988 年	1953～1988 年
r	0.6185	－0.015	0.237	0.68354	0.638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字计算。

四、投资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投资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此就出现了双重体制同时并存的格局，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种矛盾和摩擦。投资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投资自主权没有完全落实到企业。投资体制改革中的分权实际上主要是部分决策权限从中央政府手中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企业很少得到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应有的投资自主权。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虽有所简化，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性的项目审批制度。企业虽然已在形式上成为投资主体，但并未完全摆脱对政府部门的附属地位，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因缺乏自我积累能力和受行政隶属关系的制约，没有成为实质上的独立的投资主体。

2. 投资的产权关系不明确。在实行改革后，虽然非国有投资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但国有投资仍居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投资，在理论上属全民所有，但在实际中为各级地方政府所有，而由谁来具体行使产权管理职责不清楚。投资盈利时，财政、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各个部门都想管；投资亏损时，谁都不想管。国有企业用利润留成资金进行投资，其积累财产的归属不清，企业将留成资金用于投资多了并不能获得资产收益，用于搞福利和发放奖金却可以得到实惠。政策上要求企业使用银行贷款必须还本付息，但还本付息后资产不为企业所有。

3. 投资的风险约束机制不健全。投资的宏观决策和政府投资决策名曰集体负责，但出了问题并无人负责；企业贷款投资政策上要求还本付息，但决策失误，出现亏损，可以拖欠不还，并不承担破产的风险。

4. 投资的宏观调控仍以行政手段为主。中央政府仍旧主要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控制投资规模，而且控制的对象主要是国有投资，这种宏观调节不仅缺乏相应的预见性和灵活性，而且调节的范围也过于狭窄。政府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信贷规模计划控制贷款投资规模，并往往直接干预银行对贷款项目的选择，贷款的利息亦由政府统一规定，缺乏必要的弹性，不能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起到调节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的作用。财政上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税制不分，甚至将流转税也纳入到承包指标中，政府难以用税收杠杆对投资进行调节。

（二）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投资的发展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其问题的产生既是由于旧的体制还没有被彻底废除，新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同时也是因为发展的模式仍处在转变过程之中。

投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

1. 投资与消费双膨胀，投资在建规模过大。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不明晰的条件下，内源积累动力严重不足，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可支配收入使用的一般顺序是：首先满足增加工资的需要；其次是满足发放奖金和搞职工集体福利的需要；最后才是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这是造成消费膨胀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企业外源积累的动机仍然十分强烈。由于利率低，而且贷款的本息可以拖欠不还，企业竞相以银行贷款和向社会集资进行投资。因此在消费膨胀的同时又存在投资膨胀。投资规模过大的重要标志有：(1) 在建投资规模过大。1988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在建总规模高达 13402 亿，是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近 3 倍。(2) 投资的增长幅度超过了钢材、水泥、木材等主要投资品的增长速度，使投资品供不应求，从而引起投资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86～1988 年建筑产值价格指数分别为 10%、8.4%、13.8%，其中 60%的因素是由于建筑材料价格上涨。(3) 现有生产的补偿严重不足，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供给不足。企业流动资金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中 1987 年企业流动资金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低达 17.6%。(4) 投资和消费双膨胀造成了明显的通货膨胀。1984～1988 年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分别高达 2.8%、8.8%、6%、7.3%和 18.5%。

2.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与加工工业超前发展的矛盾日趋尖锐。虽然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大大提高，但由于国有企业自筹投资及非国有投资一般更多地倾向于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因此，从总体上看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不足的。在这方面尽管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但可以用一些间接资料进行分析。从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看，增长最快的是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和高档耐用消费品；其次是啤酒、香烟等非必需消费品；重型设备、原材料的增长速度普遍很慢。1984～1988 年中国能源生产弹性系数为 0.68～0.4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水平。1985 年全国缺电量为 451 亿～500 亿千瓦时，1987 年全国缺电量达到 700 亿千瓦时，使得 25%左右的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转，造成工业生产约 4000 亿的损失。中国铁路网的弹性系数也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水平，并且呈下降趋势，1988 年约为 0.08。整个交通系统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而且主要干线上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 70%。

第二节　紧缩投资的得与失

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主要措施

针对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988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治理整顿的首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

率、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也就是说，其首要目标是实现总量的平衡。为了实现总量的平衡，国务院制定了20条措施，把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工作作为关键性的一条。1988年9月底，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总的要求是：保证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和农业等短线产品项目，压缩一般加工工业长线产品项目；保证国家计划内安排的、各方面配套条件已落实的项目，停建计划外的项目；保证必需的生产性建设项目，压缩非生产性项目，特别是楼堂馆所项目；保证重要引进技术、列入国家计划的重大企业改造和生产市场急需产品所必需的技术改造项目，压缩一般技术改造项目，特别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项目。随后，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压缩投资总规模的措施：

（一）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固定资产投资清理工作

国发（1988）84号文件规定9类项目在1989年1月10日前必须先停止施工，然后抓紧清理、审核，确定停建还是缓建。为了保证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亲自领导，国家计委、监察部、审计署、财政部、人民银行和统计局的负责人参加，对各省、自治区、市和各部门也要求由主要负责人担任清理项目小组组长，实行行政主要领导负责制。国务院召开了9次领导小组办公会议，还5次派出10个由副部长带队的清理项目检查组赴全国各地督促检查。

（二）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总规模双重计划控制和考核

国务院规定预算内外投资都要纳入各级计划；从1989年起，将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任务作为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下达给各地区、各部门，并责成各级统计部门按季度将压缩投资规模的完成情况在报纸上公布，以加强群众监督，同时规定“笼子”以外的项目一律停缓建；对银行投资贷款一律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各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得在国家下达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固定资产贷款计划以外发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对城乡集体和个体经济银行基本上不给贷款；重申凡需用自筹资金安排建设的单位，在计划审批前，必须将自筹基建资金交存建设银行专户储存，并存足半年。

（三）集中新项目的审批权，并对已批准项目和预备项目重新审查

国务院规定：总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小型和限额下项目由省人民政府审批，1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省计划部门审批。1989年除4类项目外，其他项目一律不得开工。这4类项目是：必须新开工的农业、林业、水利、气象、教育、化肥、出口创汇项目及1988年年底以前已经签订合同的涉外生产性项目和住宅项目；经国务院批准新开工的大中型、限额以上项目；必须年内开工的煤炭、小水电等项目；为维持企业正常生产，利用企业自有资金而且不搞房屋土建工程的限额以下的项目。在治理整顿期间，一律不准建设新的楼堂馆所，原则上不上新的一般加工工业项目。一些部门亦对投资项目的审批作出严格规定，如纺织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决定，今后棉纺、毛纺、化纤能力的新增和改造项目，一律由地方归口上报、由纺织部审批，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无权批准新增项目。

（四）按照产业政策进行投资调整

1989年，国务院制定并颁布《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家支持和限制的产业，使各个经济管理部门能够比较统一地按照产业系列支持、鼓励或者限制、禁止各行业的发展。按照投资的产业系列，在投资中通过控制贷款、财政补贴压缩了产品滞销、产品性能差和过多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的一般加工工业投资，适当增加了农业、铁路、煤炭、教育等行业的投资。

二、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成就及问题

（一）成就

国家在投资领域采取的治理整顿措施，收到了一定成绩，对迅速抑制通货膨胀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投资领域的治理整顿主要取得了如下一些成就：

1. 扭转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的势头。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清理整顿，1989年固定资产年度投资规模已被控制在4138亿元，比上年减少358亿元，压缩8%，如果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投资实际工作量压缩20%，是198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各类建设项目被停缓达1.8万个，减少今后投资需求675亿元，使全社会固定资产在建投资规模控制在13960亿元。新开工项目明显减少。1989年，新开工5万元以上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项目共4.1万个，比上年少开工3.7万个，减少47%，其中基建项目2.9万个，减少31%，新开工更新改造项目1.2万个，减少65%。压缩投资规模的幅度逐季加大。1989全民所有制完成投资额与上年同期比较，第一季度压缩2%，第二季度压缩6.8%，第三季度压缩9.3%，第四季度压缩11%。

2. 全民所有制的投资结构得到了改善。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用于重点部门的投资比重上升，其中1959年用于煤炭、电力和大石油3个能源部门的投资达705.6亿元，在投资总额压缩的情况下，仍比上年增长9.7%，投资比重由23.7%上升到27.8%，提高了4.1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比重达到28.8%，是1985年以来的最高比例。非生产性投资比重下降，1989年为31.4%，比1985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基本达到了30%这一历史经验的适度比例。

（二）存在的问题

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有：

1. 在建总投资规模仍旧偏大。1989年经过清理，全国决定停缓建的1.8万个投资项目中，一半为准备上马而没有动工的“影子项目”，属于在建的项目只有一半。扣除已经完成的投资，实际只压缩以后年度的投资需求220亿元，占在建项目今后需求的5%左右。在建总规模过大可能带来的问题有二：（1）由于许多在建项目未能装进计划的“笼子”，一有机会，又会造成年度投资规模膨胀；（2）继续控制年度规模，必然形成“僧多粥少”的格局。不仅如此，有些已决定停缓建的项目仍在继续施工。据审计部门对20个地区的7200个决定停缓建项目的审查，有508个项目未执行停缓建决定，总

投资达 8.7 亿。有的是拒不执行，有的是改头换面。

2. 全社会投资结构仍旧不合理。1989 年同 1988 年比较，全民所有制单位用于能源工业的投资比重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材料工业的投资比重却由上年的 20.4% 下降为 18.4%；运输、邮电、通讯部门投资的比重由上年的 13.5%下降为 10.7%；农业、文教部门的投资比重仅分别为 2.3%和 4.2%；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单纯增加生产能力的新建和扩建项目投资比重高达 48.7%，土建工程占 47.8%，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低于 25%的要求。1989 年基础产业项目在建总规模呈上升趋势，但年度规模却呈下降趋势，一上一下，由此计算的建设周期由上年的 4 年零 8 个月延长为 5 年零 4 个月。国家按合理工期组织的 204 个重点建设项目，1989 年计划安排投资 351 亿元，比上年实际完成投资减少 17%；计划通过发行建设债券和重点企业债券筹措资金的计划也未能全部实现；全年计划要求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 98 个，约有 1/4 没有建成，列入国家计划的 39 种新增生产能力，半数未达到计划指标。全社会投资中约有 2/3 以上为非预算投资，其大部分仍是用于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如果将此考虑在内，投资结构失衡的问题还要严重。

3. 建设任务减少，建筑业面临困境。改革开放以来，建设规模逐年扩大，引起建筑施工队伍迅速增加，1989 年全国有组织的施工队伍达到 1773 万人，比 1980 年增加了 790 万人。压缩投资规模给施工企业带来了 3 大难题：（1）施工任务不足。全国有 600 多万施工人员处在窝工和半窝工状态。（2）资金周转困难。1989 年全国施工企业被建设单位拖欠的工程款达 100 亿元。(3) 企业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全民所有制施工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减少 17%，产值利润率由上年的 4.1%下降为 3%。

4. 市场疲软，生产滑坡。根据 1987 年的投入产出模型计算，每亿元投资影响社会总产值 2.58 亿。压缩年度投资规模不仅直接减少了钢材、水泥和木材等生产资料的需求，而且还减少了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由于即期投资需求减少，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随之减少，企业产品出现了严重积压，生产严重“滑坡”，产值增长速度大幅下降。

三、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存在问题的原因

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实际上是经济比例失调以后所进行的一次调整。它包括生产力的调整和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且必须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生产力的调整。这种调整在我国有过三次：第一次是 1962 ~ 1965 年；第二次是 1979 ~ 1981 年；第三次是 1988 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这三次调整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清理在建项目，通过砍在建项目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通过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减少社会总需求，同时压缩生产资料的需求。前两次调整尤其是第一次调整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 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由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而消费需求受到了投资的严重挤占；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投资需求所拉动的重工业发展过快，而轻工业、农业严重滞后。因此，压缩投资规模既可以解决总需求过大的问题，又可以使产业结构趋于协调。(2) 前

两个时期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至1979年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仍有75.8%为预算内投资。紧缩预算内投资规模容易奏效。(3) 中央与地方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央能做到令行禁止。(4) 国家对企业实行统负盈亏财务体制，可以采取果断的措施对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和没有原材料保证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财政还可以拿出资金清理基建工程下马后所引起的企业之间的拖欠债务。(5) 第一次压缩投资规模所空闲出来的劳动力多为新近国家统一从农村招收的职工，国家可以采取措施让其还归农村，城镇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第二次调整时空闲出来的劳动力及新增劳动力还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安置。

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也是以清理在建工程项目、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基本思路的，但不仅没有完全达到预定目标，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对经济体制已经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投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不尽正确。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

(一) 对总需求膨胀的程度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在中国通常以零售物价指数来反映通胀的程度，以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来反映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差额。这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却夸大通胀和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严重程度。这首先是因为传统的价格体制不合理，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等的价格水平低于市场均衡价格，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适当提高其价格是合理的。其次，零售物价指数在1988年以前一直控制在10%以内，只是在1988年才急剧上升到18.5%。其重要原因是中央准备搞价格“闯关”，居民超前超量抢购，提前实现了本来在以后年度才会形成的消费需求。最后，我们对价格吸收货币的作用认识不足。如果原来的货币供求处于均衡状态，商品量不变，增加货币供应，会使物价上涨；但一旦物价上涨，为了维持同量的商品流通，就必须保持货币供应量不变。这时，货币供应就不存在过多的问题。

(二) 对总需求的内部结构缺乏深入分析

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传统体制下，总需求膨胀主要表现为单一的投资膨胀，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1985～1998年总需求过大已不是单一的投资规模膨胀，而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1985年中国的积累率高达35%，此后一直在30%以上，这被认为是中国出现了严重投资膨胀的主要标志。但是，目前所计算的积累率指标是有缺陷的。它对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的估计不足，对折旧的扣除也不足。在考虑上述因素后，1985～1988年的积累率约为31.14%、29.96%、28.83%和29.44%。而且投资总额中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也远远高于改革前，这部分投资的增长不仅不会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还会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简单套用改革前的经验指标来作为判断现在投资规模是否合理的尺度。事实上，这几年消费不仅没有受到挤压，还出现了消费需求膨胀。其主要表现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社会集团消费超过了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三）对居民储蓄的经济意义缺乏足够认识

在改革前，居民收入很低，基本上用于当期生活消费，即使有所剩储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钱买不到物资。所以，人们通常把居民收入作为消费基金来看待，而把居民储蓄视为被迫储蓄，而且把它作为消费品供给短缺的标志。改革后，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全国城乡储蓄总额由 1978 年的 210.6 亿元增加到 1988 年的 3801.5 亿元，增长了 17.1 倍，年均增长 33.6%。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收入已经不能简单地等于消费基金和消费需求，居民储蓄则可以作为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由于对居民储蓄的意义缺乏足够认识，一方面造成对投资供给能力的低估，另一方面则造成对消费实现不足的高估。两者都会导致对投资增长形势的判断不准。

（四）对资源闲置和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缺乏充分的认识

经济资源的供给量受三个方面的约束：自然约束，如自然资源受自然储存量的限制；技术水平的约束，技术水平可以扩展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由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有效约束。投资品的供给也是由这三重约束决定的。在改革以前，社会产品的供给普遍短缺，"短缺经济"被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以致使人们忽视了对社会经济资源闲置和利用效率低下的认识。事实上，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都存在劳动力的闲置和机器设备的闲置。能源、原材料等长期供给不足，但其利用效率却十分低下。由于对资源闲置和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缺乏足够认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一直是放在抑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上，却忽视了提高资源利用度和资源利用效率，忽视了促进供给的增长。换句话说，宏观管理的思路一直是想法设法把需求压到和实际供给相适应的程度，而忽视了如何尽可能增加供给，使一定时期的供给与一定的需求相适应。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一致，但在不同的条件下，两者实际效果是很不相同的。

（五）对投资结构失衡的原因缺乏明确认识

从中国投资增长的历史来看，投资增长的大起大伏总与投资结构的失衡相联系。投资的强制总表现为一些部门的投资超前，而使另一些部门的投资相对不足。投资增长到一定的程度总会遇到短线资源供给不足的约束，从而使增长被迫停止。1985～1988 年投资结构失衡无疑是国民经济被迫进行调整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对投资结构失衡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把结构失衡的原因归结为改革中存在向市场倾斜的错误，使计划经济受到削弱，具体表现则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过度向企业和个人倾斜。中央财政收入少，用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而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资受市场的自发调节，主要用于加工工业，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和加工工业超前的矛盾。基于这种认识，治理整顿中采取了一系列减少市场调节和加强计划调节的措施。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滑坡，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收入的比重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财政用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可能大量增加，加之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将企业投资和居民投资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结构的调整收效甚微。

对投资结构失衡的原因缺乏正确认识还表现在忽视资产存量结构僵化对投资结构转

换的阻碍作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投资结构的调整和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两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中国原有的资产存量结构不合理，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又异常激烈，仅靠投资结构的变化带动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在紧缩需求以后，长线产业的产品滞销，为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如果能迅速停止长线产品的生产，滞销产品就不会增加；如果能迅速转产，生产设备就不会长期闲置。但是，实际中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时机。为了维持社会安定，不仅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维持长线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还维持长线企业的生产。因此，职工工资的增长居高不下，长线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因为没有销路而大量库存积压。短线产业的企业本应加快发展，但实际中却受到拖拽。其产品销售出去后，因其他企业拖欠不能取得销售收入，因而也就不能维持生产和进行投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也不可能迅速走出低谷。

总的来看，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1985～1988 年中国经济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总需求膨胀，而主要是结构失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总需求的膨胀，但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投资膨胀，而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并发症；经济结构中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产资料投资和生产的比重过大，而主要是加工工业超前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地压缩投资年度规模，只能短期解决投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而不能解决消费需求与消费供给的矛盾，更不能解决消费供求和投资供求内部的结构矛盾。由于高估了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的膨胀的严重程度，导致对年度投资规模的紧缩力度过大，加之结构调整尤其是资产存量结构调整不力，因此国民经济出现了衰退，经济效益随之下降。

第三节　以投资启动国民经济发展

一、以投资启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

从 1989 年 9 月开始，为了解决生产增长速度滑坡、企业生产设备闲置增加、在职失业加剧及市场疲软等问题，国家调整紧缩力度，注入银行贷款。第一步是注入商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但由于最终需求没有增加，商业库存增多，生产启而不动；第二步是注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大量流动资金贷款转化为库存积压资金，市场需求仍然严重疲软；从 1990 年第二季度开始，国家采取了第三步启动措施：在继续控制在建投资总规模的同时，放松了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力度，通过扩大即期投资增加最终需求，以投资启动经济发展。其主要措施如下：

（一）调整年度投资计划

1990 年年初，国务院提出：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要保持在上年实际工作量水平。鉴于社会最终需求不足，3 月国务院决定调整年初计划。1991 年又进一步提高了固定资

产投资计划指标。年初计划所确定的年度投资规模计划为5000亿元，比上年调整计划增加450亿元，以保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

（二）增加注入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在实行治理整顿后，财政收入下降，企业经济效益不佳，财政投资资金和企业投资资金均显不足，为了保证调整投资计划的实现，1990年7月，国务院批准增加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50亿元，其中37亿元由建设银行按指令性计划全部用于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当年国内贷款比上年增长154.54亿元，使贷款总额达到870.88亿元，增长21.6%，占全部资金增加额的60%还多，其增长幅度列于各种资金来源之首。1991年国内投资贷款继续调整增长，其总额达到1292.19亿元，增长幅度高达48.4%，使国内投资贷款总额比1998年超出377.6亿元。

（三）允许进行股份制试点，发展资金市场，增加投资来源

1990年上半年，深圳和上海两地“股份热”骤起。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正式成立营业，深圳证交所也于1991年7月正式成立营业。到1991年年底，深圳市政府批准工业行业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近2000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51.9%，批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19家，占企业总数的3.1%；上海股份试点企业也有20多家。深圳和上海的股份热迅速波及全国。到1991年年底，全国股份制试点企业达3200家。这一时期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其着眼点主要在于通过股份筹措建设资金，以缓解生产、技术改造和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资金不足的矛盾。它是在资金高度紧张条件下的一种自发行为。到1990年，投资性证券年发行额占当年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的比重就已由1987年的28%提高到63%，成为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

（四）努力开拓利用外资的通道

受经济调整和政治因素的影响，1989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100.6亿美元，比上年降低1.6%。1990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发布《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的暂行管理办法》，发布《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批准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利用外资获得明显增长，其中增长幅度较高的是外商直接投资。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4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2%。

（五）在增加投资总量的同时，着力调整投资结构

国务院发出《关于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对若干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和改造加强管理的通知》。规定凡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停止生产的产品，一律不得按原产品新建、扩建和改造生产线。对国家限制生产、建设和改造的产品，一般也不应按原产品新建、扩建和改造生产线。对国家需要加强控制的少数产品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按产业政策与建设改造规模相结合的审批办法。对银行新增投资贷款实行指令性计划，直接落实到项目。取消建筑税，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对各类项目按行业及技术经济特点和规模大小，分别以0%、5%、10%和30%的税率课税，以体现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的要求。

二、投资启动的成效与局限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1990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当年投资完成额为4449.3亿元，比上年增长7.5%。但由于追加计划落实较晚，资金投入不足，实际工作量仍下降3.8%，未能达到计划要求。1991年继续加大投资启动力度，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5509亿，超过年度指标509亿，比上年增长23.8%，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13.1%。

固定资产投资的明显回升，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起了积极作用。(1)带动了生产资料市场回升。1991年，全国物资系统购进生产资料2891亿元，比上年增长25.3%，销售3129亿元，增长24.5%，从而使库存积压明显减少。全年钢材、木材、水泥的产销率均超过100%，机电设备的产销率为98.8%，也比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2)使施工任务增加。到1991年年底，处于窝工和半窝工的施工劳动力人数已减至300万人。(3)直接和间接地刺激了消费需求。由于投资回升，全年消费增加约350亿元，占全部消费增加额的27.7%。(4)促进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并使经济效益好转。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1%，国民收入增长5.1%。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7%，国民收入增长7.6%。亏损企业亏损额和亏损面明显下降，财政收支形势也有所好转。这表明，中国经济的正常增长必须有适度的投资增长支撑。但是，投资启动也存在局限，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并不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良性协调发展的轨道。

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收入、就业人数、财政收入、投资效果系数等指标的高低是紧密相连的。这些指标波动的方向在大多数年份相同，仅在少数年份相异。这就是说投资增长一般会带动国民收入增长、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上升、投资效果系数提高；相反，投资下降则引起国民收入、就业人数、财政收入减少和投资效果系数下降。以1984～1985年为例，投资增长24.5%到41.8%，职工人数增长3.3%到3.6%，职工工资总额增长11.2%到13.3%，投资效果系数（不考虑时滞）为0.45至0.38，财政收入增长21.1%到25.2%。除职工人数增长速度外，其余均为“六五”和“七五”时期的最好水平。其中1985年为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惟一没有财政赤字的年份。这些是投资增长通过创造需求所带来的短期效应。但是，长期效应好，并不等于短期效应就好。事实上，正是在1984年和1985年开始出现了产业结构失衡和通货膨胀。由此可见，重要的并不是投资扩张是否带来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及企业亏损的减少，而是这种增长是否建立在经济结构协调的基础上，从而能否稳定持久地保持下去。

从现实看，中国投资的增长并不是在市场需求增长推动下重新扩张的，而是为了缓解市场疲软、工资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人为启动的。按正常情况，经济复苏应以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为起点。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淘汰不适合社会需要的生产能力，又可以增加适合市场需要的资产。但实际中真正的技术改造投资增长慢，新开工的基本建设却异常活跃。1991年，在全民所有制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2075亿元，比上年增长21.8%；更

新改造投资997亿元，增长20.1%，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以更新改造名义搞的基本建设。按产业政策的要求，新增投资主要应用于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1991年，全民所有制投资中，原材料工业投资533亿元，比上年增长2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15.7%上升到16.1%；运输、邮电、通讯业投资468亿元，增长40.1%，所占比重由12.2%上升到14.1%；农业、林业、水利投资101亿元，增长31.2%，所占比重由2.8%上升到3.1%；但能源工业投资942.9亿元，增长14.4%，所占比重由30.1%下降为28.4%。这些统计数据表明投资结构并没有显露出明显改善的迹象。更令人担忧的是，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1991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中有70%左右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其中相当一部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从资产存量结构看，随着投资的回升，市场需求由不足转旺，使一些长线产品也可以找到销路，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可以用增加投资和提高资产存量的办法来维持其生存，资产存量结构调整的迫切性还会被暂时掩盖起来。在实行投资启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后，资产存量结构调整的速度不仅没有加快，反而下降了。

从产品结构看，1991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同期加工工业明显高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的产品有：自行车产量增长15.6%；彩色电视机增长15.6%；洗衣机增长1.2倍。低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的基础工业有：原煤增长0.9%；原油增长0.9%；发电量增长8.7%；钢材增长7.6%；10种有色金属增长5.5%。这表明加工工业的发展继续超前于基础工业的发展。从1991年第三季度开始不少地区又出现了电力供应不足，交通运输紧张的问题。

由于投资增长只是启动了市场需求的增长，而没有有效地启动经济结构的转换，财政、金融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一是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依然十分严峻。199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3610.9亿元，总支出为3813.6亿元，收支相抵，财政硬赤字为202.7亿元。在财政总收入中，债务收入为461.4亿元，因此财政总赤字为674.1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7.7%，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其二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从信贷增长来看，1991年年初计划信贷增长额为2100亿元，增长率为13.8%，但实际上1~10月的增长额已达1865.19亿元，增长20.1%。1989~1991年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9.6%，流通中的货币年均增长14.2%，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5.5%。其三是企业经济效益依然很低。

三、投资结构转换受阻的主要原因

投资增长之所以没有启动投资结构的明显转换并带来经济效益的明显提高，根本原因在于这次投资回升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启动的，仍存在许多制约投资结构转换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因素：

1. 产权关系不明确，微观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缺乏着力调整投资结构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产权关系不明确突出地表现在国家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不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已颁布几个年头，但实际中并没有

得到贯彻落实，企业不能优胜劣汰。因此，资产存量结构僵化，并拖拽投资增量结构的转换。即使在股份制试点企业，产权关系也不明晰。为了保证试点的成功，各级政府往往还对试点企业实行特别的保护。试点企业的董事长和经理一般仍由政府委派，并不是对股东负责。这种着眼于筹资的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机制的彻底转换。

2.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劳动力就业压力大，企业缺乏调整结构的必要条件。调整资产存量结构，通常需要释放出企业内部多余的劳动力，这部分多余劳动力的生活问题应由社会来解决，但我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人们担心劳动力的重组和失业引起社会动乱，以致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破产法》得不到有效实施、资产存量僵化的重要原因。

3. 地方政府的职能不清。各级地方企业在经济上仍依附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包括亏损企业采取多方面的保护，实行地区封锁政策，竞争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生产要素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流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实行分成包干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多热衷于发展价高税多的加工工业，使地区投资结构趋同化。地方政府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负责，为了增加就业，地方政府也会千方百计发展加工工业，并对本地企业实行保护政策。

4. 金融改革滞后，中央银行既没有独立于专业银行，更没有独立于政府。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人民银行，并实行中央银行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体制，地方人民银行也没有独立于地方政府；专业银行没有成为自主经营和自担风险的真正的商业银行；资金利率受政府控制，不能反映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甚至存在存贷利率倒挂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可能运用金融手段对微观经济进行有效的调节。

因此，投资启动只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短期的速度效益。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增长，则必须进一步加快投资的增长，并使投资的增长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不久又可能遇到资源短缺的约束。总之，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不可能摆脱“增长过热——紧缩——增长过热”的“怪圈”循环。要走出这种循环，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速制度创新的步伐。

第十二章　工业经济和运输、邮电业的改革与发展

第一节　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建设的成就

一、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

从1985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应着重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一是重新确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二是解决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以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国家在工业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一个局限性，就是限制了工业企业的自主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1985年起，在工业生产方面，只对煤炭、原油及各种成品油、钢材、有色金属、木材、水泥、基本化工材料、化肥、重要机电设备、化纤、新闻纸、烟、军工产品等重要工业产品中，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部分的生产、分配实行指令性计划，以保证重点生产建设的需要。国家计委对工业企业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品，由120种减少为60种；国家统一分配的生产资料，由原来的256种减少为65种。其中，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有30种，由国家物资局管理的有35种；国家统一安排供应出口的商品，由原来的70多种减少为36种。与此同时，各行政部门、行业部门的指令性计划也相应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指令性计划的减少，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扩大，为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物资采购、生产安排、产品销售、资金调配、劳动组织等方面获得自主权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二）企业管理权的再次下放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增多，扩大企业自主权，

改变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中央有关工业管理部门开始陆续下放企业，实行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制。机械工业部直属的624个企业于1985年年底全部下放完毕，各省、市、自治区机械工业厅（局）的直属企业332个，于1985年年底下放274个，占82.5%。其余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非机械工业部门直属机械工业企业，也实行下放。电子工业部也于1985年年底基本完成了部属企业的下放工作。到1985年底，共下放168个企业，占应下放企业总数的97.6%。将企业的管理权从中央部门下放到地方，也属于行政分权的性质。但在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的新条件下，这次企业管理权的下放与历史上数次进行的下放企业意义有所不同，它有利于企业之间发展横向联合，对于主管部门切实向行业管理转变也有重要意义。

（三）成立行业性总公司——工业主管部门转变职能的初步尝试

1987年9月，经纺织工业部批准，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成立。其核心企业为中国纺织机械工业总公司。按照组建时确定的方案，核心企业对其他成员分别实行“六统一”和“三统一”管理。即对紧密层企业实行“产、供、销、人、财、物”六统一管理；对半紧密层企业实行“产、供、销”和协作配套管理。从1988年开始，由核心企业对国家财政实行上缴所得税总承包，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总挂钩，再由核心企业对紧密层企业实行分承包和分挂钩。中国纺织机械集团在组建之初还行使纺织机械行业管理职能。经国务院批准，1990年2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在北京成立。中汽总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由机电部归口管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机电部授权中汽总公司行使我国汽车工业行业管理的职能。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还有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石化总公司等。

组建行业性总公司是转换政府管理职能的初步尝试，它使政府主管部门从管理企业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将精力主要放在研究行业发展趋势、制定行业政策和从事宏观调控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行业性总公司的组建和运行，需要认真研究以下两个问题：（1）垄断问题。将全行业的主要企业都集中在一个总公司下面，难免产生垄断。产业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市场上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生产、销售产品，是一种自然垄断。但这种现象只限于电力、通讯、自来水等基础产业。国外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对石化之类的竞争性行业，实施人为的自然垄断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多大积极意义的。产业经济学理论还揭示，产业集中度值 C_8 值大于70%，属于寡头垄断型产业，如果不是自然垄断型的，政策、法规应予以限制。石化行业只组建一个带控股性质的总公司，其 C_8 值肯定会大于70%，从产业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这种现象是应当禁止的。而事实上，我国石化总公司系统主要产品能力占市场份额70%～80%。(2) 行业性总公司与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关系。在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之上再加一层行业总公司，是否合适？从现实情况看，一些行业总公司以行政手段管理下属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下属企业的自主权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从这一角度讲，行业总公司这一层次是否是多余的，确实值得研究。

（四）扩大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始于1979年的企业改革，是围绕着放权让利的思路展开的。为了稳定企业与国家

的分配关系，国家在试点的基础上，于1983年1月和1984年10月分两步实施了“利改税”。

通过80年代初期的改革，国有企业初步展现了活力。但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放权的目标是让企业自主经营，但在此同时，对企业与其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未作相应的调整。而此二者是放权的过渡站。它们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国家要求它们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也给予它们相应的经济利益。这种权利结构导致了如下的结果：(1) 作为过渡站的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将应下放至企业的自主权，从部门、地方利益出发而截留。(2) 让利是通过调整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关系，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并使国家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但执行的结果，财政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未能达到；而企业留利虽有增长，但由于缺乏行为长期化激励和约束机制，企业留利明显向职工个人分配倾斜。(3) 企业利润在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比例不合理，企业留成比例普遍偏低，可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很少，不利于企业扩大规模、改变落后的技术状况。

以上分析表明，始于1979年、1980年的以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线的企业改革，进行到1983年、1984年，仍未取得实质性成效，改革试验仍需继续进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企业改革、城市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决定》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并强调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个中心环节，应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各种关系，并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此后，中国的企业改革不断出台新的措施：围绕企业活力问题，划小核算单位，使责、权、利更统一；租赁经营、资产经营责任制等在许多地方试行，并取得良好效果；从1985年起，在广州、沈阳等地试行股份制试点；1986年12月，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出台，为企业产权转让提供了依据；从1987年开始，经营承包制大面积铺开；198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问世，将企业的责、权、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为企业改革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1988年下半年至1991年，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企业改革的步伐相对放慢。其间主要是推行承包制、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

在实行放权让利的同时，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主要内容是：(1) 普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86年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颁发了有关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3个条例，明确规定厂长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负全面的责任，处于中心地位；企业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是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并做好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审议企业的重大决策、监督企业的行政干部、维护职工的权益方面发挥作用。这些规定以制度的方式初步理顺了企业厂长（经理）、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三者间的关系，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奠定了基础。到1957年年末，有68%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推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2) 深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这突出表现在进行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1986年，国务院颁发了《国营企业实行合同制

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待遇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的工人，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废除“子女顶替”和内招职工子女的做法，面向社会公开招收，择优录用；给厂长（经理）辞退职工的权力。

（五）改革企业分配制度

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是在1984年陆续起步的。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复杂性不低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复杂性。因为地区、产业、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状况很不一样，特别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如价格政策、税收政策、自然条件等）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对企业生产成果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与企业自己的努力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出哪个因素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影响大一些。1985年的工资改革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大多数企业实行奖金与本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与此同时，还扩大了企业在工资分配上的自主权。许多企业根据各自的特点，采取了承包工资、分解工资、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百分计奖等分配办法。

（六）推行行业、部门承包制

以往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端，不仅表现为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还表现为部门、行业向国家争投资，资金无偿使用，不承担投资风险，部门、行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为了消除这一弊端，在企业中实行经营承包制的同时，首先在石油化工和统配煤矿行业推行行业承包制的试点。经国务院批准，从1985年起，全国统配煤炭实行投人产出总承包，其基本内容是包产量增长、包基本建设规模和投资额、包财务亏损额。以后又在冶金、电力部门实行了以部门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钢铁工业自1986年实行投人产出包干制的内容是，将投资、原材料、能源等投人同产量、品种、质量、能源消耗、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挂钩。这些措施的实施，初步扭转了过去向国家争投资、争项目的现象，促使部门开始把眼睛盯在内部，进行挖潜革新、改善经营管理，开始从单一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管理转变。当然，部门行业承包还只是在未能解决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情况下改革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今后生产公共产品行业的改革，还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工业经济的巨大发展

（一）1985至1988年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1985～1988年是我国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198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达到18224亿元（本章凡年度工业总产值数字都含村办企业），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4年增长92.7%，4年年平均增长17.8%。是我国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工业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最快的历史阶段之一。

这4年期间，工业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软着陆”——高速发展的过程。

1985年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工业生产高速发展。从第一季度起，工业生

产就出现了比上年同期增长 22.5%（本章凡工业月度、季度增长速度，都是指乡以上企业）的高速度，第二季度增速进一步达到 23.2%。整个国民经济也呈现出过热势态。为了避免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过于紧张，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这些紧缩措施从第三季度起逐见成效，工业过高的发展速度开始回落，8 月份在 20%以下，到 12 月份降至 10.2%。全年工业总产值为 97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4%，是 1979 年以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

1985 年，在 100 种主要产品产量中，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有 82 种；磷肥、硫酸、硫铁矿、化学农药、电子计算机等 18 种产品没有完成计划；其余大多数产品供过于求。

1985 年轻工业总产值为 45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X.7%。轻工业产品花色品种增加，中高档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但一些紧俏产品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轻工业产品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产品有：电视机的产量达到 1668 万部，比上年增长 66.1%；录音机产量为 1393 万部，比上年增长 79.4%；照相机产量为 179 万架，比上年增长 41.8%；家用洗衣机产量为 887 万台，比上年增长 53.5%；家用电冰箱产量为 145 万台，比上年增长 164.5%。重工业产值为 51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2%。一次能源产量（折标准煤）8.55 亿吨，比上年增长 9.9%，电力和原材料供应仍然紧张。重工业产品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有：发电设备增长 20.1%，汽车增长 38.7%，铁路机车增长 13.4%，机床增长 15.7%。与上年相比，重工业产品呈负增长的有化学农药（-29.4%）、硫酸（-17.2%）、化肥（-9.5%）、木材（-1%）等。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1985 年工业经济的发展势头较猛，以轻工业为最。彩电、家用洗衣机和电冰箱超常规增长，一方面反映了轻工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居民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

1986 年我国的工业生产走出了一条“V 字型”道路。上半年，紧缩政策的作用使工业生产缓慢增长；下半年，工业生产走出低谷，增长率迅速上升。1985 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为 21.4%，紧缩政策使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直线式下跌，1986 年 2 月接近零增长，这一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仅比 1985 年同期增长 4.9%。下半年紧缩政策有所松动，工业生产便随之回升。与 1985 年同期相比，1986 年第三季度各月的增长率分别为 7%、8%、10%，12 月份达到 17.3%。全年工业总产值 111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超过计划规定的增长 8.8%的要求。

1986 年，轻工业总产值 53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重工业总产值 58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在轻工业中，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工业增长较快，适销对路的名优产品增长较快。在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增长较快。但工业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部分不适销产品库存积压增加。

在 1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有 90 种，汽车、拖拉机、电子计算机等 10 种产品没有完成计划。轻工业产品的增长幅度不仅低于 1985 年的增长幅度，而且，就具体产品而言，也出现了与 1985 年不同的情况。1985 年超常规增长的家用电器，包括电视机、录音机、家用洗衣机和电冰箱，1986 年的增长幅度明显回落。（详见表 1）在重工业中，汽车、拖拉机、机床的增长幅度分别由 1985 年的 38.2%、

13.4%、25.2%，下滑到1986年的-15.4%、-36.4%、-2.1%。

从工业结构方面看，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开始做到真正的“先行”。以电力工业为例，1986年1至11月，全国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增长9.4%，一改1980年以来电力增长低于工业增长速度的状况。煤炭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还增加了出口和库存，各地区、各部门煤炭供应紧张的状况有所缓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力和煤炭的生产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能源和原材料等工业部门的落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1986年短线产品供需矛盾趋缓、库存增加，既有供给增加的因素，也有需求不旺、产品规格不对路的因素。

表1　　部分家用电器1986年与1985年增相比较　　单位:%

	1985年的增幅	1986年的增幅
电视机	66.1	-12.5
录音机	79.4	26.1
照相机	41.8	13.1
家用洗衣机	53.5	0.7
家用电冰箱	164.5	55.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40页计算。

1987年工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是国家决定继续采取“压缩过热空气”的方针。但这一方针贯彻不力。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3813亿元，比上年增长17.7%。这一年工业增长的特点是四个季度的增长速度比较平均，一、二、三、四季度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1%、15.5%、15.7%和13.4%。第四季度的增速从数字上看虽然比前3个季度低，但却是在上年第四季度较高的基数基础上的增长。因此到年末，工业生产的增长仍是呈高速发展之势。为了避免经济再度过热，国家在年末确定了将财政和信贷“双紧”作为安排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

1987年轻工业总产值6656亿元，比上年增长18.6%；重工业总产值7157亿元，比上年增长16.7%。电力工业和支农工业的发展明显加快，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等基础工业稳步发展。消费品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特别是名优耐用消费品增长更快。但工业生产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矛盾仍然存在，能源和一些原材料供应紧张。1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轻工业产品增幅最大的仍然是电视机、照相机、家用洗衣机和电冰箱等消费品。重工业产品中，1986年呈负增长的木材、汽车、拖拉机等产品，1987年的增长速度明显回升，并有较大的增幅。

1988年，原定的经济工作的“双紧”方针没有实现，工业生产仍呈高速增长之势。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8224亿元，比上年增长20.8%。轻工业发展加快，产值为8979亿元，比上年增长22.1%，主要是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增长较快，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增长更快。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回升，总产值为9245亿元，比上年增长19.4%。其中加工工业增长更快，大大超过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增长幅度，致使工业生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1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轻工业增长幅度最大的仍然是家用

电器类产品，如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重工业产品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仍然是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等产品。此外，钢和钢材、水泥、原煤、原油、电力等产品，也大体保持与上一年相等或略高于上一年的增幅。工业的脱离实际的过高增长，是整个国民经济过热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的方针，工业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工业经济在治理整顿中的进展

1989 年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总的经济形势是：社会需求得到有效控制，社会供给继续增长，社会总供求之间的矛盾趋缓，物价涨势逐月回落，工业生产继续有所增长。1989 年工业总产值 220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5%，比 1988 年的增幅减少 12.3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治理整顿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989 年工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全年轻工业产值 107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重工业产值 112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自 1985 年以来首次超过轻工业的增长速度。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由前几年超常规增长转为下降。彩电、录音机、照相机、家用洗衣机和电冰箱均为负增长。前两年增幅较大的汽车、拖拉机也转为负增长，钢和钢材的增长率分别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了较大的控制。

从宏观上讲，治理整顿有一定的成效。这一年的治理整顿，以实施“双紧”为主要措施，对抑制物价上涨、减缓超常规增长的工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业生产虽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起伏回落幅度较大。从 1988 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治理整顿，在步骤上是从抑制总量入手，达到减缓工业生产过快的增长速度的目的。在此前提下，逐步转向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从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到 1989 年年底，工业生产的发展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 4 个阶段：加速增长阶段、惯性增长阶段、增长回落阶段、增长不稳定阶段。

加速增长阶段。这大体发生在 1988 年第四季度。这期间，财政金融的“双紧”政策并未对工业生产产生立竿见影的抑制作用。相反，1988 年前 9 个月信用膨胀、多投资金垫底，共新增工业流动资金贷款 340 亿元，为 1987 年同期的 1.54 倍。这使得第四季度的工业生产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当季增长 18.8%，高于前三季度 17.5%的速度。这为 1989 年的惯性增长打下了埋伏。

惯性增长阶段。其时间为 1989 年上半年。受上年加速增长的影响，1989 年头两个季度全国工业生产分别继续保持 10.4%和 11.1%的增长率。从增长的地区构成来看，月增长率在 10%以上的地区由 1 月份的 6 个、3 月份的 21 个，增长到 4 月份的 23 个。从产业构成看，1989 年上半年加工工业仍然保持 14.1%的超高速增长势头，而基础工业只增长 6.1%。其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分别增长 5.7%和 5.8%。由此可见，治理整顿政策、措施的执行、落实与当初的设计有偏差，调整结构的目的未能如期达到。

增长回落阶段。这是指 1989 年的第三季度，工业生产开始逐步纳入抑制总量增长的轨道。第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为 5.4%，回落相当明显。与此同时，工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全部工业中，基础工业增长加快，为 9.5%，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分别增长 7.8%和 9.6%，高于同期加工工业 7%的增长速度。

不稳定增长阶段。进入1989年第四季度，全国工业生产呈现徘徊状态。当季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只增长0.7%，其中10月份出现10年来未有的下降2.1%的情况；11月份也仅增长0.9%；12月份虽有回升，增长率也仅仅为3.4%。

1990年年初，受治理整顿和紧缩政策滞后效应的影响，在1989年第四季度低速徘徊的基础上，工业生产继续下降。与1989年同期相比，头两个月下降0.9%，第一季度持平。3月份，国家出台启动生产的宏观措施，4月份以后，工业生产逐月回升，第二、第三季度分别增长4.1%和5%，8月份开始宏观调控措施陆续到位，加上农副产品加工季节性增长，工业生产速度明显加快。第四季度增长了14.2%。全年工业实现总产值23924亿元，比上年增长7.8%。

1990年轻工业总产值11813亿元，比上年增长9.2%；重工业总产值12111亿元，比上年增长6.2%。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生产情况较好，供应紧张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受市场变化的影响，多数高档耐用品、投资类机电产品的生产下降，工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1989年呈负增长的家用电器类产品，如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1990年仍然维持原状；重工业产品中，除汽车、拖拉机仍是负增长外，水泥、木材、化学农药、发电设备、机床等也出现负增长。工业生产面临很大的困难。

1991年工业经济全面复苏。1～9月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3.9%。第四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速低于前9个月，但却是建立在上年同期两位数增长速度基础上的。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8248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基本上进入正常发展阶段。

1991年轻工业产值13801亿元，比上年增长14.6%。主要轻工业产品中，适销对路的产品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家用电器类产品，如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的生产走出连续几年负增长的“胡同”，出现较高的增长率。重工业产值14447亿元，增长14.4%，主要重工业产品中，机电产品生产增长较快，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基本稳定。

（三）1985年至1991年工业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综合上述1985至1991年各个年份工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可以对这几个年份工业经济的发展作出如下总体评价：

1．工业经济的宏观和微观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1) 从所有制结构上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1985年，全国工业企业有518.5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9.3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74.2万个，城乡个体企业334.8万个，“三资”企业及合营企业0.2万个。到1991年年底，全国共有工业企业809.2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0.5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59.1万个，城乡个体企业638.5万个，“三资”企业及合营企业1.1万个。从增长率的角度分析，全国工业企业数1991年比1985年平均增长56.1%。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增长13%，集体所有制企业增长－8.7%，城乡个体企业增长91%，“三资”企业增长450%。

(2) 国有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活力有所增强。1985至1991年，中央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条例、规定，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自主权逐步扩大到产品生产、销售、原材料采购、产品定价、职工工资以及劳动管理制度、机构设置、资产出租、联合经营、产权变更等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进

行第二步利改税，将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以及减免大中型企业的调节税等，使企业的财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据统计，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留利占实现利润的比重，由1985年的38.3%，上升到1989年的55.2%、1991年的69.3%；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自有资金，1989年比1985年增长60%。

(3)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所进展。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到1989年年底，实行承包制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占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数的90%以上，其中实行“两保一挂”的占6.2%，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占14.1%，实行上缴利润包干、超收分成的占21.1%，实行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的占15.6%。此外，国家还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租赁、兼并、拍卖等不同形式的经营机制改革。这些都使国有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开始有所转化。

(4) 工业品价格改革。由“六五”期间的以调为主，转为调放结合。到1989年年底，工业品价格中由国家定价的比重，从1986年的64.2%下降为55.9%。

(5) 对部分企业集团和基本建设集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相当于省部级的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及技术引进项目的审批权。企业集团的计划草案直接报送国家计委，经过综合平衡后，有关指标由国家计委直接下达给企业集团，跨越了有关省份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中间环节。对企业集团实施计划单列，引起过一些争论。但是，应当承认，实施计划单列，改变通过中间环节给企业扩权的做法，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中间环节以各种名义截留企业自主权的局面。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实行自主经营的重大举措。

2. 工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1) 建设速度加快，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1985～1989年工业部门全民所有制企业完成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9639.5亿元，新增固定资产7204.7亿元，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9507.2亿元，比1984年的3395.5亿元增加了6111.7亿元。

(2) 技术水平提高。1985～1991年，通过技术引进和加快对老企业的改造，我国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其中，5000万元以上的重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超过500项，投资500多亿元。平均每年发展新品种1000多个，70%以上的新产品达到国外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3) 工业总产值和产品产量高速增长。1985～1991年，我国的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其中，轻工业快于重工业。1991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达到28248亿元，比1984年增长159.3%，年均增长14.5%，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轻工业总产值达到13801亿元，比1984年增长172.2%，年均增长15.4%；重工业总产值达到14447亿元，比1984年增长144.4%，年均增长13.6%。重要产品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原煤产量10.8亿吨，比1984年增长了37.8%,；原油产量1.41亿吨，增长23%；发电量6775亿千瓦/小时，增长79.7%；钢产量7100万吨，增长63.3%；水泥产量25261万吨，增长105.3%；汽车产量71.42万辆，增长125.7%；化学纤维产量15.5万吨，增长160%；电冰箱产量469.9万台，增长758.5%；自行车产量3676.8

万辆，增长28.5%；手表产量7595.5万只，增长100%；电风扇产量6219.1万台，增长252.2%；电视机产量2691.4万台，增长168.1%；照相机产量478.2万架，增长280%。

三、工业经济效益分析

对1985～1991年工业经济的效益，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 工业净产值和工业净产值率。1985～1991年，中国工业净产值逐年增长（详见表2），从1984年的2516亿元增加到1961年的770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16.8%，年均增长11.7%。但由于工业净产值增长速度低于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工业净产值率逐年下降。工业净产值率从1984年的33.03%，降至1988年的29.72%，1991年又进一步下降到27.27%。

表2　　　　全国工业净产值率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工业净产值（亿元）	2156	3163	3573	4262	5416	6241	6610	7703
工业净产值比上年增长（%）		19.6	9.6	13.0	17.4	6.0	5.5	11.4
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1.4	11.7	17.7	20.8	8.5	7.8	14.5
工业净产值（%）	33.03	32.55	31.92	30.85	29.72	28.35	27.43	27.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47页计算。

2. 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85～1991年期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表3　　　　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同劳动生产率　　单位：元/年·人

	全部工业		全民所有制工业		集体所有制工业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1984年	11190		14070		9227			
1985年	12372	10.56	15080	7.18	8206	-11.07	22752	
1986年	12609	1.92	15451	2.46	8600	4.8	22009	-3.27
1987	13691	10.72	16671	7.9	9979	16.03	26203	19.06
1988	15835	13.42	18056	8.31	12195	22.21	32893	25.53
1989	16568	4.63	18320	1.46	13170	8	36550	11.12

	全部工业		全民所有制工业		集体所有制工业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1990	17408	5.07	18639	1.74	14258	8.26	41465	13.45
	(26248)		(30839)		(18171)	(52679)		
1991	28704	9.36	32304	4.57	20664	13.72	67599	28.32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年鉴（1992)》，中国年鉴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第 1092 页。

注：1. 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按指数换算成 1960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990 年括号内的数字和 1991 年的数字是按 1990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

2. 集体所有制工业 1984 年以苗为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的数字，1985 年以后为乡以上工业的数字。

劳动生产率及其上升的特点是：

(1) 各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除集体所有制企业在 1985 年（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变化的原因）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在 1986 年外，全员劳动生产率都是逐年上升的。

(2) 从 1986 年开始，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高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从 1987 年开始，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高于公有制企业。

(3) 到 1991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高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低于其他经济类型的工业企业。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 1，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为 0.64，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为 2.09。公有制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的状况令人担忧。

(4) 从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工业生产发展的关系看，凡是全国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年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都较高。1986、1989 和 1990 年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较慢，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也都比较小。说明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速度型”的。

由于这里使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是人均产值指标，只反映了人均产出状况，没有反映资金投入和占用与产出的关系，不能综合反映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结合其他指标进行全面分析。

3.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分析。我们采用了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税、资金利税率、每百元工业产值利税率、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和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这几个财务指标来分析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

1985～1991 年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的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在 1985～1989 年期间呈上升趋势（详见表 4），此后两年逐年下降。到 1991 年为 106 元，比 1984 年高出 8.2 元，但低于历史最好水平。由于指标本身是产值指标和复杂的价格因素（如产品价格逐年上涨，而原固定资产没有重新核资升值），这个指标不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的效益情况。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在1985～1988年期间呈徘徊下降趋势，此后的3年逐年下降，到1991年，已从1984年的22.3元降至12.3元。

资金利税率（除个别年份）和产值利税率在1985～1991年间呈直线下降趋势。

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在1985～1991年的各年度有升有降，总趋势是上升。到1991年为31.7元，比1984年的26.9元多占用4.8元。可比产品成本年年上升。

表4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分析指标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元）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元）	资金利税率（%）	每百元工业产值利税率（%）	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元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
1952年	134.1	25.1	25.4	18.7	23.1	2.30
1957年	139.3	34.2	31.6	24.5	19.4	3.80
1965年	93.1	29.7	29.8	30.3	25.5	8.80
1978年	99.3	24.8	24.2	24.9	33.0	4.60
1984年	97.8	22.3	24.2	22.8	26.9	-2.00
1985年	102.7	22.4	23.8	21.8	26.6	-7.70
1986年	100.2	19.9	20.7	19.8	28.9	-7.30
1987年	104.2	19.7	20.3	18.9	27.7	-7.00
1988年	113.1	20.2	20.6	17.8	25.8	-15.60
1989年	116.9	17.5	17.2	14.9	27.7	-22.20
1990年	108.3	13.0	12.4	12.0	31.8	-7.00
1991年	106.0	12.3	11.8	11.6	31.7	-4.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31页。

注：1952～1976年是按1970年不变价格工业总产值计算，1977年以后按当年价格计算。

通过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的分析说明，在1985～1991年期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是呈下降趋势的。

综合以上几个指标的分析，如果以工业净产值率作为考核工业经济宏观效益的核心指标，以资金利税率作为考核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核心指标，那么，在1985～1991年期间，无论是从工业经济整体看还是从国有制工业企业看，经济效益在统计上的表现都是下降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一。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说明。

1.1985～1991年期间，中国处在新旧体制转化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冲突是此期间工业经济下降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1) 国家直接管理力度减小，间接调节作用有限，市场体系不健全，竞争不充分，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扩大，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参与投资，造成了重复建设，区域产业结构雷同，企业规模偏小，这种情况对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无疑有负面影响。(2) 国有企业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激励与

约束机制不对称，集团消费恶性膨胀，"工资侵蚀利润"，而且个人收益分配隐性化，这样不仅利润减少，在统计上净产值也减少；破产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不能通过资产重组优化要素的组合。(3) 政府职能未能根本转变，寻租机会和空间越来越大，加大了交易成本。(4) 各种摊派名目繁多，企业不堪重负。

2. 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在各部门之间分配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过去以工业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收入，通过价格改革、拨改贷等途径分流到了其他部门。

3.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供应丰富，市场已开始从过去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居民购买商品的选择性加强，企业适应市场、调整产品结构的能力比较差，加上重复建设等原因，造成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畅，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这说明必须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深化企业改革。但又与过去即使工业产品不对路也由国家包销，工业报喜、商业报忧的情况，以及与过去商品匮乏、即使产品质量低劣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情况下实现的工业利润不能简单相比。

4.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利润甚至折旧全部上缴，国家用这些资金铺新摊子，搞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忽视了原有企业的更新改造。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有了留利，但资金有限，无力解决长期以来遗留的问题。这种情况造成许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无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总之，1985～1991 年期间工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只有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为今后改善工业经济效益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四、防治工业污染、保护环境的成效和问题

80 年代以来，中国把防治工业污染、保护环境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此，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环境保护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1982 年 11 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把保护和改善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大任务之一。1983 年 12 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中国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具体措施，并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列为基本国策。1985～1991 年的环境保护工作，是以加强环境管理为中心，以消除烟尘、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等"四害"污染为重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工作。

1. 城市环境保护工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市政建设和环境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环境保护工作以城市为重点，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把环境保护与城市的建设、改造结合起来，由单项治理转向综合治理，开创了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局面。(1) 加强城市饮用水源的管理，进行了重点水源的污染治理。(2) 大气烟尘污染有所控制。如 1985 年全国 90 多个大中城市，结合消烟除尘、改变燃料结构、推广集中供热等综合措施，建立了 148 个烟尘控制区，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减轻了城市的大气污染。(3) 加强城市噪声控制。(4) 绿化、美化环境有了较大进

展。不少城市建设了一批公园绿化区和道边路旁绿地花坛。

2. 工业污染防治的进展。全国各地工业系统，结合技术改造，建设了一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工程。通过限期治理、关停并转迁和创建环境保护清洁工厂等措施，提高了工业“三废”治理率，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量，使一批重点污染源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3. 环境保护管理不断加强。

4. 环境保护教育事业、科学研究有了发展。许多高等院校设立了环境保护专业，为环境保护工作培养人才。国家对环境科学研究课题进行立项，并按计划验收、鉴定，国家授予科学技术进步奖进行鼓励。

5. 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1984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这一规定下发后，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问题开始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还制定了防治乡镇企业污染的法规和实施细则，工作逐渐得到开展。

这几年工业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1) 环境保护管理力度不足。国家虽然制定了有关法律，逐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环境管理体系，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环境管理阻力很大，效果有限。(2) 环境保护资金渠道不畅通。1984 年，国家经委、计委、财政部等 7 个部委曾联合发出了关于环境保护 8 条资金渠道的规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变化和文件规定不严格等原因，除了排污收费和“三同时”资金有一定保证外，其余渠道都不落实。(3) 环境保护法规的宣传还不够深入。许多企业、地方的领导，特别是乡镇企业的领导，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认识，加之管理水平较低，所以环境污染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乡镇、农村有扩大、蔓延的趋势。

到 1991 年止，中国的环境保护也不能令人满意，工业污染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

1991 年，全国废气排放量为 10.1 亿吨（不包括乡镇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570 万吨，粉尘排放量为 580 万吨；燃料燃烧废气消烟除尘率为 84.7%，工业锅炉烟尘排放达标率为 72%，工业窑炉烟尘排放达标率为 51.2%。与上年相比，南方城市污染程度有所下降，而北方城市变化不大。中国的酸雨仍限于局部地区，降水 pH 值范围在 3.79 ~7.60 之间，年均值低于 5.6 的地区占 59%。南方一些地区酸雨出现频率已超过 90%。这种状况令人担忧。

1991 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 336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235 亿吨，比上年下降 5.5%。工业废水中化学耗氧量为 721 亿吨，比上年增长 1.8%；氰化物排放量为 465 吨，比上年增加 13%；挥发性酚排人量为 7859 吨，比上年下降 15.7%。1991 年，中国首次完成了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乡镇工业外排废水达标率为 14.8%，工业锅炉达标率为 37.9%，工业锅炉改造率为 10.2%。乡镇工业的污染问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总结 1985 ~ 1991 年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带规律性的结论：(1) 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既要反对“环境污染难免论”的观点，也要反对以不切实际的环境质量要求来限制经济发展的

做法。(2) 坚持"以加强管理为中心"的工作方针。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目前不可能有大量的资金投向环境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污染又主要是企业装备落后、管理不善、能源资源浪费严重等原因造成的。因此，以管理为中心来治理污染，符合我国的国情，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路子。(3) 大力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4) 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办实事、见实效"，逐步改善环境质量。

第二节　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成就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践表明，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变、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通常，人们将这种规律性概括为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集中化是指生产要素日益集中于专业化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分散化是指在企业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有大量的小型、微型企业存在和发展。大中小企业相互协作、各得其所，共同为经济发展作贡献。

1985～1991 年，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化，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主要成就有：

1. 大中型企业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大中型企业在全国工业生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只能加强其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削弱。1985～1991 年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实现了这一目标。1985 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为 2.32%，相应的产值比重为 49%。1991 年全部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中，大中型企业数占 3.57%，相应的产值比重为 55.98%。

2. 采取政策和措施引导小型工业企业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小企业的作用，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为此，在 1985～1991 年间，我国也非常重视小企业的发展。以前，我国的小企业在钢铁、化肥、纺织等宜于发展大、中型企业的领域有盲目发展的势头。1985～1991 年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十分注意解决这个问题，鼓励小型企业在砂石开采业、轻质建材业、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缝纫业等方面发展。

3. 调整大中小企业间的组织结构关系，发展专业化协作生产，以改变长期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在城市改革中大力发展横向联合，这对冲破地区、部门、所有制分割，打破条块分割的格局，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企业集团，是我国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成果。

4. 注意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作用。国有大中型企业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也是企业组织结构中的中心环节。因此，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有特殊的意义。为此在1985～1991年间，我国始终将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其间的主要措施，有贷款优惠，有给予大中型企业直接的外贸权等。1991年，国务院又专门提出了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的11条政策措施。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经济发展中长期的人为因素的作用，使企业的组织结构的演变不完全符合规律的要求。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经过1985～1991的调整，向合理化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企业组织结构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可以用“散”、“全”、“低”来形容企业组织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所谓“散”，是指集中化不够，产业布局、产品生产分散进行，没有形成必要的集中度。经济学理论表明，一种产品的生产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使成本降低、效益提高。按照这一要求，应通过行政的、市场的手段，限制分散布局，以使原有产业点扩大规模。但我国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不够。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是规模效益非常显著的行业，宜发展大企业。但我国的小钢铁厂则遍地开花，县办、乡办、村办钢铁厂被认为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有效途径。但这里有巨大的资源浪费。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钢铁工业的最小规模应为800万吨年综合生产能力，但我国目前无一家企业达到这一标准。有专家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最小规模也不应低于300万吨年综合生产能力。按这一标准考核，目前仅鞍钢、首钢、宝钢及武钢能过关。中国以占全球1/3的钢厂生产了只占全球1/10的钢铁产品。资源浪费之大，是不难看出的。汽车工业也有同样的问题。按国外的经验，汽车厂的最小规模是40万辆，但目前我国只有两家才达到年产10万辆的水平，差距之大，非常明显。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分散布局问题也相当严重。

所谓“全”，是指企业的功能全。当然，这种“全”，有特殊的含义，即“大而全”、“小而全”，缺乏必要的专业分工。以机械行业为例，它是分工协作效益非常明显的行业。但我国机械行业12万个企业中，有80%是“全能厂”，其铸件、重锻件的自给率分别在80%和90%以上。但日本同类企业中，自制铸件占15%，美国占40%左右。“全”的另一表现是工厂的社会服务功能强，工厂办社会，学校、幼儿园、医院、食堂等一应俱全，无所不管；职工生老病死，企业无所不包。工厂的辅助性功能占去了企业的很大精力。这不利于企业向专、精、深方向发展。

所谓“低”，是指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低。对经济效益问题，我们在前面作过一些分析。这里结合企业组织结构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原国务院经贸办、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等6个部委组成的划分企业类型协调小组发布了国经贸企［1992］176号文，即《关于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名单的通知》。这个通知认定了全国机械工业行业共有大型企业1070家，其中特大型3家，大一型97家，大二型279家。这些大型企业有关经济效益指标与机械工业全行业的比较如表5所示。

表 5　全国机械行业经济效益比较

企业规模	资金利润率（%）	资金利兑率（%）	人均利润（元）	工资利税率（%）	销售利税率（%）	单位净产值能耗（元/吨）
特大型	2.31	7.12	690	74.47	7.27	1075
大一型	3.94	8.78	1220	83.86	9.04	2122
大二型	3.65	8.36	997	80.98	7.85	2461
大企业合计	3.72	8.56	1084	82.10	8.39	2154
机械行业合计	5.39	10.98	1228	98.00	8.99	3037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参考》，1993 年第 54 期。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机械行业无论是特大企业，还是大一、大二型企业，其经济效益普遍低于机械工业全行业的经济效益。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企业规模不当有关。因为，如果特大、大一、大二型企业是经济规律作用的产物，那么其经济效益肯定会好。与上述我国机械行业 80% 是全能厂结合起来考虑，可以认为，这些大型企业的规模大得不适当，应走分散化的道路。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存在的问题

1985～1991 年，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进展。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一些长期性问题得到解决，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转化为新的表现形式。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合理化，又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不断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一）超越历史阶段的重工业过重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在 50 年代初期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中国政府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从 1953 到 1978 年的 26 年间，除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 1961、1962、1965 年轻工业降低的速度低于或增长的速度高于重工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1967、1968、1974、1976 年因政治动乱国家无法组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导致重工业的增速低于轻工业，在其余 19 年经济正常发展的年份中，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轻工业。1978 年与 1952 年相比，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27.8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13.8%；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9 倍多，年均增长 9.3%；年均增长速度之差为 4.5 个百分点。由于重工业的高速增长，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 1952 年为 35.5% 的基础上逐年上升，1955 年开始超过 40%，1958 年超过 50%，1960 年高达 66.6%。在 60 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重工业比重逐步下降，1965 年降至 50% 以下。后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几年徘徊，从 1970 年起重工业的比重稳定地超

过50%，到1978年为56.9%。

由于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建设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由此形成了在国民经济中重工业过重，农业、轻工业过轻的畸形结构。从工业内部的结构看，轻工业发展缓慢，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从重工业内部结构看，重加工业发展过快，能源、原材料工业不能满足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重工业的发展是自我服务型的，没有很好地发挥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技术改造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还是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劳动力充裕，资金和外汇不足。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发展轻工业的做法，违背了资源禀性，因而不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不利于资金的积累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国实现了发展战略的转移。工业内部的关系得到调整，重工业逐步转变服务方向，轻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84年与1978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00.7%，年均增长12.3%；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50%，年均增长7%；年均增长之差为5.3个百分点。在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3.1：56.9改变为1984年的47.4：52.6。

在1985~1991年期间，轻工业持续高速发展。除治理整顿期间的1990年外，其他各年度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都超过重工业（详见表6)。1991年与1984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2.2%：年均增长15.4%；重工业总产值增长144.4%，年均增长13.6%；总增长之差为27.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之差为1.8个百分点。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4年的47.4%提高到1991年的48.9%。由于工业增长速度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轻重工业的比重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而在这7年中重工业产品价格提高的速度又高于轻工业，因此，上述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变化还不能准确地反映轻工业高速增长带来的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如按1984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超过50%。如果说经过几年的价格调整，1991年的价格体系更为合理，那么，按1991年的价格计算，1984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低于47.4%。

表6　　轻、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和比例关系　　单位:%

	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值增长速度		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以业总值为100)	
	轻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84年		47.4	52.6	
1985年	22.7	20.2	47.1	52.9
1986年	13.1	10.2	47.6	52.4
1987年	18.6	16.7	48.2	51.8
1988年	22.1	19.4	49.3	50.7
1989年	8.2	8.9	48.9	51.1

	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值增长速度		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以业总值为100）	
	轻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90年	9.2	6.2	49.4	50.6
1991年	14.6	14.4	48.9	51.1
1991年比1984年增　长	172.2	144.4		
1985～1991年年均增长	15.4	13.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56、57页。

整个80年代中国轻工业的高速发展，转移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带动了出口的增长，改善和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认为，轻、重工业的比例调整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从总体上看是更加协调了。

（二）工业产业结构矛盾的重要表现——基础工业的发展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80年代以轻加工业领头的加工业的高速发展，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体制背景下实现的。这个时期内，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在投资领域形成了多元投资主体的格局；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一方面直接管理手段减少，另一方面间接管理体系还在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价格体系尚不完善，要素市场也处于起步阶段。在新旧体制的摩擦与冲突中，政府虽也尽力在增加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但基础工业的发展仍低于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业产业结构中原有的基础工业不能适应重加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转化为基础工业的发展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新的表现形式。

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在“七五”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1%，基础工业仅为10%，低于整个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在1985～1991年期间，许多重要基础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详见表7)，且差距较大。通过国际的比较更能说明问题。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1000美元时，对钢材的需求增长较快，钢产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1～1.6，我国在1985～1991年期间仅为0.87。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其起飞阶段，能源弹性系数一般都超过1，而中国在1985～1991年期间仅为0.51。能源不足制约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表 7　基础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比较　单位：%

	1985～1991 年 年均增长	1985～1988 年 年均增长	1989～1991 年 年均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	8.4	10.8	5.4
工业总产值	14.5	17.8	10.3
一次性能源	4.3	5.4	3.1
发电量	8.7	9.7	7.5
钢	7.3	8.1	6.1
水泥	10.8	14.4	6.3
纯碱	11.1	8.5	14.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有关资料计算。

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基础产业增速与工业总产值增速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并不是因为这些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提高了，而是整个工业生产速度放慢的结果。1991 年工业生产逐渐步人正常发展，一些地区又频繁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基础工业不能满足加工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又突出起来。

（三）宏观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1. 短缺与过剩并存。从行业之间看，电力、钢材等原材料工业一直短缺，能源、原材料的超前系数下降；而机械加工等行业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新兴行业，如家用电器行业，则一哄而上，失去控制，在短期内由短缺变为过剩，生产力浪费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在行业内部，如在钢铁行业内部，生铁、钢坯生产能力不足，而轧钢能力长期过剩。

2. 产业结构中的技术结构不合理，中低技术过多。主要表现在，代表技术梯次先进部分的国有企业的更新改造进展缓慢，技术装备老化，而以中低技术为基础的乡镇企业发展过猛；一些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的低效、高耗设备仍在生产销售；地方、企业偏好于引进简单组装型技术，进口装配线组装件抢占国内市场。

3. 加工行业发展的齐头并进和区域分布不合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沿海地区虽然技术力量雄厚，但发展新技术产业缺乏动力和压力，仍主要发展传统加工业和扩大生产规模，没有有效地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上来，这与我国开放沿海地区的战略构想不尽一致。而在西部地区，一些原来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省份，虽然技术力量薄弱，但在局部利益的推动下，也大上价高利大的加工业。

4. 产业结构有超稳定的趋势，结构调整成效不大。一些长线行业的生产能力没有明显缩小和转移，该压的没压低，该保的没保好，就是这种超稳态的表现。各行业的利润率、同一行业在各地区的利润率的悬殊差别长期存在，但这些行业和企业很少因这种差别而转移、淘汰，也是这种超稳态的表现。

三、工业区域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问题

（一）东西差别进一步扩大

1985～1991年，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虽然中西部搭上了东部发展的特快列车，但东西部的差距还是拉大了。而这种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工业发展差距造成的。1952年东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为115.6元，中西部地区为83.6元，二者的差距为31.9元。1985年，二者的差距为614元。1989年，东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为1571.41元，而中西部地区只有931.72元，二者的绝对差距扩大到640元。199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114元，西部地区为990元，二者的绝对差距为1124元。差距拉大的趋势非常明显。

造成东西部差距拉大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

1. 宏观区域政策的作用。1985年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再度向经济技术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倾斜，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步入快车道。除中央政府的投资比重再度升高外，相关的财税、吸引外资的外贸、外汇、价格、分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紧紧跟上。中国的经济特区全在南方，两大证券交易所都在东南部。这些有利条件促进了东部地区工业高速发展，因而带动了总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西部地区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这是改革以来东西部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

2. 原有基础的影响。东部地区原有基础好，再加上良好的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条件，只要稍加重视，并提供适当的机会，便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西部地区则不具备这种客观条件。为较快地显示改革成效、减少改革成本、增强改革的示范效应功能，优先发展东部地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3. 市场发展程度不一样。总的来讲，1985年后，中国的市场作用逐渐加大。但在区际间，则很不平衡。东部地区等改革的先行者，从改革之初，便加大市场作用的分量。有“敢为天下改革先”之称的广东省，最早取消或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带来了高效率。这是东部地区发展快的巨大动力。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可说是市场机制迟迟不肯度“玉门关”，指令性计划、行政管制层层加码。这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中西部地区发展慢的根源之一。

（二）南北差距悄然形成

改革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南北区际关系来看，北方的经济状况、技术基础、生活水平优于南方。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发展速度都不快，人们对其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但70年代末期以来，尤其是1985年以来，当人们将注意力放在南北关系上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方的发展速度、技术基础、生活水平，在短期内赶上北方，并在许多领域超过北方。新的南北差距、南富北贫、南发展北停滞等问题，无情地摆在人们面前，并且这种差距有不断扩大之势，使人们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它对北方的经济运行、企业发展、资源流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下面对南北差距作些分析。

以华南的广东、福建、广西、海南4省区为例，4省区的面积为57万平方公里，人口1.45亿，但1991年的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份额为21%。

1978～1991年，华南4省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约8倍，年均增长15.65%，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长5.5倍，年均增长12.08%。在此14年间，4省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9.12%提高到14.6%。1978～1991年，华南4省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约5.5倍，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1.98%，也明显高于全国同期增长约4.6倍、增幅为8.6%的水平。

将中国南方和北方有代表性的省份在改革前后国民收入、工业净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作一比较（见表8），即可发现差距。

表8　　若干省份分阶段国民收入和工业净产值年均增长率　　单位：%

	国民收入		工业净产值	
	1953～1978年	1979～1990年	1953～1978	1979～1990年
北京	12.5	8.2	16.2	7.2
天津	7.4	6.9	4.6	2.2
辽宁	7.3	6.9	9.8	6.9
吉林	5.5	8.1	9.7	9.0
黑龙江	6.3	6.2	10.8	5.4
浙江	5.7	11.9	11.0	16.8
广东	5.3	11.5	10.3	14.8
广西	5.0	7.2	8.8	9.8
福建	5.4	11.0	9.9	14.6
云南	6.0	9.3	10.3	12.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注：广东省的资料包括海南地区（省）。

表8的资料显示，总体上的南发展、北停滞趋势非常明显。所选的北方两直辖市及东北三省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改革前是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重要贡献者，而东北三省更有中国重工业基地之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然而，它们落伍了。但与此同时，中国南方出现了经济奇迹，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南方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一个包括香港、广东、台湾、福建在内的大经济区正在东南亚地区形成，这个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将比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更有经济意义。

南方与北方差距的拉开还可举两例：

在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人们用异军突起来形容。而南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则可称为“异军”中的排头兵，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前10名县（市），大部分在南方，而它们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靠乡镇企业起家。当然，北方也不乏龙虎式的乡镇企业。但北方疆域辽

阔、人口众多，与南方相比，乡镇企业的数量、质量要逊色许多。

从城乡协调发展来看，南方依托乡镇企业的发展，缩小了城乡差别，形成了城市带乡村、乡村促城市的新型城乡关系。这一点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明显。许多城里人放弃传统的商品粮户口，到乡村安家，说明这一带的乡村经济足以与城市经济抗衡。这对引导中国社会变革有巨大意义。

（三）地区工业结构趋同

地区工业结构趋同是我国地区工业结构的特有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不少地区仍有万事不求人的“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同。有关部门对全国各地区工业部门结构相似系数的分析表明，除个别省份外，全国多数省份的这一系数都在 0.9 以上。地区工业结构趋同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极大的障碍作用。这种趋同性的表现及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 重复布局。适宜于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工业在各地重复布点，大部分企业的生产能力达不到经济规模，造成资源的浪费。汽车工业即为一例。现在全国除西藏外，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制造、改装厂。1991 年，全国汽车产量只有 71.3 万辆，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 1 个月的产量。1985～1989 年，全国汽车行业的投资共计 120 亿元，其中 75%由地方和部门自筹资金完成。

2. 高利诱惑。价格不合理对地区工业结构的趋同运动起了诱惑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加工行业。在原材料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在价高利大的诱使下，各地区利用行政手段发展加工业。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洗衣机厂、手表厂、纺织厂在全国遍地开花。对原材料的过度需求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原材料价格暴涨。到 1991 年年末，全国除西藏和宁夏外，各省份都有彩电厂，共有 70 多家整机厂，但没有一家的规模达到 100 万台。1991 年，全国彩电产量为 1194.4 万台，平均产量只有 8 万多台。而同期日本松下公司的彩电产量为 470 万台，韩国三星公司的产量超过 300 万台。

3. 行政性垄断。这是指地方以行政性手段垄断原材料的自由流动，来发展与另一地区完全相同的工业。烟草、纺织等行业的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即为此例。小烟厂、小纺织厂的产生与行政性原材料垄断有极大的关系。这不但使该行业的产出数量、质量、效率得不到改善、提高，而且还会使该行业走向衰落。我国一些地区低水平的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给上海等地的先进纺织厂、烟厂的生存和发展造成重大威胁。

应当说，地方保护主义是财政上“分灶吃饭”的伴随物。这给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制造了巨大的障碍，给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制造了无形的“拦路虎”。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主要有：(1) 有的地区明文规定，擅自购买外地产品者，没收全部进销差价，并处以罚款。(2) 有的地区指定商业公司统购包销部分地方产品，地方产品不足，经批准，方可从外地进货。(3) 有的地区对经销限制产品的企业不予贷款，在工商管理、质量检查、商品检验、能源供应等方面层层设卡。(4) 有的地方对本地产品不分花色品种、不问是否适销对路，一律要求商业部门收购。其结果是造成产品移库，为质次价高、无竞争力的产品以不正当的手段找到出路。

第三节　交通、邮电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

一、交通、邮电业的体制改革

（一）1985~1991年交通运输业的管理体制改革

1985~1991年，交通运输部门的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许多成效。

1. 实行政企分开，加强行业管理。1985年以来，各级地方交通部门通过调整、充实，逐步健全了交通行政管理机构，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行政宏观管理，包括规划建设、法规建设、安全保障、科研教育和信息统计等方面。交通部和各省（市、区）交通厅（局）陆续下放了一批直属企业。天津港下放到天津市，实行交通部和天津市双重领导，以天津市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港口吞吐量、日均离港船数、实现利润和基本建设投资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大幅度增长，为港口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长江航运管理体制在实行港航分管的基础上，逐步落实港口下放工作。

继天津港下放后，1986年，交通部又将大连港和上海港分别下放给所在城市，实行"双重领导，城市为主"的管理体制。港口下放后，实行"以收抵支、以港养港"的办法，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增强港口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另外，交通运输业"多家经营"的局面也开始形成。到1985年年底，全国个体运输汽车达29万辆，超过了交通部门专业营运汽车的拥有量；个体运输船舶达24万艘、320万吨，相当于国家和集体内河运输船舶的一半。

2. 精简机构，改革领导体制。1985年，又将昆明铁路局并入成都铁路局，使全国的铁路局减少到12个。铁路系统内部，层层实行运输承包制，局长、分局长、站段长等首长负责制，以及试行工资总额与运输工作量、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等改革措施，取得了提高运输能力、增加运输收入和上缴利税增长等效果。

3. 实行全行业总承包。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铁路部门实行了"投入产出，以路养路"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好效果。铁路总体运输能力扩大，生产质量也有改善。民航的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国务院的方案，在1986年做充分的准备，从1987年开始，也逐步实行了政企分开。

4. 积极开展横向联合。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交通运输部门的横向联合已从单纯的运输协作，发展到包括资金、人才、信息等在内的全方位联合。华东、东北和长江沿岸各省市，先后建立了协作委员会，以加强地区运输企业间的横向联合。沈阳和哈尔滨铁路局，广州和上海铁路局之间，率先打破路局界限，发展局间的横向联合，挖掘运输潜力，扩大了限制口的通过能力。铁道部运输局和中国远洋总公司实行了跨部门的横向联合，开办了远洋和铁路国际集装箱水陆联运。

5. 调整客运票价。经国务院批准，从1989年9月1日起，提高铁路、水路、民航的客运票价，铁路每人公里的票价平均提高112%。交通部直属上海、广州海运局，大连轮船公司和长江轮船公司，黑龙江航运局的客运票价平均提高96%。民航国内航线对国内旅客，在优惠折扣的基础上，上调77%，对外国旅客只作局部调整。

6. 拓宽筹资渠道。1991年，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在广东联合召开了全国合资铁路工作会议，肯定了三茂铁路公司合资建铁路的经验，并称之为"三茂模式"。三茂铁路公司在修建"三茂线"铁路时，由广东省政府作为投资的牵头单位，通过吸收企业资金、发行铁路建设债券，几年时间就全线投人运营。这为合资建设铁路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国家计委和铁道部与有关部门配合，拟定了《关于大力发展合资铁路的若干政策建议》，提出了合资铁路要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贯彻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这些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二）1985～1991年邮电通信业的管理体制改革

为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对邮电通信业的需求，1985～1991年间，邮电通信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较1985年以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发展。

1. 邮政工作改革。

(1) 邮运工作改革。随着邮政业务量的增加，运输能力和运输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干线运输能力比实际需要相差20%～30%。运输不畅、邮件积压问题相当严重。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从1985年起，对邮运工作进行了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成立了邮电部邮政运输局和6个大区的邮运分局，加强干线邮运的统一指挥高调度；改变单纯依靠铁路客运的邮运结构，开辟了部分干线水运和汽车邮路，并开展了铁路集装箱邮运业务；确定邮政的押运、转运两个工种免征奖金税，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2) 邮票发行和集邮工作的发展。随着集邮事业的发展，邮票发行工作不能满足集邮方面的需求。为改变这种局面，从1985年起，对邮票发行和集邮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有：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确定邮票发行和集邮工作要尽力满足集邮爱好者的要求；分别成立了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和中国集邮总公司，以改变过去的政企不分的局面；扩大邮票的印制发行量；扩大邮票的销售渠道等。

(3) 报刊发行的改革。针对报刊发行增长快、品种多，而且超过了邮政部门的发行、运输能力的特点，对报刊发行方针作了适当调整。其做法是：计划发行、区别对待、扩大零售、发展代办。对印数大的报刊，努力推广"分地印刷、分地发行"的办法，以减轻运输压力。

2. 改革邮政部门领导体制。1986年，邮电部门稳步推进了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这就是实行局长负责制。到1986年年底，已有527个邮电企业试行了这一制度，占企业总数的19.3%。

3. 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鼓励邮电事业发展的优惠办法。采取了鼓励企业发展业务的新措施。包括：对超计划利润，邮电部和企业所在省份的邮电管理局实行二八分成，产品结算单价的国际业务利润率由30%提高到40%；每新开办一个邮政储蓄点，邮电部补助1500元，并按储蓄收人的一半返还各相关省局；贯彻"以邮养邮"的方针，邮

政利润除缴纳有关税收外，其余全部用于邮政事业；制定和实施了《邮电企业工资总额包干试行办法》，以促进节约用人，提高劳动生产率。

4. 依靠社会力量加快邮电事业的发展。为适应邮电业务大幅度增长的要求，邮电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邮电工作的指示，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依靠社会力量，多方筹集资金，加快了邮电事业的发展。如，福建省1985年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集资达4680万元，约占全年邮电建设总投资的一半。1986年，福建省新增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14840门，长途报话电路176路，有19个县、市开通了到香港的半自动、全自动长途电话直拨业务。1986年，福建省的电话普及率在全国名列前茅。

二、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

（一）交通、邮电事业的建设

1985～1991年，交通、邮电事业的建设取得了成效。全民所有制交通、邮电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计1946.97亿元，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2.2%。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457.95亿元，占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3.8%；更新改造投资489.02亿元，占同期更新改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9%。通过投资新增固定资产1425.58亿元。

在这个时期，交通、邮电业建成了一大批大中型项目。主要包括：

铁道部门。山东兖石线，四川成渝线电气化工程，新菏线，上海新客站，衡广复线，京包复线电气化配套工程，天津铁路枢纽工程，黑龙江嫩黑铁路，新焦太焦复线，石家庄铁路枢纽，山西北同蒲复线，大沙线，石太线电气化工程，内蒙通霍铁路，安徽阜淮线，南同蒲铁路线，沈阳铁路枢纽，广西南防铁路，京秦铁路等。

海港码头。山东石臼港煤码头，温州港龙湾港一期工程，汕头港，广西防城港，锦州港成品油码头等。

公路及公路桥。青藏公路改建工程，湖北沙洋大桥，河南郑州黄河公路桥，浙江飞云江大桥，广东洛西大桥，河南开封黄河大桥，广州—珠海高速公路，广州—佛山高速公路，平泉—双井公路，沈大高速公路，107国道湖南段等。

民航。河南洛阳机场，广东梅县机场，沈阳桃仙机场，湖南黄花机场，浙江温州机场，浙江宁波机场，云南芒市机场，广西北海机场，山东烟台莱山机场，陕西咸阳机场，青海省曹家堡机场等。

邮电部门。广州市程控交换系统，京汉广中同轴电缆工程，沪津杭中同轴电缆工程，北京国际电信局，上海国际电信局，北京十万门程控市话工程，上海长途通讯枢纽工程，上海程控交换机工程，京沪数字微波工程，宁汉渝光缆工程，辽宁沈阳邮政通信枢纽工程，汉渝微波工程等。

这批大中型项目的建成对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交通、邮电业务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1985～1991年交通、邮电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1991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5.34万公里，虽只比1984年的5.17万公里增加0.17万公里，但路线质量提高，营运能力加强。如铁路复线里程1991年达到13380公里，比1984年增长了38.4%，占营运里程的比重也由18.7%提高到25%，主要干线的复线率都在90%以上；铁路电气化建设进展也很快，到1991年已有电气化铁路7800公里，比1984年的3000公里增长了160%。新建公路11.5万公里。有路面的公路里程占公路总长度的比重从1985年的79.6%增加到87%；一级、二级以上公路增加，高速公路的建设开始起步。沿海港口的建设加快，1991年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达到53220万吨，比1984年提高了93.2%。民用航空事业发展很快。1991年民用航空航线达到452条，航空里程为55.9万公里，旅客周转量为3013185万人公里，货邮周转量达到100954万吨公里，分别比1984年增长68.7%、101.7%、157.7%和143.2%。

交通运输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虽然1985～1991年，它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制约因素。交通运输业的主要问题有：（1）经济效益低。如，1991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总收入比上年增长8.4%，但地方公路和水运企业亏损面有所增长，在运输、交通工业企业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潜亏企业。这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管理有关，另一方面与价格体系有关。(2)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落后。铁路南北干线、东西干线以及出入西南等运输干线的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京沪线符离集口只及运输需要的50%。港口吞吐能力不足，煤炭卸船、粮食和杂货码头泊位仍是短线，运输船舶数量少、船龄长的问题十分突出。公路等级低、路况差还很普遍。民航运力不足，尤其是国内航线运力缺口较大，一些省会城市和旅游、开放城市的机场跑道承载能力低，全国不少机场候机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3)交通运输业的投资缺口大。许多急需的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因资金短缺而不能及时修建，对当前和今后运输业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邮电事业得到很大发展。1991年全国完成了邮电业务量204.4亿元，比1984年增长了两倍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邮电通信业与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几年来，邮电通信业朝方便、灵活、高效、普及和国际化的方向迈出了更大的步子。这几年，我国增加了特快专递业务；卫星、光纤通信开始应用；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直接通邮；198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三通”政策的促进下，两岸邮电部门开始直发函件和实行电话直拨。与1984年相比，1991年长话电路增长近3.7倍。长途电话直拨用户迅速增加，达到262万户；其中，直拨国际及港澳的用户达到102万户。市内电话用户发展到670.83万户，比1984年增长了251.1%；住宅电话比重加大，占市话用户的比重达到35.6%。新、轻型电信业务高速增长，到1991年年底，有426个城市开办了无线寻呼业务；移动电话用户达到近5万户。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话机部数从1985年的0.6部增加到1991年的1.29部。

1985～1991年的邮电通信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1）通信能力严重不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到1991年年底，全国电话普及率不到2%，远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普及率。市话待装户有增无减，长途电话线路超负荷日趋加剧，邮件处理手段落后，传递速度慢。(2) 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不少，落后于通信业的发展，社会反映强烈的一些热点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3) 职工队伍素质还不能适应邮电通信业不断发展的要求，不少企业缺乏现代化的管理和技术人才。(4) 邮电通信领域的技术开发和教育、培训等还较为落后，不能满足通信业发展的要求。

第十三章　向市场化迈进的农村经济

第一节　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

一、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取消

自1953年开始实施的统派购制度，曾经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自1979年开始，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原来与“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相联系、与集体生产组织指令性计划相关联的统派购制度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需要。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为了使农副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年底为止，农副产品收购的改革主要是品种和数量上的调整，统派购制度并未取消。虽然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曾提出要对农村流通体制进行改革，1982年年初，国家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中要实行合同制，通过合同制把国家计划和农民生产协调起来，但由于一系列原因，购销合同制并未实行。到1984年，由于连续几年的农业丰收，流通领域改革滞后所引发的矛盾显性化，从个别产品、局部地区的“卖难”，变成全国性的“卖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决定自1985年开始，对实行了多年的农副产品统派制度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1) 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统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国家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2) 为了加强合同定购与市场收购制度，把合同定购与农业生产资料奖售制度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1985年1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以下简称1985年1号文件）明确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商业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的粮食，国家确定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粮价，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以保护农民利益。定购的棉花，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棉花也可以自由上市。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实行自由交易。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

针对1985年出现的粮食、棉花产量的大幅度波动，从1986年开始，国家对农产品合同定购政策进行了调整。在1987年进一步完善了粮食定购制度，实行粮食合同定购与平价化肥、柴油以及发放预购定金“三挂钩”。198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以下简称1986年1号文件）指出：“把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是粮食收购制度的重大改革，只能逐步完善，不可因为粮食生产出现年度性波动就动摇改革的方向。为了保持和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将适当减少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比重，并对签订合同的农民按平价供应一定数量的化肥，给予优先贷款。”1985年，全国粮食合同定购数量为790亿公斤，1986年减为615亿公斤。棉花合同定购数量1986年仍维持在1985年42.5亿公斤的水平上。但为了缩小南北棉花收购价格上的矛盾，自1986年新棉花上市起，北方棉花加价比例由“倒三七”改为“倒四六”；南方棉花加价比例不变。为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1986年10月中旬，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提出1987年要稳定粮食合同定购任务（维持在1986年的水平），充实粮食合同定购内容，中央专项安排一些化肥，柴油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每50公斤贸易粮拨付优质标准化肥3公斤、柴油1.5公斤（上调中央的合同定购粮食，每50公斤贸易粮仍拨给优质标准化肥5公斤）。国家对合同定购的粮食发放预购定金，由粮食部门合同定购粮食价款的20%发放，在农民交粮时扣还，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通知》决定，从1987年粮食年度开始，国家对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外的粮食，实行随行就市，议价收购，让农民从多卖议价粮中增加收人，1986年粮食年度国家委托代购的粮食，从秋粮收购开始，除小麦外，可通过议价收购方式完成。向农民议购的价格，每公斤贸易粮在原超购价基础上加0.06元；市价低于这个水平时，随行就市议购。为鼓励棉农积极性，1988年3月中旬，国家计委、商业部、财政部、农牧渔业部、石化总公司联合发出《关于国家对收购、调拨棉花分别实行奖售柴油、粮食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88年新棉上市起，国家实行收购棉花奖售柴油和省间调拨棉花售粮食的办法，国家每收购刃公斤皮棉奖售棉农平价柴油2.5公斤，省间调拨棉花实行吨棉吨粮的奖励办法，即按国家计划净调出量，每吨奖售粮由中央财政补贴差价款128元。

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多年来上上下下已经习惯于统购统销的一套做法，改为合同定购后，许多工作跟不上。而且，由于定购价格仍由国家确定且偏低，影响了农民向国家出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不少地方把协商变成摊派，合同书变成任务通知单。加上“三挂钩”也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因而不仅改革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1985～1988年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徘徊。1985年决定取消统派购制度的动机，是为国家减轻负担。但统派购制度的取消却导致了更大的财政补贴。据统计，1985年以后几年，在政府的预算支出中，预算补贴竟占约1/6的份额。1984年，财政价格补贴218.34亿元，1988年增加到316.82亿元，其中，粮棉油价格补贴由201.67亿元增加到204.03亿元，增加2.36亿元，调整肉价增加补贴40.40亿元。巨额财政补贴换来的是政府、消费者、生产者、经营者的4个不满意。政策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合同定购制度没有触动消费者

的利益以及维护这一利益的统销制度。其中，矛盾最为突出的，要属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方面。

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第一大宗农产品，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关系到整个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成败。1985年开始改革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后，在粮食收购方面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定购价格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仅凭自愿协商难以实现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其次是改革对粮食销售制度触及很小。当时我国平价粮食销售的数量约占社会粮食商品总量的80%，为了保证平价粮食供应，国家必须收购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不得已而重新使用强制性手段来落实定购合同，甚至用封锁市场等办法来保证合同定购的实现，致使合同定购演变为“比统购还统购”。为了真正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同时保证粮食供给的基本稳定，198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河南省新乡市和广西省玉林市两个粮改试验区，许多地方政府开始改革粮食统销制度。实际做法大致有3类：(1) 压销。即将城镇居民基本口粮以外的平价供应改为议价供应，如山西省、辽宁省，等等。(2) 暗补改明补。即在提高平价粮食价格的同时，向消费者发放补贴，如广东省和福建省。(3) 压销与提价并举，如广西玉林市和河南新乡市。

1990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粮食丰收带来了充足的粮食资源和稳定的市场。与此同时，从1989年开始实行治理整顿以后，整个经济环境趋于宽松，通货膨胀得到明显抑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1990年年底提出了近期全国粮改的基本方针，即“稳购、压销、提价、包干”；明确了现阶段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保证平价粮食供应和近几年内稳定国家定购数量500亿公斤不变及各地通过压缩平价粮销售，力争在一两年内把居民口粮之外的平价粮食销售放开，实行定购粮食与平价销售粮食大体平衡的基础上，推进农产品价格改革步伐，即在收购上，逐步提高粮食的购销同价。1991年5月1日，国务院出台了调整粮食统销价格的改革措施，3种粮食（面粉、玉米、大米）中等质量标准品全国平均统销价每0.5.千克提高0.10元，对职工给予适当补贴，每个职工每月基本工资提高6元。

1991年的粮改，对于理顺粮食价格，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起到了重要作用。市场物价平稳，社会安定。这表明，我国农副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已基本进入了一个以建立市场体系和健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为主的新阶段。

二、农副产品市场的发展

1985年是我国农村生产经营向市场化迈进的重要转折点。以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向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相结合转化作为基本标志，从根本上改变了主要农副产品单纯由国家下达生产任务和进行收购的局面，形成了农副产品多渠道流通的格局。

（一）城乡集市贸易的发展

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使上市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城乡集市贸易得到充分的发展。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的发展是我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最明显的成果之一。1979年就明确提出要开放集市贸易，肯定了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

使得多年来受到极大压抑的集市贸易迅速恢复。1979 年全国集贸市场 38993 个，1984 年发展到 56500 个。从 1985 年起，由于取消农副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与市场收购相结合的制度，集贸市场以更高的速度发展。1985 年，城乡集市发展到 61337 个，1988 年发展到 71359 个，1988 年是 1979 年的 1.83 倍。其中城市集市在 1978 年前几乎绝迹，到 1988 年已发展到 12181 个。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 1979 年为 183 亿元，1988 年增加到 1621.3 亿元，1988 年比 1979 年增加了 7.86 倍。从 1989 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城乡集市个数的增长势头有所减缓，但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仍保持稳定的增长。(详见表 1)

表 1　　城乡集市贸易情况

	1985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城乡集市数（个）	61337	69683	71359	72130	72579	74675
其中：城市集市数（个）	8013	10908	12181	13111	13106	13891
乡村集市数（个）	53324	58775	59178	59019	59473	60784
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亿元）	632.3	1157	1621.6	1973.6	2168.2	2622.2
其中：城市集市贸易成交额（亿元）	120.7	347	545.3	723.6	837.2	1079.2
乡村集市贸易成交额（亿元）	511.6	811	1076.0	1250.0	1330.4	1542.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第 619 页。

从表 1 可以看到，城乡集市个数 1987 年和 1988 年分别比 1985 年增长了 13.6%和 16.3%，而 1989 年、1990 年和 1991 年比 1988 年分别增长 1.08%、1.7%和 4.6%；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却增长稳定，1989 年、1990 年和 1991 年的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分别比 1988 年增长了 21.7%、33.7%和 61.7%。这表明，城乡集贸市场已成为农副产品流通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为农副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

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使农民家庭消费品的商品性稳步提高，自给性稳步下降，形成了农村商品化生产的新格局。(详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到，农民家庭消费中商品性消费所占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39.7%上升到 1988 年后的近 70%。这说明，我国农村已经开始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走出来，正在步入市场经济。在农村，随着与市场接触面的逐步扩大，农民的商品意识正逐步提高。

表 2　　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　　单位：元

	1978 年	1985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商品性消费							
1. 食品	18.91	76.46	101.90	126.83	151.52	151.39	159.64
2. 衣着	13.12	30.70	33.56	40.41	43.35	43.93	49.61
3. 住房	3.49	38.66	56.80	70.25	76.07	68.50	67.77

	1978年	1985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4. 燃料	2.64	3.92	4.46	5.68	6.98	7.05	7.41
5. 用品及其他	6.68	35.88	47.03	60.00	65.32	63.52	71.87
自给性消费							
1. 食品	59.68	106.97	117.77	127.74	138.06	187.91	192.66
2. 衣着	1.62	0.64	0.67	0.72	1.03	1.41	1.37
3. 住房	0.18	0.80	0.96	0.85	0.98	0.80	1.13
4. 燃料	5.64	14.24	14.38	16.01	16.53	19.41	19.40
5. 用品及其他	0.94	0.18	0.16	0.27	0.24	0.31	0.3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第 310 页。

（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逐步建立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全国各省市都有分布，就其形成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发形成的批发市场，如四川新都县的粮食批发市场。这类批发市场基本上是在集贸市场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主要从事现货交易，交易品种既有鲜活产品，又有干成品。在自发市场上，交易的品种、价格基本放开，国家基本不直接干预经营，任何经营主体都能进场交易。另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规范设计而建立的批发市场。建立这类批发市场，目的是改革原有农产品购销体制，其贸易主体基本是国营的经销公司或国营加工企业，交易品种是政府尚未完全放开的产品，其中主要是粮食。建立粮食批发市场是粮食商品流通体制的一项重要变革，中央对此采取了积极谨慎的态度，拟定先试点，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推开。经过两年多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第一家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于 1990 年 10 月 12 日在郑州建立。此后，先后于 1990 年 12 月 8 日、1991 年 1 月 5 日和 3 月 15 日建立了江西九江粮食批发市场，安徽芜湖大米批发市场和吉林玉米批发市场等省级批发市场。

从数量上来讲，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至 1990 年年底，工商系统管理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达 1340 个，比 1983 年增加 5.7 倍。批发市场的交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86 年，城乡每个批发市场的成交额平均为 318 万元，1990 年增加到 864 万元。但总的来说，批发市场的数量偏少，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据统计，在城乡集市贸易总额中，批发市场成交额所占的份额，1986 年为 3.6%，1990 年为 5.3%。1991 年通过批发市场的粮食只有 50 亿公斤，约占粮食商品量的 5%。

第二节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一）种植业的徘徊与回升

1.1985～1988年，主要农作物减产，种植业出现停滞。1979年以来，主要农产品连年增产。1984年粮、棉大丰收，粮、棉产量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10年内的最高增长速度。在农产品产后设施准备不足、流通环节不畅的情况下，出现了粮、棉等农产品的结构性剩余。有些同志由此产生了对农业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如“三年不种棉花也够用了”，“粮食已经过关了，要多出口、多转化”，等等，导致了1985年农产品流通领域改革中出台的农产品定购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既不利于增加农业总产值，更不利于增加农业收入，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85年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和“倒三七”比例价，减少了粮农从原超购加价中得到的实惠。加上提高生产资料价格，许多经济作物、畜牧水产品价格放开，使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下降，从而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产区提供商品粮的积极性。对棉花收购价格、奖售政策和棉农口粮政策调整的步子也过大过快，北方棉区的超购加价比例由“倒二八”改为“倒三七”，取消棉花收购奖售粮和扩大棉田补助粮等，加上对棉农交售棉花压级压价，严重挫伤了棉农种棉的积极性。同时，对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求之过急，步子迈得过大，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调减了433.87万公顷，棉花播种面积调减了178.27万公顷，导致粮食和棉花总产量当年分别减产6.9%和33.7%，由1984年的4073.1亿公斤和62.58亿公斤分别减产到3791.1亿公斤和41.47亿公斤。针对1985年主要农产品的大幅度减产，1986年和1987年，中央在政策上作了些微调，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粮、棉生产的政策措施，如减少粮食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的比重，实行粮食合同定购与平价化肥、柴油及发放预购定金“三挂钩”；在全国棉花合同定购任务完成前不放开棉花市场，明确奖售化肥标准，等等。但在执行中，中央减少了定购量，地方又层层加码；定购任务没有完成之前，各地又不敢放开粮食市场；“三挂钩”手续繁杂，环节较多，没落到实处。加上化肥、农膜、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大大抵消了提价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因此，对促进农民种粮、棉的吸引力不大，1988年粮、棉生产有一定的恢复，粮食产量为3940.8亿公斤，棉花产量为41.49亿公斤，但总产仍未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

在粮、棉减产的1985年，其余各项经济作物都是增产的。但是，自1986年以来，油料、黄红麻、糖料等都出现了减产和徘徊状况。1986～1988年，油料总产量比1985年分别减产6.5%、3.2%和16.3%；糖料总产量1986年和1987年比1985年分别减产

3.2%和8.2%，1988年略有恢复，比1985年增产2.3%，黄红麻产量1986～1988比1985年分别减产65.5%、72.4%和73.9%。正是由于1985～1988年期间种植业中主要农作物先是出现大幅度减产，后又出现回升乏力和波动、乃至停滞，致使在农业内部结构中，种植业出现了停滞。种植业产值1984年为2195.12亿元，1988年增加为3276.88亿元，4年增加1081.76亿元，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84年为68.30%，1988年降至55.87%，4年间下降了12.4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3.1个百分点。

种植业之所以出现徘徊的局面，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即长期以来全国上下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在，1984年农业丰收后，农业投资逐年递减。农业投资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投资三个部分。首先从国家投资来看，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1985年、1986年是绝对减少的。1985年为35.91亿元；1986年为35.06亿元，比1979年的57.92亿元减少22.86亿元。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79年的11.1%直线下降到1986年的3%。支援农村经济和农业事业费绝对数有所增长，但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资金的比重1978年为13.6%，1984年下降为9.1%，1987年下降到8.0%。1987年以后，农业形势的恶化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问题逐步重新得到了重视，支农资金开始出现增加趋势。农业基建投资1987年达到42.11亿元，1988年又增加到46.17亿元，比1986年提高了11.11亿元，但仍没有达到1979年的水平。农业事业费1987年达到132.76亿元，1988年达到158.7亿元。农业集体和农民个人投资也呈下降趋势。1982年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的投资达52.27亿元，1984年降到29.45亿元，1985年仅为22.33亿元，农业投资占集体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82年的30%降到1985年的6.8%。一般来说，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也相应增加。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农民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增加的货币收入首先投向建房，1985年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478.43亿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仅128.31亿元，占26.8%；而用于住房的投资高达330亿元，占69.02%。1988年，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到865.23亿元，用于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反而有所减少，仅124.01亿元，而用于住房的投资猛增为581亿元。对农业投资的减少，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生产设施的破坏、失修，既影响了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的4年徘徊，又大大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后劲，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2.1989～1991年，从粮食作物增产到粮棉油全面发展，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回升。农业的严峻形势，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保持农业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从1988年年底开始，强化全国上下对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1) 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确定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指导方针。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深化改革期间，特别强调重视农业，并重申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根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年底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夺取农业丰收的决定》。

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指出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问题，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全会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迅速掀起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中央还指出，要把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状况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

(2) 多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资金方面，国家在财政比较困难、普遍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1989年为50.64亿元，1990年为66.71亿元。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用于农业的信贷资金增加。1991年农村信用社对集体农业贷款由1988年的80.1亿元增加到169.9亿元，对农户的贷款由1988年的372.4亿元增加到631.4亿元。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化肥施用量1989年比1988年增加116万吨，1990年安排的化肥总资源增加200万吨。农药、农膜基本保证供应。各地也都通过调整投资计划、财政预算、信贷结构等途径，增加农业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方面，1989年10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各地相继掀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1989年冬至1990年春，农田水利投人工日比上年同期增长31.6%。依靠科技振兴农业方面，1989年1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依靠科技进步是振兴农业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农业部将1990年确定为农业科技推广年，以加速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取得明显效果。据统计，实施的18项丰收计划，其中种植业技术推广覆盖面积2620万公顷，增产粮食60亿公斤、棉花1.1亿公斤、油料4亿公斤、糖料12.2公斤，等等，总产值为48.53亿元，投人产出比为1：6。

(3) 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国家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决定1990年继续提高棉花、油料、糖料和生猪的收购价格。其中棉花每50公斤由236元提高到300元，食用植物油合同定购价每50公斤由165.8元提高到212.8元。增加挂钩化肥的数量，即合同定购粮每50公斤挂钩的优质化肥从6公斤增加到15公斤，并对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许多地方还相应采取了一些价外扶持政策，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解决不少地区出现的“卖粮难”问题，1990年国务院决定建立粮食最低保护价格以及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并按国家保护价格收购农民余粮，保护农民利益，避免谷贱伤农。此外，农业综合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逐步进入效益发挥期，也是我国农业停止徘徊逐步回升的重要因素。我国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是从1988年开始的，先是设立土地开发建设基金，后又建立农业综合开发基金。国家每年拿出10多亿元，加上地方的配套资金，农行专项贷款以及农民自筹资金，投入五六十亿元，重点是改造中低产田，同时开发利用一些宜于开发利用的新的农业资源。1988年开始利用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开发建设的黄淮海平原、三江平原、松辽平原等20片农业开发区，已开始进入效益发挥期。“六五”和“七五”第一批建设的171个商品粮基地，432个农牧渔业商品生产基地也正值发挥效益的最佳时期。

由于上述原因，主要农产品产量有了较大幅度提高，种植业徘徊的局面开始得到扭转。1989年，我国粮食产量达4075.5亿公斤，超过1984年4073.1亿公斤的以往历史最

高水平。但在1989年，粮食增产主要靠扩大播种面积，是以减少棉、油、糖播种面积，使这3种作物减产为代价的。1988年增加了208.2万公顷，亩产量平均只增加1公斤。而棉花、油料、糖料由于播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因此，1989年的“农业丰收”实际上只是粮食丰收。1990年依靠提高复种指数，使得粮、棉、油、糖4种主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有所增加，从而1990年粮食产量达到4462.4亿公斤的历史新水平的同时，棉、油、糖的产量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详见表3)

表3　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

	播种面积（万亩）				产量（万吨）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粮食	165184	168307	170199	168470	39408	40755	44624	43529
棉花	8302	7805	8382	9808	414.9	378.8	450.8	567.5
油料	12925	12992	13619	14539	1320.3	1295.2	1613.2	1638.3
甘蔗	1386	1439	1513	1746	4906.4	4879.5	5762.0	6789.8
甜菜	1117	8H	1006	1175	1281.0	924.3	924.3	1628.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58～361，357页。

主要农作物从1980年开始的增长势头，带动了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回升。1989年种植业比重由1988年的55.87%上升到了56.23%，回升了0.36个百分点。1990年在1989年回升的基础上又有较大提高，达到58.49%，比1989年回升了2.26个百分点。1991年农作物种植业产值达到4662.72亿元，比1989年和1990年分别增加988.30亿元和181.02亿元。

（二）林牧渔业的发展

1. 林业的发展。1985年1号文件指出，“1985年国家以一定财力物力支持粮棉集中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林业等产业”，“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山区25度以上坡耕地要返耕还林还牧。集体林区取消木材统购，开放木材市场，允许林农和集体的木材自由上市，实行议购议销”。1986年年初，林业部发出关于植树造林的通知，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1987年12月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提出了加快林业改革的6项措施，要求全面推行林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变传统林业模式，统筹规划，集约经营，抓紧建立速生丰产用材料基地；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广泛推行横向联合，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办开放式大林业。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调动了多方面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一大批经济林生产基地和名、优、特产品基地初步形成。据统计，1991年全国造林569.6万公顷，封山育林368.5万公顷，全民植树23亿株；生产木材5443万立方米，各类人造板210万立方米。全国人工造林累计保存面积已达3115.5万公顷，居世界首位。1984年林业产值为161.6亿元，1991年达到36’7.90亿元，但林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仍是下降的，1984年为5.03%，1991年为4.51%。林业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显著，到1991年

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已造林 268 万公顷；贯穿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体系累计造林 1179.2 万公顷；长江中下游防护林体系建设自 1989 年启动以来已完成造林 268 万公顷。在我国 1.8 万公里海岸线全面推进了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已建起 1 万多公里的基干林带。平原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实现了第一阶段规划目标。已有 504 个县达到建设标准，73.5%的平原耕地实现了林网化。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资源管理，我国森林资源状况出现了好的转机，根据 1988～1991 年的森林资源清查，全国森林面积已由上一次清查的 1.25 亿公顷增加到 1.29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由 12.98%上升到 13.4%；活立木总蓄积量上升到 108.68 亿立方米，比上一次清查时增加 1.7 亿立方米。基本实现了全国森林资源总生长量和总消耗量持平，扭转了长期以来森林蓄积量持续下降的局面，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主要林产品产量都有一定增长。橡胶由 1985 年的 1.88 亿公斤增加到 1991 年的 2.96 亿公斤，松脂由 3.44 亿公斤增加到 4.4 亿公斤，生漆由 0.02 亿公斤增加到 0.03 亿公斤，油桐子由 6.19 亿公斤增加到 6.21 亿公斤，核桃由 1.22 亿公斤增加到 1.52 亿公斤。

2. 畜牧业的发展。1985 年，粮棉生产出现了徘徊，而畜牧业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从 1986 年开始，畜牧业受到 1985 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的直接影响，带来了饲料短缺和价格上涨问题。此外，虽然从 1985 年起国家放开了畜产品购销价格和实行了多渠道经营，但在旧体制影响下，价格放而不开，渠道多而不畅，导致 1986 年和 1987 年与"六五"时期相比，虽然主要畜禽的存栏量、产品产量和畜牧业产值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普遍下降。肉类产量 1985 年比上年增长 14%，1986 年和 1987 年仅分别比上年增长 9.6%和 4.9%；蛋类产量 1985 年比上年增长 23.9%，1986 年和 1987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3.8%和 6.3%；畜牧业产值 1985 年比上年增长 17.2%，1986 年和 1987 年仅分别比上年增长 5.6%和 3.2%。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1985 年为 22.02%，1986 年下降为 21.77%，1987 年有恢复，为 22.79%。特别是受粮食影响大的生猪和家禽的存栏量和产品产量增长率下降的幅度更大。生猪存栏量 1985 年比上年增长 8.0%，1986 年和 1987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1.7%和 -2.8%，导致猪的存栏量自 1979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加上农村的猪肉自食量增长较快和流通不畅等原因，沿海和大中城市的猪肉供应趋紧。1987 年第三季度以后，多数城市相继恢复猪肉和禽蛋限量凭证供应。

为了扭转畜牧业生产的这种局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 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稳定养猪政策，扶持生猪生产。1987 年 2 月国务院转发的国家物价局《关于 1987 年物价安排的意见的报告》提出，适当上调生猪的收购指导价。1989 年国家决定生猪收购指导价按 1：5 至 1：5.5 的水平掌握。同年，国务院转发商业部、农业部、财政部的报告中指出："各地要保持生猪与饲料粮、饲料地、化肥挂钩以及'以工补猪'等政策的稳定，以保护生产者的养猪积极性。1987 年以来，国家每年用于扶持肉禽蛋生产和安排猪肉市场的 30 亿公斤饲料粮差价款，继续执行到 1990 年。发展商品瘦肉型猪基地的专项投资，1990 年继续拨给。"(2) 发挥区域优势，建设畜禽商品生产基地。据统计，到 1990 年全国已建设各类畜禽商品生产基地 667 个，其中"七五"期间建设的有 535 个。(3) 强化畜牧业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牧区以草为业，在草业建设

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业和饲草加工业。各地认真贯彻实施国家关于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的有关规定，采取围栏封育、改良草场、人工种草、飞播牧草等各种措施，恢复草原植被，建设人工及半人工草场，使草场退化、沙化得到缓解。1985年以来，在全国一些地区还开展了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的改革试点工作，国家与各省、区联合投资兴建了近200个县级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地方自筹资金兴建了500多个县中心。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机械化。到1988年，养20万只鸡以上的大中型机械化鸡场已有200多家，在城市近郊的一些大型奶牛场、养猪场，自动喂料机、自动饮水器、环境控制器等代替了人工劳动。

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加上从1989年开始种植业的好转，使我国畜牧业生产出现稳定增长的势头。生猪产量由1987年的32773.3万头增加到1991年的36964.6万头，4年增加4191.3万头，平均每年增加1047.8万头。其他畜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增长。1990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达到285.7亿公斤、禽蛋79.46亿公斤、奶类47.51亿公斤、绵羊毛2.39亿公斤，蜂蜜1.93亿公斤，肉类总产量首次超过世界产肉大国——美国，跃居世界第一。1991年，肉类总产量达到314.44亿公斤。畜牧业产值由1987年的1065.78亿元增加到1991年的2156.31亿元，4年增加1090.53亿元。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由1987年的22.79%上升到1991年的26.43%。

3. 渔业的稳步增长。从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的渔业调整，使水产养殖和加工业迅速发展，外海渔业资源也逐步得到开发。但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局面仍未得到扭转。在这种形势下，1985年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以养殖业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坚持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产供销、渔工商、内外贸综合经营，加快速度，提高质量，讲求效益”。这一发展战略的提出，为我国水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经过几年的调整，水产品结构和经营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大发展的局面。

(1) 淡水渔业发展迅速，在水产品总产量中的比重逐步上升。1985年淡水产品产量22.5亿公斤，1991年增加到55.1亿公斤；在水产品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36.3%，上升到1988年的42.9%，以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1989年为42.6%，1990年为42.3%，1991年为40.8%，仍高于1985年的水平。同期，海水产品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63.7%下降到1991的59.2%。

(2) 养殖业发展速度加快。到1991年海淡水养殖扩大到445万公顷。1985～1988年，捕捞产品产量由39.6亿公斤增加到52.87亿公斤，养殖产品产量由30.91亿公斤增加到53.22亿公斤，在水产品总量中所占比重，捕捞由56.2%下降到49.8%，养殖由43.8%上升到50.2%。

(3) 远洋渔业开发出现良好开端。经过周密准备，1985年3月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首次派出13艘远洋非洲的船队。此后，上海、大连、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的渔业公司也相继派出了船队。到1988年，我国已有98艘船、近2000人，在16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域从事捕捞、经营和其他经济活动，形成了1亿公斤生产、经营能力。1988年1年就运回国内鱼货2700万公斤，超过1985～1987年3年2000万公斤的水平，

有力地支援了城市供应。到 1991 年，在国外的各类远洋渔船已达 234 艘，生产经营量超过 1.8 亿公斤。结构调整带来了渔业的稳步增长。水产品产量 1985 年增产 8.6 亿公斤，1986 年增产 11.9 亿公斤，1987 年增产 13.2 亿公斤，1988 年增产 10.6 亿公斤，1989 年增产 9.1 亿公斤，1990 年增产 8.5 亿公斤，1991 年增产 11.4 亿公斤，达到 133.9 亿公斤。渔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3.48%上升到 5.93%。

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

乡镇企业的前身是我国的农村手工业和社队企业。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提高，这既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前提条件，也创造了一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1979～1983 年期间，中央多次提出，为了积累资金，为剩余劳动力广开生产门路，增加社会收入，改变农村和农业的经济结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市场，要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国家对社队企业也分不同情况，实行低税或免税等优惠政策。社队企业得到迅速发展，总产值从 1978 年的 493.07 亿元增加到 1983 年 1016.83 亿元。1984 年，国家把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对家庭办企业和联产办企业给予了肯定，户办、联户办企业迅速兴起，并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明显特征。1984 年，乡镇企业数达 606.52 万个，其中，乡村两级企业仅占 30.7%，而户办、联户办及组办企业占 69.3%。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 1709.89 亿元。

为了推动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根据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星火计划”，决定“七五”期间开发 100 类适用于乡镇企业的成套技术装备并组织大批量生产，建立 500 个技术示范性的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全套工艺技术、管理工程、产品设计和质量控制方法，共培训 100 万农村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使之掌握一两项本地区适用的先进技术。1985 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不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方针，而且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规定了比较具体的发展原则。《建议》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方针应该是：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发展乡镇企业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兴办乡镇企业要立足于农业、服务于农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发展农产品的储藏、包装、运输、供销等产前产后服务。第二，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建议》指出，各地兴办乡镇企业要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减少盲目性。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在遵守国家规定和保护资源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小型采矿业、小水电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自身的条件发展为大工业配套和为出口服务的加工业。第三，乡镇企业应当主要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第四，实行谁投资、谁经营、谁得益的原则，禁止平调，等等。

国家的经济、技术及产业政策的扶持与引导，大大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使

1985～1988年成为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数达1888.16万个，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495.66亿元，比1984年的1709.89亿元增长2.8倍，年递增速度为39.6%。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1.8%，占当年全社会总产值的21.8%。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4529.3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4.9%。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由1984年的5208.11万人增至1988年的9545.45万人，平均每年接纳农村劳动力1084.335万人，其中乡村两级企业平均每年接纳农村劳动力227.943万人。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上缴国家的税金逐年增加，由1984年的79.1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236.5亿元，增长3倍多。1985～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量中，乡镇企业的贡献份额占50.87%。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乡镇企业的调整

在1985～1988年的高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一是乡镇企业增长速度过快，并成为全国加工工业过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1988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达到2098.7亿元，比1984年增加1523.71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8.2%，扩大了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三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在地区布局、行业布局等方面与城市工业趋同现象严重，加剧了城乡工业不少行业加工能力过剩和普遍开工不足的状况。四是经济效益逐步下降。乡镇企业百元资金实现的产值、利税和产销利润率等经济效益指标均呈下降趋势。乡、村两级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1979年为29.1元，1984年下降为15.2元，1988年更降至9.3元，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79年为35.4元，1984年下降为24.6元，1988年更降为17.9元。因此，在从1988年10月开始的以宏观紧缩为主要内容的治理整顿时期，国务院对乡镇企业提出执行“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八字方针，紧缩对乡镇企业的贷款。

由于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以市场为导向、由市场来调节的，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其发展产生的影响较大，因此，对乡镇企业的调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1) 过快的增长速度得到控制。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比1988年增长14.4%，是80年代增长速度最低的年份，大大低于1984～1988年间年递增39.6%的速度。(2) 产业结构得到初步调整。治理整顿中宏观一紧缩，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之间趋同所导致的摩擦与冲突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认识到城乡企业之间分工协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动自觉地调整产业结构。1988年，乡村集体工业企业中轻、重工业比重为53.1：46.9，1989年调整为53.7：46.3，1991年这一比重为54.2：45.8，轻工业比重逐渐上升。在1989年乡镇工业总产值的分行业增长中，轻、重工业分别为15.3%和12.6%，轻工业比重工业高2.7个百分点。(3) 企业素质不断提高，对乡镇企业的宏观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化。在整顿中，那些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的企业被淘汰。各地按照国务院关于产业政策的规定，对那些浪费能源、原材料和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为了推动企业上档次，上水平，各地都比较重视技术改造工作，一改过去重视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的倾向，注重抓现有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各地依照“有保有压、有

上有下”的原则，加强对新上项目的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为了整顿市场秩序，全国普遍对经营许可证进行了检查，对食品卫生、煤矿安全生产、车间生产环境等进行了验收，不合条件的停产整顿。1989 年，乡镇企业数为 1868. 仍万个，比 1988 年减少了 19.53 万个，1990 年更减少为 1850.40 万个。乡镇企业职工人数 1989 年为 9366.78 万人，比 1988 年减少 178.67 万人，1990 年更减少为 9264.75 万人。(4) 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9 年，在市场走向疲软、大批乡镇企业倒闭的情况下，全国乡镇企业仍向国家财政上缴税金 364.5 亿元，比 1988 年净增 54.3 亿元。1989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为 7428.38 亿元，比 1988 年净增 932.72 亿元，1990 年又比 1989 年净增 1033.26 亿元。1991 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为 11621.69 亿元，比 1989 年增长 65.6%。1989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 8.3%，其中国有工业企业增长率为 3.7%，乡镇工业企业增长率为 12.7%，为前者的 3.43 倍。1991 年乡镇企业实现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和各项劳务收入 1065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6%；上缴国家税金由 1988 年的 236.5 亿元增加到 333.8 亿元；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产值、利税分别比上年提高 3.7%和 5.3%，百元资金实现产值、利税分别提高 3.4%和 4.8%。

(三)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意义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经受了困难的严峻考验，依靠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勇渡难关，保持了适度健康的发展，为“七五”计划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在党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出路。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30%，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力还会增多。在城市待业人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靠国家投资办企业来解决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不可能的。我国农村发展乡镇企业，为解决这个难题找到了办法。到 1991 年，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已达 9609.11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22.3%，缓解了剩余劳动力对社会经济的压力。

2. 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乡镇企业在农村改革中“异军突起”，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1991 年，乡镇企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24%提高到 59%，超过了农业产值，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乡镇企业以工补农、建农的资金，1978～1989 年共达 275 亿元，其中 1985～1986 年 3 年达 22.3 亿元，1988、1989 两年高达 125.6 亿元。同期用于支援农村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资金高达 600 多亿元。同时，乡镇企业还兴办了一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中小农具制造、农用化工、农机修理、农用建材等农用工业企业，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78～1988 年，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仅工资部分就有 3740 多亿元，占这期间农民收入净增部分的 25%以上。

3. 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七五”期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净增量中，乡镇企业占31.5%；上缴国家税金由137亿元增加到410亿元，年递增24.5%，出口创汇由39亿美元增加到130亿美元，年均递增26%，占国家外贸出口的比重由14%上升到21.6%。1990年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占全国同类产品的比重为：原煤占1/3，水泥占1/4，砖占96%，服装占1/2，中小农具占70%。

4. 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安定和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曾一度趋向紧张，主要集中在计划生育、农民负担和合同定购三方面，农民称政府是“要粮、要钱、要命”。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影响政府与农民关系的这三个难题基本得到解决。乡镇企业从税后利润中拿出相当部分用于以工补农和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并替农民承担了一些社会负担。仅1983～1988年乡镇企业用于农村福利事业的资金达131.54亿元。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起点和前提，乡镇企业每年要拿出数亿元利润用于农村教育事业，仅1990年乡村企业用于教育的资金达14.7亿元。

5. 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尽快建立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壮大国家实力，国家一方面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转移农民创造的财富用于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补贴；另一方面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制度、户籍管理等措施，把农民“滞留”在农村，形成了“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居民住城镇、农民住农村”的二元社会结构。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调整了严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打破了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促进了农村集镇和小城市的发展。在乡镇企业发展较集中的地方，运输业、商业等行业也发展很快。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小城镇，有的发展为小城市。同时，乡镇企业税后利润每年都有几亿元用于小城镇建设，也加速了农村城市化的步伐。1989、1990年乡村企业用于小城镇建设的资金分别为3.8亿元和5.2亿元。

6. 乡镇企业良好的经营机制为我国城市工业改革提供了经验。乡镇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市场为导向，它生存于国家直接的计划体制之外，一切经济活动都在市场上进行，生产上以销定产，经营上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还有灵活的市场化的就业机制，对企业的关、停、并、转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因此，它与国营企业相比，经营机制更有活力。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和企业体制特点，为我国城市工业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第三节　双层经营体制的现状与完善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发展中的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1979年年初开始由“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逐步发展而来的。它有3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集体经济内部引入家庭经营，形成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在坚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赋予农民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三是把承包农户的劳动投入与劳动成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坚持长期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它不仅适应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而且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尽管1985年开始出现了粮食、棉花生产的徘徊情况，但从1978年到1988年，农村经济总的发展一直是上升的。农村社会总产值从1978年的2037.54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2534.69亿元，10年增长5.2倍，平均每年递增19.9%。

但同时也要看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1) 土地分割细化，地块过于零星。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在土地使用权上沿用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严格按人头或劳动力比例，优劣搭配平分，造成了每户分到的土地，不仅面积小，而且支离破碎。(2) 缺乏地力补偿和土地经营权合理流动的自我调节机制，不利于土地肥力的提高和规模经营的发展。(3) 土地所有权在实践中模糊不清。“土地归集体所有”，但集体由谁代表，没有明确法规确认和制度保障。结果农户认为分田到户，使用由己，出现挪用耕地甚至撂荒等现象。(4) 承包双方缺少完备的合同契约，合同纠纷时有发生。承包后，农村共签订农业承包合同3亿多份，户均1.7份。全国每年发生合同纠纷2000万起以上，每年不兑现或不完全兑现的合同约7000万份，欠承包合同款25亿余元。(5)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在开始实行大包干时，由于缺乏经验，过分强调平均，认为分得越彻底越好，使集体经济成了空壳。加上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只注意发展家庭经营，使集体经济成了空架子，农民成了“单干户”。(6) 一家一户生产，难以自觉地、迅速地采用新的技术增产措施，难以承担新的开发建设项目，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有人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已到了历史的尽头，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应该由集体统一经营所代替。其实，家庭经营只是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层次，另一个层次是集体统一经营，统一经营正是克服前者不足而存在的。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本身的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局限性和问题的存在，就要改变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二、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

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主要是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加强集体统一经营的功能。1985年1号文件提出“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社”，并指出：“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要积极办好机械、水利、植保、经营管理等服务项目。”1985年夏农业减产，各个地方开始重视统一经营层次的建设。1986年1号文件提出：“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应当进一步完善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承包是党的长期政策，决不可背离群众，随意改变。”1987年中央有关文件又进一步强调“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并且提出一些原则性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1. 规定了乡、村合作组织的特点、职能和设置办法。乡、村合作组织具有“社会性、综合性特点”，“不管名称如何，均应承担生产服务职能，管理协调职能和资产积累职能，尤其要积极为家庭经营提供急需的生产服务”。2. 规定了完善土地承包的原则，并指出“土地联产承包制，是合作经济内部的责任制形式”。3. 规定了完善林果园及集体企业承包的办法，并提出解决合同纠纷的原则。1987年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发出《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制的意见》，对土地联产承包制的完善和乡、村合作组织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要求。从1987年以后，全国各地都开始深入具体地推进联产承包制的完善工作。

1. 健全乡、村合作组织，增强集体经济实力。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保留及没有宣布解散原集体经济组织，所以在那些没有合作经济组织名称的地方，完善联产承包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设立社区合作组织的机构。而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又是社区合作组织存在的基础。因此，各地在完善联产承包制中都十分重视这一工作。浙江省政府拨出2400万元贴息贷款，帮助贫困村合作组织增强经济实力。湖南省从省财政中拿出2000万元，作为建立发展村办企业基金，重点帮助没有企业的村和贫困村发展村办企业。宁夏自治区到1988年下半年有44.6%的村建立了社区合作社，陕西省至1988年6月有34.4%的村设立了社区合作组织机构。

2. 改进土地承包办法。土地承包是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内容。完善联产承包制中的重要工作是改进土地承包办法。“两田制”是各地普遍探索的一种办法。两田制，即把承包地分为口粮田、责任田；口粮田按人承包，责任田按劳力平均承包，或投标承包。人口变动后，用两田互补的办法，不用调整承包土地；不务农的劳力把土地转出后，由务农户承包。这种办法既解决了人口劳力变动后土地频繁调整的问题，又有利于土地使用权的稳定，并有利于土地的逐步集中。此外黑龙江省肇东市还实行了土地培肥制、耕暄制和劳动积累制，山西省昔阳县实行了土地评定等级、升奖减罚的办法。

3. 清理集体财产。198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农研室和农牧渔业部《关于清理农村集体财产的意见》，对清理集体财产的意义、内容、方法做了布置和要求。各地按这一文件精神开始了清理集体财产的工作。通过清理集体财产，基本上摸清了集体经济的家底，初步解决了实行联产承包制后集体财产关系不清、所有权混乱的问题。据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到1988年年底，村合作经济组

织（不包括村集体企业）尚有集体财产 820.2 亿元，比承包前减少 20.9%，收回各种欠款 60 多亿元。

4.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986 年 1 号文件指出："随着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的种植专业户。"中央 1987 年有关文件又进一步指出："长远看，过小的经营规模会影响农业进一步提高积累水平和技术水平……在京、津、沪郊区，苏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可分别选择一两个县，有计划地兴办具有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或合作农场，也可以组织其他形式的专业承包，以便探索土地集约经营的经验。"经过几年的探索，土地规模经营不但在发达地区发展，在一些落后地区的发达乡村也得到发展。规模经济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从全国来看主要有集体农场、专业队、农业车间、家庭农场、两田制等形式。

5. 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为了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业增长，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 1984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办的服务为基础，以国家举办的农业经济技术服务为依托，以社会性组织、民办服务为补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具体来说，包括农业技术，农业科研、教育，农业流通，农村金融、保险，农民专业协会、研究会等民间组织五大系统。据统计，到 1990 年，全国已建成县农技推广中心 1195 个，职工近 5 万人；全国拥有农技推广站 1.74 万个，职工 15.69 万人，种子公司 2775 个，职工 5.78 万人；全国拥有农机总动力达到 2.87 亿千瓦，县、乡、村办的各类农机网点 61 万多个；畜牧兽医站 8097 个，职工 9.08 万人；淡水鱼原种场、良种场、鱼苗鱼种场 1300 多个；农经服务机构 5 万多个；地区以上农业科研单位 1.1 万多个，职工 12.6 万人，其中科技人员 5.73 万人；拥有 67 所农业高等院校和 375 所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全国现有基层供销合作社 3.26 万个，下设各种经营网点 50 多万个，职工 350 万人；已建成一支 20 万人的生产技术指导队伍，以供销社为依托，组建了 1.58 万多个专业合作社（协会）、1 万多个庄稼医院、2.6 万个配药配肥站和 743 个商品生产基地；乡镇一级有独立核算的信用社 58.2 万个，非独立核算的村一级信用分社和信用站 32 万个，脱产人员 51.7 万人，不脱产人员 26.9 万人；全国农村有各种专业技术研究（协会）10 万多个，专业性的生产服务组织 41.9 万个。另据有关部门 1991 年对 274 个村的调查，有 48 个村建有农田耕作、农产品销售、饲料加工等专业性服务组织 340 个；有 105 个村有农户办的良种繁育，农田耕作，饲料加工等专业性服务实体 1049 个。这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为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还很不完善，还有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这些服务组织在农村各自为政，分散服务，整体性、综合性较差，未能形成比较理想的体系，社会化程度不高，而且产后服务较弱，村级服务组织建设与经济落后地区的服务组织建设相对滞后。

第四节 七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一、七年农村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从1985年开始的农村第二步改革，以改革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为突破口，大胆引入市场机制，并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成功。

1.形成了农副产品多渠道流通的新格局，农副产品商品率逐年提高。1984年到1991年，粮食社会收购量由1172.45亿公斤增加到1363.55亿公斤，棉花社会收购量由52.12亿公斤，增加到52.9亿公斤，水产品社会收购量由30.8亿公斤增加到65.24亿公斤，其他农副产品收购量也大幅度提高。

2.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1984~1991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构成中，农业所占比重由63.43%降至42.92%，非农产业所占比重由37.57%上升为57.08%。

3.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1985~1991年，人均粮食产量由360.7公斤增加到378.3公斤，人均棉花产量由3.9公斤增加到4.9公斤，人均猪、牛、羊肉由16.8公斤增加到23.7公斤，人均水产品由6.7公斤增加到11.7公斤。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较大提高。粮食由每亩232公斤提高到258公斤，棉花由每亩54公斤提高到58公斤。

4.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84~1991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497万千瓦增加到29388.6万千瓦，机耕面积由3510万公顷增加到5044万公顷，灌溉面积由4467.5万公顷增加到4806万公顷，化肥施用量由173.98亿公斤增加到280.51亿公斤。

5.宏观调控机制基本得到转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由指令性计划变为指导性计划。在旧体制下，农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农村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其调控手段主要是行政干预。通过一系列改革，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工农业生产的微观结构，并使2亿多农户变成了面向市场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现在，国家仍然制定农村经济长远规划、中期计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通过各级政府计划部门和主管业务部门层层下达。但这些计划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不再有强制性，它只引导农民按照计划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政府的作用主要由市场来调控。(2)改革投资和金融体制，发挥借贷利率的调节作用。将过去平均分配投资的方法转变为重点投入，按项目投入。例如，国家利用有限的资金，扶持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扶持出口基地建设，增强创汇能力；扶持生产性建设，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同时实行有偿使用，流动使用，改变了过去单纯由政府部门分配资金的方式，国家和地方建立投资公司，实行企业化经营，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7年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1.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逐渐扩大。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推进，物价逐步放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整个物价上涨过猛，大大超过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的涨幅。1989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8.9%，农产品提高18%，使一度缩小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又不断拉大。1988年比1984年缩小29.8%，1989～1991年“剪刀差”又扩大16.5%。其中1990年和1991年分别比上年扩大了6.6%和5.1%。

2. 农民负担逐年加重。按国务院规定，农民的经济负担不能高于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据农业部统计，农民直接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1990年人均26.1元，比1989年增长25.48%，1991年人均29.2元，比1990年增长11.88%，而1989～1991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仅增长4.1%，远远低于负担增长速度。如果再加上地方自行增加的村提留和统筹费，已远远超出5%的标准。1989年人均负担37.1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7.67%；1990年人均负担41.15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7.88%；1991年人均负担44.55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7.94%。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金逐年增加，人均纳税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大。税金总额由1986年的199.38亿元增加到1991年的437.72亿元，农民人均纳税和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86年的23.80元和7.02%增长到1991年的49.40元和8.80%。

3. 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趋于停滞和下降。1979～1984年，连续6年的农业高速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元增长到1984年的355元，扣除物价因素，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15.1%。1985～1988年，农业生产徘徊，但农村经济继续发展，主要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44.94元，农民继续增收。但扣除物价因素，这4年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5%，跌落了10.1个百分点。1989～1991年这3年农业生产增长较快，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生产总值增长4.5%，粮食产量年递增3.4%，乡镇企业产值年递增21.4%，各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农民实际收入增长停滞，农业增产不增收。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988年的544.94元增加到1991年的708.55元，名义上增长163.61元，但同期物价总指数上涨27.1%。所以3年实际只增长2.2%，平均每年只增长约0.7%。

4. 农业投入减少，农业生产条件后劲不足。1985年以后，无论是国家、还是农业集体和农民，对农业的投入都呈下降的趋势，致使农业生产条件后劲不足。灌溉面积在1985年下降至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在1986、1987年略有回升，但1988年又转为下降，1988年仍未达到1981年的水平。机耕面积虽然在1986午后回升较快，但1988年也仅接近1980年的水平。从1989年开始，全国都十分重视农业，国家也增加投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恢复，机耕面积和灌溉面积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由于水土流失，沙化碱化的情况仍在发展，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依然薄弱，所以农业生产条件仍然难以支撑农业长期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5. 农村非农产业结构畸形。1984~1991年，农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63.43%降至42.92%，下降了20.51个百分点；农村工业所占比重由22.92%上升到43.50%，增加了20.58个百分点；农村建筑业所占比重由7.31%，下降为6.01%，下降了1.3个百分点；农村运输业所占比重由2.62%上升到3.48%，增加了0.86个百分点；农村商业、饮食业所占比重由3.73%上升到4.09%，增加了0.36个百分点。在农村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上升的20.51个百分点中，农村工业上升的贡献占了79%。工业或制造业增长过快，而商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这与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特征极为相似。

上述问题的存在，都根源于长期以来对农业的忽视和冷落，国家总体经济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从农业中取得过多，对农业的支持太少，直到80年代，我国每年还从农业中抽取1000亿元，比政府每年财政给农业支持的资金大10倍以上。这种状况如不改变，落后的农业还要衰退，不可能支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纵观1985~1991年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1）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和农业是物质生产领域两个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工农业比例是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保持二者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在工业保持较高增长速度时，要保证农业的适度发展，在财力、物力与技术上大力支持农业，把农业放在一切经济工作的首位。(2) 农业丰收后要恰当估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可忽视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始终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现在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一千多万人，耕地面积每年减少几百万亩，人地矛盾短期内难以缓解。由于人口增多，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尽管有了大幅度增长，粮、棉、油料、肉、水产品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占有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应重视增加对农业的投人，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综合生产力水平，决不可在农业丰收后随意减少投人。(3) 农业丰收后不要把农民的富裕程度估计过高，防止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加重农民负担。

三、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保护生态环境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同环境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制定了以预防为主、强化环境管理和一系列保护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政策。这些政策采用法律条文的形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从而把我国农业环境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

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国家有计划地抓了一批绿化工程和基地建设。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海防林工程，速生林工程，经济林及牧草基地。1985~1991年期间，中国政府在治理农业生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对于提高森林覆盖率，防止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改善区域内的生态环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78年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工程，

到1991年已经累计造林1.5亿多亩，实现了林网化。过去沙化、盐渍化、牧草严重退化的1.3亿亩草原得到保护和恢复，已有1.1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

“七五”计划开始实施的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涉及9省145个县，计划一期工程10年时间增加森林面积1亿亩。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达到规划要求，林业部还制定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和《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县级总体设计规定》。各地根据这些规定，结合当地实际，先后制定了有关实施细则和具体规定。到1991年年底，已完成造林247.9万公顷，其中重点工程造林112万公顷，合格率达90%以上。

平原防护林体系，是以农田防护林为主，以防护林带、农林间作、四旁植树、成片造林为主要内容的带网片点相结合的综合防护林体系。经过不懈努力，到1991年，全国已有林网化的农田面积2881万公顷，占适宜林网农田面积的73.5%；林网化牧区面积38.8万公顷，占牧地面积的9.3%。历史上无林少林的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已达12.5%。

对于黄河流域的治理，根据我国的特点采取了以户承包的方式，并规定，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30年至50年不变。1986年，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全面展开，1988年，国家将淮海平原定为农业开发重点治理区，1989年，国家和山东省把黄河三角洲列为黄淮海地区开发的一部分，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到“七五”末期，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区累计治理保存面积达13.5万平方公里，占40余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的30%。水土保持产生的效益已达200亿元以上，相当于投入资金的3倍多。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1.8万公里，沿海滩涂总面积2519.2万公顷，到1991年已营造沿海基干林带1万多公里，营造农田林网控制耕地面积近268万公顷。

为了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重视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各地还重点抓了生态农业的试点建设。例如安徽省的阜阳地区、山东省的菏泽地区、河南省的周口地区、山西省的吕梁地区，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991年，全国县级生态农业试验区已有100多个，乡、镇、村、场生态农业试点已有1000多个。全国除西藏、青海外，都有生态农业试点。

经过多年的治理，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到1991年，全国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到55.8万平方公里，治碱面积达到511万公顷，堤防长度达到23.3万公里，堤防保护面积达到321万公顷。

应当看到，我国生态环境状况虽然有局部改善，但全局还存在着继续恶化的危险。据调查分析，由于对废气、废水、废渣这些污染物处理和回收利用水平低，致使遭受污染的农田面积已有670多万公顷。每年土壤沙化面积递增1560平方公里，全国盐渍化面积到1991年已达761.4万公顷。尽管有关方面抓紧了对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但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仍然呈现扩张趋势，1985年为129.2万平方公里，1991年达到162.3万平方公里。（详见表4）因此，中国农业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还十分严峻，任务还十分艰巨。

表 4　　1985～1991 年全国水土治理情况

	1985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水土流失面积（万平方公里）	129.2	130.2	133.8	134.8	136.0	162.3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万平方公里）	46.4	49.5	51.3	52.2	53.0	55.8
治理占流失面积比重（%）	35.5	37.5	38.3	38.7	39.0	34.4
盐碱化耕地面积（万公顷）	769.3	763.6	767.2	753.9	753.9	761.4
治碱面积（万公顷）	456.9	475.6	483.0	488.3	499.5	511.0
治碱占盐碱耕地面积比重（%）	59.4	62.3	63.0	64.8	66.6	67.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第 345 页。

第十三章　商品流通与市场

1985～1991年间，中国商品流通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商品流通进一步放开，流通微观主体更加多元化。国有商品流通企业在进行以承包制为改革主要形式的同时，逐步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的试点。供销合作社改革迈开了新步伐，在建立农村商品生产服务体系方面有了新的进展。非公有制商品流通企业迅速发展。商品市场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城乡集贸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1988年夏秋之间的商品抢购风潮过后，又出现了长达3年的市场疲软（1989～1991年）和治理整顿。通过整顿市场和流通秩序，采取多种措施启动市场，开拓市场，到1991年全国市场开始走向正常，为新的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一节　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化

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

1985年以来，随着贯彻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逐步深入，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日益深化。

（一）农产品流通体制的重大变革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1985年1号文件。这个文件强调了要进一步改革国家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体制，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其中，在农产品流通体制方面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该文件决定，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主要内容是：（1）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具体办法是：由商业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的粮食，国家按“倒三七”比例价计算定购价格（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保护农民的利益。定购的棉花，北方按“倒三七”比例、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棉花也允许农民上市自销。（2）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

价。(3) 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

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是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重大改革。自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以来，粮食、棉花的统购实行了30多年，生猪和其他农产品实行派购也有30余年历史。50年代实行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当时有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情况下，主要农产品需求猛增，供求矛盾十分突出，私商的投机倒把活动则加剧了这一紧张局势。为了保证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保障城乡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稳定市场与物价，当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派购制度是一种合乎历史逻辑的理性选择，实行的结果，对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来把这种具体历史条件下采取的具体措施当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坚持，长期不变。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行动上的墨守成规，条件变化了也不随之相应进行变革，从而使其消极作用愈来愈大，其主要弊端是抑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隔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推进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为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取消统派购制度而实行合同收购与市场收购，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更多市场机制，加强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合同定购虽然仍然是国家按计划与农民进行经济结合的形式，但它与统派购已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合同定购是国家与农民进行平等协商的结果，是一种经济行为，而统派购则带有浓厚的强制性、行政性；(2) 合同定购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要求的，定购价格较多地考虑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而统购派购价格则较大幅度地偏低于其价值；(3) 合同定购的范围和数量比统派购的范围和数量要小得多，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以后的农产品均可自由上市，不实行合同定购的农产品更是可以随时随地自由上市，这样，农民就可以更多地与市场发生联系，根据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国家实行粮食合同定购，重点放在那些适宜种粮、提供商品粮较多的地区，以保护粮农的生产积极性。对城市郊区适宜发展副食品生产的地方，发展多种经营潜力较大的地方，以及退耕还林、还牧、还渔的地方，都要逐步把粮食放开，以发挥地利优势；对贫困的地区也要逐步把粮食放开；对繁育优良种子的专业场（户）生产的粮食种子，不列入合同定购，可以由主管种子部门经营，也可以自由购销。

随着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取消统派购制度的逐步实施，除粮食、棉花等9种农产品由商业部门按计划与农民签订合同进行收购，烟草按专卖条例规定收购，甘草、厚朴、麝香、杜仲四种中药材由国家指定的商业公司收购外，其余农产品以及完成合同定购或按规定收购以后剩余的农产品，均可由农民自由上市，其交易额约占社会收购额的一半以上，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农产品流通领域实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这是农产品流通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改革，对实行3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从根本上进行了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

（二）消费品流通进一步放开

在80年代初消费品流通初步放开的基础上，80年代中期和后期，消费品流通进一步放开，市场机制调节在消费品流通领域逐步成为基础性调节。

随着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取消，以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对象的消费品流通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调节范围。粮食及其制成品在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后，国家可以通过市场收购，灵活经营，农民也可以自由上市，随行就市，自由购销的比重大大增加。80年代中后期，相当多的城市居民家庭已不再向粮店购买计划定量粮，而是到城市粮食集贸市场上购买粮食，在品种、质量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与此同时，大中城市副食品经营也逐步由“统”到“放”。从1985年起，广州、武汉、成都、湛江等大中城市相继放开了蔬菜、猪肉、牛羊肉、水产品、禽、蛋、奶等副食品的市场。随后，其他大中城市也陆续放开了副食品市场。过去，这些副食品对农民实行派购或统一收购，在生产和购销上统得很死，结果是越统越死，越死越赔，越赔越统，形成“恶性循环”。大中城市放开副食品经营以后，大中城市郊区（包括近郊区与远郊区）和一些农村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农民和其他农业生产者摆脱了派购和统一收购的束缚，加强了与市场的联系，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照市场需要，根据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不断调整和优化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和蔬菜瓜果的生产，使供应大中城市的副食品在数量、品种、质量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增加和提高，副食品市场越来越兴旺、活跃，城市居民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多彩，结果形成了一放就活，活了东西就多，多了就不赔甚至赚钱，开始出现了“良性循环”。

日用工业品消费品市场进一步放开，在日用工业品消费品领域，基本上已实现了市场调节。其中，小商品日用工业品市场已完全放开，全部实行市场调节。生产与经营这些小商品的厂家和经营者根据市场需要灵活安排生产和经营，更好地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小商品市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生活，例如，闻名全国的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在1985年年底，有各类小商品12000多个花色品种，各种小百货、小五金制品、小塑料制品、小玩具、小杂件应有尽有。与居民告别多年的顶针、尖脚鞋、瓜皮帽等40多种传统小商品又在市场上露面了；火钳、生铁锅和针头线脑之类的小物品也日渐丰富。家庭主妇再也不用“买点线，跑一片；买根针，跑断筋”了。不仅汉正街附近的居民受益，而且不少家住武昌、汉阳的居民尤其是家庭主妇也时常到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来选购日常生活用品，周围县市与农村的商贩则大量从汉正街市场进货，贩运到农村销售，从而活跃了附近农村市场。

城乡居民购买热点的耐用消费品和轻纺工业产品也进一步放开。1985年和1986年，国家进一步发展轻纺产品，继续实施“六优先”（优先供应原材料、优先保证能源、优先安排改造项目、优先安排计划任务、优先贷款和优先运输）的政策，使耐用消费品和一般轻纺产品大幅度增加，丰富了市场供应，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纯棉布、毛线、粗纺呢绒、服装、鞋帽、名牌自行车（永久、飞鸽、凤凰等）、新闻用纸、各种食品的生产和供应都有较大的增长，城乡市场进一步繁荣兴旺。198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达到4950亿元，比1985年增长15%，增长速度呈逐步上升的状态。各季增长速度依次为9.6%、14.1%、17.4%、18.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绝大部分是城乡人民生活消费品，反映了市场放开、人民购买力增加、市场日益活跃和繁荣。

（三）生产资料流通初步放开

生产资料流通领域是原计划经济控制最严格的领域之一，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也逐步渗透了市场机制因素，逐步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比重。随着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缩小，其通过市场进入流通领域的比重增加，生产资料流通初步放开。1985年，由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比1980年减少了一半，即由1980年的40%下降到20%；同期，国家统配资源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也在逐步下降，其中，煤炭由57.9%下降到50.6%，钢材由74.3%下降到56.7%，木材由80.9%下降到30.7%，水泥由35%下降到19.4%，相反地，企业自主支配的比重则逐步增加，比如钢材，由企业自主支配的比重则由1980年的23.5%上升到1985年的30.2%。1985年各省市横向地通过市场组织的生产资料，占地方企业消费总量的比重，钢材为38%，木材为46%，水泥为61%。一些重要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后，不仅扩大了企业和地方自主支配物资的比重，而且在价格上形成了两种价格，即同一商品有计划价和市场价两种价格，从而打破了生产资料单一计划价格的局面。1985年，一些重要生产资料国家定价的比重下降，企业定价的比重上升。如水泥，国家定价的比重仅占1/3，煤炭占50%，钢材则占到60%，"双轨制"价格固然激发了企业的利益动机，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而且价差比较大，市场价往往高出计划价一半甚至一二倍，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为牟取暴利、投机倒把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弊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露出来。

生产资料流通的初步放开，为生产资料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水泥、钢材、木材等，形成了若干个开放性的市场，使生产资料流通逐步走向市场化。比如，钢材市场就在80年代中后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1986年12月起，国家先后分三批在151个城市新建了182个钢材市场，沟通供需双方直接见面，洽谈成交。这一时期，国家还对计划内中转供应的生产资料，在石家庄实行了"计划内外同一销价、价差返还"的试点，作为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并轨的一种过渡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并在一些城市进行推广，到1987年年底，有88个城市实行了这一办法，从而加大了生产资料流通中的市场调节作用，加快了生产资料流通市场化的进程。

二、"三多一少"商品流通格局的初步形成

自1979年以来就在商品流通领域推行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简称"三多一少"）商品流通格局，到80年代中后期已经初步形成。

国有商业比重逐步缩小，但在商品流通总体上仍起着主导作用。随着流通体制改革

的逐步深化，流通领域正由封闭式、少渠道、多环节的商品疏通体系向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过渡。在这一过渡中，国有商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继续发挥国有商业的主导作用，国有商业必须深化改革，推进以国有商业为主体和核心的横向经济联合。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横向经济联合，一般以商品购销服务为主要内容，是资金、货源、经营艺术、营业服务设施等流通要素的联合，是以城市为中心，以独立经营的企业为基础的。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横向经济联合，可以打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的界限，壮大国有商业的力量，发挥国有商业的整体优势。具体形式主要有：国有大中型零售商业企业之间的联合、国有批发企业之间的联合、国有批发企业与国有零售企业之间的联合、工商结合的商业联合体、耐用消费品的工商联营、以大型商业企业为核心的商业企业集团等。

国有零售商业企业的横向联合组织在80年代中后期有了较大的发展。由北京百货大楼、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武汉商场、广州南方大厦等14家国有大型零售商店自愿结合组成的跨地区商业组织——贸易联合会（简称“贸联会”），是在60年代初由6家商店组成的全国大型百货商店经理座谈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80年代中期，面临工业自销扩大、计划商品分配体制的消除，多种经济成分商业的激烈竞争，国有大型零售企业就在经理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了横向经济联系的贸易联合会。通过贸易联合会的形式，集全国大型零售商店的优势，打通全国的货源渠道，开辟全国的销售市场，增强企业的经营实力，更好地发挥国有商业的主导作用。贸易联合会的联合，采取联合购销的办法，联合经销、联合展销、联购分销、分购联销，各成员单位之间还可以委托进货，互为代理，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国有大型零售企业的整体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全国贸易联合会的启发下，1985年4月又成立了全国新兴商场开发联合会，简称“新联会”。它是由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大中型百货商场自愿结合组成的跨地区商业联合体，发起单位有天津劝业场、武汉中南商业大楼、大连商场、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大中型商场，新联会成立时有成员商场20家。该会进行横向经济联合的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商品交流，同全国各地重点厂家直接挂钩，广泛开通货源渠道；组织信息交流，各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沟通经营情况的信息；组织经验交流，每年组织一次大型商品交易会，同时举行年会。

在跨地区商业联合蓬勃发展的同时，同一地区的商业联合组织也应运而生。1986年，上海市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百货商店和徐汇百货商场、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宝钢百货商场等11家大型百货商店，组成经济贸易联合会，这是上海商业系统组成的第一个大型横向联合组织。该联合体以联合的优势，实行联购分销等批发业务，发展横向联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前，这11家商店都实行自行采购，批量小，常常不能与厂方达成满意的协议。联合后，实行联购分销，批量大，能顺利与厂方达成协议，且这11家商店地处上海市卢湾、杨浦、静安、普陀、南市、虹口、徐汇、吴淞等8个区的商业中心，有利于相互调剂余缺，方便顾客购买，繁荣市场。其他大中城市也普遍建立了同城商业横向联系的组织，增强了国有商业的总体竞争优势。

1987年，商业经济联合继续发展，到1987年年底，全国有各种类型商业经济联合体6792个，比1986年增长20.3%，全年营业额达155亿元，利润6.5亿元，显示了流通领域经济联合的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和城镇其他形式的集体商业也在改革中继续稳定发展。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继续推进体制改革，按照合作社原则把供销社办成农民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组织，完善商品生产服务体系，实行产、供、销系列化服务。供销社系统还按照经济区调整了基层供销社，减少数量，扩大规模，提高运行效率。到1986年年底，全国基层供销社已由1985年的34999个调整为32760个，撤并了2239个。调整后的基层供销社更加符合商品流通规律，经营规模扩大，服务能力普遍增强，供销社在农村商品流通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成为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渠道。

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流通组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发展速度上大大超过了公有制经济成分流通组织的发展速度，因而其地位和所占比重不断加强。到1985年，我国从事个体工商业的人数，已超过全国商业系统职工的人数。1985年年底，全国城乡有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达1168万，比1984年增长25.5%；从业人员达到1756万人，比1984年增长34.8%，比全国商业系统职工人数多300多万。与此同时，私营经济成分的流通组织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城乡集市贸易也发展很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销售迅速增加。城乡集市贸易网点1987年达到6.9万个，该年集市贸易成交额达到1100亿元，比1986年增长21.3%。

这样，从1978年开始的流通体制改革，经过10年的历程，使我国商品流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国营商业一统天下，分配式、封闭式、少渠道、多环节的流通体制，逐步向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开放式的商品流通体制过渡，初步形成了“三多一少”的商品流通格局。1987年，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4.6%降到38.6%，集体所有制商业（含供销社）由43.3%降到35.7%，而个体经济和农民对非农民的零售额却由21%上升到25.3%。“三多一少”商品流通格局的初步形成，使市场更加活跃和繁荣，更方便人民生活。到1987年年底，全国各种类型的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经营网点数达到1205.9万个，比1978年年底增长8.6%；从业人员达2827万人，比1978年年底增长3.65倍。

三、商品流通微观主体的改革

（一）国有商品流通企业的改革

国有商品流通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其出路只能是深化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体制改革。商业改革始终紧紧抓住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努力探索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增强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

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在80年代初进行扩权让利的基础上，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进行以承包经营制为主要形式的改革。1987年6月10日，国务院向各地、各

部门批转了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区别行业特点和行业规模，实行多种管理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意见》强调指出，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多种承包经营责任制，小型企业则要大力推行租赁制，有的小门点可以公开拍卖。

1987年以来，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普遍推行。各地做法大体有4种形式：(1)"两保一挂"，即承包经营中，企业要保上缴国家税利，保企业发展后劲，实行职工收入与上缴国家税利挂钩；(2)上缴利润递增包干；(3)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4)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指政策性亏损企业包干亏损定额）。截至1987年6月底，全国已有6833个大中型商业、饮食、服务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占全国大中型商业企业总数的35.6%，到1987年年末，大中型国营商业企业有60%以上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1990年实行第一轮承包合同，全国有93%的大中型商业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中82%的企业到1990年年底合同到期，从1991年开始新一轮的承包。新一轮承包基数要求坚持科学合理原则确定，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承包基数原则上以前3年（1988～1990年）承包合同规定的上缴利润实际平均数适当调整确定，也可按照前期承包合同确定的最后1年任务数适当调整确定。

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改革主要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是：初步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使企业有了较大的自主经营权；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国营商业的活力；推进了国营商业面向市场，开展竞争，锻炼了国营商业职工。但是，承包经营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消极作用和弊端也逐步显露。主要是：承包办法实行主营部门与企业一对一谈判的方式，承包基数忽高忽低，因人因企业而异，缺乏公正、合理的依据，容易造成苦乐不均的现象；承包期限短，承包人往往忽略企业长期发展，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谋取眼前利益，短期行为严重，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增添了不少障碍和困难；在相当一部分承包企业中，承包经营者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干群关系的改善。因此，改革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在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改革形式的同时，这一时期有一小部分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开始了实行股份制的试点。1984年7月，北京市天桥百货商场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取名为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年初至1987年年初，国有商业企业股份制试验形成第一次高潮，在1年多的时间内，广东、湖北、四川、福建、浙江、黑龙江、辽宁、上海等省市先后成立了10多家以国有商业为基础组建的股份制企业。但由于在股份制性质问题上认识分歧较大，1987年股份制试点转入低潮。从1988年年初到1989年年初，国有商业企业股份制试点进入第二次高潮，试点企业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有的省市还制定了有关规范股份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到1989年下半年，股份制姓"社"姓"资"的争论又起，股份制试点进入第二个低潮。1990年

12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以及1991年4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规划纲要，再次明确了继续进行股份制试点，此后股份制企业又兴起了高潮，一直延续了好几年。到1991年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以国有商业企业为基础组建的股份制企业约有130家，分布在14个省和直辖市。这一阶段商业股份制企业的组织形式大体有以下6种：（1）以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为基础，全部折成股份，并且公开发行股票，在企业内外招股集资的股份制企业，如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商场股份有限公司；（2）若干中小零售企业通过资产折股，管理机构合并，同时公开发行股票形成资产一体化的股份制企业，如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3）在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基础上，吸收其他工商企业法人参股的内部职工入股形成的股份制企业，如哈尔滨同记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第二百货大楼；（4）以一个大中型批发企业为核心，吸收同行业其他批发企业及有关厂家参股形成的具有集团性质的股份制企业，如福建南平五交化批发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茶叶集团公司；（5）由若干个国有商业企业以及其他相关企业联合投资、共同创办的以为股东服务为宗旨的股份联合体，如武汉粮油食品贸易中心、西南五交化企业集团总公司；（6）吸收本企业职工入股形成的股份制企业，如广州南方大厦股份集团公司、四川绵阳五交化股份有限公司。前两种股份制企业比较接近于国际上通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们对外部环境特别是市场环境要求比较严格，发展较慢，数量较少，截至1991年年底，全国只有10家；后4种股份制企业比较接近于国际上通行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外部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操作较为简便，因而发展较快，尤其是内部职工入股的股份制企业数量最多，全国共有90多家。

这一时期，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还试办了若干个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它们有的与股份制试点相结合，形成股份制企业集团；有的不进行股份制试点，只是实行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以发挥国有商业企业的整体优势，更好地开展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国有商业企业力量。

国有小型企业的改革，自8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以租为主，租、转、改、卖相结合的改革。租就是租赁，即把国有小型商业企业租赁给经营者个人或集体进行经营，国有小型商业企业的性质不变，职工的全民所有制身份不变，只是改变经营方式和责、权、利结合方式。国有商业企业的资产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测算，经营者按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每年上缴给企业相当数量的租赁费。转是转变所有制，由全民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改是改变经营方式，由国有国营改变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卖是对一些国有小门点进行公开拍卖，既可卖给集体，也可卖给个人。

国有小型商业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以改、转为主到以租为主的过程。1986年国有小型商业企业有64600家进行了改革，其中有76%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有12%转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有12%约7000多个小型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到1987年年末，小型国有商业企业有80%改为集体经营，转为集体所有制和租赁给个人经营。随后，租赁经营逐步成为小型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

（二）供销合作社改革

供销合作社在80年代初经历了供销社性质的大辩论，明确了供销社改革的核心是

变全民为集体、变官办为民办，把供销社真正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组织。在此基础上，80年代中后期，供销社改革进一步深化。1985年至1987年，供销社改革主要内容是：(1)继续按照合作社原则，坚持变官办为民办，变全民为集体的改革思路，尽快把供销社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组织。(2)以支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为中心，建立和完善农村商品生产服务体系。供销社在这方面迈出了新步子：一是供销社与农民联营办生产基地，实行产供销结合，生产与流通紧密结合；二是组织新的联合体或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村商品生产上规模、增效益；三是实行产供销系列化服务和售前、售中、售后全过程服务。许多地方的供销社为了帮助和指导农民科学用地、合理用药，解决农民使用农药化肥中的具体问题，建立了为农民服务的“庄稼医院”、“土肥站”，宣传、示范农业科学技术，并把供销与生产结合起来，为农民解决产前、产中、产后的问题。(3)发展供销社系统内外的横向经济联合。以供销社联社或大型供销专业公司为核心，组建新型经济联合体，从系统内、地区内的联合，发展到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在城市建立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扩大供销社经营的辐射能力和市场边界，开拓更广大的市场；推行直来直去的流通方式，建立产销直接见面的流通市场，减少中间流转环节，提高流通效率和效益。(4)适应新的形势和市场变化，实行灵活的经营策略，改变经营方式。农副产品广泛推行代理制、联营制、合同制；工业品经营实行联购分销，组织展销会，实行展销结合；对远距离运销的商品实行联营。(5)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供销社企业内部责任制。推行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和“三员”(采购员、推销员、多种经营辅导员)专业承包责任制；小型企业试行租赁经营。(6)逐步完善流通设施。加强网点建设、仓储设施建设和运输设施建设，建立和加强商品养护和检验设施，提高流通设施的现代化水平。(7)从1987年起，全国供销系统建立特种公积金制度。特种公积金是供销合作社为自身发展需要而建立的一种互助合作性质的基金。由各地供销合作社从每年税后盈利中提取，按规定上缴。资金主要用于支援灾区供销社恢复经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供销社发展生产，支持供销社改革中示范性的经营服务项目。(8)扩大农民股金，增强供销社农民所有的经济内涵。从1982年至1986年的5年间，全国供销社吸收农民的资金已有22亿多元，比供销社体制改革前的1981年增加了6倍，入股农户达1.4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5%。

(三)非公有制商品流通企业迅猛发展

按照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深化国有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城乡非公有制经济。80年代中后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商品流通领域主要是发展个体经济，俗称个体工商户或个体户。在个体工商户中，个体商业户占绝大多数。1985年年底，全国城乡有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有1168万户，从业人员1756万人，比全国商业系统职工人数多300万人。到1986年6月底，全国城乡个体商业(包括饮食、服务、修理业)共计874万户，从业人员1224万人。到1987年，全国城乡个体户多达1372.5万户，拥有资金236亿元，全年营业额1038.4亿元，其中商品零售额744.2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2.78%。城乡个体商业的迅猛发展，方便了人民群众生活，丰富了市场，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对社会主义

经济起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已开始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经济力量。但是，在相当一部分个体户中，存在着偷税漏税、短斤少两、坑蒙拐骗等违法活动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这些都应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和市场管理，认真予以解决。

第二节　商品市场体系的培育

一、商品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逐步深化，建立和发展市场体系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

从市场运行客体对象来看，整个市场体系可以划分为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两大块。其中，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两大部分，每一大部分又可细分为更加具体的市场，从而形成商品市场体系；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金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每一种要素市场也可以细分为更具体的市场，从而形成要素市场体系。应该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市场既是商品市场的组成部分，也可作为生产要素市场的组成部分，房地产市场既是生产要素市场，但它也有相当部分属于商品市场（居民住宅市场就是一种消费品市场）。

在市场体系中，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商品经济越发达，二者的关系就越密切。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商品市场始终是整个市场体系的基础，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决定着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要素市场对商品市场也有重要的作用，也制约着商品市场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市场体系发育很不健全，商品市场不发达，要素市场更缺乏。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有一个不断发育、培育和成长的过程。而商品市场的发育则是市场体系发育的基础，是要素市场发育的前提。

二、城乡集贸市场的建设

以供应城乡居民日常必需的农副产品为主要特色的城乡集贸市场，自80年代初期得到恢复后，80年代中后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全国各地城乡普遍加大了集贸市场建设的力度，集贸市场增加很快。1983年集贸市场刚刚恢复不久，城乡集贸市场网点有48803个，贸易额为385.8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约为13.5%；到1988年年底，全国已有城乡集市71359个，全年成交额达1621亿元，大大超过了国营和合作商业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

随着城乡集贸市场的发展，城乡集市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城乡居民对集

市贸易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增加。这种趋势在城市集贸市场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对全国106个城市、140个县城的抽样调查，1986年城镇居民从集市购买食品人均支出152.28元，比1985年增加32.76元，增长29.7%，居民对集市贸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其中中小城市居民对集市贸易的依赖程度要大于大城市，与城市规模成反比，城镇集市贸易不仅促进了城乡交流，而且使城镇居民的副食品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到1989年，在我国城市副食品供应中，计划外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增大，已形成“半壁江山”。除猪肉外，人们去集贸市场购买的主要副食品已略多于在国营商店的购买量，少数品种已多出1倍以上。据国家工商局提供的数字，1989年全国城市集贸市场主要商品成交量与国营商业零售量相比，若以国营商业零售量为100%，则集贸市场的蔬菜成交量为139%，鲜蛋成交量为103%，牛羊肉、水产品成交量均在180%以上，鸡、鸭、鹅、干鲜果的成交量分别为230%和391%；猪肉的成交量略小于国营零售量，为75%。

城乡集贸市场在城乡居民副食品供应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到1990年已成为居民副食品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90年，在社会农副产品的消费量中，集贸市场提供了肉禽蛋的68.2%，水产品的89.1%，干鲜果的80.3%，干鲜菜的75.8%，城乡集市贸易大大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并已形成南菜北运、水果和水产品流通全国的格局。这一事实表明，集贸市场的作用已不仅仅是补充，而是城乡居民购买农副产品的重要渠道。到1991年年底，全国城乡集贸市场达7.4万个，商品成交额2622亿元，已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3.4%，集贸市场已成为城镇居民菜篮子的主要供货场所。为适应这一变化，许多地区已把集贸市场的建设纳入总体规划之中，兴建室内集贸市场，引摊入室，并加强集贸市场的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有相当多的城市，对集贸市场地位与作用的变化仍熟视无睹，以街为市，以路为市的现象仍很普遍，没有相应地进行集贸市场的规划和建设，占道经营，影响城市交通和公共卫生，给居民购物带来很大的烦恼。如何规划、规范和加强城乡集贸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应该提到各级领导尤其是大中城市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来，认真研究，通盘规划，加快建设，规范管理，使集贸市场在城乡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菜篮子供应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把集贸市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兴起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进入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农副产品流通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为了适应农副产品大流通、大市场的需要，各种类型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应运而生，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形成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兴起的高潮。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综合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专业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前者是指各种农产品批发都在同一市场上进行，是比较粗放的市场。后者是指某一种或某一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集约化程度较前者高的市场，例如粮食批发市场、蔬菜批发市

场、肉类批发市场、禽蛋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中药材批发市场、花卉批发市场等。从发展趋势看，专业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逐步成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主要形式。

兴起于1984年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到1989年年底，全国已有1300多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城市集贸市场的农副产品多数来自这些批发市场，其中大城市占60%～70%，中小城市占50%～60%，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上，长途贩运人员占经营人员的60%以上。到1991年，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发展到1600多个，是1983年的8倍多。

粮食批发市场。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我国粮食批发市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经过几年的筹备和试运转，国家级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于1990年10月12日正式开始营业，这是我国第一个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上市品种暂定为小麦一种，第一天成交小麦5万多吨。1991年3月2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了开业以来第一笔远期合同，这是湖南省冷水滩市面粉厂与河南省滑县议价粮油公司签订的9～12月份交货的远期合同，它预示着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在向期货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迈出了接近的一步。1991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一周年，已初步显示出其作用。一年来，该市场成交粮油60万吨，市场辐射范围达20多个省份，合同履约率在90%以上，"郑州价格"已成为全国粮食交易的指导价格。

除了郑州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以外，我国还相继建立了区域（省）级粮食批发市场和初级粮食批发市场。到1991年年底，我国在粮食区和粮食传统集散地的黑龙江、吉林、湖北、九江、芜湖、长沙、威海等地办了厂家区域性（省级）粮食批发市场并陆续开业。1991年，8大粮食批发市场（上述7大市场加上郑州粮食市场）的粮食成交量达50亿公斤。这些市场，加上小范围的地区粮食批发市场和农村初级粮食批发市场，已初步形成多层次的中国粮食批发市场体系的雏形，对全国粮食流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蔬菜、果品、肉类批发市场。随着人民群众对蔬菜、果品、肉类需求的增长和上述产品生产总量的增加、品种的扩大以及商品量的增长，这类批发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蔬菜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有了突破性发展，过去那种"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封闭式小市场旧格局已被打破，正被开放式全国流通的大市场新格局逐步取代。一大批蔬菜生产基地在全国相继建立和发展，出现了蔬菜的规模经济，相应地，蔬菜流通体制也发生了大变化，地区间蔬菜流通发展很快。到1989年年底，我国省际间的年蔬菜交易量已超过60亿公斤，各种形式的批发交易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山东省寿光县过去是一个知名度很低的县，8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力发展商品蔬菜，上规模、上档次，到80年代末已成为全国最大蔬菜集散地，年吞吐量达16亿公斤。蔬菜全国大流通格局的出现，使黄河以北的大中城市从根本上改变了昔日冬季仅有大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的市场情况，东西南北中各地市场蔬菜品种都日益增多，数量增加，老百姓的菜篮子日益丰富多彩。1991年夏季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为适应蔬菜经济的客观发展需要，建立全国蔬菜统一大市场势在必行。会议指出：建立全国蔬菜统一大市场有利于生产要素

合理流动与商品资源合理配置，是形成国家可调控的市场运行机制的可靠保证。建立全国蔬菜统一大市场要以多层次蔬菜生产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为依托，以批发市场为主体，形成全国蔬菜市场网络体系。为此，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建立全国统一蔬菜生产基地；建立若干个中央批发市场和区域性批发市场；大力加强蔬菜流通设施和信息网络建设；实行开放式蔬菜体制，坚决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

果品市场从 1984 年 7 月放开以来，在果品生产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1987 年水果生产量为 166.8 亿公斤，比 1984 年的 98.5 亿公斤增长 69%，一些省市及跨省市联合建立了一批果品企业集团，不同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的果品经营十分活跃，果品批发市场也应运而生。1987 年全国主要大城市仅供销社系统兴办的不同形式的果品批发市场就有 200 多家，其他不同类型、不同经济成分兴办的果品市场还有不少。果品批发市场的兴起，为产销直接见面、减少流转环节、满足市场需要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了调节肉类供求、平衡产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肉食需要，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肉类批发市场也开始建立起来。1991 年 10 月，由商业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开办、共同领导的成都肉类产品批发市场开业，使肉类批发市场走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该市场是商业部继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之后，与地方政府联合开办的又一个面向全国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

这一期间，其他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如中药材批发市场、水产品批发市场、花卉批发市场、禽蛋批发市场，等等，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四、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更加活跃

与日用工业品国有批发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相反，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这种开放式的灵活性很大的批发流通形式却随着市场发展的需要日益活跃起来。尤其是 80 年代中后期和 90 年代初，随着乡镇工业企业异军突起、大幅度跳跃式发展，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工业迅猛发展，日用工业品流通量迅速增加，导致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的迅速崛起。其中，日用工业小商品批发市场发展得更为迅速。1990 年，全国日用工业小商品市场已有 3000 多个，其中批发市场 265 个，日用工业小商品批发市场 1990 年成交额达 113 亿元。1991 年年底，全国日用工业小商品批发市场又增加到 411 个。1991 年成交额超过 6 亿元以上的专业工业小商品批发市场有 8 个。饮誉全国的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批发市场，以其商品小、品种全、价格低、经营活的特色，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尤其是邻近省区广大农村的客户，成为城乡经济交流的重要枢纽。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南北客商络绎不绝，日流动人口有 5 万～6 万人之多，1990 年市场贸易成交额达 10.12 亿元。河北白沟过去是“一穷二白”的农村小集，到 90 年代初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拥有 4 条商业街、8 个专业市场、日客流量达 10 万人的大市场，日成交额逾百万元。温州桥头纽扣市场，以纽扣花色品种齐全的专业优势闻名遐迩，各色纽扣应有尽有，八方客户纷至沓来，小小纽扣年成交额达 1 亿元，被称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

遍布全国的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在沟通产销、联结城乡、推进地区之间商品交流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往往是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即使是批发生意经营也十分灵活，一般来说，批发起点比较低，使小批量客户便于成交，并且按批发量大小分成不同档次，制订不同档次批量的批发价格，批量愈大、批量档次愈高，单位批发价格就愈低，从而鼓励大批量客户进场批购，促进批发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档次的提高。

在综合性日用小商品批发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大型工业品批发市场，它是在市场推动生产、生产发展又扩大市场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前面提到的温州桥头纽扣市场是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的例子。而江苏吴江东方丝绸市场则是大商品专业批发市场的一个例子。该市场以江浙丝绸生产为依托，其市场面辐射到整个华东以至全国，并在国外产生一定影响。再如浙江绍兴轻纺市场的兴起，也再次证明了生产专业化、规模化对市场专业化、大型化的推动作用。1988 年绍兴市在东距绍兴县城关、15 公里的柯桥镇，建立了露天为市的“布街”，随着交易量的扩大，该县投资建设了建筑面积达 2.3 万平方米的 4 层营业用房共 600 多间的大型室内市场，并更名为轻纺市场，以布的批发交易为主。1989 年成交额达 3.1 亿元，1990 年为 5.7 亿元，1991 年达 7.8 亿元。绍兴轻纺市场的迅速崛起，正是以浙江、江苏比较发达的纺织品工业为基础和后盾的，而绍兴轻纺市场的发展，又推动了纺织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日用工业品综合批发市场和专业批发市场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它一头连着星罗棋布、遍布城乡的日用工业品零售市场（其对象是亿万消费者），一头连着正在上档次、上规模、上质量、上水平的日用工业品生产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日益显示出其生机与活力，日益兴旺发达。它也给国有批发企业摆脱困境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转变观念，以市场为导向，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五、生产资料市场方兴未艾

80 年代中期以来，以市场取向为特征的改革逐步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已成为国家决策层的共识，而生产资料市场则是这一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最完备的领域，尤其是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更是实行几乎全封闭性的计划分配体制，纳入统配的物资涵盖面相当广，指令性计划占绝对统治地位。1979 年改革开始的第一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平衡、分配的统配物资，仍多达 256 种。80 年代初，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工业生产资料的统配范围逐步缩小，尤其是 1984 年推进全国综合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统配物资的范围更是大幅度缩小，到 1985 年减少到只有 20 多种，1990 年减少到 19 种，1991 年仍为 19 种。国家对这 19 种统配物资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对统配物资，国家统配比重（即统配物资的统配量占该物资国内生产总量的份额）则是不断下降的。下面列举钢材、

木材、水泥、煤炭 4 种主要统配物资的统配比重变化见表 1。

4 种主要统配物资的统配比重，除煤炭略有上升（由 1984 年的 49%上升到 1991 年的 52.2%）外，其余 3 种均大幅度下降。其中，钢材的统配比重由 1984 年的 62.3%下降到 1991 年的 40.7%，木材由 44.3%下降到 25.9%，水泥由 24.1%下降到 11%，从而使计划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指导性计划管理的比重增加，市场调节相应扩大。统配物资范围的缩小和统配比重的下降，为工业生产资料的市场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市场体系格局的构想，为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和培育注入了新的生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生产资料市场在 80 年代初就开始起步，并以较大的势头迅速发展。1985 年各省市通过市场组织的物资，占地方企业消费总量的比重，钢材为 38%，木材为 46%，水泥为 61%。此后，生产资料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 1986 年 12 月起，国家先后在 151 个城市新建了 182 个钢材市场，从而使钢材供需双方有了合法直接交易的场所。

表 1　　主要统配物资占国内生产总量的比重变化

单位：%

	钢材	木材	水泥	煤炭
1979 年	77.1	85.0	35.7	58.9
1984 年	62.3	44.3	24.1	49.0
1990 年	41.6	30.7	13.1	50.4
1991 年	40.7	25.9	11.0	52.5

资料来源：桂世镛等主编：《中国计划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 页。

在统配物资统配比重不断下降，生产资料市场逐渐放开的情况下，一些重要生产资料出现了计划价和市场价两种价格，即同一种生产资料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市场上有两种价格，人称“双轨制”价格。一些重要工业生产资料由国家定价的比重也下降，而市场价则要高出计划价很多，例如水泥要高出 40% ~ 60%，钢材要高出 1 ~ 2 倍。这种情况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某些不顾全大局的企业为了本企业局部利益，不履行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使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况愈下。某些企业对国家计划任务交次留好、交长留短，使用户难以接受，也影响国家合同的执行；另一方面，“双轨制”价格有巨大的价格差，为某些人搞不正之风和“官倒”、“卖批文”等腐败行为提供了温床，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恶化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双轨制”价格必须改革。“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方向，是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市场价。但是，这个改革过程是相当长的。作为过渡性的办法，一是通过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严格双轨规范运行，防止串轨，混轨的寻租行为；二是在加大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逐步缩小“双轨制”价格之间的价差；三是实

行同一价格、价差返还。80年代中期，石家庄市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了“计划内外同一销售价格、价差返还”的改革，具体办法是对重要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无论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的，均按同一销售价格出售，计划价与市场价的价差部分，由主管部门统一核算，按期结算，返还给生产企业。这种办法对防止价格混乱以及利用价差牟取暴利的腐败现象，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推广了石家庄市的这一经验，到1987年年底，已有88个城市计划内中转供应的物资推广了这一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上，鉴于某些农业生产资料的特殊性，放开让多种渠道经营出现了很多弊端，尤其是假冒伪劣农药、化肥，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并严重影响农民的身体健康，危害社会发展，因此，国务院于1988年作出了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规定这三种农资商品由国家委托基层供销社和县以上供销社的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经营，不准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经营。这是国家为了确立重要农资商品流通秩序的重要措施，是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形成宏观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的必要过渡办法。专营本身是改革的一种深化，与放开搞活的总政策是一致的。这三种重要农资商品实行专营后，各级供销社农资专营部门在安排好当地农资市场的前提下，对多余的品种、数量，则本着平等互利、相互支援的原则，进行余缺调剂和品种串换，坚决打破地区封锁，以充分发挥农资商品的效益。

第三节　市场大波动与整顿流通秩序

一、震惊中外的商品抢购风潮

1988年夏季，在中国大地上，涌动着一股巨大的商品抢购风潮，其来势之猛，波及面之广，影响之剧烈，为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的最高峰，浪潮滚滚，震惊中外。

这一次全国性抢购风潮出现在1988年8月。从当年8月17日开始，首先在福州、天津、上海、重庆、成都、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中心商业区发生抢购，随后就迅速向其他地区扩散蔓延，影响波及面扩大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到处是排队抢购的人流，大大小小的各式商店都挤满了人群，人们摩肩接踵，争先恐后，见货就买，不问质量，不论价格高低，不管是否需要，倾其所有，大量抢购，恐惧、惊慌的眼神随处可见，抢购到的人已呈麻木状态，没有抢购到的人满面愁容，怨声不绝。抢购的主要物资集中在价高、耐用的高档日用工业品上，如家用电器尤其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以及服装、床上用品。其他工业品以及粮食、食油、食盐和副食品也有大量抢购的。据有关方面估计，抢购的商品范围，涉及到50个大类500多种工业品商品，以及各种主、副食品。参与抢购的，有大人、有小孩、有老年、有妇女，主力军是青年夫妻

和中年家庭妇女。据有关部门的保守估计，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国约抢购了价值60亿元的商品。销售额呈非正常大幅度增长。1988年8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比1987年同期增长了38.63%，大大超过了正常增长幅度。主要商品零售量大幅度增长，1988年8月零售量同1987年8月零售量相比的增长差率为：彩色电视机40%，黑白电视机64%，洗衣机160%，电冰箱100%，录音机71%，电风扇68%，自行车52%，毛线70%，棉布46.7%，呢绒53%，绸缎40%，棉毛衫裤92%，卫生衫裤74%，滞销多年的缝纫机也增长了58%。这次商品抢购风潮还引发了银行挤兑风潮，人们纷纷到银行提取储蓄存款，担心货币大贬值，物价大波动，购物保值心理占了上风，导致1988年8月份城乡储蓄非正常减少26.8亿元。银行资金紧张，到处告急。抢购大风潮正引发着经济的大波动，进而引发着社会的躁动和人心的浮动，形势十分严峻，这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决定实施以稳定为目标的治理整顿政策。

这次波及全国的商品抢购风暴，主要原因是经济过热和改革的时机选择不当造成的。本来，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在1985年上半年的经济繁荣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症再起，引发物价大幅度上涨，经过1985年2月、4月、6月、9月4次省长会议，压缩空气，到1985年年末，经济过热状况已基本缓解，再加上1986～1987年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尤其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了较为协调的良性经济发展势头。但是，到1988年上半年政策发生了变化，经济再度过热，尤其是在物价已经上涨，居民承受能力已到极限的情况下，还要价格闯关，从而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抢购风潮。

经过压缩空气，控制基建投资和消费需求等措施，1986年零售物价指数已从1985年的8.8%回落到6%。但“软着陆”尚未“着陆”又急于起飞，使1987年物价指数又上升到7.3%。198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率逐月攀升，2月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1.2%，3月份上涨11.6%，4月份上涨12.6%，5月份上涨14.7%，6月份上涨16.5%。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把稳定物价、稳定经济放到重要地位来认真解决，可当时却继续在物价改革出台的舆论上不断加温。1988年3至5月，舆论界宣传居民对价格改革有很强的承受能力，宣称不能片面强调稳定物价，大声疾呼价格改革要闯关，而无视现实生活中居民对通货膨胀的不良预期。当时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也一再宣布，价格改革要敢冒风险，要迎着风浪前进。

1988年上半年，价格改革出台措施大大加快了步伐，除了相继调整了部分粮食、油料、棉花和茶叶、木材、黄红麻的收购价格以及调高了煤炭、原油、电力等生产资料的部分航线的运价以外，5月份以后，彩色电视机、名烟名酒、棉纱棉布等价格均大幅度上浮，上浮幅度为20%～30%，再加上放开猪肉、鲜蛋、大路菜、白糖等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使物价上涨幅度进一步提高，在1988年6月份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6.5%的高幅上涨情况下，7月份更上涨至19.5%，8、9月份达到23.2%，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到民心安定和社会稳定。

在物价大幅度上涨和商品抢购风潮的气氛烘托下，假冒伪劣商品大行其道，泛滥成灾。市场秩序混乱，流通领域丑恶腐败现象蔓延滋长，投机倒把、倒卖批文、牟取暴

利、欺行霸市、利用“双轨制”价格损公肥私、扰乱市场，以及对某些农产品盲目抬价抢购的各种“大战”烽烟四起，严重破坏了市场正常秩序，危及流通的发展。

二、治理市场环境，整顿流通秩序

鉴于商品抢购风潮所引发的严峻形势，中国最高决策层采取紧急措施果断处理危机，迅速扭转局势，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鉴于1988年夏季物价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商品抢购风潮所带来的严峻局势，全会强调治理整顿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确保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并把实现这一目标任务作为1989年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整顿经济秩序的艰巨工作中，重点又是治理市场环境、整顿流通秩序。治理市场环境、整顿流通秩序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清理整顿公司。重点是解决一些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非法倒卖、牟取暴利的问题，严厉惩治“官倒”。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监察机关集中力量查处了一大批流通领域利用权力或关系，违反规定倒买倒卖、牟取暴利、中饱私囊的“官倒”案件。截至1988年年底，共立案查处倒卖生产资料、批文票证、紧俏商品、外汇等各类“官倒”案件759起，结案336起，给予行政处分的172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60人，罚没金额3755万多元。

2. 治理价格混乱现象。狠刹物价涨风，打击价格违法活动，理顺价格秩序。据国家物价局提供的情况，仅1989年第一季度，全国共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137907起，查出非法所得2.39亿多元，经济制裁总额2.25亿多元，其中95.8%已上缴财政。价格违法大案要案多发生在工交、物资、供销企业及批发商业企业，从商品分类上看，则多是生活消费品。在打击价格违法活动、治理价格混乱局面的同时，从当时经济情况出发，放慢了价格改革的步伐，防止因价格改革出台过多过快而牵动物价再一次猛烈上涨，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物价涨幅平和甚至无上涨感觉的氛围中，降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利于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

3. 打击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由来已久，在1988年夏季商品抢购风潮期间，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相当普遍，泛滥成灾，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治理整顿期间，抓紧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生产与经营的违法活动。1989年年初，国家技术监督局部署在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沈阳、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10大城市开展市场商品监督检查，打击制造、销售假冒、劣质产品的非法活动，这次市场突击检查的范围，重点是白酒、色酒、粮油、罐头、电热毯类9种商品，查出的假冒劣质产品通过新闻舆论公之于众，并按《工业品质量责任条例》或当地有关质量监督处罚办法严肃处理。但是，打假任务十分艰巨，屡打不绝。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提供的资料，1989年上半年抽查结果，市场上商品质量标准合格率

只有57.3%，浙江产的“日芝”牌电冰箱1988年共产105万台，合格率只有26.9%，人们惊呼：劣质产品屡禁不止已成为社会公害。1989年下半年，国家加大打假力度，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鉴于打假工作的艰巨性，国家有关方面提出要立足长期作战，用3年左右时间使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大大减少，要像抓“扫黄”一样扫除假冒伪劣商品，要坚持不懈地抓好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整顿市场的工作。商业部系统1989年上半年对210个生产厂家的221个牌号的产品进行抽查，相当多的商品质量很差，有的商品竟然是全部不合格的伪劣货。针对这一情况，商业部提出要从把好进货关入手，杜绝伪劣商品。要通过质量检测严格把关，不能让伪劣商品进入流通领域。但由于缺乏立法和执法手段，缺乏过硬的措施，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效果仍很不理想。

4. 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为了制止市场上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农膜多头经营、倒买倒卖、市场混乱的现象，国务院于1988年10月28日作出《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整顿农资市场秩序，国家委托商业部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各级供销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对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经营上述商品，化肥、农药、农膜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并规定自1989年1月1日起实行专营。这是推动改革顺利进行、确立重要商品流通秩序的重要措施；也是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距，逐步形成宏观控制下的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必要过渡措施。

经过从1988年第四季度到1989年下半年的一年时间，治理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未解决，尤其是供求总量不平衡的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求大于供的总态势仍然存在。到1989年年底，供求差率约达8%；流通中的货币依然偏多，物价涨幅仍然偏高。1989年上半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总水平仍高达25.5%，下半年物价降幅较大，但全年综合计算，涨幅仍高达17.8%，只比1988年涨幅18.5%低0.7个百分点。这些情况表明，治理整顿的目标远未实现。

1989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全会要求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的要求，在市场和流通领域进一步开展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工作，主要包括：

1. 继续清理整顿流通领域的公司。继1989年清理整顿公司尤其是党政机关办理的各种公司以后，1990年，又继续清理了各部门各类公司，尤其是流通领域的公司。例如，外贸系统着重清理了1988年新成立的各类外贸公司，撤并了一些重复设置的、无对外经营条件的、不到银行结汇和逃汇的公司；商业和物资系统则重点清理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批发业务，整顿和撤并了一些不具备条件和进行违法经营的公司。自1989年以来，到1990年年底，全国共撤并公司10.5万多个，占原有公司总数的35.2%，其中撤并流通领域公司7.3万个，占撤并公司总数的70%，至此，这项工作已基本结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 控制通货膨胀、降低物价与深化价格改革同时并进。1990和1991年，继续实行治理整顿方针的突出成果表现在：市场物价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1990年社会商品零

售物价指数只比上年上涨2.1%，是1980～1990年期间物价上涨幅度最低的年份之一。它对于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具有重要的作用。1991年全国零售物价水平也只比上年上涨2.9%，也是近10多年来涨幅较低的一年。但应指出的是，1991年虽然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只有2.9%，但分月指数则呈上升趋势。具体来说，1991年的1～4月份，分月物价上涨幅度是逐步回落的，由1月份的1.4%降到4月份的0.6%，但从5月份开始，上涨幅度就上升，5月份涨幅为3.1%，到8月份上升到4.4%，9～12月份又基本维持在4%左右的涨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1990年城市物价上涨水平低于农村物价上涨水平的情况相反，1991年城市物价上涨水平明显高于农村，35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价格水平上涨8%，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上涨幅度超过10%，居民对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心理压力和预期加重加大，潜伏着物价再度大幅度上涨的危险。

在抑制通货膨胀、努力降低物价水平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价格改革，主要是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结构性调整。(1) 调整城镇粮油销价。1991年粮食销价上调66%，食用油价格上调1.6倍，与粮油相关的制成品价格也相应上调。这次城镇粮油销价上调幅度大，但没有引发涨价风，人心平静，这次改革应该说是成功的。城镇粮油销价的调整，使粮油购销价格大幅度倒挂的现象有了明显好转。粮食购销倒挂差价由调价前的每500克0.15元下降到调价后的0.05元，食用油购销价格持平。据匡算，粮油销价调整后一年可减少财政补贴近150亿元。(2) 调整基础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1991年年初，对铁矿石、铁合金、钢坯等统一出厂价进行调整，上调幅度为17%～26%，钢材出厂价也有一定幅度上浮；平价原油提价幅度为19.8%，高价原油提价幅度约7%；1991年上半年又调整了成品油出厂价，其中汽油价格上调16%，煤油价格上调17%～22%，非农用柴油价格上调37%，高价油也不同幅度上浮；统配煤继续实行增产加价的办法，1991年统配煤价格平均上涨17%；铁路货运和管道运输价格1991年上半年分别提价7.4%和24.62%。这些初级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微调对缓解计划价格偏低有一定作用，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 整顿价格“双轨制”，对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计划内外价格并轨，或缩小“双轨制”价差。1991年3月12日，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发出《关于水泥企业水泥实行计划内外统一出厂价格的通知》，决定从4月1日起对统配水泥企业水泥价格并轨，实行计划内外统一出厂价格。不过由于并轨后的价格偏向计划价格，不利于水泥这种竞争性产品的发展，但这也提供了一种经验教训和思路，即竞争性产品价格并轨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向市场价过渡。同时，在计划价上调和市场价下跌的双重作用下，生产资料双轨价差普遍缩小。1991年上半年计划内外双轨价差继上年缩小之后又进一步缩小，综合差价率由上年同期的30%降到20%，其中生铁、线材、薄钢板的计划内外差价率分别由上年同期的39.8%，46.8%和99.4%缩小为18.9%、16.3%和35.4%，某些过去长期紧俏的物资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计划价高于市场价的现象。应该说，这两年价格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对理顺价格关系，推进经济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价格不合理结构年深日久，且价格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价格改革和价格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路还相当长。

3. 继续整顿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等违法活动。1990年和1991年，在继续整顿

批发市场秩序的同时，也开始整顿零售市场秩序。鉴于出租柜台引起诸多混乱现象，商业部于1991年7月决定，大中城市的国营大中型商业零售企业（含饮食服务业和粮食系统的零售企业）、供销合作社的大中型零售企业，今后一律不准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出租柜台。国家有关部门继续进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生产经营的违法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国家技术监督局1991年第四季度抽查了全国793个企业41类1003种国内销售的商品，合格率为79.2%，比1989年第四季度抽查5种798组市场随机抽取样品检查合格率71.8%有所提高（因抽取商品类别不同，品种数量不同，这种比较只是一种参考，不能绝对化）。1991年第四季度抽查结果表明：跟踪抽查的产品质量提高幅度较大，例如合格率为100%的9类产品中有5类是多次监督抽查后才提高的；合格率为70%以下的10类产品中有9类是国家第一次监督抽查的产品。可见，国家监督抽查工作对打击假冒伪劣，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抽查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不严格执行标准；质检机关把关不严；食品标签不合格，等等。这说明，打击假冒伪劣，提高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任重道远。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91年，治理整顿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从市场流通领域来说，市场环境得到了初步的治理，流通秩序有了一定的好转，为经济的新发展准备了较好的条件。但是，市场环境的治理，流通秩序的整顿仍然有许多未了结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三、市场疲软与启动市场

（一）市场销售由疲软、复苏到走向正常增长的基本情况

在国家大力进行治理整顿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市场销售疲软现象。市场销售疲软现象从1988年年末到1989年年初就已露出苗头，1989年全年均处于疲软状态，8月进入疲软低谷，1990年继续疲软但经过启动市场的一些措施后有所回升，1991年逐步由疲软中爬坡，向市场销售正常化过渡，摆脱疲软状态，为新的一轮市场兴旺发展准备条件。

1988年8月商品抢购风达到高潮，同年9月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以后，从1988年10月开始，消费品市场就开始降温，商品抢购风潮迅速被遏制。1989年上半年，市场商品销售逐步滑坡，其趋势是由旺转平，由平转滞。尤其是在抢购风潮中热销的消费品，销量明显下降，1989年上半年，电冰箱销量下降6.9%，洗衣机下降22.1%。与此同时，商品销售额由名义增长实际负增长转为名义销售额出现负增长。1989年1~5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7.2%，6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9.1%，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为负增长。到1989年8月份，市场商品销售由淡转滞，进入疲软低谷，当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0.7%，是改革开放10年来第一次出现的负增长。此后连续3个月销售下降，12月份虽稍有回升，但只比上年同期增长0.3%。1989年8~12月的5个月中，市场销售疲软相当突出，销售额的下降几乎涉及全部主要商品。据国家统计局对28种主

要商品的统计，除鲜蛋销量增长9.3%以外，其余27种商品销售全部下降。下降的趋势是：穿与用的商品销量下降幅度大于吃的商品下降幅度，高档消费品下降幅度最大。

1989年市场商品销售疲软是全面性的，实际是负增长。1989年按现价计算的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比上年增加8.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比上年下降8.9%，其中有的商品如棉布、自行车、缝纫机、家用电器等，按现价计算也比上年下降了20%～40%。从城乡市场分别来看，在消费品销售全面疲软的情况下，农村市场疲软程度比城市更大，1989年全国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比上年增长5.2%，比全国零售额增幅低3.7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下降14%左右。

1990年市场销售疲软状况继续存在，并一度有所加深。1990年春节以后（1990年2月），许多城市商品销售明显转淡，北京、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重庆6个城市和10家大型商店1990年2月上半月商品销售总额为768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2%，居民储蓄倾向明显大于商品消费倾向。其他各地情况也大体相似。随着启动市场的措施逐步到位，到1990年下半年市场销售疲软的势头有所减弱，开始出现某种回升的迹象。1990年11月初至12月初，分别在西安、南昌、广州等地举办了全国文化用品、鞋帽商品、家电用品和出口商品的秋季交易会，交易情况都比上年同期要好，成交总额增幅较大。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市场在经历了近两年的疲软徘徊之后，从1989～1990年上半年的销售疲软到1990年下半年的复苏，已于1990年年末开始走出低谷，市场销售逐渐向稳定增长方向发展。1990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255亿元，比上年增长1.9%。

1991年随着治理整顿工作的基本结束和国民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国内市场已基本扭转了销售疲软局面，出现平稳、正常增长迹象。1991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9398亿元，比上年增长13.2%，扣除零售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这一增长速度与1979～1983年的正常增长速度基本相同，表明市场销售增长速度已恢复到正常、稳定增长的水平。

（二）市场疲软成因分析

1989～1990年上半年呈现出的市场销售疲软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宏观政策紧缩的影响。由于国家在1989～1990年采取了宏观紧缩政策，抑制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张力，由需求过旺转入需求平缓和紧缩，这是导致市场销售疲软的总的经济背景和主要成因。紧缩的宏观政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 压缩社会总需求。压缩社会总需求主要是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上年压缩500亿元，随后不久，国务院又决定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规模上年压缩920亿元，减少21%，比原定的压缩指标多压缩了420亿元。实施结果没有达到这么大的压缩规模，但总的趋势是逐季减少的，1989年全年共减少固定资产投资359亿元。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缩减目标，但在1988年经济过热高潮中，固定资产投资从比上年增加856亿元的高水平上降了下来，已是不小的成绩。这对抑制通货膨胀、降低市场物价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不可避免地缩减了对基本建设所需物资的需求，引起销售平滞，同时也带动了消费需求的缩

减。压缩社会总需求也包括压缩消费需求，制止消费膨胀。这主要是通过一些措施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例如，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限制集团消费。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1989年社会集团购买力在上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按可比口径压缩20%，争取减少社会集团消费170亿元。同时，通过严格控制财政事业费开支和预算外资金的使用，压缩除工资奖金以外的其他个人收入以及其他一些措施，控制消费基金规模。(2)控制货币发行总量，加强货币回笼力度。这就从源头上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89年实行紧缩银根的政策。上半年现金收支相抵货币有所回笼，1~6月累计回笼货币53亿元。1989年全年投放货币210亿元，大大低于计划控制数（1988年年底和1989年年初全国计划会议和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1989年货币发行控制在400亿元以内），比1988年货币投放680亿元减少470亿元。与此相联系，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猛增，1989年1~9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累计增加999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加279亿元，增幅达38.8%。而银行各项贷款规模则大为缩小，到9月底为601亿元，仅相当于计划的37%。这些方面的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流通中的货币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恢复了货币的正常运行，从而抑制了通货膨胀，对稳定物价起了重要作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货币投放减少，贷款规模缩小，货币回笼增加，居民储蓄增加，又大大减少了商品需求，购买力分流向储蓄倾斜，使商品购买力削减，从而对商品销售的疲软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

2. 商品抢购风潮中大量超前抢购所产生的沉淀消费滞后效应，加剧了市场销售疲软的程度。在1988年夏季的商品抢购风潮中，广大消费者购买了超过即期消费的大量消费品，有的超前购买了可供消费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商品，当抢购风潮平息，市场趋向平稳后，消费者就会用较长的时间消费在抢购风潮中提前超量购买的大量消费品，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再到商店去购买这些商品，这种消费滞后效应使商店里各类大量的商品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销售出去，平销或滞销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3. 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变化也对市场销售疲软具有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消费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这种消费心理是与消费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紧密相关的。物价上涨，消费者对通货膨胀预期则加大，认为通货膨胀有继续加剧的趋势，为了避免更大经济损失，就盲目购买，超前大量购买，甚至一时不需要的商品也购买，以达到“购物保值”、减少损失的目的；当物价涨幅下降甚至物价下跌时，消费者对通货膨胀预期则是减小的，认为货币不会继续贬值下去，并持币待购，不急于买东西，或等待商品价格继续下降后再买更划算，这就影响了商品的正常销售，加剧了销售疲软的程度。

4.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暴露，质次价高的长线产品必然滞销。在商品抢购风潮中，“萝卜快了不洗泥”，人们见货就买，不问质量好坏，这就掩盖了经济结构中的各种矛盾。一旦抢购风潮过后，市场恢复常态，许多一哄而上的项目，盲目发展的工厂所存在的质次价高、货不对路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这样，由于盲目上马造成供过于求的产品，质次价高的产品就被消费者拒之门外，成了滞销品，这是市场销售疲软所揭示出来的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深层次的矛盾。

5. 一部分城乡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是市场销售疲软的又一深层原因。(1)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生产滑坡，开工不足，尤其是在前几年经济过热中发展起来的长线产品加工工业，这时因产品货不对路、质次价高而销不出去，大量积压，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职工收入也相应减少，由于企业不景气，不但不能招工，而且使相当一部分在职职工待业休闲，使社会待业和厂内待业人数急剧增加，导致一部分职工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下降。(2) 农业生产增长缓慢，加上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用生产资料和农村日用工业品价格偏高，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使“剪刀差”扩大，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少收入，实际购买力下降，因而也减少了对工业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必然使农村市场销售疲软。1989 年，农民的实际收入 10 年来第二次下降，这是农村市场疲软的直接原因。1990 年第一季度农民人均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性投资的现金均有下降，分别为 116.6 元和 42.4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分别下降 1.6%和 2.3%，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普遍下降。

6. “三角债”困扰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市场商品销售起到了抑制作用，也加剧了市场疲软的程度。由于银根紧，贷款规模限制以及其他原因，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的现象愈演愈烈，许多企业把产品销售出去后，不能及时收到货款，有的货款已无法收回，成了死账、呆账。许多企业因“三角债”困扰而无力继续经营，或不敢销售产品，害怕货出去收不回钱，多付银行利息。有货不能卖，有货不敢卖，当然就会导致进一步的销售疲软。

(三) 启动市场初见成效

市场销售疲软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工业企业停产、半停产的状况日益严重，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三角债”的困扰使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亏损面扩大，亏损金额增加，商业企业销售不畅，费用增加，经济效益也在下降，农村经济受销售疲软的影响更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也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仍应深化改革，扭转市场销售疲软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去启动市场，促进市场的活跃与繁荣，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1989 年 8～12 月是市场销售疲软最严重的时期，1990 年上半年继续疲软。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从 1990 年年初起，就开始通过深化改革，采取多种措施启动市场。除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业结构，增产适销对路的日用工业品，适当增加贷款规模作为企业的启动资金，清理“三角债”等措施外，还特别注意搞好市场营销，大力开拓市场。一是发挥国有商业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商业的积极作用，采取各种有效的促销手段扩大商品销售；二是打破地区封闭、部门封锁的禁锢，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搞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三是内外结合，在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启动市场已初见成效，市场销售经历了由滞转平、由平转旺，从 1990 年下半年起市场销售开始复苏，到 1991 年已进入正常增长阶段。1991 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 9398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 13.2%，扣除零售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10%；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 8227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 13.4%；1991 年各季销

售呈均衡增长趋势，第一季度增长13%，第二季度增长12.6%，第三季度增长12.8%，第四季度增长14.6%，各季增幅差距不大，表明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实现平稳、正常增长。与此相适应，全国各地市场销售也普遍增长，尤其是城乡市场都有较大增长。1991年，城市市场趋于活跃，销售额增长较快，城市消费品零售额达4515亿元，比上年增长16.1%；农村市场也扭转了严重疲软局面，市场销售回升较快，1991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为3712亿元，比上年增长10.4%，虽然农村市场销售增长速度仍低于城市市场，但它与城市市场销售的增长差幅在逐步缩小，1991年农村市场销售的增幅与城市市场销售的增幅之差，由年初第一季度的9.5个百分点（18.7%＞9.2%）缩小到年末第四季度的3个百分点（15.5%＞12.5%）。这表明，提高农民收入仍是继续活跃市场的一项重要任务。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启动市场已初见成效，但不宜估计过高，许多影响市场进一步繁荣活跃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彻底解决，例如，产品结构不合理、不适销对路商品过多造成积压的问题仍很严重。商业部门供应的682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不断增多，1990年占25%，1991年占27%；工业部门的库存积压也相当严重，1991年年末，产成品资金占用仍在1200亿元以上，1991年工业生产增长高于市场销售实际增长3个百分点左右，说明产品结构不合理仍然存在，工业生产的增长仍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贷款和投资的拉动，而并非完全建立在市场销售的基础上。又如，农村市场增幅相对较低，说明农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仍较慢，对农村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兴旺是一个不利的制约因素。再如，社会集团购买力大幅度增长的现象重新抬头，物价涨幅从1991年下半年起又有所加快，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所增大，等等。当然，矛盾与问题总是会存在的，即使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我们去解决。指出存在的问题，是要对启动市场所取得的成效有一个恰当的估价，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在今后的市场运行中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促进市场与流通的健康发展。

第十四章　加大对外开放幅度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的幅度进一步加大。受经济过热和新旧体制摩擦的影响，外贸秩序曾一度出现过混乱。经过治理整顿，局面逐步扭转。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密切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中国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所作的努力，使中国外贸体制开始适应国际贸易规范，也进一步调动了中央、地方、企业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积极性，推动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第一节　加大对外开放幅度

1980年下半年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以及1984年5月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先后作出了扩大经济开放地区和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些战略决策的实施不仅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种多层次、有重点、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而且使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又有了新的进展。

一、大幅度扩大对外开放地区

1985年1月25～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并于2月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开放区。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长江三角洲开放地区包括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常州、绍兴、嘉兴、湖州等10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城镇和广大农村；珠江三角州开放地区包括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5市及周围城镇和农村；闽南三角地区包括厦门、漳州、泉州3市及周围的城镇和农村。这3个经济开放区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珠江三角洲紧靠港澳，长江三角洲环绕上海，闽南三角地区面对台湾。它们都顺江临海，交通方便。农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就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大多是传统的出口创汇地区。这些地区的开放，不仅能够加速沿海经济的发展，使其尽早成为开放式、现代化的文明

富庶地区，而且通过外引内联，还能带动内地的开发和发展。

国家为经济开放地区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包括：扩大这些地区内省辖市人民政府（包括部分县人民政府）利用外商投资的审批权限（每个生产性项目的总投资审批限额为500万美元以下）；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技术改造和出口创汇项目，在资金、设备供应和技术指导等方面进行优先安排，所需进口的生产资料，在1990年以前一律免征关税和进口产品税（或增值税）；省辖市区、县的城关区（包括重点工业卫星镇）举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属生产性项目、科研项目和农业出口项目的，其企业所得税减按八折征收。外商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进口的用于本企业的生产资料、交通工具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产品税，其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扩大这些地区的外贸出口经营权，属本地生产的非国家统一经营产品，下放给省、市经营或联营，自负盈亏；这些地区的省辖市，经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在当地发行专项债券或股票等。这些政策措施大大激发了经济开放地区的技术改造和出口创汇积极性。

1988年4月7日，国务院决定再一次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这次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共140个市、县，其中包括杭州、沈阳、南京3个省会城市。这样一来，不仅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开放范围从过去的“小三角”扩大到“大三角”，而且使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和河北省渤海湾的秦（皇岛）、唐（山）、沧（州）地区以及广西自治区靠近北部湾的某些市、县也进入了沿海经济开放区行列。至1989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已扩大到12个市、80个县（市）；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扩大到11个市、42个县；闽南厦漳泉经济开放区扩大到3个市、28个县（市）；辽东半岛经济开放区有7个市、16个县（市）；胶东半岛经济开放区有3个市、27个县（市）；渤海湾经济开放区有5个市、12个县（市）；广西北部湾经济开放区有1个市、5个县（市）。新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地区，同以前开放的地区一样，享受同样的优惠待遇。根据国家要求，这6个经济开放区除了和开放城市一样成为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和加强同内地联系的桥梁外，还要求按照出口贸易的需要，加快工农业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建成贸——工——农的生产结构体系，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1988年4月13日全国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批准成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是我国创办的第五个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它的面积有3.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深圳特区的103.8倍），人口627万。海南岛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是西太平洋沿岸环形带上的一颗明珠。这里的热带作物资源、地下矿产资源、海洋水产资源极为丰富，尚待开发，这是海南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优势。经过有关专家认证，海南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建成以工业为主导，工业、农业、贸易、旅游并举，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外向型综合性经济特区。为了加速海南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国家对它实行了更加开放的政策。主要是：国家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经济管理自主权；海南岛国家所有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为70年，期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的，经批准期限可以延长；对外商提供更加广阔的合作领域，外商投资方式可以更加灵活多样；对货物、人员出入

境采取更加方便的措施，在海南岛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持有25%以上股份的企业，均享有进出口经营权，其他企业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也可以享有进出口经营权；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在海南岛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海南岛内的企业出口产品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取得的外汇收入，均可保留现汇等。这些政策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有效的保护和优惠待遇，有利于加速海南岛的开发。

至此，我国形成了北起辽宁南到海南，成线连片的沿海开放地带。这一开放地带，分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地区3个层次，包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1个市县，人口达2亿。

1988年7月3日，为贯彻扩大对外开放的方针，国务院还作出了适当扩大内地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吸收外商投资审批权限的决定，将每个项目总投资的审批权限由原500万美元以下扩大到1000万美元以下。这一措施为内地招商引资、加快开发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外开放的大幅度扩大、特别是沿海开放地区的迅速扩大，给我国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新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和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外引内联，在其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沿海地区与内地争夺市场、资金、原材料的矛盾，加重了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引导沿海开放地区健康发展，并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实施沿海开放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1987年理论界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重工业高级化都因资金有限而受到制约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的观点，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又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获得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这种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循环关系的思路，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与肯定。同时，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经过1979～198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世界各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滞胀”困扰，除将钢铁、纺织、造船、服装、皮革、化工等“夕阳工业”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外，已开始将部分知识和技术密集产品中带有劳动密集特点的元器件和零部件的生产或装配作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费用低廉的发展中国家；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化升级，这也为发展层次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接受外来投资和增加出口的机会。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8年年初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对这一发展战略表示完全赞成，提出要大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出，这一战略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全局，是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利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而且也有利于内地经济的开发和全国经济的振兴，必须坚决组织实施。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决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为了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国务院于1988年3月4～8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沿海各地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抓住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有利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

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费用低廉，素质比较高，交通方便，基础设施比较好，科技开发能力也比较强。这是我们的优势。历史上我们曾经错过几次发展良机，这次不应再错过。沿海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抓住出口创汇这个中心环节，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把它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沿海城市的工业企业是参与国际竞争和扩大出口创汇的主力军，必须增强企业活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努力增加机电产品的出口；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挥机制灵活、适应性强的优势，积极扩大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发展“三来一补”项目，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品出口；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广大农村应进一步贯彻“贸——工——农”方针，发展创汇农业，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建设经济作物、水产、家禽等出口生产基地，增加鲜活商品和经过深加工的高档优质农副产品出口。

（二）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内地让出部分原料和市场

随着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内地经济的日益发展，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路子只靠国内的原材料，沿海和内地争原料的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因此要鼓励沿海地区到国际市场上去进口国内紧缺的原材料，在国内加工增值后把产品再销往国际市场，大进大出，以进养出。这样就能为内地让出部分原材料和市场，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开发。沿海地区在发展“两头在外”产品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厂房和设备，生产、加工相同或相近的产品，不能铺新摊子和大搞设备引进，否则大进难于大出，不可能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

（三）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鼓励现有企业采用“嫁接”办法发展

沿海地区向外向型经济转变，要继续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改善投资的“软环境”。提高办事效率，搞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提供较好的生产经营条件，使外商能按照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在举办外商投资企业时，要按照我国的产业政策选择项目，重点发展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除举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外，还欢迎外商举办独资企业。沿海地区现有工业企业较多，基础比较雄厚，鼓励采用中外合资或合作方式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嫁接”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加快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当前建设资金困难的有效办法。

（四）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经过前几年的技术改造，沿海地区企业的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离国家四

化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由于政策以及体制原因，科技进步带来加快发展的可能性还没有变为现实性。要把科技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一是通过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竞争机制，推动企业关心科技进步；二是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使科技更好地为生产、为产品出口服务，打破科研与生产相脱节的现象。同时要允许科研人员直接办企业。在科研中心、学校周围办一些知识密集型企业和体现与运用科技成果的企业，对科研开发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好处。中央和地方都应重视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这一大课题。沿海地区企业要继续利用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强消化、吸收、创新和国产化工作。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力量的作用，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提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能力。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沿海中心城市和经济特区要努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不断发挥对内地的技术辐射作用，推动全国的技术进步。

（五）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横向经济联合

沿海各地情况不同，优势各异，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发展外向型产业和开展对外技术合作方面要有不同的侧重和分工。沿海开放地带的不同开放层次要发挥各自特殊的功能，制订切实可行的规划，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沿海的主要城市和经济特区要站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列，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各沿海地区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应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形成生产协作和经济技术辐射网络，把各地的分散优势汇集成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综合优势。

（六）既要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又要稳定全国经济

沿海地区在采取进一步改革、开放措施时，要注意避免同全国稳定经济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和摩擦，特别是涉及物价问题的时候，步子要稳一点，尽量减少对内地的冲击和影响。沿海地区利用外资的重点应放在兴办“三资”企业上，着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减少国家举借外债的总规模。特别是要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在原有的厂房、设备基础上，利用外资引进或改造关键设备和关键技术，减少我方所需要的配套资金，以利于国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总规模。在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时，要解决好原有资产的合理评估、原有管理人员的精减、多余劳力的安置等问题。沿海地区要多从当地开辟资金来源，对那些长期亏损已成为财政包袱的小商店、小工厂，可以拍卖给集体、个人或其他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国家从拍卖中回收的大批资金，可用来进行重点建设和发展技术先进的企业；土地实行有偿使用也是一大财源；沿海许多城镇出售旧房也可以筹集大笔资金；要积极进行股份制试点，更多地把短期资金变为长期资金，以扩大建设资金来源。

1988 年 3 月初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沿海各省市以及内地的一些省市积极行动，迅速研究、制订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和规划。3 月 23 日，国务院又作出《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决定扩大沿海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审批权限，下放外贸企业审批权，改进对进料加工出口的海关监管，在沿海地区开放直辖市设立外汇调剂中心等，进一步激发了各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积极性，形成了各级干部“想外向、干外向”的局面，使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成了 1988 年上半年相当多

省市经济工作的中心。

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大进大出，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如何给沿海的地方和企业创造一个随时能进能出的环境和条件。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企业才能逐步适应国际市场的千变万化，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因此，在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迫切需要对外贸体制进行更深入的改革。

第二节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7年间，外贸体制改革经过9年多的探索、实践，在下放外贸经营管理权、促进工贸结合、扩展外贸渠道、实行灵活经营、改善宏观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从总体上来看，旧的外贸体制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旧的以依靠行政手段为主要特征的直接管理虽然已经削弱，但仍然是宏观管理的主要方式；以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要特征的间接调控体系虽然已经开始建立，但仍未形成有计划商品经济所必需的间接调控体系。国家对外贸的宏观调控手段尚缺乏力度，调节体系尚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工贸、农贸、技贸、进出口结合与进出口代理制在体制上仍没有理顺。第二，外贸企业缺乏自负盈亏的条件和能力，仍处于吃中央财政“大锅饭”的状态。由于提供出口货物和进口物资的工农生产企业属于地方财政体系，并已经实行承包经营，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条件下，使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三，价格体系和汇率不合理，既不利于鼓励出口创汇，也加重了中央财政的补贴负担。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外贸企业本身的经营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根据中共中央十三大提出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精神，1988～1991年间外贸体制经过了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实行完全自负盈亏两大回合的改革。

一、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7年9月26日，国务院同意并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1988年外贸体制改革方案》，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自此进入实施阶段。这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全面推行外贸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其具体措施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直接承担出口任务的国家外贸公司，分别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基数、上缴外汇额度基数、出口基数内人民币补贴基数、外汇额度挂账数额。各地方承包以后，把各项承包指标分解落实到地方外贸企业。完成承包指标以内的外汇收入，大部分上缴国家，少部分留给地方和企业。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商品，按照现行规定，实行差别外汇留成比例；超过承包指标的外汇收入，少部分上缴国家，大部分留给地方和企业。除部分商品实行全额留成以

外，基本上拉齐外汇留成比例（中央和地方实行二八分成）。地方部门和企业分得的留成外汇，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自主支配和使用。1988年，国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和沿海重要城市建立了一批外汇调剂中心，地方、部门、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外商投资企业均可在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外汇。调剂价格按照外汇供求状况实行有管理的浮动。与此同时，按照国际惯例，全面实行出口退税。已实行增值税的产品，退还增值税；未实行增值税的产品，退还产品税和营业税。实行收购制的出口产品，退税给外贸经营企业；实行代理制的出口产品，退税给生产供货企业。

（二）在3个行业实行外贸自负盈亏的试点改革

在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还在轻工业、工艺品、服装3个行业实行外贸自负盈亏的试点改革。这3个行业的外贸出口收汇，大部分留成给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地方，少部分上缴国家，外贸企业实行完全自负盈亏；3个行业的试点改革，由各地方在承包的前提下自行组织实施。

（三）进一步改革进出口经营体制

在出口经营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对商品经营范围进行了划分。强调对于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资源性重要出口商品，实行指令性计划，由国家指定的一家或几家外贸总公司及其直属的分公司、子公司统一经营；对于少数国际市场上容量有限、有配额限制、市场竞争激烈的比较重要的商品，实行指导性计划，由部分有这类商品经营权的各类外贸公司分散经营；其他绝大部分出口商品，实行市场调节，由各类外贸公司放开经营。无论哪一类出口商品，凡实行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的，均按出口配额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执行。

在进口经营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对于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的、敏感性的重要进口商品，由国家指定的外贸总公司及其直属的分公司、子公司统一经营；对于少数国际市场集中、价格敏感的大宗进口商品，由有该类商品进口经营权的各类外贸公司联合成交；其他绝大部分进口商品，由各类外贸公司放开经营。无论哪一类进口商品，凡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均按进口许可证管理制度执行。

（四）政企分开，进一步改革外贸行政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

根据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机构、精简人员的原则，各级外贸行政部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不再干预外贸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经贸部逐步转变职能，在外贸管理方面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由偏重部门管理转为行业管理；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关系，引导企业行为；集中更多的精力对外贸进行宏观管理，主要负责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法规条例。经贸部属的外贸总公司设在各地方的分支公司、地市外贸公司和自属生产企业，除保留经营统一经营商品的分支机构以外，均在计划、财务、机构、编制和劳动工资等方面与总公司脱钩，下放地方作为独立的经济法人。外贸总公司转变职能，由管理性变为经营性，实行企业化经营，向综合型、集团型、多功能、国际化企业的方向发展，集中更多精力开拓国际市场，为扩大我国进出口贸易服务。外贸总公司的内部机构

也作了适当调整，并成立了一批直属的子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改革方案进行国际化经营、综合承包的试点改革。经贸部及外贸总公司转变职能以后，咨询服务、信息交流和部分协调管理工作，由进出口商会承担。1988年先后成立了食品土畜、纺织丝绸、轻工工艺、五矿化工、机电、医药保健品等6个行业的进出口商会及若干商品分会。

上述改革措施的推行，取得了一定效果。表现在：（1）由于在承包出口创汇基数内，地方和企业能得少部分留成外汇，超基数后出口创汇能得大头，加之出口退税等好处，因而激发了地方、外贸企业以及生产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积极性，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2）外贸企业承包后，承包指标以内，国家虽然有补贴，但补贴数额已经冻结，不再增加；超承包指标以外的出口，国家基本不再给予经济补贴，这对促使企业加强成本核算、注重经济效益有一定作用。

但由于外贸经营权下放后，企业缺乏必要的自我约束机制，加之宏观管理和监督工作未跟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1）有的企业盲目增加出口，出口了国内市场紧缺或不安排出口的重要物资，如生铁、镍和镍材等，影响了这些物资价格的稳定，加剧了这些物资内外销的矛盾。(2）审批外贸公司掌握不严，批准成立了许多“皮包”公司。1988年新成立外贸公司近2000家（不含海南省有进出口报关权的企业)。大部分新成立的公司不具备经营条件，资金不落实，缺乏稳定的出口货源，缺少经营人才和外销渠道。有的公司不按照经济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经营，在国内抬价抢购，在国外低价竞销，不重合同，不守信用，不重商品质量，干扰了外贸的正常秩序，使一些外商对经营我国商品失去信心，索赔和反倾销案件增多，损害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信誉。(3）一部分外贸公司程度不同地存在官商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少数不法分子内外勾结，钻计划内计划外、国内国外差价的空子，从中牟取暴利。

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供求失衡、通胀严重的大背景下，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上述问题，一方面，进一步拉大了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缺口，加剧了当时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搞乱了国内外市场秩序；另一方面，一些省市和地方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不顾具体情况，盲目上项目、铺摊子，急躁冒进，也加剧了1988年再度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恶化了体制改革的环境，妨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因而必须进行治理整顿。

二、治理整顿外贸秩序

1988年9月26日召开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治理整顿，对外经济贸易也进入了治理整顿阶段。对外贸易的治理整顿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清理整顿对外贸易公司

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后，为落实对外贸易公司的清理整顿工作，国务院在1989年2月20日专门颁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各

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的通知》，同年11月10日又批转经贸部《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的意见》。这些文件明确规定了清理整顿的政策和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经济特区的外贸专业公司，工贸、农贸、军贸、技贸公司，地方贸易公司，边境贸易公司，综合贸易公司，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生产企业集团），经营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公司以及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公司，认真地进行清理整顿。这些文件规定：(1) 凡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企业，经营混乱、经济效益很差、亏损无法弥补的，都限期整顿，予以撤销、合并或取消其进出口经营权。其中1988年后由经贸部批准的地（市）外贸公司和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的外贸公司，经过治理整顿，符合设立外贸企业条件的，可继续保留其进出口经营权，不符合条件的，要取消其进出口经营权。由各地方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省属外贸公司、地（市）外贸公司，由原审批部门按规定的外贸企业条件重新审核，对不具备条件的要取消其进出口经营权，对确实具备条件的，可保留其进出口经营权，并报经贸部审定。经各地方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县（市）外贸公司，保留少数经营本县（市）有发展前途，属名、优、特第三类出口产品的外贸公司的进出口经营权，但须经原审批部门审核，报经贸部批准。其他县（市）外贸公司的进出口经营权原则上予以取消。(2) 各地方成立的地方外贸公司不得在省外设立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分支机构，已在省外设立的，应予撤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专营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的外贸公司，原则上只允许保留一两家。边境省、自治区经营边境贸易（含专营易货贸易）的外贸公司，除已批准的毗邻城镇的外贸公司以外，原则上也只保留两家，其他公司应予撤销或合并。(3) 经营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生产技术合作业务的各类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属于资金不落实、不具备经济实体条件，成立后不能正常开展业务或违法经营的，各地方限期整顿后予以撤销或合并。(4) 经过清理整顿后，各地方、各部门保留的对外贸易公司及核定的经营范围，均须重新报经贸部审定，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今后，各级各类对外贸易公司和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公司，统一由经贸部及地方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按国家统一政策，进行行业和业务的归口领导和管理。清理整顿工作结束后，各级各类对外贸易公司和全国性、跨省的生产企业集团申请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均由经贸部审批。各地方技术比较密集的大中型生产企业和紧密型生产企业集团自营本企业产品有关的进出口业务，由各地方对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后报经贸部备案。如发现已批准的生产企业或生产企业集团不具备经营进出口业务条件的，经贸部有否决权等。

按照上述政策措施，经过近3年的努力，至1991年清理整顿外贸公司的任务基本完成。在全国原有的5300多家各类外贸公司（包括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中，撤销或取消外贸经营权的有1300多家，保留4000余家。基本情况是：4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原有各类外贸公司3000余家，撤销1000多家，保留1900多家；5个经济特区原有各类外贸公司1200多家，撤销200多家，保留1000多家；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原有外贸公司800多家，撤并100多家，保留650多家；另外，还保留

了450多家大中型生产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

（二）加强和调整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为了稳定国内市场和整顿外贸秩序，在清理整顿公司的同时，经贸部还改进和加强了对进出口许可证的管理工作。采取的措施是：（1）对出口许可证实行“一批一证”。即一份出口许可证只能报关使用一次，不管所签发的数量出运是否完毕，均由领证单位退回原发证机关核销。但对补偿贸易项目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以及活家畜、活家禽、牛羊肉、原油、煤炭等不实行“一批一证”办法。（2）禁止某些贵重、紧缺物资出口。从1989年2月1日起，对铜及铜基合金、铝及铝基合金、白金、黄磷、镍及镍基合金、镍材等6种商品禁止出口，加上原来麝香、天然牛黄、聚乙烯、烯土中的独居石等4种，我国公布禁止出口商品共10种。（3）调整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及发证机关。从1989年2月1日起先后增加了对新闻纸、铬铁、锰铁、怀药、聚苯乙烯、二甲苯及铜、锌、铅、锰、铁、镍6种矿砂等23种商品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调整后，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由1988年的153种增加到1989年的173种。这次调整使省一级的经贸管理部门发证商品有所减少，特派员办事处发证的商品有所增加；个别容易出现混乱的商品，如钢材、生铁等，改由经贸部发证。1990年和1991年又对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作了部分调整，先后撤销了对独居石和黄磷禁止出口的管制，增加了对部分中药材和土特产品的出口管理。至1991年，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调整到235种。1990年经贸部为制止抬价抢购，还对某些土特产品实行了由产地发证的办法，即由该产品的主产省区对外经贸管理机关根据市场行情和需求量，报经贸部核定后签发出口许可证。其他地区的外贸公司出口该项商品，必须到规定的主产地区领证。在进口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对规定不够明确或发证容易产生混乱的商品，进一步明确规定了领证范围和发证手续，扩大了经贸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签发进口许可证的范围。

（三）加强出口商品商标管理

在对外贸公司进行清理整顿的同时，经贸部还对全国经贸系统的出口商品商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理清了出口商品商标在国内外注册的情况，健全了商标档案和商标管理机构，制定和完善了商标管理制度。针对少数外贸业务干部和有关企业人员商标知识不足和法律观念淡薄的情况，经贸部还着力抓了出口商品商标知识培训、商标假冒侵权展览等工作，并查处了几家外贸公司的商标侵权行为。出口商品商标管理工作的加强，增强了外贸企业的商标法律观念和创立名牌的意识，提高了对商标在出口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商标侵权行为和滥用商标问题也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据1991年统计，我国各出口企业在国内注册的商标共有5003个，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注册商标计6620个。

经过3年治理整顿，初步解决了外贸企业设置过多过乱的问题，各种抢购出口商品的大战基本得到制止，对外削价竞销和“水货”问题有所减少，倒卖进出口许可证的非法活动得到一定遏制，外贸秩序和外贸环境开始好转和改善，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也为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新体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三、实施自负盈亏的对外贸易新体制

1988年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为适应先期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方便沿海地区大进大出而实行的，在体制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吃“大锅饭”的现象仍然存在，中央财政负担仍然较重。因为承包制只是实行补贴包干“封顶”，并未取消补贴。既然存在补贴，就难以避免外贸经营中的依赖思想和负盈不负亏现象。二是按地区对外贸企业实行不同的出口补贴和外汇留成比例，但各地外贸企业的财务条件和竞争条件并不平等，这仍然是诱发各地相互间对内抬价抢购、对外削价竞销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更深入的改革。在经济秩序基本好转的条件下，通过总结3年承包和轻工、工艺、服装3个行业实行完全自负盈亏试点改革的经验，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自此全面展开。

这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 从1991年1月起，取消国家对外贸企业的出口补贴；合理调整汇率；适当增加外贸企业的外汇留成比例，使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 改变按地区实行不同外汇留成比例的办法，实行按大类商品、全国统一的外汇留成比例，创造同类外贸企业平等竞争的条件。规定一般商品收汇按外汇牌价上缴国家20%，地方政府留成10%，其余留给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外贸企业。为保证国家的集中用汇，国家以全国外汇调剂市场平均价向外贸企业和出口供货企业分别收购收汇金额的20%和10%。其余留给企业的外汇由企业自主支配和使用。

3. 在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外贸公司的同时，支持那些产品技术比较复杂、出口量大、符合自营出口条件的大中型国营生产企业和紧密型生产企业集团自营出口本企业（企业集团）的产品。进口本身需要的技术、设备和物资，其进出口经营权由经贸部审批。为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加强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和进出口商会对进出口商品的协调管理。

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各外贸、工贸进出口总公司及其他外贸企业，向国家承包出口总额、出口收汇额和上缴中央外汇（包括收购）额度任务，承包任务根据“八五”计划对外贸发展的要求和全国外贸出口的实际情况，逐年核定。

5. 进一步搞活外汇调剂市场，在保证完成上缴国家外汇额度和收购任务后，允许外汇额度进入调剂市场，并跨地区调剂。各地方政府、各部门不得用行政手段干预留成外汇跨省、区、市的横向调剂流通。

6. 进口商品的经营办法基本不变。为支持国内生产和增强外贸企业的综合运筹能力，按照保证国家必要的外汇储备和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原则，要保持适度的进口规模，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

上述以实现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措施，经过1991年的认真贯彻实

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表现在：（1）打破了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吃“大锅饭”的体制，减轻了中央财政的补贴负担，也为出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消除了一大制约因素。（2）基本实现了外贸企业在平等竞争条件下的自负盈亏经营，提高了外贸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改善服务态度和方式的自觉性，使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明显增强。（3）由于新体制适当增加了外贸企业的外汇留成比例，因而经过综合运筹后，企业用于进口的外汇增加，这对于更多地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扩大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都有积极作用。同时，新体制还积极支持技术含量高、批量大的产品出口，鼓励有自营出口条件的国营大中型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本企业产品，这对发挥我国工业加工能力较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及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的看来，这一轮改革的时机选择适当，成效也很显著。但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仍然存在，外贸企业身处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和竞赛规则的夹缝之中，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负盈亏，在体制上仍有不少障碍：（1）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仍不健全。经过几轮改革，在政企分开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仍然较多；经贸部的宏观管理权限下放后，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甚至出现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市场分割的现象；支持对外经贸发展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配套改革滞后；出口信贷、信贷担保等国际上通行的出口激励手段不完善，出口退税未能做到及时、足额。（2）协调机制不健全。以进出口商会为代表的协调机构，有较浓的部门利益色彩，与其他行业协会的关系没有理顺，既缺乏权威性，又缺乏必要的协调手段。（3）外贸企业尚未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实体，产权不清晰、责任不明确；经营目标主要是完成政府下达的出口创汇任务，经济效益尚未摆到中心位置；经营规模受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约束，普遍小型化、分散化、单一化，集团经营模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差。企业内部管理改革滞后，缺乏自我约束，高价竞购、低价竞销的现象时有发生，既干扰了国内经济秩序，也使自己在国际上经常陷入反倾销的窘境。

情况表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经过下放经营权、全面实现承包制的探索而进入自负盈亏的新阶段之后，仅仅依靠外贸自身的努力，尚无法实现自负盈亏的目标。这次改革所牵涉的面比以往更广，对配套措施和宏观经济环境的要求比以往也更高。自负盈亏在实施中所遇到的困难，意味着整个改革需要在理论和具体措施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同时，外贸企业要摆脱在国内和国际两种不同运行机制和竞赛规则中周旋的困境，也需要向国际规范靠拢、按国际惯例经营。

四、适应国际贸易规范，申请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el Agreemen t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于 1947 年 10 月 30 日在日内瓦签订，中国是 23 个创始国之一。1950 年 5 月 5 日台湾当局退出关贸总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承认过此次退出的合法性。1965 年 1 月 21 日，台湾当局申

请以观察员资格出席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获得批准，但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根据凡属政治性质的问题服从联合国大会决定的原则，于同年11月撤销了台湾当局的观察员资格。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政府没有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问题。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中国加强了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并于1986年7月11日，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要求恢复中国缔约国合法地位的申请。1987年5月14日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专门成立中国问题工作组，审议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1989年年初进入磋商加入议定书文本的实质性阶段，但该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这一问题被搁置了下来。1991年，关贸总协定恢复了审议我国的加入问题。在1986～1991年5年多的时间内，中国为适应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包括：

（一）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对外经济贸易法规

如涉外经济合同法、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有关法规、管理货物进出口的有关规定、进出口商检法规、海关监管法规、外汇管理规定、知识产权与技术引进方面的法规、仲裁与诉讼方面的法规等，并且承诺尽快制定《外贸法》、《反倾销法》等法规，派出工作组到日本、欧共体、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等国去征询意见。

（二）降低进口税率

1986年3月至1991年上半年，我国先后调低了83个税目的进口税率，1991年年底，又决定降低225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并承诺将关税总水平降到关贸总协定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水平，根据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各个进口商品的税率幅度，在1992年内取消进口调节税。

（三）改革各种非关税措施

主要是：（1）取消进口替代清单。对于已公布的1751项进口替代清单全部予以取消，今后也不再制定进口替代清单。（2）减少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范围。1991年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53种，承诺2至3年内使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范围减少2/3。（3）减少外贸指令性计划商品范围。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之后，已不实行指令性出口商品计划，指令性进口计划已降到进口总额的1/5，实行指令性计划的经常性进口商品只包括粮食、化肥、木材、棉花、铁矿石等少数几种产品。今后指令性计划将进一步减少。（4）改善外汇管理，调整外汇政策。经过外汇体制改革，到1991年为止，中国的外汇分为中央外汇和地方、部门、企业的留成外汇两类，实行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中央外汇按计划使用，约占20%。根据国家规定，地方、部门、企业的留成外汇可以自由安排使用。既可以用于进口，也可以到外汇调剂市场出售。没有留成外汇的企业可以到外汇调剂市场购买。外汇调剂市场成交额逐年扩大，1991年全年成交额达204亿美元，占进口额（国际收支统计口径）的40%。经过进一步稳定有效的改革，中国外汇市场将向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过渡，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差距已缩小至1991年的8%。强调中国汇率改革的近期目标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物价体制改革的进程，进一步使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接近，实现单一汇率。汇率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反映经济和

币值变化的综合监测指标体系，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5) 加强进出口商品的检验工作。为保证进出口商品的质量，维护对外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中国在公布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中，涉及进口商品 17 类、303 种，出口商品 17 类、589 种。实际上，对出口商品的检验比进口商品更严格。中国政府表示，在商品检验制度方面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不对外国产品的检验构成和进行歧视。

(四) 提高外贸政策和法规的统一性与透明度

在 1991 年及此前已经公布了一批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承诺抓紧清理现有进口管理的内部文件，需继续执行的，尽早公布。今后凡涉及进口管理的规章，都由对外经济贸易部统一对外发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不发达，许多行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将通过制定符合关贸总协定的《外贸法》，对少数幼稚工业进行保护。中国政府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合法地位所做的大量工作及作出的承诺，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的决心。

第三节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又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创办保税区和生产资料保税市场、扩大汕头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使对外开放又迈出了新的更大步伐。

一、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1990 年春节期间，上海市委、市政府向当时在上海休养的邓小平汇报了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当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7 日，姚依林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上海，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同年 4 月，李鹏到上海视察工作，就开发开放浦东问题广泛听取了国家计委、财政部、经贸部和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并于 4 月 18 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国内外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

浦东新区的范围是指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面积为 350 平方公里的一块三角形地区。新区紧靠上海市中心，工业基础好，配套能力强，流通网络比较发达，科技力量比较雄厚。上海是世界闻名的都市，我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开发开放浦东，对于发挥上海的优势，促进长江流域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开发开放浦东，是我国 90 年代对外开放的重点，是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上海市制定了贯彻落实方案和分步实施规划，决定把浦东新区逐步建成具有

合理的产业布局、先进的交通网络、便捷的通讯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新区。开发浦东新区总体规划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上海市中心区的浦东部分为中心，采取敞开式的布局结构，规划成各有侧重、相对独立的5个综合分区。一是外高桥——高桥分区。通过建设大型现代化港区和外高桥电厂，依托港区分块开发建设约10平方公里的外高桥保税区。该区内集中发展自动化仪表和机械、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办公用品等技术先进、产品档次较高的出口产品。二是陆家咀——花木分区。此区内建设占地面积28平方公里的陆家咀金融贸易区，大力发展金融、贸易、商业、对外服务、房地产业和咨询、信息等现代服务业，作为浦西外滩功能的延续。三是北蔡——张口分区。拟建成科学教育园区，重点发展高技术和新兴工业。四是庆宁寺——金桥分区。此区主要利用现有造船和导航工业基础，大力发展所需的配套工业。规划开发8.27平方公里，建成金桥出口加工区。五是周家渡——六里公区。这一区现有上钢三厂和耀华玻璃厂，今后将扩大与造船和汽车工业配套的船用钢板和轿车玻璃的生产能力。根据“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浦东开发的首期重点是建设好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陆家咀金融贸易区3个小区。

为加快浦东的开放和建设，国务院和上海市相继制定了《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上海浦东新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关于上海浦东新区产业导向的投资指南》、《上海浦东新区土地管理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货物、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管理办法等10多项政策法规。其主要内容是：(1) 鼓励上海发展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为主的产业（包括电子计算机、电子原器件、精密仪表仪器、高新机械设备、高效低毒农药及各类新型材料等)。(2) 对外商在新区投资，实行税收优惠。外商在新区的生产性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出口产值占企业产值70%以上的，减按10%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及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投入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10年以上，其经营所得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在2000年年底以前，免征新区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地方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免征工商统一税和关税（国家另有规定的产品除外)。新区建设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车辆、基建物资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3) 允许土地出让。浦东新区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通过招标、拍卖、协议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商业、娱乐用地40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居住用地70年，综合和其他用地50年，成片开发经营的土地使用年限按照用途确定。(4) 扩大新区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总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外商独资经营项目，外高桥保税区、陆家咀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等市级重点开发区域内的项目，由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审批。总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下的非限制性项目由有关主管局和区、县人民政府审批。(5) 设立外高桥保税区，在保税区内实行更优惠的政策。

上述法规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大加快了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至1991年年底的一年多时间内，南浦大桥建成通车（1991年10月)，外高桥保税区的隔离设施建成并通过海关验收，连接浦东新区和浦西的各项基础设施也陆续进人施工阶段。这一年多的时

间内，浦东新区设立了20多家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其中9家为中外合资或外资银行），建立起18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总投资额8亿美元，相当于浦东开放前10年总和的5倍。正在洽谈的项目有200多个，其中90多个已经批准。同时还批准了700多家内资企业，总投资额为9亿多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进一步扩大经济特区范围

1991年4月，国务院批准把汕头经济特区的范围从汕头市东部的龙湖片和东南部的广澳片扩大到汕头市区，面积从52.6平方公里扩大到234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海南、深圳的第三大经济特区。这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步骤的又一重大举措。汕头经济特区的扩大，不仅对理顺原汕头市区与特区的关系、加速汕头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广东东部及内地广大腹地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有重要作用。汕头经济特区面积扩大后，对汕头市及其周围地区的行政区划也做了适当调整，汕头经济特区包括4个区，此外成立了揭阳、潮州两个市，并于1991年11月1日付诸实施。至此我国经济特区的总面积已达到34813.5平方公里，比1981年增加了100多倍。经济特区面积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三、增设保税区、建立生产资料保税市场

继1990年批准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之后，199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又设立了天津港保税区和深圳的沙头角和福田保税区。这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这些保税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有一定范围的封闭式综合性对外开放区域，一般靠近港口和交通要道，具有运输便捷的优势。深圳特区的福田保税区在新建的皇岗口岸附近，面积为1.35平方公里。沙头角保税区在沙头角区的东部，面积为0.2平方公里。天津港保税区位于天津港界内，面积为1.2平方公里。这些保税区都要建立完善的隔离设施，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优惠政策。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保税区是国境以内、关境以外的区域，非保税区产品进入保税区视同出口，保税区产品进入非保税区视同进口。保税区内可以建立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从事出口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国家统一经营的出口商品或外国对我国实行被动配额的商品，一般不应在保税区内生产出口）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保税区内可以设立贸易公司，从事转口贸易和为保税区内的企业代理原材料、零配件的进口和产品出口。保税区内的生产性企业可以从事本企业生产用的原材料、零配件设备的进口和产品出口，可以直接对外承接与生产有关的加工业务。总之，保税区可以充分利用其交通便捷、靠近国际市场的地缘优势，发展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仓储运输、分类包装等多种业务，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至1991年年底，沙头角保税区已开发工业用地10万平方米，竣工标准厂房11万平方米，建立外引内联企业80多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70多家）；福田保税区直通香港的高架桥和横跨港深珠高速公路的3号桥已全面竣工，已经开发出50

多万平方米可供外商使用的建筑用地。天津港保税区批准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国内投资项目55家，投资额达1.3亿美元，整个保税区的隔离设施已经通过海关验收。

在增设保税区的同时，1991年5月，我国还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了第一个保税生产资料市场。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又一个新的探索。在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创办之前，深圳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原材料、零配件大部分从国际市场上进口，这既给企业生产带来种种不便，也难于防范有的外商采用“高进低出”手段转移利润。保税生产资料市场的建立，使外商能就地购买到所需生产资料，这样既可以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减少运输费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又可以随时掌握国际市场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行情，限制外商在购买生产资料过程中的作弊行为。1991年年底，深圳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已有19个贸易行开业，经营建材、电工、机械等各种行业的生产资料。供应范围主要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引内联等各类生产企业，这些企业购买保税生产资料市场的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如销往国外，不征进口关税；如销往国内，须照章补税。深圳保税生产资料贸易行，以优化对外商企业服务为宗旨，以微利经营为原则，生产资料价格比香港市场低5%～10%，深受用户欢迎。

四、扩大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85年7月，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市政府联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此后，国务院于1988年5月批准建立了北京中关村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同年8月，火炬计划颁布实施，各地方政府批准兴办了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至1990年年底，全国各地兴办的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共37个，占地面积559.3平方公里，固定资产净值24.6亿元，流动资金52亿元，从业人员12.8万人。国家科委认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共1690家，其中出口创汇企业151家。这些企业在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主要开发项目共2026项，获奖项目938项（其中国家级奖160项，占当年国家奖项目的22%。另有国际奖67项），在促进科技进步和扩大出口创汇方面发挥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1991年3月6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除中关村外，新批准建立2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它们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京浦口高新技术外向型开发区、沈阳南湖科技开发区、西安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火炬疝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南湖—南岭新技术工业园区、哈尔滨高技术开发区、长沙科技开发试验区、福州科技园区、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科技工业园、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兰州宁卧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济南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桂林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深圳科技工业园、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至1991年年底，国家批准建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总数达27个。国务院在《通知》中授权国家科委负责审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区域范围、面积，并进

行归口和具体指导。与此同时，国务院还批准实施国家科委制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府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税务局制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

上述文件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享有如下优惠政策：(1) 被认定的高新企业一律减按 15%征收企业所得税。出口额占当年产值 70%以下的，减按 10%征收企业所得税。(2) 从投产年度起，2 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新办中外合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 2 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3) 区内可设立保税工厂，来料加工出口产品可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产品税、增值税。(4) 区内高新企业出口产品可免征出口关税，进口国家不能生产的仪器、设备可免征进口关税。此外尚有高新仪器、设备加速折旧，国家扩大投资等项优惠。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开放区有所不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虽然也划定了一定区域，但区内非高新技术企业不能享受上述优惠。它是我国扩大开放过程中所涌现出的一种新的开放形式。

第四节　在新旧体制摩擦中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新发展

1985～1991 年是新旧体制摩擦最激烈的一段时期，在国内通货膨胀和国外某些国家实行贸易制裁的严峻考验面前，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外经贸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使这段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商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开放幅度的加大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进出口贸易额迅速扩大。1985～1991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696.0 亿美元增至 1357 亿美元，年均递增 14.2%（其中出口由 273.5 亿美元增至 719.1 亿美元，年递增 15.6%；进口由 422.5 亿美元增至 637.9 亿美元，年递增 12.8%）。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1.4%提高到 1991 年的 2.0%，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位次由第 17 位上升到第 13 位。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全国外贸的快速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1 年，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上海、天津等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出口总额达 422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69.3%，比上年增长 16%，其中广东、福建、浙江增幅最大，分别比上年增长 30.7%、28.7%和 28.6%。在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总的趋势是：在出口商品中，制成品比重大幅

度上升，初级品比重大幅度下降；在进口商品中，制成品比重有所下降，初级品比重有所上升。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1985～1991年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动表

单位：亿美元

	出口					进口				
	总额	初级品		制成品		总额	初级品		制成品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1985年	273.5	138.3	50.6	135.2	49.4	422.5	52.9	12.5	369.6	87.5
1986年	309.4	112.7	36.8	196.7	63.8	429.0	56.5	13.0	372.5	87.0
1987年	394.4	132.3	33.5	262.1	66.5	432.2	69.2	16.0	363.0	84.0
1988年	475.2	144.1	30.4	331.1	69.6	552.8	100.7	18.3	452.1	81.7
1989年	525.4	150.8	28.7	374.6	71.3	591.4	117.5	19.8	473.9	80.2
1990年	620.9	158.9	25.6	462.0	74.4	533.5	98.6	18.5	434.9	81.5
1991年	719.1	162.1	22.5	557.0	77.5	637.9	108.4	17.0	529.5	83.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27～629页统计数据编制。其中比重为占出口（或进口）总额的百分比。《年鉴》公布的1986年出口商品的数字中，初级品与制成品相加之和与总额不相符。

从表1可知，在1985年的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品占50.6%，制成品只占49.4%。至1991年，制成品比重升至77.5%，而初级品比重则下降至22.5%。制成品出口还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乡镇企业的出口不断增长，在全国外贸出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测算，1989年的国内出口交货总额中，有24%的份额是由乡镇企业提供的。

在大宗产品的出口方面，乡镇企业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服装出口占72%，工艺品占45%，日用品占28.5%，丝织品占24.3%。一批具有国际专业化分工效应的出口基地已经出现，如广东顺德的家用电器组装、东莞的玩具制造、江苏吴县的丝织品、北京顺义和辽宁大连的服装、福建莆田的制鞋等。二是纺织品的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1985～1990年的6年间，包括服装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共514.34亿美元，为同期全国出口总额（1977.96亿美元）的26%。1991年仅纺织品和针织成品两项出口额即达89.98亿美元，创历史最好水平。三是机电类加工制成品的出口比重稳步快速上升。1985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只有16.78亿美元，而1991年则增至140.8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42.3%，同期在全国总出口中的比重由6.14%增至19.6%，高于全国出口平均增长率11.6个百分点。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增大及其内部结构变化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在1985～1991年这段时间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已开始进入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起步阶段。

这段时间的进口商品结构也有变化。1985年初级品进口占12.5%，制成品进口占

87.5%；1991年初级品比重上升至17.5%，制成品比重则下降至83%。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较为复杂，就初级品进口比重上升来说，既有国内某些农矿原料短缺、需要扩大进口的因素，也有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来料加工的因素。就制成品比重下降来说，既有国内替代工业发展减少进口的因素，也有国家政策限制进口的因素。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还是一个以进口技术和机器设备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现有进口商品结构尚难发生大的变化。1991年，我国在扩大化肥、农药、原油、针织原料、化工原料、铁矿砂等物资进口的同时，经贸部派出大型贸易采购团赴美国、欧洲和日本采购，扩大了从这些国家的进口。

这几年间，进出口贸易的市场分布也进一步多元化。在继续巩固、发展与北美、西欧、日本、香港地区贸易往来的同时，还加强了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199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142.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67%；与欧共体贸易额为151.4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12%；与日本贸易额为202.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33%；与香港地区贸易额达495.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24%。与非洲、拉美、中东、大洋洲等地区的贸易也有发展，不少外贸公司还在巴西、多哥、津巴布韦、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了贸易代表处和子公司，这对进一步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发展经济合作与灵活贸易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中国外贸企业在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爱沙尼亚等国设立了办事处和贸易公司，这些机构依照当地法律积极开展了多项业务。中国与越南、缅甸、尼泊尔、蒙古等接壤国家的边境贸易也发展很快。

二、利用外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1985年后，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虽然使利用外资受到一些影响，但1991年在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全面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利用外国政府贷款1985年为4.86亿美元，1991年恢复和新签协议额达40亿美元，协议合同生效额23.%亿美元，实际支付额约18亿美元。1991年签约生效的贷款项目共139个，其中包括年产14万吨乙烯的新疆独山子项目、江苏利港电站、年产60万吨钢和50万吨钢管的天津无缝钢管、神朔铁路、南昆铁路、宝中铁路、衡商铁路、重庆长江二桥、合肥铜陵公路及铜陵桥、北京地铁、年产100万台无氟冰箱压缩机项目以及若干省市的港口项目和涉及许多省市的程控电话通讯项目等一大批骨干项目。截至1991年，外国政府向我国承诺贷款累计金额为230亿美元，累计协议金额约180亿美元，已建和在建项目900多个。这些项目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从1982年开始利用世界银行第一笔贷款起到1991年年底止，我国共获得世界银行贷款项目101个，承诺贷款总额119.92亿美元。这些贷款主要用在农业、交通、工业、能源、城建、环保等部门。其中16个已经建成，18个即将建成，其余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已竣工的项目都产生了明显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财政部与世界银行联合进行的三次项目大检查结果均表明，中国的项目执行情况大大超出亚洲地区和整个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平均水平。1991年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创历史最高水平，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批准对我国的15个项目提供贷款，总额达25.046亿美元。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农业、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除贷款合作之外，我国与世界银行在经济调研领域也进行了广泛合作。双方进行有计划的专题调研合作始于1985年，截至1991年，先后5次共制订了71项调研课题。在已完成的课题报告中，提出了不少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这几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截至1991年年底，我国累计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42027个，协议外资金额523.3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32.72亿美元。其中合资项目24684个，协议外资金额213.2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4.31亿美元；合作企业11089个，协议外资金额183.0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1.93亿美元；独资企业6180个，协议外资金额92.89亿美元，实际使用25.64亿美元。这些成绩主要是在1985~1991年期间取得的，其中1991年最为突出。这一年，吸收外商投资实现了三个突破：即新批准外商投资项目突破1万个；新批准外商投资协议金额突破100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突破100亿美元。以上三项均比1990年增长50%以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段时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生产性项目占主导地位。如1991年批准的12978个项目中，生产性投资占90%以上，主要分布在工业、农业、林牧渔、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行业。其中，工业项目11632个，占总项目数的89.6%，协议外资金额96.23亿美元，占总金额的80.3%。农林牧渔项目325个，占总项目数的2.5%。非生产性项目不足10%。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行业分布状况，无疑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二是技术先进的大中型项目增多。如年产旅行车5万辆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项目，外商投资额为2998万美元；鞍山千喜钢材加工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具有冷弯性能的钢管、镀锌钢管，投资额为1250万美元；烟台造纸厂与香港全兴实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合资经营的涂布白板纸项目，总投资额为8529万美元，外商投资额占52%，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生产工艺、设备和管理方式，填补了国内空白。三是台商投资发展很快。1979~1991年台商投资项目共3604个，协议总金额29.2886亿美元，实际利用8.6604亿美元。但1991年1年内，台商投资项目达到1735个，协议总金额13.8852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4.6641亿美元。项目数和协议金额数均超过美国、日本、欧共体，仅次于港澳地区，居第二位。四是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生产总值137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75%；直接出口额120.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4.3%，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16.7%；缴纳税金（不含关税）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3%。在深圳特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78.3%，其出口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5.6%。在全市出口创汇300万美元以上的79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90%。

三、技术进出口贸易取得较大进展

自1981年1月国务院在《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中对技术引进作出新的原则规定（即严格控制成套设备进口、着重引进适用先进技术、避免重复引进、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掌握）后，中国技术引进的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引进重点由过去以新建项目为主转向以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为主。二是引进方式由过去以引进成套设备为主转向以采用许可证贸易、合作生产、顾问咨询和技术服务为主。1985～1991年在继续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需要，技术引进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段时间经审查批准的引进合同共2894项，合同总金额186.59亿美元。其中能源、交通、通讯、石化、化工、冶金、机电等行业的项目占总金额的80%。1991年审查批准359项、总金额达34.59亿美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54.7%和1.74倍；1991年的技术引进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力、化工、机器设备制造行业，这三个行业的合同金额达到29.6亿美元，占合同总金额的85.5%。引进的技术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法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苏联和英国占项目的75%，占同期总金额的81.2%。这段时间的引进在具体做法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将过去主要由生产企业单独引进改为科研机构、生产企业联合引进；将过去由使用引进技术为主改为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为主，从而减少了国内能够生产的设备的进口，提高了引进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加快了国外技术转化为本国生产力的进程。例如，在实现"七五"期间彩电国产化目标的过程中，由国家经委逐项咨询、论证和审定，决定引进12项国外技术，把主机厂、辅机厂、配套原料器材厂及科研单位、设计单位、大专院校一起组织起来，做到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与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段时间，我国的技术出口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呈现出逐年加速扩大的趋势。1986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首次在第60届广交会上创办中国技术出口交易馆，成交额仅30万美元，在1987年的第63届广交会上，中国技术出口成交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元。到1989年年底，中国共签订了技术出口合同401项，累计金额11.69亿美元。1990年签订技术出口合同268项，合同金额9.89亿美元。1991年，签订的技术出口合同数猛增到462项，合同金额12.77亿美元。出口的技术主要有：维生素C二步发酵技术、焊接系统技术、大中型电脑软件、氧化钇生产技术、离子氮碳钛三元共生技术、橡胶状丁苯嵌段共聚物技术、新型乳化炸药技术、铬铁冶炼生产技术、食用菌技术、浮法玻璃成套设备、纺织成套设备、水泥成套设备、电站设备、彩电生产线等。技术出口的国家（地区）不断增多，1991年我国已向包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技术。其中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出口占较大比重。技术出口合同金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巴基斯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苏联、伊朗、中国香港和德国。技术出口的行业也越来越多，1991年已有机械、轻工、电子、通讯、建材、化工、冶金、能源、纺织等16个行业向国外出口技术。技术出口的形式也日益

多样化：已从过去的单纯出口技术发展到技术带设备、技术带生产线、技术带成套设备、技术带工程承包、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技术入股、举办合资企业等多种形式。在1991年的技术出口合同中，成套设备出口合同额为11.6亿美元，占全年技术出口合同总额的91%，这种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机电产品的出口。

四、国外经济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对外援助作出新的贡献

80年代初，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处于萎缩状态，竞争空前激烈，使刚起步的中国对外承包劳务合作事业面临严峻考验。在此情况下，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严格遵守"守约、保质、薄利、重义"的经营方针，克服困难，奋力开拓，终于打开了局面，使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事业获得了稳步快速的发展。1985年我国全年签订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为828项，合同总金额11.8439亿美元。而1991年则增加到8438项和36.09亿美元，分别增长9.2倍和2.04倍。70年代末至1991年的十多年间，中国累计签订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共24247项，合同总金额190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120亿美元，累计派出劳务人员60万人次，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超过15亿美元。其中1985～1991年签订的合同共22368项，合同总金额152亿美元。这段时间，我国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155个，涉及国内建筑、冶金、铁路、公路、港口、桥梁、电力、通讯、机械、石油、化工、水利、广播、农林、水产、纺织、轻工、航天、核能等诸多行业。经过清理整顿，1991年全国共保留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兼营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公司123家，在国外设立的办事机构约160个。这些公司经过国际竞争的考验，力量不断壮大，已成长为一支作风顽强、能打硬仗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队伍。其中一部分专业公司已进入世界大承包商行列，开始了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规模经营。

这几年，我国的海外投资也很活跃。截至1991年年底，我国共批准海外非贸易企业1008家，其中1985～1991年共批准895家，占总数的88.8%。仅1991年就批准海外非贸易企业207家，协议投资额7.59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为3.67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48.35%。这些企业分布在五大洲的105个国家和地区。

遵循《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量力而行的指导方针，我国继续向一些经济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社会主义中国在援助中所体现出的真诚和无私精神，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1985～1991年间，我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援建了300多个项目，向40多个国家派遣医疗队9000多人次。仅1991年就向37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年末医务人员1139人，医疗点91个。1991年，尽管我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又遭遇了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但我国仍然认真履行已签订的援助协议，并同55个国家签订了新的援助协议。新签援款金额比"七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新签援款金额增长30%，而且援助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援助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这一年实施的经济援助项目共263个，其中建设项目81个，其他工作项目182个。当年竣工的孟加拉国桑布吉公路桥、巴布亚新几内亚体育中心、老挝卫星地面接收站等27个项目，因质量

良好，受到了这些国家的高度赞扬。1991年我国继续对111个已建成的老项目以设备大修、技术改造、提供零配件、技术指导、参与管理、管理合作、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合资经营等形式进行了援助巩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91年我国还向39个国家无偿提供了1.4亿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包括粮食、日用品、纺织品、药品、医疗器械、卡车、客车、拖拉机等），以帮助这些国家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受援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在当地产生了良好影响。

根据“有给有取”的方针，中国还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业发展组织、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救灾署等发展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技术合作。从1979年起至1991年的13年间，中国共接受联合国开发署等发展机构无偿技术援助总承诺8.29亿美元，实际执行额为5.8亿美元，其中1985～1991年分别为6.59亿美元和3.34亿美元。安排项目439个，已完成近200个。这些项目涉及机械、电子、交通、地质矿产、轻纺、化工、农林牧渔、科教文卫、儿童福利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中国1979～1991年间向联合国发展系统外汇捐款共3854万美元，人民币捐款3135万元。其中1985～1991年分别为2816万美元和684万元（人民币）。这期间，中国还在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参与了有关纲领、宣言、决议及行动计划的谈判和制订工作，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主张，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作出了贡献。

五、国际旅游客源增多，接待条件进一步改善

中国的国际旅游业1984年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85年接待国外游客1783.3万人次，创汇1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8%和10.5%。1986～1988年连续3年保持上升势头，1989年比上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1990年开始恢复，1991年又出现高速增长。当年接待国外游客3334.37万人次，创汇28.4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21.4%和28%。在1985～1991年的7年中，共接待国外游客1.84亿人次，创汇137.63亿美元。在各级政府、旅游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大陆已具备了一定的接待能力，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旅游者和海外侨胞提供多种接待设施和服务。如中旅集团有300多家旅行社、100多家华侨旅游侨汇服务公司、近200家饭店、30多家汽车公司、3万多职工，已形成能提供配套服务的较完整的服务体系。经过清理整顿，到1991年年底，全国有一类旅行社（能直接经营对外招徕并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来中国大陆、归国或回内地旅游等业务的旅行社）72家，二类旅行社（不直接对外招徕，只经营接待一类旅行社或其他涉外部门组织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来中国大陆、归国或回内地旅游等业务的旅行社）729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和经营管理及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创汇潜力将会得到进一步发挥。

第十五章　完善财政功能　健全税收制度

第一节　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必然引起财政收支和财政体制的变化。而财政及其体制的变革，一方面顺应了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财政体制的变革主要体现在1985年的划分税种和1988年的分级包干以及乡财政的普遍建立。

一、1985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的权利和责任，使财政体制更好地体现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从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其主要内容是：

（一）按第二步利改税后的税种划分各级财政收入

1. 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包括中央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铁道部和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的营业税；军工企业收入；中央包干企业收入；中央外贸企业亏损，粮、棉、油超购加价补贴；烧油特别税；关税和海关代征的产品税、增值税；专项调节税；海洋石油外资、合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所得税和矿区使用费；国库券收入；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其他收入。

石油部、电力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企业的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以其70%作为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30%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

2. 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包括地方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和承包费；集体企业所得税；农牧业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契税；地方包干企业收入；地方经营的粮食、供销、外贸企业亏损；税款滞纳金、补税罚款收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其他收入。尚待开征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

3. 中央和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包括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资源税、建筑税、盐税、个人所得税、国营企业奖金税、外资、合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

（二）仍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地方支出

除了中央支出和地方支出以外，对于不宜实行包干的专项支出，如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抗旱和防汛补助费、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等，由中央财政专案拨款。

（三）核定收支以确定上解或补助

凡地方固定收入大于支出的，定额上解中央；地方固定收入小于支出的，从共享收入中确定一个分成比例，留给地方；地方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方还不足以抵拨其支出的，由中央定额补助。比例或数额确定以后，一定5年不变，地方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中变化因素较多的情况，在1985、1986年内，可以把地方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加在一起，同地方支出挂钩，确定一个分成比例，实行总额分成。

（四）特定地区的体制规定

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财政大包干办法。其定额上解或补助数额，应根据上述收支划分范围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后的收入转移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对民族自治区和视同民族自治区待遇的省，按照中央财政核定的定额补助数额，在5年内继续实行每年递增10%的办法。

二、1988年改进地方财政包干办法

划分税种的体制是不规范的分税制，无论从固定收入还是从共享收入来看，都缺乏应有的规范性。这种包干制与分税制的不协调结合，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难以克服原包干制的弊端。为了进一步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特别是收入上解地区的积极性，解决部分地区收入下滑的问题，更好地处理中央与这些地区的财政关系，国务院决定在1988～1990年期间，在“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基础上，对包干办法作一系列改进。全国3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广州市、西安市的预算关系仍分别与广东、陕西省联系外，对其余37个地区分别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

（一）收入递增包干

即以1987年决算收入和地方应得预算支出为基数，参照各地区近几年的收入增长情况，确定各地区收入递增率（环比）和留成、上解比例。每年地方在收入递增率以内的收入，按确定的留成、上解比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留给地方；收入达不到递增率而影响上解中央的部分，由地方自有财力补足。实行这种办法的有北京等10个地区。

（二）总额分成

即根据各地区前两年的收支情况，核定收支基数，以地方总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确定地方的留成和上解中央比例。实行这种办法的有天津等3个地区。

（三）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

即以上年实际收入作为基数，基数以内部分按总额分成比例分成；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除按总额分成比例外，另加增长分成比例。实行这种办法的有大连等3个地区。

（四）上解额递增包干

即以1987年上解中央的收入为基数，每年按一定比例递增上交。实行这种办法的有广东、湖南。

（五）定额上解

即按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收大于支部分，确定固定的上解数额。实行这种办法的有上海等3个地区。

（六）定额补助

即按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确定固定数额的补助。实行这种办法的有吉林等16个省或自治区。

除“总额分成”外，其余各种包干办法的共同特点是在原定总额分成的基础上实行“边际增长分成”，即地方可以从增收或超收中多留。因此，财政大包干体制扩大了地方的财力和财权，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防止个别地区收入下滑，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地方收支仍由中央统一核定，尚不是完全独立的一级预算，中央与地方预算的关系不稳定，包干办法包死了中央，在新增的收入中，中央所得过少，使中央预算收入占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削弱了中央预算的宏观调控能力；包干体制加剧了地区封锁、割据和重复建设，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

三、乡财政的壮大与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3〕35号通知中关于“随着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的要求，财政部于1985年4月颁发了《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办法》明确了乡财政要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指出了乡财政的4项职责。乡财政收入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组成。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财政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契税和其他收入。预算外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经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些镇按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事业费附加。乡财政支出也分3部分，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财政管理的行政管理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农林水利事业费和其他支出。预算外部分包括用上述各项附加收入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收入安排的各项支出。

乡财政的管理体制有以下形式：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定收定支，收入上缴，超收分成（或增长分成），支出下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一年一定；定收定支，收支包干，定额上解（或定额补助），一定几年。

从1983年10月起到1987年，全国普遍开始建设乡财政，全国7.2万个乡中，已有80%以上的乡建立了乡财政，江苏、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浙江、湖南、江西等省有90%以上的乡建立了乡财政。全国乡财政人员增加到16.8万人。一个中央、省、县、乡（镇）的4级财政新格局已初步形成。各地乡财政建立后，基本上实现了“乡政府当家，乡财政管家，乡长一枝笔，乡财政一本账”，调动了乡政府当家理财和开源节流的积极性，使这些地区更加重视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组织收入，增加财力，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节　开源节流　增收节支

一、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不仅有利于抑制需求膨胀，缓解市场供需矛盾，有利于增收节支，平衡国家预算，而且对于实现清廉从政，扭转社会上的奢侈浪费之风，都具有重要意义。在1985、1988年，各级政府尤其注意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每年压缩20%

1988年10月，国务院作出决定，要求从严控制并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数额，1988和1989两年要在上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按实际可比口径计算每年压缩20%。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按照下达的控制指标，逐级核定，层层落实。

（二）重新确定专控商品的范围

国家对社会集团控制购买的商品，原规定为31种，后缩小为14种，1985年确定为17种，1986年扩大到四种。凡购买专控商品，都必须报经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机关审批，到指定的商店购买。

（三）实行直接控制和间接管理两种办法

对于县以上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全民和集体企事业、基建单位以及职工在200人以上的乡镇企业、城市街道企业的社会集团购买力，由上级机关分配指标，按计划管理，实行直接控制。对于县以下的单位，职工在200人以下的乡镇企业和街道企业，由上级机关提出压缩要求，自行落实，实行间接控制。

（四）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要建立严格的会议审批制度，企业的正常招待费用可在企业管理费中单独反映，各级政府要按规定清理各单位的小汽车和大轿车，各地要尽快重新制订职工劳动保护用品发放范围和标准，要改进公费医疗管理办法。

（五）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工业、商业、物资部门和银行对单位购置的非生产性用品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财政、审计、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控购规定的，必须严肃处理。对突破控购指标的，应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超指标数额50%以下的罚款。

二、压缩行政经费

80年代以来，一些政府部门滋长了摆阔气、讲排场、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使各级行政经费不断增加，大大超过财政收支的增长幅度。行政经费占国内财政支出的比例1984年已达到8%。为了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国务院和财政部先后多次发出节减行政经费的通知。

1985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节减行政经费的通知》，198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行政费问题的报告》，并发出通知。主要措施有：进一步整顿行政费开支范围，坚决压缩行政经费，1985年的行政经费预算，从中央到地方都削减10%；清理和精简机构，严格控制行政人员编制；大力节减设备购置和办公费用；精简会议、文件和刊物；坚决刹住不正之风，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坚持勤俭办外事；整顿内部宾馆、饭店、招待所的收费标准；制止摊派和挤占行政经费，改进和完善经费包干办法；机关后勤服务部门要逐步实行经济管理；对行政单位全面实行定期审计；整顿预算外资金。

198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严禁用公款宴请和有关工作餐的规定》。《规定》指出，工作餐不准上价格昂贵的菜肴，不准用公款购买烟酒。这些通知和规定对压缩行政经费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整顿"小金库"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有不少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违反国家财经制度，私设各种形式的"小金库"，屡禁不止。这是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助长了奢侈浪费，而且腐蚀干部，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1989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结合1989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对私设的"小金库"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和检查。规定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除了党费、团费、工会会费、稿费提成和职工互助会等项目外，凡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的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支列收、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这次清理检查主要是1988、1989年列入"小金库"的各项收支，以及历年滚存的"小金库"结余。在12月15日以前先进行自查，自查自报的"小金库"资金，已用于生产和集体福利的，要转入本单位财会部门的账目，在自有资金项目下作列支处理；已用于职工奖金、实物、补贴、津贴的，要纳入单位奖金发放总额，按规定补缴奖金税；余额部分一律上缴财政50%，单位自用50%。对不自查而被检查组查出的"小金库"资金，凡已经支用的，不分资金用途，全

部由单位用自有资金补足，上缴财政，余额全部上缴财政，并处以罚款。

四、国内债券的发行与偿还

这一时期的国内债券有4种形式：国库券、特种国债、保值公债和重点建设债券。1985~1991年期间，国内债务收入规模逐年扩大。1985、1986年国内债务收入只有国库券一种，分别为60.61亿元、62.51亿元（计划发行60亿元）。1987年国库券收入63.07亿元（计划发行60亿元），重点建设债券54亿元。1988年国库券收入92.17亿元（计划发行90亿元），国内其他债务（包括除国库券之外的其他公债和专业银行购买财政专项债券，下同）40亿元，主要是建设债券。1989年国库券56.07亿元（计划发行55亿元）、国内其他债务207.84亿元，包括保值公债125亿元（计划发行120亿元）和特种国债（计划发行50亿元）。1990年国库券93.46亿元（计划发行55亿元）、国内其他债务103.78亿元，包括特种公债（计划发行45亿元）。1991年国库券199.3亿元（计划发行100亿元）、国内其他债券81.97亿元，包括特种国债（计划发行20亿元）。

以1989年为界，我国公债管理制度发生比较大的变化。1989年以前，国库券发行对象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城乡居民。自1989年起，国库券只对公民个人和个体工商户发行，而特种公债只对各类企业、金融机构、企业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职工退休养老基金、待业保险基金、交通部车辆购置附加费管理机构发行，保值公债则对城乡职工、居民、个体工商业户、各种基金会、保险公司以及公司发行。公债利率也逐年提高，1986年国库券年息集体购买的为6%，个人购买的为10%；1989年起国库券年息为14%，特种国债为15%，保值公债的年利率随人民银行规定的3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浮动，加保值贴补率，外加一个百分点。公债流通市场逐渐形成，从1985年开始，规定可用国库券向银行贴现和挂失。1988年建立了公债流通市场，这使得原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两家承购，转化为专业银行、单位和个人3家共同承购的体系。1989年确定了财政、银行、邮政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多渠道办理推销公债的体制。1991年又进行国库券承购包销试点，通过承购包销完成了发行总量的65%。

从1986年起，我国内债进入了还债期，如1981年国库券的本金自1986年到1990年分5年作5次偿还。1986~1991年国内债务还本付息额分别为7.98、23.18、28.44、19.30、113.75、156.69亿元。

五、国外债务收入的增加

除了开辟国内财源外，政府还注重开拓国外财源。据统计，1985~1991年财政国外借款收入分别为29.24、75.74、106.48、138.61、144.06、178.21、180.13亿元，同期财政用于国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分别为32.59、34.49、51.%、42.58、45.83、68.21、80.22亿元。到1990年年末，全国外债余额为525.5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债务余额为

457.8亿美元，占外债总额的87.1%，短期债务余额为67.7亿美元，占外债总额的12.9%，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25%的短期外债警戒线，这表明外债结构状况良好。在525.5亿美元中，政府部门债务余额占24.5%，金融机构债务余额占53.2%，国内企业债务余额占13.3%，外商投资企业债务余额占9.0%。1990年我国债务率（还债额与借债额的比例）为89.3%，低于100%的国际警戒线，偿债率（还债额占外汇收入的比例）为8.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

第三节　税利分流——国家与企业关系的新模式

一、税利分流的提出与意义

（一）税利分流的概念与提出

所谓税利分流，是指把国家与国营企业利润的分配关系分解为两个层次，国营企业实现利润的一部分要以所得税的形式上缴国家，另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上缴国家，其余部分留在企业让企业自主运用。税利分流的核心是国营企业必须依法缴纳所得税，国家对企业依率计征所得税，对所得税不能搞承包，取消用所得税前利润归还固定资产投资借款的制度，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借款要由企业用可以自主运用的资金归还。

1987年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逐步建立起比较适合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制度、规则和工作方法，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对逐步试行税利分流十分重视，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财政体制要在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逐步转向税利分流，理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进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试点"。李鹏总理在1990年8月全国工业生产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指出："要稳定和完善企业承包制，并通过试点，逐步向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过渡。过渡时间的长短和过渡的步骤，是制定'八五'计划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税利分流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以政权为依据，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和经济调控者；二是以所有权为依托，作为全民所有制资产所有者。根据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两个不同的身份应行使不同的职能。

国家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要求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国家以政权为依据，作为社会管理者和经济调控者，行使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职能，来保证政权的巩固，国防力

量的增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要行使这些职能，就必须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以强制的手段无偿征集税收，包括对企业、个人征收。不论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还是所有制多元化的经济联合体，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都必须依法纳税。

国家以所有权为依托，作为全民所有制资产的所有者，行使对国家的投资特别是经营性投资进行管理的职能。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资金效益最优化的原则向企业投资，就应从投资效果中获得利润收益，企业应该在国有资产保值的基础上不断增值，并把所得税后利润的一部分以一定形式缴给国家。

（三）实行税利分流的意义

1. 有利于提高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国家的宏观调控侧重于利用经济杠杆，而税收就是国家用来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实行税利分流，使国营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一样，向国家缴纳流转税、所得税、地方税及其他税种，才能使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在所有经济成分中发挥作用，使国营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一样，都在国家宏观政策和计划的指导调节下发展。同时，利润仍是重要的经济杠杆，不可偏废，存在着与税收不同的经济特点，更具有灵活性。因此，税利分流在发挥税收和利润各自长处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

2. 有利于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从企业利润留成到两步利改税，逐步形成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可以在缴纳所得税之前用该借款项目的新增利润归还的制度，这对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盲目投资的问题，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经济效益低下。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让企业用自主运用的资金还贷，促使企业提高效益观念，加强可行性研究，自行约束不合理的投资行为，使企业逐步转换经营机制。

3. 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所得税以企业利润为计税依据，利润额越大，税款也越大，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尤其是承包和还贷之前的利润额是一个比以前大得多的数额，实行税利分流，把所得税从承包利润中分离出来而先行计征，以及对税后利润再进行分配，上缴国家一部分，这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税利分流的步骤和内容

（一）税利分流的步骤

税利分流从试点到推行在1985～1991年期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年初试——膨胀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89～1990年深入——紧缩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1991年开始进入完成——协调发展阶段。试点推进的程度和经济发展的程度相适应。由试点转向全面推开需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经济增长要有一个正常的发展速度，二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作全面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三是经济全面深入的改革提到主要议事日程上来。

（二）税利分流的试点情况

自1988年重庆市对市属630户国营企业进行税利分流改革试点以后，财政部又相继核批了黑龙江牡丹江市124户市属国营企业、河南省南阳市46户国营企业、吉林省大安市60户国营企业和辽宁省本溪市26户国营企业的试点实施方案。与此同时，福建省厦门市、湖南省益阳市对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河南省南阳地区对直属国营企业，江西省对横峰县国营企业，以及海南省对建省前已有的国营企业也先后进行了税利分流的试点。有些地区则根据条件选择了行业和个别企业试点，如内蒙古对自治区直属物资行业，成都市对机械、化工、医药3个行业，上海市对6户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了试点。以上第一批共计有11个地区在不同的范围进行了税利分流试点。此后云南省曲靖市，陕西省汉中市，福建省福州市、松溪县，山东省日照市、茌平县，湖南省汨罗市，湖北省荆门市、老河口市，安徽省阜阳市，江苏省无锡市、常熟市，山西省原平县、沁水县、临猗县等，以及上海、北京、武汉、西安市也积极酝酿和进行试点。到1990年年底，全国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分别在27个地、市、县进行了税利分流试点，试点企业有1500多家。试点企业初步取得了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润、上缴国家收入和企业留利同步增长的效果，在控制企业不合理投资行为方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税利分流的基本办法

税利分流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国家从企业的实现利润中先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可实行各种分配办法，并同时实施企业税后还贷制度，使企业的利润形成税利并存的格局。

1. 将原来55%的所得税适当降低，对各类企业实行统一的所得税制。各地试点的税率不同，分别为35%或5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最低为10%，最高为35%。不搞所得税承包。

2. 实行税后还贷。为了顺利实现由税前还贷向税后还贷的转换，采取了逐步推进到位的方法，对1986年年底以前贷入的老贷款，规定由税前税后各归还一半；对1987年起贷入的新贷款，一律改为税后归还。取消企业按还贷数提取“两金”（福利基金与奖励基金）的规定，将此数核入企业的合理留利。

3. 取消调节税，实行税后承包。根据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剩余利润和还贷情况，核定企业合理留利，对税后利润较多的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税后承包制。如重庆市规定，以1986年实际财务决算为基数，将实现利润总额减去核定的税前还款利润、应缴所得税、核定的税后还款利润及企业合理留利后，即为应上缴财政利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一次性增减因素后为核定的税后承包利润基数。

三、税利分流的效应分析

（一）税利分流较好地体现了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改变了原有法人分配格局

从试点企业实现利润中上缴财政收入、企业留利和归还贷款的三部分分配比例的变化情况看，由于1988年开始实行税利分流试点，财政收入分配比重开始回升。如重庆市三者比例1986年为35:43:22，1987年为25:44:31，1988年为27:42:31，1989年为29:45:26。

（二）税利分流向统一所得税制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利于健全税制，硬化税收约束机制

统一试点企业所得税之后，为企业开展公平竞争提供了条件，也为全面统一所得税制创造了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地方乱开减免税的口子。

（三）税后还贷有利于建立自我约束投资的机制

从试点地区情况看，税后还贷大大地抑制了企业投资的冲动。如1988年重庆市242户工业试点企业年末借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7.5%，而122户承包企业年末借款余额比上年增长34.75%。全市630户试点企业没有一例投资失当、效益不理想的现象。

（四）税利分流强化了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监督

财税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企业财务管理和税收征管工作，也从客观上促使企业增强财经纪律观念，有利于消除“只包不管”或“以包代管”的倾向。

第四节　完善税制与强化税收调控

一、陆续开征18种税收

短短7年中新开征18种税，这在新中国税制史上是新税种出现最多的一个时期。这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这18种税是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特别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进口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集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筵席税，耕地占用税。这些税种分为4大类。

（一）所得税制的充实

集体企业所得税于1985年4月颁布实施，以集体企业的所得额为课税对象，纳税人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集体企业，税率与国营小型企业使用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相同，最高一级为55%，最低一级为10%。私营企业所得税于1988年6月颁布实施，对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城乡私营企业，就其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按35%的税率征收。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于1991年7月颁布实施，在此之前是实行1980年起先后开征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新税税率为30%，另按应纳税所得额征3%的地方所得税。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

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于1986年1月颁布实施，税率采用10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一级，全年所得额不超过1000元的，税率为7%；最高一级，全年所得额在3万元以上的，税率为60%。对全年所得额超过5万元的，按超过部分的应纳税所得额，加征10%至40%的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于1987年1月颁布实施，对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中国公民的个人收入征收，根据收入来源，分别采用超倍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20%)。由于有些纳税人依法纳税观念淡薄，税务部门在征收过程中受到干扰，使1987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收入仅完成计划的39.2%。因此，1988年1月国务院责成财政部发出《关于进一步搞好个人收入调节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6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征收私营企业投资者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规定》。12月5日起又在北京海淀区进行个人收入调节税申报制度试点，以逐渐强化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管工作。

（二）流转税制的完善

特别消费税于1989年2月颁布实施，对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和进口彩电、小轿车的单位和个人征收，采用定额税率。如天津夏利每辆0.2万元，20英寸彩电每台40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于1985年1月颁布实施，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缴纳此税，以3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纳税人在市区的税率为7%；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在其他地区的税率为1%。

关税除了相应的调整之外，还有于1985年7月实施的进口调节税，规定对小轿车、旅行车、工具车、越野车和其他机动小客车、8吨以下载重车、摩托车、录像机、复印机、彩色投影电视机、电视显像管、电子计算机、微型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涤纶加工丝、化纤织物征收。进口调节税与关税及进口环节产品税（增值税）同时征收。

（三）目的税制形成体系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于1991年4月颁布实施，由1983年开征的资源税演变而来。其征税范围是全社会（“三资”企业除外）一切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税依据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际完成的投资额，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最低税率为0，最高税率为30%。

集体企业奖金税于1985年8月颁布实施，计算方法和征收规定均比照国营企业奖金税的有关规定办理。凡执行国营同行业企业工资标准的，比照国营同行业企业工资标准计算。未按国营同行业企业工资标准执行的，每人每月工资统一按60元计算，超过部分视同发放奖金。月工资以后提高到80元、100元。事业单位奖金税于1985年9月颁布实施，凡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国家不再核拨事业经费，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工资标准和核定的增资指标自费工资改革的，在增发工资外，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不超过3个月基本工资的，免税；超过免税限额的部分比照国营企业奖金税适用税率征收奖金税。凡需要国家核拨一部分事业经费的事业单位，免税限额为1个半月。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于1985年7月颁布实施。凡实行工资总额随经济效益挂

钩浮动的国营企业，都征收工资调节税。对企业当年增发的工资总额超过国家核定的上年工资总额7%以上的部分按超额累进税率计征，最低30%，最高300%。从1987年起，奖金税、工资调节税税率相继调低。

城镇土地使用税于1988年11月颁布实施，税额按每平方米大城市0.5元至10元、中等城市0.4元至8元、小城市0.3元至6元、县城以及建制镇和工矿区0.2元至4元计算征收。耕地占用税于1988年4月颁布实施，纳税人为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以县为单位，人均耕地在1亩以下（含1亩）的地区，每平方米缴纳2元至10元；人均在1亩至2亩（含2亩）的地区，每平方米缴纳1.6元至8元；人均耕地在2亩至3亩（含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缴纳1.3元至6.5元；人均耕地在3亩以上的地区，每平方米缴纳1元至5元。车船使用税于1986年10月颁布实施，凡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车船的单位和个人都要缴纳。

印花税于1988年10月颁布实施，凡在我国境内书立、领受各种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要缴纳印花税。根据应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比例税税率或按件定额计征。筵席税于1988年9月颁布实施，凡在饭店、酒店、宾馆、招待所以及其他饮食营业场所举办筵席的单位和个人都要缴税，按次从价计征，税率为15%～20%，征税起点为一次支付金额200元～500元。

（四）财产课税的恢复

房产税于1986年10月颁布实施，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30%后的余值计算纳税的，税率为1.2%；按租金收入计算纳税的，税率为12%。

这一时期除了增加18种税以外，还开征了教育费附加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教育费附加于1986年4月颁布实施，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应缴纳教育费附加，以3税税额为计税依据，附加率为1%，1990年提高为2%。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于1989年1月颁布实施，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各项预算外资金，所有集体、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后利润，都按10%的比例缴纳调节基金。

二、完善原有税种和政策

许多在1985年以前开征的税种，也根据经济发展和治理整顿的新情况予以调整。(1)从1985年起，农业税由粮食折征代金以适应农产品收购制度的改革，折征代金统一按粮食"倒三七"比例收购价（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计算。从1989年起，将果用瓜和海水养殖产品收入列入农林特产税征收范围，对大部分农林特产收入实行全国统一税率。(2)从1985年起，降低国营企业奖金税税率，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不超过4个月标准工资的免税；超过4至5个月部分征30%；超过5至6个月部分征100%；超过6个月部分征300%。1987年再次降低税率，超过4至5个月部分征20%；超过5至6个月部分征50%；超过6至7个月部分征100%；7个月以上部分征

200%。(3) 从1987年8月起，对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和在境内工作的华侨、港澳同胞的工资、薪金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4) 颁布了新的《进出口关税条例》和《海关进出口税则》，调整了税则结构，降低了税率。1987年又对关税条例进行修订。

新税种的不断设立和老税种的完善，使我国由单一税制向复合税制过渡，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税收制度，也就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税制体系。但也存在税种重复等问题。与此同时，税收政策也不断得到完善，如1985年1月，财政部为了支持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在所得税方面给予6项照顾；1986年4月财政部又颁发《关于促进横向经济联合若干税收问题的暂行办法》；1991年4月国家税务局颁发《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等，这都强化了税收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

三、加强税收流失的治理

由于纳税人经济利益观念的膨胀、纳税意识的淡薄，以及税制中存在的漏洞和税法执行的松弛，80年代后期税收流失的程度明显高于前期。这一时期税收流失的表现及治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偷漏抗税及其查处

这一时期偷税漏税现象已相当普遍，抗税事件时有发生。如据1985年4月至6月的不完全统计，河北省仅在9400多个整党企业进行自查和重点检查，就有近半数的企业存在偷税漏税问题，共查补税款1520万元。80年代末，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抗税案件在许多地方频频发生。这不仅干扰了国家税收工作的正常秩序和国家税法的贯彻执行，而且使税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全国税务系统每年因公被打的有3000人次左右，重伤致残的近200余人，因公牺牲的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

因此，税务部门加大打击偷漏抗税的力度，以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一是加强与检察部门的合作，联手打击偷漏抗税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于1985年4月和1991年3月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查处偷税抗税案件。各级检察机关要主动与税务部门联系，了解本地区偷税抗税的情况，要把查处偷税抗税案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深入这类案件多发地区，着重查处那些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和社会影响很坏的重大案件。要把重点放在查处国营、集体纳税单位的案件上。要与人民法院配合，选择典型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宣判，形成声势，达到“办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二是加强财务监督，尤其是加强发票管理。1986年8月，财政部颁发《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发票由税务机关统一管理，未经税务机关批准，不得印制、出售发票，税务机关查处发票违章案件时均应立案，严格按规定处理。1988年8月，国家税务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发票管理和检查清理发票的通知》，决定在9月、10月间在全国开展一次发票大检查。三是规范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税收秩序和开展税务大检查。

（二）欠税及其清理

为了制止欠税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1989年8月国务院成立联合清理拖欠税款领

导小组，小组成员有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计委、经贸部、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的负责人，要求各部门领导把这项工作排入重要议事日程。1990年10月，联合清理拖欠税款小组提出《关于抓紧清理欠税的几点意见》，要求采取各种措施，层层落实清理欠税指标，使年底欠税余额低于年初的20%以上。这些措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欠税仍很严重，截至1991年6月底，全国欠税高达210亿元，有的企业甚至有纳税能力也赖着不缴。

（三）骗税现象开始出现

1985年国务院对税收政策和外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决定从4月1日起对所有经营外贸业务的企事业单位的出口商品实行全面退税政策，以增强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支持出口创汇，还颁布了《出口退税审批管理办法》等法规。1991年出口退税已达254亿元，骗取出口退税款的现象也相伴而生。到1989年全国14个重点出口退税地区共查处骗退税款2.8亿元。1991年2月，国家税务局、经贸部、海关总署、财政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发出《关于加强出口产品退税管理的联合通知》，要求加强出口退税计划管理，严格退税凭证管理，严厉查处出口退税违章行为。

四、规范个体、私营企业的税收秩序

鉴于以上税收严重流失的情况，国家税务局几乎年年提出要依法治税和加强税收管理，要求在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中正确执行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对个体、私营企业的税收征管，加强涉外税收工作，其中规范个体、私营企业的税收秩序是一项重要工作。

1989年8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个体工商业户账簿管理的规定》，要求个体户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建立、使用和保管账簿、凭证，并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检查。1989年8月，国家税务局发布《关于整顿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税收秩序的通知》，定于8月至9月在全国范围内对城乡个体户税收秩序进行全面的检查整顿。8月底国务院也发出《关于大力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工作的决定》，决定在10月底以前对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纳税情况集中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整顿。这些专项检查与税务大检查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个体和私营企业的税收增长，如1990年个体税收比例比1989年增长8.7%，创历史最高水平。

五、卓有成效的税务大检查

从1979年开始，财税机关基本上每年都进行一次规模不同的财务税务大检查，但这项活动还不规范。从1985年起，国务院每年都组织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进行全国规模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使这项制度正常化、规范化，成为一项严肃国家财经法纪、制止财政收入流失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从1985～1991年的7次大检查中，仅税收一项共查出各种违法违纪金额901亿元，把其他方面数据加起

来为917.59亿元，其中上缴财政576.56亿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财务物价税务大检查情况表

单位：亿元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总额
查出金额	160.63	69.13	129.26	131.93	175.59	134.34	116.71	917.59
入库金额	106.28	45.14	85.13	79.05	101.75	90.56	68.65	576.56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报》，1993年10月28日。

每年大检查的范围基本相似，但又各有重点。如1988年大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偷税、漏税，截留和私分国家的税款和收入，以及虚报亏损、骗取国家财政补贴的；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倒卖紧俏生产资料、消费品，牟取不正当价差收入的；滥发奖金、补贴、实物的；对外经济交往多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还要检查外汇违纪问题。检查的重点是中央企业、省（市、自治区）属企业和其他大型企业；各类公司，包括各种贸易性公司、金融性公司、技术开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和综合性公司等；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和有罚没收入的机关单位。重点检查面一般不少于20%，其中对重点检查单位的检查面要达到50%。大检查的规模也一年年扩大，如1990年的大检查中，全国有241.8万户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和583.1万个个体户进行了自查，对99.8万户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和207.2万个个体户进行了重点检查。

六、税收征管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实行利改税以后，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税收。税收征管工作抓得好，就可以充盈国库；征管工作有漏洞，哪怕是每个地方、每个税种流失一点，集中起来就是很大的财政损失。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单位和个人偷税、漏税、抗税、越权减免税现象比较普遍。除了法制观念淡薄、本位主义严重等原因外，也与税收征管上存在不少漏洞有关。为此，1986年4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对纳税人、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税款征收、账务、票证管理、税务检查、违章处理等作了严格规定。税收征管条例明确规定对偷税、抗税的直接责任人，以及支持、怂恿、包庇偷税、抗税行为的人，分别给以经济制裁，必要时还要移送司法机关强制处理。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作出与税收法规和税收管理制度相抵触的决定。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各种税法明确规定了纳税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哪些税以及适用的税率。税收征管条例又进一步规定纳税人应按什么程序、制度和方法缴税。纳税人和征收机构严格按照税法和征管条例办事，既可以避免多缴税，维护纳税人的正当权益，又可以防止偷税、漏税，从而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税收征管条例成为历次税务大检查的有力武器。

第五节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

一、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大步骤

据统计，截至1988年年底，我国拥有的预算内国营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原值就达16150亿元（不包括资源性资产）。国有资产管理在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转变，即由保值型管理向增值型管理过渡。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重大步骤。

（一）建立机构，转变体制

1987年以前，我国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是同忽视甚至否认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相联系的。主要特征是政企不分，产权管理主体多元化。主要问题，一是造成产权分割，形成部门、地区所有制和条块分割，阻碍资产配置优化；资产增量管理与存量管理、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分离；产权关系模糊，责任不清，影响资产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政府部门直接经营企业。

为了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国务院1988年1月决定于1989年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到1989年年底，全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逐步形成。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境内外的国有资产；拟定国有资产管理的法规和制度；制定国有资产投资和利润分配办法；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国有资产的发包、租赁、合资、参股经营等工作，处理承包、租赁、合资、参股经营和兼并、拍卖、破产清理等经济活动中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监督和检查国有资产的运营状况等。

1990年1月，首次全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做好以下工作：(1) 有计划地开展清产核资工作，计划用三四年时间把“家底”摸清。(2) 加强产权管理，认真查处各种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问题。(3) 通过兼并和划转等方式，推动国有资产合理流动，促进资产优化组合，提高利用效率。(4) 参与完善国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工作，建立国有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必要的制约机制，进一步增强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5) 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投资活动的监督管理，促进提高投资效益。(6) 抓紧立法，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法制管理。这次会议已清晰地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的问题，使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步入正轨。1990年2月，财政部、人民银行、国有资产管理局就撤销和合并全民所有制公司有关资产和债权债务清理的问题发出通知。1990年7月，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八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开展清查资产、核实国家资金、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的工作。

1991年4月，第二次全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一

年多来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新进展和新经验，部署1991、1992年的重点工作，研究讨论国有资产管理的“八五”计划纲要和十年规划的设想。重点工作是从改进和加强所有权管理方面下功夫，特别是要通过试点，探索对以资产为纽带的企业集团实施产权管理的体制和方法，以及对投资公司、行业总公司和有关部门实施产权管理的体制和方法。还要参加税利分流的试点工作，试验和探索税后利润逐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的途径和方法。

（二）公布资产评估办法

为了正确体现国有资产的价值量，保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凡属资产拍卖、转让，企业兼并、出售、联营、股份经营，与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开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企业清算以及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凡属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企业租赁以及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的，如当事人认为需要，可以进行资产评估。《办法》还对组织管理、评估程序、评估办法、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这为国有资产管理提供了可操作的规程。

二、《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的颁布与复式预算

为了加强国家预算管理，强化国家预算的分配、调控和监督职能，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形势，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预算管理条例》，自1992年开始实行，这是我国预算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法制化、正规化的重要标志。《条例》的内容有国家预算管理原则和组成，各级预算管理职权，各级预算收支范围的划分，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调整和决算，各级的法律责任等。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实行复式预算，即国家预算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两部分，并保持合理的比例和结构。经常性预算不列赤字，中央建设性预算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的方式筹措，但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地方建设性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复式预算的好处是：(1) 预算编制的顺序是先经常性预算，后建设性预算。经常性预算坚持收支平衡，并有一定结余转入建设性预算；建设性预算则坚持量力而行，如有差额可以通过发行一定数额的债券和借款来弥补。这有利于体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也有利于根据筹资的能力控制投资规模，做到量财办事。(2) 把经常性预算与建设性预算分开，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各自的预算收支状况，增加预算的透明度。(3) 按收支的项目性质划分，便于考察各项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效益，有利于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条例》总则明确规定“国家预算应当坚持收支平衡”，这是对以后预算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但在短期内很快就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又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央建设性预算收支差额将通过国内外发行建设债券和借款来弥补，不再向银行透支则是事关财政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决策，也是对传统财政与银行关系和综合平衡理论的一次大调整。对地方财政要保持平衡的要求是必要的。

三、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措施

1985～1991年期间，预算外资金迅速增长。1985年预算外资金总额在1400亿元左右，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81%；1988年为2270亿元，比1978年增加1923亿元，每年增长数额都在200亿元左右；1989年高达2658.8亿元，为1978年的7.7倍，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94.8%，已与国家预算并驾齐驱，而在不少地方，预算外资金已超过了预算内资金。与此同时，我国预算内资金增长缓慢，收不抵支，连年出现财政赤字，与预算外资金大幅度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由于财力过于分散，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由1978年的37.2%下降到1988年的19.2%。国家预算内财力严重不足，削弱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预算外资金对搞活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财经纪律松弛，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有些单位巧立名目乱收费，化预算内收入为预算外收入，有的甚至将这笔资金变成单位的“小金库”；二是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用预算外资金乱上计划外项目，盲目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三是有些专项资金没有完全用于规定用途，如挪用生产发展基金发放奖金、实物和搞福利等。这些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膨胀。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1986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通知》强调：(1) 预算外资金是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提取、自行使用的不纳入国家预算的资金。(2) 各项预算外资金的收费标准、提留比例、开支范围和标准都必须按照国务院及财政部规定的制度执行。(3) 预算外资金用于基本建设要严格控制，并按规定程序报批。(4) 基本折旧基金应用于固定资产更新改造，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于基本建设。(5) 职工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和工资增长基金，必须按照财政、劳动人事部门和主管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坚持先提后用，并按规定缴纳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6) 各地区、各部门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可以在资金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方式。(7)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编制年度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决算，并按季报送收支执行情况，由财政部门逐级汇总后，上报财政部。(8) 各级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都要纳入综合财政信贷计划，进行综合平衡。(9) 各级财政、银行和审计部门要经常掌握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的执行情况。(10) 各级财政部门应建立健全预算外资金管理机构。

为了有效地压缩预算外资金，国务院决定从1989年起征集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从预算外资金中集中一部分财力，为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也有利于合理引导预算外资金流向，紧缩一般，加强重点，压缩社会总需求，控制盲目建设和消费膨胀。

第六节　财政调控机制在改革中完善

一、财政收支增长与财政困难

80年代后期的财政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财政收支增长与财政困难并存。（详见表2）收支的增长应该有利于缓解财政困难，但在这一时期却难以看到这种因果关系。

表2　　1985～1991年财政收支状况表

	总收入（亿元）	增长率（%）	总支出（亿元）	增长率（%）	结余（亿元）
1985年	1866.40	24.3	1844.78	25.2	+21.62
1986年	2260.26	7.9	2330.81	5.8	-70.55
1987年	2368.90	4.8	2448.49	3.6	-79.59
1988年	2628.02	10.9	2706.57	10.0	-78.55
1989年	2947.87	12.2	3040.20	12.6	-92.33
1990年	3312.55	12.4	3452.20	11.8	-139.65
1991年	3610.88	9.0	3813.55	9.5	-202.67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6页。

由表2可知，财政收入与支出规模连年扩大，尤其是1985年的收支分别比上年增长24.3%和25.2%，但赤字额也逐年扩大，1991年已高达202.67亿元。1985年有21.62亿元的结余，但深入分析之后也仍然是赤字。1985年动用了大量外汇库存，所以当年财政有些结余，如果再抵掉当年内外债收入89.9亿元也是赤字。1986～1991年年年赤字，累计净赤字663.34亿元，如果加上内外债1698.4亿元，赤字额达2361.74亿元。除此之外，应该由财政弥补的粮食等企业亏损还有很大部分没有弥补，这也是潜在的赤字，同时财政支出方面有些应该支出的钱未能保证供应，造成不少遗留问题。沉重的赤字包袱把中国财政推人了第三个财政困难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过3次大的财政困难。

第一次是1958～1960年。1958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出现不正常的高速增长，加上实行高积累政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57年的34.1%提高到1960年的46.9%，1960年的财政收入比1957年增长了84.5%，1960年的财政支出比1957年增长了115%，基建支出增长了186.5%，结果出现越来越大的赤字，3年赤字分别为21.8亿元、6.74亿元、81.85亿元。1960年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以上。

第二次是1979～1980年。粉碎“四人帮”后，国民收入逐年增长，但由于从1979

年开始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价格补贴和职工工资奖金补贴等减少了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37.2%下降到1980年的29.4%，同时从1978年开始实行新的冒进计划，财政支出上升。1980年与1977年相比，财政收入增加了24.1%，财政支出增加了43.8%，基建支出增加了39.4%，以致出现1979年170.67亿元和1980年127.5亿元的赤字。1979年赤字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5%以上。

第三次是1985～1991年。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86年以后又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双膨胀。198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2694.98亿元，比1980年增加2.61倍，比1985年增加60.4%。198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1807.1亿元，比1980年增长1.88倍，比1985年增长69.7%。这一时期靠举借内外债、吃外汇老底、搞财政赤字和增发货币，使国民收入有一定的增长，1988年比1986年增长46.0%。但由于对企业采取较多的减税让利措施，以及粮食等企业亏损增加等原因，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由1986年的27.7%下降到1988年的21.6%（按可比口径计算由24.9%下降到19.2%），1991年占21.3%。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排除一些不可比因素是有限的，如1986年起由于将原来由冲减收入拨补的财政价格补贴改列支出，使1986年财政收入和支出都虚增257.5亿元。1988年财政收入比1987年增长10.9%，而1988年物价上升了18.5%，扣除物价因素，财政收入则是负增长。

80年代后期出现的财政困难，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调整积累消费比例关系，改善人民生活，同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给企业放权让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走的步子快了些，宏观控制未跟上，企业留利增加过猛，使原来由财政集中的资金过多地转化为预算外资金，加上“官倒”、“私倒”使部分财政收入流入集体和个人的口袋。如果1988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能达到1986年的27.7%，提高6.1个百分点，按1988年国民收入11533亿元计算，可增加财政收入704亿元，那么整个财政状况将大有改观。除了沉重的赤字负担外，财政困难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债务负担沉重，到1991年年末，扣除已偿还的部分，国家财政负担的内债余额1059.94亿元，国家统借统还外债余额276.10亿元；二是各种补贴和出口退税数额过大，1991年企业亏损补贴达510亿元，价格补贴支出374亿元，出口退税254亿元，3项合计达1138亿元。

由上可知，80年代后期的财政困难不是在经济滞缓甚至萎缩状态下产生的困难，而是在国民经济较快发展时期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政策体制的制约，使经济发展成效不能充分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来所引起的财政困难，因而是政策体制型的困难，带有鲜明的新旧体制转换这一过渡时期的时代特征。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过程中，财政已尽了最大努力，致力于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是与以前的财政困难的不同之处。

二、完善财政体系与财政宏观调控机制

在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财政部门也积极完善财政体系，以完善财政宏观调控机制，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积极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80年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期，这期间有停顿有调整，但总的趋势是朝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方向发展。财政不仅积极进行自身的改革，而且积极帮助和支持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使财政宏观调控机制逐渐完善。

1. 支持价格体系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关系，建立新的价格形成机制。1979年以后，国家多次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财政负担的购销价格倒挂产生的亏损补贴不断增多。国家在有步骤地对生产资料和基础行业价格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由于煤炭、石油等基础工业产品和化肥农药等农用产品价格偏低问题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仍要财政予以补贴。对一部分受生产资料调价影响、短期内无力消化的加工工业，财政也给予一定的补贴。1985～1991年财政价格补贴支出高达2258.81亿元。大量的价格补贴虽然增加了财政的压力，但缓解了由于不合理和进行价格改革引起的社会矛盾和不平衡。

2. 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增强企业活力，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1987年起普遍推行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进行了税利分流试点，1985～1991年全国企业留利额达3974.4亿元，各年分别为461.8、489.3、538.5、700.6、698.0、539.8、555.4亿元。1989年后虽有减少，但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3. 支持改革工资制度，调整国家与个人的分配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据统计，1979～1991年财政为了支持工资改革，减收增支4878.7亿元，其中减少收入1864.9亿元，增加支出3013.8亿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资制度中不合理的矛盾。

4. 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方针，实行鼓励引进外资、技术的财税政策。国家对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侨资企业和外籍人员收入，本着税负从轻、减免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遵循维护国家主权、尊重国际惯例、避免双重课税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同一些国家签订或草签了避免双重征税、防止偷税漏税的协定。在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某些外国政府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并在国外发行了政府债券。

（二）完善财政管理机制

财政管理机制的完善侧重于3个方面。

1. 改革预算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政府财权，调动地方财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1985～1987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1988年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对少数民族地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广东、福建、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体制、政策和资金上继续给予特殊照顾，绝大部分地区已建立了乡财政。199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级预算单位共

有161个，占全国县级预算单位总数的6.7%。地方财政可支配财力1991年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55.7%。

2.改革税制，有效利用税收经济杠杆，增强税收宏观调控作用。税制改革到了1991年，已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相配套，由6大类、33种税组成的、多环节、多税种、多层次的复合税制体系。税收法制建设和税收征管改革的步伐也逐步加快。

3.改革资金分配方式和管理办法，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从1979年开始试行拨改贷到1991年年末，累计发放中央级拨改贷862.9亿元。另对有收入和经济偿还能力的某些单位以及部分专项支农资金，建立了周转金制度。

（三）支持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国家财力的扩大，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为国家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提供了财力基础。

1.增加重点建设资金投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1985~1991年财政共投入经济建设资金9376.73亿元，其中大部分投入到能源交通，还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能源交通重点建设投资和限制长线产品生产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调节的职能。

2.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85~1990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达1321.39亿元，平均占财政支出的8.3%。另外还有农业周转金。

3.增加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的投入，促进技术进步，增强企业发展后劲。1985~1991年财政的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3项费用达990.23亿元，平均占财政支出的5.1%。此外对企业提取和使用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基金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4.增加教育经费支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1985~1991年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总额为2368.99亿元，其中教育事业费为1982.97亿元，教育基建投资为209.93亿元，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为144.6亿元。

5.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水平。1991年安排的科技3项费用、科学事业费、科研基金和其他科研部门事业费投入为156.23亿元，比1978年的52.89亿元增加103.34亿元，增加了1.95倍。财政还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增加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经费来源。

（四）财政改革的经验

1.不断深化改革才是财政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带来经济的全面发展，为财政提供财源基础；财政也只有根据形势发展适时地对财税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才能保持财政收入的增长。

2.财政改革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拨改贷”在80年代起了重要作用，到了90年代成为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的原因之一，就应顺势改为“贷改投”来缓解国有企业的负担。在坚持流转税为主体的同时，反对企业承包流转税，保持税收收入的增长。

3.财政在困难的情况下要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恢复和出台一些新的税种和增收

措施。"七五"时期出台增收措施加多项，累计金额约1000亿元。

4. 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时期，应通过压缩行政经费、推行经费包干、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和各种补贴等控制财政支出，以抑制通货膨胀。

三、中央财力萎缩：财政隐患之一

80年代以后的改革虽然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困难有增无减。中央财力的萎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央财政赤字增大

从财政收支的账面赤字即硬赤字来看，1985～1991年我国有6年出现财政赤字。其中中央财政赤字额增长更快，1985～1991年中央财政赤字总额累计达438.19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的扩大，又束缚了中央财政支出能力，如1987年中央财政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仅为42.1%，比1981年下降1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毫无伸缩余地、难以为继的地步（详见表3）。当然地方财政赤字也很大，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1988年有一半以上的县出现赤字。

表3　中央财政收支平衡表

	收入		支出		结余（亿元）
	绝对数（亿元）	比重（%）	绝对数（亿元）	比重（%）	
1985年	707.87	37.9	836.54	45.3	－128.67
1986年	916.67	40.6	962.26	41.3	－45.59
1987年	905.84	38.2	1031.94	42.1	－126.1
1988年	1045.54	39.8	1060.40	39.2	－14.86
1989年	1105.49	37：5	1105.19	36.4	+0.3
1990年	1367.87	41.3	1372.75	39.8	－4.88
1991年	1399.65	38.8	1517.74	39.8	－118.09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统计（190－1991）》，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81页。

中央财政的隐性赤字也很大。由于财政的行政管理者职能与财产所有者职能混在一起，企业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难以界定，国有企业亏损挂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财政应补未补的挂账，企业亏损挂账和潜亏实质是赤字的隐性形式。到1991年年底，全国各行业中财政应补未补的挂账累计额已超过700亿元。

（二）中央债务负担加重

我国自1979年开始重新借外债，1982年开始发行内债。到1991年年底，财政累计举借内外债已达1693亿元，扣除已偿还的本息，未偿还的债务余额还有1200亿元。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内外债务由中央政府负担，中央财政每年要拿1/5～1/4的收入进行还本付息。

（三）中央财政调控能力削弱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已成为一种共识。具体表现为中央调控手段单一，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没有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协调机制，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摩擦日益加深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 企业承包制包死了财政。企业包盈不包亏和包挂两张皮使企业占尽好处，1989、1990年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3%、7.6%，而工业承包企业实现利润却分别比上年下降12.6%、61。6%，上缴财政的利润也分别比上年下降26.3%、68%。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分别核定，一户一率，难免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

2. 地方和部门的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难以发挥。中央财政收入无法随着经济和财政的增长而增长，地方财政也苦乐不均，往往“包而不子”，中央财政要承担地方项目支出。

3. 财税分家导致财政收支脱节，削弱了中央财政运用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制定预算时讨价还价，执行过程中退税和减免税由税务一家决定。

4. 税前还贷缩小了中央财政的调控范围，是用银行职能代替财政职能。

5. 财政资金基金化，各级财政难以调控。经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批准建立的基金超过50项，1989年各种基金的征收额达480亿元。

6. 预算外资金增长过猛，其收支管理缺乏应有的宏观调控和计划指导。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必须转变和健全财政职能，界定职能范围；转换财政运行机制，实现财政转轨；改革财税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四、税负不公：财政隐患之二

尽管已实行了复税制，但以两步利改税为基点建立起来的复税制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有税制过于繁杂，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三税并立、互不交叉，多种所得税并立，内外税制不统一，地方税规模过小等。其中问题最大的莫过于多种所得税并立，税负不公。

对国内企业有三种所得税：国有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三种所得税在调节经济、组织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形成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1. 多种所得税并立，导致税收政策无法统一和税负不公。从税率上看，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55%的比例税率，国营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采用10%～55%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形成税率混乱、易于偷税的状况。从税前列支标准上看，国有企业允许100%的税前还贷，集体企业只能在税前还60%，私营企业全部税后还。从优惠上看，国营、集体企业申请税收减免的标准在执行中要比私营企业宽得多。

2. 名义税率偏重，背离企业实际负担状况，形成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扭曲。考虑到财政收入和财政体制的要求，国营、集体企业所得税实行高税率，高税率势必同放

权搞活企业的政策相冲突，导致各种减税让利措施出台，如税前还贷、包所得税和减免税等。

3. 按不同所有制形式设置企业所得税，不利于深化企业改革和建立市场体系。

4. 国营大中型企业税利不分，负担偏重。第二步利改税后，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实现利润除了要缴纳55%的所得税之外，还要负担20%左右的调节税，税后利润另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沉重的税负使企业急于承包所得税，实行税利统算，税利不分。要使税负公平，必须实行税制改革，先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再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第十六章　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金融职能的完善

第一节　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5～1988年8月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改革步子大，涉及面广，成效也较显著。中央银行在加强宏观金融调控的同时，逐渐加大市场和间接调控手段；金融发行市场稳健发展，二级市场开始起步；多种金融机构得到较快发展，专业银行开始探索企业化经营，并取得一定进展。

一、加强金融宏观调控

1985年至1988年8月，中央银行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运行环境，实行不同的金融、货币政策。针对1984年经济"过热"、年底信贷规模失控、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1985年采取了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发行。1986年根据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金融体制改革围绕"增加储蓄，改进服务，合理使用资金"三方面进行，结合对1985年贷款"一刀切"、忽视对地区和结构调整的"补账"需要，实行"稳中求松，区别对待"的货币政策。1987年在全国"压缩膨胀空气"的背景下，2月9日在南宁召开的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提出"金融系统也要压缩膨胀空气"，执行"紧中求活"的货币政策，并从第四季度开始紧缩银根。1988年根据国务院大幅压缩货币发行、相应紧缩信贷规模的要求，金融工作方针是"控制总量，调节结构"。1～8月在继续1987年各种行之有效的调控措施的同时，重点加强和改善对货币发行、信贷规模、金融信托资金和短期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和定量化调控，适应了经济体制深化的要求。在执行不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中央银行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

（一）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发行

1．编制和执行国家综合信贷计划，加强对各项贷款的计划管理和控制。实行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后，中央银行开始编制和执行国家综合信贷计划。1985年4月，国

务院规定，建设银行的信贷资金全部纳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1985年11月20日正式实施。从1987年起，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纳入地方人民银行的综合信贷计划，用于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贷款控制在国家正式批准的固定资产计划规模内。技术改造贷款由人民银行独立审查，自主决定，计划控制，改变了以往由企业主管部门与银行联合"戴帽"下达的办法。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要求企业必须有30%～50%的自有资金，逐步改变敞口供应的办法。严格控制购买外汇的人民币贷款（原则上自行解决，不足部分银行最多给予50%的贷款），实行专户管理。

1987年，人民银行将1987年贷款总规模和货币发行量控制指标，分别下达给各专业银行总行和人民银行省级分行，作为它们的监控目标。下半年对增长过快的乡镇企业贷款和农村信用社贷款，分别提出全年力争保持在6月末和8月末水平的要求，作为各地信贷的监测目标。1988年中央银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信贷总规模（1560亿元）和固定资产贷款规模（全年投资计划为2980亿元），由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按地区，分上半年数和全年数两个指标按月、按季考核和监测。工、农、中、建、投5家专业银行发出联合通知，规定总行年初分配和以后追加的信贷指标，必须报人民银行总行和各地人行，不允许计划外发放贷款，各地人行负责本地区的信贷规模控制。

2. 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划分中央银行与各专业银行的资金，将信贷计划与信贷资金、联行汇差分开。从1985年1月1日起，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的基本特征是"分灶吃饭"、"双轨下达"，即人民银行资金与各专业银行资金，以及信贷计划和信贷资金两分开，将信贷总规模的控制指标同时下达给各专业银行和地方，打破信贷资金的"大锅饭"。1986年明确规定信贷计划和信贷资金分开管理，信贷资金与联行汇差分开管理。中央银行通过信贷计划控制贷款规模，不包各专业银行的资金；实现信贷计划的资金来源，由各行通过资金的运筹自行解决。同时规定，各行必须及时清算联行汇差，做到账钱一起动，不准用联行汇差去扩大贷款。

中央银行贷款分计划内贷款和临时贷款两种，实行限额分配。人民银行核准的计划内贷款限额，实贷给各专业银行，转入其在人民银行的存款账户后方能支用，存款户无钱不能透支。临时贷款是利用专业银行信贷资金使用的时间差和地区差而进行的临时资金调剂，解决专业银行在组织实施年度信贷计划过程中的暂时资金困难，由中央银行根据专业银行的头寸，灵活进行调控。1987年中央银行贷款在限额分配的基础上，实行期限管理。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再区分计划内贷款和临时借款，依照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贷款用途，改行期限管理。把贷款分为两类（年度性贷款、短期贷款）四种，即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两年的年度性贷款，及3种短期贷款：日拆性贷款（一般为10天，最长不超过20天）、季度性贷款（一般为两个月，最长不超过4个月）、再贴现（一般为6个月）。实行期限管理，中央银行掌握了贷款限额分配的主动权，改变了此前计划内贷款有放无收、临时贷款不临时从而成为变相拨款的状况，初步实现了资金与计划的分开管理，进一步理顺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关系，实现了贷款由供给型向借贷型的转变。期限管理的贷款规模控制，成为中央银行调

控自如的手段。

人民银行采取不同措施，加强中央银行贷款的具体管理。为解决1985年专业银行将临时贷款短借长用、弥补信贷资金缺口、重开信贷资金“大锅饭”的问题，1986年人民银行重申临时贷款的性质和用途，明确规定不能用于填补专业银行信贷计划的资金缺口，并对人民银行各级分行实行分级管理。1987年为“紧缩膨胀空气”，保证年末农副产品收购等资金需求，大力收回短期贷款。按照2月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关于1987年第一季度以前收回1986年新增短期贷款的精神，各级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于3月底共收回146亿元，完成总任务的74%，到8月底收回近200亿元，全部完成任务。1988年对年度性贷款限额，统筹安排，灵活调剂，按短期贷款标准发放。同时，确定收回对专业银行短期贷款250亿元、年度性贷款50亿元；并规定，对各地收回的人民银行年度贷款和短期贷款，全部留在当地使用，实行“多收多贷，少收少贷”的政策。

信贷资金的管理，从1985年开始实行“区别对待”政策，1986、1987、1988年改变了完全按指令性计划控制贷款规模的做法。对固定资产仍实行指令性控制，对流动资金贷款则推行“多存多贷，少存少贷”的指导性计划控制，专业银行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少吸收存款必须少发放贷款，调动了各地和各行组织存款的积极性。同时，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已将人民银行贷款的“实贷”权下放到人民银行二级分行，由过去把贷款全部发放给省市专业银行，对专业银行“上贷下存”，改为现在由人民银行二级分行根据经济、市场变化和信贷资金供求状况，对地市专业银行直接发放贷款。人民银行对贷与不贷、贷多贷少、期限长短，有实际的决定权，便于其较自如地运用这一手段调控信贷总规模。

3. 对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金实行比例管理。1987年8月20日，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联合颁发《关于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管理的暂行规定》，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规定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金实行比例管理。主要有五项比例，即：(1) 存款准备金比例，从1987年起，新增存款按10%缴纳存款准备金；(2) 业务周转金（含库存现金）比例，按存款的一定比例留存；(3) 呆账准备金比例，每年在税前按年末贷款余额的5%提留；(4) 存贷比例，各项贷款占各项存款与自有资金的比例控制在75%以内；(5) 新增乡镇企业设备贷款占乡镇企业新增贷款比例，一般应在30%以内。

4. 加强对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信贷资金管理。主要内容有：(1) 控制信托规模。从1987年起，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纳入国家信贷计划。其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与租赁，纳入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内；当年发生额，最高不能超过当年新增信托存款、发行债券和实受资本金总和的60%。1988年则进一步将金融信托投资公司的信托贷款计划，作为一个单独层次由人民银行负责监控。(2) 控制存款吸收的范围。规定银行不能在计划外向其提供资金，不能把人行批准的其他资金转移到信托投资公司，不准把自筹基建存款转移到信托投资公司提前使用。(3) 资金自求平衡，量入为出，中央银行不对其发放年度性贷款。这些措施，防止了信托投资公司通过信托口子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此外，还通过特种存、贷款控制贷款规模。1986年通过发行金融债券、资金“高来高去”的方式，发放特种贷款19亿元，支持经济效益较好的收尾工程项目。1987年人民银行开办农村信用社特种存款，吸收存款50亿元。1988年向金融信托机构开办两种1年期的特种存款共计20亿元：一种是按6月份在人民银行存款余额的30%缴存，利率为7.5‰；另一种是按超过人民银行下达的信托贷款计划多放贷款部分的50%缴存，利率为4.2‰，限制其通过委托贷款扩大贷款规模。

（二）调整利率

1.四次调整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从1985年开始，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下简称“中央银行存款”）、贷款实行差别利率。中央银行存款利率为月息3.6‰，计划内借款、临时借款利率分别为月息3.9‰、4.2‰，人民银行总行根据需要调整上述存、贷款利率。差别利率迈出了中央银行通过资金成本制约专业银行过度的贷款需求的第一步。中央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经过1986年8月1日、1987年1月1日（中央银行贷款实行期限利率）、1987年第四季度、1989年2月9日的四次调整，分别由月息3.6‰、3.9‰调整为4.2‰、5.4‰～6‰（年度性贷款利率为6‰，季节性贷款利率为5.7‰，日拆性贷款利率为5.4‰）；从1987年1月14日起，对季节性、日拆性两种贷款实行逾期加收罚息制度。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调整，有利于防止专业银行把向中央银行借款作为盈利手段，打破其对中央银行的资金依赖思想，促使专业银行积极组织资金发放贷款，并推进企业化进程，使利率的调节功能得到加强。

2.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1985年4月1日、8月1日，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各项存、贷款利率。调整后的1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从年初的5.76%提高到7.2%；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利率从3.6%调到4.32%；固定资金贷款（即基建贷款和技改贷款的合称）、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别由5.04%、7.2%均调到7.92%，并根据期限实行差别利率。1987年5月25日，人民银行调整企业单位定期存款利率，将1、2、3年的企业单位定期存款利率调整为月息4.2‰、4.8‰、5.4‰，并增设半年期档次，月息为3.6‰。3次利率调整，对增加银行的资金来源，制约信贷资金的扩张，起到了较好的调节作用，加强了利率的调节功能。

3.差别利率和贴息。1987年1月9日，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性贷款实行差别利率和贴息，5年期以下、5年（含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分别由年息9.36%、10.8%降为5.88%、7.32%，银行对借款单位分别按2.88%、4.32%计收，中央财政按年息3%计收。这一办法从1986年12月21日起执行。

此外，为加强利率的统一管理，人民银行还于1987年4月25日下达《关于储蓄存款利率规定的通知》，规定各专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执行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统一利率政策，不得擅自提高存款利率，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利率浮动20%以内和20%以上必须经过农业银行和当地人行审批。

（三）确立存款准备金制度

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规定，除自有资金和财政性存款外，专业银行吸收的一般性

存款，必须按照规定的比例向人民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由人民银行统一运用，并对逾期不缴等行为作出罚息规定。1985年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是：建设银行30%，从1985年11月20日实行；其他各专业银行为10%，从1985年年初实行，存款准备金利率为月息3.6‰。从1987年10月份开始，中央银行将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比例由10%提高到12%。存款准备金制度从存款派生倍数和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两方面增强调控专业银行的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有利于防止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成为中央银行重要的调节手段。

（四）加强和改善外汇、外债管理

1. 调整汇率，提高外汇留成比例。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促进出口创汇，1985年、1986年7月人民币汇率分别较上年下调14.29%、13.6%，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由1985年年初的1:2.8元调到1986年7月的1:3.70。外汇留成比例逐步提高，1985年一般性出口商品，留成比例提高到25%，超计划出口创汇额，实行中央和地方倒“三七”分成，并切实贯彻谁创汇谁留成，使出口创汇单位真正得到留成外汇；1987年将赡家侨汇留成比例由原来的30%提高到50%，建筑侨汇留成比例由原来的40%提高到60%，并加快留成外汇的核拨速度，由原来的每半年核拨缩短为每季、每月核拨，采取电子计算机核算。

2. 增设机构，加强外汇管理。全国的外汇管理机构由1985年的114个增加到1986年的170多个，各外汇管理分局在外汇使用上，按照严格掌握、区别对待的原则，合理审批外汇，逾期外汇现象明显减少，同时健全批汇制度，严格按照用汇指标控制进口。

3. 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管理，放开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调剂价格，打击外汇黑市。1985年年初，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对外汇收支逆差扩大、外汇管理混乱的状况进行检查。3月13日作出《关于加强外汇管理的决定》，要求严禁倒卖外汇和外币流通，取缔炒买炒卖外币、外汇券的黑市。4月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则》，规定了套汇、逃汇、扰乱金融3种行为及相应的处罚措施。7月17日，国务院转发了中国石油化学总公司、对外经贸部的请示报告，要求制止沿海地区利用海上加油炒卖外汇。21日，中纪委通报了辽宁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与深圳市商业公司合伙截留玉米出口外汇，并参与外汇黑市瓜分违法所得的案件，要求各地查处变相买卖、逃套外汇案件。为鼓励外商在华投资，国务院于1986年1月15日发布《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收支平衡的规定》，并放开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外汇调剂价格，促进其外汇收支平衡，方便其生产经营和将合法所得利润汇往国外。

4. 建立全国外债监测系统，加强对外债的宏观调控。1985～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组织进行了3次全国外债普查工作，并于1987年8月27日发布《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制定《外汇登记实施细则》，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外汇统计监测系统。1987年9月公布《中国国际收支概览表（1982～1986）》。人民银行于1987年2月20日、9月27日公布的《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关于中国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的管理规定》等法规，明确了提供境外担保及境外发行债券的审批机关分别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并对其他细节作出具体规定。1988年公布《关于境内金融

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的管理规定》，下发《关于对沿海地区短期借款实行余额外债管理的规定》，并规定未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不得借用国外商业贷款，加强了对外债的管理。

（五）立法及行政手段

为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和金融法规建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85、1987年分别设置了金融行政管理司、条法司，各级人行相继设立相应的处、科、股。

1. 金融立法。1985～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制定（含参与制定）、颁布实施了《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城市信用社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条例，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因此而基本有法可依，有利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了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其中，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金融法规。制定并颁布实施了《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则》、《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外汇统计监测暂行规定》、《中国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的管理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等法规，加强外汇、外债管理。依据1985年《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办法》、1987年3月27日《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和4月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股票、债券管理的通知》规定，加强票据承兑贴现市场、股票、债券市场的管理。

2. 金融行政管理。中央银行依法加强了对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管理。各级人民银行对本地区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清理、整顿、审核和发放金融许可证的工作；继续整顿信托投资公司，1986年明确规定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只能在大中城市设立，县以及县以下地区不得设立，禁止个人经营金融信托投资业务；1985年5月开始建立稽核机构，银行稽核机构依据财政金融法规，多次开展信贷、利率、外汇大检查，打击以贷谋私等不正之风；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综合稽核和专项稽核，开展全面稽核试点和人行内部稽核，建立金融系统稽核工作联系会议制度；加强对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管理，明确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发行股票，少数经过批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试行股票发行，必须置于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企业发行债券必须经当地人民银行批准，发行额度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查处、打击套汇与逃汇等非法外汇活动。金融立法和行政管理，保证了金融秩序和金融局势的基本稳定。

二、金融市场稳步开拓

1985～1988年，为适应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及发展商品经济和横向联合、努力搞活资金的需要，结合“七五”计划关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培育市场”、“要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金融市场”的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以法规形式明确的“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相互

拆借”、拆借“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议定”、“专业银行可以代理企业发行债券”、“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可以代理企业的证券发行”，各地积极、稳妥地开拓了新的融资工具和融资渠道，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为改革起点的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中的“相互融通”原则，直接推动同业拆借市场的开拓，并带动其他金融市场的逐步形成和发展。

（一）同业拆借市场

“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新信贷资金管理办法，直接推动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1985 年，各银行系统内部之间、不同系统银行之间、跨地区不同银行之间这 3 个层次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以武汉、沈阳、上海、开封等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同业拆借市场。1986 年银行同业拆借活动已在全国铺开，开始形成跨系统、跨地区、内外结合、不同层次的融资网络。以武汉、沈阳、上海、开封为中心的区域性拆借市场，初具规模。大中城市的专业银行分支行之间的同城拆借已普遍开展。同年蓬勃发展的城乡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使正在形成的拆借市场纳入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同业，成为金融同业拆借市场。1986 年全年的资金拆借量达到 300 亿元。

1987 年除边远省市外，全国都已建立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同业拆借市场，初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贯穿东西（长江沿岸 27 家中心银行组成的资金融通网络）和南北（京广、京沈铁路沿线中心城市银行组成的资金融通网络）、跨地区跨系统多层次大范围的十字型资金融通躯干网络，同时建立了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太原、广州等 10 多个全国性的同业拆借有形市场，全国同业拆借资金累计达 2300 亿元。

1988 年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迅速，管理趋向规范。全年拆借金额上升为 5241 亿元，年内人民银行批准设立 37 家融资公司，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同时严格规定拆借期限不得超过 4 个月，不得用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些地方试行票据化拆借，以加强拆借资金的安全性。

（二）商业票据承兑贴现市场

1985 年 3 月 5 日，人民银行在总结上海、重庆等地的试点经验后，颁布《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办法》，要求从 4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使原来有限开放的商业信用逐渐走向规范，推动了该市场的发展。1986 年，人民银行正式开办了对专业银行贴进票据的再贴现，到年底全国已有 140 多个城市开展了上述业务；专业银行间的转贴现也有发展，武汉于 1986 年进行 1 笔 750 万元的票据转贴现。1987 年票据承兑贴现市场的贴现种类和贴现票据有所发展，除商业票据的承兑、贴现外，还新增了对 1985 年国库券的贴现，并将贴现种类延伸到劳务、科技和期货交易等方面，有力地推进了票据贴现市场的发展。全年票据贴现总额达 86 亿元，人民银行再贴现票据金额达 35 亿元。

（三）债券、股票市场

1985 年～1988 年，为灵活融通资金，各地在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的同时，大胆探索股票、债券的资金融通活动，并积极管理和引导，有控制地开展了股票、债券市场，

推动了直接金融市场的萌芽。4年间累计发行股票、债券950.28亿元，其中，债券915.28亿元、股票35亿元。各类债券的构成是：包括国库券在内的国债为429.87亿元，占47%；金融机构债券280亿元，占31%；企业债券205.41亿元，占22%。从年份构成看，大多在1987、1988年发行，1987、1988年的债券发行占72%，股票发行占71%。

1.发行市场。债券发行方式进行了贴现发行、累进利息发行等新尝试。1986年11月，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采取贴现方式发行地方金融债券1亿元，即债券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发行，票面金额与发行价格之间的差额即为债券利息。工商银行从1987年10月份起向全国发行18亿元金融债券，采取累进利息发行（即按浮动期限固定利率发行，在计息方式上采取逐年累进制）和贴水发行，首创了新的金融债券发行方式；并规定可以转让和抵押，保持了债券的流动性。

股票（含股金券）的发行在1985年大多带有保息分红的内部集资性质；1986年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988年股票发行开始走向规范，发行增长迅速。作为“稳定金融，引导消费”的措施之一，国务院和中央银行对发行股票持肯定和鼓励态度，国务院8月21日在批转人民银行《关于控制货币，稳定金融几项措施的报告》中，要求引导企业发行股票、债券，进一步开辟和扩大股票；债券市场。1988年7月15日沈阳金杯汽车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50余万股，筹资5000余万元，股票的发行经过资产评估、评估信用，向人行申请、发布招股说明书等程序，迈出规范发行的步伐。福建兴业银行11月还向个人发行总额为3000万元的人民币优先股票。1988年全年发行股票25亿元，是1985~1987年3年总和的2.5倍。

2.流通市场。在发行初具规模和对发行方式进行新的探索的同时，股票、债券的流通转让市场也开始起步。1985年6月27日人民银行颁发《1985年国库券贴现办法》，规定1985年国库券可以向银行办理贴现（限持满两年的个人）和抵押贷款（限企业）。该《办法》的出台，使国库券开始具备流动性，为国库券流通转让市场的开拓奠定了基础。1986年8月5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始试办企业债券的二级交易，买卖该市6个企业的8种债券，并开办债券抵押业务。到年底，全市14家企业的26种债券，全部进入柜台交易（其中3种债券只办抵押），成交额达144.8亿元。同年9月26日，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分部开办股票现货买卖业务。在上海、沈阳的示范下，丹东、宁波等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也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相继开办股票、企业债券的流通转让业务。1987年国库券的二级市场开始起步，按照1985年颁布的《1985年国库券贴现办法》，银行开始办理1985年国库券的贷款抵押和贴现。1988年4月21日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在沈阳、上海、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进行，6月2日将试点城市扩大到其他54个城市；交易的券种是个人持有的1985、1986年国库券，由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资本比较雄厚、经营管理较好的信托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采取自营买卖（占90%）和代理买卖（占10%）进行交易。国库券二级市场的开放，促进了流通转让市场的发展，交易品种由此前3种（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少量股票）增加到4种，促进了市场的拓展。全年61个城市的国库券成交金额达23.83亿元，股票、债券的交易总

量为26.16亿元，是1987年的23.4倍。其中债券转让总金额达26.06亿元，是1987年的23倍；股票转让922万元，是1987年的115倍。证券中介机构随着股票、债券市场而发展。到1988年批准成立34家证券公司，主要办理有价证券的代理发行、转让交易、登记、保管、过户和咨询业务；设立8家评信公司，试办企业债券、股票的评级。

股票、债券发行市场的开拓和流通市场的试办，标志着我国对金融市场的改革和探索已进人新阶段，它改变了有发行市场而无流通市场的现状，解决了有价证券的流动性问题，得到居民和市场的欢迎。

（四）外汇调剂市场

1985年12月，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筹办、成立外汇调剂中心，随后，其他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也相继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的是特区企业合法的外汇。调剂价格按出口创汇企业上一季度的平均换汇成本以适当比例浮动，最高不超过10%。深圳调剂中心当月成交73笔，调人金额558.5万美元，调出金额521.5万美元。

1986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办理外汇调剂的几项规定》，并在深圳进行扩大外汇调剂范围的试点。11月6日，上海成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调剂中心。当年成交41笔，金额达371万美元。中国银行还积极开展代理客户进行外汇买卖的新业务，全年共代理230笔，金额达9.6亿美元；买卖种类包括即期、远期、调期、择期和期权5种，币种包括15种可兑换货币。

1988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城市均成立外汇调剂中心，10月4日全国外汇调剂中心在北京成立，调剂价格放开，调剂范围扩大，沟通国内企业外汇和外资企业这两个以前分离的市场，使其相互调剂；海南、深圳、厦门、宁波等地还试办个人外汇调剂；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公开的外汇调剂市场，把特定的外汇供求集中于特定的场所，公开竞价成交，体现了公开化、市场化，增加了交易的透明度。全年外汇调剂金额达62.64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调出6.62亿美元，调人2.2亿美元，调剂的总金额占同期留成外汇的1/3、进口用汇的18%，促进了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的发展。

此外，新的金融工具和新的融资方式得到发展。1985年开拓、增加了支票、农村定额转账支票、旅行支票等新的信用流通工具，中国银行于1986年6月创办长城人民币信用卡，并于1987年2月、10月加人万事达卡和维萨卡这两个信用卡国际组织。1987年上海人行批准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1亿元，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等金融机构发行大额可转让（抵押）存单5.9亿元，并于11月份开办同业票据买卖业务。到1988年全国共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债券11.72亿元、大额可转让存单刃.26亿元。新信用工具和新融资方式的开拓，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成为推进金融市场发展的有力因素。

三、多种金融机构发展较快，专业银行企业化开始起步

（一）多种金融机构的发展

在1985年整顿金融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1986～1988年，除专业银

行分别增设分支机构外，新型的综合性银行、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

1. 新型的综合性银行、商业银行。1986、1987年，成立了3家综合性银行。1986年7月25日，国务院决定恢复交通银行国内机构，10月25日对外试营业。按照把交通银行办成"改革的银行，而非改革的对象"的要求，交通银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可以办理包括外币业务在内的多种金融业务；总部设在上海，其分支机构按经济区域设置。1987年4月交通银行正式营业，同月批准的中信实业银行和招商银行也相继正式对外营业。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于11月份正式组建。1988年还设立了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为配合住房改革和促进住房商品化，10月、12月在烟台、蚌埠试办了住宅储蓄银行，专业银行内部设立独立核算的住房信贷部。

2. 城乡信用社快速发展。1986年，全国为城镇集体和个体经济服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有1400余家，1987年新增500多家，1988年则由1987年年底的1615家发展到3265家，增加1倍多；农村信用社发展更加迅猛，到1988年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到60897家。

3. 金融信托投资等机构在1985年整顿、清理的基础上，也有较大发展。1986年经人民银行批准的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有112家。1987年新成立信托投资公司250多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10家，租赁公司7家，保险公司两家（深圳平安保险公司和新疆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评信公司4家（大连、上海、沈阳、哈尔滨），证券公司1家（深圳特区证券公司），使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扩大。到1988年年底保险企业及分支机构由2749个发展到2805个，信托投资公司由575个发展到745个，金融租赁公司由5个发展到9个，企业财务集团由9个发展到15个，证券公司新增34个，评信公司新增8个。新设立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四川人寿保险公司、深圳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财务公司、中国华阳联合租赁有限公司等。

4. 农村农民互助基金会、农经服务公司、扶贫储金会、金融信托合作社、农民互助保险合作社等合作性的金融机构也蓬勃发展。这些机构积极稳妥地开展多种业务，对专业银行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并成为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者。

此外，邮政部门从1986年开始办理邮政储蓄，当年网点发展到2794个。外资在华银行自1985年以来在经济特区也迅速发展，并于1988年5月17日试办人民币业务。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合作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

（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

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始于1985年各行"划分资金，自主经营"，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和"七五"计划将其明确为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在多种金融机构快速发展、鼓励专业银行业务交叉和适度竞争的1987、1988年，则进行了多种探索，迈出了"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第一步。

1. 开拓新的业务。1985 年各专业银行相继开办了商业票据承兑贴现、国库券抵押贴现、农村定额转账支票、旅行支票等新业务，中国银行还开办信用卡、信用证下出口押汇、远期汇票贴现、远期外汇买卖等新业务，并开始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B/A）运用纽约金融市场资金。1986 年 6 月，中国银行首创发行了长城信用卡，并根据西方金融创新的发展情况，开办了金融远期交易、期权交易、调期交易等新业务，代理客户进行外汇买卖，1987 年开办了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其他部分专业银行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办了外币存、放、汇兑业务，开始推行抵押、担保、贴现贷款。保付支票、旅行支票、汇票及同城票据交换等业务进一步拓展。

2. 简政扩权，转换职能，增强基层活力。1986 年农业银行总行及广州、武汉等试点城市市行采取了综合配套放权的改革措施，对基层行下放了资金、计划、财务等 26 项权利，核定了成本费用率；沈阳市农行作出了扩权的 10 条规定。交通银行新办的业务品种，还拥有利率浮动权。保险总公司下放了部分新险种条款、保险费率的制定权，改革部分险种的承保方式和办法。1987 年农行等专业行进一步对县市支行进行综合配套放权，使基层行处拥有业务经营的自主权；上级行处则转变职能；从原来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日常事务中超脱出来，改善和加强对基层行处的监管，初步实现了上级行处和基层行处管理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3. 推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1986 年试点城市的农业银行对部分储蓄所实行"三包一挂钩"，即包储蓄任务、包服务质量、包费用水平，并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的承包责任制。同年年底，农行县级支行普遍推行各种形式的岗位责任制，全国 1000 多个储蓄所试行储蓄所经营承包责任制。1987 年储蓄所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各种责任制和承包制继续推行，农行、工行等专业行试行了行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建立并健全岗位责任制，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1988 年农业银行系统对财政部试行财务大包干，实行"三包一挂"，即包上缴国家税利、包完成宏观调控指标、包资金效益指标、完成上述指标后与自身的经济利益挂钩。内部承包则层层落实到基层，并实行资金比例管理、转变职能、强化信贷管理等配套改革。农行、工行普遍推行"行长责任制"，中行珠江、沈阳分行试行目标经营责任制，建设银行总行则在沈阳、西安分行试行包信贷资金、包上缴利润、包完成存款任务、包收回贷款任务的承包制。各专业银行加快推行以储蓄承包为重点的单项业务承包责任制。工行在广州、宁波、宜昌等 5 分支行试行劳动工资（出纳专业）计件工资制和浮动升级法。农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探索专业银行增强完成宏观调控任务和基层行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方面，取得了初步有益的经验。

4. 确立基本核算单位，试行利润留成的财务体制改革。从 1985 年开始，各专业银行对分支机构划分内部资金，确立独立核算单位，到 1987 年基本确立以中心城市分、支行（农行以县支行）为独立核算单位，上下资金调拨关系为存贷关系，初步打破内部资金的"大锅饭"。1988 年 2 月 26 日，工行将核算单位分为城市行、县支行和城区办事处二级，实行统一计划，分级核算，划分资金，指标考核，统负盈亏，分配挂钩的办法。农业银行从 1985 年开始逐步把"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自主经营"的资金管理体制推行到县市支行，核定资金，多存可以多贷，自求平衡，自担风险；并于

1986年按人员、业务量、利润试行“四、三、三”比例核定留成利润。建设银行财务实行总行、省、地、县分支行4级核算，利润按“三、三、四”的比例计算留成，即留利额中，利润因素、业务量各占30%，人员因素占40%。

5.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新建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成立之初就按企业化方向建制立法。交通银行于1987年试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88年继续推进、完善，初步建立以负债管理为主的自控体系。该自控体系由三大体系构成，其中，以“比例管理”为核心的自控体系由固定资产贷款规模等3项政策性自控指标和存贷比等4项经营性自控指标构成，每一指标规定了相应的比例。工行广东省分行于1988年试行对辖区二级分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交通银行和工行广东省分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及自控体系），为建立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探索了银行改革的新路子。

第二节　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1988年9月至1991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阶段，主要起因是1988年1-8月金融形势出现新的变化。1988年1~8月货币投放过多，上半年净投放现金88.6亿元，由货币回笼变为净投放，1~8月净投放货币285.56亿元，较1987年同期多投放308.58亿元；信贷增加过猛，1~8月贷款增加927.1亿元，占全年贷款新增额的51.5%，较1987年同期增加557亿元，增幅近100%；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加剧，从4月份在较大范围内开始出现了3次挤提存款、抢购商品现象，储蓄存款较1987年同期减少26.15亿元，并于8月形成全国范围的挤提、抢购风潮。因此，从9月份开始，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控制货币、稳定金融及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加大了调控力度，实行从紧的金融政策，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1989年、1990年、1991年继续深入进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按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金融系统坚持执行紧缩政策和“控制总量，调节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适时调节”的货币、信贷方针，完善原有各项改革措施，并探索新的改革措施。

一、强化宏观金融控制

1988年9月至1991年，中央银行在强化和完善金融调控过程中，加大了计划调节和行政管理。对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计划，实行行政首脑负责制：收回或取消了部分下放的权利。为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充分发挥人行的监督和宏观调控作用，对各级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的正、副行长的任免实行归口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货币、信贷总规模控制在计划范围内，初步调整了贷款结构，整顿了金融秩序，保证了金融业的稳健发展。

(一) 编制全社会信用计划，完善计划体系

为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从严控制货币和信贷，在1989年试编的基础上，1990年中央银行正式编制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内的全社会信用规划，分四个层次进行管理和监控：(1) 编制包括银行、城乡信用社、各类信托投资机构和各类债券、股票、集资等信用活动总量的计划；(2) 编制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的国家银行信贷计划；(3) 编制包括城乡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计划；(4) 编制各种证券的信贷计划。该信用规划的编制，有利于防止在银行信贷之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膨胀，具有统揽全局的作用，是完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

同时，人民银行总行于1990年编制和下达了国家银行外汇信贷计划。该计划包括国家银行外汇信贷和其他金融机构外汇信贷两个基本计划，把国家银行和国家指定作为对外融资窗口的其他金融机构，借入国家商业贷款计划和境外拆借短期资金总规模都纳入计划管理，由人总行对计划进行审批，便于综合平衡外汇信贷资金，加强外债、外汇管理。

(二) 控制货币发行

为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人民银行规定从1988年10月1日起，凡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户的企事业单位、机关、部队、团体、学校等，提取工资、奖金、补贴等一律控制在8月份的水平上，超过部分不予支付现金；同时通过定期储蓄存单、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转移和推迟符合政策的超出8月份水平的消费基金。10月20日向人行广东分行和深圳特区分行开办50亿元的特种存款。1989年人民银行总行收回下放给省级人民银行的资金机动权，对1988年允许省级分行使用的调增的1%存款准备金、财政性存款超计划50%部分、邮政储蓄超100%部分的资金，收归总行统筹安排。针对紧缩银根后出现的市场疲软、生产滑坡、资金紧张等问题，中央银行适时调整紧缩力度，增加短期资金。全年先后投放20亿元支持农业发展、30亿元支持重点企业生产备料，并4次对国营大中型企业投放启动资金244亿元。对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并于年底发放短期贷款480.16亿元，用以收购农副产品。

(三) 控制信贷规模，调整贷款结构

1. 贷款规模控制。从1988年9月开始，中央银行实行贷款规模控制的责任制。按地区分配的贷款规模，由各地政府和人民银行负责；各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由专业银行总行的行长负责。“在国务院没有批准调整规模前，任何银行、任何地区不能突破。哪个银行突破了由哪个银行行长负责；哪一级银行突破了，由哪一级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对贷款规模层层建立责任制，落实到基层。在规定的贷款指标内，明确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重点支持的三个方面和“十不贷”，违反“十不贷”政策发放贷款者，要追究有关单位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1989年则实行“限额管理，以存定贷”的责任制，人民银行总行核准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全年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最高限额；贷款限额均为指令性计

划，未经批准，不得突破；总量控制实行“全年量底、按季监控、按月考核、适时调节”的办法；同时规定发行的金融债券不得投资于固定资产，不增加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营者的固定资产贷款。1990年进一步将原来对专业银行每季下达限额，改为分别下达上半年、第三季度、全年最高贷款限额指标，按季进行监控，季度限额为指导性计划，全年最高限额为指令性；同时，人总行对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再贷款实行全额管理，纳入贷款限额管理并作为指令性计划，考核6月底和年末再贷款最高限额，有效控制全年贷款量。1991年在继续严格控制贷款总规模的前提下，对国家专业银行的部分行推行贷款限额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办法。

2. 适时调节贷款规模。1989年中央银行按照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提出了支持产业发展的序列和实施办法，重申了各专业银行的支持重点，强化贷款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1990年，适应经济稳定和发展经济的要求，中央银行适时增加贷款规模和中央银行再贷款，实施了贷款规模调剂办法，增强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的资金调控权。经国务院批准，1990年上半年贷款规模由300亿元调增到600亿元，全年贷款规模由1700亿元增加到2700亿元，实际执行结果为2757.1亿元，较年初计划增加1057.1亿元，较1989年增加899.1亿元。增加的贷款主要是满足农副产品收购增加、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贷款、对亏损及困难企业的“安定团结”贷款、市场启动贷款、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贷款、清理“三角债”的清欠贷款等，在适时调节贷款规模的同时，调节了经济和产业结构。同时，为改善信贷规模管理，灵活调剂地区内信贷规模，人总行对人行省级分行增加50亿元机动贷款规模，用于调剂辖区内、地区间、行际间的临时需求和贷款限额分配中的不足。

1991年将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的机动贷款规模占贷款总规模的比例由5%提高到7%，增加了省级人民银行贷款规模的调剂能力。按照国务院提出的1991年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银行重点抓了挖掘资金潜力，搞活资金存量，实行了“压贷挂钩”、压缩三项资金占用等措施。

（四）加强对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的管理

从1988年9月1日起，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2%调整为13%，同时要求各行留足正常的备付金，以保证支付能力。信托投资公司委托存款大于委托贷款的资金，按照统一比例缴纳存款准备金。1989年进一步规定，各家银行存款备付金比例最低为5%～7%，由各地人民银行监督；对挤占、挪用和不缴、少缴或迟缴存款准备金的，加收罚息。

（五）调整利率

为稳定和巩固存款、控制贷款，1988年9月1日、1989年2月1日，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各项存、贷款利率。调整后的存、贷款利率分别平均提高4.41、3.48个百分点，1年期存、（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均为11.34%，贷款利率按产业政策有高有低，严格贷款的加息制度。同时，将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利率同个人存款利率拉平，初步改变了企

事业单位与个人存款双重利率的状况。1988 年 9 月 10 日起，对 3 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实行保值，直到 1991 年 11 月底。为方便储户，多吸收存款，1989 年 6 月 1 日增设 3 个月档次的居民储蓄存款和单位存款，利率为 7.56%。

1990、1991 年，为促进生产发展和商品销售，人民银行先后于 1990 年的 3 月 21 日和 4 月 15 日，8 月 21 日，1991 年的 4 月 21 日、7 月 1 日 4 次调低各项存款、贷款利率。调整后的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从 1989 年的 11.34%降到 8.64%，存款年利率由 11.34%降到 7.56%，并进一步严格加罚利息政策。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向社会发行的 1～3 年期的金融债券利率等也相应下调。对粮食、外贸、商业储备和国家重点建设等贷款实行的优惠利率，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也相应下调。从 1991 年 12 月份起，停办保值储蓄业务。为加强利率管理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于 1991 年 12 月 11 日颁布《利率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人民银行是利率管理的主管机构，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利率管理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它标志着中央银行的利率管理进入依法管理的新阶段。

（六）外债和外汇管理

1. 下调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1989 年 12 月 16 日、1990 年 11 月 17 日人民币汇率分别下调 21.2%、9.57%，由原来的 1:3.71 调整为 1990 年的 1:5.20，这一汇率水平逐渐接近外汇调剂价格，促进了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发展。1991 年人民币汇率改变了此前阶段性调整汇率的做法，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参考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变动等因素，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有升、有降的调整。汇率调整机制的改革，逐步适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运行机制，便于更好地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

2. 加强出口收汇，合理控制外汇支出，整顿外汇经营秩序。1989 年各级外汇管理部门加强出口收汇，合理控制外汇支出，引导地方、企业、部门将留成外汇重点用于农业和轻纺原材料、交通运输、燃料工业及出口创汇产品。1989 年 3 月 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1990 年《境内机构的贸易与非贸易等外汇收支结汇的规定》的实施、《旅游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的颁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制定与实施、《外汇指定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等 3 个规定的颁布、《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的制定与公布及其于 1991 年在全国范围的展开等，加强了对境外投资的管理，控制了企业单位提前买汇和推迟收汇，提高了出口收汇率，提高了留成外汇的核拨速度和缴中央外汇的划拨速度，防止了旅游外汇流失，整顿了外汇经营秩序。对平衡国际收支，促进经济发展和外贸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3. 进一步培育和开拓外汇调剂市场。1989 年 7 月、1991 年 12 月 1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发布的《华侨、港澳同胞捐赠外汇参加外汇调剂的暂行规定》、《关于境内居民外汇和境内居民因私用汇参加调剂的暂行办法》，扩大了外汇调剂的范围和调剂市场的汇源，进一步培育和开拓外汇调剂市场，发挥了外汇市场的调节作用，抑制了外汇黑市交易，受到国内外侨胞、侨眷的欢迎。

4. 加强外债统计监测，实行外债登记制度，强化外债管理。1989 年 2 月 14 日国务

院就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问题发出通知，对借款规模、额度及外汇担保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要求保证按期偿还债务，维护国家信誉，同时要求进一步完善外债登记和统计监测系统，并于11月公布《外汇（转）贷款登记管理办法》和《外债登记实施细则》。

1990年，人民银行加强对外债的登记监测，较好地完成外债转贷款的登记汇总，控制了融资成本。在十几个省市协助有关部门建立偿债基金。继续控制外债规模的增长，加强对外借债窗口的管理，规定短期对外借款不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严格控制借用外债在国内转换成人民币使用。严格外汇担保的管理，按照外债谁借谁还的原则，落实偿债责任制，保证外债还本付息。

（七）立法和行政管理

1. 清理整顿金融性公司。为贯彻国务院治理整顿的决定和进一步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的决定，1988年8月人民银行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停止组建区域性银行，暂停审批非银行金融机构；9月份人民银行规定金融信托投资公司一律实行停止发放委托贷款、投资、拆出资金，同时开始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清查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10月份，国务院成立信贷、现金检查办公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信贷、现金大检查。1989年，根据国务院清理整顿公司的要求，人民银行撤销所办的融资公司、证券公司、评信公司和302个金融系统所办的非金融公司，清理整顿各类基金会，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一些管理办法。1990经反复酝酿并正式颁布的《关于金融性公司撤并留的政策意见》，明确了清理整顿金融性公司的政策规定，使清理整顿进展顺利并基本结束。1988年的1227家金融性公司，批准保留285家，暂不撤销的有150家，予以撤并的有792家。在保留和暂不撤消的435家金融性公司中，信托投资公司占339家，其余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分别占23家、9家、17家和47家，改变了金融性公司过多的状况，奠定了其健康适度发展的基础。

2. 加强利率、储蓄管理，清理整顿盲目竞争。针对各地出现的“利率大战”、“储蓄大战”，1989年、1990年人民银行明确了加强利率和储蓄管理的有关规定，停止摸奖储蓄，取消贴水储蓄，禁止有奖储蓄，保证储蓄业务健康、有序发展。禁止金融机构对企业投资、与企业联合经营，禁止财务公司在集团外开展存、贷款投资业务。加强对同业拆借期限、用途的管理，严禁将拆借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跨年度使用，将股票、债券等社会集资纳入全社会信用计划，严禁企业集资扩大固定资产贷款。银行稽核部门加强对贷款限额、投向和贷款效益的稽核检查。

3. 清理企业的多头开户，整顿结算秩序。为改变企业多头开设结算账户，弱化银行结算监督的现象，1990年、1991年各级人民银行组织各金融机构，按照“一业为主，适当交叉，尊重客户自愿”的原则和人民银行《关于清理整顿账户的规定》，对企业单位多头开户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要求企业选择一家银行建立基本账户。在此基础上，各级金融机构开始推行“开户证”和“贷款证”制度，并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同时，为配合清理企业“三角债”，整顿了结算秩序。中央银行稽核、检查了金融机构执行结算制度的情况，查处压票、无理退票、无理拒付、在结算纠纷中偏袒本地企业等违

章违纪行为；恢复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结算监督，促进结算秩序的好转。

4．金融立法。除前文已述的立法外，为贯彻治理整顿的决定，1988年9月8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人民银行制定了相应的《现金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并根据金融发展和经济改革的需要，草拟4项金融行政法规草案，报送国务院审议、制定20余项金融业务基本规章。1991年人民银行在抓紧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的同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条例和章程，并全面清理1949~1988年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废止了其中的641份。人行和各金融机构通过各类稽核，查处、处理了一批违章、违纪案件，使金融体系的法制建设逐步加强。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结合各地实际，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为加强宏观金融调控，稳定经济、金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为解决农村信用社亏损增加问题，1990年人民银行会同农业银行采取如下措施：对信用社的信贷资金管理由规模管理改为比例与规模相结合，适当放宽贷款规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由平均17%左右降到13%，对贫困地区的信用社还可降到10%，从1991年起3年内安排3亿~5亿元低息贷款等。

二、金融市场的继续开拓

1989年~1991年，同业拆借市场受治理整顿的影响，拆借量较1988年大幅萎缩；但有价证券的发行量逐年扩大，并于1991年试行金融机构承购包销部分国库券的发行方式；流通转让市场的试点继续进行且有所发展，外汇调剂市场的范围和形式也有扩大，金融市场继续开拓。

（一）同业拆借市场

1989~1991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建立了资金拆借中心，并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跨地区、跨系统、多层次的融资网络，拆借市场利率较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的紧张程度，成为宏观金融调控的重要依据。受从紧政策和贷款限额控制的影响，不少地区头寸较松，拆借量较1988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989年为2934亿元，较1988年减少2307亿元，1990年为2641亿元，1991年为2927亿元。

（二）债券市场

1989年至1991年债券（国债）的发行品种有所增加，发行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1989年国债除国库券、财政债券等品种外，年内新增特种国债（43.7亿）和保值公债（87.43亿）两个品种；在发行方式上，继1990年部分国库券通过证券市场发行成功后，1991年国库券发行采取承购包销方式，由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等58家金融机构（承购包销对个人的25亿元国库券）和各地财政部门承购包销全部国库券，彻底取消行政摊派发行。全年国库券发行计划由年初的10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实际发行199亿元，较上年增加114%。

债券转让市场继续开拓。1989年债券的转让新增了国家建设债券、重点企业债券、基本建设债券、企业短期融资券4个品种，使债券转让的总品种由4个增加到8个。1990年新增保值公债这一交易品种。同时，国库券的二级转让市场继续放开，从1990年开始，凡上年（含上年）以前发行的国库券均可在一些经济发达城市的证券交易机构上市转让；大中城市的债券二级市场进一步活跃。1990年债券交易量达118.469亿元，是1989年的5.2倍；1991年则高达415.9亿元，是1990年的3.5倍，其中国债交易额为370亿元，国库券交易额为339.5亿元，分别为1990年的3.18倍、3.23倍。

（三）股票市场

1989年股票发行6.62亿元，流通转让2315万元。上海等地在股票发行和流通市场初步形成的基础上，注重股票发行的规范化。如，在部分股份制企业实行税利分离政策，（飞乐音响公司）发售无偿增资股票，改变股票为保本息分红的“储蓄”的片面认识，采取联合承销团的形式发行股票，溢价发行企业股票等。1990年各地股份制试点企业新发行各种股票4.28亿元，累计发行45.9亿元。年内在上海、深圳两市进行股票上市、转让的试点，交易量达18.12亿元，是1989年的近900倍。为加强股票市场的集中统一管理，保证股份制与股票市场试点稳步进行，人民银行规定，股票的发行和上市交易只限在深圳、上海试点，其他地区一律不再批准发行和上市新的股票；深、沪两地股份制企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需报人总行批准；股份制企业的内部股票发行，一律由人行一级分行审批，报总行备案。在提高市场效率方面，建设银行建立证券信息网络，并于4月24日正式开通传递信息。12月5日，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在北京正式开通，拥有会员18家。1991年全国各地股份制试点企业发行各种股票29.5亿元，其中向社会公开发行27.7亿元。12月经全国股票办公会议审查批准，上海、深圳分别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1亿元人民币、2.85亿元人民币，开始通过股票发行吸引外资。与此同时，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额猛增，全年股票转让交易额达45.15亿元，是1990年的2.5倍。

1989～1991这3年，股票、债券的发行总量及股票、债券的发行量分别为1511.36亿元、40.42亿元、1470.94亿元，较1985～1988年同期分别增长34%、15%、35%；股票、债券的流通总量及股票、债券的流通量分别为619.15亿元、63.50亿元、555.6亿元，是1985～1988年同比量的22.73倍、373.53倍、20.53倍。

（四）外汇调剂市场

1989年，外汇调剂市场继续发展，厦门、福建、海南等省市、经济特区相继开办不同类型的公开外汇调剂市场，如海南省“价格、时间、政策三位一体模式”等；上海市则从交易主体的参与形式（会员制）、成交方式（单一成交价竞价买卖）和结算制度3方面，探索了培育和发展外汇调剂市场的新路。全年调剂成交金额达85.66亿美元，较1988年增加36.8%。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调剂也发展迅速，全年达15.72亿美元。1990年，针对外汇调剂市场持续供大于求、调剂价格稳中有降的情况，外汇管理部门扩大了调剂外汇的用途，采取措施调节供求关系，保护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支持

重点用汇和生产正常用汇。同时，一些地方建立新的公开市场，原有的公开市场进一步完善，改单一竞价成交为复数竞价成交，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到年底，全国已有90多个城市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外汇调剂规模达131.64亿美元，较1989年增长53.68%。1991年的外汇调剂市场配合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外汇调剂范围。12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外汇和境内居民因私出境用汇参加调剂的暂行办法》的颁行，使得国内居民的外汇开始进入外汇调剂市场，外汇调剂总额为204.5亿元。1989～1991年这3年间，外汇调剂累计达421.8亿美元。

（五）中介机构及其组织形式的发展

1990年，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有46家，1991年则发展到59家，拥有证券业务部300多家，大批代办点遍布全国城乡。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及所进行的股票上市转让试点，使得初具规模的证券市场日趋兴旺，交易活跃。部分地区的人民银行探索建立地区内多家金融机构参加、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会员制的有形“金融市场”。人民银行1990年10月成立、12月5日开通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于1991年11月4日正式并网运行，会员由18家发展到60多家。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管理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此外，工商银行1989年10月15日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牡丹人民币信用卡业务。票据承兑贴现市场也有所发展，1990年各地签发商业票据近300亿元，承兑贴现238亿元，中央银行再贴现85亿元。

三、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继续探索

1989～1991年，各专业银行在实行企业化经营过程中，除继续推行行长负责制（或行长任期目标管理）、完善多种形式的目标经营责任制和单项承包责任制外，还进行了多项探索。

（一）财务包干和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

农业银行继续试行对财政部的财务大包干和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增加国家宏观调控任务和考核指标，如宏观调控指标（不突破贷款规模、不突破乡镇企业贷款规模、按时足额清算联行汇差等）、资金效益指标、利润指标、廉政指标。将宏观指标考核分成比例，由1988年的25%提高到30%。同时，其他各行继续完善总分行职能转换、行长负责制、各种责任制等已出台的改革措施，纠正不当做法。

（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试点

1989年，交通银行继续完善其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核心的自控体系。工行广东省分行在1988年实行1年的基础上，对辖区二级分行正式进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为此制定《资产负债管理办法》，规定了存贷比例（70%～75%）、拆入短期资金比例（上年存款增加额的25%～40%）、固定资产贷款比例（15%）、单个企业和单个项目贷

款比例（8%，或绝对额1亿元内）等管理比例。1990年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行探索在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制定信贷基金占贷款的比例、长期贷款占贷款的比例、自有资金与资金运用的比例等，以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避免超负荷经营，逐步使银行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合理化，并建立相应的考评办法，增强专业银行的自我约束能力。到1991年年底，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已从1989年试点的广东省分行推向山东、辽宁、河北、四川、浙江等十几个省分行。

（三）完善信贷管理制度

1989年部分地方的专业行推行对企业的信用评估集体审议，领导决策，三级审批的贷款制度。1990年、1991年，为提高贷款的使用效益，减少贷款风险，各家专业银行进一步推行“审贷分离”和“三查分离”管理办法，完善贷款管理的制约机制。建设银行总结并推广“审贷分离、分级分段管理”的贷款审批制度，使项目评估、审查职能从贷款业务部门中分离出来，把项目管理分成项目评估、贷款承诺、实施管理三个阶段，并按照不同阶段的工作性质，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实行分段、分级管理。工商银行探索贷款审、贷、收分离的途径，在全国20多个省区293个地县行处制定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为内容的“三查分离”制度。在推行“三查分离”制度时，采取两种形式：（1）部门分离，即贷款的审、贷、收三个环节由贷款调查部、贷款审查部、贷款检查部3个平行的部门负责，实行部门分离；（2）岗位分离，即贷款“三查”的三个环节，在信贷部门内部由不同的信贷员操作，实行岗位分离，责任到人，交叉审查。此外，部分银行实行全员风险抵押制度，以减少风险贷款的发生。

（四）积极开拓新业务

中国银行开办货币期权买卖和代客调期业务。工商银行于1989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办了牡丹人民币信用卡业务。此外，大额可转换定期存单的发行也有很大发展。

第三节　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与问题

一、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

7年来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确立和充实了调控手段，加强并完善了宏观金融调控

1985年，新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施后，中央银行确立并充实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即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和差别利率等调控手段，新增了、最低备付金比例作为调控手段，并根据经济和金融运行情况适时调节。改革了利率

体系和利率结构，缩小了专业银行与中央银行贷款利率的利差，实行加罚利息制度，对部分专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政策；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7次调整存、贷款利率，并对流动资金贷款按效益高低和产业政策实行差别利率和优惠利率，体现了“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信贷政策。在利用汇率杠杆上，7年来先后4次调整汇率，使人民币汇率接近调剂市场汇率；1991年改革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加强、完善宏观金融控制方面，改革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实存实贷”的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划分中央银行与各专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并于1987年对中央银行贷款实行期限管理，打破了信贷资金的“大锅饭”，初步实现中央银行贷款从供给型向借贷型的转变。在1985年编制国家综合信贷计划，并先后于1985、1987年正式纳入建设银行、金融信托机构信贷计划的基础上，1990年中央银行编制了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内的全社会信用规划，分4个层次进行监控；编制和下达包括国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外汇信贷计划在内的国家银行外汇信贷计划，将借用国际商业信贷计划和境外拆借短期资金总规模都纳入计划管理，完善了计划体系。外债监测系统和外债登记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加强了借用外债的管理。通过建立银行稽核制度，开展信贷、利率大检查，清理、整顿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和金融性公司，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理》、《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城市信用社管理暂行规定》、《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违反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等条例、法规，加强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保证了金融秩序的基本稳定和金融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7年来，中央银行初步建立了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调控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在加强信贷计划等直接调控的同时，加大了利率、汇率等经济调控手段的分量；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减少行政管理手段，增加间接调控手段，调控手段得以改善和完善，增强了执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二）金融市场稳步开拓，发行市场初具规模，流通市场逐步扩大

1985～1991年，以同业拆借市场为主的短期资金市场，以债券为主的长期资金市场发展迅速，1991年深圳、上海两地还发行B种股票3.8亿元，吸收外资2.4亿美元；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流通市场，从1986年起步，在1988年国库券二级市场开放后得到快速发展，交易品种增加；作为配套改革措施的外汇调剂市场，在1988年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加快外贸体制改革后，发展迅速。通过7年的开拓和培育，以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发行、转让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初步形成，在调剂资金余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同业拆借（1986～1991年）累计达16343亿元。各类债券、股票发行2638.24亿元，1991年年末余额1747.17亿元，其中国债（国库券）、金融机构债券、企业债券、股票分别累计发行1307.88亿元（803.15亿元）、597.94亿元、657.00亿元、75.42亿元，占比分别为49.57%（30.44%）、22.66%、24.91%、2.85%；债券、股票流通转让量累计为646.43亿元，其中，国家债券（国库券）、国家投资公司债券、金融

债券、企业债券、股票的累计流通量分别为531.58亿元（489.21亿元）、2.51亿元、9.55亿元、39.11亿元、63.68亿元，在流通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82.23%（75.68%）、0.39%、1.5%、6.1%、9.9%。大额可转让存单累计发行、兑付、转让分别为1131.44亿元、701.19亿元、1.69亿元，1991年年末余额为430.25亿元。全国外汇调剂（1988～1991）累计成交484.44亿美元，调剂规模年均增长48.61%。

（三）积极发展多种金融机构，探索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

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1985～1991年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发展迅速。7年间，恢复并建立了交通银行等3家综合性银行，发展了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区域性银行，试办烟台、蚌埠住宅储蓄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开办邮政储蓄业务，金融信托投资机关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到1991年年底，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情况是：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123356个，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3383个，农村信用社57927家，城市信用社3518家，金融信托投资机构375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18家，证券公司及分支机构59家，证券营业部300余家，邮政储蓄网点18738个。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合作的金融体系，基本适应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

在积极、稳健发展银行和多种金融机构的同时，专业银行于1987年开始业务交叉和适度竞争，并积极探索企业化经营的途径。1985～1988年，企业化经营的探索主要从开拓新业务、简政放权、利润留成、推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及单项责任制和行长任期目标制等方面着手，并试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建立自控体系，试点担保、抵押、贴现贷款，完善贷款制约机制。1988年后的企业化经营，则主要是继续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实行信贷资金“审贷分离”和“三查分离”制度，建立专业银行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管理体系。专业银行的企业化经营，初步实现了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银行新业务的开展和金融市场的开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1985～1991年，我国金融业在积极对外开放，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也取得进展。1986年3月，我国作为中国惟一合法代表加入亚洲开发银行；1987年我国加入万事达卡和维萨卡这两个国际信用卡组织；1988年加入新的世界黄金组织——伦敦黄金市场协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不断加强。到1991年年底，中国银行在港澳及海外的分支机构达15649个，其中分行23个、支行316个、办事处431个；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也由1985年前的中国银行1家扩展到1991年的180多家。同时，29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我国14个城市设立代表处218个，其中外资银行178个（含分行41家），合资银行3家，保险公司16家，证券公司14家，并于1988年5月经人民银行批准，试办人民币业务。中国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B股），组织银团贷款、商业贷款，签订政府信贷协议，出口信贷，

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利用外资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到1991年年底，我国外债余额为796.27亿美元，外汇储备为426.25亿美元。

二、存在的问题

1985～1991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是按照"七五"计划关于"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微观搞活"的总要求进行的。据此要求，宏观上加强和完善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微观上促进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和金融市场的开拓，成为本时期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但从7年的改革历程看，这3个方面的发展同期而不同步。搞活专业银行（如放权、利润留成、承包责任制）和开拓金融市场（如通过股票债券、同业拆借融通资金），同工商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合拍，有利于调剂余缺、融通资金，银行基层行处、地方、企业积极性提高，易于而且乐于推行；同时，地方、企业、银行基层行处又实际形成一种片面的"思维定式"，认为加强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等于"重走老路"、"阻碍改革"，因此7年来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探索和金融市场的开拓进展较大，而加强和完善宏观金融调控进展较慢，在1988年近乎失控。"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发展不平衡与矛盾突出，反映了金融体制改革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总体乏力

1985～1991年，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几乎年年有"紧"，如1985年和1989～1991年的"紧缩银根"、1986年的"稳中求松"、1987年的"紧中求活"、1988～1991年的"控制总量，调节结构"等。但执行效果7年来大多是借"紧"、"控制"之名，行"松"、"扩张"之实，货币和信贷处于膨胀和失控状态。1985～1991年贷款最高、最低年增长率和7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8.5%（1986年）、16.8%（1988年）和21.07%，货币发行最高、最低年增长率和7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7.81%（1988年）、-69.91%（1989年）和36.56%；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均为8.4%。信贷、货币的年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在历年的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是一紧缩，地方、企业就叫唤，下半年银根便放松，紧缩总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各年第四季度贷款的增速平均在30%～50%之间；即便在3年治理整顿期间，贷款年均增长率仍近20%，紧缩政策仅在1988年第四季度和1989年年初得到执行，并从1990年开始多次降低各项存、贷款利率。除货币与信贷外，中央银行在控制国有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控制银行信用与社会集资等其他信用方面的能力也不均衡。

造成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双重货币政策目标（稳定币值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币值稳定和高通货膨胀为代价的，经济运行呈现（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双高"（前4年）、"双低"（后3年）而总体为双高的明显特征。7年年均GN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4%、8.9%，其中1988、1989年高达18.5%、17.8%。同时，中央财政（借款与透支）、地方政府的干预过多，专业银行争相竞争有利业务、留下农副产品收购等资金"硬缺口"的"倒逼"机制，以及人民银行直接发放"开发性贷款"、"老少边穷地区贷款"和在治理整顿初期发放的"点

贷”、“安定团结贷款”等，也是宏观调控乏力的重要原因。上述情况说明，要真正加强和完善宏观金融调控，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稳定币值”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并进一步逐步理顺中央银行与财政、地方政府、专业银行的关系，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

（二）金融市场基本是发行市场、行政市场，发展与规范的矛盾突出

到1991年年底，我国形成了以同业拆借和债券发行、流通为主体的金融市场，发展速度较快。1986～1991年同业拆借累计达16343亿元，较同期新增贷款的总和（12310亿元）高出33%，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24529亿元）的比重为66.6%。但是，同业拆借市场仍为地方性、区域性的市场，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资金“画地为牢”现象严重。股票、债券的流通总量为646.42亿元，占发行总量2638.24亿元的比例为24.5%，其中，国库券的发行、流通量占比分别为30.44%、75.68%，金融市场基本仍是发行市场，国库券市场占据主体地位，同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国债市场，股票局限在上海、深圳两地发行、流通，为区域性市场。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并没有相应跟上。1986年银行同业拆借发展为金融同业拆借后，不规范的问题显露。本为调剂临时资金余缺的“头寸市场”，演变为“短借长用”、弥补信贷资金缺口的变相借贷市场，作为拆借主要来源的中央银行短期贷款变为变相的再贷款；非金融机构也参与拆借；同时地方行政和专业银行上级行处行政干预过多。在利率、汇率双轨制下，拆借成为“资金倒爷”、“外汇倒爷”牟取非法利润的手段，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股票市场经历了先抑后扬再抑的发展过程，1991年表现尤为明显，股票的供不应求，以及投资者金融意识的淡薄与股票投资的盲目，一度导致股市的大起大落。

（三）“两种职能”、“两种业务”不分，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进展不大

1985～1991年，专业银行探索了企业化经营的多种途径。但是，由于专业银行“政企不分”，同时承担着经济调控职能和企业化经营职能，政策职能与商业职能合一；加之，业务经营中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合一，企业化经营的总体进展不大。这两个不分，在3年治理整顿期间，表现尤为明显。如1988年第四季度的“十不贷”规定：“各专业银行也承担宏观调控的责任，决不能因为实行企业化管理而影响和削弱这方面的职能”；“专业银行既要承担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和国家政策性贷款任务，同时，又要进行企业化管理。”1991年拟定的“八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专业银行主要是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承担经济调控职能，同时进行企业化管理，实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两个不分，使得专业银行在企业化经营中，对有利的业务争先恐后，对无利的业务相互推诿，商业动机占据主导，而将农副产品收购的等资金硬缺口留给中央银行；同时，由于行政干预过多，政策性业务过大，加之利率倒挂，银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短期效应和约束不严，专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仅1988年便达10%，亏损面扩大，企业化经营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实现“政企分开“（将政策性职能与商业性职能分开）、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开，成为深化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迫切需要。

第十七章 科学技术发展与科技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的科技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开始扭转了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局面，逐步转向了科技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1985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提到了重要工作日程上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1985 年至 1991 年间，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科技发展的计划，取得可喜成果；科技体制改革在艰难中举步，在新旧两种体制的摩擦、碰撞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科技进步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在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第一节 发展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与规划

1985 年以后，大力发展科技事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已逐步形成共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科学技术事业逐步形成了分层次和多项计划的全国性发展规划。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深化

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化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自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提出以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此思想分别有过论述。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的背景下，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于 1988 年鲜明地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1989 年，他在谈到经济发展时又一再指出，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1991 年，他进一步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为中国科协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邓小平同志关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科技发展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为我国制定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各项科技政策，实行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定的思想理论基础，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提高到了国家重要工作日程上来。198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由此确立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项方针正确处理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理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生产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技术结构的确定与选择，以及正确对待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和方向，开创了我国科技工作空前活跃的新局面。1987年，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在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关系民族振兴的大事"，并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1989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题为《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国的历史性任务》的重要讲话。讲话中指出："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理论的发展和深化，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科技进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科学技术作为强大的生产力，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重要支柱。只有紧紧依靠技术进步，我们才能在国际竞争中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为了使经济建设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使科技战线更自觉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在1985年至1991年间，国家坚定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对科技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部署。

从宏观上讲，科技工作的布局，大体上可分为3个层次，6大计划。第一层次，是直接为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工作，包括进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重大技术攻关，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的技术进步，提高工业、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第二层次，是新兴技术和高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争取在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内有所突破，促进新兴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第三层次，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科技工作的这3个层次，都是振兴经济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也反映了科学

技术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为了充分发挥不同层次的作用，国家提出了以6大计划为中心的战略部署。

（一）重点科技攻关计划

选择一批国民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攻关，对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1982年起，国务院有关部委共同制定了“六五”和“七五”两个5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计划。“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计划共选了76个项目、348个课题，并于1986年4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共分解落实近4000个专题合同，有近15000个单位，包括10万余名科技人员参加。

“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是以科技长远规划为基础，与“六五”攻关计划相衔接而安排的。主要内容分4个方面。一是行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和装备。在农业方面，着重研究种子改良，使我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的品种更新换代。在工业方面，总的要求是追赶国外80年代水平，结合对引进的国外成熟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发展，为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提供技术和装备。二是重点新产品的开发。这是针对国内市场的需要而安排的攻关课题，主要是轻工、纺织、农产品的加工转化、金属和化工原料的深度加工、下游产品的开发等。三是新兴技术领域的开拓。新兴技术领域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在新材料方面，主要是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及高温结构陶瓷等。生物工程方面，着重是把一批研究成果转化为新产品，同时加强基因工程等研究。四是社会发展方面的科技攻关。对资源、生态、环境、医疗保健等社会发展方面的科技工作要适当加强。

（二）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80年代以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3月，一批科学家向中央提出了发展中国高科技的建议，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这一发展高技术的建议，被称为“863”计划。1986年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国务院有关部委组织了数百名著名专家，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论证，于同年年底完成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制定工作，并于1987年3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实施。

根据我国国情，将集中一部分精干的科技力量，拨出一定数量的专款，在今后十几年内，选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激光技术7个领域作为重点。通过《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组织实施，力争达到以下4个目的：(1) 积极跟踪国际高技术发展的动向，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在某些有一定优势的项目上力争有所突破。(2) 培养、造就一批新一代的高水平科技人才，使学科配套，结构合理，有旺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能力。(3) 将开发成果尽快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为改造传统产业和建立新兴产业服务，推动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等在20世纪末向现代化过渡。(4) 为2000年后我国形成具有一定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为国民经济向更高水平的稳定持续发展准备后劲。

根据上面7个优选领域，确定了15个主题项目，先后分解出100余项专题，近千

项课题。直接参加的科研单位有数百个，科技人员1万人以上。为充分发挥专家在实施高技术计划中的重要作用，成立了7个领域的专家委员会。这些委员的平均年龄52岁，最年轻的才28岁。

(三) 火炬计划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为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要在全国选择若干智力资源密集地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1988年，国务院在总结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且相应地给予18条优惠政策。1988年8月，国家科委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以促进高新技术向产业转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出台。

实施火炬计划的主要目的是：(1) 使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等科技计划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2) 使全国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具有较强技术开发力量的大中型企业、军工企业以及数10万科技人员参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创办高技术、新技术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我国的科技优势。(3) 使我国在国际高技术产品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4) 火炬计划确定的近3年的目标是：培植创办2000个高技术企业，开发2000个高技术产品，其中70%形成规模经济，30%出口创汇。

实施火炬计划的方针和具体措施主要是：(1) 火炬计划要瞄准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高技术及其产品一开始就要带有国际性，必须走国际化道路。(2) 火炬计划是以科技界（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科技开发公司）为主体，建立技工贸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实体。科技产、业实体可以是全民的，也可以是集体的、个体的、合资的、外资的等各种形式。(3) 火炬计划对产品的要求是：技术高、效益高、能出口。但针对目前国内情况，不一定只限于高技术，也可以是新技术产品。起步时要强调产品投资少、周期短、效益好，以便尽快为火炬计划的发展积累资金。(4) 火炬计划主要靠贷款。少数部分拨款仅用于支持一些服务性项目，如创业服务中心、人员培训等。

(四) 星火计划

以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振兴地方经济为目的的星火计划，1985年下半年开始试点，1986年在全国付诸实施。星火计划对我国农村发展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开辟了广阔前景。其次，为探索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再次，乡镇企业对老城市和大城市的改造起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星火计划的目标就是用科学技术引导农民建立新的产业，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走农村就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星火计划作为80年代第一个促进农村发展的科技计划，具体任务有3个：为农村开发、推广适用技术成果和技术装备；在农村建立科技先导型示范企业；在农民中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五) 基础研究计划

基础研究计划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第三个层次。在推进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同经

济结合的过程中，突出地强调了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但对基础研究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并不要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也出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是按照3个层次逐个部署。

（六）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该计划于1990年正式出台。其宗旨是：为科技成果向生产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推人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动员成千上万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力量在农村、工矿企业中大范围、大面积组织实施，形成规模效益，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技术水平，特别是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农业规模经济效益增长。

除了上述6大科技计划外，还有“丰收”、“燎原”科技计划，都是80年代以来，经邓小平同志倡导，党中央制定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陆续开始实施的，是科技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重要内容，是科技改革的大动作。

第二节　科学技术体制改革

一、原有科技体制的主要弊端

我国原有的科学技术体制是在科学技术自身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需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原有的科技体制已在许多方面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其主要弊端是：

（一）在科技宏观管理方面

原有的科技宏观管理系统的主要弊端：（1）封闭性。即管理对象是狭义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管理功能只注重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决定因素的功能开发，导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脱节。系统内部的科学管理、技术发展管理和生产技术管理均自成体系，互相脱节；系统外部与经济、社会管理脱节；国内科技管理与国际科技发展脱节。（2）集权性。科技宏观管理功能微观化，造成管理层次错位，职责不分。如政研不分，谋断合一，战略决策与业务决策合一，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合一。（3）行政性。科技管理主要靠会议、文件、报表、汇报、批条、评比等行政手段来组织科技工作，通过人、财、物的分配权，直接控制、干预微观科研组织结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活动的全过程。

（二）在科技投资体制方面

国家以科技“规划——计划”的方式安排专项经费发展科学技术。科技投资费用的来源主要靠国家拨款，在科技经费管理方式上，根据国家和地方两级科技计划，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进行预算、决算。这种投资体制是“供给制”式的。其弊端是：割断了

社会各方面，尤其是企业对科技进步的投资渠道；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不能直接受到经济和社会需要的制约和检验，不利于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和协调；经费使用上统得过死，束缚了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政管理层次过多、繁杂，影响科技经费使用的时效；指令性的分配方式，致使接受经费单位缺乏竞争性，影响科技投资的效益；单纯研究型的投资，不利于科技成果及时地向生产领域转移和应用；无偿使用科技经费，使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从事科研工作不讲究经济效益，忽视科研成果的价值规律，形成科研单位吃国家的“大锅饭”，科技人员吃科研单位的“大锅饭”的局面。

（三）在科研组织结构方面

在科研组织结构方面，我国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科研机构是按条块、部门设置的，是政府部门的依附物。其建制和布局完全与经济系统相脱离。科研单位只有一条对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垂直联系，没有横向面向社会为生产企业服务的联系渠道。科研与生产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两个系统双轨运行，形成科研、生产“两张皮”。

（四）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方面

原有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的主要特点：(1) 高度集权，不分类别，实行统一管理；(2) 用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调配人员；(3) 国家行政部门直接控制微观层次，缺乏间接的社会调节机制。其主要弊端是：人才管理如死水一潭，缺乏活力；条块分割，部门壁垒，人才为单位部门所有，受编制、工资、户籍等关系制约，一次分配定终身，一般很难流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里，人才积压与人才缺乏的状况并存，人才资源很难得到合理的配置。

原有科技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说明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就不能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科技同经济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的新体制；难以推动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改革的核心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二、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存在的问题

1985 年以来，我国的科技体制从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和科技人员管理制度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改革。首先从科技系统内部的机制和格局改革起步，逐步向农村、企业及社会科技进步的广泛领域深入推进，在做法上，以运行机制改革为重点，带动组织结构的调整和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的改革。先后进行了开放技术市场、改革科技拨款制度、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横向联合、推动科技长入经济等工作，实施了科学基金制、技术合同制、经费包干制、所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经济核算制、招标制、聘任制等管理制度，制定了一系列财政、金融、税收配套政策。

（一）运行机制的改革

1. 科技拨款制度改革。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科技拨款改革实施6年来，在转变科技人员的观念，促使科技运行机制转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一开始就明确要分两步走，前两年步子要小一些，主要是普遍起步，完成划转和分类工作，理顺关系，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打好基础，摸索经验；后三年适当加快改革步伐。

1986年，对国务院归口部门和省市两级直属的全部2523个科研机构，按其科技活动的特点，实行了技术开发类、技术公益类、基础研究类不同类别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实行了按合同制、包干制、基金制等新的拨款方式。对技术开发类研究所，事业费削去了10%，对从事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科研机构，运用科学基金的方式，择优支持有重大应用前景和有可能取得学术突破的研究项目。1986年全国55个部委的研究所，通过面向经济建设，面向社会发展的需要，共获得纯收入达4.5亿元，相当于事业拨款的29.8%。全国55个部委的技术开发类研究所，获得的纯收入为3.4亿元，相当于事业费拨款的111%，其中，技术性收入占纯收入的80%（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收入占65%，中试产品收入占15%）。

1987年和1988年是科技拨款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的两年，运用利益分配激励机制，及时发布和实行减拨事业费幅度与奖金税起征点挂钩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拨款改革进程。1987年原计划综合核减中央部门科技开发型科研单位事业费25.9%，由于政策的推动和部门的积极响应，核减了40.6%，改革有了良好的开端。1988年取得了中央部门科技开发型科研单位综合核减事业费53.2%，地方核减事业费约50%的成绩。

1989年和1990年，是拨款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的两年，也是国家处于政治、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改革面临着考验，挑战和转机同时并存。经过不断的努力，特别是1989年下半年的艰苦工作，科技拨款改革得到了财政、税务、金融等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取得了“两项基金”（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新计征法、中试产品免征所得税、大幅度增加科技贷款制度、实行科技周转金政策等一系列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政策性突破，科技拨款改革出现了新转机。1990年，拨款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成功地取得了中央部门75%的科技开发型科研单位较平稳地实现事业费减拨“到位”，17个部门实现全行业到位；地方有78.3%。的科技开发型科研单位事业费平均减拨比例高于83%，与减拨“到位”目标只差半步之遥。在此基础上，1991年，中央级科技开发型科研单位较平稳地实现了全部“到位”的目标；地方有80%左右省市和75%至80%的科技开发型单位实现了减拨“到位”。

2. 技术市场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呈现活跃的景象，技术成果作为商品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技术市场也随之形成并逐步完善。

第一，技术交易额逐年上升，交易规模不断扩大。1984年全国技术转让成交额只有7.2亿元，到1985年，已上升到23.7亿元。1986年达20.6亿元，1987年达33.5亿元，1988年达72.4亿元。大中型企业积极进入市场的局势已开始显示出来，1989年，在全国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仍大幅度增长，达到81亿元，1990年，

技术贸易成交额达75.2亿元，1991年达94.8亿元。据1991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贵州、西藏）的统计，共签技术合同20.7万份，成交额较前一年增长25.36%，比成交额最高的1989年还增长15.57%，成交额超亿元的有北京、辽宁、上海、四川、河北、江苏、山东等17个省市，北京居首位（22.43亿元），净增值最高的是上海，山西第一次跨入亿元行列。若以行政区划来排列，增长率依次为华东（44.29%）、东北（43.36%）、西北（25.32%）、中南（21.93%）、华北（12.20%）和西南（13.16%）。此间，单项技术的成交额也在增大，1986年平均为2.36万元，1989为3.11万元，1991年为4.55万元；技术交易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所占的比例，1989年占59%，1990年占56.17%，1991年占63.86%。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种所有制的经营体系在全国初步形成，1988年共有技贸机构1.8万个（从业人员44.2万），1989年共有1.97万个（从业人员36万），1990年共有2.07万个（从业人员53.9万），1991年共有2.11万个（从业人员53.17万）。由于不断重视人才培训，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日趋合理，智力、层次大有提高。

第二，技术交易更加活跃，贸易方式及途径多样化，促进了技术与经济的结合。

（1）技术交易会层出不穷，水平和质量逐步提高。1990年我国共举办各种层次、各种形式和各种行业的技术交易会656次，展示技术项目9.51万项，成交额26.10亿元。1991年举办交易会456次，展出项目12.5万项，成交额35亿元（占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36.96%），并且交易会越来越重效益。为提高合同成交率，交易会增添了许多新的服务内容：如组织公证、鉴证；组织金融、物资、税务、工商、外贸部门以及技术合同认定机构到现场办公；采用难题招标形式，推动卖方提高展出项目质量；有针对性的牵线搭桥，撮合有关双方项目洽谈。

（2）边境技术贸易有良好开端。开业3年的南方展销中心，面向东南亚和港澳台，第一年技术交易额为3.5亿元，1990年为12亿元，1991年为14亿元，已有21个省市在该中心设立代理窗口。1990年开业的北方展销中心，已向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广泛开展业务，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3）技术贸易从中心城市向县乡延伸，促进了科技兴农。湖南、江苏、河北、江西等省的许多县科委，注重运用市场机制把农业技术和社会化服务引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引入农村的技术项目成交额已由1988年的2.88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5.43亿元。这表明我国农业技术商品量正在增长。

（4）大中型企业的技术交易逐步走上轨道。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进步至为关键。大中型企业既是技术市场的买方，又是仅次于科研机构的第二大卖方，它们在技术转移中有着双向的功能。同时，增强其参与意识，牵动这一“龙头”加入技术市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据统计，1990年工业企业购买技术13.65万项，成交额49.86亿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项目及成交额的71.3%和67.9%，而其中大中企业又占工业企业的51.2%和65.5%。1991年工业企业购买技术13.2万项，成交额60.54亿元，占总成交额的63.86%，而大中企业又占工业企业成交额的66.8%。我国大中企业相对集中了较好的技术装备和全国70%的工程技术人员，它们理应成为我国技术市场的主体。

(5) 技术转让走向世界，涉外技术贸易额逐年增加。我国的技术出口从1985年的3120万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9.8亿美元，增加了32倍。并且国家科委还决定了从1990年起，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成为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所属亚太技术转让中心（APCTF）技术信息网的中国归口联系单位，负责该组织在中国的有关业务工作。

第三，技术市场管理体系及法规基本形成，技术交易逐步规范化。按国家科委要求，截止到1991年年底，全国已有44个省市建立了技术市场管理机构。另外，市地级建立了252个、县市级建立511个、乡镇级建立115个。此外，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也相继建立了行业技术市场管理机构，促进了行业技术贸易的发展。技术市场法制建设在1985至1991年间不断得到完善。

3. 建立和实施自然科学基金制。建立和实施科学基金制，是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的又一项内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是科学技术的重要组织部分，对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广泛、深远的作用。为了加强科技发展战略的纵深配置，保证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稳定发展，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充实科学贮库和人才贮备，1986年年初，国家开始建立和实施自然科学基础制，基础研究工作逐步从部门封闭状态走向“开放、流动、联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1991年基金额达1.45亿元，累计投入经费6.3亿元，各类专家委员会不断充实和完善；60多个国家级实验室大部分已经开放，实行了客座研究制度。1991年年底，投入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约10万人，比1985年增加了50%。“七五”期间国家投入11.1亿元用于基础研究基建和设备，国家科学基金和地方部门科学基金投入7.3亿元。此外“863”计划投入高技术研究领域已达10亿元。同时，我国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不断增长，国际公认的4个检索工具收入我国的科技论文，1987年比1985年增长46%，1989年达到12221篇，比1988年增加3.1%。

（二）组织结构的改革

我国科研组织结构的改革，从1979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如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实行预算包干制、科技责任制，削减事业费，实行技术合同制、所长负责制、科研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所有这些都是侧重于各类科研机构内容管理机制的转换。1987年1月，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推进科研设计单位进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规定》，由此，各类科研机构改革的重点从内部管理机制的转换，开始转向外部组织结构的调整。它们根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以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方向，在国家相应的宏观政策指导下，以各种方式长入经济，积极创办各类经济实体，开始了分流重组的进程。各类科研院所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寻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最佳位置。在这个“寻找”过程中，各类科研机构积极创办各种形态的技术经济实体，采用各种方式长入经济之中。

1. 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出现了一批科研生产联合体。许多科研机构与企业互相承包、租赁、参股、兼并，实行联合经营，或进入企业、企业集团或发展科研型企业等。据统计，1988年全国已有361个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比1987年增加39%，有的发展成为中小企业或乡镇企业技术中心；有的以技术、资金入股，与企业合

资经营；有的以科研机构牵头，吸收企业组成科技先导型企业集团，有近18%的科研机构承包、领办或兼并了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科研生产联合体发展到10000多个。截止到1991年，科研机构已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有400多个，有近50%的科研院所拥有自己的中试实验和生产场所，科研单位创办的技术经济实体近4000个，其中中外合资的占10%左右。一大批科研机构通过技术转让、成果转让、工程承包、咨询服务等多种途径面向经济建设，不仅使经费收入大幅度增加，科研条件得到改善，而且走出了一条能够充分发挥自我优势的发展道路。

2. 集体、个体、私营等民办科技机构发展迅速。民办科技是科技体制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在改革中孕育，在改革中发展。据调查，截止到1991年年底，全国民办科技机构已发展到19000多个，其中集体性质的14000多个，个体的3000多个，私营的1000多个，从业人员近4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约22万人。民办科技机构坚持了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灵活运行机制，保持了旺盛的发展活力。

3.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198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1年3月又批准建立了2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赋予开发区相当优惠的扶持政策。兴办开发区，吸引了一大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大中企业前往开发区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到1991年年底，开发区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达3500个，并且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立最早的北京开发区，4年来已累计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00亿元，为国家缴纳税金4亿元，创汇1.33亿美元。

（三）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改革

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载体，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是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和增强国力的关键。世界经济、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努力创造一个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环境和条件，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1985～1991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传统的科技人员管理制度从浅至深、由点到面逐步地进行了改革。

1. 建立人才流动机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决定》对人才流动问题作出明确的政策规定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原有基础上，又先后建立了一大批人才交流机构，一大批科技人员冲破封闭、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束缚，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流向经济建设需要的地方，流向能够施展才干、创造成果的地方。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人才流向是合理的：一是由城市流向农村，由科研、教学部门流向企业；二是从单一的人才流向转向人才、技术、设备三者配套的流动；三是从单纯的人员编制流动转向注重各种形式的智力流动。

2. 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日趋增多。例如1989年，在全国1000万科技人员中，就有80多万名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兼职活动。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在促进智力流动、促进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针对社会上对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的不同看法和反映，国家在重申允许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的同时，加强了引导和管理，提倡有组织地进行业余兼职活动。

3. 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从1985年起，我国开始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选拔一批已在国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一段时间的科研工作。然后，按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选择工作单位，也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意愿分配工作。

4. 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1986年1月，我国由点到面地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这是改革传统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发展看，科技体制改革已开始跳出封闭的科技系统，以科研体制为主的改革已转向以推进国民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的改革。科技体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许多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悬而未决的旧矛盾，也有在改革深化中遇到的新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宏观管理改革滞后，宏观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的解决涉及经济、计划、财政、金融、税收、教育及产业部门等各方面，需要宏观管理部门共同努力。但部门利益的实际存在以及部门利益的形成机制之间缺乏协同关系，往往阻碍着部门之间相互主动协调配合，增加了改革措施配套实施的困难。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以“两张皮”的办法去解决“两张皮的结合”的矛盾情况。

2. 社会发展缺乏技术进步机制。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正处于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微观生产组织尚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动力、压力与活力，从而增加了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难度。一方面，企业的科技进步工作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加强，另一方面，独立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还未能有效参与各领域的主要科技活动，特别是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企业的技术改造、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技术攻关及新产品开发等工作。

3. 科技资源配置缺乏把握尺度。经过几年的改革实践，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三个战略层次业已明确，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层次的分配比例如何确定尚缺乏科学的测评依据，不仅增加了科技组织结构调整政策的选择难度，也往往使实际工作中的科技资源分配处于随机状态，出现向呼声高的方面倾斜的问题，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引起许多对改革的争论。

4. 政府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缺乏调控手段。科技工作的管理受条块分割而难以统一，造成技术、资金、物资分割脱节，研究开发工作低水平分散重复，中试环节薄弱等问题，影响了科技整体优势的发展和科技成果及时有效转化为直接生产力，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5. “面向经济建设”与科技自身发展的统筹兼顾不够。为了解决科技与经济长期脱节的问题，前一阶段的改革着重调整科技力量。侧重推动经济发展，而对于科研机构增强科研实力，保持科研后劲缺乏必要的引导性政策措施和投入措施。同时，国家科技经费开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下降，导致治理整顿期间，科研机构的经济承受能力下降，科研基建缺乏必要的物质保证。

6. 科技人才生活、工作条件以及梯队、布局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人员流动面临着严重困难。技术职务聘任制难以真正落实、科技人员待遇偏低、人员老化、知识老化、人才断层、人才外流、科技队伍结构布局不合理等问题，由于牵涉因素多，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对科研队伍的思想情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上述问题的存在，有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教育的多种因素，有待深化改革中综合解决，关键是要不断改善宏观管理，加强宏观管理部门的协调和协同作用。

第三节　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科技事业日新月异，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并且科研工作在许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技进步创造出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

一、几项重要科技计划的执行情况

（一）重点科技攻关计划

“七五”攻关共安排重点项目 76 项，签订 4964 个专题合同，参加科技人员共 13 万人，其中财政拨款 32 亿元，建成试验生产线 1339 条，工业试验基地 872 个，农林试验基地 2513 个。共取得科研成果 10462 项，其中有 58%的项目达到 80 年代国际水平。填补国内空白的有 4112 项，占 39.3%。国内领先的有 4167 项，占 39.8%。获各类国家科技奖 155 项，省部级奖励 1127 项，专利 334 项，累计获得经济效益 406.8 亿元。

在国家攻关计划的指导下，各省市还推进了自己的攻关计划。据对 32 个省市统计，共安排 2 万多个攻关项目，地方财政投入 28 亿元（占地方科技三项费用的 60%），取得成果 12000 多项，其中有 50%以上获省级以上奖励，取得经济效益 135 亿元。

“七五”科技攻关是在“六五”科技攻关的基础上层开的，它确定的 76 项重大科技攻关课题都是在经济建设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科技难题，这些难题攻克后，大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进国家重点建设顺利进行。如，重载列车成套技术中重载钢轨、牵引机车、自卸敞车、同步操作等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大秦重载铁路得以迅速铺就，并投入营运；“七五”期间培育成功 150 多个农作物优良品种，扩大了良种种植面积 0.5 亿公顷；增产粮食 75 亿公斤；我国生物医药科技工作者联合攻关研制成的乙型肝炎疫苗，已形成了年产 100 万人份的能力，为新生儿和高危人群实行乙肝计划免疫创造了条件。另外，“七五”科技攻关的很多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都注意引进、吸收、消化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从而使科技攻关项目显示出起点高、进展快、成果先进的特点。这不仅大大

加快了我国四化建设的技术更新步伐，而且也推进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如“七五”期间完成的2000门程控交换机已投人批量生产，万门程控交换机也研制成功，并投人试运营，四次群以下光纤通讯已形成工程总包能力。这些新型通讯设施的研制成功，使我国通信领域实现了技术更新换代。

（二）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全面实施以来，对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等5个领域、11个主题分解成1000余个研究课题，组织了共600多个单位参加，涉及1万多名科技人员，组建成8个研究中心，取得400余项成果，其中达到80年代中后期水平的成果52项，有20余项阶段成果已达中试水平，正向产业化过渡。有的成果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还有不少阶段成果，直接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例如，在已完成的“863”项目中，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我国粮食增产找到了新的途径。在自动化领域智能机器人的自动任务规划和路径规划系统的研究中，主体视觉并行匹配算法、机器人平移运动障碍检测与运动参考检测、机器人视觉平行处理课题中用神经网络方法研究的彩色图像压缩比等项目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在“863”计划的推动下，我国非线性光学晶体的研究和开发有了新的进展。偏硼酸钡、三硼酸钽锂晶体荣获“国际激光集锦”工业成就奖。我国独自发展的光电存储用的光子灼孔材料取得明显进展，在国际已首次实现在液氮温度下双光子选通光谱烧孔，性能均优于国外文献报道水平。“863”计划支持的实现汉语语音识别系统在法国高技术博览会上获大奖，再次证明我国汉语语音识别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外，“863”项目中在一些领域突破了关键技术，在国内高技术发展中起了先导的作用。

（三）火炬计划

火炬计划实施4年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1988年为43项，1989年238项，1990年298项，1991年301项，共880项。项目完成满产后年新增产值可达212亿人民币，年新增利税可达55亿人民币，年新增创汇约12亿美元，年新增节汇约11亿美元。投人产出比为1：4.1，利税率26%。已累计开发新产品2161种，实现新增产值75.3亿元，利税19.7亿元，创节汇5.1亿美元。

火炬计划项目的实施初见成效，具体表现在以下8个方面。

1. 加速了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火炬计划的实施，加速了一批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特别是一些高校的成果，当年就转化为商品，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

2. 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如“35吨/时循环流化床锅炉”，是济南炉厂在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与中科院紧密结合，把世界上先进的循环流化燃烧技术用于发电锅炉的改造，使发电锅炉实现了高效节能和保护环境两个目标。

3. 给企业带来了活力。如湖南益阳灯泡总厂在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新型汽车前照灯”产品带动下，由原来的一个只有15人的小厂，发展成拥有1000多名职工，产值3100万元，利税645万元的中型企业。

4. 填补了国内空白。如辽宁省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水泥窑外分解系列成套设备”，填补了我国干法窑外分解设备的空白，与传统水泥机械立窑相比，可节能20%，并提高了水泥的标号。

5. 替代进口产品。如山东淄博潜水电泵厂实施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5.5QD320型潜水油电泵”，已替代进口产品，满足了油田急需。

6. 出口创汇。如联想集团实施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联想286”，仅1990年就外销1000万美元，“联想386”外销216.3万美元。

7. 产品丰富了国内市场。如兰州医用炭素公司承担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人工心脏瓣膜”，1990年已形成上万只的生产能力。

8. 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如哈尔滨电子技术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高精度液体密度质量检测系统”，1990年创产值570万元，创税利达282万元，企业留成140万元，并为国家节省了外汇。

火炬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技术产业开发区，4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乙截止到1991年年底，全国已有各种类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8个，其中国家开发区27个，经国家科委批准认可的省级开发区10个，地方自办的11个。开发区企业有3419家，从业人员有13.8万人，技工贸总收入87亿元，比1990年增长45.1%；总产值60亿元，比上年增长36.3%；利税总额11亿元，比上年增长46.9%；出口总额7.4亿元，比上年增长58.8%。仅27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在地内，有科研院所5191所，理工科大专院校635所，科技人员600万人。

（四）星火计划

星火计划自1985年实施以来，已安排技术开发和示范27000个，其中14000项已经完成。累计新增产值339亿元，创利税81亿元。向农村推广了100多种适用技术装备，为农村培训了650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星火计划的实施，为科技兴农，为建立社会化科技服务，为促进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显著的示范作用。开拓了一条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的有效途径，闯出了一条发展农村经济可行的道路，开辟了广大科技工作者贡献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星火计划像一面旗帜，引导着亿万农民逐步告别落后的自然经济观念，走上依靠科技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大道，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五）基础研究计划

截止到1991年年底，已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等10多项大型科学工程，7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70多个部门开放实验室。取得的重大成果有：超导体材料的临界电流密度为当时国际最高水平，在国际上首创黑白胶片作彩电摄影技术等。

（六）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1990年该计划共选定485项成果重点推广，其中农业289项、工业196项。1991年，全国已有578项重点科技成果进入国家级成果推广计划指南，涉及600多个技术依

托单位，已在2000多个工矿企业及广大农村实施，总投入为20亿元。这些项目的完成，可实现年新增产值100多亿元，新增利税15亿元的目标，农业项目可增粮食60亿公斤。如黑龙江、吉林等地推广的“水稻寒地旱育稀植技术”，1991年共推广145.7万公顷，3年累计推广266.7万公顷，增产粮食20多亿公斤，节省水和种子价值10多亿元。

二、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截止到1991年年底，中国已与1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与交流关系，其中与61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或经贸科技合作协定。中国已在联合国系统的30多个科技机构中取得席位，参加了280多个国际科技学术组织。1991年官方与民间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为14000项，人员来往53000人次，比1978年分别增长13倍与9倍，并且已在34个国家和地区的50个使、领馆和驻外团内设立了科技处（组），派驻有130多名科技官员。

第十八章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发展

从1985年到1991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随着全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也有新的发展。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其特殊性，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亦有其自己的特点。

第一节 改革开放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及近期发展的总体构想

一、经济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幅员辽阔，拥有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至1991年年底，民族自治地区的总面积、草原面积，分别占全国相应总面积的64.3%和75.0%，水力蕴藏量占52.3%。这较之中国的发达地区，所占优势是很明显的。光能、风能等空中资源也得天独厚。地下资源不仅种类多、品位高，而且储藏量大。在民族自治区中，广西的锰，新疆的金，宁夏的石膏，西藏的硼砂、铬，内蒙古的煤、稀土元素；在多民族省份中，甘肃的钾、钠、镁、锂等矿种，蕴藏量均占全国的首位。

内蒙古“东林西铁，南粮北牧，遍地矿藏”。全区矿藏不但十分丰富，而且量大质优，开采容易，已探明储量有70多种，其中有7种储量占全国之首，10种储量位于全国第2位，25种分别在全国第3位到第10位之间。举世闻名的稀土储量比世界其他各国目前探明储量的总和的4倍还要多。国家“七五”期间开采的5大露天煤矿，有4处在内蒙古。地上资源中草原面积占全国的1/3，是国家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闻名遐迩的大兴安岭，有2/3的面积在内蒙古境内，木材蓄积量占全国1/10。

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条件优越，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在发展蔗糖、亚热带作物、有色金属、水电、建材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已探明的73个非金属矿中，储量在全国居于前10位的就达26个之多。

西藏既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又是中国较大的林区之一。天然水能储藏量占全国的30%左右，地热能储藏量居全国首位，太阳能的资源也为全国之首。西藏是世界上最高、最大、最年轻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而且西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境内雪峰林立，湖泊纵横，名胜古迹众多，风土人情奇特，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是世界各国旅游、登山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宁夏山川壮丽，资源丰富。川区土地肥沃，黄河自流灌溉，稻麦高产，瓜果飘香，自古被誉为“塞上江南、鱼米之乡”；全区煤炭储量居全国第5位，石英砂、石炭岩等储量可观；水能、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前景广阔。

新疆已探明的矿产有110多种，铍、锂、钠、硝石、白云母均占全国重要地位。1978年以来，探明的石油、天然气的储量，超过以前20多年探明的储量。其石油勘探的结果，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中国陆地石油的前途。它的煤炭资源量超过5000亿吨。它还是中国著名的畜产品基地，天山是著名的林区。其农业也很有名，特点是“荒漠绿洲，灌溉农业”，有充分热量和土地资源。从已开发建设的情况以及具备的基础条件看，新疆有条件建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棉花基地、瓜果基地、畜牧业基地、棉纺和毛纺基地、盐和盐化工基地、制糖基地、食品工业基地、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煤炭和煤炭化工基地、有色和稀有金属基地。

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特殊的地理条件。除广西外，其他各自治区虽然均深处内陆，多数更远居边疆，无沿海通航之便。但是，除宁夏外，这些民族地区与12个邻国接壤，具有陆上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在边境线上几乎全部居住着少数民族，有20多个民族与国外民族相邻而居，相同的民族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发展中外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对外交流的历史传统。内蒙古是通往苏联、东欧的第一条通道。新疆同5个国家接壤，北疆铁路的兴建，成为连接欧亚的第二座大陆桥，这就为新疆也为全国向西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向西开放有着巨大的潜力，少数民族地区将先享其利。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亦有其不利条件。这主要是经济基础较差，经济的发展的起点低，而且起步较难，也较慢。这里所说的基础，不是指蕴藏于地下或存在于地表尚未开发利用的资源，而是指交通、设备、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等。这些条件的具备都不是轻易可得，而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就以生产力水平来说，在起步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耕作技术有的还是“二人抬杠，三人犁”，有的甚至还是“石锄翻地，木槌点种”，“靠天吃饭”。有的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经济还是以自然分工为基础，以封闭的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率只有10%，有的只有1%，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经济，而且交通闭塞，人民文化素质较低，再加上观念陈旧，在长期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谨小慎微、不敢进取的保守心理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和商品经济格格不入的，就更增加了向前发展的难度。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将在长时期内发挥其有利作用，而且将越来越发挥其积极作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它还是潜在的、待开发的；其不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的发展会起着制约作用，但在将来，其中一些条件将会发生转化，变不利

为有利，另一些条件将会趋于消失。

二、各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和构思

在改革开放中，各民族自治区根据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总形势以及自身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初步形成了各自的总体格局或提出了总体构想。

广西初步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双向开放格局：第一个层次，是以北海市和防城港区为窗口，连结玉林、梧州、钦州组成桂东南经济开发带，利用毗邻广东、临近港澳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第二个层次，是以联结在铁路线上的南宁、柳州、桂林三个中心城市为枢纽，发挥资金、设备、技术的优势，内引外联、点面辐射，成为联结东西呈双向扇面的桂中经济开发区；第三个层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桂西北地区，这里经济发展居后，但水、电、有色金属和建材等自然资源丰富，它以资源优势为引力，内外开放，共谋振兴。

西藏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是：牢固树立以农牧业为主的指导思想，切实做好智力投资、智力开发，办好教育，培养人才；认真抓好能源、交通、邮电、通信，适当超前安排，有重点地发展有地方特色的加工业、矿业、内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战略方针是：“三开一重”，即开放（对内对外开放）、开拓（开拓区内、国内、国外三个市场）、开发（开发优势资源）、重点突破（产业与区域重点突破），实行不平衡发展。区域布局是：重点发展中部（以拉萨为中心的“一江两河”河谷地带。“一江两河”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放开搞活西部（日喀则地区和阿里地区的边境县），联合开发东部（昌都和林芝地区）、藏北（那曲地区为主的藏北牧区）牧矿致富。

宁夏经济发展的总体构想是：充分发挥农业、能源两大优势，逐步形成互相促进、多次增值的农业——轻纺食品工业、能源——高耗能工业及其深加工工业两大主要产业系列；建立4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银川地区重点发展机械、化工、轻纺、食品和其他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建成工贸结合的综合性工业区；银北地区重点发展煤、电、钢铁、铁合金等工业，逐步建成宁夏第一个能源高耗能工业区；银南地区加快机械、轻纺工业发展的同时，扩大电力、冶金工业规模，加速煤炭和天然气开发，开拓第二能源、高耗能工业区；固原地区逐步建成农林牧土特产加工和建材工业区。

新疆提出了拓展对外开放领域，实行全方位开发，逐步向西倾斜的总体战略。做到东进西出，逐步西倾，利用空中陆地的“丝绸之路”，积极发展同苏联、东欧及西亚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往来，使新疆成为中国重点向西开放的前沿。并要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外引内联，使新疆的优势得到更大的发挥。

内蒙古地形狭长，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形成西部和东部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较强，人才比较集中，特别是以呼和浩特、包头、准格尔为中心，以乌海、二连浩特为两翼的“金三角”区域，要求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好的基础，实施区域综合开发，全面发展。东部地区则以林、牧、农业较为发达，工业也有一定基础，以赤峰、通辽、牙克石、海拉尔、满洲里等城市为依托，基本形成内蒙古

东部经济带。并充分利用二连浩特和满洲里两个处于边境的内陆城市的优越条件，建立内陆开发区，重点发展与蒙古、苏联等的经济联系。内蒙古还提出了经济发展近期的3个奋斗目标：(1) 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全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达到全国中等以上水平（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2) 在农、牧、林、工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粮食基本自给；(3) 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全区财政的自给率，争取有一定的机动财力用于发展经济文化。经济建设的基本路子是：林牧为主，农工并举，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特别要抓好粮食生产，逐步形成种、养、加相结合，贸、工、农、牧相联系的商品经济生产体系。

这些总体格局、构想或奋斗目标，或着重在各地区的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或着重在人民生活水平和自治区财力方面的近期提高方向，系依据改革开放中整个国民经济的形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提出的，由于各自治区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各具特点。

第二节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优惠政策

为了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尽可能减少民族地区不利条件所带来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各民族自治区本身也实行了一些优惠政策。在1985~1991年期间，这些优惠政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一、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

(一) 总的优惠政策

总的优惠政策是指综合性的，对各少数民族地区都适用的优惠政策。主要有：

在权限方面，国务院和有关省采取了适当放权、让利的措施，使民族自治地方更好地行使了自主权。如将企业下放自治地方管理，扩大了技改项目的审批权和在对外贸易、财政、税收等方面实行放权让利的一些变通办法，使自治地方拥有比其他地方多一点的权限。在经济建设方面，对民族自治区地方有些自治县和州、县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对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放宽了政策；鼓励边境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开展与邻国的边境贸易。在对外贸易的外汇留成上，国家规定，除广东、福建省留成30%以外，其余省市都只留25%，而对自治区和民族省扩大了留成比例，如西藏留成100%，4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省留成50%。吉林、四川、甘肃等省对省内自治州，将省留成部分全部放给自治州。

在财政方面，1984~1986年，国家对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省的财政补贴仍然递增10%，1986年财政补贴为79亿元。国家还继续实行对民族自治地方在机动金、预备费方面的照顾，给予民族地区补助费、边疆建设事业补助费和边疆地区基本建

设补助费等专项补助。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拨放开发贷款、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等低息和贴息贷款。国家从1986年起每年安排10亿元作为扶贫贴息贷款，扶持的271个县中，自治县和自治区、州的县共有119个，占44%。

此外，中共中央还明确指出，在治理整顿中，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贯彻执行扶植政策，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以逐步改变其落后面貌。

（二）分别对各个自治区的优惠政策

1988年，国务院确定，新疆为国家棉纺、糖生产商品基地，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国家投资5.4亿元，建设新疆棉花、甜菜基地，基本建设从1988年开始，8年建成；计划开荒533.3万公顷，改造低产田53.3万公顷，棉花产量为50万吨～60万吨，甜菜为460万吨～560万吨。并决定从1988年起，国家从征收的耕地占用税中每年拨付6000万元，3年共18000万元，作为扶持新疆发展棉花、糖料的周转基金。同时，国家对新疆的信贷规模适当放宽，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给予支持。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对新开荒地免征农业税5年，新疆糖厂的新增产品免征所得税，食糖调拨价适当上浮。在建设规模上，纺织部将在国家计划内适当增加棉纺锭，帮助支持新疆开展国内补偿贸易，与沿海地区合资建棉纱厂，允许农民带资进厂，还可适当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或其他外资进行建设。另外，国家投资5亿多元扶持新疆建设的南疆泽普石油化工厂，于1989年5月正式建成并全面试产。1990年年底，国家豁免了该厂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贷款的本息，这就大大减轻了南疆三地州的经济负担，该厂的投产，进一步缓和和解决了南疆地区石油产品、化肥、燃料短缺的矛盾，改变了“北油南运”、“北肥南调”的状况，促进了南疆经济的发展。多年来，国家在新疆民族聚集区陆续建了一些为民造福项目和基础建设项目。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喀什二项电站被列入重点补助项目，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电站也被列入中央专项补助。1991年6月，中国银行提供1亿美元贷款开发规模巨大的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油田，它对中国以后10年乃至21世纪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1年5月，由中央部门和新疆地方联合投资24亿元的新疆独山子14万吨乙烯装置合同在北京草签。这一工程是中国“八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国家实施开发新疆、振兴民族经济的重大战略项目之一。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的全长460公里的兰新铁路西段——北疆铁路，已铺轨到乌苏，又继续向前延伸。1990年9月1日，已建成通车。

1988年年初，国家给予内蒙古的优惠政策是：除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外，在利用外资工作中，需要更加优惠的政策和要求，内蒙古还可提出以更加优惠的政策和要求，请国务院有关部门支持解决。关于投资规模问题，对其他地区到内蒙古投资建设或内蒙古自筹资金的基建项目，只要资金来源正当，投资方向合理，通过批准可以追加投资指标。此外，围绕实现近期3个目标，国家给内蒙古上两个项目，一个是年产100万吨的炼油厂，另一个是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化肥厂。从1990年开始的10年内，国家将继续对内蒙古投资用于能源、交通等基本建设。正在建设中的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二连油田、横贯内蒙古大半个草原的集（宁）——通（辽）铁路和准葛尔油田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将给内蒙古经济带来更大的发展。

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广西将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除北海市外，又增加了梧州市以及所辖的苍梧县、合浦县、钦州市、防城县、玉林市等，开发区由原来的20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18000多平方公里。另外，从1988年起，国家从征收的耕地占用税中，每年拨付2000万元，5年共1亿元，作为扶持广西发展糖业的周转基金，用于低息贷款的贴息或半贴息。1990至1992年，国家拨款3000万元，在广西北部湾沿海和郁江、浔江流域10个县，72个乡（镇）建立第一批农业综合开发区。

国家对西藏，一如既往地从各方面继续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凡是实践证明有利于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西藏人民生活的政策和措施，一律不变。中央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1988年以来，每年都在10亿元左右。国家决定将西藏“一江两河”流域的综合开发，列入国家“八五”计划和以后10年重点建设项目，力争用10年时间，投资10亿元，实现增产粮食1.5亿公斤、增产肉类2400万公斤等目标。1989年，国家对西藏投资较1988年增加了57.4%，加上西藏地方投资，这年基建投资总规模达到4.5亿元，这项投资主要用于西藏的交通、能源建设，以及拉萨的老城区居民住房改造和城市供水系统的建设。从1986年到1990年，中央对西藏基建投资达24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9亿多兀。

二、各民族自治区实行的特殊政策

（一）西藏

西藏实行既不同于内地各省，又有别于沿海经济特区的政策。确定了“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方针。坚持“两个为主”，实行“两个开放”，实现“两个转变”。农村牧区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农畜产品以市场调节为主。牧区“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农区“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工商企业主要发展个体和集体经济，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产）品仍然实行国家计划管理和指导外，其他商品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敞开大门，打破封锁，既对国外开放，也对国内各省、自治区、市开放。巩固和发展与邻国有关地方的睦邻友好关系，发挥西藏有较多边民贸易的传统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边境贸易。实现从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型经济。

西藏之所以实行“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是根据西藏实际情况确定的。西藏生产力水平很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群众又有独特的消费需要，市场容量不大，而且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十分不便，农牧区以家庭经营为主，商业、手工业以集体、个体经营为主，90%以上的工业品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从内地调进的，加之又处于和内地经济联系不甚密切的经济区域，实行这一方针，就会有效地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因此，除国家调拨的主要商品外，对本地区的农畜土特产品和除木材、水泥等少数产品以外的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全部实行市场调节，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取消计划收购和计划分配，价格放开，随行就市。

为了吸收外商投资，1986年，西藏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办法，使每个客户到西藏投资能有利可图。其基本原则是：（1）放宽投资范围，客户可在能源、交通建筑、轻工、纺织、食品、服务、维修、医药制造、农、林、牧、养殖、加工及其他行业投资，还可以合资、合作经营、补偿贸易等方式，投资于旅游业和矿业开发。（2）给予外资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和优待。（3）减征或免征赋税。（4）提供优惠贷款。（5）欢迎客商在西藏设立办事机构，设立各种窗口，西藏在场地、开展业务和生活方面为其提供方便。

（二）新疆

为了推进新疆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技术贸易合作关系，新疆于1985年制定了8条对外合作优惠政策和实施细则。对独资、合资企业按区内价格提供原料、能源和运输条件，对外销产品的税收给予优惠，外贸部门可帮助推销部分产品；部分产品可以内销，地方税可适当减免；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期可适当放长，期满后还可以延长；企业建设用地价格可以低于国内其他地区，劳务费用予以优惠。自治区在能源勘探、交通、工矿业及牧业、医疗、教育、科研、旅游设施等方面，欢迎国内外客商和华侨到新疆独资、合资兴办开发性事业。同时欢迎国外企业家、科技专家、学者到新疆实地考察，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为他们提供方便。

（三）宁夏

1988年，宁夏自治区政府决定将同心县作为农村流通试验区，以培育和放开专业市场，加快山区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从7个方面给予优惠：（1）放开皮张、毛绒、发菜和计划木材经营。国营、集体、私营企业以及个人都可以上市交易。（2）降低企业注册资金限额。（3）实行低税政策。除国家规定的20种产品不减税外，其他产品县政府可根据情况减免本地企业和外地在同心办的企业的产品税。（4）进一步搞活资金融通，经人民银行宁夏分行批准，县可试办股份制金融组织。（5）允许个人充当经纪人从事商品中介活动。（6）县成立外贸公司，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营、集体、私人企业都可委托外贸公司与口岸和外商洽谈业务，外贸公司也可实行代理制扩大业务范围。（7）多渠道集资建设市场。市场实行统一领导管理、统一收费标准。

（四）广西

1991年，广西把农业综合开发的重点放在大力开发荒山、荒地、荒水、荒滩和分类改造低产田、低产水面、低产林果和低产畜禽上，并制定出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在加强领导、统一规划的基础上，既支持原地承包开发，也允许易地承包开发；坚持“谁投资，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开发之初免征3~5年特产税，承包期可定为30年至50年；鼓励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科技部门、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参与开发，所得收入可用于改善干部职工福利或股金分红。广西待开发的农业资源丰富，全区几千万亩“荒域”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外开放与协作

一、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和中部一些地区的协作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也离不开西部地区，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民族关系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在经济关系上，东部和中部地区离不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离不开东部和中部地区。这就要把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助和互相帮助扎实地、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在这方面，各民族地区都迈开了步伐，取得了成绩。

内蒙古东西长2400公里，工业城市少，仅有的呼和浩特、包头两个中等城市居于中部，偏东的两翼地区，难以受到其经济辐射影响。为此，1986年，内蒙古提出“借邻省、区城市经济辐射之光”的指导思想，大力促进本区东部3盟1市与东北3省进行区域联合，共同开发褐煤资源，发展电子工业，组织公路交通运输等。同时促进本区西部的5盟3市与邻省区的兰州、银川、天水等城市的横向经济联合，开发项目30多个。1988年，内蒙古划出呼伦贝尔盟和乌海市搞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吸收国内外资金、技术，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开发自治区丰富的资源，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该市将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水资源发电，再将电力和当地优质的石灰石、石英石、原盐等资源结合起来，生产廉价的电石、烧碱、聚氯乙烯、硅铁等高能耗产品。用这些国内外紧俏产品，交换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以促进该市的原材料工业向深层次加工发展。同时，使沿海地区利用这些高耗能原材料和电力，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呼伦贝尔盟有0.1亿公顷草原，该盟已划出66.7万公顷，向上海、江苏、天津等地招标，以补偿贸易方式吸引投资者去建设畜牧业基地。当地用羊毛等偿还投资。1988年至1991年，内蒙古先后派出100多个贸易洽谈和考察团，北渡国门，南下内地，广泛开展横向经济技术合作。全区12个盟市已与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协作网络，实施了400个多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为自治区引进资金近10亿元，合资的工厂、联建的项目遍布各地。1991年，又同上海市签订了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为了扶持内蒙古发展经济，仅“七五”期间，全国各地援建内蒙古的经济项目就达2100个，资金7.7亿元。这期间，内蒙古大力开发资源，支持各地发展外向型经济。据统计，仅价格开放后的头两年，内蒙古支援各地的物资达125亿元，相当于过去30多年的37%以上。

1986年，广西、广东达成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广西借助广东振兴经济，广西有资源和能源优势，广东有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优势，商品经

济发达，广东产品经广西可进入西南，广西产品经广东可打进港澳，互相联合，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江苏对口支援广西发展经济，到1990年，10年支持实施项目逾1200个，培训各类技术人员5563人。支援协作已从一般的技术物资交流发展为经济技术承包，技术转让，新产品开发，联合办厂，合资开发，大跨度扶贫等。从省区联合，发展到地市结对、县与县结对、企业结对和跨地区加入企业集团，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口支援协作。

到1990年，新疆已同全国29个省、自治区、市和中央19个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并与上海市和江苏省结成对口省（市）区。仅1990年，江苏、新疆两地达成纺织、轻工以及教育等方面合作项目就有30个。6年来，新疆共引进兄弟省市资金4.3亿元，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合作项目6253个，已完成或正在执行的项目有4726个。通过协作新增产值累计达16.5亿元，新增利税2.9亿元。新疆同许多省、自治区、市及中央有关直属企业在联合开办棉纺、化工、玉石加工、盐业生产、建立羊毛生产基地等方面，达成并实施了1036个协作项目。1991年，新疆有关部门同四川、天津等省市签订首批联合开发合同，新疆引进资金开发棉花生产基地，无息引进资金3750万元，开发棉田1万公顷。

上海同云南、新疆、西藏、宁夏进行多渠道、多层次横向经济联合，到1990年，10年来完成科技咨询、技术成果转让、资源开发、合资经营等科技、经济协作项目1800多个，培训人才1万多名，投资两亿多元。北京、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市在支援西藏建设和西部地区开发方面也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几个经济协作区的区域间协作

区域间协作，即具有一定经济联系的地区，或同一民族居住而又跨越几个省、自治区的地区，或同一条铁路干线贯通的地区为了达到共同发展经济的目的，而建立的经济协作区。西南5省、区6方（川、黔、滇、桂、藏、渝）自1984年开始，按照“自力更生、多方联合、国家支援、共谋振兴”的方针和自愿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每年召开一次经济协调会。这5省6区居住着30多个少数民族；民族聚居区占5省、区6方总面积的70%，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到1990年年底，这个协作区各方之间共签订协作项目9275项，实施4468项，协作通融资金6.4亿元，这个协作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一个以农业、能源交通为重点，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企业联合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横向经济联系的格局。除西南协作区外，还有中南6省3市、西北5省（区）等经济协作区以及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它们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显示出巨大的群体效益。

青、藏、甘、滇、川5省区相互间毗邻地区，1987年年底建立了松散型的经济协作关系。这一经济协作已横跨5省区的11个州地、47个县，总面积有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矿产资源丰富，畜牧业、水利、林业、旅游业都具有优势。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因，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过去一直受到制约。经济

协作关系建立后，各地本着从小到大、从易到难的原则，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他们首先打破区域界限，修通了一批断头路。仅甘、青、川3省毗邻区到1991年已接通断头公路4条。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各地的商品流通，各地毗邻地区之间，建立了一批开放性的市场，利用民族节日活动等机会，进行物资贸易交流，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了改变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各毗邻地区发展了一批皮毛加工、肉乳品加工等畜产品加工企业，达成许多协作项目。据统计，甘、青、川3方9县区3年多来共达成协作项目近百项，成交额达120万元。毗邻地区企业之间还积极开展技术协作，实行联合技术攻关，取得了明显成效。

陇海——兰新经济带，是以陇海——兰新铁路为纽带，沿线大中城市为骨干，东西两个对外开放口岸连云港和伊犁连结起来的广大经济带，实行大跨度的区域联合。这条经济带包括江苏、山东、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区，长4000多公里，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3。这里煤田、石油含量丰富，农牧业资源潜力巨大，还有有色金属和黄河中下游的水能资源。这里是我国棉花、小麦的生产地带，其中棉花产量占全国一半，全国5大牧区，在这条带上的就有3个。其他如林木、瓜果、蔬菜、油料、烟叶、药材等都是出口创汇的重要资源。经济带上的各民族，已经形成松散的经济联系，如建立陇兰沿线各省会城市市长的经济促进会，各省市、州长和专员联席会，对外经济促进会，又建立淮海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关中经济区、西北经济区的协作关系，此外还有银行、物资、科技等多层次、多行业、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

此外，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开展了边际之间的横向经济协作，由起步而日益活跃。“七五”期间，中国民族地区与内地、沿海之间以及民族地区之间，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先后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数万个。5个自治区与兄弟省市签订经济技术协作项目近两万个，引进资金和物资总额100多亿元，初步形成了纺织、制糖、机械、电子、物资等行业的协作网络，组建了一批企业群体与企业集团。

联合与协作不仅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内地、沿海的经济逐步结为一体，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

除此之外，中国民族地区还先后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并兴建了一批合资企业。

三、民族关系以经济交往为主体

改革开放把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带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以经济交往为主体的新时期。

80年代初，内地数以万计的能工巧匠涌入边疆兄弟民族地区，他们带去的技术、信息和经商意识到1990年已在广大农村、牧区、山寨落地生根。遍布西藏城市、乡村、牧区的3万多个体户，藏族等少数民族占了70%。广西南宁地区，壮族青年已成为个体经商者的主体。在内蒙古草原，数万个蒙古族个体运输户、伙食摊、修理匠突起，迫

使内地去的“能人”不得不另谋新业。据统计，5个自治区在1990年年底共有个体工商户近百万，其中多数是当地少数民族。这批新兴的少数民族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还把自己的足迹和目光投向内地和沿海地区。据估计，80年代末，每年都有几十万名少数民族农牧民跨下马背，走出牧场、家园，到沿海和内地务工经商。善于经营饮食、皮毛加工的维吾尔族，带着祖传的技能和自家的产品跑遍了全国各地，风靡全国的烤羊肉串，充分显示了他们食品文化的吸引力。以个体经济的大交流为先导，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封闭打破了，横向经济联合日趋活跃，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交往的扩大，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各民族族际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以汉族为主的东部地区少数民族成分和人口也在大幅度增加。首都北京，拥有55个少数民族41万人。上海、天津、广州也已成为各民族汇集的大都会。在南起广东、北至河北的沿海8省市，少数民族人口已有440多万。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西北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东北的鄂温克族、赫哲族和云南的基诺族人，纷纷到上海学习和工作，使上海市拥有44个少数民族。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接纳了来自大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人和西藏高原上的门巴、珞巴人。西藏迎来了海南的黎族，云南的景颇族、佐佬族、水族等民族的人；世居新疆的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则到了云南落户；朝鲜族世居的长白山区接纳了来自西藏的珞巴、门巴和云南的景颇人、基诺族人。

各民族的经济交往，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经济上的共同繁荣。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南部有座博荣山，山下是3个不同民族村屯，达斡尔族聚居的西博荣村有林木，汉族聚居的东博荣村种旱田，朝鲜族聚居的广丰村种水稻。过去3个村互不来往，各自恪守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80年代末，3个村各族同胞加强联系，互相学习，把过去各村的优势变为共同优势，生产、生活都有了很大提高。东乌珠穆沁旗旗府乌里镇斯太镇数年前还是沉寂的、冷落的草原小镇，到1990年已成了生机勃勃的工业新城。全镇迅速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垮了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地域的界限，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模式，走上了一条横向联合的道路，他们先后从区内外聘请了300多名汉族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帮助旗里发展工业，同时选派200多名民族青年到外地学习，建立起自己的技术骨干队伍。到1990年年底全旗形成了包括毛、绒、皮、肉、乳、骨、血和内脏在内的畜产品加工工业体系，产品畅销区内外。198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314万元，比6年前增长了6倍。

四、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开展

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与12个国家接壤，有数百条传统的交通通道，对外开放具有良好的态势。根据相邻国家的情况，发展边境贸易和边民互市，开展旅游业和劳务出口，改善投资环境，扩大与外地和外国的经济合作，进而振兴南北丝绸之路，有着广阔的前景。发展边境贸易是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兴边富民和巩固国

防也具有重要意义。到1988年年底，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共有国，家边境口岸和地方边境口岸143个，与苏联、蒙古、朝鲜、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老挝等邻国的边境贸易达6.53亿美元。

到1988年年底，内蒙古呼伦贝尔改革试验区沿中苏、中蒙边境一带的6个易货贸易口岸已有4个经批准建立了边境贸易机构。1991年7月，中蒙分别在两国边境口岸塔克什肯和布尔干举行中蒙边界口岸首开仪式。

广西是我国惟一有沿海开放城市的自治区。到1990年，广西已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客户建立了业务关系。

西藏边境地区不断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飞跃发展和社会局势的稳定。西藏边境地区有22个县（口岸），居住着藏、汉、珞巴、门巴等17个民族。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十分落后，边民生活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和政府高度重视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给予了许多区别于腹心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投资维修民族新村、边民住宅、供应商品粮等，还给予很多补贴和救济，扶持发展边境贸易。1989年年底，西藏边境地区已有较大的对外通商通道和边境市场27个，其中樟木、吉隆、普兰和日乌陆地通商口岸发展很快，亚东的下马镇和帕里镇两个历史上的通商口岸又有新的发展，截止到1989年，边境小额贸易和互市贸易达12000万元。如将尼泊尔商人出售的禽、蛋、蔬菜、鲜木及樟木群众进行的零散生意计算在内，1989年樟木边境贸易额在1亿元以上。

在新疆境内中苏边境著名的霍尔果斯和吐尔戈特两个口岸，来往于两国运输货物的汽车络绎不绝，运去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换回的是钢材、水泥、木材、化肥等重化工业品。1989年，西部边境地方贸易已庐工程承包、合资经营、来料加工、劳务合作、科技交流等多方面、多形式、多区域延伸发展。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已开展了10多项科技合作，内容涉及矿产、石油、天然气开发，地震研究，能源利用等。1989年中，仅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便一次向新疆提出了51项科技合作建议。这些合作已透过边境向中苏内地延伸。1990年，新疆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开放了中巴、中苏、中蒙通商口岸。

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德宏傣族自治州边境贸易发展迅速，1989年年底，全州已形成以边境贸易为导向的经济结构。

宁夏虽地处内陆，不与外国接壤，但宁夏回族同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许多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条件。因此，开展同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联系，打开国际合作的渠道具有独特的优势。

民族地区的边境贸易与边民互市在这一时期虽然尚处于起始阶段，但在蓬蓬勃勃的发展之中。中国向西走出国门，将会和向东走出国门一样，为改革开放开辟宽阔的道路。

第四节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新面貌

一、贫困地区面貌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全国多数地区人民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并进一步走向小康。但在全国一部分地区的人民中，温饱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生活在贫困线上。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重。1986年国家重点扶持的331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有141个，占42.6%。1988年，少数民族地区还有20%的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1000万人在住房、饮水方面有较大困难。一些山区、牧区和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很落后，文盲仍占很大比例。少数民族地区不仅贫困面大，而且贫困程度较一般地区更为严重。为改变这一状况，国家提出要把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作为"七五"期间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主要内容。国务院、中央有关部委、各民族自治区都为此作出了努力。到1990年年底，全国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4000万减少到2000万。

（一）国家的扶贫特殊政策

国务院1989年进一步明确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几项特殊政策。

1. 为了大力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资金、物资、技术、管理等方面要继续给予扶持和帮助。若确有必要对国家产业政策作补充时，可经所在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后，报经国务院审批。

2. 切实放开农副产品销售。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除国有矿山和国营农、林、牧场计划内产品，少数民族贫困县的合同订购粮食、棉花外，要坚持放开其他各种农、林、牧、矿等产品销售；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粮食，可以1988年年末实际完成的定购数为基数，一定4年不变，超基数的产品放开销售。

3. 减轻负担，增强内部活力。继续减免贫困户的农牧业税；对没有偿还能力的贫困户所欠农贷可延长还款期限3至4年，并停止逾期罚息或实行停息挂账；尽量减少贫困县购买国库券任务；核定贫困县上缴税收基数，超收全留。以1988年年末上缴省、自治区和中央的税收为基数，从1989年起到"七五"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结束时，超基数部分全部留县。

4. 设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工程基金"。基金集中用于每年解决一二十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群众温饱问题，决不能挪作他用。

（二）中央有关部委的大力帮助

在扶贫工作中，中央有关部委做了许多工作。

农业部重点在贫困地区大力推广地膜覆盖玉米栽培技术，组织实施“温饱工程”。在少数民族的贫困县中推广地膜玉米14.3万公顷。农业部还把武陵山区作为扶贫联系点，组织机关干部直接参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开发工作。该部在农业发展资金和物资上，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尽可能予以照顾和帮助。

地矿部于1986～1989年4年间，在贫困地区开展地质工作项目总数达2015项，投入地勘费4.8亿多元。

中国农业银行自1981年起对民族贸易、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贷款实行优惠的低利率；1985年对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的部分地方开办了低利率的农民建房贷款；1988年对内蒙古、新疆的27个县（旗）开展了牧区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在贷款中还对贷款期限、额度、自有资金比例等方面实行了松动，使贷款条件相对优惠于其他地区。据8个少数民族地区统计，1981年这些地区的贷款余额为14.6亿元，而1989年为88亿元，增长了5倍。

此外，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本着“实事求是，尽力而为，拾遗补缺，讲求实效”的原则，积极开展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1988年以来，他们还为少数民族地区企业提供管理和技术服务，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新疆对南疆三地州的优惠政策

1986年6月26日，中共新疆区委、新疆人民政府发出文件，对南疆喀什、和田、克孜勒苏三地州实行12条优惠政策：

1. 在棉花收购上，今后凡是国家增加给自治区的定购指标，优先照顾三地州。

2. 蚕桑丝绸业实行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就地深加工，产销直接见面，生丝出口由外贸部门经营，利润全部返还给农民。

3. 在国家统一规划下，采矿业实行大矿大开、小矿放开，鼓励农牧民个人、联户或集体开矿，国营或集体办的水泥厂的采矿和运输全部由乡镇企业和农牧民经营。国营厂、矿要尽量多地吸收当地贫困农牧民为合同工。

4. “七五”期间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免征农业税，减少部分由自治区财政补贴。以上年度实际核定的收入为准，对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的农户（塔什库尔干县除外）一律免征农业税，按地州平衡后的农业税指标的不足部分，由自治区财政补贴；免去粮食定购任务，不提或少提集体提留；免收中、小学生学杂费，由自治区财政补贴；对人均纯收入在150元以下的牧民和120元以下的农民，机井抽水费用可从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项目酌情补贴；对人均纯收入在150元以下的牧业户，适当延长牲畜折价款还款期，延长期限由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5. 建立1000万元扶贫生产周转基金，从中拿出250万元作为3000万元银行贷款的贴息。这笔周转金和贴息贷款只能用于人均纯收入在150元以下的牧民和120元以下的农户，从事技术开发、组织扶贫经济实体、发展多种经营和购买生产资料。这笔周转金作为有偿资金，定向投放、限期收回。

6. 大力扶持发展乡镇企业，自筹资金的比例降为10%～20%，今后逐步提高对乡镇企业贴息贷款的额度。

7. 对贫困地区的工程技术设计要求优先安排，费用不能高于乌鲁木齐地区标准的下限。

8. 调整财政补贴递增比例。克孜勒苏自治州由7%提到8%，喀什地区由6%提到7%，和田地区由6%提到8%。

9. 能源交通建设基金超收上缴自治区部分（即70%）留地方财政。

10. 喀什地区的巴楚、疏勒、疏附和喀什市列为“三照顾”县（市）。

11. 自治区1986年给南疆三地州的4000万公斤返销粮中，1500万公斤按平价供给人均收入在120元以下的农民和150元以下的牧民。

12. 将1400多名流浪儿童收容起来，在三地州建立4所学校进行教育，也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教育挽救。

1988年，新疆改变传统的扶贫办法，吸引沿海东部发达地区到自治区贫困县承包开发项目，帮助用好扶贫资金。东部向西部转移人才、技术和资金，西部为东部提供肉禽蛋奶和原料。新疆疏附县已与浙江省联合举办疏附县棉纺纱厂，于田县和江苏扬州市联合开发于田、策勒、民丰联合毛纺厂，福海县与江苏联合举办福海县糖厂，仅这3个项目就投资5440万元。

优惠政策使贫困农民得到实惠。以和田地区为例，“七五”以来，国家每从和田农民手中收取1元农业税，同时就为和田农业投入8.25元。在财政方面仅免收贫困户的农业税一项，全地区就有7.6万多户、28.5万多人享受了这项照顾，同时，还投入免税补助款755.5万元，平均每户享受照顾款额为99元，相当于每户免收3.2公顷播种面积的农业税。“七五”期间，和田地区总累计农业税收仅有1802.8万元，耐国家用于和田地区的专项农业生产资金每年都在3000万元左右。“七五”总累计达14873.5万元，是该地区农业税累计收入的8.25倍。“七五”期间该地区90%以上的贫困户已脱贫达到温饱水平。

到1990年年底，新疆全区24个贫困县，有20个越过了温饱线。

（四）内蒙古扶贫工作出现四个方面的转变

1986、1987两年，内蒙古扶贫工作从资金使用、扶持办法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扶贫工作开始从单纯救济转向经济开发，全区的扶贫工作出现了4个方面的转变：由重点扶持农牧业生产转向开办经济实体，扩大扶贫面，使贫困户有了固定收入；由一家一户的扶贫转向搞开发性生产，改变靠天吃饭的自给性经济，化肥、地膜、良种及草、棚、防疫、改良等工作都实行综合配套服务；依靠科技扶贫已被越来越多的地区所重视；由单一部门扶贫转向全社会扶贫。两年中有21万个贫困户脱贫，全区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

此外，一种适合牧区特点的扶贫形式——“扶贫流动畜群”在内蒙古草原普遍推广。方法是苏木（苏木，相当于乡）政府把羊只拨分给被扶持的贫困牧民喂养，饲养期间所产仔畜、羊奶、羊毛等畜产品，全归困难户所有；待其基本脱贫后，收回原来的牲畜基数，再用以扶持其他的贫困牧民。到1987年6月，全区扶贫流动牲畜已发展到20万只，一批又一批牧民向贫困告别，许多人走上致富之路。

（五）广西扶贫工作卓有成效

广西高度重视基层加强扶贫工作的领导，改变扶贫资金投向，抓好项目落实和管理。1986年后，把原来的单纯救济向经济开发转变；把按贫困人口切块投放，向切块控制、按项目效益投放转变；把资金单项输入，向资金、技术、物资配套综合输入转变，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相对集中，重点使用。并抓好以工代赈工程和积极开展科技扶贫，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种养技术水平。到1990年6月，已有10个县、750万贫困人口越过贫困线。

广西还采取特别的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对经济不发达“老、少、穷、山”县，自治区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并在资金上实行倾斜，对特困地区还减免了农业税。到1990年，已有800万贫困农民、23个贫困县跨越温饱线。少数民族人口比较集中的49个贫困县、市、自治县，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5%和18%。

（六）青海省贫困农牧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青海省10个贫困县，都是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共有贫困户113700户，人口626400人。青海在扶贫开发中投入种养业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约2600万元，占贷款总额的62%，并广泛开展科技培训，使贫困地区农牧业生产稳步发展。几年中全省还投入扶贫专项贴息贷款914万元，举办各级各类企业248个，对这些地区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到很大作用。1985年以前，这里的农牧民年人均收入只有120元，而1990年年底则超过350元，有3个县超过400元。贫困农牧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地区逐步脱贫致富。

（七）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取得可喜成绩

宁夏西海固地区是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经过持续开展扶贫，到1989年年底已取得88%的农民基本解决温饱的可喜成绩。中共宁夏党委和政府提出3年扶贫攻坚新对策，以打好温饱攻坚战和区域经济开发、建立支柱产业为重点，集中力量实施一个温饱工程，搞好农田水利、服务体系、基层组织3项建设，开发淀粉、亚麻、土畜产、矿业4个产业。到1991年，科技扶贫使该地区遍开致富花，90%的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八）西藏自治区脱贫步伐加快

西藏自治区在“七五”期间共投放扶贫和救灾款1亿多元，扶持个体经济万余户，新办各种经济实体百余个，使6万余户、30多万人初步摆脱了贫困。

二、一些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出现了新气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在各民族自治区中占主要地位的少数民族的经济有重大发展，而且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的经济也不断出现新气象。

内蒙古额尔古纳右旗认真贯彻少数民族政策，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对华俄后裔一视同仁。该旗位于内蒙古最北部，是中国蒙古族的发祥地，又是我国俄罗斯民族

聚居区，居住着汉、回、蒙古、达斡尔、鄂伦春、俄罗斯等12个民族，还有部分俄后裔。过去，少数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族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各民族间及少数民族内部纠纷时有发生。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这种状况大有改善。1965年，这个旗将自治区政府拨出的400万元专款用于扶持少数民族和华俄后裔的生产，1986年基本上解决了贫困户的温饱问题。这个旗还在政治上对华俄后裔一视同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本着自愿原则，尊重其信仰。

内蒙古鄂伦春族在1958年开始定居生活后，不愿接受政府免费配给的奶牛，不相信下麦种施化肥能种出粮食来，竟把送上门的麦种和化肥远远地丢到山沟里，免费提供的蔬菜种籽被喂了野鸡。但后来，一切都变了，到1991年年初，在鄂伦春自治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的十字大街上，加多个鄂伦春人经营的食品、水果、饮料等摊点一字摆开。在全自治旗已有100多鄂伦春族个体户，从事皮毛、饮食、运输等商业活动，成为鄂伦春民族历史上第一代"商人"。在伊敏镇的机械化农场里，97名鄂伦春人驾驶着拖拉机、收割机、打草机等各种机械化农机具，在草场和农田里耕耘。在5万多平方公里的自治旗土地上，有180多户猎民种起了大棚蔬菜、木耳、黄花，养了牛羊，联办了11个小型家庭农场，走上了多种经营、发展生产的新路。到1989年年底，已与广东、海南、北京等地达成联营项目15个，引进资金500多万元，他们生产的北花霜、杀菌剂、卫生清洁剂等商品已销往香港市场。1990年8月，他们又和美国一家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境内的矿泉水资源，仅此一项，该旗的年人均收人就将增加200多元，而达到700元。全自治旗的1789名鄂伦春人，1991年年初只有40多人还在有计划地从事狩猎生产。

到1987年，全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已建立起2900多个民族乡。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民族乡。这些民族乡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新的发展。西藏政府对聚居在边境地区的珞巴、门巴族和僜人、夏尔巴人，按民族特点，建立了8个民族乡，并按不同的民族经济发展农、牧、副业和编织业、狩猎业，还帮助他们建立居民新村，修公路、修电站、种茶树、培植果园，发展商品生产。有些边远地方的民族乡建立了汽车转运站、供销网点，使千年的山乡，开始出现兴旺景象。日喀则地区聂拉山县夏巴尔村的群众人均年收入超过800元。察隅县的僜人新中国成立前被侮蔑为"野人"，西藏民主改革时期，僜人走出深山老林，建立了村，有了自己的土地，政府还为僜人建新房、修电站，使他们用上了电灯。自1982年以来，国家用于新村建房的投资达6.70万元。到1991年，察隅县已有2/3的僜人住进了新房。昔日结绳记事、杀牲送鬼的落后状况得到逐步改善。在下察隅乡，全乡187户僜人，1990年向国家上缴余粮5万余公斤，人均年收人达750元。10年改革，商品经济的观念开始在僜人地区扎根，不少的村寨出现了桂园、蕉园、鱼塘等商品基地，市场上出现了僜人的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家用电器在僜人家庭已不是希罕物，有的家庭还购买了彩电、洗衣机等高档电器。到1991年年初，自治区、地区以及县乡各级学校里都有僜人学生，察隅县已有8名僜人大中专毕业生。国家还培养了9名僜人医生和大批的乡村卫生员，并对僜人实行免费医疗。僜人人口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0余人发展到1181人。

新疆阜康县三工河哈萨克民族乡，10年前，牧民家庭家家均有数十头大小牧畜，但只吃不卖，他们过着孤独的山野生活。到1990年，所有散居在山中的哈萨克牧民，早已出山，定居在山脚下，过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已基本结束。乡政府所在地的三工村，完全变成一个集镇似的村落。依靠天池风光，1989年，这个乡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少数民族旅行社——阜康县瑶池哈萨克乡村旅行社。与此同时，乡政府还依靠当地资源，办起煤窑、建筑、运输等10个乡镇企业，1990年全乡总收入达424万元，其中工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1.58%，人均收入由10年前的57元跃到729元。

位于福建东部的罗源县，是畲族聚居地区之一。这里集老、少、边、岛于一地。过去是有名的贫困县。在省、市领导的帮助下，该县依据自己依山傍海的特点，制定、实施了“四步走”的方针：第一步，发展庭院经济。第二步，在此基础上发展全县配套的重点产品“七条龙”：食母菌、竹编、草席、茶叶、罐头、水产品、羽绒。第三步，发挥罗源沿海的优势，将“七条龙”引向国际市场。1990年全县外贸出口总值达3790万元，占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15%。第四步，基本脱贫后大搞开发性生产，建立一批骨干企业。1990年全县对虾养殖单产、总产分别比上年增加269.6%和204.7%，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多。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57元，贫困户占农户的比例从32%下降到2.5%，脱贫率占98.4%。

改革开放给甘肃陇兰大地的185万回、藏、东乡、裕固、保安等少数民族注入了活力。地处祁连山北麓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立足于资源优势，狠抓畜牧、粮油、工业、乡镇企业4大经济产业，大力推进畜、草、粮、油、工、矿、商、杂8大系列商品生产。1991年农民人均占有粮食1058公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2038元，成为甘肃首富。

云南边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投资修建公路5万多公里，使少数民族98%的乡镇通了公路。云南新建的3个现代化航空港都在少数民族地区，它们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机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嘎洒机场和思茅机场。1991年年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电力工业年发电量超过50亿千瓦小时，90%的乡镇通了电。政府还拨出专款，在这里安装了电视地面接收站。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新中国成立后，山上的彝族、哈尼族同胞被接下山来，与傣族群众共耕甘蔗。1991年年底，全县蔗田扩大到4000多公顷，年人均纯收入643元，解决了温饱问题。西双版纳的农垦大军还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开垦橡胶园，为他们提供资金、橡胶苗、芽接条以及胶碗、胶舌、胶桶、胶刀等生产用具。各国营农场还派出技术术人员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技术指导。1991年年底，西双版纳少数民族橡胶园已发展到3.8万公顷，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云南全省12万多公顷橡胶园中，有5.3万多公顷是少数民族群众经营的。云南少数民族工业总产值已近500亿元。少数民族成为云南制茶业和制糖业的主力军，茶叶产量占全省茶叶总产量的一半，甘蔗和蔗糖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80%。

青海省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藏、回、蒙古、土、撒拉等少数民族人口有187.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2%。全省有6个民族自治州，7个民族自治县。1989年以来，青海省先后设立了民族经济改革试验区和格尔木资源开发试验区。到1991年年底，近10年来青海省民族地区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倍多，农牧业连续5

年丰收，农牧民人均收入成倍增长，90%的贫困人口实现了温饱，50%的牧民告别了游牧，实现了定居。

地处贵州九万大山的贫困区片中的17个贫困县都是壮、苗、布衣、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1991年年初贫困人口已从123万减少到50万人左右，已有11个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片中的沃屯村原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9元、占有粮110公斤的贫困村，1987年林业部派扶贫队开进山区，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91年年初人均收入已有2100多元，人均口粮300多公斤。

中国人口最少的黑龙江的赫哲族新中国成立前只有300来人，到1988年已发展到2000多人。国家对这个小民族特别关怀，帮助他们改变落后的渔猎生活，发展经济、文化事业。1986年，赫哲人的渔业生产工具已实现了机械化。人均收入由10年前的200元增加到600元。

三、草原牧区草畜统一责任制的推行

在草原牧区，发展畜牧业有赖于草原的保护和建设，各民族自治区对此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1985年，西藏那进县那曲区根据牧民群众的意愿，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因畜、因草制宜，把212块共1.1万多公顷冬春草场的使用权固定到户、联户或自然村。草原面积较大、居中集中的乡、村，把草场使用权固定到自然村；草场面积小、居住分散的地方，把草场使用权固定到户。

1991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实行牧业五统一：统一牧畜品种改良，统一草场建设和保护，统一疫病防治，统一防灾保畜和转场，统一安排牧区“五好”建设。

1985年，内蒙古把草、畜经营统一起来，普遍实行种草、养畜双承包责任制，出现草茂畜旺的新局面。草、畜双承包，就是草、畜统一经营生产责任制，其具体做法是：草场承包到户或联户，提取草场管理费；牧畜作价归户；适当提留。它是在总结牧畜承包和扩大自留畜的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在“左”倾思想和传统观念影响下，人和牧畜都吃“大锅饭”，重畜轻草，严重忽视草原的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导致草场超载过牧，生态失调，全区1/3的草原呈现沙化、退化、碱化，畜草矛盾尖锐。这种把草原和牧畜的权、责、利归于牧民一身的责任制，在解决人、草、畜“三张皮”的问题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同时，牧畜作价归户，牧民有了草、畜两方面的经营自主权和受益权，不再分自留畜和承包畜，不再把经营好坏看做与自己无关的事，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以充分发挥，牧民十分注意养畜的综合经济效益。这种责任制促使牧民把草和畜当成生产过程的整体，从长远考虑，作周密安排，畜牧业的生产和经营出现3个明显的变化：(1)由过去单纯注重牲畜存栏数转到注重牲畜总增和商品率，惜售观念开始转变，养“长寿畜”的少了。(2)畜群结构开始向专业化发展。各旗（县）都涌现出一批专门饲养某种牲畜的专业户，还出现一些专门从事育肥的牲畜的牧户，牧民还特别重视畜种改良和培养母畜，阿拉善盟和锡林郭勒盟有繁殖能力的母畜都占到畜群的50%左

右。(3)由单纯牧业经济向以牧业为主、多种经营发展。一些为牧业牧民生活服务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如畜产品加工、饲料加工、商业运输业、机修、饮食业等在牧区开始兴起。

1989年，为了进一步完善牧业生产责任制，内蒙古更积极实施“草牧场分等定级、有偿承包使用”制度。原实行的“草牧场划片承包”的制度还有一些弊端，最突出的是由于廉价和无偿使用草牧场，不少牧民片面追求经济收入、盲目发展牲畜头数，仍不能很好地解决草场超载、退化、沙化的问题。实行新的草牧场使用制度时，坚持了承包责任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以前承包到户的草牧场原则上不做变动，组织科技人员和基层干部逐片划定草牧场的生产力，然后分等定级，核定出适宜的载畜量，并据此收取草牧场使用费：在合理载畜量之内的，每个绵羊单位每年收费0.20至0.30元；一般性超载的提高到3至5元，严重超载的再加倍。这一制度的推行，不仅切实强化了对草牧场使用的管理，有效地遏制了草场的沙化、退化的趋势，而且拓宽了草原建设资金的来源，增加了对畜牧业生产的投人，同时还有力地促进了牧民重视草原的保护和建设，引导畜牧业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四、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一）少数民族教育体系开始形成

截至1986年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有1300多万人，少数民族教师有64.2万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体系开始形成。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并通过验收的民族县有85个，许多地方兴建了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据14个省区统计，这类学校已有5500多所，在校学生约100万人。内地已有16个省市开办了西藏班，在这些学校学习的藏族学生有400多人。在少数民族集中的省区都已建立了民族师范学校，每年有大批教师受到培训和进修。全国已有民族学院10所，在校学生2.1万多人。在全国高等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本科生有9.9万多人。从1980年开始，国家教委所属的10所重点大学开办了少数民族班，其中有9所学校还为少数民族学生设立1至2年的预科班，仅在清华大学，每年有1/4的民族班毕业生考上了研究生。其他部委所属的院校还开了气象、轻工、水利、商业、政法、医药等专业的民族班。内地重点院校和民族地区院校的校际合作也在兴起，内容涉及选派教师授课、委托培养师资、共同承担科研项目、交流教学改革经验等。1991年年初，少数民族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有13万多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近314万人，小学在校学生1052万多人，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

（二）全国智力援藏

到1987年年底，西藏已形成一个从幼儿园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民族教育网。少数民族教师已占教师总数的71%。西藏有各级各类学校2521所，在校学生16.6万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4.5万多人，占87%。

内地为西藏办学，全国智力援藏，这是中国民族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1984年，

中央作出“在内地办学，为西藏培养人才”的决定，1985年，26个西藏初中班、高中班首先在内地的天津、辽宁、湖南等19个省市的20所学校正式开课。当年即招收1300多名藏族中、小学毕业生人学。同年，北京、成都等3地开办了西藏中学。1989年，国家教委在内地开办了西藏中专班。到1991年，内地等19个部委的49所学校开办了西藏中专班，设有能源、邮电、卫生、农业、税收、财务等45个专业，在校学生3600多名，约为全部西藏中专在校生的90%。国家对西藏班的学生实行包吃、包住、包穿，每年还拿出200万元作为学生的经常费用，举办西藏班的省市和有关部门，拨出经费为西藏学生每年补助300元到500元。此外，从1988年开始，农业部、林业部、水电部和西北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全面实施智力援藏计划，对口支援西藏农牧学院。

（三）宁夏民族教育稳步发展

1988年9月，在宁夏各级各类学校中学习的回族学生共有266376人，占学生总数的25.8%。为了保证宁夏少数民族教育稳步发展，宁夏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和措施。(1) 对回族聚居的南部山区的农业小学，全部免收学杂费和书本费。对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回族学生，给予特别补助。(2) 办寄宿制回民中小学。1980年以来，在固原、西吉、海源、同心、吴忠、灵武7个县市按重点学校的要求办了7所寄宿制回民中学、77所寄宿制回民小学，中学生每月生活补助15元，小学生12元。(3) 在银川一中、吴忠中学和固原一中3所重点中学增设寄宿制民族高中班，招收南部山区农村应届初中毕业生，女生占40%。民族班学生，发给助学金、补助费、烤火费、交通费和书本费，生活特别困难的，发给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这是为向高等学校输送回族学生的重要措施。(4) 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降低分数线录取，对南部山区实行定向招生；还从宁夏大学、宁夏农学院招收名额中划出20%，切块到南部山区各县和乐陶县，保证少数民族学生有一定的录取比例。(5) 举办民族预科班。1981年起，宁夏大学、固原师专和固原民族师范学校设立民族预科班。在高考落选的回族学生中择优录取学生，经一年学习后成绩合格者转人本校学习。1988年9月有700多人在校学习。

（四）新疆采取多项措施发展教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疆采取多项措施，从政策到财力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给予支持。在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择优录取和适当照顾相结合，并招收一定的民族预科生，以保证少数民族学生按计划入学。多年来，少数民族高校在校生数一直占全区在校生数总数的56%以上，截至1991年，10年来已培养出20000多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和1000多名少数民族大学教师。1990年，新疆哈密地区的牧区已有6300多户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龄儿童从“马背”上下来走进寄宿制学校宽敞明亮的教室，结束在“马背学校”流动读书的历史。为巩固牧区学校，哈密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优先为这些学校培养和输送教师，给5%的学生发放了助学金，实行了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费等项特殊政策。

第五节　经济发展中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差距的加大

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增长

1990年，中国5个民族自治区和黔、滇、青3个多民族省（简称8省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85年增长37.6%，国民收入增长40.9%，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50.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69.5%。

“七五”期间，少数民族地区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的开发建设步伐加快。在这一期间，国家在民族地区共安排了150多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包括新骚北疆铁路、内蒙古东胜油田、云南漫湾电站、广西平果铝厂、青海龙羊峡电站等。各地重点产业、骨干产业初步形成：广西糖业基地已初具规模；内蒙古煤炭基地陆续投产，成为中国第二大煤炭基地；新疆把工业发展的重点放到发展能源、交通、轻纺、建材、冶金等重要产业上来，施工兴建了31个大中型骨干项目，5年间，全区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以11.2%的速度增长。此外，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西藏“一江两河”、红水流域等重点区域的开发也取得了进展。这些重点建设，促进了民族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

二、从统计数字看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差距的加大

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看，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全国1个百分点以上，1953～1986年低1.4个百分点，1953～1990年则低1.6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1979～1986年低1.1个百分点，1979～1990年则低2.0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差距前者拉大0.2个百分点，后者则拉大0.9个百分点。（详见表1）

表1　　工农业总产值增年均长速度民族自治地方与全国的比较

单位：%

	增长速度			
	1953～1986年	1953～1990年	1979～1986年	1979～1990年
全国	8.7	9.0	10.1	10.6
民族自治地方	7.3	7.4	9.0	8.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从1985年～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逐年的增长速度看，全国与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差距，1987年与1988年两年达到10.4个百分点和17.7个百分点，1989年虽降为8.3个百分点，但仍高于1985年和1986年。1990年降为3.5个百分点，

1991年再降为2.7个百分点，低于1985年和1986年。这是由于从1989年起，开始了经济的治理整顿。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速度越高，则民族自治地方与全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越大。更何况，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基数较小，而增长速度反而低于基数大得多的全国，其人平绝对量的差距就更大了。(详见表2)。

表2　　民族自治地方与全国1985～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逐年增长速度的比较

单位:%

	增长速度（各年为前一年的%）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全国	123.1	114.0	121.6	130.3	118.5	110.6	111.9
民族自治地方	117.5	108.9	111.2	112.6	110.2	107.1	109.2
差距	5.6	5.1	10.4	17.7	8.3	3.5	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境计年鉴）历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比较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与全国平均相比较，1986年低812元，1990年低1919元，1991年略降为低1415元，但仍高出1986年603元（1415－812＝603元)。这说明，即使在治理整顿的特殊条件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与全国人均相比较，其绝对量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详见表3)

表3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民族自治地方与全国的比较

	工农业总产值（亿元）			人均（元）			人口（亿人）		
	1986年	1990年	1991年	1986年	1990年	1991年	1986年	1990年	1991年
全国	15207	31586	36405	1438	2763	3143	10.75	11.4333	11.5823
民族自治地方	872	1290.2	2672.7	626	844	1728	1.39	1.52957	1.5468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5个民族自治区同东部发达省份经济发展情况相比较差距就更明显了。(详见表4)

表4　　五个民族自治区向东部发达省份人均社会总产值的比较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辽宁	2921.32	3307.25	3891.51	4872.78	5514.99	5663.45	6460.08
山东	1611.66	1812.53	2202.50	2910.17	3528.48	3824.91	4588.42
江苏	2450.20	2928.01	3649.40	4776.65	5302.48	5611.90	6243.50
广东	1781.42	2026.25	2605.49	3855.82	4576.22	4875.35	6041.45
浙江	2156.97	2547.22	3163.54	4101.70	4605.99	4605.99	6042.60
内蒙古	1258.25	1361.56	1533.59	1972.49	2257.68	2474.30	2827.34
广西	815.10	826.66	1085.81	1360.20	1579.28	1695.75	1941.47
西藏	1117.59	1000.49	1062.02	1298.58	1398.15	1551.35	2024.34
宁夏	1239.52	1425.00	1578.85	1958.20	2302.64	2481.28	2771.67
新疆	1356.21	1526.73	1776.90	2312.97	2704.32	2999.67	3708.6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从表4中可知，人均社会总产值沿海诸省历年最高者为辽宁，最低者为山东；5个民族自治区历年最高者为新疆，最低者1985、1986、1991年为广西，1981、1988、

1989、1990年为西藏。最高省与最高自治区、最低省与最低自治区相比，其历年差额见表5。

表5　　人均社会总产值差额

单位：元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最高省与自治区	1565.11	1882.25	2120.61	2559.80	2810.67	2663.78	2751.46
最低省与自治区	796.55	985.87	1140.48	1611.59	2120.33	2273.56	2646.9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表6　　五个民族自治区同东部发达省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比较

单位：元

	1986年	196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辽宁	2722.76	3212.81	4011.07	4564.50	4740.86	5420.80
山东	1469.89	1817.11	2418.77	3025.98	3354.53	3958.23
江苏	2500.62	3104.54	4117.55	4635.40	4942.52	5466.54
广东	1536.89	1995.07	3024.11	3644.48	3944.22	9936.95
浙江	2126.88	2617.90	3413.07	3901.38	4244.56	5164.21
内蒙古	1003.20	1156.39	1690.69	1736.10	1925.10	2124.54
广西	718.37	858.42	669.81	763.89	914.41	1015.22
西藏	572.41	589.42	669.81	763.89	914.41	1015.22
宁夏	1003.07	1106.67	1430.50	1756.04	1902.13	2085.42
新疆	1179.41	1387.78	1806.11	2124.48	2384.57	2846.3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从表6可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沿海诸省历年最高者为辽宁，最低者为山东；5个民族自治区历年最高者为新疆，最低者为西藏。最高省与最高自治区、最低省与最低自治区相比，其历年差额见表7。

表7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差额

单位：元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最高省与自治区	1543.35	1825.03	2204.97	2340.01	2536.29	2574.50
最低省与自治区	897.48	1228.69	1748.96	2262.09	2440.11	2943.0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境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人均国民收人沿海诸省历年最高者为辽宁，最低者为山东；5个民族自治区历年最高者为新疆，最低者为西藏。（见表8）最高省与最高自治区、最低省与最低自治区相比，其历年差额见表8。

表 8　　五个民族自治区同东部发达省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较表

单位：元

	1985 年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辽宁	1154.96	1292.08	1499.58	1818.01	1943.41	1975.78	2179.82
山东	717.73	766.26	924.38	1135.42	1262.68	1347.00	1605.92
江苏	991.06	1068.85	1243.21	1505.47	1617.38	1681.57	1852.50
广东	833.18	890.58	1092.42	1509.06	1717.69	1784.13	2143.67
浙江	907.67	1037.10	1234.76	1513.9	1659.72	1735.71	2037.17
内蒙古	589.69	626.96	696.95	914.85	992.08	1078.96	1205.72
广西	536.44	502.97	515.91	616.02	723.39	788.50	892.84
西藏	632.16	545.32	590.38	739.15	777.78	845.05	1147.79
宁夏	537.59	609.67	656.55	835.96	971.21	1008.30	1093.33
新疆	656.65	737.53	844.38	1082.54	1232.12	1340.42	1623.4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表 9　　人均国民收入差额

单位：元

	1985 年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最高省与自治区	498.31	554.55	655.20	735.20	711.29	635.36	566.41
最低省与自治区	181.29	263.29	408.47	519.40	539.29	558.90	713.0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从上述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各项指标的比较来看，各民族自治区均低于 5 个发达省份中的任一省份。而且其差额除 1989 年、1990 年、1991 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省与最高自治区的差额逐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各项历年均较上年增加，并呈逐年递增之势。

三、差距加大，在相当时期内难以避免

差距悬殊、差距加大，在相当时期内是难以避免的。原因何在？

1.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较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少数民族地区则处于初级阶段的低层次范畴，因而经济的发展，起步较难，也较慢。

2. 在相当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将落后于中部一些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首先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几个经济特区和 14 个开放城市都在东部、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就是我国发达的地区，有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而且交通便利，人才济济，更加濒临港澳台和日本等地，可收“近水楼

台先得月”之效。“天时”、“地利”、“人和”，它们俱具优势。实行改革开放，它们捷足先发，鱼得其水，怎能不收畅游而前之效呢？所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会迅猛发展是势所必然的，它们的加速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西部民族地区，囿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虽然国家实行优惠政策，也仍然会出现在前进中步履维艰的局面。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前者阔步奔驰，后者迈步缓行，是在所难免的。

3. 少数民族地区优势的发挥，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在经济发展上，西部民族地区所具有的有利条件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所不及的。而且，事物是具有二重性的。其具有的不利条件的另一面，就是有利条件。例如，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看，北部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西部地处西藏高原高寒地带，中南、西南多为岩、溶石地区。这些地区，发展种植业增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困难较多。但是，却有发展多种经营的有利条件；而且，地下资源丰富，水利资源充足，具有特殊的人文、自然景观，具有发展水电、石油、旅游业等的巨大潜力。它们的开发利用将会给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但是，这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都需假以时日，这既需本地区的奋发图进，自我努力，又需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大力支援。万事俱备是需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的多年努力才能到来，“东风”也需在若干年后才能惠然降临。而在此时机到来之前，要想有超乎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是起跑在后，奔跑力不足，巨大后劲的发挥还有待来日，故暂时差距加大是难以避免的。这也可以说是机会均等而实际却不均等。

四、对差距加大不能等闲视之

既然与发达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差距加大势难避免，那么是否就可说，这种状况是正常的，从而等闲视之，听之任之呢？

回答是既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这样做。既要认识到差距加大是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也有较大发展而沿海地区发展更快的情况下出现的，更要认识到差距加大是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要求相违背的，从而要努力争取尽早加以改变。差距加大，就意味着各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些愈演愈烈了，这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所以，对差距加大问题必须正视，认真对待，尽速扭转。在相当时期内差距加大难以避免，这是客观事实；但又必须尽最大可能力争缩短这个“相当时期”，这是主观努力。政府实行优惠政策，中央和有关省市的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奋发有为，就是这种主观努力的体现。这种努力，要坚持不懈，绝不动摇，而且要更加努力，更有成效，更上一层楼。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的一些地区，这种状况，今后还会持续一个时期。但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将逐渐得到改变和转化，而有利条件将逐渐得到发挥和增多，差距加大，虽然仍将延续，但幅度则将

缩小；再向前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迎头赶上东部和中部一些地区，进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那时，中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就会成为现实。中华民族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中华民族各民族也就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携手实现现代化，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十九章　人口增长的第三次高峰和就业压力

第一节　十一亿人口的普查

一、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特点和意义

1990年7月1日我国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的普查。这次普查从1989年年初开始准备，1990年7月1日至10日进行人口普查登记，1992年全部数据汇总完毕，历时1年多时间，顺利地完成了国家计划规定的全部任务。普查结果：全国人口为1160017381人，其中，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采用直接方法取得，共1133682501人。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中国同胞的人口为26334880人（含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系采用台湾省和港澳当局公布的数据。内地人口中，男性人口为584949922人，女性人口为548723579人，他们分别占总人数的51.6%和48.4%。55个少数民族共91200314人，占内地总人数的8.04%。内地市镇人口为296512111人，农村人口为837170390人，分别占内地总人数的26.23%和73.77%。

（一）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特点

人口普查涉及面广，工作程序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与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相比，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又有突出的特点和难点。

1. 普查规模大。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58260万人（不含台港人口）；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69122万人（不含台港人口）；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100391万人（不含台港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普查登记的总人口超过11亿。

2. 普查项目多。普查项目的确立，主要是根据当时国家的需要和客观可能而定。第一次人口普查，只调查了当时国家急需的“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和“本户住址”6个基本特征项目。第二次普查时，为适应国家需要，又增加了“本人成分”、“文化程度”和“职业”3个项目，但“本人成分”和“职业”两个项目只进行了登记而未统计汇总。第三次人口普查项目在前两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增加到

19项。第四次人口普查，又增加了人口迁移方面的两个项目，共计21个项目，是我国历次人口普查中最多的。

3. 流动人口多，工作难度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数量增多，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各处，而户籍仍在农村，特别是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活必需品取消了人口定量供应制度后，居民报户口的积极性明显减弱，有些农村居民不愿申报超计划生育人口，经常性人口统计漏登人数呈增加的趋势。这些都增加了取得准确普查登记资料的难度。

4. 准备时间短。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搞过人口普查的国家和地区的准备工作一般为5年，至少3年。期间有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机构的设立，用户调查和专家咨询，工作规划的制定，试点，区域划分，普查人口的选调和培训，物资准备，经费筹措，等等。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如果从1989年5月国务院下达《关于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的通知》算起，到开始实施登记，只有1年多的时间，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间少1年多。如果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尤显时间紧迫。

5. 人口普查的数据处理以地（市）为基础，以分散录入，分级汇总的方式进行。1982年的人口普查，由省一级进行录入，省和国家两级汇总。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处理以地（市）为基础，分散录入，地、省、国家三级汇总。这标志着我国统计信息自动化建设又前进了一大步，同时也给1990年的普查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

1990年人口普查的这些特点，虽然给普查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但由于我国已有了3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多次人口抽样调查的经验，经过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仍按照计划要求胜利地完成了各项普查任务。

（二）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意义

第四次人口普查进行的时间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务院决定举行人口普查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1.1990年人口普查胜利完成的政治意义。人口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的调查，也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它需要全国人民和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这次人口普查的顺利完成和质量抽查结果所显示数据的准确性，以及人口普查证实我国10多年少生了两亿人口，这些成就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11亿人口的状况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人口普查也是世界人口普查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

2.1990年的人口普查为检验“七五”计划执行情况，为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部署提供了可靠的人口数据。人口众多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搞好人口普查，查清我国人口状况，无疑是科学治国的基础。1990年的人口普查，将为分析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第一步实施情况，预测第二步实施的可能性提供准确的人口资料。

3.1990年的人口普查，为制定切实可行的人口规划，提高计划生育工作质量，完善人口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990年的人口普查，由于其规模的庞大和特有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得到

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称赞。联合国人口普查技术专家阿布诺娃来我国考察后，建议将我国进行人口普查的做法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推广。

二、一次高水平的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的根本任务是取得高质量的人口数据资料。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流动量大，"黑孩子"增多，普查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国内外曾有人对此打问号。同时，对中国大陆人口总数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普查结果将大大超过1989年发表的数字（1989年年底，我国发表的人口数是111191万人，估计到1990年7月1日普查时为113368万人），无根据地说我国大陆人口已有12亿~14亿。然而普查结果证明我国历年发表的人口统计数是有根据的，普查质量是很高的。

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结束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质量抽样调查，全国共抽查197个县市的591个调查小区，共173409人。抽样检查结果，人口漏登率为0.7‰，人口重登率为0.160，重漏相抵，人口数净差率为0.6‰；性别差错率为0.14‰；年龄差错率为3.07‰；出生人口漏报率为1.03‰；死亡人口漏报率为4.9‰。

按照国际惯例，人口普查统计总人口的误差在1‰以内被认为是高质量的，误差在2‰以内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误差超过3‰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的。我国1990年的人口普查总人口登记的误差率只有0.6‰，按此推算，全国净漏登约68万人左右。与有关国家相比，不足1‰的总人口误差数据，应该说这样精确的人口普查登记质量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如美国人口普查的总误差率一般在2‰~3‰之间，印度在1‰~2‰，日本在0.5‰~1‰之间，苏联1970年为2.5‰，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超过4‰，误差率均高于我国。

高质量的人口普查结果不是轻易取得的，为了使人口普查工作获得成功，我国政府和普查工作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次普查除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和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特做法外，在普查技术方面，还针对流动人口、超生人口、死亡人口等难点着重搞了普查前的调查摸底工作和登记后的复查、补漏工作。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和公安部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全国动员了500余万户口整顿工作人员，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摸清了人口底数，查清了近年来出生未报的人口2219万人，为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获取高质量的统计数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质量的普查成果更是普查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这次普查抽调了521.2万人，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能参加普查工作。为了获取高质量的统计结果，普查工作人员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工作热情。例如，为了查清西藏墨脱和这个全国惟一不通汽车的县的人口，普查工作者打破了封山季节不能进入县境的惯例，越过5000多米的嘎龙拉山，在6000多平方公里的雪山峡谷间第一次查清了居住在那里的门巴、珞巴和藏族人口。在全国普查工作中，还有158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广大普查工作人员崇高的思想境界、卓越的奉献和光辉的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国人口普查史册。

在研究中，有关专家也指出，这次普查死亡人口数据偏差较大，这主要是对回顾性

调查指标进行调查困难较大，另外，还有事后质量抽查没有涉及到的指标，这些都有待在充分研究中进一步检查数据质量。

第二节　人口增长第三次高峰和人口变化的新特点

一、1986年中国进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一）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回升

70年代是我国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时期。1980年与1970年相比，出生率由33.43‰降至18.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降至11.87‰，人口自然增长率减少了近14个千分点。而到了1986年，这两个比率分别为22.43‰和15.57‰，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回升趋势。（详见表1）

表1　　1952～199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

单位‰

年　份	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	年　份	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
1952	37.00	20.00	1976	19.91	12.66
1957	34.03	23.23	1977	18.93	12.06
1962	37.01	26.99	1978	18.25	12.00
1963	43.37	33.33	1979	17.82	11.61
1964	39.14	27.64	1980	18.21	11.87
1965	37.88	28.38	1981	20.91	14.55
1966	35.05	26.22	1982	22.28	15.68
1967	33.96	25.53	1983	20.19	13.29
1968	35.59	27.38	1984	19.90	13.08
1969	34.11	26.08	1985	21.04	14.26
1970	33.43	25.83	1986	22.43	15.57
1971	30.65	23.33	1987	23.33	16.61
1972	29.77	22.16	1988	22.37	15.73
1973	27.93	20.89	1989	21.58	15.04
1974	24.82	17.48	1990	21.06	14.39
1975	23.01	15.69	1991	19.68	12.9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78页。

从1982年至1990年两次普查期间的情况看，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4.74‰，其中1982～1985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4.08‰。而1986～1990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5.47‰，这反映出两次普查期间的8年中，后4年比前4年人口增长速度要快。从分年龄人数推算，这一势头要延续到90年代中期。

人口过快增长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粮食生产为例，1986年以来与1957年相比，我国粮食生产量翻了一番多，但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均占有粮食某些时期反而减少。如1984年人均为392.84公斤，1986～1991年间除1990年外，其他年份均低于1984年的水平，1988年下降到357.72公斤，到1991年仍只有378.26公斤。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美国的22%。

（二）我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性质

纵观我国历年来的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的发展状况，1950年以来，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过3次人口出生高峰。（见表2）

第一次高峰是1950～1957年。这次高峰期年均出生人数在2000万以上，年均出生率高达35‰以上。根据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这期间近半数育龄妇女生了6个孩子，每个妇女生育孩子个数平均高达6.06个。所以，这一次不但是一次出生高峰，而且是一次生育高峰。生育高峰是这次出生高峰的基本内容。

第二次出生高峰是1962～1975年。高峰期长达14年之久。这次高峰期年出生人数在2109万～2954万之间波动，年均出生率在33‰以上。这次出生高峰同样与妇女生育水平关系密切，这期间接近90%的育龄妇女生了3个孩子，12%的育龄妇女生了6个孩子，每个妇女生育孩子平均为5.5个，其中1962～1971年为6.1个。因此，这一次出生高峰同样是一次生育高峰。

表2　　　　我国1950～1990年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

年　份	出生人数（万人）	总和生育率	年份（万人）	出生人数	总和生育率
1950	2023	5.81	1971	2567	5.44
1951	2063	5.70	1972	2566	4.88
1952	2105	6.47	1973	2463	4.54
1953	2151	6.05	1974	2235	4.17
1954	2245	6.28	1975	2109	3.57
1955	1978	6.26	1976	1853	3.21
1956	1976	5.85	1977	1787	2.84
1957	2167	6.11	1978	1745	2.72
1958	1905	5.68	1979	1727	2.73
1959	1647	4.30	1980	1779	2.66
1960	1389	4.02	1981	2069	2.58

年　份	出生人数（万人）	总和生育率	年份（万人）	出生人数	总和生育率
1961	1188	3.29	1982	2126	2.57
1962	2460	6.02	1983	1902	2.25
1963	2954	7.50	1984	1804	2.19
1964	7729	6.18	1985	1851	2.20
1965	2704	6.08	1986	2189	2.41
1966	2579	6.26	1987	2251	2.49
1967	2563	5.31	1988	2262	2.31
1968	2757	6.45	1989	2293	2.25
1969	2715	5.72	1990	2391	2.25
1970	2736	5.81			

资料来源：①周夷谷、于丽莎：《出生人口数量增多是我国第三次出生高峰的主要内容》，《人口研究》，1992年第5期。

②《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3、380页。（以后再引此书仅注页码）

第三次出生高峰是1986年开始的，将持续到90年代中期。从表2可以看出，1986年出生人数再次回升到2189万人，比1985年多出生了338万人，以后逐年还有所增加，其出生规模与第一、第二次出生高峰十分接近。但这次出生高峰与前两次性质完全不同，产生的原因也不同。它主要产生于婚育年龄妇女比重的急剧提高，因而是一次出生高峰，而不是一次生育高峰。

第三次出生高峰与前两次相比有不同的特点。

1. 它起因于旺育年龄妇女人数急剧增加，比重急剧提高。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1～29岁生育旺盛年龄妇女人数1985年为8163万人，1986年为8483万人，1989年上升到9628万人，1990年和1991年又分别上升到10299和10888万人。与1985年相比增长幅度为18%以上，如此庞大的妇女生育群势必造成人口过快增长。

2.1986年以来的出生率只比1977～1985年期间略有提高，截至1990年均未超过21.06‰，远不如前两次出生高峰的峰度。之所以被称为一次出生高峰，主要是就出生人数规模较大而言的。

3. 它是一次低生育水平的出生高峰。这次出生高峰期的总和生育率并不高，1986～1990年年均总和生育率只有2.34，有1/3的地区，总人口近36946万人的生育水平已低于或接近总和生育率2.1的更替水平。这是因为，这次高峰出现的根源不在80年代中后期，而在60年代，在当时生育率太高，出生人数太多，它反映了人口现象的周期重复。

二、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迅猛

（一）1991年全国流动人口近7000万

1985年以来，我国国内人口流动异常活跃。从1982年算起，当时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为3000万，1985年上升到5000万，1987年又猛增到7000万。1988年以后的几年由于治理经济环境，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流动人口增长的势头有所遏制，但1990年和1991年，全国年均流动人口仍接近7000万。这意味着我国每17个人中有1人参加了人口的大流动。

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大城市尤为突出，在全国7000万流动人口中，仅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流动量就达1000万。北京市1985年每日流动人口达95万人，较1984年增加1/3。上海1985年每日流动人口高达165万，较1984年增加60%。1988年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成都、西安、沈阳、武汉等市每日流动人口分别为148万、117万、111.9万、110万、53万、50万、50万、30万。在一些经济繁荣和开放城市、城乡结合部、国家重点建设地区流动人口增长更快，深圳常住人口23万人，流动人口28万人，比常住人口多20%。流动人口在短短的几年形成了庞大的群体，成为大城市人口变动中最活跃的部分。

（二）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

1.务工经商从事服务等经济活动的人员是流动人口的主体。1985年以来的流动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的较多。据上海、广州、成都、太原、郑州、长春、哈尔滨等市1989年流动人口调查资料表明，在流动人口中，建筑施工工人、其他各类雇工、集贸商贩、修理服务、科技应聘等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占59.46%。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广西、四川等省、自治区各种雇工占第一位。浙江、江苏、山东、湖北等省以雇工和自谋职业为目的亦占较大比例。

2.流向：城市多于农村，省内多于省外。流动人口多数来自农村，这已被抽样调查和普查资料所证实。第四次人口普查10%提前抽样汇总数据明显反映出，从农村迁向市镇占首位，占迁移人口的48.58%。1987年北京抽样调查、1988年上海抽样调查得到的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人口分别为68.58%和47.90‰。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省际间人口流动十分频繁，但在城市引力和交通运输等条件的影响下，除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少数特大城市和开放区有较多的省际流动人口外，绝大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本省。据河南省的调查，1989年河南省286.67万农村外出人员在687.99万人次的流动中，其中在省内流动的有508.01万人次，占73.8%，流向外省的179.98万人次，占26.2%。郑州市来自本省的流动人口占到2/3。

3.男性多于女性。女性受传统观念和自身文化素质以及城市居住条件的影响，外出流动人数远远少于男性。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外出1年以上的2135万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5%，女性占45%，性别比为122，比普查登记的常住人口106.6的

性别比高出 15 个百分点。浙江全省外出的 142 万人口中，男性占 59.3%，女性占 40.7%，性别比为 145.5。1989 年河南省农村外出流动人口中，男性为 243.2 万人，占 84.8%，女性为 43.47 万人，占 15.2%。

4. 文化水平低。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他们文化水平较低，绝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全国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60.4%，文盲和半文盲高达 15.88%。

（三）“民工潮”的社会经济效果

我国农民异地流动所形成的“民工潮”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它对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农村来说，首先，大量人口流出，有利于开发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领域的转移。进入 90 年代，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 1700 万左右，通过人口流动，向更广阔的天地转移已显得特别重要。其次，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外出农民把资金、信息、管理经验带回农村，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1989 年河南省外出从事经济活动的 254.34 万人，人均外出 165 天，人均外出获收入 969.5 元（含实物折款），日均收入 5.84 元。

从城市来说，大量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对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活跃商品市场，方便群众生活，缓解某些行业工种招工难的矛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的奇迹，上海浦东的开发，北京面貌的巨变，没有那一项能离开流动的民工。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大量民工涌入城市，也给城市经济秩序、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带来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违法犯罪严重，违法经营活动大量存在，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增加了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1990 年北京抓获的流动人口犯罪分子占全市抓获的犯罪分子的 22.5%，1991 年上升到 30%，在一些流动人口集中地区为 70%～80%。流动人口中的超生现象特别严重。据上海市 1988 年调查，流动人口比常住人口计划外生育高出 24.5 倍。西安市 1990 年流动人口比常住人口计划外生育高 20 倍。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而沿海和大城市经济发展的诱惑力使“民工潮”的推力和拉力仍在日益膨胀，这种状况将加剧农民外流的浪潮。

三、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

（一）我国老龄化社会正在迫近

进入 90 年代，我国人口形势又面临新的严峻问题，其中尤以人口老龄化趋势突出，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它将成为我国人口的重要方面，也是解决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课题。按照 1982 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规定，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0%，该国即称老年型人口国家。1991 年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 1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9.2%。其中超过 10% 的有上海、北京、江苏、辽宁、天津、浙江、山东、吉林等省市。1956 年联合国委托法国人口学家

撰写并出版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一书，以65岁作为老年起点，并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7%即属老年型人口国家。现在西方人口学家仍以65岁和7%作为老年的开始年龄和进入老年型人口国家的指标，并提出了补充指标，用综合方式确定人口结构类型。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判断人口结构类型常用指标参数值见表

表3　　人口年龄结构的三种类型

	年轻人口型	成年人口型	老年人口型
老年人口系数	4%以下	4%～7%	7%以上
少年儿童系数	40%以上	30%～40%	30%以下
人口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岁～30岁	30岁以上
老少比	10%以下	10%～24%	24%以上

资料来源：刘洪康、吴忠观（人口手册），西南财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中国人口年鉴（1992）》数据显示，1991年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99%，接近7%。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儿（0～14岁）年龄组人口比重为27.71%，已小于30%，老少比已大于24%，这两项指标已经达到老年型国家的指标。

以上各项数据清楚地说明，无论是以60岁，还是以65岁作为老龄人口的起点，我国老龄化的趋势都十分明显。我国人口结构正在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据预测，20世纪末，我国将进入老年人口型社会。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点

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实践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既具有人口老龄化的一般特性，又具有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表现。

1. 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的速度快。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1953年为2540.1万人，1964年为2468.7万人，1982年为4927.6万人，而1990年猛增到629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38%、3.35%、4.89%、5.57%（老龄人口若按全国60岁及以上的口径计算，1990年全国共有969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58%）。1991年年末已达到5.99%，与1982年相比，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12%，而同期总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5%。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总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多。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最早的国家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一般在20世纪中叶成为老年型国家。英国老年人口比重从5个多百分点增长到7个多百分点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从5%增长到7%，所用的时间估计与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所用时间（20年）相同。

2. 老年人口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由于各地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生活水准与生活质量有较大差异，因此，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分布是城市高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根据1991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1年市、镇、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占人口总数的10.18%、8.96%和8.91%。人口老龄化在省、自治区、市之间差距更大，1991年上海、浙江、北京、江苏4省市6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的比重超过7%，天津为6.96%。而内蒙、黑龙江、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7省、自治区老年人口的比重在5%以下。全国老龄化最高水平的上海10.94%与最低水平的青海3.57%相差7.37个百分点。

3. 老年人口文化程度低，文盲率高。1990年普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各种文化程度占同龄人口的比重时，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只占1.56%，中专和高中占3.7%，初中占10.7%，小学也只占47.06%，而文盲半文盲高达36.98%。

老龄人口文化程度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1990年普查时，男性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女性占0.26%。中专和高中男性占9.31%，女性占0.69%。初中男性占9.29%，女性占1.44%。小学男性占37.2%，女性只有9.85%。文盲和半文盲男性为69.72%，而女性高达87.75%。

4. 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世界各国人口老化现象一般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社会福利事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1%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981美元。我国老年人口达到同等水平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目标是2000美元。我国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725元人民币，而老龄化程度却接近发达国家的比例，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四、新生婴儿性别比呈上升趋势

（一）1985年以来，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数据偏高

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人口性别比的测量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关系到人口性别结构的平衡和社会的稳定。在人类正常的生育（生物学意义的）中，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3～106之间，男婴略多于女婴数。根据我国1987年1%抽样调查，1988年2‰生育节育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从1985～1990年普查时全国的出生性别比都在110以上，比正常水平高出4个以上的百分点。（详见表4）

表4　　1985～1990年7月1日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

年　份	性别比	年份	性别比
1995	111.42	1988	（缺）
1986	112.30	1989	111.27
1987	110.96	1990.7.1	111.87

资料来源：①1985～1987年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年鉴（1991）》，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36页。（以后再引此书仅注页码）

②1989～1990年7月1日数据来自高凌：《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从1990年人口普查100%电子计算机汇总给出的1990年普查时0～5岁性别比数据，也可以反映出1985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是偏高的。（见表5）

表5　　1990年普查时0～5岁婴儿性别比

年龄（岁）	0	1	2	3	4	5
性别比	111.75	U1.59	110.11	109.12	108.47	108.23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2）》，第95页。

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也是比较高的。根据学者乔晓春在《对中国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一文提供的资料，在135个国家和地区中，出生性别比在103～107之间占80%，小于103的占5.2%，大于107的占14.8%。

（二）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随胎次增高而上升

表6清楚显示，1985年以来第1胎出生性别比仍属于正常范围，从第2胎开始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而且超出正常出生性别比7～14个百分点。1989年2～4胎性别比分别高达120.9、124.6、131.7（含4胎以上数据）。可见，1985年以来出生性别比的上升首先是从第2胎开始的。

表6　　1985～1989年全国出生婴儿分胎次性别比

年份	合计	一胎	二胎	三胎	四胎	五胎
1985	111.42	106.55	115.94	114.07	126.87	117.27
1986	112.30	105.36	116.93	123.08	125.33	123.50
1987	110.96	106.79	112.78	118.87	118.56	124.62
1989	113.8	104.9	120.9	124.6	131.7	

资料来源：①1985～1987年为《中国人口年鉴（1991）》，第535页。
②1989年为四普10%机器汇总数据。

（三）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1985年以来，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呈上升趋势这一客观存在的统计事实，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国际上一些重要刊物和新闻媒介发表许多关于我国性别比的文章和报道，如美国颇有影响的《人口与发展评论》刊物，1990年第1期发表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Huil的《中国出生性别比的近期趋势》一文，1991年第1期又发表了瑞典学者Johahssoh等的《关于失踪的中国女孩的新的人口学分析》的文章。国外学者的论文探讨了中国出生性别比上升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3方面的解释：一是漏报女婴，其中许多女婴由他人领养而不申报。二是溺杀女婴，有的学者认为溺杀女婴是中国渊源已久的一个传统。三是产前性别鉴定，人工流产女婴，保留男婴。无论哪种原因占主导地位，出生性别比升高都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有深入的讨论和卓越的见解。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高凌、曾毅、顾宝昌、徐毅等学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在重男轻女传统影响下的选择性申报和选择性生育是造成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由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陋习在各地特别在农村仍根深蒂固，超生女婴者为了躲避处罚，千方百计瞒报谎报。在80年代出生性别比超出正常值的部分至少有1/2～3/4是漏报女婴造成的。这一情况表

明，漏报女婴即选择性申报，是1985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第一位的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医疗设备水平的提高，特别是B超诊断技术的不断普及，已为选择性人工流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曾毅等学者援引自卫生部门和海关总署的信息表明，1985～1989年是B超进口的高峰期，其中仅1989年就进口了高档彩色B超机2175台。表4表明，正是从1985年起，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了显著上升趋势。由此可见，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所导致的产前性别鉴定与选择性生育已成为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不可忽视的第二个因素。溺弃女婴的封建陋习的存在虽然不是新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但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据1991年7月19日《中国社会报》报道，"湖北蒲圻市民政局自1985年以来，接收弃婴5年多计有200名，弃婴平均每年以40%的幅度增长，类似蒲圻地区这类现象在全国也绝不是个别地区"。

第三节　中国经济中的失业与就业

一、第四次劳动就业高峰的形成

（一）我国出现过的四次就业高峰

从新中国成立初算起，我国出现过四次就业高峰：

第一次是在50年代初出现的。当时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镇失业人员达到470万，约占在业人员的一半，又要解决农民的破产问题。由于国家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和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等措施，到1956年，我国基本上解决了这一时期的失业问题。

第二次就业高峰是60年代初期出现的。在5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冒进，追求高速度，使招收劳动力失控，国家职工剧增，新增职工远远超过城镇负荷限度，严重影响城镇的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运转。国家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动员城市青年去农村、鼓励个人开业等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城镇300多万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第三次就业高峰是70年代末出现的。我国城镇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和知识青年纷纷回城，造成1979年城镇失业人数达到567万，失业率高达5.4%。酿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次就业高峰。面临严峻的就业挑战，国家对"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三结合"的劳动就业方针，失业率从1978年的5.3%下降到1985年的1.8%，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第四次就业高峰出现在8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以后，失业现象有明显的增长势头，城镇待业人数已从1979年的567万下降到1984年的263万，到1989年至1991年，又分别回升到379万、383万和352万（以上失业人数并不包括滞留在企业中的隐蔽失业人数）。失业率又由1985年的1.8%回升到1989年的2.6%，到1991年仍达到2.3%。

1989年需要安排的劳动就业人员高达997.7万人。就业压力尤以县镇和边远矿山突出，据1988年7月9日《中国劳动人事报》报道，“县镇待业人数已占全国待业人数的50%，有的省高达30%”。“辽宁铁法市，是仅有13万城镇人口的县级市，1988年仍有待业青年9300多人，其中4682人失业时间已长达3年以上。”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

1978～1991年全国城镇就业紧张状况从表中可见一斑。

表7　　1978～1991年全国城镇就业与失业人数、失业率

年　份	就业（万人）	失业（万人）	失业率（%）
1978	544	30	5.3
1980	900	5415	4.9
1981	820	4395	3.8
1982	665	379	3.2
1983	628	271.4	2.3
1984	722	235.7	1.9
1985	874	238.5	1.8
1986	793	264.4	2.0
1987	799	276.6	2.0
1988	844	296.2	2.0
1989	620	377.9	2.6
1990	785	383.2	2.5
1991	765	352.2	2.3

资料来源：①《中国劳动年鉴（1990～1991）》，第519页。
②《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118页。

（二）第四次就业高峰形成的原因

在社会商品经济一般规律作用下，一部分劳动者失业具有不可避免性，而我国第四次就业高峰的出现，还有其独特的原因。

1.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第三次生育高峰的波及效应，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劳动力的自然增长进入高峰。据统计，1988～1991年平均每年约有1355.9万城镇劳动力要求就业，但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发展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却呈下降趋势。如1986～198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分别接纳536.3万、499.4万、492.2万人就业，而1989～1991年分别降至367.3万、475万、363万人。到1991年仍有352.2万人失业。

2.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劳动力供给来源多样，加剧了就业矛盾。60年代和70年代，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劳动力的增量，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就业压力不仅来自劳动力的增量，也来自劳动力存量的转移。这包括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使城镇就业

受到冲击；众多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逐步向外转移；离退休人员再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劳动制度的改革使一部分就业人员从原来的岗位游离出来等待重新就业。由于受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使城镇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上海“七五”期间缺30万劳动力，由于招用了过多的民工，使上海失业率由1985年的0.2%上升到1988年的0.9%。

3.“七五”期间，“农转非”工作曾一度失控，给城镇就业造成巨大压力。1986～1988年，“农转非”人数达1503万人，1989年国家下达了控制指标以后仍转了421万人。“七五”期间，城镇安置的就业人员中，有1/3左右是“农转非”的劳动力。所以，80年代后期，城镇失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转非”人数过多，造成城镇劳动力机械增长过快。

4. 决定的因素在于经济的发展。1989年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全国经济紧缩，加上产业结构调整，许多企业关、停、并、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减少。据统计，到1990年2月全国停产待业人员约600万人。

二、中国经济中失业现象的基本特征

随着“七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失业现象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1. 劳动力总量过剩与劳动力局部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并存。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和人口生育高峰的惯性作用，在8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力供给总量仍处在剧增时期。从1985～1991年，平均每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在2499万人以上，而同期城镇吸收的新就业人数平均每年不超过783万人。供需缺口在239万至383万之间。

我国劳动资源一直供过于求，因而在就业与招工的关系上，就业问题始终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招工难度也有所增加。由于一部分人择业观念发生变化，趋向于选择收入高、轻松舒适的工作；也由于劳动力总体素质低等原因，造成部分企业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高质量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一些苦、累、脏的行业和工种出现空缺。有些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在单位人浮于事的情况下，还不得不任用农民工。据统计，全国城市艰苦岗位缺员300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农民工顶替。

2. 劳动力流动性大，加剧了劳动力供求的矛盾。平抑前三次就业高峰，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的固定工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务院1986年颁布改革劳动制度4项“暂行规定”以后，为企业和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和“双辞”提供了政策依据，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择业均比以往灵活。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批农民脱离土地流向城市。所以，在8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力的流动率很高，而且劳动力的流向呈现出“趋高性”，趋向于经济发达地区，趋向于高收入的行业和职业。1990～1991年在广州3个人中有1个外来流动人口，上海每3.5人中有1个外来人口，北京每5个人中有1个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多，势必加剧劳动力在地区间、行业间、职业间的供求不平衡的矛盾。

3. 隐形失业与显形失业并存。1985年以来，我国的失业问题呈现出明显的隐形失业与显形失业并存的特征。据《中国劳动年鉴（1990～1991）》资料显示，1985年至

1991年，我国城镇显形失业人数在239万至383万之间，显形失业率在1.8%至2.6%之间波动，而隐形失业率却高得多，据估计，农村和企业的隐形失业率分别高达15.4%和10.7%。隐形失业同显形失业交织在一起，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两难”问题。

隐形失业主要有两种形式。

1.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隐形失业的主要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突出表现在80年代中后期以后“民工潮”对城市的冲击，“民工潮”的涌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出公开化的倾向，加重了城镇显形失业的压力。

2. 企业“冗员”的大量存在。据测算，我国城镇企业中冗员占10%～20%，全国“在职失业”人数在1500万～2000万人之间。一家汽车制造厂有职工6.4万人，一线人员只有1万人左右，二、三线人员占75%。北京一家机械厂有职工7800人，一线职工只有1700人，二、三线人员占78%。由此可见，我国企业的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

三、改革开放为劳动就业开创了新局面

（一）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为扩大就业开辟了新途径

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冲击了旧的人口控制机制，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就业压力从潜在状态逐渐显化。同时，改革开放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拓宽了就业门路，为扩大就业开辟了新的途径。

1. 农村的改革，解放了8亿农民的生产力，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到1991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609万。农村还通过发展劳务输出，解决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 在城镇，改革所有制，调整产业结构，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使劳动就业规模明显扩大。统计数据表明，新就业人数，1995年为813.6万人，经过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到1991年，还保持在765万人的规模。特别是其他所有制的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有了快速发展，前者从1984年的37万增加到1991年的216万，7年增加了5.8倍。后者到1991年已达760万人，比1984年的339万人增加了421万人，若与1978年相比增加了50.9倍。

3. 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开放沿海、沿边、沿江（河）和内陆地区，吸收了大批就业者。同时，我国还参与国际市场，到国外创办企业，发展国际运输和旅游事业，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从而创造了许多相应的就业机会。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在广东表现得十分明显。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不仅使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得到解决，还吸收了上百万外省剩余劳动力，而今，大量劳动力已成为广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在。

4. 实行“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创办劳动服务公司，为缓解就业压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三结合”就业方针的实行是对“统包统配”就业政策的冲击，不但在短时期内

顺利地渡过了就业高峰，并且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截至1991年年末，我国劳动服务公司，已发展到20万个，从业人员870万人，从创办以来，累计安置了1600多万城镇待业人员，承担了同期全国安置任务的20%。与此同时，还为国营企业安置了120万富余人员。

（二）深化用人制度改革，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资源的配置

1986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就业管理改革，从解决劳动力“余量”，缓解就业压力逐步转向劳动就业“增量”、“存量”配置制度的改革和提高劳动力素质。

1. 搞活企业固定工，引入市场机制，优化劳动组合。为了克服传统就业制度的弊端，党和国家分步骤地进行了改革。第一步，先改变由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1983年3月，全国劳动工作会议提出了在劳动部门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方针。三结合的方针打破了完全由国家统一安置就业的旧格局。第二步，改革用工制度。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国营企业招用工人》、《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企业职工奖惩条例》4项暂行规定。决定对城镇新就业的人员普遍实行合同制，今后不再招用固定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合同制工人已从1986年年初的332万人增加到1991年上半年的1406万人，劳动合同制工人占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比重由3%上升到14%。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合同制工人1991年上半年已接近300万人，约占集体所有职工的10%。与此同时，我国还把统包统配的技术学校毕业生纳人了劳动合同制的实施范围。深圳市还根据自身实际制定有关规定，将劳动合同制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分配在企业中的大中专毕业生。第三步，优化劳动组合。第二步改革只涉及新职工的使用办法。从1986年起，在全国各地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了以优化劳动组合、合同化管理、择优上岗为内容的“固定工”制度改革。1987年青岛会议后，全国有5万多户企业1500多万职工参加了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工作，到1991年年底仅湖北省就有4558家企业共95.4万职工实行了优化劳动组合。优化劳动组合具体包括负责人与职工双向选择，自由组合和领导人逐级聘用三种形式。对固定工制度的改革，促进了人才流动，在企业形成了竞争局面。

2. 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制度，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在我国的就业工作中，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二是劳动力素质低。这是劳动就业服务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开展就业培训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措施。配合劳动就业用工制度改革，劳动人事部颁布了《工人技术考核条例》、《关于就业前训练若干问题的暂行办法》。劳动人事部和国家教委共同颁布了《技工学校工作条例》。上述规定和条例确定了“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加强了职工技术教育工作。1987年全国已有技工学校4000多所，培训规模达150万人。各级劳动服务公司建立培训中心1600多所，年培训能力达80万人次。到1991年年底，全国有培训中心2100所，年培训能力达700万人。通过加强对新招工人和在职工人的技术培训，既提高了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又为失业人员就业提供了条件。

（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我国从1986年10月开始，为配合劳动合同制的实行和《企业破产法》的实施，建立了国营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1990年7月，劳动部在北京召开的待业（失业）保险工作会议后，实施的范围扩大到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截至1991年年底，参加失业保险的单位共43万个，职工7123万人，5年中累计为30万失业人员发了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并帮助20万名失业职工重新就业。随着失业保险制度实施范围的扩大，这就打破了部门和所有制的界限，加速了失业保险的社会进程。

第二十章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第一节　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

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1985～1991年期间农民收入继续提高，生活进一步改善。农村住户调查表明，1984年，农民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为355.3元，到1991年增加到708.6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1991年比1984年增长35.8%，年均增长4.5%。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据城镇住户抽样调查，1985年城镇居民年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685元。1986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828元，比上年增长20.9%；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升因素，实际收入增长13%。但有少数居民家庭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比较困难。1987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916元，比上年增长10.6%；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7%。但有21%的城镇居民家庭由于物价上涨，实际收入水平下降。1988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1119元，比上年增长22.2%；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2%。但城镇不同居民家庭实际收入有增有减，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据13个城市抽样调查，有34.9%的居民家庭纯因物价上涨造成实际收入水平下降。1989年城镇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货币收入为1260元，比上年增长12.6%。但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较多，据对19个城市调查，有35.8%的居民家庭纯因物价上涨造成实际收入水平下降。1990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货币收入为1387元，比上年增长10%，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6%。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为1544元，比上年增长13.2%，扣除生活费等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7.7%。1991年与1984年相比，城镇居民年均每人生活费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32.9%，年均增长4.1%。

从1985年到199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与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之差约为76元，111元、128元、88元、177元、244元和259元（详见表1），在支出生活费后余款逐年增加。

表 1　　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情况

单位：元

	1985 年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平均每人年收入	748.92	909.96	1012.2	1192.12	1387.81	1522.72	1713.10
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	673.20	798.96	884.40	1103.98	1210.95	1278.89	1453.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

从收入来源来看，非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快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在工资性收入中，奖金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标准工资的增长。1990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非工资性收入比 1985 年增长 1.8 倍，明显快于工资性收入增长 80.5%的速度。在工资性收入中，人均标准工资增长幅度为 59.3%，而奖金收入的增长幅达 1.1 倍。从收入结构看，在全部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下降，非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上升；在工资性收入中，标准工资所占比重下降，奖金所占比重上升。(详见表 2)

表 2　　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构成

单位：%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全部收入	100	100	100	100	100
1. 工资性收入	75.4	74.4	69.3	67.3	67.5
其中：标准工资	53	49.1	42.5	39.2	40.8
奖金、超额工资	9.3	11.8	13.4	14.0	12.2
2. 非工资性收入	24.6	25.6	30.7	32.7	32.5

表 2 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过去那种单一的收入结构模式已为多元收入结构模式所取代，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已开始取决于非工资性收入和奖金收入的增加，而不是标准工资的增加。

二、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自 1985 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但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

（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即收入水平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

1. 收入水平差距。

(1) 省（市）际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从省际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看，1985 年至 1991 年间，由于地区经济水平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省际间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1990 年收入最高省与收入最低省之间的收入之比为 1:4.43，以后还在扩大，

收入水平差距由100多元扩大到近2000元。(详见表3)

表3　　主要地区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单位：元

	1985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全国平均	397.60	462.55	544.94	601.51	686.31	708.55
北京	775.08	916.38	1062.55	1230.74	1297.05	1422.37
河北	385.23	444.40	546.62	589.40	621.67	657.38
上海	805.92	1059.21	1300.96	1379.87	1907.32	203.38
浙江	548.60	725.13	902.36	1010.72	1099.04	1210.77
贵州	287.83	341.84	397.74	430.34	435.14	465.53
甘肃	255.22	296.14	339.88	365.89	430.98	446.4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

(2) 分地带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从按地理位置划分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分析，东部沿海地区省市农民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1990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000元的省（市）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北京（1297.50元)，天津(1069.04元)，上海（1907.32元)，浙江（1099.04元)，广东（1043.03元)。全国最低农村居民收入的省份都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介于东西之间，平均人均纯收入在600元以上。1990年全国仅有两个省份人纯均收入在500元以下，都在西部地区(贵州和甘肃)。东部地区最高省份人均纯收入与西部地区最低纯收入之间差距很大，1990年为1476.34元，1991年为1556.96元。

2. 收入分配差异。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有两种方法，即基尼系数法和收入等分法考察。我们分别用这两种方法来考察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

(1) 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扩大。1978年以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村居民收入迅速提高，农村居民集团内部收入差异逐渐扩大。但直到1987年仍为“相对平均”阶段，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高低收入倍数在2.88~4.16之间。从1988年开始，随着全国范围内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第一次超过0.3，进入“比较合理”阶段。至1991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拉开，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3072。(详见表4)

表4　　主要年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和20%人口富低收入组收入倍差情况

	人纯收入（元)	基尼系数	高低倍数
1978	133.57	0.2124	2.88
1980	191.33	0.2366	3.16
1985	397.60	0.2635	3.65

	人纯收入（元）	基尼系数	高低倍数
1987	462.55	0.2916	4.16
1998	544.94	0.3014	4.68
1990	629.79	0.3099	4.50
1991	708.55	0.3072	5.00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资料》，1994年第10期。

(2) 东西地带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部内部差异化程度甚小。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反映出，1980～1990年，东西地带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都有扩大，其中，东部地带由1978年的0.28扩大为1990年的0.32，西部地带由1978年的0.24扩大为1990年的0.28。但中部地带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则变化甚小，由1978年的0.25变化为1990年的0.27。(详见表5)

表5　　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地区分布

	1980年	1988年	1990年
东部经济地带	0.28	0.31	0.32
中部经济地带	0.25	0.25	0.27
西部经济地带	0.24	0.27	0.28
全国	0.24	0.30	0.31

(3) 低收入户进一步减少，高收入户明显增加。“七五”的期，我国不同层次农户收入水平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农户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10.2%下降为4.6%，200元至500元的农户由65.5%下降为42%，500元至1000元的农户由20%上升为40.5%，1000元以上的农户由2.3%上升为12.9%。

此外，农民收入的差距还表现在从事非农产业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之间。在同一地区，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的能力差别以及由此决定的所从事劳动的性质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是衡量城镇居民收入较为合适的指标。长期以来收入分配中的平均已被打破。

1. 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的基尼系数有了扩大，收入差距在扩大。1978年为0.164，1990上升到0.182，但仍很低。这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少有的。

2. 大中小城市间人均生活费收入，有了一定差距，但相差不很大。1990年全国城镇平均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387元，特大城市为1684元，大城市为1413元，中等城市为1498元，小城市为1320元，县城为1187元。1991年全国城镇平均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544.30元，特大城市为1901.64元，大城市为1553.40元，中等城市为1661.76元，小

城市为 1495.30 元，县城为 1329.64 元。

3. 不同所有制城镇劳动者平均工资有差别。1990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 1.0，集体所有制单位为 0.74，各种合营单位为 1.31，被人们认为收入最高的个体劳动者人均净收入为 1.97，悬殊并不大。

4. 减收户呈增长趋势，部分低收入户生活困难。“七五”前 4 年，受经济波动，特别是物价上涨过猛的影响，减收户所占比重呈增长趋势。1990 年随着物价涨幅的回落，情况有所好转。(详见表 6)

表 6　　减收户的情况及减收的原因

单位：%

	每百户中的减收户	因物价上涨而形成的减收户	因家庭人口增加就业人口减少而形成的减收户
1986 年	20.8	8.6	12.2
1987 年	45.9	20.8	25.1
1988 年	50.1	34.9	15.2
1989 年	54.7	35.8	18.9
1990 年	29.8	8.0	21.8

1990 年最低收入户人均生活费收入 765.4 元，比 1985 年增长 71.4%；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仅增长 3.6%。在一部分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部分困难户的生活变得更艰难。

除工资（包括奖金、津贴）收入外，城镇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增长很快，1990 年，工资外收入超过 1100 亿元，占总收入的 25%。工资外收入主要包括福利收入，从单位得到的账外收入和实物收入，各种利息收入，从外单位得到的收入以及出售财产收入等，它们都比工资增长快。除福利收入（约占工资外收入的 20%）基本上平均外，其他收入分配是造成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差距逐年有所扩大的主要原因。

例如，约占工资外收入 40%的利息收入，当时主要是储蓄利息，在居民之间的差距很大，据第四次城乡居民储蓄抽样调查资料揭示，占调查户数 8%的个体经济户，存款占 30%，人均存款相当于汇总人均存款的 3.5 倍，而学校和国家机关存款户人均存款还不到汇总人均存款的一半。再如，从单位外得到的收入占工资外收入总额的 22%，而能得到这些收入的职工人数是极其有限的。(详见表 7)

表 7　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来源情况

	单位	1985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	元	455.88	613.08	672.93	769.50	857.59	969.69
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	元	113.52	139.80	153.18	164.25	170.89	177.89
其他劳动收入	元	12.36	14.88	17.00	22.27	22.61	27.22
财产性收入	元	3.74	5.60	7.36	12.03	15.60	19.72
转移性收入	元	65.88	112.95	180.88	222.59	250.01	274.40
特别收入	元	35.95	43.80	57.22	70.17	69.46	80.8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

所以，在这种分配体制下，绝大多数工薪人员的收入分配仍是“平均型”，收入差距不会拉得大，但由于多种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发展，确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由于小型商业和服务业实行租赁、拍卖等改革，也使部分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如个体户、私营企业雇主、外资单位工作人员、经营承包者以及从事“走穴”的演员，他们大都成了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户，与一般工薪人员相比，收入悬殊越来越大。

可以看出，这几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总特点是：一方面工薪人员（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合理地拉开，另一方面是非工薪人员的收入猛增，与一般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纵向考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呈现“X”发展过程。改革以前 30 年我国的城乡经济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的经济环境中发展的。这期间，尽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不大，但由于较长时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干扰，农村经济发展停滞、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动轨迹经历了拉大、缩小、再拉大的发展过程。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城镇居民为生活费收入，农村居民为纯收入，下同）若以农村居民为 1 比较，1952 年为 3:1，1957 年为 3.22:1，1979 年为 2.38:1，城乡居民水平差距始终在两倍数左右上。1978 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动轨迹再次经历了拉大、缩小、再拉大的“X”发展过程。即在改革初期的 80 年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由 1978 年的 2.37：1、1980 年的 2.29:1 缩小到 1984 年的 1.71:1。但自 1985 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扩大之势。1985 年至 199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由 685 元增加到 1544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398 元增加到 709 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由 1.72:1 扩大到 2.18: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详见表 8)

表 8　　不同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情况

单位：元/人

	1952 年	1957 年	1978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91 年
农村居民纯收入	57.0	73.0	133.6	191.3	397.6	424	463	545	709
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	171	235	316	439	685	910	1012	1192	1544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	3.00:1	3.22:1	2.37:1	2.29:1	1.72:1	2.15:1	2.19:1	2.19：1	2.1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

三、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1985～1991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在这些差距中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

（一）收入分配中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

1. 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

（1）反映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较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一直偏低，根据抽样调查资料，我国城市从 1980 年到 1988 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16、0.16、0.15、0.15、0.16、0.19、0.20、0.23。按照联合国的分类，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从总体上看，介于“高度平均”和“相对平均”之间。

（2）行政分配中的工资收入高度平均。从 1977 年到 1983 年，政府对行政分配中的工资收入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调资升级的标准基本上是资格和工龄，平均主义的弊端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 1985 年的工资改革压低了担任高级职务的工资标准，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由原来的 28:1 缩小到 10:1。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卫生部门脑力劳动者的标准工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缩小。（详见表 9）其中最明显的是大学教授与助教的工资差距，几乎缩小 1 倍。

表 9　　标准工资比例

	1985 年工资改革前	工资改革后 1988 年上半年
科研单位实习研究员与研究员	1:3.0	1:2.0
医院医士与主任医师	1:3.0	1:2.2
大学助教与教授	1:4.1	1:2.1
中学三级教师与高级教师	1:3.0	1:1.8
机关办事员与局长	1:3.1	1:1.6

（3）福利供给制的分配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平均主义的倾向。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供给制，相当职工工资 80% 左右的住房、医疗、交通、教育、文化设施等，

主要是以公共福利的方式供给的，没有进人工资和流通。

2. 经济活动和少数人收入偏高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和企业承包租赁者收入偏高。由于价格、税收体制不完善，管理不严等原因，部分个体经营者往往采取不正当甚至是非法的手段谋利，致使个体经营者收入与职工收入差距拉大。(详见表 10) 而私营企业主的年收入比个体户的还要高，一般都在万元以上，有的为 5 万～10 万元。企业承包租赁者的年纯收入一般也都在万元以上，最高的为几十万元。

据有关部门推算，私营企业中的“百万富翁”全国已有 5000 户左右，至于 30 万元、50 万元户，全国有数万户。黑龙江省有关哈尔滨市南岗区 5718 个个体户的调查，个体汽车汽配厂厂主年收入最高的超过 18 万元，一般在 11 万元左右。个体饭店店主收入最高的达 6 万元，一般在 2.4 万元左右。个体出租汽车车主收入最高的有 4 万元，一般在 1.2 万元左右。企业承包租赁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万元以上，最高的有几十万元，为职工收入的几倍、几十倍。上海马桥乡 24 名厂长和供销负责人 1988 年承包收入为 198 万元，人均 8250 元，最多的达 15 万元。

表 10　　1988 年个体经营者收入（年）情况

	个体经营者收入	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	个体经营者收入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倍数
北京	7458 元	1725 元	4.32
上海	6000 元	2060 元	2.91
沈阳	7605 元	1648 元	4.62
青岛	8479 元	1681 元	5.04
包头	5000 元	1495 元	3.34
景德镇	4440 元	1442 元	3.05

(2) 从在职职工总体看，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工资的“倒挂”现象十分严重。现将某省脑力劳动者比较集中的中小学校、国家机关与体力劳动者比较集中的工业、建筑业为例作一比较，详见表 11。

表中所列数据表明，中小学教师和机关干部的工资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越来越低，而工业、建筑业职工工资水平却越来越高。这说明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脑体收入“倒挂”现象更加突出。

表 11　　某省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工资比较表

	1985 年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人均工资（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	人均工资（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	人均工资（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	人均工资（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
全省平均	1082	—	1341	—	1364	—	1683	—
中小学教师	1084	2	1162	-79	1269	-95	1653	-30
国家机关干部	961	-121	1200	-41	1307	-57	1524	-159
工业行业职工	1143	61	1302	61	1446	82	1808	125
建筑业职工	1977	295	1561	320	1676	312	2025	342

(3) 不同行业之间、不同企业之间职工工资出现了明显差异。据统计，1988 年在国民经济 12 大行业中，人均工资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地质普查和勘探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等 7 个行业，最高的是地质勘探业，人均工资 2003 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1122 元），其次是国家机关（1475 元）。行业间高低差距由 1985 年的 389 元扩大为 1988 年的 881 元，3 年扩大了 2.3 倍。这只是一般情况而言，若将国家机关的低工资人员与十几万、几十万元户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4) 不同就业方式的收入差别悬殊。这里所说的不同就业方式除正常就业外，主要指在职职工从事第二职业和离退休人员再就业。后两种从业方式的收入，往往高于正常就业的收入，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一些受聘兼任街道企业、合资企业或乡镇企业的顾问、名誉厂长、技术指导等在职职工，工资外月收入在 200 元、600 元、800 元不等，个别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年收入也有高达万元的。由于部分职工第二职业收入超过本职工作的收入，因而对本职工作不热心，造成职工队伍不稳定，劳动纪律松弛，劳动效率低。

(5) 非法所得数量增加。非法所得主要指国家机关和公有制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公共财务的管理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和倒买倒卖获得的收入。

据统计，1986 年非法所得在万元以上不足 3 万元的比上年增加 179.23%，非法所得在 3 万元以上的比上年增加 358.5%。1988 年全国检察院立案侦查贪污、受贿 10 万～50 万元的 122 件，50 万－100 万元的 72 件，100 万以上的 15 件。1986 年全国法院判处贪污案件被告人 8248 名，其中贪污数额 5 万～10 万元的 166 人，10 万元以上的乃人，数额最多的达 334 万元。

此外，部分文化工作者工资外收入过高，而且其中不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比较严重。据北京税务局统计，1987 年头 7 个月，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国轻音乐团等文艺团体的 257 名演员到外地演出，收入多达 16.7 万元，其中有 187 人的收入达到了纳税标准，而支付单位没有按规定代扣税款，应纳税的演员回京后又无一人主动申报，税务人员找上门才补缴了税款。涉外旅行社的某些导游，除了

在本单位领取的工资、奖金外，一般工资外收入在6000元左右，演员“走穴”出场费有的高达3000元。

（二）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问题的产生根源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方面的，又有税收、法制政策方面的；既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又有传统意识方面的。

1. 双重体制的矛盾和摩擦是分配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实践中走上了双轨体制的轨道，已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中，更准确地说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之中。所以，物资的分配是双轨的，价格也是双轨的。在人力资源的分配上、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也都存在着双轨体制，存在着计划内和计划外两个部分，从而使得计划外经济活动的收入，明显地高于计划内经济活动的收入。

传统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体制仍然存在，发挥人们积极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新的收入分配体制不断出台，这种双重体制都按各自的规则运行，并相互干扰，使现实经济生活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双重体制的矛盾和摩擦，经济生活的一些领域陷入了无序的状态，从而使收入分配中的问题显得十分复杂。

（1）计划外的部分经济活动并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间接控制系统，并未按照有宏观控制的市场机制来运行。这是第一个层次的无序。个体户的偷税漏税，有的企业3年一倒闭另换牌子以获取免税待遇等现象，都可以从这一层次的无序中找到根源。

（2）计划内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由于改革以来简政放权，中央直接控制的能力也大大削弱，不能有效地按既有规划来运行，这可以说是第二层次的无序。在国家所能支配的财力日益缩小、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总额在整个消费基金中的比重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计划内的个人收入分配部分必然进一步平均主义化；也就是说，在更多的人来分蛋糕时，不但不能拉开差距，反而只能进一步缩小差距。

（3）第三层次的无序在于双重体制之间的摩擦。双重体制的集中表现是双重价格体制。双重价格的落差（牌价和市价的差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额。在双轨价格体制下使巨额租金的存在成为客观事实，而这一巨额租金的存在，又是流通领域中公司林立、寻租活动泛滥以及滋生腐败现象和导致分配不公的重要土壤。这段时间内社会上出现的“倒爷”就是一批专门吃这种租金的人。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从几个字的批示和一张许可证中就可以获取暴利。寻租活动还扩展到一些单位和个人。据估计，我国当时生产资料平价和议价差额为2000亿~3000亿元。这个巨大的差额，虽有部分落到国家和企业手里，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却落到了不法分子和大大小小的倒爷手里。在计划内的收入很难有所增长甚至因通货膨胀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一些单位和个人就想方设法从寻租中获得补充收益，形成了工资、奖金和正当经营收入以外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的形成和分配都是极不规则和极不透明的，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之间形成了同劳动贡献毫无联系的巨大差别，成为人们既竞相攀比又抱怨不公的原因。

所以，双重经济体制的并存和摩擦所引起的多层次无序乃至总体无序，是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主要土壤或根本原因。

2. 市场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基本要素市场不完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 商品市场不完善，价格不合理。长期以来实行价格管制，当部分产品价格放开后，地方政府的割据和控制又取代了中央的控制，所以商品的国内统一市场价格一直没有完全形成。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这是导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苦乐不均、收入不公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其他条件都相当的情况下，仅仅由于商品的价格不合理，就必然会使企业的收益产生差别，而在实行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政策下，会导致不同行业或企业的职工收入产生不合理的差别。

(2) 要素市场没有形成。首先，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劳动者不能在计划指导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发挥劳动技能的职业，这就造成了极大的机会不均等。这种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一方面使在不同所有制、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企业就业的职工的收入差别脱离各自的劳动贡献，另一方面，收入攀比机制又通过提高工资或消极怠工等形式使真正由劳动贡献的差别所决定的劳动收入的差别进一步拉平。

其次，资金市场没有形成。具有资本职能的资金不能在各部门自由转移，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资产转移就更为困难。没有资金市场，资金的价格（利息）就不会合理，主要是利息过低，不能调节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企业占有资金的多寡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差别不能得到市场的公正评价，由此产生的职工劳动收入的不均等也是不公平的。

再次，企业承包、租赁市场没有形成。企业家和承包者的才能与贡献缺乏社会的评价尺度，这是造成部分承包和租赁者收入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税负不公平、法制不健全与收入差距过大的关系。这段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公与税负不公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整体上看，国营企业比集体企业年平均赋税高出20%，国营大中型企业年平均税赋比小型企业高出3%~4%。形成国营企业税负高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又高于个体的局面。而大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无账可查，少报收入、偷税漏税十分严重。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税负不公的现象。一些靠优惠减免税度日的企业和行业可以"旱涝保收"，而一些管理严格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却捉襟见肘。比如，建筑业实行了免缴奖金税的政策，有的地区在税收管理上也对建筑业照顾过多。由于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不力，到1987年11月底，全国征收入库的税款只有2400万元，仅完成计划的30.4%，个别省份只完成3.6%，到年底，也只完成了年计划的39.2%。如果说税负不公会扩大不合理的收入差别，而征税不力则使高收入阶层的过高收入得不到有效的调节。

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差距的又一重要原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员当中腐败现象也严重了。虽然政府公布了《关于惩罚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机构去监督执行，也往往会形同虚设。一些公务人员和工商税务人员无视国家的法令，行贿受贿，甚至执法犯法，内外勾结，徇私舞弊，致使各种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文艺界"走穴"人员相当普遍地存在偷税漏税的现象。

4. 改革不同步、政策不统一造成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实行了许多有

差别的单项政策。比如，为了鼓励发展个体、乡镇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在税收、信贷等方面采取了减免税等扶持政策，对个体、集体、中外合资和国营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所得税率，税负轻重不等；为了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和鼓励人才流动，允许科技、设计单位进行经营性活动，允许企业的租赁者、承包者有较高的收入等。对特区有各种特区优惠，对一些省会城市有计划单列的优惠，对试点城市有试点的优惠。这些单项的有差别的优惠政策，虽然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政策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和科学的横向比较，也必然会在分配上产生苦乐不均和鞭打快牛的弊端。这种政策的不一致，是造成地区性和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根源之一。比如，许多地区的放活致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以某些地区的经济衰退为代价的。从对张家口市（4个区、各类行业）45名万元户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处于高收入阶层中的人，农村多于城市，流通领域多于生产领域，体力劳动者多于脑力劳动者，个体经济多于集体和全民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它符合人们天赋才能差异的分配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但问题是“谁允许”和“允许谁”。由于政策不统一，政策本身具有不同的“含金量”，所以，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使部分优胜者富起来，这是不够公平合理的。

5.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收入的影响。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已着手进行了，但主要着眼于人事调整和机构重组，并且基本上是在旧机构变化不大的基础上增加新机构，而对某些领导的利益结构及利益分配方式等尚来不及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而且，为了避免来自改革主体本身的阻力，有时往往不得不采取一些保护既得利益或追加新利益的方法。比如，在一边设计居民住宅商品化改革方案的同时，一边又规定某级别以上的干部不包括在改革范围之内，即允许其继续无偿或低价享用公房；在一边提倡建立电话市场和小汽车市场的同时，一边又允许某些干部无偿享用电话和小汽车。这显然也是造成“公仆”与“主人”之间收入反差不合理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牵涉面非常广，非常复杂，对此必须持认真慎重的态度，以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6. 平均主义公平观与政府某些决策失误。我国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小农意识非常强烈。“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富贵、均贫贱”的平均主义传统观念有着广阔的社会基础，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脆弱，这是我国这个时期收入均等化程度过高的一个历史根源。

然而，脑体劳动者收入倒挂，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即使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普遍为人们接受，人们对脑体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公平。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而在理论上一直否认脑力劳动者也同样创造价值，单纯地把脑力劳动者的收入看做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形式，从而在实际工作中也必然会越来越贬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脑体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也相应地不断缩小。尤其是通过连续3次降低脑力劳动者的工资，致使脑体劳动者的收入基本持平，以致最后出现倒挂现象。

脑体劳动者收入倒挂或持平，也是我国政府的决策失误造成的。多年来我们一直高唱重视教育，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把教育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考虑。

7. 生产水平的低下和刚性就业制度为平均主义的滋长提供了温床。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实力薄弱、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水平低，而且由于“铁饭碗”的就业制度，使大量的企业成员不能被剥离，优化劳动组合也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缩小分配档次，减少生产和生活中的种种扯皮。

第二节　居民消费

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一）居民消费水平概况

1985～1991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1985～1991年，人民生活消费水平平均每年递增5.6%，虽低于1979～1984年的平均每年增长6.5%的速度，但要大大高于1953～1978年2.2%的平均增长速度。

从内容上看，1985～1991年这段时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 食品消费逐渐讲究营养。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受农业生产和收入水平的限制，在吃的方面偏重主食，副食比较简单。这种情况从80年代开始逐步有所改变。居民膳食构成中动物性蛋白质和脂肪增加，主食比重下降，副食比重上升。1991年居民年人均消费食用植物油5.89公斤，比1978年增长2.68倍；猪肉17.44公斤，增长1.27倍；牛羊肉1.79公斤，增长1.39倍；家禽1.98公斤，增长3.5倍；鲜蛋7.10公斤，增长2.7倍；水产品6.79公斤，增长近1倍；而粮食234.50公斤，仅增长20%。中国居民从动物类食物中摄取的蛋白质及脂肪，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2. 衣着消费趋向舒适、时兴、款式多样化。流行化、成衣化、个性化已成为我国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的主旋律。一些高中档优质服装和面料消费量激增。1989年居民人均消费呢绒0.25米，绸缎0.71米，分别比1952年增长24倍和13倍。据抽样调查，1986年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已达10.6公斤，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8公斤的水平。1988年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中已拥有34件毛皮大衣、152件呢子大衣和340件毛料服装。全国每年设计的服装新花色品种达10万余个。

3.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迅速增加。“老三大件”中的缝纫机由1985年的9833万架发展到1991年14544万架，自行车由22364万辆发展到41979万辆，分别为1985年的1至2倍。“新四大件”的发展则更突飞猛进。1991年与1978年相比，电视机由304万台增

加到20671万台，电冰箱由9万台增加到3466万台，洗衣机由1万台增加到10615万台，录音机由163万台增加到13099万台，增长了几十、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倍。1991年与1985年相比，电视机拥有量增长两倍，电冰箱增长7倍多，洗衣机增长两倍多，录音机增长近3倍。组合音响、钢琴等耐用消费品也已进入一些高收入的居民家庭。

4. 居住条件有了较大改善。1985年农村平均每人住户面积为14.7平方米，到1991年增加到33.8平方米；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1985年为5.2平方米，到1991年增加到6.9平方米。

5. 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居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如"洗澡难"、"理发难"、"看病难"、"买东西难"等问题有了缓解，居民生活的方便程度有所提高。到1991年年底，每万人拥有108.84个商业点（包括个体），每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23.22张，每万人拥有医生数15.37人。自来水普及率由1985年的81%提高到1991年的90.6%，煤气、液化气普及率由1985年的22.4%提高到1991年的47.1%。

6. 文化生活多样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和丰富化。文化消费结构也有很大变化。据统计，1991年每百人拥有电视机由1985年的6.6台增加到1991年的17.8台，每百人拥有收音机由22.8台下降到20.2台，每百人每天有报纸由5.21份下降到4.20份，每人每年有图书、杂志由8.78册下降到7.13册。城镇居民中自费旅游、参观展览以及参加各种形式的文艺晚会越来越多，社交日益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消费水平的城乡比较

从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详见表12）

表12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

单位：元

	全国居民年均消费额	农民平均消费额	非农业居民年均消费额	工、农消费水平对比以农民为例
1952年	76	62	144	2.4
1978年	175	132	383	2.9
1985年	403	324	727	2.2
1986年	447	351	833	2.4
1987年	506	389	991	2.5
1988年	635	473	1281	2.7
1989年	694	513	1394	2.7
1990年	723	524	1477	2.825
1991年	803	569	1686	3.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

表12显示，1952年我国城乡消费水平之比为1:2.4，到1978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2.9。改革以后差距逐步缩小，由1978年的1:2.9缩小到1985年的1:2.2。但自1986年以后，差距又逐渐拉大，由1:2.4扩大到1991年的1:3。

从主要消费品的消费量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别。

1. 食品消费量的城乡差别。

(1) 粮食消费量。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大大高于城市居民。据统计，1985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使用粮食134.76公斤，而农民家族平均每人使用257.00公斤；1991年分别为127.93公斤、255.58公斤。差距逐年扩大。这不仅是因为农业劳动者需要更多的粮食消费来补偿他们的劳动消耗，而且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低，副食品消费量低。对城乡居民主要副食品消费量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城乡差别。

(2) 蔬菜消费量。1985年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购买蔬菜为144.36公斤，农民家庭平均每人131.00公斤；1991年分别为132.18公斤和126.97公斤。

(3) 食用植物油。1985年城乡家庭平均每人消费量分别为5.76公斤和4.04公斤；1991年分别为6.93公斤和5.65公斤。城乡差别不大。

(4) 肉类消费量。1985年城乡分别为18.72公斤和10.97公斤，1991年分别为22.2公斤和12.15公斤。

(5) 家禽、蛋类、鱼虾。1991年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家禽、蛋类、鱼虾消费量分别为4.40、8.26、8.02公斤，农村分别为1.34、2.73、2.21公斤。城乡差距较大。

2. 衣着品消费的城乡差别。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棉布的差距不大。城镇居民1985年人均为2.61米，1991年为0.97米；农民家庭1985年人均为2.54米，1991年为0.90米。化纤布消费量：城镇居民1991年人均为1.53米，农民人均为1.83米。低档衣着消费城乡差别不大。

城乡衣着消费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高档商品上。呢绒消费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1985年为0.36米，1991年为0.28米；农民人均消费量，1985年为0.14米，1991年为0.09米。绸缎人均消费量：城镇1985年为0.50米，1991年为0.35米；乡村1985年为0.07米，1991年0.05米。城乡人均消费量差距较大。

3.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城乡差别。“老四大件”拥有量的城乡差别不大且有缩小的趋势。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1985年分别为152.27辆和80.64辆，1991年分别为158.51辆和121.64辆；缝纫机拥有量1985年分别为70.82架和43.21架，1991年为66.43辆和55.84辆；手表拥有量1985年分别为274.76只和136.32只，1991年分别为271.36只和160.98只；收音机拥有量1985年分别为74.52台和54.19台，1991年为37.33台和32.41台。电视机中，黑白电视机城乡平均拥有量相差无几，甚至农村平均拥有量还多于城镇。1990年城镇每百户拥有52.36台，1991年为43.93台，农村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39.22台和47.53台。

“新四大件”城乡相差甚大。以1991年为例。彩色电视机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量为68.41台，而乡村仅有6.44台；洗衣机分别为80.58台和10.99台；电冰箱分别为48.70

台和1.64台，1991年城镇每百户拥有立体声录音机35.64台，普通录音机34.70台；农民每百户拥有收录机19.64台。

照相机城乡拥有量差距也非常大。1991年城乡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21.32架和0.87架。

家用电器的消费，农村居民家庭尚处于萌芽期，城市居民则处于成长期。

（三）消费水平的地区比较

1. 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居民消费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总的格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较高，西部地区相对较低，中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1989年消费水平高的地区（包括农村居民和非农村居民在内）为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1586元、1249元和1135元。其余的省、区全在1000元以下。500元以下的有5个省，它们是贵州（400元）、河南（403元）、云南（417元）、甘肃（484元）和江西（499元）。最高消费水平的上海与最低消费水平的贵州相比，差距近3倍。1990年，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是上海（1908元）、北京（1548元）、天津（1310元）、辽宁（1074元）。其余的省、区全在1000元以下。500元以下的有两个省，河南（499元）和贵州（445元）。上海、北京消费水平分别是贵州的4倍多和3倍多。其他各省区居民消费水平在900元以上的有黑龙江（918元）、浙江（912元）、广东（972元）、新疆（904元）。

2.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1989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1400元以上的省、区、市有6个，它们分别是上海（1737元）、广东（1524元）、西藏（1519元）、北京（1455元）、天津（1446元）和辽宁（1442元）。消费水平不足1000元的有3个省区，它们分别是江西（836元）、云南（913元）和内蒙古（935元）。被人们视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较低的西北5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均在1000元以上。陕西（1205元）和甘肃（1292元）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湖北（1066元）、湖南（1064元）、海南（1115元）、江苏（1138元）、吉林（1152元）和河北（1142元）。1990年，消费水平超过2000元的省、自治区、市有两个，西藏为2329元、上海为2172元。消费水平不足1000元的仅有江西，为993元，其他省、自治区均在1000元以上，其中1700元以上有北京（1764元）、天津（1702元）、辽宁（1700元）、广东（1768元）。

3.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1990年，农民消费水平超出1000元的有北京（1199元）和上海（1366元）。人均消费水平不足500元的有山西（434元）、安徽（482元）、河南（398元）、广西（467元）、四川（497元）、贵州（357元）、西藏（484元）、陕西（4钭元）、甘肃（362元）、宁夏（444元）。上海农民人均消费水平是贵州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近4倍。

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消费结构的层次是多样的。按取得消费对象的途径划分，可以分为商品性消费与自给性消费；按消费对象存在的途径划分，可分为实物消费与劳务消费；按消费的内容划分，可分为吃、穿、用、住等项。消费结构的状况，是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

一个重要方面。

（一）商品性消费与自给性消费的比重

商品性消费是指以货币形式体现的那部分产品的消费，自给性消费是指居民自己生产并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的那部分产品的消费。后者主要来自农民，是农民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映。随着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货币化的进展，以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受到很大的冲击，农民商品性消费占消费总额的比重上升，自给性消费比重迅速下降，人均货币收入由1985年的357.4元增加到1990年的676.7元，增长89.3%，占总收入的比重由65.3%上升到73.8%。农民生活消费商品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商品性消费占全部生活消费品支出的比重由1985年的60.2%上升到1990年的67.2%。其中，食品的商品性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41.7%上升到51.3%，衣着、用品、住房的商品性支出均保持在97%以上。农民生活消费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提高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实物消费与劳务消费的比重

实物消费通常是指物质产品的消费，劳务消费通常是指人们通过包括文化、教育、艺术、出版、卫生、保健、商业、金融、书报、咨询、运输、邮电等部门所提供的劳务而得到的一种消费需要的满足。劳务消费量愈大表明消费水平愈高。但到90年代初劳务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城市也只有8%，农村还不到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已占到30%～50%。

（三）吃、穿、用、住的消费比重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费收入和支出的增加，城乡居民的衣、食、住、用等支出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七五”时期，受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市场物价水平、消费政策导向、消费心理状态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呈先增后降的特点。“七五”前期，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市场物价等均呈持续增长的态势，刺激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超常增长，并酿成1998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和紧缩调整，使过热的经济发展开始降温，从而引发居民的消费由热转冷。1989年，部分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出现下降。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1279元，比1985年增长90%；扣除同期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4.8%，平均每年递增2.8%。与“六五”时期平均每年递增7.7%相比，增速已明显减缓。特别是1989年出现消费疲软，实际生活费支出水平比上年下降了5.7%。1990年居民消费疲软状态有所缓和，全年人均生活费支出比上年实际增长4.3%。

1. 食品消费已开始由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高。“六五”时期，居民的新增收入首先用于改善饮食消费，因此，居民食品消费水平，特别是主要食品消费量增长显著。1985～1991年这段时期，城镇居民对饮食消费的改善已开始由量的追求转向质的追求。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694元，比1985年增长97.2%；扣除食品类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16.1%，平均每年递增3%。其中，粮食消费实际增长1.7%，

副食消费实际增长13.4%。可见，副食消费水平的增长明显快于粮食消费水平的增长，居民的食品消费层次进一步提高。

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情况看，1985年前，恩格尔系数在1985年第一次消费膨胀高潮中明显下降后，开始呈缓慢上升趋势，直到1988年第二次消费膨胀高潮到来，恩格尔系数再度猛降至近10年最低点51.4%。1985～1991年后期，恩格尔系数受经济紧张、消费疲软等因素的影响，再次呈缓慢回升趋势，但“七五”时期恩格尔系数平均为53%，同“六五”时期的56.7%相比已明显下降。

2. 穿着消费由求同转向求异。这个时期，衣着消费水平增长平稳，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171元，比1985年增长74.3%；扣除同期衣着类商品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10.4%，平均每年递增2%。这不仅低于“六五”时期平均每年递增8.3%的水平，而且低于同期食品与日用品消费的递增速度。衣着消费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由1985年的14.6%下降至1990年的13.4%，说明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量已进入一定的稳定阶段。目前，居民对衣着消费的热点是不断追求款式新异、美观、舒适，特别是大城市，服装消费的档次已开始拉开，求异心理不断加强。

3. 日用品消费热点集中，波动较大。1985～1988年，受经济运行过热、物价上涨过猛、名义收入持续增长以及消费领域狭窄、消费心理动荡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居民的消费兴趣集中转向日用品市场，特别是高档耐用消费品市场，导致日用品支出比重不断上升。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日用品支出149元，比1985年增长1.1倍；扣除同期日用品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2.2%，平均每年递增17.5%，明显高于“六五”时期平均每年递增9.5%的速度。日用品支出占生活支出的比重也由1985年的10.7%上升至1988年的13.5%，增加了2.8个百分点。

1989年，物价涨势有所缓解，消费热势不断降温，特别是日用消费品市场明显由热转冷，反映在居民消费变化上，城镇居民日用品实际支出比1988年下降5.7%，消费比重由13.5%下降至11.1%。

4. 城镇居民家庭购买耐用消费品升级快，拥有量大幅度增长。这个时期，居民的消费层次进一步提高，“老四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的拥有量已进入饱和及更新换代阶段，而“新五件”（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彩色电视机和录音机）的拥有量保持直线上升的势头，标志着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详见表13)

表13　　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单位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自行车	辆	19.45	181.39	177.54	184.68	188.59	158.51
缝纫机	架	73.85	75.42	70.75	70.35	70.14	66.43
电风扇	台	90.01	104.16	117.51	128.68	135.50	143.41
洗衣机	台	59.70	69.01	73.42	76.21	78.41	80.58

	单位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电冰箱	台	12.71	19.16	28.07	36.47	42.33	48.70
彩色电视机	台	27.41	33.65	43.93	51.47	59.04	68.41
录音机	台	51.66	57.16	64.16	66.96	69.25	70.34
照相机	架	11.91	14.17	16.03	17.27	19.22	21.3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

5. 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房屋及建筑材料支出占购买商品支出的比重由1988年3.41%下降至1991年的1.72%。（详见表14）这反映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住房商品化的步伐极其缓慢。

表14　　城镇居民家庭生活费支出构成

单位：%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生活费支出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一、购买商品支出	92.16	91.50	91.84	90.80	89.98	89.07
1. 食品	52.43	53.47	51.36	54.50	54.25	53.82
2. 衣着商品	13.79	13.69	13.88	12.32	13.36	13.73
3. 日用品	11.82	11.37	13.46	11.06	10.14	9.62
4. 文娱用品	6.66	5.60	6.04	5.78	5.34	4.72
5. 书报杂志	0.84	0.84	0.75	0.87	0.87	0.90
6. 药及医疗用品	1.06	1.00	1.14	1.32	1.54	4.72
7. 房屋及建筑材料	3.41	2.55	2.17	1.92	1.56	1.58
8. 燃料	1.70	1.38	1.37	1.51	1.59	1.72
9. 其他商品	2.00	1.56	1.68	1.55	1.33	1.24
二、非商品支出	7.84	8.50	8.16	9.20	10.02	10.9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84页计算。

我们再来考察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化，从食品、衣着、用品、住房、燃料和文化生活服务等6个方面来分析。1978年以前，我国农民家庭消费基本上是围绕着"吃"、"穿"进行的，消费结构序列为吃、穿、烧、用、住、文。其中吃、烧两项支出所占比重高达74.85%。进入80年代后，吃、烧两项支出的比重已下降到70%以下。到1984年，消费结构序列变为吃、住、用、穿、烧、文。1985年吃、住、用、穿、烧、文在农民生活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分别为59.5%、12.8%、11.6%、10.2%、5.9%和2.6%（这里的"文"在统计中是属于"用"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指标比较重要，我们把它单列出来，内容包括文化娱乐用品和书报杂志）。到1991年上述比例分别为61.7%、12.1%、12.6%、8.9%、4.7%和3.0%，除"吃"由于种种原因比重上升外，

"烧"继续下降,"用"和"文"的比重上升。这说明农民在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享受。

三、居民消费特点

(一)居民消费水平发展变化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88年)为消费再度膨胀阶段。这一阶段的消费需求增长率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9.2%、12.1%、19.2%、26.6%。

第二个阶段(1989～1991年)可称为消费波动阶段。1988年的抢购风潮之后,从1989年开始出现了市场疲软。1989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比1988年增长8.9%,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销售额下降7.6%。1990年6月以后,市场开始回升,社会商品零售额6、8月份分别增长了1.4%和1.9%,10月份已回升到7.4%的水平。农村市场也已明显启动,从10月份起摆脱了前期持续下降的局面。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逐步扩大。改革之初到1985年城乡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但自1985年后城乡消费水平差距逐步扩大,1985年到1991年消费水平之比(以农民为1)分别为2.2、2.4、2.5、2.7、2.7、2.8和3.0。

(二)居民消费结构发展变化的特点

1. 逐步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这表现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开始下降,而衣着、日用品和非商品支出的比重则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城乡居民消费开始从量的满足转向对质的追求。吃开始讲究营养,穿着开始讲究美观,用品趋向中、高档,开始从物质生活领域向精神生活领域扩展。

2. 限制型消费结构有根本性改观。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和消费品的日益丰富,绝大部分商品已经取消了凭票证限量供应的做法。

3. "排浪式"的消费倾向。它的突出特点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十分整齐。1990年中国城市彩电的普及率已达51.4%,电冰箱达36.47%,洗衣机达76.21%,录音机达67.01%。城市居民高收入阶层的"新四大件"拥有量与中收入阶层的拥有量差别很小,与低收入阶层相差也不大。例如,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彩电、洗衣机等拥有量,高、中、低收入户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分别为78.27台、70.09台、55.20台,拥有洗衣机分别为84.99台、82.66台、74.32台。

第三节　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教育事业在整顿中发展

（一）教育结构趋向合理

1985～1991年期间，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得到发展。199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1075所，比1984年增加173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总数近62万人，比1984年的47.5万人增长30.5%；在校学生204.4万人，比1984年增长46.4%。1991年全国招收研究生3万人，在校研究生8.8万人，分别比1984年增长28%和53.1%。1991年全国有320个长线专业点暂停招生，工科、医药、财经招生比例上升。一方面调整了专业科类和层次结构；另一方面，一些基础学科，"四化"建设的急需学科，以及新兴、边缘学科的教育得到明显加强。1991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财经类学生占10.55%，比1984年提高3.6个百分点；工科类学生占36.6%，提高2.3个百分点；师范类学生占25.41%，下降0.2个百分点。本专科比例结构得到调整。本科生所占的比例由1985年的65.9%，下降到1990年的64%，下降1.9个百分点；专科生所占的比例由1985年的34.1%上升到1990年的36%，增长1.9个百分点。

中等专业和技术教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1991年全国有中等专业学校3925所，略高于1984年；在校学生为227.7万人，比1984年增长72.2%。其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达2977所，在校学生为161.6万人，分别比1984年增长28.9%和99.3%。1991年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633.2万人（含技工学校学生142.2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1356万人）的46.7%。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已基本改变，为我国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适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度严重存在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激烈竞争的局面。

（二）基础教育得到进一步普及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提高民族素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奠基工程。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全国范围内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84年的95.3%提高到1991年的97.8%，提高2.5个百分点。1991年全国初中在校学生3960.7万人，小学在校学生12164万人。7～11周岁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9%，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77.7%。普通初中和小学学生辍学率分别降到5.38%和2.3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但还有约占全国人口1/5的地区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这对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顺利进行造成很大的困难。部分地区的中学学生流失的势头仍未得到遏制，流失人数和流失率居

高不下。1990年初中生流失185.83万人，流失率为2%。特别是东北、华北和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初中生流失率较高。扫盲工作越扫越“忙”，“七五”时期，平均每年扫盲228.2万人，比“六五”时期减少76.2万人。再加上一部分学龄儿童中途弃学，虽然小学学生流失得到控制，但1990年小学学生流失人数仍高达292.1万人，特别是西南、西北大部分省区的小学生流失率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产生新文盲的重要因素。

（三）成人教育在整顿中得到较大发展

函授、夜校、广播电视、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发展较快。1991年成人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学生46.58万人；在校学生140.3万人，比1984年增长14%。成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3423.6万人，比1984年增长471.8%。

（四）教育投入与社会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对称

我国的教育经费长期以来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过低，1978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2.26%和7.31%。到1984年有所提高，分别达到2.89%和13.01%。1985～1991年期间，国家用于教育的支出大大增加了，从1984年的201.2亿元增加到557.39亿元，但在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仅有2.81%和14.62%。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说明国家是在尽力提高教育支出。但由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反而有所下降。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教育支出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差距。这种教育投人的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它造成的后果不仅表现在受教育者的数量少，而且教育设施的标准化和整体配套水平落后，中小学教师待遇普遍偏低，教师队伍流失，严重影响了教育的质量。

二、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1985～1991年期间，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基础建设在调整发展中，机构增加，服务范围扩大，取得了新的成就。

文化事业机构有新的增长。1990年全国共有艺术事业机构5796个，比1985年增加50个，增长0.9%。其中艺术表演团体总数减少，结构调整，艺术表演场所，创作、研究与展览机构有所增加。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馆由1985年的6020个增加到1990年的6539个，增长8.6%。其中博物馆增长较快，到1990年年底为1012个，比1985年增加301个。广播电视机构发展迅速，从1985年到1990年，广播电台由213座增加到640座，中短波、收射台和转播台由568座增加到673座，分别增长2倍和18%；电视台由202座增加到510座，电视台发射台和转播台由1215座增加到2436座。1990年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774个，文化馆2977个，公共图书馆2536个，博物馆1097个，档案馆3579个，广播电台724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703座，电视台542座，1千瓦以上的电视发射和转播台974座，各类电影放映单位14.1万个。大大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

各类卫生机构和人员继续增加。1990年年底，全国卫生机构达20.8万个，比1985年增加7000个，其中医院6.2万个，比1985年增加近3000个。其他卫生机构也有明显增加。1990年年底，全国医院床位达262.4万张，比1985年增加近40万张，大大超过“六五”时期增加25万张的增长幅度。全国平均每千个人口拥有医院床位数已由1985年的2.11张提高到1990年的2.3张。1990年年底，全国共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389.8万人，比1985年增长14.3%。其中医生176.3万人，增长24.8%；护师、护士97.5万人，增长53.1%。

体育场地建设取得新的成就。“七五”时期新建体育馆2664个，比“六五”时期的2334个增长14.1%，特别是通过首次在北京以外举办全国运动会和在北京举办第11届亚运会，我国建成了一批高质量的体育运动馆。体育事业取得新成就。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我国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共夺金牌183块、银牌101块、铜牌51块，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1991年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共获奖牌182块，86名运动员获得93个世界冠军，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第六篇

世纪之交的经济飞跃

第一章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1991年—2000年）及“八五”计划纲要的提出

199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在充分肯定我国80年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10年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提出了今后1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总体部署。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1年4月9日，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和纲要。这个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是我国90年代经济建设的宏伟纲领，这一纲领的实现，将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节　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

一、“纲要”中规定的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奋斗目标

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基本上实现，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走过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今后10年，是实现战略部署的第二步，即要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更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

过去10年，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已经开始了三个重大转变，即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从片面追求产量、产值的增长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在经济体制上，由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转向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转向独立自主基础上积极进行国际交流的开放型经济。这些转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转变过程中经济发展也出现过较大的起伏。在今后10年中，我们一方面需要坚定不移地把这些重大转变推向深入，同时要总结经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切实转到符合我国国情的格局上来，真正把国民经济引上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

根据"建议"精神，"纲要"中规定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

(一) 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即按照这个目标要求，到2000年，以1990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31100亿元，10年平均每年增长6%。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1%。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8%。

(二) 全国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即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三) 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营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21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四) 初步建立并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五)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

以上几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基本方面的客观要求。它既要求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注意经济素质和效益的提高；既重视经济建设，又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既考虑经济的发展，又考虑社会全面进步。同时，这个5方面的要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内容。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经济发展又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为主要内容，因而在这个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是可靠的。另外，它把经济发展同改善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而小康水平又具体为生活资料的丰裕、消费结构的合理、居住条件的改善、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等。它还突出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同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以及加强重点建设联系起来。它也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规定物质文明建设目标的同时，也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和健全问题。

所有以上5个方面贯穿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部综合的运动发展，从而使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至于这5个方面中提到的具体目标，"纲要"认为，如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

值（GNP）要比1980年翻两番，要求10年内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增长6%。这个速度比前10年要低一点（如“七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1981年~1990年我国经济发展年均速度为9%），但实际上平均每年增长6%的速度并不慢，“这个发展速度是积极的，也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今后10年中，经济增长的基数大了，10年中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所含绝对量比前10年大得多。另外，今后10年中，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提高效益优化结构的基础上，所以增长品质（“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的要求提高了。按照这个速度到本世纪末，我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将大幅度提高。到2000年，预计粮食将达到5亿吨左右（1990年粮食产量为4.35亿吨），煤14亿吨左右（1990年原煤产量为10.8亿吨）；钢8000万吨（1990年钢产量为6604万吨）；发电量11000亿千瓦小时左右（1990年发电量6180亿千瓦小时）。所以，今后10年保持6%的年均发展速度，可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番。在国力大幅度增强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也将会达到小康水平。

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水平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它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提高，既包括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改善）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的改善。过去曾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1000美元表示小康水平的概念。当时曾用1980年不变价格和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折算，198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300美元左右，如果用同样的比价计算，到200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960美元左右（1990年约为600多美元），大体上可以实现原来的设想。由于我国的人口将会增长（由目前的11亿多增加到12亿多或更多），所以达到以上水平是很不简单的事。

我国经济还不发达，人口增长的压力很大，要改善人民生活，逐步实现现代化，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行的。但是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容易造成经济不稳定。今后10年要求保持6%左右的中速增长，就是为了防止片面追求数量和攀比速度的偏差。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经济态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而只有长期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才能做到。同时，长期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避免大起大落，也才能为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这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需的。

二、90年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奋斗目标的立足点

中央制定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立足点是过去10年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80年代，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全面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先后胜利完成了“六五”计划和“七五”计划，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具体如下：

（一）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90年同198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34.6%，平均每年增长6.3%。粮食、棉花、油料、肉类等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如粮食产量由

1980年的3.2亿吨增加到1990年的4.35亿吨以上（增长35.9%）；棉花由271万吨增加到447万吨（增长64.9%）。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非农产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31.1%提高到54.6%。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已达9000多万人。

（二）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0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6%。原煤、原油、钢、发电、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如原煤产量，1980年—1990年，由6.2亿吨增加到10.8亿吨（增长74.2%）；钢由3172万吨增加到6604万吨（增长77.9%）；发电量由300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6180亿千瓦小时（增长105.9%）。另外，消费品产量也大量增加，而且花色品种丰富多彩，市场供应充裕。

（三）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步伐加快。80年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7万亿元，超过前30年的总和，建成投产了1000多个大中型项目。投入更新改造资金5470亿元，完成技术改造项目40.9万项。

（四）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有了较大发展。10年间，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1万多项，实施专利5万多项。国家奖励的发明1700多项，其中有些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教育方面，全国有71%的县普及了小学教育，多数城市普及了初中教育，中等技术教育迅速扩大，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10年来共培养大学本专科毕业生420多万人，研究生近20万人。

（五）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138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30元，剔除价格因素，分别比1980年增长68.1%和123.9%。城乡居民消费内容日趋多样化，消费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六）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格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对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城市，围绕着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在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资、商业、外贸、价格、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权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科技、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也相应进行了改革。10年改革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活力明显增强，也为今后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七）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迅速扩大。我国经济摆脱了原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大踏步走上世界舞台。1980年—1990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已由380亿美元增加到1154.1亿美元，增长近两倍。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

（八）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10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174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国民收入由3688亿元增加到143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7%。钢、化学纤维、有色金属、煤炭、水泥、粮食、棉花等工农业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

可见，这10年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极为明显。

总之，在80年代，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伟大成就为9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今后10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制定的。

第二节　实现90年代主要奋斗目标的基本指导方针

“纲要”在提出90年代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的同时，还提出完成这些目标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方针。

一、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并在实践中加以具体化、制度化，这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形成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精辟地概括了十二条主要原则，这就是：

（一）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二）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三）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五）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

（六）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七）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八）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九）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

（十）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

（十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

（十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沿着以这十二条为基本轮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过来的，因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90年代的奋斗目标，最根本的保证，就是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关键在于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经过80年代的努力，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但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要妥善解决当前经济生活中诸多矛盾，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把改革开放和不断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不改革开放不行，改革开放不坚持正确的方向也不行。今后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进一步努力探索，使改革不断深化，开放更有成效。

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

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条方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举世共认

的。但是，也不可否认，我国的经济发展，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曾经出现几次大起大落，给经济建设造成很大损失。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除了政治因素外，主要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脱离中国的国情，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这条方针是长期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实现到本世纪末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持续，就是保持经济每年都有发展速度；稳定，就是稳步前进，避免大起大落；协调，就是按比例发展。持续、稳定、协调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比例协调，是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按比例的速度才是合理的、效益好的、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速度。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防止急于求成的倾向。既要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又要防止国民收入超额分配，造成通货膨胀。要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

四、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同实行改革开放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为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方针，才能使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可以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而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有效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从而才能更好地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90 年代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争取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智力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但也要准备更多地依靠国内资金和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要克服经济建设中资源相对不足和资金短缺的困难，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地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努力克服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领域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今后 10 年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都必须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

五、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克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我们的重要目标，又是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只有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使人们有正确的前进方向，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上述基本指导方针，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规定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正确途径。在今后 10 年的各项工作中，要始终保持基本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全面加以贯彻。

第三节　90年代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90年代的经济建设，总的出发点是按照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纲要”中规定，今后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按照国民经济逐步现代化的要求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位置，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

（一）继续努力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今后10年和“八五”期间，既要保证各方面建设资金的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提高，首先仍应继续努力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即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防止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和通货膨胀。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主要是指导思想上片面追求高速度，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膨胀，导致国民经济总量不平衡和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最后不得不进行调整。今后10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避免出现大的波折，最重要的仍然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特别是保持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的各自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排，都要量力而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生活消费的增长要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

由于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有一个过程，财政体制“八五”期间仍将基本维持现行财政包干格局，制约着国家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重点建设投资、国防经费、科学教育事业费必须适当增加，而每年大量的企业亏损和物价补贴，以及其他一些开支，只能逐步压缩下来。因此，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很大，每年都还有一定数量的财政赤字。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开源节流，尽可能减少一些赤字。银行信贷要继续坚持稳定货币的方针，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把货币发行量和贷款总规模保持在经济发展合理需要的范围内，避免通货膨胀。要及时结汇，努力增加对外贸易收汇和非贸易收汇，保持适度进口和合理的外债规模。

（二）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经过80年代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得到加强，第三产业发展加快，新兴产业有所发展。但是，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在发展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当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加工工业总规模偏大，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第三产业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今后10年，

随着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领域拓宽，选择性增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都要求我们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应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产业结构的重组和升级。我们能不能抓住机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使之上升到新的等级，不仅直接关系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且将对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长远的影响。

根据这种情况，“纲要”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在今后10年经济建设的突出位置。主要要求是：

1. 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90年代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和向小康水平过渡，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可能很快提高，人均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加上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发展农业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纲要”规定90年代粮食产量要先后登上4500亿公斤和5000亿公斤两个台阶，并且对增加棉花、油料、糖料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发展林、牧、渔业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棉花产量要求达到52.5亿公斤）。为了完成农业发展的任务，“纲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大江大河治理，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坚持植树造林，搞好防汛抗旱；进一步抓好科技、教育兴农；努力改革和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等等。切实加强管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和水资源，对于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高度重视。各级政府要根据这些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2. 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今后10年的一项重要任务。近两年通过治理整顿、调整结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某些产品在某些地方甚至一度出现过剩的情况，这是经济紧缩条件下的暂时现象。从长远来看，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由于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大，价格和收费偏低，这就要求我们及早安排，实行投资倾斜政策，采取多种途径，筹集必要的资金。“纲要”对能源、交通、邮电通信、重要原材料等方面的建设作出了具体安排。我们要像“一五”时期成功地抓156项重点工程建设那样，集中力量，齐心协力，高质量、高效益地搞好一批重点工程和建设项目，使它们如期形成综合生产能力。有计划地新建、扩建和改建一批大中型电站、煤矿、油田、铁路和公路干线、港口、机场、通信干线、水利等骨干工程，以及冶金、化工项目。到2000年，原煤产量达到14亿吨左右，原油产量有较大增长，发电量达到11000亿千瓦小时左右，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以上，乙烯产量达到300万吨左右，化肥产量达到1.2亿吨左右（标准肥），铁路货运量达到19亿吨左右。要适当增加银行贷款，并建立煤炭、电力、石油和铁路建设基金，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要逐步调整和理顺基础产品的价格和收费，增强基础工业的发展能力。要加强地质勘查工作，使它同重点建设协调发展。在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因地制宜，多方筹集资金，进行

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3. 大力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我国加工工业规模已经不小，今后10年的发展重点，是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加强管理和技术改造，把现有企业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压缩一部分超过合理需求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淘汰一批消耗高、性能差、污染严重的落后产品。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对生产批量小、成本高、效益差的企业进行调整，推进专业化分工和联合。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以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同时把整个加工工业的素质提高到新的水平。到本世纪末，要求机械工业和轻工业的主要产品中40%左右达到或接近国际较先进水平，各部门需要的大型成套设备和关键产品基本立足国内；纺织工业的总体装备技术达到国际较先进的水平，新产品、新门类大量增加，能够较好地适应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要。到2000年，纱产量达到557万吨左右；化学纤维产量260万吨左右。

另外，要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位置，使之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带头产业。要积极运用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集中力量开发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为中心、计算机为主体的投资类产品，加强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传感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努力发展光纤、卫星、微波、程控交换等通信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以满足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

4. 积极发展建筑业，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温饱走向小康，人民生活的提高，将较多地体现在居住条件的改善方面。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纲要”规定今后10年建筑业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建筑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建筑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各项建筑都要切实保证质量，力求降低成本。要积极推广立足于国内的新型建筑材料。

考虑到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目前又比较落后的状况，“纲要”对第三产业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是商业、物资、金融、保险、旅游等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增加资金积累，活跃城乡经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和人民生活的质量，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80年代的发展中，由于经验不足，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也产生过一些混乱现象。经过治理整顿，这些混乱现象已经有所克服或者正在克服。我们要积极支持和引导，加强管理，使第三产业得到较快而又健康的发展。到2000年，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现在的1/4左右提高到1/3左右。

二、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很不平衡。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以及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各种优势的发挥和经济的合理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80年代全国经济和地区经

济都有很大发展，生产力的地区布局也有新的变化，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和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各地重复建设项目过多，产业结构趋同，资源配置不合理，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严重，妨碍了生产的合理协作和商品流通。今后 10 年，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逐步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为此，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与全国统筹规划的关系。国家要鼓励和支持各个地区发挥优势，加强指导和协调，使各个地区都能够在自己的优势产业上得到发展；同时也必须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出发，加强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和统一市场，是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发挥地区优势的前提。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不利于生产力合理布局和资源优化配置，妨碍地区优势的发挥。地区经济发展，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但在制定国家产业政策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发挥地区优势，才能促进全国经济和地区经济同时得到发展。

（二）正确处理资源富集地区与加工工业集中地区的关系。加工工业集中地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要积极发展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和出口创汇产品，减少资源消耗。要使那些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较高、运输量较大的工业，在能源充足、资源富集的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资源富集地区在加快资源开发的同时，要适当发展一些加工工业。要注意东西走向交通干线的建设，促进沿海与内地在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交流。

（三）正确处理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关系。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活水平有差异，这是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形成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和经济发达地区都要努力帮助较不发达地区改变面貌，使各个地区都能得到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继续贯彻执行扶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老根据地和边疆地区发展的各项现行政策，争取在今后 10 年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地区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使经济面貌和人民生活都有显著改善。国家要继续对这些地区给予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的支持，并将安排一批矿山、水利、交通和工业项目，以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今后 10 年，国家对贫困地区还要继续实行以工代赈政策，增加农民的移动投入，改造坡地和中低产田，为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创造条件。经济发达的沿海省、市应当分别同经济较不发达的省、区签订协议或合同，采取经验介绍、技术转让、人才交流、资金和物资支持等多种方式，在互利的基础上帮助它们加快经济发展。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要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建设公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一些加工工业项目，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使生产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

三、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

提高经济效益是今后 10 年经济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已经讲了多年，在不少方面也有进步，但总的来说经济效益差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生产消耗高，产品质量低，建设浪费大，资金周转慢，劳动生产率低，企业亏损严重，仍然

普遍存在。不少技术经济指标不仅明显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有的甚至低于我们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好水平。同行业中落后企业和先进企业的差距也很大。效益差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诸多困难的症结所在。今后10年以及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着人口众多，建设任务繁重，资金短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落后，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浪费资源的粗放经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大功夫，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纲要"要求，"八五"期间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标准煤由9.3吨下降到8.5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5%，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127天缩短到95天，还规定了其他一些提高经济效益的指标。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扎扎实实地工作，力争实现这些指标，逐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效益差的状况。

技术改造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手段。我国工业基础不小，企业数量很大，今后10年的生产建设任务主要由现有企业来承担。现在许多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迫切需要进行技术改进。"八五"时期和今后10年，要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改造现有企业，围绕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问题，组织好科研和生产攻关。机械制造工业要努力提高水平，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技术装备的需要。"纲要"规定，"八五"时期国家要选择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一批重要产品，作为技术改造的主体和突破口，努力使这些企业和产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各地区、各部门也要抓好一批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技术改造，带动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的重点，要放在节约能源，减少原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名、优、新产品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防治污染上来，并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积极推广投入少、效益高、见效快的科技成果，继续实施"星火计划"和"丰收计划"，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的转移。在加快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的同时，继续实施"火炬计划"，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及其向传统产业的扩散和渗透。电子工业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必须把加快它的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并且把它同发展精密机床等机械设备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电子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要继续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下大力量消化、吸收、应用和创新。

加强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现在，在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普遍存在着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严重浪费，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必须把强化管理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努力提高国家计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总体上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加强企业管理，特别要加强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和指挥，严格实行责任制度，强化基础工作，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许多先进企业的经验证明，只要这样做，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人，就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要在全社会各个领域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精打细算，反对浪费，少花钱多办事。

四、推动科技进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经济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我们要显著地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综合国力，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要真正把发展科技和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在今后10年中，要坚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科学技术工作的主战场，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统筹规划各个层次的科技工作，合理配置力量，并从体制改革，加强管理和增加投入等方面采取措施，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全面发展。今后10年，要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力争在一些科技领域接近或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要紧紧围绕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为解决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资源综合利用，以及人口控制、医药卫生、生态环境保护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重大课题，组织实施科技攻关计划，提供科技保证。

要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抓好一大批投入少、效益好、见效快的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要积极跟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进程，努力在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激光、超导、通信等高技术领域取得新的科技成果。继续推进“火炬计划”的实施，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推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并加快向传统产业的扩散和渗透。特别要重视发展和推广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继续加强基础性研究，增强科技发展后劲。重视发展软科学，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努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促进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繁荣和发展。

要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要全面提高各级各类教育水平。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到本世纪末在全国普及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在城镇以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基本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使农村绝大多数新增劳动力接受程度不同的技术教育和培训，企业新增职工都接受必要的职前教育和岗位培训。在业人员的劳动技能和专业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合理调整普通高等教育结构，大力提高质量。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大学。加强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使其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同类学科的水平。积极发展成人教育。要十分重视扫盲工作，争取到2000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要在全社会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方面多办一些实事，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

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今后10年总的目标，是努力使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纲要”规定，“八五”期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我国职工和农民的收入都要有一定的增长。提高人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主要措施是：发展轻纺工业和农副产品生产，继续抓好和完善城市“菜篮子”工程，组织好市场供应；积极发展为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加快城乡住宅和公用设施的建设；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发挥城乡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积极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繁荣文化事业，丰富精神生活；发展卫生体育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经过10年时间的稳步提高，到本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所谓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在物质生活方面，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要符合我国的特点和民族传统。要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使之适应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过程中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同时要积极引导消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健康有益的消费方式。

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全国小康水平的实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地区上，都将是逐渐推进的，不应该也不可能规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时间表。但2000年实现小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确定无疑的。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个方针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实行这个方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全国人民和各个地区更好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实现小康要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目前我国正处在创业阶段，百业待举。今后10年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必须妥善处理积累与消费、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实际工资总额的增长不能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实际平均收入的提高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六、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纲要”规定，今后10年，要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围绕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有领导、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改革，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要求是：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完善所有制结构。

（二）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逐步使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探索公有制经济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建立富有活力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进一步完善消费资料市场，扩大生产资料市场，发展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产市场和劳务市场，建立健全在国家指导和管理下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四）理顺国家、集体和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形成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逐步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五）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特别是运用价格、税收、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建立和健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的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经济调控体系。

要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协调配套地搞好企业、流通、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外贸、计划、投资、劳动工资、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纲要"提出再用10年时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为此，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继续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和形式。按照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根据多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大体形成了以下一些共同认识：（1）实行计划经济，可以从总体上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避免无政府状态；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和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大建设，防止大的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可以较好地调节收入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保持社会公正。实行市场调节，有利于开展竞争，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从事生产经营，做到产需结合，促进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点和长处，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这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证明这个原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正确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这一点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应当再有怀疑和动摇。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结合，能不能结合，而是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怎样把两者结合得更好的问题。（2）不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只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市场的不断发育，应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计划管理也必须自觉遵循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市场调节要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法规约束下发挥作用。（3）大体来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总量控制、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调整，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等，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大量的生产经营活动，一

般性技术改造和小型建设，主要由市场调节。(4) 国家计划管理和指导的主要任务，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规划和宏观调控目标，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协调重大比例关系，并综合配套地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运行。

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和范围，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对大量一般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实行指导性计划或者市场调节；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其生产、流通实行指令性计划，其余部分也实行指导性计划或者市场调节。再比如说，在建设领域，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重要项目建设及其布点，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决策和计划管理，同时，对投资使用、项目设计和施工管理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对其他一般性技术改造和小型建设项目，在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由市场调节。又比如说，在价格方面，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由国家管理，价格调整要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考虑市场供求变化；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总之，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和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经常进行适当调整和改进，以便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

(二) 进一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和骨干力量。目前国营大中型企业负担较重，困难较多，许多方面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它们的骨干作用，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的进展，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成效。我们就要十分重视并集中主要精力来抓这个问题，从改善外部环境和加强内部管理两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一项一项地狠抓落实，解决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实际困难，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些企业的活力明显增强。为此，应当主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1) 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要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使企业把更多的自有资金用于技术改造。逐步完善企业折旧制度和留利制度。“八五”期间继续实行并完善现行的承包制，同时积极进行“利税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制度的试点。(2) 坚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进一步贯彻落实已经颁布的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充分尊重和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具体形式，可视产业性质、企业规模、技术特点而有所不同。改革中出现的租赁制，股份制等，特别是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的企业形式，要继续稳妥地进行试点，不断总结经验。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3) 积极发展企业集团。要抓紧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推动企业的改组和联合，促进企业结构的合理化。在平等、互利、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一批跨地区、跨部门的竞争性企业集团，提倡和鼓励组建紧密型企业集团。(4) 深化企业领导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要坚持和完善厂长责任制，正确处理厂长（经理）和企业党委、职代会之间的关系。充分保证厂长对企业行使经营管理职

权，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健全企业的民主管理，改进人事制度、劳动工资制度、留利分配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切实改变企业分配吃大锅饭和留利向个人倾斜的现象，以及纪律松弛的现象。(5)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禁止随意向企业收取费用。

（三）积极推进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八五”期间，要按照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加快住房制度和保险制度的改革。要逐步改变低租金、无偿分配住房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住宅建设，改善人民的住房条件。在城镇各类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中，逐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待业保险的范围。在农村，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与可能，采取积极引导的方针，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老年保障制度。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也要改革和完善，以提高医疗质量和减少浪费与损失。在农村继续推行集资办医与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搞好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合理引导消费、深化企业改革、保障人民生活的重大措施，对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维护社会安定，顺利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两项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在已有试点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步骤地稳妥进行。

（四）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以来，改变过去中央过分集中的格局，实行放权让利，调动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一些权力下放不当，宏观管理又没有及时跟上，一些改革措施也不配套，造成经济生活中某些过于分散的现象，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过多，以至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目前这种趋势还在发展，财政收支平衡的矛盾还有所加剧。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深化改革的要求来看，都需要我们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适当集中财力物力，来办好一些必须由中央办的关系国家全局利益的大事。这决不是回到过分集中的老路，而是把必要的集中和适当的分散恰当地结合起来。中央要兼顾和协调地方的利益，地方要考虑全局的利益，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现代化建设。

（五）继续实行和完善对外开放政策。经过十多年来的努力，对外开放已经全面铺开，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今后在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最重要的是在保持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立足于现有基础，把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智力等方面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出口贸易，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和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上。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以出口原料型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已占出口总额的七成以上。今后的任务，是逐步实现由粗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向精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努力增加附加价值高的机电产品、轻纺产品和高技术商品的出口，鼓励那些在国际市场有发展前景、竞争力强的拳头产品出口，做到主要依靠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和信誉来增加外汇收入。积极发展国际旅游、劳务输出、对外承

包工程和海外投资，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要努力巩固已有的市场，积极开拓新的市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为了我国建设的需要和保持国际间的正常贸易往来，我们要保持适度的进口规模，调整进口商品结构，把有限的外汇集中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

为了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改善投资环境。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正确引导外资投向，支持办出口创汇型、技术先进型企业，以及一些大中型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注意把吸收外商投资与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推动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优势，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八五"期间，除办好已有的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外，要集中力量，搞好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要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已出台的政策要保持基本不变，并不断加以完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结合本地优势，合理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和布局，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逐步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外贸发展的需要，对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要在继续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积极性的前提下，促使外贸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联合统一对外的轨道。这项改革的意义重大，是保证我国对外贸易稳步发展的根本措施，要精心组织，认真落实。

以上提出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是今后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具体实施中，大体分为前5年（"八五"计划时期）和后5年（"九五"计划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要求。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九五"时期的发展打好基础。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在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产力布局、提高经济素质和理顺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全面实现到本世纪末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第四节　"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

我国第八个五年计划，是实现10年规划的重要措施。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要正确处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八五"头一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要继续进行治理整顿，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在转入正常发展以后，还要继续完成治理整顿遗留下来的某些任务。在整个"八五"期间，都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现实条件的可能，在确保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深化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促进治理整顿和经济发展。

一、基本任务

（一）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二）突出抓好经济结构调整，使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相适应；使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扭转；使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使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的倾向得到抑制。

（三）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地、有重点地推进现有企业技术改造。要选择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一批重点产品，作为技术改造的主体和突破口，努力使这些企业和产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要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加强重点建设，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

（四）在努力发展生产，全面厉行节约，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办法和步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并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补贴，逐步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同时，保持合理的信贷规模和结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

（五）进一步推动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并使之更好地为调整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服务。

（六）更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智力，巩固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把扩大对外开放同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

（七）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健全企业合理的经营机制为中心，协调配套地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物资、商业、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形成。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八）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妥善安排劳动就业。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继续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防御能力。

二、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

按1990年价格计算，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250亿元，比1990年增长33.6%，平均每年增长6%。农业总产值达到8780亿元，比1990年增长18.9%，平均每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达到32700亿元，比1990年增长37.1%，平均每年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1995年比1990年增长53.9%，平均每年增长9%。

三、综合经济效益

所有行业都要大力改进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到1995年，主要行业中按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要由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要由1990年的9.3吨标准煤下降到1995年的8.5吨，平均每年的节能率为2.2%。大中型企业主导产品的能源、原材料单耗，要达到国际同行业80年代初的平均先进水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5%。“八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要比“七五”有所提高。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天数，要由1990年的127天缩短到1995年的95天。

四、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

1995年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18250亿元，比1990年的14300亿元增长27.6%，平均每年增长5%。5年合计，国民收入使用额为81050亿元。5年内，不包括物价上涨因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合计为260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7%。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为170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5%。在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为84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技术改造投资55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8%。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中，按照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优先安排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的建设。技术改造的投资，重点用于节约能源、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品种，扩大出口创汇和替代进口产品，以及保证企业安全生产等方面；重点抓好一批骨干企业的改造和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哈尔滨等老工业城市的改造。

5年内，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3%。

五、财政与信贷

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在提高经济效益、适当增加税收、减少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力争国内财政收入5年平均每年递增6.1%；国内财政支出，5年平均每年递增5.7%，重点增加农业、教育、科学、国防和国家重点建设等方面的开支。5年累计，收支相抵还存在一定差额。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是我们的努力目标。由于近两年国家财政赤字比较大，“八五”又面临偿还债务的高峰，而有些开支又必须适当增加，因此，在编制和执行年度计划中，一定要努力增产增收、节约开支，把财政收支差额缩小到最低限度。

继续控制信贷总规模，积极调整信贷结构。5年内，贷款总规模平均每年增长12%；其中，流动资金贷款平均每年增长11.7%；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平均每年增长

15.3%。

此外，“八五”计划纲要中还规定以下任务：“八五”期间主要经济部门发展的任务和政策；地区经济发展的布局和政策；科学技术、教育发展的任务和政策；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人民生活和消费政策；以及“八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等。

第二章　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

第一节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到90年代初，这十多年来，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经济机制到宏观管理体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原有体制的格局已经初步打破，新体制的框架正在逐渐形成，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1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已经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由过去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向拥有法人地位的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地位转变；所有制结构由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变；经济运行机制由过去通过指令性调拨分配，逐步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调节相结合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方向转变；经济决策方式开始由过去政企不分的集中决策向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分层次决策转变；社会分配方式，由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供给方式分配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转变；经济联系方式由过去条块分割的纵向联系为主向横向经济联合转变；经济管理方式由过去进行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企业劳动人事制度开始由过去的固定工制和干部职务任命制向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开招聘和优化劳动组合的方向转变；对外经济关系由过去长期闭关锁国的封闭型经济向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放型经济转变等等。

总之，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由过去的产品经济类型的旧体制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类型的新体制过渡。

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实行改革开放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由于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初步调整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调整了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力量。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农村改革来看，我们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因地制宜发展合作性质的农业服务体系和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乡办、村办的集体经济。据统计，乡办、村办的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企业数已由1980年的142.5万个增加到1988年的159万个，增加了11．6%，就业人数由2 999.7万增加到4 893万，增加63.1%。乡镇企业的总收入由596.1亿元上升到4 231.3亿元，增6.1倍。乡村企业的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例已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88年的54.5%，已超过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业（种植业）的比例。

从城市改革来看，重点调整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扩大了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强化了企业的责任，承认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推动企业逐步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鼓励公有制企业实行专业化分工和合作，进行横向经济联合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发展多种类型的联合体和企业集团。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发展。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目前，所有制结构已经由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变。据统计：

1.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公有制单位投资的比例虽然由1981年的81.5%下降为76.9%(全民单位由69.5%下降为62.5%，集体单位由12%上升为14.4%)但仍占主导地位。城乡私人投资的比例由18.5%上升为23.1%，其中以居民住房投资为主。

2. 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业产值所占比例，1988年为93%（全民占56.6%，集体36.4%）；仍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产值仅占7%。

3.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集体企业零售额占73.5%（全民39.5%，集体34%）；个体零售额和农民对非农民零售额占25.8%；中外合营和其他经济类型的合营企业占0.4%。

（三）分配领域。改变过去的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使其向按劳分配方向转变。1987年全国推行企业工资与上交税利（或实现利润）挂钩的效益工资制。1989年又改进了这种工资总额同效益挂钩的办法。目前也出现了债券利息、股票红利和私人资本利润等非劳动收益的分配方式。不过所占比重很小。

三、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一）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为3588亿元，1980年增长为4470亿元，1990年增长为17686亿元，1991年更增为19580亿元（1991年比1990年增长7%）。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1978年—1990年平均每年增长8.8%。改革开放10年增长速度更快，1981年—1990年平均每年增长率为9%。而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就更快了。1953年—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率只为6.1%。

（二）国民收入。1978年我国国民收入为3010亿元（1978年为1952年的453.2%）。1980年增为3688亿元，1990年增为14429亿元。再以人均国民收入来看，1952年—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由104元增加到375元，26年间增加了261元。1978年—1988年10年间，人均国民收入则由375.2元，增加到1081元，10年中增加了766元。

（三）固定资产投资和积累。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78年为668.72亿元，1988年增长为2262.76亿元，1990年更，增为2918.64亿元。平均年增长率：1953年—1990年为11.6%，1979年—1990年间为12.9%，1981年—1990年为15.4%。以上数字可见，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很快，尤其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增长更快。固定资产累计额，1952年—1978年26年间，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为12029亿元，而1979年—1988年10年间，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20883亿元，后10年投资积累比前26年投资积累多73.6%。

（四）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及其在世界地位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主要工农产品产量在世界位次变化

品种	单位	1949年		980年		1988年	
		产量	位次	产量	位次	产量	位次
钢	万吨	15.8	26	3712	5	5918	4
原煤	亿吨	0.32	9	6.2	3	9.47	2
原油	万吨	12	27	10595	6	13687	4
发电量	亿度	43	25	3006	6	5390	4
水泥	万吨	66		7986	3	21014	1
化肥	万吨	0.6	33	1232.1	3	1740.2	3
布	万米	18.9		134.7	1	187.9	1
谷物	万吨	11318	2	32056	1	39408	1
棉花	万吨	44.4	4	270.7	2	414.9	1
肉类	万吨	220	3	1205.4	3	2193.6	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830页、838页。

（五）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1979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93.3 亿美元，1988 年增为 1027.9 亿美元（1990 年为 1154.4 亿美元）。1979 年到 1988 年，10 年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 4 倍。从产品结构看，1980 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 50%，工业制成品占 50%。到 1988 年，初级产品只占出口产品总额的 30%，工业制成品占 70%（1990 年初级产品占 26%，工业制成品占 74%），这种情况反映我国出口能力的增长。

另外，我国利用外资，1983 年为 34.3 亿美元，1988 年为 160.04 亿美元。从 1979 年—1990 年，我国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项目 296932 个，金额 1020.78 亿美元。

四、特区经济飞速发展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最明显例证是特区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以深圳特区经济发展为例来说明。

（一）经济全面发展，创造了“深圳速度”。深圳在建立特区前是一个只有 3 平方公里、人口 3 万的偏僻小城镇。全市只有 224 家小工厂，年工业总产值仅 6061 万元。财政预算内收入 0.17 亿元，出口贸易总额 930 万美元（1979 年情况）。建立特区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从 1980 年建立特区到 1991 年底，全市累计投入基本建设资金 297.35 亿元，开发建设新城区 69 万平方公里，新建各类房屋楼宇 2700 多平方米，形成 190 多亿元固定资产和年产值 300 多亿元的工业生产能力。建成了 9 个工业区，50 个住宅小区和一大批商贸、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等设施。新建一个飞机场，一个直升机场，一座大型铁路客站，288 公里的市政道路，7 个港区，4 个陆路口岸，安装程控电话 21 万门，开通境外 196 个城市和国内 1034 个城市的直拨电话。日供水能力 63 万吨，供电 40 多亿度。已建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

11 年来，全市共办起工商企业 20703 家（不含个体），其中“三资”企业 4287 家，协议引进外资总额 73.6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38.17 亿美元。与 1979 年相比，1991 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 174.46 亿元，年均递增 45.4%；国民收入 127.57 亿元，年均递增 44%；工业总产值（1990 年不变价）255.2 亿元，年均递增 65.4%；农业总产值（1990 年不变价）10.07 亿元，年均递增 19.8%（以上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85.17 亿元，年均递增 41.8%；预算内财政收入 27.31 亿元，年均递增 53.7%；出口贸易总额 34.46 亿美元，年均递增 63.7%。

1992 年前 5 个月，全市工业总产值达 113.47 亿元（90 年不变价），比上年同期增长 27.4%；社会商品零售额 42.35 亿元，增长 28.1%；预算内财政收入 16.34 亿元，增长 55.2%；出口总额 21.31 亿元，增长 29.76%。

（二）形成了外向型经济格局。在深圳，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的产业结构中，外向型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电子、机械、纺织、轻工等各个行业、门类 3500 多种工业产品中，出口达 1000 多种，1991 年出口 152.7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59.9%。农业兴办起技术先进、集约化生产的蔬菜、禽畜、水产、水果和鲜花等生产基地 1520 多个，1991 年出口 1.4 亿美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53.9%。1991 年旅游业外

汇收入11.05亿元（外汇人民币），占旅游总收入的52%。进出口贸易，1991年进出口总额59.67亿美元，其中进口25.2亿美元，出口34.46亿美元。深圳已成为一个新兴的出口创汇基地。

（三）为内地发展作出贡献。深圳的发展得到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同时深圳的发展又为内地发展作出贡献。到1991年底，深圳与内地联合兴办企业4392家，内地实际投资为36亿多元，为内地进口或代理进口技术设备10亿多美元，转让先进技术、工艺、配方等250多项，安排内地劳动力就业100多万人，汇回内地劳务费50多亿元。同时深圳还为内地举办各种展销会、培训班等。深圳的经验为内地借鉴推广，使深圳发挥了对外开放的窗口、对内发展的辐射和改革试验场的作用。

另外，深圳也为国家财政作出贡献。据统计，1985年到1991年，市财政直接上交省和国家财政20多亿元。此外，深圳海关关税和国家银行利润大幅度增长。11年来，海关上交国家关税107.85亿元，银行上交国家利润48.52亿元。以上三项合计176.37亿元。

（四）深圳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办特区前，深圳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宝安县（深圳市前身，现包括在深圳市内）农村人均分配只有129元（1979年），职工年平均工资769元。随着特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1990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5016元，农村人均纯收入2270元（这只是从集体分配中得到的，从个人其他收入，如劳务、房地产出租收入等不在其内）。过去人员大量外流，现在许多人已从香港等地回深圳定居。

（五）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基本情况。深圳特区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是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特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其经验有以下方面：

1.大胆开放，用好政策，多方面筹集建设资金。特区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国家和地方不可能提供，深圳自己设法筹集。主要途径为：一是外引内联，吸收境内外投资；二是向银行贷款；三是靠企业和地方财政自身积累，滚动发展。11年来，全市投入基建投资297.35亿元，投资构成如下：市财政企业自筹占37.2%，引进外资占23.6%，国内银行贷款占22.6%，中央部、委、各省市投资占9.6%，其他投资占5.9%，国家直接投资只占1.3%（3.8亿元）。这种投资结构表明，深圳的发展不是靠国家大量投资，而是靠改革开放、用好用活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多渠道筹集资金发展起来的。

2.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深圳市除关系全市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和国计民生全局的基建投资、财政收支、信贷规模、统筹外汇和人口等仍实行指令性计划外，其余均实行指导性计划，企业根据市场供求，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在价格方面，除少数商品和收费由国家定价外，97%以上的商品价格已放开，价格改革已经过关，政府不再给予价格补贴。

在所有制方面，以公有制为主，积极发展外商独资、中外合资、股份制、民间科技以及个体企业，鼓励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经济联合。

在用工和分配方面，企业有招用和辞退职工的自主权，企业与职工之间可以双向选择。允许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打破大锅饭。企业之间、个人之间贡献不同，收入也不同，收入已拉开档次。

3. 改革金融体制，推行股份制改革，建立股票、证券市场。打破专业银行原有专业分工，实行业务交叉，各金融机构之间展开竞争，形成了活跃的资金市场。1992 年上半年已有外资银行 16 家，外资保险公司、合资财务公司各 1 家，银行代表处 10 家。成立了外汇调节中心，指导企业更好地开展涉外经营。

深圳市从 1986 年 10 月开始实行股份制改革，到 1992 年初，全市共有股份有限公司 119 家，其中公众公司 20 家（14 家股票已上市，6 家正陆续上市），内部股份公司 99 家，股票发行总额（面值）24 亿元。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公司相继成立，证券经营机构已发展到 16 家、21 个网点，最近还将新设网点 9 个。股份制改革不仅筹集了大量的发展资金，而且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能力，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4. 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实行企业产权转让。投资管理公司是市属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和法人地位，对国有资产行使管理监督和投资职能，从而使产权关系更加明确，有利于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促进和加强企业管理，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

深圳市还实行了企业产权转让，到 1991 年底，全市已有 43 家企业实行了整体产权转让，转让资产 1.6 亿元。这是淘汰不合格经营者，合理配置、使用生产资源的一个有效途径。

5. 改革土地管理、住房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形成了以有偿转让为核心的土地租赁市场。住房实行商品化。目前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已经实施，这部分住房已基本卖出，少数未卖出的实行房改后的高房租。下一步企业房改准备同社会保险制度结合起来。建立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是深圳特区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工资比例各出一部分建立社会保险金个人专户和养老保险共济基金，解决职工退休养老生活保障问题。医疗保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社会统筹使用。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不但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而且从根本上减轻了企业负担，为深化用工制度改革提供有利条件。

五、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建国 40 多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提高的更为显著。拿居民收入来看，1952 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57 元，1978 年提高为 133.6 元，1989 年更提高为 601.5 元。改革 10 年，扣除价格因素，农民纯收入平均增长 11.8%。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1957 年为 235 元，1978 年增为 316 元，1980 年为 439 元，1989 年更增为 1261 元。改革 10 年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 6.5%。消费水平，全国居民消费水平 1952 年为 76 元，1978 年 175 元，

1980年227元，1989年为691元。住房面积，农村平均每人住房面积，1978年8.1平方米，1989年增长为17.2平方米；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1978年3.6平方米，1989年增为6.6平方米。储蓄，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1952年为8.6亿元，1978年增为210.6亿元，1989年更增为5146.9亿元（1990年为7034.2亿元）。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1952年为1.5元，1978年为21.88元，1989年更增为456.67元（1990年为615.24元）。城乡居民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每百人拥有电视机1978年为0.3台，1989年增加为14.7台（1990年为16.2台）。每百人拥有收音机1978年7.8台，1989年23.3台。学龄儿童入学率，1952年为49.2%，1978年为95.5%，1989年更增为97.44%。每万人口有大学生数，1952年3.33人，1978年8.9人，1989年18.47人。

第二节　转变国营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

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继续进行，并进一步深化。继续深化改革，重点是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贯彻落实《企业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并以此为中心，积极推行各项配套改革。

一、转变国营企业经营机制问题的提出和具体规定

（一）转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问题的提出。转变国营企业经营机制问题是从目前国营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当前国营大中型企业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亏损严重。1990年末，国营企业亏损户数为13171户，亏损面已达35%；亏损额248.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4倍，辽宁亏损面已达52%，加上潜亏企业已达70%；四川亏损面超过50%；据对成都189户国营企业调查，亏损户56户，亏损而没有出账的，105户，共计161户占总户数的85.2%。1990年1月—11月，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比上年同期仅增长1%，销售收入增长3%，实现利税152.77亿元，下降18.79%。其中实现利润234.96亿元，下降56.7%；税金917.81亿元，增长4.7%；上缴利税996.32亿元，下降4.08%，其中上缴利润48.51亿元，下降62.9%，企业留利只有147.1亿元，减少38.9%。

造成以上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宏观上经济结构不合理。由于国家总的计划和协调跟不上，出现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现象。由于重复生产、重复建设，许多企业开工不足，达不到规模效益。(2) 价格尚未理顺。能源、原材料价格偏低，一些下游企业又承受不了上游产品价格的上调。(3)“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机制没有改变。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不高。(4) 职工个人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速度，分配向个人倾斜。许多企业保两头，即保税、保奖金福利，挤了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的开发。(5) 企业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不强。

许多企业产品畅销时要求放开经营，产品积压时又要求国家收购，还没有投入到国内外市场去参与竞争。另外，国营企业税负和社会负担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也是原因之一。

解决企业上述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是，必须深化企业改革；主要措施是，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益，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则是问题的关键。转变国营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充满生机活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正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中心工作。转换国有企业经济机制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坚决贯彻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原则，在坚持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前提下，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实行“国家所有、企业经营”原则，认真落实《企业法》的规定，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

（二）转变国营企业经济机制的具体规定，为了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以便更好地把企业推向市场，必须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此，国务院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 1992 年 7 月 23 日公布实施。

《条例》规定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单位，成为企业法人。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原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政企职责分开，保障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坚持责、权、利相统一，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关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职工的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联系起来；发挥共产党的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深化企业改革与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强化企业管理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同时，政府也要相适应地转变职能。改革管理企业的方式，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协调配套地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物资、商业、外贸、人事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改革。

《条例》中还就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自负盈亏的责任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二、打破“三铁”和解决“双轨制”问题

（一）打破“三铁”。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企业经营新机制，使企业充满生机活力，最重要的是打破“三铁”，即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建立能高能低的分配机制，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取消工人和干部的界限，全体职工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干部实行聘任制，真正做到优化劳动组合。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随岗位和职务的变动相应调整。

在实行全员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所有企业的经营项目、发展规划、各项规章制度和改革方案，都要通过全体职工讨论通过。企业打破“三铁”后，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会大大提高。

（二）解决双轨制，给予企业充分经营自主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政企关系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是仍然存在着双轨体制，政府行政机构对企业仍然有权干预，企业还没有完全的自主权，这种双轨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仍有一定的影响。具体是：

1. 双轨制使企业难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虽然在双轨制下，使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很不充分。因为旧体制仍然存在，仍要求企业承担政府规定的任务和政策性的目标。企业承担这类任务和政策性目标越多，则自主权越小。

双轨制使企业有一定自主权，但不稳定。主要是双轨制下，政企没有完全分开，政府仍旧可以随时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当国家政策放宽时，企业自主权扩大；当收紧时，则缩小。

在双轨制下，企业虽有一定自主权，但没有实行这些自主权所不可缺少的制度和条件。比如《企业法》规定，企业有权依据法律和国务院规定辞退职工，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职工失业后，就业、养老、医疗等负担无从解决，因此，企业很难行使辞退职工的自主权。

2. 双轨制导致企业目标混乱和目标之间的冲突。改革后，企业是多目标的，既要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还要承担上交财税的任务，同时还要保障职工就业、劳保、住房、医疗等等。一方面企业仍要完成政府下达的计划指标；另一方面，企业进入市场轨道，有了盈利目标，政府下达的许多目标与盈利目标发生矛盾。有时企业如按指令性计划安排生产，则会阻碍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从而阻碍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3. 双轨制引起企业多种行为的不规范甚至混乱。企业的目的决定企业的行为，企业目标混乱必然导致企业行为混乱。一是生产行为混乱。在双轨制下，决定企业生产计划行为是双重的，既要考虑政府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又不得不关心市场状况。这样使得企业无法完全考虑市场需要来决定生产计划，难免顾此失彼。二是销售行为的混乱。在双轨制下，企业的销售行为也是双重的。当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或市场价高于计划价时，企业努力扩大自行在市场销售部分，设法减少由计划收购部分，不与政府签订订货合同，甚至不执行已订的合同；但当产品供过于求或政府的计划价高于市场价时，企业又求助政府帮助摆脱困难。

此外，双轨制造成企业行为混乱，还包括：投资行为、融资行为、原材料购进行为以及留利分配使用行为、劳动力使用行为等等。

（三）把国营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国营大中型企业如何摆脱困境，如何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益，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企业推向市场。使其发挥自主经营的作用，在市场竞争中，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当前企业缺乏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调节作用发挥不够。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首先要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逐步放开国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一般性技术改造和小型建设等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缩小企业的指令性生产计划，由企业按照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改变价格形成机制，逐步使国家管理的产品按成本、平均利润率确定价格，使大多数产品通过市场形成符合价值规律的价格。国营大中型企业应发

挥自己的优势，增强商品经济和市场观念。努力降低产品成本，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积极开拓市场，参与市场竞争，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而且也要积极面向国际市场，要在市场竞争中（包括国际市场）发展和壮大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目前困境，也才能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第三节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广与完善

一、企业承包制的实行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两权分离、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转变经营机制的一种形式。企业承包制是以承包经营合同的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一般是按照合同规定，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承包制有“两包一挂”形式，“两包”是包上交国家利税，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挂”是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形式比较普遍。

承包制自 1987 年 5 月在全国推广以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如扭转了 1983 年推广利改税所带来的实现利润和财政收入连续 22 个月滑坡局面，当年全国利税比上年增加 118 亿元，增长 9.9%，其中承包制带来新增财政收入约 60 多亿元。1988 年，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利税增长 21.4%，上缴利税增长 15.8%

二、首钢承包制的经验

首钢实行承包制比较成功，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一）首钢承包制的特点。（1）递增包干“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包全留、歉收自补”。包死基数，而且逐年递增，企业必须完成这个基数，这就形成很大的压力。超包全留，企业上交承包基数后，创多少均由企业支配，这又形成很强的动力；所以，首钢的承包制是压力和动力的结合体。（2）首钢规定留利分配比例为：发展基金占 60%，福利基金 20%，奖励基金 20%；又规定实现利润和工资总额比例为 1:0.8 挂钩浮动。把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拴在一起，这是自我激励的机制，也是自我约束的机制。（3）实行全员承包、层层落实，形成包、保、核的严格企业管理体制。包是明确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保是各单位、岗位之间，按规定进行协作；核是对包、保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据此实行按劳分配。从总公司一直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形成宝塔型的包保核体系。

（二）首钢实行承包制取得了巨大成果。（1）经济效益大增。1990 年实现利税

26.25亿元，居全国大企业之首。实行承包制以来利税增长情况：1978年为3.77亿元，1990年增至26.25亿元，平均年递增17.6%。同期鞍钢平均年递增1%，本钢12.4%，武钢14%。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加流动资金所创利税总额，1990年首钢为66.44元，鞍钢18.5元，马钢24.59元。钢产量，首钢1984年为231万吨，1990年增至425。5万吨，平均年递增11.10%。同期武钢为5.4%，鞍钢1.61%，马钢4.2%。(2) 上交利税大幅增长。改革前，1978年，首钢上交利税3.71亿元，1990年上交15.0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4倍多，平均年递增12.3%，同期全国冶金行业上交利税平均年增长为6.7%。(3) 超包部分留企业效益大。首钢实行的承包制，基数包死后，利润超包部分全部留给企业。这个办法比全部上交的财政统收统支、国家包办投资的传统体制效益高得多。首钢12年共完成重点改造项目108项，平均投资回收期不到3年，新增利税101.61亿元，12年投入产出比为1:2.62，即1元投资带来2.62元的纯收入。而到1989年为止，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投入产出比为1:0.46，首钢的投资效益高出4倍以上。(4) 首钢实行6:2:2留剩分配比例，正确体现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关系。首钢留利分配制度，自留资金比例为60%，用于企业再投入发展生产；20%用于职工福利，20%用于奖励基金（北京市规定企业留利40%用于发展生产，30%用于福利基金，30%用于奖励基金)。这种激励机制，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自留资金60%用于发展生产，形成的固定资产还是国家的)，又增强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使职工上有压力，后有动力，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三）进一步扩大首钢的自主权。1992年7月，国务院批准国务院经贸办和国家体改委“关于进一步扩大首钢自主权改革试点的报告”。“报告”提出，决定进一步扩大首钢自主权。

扩权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 扩大投资立项权。在境外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立项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由首钢自主决定。在国内总投资在2亿元以下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凡不需政府协调配套条件的，由首钢审定。(2) 扩大外经、外贸和外事权。(3) 扩大资金融通权。同意首钢成立银行。

首钢有此自主权，将尽快进入国际一流跨国公司行列。

第四节　股份制试行

要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积极进行改革新试验，也是一个重要措施。企业试行股份制，就是其中一项。

一、我国试行股份制的条件

目前，我国试行股份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首先是股份制试点工作已经在几个城市试行了几年，获得了一些经验。另外，更主要的是前一段实行企业体制改革，实行了承包制。企业承包制的推广，是目前试行股份制的有利条件。

企业改革总的目的，就是要使政企分离，使企业从行政从属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实体。企业改革，从 1979 年开始，到现今已经 20 年了，这 20 年的过程中，企业经过了扩大经营管理权的试点工作，实行利润留成制；企业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制等。口 B 前比较普遍的是企业承包租赁制。企业承包制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试行两权分离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一种形式，现在我国已经推广。这种承包制是以承包经营合同的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按照合同规定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承包制有“两包一挂”形式，“两包”是包上交国家利税，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挂”是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形式比较普遍。租赁制适用于中小企业，它是企业资产所有者代表，通过公开招标办法选择承租者，通过租赁承包经营合同，将企业的经营权交给承租者厂并向其收取二定租金。承租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职工集体。

承包制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它使两权有一定的分离，企业自主权有一定程度的扩大，经营效益也有所提高，并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企业经营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经营效果。但这种经营形式，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容易产生企业的短期行为。在这种制度下，企业承包者不可能有较长期的安排，也不可能进行重大项目的建设，容易产生拼设备吃老本等短期行为，这自然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二）企业承包者同广大职工之间在收入分配上存在着矛盾。主要是广大职工对企业承包者收入过多及实际上“负盈不负亏”不满。企业赚钱后，承包者收入过多，往往与承包者付出的劳动不相称。另外，本来承包合同中规定，承包者对企业经营是既要负盈也要负亏，但实际上企业亏损时，承包者拿不出钱来，国家往往也不强制，自然由政府来负担，因此产生实际上“负盈不负亏”现象。这种现象职工自然是不满意的。

（三）生产要素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组合受到限制。企业承包后，生产要素、机器设备、厂房等，都归承包者管理使用，别人无权干预。这样，要使生产要素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新组合，自然十分困难，而这种重新组合不得实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就很难改变。

（四）政企仍然没有分开，企业自主经营权仍未落到实处。这是承包制的最大缺陷。在承包制下，发包方仍是政府部门，承包后，企业的人事权和最终决策权仍然属于政府机构，这样承包制仍未突破传统体制的框框，企业自主经营权仍未落实。

为了进一步推进企业体制改革，让企业真正做到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

展、自我约束、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实体，就必须进一步改革企业经营机制，一个办法就是实行由承包制到股份制的转变。

二、试行股份制的目的和原则

要试行股份制，首先应弄清什么是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是以发行股票方式吸收社会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合理经营、自负盈亏，按股分红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把分散的使用权转化为集中的使用权。股份公司是一种通过发行和购买股票的方式集资经营的企业。股票持有人即为公司股东。股东可凭股票取得公司的利润分配。股票是它的持有者向股份公司投资入股并有权取得股息收入的凭证。股票可以买卖，有股票市场。股东无权退股，只能将股票在股票市场上出卖。股东还有权参与企业的管理。定期召开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它讨论决定企业重大经济活动，并选举董事会来负责企业的管理。

股份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一种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但是，也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公有制企业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试行股份制是深化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

(一) 企业试行股份制的目的：(1) 社会主义企业改为股份公司后，产权明晰，可增强所有者对公有资产运行的责任，提高公有资产的运行效率，有利于克服国营企业存在的消费倾斜、短期行为、自我约束不强等问题，真正把企业推入市场。(2) 促进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3) 通过股票买卖及参股、入股等方式，可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社会内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提高全社会的资产配置效益，并有利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4) 有利于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使部分消费基金化为积累基金，缓解社会上资金供需矛盾。(5) 通过企业的参股、控股，协调横向联合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规模经济。(6) 通过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等还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二) 试行股份制的原则：(1)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维护国有资产完整，不能化公为私或变相侵吞国家资产，也不能以搞股份制为名，追求高股利，推动消费基金的膨胀；(2) 从中国国情出发，先易后难，先从有条件的企业试行，防止一哄而起；(3) 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4) 贯彻产业政策，促进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组合，提高经济效益；(5) 个别企业发行 B 股份（即外币购置的股份），目前尚缺乏经验，但 B 股发行是引进外资的重要形式。利用发行 B 股股票的好处是，既可更广泛直接地吸引外资，又不必像贷款那样要固定支付利息，外商既分享红利，也共担风险，用此种方式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节省外汇，还可以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使企业更主动地投入市场。

有人担心这种形式的股份公司有被外商“吃掉”的危险，其实不会。因为主动权在

我方，国家可以控股。至于能发行B股股票企业的条件，也可定为：企业有盈余，并能用外汇支付外商所得红利，不增加国家外汇负担。

三、试行情况和特点

试行情况：1984年12月在北京天桥百货公司率先试点，后在广州、上海少数企业的本厂职工中发行内部股票试点。到1992年初，全国股份制企业已有3220家，其中89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现在全国有两地设有证券交易所（上海、深圳）。1988年证券交易额为1.7亿元，1990年上升为24.7亿元，1991年更高达126亿元。1992年上半年，上海、深圳两地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已有40种，股票市值600多亿元，直接参与股票投资的股民超过100万。1992年6月，国务院五个部门（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原国务院生产办）发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就股份制企业试点原则、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股权设置、内部职工持股、试点范围、组建、股份制试点企业的审批程序、政府对股份制企业的管理等作了规定。此外，有关部门还将制定《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意见》以及股份制企业在宏观管理、会计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登记、统计、股票发行与交易、新建项目股份制试点等方面的一些暂行规定，并颁布实施。

试行股份制的特点：(1) 试行股份制经营的小型企业多，大型少，集体多，全民少（如辽宁，1988年试行的股份制企业集体占85%，全民占15%，而且大部分是小型的）。(2) 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多，公开发行股票少。1988年公开发行股票的不到60家（企业内部发行股票，有的以风险抵押金转变成股份，有的用现金购买，有的用企业结余奖励基金换成股份）。(3) 股权结构中，国家股权多，其他股权少。1988年国家股占50%～70%，国家拥有绝对控股额，个人持股的份额很少。如上海真空电子股份公司，股金总额2亿元，其中国家股金1.4亿元，占70%，法人股1500万，占7.5%，个人股1700万，占8.5%。

四、股份制试行中取得的积极成果

举几个例子说明。

（一）深圳市金田实业股份公司。该公司1982年创立时，只是一个小的纺织工业公司，开办费只5000元，是个铁皮房，十几个人的小厂。1988年改股份制前，资产已发展为220万元。1988年12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从1988年股份制改革前到1990年底，公司净资产增长了11.7倍。资产总额由1988年的220万元，增长到1991年的14200万元，工业产值18000万元，创汇4250万美元。从纳税来看，股份制改革前上缴税款19万，股份制改革后，1991年为1443万元。现金田公司已由一个小的纺织公司发展成为以进出口贸易、工业生产、房地产开发、旅游服务业为四大支柱的综合性的上市公司，拥有8个全资公司、外引内联公司14家，还在美国、香港设有办事处，业务往来遍及

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日本、港澳台等地。

（二）深圳发展银行。原是一个由6家农村信用社合并建立起来的普通银行，1987年成为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到1991年该行拥有支行10个，营业部1个，分理处54个。职员由100人发展到600多人。资产由1987年的4亿元，发展到1991年的近43亿元。存款额1987年为3.87亿元，1991年增为35.25亿元（增长了8.17倍）。税前利润额1987年不到1000万元，1991年超过15000万元，人均创利（税前）1981年约5万元，1991年增为22万元。纳税额1987年－1990年末，4年上交税款8250万元，1990年一年就上交4049万元，人均纳税6186万元。

（三）在上海，股份制试点是从1984年开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是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初建时股本为50万元，1991年已发展为200多万元。上海轮胎橡胶公司也是股份制试点企业。1991年4月开始股份制试点，到1992年第一季度已取得成效。第一季度销售收入达316亿元，实现利税1亿元，分别比1991年增长61.8%和72.7%。

（四）上海氯碱总厂，原是国内最大的负债户，每年仅交利息就需1亿元，到2001年才能还清债款。该厂1992年改行股份制，发行股票可获17亿元，其中12亿还债，国家可把它用于其他建设，每年还可征收27%所得税，企业可获5亿资金进行工厂的技术改造。职工既是股东又是雇员，其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大加强。

五、试行股份制企业类型

各地试行企业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企业间相互参股持股，形成股份制企业。在横向经济联合和产权变动过程中，有的以厂房、设备和固定资产折价入股；有的以留用资金向其他企业投资；有的以技术、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这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应该积极发展，因为它有利于促进横向经济联合，有利于发展企业集团，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同时一般不涉及所有制性质。

（二）企业向内部职工集资，转为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企业通过职工入股、持股，使职工利益同企业发展联系起来，使职工更关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增强企业凝聚力。这种股份制企业应注意处理好企业经济效益与职工的经济效益的关系。要在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提高职工的收益，不能牺牲国家股的利益来增加职工的收益，造成国家受损，消费基金膨胀。

（三）向社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扩建和新建企业。或者是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大企业参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或是工商企业向社会发行股票，集资发展生产。

（四）劳动者集资入股兴办的股份制企业。主要分布在集体经济中，特别是乡镇企业中，有的由劳动者通过出资或提供某些生产工具入股，按股分红；有的在原有企业中通过“以资代劳、带股就业”方式招收劳动力，这种股份制企业等于合作社性质。

六、试行股份制取得的经验

从1984年试行股份制以来，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实行股份制有利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股份制是一种与现行全民、集体企业不同的企业法人制度，它可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从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上保证企业的自主权，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单位。如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公司、深圳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后，都有这种感觉。

（二）有利于增强企业经营责任感。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前，它只对国家负责（对具体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只要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就算完成任务，比较简单。改为股份制后，企业一方面要完全进入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另外，还必须对董事会和全体股民（股东）负责，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因此，企业负责人必须兢兢业业地进行经营，责任感大大加强。据国营股份制试点企业深圳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蔡名熙谈，公司改股份制后，他感到压力非常大。在外面，他要受社会的监督，直接受到股民的监督；在企业内部，他要对董事会负责，企业经营好坏，他要承担主要责任。为此，他还向董事会立下了保证书，在保证书中具体列出企业经营要达到的各项目标，如果完不成他就辞职。同时，实行股份制后，公司的财务必须向社会公开，每年两次要向社会公布财务状况，而且这个财务报告在公布前，必须先经过会计事务所审核签字，审计局审核，然后再经深圳市证券领导小组审核后，才得公布，这当然也是一种压力。这些压力是改股份制前没有的，所以深感责任重大。蔡说他的领导班子都是这种感觉，所以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大家几乎没有星期天，每天工作到很晚。

（三）有利于筹集社会闲散资金，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股份制企业（股份公司）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股票是股份公司发给出资者作为投资入股的证书和索取股息的票证。股份公司通过股票的发行和转让，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把社会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扩大再生产。如上海轮胎橡胶公司，在资金使用和扩大生产规模方面，就得利于实行股份制。汽车工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八五”期间将有较大的发展。轮胎行业作为配套行业，必须达到相当的规模，才能真正与之配套。但要扩大生产规模又缺乏资金（上海轮胎橡胶公司估计，“八五”期间共需投入资金10多亿元）。该公司实行股份制，通过发行股票，很快就筹集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所以实行股份制也是企业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的、有效的途径。

（四）便于理顺和完善公司集团的内部关系。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往往不只是一个单位，而是许多企业联合而成的集团公司。这样的集团公司在实行股份制前，各企业间财务产权等关系不易处理好，往往矛盾重重。实行股份制后，产权关系明晰，集团公司中各企业间内部关系容易处理好。如上海轮胎（集团）公司，是由公司本部和大中华橡

胶厂、飞泰橡胶厂联合组建的，此外还拥有紧密层企业 16 家，半紧密企业 6 家和松板散层单位 59 家。在实行股份制前，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不规范，影响了集团的发展。改为股份制后，引进符合国际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体制，理顺了集团公司内部的产权关系，促进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五）提高了企业知名度，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企业实行股份制公司后，成为法人团体，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股票上市）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财务状况，这样，一方面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加强了，另外企业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也提高了，而社会的知名度自然会有助于公司的发展了。如上海轮胎集团公司，技术设备、产品质量都不错，但在改股份制前，由于规模的限制，产品的覆盖面还不广，在国际上知名度还不高。改股份制后，通过股票在境内外发行、上市，知名度大大提高，扩大了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量，也增强了产品的竞争能力。在国际上，也扩大了轮胎公司在国际轮胎行业中的影响，为我国轮胎工业走向世界，早日进入世界十大轮胎集团打下基础。

（六）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企业在改股份制发行股份时，一般都发行职工股。职工认购公司股票后，就变成公司的股东，公司的命运就与职工发生休戚与共的关系，因而职工更加关心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也就会更积极地为企业作贡献，企业也通过认真经营使职工得到实惠。这样，股份制就把职工的切身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七、目前股份制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

股份制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摸索出不少可贵的经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须改进。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配套法规不完善。几年来为了适应股份制试点工作的需要，已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法规。如上海市就先后颁布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方法》、《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上海市城镇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试点办法》等，但还很不完备，特别是一些配套的法规还很不完善。目前急需颁布的法规如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建立以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为主要表册的财务报表体系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劳动工资制度、公司登记制度等，还没有建立。所有这些配套法规，亟待完善。

（二）企业经营自主权未完全落实。企业实行股份制的目的本来是要使企业在改为股份制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法人，应具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完全做到。一些企业改为股份公司后，上级公司和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仍然用管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那套办法来管理这些企业。同时由于董事会成员基本上是由主管部门委派的，董事会难以行使其应有的权力，一些重大的经营决策仍需经政府主管部门同意才能算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按全民或集体企业原来的那一套办法进行，企业运行机制依旧。

（三）没有做到盈亏自负。在前几年股份制试点工作中，有的企业的盈亏没有做到

自负，往往是个人股的红利分配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但国家股的红利，则不予重视，往往采取分红挂账或不分红的办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企业的税负过重，扣除税负和“两金”（能源交通基金、预算调节基金），再在留利中提取生产、福利和奖励基金、分红基金等，则所剩无几；再是国家股的代表往往不明确，股东是企业原主管部门，它既是政府的行政机构，又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没有人格化的代表。企业的经营者感受到的只是占很小比重的小股东的约束。

此外，股份制企业（即股份公司）质量和规模化不够，也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

总之，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中，虽然仍有以上不足之处，但是，股份制本身仍然是转变国营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两权分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单位，以及把企业更好地推入市场的较好的企业组织形式，应该继续推广和完善。

八、关于股份制有争论的问题及目前股份制试点的方向

（一）前一阶段关于股份制有争论的问题。

1. 股份制性质问题（是姓“资”还是姓“社”）。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企业组织制度和财产组织方式，它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服务。关于股份制有何好处：所有制关系具体化、人格化了，可以把国家、企业、个人利益通过股份有机地结合起来，改变过去全民企业谁都是所有者但谁又都不负责任的现象；在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互相制约的关系，促进企业行为的合理化；吸收职工入股，可以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关心改进企业的经营活动；有利于筹集社会上的闲置资金促进资金横向流动和使用合理化；促使承担投资风险，有利于抑制投资“饥饿症”的发展。

另一种意见不赞成，理由是：股份制会导致投资分配走向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股份制解决不了企业行为合理化问题，甚至可导向相反结果；社会主义没有必要搬用资本主义股份制来积聚资金。

2. 股份结构中设不设“企业股”问题，看法不一致。一种意见，改革以来企业留利是客观存在，尤其是企业承包以来，用留利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和补充的流动资金以及利用贷款税后还贷形成的固定资产，被列为企业资金。企业资金形成“企业股”，其持股人应是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职工财产委员会，作为合法的社团法人支配这部分股金。也有的主张这种股金在企业关停时，最终所有权仍属于国家。

“企业股”是我国特殊国情的产物，不能因为外国没有，就否认我国当前“有”的必要性。它的存在将有利于承包制与股份制的结合，有利于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自负盈亏的能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企业自有资金的所有权属国家，企业只有支配权和使用权，不应

划归企业，因此，国营企业中没有所有权属于本企业的资产，也就不存在单独的“企业股”。同时，企业股将带来一系列说不清的问题，如自有资金的量如何合理确定？谁是企业股的代表人？企业股红利收入归谁等等。也有的人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企业自有资金可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西方不许）。理由是部分资金来源为：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市场价格扭曲获得的好处；国家对部分企业减税让利而来，是历史形成的。因此这部分资金应归企业所有，应该以企业职工集体股入股并参与分享红利，不会侵权（对其他股东）。因中国目前试点企业股票不上市，将来能上市的也是少数，只要保持股东之间平等关系就不会侵权。

（二）目前股份制试点的方向。

1. 积极推进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发展横向联合组建企业集团时，可以互相参股；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地方和企业共同出资新建的企业，有条件应办成法人持股有限责任公司；有条件的全民企业可以吸收非全民企业投资入股，办成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2. 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选择一些基本建设或技术改造项目已列入国家计划而资金有缺口的企业，向本企业内部职工发行股票，筹措资金。企业实行内部职工持股，要经省一级主管部门批准，并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实行同股同利。

3. 在总结经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搞好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在上海、深圳两市有计划地逐步扩大上市股份企业数量）。

第五节　加深农村经济改革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10年改革也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农村社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1988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12078亿元，比1979年增长27倍，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9.8%上升到40%。农村社会总产值中，1988年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与非工农业产值由1978年的31.4%上升为53.5%；农业产值占比重由68.8%下降为46.5%。由于乡村工商企业发展，一大批小集镇建立起来。

（二）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变，商品市场空前活跃。1988年农村工农业产品商品率由1978年的53.7%上升为69%，其中农产品商品率由45.2%上升为58.3%，多渠道的农村商业网络正在形成。一批集体企业市场、贸易货栈、批发市场应运而生。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有7万多个农民为主体的城乡农贸市

场，成交额高达1557亿元，剔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加4.7倍。

（三）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片面的“以粮为纲”向粮食经济作物协调发展。1988年种植业内部经济作物产值占农作物种植业产值的比例达到18.4%，比1979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粮食作物产值下降到58.2%。1988年，林、牧、副、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已达44.1%，比1978年提高20.5个百分点，农作物种植业比例下降到55.9%。整个农村经济向着农、工、建、运、商综合经济方向转变。

（四）农民收入不断增加。1988年农民人均收入545元，比1978年133元增长了3.1倍，扣除物价因素增长1.6倍。现金收入占比重由30%上升为83%。农民商品性支出占比重由39%上升到70%。10年来农村新建住房60亿平方米，每个农民住房面积平均由8.1平方米上升为16平方米。农民储蓄存款总额比1978年增长10倍。农民食品丰富，营养改善。

（五）农村经济实力、活力增强，基本上解决了10亿农民温饱问题。

（六）农民商品观念加强，生产积极性提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只6年~7年间，粮食已达到基本上自给。1984年人均粮食达400公斤。

（七）加速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企业的发展，农村市镇的发展，使乡村人口发生了变化。1978年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2%，1988年下降为只占48.7%。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中的比例由70.7%下降为59.5%。全国约9000万农民，由农业性生产劳动向非农业性生产劳动转化。

二、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目前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总的方面是，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稳定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搞活农村商品流通，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抓好粮食生产和水利治理，继续发展乡镇工业，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速发村现代化的进程。

（一）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制，明确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义务，使承包户能够用好有限土地，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积极性。

（二）稳定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通过承包合同，把承包农户应向国家上交的定购粮食和向集体经济组织提留的粮、款等义务，同承包土地的权利联系起来；把发包方应为承包方提供的各种服务明确起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多得实惠，很快富裕起来。

（三）保障农民经营管理自主权。农民根据国家计划可因地制宜地耕种承包地，在承包地上的收获物，在国家政策范围内自行经营和销售。保证当年生产性投入，集体统一组织农民参加改善生产条件的建设性投入，扩大劳动积累；政府还为其创造政策环境。

（四）稳定完善承包土地农业定向使用权，农村办企业、农户建房不得占用耕地，如占用，应开荒补充。

（五）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计划转移制度。根据需要允许多余农民劳动力转向其他行业，以工（商、副）补农。

（六）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稳步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有它的优点，但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稳步发展，目前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仍然是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形式。

（七）继续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加强农业、抓紧粮食生产基础上，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按照产业政策要求，积极调整和发展乡镇工业，努力上等级、上水平。同时要求发展创汇农业的外向型经济，因地制宜建设出口创汇基地。

（八）组织农民参与流通，进一步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深化产品流通体制，从农业内部来讲：

1. 完善国家对大宗产品的合同定购制度（合同要兼顾国家、农民利益，尊重农民自主权，贯彻互惠互利政策，做到义务和权利相一致）。

2. 对国家合同定购以外和放开搞活的农产品，要积极组织多层次、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重点是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参与流通。

3. 完善放管结合的购销政策。如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要在保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前提下，放开经营。烟草、蚕茧及少量特种中药材，继续由国家指定部门统一经营。食油、食糖、绵羊毛、黄红麻等实行指导性计划，建立和完善购销合同制，引导生产和流通。其他农产品应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放开价格，同时加强宏观指导和管理。

4. 对一些多品种小批量的农副产品，依托基层供销社与农户之间组织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供、产、销一条龙新型经济联合体，参加者按照合同，共担风险，共享盈利。

5. 逐步理顺农产品价格。有计划地解决粮食收购价格偏低和购销价格倒挂问题。应有效地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防止粮食收购价微调，生产资料价格猛涨。

另外，在提高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剪刀差”，使工农业产品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价。同时，要把提高农用工业劳动生产率，减少农业生产资料流通费用的好处，让利于农民，增加农业物资投入，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6.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农产品既然越来越卷入市场，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量，克服生产上的盲目性。同时，农村中各种产业，都要努力培育开发新品种，提高品质，以便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

7. 建立可调控的农产品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国营商业、合作商业、集贸市场、综合市场、专业市场、批发市场。批发市场是这个体系的中心。重要的农产品交易要由现货交易转向长期合同和期货贸易、这是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避免生产大

起大落的重要措施。

我国城乡专业批发市场尚处萌芽时期，辐射面小，成交额少，不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因此，应当加强城乡专业批发市场的建设，办好集贸市场。要继续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初级市场，积极地、有计划地建立主要农产品的批发市场，并逐步建立全国性的批发市场。尽快形成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与此同时，除指令品种外，应鼓励和组织多渠道经营，允许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和个人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活跃市场。

8. 发展横向联合，发展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随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经济联系越来越多，应该通过各种形式打破行政区划和所有制形式的限制，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把生产、加工、销售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共同发展生产、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共同分享利益的整体。建立起产销一体化、能够增强和积累力量，保持自身良性循环机制，逐步减少直至最终取消国家财政补贴。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多地少，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同商品经济发生矛盾。1978 年开始的农村经济组织改革，到 1981 年已形成了 1.85 亿小农户，到 1990 年农户数增为 2.16 亿户，户均耕地由 10 亩降为 8.5 亩，平均每个劳动力用在耕地上的劳动日一年不到 80 个，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为剩余劳动力。同时，由于农村经济改革，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也使得剩余劳动力不断出现。1978 年农村改革后，农业生产迅速增长，1979 年～1988 年，农业产值平均增长 6.2%，超过前 30 年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 3 个百分点以上，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 31.0%，特别是 1978 年～1984 年，农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11.7%。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猛增起来。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即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适应城市工业发展的需要向城市转移，被工业吸收，从而解决了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在理论上讲，即由于城市中现代化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也远远高于农业中工资水平，这就促使剩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直至完全被后者吸收。到一定阶段，再逐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这一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不一定适用。就我国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工业发展不足，无力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如果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势必造成城市人口膨胀，给城市各方面造成巨大压力，使各方面都会出现紧张局势，城市经济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农村中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比较合适？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有多种途径：(1) 发展乡镇企业，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2)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3) 在地域转移政策上，要把“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与“离土也离乡”的异地转移恰当

地结合起来，走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出资、共同建设和发展城市的新路子。(4) 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纳入国民经济的宏观发展计划之中，进一步发展地方性的劳务市场，建立包括对劳动力进行培训、提供就业信息等在内的相应的服务体系，减少转移的盲目性。(5) 向国际劳务市场输送劳动力。

(一) 关于发展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从 1978 年实行改革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1980～年 1988 年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从 656.90 亿元增长到 6495.66 亿元，增长了 8.89 倍，每年平均递增 33.2%（1990 年更增长为 8461.64 亿元），而同期全社会总产值则从 8534 亿元增长到 21021.7 亿元，增长了 1.46 倍，平均每年递增 11.8%（1990 年为 37996 亿元）。所以乡镇企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从 1980 年的 7.7%上升到 1988 年的 26%。

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生产结构，1978 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为 70%，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1988 年农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则由 1978 年的 70%下降为 46.5%，降低了 23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 2.3 个百分点，非农业产值则由 1978 年的 31.5%，上升到 1988 年的 53.5%。

农村工业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生产结构，因而也使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就业份额明显下降。1978 年农业劳动力占全国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为 71.4%。1988 年则下降为 57.9%，下降了 13.5 个百分点，农村中农业就业比重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增加。如 1984 年以前乡镇企业每年只吸收 140 多万人，而 1984 年和 1985 年，乡镇企业发展吸收劳动力年均增长近 2000 万人。1986 年和 1987 年际增长下降。乡镇企业对农业劳动力吸收的具体情况如下：1978 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 2526.56 万人，1982 年增为 3112.91 万人，1984 年为 5208.11 万人，1985 年为 6979.03 万人，1986 年增为 7937.14 万人，1988 年更增为 9545.45 万人。

在改革开放 10 年中，农村工业迅速发展，平均每年吸收劳动力约 500 万人。可见发展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发展乡镇企业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但只这一条途径是不够的，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太多，据一般估计，我国现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有 1 亿人左右，约占劳动力整数的 1/3。而庞大的人口基础和轻型的年龄结构，会使今后一二十年内面临劳动力增长的新的高峰。据预测，农村每年要新增劳动力 1000 万左右，因此，到本世纪末，每年至少要有 1000 万劳动力需要安置，解决就业。上面，我们谈到发展乡镇企业平均每年也只能吸收 500 万人左右，还有相当一半新增人口（劳动力），需要考虑向其他方面转移。

(二) 共同建设和发展城市的新路子。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建设和发展城市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另一条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好路子。目前我国的 450 个城市中，小城市的比重过大，规模效益很低，据 1985 年统计，人口在 1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 26.4%，50 万～100 万人口的城市占 15.8%，30 万～50 万人口的城市占 7.95%，10 万～30 万人口的城市占 5.04%，10 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占 0.14%，

镇的人口占44.6%。这说明中小城市发展不够，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应当共同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应当鼓励农民进人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让他们进城建城，特别是新开发区（县级市）。另外，也应使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使其逐渐发展为中小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除了城市工业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外，还必然会产生对包括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较大的需求，促使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和人数的上升。这自然有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四、农村集体经济问题

（一）农村集体经济总的情况。1989年我国农村情况是：18%的地区建立起集体经济组织，双层经营体制搞的较好，集体经济实力较强，有完整服务体系。20%的地区有一定的村级经济实力，也能提供有限的服务。62%的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建立和很不完善，集体经济力量很弱，更谈不上服务了。具体表现：后者管理混乱，忽视组织积累和投人，忽视对承包户统一服务，土地管理混乱，农田基本建设无力开展，抗旱排涝、植保防病，产前、产中、产后必要的服务无人协调组织。而村级行政组织上，强制性向农户收粮催款，催种催收，征兵纳税，计划生育等一大堆事情，造成干群矛盾尖锐、经济上不去。

（二）解决办法。完善统一经营层次，加强承包管理，壮大集体经济，发展社会化服务。具体办法为：

1. 建立健全承包管理制度。通过完善合同进一步明确发包方与承包方的责任、权利、义务，逐步实现有偿承包、有偿转让、有偿投人，以提高农民管好用好承包土地的积极性。

2. 建立健全劳动积累制度。按照“量力而行，合理负担，取之有度，用之得当”的原则，规定每个劳动力每年应提供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的数量，以保证农田基本建设。积累工可以以资化劳，并切实加强用工管理，调动农民从事集体劳动的积极性。

3.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对一些财务混乱的村，要抓紧认真清理整顿，并建立相应的制度，防止贪污、挪用和挥霍浪费。追回原属集体积累的被少数人长期无偿占有的资金，可转为合作基金。

（三）搞好农村集体经济宏观方面的具体措施。

1. 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加强机械、水利、仓储设施等物质技术装备的使用和管理。充分利用农闲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 合理规划生产布局。要扎实地组织农业综合开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中低产田的改造问题，开发一些宜农、牧、林、渔的荒山、荒地、荒坡、荒滩、荒水，以扩大农业利用资源。山区建设水平梯田，防止水土流失。平原主要平整土地，搞好田间配套，除涝治碱洗盐，健全排灌系统。应以增产粮、油、肉为中心，农、林、

牧、副、渔全面发展。实行山水林田综合治理，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密切结合起来，实行开发承包、管理承包、科技承包等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科技人员积极性。

3. 开展对承包户统一服务工作。对几个生产环节产前产后的重大困难，以及农业科技推广（科技兴农），组织好统一服务工作，制定各种制度，将工作落到实处。特别是县乡两级应做好此项工作，建立以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服务为依托，以其他社会服务力量为补充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帮助和引导承包家庭搞好经营。同时，强化以农业机械为重点的各种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以农副业公司或加工厂为主体的产、供、加、销一条龙的服务体系。社会化服务组织要国家、集体、供销社、联合体和专业户一起上，逐步形成上下左右有联结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网络。

4. 有的地区已实行"农业双向承包责任制"（河南郑州、焦作，江苏张家港市、无锡县等地），即围绕农业生产的各个项目，市、县、乡、村、户从实际出发，层层明确任务指标，签订承包合同，上对下承包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服务；下对上承包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产量、定购任务及其他经济技术指标的完成。

各级政府还把各个服务项目分解到有关经济技术部门，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并按照规定实行奖罚制度，以保证双向的责、权、利真正兑现。农业双向承包责任制把科技、财力、人力、物力有机地结合起来，配套投入，推动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和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对贫困地区采取比特区更特殊的政策。一是要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二是要确定先富民后富县的方针。贫困地区主要应立足于扶持农民发展生产解决温饱。发展经济应立足于本地资源，立足于第一产业，不能照搬发达地区的经验，大搞原料和产品销售均依赖外地的加工工业，这样的"两头在外"的企业只能成为贫困地区的包袱。当然发达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也会对落后和贫困地区发生巨大影响作用的。

第六节　进一步扩大经济特区、技术开发区的对外开放事业

一、经济特区进入发展外向型经济更高层次的新阶段

（一）进入90年代，各经济特区已进入发展外向型经济更高层次的新阶段。各经济特区经过前些年的建设已经建立起包括电子、机械、化工、建材、轻工、食品、服装、印刷等行业的现代化工业，生产企业已达3000多家，产品1000多种，已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1991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的工业总产值达524亿元，比上年增长33.2%，其中深圳特区工业产值达255.2亿元，占五个特区工业总产

值的48%。各经济特区建立了一批技术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目前各特区都在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并在此基础上向着技术高档次、经营上水平的目标迈进。特区工业生产力不断增强，为特区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二）国际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各经济特区积极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外贸事业的发展。1991年各经济特区外贸出口主要特点：一是出口商品结构改善，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增多；二是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逐步扩大，特区自制产品出口增多；三是创出了一批出口拳头产品，如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康佳电子集团等的产品；四是积极开展远洋贸易，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总之，各经济特区出口竞争能力不断加强。

（三）外商投资企业不断增多。1991年出现外商投资热潮，5个经济特区。1991年新签外商投资项目2431个，协议外资金额27.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1.1亿美元。外商投资也呈现出结构合理、投资规模普遍增大、技术层次越来越高的趋势。1991年深圳新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中，生产性项目占90%以上，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占27.4%。外商投资的高科技项目增多，在新签项目中，属于光学品体、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项目占3成以上。不少外商还增资扩股，进一步扩大再生产。

（四）与内地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到1991年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委到经济特区创办各类企业近5000家。这些经济联合，一方面向内地提供国际经济信息，提供建设资金，转移经过消化创汇的先进技术，促进内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把内地的初级产品或原材料运到经济特区，采用先进设备进行加工增殖后销往国际市场，推动内地外贸出口。他们还到内地投资，建设出口生产基地，改造和租赁内地国营企业，对口帮助一些经济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深圳从1990年起，建立“经济合作发展基金”，采取低息贷款、项目合价、技术交流及其他经济合作方式，扶持内地比较经济落后的地区，发展经济，开发资源，促进内地经济发展。

此外，各经济特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投资研究日益完善。

二、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迅速

（一）1991年各沿海开放城市的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已进入产出阶段。现在各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初具规模，投资环境日益完善，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经济和社会效益不断提高。现已投产的生产企业达1000家，工业生产，1986年工业生产总值只3亿元，1991年达147.9亿元。各开发区已出现一批经营效益较高的企业，社会效益也较好。现开发区解决了14万多人的就业机会，并带动了周围乡镇农村经济发展。对内地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发挥了“窗口”和“桥梁”作用。现各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势头良好，项目素质明显提高，新产品不断开发，出口创汇不断扩大。

（二）上海浦东开发进展迅速。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开放是我国90年代对外开放的重

点。现浦东开发区进展迅速，现正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浦东新区连接浦西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已经开工，南浦大桥已于 1991 年 10 月建成通车，其他工程正在加紧进行。浦东开发近期重点是搞好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陆家咀金融贸易区三个小区的建设。上海浦东有较好的地理优势。上海经济技术基础雄厚，加上国家又有优惠政策，所以对外商有很大吸引力，特别是金融投资者纷纷前来。现浦东新区已设立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 20 多家，其中有 2 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1 家中外合资国际银行和 6 家外资银行形成了初步金融环境。其他外商投资也很踊跃，目前已建立外商投资企业 180 多家，投资范围也较广阔，投资总额达 8 亿元。

三、进一步扩大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新措施

（一）扩大经济特区范围，主要是汕头经济特区，从汕头市东部的龙湖片和东南部的广澳片扩大到汕头市区，面积从 52.6 平方公里扩大到 234 平方公里。汕头特区的扩大，拓宽投资领域，增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二）设立天津港、深圳、福田和沙头角三个保税区。保税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有一定范围的封闭式综合性对外开放区域。保税区有明确的界线，建立完善的隔离设施。保税区实行特区的某些优惠政策，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按 15%征收。由于保税区是国境以内、关境以外的一个区域，非保税区产品进入保税区视同出口，保税区产品进入非保税区视同进口。保税区内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免征进口关税；企业自产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对国内外投资者有较大吸引力。保税区还充分利用港口和地缘优势，发展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仓储运输、分类包装等业务，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贸易，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创汇，提高生产和管理水平，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发挥一定作用。

（三）深圳特区建立生产资料保税市场。深圳特区投资外商较多，建立保税生产资料市场，不仅可以及时供应这些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改善生产经营条件，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掌握国际市场行情，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现已有 19 家贸易行开业，经营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生产资料。深圳、九龙海关组成小组专门负责保税生产资料市场的业务，简化进货手续，支持企业开展业务，扩大供应客户。深圳保税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一般低于香港市场，因此增强了对客户的吸引力。

（四）培育和完善深圳、上海股票市场。深圳从 1978 年开始先后有 6 家股份制企业股票上市，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5 亿多元的股票。1991 年 12 月又有 11 家股份制企业上市，向社会发行面值 2.2 亿人民币的股票。1991 年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现有 10 多家股份公司的股票上市。上海、深圳除发行普通股 A 股外，还向海外投资者发行一定数量的人民币特种股票 B 股，海外投资者可用外币购买。为了对股市加强管理，深圳市政府先后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证券机构管理办法》等法规，B 股发行和管理办法细则正在审批中。加强对股市的管理，使股市更加完善。

此外，沿海开放地区和特区经济发展，今后要逐步实现国际多元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搞活大中型企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和创汇农业的发展，加强外商投资导向，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等。总之，要积极进行改革探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第七节　继续进行外贸体制改革，加速外贸事业发展

一、外贸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我国外贸体制曾经经过了两次重大的改革，一次是1988年—1990年在外贸企业中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外贸行业实行自负盈亏试点。第二次重大改革是自1991年1月1日起，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一改革目前仍在实行。

我国原来的外贸体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产品经济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问题是：(1) 对外贸易由少数国家外贸总公司垄断，不能调动各方面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2) 外贸财务体制由国家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使大多数外贸企业不能做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实行企业化管理；(3) 由于价格体系特别是汇价不合理，国家的进出口补财负担沉重，而且由于补贴标准不统一，又助长了不平等竞争，助长的抬价争购、低价竞销，影响了正常的外贸秩序；(4) 工农不能很好结合，有时还互相制约。这样的外贸体制不但不能促进外贸事业的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

1988年-1990年在外贸企业中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是第一次改革（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行业实行自负盈亏试点)。这一措施大大调动了地方和企业发展外贸的积极性。但是，这次改革没有完全取消不平等的出口补贴和外汇留成，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所以1991年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革。

第二次改革主要是通过调整汇率统一外贸留成等措施，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取消了外贸出口补贴，打破了实行多年的“大锅饭”体制，使我国外贸企业开始走上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

经过两次改革，特别是第二次改革，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首先，自1988年以来，外贸出口发展较快，我国出口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由1978年的32位，发展到1987年的16位，1991年更达到第13位。其次，出口商品结构继续优化。1978年我国出口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比重占53%以上，制成品出口不到47%；1987年制成品出口提高到66%，1990年提高到74%，1991年更提高到78%。过去许多进口产品，现在已成为我国的出口商品。过去，我国

主要是技术引进国，现在我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出口技术。1991年我国技术进口为35亿美元，技术出口已达13亿美元。第三，出口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91年出口卖价平均比上年同时提高5%，全年出口费用水平下降11.5%。第四，我国外贸出口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有了根本改善。1978年底，我国外汇结存数为1.67亿美元，1986年底也只有20.7亿美元，1990年底增长为110.9亿美元，1991年底更增长为217亿美元，加上银行的外汇头寸，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400亿美元。

二、深化外贸改革，再促外贸事业的发展

我国外贸事业自实行改革政策以来，已取得了巨大成就。199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357亿美元（其中出口719亿美元）约相当于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5倍。但是，仍未超过香港地区（1982亿美元，其中出口982亿美元）、韩国（1450亿美元，其中出口660亿美元）、台湾省（1390亿美元，其中出口761.6亿美元），仅比新加坡略多一点（新加坡1991年为1281亿美元，其中出口687.5亿美元）。我国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应该加快改革步伐，使外贸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目前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深化外贸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外贸行政管理机制。主要用法律、政策和经济等手段（包括税收、信贷、关税、利率等经济杠杆），强化对外贸进出口的宏观管理，弱化微观管理，转变管理机制，进一步改革在计划、许可证、配额、外资、贷款、援外等方面的管理机制，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严密的、切实可行的宏观管理体制，把微观行政审批办法尽量压缩到最低限度。

（二）深化外贸企业机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使外贸企业能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贸工（农、技）结合、推行代理制、逐步走向联合、形成若干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的多种形式的农工（农、技）相结合的企业集团。继续成立若干新的贸工（农、技）相结合的股份联营公司。经过批准可以赋予国营大中型外资企业国内销售权，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统筹经营。与此同时，进一步授予更多的工业企业和实体性的企业集团以进出口自营权，让它们直接走向国际市场去竞争和发展。

（三）完善外贸协调服务机制。主要是切实加强和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和服务功能，发挥研究部门、学会、协会等机构的信处咨询服务功能，完善运输、金融、保险配套服务等。

（四）进一步开拓对外经济贸易市场。我国目前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75%以上。这不仅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回旋余地受到局限，也增加了风险。因此，应在保持和发展原有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拓新市场，实施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在重视开拓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同时，还要重视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特点，采取灵活的贸易做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是吸引外资来华，80年代末，我国已开始向海外投资了。到1991年底，我国在海外的企业已达1683

家，投资金额33.5亿美元。

（五）坚持“以质取胜”。质量和信誉是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生命，是开拓市场、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基本的条件。要大力进行宣传教育，使全行业、全社会都能重视产品质量，提高质量意识，保证高质量的产品出口。

三、扩大对外开放

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应该扩大。只以“廉价劳动”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已经不够，要考虑在继续吸引外商来华办劳务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中小型为主的“三资”企业的同时，应以“以部分市场来换取技术”的措施，进一步吸引那些大的跨国公司来华办大中型高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

现阶段吸引外资主要是加工制造业和饭店旅馆业，其他行业，特别是一些第三产业虽然也有一些，但不多，还存在一些“禁区或准禁区”。如外贸、内贸、保险、金融、海洋运输、民用航空、资源开发等。这些方面应加以考虑，组织力量，经过充分论证后，作出新的决策。有的尽快开放，有的可以先进行试点。总之，应该逐步扩大开放。

积极支持办好现有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支持和帮助上海浦东、海南洋浦等新的开发区、开放城市和沿长江开发地区、边远地区的开发，对内地也应鼓励其吸引和利用外资，特别是在资源开发方面。

四、其他方面的改革

除了以上深化改革的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大力搞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宣传、贯彻落实工作，以便在促进企业两权分离，更好地走向市场，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

（二）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培育农产品批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特别是金融资金市场；

（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搞好政府机构改革，以便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相适应；

（四）以待业保险制度为重点，搞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

第八节　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

1992年1月－2月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就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并作出决议，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深入领会讲话精神，并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

邓小平的讲话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作出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概括。讲话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关经济发展的方面有以下几点。

一、有关党的基本路线问题

“讲话”中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认真讨论了“讲话”之后指出：“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践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这是总结了我国4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近10多年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得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40多年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经过不断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制定了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诚然，在这10多年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着“左”与右的干扰，但改革开放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大大提高了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举世公认、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这条基本路线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而得出来的。要一百年不动摇，则是根据解决这个矛盾所需的时间而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根据这个主要矛盾而制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坚决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来完成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且要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来完成，短时间内是不行的，可能需要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根据党的“十三大”的估计，至少需要上百年。

贯彻这条基本路线，关键是要处理好“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1980年1月所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只要我们坚持这条路线，就一定能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达到预期的目标：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问题

这次南巡讲话，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判断社会进步与倒退的主要标志。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使人们走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樊篱，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从而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

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它代表新的生产力，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条件和更广阔的前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以及忽视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忽视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因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革不适合生产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本身也是一场革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定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作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几年来，经过锐意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问题仍未解决，它与当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要求，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要求，还是很不适应的。不改变这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对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论断。它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同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同时也说明了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不仅要发展，而且还需要继续解放，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三、关于三条标准问题

“讲话”中还提出，判断改革成败有三条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三条实际上就是生产力标准。因为综合国力自然是以生产力为核心，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原因在于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的力量。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目前我们所实行的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就只能是生产力标准了。

坚持生产力标准进行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有的人为此而产生忧虑和困惑，不敢迈步。有的人则主张，任何事物都必要先搞清是姓“资”还是姓“社”。对这个问题，邓小平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率先采用过、实行过的东西，就必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对此应一概排斥而不能借鉴利用，否则就是搞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经过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利用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仅不是可怕的，而且是必要的。

一些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并非资本主义性质的。邓小平说过：“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即使是一些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如果对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用，也是可以利用的。如利用外资，发展“三资”企业等。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头脑清醒，目的明确，而且措施得当，掌握适度，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来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没有什么可怕的，深圳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然，也要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和创新，这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四、计划与市场问题

“讲话”还对计划和市场问题作了阐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也就是说，都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体现。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本质，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两种手段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直接联系。

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80 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提出，要把“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论断。后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决定”认为，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统一的。这比为“主”、“辅”的提法比以前前进了一大步。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比“十二大”只提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避开不提商品经济，也更前进了。到 1987 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并指出，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这次邓小平又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的性质问题。他说，有些同志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所谓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指，一些人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拿来作为判断我们的改革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标志。其实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而不是市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不是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是由商品经济的特性决定的，而计划经济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自然也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整个社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加强了，它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也搞计划。因此，如邓小平所说，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和形式，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共同富裕问题

过去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没有掌握规律，投资遍地铺开，造成巨大的浪费。总结经验教训，应当充分考虑和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构想，鼓励有条件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后带动后进地区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构想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关于共同富裕问题，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地经济发展速度差别很大。如1981年－1990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6倍，年均增长率为8.9%。增长较快的是；广东增长2.31倍，年均增长12.7%；浙江增长1.88倍，年均增长11.1%；江苏增长1.72倍，年均增长10.5%；山东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0.0%。有的地区则增长缓慢（主要是内地省份）。可以看出，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速度差距较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按照邓小平的构想，不要互相扯平，应当鼓励有条件的先进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后带动后进地区发展。邓小平的这一构想，既是全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全国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关于共同富裕问题，倒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邓小平曾经讲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但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还认为，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所以，有条件的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尽可能快一点，只要讲求效益，讲求质量，多搞些外向型经济，不但不会破坏平衡，而且还会有利于总量平衡的。

六、抓紧时机，加快改革步伐

关于改革开放问题，"讲话"中特别作了阐述。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迈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邓小平的这种看法，完全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

的实际情况。近年来，中国经济又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据统计，199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为28225亿元，比前年增加了14.2%，国民生产总值为19580亿元，增长率为7%。我们应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改革迈开步子，我国的经济建设就登上新台阶，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改革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都不允许我们慢慢地发展，更不允许倒退。所以，应该迎上前去，把改革的步子再迈大一些。

邓小平还指出，搞改革要敢于大胆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应该这样去做。

总之，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的发表，无异地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从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这是我国经济大发展时期。在这时期中，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代替旧的计划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又作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这些举措，都有力地促进了并将继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中较为突出的是，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进行了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小型企业采取“放开”方针；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再就业工程；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等。

在这一时期中，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大危机，中国首当其冲，中国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抵御了危机的袭击，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稳定不贬值，并对中国金融体制进行改革。1997年香港回归。回归后的香港经济，依然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努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思想领域中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战胜了一次又一次来自右的，主要是来自“左”的思想的袭击和干扰，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总之，改革开放20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目前，全国人民正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历史过程

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自从建国初期就选定计划经济的目标模式，直到1978年。在这期间，尽管我国也对经济体制进行过几次变动和改革的某些尝试，但始终未能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的。这期间，从理论上到实践中也曾提出和实行过各种目标模式，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

一、陈云的“鸟”与“鸟笼”理论

陈云的“鸟”与“鸟笼”理论是很著名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陈云在1956年即提出：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3月8日，陈云在一份提纲中写道，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一是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是基本的主要的；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这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在一次谈话中，陈云用鸟和笼子的关系对市场和计划这个问题作了形象的说明。他说：市场与计划这二者，“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

在1979年至1984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陈云的这一思想在全党占主导地位。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认为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十二大”提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十二大”将计划经济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部分，指出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以不同程度的机动权，这样才能使计划在执行中及时得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相对过去单一的计划经济而言，是一个进步。但这种思想认识也有其明显的局限和不足，主要是没有承认商品经济。在一段时间里，许多文件和文章，都还只是提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提或不敢提发展商品经济。

二、赵紫阳的信

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和理论界的认识逐步深化。1984年9月9日，赵紫阳给其他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建议把我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四层意思：（1）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2）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3）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4）指导性计划主要是用经济手段调节。信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赵紫阳的信得到其他常委的赞同。邓小平批示：我赞成，并嘱印发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陈云给赵紫阳写了回信，认为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赵紫阳的信中的主要内容被正在讨论过程中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吸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一《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面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邓小平对《决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他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应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50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

中共"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显然，"十三大"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特别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非常相似和接近了。

"十三大"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继续探索。但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期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要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创造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要经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把“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作为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的共识之一。

三、邓小平的精辟论断

就在中央提出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同时，邓小平于1990年1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在多年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更加鲜明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的精辟论断，大大启发了人们的思想，理论界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在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面对着省部级领导干部，江泽民就如何更深刻地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发表重要讲话。针对新经济体制的几种提法，江泽民说：

> 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作出定论。不过，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江泽民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前面已讲到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当然，这还不是定论。

四、历史的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党的“十四大”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呢?

（一）这是实践的证明和启迪。建国伊始，我国即选定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1957年，这一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又进一步强化和定型。在建国初期，这种体制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其弊端就越来越暴露出来。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我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与僵化的经济模式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模式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完全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把经济搞上去了的。历史实践证明，从整体上看，计划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对旧模式作修修补补，而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它，以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取而代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事实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部门和领域，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这些成功的经验给党设计新的经济模式以示范和启迪。

（二）这是理论探索和认识深化的结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认识逐渐深化。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的认识特别是他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使全党的认识获得新的重大突破。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党和理论界的认识渐趋统一。这样，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三）这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客观要求。90年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此也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要从根

本上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等深层次的问题，加速经济发展，就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参与国际竞争，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也必须将自己的经济体制与国际上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

总之，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十四大"后，经过全党的探索和努力，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设计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许多重大突破和发展，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由五个环节组成。其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中心环节；统一的市场体系，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又是现代企业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器，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第二节　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一、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在经济发展方面，除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等方面外，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重要内容。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可以体现共同致富原则，可以广泛吸收社会分散资金，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公共积累和国家税收。要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这对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意义重大。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制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第一次明确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内，给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极大鼓舞和鞭策。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850.86万户，从业人员5441万余人，注册资金2573.98亿元；私营企业96.07万户，从业人员1349.26万人，注册资金5140.12亿元。1997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纳税540亿元，比1986年增长10倍多，占全国工商总税收的比重由3.9%上升到7%。非公经济的发展，基本不靠国家投入，所占贷款比例也极小。这一方面表明了非公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非公经济的发展仍有很大潜力。只要党和政府继续采取鼓励和引导的得力措施，非公经济将在实现国家总体目标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党的“十五大”作出了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进一步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充实企业资本金。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推动政企分开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机制。要加强科学管理，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关心安排好下岗职工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

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城镇住房公积金，加快改革住房制度。

第四章　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第一节　1993年国内经济形势

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经济采取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经过3年多时间，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即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局面。

什么是“软着陆”7“软着陆”的英语是“Soft - landing”。这是从航天术语而来。在航天方面，“软着陆”是，通过减速使航天器从航天术语而来。在航天方面，“软着陆”是，通过减速使航天器在接触月球或其他星球表面瞬间的垂直速度降低到最小值，从而实现安全着陆的技术。

在经济领域的“软着陆”，是借用航天工业术语，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形象描绘。比较科学一点说，“软着陆”就是，当国民经济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超出了其潜在增长能力，打破了正常的均衡，“软着陆”是使经济增长率回落的一种方式。形象一点说，即“软着陆”是指国民经济从“过热”状态；平稳地降到适当的“温度”，并在“降温”过程中震动很小，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另外经济上“软着陆”的“软”字，还意味着适度的意思，即“过热”不行，“过冷”也不行。经济“过热”，会导致经济发展极大地超越一国潜在的增长能力，严重破坏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运行秩序，引发通货膨胀等。但是，如果抑制通货膨胀采取“急刹车”的办法，对经济进行全面紧缩，则又会使经济停滞不前，出现经济“过冷”状态。

所以，“软着陆”一般是指：经济急剧增长引起扩张，并带来资源的极度紧张；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结构扭曲，经济效益低下，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生活不安等。为了扭转这种经济“过热”现象，采取一些正确措施，既可使经济秩序恢复正常，不会产生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又能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这就是“软着陆”的含义。

1992年上半年到1993年，国内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现象。

“四热”，即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而且这种“热”一直不退。据统计，1993年全国有房地产开发公司3700家，经营公司2700家，房地产交易所1500家，共1万家左右。房地产各类企业固定资产达90亿元，自有资金每年以23.3%的速

度递增。

其次是购买股票热。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当时无人问津，政府甚至不得不采取动员、分派等办法去推销。但是到1992年8月，情况完全变了，深圳上百万人排队抢购1992年新股抽签表格，不少股民排队三天三夜未买到抽签表格甚至发生骚动，500万张100元一张的新股抽签表竟然在一个上午抢购一空。

再是开发区和集资热。1992年以来，中国各地争相圈地搞开发区。集资也形成热潮，1993年全国范围的集资金额高达1000亿元。

除以上“四热”外，这一时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猛增，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高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等居高不下。据统计，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1年增加了42.6%，1993年又比1992年增加了50.6%。

1992年，工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加了21.7%，1993年增热更强劲，达25.1%（其中6月份达30.2%），国家银行系统向企业和家庭发放贷款，1992年6月，已增加了1260亿元，比信贷计划高出一倍多，而1992年底，货币发行增长约为30%左右，货币增加量为1683亿元。

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物价持续上涨。从1992年10月份开始，零售物价涨幅逐月攀升，1993年上半年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4%，6月份达21.6%，1993年3月份，零售物价同比涨幅突破17.3%，1994年2月，突破20%，全年达到了21.7%，形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不仅是一般消费品，就是原料和资本货物价格也在大幅度上升。1992年12月，粮食价格比去年上涨了43.3%，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了25%，燃料价格上涨了69.9%，建筑用钢材的价格和建筑成本都翻了一番，而水泥价格则增长了4倍。

以上情况还引起了金融秩序混乱。企业“三角债”拖欠严重，流动资金急剧减少，金融机构还进行货币高投放。自1992年12月以来，连续两个月进行了货币高投放，而到1993年2月以后，货币投放的势头并未减弱，达到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银行存款也出现了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的情况，大量货币投放出去却不见回笼，于是金融形势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情况，即一方面，国家对货币的供给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国家银行及整个社会的资金却又十分紧张。另外，金融界内部也是纪律松弛，秩序混乱。一时间，非法集资纷纷出现。严重违章拆借，滥设金融机构，擅自提高利率，结算纪律松弛，诈骗案不断出现，即所谓“三乱”（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现象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

第二节　政府对"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现象的治理

面对这种"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现象（还有国民经济过高的增长速度，1992年高速增长，1993年下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又比1992年上半年增长了13.9%），应该怎样进行调控呢？这是摆在现政府面前的一个最突出、最紧迫而又最困难的严重问题。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不能再重复以往那种调控办法，即从巅峰一下子调到谷底的办法。运用这种办法，通货膨胀是抑制住了，但是经济增长也下来了。这是一种"硬着陆"的办法，这种"硬着陆"的办法，是绝对不能再用了。

但是，怎样实现既能降下温来，抑制住通货膨胀，又能使经济增长不受影响，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软着陆"办法呢？

1993年7月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办法和措施，使"软着陆"获得了成功。政府的宏观调控所采取举措的基本框架是：

（一）在金融方面：

1. 自1993年7月11日起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和新发行国库券的利率；

2. 命令所有专业银行在1993年8月25日前收回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放款最高限额的贷款；

3. 命令所有专业银行检查自己向非金融机构的同业放款，以便收回非法贷款；

4. 把专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从商业性贷款中分离出来；

5. 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作用，使其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角色；

6. 按照国家的规定将股份制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挂牌上市。

（二）在财政方面：

1. 行政费用削减20%；

2. 要求所有地区在7月15日前完成国库券的销售工作。

（三）在投资计划方面：

1. 重新审查地方批准建设的开发区；

2. 削减基建投资；

3. 增加交通运输部门的投资。

（四）其他方面：

1. 改革外汇留成制度；

2. 停止打白条支付购买农民粮食费用；

3. 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和摊派集资活动；

4. 向省、自治区派检查组检查金融纪律；

5. 年底前停止出台可能造成物价上涨的新价格改革措施。

以上是实现“软着陆”措施的基本框架。

这次宏观调控的基本方针是：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既制止了过“热”，也使国民经济能保持稳定、协调的发展。

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行政手段，政府更多地是利用税收杠杆、产业政策及利率、价格、信贷、汇率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而其中政府利用利率的杠杆，使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93年5月15日、7月14日，中央银行针对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在2个月内连续提高居民存款利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5月份存款利率提高了2.18个百分点，7月份在此基础上又平均上调了1.72个百分点，并对3年期的定期存款实行了保值。同时财政部提高了1992年、1993年发行的3年期和5年期国库券的利率，并对两者实行了保值。

针对资金需求过旺，中央银行采取提高贷款利率的措施。1994年四季度物价上涨达到高峰，1995年初中央银行提高再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7月份又一次提高银行贷款利率，以抑制过旺的资金需求。

利率的提高和保值措施，让人们把钱又纷纷存入银行，银行存款大幅度增加，达到宏观调控金融的目的。（当1996年国民经济趋向稳定、正常发展时，1996年4月1日，中央银行又根据物价下降的实际情况，停办了保值贴补储蓄业务，接着又于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下调了银行存贷利率，目的是使民间资本能从储蓄形态转为消费和投资形态。）

由上可见，政府利用利率杠杆以调节货币供应量，反映国家对经济杠杆的运用已日渐成熟。

在利用法律手段方面，政府也充分运用法律武器来规范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到1996年8月底止，八届人大已审议通过了89项法律规定，其中40多项是经济方面的，此外，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又颁布了大量法规。《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个人所得税法》、《合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的颁布实施，使我国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纳入了法制轨道。

在行政手段方面，政府也没有放弃。政府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行政手段，如提出限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措施要点，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物价监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财政补贴，动用储备等方面，都采取了行政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992年的58.6%，回落到18.2%。）

在财政方面，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大力控制财政支出，严肃财经纪律，取得好的效果。1995年头10月，全国财政收支基本相抵，赤字控制在预算确定的数额之内。

实现“软着陆”的措施，如何把通货膨胀控制住，又能使经济继续上升而不回落呢？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对不同行业、部门采取不同的办法，也就是该紧的紧，该松的适当放松

哪些行业、部门应该从紧呢？如（1）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2）单纯外延扩张型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3) 泡沫经济。以上应坚决从紧。

哪些应适当放松呢？如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农业、交通通信、能源以及重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以及有效益、有市场、有利于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内涵型发展部分，则给予大力支持。

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基础原材料等重点建设，从财税、货币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1996年前三季度，农、林、水利、电力、化工、电子、邮电通信、文教卫生、科技等行业的投资增幅，均高于平均增长水平。这一时期，保证完成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有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京九铁路、上海至南京高速公路、首都机场扩建工程等。

到1996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共完成投资752亿元，占全年计划投资的53.2%，比1995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为了实现“软着陆”，同时支持经济的增长，中央还在1995年8月份以后，通货膨胀逐月回落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方针，调整了货币和信贷计划，对35个大中城市有市场、有效益、不积压的企业，增加了流动资金贷款，以保持生产与市场的活力。在1996年停止了保值储蓄，降低了利率，结果可以使企业每年可减少利息负担1000多亿元。

总之，“软着陆”，不是采取“急刹车”办法，而是采取灵活的方针，即“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因而避免了经济发展上大起大落，使国民经济走上适度快速、相对稳定发展的道路。

第三节　“软着陆”措施的效果

1993年以来政府所采取的“软着陆”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1996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7%，实现了比较适度、比较快速又可持续增长的速度；同时又成功地使通货膨胀由1993年的21.7%降到1995年的14.8%，降低了6%。这些都是“软着陆”成功的、最显著的标志。因此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梦想已变成了现实。

（二）“经济过热”逐渐消除，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关于我国“经济过热”现象，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上。1992年比1991年增加42.6%，1993年又比1992年增加了50.6%，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是“经济过热”的主要表现。经过处理措施，这种现象有所改变，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实际增长只10%，1996年上半年又比上年同期降低，只上升（扣除物价因素）12%，投资结构也有些变化。

（三）在回落中保持适当、较高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1993年比1992

年平稳回落了 0.7 个百分点；1994 年比 1993 年，平稳回落 0.9 个百分点；1995 年比 1994 年回落 0.7 个百分点，1996 年比 1995 年回落 0.8 个百分点。到 1996 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 9.7%，处于基本适度增长区间。五年之内，经济增长度波动振幅，只有 3.5%。

（四）物价回落。1996 年物价回落到了一个数，在三年内，物价从 21.7%降到了 14.8%，再降到一位数 6%。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大幅度使物价上涨率降到一位数，这是很不简单的事，而且大幅度降低物价上涨率，使物价上涨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往往会引起经济上大起大落，但是中国没有，相反地我们做到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较快的增长。

（五）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以往经济调整，国家为抑制通货膨胀常常不得不实行大量补贴，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幅明显下滑，财政赤字增加。这次宏观调控，由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加上经济适度增长，因而使各项税收连续 4 年（1993 年—1996 年）平均递增 20%，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96 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达到了 17.5%（90 年代以来首次超过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年份），财政支出增长率为 15.9%，收大于支。

（六）金融稳定、正常。经过“软着陆”措施，金融形势已解除了 1993 年初危机四伏状态，整个形势相对稳定正常。1995 年我国货币投放 597 亿元，比上年少投放 827 亿元，比计划少投放 900 亿元。到 1995 年底，狭义货币供应量 $M1$，比上年增长 16.8%，增幅比 1995 年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 $M2$，比上年增长 29.5%，增幅下降近 5 个百分点。1996 年全年货币投放量为 917 亿元，增长 11.6%，狭义货币供应量为 28513 亿元，增长 18.9%；广义货币供应量为 76095 亿元，增长 25.3%，增幅回落到基本适度区间。

另外，1996 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了 1000 亿美元，达 1050 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三年里外汇储备增加了 4 倍多。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2849 亿美元，比 1992 年增加了 1244 亿美元，年均递增 15%，外商直接投资达 400 亿美元，增长了 17.2%。这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经济运行的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也较稳定，全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在 8.3∶1 的价位上。

（七）供需平衡，人民生活水平上升。1996 年我国社会商品消费总额约为 2450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2%，扣除物价指数约增长 13.3%。同时，1996 年全年投资完成 23800 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后实际增长了 13%，固定资产投资率为 35%。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相适应。1996 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总量基本合理。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与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从 1992 年的 1826 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4400 元左右，年均实际增长 6.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2 年的 784 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1900 元左右，年均实际增长 5.4%。同时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995 年起）速度，高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新增储蓄存款 26720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 6680 亿元。

（八）产业结构调整，农业、水利、能源、交通、运输，这些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据测算，1996 年我国农业增加值为 1360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95

年增长5.1%。

铁路建设中，京九铁路开通。我国西煤东运的第二条铁路大通道，首期工程神朔铁路，在1996年7月开通经营。一些重点、难点单项工程已基本建成，现已进入全线铺轨阶段。

交通、民航、邮电通信建设速度加快。1996年太旧高速公路通车，为山西东连北京、直达渤海开辟了一条快速通道。此外，杭甬高速公路，开封至洛阳高速公路，海昌至九江一级公路建设通车。民航机场建设，1996年安排投资70多亿元。此外，广西桂林两江机场、宜昌机场已全部建成通车。全长3358公里的北京至九江、广州光缆干线已完成全部敷缆任务。

能源建设，1996年，国家计委安排电力大中型投资项目40个，投产机组50台，1039万千瓦。化肥建设，1996年我国有8个化肥厂建成投产，新增尿素生产能力240万吨，磷铵18万吨，重钙96万吨。

由上可见，长期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基本上消除了生产资料长期存在的全面短缺现象，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

第五章　中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

第一节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总的思路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此后，经过一系列激发企业活动的措施，先后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阶段。1992年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又提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制度创新活动。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经过近20年改革历程，中国国有企业中绝大部分已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企业也已成为独立的收入分配主体，效益好、活力充沛的企业不断涌现。不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不应过于乐观，改革过程中的困难仍然不少，有些还是比较严重的。如，资产负债率过高，社会负担过重，产品结构落后，技术创新不足，经营管理不善，资本结构僵化等问题还比较普遍，特别是国有企业资金利税率下降、亏损额上升。1995年底，国有经济亏损面已超过40%。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5%，其中半数企业的负债率超过80%。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1.5%，比平均水平高6个百分点，比大企业高10个百分点。

另外，国有小型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也很低，为-0.87%。比国有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低3.43个百分点，比大型企业销售利润率低5.85个百分点。

此外，国有中小企业的亏损和资产流失情况也很严重。国有小型亏损企业在全部亏损的国有企业中，占近90%，占全部国有小企业的60%。据1994年3月，财政部对12.4万户企业清产核资的情况，在8万户小企业中，国有权益损失占国有净资产比重高达82.8%，中型企业占59.4%，大型企业仅占15.2%。

根据上述情况，国有企业必须继续进行改革。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总的方针是：抓大放小。抓大是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总的是，在国有制性质不变的条件下，转换经营机制，进行制度创新（如进行战略性改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放小，则主要是对中小国有企业，采取放活政策，实现政企彻底分离，使中小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产权关系上，把一些不适合实行国家所有的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转变为集体的、合资的等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以上是大的方面，我国的国有经济改革，还有许多困难问题需要解决：如产权界定和改革问题，政府转换职能和政企分开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严重的债务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市场体系的发展、市场秩序形成问题以及金融、财税制度改革问题。总之，国有经济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只有循序渐进。但是又要加快步伐，不断总结国内外经验，才能最后取得完满的成功。

二、当前国有经济的宏观状况与改革的思路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中国国有经济占用着70%左右的社会经济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近年来国有经济反而出现大面积的经营亏损和资产流失。这种状况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它整体效益的改善。

国有经济的不景气状态，是由三个层面的问题造成的：一是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国家拥有的资本越来越不足以支撑巨大的国有经济“盘子”。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通过国有银行将数以万亿元计的居民储蓄注人国有经济，但这部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且有相当数量的流失，从而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不断积累。它必然会增大货币系统中的泡沫成分，甚至孕育金融危机。二是从国有经济的分布看，由于国有资本分散于过多的企业和行业，国有经济的盘子虽大，单个企业资金却过少，以至不能实现规模经济，难以进行重大技术更新，因而竞争能力很差。与此同时，国家应予保障的领域却因财力分散而无法加以保障。三是从企业层面看，由于国有经济长期采取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经营方式，使它所掌握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改革开始以后，又片面强调对企业放权让利，这不但没有使资源利用效率得到重大提高，反而使激励与约束不对称的矛盾日益尖锐。所有这些，都使国有企业的亏损增加，效益下降。目前，明亏企业约占国有企业总数的45%，拥有2000万职工；潜亏企业约占30%，也拥有2000万职工。近年来，国有企业亏损增加很快，净盈利逐年减少。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占盈利企业盈利总额的比重，1985年为4.2%，1995年上升为43.9%。1996年1月—4月和1997年1月—3月甚至出现了亏损/盈利比例超过100%，整个国有工业净亏损的严重情况。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以上三个层面的问题是相互影响的，可以说，国有经济的问题既源于国有企业体制

的产权界定模糊、政企职能不分等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又源于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布局过散。以上两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单独处理哪一个问题都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为了改变国有经济的这种被动状况，必须：

1. 对它进行战略性改组，缩短战线，加强重点。
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有经济的改革取得整体性突破，并使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得以按时完成。

第二节　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的必要性

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是十分必要的和迫切的，这是因为：

从现实状况来看，国有经济问题的症结，是它在企业、行业之间的分布过于分散，战线过长，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据统计，截至 1995 年底，中国 29.1 万户国有工商企业的资产总额为 9.6 万亿元，其中近 2/3 是由负债（主要是银行贷款）形成的，属于所有者权益的部分占 1/3 多。扣除个人、外资及其他人的股权，再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资产当中约有 20%左右的非生产性（比如住宅、学校、医院等）资产，那么真正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资本数量实际上不足 3 万亿元。然而这不足 3 万亿元的国有资本却遍及从饮食店到远程导弹生产等几乎所有的工商领域，分布于 29.1 万户工商企业之中。换句话说，平均每家企业能够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国有资本数量仅有 1000 万元左右。

国有资产这种过分分散的状况严重损害了现有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家工业企业进入世界前 500 强之列。据有关方面分析，1995 年中国 500 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和总利润还不及美国 500 家大企业的前 3 家。中国为数众多的轿车制造厂，迄今还没有一家达到当代技术所要求的最小经济规模。由于企业规模和实力与国外企业存在巨大的差距，使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问题。在对外开放和外资进入的情况下，中国许多企业难以应付，面临生存危机。

二、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

随着世界性技术进步的加速，技术愈益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家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从过去以资源和成本为主转向以技术和管理为主。谁在技术上领先或占有优势，谁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个企业如果不能持续不断地开发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就不可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获胜。现代技术研究与开发的一大特点是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而中国国有企业由于资金不足、负担过重，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长期不足，企业只求应付眼前的生产而没有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在许多重要的高新技术领域，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拉大。例如，中国钢铁生产能力已达 1.2 亿吨，居世界第二位，但从总体上看，钢铁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低，产品结构单一，质量不高，大多数只达到国际上 50 年代—60 年代的水平。长此以往，这些企业只能坐以待毙。

三、企业的行为方式出现扭曲

由于国有资本金不足，大量国有企业实行高负债经营。据统计，1995 年末，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 65.9%，其中，半数企业的负债率超过 80%。正如现代企业理论所指出的，负债率的高低对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有明显影响。在债权约束硬度不够高的情况下，负债率过高往往促使企业经营者用别人的钱去冒经营风险，从事高风险投资或“营造自己的王国”。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而言，银行似乎有天然的责任加以“支持”，情况就更加严重。由于它们从国家银行取得贷款和从财政取得拨款实际上并无明显的区别，“千年不赖、万年不还”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使一些国有企业和一些上级主管机关的领导人养成了大手大脚地使用银行贷款的习惯，形成了不计成本、乱铺摊子等不良经营风气。

四、孕育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目前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因此，国有企业高额负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银行吸收居民储蓄，转用于国有企业。国家银行贷款总额中有 70% ~ 80% 贷给了国有企业。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中，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实际利率呈负值。在国有企业通过负利率贷款得到大量补贴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盈利率也只有 3% ~ 5%。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使用这部分资源，不但不能提供回报，往往还发生资本的净损失。相当一部分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形成了大量不良资产（呆账和烂账）。更有甚者，是通过种种渠道取得银行贷款，用老百姓的钱进行股市、期货或不动产投机，吹胀经济泡沫。一旦发生崩盘，就会触发金融危机。

五、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

在把原有的国有企业改组为现代公司的过程中，必须付出必要的改革成本，处理在旧体制下长时期积累起来的负债过大、冗员过多、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以及分离与企业主业无关的社会福利事业等问题。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有资金投入。现有的国有经济摊子铺得如此之大、如此之散，国家就很难有足够的财力解决庞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不能不使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度大大放慢。而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国有经济分布太散，就使从最终所有者到基层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链条拉得很长，难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国有企业分布得太广、太散，政府办了许多并非必须由它办的事情。与此同时并存的事实是：许多政府应当办的事情却因为没有资金而无力去办。国有经济的现有分布结构与市场经济下国家应有的功能很不适应。

例如，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一些大国，政府通常对需要高额投资的重大高新技术开发给予财政支持，由政府承担部分或全部研制费用。但中国政府却常常力不从心。如中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虽然起步较早，但由于资金短缺，技术开发进展缓慢，现已被远远抛在后面。目前，国际上已经普遍采用亚微米级的生产技术，而中国仅能生产微米级的集成电路，开发试验的差距更大。国家财力、银行可调度资金如果不能集中起来用在关系全局、关系长远发展的“刀刃”上，今后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

再如，一些特大型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在中国当前情况下，也宜于由国家兴办。但由于资金短缺，开发工作进度迟缓。像神府煤田这样可采储量达数千亿吨的特大型煤矿，就由于投入力度不足而使建矿工作步履维艰。

此外，政策性银行本来是市场经济中通行的财政性安排，目的在于用带有某种财政补贴性质的低息或贴息贷款支持社会效益大、本身的盈利水平低、回收期长的项目。然而由于政府无钱，中国政策性银行没有低息融资和足够的贴息来源，结果它们的贷款利息甚至比一般商业贷款利息还高，很难起到政策性融资应有的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般营利性事业占用了太多的国家资金，政府连实现某些基本功能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财力保证。例如，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九年制义务教育，早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许多地方因为文教经费不足，却向家长公开地或变相地收取学费。由于政法机关经费不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办理刑事案件也要向受害者收费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国家财力的分散和经费不足，致使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军队、公安系统参与商业活动的问题也难以妥善地解决。

第三节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针对上述情况，出路何在？有些人提出国家应当增加国家财力，向国有企业大量注资，以便达到既扩大国有经济的规模，又增强国有企业竞争能力的目的。然而稍加分析就能发现，这种思路是很难行得通的。

根据匡算，如果保持国有经济现有的行业和企业分布状况不变，那么，要使国有企业具备在市场上平等竞争的最基本条件，国家至少需要投入2万亿元~2.5万亿元。包括（1）基本解除企业的不良债务（主要是国有企业欠银行的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大约需要6000亿元；（2）在清理不良债务的基础上，补充资本金不足，并使严重老化和过时的生产设备得到起码的改造，大约需要1.8万亿元。除此之外，在今后的发展与改革过程中，为了解决对老职工养老欠账和安置富余人员，以及为加强国家亟需办但因财源无着无法办的事业，还需数万亿元。

这样巨额的资金需求，依靠国有企业本身的积累或国家现有的财政力量显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由过去的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储蓄为主改变为以居民储蓄为主。据世界银行估计，1978年中国国民总储蓄中，居民储蓄占3.4%，政府储蓄占43.4%，企业储蓄占53.2%。也就是说，社会总储蓄的96.6%来自国有部门。而近年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结构已经变为：居民储蓄占83%，政府储蓄占3%，企业储蓄占14%，其中国有企业不会超过7%。换句话说，在社会总储蓄中，大约只有10%来自国家部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要增加自己掌握的资金不外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增税筹资；二是通过举债，包括向国外借债筹资。然而，从增税筹资看，目前中国企业增值税平均税率14%，所得税税率33%，这样的税率从世界范围来说已经不低，加上在预算外还征收了大量税费，要进一步增加政府收入余地十分有限。何况大规模增税很可能事与愿违，在收到增加的税款并向企业注资之前，先已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因而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办法，殊不足取。从政府举债筹资看，虽然目前国家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算太高，还有一定的举债空间，但是靠发行国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期限内募集到如此巨额的资金。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解决国有经济结构不良的问题应当首先从调整存量结构上做文章，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在国家财力受限、大规模注资难以办到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保持国有经济原有的行业领域和企业数量，那么我们就很难以强有力的措施扭转国有经济的被动状况，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也难以制止。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们的回旋余地将会越来越小，必须早做决断。

事实上，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邓小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三个

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出发，国有资本完全没有必要进入那么多的行业，也没有必要搞那么多无关大局的企业。国有经济应当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而且在当前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来办的事业。

所谓战略性改组，就是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在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的前提下，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集中力量加强国家必保的行业和企业，使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收缩战线，加强重点，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通过国民经济中资本的流动和重组，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逐步解决国有经济布局过散、战线过长的状况，加强国家必保的领域。也就是说，要使国有资产从分散的中小企业向大型和特大型的企业集团，从低效的劣势企业向高效的优势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战略性领域集中。总之，通过适当减少国有经济介入的行业和企业，达到集中力量、保障重点、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收缩仅仅是国有资本分布领域的调整，而不是国有资本数量的减少。相反，通过国有资本从较低效益领域向较高效益领域的流动，国有资产的数量不仅不会减少，而且可以更好地实现保值增值。

（二）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推动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国有企业的现状是政企不分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不明确，国有企业所有者功能缺失，由此影响到国有企业内部迟迟不能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经营机制也很难得到根本的转变。通过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要在除特殊行业外的多数国有企业中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一是要将国有独资企业变成国有多元控股和国家参股企业，大量引入非国有的其他股东，包括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要将大量通过银行中介机构形成的居民对国有企业的债权转化为居民直接持有或通过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间接持有的股权。二是要在现属国有独资的企业中，变单一国有股东为多元国有法人股东。在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下，将有可能克服企业资产“所有者缺位”的弊端，有利于在国有企业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国有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富有活力的微观主体。

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基本原则，是先排出国家需要加以掌握的行业优先顺序，再按照这种优先顺序首先考虑排在前列的行业的需要。优先顺序的确定要以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职能为准绳，兼顾国有经济的现有基础，然后根据国家财力的可能性，安排国有经济的活动范围。根据当前情况，我们考虑，这种优先顺序大体上可以作如下的安排。

（一）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包括军事工业、造币工业、航天工业等。

（二）大型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具有较大外部性（即社会经济效益）的建设项目，包括大江大河治理、重点防护林工程、重点公益事业等社会效益大、受益面广、而非国有企业目前尚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的建设项目。

（三）大型不可再生资源，如油田、大型煤矿等的开发项目。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目前非国有资本没有力量承担主要投资者的职能，又不宜于让外资控制，因

而国家资本可能需要在这些行业居于主导地位。

（四）对国家长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高新技术的开发，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等，国家应当给予这类研究、开发以财政支持，并通过投资引导和行业政策等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

当然，以上的战略产业安排只是指出国家投资的大体方向和范围，并不完全排斥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国家可以根据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和它们各自的组织特点，酌情规划非国有资本的参与程度，国家则以全资国有、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以及政策扶持等方式保证战略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对国有经济的现有范围作出调整以后，国家原则上不再对非战略性领域进行新的投资。这些领域中现有国家持股的企业是否要进行股权关系的变动和经营方向的调整，则要在市场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机构和企业的直接持股单位自行决定。

还需注意到，战略产业的优先顺序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的变动，国家战略产业的重点和国有经济的范围也将随之变化。此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不同，它们所属的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也应当有所不同。我们考虑，比较合适的分工可能是：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国防工业等事关国家安全的行业、大型基础设施等；而地方政府则主要从事地区性公益项目，如城乡道路、供水、供气、供热等。

第四节　推进改组的基本方法和配套措施

对于国有经济如何进行改组，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思路是通过计划方式完成结构调整，即由各级政府制定计划，确定哪个领域哪个企业应该加强，哪些企业应该合并，然后用国家投资或行政调拨的方式加以执行。几十年的经验反复证明，用这种办法进行调整，不仅不能达到优化结构的目的，还有可能强化行政控制，不利于经济改革的总体进程。前些时有的地方在当地政府主持下进行“拉郎配”式的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结果不但没有改善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益，反而把原有的好企业拖垮了。这种失败的教训，我们应当汲取。

另一种是依托经过初步改革、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股权转让或收购兼并等活动，实现国有经济的改组。我们高兴地看到，目前已经涌现出了一批通过这种改组取得了好成绩的事例，例如一些国内绩优企业在海内外证券市场上募股上市，然后将募集到的资金投向国内企业，推动了这些企业的改革；深圳的康佳集团、上海的华源集团在国内进行的成功购并活动等等。它们的经验，是很值得深入研究，存利去弊，有领导地加以推广的。

根据上述经验和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我们建议，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最好依托现在已有的或今后陆续建立的优势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依靠市场机

制的力量，通过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活动来实现，以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带动行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改善。

这类金融运作的具体形式包括：

1. 扩股融资。即选择经营绩效较好的企业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募股融资，吸收非国有投资主体参股，促进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增强企业的实力。这种方式也可用于解决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不足问题。

2. 售股变现。不论在国家的层次上还是在国有控股公司的层次上，都可以采用这种办法扩大非国有资本的参与和替换出可供国家机动支配的资金，用于急需的方面。

3. 收购兼并。国有或非国有的优势企业对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进行收购兼并，并在新的控股企业的主持下对企业进行重整，能化解劣势企业现有困难，提高国民经济的资源利用效率。

4. 债务重组。对过度负债的企业，应进行股权—债权的置换，或者将银行债权以拍卖方式出售给合格的买主，以便强化业主（持有控制权的股东）对企业经营人员的监督，改善企业治理结构。

5. 破产清算。对生产设备严重老化、基本失去生命力的国有企业，严格依法实行破产清算，促使其存量资产流向优势企业。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结合运用以上这些手段，可望在今后的几年中逐步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正如已出现的成功事例告诉我们的，通过这种改组将形成一种既能在战略部门中发挥国有经济的优势，又能使多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各显其能的生龙活虎的局面。

在肯定上述方针的前提下，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现行体制中存在的诸多严重阻碍资本市场正常运作的因素，使它能够真正承担起国有经济重组枢纽的职能。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确，地方、部门利益的分割和保护，资本市场发育不良和缺乏规则，融资渠道不畅通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企业的融资和购并活动将会遇到很大的障碍，甚至会走歪方向。因此，在依托市场力量实现国有资产优化重组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配套改革，消除这样那样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实现制度创新。既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国有经济的重组，要依托独立企业的自主活动来进行。作为改组的初始条件，就是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中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产权能够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离，即实现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离。为此，必须以专门的代表行使国家所有权的机构代替政企不分的行政机构。从这几年的实践看，国有资产流动和重组的最大困难来自条块的分割，而条块分割的根本原因是政企不分。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不可能真正执行所有者的职能，却握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要使国有资产真正流动起来，必须首先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现在，一些行业的主管机关为保持自己

的权力，纷纷要求具有国有控股公司的权能。这种建立全行业垄断公司并且多少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它的建立将会固化条块分割的格局，不利于国有资产的流动和优化重组，显然不宜加以提倡。此外，现行财税、金融体制中不利于资金跨行业、跨地区流动的规定，如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上缴、贷款额度按地区切块等做法，也应及早加以改变。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加快银行体制改革，包括多组建一些股份制银行，对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和公司制改造，逐步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以及在加快上述改革的基础上，参照国际经验，逐步放宽对银行直接投资和参与企业管理的限制。

2. 发展机构投资组织。目前居民投资的积极性很高，但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大量的散户直接投资和分散持股，既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也不利于对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可供选择的途径，一是对现有的信托投资公司进行改造，使其业务集中于投资中介业务；二是组建多种形式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商业性的养老金基金、共同基金、捐赠基金会；三是相机引进外资机构。

3. 发展投资银行，为资本所有者投资和为企业购并与融资活动提供规范的咨询策划服务业务。途径同前：一是改造；二是新建；三是引进。

4. 按照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规范证券市场。尽快将现行的上市规模控制和额度审批制改为资格审查制；尽快实现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完善证券市场管理规则，规范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和企业产权市插的监管必须切实加强；严厉打击公款炒股、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活动；等等。

（三）清理企业的不良债务和隐性负债。目前国有企业债台高筑，这不仅是制约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的重要障碍，也是影响国有资产流动和重组的最主要因素，必须妥善地加以处理。对于国有企业欠银行的不良债务，可以由财政与银行共同研究制定办法，实施企业债务转换和重组。对于企业转轨过程中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问题，也必须妥善地加以解决。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不仅关系到国有经济本身的发展，也涉及到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改善和稳定发展。经过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将呈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而又不宜由非国有企业控制或民间无力兴办的战略性产业外，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将不再充当主力经营者的角色，而是以市场竞争中平等的一员的身份参与竞争，根据营利性的考虑进入和退出；即使在前一领域中，绝大部分国有独资、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企业也和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的企业一样，在民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商品生产者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

第六章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一节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性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一）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作为企业的出资者是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拥有出资者所有权，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企业法人财产权，从而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进而在企业中形成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

（二）企业权责明确。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三）出资者权责明确。出资者按照向企业的投资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其向企业的投资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

（四）政企分开。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并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五）管理科学。企业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性

企业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环节，它必须和整个经济体制相适应。改革前，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决定了企业只能采用缺乏自主权的传统国有企业制度。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放权让利政策，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这种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以政策调整为特征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得到一定转换，企业活力有所增强。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企业经营机制并未根本转变。其主要表现是：政企不分，企业负盈不负亏，企业约束机制不健全，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企业的债务、冗员、社会负担沉重等等。这些问题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整体经济效益不佳，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样才能使国有企业真正作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市场主体，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对市场作出灵敏的反应，根据市场信号及时调整企业生产经营方向和规模，从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与形式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

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内容，包括四项基本制度：

（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出资人制度。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其出资者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国有资产出资人以其向企业的全部投资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包括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权、经营管理者选择权。除此之外，国有资产出资人不能干预企业经常性的生产经营活动，确保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国有资产出资者只以其向企业的全部投资承担企业的各种债务和损失。

国家作为出资者，对企业中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运营机构依法行使出资者权利，实施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对国有资产进行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相应地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的立法和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

（二）企业法人财产制度。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法人与企业经营权的有机结合。企业依法享有对企业财产的经营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经营收益权。企业对由出资者投资所形成的企业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支配，自主经营。

企业法人财产具有整体性、稳定性、连续性和效益性的特点。整体性是指企业法人财产不可分割，企业的出资者除国家独资企业外，还有其他的出资者，但不论企业的出资者有多少，企业的法人财产合为一体，由企业法人占有和使用，企业实行统一经营管理，出资者不能随意抽回投资。稳定性是指出资者即使将其向企业的投资转让给他人（如出卖股票而使股权变动），企业的财产并不因而发生变动，保持了企业财产的相对稳

定。延续性是指只要企业存在，企业法人就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权，不会因投资者的变动而影响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行使。效益性是指企业法人财产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的财产所有者不必亲自经营自己的财产，而是委托给有经验、会管理、善经营的专职经营者，即企业法人代为经营，从而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三）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出资者来说，出资者仅以其向企业的投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如果企业在经营中发生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甚至破产时，出资者仅以其投资额承担有限清偿责任，不用以出资者的其他财产赔偿，从而减少了出资者的投资风险，有利于出资者自我保护。二是对企业来说，企业以其经营的全部法人财产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当企业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甚至破产时，只以企业现有的全部法人财产为限进行清债和赔偿，不涉及企业以外的财产。

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并使企业经营者独立自主地从事生产经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四）企业组织管理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具有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之间的责任与权利关系，三者之间通过企业的权力机构、经营管理机构、监督机构，形成各司其职、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三种机构在实行公司企业形式时，相应建立股东会、董事会（以及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和监事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所聘任的经理负责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它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这种企业组织管理制度，有利于从企业内部建立起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现代企业制度应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科学管理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企业的科学管理制度包括基础性管理制度，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定额管理以及财务管理、劳动用工管理、分配管理、计划管理、物资管理等等；市场经营管理制度，如营销管理、信息管理、市场预测管理、合同管理、广告管理等等；资产运营管理，如存量资产管理、资金管理、商标管理、专利管理等等。

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包括政治民主、生产技术民主和经济民主三方面的管理制度。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民主管理作用，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要组织职工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宜。

现代企业制度要实行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特别是要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保证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企业的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与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

我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多种多样。有些国有企业，可以搞公司制，而公司制又有多种形式。可以是单一投资主体的国有独资公司，也可以是混合所有的有限

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可以是多个国有投资主体共同组成，也可以是国有投资为主与非国有投资主体以及个人投资共同组成的国有控股公司。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我国的公司企业主要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是指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所设立的企业法人组织。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特征是：公司注册资金的最低限额为10万元~50万元（不同行业的最低限额不同）；公司的全部资产不分为等额股份；公司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不发行股票；公司股份的转让有严格限制；股东人数有一定限额；股东按其出资比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五个以上股东为发起人，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所设立的企业法人组织。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的公司。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向社会公开募集而设立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特征是：公司注册资金最低限额为2000万元；公司的全部资产分为等额股份；公司向股东发行股票，少数公司经过审定批准股票可以上市交易和转让；股东人数不得少于规定的发起人数，但无上限；每一股有一表决权，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国有股权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按不同产业和股权分散程度而有所区别。一般竞争性行业和基础产业中的公司，国家要控股，并吸收非国有资金入股，以扩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影响范围；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和军工企业由国家独资经营；全国性行业总公司宜改组为控股公司；同时应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建立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产权联结为主要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发挥其促进结构调整，提高规模效益，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

第三节　我国传统企业的公司化改造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企业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必须对传统的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化改造。具体步骤和措施如下。

一、建立能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制度

企业法人制度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按照民法规定，凡是按照法定程序组成的，有固定的组织机构；拥有独立的财产；能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社会、经济组织，即称为法人。具有法人特征的企业称为法人企业。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

还不是真正的法人企业，它们实质上是由国家负无限责任的一种企业形态。

二、采用负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

股份公司是典型的法人企业。要使我国的国有企业变成真正的法人，必须大力发展股份公司。

股份制企业一般可以分成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我国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比较合适。我国的《公司法》肯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两种公司形式。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规定少数国有企业在进行公司化改造时，可以成立国有独资公司，但是这种公司也必须是负有限责任的。而且，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应该严格控制，只有少数经营管理得好的大型企业才能采用这种形式，多数企业只能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和不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

三、采用纵向授权的企业领导制度

我国传统的企业领导制度有两大主要缺陷：一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的代表没有进人到企业之内，企业内部没有行使所有权的组织机构。企业的主要领导人都要由党和国家有关机构任命，由他们来管理企业。二是我国企业采用的是一种横向分权的领导制度。这种企业领导制度的特征是：国家把企业的统一经营管理权分别让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行使，形成了以厂长（经理）为首的生产经营指挥系统，以党委书记为首的政治工作系统和以工会主席为首的民主管理系统。近些年来，虽然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从法律上确定了厂长（经理）为法人代表，明确了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中心地位，但是，由于党委是企业的政治中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也起重大作用，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也有审议权，对与职工利益直接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决定权。因此，横向分权的总格局并没有真正改变。这种企业领导制度造成管理权限分散、职责不清、多头领导、工作效率低等弊病。

现代企业的领导制度避免了上述缺点，更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高效率。首先，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它必须具有财产管理权、经济决策权、生产经营的指挥权和监督权。企业的领导制度必须全面行使这些权力。比如，在股份制企业的领导制度中（又称法人治理结构），财产管理权是由股东大会行使的，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营决策权是由董事会行使的，董事会是企业的决策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指挥权是由经理、副经理等专业人员行使的，他们组成的机构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挥系统；监督权是由监事会行使的，他们是企业经营管理的监督机构。其次，这种企业的领导制度不是实行的横向分权制度，而实行的是纵向授权制度。即股东大会给董事会和监事会授权，董事会给经理授权。再次，企业民主管理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过去，由于企业只是单纯的生产单位，本身的权限小，这就限制了

民主管理的范围，使企业的民主管理主要在解决生产技术性问题中实行。过去我国常说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总结。扩大企业自主权后，职工民主管理的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是，由于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职工民主管理的范围仍然比较小。在现代企业的领导制度中，由于企业成为了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就为扩大生产管理的权限和范围创造了条件。比如，在股份制企业中，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改造股东的权责；职工可以根据国家立法或企业的章程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董事会和监事会，行使经营决策权和监督权。这样，在公司的财产管理机构、经营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都可以有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职工参加，工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及企业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建议，根据国家的法律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做既可以克服横向分权带来的各种弊病，提高管理效率，又可以实现全面的民主管理。

四、建立规范化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

我国传统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是按照前苏联的模式，为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设计的，它存在许多缺陷，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其主要缺陷是：(1) 传统的财务会计制度是按照部门、行业和所有制来制定的，造成不同部门、行业和所有制企业的会计制度不广致，会计准则、核算办法不统一，使会计检查、会计监督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利于互相借鉴、交流，也不适应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2) 传统的财务会计制度主要是为国家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服务，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3) 传统的会计制度与市场经济国家的会计制度不接轨。传统的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存在很大的差距，没有吸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和创造的较先进的财务会计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必须对传统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化的财务套计制度。

现代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和我国传统的企业财务制度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1) 现代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比较规范化，它对各种企业都实用，而且遵守国际惯例。(2) 现代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要求企业不仅可以为国家提供财务会计信息，而且可以为所有者；有投资意愿的法人组织和居民等提供必要的财务会计信息。(3) 现代财务会计能够全面反映企业长期的状况，特别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在传统的企业财务制度中只有资金平衡表，而没有设立资产负债表。在任何情况下，资金的来源和运用都是平衡的，因此，它既不能反映出所有者的权益，又不能反映企业的负债情况；而在现代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中，设立了资产负债表，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4) 现代财务会计会计科目的设置、成本计算方法、会计报表体系都比较科学，既可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又方便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

我国从 1993 年 7 月 1 日起已经开始实行新的财务会计制度，这种新的财务会计制度已经吸收了现代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一些主要优点，在执行中应该进一步完善。

五、建立利益均沾的企业分配制度

在传统的企业分配制度中，虽然强调要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企业自身没有独立的利益，企业家的利益不能得到体现，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又和国家利益相混淆，因此，实际上只存在国家和企业职工这两种利益主体，只存在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这两种利益关系。国家强调多收，职工强调多得。企业内部无法形成相互制约的平衡约束关系，企业也不能自主发展。这种分配制度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要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对传统的企业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化的企业分配制度。

这种分配制度建立的原则是：(1) 要使国家的利益得到很好体现。(2) 要使企业的所有者的权益能得到很好体现。(3) 要使企业的职工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4) 要把企业家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5) 企业自身的利益要得到很好体现。

六、建立双向选择的企业劳动人事制度

与上述改革相配套，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下面将谈到）。

第四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

一、试点的目的及内容

大中型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制企业还存在不少困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今、明两年还不可能全面展开，主要是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已经选择了100家试点企业，这些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上将先行一步。通过试点，主要达到以下目的：

1. 寻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2. 探索政企职责分开的路子，使企业彻底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自主经营。

3. 理顺产权关系，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体系，建立企业法人财产权。使企业真正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现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统一，切实做到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4. 完善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形成权责分明、团结合作、互相制约的机制。

试点的内容包括：

（一）完善企业的法人制度，使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核实企业法人财产占用量，核定资本金，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及其他出资者，按照持股比例依法享有股东权利，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出资者不直接参与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不能直接支配法人财产。出资者不能抽资，企业不能退股，企业产权可以依法转让。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出资者承担资产（资本）保值增值的责任。企业作为独立的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不再套用行政级别。

（二）确定国有资产的经营机构。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可以作为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和国有资产的经营组织，依法对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实施股权管理。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包括作为特殊法人的国有控股公司和国家授权的特定经营部门。国有控股公司主要采取国家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的形式。

（三）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确定企业改组成公司的具体组织形式。生产某些特殊产品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企业可以改组成国有独资公司；大部分企业应该组成有限责任公司；具备条件的可以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只能是少数；现有的全国性行业总公司可以逐步改组成国家控股公司，但是不能搞成一家公司的全行业垄断；企业集团按照母子公司的体制进行改组。

（四）适应公司制度的要求，建立规范化的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国有独资公司应该建立董事会，其成员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任命。其他多投资主体的公司都应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通过法定程序选举产生。

（五）改革企业劳动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取消企业管理人员的国家干部身份，打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身份界限，建立企业与职工双向选择的用人制度。经理、副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与董事会签订聘用合同，其他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和员工均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企业经营活动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严重困难时，可以裁员，但要按照合同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国家对企业工资总量实行间接控制。职工的收入由企业自主决定；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包括年薪、奖金等由董事会决定；董事长、董事、监事等的报酬由股东会决定；兼职董事和监事实行津贴制。

（六）健全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全面实行《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有关规定，使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符合公司制度的要求和与国际规则接轨。

（七）完善工会工作和加强职工的民主管理。国有独资公司、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可以由职代会或者工会代表职工实行民主管理。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就工资、工时等劳动条件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建立

协调和稳定企业劳动关系的有效机制。公司研究制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制定重要规章制度时，应听取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时，应该事先听取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和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

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及股份制改造进行情况

1997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对全国2343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表明，截止到1996年底，全部试点企业生产经营总量稳定增长，经济效益好于全国国有企业平均水平。其中，国家确定的百户试点企业效益好于全国试点企业平均水平。经过近三年的试点，绝大多数企业改制工作比较顺利，完成了公司制改造，占七成以上的企业已进行公司注册登记；企业产权关系基本明确，建立了资本金制度和国有出资人制度；大多数公司制企业初步确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及企业法人财产权；试点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限也基本明确，多数企业的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经政府提名后由董事会聘任，内部人事任免不必经政府部门批准；绝大多数试点企业的总经理能够行使《公司法》所赋予的经营管理权；试点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也得到加强。

1997年成为国有资产重组年。“抓大放小”和股份制改造是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主要形式，1000家国家重点支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其利税总额约占全国的85%，其中半数以上的企业明确了主办银行。全国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已有84.4%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已初步建立。1997年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扩大到111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以国有企业为主改造或新设的股份有限公司约9200家，股本总额约6000亿元，其中国家股占43%，法人股占25.1%。在乡镇企业中，股份合作制企业已占50%。到1997年8月底，全国上市公司达708家（其中1997年新上市200家），上市股票市价总值达16400亿元（其中1997年新股额度500亿元），市价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1997年国家安排了300亿元银行呆坏账冲销资金，支持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的企业破产，1月—9月在试点城市中已有389户企业破产终结，77万人进入再就业中心，632户企业被兼并，分流人员116万人。

第五节 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

一、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

（一）企业亏损居高不下。1997年上半年，盈利企业的盈利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5

倍，但是企业的亏损额也相应扩大，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2%，据对全国37万家工业企业的统计，1月—4月亏损企业亏损额为555亿元，在上年同期效益滑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长8.1%。其中，国有企业亏损额高达342亿元，占全部亏损额的61.7%。1月—5月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47%，亏损企业亏损额达40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到8月末，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6.8%，较上午同期增加2.9%，而亏损额为57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

亏损企业以地方企业为主，中央企业、大中型企业的亏损减少。从行业来看，煤炭、纺织、森林、军工等部门大约占全部国有企业亏损的八成左右，主要集中在一些老工业基地。

据调查分析，目前国有企业状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盈利大户，约占40%多。这部分企业目前投资回报率约为10%～15%；二是生产经营本来不错的企业，由于几年前投资决策失误，如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类企业约占10%；三是占20%的传统产业，这类企业长期以来忽视市场开拓和产品更新，产品积压，基本费用与产出达不到盈亏平衡点；四是早该退出市场，不能再靠国家资金保下去的企业，约占20%多。

（二）下岗职工增加，部分职工生活困难。1997年二季度末，全国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停、减发工资的困难职工约有1000万人，占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总数的10%左右，比1996年年底增加近100万人，其中约有400万人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再就业，约有600万人还处于无业状态。据统计，基本生活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特困职工已有200多万人。受其影响的主要是停产半停产企业的下岗职工。职工下岗及其生活困难的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既是旧体制下企业深层矛盾的暴露，也是企业走向市场后追求高效率、低成本的结果。

部分职工生活困难与下岗职工增多，已经造成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已就职工解困与再就业问题向有关职能部门及各地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有关的工作组织、资金筹集等正在积极进行。在多方努力下，上半年各有关地方和部门为1000多万困难职工发放了基本生活费，帮助了228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局部缓解。

二、存在问题的成因

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之所以出现经济效益滑坡以及职工生活困难等现象，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我国投资政策的周期性、产业结构的老化、体制改革的滞后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具有很大影响，而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落后以及社会负担过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一）投资政策问题。重复建设多，造成我国汽车、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等产品的生产重叠度高达20多个地区。生产分工布局无效益。投资项目的小型化、小项目的投资竟占全部投资额的五成以上。其次是科技政策落实不到位。据估计，目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不足20%，大多数还是处于六七十年代的技术水平，有的甚至是四

五十年代的水平。

（二）改革滞后。改革19年来的现实状况告诉我们：诸如承包制、股份制、企业兼并等种种改革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的甚至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由于环境和各种条件的变化，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尚未获得根本性的突破。撇开试点情况，我们发现，就所有制与财产关系而言，企业领导人对公有财产仍然只能负盈而不能负亏；政府各部门均可以对财产的使用发号施令，企业内部的经营者或生产者可以借种种名目侵害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全民所有的资产在产权转让上受到很大限制，等等。就控制机制而言，政府的主管部门只下放了部分经营权，还有一些重要的权力如投资权等却不在企业手里。即便是有限的经营权，如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定价、劳动工资、资金等，企业也无法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或者半依半赖，或者讨价还价。在试行股份制的企业里，董事会往往徒有虚名，如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董事会不能决定，而要照规定的比例使用。连总经理的任命也需上报政府部门批准。就组织结构而言，多数企业就像一个小社会、小政府，有各种社会职能部门，从事各种非生产性活动。另外，企业多设有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口的组织机构，以应付上级各种文件、会议和种种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非生产性开支增加，给提高经济效益带来各种负担。

（三）管理落后。1997年企业领导班子的考核结果表明，目前有些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属于六大问题班子。一是观念陈旧，至今摆脱不了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没有能力搞好企业的“软”班子；二是思想作风不正，严重以权谋私搞腐败，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烂”班子；三是面对企业的困难，精神不振，畏缩不前，不发动和依靠职工群众向企业内部使劲，一味“等靠要”的“懒”班子；四是内部不团结，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影响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散”班子；五是个人独断专行，造成重大决策失误，难以发挥班子整体功能的“家长式”班子；六是年老体弱、缺乏活力、知识老化，不懂得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经营管理，影响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僵化”班子。

（四）负担过重。据统计，目前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服务福利设施占企业总资产的15%～20%。办社会事业费用支出约占全部企业管理费用支出的50%左右。目前，国有企业开办的学校有1.8万多所，在校学生有610万多人；疗养院1.9万个；医院22.5万个。企业因办这些社会事业要多支出600亿元。另据有关部门的初步估算，我国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约为2400多万人，占全部职工人数的25%～30%。如果按人均支付费用4000元计算，国有企业每年要为这些富余人员支付960亿元。离退休人员也是国有老企业的一大负担。1978年到1997年，我国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人数由原来的3%增加到30%多。现有的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已高达2000万人～3000万人，每年企业要支付退休金1200多亿元。

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企业家们感到头疼的问题。企业家们普遍反映，离退休职工的生活费支出、医疗支出以及冗员过多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障碍，只有尽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才能真正在市场上与非国有企业展开公平的竞争。减员增效已经是它们的一致呼声。

三、解决问题的措施

据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1997年—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将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把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抓好大的，放活小的，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为国有企业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1998年要在总结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措施意见。在时间上努力实现到本世纪末在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在制度创新上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进行规范，在整体同步推进配套改革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在重点难点问题上力争有更大的突破。

（二）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首先要在继续扩大并抓好国家重点企业的同时，扩大国家企业集团试点，赋予试点企业集团更大的自主权，努力实现国有经济向国家必须控制的重点产业集中、向优势大企业集中，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有经济规模小、力量分散的布局状况。在1000家重点企业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以产权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强强合并，加快组建大企业大集团，扩大这些大企业的投融资自主权和运营国有资本权进程。根据《"九五"国家重点技术开发指南》的精神，国家将扶持180家企业进行技术开发，重点扶持宝钢等6家企业。国家准备每年向宝钢、海尔、北大方正、华北制药、长虹及江南造船厂6家企业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工业500强。其次要积极推进和规范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改革的进程。在股票上市、发行可转换债券、吸纳机构投资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在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力争到本世纪末培育5家～10家具有较强自我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

（三）采取更加灵活和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国家将鼓励各地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把它们直接推向市场。

（四）扩大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调整改组工作，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推进再就业，促进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

（五）多渠道增资减债，探索从根本上解除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途径和办法。根据地方财力状况，按一定比例将企业实际上缴的所得税、属地方部分的增值税以及城建税等返还企业，作为国家资本金投入，此其一；将中央或地方给企业的财政性借款和"拨改贷"本息余额、企业历年欠缴财政的"两金"、集中的折旧及承包利润等转为国家资本金，此其二；将企业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或税后利润，在一定时限或企业负债率降至一定比例之前，留在试点企业，用于增加国家资本金，此其三；允许企业提高折旧率、加速折旧，增加企业自有生产经营资金，此其四；给予一定的A股、B股上市额度，此其

五。与此同时，试点企业还可以通过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二级单位改组，设立多元投资主体的子公司来降低企业的负债率。

（六）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实行了公司制改造的企业，要逐步构建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组成的权责分明、相互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成员均须严格按《公司法》规定程序产生、聘任和解聘。其他类型的国有企业，将继续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管理人员聘任制，逐步引入竞争机制，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试行年薪制。不断深化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加强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对领导班子的民主评议和监督，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企业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在开展考核建设工作过程中，将积极研究和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领导人员选拔工作新机制。按照管人和管事既互相结合又合理制约的精神，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办法和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一套优胜劣汰、奖惩分明、监督有力的用人机制，营造一种有利于优秀企业经营管理者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条件。

（七）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制的有效途径，搞好国家控股公司试点。

（八）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统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抓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城市试点。

第七章　放开国有小型企业

第一节　目前国有小型企业的一般情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小型企业的形势比大中型企业更加严峻。.

首先，国有小企业负债率很高，亏损挂账严重，偿债能力很低。据1994年清产核资结果，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5.1%，其中小型企业资产负债率为82.5%（特大型企业60.6%，大型和中型分别为74.9%和80.3%），小型企业资产负债率比平均水平高7.4个百分点，比特大型企业高出22个百分点，比大型和中型企业，分别高出7.6和2.2个百分点。

从所有者权益看，小型企业为1064.5亿元，特大型企业为2929.5亿元，大型3937.8亿元，中型2389.2亿元，占资产总额比率分别为17.4%、39.4%、25.1%、19.7%。如果考虑损失挂账因素，则小型企业从总体上看已经资不抵债。

从偿债能力看，国有小型企业的债务资本比率（债务与净资产的比）：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比率都达不到国际标准，并明显低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据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有小型工业企业的债务资本比为2.49，比国际标准高1.49，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1.92）高0.57，比国有大型工业企业（1.65）高0.84。企业的流动比率，小型工业为0.78，比国际标准值低1.13，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值低0.09，比国有大型企业（1.03）低0.16。

其次，国有小企业盈利能力差。据全国清产核资的数据，国有小型企业总的销售利润率为－0.78%，比国有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低3.43个百分点，比国有大企业低5.85个百分点；国有小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为－1.6%，比国有企业的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低5.51个百分点，比国有大企业低7.6个百分点；国有小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为1.9%，比国有企业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低1.4个百分点，比国有大企业低2个百分点。

在资金利税率方面，独立核算的国有小企业为3.4%，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4.6个百分点（不及其一半），比国有大企业低6.6个百分点，比国有中型企业低2.8个百分点。

在产值利税率方面，独立核算的国有小企业为4.5%，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6.6个百分点，仅及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一半，比国有大企业低近10个百分

点，比国有中型工业企业低近3个百分点，比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近5个百分点。

第三，国有小企业亏损严重。据全国清产核产结果，在全部亏损企业中，国有小型亏损企业占全部亏损企业总数的近60%。国有小企业亏损额占其资产总额的比重为2.2%，比国有大企业亏损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高出1.3个百分点；国有小企业亏损额占其净资产比重为6.7%，比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额占其净资产比重高出4.5个百分点。

最后，国有小企业人员负担重，工资成本高。据清产核资结果，国有小企业职工人数为2346.9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30.3%。从百元资产所负担的工资看，国有小企业为6.9元，比国有企业平均水平（5元）高1.9元，比大型企业（3.5元）高3.4元，即高出近1倍。

以上情况表明，国有小企业处境十分艰难，其中大部分为亏损企业，其资产多为劣质资产，创利能力很差。

国有小型企业亏损的原因，主要是大型企业由于规模效益，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国家资金政策的优惠，往往还能保持某种优势，或者具有某种承受力。非国有经济的竞争，最先对中小企业产生竞争压力，而在越来越紧的银行贷款的约束下（不少企业负债太多），一些国有中小企业自然难以应付，而必然陷于亏损的泥潭之中。因此，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日益成为地方财政的包袱，成为地方政府要不断进行补贴的沉重负担。如河南省漯河市对市直属预算内工业企业逐家算账，截至1996年6月底，核定资产总额12.50亿元，负债总额10.12亿元，净资产只有2.38亿元，比1995年底减值6941万元，减幅22.6%。1997年对市第一批改制企业测算，大部分企业已没有多少净资产了，不少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如漯河化工厂，1991年固定资产1579万元，利税160万元。但后来衰败下来，到1996年已有600多名退休工人和1300多万元的债务，沉重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盈利大户变成亏损大户。

第二节　国有小型企业改革形式

以上是国有小型企业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国有小型企业的出路何在？只有进行改革，即对国有小型企业采取“放小”的政策，即放开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放活小企业有多种方式，如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和出售等。主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灵活采用某种方式和形式。

放开国有小型企业比较成功的形式是股份合作制，现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进行一些分析。

一、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典型形态乃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但是对于

一些具备条件的国有小企业也可以试用。这种形式对于国有小企业，在股权设置上，有设国家股和不设国家股两种。设国有股的是将小企业经营性的净资产折为国家股，同时吸收社会法人、自然人和企业内部职工入股。（也有将小企业净资产的一部分折为国家股的。）不保留国家股的，是将改制企业的全部净资产出让给社会。

关于什么是股份制，股份制的特点以及股份制对国有企业改造的作用等，前面都已说过，此处从略。

二、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放开、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的重要形式。

1997年下半年国家体改委发布了《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的指导意见》，这是引导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文件。据国家体改委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国有小企业改制的各种形式中，股份合作制约占35%，是所占比重最高的一种形式。在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已占乡镇企业的50%以上。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省份，这一比例更高。山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全部改制企业中占50%以上，浙江省的温州、台州两地股份合作企业已初具规模，仅玉环县就有股份合作制企业4000多家，全县渔民人均纯收入的40.2%来源于股份合作企业的工资收入，股份合作企业所缴税金占全县地方财政收入的89%。河北省目前10780户国有小企业中有1082户实行了股份合作制，3388户集体小企业中有349户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就全国来说，目前股份合作企业已达400多万家，仅乡村股份合作企业就超过300万家。

目前股份合作制已经出现多种形式，如下是一些常见模式。

（一）诸城模式。诸城在山东省，诸城的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采取股份合作制形式。诸城股份合作制的股权结构，表现为企业职工全员持股，股权单一，持股平均化程度较高，实际上是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联合起来共同掌握企业的所有权，是通过购买企业的净资本产权的方式来取得这种对企业产权的控制权的。

如诸城四达公司的改制情况：资产评估后，全厂在岗职工196名，以每股1000元，出资1800股购买了原企业产权——180万元的生产经营性净资产，其全额承担原企业债务。80%的股份实行配售，20%股份自愿认购。出售结果，180万元股份全部被承认，认股率达100%，人均持股近万元。最高持股额是平均持股额的8倍。由于最高持股额与最低持股额的股东人数很少，大部分职工持股额相等或相近，所以股权比较平均化。

诸城模式是一种脱离了政府控制的企业主权模式。它具有一个能够与市场经济发展在较高程度上一致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它会随市场经济的成熟和企业发展的成熟而日益合理化。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持股额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二）海城模式。海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经营者持大股，它是以经营者掌握企业股权中的控股能力为主，其他职工控股为辅的股权结构。海城改制后，新企业的所有权控制者主要仍是原先的经营者或领导者，再加上具有一定购买力的管理人员、职工以及合伙经营者。它与诸城模式较为平均化的持股结构的不同就在于突出了经营者控股的作

用，因而这种机制较大程度上强化了经营者激励性和风险性的作用。

海城模式主要是建立在“能人经济”的基础上，这是与海城长期自发的发展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基础分不开的。据海城人看来，一个活跃的能人就是一定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是一个核心。海城的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秘密就在于，有如此众多的能人在组织生产和市场。目前，经营活动的主体已经能人化了。通过企业转制，海城的市属公有企业、村镇集体企业迅速地转向了新体制，其特征之一是“企业资产人格化”。那些较早富起来的人积聚了购买企业的资本和经营企业的能力，那些原先在企业里担任厂长的人则积聚了经营企业的经验、市场信息和人力资源，这些人在 1995 年大规模展开的企业改制中捷足先登。

当然，海城公有企业的改制并非自发形成，而是在政府支持下形成的。不过，海城模式与私有经济自发形成的股份制的不同在于，它面临着较复杂的职工安置问题，职工身份转变的问题等等。诸城模式由于职工人人持股，故不存在很多的职工身份转变的问题；而海城则直接面临如何使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改变身份成为普通的非国有的民营企业的职工的问题。通过一次性付款买断了工龄，使其转变了原有身份。

（三）漯河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也是经营者持大股。漯河推行股份合作制形式比全国兴起此种形式，整整早了 5 年。但在初期职工对入股并不积极。到 1996 年上半年，市直属 20 家预算内工业企业有 18 家严重潜亏，资产负债率由 1991 年的 56.9%，逐年攀高至 1996 年的 81%。

股份合作制对规模很小的企业确有较强的适用性，但对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企业全体员工人人有份，且悬殊不大，实际上是新的平均主义。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没有责任。漯河的实践证明，股份合作制对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职工人人参股，新的平均主义使职工并未感到压力，也没有意识到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漯河冶金厂 1993 年搞股份合作制时，采取买一配二的办法，鼓励职工入股，但事实上不论企业盈亏，每年均按 15%计息分红，成了一种变相集资行为。

漯河曾经搞过股份合作制，但并未成功，于是它选择了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典型的漯河模式的特征。漯河的股份化由主要发起人与其合伙班子或合伙员工组织共同购买，但是发起人要承担 20%的股权，在其他股东均为厂内的管理人员和职工的情形下，也就是说，发起人承担企业的主要风险、责任和权利。漯河模式的特点是经营者与一般员工的持股比例需要保持某种较大的差异，与诸城模式较为平均化的持股结构不同，也与海城模式的经营者占有 50%以上的控股权不同，漯河模式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漯河的经营者掌握 20%的股权，在其他股东较分散时，具有控股能力，但当其他股东联合起来时则要受到很大的制约。

（四）服从于按劳分配的股权结构。这种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权结构的特点是，根据职工工龄长短、岗位重要性和经营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来决定股权的分配。这种结构相对员工完全平均持股来说，激励效果可能会好些，因为它强调了职工之间的差异性，即技能、经验积累和岗位的差别性。企业经营班子的持股比例为 25%，其中法人代表的持

股比例不低于总股份的5%，最高与最低的持股差异大约为5倍。所以该企业的股权结构总体上看是比较平均化的。这种企业实际上是把一部分劳动工资分配的原则应用于股权的分配，使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结合起来，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更强化了劳动收益分配的效果，因为其股权结构大体上是服从于按劳分配原则的。

但是，按劳分配主要是工资薪金的分配，而股权红利分配则是按资分配。这两种不同的分配原则只能是依照生产要素的不同功能来决定。按劳分配中职工的收入是有保障的，是确定的收入，在生产中它是进入生产成本的，属于企业必须保证和满足的收益。然而，作为股权收益的红利则是不确定的，它是由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因此它要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股权收益的分配作为按劳分配的某种补充是可行的，然而让其完全服从于按劳分配的要求去进行分配，则是不合适的，因为两者的职能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中，每种生产要素都按其职能取得自己的要素报酬。企业家的报酬就是来自市场的不确定性收益，来自于其对市场潜在机会和潜在收益的敏感性，以及来自其组织不同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创新的能力。如果企业的剩余收益主要是按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那么企业家的激励来源就会丧失。一般劳动者的生产创新和市场创新的能力是很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其在股权结构中的相对比重也应该是有限的。所以，股权承担的责任和利益的对称性决定了股权结构及其配置效率。

（五）多元产权的股份化模式。多元产权股份化模式，在四川省对小型公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时，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较多。其具体做法是，先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然后保留部分国有资产（有的企业设置国有股），由国有资产管理者派出代表行使相应的职权，承担相应的责任，享受相应的利益。其余部分则有偿转让给职工或社会法人。

在四川省，这种改制方式一般被运用于县属企业中规模稍大、效益较好、对县财政有一定影响的企业。之所以要保留一部分国有资产，主要是因为政府想通过设置国有股参与这类企业的重大决策，更好地推动这类企业的发展和保证县财政收入。如犍为县于1993年9月将国有犍为水泥厂的40%经评估后的生产性净资产留作国有股，其余的60%经国资管理部门批准，折股转让给企业内部职工。并且，经职代会决议，将职工的全部股金组成“职工合股基金会”，作为法人股与国有股一起发起设立“金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原有企业的非生产性国有资产则经县政府同意，由县国资办委托金马公司专项管理。

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公司化改制，在一些地方并未取得成功，其原因主要是，国有股仍占统治地位，政府仍对企业有完全的控制权，政企不分现象仍然没有消除，企业因而没有活力。

第八章　中国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1999年3月15日《宪法修正案》中，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原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修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节　个体工商业的发展

一、个体工商业的性质和作用

个体工商业是个体劳动者从事的工业、手工业或商业。个体工商业是我国现阶段个体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个体经济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由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一方面，说明个体经济所有权比较完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和支配权；另一方面说明，他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

个体经济是一种私有经济，它与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经济不同，它是一种以生产资料所有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经济。

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原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的方针是，“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个体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劳动就业，促进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繁荣市场，方便人民生活，也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改革。

二、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个体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年—1957年。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指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持其发展。"1949年，城镇个体经营者有724万人，到1953年，达到898万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和统购统销后，个体工商业者的数量开始缩减，到1956年底城镇个体工商业者仅为16万人。1956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后，个体工商业又有了一定发展，到1957年底，城镇个体工商业达到104万人。

（二）1958年—1978年。1958年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个体经济的数量徘徊在100万人~200万人之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个体经济日益衰萎，从1966年的156万人减少到15万人，几乎灭绝。

（三）1978年以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开始修正"左"的错误，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经过近20年的努力，到1998年6月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2850.85万户，从业人员5441.85万人。个体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私营企业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98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投资者超过200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额7000亿元，聘用员工1000多万人，经营企业100多万家。实践证明，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是社会稳定的促进者，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生力军。

一、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定私营企业为雇工8人，是区别于个体工商户。政策规定个体工商户可以带一两名学徒，请三五个帮手，二者加起来不超过7个人。

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还规定了私营企业分为独资企业、合作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三种类型，明确了私营企业具有的主要权力等。

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经过了一个特殊道路。在新中国成立时，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私营企业就是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它是当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

成分的一种。《共同纲领》规定还允许它有一定的适当的发展。但是到1953年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被取消了。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私营经济才又得到存在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是：

（一）私营经济萌生、起步阶段（1986年以前）。

1. 萌生阶段（1982年以前）。早期的私营经济是在个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小工厂、小商贩等一概扣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三自一包"（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及小商小贩小工业者等都落实了政策，定为劳动者。这时在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就出现了雇工经营现象，出现了个人私营企业。有的地方也有联户企业。如福建省晋江县陈埭镇。1979年10月，该镇洋埭村一农民，以每股2000元，募集了14股，职工11人，借了一间房子，办起制作胸罩小工厂。1980年3月，19户农民集资18股（其中有两户1股），每股1000元。又向工人每人借300元，借了一位股东100多平方米的空屋作厂房，生产制作凉鞋。这样一年时间，该县办起联户集资企业500多家，投资总额1000多万元。

2. 起步阶段（1983年—1986年）。经过几年的积累与经营，私营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组织的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272个村的374322户调查，1984年参加新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占其总户数的3.2%，专业户占其总户数的3.5%，个体工商业占其总户数的4.4%。其中新经济联合体雇工经营的占其总数的51%，平均每个联合体雇工7.9人。1984年雇长工（每年雇工6个月以上）的农户，占调查总户数的0.55%，所雇长工人数占样本农户劳动力总数的1.84%；1986年雇长工的农户，占调查户总数的0.74%，所雇长工人数占样本农户劳动力总数的4.2%。雇工人数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两年增加了1倍以上。

另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资料，1986年同1983年比较，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业户、从业人数和注册资金额分别增长了1.05倍、1.47倍和5.51倍。

这段时期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原因：

（1）持续多年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给亿万农民强大的购买力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贯彻落实，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国内市场的扩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低技术工业在农村中的发展和普及，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政策陆续配套，政治环境宽松。国家政策允许私营企业发展，给私营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国家银行也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另外，不少地方把农田包干到户的办法，简单地推广到农村社队企业，很快就演变成包干提留的"一脚踢式"的私营企业。另外，小矿放开的资源开发方针，也促进了雇工经营小矿的发展。

（二）曲折发展阶段（1987年—1991年）。这一阶段，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登记工作。1987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

深入》文件中，首次肯定私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对它采取的基本政策。文件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一种补充形式。它的作用是：(1) 可实现资金、技术、劳动力的结合，并尽快形成社会生产力；(2) 对于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经营人才的成长，也起很好的作用。

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是："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逐步引导"，是引导私营企业自身健康发展。

同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在报告中，对私营经济的地位、性质和积极作用作了阐述。明确承认其合法存在。党对私营经济的基本政策是：鼓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关于私营经济的作用，报告中说：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关于私营经济的性质，报告认为，仍然"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宪法中，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我国私营经济真正进入合法发展的阶段。

根据宪法规定，1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从此私营企业发展和管理被纳入法制轨道。

不过，在私营经济起步阶段，由于正处于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市场体系不健全，而离开土地的发展对经营管理工商业缺乏应有的知识和经验，而指导思想上，急功近利，"重发展，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加之企业本身技术含量低、粗放型经营、缺乏约束机制，因而出现鱼龙混杂情况，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不断出现。

1988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这时私营企业又遇到资金不足、原材料紧张、"三角债"等问题。1981年的政治风波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讲私营经济的"弊"多了，讲"利"少了。在宣传上，还出现了"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私有化的社会基础"，"发展私营经济是指私有化"，"私营企业主是制造动乱的中产阶级"等等。有的地方还出现把私营企业主当作"革命对象"，打入"另册"。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这一阶段，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下降情况。1988年底，个体工商业户数和从业人数，分别为1452.7万户和2305万人。1989年同1988年比较，这两项数字分别下降了14.15%和15.8%；1990年—1991年，户数和从业人员虽有所回升，但1991年同1988年比较，个体工商业的户数和从业人员仍然分别减少35.9万户和47万人，分别下降2.47%和2.04%。

私营企业发展情况也类似个体工商业。1989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为9.06万户，投资者（私营企业主）21万人，雇佣工人142.6万人（户均雇工15.74人）。1990年6月底，私营企业户数下降为8.8万户，是年年底，回升到9.8万户，投资者22.4万人，雇工147.8万人（户均雇工15.08人），注册资本总额951552万元（户均注册资本9.7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3%、6.7%、3.7%和12.6%。1991年底，私营企业为10.8万户，投资者24.14万人，雇工159.8万人（户均雇工14.8人），注册资本金总额

1231689万元（户均注册资本 11.4 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9.9%、7.8%、8.1%和 29.4%。

（三）高速增长阶段（1992 年—1997 年）。同 1991 年相比，1992 年—1997 年 6 年中，共计增加私营企业 85.3 万户（平均每年增加 14.2 万户），增加从业人员 1165.4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194.2 万人），增加注册资本额 5016.9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 836.2 亿元）。如表 1 所示。1997 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为 96.1 万户，从业人员 1349.3 万人，注册资本金额达 5140.1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7.3%、15.2%、37.0%。

表 1　　全国私营企业发展速度

（1992 年—1997 年）

年份	私营企业户数（万户）		从业人数（万人）		注册资本总额（亿元）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1992	13.9	28.8	231.9	26.0	221.2	79.8
1993	23.8	71.2	372.6	60.7	680.5	207.6
1994	43.2	81.5	648.4	74.0	1447.8	112.8
1995	65.5	51.6	956.0	47.4	2622.0	81.1
1996	81.9	25.0	1171.1	22.5	3752.4	43.1
1997	96.1	17.3	1349.3	15.2	5140.1	37.0

资料来源见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43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私营经济在这段时期（1992 年—1997 年），发展迅速的原因如下。

1. 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加。1992 年—1996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77.1%，平均年增长 12.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 1544.3 元，提高到 4377.2 元，扣除物价因素平均实际增长 7.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 708.6 元提高到 1926 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5.7%。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由 9110.3 亿元增加到 38520.8 亿元，五年增加 28410.5 亿元。如果加上居民手持现金、国债、国库券、股票、企业内部股金、保险、投资基金、外币储蓄等，居民拥有金融资产将达 7 万亿元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也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2. 具有人身自由，相对剩余的劳动力增加。由于改革深化，“九五”期间大约有 2000 万人隐性失业或者不能充分就业，其中国有企业约 1500 万人，机关事业约 500 万人。农村至少有 12000 万个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因此，为私营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的、相对剩余的劳动力。

3. 政府支持发展私营经济。1992 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些论述和决定，解答了领导干部的疑虑，使他们认识到私营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许多地方政府因而支持和加快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私营经济这一时期（1992年—1997年）除快速发展之外，还有以下特点：效益显著；企业规模，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投资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增长最快；企业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增长迅速，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加强；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但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较快；全国私营企业继续向城镇集中等。

二、私营经济发展中的特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在发展中出现一些带规律性的特点，比较显著的有：

（一）“假集体”现象。私营企业在发展中出现“假集体”现象。即私营企业向所在社区有关部门登记时，往往以集体企业名义登记、注册，开展经营活动，缴纳税金，企业经营者则以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为什么私营企业一定要戴上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呢？温州市的一位市委书记曾解答过这个问题，即：“他们怕太公，怕财产充‘公’；又怕太私，戴‘资本家’帽子。”具体原因有三。

1. 企业主为了政治上“保险”。

2. 企业主为了经济上实惠。因为“假集体”可以享受真集体企业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及市场信誉。

3. 社区领导也是为了经济上的实惠和政治上的“保险”。“假集体”企业可以通过上交管理费形式，将部分国家应得的税金转变为地方政府计划外收入，由社区领导直接支配。同时，在凡事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的年代里，如果私营企业发展过多、过快，在社区经济结构中比重过高，社区领导可能会有政治方向性、“路线”错误等问题。而用“假集体”则表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发展，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二）资本增值速度快。从总体看，私营企业资本增值速度很快。如80年代中期，它们使用的资金（即国家资金和流动资金），在开业时为10万元，到1992年底已达55万元，增长4.5倍，平均开业时间5.1年，平均每年的资本增长速度为31%。

另据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区的典型调查，私营资本增值速度更快。如全国11省26村97家企业初始资本3.2万元，调查时资本14.4万元，资本增长率为450%，平均创办时间3.4年，年均增长速度55.6%。又浙江苍南全县18家企业抽样调查其资本年增长速度为47.2%。河北永年余县调查资本年均增长速度为25.7%；湖南邵东全县56家企业抽样调查，资本年均增长速度14.3%。

如与过去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初期和黄金时代增值速度比较，1894年—1936年，民族资本中产业资本增加了184倍，平均每年递增13.2%。1912年—1920年间，发展最快的卷烟业资本增值速度平均每年为36.7%。上海荣氏集团从1900年—1922年，资本增长了200倍，平均年递增27.2%。可见，1992年—1997年期间中国的私营企业资本增长速度最快，远远超过解放前民族资本的增值速度。

三、私营企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私营经济早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出现一种现象，哪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高，哪里私营经济发展就快，而那里的综合经济实力也一定比较强，出现了私营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同步现象。

如浙江省是个资源少、人口少的省份。可是近 20 年来，它的经济增长较快，成为经济强省、市场大省。1996 年该省国内生产总值达 4746.1 亿元，在全国各省、市、区的位次由第 12 位跃升到第 5 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9455 元，仅次于京、津、沪、粤。分析原因，最根本的是它在改革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抓住市场这个中心，坚持在各类市场主体的共同发展中统一管理，建立市场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健全市场秩序。全省有各类市场 4468 个，平均不足 1 万人就有一个市场。不仅市场密度大，规模也大，是全国市场平均规模的 2.6 倍。年成交额占全国总成交额的 12.9%。同时，全省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有 8.8 万户，从业人员 127.3 万人，注册资本金额 399.1 亿元，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10.7%、10.6%和 10.9%，而它的人口只占全国总数的 3.5%。

如该省温州市，从 1978 年到 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由 13 亿多元增长到 602 亿元，人均收入由 113 元分别提高到：农民人均收入 3700 多元，城镇居民平均收入达 7800 多元，90%以上人口达到了小康标准。温州经济之所以发展快，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数量多（全市有个体工商业 23.4 万户，私营企业 5900 户，股份合作企业 3.2 万户，集团公司 170 家，国有企业 140 家）。再是市场发育程度高。本市有各类交易市场 528 个，其中成交额在亿元以上的有 57 个。同时有 100 多万人跑市场，其中有 20 万人是劳务输出，从事弹棉花、开矿、城市建筑和修理、修补等；有 80 万人是大小生意人，而专门跑供销的就有 14 万人，等。

第九章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第一节　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农业的基础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经过实践证明，到了90年代仍然如此。原因是：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也有重大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受农业所提供的剩余农产品的规模和数量的制约。在我国，拥有12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我国人口多，可耕地少，用占有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没有农业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可见，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尤其是这样。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还表现在：

(1) 农业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等基本生活资料；

(2) 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丰富的原料；

(3) 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

(4) 农业发展还为工业发展提供最广阔的和最可靠的市场；

(5) 农业还为经济建设资金积累提供重要来源；

(6) 农业为对外贸易提供大量出口商品。

由上可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基础地位。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最早，其形式是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目前这种责任制的情况如下。

(一) 继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农业集体经济过去长期实行“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形式，农民缺乏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农民的经济利益受到侵犯，从而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1979年以来，农业集体经济的经营组织形式进行了深刻改革，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为主要的形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水利设施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使生产经营的责、权、利相结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关系，使劳动者的收益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的一种经营组织形式。它通过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合同制形式，把土地等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使用，合同规定农户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如完成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和交纳的集体提留等。合同还对有关向农户供应生产资料、提供技术服务等事项作了规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还相当低下，主要使用手工工具，并以畜力为基本动力；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还很低，很大程度上尚依靠个人的生产经验来安排和调整农业生产措施；农业生产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阶段。根据农业生产力的这种现状，采用家庭承包的小规模经营方式，有利于发挥家庭生产经营的长处，调动农民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适应现阶段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经营组织形式，是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农户自筹资金经营相结合。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土地、农田水利工程、集体企业、集体生产用大型生产设施和机械等，仍属集体所有。农户对所承包的集体耕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农业集体经济凭借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承包农户缴纳集体提留。承包农户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在较长时期内不改变，从而有利于农户利用自筹资金，在土地上追加投资，添置属于承包农户所有的各种生产资料。属于集体公有的基本生产资料同农户自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可以发挥出更大经济效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民的自主经营。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它们的生长受多种自然因素的制约，农业生产要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措施，灵活安排生产。在我国当前条件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户享有经营自主权，有利于直接生产者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安排农活和组织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合理支配和使用人力、物力、财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劳动收入和农户自投资金收益相结合。承包农户所收获的农产品，根据承包合同完成上缴国家农业税和集体提留任务以后，其剩余部分就是劳动者的所得。剩下归己的部分中，既包括农民的劳动所得，又包括农户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所带来的收益，同时还包括农户维持再生产的基金。所以，联产承包分配，既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原则，又体现了农户多投资多得，少投资少得，避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现象，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在生产中追加投

资，实行精耕细作，搞好集约式经营。

(二)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指集体统一经营和承包农产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经营体制，这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农业集体经济中，某些重大经济活动的基本决策要由集体统一制定，那些一家一户办不到、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需要并可能统一经营的项目，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重要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集体提留的数量和用途、农田基本建设的筹建等，都应由集体统一规划。水利灌溉、植物保护、机耕土地、培育良种等，由集体统一经营。由于各个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发展状况和具体情况不同，集体统一经营的项目有所区别，但要做到集体财产统一管理，各种利益关系由集体协调，生产服务、集体资源开发、农田基本建设由集体组织。除了由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项目外，其他各种经常性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都由承包农户分散进行，农户从具体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实行农户分散经营，可以适应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承包农户家庭成员共同参加劳动，实行小规模独立经营的长处，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保留了集体经济原有的统一经营的长处，又克服了集体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既发挥了家庭经营的优点，又克服了农户分散经营的某些不足之处。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户分散经营，两个经营层次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统分结合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可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节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农业经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环节。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市场为导向，发育农村市场，打破地区封锁、城乡分割的状况，进一步搞活流通，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开放性，深化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

(一) 加快以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市场的培育。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已大大提高，但是，农产品的“卖难”问题仍然存在，农产品的流通阻滞

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大力促进农产品市场，特别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育，完善农产品市场的需求预测、信息提供、协调引导、产销衔接方面的服务，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实行以销定产，开展合同定购，并在产区与销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发展农产品期货贸易，建立相对稳定的产销关系。

（二）发展多渠道流通，活跃农村市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村商品生产主体分散化，出现小规模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因而需要发展多渠道的流通，既向农民供应生产资料，传递市场信息，又组织农产品的收购、运输与销售。在多种流通渠道中，供销合作社和国有内外贸商业是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三）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农村承包农户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资金、技术、人才等等，这就需要通过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使各种生产要素同农村用户相互沟通和连接，避免两者的脱节，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优化组合，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深化农产品价格体制的改革。除了国家规定的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统一收购经营或部分统一收购经营外，其余全部放开，价格随行就市，实行市场调节。统的部分，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购销和调存，对国家合同定购和专项储备粮，实行保护价，以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增长，要逐渐减少国家统的品种和数量，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已经放开的农产品，要真正放开经营，放开价格，反对垄断封锁，做到货畅其流，确立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要理顺价格关系，使工农业产品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价，有效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提高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开经营和放开价格，不等于放任自流。国家在从直接计划和组织农业生产转向间接指导和协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要求，需要加强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市场的宏观调控，有效运用税收、信贷、利率、财政等经济杠杆，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

1. 大力发展各类农副产品市场，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发育，扩大商品集散，加快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促进农村商品流通的发展。

2. 加强市场动态预测，向农民提供各种市场信息，通过合同定购、市场收购等途径，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参与市场交换。

3. 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保证农用资金的到位。大力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支持农用工业的发展，重视流通设施的投资，并动员各方面力量建设仓储、运输、加工等基础设施。

4.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做到量力而行，不能超越农民的承受能力而乱行集资摊派。

5. 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机制。对重要农产品，建立必要的储备调节制度，搞好市场吞吐，做到以丰补歉，平抑市场物价、逐步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用于补偿因市场价格波动给农业生产者带来的损失。动员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保险，增强对农业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抗逆机制。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搞活城乡经济，具有重要作用：(1) 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节约劳动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改善经营管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2) 有利于打破农村的小生产式的经济封闭状态，使农业生产真正面向市场，促进农村由自给半自给型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发展。(3) 有利于加强和沟通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多种经济形式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各自经济的增长和共同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和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

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发展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也是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促进农村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它对于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健全双层经营体制，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本内容，是为农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它既包括对农业生产资料、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供应的服务，也包括农业的生产经营、科学管理、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服务，还包括农产品的运输、储存、销售等各项服务。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以乡村集体或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以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和各种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以农民自办和联办服务为补充而形成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以及工农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体系。具体地说，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由以下各方面所构成：(1)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的以统一机耕、排灌、植保、收割、运输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2) 乡级农技站、农机站、水利（水保）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水产站、经营管理站、气象服务网等专业经济技术组织提供的服务；(3) 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种农产品经销、加工企业和农民自愿组成的服务实体，为农业提供的专项服务或系列化服务；(4) 商业、物资、外贸、金融等国家经济部门开展的以供应生产和生活资料、收购、加工、运销、出口，以及筹资、保险等为重点的服务；(5) 国家农业、林业、水利等经济部门提供的组织、协调、扶持和技术推广、科研咨询、品种改良等方面的服务；(6) 科研、教育单位在农村所开展的以技术咨询指导、人员培训、集团承包为重点的服务。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1) 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协同办服务事业的原则。既要通过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对农业提供的服务，体现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指导和调控，又要加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对农业的服务功能，发挥其内联广大农户，外联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和其他各种服务组织的纽带作用，还要鼓励兴办各类农民自办、联办，以及合作经济性质的服务性经济实体。(2) 农民接受服务实行自愿原则。服务组织要根据农民的需要开展服务，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吸引农

民。(3) 基本实行有偿服务原则。服务实体既要合理收取费用，又要适应农民的承受能力。

第三节　科教兴农

科教兴农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农业的发展，农业能否上新台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有无新的突破性进展及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

一、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科研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1978 年以来，全国共取得农业科研成果 2 万多项，培育出包括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在内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 1000 多个。农业基础性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植物细胞组织培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单倍体育种和应用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基因工程、生物工程和家禽胚胎移植工程进展较快。农业科研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科研人员已近 12 万人。但是，我们要在人均农业资源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条件下创造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必须使农业科学技术有新的发展和更大的提高。一要加强生物技术的基础性研究，特别是育种研究，力争在理论和方法、基因工程实用化、病虫害防治机理等方面有新的突破。要重视生物技术在动植物遗传育种上的应用，培育适应性强的高产、优质新品种。二要加强农业重大技术的应用研究，重点是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区域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产品加工及综合利用等对农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加快电子计算机、遥感信息、核辐射、大气物理等高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为农业资源调查、环境保护、灾害预测、产量估算等提供先进的科技手段。三要加强农用工业的开发研究，大力研制优质复合长效肥料，高效、安全、低残留农药，先进的农业机械和设施，用现代工业来装备和支持农业。加强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农业先进技术成果，加快消化、吸收和创新，缩短与国外的差距。

二、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

推广和普及农业先进实用技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也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发展很快，全国累计推广了 6000 多项实用农业科技成果，农业增产中科技贡献率明显提高。全国已有上百万人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和大批农民技术人员，他们为普及农业技术，推动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还比较低，得到推广应用的仅有 1/3，

形成规模的不到20%。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最关键、最迫切的是要加强农技推广工作，尽快把增产增效显著的重大实用技术大面积推广到生活中去。“九五”期间，要以推广现有农业科技成果为重点，力争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40%～50%。农业科技工作要面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一主战场，紧紧围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大先进实用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力度，确保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两大战略任务，促进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通过实施“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种子工程”等，重点抓好优良品种推广、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作物栽培与管理等关键技术。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必须巩固和发展农技推广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健全农技推广体系，保证农技推广经费。要充分利用各种民间科技组织的力量，发挥科技示范户、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作用，形成以国家技术服务部门为骨干，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各方面共同参与，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

第四节　加快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是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业发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道路。

乡镇企业包括农村集体经济举办的企业，部分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以及农村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等。我国目前农村的乡镇企业，大部分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

近几年来，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八五”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量的30%、工业增加值净增量的50%、进口额净增量的45%和农民人均收入净增部分的50%均来自乡镇企业。

目前乡镇企业虽然总量不少，也涌现出一大批规模较大、素质较高的企业，但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主要表现在：粗放经营，设备简陋，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等方面。由于以上情况严重影响乡镇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因此，加快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加强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已经刻不容缓。具体办法：

1. 对起步较早的企业，应采用和发展高新技术，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装备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2. 兴办新的乡镇企业，要立足开发本地资源，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科学管理方法，走集约经营的道路。

3. 要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4. 要抓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提高乡镇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第十章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第一节　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及国家的方针政策

一、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必要性

关于科学技术，邓小平1978年3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方面每一次重大发现和突破都会伴随着生产的巨大飞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推动了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世界上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美国按人口平均的产品增长，大约90%是依赖于技术的变革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日本从1950年到1975年间，共引进先进技术25700项，战后日本经济调整发展，是依靠引进先进技术，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约有60%～80%的份额是依靠科技进步的方式取得的。当代世界2万亿美元贸易额中，高科技产品占1/3以上。

历史已经证明，在现代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谁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谁就在经济、军事、政治上占据优势地位，否则就要落伍。我国是一个经济技术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因此，发展科学技术进行科技改革是我国当前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的首要任务。

二、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政策

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发展科学技术十分重视。1980年党中央就提出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1982年进一步明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1985年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198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且两

方面是相辅相成的。1985 年颁布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987 年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提出逐步实行政研职责分开，国家对科研机构变为间接管理；科研机构全面实行所长负责制，逐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等；同时指出，科技工作必须不断探索积极面向经济建设新的生长点，主动步入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促进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1988 年国务院又作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鼓励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步入经济，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积极开发和组织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在智力密集地区兴办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动企业和农林的科技进步，支持集体、个体等不同所有制形式科研机构的发展；为了促进科研机构切实引入竞争机制，适应生产经营活动日益增多的要求，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

以上这些国家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大大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及其与经济相结合

科技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相结合是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建国以来，我国已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形成了 2500 多万人的科技、教育队伍，其中 230 多万人从事科研开发活动。每年取得 3 万多项重大科技成果，批准 3 万多项专利。在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我国 80%以上科技力量已投入与经济相结合、自主发展的道路。已取得两弹一星、杂交水稻、HJG—04 大型程控交换机、曙光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工业机器人、生物疫苗和医药、200 兆瓦低温核供热堆、功能材料等一大批在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并有望形成大产业的成果，并取得像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清洁生产技术等可促进整个行业技术等级的高技术成果。高新技术开发区 1987 年年产值已达 580 亿元，比 1986 年翻了一番。民营科技企业产值、利润每年以 30%～50%的速度增长。科技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额已达到 30%左右，在整个经济增长中贡献额也达 30%左右，而且在不断增加。

今后科技进步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方面，应当把技术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加强基础性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合理配置力量，努力攀登科技高峰，为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此，具体应做到：

（一）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在人口不断增长情况下，要保障全国人民丰衣足食，使农业和农村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农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注意高新技术和常规技术的结合，加快推广成熟、适用的先进技术。继续进行中低产区综合治理试验和示范。完善商品粮基地综合生产配套技术。加强动植物优良品种选育，为种子工程不断提供技术支持。加强重大病虫草、鼠害的预报、控制技术研究。加强节水技术和旱作技术研究推广。开展保护林工程、沙漠化防治技术研究。积极促进生物工程、计算机、遥感等高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着重抓好我国现有农业先进技术的组装配套，有选择地引进一批国外、境外的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加速推广应用。大力提高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和规模效益。继续推进农科相结合，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二）提高产业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推广步伐。技术开发创新是产业科技进步的源泉，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动力。要根据产业发展需要，结合重大工程，组织科技攻关，着力解决关键性、共性、基础性的重大技术。通过加强对技术的工程化和系统集成，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

（三）积极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高技术产业是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高技术研究与开发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导，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源泉。要在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可跨跃的技术层次上，开展高技术研究开发工作。努力提高高技术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市场占有份额。发展高技术要紧密结合经济建设的需要，把握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掌握知识产权、实现产业化作为主要目标。国家应继续组织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遴选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精锐队伍，加强集成，协同攻关，力求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

（四）加强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要依靠科学技术，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要切实加强社会发展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在计划生育、重大疾病防治、新药创制等方面攻克一批关键技术。要抓好一批环境、生态、资源的保护、治理与综合利用等示范性工程。应建立一批以科技引导社会发展的综合实验区，开发和推广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五）基础性研究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追求新的发现和发明，积累科学知识，创立新的学说，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基础性研究要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科技问题，瞄准国际科学发展的前沿，选择我国有优势的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创新研究。要注重发展新兴带头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支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理结合，重视软科学研究及应用。

（六）积极开展国际间科学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科学发展的丰富资源，把科学发现与技术突破结合起来，推动科学研究特别是复杂技术系统中交叉学科的研究，提高工程化研究的能力。结合国际科学发展和我国产业技术发展趋势，重点发展新兴带头学科、交叉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主要是生物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和环境科学。

（七）加强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充实重点基础科研设施，在现有国家重点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建设一批开放的科研基地。努力提高科研仪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自主研制开发能力。重视科技信息的有效利用和传播，加强科技图书、资料和数据库的建设。建设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示范网络。有计划地建立全国科技信息资源传输的设施，建设联结全国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科教信息网络，实现科技信息共享和交流的现代化。

（八）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科研、开发、生产、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应该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优化科研组织结构，合理分流人才。加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推动以技术开发为主的科研院所进入大型企业集团或转化为高技术企业，鼓励大中型企业自办技术开发中心，努力使企业成为技术研究开发的主体。

第三节　发展高新科学技术

一、高新技术发展战略

高技术研究与开发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导，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源泉。发展高技术要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要在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海洋等重要领域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高技术的若干重要领域占一席之地。

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要按照邓小平“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指示，实行需求牵引、市场导向、技术驱动、产业为本、立足国情、发挥优势、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发展战略，并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一）紧紧围绕三大目标，解决国家重大关键问题。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要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三大目标，解决国家重大的、关键的、紧迫的问题。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要坚持需求市场导向与技术导向相结合，以需求市场导向为主。所选择的高技术大部分应是在5年~7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能形成产品或产业的关键技术。

（二）突出创新，努力提高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水平。高技术研究发展要以形成我国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提高我国高技术的自主开发能力和水平为重要目标。高起点发展我国的高技术，注重在一些具有优势的领域占领制高点，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要将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大力扶植拥有我国知识产权产品的高技术企业。

（三）发展新兴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并举，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结合。发展高技术

产业要以创造高附加值、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为主要目标，特别要发展竞争能力强、生产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的大型高技术企业集团。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要注重用高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向企业输送高技术及现代经营、管理方法，移植高技术产品，扩大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发展高技术产业应充分利用当代先进的科技成果，积极引进，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在引进产品、装备的同时掌握技术并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对引进的设备和技术认真组织消化、吸收，再逐步进行技术创新。对于我国有资源优势、有技术基础的领域，应加强自主开发。

（四）有限目标，重点突破。发展高技术，必须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国情国力出发，选择有限目标，确定优先发展领域，解决重大关键技术和产业化问题，取得重点突破。此外，重点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二、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目标与任务

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和制高点。发展高技术产业，对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国际高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到2000年力争使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5%，2010年提高到25%左右，接近美国90年代初期水平；到2000年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总增加值的比例及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5%，2010年提高到25%以上，接近原联邦德国90年代初期水平。52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现年产值5000亿元。

90年代末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具体任务：

（一）以市场导向为主，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海洋技术、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为应用重点，突破一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从而形成高技术产业的生长点，培育一批新兴产业。

（二）支持大、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共同发展。大中型企业是发展高技术的主力军，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航天航空、核能、造船、电子、邮电、通信等大中型企业，容易形成高技术产业集团优势；新成长的高技术企业，包括民营高技术企业是高技术产业的生力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市场意识和灵活的一机制。“九五”期间要重点扶植并形成一批高技术产值超百亿元企业、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切实增加国家经济实力。

（三）发展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改造相结合。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最终必将走上高技术发展的道路。“九五”期间以支柱产业为主要对象，发挥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功能，大力推广先进制造技术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普遍应用CAD、CAM、CAT等技术，形成一批应用CIM、计算机辅助技术、精密成形及加工、激光加工、工业机器人、数控系统、自动测试等技术含量高的示范企业。推动企业技术改造走向高技术内涵发展的道路。

（四）完善和建设一批高技术研究和产业基地。根据高技术研究发展和产业化的需要，按照研究开发、产业化几个不同层次部署基地、中心的建设。

1. 高技术研究中心。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使之成为我国高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基础技术研究，为产业化提供成熟的高技术成果。

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已建立的各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使之覆盖主要的高技术领域。工程技术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将有市场价值的重要应用科技成果进行后续的工程化研究和系统集成，转化为适合规模生产所需的工程化技术，培训工程化人才，加速和实现高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

3.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形成一批产业特色鲜明、具有导向作用的高技术产业基地，建立上百亿元的高技术开发区 15 个，上千亿元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1 个。开发区的生产总值达到 5000 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 4000 亿元。

大力促进上述三类基地的联合与合作，创建高技术研究、开发、中试、生产一体化的发展环境与机制。

三、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优先支持的重点领域

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优先支持重点领域的选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有国家目标，以提高国家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掌握知识产权、增强经济竞争力为主要目的。立足国情，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力求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在世界高技术的若干重要领域占居一席之地。目前高技术研究拟选择的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是：

（一）信息领域，以微电子技术和重要元器件为基础，加强系统及其应用技术和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重点发展现代通信技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技术、新型光电子器件及系统集成技术、高性能汉字计算机及软件工程技术等。

（二）生物技术领域，以农业生物技术、医药生物技术为突破口，重点研究开发转基因动植物育种技术及其配套技术、粮食和经济作物优质高产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重要疑难病基因治疗技术、新型酶制剂、蛋白质工程、生化工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等，为生物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三）先进制造技术领域，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为发展重点，研究开发现代设计技术、精密与加工技术、激光加工技术、机器人技术及其应用工程、数控技术、传感技术、工业控制技术、系统管理技术等，为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四）新材料领域，重点发展复合材料、工程塑料、陶瓷材料、膜分离材料、新型金属材料、新型功能材料及材料的设计、改性、制备技术，强化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汽车用新材料、电子信息材料、建筑新材料、能源与环境材料、军工配套新材料等关键新材料的开发应用。

（五）能源领域，重点发展先进核能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清洁能源技

术等，提高能源开发与利用效率，逐步增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六）海洋技术领域，开展维护海洋权益和公益服务技术研究，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和海洋环境要素监测技术研究，重点推进海洋生物技术、海水化学元素提取技术、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技术。

附：有关高新技术发展的调查报告。

[附] 调查报告

北京城市经济建设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考察

——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到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

一、当今世界高科技发展及我国发展高科技的迫切性

高新技术产业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新兴产业。北京城市经济建设中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突出发展，特别是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创立和发展，还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道路。

高新技术产业就是以最新科学技术成果为基础而建立的新兴产业。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微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出现了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技术、资金更加密集，产品附加价值也高。因此，它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导致了劳动就业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而高科技在经济中的应用，还能有效地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露端倪。自90年代以来，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其他生产要素的总和。所以，知识创新，特别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是一国经济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益地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美国当今经济增长中，有30%来自高科技部门）。高科技在经济中的应用，不仅推动了一国国民经济的持续上升，而且促使一些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演变为物化在商品中的科技水平的竞争，而这又使得高科技产业本身的发展和竞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得到很快的发展。邓小平早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80年—1981年，他又多次指出：科学技术必须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技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1988年他又指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1991年，邓小平发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明确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科委也为发展高科技作出决定，1985年3月，在中央的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中指出：为加快新兴产业发展，要在全国选择若干智力资源密集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以后又制定一系列科学技术发展计

划，如星火计划、863计划（国家发展高科技计划）、火炬计划、丰收计划等。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创立和发展

我国的高新科学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在有条件的地方都有了高科技产业，其中由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到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由民办科技企业起步）的规模，很有特色，值得探讨。

北京海淀中关村地区是一个知识密集区。早在1911年清政府创办的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及1931年成立的燕京大学（北大前身），就设在中关村地区。建国后，一批新的大学、中科院及一批国家级科研所也建在这里。经过多年的建设，现在中关村地区已有普通高校30多所、科研机构130多个，是我国科教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中科院是我国最高层次的国家级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全院41个科研单位，近万台科研仪器，平均每年承担科研任务2000多项，获国家级成果奖近百项。

中关村地区虽然有这些优势，但在改革开放前，这样雄厚的科技力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科技人员仍然关着门搞科研，教学人员也是关着门搞教学，所以直到70年代，整个中关村地区仍然十分落后。有人形容说，当时的中关村只有四季青公社的一个锅炉厂算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企业了。这样，中关村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地区社会结构：高楼深院内知识分子成群，关门研究，高楼外面则是农村经济，种粮种菜，倒也显得清静。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浪潮兴起，世界新技术革命也开始冲击到中关村这个智力密集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政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知识分子们开始考虑把科研与实际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但是这条路到底该怎样走呢？由于当时的传统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得很厉害，人们想走出大院到中关村大街上创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社会生产力永远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火车头，而作为生产力中的具有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特别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科技工作者，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样，要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使科学技术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就需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科技工作者大胆地走出来创业。结果，终于有人走出来了，那就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和纪世瀛等另外6人，他们于1980年10月30日在中关村街上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将科技变成生产力（像美国的硅谷一样）。服务部创立之后，他们又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个合同，与海淀区4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还开办了行业知识青年技术专修班等。

然而，陈春先的事业并不是那么顺利。在此后3年时间里，中关村街上惟一的这家民办科技机构备受打击。但他们没有屈服，他们硬是在强大的习惯势力与旧体制下苦苦地支撑了三年。直到1982年，一名新华社记者写了“内部动态”，把情况反映到了党中

央，问题才得到解决。1983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等看了报告并经过了解，肯定了陈春先他们的事迹。认为，陈春先走的路子是对的，这是一条新路子，可以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且使科技人员可以更好地为“四化”做贡献。同时，也可以使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先富起来，从而打破“铁饭碗”、“大锅饭”。这些批示，对将要出来办科技企业的人员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和鼓舞。

1983年5月，中科院与海淀区联合创办了第一家科技企业——科海技术开发公司，之后，信通、华海、四通、联想等新兴产业公司纷纷成立（四通推出了Brother牌2024打印机，而联想则推出了联想汉卡等）。

当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就发展到11家，从1980年开始孕育的科技企业，此时已是科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并初步确立了科技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不断向前，1985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关村地区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务院的批示对中关村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1986年5月四通成立集团公司，其拳头产品MS系列文字处理机的第一种型号MS—2400上市，当年销售上万台，使其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87年3月，又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资经营“北京四通办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这是电子一条街上第一家中外合资科技企业。1987年四通北京总部以及分公司和合资企业总营业额达5.1亿元，利润3600万元，纳税1694万元，创汇123万美元。

1985年4月联想汉卡投入市场，至1989年，其工业产值近4000万元，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种奖励，也成为电子一条街的拳头产品。1985年，北大几位教授筹办了北大新技术公司（北大方正前身），将王选教授多年研究的汉字电脑输人成果应用于激光电子照排系统。激光电子照排系统是印刷业中的一项重大发明创造，它将传统的印刷术从手工检字、铅字浇铸一跃而到电子排版直接印刷，这是排字印刷史上的一场巨大变革。1987年1月，跨部门、跨地区的大型联合公司——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成立，其成员以电子部从事计算机生产、研究的单位为主，这是我国电子工业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样，从1984年到1987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高新科技企业就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1987年一条街上的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值达2.2亿元，并在这里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微型机及其元器件市场。

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海淀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区内新技术企业又得到了很大发展。据统计，从1988年到1992年，中关村试验区中技工贸总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6个，超1000万元的有71个，超800万元的有145个。更重要的是企业自己开发产品的比重逐年增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召开之后；区内企业又纷纷开始了“二次创业”热潮。四通重组集团企业结构，并在香港股市上市股票，实行与“巨人同行”战略与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合资组建大型生产企业，以合资中的“少比例”换来进入国际“大市场”，实行多样化经营等。联想则在1989年组建了集团公司，1990年推出自己品

牌的电脑，并在1995年与IBM、康柏等对手的竞争中，采用降价的战略，夺得可观市场份额。目前，联想在品牌电脑、电脑主板、系统集成、代理销售、工业投资和科技园区六大方向多元发展硕果累累，1997年联想电脑闯入亚太十强，排名第8，电脑主板年销量进入世界第5名。北大方正所研制出来的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占领了国内外中文照排的大部分市场，1992年又与香港金山公司合资成立香港方正，1995年在香港成功发行股票。此后相继与苹果、爱克发等跨国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1997年与IBM签约合作，标志着方正带着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迈向全球化道路新的一步。此外，像清华同方等企业，由于依靠清华大学的技术力量和名气，发展也极为迅速。中科院更是坚定实行“一院两制”（两种运行机制），在试验区成立了142家高新技术企业。用友公司1997年成为通过ISO 9000国际标准软件企业，其财务软件目前已占领全国市场44%。京海是中关村的元老级企业，一直在不断探索自己的路，1995年开工建设了自己的药厂，开发了“护肾宝”，使京海的保健品走上规模化经营。

从1988年到1997年，试验区已连续10年保持高速、协调、健康的发展态势。10年累计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195.47亿元，上缴税费42.21亿元，出口创汇12.37亿美元。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30%以上。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22.13亿元，比上年增长25.3%。技工贸总收入340.87亿元，工业总产值170.18亿元，上缴税费10.86亿元。分别为1988年的24倍、35倍和21倍。目前试验区内有新技术企业4525家，其中10家进人“北京经济百强”，有4家进入国家重点支持的千家企业行列。此外，国际知名企业微软、英特尔、惠普等也进驻中关村，凭着雄厚的资本和技术，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形成国内外企业既联合，又竞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三、中关村新技术开发区在北京城市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中关村新技术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在北京市经济建设中起了巨大作用。

（一）带动了海淀区经济的发展。中关村所在的北京海淀区，1984年以前产业很不发达，到了1997年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海淀区内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区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126.2亿元中，试验区就占了77.29%，海淀区财政收入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而试验区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

（二）推动了北京发展战略的转变，成为北京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北京是个政治文化消费城市，产业很不发达，而且效率不高。据调查，1995年北京地方320家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1.7%，而试验区从1992年—1994年总产值以平均62.89%的速度递增，1996年北京市工业增加值增量中1/3来自试验区。因此，1996年12月，北京市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把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北京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到1997年，试验区内国内生产总值为130.57亿元，上缴利税总额12.8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50%。试验区新技术企业已连续5年占北京市技术出口创汇的1/2以上，其中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占70%以上。这就使北京能利用自己在人才、技术等条件的独特优势地位将经济建设的重心转移到高新技术这种新兴产业上来。

（三）带动、改造传统产业。试验区的大量技术成果具有较强的技术辐射和知识转移能力，尤其是各项成果和专利逐渐向传统产业扩散。仅1995年就有175项成果转让258次，转让的直接收入达116亿元，如中科院化学所、中科集团与中国纺织大学合作推出细旦、超细旦丙纶长丝制造技术，之后再与北京市绦纶厂合作生产出泰绦纶系列产品，为带动北京市传统产业纺织业走出不景气提供了机遇。1997年试验区企业与北京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签订了698份合作合同，涉及4.8亿元的资产结构调整。

（四）对其他高新区的示范作用。自试验区建立以来，由于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及其在转化科技成果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绩，对国家制定高技术发展战略，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海淀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后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高新区，到1998年初总数已达53个，它们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大批机制灵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技术创新能力强的高新技术支柱产业，1997年全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达16500家，技工贸总收入3300亿元，利税320亿元，出口创汇12亿元。

四、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所体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

（一）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创业作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高技术产业最初是由进行科研工作的知识分子走出科研高墙创办起来的。如陈春先、纪世瀛等中科院科技人员，他们出来创办“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探索在中国条件下发展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良好开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已走过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具体生产制造的道路，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增长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而推动这些的，是具有一定技能和较高素质的知识分子。中关村企业的成功，正是依赖了这样一批具有高水平的知识分子队伍自觉进入市场经济，能动地创办科技企业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而发展起来的。

（二）民营“四自”原则。这是四通在创业初期提出来的，即“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后，被一条街上的其他民营企业纷纷接受。这4条原则，十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精神，它对中关村民营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四通，以2万元起家，第一年就赚了143万元，到1991年，其销售额已达5亿。现在中关村的国有企业也在探索吸收试验区民营科技企业的“四自”方针，以盘活自己的资产，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

（三）技术不断创新。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断快速发展，关键的一条是，它们在技术上不断进行创新。高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必定要求企业不断创新。如北大方正，在其“激光汉字照排系统”上市并占领了国内外大部分市场后，它又于1991年开始进行彩色激光照排版的开发，并于1992年在《澳门日报》投入生产性使用。此后，它又继续研制成功了0.7微米线宽的专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使处理彩色照片、图形、字形的速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就是它们的“顶天立

地”精神。“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的新突破，“立地”就是它们的科技产品商品化大量推广，做好服务，也就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四）技工贸一体化。要使高新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研制，并将研制成果转为技术产品，再通过市场销售出去，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这就是中关村企业所走的技工贸相结合的道路。联想总裁柳传志认为，一个企业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开发，也不是制造，而是营销，而且是规模营销。现在联想的 PC 机销量在中国市场上已打败 IBM 排名第一。而联想在形成规模产业的过程中，又在自己的产品中注入越来越高的科技含量，从而使产品挟技术优势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形成更大规模的产业。

（五）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中关村企业的起步是受了外国科技企业的启示，而在发展初期，也要依靠对国外产品进行二次开发，或者进口外国部件“攒机”，靠这积累资金和引进技术，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但只是这样是不行的。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之下，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还必须大胆走向国际市场。如四通的“与巨人同行战略”，联想打入“亚太十强”，方正与苹果、IBM 等的合作等。四通的“与巨人同行”的“巨人”，就是世界一流大公司、大规模投资、高层次技术引进。所谓“同行”，就是并肩向前兴建产业。与“巨人同行”是借巨人之势，搞自身产业之实、最终成为四通巨人。四通的这一经验是很成功的。在与外资合作的同时，由于外资企业的介入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也激发和引导本国企业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六）政府对企业少干预、多帮助，没有政企不分现象。试验区里是民营企业为主，它们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的合法经营，从不干预，完全由企业自由发展。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为企业做好服务性工作，如提供优惠条件、帮助企业协调关系、筹集资金等，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如政府曾帮助四通、联想、方正筹集资金 10 亿元，使它们的股票能够在香港上市，并获得了成功。政府对企业不干预，特别是没有像对国营企业那样政企不分的现象，是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七）人才优势和正确政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有高科技专门人才，而中关村地区正是高科技人才的密集区（如上述清华北大等 30 多所高等院校和 130 多个高级科研机构），正是有了这样集中的高科技人才，新技术产业开发研制才得以发展起来。

当然，只有人才没有正确的政策也是不行的。比如中关村的人才，早已集中在那里多少年，可是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只有现在在党的正确改革开放政策下，他们才走出来创办高新技术产业的。

总之，从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到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成立和发展，这条发展道路，现在看来是成功的。

第十一章　健全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再就业工程

第一节　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社会保障制度是指社会为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福利而提供物质帮助的各项措施的统称。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死亡等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社会保障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总和，构成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生产，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一）有利于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社会成员由于年老、失业、疾病、工伤，以及其他各种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发生困难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解除或缓解其困难，使劳动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难有所济、伤有所疗，从而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二）有利于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可以使企业摆脱职工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性负担，有利于企业优化劳动组合与人才合理流动，从而有利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集中精力从事生产经营，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活力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三）有利于政府精简机构和减轻负担。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可以将社会保险、救济、福利、优抚等方面的某些事业，由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承担，使政府摆脱一些社会问题的困扰，减轻费用负担，有利于政府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四）有利于引导合理消费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通过政府、企业、个人共同负担和筹集社会保险费用，可以使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以社会保险基金的形式，用于养老、医疗、待业，以及防止各种意外事故，从而使劳动者的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化。同时，随着各种社会保险基金的日益增多，在保证正常支付劳动者各种保障金的前提下，有一部分暂时不使用的社会保险基金，可转化为投资，用于发展经济建设。

第二节　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一、我国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存在着较多的弊端，主要是：(1) 社会保障费用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支付，造成国家财政和企业的沉重负担，未树立职工个人的保险意识，使职工个人收入中本应用于个人保险的费用，变为现实购买力，加大了对市场的压力。特别是随着社会保障内容的扩大与人口老龄化的迫近，国家财政和企业负担日益加重，难以为继。(2) 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享受社会保障的机遇不均等。社会保障多数是对国有企业和城镇大集体企业职工实行，其他社会成员特别是农民不能享受或只享受有限的社会保障。(3) 社会保障项目中，明保少，暗保多，保障效果不明显；同时，社会保障项目不完备，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待业保险制度不健全或不能有效推行，难以很好实现企业的劳动优化组合与职工的合理流动。(4)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完善，保障措施不配套，社会保障立法滞后，未建立宏观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缺乏社会保障的规划、协调、监督体系。

二、健全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资金来源多渠道，待遇结构多层次，保障方式多形式，管理体制法制化、社会化和规范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如下：

(一) 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1995 年 3 月，国家明确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同时推荐两种实施办法供各地选择。199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 22 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已有 61.7 万户企业、8738.2 万职工和 2241.2 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总覆盖面约为 1.2 亿人。养老保险已积累了一定的基金，据不完全统计，1996 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020 亿元，支出 894 亿元，累计结余 523 亿元。针对出现不同的个人账户比例，不同的企业缴费比例、不同的管理层次和不同的待遇支付标准，国务院决定尽快结束两种实施办法并存的局面，要求各地按照基本养老保险统一方案尽快实现并轨。

统一方案的要点是：按职工工资的 11%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其中个人缴费 8%

(逐步到位)，企业缴费划入3%，社会统筹部分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确定企业缴费比例。养老金支付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养老以退休职工平均余命月数（120）；此外，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在职职工工资的增长情况，建立养老金的调节机制。

按照统一方案，现行各种办法可以平稳地向新制度过渡。实行办法一的地区，保留现行个人账户中11%以职工本人工资为基数记入的部分，而将按社会平均工资记入的部分（5%～6%）分离出来，放在职工退休时按社会平均工资计发的部分；实行办法二的地区，将目前个人账户（3%～5%）与“缴费性养老金”合并起来，按11%的比例建立个人账户，原规定的“社会性养老金”大致上相当于基础养老金；实行第三类办法的地区将个人账户比例统一规范为11%。

（二）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职工健康水平的要求，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职工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并使之逐步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

关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曾进行试点工作。1996年4月，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发布了《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扩大医改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用人单位的缴费率，由试点城市参照本市前三年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确定。缴费率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10%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超过10%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经国家财政部批准。职工个人缴费，先从本人工资的1%起步，由用人单位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以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

2. 建立职工个人医疗账户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医疗费不低于50%的部分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记入个人医疗费用。个人医疗账户，专款专用，用于支付职工的医疗费用。个人医疗账户的本金和利息为职工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中未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用于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由市医疗保险机构管理，集中调剂使用。

3. 职工医疗费先从个人医疗账户中支付。个人医疗账户用完后，先由职工自付按年度计算的本人工资5%的医疗费。其超过部分，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支付，但个人仍要负担一定比例。个人负担的比例随费用的升高而降低：医疗费超过本人年度工资收入5%以上，但不足5000元的部分，个人负担10%～20%；5000～10000元的部分，个人负担8%～10%；超过10000元部分，个人负担2%～5%。

目前需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

1. 如何界定基本医疗保障。关于基本医疗保障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医疗水平会产生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障定义。我们既然确定了“基本医疗保障的水平和方式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那么，就应当合理界定基本保障范围，各有关方面应进行研究。

2. 离休人员的医疗费用问题。医改《扩大试点意见》中规定，老红军、离休人员和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不设立个人医疗账户，个人也不缴纳医疗保险费，医疗费

用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支付。若超过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所能支付的最高医疗费用限额，由原资金渠道解决。离休干部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现在大都年老体弱，或伤残多病，国家对他们给予一定的医疗照顾是应该的。但在改革试点过程中，离休人员的医疗费用如何加强管理，还有待研究解决。

3. 医疗机构的配套改革和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疗机构的配套改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机构设置和医疗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医疗服务总体上供不应求，而在局部特别是城市又供大于求。应在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适当分流医务人员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对于这类问题，应当通盘考虑，认真研究。

4. 困难企业的参保问题。我们搞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共济，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那些困难企业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障。对于困难企业要做具体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去解决其参保问题，如缓交、分段交，或将缓交的期限放的更长一点，等等。当然，从根本上讲，要从深化改革中寻找出路，比如通过优化资本结构、产权流动重组、兼并、破产等这些办法来解决企业的困难。既要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又要从长计议。

5. 属地化原则问题。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要实行属地原则，这是扩大医改试点的一个重要原则。属地化的本质就是社会化，而不要理解为地方化，更不是“划地为牢”。属地化也不专指中央企业属地化，而地方企业不执行属地化原则。属地化更不能是好的企业就实行属地化，而效益不好的企业就不实行属地化。对于行业来说，需要正确理解属地化的本来意义。要承认一些行业的特殊性，但是，不能过份强调或不适当地强调特殊性来否定属地化原则。对于地方来说，要充分理解有些行业的特殊性，创造适宜属地化的条件。比如提高统筹层次，建立健全方便职工的社会化服务网络等。

（三）失业保险制度方面。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范围逐步扩大。1986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范围只覆盖国有企业的合同制工人和破产及濒临破产企业的部分职工。1993 年，国务院颁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把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国有企业的职工。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制定失业保险实施细则时，把这项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城镇所有类型企业的职工，并规定职工缴纳一定的失业保险费。

根据 1993 年的《规定》，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的人员共有七种九类：依法宣告破产企业的职工；濒临破产的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简的职工；按照国家规定被撤销、解散企业的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停产整顿企业被精简了的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企业辞退、除名或开除的职工；依照法律、法规或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的其他职工。

截至 1995 年底，参加企业职工失业保险的在职职工 8271 万人，比上年增加 284 万人，增长 3.56%，占全国企业职工总数 72.8%；失业职工年平均人数为 118 万人，比上年增加 27 万人；领取失业救济金实际人数 153 万人，比上年增加 44 万人；年末失业职工实际人数 127 万人。1995 年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已达 71 亿元，相当于当年保费收

人的2倍以上，超过当年支出约4倍。失业保险金积累增加表明，社会承受失业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这为困难企业适当加大富余人员向社会分流的力度，进一步推动企业改革，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 失业保险基金不能调剂。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全国收缴失业保险基金34.6亿元，当年支出18亿元，滚存结余71亿元。看起来失业保险滚存结余量不小，但由于失业保险一般是县级统筹，所以一些失业问题严重的地区基金告罄，其他地区积累的基金却不能调用共济，失业人员不能按时领取失业救济金（养老保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 失业保险的作用受到限制。中国目前的失业率不到3%，但这并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大量潜在失业或称隐性失业人员。据1996年上半年的统计。国有企业中每两个职工就有一个在亏损企业中工作，约有3500万人在亏损企业中。此外，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约在2000万左右。从改革的方向看，失业从隐性到显性有其必然性，但目前的保险基金是无力承担这一责任的，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条件也不能承受国有企业即把富余人员全部推向社会。目前，对于隐性失业是否显性化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工作不饱满，毕竟有工作，不能叫失业。

3. 失业救济与社会救济缺乏统筹协调。目前失业救济的标准相当于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金额的120%～150%，具体数额由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一些大城市结合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对最低工资线、最低养老金与最低生活保障金一并进行了规定。但是，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把最低工资、失业救济金、最低养老金及贫困救济金从整体上统筹规定。

以上问题需要逐步解决。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制定失业保险实施细则时，还把这项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城镇所有类型企业的职工，并规定职工交纳一定的失业保险费。实行失业保险，既要保证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又要促进失业者再就业。目前，我国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已达1亿多人，已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73%。而作为失业保险的重要辅助措施，构筑最后“保障线工程”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全国已有28个省市区正式发布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截止到1996年10月25日，全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也已覆盖全国城市的20%左右。

第三节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势

按照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在大力发展社会保险的同时，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发挥对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制定相应政策，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

等社会群体和优抚对象的合法。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抚恤补偿机制，依法安置退役军人，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服务，加强福利设施建设。

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趋势

按照《纲要》确定的目标，到2000年，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应城乡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在“九五”期间，统一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统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原则上在1997年底以前完成，个别地区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将统一期限延长到1998年底；没有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地区，要加快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步伐，在2000年以前实现省级统筹。

目前需要做的是，建立三层次养老保险结构。

在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分散逐步转向统一之后，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仍然偏高，约在60%左右，国家负担过重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有关专家通过研究论证后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把现在设计的统一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部分转到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中，使现在的“小补充”养老保险变为“大补充”养老保险。同时对基金的管理和营运分别作较大的调整，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从长远考虑的，作为课题研究的，不是（目前也不可能）政策性的东西。

去年，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外专家研究企业补充保险问题，提出在我国建立三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同时世界银行完成了《中国养老金体制改革》报告，提出在中国建立三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我们认为，从总体看，三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或称“三柱式养老保险体系”是可行的。

第一层次是政府举办的基本养老保险，可考虑由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强制收缴基金，纳入政府财政社会保障预算，由政府或公共机构经办，覆盖全社会。这一层次的保险构成最低养老保障的社会安全网，替代率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5%左右（世界银行建议为省平均工资的24%）。

第二层次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采用个人账户储存积累模式。这一层次在澳大利亚、法国、瑞士是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多数国家采取政府鼓励、单位自愿建立的方式。我国可以考虑对这一层次中的某一部分，例如工资11%的个人账户部分实行强制实施，而对超过工资11%的个人账户部分采用税收优惠的办法鼓励实施。这样，这一层次的替代率将随企业经营状况有所差别，大致在40%～60%之间（世界银行建议由雇主即用人单位和雇员按50:50的比例缴纳相当于职工8%的工资，假设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与工资增长率相等，其替代率约为40%）。这一层次的基金劳动管理应进入市场，由职工、企业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基金理事会，通过招标委托商业性保险、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营运管理。

第三层次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职工个人自愿投保，政府

给以一定的税收优惠。

以上三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的责任，有利于在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基础上，将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入市场，解决基金增值问题还可弥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长期投资项目资金不足，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趋势

必须进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对此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两江”试点的基础上，今年抓好50多个城市扩大试点，以取得更完整的经验，再在面上推广，争取“九五”期间在城镇基本建立起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一）确定基本医疗的范围。探索和确定基本医疗的范围，目的是避免因个别高额医疗费用造成医疗保险基金“出险”而危及绝大多数职工的基本医疗。一方面，卫生部门制定诊疗技术规范，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险药品报销目录，制定合理的、分档次的医疗收费标准；另一方面，要求各试点城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社会统筹基金所能支付的最高医疗费用限额。对于超过限额的医疗费用，应当通过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等途径来分散风险。

（二）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同步改革。在养老保险改革中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分别进行，医疗保险改革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职工按照统一制度和政策同步改革，保险的基金筹集方式和基本结构要统一，同时考虑到劳动部门分管企业职工医疗，卫生部门分管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医疗的现状，以及原公费、劳保医疗同步改革可以避免国有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相互攀比，更能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也有利于职工在更大范围内合理流动，并防止医疗费用在两种不同医疗制度下的非正常转移。

（三）推进区域卫生规划。与职工医疗保险改革相配套，必须推进区域卫生规划，逐步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中国卫生资源过分集中在城市大医院，大城市中的医疗机构和大型医疗设备供过于求的矛盾突出（有资料表明，广州、沈阳CT机和核磁共振仪器比伦敦的多），实行职工医疗保险改革的同时，需要调整医疗机构的布局，充分发挥现有卫生资源的潜力，降低医疗费用。此外，许多企业办的医院也应纳入区域卫生规划之中，积极推行企业医疗机构社会化进程。

三、失业保险制度改革趋势

（一）现行的失业保险只覆盖国有企业，这显然越来越不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要求。目前，国有企业总体经济效益低下，无力扩大再生产，所吸收就业职工占城镇新就业总量的比重，由1985年的61%下降到1995年的36.1%。据预测，“九五”期间国有企业不仅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减弱，还将向社会排出约1500万富余劳动力。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合资及个体经济组织，近年来吸收就业的比例不断提

高，1995年城镇新就业人员到非国有单位的比重为62.9%。这样一种就业状况，要形成统一的劳动力，以利于劳动者在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之间合理流动，必须尽快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现在一些地方，如上海、大连、杭州、广州、齐齐哈尔等，在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时，已经把失业保险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定覆盖各类经济类型企业职工的《失业保险条例》。

（二）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失业保险不能用于仍同企业保持劳动关系的职工。但考虑到国有企业目前状况，可以用一部分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安置富余人员。上海市以大企业集团为依托，第一步把下属企业的富余人员先从企业中分离出来，集中到集团所办的服务中心。然后分类加以解决。上海纺织行业55万人，有18万人分流出来了，采取以政府支持为依托，以集团所办服务中心托管为主要形式、企业与社会共同承担分流负担的办法。这是一种过渡办法，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又没有直接给社会造成大的压力。应当允许使用一部分失业保险金支持这种做法，尽量减缓失业对社会的压力。

（三）失业保险金的使用要有利于促进再就业。随着科学技术在各个产业中的应用速度加快，以至发生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此相关，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也必须调整。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职业培训、转业培训是解决结构性失业的主要措施。失业保险不能满足于使失业者有一定的生活保障，还应当积极促进和帮助他们经过职业培训或转业培训实现再就业。为此，一定要注意失业保险津贴水平不能过高，防止一些福利国家"失业保险促进失业"的现象在中国发生；再就是可以拿出一部分失业保险基金用于失业者的培训。

（四）建立预防高失业率风险基金。"九五"时期，我国就业的压力相当大，结构性失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也可以说是1978年以来自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精简分流富余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此外，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三资企业及个体工商业从业人员增长很快，一旦经济波动，它们会很快向社会释放劳动力；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联系密切，进出口贸易占GNP的30%以上，国际经济波动也会严重影响国内的就业状况；到1995年底，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人数约5000万。面对这样的局面，要研究对策：一是推进失业保险；二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施"再就业工程"，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失业保险必须适应新的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并建立预防失业率的风险准备。

第四节　再就业工程

再就业工程是深化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而这一点在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实践证明，再就业工程可以使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员有尽快找到重新就业的机会。

一、失业的现状及成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呈连年增高的态势：1992年为2.4%，1993年为2.6%，1994年达到3%；这三年的失业人数分别为370万人、420万人和500万人。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1991年为10万人，1992年为34万人，1993年为102万人，1994年达到180万人，超过了前七年人数的总和。上述失业人数中还未包括国有企业1000多万目前已下岗、半下岗和待下岗人员及500多万不能正常领取工资的生活困难人员。几项相加，失业人数约有2000万之多。导致失业人员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有：

（一）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长期存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三方面的巨大压力：（1）城乡每年新增劳力超过1000万；（2）企业体制改革使越来越多的职工失去原有的工作，成为富余人员；（3）农村中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急待寻找就业门路。这三方面的因素相加，对全社会构成了巨大就业压力。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仍然不能满足巨额劳动力对就业机会的要求。

（二）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而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如果说传统上对生产力的解释是：生产力=（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科技，那么新的生产力公式则成为：生产力=（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高科技的乘方。这说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所起的作用已经达到要用幂级数计算的程度。相比之下，劳动力对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性明显减弱，高技术产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大大降低。

而在劳动力数量型过剩的同时，质量型短缺现象却十分严重。许多行业，尤其是那些技术含量高，对劳动力素质如技术水平、熟练程度等有较高要求的行业、部门，则明显感到人才缺乏，结构性的劳动力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三）大批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抢占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

二、再就业工程及其实施

如何使失业人员得到必要的社会扶助并尽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关系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改革能否继续深入。1993年，国务院出台了《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从1993年起，国家开始在部分城市进行再就业工作的试点，并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1994年，劳动部在全国30个城市实施了再就业工程，其具体做法是：（1）全面推进就业制度和就业服务事业发展，由劳动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组成专门机构，对失业人员进行登记，提供必要的失业救济金，开展就业培训等活动。（2）利用劳动服务企业建立生产自救基地，发挥劳服企业在这方面所具有的天然优势，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出路。（3）对缺乏一技之长或不能利用原有技能或原技能急需提高更新的失业人员进行就业培训，使其掌握某种谋生的技能或提高技术水平，尽快找到新的工作岗位。（4）实行优惠政策，鼓励用工单位优先招收失业人员。如将一定数额的失业保险金（不超过

24个月）一次性拨付给用人单位，以为安置、培训失业人员之用；政府也出面促成优势企业兼并破产企业，以便让职工得到妥善的安置。企业安置得越多，得到的优惠就越大。(5) 组织劳务输出，这既可以使一部分劳动力到国外赚取高报酬，又可为国内其他失业人员腾出不少就业岗位。

总之，通过兴办劳动服务企业，组织开展生产自救；通过政策指导，鼓励、支持失业人员组织起来就业或自谋职业；利用各种就业服务设施和培训、安置基地，通过职业指导，为失业人员介绍职业信息和求职方法；通过开展转业训练，提高再就业的能力；通过提供求职面谈和工作试用，促进双向选择。1994年，全国利用各种途径共安置城镇失业人员715万人，占需要安置人员总数的58.9%。全国已建立职业介绍机构2.5万个，就业培训中心2600多个，劳动服务企业18.8万户。有关部门为180万人发放了失业救济金，并帮助其中的108万人实现了重新就业。

三、政府在再就业工程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之中，各类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尚不完善。在失业保险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之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以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形式为失业人员提供社会救济、职工培训和重新就业的机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像这样浩大的工程，离开了政府的推动和周密的部署是难以取得成效的。从长远看，我们应当本着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但在现阶段只能由政府承担起组织、协调及具体安置等工作并承担大部分费用，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政府出于深化改革的需要和对社会稳定的考虑而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瑞典政府仅1992年—1993年度用于失业人员的各种培训费用就达170亿瑞典克朗，占全部财政拨款的23%。新加坡政府建立了技能发展基金，对因产业结构变化及其他原因而失业的人员实行有组织的培训，每年平均组织2万名职工接受在职培训，同时也对失业职工进行培训。这种“连续的铁饭碗”制度，既解决了失业问题，也解决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更新问题，促进了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我国政府在解决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完全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可以采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以劳动代替资本的战略以缓解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在农村扩大非农产业，实现让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保护、发展农民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通过资本社会化、大众化来扩大就业空间，增加就业门路；发展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导向，以便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制定职业培训计划，发展人力资本，多培养高素质人才，缓解劳动力数量型过剩和质量型短缺的矛盾；等等。此外，还要继续实施旨在规范农民进城打工的“有序化工程”，减少8000万农民工进城对再就业工程造成的冲击。总之，要真正让再就业工程产生实效，政府要热情地把这项工作当作自己的份内任务来完成。劳动部统计表明，经过再就业培训的失业人员中的80%都能够重新找到工作。政府的作用是大有可为的。

四、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难点与解决途径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作的全面推开，需要得到再就业工程帮助的失业人员也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是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那就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产生通胀。如果一味强调解决失业问题，人为地扩张经济、增加供给以刺激需求，就可能引起新一轮通货膨胀，加大已经很严重的通胀压力。从更广大的范围看，失业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扰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更多先进技术的采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员被从目前的工作岗位上裁减下来，使全球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更加难以缓解。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在认识失业这一现象的消极作用时，也应注意它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要吸取计划经济时代用隐性失业来代替显性失业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在于使劳动力这一最活跃的要素由于无法流动而失去活力的教训。高度的就业稳定会使一个单位成为一潭死水，变得效率低下，死气沉沉。而市场经济恰恰就是通过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这个意义上看，存在一定比例的失业，正是一个社会能保持较强活力和较高效率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当把再就业工程当作一项长期工作来抓，把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当作一个长远目标来努力，使其服从于、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要真正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仅仅靠再就业工程是不够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如果能创造更多的需求，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只有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使经济逐渐吸收那些处于显性及隐性失业状态的大量失业人员。要结合企业制度的改革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鼓励效益好的企业去兼并效益差的企业，从而使失业人员尽快在资源重新配置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中得到再就业机会。要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以吸收更多的失业人员在这一领域就业。另据有关资料，将100万元投资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可分别安置400人、700人和1000多人就业。可见，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大于一、二产业。目前世界各工业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约为50%～60%，我国仅为30%左右。因此，在我国发展第三产业的潜力很大。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仅仅依靠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还不够，还需要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如企业制度改革、价格改革、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及使第三产业中的产品市场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等。随着五天工作制在我国的实行，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外出购物、从事影视娱乐或旅游观光，这些都给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餐饮业、影视业及旅游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五天工作制也扩大了许多服务行业的用工需求。据预测，全国可由此增加300多万个就业机会，这也为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在我们实施再就业工程时，不能因此而放松对通货膨胀的警惕和控制。要注意把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与控制通胀问题结合起来，争取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3%的目标以内。要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努力使通胀率不突破计划规定的目标，保持二者

的动态平衡。

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和大局的稳定。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都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有关政策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推动下岗职工再就业，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把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通盘考虑。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企业改革，都要把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结合起来。各级财政要把实施再就业所需经费列人年度财政计划。要通过结构调整，使就业容量大的部门得到大力发展。在推进改革中，要加强劳动力宏观管理，规范下岗程序，把握下岗总量，关心下岗职工生活，处理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之间的关系。

（二）完善再就业工作机构，更加有效地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央和各级财政要加大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投人。要鼓励各地和社会各界积极创办职业介绍机构，多渠道、多形式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服务。政府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开发人力资源，提供资金、政策和信息服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行在政府指导和扶持下，个人自学、企业组织和社会帮助相结合，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和转业、转岗培训，使技能教育和就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不断增强职工的择业竞争力和市场适应力。

（三）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切实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加快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建立健全失业和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机制。

（四）加大监督力度，与侵害职工劳动权利的行为作坚决斗争。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已有各项再就业法规和政策的落实。政府劳动监察部门要与工会等--起，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及时纠正违反《劳动法》、侵害职工劳动权利的行为。

（五）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齐心协力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

第十二章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后，正当我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转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之时，在东南亚爆发了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从1997年7月至12月发生的金融风暴先后席卷了大部分东亚、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以及经济大国日本。风暴所到之处，货币贬值、股市下跌、外汇储备缩水、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受害严重的国家，还会伴随物价上升、贷款利息上扬和股市萎靡的情况，还会有严重的工人失业、全民收入降低以及社会购买力下降等。已有几个国家呼吁社会各界乃至世界各国给予援助，泰国和韩国已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紧急贷款援助。

部分亚洲国家如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因为不同的原因，未直接卷入风暴之中，但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抵御了这次危机的侵袭。

第一节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这次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发生。1997年7月，泰国央行被迫放弃实行已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一揽子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曼谷外汇市场泰铢对美元汇率顿时下跌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记录。泰国央行还宣布主要银行利率从10.5%提高到12.5%，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增长率，由原来的7.1%下调到4.6%。泰国央行还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由12%提高到14%。

一时间，危机迅速波及到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汇市暴跌、股市狂泻、利率上扬，外汇供不应求，通胀率大幅上升，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到1997年末，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圆对美元汇率全年分别下跌45.3%、57.5%、53.8%、48.3%，股市全年分别下跌56.0%、52.4%、37%、42%（以当地货币计)。一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东亚各国多次协调救援活动，未能阻止危机蔓延。

进入1998年，东亚汇市、股市又起跌风。1月上旬，一些国家货币汇率相继下落到有史以来最低点。据统计，5月至6月东亚各经济体货币兑美元汇率的跌幅分别是:

印尼 7.6%，马来西亚 6.4%，菲律宾 5.7%，泰国 4.6%，新加坡 1.5%，日本 0.6%。各经济体的股市跌幅分别为：新加坡 3.8%，马来西亚 3.8%，菲律宾 2.8%，印尼 2%，日本 0.4%。

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国际金融投机商进行金融投机操纵爆发的。1997 年初，国际金融投机商（金融炒家）在泰国金融市场上购买大量数月期远期泰铢合约，并约定于数月后以泰铢归还。（届时，假如泰铢升值，则出售合约的一方可以获利；假如泰铢贬值，则炒家可以用价值较低的泰铢还账，从而获利。）到五月份已积累了 150 亿美元之巨。由于市面上这类需求增加，当时泰国央行自以为能左右泰铢汇率，因而发行了大量这类金融期货合同，以图从中谋利，而这些合同大多数落入炒家之手。1997 年 5 月，当泰国央行发觉不对，要急速收兵，停止合同时，已为时太晚。

5 月中旬，泰国外汇市场上开始有人大量抛售泰铢（泰国货币），直接冲击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泰铢。不久，泰国中央银行出面干预，抛出了近 100 亿美元救市。5 月 15 日，泰政府还发表声明，强调泰币绝不贬值，泰国经济地位仍然稳固。同时，当局宣布提高利率（由 10.5%提高到 12.5%），以阻止缺乏泰铢的炒家对短期合同补仓。然而，这些国际金融投机商财大气粗，持有大量长期合约，敢与泰政府一拼高低，而泰政府根本承受不了。

果然，5 月 16 日（声明发表第二天），泰铢对美元的比价一度跌到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出现了 26.75 铢兑换 1 美元的罕见情况。到 7 月 2 日，泰金融当局宣布泰币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了实行了 13 年多泰币与美元挂钩，当日的汇市，泰铢对美元的比价跌落至一个新低点，一日间贬值 20%。（以后 7 月 15 日，跌到了 30.35，7 月 23 日又跌到 32.11。）这时外资持续流出泰国。这种局面也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8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齐聚东京，承诺向泰国提供 172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帮助泰国度过难关。泰国同时也采取许多具体应急措施以挽救金融危机，但收效不大，泰铢仍然继续下挫，到 10 月底已跌到 40.91，比 7 月 2 日贬值了 58.6%。这时泰国总理辞职，新总理川立派上台，努力将汇率压到 40 以下。

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泰国?

国际金融投机商投机操纵，是泰铢大幅度贬值的直接原因。但泰国金融危机爆发还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首先，经济增长基础与国内经济结构不适应。十多年来泰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出口推动，而其出口产品又过于单一，主要是电子产品。这种经济结构很容易受国际市场和国外竞争的制约。1996 年世界电子产品需求不旺，而国内劳动力成本攀升，导致出口产品成本提高，因而出口增长率从 1995 年的 22.5%下降为 3%。经常项目逆差扩大，1996 年达 16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以上），严重动摇了泰铢的基础，使国外投机商有机可乘。

其次，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与货币制度不适应。泰国全面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但同时仍维持原来的泰铢汇率盯住美元，联系汇率制度不变，且长期实行高利率。由于泰铢利率高于美元，泰铢汇率又与美元挂钩，外国投资者投资泰铢资产可获得较高利差，

且无汇率风险。大量外资进入泰国市场，不少是短期游资，一遇风吹草动即刻抽走，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再次，大量引进外资同时缺乏对外资的投向的引导。大量外资流入泰国，泰国外债大增，1992年200亿美元猛增到600亿美元（最高达到850亿美元）。没有正确导向，外资大量投向房地产（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0%），增加了经济增长中的泡沫成分。原来房地产价格一再攀升，后来由于经济基本条件发生变化，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房地产商资不抵债，造成银行呆账、坏账急剧增加（1997年泰国银行呆账、坏账总额达200多亿美元），降低了银行业抵御金融风暴的能力。

第四，泰国的银行系统很不完善。1992年至1993年间泰国经济发展迅速，很多钱庄扩大规模成为银行，财政状况及管理水平欠佳，对当时炽热的房地产贷款程序更欠完善。很多外汇交易盘都在离岸金融机构进行，不在泰国央行监管之下，政府很难侦察到国际炒家的活动，难以抵御。

以上是国际金融投机商为什么首先选择泰国进行金融投机的原因。

第二节　中国对亚洲金融风暴的抵御

亚洲金融危机也曾冲击过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和其他遭受金融风暴袭击的亚洲国家不同，它的抵抗力更强一些。现在分析一下它与其他国家的异同之处。

中国自80年代开始仿效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到90年代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巨大的出口需求和巨额的外资外债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强大的拉动作用。中国的产业结构也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外贸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作用也日益显著。此外，中国也曾经历过一段以“信用膨胀、股市暴涨、房地产热”为特征的经济过热发展阶段等。

但是中国和遭受金融风暴袭击的亚洲诸国不同之处是：

（一）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经济“软着陆”计划，并在1997年着陆成功。

（二）中国金融体系中也潜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如外债高达1200亿美元，呆账、坏账占银行贷款很大比重，出口增长率已从1994年的32%和1995年的23%，降低到1996年的1.5%；外资直接流入量从1993年时的1114亿美元，下降到1996年的737亿美元。这些与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前的亚洲诸国情况相似。但是中国政府确实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化解了这一风险。中国目前，无论在市场开放程度上、经济发展水平上、国内市场规模上、整体经济结构上，以及国家金融状况等方面，都与亚洲各受灾国有很大差别。

（三）中国各银行在信用扩张和超贷程度方面虽然不在亚洲各国之下，但中国民众的储蓄率很高，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有了这样高的储蓄率再加上严格的汇率管制，就使得银行体系虽然背负着很高的放债额与呆坏账率，但达到资金链断裂而导

致破产倒闭的可能性仍旧不大。

（四）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背着高额外债（1200亿美元外债负担），但就负债比例与长短期债务结构来看，仍属正常与合理的范围。例如到1996年底时，中国14.3%的负债率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低于韩国的22%，马来西亚的33%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50%。此外，中国当前拥有高达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与东南亚四国的总和（其中乾韩画304亿、泰国284亿、马来西亚247亿、印度尼西亚204亿、菲律宾109亿）。雄厚的外汇储备资源使中国足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抵挡和应付一般的突发性事件。

（五）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是任何亚洲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近来国际市场上已显现出一些需求减弱和生产过剩的征兆，又由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货币不贬值，因而带来出口减少等，但中国政府已注意到这一点，正在扩大内需上下功夫，即使东南亚或全球市场上出现产品过剩局面，中国也将拥有足够的能力将其消化在国内的庞大市场中。

（六）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足，价格低廉，其他亚洲国家都不能相比。虽然沿海一带劳工成本在不断上升，但中国内陆省份中，仍然充斥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只要中国政府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仍可将外商吸引到那些仍待开发的边远地带，使外债可以不出国门就享受到丰厚的边际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从而避免外资流失。

（七）中国银行与金融业进入市场较晚，开放程度有限，而制造业与消费品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和股市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亚洲各国。因此，金融业危机对于整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会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不像其他亚洲国家那样拖垮整体经济。

（八）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虽然有所降低，但仍有400亿美元顺差，这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贸易逆差具有天壤之别（新加坡、台湾除外）。如韩国有237亿美元贸易赤字，泰国14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82亿，泰国贸易赤字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8%。

另外，与其他亚洲国家纷纷提高利率、力保货币安全并减缓经济增长不同，中国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发展，并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由两年前的将近25%，降低到目前的3%，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未来一两年内应能仍保持在将近8%的水平（1998年因特大水灾损失为7.8%）。

（九）最根本的差别还在于中国是半封闭的货币兑换机制，屏蔽了外部市场的不利干扰，使国际金融投机商难以从人民币的汇率上兴风作浪，使中国可以安然避开这次外部金融风暴。

第三节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稳定，人民币不贬值

一、人民币不贬值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对人民币是否贬值问题，中国政府曾多次向世界郑重作出不贬值的承诺。1997 年 12 月 24 日，当时中国副总理朱镕基在北京会见“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会长根本二郎一行人时，就宣称人民币不会贬值。又据日本《经济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说，朱基在中南海接见在日本商界中有极大影响力的“经团联”访问团时说，亚洲的货币风暴迄今已有三波，若第四波出现将对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阻止第四波，人民币不会贬值。

朱镕基在 11 月底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也曾表示，中国绝不会采取让人民币贬值的对策。

关于人民币是否贬值问题，据说国内曾经有过讨论：外贸部门人士希望人民币贬值，以利出口。他们计算过，如果以目前的人民币值计算，中国 1998 年的对外贸易顺差，将减少 300 亿美元以上，等于比 1997 年减少 70%以上，打击不可谓不大。但是金融界人士则不同意贬值，他们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在亚洲还占优势，因此受到金融风暴影响范围很小，并且中国目前正在推行金融等经济改革，如果人民币贬值会造成心理上负面效果。最后，中国政府还是裁定，人民币不贬值，结束了这场争论。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决定人民币不贬值是有根据的。从短期来看，决定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原因是外汇的供求情况，而外汇供求情况又取决于国际收支状况。这几年我国的外汇供应十分充足，目前内地的外汇储备高达 140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外汇实际上供大于求。同时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也形势喜人，1997 年外贸顺差有 400 多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中央银行每天有 1 亿多美元外汇收入。此外，1997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 500 多亿美元。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决定了人民币没有贬值的压力，而有一定程度的升值压力。

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取决于该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结构是否合理。近年来，我国的物价形势相当平稳，1997 年全国零售商品物价指数还不到 1%，消费价格指数只有 2.8%，这表明物价上涨幅度极小，部分商品的价格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老百姓应当感觉到手中的人民币越来越“值钱”。这表明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很强，人民币的实际价值也是高的。此外，中国经济的强大增长潜力也是世界公认的，经济结构也不断趋于合理。所以，人民币在较长的时期内也同样没有贬值的压力。

再从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因素来看，国际投机势力不可能在我国兴风作浪。因为这里不存在国际投机势力生长的“土壤”。我国的外汇市场基本上还不是个开放的市场，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目前也没有开办外汇期货，外汇管理体制是

严格而且相对封闭的。同时，我国的A股市场也没有对外开放，国际投机势力无法进入；B股市场的盘子又很小。因此，国际游资很难对人民币形成冲击。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的外资和外债结构也比较合理。我国近年来引进的外资大多数为直接投资，外商投资的实业项目拿不动、搬不走，当然也就很难转化为游资，也不可能快速进出中国市场，对人民币构不成威胁。我国的外债绝大部分为中长期债务，不可能因为集中还债而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

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这将对我国的出口带来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短期和有限度的。货币贬值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刺激出口，但这仅仅能维持一段时间，此后货币贬值将提高进口成本，增加外债负担，引起国内通货膨胀。世界各国普遍认为靠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并不可取，也没有一个国家靠货币贬值来增强国力。从60年代到80年代，日元升值了2倍多，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和国力却迅速增强。事实上，人民币不贬值将推动我国外贸企业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有关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8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回顾

起始时间	汇率制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1981年1月1日	1. 两种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 2. 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	1. 国家公布外汇牌价。1美元约合1.45元人民币左右 2. 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1美元=2.8元人民币 3. 同时存在外汇调剂价格	1. 鼓励出口和外资流入，避免非贸易外汇收入的损失 2. 外汇留成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外汇调剂业务，产生了外汇调剂价格
1985年1月1日	单一盯住的官方汇率制与市场汇率并存	1美元=2.8元人民币	避免双重官方汇率制对贸易发展的不利影响
1986年7月5日	1987年以后，随外汇调剂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同时并存	1美元=3.7元人民币	一方面纠正高估的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国内物价上涨，人民币对内价值下降
1991年4月9日后	官方汇率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	小步微调，到1993年12月，1美元=5.8元人民币	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减轻过去一次性大幅调整对经济的冲击
1994年1月1日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1美元=8.7元人民币	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
1998年1月1日	同上	1美元=8.28元人民币（1995年底人民币汇率上升至1美元兑换8.31元人民币，并在此后保持稳中趋升态势）	国际收支顺差，国内外汇供大于求

二、人民币贬值与否的利弊

出口与引进外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贬与不贬，根本之点取决于外资流向。假如外资一如既往源源不断流向中国，人民币不贬反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的主要来源——亚洲，现在已到了资金枯竭的地步。自从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去年底，中国吸收外资金额为3600亿美元，其中2200亿美元为直接投资。仅港、澳、台三地对内地的投资即占其65%，如果包括东南亚、日本以及韩国，这个数字达到了80%。所以中国决定从1998年起对外国公司进口高科技产品免除关税。这表明中国不再把贬值作为提高其竞争力的手段，这是一个积极的象征。然而，免税并不能对吸引外商起决定性作用。

至于人民币的贬值会不会影响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从长远看会有一定影响，但短期内不会有影响。现在东南亚国家虽然劳动力便宜了，今后市场会更开放，但混乱的金融秩序不容易在短期内整顿好，印度尼西亚等国还会遇到政治社会问题，投资者必然考虑投资环境的因素。此外，投资目标也很重要，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好国内市场，外资企业的内销比重逐年增大。相反，东南亚国家经此金融风暴的打击后，消费市场萎缩，购买力下降。因此，在短期内，外国投资者的兴趣会在中国。

当然，亚洲金融风暴短期内会对外资在中国的投入有所影响，贬值打击外商投资的信心，使投资者对整个亚洲的状况产生担忧并导致观望。同时，亚洲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会促使部分投资者暂时从各个市场，包括中国调走资金，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在目前的状况下会抽回部分资金，而这三种举动都会影响境外对中国的投资。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状况：由于中国在此次金融风暴中相当稳定，目前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原先流往东南亚等金融不稳定地区的资金，会改道流向中国。

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短期外债在安全线以内。人民币不贬值也有利偿还外债。而人民币不贬值也会受到很大压力，如出口竞争受到压力，相对于东南亚货币贬值，实际上也产生人民币升值效应，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这也是目前人们预测人民币贬值的主要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很大影响，去年（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出口增长率为20%，可见出口增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如果今年出口贸易增长放慢，必然拖累整个经济增长速度。

总之，人民币存在着不贬值的客观经济因素。外界只看到出口竞争力问题而预测人民币走贬，但忽略了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人民币稳定，对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东南亚货币目前已贬值50%左右，人民币小幅度贬值不解决问题，像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大幅度贬值就会引起通货膨胀。目前中国通胀率是低了点，需要刺激有效需求，但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得不偿失，应该是调整政府机制。

综合考虑，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首先，人民币如果大贬，必然引发亚太邻国货币新一轮狂贬和出口恶性竞争，以此使中国达到提升出口竞争力的目标，得不偿失。其

次，人民币如果动摇，港元联系汇率就会失去有力的依靠，在国际投机者的狙击下必然崩溃，这又是中国政府当前所不愿看到的。

反过来看，人民币如果能顶住贬值压力，不仅有利于亚太邻国经济复元，也将提升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即使出现出口和外资双降的局面，当局也可运用多种其他政策工具，不至于一定要靠人民币贬值来应付。而且，中国正处在全面调整经济结构的转折期，本来就需要大幅增加固定资产和基本建设投资，也将相应扩大进口，还要控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坚挺反而有利。

三、人民币贬值与否与香港经济

香港与内地进出口贸易关系密切，人民币一旦贬值，首当其冲的将是港币，所以人民币不贬值是间接支持港币。保持人民币的稳定，中国政府也是考虑到了稳定香港经济的因素。目前，香港国民生产总值很大部分与内地有关。一旦人民币失守，港币也就相当危险。人们会因此对港币失去信心而大量抛售。东南亚各国出现的金融危机就可能在香港重演。

当前香港经济的隐忧是联系汇率不得不维持，但付出代价太大。香港证券市场上，期货指数有弱点而造成投机客进击。例如攻击基础薄弱的红筹股指数，对炒家来说，明显是风险低、利润大，因此他们会一次次进击。

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做无可避免地表示港币汇率必须维持在目前令人痛苦的高价位。香港的银行基本利率已在 1996 年 10 月由 8.75%提高到 9.5%。香港当局又宣布，此一利率将在 1998 年 1 月提高到 10.25%。在货币市场，三个月期的贷款利率已朝向 15%攀升。对香港这样严重依赖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经济体来说，这是极端痛苦的。根据估计，自 1997 年夏季以来，香港的房屋价格已下跌 20%左右。

中国政府及香港当局面临的政策两难是密切相连的。如果中国将人民币贬值，那对历时已经 15 年的港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的可信度将会造成破坏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最近一段时期，在香港上市交易的中国内地公司的股票一直遭到最严重的打击，反映出市场担心人民币终将被迫贬值的忧虑。与此同时，香港经济也将遭到严重的打击。中国内地的出口减缓将对香港造成重大影响，因为香港转口贸易有 60%的来源是中国内地。如果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能够与香港完整的金融体系圆满地结合在一起，将会有助于香港经济与股市结构的改善，同时也为中国国有经济的转型与改造提供可观的资本援助。

四、人民币不贬值与出口竞争力

今后对中国来说，如何在人民币不贬值的前提下，保持出口竞争力是关键。其实，这是做得到的。从出口产品结构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比较有很大不同。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较单一，中国出口产品较多样化。例如，占中国出口 20% ~ 30%的机电产品就

是东南亚无法取代的。

从生产成本看，在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还是比韩国便宜。现在中国劳动力价格与东南亚国家也差不多，但其劳动生产率则超过东南亚。何况，中国三资企业占总出口的30%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加工产业。它们的原料和零件需从欧美国家进口，一般都是以美元计价。人民币是否贬值对它们并没有影响。如摩托罗拉的手提电话零件都来自美国。在中国或在泰国厂组装，零件价格不受货币贬值影响，区别只在劳动力价格。当然，不是说中国出口贸易全然不受影响，但政府已采取出口退税和向出口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政策解决。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已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去年下半年出口增幅降为17.1%，比上半年低了9.2个百分点。中国与东南亚在出口商品结构及市场结构上，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如电子、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等非常相似，市场也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亚洲国家货币汇率贬值，在短期内将促使其出口增长12%，一年后更将促使其出口增长56%，即使扣除经济衰退的因素，实际增长也将高达46%。中国有关专家由此断定，今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金额会减少，部分出口企业的效益也会下降。如何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已成为中国外贸是否能逃过此次金融风暴的主要因素。事实上，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推动力。

五、人民币不贬值的意义

人民币不贬值的意义从狭义的观点来看，在于显示中国对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重大贡献，以及中国顾及到全球市场的利益。从支援香港及亚洲其他国家度过货币危机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不贬值是有很大作用的。中国经济在亚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亚洲各国的货币危机还未过去，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其他各国货币将进一步轮番贬值，加剧亚洲的金融危机。因此，我国领导人已多次指出，人民币不贬值是我国对亚洲金融作出的积极贡献。人民币不贬值还将增强香港居民对人民币和港币的信心，维护港币的联系汇率制，确保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定。

另外，中国对人民币不贬值，其意义不仅限于金融方面，对加强中美合作也有积极意义。自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97年访美之后，美中双边关系显然已朝向建设性的合作之路迈进。朱镕基对萨默斯斩钉截铁地保证（人民币不贬值），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深切了解此次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的严重性，同时亦突显了中国亟愿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诚意，美中双方的合作不应局限于外交或政治，在文化上、经济上、科技上和军事上，皆有广大的合作空间可资开拓，即证明了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重要性，这种支持与合作，不仅是互利、互惠的，而且可以稳定大局。

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和国际政治上已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大国，在经济上亦已快速地崛起于世界市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很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国与国之间乃是相互依存的，人民币虽属不能转换的货币，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冲击幅度

比较有限，但中国在危机中坚决表示人民币不贬值的态度，即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所应有的做法。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采取开明、弹性、圆通的政策，非但对本身有利，对国际间的合作皆有正面的贡献。

第四节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一、亚洲金融危机启示：中国金融体制必须改革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生危机，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它们开放过度，而是金融改革滞后，它们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及早解决，经营体制已经落后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不能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如果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也许能很好地处理危机，减少危机的影响程度。因此，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危机发生后都不是关闭金融市场，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借此来改善和增强它们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扩大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渗透程度。

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包括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但正因为如此，中国更加要关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难题。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而言是积极的教训，虽然风暴间接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但正面酌因素大于负面。通过此次风暴，中国要想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本，必须加速金融体制改革，并形成良好的机制。这场风暴对中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机制都有重要的价值，从积极的角度看，这场风暴不仅不会阻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反而会促进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开放。

中国现在不会出现类似东南亚部分国家那种金融危机，但金融业中隐藏着金融风险，对此不可掉以轻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报告金融工作情况时说，从亚洲一些国家金融危机中应吸取的教训是，一个国家要保持稳步发展，必须坚持宏观经济量平衡，切忌“泡沫经济”：要有稳健的金融体系和合理的货币制度；要有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对金融业开放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中国金融业隐藏着风险，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高；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问题较多，有少数已不能按期支付到期债务；一些地方和部门非法批准设立的各种金融机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股票、期货市场存在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等等。

上述问题如不及时化解，必然会动摇和破坏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良好的信用制度和稳健的金融体系，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银行必须深化改革，依法加强监管，加大金融执法力度，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1998 年有关部门将联合开展全国范围的金融执法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要

停业或部分停业整顿，直至关闭。

二、银行呆账的清理

中国国企改革以及银行经营状况的呆坏账问题其界定与国际通用的不一样。中国在1997年年底开始实行新的贷款划分办法，即与国际做法保持一致，希望经过两年的努力，使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管理达到较高水平。

与国际通行的划分不同，中国将贷款分成正常的和不良的，不良贷款中又分成三类：逾期贷款、呆滞贷款（逾期二年以上的）、呆账贷款（因企业破产、自然人死亡等原因难以收回的）。三类加总，到1997年底已达25%，其中属于呆账贷款的不足2%，大部分是呆滞贷款。若加上呆滞贷款中的一部分，中国真正收不回来的贷款也只有5%~6%。

不良贷款高的状况是多年来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企业的信用意识不强，一方面在银行大量存款；一方面拖欠银行贷款不还，宁可承担逾期罚息也不还贷。银行贷款期限也偏短，平均只有五六个月，与工商企业生产200多天的周转不相适应，这也造成了逾期贷款增多。

中国1997年核销了300亿元呆坏账，1998年将核销500亿元，1999年—2000年再每年核销600亿元呆坏账，这样中国商业银行的呆账会大大减少。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同时，中国将采取措施，在1997年或迟至1998年，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

三、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问题

自1998年元旦开始，中国将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中国金融体制朝市场化方向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国要降低金融风险，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转型，都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现代化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这也是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转变过程中的最大难题。而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又在于把国有银行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正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之举。

贷款限额是过去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做法，当局藉以控制贷款总量及流向。按照政府的意旨，它们不得不向大批没有效益、以致长年亏损的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累计呆账、坏账已超过人民币万亿元；另一方面，受到贷款规模的限制，非国有制企业即使盈利前景甚佳，仍不易得到国有银行的支持，各种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则应运而生。

实际上，中国光靠贷款限额已越来越难控制货币信贷的总量。中国已不再是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国有银行之外的多种金融机构提供的新贷款，已占全部金融机构新贷款的一半左右；当局能管住国有银行，却管不住其他金融机构，反而造成信贷管理混乱，

金融风险大增。

近年来，中国大力整顿金融秩序，迫使各商业银行减少不良贷款，限期之后达不到要求的行长就会被撤职。在此压力下，银行贷款确实小心许多，1997年出现数千亿贷款限额用不完的罕见状况。不少银行宁可把资金用来购买国库券也不愿冒险贷出，两者息率相差不多，风险却大不相同。中国经济有“过冷”的危险，银行“惜贷”应是主要原因之一。

取消贷款规模后，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方式大致上已由直接变为间接，主要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各银行须在今后三五年内，把存贷款比例由目前的89%降到75%的规定比例之下。各银行必然要想尽办法争取增加存款，提高贷款的质量，彼此竞争将趋激烈。

但在目前通货膨胀率已近于零的情况下，政府不仅不希望信贷下降，而且还要增加借贷总量。为此，中国的下一个动作将是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加快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据悉，改革后的准备金比例，将由目前的20%左右（13%的法定准备金加上5%～7%的备付金）降低到12%左右，这些措施将使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能力增强不少。而且，由于不再有信贷额度，另一些银行有额度却没有存款的失衡反常现象也得到改变，也将有利于银行增加贷款。

政府对银行实行间接控制，主要政策工具是同业拆借市场、存款准备金和利率，国有商业银行则应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主体”。但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中要做到这点仍然很不容易。如果银行完全自主经营和自担风险，它们一定不肯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及高风险的新兴产业提供资金，效益差的国有企业立即会失去贷款，大批刚转为股份制的原国有中小企业更将求贷无门，陷入绝境。政府财政规模有限，国有商业银行还是须服从政府推行特定政策的需要；即使钱款贷了出去收不回来也没有办法。

取消贷款限额后，中国金融调控机制与美国越来越接近，实质上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的银行存贷款利率仍由中央银行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仍不能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和自己的经营策略加以调整。现在通胀虽降了下来，银行仍不能按风险大小来调整利率高低，也不能用更高的利率来争取存款，缺乏市场竞争所需的灵活性。

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只是金融调控方式的变革，不会影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它仍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效应。过去分配贷款规模时，难以准确把握各地经济增长对资金的实际需求，也难以适应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主要考虑国有经济的需求，而商业银行也因贷款规模限额所累，与其他金融机构处于不平等竞争的位置。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权到位，有利于它们加快商业化转轨，可以按照效益原则选择贷款对象，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四、改革金融管理体制

中国已决定加快和深化金融改革，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建立现代金融体系。要求

各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一步从严管理，树立银行“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的良好形象。

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中国人民银行首次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若干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用二到三年的时间形成一套责任明确、平衡制约、规章健全和运作有序的内控机制，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目前国内的金融发展极不平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控方面的起点不同，以及各监督机构水平不齐和有差别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金融监管。近来金融机构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些十分严重，如：对内部监控的理解有偏差；总行和监控机构缺乏相互制约；对决策管理人员监控不足；内部监控手段和措施不力等。不久前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用三年的时间建立内部监控体制。另外，要争取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令违规经营和严重案件明显下降，使中国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内部管理方面和国际惯例接轨。

据人民银行负责人称，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逐步实施的六项举措；

（一）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二）加快国有银行和中保（集团）公司的商业化改革步伐。从1998年开始，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逐步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

（三）建立健全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加快地方性金融机构建立。在把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机构适当集中到大中城市，重点服务对象逐步转向大中型企业的同时，适当发展地方性银行。

（四）积极稳步地发展资本市场，适当扩大直接融资。在坚持间接融资为主的前提下，逐步增加直接融资的渠道和比重；进一步规范并扩大企业债券发行，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可转换债券试点。

（五）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加快行业自律制度建设。

（六）加大金融执法力度，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1998年要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一次全国范围内金融执法大检查，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要停业或部分停业整顿，直至关闭。

五、加强外汇管制，防范金融投机

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货币贬值的恐慌心理已影响到国内，不少大城市的地下外汇交易商，近来争相买进美元避险。不过，从中国拥有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来看，人民币是不会贬值的。

以往中国民众除海外旅行及业务需求外，不准以其他理由兑换美元。最近中央银行已放宽这项规定。为防范中国金融市场受到冲击，国家外汇管理局继续加强外汇检查和监管力度，以巩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维护金融外汇秩序的稳定。

中国于1994年通过外汇体制改革实行了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底又实

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这意味着中国经常性的对外支付已不受限制，正常的贸易、非贸易用汇需求一般都能得到满足。不过，在外汇体制改革取得良好成效、外汇形势较为宽松、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的情况下，境内外的一些资金也开始凭借各种非法渠道出入中国套汇、套利和骗汇。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已注意到，要巩固外汇改革的成果，必须加强外汇检查和监管的力度。

从1995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都对广东省金融机构进行外汇大检查。1996年，对全国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进行了检查。1997年上半年，对北京地区的专业银行总行进行了检查。检查中发现有些企业和个人利用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为其代理进口业务，用假报关单骗汇，以取得骗税或走私的外汇资金，外贸公司无成本地赚取代理手续费。还有一些国际投机资本，混入经常项目汇入境内，或在境内股市炒作，或在中国境内购买假报关单购汇套取汇差。

外汇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充实监管及检查人员，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对大案、要案重点调查，对发现的问题作了严肃处理。对严重违法问题，与有关部门联合给予了严厉打击。近几年，外汇管理系统投入资金，装配先进的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外汇管理系统与专业银行的电脑联网正在逐步进行，通过联网可以传递交易信息。外汇管理部门还加强了与海关的合作。1997年海关总署和外汇管理局签订了联合打击利用假报关单骗汇的备忘录，由海关负责协助核对进、出口单据，积极防范违法案件的发生。

外汇管理部门除将继续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完善外汇体制改革外，还将继续加强对违规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对有关机构和单位，在处罚之外，还将加强对其日后购汇的监管。对触犯刑律的交公安部门处理，以巩固外汇改革的成果，维护金融外汇秩序的稳定。

关于企业外汇需求问题，中国政府从1994年4月起实行外汇结汇制度，取消国内企业外汇留存，企业创汇所得百分之百要卖给银行，有需要再向银行申请购买外汇。这样一来，国家外汇储备数字跃升，其实包括了原先企业的外汇。而企业外汇需求受到人为的压抑。一旦企业的外汇需求释放出来，外汇市场供不应求，也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不久前，中国政府宣布企业可留存外汇收入的15%。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有了15%这个开始，今后就可以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不断调节，满足企业的外汇需求，不致因此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压力。在人民币不贬值以保持经济环境稳定的前提下，这是最有效的调节外汇供求的办法。

六、消除隐患，加强金融风暴抵御能力

经过金融风暴的冲击，可以预见，亚洲的金融体系必将发生根本变革，无论是被迫的，或是主动的，这是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中国不能例外，应该主动消除金融隐患，加强抵御金融风暴的能力。

中国预期将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

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以应付内外金融风暴的挑战。

另外，中国正打算打破行政区划重组银行体系，排除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使商业银行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为大中型企业服务。同时，发展地方银行，也是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所不可缺少的举措。

中国金融体系隐藏的不良贷款比重偏高、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混乱、从业人员素质差以及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等危险亟待化解，否则可能进一步引发整体金融问题。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有限，主要方法将是依靠对自身金融体制管理水平的提高。

《国际形势分析报告：1997—1998》报告认为，1997 年由东南亚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表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带来的不只是利益也存在着风险。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同一个地区内国家间的纽带已越来越紧密，各国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共存关系，因此应当努力寻求建立区域各国之间有效的协调机制。

报告指出，当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时，中国成了唯一的例外，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金融领域尚未大幅度对外开放。但中国向世界开放其金融领域只是时间问题，这将使中国面临两种风险：一是其他国家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二是国际金融体系自身危机的影响。

报告预测，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只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参加者，无力组织对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将是有限的，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危害的主要方法，将是依靠对自身金融体制管理水平的提高，而无法指望通过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来减少国际金融风险。

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外汇管理局认为，不会因为近期金融风暴给亚洲国家带来的灾难，而改变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最终目标。但改革的步伐会更谨慎。另外，对中国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中国将维持谨慎态度。

第十三章 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形势

1997年，香港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经历了150多年的风雨沧桑，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以新的姿态面向新世纪，为创造香港美好的未来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香港回归后，经济形势仍然十分稳定。

第一节 香港回归的伟大意义

我国政府成功地收回香港，恢复行政主权，对中国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意义重大。

首先，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以来由衰败走向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国人民蒙受了一个半世纪的民族耻辱，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香港回归前后，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精神，增加了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信念。在国际上，中国顺利地收回香港主权并把“一国两制”的构思付诸实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

其次，香港回归祖国，必将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同时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保持现行的经济制度不变，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了稳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香港回归之后，政治前途明朗化，彻底消除了过渡时期国际投资者和香港市民对香港前途产生的一些疑虑。现在，人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香港回归之后，同内地的各方面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将进一步密切，香港的经济发展将从内地得到强大的动力，这对于以内地作为主要市场的香港经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从另一方面看，香港作为地区性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对内地提高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将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例如，香港是内地吸引境外投资的首要来源地。据外经贸部业务统计，从1979年到1996年底，香港到内地累计投资项目数为162218个，占同期全国吸引境外投资总数的41.33%；协议港资金额为2602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协议境外投资总额的43.30%；实际利用港资金额为984亿美元，占同期全国

实际利用境外资金总额的49.14%。回归之后，香港过去在内地和外部世界之间曾经发挥的中介和桥梁作用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再次，香港的回归将促进香港和内地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回归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为内地同香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回归之后，香港和内地的合作将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双方在经济发展计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协调机制将更加完善，从而使合作的效率和成果更为显著。例如，华南地区大型基建项目的协调和功能整合，共同创造地区性经济发展优势等问题。又如，发展高科技是香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在这方面，若把内地的科技优势和香港的资金、市场开拓经验优势结合起来，将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第四，香港的回归，对加速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有重要意义。香港的顺利回归，是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具体实践，是实现祖国统一的第一步。香港的回归，有利地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和一切分裂国家的反动势力，对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香港完成了平稳过渡，实现了政权的顺利交接，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树立了榜样。

第五，香港的回归，不仅对中国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对国际社会处理争端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香港的回归方式，对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谋求和平统一、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经验，起了示范的作用，这对于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二节　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形势

香港回归后，无论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势都十分稳定。在经济方面，1997年以来，香港经济承接1996年下半年开始的增长态势，在内部需求和服务出口的带动下持续复苏。受回归因素刺激，本地投资活动非常活跃，股市恒生指数曾数次超过15000点的高水平，房地产建筑业务蓬勃发展，机器设备投资增加，消费开支稳步增长。上半年香港有形贸易出口虽然改善不大，但是旅游、运输、贸易服务及金融等服务行业出口表现理想，作为亚太区重要商贸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经济好转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进口物价下降则舒缓了通胀压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和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较低的失业率，为回归后的香港经济提供了一个稳定、有利的发展环境。

香港1997年首季度的本地生产总值取得6.1%的实质增长，比1996年同期的4.0%和1996年第四季度的5.7%有明显改善。第二季度，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同上年同期相比实质增长6.4%。1997年推动香港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

（一）香港的回归，使本地工商界投资信心迅速增强，投资市场活跃。

（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以及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和行政

领导班子得到港人和国际投资者的认同，许多持观望态度的投资者纷纷进入市场；加上中国内地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香港企业在内地的投资机会增加，盈利前景乐观，吸引大量国际及本地资金流向股市和地产。1997年以来反映香港股票价格的恒生指数屡创新高，较1996年底上升逾一成，过去一年的升幅更高达三成。股市高涨吸引更多公司利用股市集资，上半年新上市公司多达42家，中资企业和中国国企受到投资者欢迎。1996年开始复苏的物业市场1997年更为活跃，各类物业价格普遍上升两至三成，上半年楼宇转让宗数比1996年同期增长四成，成交金额增长一倍多。由于楼市旺盛，发展商纷纷加快楼宇建设，首季住宅建造工程完成量较去年同期增29%，批准动工的楼宇面积较1996年同期上升31%，弥补了建筑业因基建工程接近所形成的空档。此外，机械设备投资也有显著增长，其中新机场和机场铁路已进入机电工程部分，购置大量设备。而本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积极推行电脑化，也增加了机械设备的投资。1997年第一季度，本地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增长18.9%，其中楼宇及建筑增长2.7%，机器及设备增长26.3%；第二季度，本地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增长16.2%，其中楼宇及建筑增长6%，机器及设备增长15.4%。

（三）消费市场继续好转。经济环境改善、投资市场活跃、股价楼价上升，对消费市场有一定的刺激作用。1997年第一季度私人消费开支增长5%，第二季度大幅上升8.7%。另外，1997年7月前后，与九七回归有关的物品特别受欢迎，商人（包括政府）借机推出大量回归商品，形成一次又一次的购买高潮。

（四）中国内地经济持续较高速增长，推动香港服务业的发展。199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实质增长约9.5%，前5个月进出口贸易增长13%。虽然内地直接贸易的发展减少了对香港转口的依赖，使香港有形贸易未能像以往那样受惠，但是香港通过离岸贸易仍然可以分享内地贸易扩大的成果，其中包括为内地提供转运服务，以及提供各种离岸贸易服务。1月—4月香港港口货箱处理量较上年同期上升10%，其中货箱码头处理量更增14%。1月—5月香港空运货站理货量增幅达17%，其中转运量增24%。香港的服务出口还包括旅游、金融和其他专业服务等。1997年来港游客持续增加，1月—4月已达4.92万人次，较1996年同期上升9%，其中内地游客继续居香港游客来源首位，增20%。在本地酒店和宾馆房间数目增加的情况下，1月—4月入住率仍保持去年同期87%的水平。1997年多家中国国企在港发行H股，亦有香港中资公司进行国际招股活动，香港不少金融和会计机构参与其中，向内地和海外输出了专业服务。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1997年香港物价上升态势平稳，1月—5月甲类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平均上升6%，与1996年全年平均增幅持平。进口粮食和消费品价格因来源地通胀降低而受抑制，对舒缓本地通胀有一定帮助。

1997年下半年，香港经济，特别是股市，受到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影响。1997年第二季度以来，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货币相继受到国际金融投机者的密集狙击，外汇市场剧烈动荡，汇率反复下降至多年来的最低点，利率则升至空前的高水平，股市受到拖累而急剧滑落，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自1997年1月初至9月初上述5个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价均有不同程度的跌

幅，按跌幅的大小排列，依次为：泰铢下跌28.54%，印尼盾下跌21.88%，菲律宾比索下跌18.78%，马元下跌16.67%，新加坡元下跌8.31%，其中大部分的跌幅都是在7月—8月期间出现的。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动荡，成为继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又一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在东南亚国家得手以后，国际金融投机者开始对港元采取行动。7月份，国际炒家开始小规模狙击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入市干预，击退了这次狙击。8月中旬，国际炒家再次行动，在国际汇市炒卖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采取措施，使银行隔夜拆息大幅扯高，炒家在汇市中再次受挫。但是，由于高利息加上外围股市气氛的影响，香港股市在连续大幅上升4个月的情况下出现显著回落，8月15日和19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1点和619点。10月下旬，国际金融投机者卷土重来，在汇市和股市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狙击行动，香港金融管理局为了捍卫港元的联系汇率，全力抽紧银根，使银行同业拆息一度高越300厘的水平，使港元现汇曾出现了1美元兑7.6港元的高水平，这是自1983年港元联系汇率制度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象。股票市场由于受到空前高息的影响，大幅下挫。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一度下跌1700点，创单日下跌记录。在10月20日—24日的5个交易日内，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00点，从8月初的16673点高位跌破万点大关。这是一次对回归后香港的严峻考验。经过这次考验，证明香港特区政府对处理类似危机是有能力的，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取果断的措施，击溃国际炒家的狙击。同时，也表明香港各界人士对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前景是充满信心的，能够齐心协力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表明香港的经济实力是强大的，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各种困难和危机。同时，这次金融风暴也考验了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状况和香港居民对香港的信心，有舆论指出，香港在回归之后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这次金融风暴发生在人心不稳定的时期，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于1997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幅度较高，尽管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的幅度会有所缩小，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会达到5.5%的目标。展望1998年，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为：

1. 香港利率趋升，将使企业的经营成本加大，影响企业的扩张，对企业的购置固定资产的消费形成制约，同时有可能对香港的地产业带来不利影响；

2. 股市汇市的波动，将影响到居民的私人消费；

3. 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从而使香港的出口及服务价格相对变高，从而降低了香港在国际商品和服务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4. 1998年，若干政府的大型基建项目处于前期准备过程，政府消费开支不会对经济增长提供很大的推动力；

5. 估计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在连续几年强劲增长后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这会影响到香港的外部经济环境。

这样，1998年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比1997年放慢。1998年，住宅建设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同时由于香港的主要服务业市场是内地，而人民币并没有贬值．从而使香港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这将对香港经济提供有利的支持。经过1998年的调整后，香港的楼价和服务业价格会有所回落，这会提高香港的竞争能力。到1999

年，随着大规模政府基建项目的正式开工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香港经济将会进入新的增长时期。

从目前的情况看，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对于香港来说，应付国际金融炒家的挑战，保卫联系汇率制度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联系汇率制度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同，香港一直是全球自由度最高、最为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经过百多年市场机制的运作，香港逐步建立起一个开放而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制度，并在多次国际金融风暴的考验下日益走向成熟。但是，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金全球化的趋势汹涌澎湃，国际投机资金的势力空前壮大，这些都使香港的金融体系面临新的考验。因此，香港在继续保持金融市场高度自由化的同时，也必须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提高监测国际投机资金流向的能力，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使金融体系无懈可击，以防范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从经济实力上看，香港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国际炒家的狙击，再加上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表示大力支持港元联系汇率，从而使港元的地位更加巩固。相信香港能够最终经受住这次东南亚乃至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成为新兴经济体中受金融风暴影响最小的经济体系。

第十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中的尖锐斗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人帮”那一套极左路线虽然被否定，但是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对“文化大革命”后我国经济发展的走向，有很大的影响。争论的问题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即：(1)“两个凡是”问题；(2)姓“社”姓“资”问题；(3)姓“公”姓“私”问题。

以下详细分析。

第一节　“两个凡是”问题

一、“两个凡是”的提出

“两个凡是”问题，是华国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人帮”被打倒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华对“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抱肯定态度。他在1976年10月8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上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有所不足。“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他还肯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在197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中还特别指出：“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胜利。”2月7日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通称“两报一刊”）重要社论中明确提出“抓纲治国”问题。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主持工作所发表的一系列的观点和意见。

华的这些观点意见，主要是建立在他的“两个凡是”理论基础上。早在1976年10月，他就讲到，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两个凡是”正式提出是

在华国锋批准发表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原文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这样，按照"两个凡是"的说法，被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天安门事件"就不能翻案，邓小平也不能出来工作（邓小平1975年再次被批判）。这也正是华提出"两个凡是"理论的目的。

本来1976年4月5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人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但却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周于1976年1月8日逝世，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群众因悼念周恩来而遭到镇压）。粉碎"四人帮"后，本来应该平反，但因"两个凡是"理论，不予平反，因此，在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北京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悼念周恩来。

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也是一样。按照华国锋"两个凡是"意见，也不予解决。

不过，"两个凡是"方针公布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对。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些领导同志起来反对"两个凡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为邓小平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华国锋没有同意，说什么中央对解决邓小平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的，等等，所以不能动。

二、对"两个凡是"理论的初步接触

对"两个凡是"的理论，首先是邓小平亲自出来反驳的。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复职的情况下，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问题。他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一些讲话，来说明什么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后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又作了更详细的阐述。他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毛泽东历来也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不能因为毛泽东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而是应该爱护和尊重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是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还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两个最根本的内容，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时不但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等待平反，其他一些冤假错案，也在等待平反。但

是“两个凡是”不突破，所有平反都是不可能的。1977年8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大”，华国锋在“十一大”上所作报告中，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并提出了四个“坚持”，即：（1）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2）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及时；（3）坚持反右，反对反“左”；（4）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如在经济上坚持农业学大寨等）。

以上这四个“坚持”，实际上是“两个凡是”理论的具体化。

看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必须从理论上深入地进行分析批判，才能解决。

三、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在“两个凡是”问题的解决中，这时出现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过程是：

首先，1978年初在胡耀邦组织指导的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所写《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中，曾提出研究党史应遵循的原则：一是应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进行研究。再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这时一些刊物上出现了研究工作应该实事求是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的讨论。最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亲自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1978年5月10日），第二天（11日）《光明日报》刊载，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文章着重指出，随着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实践也在不断地发展，新事物和新问题也会层出不穷，对新事物和新问题的研究所作的新概括和所提出的理论是否正确，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呢？惟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用实践来检验。另外，任何思想、理论即使在一定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有力地从理论上、思想上戳穿了“两个凡是”的虚伪性，打破了用“两个凡是”加到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精神枷锁，使人们获得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同。又有不少人发表文章支持，各地也纷纷起来发表文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从8月到11月，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分区负责人纷纷表态，公开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

在这种形势下，从11月10日到12月5日历时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迫于大家的压力，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平反了。

会上大家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

的实事求是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华国锋在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虽然检讨很勉强，也不深刻，但终究表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取得了胜利，而"两个凡是"失败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否定了"两个凡是"理论，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而且还为12月18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深刻批判了"两个凡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外，全会还决定，撤销了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结论。全会还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的方针政策。

总之，"两个凡是"问题，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彻底被批判、被否定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9第一次反对"左"的思想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第二节　姓"社"姓"资"问题

一、姓"社"姓"资"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斗争中第二个大问题是围绕着姓"社"姓"资"问题展开的。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社会上就有一些人对政府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看法，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既然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那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呢？提出要质问姓"社"姓"资"的人认为，他们（搞自由化的人）的经济根源就是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怎样会出现这些人物，因此，他们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的性质提出质疑，是姓"社"还是姓"资"，即改革的性质问题，改革究竟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改革"。他们提出这样的质疑，很明显，是把党所实行的改革，看成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什么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呢？"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因为改革的实行，改变过去公有制的绝对统治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他们认为，这就是要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另外，他们认为取消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化，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是把市场经济看作为资本主义经济。

他们还把要不要问姓“社”、姓“资”问题，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光明日报》1991年8月7日转载的《高校理论战线》同年第3期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其中谈到：“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他们不仅对政府实行的改革，一般的提出质问，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有的文章还直截了当地指责政府实行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改革的政策是“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问题越提越严重，对政府实行的改革全面加以否定。

这时正值苏联、东欧发生巨变，质问政府改革开放政策姓“社”姓“资”，更是甚嚣尘上了。

二、对质问姓“社”姓“资”的反驳

正当姓“社”姓“资”问得起劲的时候，1991年2月15日，农历年正月初一，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和《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写的文章，署名是皇甫平，是黄浦江畔的评论的谐音。

文章着重分析了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论证了上海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只有改革一路，文章指出：“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3月2日，皇甫平再次发表署名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着重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说明，即“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文章还批评了总是以姓“社”姓“资”来加以责难，会使改革“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之中。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三篇署名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对扩大开放问题作了阐述，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如果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后来出版的《交锋》一书的作者，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说：“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正是利用问一问姓‘社’姓‘资’，来制造思想混乱，干扰改革开放，使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来大好形势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这种‘问一问’的惟一作用，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

《交锋》作者指出，对在“三个有利于”条件下，实行的改革开放措施，先诘问姓“社”姓“资”，实质上就是企图阻挠改革，否定改革。他指出：

> 其实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极左思潮就在不断地问，不断地答。
>
>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首先突破的。在那个时候，有人就问过，包产到户姓“社”姓

"资"。答案是：这是单干，是倒退，姓"资"。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生气勃勃，也有人问过它姓"社"姓"资"。答案是：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姓"资"。

建立特区，有人问过姓"社"姓"资"。答案是：在特区里，只有那面飘扬的旗子是红的，其他都是"白"的。姓"资"！

浙江温州、福建石狮，个体私有经济起步早，发展快，名声大，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那里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国有经济，姓"资"。

城市企业改革，搞厂长负责制，有人问过姓"社"姓"资"。答案是：这是削弱党的领导，姓"资"。

鼓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是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这是私有化潜行，破坏社会主义基础，姓"资"。

多利用一点外资，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多一份外资就是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姓"资"。

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比如海南洋浦），姓"社"姓"资"？答案是：这是出卖国家主权，它不仅是姓"资"，简直是卖国，是卖国贼！

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答案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姓"资"。

改革开放以来，最实质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于逃脱姓"资"的厄运。

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

在提问姓"社"姓"资"中，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如计划与市场问题、改革开放问题、特区设立问题、"三资"企业问题等，其中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的最多。

如有人说；"他们（指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又有人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而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之属性。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美化资本主义。"这很明显，是把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人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

1990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科学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文章，把对计划经济的批评，说成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文章说："一些人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化的主张……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

可见，计划和市场问题，已经不是一般问题，已经上纲上线，把计划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把市场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同时，把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拉到了一起。

1992年1月—2月，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对以上问题作了说明，给了"左"

的思潮以有力的回击。

邓小平首先指出，当前思想领域中的主要倾向是“左”的思潮的干扰。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邓还针对改革开放被质问是姓“社”姓“资”，是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因而迈不开步子，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特区”的设立问题，有人说姓“资”。邓说，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

对“三资”企业问题，邓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当然邓小平南巡，还对计划与市场问题作了重要讲话，解决了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他打破了“左”的思想的禁锢，就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他指出，中国当前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还指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三个“有利于”改革标准理论问题，使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成熟和完备，也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诘问姓“社”姓“资”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文章，集中攻击邓小平讲到的对“什么叫社会主义……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看法。《交锋》一书的作者揭示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讲话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了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巨大勇气。《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一文的作者，明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说：“‘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这种批判的语气，不禁让人们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种口吻。)

《交锋》作者继续分析说：“在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中，自以为对社会主义十分清楚的作者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主要内容就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要问一问这篇文章的作者，1997 年，党的“十五大”确认：‘非公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并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十五大’这些决定对不对呢？‘十五大’之后，我们国家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谁》一文的作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二者必居其一。假如是自己还没搞清楚，就蛮横地批判别人‘不清楚’，那么，这除了是扣帽子、打棍子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第三节　姓“公”姓“私”问题

继姓“社”姓“资”论争之后，1995 年初，社会上又出现了姓“公”姓“私”之争，即指责政府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私营经济比重增大，出现了“私有化倾向”，“向着私有化方向迈步”，是“和平演变”的过程，发展下去会使资本主义复辟。

在这方面指责比较多的，主要表现在几次“万言书”中（四次）。这个问题一直到 1977 年 5 月 29 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报告和 1997 年 9 月 12 日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才解决了姓“公”姓“私”的论争。因此，有人把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和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当作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 1978 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战胜“两个凡是”；第二次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

一、第一份“万言书”

“万言书”本来的题目叫《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文章可能写在 1994 年底和 1995 年初，未公开发表，但流传很广。由北京传到各地，内容有万字以上，故通称“万言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解除了姓“社”姓“资”的束缚，思想上得到了解放，经济上贯彻中央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和发展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各种经济成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第一份“万言书”出台了。

“万言书”中列举了1980年到1994年间，各种经济成分发展演变的情况，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而作为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则相对减少（国有比重由76%下降为43.3%，集体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上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有由51.4%下降为41.3%，集体由44%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上升为30.8%）。

“万言书”作者认为，私有经营的比重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作者认为，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正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出现。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现在资产阶级重新出现，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他们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社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万言书”还谈到“社会意识的变化”和“执政党的变化”。

以上是第一份“万言书”（即《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主要内容。“万言书”还上书党中央，企图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万言书”，社会上反映很强烈，有的私营企业主听说后，甚是惊恐。有的还转移了财产到国外。理论界则议论纷纷，有的人不同意“万言书”的意见，如《交锋》作者说，“万言书”“人们私下将它看作一份‘左派纲领’，甚至看作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檄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熟知这种行文策略：以偏概全，以一当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局势’的危险性，从而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

二、“访苏报告”

1995年正当第一份“万言书”在社会上流传时，同年12月21日一份访俄报告《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又推了出来。该报告是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访问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与一些俄罗斯经济学家座谈、交流，回国后写成的。

这位教授访俄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原来的社会主义苏联如何演变成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报告是想借俄罗斯学者之口，要中国接受苏俄改革失败的教训“以俄为鉴”，终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

“报告”介绍说，俄罗斯学者陈述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今日的资本主义俄罗斯，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第

二阶段，另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出来发表各种言论，归纳起来主要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第三阶段，作为政治家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利用共产党的政府权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即经济制度市场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私有化，政治上摧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建立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整个演变过程的核心是经济上的私有化。私有化出现了一批暴发户，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毁掉了社会主义经济，使共产党下台，改革遭到失败。结果苏联解体，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出现。

"报告"还借俄罗斯学者的口说"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中国应该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主要两点：首先要识破骗子；再是，绝不能搞私有化。

"报告"结束时，还借俄罗斯学者之口发问。这位俄罗斯学者说，他不久前曾访问过中国，知道中国的国营企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他说，你们说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了，依我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越来越大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社会主义成分。你们有什么有效办法保证中国不变成资本主义呢？

以上是"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借外国人（俄罗斯学者）之口来说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停止。"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前苏联之覆辙"。

苏联解体是一个历史事实，它是 1991 年 12 月 25 日解体的（是由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终止，他履行的总统行为，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蓝、红、白三色旗升起，叶利钦上台）。到底苏联是怎样解体的？这个问题现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有不少人正在研究。因此不应忙于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说明，就是中国所实行的改革与原苏联的"改革"是不相同的。因此对于苏联解体的问题，还应多多研究，不宜多发表什么意见。目前应该着重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所以，邓小平就主张，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划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主要是经济改革）。他提出"韬光养晦，静观事变"的方针，来对待苏联的变故。

三、第二份"万言书"

1995 年夏秋期间又出现了第二份"万言书"，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这份"万言书"与第一份一样，仍然是在论证我国国家安全已面临严重威胁。不过，这次作者是侧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形势来"反和平演变"的。

作者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我国的重大变化。在国内经济方面，计划和市场两者都不理想，中央调控能力大大削弱，把西方理论和经验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盲目崇拜，国有资产被大量吞食侵占，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私营经济迅猛发展，成倍增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我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

中，存在着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思想代表、经济代理势力，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也是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

在国际方面也存在构成基本威胁的力量，其中“和平演变”最为关键。因而“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交锋》作者对第二份“万言书”评论说：“万言书”作者提出了“和平演变”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所遵循的途径，有如他们自己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交锋》作者还指出，“我们还记得，在‘文革’中有两个相当著名的口号：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第二份“万言书”全部评论的焦点也有两句话：一句是‘和平演变’是最严重的威胁；一句是‘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是最大隐患’。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中国的事情，则就不仅仅是给改革套上一条新的思想枷锁的问题，还要完全地取消改革，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去。”

1996年春，4月15日《经济日报》理论周刊发表了晏智杰的文章《中国经济改革不容逆转》，这是针对“万言书”和“访苏报告”的批评文章。文章开头就指出：“最近一段时间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有个别人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出质疑，据说是借外国人诉说其本国改革失败之口，要我们引以为鉴”。接着说到“万言书”的观点：“有人说，如果不是改革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似乎改革是混乱之源。”文章说：“国有企业的现状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但以此为据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甚至主张开倒车，却是不可取的。应当说，国有企业陷于困境，根本的原因在于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而不是因为改革所致。改革只是造成了一种使这些弊端难以再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和环境。”文章还指斥“万言书”的作者，“搬出前人的某些本本或条条，说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我们就应该告诉他，这是本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文章还不指名地指责“访苏报告”的作者：“有的同志引述据说是某国学者的看法，认为该国改革失败了，于是某国学者认为中国有必要‘引以为鉴’。似乎如果中国不立即悬崖勒马，必重蹈某些国家的覆辙。”文章说：各国国情不同，“就算该国的改革失败了，也不能就此断定中国的改革必败无疑。”

1996年7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东方更夫的《引进外资与国家安全》文章，是针对“万言书”所说“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将导致对外国的依赖”。文章评论说，“外资”和“外国”并不是等同的概念。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商人无祖国”。资本和国家分离已被认为是现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当前国际关系的实质是相互依赖。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很难说，谁更依赖谁。文章还评论说，“万言书”认为，外资的大量涌入，将危及我国的安全。这种说法完全不对。外资纷纷涌入中国，正是中国经济富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第三份“万言书”

第三份“万言书”大概完成于1996年12月到1997年1月。其主要观点已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署名“本刊特约评论员”。

第三份“万言书”的中心，主要是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方针，认为这是私有化的主张（也就是姓“公”姓“私”问题的诘难）。

1995年下半年，中央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抓大放小”方针。“抓大”，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一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放小”，就是将一般国有小企业扭亏无望的、产品无市场的，将其或者兼并，或者租赁、承包，或卖掉，或破产处理。本来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但是“万言书”的作者却认为是私有化。

另外，第三份“万言书”不同意一般经济学家关于从资产比重优势和主导作用方面理解和确定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分化。”

“万言书”还认为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也是私有化，“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万言书”还说，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比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

这里可以看出，“万言书”的作者，是打着国有企业比重下降，私营企业比重上升，因而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幌子，来反对中央“抓大放小”方针的。

“抓大放小”方针是中央针对国有企业现状所采取的一种改革新措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曾经采取过简政放权、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以及股份制（试点）等形式。“抓大放小”是在采取这些形式后的一种新的措施。关于改革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应该是允许的。邓小平就讲过，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搞改革要敢于大胆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6年春夏之交，江泽民总书记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也说过：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深化。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

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问题，朱镕基在他做副总理的时候，就对“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性质变了这个问题，讲过他的意见。他说，我们讲的是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项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60%，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

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了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清楚了。中央没有因为第三份“万言书”的意见，就停下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是坚决继续地前进。

五、第四份“万言书”

1997年一二月间，第四份“万言书”又出台了。第四份“万言书”还是打着“反自由化”的招牌，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名单，还列出许多出版单位和媒体，这些单位和媒体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持着。还点了一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倾向的书籍。对第四份“万言书”的这种做法，《交锋》的作者揭示说，这是“中国人在‘大批判’年代中通常说的‘点名”。其目的“是要纠正当前各级党委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

以上是四份“万言书”为代表的“左”倾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问题的论争，还是在江泽民总书记的“五二九”讲话和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集中解决的。

“讲话”和“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万言书”或其他“左”倾观点，但有些讲法，针对性还是很强的（就是针对“万言书”中的“左”倾观点而讲的，看过“万言书”和其他“左”倾文章的人，都能看出），江泽民针对“左”的思潮的干扰，强调坚持和维护邓小平理论地位，对姓“社”姓“资”问题、姓“公”姓“私”问题等，在他的“讲话”和“报告”中也都涉及到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直接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并引用了邓小平的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二）针对“左”的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干扰，而强调邓小平理论地位。他说：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又说：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重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理论。他指出：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江泽民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针对“公”、“私”比重问题，公有制主体地位问题，他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民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还改变了对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这一传统提法，改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坚持维护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方针。他说：要着手搞好整个国民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五）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问题，他说：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第十五章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年—1997年，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年均增长8.4%。经济高速增长，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节　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七位。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1997年达74772.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4.9倍。若按世界银行汇率法估算，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0554亿美元，位于美国（76901亿美元）、日本（47723亿美元）、德国（23195亿美元）、法国（15266亿美元）、英国（12202亿美元）和意大利（11554亿美元）之后，而居世界第七位。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位次之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位次变化情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1997年	
	百万美元	位次	百万美元	位次	百万美元	位次	百万美元	位次	百万美元	位次
美国	2587100	1	3946600	1	5392200	1	6952020	1	7690100	1
日本	1039980	2	1327900	2	2942890	2	5108540	2	4772300	2
德国	819140	3	624970	3	1488210	3	2415764	3	2319500	3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1997 年	
	百万美元	位次	百万美元	位次	百万美元	位次	百万美元	位次	百万美元	位次
法国	651890	4	510320	4	1190780	4	1536089	4	1526600	4
英国	522850	5	454300	5	975150	6	1105822	5	1220200	5
意大利	393950	6	358670	6	1090750	5	1086932	6	1155400	6
加拿大	253350	7	346030	7	570150	7	568928	9	583900	9
中国	252230	8	265530	8	364900	10	697647	7	1055400	7
巴西	237930	9	188250	9	414060	9	688085	8	773400	8
西班牙	108320	10	164250	11	491240	8	558617	10	570100	10
墨西哥	166700	11	177360	10	237750	13	250038	13	348600	16

（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1978 年—1997 年，中国煤炭产量始终保持世界首位：谷物、棉花、油菜子、猪牛羊肉、钢、布、水泥和电视机等八种工农业产品分别由第 2 位至 16 位上升至世界第 1 位；发电量和化肥产量则分别由第 7 位和第 4 位上升至第 2 位；原油产量由第 8 位上升至第 5 位。

工农业产品产量的提高是以工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为基础的。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耕作的机械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1996 年，机耕面积已占总播种面积的 39.9%，化肥施用面积已占 87.3%，农药施用面积已占 67.7%。在工业生产方面，1997 年全国生产标准煤 131989 万吨，是 1978 年的 2.1 倍；全国生产电力 10800.2 亿千瓦时，是 1980 年的 3.6 倍。

（三）对外贸易总量跃升世界第 10 位。1978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有 206.4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27 位。其中出口额为 97.5 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7.5%，居全球第 28 位。1997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至 3251 亿美元，比 1978 年扩大了 14.8 倍，居世界第 10 位。其中出口额达 1827 亿美元，比 1978 年扩大了 17.7 倍，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3.3%，居全球第 10 位。

（四）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二位。1978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 1.67 亿美元；1997 年底增至 1399 亿美元，增加了 830 多倍，仅次于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

二、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有，举世罕见

1978 年—1997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9.8%，这一速度不仅高于改革开放以前 1952 年—1978 年 GDP 年均 6.1%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同期世界上多数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 6.5 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 7.3 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 6.5 个百分点，比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省、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高出 1.9 个～3.5 个百分点。

三、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8.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6.0元增加到5160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2%。1997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280亿元，加之手持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居民总共拥有的金融资产超过60000亿。

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1997年的2677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7.7%，明显高于前26年年均增长2.2%的幅度。在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7年的55.1%；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比1978年降低11个百分点，降至46.4%。

据估计，中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生活目标，其中，城市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已达90分（100分为满分）；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已达81.5分。

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演变为1997年的18.7:49.2:32.1。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基本上符合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演变的普遍规律，即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在第一产业内部，突破了“种植业独撑天下”的局面，实现了农、林、牧、副、渔各产业的共同发展。在第二产业内部，改革开放后的这一段时期内，中国轻重工业的发展经历了“轻工业优先发展→轻重工业同步发展→加强基础工业建设→重工业较快发展”的变化过程，经济增长来自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制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在第三产业内部，中国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新兴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迅速，改变了第三产业以商业和饮食服务业为主的“量小、单一”的传统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区域结构（产业布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改革以前，在地区发展方面，中国实施的是均衡发展战略，强调的是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各地区经济的自成体系，而忽略了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地区发展战略逐步发生了变化，由强调各地区经济的自成体系转变到强调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虽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局限性的影响，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据测算，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大部分地区的工业行业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行业产值结

构的相似系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30个省市区中（四川和重庆为一个经济单元），结构相似系数下降者有24个。

五、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的经济都得到了快于改革以前的增长，都享受到了经济繁荣带来的益处。但是，各地区的发展速度并非一致，在发展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以江苏省和贵州省为例：1978年，江苏省的人均GDP为419元，贵州省的为168元，江苏是贵州的2.5倍，两者的绝对差为251元；1997年，江苏省的人均GDP为9344元，贵州省的为2215元，江苏是贵州的4.2倍，两者的绝对差为7129元。20年来，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31%下降为27.5%，西部地区由16.5%下降到14.1%，而同期东部地区则由52.5%上升到58.3%。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各地区的绝对差别也在不同程度地扩大。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差距明显扩大，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幅度小于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但是，从绝对量上说，这种差距的扩大还是比较显著的。1981年—1997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了12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0.6倍，西部地区增长了10.3倍，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增长明显地快于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例关系由1981年的1.18:1:1.06演变为1.45:1:1.04。

六、城市化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以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一直在8%左右徘徊，城市总人口（包括农业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2%；到1997年，市区非农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7.7%，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3.8%。1978年，中国有193个建制市，1997年，中国的建制市扩大到668个。通过20年的发展，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开始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功能互补的城市群：以北京、天津、青岛、沈阳、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小城镇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1997年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已达382个。

第二节 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实现的。

一、在“双轨”体制并存中实现的

1978年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坚定地推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1997年，在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4.4%下降至15%以下，除粮；棉以外，其他农产品已全部放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7%下降至5%以下；在工业品出厂价中，按市场价格销售的生产资料比重已占96%以上。中国的改革是多方面的，除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外，还包括投融资体制、企业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分配体制等的改革。由于中国的改革是逐步展开的，改革开放的20年实际上也是“双轨”体制并存的20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迄今还没有彻底地建立起来，旧体制的痕迹在某些领域（如投资领域）还明显存在。因此，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在“双轨”体制并存中实现的。

二、在不断深化的开放中实现

如果说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是在对外封闭的环境中运行的话，那么，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的运行便由封闭走向了开放。1980年，中央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中央决定开放大连、青岛、宁波等14个沿海城市；1988年，中央决定成立海南省并将之辟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2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20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扩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对外开放除了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还加快了中国利用外资促进自身现代化的步伐，使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从1979年至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累计3483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63%以上，达2200多亿美元。正式投入运营的外资企业12万多家，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余额达644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70%以上。1997年底，世界排行榜前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来华投资的达200家以上。

三、经济增长的支持力量逐步多元化

197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公有经济支持的。在农村经济中，人民公社制度排除了其他一切经济形式。在工业经济中，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00%（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到1997，年底，全国注册的工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4947万家，从业人员4200万人；“三资”企业23.6万家；股份制试点企业68万家，注册资金17302亿元。据测算，1997年，中国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5.8%。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

四、不断的技术进步推动著经济增长

1978年以来，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科技实力不断增强。1997年国有企事业单位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049.5万人，比1978年增长3.7倍。全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262万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168万人，占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64.1%。1997年，全国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30566项，而1980年只有2687项，前者是后者的11.4倍。据统计，1981年—1995年全国共取得科技成果7.3万项，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占35%，国内领先水平的占36%。1995年中国研究与开发（R&D）支出总量水平列世界第17位。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7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2.9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29.3%。在农业科技方面，仅在“八五”期间，就培育出300多个新品种，新增粮食300多亿公斤，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增加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在工业技术领域，1997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新产品实现利税达3631亿元和524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加3.5和4.1倍。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经济结构不断变动和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因此，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举其要者如下。

一、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因此必须进行经济改革。中国的改革与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不同，它不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即实行以贸易、价格自由化、快速私有化、严厉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蓝图的激进经济改革，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从计划经济最薄弱环节——农村和农业开始，然后逐步向城市和其他领域推开，最后动摇计划经济的基础——中央计划体制。这是一种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的改革方式，是在始终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

另外，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阶段，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阶段，最后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经验是：（1）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突出问题；（2）在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渐进中求突破，在突破中求完善，在政治和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二、实行掌握主动权的对外开放政策，努力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改革一样，也是以渐进方式进行。中国的开放，经历了试点起步（1979年—1983年）、重点延伸（1984年—1987年）、沿海铺开（1988年—1991年）和全面推进（1992年以后）四个阶段。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经济正在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0%上升到1991年的31%，并进而上升到1997年的36.1%。以此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中国是印度和巴西的2倍左右，甚至也高于美国和日本。除此之外，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还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地域和产业领域的广泛进入。90年代后，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了2000多亿美元，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尽管集中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在制造业租房地产业，外商投资已具有相当深度。1995年，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占制造业全部投资的份额已达到41%；房地产业所占投资份额已达35%。在服务领域，如商业零售、金融和电信领域，外资也实现了进入实际市场。到1997年底，中国共有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544家，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170多家，包括外国银行分行142家，中外合资银行5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资保险公司8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家。其中9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商业零售领域，虽然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外资商业零售机构只有十几家，但实际营业的外资零售商场

已达数百家。

应该指出，中国对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对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十分谨慎的。在金融风暴席卷东亚地区的时候，中国能安然无恙，是中国实施的“在开放过程中掌握主动权，根据发展水平和对外部形势变化的驾驭能力决定对外开放的程度速度”战略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经济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富民政策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提高人民生活方面，采取“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实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富民政策”，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中国经济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经历了28年的发展，但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仍然相当贫困，居民消费仍然处于贫困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逐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放弃了旧有的发展战略，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消费作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之重要环节的地位逐步得到确认。在改革初期，中央提出了要走“速度比较实在，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较多实惠”的发展之路。1987年，中央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改善人民生活在这个部署中的每一步中都处于重要的位置：第一步，至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完成。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央还逐步明确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的方针政策。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从需求方面支持了经济的增长。

四、努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没有避免周期性的波动，经历了1978年—1983年、1984年—1990年和1991年至目前的三个周期，但是，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拉长了，波幅减小了。这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改革以前，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往往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不断地追求和推动经济的粗放型、

外延型的超高速扩张，导致了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和国民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以后，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了转变，由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度，逐步转向兼顾增长与稳定，兼顾增长与效益，转向追求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其次得益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改革以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惟一主体，对经济周期通常采取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式的调节，使经济运行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之中。改革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经济手段在经济周期调节中的作用，使经济运行摆脱了那种"乱—管—死—放—乱"的循环。宏观调控的成功，特别是1996年—1997年间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帮助中国顶住了1997年下半年始发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重要统计资料选录

附表 1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年	单位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一、人口								
年底总人口	万人	57482	96259	98705	105044	109614	111191	114333
二、劳动力（年底数）								
劳动力资源人数	万人	26710	51691	53991	62114	66960	68364	69732
社会劳动者人数	万人	20729	40152	42361	49873	54334	55329	56740
*职工人数	万人	1603	9499	10444	12358	13608	13742	14059
三、国民生产总值	亿元		3588	4470	8557	13984	15789	17695
四、国民收入	亿元	589	3010	3688	7020	11738	13125	14384
五、社会总产值	亿元	1015	6846	8534	16582	29807	34604	37969
*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810	5634	7077	13335	24089	28552	31513
六、固定资产投资								
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910.85	2543.19	4496.54	4137.73	4451.07
生产性	亿元				1544.10	2828.70	2571.97	
非生产性	亿元				999.09	1617.89	1565.76	
*住宅	亿元				641.63	1067.02	1063.84	
2.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43.56	668.72	745.90	1680.51	2762.76	2535.48	2926.83
基本建设投资	亿元	43.56	500.99	558.89	1074.37	1574.31	1551.74	
更新改造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67.73	187.01	606.14	1188.45	983.75	
3. 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45.95	327.46	711.71	569.99	

指标 \ 年	单位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城镇	亿元			22.95	128.23	254.97	185.63	
农村	亿元			23.00	199.23	456.74	384.36	
七、国家财政								
1. 国家财政收入	亿元	183.7	1121.1	1085.2	1866.4	2628.0	2919.2	3244.8
中央	亿元		164.6	209.7	707.9	1045.5		1367.9
地方	亿元		956.5	875.5	1158.5	1582.5		1944.7
2. 国家财政支出	亿元	176.0	1111.0	1212.7	1844.8	2706.6	3014.6	3395.2
中央	亿元	127.4	521.0	650.7	836.5	1060.4		1372.8
地方	亿元	48.6	590.0	562.0	1008.2	1646.2		2079.4
3. 预算外资金收入	亿元	13.6	347.1	557.4	1530.0	2270.0		
八、物价指数（以上午价格为100）								
1.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101.7	103.9	107.1	108.6	123.0	115.0	97.4
2. 零售物价总指数		99.6	100.7	106.0	108.8	118.5	117.8	102.1
3. 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		102.7	100.7	107.5	111.9	120.7	116.3	101.3
九、工资								
1. 职工工资总额	亿元	68	569	772	1383	2316	2619	2951.1
2. 职工平均货币工资	元	445	615	762	1148	1747	1935	2140
十、居民消费水平	元	76	175	227	406	643	700	731
农民	元	62	132	173	324	480	518	519
非农业居民	元	149	383	468	747	1288	1404	1448
十一、农业								
1. 农业总产值	亿元	461	1397	1923	3619	5865	6535	7662.1
2. 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	万吨	16392	30477	32056	37911	39408	40755	43500
棉花	万吨	130.4	216.7	270.7	414.7	414.9	378.8	450.8
油料	万吨	419.3	521.8	769.1	1578.4	1320.3	1295.2	1613.2
甘蔗	万吨	711.6	2111.6	2280.7	5154.9	4906.4	4879.5	5762.0
甜菜	万吨	47.9	270.2	630.5	891.9	1281.0	924.3	1452.5

指标 \ 年	单位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茶　叶	万吨	8.2	26.8	30.4	43.2	54.5	53.5	54.0
水　果	万吨	244.3	657.0	679.3	1163.9	1666.1	1831.9	1874.4
猪、牛、羊肉	万吨	338.5	856.3	1205.4	1760.7	2193.6	2326.2	2513.5
水产品	万吨	167	466	450	705	1061	1152	1237
十二、工　业								
1. 工业总产值	亿元	349	4237	5154	9716	18224	22017	23851
2.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布	亿米	38.3	110.3	134.7	146.7	187.9	189.2	180.0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37	439	535	911	1270	1333	1330
糖	万吨	45	227	257	451	461	501	571
自行车	万辆	8	854	1302.4	3227.7	4140.1	3676.8	3141.0
缝纫机	万台	6.6	486.5	767.8	991.2	983.2	956.3	723.8
手表	万只		1351.1	2215.5	5431.1	6661.6	7275.6	8671.3
家用电冰箱	万台		2.8	4.9	144.81	757.63	670.79	475.40
电视机	万台		51.73	249.20	1667.66	2505.07	2766.54	2662.00
*彩色电视机	万台		0.38	3.2	435.28	1037.66	940.02	1023.00
家用洗衣机	万台		0.04	24.5	887.2	1046.8	825.4	652.6
录放音机	万台		4.7	74.3	1393.1	2540.4	2418.1	2970.3
照相机	万架		17.89	37.28	178.97	312.26	245.18	189.9
原　煤	亿吨	0.66	6.18	6.2	8.72	9.8	10.54	10.8
原　油	万吨	44	10405	10595	12490	13705	13764	13810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73	2566	3006	4107	5452	5848	6180
钢	万吨	135	3178	3712	4679	5943	6159	6604
成品钢材	万吨	106	2208	2716	3693	4689	4859	5121
水　泥	万吨	286	6524	7986	14595	21014	21029	20294
3.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年	4200	11131	12081	15080	18056	18320	18320
4.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年	单位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年底固定资产原值	亿元	148.8	3193.4	3730.1	5956.2	8795.2	10160.8	
资金总额	亿元	146.8	3273.0	3663.7	5604.1	8603.4	10318.0	
年底固定资产净值	亿元	100.8	2225.7	2528.0	3980.8	6040.4	7033.2	
定额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	亿元	46.0	1047.3	1135.7	1623.3	2563.0	3284.8	
利润和税金总额	亿元	37.4	790.7	907.1	1334.1	1774.9	1773.1	
十三、运输与邮电								
1.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76Z	9829	12026	18126	23825	25591	26322
铁　路	亿吨公里	602	5345	5717	8126	9878	10394	10593
公　路	亿吨公里	14	274	764	1693	3220	3375	3441
水　运	亿吨公里	146	3779	5053	7700	10070	11187	
管　道	亿吨公里		430	491	603	650	629	
空　运	亿吨公里	…	1.0	1.4	4.2	7.3	6.9	
2.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248	1743	2281	4437	6207	6073	5612
铁　路	亿人公里	201	1093	1383	2416	3260	3037	2616
公　路	亿人公里	22.6	521	730	1725	2528	2662	2600
水　运	亿人公里	24.5	101	129	179	204	188	
空　运	亿人公里	0.2	28	40	117	215	187	
3. 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1440	19834	21731	31154	41266	44214	48219
4.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1.64	11.65	13.34	29.60	54.00	64.81	81.65
5. 函　件	亿件	8.09	28.35	33.13	46.78	59.77	57.28	
6. 报刊期发数	万份	1363	11250	16431	30172	27443	17704	
十四、能源生产与消费（标准煤）								
能源生产总量	万吨	4871	62770	63735	85546	95801	101639	104000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		57144	60275	76682	92997	96934	98000
十五、国内商业								
1. 社会商业商品购进总额	亿元	175.0	1739.7	2263.0	3532.5	6861.3	7606.0	
＇工业品	亿元	84.5	1263.4	1567.6	246Z.3	4985.5	5468.7	
农副产品	亿元	90.1	459.9	677.0	1033.2	1794.2	2053.7	
2. 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								

指标＼年	单位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粮　　食	万吨	3903.0	5072.5	6129.0	10762.8	11995.3	12138.1	
棉　　花	万吨	108.7	209.6	261.0	431.9	377.8	330.6	
食用植物油	万吨	98.0	110.5	191.0	409.8	395.3	380.7	
甘　　蔗	万吨	369.7	1557.9	1584.0	3687.5	3601.0	3395.9	
甜　　菜	万吨	39.0	255.3	554.1	806.4	1168.8	776.3	
茶　　叶	万吨	7.7	24.3	26.2	39.5	55.6	53.4	
肥　　猪	万头	3742.7	10936.5	14250.0	16020.8	17232.5	17583.0	
菜　　牛	万头	125.8	140.8	221.6	463.8	755.3	758.3	
菜　　羊	万只	522.7	998.3	1680.2	2839.3	3395.5	3696.4	
鲜　　蛋	万吨	19.4	56.0	99.1	192.2	255.6	267.5	
水产品	万吨	91.8	269.2	239.3	334.2	437.6	467.1	
3.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276.8	1558.6	2140.0	4305.0	7440.0	8101.4	8300.10
4. 主要消费品零售量								
粮　　食	万吨	2961.0	4750.0	5497.0	9011.6	9691.7	9347.4	
食用植物油	万吨	76.5	87.5	126.0	349.1	455.8	411.6	
猪　　肉	万吨	170.4	467.5	704.5	916.4	1066.7	1131.3	
食　　糖	万吨	47.1	315.6	363.5	572.5	663.2	579.2	
布	亿米	30.8	76.9	98.4	121.2	132.5	127.8	
缝纫机	万架	10.0	439.8	665.0	1103.0	1014.7	710.0	
自行车	万辆	33.5	809.6	1186.0	3111.2	4137.5	3348.7	
电视机	万台		55.1	364.0	2156.9	2662.9	2173.8	
洗衣机	万台		0.2	23.5	1098.1	1698.9	1233.4	
电冰箱	万台		2.0	5.5	220.0	733.5	604.4	
5. 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量								
化学肥料（标准量）	万吨	29.5	4087.5	5531.1	6231.8	8761.4	9378.7	
化学农药	万吨	1.5	146.4	152.7	65.3	73.6	63.7	
农用动力机械	万千瓦		1037.1	639.8	723.4	1221.0	1014.6	
十六、对外贸易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19.4	206.4	381.4	696.0	1027.9	1116.8	1154.4

指标 \ 年	单位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出口额	亿美元	8.2	97.5	181.2	273.5	475.2	525.4	620.9
进口额	亿美元	11.2	108.9	200.2	422.5	552.7	591.4	533.5
十七、教育文化								
1. 在校学生数								
高等学校	万人	19.1	85.6	114.4	170.3	206.6	208.2	206.3
中等专业学校	万人	63.6	88.9	124.3	157.1	205.2	217.7	224.4
普通中学	万人	249.0	6548.3	5508.1	4706.0	4761.5	4554.0	4586.0
小　　学	万人	5110.0	14624.0	14627.0	13370.2	12535.8	12373.1	12241.6
2. 出版数量								
图　　书	亿册（张）	7.9	37.7	45.9	66.7	62.2	58.6	
杂　　志	亿册	2.0	7.6	11.2	25.6	25.5	18.2	
报　　纸	亿份	16.1	127.8	140.4	199.8	207.2	156.2	
十八、卫生								
医院床位数	万张	16.0	185.6	198.2	222.9	250.3	256.8	262.4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69.0	246.4	279.8	341.1	372.4	380.9	389.8
*医　生	万人	42.5	103.3	115.3	141.3	161.7	171.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 年版。1990 年数字引自“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及国际比较”。

①在以下采用的 40 个附表中，* 表示其中的主要项。

②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量为全民所有制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销售量。

附表 2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发展速度

指　　标	1989 年为以下各年%					平均每年增长%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53—1989	1979—1989	1981—1989	1979—1990
一、人口									
年底总人口	193.4	115.5	112.6	105.9	101.4	1.8	1.3	1.4	
二、劳动力（年底数）									
劳动力资源人数	255.9	132.3	126.6	110.1	102.1	2.6	2.6	2.7	2.5
社会劳动者人数	266.9	137.8	130.6	110.9	101.8	2.7	3.0	3.0	2.9
*职工人数	857.3	144.7	131.6	111.2	101.0	6.0	3.4	3.1	3.3
三、国民生产总值		259.3	223.5	138.1	103.6		9.0	9.3	8.7
四、国民收入	1133.4	250.0	219.5	136.5	103.3	6.8	8.7	9.1	8.4
五、社会总产值	2215.5	305.0	259.4	153.2	105.2	8.7	10.7	11.2	10.3
*工农业总产值	2432.3	312.4	267.8	159.1	107.5	9.0	10.9	11.6	10.6
六、固定资产投资									
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454.3	162.7	92.0			18.3	
生产性				166.6	90.9				
非生产性				156.7	96.8				
*住宅				165.8	99.7				
2.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5820.7	379.2	339.9	150.9	91.8	11.6	12.9	14.6	13.1
基本建设投资	3562.3	309.7	277.6	144.4	98.6	10.1	10.8	12.0	
更新改造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		586.5	526.0	162.3	82.8		17.4	20.3	
3. 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1240.5	174.1	80.1			32.3	
城　　镇			808.8	144.8	72.8			26.1	
农　　村			1671.1	192.9	84.2			36.7	
七、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收入	1589.1	260.4	269.0	156.4	111.1	7.8	9.1	11.6	9.3
国家财政支出	1712.8	271.3	248.6	163.4	111.4	8.0	9.5	10.6	9.8
八、工　　资									
1. 职工工资总额	1394.2	209.7	169.2	115.9	97.2	7.4	7.0	6.0	

指　　标	1989 年为以下各年%					平均每年增长%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53—1989	1979—1989	1981—1989	1979—1990
2. 职工平均实际工资	158.2	143.4	126.9	103.1	95.2	1.2	3.3	2.7	
九、居民消费水平	367.0	207.3	177.6	117.0	98.8	3.6	6.9	6.6	
农民	339.3	215.3	183.5	113.1	98.7	3.4	7.2	7.0	
非农业居民	371.7	174.8	156.6	120.4	98.0	3.6	5.2	5.1	
十、农　　业									
1. 农业总产值	376.2	188.3	172.6	117.2	103.1	3.6	5.9	6.3	6.1
2. 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　　食	248.6	133.7	127.1	107.5	103.4	2.5	2.7	2.7	3.0
棉　　花	290.5	174.8	139.9	91.3	91.3	2.9	5.2	3.8	6.3
油　　料	308.9	248.2	168.4	82.1	98.1	3.1	8.6	6.0	9.9
甘　　蔗	685.7	231.1	213.9	94.7	99.5	5.3	7.9	8.8	
甜　　菜	1929.6	342.1	146.6	103.6	72.2	8.3	11.8	4.3	
茶　　叶	652.4	199.6	176.0	123.8	98.2	5.2	6.5	6.5	
水　　果	749.9	278.8	269.7	157.4	110.0	5.6	9.8	11.7	
猪、牛、羊肉	687.2	271.7	193.0	132.1	106.0	5.3	9.5	7.6	9.4
水产品	689.8	247.2	256.0	163.4	108.6	5.4	8.6	11.0	8.5
十一、工业									
1. 工业总产值	5995.1	361.5	304.1	172.3	108.5	11.7	12.4	13.2	12.0
2.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布	494.0	171.5	140.5	129.0	100.7	4.4	5.0	3.8	4.2
机制纸及纸板	3602.7	303.6	249.2	146.3	105.0	10.2	10.6	10.7	9.7
糖	1113.3	220.7	194.9	111.1	108.7	6.7	7.5	7.7	8.0
自行车	45960.0	430.5	282.3	113.9	88.8	18.0	14.2	12.2	11.5
缝纫机	14489.4	196.6	124.6	96.5	97.3	14.4	6.3	2.5	
手　　表		538.5	328.4	134.0	109.2		16.5	14.1	
家用电冰箱		23956.8	13689.6	463.2	88.5		64.6	72.7	
电视机		5348.0	1110.2	165.9	110.4		43.6	30.7	
*彩色电视机		273068.4	32426.9	238.4	100.0		105.3	90.1	

指　　标	1989年为以下各年%					平均每年增长%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53—1989	1979—1989	1981—1989	1979—1990
家用洗衣机		2063500.0	3369.0	93.0	78.8		146.7	47.8	
录放音机		51448.9	3254.5	173.6	95.2		76.4	47.2	
照相机		1370.5	657.7	137.0	78.5		26.9	23.3	
原　　煤	1597.0	170.6	170.0	120.9	107.6	7.8	5.0	6.1	4.8
原　　油	31281.8	13Z.3	129.9	110.2	100.4	16.8	2.6	3.0	2.4
发电量	8011.0	227.9	194.5	142.4	107.3	12.6	7.8	7.7	7.6
钢	4562.2	193.8	165.9	131.6	103.6	10.9	6.2	5.8	6.3
成品钢材	4584.0	220.1	178.9	131.6	103.6	10.9	7.4	6.7	7.3
水　　泥	7352.8	322.3	263.3	144.1	100.1	12.3	11.2	11.4	9.9
3.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436.2	164.6	151.6	121.5	101.5	4.1	4.6	4.7	
4.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年底固定资产原值	6828.5	318.2	272.4	170.6	115.5	12.1	11.1	11.8	
资金总额	7028.6	315.2	281.6	184.1	119.9	12.2	11.0	12.2	
年底固定资产净值	6977.4	316.0	278.2	176.7	116.4	12.2	11.0	12.0	
定额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	7140.9	313.6	289.2	202.4	128.2	12.2	11.0	12.5	
利润和税金总额	4740.9	224.2	195.5	132.9	99.9	11.0	7.6	7.7	
十二、运输与邮电									
1. 货物周转量	3357.0	260.3	212.7	141.1	107.4	10.0	9.1	8.7	8.6
铁　　路	1726.6	194.5	181.8	127.9	105.2	8.0	6.2	6.9	5.9
公　　路	24100.0	1231.4	441.6	199.3	104.8	16.0	25.6	17.9	23.5
水　　运	7654.8	295.7	221.2	145.1	111.0	12.4	10.4	9.2	
管　　道		146.3	128.1	104.3	96.8		3.5	2.8	
空　　运		690.0	492.9	164.3	94.5		19.2	19.4	
2. 旅客周转量	2452.8	349.0	266.7	137.1	98.0	9.0	12.0	11.5	10.2
铁　　路	1510.9	277.9	219.6	125.7	93.2	7.6	9.7	9.1	7.5

指　　标	1989年为以下各年%					平均每年增长%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53—1989	1979—1989	1981—1989	1979—1990
公　　路	11778.9	510.9	364.7	154.3	105.3	13.6	16.0	15.5	14.3
水　　运	767.3	186.1	145.7	105.0	92.2	5.7	5.8	4.3	
空　　运	93500.0	667.9	467.5	159.8	87.0	20.3	18.8	18.7	
3. 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3404.5	247.2	225.6	157.4	107.5	10.0	8.6	9.5	7.7
4. 邮电业务总量	2838.1	399.5	349.0	218.9	120.0	9.5	13.4	14.9	14.4
5. 函　　件	708.0	202.0	172.9	122.4	95.8	5.4	6.6	6.3	
6. 报刊期发数	1298.9	157.4	107.7	58.7	64.5	7.2	4.2	0.8	
十三、能源生产与消费（标准煤）									
能源生产总量	2087.6	162.0	159.5	118.9	106.1	8.6	4.5	5.3	
能源消费总量		169.6	160.8	126.4	104.2		4.9	5.4	
十四、国内商业									
1. 社会商业商品购进总额	4346.3	437.2	336.1	215.3	110.9	10.7	14.4	14.4	
工业品	6471.8	432.9	348.9	222.1	109.7	11.9	14.2	14.9	
农副产品	2279.4	446.6	303.4	198.8	114.5	8.8	14.6	13.1	
2. 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									
粮　　食	311.0	239.3	198.0	112.8	101.2	3.1	8.3	7.9	
棉　　花	304.1	157.7	126.7	76.5	87.5	3.1	4.2	2.7	
食用植物油	388.5	344.5	199.3	92.9	96.3	3.7	11.9	8.0	
甘　　蔗	918.6	218.0	214.4	92.1	94.3	6.2	7.3	8.8	
甜　　菜	1990.5	304.1	140.1	96.3	66.4	8.4	10.6	3.8	
茶　　叶	693.5	219.8	203.8	135.2	96.0	5.4	7.4	8.2	
肥　　猪	469.8	160.8	123.4	109.8	102.0	4.3	4.4	2.4	
菜　　牛	602.8	538.6	342.2	163.5	100.4	5.0	16.5	14.6	
菜　　羊	707.2	370.3	220.0	130.2	108.9	5.4	12.6	9.2	
鲜　　蛋	1378.9	477.7	269.9	139.2	104.7	7.3	15.3	11.7	
水产品	508.8	173.5	195.2	139.8	106.7	4.5	5.1	7.7	
3.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758.2	255.5	201.3	188.6	92.4	8.1	8.9	8.1	14.4

指　　标	1989年为以下各年%					平均每年增长%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53—1989	1979—1989	1981—1989	1979—1990
4.主要消费品零售量									
粮　　食	315.7	196.8	170.0	103.7	96.4	3.2	6.3	6.1	
食用植物油	538.0	470.4	326.7	117.9	90.3	4.7	15.1	14.1	
猪　　肉	663.9	242.0	160.6	123.5	106.1	5.2	8.4	5.4	
食　　糖	1229.7	183.5	159.3	101.2	87.3	7.0	5.7	5.3	
布	414.9	166.2	129.9	105.4	96.5	3.9	4.7	2.9	
缝纫机	7100.0	161.4	106.8	64.4	70.0	12.2	4.5	0.7	
自行车	9996.1	413.6	282.4	107.6	80.9	13.3	13.8	12.2	
电视机		3945.2	597.2	100.8	81.6		39.7	22.0	
洗衣机		616700.0	5248.5	112.3	72.6		121.1	55.3	
电冰箱		30220.0	10989.1	274.7	82.4		68.1	68.6	
5.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量									
化学肥料（标准量）	31792.2	229.4	169.6	150.5	107.0	16.9	7.8	6.0	
化学农药	4246.7	43.5	41.7	97.5	86.5	10.7	-7.3	-9.3	
农用动力机械		97.8	158.6	140.3	83.1		-0.2	5.3	
十五、对外贸易									
进出口总额	5754.1	540.8	292.7	160.4	108.6	11.6	16.6	12.7	
出口额	6401.2	538.4	289.7	191.9	110.7	11.9	16.5	12.5	16.7
进口额	5280.4	543.1	295.4	140.0	107.0	11.3	16.6	12.8	14.2
十六、教育文化									
1.在校学生数									
高等学校	1090.1	243.2	182.0	122.3	100.8	6.7	8.4	6.9	7.6
中等专业学校	342.3	244.9	175.1	138.6	106.1	3.4	8.5	6.4	8.0
普通中学	1828.9	69.5	82.7	96.8	95.6	8.2	-3.2	-2.1	-2.9
小　　学	242.1	84.6	84.6	92.5	98.7	2.4	-1.5	-1.8	-1.5
2.出版数量									
图　　书	741.8	155.4	127.7	87.9	94.2	5.6	4.1	2.8	
杂　　志	910.0	239.5	162.5	71.4	71.4	6.2	8.3	5.5	

指　　标	1989年为以下各年%					平均每年增长%			
	1952	1978	1980	1985	1988	1953—1989	1979—1989	1981—1989	1979—1990
报　纸	970.2	122.2	111.3	78.2	75.4	6.3	1.8	1.2	
十七、卫　生									
医院床位数	1605.0	138.4	129.6	115.2	102.6	7.8	3.0	2.9	2.9
卫生技术人员	552.0	154.6	136.1	111.7	102.3	4.7	4.0	3.5	3.9
医　生	404.2	166.3	149.0	12L6	106.2	3.8	4.7	4.5	

资料来源：《中国境计年鉴（1990）》。1990年数字引自“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及国际比较”。

①本表第三、四、五、九项及农业总产值发展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工资按扣除价格变动因素计算；

本表工业总产值和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发展速度是按扣除价格变动因素计算的。

附表 3　　主要农产品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比较

产品名称	单位	解放前最高年		指数（以解放前最高年为 100）					
		年份	产量	1949	1952	1953	1984	1988	1989
粮食	万吨	1936	15000	75.5	109.3	258.2	271.5	262.7	271.7
其中：稻谷	万吨	1936	5735	84.8	119.4	294.5	310.8	294.9	314.1
小麦	万吨	1936	2330	59.2	77.9	349.3	376.9	370.6	389.7
玉米	万吨	1936	1010		166.8	675.3	726.8	765.8	781.5
大豆	万吨	1936	1130	45.1	84.1	86.4	85.8	103.1	90.5
薯类	万吨	1936	635	155.1	257.5	460.6	448.5	424.7	429.9
棉花	万吨	1936	84.9	52.4	153.6	546.2	737.1	488.7	446.2
花生	万吨	1933	317.1	40.0	73.0	124.6	151.8	179.5	169.1
油菜子	万吨	1934	190.7	38.5	48.9	224.8	220.5	264.5	30.4
芝麻	万吨	1933	99.1	32.9	48.5	35.2	48.0	40.8	34.1
黄红麻	万吨	1945	10.9	33.9	280.7	934.9	1368.8	989.0	1200.0
桑蚕茧	万吨	1931	22.1	14.0	28.1	121.3	138.5	178.3	196.8
柞蚕茧	万吨	1921	9.4	12.8	64.9	76.6	53.2	48.9	56.4
茶叶	万吨	1932	22.5	18.2	36.4	178.2	184.0	242.2	237.8
甘蔗	万吨	1940	565.2	46.7	125.9	551.0	699.2	868.1	863.3
甜菜	万吨	1939	32.9	58.1	145.6	2790.9	2517.9	3893.6	2809.4
烤烟	万吨	1948	17.9	24.0	124.0	643.0	862.0	1305.6	1343.6
苹果	万吨	1936	12.1		97.5	2926.4	2430.6	3590.1	3718.2
柑桔	万吨	1936	40.1		51.6	323.2	373.8	638.4	1137.4
香蕉	万吨	1937	10.3		106.8	201.0	291.3	1776.7	1363.1
大牲畜年底头数	万头	1935	7151	83.9	106.9	144.7	151.6	175.3	179.1
牛	万头	1935	4827	91.0	117.2	161.8	170.1	202.9	208.7
马	万头	1935	649	75.1	94.5	166.6	169.2	162.4	158.6
驴	万头	1935	1215	78.1	97.2	77.8	82.0	91.0	91.7
骡	万头	1935	460	32.0	35.6	99.8	104.1	116.7	117.2
猪年底头数	万头	1934	7853	73.5	114.3	380.2	390.7	435.8	449.3
羊年底头数	万头	1937	6252	67.7	98.8	267.0	253.4	322.3	338.5
水产品	万吨	1936	150	30.0	111.3	264.0	412.7	707.3	768.0

资料来源：《中国境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年鉴（1989）》。

附表 4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比较

产品名称	单位	解放前最高年		指数（以解放前最高年为 100）			
		年份	产量	1949	1952	1988	1989
纱	万吨	1933	44.5	73.5	147.4	1046.5	1071.2
布	亿米	1936	27.9	67.7	137.3	673.5	678.1
火柴	万件	1937	860	78.1	105.9	345.3	386.4
原盐	万吨	1943	392	76.3	126.3	577.6	721.7
糖	万吨	1936	41	48.8	109.8	1124.4	1221.7
卷烟	万箱	1947	236	67.8	112.3	1311.9	1353.8
原煤	亿吨	1942	0.62	51.6	106.5	1580.6	1700.0
原油	万吨	1943	32	37.5	137.5	42826.9	43012.5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1941	60	71.7	121.7	9086.7	9746.7
钢	万吨	1943	92.3	17.1	146.3	6438.8	6672.8
生铁	万吨	1943	180	13.9	107.2	3168.9	3233.3
水泥	万吨	1942	229	28.8	124.9	9176.4	9183.0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1941	129	70.5	153.5	5653.5	6544.2
硫酸	万吨	1942	18.0	22.2	105.6	6173.9	6407.2
纯碱	万吨	1940	10.3	85.4	186.4	2532.5	2953.4
烧碱	万吨	1941	1.2	125.0	658.3	25038.3	26758.3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1941	0.54	29.6	253.7	3550.0	3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境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0）》。

附表 5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情况（1990 年前）

项目	单位	1952 年	1957 年	1978 年	1985 年	1990 年
一、就　　业						
每一农村劳动力负担人数	人		2.08	2.53	1.74	1.64
每一城镇就业者负担人数	人		3.29	2.06	1.81	1.77
城镇待业率	%	13.2	5.9	5.3	L8	2.5
二、收　　入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57.0	73.0	133.6	397.6	629.8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	元		235	316	685	1387
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445	624	615	1148	2140
三、消费水平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	元	76	102	175	403	713
农　　民	元	62	79	132	324	519
非农业居民	元	149	205	383	727	1448
四、储蓄						
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8.6	35.2	210.6	1622.6	7034.0
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	元	1.5	5.4	21.9	153.3	615.2
五、住房						
农村平均每人住房面积	平方米			8.1	14.7	17.8
城镇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平方米			3.6	5.2	7.1
六、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						
每万人口拥有营业点	个	95.7	41.8	13.0	100.8	103.7
每万人口拥有人员数	人	165.8	117.8	63.1	238.7	254.5
七、交通						
每百人拥有自行车	辆			7.7	21.4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车辆	辆	0.8	1.0	3.3	3.9	
八、城市公用事业						
自来水普及率	%	42.0	56.6	81.0	81.0	
煤气、液化气普及率	%		1.5	13.9	22.4	
每万人拥有绿地	平方米	…	…	10.6	13.7	
九、文化						
每百人拥有电视机	台			0.3	6.6	16.2

项目	单位	1952 年	1957 年	1978 年	1985 年	1990 年
每百人拥有收音机	台			7.8	22.8	22.0
每百人每天有报纸	份	0.8	1.0	3.7	5.2	3.8
每人每年有图书、杂志	册	1.7	2.5	4.7	8.8	6.6
十、教育						
学龄儿童入学率	%	49.2	61.7	94.0	95.9	97.8
每万人口有大学生效	人	3.3	6.8	8.9	16.3	18.0
十一、卫生						
每万人拥有病床数	张	2.8	4.6	19.4	21.1	23.0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人	7.4	8.4	10.8	13.3	15.4

资料来源：《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及国际比较》，附表 5。

附表 6　　**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　　单位：亿元

年份	总计	城镇储蓄	定期	活期	农户储蓄
1952	8.6	8.6	4.8	3.8	-
1953	12.3	12.2	6.8	5.4	0.1
1954	15.9	14.3	9.8	4.5	1.6
1955	19.9	16.9	13.3	3.6	3.0
1956	26.7	22.4	15.9	6.8	4.3
1957	35.2	27.9	19.6	8.3	7.3
1958	55.2	35.1	23.9	11.2	20.1
1959	68.3	47.3	31.6	15.7	21.0
1960	66.3	51.1	37.3	13.8	15.2
1961	55.4	39.2	29.7	9.5	16.2
1962	41.1	31.4	25.6	5.8	9.7
1963	45.7	35.6	29.4	6.2	10.1
1964	55.5	44.8	37.0	7.8	10.7
1965	65.2	52.3	43.4	8.9	12.9
1966	72.3	57.7	46.9	10.8	14.6
1967	73.9	59.8	48.9	10.9	14.1
1968	78.3	62.3	50.3	12.0	16.0
1969	75.9	61.0	49.4	11.6	14.9
1970	79.5	64.5	53.8	10.7	15.0
1971	90.3	73.3	61.4	11.9	17.0
1972	105.2	85.1	69.6	15.5	20.1
1973	121.2	94.1	77.7	16.4	27.1
1974	136.5	105.8	86.7	19.1	30.7
1975	149.6	114.6	94.5	20.1	35.0
1976	159.1	122.2	100.6	21.6	36.9
1977	181.6	135.1	111.7	23.4	46.5
1978	210.6	154.9	128.9	26.0	55.7
1979	281.0	202.6	166.4	36.2	78.4
1980	399.5	282.5	228.6	53.9	117.0
1981	523.7	354.1	289.4	64.7	169.6
1982	675.4	447.3	365.2	82.1	228.1
1983	892.5	572.9	463.9	108.7	319.9
1984	1214.7	776.6	615.3	161.3	438.1
1985	1622.6	1057.8	841.2	216.6	564.8
1986	2237.6	1471.5	1189.3	282.2	766.1
1987	3073.3	2067.6	1647.9	419.7	1005.7
1988	3801.5	2659.2	2045.2	614.0	1142.3
1989	5146.9	3734.8	3102.5	632.3	1412.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

附表 7　　主要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

国家或地区	货币名称	国内生产总值（现价：亿本币）			平均每年增长%	
		1952 年	1978 年	1989 年	1966 年—1980 年	1981 年—1988 年
中国	人民币元	589①	3588②	15789②	6.6①	10.1
美国	美元	3457	22192	51632	2.7	3.3
日本	日元	62170	2044030	3650870⑥	6.5	3.9
联邦德国	西德马克	1365	12853	22356	3.3	1.8
英国	英镑	157	1681	5072	2.4	2.8
法国	法郎	1456	21826	61022	4.0	1.8
意大利	里拉	115700	2222540	11880000	4.3	2.2
加拿大	加元	2.51	2416	6485	5.1	3.3
澳大利亚	澳元	73	1003	3571	4.0	3.3
苏联	卢布	1277①③	4225①	6568①	6.1①⑧	3.0①
匈牙利	福林	830①	5146①	17060	5.6	1.6
南斯拉夫	第纳尔		17237	15832809	6.0	1.4
印度	卢比	976	9775	39116⑥	3.6	5.2
印度尼西亚	卢比		227460	1394520⑥	8.0	5.1
泰国	铢	313	4700	17908	7.2	6.0
巴基斯坦	卢比	207④	1764	7723	5.1	6.5
韩国	韩圆	470④	242430	1422670	9.6	9.9
埃及	埃镑	11⑤	98	647	6.8	5.7
尼日利亚	奈拉	12	355	1583	6.9	-1.1
墨西哥	比索	593	23374	1929350⑦	6.5	0.5
巴西	新克鲁扎多		36	919520⑥	8.8	2.9

资料来源：《社会主义在中国》。

①国民收入数字。②国民生产总值数字。③1958 年数字。④1953 年数字。⑤1959 年数字。⑥1988 年数字。⑦1987 年数字。⑧1961 年—1980 年数字。

附表 8　　主要国家和地区工业生产指数（1990 年前）

（1980 年 = 100）

国家或地区	1952 年	1978 年	1985 年	1988 年	1989 年
世界总计	27	96	108	122	127
发达国家	29	96	109	120	124
发展中国家	16	99	99	122	130
中　国①	5	84	176	280	304
美　国	34	98	112	125	128
日　本	6	89	118	134	142
联邦德国②	23	95	104	111	117
英　国②	53	103	108	118	119
法　国②	25	96	101	108	112
意大利	18	89	97	108	113
加拿大②	27	96	115	126	127
澳大利亚	46	94	115	129	
苏　联	11	94	119	134	136
匈牙利	20	99	110	115	111
南斯拉夫	8	89	114	122	137
印　度	23	99	140	178	188
印度尼西亚③		75	82	83	
巴基斯坦③		81	154	183	
新加坡③		77	107	161	
韩　国		91	164	268	276
墨西哥②	13	82	108	109	
巴　西	10	87	99	107	111

资料来源：同附表 7。

①中国为工业总产值指数。②包括建筑业。③为制造业生产指数。

附表 9　　主要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指数[①]（1990 年前）

（1980 年 = 100）

国家或地区	1952 年	1978 年	1985 年	1989 年	1990 年
世界总计		98.4	115.5	123.0	125.4
发达国家		101.0	109.3	110.9	112.4
发展中国家		95.8	121.6	135.1	138.4
中国[②]	39.0	91.5	141.9	160.1	173.2
美国	60.9	99.2	111.8	106.9	109.6
日本	66.0	113.4	111.5	102.9	100.8
联邦德国	61.2	98.2	107.0	111.1	111.1
英国	51.2	91.6	107.3	103.5	104.3
法国	52.5	91.0	105.7	101.2	102.9
意大利	54.8	89.8	99.0	100.3	97.1
加拿大	71.5	103.2	114.3	114.9	124.7
澳大利亚	54.4	118.7	118.2	123.3	126.0
苏联	41.4	110.2	110.8	121.1	123.4
匈牙利		94.3	103.7	109.8	100.0
南斯拉夫	29.9	94.0	101.0	101.4	96.0
印度	50.2	102.7	126.3	147.5	150.6
印度尼西亚	44.6	87.5	127.6	152.0	155.0
泰国	31.0	99.7	122.7	129.9	126.4
巴基斯坦	43.8	90.0	123.8	151.8	157.1
韩国	38.3	125.3	123.1	119.0	111.5
埃及		95.4	124.4	136.5	143.8
尼日利亚		83.3	120.4	122.5	123.3
墨西哥	30.0	97.4	112.3	115.9	115.7
巴西	35.2	88.4	125.3	137.9	133.0

资料来源：同附表 8。

①国外农业生产指数按农业增加值计算，只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农产品的初步加工。

②中国为农业总产值指数，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不包括林业渔业和副业。

附表 10 国际储备和黄金储备（1990年前）

（年底数）

国家和地区	国际储备（不包括黄金．亿美元）					黄　金（万盎司）				
	1980年	1985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80年	1985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中国	25.5	127.3	163.1	185.4	179.6	1280	1267	1267	1267	1267
美国	156.0	321.0	347.2	367.5	635.5	26432	26265	26238	26187	26193
日本	246.4	267.2	809.7	967.3	839.6	2423	2423	2423	2423	2423
联邦德国	485.9	443.8	787.6	585.3	607.0	9518	9518	9518	9518	9518
英国	206.5	128.6	417.2	441.0	347.7	1884	1903	1901	1901	1899
法国	273.4	285.9	330.5	253.6	246.1	8185	8185	8185	8185	8185
意大利	231.3	156.0	302.1	347.2	467.2	6867	6667	6887	6667	6567
加拿大	30.4	25.0	72.8	153.9	160.6	2098	2011	1852	1714	1610
澳大利亚	16.9	57.7	87.4	138.0	134.2	793	793	793	793	793
匈牙利	20.9	31.2	22.7	18.7	16.7①	207	233	164	159	141②
罗马尼亚	3.2	2.0				371	382			
南斯拉夫	13.8	11.0	7.0	23.0	41.4	185	186	187	189	190
印度	69.4	64.2	64.5	49.0	38.6	859	940	1045	1045①	1045
印度尼西亚	53.9	49.7	55.9	50.5	54.5	239	310	310	310	310
菲律宾	28.5	6.2	9.7	10.0	14.2	192	148	278	284	245
泰国	15.6	21.9	40.1	61.0	95.2	249	249	248.	248	248
马来西亚	43.9	49.1	74.4	65.3	77.8	232	234	235	265	237
新加坡	65.7	128.5	152.3	170.7	203.5					
巴基斯坦	5.0	8.1	5.0	4.0	5.2	182	190	194	195	195
缅甸	2.6	0.3	0.3	0.8	2.6	25	25	25	25	25
孟加拉国	3.0	3.4	8.4	10.5	5.0	5	6	7	7	8
土耳其	10.8	10.6	15.9	23.7	47.8	377	386	383	382	378
韩国	29.3	28.7	35.8	123.5	152.1	30	31	32	32	32
埃及	10.5	7.9	13.8	12.6	15.2	243	243	243	243	243
尼日利亚	102.4	16.7	11.7	6.5	14.72	69	69	69	69②	69②
墨西哥	29.6	49.1	124.6	52.8	63.3	206	236	254	267①	102
巴西	57.7	106.1	63.0	66.8③		188	310	243	214	98
阿根廷	67.2	32.7	16.2	33.6	14.6	437	437	437	437	43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0）》。

①1989年7月数字。②1989年10月数字。③1988年4月数字。联合国《统计月报》，1990年6月。

附表 1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PRINCIPAL AGGREGATE INDICATORS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LATED

指 标		Item	1985
人口与就业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人口	(万人)	Population (10000 persons)	
年底总人口		Year – ehd Population	105851
市镇人口		Urban	25094
乡村人口		Rural	80757
男性人口		Male	54725
女性人口		Female	51126
就业	(万人)	Employment (10000 persons)	
从业人员数		Employment	49873
#职工人数		Staff and Workers	12358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Registed Unemployed in Urban Areas	238.5
宏观经济		Macroeconomic Indicator	
国民核算	(亿元)	National Accounting (100 million yuan)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8989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8964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2542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3867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2556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s	8792
#最终消费		Total Consumption	5773
居民消费		Resident Consumption	4589
政府消费		Public Consumption	1184
资本形成总额*		Total Investment	3386
固定资本形成		Fixed Assets	2641
存货增加		Stock	745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0 milhon yuan)	

展总量与速度指标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总量指标 Aggrgeate Data				速度指标（%）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1990	1995	1996	1997	速度 Index（1997 比以下各年）（1997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1985	1990	1995	1996	1986—1990	1991—1995	1991—1997
114333	121121	122389	123626	116.8	108.1	102.1	101.0	1.6	1.2	1.1
30191	35174	35950	36989	147.4	122.5	105.2	102.9	3.8	3.1	2.9
84142	85947	86439	86637	107.3	103.0	100.8	100.2	0.8	0.4	0.4
58904	61808	62200	63131	115.4	107.2	102.1	101.5	1.5	1.0	1.0
55429	59313	60189	60495	118.3	109.1	102.0	100.5	1.6	1.4	1.3
63909	67947	68850	69600	139.6	108.9	102.4	101.1	5.1	1.2	1.2
14059	14908	14845	14668	118.7	104.3	98.4	98.8	2.6	1.2	0.6
383.2	519.6	552.8	570.0	239.0	148.7	109.7	103.1	9.9	6.3	5.8
18598	57495	66851	73453	301.0	205.8	119.1	108.5	7.9	11.6	10.9
18548	58478	67885	74772	306.9	210.2	119.2	108.8	7.9	12.0	11.2
5017	11993	13844	13969	163.6	133.3	108.8	103.5	4.2	4.2	4.2
7717	28538	33613	36770	425.4	276.8	124.2	110.8	9.0	17.4	15.7
5814	17947	20428	24033	293.7	187.6	116.7	108.2	9.4	10.0	9.4
18320	59405	69366	76077	865.3	415.3	128.1	109.7	15.8	26.5	22.6
11365	34529	41040	44768	775.5	393.9	129.7	109.1	14.5	24.9	21.6
9113	27839	33188	36118	787.1	396.3	129.7	108.8	14.7	25.0	21.7
2252	6691	7852	8650	730.6	384.1	129.3	110.2	13.7	24.3	21.2
6444	23877	26867	28564	843.6	443.3	119.6	106.3	13.7	29.9	23.7
4732	20301	23336	25698	973.0	543.1	126.6	110.1	12.4	33.8	27.3
1712	3577	3531	2866	384.7	167.4	80.1	81.2	18.1	15.9	7.6

续前表 1 continued

指　标		Item		198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2 543.2
# 国有单位		State - Owned Units		1680.5
集体单位		Collective - Owned Units		327.5
个体经济		Individuals		535.2
财政	(亿元)	Public Finance	(100 million yuan)	
国家财政收入		Government Revenue		2004.8
中　央		Central Government		769.6
地　方		Local Governments		1235.2
国家财政支出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2004.3
中　央		Central Government		795.3
地　方		Local Governments		1209.0
物价总指数	(上年 = 100)	Price Indices	(preceding year = 100)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General Retail Price Index		108.8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General Consumer Price Index		109.3
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General Farm and Sideline Products Purchasing Price Index		108.6
利用外资	(亿美元)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USD 100000000)	
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额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for Utilization Through Signed contracts or Agreements		98.7
实际利用外资额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tilized		46.5
能源生产与消费	(万吨标准煤)	Production and comsumption of Energ	(10000 tons of SCE)	
能源生产总量		Total Energ yPorduction		85546
能源消费总量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76682
	产　业	Industries		
农业		Agriculture		
耕地面积	(千公顷)	Cultivated Areas (1000 hectares)		96846
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万人)		Number of Persons Engaged in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0000 persons)	30352

总量指标 Aggrgeate Data				速度指标（%）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速度 Index（1997 比以下各年）(1997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1990	1995	1996	1997	1985	1990	1995	1996	1986—1990	1991—1995	1991—1997
4517.0	20019.3	Z2913.5	Z4941.1	980.7	552.2	124.6	108.8	12.2	34.7	27.6
2986.3	10898.2	12006.2	13091.7	779.0	438.4	120.1	109.0	12.2	29.6	23.5
529.5	3289.4	3651.5	3850.9	1175.8	727.3	117.1	105.5	10.1	44.1	32.8
1001.2	2560.2	3211.2	3429.4	640.8	342.5	134.0	106.8	13.3	20.7	19.2
2937.1	6242.2	7408.0	8651.1	431.5	294.5	138.6	116.8	7.9	16.3	16.7
992.4	3256.6	3661.1	4226.9	549.2	425.9	129.8	115.5	5.2	26.8	23.0
1944.7	2985.6	3746.9	4424.2	358.2	227.5	148.2	118.1	9.5	9.0	12.5
3083.6	6823.7	7937.6	9233.6	460.7	299.4	135.3	116.3	9.0	17.2	17.0
1004.5	1995.4	2151.3	2532.5	318.4	252.1	126.9	117.7	4.8	14.7	14.1
2079.1	4828.3	5786.3	6701.1	554.3	322.3	138.8	115.8	11.5	18.4	18.2
102.1	114.8	106.1	100.8	297.3	183.3	106.9	100.8	10.1	11.4	9.0
103.1	117.1	108.3	102.8	337.1	204.1	111.3	102.8	10.6	12.9	10.7
97.4	119.9	104.2	95.5	315.	191.8	99.5	95.5	10.4	14.0	9.8
120.9	1032.1	816.1	610.6	618.6	505.0	59.2	74.8	4.1	53.6	26.0
102.9	481.3	548.0	644.1	1385.2	625.9	133.8	117.5	17.2	36.1	30.0
103922	129034	132t16	131989	154.2	127.0	102.3	99.5	4.0	4.4	3.5
98703	131176	138948	142000	185.2	143.9	108.3	102.2	5.2	5.9	5.3
95673	94971							-0.2	-0.1	
33336	32335	32260	32435	106.9	97.3	100.3	100.5	1.9	-0.6	-0.4

续前表 2 continued

指　　标		Item	1985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00 million yuan）	3619.5
主要农产品产量	（万吨）	Output of Major Farm Products　（10000 tons）	
粮　　食		Grain	37911
棉　　花		Cotton	414.7
油　　料		Oil – Bearing Crops	1578.4
甘　　蔗		Sugar Cane	5154.9
甜　　菜		Beet Roots	891.9
茶　　叶		Tea	43.2
水　　果		Fruits	1163.9
肉　　类		Meat	
水 产 品		Aquatic Products	705.2
工业		Industry	
工业总产值	（亿元）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100 milliOn yuan）	9716.5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Output of Major Indstrial Products	
布	（亿米）	Cloth　（100 million m）	146.7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Machine – Made Paper and Paperboards　（10000 tons）	911
糖	（万吨）	Sugar（10000 tons）	451
家用电冰箱	（万台）	Household Refrigertors　（10000 units）	145
电视机	（万台）	Television Sets　（10000 units）	1668
#彩色电视机		Color Television Sets	435
家用洗衣机	（万台）	Household Washing Machines　（10000 units）	887
录音机	（万台）	Recorders　（10000 units）	1393

总量指标 Aggrgeate Data				速度指标（%）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速度 Index（1997 比以下各年）（1997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1990	1995	1996	1997	1985	1990	1995	1996	1986～1990	1991～1995	1991～1997
7662.1	20340.9	23428.7	24587.7	207.6	164.6	114.9	105.1	4.8	7.4	7.4
44624	46662	50454	49417	130.4	110.7	105.9	97.9	3.3	0.9	1.5
450.8	476.8	420.3	460.3	111.0	102.1	96.5	109.5	1.7	1.1	0.3
1613.2	2250.3	2210.6	2157.4	136.7	133.7	95.9	97.6	0.4	6.9	4.2
5762.0	6541.7	6687.6	7889.7	153.1	136.9	120.6	118.0	2.3	2.6	4.6
1452.5	1398.4	1672.6	1496.8	167.8	103.0	107.0	89.5	10.2	-0.8	0.4
54.0	58.9	59.3	61.3	141.9	113.5	104.1	103.4	4.6	1.8	1.8
1874.4	4214.6	4652.8	5089.3	437.3	271.5	120.8	109.4	10.0	17.6	15.3
1237.0	2517.2	3288.1	3601.8	510.7	291.2	143.1	109.5	11.9	15.3	16.5
23924.4	91893.8	99595.3	113732.7	666.4	358.9	131.9	113.1	13.2	22.2	20.0
188.8	260.2	209.1	248.8	169.6	131.8	95.6	119.0	5.2	6.6	4.0
1372	2812	2638	2733	300.0	199.2	97.2	103.6	8.5	15.4	10.3
582	559	640	703	155.9	120.8	125.8	109.8	5.2	-0.8	2.7
463	919	980	1044	720.0	225.5	113.6	106.5	26.1	14.7	12.3
2685	3496	3542	3637	218.0	135.5	104.0	102.7	10.0	5.4	4.4
1033	2058	2538	2711	623.2	262.4	131.7	106.8	18.9	14.8	14.8
663	948	1075	1254	141.4	189.1	132.3	116.7	-5.7	7.4	9.5
3024	8581	8633	8274	594.0	273.6	96.4	95.8	16.8	23.2	15.5

续前表 3 continued

指　标		Item	1985
照相机	（万架）	Cameras　(10000 units)	179
原　煤	（亿吨）	Coal　(100 million tons)	8.7
原　油	（万吨）	Crude Oil　(10000 tons)	12490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Electricity　(100 million kwh)	4107
钢	（万吨）	Steel　(10000 tons)	4679
成品钢材	（万吨）	Steel Products　(10000 tons)	3693
水　泥	（万吨）	Cement　(10000 tons)	14595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Principal Financial ltem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ith Independent Accounting System	
固定资产原价	（亿元）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100 million yuan)	6926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亿元）	Annual Average Balance of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100 million yuan)	4725
利润和税金总额	（亿元）	Pre－Tax Profits　(100 million yuan)	1657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建筑业企业人数	（万人）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10000 persons)	1701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100 million yuan)	985.1
施工房屋面积	（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10000 sq.m)	35492
竣工房屋面积	（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10000 sq.m)	17073
交通运输		Transportation	
货运量	（万吨）	Freight Traffic　(10000 tons)	745763
铁　路		Railways	130709
公　路		Highways	538062
水　运		Waterways	63322
管　道		Pipelines	13650
空　运		Civil Aviation	20
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10000 persons)	620206
铁　路		Railways	112110
公　路		Highways	476486

总量指标 Aggrgeate Data				速度指标（%）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速度 Index（1997 比以下各年）（1997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1990	1995	1996	1997	1985	1990	1995	1996	1986～1990	1991～1995	1991～1997
213	3326	4121	4687	2618.4	2200.5	140.9	113.7	3.5	73.3	55.5
10.8	13.6	14.0	13.7	157.5	126.9	100.7	97.9	4.4	4.7	3.5
13831	15005	15733	16074	128.7	116.2	107.1	102.2	2.1	1.6	2.2
6212	10070	10813	11356	276.5	182.8	112.8	105.0	8.6	10.1	9.0
6635	9536	10124	10894	232.8	164.2	114.2	107.6	7.2	7.5	7.3
5153	8980	9338	9979	270.2	193.7	111.1	106.9	6.9	11.7	9.9
20971	47561	49119	51174	350.6	244.0	107.6	104.2	7.5	17.8	13.6
14390	44989	52027	59570	860.1	414.0	132.4	114.5	15.7	25.6	22.5
10139	32287	34493	39779	841.9	392.3	123.2	115.3	16.5	26.1	21.6
1946	5050	5147	5740	346.4	295.0	113.7	111.5	3.3	21.0	16.7
1717	2512	2992	2805	164.9	163.4	111.7	93.8	0.2	7.9	7.3
1947.6	9505.0	11579.2	12462.6	403.2	314.0	193.7	105.1	9.1	11.0	11.6
37923	89863	129087	128680	362.6	339.3	143.2	99.7	1.3	18.8	19.1
19553	35666	60048	62244	364.6	318.3	174.5	103.7	2.7	12.8	18.0
970602	1234810	1296200	1275802	171.1	131.4	103.3	98.4	5.4	4.9	4.0
150681	165855	168803	169734	129.9	112.6	102.3	100.6	2.9	1.9	1.7
724040	940387	983860	976536	181.5	134.9	103.8	99.3	6.1	5.4	4.4
80094	113194	127430	113406	179.1	141.6	100.2	89.0	4.8	7.2	5.1
15750	15274	15992	16002	117.2	101.6	104.8	100.1	2.9	-0.6	0.2
37	101	115	125	625.0	337.8	123.8	108.7	13.1	22.2	19.0
772682	1172596	1244722	1325364	213.7	171.5	113.0	106.5	4.5	8.7	8.0
95712	102745	94162	92578	82.6	96.7	90.1	98.3	-3.1	1.4	-0.5
648085	1040810	1122110	1204583	252.8	185.9	115.7	107.3	6.3	9.9	9.3

续前表 4 continued

指 标		Item	1985
水 运		Waterways	30863
空 运		Civil Aviation	747
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V01ume of Freight Handled at Major Coastal Ports （10000 tons）	31154
邮电通信业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Total Business Revenue （100 million yuan）	30
函 件	（亿件）	Number of Letters Delivered （10000 pieces）	46.8
报刊期发数	（万份）	Number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Distilbuted （10000 copies）	30172
局用交换机容量	（万门）	Capacity of Office Telephone Exchanges （10000 lines）	613
中央国有		Central State – owned	337
地方国有		Local State – owned	277
电话机	（万部）	Number of Telephone Sets （10000 units）	626
中央国有		Central State – owned	476
地方国有		Local State – owned	150
国内商业		Domestic Trad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100 miUion yuan）	3801
对外经济贸易		Foreign Trade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Total Exports and Imports（USD 100 milhon）	696.0
进口额		Imports	422.5
出口额		Exports	273.5
国际旅游		International Tourism	
来华旅游人数	（万人）	Number of Tourists from Abroad （10000 persons）	1783
旅游外汇收入	（亿美元）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from Tourism（USD 100 million）	12.5
金融保险		Finance and Insurance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亿元）	Deposits of National Banking System（100 million yuan）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亿元）	Loans of National Banking System （100 million yuan）	

总量指标 Aggrgeate Data				速度指标（%）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速度 Index（1997 比以下各年）（1997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1990	1995	1996	1997	1985	1990	1995	1996	1986～1990	1991～1995	1991～1997
27225	23924	22895	22573	73.1	82.9	94.4	98.6	－2.5	－2.6	－2.6
1660	5117	5555	5630	753.7	339.2	110.0	101.4	17.3	25.3	19.1
48321	80166	85152	90822	291.5	188.0	113.3	106.7	9.2	10.7	9.4
82	989	1342	1773	3144.4	1139.9	179.3	132.1	22.5	44.8	41.6
54.9	79.6	78.7	68.6	146.6	125.0	86.2	87.2	3.2	7.7	3.2
20078	21689	21157	21875	72.5	109.0	100.9	103.4	－7.8	1.6	1.2
1232	7204	9291	11269	1838.3	914.7	156.4	121.3	15.0	42.4	37.2
826	5457	6924	8407	1494.7	1017.8	154.1	121.4	19.6	45.9	39.3
406	1747	2367	2862	1033.2	704.9	163.8	120.9	7.9	33.9	32.2
1233	5762	7732	10111	1615.2	820.0	175.5	130.8	14.5	36.1	35.1
1026	4346	5538	6745	1417.0	657.4	155.2	121.8	16.6	33.5	30.9
205	1152	1509	9432043	362.0	996.6	177.3	135.4	6.4	41.2	38.9
7250	20620	24774	27299	241.6	205.4	123，8	109.3	3.3	10.7	10.8
1154.4	2808.6	2898.8	3250.6	467.0	281.6	115，7	112.1	10.6	19.5	15.9
533.5	1320.8	1388.3	1423.6	336.9	266.8	107，8	102.5	4.8	19.9	15.1
620.9	1487.8	1510.5	1827.0	668.0	294.3	122.8	121.0	17.8	19.1	16.7
2746	4639	5113	5759	323.0	209.7	124.1	112.6	9.0	11.1	11.2
22.2	87.3	102.0	120.7	965.6	543.7	138.3	118.3	12.2	31.5	27.4
			82390							
			74914							

续前表 5 continued

指　标		Item	1985
中保集团保险金额	(亿元)	PICC Amount Insured (100 million yuan)	
中保集团保费	(亿元)	PICCInsurancePremuim (100 million yuan)	
中保集团赔款额	(亿元)	PICCAmountReparations (100 million yuan)	
教育、科技、文化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e	
教育		Education	
专任教师数	(万人)	Full – time Teachers (10 000 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34.4
中等学校		Sccondary Schools	296.7
小　学		Primary Schools	537.7
在校学生数	(万人)	Students Enrollment (10000 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70.2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5092.6
小　学		Primary Schools	13370
国家用于教育支出	(亿元)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on Education (100 million yuan)	226.0
科技		Scienceand Technology	
科学家、工程师数	(万人)	Number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10 000 persons)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亿元)	Expenditure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00million yuan)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Volume of Transaction in Technical Markets (10 000 yuan)	
文化		Culture	
出版数量		Publications	
图　书	(亿册，张)	Number of Books Published (100 million copies)	66.7
杂　志	(亿册)	Number of Magazines Issued (100 million copies)	25.6
报　纸	(亿份)	Number of Newspapers Issue (100 million copies)	199.8
故事影片产量	(部)	Production of Feature Films (film)	127
电视节目制作时间	(小时)	Time for TV Programs Production (hours)	38056
家庭、生活、环境		Family, People' s Livelihood and Environment	

总量指标 Aggrgeate Data				速度指标（%）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速度 Index（1997 比以下各年）(1997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1990	1995	1996	1997	1985	1990	1995	1996	1986～1990	1991～1995	1991～1997
			171315							
			7727094							
			2471528							
39.5	40.1	40.3	40.5	117.7	102.5	101.0	100.5	2.8	0.3	0.4
349.2	388.3	404.0	418.6	141.1	119.9	107.8	103.6	3.3	2.1	2.6
558.2	566.4	573.6	579.4	107.8	103.8	102.3	101.0	0.8	0.3	0.5
206.3	290.6	302.1	317.4	186.4	153.9	109.2	105.1	3.9	7.1	6.3
5105.4	6191.5	6635.7	6995.2	137.4	137.0	113.0	105.4	0.1	3.9	4.6
12241	13195	13615	13995	104.7	114.3	106.1	102.8	－1.7	1.5	1.9
462.5	1193.8							15.3	20.9	
	155.4	168.7	166.6			107.2	98.8			
	349.0	404.7	481.9			138.1	119.1			
750969	2683447	3002045	3513718			130.9	117.0		29.0	24.7
56.4	63.2	71.6	73.1	109.6	129.6	115.7	102.1	－3.3	2.3	3.8
17.9	23.4	23.1	24.4	95.3	136.3	104.3	105.6	－6.9	5.5	4.5
160.5	178.9	179.5	186.5	93.3	116.2	104.2	103.9	－4.3	2.2	2.2
134	146	110	88	69.3	65.7	60.3	80.0	1.1	1.7	－5.8
91572	383513	550738	616437	1619.8	673.2	160.7	111.9	19.2	33.2	31.3

续前表 6 continued

指 标		Item	1985
家庭		Family	
家庭总户数	（万户）	Total Number of Househ01ds (10000households)	23804
城镇居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P	（人）	Average Household Size in Urban Areas (person)	3.9
农村居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人）	Average Household Size in Rufal Areas (person)	5.1
婚姻		Marriages and Divorces	
结婚数	（万对）	Numbe of Marriage (10000 couples)	831.3
离婚数	（万对）	Number of Divorces (10000 couples)	45.8
居住		Housing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Per Capita Floor Space of Urban Residents (sq.m)	5.2
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Per Capita Floor Space of Rural Residents (sp.m)	14.7
生活		People' s Livlihood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Per Capita Anuual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ods (yuan)	73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gidents (yuan)	398
城乡储蓄荐款余额	（亿元）	Outstanding Amount ofvSaring Deposits in Urban and Rufal Areas (100 million yuan)	1622.6
工资和福利		Wages and Welfare	
工资总额	（亿元）	Total Wages (100 mmion yuan)	1383
职工平均工资	（元）	Average Wage of Staff and Workers (yuan)	1148
职工保险福利费	（亿元）	Insurance and Welfare Funds for Staff and Workers (100 million yuan)	331.6
离休、退休、退职职工人数	（万人）	Number of Retired Resigned Staff and Workers (10000 persons)	1637
离退休、退职职工保险福利费	（亿元）	Insurance and Welfare Funds for Retired Staff and Workers (100 million yuan)	149.8

总量指标 Aggrgeate Data				速度指标（%）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速度 Index（1997 比以下各年）(1997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1990	1995	1996	1997	1985	1990	1995	1996	1986—1990	1991—1995	1991—1997
27738	31676	32008	32890	138.2	118.6	103.8	102.8	3.1	2.7	2.5
3.5	3.2	3.2	3.2	82.1	91.4	100.0	100.0	−2.1	−1.8	−1.3
4.8	4.5	4.4	4.4	86.3	91.7	97.8	100.0	−1.2	−1.3	−1.2
951.1	929.7	934.0	909.1	109.4	95.6	97.8	97.3	2.7	−0.5	−0.6
80.0	105.5	113.2	119.8	261.6	149.8	113.6	105.8	11.8	5.7	5.9
6.7	8.1	8.5	8.8	169.2	131.3	108.6	103.5	5.2	3.9	4.0
17.8	21.0	21.7	22.4	152.4	125.8	106.7	103.2	3.9	3.4	3.3
1510	4283	4839	5160	194.5	157.4	107.4	103.4	4.3	7.9	6.7
686	1578	1926	2090	162.7	140.6	114.0	104.6	3.0	4.3	5.0
7034.2	29662.3	38520.8	46279.8	1852.2	657.9	156.0	120.1	34.1	33.4	30.9
2951	8100	9080	9405	189.4	146.8	103.5	100.5	5.2	7.2	5.6
2140	5500	6210	6470	156.9	139.3	104.8	101.1	2.4	5.8	4.8
937.9	2361.3	2725.3	3043.5	255.6	149.5	114.9	108.3	11.3	5.4	5.9
2301	3094	3212	3351	204.7	145.6	108.3	104.3	7.0	6.1	5.5
472.4	1541.8	1817.8	2068.3	384.5	201.7	119.6	110.4	13.8	11.0	10.5

续前表 7 continued

指　标	Item	1985
卫生	Health Care	
医院、卫生院　（个）	Number of Hospitals	59614
医生　（万人）	Number of Doctors　(10000 persons)	141.3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10000 units)	222.9
市政建设	City Construction	
自来水供应量　（亿吨）	Volume of Tap Water Suppl　(100 million tons)	128.0
下水道长度　（公里）	Length of Sewer Pipelines　(km)	31556
城市煤气和天然（万立方米）气供气量	Volume of Coal Ga sand Natural Gas Supply in Urban Areas (10000 cu.m)	411853
公共汽（电）车总数　（辆）	Total Number of Public – Buses and Trolley Buses (unit)	45155
铺装道路长度　（公里）	Length of Paved Roads (km)	38282
绿地面积　（公顷）	Areas of Green Land (hectare)	159291
环境、灾害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	
污染治理项目本年　（亿元）完成投资额	Actual Investment 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for Pollution Treatment in the Year (100 milllon yuan)	22.2
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起）	Number of Polution Accidents (times)	2716
环境污染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Losses Coverted into Cash (10000 yuan)	
环境污染事故赔罚款金额（万元）	Amount of Reparations and Fines (10000 ynan)	
火灾发生数　（起）	Number of Fire Disasters	34996
火灾损失　（万元）	Fire Loss (10000 yuan)	28422
交通事故发生数　（起）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s	97573
交通事故损失　（万元）	Loss of Traffic Accudebts (10000 yuan)	6599

资料来源：《中国境计年鉴（1998)》。20 页～27 页，北京．中国境计出版社，1998。

说明：1. 本表总量指标中的价值量指标除邮电业务总量指标外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2. 本表速度指标中，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物价指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值、邮电业务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收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费、离退休、退职职工保险福利费指标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3. 邮电业务总量，1991 年后按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 年及以前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

总量指标 Aggrgeate Data				速度指标（%）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速度 Index（1997 比以下各年）（1997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1990	1995	1996	1997	1985	1990	1995	1996	1986～1990	1991～1995	1991～1997
62454	67807	67964	67911	113.9	108.7	100.2	99.9	0.9	1.7	12
176.3	191.8	194.1	198.5	140.5	112.6	103.5	102.3	4.5	1.7	1.7
262.4	283.6	286.6	290.3	130.2	110.6	102.4	101.3	3.3	1.6	1.5
382.3	496.6	466.1	476.8	372.5	124.7	96.0	102.3	24.5	5.4	3.2
57787	110293	112812	119739	379.4	207.2	108.6	106.1	12.9	13.8	11.0
2389354	1940248	1985908	1931945	469.1	80.9	99.6	97.3	42.1	－4.1	－3.0
62215	136821	148109	169121	374.5	271.8	123.6	114.2	6.6	17.1	15.4
94820	130308	132583	138610	362.1	146.2	106.4	104.5	19.9	6.6	5.6
474613	678310	665119	682238	428.3	143.7	100.6	102.6	24.4	7.4	5.3
45.4	98.7	95.6	116.4	524.3	256.4	117.9	121.8	15.4	16.8	14.4
3462	1966	1446	1992	73.3	57.5	101.3	137.8	5.0	－10.7	－7.6
57302	37136	36856	140280	400.8	244.8	377.7	380.6	10.4	－8.3	13.6
51182	107777	102909	154141	542.3	301.2	143.0	149.8	12.5	16.1	17.1
250244	271843	287685	304217	311.8	121.6	111.g	105.7	20.7	1.7	2.8
35362	152267	171769	184616	2797.6	522.1	121.2	107.5	39.9	33.9	26.6

说明：a) The data in value terms in the table are c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b) The 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of thevfolow indicators are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prices: GNP, GDP, price indices,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orestxy, animalhusbandry and fishery,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gross output valu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usiness volume of postvand telecommunicatlons total retailsales, per capita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ldtnts, Wages and welfare. retail sales, per capita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ages and welfare.

c) Figures on postl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before 1990 were calculated at 1980 constant prices, and those since 1991 were calculated at constant pnces.

附表 12　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1990 年前）

	1949 年	1957 年	1965 年	1978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89 年
谷物		3	2	2	1	2	1
猪、牛、羊肉	3	2	3	3	3	2	1
棉花	4	2	2	3	2	1	1
大豆	2	2	2	3	3	3	3
花生	2	2	3	2	2	1	2
油菜子	2	2	2	2	2	1	1
甘蔗		3		9	9	4	4
甜菜				21	12	8	8
茶叶	3	3	3	2	2	2	2
钢	26	9	8	5	5	4	4
煤	9	5	5	3	3	2	1
原油	27①	23	12	8	6	6	6
发电量	25	13	9	7	6	5	4
水泥		8	8	4	3	1	1
化肥		33	8	3	3	3	3
化学纤维		26②		7	5	5	4
布		3	3	1	1	1	1
糖			8	8	10	6	6
电视机				8	5	3	1

资料来源：同附表 8。

①1950 年位次。②1960 年位次。

附表 13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
STRUCTURAL INDICATORS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指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人口与就业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人口	Population				
城乡结构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城镇	Urban	23.7	26.4	29.0	29.9
乡村	Rural	76.3	73.6	71.0	70.1
性别结构	Sexual Structure				
男	Male	51.7	51.5	51.0	51.1
女	Female	48.3	48.5	49.0	48.9
就业	Employment				
产业结构	Industrial Structure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62.4	60.1	52.2	49.9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20.9	21.4	23.0	23.7
第三产业	Teriary Industry	16.9	18.5	24.8	26.4
经济类型结构	Structure by Ownership				
国有单位	State – owned	18.0	16.2	16.6	15.9
集体单位	Collective Owned	6.7	5.6	4.6	4.1
联营经济单位	Joint – owned		0.2	0.1	0.1
股份制经济单位	Share Holding			0.5	0.7
外商投资经济单位	Foreign Funded		0.1	0.4	0.4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单位	Funded by Entrep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0.01	0.4	0.4	
其他经济单位	Others		…	0.02	0.02
私营企业	Private		0.1	0.7	1.1
个体	Individual	0.9	1.0	2.3	2.8
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农民	Farmers Engaged in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ing	74.3	74.0	71.9	71.0
宏观经济	Macro Economy				

指　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国民核算	National Accounting				
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	Industrial Structure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28.4	27.1	20.5	18.7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43.1	41.6	48.8	49.2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28.5	31.3	30.7	32.1
国内支出结构	Domestic Expenditures Structure				
最终消费	Total Consumption	65.7	62.0	58.1	58.8
居民消费	Personal Consumption	52.2	49.7	46.9	47.5
农民	Agricultural Residents	33.2	28.0	23.0	23.6
非农业居民	Nonagricultural Residems	19.0	21.7	23.9	23.9
政府消费	Social Consumption	13.5	12.3	11.3	11.4
资本形成	Total Investment	38.5	35.2	40.2	37.5
固定资本形成	Fixed Assets	30.0	25.8	34.3	33.8
存货增加	Goods in Stock	8.5	9.3	6.0	3.8
净出口	Net Export	-4.2	2.8	1.7	3.6
投资	Investment				
经济类型结构	Structure by Ownership				
国有单位	State - owned	66.1	65.6	54.4	52.5
集体单位	Collective Owned	12.9	11.9	16.4	15.4
联营经济单位	Joint - owned			0.6	0.5
股份制经济单位	Share Holding			4.3	5.6
外商投资经济单位	Foreign Funded			7.8	7.8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单位	Funded by Entrep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3.4	3.8
其他经济单位	Others			0.3	0.7
个体	Individual	21.0	22.5	12.8	13.7
资金来源结构	Structure of Funded Sources				
国家预算内资金	State Budgetary Appropriation	16.0	8.7	3.0	2.8
国内贷款	Domestic Loans	20.1	19.6	20.5	18.9
利用外资	Foreign Investment	3.6	6.3	11.2	10.6

指　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自筹和其他投资	Fundraising	60.3	65.4	65.3	67.7
财政	Government Finance				
财政收入结构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Revenue				
中央	Central Government	38.4	33.8	52.2	48.9
地方	Local Governments	61.6	66.2	47.8	51.1
财政支出结构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中央	Central Government	39.7	32.6	29.2	27.4
地方	Local Governments	60.3	67.4	70.8	72.6
利用外资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实际利用外资结构	Structure of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tilized				
对外借款	Loans from Abroad	57.8	63.5	21.5	18.7
外商直接投资	Direct Investment by Foreign Enterpreneurs	35.7	33.9	77.9	70.2
外商其他投资	Other Investment by Foreign Enterpreneurs	6.4	2.6	0.6	11.1
能源生产与消费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能源生产总量结构	Structure of Total Energy Production				
原煤	Coal	72.8	74.2	75.3	74.3
原油	Petroleum crude Oil	20.9	19.0	16.6	17.4
天然气	Natural Gas	2.0	2.0	1.9	2.3
水电	Hydropower	4.3	4.8	6.2	6.0
能源消费总量结构	Structure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煤炭	Coal	75.8	76.2	74.6	73.5
石油	Petroleum Oil	17.1	16.6	17.5	18.6
天然气	Natural Gas	2.2	2.1	1.8	2.2
水电	Hydropower	4.9	5.1	6.1	5.7
产业经济	Industrial Economy				
农业	Agriculture				

指　　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农林牧渔业产值结构	Structure of Gross Output Value				
农业	Farming	69.2	64.7	53.4	56.4
林业	Forestry	5.2	4.3	3.5	3.3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22.1	25.7	29.7	31.0
渔业	Fishery	3.5	5.4	8.4	9.3
工业	Industry				
全部工业总产值结构	Structure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t Township and Higher Levels				
按经济类型分	By Ownership				
国有工业	State - owned	64.9	54.6	34.0	25.5
集体工业	Collective Owned	32.1	35.6	36.6	38.1
#乡办工业	Township	7.8	10.2	13.0	
村办工业	Vilage	6.8	10.0	12.9	15.8
合作经营工业	Joint	1.6	2.3	2.3	4.1
城乡个体工业	Individual Owiled	1.9	5.4	12.9	17.9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Other Ownership	1.2	4.4	16.6	18.4
#股份制工业	Share Holding			3.5	4.4
外商投资工业	Foreign Funded			5: 9	7.3
港澳台商投资工业	Funded by Entrep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6.1	5.4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建筑业总产值结构	Structure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国有经济	State - owned	48.2	48.0	39.5	36.3
城镇集体经济	Collective Owned	20.4	21.0	20.0	31.5
私营经济	Private				0.4
联营经济	Joint - owned			0.1	0.2
股份制经济	Share Holding			1.5	3.5
外商投资经济	Foreign Funded			0.3	0.6

指　　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	Funded by Entrep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0.4	0.5
其他经济施工企业	Others			0.01	0.2
农村建筑队	Rural Construction Teams	31.5	30.9	38.2	26.8
运输业	Transportation				
货运量结构	Structure of Freight Traffic				
按运输方式分	B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铁　路	Railways	17.5	15.5	13.4	13.3
公　路	Highways	72.1	74.6	76.2	76.5
水　运	Waterways	8.5	8.3	9.2	8.9
民用航空	Civil Aviation	…	…	0.01	0.01
管道输油（气）	Pipelines	1.8	1.6	1.2	1.3
国内商业	DomesticTrade				
批发零售贸易商品销售总额结构	Structure of Total Sales by Ownership				
国有商业	State – owned Trade			65.8	48.5
集体商业	Collective Owned			26.6	21.0
私营企业	Private Trade			0.8	2.8
个体经济	Individual				20.2
联营经济商业	Joint – owned Trade			1.5	0.8
股份制商业	Share Holding Trade			4.6	5.3
外商投资商业	Foreign Funded Trade			0.2	0.6
港澳台商投资商业	Trade Funded by Entrep – 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0.3	0.3
其他经济单位	Others			0.3	0.4
对外经济贸易	Foreign Trade				
出口商品结构	Structure of Exports				
初级产品	Primary Goods	50.6	25.6	14.4	13.1
工业制成品	Manufactured Goods	49.4	74.4	85.6	86.9

指　　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进口商品结构	Structure of Imports				
初级产品	Primary Goods	12.5	18.5	18.5	20.1
工业制成品	Manufactured Goods	87.5	815	81.5	79.9
国际旅游	International Tourism				
来华旅游人数结构	Structure of Tourists				
外国人	Foreigners	7.7	6.4	12.7	12.9
华侨	Overseas Chinese	0.5	0.3	0.2	0.2
港澳台同胞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91.8	93.3	87.1	86.9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结构	Structure of Sources of Funds in State Banks				
各项存款	Deposits				86.7
金融债券	Bonds				0.03
对国际金融机构负债					0.2
货币流通量	Currency in Cirulation				10.7
其他收入	Others				2.3
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结构	Structure of Fund Uses in State Banks				
各项贷款	Loans				78.8
有价证券及投资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3.9
在国际金融机构资产					0.6
黄金占款	Purchase of Gold				…
外汇占款	Purchase of Foreign Exchanges				14.2
库存现金	Vault Cash				0.9
财政借款	Government Debt				1.7
教育、科技、文化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教育	Education				
在校学生结构	Structure of Student Enrollment				
大学生	College and University	0.9	1.2	1.9	1.5

指 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Students				
中学生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27.3	29.1	31.0	32.8
小学生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71.8	69.2	67.0	65.7
专任教师结构	Full - time Teachers by Type				
大学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4.0	4.2	4.0	4.0
中学	Secondary Schools	34.2	36.9	39.0	40.3
小学	Primary Schools	61.9	59.9	56.9	55.7
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技经费收入结构	Structure of Funding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penditure				
# 自筹资金	Fundraising			44.2	44.6
银行贷款	Loans from Banks			13.2	13.1
科技经费内部支出结构	Structure of Interna Expenditures on Seientific and Telenological Activities				
# 劳务费	# Service Fees			21.0	19.7
固定资产购建	Purchases of Fixed Assets			28.5	27.6
#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41.3	45.3
生活、环境	Family, People' s Livelihood and Environment				
生活	People' sLivelibood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食品类	Food	52.2	54.2	49.9	46.4
衣着类	Clothing	14.6	13.4	13.5	12.4
用品及其他	Articles for Daily Use and Others	28.4	27.6	29.5	32.6
居住	Residence	4.8	4.7	7.1	8.6

指　　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食品类	Food	57.6	58.6	58.	55.1
衣着类	Clothing	9.7	7.6	6.9	6.8
用品及其他	Aticles for Daily Use and Others	14.2	16.1	20.6	23.7
居住	Residence	18.2	17.3	13.9	14.4
福利	Social Welfare				
职工保险福利费结构	Structure of Insurance Contribution and Welfare Funds of Stuff and Workers				
国有单位	State – owned Units	82.5	82.S	83.9	84.7
城镇集体单位	Urban collective Owned Units	17.1	16.3	12.5	11.1
其他单位	Others	0.4	0.8	3.7	4.2
离退休人员结构	Structure of Retired Staff and Workers				
国有单位	State – owned Units	71.2	75.7	77.6	78.7
城镇集体单位	Urban C01lective Owned Units	28.5	24.6	20.1	18.6
其他单位	Others	0.3	0.5	2.3	2.7
卫生	Flealth Care				
医生结构	Doctors by Type				
中医	Doctors of Traditional Chin – ese Medicine	23.8	20.9	18.7	17.4
西医师	Doctors of Western Medicine	42.6	60.0	61.8	62.3
西医士	Paramedics of Western Medicine	33.5	18.8	19.0	19.7
医院床位结构	Hospital Beds by Area				
市医院	Hospitals at City Level	43.2	52.9	61.3	63.5
县医院	Hospitals at County Level	56.8	47.1	38.7	36.5
环境、灾害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s				
治理污染资金使用结构	Uses of Funds in Pollution				

指　　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7
	Treatment				
治理废水	Waste Water Treatment	44.6	47.6	45.6	62.6
治理废气	Waste Gas Treatment	32.4	32.6	33.2	24.6
治理固体废物	SOlid Wastes Treatment	9.0	11.2	14.1	5.4
治理噪声	Noise Abatement	2.3	2.6	2.2	0.7
其他	Others	11.7	6.0	4.9	6.7
火灾事故损失额结构	Structure of Fire Losses Converted into Cash				
特大	Extraordinarlly Serious Fires	41.4	35.1	35.8	23.7
重大	Serious Firies	33.4	27.8	38.3	14.5
一般	Ordinary Fires	25.2	37.2	25.9	61.8
交通事故损失额结构	Structure of Losses of Traffic Accidents Converted into Cash				
特大	Extraordinarily Serious Accidents	18.0	12.5	11.8	12.8
重大	Serious Accidents	14.6	19.8	22.0	21.1
一般	Ordinary Accidents	67.4	67.7	66.2	66.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28 页～31 页。

附表 14　　改革开放前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和增长速度

TWENTY YEARS' MAIN INDICATORS ANDGROWTH RATES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OPENNING

指　标		Item	1952	1978	1997	年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953－1978	1979－1997
人口与就业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人口	（万人）	Population　(10000persons)					
年底总人口		Year－end Population	57482	96259	123626	2.0	1.3
市镇人口		Urban	7163	17245	36989	3.4	4.1
乡村人口		Rural	50319	79014	86637	1.8	0.5
就业	（万人）	Employment　(10000persons)					
经济活动人口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21106	40682	70580	2.6	2.9
从业人员数		Employment	20729	40152	69600	2.6	2.9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17317	28313	34730	1.9	1.1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1531	6945	16495	6.0	4.7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1881	4890	18375	3.7	7.2
职工人数		Staff and Workers	1603	9499	14668	7.1	2.3
宏观经济		Macroeconomic Indicator					
国民核算	（亿元）	National Accounting (100million yuan)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679.0	3624.1	74772.4	6.1	9.8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342.9	1018.4	12968.8	2.1	5.0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141.8	1745.2	36770.3	11.0	11.9
工业		Industry	119.8	1607	31752.3	11.5	12.0
建筑业		Construction	22.0	138.2	5018.0	7.2	10.8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194.3	806.5	24033.3	5.5	10.6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29.0	172.8	4525.5	7.5	10.1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Services	80.3	265.5	6281.5	4.3	9.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Per Capital GDP (yuan)	119	397	6079	4.0	8.4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GDP with Expenditure Approach	692.2	3605.6	76077.2		
#最终消费		Total Consumption	546.3	3239.1	44768.2		
居民消费		Resident Consumption	453.0	1759.1	36117.8		
政府消费		Public Consumption	93.3	480.0	8650.4		
资本形成总额		Total Investment	153.7	1377.9	28564.0		
固定资本形成		Fixed Assets	80.7	1073.9	25698.0		
存货增加		Stock	73.0	304.0	2866.0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0million yuan)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43.56	500.99	9917.02	9.8	17.0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1.15	167.73	3921.94	22.1	18.0
财政	（亿元）	Public Finance　(100milion yuan)					
国家财政收入		Government Revenue	183.70	1132.26	8651.14	7.2	11.3
中　央		Central Government	99.86	175.77	4426.92	2.2	18.5

指　标	Item	1952	1978	1997	年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953–1978	1979–1997
地　方	Local Governments	123.00	956.49	4424.22	8.2	8.4
国家财政支出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176.00	1122.09	9233.56	7.4	11.7
中　央	Central Government	168.60	532.12	2532.50	4.5	8.6
地　方	Local Governments	51.92	589.97	6701.06	9.8	13.6
能源生产与消费（万吨标准煤）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nergy (10000tons of SCE)					
能源生产总量	Total Energy Porduction	5192	62770	131989	10.5	4.0
能源消费总量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5411	57144	142000	9.9	4.9
产　业	Industries					
农业	Agriculture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00million yuan)	461	1397	24588	2.7	6.6
主要农产品产量　（万吨）	Output of Major Farm Products (10000tons)					
粮　食	Grain	16392.0	30477.0	49417.1	2.4	2.6
棉　花	Cotton	130.4	216.7	460.3	2.0	4.0
油　料	Oil – Bearing Crops	419.3	521.8	2157.4	0.8	7.8
甘　蔗	Sugar Cane	711.6	2111.6	7889.7	4.3	7.2
甜　菜	Beet Roots	47.9	270.2	1496.8	6.9	9.4
茶　叶	Tea	8.2	26.8	61.2	4.7	4.5
水　果	Fruits	244.3	657.0	5089.2	3.9	11.4
肉　类	Meat	338.5	856.3	5152.1	3.6	9.9
水产品	Aquatic Products	167	465.5	3601.6	4.0	11.4
工业	Industry					
工业总产值　（亿元）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100million yuan)	349	4237	113733	11.4	14.9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Output of Major Indstrial Products					
布　（亿米）	Cloth (100million meter)	38.3	110.3	248.8	4.2	4.4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Machine – Made Paper and Paperboards (10000tons)	37.0	439.0	2733.2	10.0	10.1
糖　（万吨）	Sugar (10000tons)	45.0	227.0	702.6	6.4	6.1
家用电冰箱　（万台）	Household Refrigerators (10000units)		2.80	1044.43		36.6
电视机　（万台）	Television Sets (10000units)		51. 73	3637.24		25.1
#彩色电视机	Color Television Sets		0.38	2711.32		59.5
家用洗衣机　（万台）	Household Washing Machines (10000units)		0. 04	1254.46		72.4
录音机　（万台）	Recorders (1000units)		4.70	8273.86		48.2
照相机　（万架）	Cameras (1000units)		17. 89	4686. 89		34.1
原煤　（亿吨）	Coal (100million tons)	0.66	6. 18	13.73	90	4.3
原　油　（万吨）	Crude Oil (10000tons)	44	10405	16074	23.4	2.3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Electricity (100million kwh)	73	2566	11356	14.7	8.1
钢　（万吨）	Steel (10000tons)	135	3178	10894	12.9	6. 7

指　标		Item	1952	1978	1997	年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953－1978	1979－1997
成品钢材	（万吨）	Steel Products　(10000tons)	106	2208	9979	12.4	8. 3
水　泥	（万吨）	Cement　(10000tons)	286	6524	51174	12.8	11.5
交通运输		Transportation					
运输线路长度		Length of Transportation Routes					
铁路营业里程		Length of Railways in Operation	2.29	4.86	5.76	2, 9	0.9
公路里程		Length of Highways	12.67	89.02	122.64	7. 8	1.7
内河航道里程		Length of Navigable Inland Waterway	9.50	13.60	10.98	1.4	－1.1
民用航线里程		Length of Civil Avaition Routes	1. 31	14.89	142.50	9.8	12. 6
管道里程		Length of Pipilines		0.83	2.04		4. 8
货运量	（万吨）	Freight Traffic　(10000tons)	31516	248946	1275802	8.3	9.0
铁路		Railways	13217	110119	169734	8.5	2.3
公路		Highways	13159	85182	976536	7.4	13.7
水运		Waterways	5141	43292	113406	8.5	5.2
管道		Pipelines		10347	16002		2.3
空运		Civil Aviation	0.2	6.4	124.7	14.3	16.9
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10000persons)	24518	253993	1325364	9.4	9.1
铁路		Railways	16352	81491	92578	6.4	0.7
公路		Highways	4559	149229	1204582	14.4	11.6
水运		Waterways	3605	23042	22573	7.4	－0.1
空运		Civil Aviation	2	231	5630	20.0	18.3
邮电通信业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邮电局所数			49541	49623	79273		2.5
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总长度			1289727	4863282	5766054	5.2	0.9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Total Business Revenue (100million yuan)	1.64	11.65	1773.29	7.8	23.1
函件	（亿件）	Number of Letters Delivered (10000pieces)	8.09	28.35	68.55	4.9	4.8
报刊期发数	（万份）	Number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Distributed　(10000copies)	1363	11250	21875	8.5	3.6
交换机容量	（亿门）	Capacity of Exchanges (10000lines)	47.1	405.9	11269.2	8.6	19.1
城市		Urban Areas	39.5	174.9	8406.8	5.9	22.6
农村		Rural Areas	7.6	230.9	2862.4	14.0	14.2
电话机	（亿部）	Number of Telephone Sets (10000units)	39.0	368.8	10111.1	9.0	19.0

指 标	Item	1952	1978	1997	年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953 – 1978	1979 – 1997
城市	Urban Areas	34.7	236.4	6745.2	7.7	19.3
农村	Rural Areas	4.3	132.4	2042.6	14.1	15.5
国内商业	Domestic Trad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100million yuan)	262.7	1264.9	27298.9	5.4	9.6
对外经济贸易	Foreign Trade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Total Exports andvImports (USD 100million)	19.4	206.4	3250.6	9.5	15.6
进口额	Imports	11.2	108.9	1423.6	9.1	14.5
出口额	Exports	8.2	97.5	1827.0	10.0	16.7
教育、文化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教育	Education					
专任教师数 （万人）	Full – time Teachers (10000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2.7	20.6	40.5	8.1	3.6
中等学校	Secofidary Schools	13.0	328. 1	418. 6	13.2	1.3
小 学	Primary Schools	143.5	522.6	579.4	5.1	0.5
在校学生数 （万人）	Students Enrollment (10000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9.1	85.6	317.4	5.9	7.1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314.5	6637.2	6995.2	12.4	0.3
小学	Primary Schools	5110.0	14624.0	13995.4	4.1	-0.2
文化	Culture					
出版数量	Publieationa					
图 书 （亿册·张）	Number of Books Published (100million copies)	7.9	37.7	73.1	6.2	3.5
杂 志 （亿册）	Number of Magazines Issued (100million copies)	2.0	7.6	24.4	5.3	6.3
报 纸 （亿份）	Number of Newspapers Issued (100million copies)	16.1	127.8	186.5	8.3	2.0
故事影片产量 （部）	Production Feature Films (film)	4	46	88	9.8	3.5
生活	Life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	Per Capita Consumption	80	184	2936	2.3	7.3
农民	Farmer	65	138	1930	1.8	7.2

指　标	Item	1952	1978	1997	年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953－1978	1979－1997
非农业居民	Nonfarmer	154	405	6048	3.0	6.2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Outstanding Amount of Saving Deposi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100million yuan）	8.6	210.6	46279.8	13.1	32．8
职工工资总额　（亿元）	Total Wages　（100million yuan）	68.3	568.9	9405.3	8.5	15.9
职工平均工资　（元）	Average Wageof Staff and Workers（yuan）	445	615	6470	1.2	4.2
卫生	Health Care					
医院、卫生院　（个）	Number of Hospitals	3540	64421	67911	11.8	0.3
医生　（万人）	Number of Doctors（10000persons）	42.5	103．3	198.5	3.5	3.5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	Number of Hospital Beds（10000units）	16.0	185.6	290.3	9.9	2.4
市政建设	City Construction					
自来水供应量　（亿吨）	Volume of Tap Water Supply（100milion tons）	9.6	78.8	476.8	10.5	9.9
下水道长度　（公里）	Length of Sewer Pipelines（km）	10107	19556	119739	3.2	10.0
城市煤气和天然气供气量　（万立方米）	Volume of Coal Gas and Natural Gas Supply in Urban Areas（10000cu.m）	12696	66593	535412	8.2	11.6
公共汽（电）车总数　（辆）	Total Number of Public Buses and Trolley Buses　（unit）	6174	25839	169121	7.1	10.4
铺装道路长度　（公里）	Length of Paved Roads　（km）	14422	26966	138610	3.0	9.0
绿地面积　（公顷）	Areas of Green Land　（hectare）	…	81735	682238		11.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38页～40页。

说明：1. 本表总量指标中的价值量指标除邮电业务总量指标外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2. 本表速度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邮电业务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职工平均工资指标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3. 邮电业务总量，1952、1978年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7年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

4. 在1952年数据列中，更新改造投资、能源生产与消费为1953年数据，市政建设指标为1957年数据。

a) The data in value terms inthe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b) The 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of the follow indicators are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es: GDP,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business volume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otal retail sales and average wage of staff and wotkers.

c) Figures 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1952and 1978were calculated at 1970constant prmes, and those in 1997were calculated at coustalit prices.

附表 15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The data is value term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单位：亿元（100million yuan）

年份 year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 Catering Trade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Per Capita GDP (yuan)
1952	679.0	679.0	342.9	141.8	119.8	22.0	194.3	29.0	80.3	119
1953	824.0	824.0	378.0	192.5	163.5	29.0	253.5	35.0	115.5	142
1954	859.0	859.0	392.0	211.7	184.7	27.0	255.3	38.0	120.3	144
1955	910.0	910.0	421.0	222.2	191.2	31.0	266.8	39.0	119.8	150
1956	1028.0	1028.0	443.9	280.7	224.7	56.0	303.4	46.0	131.4	165
1957	1068.0	1068.0	430.0	317.0	271.0	46.0	321.0	49.0	133.0	168
1958	1307.0	1307.0	445.9	483.5	414.5	69.0	377.6	71.0	136.6	200
1959	1439.0	1439.0	383.8	615.5	538.5	77.0	439.7	94.0	145.7	216
1960	1457.0	1457.0	340.7	648.2	568.2	80.0	468.1	104.0	133.1	218
1961	1220.0	1220.0	441.1	388.9	362.1	26.8	390.0	69.2	110.8	185
1962	1149.3	1149.3	453.1	359.3	325.4	33.9	336.9	57.4	80.5	173
1963	1233.3	1233.3	497.5	407.6	365.6	42.0	328.2	55.0	76.1	181
1964	1454.0	1454.0	559.0	513.5	461.1	52.4	381.5	58.4	94.0	208
1965	1716.1	1716.1	651.1	602.2	546.5	55.7	462.8	77.4	118.3	240
1966	1868.0	1868.0	702.2	709.5	648.6	60.9	456.3	85.1	148.1	254
1967	1773.9	1773.9	714.2	602.8	544.9	57.9	456.9	72.3	153.5	235
1968	1723.1	1723.1	726.3	537.3	490.3	47.0	459.5	70.5	138.9	222
1969	1937.9	1937.9	736.2	689.1	626.1	63.0	512.6	84.9	163.6	243
1970	2252.7	2252.7	793.3	912.2	828.1	84.1	547.2	100.2	178.1	275
1971	2426.4	2426.4	826.3	1022.8	926.6	96.2	577.3	108.4	178.3	288
1972	2518.1	2518.1	827.4	1084.2	989.9	94.3	606.5	118.0	194.3	292
1973	2720.9	2720.9	907.5	1173.0	1072.5	100.5	640.4	125.5	211.0	309
1974	2789.9	2789.9	945.2	1192.0	1083.6	108.4	652.7	126.1	206.6	310
1975	2997.3	2997.3	971.1	1370.5	1244.9	125.6	655.7	141.6	175.8	327
1976	2943.7	2943.7	967.0	1337.2	1204.6	132.6	639.5	139.6	147.2	316

年　份 year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 Catering Trade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Per Capita GDP (yuan)
1977	3201.9	3201.9	942.1	1509.1	1372.4	136.7	750.7	156.9	213.8	339
1978	3624.1	3624.1	1018.4	1745.2	1607.0	138.2	860.5	172.8	265.5	379
1979	4038.2	4038.2	1258.9	1913.5	1769.7	143.8	865.8	184.2	220.2	417
1980	4517.8	4517.8	1359.4	2192.0	1996.5	195.5	966.4	205.0	213.6	460
1981	4860.3	4862.4	1545.6	2255.5	2048.4	207.1	1061.3	211.1	255.7	489
1982	5301.8	5294.7	1761.6	2383.0	2162.3	220.7	1150.1	236.7	198.6	525
1983	5957.4	5934.5	1960.8	2646.2	2375.6	270.6	1327.5	264.9	231.4	580
1984	7206.7	7171.0	2295.5	3105.7	2789.0	316.7	1769.8	327.1	412.4	692
1985	8989.1	8964.4	2541.6	3866.6	3448.7	417.9	2556.2	406.9	878.4	853
1986	10201.4	10202.2	2763.9	4492.7	3967.0	525.7	2945.6	475.6	943.2	956
1987	11954.5	11962.5	3204.3	5251.6	4585.8	665.8	3506.6	544.9	1159.3	1104
1988	14922.3	14928.3	3831.0	6587.2	5777.2	810.0	4510.1	661.0	1618.0	1355
1989	16917.8	16909.2	4228.0	7278.0	6484.0	794.0	5403.2	786.0	1687.0	1512
1990	18598.4	18547.9	5017.0	7717.4	6858.0	859.4	5813.5	1147.5	1419.7	1634
1991	21662.5	21617.8	5288.6	9102.2	8087.1	1015.1	7227.0	1409.7	2087.0	1879
1992	26651.9	26638.1	5800.0	11699.5	10284.5	1415.0	9138.6	1681.8	2735.0	2287
1993	34560.5	34634.4	6882.1	16428.5	14143.8	2284.7	11323.8	2123.2	3090.7	2939
1994	46670.0	46759.4	9457.2	22372.2	19359.6	3012.6	14930.0	2685.9	4050.4	3923
1995	57494.9	58478.1	11993.0	28537.9	24718.3	3819.6	17947.2	3054.7	4932.3	4854
1996	66850.5	67884.6	13844.2	33612.9	29082.6	4530.3	20427.5	3494.0	5560.3	5576
1997	73452.5	74772.4	13968.8	36770.3	31752.3	5018.0	24033.3	4525.5	6281.5	60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55页。

说明：1980年以后一、二、三产业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差额为国外净要素收入。

a) Since 198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tal of primary, secondar &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has been the net factor income from abroad.

附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COMPOSI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The data in value term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

年份 year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 Catering Trade
1952	100.0	50.5	20.9	17.6	3.2	28.6	4.3	11.8
1953	100.0	45.9	23.4	19.8	3.5	30.8	4.2	14.0
1954	100.0	45.6	24.6	21.5	3.1	29.7	4.4	14.0
1955	100.0	46.3	24.4	21.0	3.4	29.3	4.3	13.2
1956	100.0	43.2	27.3	21.9	5.4	29.5	4.5	12.8
1957	100.0	40.3	29.7	25.4	4.3	30.1	4.6	12.5
1958	100.0	34.1	37.0	31.7	5.3	28.9	5.4	10.5
1959	100.0	26.7	42.8	37.4	5.4	30.6	6.5	10.1
1960	100.0	23.4	44.5	39.0	5.5	32.1	7.1	9.1
1961	100.0	36.2	31.9	29.7	2.2	32.0	5.7	9.1
1962	100.0	39.4	31.3	28.3	2.9	29.3	5.0	7.0
1963	100.0	40.3	33.0	29.6	3.4	26.6	4.5	6.2
1964	100.0	38.4	35.3	31.7	3.6	26.2	4.0	6.5
1965	100.0	37.9	35.1	31.8	3.2	27.0	4.5	6.9
1966	100.0	37.6	38.0	34.7	3.3	24.4	4.6	7.9
1967	100.0	40.3	34.0	30.7	3.3	25.8	4.1	8.7
1968	100.0	42.2	31.2	28.5	2.7	26.7	4.1	8.1
1969	100.0	38.0	35.6	32.3	3.3	26.5	4.4	8.4
1970	100.0	35.2	40.5	36.8	3.7	24.3	4.4	7.9
1971	100.0	34.1	42.2	38.2	4.0	23.8	4.5	7.3
1972	100.0	32.9	43.1	39.3	3.7	24.1	4.7	7.7
1973	100.0	33.4	43.1	39.4	3.7	23.5	4.6	7.8
1974	100.0	33.9	42.7	38.8	3.9	23.4	4.5	7.4
1975	100.0	32.4	45.7	41.5	4.2	21.9	4.7	5.9
1976	100.0	32.8	45.4	40.9	4.5	21.7	4.7	5.0

年份 year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 Catering Trade
1977	100.0	29.4	47.1	42.9	4.3	23.4	4.9	6.7
1978	100.0	28.1	48.2	44.3	3.8	23.7	4.8	7.3
1979	100.0	31.2	47.4	43.8	3.6	21.4	4.6	5.5
1980	100.0	30.1	48.5	44.2	4.3	21.4	4.5	4.7
1981	100.0	31.8	46.4	42.1	4.3	21.8	4.3	5.3
1982	100.0	33.3	45.0	40.8	4.2	21.7	4.5	3.8
1983	100.0	33.0	44.6	40.0	4.6	22.4	4.5	3.9
1984	100.0	32.0	43.3	38.9	4.4	24.7	4.6	5.8
1985	100.0	28.4	43.1	38.5	4.7	28.5	4.5	9.8
1986	100.0	27.1	44.0	38.9	5.2	28.9	4.7	9.2
1987	100.0	26.8	43.9	38.3	5.6	29.3	4.6	9.7
1988	100.0	25.7	44.1	38.7	5.4	30.2	4.4	10.8
1989	100.0	25.0	43.0	38.3	4.7	32.0	4.6	10.0
1990	100.0	27.1	41.6	37.0	4.6	31.3	6.2	7.7
1991	100.0	24.5	42.1	37.4	4.7	33.4	6.5	9.7
1992	100.0	21.8	43.9	38.6	5.3	34.3	6.3	10.3
1993	100.0	19.9	47.4	40.8	6.6	32.7	6.1	8.9
1994	100.0	20.2	47.9	41.4	6.4	31.9	5.7	8.7
1995	100.0	20.5	48.8	42.3	6.5	30.7	5.2	8.4
1996	100.0	20.4	49.5	42.8	6.7	30.1	5.1	8.2
1997	100.0	18.7	49.2	42.5	6.7	32.1	6.1	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56页。

附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

The indice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es .

（上年 = 100）（preceding Year = 100）

年　份 year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 Catering Trade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er Capita GDP
1953	115.6	115.6	101.9	135.8	135.7	136.4	127.3	124.1	138.0	113.1
1954	104.2	104.2	101.7	115.7	119.3	96.7	99.4	110.8	101.8	101.8
1955	106.8	106.8	107.9	107.6	106.6	113.8	104.6	102.5	99.9	104.5
1956	115.0	115.0	104.7	134.5	128.6	170.0	114.1	121.8	108.5	112.7
1957	105.1	105.1	103.1	108.0	111.4	92.9	104.8	107.2	98.9	102.4
1958	121.3	121.3	100.4	152.9	153.4	150.0	117.9	146.7	103.6	118.3
1959	108.8	108.8	84.1	125.8	129.1	105.7	115.2	131.0	105.9	106.7
1960	99.7	99.7	83.6	105.6	106.1	101.4	104.8	110.4	91.2	99.5
1961	72.7	72.7	101.4	57.9	61.0	34.6	74.3	65.0	73.0	73.4
1962	94.4	94.4	104.5	89.2	86.7	123.8	90.8	81.1	96.0	93.6
1963	110.2	110.2	111.3	114.5	113.3	125.9	104.4	98.4	108.2	107.5
1964	118.3	118.3	112.9	125.6	125.6	125.6	115.5	105.4	113.2	115.5
1965	117.0	117.0	109.7	124.2	125.8	110.6	115.8	134.5	99.5	114.3
1966	110.7	110.7	107.2	122.4	123.8	109.4	98.2	110.3	120.4	107.7
1967	94.3	94.3	101.9	85.7	84.9	95.0	100.5	86.0	104.1	91.9
1968	95.9	95.9	98.4	90.8	91.8	81.1	100.6	97.7	90.7	93.4
1969	116.9	116.9	100.8	133.1	133.0	134.5	113.3	122.7	119.2	113.7
1970	119.4	119.4	107.7	134.8	135.2	130.4	107.1	116.8	109.4	116.1
1971	107.0	107.0	101.9	112.3	112.3	112.1	105.8	108.3	99.9	104.1
1972	103.8	103.8	99.1	106.7	107.6	97.9	105.0	109.6	108.8	101.2
1973	107.9	107.9	109.0	108.3	108.8	103.4	105.5	106.3	109.0	105.4
1974	102.3	102.3	104.1	101.4	101.0	106.5	101.6	100.3	98.0	100.2
1975	108.7	108.7	102.0	115.8	116.0	113.8	104.9	111.4	99.9	106.8
1976	98.4	98.4	98.2	97.5	96.9	104.8	100.4	98.4	96.3	96.9
1977	107.6	107.6	97.8	113.3	114.4	101.2	109.5	112.6	113.4	106.2

年份 year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 Catering Trade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er Capita GDP
1978	111.7	111.7	104.1	115.0	116.4	99.4	113.7	108.9	123.1	110.2
1979	107.6	107.6	106.1	108.2	108.7	102.6	107.8	107.7	108.8	106.1
1980	107.8	107.8	98.5	113.6	112.7	126.8	105.9	105.7	98.7	106.5
1981	105.2	105.2	107.0	101.9	101.7	103.2	110.4	101.9	130.0	103.9
1982	109.3	109.1	111.5	105.6	105.8	103.4	113.0	111.7	103.9	107.5
1983	111.1	110.9	108.3	110.4	109.7	117.1	115.2	110.0	121.9	109.3
1984	115.3	115.2	112.9	114.5	114.9	110.4	119.4	115.0	121.5	113.7
1985	113.2	113.5	101.8	118.6	118.2	122.2	118.3	113.5	128.9	111.9
1986	108.5	108.8	103.3	110.2	109.6	115.3	112.1	112.8	110.6	107.2
1987	111.5	111.6	104.7	113.7	113.2	177.7	114.4	110.0	113.5	109.8
1988	111.3	111.3	102.5	114.5	115.3	108.9	113.2	113.3	114.3	109.5
1989	104.2	104.1	103.1	103.8	105.1	91.5	105.4	104.7	91.7	102.5
1990	104.2	103.8	107.3	103.2	103.4	101.2	102.3	108.6	95.2	102.3
1991	109.1	109.2	102.4	113.9	114.4	109.7	108.8	111.2	104.5	107.7
1992	114.1	114.2	104.7	121.2	121.2	121.3	112.4	110.5	113.1	112.8
1993	113.1	113.5	104.7	119.9	120.1	118.8	110.7	112.4	106.6	112.2
1994	112.6	112.6	104.0	118.4	118.9	113.5	109.6	109.5	107.7	111.4
1995	109.0	110.5	105.0	113.9	114.0	112.4	108.4	112.1	105.9	109.3
1996	109.8	109.6	105.1	112.1	112.5	108.4	107.9	111.4	105.4	108.4
1997	108.5	108.8	103.5	110.8	111.1	107.8	108.2	110.7	108.5	107.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57页。

附表 18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

The indice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es.

(1978 年 = 100)

年份 year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 Catering Trade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er Capita GDP
197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79	107.6	107.6	106.1	108.2	108.7	102.0	107.8	107.7	108.8	106.1
1980	116.0	116.0	104.6	122.9	122.4	129.2	114.2	113.8	107.4	113.0
1981	122.0	122.1	111.9	125.2	124.5	133.3	126.2	116.0	139.6	117.5
1982	133.3	133.1	124.8	132.1	131.7	137.9	142.6	129.5	145.1	126.2
1983	148.2	147.6	135.1	145.8	144.5	161.4	164.3	142.5	176.8	137.9
1984	170.9	170.0	152.6	166.9	166.0	179.0	196.1	163.8	214.8	156.8
1985	193.5	192.9	155.4	197.9	196.2	218.7	231.9	185.9	276.8	175.5
1986	209.9	210.0	160.5	218.2	215.2	253.4	260.0	209.7	306.1	188.2
1987	234.1	234.3	168.1	248.1	243.6	298.7	297.4	230.7	347.3	206.6
1988	260.5	260.7	172.3	284.1	280.8	322.5	336.7	261.5	396.9	226.3
1989	271.5	271.3	177.6	294.8	295.0	295.3	354.8	273.8	363.8	231.9
1990	283.0	281.7	190.7	304.1	304.9	298.8	363.0	297.2	346.5	237.3
1991	308.8	307.6	195.2	346.3	348.8	327.4	395.0	330.5	362.1	255.6
1992	352.2	351.4	204.4	419.5	422.6	396.2	444.0	365.2	409.4	288.4
1993	398.4	398.8	214.0	502.8	507.5	467.5	491.3	410.5	436.4	323.6
1994	448.7	449.3	222.6	595.2	603.5	531.5	538.3	449.5	469.9	360.4
1995	489.1	496.5	233.7	677.7	688.2	597.4	583.4	503.4	497.6	394.0
1996	536.8	544.1	245.6	759.8	774.3	648.2	629.4	561.1	524.3	427.1
1997	582.4	592.0	254.2	841.9	860.2	699.4	681.0	621.1	568.9	45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58 页。

附表 19

就业基本情况
EMPLOYMENT

项　目	Item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从业人员合计　（万人）	Total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10000persons)	66373	67199	67947	68850	69600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37434	36489	35468	34769	34730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14868	15254	15628	16180	16495
第三产业	Tertiaryv Industry	14071	15456	16851	17901	18375
从业人员构成　（合计=100）	Composition of Employed Persons (total = 100)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56.4	54.3	52.2	50.5	49.9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22.4	22.7	23.0	23.5	23.7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21.2	23.0	24.8	26.0	26.4
按城乡分从业人员　（万人）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by Urban and Rural Areas (10000 persons)					
城镇从业人员	Urban Employed Persons	17589	18413	19093	19815	20207
国有经济单位	State - owned Units	10920	11214	11261	11244	11044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Urban CoUective Owned Units	3393	3285	3147	3016	2883
联营经济单位	Joint Owned Units	66	52	53	49	44
股份制经济单位	Shfire Holding Units	164	292	317	363	468
外商投资经济单位	Foreign Funded Units	133	195	241	275	300
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	Units Funded by Entrep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155	211	272	265	281
其他经济单位	Units of Other Types of Ownership	18	9	11	9	18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186	332	485	620	750
个体	Self - employed	930	1225	1560	1709	1919
乡村从业人员	Rufal Employed Persons	48784	48786	48854	49035	49393
# 乡镇企业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12345	12017	12862	13508	9158
职工人数　（万人）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10000persons)	14849	14849	14908	14845	146
国有经济单位	State - owned Units	10920	10890	10955	10949	10766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Urban Collective Owned Units	3393	3211	3076	2954	2817
其他经济单位	Units of Other Types of Ownership	536	747	877	942	1085
合同制职工人数　（万人）	Number of Contract Staff & Workers (10000 persons)	3123	3839	6096	7580	7708
国有经济单位	State - owned Units	2396	2853	4396	5549	5557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Urban Collective Owned Units	526	645	1149	1394	1424
其他经济单位	Units of Other Types of Ownership	200	341	551	637	727
女职工人数　（万人）	Number of Female Staff & Workers (10000persons)	5542	5646	5755	5745	5687
城镇新就业人数　（万人）	Number of Newly Employed Persons in Urban Areas (10000persons)	705	715	720	705	710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万人）	Number of Registerde Unemployed Persons in Urban Areas (10000 persons)	420	476	520	553	570
城镇登记失业率　（%）	Registered Uneroployment Rate in Urban Areas (%)	2.6	2.8	2.9	3.0	3.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127 页。

说明：1. 1990年以后，经济活动人口，从业人员总计、城镇和乡村从业人员小计资料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调整，因此分地区、分经济类型、分行业的资料相加不等于总计。(下表同)

2. 1997年乡镇企业局统计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统计范围有所调整，故与以前年份数字不可比。

a) Sinee 1990 the data on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thc total employed persons and the sub – total of employed persons in urban and rutsl areashave been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ate obtained from the sample surveys on population changes. As a result, the sum of the data by region, by ownership or by sector are not equal to the total. The same as in the followig tables.

b) Coverage of rural employed persons in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was modified on 1997 by the Bureau of Township En terprise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he figure of 1997 therefore is not comparable with figures of preceeding Years.

附表 20　城镇私曾企业和个体分行业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IN URBA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SELF – EMPLOYED INDIVIDUALS BY SECTOR

(年底) 单位：万人　　(Year – end) (10000persons)

年份 Year	合计 Total	农、林、牧、渔业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制造业 Manufac – turng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1978	15.0			3.0		1.0	
1980	81.4	0.2		9.5		0.4	
1985	450.1	1.9		51.4		5.1	
1986	483.1	1.9		60.0		5.1	
1987	568.8	1.7		74.3		6.5	
1988	659.3	4.2		90.3		9.7	
1989	648.2	2.6		84.5		4.9	
1990	670.5	0.6		91.3		4.6	
1991	759.5	0.4		128.0		7.8	0.1
1992	837.9			129.6		5.9	
1993	1115.7		6.7	167.3	8.1	10.8	
1994	1557.4	5.4		271.8		17.9	
1995	2045.0	13.4	10.2	339.0		28.1	
1996	2328.8	17.7	10.3	400.1		33.9	

年　份 Year	合　计 Total	农、林、牧、渔业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制造业 Manufac－turng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1997	2669.0	31.8	10.8	450.6		38.8	
1978	1.0	9.0	1.0				
1980	0.8	57.1	13.0	0.4			
1985	22.3	325.0	40.9	2.8	0.7		
1986	24.4	336.7	50.6	3.1	1.2	0.1	
1987	30.6	390.7	58.6	4.0	2.3	0.1	
1988	39.5	442.9	65.6	4.1	2.8	0.2	
1989	34.1	443.1	71.7	3.9	3.1	0.3	
1990	36.4	431.2	94.3	7.0	3.9	1.2	
1991	46.1	489.0	78.2	4.2	4.9	0.8	
1992	47.5	550.7	90.9			2.7	10.6
1993	62.3	714.9	120.8		5.0	7.0	12.8
1994	95.7	973.5	167.2				26.0
1995	111.0	1265.8	241.9				35.6
1996	131.8	1419.1	274.5				41.4
1997	153.6	1617.7	315.7				50.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151 页。

附表 21　　各地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1997 年底）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BY REGION (END OF 1997)

单位；万户、万人　　(10000hOuseh01ds，10000persons)

地区 Region	合计 Total			城镇 Urban Ateas			乡村 Rural Atea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投资者 Employer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投资者 Employer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投资者 Employers
全国 National Total	96.1	1349.2	204.2	59.6	749.6	133.2	36.4	599.7	71.0
北京 Beijing	1.0	11.2	1.3	0.6	6.6	0.8	0.4	4.6	0.4
天津 Tianjin	2.0	22.0	4.2	1.4	13.7	2.9	0.6	8.3	1.3
河北 Hebei	5.6	112.3	12.4	1.8	27.7	3.8	3.8	84.5	8.6
山西 Shanxi	2.2	37.7	5.2	1.2	19.2	2.8	1.0	18.6	2.3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1.4	21.2	3.5	1.1	17.0	3.0	0.2	4.2	0.6
辽宁 Liaoning	5.2	73.0	10.4	4.0	54.8	8.6	1.1	18.2	1.7
吉林 Jilin	2.0	25.1	3.1	1.6	19.1	2.5	0.5	6.1	0.6
黑龙江 Heilongjiang	2.6	31．1	4.6	1.9	22.6	3.6	0.8	8.5	1.0
上海 Shanghai	6.9	73.3	13.8	5.2	53.2	10.7	1.7	20.1	3.1
江苏 Jiangsu	7.0	80.0	13.0	3.2	33.5	7.0	3.7	46.5	6.0
浙江 Zhejiang	9.2	135.5	17.1	3.8	51.2	7.6	5.4	84.3	9.5
安徽 Anhui	2.1	29.4	5.1	1.4	17.8	3.4	0.7	11.6	1.6
福建 Fujian	3.1	44.1	7.3	1.9	23.5	4.3	1．2	20.6	3.0
江西 Jiangxi	2.5	42.8	5.8	1.3	23.7	3.3	1.2	19.2	2.5
山东 Shandong	7.7	106.7	15.3	4.1	50.1	8.7	3.6	56.6	6.6

地区 Region	合计 Total			城镇 Urban Ateas			乡村 Rural Atea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投资者 Employer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投资者 Employer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投资者 Employers
河南 Henan	3.4	48.5	7.7	1.9	19.4	4.2	1.5	29.1	3.5
湖北 Hubei	3.9	60.9	8.4	2.4	33.5	5.5	1.5	27.3	2.8
湖南 Hunan	2.4	43.4	7.2	1.6	26.9	4.6	0.8	16.5	2.6
广东 Guangdong	12.0	152.9	25.6	8.9	105.8	20.2	3.1	47.1	5.4
广西 Guangxi	1.1	16.4	2.7	0.8	10.8	2.0	0.3	5.6	0.7
海南 Hainan	1. 4	10.1	3.3	1.4	8.9	3.1	0.1	1.2	0.2
重庆 Chongqing	1.6	28.4	3.8	1.2	19.7	2.9	0.5	8.7	0.9
四川 Sichuan	3.0	45.1	6.7	1.8	27.1	4.5	1.1	18.0	2.2
贵州 Guizhou	1. 2	16.6	3.2	1.0	12.1	2.7	0.2	4.5	0.5
云南 Yunnan	0.7	14, 0	1. 4	0.4	7.2	0.9	0.3	6.7	0.5
西藏 Tibet	…	0.3	…	…	0.2	…	…	0.1	…
陕西 Shanxi	2.4	33.6	5.4	1.7	20.1	3.8	0.7	13.5	1.6
甘肃 Gansu	0.8	13.0	2.1	0.6	8.5	1.5	0.2	4.5	0.5
青海 Qinghai	0.3	3.5	0.7	0.2	2.5	0.6	…	1.0	0.1
宁夏 Ningxia	0.4	4.7	0.9	0.3	3.4	0.7	0.1	1.3	0.2
新疆 Xinjiang	1. 1	12.5	3.0	0.9	9.9	2.6	0.2	2.7	0.4

资料来源，《中国境计年鉴（1998）》，152页。

附表 22　　各地区个体从业人员（1997 年底）

NUMBER OF SELF – EMPLOYED INDIVIDUALS BY REGION (ENDOF, 1997)

单位：万户、万人　　(10000households, 10000persons)

地区 Region	合计 Total		城镇 UrbanAreas		乡村 RuralArea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Individual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Individual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Individuals
全国 Notional Total	2850.9	5441.9	1023.8	1919.4	1827.1	3522.4
北京 Beijing	24.7	34.8	10.7	15.4	14.0	19.4
天津 Tianjin	24.2	33.8	11.9	14.8	12.2	19.0
河北 Hebei	247.9	567.0	40.0	81.6	207.9	485.4
山西 Shanxi	65.7	115.2	17.1	30.5	48.6	84.7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52.9	94.9	32.7	57.9	20.2	37.1
辽宁 Liaoning	114.5	182.0	63.8	100.4	50.7	81.6
吉林 Jilin	111.4	171.4	57.1	94.1	54.3	77.3
黑龙江 Heilongjiang	123.7	242.9	70.3	132.8	53.4	110.1
上海 Shanghai	16.2	21.0	5.6	7.5	10.6	13.5
江苏 Jiangsu	136.4	234.8	31.5	56.6	104.9	178.2
浙江 Zhejiang	153.2	256.4	36.9	57.9	116.3	198.5
安徽 Anhui	120.5	265.8	48.7	109.9	71.8	155.9
福建 Fujian	52.9	105.5	22.8	43.0	30.1	62.5
江西 Jiangxi	81.8	201.9	33.3	84.2	48.5	117.8
山东 Shandong	253.6	546.2	46.8	101.6	206.8	444.6
河南 Henan	180.0	323.2	63.5	113.2	116.5	210.0

地区 Region	合计 Total		城镇 UrbanAreas		乡村 RuralArea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Individual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Individuals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从业人数 Number of Employed Individuals
湖北 Hubei	186.1	401.5	68.2	141.8	117.9	259.7
湖南 Hunan	180.1	429.4	71.5	173.4	108.5	256.0
广东 Guangdong	141.5	269.9	71.7	138.0	69.8	131.9
广西 Guangxi	89.0	127.0	37.3	54.5	51.8	72.5
海南 Hainan	11.0	19.7	4.2	8.2	6.8	11.5
重庆 Chongqing	57.8	124.7	22.5	54.9	35.4	69.8
四川 Sichuan	160.3	213.8	51.5	71.5	108.7	142.4
贵州 Guizhou	40.4	57.0	19.5	28.5	21.0	28.4
云南 Yunnan	66.0	109.9	19.7	34.0	46.3	75.9
西藏 Tibet	4.1	5.8	2.7	3.9	1.4	1.9
陕西 Shanxi	62.0	132.5	20.8	42.6	41.2	90.0
甘肃 Gansu	43.1	78.4	12.8	23.6	30.4	54.8
青海 QingShai	7.2	10.7	4.5	6.6	2.8	4.1
宁夏 Ningxia	8.9	13.5	3.5	5.1	5.4	8.3
新疆 Xinjiang	33.7	51.1	20.8	31.4	12.9	19.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153页。

附表 23

职工工资总额和指数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ND RELATED INDEX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工资总额（亿元） Total Wages (100million yuan)				指数（上年同期=100） Index (Preceding Year=100)	
		合计 Total	国有经济单位 State-owned Units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Urban Colletive Owiled Units	其他经济单位 Units of Units of Other Types of Ownership	合计 Total	*国有经济单位 State-owned Units
1978		568.9	468.7	100.2			
1980		772.4	627.9	144.5		119.4	118.6
1985		1383.0	1064.8	312.3	5.9	122.0	121.6
1986		1659.7	1288.5	362.8	8.4	120.0	121.0
1987		1881.1	1459.3	409.1	12.6	113.3	113.3
1988		2316.2	1807.1	487.6	21.5	123.1	123.8
1989		2618.5	2050.2	534.4	33.9	113.1	113.5
1990		2951.1	2324.1	581.0	46.0	112.7	113.4
1991		3323.9	2594.9	658.6	70.4	112.6	111.7
1992		3939.2	3090.4	743.2	105.6	118.5	119.1
1993		4916.2	3812.7	849.9	253.6	124.8	123.4
1994		6656.4	5177.4	1023.3	455.6	135.4	135.8
1995		8100.0	6080.2	1182.0	637.8	121.7	117.4
1996		9080.0	6792.7	1241.0	761.4	112.1	111.7
1997		9405.3	7211.0	1253.4	940.8	103.6	106.2
	北京 Beijing	514.8	383.6	53.8	77.4	116.4	113.0
	天津 Tianjin	223.3	160.5	26.5	36.3	105.3	104.0
	河北 Hebei	386.0	321.8	44.1	20.1	105.7	106.6
	山西 Shanxi	240.0	209.2	25.6	5.2	101.6	102.1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185.4	158.6	21.0	5.7	105.4	106.9
	辽宁 Liaoning	544.5	408.1	92.4	44.0	103.7	103.5
	吉林 jilin	274.5	221.4	35.3	17.8	104.1	102.3
	黑龙江 Heilongjiang	382.8	318.2	42.4	22.2	105.5	105.1
	上海 Shanghai	510.1	353.7	53.7	102.7	103.5	101.3
	江苏 Jiangsu	635.4	447.0	124.9	63.6	106.7	108.7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工资总额（亿元） Total Wages (100million yuan)				指数（上年同期=100） Index (Preceding Year=100)	
	合计 Total	国有经济单位 State-owned Units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Urban Colletive Owiled Units	其他经济单位 Units of Units of Other Types of Ownership	合计 Total	*国有经济单位 State-owned Units
浙江 Zhejiang	402.0	251.8	100.1	50.0	111.1	113.3
安徽 Anhui	273.8	212.2	43.4	18.3	106.9	104.5
福建 Fujian	263.4	160.4	29.5	73.5	116.7	115.3
江西 Jiangxi	194.4	166.7	21.9	5.8	104.6	105.0
山东 Shandong	580.5	450.0	79.7	50.7	109.0	108.6
河南 Henan	434.1	336.3	66.0	31.7	106.6	101.3
湖北 Hubei	391.0	317.8	45.7	27.5	104.9	104.5
湖南 Hunan	314.9	265.5	40.7	8.7	105.1	105.5
广东 Guangdong	858.4	539.9	120.4	198.0	106.8	105.4
广西 Guangxi	184.9	155.9	18.4	10.5	101.2	100.8
海南 Hainan	58.1	47.5	3.4	7.2	103.6	100.6
重庆 Chongqing	158.2	122.7	24.4	11.1	108.7	108.3
四川 Sichuan	380.6	302.0	51.4	27.3	107.2	106.3
贵州 Guizhou	119.9	105.6	11.0	3.4	106.9	106.2
云南 Yunnan	219.1	190.8	21.0	7.3	112.9	112.8
西藏 Tibet	17.0	16.4	0.5	0.1	91.9	91.6
陕西 Shanxi	204.6	182.3	16.4	5.9	106.5	106.5
甘肃 Gansu	153.1	134.5	16.4	2.2	104.1	105.4
青海 Qinghai	45.9	43.0	2.6	0.3	106.5	107.0
宁夏 Ningxia	44.9	38.0	4.4	2.5	109.5	106.4
新疆 Xinjiang	209.8	189.9	16.4	3.6	110.5	110.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157页。

附表 24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

TOTAL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 AND THEIR INCREASE RATE

年份 Year	财政收入（亿元） Total Revenue（100million yuan）	政政支出（亿元） Total Expenditures（100million yuan）	收支差额（亿元） Balance（100million yuan）	增长速度（%） Inccrease Rate（%）	
				财政收入 Total Revenue	财政支出 Total Expenditures
1970	662.90	649.41	13.49	25.8	23.5
1971—1975	3919.71	3917.94	1.77	4.2	4.8
1971	744.73	732.17	12.56	12.3	12.7
1972	766.56	765.86	0.70	2.9	4.6
1973	809.67	808.78	0.89	5.6	5.6
1974	783.14	790.25	—7.11	—3.3	—2.3
1975	815.61	820.88	—5.27	4.1	3.8
1976—1980	5089.61	5282.44	—192.83	7.3	8.4
1976	776.58	806.20	—29.62	—4.8	—1.8
1977	874.46	843.53	30.93	12.6	4.6
1978	1132.26	1122.09	10.17	29.5	33.0
1979	1146.38	1281.79	—135.41	1.2	14.2
1980	1159.93	1228.83	—68.90	1.2	—4.1
1981—1985	7402.75	7483.18	—80.43	11.6	10.3
1981	1175.79	1138.41	37.81	1.4	—7.5
1982	1212.33	1229.98	—17.65	3.1	8.0
1983	1366.95	1409.52	—42.57	12.8	14.6
1984	1642.86	1701.02	—58.16	20.2	20.7
1985	2004.82	2004.25	0.57	22.0	17.8
1986—1990	12280.60	12865.67	—585.0	77.9	9.0

年份 Year	财政收入（亿元） Total Revenue（100million yuan）	政政支出（亿元） Total Expenditures（100million yuan）	收支差额（亿元） Balance（100million yuan）	增长速度（%） Inccrease Rate（%）	
				财政收入 Total Revenue	财政支出 Total Expenditures
1986	2122.01	2204.91	—82.90	5.8	10.0
1987	2199.35	2262.18	—62.83	3.6	2.6
1988	2357.24	2491.21	—133.97	7.2	10.1
1989	2664.90	2823.78	—158.88	13.1	13.3
1990	2937.10	3083.59	—146.49	10.2	9.2
1991—1995	22442.10	24387.46	—1945.36	16.3	17.2
1991	3149.48	3386.62	—237.14	7.2	9.8
1992	3483.37	3742.20	—258.83	10.6	10.5
1993	4348.95	4642.30	—293.35	24.8	24.1
1994	5218.10	5792.62	—574.52	20.0	24.8
1995	6242.20	6823.72	—581.52	19.6	17.8
1996	7407.99	7937.55	—529.56	18.7	16.3
1997	8651.14	9233.56	—582.42	16.8	16.3

资料来源：《中国境计年鉴（1998)》，269 页。

说明：1.1985 年及以前，价格补贴冲减财政收入，1985 年以后改列财政支出。为统一口径，本表对 1985 年及以前数字做了调整。

2. 本表不包括国内外债务部分。

a) Government price subsidies were listed as negative revenue items prior to 1986, but they have been listed as expenditure items in governmentaccounts since 1986.

b) Domestie and foreign debts are excluded in this table.

附表 25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情况

IMPROVEMENT IN PEOPLE' S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项　目	Item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
就业	Employment						
每一农村劳动力负担人数 (人)	Number of Dependents per Rural Laborer (persons)	2.53	2.26	1.74	1.64	1.56	1.56
每一城镇就业者负担人数 (人)	Number of Dependents per Urban Employee (persons)	2.06	*1.77	1.81	1.77	1.73	1.74
城镇失业率 (%)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	5.3	4.9	1.8	2.5	2.9	3.1
收入	Income of Ruraland Urban Reeidents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Annual Per CapitalNet Income ofRural Residents (yuan)	133.6	191.3	397.6	686.3	1577.7	2090.1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 (1978=100)	Index of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1978=100)	100.0	139.0	268.9	311.2	383.7	437.4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Annu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yuan)	343.4	477.6	739.1	1510.2	4283.0	5160.3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 (1978=100)	Index of Annu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Urban Residents (1978=100)	100.0	127.0	180.4	198.1	290.3	311.9
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yuan)	615	762	1148	2140	5500	6470
消费水平 (元)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yuan)						
全国居民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All Residents	184	236	437	803	2311	2936
农民	Agricultural Residents	138	178	347	571	1479	1930
非农业居民	Nonagricultural Residents	405	496	802	1686	5044	6048
储蓄	Savings						
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Balance of Savings Deposit of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Year-end) (100 million yuan)	210.6	399.5	1622.6	7034.2	29662.3	46279.8
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 (元)	Per Capita Balance of Saving Deposit (yuan)	21.88	40.47	153.29	615.24	2448.98	3762.36

项　　目	Item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
住房面积（平方米）	Per Capita Floor Spa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sq.m)						
农村平均每人住房	Rural Areas	8.1	9.4	14.7	17.8	21.0	22.4
城市平均每人居住	Urban Areas	3.6	3.9	5.2	6.7	8.1	8.8
交通	Traffic						
城镇每百户拥有摩托车	Number of Motor Cycles per 100 Households in Urban Areas					6.3	11.6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车辆	Number of Buses per 10000 Persons in Cities	3.3	3.5	3.9	4.8	7. 3	8.6
城市公用事业	Pubilc Utilities in Urban Areas						
自来水普及率　（%）	Rate of Access to Tap Water (%)	81.0	81.4	81.0	89.2	93.0	95.2
煤气液化气普及率　（%）	Rate of Access to Gas and Liquefied Gas (%)	13.9	16.8	22.4	42.2	70.0	75.7
每万人拥有绿地　（公顷）	Green Areaper 10 000 Persons (hectare)	10.6	9.6	13.7	32.2	36.7	35.0
文化	Culture						
城镇每百户有彩色电视机　台	Number of Color TV Sets per 100 Households in Urban Ateas			17.2	59.0	89.8	100.5
农村每百户有电视机（台）	Number of TV sets per 100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0.4	11.7	44.4	80.7	92.4
每百人每天报纸　（份）	Newspapers per 100 Persons per Day	3.66	3.92	5.21	3.87	4.07	4.15
每人每年有图书杂志（册）	Number of Books and Magazines per Person per Year	4.74	5.82	8.78	6.55	7.19	7.92
教育	Education						
学龄儿童入学率　（%）	Enrollment Ratio of School – Age Childten (%)	95.50	93.93	95.95	97.83	98.50	98.90
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	Numbe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er 10000 Persons (person)	8.9	11.6	16.1	18.0	24.0	25.7
卫生	Public health						
每万人有医院、卫生院病床　（张）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per 10000 Persons	19.3	20.1	21.1	23.0	23.4	23.5
每万人有医生数　（人）	Number of Doctors per 10000 Persons (person)	10.7	11.7	13.3	15.4	15.8	16.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324 页。

说明：1. 带 * 号为 1981 年数。

2. 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为建设部境计数字。

a) Figures with (*) are data in 1981.

b) Data on the per capital floor spa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urban areas are obtained from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附表 26　　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

OUTSTADING AMOUNT AND ADDED AMOUNT OF SAVINGS DEPOSI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YEAR - END)

单位：亿元　　(100million yuan)

年份 Year	年底余额 Outotoding Amount			年增加额 Added Amount		
	总计 Total	定期 Fixed Deposits	活期 Current Deposits	总计 Total	定期 Fixed Deposits	活期 Current Deposits
1978	210.60	128.90	81.70	29.00	17.20	11.80
1980	399.50	304.90	94.60	118.50	138.50	-20.00
1985	1622.60	1225.20	397.40	407.90	324.30	83.60
1986	2237.60	1729.20	508.40	615.00	504.00	111.00
1987	3073.30	2356.30	717.00	835.70	627.10	208.60
1988	3801.50	2836.70	964.80	728.20	480.40	247.80
1989	5146.90	4182.10	964.80	1345.40	1345.40	0.00
1990	7034.20	5851.30	1182.90	1887.30	1669.30	218.00
1991	9107.00	7598.70	1508.30	2 072.80	1 747.40	325.40
1992	11545.40	9288.20	2257.20	2 438.40	1689.50	748.90
1993	14762.39	11627.89	3134.50	3216.99	2 339.69	877.30
1994	21518.80	16838.60	4680.20	6 756.41	5 210.71	1545.70
1995	29662.25	23778.24	5884.01	8 143.46	6 939.50	1203.96
1996	38520.84	30873.20	7647.64	8 858.50	7 095.00	1763.50
1997	46279.80	36226.74	10053.06	7 758.96	5 382.84	2 376.12

资料来源：《中国境计年鉴（1998）》，325 页。

附表 27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指数**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ANDTHE RELATED INDEX

年 份 Year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Per Capital Annual Net Incom of Rural Household (yuan)	指数 Index (1978 = 100)	Per Capital Annual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 (yuan)	指数 Index (1978 = 100)
1978	133.6	100.0	343.4	100.0
1980	191.3	139.0	477.6	127.0
1985	397.6	268.9	739.1	160.4
1986	423.8	277.6	899.6	182.5
1987	462.6	292.0	1002.2	186.9
1988	544.9	310.7	1 181.4	182.5
1989	601.5	305.7	1375.7	182.8
1990	686.3	311.2	1510.2	198.1
1991	708.6	317.4	1700.6	212.4
1992	784.0	336.2	2 026.6	232.9
1993	921.6	346.9	2577.4	255.1
1994	1 221.0	364.4	3496.2	276.8
1995	1 577.7	383.7	4 283.0	290.3
1996	1926.1	418.2	4 838.9	301.6
1997	2 090.1	437.4	5 160.3	311.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325 页。

附表 28

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BASIC CONDITIONS OF RURAL HOUSEHOLDS

项 目 Item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调查户数（户）Number of Households Surveyed	15914	66642	66960	67340	67610	67680
调查户人口（人）Number of Resldents Surveyed（person）						
常住人口 Number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s Surveyed	88 090	341525	321429	301878	298530	294559
平均每户常住人口 Average Number of Permanent Residents per Household	5.54	5.12	4.80	4.48	4.42	4.35
平均每户整半劳力 Average Number of Able – bodied and Semiablebodied Laborers per Household	2.45	2.95	2.92	2.88	2.84	2.79
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Average Number of Persons Supported by a Laborer（including the laborer himself or herself）	2.26	1.74	1.64	1.56	1.55	1.56
平均每人年收入（元）Per Capita Annual Income（yuan）						
总收入 Total Revenue	216.22	547.31	990.38	2337.87	2806.73	2999.20
纯收入 Net Income	191.33	397.60	686.31	1577.74	1926.07	2090.13
现金收入 Caoh Income	113.12	357.39	676.67	1595.56	1927.01	2131.21
按纯收入分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Percentage of Households Grouped by per Capita Annual Net Income（%）						
100 元以下 Under 100 Yuan	9.80	0.96	0.22	0.22	0.13	0.18
100～200（元）Yuan	51.80	11.26	1.80	0.38	0.18	0.19
200～300（元）Yuan	25.30	25.61	6.57	0.81	0.36	0.34
300～400（元）Yuan	8.60	24.00	11.99	1.55	0.66	0.60
400～500（元）Yuan	2.90	15.85	14.37	2.40	1.20	0.97
500～600（元）Yuan		9.06	13.99	3.70	1.88	1.47
600～800（元）Yuan		8.02	20.83	9.59	5.56	4.49
800～1000（元）Yuon	1.60	2.93	12.45	11.58	8.00	6.49
1000～1200（元）Yuan		1.89	12.20	26.60	23.74	7.59

项　　目 Item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200～1300（元）Yuan						4.20
1300～1500（元）Yuan						8.56
1500～1700（元）Yuan		0.26	3.47	17.25	19.89	8.17
1700～2000（元）Yuan						11.35
2000～2500（元）Yuan		0.16	2.11	25.92	38.40	14.93
2500～3000（元）Yuan						10.35
3000～3500（元）Yuan						6.56
3500～4000（元）Yuan						4.13
4000～4500（元）Yuan						2.68
4500～5000（元）Yuan						1.81
5000以上　5000（元）Yuan and over						4.94
平均每人年支出（元）Per Capita Annual Expenditure（yuan）						
总支出 Total Expenditure	195.52	485.51	903.47	2138.33	2535.16	2536.79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Expenditure for Household Business	24.61	121.39	241.09	621.71	709.42	706.27
生活消费支出 Expenditure for Consumption	162.21	317.42	584.63	1310.36	1572.08	1617.15
其他非生产性支出 Other 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s	8.42	9.57	18.80	55.28	82.48	45.37
现金支出 Cash Expenditure	122.93	389.19	741.17	1766.67	2137.39	2 297.30
生产费用 Productive Costs	14.05	98.93	183.35	517.06	587.76	599.91
缴纳税金和上交集体承包费支出等 Taxes and Payments to Collective Units	0.24	16.35	33.38	76.96	94.45	97.81
生活消费支出 Expenditure for Consumption	83.83	194.68	374.74	859.43	1076.22	1 126.28
储蓄借贷支出 Expenditure for Savings and Credit	15.91	57.96	102.11	220.86	249.90	337.55

资料采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344页。

说明：1. 本表与附表29为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

2. 1997年纯收入分组户数比重进行了调整。

a) Data in Tables 28 to 29 are obtained from the sample surveys on rural households.

b) Percentage of households grouped by per capita annual net income has been adjusted since 1997.

附表 29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收入和纯收入

PER CAPITA ANNUAL GROSS AND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单位：元　　(yuan)

项　目 Item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总收入 Gross Income	151.79	216.22	547.31	990.38	2337.87	2806.73	2999.20
基本收入 Basic Income	142.27	193.82	517.40	954.59	2231.12	2684.56	2883.24
劳动者报酬收入 Labourers' Remuneration	88.26	106.38	72.15	138.80	353.70	450.84	536.56
集体组织劳动报酬 From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85.25	100.44	17.45	27.02	68.73	90.34	105.46
企业劳动报酬 From Enterprises	3.01	5.94	27.71	54.06	256.63	311.51	361.04
# 乡村企业劳动报酬 From Township Enterprises	3.01	5.94	22.15	42.01	111.45	130.70	145.22
其他单位劳动报酬 From Other Units			26.99	57.72	28.34	48.99	70.06
家庭经营收入 Income from Household Business Operation	54.01	87.44	445.25	815.79	1877.42	2233.72	2346.68
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 Transfer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9.52	22.40	29.91	35.79	106.75	122，17	115.96
纯收入 Net Income	133.57	191.33	397.60	686.31	1577.74	1926.07	2090.13
按收入来源分 By Source							
基本收入 Bask Income	124.05	168.93	367.69	657.35	1479.49	1813.29	1987.27
劳动者收入 Labourers' Remuneration	88.26	106.38	71.71	138.80	353.70	450.84	514.55
家庭经营纯收入 Net Income form Household Business	35.79	62.55	295.98	518.55	1125.79	1362.45	1472.72
农业收入 Farming	15.15	21.93	191.46	330.11	775.12	924.40	943.01
林业收入 Forestry			6.16	7.53	13.52	16.13	19.37
牧业收入 Animal Husbandry	12.01	25.71	44.36	86.04	111.76	141.01	184.72
渔业收入 Fishery	1.42		3.59	7.11	15.69	17.50	20.98
手工业收入 Handicraft	5.19	2.87	8.11	10.89	18.97	24.83	26.89
采集、捕猎收入 Gathering and Hunting		5.80	10.13	14.36	21.40	23.40	25.02
工业收入 Industry			2.18	9.15	13.63	19.84	24.48

项　　目 Item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建筑业收入 Construction			7.41	12.18	34.53	44.74	53.47
运输业收入 Transportation		6.24	8.47	13.45	27.76	36.00	46.20
商业收入 Commerce				10.75	30.21	39.56	49.74
饮食业收入 Catering Services			6.13	1.94	4.05	4.53	5.51
服务业收入 Service Trade			3.25	6.77	17.18	21.97	25.33
其他收入 Others			4.73	8.27	41.97	48.54	48.00
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 Transfer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9.52	22.40	29.91	28.96	98.25	112.78	102.86
按收入性质分 Grouped by Type of Income							
生产性纯收入 Productive Income	124.05	168.93	367.69	657.35	1479.49	1813.29	1987.28
第一产业收入 Primary Industry	113.47	149.62	298.28	510.86	996.51	1192.61	1267.69
第二产业收入 Secondary Industry	10.58	19.31	29.47	70.68	287.24	372.37	437.78
第三产业收入 Tertiary Industry			39.95	75.81	195.74	248.31	281.81
非生产性纯收入 Nonproductive Income	9.52	22.40	29.91	28.96	98.25	112.78	102.8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345页。

附表 30

主要农产品产量
YIELD OF MAJOR FARM CROPS

单位：万吨　　　　　　　　　　　　　　　　(10000 tons)

年份　地区 Year　Region	粮食 Grain	谷物 Cereal	#稻谷 Rice	#小麦 Wheat	#玉米 Corn	豆类 Beans	薯类 Tubers	油料 Oil－Bearing Crops
1978	30477.0		13693.0	5384.0	5595.0		3174.0	521.8
1980	32056.0		13991.0	5521.0	6260.0		2873.0	769.1
1985	37911.0		16857.0	8581.0	6383.0		2604.0	1578.4
1987	40298.0		17426.0	8590.0	7924.0		2820.0	1527.8
1988	39408.0		16911.0	8543.0	7735.0		2697.0	1320.3
1989	40755.0		18013.0	9081.0	7893.0		2730.0	1295.2
1990	44624.0		18933.0	9823.0	9682.0		2743.0	1613.2
1991	43529.0	39566.3	18381.0	9595.0	9877.0	1247.1	2716.0	1638.3
1992	44265.8	40169.6	18622.2	10158.7	9538.3	1252.0	2844.2	1641.2
1993	45648.8	40517.4	17751.4	10639.0	10270.4	1950.4	3181.1	1803.9
1994	44510.1	39389.1	17593.3	9929.7	9927.5	2095.6	3025.4	1989.6
1995	46661.8	41611.6	18522.6	10220.7	11198.6	1787.5	3262.6	2250.3
1996	50453.5	45127.1	19510.3	11056.9	12747.1	1790.3	3536.0	2210.6
1997	49417.1	44349.3	20073.5	12328.9	10430.9	1875.5	3192.3	2157.4
北　京 Beijing	237.5	232.3	15.8	96.4	118.9	2.8	2.4	2.7
天　津 Tianjin	206.2	200.5	51.1	77.4	65.5	4.6	1.1	3.0
河　北 Hebei	2746.7	2554.1	102.4	1330.7	1009.5	68.0	124.6	118.0
山　西 Shanxi	901.4	7.97.2	3.8	348.6	350.1	37.8	66.3	28.1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1421.0	1188.0	70.6	307.9	677.9	118.7	114.3	73.1
辽　宁 Liaoning	1313.5	1237.0	385.7	56.5	668.3	37.2	39.3	16.1
吉　林 Jilin	1808.3	1707.2	376.2	13.0	1260.3	73.7	27.4	15.9
黑龙江 Heilongjiang	3104.5	2434.9	860.9	328.4	1165.9	588.7	80.9	18.2
上　海 Shanghai	230.2	227.4	165.9	34.3	4.8	2.1	0.7	10.7

年份　地区 Year Region	粮食 Grain	谷物 Cereal	#稻谷 Rice	#小麦 Wheat	#玉米 Corn	豆类 Beans	薯类 Tubers	油料 Oil-Bearing Crops
江　苏 jiangsu	3563.8	3371.5	1931.2	1064.7	243.7	92.1	100.2	141.9
浙　江 Zhejiang	1493.5	1879.3	1238.0	72.1	14.1	34.6	79.6	48.9
安　徽 Anhui	2802.7	2490.1	1290.2	941.2	229.1	100.4	212.2	205.0
福　建 Fujian	961.8	774.6	739.3	17.2	8.9	25.3	161.9	24.4
江　西 jiangxi	1767.7	1658.7	1636.0	10.7	8.4	39.0	70.0	105.6
山　东 Shandong	3852.2	3501.9	112.1	2241.3	1106.0	85.8	264.5	240.9
河　南 Henan	3894.7	3561.6	342.9	2372.4	807.7	107.3	225.8	276.7
湖　北 Hubei	2634.4	2447.9	1818.5	446.8	161.0	54.3	132.3	195.5
湖　南 Hunan	2801.9	2613.8	2495.8	29.1	76.5	56.0	132.1	129.3
广　东 Guangdong	1897.7	1646.2	1582.5	5.6	51.1	23.1	228.4	75.5
广　西 Guangxi	1544.8	1443.8	1269.3	4.8	165.5	40.6	60.4	55.5
海　南 Hainan	213.9	173.7	168.3		4.2	2.3	37.9	8.4
重　庆 Chongqing	1157.7	893.6	546.4	128.4	208.9	21.9	242.2	23.3
四　川 Sichuan	3461.3	2995.5	1664.6	611.1	580.7	75.8	390.0	134.2
贵　州 Guizhou	1025.9	845.5	462.0	107.9	263.6	33.4	147.0	59.0
云　南 Yunnan	1271.9	1107.3	530.2	165.0	363.2	80.0	84.6	17.4
西　藏 Tibet	77.3	75.8	0.5	28.3	1.4	1.5		3.4
陕　西 Shanxi	1044.4	954.4	93.4	562.7	271.4	26.7	63.3	36.7
甘　肃 Gansu	766.2	686.2	4.8	328.3	166.9	9.4	70.6	35.6
青　海 Qinghai	127.6	100.3		78.3		13.2	14.0	18.4
宁　夏 Ningxia	256.6	236.0	59.9	82.2	83.2	6.9	13.7	6.2
新　疆 Xinjiang	830.0	813.1	55.3	437.6	294.3	12.3	4.7	30.0

年份　地区 Year　Region				棉　花 Cotton	麻　类 Fiber Crops	#黄红麻 Jute and Ambary Hemp	甘　蔗 Sugarcane	甜　菜 Beetroots	烟　叶 Tobacco	#烤烟 - Flue Cured Tobacco
	#花生 peanuts	#油菜子 Rapeseeds	#芝麻 Sesame							
1978	237.7	186.8	32.2	216.7	135.1	54.4	2111.6	270.2	124.2	105.2
1980	360.0	238.4	25.9	270.7	143.6	54.9	2280.7	630.5	84.5	71.7
1985	666.4	560.7	69.1	414.7	444.8	206.0	5154.9	891.9	242.5	207.5
1987	617.1	660.5	52.6	424.5	208.4	56.9	4736.3	814.0	194.3	163.6
1988	569.3	504.4	40.4	414.9	127.0	54.0	4906.4	1281.0	273.4	233.7
1989	536.3	543.6	33.8	378.8	112.4	66.0	4879.5	924.3	283.0	240.5
1990	636.8	695.8	46.9	450.8	109.7	72.6	5762.0	1452.5	262.?	225.9
1991	630.3	743.6	43.5	567.5	88.4	51.3	6789.8	1628.9	303.1	267.0
1992	595.3	765.3	51.6	450.8	93.8	61.9	7301.1	1506.9	349.9	311.9
1993	842.1	693.9	56.3	373.9	96.0	67.2	6419.4	1204.8	145.1	303.6
1994	968.2	749.2	54.8	434.1	74.7	35.5	6092.7	1252.6	223.8	194.0
1995	1023.5	977.7	58.3	476.8	89.7	37.1	6541.7	1398.4	231.4	207.2
1996	1013.8	920.1	57.5	420.3	79.5	36.5	6687.6	1672.6	323.4	294.6
1997	964.8	957.8	56.6	460.3	74.9	43.0	7889.7	1496.8	425.1	390.8
北　京 Beijing	2.7			0.2						
天　津 Tianjin	1.3		0.1	0.4	0.1	0.1				
河　北 Hebei	106.8	3.5	1.6	24.9	1.4	1.3		7.1	1.9	1.4
山　西 Shanxi	2.9	1.5	0.6	4.4	0.2			66.8	2.6	2.6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0.4	8.9	0.3	0.1	0.6			306.4	4.1	3.4
辽　宁 Liaoning	13.4	0.1	0.4	1.5				40.1	6.1	5.2
吉　林 jilin	4.5		0.3		0.1			32.9	7.2	4.8
黑龙江 Heilongjiang	0.8	2.9			13.3			447.7	17.5	16.3
上　海 Shanghai	0.3	10.4		0.4			6.2			
江　苏 jiangsu	39.5	100.5	1.8	50.7	0.5	0.3	19.8	3.6	0.5	0.5

年份　地区 Year　Region	# 花生 peanuts	# 油菜子 Rapeseeds	# 芝麻 Sesame	棉花 Cotton	麻类 Fiber Crops	# 黄红麻 Jute and Ambary Hemp	甘蔗 Sugarcane	甜菜 Beetroots	烟叶 Tobacco	# 烤烟 - Flue Cured Tobacco
浙　江 Zhejiang	2.5	46.0	0.4	4.8	2.4	2.4	60.0		0.3	
安　徽 Anhui	53.6	139.7	11.7	30.1	12.8	10.9	19.5	0.4	8.3	7.9
福　建 Fujian	22.3	2.0	0.1		0.2	0.1	249.9		12.5	12.3
江　西 jiangxi	33.3	68.1	4.2	13.2	1.9	0.8	220.6		3.9	3.1
山　东 Shandong	235.6	4.4	0.5	35.4	1.5	1.3		1.5	18.5	17.7
河　南 Henan	218.3	42.0	15.5	79.0	13.7	13.5	17.3		41.6	41.0
湖　北 Hubei	31.2	147.5	15.6	58.1	8.8	5.6	100.9		20.0	13.9
湖　南 Hunan	23.7	104.8	0.5	25.6	5.2	0.4	174.5		23.8	22.5
广　东 Guangdong	74.1	1.1	0.2		1.0	1.0	1764.3		7.3	5.4
广　西 Guangxi	42.4	12.3	0.6	0.1	2.2	1.8	3242.4		9.1	6.7
海　南 Hainan	8.0		0.4		0.1	0.1	377.5			
重　庆 Chongqing	4.5	18.3	0.3	0.1	1.1	0.4	8.1		16.5	13.4
四　川 Sichuan	28.8	104.8	0.2	10.7	5.4	2.9	155.7	0.1	18.6	12.3
贵　州 Guizhou	5.2	53.0		0.1	0.3	0.2	37.0	0.1	71.1	68.7
云　南 Yunnan	3.8	12.8		0.1	0.2		1434.9	0.3	110.2	109.3
西　藏 Tibet		3.3								
陕　西 Shanxi	4.7	25.8	1.1	2.1	0.1		1.2	2.3	12.9	12.2
甘　肃 Gansu	0.1	17.3		3.4	0.2			139.1	9.5	9.2
青　海 Qinghai		17.8								
宁　夏 Ningxia								59.8	0.3	0.3
新　疆 Xinjiang	0.1	8.9	0.1	115.0	1.6			388.7	1.0	0.8

年份　地区 Year　Region	蚕茧（吨）Silkworm Cocoons (ton)	#桑蚕茧 Mulberry Silkworm Cocoons	茶叶（吨）Tea (ton)	水果（吨）Fruits (ton)	#苹果 Apples	#柑桔 Citrus	#梨 Pears	#葡萄 Grapes	#香蕉 Bananas
1978	228150	173300	268000	6569700	2275150	382700	1516950	103850	85350
1980	325750	249800	303700	6792550	2363100	712600	1466300	110000	61300
1985	371354	335760	432337	11639456	3614111	1808347	2136766	361409	631017
1987	402152	353537	507972	16679158	4263836	3223848	2489040	640878	2029498
1988	440804	394397	545417	16661004	4344394	2560013	2721242	792247	1829672
1989	488098	434758	534876	18319316	4498920	4561104	2564959	874245	1403736
1990	534421	480179	540070	18744222	4319315	4854935	2352753	858525	1455927
1991	583656	550541	541581	21761256	4540445	6332543	2497760	915882	1981170
1992	692205	659522	559827	24400930	6555836	5160081	2846121	1125102	2450988
1993	756667	711622	599941	30112154	9069557	6560974	3217130	1354770	2700680
1994	813078	776941	588468	34998152	11129017	6805445	4042932	1522083	2897832
1995	800218	759835	588553	42146267	14007662	8224984	4942445	1741707	3125003
1996	508312	470942	593386	46528224	17047250	8456587	5806627	1883142	2535591
1997	469432	422978	613366	50893223	17218571	10102200	6414831	2032805	2892268
北　京 Beijing									
天　津 Tianjin									
河　北 Hebei	64	62		5561208	1751374		2113339	361689	
山　西 Shanxi	4318	4318		1464408	1101227		91603	28178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404			199543	38439		102115	15142	
辽　宁 Liaoning	39685	153		2641058	1611487		471870	193380	
吉　林 jilin	1128	2		374949	61705		101042	44591	
黑龙江 Heilongjiang	843			154949	96993		12384	7916	
上　海 Shanghai									

年份　地区 Year　Region	蚕茧（吨）Silkworm Cocoons (ton)	#桑蚕茧 Mulberry Silkworm Cocoons	茶叶（吨）Tea (ton)	水果（吨）Fruits (ton)	#苹果 Apples	#柑桔 Citrus	#梨 Pears	#葡萄 Grapes	#香蕉 Bananas
江　苏 jiangsu	86441	86441	11852	1403961	549159	51747	312562	67907	
浙　江 Zhejiang	94810	94810	101716	2693751	809	2105054	73983	95829	
安　徽 Anhui	24086	24086	45842	743611	272130	8458	307332	39684	
福　建 Fujian	115	115	109887	3343393	131	1538981	59056	21650	571063
江　西 jiangxi	4878	4878	19215	676384		483034	37466	3375	
山　东 Shandong	34871	33773	1286	7865695	5582052		778169	2151339	
河　南 Henan	16034	13045	6776	2692597	1972032	7944	148144	120367	
湖　北 Hubei	12595	12487	47692	1790764	58644	849249	480268	49595	
湖　南 Hunan	1136	1076	55493	1532102		1341400	23290	11272	
广　东 Guangdong	21052	21052	36640	4144783		866913	27436		1334175
广　西 Guangxi	15253	14992	19734	3155219		1006996	60167	14929	685532
海　南 Hainan									
重　庆 Chongqing	46	46	14996	607242	4274	456672	31205	5942	1424
四　川 Sichuan	85266	85266	45217	1851311	161166	1068944	200372	66659	7149
贵　州 Guizhou	1322	1318	16489	251408	5713	84632	31592	6822	10411
云　南 Yunnan	6513	6507	70800	660198	80330	77434	149386	11697	94035
西　藏 Tibet									
陕　西 Shanxi	14478	14455	6316	3265529	2636537	20072	266063	39357	
甘　肃 Gansu	361	361	204	1002458	561019	1107	242462	11501	
青　海 Qinghai									
宁　夏 Ningxia	191	191		162349	140363		7930	5243	
新　疆 Xinjiang	3132	3132		1236730	275178		147123	49816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403 页～405 页。

附表 31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OUTP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化学纤维 (万吨) Chemical Fiber (10000tons)	# 合成纤维 Synthetic Fiber	纱 (万吨) Yarn (10000tons)	布 (亿米) Cloth (100million m)	毛线 (万吨) Knitting Wool (10000tons)	呢绒 (万米) Woolen Goods (10000m)
1952				65.60	38.30	0.20	423
1957		0.02		84.40	50.50	0.57	1817
1962		1.36	0.04	54.80	25.30	0.78	3242
1965		5.01	0.52	130.00	62.80	1.10	4240
1970		10.09	3.62	205.20	91.50	2.17	5776
1975		15.48	6.57	210.80	94.00	2.66	6943
1978		28.46	16.94	238.20	110.30	3.78	8885
1980		45.03	31.41	292.60	134.70	5.73	10095
1985		94.78	77.06	353.50	146.70	12.59	21816
1987		117.50	98.20	436.80	173.00	20.47	26538
1988		130.12	112.47	465.70	187.90	22.50	28609
1989		148.09	128.20	476.70	189.20	25.00	27962
1990		165.42	143.43	462.60	188.80	23.80	29505
1991		191.03	167.03	460.80	181.70	28.25	31141
1992		213.04	188.17	501.70	190.70	35.06	33792
1993		237.37	208.86	501.50	203.00	34.35	35383
1994		280.33	246.72	489.50	211.30	43.96	41900
1995		341.17	308.87	542.20	260.18	51.38	65392
1996		375.45	337.05	512.21	209.10	48.25	45953.68
1997		471.62	428.46	559.83	248.79	48.80	38791.30
	北　京 Beijing	3.04	3.04	6.42	2.52	0.42	1268.11
	天　津 Tianjin	10.79	10.06	13.61	4.98	0.77	744.00
	河　北 Hebei	8.23	6.59	39.49	16.59	15.15	2685.37
	山　西 Shanxi	2.96	1.85	6.95	3.39	0.12	99.49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0.63	0.29	1.98	0.83	0.23	760.24
	辽　宁 Liaoning	28.09	25.70	17.17	5.35	0.19	648.47
	吉　林 jilin	6.38	1.59	5.07	1.28	0.08	486.90
	黑龙江 Heilongjiang	15.86	15.56	4.22	1.08	0.03	213.70
	上　海 Shanghai	39.26	35.30	20.48	4.78	1.08	3229.89
	江　苏 jiangsu	139.11	132.50	96.57	40.46	14.99	17033.73
	浙　江 Zhejiang	71.16	67.20	31.68	37.35	2.26	3788.62
	安　徽 Anhui	7.91	7.91	23.36	9.38	0.26	408.90
	福　建 Fujian	26.91	25.75	11.57	7.84	0.67	427.20
	江　西 jiangxi	6.33	2.42	11.04	3.61	0.08	231.31
	山　东 Shandong	22.21	19.49	70.85	29.27	4.92	2148.00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化学纤维 (万吨) Chemical Fiber (10000tons)	#合成纤维 Synthetic Fiber	纱 (万吨) Yarn (10000tons)	布 (亿米) Cloth (100million m)	毛线 (万吨) Knitting Wool (10000tons)	呢绒 (万米) Woolen Goods (10000m)
	河 南 Henan	11.35	7.06	49.59	13.70	0.53	519.00
	湖 北 Hubei	6.62	4.16	50.04	22.08	0.70	431.12
	湖 南 Hunan	5.53	5.00	13.27	4.40	0.07	
	广 东 Guangdong	36.39	36.38	15.98	12.94	4.71	1117.86
	广 西 Guangxi	2.18	2.18	7.20	1.23	0.07	27.97
	海 南 Hainan	1.45	1.45	0.12	0.22		
	重 庆 Chongqing	2.92	2.92	5.06	5.33	0.04	5.64
	四 川 Sichuan	5.26	3.57	12.59	6.60	0.14	194.88
	贵 州 Guizhou	0.64	0.64	2.13	0.88	0.05	3.00
	云 南 Yunnan	2.28	1.75	2.67	1.12	0.04	25.00
	西 藏 Tibet					0.01	7.17
	陕西 Shanxi	2.09	2.09	13.90	7.89	0.13	318.11
	甘 肃 Gansu	2.51	2.51	1.42	0.42	0.65	661.37
	青 海 Qinghai			0.53	0.24	0.10	47.00
	宁 夏 Ningxia	0.41	0.41	0.19	0.06	0.07	32.68
	新 疆 Xinjiang	3.11	3.11	24.71	2.99	0.24	1226.57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丝 (万吨) Silk (10000tons)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Machine－made Paper and Paperboards (10000tons)	缝纫机 (万架) Sewing Machines (10000units)	自行车 (万辆) Bicycles (10000units)	表 (万只) Watches (10000units)	日用陶瓷器 (亿件) Household Ceramics (100million pcs)
1952		0.56	37.00	6.60	8.00		
1957		0.99	91.00	27.80	80.60	0.04	20.20
1962		0.47	112.00	77.90	137.10	81.80	18.80
1965		0.91	173.00	123.80	183.80	108.30	19.70
1970		1.67	241.00	235.20	368.80	358.10	19.30
1975		2.31	341.00	356.70	623.20	809.00	29.20
1978		2.97	439.00	486.50	854.00	1410.80	34.70
1980		3.54	535.00	767.80	1302.40	2267.50	34.80
1985		4.22	911.00	991.20	3227.70	5447.10	36.40
1987		5.19	1141.00	970.00	4116.70	6159.40	47.30
1988		5.10	1270.00	983.20	4140.10	6788.90	53.20
1989		5.23	1333.00	956.30	3676.80	7559.70	50.80
1990		5.66	1372.00	761.00	3141.60	8671.30	52.70
1991		6.07	1479.00	763.80	3676.80	7824.90	59.00
1992		7.42	1725.00	833.20	4083.60	8658.80	62.70
1993		9.40	1914.00	840.60	4149.60	19290.80	67.90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丝（万吨）Silk (10000tons)	机制纸及纸板（万吨）Machine－made Paper and Paperboards (10000tons)	缝纫机（万架）Sewing Machines (10000units)	自行车（万辆）Bicycles (10000units)	表（万只）Watches (10000units)	日用陶瓷器（亿件）Household Ceramics (100million pcs)
1994		10.64	2138.00	861.20	4364.90	47776.80	83.55
1995		11.34	2812.30	970.61	4472.25	48191.29	89.28
1996		9.49	2638.20	683.69	3361.18	47975.64	99.96
1997		8.25	2733.20	702.64	2999.29	29504.61	115.61
	北　京 Beijing		18.12	0.19		303.35	
	天　津 Tianjin		40.56	11.27	336.78	261.54	0.09
	河　北 Hebei	0.01	258.40	1.25	11.68	96.14	7.54
	山　西 Shanxi	0.06	51.61	1.07		3.86	2.19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16.03		0.20		0.06
	辽　宁 Liaoning	0.36	84.20	0.18	55.12	219.46	0.06
	吉　林 Jilin		45.42			5.76	0.17
	黑龙江 Heilongjiang		58.09			14.12	0.04
	上　海 Shanghai	0.05	40.00	275.69	681.94	586.45	
	江　苏 Jiangsu	1.91	186.31	65.91	486.59	430.99	1.70
	浙　江 Zhejiang	2.77	266.72	155.07	452.75	132.12	2.63
	安　徽 Anhui	0.45	106.32	31.02	25.86	76.89	1.50
	福　建 Fujian	0.04	89.94		29.90	981.20	19.65
	江　西 jiangxi	0.06	35.49		9.62	59.53	5.70
	山　东 Shandong	0.53	342.25	2.39	113.49	373.77	13.66
	河　南 Henan	0.11	254.48	13.04	99.28	42.18	9.79
	湖　北 Hubei	0.15	72.51	0.79	8.58	92.67	0.40
	湖　南 Hunan		94.39	4.16	1.66	3.56	12.36
	广　东 Guangdong	0.14	288.63	111.96	657.66	24615.24	26.57
	广　西 Guangxi	0.09	80.12		22.15	1145.44	6.62
	海　南 Hainan		1.85			0.37	0.08
	重　庆 Chongqing	0.38	23.27	0.07	1.32	31.14	0.69
	四　川 Sichuan	0.89	85.00		0.11		1.47
	贵　州 Guizhou		12.57				0.18
	云　南 Yunnan	0.08	38.51	3.34	2.01		1.77
	西　藏 Tibet		0.01				
	陕　西 Shanxi	0.12	90.64	25.23	2.56	28.83	0.27
	甘　肃 Gansu		18.58		0.04		0.11
	青　海 Qinghai		1.07				
	宁　夏 Ningxia		15.95				0.25
	新　疆 Xinjiang	0.04	16.17				0.02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合成洗涤剂（万吨）Synthetic Detergents (10000 tons)	原盐（万吨）Salt (10000 tons)	糖（万吨）Sugar (10000 tons)	食用植物油（万吨）Edible Vegetable Oil (10000 tons)	罐头（万吨）Canned Food (10000 tons)	饮料酒（万吨）Alcoholic Beverages (10000 tons)	#啤酒 Beer	卷烟（万箱）Cigarettes (10000 cases)
1952			495.00	45.00	98.00	1.30	23.00		265.00
1957			828.00	86.00	110.00	6.20	67.00	5.00	446.00
1962		2.40	994.00	34.00	76.00	7.30	79.00	10.00	244.00
1965		3.00	1147.00	146.00	139.00	12.20	89.00	9.00	478.00
1970		9.30	1109.00	135.00	103.00	19.30	121.00	16.00	783.00
1975		22.30	1481.00	174.00	156.00	35.10	212.00	27.00	992.00
1978		32.40	1953.00	227.00	177.00	48.80	247.00	40.00	1182.00
1980		39.30	1728.00	257.00	222.00	57.20	368.00	69.00	1520.00
1985		100.50	1479.00	451.00	401.00	142.50	851.00	310.00	2370.00
1987		119.20	1764.00	506.00	478.00	161.50	1195.00	540.00	2881.00
1988		131.90	2264.00	461.00	480.00	220.90	1357.00	656.00	3096.00
1989		146.60	2829.00	501.00	496.00	232.50	1285.00	643.00	3195.00
1990		151.40	2023.00	582.00	544.00	157.10	1386.00	692.00	3298.00
1991		146.20	2410.00	640.00	644.00	193.00	1539.00	838.00	3226.00
1992		166.60	2838.00	829.00	661.00	224.30	1753.00	1021.00	3285.00
1993		188.30	2943.00	771.00	965.00	230.30	1971.00	1192.00	3376.00
1994		217.00	2996.00	592.00	723.00	247.30	2233.00	1415.00	3432.00
1995		299.80	2977.72	558.64	1144.50	310.57	2559.66	1568.82	3485.02
1996		262.20	2903.57	640.20	946.54	282.61	2650.85	1681.91	3401.92
1997		279.91	3082.66	702.58	893.73	254.57	2834.12	1888.94	3377.42
	北　京 Beijing	9.49			0.61	0.26	126.57	115.98	16.88
	天　津 Tianjin	10.28	226.31		6.18	1.64	13.73	6.79	17.00
	河　北 Hebei	4.48	397.03	1.32	30.37	28.42	149.95	119.69	112.82
	山　西 Shanxi	19.67		4.35	12.86	1.37	31.37	10, 22	27.60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0.77	100.00	26.70	15.41	4.88	56.32	39.29	25.80
	辽　宁 Liaoning	5.72	306.61	5.28	29.42	6.03	158.41	128.69	40.51
	吉　林 Jilin	3.85		6.06	15.04	0.95	95.37	82.58	59.53
	黑龙江 Heilongjiang	3.93		36.21	67.10	0.92	150.03	119.43	72.50
	上　海 Shanghai	30.89			12.35	3.72	34.17	28.41	108.28
	江　苏 Jiangsu	22.29	388.91		82.45	5.56	151.45	78.60	85.24
	浙　江 Zhejiang	12.24	39.00	1.35	26.83	36.09	232.15	141.02	84.12
	安　徽 Anhui	22.18	22.01		80.80	14.50	164.21	.97.09	196.50
	福　建 Fujian	0.38	29.27	17.44	6.67	44.77	117.60	109.33	81.44
	江　西 jiangxi	3.86	31.40	10.00	15.04	3.34	53.78	39.64	35.54
	山　东 Shandong	20.33	831.23	1.83	131.46	20.99	366.58	232.35	228.12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合成洗涤剂（万吨）Synthetic Detergents (10000 tons)	原盐（万吨）Salt (10000 tons)	糖（万吨）Sugar (10000 tons)	食用植物油（万吨）Edible Vegetable Oil (10000 tons)	罐头（万吨）Canned Food (10000 tons)	饮料酒（万吨）Alcoholic Beverages (10000 tons)	#啤酒 Beer	卷烟（万箱）Cigarettes (10000 cases)
	河　南 Henan	13.07			35.02	7.26	143.90	98.53	290.28
	湖　北 Hubei	11.39	214.08	0.85	99.35	6.45	134.29	89.57	213.55
	湖　南 Hunan	6.32	68.91	7.72	36.05	4.69	56.29	26.03	233.39
	广　东 Guangdong	30.72	12.02	128.36	28.50	9.70	151.47	115.26	157.68
	广　西 Guangxi	4.40	7.19	244.90	29.62	17.25	37.48	22.66	90.68
	海　南 Hainan	0.31	9.07	30.23	0.29	15.08	4.74	3.30	8.80
	重　庆 Chongqing	7.32	44.07	0.42	4.30	2.27	55.54	40.45	68.74
	四　川 Sichuan	12.61	234.96	10.11	41.17	6.04	179.22	57.60	125.29
	贵　州 Guizhou	0.30		0.65	13.92	0.19	47.30	8.29	205.32
	云　南 Yunnan	9.06	46.59	112.12	2.65	1.10	30.97	10.82	624.80
	西　藏 Tibet				0.13		0.51	0.45	
	陕　西 Shanxi	6.43	11.70	0.16	14.52	2.10	32.30	24.10	121.00
	甘　肃 Gansu	3.13	6.41	9.10	11.37	0.80	24.49	19.85	26.99
	青　海 Qinghai	0.97	15.93		2.33	0.01	2.66	0.87	2.00
	宁　夏 Ningxia	1.71	0.09	5.13	6.97	0.19	5.37	4.85	3.80
	新　疆 Xinjiang	1.80	39.85	42.28	34.92	8.03	25.90	17.20	13.21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中成药（万吨）Chinese Patent Medicine (10000tons)	家用电冰箱（万台）Household Refrigerators (10000units)	电风扇（万台）Electric Fans (10000 units)	家用洗衣机（万台）Household Washing Machines (10000units)	收音机（万台）Radio (10000 units)	录音机（万台）Recorders (10000 units)	电视机（万台）Television Sets (10000units)	#彩色 Color TV Sets	照相机（万架）Cameras (10000 units)
1952						1.70				
1957			0.16			35.20	0.10			0.01
1962			0.09			90.30		0.36		2.05
1965			0.30			81.50	0.50	0.44		1.72
1970			0.52			323.10	1.40	1.05	…	4.04
1975			1.80			935.60	3.20	17.78	0.29	18.49
1978			2.80	137.80	0.04	1167.70	4.70	51.73	0.38	17.89
1980		10.30	4.90	723.70	24.50	3003.80	74.30	249.20	3.21	37.28
1985		17.50	144.81	3174.60	887.20	1600.30	1393.10	1667.66	435.28	178.97
1987		24.20	401.34	3660.70	990.20	1763.80	1978.00	1934.37	672.72	256.70
1988		27.50	757.63	4495.50	1046.80	1548.90	2540.40	2505.07	1037.66	312.26
1989		22.60	670.79	4991.90	825.43	1834.70	2349.00	2766.54	940.02	245.18
1990		22.60	463.06	5799.30	662.68	2103.00	3023.50	2684.70	1033.04	213.22
1991		26.90	469.94	6219.10	687.17	1969.10	2873.70	2691.41	1205.06	478.18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中成药（万吨）Chinese Patent Medicine (10000tons)	家用电冰箱（万台）Household Refrigerators (10000units)	电风扇（万台）Electric Fans (10000 units)	家用洗衣机（万台）Household Washing Machines (10000units)	收音机（万台）Radio (10000 units)	录音机（万台）Recorders (10000 units)	电视机（万台）Television Sets (10000units)	#彩色 Color TV Sets	照相机（万架）Cameras (10000 units)
1992		32.20	485.76	6837.00	707.93	1648.90	3231.80	2867.82	1333.08	526.48
1993		36.20	596.66	7387.30	895.85	1754.20	3647.90	3032.97	1435.76	1930.46
1994		37.90	768.12	8613.50	1094.24	4132.30	8395.60	3283.26	1689.15	2830.02
1995		61.36	918.54	12966.67	948.41	8204.55	8581.36	3496.23	2057.74	3326.15
1996		40.80	979.65	10291.68	1074.72	5650.72	8632.82	3541.81	2537.60	4120.77
1997		47.93	1044.43	8171.42	1254.48	4624.21	8273.86	3637.24	2711.33	4686.89
	北　京 Beijing	1.27	0.01	9.89	11.95	6.46	69.10	40.82	38.92	157.73
	天　津 Tianjin	0.48	0.69	2.05	45.82	4.60	33.69	84.36	59.16	166.11
	河　北 Hebei	1.85		0.47				3.60	3.60	
	山　西 Shanxi	0.38		0.74	42.08				0.12	0.12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0.16				0.45	0.53	15.66	11.58	
	辽　宁 Liaoning	0.39	6.86	7.83	25.78		0.76	73.20	68.06	
	吉　林 Jilin	1.35	0.36					1.58	42.99	42.99
	黑龙江 Heilongjiang	0.63			0.31	0.42		65.13	65.13	0.05
	上　海 Shanghai	0.98	30.72	136.23	124.81	56.21	154.05	181.02	70.42	373.95
	江　苏 Jiangsu	5.86	59.81	710.46	143.00	38.13	203.16	379.93	282.06	31.64
	浙　江 Zhejiang	1.35	51.40	1319.55	162.32	46.49	53.90	421.12	41.40	14.05
	安　徽 Anhui	6.92	109.39	31.86	179.36				59.39	18.25
	福　建 Fujian	0.59		11.25		207.94	369.53	158.96	128.14	221.28
	江　西 Jiangxi	1.69	30.29	45.69		0.26	34.55	17.31	7.88	17.32
	山　东 Shandong	1.46	257.10	250.71	218.35		0.71	182.08	159.50	81.41
	河　南 Henan	2.02	102.97	27.24					39.47	21.20
	湖　北 Hubei	1.66		29.74	36.51	0.38	0.51	3.86	3.03	
	湖　南 Hunan	1.22	7.61	16.34		1.62	73.90	15.64	0.41	
	广　东 Guangdong	6.37	329.67	5435.34	205.62	4208.97	7206.26	1086.40	1021.24	3589.62
	广　西 Guangxi	3.40	0.01	53.93	·	7.74	69.87	30.02	2.07	
	海　南 Hainan	0.46				0.21		0.52	0.52	
	重　庆 Chongqing	1.90	0.61	53.40	20.58			0.50	0.15	1.55
	四　川 Sichuan	2.71	1.22	27.93	0.21	1.00	0.25	603.98	582.57	
	贵　州 Guizhou	1.10	0.45		1.30				37.36	5.22
	云　南 Yunnan	0.56	0.78					2.22	1.26	
	西　藏 Tibet	0.01								
	陕　西 Shanxi	0.47	47.99	0.45	5.47	43.36	1.51	85.87	76.19	21.71
	甘　肃 Gansu	0.35	6.50		31.32			4.74	0.20	10.48
	青　海 Qinghai	0.02								
	宁　夏 Ningxia	0.07							0.53	
	新　疆 Xinjiang	0.24							0.47	0.08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原煤 (亿吨) Coal (100million tons)	原油 (万吨) Crude Oil (10000tons)	天然气 (亿立方米) Natural Gas (100million cu. m)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Electricity (100million kwh)	#水电 Hydropower	生铁 (万吨) Pig Iron (10000tons)	钢 (万吨) Steel (10000tons)	成品钢材 (万吨) Steel Products (10000tons)
1952		0.66	44.00	0.08	73.00	13.00	193.00	135.00	106.00
1957		1.31	146.00	0.70	193.00	48.00	594.00	535.00	415.00
1962		2.20	575.00	12.10	458.00	90.00	805.00	667.00	455.00
1965		2.32	1131.00	11.00	676.00	104.00	1077.00	1223.00	881.00
1970		3.54	3065.00	28.70	1159.00	205.00	1706.00	1779.00	1188.00
1975		4.82	7706.00	88.50	1958.00	476.00	2449.00	2390.00	1622.00
1978		6.18	10405.00	137.30	2566.00	446.00	3479.00	3178.00	2208.00
1980		6.20	10595.00	142.70	3006.00	582.00	3802.00	3712.00	2716.00
1985		8.72	12490.00	129.30	4107.00	924.00	4384.00	4679.00	3693.00
1987		9.28	13414.00	138.90	4973.00	1000.00	5503.00	5628.00	4386.00
1988		9.80	13705.00	142.60	5452.00	1092.00	5704.00	5943.00	4689.00
1989		10.54	13764.00	150.49	5848.00	1183.00	5820.00	6159.00	4859.00
1990		10.80	13831.00	152.98	6212.00	1267.00	6238.00	6635.00	5153.00
1991		10.87	14099.00	160.73	6775.00	1247.00	6765.00	7100.00	5638.00
1992		11.16	14210.00	157.88	7539.00	1307.00	7589.00	8094.00	6697.00
1993		11.50	14524.00	167.65	8395.00	1518.00	8739.00	8956.00	7716.00
1994		12.40	14608.00	175.59	9281.00	1674.00	9741.00	9261.00	8428.00
1995		13.61	15004.95	179.47	10070.30	1905.77	10529.27	9535.99	8979.80
1996		13.97	15733.39	201.14	10813.10	1879.66	10722.50	10124.06	9338.02
1997		13.73	16074.14	227.03	11355.53	1959.83	11511.41	10894.17	9978.93
	北 京 Beijing	0.10			146.43	9.19	750.29	801.70	652.40
	天 津 Tianjin		645.90	7.58	178.19		185.33	236.79	495.69
	河 北 Hebei	0.79	415.16	3.65	694.12	10.62	1379.56	1056.14	786.42
	山 西 Shanxi	3.38		0.92	546.02	5.76	1465.02	398.98	278.83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0.83	131.51	0.10	342.23	1.09	450.84	453.32	339.94
	辽 宁 Liaoning	0.59	1504.08	19.14	615.23	28.83	1358.08	1354.86	1123.53
	吉 林 Jilin	0.27	405.10	2.95	280.03	40.67	146.79	139.01	109.35
	黑龙江 Heilongjiang	0.85	5609.16	23.49	432.90	10.85	82.31	88.41	75.48
	上 海 Shanghai				458.48		1054.56	1532.42	1296.48
	江 苏 Jiangsu	0.25	135.23	0.12	777.00	0.46	267.52	475.01	856.79
	浙 江 Zhejiang	0.01			485.77	61.39	77.29	152.37	271.44
	安 徽 Anhui	0.49	9.01		329.33	9.69	490.14	385.72	313.03
	福 建 Fujian	0.08			310.18	194.13	124.91	89.34	148.47
	江 西 Jiangxi	0.21			179.82	60.52	149.48	173.80	154.79
	山 东 Shandong	0.91	2801.34	10.02	840.30	0.46	604.45	523.14	370.35
	河 南 Henan	1.05	587.13	11.90	630.83	12.33	362.00	334.16	329.31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原煤（亿吨）Coal (100million tons)	原油（万吨）Crude Oil (10000tons)	天然气（亿立方米）Natural Gas (100million cu.m)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Electricity (100million kwh)	#水电 Hydropower	生铁（万吨）Pig Iron (10000tons)	钢（万吨）Steel (10000tons)	成品钢材（万吨）Steel Products (10000tons)
	湖北 Hubei	0.15	82.06	0.66	490.45	245.26	702.48	790.26	699.91
	湖南 Hunan	0.44			345.96	192.99	264.69	243.73	196.80
	广东 Guangdong	0.08	1418.07	36.80	981.15	153.84	174.70	248.70	296.69
	广西 Guangxi	0.11	8.64	0.01	237.26	156.58	111.86	98.58	77.18
	海南 Hainan		0.06		34.60	14.85	1.06		2.92
	重庆 Chongqing	0.29		2.44	148.16	31.38	138.54	138.93	120.56
	四川 Sichuan	0.62	23.25	80.03	491.97	246.84	491.31	548.84	440.53
	贵州 Guizhou	0.66		0.95	255.75	110.84	115.60	78.77	57.65
	云南 Yunnan	0.33	0.16	0.03	253.14	167.63	213.57	184.00	185.78
	西藏 Tibet					5.78	4.51	0.03	
	陕西 Shanxi	0.49	242.77	2.17	269.78	22.47	101.81	47.95	42.34
	甘肃 Gansu	0.23	185.86	0.30	246.42	82.48	146.53	170.69	114.18
	青海 Qinghai	0.03	160.24	2.20	84.26	50.20	0.16	43.13	33.28
	宁夏 Ningxia	0.17	80.18	0.26	113.42	7.01	6.67	8.23	8.92
	新疆 Xinjiang	0.30	1629.25	21.30	150.58	26.97	93.82	97.21	99.89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铁合金（万吨）Ferroalloys (10000tons)	焦炭（万吨）Coke (10000tons)	水泥（万吨）Cement (10000tons)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Plate Glass (10000 weight cases)	木材（万立方米）(Timber (10000 cu.m)	硫酸（万吨）Sulfuric Acid (10000tons)	纯碱（万吨）Soda Ash (10000tons)
1952		1.70	289.00	286.00	198.00	1233.00	19.00	19.20
1957		10.50	830.00	686.00	430.00	2787.00	63.20	50.60
1962		19.70	1342.00	600.00	367.00	2375.00	96.80	51.90
1965		33.90	1333.00	1634.00	599.00	3978.00	234.00	88.20
1970		59.50	2330.00	2575.00	928.00	3782.00	291.40	107.70
1975		76.90	3680.00	4626.00	1262.00	4703.00	484.70	124.30
1978		93.90	4946.00	6524.00	1784.00	5162.00	661.00	132.90
1980		99.40	4343.00	7986.00	2466.00	5359.00	764.30	161.30
1985		149.40	4802.00	14595.00	4942.00	6323.00	676.40	201.10
1987		184.60	5795.00	18625.00	5803.00	6408.00	983.30	236.30
1988		208.40	6108.00	21014.00	7293.00	6218.00	1111.30	260.90
1989		238.20	6624.00	21029.00	8442.00	5802.00	1153.30	304.20
1990		244.20	7328.00	20971.00	8067.00	5571.00	1196.90	379.50
1991		246.00	7352.00	25261.00	8712.00	5807.00	1332.90	393.60
1992		254.80	7984.00	30822.00	9359.00	6174.00	1408.70	455.00
1993		300.00	9320.00	36788.00	11086.00	6390.00	1336.50	534.90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铁合金 (万吨) Ferroalloys (10000tons)	焦 炭 (万吨) Coke (10000tons)	水 泥 (万吨) Cement (10000tons)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Plate Glass (10000 weight cases)	木 材 (万立方米) (Timber (10000 cu.m)	硫 酸 (万吨) Sulfuric Acid (10000tons)	纯 碱 (万吨) Soda Ash (10000tons)
1994		336.10	11477.00	42118.00	11925.00	6615.00	1536.50	581.40
1995		431.88	13510.05	47560.59	15731.71	6766.86	1811.00	597.71
1996		418.02	13643.10	49118.90	16069.37	6710.27	1883.57	669.29
1997		404.38	13731.17	51173.80	16630.70	6394.79	2036.87	725.76
	北 京 Beijing	3.70	399.39	700.85	520.14	6.12	9.26	
	天 津 Tianjin	1.35	170.38	209.00	300.20		11.33	64.73
	河 北 Hebei	10.98	1239.00	3761.87	2348.64	55.76	88.82	80.62
	山 西 Shanxi	24.50	5279.13	1420.15	353.29	32.43	56.23	2.57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7.19	423.54	465.76	399.77	524.15	12.78	40.10
	辽 宁 Liaoning	23.95	807.36	1829.04	1494.24	163.16	108.74	71.21
	吉 林 Jilin	32.75	154.02	627.12	105.21	565.47	12.97	3.66
	黑龙江 Heilongjiang	0.80	175.45	709.69	440.93	1154.77	6.17	0.02
	上 海 Shanghai	20.68	665.02	338.47	691.08		36.79	4.44
	江 苏 Jiangsu	5.96	216.25	4031.73	1380.13	73.93	189.40	90.37
	浙 江 Zhejiang	13.90	53.84	3430.12	683.67	190.07	47.74	14.49
	安 徽 Anhui	2.09	299.90	2310.90	262.67	269.51	137.03	9.35
	福 建 Fujian	6.68	43.53	1522.42	468.03	479.64	29.77	6.58
	江 西 Jiangxi	9.62	170.58	1047.49	244.21	268.65	59.72	1.16
	山 东 Shandong	1.17	319.08	5830.54	1608.27	167.11	150.02	138.32
	河 南 Henan	11.93	345.62	3417.00	1546.18	150.67	89.66	41.03
	湖 北 Hubei	10.54	394.44	2093.50	459.63	129.78	163.30	42.92
	湖 南 Hunan	33.88	243.84	2208.66	543.49	331.27	110.37	10.91
	广 东 Guangdong	1.12	54.70	5147.87	812.74	277.48	137.85	19.81
	广 西 Guangxi	38.22	69.46	1893.00	201.40	365.86	56.44	
	海 南 Hainan			187.96		49.38	0.96	
	重 庆 Chongqing	2.59	132.84	977.37	116.96	39.80	52.23	8.54
	四 川 Sichuan	25.83	563.10	2351.21	670.55	403.14	166.08	46.29
	贵 州 Guizhou	41.24	536.54	632.00	26.34	63.71	26.01	
	云 南 Yunnan	19.86	424.28	1341.26	110.50	386.33	144.33	5.90
	西 藏 Tibet				32.23		25.00	
	陕 西 Shanxi	5.11	304.09	1165.87	273.47	116.83	47.25	4.24
	甘 肃 Gansu	15.26	102.27	602.69	400.19	43.86	66.85	11.35
	青 海 Qinghai	15.98	4.27	79.05	90.20	7.40	1.41	1.25
	宁 夏 Ningxia	16.04	33.27	181.47	57.25	14.51	9.63	
	新 疆 Xinjiang	1.45	106.99	627.51	21.32	39.00	7.72	5.90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烧碱（万吨）Caustic Soda (10000tons)	农用氮、磷、钾化肥（万吨）Chemical Ferrilizer (10000tons)	#氮肥 Nitro－genous	#磷肥 Phoophate	化学农药（万吨）Chemical Pesticde (10000tons)	电石（万吨）Calcium Carbide (10000tons)	塑料（万吨）Plastics (10000tons)	轮胎外胎（万条）Tires (Cover) (10000units)
1952		7.90	3.90		3.90	0.20	1.10	0.20	42.00
1957		19.80	15.10	12.90	2.20	6.50	4.90	1.30	88.00
1962		29.00	46.40	33.80	12.60	8.80	19.40	4.00	128.00
1965		55.60	172.60	103.70	68.80	19.30	44.00	9.70	232.00
1970		89.20	243.50	152.30	90.70	32.10	69.60	17.60	425.00
1975		128.90	524.70	370.90	153.10	42.20	98.30	33.00	700.00
1978		164.00	869.30	763.90	103.30	53.30	123.80	67.90	939.00
1980		192.30	1232.10	999.30	230.80	53.70	152.00	89.80	1146.00
1985		235.30	1322.20	1143.80	176.00	21.10	195.30	123.40	1926.00
1987		273.90	1672.20	1342.30	325.90	16.10	241.20	152.60	2333.00
1988		300.50	1740.20	1365.30	369.20	17.90	225.60	190.40	2991.00
1989		321.10	1802.50	1424.10	372.80	20.80	246.10	205.80	3226.00
1990		335.40	1879.70	1463.60	411.40	22.80	228.00	227.00	3209.00
1991		354.10	1979.50	1510.10	459.70	25.50	235.80	283.00	3940.00
1992		379.50	2047.90	1570.50	462.20	28.10	242.50	330.80	5183.00
1993		395.40	1956.30	1525.60	419.00	25.70	264.20	359.90	6391.00
1994		429.60	2272.80	1736.30	504.40	29.00	292.00	401.40	9302.00
1995		531.82	2548.14	1859.18	662.64	41.65	345.67	516.87	7945.84
1996		573.78	2809.04	2136.05	651.17	44.75	309.22	576.86	8805.67
1997		574.40	2820.96	2074.93	714.56	52.67	344.70	685.76	9598.99
	北　京 Beijing	11.36	11.92	11.54	0.38		1.21	72.61	296.05
	天　津 Tianjian	44.15	10.91	8.58	1.46	3.84	7.46	52.83	167.02
	河　北 Hebei	32.64	178.50	147.25	31.25	6.34	16.28	21.89	224.62
	山　西 Shanxi	13.26	116.23	97.38	17.51	0.37	77.17	2.49	117.12
	内蒙古 InnerMongolia	14.67	16.87	14.98	1.81	0.02	19.95	2.58	3.96
	辽　宁 Liaoning	33.44	84.71	74.27	8.91	2.12	3.17	65.71	361.14
	吉　林 Jilin	8.62	27.53	27.26	0.27	0.44	6.85	19.23	54.06
	黑龙江 Heilongjiang	16.66	44.56	44.21	0.34	0.58	9.13	36.44	202.08
	上　海 Shanghai	41.01	18.07	16.09	1.98	1.46	8.53	64.56	829.57
	江　苏 Jiangsu	59.59	187.98	122.72	62.75	9.27	8.35	68.02	307.61
	浙　江 Zhejiang	30.76	67.13	59.32	7.81	5.79	13.84	16.82	1054.32
	安　徽 Anhui	10.63	181.81	124.14	57.67	1.89	9.74	6.34	174.13
	福　建 Fujian	12.47	54.74	46.85	7.89	1.23	14.57	10.06	923.85
	江　西 Jiangxi	9.57	44.73	29.78	14.92	0.63	8.38	5.13	0.90
	山　东 Shandong	79.46	262.70	220.96	39.20	5.22	5.19	61.55	2745.77
	河　南 Henan	32.54	237.89	194.09	42.86	0.92	10.21	28.05	536.63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烧碱（万吨）Caustic Soda (10000tons)	农用氮、磷、钾化肥（万吨）Chemical Ferrilizer (10000tons)	#氮肥 Nitro-genous	#磷肥 Phoophate	化学农药（万吨）Chemical Pesticde (10000tons)	电石（万吨）Calcium Carbide (10000tons)	塑料（万吨）Plastics (10000tons)	轮胎外胎（万条）Tires (Cover) (10000units)
	湖北 Hubei	17.09	237.77	126.32	111.17	3.45	8.72	11.33	273.40
	湖南 Hunan	19.29	150.81	122.03	28.30	4.20	13.81	8.72	22.15
	广东 Guangdong	15.35	59.25	38.09	21.16	1.08	0.10	70.51	328.86
	广西 Guangxi	9.11	47.04	27.64	19.39	0.89	12.11	2.36	131.54
	海南 Hainan		21.62	21.30	0.33	0.03	0.08		40.93
	重庆 Chongqing	8.48	66.07	46.89	19.03	0.97	2.91	0.23	105.01
	四川 Sichuan	27.07	252.33	183.26	67.35	1.52	13.28	6.94	115.57
	贵州 Guizhou	2.53	69.17	41.68	27.48		8.22	1.04	208.85
	云南 Yunnan	3.50	144.31	71.43	72.86	0.09	10.67	1.23	84.51
	西藏 Tibet								
	陕西 Shanxi	7.33	81.91	52.08	29.39	0.10	17.28	2.46	5.19
	甘肃 Gansu	6.84	41.07	24.27	16.80	0.20	11.25	19.25	8.92
	青海 Qinghai	0.75	19.27	0.57	0.14		0.35	0.02	
	宁夏 Ningxia	2.70	41.19	38.11	3.08		23.04	2.49	187.77
	新疆 Xinjiang	3.55	42.87	41.82	1.05	0.02	2.84	24.86	87.47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交流电动机（万千瓦）Alternating Current Motors (10000kw)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Metal Cutting Machine Tools (10000units)	汽车（万辆）Motor Vehicles (10000units)	#载重汽车 Trucks	拖拉机（14.7千瓦及以上 万台）Tractors (14.7kw & over 10000uints	小型拖拉机（万台）Minitractors (10000units)
1952		64.00	1.37				
1957		146.00	2.80	0.79	0.62		
1962		343.00	2.25	0.97	0.78	0.71	0.01
1965		405.00	3.96	4.05	2.65	0.96	0.36
1970		1456.00	13.89	8.72	4.71	3.19	5.14
1975		2799.00	17.49	13.98	7.76	7.84	20.94
1978		3195.00	18.32	14.91	9.61	11.35	32.42
1980		2570.00	13.36	22.23	13.55	9.77	21.79
1985		3484.00	16.72	43.72	26.90	4.50	82.25
1987		4172.00	17.22	47.18	29.84	3.71	110.60
1988		4511.00	19.17	64.47	40.33	4.72	133.57
1989		4095.00	17.87	58.35	36.34	3.98	111.81
1990		3528.00	13.45	51.40	28.97	3.94	110.14
1991		3825.00	16.39	71.42	38.25	5.27	134.78
1992		5243.00	22.87	106.67	47.67	5.70	139.07
1993		5450.00	26.20	129.85	59.79	3.77	96.14
1994		5946.00	20.65	136.69	66.30	4.67	135.51
1995		6010.59	20.34	145.27	59.60	6.33	206.30

年份 Year	地　区 Region	交流电动机 (万千瓦) Alternating Current Motors (10000kw)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Metal Cutting Machine Tools (10000units)	汽　车 (万辆) Motor Vehicles (10000units)	#载重汽车 Trucks	拖拉机 (14.7千瓦及以上　万台) Tractors (14.7kw & over 10000uints	小型拖拉机 (万台) Minitractors (10000units)
1996		5312.83	17.74	147.52	62.51	8.37	209.66
1997		5127.42	18.65	158.25	57.36	8.24	201.64
	北　京 Beijing	148.66	0.22	11.59	3.71		0.37
	天　津 Tianjin	65.34	0.18	15.86	1.35	1.05	0.16
	河　北 Hebei	343.27	0.35	1.26	0.37	0.22	17.21
	山　西 Shanxi	66.77	0.07	0.19	0.05		0.20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31.40	0.03	0.07	0.01		0.51
	辽　宁 Liaoning	561.15	1.10	3.93	1.21	0.04	0.95
	吉　林 Jilin	22.94	0.05	22.19	8.82	0.10	2.85
	黑龙江 Heilongjiang	88.56	0.18	5.01	1.62	0.06	5.21
	上　海 Shanghai	563.39	1.87	23.30		1.95	
	江　苏 Jiangsu	893.42	3.01	9.72	3.14	0.42	24.32
	浙　江 Zhejiang	456.87	5.98	0.92	0.10	0.62	3.33
	安　徽 Anhui	106.72	0.22	3.50	1.03	0.01	20.87
	福　建 Fujian	123.40	0.10	0.61	0.33		4.11
	江　西 Jiangxi	64.31	0.31	8.18	7.54	0.08	2.16
	山　东 Shandong	318.24	1.98	1.44	1.14	1.40	61.67
	河　南 Henan	222.80	0.10	1.05	0.84	1.80	30.42
	湖　北 Hubei	89.63	0.21	16.51	8.21	0.26	1.16
	湖　南 Hunan	235.47	0.11	0.76		0.03	0.65
	广　东 Guangdong	215.50	0.68	0.98	0.45		2.17
	广　西 Guangxi	30.32	0.31	9.97	7.16		10.78
	海　南 Hainan			0.26			0.01
	重　庆 Chongqing	77.10	0.16	16.07	8.03		0.05
	四　川 Sichuan	96.92	0.13	1.62	0.54		3.81
	贵　州 Guizhou	6.79	0.04	0.36	0.14		0.57
	云　南 Yunnan	76.39	0.66	1.14	0.93		3.35
	西　藏 Tibet						
	陕　西 Shanxi	128.35	0.41	1.65	0.55		1.14
	甘　肃 Gansu	38.96	0.05				1.49
	青　海 Qinghai	0.13	0.02				
	宁　夏 Ningxia	34.35	0.09			0.02	0.65
	新　疆 Xinjiang	20.28	0.01	0.11	0.08	0.18	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465 页～472 页。

说明：1. 广东省电子产品录音机、收音机、表等 1994 年的产品产量包括用国外进口零部件组装的产成品产量。

2. 收音机产量 1996 年比 1995 年下降较多，主要是因为广东省部分企业停产或转产。

a) The output of electronic products such as taperecorders, radios, watch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94 included those which were assembled with the spare parts imported from abroad.

附表 32　　人民币对主要外币年平均汇价（中间价）

AVERAGE EXCHANGE RATE OF RMB YUAN AGAINST MAIN CONVERTIBLE CURRENCIES (MIDDLE RATE)

单位：人民币 . 元　　(RMB. yuan)

年　份 Year	100 美元 100US Dollars	100 日元 100Japanese Yen	100 港元 100Hong Kong Dollars
1981	170.51	0.7735	30.41
1982	189.26	0.7607	31.15
1983	197.57	0.8318	27.36
1984	232.70	0.9780	29.71
1985	293.67	1.2457	37.57
1986	345.28	2.0694	44.22
1987	372.21	2.5799	47.74
1988	372.21	2.9082	47.70
1989	376.59	2.7360	48.28
1990	478.38	3.3233	61.39
1991	532.27	3.9602	68.45
1992	551.49	4.3608	71.24
1993	576.19	5.2020	74.41
1994	861.87	8.4370	111.53
1995	835.07	8.9225	107.96
1996	831.42	7.6352	107.51
1997	828.98	6.8600	107.0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620 页。

附表 33

进出口贸易总额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年 份 Year	人民币（亿元） 100million Yuan				美 元（亿元） USD 100million			
	进出总额 Total Imports &Exports	出口总额 Total Exports	进口总额 Total Imports	差 额 Balance	进出口总额 Total Imports &Exports	出口总额 Total Exports	进口总额 Total Imports	差 额 Balance
1952	64.6	27.1	37.5	-10.4	19.4	8.2	11.2	-3.0
1957	104.5	54.5	50.0	4.5	31.0	16.0	15.0	1.0
1962	80.9	47.1	33.8	13.3	26.6	14.9	11.7	3.2
1965	118.4	63.1	55.3	7.8	42.5	22.3	20.2	2.1
1970	112.9	56.8	56.1	0.7	45.9	22.6	23.3	-0.7
1975	290.4	143.0	147.4	-4.4	147.5	72.6	74.9	-2.3
1978	355.0	167.6	187.4	-19.8	206.4	97.5	108.9	-11.4
1980	570.0	271.2	298.8	-27.6	381.4	181.2	200.2	-19.0
1985	2066.7	808.9	1257.8	-448.9	696.0	273.5	422.5	-149.0
1986	2580.4	1082.1	1498.3	-416.2	738.5	309.4	429.1	-119.7
1987	3084.2	1470.0	1614.2	-144.2	826.5	394.4	432.1	-37.7
1988	3821.8	1766.7	2055.1	-288.4	1027.9	475.2	552.7	-77.5
1989	4155.9	1956.0	2199.9	-243.9	1116.8	525.4	591.4	-66.0
1990	5560.1	2985.8	2574.3	411.5	1154.4	620.9	533.5	87.4
1991	7225.8	3827.1	3398.7	428.4	1356.3	718.4	637.9	80.5
1992	9119.6	4676.3	4443.3	233.0	1655.3	849.4	805.9	43.5
1993	11271.0	5284.8	5986.2	-701.4	1957.0	917.4	1039.6	-122.2
1994	20381.9	10421.8	9960.1	461.7	2366.2	1210.1	1156.1	54.0
1995	23499.9	12451.8	11048.1	1403.7	2808.6	1487.8	1320.8	167.0
1996	24133.8	12576.4	11557.4	1019.0	2898.8	1510.5	1388.3	122.2
1997	26958.6	15152.8	11805.8	3347.0	3250.6	1827.0	1423.6	403.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620 页。

说明：1. 进出口差额负数为入超。

2. 本表 1979 年以前为外贸业务统计数，1980 年以后为海关进出口统计数。

a) A negative balalice indicates an unfavourable balance of foreign trade.

b) Data before 1979 were obtained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data since 1980 have been obtained from the Customs statistics.

附表 34

教育事业基本情况

BASIC STATISTICS ON EDUCATION

指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学校数（所）Number of Schools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016	1075	1054	1032	1020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104848	100777	95216	94115	92832
#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3557	3982	4049	4099	4143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93221	87631	81020	79967	78642
小学	Primary Schools	832309	766072	668685	645983	628840
专任教师（万人）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10000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34.4	39.5	40.1	40.3	40.5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296.7	349.2	388.3	404.0	418.6
#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adary Schools	17.4	23.4	25.7	26.7	27.6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265.2	303.3	333.4	346.5	358.7
小学	Primary Schools	537.7	558.2	566.4	573.6	579.4
招生数（万人）New Student Enrollment（10000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eation	61.9	60.9	92.6	96.6	100.0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1789.8	1815.8	2354.1	2384.2	2501.5
#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adary Schools	66.8	73.0	138.1	152.3	162.1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1606.9	1619.6	2025.9	2042.9	2128.2
小学	Primary Schools	2298.2	2064.0	2531.8	2524.7	2462.0
在校学生（万人）Student Enrollment（10000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70.3	206.3	290.6	302.1	317.4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5092.6	5105.4	6191.5	6635.7	6995.2
#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157.1	224.4	372.2	422.8	465.4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4706.0	4586.0	5371.0	5739.7	6017.9
小学	Primary Schools	13370.2	12241.4	13195.2	13615.0	13995.4
毕业生数（万人）Graduates（10000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31.6	61.4	80.5	83.9	82.9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1279.1	1497.5	1636.9	1725.4	1929.8
#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42.9	66.1	83.9	101.9	115.7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1194.9	1342.1	1429.0	1484.0	1664.0
小学	Primary Schools	1999.9	1863.1	1961.5	1934.1	1960.1
每一教师负担学生数（人）Student－teacher Ratio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5.0	5.2	7.2	7.5	7.8

指标	Item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17.2	14.6	15.9	16.4	16.7
小学	Primary Schools	24.9	21.9	23.3	23.7	24.2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亿元）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for Education (100million yuan)**	**226.8**	**462.5**	**1193.8**		
#预算内支出	Budgetary Expenditures for Education	225.7	410.4	1081.0		
#教育事业费	OPerating Expenses	184.2	352.5	891.5		
基建投资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ment in Education	27.2	29.6	58.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681页。

附表35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国际比较）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ITS GROWTH RATE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6 国内生产总值（亿本币）GDP (national currency 100million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上年增长%）GDP Growth Rate over the Preceding Year			
			1994	1995	1996	1997①
中　国	（人民币元）China（Yuan Renminbi）	67885	12.7	10.5	9.6	8.8
美　国	（美元）United States（US Dollar）	76360	3.5	2.0	2.4	3.6
日　本	（日元）Japan（Yen）	5003560	0.6	1.4	3.6	2.3
德　国	（德国马克）Germany（Deutsche Mark）	35400	2.9	1.9	1.4	2.2
英　国	（英镑）United Kingdom（Pound）	7423	4.3	2.7	2.3	3.0
法　国	（法郎）France（Franc）	78744	2.8	2.1	1.5	2.5
意大利	（里拉）Italy（Lire）	18735000	2.2	2.9	0.7	1.0
加拿大	（加元）Canada（Dollar）	8203	4.1	2.3	1.2	3.5
澳大利亚	（澳元）Australia（Dollar）	4996	5.4	3.9	3.4	3.5
俄罗斯	（卢布）Russian Fed.（Rouple）	22561200	-12.6	-4.0	-3.3	
捷　克	（克朗）Czech Rep（Koruna）	14140	2.6	4.8	9.7	2.6
波　兰	（兹罗提）Poland（Zloty）	2860③	6.0	6.5	6.0	5.0
匈牙利	（福林）Hungary（Forint）	55619	2.9	1.5	0.8	2.4
罗马尼亚	（列伊）Romania（Lei）	497948②	3.9	6.9	4.0	
印　度	（卢比）India（Rupee）	109858③	7.6	7.3	6.4	
印度尼西亚	（卢比）Indonesia（Rupiah）	5326310	7.5	8.2	7.9	
菲律宾	（比索）Philippines（Peso）	21966	4.4	4.8	5.7	
泰　国	（铢）Thailand（Baht）	46654	8.9	8.7	8.3	
马来西亚	（林吉特）Malaysia（Ringgit）	2498	9.2	9.5	8.6	
新加坡	（新加坡元）Singapore（Dollar）	1326	10.4	8.8	7.0	
巴基斯坦	（卢比）Pakstan（Rupee）	21749	3.8	4.4	5.9	
缅　甸	（缅元）Myanmar（Kyat）	7154	7.5	6.9	5.8	
孟加拉国	（塔卡）Bangladesh（Taka）	13016	4.2	4.4	5.4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6 国内生产总值（亿本币）GDP（national currency 100million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上年增长%）GDP Growth Rate over the Preceding Year			
			1994	1995	1996	1997①
土耳其	（里拉）Turkey（Lira）	143200000	-5.1	6.7	7.4	5.2
韩　国	（韩圆）Korea, Rep.（Won）	3899790	8.8	8.9	7.1	5.3
埃　及	（埃镑）Eeypt.（Pound）	2283	3.9	4.6	5.1	
尼日利亚	（奈拉）Nigeria（Naira）	9143②	1.3	1.3	2.9①	
墨西哥	（新比索）Mexico（New peso）	25442	4.5	-6.2	5.1	5.4
巴　西	（雷亚尔）Brazil（Reai）	7529	6.1	4.1		
阿根廷	（比索）Argentina（Peso）	2974	8.5	-4.6	4.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927 页。

国外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月报》1998 年 3 月，《OECD 经济展望》1997 年 6 月。

Sourc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March 1998,《OECD Economy Outlook》June 1997.

①初步数。②1994 年数字。③1995 年数。

①Prelimtnary figure. ②Data refer to 1994. ③Data refer to 1995.

附表 36　主要农产品产量（国际比较）

OUTPUT OF MAJOR AGRICUITURAL PRODUCTS

单位：万吨（10000tons）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7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7
谷　物	Cereals		棉　花	Cotton Lint	
世界总计	World	2074790	世界总计	World	1956
中　国	China	44349	中　国	China	460
美　国	United States	34146	美　国	United States	401
印　度	India	22071	印　度	India	272
俄罗斯	Russian Fed.	8044	巴基斯坦	Pakistan	176
法　国	France	6218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106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5993	土耳其	Turkey	76
巴　西	Brazil	4961	澳大利亚	Australia	58
加拿大	Canada	4832	墨西哥	Mexico	38
德　国	Germany	4541	希　腊	Greece	35
阿根廷	Argentina	3314	阿根廷	Argentina	32
大　豆	Soybeails		花　生	Groundnuts in Shell	
世界总计	World	14152	世界总计	World	2698
美　国	United States	7407	中　国	China	965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7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7
巴西	Brazil	2616	印度	India	800
中国	China	1473	尼日利亚	Nigeria	172
阿根廷	Argentina	1103	美国	United States	159
印度	India	440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00
加拿大	Canada	282	塞内加尔	Senegal	72
巴拉圭	Paraguay	260	缅甸	Myanmar	59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55	刚果	Congo	56
玻利维亚	Bolivia	102	阿根廷	Argentina	40
意大利	Italy	95	苏丹	Sudan	37
油菜子	Rapeseeds		黄麻	Jute + Jute – Like Fibres	
世界总计	World	3405	世界总计	World	336
中国	China	958	印度	India	172
印度	India	638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98
加拿大	Canada	609	中国	China	43
法国	France	349	泰国	Thailand	12
德国	Germany	284	缅甸	Myanmar	5
英国	United Kingdom	145	俄罗斯	Russian Fed.	5
澳大利亚	Australia	75	越南	Viet Nam	1
捷克	Czech Rep.	58	尼泊尔	Nepal	1
波兰	Poland	54	巴西	Brazil	1
丹麦	Denmark	27	古巴	Cuba	1
甘蔗	Sugar Cane		甜菜	Sugar Beets	
世界总计	World	121594	世界总计	World	27408
巴西	Brazil	32920	法国	France	3277
印度	India	26500	德国	Germany	2849
中国	China	7890	美国	United States	2663
泰国	Thailand	6000	乌克兰	Ukraine	2400
墨西哥	Mexico	4226	俄罗斯	Russian Fed.	1700
巴基斯坦	Pakistan	4199	土耳其	Turkey	1622
澳大利亚	Australia	4077	波兰	Poland	1600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7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7
古　巴	Cuba	4000	中　国	China	1497
哥伦比亚	Colombia	3280	意大利	Italy	1300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2860	英　国	United Kingdom	956
茶　叶	Tea		烟　叶	Tabacco Leaves	
世界总计	World	268	世界总计	World	697
印　度	India	75	中　国	China	425
中　国	China	61	美　国	United States	75
斯里兰卡	Sri Lanka	27	巴　西	Brazil	62
肯尼亚	Kenya	22	印　度	India	56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7	土耳其	Turkey	23
土耳其	Turkey	12	津巴布韦	Zimbabwe	22
日　本	Japan	9	马拉维	Malawi	15
伊　朗	Iran	6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4
阿根廷	Argentina	0	希　腊	Greece	13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5	阿根廷	Argentina	12
肉类②④	Meat②④		牛奶④	Cow Milk④	
世界总计	World	21517	世界总计	World	46632
中　国	China	5915	美　国	United States	6998
美　国	United States	3456	俄罗斯	Russian Fed.	3545
巴　西	Brazil	1097	印　度	India	3300
法　国	France	633	德　国	Germany	2862
德　国	Germany	584	法　国	France	2567
俄罗斯	Russian Fed.	527	巴　西	Brazil	1985
印　度	India	430	乌克兰	Ukraine	1570
意大利	Italy	407	英　国	United Kingdom	1460
西班牙	Spain	308	波　兰	Poland	1143
墨西哥	Mexico	368	荷　兰	Netherlands	1110
水果④	Fruit④		羊毛⑤④	Wool Greasy⑤④	
世界合计	World	41116	世界合计	World	248
中　国	China	4653	澳大利亚	Australia	71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7	国家和地区	Country or Territory	1997
印 度	India	3935	中 国	China	28
巴 西	Brazil	3458	新西兰	New Zealand	26
美 国	United States	2952	俄罗斯	Russian Fed.	9
西班牙	Spain	1267	乌拉圭	Uruguay	7
墨西哥	Mexico	1214	阿根廷	Argentina	7
意大利	Italy	1086	英 国	United Kingdom	7
法 国	France	1080	南 非	South Africa	6
乌干达	Uganda	1015	巴基斯坦	Pakistan	5
伊 朗	Iran	963	伊 朗	Iran	5
水产品③	Fishery③		天然橡胶④	Natural Rubber④	
世界合计	World	11291	世界合计	World	597
中 国	China	2525	泰 国	Thailand	164
秘 鲁	Peru	894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54
智 利	Chile	759	马来西亚	Malaysia	108
日 本	Japan	676	印 度	India	54
美 国	United States	563	中 国	China	40
印 度	India	490	越 南	Viet Nam	13
俄罗斯	Russian Fed.	437	斯里兰卡	Sri Lanka	11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412	尼日利亚	Nigeria	9
泰 国	Thailand	350	科特迪瓦	Cote d' Ivoire	8
挪 威	Norway	281	菲律宾	Philippines	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928 页～930 页。

国外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季报》1997 年第 3/4 季度、《渔业年鉴》1995 年。

Sources: United Nations FAO《Quarter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1997.3/4,《Yearbook of Fishery Statistics》1995.

①包括红麻 .②包括牛肉、羊肉、猪肉、马肉、家禽肉以及其他家养和野生动物肉。③1995 年数字。④1996 年数字 .⑤未洗羊毛 .

①Including apocynum.②Including beef and veal, buffalo meat, mutton and lamb, goat meat, pork, horse meat, poultry meat and meats of all other domesfic or wild animals such as camels, rabbits and game animals.③Data refer to 1995.④Data refer to 1996.⑤Contained 30 to 50 percent of impurities.

附表 37　　我国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CHANGES IN THE ORDER OF PRECEDENCE

OF OUTPUT OF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项　　目 Item	1949	1957	1965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谷物 Cereals		3	2	2	1	2	1	1	1	1
肉类①Meat①	3	2	3	3	3	2	1	1	1	1
棉花 Cotton Lint	4	2	2	3	2	1	1	1	1	1
大豆 Soybeans	2	2	2	3	3	3	3	3	3	3
花生 Groundnuts in Shell	2	2	3	2	2	2	2	1	1	1
油菜子 Rapeseeds	2	2	2	2	2	1	1	1	1	1
甘蔗 Sugar Cane		3		9	9	4	4	3	3	3
茶叶 Tea	3	3	3	2	2	2	2	2	2	2
水果 Fruit					10	8	4	1	1	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930 页。

国外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鉴》1995 年、《统计季报》1997 年第 3/4 季度。

Sources：United Nations FAO《Yearbook of Production》1995，《Quarter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1997.3/4.

①1993 年以前为猪、牛、羊肉产量的位次。

a）Data refer to pork，bear and mutton before 1993.

附表 38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96 年）

OUTP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1996）

单位：万吨（10000tons）

项　　目 Item	数　量 Quantity	项　　目 Item	数　量 Quantity
钢（万吨）Crude Steel（10000tons）		煤炭④（万吨）Coal④（10000tons）	
世界总计①World①	71437.3	世界总计①World①	471696.0
中　国 China	10124.0	中　国 China	139700.0
日　本 Japan	9895.2	美　国 United States	106288.8
美　国 United States	9500.4	印　度 India	30 784.8
俄罗斯 Russian Fed.	4916.4	俄罗斯①Russian Fed.①	25569.6
德　国 Germany	3079.2	澳大利亚①Australia①	24180.0
韩　国 Korea，Rep.	3890.4	德　国 Germany	23218.8
加拿大 Canada	2902.8	波　兰①Poland①	19971.6
意大利 Italy	2772.0	南　非①South Africa①	19599.6

项　目 Item	数　量 Quantity	项　目 Item	数　量 Quantity
巴　西 Brazil	2523.6	捷　克①Czech Rep.①	9344.4
乌克兰 Ukraine	2233.2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8694.0
原油（万吨） Crude Petroleum（10000tons）		电　Electricity （亿千瓦小时）（100million kwh）	
世界总计 World	306531.3	世界总计①World①	129548.0
沙特阿拉伯①Saudi AraBIA①	39901.2	美　国①United States①	33453.1
美　国 United States	37274.4	中　国 China	10813.0
俄罗斯 Russian Fed.	30 099.6	日　本①Japan①	9899.6
伊朗①Iran①	17940.0	俄罗斯①Russian Fed.①	8674.9
中　国 China	15733.0	加拿大 Canada	5489.6
墨西哥 Mexico	14900.4	德　国 Germany	5470.3
委内瑞拉①Venezuela①	14486.4	法国①France①	4931.8
挪威①Norway①	13461.6	印　度 India	3937.0
英国①United Kingdom①	12180.0	英　国 United Kingdom	3316.2
阿联酋①United Arab Emirates①	10321.2	巴　西 Brazil	2754.0
水泥（万吨） Cement（10000tons）		化肥（万吨）① Fertilizer①（10000tons）	
世界总计①World①	137466.0	世界总计 World	14323.8
中　国 China	49119.0	中　国 China	2809.0
日　本 Japan	9441.6	美　国 United States	2558.7
美国①United States①	7532.4	加拿大 Canada	1247.9
印　度 India	7032.0	印　度 India	1138.5
韩　国 Korea，Rep.	5844.0	俄罗斯 Russian Fed.	960.3
泰　国 Thailand	3873.6	德　国 Germany	476.8
德　国 Germany	3602.4	白俄罗斯 Belarus	326.4
巴　西 Brazil	3459.6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322.1
意大利①Italy①	3452.4	法　国 France	300.5
土耳其①Turkey①	3301.2	巴　西 Brazil	226.2
合成橡胶 Synthetic Rubber （万吨）（10000tons）		汽车⑥Motor Vehicles⑥ （万辆）（10000units）	
世界总计①World①	818.2	世界总计 World	5133.2
美　国 United States	248.6	美　国 United States	1179.9
日　本 Japan	138.9	日　本 Japan	1034.6

项　　目 Item	数　量 Quantity	项　　目 Item	数　量 Quantity
俄罗斯 Russian Fed.	77.5	德　国 Germany	484.3
中　国 China	60.0	法　国 France	359.1
法　国 France	58.2	韩　国 Korea, Rep.	281.3
德　国 Germany	57.0	西班牙 Spain	241.2
韩　国①Korea, Rep.①	37.2	加拿大 Canada	239.7
英　国 United Kingdom	32.9	英　国 United Kingdom	192.4
意大利 Italy	30.3	巴　西 Brazil	180.4
巴　西 Brazil	28.8	意大利 Italy	154.5
天然气 Natural Gas（千万亿焦耳）(10million terajoules)		轮胎 Tires（万条）(10000units)	
世界总计 World	88663.0	世界总计 World	90461
俄罗斯①Russian Fed.①	23233.1	美　国 United Staes	25531
美　国 United States	20729.0	日　本 Japan	15140
加拿大 Canada	7505.6	泰　国 Thailand	13008
英　国 United Kingdom	4324.7	中　国 China	8806
荷　兰 Nether Lands	2841.6	法　国 France	6272
印度尼西亚①Indonesia①	2443.6	韩　国 Korea, Rep.	5774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stan	1702.7	德　国 Germany	4856
委内瑞拉①Verezuela①	1626.4	意大利①Italy①	4052①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1574.1	英　国 United Kingdom	3096
阿根廷 Argentina	1399.4	巴　西①Brazil①	3072①
新闻纸 Newsprint（万吨）(10000tons)		原木⑦①Roundwood⑦①（万立方米）(10000cum)	
世界总计①World①	34681.0	世界总计 World	341104
加拿大 Canada	901.6	美　国 United States	50341
美　国 United States	630.4	印　度 India	29916
日　本 Japan	314.0	巴　西 Brazil	28530
瑞　典 Sweden	6.0	加拿大 Canada	18620
德　国 Germany	170.9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8589
芬　兰 Finland	132.7	尼日利 Nigeria	11049
韩　国 Korea, Rep.	119.0	俄罗斯 Russian Fed.	10955
俄罗斯②Russian Fed.②	103.8	中　国 China	6767
挪　威③Norway③	100.7	瑞　典 Sweden	5992③

项　　目 Item	数　量 Quantity	项　　目 Item	数　量 Quantity
法　国②France②	84.4	芬　兰 Finland	5022
糖（万吨） Sugar（10000tons）		电视机①⑤（万台） TVSets（10000）	
世界总计 World	12680.0	世界总计 World	13071.5
印　度 India	1832.0	中　国 China	3496.2
巴　西 Brazil	1478.0	韩　国 Korea, Rep.	1872.2
美　国 United States	664.0	美　国②United States②	1388.1
中　国 China	640.0	马来西亚 Malaysia	946.1
泰　国 Thailand	632.0	日　本 Japan	902.2
澳大利亚 Australia	532.0	巴　西 Brazil	642.4
法　国 France	457.0	西班牙 Spain	539.2
古　巴 Cuba	453.0	德　国②Germany②	323.4
墨西哥 Mexico	438.0	新加坡⑧Singapore⑧	304.0
德　国 Germany	418.0	英　国⑨United Kingdom⑨	302.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931 页～933 页。

国外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月报》1997 年 10 月、《工业产品统计年鉴》199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季报》1997 年 3/4 季，《肥料年鉴》1996 年、《林产品年鉴）1992 年，美国汽车协会《世界汽车敷据表》1998 年。

Sources: United Nations《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October 1997, 《Industrial Statistics Yearbook》1995; FAO《Quarter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1997.3/4, 《Yearbook of Fertilizer》1996, 《Yearbook of Forest Products》1992; The United States《World Motor Vehicle DatMa》1998.

①1995 年数字。②1994 年数字。③1993 年数字。④中国为原煤，国外为商品煤。⑤包括彩色电视机和黑白电视机。美国为交货量。⑥包括商用车和乘用车。⑦指采伐所得的全部木材量，其中包括工业用圆木、薪炭材、从采伐中回收的木材。中国为木材产量，包括原木和薪材，同其他国家的原木产量不完全可比。⑧1989 年数。⑨1988 年数。

①Data refer to 1995.②Data refer to 1994.③Data refer to 1993.④The figures relate to all grades of anthracite and bituminous coal, lignite and brown coal, but exclude recovered slurries. Chinese data refers to the raw coal including lignite and waste.⑤Including color TV sets and black and white TV sets.⑥Including commercial vehicles and passenger cars.⑦All wood obtained from wood logging, including log for industrial use, fuel wood and wood recovered logging losses. But Chinese data refer to log and fuel wood.⑧Data refer to1989.⑨Data refer to 1988.

附表 39　　我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CHANGES IN THE ORDER OF PRECEDENCE OF OUTP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产品名称 Item	1949	1957	1965	1978	1980	1985	1990	1992	1994	1995	1996③
钢 Crude Steel	26	9	8	5	5	4	4	3	2	2	1
煤 Coal	9	b	5	3	3	2	1	1	1	1	1
原油 Crude Petroleum	27①	23	12	8	6	6	5	5	5	5	5
发电量 Electricity	25	13	9	7	6	5	4	4	2	2	2
水泥 Cement		8	8	4	4	1	1	1	1	1	1
化肥 Fertilizer		33	8	3	3	3	3	3	2	2	1
化学纤维 Chemical Fibre		26②		7	5	4	2	2	2	2	2
棉布 Woven Cotton Fabrics			3	1	1	1	1	1	1	1	1
糖 Sugar			8	8	10	6	6	3	4	4	4
电视机 Televioion				8	5	3	1	1	1	1	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933 页。

国外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月报》1996 年 9 月、《工业统计年鉴》1994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鉴》1995 年、《肥料年鉴》1995 年。

Sources: United Nations《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September 1996.《Industrial Statistics Yearbook》1994; FAO《Yearbook of Production》1995,《Yearbook of Fertilizer》1995.

①1950 年数字。②1960 年数字。③估计数。

①Data refer to 1950. ②Data refer to 1960. ③Estimates.

附表 40　　货币汇率（年末中间价）

EXCHANGE RATES (MID - POINT RATES)

一美元合该国货币数（Unless otherwise stated national currency per U.S.dollar）

国家和地区	货币名称 Country or Area Currencies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①
中　国	（人民币元）China (Renminbi Yuan)	3.20	5.22	8.32	8.30	8.29
美　国	（美元）United States (Dollar)	1.00	1.00	1.00	1.00	1.00
日　本	（日元）Japan (Yen)	200.50	134.40	102.83	116.00	119.35
德　国	（德国马克）Germany (Deutsche Mark)			1.43	1.56	1.79
英　国	（英镑）United Kingdom (Pound)	0.69	0.52	0.65	0.59	0.62
法　国	（法郎）France (Franc)	7.56	5.13	4.90	5.24	6.05
意大利	（里拉）Italy (Lire)	1678.50	1130.10	1584.70	1530.60	1759.50
加拿大	（加元）Canada (Dollar)	1.40	1.16	1.37	1.37	1.39
澳大利亚	（澳元）Australia (D011ar)	1.47	1.29	1.34	1.26	1.36

国家和地区	货币名称	Country or Area Currencies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①
俄罗斯	（卢布）	Russian Fed.	(Rouple)			4640.00	5560.00	5830.00
捷　克②	（克朗）	Czech, Rep.②	(Koruna)			26.60	27.33	33.80
波　兰	（兹罗提）	Poland	(Zloty)			2.47	2.88	3.47
匈牙利	（福林）	Hungary	(Forint)	47.35	61.45	139.47	164.93	195.44
罗马尼亚	（列伊）	Romania	(Lei)	15.73	34.71	2578.00	4035.00	7471.00
保加利亚②	（列弗）	Bulgaria②	(Leva)	1.00	2.80	70.70	487.35	1809.00
南斯拉夫	（新第纳尔）	Yugoslavia, FR	(New Dinar)		10.66	5.32	5.54	6.38
印　度	（卢比）	India	(Rupee)	12.17	18.07	35.18	35.93	36.36
印度尼西亚	（卢比）	Indonesia	(Rupiah)	1125.00	1901.00	2308.00	2383.00	3035.00
菲律宾	（比索）	Philippines	(Peso)	19.03	28.00	26.21	26.29	30.17
泰　国	（铢）	Thailand	(Baht)	26.65	25.29	25.19	25.61	34.33
马来西亚	（林吉特）	Malaysia	(Ringgit)	2.43	2.70	2.54	2.53	2.96
新加坡	（新加坡元）	Singapore	(Dollar)	2.11	1.74	1.41	1.40	1.53
巴基斯坦⑧	（卢比）	Pakistan③	(Rupee)	15.98	21.90	34.25	40.12	40.52
缅　甸	（缅元）	Myanmar	(Kyat)	7.84	6.08	5.78	5, 99	6.32
孟加拉国	（塔卡）	Bangladesh	(Taka)	31.00	35.79	40.75	42.45	44.55
土耳其②	（里拉）	Turkey②	(Lira)	477	2930	59650	107775	165810
蒙　古②	（图格里克）	Mongolia②	(Tugrik)	3.60	5.60	473.62	693.51	804.86
韩　国	（韩圆）	Korea, Rep.	(Won)	890.20	716.40	774.70	844.20	902.00
埃　及③	（埃镑）	Egypt③	(Pound)	0.70	2.00	3.39	3.39	3.39
尼日利亚	（奈拉）	Nigeria	(Naira)	1.00	9.00	21.89	21.89	21.89
墨西哥	（新比索）	Mexico	(New Peso)	0.37	2.95	7, 64	7.85	7.76
巴　西	（雷亚尔）	Brazil	(Reai)			0.97	1.04	1.09
阿根廷	（比索）	Argentina	(Peso)		0.56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940 页。

国外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月报》1997 年 12 月。

Source: United Nations《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December 1997。

①8 月份数。②由联合国项目的业务汇率推算的非商业汇率。③固定汇率。

①Data refer to August. ②Data refer to commericial rates derived from the operational rates on exchange for United Nations Programs. ③Fixed rate.

第七篇

2006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

第一章 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第一节 200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2005年，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政策措施，更加注重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加注重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国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所提高，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新突破。(1) 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的良好态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亿元，增长9.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5.2%，第二产业增长11.4%，第三产业增长9.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增幅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7%，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薄弱环节建设得到加强。经济效益继续提高，全国财政收入31628亿元，增长19.8%，增收5232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362亿元，增长22.6%。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1.8%。(2)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生产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继续发展。全年粮食总产量48401万吨，比上年增加1454万吨，优质专用小麦、优质稻谷种植面积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畜牧水产业和蔬菜、水果生产稳步发展。工业领域组织实施了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和装备国产化项目，一大批落后生产能力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善，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服务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煤、电、运输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面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进展顺利，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出现良性互动的局面。(3)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新进展。节能、节水、节材、节地以及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力度加大，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开始启动，建设节约型社会取得良好开端。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比上年下降8.7%，实际建设占用耕地比上年减少4.1%。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继续实施，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加大，城市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水平进一步提高。(4) 重点领域改革实现新突破，对外开放达到新水平。在农村、国

有企业、财税、金融等领域，出台了一些多年想改、难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全年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全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4001个，实际使用金额603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089亿美元。国内企业“走出去”取得积极进展。(5)社会发展呈现新局面，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加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分别增长9.6%和6.2%。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005年国民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十五”计划主要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各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这些都为做好2006年和“十一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节　2006年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总体要求

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从各方面情况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总体上是有利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仍将保持增长态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不会有大的减弱。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继续加快，区域合作加强，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国内来看，我国仍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的时期，市场需求潜力很大，内在增长动力较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供求总量关系进一步改善，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增强，这些都有利于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各方面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但同时，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发展不平衡、体制不完善等都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目标的难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依然存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日益显现；就业、社保、收入分配、教育，卫生等领域都存在着不少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任务很重。此外，世界经济发展也存在不少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切实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挑战的准备。

做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坚持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为“十一五”开好局、起好步。

贯彻落实好上述精神，关键是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为此，2006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要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避免出现大起大落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和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坚持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作为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发挥各地区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坚持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加大改革力度，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四是坚持把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认真解决群众关心的重点、热点和现实问题，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五是坚持把解决当前问题和长远问题结合起来，抓紧研究解决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性、长远性重大问题，为“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和更长远的发展打好基础。

第三节　2006年宏观调控主要政策措施

围绕全国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2006年要着重抓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重点是：(1) 保持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依法加强税收和非税收入征管，严格控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2) 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2006年中央财政赤字安排295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50亿元，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下降。(3) 缩减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2006年拟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00亿元，比上年减少200亿元，同时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资金比上年增加100亿元。(4) 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和国债投资结构。财政资金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确保重点支出需要。国债和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资金要优先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持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水利、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涉及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建设项目等，保证重点续建项目，适当开工建设事关“十一五”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

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促进金融机构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继续控制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贷款，增加对有效益、有市场的企业流动资金的贷款，加大对农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助学、就业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做好西部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的相关金融服务，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直接融资，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落实利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健全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提高中央银行对市场利率的引导能力。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改进和完善外汇管理，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强化金融监管，减少金融不良资产，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二) 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保持合理投资规模

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1)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统筹安排企业离退休人员、城市低保对象、残疾军人等各类优抚对象的相关待遇，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最低小时工资制。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推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 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商业设施，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鼓励企业开发生产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商品，严厉查处坑农害农行为。(3) 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积极培育消费热点，规范和发展住房、汽车交易市场，扩大文化、健身、旅游等服务性消费。(4) 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环境，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合理调整消费税，加快建设个人征信体系，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继续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价格和收费专项检查，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继续严格土地审批和信贷投放，加强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与土地、信贷、环保、安全等政策的协调配合，从严控制新上项目，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1) 坚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继续从紧控制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和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地，控制耕地资源紧缺、人地关系紧张地区的建设用地。(2) 加强城镇规划，严禁形象工程建设，规范城建打捆贷款，继续合理控制城市拆迁规模。进一步完善开发区管理政策，巩固开发区清理整顿成果。(3) 深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增加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控制高档商品房开发，加快建立健全廉租房供应体系。

(三)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工夫，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局。(1)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认真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继续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种子工程和植保工程，加强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中低产田改造，稳定粮食种

植面积。(2) 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全面取消农业税。继续在主产区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粮食市场价格。增加对农民的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建立和完善对种粮农民的支持保护制度。加强涉农收费和价格监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继续清理取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3) 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继续实施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和农业信息体系建设，推广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和良种良法等技术，推进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强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建设，抓好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落实好扶持家禽饲养业的各项措施。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积极发展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4) 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文农资金、国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总量要高于上年，各级政府也要努力增加投入。要通过直接补助资金、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工投劳。加强小型水利设施等农田基本建设，支持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和中部地区排涝泵站改造，开展土地整理；以水、气、路、电为重点，着力解决部分地区群众饮水安全问题，积极发展沼气、秸秆气化和小水电，实施“十一五”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加快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完善部分省份农网改造。(5) 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各级政府要严格履行将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继续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工作，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投入机制和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完成农村寄宿制学校改造任务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扩大新型农村卫生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标准。发展农村通信，加强农村乡镇文化站和广播电视、电影放映等工程建设。

（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全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抓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一中心环节，着力优化产业结构。(1) 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完善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政策体系，强化创新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公民知识产权意识，实行支持企业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促进科技资源开放与共享，建立健全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快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逐步形成一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并能提供系统集成服务的大型企业。对使用国产首台、首套技术装备给以政策扶持。(2) 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依托重点工程，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的重大装备国产化，带动关键基础产品和零部件发展。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电子

信息、生物、航空等领域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工程建设，推进高技术产业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转变。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社区、物业管理等新兴生活服务业，提高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发展水平。(3)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抓住当前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增强的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促进产能过剩行业控制总量、优化结构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区别情况，继续清理整顿在建和拟建项目，依法淘汰和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落后产能和企业；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产业集中度。(4)加强煤电油运供需衔接。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稳定煤炭生产和供应。加大对国内油气资源勘探的投入，深化油气资源开发，努力增加石油天然气供给，建立健全石油储备和应急体系，推进煤炭液化示范、煤层气开发利用工程。认真落实电力发展规划，优化发展火电，搞好水电、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建设，完善电网结构。加强煤运通道、港口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耗煤量大的企业与煤矿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完善电力需求侧管理，加强成品油资源调运与销售管理，加强铁路、公路、水路运输衔接，全面建立煤电油运应急协调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和反事故措施，做好关系群众生活的水、电、气、油、暖等供应保障工作。

(五)推动东中西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认真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继续加强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巩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支持建设特色资源加工基地，促进重点地带、重点城市和重点产业开发。加强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和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2)加强东北地区大型粮食基地建设，继续支持重点行业技术改造、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重组，抓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棚户区改造和采煤沉陷区治理，实施以松花江、辽河流域为重点的生态环境整治工程。抓紧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继续做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搞好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东北地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3)出台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措施，重点加强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展现代流通业。稳步推进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4)东部地区要率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着力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5)加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和支持。进一步完善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6)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推动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开展主体功能区划研究，根据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发展方向和配套政策，推动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六）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放在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规划和财税、价格等政策引导，加强宣传教育，确保取得明显成效。（1）大力推进节能降耗。组织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突出抓好1000家高耗能企业的节能工作。推行强制性产品能效标准，加强重点用能产品能效标识管理，扩大节能产品认证范围。加快培育专业化节能技术服务体系。修订《节约能源法》和节能技术政策大纲，出台节约石油管理办法。建立各地区和重点行业能耗目标考核体系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公报制度。推进政府机构带头节能。（2）研究建立节水标准体系，推动重点行业节水技术改造，加大节水设备和器具推广力度，加快中水回用设施建设，支持海水淡化和直接利用。（3）建立和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标准，着力盘活现有建设用地存量，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4）加强重点行业原材料消耗管理，鼓励开发生产高强度和耐腐蚀金属材料，促进木材节约代用，研究实施节约包装材料和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的政策措施。（5）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认真做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加快循环经济关键和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进共伴生矿和工业废物综合利用以及废旧资源回收利用，出台《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条例》。（6）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水土保持、京津风沙源治理和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等重点工程。加大"三河三湖"、南水北调沿线、三峡库区、松花江、黄河中上游、长江上游等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城镇水源地保护，做好重点城市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积极预防和治理农村面源污染。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强化环境和生态保护执法，高度重视对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

（七）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努力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1）促进进出口平稳发展，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完善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提升传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支持农产品和服务产品出口，鼓励扩大高技术和机电产品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引导加工贸易企业逐步从代加工向代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鼓励增加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国内短缺能源资源的进口。加强对大宗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协调。（2）健全贸易摩擦协调应对机制，加强对外经贸交涉与谈判，发挥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行业自律和协调功能，减少和妥善应对贸易摩擦。建立健全国家经济安全预警系统和产业损害预警系统。继续推动区域和多双边经济合作。（3）继续积极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强对外资投向的产业和区域引导，吸引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附加值高的加工制造环节、服务外包业务和建立研发机构，继续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完善规范企业并购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4）完善境外投资的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协调和监管机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

通过多种方式对外投资。

（八）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坚持把深化改革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气力推进改革。(1) 全面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高度重视研究解决全面取消农业税后面临的新问题。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推进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继续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2) 积极推进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立健全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等监管体制，完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深化电信、电力、民航、邮政、烟草管理体制改革，推进铁路、盐业等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进一步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在创业、融资、人才培训等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3) 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金融企业改革，搞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合理调整产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提高经营水平和竞争力。研究制定政策性银行体制改革和职能调整方案。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强化资本充足率约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业投资基金试点。(4)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加快建立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科技创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财税制度。研究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和物业税改革试点，调整完善资源税。(5) 继续推进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核准制和备案制，尽快制定完善规范政府投资管理的相关制度。健全投资监管和调控体系。(6)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石油定价机制及其配套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和分时电价制度，逐步实施新的输配电价管理办法；合理调整城市供水和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建立规范的基准地价制度；健全矿产资源消耗补偿机制。(7)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市场中介组织关系，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许可。依法界定和规范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责，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问责制。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九）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大力发展社会事业，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1) 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利用多种有效形式安置富余人员，支持发展社区就业和灵活就业，做好新成长劳动力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扶持政策延长三年，并根据各地实际将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到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加强对军工、森工等行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支持。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2) 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扩大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

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加快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建设。做好城市低保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解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3) 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规则和监管体制，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取缔各种非法收入。加快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增加扶贫投入，因地制宜地推进扶贫开发。做好灾区群众生活救济、生产恢复和灾后重建工作。帮助城镇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取暖、看病等特殊困难。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4)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继续把发展农村教育作为重点。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各级政府都要增加职业教育投入，加强职业教育设施建设，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加强重点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切实把高等教育发展转到以提高质量为主的轨道上来。建立有效的教育资助体系。坚决纠正教育乱收费。(5) 认真研究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快完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全面完成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整合现有卫生资源，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继续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整治。推动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大力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秩序，解决药品价格虚高和医疗服务中的某些混乱现象。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6)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市场管理。(7) 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的势头。落实责任制，严格执法，加强矿山、交通运输、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治理，加大事故责任追究和惩罚力度，坚决关闭取缔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企业。按照企业负责、政府支持的原则，多方筹集资金，进一步加强煤矿技术改造和瓦斯治理。(8) 高度重视容易引发群体事件的重大问题，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纠纷调处机制，妥善解决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库区移民、排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快完善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保持社会稳定。

第二章 财 政

第一节 2005年财政运行情况

全国财政收支情况良好。全国财政收入再上新台阶，突破三万亿元大关，达到31628亿元（不含债务收入，下同），完成预算的108.1%，比预算超收2373亿元，比上年增加5232亿元，增长19.8%。全国财政支出33708亿元，完成预算的104.5%，比预算超支1453亿元，比上年增加5221亿元，增长18.3%。全国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2080亿元。

中央财政总收入17250亿元，完成预算的106.4%，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加2581亿元（已扣除新增出口退税指标584亿元），增长17.6%。中央财政总支出20249亿元，完成预算的105.4%，比上年增加2389亿元，增长13.4%。中央财政赤字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6%。地方财政总收入26566亿元（含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完成预算的107.2%，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加4158亿元，增长18.6%。地方财政总支出25646亿元，完成预算的103.5%，比上年增加4340亿元，增长20.4%。地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或结转919亿元。

（一）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

2005年是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的第一年。中央财政赤字预算3000亿元，比上年减少192亿元；国债项目资金由上年的1100亿元调减为800亿元，同时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100亿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和突出重点、压缩一般的原则，进一步调整了国债资金和预算内投资的使用结构和投向，重点支持“三农”、科教文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支持体制改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一是不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28个省份已免征农业税，其余三个省也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中央财政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662亿元，8亿农民得到实惠，基本实现了“减轻、规范、稳定”的改革预期目标。二是认真落实

“三补贴”等政策。全国30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132亿元，6.42亿农民直接受惠。安排良种补贴38.7亿元，比上年增长35.8%。中央财政兑付农业机械购置补贴3亿元，是上年的4倍多。三是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农村和农民的长远发展。中央财政补助资金4亿元，支持培训农村劳动力280万人，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三）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一是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认真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落实关于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各项财税优惠政策。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完成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支持做好企业军转干部和复退军人解困工作。支持东北地区开展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工作。二是继续加大教育事业投入。在进一步支持高等教育，促进科普事业发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重点支持农村义务教育。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70亿元，组织实施“两免一补”政策，惠及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3400万名。三是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增加公共卫生支出，支持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助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疾病信息网络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建设。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禽流感防控基金，实施旨在缓解禽流感影响的阶段性财税优惠政策。

（四）完善税制和相关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一是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中央、地方负担比例由75:25调整为92.5:7.5。新方案的实施，对解决地区间退税负担不均衡、减轻地方财政负担，缓解出口企业资金紧张状况，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促进外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明确了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研究提出了豁免东北地区各类企业1997年前历史欠税的实施方案。三是适时完善了证券交易所等涉及资本市场的有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政策，出台了股权分置改革暂免征收印花税、所得税以及对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人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四是合理调整出口退税、关税等政策，鼓励国内急需的农业生产资料、关键零部件和重要原材料进口，限制高耗能、高污染、高物耗以及资源性产品出口。此外，还出台了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的税收政策。

（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是中央财政安排150亿元资金，实施“三奖一补”政策（即对财政困难县政府增加本级税收收入和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对产粮食大县给予奖励；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有效调动了各地财力向基层倾斜、创新财政管理方式、发展县域经济、精简县乡机构和人员、控制和化解政府债务的积极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初显成效。二是继续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增强财力薄弱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200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达到1121亿元。三是大幅度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2005年下达民族转移支付资金159亿元，比上年增加80多亿元，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六）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财政管理

一是部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实行了中央部门实物费用定额改革试点，实施项目预算滚动管理，积极探索建立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二是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三是国库集中支付在中央各部门全面推行，基本确立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财政财务管理中的基础地位。四是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已达2500亿元。五是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稳步推进，已开始了模拟试点。

第二节　2006年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改革

2006年，财政工作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狠抓增收节支，优化支出结构，切实保障重点支出，着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财政收支计划主要安排是：中央财政总收入19272亿元，比2005年增加2022亿元，增长11.7%。中央财政总支出22222亿元，比2005年增加1973亿元，增长9.7%。汇总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安排，全国财政收入35423亿元，增加3795亿元，增长12%；全国财政支出38373亿元，增加4665亿元，增长13.8%。财政赤字2950亿元，比2005年预算减少5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预计进一步下降到1.5%。

2006年财政政策重点：

（一）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调整和优化政府投资结构

2006年安排国债资金600亿元，比上年减少200亿元，不再代地方政府发行国债，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100亿元。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1154亿元，比上年减少100亿元。继续调整优化国债项目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使用结构，优先支持农村建设、科教文卫、资源节约、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西部大开发，保证重点项目建设。发挥政府投资对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支持税制改革等体制创新和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二）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实现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教师工资保障机制。2006年首先在西部地区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机制。二是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区），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标准分别由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三是完

善并加强“三补贴”政策，安排13个粮食主产省（区）粮食直补资金125亿元，达到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规模的50%；扩大农机具购置的资金补贴范围；积极研究探索建立对农民种粮收益综合补贴制度。四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农村“六小”工程以及优质粮食生产工程、种子工程等项目建设。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村扶贫开发的支持力度。

（三）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是继续支持就业再就业工作。进一步落实相关财税扶持政策，并妥善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关历史遗留问题。二是继续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细化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深入研究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做好优抚安置和军转干部解困工作。三是支持解决突发性事件。大力支持安全生产和抗灾救灾，全力支持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确保防控经费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家禽业发展。

（四）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增加财政科技投入。中央财政科技支出安排将大幅度增加，以引导全社会重视科技创新和增加科技投入。二是完善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探索有效管理科研课题经费的方式，强化科技经费监管，研究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绩效评价体系。三是完善促进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研究制定扶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进出口税收政策，鼓励资源型、环保型商品和先进技术设备、零部件进口，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物耗和资源型产品出口。积极运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五）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继续加大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地方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的调控作用。2006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1359亿元；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200亿元。二是巩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成果，加大工作力度。继续完善“三奖一补”政策，增加奖补资金60亿元。研究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合理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收入和责权关系。三是认真落实区域发展总体规划中明确的财税政策。重点落实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财税优惠政策；积极研究制定并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财政政策；引导和支持东部率先发展。四是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增加扶贫开发投入。

（六）深化财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一是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结束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征收历史；积极研究提出烟叶特产税替代方案；实施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二是积极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集中支付范围进一步向基层预算单位扩大；研究建立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制度。三是进一步完善税制。巩固和发展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成果；尽快出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将企业新增机器设备所含税款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方案；出台实施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方案；积极推进部分地区实施物业税改革试点；制定并实施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资源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等改革；发挥关税和出口退税政策作用，支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认真组织煤炭行业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择机完善消费税，对部分资源性产品和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四是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适时推行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三章　金　融

第一节　2005年金融形势

（一）货币信贷运行情况

1. 广义货币供应量M_2增长速度加快。12月末，广义货币M_2余额29.9万亿元，增长17.6%，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_1余额10.7万亿元，增长11.8%，比上年回落1.8个百分点。M_0余额2.4万亿元，增长11.9%，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净投放现金2563亿元，比上年多投放841亿元。

2. 金融机构贷款平稳增长，存款大幅多增。全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4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其中，企业存款增加1.1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1752亿元。到12月末，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大关，达14.1万亿元。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2.4万亿元，比上年多增871亿元，低于指导性计划2.5万亿元的水平。其中，短期贷款增加6509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1972亿元。新增中长期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例为50.9%，比上年回落10.8个百分点，贷款期限结构有所改善。

3. 外汇占款继续增加，基础货币增幅回落。全年外汇占款增加18619亿元，比上年多增757亿元。12月末，基础货币余额为64343亿元，增长9.3%，比上年回落3.3个百分点。

4. 金融机构流动性充裕，货币市场利率有所回落。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平均为4.17%，比上月回升1.1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回落1.07个百分点。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呈现先扬后降态势。3月17日下调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前，1月份和2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02%和2.31%；3月17日后，货币市场利率逐月回落，到年末有所回升，12月末，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L? 2%，比上年末回落0.35个百分点。

5. 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得到发挥。2005年3月17日起，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由1.62%下调为0.99%，同时开放同业存款利率。加强本外币利率政策协调，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五次小幅调高境内美元、港币小额存款利率，减轻结汇压力。

6. 外汇存款多增，外汇存贷比进一步上升。全年新增外汇存款68亿美元，比上年多增29亿美元。新增外汇贷款171亿美元，比上年多增4亿美元。年末外汇存贷比为93.1%，比上年末提高4.7个百分点。

7. 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截至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增长34.3%，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比上年多增22亿美元。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出台后至12月末，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增强，汇率水平总体上保持稳定。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8.0702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2.56%。

8.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继续实现"双降"。2005年末，主要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万亿元，比年初减少4985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8.9%，比年初下降4.3个百分点。

（二）证券市场发展情况

2005年，境内股票债券融资达到13215.4亿元。其中，发行国债5042亿元、金融债券7088亿元、企业债券654亿元、资产支持证券71.9亿元、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21.3亿元；境内股票市场共筹资338.1亿元，其中A股首发筹资56.7亿元，增发筹资278.8亿元，配股筹资2.6亿元，未发行可转债和B股。另外，H股筹资189.2亿美元。

上证综合指数年初开盘1260.78点，年底收盘1161.06点，下跌7.91%；深圳成份指数年初开盘3051.23点，年底收盘2863.61点，下跌6.15%。全年沪深股市股票、基金日均成交额为134亿元，比上年下降27.6%，投资者开户数达7336万户，比上年底增加124.6万户。截至2005年12月31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A、B股）共1381家，市价总值32430亿元，流通市值10631亿元。

（三）保险业发展情况

保险业继续稳定发展，全年实现保费收入4927.3亿元，增长14%。截至2005年底，保险总资产15225.9亿元，比年初增加3240.1亿元。市场主体稳步增加，新增22家保险公司，总数已达93家。保险中介发展较快，通过中介实现保费收入3596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73%。保障经济能力不断提高，保险赔付支出1129.7亿元，增长11.9%。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总量进一步增加，资金运用余额14135.8亿元，比年初增长31.2%。

货币信贷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贷款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二是外汇持续大幅流入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是对当前货币总量调控的主要挑战之一；三是市场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压力增大；四是消费信贷比重下降较大。

证券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股市总体上处于弱势运行状况，市场信心有待进一步恢复；二是已完成或者进入股权分置改革程序的上市公司市值还不到总市值的一半，尚有较大部分上市公司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三是上市公司质量仍有待提高；四是市场

层次和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五是证券公司风险不容忽视。

保险业在快速发展中仍存在产品结构不合理、服务质量不高、风险防范任务重、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

第二节　2006 年主要政策措施

2006 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着力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进一步改进外汇管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2006 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和狭义货币供应量 M_1 分别增长 16%和 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 2.5 万亿元。

（一）货币信贷政策和银行业监管措施

1. 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监测研究，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适时适度调控基础货币，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继续采取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债券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适时收回过多流动性；加强再贷款和再贴现管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利率形成机制，提高利率政策的调控效果。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货币信贷平稳合理增长。

2. 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稳定的需要出发，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实行资金流出入平衡管理。加强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防范外汇市场过大波动。

3. 加强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及银行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合理配置信贷资源。适时发布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信息以及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等有关情况，引导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银行监管部门要参照产业政策及时制定颁布行业信贷风险指引。各金融机构也应加强对市场和行业信息的分析预测，合理配置信贷资金，规避信贷风险。

4. 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优化信贷结构。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合理把握贷款进度，优化信贷结构，着力加大对农业、中小企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做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相关金融服务工作。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服务。支持合理住房消费，指导商业银行改进住房金融服务和风险管理，促进金融机构拓展消费信贷业务。

5. 加强银行业监管，实现银行业体系稳定和安全运行。进一步落实审慎监管政策措施，保持有效监管能力建设的良好势头。认真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准备工作，完善资本审慎监管制度，全面推行五级分类制度。有效运用各种监管手段，加强和改进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科学监管。完善监管法规制度，加强和改进市场准入监管，引导民营资本等国内外资金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审慎推进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高度重视防范和处置风险，切实维护银行体系稳定。

6. 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在规范发展已推出金融产品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推进股权融资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创业投资，积极稳妥地进行产业投资基金试点。

7. 深化金融企业改革，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展。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在巩固成效的基础上继续稳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强对改革效果的跟踪监测。按“一行一策”原则，继续审慎选择战略投资者；规范公司治理，改善经营管理，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做好充分准备，把握上市时机和节奏。制定和实施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统筹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推动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

8.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研究建立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的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整体金融风险和区域金融风险的分析评估。密切关注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发展状况，防范跨行业、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风险补偿机制。

9.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法律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在继续完善企业和个人信贷信息系统的同时，支持各部门和各地方合理建设有序开放的信用信息互联平台，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信用信息共享，并大力规范和培育市场运作的第三方征信机构。建立严格的失信惩戒机制。

（二）规范和积极发展资本市场

1. 以完善市场功能为重点，继续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积极构建多层次市场体系，努力促进市场创新，不断提高市场效率，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着力推进股权分置改革，落实配套政策，规范改革秩序，实现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的转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进一步加强市场法制建设；大力推进市场创新，拓展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深化发行制度改革，从增量上促进上市公司结构调整。推动并购市场创新，改善存量上市公司结构。推进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市场结构。积极推动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完善监管机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全面落实《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制度和机制。

2. 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期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进一步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进一步强化和规范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维护企业债券参与各

方的权益；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切实控制兑付风险；探索市场化发行的新方式，增加发行品种，以适应企业债券市场的需要；加快修订《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制定和完善企业债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配套规章制度。扩大投资者范围，优化投资者构成。强化期货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发展，防范市场风险，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加快商品期货新品种的开发，完善期货交易机制，适时推出商品期货期权交易。积极研究推出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金融期货交易品种。

（三）进一步规范发展保险市场

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创新体制，促进创新发展，培育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政策体系。二是继续深化国有保险公司改革，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加强保险公司董事会建设，注重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建立健全高管人员业绩评价标准和考核机制。三是大力加强薄弱环节建设，促进保险业协调发展。注重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产品，发展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大力发展责任保险，深入推进农业保险。强化保险资产的集中化和专业化管理，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四是坚持把防范风险作为保险业的生命线，完善监管手段，转变监管方式，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重点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提高保险公司内控建设水平。

第四章　投　资

第一节　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

2005年，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加强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指导，严格市场准入标准，投资调控成效进一步显现。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势头继续得到抑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8604亿元，增长25.7%，增幅下降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5096亿元，增长27.2%，增幅下降1.3个百分点。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呈现以下特点：

（一）农村和农业投资增速回升，第二产业投资稳定增长，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回落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3508亿元，增长18%，增幅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个人投资增长16.9%，提高10.8个百分点。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7.5%，增幅比上年提高7.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8.4%，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38.6%，提高2.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0%，下降1.6个百分点。

（二）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继续快于东部地区，所占比重稳步提高

在城镇投资中，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4%，增幅比上年下降2.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增长32.7%，增幅下降0.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增长30.6%，增幅提高1.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投资占各地区投资的比重为54%，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地区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2.8%和21.3%，分别比上年提高0.9和0.5个百分点。

（三）钢铁、水泥等热点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部分薄弱环节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在城镇投资中，钢铁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27.5%；水泥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增长26.6%，增幅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增长65.6%，提高4.8个百分点；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增长29.7%，提高11.8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5.7%，提高29.2个百分点；卫生投资增长28.9%，提高5.1个百分点。制造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投资增长62.9%，比上年提高24.2个百

分点；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1.6%和68.9%，分别提高28.7和34.2个百分点。

（四）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逐步回落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呈逐月回落态势，全年完成15759亿元，增长19.8%，增幅比上年下降8.3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14%，增幅比上年下降13.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增长32.5%，下降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增长33.4%，提高12.8个百分点。

（五）新开工项目数量和计划总投资规模继续攀升

全国建设与改造新开工项目186560个，比上年增加34197个，多增30267个。山东、河北、辽宁、河南、江苏5省全年新开工项目均超过1万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4830亿元，增长32.4%，增幅比上年提高8个百分点，已经处于除2003年（54.7%）以外近6年来的最高水平。天津、上海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1倍以上。

（六）资金来源比较充足

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80934亿元，增长28.2%。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24%，增幅比上年提高11.1个百分点；国内贷款增长18.2%，提高4.4个百分点；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增长29.4%，下降3.7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8%，下降5.7个百分点。在城镇投资中，私营企业投资增长61%，高于国有企业投资增速44.4个百分点；私营企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2.4%，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据人民银行统计，全年银行中长期贷款余额增加11972亿元，比上年少增2012亿元。

（七）投资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全面实施，核准和备案程序进一步完善。投资项目咨询评估引入竞争机制进展顺利。政府投资管理得到加强，先后制定出台《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公示试点管理办法》。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积极推进。

总体上看，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但当前投资增幅仍然偏高、投资规模依然偏大、新开工项目偏多，部分领域盲目投资和无序建设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投资冲动依然较强，投资反弹的压力较大，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节　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政策与工作重点

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工作要按照树立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改进和规范政府投资管理。继续深化投资

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整体入轨。重点工作是：

(一) 继续加强和改善投资调控，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

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过快增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进一步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建设。加强城乡建设规划，严格控制“形象工程”建设。继续清理整顿开发区，做好建设领域工程款清欠工作。切实加强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搞好与信贷、土地、环保、安全等政策的协同配合，逐步建立投资调控的长效机制。

(二) 调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改进和规范政府投资管理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在落实“五个统筹”、加强薄弱环节和促进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将政府投资进一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社会事业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解决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问题等方面倾斜。继续改进和规范各类政府投资管理，推进建立政府投资稳定增长机制。继续加强对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

(三) 加强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设

2006年财政性建设资金要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确保新农村建设取得实效。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以及科技，教育等方面建设。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振兴步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继续推进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治淮骨干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强重大项目规划，搞好重大项目储备。

(四) 加大住房供应结构调整，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进一步贯彻落实稳定房价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制定完善房地产开发中长期规划，合理确定房地产布局和结构，增加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供应，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切实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研究解决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中存在的政策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多渠道筹措廉租房资金，逐步扩大廉租房的受益面。继续控制城镇拆迁规模。

(五) 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推动投资体制改革整体入轨

既要全面推进，更要抓住重点，解决突出问题。改进完善投资项目核准程序和要求，规范核准内容和方式，并适时调整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加强对各地实施投资项目备案制的指导，全面实施规范、高效的备案制度。抓紧出台政府投资体制改革配套文件，逐步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制度。扩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工作，开展政府投资项目公示试点。

第五章　消　费

第一节　2005年居民消费发展的基本情况

2005年，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较快增长，市场销售稳中趋旺，消费热点继续发展。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城乡销售增速差距有所缩小

2005年，除一季度受春节因素影响外，其余各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在12%—13%之间，增长较为平稳。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7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分城乡看，城市和农村（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3.6%和11.5%，城乡增幅差距比上年缩小1.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额增长12.6%，餐饮业零售额增长17.7%。

（二）消费热点继续发展，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

房地产销售继续较快增长，商品房销售额达到18080亿元。电信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年末全国电话用户达7.44亿户，比上年末增加9728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57部/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750万户，比上年末增加1263万户。汽车销售较快增长，全年销售轿车278.7万辆，增长24.3%；年末私人汽车保有量2365万辆，增长22%。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全年国内出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增长10%；国内旅游总收入5286亿元，增长12.2%。住房、汽车、电信、旅游等消费热点的发展，对消费扩大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

（三）居民消费支出继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城乡居民各类消费进一步增长，食品消费的比重逐步降低，城镇居民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以及农村居民交通通讯、家用设备和医疗保健等消费快速增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943元，增长10.6%。其中，食品支出增长7.6%，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6.7%，比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衣着支出增长16.6%，医疗保健支出增长13.8%，交通通信支出增长18.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2555元，增长16.9%，比上年加快4.5个百分点。其中，食品消费支出1162元，增长12.6%，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5%，降低1.7个百分点；衣着支出增长23.6%，家庭设备用品和

服务支出增长 24.9%，交通和通讯支出增长 27.2%。

在市场销售和居民消费继续较快增长的同时，消费领域一些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主要有：(1) 农村消费增长依然滞后。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 32%，城乡消费差距很大。农村市场销售增速仍落后于城市，农村销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32.9%，比上年下降 1.2 个百分点。(2) 农民教育、医疗消费负担沉重。农民文教娱乐支出增长 19.3%，比上年加快 14.2 个百分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 28.7%，加快 15.9 个百分点。农民教育和医疗费用增长加快，说明农民在这些方面的消费负担加重，从而影响其他消费的扩大。(3)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继续降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即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75.7%，比上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呈继续降低的态势。(4) 消费率进一步降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最终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3.3%，比上年下降 4.5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进一步降低，消费率为 50.7%，比上年下降 2.3 个百分点，创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二节 2006 年扩大居民消费的工作重点

扩大居民消费是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2006 年，要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突出解决居民在上学、就医、居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促进居民扩大消费。

（一）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增加收入是扩大消费的根本措施。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稳定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税收、价格、补贴等政策，坚决查处以各种名目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加强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技能培训、信息引导和服务，确保农民务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要以扩大就业和加强工资管理为重点，促进城镇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认真落实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各项政策，重点解决体制转轨遗留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加强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研究推行小时最低工资制度。妥善处理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拖欠职工工资、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费等问题。

（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消除居民扩大即期消费后顾之忧的治本之策。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城市低保工作，逐步提高保障标准。适应就业形式的发展变化，不断扩大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快提高统筹层次。解决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资金来源问题。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要努力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合理确定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妥善安置失

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

（三）减轻居民教育、医疗负担

加大财政对教育、卫生的投入，减轻居民教育和医疗支出负担，是改善居民支出预期的重要措施。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扩大免收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的范围。认真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合理确定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完善国家和社会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制度。稳步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理确定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遏制乱用药、乱检查、乱收费，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遏制居民医疗支出负担过快膨胀。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扩大试点范围，提高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加强城乡医疗救助体系建设。

（四）稳步发展热点消费

培育和扩大住房、汽车、通信、旅游等消费，是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方面。(1) 切实落实稳定住房价格的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落实住房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合理确定职工住房补助标准。(2) 制定鼓励生产、购买和使用经济型轿车的政策，取消对小排量汽车使用的限制，规范汽车维修服务业，加强停车设施的规划和建设。(3) 规范电信业竞争和服务，完善电信服务条款，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提高电信服务水平。(4) 积极发展文化、健身、旅游等消费，加强对企事业单位执行劳动法规定的职工作息、休假和工薪制度的监督检查。进一步落实年休假制度，使职工有更多时间休息和出游，促进旅游业和旅游消费健康发展。

（五）改善消费环境

努力改善城乡消费环境，是引导和促进居民消费的一项迫切任务。(1) 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扩大农村广播电视覆盖面，为农民扩大消费创造条件。(2) 积极发展城乡商业设施。鼓励发展超市、连锁经营等多种业态，加快建设租赁市场和二手商品市场。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支持流通企业向小城镇延伸经营网络。(3) 大力整顿消费品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价格欺诈、非法广告等各种不法行为，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整治工作。(4)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广泛深入地开展消费者权益宣传教育，积极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中介机构，加大消费纠纷处理力度。(5) 加强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发展消费信贷，增加消费信贷品种。

第六章 价 格

第一节 2005年的价格走势

2005年价格运行平稳，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1.8%，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2.9%，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升8.3%。

价格运行有以下特点：一是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十五”期间是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总水平波动最小的时期，2005年又是“十五”期间价格运行态势最好的年份。全年除2、3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外，其余各月同比涨幅在1%—2%之间。二是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全年合计，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粮食全国综合平均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70元，比上年下降0.3%。居民消费价格中的粮食价格各月环比波动幅度均在0.3%以内，全年累计上涨1.4%，涨幅比上年降低25个百分点。三是居住、服务类价格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八大类构成中，食品类价格变动仍是拉动价格总水平上升的主要因素，但其影响程度明显减弱。全年食品类价格上涨2.9%，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个百分点，影响程度较上年减少2.3个百分点；居住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分别上涨5.4%和2.2%，二者合计推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个百分点，影响比上年加大约0.2个百分点。四是生产资料价格涨势趋缓，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传导有限。2005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大低于上年，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分别比上年减缓3.1、1.2和10.7个百分点。受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升，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出厂价格分别较上年上涨17.3%、17.3%和29.4%；电解铜、电解铝价格呈先升、后降、再升的N型走势，全年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吨35407元和16828元，比上年分别上涨26.4%和3.7%；钢材价格先涨后跌，平均价格水平略低于上年，线材、螺纹钢、中厚板和冷轧薄板等4种主要钢材全年平均价格为每吨4253元，比上年下跌2.7%。从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关系看，受市场竞争格局制约，以及上游产品价格涨幅回落，下游产品价格上涨有限。

第二节 2005年的价格工作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围绕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中心任务，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和改进价格调控监管

一是加强价格监测分析，把握好价格调控的政策取向。进一步健全价格监测体系，完善监测预警工作制度。认真做好对重点商品的价格监测工作。加强对国际市场及进出口商品价格监测，按月、按季分析价格形势，准确把握价格走向。二是继续对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抑制化肥价格过快上涨。及时公布早、中、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适时启动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有效防止了市场粮价下跌。对尿素出口征收季节性关税，暂免征收尿素产品增值税，对化肥生产用无烟块煤实行最高限价，限制中小型氮肥生产企业的尿素出厂价格。三是积极应对国际市场高油价影响，合理调控成品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动，先后6次有升有降地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恢复了向民航国内航线旅客收取燃油附加的政策，各地适时调整了出租车、城市公交、公路客运价格。

（二）继续深化价格改革

一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取得新进展。水价改革取得重大进展。5月份以来，已有10多个省份调整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或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有20多个省份的100多个城市调整了城市供水价格或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电价改革稳步推进。上网、输配和销售电价管理办法出台实施，东北地区两部制上网电价改革进展顺利，华东和广东地区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改革开始起步。全国基本实行了峰谷分时电价，部分省市还试行了尖峰电价。完善石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的思路已基本形成。推动以完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调节利益分配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推进航空煤油出厂价格市场化改革。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天然气价格，建立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二是积极稳妥疏导价格矛盾。实行煤电价格联动，将全国销售电价每千瓦时平均提高2.52分钱。出台煤热价格联动指导意见，指导各地适时适度调整热力价格。适当调整国铁货运价格和内贸港口收费标准。各地还相机出台了管道燃气、医疗、教育、旅游景点等调价措施。

（三）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价格热点、难点问题

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10月初，国家降低了22种抗生素类药品价格，大部分省份随后出台了补充剂型规格的降价方案，平均降价幅度达40%，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约40亿元。重新修订了政府定价药品目录，将实行政府定价药品的品种从1500种增加到2400种，增强了政府监管药品价格的能力。制定了《药品差比价规则》，从制度上抑

制了企业变换剂型、规格、包装等变相涨价的行为。规范教育收费行为，全面推行并完善“一费制”收费办法，继续稳定高等学校收费标准，出台《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治理涉农乱收费，对部分省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进行了重点抽查。治理向非公企业收费，对初创小企业减免登记注册费。改进电信资费管理，将国内长途电信业务等资费由政府定价改为按上限管理，对固定电话月租费由单一价格改为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多种资费套餐。规范城镇廉租住房租金和基准地价管理，完善房地产价格统计分析制度，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权益。建立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协调机制，遏制门票价格过快上涨。

（四）加大价格行政执法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一是组织实施涉农、教育、医药、煤炭、电力等价格收费专项检查，开展查处价格欺诈行为专项行动，全年全国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10万件，实施经济制裁24.9亿元，其中退还用户10.7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3亿元，罚款1.2亿元，有力地整顿和规范了市场价格秩序。二是积极推动价格监督进社区，实行社区价格收费公示，及时处理和答复价格举报、价格咨询，维护群众价格权益，促进社区稳定和谐。三是大力推进价格诚信建设，开展“价格诚信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抽查物业管理明码标价工作，发布《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码标价规定》、《广告服务明码标价规定》，促进行业规范标价、诚信经营。四是切实做好价格举报工作，认真贯彻《信访条例》，妥善化解价格矛盾和纠纷。五是继续完善价格法制建设，扩大价格行政执法责任制试点，发布《价格监督检查案卷评查规定》、《价格监督检查文书评分标准》，修改完善《价格监督检查案卷管理规定》。

第三节 2006年价格工作要点

2006年，价格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任务，积极稳妥推进价格改革，适时适度疏导价格矛盾，大力整顿规范价格秩序，不断提高调控监管水平，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切实做好稳定粮食化肥价格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

努力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善粮食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研究建立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粮食价格综合补贴制度。稳定和完善现行化肥市场价格调控政策，促进化肥生产流通，有效控制化肥出口，保证市场供应，提高化肥价格市场化程度，充分发挥化肥淡季商业储备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化肥市场价格的监管。研究适时放开化肥价格、对农民实行化肥等农资补贴的改革方案。加大清理整顿涉及农民负担的价格和收费力度，改进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

一是完善石油价格机制。认真落实完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成品油价格关系，合理安排国内成品油价格。二是深化电价改革。实施新的输配电价管理办法，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配合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区域电力市场，做好推进竞价上网的前期工作。三是推进水价改革。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并适当提高征收标准；合理调整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农业用水价格，完善农业水费计收办法；加大污水处理收费制度的实施力度；加快推行阶梯式水价、超计划超定额用水加价等科学合理的水价制度。四是改进天然气价格管理。继续稳妥推进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改进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五是促进煤炭价格市场化。取消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措施，在保持电煤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由煤、电双方自主确定交易价格。加强电煤价格监测工作，防范电煤价格异常波动。六是推动土地价格改革。推动建立规范的基准地价确定公布制度和协议出让最低价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制定并公布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逐步实现征地补偿同地同价。

（三）继续下大力气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问题

一是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配合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严格限定学校的服务收费；对高等教育培养成本进行全面审核，降低过高的学费标准；清理整顿改制学校收费。加强对中小学教材价格的监管，研究控制豪华版教材使用的价格政策。二是努力解决群众“看病贵、药价高”问题。完善药品的政府定价办法及相关配套措施，对部分政府管理的药品进行出厂价核定试点。继续分批降低政府管理的药品价格，对市场调节价药品和医疗器械价格依法进行必要的干预。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制止医疗服务中存在的大处方、乱检查、乱收费的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三是强化房地产价格管理。改善征地、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等土地价格管理工作；规范住房销售、房地产中介与物业服务收费行为；规范经济适用房价格和廉租住房租金；探索开展住房成本调查工作的有效途径，努力稳定住房价格。

（四）有效开展价格监督检查，积极营造良好价格环境

一是分层次组织实施价格收费检查，第一层次为涉农价格收费专项检查和涉企收费专项检查试点；第二层次为医药价格、教育收费、电力价格、人力资源管理收费重点检查；第三层次为分类指导地方自主开展电信、海关、铁路、殡葬、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等价格检查。二是继续深入开展查处价格欺诈专项行动，重点规范商业促销、通信行业中存在的价格欺诈行为；加强市场价格巡查，密切关注粮食、煤电油运、房地产等商品的供求情况和价格走势，关注禽流感等突发事件对价格收费的影响，防范价格异常波动。三是大力推进“价格服务进万家”，从2006年起，用三到五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分步骤推进以价格服务进农户、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进景区等为主要内容的“价格服务进万家”系列活动。四是深入开展价格诚信建设，积极推进明码实价，组织“价格诚信单位”和“教育收费公示示范学校”等创建活动，建立价格诚

信信息记录公布制度。五是进一步做好价格举报工作，研究修订《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与《信访条例》衔接。

（五）切实推进价格依法行政

一是推动价格立法。积极参与《行政收费法》和《反垄断法》的起草和实施工作。开展《价格法》修改的前期工作。制定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决定》的意见。研究制定《价格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启动《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管理条例》的研究起草工作。出台实施公用事业价格管理办法和药品政府定价办法。研究制定管道运输价格和道路通行费管理办法等规章。做好地方定价目录的修订工作。二是进一步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行为，规范价格决策听证行为。三是大力推进成本监审，严格履行成本监审程序。加强对定调价成本监审实施情况的监督。加快制定具体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四是加强法制基础工作。加强对系统法制建设的指导；开展价格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工作，提高全系统依法行政意识；组织开展第六届全国价格监督检查案卷评查活动；切实做好价格鉴证师注册、价格评估人员资格和机构资质认定的行政许可工作。

第七章　国际收支

第一节　2005年国际收支的基本情况

2005年，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双顺差”结构，顺差规模扩大，外汇储备继续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汇率水平在合理、均衡的基础上保持基本稳定。

（一）经常账户继续保持顺差

2005年，我国经常账户继续保持顺差，货物贸易顺差扩大。

1. 货物贸易顺差规模较大。我国货物贸易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进出口总值达到14221亿美元，增长23.2%；出口增幅明显大于进口增幅，全年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进口6601亿美元，增长17.6%。进出口顺差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19亿美元。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顺差大幅度增加，从出口方面看，主要是全球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我国产品外需强劲，加之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产能增加；从进口方面看，主要是国家抑制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国际价格水平变动等因素导致我国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进口增速减缓，国内产品竞争力提高也替代了对部分进口品的需求。

2. 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有所缩小。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继续扩大，逆差规模缩小。运输账户逆差依然是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账户也存在一定的逆差。旅游账户一直是我国服务贸易中顺差的主要来源，2005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旅游收入和支出都出现较快增长，但收入增速明显快于支出，导致旅游账户顺差有较大增加。

3. 收益和经常转移账户顺差增加。随着我国境外资产存量，不断扩大，境外资产收益不断增加，加之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增加等影响，收益账户流入增长较快并导致该账户出现顺差。经常转移账户顺差扩大，其原因主要是侨汇收入有较大幅度增加。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缩小

2005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继续保持顺差状态，但顺差规模比上年缩小。

1. 直接投资顺差减少。我国利用外资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为603.3亿美元，规模比上年略有下降，这是199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外商直接

投资下降的原因，一是受宏观调控影响，项目审批趋于严格、土地供应紧张；二是国内经济出现一些新变化，如劳动力成本上升、煤电油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等；三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导致一些国际资本向外分流。

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境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但与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我国境外投资规模仍然偏低，对直接投资账户影响依然有限。

2. 证券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提高、本外币利差缩小和人民币汇率调整等因素影响，国内金融机构持有境外有价证券资产有较大增加，这是造成证券投资账户由上年顺差转为逆差的主要原因。境外投资者虽然对我国证券投资继续增长，但由于受投资渠道等因素的限制，增幅不大。近年来证券投资账户变动对我国国际收支影响程度逐渐加大。

3. 其他投资继续保持顺差。贸易信贷账户保持顺差，贷款、货币和存款及其他负债账户顺差有一定增加。

（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

2005 年 7 月 21 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次汇率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汇率调控的方式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二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每日浮动区间，三是将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初始水平调整为 1 美元兑 8.11 元人民币的水平。

到年底，人民币兑美元的基准汇价为 1 美元兑 8.0702 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 2.56%，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价为 1 美元对 8.1917 元人民币。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8189 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2089 亿美元。

第二节　2006 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发展趋势及政策取向

（一）2006 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化趋势

2006 年，我国国际收支有望继续保持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双顺差"结构，但顺差规模较上年会有较大幅度缩小，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1. 经常账户顺差规模缩小。预计 2006 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将明显小于上年。出口方面，从国际因素看，全球经济和贸易的稳定增长为我国外贸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6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与 2005 年持平，但全球贸易额将增长 7.4%，略高于 2005 年 7%的水平。我国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经

济也将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从国内因素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升级、出口产品竞争力明显提升为我国出口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出口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变动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后，不但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有限，而且所遇到的各种贸易摩擦将继续增加。进口方面，2006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新开工的投资项目增加会带动进口增长。更重要的是，我国将在调整出口结构，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等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会对缩小货物贸易顺差起到促进作用。综合看来，2006年进口增速将超过出口增速，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将有所缩小。

服务贸易将继续出现逆差。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尚存在不小的差距，加之随着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商在华服务业投资不断增加，服务贸易账户仍将保持逆差状态。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仍将是构成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项目。

由于境外投资者在我国的资产存量显著超过我国在境外的资产存量，加之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减弱，预计我国投资收益账户将转为出现逆差。转移支付账户受侨汇收入增加影响而继续保持顺差状态。

2. 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规模缩小。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内外部因素不会出现很大变化，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从国际影响因素看，预计全球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我国仍是全球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从国内影响因素看，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一些制约外商投资增长的短期因素将有所缓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将进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服务业将按承诺扩大开放，服务业外资经过几年准备和试探性投资，有可能出现集中投资的情况，因此外资在服务业投资比重可能出现较快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境外投资也将继续出现较快增长的态势，但对直接投资账户影响不大。

近年来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账户经常受国内外利率、汇率等短期因素影响而出现较大波动，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减弱之后，这两个账户变动将更多地受国内外利差影响。预计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账户的变化不会改变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格局。

3. 外汇储备稳定增长，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预计在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但增长幅度将比2005年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人民币汇率有望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二）2006年我国国际收支的政策取向

1. 国际收支工作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保持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是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余额过大，不但形成了对我国不利的财富国际转移，而且外汇占款不断增加也不利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200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连续大幅顺差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渐增加。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需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减少我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

2. 减少货物贸易顺差，促进经常账户平衡。在当前的情况下，货物贸易账户是决

定我国国际收支变动的基本因素，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最重要的是要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为此需要在支持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缩小贸易顺差，努力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一方面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逐步完善大宗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另一方面要扩大国内短缺性资源、战略原材料、先进技术和设备等进口。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层次和水平，在开放过程中提高服务业竞争力。

3.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鼓励境外投资。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形势看，利用外资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我国利用外资应侧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外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二是逐步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待遇，在合适的时机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三是继续按照我国有关承诺稳妥有序开放服务业市场，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重视服务业开放可能引发的问题。同时继续鼓励境外投资健康发展，加快境外投资政策促进和协调机制建设，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活动，稳妥有序地拓宽资金流出渠道。

4. 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增强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增加市场交易品种，完善外汇交易模式。加快外汇市场建设，积极推出各类外汇衍生产品，为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规避外汇风险服务。继续改进外汇管理，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规范和引导外汇资金流入，适当拓宽资本流出渠道。

5. 适度控制短期外债规模，防范短期外债增加可能引发的国际收支风险。短期外债属于波动性较大的资金流入，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存在集中流出并引发国际收支风险的可能。近年来我国短期外债出现较快增长，短期外债余额占全部外债比重已经超过一半。虽然在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短期外债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但短期外债过快增长会加大未来国际收支潜在风险。为此应继续规范资金流入管理，严格控制境内银行短期外债规模，对外资银行外债实行总量控制；对外资企业对外借款严格按照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差额管理等。同时完善国际收支风险监测，强化国际收支预警分析，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管理，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第八章　国民经济动员

第一节　2005年国民经济动员回顾

2005年，国民经济动员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紧紧围绕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以提高平战转换能力建设为核心，以预案体系建设为重点，以信息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为基础，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发展战略上更加协调一致。紧密结合"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十一五"规划，正确处理好全面与重点、平时与战时、需求与可能、近期与长远的关系，充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和地区经济布局调整的目标，努力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进一步促进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发展进程上更加协调一致。注重从总体上把握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目标，努力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使国防建设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加强，更好地适应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协调一致。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要求，立足于我国动员实力、潜力状况，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贯彻国防要求的工作力度，切实加强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的动员基础建设。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发展机制上更加协调一致。进一步建立健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军民两大资源优势，将国防建设植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提倡社会大协作，重视搞好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组织我国民用工业技术力量支持国防建设，继续促进国防科技工业装备国产化。

（二）按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国家应急体系建设成绩显著

国家应急体系和机制得到完善。分级分类的各项专业应急预案编制取得实质性进

展，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核心，建立健全了应急预案体系。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基本确立，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初步形成。同时，采用先进的检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理技术及设备，积极做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此外，根据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实际需要，以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状况为基础，编制了经济动员预案，构建了分层管理、分级编制的经济动员预案体系。

公众的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能力得到提高。抓好面向全社会的预防、避险、减灾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努力形成全民动员、预防为主、全社会防灾减灾的良好局面，从而提高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生活秩序的能力和水平。

（三）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建设继续得到加强

重要产品和技术的平战转换能力有所增强。根据需要建立了国民经济动员中心，作为技术储备和扩散基地、专业人才支撑和保障基地、国民经济动员预案的维护和演练基地，进一步优化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建设的结构和布局。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取得进展。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为实现国民经济动员的精确管理和高效指挥调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经济动员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取得成效。针对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工作遇到的重点、难点和倾向性问题，加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积极探索新世纪新阶段国民经济动员规律。发挥军地教育资源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人才培养，已基本形成在职培训、学位教育、学历教育、出国考察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训体系，提高了国民经济动员领域人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业务工作和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

第二节　2006年国民经济动员展望

2006年，国民经济动员建设进入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逐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突破制约发展的重大瓶颈和体制障碍，开创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新局面，为“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动员的发展和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注重国防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协同发展。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必须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考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确保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时，重视国防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国防投入，保障和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要实现国防和经济两大建设的统一、两个进程的同步和两种资源

配置的匹配，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共同发展，促进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注重国防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融合发展。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突破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融合发展的障碍，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把国防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融入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合理确定国防建设的布局，统筹国防资源与经济资源，形成国防经济和国民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建设对国防建设的支撑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带动作用。

注重军工产业和民用产业的互动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民用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高端带动作用，使军工产业成为国家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逐步消除民用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的体制性障碍，建立健全准入机制，努力探索民用企业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方式和现实途径，形成依托民用工业体系的现代"哑铃型"国防工业结构，在军民经济融合的基础上铸造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

注重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互通发展。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和军民通用技术标准，加快军民两用技术和通用产品的研究开发，推动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相互转换，促进国防科技资源与民用资源的对流和优化配置，提升两用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既要鼓励具有民用前景的国防科技向民用领域转移扩散，发挥国防建设对地方经济建设和相关产业、行业的拉动和促进作用，也要支持民用科技参与国防领域的竞争，广泛吸纳成熟的民用先进技术，为国防建设服务。

注重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的兼容发展。紧紧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加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和从社会引进专业人才工作的力度，更好地满足国防建设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同时，在军队教育体系中加大培训通用性人才的力度，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各类人才。

注重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的共用发展。把国防建设战略布局的完善与国家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布局调整结合起来，在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中兼顾国防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双重服务的功能，做到一笔投资能获得平时、战时两种效益，一份投入能获得军用、民用两份产出。

（二）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切实加强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建设

加强专业保障队伍建设。要依托国防科技工业的生产企业，组建和训练装备维护及维修所需的技术保障队伍，做到既能保障部队作战要求，又能满足应对突发事件需求。

搞好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国家信息网络资源，整合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加强对潜力调查数据的动态维护和使用，提高智能化决策水平。

加快国民经济动员中心建设步伐。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优化空间布局、突出结构重点、调整数量规模等方面出发，做好国民经济动员中心建设工作，促进国民经济重要产品和技术顺利实施平战转换。

（三）强化应急应战双重功能，完善国民经济动员体系

进一步完善预案体系。根据形势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动员总体预案，组织编制专项预案，健全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体系，明确动员准备的任务、要求和措施，提高国民经济动员预案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同时，做好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体系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其他专项应急预案的衔接。

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新动员观念，强化动员职能，把平时应急、战时应战作为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一旦有事，能够快速、高效地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运行机制，促进军队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提高保障国家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加快国民经济动员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法规体系，把国民经济动员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一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加紧起草出台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国民经济动员法》；另一方面，有关地区和部门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动员条例和办法，不断推进国民经济动员法制化进程。

第九章 农业和农村经济

第一节 2005年农村经济形势

2005年，国家继续坚持巩固和加强农业，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农业税减免进程加快，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扩大，继续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化肥生产、抑制农资价格上涨、保障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有力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落实力度，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灾害较重的情况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粮食产量在上年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继续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8401万吨，比上年增产1454万吨，连续两年较大幅度增产。棉花产量减少较多，油料略有增产，糖料有所减少。农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标准化进程加快，全国优质专用小麦面积比上年增加18%，已占全部小麦种植面积的48%，优质稻种植面积超过稻谷种植面积的50%，"双低"油菜籽占油菜籽总面积的74.3%。畜牧水产业保持稳定增长势头，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农民收入在上年较大幅度增长基础上保持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全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实际增长6.2%，为1997年以来的第二个高增幅年份。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耕地减少和淡水短缺的趋势不可逆转，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余地越来越小，气候条件还难以预测，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加大，特别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放松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倾向，粮食安全问题还不容忽视。二是粮价下行的压力较大，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些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政策性增收因素的贡献作用有所减弱，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农户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三是农村基础设施依然滞后，特别是农村社会事业欠账较多，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不高，严重制约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2006年农村经济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2006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局之年，要认真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稳定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扩大农民非农就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

加强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保护体系，保持支农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人，建立健全政府支农投资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国家将把对基础设施建设投人的重点转向农村。继续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民实行的"三减免、三补贴"政策，在前两年免除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减免农业税的基础上，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强化粮食直补力度，将主产区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县和财政困难县的奖励补贴力度。改革和完善现行化肥调控机制，研究建立对种粮农民的化肥、柴油等农资的直接补贴办法。

（二）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提高质量和效益，努力增加种粮收入，不断提高生产能力，适度利用国际市场，保持粮食供求大体平衡。要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乱占滥用耕地势头，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继续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加快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促进主产区粮食产量稳步增加。继续实施种子工程和植保工程，加大优良品种繁育力度，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技术，不断提高粮食单产、品质和生产效益。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继续把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作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加大中部4省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工程力度，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大力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实施新一轮沃土工程，科学施用化肥，全面提升地力。继续推进农业机械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继续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合理的粮价水平，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调控，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三）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广大农民最迫切需要改善的生产生活条件入手，突出抓好改善“水、气、路、电”。一是大幅度增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投资规模，解决20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二是加快普及农村沼气，大幅度增加农村沼气建设投资规模，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三是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启动“十一五”乡村公路改造工程。四是根据各地实际，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小水电等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加强无电地区电力设施建设，完善部分省份农村电网改造。同时，继续发展农村通信。搞好村庄规划，加强村庄整治，科学引导农民改善村容村貌。坚持以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为核心，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继续加快推进西部“两基”攻坚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等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农村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建设，支持乡镇文化站、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农村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加快发展特色农业、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继续实施现代农业建设项目。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继续实施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加快实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继续扶持小城镇经济发展。增强县级管理能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拓宽农民非农就业和增收渠道。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继续增加扶贫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做好易地扶贫工作，加快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步伐。加强涉农收费和价格监督管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五）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切实加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选择部分县（市）开展化解乡村债务试点工作。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稳步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完善粮食流通体制，加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加快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垦管理体制和国有农场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支农投资整合工作，不断提高政府支农投资效益。

第十章　工业经济

第一节　2005年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2005年，工业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有所加快，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

（一）工业生产平稳较快增长

全部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76190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66425亿元，增长16.4%，增幅比上年低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的主要特点：一是运行的稳定性有所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各季分别增长16.2%、16.5%、16.2%和16.4%，波动幅度由上年的2.8个百分点收窄到0.3个百分点。二是工业增长的重化趋势有所减弱。全年重工业增长17%，增幅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轻工业增长15.2%，增幅提高0.5个百分点；轻、重工业增速差距由上年的3.5个百分点缩小至1.8个百分点。三是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全年股份制企业完成增加值32173亿元，增长17.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8.4%，比上年提高4.5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26063亿元，增长10.7%，比重为39.2%，比上年降低3.1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完成增加值增长最快，增幅达到25.3%。四是工业品出口交货值继续较快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47949亿元，增长26.1%。据测算，出口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9%，拉动工业生产增长3.1个百分点。

（二）能源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解

国家继续加强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继续加大对能源领域薄弱环节的投入，增加有效供给，能源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全年新增发电装机6326万千瓦，电网建设新增220千伏及以上线路11420公里；新增煤炭生产能力1.2亿吨，原油生产能力2295万吨，炼油生产能力2235万吨，天然气生产能力130亿立方米。能源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原煤产量突破20亿吨，达到21.9亿吨，比上年增加1.98亿吨，增长9.9%；发电量24747亿千瓦时，增长12.3%；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为1.81亿吨和500亿立方米，增长2.8%和20.6%。煤炭供求基本平衡，全年煤炭消费21.4亿，增长

10.6%；年末直供电厂存煤2483万吨，比上年末增加1384万吨。电力供应紧张形势总体缓和，全年全社会用电增长13.5%，增幅比上年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增长12.5%，回落4.3个百分点；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5876小时，比上年减少115小时；国家电网系统6—8月拉限电条次和损失电量同比分别下降61%和66%。部分地区成品油供应一度紧张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市场供应总体基本平稳。

（三）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抓住经济总量关系有所改善的有利时机，利用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增强的倒逼机制，综合运用土地、税收、信贷和投资等手段，引导企业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优胜劣汰、产业升级。工业生产结构不断改善，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微型电子计算机、显示器、数码相机等高技术产品生产增势强劲，增幅均在37.2%以上；焦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品生产趋缓，增幅分别回落1.4个、2.1个、2.5个和3.7个百分点；粗钢、钢材生产增速从三季度开始逐月放缓，12月当月分别增长16.2%和17.4%，比上半年回落12.1个和8.5个百分点。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钢铁行业强势企业之间的联合重组拉开序幕，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优势企业趋向活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营汽车企业发展迅速，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等行业的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稳步推进，一批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研制开发取得进展，提升了工业技术水平。

（四）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

围绕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是加大重组力度。完成了9组18家中央企业的联合重组，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企业已减少到168家。确认公布了96家中央企业主营业务，招商集团、中国包装总公司等企业的非主营业务资产剥离重组已经完成，进一步优化了资产，精干了主业。二是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神华能源、东风股份、中国远洋、中化化肥等一批企业先后在境内外上市或增发股票。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进展顺利，宝钢集团、神华集团等6家企业相继建立和完善了董事会，中铁建等9家企业的试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三是稳妥推进国有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截至200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通过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147.5万人。71家中央企业主辅分离的总体方案得到批复，涉及改制单位4190户，分流安置职工65万人；第二批74家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全面启动。四是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取得进展。截至2005年底，全国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658户，核销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560亿元，安置人员719万人，其中2005年实施项目174户，核销190亿万。五是有序流转国有产权。出台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整合了产权交易机构，实行了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公示制度，使国有产权转让更加规范。据统计，2005年京津沪3家产权交易机构转让企业国有产权3622宗，成交金额1080亿元。

（五）经济效益较好

全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176.61，比上年提高11.66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产品销售收入突破20万亿元，达到24.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7%；实现利润14362亿元，增长22.6%。其中，煤炭、石油、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等开采业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78.8%、68.2%、35.2%、97.7%和100.6%；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净亏损150亿元，钢铁行业利润下降4.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下降14.3%，化纤行业下降20.3%；新增利润最多的五个行业是石油开采、煤炭、电力、通用设备和农副食品加工，合计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72.4%，比上年前五个行业新增利润所占比重提高16个百分点。石油开采业实现利润2936亿元，比上年增加1191亿元，分别占全部工业利润和新增利润的20.4%和45%。

总体来看，2005年工业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企业竞争力不强等长期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前几年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日渐突出，不良后果日益显露；石油等能源和初级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增加了下游行业的生产成本；贸易摩擦加剧，加大了企业经营难度。这些都将制约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第二节 2006年工业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2006年，工业经济工作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

（一）着力提升工业技术水平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一是通过建立健全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对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大市场潜力的工业领域，要有效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重点推进集成性自主创新，确立自主品牌；对难以引进技术的工业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力争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对国内外差距大而又能引进的技术，要在加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再创新。二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按照产业集聚、规模发展和扩大国际合作的要求，继续在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实施产业化工程，继续在具有较好条件的软件、微电子、生物和民用航空等领域发展一批特色产业基地，培育新的增长点。要加快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促进由组装中心向制造中心的转变。三是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依托重点工程，强化政策支持，通过引进技术、联合开发、联合制造、自主研发等多种方式，在大型清洁高效发电设备、大型乙烯成套设备、轨道交通装备等领域，加快研制开发和系统集成，增强制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大技术装备的能力。四是加大运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立足现有的产业基础，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高产品档次和技术水平。

（二）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扶优汰劣，采取重组、改造、淘汰等办法，力争在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一是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安全、能耗、水耗、资源综合利用和质量、技术、规模等标准，提高准入门槛，严格控制新上项目。二是依法关闭一批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分期分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对淘汰的生产设备进行废毁处理。三是支持符合产业政策和技术水平高、对产业升级有重大作用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围绕提升技术水平、改善品种、保护环境、保障安全、降低消耗、综合利用等方面，对传统产业实施改造提高。四是按照市场原则，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资产、资源、品牌和市场为纽带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同时，要密切跟踪分析产能过剩行业运行态势，适时发布相关信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

（三）进一步加强节能降耗和发展循环经济

一是加快推进水、电、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调节和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投资行为，促进自觉节约资源能源机制形成。二是突出抓好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等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工作，对一批重点企业的工艺、技术和设备进行全面改造，降低企业能源消耗。三是加快节能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组织对共性、关键和前沿节能技术开发，实施重大节能示范工程，促进节能技术产业化。四是在重点行业开展循环经济试点，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支持冶金、化工等行业的工业废物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四）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股份制改革以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重点，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是围绕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推进中央企业的调整重组。加强内部整合，减少管理层次，缩短管理链条，将主业做强做优做精。加大经营困难、包袱沉重、缺乏竞争力企业的退出力度，积极促进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重组。二是贯彻新的《公司法》，加快国有企业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改革。以推进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完善董事会为重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三是继续做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争取在三年内基本解决企业富余人员问题；采取分离移交、共建共管、辅业改制、市场化改革等多种途径，加快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进度。四是继续做好困难企业的关闭破产和重组脱困工作。按照国务院批复的规划，积极推进中央企业的政策性破产，继续做好重组脱困工作，努力降低重组脱困成本，减少国有资产损失。五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央企业薪酬激励与收入分配制度。积极探索股权激励等多种方式，加快建立对企业经营者的中长期激励机制。推动企业尽快建立起规范、透明、严格、有效的企业负责人职位消费制度的基本框架。

第十一章　能源工业

2005年，国家利用法律的和经济的调控手段，加强了能源产运销衔接和协调，初步缓解了资源、环境和能源供给约束的突出矛盾。全国能源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能源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增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稳步发展。

第一节　2005年能源工业发展情况

（一）能源生产

1. 煤炭。煤炭工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市场供需两旺，产销量持续增长，但增速明显回落。煤炭进出口呈现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趋势，全社会煤炭库存有较大增加，煤炭价格趋于稳定，煤炭企业经营状况继续好转。在国家政策和资金引导下，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组建工作步伐加快，煤矿建设投资持续增长。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施行，将煤炭工业发展和改革推向了新的阶段。

2005年，全国原煤产量完成21.9亿吨，增长9.9%。其中，国有重点煤矿10.5亿吨，增长12.9%；国有地方煤矿3.1亿吨，下降5.4%；乡镇煤矿8.3亿吨，增长13.5%。国有重点、国有地方和乡镇三类煤矿产量比例为48%、14%、38%。全国商品煤销量完成20.4亿吨，增长10.6%。全国煤炭铁路运量完成10.7亿吨，增长8%；大秦线等铁路运输干线和秦皇岛港等主要转运码头能力提高，运输量大幅增长。受市场需求和国家出口政策调控影响，全年煤炭出口7168万吨，减少1498万吨，下降17.3%；煤炭进口2617万吨，比上年增加749万吨，增长40.1%；煤炭净出口4551万吨，减少2247万吨，下降33.1%。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的商品煤售价恢复性上涨，全年平均价格达到270.2元/吨，并趋于稳定。煤款拖欠数额继续下降，截至2005年末，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应收账款余额为140亿元，比上年末减少29亿元。煤炭安全投入增加，原中央财政82家国有重点煤矿全年累计提取安全生产费用120亿元，吨煤提取16元。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得到一定的加强，实现了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三个下降。但煤矿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重特大事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2. 电力。2005年，全国电力生产增长速度仍然保持较高水平，新增发电能力大幅度增加，电网建设较快增长，各地来水情况好于去年，电煤库存相对充足，煤电利用小

时有所下降，全国电力供需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部分地区季节性、时段性拉闸限电现象依然存在，但与去年相比，拉限电的范围以及影响程度大幅度减少。同时，输、配电网“卡脖子”现象逐步显现。

全国发电量达到24747亿千瓦时，增长12.3%，增幅比上年回落3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发电量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增长13.4%；火电发电量2018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81.5%，增长12.4%；分地区来看，全年发电量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江苏、海南、青海、山西、广西、河南、福建、新疆、山东、云南、内蒙古、湖北、浙江、西藏和北京等15个省区市。

3. 石油天然气。2005年全国石油、天然气继续呈现供需两旺形势，原油生产稳中有升，天然气产量大幅度上升，天然气生产与消费量增速明显快于石油。2005年2月份受气候寒冷影响，部分城市天然气需求量大幅度上升，北京市首次出现供应紧张形势，对各行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5年，原油累计产量达1.81亿吨，增长2.8%。天然气累计产量500亿立方米，增长20.6%。原油进口12682万吨，增加401万吨，增长3.3%；成品油进口3143万吨，减少644万吨，下降17%；原油和成品油出口分别为807万吨和1401万吨，分别增加258万吨和255万吨，增长46.9%和22.2%。同期石油表观消费量31604万吨，下降0.5%。国际油价在动荡中持续攀升，不断创出历史新高，WTI原油价格一度突破70美元/桶大关，全年平均泊价涨幅达37%。汽油和取暖油期货也涨至历史最高水平。

（二）能源建设情况

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重点项目建设继续加快，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一批能源项目陆续建成投产，能源供给能力大大增加，供需矛盾总体上得到缓解。

1. 煤炭。全国煤炭工业总投资约864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煤炭资源勘探投资47亿元，煤矿建设投资约479亿元，煤矿安全改造投资230亿元，煤矸石、煤泥、矿井水、灰渣等综合利用投资90亿元，煤层气、煤炭液化示范工程投资18亿元。据调查，全年全国煤矿投产规模1.2亿吨，在建规模还有约4亿吨，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工作进展顺利。煤矿安全改造资金投入力度加大，在已经安排国债资金58.65亿元基础上，2005年又安排30亿元专项用于国有煤矿安全改造和瓦斯治理。

2. 电力。开工电站规模超过历史之最，投产规模达到6600万千瓦，核准并开工电站项目139个，建设规模1.18亿千瓦。截至2005年底，全国发电装机达到50841万千瓦，增长14.9%。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和变电设备容量分别达到25.19万公里和86680万千伏安，增长9.6%和15.9%。西北750千伏输变电示范工程、西北—华中“背靠背”灵宝换流站联网工程、南方电网天生桥至广东第四回500千伏交流输变电等一批重点工程投人运行，对改善电网结构，增强电力供应能力和安全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3. 石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取得进展，国际合作取得成效，形成了一定的石油生产能力，天然气生产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全年新增石油探明储量9.43亿吨，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5263亿立方米。塔里木油田油气产量超过1500万吨油当量，成为

我国石油增储上产的重要战略接替区，川渝气区天然气产量将超过150亿立方米，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基地之一。经过重组后的延长油矿管理局原油产量超过700万吨。建成第一条中哈国际输油管道。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建设进展顺利，部分油库具备了一定的收储能力。

4. 农村电力与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农村电力建设进一步推进，全年国家共核准水电项目14个，截至2005年底，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1700万千瓦，三峡、龙滩、小湾等西部水电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三峡电站左岸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溪洛渡、锦屏一级、拉西瓦和彭水等一批大型水电相继开工建设。风电特许权招标建设加快发展，全年在建规模200万千瓦，全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126万千瓦，当年新投产50万千瓦。水电开发有序进行和风电的加快发展，为节约能源资源、调整能源结构和保持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2005年，下达县城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投资计划54.1亿元，至此县城电网改造829亿元（其中100亿元国债资金）已全部下达。同时，安排5亿元国债资金继续实施西部农网完善。县城电网改造和农网改造任务基本完成，较好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用电条件，提高了能源效率。

第二节　2006年能源工业工作重点与政策取向

初步预测，2006年，煤炭电力供应紧张局势将继续趋向缓和，但能源供应总体上仍然偏紧。煤炭电力供应能力潜在过剩的压力将明显增加，宏观控制和结构调整面临新的挑战。应对能源形势的新变化，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用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去解决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

能源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能源方针，以节约能源资源、调整能源产业结构、有效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为重点，加快发展清洁环保能源，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促进能源产业升级。建设大型煤炭基地，调整改造中小煤矿，积极推进煤炭液化示范工程，鼓励煤电联营，加快发展煤层气（瓦斯）、矿井水、劣质煤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矿山循环经济。继续调控电力建设规模和速度，推进火电机组上大压小、上煤压油，着力优化火电结构。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加快电网建设，扩大“西电东送”规模。实行油气并举，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扩大境外合作开发，增强石油战略储备能力，稳步发展石油替代产品。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加强能源法律法规、政策信息建设。

（一）做好“十一五”能源规划编制工作

根据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发展目标，按照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和煤电油气各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调整发展建设布局，完成能源及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同时，继续组织做好京津冀、长三角、东北地区等区域能源规划编制工作。

（二）优化能源产业结构

1. 抓住机遇，加快调整电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巩固电站项目清理成果，维护正常电力建设秩序。抓住电力供应相对宽松的时机，加大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电源的建设力度，积极推进火电机组“上大压小、上煤压油”，下大力气改善电源结构。加快关停淘汰小火电及燃油机组的步伐。调整发电调度规则，实施节能、环保、经济调度，促进热电联产和综合利用发电的有序发展，提高热能效率，节约能源资源。

2. 加快电网建设，统筹发电与输配电的协调发展。加强区域网架建设，强化内部骨干网架。继续推进西电东送、南北互济，努力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供电可靠性。积极推进超高压输电技术发展，加快现有输电设施技术改造，力争将现有各电压等级输电能力平均提高15%—20%。加强电力设备市场调控，引导制造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避免出现制造能力过剩的现象。

3. 优化煤炭产业组织结构。针对部分地区煤炭投资过热、煤矿在建规模过大、产能潜在过剩的问题，进一步摸清在建规模底数，采取措施，抑制盲目和违规建设。强化规划调控作用，严格煤矿建设程序，提高市场准人标准，有序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充分利用供需缓和的有利时机，加大力度推进企业重组、资源整合和中小型煤矿的联合改造，促进大型煤炭集团发展，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继续依法关闭布局不合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小煤矿。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大力发展以煤炭加工转化、资源综合利用和矿区环境治理为主要内容的矿区循环经济，优化矿区产业结构，促进矿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扩大能源对外合作

1. 积极推进煤炭企业战略性重组。加快煤炭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打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界限，培育和发展若干亿吨级大型煤炭企业集团。鼓励各类投资者参与国有煤矿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大型煤炭基地建设。

2. 继续推进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剥离三产和多种经营企业的改革，逐步完成地方电网企业的重组改造；积极推进区域电力市场的建设工作，发挥电力市场在调剂电力余缺、缓解电力供需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具备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竞价上网和大用户直供试点，以及进行输配电业务财务分开核算工作，为在条件成熟时实行“输配分开”改革创造条件；逐步完善电价改革方案和电力项目核准制。在坚持国有控股或国有占大股的情况下，允许各种所有制经济投资电网建设。在统一规划、优化调度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水电开发投资多元化。

3. 积极研究探索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研究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如何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继续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业管理模式。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石油市场体系，规范勘探、开发、炼制、销售等市场秩序和经营行为，维护国

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抓紧制定和完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管道建设等市场准入标准，有序放开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市场。

4.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增进能源国际合作。继续加大能源领域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妥善处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欢迎国际资本参与我国能源建设，支持国内能源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和双边能源合作，加强政策和信息交流，积极宣传我国能源政策，共同维护能源安全。

（四）加强能源法规建设，完善能源法规体系

修订和完善《电力法》、《煤炭法》及其配套法规。制定煤矿勘探、开采等行业准入管理办法，健全煤炭产业技术政策和标准体系；出台《违规电站项目处罚办法》等相关政策，研究规范热电联产和综合利用发电的政策措施；起草《石油天然气法》和《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制定和完善《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法规和政策。

（五）继续抓好能源生产安全

1. 全面推进煤层气（瓦斯）抽采利用工作。做好煤层气（瓦斯）抽采利用“十一五”规划，制定和完善相关标准、规范和政策，继续利用国债资金支持瓦斯治理和抽采利用，加快煤矿瓦斯抽采技术攻关和示范工程建设，促进煤矿瓦斯产业化发展，努力实现阶段目标。继续支持煤矿企业安全改造，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

2. 进一步加强电力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抓好各地电力工程质量和安全检查工作，政府、监管机构和企业通力配合，完善责任体系，积极排查质量与安全隐患，确保电力建设工程质量。

3. 其他安全生产工作。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行业以及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建设工程，要根据各自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抓好安全工作，做到安全生产、安全建设、安全发展。

（六）加强能源重大项目建设

加快核准一批大中型煤矿项目，选择一批储量丰富、外运条件好的大中型煤矿，实施改造和扩建；重点支持大型煤炭基地建设，使其成为全国商品煤供应基地；积极发展洁净煤技术，重点抓好煤炭洗选、加工等技术的应用，逐步推进煤矸石、煤泥、煤层气的综合开发利用；继续搞好煤炭地下气化、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煤炭液化等示范工程建设。

大力推进水电、核电等清洁电源的前期工作，加快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等重点项目的开工建设；火电要结合各地电力供需形势和在建项目情况以及电站项目清理工作，增加电力需求增长较快而在建规模偏小的电力紧张地区的开工规模。

继续做好东海天然气开发、进口LNG、国家石油储备建设等国家重大项目，认真研究塔里木、鄂尔多斯、四川等盆地的天然气开发问题。

继续推进风电特许权招标，加强风电资源评价工作和大型风电项目的规划工作；启动秸秆发电示范项目，研究促进秸秆发电的政策措施；组织开展分布式能源政策研究，并进行工程项目建设示范。

第十二章 交通运输业

第一节 200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和改革情况

2005年，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市场配置交通运输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加强，有效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交通运输生产形势

2005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继续显现，交通运输供给能力稳步增加，不合理运输需求得到有效抑制，交通运输紧张局面有所缓解。全年全社会主要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184.2亿人、旅客周转量17473亿人公里，分别比上年增长4.2%和7.1%；完成货运量183.7亿吨、货物周转量78329.8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7.7%和12.8%。

铁路重点运输得到保障。针对铁路运能不足的现状，铁路部门优化运输组织，加快既有线挖潜扩能和新线建设，努力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装车达到12万车以上，比上年增长5%，创历史最好水平，基本保证了煤炭、石油、粮食、化肥等国家重点物资运输的畅通；在春运和"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期间，通过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和学生专列等措施，基本满足了旅客的出行需要。

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高水平。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9.3亿吨，增长18.7%。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13.41亿吨，增长18.7%；规模以上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7436.27万标准箱，增长23.6%。上海港完成货物吞吐量4.43亿吨，成为世界最大港口，其中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809万标准箱，比上年增长24.2%，继续位居世界第三。

民航客货运输增长较快。全年运输总周转量比上年增长12%、客运量增长13.6%，货邮运量增长9.7%。

（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全社会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409.4亿元，比上年增长20%。其中，铁路建设完成投资1329亿元，比上年增长45.7%；公路建设完成投资5300亿元，增长12.7%；沿海、内河港航设施建设完成投资580亿元，增长42%；民航业完成投资200亿元，增长25%。

青藏铁路顺利铺通，实现了我国各省区市都通铁路的目标，而且也标志着我国铁路建设水平居世界前列。全年新线铺轨1085公里，复线铺轨662公里；新线投产1203公里，复线投产486.3公里，电气化铁路投产862.7公里。建成投产了大秦线2亿吨扩能工程、宁西线、渝怀线、株六复线、京九复线等铁路；开工建设了武广、郑西客运专线、宁波—福州—厦门等铁路。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和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实施。全年公路建设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建成公路约1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457公里，新改建农村等级公路25万公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部开发干线公路、县际及农村公路等一大批公路建设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港区顺利开港。全年建成万吨级深水泊位130个，新增吞吐能力1.9亿吨，内河“两横一纵两网”骨干航道建设工程进展顺利。

此外，建成投产长春国际机场，扩建完工西宁曹家堡等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二跑道工程、大连周水子机场航站区扩建、上海及广州区域管制中心、民航数据通信网改造等工程建成投产，竣工投产满洲里、大同、达川、怀化、黎平、克拉玛依等11个中西部支线机场。

“十五”期间，在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下，全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绩。截止到2005年底，交通运输设施网络里程达到220万公里，比2000年增长37%。其中，公路里程192万公里，增长37%；铁路里程7.5万公里，增长9.5%；内河航道里程12.3万公里，增长3.4%；长输油气管道里程4.9万公里，增长98.4%；港口泊位3.56万个，增加2835个，沿海万吨级以上泊位1113个，新增344个（含长江南京以下港口）；民用机场达到145个，新增24个。

（三）交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进展

交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交通运输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交通运输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国务院颁布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明确了加强全国农村公路管理和养护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措施。铁路体制改革方案正在深入研究，改革思路进一步完善，改革总体目标进一步细化；铁路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撤消了41个铁路分局，减少了管理层次。民航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民航企业机场联合重组改制管理规定》颁布实施，民航企业、机场联合重组行为得到规范；民用航空市场准入进一步放松，民营和国外企业准人航空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航空运输市场正在逐步形成。

但也要看到，由于全社会对交通运输业的需求较大，交通运输系统基本上是在超负荷运转，主要铁路干线能力基本饱和，港口吞吐能力和主要公路干线通过能力仍比较紧张，新增加的运输能力满足不了运量增长的需要。

第二节 2006年交通运输工作重点与政策取向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交通发展规划的第一年，交通运输行业要做好交通中长期规划编制，有机衔接和协调各种交通方式；继续加强能源运输建设，全力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加快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步伐，增加有效供给，努力缓解交通运输紧张状况；深化交通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交通运输市场化进程。

（一）科学制定和认真落实交通发展规划，为“十一五”交通运输发展奠定基础

一是结合贯彻落实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全面实施《综合交通体系“十一五”发展规划》和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十一五”发展规划，并做好衔接和协调工作；二是做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和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三是加快《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全国民航机场布局规划》等规划的报批工作；四是继续落实《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全国农村公路建设规划》、《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渤海湾三区域沿海港口建设规划》和《环渤海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并制定相关政策，推进规划项目前期工作；五是本着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落实农村公路五年建设方案和2006年建设项目计划，力争取得“十一五”的良好开局。

（二）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量调整运输结构和区域交通协调发展

继续加强煤运通道和下水港口改造，扩大煤运通道能力，重点建设煤炭集运系统、下水港口和疏运系统的建设，保障煤炭运输需要，并抓紧开展新的煤运通道的前期工作。进一步加快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区域交通建设步伐，扩大增量，调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有：青藏铁路线上配套工程，武广、郑西客运专线等铁路项目，国家高速公路网、进藏公路等项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及三区域港口煤炭、石油、矿石、集装箱码头等港口项目，北京首都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上海浦东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加快农村公路、中西部支线机场建设。对京沪高速铁路等重大项目，要抓紧开展前期工作，为早日开工建设创造条件。

（三）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努力转变交通增长方式，不断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

加快大马力机车和高速动车组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及其能源使用效率，并减少环境污染；推广使用公路和桥梁建设的新材料、新工艺，提高车辆通过效率，降低运输噪音；提倡并支持运输工具采用节油技术等，降低运输单位能源消耗；继续加快铁路发展，有计划地推进轨道交通发展，加强内河航运发展，节约交通运输发展的土地占用量；合理配置交通资源，在大力发展容量大、污染小的现代化交通运输方式

的同时，注重加快现有交通设施扩能改造的步伐，提升交通运输发展效率。

（四）大力加强综合交通建设，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组合优势

科学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综合交通通道和枢纽，强化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协调，完善运输网络，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促进一体化运输；进一步加强交通需求侧管理，合理引导交通需求，有效满足运输需要，提高运输服务质量。

（五）加快交通运输管理改革，促进交通运输全面发展

一是完善铁路体制改革思路，大力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出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努力推进中国铁路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二是进一步深化民航改革和港口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推进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

第十三章 装备制造业

第一节 2005年装备制造业发展情况

2005年，装备制造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一）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全年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约62000亿元，增长约20%。由于原材料涨价以及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降价，全年实现利润约2689亿元，与2004年基本持平。

农业、运输、能源、环保等市场需求较大的设备生产增长迅速。大中型拖拉机产量16.2万台，增长42.7%；发电设备产量9200万千瓦，增长28.9%；铁路货车产量3.9万台，增长41.9%。高档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增长速度较快，数控机床、30万千瓦以上发电设备、数字仪表增速均高于同类产品。

贸易结构有所改善。机械设备出口交货值5998亿元，增长29%。一般贸易出口增长较快，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平稳，一般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的增幅差距缩小。大型和成套机电设备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加快增长态势。

资本和技术流动更加活跃。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保持对外资的吸引力，研究开发、高附加值产品类外资企业进入步伐加快。同时，国内企业也开始购并外国企业，扩大利用国外品牌和技术的领域，如机床行业2005年国内企业购并了著名的德国科堡、席士、凯狮等机床企业。

（二）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装备本地化工作稳步推进

电力装备形成了较完整的制造体系，发电设备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了5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中，80%以上为本地化生产的机组。600兆瓦超临界火电机组已经投运，国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已开始大量订货。依托秦山二期扩建、岭澳二期的核电设备本地化进展顺利，在600兆瓦核电机组实现本地化的基础上，百万千瓦核电机组也部分实现了本地化。三峡右岸机组实现了自行设计成套，与国外合作制造的重型燃气轮机组已有十余台提交用户。直流输电设备以贵广二回路工程为依托的设备采购招标取得成功，本地化率可达70%。国产750千伏输变电线路投入运行。±500千伏直流输电

设备和500千伏交流输电设备基本实现国内制造，也为百万伏等级设备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首台国产电站空冷系统即将投入运行。抽水蓄能机组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进展顺利。

冶金装备已能成套提供年产800万吨级钢铁联合企业常规流程设备，中厚板和薄板轧机等关键设备研制成功，薄板坯冷、热连轧成套设备本地化率超过80%，可以自主成套。4000立方米高炉、干熄焦成套装置、高炉尾气回收装置等实现了本地化。

石油化工装备中7000米电驱动石油钻机已成套出口，年产千万吨级的大型炼油厂设备本地化率达90%，5万立方米等级大型空分设备、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成套装置、60万—70万吨乙烯改造工程所需的压缩机等关键设备已实现本地化。

船舶工业已能够建造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FPSO大型海上石油储油轮、8000标箱级集装箱船和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的自主生产率达到70%以上。铁路四次大提速所需要的全部机车车辆、信号系统和路轨桥梁等都是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装备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进展顺利。

数控机床的品种已经超过1500种，中档及以下数控机床已能满足国内需求，五坐标等高档数控机床已经进入市场，行业骨干企业发展较快。

日产8000吨水泥成套设备、日产400吨聚酯成套设备实现了本地化。

首台国产60万千瓦火力发电站自动化控制系统已经交货。60万千瓦核电站计算机监控和常规岛控制系统实现本地化，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125马力轮式拖拉机、250马力大型自走式采棉机、起重量200吨全路面起重机、100吨级液压挖掘机等实现了本地化，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国外合作制造的大断面岩石掘进机开始提供用户。

（三）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弱、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国际竞争力不强。二是一些落后甚至应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得以继续生存，如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普通中小型电机，仍在继续生产和销售；低水平扩张有所抬头；国际资本、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加剧了部分产品生产能力膨胀。三是原材料供应、价格波动和重点项目建设对产品需求的不均衡性影响装备工业运行质量，主要原材料、能源、运输等价格的上涨提高了产品成本，企业增产不增收。

另外，一些地方以各种理由干预国内装备企业之间的联合重组，却热衷于将重点装备制造企业出售给跨国公司，影响装备产业安全。

第二节　2006年的工作重点

2006年，要抓住装备市场活跃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作为重点，编制实施方案，制订具体政策，抓好重点项目，力争使装备业振兴有一个良好开端。

（一）注重转变增长方式

引导企业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央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精神实质和政策内涵，抓住近几年装备制造业效益好转和投资能力增强的有利时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下大力气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开拓国际市场。要防止借振兴装备制造业之机，一哄而起，布新点，办新厂，搞低水平的规模扩张。

（二）细化发展思路

一是对高效清洁发电和输变电、大型石油化工、先进适用运输装备、高档数控机床、自动化控制、集成电路设备等重点发展的16项重大装备，逐项进行实施方案研究，制订具体的目标和措施。二是制订船舶、轨道交通设备、数控机床等行业专项规划。三是组织行业协会和有关专家，对主要装备行业的发展形势、趋向和发展思路进行研究并发布信息引导行业发展。

（三）制订相关法律和政策措施

围绕《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政策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重点建设工程装备采购、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合资、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管理办法等具体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制定重点领域装备技术政策。在全面总结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通行作法的基础上，研究起草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法律法规，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四）修订完善技术标准

根据装备制造业产品和技术进步的要求，抓紧修订和补充有关技术标准。重点是对新产品、配套范围广的产品、涉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品，提高标准等级，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

（五）加大对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的财政资金支持

重点支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重点行业所需的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主要包括清洁高效发电设备及输变电设备、大型电站辅机、石油和天然气长输管线和大型煤化工设备、高速铁路及城轨交通设备、新型船舶及船用配套设备、数控机床、新型农业装备、重大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关键精密测试仪器等。用信息化和高新技术提升和改造装备工业，完善关键工艺技术，提高研发能力，切实加强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加强科技

开发基础设施建设。

（六）加强重大技术装备本地化的组织协调工作

直流输电设备、重型燃气轮机、抽水蓄能发电设备、三峡右岸大型水电机组、煤液化设备、60万千瓦电站分散式电站控制系统（DCS）的自主化要在已定工程和方案的基础上抓好落实，加快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进一步做好隧道掘进机等本地化工作。深入开展百万伏特高压输变电试验工程设备研制的前期工作。落实新型高档数控机床的开发研制项目。结合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研究解决船用配套设备、数控机床功能部件、重大电站辅机等关键配套件的本地化问题。

（七）做好重点工程的装备本地化工作

确保秦山二期扩建、岭澳二期工程核电设备的质量和进度，完善已引进的二代设备技术；引进消化第三代设备技术。依托天津石化等项目，推进百万吨级乙烯裂解气压缩机、乙烯压缩机、丙烯压缩机、大型裂解炉等设备本地化；实现对苯二甲酸（PTA）装置的自主设计、自主制造和关键设备国内提供，本地化率达到70%。依托宝钢梅山、鞍钢、天津天铁项目，实现连铸连轧成套设备的自主设计和关键设备自主制造，本地化率达到80%以上。依托铁路高速专线及重载货运线路、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等建设工程，通过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加快实现轨道车辆及信号控制系统本地化。

第十四章　原材料工业

第一节　2005年原材料工业运行情况

2005年，原材料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总体经济效益稳步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宏观调控成效进一步巩固。

（一）生产规模继续增长

在国内外需求快速增长的拉动下，主要产品产量快速增加。钢和钢材产量分别达到3.52亿吨和3.97亿吨，比上年分别增长24.6%和24.1%；铜、电解铝和氧化铝产量分别为260万吨、779万吨和851万吨，增长18.1%、16.4%和21.9%；水泥产量10.6亿吨，平板玻璃产量3.66亿重量箱，分别增长10%和16.8%；乙烯、化肥（折纯）和烧碱产量分别为756万吨、5220万吨和1264万吨，增长20%、8.6%和21.4%；化纤和纱产量分别为1618万吨和1440万吨，增长13.6%和11.5%；纸及纸板产量5404万吨，增长26.3%；原盐产量4455万吨，增长16.3%；黄金产量达到226吨，比上年增加14吨；稀土产量继续稳定在8.6万吨水平。

（二）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善

钢材品种结构中，板带比达到38.6%，比上年提高4.91个百分点；电解铝行业基本淘汰了落后自焙槽生产能力；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达到45%，提高12个百分点；石化工业柴汽比由去年的1.93提高到2.04；离子膜烧碱占烧碱产量的比重达到29%，提高4.9个百分点；高浓度磷肥占磷肥产量的比重达到62%，提高8.1个百分点；化纤行业差别化纤维比重达到31%，提高3个百分点；钾肥自给率达到30%，提高4个百分点；子午胎占轮胎产量的比重达到45.6%，提高2个百分点。

（三）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首钢搬迁重组工作全面展开，关停能力和新项目建设获准启动，武钢、鄂钢、柳钢完成重组，鞍钢和本钢实现了初步联合。中铝公司通过兼并重组，电解铝生产能力达到280万吨，占全国的比重由上年的9.6%提高到27.2%；10家水泥企业集团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2.2%，较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安徽海螺集团水泥产量已超过5000

万吨，居世界第6位；化肥生产企业平均生产规模达到4.4万吨，较2000年增加了76%；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省份化纤工业集聚发展，产能已占全国的87.7%。

（四）装备水平快速提升

宝钢、武钢、鞍钢等大型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燕山、齐鲁等乙烯装置达到了70万吨级规模，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日产2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装备已全部实现本地化生产，日产4000吨、5000吨装备本地化率达到90%以上。利用自主研发技术，建设了青海100万吨钾肥、山东水煤浆气化30万吨合成氨等重点项目。装备水平的提升使我国工业能耗水平显著降低，2004年每吨钢、乙烯、水泥综合能耗分别下降到0.76吨标煤、688大卡和0.145吨标煤。

（五）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在生产持续增长的同时，原材料工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钢铁、有色金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分别为1314亿元和544亿元，分别增长15.3%和59.3%。石化和化工行业全年实现利润3708亿元，增长32.3%。纺织行业实现利润689.7亿元，增长34.3%。造纸行业实现利润175亿元，增长24%。烟草行业实现利税2495亿元，增长14.4%。

（六）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国家加强对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的调控和引导，原材料工业产品出口结构得到优化，效益不断提高。钢材出口2052万吨，比上年增长44.2%，其中板管材出口1200万吨，增长50%。未锻造铝出口113.9万吨，比上年减少21.7%。铝材出口71.1万吨，增长65.1%，其中铝板带出口增幅超过100%。石油和化工产品出口额564亿美元，增长37.8%。化纤及化纤纺织品出口407万吨，增长18.2%。

（七）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根据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开工建设了一批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提高主要原材料产品市场供给能力的重大项目。钢铁工业启动宝钢汽车板及不锈钢、首钢冷轧薄板、鞍本集团本钢冶炼系统改造及280万吨精品板材、天铁集团板材、舞阳钢铁公司宽厚板等重大项目。铝工业启动中铝郑州、中州、贵州、广西平果等4个分公司氧化铝扩建项目，新建华银、晋北铝厂，共新增氧化铝生产能力近500万吨。石化工业启动独山子石化、大连石化、盘锦乙烯、天津、四川等大型炼油、乙烯基地改扩建或新建项目。推进化纤原料项目建设，核准一批PX、PTA、乙二醇项目。加快实施林纸一体化工程，启动贵州赤天化、湖南岳阳、武汉晨鸣、海南金海等大型项目。

原材料工业保持了比较好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增长方式比较粗放，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格局。单位资源产出水平大大低于国际水平，主要行业单位产出消耗和资源消耗水平偏高。二是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铁矿石、铜矿、氧化铝等重要矿产资源国内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三是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产品价格下降，行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趋势。四是石油等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使部分行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

第二节　2006年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重点

2006年，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控制总量、优化布局、调整结构、降低消耗，努力促进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强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严格准入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抓住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汽车等行业总量矛盾缓和的有利时机，依法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着力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大力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积极培育和发展生物能源、生物化工产业。

（一）发展高附加值产品

1. 冶金工业。钢铁工业，支持发展国内短缺的冷轧薄板、硅钢片等产品，严格控制新上一般炼铁、炼钢生产能力。铝工业，加快建设大型氧化铝基地，在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以铝电联营的方式，适度发展具有竞争力的电解铝企业，积极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铝深加工产品和新型合金材料。铜工业，加大资源勘查力度，增加资源储备，稳定矿山生产；引导和调控铜冶炼发展，积极发展高精尖铜板带等深加工产品和新型合金材料。稀土工业，切实加强资源保护，着眼于高精尖领域，大力发展稀土生物材料等新材料和高端应用产品。黄金工业，坚持存量发展为主的方针，加强地质勘探和资源保护，发展低品位、难选冶金矿资源选冶技术和深部金矿的开采技术。

2. 化学工业。炼油工业，通过关停并转小型、低效炼油装置，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油品收率。乙烯工业，按照“基地化、大型化、一体化、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加快生产能力建设；积极扩大乙烯原料来源，继续实施以扩能降耗和提高竞争力为主的改扩建，统筹区域布局，推进炼油化工一体化，加快乙烯及下游石化产品生产装置的成套工艺技术、催化剂技术以及其他新技术的开发和转化。化肥工业，加快发展缓控释尿素和高浓度磷肥，力争实现氮肥和磷肥基本自给，提高钾肥自给率。医药工业，加快新一代生物技术药物产业化，推进中药现代化和天然药物的发展，巩固传统化学原料药优势，开发特色原料药。继续加大高毒农药替代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3. 建材工业。以节能、节地、节水、节约矿产资源、环保和提高产品标准为重点，加快建材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水泥行业，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发展日产4000吨及以上规模的大型新型干法水泥。玻璃工业，加快发展功能性材料，不断提高加工深度。同时，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型建筑材料、保温材料和绿色装饰材料，提高建筑物质量，延长建筑物寿命。

4. 化纤工业。积极开发生物质新型化学纤维原料，发展高技术化学纤维材料和高性能差别化、功能化纤维。促进和引导高科技化学纤维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等领域的应用。

(二) 优化生产力布局

钢铁工业，组织实施首钢、杭钢、广钢等城市钢铁企业搬迁，建设曹妃甸、南部沿海钢铁基地。铝工业，扩建和新建平果、中州、晋北、华银等大型氧化铝基地，建设西南、东北轻铝加工基地。炼油工业，调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炼油能力相对过剩的东北等地区要严格控制规模，在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加快现有炼厂改扩建。化肥工业，加快产业布局和原料及动力结构调整，在能源产地和粮棉主产区建设若干百万吨级尿素生产基地，建设云南和贵州磷复肥基地、青海和新疆钾肥基地。造纸工业，加快建设林纸一体化工程，以原料结构调整为核心，带动布局调整，降低水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重点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培育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整黄淮海地区。

(三) 推进企业联合重组

以市场为导向，以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为指导，结合企业改组、改造、改制适时推进钢铁、水泥、电解铝、炼油、造纸、制盐等重点行业的企业重组，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钢铁行业重点推进鞍钢和本钢重组计划的落实，推动宝钢与广东企业的重组，首钢与河北钢铁企业的重组。水泥行业重点推进亚泰集团、乌兰集团、冀东水泥等大企业重组和发展。有色行业重点推进中铝公司与地方企业的兼并重组，推动骨干铜冶炼企业之间的联合重组。炼油行业重点推进千万吨级原油加工基地的建设。造纸行业要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积极促进造纸企业的联合、兼并、重组。在合理利用草浆造纸的同时，加大小草浆造纸关停并转的力度。制盐工业重点培育和发展大型制盐企业(集团)，建立依托优势企业集团的稳定有效的食盐供应体系，促进大型制盐企业与大型工业用盐企业的合作，推进资源利用率低、能耗消耗高、经济规模小的小盐厂的关停并转工作。

(四)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支持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工业企业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物排放。钢铁工业要按产业政策要求，加快构筑循环经济型工厂，推广高炉、转炉、焦炉煤气回收发电，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利用回收煤气发展燃气轮机发电，全面推广采用干熄焦、低热值燃料蓄热式燃烧技术。氧化铝生产要采用先进技术降低赤泥碱含量，提高赤泥回收利用率。水泥行业要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在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附近的大型水泥厂，充分采用新型干法水泥窑处置工业废弃物、污泥和生活垃圾。鼓励支持在日产 2000 吨以上规模新型干法窑建设中低温余热发电站，充分利用废气余热资源；提高造纸工业水资源利用率和废纸回收利用率，降低 COD 排放。

第三节 政策措施

（一）加强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引导

继续做好钢铁、汽车产业政策和铝工业专项规划和产业政策颁布后的贯彻落实，同时抓紧制定和出台造纸、稀土、黄金、铜、铅、锌、镍、钨、锡、锑、黄金、化肥、农药、燃料乙醇等行业专项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社会投资方向，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

（二）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要抓住当前市场有压力、企业有动力、发展有政策的有利时机，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推进钢铁、水泥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上大压小，扶优汰劣。同时妥善处理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三）抓好重点行业节能降耗

一是在制定和落实产业政策、行业标准过程中，对重点耗能行业提出更加严格的能耗标准。二是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在企业节能、节水、节材方面的应用。通过信息资源整合并实施企业流程再造，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融合，促进传统产业增长方式转变。三是重点抓好百万吨级大型乙烯成套设备和 PX、PTA 和冶金、纺织行业装备本地化工作。

（四）促进区域工业协调发展

继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决策部署，充分挖掘和发挥现有工业基础优势，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支持中部和西部特色资源开发的重大项目建设。对有利于带动和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大项目，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五）抓好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

一是坚持原料多元化，发展生物质化工。抓住生物能源发展重大战略机遇，结合我国农林业资源的状况，确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重点领域，加快推进产业化。二是搞好车用乙醇汽油试点。围绕试点区域内汽油消费不断增长的实际情况，协调落实燃料乙醇的供应，确保市场稳定；因地制宜，促进现有生产试点企业的原料多元化和综合利用水平的提高；结合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促进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与社会批发企业的共同发展，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和地方法规。

第十五章　高技术产业

第一节　2005年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200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态势，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一）产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了高技术产业“产业集聚、规模发展和扩大国际合作”的总体发展思路，为高技术产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出台《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激发了我国创业投资和中小高技术企业创新创业活力；颁布实施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投资项目核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等管理法规，推进政府依法行政，为高技术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产业规模继续加快增长

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强。200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企业实现增加值783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9.8%，高出规模以上工业3.4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2.9%；实现产品销售收入33817亿元，增长23.5%。

（三）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拉动全国外贸出口的主导作用增强，促进了外贸出口结构的优化。据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4160亿美元，增长27.2%，高出全国外贸增速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183亿美元，增长31.8%，高出全国外贸出口增速3.4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出口比重达到28.6%；单月出口额从9月份首次突破200亿美元，连续四个月创历史新高。

（四）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一些技术含量高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增势强劲。2005年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为8084万部，增长35.3%，其中笔记本计算机4565万台，增长66%。移动通信基站设备724万信道，增长65%。彩色电视机中液晶电视机产量452万台，增长418.6%；等离子电视机77万台，增长215.9%。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等部分低档产品产量增长缓慢，甚至

逐步下降。

(五) 就业岗位不断增加

高技术产业在保持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截至2005年底，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已达666万人，增长11.2%，高出工业平均增幅5个百分点，全年累计新增就业岗位近80万个。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保持了较高水平，达到51万元/人（销售收入/从业人数），高出工业近15万元/人。

(六) 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

通信和信息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增长，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2005年电信业务收入达到5799亿元，同比增长11.7%，宽带上网人数达到6430万人，数据通信业务收入增速2倍于主营业务收入。截至2005年底，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达到7.44亿户，稳居世界第一，其中农村电话用户数达到1.11亿户。通信业增加值为4160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近10%。软件业收入达到3900亿元，增长约40%；出口约36亿美元，增长28.2%。

(七) 高技术产业效益呈下滑趋势

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处于国际分工中下游，高增长、低效益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由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受国际市场、技术变化影响较大，随着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贸易摩擦加剧，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增加。高技术企业缺乏创新活力，受国际国内市场紧缩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效益出现下滑趋势，利润增幅下降。与上年相比，2005年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增幅下降了21.7个百分点。

(八)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缓

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但增速有所下降，并明显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全年高技术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72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19.8%，比上年低5.4个百分点，比制造业低19.4个百分点。

第二节 2006年高技术产业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2006年，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要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落实高技术产业和信息化“十一五”专项规划，制定推进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措施，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加快推进产业化、信息化、国际化，促进高技术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 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一是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在我国具有相

对竞争优势的前沿科学领域和经济建设重点需求的战略性技术领域，建设若干战略性、标志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二是在生物、信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发展；三是开展三峡配套工程装备、大型空冷火电机组成套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进一步加强节能和新能源、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四是积极促进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等各类中介机构发展。

（二）努力提升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

继续做大、加快做强信息产业。一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抓紧出台软件、集成电路产业振兴政策和数字电视产业政策。二是大力培育数字化音视频、下一代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等基础性核心产业。三是突破关键技术，通过集成电路、先进计算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四是建设软件、微电子等产业基地，促进产业链形成和产业聚集。五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建立开放创新的产业技术体系，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六是实施《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邮政业政企分开；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

（三）大力发展生物、民用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

抓住机遇，力争实现生物、民用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局部领域的新突破。在生物领域，抓紧研究制定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和专项产业政策，以生物医药、生物能源和生物制造等领域为重点，实施生物质能工程、生物制造、新型疫苗等重大专项，新建一批生物产业基地。加强技术标准、生物安全监测与鉴定体系建设，促进生物产业规模化发展。在民用航空产业领域，加强创新条件建设，加快新支线飞机研制进程和系列化发展，推进大型飞机、发动机的自主研制和国际合作，实施通用飞机、直升机产业化，大力推进航空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在民用航天产业领域，加快对地观测、遥感应用、广播电视直播、民用通信等卫星应用，开展相关终端设备产业化和卫星数据产品标准制定工作。

（四）积极发展高技术服务业

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一是加快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构筑适应未来信息传输的通信网络；二是大力发展增值服务业，加速推进数字内容和系统集成服务业发展；三是要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水平和质量，创造多层次的服务需求，推动传统服务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五）加快推进高技术产业化

把高技术产业化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重要手段，积极组织开展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扶持政策研究，加快研究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研究鼓励创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修订并发布《当前国家鼓励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加速自主知识产权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积极培育新材料、新能源和先进环保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绿色和环保材料、汽车电子等高技术产业化。加大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

用力度，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推进东北、西部等地区特色资源的产业化，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六）稳步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推进电子政务的建设，实现信息共享，推进政务公开，进一步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电子商务，推进企业信息化，支持建设面向区域、行业和中小企业的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和信用、支付、安全等支撑体系。推进信息安全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和产品产业化，加强安全监控、密钥管理、网络信任、应急响应等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公益性信息服务试点工作，以点带面推动科技、教育、就业保障等领域的公益性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七）继续扩大国际合作

把握世界产业分工调整的机遇，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一是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承接国际高技术制造业、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的转移，加快培育与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相衔接的产业配套体系。二是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国内一些高技术企业进一步“走出去”，加快利用国外的技术、人才资源和先进管理经验，构建世界级的中国跨国公司。三是加大高技术产业领域国家合作和交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通过申请国外专利的方式形成和保护核心竞争力。

第十六章　信息产业

2005年信息产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全年信息产业增加值达到13100亿元，增长22.6%。

第一节　2005年信息产业经济运行状况

（一）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继续快速增长，全年完成销售收入38411亿元，增长24.8%，工业增加值9004亿元，增长28.2%，实现利税总额1742亿元，增长6.5%。一些主要产品产量继续增长，全年生产移动通信基站设备724万信道、微机8084万部、移动通信手机30354万台、彩电8284万台、集成电路266亿块，分别增长65%、35%、30%、12%和13%。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68亿元，增长22%。

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全年出口总额超过2682亿美元，增长29.2%，超过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1/3。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已形成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类产品、家电产品、电子元器件、软件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且范围不断扩大。手机、光通信设备、数字式程控电话交换机、彩色电视机、液晶显示板、路由器、笔记本电脑、光缆等产品出口额增幅都超过30%。软件出口额36亿美元，增长28.2%。

（二）电信业

电信业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全年新增电话用户9728万户，电话用户达到7.44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新增3868万户，达到3.5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新增5860万户，达到3.94亿户。全年实现电信业务收入5799亿元，增长11.7%。完成电信固定资产投资2071亿元。数据通信业务发展迅猛，收入增速为主营业务收入的2倍，收入占电信总业务收入的比重上升了0.6个百分点，固定本地电话业务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移动电话分组数据用户新增4494万户，达到7101万户，移动数据收入已占移动通信收入的16.4%，比上年增加2.4个百分点。各大电信运营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约20%，继续保持2004年以来利润增速高于收入增速的局面。我国电信市场进一步开放，在增值电信业务领域，民营企业已占主体地位。同时，外资进入的步伐明显加快，电信

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投资日趋活跃。

互联网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05年底我国网民数、宽带上网网民数、上网计算机数分别达到了1.11亿、6430万和4950万，分别增长18.1%、50.2%和19%。我国域名总数达到259.2万个，其中CN下注册的域名首次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09.7万个，增长153.9%。目前CN域名注册量在所有国家顶级域名中，稳居亚洲第一，2005年底全球排名上升7位，达到第6位。

（三）邮政业

邮政业全年完成业务总量623.6亿元，增长10.1%；实现业务收入574.7亿元，增长7.6%，增速提高6.3个百分点。邮政国际业务发展较快，完成业务量33.8亿元，增长17.6%。特快专递业务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较快增长，全年完成业务量2.29亿件，增长15.6%，实现收入65.7亿元，增长19.1%，均高于去年增速水平。

第二节　2005年信息产业运行特点

（一）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加值与销售收入增速回落，经济效益有待提高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工业总体水平，而销售收入增速低于全国工业总体水平，二者均比2004年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利润总额仅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全行业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6%下降到目前的3.4%，比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低约2个百分点，转变产业增长方式的要求十分迫切，产业发展正逐步迈人由速度规模型向创新效益型转变的关键时期。

（二）电子信息产品结构进一步调整

电子信息产业通信、计算机、家电、电子元件和电子器件几大行业中，增长最快的是电子元件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速分别高出全行业水平约15和27个百分点，收入和利润占全行业比重分别达到15%和24%，比去年分别提高2.2和5.7个百分点，利润超过通信设备制造业，改变了以往主要靠通信产品利润拉动全行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局面；其次是计算机业，利润增速高于全行业水平26.5个百分点，销售收入增速和实现利润低于电子元件行业；第三是通信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速高出全行业增速约5个百分点，但利润下降15.4%；电子器件和家电行业增长放缓，销售收入增速分别低于全行业增速6.5和15.2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比重有所下降。电子器件行业利润下降，而家电行业经济效益状况比上年大为好转，利润增长3.6倍。

（三）重大专项工程进展顺利

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研发工作胜利完成，已形成了国家标准草案。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核心网已联结国内几十个城市，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开

发、产业化和应用推广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第三代移动通信从芯片到终端、系统的产业链日趋完善，特别是TD—SCDMA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大规模商业应用奠定了基础。通过若干重大专项工程的实施，一批高水平电子信息产品实现了产业化，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四）电信业稳定增长，用户和业务收入增长趋缓

新增电话用户数量和电信业务收入增速均比2003年、2004年同期水平有所降低，两项指标呈现增长放缓局面。主要原因，一是电话用户渐趋饱和。我国住宅固定电话家庭普及率已经达到70部/百户，其中东部地区已接近普及；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超过75%，而在普及率较低的西部和农村潜在市场，受居民消费能力限制，还难以形成有效需求。同时，无线市话的增速减慢，对固定电话用户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下降。二是电信业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目前我国电信业还处于以投入为手段、以规模扩张为目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以创新为手段、以效益增加为目标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才刚起步，电信企业尽管在成本控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业务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在创造和引导新的信息消费需求方面，还受到体制、企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进展较为缓慢，在电信实际资费水平下降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单用户收入（ARPU值）逐年下降。电信运营企业亟待借鉴国际经验，提高业务和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传统语音业务以外的新业务，实现由传统电信运营企业向综合信息服务企业的转型。

（五）电信普遍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通电话行政村比重达到97.1%，圆满完成了十五计划指标任务。由于余下的未通电话行政村自然地理条件更差，建设难度更大，而我国电信普遍服务机制还未完全建立，今后的建设任务还很艰巨，应尽快建立电信普遍服务长效机制，推动农村通信发展。

第三节　2006年信息产业发展思路和目标

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信息产业要以落实“十一五”规划为主要任务，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为工作主线，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政策环境和创新机制，实施重大专项工程，大力提升产业层次，转变增长方式，推动我国信息产业继续做大，加快做强。力争明年信息产业增长速度超过今年水平，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将进一步扩展信息技术的应用空间；自主创新配套政策及相关产业政策等的实施，将使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

完善，信息产业投资仍将稳定增长，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预计2006年我国信息产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发展目标：信息产业增加值接近15800亿元，增长约20%。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销售收入达到46000亿元，增长超过20%，出口总额超过3200亿美元，增长约20%。完成电信业务收入7000亿元，增长约10%。新增电话用户约8000万户，电话用户达到8.2亿户。邮政业完成业务收入600亿元，增长约5%。

第四节 2006年信息产业发展的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一）完善产业创新机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贯彻落实中长期科技规划和促进自主创新有关政策，从机制上促进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人才激励机制。落实创新能力建设规划相关内容，大力推进信息产业领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做好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有关工作，提高核心产业技术水平。将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列为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支持的重要内容，加大国家投入，引导社会资金，完善产业创新体系，以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二）深化体制改革，推动三网融合

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完成全国邮政监管机构重组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组建工作，初步建立邮政普遍服务机制。强化电信监管体系，推动电信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建立政府监管下的电信市场有效竞争架构。通过电信和广电业务融合和利益共享，推动管理体制变革，推进三网融合进程，促进文化产业和信息服务业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政策，促进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增长

出台软件和集成电路、数字电视等产业政策，并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切实落实有关政策。在信息产业领域进行创业投资试点工作，形成以创业投资、产权交易为重要内容的投融资体系，促进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增长。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高技术项目在土地、信贷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外资企业与我国内地企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促进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向内地转移。

（四）加快建立通信普遍服务机制，推动新农村建设

研究制定电信和邮政普遍服务政策，加快建立通信普遍服务机制，继续组织开展"村村通"工程，提出"十一五"邮政普遍服务目标，落实保障措施，提高农村信息化

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五）采取综合措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协调，综合运用投资、外交、经贸、法律等各种手段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数字电视、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TD—SCDMA标准、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WAPI）、射频识别（RFID）和软件外包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扩大我国相关标准的应用范围，鼓励并引导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十七章　工交经济运行调节

第一节　2005年工交经济运行情况及重点工作

2005年，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加强经济运行调节，搞好综合协调，着力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障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加强综合协调，缓解煤电油运紧张状况

各方面高度重视煤电油运工作，针对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加强协调，增加供给，进一步加强需求侧管理，抑制高耗能行业过快扩张势头，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状况总体上比2004年有所缓解。

1. 加强协调，促进煤炭产运需衔接。开展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工作，加强煤炭经营监管，整顿规范煤炭经营秩序，开展了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工作。采取有力措施缓解秦皇岛港煤炭压港问题，保证了运煤大通道的畅通。及早组织做好夏季、冬季高峰期电煤供应工作，协调铁路、交通部门抢运煤炭，保障了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居民生活用煤需要。煤炭供需矛盾总体趋缓。全社会及主要港口、重点用户煤炭库存自4月份起明显回升，12月末直供电厂存煤2483万吨，比2004年底增加较多，处于正常水平。

2. 强化需求侧管理，做好电力运行调节。在夏季、冬季用电高峰期到来之前，提早部署有关工作，努力增加供给。针对空调负荷快速增长给电网平稳运行造成的困难，组织有关单位加强网省间电量余缺调剂，有效减少了部分城市电力供需缺口。加强需求侧管理，缓解高峰时段供电紧张，确保电力安全稳定运行。电力迎峰度夏期间，国家电网公司系统拉限电条次和损失电量同比分别下降61%和66%，南方电网公司系统拉限电现象也明显减少。全国夏季用电高峰电力最大缺口不足2500万千瓦，比2004年减少约1000万千瓦。

3. 统筹安排，保障国内市场油气供应。年初协调解决了北京天然气、采暖用燃油供应问题，确保首都尤其是重点单位用气和供热。二、三季度部分地区成品油市场供应趋紧，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广东、北京等地区的监测，协调有关单位增加生产、减少出口、加强调运，基本保证了市场供应。四季度以来部分地区天然气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对此加大了协调力度，督促有关地区制定并实施有序供气方案和应急保障预案，加强资源调度，强化需求侧管理，优先保证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用气。

4. 突出重点，加强重要物资运输协调。协调铁道、交通部门，加强运输组织，充分挖掘潜力和扩大运输能力，确保煤炭、石油、粮食、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针对二季度山西煤矿整顿、资源外运减少的情况，采取调整部分重点合同、加大周边地区煤炭货源组织力度等措施，保证了铁路大秦线运能的发挥。协调有关单位适时增加沿海运力，加快港口能力建设。全年铁路大秦线、侯月线均比上年增运 5000 万吨以上；沿海港口新增煤炭吞吐能力 4585 万吨。

5. 推进改革，加快建立长效机制。积极推进煤炭订货方式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2005 年煤炭产运需衔接会重点合同数量和兑现率都大幅提高，为全年煤炭稳定供应打下了良好基础。建立健全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长效机制，着手起草《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办法》和《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规划》。推动煤电价格联动的实施、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煤、电、油、气等产品的比价关系。经国务院批准，会同有关部门、地区和单位，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开展新疆石油开采秩序清理整顿工作，研究提出建立鄂尔多斯能源开发正常秩序若干意见。

（二）加强政策引导，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继续推动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有关产业政策的实施和配套措施的完善，加快淘汰电解铝自焙槽和落后小水泥等，抑制铜冶炼行业盲目扩张，支持大企业集团兼并重组，提高行业生产集中度。针对 2005 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亏损上升的情况，提出了促进工业企业利润稳定增长的对策建议。对水泥、铝、铜、煤炭、纺织等重点行业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加快这些行业结构调整的专题报告，并着手制定具体指导意见。此外，还就铅锌、平板玻璃等行业存在的盲目扩张问题进行调研，研究提出了促进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着力解决行业运行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协调有关方面，确保秦皇岛港煤码头扩建工程所需大型设备按期完成交货。协调有关部门和企业，动用国家储备缓解大型变压器生产所需取向硅钢片紧缺矛盾，保障了重点电力工程的建设需要。针对汇率机制改革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轻工、纺织行业造成的影响，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

坚持按季度召开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针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纺织、铜冶炼等行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预警，引导企业投资和新闻舆论方向，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引导，宣传政策，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做好应急物资保障，不断增强公共服务职能

做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物资保障工作，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落实流感防治药品储备，及时为安徽、新疆、广东等有关地区和单位紧急调运防控禽流感药物。讨论修改《国家医药储备管理办法》，做好防治大流感的应急准备。松花江水体受污染后，协调有

关省区和公路、铁路部门紧急抢运活性炭，满足了黑龙江省及其他方面的急需。推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加快建立应急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四）积极探索，加快推动现代物流发展和自主品牌建设

经国务院同意，建立了由15个部门和协会参加的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启动了全国现代物流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召开了全国现代物流工作会议，推进现代物流基础性工作开展，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积极做好推进品牌战略的有关工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完成了《加快我国自主知名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针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品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实施纺织品牌建设工程、促进我国纺织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第二节　2006年工交运行调节工作思路及行业重点工作

2006年，工交经济运行中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存在不少困难与挑战。主要是：煤电油运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紧张仍会存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国际油价、贸易摩擦等不确定因素更为复杂。

（一）经济运行工作思路及重点

经济运行工作基本思路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目标，加强行业引导；继续加强煤电油运综合协调，强化需求侧管理和节能降耗；大力推进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强应急响应体系建设，切实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保障工作；积极推进自主品牌建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进一步完善经济运行监测预警机制，加强保障与服务能力建设，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1.继续加强煤电油运有效衔接。加强供需双方衔接与协调。组织引导煤炭、电力、石油石化、交通运输企业稳定生产和供应，进一步提高安全运行保障水平，加强上下游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跨区域电力余缺调剂，坚持按照轻重缓急有序安排供应，保证重点地区、高峰时段的用煤、用电、用油、用气和运输需求。积极推进煤炭订货方式和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将协调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2.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产业政策，认真执行行业发展规划，做好铜、铝、水泥、煤炭、纺织及钢铁、铁合金、焦炭、电石等行业的清理整顿工作，抑制生产能力盲目扩张。主要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研究建立落后生产能力的退出机制。加快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发展高附加值及国内需大量进口的高端产

品，支持优势企业以资产、资源和市场为纽带，通过兼并重组做强做大，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

3. 全面加强需求侧管理。积极研究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能源、资源消耗的管理，促进节能技术的推广和节约型产品的使用。加快建立电力需求侧管理长效机制。选择部分高耗能企业，制定节能降耗年度控制目标，并监督实施。加快企业节能降耗的技术改造，加大对消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工艺和产品淘汰力度，研究实施强制性淘汰制度，建立有利于扶优汰劣的运行机制。

4. 继续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完成“十一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总体建设规划，加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全力做好应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及突发事件的后勤保障工作，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安排防治疫情的疫苗、药品以及消杀、防护等医药用品的生产、储备和调运。

5. 积极推进自主品牌建设。加快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品牌建设，着力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企业提升产品档次和加工深度，加强研发能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大力促进自主知名品牌，鼓励各行业、各产业集群打造行业品牌、区域品牌，重点支持和培育一批优势企业加强品牌设计、技术研发和营销渠道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努力提高自主品牌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

6.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积极营造现代物流发展的宏观环境，大力发展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的物流企业，建立完善、优质、快捷、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和运转效率。做好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综合协调工作。

（二）工交行业经济运行工作要点

煤炭：一是搞好产运需综合平衡。重点抓好迎峰度夏、冬季取暖两个用煤高峰季节，以及春节等重要节日和“两会”期间的煤炭供应；加强市场动态监测，做好应对台风、洪涝灾害等紧急情况下的煤炭调度，保障稳定供应。二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煤炭生产许可监管。提高开办煤矿和进入生产领域准入门槛，制定和实施中小煤矿资源整合、改造重组规划，完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制度，严格控制超能力生产，修订煤矿资源回采率标准和管理办法，提高集约化开采水平和资源回收率。三是加强煤炭经营监管，提高煤炭经营企业准入门槛，依法打击煤炭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四是继续推进煤炭订货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化的煤炭交易体系。

电力：一是加强运行调节，认真做好电力供需监测预测、电力电量平衡协调，着力抓好夏季和冬季用电高峰的调度工作，努力保证电网平稳运行。二是强化供电安全，督促电网公司、发电公司建立大面积停电应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和反事故措施，做好联合反事故预演工作。三是深入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力争在实施办法、专项规划、示范项目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着手研究制定相关政策，重点解决专项资金等关键问题。四是开展《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等电力运行法规的修订工作。

石油石化：一是继续加强石油石化行业运行的总量调节，密切监测油气生产运行动态和市场供应情况，组织企业适时调整加工量、进出口、库存。二是加强成品油资源调

运与销售管理，保证重点地区用油需要。三是密切跟踪国际石油市场变化及对国内石油供应的影响，及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四是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规范石油开采秩序的相关工作。五是认真研究2006年底我国原油、成品油批发市场开放对石油石化行业运行的影响，做好有关准备工作。六是全面贯彻《农药生产管理办法》，加强监督检查，做好农药生产管理及农业化学物质行政保护的相关工作。

冶金有色：一是加强对钢铁市场的监测和信息引导，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推动结构调整。二是贯彻落实制止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的有关政策，制定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促进铜工业结构调整。三是研究提出促进铅锌行业持续发展的政策意见。四是严格控制不符合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电解铝项目，规范氧化铝项目的建设行为，研究制定铝加工行业市场准入条件。五是研究提出有色金属行业节约资源、降低消耗以及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思路。六是支持国内短缺的钢铁、有色金属原料进口，开拓高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搞好行业自律，促进规范发展。

建材：一是跟踪分析宏观调控政策对建材行业的影响，做好总量平衡工作，加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防止局部地区短期新增生产能力过快增长。二是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下发加快水泥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提出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等行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意见。三是推动相关部门研究制订水泥工业综合利用的配套政策，研究制定建筑节能玻璃技术法规和政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四是重点支持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发展新型干法水泥，加速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生产集中度。五是研究有关推广高性能混凝土、限制立窑水泥使用方面的政策规定，完善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政策。

机械：一是积极促进重大装备的生产与配套，特别是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首台、首套的研制，做好保障和服务工作。二是大力引导农业机械和农副产品深加工装备发展，鼓励企业开发小型化、多样化的产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三是继续跟踪协调解决大型发电设备、大型石化装备、重型机械设备等产品超限运输难的问题，保证重点工程项目顺利进行。四是按照有关产业政策，继续在中小电机行业开展“以冷代热”工作，加大推进淘汰热轧硅钢片和使用冷轧硅钢片力度，组织中小电机行业开展高效、低噪音电机的研发、设计、制造和推广。

轻工：一是组织起草《糖业管理条例》，提出制糖行业结构调整的意见，落实糖精限产限销政策，依法做好糖精生产计划下达和执行监管工作。二是组织完成《促进白酒行业健康发展指导意见》，推进酒类立法进程以及白酒消费税税制改革工作。三是加强对食品、家电、造纸、皮革、包装、塑料制品等重点行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服务，加强调查研究，跟踪分析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及时协调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四是做好食品安全生产和品牌培育工作。

纺织：一是积极推进纺织行业结构调整，形成加快纺织行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并推动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二是加强纺织行业经济运行的监测预警，与行业协会定期联合召开季度纺织经济运行分析会，加强对行业的指导。三是针对行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重点对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调整、国际油价波动等对纺织行业的影响进行专题调研，及时提出对策措施建议。四是推动自主知名品牌建设，推进开展自主品牌的统

计、评价等基础性工作。

医药：指导行业生产、流通及地方行业管理工作；帮助骨干企业做好“十一五”规划；加快中药现代化和化学原料药出口基地建设步伐；做好医药储备管理工作，按照新修订的《国家医药储备管理办法》加强和完善医药储备管理；继续做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履约工作。

交通运输：一是建立季度运输协调会议制度，安排部署运输工作的重点，加强铁路、公路、水路运输衔接，充分发挥综合运输网络的作用，提高运输效率。二是在铁路运输能力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鼓励和引导企业多采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方式，减少汽车运输对环境的污染。三是继续抓好春运及重点物资的运输协调。四是继续抓好铁路道口管理工作，争取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文件，以保证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的安全、畅通。

第十八章　服　务　业

2005年，各地更加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把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扩大就业、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全年服务业增加值为73395亿元，增长9.6%，其中，批发零售餐饮业17119亿元，增长11.4%；运输邮电业13805亿元，增长12.4%；金融保险业6188亿元，增长9.8%；房地产业8125亿元，增长5.3%；其他服务业28158亿元，增长8.1%。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3%，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8%，回落1.2个百分点。

第一节　2005年服务业发展的特点

（一）现代服务业增长加快，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现

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会展、中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蓬勃发展，各种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提升了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

（二）服务业发展向中心城市集中，部分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开始显现

在相当多城市中，服务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特别是人口高度密集、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心城市，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均较为强烈，对服务产品供给的拉动大大强于非城市地区。

在大城市，部分服务业呈现出集群化发展的态势，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按照现代理念统一规划，依托交通枢纽，将商务楼宇、星级宾馆、商业设施以及相关的生产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地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形态美观、内外联通、生态协调、资源节约，具有较强服务产业集聚能力的区域。这些集聚区通过服务业产业集聚降低了经营成本，提升了区域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持续增长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服务性消费持续增长，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增幅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

支出2224元，增长10.7%。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实际增长6.2%，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757元，增长22%。城镇居民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方面的支出都保持快速增长，消费结构正在升级。

（四）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

2005年服务业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2675亿元，比去年增长20%，增速分别比第一、第二产业低7.5和18.4个百分点。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上年的60.2%下降到56.8%，下降了3.4个百分点。

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5个行业实际完成投资占服务业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86%左右。可以看出，服务业投资虽然在三次产业中比重较高，但绝大部分投入了交通运输、水利、环境、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行业上，这是必要的。但对发展潜力较大且能够大量吸收就业以及亟须产业化、市场化的服务行业，急需加大投资力度，促进其尽快发展。

第二节　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观念、体制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服务业发展还相对滞后，仍然存在着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不能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是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200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3%，比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1.1%仍然低10.8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64%低20多个百分点，差距较大，明显偏低。服务业的发展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是内部结构不合理。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比重仍然较大，约占40%左右，新兴行业如信息、咨询、文化、科研开发、教育、旅游、房地产、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服务业，比重仍不足30%。

三是产业素质和竞争力有待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总体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不高，服务效率和附加值低。交通运输等部分行业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三节　2006年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深化社会事业和垄断行业改革

加快推进服务业体制改革，对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等应该和能够市场化的领

域，尽快放开市场准人，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维护公众利益；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推动电信、铁路、港口、民航、公用事业等行业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创造条件、鼓励竞争和加快发展。对部分利益关系较为复杂、改革难度较大的服务行业，要先行试点，积极推进，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

（二）加快事业单位和后勤服务改革

进一步明确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对营利性公用服务单位，要逐步改制成独立的市场主体，实行企业化经营，加快推进产业化进程。继续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向社会化服务转变，研究咨询、会议培训、公务接待、物业管理、饮食、交通、医疗等服务，可以通过招标、委托代理等方式由社会服务机构提供。

（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继续开放服务市场，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地区总部，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服务业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有序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提高我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和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对外服务贸易的规模、层次和水平。支持有条件的服务企业到境外投资，鼓励境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扩大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

（四）加大政府对服务业的投入和引导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继续增加对文化事业、卫生事业、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扩大服务供给，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国家在财政预算内建立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并逐步增加规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建立相应的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引导社会多渠道增加对服务业的投人。重点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新兴行业的发展以及服务标准的研究制定和服务业培训工作。

（五）拓宽投资融资渠道

要逐步完善融资服务体系，疏通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渠道，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服务业。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进入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通过股票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多渠道筹措资金。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应服务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服务质量。鼓励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和信用担保机构对运用新技术、新业态的中小服务企业给予积极支持。

（六）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服务业提高竞争能力的中心环节，逐步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制订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大力提高企业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业整体技术水平。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和创新现代服务方式和业态，深化专业分工，再造服务流程，开拓增值服务。鼓励服务企业通过大力发展自有技术和核心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市场信誉和服务水平，创建自主品牌。

（七）引导服务消费

提倡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引导城乡居民增加服务消费，营造有利于扩大服务消

费的社会氛围。完善职工休假和作息制度，倡导职工利用休假时间进行旅游观光、康体健身、文化娱乐等健康有益的服务消费。推广分期付款、租赁服务等灵活多样的服务消费形式，增加信用消费品种，扩大消费市场，拓宽消费领域。

（八）加快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加大对就业培训、职业介绍、劳务输出等就业服务的投入，规范劳动者、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市场行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加强劳动保障制度和维权体系建设，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九）推进服务业市场体系建设

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政府定价产品的听证、审议等价格形成机制，合理调控价格。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针对服务业中行为不规范问题，要完善监管措施、加大惩处力度。

（十）加强服务业法制建设

抓紧制定和完善服务业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和行业准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服务业的规范有序发展，创造适宜的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加强服务业法制宣传教育，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服务业执法人员的素质以及依法办事能力。

（十一）完善服务行业标准

加快制定和完善服务行业标准，积极引进、采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标准，提高服务行业规范化水平和服务质量。对尚无标准的行业，鼓励企业、地方和行业协会先行制定服务标准，主管部门要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提出国家或行业服务标准。

（十二）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加快信用征集和信息披露立法进程，制订服务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评估技术标准，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服务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建立服务企业信用信息库，积极推进信用信息公开，实现信用信息的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建立健全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提高信用产品质量，改善信用产品供给，积极培育信用产品的市场需求。

第十九章　旅　游　业

第一节　2005年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全面增长

全年入境旅游人数1202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468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2.1%。全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29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国内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528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和12.2%。春节、“五一”和“十一”三个“黄金周”出游人数分别为6902万人次、1.21亿人次、1.11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9.1%、16%、10.5%；实现旅游收入分别为313亿元、467亿元、415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8.1%、20%、16.6%。全年出境旅游者310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5%。

（二）旅游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

一是旅游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红色旅游产品走俏市场，观光产品的配套服务得到改善，工农业旅游示范点进一步拓展，景区（点）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继续推进，旅游精品战略正向纵深发展。二是市场主体培育得到强化。旅游企业的网络化、集团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旅游企业的改制、改造稳步推进，外商投资旅行社的数量继续增加，资本的多元化趋势更加鲜明。通过举办首届“中国旅游投资洽谈会”，为有效利用境外及社会资本搭建了“平台”，拓宽了旅游投融资渠道。三是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协作得到加强。通过完善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等制度，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形成。四是区域旅游合作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旅游统一大市场的发展进程。

（三）旅游市场秩序继续好转

加强以出境游为重点的旅游市场规范治理工作，针对“零负团费”等侵害游客权益的行为，加大了治理工作的力度。推出了“诚信旅游活动”，倡导诚信守法经营，引导游客明白消费。不断创新市场管理机制，运用综合措施，推进了旅游行业管理和规范治理旅游市场秩序工作的深入。坚持“以人为本”已成为旅游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完善旅游质量监督，进一步强化了对游客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发放《出国旅游须知》等，在为游客提供咨询的同时，积极引导游客理性消费和文明旅游。

（四）启动红色旅游发展工作

贯彻落实《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配套完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重点打造100个左右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强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红色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促进红色旅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三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国红色旅游发展工作会议”，对全国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联合中央和国务院13个部门印发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精品线路名录。安排预算内专项资金7亿元，支持了52个主要是抗日战争题材或红军长征题材的红色旅游重点景区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安排了5.1亿元投资用于支持韶山、井冈山、延安三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安排1.44亿元用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设。

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一是旅游景区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开发建设的景区，由于游客量急剧增长，加上原来的规划滞后和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景区城镇化、商业化日益严重，一些不可再生的遗产资源受到毁坏，景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二是旅游企业的“诚信”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广大游客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国内居民出境游的服务质量亟待提高。三是游客出行过于集中，不利于旅游企业和景区的平稳正常运行。近年来，春节、“五一”和“十一”三个“黄金周”国内游客出行规模都占到全年总规模的1/4左右。游客出行过度集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日显突出，加大了铁路、民航、公路等旅游运输组织难度，不利于旅游企业确定合理的经营规模、人员规模，加大了其经营活动的组织安排难度和相关成本，也加大了旅游资源的保护压力和旅游安全风险，难以保证服务质量。四是国内部分知名景区先后以调节游客流量为由，大幅度提高门票价格，加重了游客经济负担。

第二节 2006年旅游业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

（一）发展目标

2006年，旅游行业要抓住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有利时机，围绕扩大内需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领域，以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动力，促进旅游产业体系建设，提升旅游产业素质，综合发挥旅游产业功能，为“十一五”旅游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2006年全国旅游业发展预期目标是：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3亿人次，增长8%。其中，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达到5050万人次，增长8%；入境外国人达到2210万人次，增长9%。旅游外汇收入达到328亿美元，增长10%；国内旅游人数达到13.1亿人次，增长8%；国内旅游收入达到5830亿元，增长10%。旅游业总收入达到8490亿元，增

长10%。出境旅游人数达到3400万人次，增长10%。居民出游率达到98.6%。旅游业新增就业50万人。

（二）工作重点

1. 进一步巩固提高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尽快打破狭隘的“门票经济”，创新产品，细化服务，拉长产业链，扩大产业面，把扩大就业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研究制定扩大旅游就业的政策措施，加强旅游就业服务和规范管理，启动旅游就业援助工程，为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重点，探索旅游扶贫新模式，积极研究制定旅游扶贫促进计划。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可以紧紧围绕旅游业中的食、宿、行、游、购、娱等六大要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相关产业，构建服务体系，开发特色产业和商品，吸引资金、管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移动，推动贫困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2. 推进“诚信旅游”建设，着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探索建立旅行社批发和零售体系，实现旅游市场组织网络的制度突破。建设旅行社、饭店和导游人员的“诚信信息库”，提供公开透明和制度化的信息渠道。开展“诚信旅游示范单位”试点评选工作。完善旅行社和导游职业的准入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进一步强化导游年审、考核工作，完善导游员IC卡管理系统，推动导游人员社会化管理。继续开展“抓行风、树形象、促发展”活动，加强行风评议和公共监督。联合推出“诚信旅游神州行”系列宣传活动，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氛围。充分发挥旅游行业协会在推进诚信建设中的作用，结合行业协会的改革，建立、完善行业自律制度，加强行业自律能力建设，倡导和鼓励各类经营单位增强信用意识，共同推出“万家企业共建诚信”活动，引导诚信经营活动向纵深发展。与部分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探索建立“诚信旅游”互动合作机制。坚持把确保游客安全放在第一位，建立规范的旅游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针对近年来国内游客自助游增多的趋势，加快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加强高速公路沿线、旅游城镇和景区为自助游客的服务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重点旅游城市车站、机场游客信息中心建设。

3. 积极推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工作方式，促进绿色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旅游业环境友好、资源可永续利用的优势，实施绿色行动计划，把旅游业建设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兴产业。总结推广环境保护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总结推出资源节约型的旅游经营模式，总结倡导环境友好型的旅游消费模式，促进实现旅游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订相关的标准，推出“生态旅游景区标准”，完善和推行各种绿色经营标准，形成建设绿色产业体系的工作框架。要鼓励和推进绿色经营，创建绿色旅游企业，鼓励企业参加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鼓励绿色旅游消费，促进旅游者提高环保意识。

4. 加强宣传促销力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旅游合作。继续实施“奥运—旅游”计划，抓紧制定“世博—旅游”计划。进一步强化中国整体国家形象宣传，积极组织各地和旅游企业参与奥运、世博促销。继续抓好对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欧美、东南亚等主要客源市场的系列促销活动，重点抓好中日旅游交流年系列活动、美

国“中国之夜”大型活动；积极做好印度、南美、中东等潜在客源市场的开发前期工作。组织会展、高尔夫、邮轮等高端旅游产品的专题促销。以产品为纽带，启动中国“国际旅游精品库”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国旅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对全球分销系统的利用，做好旅游网上博览会，发挥信息化促销功能。进一步发挥旅游对外交和对港澳台工作的积极作用。继续做好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各项准备工作，促进海峡两岸旅游互动。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地区的旅游合作，完善粤港澳合作机制。做好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开放和后续管理工作。

5. 以规划为龙头，加快推进旅游区域合作，打造一批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旅游精品和精品旅游线路。继续抓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精品线路和重点地区建设，促进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2006 年及“十一五”期间，要集中力量，重点做好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川滇藏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以及鄂豫皖大别山、长江沿线、古丝绸之路沿线、青藏铁路沿线等旅游线路的区域合作规划，整合资源，打造精品，提高国际竞争力。

6. 进一步加强旅游法规和行业标准建设。积极推进依法治旅，抓紧完成《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和《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三个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进一步加强旅游标准化工作，根据《全国服务标准 2005—2008 年发展规划》，完善旅游标准体系，加紧制定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俗旅游、国家旅游度假区旅游等产品标准。研究制订自驾车、滑雪、温泉旅游等专项旅游标准。加快制订绿色饭店标准、“酒店综合评价体系”、汽车旅馆和“旅游电子商务标准”等管理标准。

第二十章　房地产业

2005年，针对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商品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供应结构不合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等突出问题，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引导和调控，取得了积极成效。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的势头得到控制，过热的购房需求开始降温，房地产供求关系得到改善，房价涨幅逐步放缓。

第一节　2005年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

（一）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

全年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5759亿元，增长19.8%，增幅比上年回落8.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10768亿元，办公楼投资740亿元，商业营业用房投资2000亿元，分别增长21.9%、13.4%和16%，增速比上年分别回落6.8、14.9和15.4个百分点。从5月份起，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已持续8个月低于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二）土地供应总量得到控制，土地开发面积和房屋竣工面积大幅回升

据国土资源部动态监测，全年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总量比上年减少20.2%，经济适用住房用地供应量所占比例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全年购置土地面积3.82亿平方米，减少4%，增速比上年回落9.4个百分点；完成开发面积2.08亿平方米，增长5.2%，比上年提高16.6个百分点。全年竣工房屋面积4.88亿平方米，增长14.9%，比上年提高12.8个百分点。

（三）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增幅下降，定金及预收款增速大幅回落

全年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21178亿元，增长23.4%，增速比上年回落6.5个百分点。其中，企业自筹资金7039亿元，增长35.2%；利用外资252亿元，增长10.4%；国内贷款3835亿元，增长21.4%；定金及预收款7749亿元，增长4.8%，增速比上年回落39.6个百分点，占全部到位资金比重比上年下降6.5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低。

（四）商品房价格涨幅趋缓

据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查显示，2005年下半年以来，各类房地产价格小幅波动、涨幅趋缓，部分热点城市房价稳中有降。第四季度，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5%，涨幅回落3.6个百分点。其中，经济适

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和高档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分别上涨3.9%、6.8%和9.3%，除经济适用住房价格涨幅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外，后两类住房价格涨幅分别回落4.8和3.2个百分点。二手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8%，涨幅回落12.6个百分点。非住宅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回落2.6个百分点。房屋租赁价格同比上涨1.6%，涨幅回落0.4个百分点。

（五）过热的购房需求得到初步抑制，住房供求关系得到改善

通过采取调整住房税收政策和贷款利率，以及限制期房转让、实行购房实名制、控制拆迁规模等一系列措施，过热的购房需求得到初步抑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在上年下降40%的基础上，又下降了13.6%。40个重点城市全年商品住房累计成交面积同比下降3.2%，有7个城市降幅达20%以上。投机性炒房得到有效遏制，自住性购房所占比重开始上升，一些热点城市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销售量上升，市场供求关系得到改善，成交量逐步趋于稳定。

（六）房地产市场秩序逐步规范

各地进一步加大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工作力度，一些地方开展了整顿房地产广告、商品房销售活动等专项整治活动，7月份以来，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销（预）售商品房案件。同时，通过加快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建设，建立网上投诉等信息反馈渠道，增强了市场的透明度。这些措施，对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 当前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地区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房地产市场供应体系还不完善，住房梯次消费及一、二级市场联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土地增值收益，忽视房地产市场供求结构调整，对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开发重视不够。截至2005年底，40个重点城市中，有23个城市套型在12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占累计可售商品住房面积50%以上，有16个城市8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所占比重不足10%。2005年经济适用住房完成投资比上年下降6.8%，占商品住房开发投资的比重仅为5.2%，比上年又下降了1.7个百分点。由于调整住房供给结构一般需要2年的周期，一段时期内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偏紧状况仍将持续。

二是部分地区商品房空置面积有所增加。2005年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约1.43亿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15.7%，而上年是下降8.3%。其中，商品住宅空置面积0.83亿平方米，增长12.4%，而上年是下降15.6%；商业营业用房空置面积0.39亿平方米，增长23.2%，增幅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空置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商品房为0.79亿平方米，所占比重为55.6%。

三是投资投机性需求以及被动性需求反弹压力依然存在，部分地区房价仍然上涨较快。由于家庭投资渠道较少，投资购房仍是部分居民首选；一些城市拆迁、建设规模较大，引发的被动性住房需求扩张较快；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影响，一些境外资本借机进入房地产市场投机套利等，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中心城市仍面临较大的房价反弹压力。2005年第四季度，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涨幅比三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有3个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0%。

四是房地产市场秩序仍有待规范。目前房地产开发、交易和中介行为总体上还不够规范，违规开发、合同欺诈、哄抬房价、伪造合同骗贷等违法违规行为还时有发生。

第三节 2006年房地产业发展重点和调控政策措施

2006年，要以“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价格基本稳定”为目标，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积极引导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着力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切实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加强城市规划和土地供应管理，继续适当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土地供应，停止别墅类项目土地供应，严格控制大户型、低密度高档住宅以及商业营业用房土地供应。抓紧做好2006年和2007年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安排及其发布工作。严格执行土地出让前置条件中的规划设计条件、套型面积标准等控制性指标，以保证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对一些尚未开工或有条件的在建商品住房项目，要鼓励开发企业调整规划设计方案，增加中小户型住房。

（二）加强房地产市场综合监管，进一步整顿规范市场秩序

继续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严肃查处开发和销售环节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合理控制城市拆迁和建设规模，规范拆迁行为。结合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信用档案建设，进一步完善预（销）售房屋的即时合同备案和实名制购房制度，强化预售款监管。严格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企业诚信建设，促进行业自律。严格土地管理，加大对囤积、炒买炒卖土地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强化房地产用地供前、供后监管。严格税收征管，加强房地产企业会计信息的审计和监督。加强信贷管理，加大对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监督力度，控制不合理的房地产贷款需求。

（三）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引导和鼓励居民住房消费

完善有区别的税收政策，减轻普通居民住房消费负担，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促进住房梯次消费。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调整经济适用住房定位，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监管机制和实现方式。严格集资合作建房管理，坚决制止以集资合

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配或房地产开发等违规行为。进一步完善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制度，落实以财政预算为主的资金来源渠道，加快制定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年度目标和计划。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创新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住宅发展模式，提升住宅品质。推进房地产金融制度创新，拓宽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渠道。规范房地产信托市场，加强房地产市场境外融资监测。加快个人征信体系建设，规范发展住房消费信贷。完善土地增值税等有关税收征管政策，规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章　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把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使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迎来了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2006年中小企业工作将加快体制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全面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为“十一五”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工作扎扎实实开好局、起好步。

第一节　2005年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

（一）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截止到2005年底，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数已达到4242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6%，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430多万户，个体经营户达到3921.6万户，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的588.7万户，第三产业3332.9万户。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5%，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58.9%，上缴税收占48.2%。

据统计，2005年中小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增长30.9%，销售收入增长30%，实现利润增长26.9%，上缴税收增长34%，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年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新增800多万个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年末在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到3.49亿人；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增长到2.07亿人。2005年，非公有制企业（不含外资）出口总额达1489.8亿美元，增长47.3%，较全国商品出口增幅高18.9个百分点。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出口已占全省出口的近40%，超过国有及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出口第一军团。目前，一批有实力的非公有制企业已走出国门，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生力量。

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和就业扩大的生力军。

（二）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和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是建国以来第一份全面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文件。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相继出台了有关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改进政府监管等方面17件具体政策文件。各省市也出台了具体措施和配套办法200多件，22个省市成立了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进一步开展非公有制企业治乱减负工作，截至2005年底，取消涉及非公有制企业不合理收费2385项，查处“三乱”案件1885件。有利于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三）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

1. 逐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各级政府把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原则，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作用，鼓励培训、信用担保、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管理咨询、市场开拓、国际合作等社会化服务机构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专业知识培训、创业辅导、信用信息征集、技术创新、国际市场开拓、公共服务采购和服务体系建设。到2005年底，各类中小企业综合服务机构已达250多家。继续实施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全年对5万多名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了免费面对面培训和网络远程培训。积极推动“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组织社会资源为1.9万户企业进行了免费创业指导和创业综合服务。举办了中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全国共有9822户中小企业上网发布了招聘信息，提供就业岗位近12万个。进一步完善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开通了38个省级、地市分网，为几十万户中小企业免费提供政策、市场信息。

2. 努力缓解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大力推动担保体系建设。出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对跨省区或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设立与变更有关事项的通知》，对2.8万多户中小企业开展了信用等级评价和信用信息征集。开展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转贷款、担保贷款等业务，2005年用于中小企业信贷规模突破100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倍。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达50家，融资额达120亿元。目前，全国已设立中小企业担保机构2188家，累计受保企业达19万户，累计担保金额约3000多亿元。

（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国家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重点鼓励中小企业自主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填补市场空白；支持中小企业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产品质量。从1999年开始，国家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扶持了5000多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协作配套关系，促进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积极培育各类专业技术服务机构，逐步建立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支持平台。利用

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2亿元专项资金，共支持300多户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项目，带动了约60亿元的社会投资。实施了“国家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推动建立了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联盟，启动“百万中小企业上网”，全面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目前，中小企业发明的专利和研发的新产品分别占总量的66%和82%，中小企业已成为技术与机制创新的主体。

（五）企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鼓励企业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强内部管理，促进中小企业由“传统家族制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2005年底，在全国私营中小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已超过180万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65%。引导中小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建章立制，建立安全、环保、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制。强化劳动合同管理，依法维护中小企业职工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开展中小企业管理咨询服务，2005年20个省市的62个咨询服务机构为593家小企业开展了管理咨询服务，取得了明显效果。

（六）企业整体素质提高，结构调整加快

引导和推动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注重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业促就业；优先发展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繁荣市场、扩大就业；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截至2005年底，广东、浙江、江苏、福建、上海等东部沿海省市产业集群发展迅速，集群经济已占到全省工业的50%左右。产业集群覆盖到纺织、服装、皮革、家用电器、汽摩配件、五金制品、工艺美术等大部分传统行业，目前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以及文化产业等高技术和新兴领域也开始迅速发展。

（七）国际合作和交流成果显著

2005年是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最活跃、成果最多的一年，我国分别与美国、法国等5个国家签署了《中小企业合作协议》。积极参加APEC和OECD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继续在APEC发挥积极作用。牵头成立了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开展了中法、中德、中意、中英、中美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暨中法中小企业博览会，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3522家中小企业，以及163家法国中小企业参展，签订贸易、合作、投资协议2.3万个，总签约金额426亿元。成功举办了首届东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与投资高层研讨会，会议发表了《北京倡议》。

第二节 2006年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2006年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局，紧紧围绕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努力开创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一）推进政策法规体系建设

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和《若干意见》，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文件。主要是有关市场准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管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鼓励创业、信用担保、培训、信息化、对外合作等政策措施。

（二）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坚持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以及突出服务性的原则，重点围绕信用担保、投资融资、创业辅导、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管理咨询、市场开拓、经营管理、国际合作等领域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综合服务组织和专业服务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作用。引导各类服务机构转变观念、改进服务作风，提高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质量。要增强“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的系统功能和服务能力，将中小企业信息网络建成覆盖全国的大型信息网络和服务平台，成为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平台，改善中小企业的信息利用条件，推动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

（三）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建立健全产学研相结合的中小企业创新支持体系，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推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联合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信息化，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大力节约资源、能源，加强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发展。2006年重点推动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支持平台建设，在有条件的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支持建立示范平台。鼓励大学、科研院所、大企业开放科研基础设施，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研发、试验、检测等支持和服务；继续组织实施“国家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在开展调研、组织培训、举办展览和论坛等各项活动的同时，推动20万户中小企业上网，初步实现信息化。

(四) 推动中小企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

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大力发展主导产业、优势特色产业、农畜产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淘汰、禁止、限制发展污染严重、低水平、浪费资源的中小企业。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人力和资源优势，推进产业转移，促进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发展。2006年要提高企业集聚度，优化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加强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引导和规划，开展成长型产业集群评价工作，建立重点产业集群联系制度，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区域国际品牌工作试点，推广产业集群产业升级示范区建设经验，促进形成一批有特色，有规模，体系完整、科学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五) 深化企业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引导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创新，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服务和监管。引导和监督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鼓励和支持企业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强内部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思想、管理体系、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引导中小企业建立和完善安全、劳动、财务等各项规章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坚持逐步推进，分类指导，积极开展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管理上等级活动。

(六)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培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队伍素质

加强中小企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中小企业素质，是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迫切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财政的引导作用，统筹规划，分类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形成科学的培训工作服务体系；加强培训内容和方式的创新，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率；以精简高效为原则，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多层次，多类别的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素质。2006年继续实施“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探索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建立适合国情的中小企业学院和职业经理人培训体系，进一步提高培训工作的质量，逐步规范中小企业培训市场。

(七) 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开发适宜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内外上市，扩大直接融资渠道。规范和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创业投资机制，支持中小投资公司设立和发展。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补偿机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按照《中小企业促进法》要求，加紧制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研究制定担保业的监管意见和再担保模式方案，加紧制定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展的扶持政策，尽快明确担保机构设立与变更审批程序与管理办法；下发第五批对担保机构实行免税名单。继续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加快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征集体系和评级发布制度。

(八) 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请进来”

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鼓励东部地区有实力的中小

企业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形式，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动中小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加快中小企业出口产品由初级工业制成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深加工制成品转变，培养和扶持--批品牌出口产品。鼓励企业在境外建立资源开发型、技术开发型、贸易型实体以及技术研发机构，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和产品出口。多渠道、多形式吸收外商资金，把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智力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招商引资水平。加强与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交流，落实 CEPA 协议，做好内地与港澳中小企业合作各项工作。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国内外展览、展销活动，在总结前两届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提高，把第三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办出品牌。

（九）加强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监测与分析

及时跟踪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运行动态，定期发布统计信息。在部分省市开展健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统计监测体系试点工作，在统计口径、指标设置、报送方式、数据处理、信息发布等方面积极探索，做好统计监测和生产经营分析的基础工作。继续开展中小企业成长性评价，建立全国成长型中小企业基本信息库，向各金融机构和全社会进行推介。

第二十二章　城镇化

2005年，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镇体系更加完善，城镇空间布局趋于合理。

第一节　2005年城镇化进展情况

（一）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向大中城市转移，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

2005年底，全国设市城市661个，城镇人口5621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3%，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全年农村常住户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达10038万人，首次突破1亿人大关，比上年增加685万人，增长7.3%。其中，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就业的劳动力占总数的65.1%，大中城市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体系逐步完善

目前，全国GDP的70%左右、工业增加值的60%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0%左右都来自城市。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较快，集聚人口和产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更加显著；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成为振兴和繁荣区域经济的重要载体，全国综合经济指标排名前1000位的小城镇，平均吸纳人口近8万人，人口最多的小城镇已容纳近100万人。全国661个城市中，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分别为4个、283个和374个，东部、中部和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城市数分别为263、227和171个。

（三）城市建设投资稳定增长，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城市建设投资增长稳定。根据建设部统计，全年完成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5200亿元，增长9.2%。“十五”期间，全国城市建设完成投资1.99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7%。城镇基础设施有效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关系居民生活的城市用水、燃气、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公共服务不断加强。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改造力度加大，部分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得到一定改善，全国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达到395公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日益深化，住房消费全面启动，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2000年的20.3平方米提高到26平方米。

（四）产业和人口进一步集聚，城市群发展逐步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我国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不仅是就业和居住的密集区，也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域。2005年上半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99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37%；进出口额占到全国2/3以上，其中进口占全国的81%，出口占74%。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中原、长株潭等城市群也在发展壮大，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

（五）加强改革探索，城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进一步改善

各地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河南、内蒙古等地进一步降低了进城务工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规定，要求将工伤、医疗保险逐步覆盖到进城务工人员。一些城市着手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和子女教育问题，建设了一批“农民工公寓”，创办了专门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中小学；还有一些城市实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就学享受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的待遇，并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一是缺乏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的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城市布局结构不合理，相邻城市之间发展不够协调，不利于形成分工明确、布局科学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二是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指标，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三是一些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四是城市规划和管理脱节，市政工程缺乏统筹规划和建设，综合管理能力滞后，影响城市运行效率，一些城市“城中村”和“城市贫民区”问题比较突出。

第二节　2006年推进城镇化工作重点

2006年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城镇化发展要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健全体制机制，推进城镇化发展。

（一）分类引导，推进农村人口平稳有序城镇化

一是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继续实行亦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法定假日和安全保护等方面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二是对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创造条件使之逐步转为城市居民，依法享有当地居民

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三是对因城市建设导致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城市政府要立即将其转为城市居民，并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失业保险或最低生活保障等。四是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应从调整产业结构的源头入手，通过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和总量控制等方式，间接调控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逐步形成用经济办法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机制。

（二）科学布局，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合理规划，引导城市群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一是已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要继续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区域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二是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三是人口分散、资源条件较差、不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重点发展现有城市、县城及有条件的建制镇，成为本地区集聚产业、人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中心。

（三）统筹协调，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规划城市规模与布局，要符合当地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地质构造等自然承载条件，并与当地经济发展、就业空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相适应。一是加强城市水源地保护和供水设施建设。缺水城市要适度控制城市规模，禁止发展高耗水产业和建设高耗水景观，地下水超采城市要控制地下水开采，防止地面沉降。二是统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破除部门和地区分割，在统一规划基础上协同建设，减少盲目填挖和拆建，进一步加强城市防洪、抗震、消防等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三是以实现城市的环境价值和社会有序发展为主要目标，稳步推进城市危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保障拆迁户合法权益。四是城市规划和建设要延续历史，传承文化，突出特色，切实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资源。五是强化城市规划实施的监管，推进城市综合管理，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四）深化改革，健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快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一是加快推进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与户籍挂钩的就业、工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制度改革，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方面取得突破。二是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和政策，形成税收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机制，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改革规划体制，进一步明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各类规划的功能定位，规范规划编制程序，形成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的统一规划体制。四是改革城镇化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在国家统一的法律、规划、政策框架下，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城镇化管理体制。

第二十三章　地区经济

2005年，各地区坚持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努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

第一节　2005年地区经济运行特点

（一）绝大多数省份增速低于上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减缓

2005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大地区的生产总值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12.7%、12%、12.5%和13.1%。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放慢而有所减缓。

（二）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快于其他地区，地区产销率保持较高水平

2005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大地区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0.1%、16.8%、21.5%和20.4%，与上年相比，增幅均回落2—3个百分点。四大地区工业产品销售率水平分别为97.98%、98.09%、98.22%、98.09%，与上年相比，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产销率水平提高，东北和中部地区略有回落。全国有18个省份的工业产销率高于全国98.1%的平均水平，其中东部地区占7个，西部地区5个，中部地区4个，东北地区2个，排在前6位的分别是天津100.6%、湖南99.6%、云南99.4%、新疆99.1%、重庆和青海均为98.8%。

（三）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东北地区增幅最高

2005年，四大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30.6%、39.3%、31.9%和22.4%，东北地区投资增速最高。与上年相比，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增幅分别提高1.2和5.8个百分点，中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回落3.7和2.3个百分点。

（四）地区消费稳步增长，市场价格涨幅回落

2005年，四大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4%、13.4%、14.1%和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13.5%、12.9%、12.4%和13.6%。与上年相比，增幅分别提高2.2、2.5、1.9和1.7个百分点。全国31个省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在10%以上。四个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比上年上涨0.4%、0.42%、

1.53%和0.7%，涨幅分别比上年回落2.61、2.1、2.56和1.55个百分点。全国有6个省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低于上年。

（五）地区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除中部地区外出口增长均快于进口

2005年，四大地区进出口贸易分别增长23%、19%、18.7%和23.5%，与上年相比，分别回落8.5、7.4、20.4和12.7个百分点。全国有13个省份的进出口贸易超过全国23.2%的平均增长速度。四大地区出口贸易分别增长25.1%、31.5%、18.4%和28.8%，与上年相比，东北地区增幅提高7.7个百分点，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回落1.7、22.7和7.3个百分点。四大地区进口贸易分别增长20.3%、6.1%、19.3%和18%，与上年相比，分别回落17.8、23.1、17.2和18.2个百分点。

第二节 2006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各地区协调互动

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成果，继续推进退牧还草，支持建设石油、稀土、钾磷肥等特色资源加工基地；积极培育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旅游和特色农牧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着力提高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继续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点企业改组、改造。搞好东北地区煤炭、石化、钢铁、装备等重点行业的调整改造，抓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和棚户区改造以及采煤沉陷区治理。加大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有关政策措施的研究力度，加强中部地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加强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继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经济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循环型社会的有效模式；着力构建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等大都市经济圈的区域经济协作机制，促进大都市经济圈加快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强化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陆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二）继续抓好区域规划试点工作，并积极探索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的互动机制

上半年，完成京津冀大都市圈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规划编制和上报工作。在全面总结区域规划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选择几个对我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跨省区地区开展区域规划研究工作。加快编制并出台《区域规划编制办法》，提出有利于规划实施的配套措施，加强对地方区域规划工作的指导力度。积极探索区域规划实施与区域政策的协调互动机制。抓紧开展主体功能区划问题的研究，明确各类功能区的范围、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配套政策。

（三）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城乡协调互动的良好局面。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调整农业结构，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加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力度，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和重大建设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扶持，努力改善贫困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促使贫困地区加快脱贫致富，进一步做好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试点工作。加快修订壮大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提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政策措施。

（四）加快推进国内国际区域合作

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积极扩大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合作。加大调研深度，进一步研究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探索区域合作新机制及模式。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一步拓宽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以图们江、澜沧江—湄公河、东盟、中亚、中蒙区域经济合作为重点，进一步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区域合作。

（五）促进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积极做好重大环保项目建设工作，继续抓好“三河三湖”、环渤海、南水北调沿线、三峡库区、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力度，加快淮河流域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建设。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抓好重大环保技术与装备产业化示范。加大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力度。继续开展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和防．治荒漠化。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树立节约和保护资源的意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

第二十四章 西部开发

2005年，在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西部各地区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开发取得新进展。

第一节 2005年西部大开发进展情况

（一）国家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财力性转移支付和各项专项补助达2050多亿元，中央各类建设资金投入约950亿元。安排国外优惠贷款规模26.7亿美元。批准发行企业债券77亿元。在国家重大项目布局上，西部地区新开工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农村建设等10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1360多亿元。国家投入带动了社会投入，西部地区全年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6004亿元，增长30.6%。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390亿元，增长12.7%。

（二）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一批重点工程建成并发挥效益

青藏铁路提前一年全线铺通，遂宁—重庆—怀化铁路基本完工，西安—郑州客运专线等一批铁路项目开工建设。县际公路工程基本建成，“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全部开工，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0000公里。西宁、满洲里等10项机场新建、改扩建工程完工。内蒙古尼尔基广西百色、四川紫坪铺等水利枢纽工程相继下闸蓄水，安排了168座病险水库加固、92个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等项目，重点解决了43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农村水电装机容量260万千瓦。继续安排建设了一批城市及县城供水管网、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全年新增电话用户1500万户，新增光缆线路长度6.7万公里。

（三）生态环保建设稳步推进，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国家出台有关政策措施，促进各地区进一步巩固生态建设成果，西部地区共完成退耕地还林74.3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67.7万公顷，封山育林66.3万公顷，退牧还草666.7万公顷。天然林保护工程新增营造林96.1万公顷。京津风沙源治理面积新增62.1万公顷。继续实施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工程。新建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湘黔渝交界地区锰污染治理和晋陕蒙宁交界地区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清

理整顿活动取得初步成效。

（四）加快推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重点区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国务院召开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工作座谈会，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加强了对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指导和协调。西部地区石油、天然气勘探取得新进展，地质储量明显增加。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特色农牧业、旅游业等资源优势明显的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企业规模和实力明显增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投资、引进技术和人才的综合能力明显提高，一些重点企业在机械装备、仪器仪表、信息通信、生物制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增强。军工企业军转民技术开发力度加大。

（五）社会发展领域的投入力度加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

国家安排30亿元资金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程，安排15.4亿元向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费发放教科书，使西部地区近1700万名学生受益。安排30亿元资金支持西部地区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地方病、艾滋病防治和预防接种等工作得到加强。“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范围扩大，农村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基本实现。“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流动放映“2131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稳步推进，“送书下乡”、“文化下乡”、“科技下乡”等活动取得良好成效。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加大。

（六）“东西合作”进程加快，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东西合作呈现出加快发展势头，初步统计6年来东部地区企业累计到西部投资已达3万家，投资规模近6000亿元。西部地区涉外经济较快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451亿美元，同比增长23%。全年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1.3%，增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年累计输出境外各类劳务人员约3.5万人。满洲里、二连浩特、河口、瑞丽、阿拉山口等沿边对外开放重点城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

（七）人才开发工作明显加强，西部开发法制建设积极推进

全年累计培训县以上西部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干部1500人次，选派449名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东部地区挂职锻炼，选调257名拔尖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到国家科研机构学习研修。从东部地区选派146名青年博士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服务，组织120余名院士专家赴西部地区开展咨询服务，8600多名高校毕业生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加强对各类人才的专题培训，累计培训各类人才5万余人次。组织对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项目全部建成投入使用。《西部开发促进法》制定工作稳步推进。

第二节　2006年西部开发工作重点

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按照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2006年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重点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促进西部地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在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加快解决西部地区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聚精会神谋发展，加快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逐步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各地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更加重视抓住国家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机遇，着力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机会。要更加重视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国家要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促进"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二）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新开工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加快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并做好项目储备。确保青藏铁路通车运营，推进郑州—西安客运专线、宜昌—万州线、洛阳—湛江铁路等重点铁路建设，加快"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西部开发8条省际干线公路建设，支持西部地区国、省道改造和沿边境重要口岸公路等建设。抓紧完成云南文山、贵州荔波等14个机场建设项目。加快在建水利重点工程建设，新开工甘肃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等水利工程。继续加强西部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进一步健全西部地区通信网络，推进西部地区邮政普遍服务。

（三）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搞好"五个结合"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通知》精神，计划全年安排退耕地还林地26.6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地106.7万公顷，开展配套基本口粮田建设试点。在2005年已预安排666.7万公顷的基础上，再安排退牧还草333.3万公顷，开展退牧还草工程中期评估。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等工程，推动南方石漠化地区、甘肃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青海湖周围地区等重点区域的生态保护和治理工作，促进生态自然恢复。继续做好西部地区大江大河水污染治理和中心城市环境整治工作。

（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

加强统筹规划和指导，加快培育和建设若干油气、大型煤炭、大型水电、石油化

工、有色金属、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着力壮大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切实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支持西部地区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和土地合理利用。推动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和提高引进水平。指导有条件的重点开发区域和重点企业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五）着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全面落实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基础教育费用减免、改善高等教育基础条件等政策措施，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继续抓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和救治体系建设，扩大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加大中央财政补贴力度和补贴范围。继续扩大“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实施范围。做好文物、历史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支持公益性、基础性科研机构能力建设。以推进具有西部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继续支持农村地区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西部地区“通达”工程和“通畅”工程、农村客运点、农村公路和渡口建设。加快农村沼气建设。启动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完善部分省份农村电网改造。加快解决高氟、高砷、苦咸水、缺水地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加强扶贫工作，做好生态敏感地区人口的易地搬迁工作。支持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和就业指导。

（六）引导重点区域集约发展

组织开展重点地区开发规划工作，促进产业聚集、人口集中和经济集约发展，形成若干能够带动和促进周边地区和农村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极。鼓励和支持综合条件较好的城市群地区和省会城市地区，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完善城市功能，着力调整提升工业结构和企业技术水平，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资源富集地区要加大资源勘探力度，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合理有序开发资源，调整优化资源工业合理布局，促进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建设。加快沿边重点城镇的对外开放步伐，发展有特色、有竞争力的区域合作经济。继续支持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全面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计划。

（七）全方位推动人才开发

进一步调整、完善和落实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政策措施，编制实施“十一五”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东部省市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培训计划。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进一步抓好东西部地区之间公务员对口培训。积极开展面向国际和其他地区的引智工作，继续实施“博士服务团”、“西部之光”等人才开发专项工程。围绕三峡库区建设、青海三江源保护、国家重要资源基地建设等，加强专门人才开发。研究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就业。有计划地在全国建立若干西部人才开发基地。

第二十五章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2005 年是中央振兴东北各项政策全面落实，各项工作全面展开的一年。振兴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开始受到触动和得到解决，发展的基础更为稳固。

第一节　2005 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和成效

（一）中央关于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各项政策全面落实

在黑龙江、吉林两省率先试点的基础上，免征农业税政策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2005 年中央财政对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农村税费改革给予转移支付、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等支持。继辽宁之后在黑龙江、吉林两省推开并完成了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任务。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率先在东北三省八个行业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加大了对东北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和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财政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安排 1478 亿元贷款额度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减免表外欠息和核销呆坏账工作。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 29 条政策意见。国土资源部与振兴东北办联合下发《关于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矿产资源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了东北地区土地和矿产资源利用的优惠政策。国务院还出台了解决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问题的政策，并选择确定了首批试点城市。

（二）国家商品粮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

国家安排东北地区良种补贴、扶贫开发等资金 18.36 亿元，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17.89 亿元，提高东北地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并且采取了稳定粮食价格、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政策，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极大发挥。农垦在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国家安排了东北地区 26 项总里程 979 公里的粮食主产区公路建设，批准 43 个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深加工。

在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试点的基础上，继续开展重点水土流失区域的治理，国家安排 52.89 亿元支持黑龙江、吉林和大兴安岭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生态建设工程。

（三）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积极进展，重点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取得重大突破

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黑龙江省将106户国有企业列入改制计划，92户已经完成任务。吉林省对816户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施了改革攻坚并基本完成改制任务。辽宁省60%以上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80%的国有中小工业企业完成产权制度改革。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功联合重组为鞍本钢铁集团，具备了年产钢2000万吨、销售收入1000亿元的水平；大连造船和大连新船两大船舶生产企业合并成立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造船能力达到全国年造船总量的1/5；黑龙江哈量集团成功并购了在国际工量具行业中技术水平属世界一流的德国凯狮集团；大连机床与华中数控合资兴建产业化基地，同时还收购了美国英索尔公司的生产制造公司和德国兹默曼公司；沈阳机床成功并购德国希斯公司；沈重集团重组了沈阳低压开关厂、机电研究设计院等优良资产，并同步实施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重组后的企业告别了近十年的亏损，多项经营指标创造了历史新高；推动民营资本进入东北，并购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如山东晨鸣纸业收购了严重困难的吉纸股份，重新启动了生产；浙江逸盛公司在大连建设50万吨QTA项目；特变电工与沈变实施战略重组后，企业效益较大幅度提高。截至2005年12月末，共启动了东北老工业基地218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使鞍钢、东北特钢、一重、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大庆石化、吉化、抚顺炼化、一汽、哈电站设备等一批重点老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四）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范围稳步扩大，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阜新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以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接续替代产业的态势已基本形成。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工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转型三年来全市实现再就业13.1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净减少11万人，GDP增速由“九五”时期的2.1%上升到近三年的20%以上。辽宁与内蒙古开展经济合作支持阜新矿业集团开发内蒙古白音华煤矿，促进阜新市富余矿工和生产能力的有序转移。

国务院批准把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范围扩大到大庆、伊春、辽源等石油、林业、煤炭类型城市，并在大连召开了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座谈会，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和长效机制。试点城市大庆、伊春、辽源经济转型规划已经制定，试点工作正在全面有序展开；伊春林区的林权改革试点也已启动。

东北三省加快推进了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成片棚户区改造。国家投资32.78亿元用于15个沉陷区项目的治理改造。拨款2.2亿元在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上支持辽宁棚户区改造。目前辽宁省已率先启动了治理工作，拆迁棚户区765万平方米，开工建设758万平方米，安置棚户区居民10余万人。吉林、黑龙江两省正在抓紧制定棚户区改造方案。

（五）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推进，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哈大客运专线、东北东部铁路通道项目的前期工作进展顺利。铁岭至朝阳高速公

路、黑龙江大兴安岭洛古河界河桥、黑河大桥等项目的前期工作也在加快。开工建设了通化至下排高速公路等工程。大连新机场及漠河、鸡西、长白山等支线机场前期工作正在进行。大连大窑湾港区集装箱码头二期工程，营口港深水航道、集装箱码头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广东核电与中电投联合建设大连红沿河核电站协议已经签订。国家还核准了沈阳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规划和前期建设工程；制定了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地区）电力发展中长期规划，建设了方牡敦包等输电线路，黑龙江南输电力加大。此外，在东北及蒙东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大型煤炭生产基地的工作也正在研究、规划之中。沈阳—大连城市群、长春—吉林工业带和哈大齐工业走廊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也在积极推进。推进了资源型城市、重点企业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和黑龙江、吉林省生态省建设工作，加大了城市供水管网改造，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网配套建设的力度。

东北三省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建设，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软环境。同时，举办了一系列国际性会议，积极宣传振兴东北政策，切实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人才、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也积极组织考察、调研，献计献策，做了大量工作。

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顺利，东北地区的形势特别是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一是经济快速平稳增长。三省地区生产总值 17129.9 亿元，增长 12%，高出全国 GDP 增长率 2.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 6374.5 亿元，增长 16.2%。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三省粮食总产量达 1484 亿斤，在去年大丰收、实现粮食总产量 1446 亿斤的基础上又增产 38 亿斤，增长 2.7%。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5 年，东北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 6903.8 亿元，增长 39.3%，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 12.1 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主要投入了工业特别是技术改造项目。三是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2005 年，东北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571.1 亿美元，增长 19%。其中，出口总额为 319.8 亿美元，增长 31.5%，比全国出口总额增速高出 3.2 百分点。四是社保、就业工作双推进，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双增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合计分别为 2419 万、1267 万、1740 万和 849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下降了 0.08、0.03 和 0.9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 18.6%、24.6%、22.7%；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10.7%、10.8%、12.8%；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 7.2%、8.8%、7.3%。

但也要看到，东北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一些影响长远发展、决定振兴成败的根本性、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管理方式不先进和整体盈利能力不强；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生态建设滞后和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十分突出。

第二节　2006年工作要点

2006年是“十一五”时期的第一年，是全面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第三年，也是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各项政策全面推出、各项改革实施攻坚的关键之年。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继续深化改革、努力扩大开放，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着力研究解决影响老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东北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振兴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更大突破，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

一是继续抓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认真组织好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争取用三年时间解决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问题。推动化解不良债务、豁免企业历史欠税的政策措施出台。尽快出台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二是努力推进老工业基地的各项改革。坚持发挥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做好黑龙江伊春市的林权改革试点工作。研究制定促进东北地区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同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扩权强县改革。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开放更多领域，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国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支持东北三省办好有关国家级重要展会。进一步推动沿边开放和图们江流域国际合作。做好“俄罗斯年”有关各项工作。加强与内蒙古东部盟市的协作和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与港澳台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四是努力建设现代化大农业。推进农业的规模化、基地化、产业化经营。加强尼尔基下游配套灌区建设，进行黑龙江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及其他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等重大水利工程。继续抓好大型商品粮食基地、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种子工程、植保工程等重大农业项目，扎实推进东北大型国家商品粮基地建设。进一步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大力发展以大宗农产品和优势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大力推广发展现代化养殖业。充分发挥农垦系统优势和示范作用，建设现代化的大农业。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全面规划和启动有东北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是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重点推进东北地区具有发展优势的钢铁、装备、造船、煤炭、石化、汽车、森工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改革、结构调整和产业集聚，打造东北优势产品品牌。积极推动沈阳—大连城市群、长春—吉林工业带、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实施产业集聚。进一步推动鞍钢、本钢联合重组进程，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推动吉林、黑龙江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尽快将农产品深加工、生物化工、现代服务业、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成为新优势产业。在装备制造、原材料等优势产业和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支持一批高技术产业化、技术创新和科研项目建设。在重点发展领域建立国家研发中心、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坚持开放式创新，支持企业引进消化再创新国外先进技术。

六是加强以交通、能源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开工建设哈大客运专线、东北东部铁路通道、长春吉林城际铁路等项目，对滨绥、绥佳等铁路实施扩能改造。建设哈尔滨、沈阳、大连集装箱中心站和长春集装箱办理站，逐步构建东北地区双层集装箱运输通道。加快铁岭至朝阳等高速公路建设。启动大连、漠河、伊春、鸡西、长白山等机场建设等。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大型煤炭生产基地，促进煤电联营和综合开发。利用内蒙东部和黑龙江煤电丰富的优势，加快建设坑口电站，实施“西电东送”和“北电南送”。推进辽宁核电站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推进大庆天然气田和管道建设。加快大连国际航运中心和东北边境口岸设施建设。

七是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制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起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从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国债和中央预算内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集中扶持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建设一批能够充分吸纳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的项目。国家和省在安排重大项目时，要适当向资源枯竭型城市倾斜，加快培育建立新产业。国家政策性银行要在各自经营范围内为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企业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继续抓好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工程，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原中央下放煤矿企业棚户区改造任务。

八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现有森林植被的保护，增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体系建设、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东北西部荒漠化治理、防沙治沙工程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加强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大型灌区建设和节水技术改造。保护松花江、辽河、黑龙江水环境，重点解决松花江、辽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严格控制‘耕地占用。力口强基本农田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加大黑土区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好珍贵的黑土地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型城市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

九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切实解决森工、煤矿、军工等困难行业、困难企业职工的就业和医保问题。认真落实职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支持和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地方政府组织政府投资项目时，尽可能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大力开发公益性工作岗位，增强贫困人群的脱贫能力，切实改善城市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要加强农民工、失业人员的岗前培训。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推进文化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综合文化站建设。大力发展集文化、体育、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东北特色旅游。

第二十六章 市场流通

2005年，我国市场体系建设步伐继续加快，多层次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各类别的要素市场框架正在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市场竞争程度和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市场运行规则和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

第一节 市场体系发展状况

（一）市场规模继续扩大

全年批发零售餐饮业实现增加值171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实现增加值13805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各类商品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门类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格局。

（二）以市场为主导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确立

随着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化，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现了市场定价。房地产、劳动力、产权、信息、技术市场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供求调节。在金融市场上，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上限已基本放开。基本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有价证券发行价格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

（三）统一开放的市场格局进一步巩固

国有经济稳步发展，非国有经济快速增长。在市场准入方面，一些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陆续出台。民航、电力、电信等垄断性行业逐步引入竞争机制。在保险市场、证券市场、产权市场、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以及银行业中都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开放。贸易政策的统一性、规范性和透明度不断提高。

（四）市场法制环境得到改善

针对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国家出台了《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等法律法规，基本上建立起与市场体系正常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市场运行规则体系，使市场法制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有关部门加大了行政执法力

度，促进了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和有序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

（五）粮、棉、糖等重要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取得明显进展

一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已全面放开，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和调控功能逐步完善，地方储备特别是粮食销区的储备得到加强，产销区协作关系初步建立，粮食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二是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进展顺利，按照“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路子”，积极推进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棉花收购、加工等环节初步形成多渠道竞争的局面。同时，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工作目前已进入全面推行阶段。三是规范糖料收购秩序，继续推动糖料和食糖生产走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之路，建立糖料生产者与制糖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机制。

市场体系建设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一是市场体系中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较快，要素市场的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东中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二是市场准入制度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标准过高，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制约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三是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同时并存，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四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价格欺诈问题突出，失信现象大量存在，社会信用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

第二节　2006年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

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依法规范政府行为，加快市场准入监管体系建设，实行市场准入程序的公开化，增加市场准入的透明度，完善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废除各种妨碍公平竞争、构成市场壁垒的行政规定。

（二）抓紧完善要素市场体系

一是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努力消除各种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体制性因素，创造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社会环境。二是健全技术市场，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三是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四是促进信息市场不断发展，规范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

（三）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加快农村商业流通体系建设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积极推进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推行入市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继续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工作，搞好连锁“农家店”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促进农产品销售。加快农产品标准化步伐，健全质量检验检测体

系，提高食用农产品安全水平。继续完善全国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网络，努力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省际互通。

（四）继续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改革方向，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各类商品货畅其流、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加快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促进商业、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焕发活力。以完善市场功能、发展新型商业业态为重点，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第三方物流等现代流通方式。继续深化粮食、棉花、化肥等重要商品的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

（五）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强对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规划，明确政府部门、信用管理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市场主体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责任，协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树立诚信意识，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建立信用信息公开制度，引导经营主体建立信用自律机制。建立健全惩戒失信行为的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化手段，强化监督措施，依法惩处违规失信行为。

（六）继续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点是，围绕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格执法，坚决打击社会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制售假冒产品行为，有效遏制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局面，维护消费者和生产厂家的利益。强化协同监管，逐步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反商业欺诈长效机制。规范税收执法，健全税收征管体系和税务监督机制，堵塞税收流失漏洞，严惩偷逃骗税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第二十七章　粮食流通

第一节　2005年粮食流通工作情况

2005年，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粮食流通工作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粮食流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积极稳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2005年，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加强对改革的分类指导，及时总结和推广山东莱州、章丘等县级粮食部门的改革经验，以点带面推进改革。总体上看，粮食流通体制、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都取得重大突破。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三老”历史包袱逐步得到解决。截至2005年底，全国国有粮食企业职工总数113.45万人，其中购销企业74.52万人，比上年分别减少52.83万人和30.25万人，减幅为31.8%和28.9%。在做好减员分流工作的同时，各地积极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累计安排国有粮食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27.48万人，占减员分流职工总数的52%。安徽、北京、广东三省（市）已经完成了政策性挂账从企业剥离和上划工作，河北等19个省（区、市）完成了政策性挂账的认定，天津、山西、辽宁等7个省（区、市）完成了现场清理审计并正在进行政策性挂账的认定。截至2005年末，全国老粮库存427亿斤（其中陈化粮227亿斤），主要集中在河南、吉林、黑龙江等省，其他省份已基本按计划销售完毕。

国有粮食企业产权制度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05年底，国有粮食企业调减到27831个，其中购销企业17714个。国有粮食企业中已经改制的达到16837个，其中购销企业改制10852个，分别占企业总数的60.5%和61.3%。

粮食产业化经营发展较快，企业扭亏取得成效。据初步统计，到2005年底，全国国有粮食企业中规模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442个，其中购销企业712个。粮食企业经营出现好转，亏损大幅下降，全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亏损总额为92.4亿元，比上年减亏160.28亿元，剔除企业历史财务包袱利息和处理老粮价差损失、支付改革成本等因素，当年可以实现扭亏。

（二）加强粮食调控

按照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确定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着力抓好粮食收购工作，发挥储备调节作用。2005年，国有粮食企业全年收购粮食2307亿斤（贸易粮），占全社会粮食收购总量的63%，较好地发挥了主渠道作用。

针对早籼稻收购季节出现的粮价下行压力的情况，及时启动早籼稻和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加强对预案实施的指导和监督。截至2005年底，按最低收购价收购早籼稻95亿斤，收购中晚籼稻150亿斤，合计占各类企业籼稻收购总量的54%。

配合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在新粮上市时采取暂停轮换出库和先轮入后轮出等办法，有效避免打压市场粮价。及时下达中央储备粮年度轮换计划，督促和指导各地充实地方粮食储备。

继续做好军粮、退耕还林粮等各项政策性粮食供应工作；贯彻实施新的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开展社会粮食供需平衡调查，全面掌握全社会粮食流通和供求情况。

（三）加强全社会粮食流通监管

认真贯彻《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按照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重点抓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收购资格审核、统计制度、中储粮代储资格认定、质量监管等一系列配套规章的贯彻实施。加快建立粮食市场准入制度，各地按规定进行粮食收购资格审核，鼓励多元市场主体人市收购。按照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分3批共受理2000余户企业申请，经审核批准1679户企业的代储资格。

组织开展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库存检查。在各地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分两批对15个省（区、市）、137个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140亿斤粮食库存情况和质量与卫生情况进行抽查。

各地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体系建设取得一定进展。有23个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了监督检查机构。制定了监督检查工作规程和行政处罚程序等配套办法。组织开展监督检查人员行政执法培训，有1.2万人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加强粮食执法检查和市场监管，认真查处了一批涉粮案件，维护了粮食流通秩序。

（四）推动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编制要求，编制完成粮食行业、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粮油加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全国粮食现代物流建设规划。组织研究起草"十一五"粮食流通科技发展指导意见。组织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等重大项目课题。

进一步完善粮食批发市场重点联系制度，建立大中城市成品粮批发市场重点联系制度和成品粮油价格周报制度。制订和发布国家和行业粮油标准4项。启动粮食收获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面向全社会开展标准质量信息服务。颁布粮油保管员等粮食行业7个特有工种国家职业标准，建立了33个粮食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在全行业推行粮食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深入推进“放心粮油”工程，开展放心粮油进农村活动，改善农村市场环境，促进农民消费。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粮油名牌战略。组织开展纪念“世界粮食日”和“爱粮节粮宣传周”活动，成功举办广西粮油精品展交会和2005中国（四川）粮油精品展示交易会。出版发行《粮油食品营养与健康知识百问》10万册，传播粮油科技知识，提高公众食物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二节　2006年粮食流通工作重点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巩固和发展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成果的关键之年。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建立稳定粮食产销关系，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切实保护好种粮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主要任务是：

（一）继续完善粮食流通体制，积极推进和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

一是积极稳妥地解一页企业历史包袱。继续加强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财务挂账清理审计、认定和剥离工作的指导。研究提出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性挂账的处理办法，为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造条件。二是努力做好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工作。认真做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切实将支持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充分利用企业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企业的有效资产，兴办企业实体，开展多种经营，扩大就业空间，增加就业岗位，安置富余人员。三是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理顺政企关系，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合理调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布局，积极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企业组织结构创新。认真研究粮食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办法，探索对国有粮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有效形式。四是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加强对粮食市场建设的规划、指导和扶持，防止盲目重复建设，提升市场服务功能。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非国有资本进人粮食市场，优化粮食市场主体结构，促进多元粮食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进一步消除粮食流通中的体制性障碍，逐步形成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生产的流通机制。五是继续加强对产区、销区、产销平衡区改革的分类指导。密切关注和重点掌握各地区尤其是主产区在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抓住关系改革的关键和重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建立县级粮改联系点制度，继续总结推广县级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典型经验，促进改革的整体推进。

（二）健全粮食调控体系，努力实现粮食供求紧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按照“基本立足国内保障粮食供给，努力保持粮食供求紧平衡”的要求，进一步加

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一是根据粮食的产需和供求情况，适时适度地做好市场调控工作。努力做到粮食总量、品种、结构基本平衡。加强粮食供给薄弱地区的粮源，确保粮食市场稳定。二是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积极做好粮食购销工作。在保持粮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健全启动机制、补贴机制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价格保护机制。引导企业积极人市收购，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三是进一步加强中央储备粮行政管理，完善中央储备粮轮换机制。妥善解决国债投资建设粮库的产权归属问题。及时下达年度轮换计划，指导和监督有关企业均衡做好储备粮轮换工作，积极推进储备粮轮换的公开化、透明化，使储备粮轮换更好地适应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四是加强地方储备粮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进一步充实地方粮食储备，优化储备布局和品种结构。五是继续做好军粮、退耕还林粮等政策性粮食供应工作，积极搞好库存老粮的销售。在不打压市场粮价的前提下，妥善处理陈化粮，尽可能利用资源，减少损失。六是继续加强粮食统计和监测预警工作，完善粮食应急机制。

（三）建立健全粮食产销区稳定的购销关系和衔接机制，大力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

引导和促进产区与销区优势互补、企业与农民利益协调，是促进粮食生产和流通协调发展的关键。一是逐步建立产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适当调整粮食风险基金支出结构，支持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和发展产销合作。二是强化促进粮食产销衔接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产销区利用各自优势，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开展深层次合作。加大对产销衔接运输、银行结算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协调解决产销合作中遇到的运输、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三是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加快以粮食购销、加工企业为龙头的粮食产业化体系建设，积极培育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和发展粮食订单生产、订单收购，引导企业与农民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并带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实现粮食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粮食规模化经营，使农民在粮食流通和粮食产业化经营中切实得到实惠。

（四）抓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粮食行政执法体制

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相关配套规章，继续抓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各项制度建设；加强对各级储备粮和政策性用粮进行监督检查，继续组织有关部门和地方开展粮食库存自查和抽查，全面掌握粮食库存的动态变化情况，为做好粮食宏观调控工作、实现紧平衡调控目标提供准确依据；健全省级监督检查机构，逐步将监督检查体系建设向市县延伸，重点推动基层的行政执法；建立粮食经营者诚信档案和监督检查执法信息网络系统；完成《“十一五”粮油标准发展规划》的编制，加强粮食国家和行业标准、陈化粮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推进和规范全国粮食质量调查与品质测报。

（五）全面启动粮食行业“十一五”规划纲要，加快粮食现代物流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

积极推进和组织实施《全国粮食现代物流设施建设规划》和“十一五”粮食物流重

大项目、重点工程；认真落实“十一五”粮食流通科技发展指导意见，做好重大科技项目管理和前期启动工作，有效促进粮食行业科技进步；启动农村粮食产后安全保障工程，指导农户家庭安全储粮，减少粮食产后损失；继续推进“放心粮油”工程，深入开展“放心粮油”进农村活动；高度重视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逐步建立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第二十八章　棉花流通

第一节　2005年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2005年，按照国务院确定的“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路子”的精神，积极推进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进展顺利，国内棉花市场流通秩序较好，市场调控取得成效。

（一）棉花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

棉花收购、加工多渠道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据统计，全国具备收购加工资格的棉花加工企业8000多家。2004年度（2004年9月1日—2005年8月31日）棉花收购中，供销社系统以外企业收购棉花数量占社会收购量的47.5%左右，预计2005年度（2005年9月1日—2006年8月31日）所占比例进一步提高。棉花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推进，郑州棉花期货交易和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电子撮合交易积极发挥功能作用，反映棉花供求、引导价格走势、促进商品棉有序流通。

（二）棉花市场管理和质量监督进一步加强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主要产棉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严厉打击无照经营、混等混级收购以及掺杂使假等行为，棉花企业质量意识增强，没有发生恶性质量违法案件，棉花市场运行基本平稳，流通秩序良好。

（三）棉花产业化经营在积极探索中发展

各地对棉花产业化经营进行了积极探索，有的地区以供销社棉花企业为龙头，上联纺织企业，下联棉花合作社；有的以纺织企业为龙头，吸收棉花收购加工企业、棉花种子公司等组建企业集团，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管理规范、效益良好的产业化龙头企业。

（四）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进展顺利

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圆满成功。棉花加工企业和公证检验承检机构按照棉花质量检验新体制进行的试点工作达到预期目的，提高了棉花加工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改革试点成功的基础上，2005棉花年度开始全面推开改革。

(五) 加强市场调控

2004年度我国棉花丰收，但纺织生产和出口增长较快，供求矛盾依然突出。为平衡供需缺口，稳定国内棉花市场，在年初按照加入世贸承诺发放进口关税配额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变化两次增发进口配额140万吨，满足了纺织工业的需要。增加发放的棉花进口配额采取滑准税方式征收进口关税，以保护棉农利益。继续实行收储新棉的政策，稳定棉花市场。在国际市场棉价较低时，组织进口部分棉花入储，增强了国家调控能力，促进了棉花市场稳定。

棉花流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棉花加工能力过剩，市场秩序混乱的隐患依然存在；棉花中混入异性纤维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棉花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

第二节 2006年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工作重点

2006年，要继续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的要求，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管理，规范流通秩序，保证棉花质量，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市场稳定。

(一) 全面推行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

继续做好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推行工作，密切关注、指导检查改革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协调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切实落实改革各项优惠政策措施，研究新的支持政策。完善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改进回潮率在线测量等设备，加快完善国产检验仪器。按照规划要求合理布局棉花加工企业和承检机构实验室，做好企业更新改造和实验室建设。

(二) 进一步加强棉花市场和质量监管

加强对棉花市场的监督，依法查处、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依法加强棉花质量监督，加强收购和加工环节质量规范，严厉打击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混等混级、质量与标识不符等违法行为。继续贯彻落实《避免在棉花采摘、交售、加工过程中混入异性纤维的暂行规定》，做好排除异性纤维的工作。

(三) 加强棉花市场调控

建立高效的调控运作机制。视市场供求和价格情况，适时采取收储或投放储备棉等措施，保持棉花市场的基本稳定。在国际棉价较低时适当购进，弥补国内市场缺口或补充国家储备。加快建设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密切跟踪监测国内外市场产购销存情况和价格走势，科学预测，建立定期的权威棉花信息发布制度，积极引导棉花产业发展。

第二十九章　人　　口

第一节　2005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情况

（一）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

2005年，全国出生人口1617万人，净增人口768万，年末总人口达到13075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9‰。至此，“十五”计划确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9‰以内，到2005年总人口控制在13.3亿以内的计划目标顺利实现，中央确定的“十五”期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圆满完成。

（二）农村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能力继续得到加强

中央政府继续安排预算内专项资金，支持中西部地区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建设，建成县级计划生育服务站项目250个，中心乡（镇）服务站试点项目166个，完成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中西部农村计划生育服务网络落后的状况继续得到改善。

（三）人口和计趾生育工作的利益导向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

中央财政共安排4亿元专项资金，地方财政安排2亿多元资金用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目前，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23个省（市、自治区）和山东、西藏的36个县。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其他省（市）继续按照国家统一要求自行进行试点。已经纳人国家试点范围的奖励扶助群众达到93万人，加上自行试点地区，2005年奖励扶助制度覆盖的受益群众已经超过135万人。“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继续推进，在试点的宁夏、云南、青海，共兑现奖励资金10640万元，其中中央补助1560万元，地方财政支出9080万元，受益群众达到31.3万人，有效地推进了计划生育工作思路从以惩罚多生为主向以奖励少生为主的转变。

（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得到加强

出生缺陷干预工作继续得到加强，有近800万妇女接受了优生筛查，近3000万妇女接受了多种形式的优生科普宣传、咨询、指导，优生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同时，在出生缺陷高发地区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指导活动，全面提高预防能力，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普及优生科普知识的健康教育活动，宣传婚检的好处，唤起全社会特别是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积极参与。

（五）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治理工作取得进展

国家继续加大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力度，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目标考核责任制，坚决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行为业已收到明显成效。“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有24个省（区、市）以不同形式成立了“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活动覆盖112个市（地）、325个县，另有569个县自主开展试点工作。

第二节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形势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压力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生人数可能出现回升。主要原因，一是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年均增加270多万人；二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的独生子女（1亿人左右）正陆续进入婚育期，使每年政策内出生人数增加100—200万人；三是全国已明确禁止中、大月份人工流产，将使出生人口增加。总体看来，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群众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农村计划生育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和部分农村地区计划外生育问题仍比较严重，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2000年达到117，比正常值103—107的范围超出很多，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30。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主要是性别选择的结果，是传统观念影响下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偏差的结果，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综合治理。目前随着工作力度的加大，这种状况开始好转，但性别比与正常值相比依然存在差距，需要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但会对婚姻家庭形成严重冲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其潜在的社会风险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三）流动人口群体庞大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推测，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约有1.4亿人，绝大部分进入了城市，其中进城务工农民超过1亿人。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带来了冲击，也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受体制、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量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很难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各项公共服务，他们遇到的困难已经不局限于就业和劳动保障层面，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社区生活、计划生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有着普遍的边缘化趋势。

（四）人口老龄化影响深远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总量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和城乡差异大等特点。老年人口的逐年攀升，使我国社会养老资源不足、老年服务体系不健全、应对机制不完善和社会心理准备不充分等问题日益凸现。未来五年，老龄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继续上升，社会保障问题将更加突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社会压力将明显增大。

第三节　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人口计划

2006年人口计划总目标为：年末总人口为131740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

（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

1. 稳定低生育水平，努力开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局面。继续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利契机，把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抓紧抓好。继续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做好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

2. 全面推行农村计划生育两项制度，加强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继续按照“巩固成果，逐步扩大；完善制度，规范操作；因地制宜，增强实效”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启动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困难扶助制度试点工作。同时，继续深入推进计划生育“三结合”活动，努力做好以救助贫困为重点的“幸福工程”。加强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政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促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3. 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和人口文化，推动先进思想、文明观念、政策法规和科普知识进村入户。扎实推进“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建立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跨省协作机制，在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的地区开展集中治理活动。

4. 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规和地方条例，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深入学习贯彻《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检查。推动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的修订工作，推动建立流动人口以居住地为主的管理服务机制。完善区域协作制度，加强对流动人口较多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督查。做好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刑事立法的协调工作，加大依法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力度。

5. 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完善管理和服务网络。继续加强中西部地区县、中心

乡（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建设，完善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网络。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促进生殖健康产业的发展。完善避孕药具使用不良反应监测体系，严格执行避孕药具政府采购目录。加强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互联互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

第三十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2005年科技发展基本情况

(一) 国家编制并发布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了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即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提出了15年发展目标,即经过15年的努力,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明确了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和强化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二) 科技投入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2005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3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4%。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支持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全年国家安排科技攻关计划课题288项、"863"计划课题911项,973计划项目124项,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333项,重大产业技术开发项目36项,组织实施国家认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56个,启动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家,安排国家重点实验室改造项目16项,继续投入并实施了重大科技设施建设。2005年,国家财政科学基金还专门投入34亿元资金支持国家自然科学研究。

(三) 重大专项取得进展

中央财政累计向12个重大科技专项投入80亿元,地方、部门配套投入40多亿元,企业投入超过100亿元,突破了一些关键技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中央处理器"众志"、"龙芯"系列为代表的集成电路已由技术突破向产业化发展,红旗、银河、永中等国产核心软件在国内得到推广应用,网络通信、信息安全、信息家电等领域的系统芯片开发和应用取得突破。100纳米刻蚀机、大倾角离子注入机等样机研究成功并上线试验,100纳米光刻机研制已掌握集成技术,使我国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装备制造这一国际高端领域占领一席之地。在清洁能源汽车、食品安全、水污染治理、功能基因和生物芯片、新药创制等专项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技术突破,申请国内外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近2000项,形成国家标准700多项。围绕资源约束、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等方

面重点组织实施了一批重大产业关键技术，加快了我国资源、能源的勘探开发步伐，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循环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通过采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得以提升。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取得重大进展，大型输变电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研制出的9000米油气田深钻，高新优船舶、大型核电装备、重型燃气轮机、高速铁路动车组等重大技术研制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进展顺利。

（四）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稳步提升

通过实施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计划、知识创新试点工程、985工程等，我国的基础研究能力得到稳步提高。据统计，从1997年以来，SCI（科学引文检索）收录我国科学论文以年均19%的速度递增，论文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五位。近年来，我国已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在国际科学前沿占据一席之地。例如，北京谱仪国际合作组发现了X1835新粒子，造血干细胞分型研究步入国际领先水平，非线性光学晶体、量子信息和通信、超强超短激光研究居国际前列，冶金过程晶粒细化调控被认为是提高钢铁行业技术水平的一次“革命”，并行计算技术的关键性突破为我国超级计算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重大地史时期生物的起源、辐射、灭绝和复苏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一批重要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为鸟类恐龙起源说、飞行树栖起源说和羽毛起源等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上海光源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全面实施，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工程等基本完工。按照全面推进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完成了知识创新工程二期建设任务，优化了科研环境，为全面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五）科技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

“神六”载人航天器发射成功，完成了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是我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重要里程碑。青藏铁路全线贯通，标志着我国在破解“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这三大世界性难题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世界上首条示范应用的750kv交流输变电线路建设，大大提升了我国的输变电技术水平。我国研制出的龙芯2号芯片，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芯片。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单个分子内部的化学反应，并利用局域化学反应改变和控制分子的物理性质，实现了重要的物理效应。我国实施的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胜利竣工，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我国研制的“纳米药物分子运输车”，提高了对疾病的有效治疗作用。我国研制出了世界上首例利用血管内皮抑制素开发的抗癌药物，即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在国际上首次解决了量子密钥分配过程的稳定性问题，开发出迄今为止国际公开报道的最长距离的实用光纤量子密码系统。

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国内专利申请38.3万件，比上年增长37.4%。其中，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为9.3万件，比上年增长42.1%，占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53.8%。全年共授予专利权21.4万件，增长12.5%，其中国内专利授权17.2万件，增

长13.4%。在三种专利授权中，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发明专利授权达到5.3万件，占授权总量比重的24.9%，增长8%。

通过实施人才战略，承担国家"973"、"863"计划的青年科研人员和归国人员均占到半数以上。目前，我国企业研发人员占全国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已超过60%，一支以中青年科学家为中坚力量、老中青相结合的科技人才格局基本形成。

（六）企业技术进步不断推进

进一步强化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重大科研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以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培育高技术产业、提高我国主导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启动建设了基因工程药物、新型疫苗、重型技术装备、煤矿瓦斯治理、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制造装备数字化等19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目前，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已达到361家，省级认定技术中心达到3015家。组织实施了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围绕建立一流水平的企业自主创新基础条件，突破企业自主创新的瓶颈制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了一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继续开展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005年年度评价和重点企业技术创新统计分析工作，加强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态管理和监测分析，2005年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有了大幅提高，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企业在行业技术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强，一大批企业将自己研究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陆续转化为国家和行业的标准。加快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等全方位的服务和支持。

（七）科技发展的宏观环境进一步改善

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察办法》、《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等近30项政策性文件；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技进步法》执法检查，依法行政取得积极进展，同时加快了《科技进步法》的修订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规范了认定工作。发布了《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规划》，明确了近期的重点任务和目标。发布了《关于高新技术中央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展高新技术中央企业的股权激励试点和产权改革试点，加快了企业的重组步伐，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颁布了《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评估验收工作指导意见》。

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在加快应用型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的同时，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人员结构得到较大调整，学科结构进一步优化，科研能力显著增强。目前，转制科研机构通过市场获得的收入年均增长在20%以上，中央各部门公益类科研机构已形成100个左右的重点院所和约1.5万人的精干研究队伍。

（八）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继续得到加强

继续实施科普工作纲要、青少年科普活动指导纲要，落实鼓励科普事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科普设施建设，促进了科普工作的深入发展。目前，全国各类科普工作人员达

20万人，每年8000万人次接受科普教育；500平方米以上各类科普场馆近1000个，90%以上科普设施对公众开放，每年出版科普读物近万种，专业科普网站近百个；科普三下乡、科技活动周、APEC青年节等科普工作推陈出新；精心组织了全国科普日活动，开展了重点科普活动4151项，参与科普志愿者180余万人，群众5000余万人次，公众对科学观点理解达到30%，对科学与社会的理解达到46%以上，公民科学素养不断提高。

第二节 当前科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

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

（二）科学研究质量不够高，尖子人才比较匮乏

从1995年到2005年，美国每篇论文被引次数是12.92，巴西和印度分别是4.73和3.53，我国只有3.32。我国缺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科学大师和世界级领军人物。

（三）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

从1994年到2003年，我国10年累计投人研发经费910亿美元，仅为美国同期的1/26，韩国的1/2。2004年我国研发经费为238亿美元，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13。全国研究开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韩国的1/7和日本的1/8。

此外，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着突出问题：一是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二是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三是科技宏观管理各自为政，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四是激励优秀人才、鼓励创新创业的机制还不完善。

第三节 2006年科技工作重点

2006年是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第一年，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切实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配套政策措施

加强宏观协调与配合，抓紧研究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政策实施细则，确保《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落到实处。实施扶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推进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加强对政策落实的监督。跟踪了解配套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及时研究并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发挥各部门、各地的积极性，形成全国推进自主创新的良好局面。

（二）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着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探索和完善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围绕提升产业原始创新能力，构建产业基础平台，在产业前瞻性技术、核心技术、重大装备设计实验等方面建设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进一步强化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工程化和系统集成能力，在生物、信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建设若干国家工程中心，提升战略产业和主导产业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深入推进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继续做好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认定技术中心的工作。加快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面向区域和行业服务的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为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建设科技支撑体系，全面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确定的九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建设中科院知识创新三期工程。进一步盘活科技资源，促进资源共享。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先期启动和组建一批基础学科、部分前沿和社会公益领域重点实验室或研究开发基地。重点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科技成果信息服务体系和公益与行业共性技术转化平台等网络科研环境建设。

（三）继续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要求，抓紧重大科技专项的前期准备工作，成熟一个，启动一个。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实施蛋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究等若干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信息、生命、空间、海洋、纳米和新材料等前沿战略高技术领域超前部署。继续推进信息、生物、制造业等领域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加强资源、生态和环境等领域的科技工作，推进人口与健康、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科技进步。积极采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在能源、冶金、化工、轻纺、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有重点地改造一批骨干企业，提高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推广电子商务应用，采用高新技术促进传统产业转变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围绕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继续加强重大产业技术开发和重大成套技术装备研制的工作力度，推动传统产业技术进步。

（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全面深入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把明确定位、优化结构、完善机制、提升能力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加强科技宏观管理与协调，完善科技政策法规体系，建立

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各类创新主体的协调互动，提高科技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为促进自主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推进科技计划管理、经费管理、科技评价和科技奖励管理等改革工作，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

（五）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合作

鼓励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广泛开展相关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特别是参与国际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和探索工作，提高我国的科技实力。不断开拓并充分利用国际各类科技资源和渠道，加速培养我国的科技人才，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十一章　教　育

第一节　2005年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2005年，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把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扎实推进“两基”攻坚工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点加强面向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注意把握发展节奏，各级教育保持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教育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

1. 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切实加强，“普九”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提高。各级政府认真落实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显著增加。一是继续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扎实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中央继续安排专项建设资金30亿元，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学校2529所，新建校舍456万平方米，可新增在校生59.8万人，新增寄宿生67.6万人。二是加大力度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中央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地方政府投入27.5亿元，在中西部地区为主的15万所农村中小学校（教学点）装备了不同模式的远程教育设施，可服务于5800万农村中小学生。三是继续安排中央专项资金20亿元，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十五”期间，中央累计安排“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专项资金90亿元，地方共计投入340亿元，改造D级危险校舍7800万平方米，使3400多万农村师生告别了危房。四是着力解决贫困家庭学生学习和生活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安排“两免一补”专项资金70多亿元，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700万贫困家庭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还为中西部地区1700万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全国“普九”人口地区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超过95%，青壮年文盲率继续控制在4%以下。

2. 中等职业教育得到加强，高中阶段教育快速发展。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把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明确了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中央安排10亿元国债资金实施“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建设计划”，支

持了525所中等职业学校和县级职教中心，重点加强实习实训设施和教学条件建设，为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创造了条件。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达到647万人，比2004年增加招生80万人。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教育结构调整，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明显扩大，在校学生人数达到3968万人，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7%。

3. 高等教育稳步健康发展，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新进展。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504.5万人，研究生招生36.5万人。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1562万人，在学研究生9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高等教育"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进展顺利，有力推动了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4. 现代远程教育得到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教育系统下一代互联网建设顺利进行，中国教育科研网络建设继续推进。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与中国教育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平台实现了覆盖全国、互联互通，为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供了技术保障。全国90%的高校、3.8万所中小学、近6000所中职学校基本建成校园计算机网络。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开始发挥向农村地区输送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师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作用。

5. 高度重视做好大学生就业和贫困家庭大学生助学工作。200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326万人，比上年增加72万人。各级政府和高等院校高度重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和国务院的各项政策规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总体进展顺利，一次就业率继续保持在70%以上。大力推进按新政策、新机制运行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以助学贷款为主，奖学金、助学金、减免学费、勤工助学等构成的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艰苦行业工作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初步建立。截至2005年，全国高校累计审批贷款学生156万人，助学贷款合同金额125.5亿元。

（二）教育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1. 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基本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新管理体制基础上，国务院进一步作出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决定，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经费保障机制。农村义务教育新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的确立，使多年来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有望得到根本解决。

2. 规范教育收费，为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推行了"一费制"收费办法，对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继续严格执行"三限"政策，对高校收费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和广泛督察，进一步规范了教育收费，切实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有关部门扩大了教育收费检查监督范围和查处力度，教育乱收费蔓延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试点扩大到全国11个省市。

3. 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思想实现了重大转变，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鼓励发展民办职业教育。转变办学模式，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密切与企业、人才、劳务市场合作，及时更新教学内容、调整专业结构，按照“订单培养”的要求推动职业学校运行机制改革。转变办学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农村教育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义务教育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差异过大，教育的公平性问题需要引起充分重视；素质教育尚未得到真正落实，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和应试教育倾向还相当严重；教育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教育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结构之间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仍很突出；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结构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就业市场的需求；教育行业不正之风和教育乱收费现象有待进一步遏制。

第二节　2006 年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2006 年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按照“普及、发展、提高”的要求，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促进各级教育协调发展，为“十一五”期间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是重点抓好农村义务教育，继续推进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巩固进程。坚持把农村义务教育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努力降低农村学生特别是女性学生辍学率，巩固“普九”成果，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做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补助西部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启动全国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保障新机制的改革。中央继续安排专项资金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为实现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目标奠定基础。

二是突出抓好职业教育，促进高中阶段教育协调发展。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继续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积极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强县级职教中心建设，为培养新型农民和转移农村劳动力服务。深化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加强职业学校实习实训设施，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继续发展普通高中教育，扩大高中阶段教育供给能力。

三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进高等教育稳步持续健康发展。继续组织实施好“985

工程”，制订“十一五”“211工程”建设规划，大力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努力提高高校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加强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工作。切实把握好发展节奏，稳步发展普通本专科教育，着力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2006年普通高校本专科计划招生530万人，比上年增长5.1%；研究生招生40万人，比上年增长9.6%。

四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评估和考试制度，研究建立推进素质教育的评估和考试制度。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拓展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有效途径，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第三节 2006年教育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

（一）以改革促发展，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

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改革招生评价和选拔制度，完善素质教育的体制环境；推进中小学课程改革，完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深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和推行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制度。落实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稳步推进中外合作办学。

（二）完善投入保障机制，提高教育投资使用效益

要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增加教育投入。国家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并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各地政府要按照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要求，健全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义务教育免杂费和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按时足额到位。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投资办学和捐资助学。要坚持勤俭办事业的方针，加强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管，完善学校财务制度，强化学校财务审计，有效遏制挤占、挪用和浪费教育经费现象的发生。

（三）做好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努力促进教育公平

落实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政策，加大对贫困学生“两免一补”的支持力度。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深化国家奖助学金发放办法改革，完善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政策，健全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建立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安排资金，帮助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农村贫困家庭和城镇低收入家庭子女支付教育和培训费用。

（四）加强教育法规建设，清理教育收费行为，提高依法治教水平

加快《义务教育法》、《教育法》、《学位法》修订工作，加快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执法检查和监督制度，依法规范各级教育办学行为。坚决遏止教育乱收费现象和教育运行中各种违规现象，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审批义务教育阶段新的改制学校和改制学校收费标准，并对现有改制学校进行全面调查清理。健全教育督导与评估体系，引导创建"教育收费公示示范学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十二章　水资源保护和利用

第一节　2005年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主要情况

2005年，我国珠江、淮河、辽河流域和福建闽江等江河都发生了大洪水，其中珠江流域西江发生超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辽河流域发生近十多年来的最大洪水，汉江、渭河发生严重秋汛。东南沿海登陆台风多、风力强、影响范围广，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严重。全国洪涝灾害受灾人口20026万人，死亡1660人，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2.24亿亩，直接经济损失1662亿元，受灾面积、受灾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常年偏多，因灾死亡人数较常年减少。旱灾总体上较常年偏轻，但西南、华南、西北和华北部分地区一度旱情较重。全国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2.4亿亩，造成粮食损失193亿公斤，经济作物损失223亿元，全国有2313万人、1976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由于部署及时、应对主动、措施得力，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洪涝干旱灾害损失，保障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的同时，骨干水资源和供水工程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辽宁大伙房水库输水二期工程、四川武都、云南麻栗坝、重庆鲤鱼塘、山西张峰、城市应急供水水源、自来水厂及输配水管网建设改造等一批重点水源和供水工程正在加紧建设。继续实施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解决了11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饮水工作重点实现了从饮水解困到解决饮水安全的历史性转变。对全国饮用水安全现状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研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打算。

深入开展节约用水，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继续大力加强灌区续建配套改造和节水增效示范项目建设，安排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和节水示范项目国债投资21.5亿元，资金安排规模为历史最高水平。在粮食主产区新开工40个大型灌区的节水改造工程，使已实施节水改造的大型灌区总数达到了306个，占全国402个大型灌区的76%。预计建设工作完成后，可增加年节水能力20亿立方米。加强了城市和工业节水，强化用水管理和节水宣传，推进高耗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积极开展再生水和海水利用。编制并发布了《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和《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开展了《“十一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和《矿井水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指导制定了一批节水国家标准，研究提出了《节水产品（设备）目录》和优惠政策建议方案，全国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发布了用水定额。利用国债资金安排支持了26个节水项目，投资约21亿元。继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甘肃张掖等一些地方初步建立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天津、山东、北京等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用水总量大幅下降。据初步统计，2005年全国万元GDP用水量由2004年的391立方米下降到358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2004年的188立方米下降到164立方米，水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得到加强。《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完成第一阶段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了水资源配置阶段的工作，为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继续加强了黄河、黑河、塔里木河等河流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实施了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水、从山西、河北多库联合调度向北京集中输水，保障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首都的供水安全。以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为重点，全面开展了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加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实施，黄河、黑河等流域实行了取水总量控制，辽宁大凌河流域、永定河上游地区探索开展了初始水权分配工作。继续深化水价改革，促进了节约用水和水资源保护。依法加强水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完成了三峡库区、淮河流域纳污能力核定工作，启动了桂林、武汉等城市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

进一步推进南水北调东线水污染防治进程，完成了江苏和山东两省的治污控制单元实施方案的审查工作。“三河三湖”、三峡库区、南水北调东线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继续推进，污水处理收费和产业化政策不断落实。编制《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加强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内的工业污染点源治理和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安排开展了31个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和14个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累计下达国债资金5.49亿元。加大了对“三江源”等江河源头区的水源涵养和保护力度，综合防治水土流失面积10.9万平方公里。

第二节　水资源开发保护利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我国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严重和水土流失、水污染形势严峻，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不高。加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已越来越迫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资源开发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治理开发、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全面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全面规划，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合理安排水资源工程建设；加强制度和科技创新，强化对涉水事务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全面提升水资源管理保护水平；大力推广先进实用的技术，发展循环经济，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原则是：坚持水利发展目标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相适应，水利建

设规模和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充分重视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流域和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科学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妥善处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市与农村、流域与区域、开发与保护、建设与管理、近期与远期、生活生产与生态用水等各方面的关系。继续把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和节约配置放在突出位置，坚持节水为主，治污优先，在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海水资源和再生水的开发利用。

第三节　2006年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一）进一步做好“十一五”水利发展规划和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研究明确“十一五”水利发展和改革的主要目标、任务和措施，突出改革和制度创新，高质量地做好“十一五”水利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继续抓好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在已完成水资源配置阶段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基本完成规划编制工作，实现全国可利用水资源的省际分配。完成全国农村饮水安全规划、城市饮用水源地保护规划和全国节水灌溉规划。

（二）搞好南水北调等重点水资源工程建设

加快和完善南水北调骨干和配套工程前期工作，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严格管理，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进一步推进东线水污染防治进程，确保调水水质目标。加强其他水资源调蓄和配置工程建设，在搞好紫坪铺、鲤鱼塘等在建工程的同时，做好一批水源工程的前期工作。全力做好饮水安全工作，在实施《2005—2006年农村饮用水安全应急工程规划》的基础上，抓紧编制完成《“十一五”农村饮水安全建设规划》，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提高管理水平，确保“十一五”期间解决农村1亿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2006年计划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央投资40亿元，较2005年翻一番，规划解决20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启动开展全国城市饮用水源地有机污染调查工作，对全国范围内498个供水人口20万以上、日供水能力5万吨以上的集中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和一些重要饮用水水源地进行全面调查，摸清我国城市饮用水源地有机污染状况，为下一步加强饮水安全保障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发利用雨洪资源、再生水、海水及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源。继续开展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恢复其防洪、兴利库容，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和发挥效益。科学安排洪水出路，加强洪水风险管理，不断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确保防洪安全。加快完善易旱地区和严重缺水城市的抗旱预案。

（三）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加快研究制定完善节水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强化节水的激励政策，建立和完善节水监督机制。编制并发布实施《“十一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矿井水利用

规划》，做好《海水利用专项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强化节水基础工作，加快建立全国用水定额指标管理体系，着力建立良性的节水新机制，积极推进国家水权制度建设。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宣传，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

坚持把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加大节水增效工作的力度，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和灌区生产能力；同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灌区管理制度改革，扩大用水户参与，积极引导农民开展田间节水工程建设、改造和维护。加强重点耗水行业和企业节水工作，加大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力度，加快淘汰水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严重缺水地区要限制高耗水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建立多元化的节水投融资机制，加大节水投入，支持一批示范项目。积极推动生产布局和用水结构调整，提倡清洁生产。争取实现万元 GDP 用水量降至 345 立方米，比 2005 年下降 3.6%的目标。

（四）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

搞好流域和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继续抓好黄河、黑河、塔里木河以及官厅、密云水库上游地区的水量调度，做好生态补水工作。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保护好饮用水水源。以预防保护和有效监督为主，充分发挥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加强对重点水土流失地区和生态脆弱河流的综合治理。结合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生态建设，加强江河源头区和重要水源涵养区的保护与管理。实行严格的地下水保护政策，加强地下水超采地区的综合治理。加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强化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的实施。继续推进塔里木河、黑河等专项治理工程。

加强水资源监测与评价，严格水体纳污总量控制。抓紧完成全国及各省水功能区区划的报批工作，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继续推进“三河三湖”、渤海、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等重点流域的水污染治理工作，编制完成“十一五”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加大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松花江等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力度。完善重要水源地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应对各种突发性污染事故的能力。做好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内工业污染点源治理的收尾工作，争取全面完成规划内工业污染点源治理项目和规划确定的水污染治理任务。

（五）强化对涉水事务的社会管理

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水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涉水事务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强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强化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依法管理和规范水事活动。加强水资源信息发布，改善公众参与环境，强化社会参与和监督。建立和完善预案，增强应对各种水事危机及突发事件的能力。积极探索流域综合管理改革，理顺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的关系，研究逐步建立由相关方面参与的民主、协调、权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委员会制度，将流域内涉水事务统一纳入流域综合管理范畴。在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框架下，建立统筹水源、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及回用等涉水事务机制，实行区域水资源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统一管理。

第三十三章 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第一节 2005年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情况

2005年，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为重点，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取得积极进展。

（一）切实加强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宏观指导

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目标、重点和措施。国务院召开了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建设节约型社会做出全面部署。根据国务院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印发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将重点工作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对本地区、本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做出全面安排，建立协调机制，提出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

（二）研究制定资源节约规划、政策和标准

组织开展发展循环经济战略、建设节约型社会理论和实践研究，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十一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布了《海水利用专项规划》，研究提出了《节能节水产品目录》和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及税收优惠政策方案；发布了《节水技术政策大纲》和《国家鼓励发展的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技术》。制定并发布了《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和一批强制性能效标准及高用水行业取水定额国家标准。

（三）突出抓好节约降耗工作

落实《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编制《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方案》，部分工程已经启动；研究提出《千户高耗能企业节能跟踪管理实施方案》，并已确定1000家企业名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确定并公布了第二批256个限时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城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木材节约和代用工作意见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意见的通知》；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能源办、国家统计局研究建立了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将经过认证、能效等级较高的节能产品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实施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通过补贴方式，采取大宗采购、电力需求侧管理、产品质量承诺三种模式推广高效照明产品。

（四）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正式启动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循环经济试点实施方案编制要求的通知》，在钢铁、有色行业召开了发展循环经济现场会，开展循环经济立法和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统计制度研究工作。

（五）加大资源节约投资力度

2005年共批复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等重大项目101项，总投资102亿元，安排国债资金10.5亿元。通过实施资源节约重大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技术进步，带动了社会资金的投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005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比2004年下降8.4%，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下降12%。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比2004年提高0.1个百分点。在高耗能行业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全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与2004年基本持平。

第二节　2006年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重点

2006年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节约资源基本国策，加大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力度，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市场主体节约能源资源的自觉性，务必在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2006年资源节约的主要目标是：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4%；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比2005年有所降低；城市、农村和重点工业行业取水量基本保持稳定；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以节能降耗为重点，加快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

1. 强化节能管理。一是修订《节约能源法》，通过立法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完善各行为主体责任，强化政策激励，明确执法主体，加大惩戒力度。二是建立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制度。各地区要把GDP能耗降低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市、县和企业，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加强监督；选择若干省、市试点，开展将GDP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党政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的试点。三是建立GDP能耗公报制度。从今年开始每年6月底向社会公布分地区GDP能耗、GDP能耗降低率、GDP电耗等指标；建立重点行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统计报表制度，定期公布。四是加强准入

管理。加快推进相关标准制定，健全重点行业新建项目、重点耗能产品和新建建筑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杜绝高耗能项目、产品和建筑盲目发展，控制增量。五是建立节能审计制度。制定和完善高耗能行业不同类型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对重点耗能企业开展节能审计，找出问题和潜力，制定措施，限期改造。六是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通过节能审计，对标找差距，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强化措施，政府采取公报、检查、抽查、通报、交流等方式对企业节能进行跟踪指导；组织开展“1000家高耗能企业节能行动”。七是推动政府机构带头节能。明确加强政府机构节约资源的目标、措施和具体要求。八是编制《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落实《海水利用专项规划》。

2. 推进技术进步。一方面组织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支持一批重点节能项目，解决共性和关键技术问题，增强节能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基于市场的节能技术推广机制。一是总结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研究通过财政补贴方式，加速淘汰落后高耗能设备，加快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如对淘汰高耗能设备、对量大面广的节能产品开展大宗采购，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对提前达到超前性国家能效标准和一级以上能效标识的节能产品给予补贴。二是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培育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公司，为企业、机关、商厦、学校等提供诊断、融资、设计、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以节能效益分享方式回收投资和合理利润，加快促进企业节能技术改造。三是推动政府机构采购经认证达到较高能效标准的节能产品。还要修订发布《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建立节约型的增长模式

1. 健全法律法规。根据全国人大的要求，起草《循环经济法》立法建议和草案文本；出台《废旧家电回收管理条例》；制定《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废旧轮胎和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条例等专项法规。

2. 搞好示范推广。实施好第一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支持一批重大项目；推进煤炭、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

3. 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选择废旧家电、废旧手机、报废汽车等研究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4. 加强宏观指导。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建立国家、行业及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相关统计制度。

（三）加强项目管理

一是重点支持节能降耗、循环经济试点重大项目和重点污染源治理项目，做好项目储备，组织好项目审查和投资计划的下达。二是研究改革项目补助办法，适当调整项目补助资金比例（或额度）。进一步拓宽资金渠道，研究利用政策性银行投资支持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项目。三是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对在建项目的跟踪调度。

第三十四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2005年环境保护工作

2005年，全国环境质量总体稳定，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多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初步控制，工业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治理不断推进，生态保护和治理得到加强，核与辐射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得到提高。

（一）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分析了我国环境保护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形势，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分阶段目标，确定了工作重点和相应的政策措施。

（二）进一步完善环保法律法规

修订《水污染防治法》，明确各方责任，加大对违法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建立责任追究制度。逐步完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逐步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扩大公众环境知情权。

（三）加强规划编制及实施，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

一是突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抓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发布了《铬渣综合整治方案》；下发了《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编制并实施《2005—2006年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规划》，开展城市饮用水源有机污染调查，启动"十一五"农村饮用水安全规划的编制工作。二是突出重点流域、区域的污染治理。"三河三湖"、渤海、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和军事区域水污染防治项目进展顺利，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划中江苏和山东两省的控制单元实施方案、中线丹江口库区及上游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规划编制完成，发布了《2005—2007年淮河流域重点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规划》。三是突出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启动了《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和《全国城镇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

（四）加强宏观调控，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一是严格控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排放行业的盲目发展，公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制定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专项规划和技术标准，通过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的相互配合，抑制部分高污染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二是继续加大对钢铁、有色、纺织、化工、造纸等行业的技术改造步伐，提高造纸、化工、酿造、纺织等污染较重行业的工艺技术水平，降低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量；结合技术改造，"以新代老"，解决了一批老企业的污染问题。三是大力支持和发展环境污染相对较小，对经济增长有较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五）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督执法

2005年，国务院六部门开展了"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00多万人次，检查企业42万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问题2.3万件，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2682家，处理相关责任者163人；查处并曝光一批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建设项目；在全国14个省区开展了铀矿冶放射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全国在役核电厂、研究堆、和燃料设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开展了全国环境安全大检查，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11.2万人次，检查企业4.3万家，排查了一大批环境安全隐患。

（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一是加强宏观指导，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意见》。二是启动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产业园区和省市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三是开展了《循环经济法》立法调研和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研究。四是组织编制重点行业循环经济支撑技术目录，推动循环经济技术进步。

积极培育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组建环保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规范和强化准入管理；发布了《加快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规范脱硫设施的供方市场，营造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

（七）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生效，气候变化问题进一步成为国际关系的热点之一。我国积极参加了加拿大蒙特利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1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1次缔约方会议，中国作为六个初始成员国之一发表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声明》。2005年5月，我国正式核准《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尽管2005年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的任务仍十分繁重。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有所增加，预计2005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烟尘、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6%、2.2%、6.3%、4.4%、2.3%、5.4%。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农村环境问题愈益严

重，畜禽粪便、水产养殖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污染加剧。

第二节 2006年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

2006年，环境保护工作要以改善环境质量和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为根本出发点，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加快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治理，综合利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提高环境执法水平，努力保障环境安全。

2006年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是：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量要分别比2005年预计数下降2%左右，城市污水处理率提高2个百分点，有效控制住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长。为实现上述目标，2006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着力推进7项重点工作

要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以强化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城市环境保护；以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重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重点，强化生态保护；以核设施和放射源监管为重点，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以实施国家环保工程为重点，推动解决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

（二）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人口数量以及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环境容量有限、自然资源供给不足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实行优化开发，坚持环境优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同时率先完成排污总量削减任务，做到增产减污。在环境仍有一定容量、资源较为丰富、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实行重点开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合理利用环境承载能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做到增产不增污。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和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实行限制开发，在坚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确保生态功能的恢复与保育，逐步恢复生态平衡。在自然保护区和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区实行禁止开发，依法实施保护，严禁不符合规定的任何开发活动。要确定不同地区的主导功能，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

（三）加强重点流域、区域及面源污染的综合整治

进一步做好“三河三湖”、酸雨和二氧化硫“两控区”以及三峡库区、南水北调沿线的污染防治工作，启动松花江、黄河中上游、长江上游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国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护饮用水源。在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中，要把解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建立和完善饮用水水源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加快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在完善面源污染负荷监测和估算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面源污染控制的环境法规，抓紧研究防治农村及重点流域面源污染环境管理手段。加强环境监督管理，控制规模化畜、禽、渔、养殖业的污染。积极开展农业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节水农业。

（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意见》，抓紧制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组织起草《循环经济法》草案文本，组织实施示范试点。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运用经济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

（五）提高工业污染防治水平

一是严格控制新污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法规，严格依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积极推进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落实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从源头上堵住新增污染，二是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制定严格的环境、能耗、水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安全、质量、技术等标准，提高准入门槛；以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为契机，因势利导，化害为利，综合利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力争2006年在促进产能过剩行业控制总量、优化结构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三是继续抓好冶金、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轻工等重点行业的污染防治工作，解决“结构性污染”；四是推进重点领域工业污染源治理，继续抓好三峡库区及其影响区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淮河流域及南水北调东中线工业废水治理、“两控区”二氧化硫治理、铬渣等工业危险废物污染治理等。

（六）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

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不正常运转治理设施、超标排污、不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在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发建设和开展旅游或者违规采矿造成生态破坏等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查处。进一步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加强对环境执法活动的行政监察。

（七）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和交流

积极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际谈判中，要坚持公约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采取行动；高度重视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正确把握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平衡；强调今后把重点放在具体行动上来，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和资金。做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内履约工作，要抓紧编制“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白皮书”，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项目的管理和协调。

第三十五章 生态建设

第一节 2005年生态建设基本情况

2005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具体部署，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面推进生态建设各项工作，在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草原保护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1.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安排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用于工程区公益林建设，完成营造林1580万亩，工程区内14.3亿亩森林资源得到有效管护，富余职工得到妥善安置，森工企业金融机构债务免除工作稳步推进。经过多年的建设，工程区生态状况明显好转，生物多样性增加；林区经济活力增强，经营格局初步实现了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资源保育为主的转变，经济结构开始走向多元化。

2.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安排固定资产投资16亿元，全年完成治理面积1865万亩。工程建设有效地改善了京津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带动了这一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往粗放型、过度消耗资源型的增长方式正在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化，产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工程区广大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工程建设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建立了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体制和机制。林权、草权制度的改革步伐加快，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项目省（市、区）对工程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也正在逐步建立。

3. 退耕还林工程。安排固定资产投资28.5亿元，全年完成退耕还林1667万亩，配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4000万亩。在继续推进重点区域退耕还林的同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解决农民吃饭、烧柴、增收等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问题上来，加强了退耕还林重点区域的基本口粮田建设、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封山禁牧舍饲等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建设成果的巩固。

4. 退牧还草工程。安排固定资产投资18.8亿元，全年完成退牧还草1亿亩，其中禁牧4580万亩，休牧5040万亩，划区轮牧380万亩。工程区草原植被得到明显恢复，牧草产量显著提高，草原生态持续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工程的实施促进了项目区

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为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5. 水土保持工程。安排固定资产投资8.3亿元，开展了长江和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黄土高原区水土保持淤地坝试点、珠江上游南北盘江水土保持试点、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试点、晋陕蒙砒砂岩区沙棘生态工程等一系列国家重点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治理任务1.35万平方公里，实施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3856条，竣工2176条，改造坡耕地287万亩，营造水土保持林草1100多万亩，建设小型水利水土保持工程19万余处（座），新建淤地坝1190座。

6. 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安排固定资产投资6亿元，突出各项工程各自特点推进建设。三北防护林建设突出防沙治沙，重点安排了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呼伦贝尔沙地的治理；长江防护林建设突出"两湖两库"（洞庭湖、鄱阳湖、丹江口库区、三峡库区）；珠江防护林建设突出石漠化治理；沿海防护林建设则加快了红树林及沿海基干林带建设步伐；太行山绿化建设着重推广生态经济型模式；平原绿化突出农田防护和通道绿化。

7. 农村沼气建设。安排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项目建设共涉及921个县、9144个村，新增农村户用沼气104万户。农村户用沼气建设极大地解决了农民生活用能问题，节约了薪炭材的使用，保护了生态环境，同时也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和卫生状况。

（二）生态建设政策措施不断完善

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整体推进，林业税费改革取得新进展，促进了私有林的蓬勃发展，增加了林农收入。国有重点林区林权制度改革、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进入试点阶段，为国有林区林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草原区进一步完善了草原家庭承包经营制，提高了退牧还草围栏建设补助标准，延长了青藏高原地区饲料粮补助年限，增加了重度退化草原补播草种费，各级政府加大了对退牧还草工程区畜种改良、疫病防治等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加强了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和科学调度，合理安排生态用水，塔里木河下游和黑河下游等流域生态环境得到初步改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制度初步建立，4亿亩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纳入补偿范围。

（三）综合治理力度不断加强

进一步重视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启动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建设内容涵盖了生态治理和保护、农牧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科技支撑等诸多方面，是目前国家实施的生态建设工程中最具综合性的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对进一步改善全国生态环境，促进该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农牧民达到小康生活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全社会生态意识明显增强

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加了全民生态环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取得进展，全国环境状况、国土绿化、林业六大工程、水资源等公报每年发布。随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树立，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措施的落实，以及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和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和实施，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保护生态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明显提高。生态治理的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初步形成。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加强对义务植树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发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义务植树运动的新高潮。部门绿化取得新进展，铁道系统绿化速度加快；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面开展三荒造林、种草工作，支援地方绿化和生态建设；妇联组织开展“三八绿色工程”建设取得新成绩。

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十五”期间，国家对生态建设高度重视，保持了生态建设的稳定投入，继续组织实施和新启动了一批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初步统计，“十五”期间，全国累计完成营造林面积393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18.21%；综合防治水土流失面积54万平方公里，其中综合治理面积24万多平方公里；治理“三化”草地2050万公顷；退耕还林821万公顷。

第二节　2006年生态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一五”期间，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为重点，强化对水源、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湿地保护和荒漠化石漠化治理等生态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海岸带的生态保护和管理，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自然生态恢复。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生态建设要继续以重点工程为载体，突出综合治理，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不断提高生态建设成效。

（一）加强生态建设规划的引导作用

各级政府要将生态建设作为制定“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各项专项规划的重要内容，加强各项规划的协调和衔接，构建较为完善的生态建设规划体系。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作，提高规划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一是要保持国家投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按规划要求实施好各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二是不断加强资金使用和项目质量管理，进一步提高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严格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资金管理，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推广各地先进的管理经验，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同时通过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切实提高工程建设质量。三是巩固和发展生态建设成果。进一步加强生态建设配套保障措施的建设，解决好农民吃饭、烧柴、增收等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问题；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建设高标准基本口粮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大力发展生态建设后续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继续搞

好农村以沼气为主的能源建设，有效保护林草植被；积极推进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

（三）突出重点区域的生态综合治理

进一步坚持突出重点、分步推进的生态建设原则，在做好全国面上生态建设的同时，突出重点区域的综合治理。继续实施好京津风沙源治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两个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加大对西南岩溶石漠化地区、东北西部风沙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等区域的投入力度，整合现有资金，实施综合治理。

（四）加快生态保护体系建设

在加强生态治理的同时，充分重视生态保护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将保护和治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是加快和完善生态法律体系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抓紧制定国有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森林法》的修订工作。二是坚持预防为主，避免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要特别重视开发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论证，将开发建设同生态保护措施同步实施。三是高度重视森林草原防火和病虫害鼠害防治工作，保护好现有林草资源。四是在继续搞好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湿地保护。

第三十六章 居民收支

第一节 2005年居民收支情况

200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质量继续提高。

（一）城镇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

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增长11.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增幅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1.工薪收入增幅趋缓。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7798元，增长9%，增幅比上年低2.8个百分点。主要是上年各地出台的增资政策较多，而2005年的工资政策侧重规范和完善分配制度，职工工薪收入增长趋于平稳。

2.经营净收入大幅度增长。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680元，增长27.6%，增长幅度高于上年15.3个百分点。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个体经营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带动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

3.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651元，增长14.2%，增幅提高了4.3个百分点。主要是养老金、离退休金及社会救济收入增长较快，城镇居民的保障程度不断提高。

4.财产性收入平稳增长。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93元，增长19.7%，增幅仅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主要是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逐步显现，房租收入相应降低。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股息等资本收益增长有限。

（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继续增加

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7943元，增长10.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9%，增幅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主要特点是：

1.食品和衣着类基本消费支出增长出现分化。由于粮食和禽蛋等副食品价格稳定，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类消费支出2914元，增长7.6%，增速比上年降低4.5个百分点。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6.7%，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衣着类消费支出明显上升，达到801元，增长15.6%，增速比上午加快7.9个百分点。

2.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增长趋缓。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性支出达

到1097元，增长6.3%，增速比上年下降4.2个百分点，居民教育服务消费支出增长开始出现放缓迹象。

3. 交通和通讯支出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达到997元，增长18.1%，增幅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4. 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较快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为809元，增长10.2%。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601元，增长13.8%，增速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

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增加31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增速比上年放慢0.6个百分点。

1. 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75元，首次突破千元，比上年增加176元，增长17.6%，增幅比上年高9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额占全年农民纯收入总增量的55.5%。在工资性收入中，务工收入人均713元，比上年增加126元，增长21.5%。其中，本地打工收入人均244元，比上年增加55元，增长29.3%；外出务工收入人均469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长17.7%。外出务工收入增加主要是因为务工人数和工资水平稳定增长。

2. 出售农产品收入增速回落。农民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经营纯收入人均1470元，比上年增加72元，增长5.1%，增速回落14.9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纯收入人均1098元，增加41元，增长3.9%；林业纯收入人均46元，增加12元，增长34.1%；牧业纯收入人均284元，增加13元，增长4.6%；渔业纯收入人均43元，增加6元，增长17%。2005年粮价略微下跌，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收入增长，但由于产量增加，全年农业收入仍保持了增长。另外，部分地区发生禽流感等疫情，对牧业增收造成一定影响。

3. 家庭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持续回升。农户家庭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经营纯收入人均375元，比上年增加27元，增长7.8%，增加额和增长幅度在“十五”期间都是最高的。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生产经营得到的纯收入人均108元，与上年基本持平；从事第三产业生产经营得到的收入人均267元，比上年增加27元，增长11.3%。

4. 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人均88元，比上年增加12元，增长15.5%。财产性收入中增加较多的是租金收入和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其中租金收入人均20元，比上年增长38.8%，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人均8元，比上年增长34.9%。农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人均147元，比上年增加32元，增长27.6%。主要是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带回收入、离退休金及养老金，以及退耕还林还草补贴。

（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加快

2005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快速增长，生活质量继续提高。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555元，比上年增加37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5%。主要特点是：

1. 食品和衣着类基本生活消费快速增长。农村居民食品支出人均1162元，比上年增加130元，增长12.6%；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5%，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用于衣着的支出人均98元，比上年增加28元，增长23.6%。

2. 居住支出和文教娱乐支出增长较快。农村居民住房支出人均370元，比上年增加46元，增长14.2%；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人均295元，增加48元，增长19.3%。

3. 家庭设备用品、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强劲。农村居民用于购买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的支出人均111元，增加22元，增长24.9%。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人均168元，增加37元，增长28.7%。

4. 交通和通讯支出增长迅速。农村居民交通、通讯费用支出人均245元，增加52元，增长27.2%。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保持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难度较大。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三是国有单位分配秩序混乱的状况仍未有效改善，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仍然突出。

第二节　2006年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措施

2006年，要重视解决城乡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继续整顿分配秩序，保持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努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为实现上述目标，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三农”工作，力争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继续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金融政策等手段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着力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切实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稳定主要农产品价格。加强金融支农工作，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建立农业政策性金融和保险体系。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继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建立健全确保农民工工资正常支付的机制。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二）从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出发，加快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在规范管理、“应保尽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类救助”，研究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差金额。加快城市医疗救助体系建设，适度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水平。继续探索和建立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优惠政策和临时

救助制度为补充，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相配套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建立制度，尚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健全特困群众定期定量和临时救济制度。认真做好五保供养条例修订出台后的贯彻落实工作，尽快把符合条件的孤老对象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继续做好优抚安置工作，不断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全面提高灾害应急救助能力和综合减灾能力。

(三) 深化国有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要加快推进电力、铁路、民航、电信等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企业工资收入的管理和总量调控，建立健全工资增长约束机制。加快国有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适时调整工资标准，解决同一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公务员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推进政府机关后勤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步伐。

(四)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加强对国有资产转让和企业经营者薪酬制度的规范和管理。对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外的各种补助、津贴等进行清理分类，坚决取缔企业违反规定、自立名目发放的不合理收入；规范经营者的住房、交通、通讯等职位消费，加强公务消费的财务审计和监督；依法打击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内幕交易、商业贿赂与金融欺诈等违法行为。严禁政府公务人员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谋取非法收入和挥霍公款，坚决制裁各类腐败行为。

(五) 强化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

规范和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加快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建设个人所得税信息化管理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社会成员的收入信息共享，逐步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员全额管理、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和对税源的管理。

第三十七章　就　业

第一节　2005年就业基本情况

（一）城乡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改善

2005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就业岗位的增加。年末城乡就业人数达到7582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2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733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55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新成长劳动力就业继续保持较好状况，9月末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72%，与上年同期持平。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2%，实现了年初提出的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的预期目标。

（二）再就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再就业政策，再就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年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仅有61万人，比上年减少92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510万人，完成了年初预定再就业500万人的目标。

2005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有关政策的延续和扩展工作，基本解决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问题，重点做好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和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人员的再就业工作，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三）城乡统筹就业发展良好，劳动者权益日益得到保障

2004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要求消除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政策，为进城就业农民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这些规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政策支持，也是向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方向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各地区都将统筹城乡就业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纳入了政府的工作目标。各地政府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农民工的多种“证卡”制度和各种收费，废除了限制农民工就业的领域和行业的规定。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在签定劳动合同、保证工资按时发放、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农民工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等方面的权益。2005年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约10824万人，比上年增加564万人。

第二节 2006年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

（一）2006年的就业形势

1. 劳动力供给压力依然很大。2006年，我国16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总量将增加1700多万人，是劳动力供给增量的峰值年。城镇劳动力当年供给总量约25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900万人，包括高校毕业生410万人和初、高中阶段毕业生490万人；上年结转及新增下岗人员450万人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50万人；按政策须在城镇安置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和复转军人300万人等。

2. 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将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受近年来产业结构重型化、技术进步加速、劳动生产率提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迟缓等因素影响，2006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就业弹性）将继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同时，受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一些过热行业特别是一些规模小、效率低的企业的发展将受到抑制，在一定时期内将使劳动力需求减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整顿甚至关闭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也将产生大量失业人员。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中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的增多，将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劳动力需求带来负面影响。

（二）2006年促进就业的目标和政策措施

2006年，力争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其中"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

1.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把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促进就业的根本途径。继续实施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相互促进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切实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研究建立宏观调控政策的就业评估机制、行业预警和就业监测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结构调整和行业波动带来的失业风险。

2.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的各项政策措施，做好有关政策的延续和扩展工作。重点解决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人员的再就业工作，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研究制定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等困难地区、军工森工等困难行业和被完全征地农民等困难群体的就业政策和就业援助制度。

3. 继续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统筹促进城乡就业。研究建立统筹城乡就业的管理体制和就业目标考核体系，健全与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实现农民增收、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加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进一步改善进城农民工就业环境，提高其就业质量和稳定性。着重解决好拖欠工资、劳动和生活环境差、工伤事故频发及子女入学难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 进一步加强城镇新成长劳动者和其他劳动者的就业工作。要加快深化科教文卫、公共管理等体制的改革，为长期有效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奠定基础。通过完善政策和保障制度，引导形成多元化的择业观，鼓励高校毕业生下基层工作和自主创业。加强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研究改革退役军人就业管理机制，妥善解决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

5. 结合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精神，积极推动职业培训工作，鼓励和支持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培训。

第三十八章　社会保障

第一节　2005年社会保障基本情况

（一）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工作继续推进

国务院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工作基本结束，两省完成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养老金计发办法调整顺利，个人账户做实规模超过5%。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对下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办法作出了规定。城镇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继续进行，试点县达到1100多个。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适当调整了失业保险制度的功能设置，加大了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再就业的力度。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加快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推进速度加快。国务院召开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决定2006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40%的县（市、区），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标准均提高到每人每年20元。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普遍推行，全年直接享受救助的人数达到304万人，人均享受救助资金187.5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在部分地区继续进行，年底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有5400多万人，与上年大体持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步伐加快。在上年基础上，全国又有6个省发布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全国共有1534个县开始试行农村低保制度，年底享受农村低保的人数达到777万人，分别较上年增加328个县和289万人。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等农村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进一步调整巩固，五保供养资金来源稳定性增强。

（三）“两个确保”继续巩固，社会保障直接受益人数不断增加

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得到按时足额发放，连续两年实现无拖欠。全年为4362万参保离退休人员发放基本养老金4079亿元，发放人数较上年增加259万人，离退休人员月人均领到基本养老金约770元，较上年增加约65元。为20多万仍在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34.6亿元；为362万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发放了失业保险金。享受城镇医疗救助制度支持的人数增加，全年有51.9万城市低保对象得到医疗救助制度的支持。分别有63万人和60万人享受了工伤、生育保险待

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享受人数基本稳定，全年共有2233万人得到低保补助。中央财政对城市低保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全年合计支出190.7亿元，较上年增加17.7亿元。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达到72元，较上年增加7元。

（四）社会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保险基金的支撑能力有所增强

截至2005年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参加人数分别达到17444万人、13709万人、10648万人、8390万人和5389万人，分别较上年增加1091万人、1305万人、64万人、1545万人和1005万人。其中，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职工与参保离退休人员之比分别为3:1和2.66:1，制度内赡养比基本稳定。全年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分别达到5040亿元、1387亿元、333亿元、87.3亿元和42.2亿元，支出分别为4079亿元、1069亿元、207亿元、46.7亿元和27.1亿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分别为961亿元、318亿元、126亿元、40.6亿元和15.3亿元，累计结余分别为3913亿元、1276亿元、512亿元、157.3亿元和71.2亿元。养老保险基金中，全年中央财政共补贴545亿元，其中用于补贴东北做实个人账户约65亿元，用于补贴其他省市养老金发放缺口约480亿元。

社会保障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无法解决劳动者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不利于劳动力流动、保险覆盖面扩大和劳动者权益保护；一些社会保险险种缴费率偏高，不适宜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参保；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矛盾突出，政府财政补贴负担较重；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不衔接，造成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同类型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差别较大，矛盾突出；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主要社会保险险种可持续发展机制尚未得到有效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大多数农村人口还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服务能力薄弱，不适应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等等。

第二节　2006年社会保障工作重点和措施

2006年，社会保障工作要按照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继续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加大对困难和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加快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服务能力。

一是继续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各项要求，做好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调整工作。积极稳妥地进行扩大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研究建立个人账户基金的运营和监管体制。加快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研究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案。继续推进企业年金制度建设。

二是继续完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认真解决各类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问题，尽快解

决困难企业退休人员、转制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问题。加快研究并择机出台关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意见。扩大城镇医疗救助制度的试点范围，做好医疗救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工作。

三是进一步确保社会保障待遇的发放和做好保险基金的征缴管理工作。继续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的后续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失业保险金。以混合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及灵活就业人员等单位和群体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监督管理力度，确保基金的合理有效使用。继续对城市低保对象做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探索将长期在城市务工和生活的农民逐步纳入城市低保的办法。

四是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退役士兵优抚保障制度，适当提高对高龄多病人群的优抚保障标准。稳定农村五保供养制度，逐步扩大集中供养面，改善供养条件。继续做好灾民和农村特困户生产生活救灾救济工作。

五是加强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础建设。继续加大财政等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力度。加强社会保障服务设施、人才队伍等能力建设。探索建立社会保障宏观监测指标体系。

第三十九章　卫生、文化和体育事业

第一节　卫生事业

（一）2005年卫生事业发展概况

1.农村卫生工作得到加强。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各地根据国务院提出的扩大试点的原则要求，在巩固2004年试点成果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扩大试点。截至9月底，全国已有671个试点县，覆盖农业人口2.33亿，共有1.77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为75.8%。试点地区参合农民就诊率和住院率明显升高，就医经济负担有所减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状况有所缓解。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安排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县中医院、妇幼保健机构7537个建设项目，总投资45亿元，其中中央投资30亿元，项目进展顺利。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约4000名城市高素质医师到600个重点扶贫县工作，帮助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农村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破伤风项目稳步实施，覆盖22个省份的1000个县，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明显提高。农村改水改厕和爱国卫生运动取得新进展。

2.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项目基本完成，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进展顺利，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重大疾病防治能力明显提高，及时处置了人感染猪链球菌、高致病禽流感疫情；非典型肺炎、鼠疫、霍乱、艾滋病、血吸虫病、结核病、乙肝等重大疾病得到有效防治。预防接种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3.积极探索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各地根据工作实际，积极进行改革探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方便群众就医，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城市卫生资源结构调整加大力度，创建了107个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全国已有95%的地级以上城市、88%的市辖区和一批县级市开展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大中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初步形成。

4.深入开展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各地探索从源头上治理医疗服务行业不正之风的机制和措施，开展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管理年活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完善医院评价和监管，开展了对全国三甲医院的检查督导工作。关闭了一批非法行医机构，查处了一批违法行医的行为。

5. 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教活动。采取业务培训、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医疗服务人员和卫生监督人员的能力建设，提高服务素质。加强了卫生科教工作，一批重大预防保健和医疗技术研究项目取得成果，一批面向农村和基层的医疗卫生适宜技术得到推广和应用。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医疗救治、重大疾病防治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发挥独特作用。

（二）2006年卫生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1.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在全面完成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继续实施应急救治体系建设和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重点转移到健全职能、落实责任、增强能力、提高水平、改善服务、转换机制上来，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体制改革，加强规范化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提高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服务能力。继续完善全国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各级卫生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工作规范和技术方案。加强专家库和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开展培训和演练，优化物质储备和应急装备。完善预测预警决策指挥系统，逐步实现计算机自动预警。同时，依托实力较强的综合医院和职业病防治医院，在全国启动建设化学中毒、核辐射应急救治基地、医疗救治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应对重大疾病、各种原因的中毒、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2. 加强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做好高致病禽流感、非典型肺炎、鼠疫、霍乱等重大急性传染病的监测和处置工作，做好应对流感大流行的预案准备，加强重大慢性传染病预防，落实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肝等重大疾病防治措施。加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流动人口的管理，提高疫苗接种率，逐步扩大免疫规划实施范围。加强职业病和地方病防治工作，严肃查处损害劳动者健康的不法行为，切实提高防治能力和水平。探索慢性病防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措施、新方法，完善以乡村、社区为基础的综合防治体系，普及健康知识，实施有效行为干预。强化临床用血安全。

3. 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按照到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总体目标，2006年将试点扩大到全国40%左右的县区，达到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两个试点县。提高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将每个农民的10元补助标准增加到20元，并适当扩大补助范围，地方也相应增加投入。

进一步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发展与建设规划”，巩固和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服务体系，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县医院等建设，改善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条件。同步推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切实提高农村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加强现有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扩大为农村定向培养学生规模，继续实施城市医师支援农村工程，逐步形成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推进乡村一体化，深化农村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机构运行机制，规范医疗卫生服务行为，遏制农村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4. 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方向，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转换机制、加强监管的原则，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主体责

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政策，在对国有医疗机构存量进行调整的同时，提高农村、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公共卫生资源的比重。通过规划、准入等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源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积极推进区域卫生规划，整合医疗卫生资源，合理调整卫生资源布局结构。从严控制大医院建设规模，严格医院高新技术和设备准入，抑制大医院盲目扩张。深化医疗机构运行机制改革，规范医疗市场和医疗服务行为，整顿医院和医生的诊疗用药不合理现象，逐步弱化药品收益对医疗机构的补偿作用，扩大药品政府定价范围、降低政府定价药品价格和医院药品的实际加成率。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的监管，加强对医疗服务标准、行为、市场准入、价格、采购等方面的监管。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与医疗机构分工合理、双向转诊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以调整现有卫生资源为主，新建扩建为辅，加大政府投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维护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质，建立规范合理的收支管理机制。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设施和人员培训给予适当支持。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市职工医保定点，推动患者社区首诊试点，引导患者社区就医。

5. 加强医院管理监督。在全国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明确医院院长的管理目标和管理责任，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公立医院院长的第一位责任，医务人员的收入不得与医疗服务收费挂钩，取缔科室承包、开单提成、小金库等违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并将检查结果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门的医疗服务监督机构，会同各地建立对医院的评价和巡查制度，重点巡查三级大型医院，对规范服务收费、监督合理用药、规范内部收入分配、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医疗纠纷、维护群众利益等方面进行检查，督促各类医疗机构结合自身实际，落实有效减轻群众负担的具体措施。建立惩防并举的纠风工作长效机制，严格监督、以法治医，从源头上遏制不正之风，严厉打击给予授受药品、器械回扣、开单提成等商业贿赂行为，进一步完善医药费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措施，控制医疗机构收入，改革药品、高值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治疗价格管理机制，控制价格虚高。严格医疗收费监管，查处滥检查、乱收费行为。

第二节　文　化

（一）2005 年基本情况

1. 文化建设全面快速发展。在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坚持把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工作的立足点，把文化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完成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规划，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启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开始扭转农村文化资源总量严重匮乏的局

面。采取切实措施，维护和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文化权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大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施力度，构建全国文化资源服务网络。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放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完善对进口文化产品和外资进入文化领域管理的有关政策。同时进一步推进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建设，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秩序，通过严厉打击非法活动、进行专项整治、提供补贴或奖励等多种手段，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平台和市场环境。

巩固和扩大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成果，由点到面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继续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为龙头，带动文艺创作演出的全面繁荣。在不断创新、增加新的文化积累的同时，努力抢救、保护、扶持京剧、昆曲等优秀传统艺术。以党和国家对港澳台工作方针为指导，以“文化认同，人心回归”为目标，对港澳台文化交流活跃。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把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提升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明确指出今后要着力解决重点文物维修工程，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几大突出问题。启动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等“十一五”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组织完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备案和国有馆藏一级文物建档工作。开展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审和报批工作。继续做好“三峡”、“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积极推进渤海国遗址保护工程、南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等重点项目。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成立相应的部际联席会议。

2. 广播影视事业进一步发展。在广播影视事业建设方面，大力实施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走出去”工程等重点工程，广播影视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综合传输覆盖能力有效提高。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4.5%，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5.8%。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宣传任务，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安全播出工作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与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显著提高。宣传工作在内容、方法、手段、形式等方面进一步创新，频率频道的专业化、品牌化特色进一步增强，积极加强和拓展网络广播影视宣传阵地建设。

在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方面，广播影视数字化步伐加快，全国已经有41个城市和省区启动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整体转换，数字技术在电影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展移动电视业务取得良好效果。电影电视剧和影视动画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年电影产量再创历史新高，电视剧继续保持1万多部集的产量，国产影视动画产量比2004年增长近1倍。

3. 新闻出版工作取得新成绩。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大力弘扬主旋律，配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组织出版了一

批具有较高质量的重点出版物和理论文章。积极抓好服务“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工作，260家出版社共安排“三农”选题4077种。认真做好未成年人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和推介工作，向广大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同时积极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少年健康上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指导改革试点单位深化改革，探索新的改革举措，重塑市场主体取得重大进展，云南、重庆等5家出版集团（公司）组建，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从3个增加到11个。新闻出版系统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工作取得重要进展，26个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所属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脱钩。

完成了“中华古籍全书数字化出版工程”和图书出版国家重点工程的论证和筛选工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出版物出口和版权输出局面有一定的改观。进一步强化监管，加大“扫黄打非”和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的力度，提高全社会的著作权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在国际版权领域的影响力。

（二）2006年工作重点

1. 文化。编制实施《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一五”规划》。加强乡镇文化站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加强各级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落实文化建设精品战略，围绕纪念建党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等重大题材，推出一批文化精品。加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华再造善本和清史编纂等工作。加强政策扶持和典型引导，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探索创新对外文化活动的方式，打造一批对外文化交流的知名品牌。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以音像市场、网络文化市场、娱乐市场为重点，做好文化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工作。加强对动漫游戏产业、数字娱乐、网络等文化产业的支持和引导，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企业改革，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编制实施《国家文物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项目规划等专项规划。建立健全博物馆管理体制，启动博物馆评估定级试点工作，继续推进馆藏一级文物建档备案工作。推进国家文物基础数据库建设。协调、组织好南水北调工程等重点工程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继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相关遗产普查，建立相应的保护档案和数据库。加大文化遗产宣传力度，组织开展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活动。启动古籍特藏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关键科技研究与开发”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进大遗址保护的政策研究和管理工作，组织实施8—10个重点大遗址保护示范项目。

2. 广播影视。围绕各项重大主题，加强宣传报道工作，推出一批群众喜爱的主旋

律作品。大力推进宣传创新，在继续推进频率频道和节目栏目专业化、品牌化的基础上，开拓网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宣传新渠道、新阵地。继续加强安全播出体系建设。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重点，大力加强农村广播电视建设，在完成50户已通电自然村通广播电视的基础上，积极实施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的“村村通”工作。着力改善农村电影放映的基础设施条件，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扎实抓好“走出去”工程，加强对外人员、节目、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扩大我国广播影视的国际影响力。继续组织实施西新工程。

以城市有线电视数字化为重点，大力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节目和服务。大力推进电影电视剧和影视动画产业发展，生产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具有导向性、示范性的精品佳作。

认真做好广播影视的各项改革工作，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要求，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依法加强管理。

3. 新闻出版。安排出版一批有深度的宣传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出版物。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实施服务“三农”重点出版物出版工程，增加适合农民群众的通俗读物的品种和数量，促进农村地区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组织出版一批宣传纪念建党85周年和长征胜利70周年的重点出版物。落实“东风工程”和援藏工程所承担的图书出版项目。

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继续推进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继续推动新华书店改造，促进区域间横向联合，跨地区经营。尝试建立报纸和期刊的市场退出机制。

强化出版物监管体制，丰富和完善法律法规；继续进行“扫黄打非”，进一步完善工作的长效机制；深化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行动，加强国际版权领域的多双边合作。制定我国出版物“走出去”的有关政策，扶持一批有实力、有条件的出版单位走出去，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第三节　体　　育

（一）2005年体育事业发展情况

1. 群众体育。200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十周年，又是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十周年，全国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群体活动，掀起了新一轮全民健身热潮。6月份全民健身周期间，全国20多个省（区、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全国亿万群众健步走活动；十运会期间，以火炬传递、首届中国全民健身博览会、开幕式全民健身展示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活动充分展现了十运会“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主题；以“亿万青少年儿童”为重点的“五个亿万人群”健身展示活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同时，2005年我国还开展了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总监测样本量超

过22万人，为了解国民体质现状、变化规律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2005年，我国群众健身场地和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全民健身工程出现新的亮点。全年共投入体育彩票公益金2100万元，在全国进行了12个“雪炭工程”和“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综合健身馆试点项目建设；投资6000万元在全国建设了1200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命名、资助了全国15个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和7个全民健身基地的建设。

2. 竞技体育。2005年，竞技体育成绩喜人。我国运动员在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等国际重大赛事中，共在22个项目中获106个世界冠军，8人2队21次创15项世界纪录，至此，建国以来我国运动员已经获得世界冠军1901个，创超世界纪录1140次，其中“十五”期间，我国获得世界冠军493个，创超世界纪录98次。

除组织参加各种国际单项比赛外，2005年我国还成功举行了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和参加了第四届东亚运动会。2005年10月9日—23日在江苏举行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是全国竞技体育水平和人才状况的一次大检阅。经过精心组织和激烈竞争，本届运动会创造了一批优异运动成绩。另外，2005年11月，在澳门举办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上，我国运动员共参加了16个大项、204个小项的比赛，取得127金63银33铜牌，以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第一的成绩，保持在东亚的领先地位。通过组织和参加以上比赛，达到了为备战2008年奥运会锻炼队伍的目的。

3. 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2005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继续按计划进行。进一步贯彻落实“节俭办奥运”的精神，对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国家曲棍球场等奥运比赛场馆的建设规模与投资进行了调整，仅上述两个项目就节约投资7.21亿元。截至2005年底，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奥运村、射击馆、自行车馆、天津体育场、秦皇岛体育场、青岛国际帆船中心等新建场馆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在场馆建设的同时，北京奥运会参赛队伍也正在建立，各项参赛准备工作全面启动。

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体育资源还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处在较低水平。群众的自觉参与意识、锻炼意识亟待加强。城乡体育发展程度还不均衡，农村体育事业与城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不多，综合竞争能力与世界体育强国相比差距明显。竞技体育训练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体育产业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尚不完善，市场管理的规范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体育发展模式还没有根本转变，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体育改革尚需深化。

（二）2006年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

1. 继续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第二阶段实施规划》；抓好农民健身工程试点，选择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批示范性的农民体育健身设施；继续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实施全民健身工程和“雪炭工程”建设；支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区体育俱乐部等体育组织建设；组织开展全国性的“全民健身周”活动。指导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开展多种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筹备并办好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

2. 全力以赴抓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继续抓住“组织、计划、责任、保障”四个落实，加强科研攻关，努力提高我国的竞技体育整体实力；继续做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赛事组织等各项筹备工作；参加第二十届冬季奥运会和第十五届亚洲运动会，努力争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做好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筹备工作。

3. 进一步加强体育产业工作。加大以竞赛资源为重点的体育无形资产开发力度。做好体育系统场馆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规范体育市场，积极推进体育服务标准化工作；进一步做好体育产业统计工作。加强体育产业人才的培养。

4. 加强体育法制和道德建设。做好制定《全民健身条例》和修改《体育法》的前期调研工作。贯彻实施《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确保“十一五”体育事业的良好开局。加强体育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和作风建设，坚定不移地做好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

第四十章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节　2005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2005年，按照国家加强和改善投资调控、推进投资结构调整优化的总体部署，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的建设。一是继续加强城市一坯保基础设施建设。以“三河三湖”、环渤海、南水北调沿线、三峡库区、首都水资源保护以及西部中心城市等流域和区域为重点，加大对城市燃气、集中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强城市污水管网、燃气管网、供热管网以及垃圾收运系统等配套设施的统筹规划和建设，城市污染综合防治能力进一步提高，城市环境继续改善。二是加快城市供水设施改造和节水设施建设。继续加强对旧城区严重老化和漏损严重的供水管网改造，增加对贫困地区缺水县城供水设施建设的投人，积极发展小城镇及周边乡村集中连片供水，使部分地区居民“吃水难”问题得到缓解。加快城市净水厂改造及生活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大力推广应用节水器具，水资源综合利用率有所提高。三是以“疏解卡口、保持畅通”为目标，加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积极发展大运量的城市快速公交系统，支持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发展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至年底，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网长度达到400公里。

进一步加大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力度。一是加快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制，规范市场监管行为，完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管办法。二是全面落实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开放投资市场，完善项目核准制，积极鼓励和引导国内外资本投资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主体与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三是遵循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公平负担的定价原则，逐步理顺市政公用产品价格构成和比价关系，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完善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第二节　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环保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历史欠账多，已建成的设施也存在因配套不完善或运营资金不足而难以正常发挥作用等问题，一些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二是县城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仍然较为普遍。多数县城只有一座净水厂，运行年限普遍较长，净水工艺落后，供水管网普遍存在老化和锈蚀问题，容易引起供水二次污染，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亟待提高。三是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四是一些城市制定的基础设施发展目标缺乏科学论证，没有充分考虑城市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存在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和不切实际提高建设标准的倾向。

第三节　2006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重点

（一）深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建立政府引导、产业化运作的市政公用事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经营性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制力度，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运营效率、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准入制度，规范行业的环保、安全、能耗水耗标准和公共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完善特许经营权招投标制度和公众监督制度，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并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加大对市政公用市场进入和退出、运行安全、产品与服务质量、价格与收费、市场竞争秩序等的监管力度。

（二）继续加强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以完善和配套现有设施为重点，加强污水配套管网建设及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升级改造。通过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加强收费和用途管理等措施，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以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为目标，合理布局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逐步建立和完善县以下区域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因地制宜，采取经济合理的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垃圾处理的减量化。积极推进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设施的建设与改造，优化城市能源结构，建立安全、稳定、高效的城市能源供应体系。

（三）提高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水平

贯彻落实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和标准体系，

全面推行公交专用车道和交通智能化管理系统，确保公共交通的道路使用优先权。以方便、畅通、安全、高效、节能为目标，建设完善换乘便捷的公共交通综合枢纽和场站等设施，加强城市路网与公共交通系统的统筹规划和协同建设，提高公共交通设施利用效率。特大城市要加快发展大运量快速公共汽车运营系统，有序发展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四）加大县城及重点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合理规划县城、建制镇及周边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重点镇的规划与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和量力而行，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特别要加大投入加快解决老少边穷和西部地区的缺水县城、重点镇及合理供水半径内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五）加强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

完善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容和编制方法。推进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依据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正确评估，科学预测城市人口增长及城市化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城市布局和发展目标，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加强市域城乡空间的统筹规划，加大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节约土地资源，特别是要减少耕地资源的占用。同时，要充分考虑城乡协调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环境改善、自然及文化资源的保护以及城市综合防灾能力建设等重点内容。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地区的规划建设管理。进一步提高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质量和适用性，强化对建设用地性质、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的控制。加强规划实施监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维护规划的规范性和约束力。

（六）加快建立健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决策机制

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决策机制。按照公益性或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决策的不同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集体决策制度、专家论证制度、技术咨询制度和决策责任制度。特别是项目决策、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监理等各环节都要建立相应的责任约束机制。要突出体现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的公共性，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基础，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计划，既要保持适度的超前性，又要避免设施建成后能力的长期闲置。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城建项目后评价制度。

第四十一章　扶贫开发

第一节　2005年扶贫开发工作进展情况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部署，不断完善扶贫开发机制，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推进农村欠发达地区发展，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365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45万人。

（一）扶贫开发工作思路进一步明确

按照中央有关要求，结合扶贫工作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地区所有问题关键的基础上，把扶贫开发融和人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基础，并据此确定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切实提高扶贫工作成效。

（二）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积极推进

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家"十一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要求，在充分调查摸底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十一五"以工代赈建设规划纲要》和《"十一五"易地扶贫规划纲要》，促使全国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工作按规划、分步骤地实施。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一方面，注重使规划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农村政策的要求，并与其他农村相关规划相衔接，与中央其他相关支农投资既明确分工又相互配合；另一方面，注重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和任务，明确有关配套政策措施。

（三）中央扶贫投入进一步增加

中央安排扶贫专项资金230亿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90亿元，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68亿元（含国债28亿元），扶贫贷款70亿元（1—3季度）。中央扶贫资金重点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集中用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围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了一大批项目。同时，中央其他相关支农投资也积极向农村地区倾斜，特别是国债资金中安排的农林、水利、气象投资，80%安排到了中西

部农村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占50%。

（四）扶贫政策的针对性明显增强

为完善扶贫开发机制，扶贫政策进一步增强了针对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是为帮助贫困农民增收，国家在安排以工代赈计划时，进一步严格要求各地认真落实以工代赈劳务报酬政策，各地的以工代赈工程为参与施工的贫困群众支付劳务报酬9.5亿元，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二是针对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继续稳步推进易地扶贫试点工程，帮助20多万人通过搬迁，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三是为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部分省组织实施了“片区综合开发”工程，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四是针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开展了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此外，利用易地扶贫等工程，积极整合扶贫资金和其他支农投资，以发挥资金的整体效益。

（五）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国家在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方面，继续积极向中西部农村地区倾斜，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贫困人口素质的提高。教育方面，国家安排投资45亿元，建设“两基”攻坚农村寄宿制学校640所，支持西部地区职业学校200所，并实施了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卫生方面，国家安排投资50多亿元，通过实施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农村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及购置农村巡回医疗车，加强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文化方面，国家安排投资16亿多元，实施了县级图书文化馆、红色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及“西新工程”。此外，还安排2亿元国债投资，建设农村基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

（六）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得以重点解决

扶贫工作着重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一方面，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把提高农村欠发达地区抵御灾害和疾病的能力，作为扶贫开发的一个主要任务，有效缓解因灾因病返贫问题；另一方面，国家以工代赈等扶贫资金积极向受灾严重的欠发达地区倾斜，帮助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稳定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把3.6万受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的农村贫困群众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保障了生命财产安全。

（七）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部扶贫协作进展顺利

在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定点扶贫工作进展顺利。挂职干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定点帮扶县谋划“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战略和思路，提出政策建议。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明显，通过干部交流、企业合作、劳务输出等形式，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办了大量好事、实事。

（八）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推进

在开展世行贷款扶贫项目、日元贷款武陵山区扶贫项目的基础上，积极参加世行、亚行等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交流与研讨，探讨消除国际贫困问题的途径，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与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合作开展了“支持中国欠发达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合作开展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发展战略

和政策选择”等研究项目。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在学习借鉴国际上扶持欠发达地区开发经验、开拓工作思路的同时，积极宣传了我国的扶贫工作。

同时，扶贫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区域性贫困和返贫问题突出，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尚待完善。

第二节　2006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2006年，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进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积极帮助农村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为推进“十一五”期间的减贫进程开好局、起好步。

（一）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继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完善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中央对欠发达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投资；二是国家在安排相关投资和建设项目时对欠发达地区给予积极支持；三是在落实好中央既定支农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有关扶贫措施，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四是在做好定点帮扶、东西协作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全国的减贫事业。

（二）着重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基础设施落后对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制约，为长远发展打好基础，从内部、外部两方面改善贫困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充分利用以工代赈等投资渠道，重点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强、与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低产田改造、小型水利、乡村公路等工程，并积极动员当地农民参与施工，使其主动参与到自身脱贫的进程中来。针对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积极稳妥地推进易地扶贫工程。

（三）加大对社会事业建设的支持力度

积极推进教育、卫生、文体及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和人口综合素质。一方面，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社会事业，努力解决贫困群众上学、就医和文化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逐步深化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在进一步明确政府承担公益性社会事业责任的同时，按照市场规律努力推进赢利性社会事业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

（四）切实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管

进一步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二是扶贫资金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

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测和检查，确保各地按照国家投资计划分解下达项目计划，并按照建设项目安排扶贫资金。三是资金主管部门要会同审计、稽查、监察等部门共同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管，切实发挥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四是在做好扶贫资金和项目公告、公示的基础上，积极发挥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逐步建立起政府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扶贫资金监管模式。

（五）积极开展扶贫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争取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用于我国的减贫事业，并努力降低利用外资成本，减轻欠发达地区利用外资的负担。结合我国政府自身实际，努力支持其他国家开展减贫行动，支持国际组织和有关机构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作为首要目标和重要任务，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扩大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积极探索南北合作的新方式，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纪实

第一篇

1949 年的中国

开场话：收拾人心？丢掉人心？

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国统区报纸上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字是“人心”。人心到底怎么啦？请读者先看一段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

即将跨进1949年，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报喜不报忧的“喉舌”《中央日报》，在时局每况愈下、人心极度涣散的状况下，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一篇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赫然出现在1948年11月4日的《中央日报》上。人心状态如何，人心何以如此，怎样收拾人心？社论如此评论说：

近来东北战事失利，政府当局也不再讳言，而变相的物价高涨，更是每个升斗小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逼之中。这些真真实实的情形，真实得不是少数人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煞，更真实得不是任何粉饰之辞所能粉饰的了。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钱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作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之而大振。区区“共党匪徒”，不足平也。

退一百步讲，长江以南地区尚足可抵欧洲十余国，人口有二亿以上，出海便利，物资富饶，交通发达，较之北伐时代的凭借，其优厚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要悲观？根本毛病就在自身。如果吾人能够确实掌握并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那么消灭共产党实绰有余力，而确实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最根本的关键是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绝对不能靠一纸公文命令。……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战事失利，物价飞涨，特权阶层享有特权，只顾一己私利，无视人民利益等等，都是造成人心丧失的原因，需要赶快“收拾”。社论说明此时的人心已是一盘散沙，但还没有丧尽，还有“收拾”的机会。社论旨在提醒政府，痛下决心，兴利除弊，惩治豪

强，笼络民众，“对抗共产党”。如果这一次机会再不抓住的话，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就不言自明了。

如此直截了当地针砭时弊，抨击政府，同情百姓，在《中央日报》历史上还不多见。《赶快收拾人心》可以说既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当头棒喝，又为国民党政府开出了一帖“收拾人心”、“挽救时局”的上好药方。不过，社论要求国民党“收拾”人心，有时也让人们觉得仿佛是要政府“处理掉”人心似的。这以后，倒是有的媒体呼吁的“抢救人心”，还让人感到“人心”虽然丧失，但总还有一线救活的希望。然而，1949 年社会局势的发展，不幸给《中央日报》社论言中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把“收拾”或“抢救”民心，变为“争取”或“团结”民心，反而更快地把民心丢掉了，“收拾”掉了。

看过电影《乌鸦与麻雀》的人，也许还记得这样几个场景：

镜头一：

华先生正在烧报纸杂志，华太太问：“你看这些书报可以卖钱的，干吗要烧掉呢？”

华先生手里正拿着几本《观察》、《展望》、《文萃》之类的刊物在烧，略显不安地说：“我早和你说过，这两天外面很紧张，到处突击抓人，这些书留在家里没有好处……学校近来老出事情，老校长给教育局撤了差，昨天老张、老吴又给特务抓走了……”

镜头二：

楼下儿童边玩耍，边唱儿歌：“猴子猴，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住了二楼翻筋头；翻筋头，又接收，做大官，不发愁，汽车老婆都有喽。”

小广播动员孔有文收侯家的房子（该楼以前是孔家的），孔说：“这个世界就是没有是非，没的说”；“我告诉你（小广播），他（侯某）今天如果还是汉奸，我自然不怕了！可是人家神通广大，摇身一变，还是大官，依然骑在我们头上呀！”“我看透了，十年来在报馆当了个小校对，别的不懂，这几十年的历史倒熟了：一会儿‘剿匪’了，一会儿和平了，一会儿‘戡乱’了，搞来搞去，老百姓还是受罪的老百姓；人家明明是汉奸，一转脸就说是地下工作者，而我这个老头子，连自己的独养儿子都送去抗战，到头来却凭人家姓侯的一句话，是什么新四军的，就要抓人，还要把房子都得充公！你们说说，这笔账怎么个算法？天底下有什么是非？”

镜头三：

热闹的街市，小广播在马路上边走边喊：“涨了，涨了！”

小广播走进一条美货摊位林立、行人来攘往熙的人行道，匆忙地向摊贩打招呼：“涨了，涨了！……

美金又涨了！码子还不改……涨了！”

他终于走到自己的摊子旁，萧太太（小广播老婆）正卖一罐 5 磅奶粉给一位顾客。他急了：“唉唉，

涨了！不能卖！”

买主闻声丢下钱就跑，萧太太着急追过去。

“唉唉，不卖了！”可是人已远扬了。

小广播望着那人去的方向，咬着牙，拍着大腿埋怨。他愤然地收起所有标牌纸，说：“算了！收摊子！”把纸标一撕，往地上一甩，碎纸飘舞：“今天生意不做了”。

镜头四：

编辑部里，孔有文对同行小吴答话：“一边是愈戡愈乱，一边也愈涨愈凶噢！”

这部陈白尘执笔编剧，沈浮、郑君里、赵丹、徐韬等人策划主演，昆仑影业公司制作的电影，1949年在上海拍摄完毕，不料却被国民党政府所谓的“非常时期委员会”勒令停拍，剧本和已拍好的胶片都被没收，“昆仑”业务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一时在文艺界掀起轩然大波。

一部文艺作品遭到当局的禁止或取缔，通常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当局不愿意该作品暴露了当局不愿为人所知的真相，即所谓“阴暗面”；一是该作品歪曲事实，蓄意攻击现当局。国民党当局缘何禁止《乌鸦与麻雀》？原来小电影可以反映大社会。《乌鸦与麻雀》通过描述住在同一幢楼里的4户不同身份的人家，在金元券泛滥、舆论控制严密、物价飞涨、政局动荡时期的不同生活方式，以及家庭成员的各种心态。这4户人家分别是本人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当官、老婆孩子在上海、该楼楼主侯家；小商贩“小广播”一家；学校老师华先生一家；报社校对员孔有文一家。侯曾在汪伪政府任过职，“胜利”后，摇身成了“接收”大员。其余三家都租赁了侯家的一楼房间。在这幢楼里，各家心态不一。该片名称虽取“乌鸦与麻雀”两只小鸟，却似乎应验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俗语，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舆论导向以及民众心态，浓缩了大社会的状况，真实再现了当时社会各种弊端，折射了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国民党政府官员、市民、小商业者、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等各阶层人士的心态。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对《乌鸦与麻雀》如此敏感和痛恨，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上海一解放，剧组人员马上开拍了这部被禁的影片。政治依赖于经济与军事两大支柱，民心的向背，则是政治的重心。重心一失或一斜，政治立见危机。但是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经济措施得当，还可以安慰民心；军事是政治的保障，军事战略正确，也可以振奋人心，从而救民心于濒危。这一切，又取决政治上的纲正纪立。其时人心究竟到了何等地步？来年人心的演变趋势怎样？政府还能不能据方抓药，抢救人心？人心得失的关键在哪里？人心在国共双方较量的天平上的倾斜度几何？人心向背与1949年中国社会更替的关系怎样？请随笔者回首当年，考察乱世之秋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追寻历史变迁的轨迹。

第一章　和与战——和战声中众生相

“和”或“战”，是1949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奏出的强音。它们不但为国共双方军政高层人物魂牵梦绕，也为社会其他各阶层人们拭目以待。194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在《新年文告》（即共产党所称的《求和声明》）中提出“实现和平”；普通民众则恳求“求生”、“善生”，“使人人都有一碗饭吃，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备战以求和，拖延时间，实现划江而治，是国民党的幻想；战，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实现永久的和平，是共产党的理想；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是所有民众的迫切愿望。社会各阶层对和、战的期望值不同，自然众口不一，心态各异。围绕这些理想、幻想和期望，各自尽心尽力，为之奋斗。

第一节　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

从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起至1949年初，差不多20年。在这20年中，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事业则如火如荼，蒸蒸日上。可谓“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

1946年7月起至1948年7月止的两年中，国民党政府前线不靖，后院不宁。在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下，国民党军队被歼灭了260多万人。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国统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存，民众不断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采取何种办法才能挽救危局？在即将跨进1949年之际，再不进行全面检讨，势必导致军心一蹶不振，民心永远丧失，政权彻底倾覆。

蒋介石一向不轻言失败，可在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召开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面对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汤恩伯、桂永清、范汉杰、杜聿明、黄维、宋希濂、黄百韬等诸路“爱将”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署长等共120多人，神情沮丧，意志消沉。蒋介石声色俱厉而又万般无奈地慨叹道：“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在我们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

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此乃是蒋介石多年来最不甘承认、也最不愿面对的现实。在"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当头，不得不"警醒"部属。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未泄气，他仍不断地给在座的"爱将"们鼓劲加油，还大谈了一通哲学原理："对共产党的问题除了军事斗争之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个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他所说的哲学就是他接下来讲的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即"破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去掉这个"心中贼"。

不管他的哲学大道理讲得多么头头是道，那些在前线为他带兵卖命的将领最关心的还是兵器粮饷。几天会议下来，听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困难、危险、诉苦。部属们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的几个问题最能反映前方将士的心态和各路"诸侯"的迫切要求：(1) 军官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舞士气呢？(2) 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果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呢？(3) 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报国呢？他们建议从 8 月份起，所有官兵的副食品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的薪金也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五元至三十元不等，最多的不得超过三十元，借以维持官兵们的生活。物质生活的贫乏，已经使得官兵及其家属难以维持生计，逼得他们自杀、卖淫、卖儿鬻女，老百姓的生活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1948 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孝陵卫西侧的礼堂里，又召开了一次军政行政长官会议。会上，他不时地给与会人士鼓劲打气，要大家闻败不馁，下一步，只要凭借长江天险，陆、海、空三军配合，转败为胜，仍然是有把握的。希望大家赶快整顿补充，做好反攻准备，一心一德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革命大业"一定可以复兴。又把他随身携带的"剿匪"手本《曾胡增补治兵语录》拿出来，提示大家多下工夫去研究运用，说："曾国藩、左宗棠能平洪、杨之乱，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可以弭平'共匪'，为国家民族建树奇勋。"几天之后，他没有来得及布置"复兴大业"计划，1949 年《求和声明》甫一发表，即被毛泽东发文驳得体无完肤，不得不于 1 月 21 日宣布了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下野。当天下午 4 时 10 分，乘专机黯然离开南京，回到老家奉化。临走前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等部分党政军高级人员陪同下，前往东郊拜谒了中山陵。大家一言不发，以免自讨没趣。为了冲淡失败的阴影，打破尴尬局面，蒋介石强打精神，在陵前对随从进行临别训话："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愤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及西南广

大地区，比在黄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谁都知道，蒋介石所指的基础只是指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军队绝对数，而此时的民心所向，与北伐前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尽管蒋介石的客厅里还挂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手书的对联：“登高望远，立马定中原”，但事过境迁，此时的中原已是解放军纵横驰骋的疆场，蒋介石只能立马长江，遥望中原，徒增伤悲。这与内战初期，蒋介石扬言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时的勃勃雄心形成鲜明反差。国民党军队已不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也不是抗战胜利后，万民欢呼的国军，其气势与 1946 年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时不能相提并论。国统区民众心态也是今非昔比。

1948 年下半年到 1949 年，共产党攻势凌厉，胜券在握，国民党江山易手只是迟早的问题。在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之际，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议和姿态。这种局面是 1946 年 7 月，蒋介石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时绝对没有料到的。困兽犹斗，尚未绝望的蒋介石，还指望依靠长江天堑，与共产党垂死一搏。所以虽然宣布下野，却不愿就此向李宗仁拱手让权，向共产党乞降。在下台前 3 天（1 月 18 日），暗使手段，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专任总司令，实际上要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积极部署湖口到上海的长江防务；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司令；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这样，蒋介石人已下野，名义上仍为国民党总裁，幕后军权在握，遥控指挥。当时就有人预测道：蒋介石“若远走高飞，不再问国事，是他聪明；他若走到台湾，摆小朝廷的摊子，那就还有是非，他个人的悲运还要往下演。”结果，蒋介石不但没有马上退到台湾，而且安营扎寨于奉化，就近操纵国民党军政事务。

第二节 幻想、理想与期望

尽管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口口声声说：“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介石的意图共产党看得最清楚，毛泽东当即在 1 月 4 日《评战犯求和》中予以揭露。鉴于国民党求和心切，也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议和的 8 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共产党提出的这些条件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拥护。1949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政务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欢迎会，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而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的民

主人士。会上，各民主人士发表演说，一致痛斥国民党的和平阴谋，拥护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在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和谈。在进步政治团体中间，按八项条件谈和的舆论已形成一边倒态势。

但是，在如此苛刻条件下议和，一向唯我独尊的蒋介石绝对放不下这个架子。“大敌”当前，谁愿出山主政，出面与共产党议和？只有李宗仁企图通过与共产党议和，实现“划江而治”，圆一个“总统梦”。于是动员自己能够调动的力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逼着蒋介石“下野”。孰料蒋介石临下台之前，暗使一手，让李宗仁只捡得“代总统”虚荣，华而不实。他的命令出不了门，本来也“期望息兵，达成和局”，“死马当活马医”；因环境特殊，蒋介石处处在背后牵制，使他“这匹老马不能尽应有的努力”。不管如何，既为“代总统”，总想“代”出点样子，于是公开摆出了和谈姿态，企图在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基础上与共产党讨价还价，幻想共产党先停战，后和谈。

为了配合和谈，李宗仁确实采取了一些行动，来向共产党表露心迹。他上台后，即于1月22日发表声明，愿意在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在这一点上，李的态度十分积极。由于急于同共产党方面直接联系，他首先考虑与距离南京最近的三野陈毅部进行接触，派曾在苏北黄桥等地与新四军及陈毅打过交道的李明扬到江北找陈毅。他还拟订了“民主”、“和平”纲领，委婉批评蒋介石的独裁及其带来的危机。民主人士也是他寻求与共产党接触的一个渠道。上台不久，就让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暗中与民盟领导罗隆基接洽。当时罗的好友、著名记者浦熙修被南京卫戍总部扣押，罗正在设法营救，邱为了帮助代总统促成和谈，与罗拉关系，暗中请南京卫戍总部副司令覃异之帮过忙。既然与代总统有益，军警方当然照办不误，下令放人。李宗仁也没有忘记后台老板美国，他通过甘介侯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挂钩，争取更多的美援，军事上也尽量与黄埔系搞好关系。为了显示“和谈”诚意，他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在和谈时争得共产党的谅解。1月24日，命令行政院作出如下变革：（1）各地“剿匪”总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4）释放政治犯；（5）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依法不得逮捕。李宗仁确实想作出一点民主姿态，但因受蒋介石牵制，无法施展；有蒋介石随时在幕后撑腰，蒋介石的心腹便处处与李作梗，他们对“代总统”的命令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如解除报刊禁令、释放政治犯等措施就不能兑现，张学良、杨虎城两政治犯因蒋介石的阻挠，不但不能释放，反落得一囚一死的命运；经济上一塌糊涂，国库里仅有的1.6亿多美元的黄金储备也在李上台之后，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组织运到台湾。李宗仁要钱没钱，要兵没兵，捉襟见肘，有心无力，有限的“民主改革”也要被死硬派“拆烂污”，注定了他主持的与共产党的和谈之路崎岖坎坷，困难重重。

对于国民党所企求的“和平”，社会舆论不一，有的帮助蒋介石及李宗仁呼吁呐喊，要求共产党就地停战和谈，不断对共产党施加压力。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国统区有媒体做过分析，指责共产党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提出蒋总统、李代总统“两人的

企求和平，不仅见之于卑躬屈膝的言辞，更见之于至诚不息的行动，蒋总统既然引退于前，李代总统又征求社会贤达的意见，要求代表去北平，探询共产党的意思，都说明政府诸公确能体念人民痛苦之深，尽其进取和平的最大努力”。而共产党方面，毛泽东发表他的八项和谈条件，李代总统愿意就此八点展开商谈，依情理讲，只需共产党派定代表，指定地点，和谈即可进行，“哪知共产党得寸进尺，战犯名单在一批一批增加，或将永无终止的时候。今天的政府与共产党，既同称为救国救民，‘解放’人民，则目前人民最紧要最迫切的一事就是立刻不打仗，立刻停战。所要的是整个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永久的和平，而决不是一地一隅的局部和平，也不是一月半月的暂时和平。”把阻止和平的责任尽往共产党头上推：和平障碍就在于共产党完全以征服者自居，不再考虑人民仍受战祸之痛苦，且自信用武力可以统一中国，而不必以对等地位来看待李代总统领导的国民政府。认为在共产党现在态度下，和平无望，因为共产党今天正是踌躇满志、趾高气扬的时候，人民不过是幌子，是玩物；与根本不讲信义者谈和平，不啻缘木求鱼。何况共产党口口声声以“解放人民”为号召，则人民哀求停战和谈的呼声毕竟不应充耳不闻，否则其讲如何自解；又拿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共产党3年前一贯呼喊的口号，来佐证眼下的共产党不愿停战，缺乏和平诚意的观点。这些舆论把共产党采取的战争行为定义为“反人民”，吹嘘只有国民党政府才是人民意愿的代表者。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提到的“人民”，并不是广大民众，而是国民党政府中少数人。国民党政府如果真像他们描述的那样，处处为人民着想，那么局势也不会演化到今天这般地步。他们的目的，是把战争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帮助国民党争取丢得差不多的民心。3年来，共产党一直号召和推动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国统区常常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3年后的今天，国民党居然拿出这些要求，指责共产党的和谈诚意，富有戏剧性，共产党自然不会接收。

国民党政府内部，对和谈的反映可谓千姿百态。有人在感觉到和谈局面难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展开时，就“马后炮”放得奇响，所有的“先见之明”都应声而出。行政院院长孙科在这点上有上乘表现。1949年2月4日，行政院在院长孙科的带领下，率先“避难”广州，引来朝野非议。既然总统和代总统都提出和谈，作为一院之长，就有往自己脸上贴金、向国人表功的义务。2月6日，孙科在广州行政院“乔迁”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夸示自己先知先觉的特异功能。他说，他开始组阁时，就决定谋取“光荣和平”，而绝非投降内阁，他一向主张以和平解决国内问题，而绝不能以武力屈服而谈和平。政府的迁穗，系为避免战火的威胁，因政府所追求的是和平，绝不能作城下之盟，2月4日迁穗，是经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各首长的同意才进行的，并非行政院单独行动。政府只是异地办公，而不是迁都，可以在不受战火威胁下为和平而努力。他声称，在胜利后，曾有若干人士主张以战争解决国内问题，他就极力反对。2月7日，孙科再次鸣锣登场，抛出“平等和平”的论调，为战犯开脱，否定八条中的第一条。然而，孙科的“马后炮”在国民党内部乃至个别媒体引来一阵唏嘘，因为1月以后的两个半月以来，行政院举棋不定，彷徨无主，喊出“光荣和平”后，碰了一鼻子灰，而行政院迁穗，虽说是得到李代总统的批准，又因行色仓皇，受尽了冷嘲热讽，加上若干阁僚

大受指责，革新政治根本谈不到，于是政客朋比，流言四起，加上立法院倒阁之意强烈，且有人提出蒋介石留在国内，仍在阻挠和平，要求他出国。

强硬派竭力主张，只有能战，才能与共产党谋和。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对于和平问题曾经发表的书面讲话，最能够代表当时国民党强硬派立场。在讲话中，他强调：在和与战的问题上，政府要和平，共产党要战，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备战以言和，能战方能和。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特别指示，说“政府与其五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八项条件“政府不愿意接收”等。

地方实力派也不断发表言论，大谈他们的和平主张和计划，认为靠政府不行，靠共产党更不行，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局部和平。2月6日，在兰州召开的西北各省立法委、监委、国代及耆绅出席的时事座谈会上，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就表示：共产党标榜的解放人民的方式，不合人民的需要，我们今天应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自己的命，要团结一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工作，以西北之力量保卫西北，促进国家进步，我们需要使西北人民听不到枪炮声，才算是达到保卫西北的目的。

这些言论企图表明，国民党是要和谈的，但共产党不愿先停战，那么，破坏和谈的责任就应该由共产党来负；国民党为了人民，要求和谈，共产党不愿停战，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只有满足国民党的就地停战，“划江而治”，才是真和平；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步步退却，不是败退，而是主动撤退，作出和平的姿态；蒋介石、李宗仁都是“爱好和平、体贴民情的谦谦君子”，共产党、毛泽东反倒成了破坏和平、不顾人民的“战犯”。按照强硬派的立场，如果共产党按照他们的意见就地停战和谈，则国民党仍可以占据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还拥有大量武装力量，中国很可能再次陷于南北朝对峙局面。

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及国民党强硬派的一系列言论，激起一阵议和浪潮，引发了不少社会人士对议和的关注和呼吁。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蒋介石等口喊和谈实为拖延时间、伺机反扑进而实现以战求和、划江而治的真实意图，他们的议和愿望与国民党当局及强硬派有着本质不同，他们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真诚盼望战争早日停止，给国家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1月4日、5日、7日，各地和平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天津参议会发出通电，呼吁双方罢兵；北方29省、市国大代表联谊会致电蒋介石，请求他委曲求全，拯救国运于垂危，企求和平早日实现；湖北省筹划组成和平促进会，发动熊秉坤，拟请双方罢兵；江苏参议会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呼请双方罢兵讲和；上海参议会于1月8日通电，发起全国和平促进会，邀请各省、市的参议会及全国性团体推派代表，来沪会商，得到很多单位的赞同，并于2月8日召开筹备会，准备召开正式会议；1月9日，北平积极筹办和平促进会，邀请各文化团体及教授参加，东北留平人士也加入筹备活动；青岛市参议会因山东青岛一带，先遭受8年抗战之苦，接着3年内战，工商业凋敝，土地荒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盼望和平心切，特意开会，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朱德，要求停战言和……

社会各界大多数人确实真心希望和平。如有的和平团体和参议会提出：“今民心厌战已达极点，国家将濒绝境，若再兵连祸结，必将陷国家民族万劫不复之地”；“国家需要建设，人民渴望休养……若再迁延几月，鹬蚌相争，炎黄子孙将永沦为奴隶”；等等。

和平声明发自肺腑，声泪俱下。1949年2月12日，全国和平促进会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揭幕，标志着国统区各社会力量呼吁和平、争取和平运动趋于高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16个参议会和全国性职业团体计36个单位的代表48人。社会力量和社会团体纷纷在会上阐述和平主张。与会的监委会代表对国民党参加和谈应持的姿态提出4条意见：要有勇气承认失败；要妥商条件；要排除障碍；要整饬纲纪。甘肃代表提出8项建议：和平应以平等互谅为基础；双方即行停战；召开全国各党派、各法团、各区域代表及社会贤达的政协会议；维持中华民国法统，并可依法修改宪法；依据民生主义，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政策；保障人民生活自由；军队属于国家，任何党派不得以武力当工具；和谈一切应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作全国一致行动。2月14日闭幕的上海“全国和平促进会”发表了宣言，称：首先，我们以为要促成和平的实现，目前必须努力达到三点：(1) 要求双方立即就地停战；(2) 要求双方同时停止宣传攻击；(3) 要求双方迅速派定负责代表，在共同赞成的地点，开始全面和平会谈。其次，果真要获得真正永久的和平，而不是两个战争时期中的间隙，则必须有下列两点共同的认识：第一，人民必须重视自己的地位和力量；第二，和平的目的是为了救人民，保障人民的生存与自由。政治制度尽可以在自由平等的大原则下，在不变更中华民国国体的大前提下，作适合时代环境的规定，而今后最重要的国策不外：(1) 政治民主化；(2) 经济社会化；(3) 军队国家化。总之，我们老百姓今天实在感到活不下去了，实在需要大喊“救命”了。

各方人士对国民党诸般弊政提出尖锐批评，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按照民主原则进行革新。同时又主张，这些变革应在不变更中华民国国体的前提下实行，国共双方要在就地停战、基本平等基础上开始和谈。这些建议与国民党强硬派的立场颇多相似之处，但不希望政府以战谋和。他们对国民党批评尖锐而深刻，有关人民利益的要求真诚而具体，对长年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恐惧而厌恶。他们的主张和建议与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尚有很大距离，但毕竟能代表国统区大部分人士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国共双方和谈的列车才得以启动。

和平促进会召开的第二天（2月13日），由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登机启程。全上海乃至全国的人们都十分关注此行代表。从起飞前机场送行的热烈场面足以能够看出人民对和平的殷切期望。代表们在机场的身份几乎被当作天使，一重重地被人们包围着，尤其是“和平老人”邵力子，他在被邀到楼上休息时，一扇他跨过去的门立刻让人加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和平之门”。代表们被一种热切期望的空气鼓动得相当兴奋。有人说这几位代表的籍贯正巧是分布在东西南北，似乎他们正好代表了东西南北全国各个角落的人们的意见。颜惠庆说：“今天，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在希望和平而感到和平之可贵；中国人民因为受苦最深，所以渴望更切，我们代表团能够在这种机会里飞向故都，谋求和平，对全国人士的和平渴望，总是算有了进步。但愿此行能够把

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电讯共方对正式和谈的时日问题的答案，及部分意见带回，就算圆满了。”当专机升空起飞时，许多人高呼“终于去了”。对

于“和平代表”的任务，邵力子作了形象的说明：他认为“敲门使者”，实在是不妥当的，因为敲门是用在门尚未开的时候，我们是去推开那扇仅是虚掩着的门，我们希望和平之门大开啊！可见，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和平的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对和平的实现寄予厚望。

国统区普通民众对于和平的愿望并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吃够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的苦头，对政府并不存有多大期望，但他们并没有产生推翻现政府的政治念头；对于共产党的政治情况，他们还模糊不清，并不清楚在国民党之外，是否还有更开明的政府以及有益民生的施政，对这场战争谁胜谁败，他们心中无底。他们只凭直感知道，战争是导致他们生活不得安宁的主要原因之一，唯有结束战争，和平才能降临，生活才会安定。1月15日天津被共产党攻克后，国统区就有人士通过考察时局，揭示民众内心愿望，认为民众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印象，但至少没有理性认识，他们到底愿意跟谁，还不能最终确定，心中有一大串疑问。在共产党倾覆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可能性方面，他分析道：就以往的三年战果来看，共产党的成绩远胜于政府，可谓节节胜利。但就一般历史上的战争来看，初期的胜利可能是全面胜利的基础，但不一定能确保最后的胜利。现在政府尚保存大部分地区，又有外援，不是共产党短期内所能倾覆的：政府消灭共产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抗战之前，苦战10年，还不能消灭占弹丸之地的共产党，何况现在已占有半壁江山？全国人民心理是否愿意任何一方统治中国也成问题。从战区逃出来的人民，有称赞共产党的军事与政治的，但何以他们不在共区继续呆下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一般的舆论对于政府的不满是事实，一部分人士希望共产党执政也是事实，但如果说大多数人们都愿意背弃政府而投向共产党的怀抱，则恐非尽然。国民政府的优点和弱点为人所共知，但共产党的优点和弱点则令人甚为模糊。国民党的政治日趋下游，人们固然痛心；但其北伐与抗战的功绩一时当不致为人所遗忘。客观地说，我国民众有一部分人希望由共产党执政，也有一部分人仍旧拥护现政府，而大多数人民态度如何则不易知，但绝不会完全拥护一方是可断言的。为了避免战事继续拖下去，为了解救人民所受战争的痛苦，似乎只有第三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作者对当前局势的分析颇能代表国统区普通民众的心态：不管谁胜谁负，也不管何派当政，战争结束，和平实现，就是他们的愿望。

不少站在中间或偏左立场的新闻媒体对和平始终持低调态度。它们盼望和平，但又觉得眼下实现和平困难。早在1948年11月，被蒋介石政府逼得出走香港的王芸生，就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社评，预测说：“时势如此，和平无望。在此情况之下，政府自然要尽一切可能，以加强军事，继续打下去，经济自然也尚难好转，人民自然还要吃苦。这一串，好像命中注定，无可如何……那么，难道就这样下去了吗？人类虽然不免战乱，毕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而且战乱是变，和平是常，我们所付出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战火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和平既已不可遽得，且也不能廉价取得，那么我们便唯有忍痛挣扎，以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了。”认为眼下实现和平非常不易，为了永久的和平，民众暂时遭受的战争痛苦是值得的，让

民众宽心，暂时的痛苦过后，永久和平目标为期不远。

有的受进步势力影响的媒体从历史和现实，从国际到国内，分析了和平实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驳斥了国民党强硬派备战谋和的言论，指出："'光荣和平'论，从历史上看，只适用于国际战争，决不适用于国内战争"，"在国内战争中，以备战来谋求'光荣和平'，必致和平尚未诞生即行流产，结果更无光荣可言。其次，光荣究竟属于谁？如果属于政府，则不无问题，这个政府把国家弄得这样稀烂，有何'光荣'可言；而到和谈时，反而斤斤计较什么光荣，岂非令人啼笑皆非！""总括一句话，在国内战争中，不谈'光荣'则已，如要谈'光荣'，这个'光荣'应属于人民，应该来自人民。"这与共产党的观点已非常接近，强烈谴责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揭穿了国民党叫嚷的"光荣和平"的用心，指出目前的战争虽然让人民遭受了无尽苦难，但是，如果让这些苦难继续更长的时间，人民将更加痛苦；为求真正持久的和平的实现，就必须忍受目前的苦难，继续战争，直到把国家"弄得稀烂"的政府被推翻。

国共两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与民间团体和普通民众的愿望并不完全一致。在最后的较量中，谁能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因素，把社会各阶层企求和平的不同心理，引向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轨道，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谁就能在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赢得胜利。

最了解国民党的莫过于与蒋介石打了 20 多年交道的共产党，研究蒋介石最透彻的莫过于毛泽东等共产党高层人士。在当时条件下，李宗仁无法独立主持大局显而易见，在议和决策上也不例外，仍要经常跑到奉化向"下野"总统请示汇报。连和谈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在赴北平与共产党正式谈判前，仍要向蒋道别。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以毛泽东的英明，以蒋介石的野心和德性，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有花无果。共产党坚持的国民党在和平条约上不签字解放军要过江，签字也要过江，是既定方针，也是终极目标。出面主和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上台那一天起，就为个人的命运打上悲剧色彩。

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求和言论，共产党一方面不断严厉驳斥，一方面表示和谈意愿。2月份，毛泽东接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代表时，曾含蓄地说："打牌打了这么久，也该不再打了。"发出了共产党愿意和谈的信号。与此同时，对蒋介石暗中调兵遣将、镇压学潮、金元券泛滥、物价腾涨等，共产党总是及时予以无情揭露和批判。对于工商业等民间团体的愿望，共产党则尽量给予满足。如二三四月份，上海工商业界提出的通航、通邮等建议，都得到共产党的满意答复，有些虽然未及实施，上海即已解放，但对于团结大批工商业者，促使他们在共产党进驻时，留在大陆，保护工商业企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坚持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谈判的强硬立场丝毫没有改变。1949年4月1日，南京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惨案，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及时予以揭露，使国民党更加陷入被动。4月6日，谈判尚在进行之中，《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的社论。这更加表明，共产党根本不想在国民党要求的"平等"条件下，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一切行动都围绕彻底打垮国民党军队、消灭国民党政权这个宗旨。

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会发现，那时的李宗仁不能组织力量与共产党抗衡，也没有资本与共产党实现对等和局。在国民党历史上，蒋介石已有两次下野的“壮举”，可是每次他的力量不减反增。此时的李宗仁确实想大干一番，雄心勃勃地想以自己的实绩压倒蒋介石，博得满朝文武官员、国民及国际后台的支持。他在2月15日的对全国文武公教人员及前方将士广播中，表明了他兴利除弊、重新振作人心的决心，决心在最短期间，政府必须完成两项为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重要任务：第一，谋取和平；第二，革新政治。关于革新政治，他谈得最多，认为目前最切要、最起码的，就是整肃纲纪，换言之，就是要先从军政人员心理和行为上的革新做起。他在演说中，指出现在国家残破到如此地步，人民遭受如此不堪忍受的痛苦，不仅使国家建设无法着手，甚至于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的一线生机也已经濒于灭绝，不仅使人民的幸福无法增进，而且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维持，这既是多年来对内对外战争的结果，更是政治腐败的恶果。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豪门霸道、政治腐败、纲纪松弛、官民关系紧张，断言此后的政治是否能够改革，国家是否能够复兴，乃至全国人民死生祸福，党政人员个人的功罪荣辱，均系于今天这一转念之间。号召全体军政人员不要再因循泄沓，错过了这个新生的机会。这是李宗仁对国家、军政的一次全面检讨，也是对所有军政人员寄予的厚望。他已经暗示，如果这种现象不能马上纠正，那么国家、人民、军政官员个人将失去一切振兴的机会。李宗仁的演说虽然慷慨激昂，但付诸实践的效果并没能令国人“耳目一新”，也未能令共产党政府“刮目相看”。权贵豪门照旧腐败，军民官民关系日趋紧张，国计民生更加凋敝。以此情形，怎能与蒸蒸日上的共产党谋求对等和谈？

既然如此，4月1日赴平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团并没有带回更多的和平希望已在意料之中。4月20日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被国民党当局拒绝签字，和谈最终破裂。4月22日，解放军突破千里江防，4月23日，南京解放。下野的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了，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前台，收拾李宗仁无法收拾的残局。4月27日，他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溪口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承诺：愿以在野之身，追随军民奋斗，救国救民信念不移；号召军民拿出抗战时期的精神信念，军民打成一片，确信“转危为安之机就在今日”；决心接受教训，努力全面革新，一致奋起，争取最后成功。又由奉化飞到杭州，一面决心“要不惜一切牺牲与共产党周旋到底”，一面又担心输光老本，下令所有部队向沪宁杭撤退。集中兵力保卫大上海。他的决定是不错的，可惜太晚了。尽管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发布了大量反共传单，高呼“反共剿匪是救国救民”等口号，动员各方力量抵抗解放军进攻上海。但被国民党政府害惨的上海人民对这些激情有余、中气不足的宣传口号已经漠然，他们虽对共产党缺乏较多的了解，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无任何幸福之言确是事实。再说人民也不是抗战时期的人民了，对于蒋介石的高调听得够多了。既然这位“抗战英雄”不要人民，人民何必为他卖命！共产党过江后，势如破竹，南京解放后的1个月零3天，就拿下了大上海。从此，国民党军队一败千里，在较短的时间内被赶出祖国大陆。

第三节　醉生梦死的豪富，紧张对立的官民

1948年开始，国民党内部弥漫了悲观思想，人们对当局宣传的各种消息越来越怀疑。1948年2月17日，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中就陈述说：在政府内，一种悲观和失败的心理正在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还注意到，随着局势继续恶化，这种情绪越来越广泛深刻。那些薪水过少并且遭受着一切通货膨胀之苦的官员们（外交部长的月薪相当于美金35元）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与共产党的争执不能为一纯军事手段，或至少不能有一种会使政府权力保持优势和不受侵犯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现在静观待变的人为数日多……在国内若干地区的地方领袖，由于对中央政府还在继续完成其职务失去信心，已经开始显出各自为政的倾向。进入下半年及1949年后，这种悲观情绪越来越浓。

国共战区前沿的政府机构人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逃”的人，另一类是“混”的人。他们完全失去与“党国”共存亡的勇气和决心，平津被围后，有路子的纷纷南飞潜逃，没路子的浑浑噩噩，醉生梦死。逃的人急急惶惶，12月22日那天，北平就有3000多人申请购买飞机票，买票的人竟似抢购挤兑一般，排成长长的队列。这些排队登记离平的乘客，除少数有特殊理由外，大多是被人们称为社会“渣滓”的人，其中有些竟是各部门的首长。“混”的人则浑浑噩噩，不思振作。天津《大公报》的一则社评对“逃”和“混”的人的嘴脸有过形象生动的刻画：这些人“平时腰缠累累，事急鸿飞冥冥。日常擅作威福，恣意享受，垄断把持，排挤倾轧，以保禄位。现在那一副精神，却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千方百计，争先逃跑，连办理交代的手续都不管了。还有若干人员更是眼明腿快，早就找借口，抓理由，出差京沪，故意逗留，今天却千呼万唤也不回来了。更有些没出息的人们，虽然身在平津，早已心驰港粤，整天凄凄惶惶地要伺隙溜走。就是这一大群人，把这个社会闹得好像乱纷纷的。其中有弃职潜逃的官吏，已经奉文缉拿，或要求押解回来，听候惩罚。然而这一班可耻的人们，一旦飞到京沪一带，正如蛤蟆跳进了池塘”；“本来社会中的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是充满了推拖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大家在‘且管今朝，休管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观念支配下，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无能，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更有不少人抱着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耗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所以，尽管市面寥落，生意清淡，烟酒等消耗品的销售却骤然增加，酒肆楼馆，狂赌大嚼之风甚盛。由此预测说：“其流毒所至，可以使社会陷于麻痹瘫痪的状态。”政府机关内部，掌权的，没有谁愿意打起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尽职尽力；许多有钱的人，唯恐战局混乱，末日来临，深怕到时有钱无处花销，就拼命吃喝

玩乐，用完等死。只是这些人的钱，大多不是辛苦劳动挣来的。所以花起来不心疼，不花白不花。

战区前沿如此，处于“后方”的京沪一带也是这样。入上海的所有饭馆、旅馆、戏馆、跳舞场、电影院，无不挤得满满的，特别是酒楼饭店，情形真是可怕。拼命地喝，拼命地吃，拼命地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钱似的，在内地乡村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在饥饿线上，就是在上海，也随处可见终日不得温饱的穷苦人，见到饭店里这种情形，真会使人联想到是升平世界，也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景象。

与普通公职人员的待遇相比，握有权柄的上等公务人员的薪金并不多到哪里去，但他们显然过着比普通公教人员优厚得多的生活，如果没有不正当的收入，他们应当过着与公教人员一样惨苦的生活。可是事实上，正如上海10院校教授会所揭露的那样：他们有的拥有大量金钞，有的在海内外各地都市都广置地皮大厦，平时享受程度超过古代帝王，就是他们所垄断的国营金融及企业机构的同样公务人员与公丁茶役的月薪也无不倍于这些公教人员而自给有余。

有权有势者大肆吃喝享乐，政府却一再号召人民勤俭。只有人民裤腰带勒紧了，政府要员的裤腰才能宽松。对此，连一些地方的议员也表示反感。1948年9月广州参议员会议上，议员们就提出，只有豪门应该勤俭，质问政府道：“现在广州市民实在已经到了最大限度勤俭的境地，还要叫他们再勤俭吗?”

1949年以后，国民党内部，更是低压笼罩，人心失常：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使业已紧张的官民关系更加恶化。官员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不良行为就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简直把人民不当人。蒋介石在不少场合都发表过讲话，要求属下多考虑人民，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他的话没有谁能听得进去，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大家能捞一点是一点，不捞反倒不正常。

在这样的行政状况下，普通民众却连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活需要都得不保障，更谈不上政治上的应有权力。如四川的渠县，人口70万，地广物丰，可是在国民党统治下，1948~1949年间，由于生活的刺激和压榨，迫使人民一天一天走向穷困、痛苦以致死亡。那里的人民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尤其是地方法院，怨声载道，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随你民事刑事，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二百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出催收，绝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方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再以贵州省的食盐为例。贵州的食盐一向依赖四川供应，抗战胜利到1949年，川康盐局随时提价，贵州人早已不满，尤其从1948年8月19日~12月1日，时间不过三

个月，盐价即已经调整6次，涨价高达50倍多。战前1升米1斗盐，人民乐道。到了1949年，一升米最高价20元，而1斗盐价黑市已达25元，1升米买不到1斗盐。这还是贵阳市，边远的地区早已视食盐为“打牙祭”，除非婚丧庆悼，逢年过节，不敢妄想，食盐为人民生活“每天开门七件事”之一，如此奇涨，超过人民负担能力。川康局公布盐价上涨后，贵州人对盐局的不满程度更是火上浇油。闹得如此离谱的原因，一是官商串通作弊，高抬价格，盐商每请加价，有求必应。黔盐运销除盐局自运自销一部分外，余均委托商人办理，如盐运商认为成本不够，可随时向盐局请求增加运价弥补，否则即以停运相要挟。同时一面制造谎言，一面制造黑市，以达到一面增加运价，一面获得黑市售盐的双重利润。贵州的10多家盐运商表面上只是运商，暗中都拥有无数的销售商作下线，同时与盐局勾结。而且他们本身就是豪门资本利用半官半商买空卖空的手腕，把黔人害得死去活来。如此盐官、金融界、运销商沟通成一系列，贵州的食盐问题永远不能获得解决。二是盐局办理不善，措施失当，运销办法落伍，不符实际。

在黄金的存兑上，政府及银行官员几乎不顾普通民众利益，有的竟背着民众，“先下手为强”，自行将计划内的黄金内部瓜分，等到民众要兑换时，已是行在金空，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如蒋介石退守西南时，西南的金元券虽然仍在使用，但人们还想在最后关头，把金元券兑换黄金，金融市场混乱不堪，商店快要关门。蒋介石坐镇的成都，尤为严重。各银行门口等着兑换黄金的市民排起了长蛇阵，四川军政长官王陵基眼看局面难以收拾，为了安定人心，亲自跑到蒋介石下榻的成都黄埔军校当面诉苦：再不抛出一点黄金，很难控制局面。蒋介石只好同意先拿出500两供兑换。当天全市共设3个兑换点，计兑换了135两，其余365两下落不明，自然是进了经办者的腰包。

这类现象甚至连一些反共老手也骂不绝口。宁夏中央银行地处偏远，转运不便，1948年12月9日才开始办理黄金存兑，比预定的时间晚了13天。首批运到的190多两黄金，由于手续不周详，不到数日，存金便全部告罄，一般老百姓都没有兑上，引起了一阵“黄金潮”。原来银行内部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将黄金兑进了自己的腰包，不少老百姓手上拿着白条干瞪眼。身为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终于忍不住，“仗义执言”，为蒋介石鸣怨叫屈：“总统为国为民，劳心劳力，而命令一下，执行机关，中间办事人员，层层折扣，命令完全变质，这不仅是黄金存兑独有的现象。言念及此，真不禁为老百姓叫冤。”最后，冒着越俎代庖的谴责，出动军队，才将作弊人员查出。

国统区民众饱受政府折腾、官员欺凌，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能逃避到台湾的已是“上户”，但当他们应该算是找到了一块“平安地”后，并没有对现政权增加一份感激之心；那些留在政治争夺地区的民众也早已对动荡不安的时局习以为常，乃至近乎麻木。

第四节 枵腹从公的公职人员

普通公教人员的凄惨生活与那些有权有势者的豪奢生活恰成鲜明对比（公教人员是那时政府公务员和教职人员的统称，在有关文字中，常连在一起称呼。教职人员的生活及心态在后面谈到知识分子及学校情况时，将作详细介绍，笔者此处的公教人员主要集中讨论政府公务人员，或公职人员）。“八·一九”之后，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艰难。延至 1949 年，金元券泛滥贬值，公职人员的生活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急剧下降。

“八·一九”以后，万物上涨，唯有金元券猛跌，公职人员无法应付一日数涨的物价，整日为生计犯愁，经常牢骚满腹。每到月中发薪，便有许多公职人员难以入眠，不知如何处理到手的金元券。一位叫“索贝”的公职人员写了一篇小小说《薪水贬值记》，道出了他们的苦经：14 日下午，为了如何处理明天的薪水，几个同仁商量了半天，想好好发挥一下薪水的妙用。尽管数目很小，但还是想在这方面创造点“奇迹”。大家对金钞、物资、拆息等有不同意见，于“袁大头”一点，大家众口一词，深恶痛绝，说再不要上“冤大头”的当了：“大头”从旧历年初就已 1600 元金元券，此后的一个多月中，竟只跌无涨。上一次“应变费”全买了“大头”，十六买进，十四卖出，真是惨绝人寰，冤透、冤透。夜间这位公职人员还在算计：要是买“袁大头”，最适宜他们这些人的身份。但有前车之鉴，决定不能再捧袁世凯的脑壳，自食其果。15 日一早领得薪金，大家不再考虑“大头”，一致认为央行要大抛黄金，银根必紧，还是放“星期存款”去吧，这比较容易办而不会太“吃亏”。至少可以保存一部分币值，也有人家里的柴米油盐宁可不买，也要去放拆息。结果 15 日中午以后，“大头”从四四跳到四八，16 日晚上已跳到六五高峰。比金、钞涨得快，跳得凶，比“星期存款”的拆息更是大巫见小巫。只好自怨自艾：买什么不涨什么，不买什么涨什么。其实他们没有弄清，那几天正是各厂商、各商店以及上海各公务机关发薪的日子，公职人员拿了这点薪水，没有别的念头好转，还是去买“大头”，“大头”安得不狂涨？袁大头，冤大头，怨大头！那时生活指数涨到千倍，公职人员的薪金经常还只在二百倍左右徘徊，公职人员虽然还有点固定薪水可得，不过这种日子十分难熬。有时定好了 15 日发钱，由于银行银根紧缩，各机关领款人都排成长队恭候，待钱拿到手时，已经是 18 日。而这时物价已经提前两天上跳了。有时发薪前，米价只 4 万一担，拿到薪水时，已涨到 5 万元；“袁大头”由 5000 多一枚涨到 6000 多一枚，比原先的价值大大打了折扣。

京沪一带公职人员待遇在全国还算是好的，他们可以享受政府的食物配给，深为其他城市公职人员羡慕。即便如此，他们也已是度日维艰了。以 1949 年 3 月上旬的上海市府为例，在江西路、汉口路交界处的市府大厦，是上海的心脏，有 1000 多名公职人员。这时上海的生活指数已跳到 643 倍，公职人员所得薪金仍是按生活指数 75 倍计算的。照此计算，市长一级每月可拿金元券 17400 元的薪金，老资格的科长每月 10000 元

左右，多数公务员不上万，一般能拿4500元，工友的底薪是600元，多时在千元左右。靠工薪生活的公职人员和工友最令人担忧。一位40多岁、老大学生的单身科长每顿只能吃一碗光面，工友夜间只能睡地板，每月工资付了饭钱，所剩无几，有时连理发、洗澡的钱都不拿出。他们"过一天，算一天，只求不饿死"。家里孩子较多的公务员生活就更惨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姓黄的公职人员，家有4个女孩、2个男孩，每月薪金四五千元及配米3斗，这点钱连全家买白水煮面吃都不够，小孩上学以米算学费。妻子带着两个男孩被迫疏散到杭州乡下，让丈夫带着女儿们"好在上海生活"。可凭这点钱无法生活。于是，他把4个女儿（分别为7岁二年级、11岁五年级、12岁、14岁六年级）送到妇女教养所去请求救济。临别时，孩子哭哭啼啼，父亲忍着泪水。教养所所长为难地对黄某说，这里没有高级班，大孩子上学有问题，黄某苦笑着说："现在不能谈读书不读书，只要把肚子混饱。"

相对于京沪一带的公职人员，内地公职人员待遇更低，他们不能享受到食物配给，金元券的购买力低得吓人，中央的款项又总是姗姗来迟，机关经常有断炊之虞。2月10日这一天，长沙春寒料峭，大雪纷飞，一天未停，元宵节将到，街头萧条，宛如死市，各机关因经费困难，相率停开伙食，财政厅长李锐穷于应付，呈请辞职。1949年2月，昆明市场极度紊乱，各种货物掀起疯狂涨风，半开银元一马当先，每枚高达530元，公职人员生活无以为继，国民党中央驻滇机关已有数处断炊。1949年3月份，重庆由中央发款的机关因待遇与京沪地区相差太远，陷于断炊之境，纷纷向央行临时借贷及透支，形势紧迫，而央行因为2～6月份的支付数还没有接到，穷于应付，险象环生，请求按京沪指数调整，并在中央总行支付手续书尚未到达前，通知重庆央行照应领库款数暂时贷借。在外地工作的无权无势的穷公职人员，有的工作多年，连回家省亲的机票都买不起。上海某机关的一个高级职员，老家在重庆，1949年4月下旬，妻母皆病，来电催他回乡，这位职员曾于几周前到中央航空公司登记，公司届时通知他去买票，依据"大头"计算，从上海到重庆的机票需90块银元一张。该职员归心似箭，回来后，变卖了所存一切物件，仅得大头20枚，向中央航空公司要求优待，中航以票价规定，不能通融，职员因思念妻、母心切，致精神失常，竟异想天开，又跑到中航售票处交涉，愿付20枚大头，不购机中坐票，希望能为他在机翼下加挂一跟索子，将他带到重庆。

一般公职人员的薪水维持家用根本不够，但从事第二职业也不容易，各行各业均有一个"圈子"，进不了圈子，别提赚钱，连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台湾一个粮食局会计郭年芳，福建人，家有老母及在中学读书的弟弟，因收人不够维持家用，利用夜间公余时间踏三轮车，藉以弥补，因没有人三轮车帮而遭同业恼怒，被一帮流氓毒打，差点送了性命。

流亡的公职人员比起当地的公职人员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家园，在异地却得不到政府的及时照顾，为了生存，不断向政府请愿。如1949年2月，流亡到上海的3000多东北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和下级官员，被国民党弃置不管。原来答应发给他们的救济金没有兑现，无法生活下去。2月14日，他们集体冲进中央银行示威请援，要求发给救济金。

"八·一九"币改之前，报纸上就不断有公职人员不堪生活所迫而自杀的消息。币改前，普通公职人员因生活所迫，厌世自杀的事时有发生，币改后，这类事件有增无减，并且自杀的已不只是下级公职人员，不少中级公职人员也走上了绝路。如兰州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书记官曹正志是甘肃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儿子，因为物价猛涨不已，待遇菲薄，贫病交加，家庭人口又多，为生活所迫，自杀身亡，经法院员工募捐，才为他料理了后事。

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公职人员只好集体向政府要饭。1949年，公职人员集体请愿运动此起彼伏。1949年1月7日上午，首都南京各机关二三百人，包括总统府、各部院会、各军警宪机关、学校71个单位齐集行政院，请求政府按照上海公教人员存兑黄金办法，照旧有办法，每两2000元，每人存兑1两。为了解决公教人员因物价上涨而带来的生活困难，1月8日，行政院第34次会议决定调整公教人员待遇，从1月起，南京、上海照去年12月份薪水数，增加一倍半，即按"八·一九"限价的15倍上调，加发一个月的薪水，以作为年终奖。同时，还以时值戒严时期为名，要求所有公务人员不得聚众请愿，妨碍公务，并责成各级主管长官，约束部属，绝对禁止擅自行动，违反法纪，如有违背者，按《戒严法》处置。但这时的物价指数早已超过了15倍，杯水车薪式的补助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请愿一直延长到1月12日。宪兵队、警察闻讯后，立即派大批徒手警察及便衣人员赶到行政院，维持秩序。请愿代表要求面见院长孙科，并在行政院广场高呼口号："不达目的不止。"

公职人员的薪金已难以维持自身的生活，更谈不上养家糊口。上海高检处的书记官记录员等36人2月18日联名请求发放救济费，因为现在1个月的报酬，仅足够每天买1瓶半的开水，所以联名向院方每人借贷金元券2万元，不分职别，定名为"临时生活紧急救济费"。高检处职员、法警、工友也提出同样要求。2月7日，武汉中央机关联谊会扩大为武汉区公教人员联谊会，向中央呼吁，请将文职人员待遇照武职人员办法，发给银元，请照京沪办法，配给实物。

2月下旬到3月初，各地公职人员的反饥饿运动继续高涨，成都、太原、上海、杭州、昆明、桂林、汉口等地卷人斗争。2月27日驻武汉中央各机关联谊会扩大组织为武汉区公教人员联谊会筹备会，并通电请全国公教人员一致向中央呼吁，将文职人员待遇照武职人员薪饷办法，一律发银元。3月，昆明物价水平已为"八·一九"时的1350倍，国民党政府却仍按50倍的物价指数发薪，公职人员的实际收人已降为不到去年的4%。桂林地区不到5%。汉口，简任级的公职人员全月收人不足银元6元，荐任及委任级不足4元，个人温饱无法维持，根本谈不上养家。太原公职人员月薪还不足10天的食用，迫使他们纷纷起而要求改善待遇，改发实物。福建省政府公务员3月4日召开"救命会"，决定通电全国，号召国民党统治区公务员为改善待遇斗争。4月，汕头的中级公职人员只能拿到一千几百元的月薪，1个月的辛劳所得，仅能换到10市斤的白米而已，是地道的"枵腹从公"，一部分职员因待遇太低，开始怠工。

武职军官的待遇一直较文职为优，"八·一九"以后，薪金发放改以银元计算，深为文职官员羡慕。特殊地区可以另外划定。但按绝对价格计算，武职人员的生活也不见得

优裕。至1949年2月止，国民党军人每月所得的薪饷大致如下：

下等兵300元；中等兵338元；上等兵450元；下士600元：中士750元；上士1050元：准尉4560元：少尉5190元：中尉6150元；上尉7800元：少校9600元：中校12450元；上校14100元：少将15600元；中将17100元：上将19000元。

下等兵每月的300元薪饷照当时的物价指数，只够买15只烧饼，上将19000元，也只够买二担多米。副食费（菜金）每人每月1200元，官兵一律，每人每天只合40元，采办士兵到菜场采购时，因与市场物价相距太远，不能不强迫菜贩照所谓“官价”购买，菜贩损失太大，不免发生怨言。

退役军人失去固定收入，工作一时难有着落，生活更加难熬，为了活命，有时连鸡鸣狗盗之事也铤而走险地试上一把。昆明一位叫方裕骧的退役军官，毕业于金陵大学，退役后流落于昆明。家有一妻、一女、三子，为生活所迫，在街头抢劫，未成被拘。在云大土木系读书的儿子方锦生得知父亲所为，羞愧无已，愤激引爆雷管自杀，结果炸断两根指头。

生活的低下不但影响了官兵的士气，也危害到社会治安及军民关系，心理不平衡的士兵，时常在公共场合惹是生非，发泄不满，有的公开骚扰抢劫老百姓，官民关系恶化。如上海在备战谋和的状态下，开来了很多部队，到1949年3月份，这里将近20万人左右。经过上海开往台湾、浙闽以及由东北、华北撤退来的部队，人数太多，成分复杂，有少数军人侵人民房，扰民举动层出不穷。待遇太薄，营养不良，士气大受影响，也导致军纪败坏。

国民党军队为了欺骗士兵为他们卖命，往往在士兵中宣传说：官兵一旦落到解放军手中，非被杀头、活埋、挖眼不可。有的士兵在被俘前，把自己的钢笔、手表丢弃砸坏了，看到别的俘虏好好地保有自己的东西，懊恼不已。白崇禧的七军素以作战勇猛著称，是白的命根子，可是到1949年11月份，已有一两个月不发军饷，部队谁有办法抢老百姓的，谁就吃好的。战斗任务事先不敢叫下级军官知道，更不敢让士兵知道，知道了就要提前开小差。在长官当中，赌嫖似乎比吃饭还重要，一个师参谋长在被俘时穿了一件抢来的老百姓女人的衣服，一直不肯开口，憋了半天时间，问了一句：“我们政工队那几个女的还好吧?”原来他所说的“政工队”，就是他们在河南抢的娼妓、掳的良家妇女，给长官们寻开心的。无怪湘南的老百姓都恨之入骨，对解放军说：“幸亏你们来得快呀，再来晚几天，我们可就完啦。”

政府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行，依靠政府机关人员的精心操作；国家军队战斗力的增强，取决于士气振作。1949年，国民党内部，公职人员为生计所迫，无法集中精力办公；武职人员待遇低下，营养不良，军纪败坏，战斗力削弱，也影响了军民关系。操作国家行政机器和担负军事任务的主体都不能振刷一新、奋发有为，那么，国民党政权的生命力势必随之削弱以致消亡。

第五节 南迁狂潮

1949年，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南迁。从1948年下半年，战局急速转变，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特殊的人口流动狂潮。总的趋向是：由北方向南方；由关外向关内；由国内而国外；由“解放区”向“非解放区”；由内地城市到沿海城市。

国共交战区，人们最担心不长眼睛的炮火无缘无故落到头上，至于谁胜谁负，他们并不太在意。为了逃离战区，穷人、富人、有权有势者、无权无势者，都争相离开。在逃跑过程中，各人身份不同，遭遇就不一样。迁移狂潮兴起及流向，是战火的驱使，也是人性的大暴露；迁移群体中的各种心态，是社会各阶层心态的缩影。为了自己逃命，不少人的人性都被扭曲了，只要自己能走，即便牺牲他人的性命也毫不悲悯。看看1948年10月14日、15日开始大撤退的烟台，我们就不难想象这种情景：逃难的人流海啸般地拥向东、北码头，大的哭，小的叫，年轻有力的爬上停泊在海边的小渔船，渔船挤翻了好几只，落下海的顷刻间送了性命，可是码头上人越来越多，不怕死的还是往小船上挤。风和雨专门折磨苦难的人们，码头上个个淋得像落汤鸡，小鱼船出港危险，而且大多数给军方控制了；大船军用，谁也上不了船，可人们被雷鸣的枪炮声震昏了头，有人饿急了跳海，也有人自动把孩子扔下大海，这时人们几乎失掉了人性，谁也顾不了谁，而且谣言四起，说国军撤退后，军舰和飞机要把烟台炸成平地。只有央行有办法，花钱雇大船，装成箱的张裕公司的白兰地，捎上烟台交际花，请来了几个武装枪兵保护，一位大汉正想南迁狂潮爬上船，当场被一枪了结。其他老百姓想上船，根本没门。

普通公职人员轻易搞不到各种现代化的交通“票”，他们多是随群逐居，处境之难，仅比百姓难民略好，是一种有身份的“难民”，衙门越是清寡，“难民”就越多。如教育部历来是无财可发的清水机关，在举国大迁移中，滞留“后方”的人也最多。1949年2月初，教育部的部长、次长等相继飞往广州，其余职员除籍属渝、蓉、闽、桂等省市的一部分职员，调派各省、市教育机关及学校服务，仍由教育部发薪外，南京籍的职员五六十人仍留在南京，其余大部分职员都已来到上海，其中未经分发各地及该市服务，在沪待命的占多数。他们的生活朝夕难保。分发在市教育局及各校服务的虽仍由教育部发薪，但这里的机关不能提供宿舍，加上部员多携家眷而来，住宿更成问题。留沪待命的，也因交通工具及异地物价高涨，食宿均成问题，离沪他往，不易成行。

公职人员南迁的心态变幻不定。一些普通公教人员，害怕卷人国共交战的枪林弹雨，饱受战火摧残，希望远离战区；有的因受国民党歪曲宣传而害怕共产党，不敢留下来，等待共产党接管。他们眼看国民党江河日下而无能为力，虽也厌倦国民党政府，但在“害怕”与“厌倦”之间，最终选择了被他们厌倦的现政府。他们对和平和“划江而治”寄予厚望，认为划江而治应是最好的结局。所以，起初北方南逃的多落脚在上海，

并不想远离大陆本土。台湾作家李敖先生回忆他一家来台前遭遇时说：爸爸李鼎彝是吉林六中校长，1948年在东北曾经帮过一位台湾朋友的大忙，朋友回到台湾后，写信劝李去台湾。李判定国民党虽然战败，但剩余力量，谅可以维持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1949年三四月份以后，战局发展迫使他们改变初衷。

政府既想动员公职人员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又无法解决要“逃难”的经费问题，迫使公职人员不断向政府申请迁移补助。北方各城市相继失守后，国民党政府估计南京难守，并没有作坚守南京的准备。从1948年11月起，南京公职人员的眷属就开始疏散，并发给两个月疏散薪金；1949年1月份开始，发给员工3个月应变费。但这以后，疏散费和应变费都难以到位，公职人员及家属想逃却没钱。2月14日，上海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员工联谊会在海关进修社举行茶会，向新闻界宣布：目前一个中级公务员月薪收人，仅能购米两斗，要求援首都公务员例，按发款时物价指数比例，火速发给眷属疏散费、员工应变费，疏散眷属，合理调整待遇，使得他们安心工作。16日下午，上海各机关150名代表到徐财长私邸请愿，但也没能解决疏散费。非但如此，1949年年初，鉴于赴台湾、香港、广州及国外的人数增多，在“保卫大上海”的口号下，国民党政府希望普通公职人员出一份力。上海市参议会竟于1949年1月5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责令闻风而逃者交付“保卫捐”5万元。当然，这些捐献只有普通公职人员才“有幸”摊上，高等官员照样可以不交一分，即可走人。仍想疏散的公职人员及其眷属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神通”的，就干脆不走。

对于这些人，政府已顾不上他们的政治倾向，去留听凭选择，只求他们不要乘机闹事，扰乱社会秩序。如南京解放前夕，前方各部队被歼后，逃到南京的军官很多，卫戍总部的军官收容所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军官生活很苦，满腹牢骚，经常在外面滋事生衅。政府职员也面临生活上的苦难，由于政府迁都广州，各部留京职员感到今后出路及生活都成问题，困难重重，于是分别组织了联谊会，以便向政府要求发放应变费，遣散人员，发给遣散费。但这种联谊会也为政府所不容，被当局严加取缔。4月23日，解放军兵临城下，中央各机关紧急“疏散”，城内外挤满了国民党的溃兵，机场上机少人多，有资格登机南下的也限于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多数政府机关人员只能就地疏散。政府倒是没有过多苛责他们今后的去向，事实上也无力一一过问。所以，早在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央行政院成立的“中央各机关疏运委员会”就已开始紧急疏散。中央各机关先进行了一次精简，凡是不愿意随政府迁广州的，可以自由表态，愿意留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500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的，交通工具自找，发给疏散费300万元；愿意随政府迁移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50万元。然后分别调度飞机、火车、轮船、汽车实行疏散，各机关的档案、公物及人员，在23日前偷运走了一大部分。那几天，南京最忙碌凌乱的数3个飞机场，载运国民党官员的中央、中国两家航空公司的几十架飞机，从机场不断起飞。机场上挤满了几天前还踏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达官贵人，他们手提肩扛着从人民身上搜括来的大批行李细软，急急惶惶地登机逃命。作鸟兽散的机关要员，大量劫走国库财产，并破坏烧毁物资、档案。财政部已将重要档案运到上海，并拟与中央银行一起运到广州。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官邸的炉子整天

火势旺盛，他的秘书们把不能带走的公文卷宗统统付之一炬。此时留在南京各机关人员本来不多，疏散比较容易。但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一般公务员的去留，已没有政治上的苛求。

起初，公职人员南迁地址不限，台湾为主要去处之一。2月份以后，这一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公职人员想在大陆内部回旋尚可，要想进入“安全岛”台湾，并不像年初那么自由。2月10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及台湾省府，以确保台湾治安为由，制定了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的暂行办法，从3月1日起实施。对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限制极严，入境者均须事先获得总部及省府许可，发给入境证明书及许可证。又规定2月26日、27日为户口总清查日期，一切民用轮船、航机停止入境，省内民用交通运输一切停止。2月19日，对进台人员的限制又增加了7项补充办法：(1) 经常入境班轮之船员，发给长期许可入口证；(2) 航空班机附机人员，由公司证明；(3) 游览旅客可申请发给限期入境证，由中国旅行社代办手续；(4) 12岁以下小孩允许无证入境；(5) 军公人员可凭主管长官证明入境；(6) 借此滋扰旅客者，以军法严惩；(7) 几个港口分别责成即位港口主官负责。入境证之难办，使来台的人数急剧减少，每一次客轮来台，仅有百余或数十名旅客，航空客机有时一趟也只载十多人。进入1949年3月份，内地人员迁台势头逆转，台湾出口的旅客突然增多，而且多数是往大陆去的。3月12日开向上海的“中兴轮”的两千个舱位销售一空。中航公司台沪班机也因旅客过于拥挤，11日就停止登记，去沪的客票要一星期以前才能订上票。台湾从3月1日起实行入境办证后，经审查合格准许入台的10几天中仅有400多人合格，这些离台旅客短期内将不会返台。而且，台湾当时的形势也令不少打算迁移的人员望而却步。1949年的头两三个月，进口旅客一向比出口旅客多，房屋及物价都受到直接影响，实施登记入境政策后，入境旅客顿减。有人曾酝酿废除入境登记办法，但台湾各县、市参议长曾发表书面谈话，称：限制入境是台湾民众的要求。自“光复”以来，大家欢迎祖国大陆人士来台，指导复兴建设工作，几年来，台湾有如此进步，也是由很多人士协助的结果。但因近来大陆动荡不安，对大批来台的人士本当欢迎，惟因人口激增，发生食住恐慌，很容易引起社会混乱，刺激物价，如今产米的台湾米价比大陆还高，为了保证国家安定起见，不得不要求政府采取权宜之计，并不是排外。从实际情况看来，即使台湾当局鼓励人员入台，台湾的局势对人们也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自愿来台的人数急速减少，实在是人们并没有在这里看到生活的希望。此外，“二二八”事变的阴影使他们不安，对台湾不大放心，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这种局面，直到国共和谈失败后才有所改观。

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及时登机乘船、随“院府”南迁的也只限于党政要员、富商大贾。他们用金条、票子、权势、面子、人情、力量等，搞到了各种各样的“逃难”票，挤上飞机、轮船、火车、汽车，向上海、福州、广州、台湾跑，加剧了这些城市的腐蚀力。达官贵人们尤其是政府的贪官污吏、族人、亲戚、朋友、门生，以及豪门、富商、大地主和他们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眷属仆从等，属于“高等”公职人员，他们的境况非普通公职人员可比。他们的特点是只消费不生产，来到哪里，就增加哪里的负担。除极少数是诚心追求所谓“思想自由”外，大多数是怕留在解放区里受“清算”（如贪官、

污吏、豪门、汉奸等），或不愿留在解放区勤恳工作，稍微降低生活程度的人。他们来到哪里，哪里的社会政治就更加腐化、恶化，以致低沉，工作效率低下。而且，这些人多半会欺负人民，加深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鸿沟；这些人大多很有钱，握有大量游资，他们来到哪里，哪里的物价就会上涨；物价上涨，会引起升斗小民生活困难；生活困难，引起人心浮动；人心浮动引起社会不安，加速政府的腐败。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一个社会之中，这种人愈多，这社会一定愈腐化，愈瘫痪，愈接近崩溃的边缘。"最后"体面"并且顺利到达台湾的多为这类人员：平时做官敛钱的是他们，率先逃跑的也是他们。也有些拥有大量资财，怕共产党来了被"共"掉，提前到台湾开展新的事业；有些则通过上层朋友，争取到各种运输票或人境证，才得以人台。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即逃难的人分为三等：第一等逃美国；第二等逃香港；第三等逃台湾。逃到台湾的虽然是第三等，但他们仍是富贵人士，生活标准超过了当地台湾人，台湾社会更显贫富悬殊。至于那些被拉上战船而与家人失散的士兵，今后的命运难以预知。

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人心涣散，毫无生气。不少公职人员感到再为"党国"卖命，已没有什么出路，特别是在战事频败、经济萧条形势下，更感到压力重重。许多人都有"两可"态度，认为国民党主政，是为老百姓工作；而共产党来了，也一样为老百姓工作。贫穷的人们期望值更高，认为共产党来了可以"翻身"，共产党要清算的对象是大豪门，与老百姓无关。总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战争的罪恶是由国民党引起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渐渐脱节，两者之间，深深地隔着一条鸿沟。对国民党而言，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现象，是行将灭亡的征兆。

人心涣散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的凝聚力丧失殆尽，行政渠道处处滞碍，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内阁走马灯似的换了3届，这在中外历史上还不多见。一些地方行政大员，也渐渐对前途悲观失望，办公兴趣全无。如上海整日处于学潮、罢工、饥饿的吵闹声中，整个市政府班子几乎集体离职。政府如此，地方如此，公职人员如此，显现出社会大变动前夜的景象。

第二章　消与长——经济崩溃、恢复与民众生计

第一节　经济走入死胡同

1947年6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战争已经不主要在解放区而主要在国统区进行。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败相环生，而在经济上的失败尤其是币制改革的失败，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949年中国社会，货币、物价、民生，是上至国民党最高当局、下至平民百姓每天都要关心、谈论的问题。民众的物质生活方式及消费心态，都随着货币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混乱已非一日，早在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不兑换纸币——法币，一方面充当流通媒体，一方面又是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敛聚财富的重要工具。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只有14亿元，8年抗战期间，通货不断膨胀，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000亿元。1946年3月，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内战使国库入不敷出，因为要打仗，就得花大钱。钱从何来？除了后台老板美国的有条件支持外，少不了横征暴敛、滥发纸币、抬高物价，没完没了地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国民党财政部统计，1948年1～7月，国民党财政支出为65545711亿元，财政赤字数为4345656亿元，与此同期的国民党军事费用为4489997亿元，财政支出中60%以上依靠赤字，依靠通货发行。赤字所占支出的总比重几乎等于军事费用所占比重。战后蒋介石经常保持的军队在500万以上，财政支出的3/5是用来养兵的，原本严重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恶化。肩负支撑战争庞大费用重任的法币犹如海上一叶扁舟，飘摇欲倾。1947年4月，在短短的1年内，法币陡增到16万亿以上。到1948年8月20日前，法币发行额达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47万倍，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3492万倍。战争一天不结束，财政问题就一天不会根本解决。1947年2月“黄金潮”后，大家拼命将藏有的纸币全部抛出去，各商店见收到的纸币买不回货物的原量，只好停业，从此大家对纸币丧失信心，渐渐开始以实物作本位。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税收大减，被地方截留的日益增多，财政部不敢发表岁收统计。各地驻军和地方当局的苛捐杂税和临时性摊派更是有增无减，是名副其实的“民国万税（岁）”。

最初几个月，城市工人的贫困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关物价、生计等成了媒

体头号社会新闻题材。如1948年8月1日，改版第一天的南京《益世报》在“本市新闻”版的头条消息，便是“一片加价声，涨风迎8月”。《人间》副刊登出的《丑奴儿令》，如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一日数涨的情况：“忙将米袋装法币，绕过街坊奔米庄，排得长蛇阵一场。回眸一转风光转：一石黄粱，九斗何妨，安排明天吃秕糠。”前队买一石米的钱，到了后队只能买九斗米。总之，1947、1948年间，国统区通货极度膨胀，物价不断上涨，“经济已经到了焦头烂额、山穷水尽的局面”。

当然，国民党政府可以顺口把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归咎于共产党。1948年7月2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在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中说：“自日本投降后，国土收复，物价已渐稳定，可是又受‘共匪’扰乱，而且扰乱的范围很大，使得民生格外艰苦，物资不能畅通，促使物价飞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自然加大，法币发行数字也很快地加高，通货日益膨胀，物价随之增高，因为通货和物价互为因果，更使物价不断上涨。”然而，经济问题已经火烧眉毛，非果断解决不可。于是有人提出，要“戡乱”，先要将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解决后，“戡乱”才能成功。在国民党当局看来，经济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戡乱”的成败。经济问题一解决，才有足够的资金来打内战，否则，一切皆无着落。1948年8月19日，政府对于战胜通货膨胀，终于找到了孤注一掷的办法一发行金元券，实行所谓币制改革。1948年8月以前，法币的滥发使整个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但还不及“八·一九”金元券发行后崩溃得那样迅速，那样彻底。

从1948年3月起，新的币改方案就在酝酿之中。3月，国民党政府施行《中华民国宪法》，4月，蒋介石如愿以偿地荣登“总统”宝座。蒋介石的当务之急仍是“戡乱”。“戡乱”太需要钱了，他急需一批理财高手来帮他筹集钱物。他原想让张群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因CC系的立法委员反对，才把翁文灏拉出来组阁，支撑门面。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部长。翁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王曾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为地质学专家，一为出版界泰斗，二人联袂理财，堪称“书生治国”；蒋介石也为自己的“贤明”政治贴上了一块金字招牌。

此时对蒋介石来说，只要有钱，什么都行。所以在经济上显得格外“民主”，对翁、王二人权力完全下放，说：“军事完全由我主持，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翁、王得此“口谕”，劲头十足。王云五鉴于“公库收入仅及支出的百分之五，物价飞涨，支出庞大，全靠发行新票支持；军事开支所占比重极大”等情形，建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元券以代替法币，即以政治力量来收兑或收存国民所持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在全国设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执行。并拟订出一套财经改革主要是币制改革的方案。翁、王的计划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赞同。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翁文灏、王云五联合签发了《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要旨如下：

一、自即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元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具体办法有：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中华民国的货币以金元为本位币，每元的法定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由牛央银行发行金元券，十足流通行使；金元的辅币为角及分，以10分为1角，10角为1元；金元券券面为1分、5分、1角、2角、10元、50元、100元7种；金元辅币分为1分、5分、1角、2角、5角5种，以铜、镍、银分别铸造，并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元辅币券，同时流通；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的，应于1948年9月30日（后由行政院把黄金、外汇展期到10月31日，白银、银币展期到11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他委托之银行换取金元券，折合率如下：

法币及流通券停止发行，所有以前发行的法币，以300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

东北流通券以30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限于1948年11月20日以前无限制兑换金元券；

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元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换金元券3元，银币每元兑换金元券2元；

美元每元兑换金元券4元；

在兑换期内，法币及东北流通券暂准照上列折合率流通行使。

台湾币及新疆币的处理办法，由行政院另定之；金元券的发行采取十足准备制，前项发行准备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期于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之；

金元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

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的，其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一律没收。

蒋介石对币改期望值甚高，指望通过币改渡过目前的经济难关，因此，一开始决心很大。上海是蒋介石政权发行金元券、掠夺金银、外币和管制经济的中心，法案公布后几天，蒋介石几乎每晚与上海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电话联系，询问上海收兑情况。他电邀上海的党、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目刘功芸、宣铁吾、杜月笙等前往南京，当面吩咐必须执行。币改初期，各方意见就不断反映上来，宋子文时期曾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顾问的黄元彬就说，在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钞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又当内战紧迫的时候，改革币制的机会早就错过，金元券的办法要以政治力量来施行不兑现的货币，更加危险万倍。一旦发行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必定到处突破政治力量，不过几个月就会崩溃。挽救办法是立即停止收兑金银外币，这些金银外币在人民手中没有多大危险、反之，放出大量金银外币危险极大，无异于把死老虎收回来而把活老虎放出去；必

须改为无限制兑现。实际上在发行额未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前，商民不会来兑现；必须想办法酬足准备金。如果金元券全凭政治压力兑换，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弃去纸币、存储实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冲破政治力量的控制。旧财政部资深官员、金融界知名人士戴立庵也认为，"办法"矛盾之处甚多，如规定各种物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价格，同时对公共交通事业的收费又可调整价格，电力和运输的支出与物价成本有关，都是构成物价的因素，如果同意它调整，又怎么能限制其他物品不加价？限制收兑黄金、白银和外币来充实准备，办法很好，但大批新券出笼，骤然增加庞大的购买力，对市场压力很大。

蒋介石渴望通过经济"戡乱"实现政治"戡乱"，已近乎"病急乱投医"，因而对各方反对意见充耳不闻。为显示本次币改的严肃性，1948年9月6日，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教训对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的上海银行家说："上海银行界领袖对国家、对政府和人民之祸福利害，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毫没改变。在'共匪'这样猖獗、人民这样痛苦、尤其是前方官兵这样流血牺牲的时候，政府为要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决心实行这一个重大的改革，其成败利钝，实有关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若辈拥有巨量金银外汇的，尤其是几家大银行，这样自私自利，藐视法令，罔知大义，真令人痛心。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警告他们：不据实陈报存放，政府就要依法处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予以严厉的制裁。蒋介石不惜搬出了"助长'共匪'的内乱"来训斥金融界大老板，确实来势汹汹，给人感觉雷声大，雨点也大。

第二节　"打虎"英雄败走麦城

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可以直接左右金融市场，蒋介石首先把他们召集起来，厉声责问他们："要钱还是要命"，同时向全国派出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监督执行币改措施。

币改行动首先在金融中心上海展开。他与蒋经国父唱子和，雄心勃勃地要整饬金融市场，打赢币改一仗。他特派蒋经国亲临上海前线督战，派委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名义上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蒋为副职，实际上由蒋全权经办）。蒋经国怀揣总统的"圣旨"，决意一显身手。他把"戡建"的指挥部设在中央银行，亲自指挥"戡乱建国大队"。为了壮大队伍，他向社会招募了一批"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搜查敢于违抗命令、私藏金银的"不法分子"。打出的标语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来势汹汹，时人称这支队伍为"打虎队"。他给上海军警单位发出指令：对违犯物价管制规定者，吊销执照，没收货物，法办负责人。9月12日，在上海体育馆召开的青年军人联谊会上，他对青年军及市民慷慨陈词：新经济方案是社会性革命的开始，民生主义真正实行的初端，应打

倒投机商，赶走冒险家，消灭暴发户，使上海成为五百万市民之上海，非少数享乐者之上海。他与蒋介石异口同声地把“共匪”和奸商列为同一类型，都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要同样地打，一起打。他满怀信心地宣称，今天牺牲少数人的不法利益，以谋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是真民主，如首先将上海的不法主力扑灭干净，则全国其他各地自然因而安定。他发誓“与上海五百万市民共同向恶势力斗争到底”，还提出“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组织“经济戡乱大队”游行示威，高声叫嚣，故意渲染紧张局势，对“不法分子”进行心理威慑。

“经济戡乱”旋风发源于上海，波及全国：首先撞上枪口的是泄露币改方案机密消息、抛空巨额永纱股票、获亿万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几乎是被“就地正法”；接着是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荣鸿元等64人，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等犯罪嫌疑被拘捕；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业民、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以受贿罪遭枪毙……几板斧砍下之后，蒋经国声名鹊起，全国风闻。上海有人捧他是“蒋青天”，外国人称他是“经济沙皇”，俨然成了“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他不少地区闻声响应。9月12日，北平的华北、东北各院校学生还成立了“打虎后援队”，举行游行示威，高举“打倒豪门、铲除奸商、要求活命”的大旗，张贴“剥虎皮、吃虎肉”、“宁使一人哭，不要大家哭”标语，高呼“杀贪官、杀奸商”的口号。据当时一家刊物记载：蒋经国的有力铁拳，从9月2日起，开始在上海挥击，在铁拳下踉跄倒下去的，有不少为人耳熟能详的工商巨子，其中有纸、烟、纱布、金融圈子里的巨擘，还有牵涉到泄漏币制改革机密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和杜维屏。这一严厉措施，宛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上海，尤其是杜维屏的被捕，更使人咋舌。杜维屏是手可通天的“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公子，此举在舆论界大兴波澜。连当时的美国商界的一些人士都怀疑蒋经国侨居苏联时间日久，沾染了共产主义的倾向，担心如果果真像蒋公子演说中说的那样，中国人逐渐“左倾”，则对于在华的经济合作计划可能发生影响。

经此一役，国库颇有收获，至1948年10月底的一个月中，在上海一地，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3.7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的。蒋介石以纸换金，又成功地做了桩一本万利的买卖。尽管各银行的外币存款和外币证券搜括的数目与他们的企图相差太远，但还是让一些商人及小民大受其害。

虽然蒋经国号称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然而，蒋经国毕竟不是武松：遇到真老虎时，能豪气干云，臂力陡增，而且是借着酒劲。“蒋英雄”碰上真正“恶虎”拦路时，已先行畏缩，无法做到胆壮气粗。当时就有媒体评论说：“众目昭昭，真正的豪门，仍逍遥自在……改币最终的成败，与此辈豪门是否爱国及拥护政府有关，此间打过，则人民无话，工商心服。若打虎至牛而止，不进山林虎穴，精神一露，功亏一篑，那就太可惜了。”事情就出在杜月笙这位“上海闻人”身上。杜维屏是杜月笙的三公子，他的被捕，显然是杀鸡吓猴，要杜月笙站出来，做个遵守法令的榜样；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宣铁吾与杜月笙间旧隙早生，暗藏宣泄私愤之心。老谋深算的杜月笙一开始默不作声，伺机报复。等到儿子被捕，他才出来辟谣和表态，说：“二十年来，镛之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镛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相

绳，不枉不纵，深致钦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议，而敢不遽以暴力、革命等字句相加，当不值识者一笑也。”又表明态度：打老虎是好事，他可以帮助找到更大的老虎，找到以后，把大老虎杀了，他儿子和女婿即使拉出去陪斩，也是千该万该的，杜某眉头都不皱一下。他不动声色地调查了许多事实，如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等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况也远为严重，要专员立即派人去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蒋经国骑虎难下，立即派“打虎队”在杜所派的人员的指引下，前去把扬子公司团团围住，搜查的结果，完全符合杜的举发，把主事人扣留起来。

扬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者大有来头——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该公司在抗战胜利后，依靠方方面面的特殊关系，通过处理“剩余物资”大发了一笔。这次以为凭其“皇亲国戚”身份，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孰料他的这位姨表兄也太不会“做人”，任由手下人直奔扬子公司核查。孔事先未接到任何“招呼”，“打虎队”查上门时，居然措手不及，公司被封，人被拘禁。他只好向姨妈宋美龄哭诉求情，再由姨妈向姨夫蒋介石劲吹“枕边风”，说情通融。10月1日，宋美龄亲自从南京飞抵上海，被捕不久的孔令侃很快被小姨从拘留地救出。蒋公子本想借此机会，树立铁面无私、大义灭亲的形象，以在金融乃至政界扬名立身，可等他闻讯赶到时，已是人去狱空，唯有仰天叹息，无可奈何。蒋家父子苦心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戡乱建国”运动就此近乎夭折。

国民党政府发现金元券，单凭政治力量，没有足够的储备金，市场也没有充足的流通货物，完全不顾经济规律。一旦政治措施失灵，货币就会像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经济将落人彻底崩溃深渊。金元券出台不久，有人就断定它活不长，果然不到90天，物价一再狂涨，继“法币”以后，很快就成为废纸。进步人士胡希明曾借用广东人的口头语，在报纸上写了一首打油诗《闻道》，讽刺金元券：“闻到金元券，无端要救穷，依然公仔纸，难换半分铜。骗子翻新样，湿柴认旧踪，这真天晓得，垂死摆乌龙。”

第三节　金融失控

国民党违背经济规律，发行金元券，造成整个金融秩序紊乱不堪。11月份，在取消限价及放松人民金银外币持有限制后，货币发行已无章可寻，瞬息多变。1949年更加剧烈。第一季度，由于市面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5000、1万、5万、10万四种，数量不限。金元券五万元也已经有发行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大钞的流行，使原来价位就不低的物价进一步腾涨。就在各地已将金元券炒得火热、法币打折兑换金元券的时候，边远地区的金元券却是姗姗来迟。1948年11月20日，是法币停用的最后期限，可是广西西林县到11月23日，人们还没有见到金元券的“芳容”。

在此情况下，政府方寸大乱，想当然的货币改革措施不断出台。1949年2月23日，事先“避难”广州的政府公布财经改革新方案，3月实施。主要内容：第一，军队的薪饷和副食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第二，税收方面，海关进口税仿照从前海关金单位制，

改以每元等于美金4角所谓“关元”为计算单位，人民须以金、银、外币向国民党中央银行兑换“关元”，专充交纳关税之用。货物税中，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照规定税依旧征收实物，不便征收实物者，也以实物价格折算金元券交纳，直接从人民手中掠夺金银物资；第三，国民党中央停止对各省市县的财政补助，将原属中央的田赋三成及土烟土酒税特种税划归地方，放宽地方征收课税的限制，鼓励地方政府更凶狠地榨取人民；第四，允许金、银、银元自由买卖，准许银元自由流通。这次开放是将“八·一九”以后歇业的市场重新恢复，使金银及银元有一正式的公开的市场，市场组织可能仿照目前的证券交易方式，参加市场交易的会员，必须是合格的行家，须交定额保证金，市场的经营及管理权将尽可能由民间负责。

关于金银外汇具体规定为：金银允许人民自有买卖，金银与金元券已无固定兑换率，1948年11月12日颁布的《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及1947年12月修订公布的《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已不再适用。新财经方案后，银元买卖要变得合法了，从此“黄牛群”又再度壮大，“叮叮当当”的音乐声开始响遍各个场所。但银元在新方案中名不正，言不顺：既把它估算为计算薪饷的标准，又规定金元券是唯一的本位币；既准备日造60万枚银元，又不许市场以银元计价；既准许银元流通，声称金融改革、稳定物价，4种大钞却又同时出笼。结果不过是把半公开的银元投机交易公开化，合法化；对“黄牛”的职业予以保障。

1949年3月以后，一方面是金元券身价大跌，一方面是币制日趋紊乱，各种通货相继登台亮相，一旦与市场行情接触，才发现这些改革不过是纸上谈钱。根据政府新推出的财经改革方案，上海市府决定，上海的水电煤气电车等公共事业新价从3月要照“关元”计算收费。不过这项改革虽为财政部公布，在上海实验后，即告无效。所谓“关元”，就是战前的“海关金单位”，专为进口商人交纳关税时使用，绝不是一种可作流通的通货。从币制关系说，“关元”是一种虚金单位，政府用以计算征收海关进口税，原为了保证税收不遭贬值的损失，不能作为一般货物交换的计价单位，上海采用“关元”的6.25折为计价单位，等于以美金为计价单位，这在租界的时候都没有实行过。

政策宣布后，各方面认为，关元价格与美金相联系，公用事业改用美金计算，不但是变相改取美金价格，显然也是抹杀金元券的流通价值，一般商业习惯及薪金阶层的收入均以金元券为本位，生活指数又以金元券为指标，还没有听说该指数以关元来替代；中央银行收购美金，按黄金与外汇市价折算，逐日挂牌，关元随美金价格变，甚至一天一变，则公共事业价格必须逐日调整，一般物价也要一日一变，关元实际上就会领导价格的上涨；且公共事业费以关元为计价的标准，那么其他如房租等一般物价也可援例改变计价基数，影响所及，将陷人民生活及金元券于绝境；不但人民反对，也未得到财政部批准，财政部发电到沪，予以制止。关元政策公布后，物价再度暴涨。

“关元”是个新名词，老百姓不大听说，还以为是从前的“关金”，只值法币20元。其实不然．它值美金4角，其实就是公用事业费要照美金折合金元券收费了。尽管声称是为了“避免金元券贬值”的影响，却苦了没有“关金”只有金元券的公教人员。水、电、吃饭、坐车天天不能少，钱却要照“关元”计算。手里拿着几张天天在贬值的金元

券，还要到月底去付那硬不肯贬值的关元。公用事业不是堂而皇之地经过核准，而要以什么关元标价，出售“货品”。也有少数商店以银元标价，但以关元标价的却是全部公用事业。老百姓觉得，这简直是“妨碍币制，扰乱金融”，属于“从严取缔”之列。而且银洋，不管是大头、小头、龙洋、船洋，总还是中国的钱，而什么“关元”却是外国钱，更属于“妨碍币制，扰乱金融，要从严取缔”。工商团体也极力反对。3 月 8 日，上海参议会议决取消公共事业费“关元计价”。市长也不得不承认用字失误，不该用“关元”两字。

3 月份，何应钦组阁后，又通过了财政金融新改革案。财税方面，创立“税元”单位制，一切税捐除关税外，均以税元计算交纳，每税元一元合市制黄金一份，由纳税人以金元券换购专充交纳税捐之用，不在市面流通。在金银币制方面规定，黄金白银准许人民买卖；银元准许流通买卖，政府筹铸银元；外国币券仍禁止流通；金银外币不得携带出国；旅客携金不得超过 2 市两；银不得超过 20 市两；外币总值不得超过 500 元。酌办生产贷款，优先给予民生日用品事业以购买原料及结汇之便利……可是税元价值不变，金元券却天天下落，听上去，政府不会吃亏，纳税人却要时时弥补金元券下跌造成的差价。自然又招来一片反对声。

为了解决票荒问题，4 月 18 日中央银行发行三种 5 万元面额大钞。大票漫天飞舞，可就是不值钱，钞票甚至不如冥钞。每逢清明，人们习惯买些锡箔焚化以祭奠先人，但这时的锡箔每千张需要金元券 5400 元，平均每张 5.4 元，厚厚的一堆钞票，只换来一堆锡箔，有人竟突发奇想：清明节，全国所烧去的锡箔数量可观，如果中央银行能够想一个办法，使老百姓（尤其是老婆婆们）相信金元券在阴司也可以通用，而且丝毫不会贬值，则人们自然就不会拿 5000 多元去买 1000 张锡箔，而改为直接把钞票烧给阴间的亲人了。这样中央银行无形中可以收回（因为别人替你烧掉了）大批通货，自己则丝毫不必抛出黄金或银元，岂不一举两得？金元券惨落声中，钞票本身的印刷费及纸张成本有时竟超过其票面币值，小票尤其如此，如上海《大美晚报》印刷部估计，印 1000 张票面 100 元的金元券，成本竟达到金元券的 20 万元，价值竟超过票面价值 1 倍。据说后来有人把 5 万元的票额的金元券裱糊房子，比买花纸还好看，又便宜。

在币改之中，银元出人意料地受宠。银元的每一次变动都是一次社会经济变动的前奏，也是结果，银元命运的沉浮起伏，衰荣兴替，成了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经济史的缩影。如果说银元的流通从光绪时说起的话，那么至 1949 年 3 月份新财经方案出台时，它在中国已“混”了六七十年。币制一改再改的结果，仍然是借重了银元，1935 年法币问世和 1948 年的“金元券”出笼，都与银元作对，结果都被银元击败。

“八·一九”币改，政府一面以“含金”的金元券广收银元，一面“严刑峻法”禁止流通和持有，仿佛是银元的末日。由于金元券的滥发，造成货币贬值，市面上比较值钱的是银元。银元对金元券的比价一再上涨，银元东山再起，民间父老和大小各“头”久别重逢，倍觉亲切，人民无不庆幸银元得以昭雪平反。同时也一次次激起泛滥全国的“银元潮”。工农兵学商公教人员无一例外被卷入漩涡。银元交易既偷偷摸摸，又堂堂皇皇，忽禁忽放，一会儿以存兑方式源源兑出，却又说不许买卖；一会儿严禁买卖，却又

让它进进出出。民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从银元的命运即可窥见一斑。

所谓银元，有“大头”和“小头”之分。上面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那种为“大头”，又名“袁大头”，上面铸有孙中山头像的那种为“小头”，又名“孙小头”。大头比小头的价值高，“袁大头”可以当之无愧地荣获“银元冠军”。因为它含金量足，成色好，共产党银行所规定银元兑换价以袁大头索价最高，大头在市场的收购价从未衰跌。有人说，袁世凯其人，虽然在民国史上已经臭名昭著，但袁世凯其“头”，以成色地道，声望日增，仍受老百姓的欢迎，不像金元券那样一味蒙骗老百姓。荒唐如袁世凯者，也知道“遗爱”老百姓的道理，而民国领袖在币值信誉上竟不如袁世凯，这无疑是历史的嘲讽。

1949年四五月份以后，金元券在许多地方被挤出流通领域，通货渠道政出多门，交易方式五花八门。金融市场一片紊乱。1949年6月25日，行政院规定一银元为金元券5亿元。四川省政府则早在6月12日就宣布银元一元等于金元券7.5亿元；6月21日，重庆银元的黑市，一元等于金元券的25亿元。西北各省、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宁夏、青海、新疆三省，甘肃所属的夏河、临夏等地已弃用金元券。五花八门的通货竞相登场。江西吉安商会已发行十万角券。汉口5月初发行镍币，作为通货。新疆规定从5月20日起，货币改以银元为单位，同时由省银行发行与银元等值等量的银元票，流通全省，十足兑现，银元辅币分一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五种，并规定银元不得携带出省，违者严惩。金元券只作内汇货币。1949年4月，广西全省使用金元券的地区仅占1/10，仅在几个大城市使用，9/10除一小部分以银元通用外，均以谷物计算，形成物物交换的现象，几乎已回复到古时的交易办法。4月份，长沙金元券绝迹后，国营事业也相继改收银元，邮局决定从5日起，也改用银元收费。绥署接着规定，国税一律改征银元，今后湖南实行自给自保，公务员的薪金均改发银元。湖北、湖南田赋、租税改征银元。金元券出笼仅9个月，几乎等于废纸，在世界货币史上，可算是最短命的通货（不算后来国民政府发行的银元券）。

广州商会准备发行商库券。1949年7月4日，广州发布币制改革，不知是谁想出的愚蠢念头：以银元为本位，先行发行银元兑换券，每一元银元券可兑换金元券五亿元，两月内收回金元券。新币的票面分1元、5元、10元、50元、100元。又发辅币为1分、5分、1角、2角、5角五种。银元与黄金外币比率按中央银行逐日的牌价计算。银元券与台币的兑换率也将有所规定。各省发行的地方券或大洋券，其票面在1元以下的仍准许流通。7月7日，广州财政部拟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而且银元券并不能随时随地兑现，只有在政府指定的几个地区如广州、重庆、福州、衡阳、桂林、昆明、成都、兰州等地办理，而在其他地方不能办理，兑换银元券的同时，黄金仍可以兑换，一定数量以下的银元券就无法兑现。银元券实际上是区域性的不能兑换的纸币。由于人民对国民党的纸币的信任，由挤兑到拒用；政府出尔反尔，政策多变；加上解放军迅速南下，到10月份，银元券基本废止。银元券成了除金元券之外的第一短命币制。

1949年以前的台湾，远离战争烽火，物价平稳，币值坚挺，可是到了1949年，由

于一班富户及政府官员纷纷来此，物价逐渐高涨，货币发行数值也在不断增加。1945年台湾银行发行总数为2.8亿元，1946年底，已增至5亿元，1948年底，已超过100亿。台币对金元的比值，1949年1月为1金元对台币150元，台币不断贬值。1949年，台湾的币制变化不定，秩序混乱。台湾这时是台币与金元券并用。组织兑换上，4月21日还是25元兑100元金元券，到了26日，已是10元台币兑100元，米价已涨到每百斤80多万元。5月26日，台湾调整币制，以一元对金元券2000元，原因是金元券已不值一文了。凡是解放军占领的区域，早已改用人民币。未被占领的区域，人们也不用金元券。大交易用金条、美钞来计值，小交易用银元计值，金元券不敢留在身边，只要过一夜，就贬值不少了。

金元券原定发行总数20亿元，首期发行2亿元，但到1949年6月，发行额总数已达130万余亿元，为初期发行额2亿的65万倍。按上海的黄金外汇黑市和批发物价指数计算，金元券发行期间，发行增加了65万倍，而黄金市价上涨了130余万倍，美钞市价上涨了130余万倍，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120余万倍。

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元券，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先是买空卖空，后是出尔反尔，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国民党还得意洋洋地宣称，正是有了这些黄金，才安定了台湾的人心。殊不知，这些黄金使老百姓进一步领教了国民党的敛财手段，大陆民心因此丧失殆尽。

第四节　币改与民生

国民党政府历次币改，前后政策有很大随意性，很少顾及人民的利益，改来改去，目的都是想从人民口袋里多掏钱出来，把老百姓折腾得死去活来。在这方面，东北人民可以说是首当其冲。1935年实行法币时，老百姓就吃了哑巴亏；抗战以后，东北在日寇统治期间，日本鬼子为了贬低币值，将法币换成日本军用票或伪满州币，兑换率从军用票1比法币2.1变为1比10.4，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抗战胜利，国民党到达东北后，决定以东北流通券代替伪满洲币流通。规定与关内法币的比值为1：15，即1元东北流通券可以兑换15元法币，后来贬值为1：11.5和1：10。东北解放前，出入关内外的人都要在山海关兑换法币，在东北流通券尚未运到之前，杜聿明在火车上就对经理处指示，由东北保安长官部发行“盖印法币”若干亿，分发所属一三、五十二两军和刚刚接收的地方团队和原伪满军使用。所谓“盖印法币”就是法币的票面上盖上杜聿明的官章，就能与当地的伪满洲币等值流通。这样原来的法币一下子便提高了15倍的价值，这种货币在锦州一带广为流通。直到1948年间，锦州中央银行发出告示，将流散民间的“盖印法币”等值收回。但由于比率降低，由1：15降为1：10，人民已遭受损失，再加上远居山区边陲小民，为了兑换一点为数不多的钱，要起早摸黑到锦州中央银行排

队候兑，得不偿失，有的干脆自认倒霉，放弃兑换，“盖印法币”以后并未如数收回。到金元券出台后，老百姓的一点积蓄再次被掏了出来“爱国了”。1948年11月，又准许老百姓兑换黄金，但这时金元券的价值比发行初期大打折扣，老百姓急于换回两个月前献出去的金银，但份额已今不如昔。开始兑换金元的第一个上午，上海中央银行前就有一位老太太号啕大哭，对人说：“上次兑换金钞时，我拿了500个银元来兑，得到金元券1000元，然后去放利息。我想放息不合算，想买回我的银元，哪晓得现在1000元只能买回银元50枚，气不过，所以哭了起来。”

由于当局处理兑金政策的错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间循环式的扩大，商人囤货的普遍，无情地刺激了物价；战局的动荡不安，内地若干米面来源发生匮乏，粮价只升不降。以上诸多原因导致民众一开始就对新币制缺乏信任，预计到新币必然贬值，第一反应就是抢购商品。当人民在经验中体悟到金元券购买力不断地降低，就产生了“重物轻币”的心理，一有现钞在手，立刻购买货物，其中大部固然是米、煤、油、纱等生活必需品，但藉此以保存自己财产价值的也不少，遂使市场物资愈益缺少。

金元券刚发行将近两个月时，10月中旬，通货的发行就接近12．5亿元，相当于“八·一九”流通额的5倍。这些货币并没有被政府从税收中收回，也没有流入生产事业，而是积累和游散于城市中，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形成游资压迫物价、全国压迫上海、生产事业转而停止等恶劣情形。如上海抢购潮涌，浦东农妇渡江赶来，纽扣都要限购一只，草纸每人限购10张，零售抢购把商店中摆在外面的货物抢购一空，所有各城市中的日用品，除非付出远远超过定价的价钱，否则难以买到；短期存款利息很低，只有月息4分；有组织的金条和美金黑市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到“正常”的基础。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警察有名无实，缺乏热情，办事效率大大降低。昆明从10月17日，就宣布取消限价，实行议价。各业所拟定物价均以黑市价为标准，有的还超过黑市价。上海市为了宣传节约，规定每周二为“无肉天”，不准吃肉卖肉，星期一屠宰场停宰，违者警告罚款，吊销执照。平津地区被解放军包围，物价更是直线上升，以“八·一九”为基数，1949年元月4日的物价已上升了95倍。西安、无锡、镇江等地的物价也在腾涨。西安元月上半月的生活指数以1948年“八·一九”为基数，增长了46倍多。兰州在币制“翻新”的形势下，简直形成币灾，中下层人民在币灾里，随时都有灭顶的危险。

10月底，限价政策破产，冻结工资办法也相应取消。然而，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永远低于实际物价上涨指数．这两种措施失败后，金元券的发行泛滥成灾，市场失控，工人生活日窘，对政府大失所望，促使他们离心离德。从货币观点看，金元券违背了金融的基本原理，政府在根本没有现有储备金的情况下，一味发行，而不于此时冻结游资，以至突然放出五六倍于旧法币的通货，有如洪水泛滥；强力限价，一面商民怕死赔本，一面金元纷飞，于是演成全国抢购一空的惨相。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商业城市，“八·一九”以后，抢购风首先从这里刮起，而后蔓延全国，11月7日，提篮桥一带居民为挤买10月份的配售户口米，竟有4万人同时出动，老老小小等了两天一夜，结果3万多人空手而回。1949年1月．从东北避难上海的中学教师李鼎彝一家9口人，属于普通

公教人员家庭。从他当年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的购物囤货数量：

米九包强，足敷一年之用；面九麻袋，足敷四个半月之用；豆油四十斤，足敷四个月之用；猪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煤油五桶，足敷五个月之用；酱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煤球一千斤，足敷四个月之用；木炭二百斤，足敷四个月之用；劈柴六百斤，足敷两个月之用；盐三斤，足敷一个月之用；楂米，平均足敷一年之用；粮油，足敷半年之用。

一个普通的教职人员，子女多在念书，没有固定的收入，家里还雇有佣人，其购买力在社会上至多算中等水平。在购买力极为一般的条件下，竟然拿出如此一笔钱来抢购物品，储足家人三个月至半年以上的用度，可见中等收入家庭的购物心理。这些人还算是有“远见”，再过几个月，物价腾涨，金元券暴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那些无囤积习惯的家庭倒足了大霉，整天为了那点配购计划挤进购物长龙。买到还好，买不到则全家挨饿。民众抢购物资的习惯，又使金元券的流通速度大大增加了，物价一日数涨而不跌，就是金元券流通量太大速度太快之故。这些都是加深物价变乱泛滥的原因。

为了配合金元券的发行，政府为防止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规定了限价令，但效果甚微。限价布告一公布，往往就出现货物无市的状况，民众生活大受影响。如 1948 年 8 月 29 日，秦皇岛军警宪联合稽查处贴出布告，规定：各种物价均需依照 8 月 19 日之物价为标准，非经奉准，不得擅自抬价，倘有顾违，即依法惩处。布告贴出后，粮食市场粳米几乎绝迹，仅有几份不好的，大喊“依照官价”。买米的人也不像前两天那样挤不动了。走遍了菜市街，看不见一个卖葱的。天津当局也大举检查黑市，查抄了证券行等 9 家违法交易市场，大批人犯带回警察局审讯。但不久，当局就感到违法商人抓不尽，市府被迫宣布检查小组暂时停止。

抢购成风，造成市场货物短缺，老百姓有钱难购物，逼得人抢米、发疯和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1949 年 1 月 20 日开始，上海户口米价上调，又逢年关，19 日白天起，多数户口米配售店前，呈涌购现象，秩序混乱，一些米店前，直到晚间警察出面，秩序才得以恢复。闸北一带的贫民甚为不满，发生强抢户口米事件，经警察弹压，众人才一哄而散。4 月 16 日，重庆粮价猛涨，爆发十多起抢米风潮。西安一屠户，一家 4 口人，因物价高涨刺激过深，竟致疯狂，夜夜爬上屋顶，揭瓦打人，并大呼“有金元券没有?”闹得邻居难以入睡。抢购粮食致死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天津一位老太太因排队买面时间过长，等轮到她买时，气力用尽，倒地而死。天津还发生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36 岁码头工人赵春来，因为全市粮荒，他妻子买不到棒子面，母子俩经常在家挨饿。一天，赵特地不做工，跑到附近的万兴合米面庄去采购配售的次等粉，轮到他买时，掌柜硬说面已卖完，赵却明明看到还有 12 袋面粉，当时就要买，否则要检举掌柜惜售。米面庄请人出来调解，把赵劝回家，同时把米面挪开，并愿白送赵两斤面粉。赵不接收，米面庄反把赵告了个“举众扰乱配售秩序”罪名。于是，赵被带到警察分局、总局、法院，一星期后才被保释出来。赵回到家一看，发现孩子已在几天前饿死，妻子也在病中。赵

极度伤心，乃从地下扒出孩子尸体，扛到警察局，控告米面庄。”币制改革给零售商带来了沉重打击。物价涨风劲刮，获利的只是少数人，多数善良苦难的人们，忍受着生活的高压，终日过着饥馑、恐怖、混乱的日子。

恐慌的市场，是黄牛党最为活跃的场所。币制改革以前，各城市的黄牛党的活动限于倒卖电影票、火车票等。币改后不同，变本加厉，威极一时，衣食行都有黄牛党插足，声势煊赫，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黄牛党却有神通搞到，多次倒手，价格急剧攀升。对于金银、外币的黑市猖獗和物价的狂涨，人民虽然痛恨之至，但恨归恨，谁也不敢把金元券攒在手，千方百计兑换成银元或黄金。那年头，人气最旺的要数各地的央行或支行。如上海每天晚上八九点宵禁，凌晨五点解禁，老百姓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江四周，清晨五点一过，便潮水般涌向央行抢兑黄金。挤伤踏死人的事时有发生，1948 年 12 月 23 日，是上海市民存兑黄金银币的第二申请期，中央、中国、交通、中农、邮汇局等合作金库分派存兑申请书，竟有 10 万以上的市民争挤 2 万份申请书，当场造成男女市民 50 多人死伤（7 人死亡）的大惨剧，即便警察出面也无济于事，被鞭打致伤的 45 人。

1948 年的阴历年关（公历 1949 年初），真的成了国统区人民的“难关”。人们惊叹连呼：“这种年关如何过得了?”但人们还是指望年关过后，物价回跌。新年刚过，照理物价应该下跌，事实并不如此，物价仍如断线的风筝，只升不降。顾客过了年，口袋仍是瘪瘪的，了无购物兴趣，市场仍显不出激活迹象。2 月 3 日的《申报》报道：过了春节，物价犹如一场春梦，醒来时，全都翻脸不认人，此中以黑市金银所涨最凶，里巷处处丁当响着的银洋，过了五天春节，前后跳了足足 3 倍。其他吃的穿的，大多涨上一倍到二倍。市民们最关切的食米和蔬菜的价格，春节的几天中，简直是陷于空前的无政府状态。接下来的两个月，市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以猪肉一项为例，上海一月份全市宰猪 76462 头，二月份减到 26200 头，三月份平均每天 600～700 头左右，比二月份又有减少。原因主要是苏北军事局势恶化，大江南北交通断绝，仅赖京沪、沪杭沿线乡村供应；其次在高物价之下，一般市民生活水准天天在降低，猪肉对于大多数平民已如“奢侈品”，可望不可即，“三月不知肉味”的大有人在。与 1948 年“八·一九”前后相比，人们猪肉的享用量减少若干。3 月份，全市 500 多万市民，每 100 人中，平均每天只有一人能吃猪肉一斤。3 月 7 日，上海的大米每担达金元券 28000 元，与 12 天前的国民党政府宣布的“财政经济改革”时比较，上涨 1.33 倍，与“八·一九”比较，上涨 1450 多倍。

国民政府各项物事加价，早已引起人民的不满，人通过一切渠道发泄他们对涨价的不满。1948 年 8 月 18 日，即“八·一九”金元券改革的前一天，中央航空公司收到寄自西安、署名为“飞刀会”的怪信，声言飞机票再涨价，就要捣毁飞机。信中说：“贵公司航空客货运一再加价，最近不满一月，连涨两次，抑且垄断居奇，此种强盗式的加价，较之杀人放火的共产党还要凶猛。共产党的杀人是一隅的，你们的杀人是普遍的，所以目前的百姓对你们这辈强盗莫不个个咬牙切齿。这种局面下，中国岂有不亡？本教有鉴及此，特组织飞刀会，专以锄奸杀贼、除暴安良为宗旨，倘贵公司再非法垄断，并

任意加价，本会即派会友分发各地，将你们停留在各地之飞机加以破坏，特此警告并希查明。”这封纯属发泄私愤的恐吓信在中航公司引起一场虚惊。这位寄信人显然充满对共产党的误解和诬蔑，但更怀有对中航公司随意加价的怨恨，把它看成是“普遍的杀人”。该“会”也许不知道中航公司的加价是受政府的经济政策决定的，其警告似乎没有找准对象，但足以反映他及普通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深恶痛绝。到1949年国民党离开大陆前，国民党统治下各个地区的人民，都在恶性通货膨胀之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受够了生活的折磨，痛恨政府的经济政策，盼望战争早日结束，真正过上太平日子。

1949年，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是最灰暗的一年，其失败的迹象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两者背后又隐藏着经济的失败。多年来，通货膨胀一直困扰着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势头很难遏止。1948年底及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一发难勒。有人认为，政府所以不能用非通货膨胀的方法增加岁收，以及通过储蓄和征税方法吸收剩余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怕因此而失去人民的拥护。政府乃决定拒绝采取有效步骤来调整支出，并且过分重视政府的威信和外来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其实，国民党政府自己不止一次地置人民的利益不顾，通过各种手段疯狂榨取人民的血汗钱，“民国万税”并不是民众一句无意间的牢骚。政府腐败无能，不愿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官僚集团本身是政治腐败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没有勇气在老百姓面前自报家丑，自打耳光。代表官僚集团利益的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只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幻想通过业已腐朽的行政力量来抑制通货膨胀，结果扬汤止沸，顾此失彼，经济崩溃一泻千里。

第五节 经济恢复和民生改善

华北刚解放，共产党面临的经济问题也相当严重，通货膨胀继续恶化，实物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并不宽裕，可是共产党在发现问题后，能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所以在共产党解放区，因通货问题引发的物价波动一般能很快得到控制，人们并不像生活在国统区那样恐慌。

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严肃认真。在共产党控制区内，像国统区那样的商业投机行为是被坚决禁止的，对于“临清事件”的处理就是典型例证之一。1948年10月，华北解放区临清市（位于鲁西北运河与衡河汇合处）发生了华北、华东两解放区的国营贸易机关抢购棉绒150万斤，刺激物价上涨，引起私商投机，有20多家国营商店卷入，造成国库损失冀南币3.05亿元，导致当地市场极度混乱，影响恶劣。共产党对这件事迅速作出严厉批评。1949年1月17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以政府的名义，号召各地军政单位要以此为警号，从中吸取教训，以便在取得全国胜利后，更好地对付庞大的商业资本，安排好大城市集中的生活消费、原料消耗与集中生产品的分配，处理好纷繁复杂的大规

模商业活动。为此，冀鲁豫几家贸易公司登报进行了深刻检讨，承认这种行为是缺乏国家整体观念，投机营利造成的恶果，表示要提高理论认识，加强政策学习，坚决反对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这件事表明，共产党对经济问题十分重视，为以后城市经济工作做了思想准备。在进入大城市后，共产党认真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行市场的稳定，为取得全国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打下了基础。

为了防止市场无政府状态，政府对公营商店的购买区域作了一定限制。如华北政府工商业部就于1949年2月规定，公营商店不得到邻区收购物资。对于公营企业的违法行为，政府严肃处理。冀中辛集25家公营企业机关，违法向私人银行存款，被政府严加制止，依法处理。晋中兑九峪市场，是晋中粮食交易的主要市场之一，由于当地政府一度放松了对该市场的领导，造成物价狂涨，5家商店垄断了全镇70%的粮食来源，进行私自交易，闹得群众有钱买不到粮。当地税务局针对这一情况，召开各商店会议，规定了新的办法：建立粮食市场，集中买卖；买粮先尽群众，粮店后买；外来商贩收买，必须呈报税务局。这样，市场秩序渐趋安定，暴涨现象停止，政府如数收得交易税。

共产党在刚接管的城市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为了安定人心，在保留其原有的经济面貌的前提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调动工人积极性、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生产力上面，把工人和市民的注意力转到生产中去，既化解了可能出现的劳资纠纷，又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工人对于政府的良苦用心也能予以谅解和支持。1949年3月份，媒体报道，华北经济形势严峻的现象一为物价问题，另一为工人工资无法养家糊口。共产党的对策是：增加生产，解决危机。人民银行决定举办生产贷款，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钢铁、纺织、交通、公用民营及国营企业。关于后者，由于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足以解决生活困难，无法达到共产党所倡导的阶级利益，获得切实保障，渐渐有不满情绪。于是政府改用"实物工资制"，加以补救。"实物工资制"原本行于东北，办法系由合作社供应职工工资中70%的实物，使其可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天津曾公开承认震中橡胶厂、北洋火柴厂劳资间发生过工资问题。震中橡胶厂工人方面表示工资太低，影响工人情绪。经过华北工会筹委会天津办事处调解后，提高工资。北洋火柴厂因工资过高，影响资方扩大再生产，经该处苦心调解，减低工资，但责成资方设法改进安全设备，负担因公受伤者的生活费用，以期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进而达到增加生产量，解决物资短缺及恐慌现象。东北及华北工人自解放后，劳动热情大大提高，工作时间由8小时增加到16小时，并以"劳动英雄"及"按件计算工资"等方法，奖励勤劳工作者。为了迎接解放后第一个"五一节"，发动"生产大竞赛"，鼓励大家都成劳动英雄，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数量，协助"解放工作"。

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元券，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崩溃，被共产党视为前车之鉴。在占领平津等地后，共产党就很快通过发行人民币，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人民币与金元券的兑换，把金元券彻底而迅速逐出华北流通市场，确立了人民币在流通领域的地位。随着共产党向全国进军，人民币也随之通行全国，并在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下，普遍推行开来。

人民币的发行和管理，是经济行为，但要有行之有效的政治行为加以保护。没有强

有力的政治措施做保障，加强对流通市场的监管，人民币的信誉度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其中，对金银市场的管理与此关系最为密切。在国民党统治下，人们深受金元券之害，只相信金银等硬通货，于是想方设法持有金银，金银黑市及银元"黄牛"如影而随，反过来又冲击了整个流通市场。共产党有鉴于此，在新解放区或新占领区，下大力气整治金银市场，确保金融秩序稳定。4月29日，人民政府修订《华北解放区管制金银条例》，禁止金银运出解放区，人民可持有金银或卖给人民银行，但不准以金银为贸易时的计价标准，或进行金银买卖；从其他解放区或国外转移金银人境的，需有政府许可证，一切进人或离开解放区的人民，皆不能携带超过1两的任何金首饰、4两以上的任何银首饰；人民想出售金银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需要金银供给工商业或其他合法用途时，必须向人民银行申请。破坏此规定的，其金银将被没收，或以八五到七折的价格强迫兑给人民银行。4月23日南京解放后，29日，南京军管会发出布告：自即日起，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元券为非法的通货。但是，为了人民的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价值金银券2500元。随着金银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到5月10日，解放军正式进入南京城，日用品并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卖银元3～4枚。5月29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金元券可用到6月15日停止，一切价值，以人民币为标准，人民要拒收金元券。人民银行从5月30日起，兑换人民币。暂定的兑换标准为一块兑金元券10万元，上海一切物价，必须依照公布的兑换率，折合人民币计算，不能因为金元券贬值而抬高物价。以后不得再以黄金、白银、外币为基础，银行的账目也要以人民币计数。

共产党一方面通过经济手段，稳定金融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措施，保证经济措施的实行。这一点，不像国民党政府，在整顿金融秩序时，为了少数几个豪门的利益，骄纵枉法，终至令行不止，自毁法规。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整顿，就显出共产党推行金融政策的决心。金元券泛滥的时代，以上海为代表的银元贩子、不法奸商左右银元市场，控制证券交易，兴风作浪，坑害市民。上海解放初，他们低估了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能力，将旧有的那套"把戏"照耍不误。汉口路等地证券大楼麇集的大批奸商、掮客散布谣言，"共产党打仗有本事，管理城市不行，搞经济更是外行"，企图操纵金融市场。无数银元黄牛从这里探听"行情"，沿街兜售银元，欺诈人民。许多人把刚刚投放市场的人民币视如"烫手山芋"，不敢在手上多捂一会儿，有人甚至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解放后的十多天里，上海市内就有30多万人参与了银元买卖活动。人民银行为了平抑物价，早上把人民币发出去，晚上却又回到银行。这导致人们对人民币不信任程度不断增加，物价跟着上涨，失业人数增多，社会动荡不安。军管部门摸清了不法分子的内情，6月10日，出动警备部队，突然包围证券大楼，查获大批黄金、银元、美钞，依法逮捕为首分子249名，同时取缔沿街叫卖银元的流氓、"黄牛"；对这些犯罪分子分别处以徒刑、罚款、劳役或保释，用以投机的资金财物均予没收。此举不仅震动了上海，也影响到江浙甚至全国，人民币开始趋于坚挺，物价迅速稳定，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老百姓称：这下"大亨鼠"完蛋了。看到商店门

口挂出的正规货物牌价时，受尽投机商折磨的市民，有时还明知故问地对店主说："侬的价钱是不是搞错了?"共产党在人民心中树立起崭新的形象。

上海的地下钱庄也是第一线的投机者，它们以高于银行放款的利息，吸收存款，再拆放出去，使得合法银行的业务受到影响。存放的手续全不按银行手续办理，储户利益没有保障，一旦放款倒账，经营者一走了之，存户成了牺牲品。地下钱庄的放款，十之八九是供投机者以投机资本，足以助长市场的波动。除经营黑市拆放外，地下钱庄还多经营黑市金钞买卖和商业投机。地下钱庄活动无一不干扰正常的工商业金融秩序，搅乱市场，危害人民的生活。在它们的影响下，即使是合法的私营钱庄，有的竟也挪用行款，或设暗户，与地下钱庄没有本质区别。继6月份搜查证券大楼、打击银元金钞投机后，上海市政府又于1949年11月25日采取行动，搜查地下钱庄，一天就破获了25处，当场抄到账册、黄金、银元、美钞等违法经营的证物。对于引起金钞黑市泛滥的黑市机构，政府于11月17日全线出击，一举破获8个金钞黑市机构，将马路上或弄堂口偷偷摸摸游击式的黄牛全部肃清，总计逮捕金钞犯及黄牛在100人以上。通过几次大的行动，整顿了金融市场，抑制了物价波动，使人民币在上海站住脚跟。

其他地方的投机商人也兴风作浪。但这种局势很快被共产党扭转过来。北平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就有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粮价暴涨，人民无不痛恨。市政府顺应人民的要求，于11月13日将16家奸商抓到公安局，限令各商号按8月份价格售粮，市民每户每天可买10斤，市粮价很快下跌。

另一个整顿金融的办法是控制游资，减缓资金流转速度。游资泛滥，是稳定物价的最大障碍。在过去，银根是物价涨跌的寒暑表：银根紧，物价跌；银根松，物价涨。为稳定物价，政府着手防止游资作祟。这项工作由国家银行业务配合行庄管理进行。解放后，官僚资本不能兴风作浪，政府加强了对行庄信用管理，如取缔退票、禁止开发本票和缴存存款汇备金等，控制了主要投资金的活动。6月，中国、中交等国家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和定期存款，人民银行举办同业定存和市民定存，并加强代收税款、货款及汇兑等业务。10月，又发动征求10万存户运动，使大量游资汇集于国家银行。政府又把人民币建立在物资和社会生产力上面，发行十分谨慎，在彻底推行外贸金银和贸易收到良好效果后，市场上风平浪静，市民也开始转变重物轻币心理，社会资金流转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银行、行庄存款很快增加。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上海的金融资本也逐步脱离投机市场，通过行庄，走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生产事业的道路。

除了加强流通市场的管理监督外，政府还根据各城市特点，采取其他一切相关措施，从根本上控制市场物价，使得一些城市解放后不久，物价就趋于平稳。这中间也有波折，但政府令行禁止，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如北平自解放后，物价基本平稳，由于经济长期受敌灾和天灾的摧残，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前，绝对的平稳是不可能的。解放半年，由于奸商的投机倒把，出现4月、7月两次物价波动。4月是春旱少雨、青黄不接之时，7月是受上海遭遇灾害、国民党封锁、市场动荡、投机活跃、游资北集的影响。一时间，纱布和粮价都有抬高趋势。针对这些情况，平津贸易机关密切配合，低价抛售粮布，打击了投机奸商。当场赔了钱的商人反过来哀求贸易公司为他们退货。另

方面，由政府以行政力量限制投机倒把行为，打击奸商，引导组织游资投向生产，加强市场管理，建立健全消费合作社。解放后南京有100万人口，真正生产的产业工人只有2.7万余人，工业资本在南京不到10%，其他90%是属于非生产性的。生产太可怜，市场方面，南京不是一个物资集散地，工业品要仰仗上海，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依靠芜湖、合肥、全椒等地区，加上投机奸商的作祟，所以在沪芜两地花纱布粮上涨波动之时，南京受两方面的压制，也容易产生波动。人民政府一面与奸商作战，一面由贸易公司低价供应粮食，配合整顿金融秩序，取缔信用膨胀、滥开支票等非法行为，打击地下钱庄，稳定了市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对于哄抬物价的商店，政府严惩不贷。南京有3家商店滥发空头支票，扰乱金融，抢购物资，哄抬物价上涨，直接间接地影响了物价波动。11月16日，南京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姑念它们初犯，提出宽大处罚：登报3天向全市人民承认错误并道歉，向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提出悔过书，以便由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向全市商民进行教育，反对投机；向工商局提出殷实铺保两家，保证今后不再犯，杜绝了哄抬物价的无政府行为。

城乡经济互为依存，而战时城乡往往因交通阻隔，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渠道阻塞。1949年共产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城市，但并没有放弃农村。共产党深知城乡联系的重要性，不断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加强城乡交流，为稳固占领并领导城市打下坚实基础。先期解放的一些城市如北平等，在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开始注意城乡经济交流。城市组织工业参观团到农村考察，了解农村对工业品的需要，分析农村市场特点，与农村商定产销集体合同，在各行各业中，着手建立城乡联合网络，互通有无。城市工商局还有计划地指导机器工业生产，面向农村，向农民提供适销对路的机器设备，既方便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又为城市厂商打开了市场，增加了城市就业机会，减少了失业压力。

1949年，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和新占领地区能够很快稳定金融市场，巩固经济秩序，加强城乡联系，与其说是得益于经济措施的切实可行，不如说是政治措施的坚强有力。这一点，是国民党难以比拟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改革，说到底，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作后盾。虽然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政治改革不到位，在一定时期内，就会成为经济的桎梏。尽管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政治桎梏的崩溃，但政治与经济不协调，经济改革的步伐往往因此迟滞。国民党几次币改，都是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并没有真正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政治的腐败，导致了经济的一次次失败；经济失败，又加速了政权的覆灭。

第三章 衰与盛——城市风貌与市民心态

抗战胜利之后，各市面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内战爆发后，一些城市的繁华景象一去不复返，至1948下半年至1949年，国共争夺的焦点转移到大城市，城市情形骤然发生变化。在国统区的城市，物价飞涨、民生艰难、市场萧条、物品短缺等是它们的共性。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点：军需开支的浩大，通货急速膨胀，币值跌落；一般人心的恐慌浮动，抢购风涨；投机商人囤积垄断，兴风作浪；部分耕田沦为战场，工厂无法生产，物资供应不足；对外交通中断，物资交流受阻，进出口渠道不畅。共产党占领城市后，对城市秩序严加整顿，城市面貌迅速改观。

政治时局在动荡，军事态势在转换，物价在跳动，人群在迁移……所有这些，造成了中国城市结构的剧烈嬗变。"动态"，成了1949年中国城市的一大特点。在此共性之下，又有各自的个性，即遭受创伤程度不同，市民心态不同。1949年国共决战中，人民生命和财产所受的损失至今无人作过统计，我们只能选择一些典型城市为个案，再现当时城市风貌和市民心态。

第一节 战火笼罩

战火笼罩下的城市可以分成两类：国共经过围城、反围城的激烈战斗，被共产党攻克的城市；虽经被共产党围城却未经交战、通过和谈解放的城市。

长春、太原、天津等是第一类型城市的代表。东北的长春、沈阳等，在国共决战中，是首先被共产党围困的几个省城。为了争夺东北这块战略要地，国共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争夺长春的斗争尤为惨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度过了解放战争以来最为难熬的日子。1948年6月1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城，断绝外界与市内的商业关系。长春原是东北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至1948年10月，被围时间已达一年多，已有40万人逃出城区，市民由70万降到20万，满街巷除了军人、家属外，就是营养不良的居民，能用麦子和糠谷充饥的已算不易，找遍长春，已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物。军民为解决燃料问题，争相拆毁木料，用来烧火。为抢木料，军民打架开枪杀人的事时有发生。有的一条街和一片区都给拆光，公园和大路两旁的树也被砍光，墓地的棺材也给刨出来了，连大马路上的沥青都被挖起来烧火。据9月9日东北野战军《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介绍，"两个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现达

3000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城中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吃的东西，90%的人都在闹饥荒。街上行人没精打采，惨状几近于古人所说的“易子而食、拆骨而焚”。9月上旬，已出现卖人肉的现象。少女出嫁，只能换来10斤米，一条裤子只值一根葱的钱，商场冷落，百姓发愁。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的统计，长春市民饿病而死的达12万人，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12万人，超过了辽沈战役敌我伤亡数字的总和，该战役中，我军伤亡67339人，阵亡14010人，国民党虽被歼灭47万人，但伤亡只有56800人，被击毙者不到半数。其他一些被围城市，不及长春如此惨烈，但市民也差不多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48年底，山西太原围城已近两个月，食用全靠空运，对外消息隔绝，粮荒严重，市民集资采购食品，金银现洋由专机运到上海，购买面粉运回。城内募捐运动也在紧张进行，钱、面、麻袋、老卤菜等一应全要。可是贫富一样待遇，贫民认为有欠公道，但人微言轻，提了也不管用。义务劳动也是全城人的“义务”，每天从早到晚，男女老幼，都在城周附近做工。大家都带着粗面汤饼，预备在休息时“打尖”。工地上要是有流弹飞过时，这些男女“工人”便会向四下逃躲或歪七歪八地躺下。街头外来援军不少，多为河南、山东大汉，不时发出的“国骂”口头禅，当地人尤其是妇女听了，十分刺耳。

天津是1949年初，解放军以武力攻下的第一座最大的城市。这里，“抢购风”早在1948年10月4日就强劲起来，数日过后，各商店陈列的货物一部分被抢购，一部分被藏匿，四壁皆空，顾客降格以求，碱店、酱油店、卤菜店都排起了长队，顷刻间缸盆一空；喂鸡鸭用的粮食店前，也排起了长队。商店在抢购中，不但将积年的陈货兜售出去，而且还乘机加价。入晚，除了药店、洗衣店等还亮着灯外，其余都双门紧闭，大饭店中餐过时不候，晚餐7点即打烊。顾客有钱也不能舒服地吃一顿。市民粮食短缺，只好向郊区农村去购粮。而政府又规定，郊区的静海等地粮食一斤一两也不准出境，在城内住的静海市民情急智生，到静海购买玉米面，蒸成窝头，用包袱背到天津，每天干这项工作的人来来往往，麇集静海车站。进入农历腊月以后，天寒风冽，将近旧年的许多节日气氛都被市民的忧郁情绪所掩盖。例如，腊月的头一个节日“腊八节”，以往普通人家都要煮些腊八豆、结缘豆，有的竟许下心愿，清晨在门前放舍，孩子们拿碗挟盆，口喊“缘啦”、“烟啦”，在街巷跳跃；杂货铺也要临时摆上煮腊八粥的五颜六色材料，里门公所（戒烟酒的地方）“参座”的信徒昼夜不断。可是今年腊八前夕，街市间的货铺腊八粥材料寥若晨星，售价贵得吓人。腊八以后陆续到来的节日引不起人们一点兴奋，最使人民担心的除了隆隆的炮声，就是万物涨价声。

天津城郊在困战几十天的时间内，外围激战激烈，市内多处落下炮弹，市民多赶紧挖掘地洞，堵塞门窗，街谈巷议，“避弹”成了主要话题。搬家避弹人很多，且大多是贫苦百姓。街头除了担架以外，扶老携幼的难民最引人注目。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8月份出生率23.5760，死亡率竟达12.36‰，多为1岁与10岁以内的儿童。天津老市民说，民国以来天津经历了多次内战和抗日战争，周围50里以内，一向没有剧烈战争，这次国共交战的剧烈程度是空前的。以前每次“事变”，尚有“租界”可以躲避，市民

仍不免惊恐万状。这次尽管隆隆炮声就在眼前，市民反而显得颇为镇静。但是人们对和平仍抱有极大兴趣。报贩子大喊“和平消息”及补充的“这次可真和平了”一类的售报“广告用语”，颇能引得市民争购阅读。正值严冬，寒风刺骨，一到夜间，除远处传来的震耳炮声外，马路上死一般寂静，经常有冻尸骨被发现。交通管制无限期延长，市民没有臂章不能外出，行人稀少，电车乘客不禁自少。商店十有八九紧锁铁门，仅有几家食品店隔着铁栏杆做生意，顾客在门前好像“探监”似的。电筒和煤油最为畅销。粮价奇贵，一般小商贩乘机抬价。市民购买配米也极为困难。街上到处堆满了沙袋，除非轻车熟路，否则有到处碰壁之苦。三轮车冒险出动，车价也迅速提升。郊区难民再度搬家，张皇过市。工厂大多被迫停工，数万工人面临失业，边缘地区的工厂已成了军事据点。由于娱乐场所大多关闭，只有胜利桥边的露天游乐场，寒风中依然观众如堵，劳苦大众比肩延颈，张口跷舌，时时迸发出一声哄笑，暂时忘掉了炮火的威胁。寻欢作乐的人胆子变小了，至10月份，公娼人数减少了400名，剩下1900余人，性病患者占1/5。到1949年1月，围城将近一个月后，攻防进行了一周，市郊居民，破家流离；城内居民，惨状亦甚，但见：“怵目兵燹，惊心物价，卤菜窝头，都成珍馐，人有失血的菜色，路有冻死的僵尸，在家坐愁米盐，出门但见苦脸，商店关门，巷口砌砖，难胞成队，粪污满街；在火药气息中，眼帘耳际的一切景象和声音，都令人心悸，也令人窒息。”

北平等是第二类城市的典型代表。自1948年下半年以来，遭受了与其他城市同样的经济恐慌，限价以后，顾客与粮店老板、军警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部分电车工人兼拉三轮车，到1948年10月份，行驶车辆由百余辆减到60多辆，每天约有百人脱班。“八·一九”以后的一二个月，物价腾涨，生计逼人，只有中产以上的人才有剩余的金元券抢购物品。“黄牛党”在上海早已兴盛，在北平人听来还算新鲜。大部分商业停业，小部分以劣质货物或空架子应付，转眼间老板或伙计可以向顾客索要悬殊的物价，玩具摊因无人光顾而早早收摊，洋点心、绸货架空空如也，只剩下小如麻将的点心来表示还在营业，却无人抢购，各摊贩的物价暗中都已擅自提高。北平某外商经营的奶厂宣布每星期停奶两天，以节省饲料，因为老板依照限价亏本，又不愿违心掺水或供应脱脂奶。许多人被逼得戒了烟，无意中满足许多家庭主妇的心愿。

北平既是数朝帝都，同时也聚集大群的穷苦百姓。抗战胜利后，华北满目疮痍，北平尤甚，民困日深，政府却搜括不停。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救济计划、复兴手工业的一套套办法惠而不实。围城之际，冰天雪地，举目所见，到处是瑟缩街头的难民、枵腹从公的公教人员、即将断炊的大群学生和面有菜色的老百姓。所有的必需品从围城起，就疯狂上涨，一天数跳。北平的人民大多有生以来还没有感受过围城的厄运，缺乏应付围城的经验，多数人家都没有存粮，平时也不可能积蓄生活日用品。许多善良的老百姓，遵纪守法，信赖官方的屡屡承诺，不能也不敢预先囤积，以作应变。所以围城后，越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越是倒霉吃亏。更可怜的是一些中层人家及贫苦小民，在“八·一九”政府雷厉风行收兑金银期间，都排着队把一点血汗钱双手献给了国家，而在北平被围后，达官贵人插翅南飞，金银也随之生翼而去，再也没有回头。政府答应空援接济的物品总是姗姗来迟，有时干脆不来。剩下的是升斗小民呼天叫地的凄苦之声。工商业历经

"八·一九"限价抢购之后，许多商店几乎被抢空。围城后，各商店、银行、钱庄或停薪裁员，或紧缩开支，等待吃光散伙。一般中小型工厂为数本来就不多，现在更加难以闯关。为了减轻城内食品压力，1月10日，当局决定疏散难民万人出境，救济品停发，每人一次发给小米5斤，金元券150元，限期离开，自谋生路。但无法根本减轻城内的压力。

尽管如此，不少市民认为，北平为三朝建都之地，经过若干变乱，文物依然无恙。有些老北平更是胸有成竹，一位前清遗老就说："怕什么？直奉战、北伐战、中日战都没有吓跑我，北平才是中国的巴黎哩（巴黎陷落三次，均未遭破坏）！"人们只是对"绝粮"、"抽兵"、"逮捕"、"挨炸"有些恐惧。

鉴于外有大兵包围，外逃无路；内部食品断绝，续守艰难；天津城池攻破、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活捉、人员伤亡惨重的先例在前，文化界人士请求保护古城文物的呼声强烈。驻守北平的司令长官傅作义成了"识时务"的俊杰，同意北平国民党守军放下武器，拯救了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也使200万同胞幸免炮火之灾。

其他被围待解放的中等城市也大多处于自动罢市状态。如青岛，币改限价后，先是粮荒，买不到粮食，后来绸缎、布匹亦步亦趋，市民及黄牛党争购这类物品，不做生意的市民也跟了上去，商店没法应付，只好关门大吉。政府强令开门，也只开3小时，照常营业的只有药铺，药也稀少或没有，连棺材店也把门关起塞，怕人抢购。

第二节 "心脏"受迫

南京、上海、武汉、合肥、杭州等城市，在1949年初，还是国民党的"战略后方"，是无数南下难民落脚的地方。到1949年三四月份，相继成了防止共军渡江的"前沿阵地"。这前后地位的转换，带来了城市风貌的变迁和市民生活的巨变。

抗战胜利后，人民得到暂时喘息，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一度再现繁荣趋势。长江沿线的城市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基地，因此，恢复的速度较之其他城市相对快些。可是，好景不长，抗战结束，内战又起，一些少许繁荣的市面昙花一现，再度陷于萧条。以合肥为例，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劫后的古城一跃而为省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大量增加，市面日趋繁荣，百业日趋发达，物价也在不断高涨。商人十有八九笑逐颜开，年年大发财源，茶肆、酒楼、旅店、浴室，天天都告客满，房荒也随之严重，家家房主，奇货可居，十字街西、府学、菜市场，每天早晨挤满了采购米草油盐，鱼肉蔬菜，家庭日用的人群。新合肥也在着手筹建之中。正当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候，1948年12月20日，突然接令搬迁到安庆，疏散到64个县市的公务员及家属潮水般分途流出，合肥市面突然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到1949年初，合肥市面生意，独资经营的只有十多家，其余都是零散的股东生意，批发较少，零售特多，主顾多为公教人员及家属。于是，公教人员日瘦，商工人员日肥。一般对象走了，零市生意一落千丈，家家改换门

面，花费较大，各银行、钱庄疏散停业，支出浩繁，除几家资本雄厚的商号稍有盈余外，其余都有蚀本之虞。军服店、照相馆、理发店、印刷店大多关门大吉。菜市场也不复往日繁荣。市面建筑半建半停。奇货可居的房主们，一两个月前，一再增加租金，甚至不谈法币、金元券，改租金为三五斗米一间，更要预付三个月、半年、一年的，条件苛刻，逼得一般公教人员的房客无路可走，只好忍气吞声，挪借典质，以付租米。现在人去房空，情形大不相同。房主特别客气，为了避免房屋住兵，一改以往凶巴巴的面目，到处请求介绍房客，欢迎立刻迁入，租价也特慷慨，自动减少一半，或不计较，甚至不要租金，给予白住，但求不为他人占住就行，可谓前倨后恭。

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南京、上海、武汉、镇江、苏州、杭州等城市，一直是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国民党视为“心脏”。国民党政府提出与共产党和谈，指望和谈成功，实现“划江而治”，这些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无疑仍要归到国民党政府辖区。所以，这些城市的民众，在国共和谈形势没有明朗的时候，心理是复杂的。国民党政府要把这些城市作为阻止解放军过江的前沿阵地，而北方南迁的官民则希望逃难生涯在此结束，把这里作为他们的理想归宿。但和谈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最后以破裂告终。因此，从1948年底到1949年解放时，这些城市风貌迥异于前：市面冷清，工商业萧条，旅游业一落千丈，熙来攘往的人流，始终聚散不定。

镇江为江苏省的省会，1月底，镇江至六圩的轮渡已告中断，江边码头，塞满了来自扬州、泰州、高邮的成千难民，渴望和平的早日实现，重返家园。几个码头，车喧马嘶，一片临战状态。江中的焦山寺，一向隐逸悠然，如今已不同以往，四周逡巡的是海军军舰和无数炮艇，而不是游客的画舫。常在水面生活的渔舟，现在只是一片片风帆，载着那浪迹天涯的难民群，沿江而下，寻找“安全”的岸边。旧历年的镇江城里，商人们正在结算盈亏，家家户户都在为辞旧迎新焦急和筹划。马路上，卖年糕、鞭炮、门神、春联以及其他有关的年货，满街触目皆是；商店中，也仿照京沪，高悬着“扫空大拍卖”的减价标志，兜揽生意；食品铺中，满挂着“金华火腿”、“广东香肠”、“南京板鸭”等各色各样的腊味。小孩的玩具也设在街头，只是价格高贵，收入微薄的公职人员及他们的孩子们只能驻足观赏，一饱眼福，因为南京各机关空前大疏散，镇江车站挤满了人群，秩序大乱。省会拟由镇江迁盛泽，更增添了忙乱。

1949年的上海，仍以其繁荣喧闹著称于世，但在这表象之下，隐藏着许多不安。1948年底到1949年初，进出上海的旅客，有如潮涌，挤满了每节火车，甚至车顶上都是人。从平津、徐蚌来的人，受尽了战争的磨难，憧憬上海这片乐土，想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不少在上海居住的外地老百姓，受一日数跳的物价和米荒的威胁，吓得他们奔回老家去吃几天米饭，先躲避风头再说，要不然改行做单帮客，往返于沪宁、杭甬道上，虽然辛苦，但转手之间，所赚总可以糊口。上海北站成了人流的聚散地。

宵禁制约着上海市民的夜生活，一旦宵禁时间缩短或取消，靠夜市生活的人们总是兴奋不已。3月1日，夜上海宵禁缩短1小时，夜市重新蓬勃起来。各舞厅、咖啡厅获悉这一消息后，即将营业时间延长到11点。电影院立即更定计划，最后一场晚9时开映。饭店餐厅也延长了营业时间。公共车辆将进厂时间推后一节。至于一般摊贩、三轮

车夫及其他恃“夜市”为生的人，对于宵禁时间缩短，特别感到兴奋。

时局动荡不定。南北交通阻隔，经济区域被割裂开来，北方的金元券通过商人排山倒海南来，使上海等城市的市场游资泛滥。从1月开始，首都南京因为政府要迁移广州，各部会的人员聚集上海，准备南下，南京的游资也随之流到上海。反映到金融市场，如火上浇油，使物价涨风一发而不可收拾。金元券发行额与日俱增，同时，金元券流通区域又逐渐缩小，平津已不流通，乃纷纷南流，使得上海物价只涨不跌。以往政府为了物价问题，往往还手忙脚乱应付一阵，现在却不为物价所动，只忙于搬场疏散，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命在他们心目中不值一提。4月20日，国共和谈失败以后，解放军即将过江，京沪地区的物价继续狂涨，市场完全陷于瘫痪。

1949年4月底5月初，战火已经迫近上海，尽管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到处张贴反共标语，制造战争当头的紧张气氛，但上海市民对于战争已不如当初那样恐慌，除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外，市区丝毫看不到战争的气象，一度门可罗雀的电影院、跳舞场等娱乐场所，又常告客满，充分反映出寻求刺激与享乐的心理。星期日，更是游人如织，笙歌处处，悠闲与繁华，让人怀疑十多里外正有生死的决战在进行。天空中飞机的异常拥挤，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500万市民正以麻木的心情等待不可知的未来。从市民的“镇定”神态看，似乎不怕被国民党描述成“凶恶”的共产党及解放军。

到了5月20日前后，解放军的炮火已逼近上海郊区，战事正酣，市民生活又发生新的变化，风气与此前大不相同，社会秩序反倒日渐纪律化。投机市场空前冷淡，物价相当稳定，西区豪华住宅整天重门深锁，各商号的玻璃橱窗都加制了护窗木板，普通住户也在围墙上和里弄巷口赶装栅栏和铁刺蒺藜。人们并不是怕解放军，而是怕那些惯于顺手牵羊的国民党大兵。为了防止不测，晚上9点左右，人们就赶回家去，游宴娱乐场所挥金如土的豪客已经稀少，百余年来奢侈糜烂的海派风气告别十里洋场。一般家庭也养成节俭习惯，新式汽车、高级收音机乏人问津，经营高级时装鞋包的商店生意惨淡不堪，进口的西装料商店尽管店主把它们搬到马路上陈列，但还是无人感兴趣，因为吃的问题太重要了，来日方长，不知如何过活。最为抢手的货物是粮食、燃料、食品。日用品方面，绳索行情看好，因为军事上修筑工事需要绳索，应变和逃难的人需要绳索，这东西虽不能吃，却成了投机商看好的物件。电影方面空前不景气，卖座率极低，国产制片商多已停工。

人心思动，局面不安。江南著名的旅游胜地、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等城市，旅游业兴旺不再。往年初春，京沪线上，人们就已像浪潮一样向苏州涌来，奇装异服、柳腰绛唇的海派女士几乎使古老的苏州掀起“革命”一般的疯狂和刺激，流线型的汽车行驶在仅有的几条大街上，仿佛他们就是苏州的主人。著名特产商店、饭馆都把这个季节作为一年中生意的黄金时间。1949年的情形与往年大相径庭，风格特别的海派女士很少出现在街头，商店饭馆门前的汽车阵也失去了以往的雄姿，偶尔有些人车作点缀，反增添了商店、饭馆的冷清。倒是乡下一般富农老妇女，南来北往上香，经过苏州，免不了到玄妙观等处闲逛一番。

1948年底开始，天堂杭州已没有往日喧闹，她冷落了顾客，顾客也冷落了她。平

时大家依恋不舍的西子湖格外冷清，你抢我夺的游船现在停在码头上，无人过问；名胜区的尼庵寺院，往日游人如云，现在游人稀少，和尚尼姑无经可念，无客可迎，柴米油盐等日用品让他们比以往更加操心。饭店茶馆中午营业很短，吃饭得赶早。许多大商店都是空空如也，店员或坐在店里聊天，或干脆关门大吉。黑市依然猖獗，沪杭线上的游客几乎绝迹，来往的都是单帮客，活着的人无肉、无米，死的人无棺材，买一具棺材得付出平时数倍的价钱，还得有门路。1949年，来杭游春的人还不少，但已不是以往加挂的豪华专车，而是三四等车厢。西湖的上等宾馆已不拥挤，三四等的旅馆倒很热闹。京、沪一带的中下层商人在"袁大头"紧俏的年头，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来杭州大手大脚花钱，不得不计算自己的行囊。公务员、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根本没有能力到杭州来。靠春汛做生意生活的人叫苦不迭，他们埋怨时局不靖，否则巨商大贾必然齐来，也可稍微松一口气。随着首都各机关的疏散，军队的不断过境与驻扎，营地不够，民房多被征用。物价波动、市面萧条，使素来恬静逸适的天堂人民心情沉重。小轿车突然增多了，而且是最漂亮的流线型的，卡车、吉普车一律增加。凡是"00"号的汽车，交通警察都得另眼相看，因为车主们往往将首都作杭州，横冲直撞，不守规则。大旅社住着带"京气"的豪客们，一掷万金的大有人在；受着命令疏散的人，踯躅街头，可怜兮兮，提携妻儿老小，前途茫茫，不知何时为止。大批过路人拥塞在杭州，卫生状况极差，随地便溺，臭气四溢，都已是司空见惯。

华中的武汉，人们谈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和"、"战"、"退"上。不过，从1948年底到1949年元月，武汉已经20多天没有收到南京的报纸，国民党当局停运了京沪新闻报纸，小道消息盛传，市民行情不清，银元贩子兴风作浪。"银元该死"、"银元恶棍该杀"，是汉口人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因为汉口银元价值一向与物价扣得最紧，银元在商场上起领导作用。时至1949年年初，"金元"未亡，人心已死，银元在汉口乃至华中地区各埠市场的作用独领风骚，一切物价都要跟着它走。尤其在汉口，万恶"银"为首，每个人对银元都恨之人骨，却又离不开它。中央银行没有把金银拿出来，供人民兑换，反而将银元运到广州，引起市面恐慌，如1949年1月12日，在各界舆论的一致谴责下，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不得不下令将已运广州的银元如数运回。

为了维持社会治安，抑制抢米风潮，一些地方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带头抢米者，这些人饿着肚子被枪杀，真的成了"饿死鬼"。搞得最认真的要数武汉市。2月2日，武汉警备部司令陈明仁呈准华中当局颁布紧急处理办法4项：聚众抢劫财物者杀；散布谣言扰乱治安者杀；为首纠众暴动者杀；故意造成黑市，扰乱币制者杀。出动大批警员开始行动，将故意危言耸听、聚众抢米的首犯枪决，帮助犯陪绑刑场，以示惩戒。另有制造金银黑市的银钱贩子多人也处以极刑，一时"观者如堵，人心大快"。经过整治，银元黑市已由1400元降到600元。

1949年三四月份，在不少人眼里，武汉已成了一座"死城"。汉口以前为华中工商业的中心，1949年渐渐成为死城。抗战时期，受日本占领军的摧残，美国飞机的轰炸，继而受通货膨胀的打击，又因外船的停驶，内战的进行，致使130万居民的城市，市面日渐萧条。经日本军队的破坏，汉阳钢厂已不复存在，现存的所谓工业，只有纱厂4

家。抗战后期，前德租界、日租界几成平地，前英租界也大受损毁，再因禁止外船驶到这里，汉口的航运业比30年代减少3/4。在人民解放军攻势的威胁下，江上更为清寂，因为中国航业公司宁愿将船停泊上海，而不愿驶到上游，以免为政府军征用，出也不去，进也不来。战前汉口共有外侨2000多人，1949年3月只剩50人左右。还有棉油、烟草、农业产品的洋行数家，维持小写字间，而大部分皆已停闭，由代表看管行中产业，以待国共和谈告成，他们仍希望汉口在中国复兴事业中占一席地位。汉口江边已成荒凉之道，道旁矗立着巨大的废弃建筑，被焚的仓库及银行的残骸日渐倒圮，无人想到加以修理。向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如今竟成死城，令人不胜感慨。

人民解放军即将过江前夕，武汉这座处于“烽火边缘”的城市，人民生活的沉闷淡化了对战争的恐惧。对于危机的现实，并没有多少人把它看成是暴风雨前夜，尽管有人麻痹，有人敏感，但大多数人的心情是平静的，只有华贵自私的人和一部分憧憬安全的人才忙着搭船乘机，拥挤在机场、码头。大多市民和公教人员都在说：“走什么？走到哪里去？”市场无论纱市、布市还是米市都非常冷落，除了升斤尺寸的交易外，已经没有大量的购销。只有中共地下党散发的大量传单和警告使得当局紧张万分，军警、部队调动频繁，增加了一丝战祸降临的征兆，而家家客满的歌台戏院、乐声铿锵的地下舞厅，则给城市带来了和平安祥的气息。

江西的九江，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已成为死角上的一个衰落市场。这里大约两年以前，往来如织的过路客拥挤的情形在市面上很难再见到，行走在街头巷尾的人们面带愁容，不知今后如何过日子。以往有10万人口，而今不过剩下半数。市区的商店据不完全统计，总数不到2000户。抗战前，浙赣铁路未通，这里是江西物资吐纳的重镇，运输业尤其是转运业为九江市场的一个大行业，九江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抗战后乃至1948年，虽然不能和往昔相比，但仍能保持市场的繁荣。1949年，这里的大行业如瓷器、粮食等外销市场正整个在走下坡路。特别是在淮海战役后，安庆战起，九江被逼上了死角。抗战前九江的瓷业有100多户，集中在滨江路与大中路的热闹市场。抗战后复员时，还有90多家瓷商，由于东去船只的停靠，以及东南市场的畅销，瓷商终日心情愉快。除了经营门市生意外，还经营京沪汉穗销售直至外销。到1949年一落千丈，90多家瓷商因生意冷落而倒闭的不止半数。航运方面，只有九江里还分行着长江与内河两帮和招商、三北的外帮船只，属于长江航运公会，由于战火的迫近，东下西上经过这里的船只寥寥无几。…

长沙市面，物价依旧狂涨，街头乞丐众多，数量多时达10万以上，多为他省难民，尽是妇孺。只有西南的成都，暂时离炮火区尚远，市民一时还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但各物趋涨、市场多已停业，市面生活日益困难。

1948～1949年上半年，长江中下游的城市，作为国民党的大本营，创巨痛深，经济接近瘫痪，工业、商业、航运、旅游等，像经过寒临霜打，蔫然不振。普通民众在生活的压迫下，对于由远而近的隆隆炮声，已不如当初那样恐惧，多数普通民众已由长期痛苦到精神麻木，一切都看开了，什么都不怕了，因此也不想再逃。因为对于没钱没权的人们来说，既然逃到哪里都是一样，还不如不逃，先过几天安稳日子再说。相反，人民

解放军越接近，市民竟越显安详，这已成了大多市民的普遍心态。国民党政府控制之时，社会秩序安定不足，混乱有余，国民党当局和军警撤离后，不少城市的社会秩序反倒处变不乱。1949年四五月以后，国民党长江中下游诸城不守，经济基地萎缩，政治中心被迫南移，预示着它的末日来临已为时不远。

第三节 战略后方?

1949年四五月份以后，东南沿海及西南沿边的一些城市，成了国民党的战略后方，南迁人群蜂拥而至，无数的官民，在炮火的威逼下，纷纷涌向后方，要在这里找到避难地。移民的增多，冲击了城市原来的运行节奏；物价的飞涨，限制了人们的物质消费；战争的黑云压抑着人们的心情。这些城市外部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内部人口结构重组和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一些平时的不太繁荣的城市，一夜之间显得“繁荣”起来；市民的焦急、漠然、兴奋、冷淡等各种心态，都在短时间内流露出来。福州、广州、汕头、桂林等是这些城市的代表。

沿海的城市中，福州算是最落后的。1949年初，南京、上海一片忙乱疏散时，这里反倒成了一块安乐的土地。此间物价较低，虽是严冬季节，只要不是雨天，气候也和暖如春。可是，自从疏散的人群拥向福州后，城市面貌骤然变化。这个不起眼的城市，比起上海的文明程度有好大一段距离，可是在京沪紧急疏散中，却一下子热闹起来。到了除夕前夜，这里可用的房子，由城市到近郊，已被南下的各色人等占用无遗。一种凌乱不安的情绪布满在每一个流徙人员的心头。房荒变得更为严重，租房非常不易，买房子也很困难，一幢木头房，要卖金条20根。因为电力不足，没有自来水，也谈不上卫生设备，比较像样一点的房子少得可怜，但巨公小民，只要在福州有亲友的，多半都来了。疏散中的福州机场顿时活跃起来，原有机场大肆扩修，影响到附近的水田，乡民大起恐慌。田地被征的乡民，厌世自缢或精神失常的大有人在。当地人一向保守，城市乡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异客，平添了许多忧虑。1月下旬，福州的人口净添4万，原住人口30万，几乎增加了1/7。新来的这些人多为国民党军警、官宦及其家属，拥挤在这里，等候飞、渡去台。他们多为非生产者，消费能力超过一般本地人。物价在近半个月中，扶摇直上，如米价1月16日为3000元，10天内升了12倍，超过了上海、南京，市民相顾失色。受南来游资冲击，市内抢购风盛行。

福州人古朴而守旧，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并不多见，现在情形略有改观，连穿西裤的女人都比过去穿西装的男人多；由京沪带来的衣服鲜亮颜色，使城市也显得时髦起来，形成了畸形的繁荣与纷乱。消费人员的增多，使酒馆的生意兴隆，人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你走不走?”进入四五月份，这里备战的空气越来越浓，军人、炮车急剧增多。福州本地人关心的不是未来命运，而是来自目前不断威胁他们生活的疯狂物价。由于福州在贸易上是一个人超的城市，没有大工厂，劳动力低廉，大部分人外出打工，留

在福州的眷属只能靠外面汇回的款子生活。所以福州物价虽然比京沪低，但人们的生活却很苦。福建是一个缺粮的省份，战前需要洋米，战时靠积谷和赣米度过一些日子，但赣米要以闽盐来交换，战后闽盐在江西已不如从前吃香，于是福建的粮食供应深受影响，转眼青黄不接，人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人口的大量南移，给华南之都广州带来的变化相当惊人。与内地其他城市一样，1948年九十月间，抢购风起，买肉挤死人的事时有发生，马路上饿尸不断，人们经常看到抬着盛尸的棺材从市面走过。年底，由武汉南下的列车乘客大多扶老携幼，搬箱带笼，类似于抗战初期逃难的情形。有的由衡阳转入桂柳，有的从韶关、株洲、耒阳下车，他们多是从徐州、京沪一带转道而来的。广州的住房和粮食问题都受到迁入人口增多的影响。据广州工务局统计，1948年最后两三个月，申请建筑新屋和修建房屋的人特多，平均每月达千件以上。下半年报请修建房屋工程比上半年多两倍。外来人口的增多，使旅馆业特别兴盛，一些旅店为了多收留旅客，纷纷把特大房间改建为小房间。吃住问题日趋严重。

与内地城市市民不同，广州人一向对时局政治缺乏兴趣，不太爱看报纸，认为新闻上所登无非是战场上打打杀杀，政客的进进出出；至于物价，只有报上所登的“官定物价”。到1948年11月份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市民一改常态，突然关心起报纸，过问起政治。而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和谈、物价。贴报栏前，卖报摊边，都挤满了人。人们见了新闻记者，就问：“和得成吗?”人人心中都存有“和”的期望。其实，对于当时的和局，许多明眼人心里都有数。有人说了个下棋笑话：“第一局他赢了我，第二局我没赢他，到第三局我叫他和，他又不愿和。”世事如棋，谁都明白。除此以外，就是涨价、加税和公私机关裁员的消息，普通公务员、银行低级职员每月薪水连一担米都买不起，大多数人坐在办公室，无精打采。人们为生计所迫，前途渺茫，才不得不关心起报纸来。

1949年1月以后的两三个月，广州大非昔比。时局动荡，政府南迁声中，这里冠盖云集，各地公务员和疏散来的“难民”使这个都市的人口突然增多，大多数难民又都把这里作为最后的安全地——事实上，大陆上也只剩下这块地方可作为大批流民的栖息所。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心理反倒单纯起来，该吃的吃，该住的住，该玩的玩，而不管市政最后由谁来接管。于是几条热闹的马路老是挤得水泄不通。晚上，各商店的霓虹灯，争奇斗妍，招揽顾客，此番繁盛，为夜市萧条的上海望尘莫及。这里没有宵禁，城市不夜，因为人口剧增，市面突然繁荣，原有的发电量更加供不应求。然而，晚上却还是灯火辉煌，茶楼酒肆，戏院歌座，无不利市三倍，浓妆艳抹的女伺，笑脸相迎。街道上，任由“03”、“04”的阔佬们在满铺沙尘的柏油马路上风驰电掣，再加上广州的“06”，还不算少的汽车点缀着这都市的繁华面。这里没有电车，只有一些破旧不堪、设计简陋的“长途车”，因为车少人多，乘客像沙丁鱼般拼命地挤。车票分全票和军警票。事实上，军警们老实不客气，坐的是“霸王车”，一般市民却买的军警票，只有少数小姐太太们既不能为“军警”，也不似“公教”，只好破钞买全票。不过乘车的人买票也好，不买票也好，只要昂昂头，抿抿嘴，售票员的就不敢多问。售票员一旦对不买票且

穿制服的乘客叽咕几声，触怒了他们的肝火，于是破口大骂："他妈的，打了几年仗，流血流汗，落得家散人亡，只身一个，只知有国，不知有家，却连坐车也遭人白眼，是国家穷，不是我们不肯买票啊！"

南方的大港、广州的吐纳地——黄埔，战后更显出其重要。以前的船只可以直驶市区，经年的战乱，珠江水浅了，外洋的旅客和货物，只能在黄埔下卸，再以驳艇和货船驶入市区。这里是国民革命军的摇篮，北伐的发源地，黄埔军官学校矗立着，虽然它的精神永存不朽，它的躯壳——校址却破旧不堪。南迁声中，这泥泞的小集，又熙熙攘攘，别有一番天地。随着孙科率行政院的迁穗，广州市民的心情格外沉重。会不会和谈失败？会不会府院分裂？于是金元券贬值再贬值，物价上涨再上涨，造成空前的波动和混乱，压得老百姓喘息困难。这里靠近香港，港币得宠，金铺和卖"香烟"的摊贩如过江之鲫，专营公开而又为当局禁止的外币买卖。一切物价都改用基数制。所谓基数，就是变相的港币底数，而跟着黑市喊价加上倍数兑拆金券。与上海半月一次的生活指数相比，要机动得多，因此不再是一日数跳，而是时刻波动，连市政捐税也实行基数制。这里饭馆之多，花色新奇，令人垂涎，有南京、上海等地吃不到的异味，猫肉、蛇肉、狗肉等，因为地近港澳，洋货充斥，尤以闹市区的摊贩为多，糖果饼干，罐头食品，花花绿绿，五光十色，资本之大，是人们想象不到的。茶楼一日三市，总是人头济济，人人显得悠闲。三四月份以后，战争的火焰已经逼近长江流域，正当逃到南国的人们庆幸时自己有先见之明时，却不知道由于他们的涌人，也给自己的生计增加了负担，不得不面临严重的生计危机。没钱的人不用说，有钱人手里虽有"条子"，但这里的通货只认港币，兑换不了几元。而这时广州的物价可算是全国最高的，虽然日用必需或非必需品并不缺少，不过物价不断高涨。但这里的政治经济政策及有钱人的消费心理是不患涨而患无，所以在京沪市场最混乱的时候，广东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只是苦了那些身无分文的"外江人"。也许正因为广州市民的政治意念较为淡薄，比内地人更务实，在国共生死较量之际，他们更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所以等到和谈失败，10月14日第四野战军林彪的前锋部队进入广州，市区内除海珠桥被国民党军队破坏外，没有任何损失。国民党报纸除《中央日报》外，广州市各报仍然照常出版。市面非常平静，商店在48小时内即已开门，抢劫案很少，并未发生流血事件。

汕头城市不大，而在1949年，却以其特殊的风格在南国独树一帜。这里百业萧条，只有烟酒店的生意特显旺盛。低级公务员如需应酬，一月薪水恰买一包香烟。理发店的价格屡屡更改，从1949年1月到1949年5月，从五十、一百、一百五到二百，直至涨到五百元，不少人因突然涨价，等理好发后，身边带不足五百元，当场感到十分难堪，致使市民不得不为理发发愁。京沪各地高等难民拥到后，汕头淳朴的风气已受"海派"的影响而渐变为奢华，走私的洋货商店或摊头如雨后春笋，西装革履和着尼龙丝袜披皮大衣的红男绿女日渐增多。汕头虽没有营业性的舞厅，但联谊社和海关俱乐部每到周末必有舞会，朱门巨室也多有家庭舞会，衣香鬓影，一派灭亡前夕的狂欢。随着物价上涨，生活维艰，私娼也陡然增多，入夜，中山公园群莺乱飞，兜揽狎客，一夜销魂之值甚低，"人肉"的价钱在汕头比不上猪肉之贵。

广西桂林，人们似乎对和平的希望更高，气氛也比其他一些地方安详得多。自从蒋介石“元旦文告”发表后，和平的氛围弥漫在桂林街头，到处都可听到谈论和平的声音，寂静很久的城市顿时活跃起来。蒋介石宣布引退后，物价马上有所回落，人们相信和平一定会实现，物价也一定会下跌。人春以后，由于偏于西南，尽管北方烽火燎原，物价漫天叫涨，尽管湘桂黔铁路罢工、大学罢课不断，来桂林“寻春”的人仍然不少。可是，人们早盼晚盼的“和平”始终没有降临。倒是1949年4月22日，李代总统专机莅临，使这里又泛出新“陪都”的气象。但好梦不长，代总统及其随从在此稍事喘息后，惶惶而去，市民依然得过且过地活着，直到解放军人城。

远在西南的昆明，也没有躲过内地上涨之风的侵袭，1949年1月以来，物价暴涨不已，京沪一带的商人不断空运大量现钞来昆，抢购物资，迫使云南省政府决定2月16日起，暂时限制现钞人境，除央行发行局外，无论军政机构团体私人，一律不准运现钞来昆。旅客携带金元券，每人不得超过5万元，超额交央行保管，不准自由动用。有权、有钱者却往往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台湾的城市受大陆局势影响甚为激烈，从内地接踵而来的高等难民群，猛烈冲击着这孤悬的海岛。粮食恐慌，仍是笼罩人民心头的阴影。台湾粮食原来自给有余，因为内地如平京沪一带的人口大量疏散到台湾，造成消耗量激增；人口和消耗量的激增，刺激了粮食大户和粮商心理，即不愿出售粮食，影响了市面上粮食流通的数量；台币本身的贬值，造成粮荒严重。加上“八·一九”以来的经济形势，培养了人们的抢购心理，致使粮食价格从3月以来，远远高于上海。

台湾是蒋介石的最后一个据点，他早已派人来此经营谋划，到1949年，国民党要说有“后方”的话，这里才真正算得上事实上的“大后方”。不过，尽管这里远离战争前线，战乱与通胀的影响没有内地诸城市严重，但一时间也无法见到欣欣向荣的景象。台北城市卫生环境极差，垃圾沿街乱倒，因无下水道，马路两旁尽是明沟，污秽发臭，阵风吹过，沟臭卷来，行人多掩鼻而过，直喊倒霉。香蕉皮遍街可见，老翁踩着香蕉皮一跤滑倒、儿童拍手大笑的景致并不少见。

环境的恶劣并没有扰了豪客们摆阔的兴致，那些从内地来的富商官宦及其家属亲眷，从不放过在岛民面前夸示威风的机会。台湾光复时，汽车绝迹，日寇离开时，城市惨遭破坏。台湾省长官陈仪奉蒋介石之命莅台署事时，从上海运来一辆旧汽车，其他的司长们都没有汽车，后来搜寻得几辆破汽车，归司长及各职员公用，这些汽车甚至连挡风玻璃也粉碎了。到了1949年，从上海到台北“逃难”的豪客，拥有很多新型的汽车，号码以数字越小越名贵，多争以“03”、“04”为号。而上海的阔太太们，还能自己开车，使省人艳羡不已。

1949年东南沿海和西南沿边的城市，既不像东北、华北前线城市市民终日在炮火枪丛中，有性命之忧，也不像长江沿线城市，在国共争夺的锋面上，去留不定。他们在南国的晚风中，由北而来的隆隆炮声，来得晚，也来得快，使他们所受终日提心吊胆的折磨远比北方同胞短。加之较重的功利务实心理，使他们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能够很快适应新形势。过往人口的频繁，带动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尤其是服务行业的兴盛，尽

管是畸形的，但足以使偏僻寂静的城市吸收了京沪一带开放的新鲜气息，成为它们日后繁荣及城市地位升格的原始动因。最后未能离开大陆的人，许多就滞留在这些城市，再没有迁徙，成了这些城市的新主人；离开大陆的人当中，许多家属亲友未能同往，没料到急速发展的政治军事局势，将他们一隔就是数十年。几十年后，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才为他们创造了亲友重聚的机会，这些城市中，不少自然成了著名侨乡，引发了新的投资热，成了它们再度繁荣的契机。

第四节　今非昔比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下的城市，经济仍复萧条，人民生活难以遽然改善，然而，市民精神上的欢娱弥补了物质上的暂时匮乏，聊以获得心理的慰藉。由于新被解放的城市，秩序大多迅速恢复正常，原先对共产党解放军抱有偏见的人，目睹了解放军秋毫无犯的纪律后，彻底解除了戒备心理。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普通市民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乐趣。感到共产党解放军并不像国民党报纸宣传的那么可怕，解放军对老百姓非常友好，军民之间相处融洽，到处是一派祥和气象。如解放军进天津时，保管工厂、仓库原封不动，丝毫不乱，马不进街，人不乱逛，缴获大小零整货物如数上交，不打埋伏，对居民秋毫无犯，币制未定之际不购买东西，只吃干粮，群众送饭婉言谢绝，人民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未见的好部队。1月31日，刚解放的北平路上，民众自由通行，城门也已开放；镇市买卖热闹，大学极为安静。2月4日，共产党正式接管北平市政府。第二天，共产党就宣布金元券与人民币的兑换率为10：1，对于教员、工人、学生及平民，可照三对一的比例兑换，以金元券500元为限，由人民银行及指定商店69家办理收兑，金元券于2月22日禁止流通。尽管直到共产党接管北平之日，北平的商情还是混乱，物价继续上涨，但是交通迅速恢复正常。2月5日，就有3列火车开往天津，天津方面也有3列开往北平，北平到附近各镇的民营公共汽车也恢复正常行驶。市民正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

许多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市民，并没有因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反面宣传，在解放军到来时惊慌失措，相反，增加了他们的好奇心理。不少市民，在解放军没有来到时，就急于看看解放军到底是什么样子，即使炮声隆隆之中，也要走上街头看个究竟。如4月21日，解放军就要过江，南京居民并无慌乱之象。21日，下关江边就站满了民众，在江边一睹兵舰雄姿，车站及街头，秩序井然，没有拥挤慌张现象。好奇心十足的群众早晨就聚集到江边，观看江北的炮战，商业进行如常，若干商店因生意清淡而关门，电影院照常开映，街头丁当之声不绝于耳，黄牛依然活跃，市民却情绪正常，市面稳定，只有达官贵人才感到紧张恐惧。4月27日，解放军进入无锡时，群众对部队纪律印象很好，一切都是新鲜的，工人、学生很热情，各工厂、银行、学校都很完整，郊迎队伍达20余里。

解放军5月27日进入上海市区时，郊外的农民已有拆除国民党军队用以抵抗解放军的篱笆及竹蒺藜；市内的公共汽车纷纷西驶去接共产党的干部；郊区农民挑菜、柴入城赶早市，市内熙攘如常，人民团体宣传车四处活跃，到处张贴标语；《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均发表拥护共产党的消息。解放军刚进驻上海后，一队队满身泥水的战士在街上巡逻放哨，许许多多男女市民不时给解放军送茶水，“老上海”都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他们怕孙传芳的兵，怕日本的皇军，怕汤恩伯的蒋军，可是，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共产党和解放军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

共产党给人们最深的印象是诚恳和务实，面对困难，并不回避掩饰，而是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并争取人民谅解，争取人民最大程度的支持。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下，不少城市一解放，就很快恢复了往昔经济秩序。尽管久经战乱，兵燹痕迹犹深，但一种勃勃向上的气象正在形成。刚被解放的天津经济陷入瘫痪，一切工业完全停止，所有外商经营的商行及工厂完全停闭。有从天津出来外侨的甚至夸张说，天津已成了一座商业“鬼城”，并说共产党显然缺乏国外贸易、银行、市政管理及经营港口设备等基本原则的学识，照这样下去，天津将成为“村庄”；人民币票值也在跌落，最初定为人民币与美金的兑换率为1：80，但三星期后，2月份修改为1：320，而黑市票值已为1：650；失业问题很严重，许多工厂难以支撑。共产党军队首先以纪律严明赢得市民的好感，在共产党的努力下，3月开始，工业上，天津的纺织厂均已开工，附近郊区的棉田收成也不错，过去因战争关系，城乡阻隔，无法运输，现在原棉正源源不断地运进，可供6～8个月之用。纺建公司在天津7厂中，最新的设备已毁于战火，其余6厂及民营4厂均已复工，共产党对民营厂没有接收，让它们稳定运作。

对于市面的萧条，人民生计的困难，共产党能够认真对待，早做准备。平津物价的稳定，就大大得益于共产党的未雨绸缪。当林彪所部由东北入关时，就已着手为平津组织粮食的初步工作。单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冀南、冀鲁豫几地，即已筹粮两亿零八万斤，储备待用。天津解放后不到一周，四乡粮食就源源入市，一般物价已趋平稳。各地农民便在凛冽寒风中，赶车运粮进津。大清、子牙河上，农民破冰清道，畅通运输。市政府还派人赴郊县，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召集当地农民、小贩、行商等座谈，发动和组织他们疏运油肉新鲜蔬菜入津，市民可以自由购买。公营企业很快恢复，公私商号也陆续开业。天津的200万市民在欢庆声中，度过了第一个幸福安宁的春节。一位老工人说：“27年没这样热闹过了。过去是‘揪心’，现在是‘顺心’了！”大中学生与人民解放军举行联欢晚会，南开大学礼堂内，上演“兄妹开荒”，校职工剧艺社、南雁和南开新闻社等社团举行夜会，漫谈学习和生活。商人们感到生意比过去好做，一位公馆的掌柜说：“今年警察也不要节礼了，杂捐没有了，真是解放的新气象。”北平解放时，解放军已在附近准备了3000多万公斤的粮食，并准备了相当数量的食油与食盐，同时贮存了7万吨煤。北平一解放，老解放区人民动用一切运输工具，为北平运粮。粮价是一切商品价格的主要标准，粮价一稳定，其他商品价格也就跟着平稳了。日用必需品的供应极为充裕，自来水、电话、用电正常使用，电车恢复行使，解放前国民党军人和特务等

"无票乘客"已经绝迹，北平与附近的几大解放区恢复通邮通车。

城市物价稳定，货源充足，商号营业，工厂开工，工人上班，大大改善了职工待遇。人民的物质生活虽然还不十分富足，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大致可以满足。这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是无法想象的。江苏徐州市民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该市公营贸易公司准备了大量粮食、面、油盐等，零售给公营企业职工过年。兴业烟草公司女工马秋英回忆说："过去过年是富人过年，穷人过关，咱一家9口，光靠做工的工资过活，只能买点杂粮做个馒头过个年，今年可不同了，领到了年关奖励金，这下子可以买点白面过个快活年了。"在政府救济和扶持下进行生产的广大贫苦市民，因为生活有了保障，年关也纷置年货。市民徐明全买了两斤半猪肉，笑嘻嘻地说："活了50多年，才过到这个好年，往年只能买两块豆饼吃吃就过个年，到今年才是真正过着好年了。"

战时一度沉静的城乡交流、商贸活动在许多地方重新繁荣起来。农产品源源输入城市，促进工业品日用品销售到农村。位于南北交通咽喉的徐州，7月1日开始，继终止了12年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畅通以后，经济也随之恢复起来，旅馆业繁荣，街上行人渐渐增多，农副产品汇集转运频繁，园林向大众开放，茶社等活动中心器具齐全，价格便宜。西安5月2日解放，到7月份，据西安市贸易公司统计，已购进的麦子为85万斤，输出洋布不足1万疋；8月份购进的麦子增达10倍以上，输出洋布增达2万多疋。随着解放军的胜利推进，甘陕商业联系的恢复，陇海铁路的即将全线通车，城乡交流的加速恢复，鼓励了西安市商人门的经营兴趣，全市11000多个大小工厂商店，除解放前早已停业或外迁100多户外，全部开张营业。银行通汇业务随之活跃起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7月份的外汇为1.9亿元，8月激增到51亿元。浙江宁波市民解放前曾被疏散下乡或早出晚归，至1949年10月份，除在市区兴起了夜市外，乡区几个市镇顿时繁荣起来，各店顾客拥挤，摊贩生意更为兴盛。各地单帮客也直接赶到乡村。一到晚上，市区商店，顾客盈门。上海为了发展内地交通，把黄浦江及苏州河上的5000多艘民船和15000名民工组织起来，从事城乡运输。其中有3000多只肥料船，每天把城里的粪肥运到乡下，乡间的农夫便以农产品和他们交换，船工们动手洗净船舱，把蔬菜瓜果装运到城市，上海700万市民每天的蔬菜鲜果，有70%以上是这些民船运回的。

解放后，消费城市大多向生产性城市转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经济结构相应得到调整。这一切，又与共产党的政策和一贯坚持的工作作风分不开。解放初期，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壮大，不正当或奢侈品商业日趋衰落。一些大城市都克服偏差现象，纷纷掀起精简节约运动。如曾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各机关都动员起来，开展节约运动。同类性质的机关人员集中办公，裁减人员，压缩住房，减少秘书勤杂人员，节省水、电、灯、碳、杂物的消耗；办公楼大灯泡换成小灯泡，水龙头减少了或规定开水时间；机关人员自己挖井，用井水洗衣洗澡；邻近的单位合并食堂，减少人力物力消耗；公安局分局利用工余，开地种菜，减薪戒酒；工厂减员不减工；总工会筹备会封闭了除必须之外的40多个抽水马桶……上海市的领导也能以身作则，与民同甘共苦。上海解放之初，推行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排场。市政机关人

员用餐标准有三级：一级餐两菜一汤，二级餐一菜一汤，三级餐一菜无汤。市长陈毅仅用三级餐。

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些生产节约运动，在国人面前树立了榜样，不但形成了一股生产热潮，也促成了一种全新的消费趋向，重生产、轻消费的风尚迅速在社会上流行。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曾经是洋人、官僚、豪门等聚集的场所，解放后，那些供有权有钱人挥霍消费的场所门可罗雀，各种奢侈品无人问津，市民生活方式逐渐改变，整个城市呈健康质朴的发展趋势，高级消费品的商店不得不转变服务观念，调整服务对象。如英商惠罗公司，过去是奢侈品的大本营，全部物品中，奢侈品占 80%，解放后营业一落千丈，经劳资双方商谈，把顾客对象转向一般市民，实行产销合作，并把无人问津的古玩部取消了。南京路 4 大公司举行大减价，并以"摸彩赠奖"招徕顾客，但专售金银珠宝、高级钟表和化妆品等奢侈品部门仍无起色；全市最高贵的"培罗蒙"西服的营业一蹶不振，改售实用品；舞厅营业大不如昔，从业人员纷纷计划改业；上海最高级的宾馆国际饭店也趋向平民化。

民众开始接收新思想的灌输，善男信女们已不再也不敢迷信鬼神，依靠鬼神吃饭的一群人在新社会无法依靠老本行为生，道士打算改行，相命的准备回家种地，香烛、冥纸、鞭炮等行业都在考虑转业。如解放前名闻全市的"命相专家"真左笔，一向门庭若市，座上客常满，他的绝大多数顾客都是一些冒险家。由于解放后取缔投机，他的老主顾不再请教他了，他说："我这一行的饭吃满了，我自己也早知是不合潮流的，所以我的本领就不曾传授给我的儿子，现在我正在努力设法，准备转业。"城隍庙香火凋零，依附迷信存在的铺子老板都在摇头叹息，30 多家骨牌店大半改售实用品，得意楼和群玉楼上的闲客，已不能再"悠闲"下去了。

苏州街上，衣服比以往朴素多了，过去是千篇一律的轻软长衫，现在是千篇一律的短衫裤子；妇女们的奇装异服，也被打入冷宫；宫巷里的元大昌酒店，门可罗雀，茶馆也不像以前那样拥挤，各小吃店和酒菜馆里的叮叮当当铲锅声稀疏得可怜；大公园里，也没有穷奢极欲的豪客去吃大菜；夏夜的公园，多是普通市民、学生、教师在纳凉休息；各种单纯的消费性行业显得不如从前，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好吃闲食，大家对生产有了新的认识，知道应该怎样生产，怎样节约。如苏州市区，进入中秋以后，糖炒栗子、生炒白果生意难做，玄妙观的蟋蟀生意一天做不到几笔，影院很少上映新片，只有传统的越剧、滑稽、魔术、杂技等还在吸引观众。

杭州的工业，解放 6 个月后，即 1949 年 10 月份，仅就织布业而言，厂家数量、织布机台数、设备及产品、品质，均较解放前大有增加。解放前，属于杭州染织布厂公会的布厂，计 321 家，至 10 月份，已增至 397 家，织机由解放前的 2050 多台增至 2590 台，电力与人力机数比由解放前的 1：1，增至 7：3。布疋产量更是激增，8 月份全市每天可出 1220 疋，9 月份每天可出 1620 疋，10 月份 2030 疋。其他工业也有不同的进展。在政府领导下，6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先后成立了 26 个联合产销会的分会，在共同购买原料、共同推销成品、共同改进技术的原则下，向合作经济发展；政府则以纱易布，代为销售成品，解决了销路问题。商业方面，从某方面来说是衰落了，那就是奢侈、投

机、操纵或买办性质商品的销售。据当局8月份的调查，各业商店解放前后的调查统计：金银业57家减为全部停业，锡箔业从240家减为113家，银行业由23家减为12家，其他如投机发达的棉纱业、靠游客生存的饭店业、买办性质的煤油业等，都相对减少。增加行业如图书教育品业、面粉业、棉花业、五金业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无不逐渐增加。

内地的一些城市中小城市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安徽蚌埠市，楼堂馆所，不是缩小了范围，就是关门转业，专映黄金影片以供有闲阶级享乐的剧院，经过改组，黯然失色，不像从前富丽壮观，营业兴旺。因为人民解放军刻苦朴实，过去奢侈浮靡的风气，一变而为节约朴素的时尚，西装革履、奇饰巧扮的仕女已很少在大街上出现，街头巷尾走动的男男女女多为粗衣布服，化妆品很少有人再用。华昌街及公园巷成业里的300多家妓院，到8月份，只剩下100多户，妓女不是从良，就是改业，有的回到乡间从事生产。

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结构的重组，使饱经战争重创的中国，重新出现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贫穷，财富匮乏，但在共产党及解放军的言行的感召下，人民的精神面貌却一扫以往颓废萎靡之态。人们虽然对共产党今后道路并不全都明了，但至少从共产党勤奋朴素、处处为民表率、解放军秋毫无犯、军纪如山的事实方面，感觉到共产党、解放军值得信赖。对大多普通市民而言，政治大道理讲得再多，高调唱得再动听，也抵不上一次直接的所睹所闻来得真切。虽然那时共产党在经济生活中，也出现过违背经济规律和消费特点的做法，但人们还是能够理解，并给予支持，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共产党把民心迅速统一到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好转上准备了条件。1949年共产党接管的城市面貌可谓今非昔比。

第五节　艺人生活与市民娱乐

1949年，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们的娱乐生活大受影响，人们很难找到和平安宁环境中的那份悠闲感觉。在一切围绕政治、军事的大气候下，艺人的生活节奏和活动方式不能不随时调整，除了专心从事公开演出之外，更多精力要放到处理非艺术性事务尤其解决生计问题上。

国统区的大城市里，人们经常可以欣赏的题材主要是进口大片、《清官秘史》、传统戏曲等。那些与现实生活贴得太近的影片，总能引起当局过敏反应，动辄受到查禁。广播里播出的文艺节目充斥了靡靡之音，可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且涉及广告收人，当局一向慷慨，文化主管部门允许播出。可是。当局认为是带“政治倾向”的演艺作品，对不起！限制公演。如电影《乌鸦与麻雀》、广播里播出的黄宗英的小说《卖火柴的女儿》、快板《为京剧跑龙套》、《丽人行》电影剪辑等，都属于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对象。

为了防止“反动”文艺作品流传，影响国民思想，国民党军政当局对电台播出的文

艺作品不断加以干预。1949年4月23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文教委员会发布禁令，对上海市各电台播出话剧的剧本进行限制。正在的播出的《日出》、《雷雨》、《原野》等，被认为“反动色彩甚浓，如鼓动工潮、阶级斗争等均多穿插”，予以禁播。同时规定，今后各电台广播剧本的采用，应送该会审查核定后，才准播送。一家“自由电台”与昆仑影业公司合作，创办了一个“昆仑星期晚会”，每周六晚广播两小时，播放的内容有黄宗英的《卖火柴的女儿》、《为京剧跑龙套呼吁救济》、上官云珠播演的《丽人行》、讽刺金元券的诗歌等，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在充满靡靡之音的杂乱声中，如一股清泉，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局的干预下，不得不在播出一个月4次后停播。

传统艺人的生活方式基本由不得自己，受战火和戒严的影响，一些战争前沿城市的艺人，已无法像以往那样在公开场所演出，为了生存，他们只好打破常规，想法演出，挣钱维持生活。1948年底，北平围城多日，因宵禁所致，梨园界人士夜晚无法在戏场演夜场戏，收入锐减。居家无事，生活困窘，只好由梨园工会组成“共同班”，在白天演戏，借慰劳军人之机，卖点门票创收。1949年初，在被解放大军包围的天津，电台和戏园子都停了，仅有的几个娱乐场所如中国大戏院、文化会堂等的演出，也是由军方在主持，专为慰劳军人，并不向外售票，民众无法入场。各演剧院本身也有种种困难。艺人的生活大起恐慌，一些闻名平津的杂耍艺人不能进行固定演出，只好与小商贩一样摆起“地摊”，卖艺谋生。像天津的小蘑菇、赵佩茹、高德明、王长友、三蘑菇等名艺人，为了生计，就不得不降格“撂地”，说起相声来。在胜利桥摊贩市场的尽头，10位艺人摆开阵势，几条长凳是所有的道具，每天从下午1点钟起，他们轮流“登凳说法”，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竭其嬉笑怒骂之能事。因为天冷，观众不多，一个下午，每人也只能挣得五六斤棒子面钱。几年来，这些当红的艺人已经山穷水尽了，能拿得起、放得下、走到空地上摆场子的还算顶有办法，还有若干艺人已经改行做小买卖，没有办法的只好在家挨饿。

国民党当局在艺人生活维艰时，从不主动提供方便，而在需要他们充当当局的宣传工具时，却要艺人服从命令。如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宣传空军优势，掩盖战场败绩，“鼓舞士气”，要上海的女电影演员去徐州慰问空军。国民党“非常时期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潘公展出面主持，遭到演员的抵制。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内，无一人前来，潘决定由警备司令部出动50辆吉普车到各演员家“武装请客”。白杨、黄宗英、上官云珠等所有演员预先得到通知，躲藏起来，吉普车全都扑了空，结果请了一些舞女去徐州一趟了事。

兵荒马乱的年代，国统区民众的娱乐生活得不到保障。国共北方激战，南方的不少城市，都有从前线撤回并流散在都市的国民党大兵和伤兵，比起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更加空虚无聊，于是经常四处寻找刺激，打发日子。但囊中羞涩，无法掏钱享受，势必惹是生非，在各个城市飞扬跋扈，民众莫敢谁何。娱乐场所一旦有大兵拥人，等于瘟神降临，普通民众无辜遭殃者比比皆是。1949年2月5日，上海中正中路的共舞台就发生军人没钱看戏，为泄私愤，乱扔炸弹，炸死无辜观众的惨剧。夜戏即将开场，二三十名军人意图无票进场看戏，遭到剧场宪兵的劝阻，悻悻而去，不一会儿，他们招来百余名

士兵，涌向剧场。宪兵担心这帮人一旦进场，难以控制，赶紧关上铁门。一士兵竟将剧场当战场，掏出手榴弹扔向铁门，撞门弹落到人行道上，当场炸死5名青年。好端端前来看戏的观众瞬间成了炮灰。2月17日下午5点半钟，又有300多名伤兵分乘几辆大卡车开到中正路共舞台，其中200多名冲进院内，占据座位，另外100名驻足大门外，场内宪兵劝阻无效，通知宪兵队增援，又有纠察队赶到，劝说伤兵出去。伤兵仍置之不理，经久不散，情势严重。一部分伤兵偷偷回营地取来手榴弹，双方对天鸣枪。直到警备司令部长官派大批军警前来，将带头闹事的伤兵捆绑后就地枪决，并将9人带回司令部审问后，事态才告平息。当晚夜戏照常进行，但观众寥寥，10点便散场。华南广州看“霸王戏”的“有枪阶级”也不少，民众正常娱乐活动顷刻间可以化为血光之灾。汕头等中小城市的电影院，票价虽贵，由于人口的激增，每场各院均告客满，军人骚扰的现象固然不少，但不如上海、广州严重。

物价上涨，电影票也不例外，人们进戏院之前，都得掂一掂口袋，人们的娱乐热情在经济萧条中无形降低了。如上海电影的价格自元月1日起涨价，最低价为8元，最高价为35元，特别卖座的影片如正在上映的周璇主演主唱的《清宫秘史》、译制片《战地钟声》则卖到45元一张。当月16日，第二次上调，首轮西部电影票价又增加了一至两倍不等，原为15元最低票价，现涨到40元，原40元最高票价，现涨到100元。尽管是星期日，然由于票价太高，营业颇见清淡。金元券的身价不断下跌，电影院也渐渐容不下它存身，给手持金元券而想看电影的观众带来诸多不便。1949年4月下旬，贵阳各业走上用银元作基数的道路，各电影院将楼座每票5000金元券改为银元1角5分，池座3500元改为1角，按当日银元价格折合金元券收费。过去5000元一张票突然改为50000元一张，甚至70000多元一张，这对靠俸薪生活为主要观众的娱乐营业场所来说，当然是生意惨淡。为此造成了许多哭笑不得的事。一家电影院第二场放映的时间已过了一刻钟，只卖出7张票，多为军人和学生。如果为7人放映，电影院损失太大，于是婉言劝请等待下场再入座，7人就是不答应。院方同意以双倍的价格赔偿票额，观众仍不应允，最后经理出面道歉，说明困难，答应请他们到附近饭馆里大吃一顿，并加倍退票，才结束了这场由改收银元、导致电影院观众稀少引发的闹剧。

北方战事正酣，南方暂且安宁，民众还在寻求娱乐；战事影响了民众的精神生活，但不像北方处于战争前沿的城市，娱乐几近停止。如上海的娱乐生活就显得丰富多彩，足球、篮球联赛、音乐会等大型文体活动，直到解放前夕，一直没有停止过。电影院也总有外国大片和国产言情艳史的电影戏曲上映。尽管票价很高，但很少像北方平津等城市那样，娱乐场所被关闭的现象。只是娱乐时间受到限制。1月份上海实行戒严令后，全市商店除公共娱乐场所、饮食店、烟纸店、水果店及摊贩因情形特殊，准其延长营业时间至晚10点半外，其余均限于下午8时以前停止营业。尽管如此，一些娱乐场所及服务行业还是受到制约，警察局据旅馆业、浴室、老虎灶、出租汽车业及妓院等呈请，准予延长营业时间至晚10点半为止。一旦戒严时间缩短个把小时，娱乐场所老板总是奔走相告，喜上眉梢。

1949年，国统区民众生计难以维持，心情日显沉重，多数人在忙碌而迷惘中，打

发这漫长枯燥的日子。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点可供娱乐的因由，人们也会“充分利用”一下，以博得一时的轻松愉快。在一年一度的1949年西俗4月1日愚人节那一天，不少无聊之士就纷纷炮制愚人消息，刊于报上，以博世人同侪一笑。如梅兰芳到了台湾，吴稚晖拜访张学良，顾正秋晕倒于浴池等等，浅薄可笑，一看就知道是“愚人新闻”。还有假传某某结婚，亲友纷纷前往送礼拜贺，害得当事人极力否认。这些还不伤大雅。恶作剧闹过头了，如假告某人的亲属病重，害得人家心急伤心，有损道德。愚人节固然可以作为娱乐的藉口，但当时社会还有比这更愚不可及之事，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其实中国人正天天在过愚人节呢。”

1949年，在共产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依据新路线而改变，出现了新的文化娱乐趋向，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北平解放不久，苏联影片逐渐取代了美国影片，看报或听无线电的人，都已熟悉“反动”、“反民主”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名词。改造旧戏运动，也被当作政治教育、思想革新的一部分，迅速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开展起来。共产党接管北平后，文化接管委员会就提出暂时停演剧目55出。主要有：提倡神怪迷信的；提倡淫乱思想的；提倡民族失节及侵略思想的；歌颂奴隶道德的；表扬封建压迫的；极无聊和没有固定思想的。像《封神榜》、《红娘》、《四郎探母》、《九更天》、《游龙戏凤》等剧目都在被禁之列。在生产节约的号召下，许多地方反对迷信，废除多年相沿的神戏。如江苏丹徒高桥一带，以谢神的名义，每年都要请扬州班子表演“香火戏”，每次耗费十多担米，在政府的干预下，停止了这项活动，并把已收上来的米还给群众。

相对于先期解放的平津，南方的上海等地的娱乐生活相对要活泼开放一些。为了维护娱乐场所正常秩序，解放军申明纪律，严格禁止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兵看“霸王戏”的现象发生。接管南京之初，刘伯承发现个别人城部队与人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甚至不买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的情况后，即于5月，相继发布了军管会军字第一、第二号布告，严令禁止上述行为，宣布除对违法者进行惩处外，并给各部主管负责人相应处分。共产党接管上海文教工作中，文艺团体和游乐场所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上海本来是一个消费城市，有几十家戏院、电影院、书场、游乐场所，而这些单位在当时都是藏垢纳污的地方，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党内外都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禁一些戏，有的主张把美国人经营的电影院一律没收，还有人主张在游艺界抓几个明显的反动分子，“杀鸡给猴子看”。上海解放不久，陈毅就曾针对上海文化工作策略曾作过一次讲话，充分显示出将军的豪爽、实在和对文化内涵的深层理解。陈毅精辟地分析道：“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30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看，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估计真正做到符合工农兵的要求，需要10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那时候你再跟人家谈工农兵，人家就会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批评几句，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逐步地改，就不容易。”所以，在在整个接管过程中，上海没有禁过一出戏，更没有

禁过一本书。大家都很自觉，戏曲界由周信芳带头，订了一个“公约”：主动不演坏戏。对于美国电影，陈毅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这样，美国的旧影片继续放映到 1950 年六七月，直到抗美援朝前后，电影院从业人员激于反美热情，才相约主动停映。上海的政策，虽然考虑到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但更多的是尊重艺术规律以及文化娱乐对社会生活的正面影响。这与陈毅市长的个人性格和文化素养有很大关系。

在新政权下，如何改变演出方法，调整服务对象，谋求新出路，是摆在每一个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新旧交替、政治更新的新形势下，艺人的思想及演出风格不得不与时代合拍，否则，他们的生命力就要被削弱。北京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曲艺艺人顾荣甫参加了一个工厂的晚会，用旧时供人娱乐的玩意形式唱了一段牌子戏，中途就给工人强行要求停演，说他这种“玩意”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能对他们的生产有任何帮助。这件事在北京戏曲界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认为，新社会，再抱着过去的态度唱“玩意”是不行了。这种转变，基本是在政治运动作用下完成的。

为了提高演出人员的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北京市委文委会于 8 月和 12 月，开办了两界戏曲界讲习班，第一届数百人，第二届 1300 多人。上自戏曲名流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筱翠花等，下到民间艺人包括“撂地”艺人，甚至戏班账房先生和茶房，都参加了学习。欧阳予倩、田汉、洪深、杨绍轩、马少波、周信芳等，曾到会作过“艺人的道路”、“戏曲的前途”、“旧艺人怎样换脑筋”、“往日今朝大不相同”等讲座。数以万计的北京戏曲艺人（大致可归纳为京戏、平戏即蹦蹦戏和曲艺即新耍三部分）都逐渐从封建、迷信、无知、愚昧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知道了这么叫“阶级压迫和剥削”，了解到在旧社会里，艺人被人称为“倡优隶卒”，“王八、戏子、吹鼓手”等都是对他们的贱称，是阶级压迫的表现；“幼而失学”，不是戏文里说的“命该如此”，而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一些老艺人一生受尽磨难，对前途悲观失望，就把命运寄托在迷信鬼神上面，有的吃斋多年，有的身着道装，见人合十，学了社会发展史后，从“鼓里钻了出来”。一位 60 多岁的老艺人说：“什么神呀、佛呀，我给他磕了一辈子的头，一点问题没有给我解决，上了两个月的讲习班，我明白了几十年没有明白的事。今后，有那给神佛烧香上供的功夫，我还在公会里多给群众办点事情呢。”

艺人们纷纷自动否定过去有毒素的戏曲，京剧界以新的观点排演了《水泊梁山》、《新五人义》，同时着手改编《四郎探母》、《大名府》等。梅兰芳在参加新政协后，把《贵妃醉酒》和《宇宙锋》全都改过了，才重新演出，自己拿不定主意时，就虚心“等待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平剧比较容易接收新的东西，除保留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之外，又大胆吸收了《白毛女》一类新歌剧的腔调和风格，演出过《王秀鸾》、《白毛女》、《血泪仇》、《九件衣》、《九尾狐》等，北平的各平戏班几乎家家在演新的戏，马少波编的《九尾狐》最为叫座。曲艺界不会唱新词或怀疑新词的几乎没有了，有的新曲艺社不唱一段旧词。以“玩艺”著称的北京天桥的戏园子、茶社、撂地艺人也都能唱新词了。如有名的拉洋片艺人小金牙，就将旧时的那套“往里瞧来往里看，十七八岁的小妞在那边”换为“百万雄师下江南”。

绝对突出工农兵为主角的空气，使 1949 年的艺术界透进了新鲜空气，与人民积极

向上、国家百废待举的形势相适应，由此也开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向单一化、公式化转变的先河。如在旧戏改革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令老戏剧工作者感到为难，如在1949年12月1日，上海举行的京剧编导座谈会上，有人就提出，一味强调以工农兵为主角，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旧剧经改革后，把观众最感亲切的东西去掉了，因而观众不易接收；中国以前的历史都是为统治阶级说话的，很少有工农兵的记载；工农兵主角，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观众便不爱看，影响了舞台美。有人提出，京剧还是偏重于历史题材好，而且要与新史学家合作。

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京剧开始疏远历史题材。戏剧工作者与新史学家合作的剧目《海瑞罢官》竟引发一场政治斗争。1964年全国规模的现代戏热潮以及样板戏模式，风行于戏剧舞台，传统历史剧让出了整块舞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则标志历史剧归于沉寂，举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封、资修”的“黑货”皆被扫地出门。可是，几十年后，当人们再次观看《贵妃醉酒》、《宇宙锋》等传统戏时，发现它们仍是那样富有魅力，饱含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的神韵。真正的艺术有其永久的生命力，政治因素在某一时期可以影响和左右艺术走向，但艺术规律终究要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

第四章　憎与爱——农民的灾星与救星

第一节　诸灾缠身

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朝的兴替，还是政局治乱，农民都承受着超过一般社会成员所承受的社会负担，正如古代文人所吟诵的那样："天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年代，这份负担尤为沉重。1949年，伴随着国共政治斗争加剧与战争硝烟弥漫，农村处在四方难靖的发展空间，农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人们渴望和平安宁早日到来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

在决定国共命运的1948～1949年，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阶层是农民阶层。那时对国民党而言，最大的悲剧就是人民不再拥护蒋介石。蒋介石"民族英雄"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是专制政治的象征，而非人民意志的代表。对大多农民而言，蒋介石的形象就更差。国民党政府在内战期间，一直以保甲制度来控制农民，但由于经济的衰败，农民眼睁睁地看到有钱有势的人从他们身上掠取了一笔笔财富，自己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农民对它彻底失去了信任。

农民最需要的是土地，而共产党千方百计满足农民的这一需要求，并使其能够保持下去。他们一向的方法是，到达一个新区时，就把土地分给农民；离开这一地区时，又给农民一些武器，嘱咐他们："用你们的武装来保卫你们自己的土地吧！"这就形成了武装的农村，便于对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军队作殊死的斗争，这同时也就形成了武装的政治组织，不再受任何人的宰割。"八·一九"以后，由于限价政策的影响，农民因为农产品价格太低，宁愿把产品积压在家，也不愿低价卖给厂商。如以棉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南通，秋后的整个市场，直接或间接要靠农民出售棉花换来的钱将它活跃起来，可是1948年下半年的棉市却异常冷淡。1947年底，来南通收棉花的江南厂商有一二十家，可是1948年他们就裹足不前了，1947年中纺在这里收了十余万担棉花，1948年国棉南通联购处还收不到3万担，与上年相差悬殊。主要是因为限价期内，价格太低，棉农不愿脱手，所以几乎没有成交的。后来限价期开放后，又因时局不安，人心不定，棉商又不愿收进；等到1949年元月初，可以做棉花交易，天公又不作美，连日阴雨，交通不便，交易不多。收购厂商又多采用以纱易棉的交易方式，棉农难以获得现金。

金元券的贬值，农民对通货完全失去信任，于是，农民私自发明的不少流通方式在

一些地区流行开来。农民宁愿用自己发明的一种通货凭证，也不愿把金元券攒在手中。江南宁沪沿线地区的乡民中间，就流通着一种不能称为通货的通货——米票，它的信誉度在这些地区远远超过金元券。"八·一九"期间，食粮存量限制，农民就把多余的米存放到米行，以避稽查人员的耳目。米行给一张凭证，即在一张纸上（白纸、香烟纸背面、牙粉袋一类的废纸均有）写品名、数量及存户姓名等，盖上米行的印章，上面加上一句"按市结价、装货不凭"的字句，无形中似乎成为徒具虚名、不可兑换的支票。但不久以后，环境和现实的需要，米票在市场上脱颖而出，互相接收，备受宠爱。人们拿金元券去商店购物，店主往往有所限制，但拿米票，不管数量大小，店主总是笑逐颜开，与顾客做生意。农民即使卖上一头肥猪，若付以金元券，即面露难色，若付以米票，即使削价若干，也心甘情愿。农民将米储藏在家，怕人偷盗，也把米存到米行，一旦失窃，还可挂失，停止支付，而且携带方便，需要用钱时，随时按市价兑换，不受纸币贬值的影响。米票胜过银行的支票。

1949年，国统区农村和农民，除了与其他阶层一样，受到金元券贬值的折腾外，还要承受着其他多方面的压力：大土地所有制的压力，战争带来的军事征用重赋及兵役的压力，家毁人亡的压力，自然灾害的压力，地方土匪、散兵游勇骚扰的压力……随着国共大决战的全面展开，这些都一股脑地往农民身上倾泻。农村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民的命根子牢牢地控制在地主军阀手里，没有土地的农民，等于失去了生活的依托，只得听凭大土地所有者宰割。如素来肥沃的川西平原上的农村，经济已整个破产，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在地主的压榨下，挣扎在死亡的边沿，到处闹米荒、匪乱，农民迫于生计而自杀、游离，阴霾密布的农村暗无天日。大量的耕地加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据统计，1949年前后，川西地区90%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其中半数以上掌握于军阀，其次为官僚、土劣、豪绅。因为川西地区水利修明，岁无荒歉，军阀官僚把这些土地作为最稳固的投资对象，他们以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财富及几次发的"国难财"、"胜利财"甚至"内战财"来收购大量土地，作为子孙的"万世基业"。加上战乱不息，民不聊生，农村高利贷便成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剥削农民、逼卖土地的最可靠的手段。许多人失去了土地，从小地主或自耕农的地位，降为半自耕农或佃农，佃农增加，竞佃愈烈，于是地租日益苛重。佃农常得不偿失，难以活口，游离、自杀等人间悲剧便司空见惯。

那年头，天灾似乎总是缠着农民不放。有时眼看到手的收成，会在一夜之间被毁灭殆尽。如察哈尔省1948年入秋以后，田间很少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的现象。可是，就在农民好景当前的时候，灾难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下列几县受害严重：崇礼县，受灾田亩约在一千五六百亩以上；张垣市农田2/3被摧毁；涿鹿县歉收一半；康保县、宣化等地的农作物、葡萄等都受到严重损失。天灾远不止一处，其他各地入秋以后，单水灾就令人触目惊心。湖南遭灾40县，灾民800万，早稻淹没，秋收无望，滨湖的280万亩良田全部进水；福州降了豪雨，台风登陆，房屋倒塌5000幢，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广东暴雨加上台风，使台山、开平两县被淹，新会、恩平两县半淹，万余亩庄稼淹没；江西雨水连绵，堤坝倒塌，46县报灾，这是30年来所没有的；安徽安庆下

游围堤溃决，沿江13县被淹土地40万亩，灾民20多万；浙东慈豁、富阳、绍兴、萧山各县农作物被台风袭击，早稻、秋稻均受折损；边远的云南，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有两县变成泽国，20余县闹水灾，到处哀鸿遍地，哭声震天。长江以南，除桂黔高原外，无一幸免于水灾。水灾造成了农田淹没、稻谷无收，房屋倒塌，人民流离失所。1949年，自然灾害有增无减，造成的一切苦难几乎完全由农民承受。

天灾固然可怕，但农民尚可与之抗争，尽量减少损失，最可怕的还是人祸。人祸来势汹汹，往往令农民躲不了，挥不去，只好忍气吞声。国共交战，"国军"是无暇来保护农民的，政府司法机关的权威更是难以庇及乡下小民，乡民成了谁都可以挤捏的对象。任意敲诈勒索老百姓，是一些农村流氓土匪的家常便饭，只要他们高兴，随时都可以拿农民开涮。如东北锦县北边的大茂乡，既无国军驻防，乡民也无力购买枪支自卫，因而不断遭到土匪和游杂部队骚扰。一到秋收季节，土匪经常公开向农民勒索"护秋"钱，每块田地要交流通券150万元，声言如不交款，休想平平安安收割。平时要柴要米，贪得无厌，甚至还抢掠财物，绑架肉票，乡民苦不堪言。勒索的"护秋"钱乡民无法交纳，只好变卖家产，勉强凑钱交给他们。屯里如此，道上也不平安，行旅所携钱财物，常遭抢劫。人民畏如虎狼。

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虽无土匪流氓之名，但对农民的态度和手段有时与土匪流氓相差无几。乱加摊派，横征暴敛，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农民终日要为如何完征和满足兵老爷的诸般需索发愁。天津郊区的独流，军方限制粮食出境，外地粮价虽比本地高，但不运粮来，老百姓吃的问题就难以解决。而政府规定军粮、马料、田赋、捐税都要交粮食，农民倍感困难。有的农民打算将马料折交现款，但政府说得好："马是不吃钞票的。"上海郊区的奉贤县，人口仅24万人，但担负赋额之繁重令人难以想象：1949年第一期增兵配额609名，每名安家费白米20担，总数需要1200担；补征1948年"自卫特捐"2500担；驻境部队副食差额每月需米2000担，修建浦东大道需米3000担。仅此已使四五口的家庭喘息困难。一方面县府严逼催索，挪东补西，以应付上级的督缴，但其本身的全部人员办公费每月仅600多元。国民党军队由于军饷经常与农民发生冲突，引起农民的不满。如河南信阳的明港地区，全镇居民约2万人，盛产粮食、猪、豆油、高粱、酒等物品，民风淳朴。农历正月初二，该镇第五保马楼等地，因应付不了由北南下的泌阳地方团队，军民发生冲突，被烧毁了10个村庄，死亡乡民30多人。

摊派的浩繁，使农民疲于应付。农民靠土地为生，尽管生产力低下，但只要年景较好，尚可勉强维持生计。但是政府要打仗，开支增大，各种额外负担便无情地压到农民头上。需索太急，而产出迟缓，田里的产量总赶不上政府的各种开支，农民几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生活朝不保夕。虽然政府最高当局三令五申，严禁摊派苛捐杂税，可是地方乡镇，阳奉阴违，已是公开的秘密。什么巡查队食米、军服费、子弹费、训导费、学米、壮丁费、户籍费、供应米耗损、临时费等，都得由乡民负担。政府对农民的各种征集已到了无章可寻的地步，简直不把农民当人看。如兴城县，政府对人民的征集名目繁多，而且只征集实物，不收贬值迅速的现款。对于征集的物资，从来没有见过主办机关公布，负责征集的区保公所，对于全保该征多少，共收多少，欠多少，缴多少，是亏是

盈，谁应当征，谁应当免等等，都没有一样详细公布过。不能公布的理由是因为经费困难，人手不足，没有纸，也没人填写。老百姓只好抱"问也问不明白，明白了更伤心"的心理，让交就交。有些摊派即使明白了不该交，却也一分不能少。如某师购买骡马，也得由老百姓贴钱购买。当时每匹马市价都在流通券七八千万以上，而某师所出的价每匹才1500万—2000万上下，与实价相差甚大，这笔差价理所当然地由当地农民贴上，名为"骡马赔款"。作战任务较重省份如察哈尔省还要统一交纳"特种保护捐"，以确保国军保护他们"平安"。1948年，武清县秋荒严重，11月份，麦种尚未下地，农村一片荒凉，每亩所交的各项"租税"竟合玉米6斗。政府收不到粮食，就派军警进村抓人。1948年底，广东中山乡村就经常有军警将缴不起粮的农户拘捕。为了躲避军警，当地农民每天早晨3点左右，就吃罢早饭，外出避难，晚上再回家。一位姓梁的农民，天一亮，就带家人走避，将8岁和3岁的幼女留在家里，以为收粮的人不会为难小孩子。不料上午9时左右，两幼女看到大批军警闯进家中，惊慌失措，大女背起小女，夺门而逃。天雨路滑，失足跌入沟河，呼救无应，双双溺死。晚上梁某回来，痛哭不已。

农民除了应付财物征集外，还要应付兵役和劳役征召。如东北自抗战胜利以来，人民的负担逐渐加重，18岁到45岁的男子，被征为后备兵和民夫的在15万以上，名义虽说是"征"，其实往往是"抓"。3年过后，农村见不到耕种的壮丁，军粮、马料、车辆，一步步向农民征借，人民一面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一面要负担浩繁的财政负担。军民之间的鸿沟从胜利那一年开始，不断增大。

1949年元旦起，国防部颁布了征兵办法《"戡乱"时期征兵要则》并开始施行，保甲仍是农村征兵的主要单位和组织机构。大量的征兵，对原已困难重重的各省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各省纷纷呼吁，减少兵额，以疏民困。如国民党中央1948年在四川省征兵配额数为6万，1949年猛增至42万。四川省参议会作出决议，提出四川省已经民力枯竭，再大量征丁，广大农村将发生严重恐慌，后果不堪想象，请求按上年兵额征丁。由于拉丁捕丁的盛行，弄得农民普遍逃难，导致农村劳动力普遍缺乏。于是老头子、老太婆、小孩子、大姑娘都被赶到田里去工作了；学龄儿童为了劳动而失学；农作因劳力缺乏而耽误。江南一些地方，每次地方征兵，县太爷往往亲自下乡督征，召集乡保长会议，不许老百姓旁听，戒备森严。等到消息传开，乡民莫不谈"兵"色变。征兵的那天夜里，乡里的一些适龄壮丁合雇一只小船，暂时漂泊水上，轮流望风看守，稍有动静，就轻声摇橹，到别的港口避风头。一夜归来，大家默默庆幸没出事。县太爷仿佛杜甫笔下的"石豪吏"。

兵祸连接，城乡间的交流越来越受阻隔，农村的粮食难以进城，城市的粮食供应日益不济，即使靠近主要粮区的城市也有缺粮之虞。以江苏南通为例。南通靠近苏北里下河地区，里下河又是主要的产米区。战前，南通是苏北米粮的一个转运口，每年中秋前后，泰县、东台、姜堰、曲塘、海安一带的新谷登场时，从南通到如皋的运盐河上，便断续航起了运米南来的船帆，南通是从来不闹粮荒的，而且启东、海门、江南一带的粮米也有从这里转运出去的。可是抗战结束、政府复员以后，就没有再现过这样的场面，苏北的产米地区大多不安宁，交通不便，每年虽照常在那里产米，但再也没有那样多的

白米装运过来了。南通的大米大多依靠江南供应，因为苏北的米很难直接运来南通，大多先运到江南无锡一带，再打个转弯，运到南通。江南运来的米价又高，造成了南通的米价高得出奇，竟高出上海1/2。南通的工资指数又是照套上海生活指数，又不享受配给品，同样工资，购买力比上海低多了。工人一发工资就拿去买米买纱，商品一时销路特旺，市民生活日趋难过，工友为米粮而闹事的事件接连发生。

即使是身处鱼米之乡的农民，手头仅有的一些食米也被腾涨的物价和名目繁多的苛政掏空了，落到种米没米吃，要吃米，得高价买米的惨境。如江南农村1948年限价时，农民以粮换金。等到物价开放的时候，正当秋收以后，米价突然升高，许多米商拼命向农村以稍高的价格收购米粮，农民为这点优惠价格所诱惑，纷纷脱售，等到卖完以后，米价还是不断高涨，他们手里已经没有米了，懊悔不及。加之农村新摊派的款项太多，而且都以米作为标准，农民无奈之中，反以高价买进米粮来偿还这些“应派应摊”的款项。所以到1949年四五月份，江南农民手里根本没什么余粮。

在许多农村，农民因为手里没有足够的钱粮，平时度日已很艰难，逢至春荒，青黄不接，更是等米下锅，等种播地。要苟延残喘，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高利贷者。在物价飞涨的年代，有钱人多不愿意放债，更助长了高利贷者的气焰。条件之苛，利率之高，真是惊人。而且全以食物计算。农民明知这是剜肉补疮，但为了活命，也不得不自跳陷阱。

长期处于战争威胁的北方农村自不必说，未直接收到威胁的江南农村也在所难免。农村经济已日趋凋敝，农民终年辛劳，收获的米谷价格虽然不低，却远不及其他物品上涨的速度。加上主要田赋，年年有增无减；兵役负担，急如星火，所以那时江南农村家庭，十有八九，债台高筑。以前在青黄不接之时，还可以借助典当，暂时调剂生活日用，现在则因时代的变迁，典当在农村已告绝迹。农民只好求助于私人借贷。那时在农村，放贷月息达到3角，就为高利，当局一度严禁。债主畏惧法令，钱钞出人，均秘密进行。可是，不久以后，金元券迅速下跌，出贷者不但难取其利，所得还不足补偿货币贬值的损失，于是有钱的谁也不愿出借。但农村放贷又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脑筋一转，就以改借实物为主，这样，可既保本，又可得息，一举两得，称心如意。于是，求借者饮鸩止渴，出借者得寸进尺，利息名目有增无减。江南有一种最普遍放贷形式叫“粒半头”，就是说求贷者借一粒米，稻谷登场时，连本还米粒半，在当时的高利贷中，这还算最轻的一种。另外还有“粒六”、“粒七”等名目，等于借出1斗，就要收回6斗或7斗，全凭借贷方的关系而定。这些是以周年计算的。还有一种叫“月月打”，放贷者更是尽其盘剥之能事，如借米1担，期限随借者的意愿而定，但要按月还资金1斗。如果是因赌博求贷，利息更是高得吓人。逢年过节，赌风很盛的乡村，赌徒把以米下注，视为常事。输赌者想翻本，就得求之于借贷，不惜孤注一掷。靠放赌债收回利息叫“彩金”，按日计算，每担利息竟需斗米之多。

算盘精的债主还有所谓放“麦包子”的，即乡下的小麦还在青苗时代，乡民因急需钱用，而将它出卖给债主，不过价格往往低于市价的一半，这压低价格所得的利益间接成了债主所得的利息。放“米包子”与此类似，只是以米代麦而已。借贷的时间，前者

在正月以后，后者在小麦上市前后，短短的三几个月，需对本对利。尽管知道利息惊人，乡农们为了急用，口干喝盐卤，也顾不了许多。狠心的债主利用“麦包”、“米包”，获利甚丰，一年之间，实物竟有数倍之多。尽管高利贷盛行，因为时局动荡，币值难保，有钱的人家对放债还是相当谨慎，轻易不肯出借。穷苦农民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再厉害的高利贷也只有忍痛承受。

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相对平静之下掩盖着不平静。租佃关系十分紧张。地主占田数受到政府法令的制约，不准超过30亩，实际上，超过30亩的并不多。他们的收入也受到政府赋税政策、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渐渐感到窘迫。于是，经常与佃农在收成分配上斤斤计较，租佃关系紧张。如福建农村自保农社与农会成立后，佃农与地主之间常常在收获的季节发生纠纷，地主多为没落的富豪，占地多在10～30亩之间，每亩分收，必与佃农争得面红耳赤，极力不使佃农达到土地法令中所规定的数目。乡村的交易多半已用谷子做交换媒介，只有零星的交易才用点纸币，纸币反成了一种新的复本位制。想在村中买点农副产品很不容易；要向农民买一只2斤重的老母鸡，农民宁愿要20斤谷子，而不要金元券。1949年的台湾，表面上看，没有内地战乱不息的残破，没有内地哀鸿遍地的凄惨，物价波动的幅度也没有内地剧烈，几乎使人认为这是一块世外桃源。台湾同胞及久住这里的人民却没有这种感觉，农民的生活仍很艰苦。1949年初，台湾农户总数达323121户，其中所谓大户仅4401户，大户的收益最少的产粮11100公斤，虽有“天赋”、“公学粮”、“随赋”收购及四成余粮收购的负担，但每年两期收获，还有9418公斤的净余，生活当然绝无问题。但全省农户中，大户不过占1%强，大多非大户的耕农，其流血流汗所得微乎其微，用以应付五花八门的生活支出，艰难可想而知。

有人把以上国民党政府在农村制造的人祸概括为4条：第一，保甲制度的弊端。在乡间，乡保长成了太上皇，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要兵，通过他，他能随时随地抓人，打人；要粮，通过他，他能叫大户不必交，小户满天飞；保甲长是政府宰割老百姓的利刃。如江西丰城邓圩乡乡长是一个由流氓起家的人，在任10年，居然娇妻美妾，大兴土木修建乡公所别墅、公馆，十周年纪念由全乡摊派庆祝费用，邀宴士绅，最后派款修起纪念馆一座。资产已在千亿以上。第二，国民党军纪败坏。乡间除了水灾、虫灾以外，还有所谓兵灾。当兵的可以强占民房，强借家具，强征车马。民间一听到兵老爷就头疼，一见到兵老爷就畏缩。第三，征实、征兵频繁。被征的兵要么是没有钱而被捉来的，要么是和乡保长有仇而被捉的，要么是买的，因“买”而引起无穷无尽的摊派逼得农民叫苦连天。第四，政府是非不分。以上这些，都使农民发出种种疑问：国民党政府究竟是代表哪班人的利益？国民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在20多年内战中充当炮灰的是穷人，出粮出钱的是穷人，通货膨胀引起破产的也是穷人，富人却大收渔人之利，放实物高利贷、做官、拿造孽钱来竞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由此得出结论：“一把火快要点得着了！穷人活不了了！”

1948～1949年的国统区农民，在多重压力下生活着，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深。尽管这时农民的政治觉悟还没有提高到共产党革命所需要的程度，但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国民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落，大部分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想

“变”。1949年，国共双方都竭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广大西北、东北、华北地区，共产党农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远离解放区的农民，一开始就接收“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反动宣传，所以农民尤其是偏僻山区老林的农民对共产党的印象存在偏差。这就给活动在国统区农村的共产党力量带来相当麻烦，他们要在那里站稳脚跟，首先要扭转农民的印象，广泛争取农民的支持。农民比较讲究实惠，谁给他们的好处多，他们就支持谁，拥护谁，过多的理论宣传往往还不如一次实惠来得有效。如广东雷州的徐闻县，曾经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时，当地农民曾经支持过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革命力量撤出该地，国民党对当地实行“清剿”政策，革命者的亲属惨遭屠杀，逃难的群众无家可归，受害人民日夜盼望共产党的队伍打回来。国民党一边对革命力量进行迫害，一面进行反共宣传，大造共产党的谣，深山密林区的群众几乎与世隔绝，对这些反共宣传，误信共产党不是好人，对共产党队伍心存疑虑，为共产党在那里站稳脚跟增加了很多困难。另一方面，那里的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这就为共产党宣传、组织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共产党对症下药，人民反对国民党什么政策，共产党就废除什么政策；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这里那里不好，共产党就偏偏在这些方面做出惊人之举，打消群众疑虑。如人民长期饱受国民党征丁、征粮、征税之苦，怨声载道，难以为生。粤桂边区党委一个支队八团进入徐闻后，立即提出反“三征”口号，进行抗丁、抗粮、抗税，人民非常拥护。部队还冲进徐闻县城，打开监狱，放出全部“犯人”。徐闻县民长期忍饥挨饿，而徐闻县“父母官”陈桐的农场谷仓，不是为全县“子民”准备的，而是他个人的家产，存有大量稻谷，部队就破仓放粮，把陈桐存放多年的稻谷全部分给了附近村庄的农民，以实际行动戳穿了国民党的宣传；国民党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部队开进村庄时，挨家挨户帮助农民劳动，为群众做好事，开展正面宣传，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了群众的东西都要归还，损坏的照价赔偿，群众非常感动，说共产党的队伍都是穷苦人，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是到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粤桂地区共产党部队解放雷州半岛的重要保障，不仅切断了国民党残余部队的退路，同时也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海南创造了条件。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新解放区的农民，耳闻目睹共产党及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实际享受到共产党带来的实惠，思想很快转到共产党一边，成为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强大支柱。

第二节　不能兑现的农村改革

在国共决战阶段，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意识到，农民的生计好坏与政府的衰竭和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争取更多农民的支持，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1948年9月1日，立法院提出一项法案，宣布将要废除租佃制，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以此消除“造反的因素”，让“叛匪”无法制造混乱。还计划在靠近共产党根据地

的地方减轻农民负担 1/3，购买地主所有权，把土地分给农民，政府命令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全国土地国有的计划，消灭地主所有制，在其他地方也进行减租和其他土地改革计划。但引出一连串的批评，到 1948 年底，还没有拿出结论，改革大多流产。

一些农村基层官员在处理农村事务中，处处棘手，他们目睹人民的负担，体验到农民的苦楚，也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如 1949 年 2 月 26 日，苏南嘉定、吴江等 16 县参议员召开参联会，请政府停止征兵征粮。政府无止境的征兵征粮不但引起人民的不满，也使地方官员感到头疼，逐渐对政府的这一政策感到厌烦，以致发动请愿。1949 年 3 月初，苏南各县参议会正副议长集会，决定向政府提出 5 点请愿计划：停止征兵；禁止军法征粮；反对整编自卫武力；停止构筑防御工事；拒绝地方军事供应。省府呈请中央顺应民情，予以解决。

农民租税过重，严重影响着农民的生计，使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感到难以维持本辖区稳定。一些省份从 1949 年起，自动着手减轻农民负担。如宁夏省为了扶持农村复兴，从减轻田租及取缔高利贷入手，想在短期内普遍设立为农民谋福利的合作社，设立免费戒烟院，以使染有吸毒嗜好的人员获得新生，并在秋后进行全省耕地分配。为了使扶植农村的计划落实到位，宁夏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案。如制定《合作贷款法》，以期取缔农村高利贷。该省当局呼吁人民达到服役年限的都应参加各种工作，沾染不良习性或无业流民要立即改正，否则由县政府管押训诫。农民每人至少养牛或骡马一头，以加强耕作能力，该牲口不得作为财产转让或抵押。鼓励农民承包牧场，政府给予资助。公共荒地由政府组织公营农场，使用机器等耕种。希望通过合理运用资金，使农民致力耕作，复兴农业。计划实现平均土地，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倡导勤俭劳动，消除贫富不均。为此，省府训练了一批工作人员，组成了扶农工作队，分别到各县去做土地、人口、劳力、农村经济现况的调查统计工作；各县、乡也组织了扶植农村工作委员会，以使扶农方案付诸实施。

地方政府也在土地改革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企图缓解农村矛盾，使农村适应“戡乱”需要。1949 年 1 月，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为配合“戡乱”军事进展，免除土地纠纷，安定社会秩序起见，特制定了《收复区农地紧急处理办法》，规定县、市境一经收复，当地政府即分别成立县、市各乡镇地权调处委员会，调处土地纠纷；收复区内的农地，其所有权为自耕农者，准予收回自耕，如农作物尚未收获时，所有权人对现耕种人用于农作物的生产费应予补偿；收复区内的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者，在未依法处理前，准收回其原有所有权，仍由现耕农民继续耕作；在“变乱”期间，农民欠交之租佃，一概免予追缴。1949 年 3 月，华中的限田政策已进入实施阶段，湖北省府遵照“剿总”指示，拟定具体办法，规定每户田产超过上等田 50 亩、中等田 75 亩或下等田 100 亩的，各县市政府应就地公告，并限期于 1 个月内，将自愿保留农地上报乡公所，逾期不报，或匿名规避的，即分别予以没收或惩处。如照这种速度，湖北大地主应于 1949 年 4 月以前绝迹。

浙江省于 1949 年年初，制定了土地改革的 10 年计划，规定了土地最高所有额，5 口以下之家 5 亩，5 口以上之家 50 亩，僧道老弱孤寡准留非自耕 5 亩，宗祠 50 亩，超

额的分给佃农、半自耕农夫，10年间，本省250万佃农、半自耕农，得在当时的2000亩的自耕土地上，取得自耕权；无主土地满3个月未向地政机关登记的，一律由所在乡镇公所执行代理。计划由省府组织土地改革工作大队，各县则组织分队，积极推行土改。杭州市府还拟订具体办法，先调查佃农雇农，指导申请领耕农地，并准备预交两成地价的实物，由市府发行粮食债券收购，领地农民分年以农业实物偿还其余8成。

陕西省土地改革决定1949年开始，有关土地法令年初已全部完成。

江西参照广西、浙江推行土地改革，制定出1949年的改革计划：(1)限制私有耕地：规定每户10口之家私有耕地，不得超过上等水田50亩，或中等70亩，或下等100亩，旱地比照加倍，超过此限额的耕地，限于6个月内出卖，逾期不卖的，由县、市政府征收，配售给原佃农或自耕农。出卖的地价照原租额的7成，从1950年起，分14年以实物交付，荒地、无主耕地除由原耕作农民承买外，应由现役军人家属优先承买，这就是耕者有其田和战时售田两大政策的中心。政府直接配售给自耕农的土地，地价按原额的5倍，分10年偿付。(2)扶植自耕农：征收放领私有地；禁止自耕农非法承买耕地；办理自耕农贷款；创设自耕农场。(3)保护佃农：登记租约；限制地租；保障佃权，业主取回自耕时，应于1年前通知佃农，佃农自请退耕时，应于3个月前通知业主。(4)健全农民组织：各级农会应于两个月内完成组织，协助办理土改；绝对禁止非自耕农参加农会为会员，以防止土豪劣绅的混入，违背此项规定，负责指导的政府负责人应受严重处分。对于江西的“土改方案”，方天逸主席下了最大决心予以实施，并准备以对敌作战的精神，对推行政策中土豪劣绅的阻碍进行清除，以保证完成。决定土地改革运动从4月1日起实行。省府为求扩大效果，通知鄱阳等54县、乡镇公所迅速设立地籍整理处，限定12月31日以前完成总归户工作。

1949年，国统区尽管“限田减租”成了一致呼声，大有临阵磨枪声势，但步伐及成效在各个地区不平衡，有的地区有了一定起色。可惜，国民党政府下不了彻底废除大土地所有制的决心，农村大土地所有者也积习已久，对政府的法令阳奉阴违，百般抵制。加之政府缺乏统一计划，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操作混乱。致使土地法令在一些地区徒具虚文。像广西一带，至南京解放后，还未见行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仍很普遍，年租八九千担的富豪在有的县随处可见。由于土地丈量不善，造成“田”与“赋”脱节，不知有多少田，应交多少赋。地主富绅操纵地方势力，政府推行限田，它们就尽量分户分占，化整为零，以图规避。佃农太多，争相领种，减租难以进行，有的地方把土改文告张贴了事。主佃关系和谐的地区，地主即使出售超额田亩，佃农或因贫苦引颈观望，或因田主抬价无人购买。地方推行不力，土地丈量、户籍、地籍统计差错百出，限田无法进行。而且国民党政府本身就无意彻底废除大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自然有头无尾。

为了复兴农业，安定农村，保证税收，供应国民党各种需要，国民党当局曾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竭力扶持农村的生产。如应晏阳初的申请，国民党政府曾与美国政府于1948年8月5日签订了《复兴中国农村协定》，由中方派3人，美方派2人，组成“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经费2750万美元。计划由实验人手，先在若干实验区创

立农业、家庭示范，推行卫生、教育、合作、增产、销售、灌溉等工作，有了成绩后再推广。建立相当的保健制度，推行乡村教育，完成若干经济区域的农村经济调查和社会调查，进行中美技术合作，农产品出口等。这是作为美援计划之一。根据这项计划，联合委员会曾在福建龙岩和浙江萧山、海宁、余杭及杭州等县、市农村实验过农耕改革，并取得一定效果。但这项计划因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未能延续下去，后来在国民党的台湾农村复兴中却起了重要作用。

1949 年国民党已意识到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可是，为时已晚，农村的元气已被消耗殆尽，处于饥饿死亡边缘的农民，已不再对现政府存有指望。中国农村不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就不能彻底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中国的农业。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第三节　全新感受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他把绝大多数农民吸引到自己身边，广泛获得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在老解放区的土改，使亿万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在新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打倒恶霸地主，搬掉了多少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农民扬眉吐气，做了自己的主人。

共产党、解放军在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是赢得农民信任、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国民党征兵征粮，往往靠抓、抢、逼，共产党则主要靠“阶级教育”以及实际行动的感化。征粮的方法是征借，工具是借用，要发给粮票。注意尊重农民的意愿，体贴群众痛苦，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灾区则发动和帮助农民生产救荒。1949 年，某团后勤部在江苏铜山马园庄筹粮时，了解到该区被水淹没过，剩下的麦子小米很少，当一个甲长筹办了一些小麦与小米给他们时，他们诚恳地对农民说：“这个地方国民党糟蹋得太苦了，这些粮食还是留给你们老年人、孩子吃吧，我们部队里都是年轻人，你们青年人吃什么，就搞什么给我们吃吧。”村民感动地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好队伍。”躲在外面的年轻人也都回来帮助他们筹粮。

诸如此类的行动，使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农民面前迅速树立起崭新的形象，很快为农民所接收，农民转而支持共产党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许多地方的农民表示：“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倾家荡产，支援前线。”淮海战役，我军参战兵力 60 万，支前民工 230 万；冀中人民支援平津前线，前后出动大车 17 万辆。渡江作战，我军参战兵力上百万，支前民工 320 万。翻身后的农民，积极开展劳军支前，保证了解放军的胜利南下及全国胜利的取得。

解放军南下过程中，农民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越来越高。1949 年 1～2 月份，山东、苏北两地的农民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踊跃参加解放军人达数十万余人。在动员人民参军时，解放军掌握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根据过去参军人数多少，现有劳动力

状况，领导群众进行适当的评议；动员参军时，保证照顾参军人员的家庭生产等等。一股向国民党政府“报仇雪恨、就在今朝”的情绪被完全鼓动起来。解放军渡江时，由于解放军遵守纪律，得到农民及其他人士的理解和支持。扬州地区的一般船工烧香拜佛求签，祈祷渡江安全。有些地方把庙里的下下签都抽掉了，有些请仙姑，地方同志便叫仙姑多说吉祥话。

对于农民的贡献，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曾作了充分肯定。他说：“在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另外一万万以上的农民正在准备着解决土地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两万万的农民将要进入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来。这在农业的中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事情。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农民贡献给战争的是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子弟、丈夫送到我们的前方后方，他们当民兵、当民工，不但在后方维持秩序，并且大批地随着部队出发到前线去做种种协助战争的工作。只要哪个地方的战事过去之后，那个地方就掀起了生产热潮。”陈毅说过的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的一首《记淮海战役前线见闻》更加生动地描画出人们群众支持前线的壮丽画卷：

几十万，民夫走不动。
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逐西东，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车访伤兵：
同志戴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

政治影响人心，人心决定战局。在国共决战的1949年，农民在双方成败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国民党政府只照顾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把绝大多数农民撇到一边；共产党正相反，他们要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将其分给农民。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化成了支持共产党解放军的无穷动力。以下两则故事，是农民态度转变最直观具体的例证：

淮海战役失败前的半个月，蒋介石召见他的特派战场视察官李以劻，让他汇报视察徐州等地的战场情形。李以劻如实汇报了对方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等情形后，又说，各地老百姓为解放军送粮食弹药，抬担架，川流络绎于道，人人乐于从事。而国统区的政治差，官吏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有时甚至连带路的人也找不到。蒋介石听了以后，不得不承认：“敌人政治是比我方强，组织宣传，开批评小组会，疾恶如仇，都是优点。我们政治是不好，缺乏有用的干部。”

蒋介石的十二兵团还留在豫西时，有一次，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和胡琏二人到了唐河，他们想找几个老百姓来聊聊风土人情，可是蒋军一到，老百姓都走光了。后来找了个老头来，一问才知道，原来在改用金元券之前，蒋军曾将现已作废的“法币”大量抢购粮食，一转眼，“法币”一文不值，老百姓叫苦连天。从此以后，蒋军所到之处，老百姓即逃之一空。到第十二兵团由确山出发后，经过豫西、皖东北边境时，所碰到的情

形也是一样。新蔡、灵泉一带，因为十八军曾在那里抓过壮丁，一次就拉去四五千人，老百姓听说蒋军要来，更是避之如洪水猛兽。十八军光顾蒙城、宿县时，也几乎是“军行所至，鸡犬一空”。当时杨伯涛见此情形，开始还以为是黄河改道，战火密集，自然条件恶劣，人烟少见，不足为怪。等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从双堆集被押送到临涣集时，沿途经过数十里，随处都是熙熙攘攘，行人如鲫，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都在为支援前方的军队奔忙，真有江山依旧、人事全非之感。他以前以军长的身份经过时，许多乡村门户紧闭，寂然无人；而今以俘虏的身份经过，不但家家户户，处处炊烟，而且铺面上还有卖馒头、花生、烟酒之属。他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上装着宰好刮净的肥猪，那是送去慰劳解放军的。杨伯涛一来一往，看到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形，不禁油然生感，曾对被解放军所俘的黄维等人发牢骚说：“他们都是国民党的罪人，共产党的功臣。”这些国民党前方将领的感慨，是国民党政府长期不顾农民利益，最后陷于失败的最好注脚。

第五章 去与留——知识分子的悲喜人生

第一节 四分五裂的“智囊团”

蒋介石历来标榜自己重视知识分子，在他的周围，确实聚集着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了他的智囊团。这既是他引以自豪之举，也令许多知识分子怀有“知恩图报”之念。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蒋介石的智囊团却四分五裂，人心涣散，智囊人物一个个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离开了他们追随的“领袖”。这并不是几个人的感情冲动所使，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心态，是他们对社会大势分析预测后作出的人生选择。属于蒋介石“智囊团”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归宿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王宠惠、梅贻琦、王世杰型；陈布雷、戴季陶型；胡适型；翁文灏型。第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追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继续从事思想文化及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直至去世。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得益于他们的贡献不少。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明确的——与旧政权共存亡。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变数太大，大多“智囊团”内的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对事业、对前途、对职业良心乃至对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期盼，从而做出不同的人生决断。第一种类型的心态比较单一，后三种类型相对复杂，以下做重点介绍和分析。

陈布雷感激“殉道”，戴季陶悲观弃世

陈布雷对国民党一直信心十足。他置身政治漩涡，却怀有文士心境，留恋书生生活，所以，抗战时期，在参赞蒋介石政府政事期间，尽量多地与各方知识分子沟通，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动员知识分子参与党国事务，改善政府声誉，提高政治效率，在参政之余，有时也能兼重学术。

抗战胜利后，随着蒋介石独享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实现独裁日益迫切，陈布雷的地位逐渐显赫起来。他曾经说过：“他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然而，现在他已迈到蒋介石政府的前台。他不仅是蒋介石的贴身幕僚的统领，还逐渐成为蒋介石政府新闻宣传的决策者和主管者，调动各种舆论工具，帮助蒋介石策划“戡乱”动员，压制各种破坏“戡乱”的言论，被誉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陈布雷的政治生涯也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兼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

长，负责筹划和组织国民党中枢的重要会议，主持蒋介石召开的“官邸会报”，直接参与国民党的军政大事。

陈布雷生性淡泊，平时不喜钻营结党，排斥异己，对国民党政府中的腐败分子及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唯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不停地为蒋介石撰写文稿。他的生命已逐渐融人了蒋介石的政治躯体之中，“对于党国，只作无条件之贡献，而毫无所求，对于总裁之一切，只有‘无微不至’四字足以当之，渠之思想与总裁不可分离（实已到‘以总裁之忧为忧，以总裁之乐为乐’之境地），甚至渠之生活亦无形中与总裁发生联系，比如总裁未就寝前，渠不肯就寝，总裁已起身时渠必先起，午后必至总裁休息时，渠方敢轻松稍事休息，无论到何处必告家中以地址，盖恐总裁随时召见或通电话也。对于党国大事，虽因所见不同，常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服从总裁之意旨，用尽心思，费尽周折，以求完成总裁之意愿……如布雷先生者，庶足以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言。”有人说他在蒋介石政府中，可以说是“没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可是，仅仅过了7个月，即1948年11月13日，这个在西方看来不吉利的日子，陈布雷就在南京服安眠药自杀，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探讨陈布雷的自杀前的心境，可以为我们了解蒋介石御用知识分子的心理提供一条捷径。

关于他的自杀，当时就在社会上传说纷纭。但是，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陈布雷不希望在他死后，外界出现对蒋介石不利的各种传言，临死前，他连如何公开发表他逝世的消息都作好安排。他在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的遗书中，拜托两位极力为自己的自杀行为辩护，依他的意思直说：“△△从8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在陈布雷给蒋介石、夫人王允默、自己儿女、三个弟弟、同僚中政会副秘书长洪兰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副官陶永标等人的遗书中，他一再陈述自己离世的缘由，主要是因为身体衰弱，精力不济，无法承担为党国为蒋介石继续“戡乱剿共”、力挽危局的重任，与其在其位不能谋其职，不如以死结束无价值之生命，一味自责。如在他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五负教诲。但自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人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命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承自己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在给蒋介石的另一封信中说：“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婞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生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愤愤无地。昔者公闻中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之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污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二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

从字面上看，信中通篇在自怨自责，口口声声说对不起“主公”，因为心里有愧，

才离世而去。然而，透过表层，我们不难看到陈布雷的内心世界。如他所说的“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值此党国最艰危时期”、“书生无用，负国负公”、“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所闻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污蔑者”、“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宣传”，都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忧虑，对民众舆论中“毒素”的无奈，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和劝谏以及对为之奋斗一生事业的失望。

然而，在这之前的一年，陈布雷对蒋介石政府还充满信心。1947年，《文汇报》总编徐铸成为《文汇报》被查封的事到首都南京“活动活动”，官方提出报纸复刊，必须答应官方提出的两项条件。被徐铸成严词拒绝，他说：“复刊应是无条件的；有条件决不复刊，再说《文汇报》由我负言论责任，所登文章，均经我亲自审过，有什么责任都由我一人负。”临回上海前，他去见了陈布雷一面，当陈布雷确信徐铸成拒绝有条件复刊之意已决，且时龄已届41岁后，带着惋惜、训导、调侃而又信心十足的口气对徐说：“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二十年后，老兄的须眉也斑白了，就这样等下去么?”此时的陈布雷，已看到国民党的腐败，然而，从来没有想到它会在一两年内，大厦根基就已动摇，而且倾覆速度如此之快。促使陈布雷“以身殉国”的事情在1948年可以说是接二连三地发生。1948年春天以来，令陈布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党国面临艰危的事有哪些呢？现以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2月26日，解放军收复营口；

3月3日，解放军在陕北取得宜川大捷，14日解放军攻克洛阳，15日解放军结束东北的军事攻势，孤立长春、沈阳；

4月22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国统区爆发反迫害、反饥饿运动；

5月，解放军取得洛阳战役、宋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胜利，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被粉碎；

6月22日，解放军占领开封；

7月16日，解放军收复襄阳，21日解放军结束晋东战役；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

9月24日，济南被解放军攻克；

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锦州，19日解放长春；

11月1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元券崩溃，物价飞腾，2日，解放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胜利，虽经蒋介石三次飞临前线督战，但国民党军队仍以被歼47万而告北；6日淮海战役开始；蒋管区失败主义盛行；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已在各阶层中普遍流行；舆论界不能整齐划一，有的为蒋介石的“戡乱”大唱赞歌，不利于蒋介石的种种言论也大有市场……

以上有些事就发生在陈布雷的眼皮底下，如南京的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到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

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他的办公室就在山西路对接的湖南路上，呐喊声时时人耳，他“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国事，急需作为智囊团首领的陈布雷拿出一揽子方案供中枢采纳。可是，以陈布雷个人的力量已经无能为力，有“油尽灯枯”之感；在其位，不能谋其职，更使他觉得“负国负公”，他自忖担不起蒋介石放在身上的这副重担，同时也对此项职责日渐厌烦。秘书蒋君章追忆陈布雷时，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当时心境：“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作最后呈告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告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有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向以“文胆”著称的陈布雷在时局危艰的形势下，已不能完成当局给他的命题文章，这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之事。而对当局的“失态”，在他政治生涯中却是从未有过的事。“失态”之后，自己也陷于痛苦的自责之中，又没有勇气挣脱蒋介石罩在他心头的脉脉情网。所以在前一天（11月12日）对当局“失态”之后，第二天就服安眠药自杀。

促使陈布雷自杀的远不止令他“饱受刺激”的国事，还有令他在公众面前难以交待的家事。他忠心追随蒋介石，他的子女们却没有受他一贯反共言论的感染，与他同心同德举家随蒋“剿共”，反而与他尽唱反调，毅然加入共产党队伍，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运动。陈布雷共有7个儿子，2个女儿，9个孩子中，女儿陈链早在193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地质系学习时，积极上进，后来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抗战胜利后，陈链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共产党北平地下电台，大肆逮捕学生及进步人士，陈链也涉嫌被捕，令蒋介石大为惊怒。尽管“主公”对他体谅有加，只嘱咐他加强管教。对他来说，一家人，两条心，颇为尴尬。陈链的事情还未摆平，小儿子陈过（后改名陈力）又给他惹出事来。两年前，还在北平念书的陈过在“沈崇事件”中参加了游行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打伤，从此，他的“左倾”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凭着一股正义感和满腔的热情参加学潮的情景，陈布雷对儿子的举动多了几分理解；一贯主张对学潮疏导而不宜武力弹压的他，对“青年军”以武力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心持异议，认为这等于又把无数青年推到共产党一边。子女们的进步与自己“进退无措”使他内心极度矛盾，隐痛时时出现，这对曾经以全副精力协助蒋介石“戡乱”的陈布雷来说，既是一次触动，也是一种煎熬，他渐渐搞清楚他的儿女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思想偏差。由此感到有必要对国民党政策检讨。就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几欲吐血时，陈布雷就觉得此仗不能再打下去，“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因此坚定了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谈判的念头，认为这样，“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可是，打红眼的蒋介石虽然看到眼前的不利战局，怎么也不相信自己会彻底输掉老本，反劝陈布雷“不必如此悲观”，并在11月8日的中央党部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严厉痛斥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的表现，并声明一切谣言不会影响他“战斗到底的决心”。蒋介石的讲话并非针对陈布雷而发，但“画外音”

中，身处要津的陈布雷自然脱不了干系。陈布雷“好心无好报”，对已被家事国事搅得焦头烂额的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像陈布雷这样殚精竭虑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本身自尊心极强而旧式士大夫思想又很重的知识分子，蒋介石的表态决定了他的最后命运。”

最近有学者根据陈布雷公子陈过先生珍藏的其父日记，发现在陈布雷11月12日写的绝笔《杂记》在发表时，国民党为了掩盖真相，删去了两大段至关重要的文字，照这些被删的文字推断，陈布雷所以自杀，是因为共事的党国要人们，在党国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不能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互寻善后之策；而陈布雷自己又无能力，挽狂澜于既倒，致使刺激过度，心理变态，突发忧郁狂，决定为垂死的党国“从一而终”。他的同事们则在羞愧之余，怕影响士气、加速瓦解，乃昧着良心抹去这些文字，反冠以“感激轻生、以死报国”的名义，造成50年来未能破解的人生之迷。陈记述听了同事们议论后的心情是这样说的：“闻朋友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如有人问我，我将答之曰：‘我惟有一死而已。”’正是朋友们互相询问的这句话促使了陈布雷的自杀。其实，说国民党党国要人出于羞愧和怕影响士气的考虑，而删去陈布雷的杂记内容，颇为确切；说朋友的一句询问是造成陈布雷自杀的直接诱因也勉强说得通，但说成是全部原因，依据略嫌不够。

笔者认为，陈布雷的死是1948年以来，国事、家事、身体、心理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所致。对于陈布雷这种复杂的心态和尴尬的处境，在他死后一个星期，《观察》杂志特约记者就及时作出了评析：“据闻近半年来，陈氏感受的刺激特多，他的女儿陈琏被牵连在北平那一桩军事间谍案子里，被逮下狱，因而影响了他在伦理上的情绪和‘孝忠’的信心，说来是近乎事实的。近因大概是他到处听到民间因限价和金券等等激起了普遍的抢米等种种不利于当局的消息，更有关系。和战纷呶无是处，边城弥望亡万里，‘三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触景伤情以致于厌世，也是有的。他死的半月前，外界就有一种传说，他半月以来提笔竟不能写一字半句，试思，以‘畏垒笔椽’、‘立马万言、一挥而就’闻于国民党之陈布雷，何以不能承命起草重要文告呢？这也是桩很有意味的事……这和传说他十二日之夕，当局命他起草某项文告，他嘱咐仆人回话，说他已睡下了，实则决死之念已定于此时，将各种事体联系起来一寻思，不难想象在陈布雷的脑际，时势已经杌陧到如何的田地了。”结合陈布雷自杀前后的家事、国事的发展动向，《观察》记者的分析是全面而符合实际的。

陈布雷感伤时势，前途无望，又无法劝说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中枢改弦更张，为了“党国”的前途，放弃一些不利于党国政治民生的措施，只好寄希望于以自己的一死换来蒋介石的“醒悟”，实行“尸谏”。据当时媒体报道，陈布雷在自杀前，曾以三事直言相谏：“停止内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后因谏之不从，决定以死相谏，同时也以此报答蒋介石多年来的“知遇之恩”。无怪乎11月18日的《中央日报》为陈布雷之死所发的消息中，用上了《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陈布雷以死报国》的标题，把他比拟成陈天华第二。所以在临终前，他勇于向子女承认自己“知识暗陋”，“性情孤僻”、“不合时宜”，尽管还自欺欺人地开导子女：“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廿年来

方针上决无错误”，但对子女们只要求他们“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而对他们的投共、“左倾行为”却无半句指责，只希望他们尽忠于“国族”，而没有苛求他们尽忠于“党国”。

陈布雷以书生型的方面吏员，效忠蒋介石二十多年，竟以服安眠药自杀方式结束一生，颇能令人深思。面对国民党的腐败，陈布雷彻底失望，即使“文胆”包天，大笔如椽，也不愿再协助蒋介石，力挽时艰；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难以报答的痛楚，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时刻萦绕脑际，使他难以痛下决心，改换门庭，择木而栖；子女们的人身选择，使他在中枢及“党国”面前丧尽颜面；国民党败局已定，他意识到，继续内战，执行“戡乱”，对国民党来说已无前途可言，必须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讲和，或许还有占据半壁江山的希望。但他所效忠的“主公”拒纳他的建议，他又不愿对蒋“忘恩负义”，只好选择“尸谏”来打动蒋介石，告诉他内战胜利无望，回头才是岸边。国事、家事诸事纷繁，身体、心理极度疲惫，陈布雷实在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也没有人能给他指明一条道路。自寻短见，似乎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可以说，陈布雷之死，是时势所逼，愚忠所驱，他的死，是时代的牺牲品。这一点，他夫人王允默在《悼布雷》一文中说得最为明白：“今大局未靖，君已先自毁灭，赍志以殁，静言思之，谓非时代之牺牲者，亦何可得?”又说：“终因世风不古，同志难求，不敢身尸要职，有负领袖识拔，友好推崇，默默自了，结束一生，惨乎痛哉!”

笔者花如此多的笔墨考察陈布雷之死，并非为了考据而考据，旨在透过这一个案，勾勒蒋介石政府之下，知识分子群体的心态。严格来说，陈布雷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但他仍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气质，即他自己说的“书生”气质。蒋介石标榜重视文人，但在 1948 年、1949 年的所作所为，却让他身边一批面临角色转换的知识分子失望颓废，感到前途渺茫。陈布雷之死，与其说是自杀，不如说是被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捆杀；与其说是效忠“党国”，不如说是效忠蒋介石一人；与其说是他个人命运的终极，不如说是国民党彻底走向衰败命运的预兆。他是一代追随蒋介石集团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代表了一种趋向。在蒋介石眼里，陈布雷是难得的忠臣，所以他死后，蒋介石在国人面前几乎把他树立成一个完人：“履道之贞，谋国之忠，持躬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然而，连这样一个“完人”，都不愿再为“党国”效忠，那么，其他声位均不如陈布雷尊崇的御用知识分子，其心态更加可想而知了。

无独有偶，文职大吏戴季陶与陈布雷选择了同一归宿。几个月前，国民党中常委、国史馆馆长、前考试院院长戴传贤还在纳闷：“主公”青眼有加、依为心腹的陈布雷，要死，也应该是慷慨悲壮，为“党国”就义，怎会如此消极悲观，撒手人寰。可是，3 个月后，他想不通的事终于想通了，并且毅然步了陈布雷后尘。这对 1949 年国民党政府又形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戴季陶，又名传贤，号天仇，与蒋介石、陈布雷一样，原籍均属浙江，只是他出生地是“天府之国”四川广汉。在其早年生涯里，他就与中国国民党结下了不解之缘。1905 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09 年回国，任《中外日报》、《天铎报》主编。1911 年被通缉，亡命日本，结识孙中山，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从此，紧随孙中山，参加过一

系列革命活动，为孙中山的革命阐释宣传。孙中山逝世后，演变为国民党右派，成为国民党右派中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青年之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惊世宏文，曾经是国共双方注意的焦点，也成了蒋介石日后政治独裁的理论依据。有了这些资本，他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从此在蒋介石鞍前马后，出谋划策。从1927年开始，先后任中央大学校长，并一度兼任宣传部委员和考试院院长，训练部长，中央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在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夺取国民政府最高权力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与陈布雷一样，也许追随蒋介石时日既久，对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比别人有更深的了解。1947年以后，蒋介石及其个别心腹爱将，仍时常夸口要在“×××时间内”消灭共产党。可是戴心里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美好愿望。他已亲眼看到，8年抗战，共产党势力不弱反强，民心不失反得，国民党正好相反。所以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陪都重庆时，亲友家人拥到他的住处，与他分享胜利的喜悦时，他却一盆凉水泼向来客：何贺之有！今后的困难将千倍艰苦，大家要提高警惕，准备去忍受。

国民党“接收”不久，国统区果然危机四起。目睹国民党诸般病萎不振的气象，戴传贤以其理论家特有的敏感性，感到国民党面临的将是一个大悲剧。可是，最使他忧心如焚的是，在悲剧即将来临之前，许多人神经麻木，清醒的人寥寥无几。他在给儿子（戴安国，留学比利时学习过机电，戴逝世前，任交通部民航局局长）的信中说，“儿今来书言及生活艰难，购物不易，不知老父五十七年间既忧且病，人人以为精神病之故，然非也，世之所谓强健者，或皆为精神病耳。”1947年11月，在写信给侄子时，更是自怨自唉：“余四十年间，于进退出处，十分谨慎，以期无负祖父长兄之教，无愧延次两祖之传，与乎国父十余年之训。”40多年来，他笃信自己选择的目标，谨慎地为之奋斗，对于多年的从政经历，他自觉无愧于祖父长兄，无愧于国父。然而，眼下这种局面与他心目中的“主义”显然格格不人，所依靠的政府及领袖又不能帮助他完成既定的理想，既恨铁不成钢，又叹无力回天，前途灰暗，忧心忡忡。1949年以来，国民党四面楚歌，从现政府身上他已看不到一线希望，尚存的一点知识分子的“文化殉道”精神，促使他不愿在与现政府绑在一起，坐以待毙。1月，淮海战场国民党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南逃广州，其时有人就劝他离穗赴台，被他拒绝。毕竟年届花甲，思乡之情在心头萦绕不断。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在桑梓四川找到归宿。可是，天公不作美，就在临登机之日，连遭大雨。戴季陶似乎预感到这是老天在与他作对，天命难违，终于在2月11日晚，与夫人一同服下安眠药，他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在广州国民党省政府招待所东山公园结束了反共的一生，其夫人则被送往医院救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童冠贤12日晨离穗赴沪前，于戴氏弥留之际，到床前探视，流连良久，怅然诀别，于右任更是老泪纵横，内心无限悲痛。他在临终前数日，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讲的“我已经是油尽灯枯”一番话，几乎与陈布雷日记所记如出一口。

这并非巧合，而是知识分子兼文职高官的共同心声。他们的死，使蒋介石如失左右臂，如此的“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老手竟弃他而去，令他悲痛难禁，遭逢接连不断的“故人零落”，唯有“中夜唏嘘”，慨叹末日的来临。兔死狐悲，在他死

后，国民政府满足了他魂归故里的夙愿，国民政府3月31日以总统的名义颁布命令："国史馆馆长、前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才识恢宏，勋猷懋著，业经命令褒扬在案，兹据行政院呈请国葬到府，追念忠勤，自应特准施行。"4月3日，将戴传贤安葬在成都外西戴氏祖茔。四川各界1日举行追悼会，2日为各界公祭，总算享尽哀荣。

胡适寻找"自由"

毛泽东1949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文中曾经说过："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不过，1949年，这些知识分子已不完全为蒋介石政府所控制，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其说是国民党政府在控制他们，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控制自己。胡适就是其中的典型。

胡适被毛泽东列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政府所能"控制"的知识分子的第一人。可是，1949年前后的胡适，却仍未放弃书生本质，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他依然注重学术。在云谲波诡的政治浪潮中，他又不可能置身方外。只是这位桃李满天下、在中国培养出几代学术大师的宗师，已走到政治生涯的末路，在国共决战已见分晓的时候，需要重新做出人生选择。

对于共产党而言，他算是"反共老手"，在共产党所列的40名战犯中，胡适"榜上有名"。事实上，胡适并不总是表现为政治上"反动"这一形象，他的学生中，"左倾分子"不在少数，如吴晗、千家驹等，但他历来注意将学术与政见分开。哲学上的实验主义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他一生的政治信仰，学术研究是他视之如命的嗜好。谁要是违背了这两点，他都要提出批评。他对人类社会实现民主信心十足，把近30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权专制的潮流看成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潮流，认为："中国人在今天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势，必须选定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族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他理解的自由包括尊重自由、拥护民主、容忍反对党、和平的渐进的政治改革四层意思，认为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就应当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专制政治"。正因为他存有自由民主的信仰，他才不懈为之努力。可是，他所依赖的蒋介石政府偏偏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方面做得极差，不断使他失望；共产党与苏俄一脉相承的阶级斗争方法又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对自由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在这两难的境界下，胡适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并没有盲目一边倒。

1949年前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泰斗，胡适的心情较以往更为复杂，他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早为人知的事实，谁都无法加以否认。但他也不是一个死心塌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人。他没有政治野心，他一生都未加入国民党。虽然1948年3月，他参加了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行宪国大"，有人认为这表明胡适有政治野心。其实，这是胡适不懂政治权术的标志，他被政坛老手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或者说是他为了答谢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不好驳蒋介石的

面子而临时作出的决定，并不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后，他为没有当上总统感到心情轻松。

1948年11月，东北已经解放，华北战事正酣，北平共产党大军已兵临城下，南京国民政府翁文灏内阁难以支撑。蒋介石又想到了胡适，特地派陶希圣赴北平力邀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胡适以“没有力量接收这个使命”为由婉拒了。在纪念北大50周年前夕，他亲口对别人说过：“我不懂政治，不要听外面瞎说。”1949年2月，胡适即将赴美前，李宗仁及行政院院长何应钦拟请他取代顾维钧，担任驻美大使，他又以不愿改变自由的初衷而谢绝。用他的话说，“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好，哪里还能搞政治。”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不懂政治”。在他心中，始终竖立着一根民主自由的标杆。

他反对暴力，但对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赞成的；他不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对激进的学生爱护有加。对因反对蒋介石专制政府举行游行示威而被捕的学生，总是设法营救，有一次还亲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势力，使学生获得自由。他对共产党倡导的政治路线持反对意见，但对共产党本身并不仇恨。1948年12月13日，人民解放军已对北平形成一个包围圈，一天，有一个人走进校长室，告诉他，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有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是微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几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决定逃跑。对共产党也未深恶痛绝，否则他听了这条消息后，必会暴跳如雷，将共产党大骂一通，以表明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他对学校及学生十分依恋，12月14日他突然接到教育部部长陈雪屏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催促他离平南下，并通知有飞机来接。胡适表示外寇来时可以撤退，现在内战，怎好丢下北大不管。后在南京方面及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的再三敦促下，才于12月16日，与陈寅恪夫妇同机飞抵南京。对于离开北大，胡适伤心不已。到宁第二天，就是北大校庆纪念日，下午，他应邀出席在宁的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50周年校庆大会”上，述及离开北大六千余教员及学生来京时，把自己比作一个“弃职的逃兵”，连称“无面目见大家”，在述及他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时，痛哭失声，泪如雨下，会场气氛凄凉异常。会后，善以小恩小惠笼络知识分子的蒋介石为他准备了家宴，替他祝寿，多少抚慰了他抑郁的心情。

不过，他没有因此而丧失自我，继续充当蒋介石专制政治的马前卒。1949年3月下旬，他最终决定去美国。临行前，蒋介石有意请他到溪口一叙，被他谢绝。14年前，抗战初起，胡适毅然挑起驻美大使的重任，在国际舞台上尽展身手，为中国的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他一向依赖的国民党政府气息奄奄，他再次赴美，已无往日的风光，只见“人还在，山河已改了”。4月6日，胡适赴美，开始近10年的寓居美国的生活。但国民党政府始终舍不得放弃胡适这块声望颇高的“社会贤达”招牌。1949年6月，难产的阎锡山“战时内阁”终于组成，阁员名单中居然将胡适列为外交部长，而这时胡适远在美国，并没有得到他的事先同意，胡也无此意向，要胡出仕，已成了阎锡山内阁的“单相思”。这以后的9年中，他竟没有回台一次，足见他对国民党官场心灰意

懒。但他对祖国的眷念之情从未改变。美方曾有人愿以优厚的条件为他在美国永久定居提供方便，他不予接收。他不想加入美国国籍。对于台湾方面，他多次发表意见，建议、批评多于吹捧赞扬。晚年有病在身，仍未忘记祖国，眷念大陆。1958年抱病回到祖国的台湾，专心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对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他推崇有加，说："共产党中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1955年正当大陆批胡适思想如火如荼时，胡适还说，他在这30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都知道的。"

1949年前后，胡适力图避开政治是非，继续追求自由民主的信仰，但在中国，无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不是能令他倾心皈依的政治派别或实体，于是选择赴美，表示在美国将多学习，研究世界大势，此外拟多发表演说。对于胡适的选择，我们今天不能单纯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角度作简单评判，而要用立体的视角客观分析。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想下水，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矛盾中度过的。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胡适之所以没有回到大陆，也许可以从他1949年1月对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说的一段话中寻到一丝原委。他认为，对国民党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分子之所以还依旧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至少还能享受沉默的自由。"这类话在这以前的自由主义人士口中就已不断出现过。1947年储安平在时评《中国的政局》中就说过，"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们把沉默的自由放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为这一理想尽力奋斗，尽管这种追求在政治观念上存有偏差，在其有生之年，也很可能不能实现，但避开政治倾向不谈，在他们身上，至少体现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韧"的追求精神。从胡适的抉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1949年，也并不是都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并不是一味追随，对共产党也不是一贯地仇恨。胡适的"出走"说明，1948年以后，国民党已无法得到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乃至典型个体的全力支持。

翁文灏宦海回头

翁文灏是1948年"八·一九"币改的主要策划人，翁虽然就任行政院院长，实是书生型的官员，所以笔者仍把他列为知识分子一类加以考察。从翁接任行政院院长、出面组阁起，政府就露出失败征兆。蒋介石1948年5月20日宣布就任"总统"，行政院院长一职，蒋介石本属意张群、何应钦，张、、何政治圆滑，审时度势，坚辞不就，才邀翁出任。按常例，在总统就职的当天或第二天，行政院就应当组成内阁，翁文灏组阁却用了一星期。根据媒体的分析和预测，在当时的情形下，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院长，都是没有办法的：谁上台谁倒霉，谁来做谁就牺牲。除非行政院院长有左右大局的权力，否

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开当前的局面；除非有谁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可是作为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只是一个账房先生，充其量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零用中，撙节一点，没有权力可以使这个破落的门户变为一门昌盛的人家；假如他失败，不一定是他个人的失败。果然，在他主持币改失败后，翁就向“总统”提出辞职。

蒋介石与翁的亲密关系非止一日。早在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就亲聆过翁文灏的讲演，1934年，翁在浙江武康遇上严重车祸时，又是蒋介石出面组织抢救，把翁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蒋不耻下问的“知遇之恩”和解人围困的“救命之恩”，都使翁很难拉下脸来，拒绝这位浙江老乡的厚爱。币改失败后，翁文灏力辞行政院院长之职，经蒋介石挽留，继续留任。翁上台之初，并不是有勇气接收内阁大任，而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组阁大命，“既无勇气拒任命于前，亦无勇气坚决呈辞于后”。拖至1948年11月，才得以卸任。结果改革之后，怨声举国，十足当了一回国人的“出气筒”。受命于危难的行政院院长一职，没有使他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反而变成腐败政治的牺牲品。

笔者这里并不想过多着墨于翁文灏的政绩优劣，而是要分析为什么这样一位与蒋介石私人感情密切、又被共产党列为首批战犯的知识分子型的国民党高官，1949年没有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日后还选择了返回祖国大陆，由国民党高官转变为共产党新政权中一分子，而且在当时情势下其政治生命还是不可预知的。

1949年，翁61岁，他的选择应该说不会是轻率的，不过他当时的心情却很复杂。起初他也想过定居台湾。1948年11月，他在行政院院长岗位上离任，12月，他把老父、老妻、大儿媳和孙女等家眷送往台湾，让儿子心源、心均留在上海，一人独居南京，观望去路，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一家人分居三处，并非他的初衷，更多的是因为他是否跟蒋介石走。他也想过留在大陆，可是共产党开列的战犯名单上，他的名字赫然在上。所以当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最后一任委员长、曾经是他部属的孙越崎等建议他将来最好不要走时，他指着桌上摆的战犯名单说：“你们可以不走，我是没有办法不走的。”言下之意，走，实出于无奈。1949年4月，南京解放，翁去台湾，将儿媳、孙女打发回沪，自己5月21日从台湾来香港。他的不少部下和同事都劝他：他的儿子、儿媳、孙女都在内地，他和老父、老妻三个老人流落在外，太寂寞凄凉了，最好把老父、老妻接到香港来，慢慢和共产党联系，得到许可，也回内地，阖家团聚，老朋友也可常见面，“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要他好好考虑。翁自己不是不想回内地，而是认为自己罪大恶极，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表示除非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写过一份“悔过书”，表示返回祖国内地的愿望。在没有得到共产党正式意见前，他拒绝台湾方面的邀请，为免遭暗杀，于1949年11月飞往巴黎。共产党方面对翁的态度灵活而富有诚意。周恩来收到“悔过书”后，当即表示愿意做民主人士方面的工作，至于战犯问题，周的解释更具艺术性，说：这是新华社消息，不是党和政府正式宣布的，可放心。共产党的态度打消了翁最后的疑虑，1951年1月辗转回到祖国怀抱。

比起其他一些国民党高官，他的政治态度相对要开明得多。尽管他事实上是在为蒋

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工作，内心却想超然于政党之外，这是他不参加国民党中各种派系的原因。对共产党也不愿过多责骂、打击。但是等到做了行政院院长后，“超然”是不可能了，公开场合，对共产党的谴责并不少，这在他内心是“冲突”的，只能凭自己的尚未泯灭的一点良知来应付国民党方面的压力，如拒绝由行政院发令，逮捕进步学生等。1949 年上半年，台湾发表的许多人签署的《反共宣言》，他的名字也列在里面，但这事先并未征得他的同意。翁文灏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身居国民党高位，却不是蒋介石的死党，他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开始是一批书生气十足的“工业救国”迷。他们想救国报国，就得依附于一个政府。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良知和独立精神；作为一个官员，他们身在宦海不得自主。经历了政治失败，对所依附政府失去希望，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的渴望再度浮现于心头，不甘再作腐败政治的附庸，这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弃暗投明，或至少抱着与原政府不合作态度。翁文灏这种被共产党通缉的“战犯”，在 1949 年前后作出如此人生选择，是蒋介石众叛亲离的又一重要标志。

以上是国民党政府中，智囊型知识分子在 1949 年前后的选择。无论陈布雷、戴传贤，还是胡适、翁文灏，他们的归宿不尽相同，他们的心态却大同小异，共通之处就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蒋介石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都是以“一介书生”人主“朝政”，都想以自己的毕生精力来报答他们的“主公”，把政府改造成一个“好政府”。他们没有想到，在权力专制的政治气候下，他们的出仕，给专制政治撒上了一层“民主”、“开明”的金粉，更加掩盖了专制政治的本来面目，使一些本来要向当局争人权的、争民主的人士尤其是知识界人对政府有了一定的认同感。在政府无可救药之际，他们选择的归宿又有一定的差异。陈布雷、戴传贤是一类，他们对蒋介石死心塌地追随，一心要为蒋介石的统治体系树立他们理想中的“道统”，希望在蒋介石身上实现“君统”和“道统”的统一。正如王芸生刻画的那样：“戴季陶这家伙，简直是一代妖狐。他的私行极坏，在私生活方面与蒋关系极深。……他写了一本《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曲解三民主义，硬与中国封建‘道统’拉关系，说什么‘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文武周公孔子又以是传之孙中山’。……他这一套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根据。”“陈布雷虽谈不上什么思想，但他的旧书生的气息极为浓厚，与蒋遇合，俨若圣君贤相……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识，何尝有什么‘礼义廉耻’，而蒋开口闭口不离‘道德’，每篇文告都要以‘道德’责叱人民；高唱所谓新生活运动，标榜四维八德；案头读物摆上《宋元学案》。这些，都是陈布雷给他的影响。”可是，当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君统”步调与“道统”轨道分叉扬镳时，他们在“君统”与“道统”之间，选择了为“道统”殉道。这样，在“殉道”的同时，也保留了一点传统士大夫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气”，更确切地说是傻气。

相对于前者，翁文灏身上，具有更为独立的人格，同样是为了报国，但他能将未来的国家与他依赖的政权区别开来，选择了光明的前途，投奔到和平的阵营，放弃了“君统”，皈依了新的“道统”，即新民主主义，并愿意为之奋斗。胡适超脱出“君统”和“道统”的樊篱，在两者之间，重新选择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学术研究。即使

后来他回到台湾，也没有再投身于官场宦海，而是抱定“技术救国”的宗旨。他晚年的处境比较凄苦，可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却重新焕发出光彩。他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西方理论整理国故等一系列治学方法，仍是今天许多学者、学子奉行不二的原则。

这个群体与纯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完全一样，其骨子里还保存了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希望现政府奋发有为，只是“阿斗”难扶，眼看着大厦将倾，油灯欲灭，却无力拯之于垂危。大难将至，各奔东西，就是不愿与国民党政府共存亡，在最后时刻，显示出仅存的一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意志和品质。他们的抉择，对大多在国民党政府或学术机构中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去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坚定了他们留在大陆的决心。如国民党在溃退前，曾想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遭到大多数院士及工作人员的反对。尽管国民党政府从1948年1月开始，就在为搬迁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他们对当年西迁之苦记忆犹新，闻听先期迁台的同仁处境并不乐观，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腐败和人心的向背趋势，决定留在大陆，等待解放。

第二节 去意徘徊

蒋介石军队溃败前夕，蒋介石没有放弃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被困在战区前沿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共产党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留在计划建立的新政权下。去或留，知识分子大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1948年底北平被围时，国民党政府把计划南撤的北平文教界人士分为四类，分批抢救：第一，各校、院、会负责首长；第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三，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第四，学术界有贡献者。总计为数不过三四百人。并任命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兼台湾大学校长，以台大为基地，以便安排内地迁往台湾的研究所和由内地迁往台湾的学者，为大陆来台学者作准备。1949年1月9日，傅斯年飞抵台北。他发表讲话说，和平固举国渴望，但在目前情势下，恐怕难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因共党宗旨“纯在征服”，奢言和平，不过准备投降而已；对于台大，他说，以开诚信，布公道，求安定，求进步为方针，并将在互助基础上，与外界学术研究机构合作，最短期内充实文理两学院，使达到全国最高标准。在后来的一个月中，这三四百人的名单是否全部列出，笔者一时无法确知，但“抢救”著名学人的行动的确紧张地进行过。

北平解放前，国民党官员纷纷逃跑，北平一片混乱，国民党教育部急电各大专院校南迁，遭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抵制。国民党政府又派出飞机北来接人。知识界第一批坐飞机南迁的是胡适、陈寅恪等，从南苑机场起飞。随后教育部派两批飞机来接学者、名流南迁，第一批因南苑机场遭解放军炮火封锁，飞机无法降落，折返回京。国民党在东单临时抢修机场，供第二批飞机降落。坐这批飞机走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

大学校长袁敦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北平艺专音乐系主任赵梅伯等人。有人名单被列入抢运之列，但他们不愿离平。如汤用彤、徐悲鸿等就属抢运对象，汤用彤宁愿把登飞机的名额让给刚才还在溜冰、穿着冰鞋的亲属，而与子女一起呆在北平，等待解放。徐悲鸿主持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徐悲鸿、吴作人等人的商定下，他们本人不离开北平，艺专也不南迁。国民党政府甚至派人前来劝说，并制造许多谣言。威胁不成，又进行利诱，答应解决他去印度办展览的经费，徐悲鸿仍不为所动。

1949年在抢运知识分子行动中，国民党无疑是大输家。对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抢运结果就是最好的说明。据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整个建制迁台的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两个单位，其余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和社会学所全部留在祖国大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人数506人，迁台的总办事处30人，历语所50人，计80人，占总人数的15.8%。194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召开时，选出的院士共81名，1949年去台湾的9人，占总人数的11.1%；去美谋职的12人，占总人数的14.8%；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总人数的74%。其中原中研院人文组的众多院士中，除胡适、傅斯年、董作宾、赵元任等十人赴台、赴美或滞美外，其余均留在大陆。中研院院士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顶尖人物，他们在社会剧烈嬗变的时刻，相信自己的抉择，反映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

共产党则既是政治、军事上的胜利者，也是文化上的大赢家。抗战以来，它留给国人的印象是务实和爱民。1948年底到1949年，这种形象在国人心目中日益高大起来。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共产党就是进步的象征，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批人把爱国与爱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及其政府画上了等号，爱国即爱党，爱党即爱民。许多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完全基于政治理由。他们不喜欢国民党现政权继续下去，所以，他们即使有帮助国民党政府解决危困的办法，但也不愿意献出来，他们知道，凡是帮助现政府解决困难，就是帮助巩固现政权。他们宁愿在经济紊乱之中等待光明的来临。他们从现政权无可救药、一定要颠覆这个前提出发，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在短短的痛苦过程中，当然有一部分人要牺牲，但是在长的痛苦过程中，被牺牲的人更多。好比女人生育之痛苦，创造新生命、新时代，这点痛苦是必须付出的。宁可让痛苦程度强烈一些，可是不能让痛苦时间加长，因为时间一拖长，母体怕受不住，等到光明的新时代来临时，享受这新时代的人，却已失去了享受的能力。他们对于有希望把中国治好的党派或政权，真心向往。

“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好，我都拥护。”这是冯友兰先生常讲的一句话，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新中国成立前夕或成立不久，不少知识分子出于对光明前途的追求，纷纷在国共政权之间、中外之间，毅然选择了共产党，选择留在祖国大陆。还有一些克服重重困难，从国外回国，投奔到共产党政权下，拥护共产党及其即将建立或已经建立的新政权。他们不是政治的投机者，而是共产党的追求者。为了实现这一信仰，他们愿意放弃身外的一切。他们当时的心境澄明，态度坚决，一心向往新生中共政权。1947年，眼看全国就要解放，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在美国长期住下去。冯说，他绝不步“白俄”的后尘，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他越是要赶回去，“怕

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回国后，对于“走不走”的问题，冯的态度很明确，抱定了社会主义“尚贤”的信念，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就这样，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并在以后维持清华的治安、等待共产党接管、保持学校的安定中起了很大作用。多少年后，冯还这样表达过他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无比崇敬心情，认为：“毛主席的功劳无论用什么字眼形容都不过分。”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轲所说的“心服”，“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由此可以推论：只要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中国人不但能够站起来，而且还能向前走得更远。“这不仅是某个人的心情，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情。”1949年，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还在美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虽然痛惜国民党的失败，但又希望即将奠定胜局的共产党能容纳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他在1948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恐怕已经是无问题的了。如果使各党派合作，是今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解决的办法只有：自由主义者应当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共产党承认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权。这一点是相互的，自由主义愈能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就愈能承认自由主义的自由。反之，共产党愈能承认自由主义的自由权，自由主义者就愈能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何兹全当时的心理是矛盾的：面对国民党人时，理直气壮，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好像他就是共产党的代表；面对共产党人，又觉得自己是个不争气的国民党人，好像是个罪人。他虽与共产党人无仇，但毕竟是“几十年的国民党人”。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有3条路可走：留在国外、去台湾、回大陆。但最终选择了回大陆，1950年9月成行。他在回忆中说：“共产党的统治对我有鼓舞有疑惧，决定我回国的力量是‘爱国’，是‘祖国’这两个字的‘神圣’力量把我这个游子召唤回来。”他们的爱国思想在回大陆后，很快与爱党融为一体，并由爱党转变为崇拜党，还能够适应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这就是所谓“只有牺牲脑袋里的个人民主，真诚彻底地向共产党投降，换取共产党的宽容，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祖国”。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中，他们为自己具有这种“投降”思想庆幸，因为它挽救了他们的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在历次运动中，一批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倒下去，他们却平安无事地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多了个投降思想，尊重共产党领导”。倒下去的知识分子就因为“骨子里多了一根‘反骨’——资产阶级民主，两党制”。后来共产党掀起的各种运动，与1949年前后，共产党战略主张和政治魄力有一定的区别；何先生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如何没有“倒下去”，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他在1949年向共产党的“投降”与在历次运动中的“投降”和“尊重”出发点也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1949年前后，他向共产党“投降”是诚心归附，是对光明前途的确信，代表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49年前后，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一大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感到温暖，他们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1949年，在实际工作中，知识分子受到应有的关照和礼遇。如有“将军诗人”之称的陈毅，可以说既执行了共产党政策，有些方面还比中央文件所规定的走得还远。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讲到对知识分子既要团结，又暗示要掌握一定的“度”，陈毅则似乎对这个“度”不太在意。在南京时，就曾亲自到中央研究院拜

访吴有训、陶孟和、杨钟健、熊子容等专家，陈毅以渊博的知识、趣雅的谈吐赢得了专家们的好感。在接管上海过程中，他曾不止一次指示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夏衍等人，做知识分子工作，“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同知识分子打交道，一定要“礼贤下士”，“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接管工作基本分为“接、管、清、改”4个字，陈毅则强调，在文化界，“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敢讲，放在心里。上海的文化工作基本按照这些指示去做的，尽管这些做法日后不止一次挨过批评，说“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吹捧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等等，事实证明这些方针是正确的，效果也是好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49年6月5日下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126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陈毅的一番开诚布公、热情洋溢的讲话，博得知识分子的好感，据说听了这次讲话，上海文化界形成了“陈毅迷”，不少人讲出了自己不为人知的故事（如吴有训讲了国民党多次要把他送台被他拒绝），有的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

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通过与共产党领导层的多次接触，亲身感受到他们全新的工作作风，对新时代赞不绝口。1949年，以82岁的高龄迎接解放的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奠基人张元济，在参加过第一届政协、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交换过意见、登临天安门城楼目睹开国大典后，回想起祖国及自身大半个世纪的坎坷经历，感慨万千，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希望。他曾亲口对儿子张树年说：“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今天有希望了。”历史学家陈垣谈他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时说：中国以往没有一个政府不黑暗，不令人灰心，共产党政府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从前所没有的，的确是历史上最省钱、最廉洁的政府。他通过解放后的北平街上，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等，判定新政府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1949年7月1日傍晚，北平群众在先农坛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28周年。毛泽东到达会场时，群情沸腾，许多人多是第一次见到人民的领袖，连长久不写诗的俞平伯也写了充满激情的白话长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那时，有些参加集会的知识分子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被摈弃在“人民”之外。俞平伯更是没想到在仅仅四五年后，要用同一枝笔来写检讨。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和人民的领袖是竭诚欢迎拥护的。

知识分子还积极参加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队伍中去。1949年9月10日，华北高教委召集平津各大学教授，研究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教学方法，规定了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教材，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有关著作为阅读教材。通过由艾思奇、费孝通、张岱年、侯外庐、常任侠、梁寒冰等组成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直属高教会，领导辅助各校进行该门必修课的教学，各校另成立分会，领导具体教学。从此，马列主义作为一门必修的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中生下根来。

知识分子则是宣传马列主义的生力军。不少人认识到，那些头脑中还有“厌恶政治”、“超越政治”、“洁身自好”、“靠技术吃饭”的人都是有一定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在于他们没有“认清时代”，“认清自己”。一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虽然解放了，但仍对共产党政策持怀疑态度，与共产党接触之后，慢慢打消了疑虑，开始拥护共产党。1949年2月3～22日，冀中十地专署为提高新区教育工作，召开了大清河北高小以上的教师座谈会，到会的有附近县、市的306名教师和联合师范学生56人。这些人过去长期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不太了解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接到开会的通知时，有人想：“过去净享受，这回一定推磨、拾柴、跑步，锻炼锻炼吧”；有的就想：“去了一定要考察事情，少说为佳，别惹出漏子来”；有的化了装，穿上一身短衣服，有自行车的不敢骑来。教师们到会之后，看到干部们的生活、言论、态度和大会民主精神，开始转变了过去的认识，但有的还在想：“恐怕不能老待咱们这么好吧……”在共产党十地地委书记张子善等领导讲了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政策、欢迎大家消除一切顾虑、大胆提出问题，以及举行了一场辩论会后，大家情绪才高涨起来，希望“回去先开学，拿工作成绩来评定自己”。

1949年解放初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他们有建设新中国的忠心热肠，愿意接收新政权的领导。有些人不但自己没有离开大陆，而且还因他们的影响，更多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留在大陆。文坛巨匠巴金在上海临解放前，曾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他认为：“人民拥护共产党，我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不但没有移居海外，还劝他的朋友和他一起留下来。巴金的朋友靳以还于6月25日北上参加首届文代会之前，在报上发表了一片短文《从黑暗到黎明》，描述了上海解放前后的所见所闻：

我看见匪军和特务们包围了学校和工厂，
我看见和我相熟的人被捉进了警备车，
我看见人民在大路上被枪杀，
我看见沾满了一地的脑浆和鲜血，
我看见在路上惶惶然走着的逃难的市民，
我看见只有一只猫溜过的空寂的街道，
我看见像狗一样地顺着墙壁急急逃走的匪军，
我看见敌人的坦克，
我看见蒋匪王朝的崩溃。
我看见天亮了，
我看见黑红脸膛的可爱的士兵进城了，
我看见我们的队伍来了，
我看见无数的挂着笑容的市民出现在街头，手拉着手团结起来。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奋过，快乐过；我不止一张脸在笑，我的全身都在笑。

至于解放初回到祖国的知识分子，更是怀着满腔的爱国爱党的热忱，文学家老舍、数学家华罗庚等，都可以在国外定居下来，但他们放弃了这些令国内许多人羡慕的机会，毅然回国，投奔共产党，踏上光明的前途。没有人勉强，没有人游说，没有政治投机，回到祖国，在新政府中做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已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聘约”教授的华罗庚1950年初回到祖国，准备工作则在1949年就开始进行了。在离开美国前，他在给美国的中国学生一封公开信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单纯以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盼望民主自由等政治信念，推断1949年大批知识分子留在大陆的全部原因，也许最为省事。历史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1949年前后，局势动荡，社会不安，但一些知识分子处变不惊。他们希望政局稳定，生活平安，但并非人人都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1949年不愿随国民党到台湾，或转道海外，寓居香港，而自愿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倾向性固然有，也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许多留在大陆的人，只是认为，国共之争“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在有的知识分子心中，对一个和平安定学术环境的渴望，比对政治、战争大势的关心更为迫切，对和平的到来充满信心。如一生疑古辨伪成“癖”的顾颉刚先生，早在1946年11月，就被选为国民大会社会贤达代表，年底出席过“制宪”大会，但最终没有走上仕途。顾颉刚在兵荒马乱的1948～1949年，只身在兰州大学，爱妻怀抱两个幼儿，又将临产，对日后处境忧心忡忡。可顾颉刚却试图以对前途的乐观来安慰远在上海的妻儿。在1948年10月9日给妻子张静秋的信中他写道：“至于时局日劣，那是全国家的事，也是全世界的事情，穷则变，最黑暗之后就会黎明，只要我们不牺牲在战争之中，到黎明了，我们自能过正常的生活了。”顾颉刚这种“书呆子”式的乐观，并没有消除妻子的忧虑，妻子终于以“有小产迹象”的借口，将顾颉刚“诓”到上海。在妻子与他商量逃难一事的时候，有不少友人逃往广东、台湾或香港，他们也劝顾颉刚同走，因为他与国民党有过过从甚密的经历。但顾似乎对前途也难以把握，1948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此大时代中，个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听之于天而已。”显然他对去和留，抱着可去可不去之念。不过，决定他作出去留决定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长期目睹了国民党所作所为，大感失望，目前兵败如山倒，即使逃避到上述地方，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熟知“白俄”颠沛流离生活的痛苦，不愿像他们那样终日流离失所。二是经济拮据，一家人的长途搬迁，路费欠缺。三是自觉平生未做过亏心事，无罪过可忏悔，也无须上帝的赦免，唯爱读书写作的本行，到哪儿都是一样，故而心地坦然。所以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邀他同往台湾，他竟避而不见。在炮火隆隆的1949年四五月，仍醉心于钩沉考辨，著书立说，联系出版。不愿当“白华”、路费欠缺、哪里做学问都一样等，构成了顾颉刚留在大陆的原因，这是一种中性的态度。

有的知识分子只是因舍不得离开故土而留在大陆，无任何政治目的，在今后的岁月

中，也没有醉心于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政治上一直与新政权保持距离，学术上始终保持独立，这些人不在少数。陈寅恪先生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据陈先生后来在第七次交待稿中回忆说："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生平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他不去台湾与香港，不仅仅是一次生存选择，更是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选择。爱故土、盼安定，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大追求。

有的不仅仅是因为相信共产党，他们更爱民族文化、爱这里的人民，渴望和平。他们的情感依附于政治，又超越政治。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在于善于因势利导，通过一系列措施，促使这类态度的知识分子慢慢向对新政权有利的方面转变。如保护、传播文化的使命感，常常使许多知识分子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而甘之如饴，有的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1949年，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国共双方对文化的重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文化人对党派或政权的认可程度，以及他们对未来出路的选择。共产党在1949年对于文化的重视，令无数文化人对共产党新政权充满无限希望，他们在最后关头，心甘情愿地留在共产党政权之中，为新政权服务，很大程度上是受共产党成功文化政策的鼓舞。1948年底至1949年初，北平解放军兵临城下，一批责任感强烈的文史人士忧心忡忡，担心此番两军交锋，历经数朝未遭毁坏的文化名城及文物古迹图书，在劫难逃。国民党政府乘机造谣，说共产党解放军"不要文化"。这不仅仅是保存文物文化的问题，更是争夺文化人士的问题。共产党在这方面措施果断及时，深得知识分子分子人心。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亲拟电稿："沙河、清和、海甸（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员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在作战时减少损失。"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几位"不速之客"拜访清华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府上，请他在一张军事地图上标出重要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便攻城时炮火避开。正在为古城文化古迹担忧的梁先生郑重地为这几位解放军联络员圈点好地图后，心情的激动与欣喜难以言状。这是文化人的衷心期盼，也是当时绝大多数文化人的愿望。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亲拟电稿，要求攻城指挥员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以后《北平市军管会人城纪律守则》第十二条中，则明确将文物古迹的保护纳入其中，北平一大批文物古迹图书得以完好保存下来。共产党这一系列举措，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共产党不要文化"的谎言，打消了北平知识分子的顾虑，北平乃至全国知识界为之振奋。他们反过来做国民党将士的工作，争取达成和平解决的协定。对于固持中性态度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则采取耐心说服等待的方式，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即使不能获得更多回报，但起码保证他们不与新政权唱反调。

由于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使得知识分子根据各自的不同经历和活动方式，在全国解放、保护文化、维持社会安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之中，不但自己决定

留在大陆，而且在促成了国共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和平解决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北平傅作义同意与共产党讲和，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有当时在乎的一批学术名流的功劳。1949年初，经过多方努力，北平会谈正式拉开。可是傅作义对和谈尚有迟疑，一时难下决心。这时他想到了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1月16日，他特邀一批学术名流到中南海勤政厅共用西餐。是战，是和，学界名流的意见非同寻常，所以，这次聚会意义极不一般，它关系到北平200多万苍生能否逃避战争炮火，关系到这座集中华古今文明于一身的古城能否脱此劫难。傅作义需要听听学者的"最后一席话"来作出最后的决定。傅作义诚邀的代表有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历史学家杨人楩、生物学家胡先骕、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宴会上，傅作义诚恳地说："局势如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以作定夺。"大家相继发言。一致的意见是只有和平，别无出路。徐悲鸿说："北平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在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也是罕见的。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毁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损伤，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北大历史系教授杨人楩情绪激动地说："内战已经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希望傅先生效仿意大利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学者的一番话坚定了傅作义与共产党和谈的决心。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军队接收和平改编，他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师级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上所说的一番话，明显有受到知识分子"一席话"的影响："回忆抗战胜利初，我是以极端兴奋的心情，希望和平统一，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及至旧政协破灭后；在蒋先生错误的'戡乱'政策之下，我辞职既不可能，而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又没有从本质上认识，把若干片面的现象，或执行过程中个别地区所发生的个别偏向，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政策。因而不自觉地还认为自己确确实实是为人民，'戡乱'是应该的。到了北平以后，许多事实使我发生了疑问，为什么青年学生要同情共产党？我平时所尊敬的人为什么也有一大部分同情共产党？解放区为什么就没有反共产党的游击队？尤其使我惊异的是共产党员一批倒下去，一批又起来，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抗战时期，人民拥护我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现在人民见我们像仇人一样躲得远远的。大家想想，我们的政治怎么维持呢？反过来看看共产党、解放军却是越来越强，底盘越来越大。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再说北平城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精粹所在，不容毁于战火；260万市民是无辜的，不应遭受涂炭。"北平的和平解放，曾经为文物保护忧心如焚的知识分子终于长舒一口气，全国的知识界对共产党的认识因之又加深了一层。

对于高等学府，共产党也很重视，处理慎重。政策是第一步"接而不管"，让原来维持校务的人继续维持校务，只派联络员进行工作上的联系，稳定了学校秩序。过了一段时间，派军代表进驻，这是政策的第二步。解放军"秋毫无犯"的行动赢得了师生由衷的钦佩，将他们称为"王者之师、有征无战"。

第三节 “小我”与“大众”

1949年前后，国共双方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意向：“爱党”与“爱国”概念是统一的；不爱“党”，则其政治立场就有问题。尽管这种观点有时并没有公开表达出来，但它确实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在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应该划等号，实际上已成为判断知识分子立场的一根重要标尺。部分知识分子却认为，爱党与爱国应该分开的，他们并没有因为爱国就一定得爱党。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当时以及加入新政权后，势必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这在曾经为“中间派”及“民主个人主义者”及政治上持中性态度的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

1949年的中间派的态度大多明朗，“一边倒”已成定势。为了找一条中间路线，他们曾经殚精竭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对中间势力的压制打击，彻底粉碎了中间人士的“中间路线梦”。他们只有独立的舆论阵地，而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在国共双方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局势面前，他们的仅有的一点中间力量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日益深得人心的共产党。

共产党在关键时候，对中间力量的工作做得天衣无缝。1948年的“五一”指示，就富有强大震撼力。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号召，吸引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1949年3月以后，不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从南方一些地方开赴东北、平山，继而聚集北平；曾经是中间派舆论阵地的上海《大公报》、《观察》杂志等，都已投到共产党的怀抱。1949年，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或一个群体的中间路线的代表，已不存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中间派人士，以知识分子的个人身份呼吁和平，走中间路线。可是，他们的呼吁，遇到严酷的现实，显得软弱无力：不能获得国民党的认同，又惹怒了如日中天的共产党，两头讨不到好。原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先生就是这类人士的代表。

从1949年元月蒋介石下野起到2月间，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上接连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对国共双方都说了不少话。对于国民党，主要集中在内战的责任方面，认为，内战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现在不能逃脱责任，目下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对于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共产党再以武力打下去，即使统一全国，但那时便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不要联合、不要民主，结果不会稳定，统一不会长久……梁漱溟对自己痛快淋漓的“高见”十分自信，认为国人看了都会叫好。尽管梁的动机是想为国家民族“止息干戈兵乱之苦”，实现和平，以便百姓休养生息，国家尽快进行经济建设，也确想“谴责国民党有罪于国家民族”。实际上

是各打五十大板，更有"为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开脱罪责"之意。

对于他的言论，国民党没有领他的情，胜券在握的共产党更为反感，当时就受尽了舆论界的冷嘲热讽。署名萧风的作者写过一篇《中间派的悲哀》，专门就梁漱溟的中间立场作了分析：这年头，说话真不容易。"左"了要被人家戴上一顶"奸匪"的红帽子，"右"了，又要被人加上"顽固"、"反动"的头衔，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吧，似乎应该左右逢源了。然而不然，弄得不好，徒贻"投机"、"帮闲"之讥。读过梁最近的3篇文章，一副和世佬面孔，一方面要国民党负全部战争的责任，一方面又要"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以，对国家人民所遭损害，同深疚歉"。虽然有点矛盾，但不如此，就不能成为国共以外的"公正人士"。可惜的是梁先生的杰作不能赢得喝彩，反而嘘声四起，左边的《中建》、《新时代》等几个刊物以《质梁漱溟》、《斥梁漱溟》、《梁漱溟政治的错觉》为题，加以围攻；而右边的刊物《新希望》也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似乎这场战争完全是国民党在唱独角戏，而共党并没有登场一样，这种说法是难以使人悦服的。"以梁先生之善观风色，面面俱到，尚不免受左右夹攻，无怪自由主义大师"过河卒子"胡适之先生，南飞以后，不声不响，诚属识时务者也。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因为国共双方都争取中间派人士，所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党派和社会贤达，红极一时，大有左右逢源之乐。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间派人士已经不入于杨，即入于墨，颇感"左右做人难"、"左右不讨好"的痛苦了。梁漱溟所声明的"只言论，不行动"，不代表任何党派、组织，完全的个人言论自由言论，足以证明，1949年中间路线的阵营已不复存在，原来的中间派在政治态度上已一边倒向共产党。他们的"中间路线"言论，对于共产党来说，已不是以往的那种可以团结利用的舆论，而是一种"反动"，他们已完全失去了旧政协时期，自由倡导政治改革、呼吁民主自由的广阔政治空间。解放前夕，有人请梁漱溟去香港，但他还是留在内地，于1950年初，离川赴京，加入新政协。但梁漱溟的这些文章，却陈账难销，与他日后同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结怨不无关系。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都重提此事，说"从历史上看，梁的路线名为帮助人民民主力量取得胜利，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路线"，"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实质是反动的，一贯反动"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民主人士"概念的理解，与解放前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1949年，"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冲击，在共产党新政权下，这种冲击往往以政治运动形式表现出来。在1949年的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新政协开会前夕），毛泽东一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等7篇论文，猛烈抨击了对美帝国主义还有幻想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说是必要的，各地都召开座谈会、报告会，批判"白皮书"，对"民主个人主义者"进行尖锐批评。不言而喻，在工人、农民、士兵中间是不会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有这种思想的，只是那些曾经或正在彷徨动摇着的、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实践过程中，具体负责文化工作的一些同志，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讲话、写文章，很难分清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之间、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区别，因此，也很容易忘记"有理、有利、有节"中的"有节"，而误伤了一些正在转变中的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

轻视、歧视乃至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在党内有很深、很久、也很复杂的基因，批判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斗争存在过火的现象。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不断在报上尖锐措辞，抨击民主个人主义者。如文史学家徐中玉就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是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与'集体主义'是分不开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实在是种不通的胡说，否则那种人就必然是一种伪装的民主分子，骨子里实在是恶霸、匪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时刻提高警惕，不要受这种恶棍匪特们的包围和游说，我们应该把他们的原形揭露出来，给以严重的打击。"这种政治口号式的批评攻击，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比比皆是。

那些自认为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知识分子，满以为在共产党得天下后，凭他们的学术声望和性情，在新政府内一样得到重用。新政府却没有因为他们的学术声望而淡漠他们在旧政权下染上的政治色彩，还有他们在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政治热情程度。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之中，有的对时局、对党政、对人事发表过不少自己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在一个主张自由的社会中，这纯属正常现象，毋须担心什么政治"帽子"或"紧箍咒"。然而，一些与旧政权关系暧昧，或在新政权建立前夕政治姿态欠高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所受的礼遇，并没有他们期望的那样高。

早在 1948 年下半年，随着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左派势力的逐渐壮大，那些思想独立、政治中立的自由派人士或个性较强的知识分子，在左派的心目中就已成为异己分子。这与 30 年代左联与其他文学团体的争论性质有所不同。那时，共产党的力量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学工作者）的争论也多限于创作流派的争论，不会因为某人的观点就划定他们的政治派别，就决定他们的政治命运。1949 年前后则不一样，其时共产党得天下指日可待，学术争论的政治倾向，往往影响着一批知识分子日后的政治命运。

三大战役尚在酝酿之时，共产党对胜利就已充满信心，所表露出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已足以赢得群众中的大多数，同样也感染着众多知识分子。正如毛泽东 1948 年元旦在晋察冀边区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结束语中写到的那样："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目睹了中国经济凋敝，民生贫困，物质匮乏，社会动乱，他们迫切盼望一个新的政府来收拾国家这个烂摊子，这个政府，必须是代表人民的。所以，只要以人民的利益相号召，就会争取具有强烈忧国忧民意识和民族情绪的知识分子的拥护。知识分子追求独立精神的传统，又决定他们不会完全放弃独立思维的个性。可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共产党胜利面前，却把共产党军事上的胜利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绝对胜利，因而产生对"绝对真理"以及手握"绝对真理"政党领袖或军事领袖的过度崇拜，由此走向极端。把如此政治观念引入学术争论，就难免产生非红即白、非好即坏、非进步即落后、非革命即反动的价值两分判断。

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郭沫若。郭在大革命时期的犀利文章令蒋介石闻之色变，恨之入骨，共产党则赏识有加。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欢庆50大寿，出席寿庆嘉宾数以千计，成为共产党颇为倚赖的文坛首领。1948～1949年期间，郭实际上担负起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特殊的名望和身份，使他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讲话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当此国共势力优劣高下判然若揭之际，他的评论往往能决定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1948年元月3日，郭沫若在中山大学作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报告，指控了"反人民的文艺"的表现，即"茶色文艺"、"黄色文艺"、"无所谓的文艺"和"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并第一次点了沈从文、萧乾等人的名字，而以萧乾为最"坏"，宣布对这些"反人民的文艺"应予消灭，即使是作为文艺上所谓中间路线的"无所谓文艺"，"可能时应开导，争取，否则则予以揭穿"。郭毫不隐讳地声称，要消灭他们，不是光靠文艺方面的问题，还得靠政治上的努力。这是第一次按照"非红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非人民即反人民"的逻辑，把作家（知识分子）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并要求借助政治的力量消灭他们。

后来郭又在香港一个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文坛一瞥》、《斥反动文艺》之类的文章，以特有的视觉，重申了这些观点。把沈从文等"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被他点中的人士，脸上仿如被黥上了深深的印记，揩抹不去，从此命运多舛。在郭讲话、著文后，"沈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写不出小说了"，甚至想自杀。其实，今天看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贬低。他当时对许多人的评价均值得商榷，经他"一评"、"一瞥"，有人不但从此被"瞥"下了文坛，也"瞥"出了"人民阵营"。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反人民"的沈从文，在1948～1949年初，也曾经有过去留两种选择：先是北京大学当局有关人士登门造访，劝他离开北平去台湾，并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大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来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教育文艺事业出力。而在他自己，早就拿定主意：不去台湾！然而，北平解放前后，北大一部分左派学生把郭沫若的言论重新抄在大字报上，悬挂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真的把他打昏了，"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他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等不断升级的批判，几乎把他推人黄泉。

同样，那些对于新政权表态不及时，或在国民党有关机构做过事的人，虽然在最后一刻选择留下来，并指望在新政权下，受到重用。现实却使他们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如平时少问政事的顾颉刚，尽管史学研究早已名著全国，而在新政权下的待遇似乎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在北平成立。顾颉刚未被邀请。这对顾颉刚无疑是一大打击。他在日记中写道："若予先解放而往，当不至如此也。前数年，予所以不能不接近政府，实以既办大中国（指大中国图书出版局），便不得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不虑即此以使人歧视。"（1949.7.11）但是据顾颉刚之女顾潮分析，顾颉刚被摈排的主要原因，是在办大中国图书出版局之前，因朱家骅的关系，而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过。即便他"先解放而往"，也不一定不是这样。因此，此年八九月份，

顾颉刚到北平联系建立禹贡学会及出版《禹贡》杂志也归于流产。对于新政权而言，这些人身上有国民党印记，即使他们冲新政权而留下来，学术上的成就却不能掩盖政治上的“斑点”。

最终选择留下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强烈的人，要获得新政权政治上的认可，就必须将自己的棱角刨光，通过“改造”、“批判”，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放弃自我。“自由主义”的倡导者、美学大师朱光潜，1948年8月6日，在《自由主义与文艺》中还强调：“自由是文艺的本体，所以问题并不在文艺应该或不应该自由，而在我们是否真正要文艺。是文艺，就必有它的创造性，这就无疑说它的自由性；没有创造性或自由性底文艺根本不能成为文艺。”他断言：“文艺的自由就是自主，就创造的活动来说，就是自生自发”，竭力呼吁“不能凭文艺以外某一种力量（无论是哲学底，宗教底，道德底或政治底）奴使文艺，强迫它走这个方向不走那个方向；因为如果创造所必须底灵感缺乏，我们纵然用尽思考和意志力，也决定创造不出文艺作品，而奴使文艺是要凭思考和意志力来炮制文艺。”他强调的“自由主义”主张与当时毛泽东批评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最后选择留在大陆。按他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在北平解放前，毅然留在北平，并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有赞襄之功。不过，解放后思想的“改造”和“批判”也在所难免。朱光潜的自我改造和批判可谓及时而深刻，他在发表《自由主义与文艺》后几个月，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检讨书《我的检查》，几乎完全推翻了自己不久前的思想或学说。他这样写道：

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我个人的转变不过是大海波浪中的一点小浪纹，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动，并非出于偶然……像每个望中国好一点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在解放前，对于共产党的主张和作风的认识极端模糊隐约，所看到的只是国民党官方杂志报纸，所接触的只是和我年龄见解差不多的人物，一向处在恶意宣传的蒙蔽里。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共产党。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的干部的吃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才忽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掉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走上大道路，得到生机。这是我感觉兴奋的景象。

其次，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书籍，像《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辩证法之类。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

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我认为共产党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论上所应走而在事实上所必走的一条大道。

在自觉不自觉的自我"清算"中，哲学史大师冯友兰先生通过1949年一年以来的"学习"，也总结出一条结论，即他过去的哲学思想，阻碍了他自己的进步，并阻碍了有些别人的进步；他以前的哲学思想不符合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精神方法所得到的，"到处都是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个人与群众脱节，理智与情感脱节。"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学术生涯和学术识见。

思想上的彻底转变，是否能在几个月内完成，只有大师们自己最清楚。但他们表达了对共产党的作风、态度、热忱、精神，使他由衷的钦佩，可以看出，他们对共产党是真心拥护的，没有虚假的成分，也没有政治投机的意图。诚如季羡林回忆那样："孟实先生同一大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与考验、前进与停滞，既走过阳光大道，也走过独木山桥，最终还是认识了真理，认为共产党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因而坚定不移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孟实先生一生是大节不亏的，他走的道路是一切正直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不过，一个人的学术思想非朝夕形成，大师们因为自己政治立场的转变而彻底否定自己多年形成的学术思想，又令后人难以全然理解；时隔已久，重新进入他们当时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政治气候要求知识分子放弃个人小我，服从大众。于是，政府通过办大学短训班、学习班来给思想模糊的人清理头脑。一些参加"革大""洗脑"的人，脑子也并未洗净。洗不净的，则等于自弃于社会，与大众隔离。文物专家史树青回忆说："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情也是复杂的，既有对新政权的拥护，又有失去自我的痛苦和无奈。他说："在革大时，体力精力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地沉默活下来。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政治要求个人渺小，自己也把个人看得渺小，是解放初期许多人都遇到的问题。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代表工农，才是进步的，革命的，否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是"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思想"，民主个人主义者，则是帝国主义在我们内部寻找的破坏、阻挠革命事业的代理人。这一观点几乎成了定论。一些学者指出，个人在大众之中，个人应该屈就大众，以大众的自由为自由；而不应该使大众屈就个人，以个人的自由为自由；个人之能在人民之中，而不能在人民之上或人民之外；在人民大众中的自由是真自由，在人民大众之上或之外的自由是伪自由，真自由如"民主的集体主义"，伪自由如"民主个人主义"。要打倒"伪自由"，提倡真自由。个体的自由已被置

于人民大众自由的对立面，因而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思维逻辑：主张个人自由的人，就不属于人民大众群体；不属于人民大众群体的人，就不是革命的、进步的，就要肃清打倒。

学术政治化，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倾向，从1949年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官方召集的知识分子会议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在诸多场合的发言，来体味知识分子当时所处的或即将面临的政治氛围。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茶话会，畅谈当前和今后的文艺主题。会上，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都表了态。周扬指出：在解放区，文艺是自觉服从政治、反映政治的，自称为超政治的文艺是不存在的。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一方面必须通晓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两者是不能分开的。解放区文艺还有许多缺点，但它有丰富内容、强烈生命力和伟大前途。沈雁冰说：在当前即将解放的城市中，应当注意反对反动统治者用以迎合小资产阶级趣味的麻醉性的黄色文艺。郭沫若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为光明天使；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就像是画龙点睛地向五四以来在黑暗中摸索的文艺界点起了火炬，希望文艺工作者把毛泽东旗帜随军事发展插到长江流域，插遍全中国；把文艺工作者变成为灵魂的工程师，为新中国创造新灵魂新人类。戏剧家洪深表示：愿意在思想上百分之百毫无保留地接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业务上不折不扣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技术。鲁迅先生的遗孀、作家许广平感到：来到解放区，非常愉快，就有一桩事令她不愉快，那就是以《八月乡村》一书受到鲁迅介绍的萧军，在东北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认为他完全违背了鲁迅的精神，根本不配称为鲁迅的学生。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件事教育了一切才子式的知识分子。画家徐悲鸿、诗人冯至、作家俞平伯、曹靖华等都以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对毛泽东文艺政策的赞扬和学习革命的热情。这次茶话会，可以说是全国文联的前奏，为全国文联奠定了基调。

许多人的发言，真诚地表达了对新社会的赞扬，对共产党政策的拥护。但个别人近乎谀词的吹捧，却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意识，把艺术规律看成是应该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牵制的客体。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只表现工农兵的条框从那时就开始编制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有些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加篾抽箍，结果条框越严密，他们自己就越不自由，自己遮住了自己的视线，禁锢了自己的思想。与政治的过于密切，倒使他们真的变得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了。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批判后，内心保留若干个人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最终都要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大众”。朱光潜先生抨击过的政治“奴使”文艺的弊端，在几个月后就得到了兑现，这也许是大师始料不及的。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吴晗作为知识分子角色的转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心目中，史家、哲学家、文学家都毫无例外地“为政治服务”，所有的这“家”那“家”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隶属于当下政治。1949年3月，吴晗到达华北解放区，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很高的礼遇，这一方面归功于他在国统区发表的一系列犀利辛辣的讽刺国民党的文章，深得共产党称赞，也由于他在政权转换关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角色转换比较顺利，尽管转换过程中有过勉强，但最后选择的还是放弃小我的“学术”，服从大局的“政治”；纯粹政治观点被带进了学术研究之中，学术的科学性和学者

本人应具有的独立性受到严重损害。吴晗的三改《朱元璋》最能说明这一点。这部著作1944年初版时，名为《明太祖》，作者写作动机是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有"指桑骂槐"的意思。1948年作第一次修改时，影射的色彩更浓了，朱元璋几乎成了蒋介石化身。该书后来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指示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朱的晚年）。"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又亲自给吴晗写信，指出在方法上，"似尚未完全接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听了领袖的话，吴晗先对该书作了两次修改，感觉有所提高。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传》的自序中，吴晗说，这些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但在今天看来，修改后的《朱元璋传》"在史料考据上比以前是严谨了，但整体质量却大不如前；如果说解放前的稿子还带有吴晗强烈的学术个性和流动生辉的学术文采的话，那么，那修改后的两稿，显得是那样的平庸、呆板，一如同时代的大部分史学著作，焉焉然无生气也。"卷进政治漩涡的吴晗，想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已经不可能，连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要随政治指挥棒转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尚未征得吴晗本人的意见，新政府便任命他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想辞职未获批准，反而要为"辞职"一事自我检讨为"知识分子的洁癖"。这以后，吴晗越来越习惯做遵命文章，1959年终于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想到日后却惹来杀身之祸。

文艺创作上，1949年文艺工作者面临着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解放区、国统区的许多作家，在新政权建立伊始，都感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唯恐自己的作品是反映小资产阶级情调，背离党的要求，老作家，包括著名作家都感到，现在写不出东西了。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2月1日，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聚集在北大，与北大学生一起座谈，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会上，不少人就提出，党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组织，党性是不会妨碍创作自由的，文艺在党的领导下，可以发展，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政治第一位，艺术第二位，艺术性应该包括在政治性之中，政治性越高越好，艺术性的政治性也是这样。有人把党性和人民性划上等号。党性就是人民的意志，符合人民利益的作品，就富有党性。写不出东西的人，是由于自己的政治性、党性不强，改造不到位。

文艺创作服从政治需要的趋向1949年以后日趋明显。文艺工作者的个体创作自由和独立的创作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此起彼伏的政治声浪淹没了，连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推出的两部力作《龙须沟》、《两面虎》（后改为《春华秋实》），都是上级的命题作品。其时，龙须沟工程还未竣工，《龙须沟》剧本就出来了，多少有些违背艺术规律；《两面虎》则在行政领导的审看中，改了12遍，每一遍都从头写起。解放后，"写不出东西"，是许多文艺工作者最大的苦恼，这不只是1957年以后的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文学大师"，1949年以后，并没有留下划时代的巨著。"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以及生活在当代社会的几代人，所以能记住大师们，很大程度上是复忆大师们解放前的"老本"。

文艺界如此，哲学、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教了一辈子哲学的知识分子居然被什么是"唯物"、什么是"唯心"的问题搞糊涂了，不知作何解释。

组织上给他们递送来这样的信息：把过去的事讲清楚了，共产党还是要他们的。北平解放后不久，一些知识分子就给毛泽东写信表态，有的赞扬毛的丰功伟绩，有的则是承认错误，清算自己的思想。这对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少人心理有很多解不开疙瘩，一时难以转弯。如冯友兰在1949年10月，效仿别人，写信给毛泽东表明心迹，主动承认过去帮国民党忙的“错误”，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新理论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原是为了向新政权表忠心，自己到底有何错误，连自己都不太清楚，可是新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居然就认定他们有错误，并提出以“老实态度”改正错误。尽管心理反感，但也莫之如何。1949年10月，金岳霖、冯友兰在思想改造中，都因多次检查不获通过而痛苦不堪。后来金、冯终于“脱胎换骨”，冯多次检讨，改写他的名著《中国哲学史》，越改越糟，到晚年乃幡然醒悟，重写哲学史，却又未能全部出版；金不得不放弃学术独立，因为听话，表现好，1956年还成为“特殊材料”铸成的人。金的三部代表作《知识论》、《论道》、《逻辑》都完成于1948年以前，1949年以后，金被“解放”了，脱胎而换骨，然而他的学术生命也就基本终止了，而那时金才50岁出头，正是人文学者的黄金年代。何以如此？金先生自己的话最能说明一切：“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们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既是政治，也是‘政治”’；“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党人盟，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我如果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这才争取人盟入党了。”大师这种典型的哲学话语道出了最为简明的道理：现实的人就要与现实政治相适应，而不能反悖现实政治，超越现实政治，即使是抽象思维也不例外；既然绝大多数人都能适应政治，作为知识分子个体，也只好从众，且不是“糊涂”、而是“心明眼亮”的“从”。

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以沉默方式，在心中保存一部分“自由”的田地。他们对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现实的政治模式缺乏热情，但有他们的政治见解。在他们感到这些见解与新政治不相符合时，只好把它们封存起来。如对把西洋哲学引进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张东荪、政治学家钱端升等，解放前都是笔锋甚劲的作者，在《观察》等很有影响的刊物上，经常可看到他们冲劲十足、纵论时事的宏文。解放后，他们几乎没有写过什么著作或文章，即便有人约稿催书，也不为所动。政治与文艺、学术的关系，也许永远“斩不断、理还乱”。

1949年前后，学术政治化的倾向引起一些学者的忧虑，担心这样的学术氛围，将给学术研究造成负面影响。1950年3月，顾颉刚在参加中国新史学会上海分会第一次学术会议时就说过：“此会以讨论学术为任务，即是要建立唯物史观的中国史，意思甚好，但大家或为政治而忙，或为生活而忙，而学术之事是不可以随便应付，然则将何以收获乎？”“随便应付”是对学术政治化倾向的一句简捷精当的描述。一些学者想在学术上继续有所建树，但又无法主宰今后的政治命运，生怕因为他们政治上的“不合时宜”

而被中断学术研究。顾颉刚在 1950 年 8 月 5 日写给另一位史学家刘节的信中就谈到他的顾虑："我辈在今日固不合时宜，然百年之后，时代骄子都尽，学术界中所纪念者匪异人任矣。每念清末有俞、孙，民初有章、王，已将清代学术引导作结论的地步，而政治潮流，来势过猛，炫人眼目，失其正常，遂将此应得之收成放下。我辈如能排万难而为之，则累累硕果皆在掌握中矣。惟士生今日，生活负担过重，不知能终容我为之否耳。"顾先生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识见，因为这类事情历史上已有"前车"，难保后来没有"覆辙"。

1949 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大潮中，被庞大的工农阶级强光映照，日趋黯然，很难觅到"自我"的影子。而共产党的一些工农干部，革命热情很高，在文化问题上则几乎是门外汉，使他们对知识分子产生本能的抵制。夏衍在上海曾搞过一次测试，以初中尺度为标准，希望六七十分的能占多数，结果 60 分以下的竟占 70%，连"五四运动"爆发的时间答对的也寥寥无几，常识性的笑话更多。虽然没有公布成绩，但事后还有人称这种"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工农干部地位的陡升，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志气给比了下去，而当时的工农干部毫无疑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人民"的群体似汪洋大海一般，淹没了所有个体。个体要得到保存，就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包括精神的和肉体的，屈服于"群体"，主动加人群体。倘若付不起"代价"，想在群体之外游离，那就等于自甘沉静，因为学术的胳膊永远扭不过政治的大腿。1949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 点，中华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时全国政协尚在筹备之中，大陆还未完全解放，这是共产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迅速汇聚到共产党的大旗之下。但受过郭沫若点名批判的沈从文，名字果然不在 733 人之中，引起了与会的巴金等文坛名流的遗憾。他们认为，沈从文这样一个写出《边城》、《八骏图》和《湘行散记》等作品的人，不论在中短篇小说方面，还是在散文方面，他都是中国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的卓越代表，把他排挤在文坛大门之外，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公平的。

1949 年，尽管共产党在政治上尽可能做得开明，但对众多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学术思想中曾经流露出的政治观还是左右着他们今后的文学或学术生命，他们虽然留在大陆，但他们并没有从肉体到精神，都被新政权接收。他们留下来，原本就想融进新政权，服务于新政权，但他们发表过的言论仿佛使他们犯了"前科"，政治大门迟迟没有开启。1966 年，曾为"自由派人士"代表之一的萧乾，无法忍受"革命"小将对他瘦弱娇小的妻子大肆侮辱，打算自杀，在留给妻子的遗言中说："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这不应仅是 17 年以后的感觉，在 17 年前，他们今天辛酸的处境就有了预兆："那阵子始终觉得'不服水土'，可又没有认真去'服'。于是，大风浪终于朝我刮来，而且一下子就把我卷进深渊。""适应性"不强，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与此相反，有些人通过学习，能很快放弃原有的思想和信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很快就适应了新社会，也容易为新政权接收。一位曾经参加"革大"首批 3 个月学习的知识分子，在谈到"革大"3 个月学习体会时，就觉得自己已被"彻底熔炼了一遭，周身得到了一次净化"。他用自己的感受推理所有知识分子学员的感受时说：

“革大是一个大的熔炉，凡是旧的知识分子一投入这熔炉的，自己有决心改造自己，那么就能改造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这3个月的学习，是比十多年学习都收获得多。这3个月的学习，在我们同学整个的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初步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们这一批一万多人，都抛弃了个人利益，服务群众利益，人民哪儿需要我们，我们便到哪儿去，不讲价钱，我们正预备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到社会大学去学习，投入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忠于人民的勤务员，成为一名革命战士，这不是唱高调，是因为我们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他所说的“我们”，如果说代表他自己或他周围的一部分人，应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说包容了“革大”所有一万多名学员的认识，恐怕会挂一漏万。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思想迅速转变过来，因而，很快适应了新社会。这些人在新政权下，是容易被吸收和任用的。如1949年8月下旬，参加过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费孝通先生，对新社会和共产党几乎是顶礼膜拜。早在1948年，他对能否为共产党的新政权认可还无十足把握。只是他觉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更能为建设中国作出贡献。这种思想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曾经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忠实的反对派”中的一员，但是在中国政府下，他可以有效地工作。虽然于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受到共产党人的抨击，他仍在1948年底道出了心愿：为中国的工农业作出贡献，同时还要批评共产党——在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在与共产党接触后，思想急速转变。他说，北平各界代表会只开了6天，对他来说是上了6天课，这6天课学到的东西抵上过去的6年，甚至30多年。30多年来，他所追求、所梦想的民主在这几天中得到了。解放以来，他对共产党钦佩的地方是苦干、负责、谦虚、有办法、不怕麻烦，中国有希望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已在眼睛面前完全证实了。同样，他对共产党其他政策包括知识分子的学习改造运动，也是十分赞成的。1949年11月，《观察》复刊后，作为杂志原主要撰稿人之一的费孝通，仍然不断在《观察》上发文，其中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竟占了大部分。像《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进步的包袱》等，都是他对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认识和赞扬。

生活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刚刚置身新社会，许多学问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在思想巨变之际，不少人大有跟不上的苦衷。除了少数左派人士之外，绝大多人都是被新政权认为是有错误的，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革命领导阶级之外。尽管共产党也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与革命力量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他们仍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文汇报》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知识分子在他没有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没下决心为人民利益服务并和工农结合以前，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革命知识分子虽有“先锋”、“桥梁”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参加革命到最后胜利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就往往脱离革命而采取消极态度，少数的甚至会投到敌人方面去；知识分子往往又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自大性，轻视工农，害怕劳动，自由散漫，这些都只有在长期群众斗争中才能洗刷干净；此外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出身不同，阶级属性也就不同，并处在不断分化

之中，在确定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之前，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斗争目标，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所以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基本可以看成是当时官方的观念，等于给知识分子定了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科技工作会议上，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做基本估计时，才首先肯定了我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总算把知识分子归人了劳动人民的行列。然而，知识分子有望享有的这一点“殊荣”，也没有得到最高领导的首肯。至于知识分子有幸成为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又是20年以后的事了。

1949年，国统区知识分子厌倦现实社会，向往和平、安定，保全中华文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共新政权下，民主生活是相当充分的，各界上层人士，都热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自我改造主观世界，他们私人生活是自由、舒畅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为共产党最后取得胜利，顺利建立、巩固新政权准备了必要条件。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便因胜而骄，一连写出批《清官秘史》、批武训、批俞平伯、批胡适等宏文，旗角开始向左飘转。过于强调政治性、歧视知识分子的苗头已经滋生。一些城市如上海文化界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在1950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后才正式开始的。在这之前，某些单位开始酝酿和试点，由于要求过高，加上对情况不了解，方法简单，伤害了部分知识分子感情的事也是不少的。如果从那时开始，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再宽容一些，学术氛围再活跃一些，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上下一心，共期有成，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将更为巨大；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及综合国力，必将是另一番面貌。

第六章　动与静——校园环境与师生追求

第一节　动中有静的校园

抗战初起，学生们就曾发出“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的呼声。1949年前后，在国共决战的紧要关头，学生“课桌”再一次受到严重威胁。学生虽然不像民族战争形势下，随时担心做亡国奴。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崩溃，国共军事决战的全面展开，不能不使学生为生计和安定的学习环境担心。

抗战时期，华北的三大著名高等院校，为了逃避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迁到西南后方，创建了西南联大，成功实现了诸校联合办学，在教书育人、学术科研、参与社会等方面，成果卓著，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大奇迹。1949年前后，中国又出现一阵迁校热潮，但这时的迁校，无论是师生员工的心态，还是政府提供的条件，都与抗战时期的迁校有着本质的不同。学校、学生的动与静，反映了国共两派政治力量争取利用学校、学生政策的成与败；师生员工对迁校的态度折射了他们对政治力量的赞同和反对。

1948年到1949年，国共双方都在竭力争取学校和学生。国统区在北方吃紧、豪门趋吉避凶之时，学校也受到影响。先是东北解放之后，共产党除军事外，还不断宣传解放区重视知识分子的消息。如清华教授孟庆基任石家庄××厂厂长、著名历史教授吴晗平安到达解放区等消息，在华北教育界引起波澜。于是，国统区各种传言纷纷出现，如共方已决定，梅贻琦留掌清华、范文澜将代替胡适等等。右派教授认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迁校”动议随之抛出。1948年9月以后，国民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军事不断败北，为了不让学校落人共产党之手，先后动员一些学校迁校。最先被要求迁校、并付诸实施的，主要是战火最逼近的前线地区的学校，其中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归入迁移的大、专、中、小学校最多。

1948年9月初，国立山西大学奉教育部电令，文、法、工各院二年级以上学生及医学院医科二年级以上学生，均迁到张垣上课，校址在张垣市长春路陈列馆。学生从9月4日起，到张垣报到。而校本部及一年级学生又迁往北平，一校两址，管理不便，11月，张垣分校决定迁平。10月，国立河南大学奉令迁到苏州，于“双十节”开学。12月底，西北大学、西北公学院及西北农学院决定在寒假内迁到成都。

政府要求迁校，但迁校的目的是什么，迁移的新地址在哪里，经费如何落实，怎样才能保证迁移过程中，图书仪器不遭损坏？诸如此类的问题，政府无法作出令师生员工信服的回答。更关键的是师生的人心问题。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复员后的几年内，对大学的兴废、教授们的饥饱死活一向不闻不问，可是在1948年底和1949年，在“抢救”部分学人南飞的同时，倒热心起把在北方的国立院校迁到“安全地区”，又据说是要成立“联合大学”，这不能不使师生对迁校的效果产生怀疑。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北方军事形势危急，但各大专院校尤其是平津教授会及学生自治会，绝大多数反对学校南迁。不少师生听说1948年底，连在广州这样安全区的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都闹得要提前放寒假，纷纷向当局提出还有什么其他“安全区”可去、“南方就平安了吗”之类的质问。于是，平津等地诸多老牌、名牌大学拒迁的呼声日益高涨。北平天主教会设立的辅仁大学，首先决定不迁校，燕大、清华、北大等学校教授会都决定，原地不动。1948年12月8日，陈雪屏（教育部代部长）不得不在北平宣布，平津国立院校及重要文教机关在原则上不迁移。再说也无处、无法、无力可迁。到11月底为止，平津真正迁校的只有“唐工”（唐山工学院）一校，其余院校多不迁。于是，国民党政府见平津地区的迁校活动难以实行，转而改成抢运学人活动。

平津地区迁校不成，国民党政府又试图动员南方学校迁移。中央大学1949年元旦就接到教育部有关迁校的密电，大多数教授表示反对。教授会主席郑集说：“学校经不起搬迁折腾，一迁已甚，何以堪再，西迁是因为日寇入侵，不得已而为；而此次是国内战争，根本没有搬迁之必要。”理学院教授张江树对迁校更是不满，他对借“同窗之谊”前来说项的中大校长周鸿经冷冷地说：“你说到台湾去，条件怎么好怎么好的，我可是没有脚的呀！不像你们这些坐飞机的……将来在台湾无亲无靠，弄得讨饭都没路，我何苦去呢？”1949年4月29日，国民党政府要求各学校紧急疏散。首批为上海法学院、国立暨南大学、私立光华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复旦大学、私立沪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15所学校，统统限于30日前疏散，疏散地点及办法由各学校自行决定。迁移事宜由上海市警察局严格督导办理，如有藉故拖延者，即予强制执行。这遭到多数学校的拒绝。浙大校长竺可桢也与学生一起，抵制迁校。1949年5月17日，就在解放军进入武汉之际，武大校长周鲠生，特别召开校务会议，向该会恳求辞职，被校务会一致挽留，并作出决议：该校一切行政，仍请周校长按原有机构，继续主持；推举代表5人，于紧要时，协助校长处理应变事宜。

一些学校没有因校长的离开而陷于混乱，校务机关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如北大校长胡适1948年底离开北平，学生自治会电促他“火速返平，主持校政”，但千唤万唤，他就是不回头。而北大仍井然有序地运行着，14日举行期末校务会，各院系主任出席者达48人，决定下学期校历照旧，不提前上课。校长寓所门外高挂“校长公寓”的牌子，一部分教授和助教迁入，以免被军人占住，校务常委汤用彤在内坐镇，在校学生2913人，请求休学的仅99人。清华学生在校长梅贻琦南下后，秩序安宁。1948年底，天津北洋大学校长张含英未办交代，擅离岗位，离校赴宁，一时腾笑学府士林。北洋师生依照民主方式产生15人委员会，决定遇到重大事项由委员会决定，学堂并未发生大

的波动。

首都南京及上海的高校，这一段时间也陷人了非官方控制状态。1949年1月16日，南京曾一度混乱，连街上的警察都撤下了岗，中央大学这时正是理学院兼数学系主任周鸿经代理校长（1947年“五·二〇”运动爆发后，中大校长吴有训提出辞去校长，出席联合国会议，中大一直没有正式任命校长，先是由医学院院长戚寿南代理校长，1948年秋由周鸿经代理校长）。周一看南京秩序混乱，就带着中央大学的校印离开了南京。周鸿经私自离校，学校又陷于经费极端困难的境地。中文系的胡小石、社会系的孙本文等为此出面活动，召开教授会，成立校务维持会，由梁希任主任委员（梁只参加了一次会后即离开南京，经苏北到解放区了），胡小石任副主任委员。梁希离校后，中大实际工作由胡小石主持。直到南京解放，中央大学秩序一直比较稳定。

为了应付各种不测，许多学校向政府提出发放应变费的要求，大多没有落实，于是，学校师生纷纷行动起来，自己组织起应变机构，筹集应变经费。同时，还要就各种事务与政府交涉，这些工作多由教师与学生联手进行。政府无形之中，把学校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如1949年1月19日，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陈维稷、该系教授苏延宾被捕，王校长及曹教务长21日前往探视，请求释放。在这一周前，该校已有5名学生被捕。交大学生为营救教授及同学，即商行应变准备等问题，于23日召开系科代表大会。当天，原有大考课程已经校方同意，暂停一天，推延到27日举行。教授会也决定召开扩大理事会，发表抗议宣言；应变机构中的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与校工代表均由各单位选出。学生自治会通过在学校放映电影，举行音乐舞蹈表演，筹募应变经费。整个学校的工作与政府几乎完全脱节，一切由学校自治。各学校的应变机构在以后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中，起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大学的情况来看，1949年前后，国统区国立大学或著名私立大学，基本处于政府行政控制之外。师生们始终认为，现在的形势与抗战时期的不同，是国内两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不管谁胜谁负，院校人才或财产都不会落人外寇之手。师生们虽没有明确表示，拒绝迁校是为把它们完整地献给共产党，但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期盼一个安定的学习、研究环境，而在兵荒马乱之时，根本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安全”的后方，所以，与其迁播不定，不如乱中取静，原地不动。这样，高等院校中，形成了一股以教授会为中心的抵制政府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但影响了为数众多的学子，也在社会上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为共产党争取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其他社会人士创造了有利条件。

没有迁移的学校避免了颠簸周折之苦，那些为逃避战火，先期迁移的学校，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东北几所大学的命运最为悲惨。如长春大学是抗战胜利后一个新建学府，规模和设备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地位，可惜被战事完全摧毁。在解放军的围城中，学生没有高粱米下肚，便以豆饼、树叶充饥，没有柴烧，楼梯都拆用了。该校学生有死伤于炮火的，有在空投粮食时被砸伤的，还有在闯过封锁线时被扫射负伤的。因为校址在双方火线地带，学生外逃不慎，即中流弹。1948年9月，总算南迁到北平，不久又决定再迁天津，而在天津，等待他们的又是不安定的局面。已迁到北平的原沈阳私立中

正大学环境恶化，学生露宿屋檐下，食不果腹。到 1948 年 10 月，流亡到北平的学生已有 21000 多人，除了东北几个国立院校学生有了归宿外，山西学生和东北私立学校学生最惨，吃、住、穿、睡都有问题。11 月，东北院校只好决定继续南迁，东北大学迁福建，长白师院迁湖南，沈阳医大去歇乐山，长春大学迁赣州。迁到苏州的河南大学到 1949 年春季开学时，因教育部南迁广州，2 月份的政府拨款还未领到，校中的存粮仅能供 3 天的需要，全校师生恐慌异常。于是推派代表向县府暂借粮千担应急。

大后方“安全岛”的台湾大学，算是 1949 年最受国民党政府重视的学校，有傅斯年亲任校长，但也不能对流亡学生全部予以妥善安置。2 月 7 日决定 2 月 21 日开学，由于校舍人不敷用，大批从内地来的学生请求进校借读，该校却无法全部予以收容。各学院二、三、四年级仅能容纳借读学生 255 人，而申请借读已超过此数，只好举行考试，决定取舍，只有台湾籍学生及家在台的其他省的学生才享有优先权。至于一年级借读生，除法学院外，其余各院一概无法容纳，只准备设立一个一年级特别班，收容文理工农 4 院的一年级学生，还不能安置所有申请借读的学生。

一些私立大学也为经济所迫，不得不在 1949 年春季开学，收取实物，以充学费。2 月 7 日，上海私立大专负责人 20 余人召开会议，决定除已经开学的圣约翰、沪江、大同、东吴 4 校外，其他即将开学学校的学杂费决定以 3 担 5 斗至 4 担 5 斗为原则，一次收取。已开学的 4 所大学按照生活指数收费。也有参议员担心，假如以白米收费恶例一开，财经制度立遭破坏，前途不堪设想。但经济形势既已如此，当局也毫无办法。

迁校风中，秩序最混乱的要数大批中学，它们大多享受不到公费待遇，只凭各学校校长的关系，到处找人、求情，解决学生的粮食和住宿。学生整天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迁移计划简直杂乱无章，学校度日如年。如 1948 年 9 月 1 日在天津开学的两个临时中学，东北流亡而来的学生占多数。校长在开学之日一早就出去借粮。东北逃来的学生都没有很多的衣服，许多人已经几个月不能换洗，女学生还有不少睡在光地板上。人秋天气骤冷，学生只好三四个人合用一床被子。教职员也一样在地板上打铺，窗上没有玻璃。夜里雨打进来，把衣服淋湿了。窝头每人定额分配，一天两只，副食费少得可怜，吃不起菜，连咸菜也没有，经过改善，有一碗盐水汤，玉米粥薄似水。吃惯了高粱米的学生不喜欢吃窝头，有些年纪小的学生吃得流下了眼泪。教师的饮食和学生一样，只是用饭时，能把办公室的桌子抬来，有个坐相，不像学生们 8 个人围着一条石凳，蹲在地上吃而已。断炊是常有的事，9 月 3 日下午，又搞不到玉米粉，结果向基督教青年会要来几十箱饼干，每人分 8 块充饥。教室里只有一块黑板，窗户无玻璃，课桌、凳子也不够，不少学生冒着炮火，又跑到关外去了。迁校风行，使当地在校学生锐减，1948 年 10 月中旬，长春全市仅有中学生 1127 人，小学生万人。

进人 1949 年以后，国共战区由黄河延伸到长江，学校、学生不断南下，所面临的困难也在不断增加，生活更加困难。已经南迁的学校和学生为数已经不少，平汉路及京沪地区的不少学校仍在准备南迁。江西、湖南等地被一些学校认为是“安全区”，不少学生纷纷前往，给沿途的接待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据江西教育厅统计，截至 1 月 21 日，招待过境的学生 13401 人，按人数多少排序依次为河南、山东、河北、东北，主要学校

有河南省立安阳高中、安阳中学、郑县高农、郑州联中、武陟中学、中正中学、睢阳中学、河北省立第二临中、教育部青年辅导班、智强中学、大梁中学、河南省立商专、汲县中学、厉志中学等。它们或在江西选定校址，或转道赴湖南。沿途江西、湖南等省份，经济本不景气，负责接待的教育主管部门，更是钱物两缺，无权也无法负担各校的经费。但学生没饭吃的时候，又总去教育厅这个清水衙门想办法。

相反，被共产党接管的北方一些学校却显得十分安静。解放前夕，北大党组织把每天收听到的解放军胜利消息和党的城市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通过壁报、交谈等方式进行宣传，发动师生防止北大南迁。为防止特务破坏，组织了纠察队、联防队，各班成立安全小组，大力开展教师工作，讲明知识分子政策，动员他们留在学校。结果北大除校长胡适、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等少数人飞离北平外，绝大多数教师都留下来。1月31日，和北平市民一起欢迎解放军入城。

1949年，在共产党新解放的城市中，如何让大学教育适应新的时代，引起政府及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全国没有解放前，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教改运动还未开始，但今后教育体制、大学课程设置等改造或改进已被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1949年3月14日，北平军管会文管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大学教育座谈会”，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前奏。出席会议的有马叙伦、范文澜、许德珩、茅盾、洪琛、沙千里、许广平、施复亮等40余名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集中讨论了大学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私立大学的存废改进问题，就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大学不须私立；院系要合并；教授应由国家统一有计划分配，教授治校，以前起过进步作用，现在落伍了，不必强调，可以由教授与学生共同治理学校；本位文化不能全盘西化；大学三年毕业，课程不要超过30门；党义、神学的课程一定要取消；法学院应改称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可取消；教育必须完全服从于政治；学生应当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是共产党解放平津后召开的第一次大学教育会议。尽管也有人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当时中国教育实际的合理建议，但彻底否定旧式教育、使办学目的服膺政治功利的呼声开始占据上风，并在全国解放后不久，发展成为教改实施步骤。解放初期实行的院系合并、文理分家、统配教授、缩短学制、简化课程、取消私立大学、改变校名、取消法律系和社会学系等措施，固然顺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于教育规律却不尽相符，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负面影响，直到80年代后期，才为政府有识之士所认识，开始逐步恢复当初的教育体系和系科课程。一些学校就连举行校庆××周年时，也要当仁不让地追溯改名前的母校。抚今追昔，仅就更改校名这一点，就令不少人感慨良多：“假如在解放之初，院系调整之时，能保存私立和教会大学之名称，而仅改革其课程及人事。诸如‘东吴’、金陵’、‘燕京’、‘岭南’、‘华西’等校名，并无‘阶级’意义，且有传统的学风，则不仅在开放中，增长引进及信息交流之便利，且可以鼓励千千万万老毕业生——大部分为老中年各门专家之积极性。而见不及此，当时‘一刀切’之结果，三十年后之今日，补救为难矣。”至于由于乱砍科系等措施，导致各专门学科人才的断档，因此造成的经济文化损失到底有多大，更是难以估算，也不是在一两代人生涯里所能弥补的。

第二节　教书难为稻粱谋

1949年，影响大陆知识分子去留的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直接关系他们的日用起居，政治因素则影响到知识分子的精神趋向。他们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从事学术科研、传道授业，才能塑造社会有用之才。考察1949年前后，国统区教职员的生存状况，有助于把握这类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征。

抗战时，各大学的教育经费中伙食与科研各占5成，1949年仅有二成用于科研，八成的伙食费还不能满足学生的生活需要。广大教职员工肩负着创造知识、传授知识的双重职责，他们的生活状况，直接影响到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职人员多有一个为学生、为学术奉献的精神，生活的艰辛已使得他们身心疲惫，但除非面临死亡危机，他们仍坚守讲台，为那份事业尽职尽力。1948年底至1949年初，平津一带正处于国共交战的前沿，在北方吃紧、许多平时富有盛誉的人员狼奔豕突、争先恐后向南方跑的时候，若干默默无闻的教职员工，怀着一颗热爱本职、同情学生的心情，依然在冻馁饥饿中挣扎，照常授课，耐苦工作，自己冒风雪勒紧腰带教别人的孩子，有的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孩子失学；为了几斤棒子面，不得不典当衣被或到鬼市冷摊去卖一些东西；为几十斤煤球，也要呆坐发愁；一个鸡蛋喊价几十元，他们自己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的收入。实在低下的生活待遇，日益吞噬着他们那为教育事业努力的热情。

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经济全线崩溃，大学也好，中小学也好，教职员工的生活每况愈下。因经济困难，许多学校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各大学校长多数只有教书的才能，而无盈利的天赋；国立大学完全依靠政府拨款扶持，而政府的拨款数甚微，无法满足学校的基本费用。北平大学最高薪金的教授，大多几乎每周都要向学校借钱。为了省钱，许多教授舍不得坐车，每天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校上课。如果家有八九口人，生活更加不堪设想。工警生活就更辛苦了，一位在蔡元培时就效力北大的工警叹息说，在敌伪时代还有配粉，从来没有吃过像现在这种苦；有家眷的校工，真是过着比狗还不如的生活。以稿费为生的知识分子，因"乱世文章不值钱"，稿费从编辑部寄出，到作者收悉，其间的价位已贬值若干。各校的教授有的贫病交加，坐视儿女衣不蔽体，夏大就有一位女教员吞水银自杀，"弦歌不绝的学府，类似排演悲剧的舞台；进德修业的学人学子几乎变成了叫花子。这是当前教育界的苦难，也是国家民族最大的悲哀"。

物质生活条件低下，加大了国民党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除了少数激进人士外，大多知识分子只要局势没有剧烈动荡，他们一般不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只要能维持生计，有一个安定环境教书写文章搞科研，就基本能够安身立命。然而，1949年前后，教职员的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因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早在1948年10月24日翁文灏带着新经济方案到北平征求专家教授意见时，82位教授发表了一则宣言，内容极为简短，仅提出物价过高，生活不易，停课三天，外出借贷。全文只有

100来字，而且是闪电式起草完毕，这在北平历次教授行动中是个创举。有媒体就此事分析道：教授们对政府已感到完全绝望，他们已不愿向政府请求，他们的宣言实际上只是向社会控诉，博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援；说明政府已经和这批睿智硕学之士起了可怕的隔离，这隔离替未来的命运作了强有力的注脚。1948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北洋、师大等教授实行罢教，要求改善待遇；武大等校也有类似的表示；武汉学生在汉阳门的废墟上举行活命拍卖会；中山大学也发出要饭吃、要温暖的声援。

1949年，教职员的生活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一天不如一天，逼得他们把大半心思花在筹钱吃饭方面。元旦过后不久，李宗仁由副总统升为代总统，“和平”的希望似乎有所增大，但民众物质生活状况未见好转，“饥饿”仍是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教职员工也不例外。当生活的重压使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时，斯文的先生们也不得不发出呼吁，请求增加薪金、改善待遇、解决温饱。元月初，国立复旦大学就有278名教职员联名致电教育部，要求增加薪水。2月初，旧历年关刚过，上海交大、复旦两大学的教授会又联名电呈政府，呼吁改善待遇，发给应变费与储粮费，其生活之窘迫及最低之要求可从电文中悉知：

同人等执教沪上，生活清苦，近鉴目前物价已较八·一九限价上涨达百倍以上，而同人待遇尚仅底薪折计之十五倍，如依今日银币市值折合，则同人中最高待遇每月收入仅四五元而已，是以收支不能平衡，生活濒于绝境，况学校当局经常费亦已至山穷水尽之时，而政府将于二月五日起南迁广州办公，沪地大专学校之应变费虽经教部田次长允于月内拨到，但迄今尚渺无消息，用特电呈钧座，除对同人待遇呼请迅赐作合理之改善外，并请发给应变费三个月，储粮费三个月，均以发款时之物价指数为准。

2月10日，上海国立大专学校教授联谊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讨论待遇问题。除已致电政府呼吁外，又推定交通、复旦、暨南3大学代表，进京面见李宗仁代总统及教育部在京负责人，要求迅速调整薪金及研究费，按原有底薪依物价指数每半月发给一次，并请加发应变费3个月，也依物价指数发给。会上决定联合发表公开信，要求优待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子弟入学，市校全免，私立各项费用则请免除一半。上项电文既是苦难教授的悲鸣，也是全国教职人员在高物价压迫下的无奈呼声。

教职员工的生活问题，不仅仅是其自身的生存问题，还关系到下一代的教育、国家的未来，因此教职员工难以维系生计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有媒体向政府和社会疾呼：“大学教授在学术上技术上，占有高超的地位；他们生活与素养，浸润于精神环境中，坚守教育本位生活，为国家尽职，为教育尽职，他们本不应有物质生活的烦扰，他们更不应该受衣食儿女负担的鞭策，以至失去正常的生活态度，影响其治学研究，如果他们的态度受了客观的影响与顿挫，这是国家的损失，教育的不幸！然而今天最严重的事实，就是驱使教育界人士，同多数中下级公务人员一样，走向了贫困，走向了困难。……今天的物价已涨至250倍到300倍，一般公教人员清苦之状，更可想见，难道政府大员依然可以熟视无睹？……我们愿提醒政府当局的注意，为了抢救教育危

机，为了安定公教人员生活，甚至为了养士，都应该调整公教人员的待遇。交大、复旦等校教授联谊会的呼吁，是陈布雷先生所谓的‘油尽灯枯’时燃烧的一点希望。这个希望，当局不应把它拍灭；相反地，应该培养这个希望，才能达到培养教育文化的目的。”社评中提到，教育人员的贫困化，是国家的损失，教育的不幸，教职人员提出的改善待遇的呼声，是“油尽灯枯”时燃烧的希望，政府不能将其拍灭，而要将其培养。政府即使为了“养士”，也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历史上“养士”一词，不是一个政府或国家的行为，而是个人或地方实力派，为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有朝一日出人头地，采取的行动。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尝君就以善于豢养鸡鸣狗盗之徒，而屡屡能在处境危艰之时，化险为夷。而今，媒体从“养士”这一层次要求政府关心教职员工，不是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贬低，而是变相地向政府敲响了最后警钟：一旦将教职员工这最后的一线希望拍灭，不但将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给教育带来不幸，而且在政府濒临灭亡时，无“士”可用；政府不“养士”，必为别人所养。这时的“别人”，不言而喻，就是共产党。

国民党政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并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致使教职员工为改善生活待遇进行的请愿、罢教等活动几乎没有停止过，规模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坚决，并得到了学生的支持。如2月14日，广东中山大学教授要求当局一周内发清薪金，如无结果，将采取某种行动。该校公费学生两千多人，为了请求增加经费，也与教授们同步行动。

沪杭一带的教职员工发现，光发电报给南京政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干脆三天两头跑到首都南京，上门要钱。2月13日，上海国立院校教授联谊会代表陈望道、曹鹤荪、刘大杰三人，去南京向李宗仁及教育部请求迅速合理改善待遇，并早日发给应变费，得到了学生的热烈支持。上海市国立6院校学生、交大学生自治会、同济各院系留校同学联合会、复旦系科联谊会、上海音专学生自治会、唐山工学院学生自治会临时代表会联名发表宣言，支持教授联谊会进京请愿，宣布这一行动“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要求——生存的要求，这一合理而必要的行动不但代表教授们的意见，而且也代表了上海国立院校讲师、助教、职员、学生们的意见，工友的共同要求，因此6院校学生郑重宣言，对这一行动决以全力支持。”经与当局谈判，政府同意增加部分经费、薪金，但仍不能满足教职员的生活需求。这时，杭州、苏州等地国立大学也申请加入上海教授联谊会。各校校长决定，继续进京请愿。2月27日，沪、杭、苏3地各国立大专院校校长王之卓、竺可桢、章益、夏坚白等再次进京请愿，要求中央改善教职员待遇，增发经费与发给应变费。校长们的行动得到了学生的支持，复旦学生开会欢送校长章益去京，几校学生团体联名上书李代总统。3月初，上海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授联谊会在上海商学院举行第五次常会，出席的除上海的10校代表外，还有新会员杭州浙江大学、艺术专科学校、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及河南大学等的教授参加，扩大改名为“上海区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授联谊会”，决定致电行政院及教育部，坚持照原薪乘以新指数发给薪金。

3月上旬，重庆各国立大学教授停教，学生响应并支持。3月23日，重庆国立教授联谊会在重大开会，再次决议：调整待遇未获合理解决办法前，绝不考虑复教。3月28日，成都省立18所学校教职员工总罢教，向政府游行请愿，教职员工声明不达目的，

罢教可能无限期推延。贵阳师生也举行游行，旗号是“救济教师员工饥寒”，博得社会同情。

国民党南京政府被推翻前夕，南方各大城市的教职员工的反饥饿斗争还在扩大。教授罢教已达半月以上的成都四川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又于4月12日联合成立“争取温饱大会”；厦门大学教职员工因南京政府积欠薪金和学校经费过多，从11日总“请假”3天；上海各公立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工组织“争取生存联合请愿团”，12日派代表向国民党立法院提出：立即配给实物，底薪十足照物价指数发给，发给储粮费，发给私立学校师生补助费及生活贷款等要求。

小学教员的薪金也得不到保障。3月23日，上海市小学教员到市政府请愿，要求：本月25日前，必须发放原薪金1000倍；要求维持实物配给，及发放欠配的食油煤球，增加福利米。第二天，中小学教职员工联谊会决议，请市政府提前发薪，并组织“索欠团”催发积欠煤油。4月22日，上海全市市立小学教员联谊会因待遇问题得不到改善，决定23日总请假一天。尽管市府陈秘书长为此震怒，警告说：哪个小学请假，就解散哪个小学，全市小学总请假，就解散全市小学，但教员们并未退缩。

小学教员的贫困化，即使在比较富裕、受战火影响较小的地区也不例外。如浙江嘉兴地区，虽尚未卷入战争烽火，表面上看，似乎是战乱中的一个乐园，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内里的空虚，广大教员的薪金得不到保障。小学教员首先发动请愿。县参会9次大会通过了解决办法，而在这之中，竟是笑话百出，口惠无实。当9次大会决定推派代表，向县长要求在一周内清发小教的8~11月份的薪金尾数时，县长满口答应，要求主管科连夜赶造名册，通知各校领取。岂知每一教员最多的尾薪仅十余元，从乡村到县城的往返开支，却耗去了二三十元，若干乡村离县城较远不及赶返，连膳宿也发生了问题，大家弄得哭笑不得。在有心办学、无力筹钱的情势下，一些校长纷纷提出辞职或离开学校。1949年1月，上海各国立大专院校校长集体向政府提出辞职，引起教育当局的紧张。1月10日，教育部次长田培林亲自召集校长，予以安慰挽留。校长们的条件是留任可以，但政府必须拿出钱来，解决学校和学生的生存问题，校长们为学校提出的要求真是低得可怜。

1949年前后，国统区从大学到小学，几乎所有教职员工的生活都发生恐慌，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不多见。这种状况是受整个社会经济大气候决定的。国民党政府一天不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一天就不能根本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已注定国民党政府无法扭转经济崩溃的趋势。所以，教职员工贫困的生活状况势必继续下去。知识分子的境遇如此之惨，令人目不忍睹。连一些专心学术、疏远政治的老一辈知识分子都看不下去了，在不少公开场合，对政府首领发出诘难。1948年秋，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南京召开院士会议，大会闭幕的那天，蒋介石为显示自己关心知识分子，以“总统”身份亲自出席。参加过戊戌变法的老一辈学者张元济先生就当着蒋介石的面，发了一通“火”：大家要看看外面是什么情况，内战愈打愈烈，民不聊生，还要开这种会议，这时要赶紧停止内战。谁都知道这些“夹层话”是说给蒋介石听的，蒋介石当场无言以对。晚上竟然还在总统府宴请全体院士。知识分子最容易被“知遇之恩”所打

动，可这时的蒋介石，连他信赖依仗的知识分子的心都丧失了。教职人员的要求已经降低到只求温饱的最低限度。

1949 年，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职员工，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但他们的请愿、罢教活动，基本没有超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范畴；在诸多请愿书中，没有过激的政治倾向明显的措辞。即使国共两党斗争日趋白热化，多数视学术和教书育人为生命的教职员工，也没有发出反对现政府的政治主张。许多教职员工，也没有完全搁下课程，抛弃学生。他们忍受物质的匮乏，为教育尽力；争取一切机会，给学生上课。他们的罢教、请愿，看似只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但这最低的层次，并不表现他们精神境界的低下，恰恰是他们对现实政治社会认识、判断最具体的参照系，也为他们今后的人生价值取向埋下了伏笔。1949 年 2 月 19 日，上海国立十院校教授发表的《告社会人士书》中说道："在八年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含辛茹苦，自是中国国民之份之所应受，不意胜利之后，政府当局不仅没有注意于改善我们的生活，而且改革币制失策，任币值一再跌低，发与我们的薪金却变本加厉地打折扣，使我们窘迫得无法维持生活"，我们的底薪就眼前而论，"以之买米，不足两斗，以之买菜，每日不够蔬菜斤半，终年所得，不足以付眼前一月水电煤气之需，哪里讲得上'仰事俯蓄'，更谈不上送子女入学，我们教育别人子女，却被迫要让自己子女失学，世间不平之事孰过于此。"这封充满辛酸悲愤的公开信，形象反映了教职员工在生活窘困状况下的不平心态。媒体担心教授这种待遇状况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恐怕等不到共军炮火的威胁，我们的大学教育早已名存实亡，徒然剩几块大专院校的空招牌了"。国统区教职员工对共产党即使还不是热切盼望，至少对现政权下的物质生活已无多留恋；一旦共产党能及时妥善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给他们提供安定的教学科研环境，他们的政治信仰很快会发生转变。

第三节　流亡学生的坎坷遭遇

1949 年，国共都在争取学生。北方战区的学生有的受国民党宣传误导，有的害怕战争，纷纷南逃。他们大多不清楚这场战争谁是正义，谁是非正义，他们只知道，战火会毁坏他们的校舍，危及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能有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于是，四处奔波，远离战火，去寻找一块安全的地方，安放他们平静的课桌。但何处才是他们的安乐窝？学生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上。

国民党政府疲于打仗以及应付各种社会问题，无法妥善安置流亡学生，学生的生活、就学等遇到很多困难。流亡学生中，只有部分可以得到政府一定的照顾，而且在各地的遭遇还不一样。如 1948 年 9 月，流亡在汉口的河南学生，仅靠同乡热心筹款度日，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经重新审查登记合格的学生共有 3800 多人，在汉口有亲属未准登记的另有 2800 多人。那些合格的，政府只可收容 1000 人，其余 2800 人没法解决。令汉口流亡学生感到不公平的是，同为河南学生，到徐州、南京、商丘的，政府全设有

招待站，提供一大笔经费，而到汉口来的竟被漠视不理，学生气愤回乡的很多。许多学生在流亡时，行色匆忙，不及备带相应物件，结果在寄寓地，无法获得一般学生待遇。如1949年初，淮、徐、豫三省区的流亡到镇江的学生已达5300多名，内有2200多名分发到句容、吕城、梁溪三中学续读，还有3100多名，因证件不足，由教育部江苏青年辅导部收容，每人只发给救济金4元。政府的懈怠，破灭了若干学生的美好希望，有舆论提醒说："现在'共匪'正在沦陷区大量争取学生，政府此举，实为不智。"

战区学生在逃难途中，真是历尽艰辛，政府又没有统一安置办法，经常只靠社会上的好心人临时筹出一点款子，帮助他们度过危机，因人多钱少，大批学生不得不加入难民行列，沿途募捐乞讨，境遇之惨，非常人所能想见。1948年底，流亡在长沙的山东、河南的数千名中学生就组成若干募捐小组，沿街向各商店募捐，几乎形成乞讨群。学生们的募捐启事凄惨可怜，不忍卒读，兹举一则为证：

> 我们毅然决然，甘愿受苦受难，忍辱忍痛，加入了难民的行列，投奔贵境，时届冬令，寒风砭骨，啼饥号寒，苦困万状，现在我们睡的是潮湿地，且没有被子，穿的是贱烂单衣，不能换洗，以致大都病死，我们没有书籍、文具，精神食粮尤感谗荒，以致颓废萎靡！同胞们，请你们回忆，你们作学生的时代，以及你们在学的子弟，有没有疾病至于死的？谁无父母？谁无兄弟？人非草木，谁能无情？今天我们向你们喊出求援之声，伸出求助之手，愿你们解衣推食，愿你们省出两杯酒钱，节下两支烟费，或者赠我们残菜剩饭，或者给我们撮麦粒米，或者小解义囊，或者慷慨捐赠，则恩同再造……

学生的募捐启事，近乎在死亡线上发出的哀鸣。

流亡的国立大学公费生，不但生活困难，在继续就读问题上也受到政府种种限制。1949年初，自平津流亡到南京的学生，就没有马上得到妥善安置，只能寄读于在宁高校，寄读的条件比较苛刻。教育部在对平津国立院校师生来京疏散的安置办法中，对于学生的救济，只有寄读办法，而无旅费等补助。寄读限于同类性质的科系，如特殊专门系科，因无校可寄读同样课程，则难寄读。寄读由学生自找相同性质的科系，因此必须先取得寄读证，到寄读学校，由该校报部核准，才能将原校公费拨到寄读学校，将来可回原校，也可不回原校。毕业有两种办法，一是寄读学校将寄读成绩转到原来学校，仍在原校毕业，二是在寄读学校毕业，届时先照章办好转学手续，将原校历年成绩单寄来，以便寄读学校根据成绩，直接予以毕业，颇费周折。那些找不到对口专业系科的学生则彷徨无计。另外，有关部门还规定，自平津来宁的旅费一律不得申请补助。

各学校对流亡学生的安排并不划一，享受上述待遇的学生已算万幸，有的学校的寄读生境遇比这还差。如1949初，广东中山大学为了接纳越来越多的流亡学生，校方特地制定了暂时收容办法：寄读学生限于2月5日至19日来校登记，呈缴原校证明书及历年成绩单；寄读生不设寄宿，并须填写保证书；寄读生不给公费及奖学金；寄读生于寄读原因不复存在时，应即返原校就读。可见，寄读生在其他学校无异于"二等公民"，寄读成了"寄人篱下"的同义词。

众多学生的流亡,给动荡不安的社会和国民党政府增加了更大压力。流亡学生的增多,使先天不足的铁路变得更加拥挤,成千上万的流亡学生从中原各个角落涌向京沪一带,再循浙赣线,分送浙、赣、湘三省设校安顿。有一段时间,浙赣线为疏运豫、鲁、苏、皖4省的流亡学生,曾经停开多次普通客货列车,用全部车次专门运送流亡学生,有时连特快车上也加挂了运送学生的车厢。足足一个月,才把两万多名学生疏运工作告一段落。

国民党政府以为把学生打发离开首都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就算万事大吉，然而，政府的漠然，学生的无序流动，不但学生终日颠沛流离，也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生活压迫，居无定所，年轻幼稚的群体经常发生非正常的举动，引发社会纠纷。如江西铅山是赣西南的一个三等县，县城虽小，却风景优美，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相处。可是自从北方2000多学生突然光临这里后，再也没有安宁过。老百姓的橘子、柿子、甘蔗、蔬菜、竹子、花生、鸡子……都是他们抢夺的对象，城里的铺子也被捣毁若干，一些品德原本就差的学生打骂老百姓、强奸妇女的事时有发生，当地人称他们“九路军”。最终，生、民矛盾激化，发生老百姓不得已集体绑架、杀害学生逃匿深山的悲剧。1949年，大批流亡学生是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学生之所以流亡，是奔“安全”的后方来的，但流亡学生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国民党政府经济、交通上的负担，而且加重了政治上的压力。国民党控制区经济本已拮据，让这么多的非劳力人口和非战争人员流亡到国统区，等于在经济、军事之外，又给国民党出了一道难题：承担流亡学生的全部费用要拿出大笔经费，而政府各项开支早已接近枯竭；置之不理，则免不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连学生都不顾，民众跟着它还有什么希望？因此，往国统区流亡的学生越多，国民党政府的负担就越重，社会压力就越大，舆论上对共产党也就更加有利。

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三四月份，已意识到此问题。政府鉴于无力承担流亡学生的大笔费用，过去动员鼓励迁校，现在则劝告学生不要轻易流亡。如1949年3月份，山东昌潍区中学生及教职员工眷属等200多人，从昌潍区逃到青岛，在青岛流落了半年。因为青岛学校的公费名额太少，无法入学，1949年3月6日又搭船来到上海，各种经费无法落实，学生生活面临危机。此时在青岛的流亡学生还有1900多人，大多准备南下。山东驻沪办事处向在沪并即将回青岛的山东省主席兼青岛市市长秦德纯请求，对在青岛的学生就地安置，暂停遣送学生来沪。

平津解放后，部分不习惯解放区生活而来到南方的学生认为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北平没有生活自由，但到了上海，却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经社会局、教育局及社会救济团体的协助，只能到难民收容所安身。饮水来自死水坑，染病的很多，膳食虽已改馒头，但菜很差，寝室竹窗太小，阳光不足，炕下全是青草，潮气很重。各学生流亡已久，学业荒废两相比较，发现这里并不如他们预想的那么好，条件还不如平津地区，于是干脆跑回北方老家。

国民党通过对流亡学生不及时安置、以收容所收留学生等方法，变相阻止学生南下。这虽然引起学生的不满，对阻遏更多的学生南下，却起了一定作用。到3月中下旬，南下的学生相对减少。解放大军过江时，江南学校学生很少有南逃的，后来不少加入了迎接解放军的行列。

第四节 学潮新概念

金元券贬值，物价上涨，给国统区莘莘学子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诸多困难。1949年1月开始，许多贫困学生为下学期的学费犯愁。由于物价上涨太快，金元券逐日以变，人们变得只信实物，不信金元券。1949年初，不少学校决定下学期以米计算学费。社会各界也已意识到学生面临的新难题，一些以助学为乐的单位或媒体开始在为救助贫困学生奔走呼吁，以变应变。如素有向读者募捐助学优良传统的《申报》集团及其他热心助学单位，为保持币值，将捐款一律以实物计算，即每天将募捐所得的助学金立即照市价买食米存在米行，将来支付助学金，也以食米付给，如此，不但币值可以保持，获助者也可得到实惠。

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受国内战乱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活亦感艰难，只好向各方求援。联合社纽约2月17日消息报道，美国各大学学生之中，中国留学生约4600名，因受通货膨胀与国内战争影响，大部分经济拮据。中华学生会负责人称：学生一年半来，备受困苦，一部分学生国内接济已断绝。哥伦比亚与纽约各大学共有中国学生450人，正扩大奖学金、助学金名额，以接济贫困学生。其他各大学也发起募捐，嘉惠中国学生。2月17日合众社华盛顿消息，中国大使顾维钧已要求经济合作总署拨基金50万美元，以资助中国留美学生，留美4000多学生中，已有2500人不能从家里获得费用。

1949年3月，政府新财政方案出台后，学生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善，上海各国立大学自费及半自费生因物价狂涨，无力交纳伙食费，纷纷要求全面公费。7所大学学生联名致电李代总统，并发表《致全体社会人士书》："生活的威胁使我们这些自费半自费的同学已无力负担膳费，即将面临断炊的绝境了。过去我们到处借贷当卖，我们当家庭教师，我们垦荒，举办拍卖会，出外擦皮鞋，一个月一个月勉强维持下去。在半饥饿的状况下，让贫血肺病侵袭着我们，然而现在却是这样的生活，我们也已山穷水尽无力负担了。"学费上涨，不少学生因付不起学费，春季入学时，只好辍学回家，返乡的路费也得靠政府资助。1949年初，在南京、上海的青海籍68名学生就因承担不起浩繁的生活费而休学返籍，青海省特拨30万元资金资助他们，并派员沿途照料。在学人数也随之锐减。生活、学业的负担过重，许多学生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干脆遁身尼庵空门，寻找一份安静。1949年春天来临，杭州尼庵中，就有好多学生尼姑。不过，学生虽然身在空门，凡心仍然不泯，担心将来被人视为"坐食"之辈，于是有人买来织毛巾的机子，编织毛巾，"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听机声唧唧了"。

为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不甘消沉而又走投无路的学生，只好纷纷举行请愿。主要目标集中于生存、完成学业和反对迫害方面。教职员工也多站在学生一边，声援或参加学生运动。从1949年1月开始，各地学潮此起彼落，且大多都曾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49年1月14日，广西大学发生学潮，该校进修班全体学生向校方请求全体升人大学。公费生公粮自去年11月起，就没有着落，引起了轩然大波，后因校方向省府借粮维持，才将事态平息下去。

上海在押的19名学生从“废食待命”向社会呼吁后，引起各界注意。上海法学院院长褚凤仪及复旦大学校长章益，1月21日下午先后到警察局拘留所探视。21日，复旦、同济、大夏等12校校长，为在押学生事一起拜访吴市长，言如不得具体答复，24日将再次集会，后向警备司令部及特刑庭交涉，并向社会呼吁。除夕前夕，上海被捕的18名学生经绝食呼吁以及上海各大学校长及家属奔走设法后，交保释放。经过5个月的关押后，终于在除夕1月28日下午回家过年。至此，于1948年8月27日被捕的学生，除同济大学的段泽判刑6个月因刑期未满尚在押外，其余全部开释。

3月15日，复旦师生员工警率先组织争生存委员会，决定联络上海其他各校，组成上海市国立大专学校学生联谊会，向政府要求：同学全体公费；教职员工警待遇按底薪乘物价指数计算；增加学校经常费用。3月23日，上海国立大专院校争生存联合会代表会同南京、杭州的学生代表进京请愿，提出全面公费、按物价指数调整教职员工待遇、增发学校日常费用、发给职员进修费等要求。

3月17日，重庆国立大学8院校学生近4000人，为争取提高师生待遇，联合游行。重庆省立学校学生也提出，如果国立学校准予贷款或发给实物，他们也要求按同样待遇补助。

……

1949年，学生运动无疑比前两年更为敏感，每一次行动都有可能成为党派斗争的重要筹码：倾向于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在决战中得分更高。这时，即使在军事上已取得绝对主动的共产党，也未放弃引导学生运动为军事和政治斗争服务。如2月27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学联”就油印分寄两种宣传品。其一为《上海学联为争取民主生存权利维护教育事业宣言》；另一为《拥护共产党八项条件，争取真和平，响应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号召发表宣言》，并附有铅印《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目前时局告上海市民书》。其中将李宗仁所倡导的“和平运动”痛加抨击，向上海教育界及学生作出如下号召：（1）向反动政府索取全部被捕学生；（2）被开除的爱国学生回校上课；（3）被禁止的学生刊物自动恢复出版；（4）向反动政府要学校经费；（5）向反动政府要应变费；（6）向反动政府要统一奖金；（7）向反动政府要校舍；（8）向士兵宣传反战，瓦解驻军；（9）阻止官僚资本南逃；（10）把民脂民膏还给人民。最后，号召学生用自己的力量，为解放上海而奋斗。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1949年的这一天，国民党当局粗暴地对待南京学生运动，一手制造了“四一惨案”。

1949年三四月，国共围绕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进入白热化。4月1日，国共北平和谈正式开始。那天，国民党政府和平代表团一早即由南京机场起飞，南京各学校学生也一早齐集总统府前，再次举行游行，掀起反征兵、反征实、反美援、反假和平运动的浪潮。同时要求学生全面公费，改善学校员工待遇，释放被捕学生，接收共产党八

项和平条件，实行真正和平。参加游行的人数达5000人，坚请“总统”或主要负责官员作出非和平不可的答复。上午9时左右，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站在台上就学生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台下秩序井然，气氛活跃，没有什么紧张的现象。10点多钟，会议解散，学生们分别喊着“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反对发行大钞”（金元券）、“停止内战”等口号，向四面八方散去。治安当局奉命未予阻止，并帮助维持秩序。下午一两点钟，事态发生变化。当游行队伍分散回校时，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军官收容总队的军人和政工特务在大中桥附近围殴戏专学生。剧专学生惨遭毒打后，被集体绑架。政大学生及工友首先得到消息，立即乘3辆校车赶去救援，又遭毒打，司机陈祝三因阻止暴徒捣毁汽车和抢救伤员而被当场打死，多人受伤。消息传来，中大等学校的学生齐往总统府门前示威请愿，学生与当局交涉没有结果。总统府降旗之后，总统府门前开来上百名警察，袭击手无寸铁的学生，当场多人受伤，其中中央大学物理系四级学生程履绎及电机系学生成贻斌受伤严重，一两天后救治无效身亡。一些教授也遭殴打。整个事件造成学生、工友3人死亡，近两百人受伤，此为“四一事件”或“四一惨案”。

这次学生运动期的只不过是敦促国民党当局接收共产党主张，实行真和平，并没有打出反对国民党或推翻国民政府的标语或口号，即使在戏专的同学遭到军官收容总队的袭击后，同学仍没有打倒国民党的言行。下午5点钟总统府降旗时，游行学生还全体起立行注目礼。然而，学生提出的接收共产党和谈条件、要求真和平这一条已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收容总队军人和特务的行动得到国民党有关当局的纵容和支持，他们以武力对付游行学生是有预谋的行动。

南京学生运动在国共双方政治斗争的非常时期发生，在其影响下，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抗议国民党政府浪潮。事发后的一两天，南京学生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及报道“四一”血案经过的新闻。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作出了四项善后办法，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警告学生，不要轻易上街“闹事”，应该配合政府的戒严行动。至于学生提出的“全面公费”、“改善学校员工待遇”等要求一样也没有满足，事态并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4月2日，南京各大专学生会主席团联合会决定从即日起实行无限期罢课。对于受伤学生，有本市和外市写信来慰问的，有亲自到医院和学生自治会来慰问的，有送来慰问款的，有在慰问时咒骂国民党的。慰问的人群中，有学生、商人、教师、市民，还有不少是国民党军人，连军官收容总队也有个别军官寄来慰问信并附来若干慰问款。4月11日、12日在中大礼堂为在事件中牺牲的陈祝三、成贻宾、程履绎召开追悼会。程履绎的父亲是湖北天门县一个士绅，是一位老国民党党员，他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国家的事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真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啊！”

消息所及，其他各地也爆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学校纷纷罢课、罢教、捐款，要求严惩凶手，追悼“四一”蒙难同学，释放学生，实现和平。为了声援南京“四一事件”，上海交通大学等31所学校的千余人，举行集会，成立了“四一血案志哀会”。各系科代表决定联络上海各校代表去南京慰问。

贵阳、重庆、广州、福州、青岛、汉口等地大专学生、教职员工在要求改善待遇声中，罢教罢课浪潮迭起。4月5日、6日，在台北的台湾和大陆师生聚集游行，当局以

“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碍治安，甚至捣毁公署，私擅拘禁执行公务人员”等罪名实行戒严，拘捕二十余名学生。

“四一事件”发生于国共正式谈判开始之时，使本来就理亏词穷、心虚势弱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更加陷于被动。适逢国共谈判的节骨眼上，不识时务的国民党当局不及时采取措施，化解矛盾，却人为扩大事态。惨案发生后，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就播发消息并作出评价说：“南京反动政府在和平谈判开始第一天，对要求真和平学生的屠杀，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和平是怎么一回事。”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评论《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社论说：从李宗仁1月21日上台以后的两月余，一件什么好事或确实有利于和平谈判的事也没有。在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等人的统治下，一个战争罪犯的毫毛也没有伤过，但是，逮捕和屠杀要求真正和平的人民的事情在国民党统治区层出不穷，“南京惨案”达到这一时期公开残杀人民的顶点。南京惨案告诉人民：任何对战争罪犯集团的庇护就意味着和平不能实现；中国人民要争生存，争自由，争和平，就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扫荡这一群吃人的野兽；有效地消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办法就是依靠人民解放军把他们一个一个活捉起来。社论还借此机会，质问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他们的政府和在哪里？平在哪里？为什么他们的代表团团长在来北平之前要到溪口去两天向第一号人民的公敌请示？为什么他们的飞机刚在北平降落，南京的大屠杀就开始了？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又屡屡提到南京政府统治之下，打死打伤学生的事实，认为应该禁止。

这不但给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一个下马威，在谈判中，也迫使国民党代表团对共产党提出和平谈判八项基础提不出实质性的反驳意见。4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国立中央大学等10所院校学生对国民党“南京惨案”罪行的控诉书。19日的《人民日报》又全文发表，书中向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哭诉道：“残酷的内战已经打了3年多，打得人民好惨！全国人民哪一个不希望真正和平的实现？……我们争生存，争真和平的合理请愿，便是在希望真和平实现和李代总统七项诺言的目的之下进行的，但我们的遭遇却是这样的悲惨！……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请您看清楚这一次血腥惨痛的事实！请您营救我们！请您援助我们！最后，为了全国人民哟活下去，让我们共同携手，争取全国人民的生存！争取人民所要的真正和平！”控诉书字字令人同情，句句催人泪下。不但对全国学生，而且对全国百姓都有很大的震撼力，为共产党争取民心、武力解放全国提供了更厚实的舆论素材。

“四一惨案”是继“五二〇”之后，国民党又一次屠杀学生的暴行。作为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它爆发于国民党政权走向垮台、共产党即将夺取政权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以前，曾有4次大的学潮或示威，即：1945年昆明的“四二一”运动；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的示威；1947年5～6月的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8年4～6月的反饥饿、反迫害及抗议美国扶日运动。其他则主要为争生存活动。其间，学生运动的目标和斗争口号有些变化。1947年夏季以前，学生运动的口号基本都与“反内战”联系在一起。1947年夏季以后，随着国民党统治似江河日下，学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难以见到光明，在国共两党

谁胜谁负的问题上已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不过，每一次学生运动还没有明确打出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旗号，只是在口号中不再提“反内战”，主要提“反饥饿、反迫害”。很多学生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完全了解，他们害怕战争，又制止不了战争，唯有呼吁和平避免战争，求得一张平静的课桌。直到这时，国统区学生的一切行动还没有脱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等基本要求。而在1949年，这种环境不仅没有到来，反而比以前恶化。

司徒雷登在国民党1947年5月20日镇压南京学生运动，造成“五二〇血案”后说：“学生是社会阶层中最敏感的一部分人，他们往往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动向而为其先声。对待学生运动只能采取因势利导而不能用镇压的方法。学生在社会上的作用相当于测量气温的温度计，蒋介石对待学生的这种办法，等于一个人不愿见到气温改变而打碎温度表一样。”尽管到了1948年5月，上海学生运动发展到同整个文化界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时，司徒雷登改变了态度，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恐吓学生“准备自食恶果”，但他把学生运动比作“温度计”，非常恰当，不能说没有眼光。其时，正处于国共谈判的节骨眼上，国民党当局不但不顾学生对当局积怨已深的现实，采取措施，化解矛盾，却人为地使事态扩大，酿成血案。共产党恰于此时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优势胜利，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日程表也已列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部分和平论调都是要求双方先停战，再讲和，显然与共产党的战略目标不相符合。这期间，南下流亡的学生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照顾，整日疲于奔波，凄凄惶惶；在校的学生也终日为食粮操心，学校三天两头的断炊饥荒，饿得他们眼冒金星，无心读书，虽经三番五次与政府交涉，所得粮食如杯水车薪；国民党特务动辄到校骚扰抓人，学生忧心忡忡，朝不保夕。他们厌倦了这个政府，恨透了这个社会，对现政府已不抱任何希望。他们开始要求国民党政府真正接收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实现真和平。如果说1949年4月1日以前的学生，对国共两党还有模糊看法、对国民党尚存一线希望的话，“四一事件”则促使他们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最终倒向共产党一边。共产党则最大限度地利用学生运动及其激起的民众感情，大张旗鼓地宣传，为在和谈桌上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和平”攻势，为解放大军南进争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创造了条件。“四一事件”后的22天，南京就解放了。“四一事件”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失去了广大学生的支持。

第五节 共产党的好帮手

在国民党政权下，受尽苦难的大学生，在共产党新政权下，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热情。1949年1月华北学生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2月初华北学联的成立，是共产党组织学生的重要举措，从此，学生有了地区性的统一组织。1949年3月1日，中华全国学联第14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出席大会的204人，代表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102万名学生。会上，国统区的学生代表向全体代表们报告了饥饿、屠杀和学术不

自由的残酷事实；解放区的学生代表描述了他们经济困难得以解除和学术自由的新生活。国统区学生经常忍受饥饿，还要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无端逮捕打骂；解放区，每个学生所强调的是学校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学生深入群众、传授知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形成了两种区域、两种境遇的鲜明对比。这标志作为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学生组织的时代已经结束，它们开始以一个政治性组织的面目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平津解放后一个月，这种迹象更加明显。1949 年 2 月中旬，学生以空前欢快的心情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帮助宣传共产党新思想。清华、燕京两千多人，协同北大、师大等院校学生组成工作大队和文艺宣传工作队，到各中小学开展普遍宣传，以座谈会、晚会、讲演等方式帮助中学生认清目前形势，了解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以及当前学生的任务。一些大学内部也开展了这种活动。清华、辅仁等院校组织了许多街道宣传队，配合解放军宣传队，并肩在街头宣传。另外还有 480 个学生参加军管会组织的工作组，深入各保甲，访问贫户，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发放兑换金元券的优待证。

解放区把恢复学校、安顿学生作为一件大事。规定部队不得干扰学校的正常生活，使原先对共产党怀有疑虑的师生，很快对共产党产生了全新印象。共产党也着手安排原来迁至平津的学校的复员工作，设立新的大学，培养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人才，尤其是政工干部。共产党进驻北平后，除原有各学校外，又新设大学 3 所：军政大学，培养军队干部，校长叶剑英；华北大学，前身是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吴玉章，培养政治干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设于西郊。另外还设立了南进工作人员训练学院。入学程度自小学到大学不等，三个月、六个月即可训练毕业去乡间工作。课程设置作了很大改革，自然科学课程没有大的改变，社会科学中，将社会科学课程经常改成“学习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禁授《罗马法》。9 月上旬，华北高教委会召集平津各大学教授，研究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教学方法，具体规定了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选出艾思奇等组成委员会领导教学。原来迁到平津的东北各大学相继被迁回长春、沈阳、哈尔滨。此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队伍中，成为共产党宣传政治思想、推行文化教育政策的好帮手。

第七章 疑与信——工商界的尽头与盼头

第一节 工商业的困境

1949年前后，政局不安，经济动荡，许多工厂、商店在战火和通胀的多重压迫下陷于破产，中国工商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

1948年"八·一九"以后，工商业遭受了限价、金元券等严重经济打击，工商业元气大伤，工商业者对国民党普遍产生不满。在"八·一九"限价开始的70天中，单上海各业，就平均各赔数百到数千万金元。11月份以后，限价取消，金券贬值，投机盛行，涨势更旺。1949年，物价如野马脱缰，失去控制。1949年前后，工商业所受冲击主要表现为：物价日夜大涨；战争隔断货物运输线，原料来源缺乏；粮食、燃料以及其他日用品稀少；制成品销路停滞；企业主受军政人物的挟制，难以自主经营；生产成本太大，原料上涨价格超过物价上涨的价格；高利贷压迫使工商业承受不起利息的负担；廉价倾销产品，难以扩大再生产；官僚资本垄断，等等。

1949年，物价高涨之下，经济反而出现萧条，这与以往一般经济萧条规律不同。从1948年11月份开放限价以来，物价一路上涨，几无止境，但工商业的萧条现象却一直存在。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繁荣是物价高涨时期的必然现象，只有生产过剩，物价下跌，经济萧条现象才会发生。老法币时代，通货膨胀得越快，物价涨得也越高，一般工业在"水涨船高"的原理下，也随着呈现出繁荣的景气，虽属表面的繁荣，但无论如何，总能维持下去。可是1949年前后，一方面是物价高涨，使消费者人人都感到生活的威胁；一方面是经济萧条，一般工商业者都感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只好紧缩与停工，有的宣布破产，工商邮运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陷人危境。兹举数例：

在唐山苦撑了42年的启新洋灰公司，到1948年11月4日，启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被迫宣布停工。因为从10月10日以来，启新没有一吨洋灰从唐山运出，所有铁路及轮船运输都用于运开滦煤炭，洋灰遭到禁运。公司现存的洋灰3万多吨，灰块9万多吨，资金冻结，无法周转，山穷水尽。即使在广州和南洋寻得销路，也因交通不畅，无法运出。3000员工生活无着落。天津的炼钢厂也濒临绝境。

青岛市的中纺公司自币改后，因粮食恐慌，渐渐将纱布也导人黑市，成了一般商人的主要投机对象，公司以限价成本出售，已蒙受巨大损失，直接消费的市民根本得不到

实惠，生产无法正常运转。10月14日，8个纺织厂同时停工，2万多工人全部失业。

华北水泥厂原辖的琉璃河、锦西厂环境恶劣，生产时断时续。国民党锦西撤守后，只剩下琉璃河厂，但因原料供应不足，成品滞销，周转困难，到12月无法进行生产。公司既无营业收入，又无政府补贴，员工薪金筹措困难，只能以制造水泥的原材料出售，勉强维持。华北钢铁公司也已发不出员工的工资，濒临倒闭。

上海化学工业原料主要依赖进口，所进原料原来可以从华北等重要港口获得，但北方战事激烈，到1949年1月，大多改为华南进口，再由华南运到上海，售价奇高，而销路之窄又为以往所没有。每当一批产品销出后，所得款项就无法再生产，即使工贷救济，也只能维持一两个月，约有一半以上已经停业。

四散在常州城内的80多家中小型织染厂，因原棉来源阻塞，纱件枯竭，煤油、电力、燃料价格昂贵，成品销路日促，范围狭小，加以捐税苛重，货价虽然不断提高，但总跟不上成本，关门者日多。

抗战胜利后，国内染料市场几乎集中在广州，一时形成发展高峰，经营此业的已达42家。到1949年前后，因资金周转不灵，影响货款流通，发展严重受阻。由于“国币”不断贬值，为了保本保值，为了能在香港以港币进货，广州洋染料业以港元为本位，顾客购货如无港币而要以“国币”支付时，则立即拨电话到十三行的钱庄查询行情，以港币为本位折算成交，并随即将收到的“国币”货款通过钱庄转为港币。这样做，几年来也算稳妥，少吃了“国币”贬值的亏。但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之日，当局事前秘而不宣，官僚资本家当然早获消息，于是把十三行金融市场的电话控制起来，同时把大量金元券抛向市场，抢购物资，染料自然是抢购对象。那天以金元券购货要折算港币，要多少折算多少，顾客十分“慷慨”。起初商人们还蒙在鼓里，各商号打电话到十三行查询，但从早到晚都打不通，而抢购浪潮越来越烈。后来“下野”消息发表，商人们对着成堆差不多已成废纸的金元券，痛心疾首，无可奈何。不独洋染料业受灾，广大民族工商业也是一样受难，只是所受打击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1949年4月份，兰州全市的工厂中，除了省营的制革厂、比工厂、水泥厂、机器厂、电器厂和民营的西北毛纺织厂，以及几家大面粉厂情形较好外，其余226家小工厂有1/3准备关门。最严重的是82家砖瓦厂没有一家能维持正常生产，18家肥皂厂、30家纺织厂、9家制革厂无不焦头烂额，其余9家小面粉厂、39家印刷厂、8家金属冶制厂、2家火柴厂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不可终日。

成都市的物价从4月7日到11日狂涨4天，商行倒闭数十家，投机商自杀多人，社会秩序空前恶劣。

4月中，武汉经管工作已经全部停止，物价与银元黑市如烈马奔腾，毫无忌惮。15日中午，银元黑市市价已突破13万大关，中等食米价竟高达180万金元，市场萧条，门可罗雀，金号倒闭的4家，卷烟业停工的30多家，其他民生工厂均已陷于僵卧状态。尤其是襄河受阻，米源减少，米行多相继歇业，武汉人士惶惶于生活窒息之苦，而对炮火可能的威胁已感到淡漠。到1949年5月初，汉口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国行抛出大批镍币、规定镍币比值后，银钱贩子又强以六折收买，致使辅币与金元券同时遭到摈弃，

市场交易顿时呈僵化状态，金融业倒闭的达数百家。

1949年4月20日和谈破裂以来，战火迫近上海。上海对外交通运输日益阻塞，工商业大受影响，不但华北与长江的客、货完全停顿，京沪、沪杭两路沿线也十九停止，华南海运虽仍畅通，但因轮位缺乏，商货南运不易，工商业四面楚歌，面临空前困难，各业贸易几乎等于零，报关、运输等业务几乎濒临停顿。各业门售方面，因购买力日低，毫无销路，若干大公司，全部门售收人还不足付电费。工商业无法维持，但要关门，又要花钱遣散大批职员，无奈之下，只有把销不出去的产品分发给职员，作为遣散费，职员为维持正常生活，只好摆地摊销售，以原始的方式换取自己所需的钱物，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出现了一种非正常的商品市场——“地摊”。1949年四五月份，地摊市场空前增多，随处可见，其中尤以西藏路北起泥城桥、南至南阳桥以及金陵东路从八仙桥到东新桥一段为多，两路彼此相接，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丝毫空隙，行人举步难行。陈列货物应有尽有，犹如露天百货店。从业人员主要有四种：因服务机关解散无法生活而出售家藏的占10%；各厂行职工发薪时领得部分实物设地摊求售的占30%；原来以此为职业或由他处迁来的占20%；本来就是流动买卖的“黄牛”因受功利限制而改摆地摊的占40%。地摊的营业，商品价格过于便宜，影响到正常的商业，对手工业而言，更是有苦难言。正规商店的营业一般都向主管机关登记纳税，而地摊货物是工商业者的最后一笔血汗钱，为了活命，无暇顾及办手续，缴税款。整个上海经济陷于难以自拔的泥沼。

金元券的贬值，使邮政业务难以正常开展。到1949年三四月，边区一些市镇已拒绝使用金元券支付邮费，许多偏僻地区金元券已经绝迹，而邮局仍以金元券为媒介，以致业务无法维持，邮路遂告阻断，邮政员工生活困苦万状。各地使用的“货币”各式各样，邮局收到的邮资五花八门，如广东的罗定、阳春、新兴、安铺、徐闻、新丰、春湾等地，一切交易均以港币、银元或谷米为单位，小数则用“广毫”；新丰等地商民均拿谷米到邮局购买邮票，邮局苦于应付；贵州的榕江、水城、威宁、三都及滇桂边境各县概以银元、广元及滇制半开银元为通货；云南的墨江等地拒用金元券，通行“半开”；河口一带竟以越币为本位；广西的情形大致与广东相仿；江西的石城、瑞金、兴国、会昌、鄱阳、余干以及湖南、甘肃、宁夏、青海等省也拒用金元券，一律以银元为通用货币。民众交寄邮件包裹，要求交付硬币，政府财政金融当局还没有银元与金元券折合率的规定，邮局无所适从。如果邮局仍以金元券为交付邮资的唯一通货，则邮局的收人仍为金元券，各地区邮政员工生活则难以维持。加上战火连天，各地邮路大受窒碍，民众通信联络十分不便。

……

以上一系列现象，不仅使工商业界人士走投无路，也使一般靠“生活指数”生活的工薪阶层难以为生。“生活指数”与物价脱节，已遭到工薪阶层的痛恨，厂商方面却仍嫌生活指数太高，负担不起，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一些大企业也试图挣扎维持生产，但金元券贬值太快，物价长势过猛，无力承担大批工人的生活费，纷纷提出解雇工人。工人的解雇，又经常引发工潮，导致社会不安。

那年头，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权。非常时期，军事重于一切，只要当权者看中哪家肥企业，他们就可以军政命令将该企业收回已有，不容工商业者辩白。如当时南京龙潭和栖霞山两个水泥厂的水泥都是重要而紧俏的物资，在市场上十分抢手。京沪杭司令汤恩伯看中了这两家“肥厂”，就借口水泥是江防构筑永久工事的重要材料，一律得由总部控制。他还派亲信驻厂监视，规定每月生产数量不得减少，售出量全部由总部控制包销，非经汤本人同意批准，任何人无权动用一包。汤总部还要求两厂将库存数字定期汇报。这样一来，汤司令无形之中就成了两个水泥厂的大老板，想买水泥的客户必须走他的门路，一时间，趋之若鹜。客户要是与长官们搭上点关系，那么就不愁有货难销，有钱难赚。上海市陆根记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手头囤有较多的建筑材料，汤恩伯与陆私交不错，经常把布防设施的水泥工事交给陆承包，材料由陆垫支。其实两位老兄是互相利用，以少报多，投桃还李。汤每每在向国防部领得巨款后，就一再备文呈请：“物价一日数迁，为了取信于民，应请折实发给黄金。”国防部发给黄金后，照规定应由国防部第四厅的后勤补给科办理，可是这件事的计划、预算和报销却由汤自己包办，他的随从参谋奔走联系，保证肥水不外流。企业主成了军政权要手中的橡皮泥，随其拿捏。

通货的影响，已使工商企业疲于应付，国民党军队无止境的骚扰，更让企业主雪上加霜。国民党在前方打仗失利，往往把怨愤倾泻到后方企业主身上，对企业不是借口驻军，就是强行征掠拉夫；敲诈勒索不成，就强取豪夺，放肆洗劫。上海解放前几天，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投资经营的延安炽昌厂，拒绝了国民党一批残兵败将的无理勒索，国民党军队就拉倒工房，偷抢生财器具，工厂损失惨重。1949 年 11 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重庆市市长杨森亲自下手，搜括了中国毛纺织厂大半黄金外币。1949 年 5 月 10 日，刘鸿生因国民党军队无端驻军他的水泥厂，强搬水泥，工厂难以承受损失，气愤之下，特致信国民党政府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常务委员谷正纲、司令陈大庆及上海市长陈良，信中说：“窃查本市各水泥厂因受产销萎缩、经济恐慌等种种迫害，早已面临崩溃前夕……各厂时有地方部队前往强征产物，似此情况，不独工厂本身深受损失，结果必致蹙其生机，速其危亡。而推厥弊害，尤足以影响工作情绪，造成社会不安后果，实至严重。”许多民族资本家为此怨声载道，恨之入骨。后来不少对共产党缺乏足够信心的资本家出走，后又回到祖国，与国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无情掠夺不无关系。

由于社会无序，治安太差，工商业者还要应付社会其他政治势力乃至恶势力的威胁。一般商号经常是地痞流氓敲诈勒索的对象。4 月中旬，武汉市就发生了不少流氓恐吓商号、公然募捐的事，他们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前线司令部”等名义，发布恐吓文告，公然携带官防证件，向各商号募集银元 15 万元，无知市民竟有受骗上当的。事后，当局不能为工商业者挽回损失。乱世之秋，不少工商业者对政府无望，有的另谋生路，有的为保存一方领地，振作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的利益。

第二节　商业者的呼声

在1949年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风暴中，广大工商业者渴望独立经营业务，在社会各阶层中，基本是一股中性势力，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但他们又无法置身于政治纷争之外，他们成了各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国共双方都想把这个既有钱、又有一定势力的社会群体拉到手中，以加重胜利的筹码。

1949年，国统区的工商业者受经济大气候的影响，艰难地维持业务运转。他们对国民党政府许多经济措施深表不满，对国共战争造成的经济发展障碍忧心如焚，又无力改变政治军事现状，仍把改善工商经营状况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为了经济利益，为了民族工商业的前途，他们不断就政府的各项政策提出委婉批评，发出各种呼吁。1948年底至1949年，政府的每一次经济措施，几乎都直接触及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只要政府措施一出台，总是伴随着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应。这些反应，不仅仅表现为工商业者的个体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群体行为，是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因此感召力大，颇能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声援和响应。

上海一向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重镇，1949年，国共华北激战，这里成了南北工商业的集聚地，工商业组织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工商业者要求改革经济环境的呼声尤为强烈。1949年1月5日闭幕的上海市第八次参议会上，代表们就存兑黄金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社会方面的议案从降低物价、保证币值、稳定市场、消灭黑市、申请工贷、馆楼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反映了工商业者稳定市场的迫切心情。在物价急剧波动关头，同行业组织往往出面，动员行业人员，维持市场秩序。2月6日，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杜月笙等发表讲话，劝告工商务业增加生产，稳定物价，号召工商业同人各就本位，努力自效，一方面加紧制造，一方面供应需求，务使物资充裕，物价稳定，计本定价，应以足供再生产、重置备为标准，万勿随俗浮沉，蹈追求暴利之嫌。安定市面，也就是安定人心。这是以工商业理事会的名义，对工商业界人士进行的动员。有的行业公会在本行业发展受阻时，会立即代表本行业同人，出面向有关当局请愿，争取应得的利益。如2月初，上海旅馆租金价格经社会局召开旅馆租金评议会，决定以“八·一九”基数增加190倍，经市政会议议决，按生活指数计算。该业同业公会闻讯后，于2月6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商讨这一问题。公会方面决定派代表到市府请愿，陈述该业困难，要求市府按照以前批定的办法，由评议会平定价格，或让公会核本议价，如仍向生活指数看齐，则希望各旅馆所付出的成本，亦请按照生活指数的倍数付给，以维持旅馆业的生存及数千职工的生活。为了使小型工厂能得到政府的一律贷款，1949年2月5日，上海市商会致信中央银行贴放委员会，请允许小型工厂一律贷款，不以是否领有工厂登记执照为限，凡是有社会局所发的商业登记证，并经所属同业工会证明其确有工厂的，允许一律贷款。工商业团体还在不断为工人待遇奔走呼吁，请求政府予以解决。

1949年3月31日，上海商会代表胡友良、工业会代表欧阳岑、总工会代表周学湘等到国行面见总裁刘攻芸，要求解决工人发薪所需现钞。

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何应钦甫一组阁，就颁布所谓新财经方案。该方案公布后，工商货物税规定改征实物，虽然尚未实施，但在民族工业不绝如缕之际，还是引起了全国工业界的强烈反对。广州、江苏、江西、上海等各省、市及水泥、卷烟、火柴、棉纺等工业联合会，鉴于政府方面尚无顾惜工业危机的明确表示，纷纷致电政府，表达反对征实的决心。同时致电工业总会要求贯彻主张，以免崩溃。政府其他一些规定，也经常引起商业团体的不满，迫使它们纷纷发表抗议。

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而当时工商业界的危机状况，不但国民党政府辖区内如此，解放区也有同样问题，双方的重视程度却有差异。假如国民党政府规划的财经政策，能顾及工商业界迫切的呼吁，而使生产少受打击，下决心解决生产成本太大、产品销售清淡等问题，还有挽救工商业的一线希望，民族资本家及中小工商业主也不致对政府由依赖转生冤仇。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军火商之外，恐怕很少有工商业者不希望和平；只有和平，才可以进行各地货物交流，畅通运输航邮，带动工商业的发展。1949年，国共双方鏖战不休，工商业团体是渴望和平最为强烈的社会团体之一。实现南北贸易，保证原料和成品销路畅通，这是一般工商业者的呼声，也是广大工薪阶层的生计所需。在政治与经济之间，他们更关心经济利益。平津一带工商业团体早在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之前，即开始呼吁和平，并于1948年12月29日，天津市工业会、商会、各职业团体、绅民等81人共同签署发出通电，分致国共双方首领蒋介石、毛泽东。电文说：

> 海内人人厌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钧座、先生本民胞物舆为怀，年来国共之争，毁坏人民生命财产难以数计，已为人们所不能忍受，战争的目的既系为国为民，今以人民所不能忍受者强加之人民，则为国为民之说已失根据。战争持续实无意义，江河以北未遭破坏之城市寥寥可数，平津两市，一为数百年文化古城，一为华北五省工商业汇萃要埠，又有四百万以上之市民喘息余生，眼见大祸临头，不能不迫切呼吁，战争终有了局，和平即是光荣，万恳发大仁慈，即将平津地区先行停止战争，以谋全面和平解决，而免生灵再遭涂炭。

他们呼吁的“和平”与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和平”宗旨有着本质不同，他们真心希望，双方罢兵言和，使平津生灵免遭涂炭。不能说他们是受国民党政府的指使，为国民党的“和平”作烟幕。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胜利也好，国民党胜利也好，战争即将给平津两城造成的灾难，任何人都可料见。他们虽说是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但他们发出的保卫平津、爱护平民的呼声却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立场居于中性。更何况他们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已经领教多日，对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还所知不多。在国共交战的夹缝之间，比起一些政治党派明确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经济需求更为迫切。他们从工商业发展的视角，看到了局势的恶化将对全国经济产生的恶果，

对工商业前景深表忧虑，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如中纺公司副总经理3月17日视察武汉时说，目前各厂的存棉情况距新棉上市至少还差4个月的量，一旦原料供应中断，不但影响全国军需民用，而且直接使上海从事纺织的70名万工人的生活陷于绝境。他一边希望产棉区军政当局珍惜物资，鼓励运销，以期共渡难关，更希望国共双方顾及民生疾苦及工业建设的艰难，不要使现存的陕、鄂棉区再遭兵燹之祸。这是从民族工商业命运及人民生计角度，呼吁国共双方罢兵。

1949年，工商业界人士或组织，不仅急切期盼着和平，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和平行动，促成国共双方和谈沟通，尽一切可能说服双方采取积极的姿态，为南北商业交流创造条件。在国共计划进行政治和谈之时，工商业也在紧锣密鼓地为南北工商业交通奔走呼吁，在国共政治力量之间，竭力斡旋。到1949年三四月份，这类活动日趋频繁。继南北局部通商、通邮之后，1949年3月17日，全国商业联合会及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理事长王晓籁为南北通商通汇事项，致电李宗仁、何应钦和毛泽东、叶剑英等：

安定以求进步，进步以求安定，乃相为用者，目前求安定，求进步，实为主观客观之需要，而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安定进步之要件，则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乃近交通工具已不能适应需要，设再予以人为障碍，必致货不能畅其流，因以人不能尽其才，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我国农工矿物，东西南北各有不同，如不互通有无，以有余补不足，则不但人民生活水准难免再低，经济秩序尤失常轨，即政府方面亦不免多费周章。因在不安定，必难有进步；而不在进步中，必难有安定。此次南北通邮、通电、通航，人心已得安定不少，社会已见进步现象，而在工商方面，以为继其后者，必为通商通汇，因遂准备加工进货，以望经济秩序之常轨可复，生活之最低水准确保……迅予实行通商通汇，实属公私两便。

他认为安定与进步是相辅相成的，达到安定、进步的“要件”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种愿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关系人心安定、社会进步的高度。经过工商业人士的努力，当月就实现了南北通汇。

1949年4月1日以后，随着国共和谈的正式开始，工商业人士加紧了推进南北全面沟通步伐。在原来局部通商、通邮及通汇的基础上，南方工商业代表又相继向国共双方提出了全面通邮、通航、易货等意见。1949年3月30日，上海工业会举行常务理事会，当晚派刘鸿生、潘士洁、田和卿、洪念祖、蔡昕涛、胡西园、姚书绅等7代表进京，会同在南京的部分工商业人士，向行政院、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呈文陈述目前工业界的危机，要求政府多为工商业界考虑，创造条件，实现南北正常贸易。在向行政院院长何应钦的呈文中说：“各地工商业之营运，全赖货物交流，方感繁荣滋长，免于窒息，社会经济枯荣，实亦消长于此。乃去冬徐蚌战役，江北撤守，以及平津局部和平之后，我上海工业界因原料缺乏，销区缩小，处境愈益艰苦……我工业界感于自身之迫切需要，爰经数度集议，研讨磋商，拟于华北江北方面举办易货，试行贸易，俾双方产品，

互获流通，凡交换出入货品，皆以民生实需工业原料为度，俾免货滞于地，致为邻邦所利用，或绕越港岛，徒耗物力。过去我方之粉易彼之煤，举办已有成效，航业界领袖曾往接洽通航，亦有眉目，最近报载通电通邮通汇等事，均在陆续举办，通商一节，倘能随之进行，不但本会所属八十余种工业，十二万余家工厂，数十万从业员工之生活，获得保障，即我公日夕企求之和平，亦可获得有利进展。”呈文中，不但陈述了工商业所面临的困难，而且把政府支持南北通商，看成是国民党政府与中共达成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工商业人士的要求下，4月1日，随同和平代表团赴平的就有通邮代表和通航代表。在双方政治谈判的同时，通邮代表与共产党有关人士就全面南北通邮（在这之前只是局部主要是上海与秦皇岛之间的轮运和邮政）进行会谈。4月2日，上海工业会召开理监事会议，研究南北通商步骤，决定电告毛泽东及华北工商界人士李烛尘，盼望支持促成。4日，上海棉纺织、橡胶、造纸等29个工业同业会开会，要求政府促进南北通商，给予工商界更多自主权。4月5日，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杜月笙致电中共毛泽东、周恩来，呼吁南北贸易。4月8日，行政院在南京召开政务会议，讨论南北的易货问题，上海工商界派6位代表提出三点议案：请行政院准许开放南北易货，并立即实施；准许工商界推派代表去华北与共产党接洽易货事宜；由船联会、工商业总会、市工业会、市商业会联名致电天津招商局经理张庆澜，及共产党对外贸易局郭局长，请免易货进出口税。

4月20日，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条约》上签字，工商业人士向国共双方提出的一系列要求或建议并未完全得到兑现。但这些问题在解放大军迅速南下、推翻国民党政权后，已不成为问题。但从1949年初以来工商业人士为促成国共和谈所作的种种努力来看，他们一直在呼吁真正的和平，坚信和平才是恢复发展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但以什么方式来获得和平，他们并没有具体的建议，更多的是集中在具体的通商、通邮、通航及货物交易方面，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既不同于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在八项条件基础上的和谈，也不同于国民党备战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的目的。在实现南北全面沟通问题上，他们在国共之间，基本不偏不倚，在实际操作中，也就容易为双方所接收。正因为如此，至4月20日以前，他们所提的一些建议已有不少付诸实践，给死水一潭的工商业界注进了一股清泉。可是，在两大政治势力的锯锋上，纯经济利益群体或组织的呼声又是那么微弱，他们充其量是一个建议者，而非决策者，最后结局取决于两大政治势力的实力较量。而两大政治势力都不愿轻易放弃这个中性力量，都在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他们。只是在这方面，共产党比国民党做得更成功。

总之，1949年国统区的工商业者，普遍不满于政府的一系列财经政策，迫切需要政府为工商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以求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稳定物价。他们的行动基本局限在经济领域，并没有过高的政治要求。他们的呼吁是善意的，实在的，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进步。由于工商业者的请愿活动往往以组织形式出现，容易形成强大社会力量，影响着政局发展。国民党当局能否妥善处理好工商业者的要求，直接关系到工商业者的心态趋向。而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大崩溃的形势面前，已很难

满足工商业者的愿望，“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处境，始终让工商业者如处梦魇，难释忧虑，严重挫顿工商业者对政府的向心力。国民党当局失去的不仅仅是工商业的经济支柱，而且还有工商业者的人心。

第三节　工商界的新生

1949年的国共决战中，对城市的争夺最为激烈。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共产党能否占领城市，并领导城市的关键。其实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在共产党内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中还不是十分清楚。许多中下层领导由于长期接收共产主义信念教育，艰苦的农村斗争生活又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带有很强的情绪化倾向，一种仇恨的心理往往导致他们在处理资本主义的方式上过于简单化。革命的激情往往压倒理性的分析，知识的狭隘时常蒙蔽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在一些人看来，既然帝国主义都是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一部分，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应该在打倒之列。他们对一般符合经济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含有民主自由成分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不能全面了解，对一般民族资本家的心态特征缺乏具体分析。对资本主义的偏见在共产党内尤其是中下层领导干部及部队中始终存在着。这样，实际工作中，歧视、损害民族资本家利益的现象，在1949年的城市争夺战中时有发生。

1949年前后，在被共产党解放的城市中，有的机关、部队占用私营企业房屋、仓库；公营企业在业务上急于扩大，排挤私营；工会急于提高工人工资福利待遇，不惜将资本家斗倒，逼得一些资本家逃亡，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些情况不断反馈到共产党高层，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针对这些问题，给党内发出题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提醒全党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方针上，要“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

在经济形式上，共产党也承认在消灭封建剥削之后，国家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应允许5种经济形式并存，即国家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其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最好形式。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再次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决议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

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针对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时注意调整对民族工业的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如1948年12月，唐山解放，中国最大的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正濒临破产，产品无销路，3000名员工发不出工资。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军代表监督生产，给予贷款，借给食粮，解决工人生活，收购积压水泥，维持生产。1949年3月起，天津人民银行给予循环贷款，解决资金困难，贸易部门则包销产品。该公司当月就恢复正常生产。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两个月后，90%的私营厂恢复。天津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交通不畅，原料短缺，销路碍滞。4月以后，政府贸易部门实行委托加工和计划订货办法，问题逐步解决。天津解放第二天，塘沽解放，中国最大的制碱工业永利公司的塘沽碱厂已经停工，积欠工资若干，人民政府采取贷款和收购产品的方法予以扶持。2月21日，该厂恢复生产，3月份的产量即达到战前的水平。其他一些城市，不少濒临破产的工商企业，在人民政府的扶持帮助下，也多相继恢复生产，既挽救了工商业者，又为大批工人就业创造了机会。

1949年以前，由于国民党的恶意宣传，南北交通的阻隔，信息渠道的不畅，国统区工商业者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琢磨不透，对工商业的政策了解不多。到1949年二三月，通过一些工商业代表亲自与共产党方面接触，对共产党的政策逐步有所认识。1949年3月19日，上海工商界举行"华北运销研究委员会"，由访问解放区的代表张丰胄等介绍他们在解放区的见闻。张对国共双方和平的前途极为乐观，以前他对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持怀疑态度，经过这次访问，有所改变，认为是否能够实现和平，还要待国共双方的努力，进行和谈则无问题，只要能和谈，一切都有商量的余地。共产党留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毛泽东对工商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方针。经他亲眼所见，解放区所有工厂均已开工增产，劳资关系在"两利"原则下合作很好，除天津中纺七厂毁于兵火外，各厂均无重大损失，国营事业的接收仅派少数人员监视而已，对民营工厂很少干预。在谈到共产党对技术人员的待遇时，张说：共产党也承认三民主义，对民生主义尤其强调，作风相当温和。通航通邮谈判也相当圆满，航线也在恢复之列，即使是中国航空公司，虽有外国股份，也不例外。对技术员待遇略有提高，其他概与旧制差不多，薪工以小米为单位。这些由直接的生活体验得到的信息，打消了工商业者的诸多顾虑，改变了从前对共产党的印象。听了张的介绍后，当场就有人提出与华北货物交易刻不容缓，否则上海各工厂在原料缺乏、成品呆滞下，无法生存下去。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尽量采取团结争取的态度。毛泽东1948年3月1日发表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就说过："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

误。”1949年，共产党尽量把这一指导方针贯彻到实际工作中。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党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向城市，从军事、政治方面来说，1949年前期，这种转变是成功的，但在经济管理方面还有欠缺，许多城市经济管理模式还深深打上农村斗争的印记。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调查研究时，针对城市管理中的一些过激现象就提出过严厉批评。他兑：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分田地一样……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隐。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背的”。上海税务部门的干部出于对一些偷漏税资本家的愤恨，对所有资本家不分好歹，加紧催税，“查账重罚”，超额多收，一些守法资本家不堪重税，表示不满，有的甚至关门拍卖。民族资本家在感到“企业实在维持不下去”的情况下，当面向市长陈毅申诉道：“我只有一份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荣毅仁也因公债一时交不出，将仓库中久存不用的机器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抵押，贷款才得以解决。人为因素造成了资本家企业的困难，不利于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加重了社会承受失业人数的负担。

针对当时资本家对共产党的疑惧心理和干部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刘少奇多次提出：“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但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联合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意义的。在中国，他们的生产上是进步的。他们这种剥削对发展生产是有功劳的，是有进步的。”还说：在工作中，应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尽管为了这几句话，刘少奇在1954年曾作过自我批评，但足以反映出共产党高层中，有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透彻的，采取的方针政策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国统区的资产阶级苦于南北不能交通，严重影响到企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对此，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就指示：为了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于我们占领南方各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党手中等，决定在某些地点与南方民航公司、电讯局、邮局、银行、钱庄恢复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检查工作不可过严。对付特务，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方面去取得成绩，而不要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求成绩，应看作一件大事去做。2月底，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农业部宋劭文、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与上海航业界代表魏文翰在北平洽谈，对于交换物资、搭客及通邮问题就已在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当月就实现了上海及秦皇岛之间的通航及邮件的捎带。在国共和谈前夕，有些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满足了南方资产阶级的意愿，也方便了广大群众的生活。

工商业者最直感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谁要是体谅他们的处境，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拥护谁，其经济利益价值观有时更重于政治价值观。庞大分散的

中小工商业者群体更是如此。国统区的中小工商业者大多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已失去信任；共产党对中小工商业者的灵活政策，却使他们重新看到了希望。为了迎接光明的到来，他们开始主动与共产党接洽，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保护自己的利益。1949年解放军来到前，一些城市市面不靖，位于闹市繁华地段的商业网点，三教九流的人随时都会前来“打抽丰”，有的干脆明白张胆地敲诈勒索，中小工商业者苦不堪言。他们本无明显的政治倾向，对共产党的认识，无非就是国民党控制的报纸杂志上宣传的“共产共妻”那一套。可是他们在与个别地下党接触后，才感到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可怕。受共产党的影响，同一个商业区域的工商业人员，在社会控制的薄弱地带，往往与同行结拜组会，抱成一团，以防不测。如南京夫子庙永安商场绒线公司老板、厂商联谊会理事、常务经理及百货同业工会理事施宪章，1947年春，在夫子庙六华春酒楼与其他商业业主十人拈香换帖，结拜为金兰十兄弟，按年龄大小排列，宣誓今后以兄弟友谊为重，不出卖弟兄，一人遇到困难，众兄弟全力帮助。业主们还组成“自励会”、“互励会”等团体，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业主们团结，善待职工，1948年“八·一九”限价时，国民党政府一再要求职工揭发工商界囤积居奇的行为时，职工不但不检举，相反和老板站在一起，把货物隐藏起来。

1949年初，解放军即将南下，一部分工商经济界人士想抽资迁移，而南京地下党及时向工商界人士散发《告工商界书》，说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工商业经济政策，以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希望工商界人士不要听信谣言，安心生产和工作，迎接解放。工商业人士既感到宽慰，又有些担心，怕国民党特务知道，性命财产难保。后经观察，没有动静，这才安下心来。对不顾职工死活、执意抽走货物、资金的资本家，则发动群众开展反搬迁斗争，号召广大店员密切注意本店动向，稳定了厂商资本家的情绪，刹住了“搬迁风”。对一些解雇和拖欠工资的纠纷，自励会、互励会则本着劳资兼顾、共度困难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调解。三四月间，南京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为挽救危局，政府在工商界及高级职员中组织了“义勇警察”。正是这些“义勇警察”在国民党溃逃之际，从夫子庙派出所夺得了十多支枪支，在4月23日后的3天行政“真空”中，巡逻于夫子庙到中华门一带，使城南一带的工厂商店均未遭到抢劫和破坏。解放军入城，“义警”还在新街口维持秩序，迎接解放军。南京解放后不久，永安商场联谊会、中央商场厂商联谊会和上海百货公司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工商界立即恢复营业。4月26日，南京几大商店都相继恢复营业，南京成了全国城市中工商业恢复营业最迅速的一个。地下党又发动召开全市工商业职工代表大会，号召店员推动资本家恢复和发展生产。还组织职工，拒用银元，打击银元贩子。为南京解放初期恢复经济、保障供给、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

又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接收”，无暇顾及广州人民生活，维护社会治安，广州市面非常混乱，不少商店经常接到敲诈勒索的恐吓信。土匪到处抢劫，掳人勒赎，百姓鸡犬不宁，工商业户失去安宁的经营环境。他们迫切要求加强社会治安，政府却不睬不问。工商业户只好出人出钱，通过广州商会，组织起广州市义勇警察，成立了“广州市义勇警察管理委员会”。该组织的经费和人员均由各工商业户摊派和派店员充当

(如果派不出店员则要出钱雇请)，自治权又掌握在工商业者手里。为了争取这支力量，中共派人员进去，做工商业界头面人物的工作，力争把民众自卫队控制在进步力量手中。工商业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千方百计抵制国民党政府的控制，拒绝各种摊派。解放军大军南下时，国民党策划退前的破坏，计划炸毁交通要道、公共设施、公私企业；恶霸土匪、地痞流氓准备在国民党撤出后，乘机洗劫广州，一时人心惶惶。这直接损害到工商业者的利益，无法和不愿撤退的工商业户在共产党及进步力量的组织下，组织起来，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工厂，保护商店，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广州解放前夕，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除炸毁海珠桥外，还在黄埔鱼雷库、天河飞机场和白云机场安放了定时炸弹，以致连续爆炸，也造成一定损失，但广州市其他的公共设备，如水、电及一切工厂等都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发生抢劫或其他骚乱，这是与商会及警察局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市区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工商业户很快安定下来，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为解放军解放华南准备了有利的后方环境。由于共产党团结争取工商业者的政策和措施灵活及时，1949年解放不久，像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广大中小工商业者密切配合，为恢复秩序、安定人心、繁荣市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四节　归去来兮

1949年初，解放军在平津实行的工商业政策、措施不断传到国统区，解放军在平津一带散发的传单不断在国统区媒体上刊登。如1948年底，共产党在北平发布传单，声明：不仅保护私人资本及财产，而且承认并保护国营工厂、银行及公用事业中的商股；命令所有中央、省、地方政府官员在解放军接管期间留职，不抵抗或不毁坏者将不予惩罚，对于阻挠及毁坏的官员将处以极刑；保护外侨的生命及财产。同时还公布了解放军八项纪律：(1) 态度讲话要和气；(2) 买物依公正价格付给；(3) 借物必归；(4) 物件损坏必须赔偿；(5) 不得骂打任何人；(6) 不得毁坏收获；(7) 不得调戏妇女；(8) 不得虐待俘虏。这八项纪律内容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同小异，可以说这些规定共产党在井冈山时就开始形成，差不多有20多年的历史，但难以在国统区报纸上公开刊载，国统区民众对它们并不了解。而今，解放军散出的传单及解放军的入城纪律，能在国统区的《申报》等报纸上公开刊载，对市民心理形成了强大冲击，起了镇静作用。从来没有听说解放军这些纪律的民众尤其是工商业者，读到这些消息，等于吃了定心丸。这类报纸一上市，常出现“市民互相争阅之，读者皆面带微笑”的景象。

资产阶级的功利倾向超过了其他阶层，在政治与实业之间，他们可能更关心实业。但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以来，一股爱国热情一直是支持他们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在他们之中，有的党派意识、政治倾向并不明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爱国信念始终根植在脑海中。他们眷恋中国传统文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政党之

争的锋面下，看好可以给祖国带来新希望的一方，最终留在祖国。

1949年解放前夕，有的资本家，通过与民主进步人士的频繁接触，逐步了解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觉悟较早，思想上不断向共产党靠拢，一开始就拒绝国民党的搬迁要求，留在大陆，守住基业，准备在共产党新政权下发展事业。这样的人如南通张氏事业的第二代传人、大生公司经理张敬礼。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大生官股代表、大生公司董事长洪兰友，要求张敬礼将大生公司迁往港台，张敬礼对洪兰友的决定，不仅不予执行，还毅然将存在香港的外汇和向国外订购的发电机、锅炉和印刷机等大量物资调回南通，没有让一个锭子拆到港台。1949年，张敬礼与大生公司的许多高层管理人员一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张敬礼对自己的这一抉择深有感触，他常说："人生中真正的起步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上海的冼冠生也是这样的人。1949年，冼冠生所办的冠生园业务，经过政府滥发金元券和限价政策的变相掠夺后，元气大伤，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此时，有人劝他抽调资金到香港设厂，凭冠生园的声誉和他经营的手段，必能在香港获利，但遭到他的拒绝。他说："我的事业在国内，发迹在上海，抗战时内迁是为了抗日，将企业外迁，这是叛国行为，我决不这样做。"他终于奋力支持到全国解放。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都无法与官僚资产阶级抗衡，还要忍受各种权贵势力及不法势力的巧取豪夺。1949年前后特别是"八·一九"币改时，工商业损失尤为惨重。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运动因碰到孔家这样的官僚资本顽石铩羽而返，但在他吹起的一阵风暴下，不少企业家从此心惊胆寒。外界甚至传言，上海被监禁的工商业界人士有3000人，并把9月间荣鸿元被捕勒索美金50万元一事称为"反企业家"倾向。这更令许多资本家坐卧不安，拿不准跟着蒋介石政权是祸还是福。而共产党解放区善待资本家的消息，经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到他们的耳鼓，更加动摇了对蒋政权的信心，减少了留在大陆的顾虑。对于共产党，他们虽还不能说"衷心拥护"，至少不存恶感，一旦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共产党的保障，就会对共产党深信不疑。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存有观望心理的民族资本家，态度都发生了根本转变。如共产党解放石家庄后，发还大兴纱厂，令裕大华资方负责人黄师让大为感动。1949年2月，黄与友人通信中称："刻下对方（即共产党）政策保护工商业及私人企业，平津传来消息尚不令人沮丧。（鲁）绍猷来信，本厂亦有交还之望。"至此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

上海解放前夕，曾有不少资本家抽移资金，有的逃亡海外，其中有些是受人胁迫的，解放后又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在新政权下继续兴办实业。如刘鸿生、吴蕴初、刘靖基等，都是解放后从香港返回内地的。刘鸿生的转变过程，颇能体现这批民族资本家的心态特征。

上海解放前夕，刘鸿生对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而且还有恐惧心理，怕共产党来了会清算他，一度也想离开上海到香港或台湾去；另一方面，考虑到一生费尽精力所办的几个企业都在上海，不甘丢掉一生心血，漂泊他乡。去或留，在他心里是矛盾的。直到上海解放前几天，他还未打定主意。这时国民党当局似乎又意识到民族资本家的价值，

想方设法把他们带走，不听劝说的，就强行挟持而去。1949年5月22日夜，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亲自派军车来，将来不及收拾行李的刘鸿生挟持上了飞机，前往广州。为了防备被押往台湾，刘从广州溜到香港。上海解放后不久，刘对共产党一时还没有更多的了解，幸亏留在上海的子女及时向他通报了上海在共产党接管下的有关信息，并亲自到香港迎接他，他才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作出重返祖国内地的决定。他作出这一决定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据他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没几天，我的二儿子刘念义到香港来接我，他对我说回去绝无危险，并一再描述上海解放后，秩序一直良好，我们的企业正在恢复等等。说实话，我当时是很想回国的。我已经说过我不想作"白华"。我的一片企业又都在国内。我已经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儿刊、都盼望我回去，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出路。但是，当时在香港的一些资本家正在彼此观望，谁都不愿意先走一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说："共产党什么办法都有，只是经济问题没办法。"我也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因此又踌躇起来。

念义在香港等了两个月，我一直没有答应他"走"或"不走"。直到念义决定单独回上海，临行那天，我才决定下一只船回大陆……

我决定回来的时候，内心夹杂着踌躇和顾虑。我踌躇，因为我认为共产党解决不了上海的米和煤的问题，更不用说解决所有其他复杂的问题了。我顾虑，因为我不知道共产党将会怎样对待我。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只要蒋介石统治中国，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可是另外一方面，通过亲友和我自己的孩子们，我也知道了一些关于解放区及其政策的正确消息。我到了香港后，这些消息不断传来。因此，我最后才决定把我的未来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如果说我一生中曾作出过聪明决定的话，那就是这一次。

刘鸿生不但自己回国，还用亲身所见所闻及亲身体会，致信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的八子刘念信，要他不要听信外界对共产党歪曲的谣言，回祖国来效力。1949年12月17日，他在信中这样给刘念信写道：

国内解放后，一切已转入正轨，昔日之贪污腐败情形一扫而空，尤以军队纪律之佳，为国民党以来所仅见。暂时生活虽稍困苦，但各界上下正埋头苦干，克服困难，照一般观察，将来必大有希望，余亦有此同感……至今之工商业趋势，着重于自力更生，外货除生产必须［需］之器外，消费性之货物绝对不准入口，羊毛亦在禁止输入之列，故余先正会同沪上毛纺业人士向西北各地采购原料，以供各厂应用。汝学有专长，返沪后决不至无事可做，甚盼早日北来为余臂助，并希转告汝五、七两兄，同作归计，乐叙天伦。

1950年12月，刘再次致信给刘念信说：

余返沪已五月有余，眼见上海解放后与前大不相同，共产党办事谨慎小心，处处着

重实际，务求彻底明了，不贪污，不徇情，人民不得隐瞒，不敢犯法，故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

民族资本家态度的转变，既有国民党政府的造孽，又有共产党政策的务实，更有共产党领导人人格魅力的感召。共产党的一系列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共产党领导群体开明的政治态度，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都使他们对前途坚信不疑。离沪赴港又离港回沪的刘鸿生，解放初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后，进一步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周恩来总理诚恳、坦率的谈话，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老实说，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坦率已经使我开始消除对共产党的疑虑，反而增长了一点信心。因为我过去四十年出入官府，从来没有这么诚恳和坦率的言论。我觉得共产党是有些不同。”像刘鸿生这样的民族资本家还有许多，如常州解放前夕，大成纺织染公司经理刘国均，误听国民党宣传，避居香港。然而在临行前，他对在常州的三个厂均作了妥善安排，各部门均有专人负责，存货及流动资金原封未动，因而解放时，由于工人护厂，反动派未能破坏，始终正常生产。解放后，刘在香港割治胆疾后，于 1950 年即回到祖国大陆。

有的民族资本家，中华传统的文化观念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相信传统的一切，不愿在有生之年流落异乡。尽管国民党软硬兼施，要把这些实业家裹挟而去，他们却不为所动。福新、申新等面粉、纺织厂老板荣德生就是这样。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要他迁厂到广州去，他没有动。为了让他离开无锡到上海，国民党甚至假造了他太太在上海病重的消息，他赶来一看，并非如此，仍旧回无锡去了。在这以前，他还经过国民党的一次有计划的绑架勒索，真是受尽了打击，然而他没有动。因为他相信中国旧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风水、示梦、扶乩之类今天看来是迷信的东西。生了病，只要打几针西药即可痊愈，他却不肯，硬是坚持用中医旧法，折腾了 3 个月才起床。经过了这么多困难，他还是对人民政协产生的新中国政府充满无限期望，对中国建设的光明远景表现乐观。他明白，要把自己的事业经营得更好，就必须参加到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去。荣老板不但自己留下来，还劝说一些与其熟悉的文化人士不要离开大陆。史学家钱穆在江南大学任教时，就曾被荣氏集团力劝挽留。钱穆也认识到，国民党胜利回都之后，沦陷区人民仍如被征服地，“人民心滋不安，金元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终因拿不准共产党是否有“丝毫开国气象”而离开内地赴香港。相对于这类文化人士，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的信任程度又深了一层。

原先对国民党死心塌地的工商业者，很多在 1949 年也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态度。他们对国民党政府不守信义、不讲公道的做法心怀怨恨。临解放前，他们之中，即便有人对共产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但也不愿再为蒋介石政权卖命效力。在币改时期因儿子杜维屏事件而被蒋经国“将过一军”的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杜月笙，就与国民党明显疏远，时常在失意的政客面前抨击蒋介石政权，说：“沦陷区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只知道要钱，搜括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还不止！”虽然他某种程度上是在发泄“八·

一九”时期的旧根，但对国民党的揭露也是一针见血。上海解放前夕，他不敢留在大陆，但也不愿追随蒋介石。蒋介石亲自出马，动员他到台湾，他却毅然决定移居香港，并终老于斯。

解放初，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共产党应有的礼遇，他们经过新旧对比，对共产党政府倾心相向。共产党政权巩固不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生存空间却日渐减小；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渐暗淡。新中国政权建立后，他们就开始处于“改造”之中，被“彻底”改造，则是从1952年开始的。1952年6月，毛泽东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应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的论断，消灭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已提到政治议事日程上。1953年，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所谓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的时代已经结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行将退出历史舞台。

第八章　放与收——媒体处境与舆论导向

第一节　处境艰难的媒体

1948年“八·一九”以后，经济大气候不景气，各地报刊难以支撑。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报刊还可勉强维持运转，地方或中小民营报纸则在各种压力下，苟延残喘，苦苦支撑。报业在“限价”、“开放”、“涨风”等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万物上涨，报纸也不例外。报价上涨，对报社而言，本是好事，但涨的是报价，而不是报纸的广告费。报价一涨，自然苦了订户，许多人无力承担，只好退订，报纸发行大受影响，中小报馆因而难以维系。如贵阳的报纸，发行广告的定价之高，在国内各大城市首屈一指，1949年4月20日以前，对开日报每份定价金元券1600元，4开晚报800元，广告每寸定价也不过1600元。4月20日，各日晚报均遵照报业联会公议，改以银元作基数，对开日报定价银元1角，4开晚报定价5分，广告每寸3角，以出版前一天晚上9点的银元价格为标准，折合金元券收费。19日报纸不过1600元，20日一跃而为8500元。银元价钱天天上涨，报纸价格也随之提高，最高曾达到39000元一份。报贩子又有陋规，以六七折从报社批发，零售时又加价一二成不等。这就意味着贵阳人在前两天银元价格最高达490000万时，要花60000元金元券才能买一份日报看看，在这个工商业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简直令人咋舌。各家报纸大感“改元”的痛苦，订户纷纷退报，零售一天比一天减少，广告除结婚、订婚等花钱作乐的外，几乎没有新户上门。各家负责人碰面时总是唉声叹气。《中央日报》、《贵州日报》等几家大报打算用“减轻读者负担”的名义，自动降低报价，广告刊多放折扣。几家小报5月1日起，改用轮流出版的办法，做一天吃三天，即由每日出版改为3天刊，还有家报纸干脆停刊，静观态势。都感到不改元不得了，改元更不得了。

报刊界人士最感头疼的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新闻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各种清规戒律逐日增多。越是腐败无能的政府，往往越是胆小心虚。1948～1949年间，国民党经济的崩溃，军事的失败，政治的腐败，都已是为国人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事。为作最后挣扎，他们还要把不少真相捂着、盖着。国民党政府在1948～1949年间，对于新闻的控制最为起劲。经济萧条，物价上涨，对新闻媒体生存构成的威胁，还比不上当局对新闻的控制。

"新闻自由"为《中华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可是那年头，在"党国"存亡关头，法律的存在早被忽视了，新闻的真假应该由当局说了算；新闻稿的发与不发，不是媒体所能决定的。国民党当局动用各方面的力量，全力管制新闻，压得新闻工作者不能出气，也无处得到真消息，所得的大多是"谣言"。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只许官府去做，不许舆论去说。政府官员可以明白张胆地贪污腐化，就是不让舆论界曝光。一旦新闻如实报道，让他们出乖露丑，就千方百计给予压制和取缔。扼杀新闻的权力不仅在中央，地方官员手里也操着生杀大权，谁不听招呼，就封谁的口，关谁的门，可谓无法有"天"——谁的辖区就是谁的"天下"。1948年9月1日"记者节"前夕，南昌报纸就因刊载不利于市政府的消息，被政府利用印刷排字工人以武力拒绝排印报纸，发生"开天窗"事件。原来，南昌市市长熊整被检举挪用"戡乱"经费以后，他曾公开否认，经省会计处、审计处、法院调查后，证明确有其事。市府闻讯后，立即唆使工人，以提高待遇、保障工作为利诱，策动少数工人向各报工人威胁：如果任何人排印不利于政府的新闻，坚决以暴力对付。9月1日，《力行》、《青年》两报同天在报上原拟刊登该内容的地方开了天窗。这一事件在南昌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在记者节庆祝大会上，江西省会记者公开宣称，本届"记者节"为"追悼大会"，一致决定，在此事没有解决以前，记者全体停发省、市新闻稿。9月1日全市的多数报纸均无地方新闻，而以广告充填版面。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南昌唯一的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1日的社论竟也因排字工拒排而开天窗。

为了进一步控制舆论导向，国民党当局在《出版法》之外，不断制定新的新闻标准，统一新闻报道口径，限制新闻报道范围，使得新闻报道千篇一律，报纸特别是民营报纸的读者群体越来越少，报业产业收入大大降低，报纸维持日益困难。如1948年12月，国民党重庆党政军当局，在《出版法》之外，就新闻报道的标准又作过一揽子规范：不得刊载的言论包括诋毁政府及元首、动播民心、降低士气、刺激学潮工潮、刺激物价、有损邦交等；称共产党必须称"共匪"或"共军"；凡军事"匪情"消息须采用中央社或官方发表的消息，否则应负法律责任，报道消息必须确凿；道听途说、谣言、"共匪"广播或"共匪"发布的消息言论不得刊载；标题与内容相符，不得夸张事实，刺激人心，不得借题发挥，以古讽今；凡有关评论政府措施的文字应提出具体意见，不得侮辱谩骂；转载其他报纸或刊载收听的任何广播消息以及刊载他人的演讲，应与自行撰写的报道负同样法律责任。这样，报纸所刊消息，不能涉及当时社会上所有老百姓所关心的热点话题，包括物价、学潮、工潮等；新闻格式要按当局的意图；军事消息应采用中央社或官方的消息；对共产党的称谓也要使用官方的专定名称；新闻责任也是报纸编辑负责制，而不是文责自负。这就等于宣布剥夺报纸自由发布新闻的权力，按此标准，像《中央日报》曾经刊登过的《赶快收拾民心》一类的社评，都在禁止范围内。民营报纸没有生存空间，这等于掐断了民营报纸的生路。当时就有报业界人士提出异议。重庆报业联合会主席高允斌谈到重庆报业处境时愤愤不平地说：各报求生存固然不易，热门也不可能，因为各报对于员工的遣散费无法负担。过去成都的报纸是跟着重庆的报纸跑，现在不一样了，成都报上刊登的东西重庆却不能刊登，弄得报纸没有生气；过去

"陪都"报纸的读者都给成都争取过去了；"陪都"报纸吃进去的是草，吐出来的是奶，草吃完了，奶就不会有了；报纸是靠业务维持的，而"陪都"报纸在业务上已没有竞争力了。

这些表明，国民党政府对于舆论的实话实说已害怕到极点，意识到在"党国"危亡的生死关头，整顿报刊非下猛药重剂不可。因而，报纸被查封或停刊的事时有披露，只要当局认为"违法"的，就可勒令停刊整顿；一切不利于政府（事实上是某些个人）的消息，都得清查。1948年济南市参议长裴鸣宇从济南逃到青岛后，发表了有关济南的言论，绥靖区认为他是"言论荒谬，为匪张目"，当地的《民报》将原话刊登，《民言报》英文转载。警备司令刘安祺下令《民报》10月30日起停刊3天，《民言报》停刊一天。1949年2月1日，《南京人报》被查封时，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司令汤恩伯手谕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以《南京人报》造谣滋事，妨碍治安，着即查究，并依法从严究办。"卫戍司令部的发言人说：本市《南京人报》有意离间军政要员，虽经本部迭予警告，该报不但不加接收，并变本加厉，于1日又毫无根据，登载首都警察厅"黄厅长（黄珍吾）开溜失风，被部下在机场扭获"新闻一则，殊属有意挑拨警员反对其首长，藉以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对高级治安负责人恣意中伤。本部虽爱护舆论，殊难坐视，汤司令恩伯已有手令到部，着将该报予以查封，并逮捕造谣分子，从严究办。希新闻界共体时艰，凡无根据之消息，足以影响人心及妨碍治安者，盼慎重发表。

被定性为"挑拨警员反对其首长"的新闻原文如下："本市部分机关首长拐款竞溜声中，维持地方治安的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竟亦于昨（31日）晨，拐带巨款，图先天下之溜而溜，卒以事机不密，在明故宫机场被部下截获，解送卫戍总部法办，此诚疏散声中又一丑事。兹将详情志后：昨晨8时许，本市延龄巷金都木器店门口，一满载行李之大卡车，因抛锚滞留路中，军警以职责关系，上前查问，始悉该车行李等物，乃黄厅长所有，拟运往福州者。司机并出示警厅通行证，言谈强硬，状至傲慢，岗警以其仗势违警，不甘忍耐，乃将其带往警局，并请示黄厅长，询问司机之言是否属实，讵黄竟支吾其词，推说是项行李为该厅督察处长周敬人所有。并派一亲信督察到局，故意将通行证撕毁，又对司机轻易泄露厅长秘密，颇为懊恼，乃赏以耳光释去。黄虽如此掩饰，然欲溜之心已为警方普遍注意，因本市全体警员每人应领之一万元疏散费尚在黄手中，未有分文发出，生活攸关，无怪疑虑纷纭。督察处长周敬人，对黄掩饰所运行李为渠者之举，尤所愤懑，遂对黄行踪暗中监视。8时许，当黄溜抵明故宫机场，尚未登机起飞之时，即为周赶至抓获，报告卫戍部拘留法办中。"当局对此事的态度是：厅长开溜无过，媒体披露有罪。而这位厅长正是压制新闻的老手，早在1948年1月，作为首都警察厅长，他就严令所属各警察局封锁新闻，不许接见记者，如有新闻需要宣传，均需经过该局核准，统一发布。这引起记者公愤，认为警察厅妨害采访自由，联名提出抗议。后来黄珍吾感到记者集体抗议，到处宣传，对自己很不利，在记者招待会上，否认封锁新闻，敷衍了事。想不到一年后，他的丑行被新闻界逮个正着，这仿佛成了他压制新闻恶行的报应。

1949年二三月份以后，国民党在战场上败绩连连，国统区危机日甚一日，对新闻

的控制愈加严密。2月8日，国民政府首都卫戍总部勒令《新中华日报》停刊，理由是该报从去年11月至今，社论及新闻报道多次违反国策，曾被江苏旅京同乡会检举，并经行政院新闻局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多次劝告及警告，均置若罔闻，2月4日，又著论攻击卫总，并反对戒严令。3月3日，汤恩伯下令对上海全市报刊进行集中审查，由社会局、警备司令部、市政府新闻处、警察局及文教委员会各派4人参加，每天上午上街巡查，下午汇报。严格各报刊登记制度。报刊审查标准有：(1)对和谈问题，应以不违反全面平等合理之原则为准则；(2)备战谋和是政府既定之国策，不得登载中伤、讥讽或违反该项国策之文字；(3)言论记载，须正确公平，不得破坏团结，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危害国家；(4)报道消息以事实为依据，不得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对国外通讯电讯，尤须审慎发表或剪裁运用；(5)严禁泄露军事秘密及为共产党夸大宣传之文字；(6)对本市治安与社会秩序之维护，以及军民合作之提倡，应共同予以有力之鼓吹。上海军警组织报刊巡回检查队，将一些“违章”出版的刊物取缔。范围包括：(1)无登记的；(2)改名出版的；(3)以丛书格式变相出刊的：(4)在外埠登记而在上海印行的；(5)登记证已经注销的；(6)取缔有案的。处分办法分为4类：取缔报刊；停刊处分；警告处分；因情形特殊，移交南京社会局核办的。经过整顿，《和与战》、《新闻观察》、《共产党内幕》、《新闻世界》、《新时代》、《老百姓》、《上海滩》等28种被取缔；《群言》、《舆论》等被有期限停刊；《经济评论》、《政治家》、《新闻杂志》等受警告后，送交南京社会局处理。

不久，政府谋取和平声中，新出版的刊物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谋和论调竞相问世，一些与当局“备战谋和”口径不一致的言论自然成了重点查禁对象，取缔报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淞沪杭警备司令部再施铁腕，会同上海文教会、社会局、警察局等机关取缔185种刊物。香港的《工商业日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在禁止销售之列。这些报纸中，被认为违反所谓“国策”的占了很大部分，如《世界知识》、《展望》、《中建》、《大学评论》、《群言》、《正义》、《共产党人物》、《新希望》等均属此列。

地方报纸如果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刊登官方不喜欢的消息，随时有可能被取缔。广州有一“昙花一现”的报纸，叫《天地新闻日报》。1949年春夏之间，原在上海办《新闻天地》方型小报的丁中江、陆铿等人，由沪来穗，编辑出版《天地新闻日报》。丁、陆都是科班新闻记者，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较熟，来到广州，以“自由主义者”标榜，他们拒绝新闻检查，言谈中不把广东的地方官放在眼中。该报将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全文在头版刊登，还用红色花边。就在当天，陆铿被捕，报纸被勒令停刊，出报不到一个月，成了短命的报纸。

1949年，台湾成了国民党政府挣扎的最后据点，为了“净化”舆论空气，保证后院的安定，对新闻界的控制日益严格，一大批报纸都被重新过滤了一遍。陈诚执掌台湾省印之初，共有大小报纸十多家，此外还有外省刊印的报纸航空版，如上海的《大公报》、《新闻报》、《申报》、《商报》、《东南日报》、《金融日报》及厦门的《江声报》等。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政治中心南移，投机商人、失意政客、政治冒险家纷纷投机报界，新创及大陆移来的报纸又有好几家，如《中央日报》、中统的《建报》、商人的

《华报》及《民族报》、《正义日报》、《大风报》等。通讯社数量也急剧增加，除中央社外，有省党部台湾社、新闻处的台新社、海疆社等。这些新增的报纸和新闻社，各自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团体的主张和利益，但代表民间的报纸、新闻社很少。尽管如此，陈诚以前在东北被击溃逃归时，曾吃够舆论界“抨击”的苦头，深知报纸的社会力量，知道多一家非嫡系的报纸，就多一家“麻烦”，所以从接掌台省权柄以来，就注意对报纸进行整顿。先是通过经济压迫，一度停止新闻纸的配给，使许多没有经济实力的小报发生动摇；再利用职权，裁并异己报纸，或勒令改组，或强迫停刊，而封闭停刊的理由非常滑稽蛮横。《成功日报》、《大风报》、《正义日报》、《华北新闻》、《平言日报》、《台北晚报》、《天南日报》、《力行报》、《国声报》等，都是在这一系列“理由”下封闭停刊的。经过陈诚的“整顿”，台湾新闻界在作风上、论调上、色彩上已归于“统一”，整天刊登的都是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表现“乐观繁荣”的好消息。

在国民党新闻高压下，一些民营报纸既要报道真实消息，争取读者，又要争取在当局新闻管制的夹缝中求生存，只好迂回报道，与之周旋。如南京有国民党中央的《中央日报》，按照国民党中宣部的要求，民营报纸报道的重大新闻得与《中央日报》统一口径，像军事新闻的发布，规定只能由“中央社”和“军闻社”统一发稿，否则就会受到警告甚至被取缔。其实，读者大多知道中央社的消息真实性如何，不但内容常常以假代真，而且还充满了对共产党诬蔑之辞。民营报纸如果跟着报道，根本没有自己的读者市场，只好各显神通。如《中国日报》一类的进步民营报纸，就采取编辑“军事综合报道”的方式，开辟市场，向读者报道真相。当时一些外国通讯社如塔斯社、法新社、美联社以及香港、新加坡的一些华文报纸，往往都有一些客观报道，他们还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新华社消息，然后把这些消息编成“军事综合报道”，把战争的真实情况透露出来。这些“综合报道”或“外电”来稿都保持了“合法”的外表。另外还通过“本报某地通讯”等方式，及时把各地的消息传递给读者。这种“剪报”是有选择性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特务横行、物价飞涨、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生活景象都经常在各地通讯上展现出来，又让当局找不到取缔的借口。

1949年，国统区媒体受到通货膨胀和国民党政府新闻管制的双重压力。政府千方百计要把媒体拉入官方宣传的统一轨道。在新闻管制中，既有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夹杂着官员的个人意旨，新闻控制已成了少数人为达到个人目的而随意利用的工具。国民党政府及部分官员十分害怕媒体揭开他们不可示人的伤疤，不惜在执行《出版法》的幌子下，干着违反新闻自由的勾当，把言论自由视为替政府或个别官员说话的自由。可是，这种肆意践踏新闻自由的行径，也使国民党政府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就是新闻工作者的群体觉醒，读者识别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第二节 黑白颠倒

1949年前后，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思想大转变的时代。国统区内，新闻自由空间越来越小，而民众的阅读兴趣又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当局有控制新闻的权力，读者则有选择阅读的兴趣。新旧交迭，时局急转，读者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现实，关心新闻，急于获得与时局相关的真实信息。在阅读新闻时，读者具有强烈的偏向性。凡是他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报刊，往往争相阅览，否则，兴味索然。如1948年底，在北平清华高校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里，每天上午11点左右，正是城里报纸出刊的时候，那里早有人在等候着，报纸一摊开，大家争阅。然而，学生看报是有选择性的，看《世界日报》的人多，看《华北日报》的少，到了下午3点钟，视线又转到当天天津的《益世报》，看前两天香港的《大公报》的人就更多了。大家深信，外国通讯社比"本报专电"强，比"中央社"更不必说了。几种剖析时局极为详尽、报道不偏不倚的刊物像《观察》、《展望》也很吃香。可是，这些报纸和新闻正是政府所烦恼的。国民党官方的报纸对读者明显缺少吸引力。

1948年以前，人们三天两头可以听到国民党压制、打击和取缔××纸的消息，但一些标榜中立、公正、独立的报刊还是能够生存下来，甚至连一些对当局政策宣传极为不利的报刊也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立发行。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左翼联盟创立、活动时即已存在。鲁迅等左翼人物因发表批评政府文章，不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恐吓、限制，但他们依然生活下来。许多刊物和杂志，仍可在国民党统治的夹缝中开办发行。也有不少激进的或同情共产党的新闻界人士惨遭杀害，但国民党当局也只敢偷偷摸摸地进行，如1934年11月13日，因倾向抗日，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的史量才等报案就是如此，非常顾忌社会舆论的反应。

抗战胜利不久，国共再度开战，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并日趋公开化。如1947年5月25日，当局以刊登不正当言论和"为匪张目"的嫌疑，封闭《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三份中间偏左的报纸；1948年4月，出版了17年的《国讯》周刊和国讯书店，因发表和出版共产党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被查封；等等，都是比较大的行动，一时引起新闻界的强烈抗议和猛烈抨击。《人物杂志》曾公开发表徐铸成的谈话，表达了他对中国新闻界的看法。徐在接收采访时说：

> 目前新闻界发展到极可怕的时期：黑白颠倒。……这次抗战，陷区报人很多与党派没有关系，然而都有奋斗精神，诛伐丑类，虽死不辞，前仆后继，大义凛然。胜利以后，报人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或者由于言论受制，失去了这种传统精神。过去，有些报纸像鸵鸟一样，对有些事情避重就轻，但还没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可是，现在却发展到血淋淋的事实都加以抹杀，反口噬人。这对于下一代青年记者养成不顾真理，歌颂

暴力不以为耻，反以说谎为当然。这影响太大了！新闻界的遭遇，的确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作为噤若寒蝉或颠倒黑白的理由。

尽管这时的新闻界已发展到“颠倒黑白”的地步，但在1948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虽比较严厉，仍是局部的，有条件的，新闻自由至少还没有完全丧失。右、中、左的报纸上，都可见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报道和严厉批评政府的评论，舆论界尚可以对政府恣意扼杀新闻的行为进行抨击，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人物杂志》敢于公开登载徐铸成的谈话，从反面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他不少报刊也为三报被查封的事，刊登文章，猛烈抨击。

另一件可以反映国统区这种新闻氛围的事就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的开办和存在。从1946年直到1948年底，《观察》就一直在发表评论政府、时局的文章，有的文章对政府政策的评判毫不留情，曾经被人们誉为国统区民众“了解政局和战争进程的唯一可靠的消息来源”的杂志。但这份杂志竟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活了3岁，最后连政府对它的态度、乃至对它“挥刀”砍杀的信息都能“跟踪”报道。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弊端，也时常被《观察》等报刊揭露得淋漓尽致。它的存在至今还被许多人认为是个“谜”。

其他民间报纸如《大公报》等，虽然站在中立的立场，但它们从未停止过对政府的批判，甚至可以与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展开辩论，他们认为不对的，即可直言批判。某些报纸内，照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记者，但没有报社同仁检举揭发。例如，提到解放前的《大公报》，“小骂大帮忙”5字评语似乎给定了终身。20世纪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大公报〉史》，也是这样给自己定性的。但王芸生的《大公报》报馆里，就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王及报社领导都知道他们的身份，但是睁一眼，闭一眼，不加排斥。他们却不允许国民党特务藏身于《大公报》。

1948年底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似乎意识到，对新闻舆论放得太宽，政府的许多事就无法进行，该是收紧的时候了。于是，新闻界如有真实报道，就会给加上“泄露机密”的帽子。前线军事老吃败仗，国民党当局不怪将帅无能，却时常把怒气发泄到新闻媒体身上。当时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过去军事之所以失利者多，多半是新闻通讯‘胡说八道’，‘太民主了’，才影响军事的行动。”说穿了，是因为当局者“厌闻不祥之音”，将军们“讳败报功”。正因为国民党在前方的军事战况及国共交战胜负的走势，往往被储安平《观察》等刊物“特约军事记者”的通讯言中，才气得蒋介石直骂娘。《展望》周刊姚溱以“波光”笔名写的“一周战局”，能够及时准确地分析战局。当局认为，只有国防部中将以上的官员知道绝密材料，才能写出此类文章。南京《新中华报》1948年10月14日刊登了有关反豪门的社论后，干脆先摆出“延颈待戮”的姿态，等待政府下刀。

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政府援引《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款关于出版品不得为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的规定，依照同法三十二条违背前项禁止而发行之新闻纸或杂志，地方主管官署应扣押的规定，勒令南京《新民报》永

远停刊。《大公报》7月10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评论，抨击此事，讽刺国民党的《出版法》，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主张废止限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评论激怒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接连发表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捉过刀的陶希圣的两篇社论，向《大公报》叫骂，并且要"三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应该说，《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发表了大量有利于国民党政府的报道。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照着阶级分析的镜子"，"清算"《大公报》的"罪过"时是这样定性的："该报是资产阶级报纸，反映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利益，帮助它所代表的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像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它是官僚资本创办的，后来又投靠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它所反映的必然是官僚资本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利益。纵使它偶尔也讲些对人民有利的话，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给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作掩护，具体成为'小骂大帮忙'。"就是这样一份"小骂大帮忙"的报纸，1949年，国民党政府也不愿让它继续好好生存下去，逼得主编王芸生无法在上海呆下去。

1947年起，国民党因重庆版《大公报》声援学潮，对它施行高压政策，尽其破坏之能事，但还不敢下令取缔。1948年底至1949年，国民党当局对《大公报》的破坏达到疯狂的程度。1948年底，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奉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指示，列举《大公报》重庆版违反十项规定的"罪证"，提起公诉，予以停刊三日的处分。所谓十项"罪证"，无非就是"违反政令、夸大危机、毁谤政府、为匪辩护、混淆视听、刺激学潮、刊载谣言、扰乱军心"等等，实际上就是报道了事实真相，揭穿了国民党谣言而已。1949年1月16，重庆《大公报》刊载了中共领袖毛泽东提出的阐述和平谈判八项基础条件的《关于时局的声明》，1月22日刊载了《蒋总统引退了》的社评，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的诚意，指出作为全国陆海空军最高元帅的蒋介石，"不能诿谢内战的大责任"，预言中国大势已是新陈代谢，无法强阻，还报道介绍了解放军攻势情况。国民党当局即以"泄露军事机密"和"通共"罪名，逮捕编辑，夺取报馆。重庆《大公报》的生命因而结束。

重庆《世界日报》，向以宣传"第三种力量"著称，成为西南地区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1948年以后，受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宣传的基调不再只为国民党内战出谋划策，转而要求国民党政府放下面子，正视现实，坦率认输，以免毁灭。1949年，尽管它仍提出国共"划江而治"等一系列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求之不得的建议，但由于它也发表了共产党关于和谈条件的原文，如实刊登了反映当时西南地区人民疾苦的报道，驳斥了国民党一些有关战争，和平的谬论，终于激得当局恼羞成怒，1949年7月25日封杀该报。

《展望》杂志1948年5月1日利用已"自行失效作废"的登记证出版了二卷一期后，立刻收到内政部、南京社会局送来的"警告令"："查南京展望杂志社发行之《展望》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内多歪曲事实，为匪张目之煽动性刊载，按照《出版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应予警告，以观后效……"可是杂志继续如实报道时事政局，发表评论，发行量在其后的近一年中，竟达到十来万份。国民党当局终于按捺不住，不断破坏打击，先是逮捕撰写"一周战局"的姚溱、杂志南京方面负责人浦熙修，接着于1949

年3月19日，《展望》三卷十八期刚出版，即将杂志查封。这段时期，凡是如实报道评论军政战局的报刊，多被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张目”等“罪名”，予以查封。

1948年底到1949年，一些处于中立的新闻工作者对共产党是有看法的，有的甚至批评过共产党，立即投奔共产党的意向并不十分坚决。由于国民党政府过于敏感，矫枉过正，无视许多媒体对政府“小骂大帮忙”或善意批评的功效，把有限的新闻自由剥夺殆尽，从职业道德上摧毁新闻工作者的意念，迫使他们由中立乃至右倾迅速左向；不少人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才选择了何去何从。越来越多的新闻界人士被国民党人为地推向共产党方面。如1948年12月25日，当《观察》出版第五卷第十八期时，国民党特务终于下了毒手，封了周刊的门，逮捕了社里的工作人员，把已发行出去的该期《观察》从街头报摊上没收了。储安平预先听了叶圣陶的话，秘密离开了上海，到达已解放了的北平，免除了一场牢狱之灾。

《大公报》遭受《中央日报》连番叫骂，主编王芸生感到异常愤怒烦闷。他一方面觉得个人不应为蒋介石政权殉葬，另一方面，又想让《大公报》继续生存下去，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考虑到《大公报》曾经发表过不少批评共产党的文章，担心不为共产党谅解，不敢贸然与共产党接触。在他彷徨无计、焦虑不安的时候，1948年10月30日，收到了毛泽东给他的通知，要他参加新政协，并要他及早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王如绝处逢生，即于11月8日飞抵香港，留下副总编曹谷冰在上海维持残局。11月10日，王在香港版《大公报》上发表了《和平无望》社论，希望人们不要仅看到眼前的战乱，还要看到未来永久的和平，要有信心等待到那一天。1949年1月1日，王芸生为《大公报》香港版撰写了元旦社论，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真正和平到来的信心。他说：“那过去的是战争的痛苦，两千多年专制君主高压下的人民磨难。这到来的应该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他的论点与毛泽东1949年元旦《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宗旨有相似之处。社论表明，曾经帮国民党说过话、又受国民党政府围攻的《大公报》已开始明显“左”倾。《大公报》香港版的转变激怒了蒋介石，曾数次通过国民党中宣部对曹施加压力，要他“纠正”香港版的态度，甚至派特务威胁说，如不马上改正过来，就枪毙他。在王芸生任总编的旧《大公报》的后期，各版都以他所在地发表的社评为准，但他在香港把这篇社论寄到上海时，上海版就未敢刊登。这份一贯倡导“中立”、“自由”的报纸于上海解放后的20多天，即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彻底摆脱“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正式宣布拥护并加入新政权，走进人民阵营。1949年，国统区的新闻工作者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未必完全赞成，但他们坦然承认，不管共产党坚持的政治主张倾向如何，共产党人既然信仰了一种主义，就在踏踏实实地为这个主义、为这个信仰去努力。不像国民党，既宣传某种主义，又不信仰该主义，且干着一些与该“主义”相违背的事，不能不令人失望。可是，1948年以前，国民党对新闻的控制是有所保留的。1948年以后，国民党发现媒体对政府政策不断揭露和批评，令它在国人面前丢尽脸面，甚感难以招架，才下了狠心，不断对新闻工作者念紧箍咒，想让他们闭嘴搁笔。然而，为时已晚，不但没能钳住记者之口，抑制天下舆情，堵住民众之口，反而激起了记者和读者了解事实真相、关心时局发展的欲望，逼得

一批按照新闻“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等宗旨办报办刊的新闻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由中立倒向共产党方面。

国民党对新闻的控制，以 1948 年为界，宽泛在前，使政府腐败无能的面目频频暴露在国人面前；苛严在后，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因逆反转而同情、理解共产党。这是国民党新闻控制失败的关键所在。国民党丢失大陆政权，新闻媒体的长期“骂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第三节　统一口径

1948 年以前，国统区的部分新闻自由，使国统区的新闻媒体不断对当局的政策提出公开批评，影响着民众心态，这无疑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这连美国驻华大使都看得很清楚。1948 年 3 月，美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汇报时，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 中国人民，无论官员或平民，都日益厌弃这个行政上无能或至多是迟钝的政府，普遍表现出对于政府的严厉批评，同时，对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痛恨的情绪越来越高涨。这一方面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受共产党成功宣传的影响，共产党的宣传大大加强了一种信念：事实上蒋介石正把中国引向毁灭和紊乱，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支持，他是不能这样做的。这种情况普遍存在。这种意见在政府控制下的报纸上是找不到的，然而它却在为那些供职于报馆中的知识分子所具有，这就使得他们在与本问题无直接关系的其他的问题上攻击我们和我们的政策。

1948 年以后，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一方面在军事上势如破竹，一方面在争取民心上净挣高分。共产党的宣传，让越来越多的官员和民众相信，蒋介石政府正把中国引向毁灭和紊乱，它的后台正是美国；反之，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引向光明和有序。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可以说，共产党从国民党舆论控制的漏洞中得益良多。

1949 年前后，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态度认真谨慎，制定的新闻政策细致严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卓有成效。1948 年以后，随着夺取城市步伐的加快，舆论导向的作用日益受到共产党的重视。1948 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中宣部、新华总社总结了在城市报纸宣传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办报方针的指示。8 月 15 日，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强调：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服务；消息以报道农村与工厂为主，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报纸副刊必须对读者进行教育。一切内容是否有益，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来衡量，也就是说，报纸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新闻稿件的发表刊用上，力图防止“无组织、无纪律”现象。1948 年 10 月 2 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记者做好新闻工作的 4 项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第二，必须独立地做

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把记者通讯员的政治立场提高到一个绝对的高度，特别强调，记者和通讯员要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办报。

新闻内容的统一性，是共产党最为重视的宣传纪律之一。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规定重要稿件社论的发表必须经党委或党委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才能见报；内容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的不能发表，要求新华社向全国广播的重要言论，在新华社广播以前，地方不得预先发表。1949年1月26日，中央又发出《宣传约法三章，不要另提口号》、《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两项指示。这在非常时期，对统一党的新闻纪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防止敌人的破坏宣传，起了积极作用。但共产党宣传媒体政治味道较浓、过于注重正面报道、教育功能等的宣传风格也由此固定下来。一旦出现与中央口径不完全一致的报道，就会受到严厉批评，对新闻工作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1948年10月10日，华北《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灾害》的长篇报道。当年，华北解放区遭受大水灾，但广大人民团结战斗，生产救荒，仍获得了平均七成的秋收成绩。但这篇报道没有更多地报道干群战胜灾害的行动，却用了大约2/3的篇幅去罗列灾害惨象，展现凄凉图景，并把这些归咎于“长期战争”及“工改政策过左”；没有再进一步挖掘导致战争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说明人民战争的正义性；没有更多地从积极方面去鼓舞人民。中央批评这种孤立地、表面地、机械地看待问题的客观和主观主义倾向是缺乏党性的表现。华北《人民日报》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在11月8日登报检讨，承认“客观主义”的特征是枯燥无味地罗列许多事实，没有思想，没有分析，没有目的，在思想方法上则是片面的，不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主流和本质。也就是说，在对自然灾害的报道中，没有把新闻的政治性提到应有的位置。

对一些中立态度报纸刊物，共产党也经常通过各种关系，“迂回”施加影响。如对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就是一例。1948年底，共产党在东北战场上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淮海战役即将打响，武力战胜蒋介石、争取全国胜利的时间日程表也已出台。这时一切要求和平的论调，都与共产党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解放全中国的宏伟战略不相吻合，不受共产党欢迎。《观察》杂志却在11月5日的5卷11期的头条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呼吁和平》。文中说：“今天呼吁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乱或百年‘戡乱’的道理。与其将来全国人死去一半再言和，何如今日乘早做和平计，替国家保留一点元气，使人民喘一口气？兵犹火也，佳兵不祥。不论什么方面，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而只求一个不尽可知、不必可靠的将来，那不过是一种不仁也未必智的冒险。”这段评论，显然与共产党战略意图不合节拍；对急于“备战求和”的蒋介石，则正中下怀。鉴于《观察》杂志的影响之大，共产党不得不派共产党员施复亮做储安平的工作。这时，正是国民党政府准备向《观察》“动刀”的时候，储安平为了保存自身性命，更为了保存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这份杂志，对于共产党做了一次妥协，在下一期刊登了施复亮的一篇从经济管理方面抨击时局的文章《评最近官方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算是对共产党的交代。杂志从此也不再呼吁和平。张东荪也因此

文遭到民盟的责难。储安平这样一个“无党”的新闻工作者最终还是留在共产党政权下做事。当然，在新政权下，《观察》杂志于1949年11月，在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11个月之后允许复刊，主编当年那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表现“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观察》特色开始退化，为国民党痛恨而宰杀、为众多知识分子及其他多层次读者钟爱的杂志，再也没有创造出昔日的辉煌。

1949年，中共在相继夺取城市的同时，加强了对舆论阵地的占领。首先，迅速接管和改造旧有新闻媒体。按照“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宣传方针，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及反动军队的各组织所出版发行的报纸、刊物及其通讯社，连同其一切设施与资财，一律予以接收；对凡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予保护；对中间性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出版；新解放城市所有继续出版与新创办的一切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律向当地政府登记。这是共产党最为果敢、也是最为有效的控制新闻的措施。

其次，在取缔、收编旧新闻阵地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地方党报，严格了对私营报刊的管理监督。解放军进入南京之初，南京的报纸种类很多，军管会发出通告：“过去本市的报纸通讯社一律重新登记，任何新建立之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认和存在。”经过审查整顿，取缔了一批反动报纸，并于4月30日出版了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派有办报经验的石西民主持工作。新闻稿件须由军管会主任刘伯承指定副主任宋任穷审定后，才可以发排。报史已近半个世纪的上海《申报》，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当天，即被上海军管会接管，在该报的原址，利用其设备，于5月28日创办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叶剑英到达广州，拘捕了十多个新闻记者，进行再教育。国民党《中央日报》被接收，创办《南方日报》，10月24日出版。

中间立场、私营的报纸有所保存，但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在首批登记过程中，经审查合格、继续刊办的就为数有限。留下的部分，除《文汇报》等大报名称沿用至今外，不少报刊从名称到人员都先后整编改易，如《观察》在1949年11月复刊后，办了13期，就被改头换面，1950年5月16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即被重新冠名为《新观察》，储安平主编一职也被共产党员、史学家黎澍取代；天津解放后，被勒令停刊的天津《大公报》，于1949年2月被改名为《进步日报》。上海《大公报》在1949年6月17日发表《新生宣言》后，体现“中立”、“公正”等办报宗旨的中性文章日益减少。

1949年，中共党报的风格模式已开始影响和规定其他报刊的操作方式。这些报刊时常要受到来自官方政治意图的规范。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新闻媒体要与党和政府绝对保持一致，一切所谓民主、自由、中立、理性的精神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新闻范畴，不能体现在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中。1949年7月31日，华东新闻学院举行开学典礼，范长江代表官方宣传机关，在会上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4条信条：消息绝对真实；思想要正确；建立群众观念；建立自我批评。其中所谓思想正确，就是指革命新闻工作便是思想斗争，报纸要指导群众，反映现实；群众观念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要大力联络帮

助工农兵通讯员。金仲华还代表官方宣传机关对知识分子在新闻宣传中的作用作了定性："知识分子讲、看、写，全都比普通一般人强，但是脆弱，要经过一次次的考验过来，才能成为人民的文化战士。"显然，政府需要的新闻工作者，首先是革命性的文化战士，知识分子型的记者，不经过锻炼，是达不到这一要求的。唯一的办法是经过"一次次的考验过来"。

从1949年开始，共产党与西方的新闻媒体就不断打笔仗。西方的不少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经常被共产党指责为严重失实，并由此引发新闻之争，乃至外交之争。北平解放不久，美联社记者穆萨发布一则新闻：一天，几个学生在北平大街上喝止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女郎，其中一人手指大衣，问是何种皮质？该女答称是狐皮。另一人问："狐有几条腿？"女答："4条。"学生即令她仿照狐狸用4条腿走路。该女不禁失声大哭。经一位年长者出面解围，才使女子免作狐狸之态。不过，学生还不甘心，警告该女子："我们现在是新中国，不准穿狐皮大衣。"这条外电报道被国统区部分报纸转载，激起共产党及学生的义愤。共产党认为，这纯属造谣。于是《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抗议文章，燕大自治会要求将穆萨驱逐出境。1949年2月7日，美联社记者穆萨2月7日又发表报道说：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没有外国消息，发行额空前低，卖《人民日报》的报童情绪低下。《人民日报》驳斥说：事实是2月7日的《人民日报》是工会问题的特刊（"二七"纪念日），虽然如此，报上仍载有匈牙利、日本、朝鲜的消息，还有一篇关于世界工联执委会的报道；《人民日报》的发行额在北平报纸中是空前的，它的发行额一天而且现在也是7万份，报纸上午9点就卖完了。为了证明报纸热销，报童热情高，《人民日报》又报道说，《人民日报》定价2元，但读者愿出50元买一份报纸看，每天早上为争取一份报纸，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打架的事，百里以外的报贩轮番骑车，往返贩报。当时《人民日报》每天是否有7万份的发行量，笔者暂时无法考证，不过在翻阅2月7日那天的一张4版报纸时，笔者没有发现关于匈牙利、日本和朝鲜的消息，也没有世界工联执委会的报道，只有4版左下角有《向苏联工农英雄们学习》的专栏，2月8日倒是有一条匈牙利的消息。

外电有些报道肯定是别有用心，但1949年，党报关于外电的新闻，主要是苏联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会等方面的消息，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并不多见也是事实。至今为止，某些外电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歪曲事实的现象仍是屡见不鲜。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立场的有异，看问题的角度不一，中西新闻媒体之间的交战今后无疑还将进行下去。

第四节 报风转向

1949年，不少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报人，对共产党政府的一些不遵循新闻规律的做法看不惯，不习惯，有意见，但这种态度只能是为个人所持有，不能为当局接收。共产

党为了贯彻一切为无产阶级服务、一切与工农相结合的方针，在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连一些科学的、符合新闻规律的媒体形式也一起摈弃，一些不带阶级性的办报技术或技巧，被看成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办报方式，不少已倾向于共产党却想保留一点独立办报特色的新闻传媒及新闻工作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或警告。

中共的新闻报道模式在1949年前后已初步形成。一切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的消息可以发表，与上级精神不一致或相违背但人民群众又想知道的消息则很难出现于媒体。比较一下当时共产党政权下的报刊与接管前国统区的报刊尤其是民营报刊，前者政治味道显得过于浓厚，几乎看不到反对意见，文章的可读性较差，内容比较单调，版面设计和广告的艺术性也不如后者清新活泼。从新闻规律的角度看，《申报》、《大公报》等似乎更像报纸。当然这一切，都可归因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如南京解放后复刊的几份报纸，都是以"凤凰涅槃"的精神开始工作。新华副刊是专给工农兵服务的，不十分注重形式，内容要具有战斗性和现实性，要有工人的诗、干部或战士的文章。《人报》曾经仿照过去晚报轻松愉快的笔调，发过一篇《大观园人物改造记：假如贾宝玉进了军大、贾探春做了政工员》，马上遭到批评，编写人员立即作了自我批判，由编者作者向读者承认错误，承认将严肃的革命文艺轻松化，直接间接地起了削弱革命情绪的副作用。认为南京文化人应发扬"学习、学习、再学习；批评、批评、再批评"的精神。读者由新闻中往往只见实际事件的一面，不及其余，降低了新闻的可读性，影响了百姓的读报兴趣。从《人民日报》等共产党机关报上，人们看到的多是人民革命斗争热情，战胜自然灾害的斗志，工农如何在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提高思想觉悟，积极生产，向党表忠心，坚决跟党走，知识分子如何彻底清算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等内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困难极为严重，从共产党报纸上，却很少看到这些困难的详细描述。共产党报纸上所报道的"困难"也多是国统区的。我们要了解当时解放区困难的详细情况，反而要去看国统区报纸的报道。而国统区的报纸对国民党政府和国统区人民面临的各种困难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并及时写出社评，不遗余力地作出评价，找出原因，建议、批评、揭露等都不留情面。

新闻报道过于强调政治性，决定了党报比私营报纸具有更大的优势，民营报纸报道新闻的自由度日益缩小。如解放前，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民营报纸——《文汇报》，1947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49年6月21日，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十五天获得新生，全报上下欢呼复刊，发自肺腑地赞美新时代，拥护新政权。新生后的《文汇报》却面临着其他民营报纸（1949年6月20日，上海文管会副主任范长江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提出以后新闻出版机构只有公营和私营，没有官方和民间概念之后，民营报纸习惯上被称为私营报纸）所碰到的类似困难，即信息不灵，采访困难，发言更难。它们与党的机关报的采访、发稿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新闻工作中，左的东西开始抬头。一些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对私营报纸的记者不信任，有的不让采访，有的敷衍了事，党报记者也不大瞧得起私营报纸记者。《文汇报》一女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就曾因党报记者优先取走所有新闻资料，两手空空回到报社，气得大哭一场。

一些苏联式的新闻套套也开始被搬移过来，私营报纸所用的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

国、全市的重大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的稿件为准；不得解释共产党及政府的法令政策。私营报纸不能在党报之前抢发消息，重大新闻的发表格式都得按上级部门的指示办理。一旦有违党报的既定风格，就得检讨认错。如长沙解放之日，《文汇报》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第二天刊出消息，即被指责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1949年11月9日，《文汇报》刊登了从香港收到的确凿的湖北恩施解放的香港专电，因"违反了规定"，被当作"伪消息"，总编辑娄立斋在各报负责人会议上对此作了检讨。再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突出眉目，也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可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这是新闻报纸当时必经的"改革"。一些老报人"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先歌颂，每以此为苦"。由于重大新闻只能用新华社通稿，独家新闻越来越少，版面没有特色，广告内容单调，言论越来越空泛，读者的兴趣日益降低。读者们反映："报纸没有看头。每天从头看到尾，要发现几条真正的所谓'新闻'是不容易的。"

刚解放时，不少在国统区或香港等地干了若干年、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新闻工作者都遇到不少难题，经常对共产党管理新闻的做法困惑乃至不满。如1948年下半年开始，留在蒋管区的各民主党派人士陆续撤退到香港，纷纷在香港召开大会，并在共产党及民主人士主办的《华商报》上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这时东北已经解放，滞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和进步人士先后通过租用外国轮船奔赴解放区，这些来往于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的船只，向香港的媒体传递解放区的报纸，了解解放区的消息。主持《华商报》的夏衍等在1949年初把解放后北平的政治情况、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消息改编为"本报北平专稿"，在《华商报》上发表。时逢"天翻地覆"之际，不但港澳，连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的华裔、华侨，都渴望知道些北平和解放区的消息，所以从1949年1月起，该报的发行量陡增，影响极大。然而，即使这种对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宣传方式，却被北平负责宣传的有关人士（范长江等）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报人不得不停止编写这种"特稿"。接管上海之初，夏衍对新闻工作的意见不减反增。他说：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使他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在北平、上海，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一律不用；他一直认为报纸应该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剧，不用外电，又不用"本报讯"和"专访"（当时还没有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呢？他又纳闷：外电有许多造谣污蔑之词，那么为什么不能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而且一一加以批驳呢？政策、方针，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可是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甚至一个星期没有一篇社论？不看、不听、不讲话，这怎么能完成喉舌的任务呢？至于不登广告，连他这样没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不难看到，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他把这些"大惑不解"的问题向负责宣传的恽逸群、范长江请教，恽的回答是：过去的《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每天只出一张，又有什么办法？范则似乎怪他多事，理由充分地说：北京报纸也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加上不让外国通讯

社发稿，是军管会下的命令。夏衍说，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饿死，把这些弥天大谎揭露出来，不是可以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吗？范无可奈何地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过于强调新闻的政治性，使共产党自己也吃了不少亏，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该有的损失。如当时上海的报纸不让刊登天气预报消息，理由是美蒋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消息会给敌人提供情报。其实，这是缺少科学知识的表现，当时长江口就有美国军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信息他们肯定知道得很清楚，台湾的天文台也可以测度出上海一带的气象。不久，上海遭到强台风袭击，事先没有准备，损失很大。

从旧社会过来的新闻记者，大多在以前的民营报纸或政府报纸中任职，接收的是旧新闻观念的熏陶和旧新闻方法的训练，对人民政府的报纸风格不太适应。为了让他们彻底完成思想转变，政府不断通过办学习班、学习文件等方法，帮助他们，改变观念，适应新方法。通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以及对解放区实际的亲身体会，许多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示要“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从新学，一切从头干。”1949年8月份开办的华东新闻学院，聚集了一大批旧社会的新闻人士。经过第一期三个半月的学习后，部分记者觉悟有所提高，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就是标榜“超然”，即不偏不倚的“新闻自由”，实际上是欺骗麻痹人民意识的口号；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新闻观念就是“阶级”观念，包括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以前的报纸多注意文章的可读性、轰动性，以及报纸的广告效应，这是忽视人民的表现；对人民的报纸整天连篇累牍刊登工人、生产的新闻，觉得太枯燥，是缺少阶级观念的表现。他们“在学习改造之后，深知过去的错误，愿意今后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以赎过去的罪愆”，从此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闻观。

1949年，在即将取得或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中，共产党一再强调新闻的党性原则，加强新闻纪律，要求新闻媒体大量报道正面消息，如：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在与蒋匪战斗中取得的一个个胜利；人民群众踊跃参军，老百姓积极支前；老解放区人民政府领导人民战胜灾荒；国统区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等等。这起了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加快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步伐。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控制尤其是民营报纸的监督控制，以及对旧式新闻记者思想的更新改造是成功的，防止了旧式报刊和记者以客观、公正、自由、及时等名义，发布被官方认为是对政府不利的消息。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给予及时有力反击，提高了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性。新闻纪律的严明，上下口径的一致，对共产党统一党政军民的意志，顺利夺取并巩固政权，功效显著，但由此也铸造了新中国新闻宣传的模式。

第九章 乱与治——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

第一节 从失业到就业

1949年前后，军事频繁，金融混乱，工商企业惨遭破坏，工厂、矿山大量倒闭，生产萎缩，交通瘫痪，引起各地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如1948年，平津的工厂70%倒闭；青岛民营工厂700家，全部歇业；四川参加产业联合会的1200家企业，歇业的达80%以上。1947年，上海失业、半失业工人近20万人，1949年5月解放时为25万人。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城市中，全国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和失业知识分子已有400万人，还有不少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

失业人员生活之苦，非常人所能想见，他们没有工作，缺少收入；通货膨胀、战火纷飞，个体生意又难以展开。有的失业者为了挣得有限的"安家费"，只好走上生死难卜的从军之路。如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在天津各区每天征募到的兵员多时40多人，少时也十多人。应征者多为失业的小本营生或工役，他们也知道一旦从军，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但与其在家饿死，不如从军以同样的生命作一次赌注。毕竟政府开出的4000～6000元"安家费"对其自身及家人还是有不小诱惑力的。因失业贫穷导致自杀的消息不断出现于报端。1948年9月，天津有一个叫刘宝谦的印刷工人，年初即已失业在家，与弟弟宝和、弟媳安氏同住。一家生活贫困，弟弟宝和迫不得已，3月份当了志愿兵，留下3000万法币给他的妻子安氏和两个孩子，靠着这些钱的利息，养活一家4口。刘宝谦不想靠着弟媳养活，于是动员弟媳，提出3000万，由他去做小买卖。不到一个月，赔得精光。为此，弟媳一纸告到警察局。刘宝谦又羞又怕，以剃刀割喉自杀。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各业工人生活受到威胁，不得不纷纷消极怠工，罢工请愿。1949年，国统区工潮迭起，工人、失业或半失业人员不断向当局提出借米借薪请求，以争取生活条件的改善，其中上海地区尤为突出。

1月12日，上海市总工会决定13日举行罢工，向有关当局请愿。12～13日，发生罢工怠工事件多起，大部分为棉纺织业工人。社会局闻讯后，即派员予以制止，并下令即刻复工再行处理。其理由是工人不依正常手续，擅自罢工怠工，"实属不合"。还有他们一遇到工人罢工，就神经质地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社会局长吴开先就告诫工人代

表："'匪谍'意图利用机会散布谣言，从事煽惑，或鼓动工潮以达其扰乱社会秩序之目的。值此戒严时期，政府对一切破坏公共利益之任何举动早具扑灭决心，深望我多数善良工人勿受利用。"

1月14日，华成烟草公司1500多女工，因要求借支工资1月，未能成功，一齐罢工。当局对此早该拿出办法，却迟迟不予办理，反把工人的正当要求归咎于"匪谍"的煽动。1月中旬，上海决定提高配米价格，工界群体反对，各业产业工会纷纷呈文市总工会，向当局提出交涉。

1月21日，上海的部分理发店职工为拆账及年奖纠纷，放下剃刀，实行怠工，此外要求旧历年底加倍收费，所得全部以充作职工年终奖。

2月9日，上海市内公共汽车司机、售票员因待遇问题，实行怠工；机器制造业产业工会东区支部及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厂、慎昌洋行、新中工程公司、日亚钢业厂、亚细亚钢业厂、平和机器厂、上海机器厂、苏中机器厂、中央电工机器厂、新业机器厂、晋昌机器厂等各单位职工代表，联袂到社会局请愿，申述职工不能长期枵腹工作，请求尽快解决。

……

1949年，铁路成了国民党运输客货的生命线，铁路工人一旦罢工，影响巨大。而铁路工人生活困难，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政府请愿抗议，要求解决生计困难。政府则能拖则拖，终于官逼民反，不断引发铁路工潮。1月，湘桂黔铁路局掀起工潮，衡柳两地职工先后罢工，衡柳间铁路停开两天。广东铁路工人为了生计，赴衡阳请愿，条件获得满足后，1月13日如愿返粤。1949年，国统区最大的铁路工潮则发生在京沪、沪杭两铁路局，惊动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军警均派员出面弹压。

2月4日，沪郊戚墅堰工人因局方应公会要求，提前发放当月米贴，决议照当日市场三等白粳米价加一成，折合金元券每担5390元，当时工方也感到满意。不料第二天米价暴涨，工人提出异议，并卧轨拦车，要求加薪加米。8日，京沪区铁路局工人突然发生工潮，京沪、沪杭各班列车完全停驶，千余工人一度包围管理局，造成紧张形势，局方同意解决工人问题，工潮才告一段落。

数日后，铁路工潮未息反涨，2月16日，工潮突然扩大。京沪、沪杭两段火车整日停顿。路段上戚墅堰机车厂、常州车场及无锡、苏州等站的工人6000人乘专车来上海请愿。上海治安当局闻讯，特派大批军警沿铁路前往阻拦，并临时炸毁路轨一小段，工人请愿列车终于被阻拦于真如杨家桥附近（离真如三公里半）。经多方劝导，工人推出各单位负责人40多人，来沪与局方谈判待遇问题，请愿车退回南翔站。两路局工人因不满局方15日公布的新待遇，曾一度罢工请愿，经王局长答应今后铁路工人待遇依电讯局同样办理，并从当日起每人先发5000元后，工人已于当晚恢复工作。但上海市工人在请愿时，曾电话通知戚厂工人，戚厂得讯响应，下午5点开出专车，拟来沪加入请愿。路局闻讯，一面派副局长兼机务处长陈福海前往劝导。陈于16日上午到达无锡车站，请愿车也已经到达无锡，并将陈及无锡局局长张羡陶劫持上车，权充路签（火车不得局长发给路签，不得前进）。其他如常州站站长林孝锦、南翔站站长何志华等均被

邀上车，充当“人质路签”。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闻报，大为震怒，认为工人如有改善待遇等项要求，尽可推派代表于局方谈判，聚众请愿，有违戒严法令，通知沿线军警阻拦列车来沪。列车经过苏州时，情势越趋紧张，上海治安当局调集大批军警保卫北火车站及管理局，虬江路一带临时戒严，同时调五十二军两个营的官兵携带全部作战配备，前往真如以西杨家桥附近，沿铁道布防，大批军警路负责人下午3点赶往真如。过了真如车站，西行一公里，白烟滚滚，已可望见请愿列车，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眼看情势危急，来不及寻找道工拆除钢轨，乃命令用2枚手榴弹将轨道一小段炸毁，五十二军士兵分散扑卧战壕，准备在工人不接收命令时，实弹射击。警备部特务营装甲车5辆也于此时赶到。列车司机看见红旗及军队戒备情形，不得不停车待命，五十二军副团长即派士兵上车监视，并将被工人置放在车头上做“避弹盾”的陈副局长解救下来。经当局反复劝导后，工人答应由一辆机车推所挂的28辆篷车退回南翔，另一机车来沪加煤，工人列车挂有救险车，炸毁铁路由工人抢修。上海方面工人听说常州工人来沪后，也招集了1400多人，乘专车前往欢迎，列车被军警阻于真如站，后来听说来沪工人退回，也返回上海。最后工人获得三项应允，16日下午以后，列车逐渐恢复正常。铁路工潮一波三折，京沪客运刚刚恢复，沪杭线又被阻塞。京沪线请愿工人刚刚退回，沪杭线工人17日就乘专车来沪。途径嘉兴站时，被站长劝阻，没有继续开往上海。18日，工潮平息，铁路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国统区其他各地也相继爆发工潮。如2月7日，广州公共汽车工人为抗议国民党宪兵无理殴打工人，举行罢工，向当局提出惩办凶手、医治伤者的要求。1949年，国民党政府对待工潮莫敢奈何，唯有尽可能临时满足他们的需要，以求息事宁人。如1949年3月，台湾邮电员工为了重新上岗的问题召开会议，张贴标语，终于迫使政府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即不考试而重新上岗。据载，台湾人每闹一次，官方都会屈服。可是，国民党政府经济已经崩溃，对工人的一系列要求，只能拆东补西，以解燃眉，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从工人提出的要求来看，工人罢工的动机都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几乎没有提出政治要求。尽管国民党当局经常指责工人罢工，是有“匪谍”在利用，其实这只是当局禁止工人罢工请愿的借口而已。经常如此，政府在工人中已无任何威望可言，国民党基本失去了工人群体的支持。

失业人数众多，在解放区的城市同样持续存在，且在一定时间之内，还有上升趋势，给新政权造成巨大压力。但人民政府政策正确，对庞大失业群体的处理得当，灵活巧妙地化解了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矛盾，有效抑制了工潮的产生，实现了标本兼治。

1949年前后，造成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如通货膨胀、战乱纷扰、城乡人口失衡外，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经济、社会结构迅速变更，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更新，政局态势明朗中藏有危机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1949年，共产党解放的城市中，工人的就业渠道遇到不少新的障碍。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由于旧的经济体系没有完全打破，新的经济体系又没有很快完善起来，新旧交替，漏洞难免，造成了新的失业和半失业现象；在一些新解放的大城市，由于曾经是国民党达官贵人及外国人淘金享乐的地方，各种私营商号及服务性行业都是适应这一消

费层次而产生的，如今人民解放军大兵进驻，共产党人主市政，这一消费层逐渐消失，相应的消费行业骤然减少或消失。如有“十里洋行”之称的上海，解放军入主后，原来的服务对象洋人和权贵富商大批撤离；解放军厉行节约，倡导俭朴，抵制腐朽的生活方式，流行起简朴廉洁的革命化生活风尚。一时间，逛商店的人数减少，西服没人穿着，咖啡店、舞厅没人光顾。严明的革命纪律不容许共产党军人涉足灯红酒绿的生活环境；消费水平的低下，限制了一般市民和中小业主追求奢侈豪华，许多高级消费品滞销，娱乐场所门前冷清，经销奢侈品如进口化妆品的柜台无人问津，生意清淡。

生活日用如此，出租车行业和书画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当时在全国声名颇隆的上海出租汽车公司——私营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解放前主要服务对象多为有钱的官僚商人及其家属成员，时过境迁，这些人或逃或躲，无法或不敢抛头露面，出租车毋须再坐，一般市民又无力乘坐，少数坐得起的也减少了次数，致使该公司连连亏损。解放前，上海1000多名各种专业的美术工作者中，一大部分靠卖字画为生，如今，有钱主顾散去，书画作者也加入了失业的行列。

解放初，各大城市经济一时走不出低谷，私营商业企业经营不易，只好裁员省支，申请停业。上海私营商业企业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间，申请停业的有3000多户，社会上无业人员数量上升，单是服装业、金融业、进出口贸易业的职工失业率就高达16.2%；有业务联系的生产厂家或生产行业受到极大冲击，破产倒闭者比比皆是。1950年三四月间最为严重，带有很大普遍性。不仅上海、天津等城市如此，许多中小城市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解放后不久，失业的人数还有增加的趋势。1950年1～4月，在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全国新增失业人口达38万～40万人。其中上海1950年的“四月危机”前后，失业工人达13万人，连同家属在内，将近50万人。上海工人失业率1949年5月为20.4%，1952年高达13.36%。失业人数的增加，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引起人心浮动，劳资关系紧张，不少资本家抽出资金，逃走香港等地。

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能否解决失业问题，是对共产党是否有能力管理城市的一场考验，也是向世人证明其既能搞政治、军事，也能搞经济的良机。对于这些旧人员，再多的大道理也抵不上小小的实惠来得有效，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差，他们心中有杆秤。在国统区生活时间较长，对国民党的作风，他们向有领教；对共产党，“好”的消息多为道听途说，更多是一些被歪曲的印象。所以，他们只有在精神上得到安慰，生活上不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差，方不会惹是生非；一旦处理不当，势必引发新的矛盾。事实证明，共产党有能力处理好这些问题。

对于庞大的失业群体，共产党并不隐讳，他们在公开场合都承认这一实际存在的问题，并向群众解释清楚，要求群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共同解决这一难题。解放初，陈毅在一次对上海60万工人的公开演说中坦率地讲道：看未来情况，上海经济将更加恶劣，预测将有更多的工厂关闭或减工，劳工已是中国领导阶级，今后不能再罢工或怠工。陈向工人承诺说，党不仅帮助工人取得他们的权利，也应该教育他们尽到他们的义务。要求工人接收较低的工资待遇。

对于旧人员，中共中央在1949年9月24日曾经有过指示，认为除反动有据、劣迹昭著而为人民群众不满者，予以撤职，除首恶分子依法惩办外，对其他人员应该“一律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机关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有一技之长又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公教人员，尽可能予以留用。对于失业工人和贫民，政府尽量给予扶持，帮助他们投身生产，生活自给。如天津市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放小本贷款6000万元，帮助失业工人、贫民进行生产。获得贷款的多为工人、贫苦市民、手工业者及小商业者，除少数进行小手工业生产外，大多数是以贩运为生，从天津购买纱布、煤油、纸烟、糖、颜料、车胎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到北平、沧县、台儿庄等地出售，然后带回蔬菜、肉类、干果、粮食及乡村土产在市内推销，不仅使市场矛盾得到解决，且使市民能以低价买到食品。虽然贷款是暂时的，但可以作救急之用。

解放前，人力车、三轮车是北平、上海等城市的一大风景。庞大的三轮车、人力车夫队伍，在城市新旧交通过渡期间，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在旧社会，属于服务性行业，整天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思想比较复杂。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管理上的问题。他们所依赖的服务对象，解放后也发生了变化，也有不少再就业问题需要政府解决。北平三轮车夫约有40000多人，大部分以蹬车为生，也有少部分兼营其他职业。在旧北平，许多车夫的境况凄惨，所以热切盼望解放军。1月31日下午，听到解放军入城的消息，一些车夫自动组成三轮车队，迎接解放军入城。解放两三个月后，他们逐步组织起来，北平各郊区有他们的工会，协助人民政府维持治安。工会除成立若干消费合作社，保证他们不受或少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外，还积极组织生产合作社，以保障他们的生活。

解放前，上海的人力车、三轮车完全由人力车行控制，车行大老板将牌照交给二老板，二老板再交给工友。工友遭受层层剥削。工友还经常要受到警察局和验牌公司的敲诈勒索，苦不堪言。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无论狂风暴雨，还是日晒如火，然而每日所得交去各种费用后，尚难维持自己的生活，家庭妻儿，只好以缝补拾荒为生。在汪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还遭到帝国主义欺凌，被无故打死打伤，无人为他们撑腰说话。上海解放时，登记的车工60000多人，人力车工5000多人，三轮车和人力车30000辆，属于工友自己的车子4000多辆。人民政府给予他们较多的关怀照顾。由于他们的生活早晚不定，居处偏僻分散，政府将其分为东西南北4区、26个站组织登记。以往工友从车商处租车费用很高，许多是不合理的附加费。工会工作组成立后，邀请劳资双方依据车件实际消耗及应得利润来洽定，规范了车租，人力车半价交纳。对于敲诈车工的黄牛流氓恶棍，政府坚决取缔镇压，保障了工友们的人身安全。在新上海厉行精简节约、公共交通车辆还没有增加期间，60000人力三轮车工友坚强地辅助了公共交通。

为了让有一技之长的失业人员能人尽其才，共产党想尽办法，予以调剂。平津解放不久，华北政府就对失业人员进行登记，按照各自的特长，分别安排工作。北平市民政局从3月1起，登记失业人员，还在社会服务处设接待站，在报上声明如有需要的，政府可前往接洽。3月份，在北平登记的失业农林技术人员470多人，在天津登记的335

人，政府组织他们学习后，分派到老解放区去，发挥作用。出发前，都发给伙食费和车旅费。

在处理失业问题过程中，共产党以正面说服教育为主，碰到一些拦路虎，则决不手软，一切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原则，既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又不让一小撮不良之辈从中兴风作浪，投机取巧。1949 年，在国共易手接管的一些城市，大多陷于无序状态。不少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市民及城市其他成员，对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能力，深表怀疑。解放军进驻上海之初，就碰到人力车夫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问题。解放前，上海的人力车是市民重要交通工具之一，数量位于全国之首，众多人力车夫饱受旧警察的欺凌，被“管”怕了。国民党警察被赶下台，车夫们总算出了恶气，以为可以不再遵守什么交通规则了，不服新政府警察的管理。对解放后警察还来管他们表示不理解，说：“交通规则是国民党规定的，见你的鬼去吧！”可谓爱屋及乌，恨屋亦及乌。警察一方面已戴上“上海市人民警察”的符号或袖章，觉得对三轮车工人“剥衣号”、“橇牌照”、“扣车子”的那一套不行了，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包括《违警罚法》已被废除，失去效力；另一方面军管会的新法律、新规章还没有制定，他们不敢多管，睁眼闭眼，束手无策，甚至有人出勤不出力，消极怠工，看新政权的笑话。马路上行驶的车辆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管理棘手。鉴于此，上海解放后 1 周，市公安局就于 6 月 2 日颁布了第一条法令《交通规则》，教育广大驾乘人员听从指挥，遵守规则。陈毅还命令警备部队协助民警维持交通秩序。对违规人员不论身份地位，按章处罚。在以军法处理一起解放军某部驾驶员在市区高速行驶、轧死行人的事件后，社会反响强烈。有人通过对比今昔，说解放前的上海，不仅国民党的军、警车辆，就连帝国主义分子的车辆，也无视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横冲直撞，肇事后扬长而去，习以为常，今天一个解放军战士因道路情况不熟，驾驶技术不高，误伤人命，受到惩处，共产党真是言出法随，执法如山。经过整治，上海交通面貌焕然一新。行人指着马路上值勤的民警说：“昔日是警察人民，今天是人民警察，谁说共产党管不了城市啊！”北平曾经也有少数车夫发生误解，认为“解放了，谁也不能管我了”，产生了如随便停车、影响交通秩序、抢拉客人、乱挤乱闯的现象，工会马上组织讨论，认为：“今天解放了，没有人打骂了，更要自觉地遵守交通秩序，决不要等别人来干涉。”车夫认识到这一点后，秩序很快得到好转。

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是共产党改造旧城市的一项浩大工程，这就必然涉及原来以寄生性生活为主的各色人等的重新安置问题。新政权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创造一切条件，实现城市新旧交替。如在接管旧南京时，共产党的方针就定位在把这个为官僚服务的消费城市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上。但国民党离开之前，南京千疮百孔，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在喧闹熙攘的表面“繁华”中，各色各样的社会垃圾和不安定因素混迹其间。据 1948 年 6 月统计，全市号称 135 万人口（包括后来划归安徽的马鞍山市和当涂等县）中，有国民党政府官吏和公教人员 11 万，警察、宪兵、特务 2 万多，他们的眷属 7 万，专为他们服务的茶房、仆役等 9 万，同上述人员沾亲带故的闲杂人员 33 万，这几类人共 70 万，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仅占总人口的 10%左右。到接管之初，无业或失业人数达 50 万左右。军管会的办法是：凡有益

于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工商业均有步骤地协助其复工，吸收一大批人员参加生产；有专门技能及特种研究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政治条件好、年轻健康、有改造前途者留职或送去培训；开办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技术干部的学校与训练班，招收一部分失业工人、公务员和学生入学；对老弱病残、无专长和只能消费的人，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转业；收容散兵游勇，发放路费，建立交通站，护送他们回家生产。工资问题，一方面，对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学生等实行供给制；另一方面，对接收的员工按中央“原职原薪”原则，加紧研究制定新的工资标准。在新工资标准未确定之前，5月份分别于4日、17日发放两次预借费，6月份按新工资发放。解决这几个问题后，工人和其他阶层的群众都比较安定，积极投身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中来。经过努力，1949年及其后的一二年内，共产党基本解决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批无业失业人员这一社会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

以上这些做法，没有引起社会恐慌，反而获得人民的谅解、支持、配合。先期解放的城市，由于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及时组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人就业率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大提高，1949～1950年期间，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据统计，1949年职工总数比1946年增加283%，而在1950年第一季度中，单在抚顺、鞍钢、本溪等10个企业中，就增加新招聘的职工16万余人，私营企业的职工人数也有所增加。

第二节　灾荒频仍与克服，难民产生与赈济

1949年的难民是抗战胜利以后最多的一年，难民数与天灾人祸的严重程度成正比。整个中国，从北方到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洒落着流民的影子，大量难民被层垒地营造出来。

农村是难民的主要产生地，很大部分难民由无家可归的农民组成。自古以来，每当诸灾并临之时，农民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伤害。他们赖以生存的资产主要是土地，一旦无法安身土地，从土地上获得应有生活物品，就有沦为难民的危险，战乱、天灾使这一现象更为严重。

1949年前后，越是靠近国共战区的地方，难民现象就越严重。1948年9月，国共关外大战展开之际，正是关内难民激增之时。人们为了躲避战火，纷纷举家南迁。天津、北平等尚属安宁的城市，是关外人首选的避难所或中转站。战火燃烧到江北，江南的上海、苏州等地，又成了江北人的避难所。解放军进逼长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又是难民新的向往地。然而，这些地方并非世外桃源，暂时远离战区，可以幸免于枪炮之口，捉襟见肘的国民党政府却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救济这些难民。救济难民工作多由民间慈善机构来承担。它们的财力小得可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的生活困难，难民依然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如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天津周边，难民成群集队，随时都可以在市郊、在野外、在都市的角落里发现颓丧枯槁的难民。他们大多来自关外，也

有来自关内各地。以往难民到来时，政府往往能即时安插遣散，因为那时的人数较少。而现在关外大战即将开始，国民党在东北只是有“点”可据，在物价与生活的高压下，巨大的人流从关外涌向关内。他们多为长春、四平、沈阳等地直接感受过炮火摧残后的余生者，在无法求生的情形下，憧憬关内的温暖，相信政府会给予妥善安置。难民成分复杂，有很多是地主、大商人、公务员，最多的还是工人、农民。有的人关只是想从此回到山东、河南老家去；有的准备搭轮南下，但更多的只带了少量的行李和一个身子，集中在平津流浪，等待政府救济。据媒体调查，至8月23日，天津的难民已有8693人，很大部分是准备长久住下的。政府救济事务由社会局社会福利科负责，福利科人手不够，又把难民的事交给地方慈善机关如红十字会、天主教青年会等主持。难民到天津后，先到收容所报到，以后便以做工、乞讨、接收救济等方式下维持生活，在“拖”日子。政府每人每天只发半斤面粉，每周三斤美援饼干。在那里，旧窑厂成了安居的乐园，野菜和草犹如珍品，知识分子和技术员找不到工作，临时充当起难童的老师。所有的难民无不在等待，等待战争的最终停止，等待真正光明的一天。

一些中小城市，由于大批难民的到来，市政压力骤然加大，加之物价狂涨，物品匮乏，难民活得艰难，死得凄惨，难民贫困化日益加重。如青岛市从鲁东各县流亡来的难民到1948年9月份，已有20万人。9月26日国民党济南失守，烟台又将撤守，公教人员、难民学生争向青岛逃避，有两万难民食宿无着落。许多人抱怨政府办事太慢，无法解救难民燃眉之急。安庆物价从1949年4月13日万元钞到市后，物价陡涨，上米18万，猪肉5万，袁洋3万。据安庆县长钱镇东给南京政府有关部门的电文称：“城内柴米告罄，难民饥饿难忍，全家自殉者历见迭出，若不速救，将有焚骸食子之虞。”

农民由于诸灾加身，不得不背井离乡，农村土地抛荒，商业一片萧条，民房毁坏无数。如豫东一带，愁云惨雾笼罩，兵灾、天灾、地震种种灾害交相攻击着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大家过一天，算一天。这里是国共争夺非常激烈的地区。到1948年9月初，人民解放军已6次进攻商丘，除商丘外，其余的县城都被攻陷过，在国民党政府手中的城市只有商丘、虞城、夏邑、宁陵4处，百姓逃亡，商业完全被摧毁，商丘还有萧条的市面，其余几处城里已没有商店，人口也很少。陇海铁路和电线经常遭到破坏。黄泛区大战时，产生了50多万难民，回到家时，有的房屋已经倒塌，家具荡然无存。各县为了构筑防御工事，把县城以外的房屋拆除，百姓真是倾家荡产。乡间的牛车、马车、粮食、树木，一方面遭受抢掠，一方面同时要供应摊派。夏邑一带靠吃树皮过活的百姓已为数不少。湖北发生特大水灾，连遭水灾的地区有58县，灾民达1700万，亟待救济的难民340万，工粮贷款都没有可靠着落。有的只好走上漫漫逃难路。

对于源源不断南来的难民，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力量妥善安置，多靠同乡会或民间组织给予救济。然而，这些组织经济实力有限，难以尽数满足难民生存需要，群体挨饿受冻者屡见不鲜。1949年1月4～5日，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上海市气温骤然下降，最高气温摄氏4度，最低气温为零下4.2度，为立冬以来最冷的一天。街头露尸激增，犹以童尸为多。普善山庄等单位的收尸车，4日一天，就收得童尸百余具。市救济会将流浪街头的300多难民和乞丐接到庇寒所安置。1月6日，气温下降到零下5.1度，从

元旦到6日，共收街头冻尸538具，其中童尸520具，成人18具。1月10日一天，上海慈善机构就收冻尸145具，也是大多为童尸。市内各大医院，每天也有不少挨饿受冻之人离开人世。不仅上海如此，内地如成都等城市冻死人数也在逐日增加。

战争的残酷性使生离死别的阴影始终笼罩在难民心头，弄得人心惶惶，许多人都赶在战祸降临前夕，办好自己的终身大事，以免一别成诀。如1949年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渐人高潮，临近市区边缘的居民渐渐向市中心区域迁移，这些人没有明确的迁移目标，大部分借住在亲友家中，小部分赁居旅馆，也有的忍痛付出巨额，顶借房屋，小旅馆均告客满，走廊上满地箱笼包裹，凌乱堆放。整日搬场的三轮车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没有住处的则流浪街头，宗教慈善团体在两周内就收容了来自沪西南郊10－20里范围内乡间逃难来城的难民3200人。战争趋紧，一般市民都感到骨肉之间聚散难定，所以子弟没有成婚的，都赶办结婚，一切从简，不讲究仪式，仅由双方家长在结婚证书上盖印而已。

难民出逃本为避免战火，躲开灾害，冲着"安全区"的温暖幸福而来，对政府安置存有指望。然而，已被四面烽火扰搅得焦头烂额的国民党政府，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更多的资金，腾出相当人手来处理难民问题，他们意识不到，如果不把被动的难民转化为主动的劳动者，任其流落社会，既是社会负担，也是政治压力。得不到安置的难民往往迁怒于现政府：怪只怪国民党无能，不怪共产党厉害。一旦发现生活确实无法着落，希望遂告破灭，觉得逃与不逃，无所区别，对于共产党、解放军，自然更易接收。

大量难民散落城市，给城市经济、秩序、治安带来诸多问题，也对共产党在新占领的城市站稳脚跟，提出新的考验。共产党一占领城市，解决难民问题马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对城市的难民或无业人员，共产党主要通过疏散、救济，帮助他们返回家乡，或就地寻找工作，解决生活困难。疏散分有形疏散和无形疏散两种。有形的疏散就是将无业人员由城市遣返回农村，从事耕种；无形的疏散，就是原在城市做工经商的人员觉得在城市已无生意可做，势必要离开城市的，帮助他们离城返乡。凡是请求离开的，马上会得到许可，并可享受政府提供的方便。如天津市人民政府从1949年2月10～23日内，遣送难民5500多人回乡生产，其中经查确系贫寒的，由市府发给免费乘火车证或酌予补助旅费。一般难民对人民政府的这一措施深表感激。北平市还为滞留在城市的难民提供方便，实在无力购买车票的，经严格审查及区政府批准后，可发给介绍信，免费乘车。

为了让难民有一技之长，人民政府还注意做好思想动员，开办难民识字班。如上海的邑庙、嵩山二区就举办了"难民识字班"，每晚上课，向难民灌输回乡的意识。课本内容有："咱们家乡，产有大豆"，说明地主的重租剥削和反动派的征粮，把大豆、高粱都要了去；"吃没粮，穿没衣，一路要饭到上海"；"洋房楼房咱无份，草席芦盖搭个棚"等。还告诉难民，家乡解放，穷人翻身，应该改变态度，回乡生产去。

经过政府及社会多方努力，不少城市的难民在较短时间内，都得到了比较妥善的疏散、救济或安置，没有发生大的难民骚动，保证了城市秩序安定。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

京为例，解放初统计，因天灾人祸背井离乡的苏北、皖北难民约20万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流浪街头的乞丐、孤儿、娼妓等约10万人，大批失业的工人、店员、仆役、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机关裁减解雇人员也有20万左右。街头脏乱差，茅屋连片，银元贩乱窜，妓女拉客，乞丐成群，特务流散，民国时期的首都几成“废都”。原有人员在再就业问题上存在种种疑虑，外来难民大多愿意留在大城市，指望找到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服务性行业的人员对原服务对象的变更，一时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于新政权的态度还在观望之中。鉴于都市人员复杂的社会心理，接管人员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继续留用旧公教人员，共有37.6万人成为人民政府的干部，6000多人被送到各类学校学习，然后分配工作，其余一般也得到妥善处理，使他们感到新社会的温暖；疏散灾民和失业人员，制定“疏散人员、组织生产、紧急救济”三结合的方针，实行“社会互济、生产自救、政府帮助”，动员政府机关和部队捐饭献衣，工商业者认捐、义卖。机关领导亲自登门，送衣、钱、粮，医疗队送衣上门，有病看病。1949年冬，共救济难民9万人。组织赈济同时，有步骤开展难民的疏散工作，将那些在家乡有房有地的人动员回乡生产；暂时难以回乡的，就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还把疏散与土改运动结合起来，原籍农村的灾民中，很快掀起回乡分田分地的热潮。市府机关则不失时机地为他们创造一切条件，方便他们回乡。1951年初，回乡人员已达18.4万人；在市区设收容站，将结成团伙、流浪街头、凶悍蛮横、偷窃扒拿、扰乱社会治安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登记收容，进行教育，发放路费，请原籍政府派人带回，截至1950年2月，共收容遣散散兵游勇及其家属4万多人；对流落街头的孤儿、乞丐、娼妓和失业的娘姨、妈妈等区别处理，动员回乡，收容孤儿，取缔妓院，消灭卖淫，教养乞丐，安排就业就学。经过努力，1949年及其后的一二年内，共疏散回乡33万多人，加上安排就业就学和其他安置的有10多万人。难民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有利于城市经济的恢复，社会秩序的安定。

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1949年的难民遣返，并不是在所有的大城市都取得成功。上海的这项工作成效就很有限。8月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了《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军管会成立难民运输中心，解决食宿及交通问题。当时上海计有失业工人25万人，连店员及所有工人家属在内，有100万人以上；贫民，连家属在内，65万人；游民，连家属在内，17万人；逃亡地主恶霸富农，连家属在内，约有10万人。10万地富难民和17万“无业流民”都被安排及早离开，此外，还准备遣返大约65万民“贫民”回原籍。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成立了失业工人就业机构，确定登记办法和工作计划，各区设工作队，各厂设工作组，专门办理登记。根据各地实际需要及工人专长，分配到公私营企业工厂去工作，或到农村从事生产。解放后，由于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城市与乡村连成一片，打破了隔绝，因此在解放后10天内，回乡市民就有20万人。在各方努力下，到8月初，动员回乡市民约有40万。处理难民的基本方针是“疏散回乡生产”，计划1949年底，再动员50万回乡。

但是，据难民救济协会的调查，9月中旬，上海仍有45万多难民。8月，正值苏北、皖北、鲁中发生水灾，庄稼歉收，许多农民又涌向上海，以求生路，9月初，难民

又以每天100名的规模进入上海。官方宣布，九十月间，只有7000名难民离开上海，进城的难民却有15万名。到年底，只得承认遣返难民工作失败，政府只好把难民养起来，但也没有取得完全胜利，马路上饿冻死人的事也有发生，虽然只是极个别，但与共产党在抗灾救荒时提出的“不让一个人饿死”的口号还是有一定距离，说明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在接下来一两年中，政府基本完成了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更证明了共产党的政策深得人心。

1949年前后，是民国以来灾荒最为频仍的岁月，国统区这样，解放区也是这样。对待灾荒的态度和处理措施，国共双方则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府经济上崩溃，政治上腐败，军事上失利，人心上涣散，使得它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来处理灾荒问题，更不能很好地动员组织群众，战胜自然灾害。

共产党则不然。共产党无论在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都遇到极其严重的灾荒。以华北而论，春耕播种初期，遇到普遍了大旱和春荒，接着在200个县发生20多种虫害；麦收前，太行、太岳地区发生罕见的风霜冻灾，并有60多县发生雹灾；进入夏初，虫灾又起，大雨连绵近两个月，河水泛滥，山洪暴发，河北及察哈尔省部分地区酿成严重水灾。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和人民政府都能采取有效措施，发动人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入夏以来，华北、东北、华中、华东等解放区和人民政府都预见到水涝之灾，即先后召集了防汛会议，发出紧急防汛指示，华北拨出小米6000万斤，以供治理全区河流民工之需，平津水利科技人员奋勇参加治河工程。各解放区沿河地区，纷纷成立各种防汛组织，并动员25万市民参加抢险队。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但长期不兴修水利，反而百般破坏，致使许多水利工程不能很快修复，灾害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1949年入夏以后，继虫、旱、风、雹灾之后，水灾爆发。虽经各解放区党政军民全力抢救，灾情仍极严重。受灾地区广及于华北、东北、华东、华中等地。以辽西为例，就遭灾23县，淹没耕地200多万亩，毁房23万多间，损失大小牲口2万多头。阜新煤矿也因大部分进水而陷于停工。华北全区遭灾土地达2500万亩，受灾人口五六百万，尤以河北、天津受灾最为严重。天津全区200万受灾的人口中，仅有60万人能维持生活到次年麦收，其余140万人陷于饥饿或半饥饿境地。灾区内不少居民是以树皮、谷糠、麸皮、野菜来糊口的。宁河七八粮区的沿龙湾河堤30余里的榆树叶子都被农民吃光。九区一带灾民，很多一家守着半块麻饼，勉强为生。农民为生活所迫，变卖了一切可卖的东西，换回一点实物。宁河三区1900多条牲口，已经卖了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地区灾后景象惨不忍睹。中南地区以河南、湖北、江西三省灾情（主要是水灾）最为严重。仅湖北一省遭水灾的人口，至7月底，已近300万；渤海、皖北、淮阴等地6月间，遭受棉虫、黑霉病等灾，7月间，又遭台风、水灾；苏北沂河与沭河的汇合泛滥，在淮阴专区淹了1700万亩良田，淹倒房屋100万间，淹死500多人，粮食损失10亿斤；6月25日，上海遭受了1915年7月28日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强台风袭击，死亡19人；西北的关中、东北的南满、北满等地都发生水灾或旱灾。1949年全国灾荒区域，据内务部研究室统计，共有1亿亩，灾民约4000万，减产粮食

120亿斤，灾区遍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及陕西等省。

与1948年不同，1949年春夏以后，共产党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胜灾荒，全面夺取并巩固政权，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解放区或人民政府不断公布灾情，同时也广播生产自救的实例。毛泽东在讲到财政困难时就说："我们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些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为了克服灾荒造成的困难，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方针。如华北地区提出"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皖北提出"主要依靠灾民自救，结合社会互济，政府救济，以工代赈"；西北提出"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互助互济"。上海《解放日报》则公布市政府的6点指示：支持南进的军事作战；对上海市民与工厂，实行有系统的、按部就班的教育，并利用大量的失业人员与游民，建设苏北受灾区域；制定政策，发展城市，以便上海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动员共产党员、工人、学生，推动农村工作，增加生产；发展内陆运输，奖励城乡贸易；实行节约，共产党员尤应身体力行。至7月底，上海农林局2400名员工中，已遣散27%，渔业部门职员452名，已遣散202名。并拟订一计划，在苏北、安徽，种植稻米、棉花。上海市政府还要求避乱之地主、农民，立即从上海有系统地疏散到乡村，参加粮食生产，并将粮食运到苏北等处，建立新地区，解救贫瘠。上海的内河航运已恢复，开通上海与南京、汉口、天津及其他港埠间的航运，以使上海自足，不再依赖对外贸易。

党和政府还动员一切可资利用的人力，参加疏浚河道，并开掘向海水道。针对经济萧条、失业增多的状况，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步骤，恢复生产，减轻灾情。在政府"不要饿死一个人"的指示下，各地组织百姓生产自救。根据各地的生产条件，群众创造了各种度荒办法，如打野菜、砍柴、打石、烧灰、纳鞋底、织席、纺线织布、织麻袋等。浙江杭县人民互助互济，补种5万亩粮田；热河平县干部带头翻种万亩雹砸地；辽西补种雹砸地15万多亩……

除各地政府拨粮济赈、以工代赈外，有些国营商店或合作社，也用贷粮、订棉、代购、运销等办法，帮助群众度灾，克服了单纯依靠救济和单纯依靠政府的观念。人民政府还大力组织群众兴修水利，提倡城乡互助，供销合作，开展国营商店、银行和合作社的密切配合，县级党委则加强对这些部门的具体领导。9月15~16日，平原省黄河沿线民堰溃决后，省政府、人民银行分行一次就发放349万斤麦种贷款。天津郊区的农民为保护天津，掘开堤堰，淹没自己的农田；机关厉行节约，发动人员捐款捐物，一同度过灾荒。经过各级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动员一切力量，把自然灾害降到最低限度，1949年收获粮食2125亿斤。

1949年前后，对灾荒的妥善处理，是共产党争取民心的一着大手笔，深得老百姓的支持，扭转了很多老百姓对共产党的错误看法，改变了中间人士的模糊认识。如1948年11月，淮海地区灾荒不断，为配合淮海战役，共产党采取了生产、救济、互助，帮助农民战胜灾荒。开始中间派认为，大灾荒，共产党要垮台。还有人认为政府穷，非

饿死人不可。干部也有以为会“糟”了的。经过互通有无，献饭救人，发扬阶级友爱，一家养几口人，献饭户多生产，少吃一口，积极组织灾民生产。工作搞好后，中间分子认为：“共产党办法多，不会垮的。”灾民来了，见此情况受到教育。群众更加相信共产党能克服灾荒，干部信心也提高了。解放初期，人民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显示出的城乡互助、工农团结、上下一心等顽强精神和崇高风格，是共产党凝聚力迅速增强的原因，也充分说明1949年共产党政权的顺利建立和巩固，不是偶然的，是顺应民心的结果。

第三节　风化败坏与整饬

许多社会不良现象如卖淫嫖娼、乞丐、吸毒等，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从来没有消除过。如卖淫嫖娼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公开、半公开进行的，公娼、私娼遍及城市街巷。扬州的公娼就曾被扬州警察局要求统一着装，“上岗”操业：夏穿白色镶红边的长衫，左胸前配桃花胸章，夏秋蓝色镶白边长衫。国民政府对私娼的禁止和改造若有若无，无法对这些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更谈不上尊重她们的人格。有的地方当局甚至以侮辱妓女人格来实现所谓的“正风化”。1948年10月，广东曲江新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以“正风化”为名，下令大捕私娼。一旦捉住，就分别罚以劳役，强迫她们抛头露面，执行清洁扫街的苦役工作，经过几天惩罚，再释放她们。袅袅婷婷的姑娘、嫖客及老鸨都给武装警察监押着，一路烟尘滚滚，看热闹的人盈街塞巷，严重伤害了妓女的自尊心，不少人用手帕遮面，或披下长发掩面。真是欲正风化，反伤风化。

解放后，人民政府公开禁止私娼，公娼也根据各地不同特点，逐步取缔。封闭妓院，解救妓女，是新中国扫除社会不良现象的一大壮举。解放初期，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小城市都相继开展了取缔妓女妓院行动。解放前，北平妓女有4等：清吟小班；“自混”或卖身给老鸨的；“住夜”和“打茶园”的；“坑家”。她们分别来自农村贫苦家庭、城市女工、国民党一般中下级军官的“姘头”、破落的宦家、日本统治时代被敌人凌辱后卖到妓院；贫民妓女大多迫于生活或受人拐骗。他们无不受着老鸨的压迫，嫖客的玩弄，多数染有疾病，几乎人人都有一笔辛酸账。解放后，妓院生意清淡，妓女收入锐减，住夜的客人，一个月找不到两三个。“开盘子”钱被老板分去一半后，所剩只够自己吃穿了。

1949年11月21日晚，北京市196家妓院全部被关闭。聂荣臻和叶剑英等领导在北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布市委决议时，全场热烈欢呼。此前，市委曾就如何处理妓院问题比如集中妓女给予教育、给妓女治疗疾病、治好后有家可归的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的助其结婚、其余的组织她们学习手艺进行生产以谋生活自立等措施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说：“这个决议很好。”在这次统一行动中，政府将饱受摧残和剥削的10200多个妓女分别收容于临时设立的生产教养院，同时对依靠剥削妓女为生、极端野蛮狠毒

的196家妓院老板、领家等385人，分别集中审查，按罪行大小依法处理，妓院财产全部没收，作为救济妓女之用。虽然有妓女认为“这下断了她们的生路”，悲伤不已，也有的本身就不识字，对政府要求她们学习文化技术，觉得滑稽可笑，但大多人过够了这种皮肉生活，在明白政府的政策及取缔妓院的决心后，都愿意回家种地找对象。那些被强买拐卖到妓院的女子更是感激政府把她们救出火坑。北京的“八大胡同”从此成为历史名词，“妓女”群体在北京终于消失，这种以人肉为商品的不良现象不复存在。

北京取缔妓院之后，对全国的震动很大，许多城市的妓院老板都知道，关闭妓院人民政府是下了决心的，何时轮到自己头上，只是迟早问题。由于各地情况不一，地方政府在时间和政策把握上略有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结束这一社会不良现象。以上海为例，解放前，“十里洋场”的上海堪称官宦富绅的“销金窟”。解放后，因消费阶层变更，妓院同样惨淡经营。人民政府政治上已上了轨道，公务员廉洁自爱，不像解放前，当官的把贪污所得的造孽钱作为“交际”、“应酬”的费用；商人们也不再有暴利可图，以余资作为追求刺激的资本；社会安定，社会风气转向朴素节俭；大批国民党贪官污吏已逃到台湾、香港和美国，留在上海的富商大贾也多深居纳福，谢绝应酬。以往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常去的高级妓院“长三堂子”等，变得门庭冷清。上海解放比北平晚，妓女妓院情况也很复杂，人民政府不是马上取缔，而是依据上海特点，采取灵活措施。1949年7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女暂行规定》，对妓女的身体健康、从业要求、妓院的登记手续、营业情况等作了详细规定。接着，市公安局又核发了《妓女营业许可证》，市卫生局性病防治所颁发了《娼妓身体检验证》，检验证内容包括营业许可证、妓院号数、转移妓女时间、字号、姓名、年龄、机关、住址等，便于有关部门定期检查。并规定有效期为1949年10月1日～1950年4月30日。这一系列规章，对防止私娼泛滥、规范妓院经营、整治社会风化，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为彻底取缔妓院创造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许多妓院都已先后被遣散或紧缩，仅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花头”大多是过去“恩客”或“老户头”帮忙性质的应酬。妓院虽未经人民政府封闭，但已趋没落。妓院老板看到北京同行的下场，一切希望都落空了。尽管失望，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碗饭吃不得了——也吃完了”，“只有关门，动脑筋另求生路了”。11月，北京彻底取缔妓女妓院的消息传到上海，妓女、妓院老板，起初是惶惑、恐惧，生怕自己的生活无法稳定。当听到北京人民政府封闭妓院，对妓女予以技术培训、帮助转业、回乡、医病与结婚，使她们跳出地狱，获得自由解放之后，又转悲为喜，希望人民政府帮助早日转业。为了防止一些妓女或妓院老板利用提前退照机会，转移财产，或从公开经营变为地下经营，公安机关对申请退照的妓女及妓院老板严格审核：妓女退照，须出具证明；结婚的，必须确实已找到了对象，并且没有梅毒等性病，并由未婚夫亲为证明；如果是转业的，必须有转业证明书；回乡的，要有证明文件和保人。妓院退照，必须妓院内真正没有了妓女，还要找到铺保，保证退牌之后，绝不在暗中经营私娼妓院。这样保证妓女退照之后，不再偷偷摸摸地进行私娼交易。

人民政府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措施，既控制了妓女妓院的活动范围、经营方式、

妓女人数，也打消了妓女、妓院老板的后顾之忧。两年后，上海彻底取缔女妓院的条件已经成熟，1951年11月，上海市委颁布《关于市处置妓女的计划》。11月25日21时，市中心区9个分局同时行动，查禁私娼，收容私娼320名；23时，查封残存妓院72家。至此，上海妓院全部封闭，长期在旧上海泛滥的不良现象被一扫而空。

在人民政府的强大威力下，其他中小城市的妓女妓院，有的自动遣散，有的被强行取缔。如解放后，苏州北局中新里的妓院已被淘汰，只剩一两户在装点门面，生意也支撑不下去了；“向导女”在过去曾经红极一时，现在也走到末路；出卖色相的歌女与三塘街出卖风骚的卖花女的时代也已过去。内地的武汉、蚌埠等地，妓女妓院也逐渐消失。接下来的一二年内，人民政府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取缔社会不良现象运动，在较短时间内，把在旧中国延续了多年的沉污积垢扫荡殆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个政府像新中国如此坚决迅速地消灭卖淫嫖娼现象。

1949年，国统区城市乞丐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乞丐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其中不少乞丐是由难民沦落而来，国民党社会局的救济只是装点门面，它连难民都不能给予妥善安置，更谈不上消除乞丐。

共产党在消除乞丐问题上棋高一着。1949年，老解放区已见不到乞丐，但在新解放的城市仍有乞丐存在。乞丐是需要重点救济的社会群体，人民政府既不能让这些人露宿街头，又不能采取强制措施遣散他们，只能主要在动员他们回乡生产、提高他们自身生存能力上下功夫。北平解放后两个月，经过政府解释、劝说，协助难民返乡，发给贫民免费乘车票，举行失业工人登记，乞丐逐渐减少。但到1949年4月，留在北平的乞丐仍不下4000人，包括车夫、厨行、小生意、店伙、小工、茶役、小贩、赶车、小手艺等业的穷人。据分区抽样调查，有劳动力的约占1/3。这中间，一些是不甘作乞丐的，他们准备讨一些钱回家去，或找正常职业谋生。有些在旧社会已成为“职业乞丐”，养成懒惰习性，不愿意再干活，把乞讨作为终身职业，北平这种乞丐占大多数。强讨索要者也为数不少。北平政府决定在发展生产的方针下，组织有劳动力的乞丐，加以教育改造，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先参加清洁卫生运动，给予适当的工作。逃亡地主和外乡人沦为乞丐的，协助其还乡，发给免费乘车证，不能劳动生产的，予以救济收容。对伤残乞丐，组织他们开展简单的劳动。

南京的乞丐收容工作井然有序，到1949年11月，乞丐收容所共收容740多人，分成青壮、伤残、妇女、儿童4个队伍，进行小组讨论和生活检讨，所内工作人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耐心说服教育，漫谈家常，根据各人切身体验，找出他们穷困的原因，再启发他们觉悟，解除思想顾虑，指出正常出路和前途。所内大多数人都积极表示重新做人，所内生产部门也响起了劳动号子。他们一样可以作为群众团体出去参加集会，自己举行晚会，还自编剧本。

上海是游民集中的地方，政府针对扒手、小偷、流氓、乞丐等不同对象，根据年龄、性别，设立妇女教养院、儿童生产教养院、收容所、残疾生产教养所和劳动生产改造所5个性质不同的教养所，进行阶级教育、纪律教育、生产教育和文化教育，从生理上、精神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迅速走上靠劳动吃饭道路。其他一些大城市也

大致采取上述措施，解决了国民党统治下多年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

1949年前后，共产党政府雷厉风行，消灭社会不良现象，对净化社会风气，消除民众对新政权的疑虑，安定民心，巩固新生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人民政府在消除社会不良现象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首先，把这些现象作为危及社会稳定、伤害社会风化的一件大事来对待，依靠人民政府的力量，加以消除。其次，令行禁止。政府法令一旦付诸实施，就一贯到底，对不服从禁令的，予以强制执行。再次，强制取缔与说服教育相结合。许多涉足不良职业的人，是由于生计所迫，并非自甘下贱，人民政府在人格上尊重他们，在生活上体惜他们，使他们感到新社会的温暖，主动配合政府取缔不良社会现象的行动。最后，提高不良从业人员的素质，增加他们的劳动技能，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出路，从根本上消除他们从良的后顾之忧。这最后一条也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这些经验，对今天打击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会风气，不无借鉴意义。

第四节　会匪肆虐与荡灭

1949年，国统区社会治安恶劣，边境土匪武装嚣张，农村恶霸土匪横行，会道门势力庞大，城市帮会众多，其中有的是在国民党政府支持纵容下活动的。

国统区边境土匪活动以西南滇、黔、湘等省最为猖獗。这原是这些地区社会治安的老大难问题，1949年前后，情势更趋严重。危害三省边境治安的恶势力主要来自4种人：一是土司，二是袍哥，三是烟匪，四是枪匪。这几种势力只要有一种存在，就可使当地治安紊乱，何况有的集诸恶于一身。加上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吏藐视法令，与不法势力互相勾结，恶势力更加嚣张。

土司可算是这些地方的地头蛇。只要能搞到钱，什么罪恶手段都敢用，什么黑道交易都敢做，什么违法行动都敢干。如黔西盘县土司龙腾霄、土豪线巴亮、滇东镇雄劣绅陇成尧等，都经常勾结地方官员，武装种烟，啸众抗铲，与川南筠莲教匪、毕节土司杨砥中等暗通声气，阴谋不法，虽然被三省政府当局及时发觉，及早防剿，但他们仍保存部分残余势力，经常流窜三省边境，是1949年西南匪患的主要策动者。

国民党政府前方要与解放军打仗，后要与土匪交锋，形成多线作战态势。1月初，云南地区土匪猖獗，经国民党驻军全力兜剿，墨江、麻栗坡均告收复，只有屏边仍在土匪手里，股匪白竹箐、李荣祥等200余人仍有窜扰之势，驻军已加强防范。滇黔边境的平彝、陆良、沾益奸匪张小流、龙腾宵12股匪会众已达2000多人。1949年1月2日早晨，围攻平彝县城，曾数度冲到城郊。经昼夜血战，才打跑土匪。平彝、盘县间120里内，土匪拥有4个据点，龙匪回窜盘丝县后，滇黔国道往来商邮车时遭抢劫，行旅裹足。3月份，云南的匪患已成燎原之势，中下旬一周内，陷入匪手的有墨江、宁洱、车里、佛海、元江、南乔（加山旁）、江越、澜沧、沧源、思茅等12县，景谷、景东等县

告急，地方纷纷向省府告急。

湘西民众持枪者的甚多，匪势猖獗，据非正式统计，有10刀支以上，国民党十七绥靖区想利用这些枪支为国家所用，却忽略了这里的地方势力。枪支掌握在豪劣们手里，他们依靠这些装备培植自己在当地的势力。贸然收缴，立即引起暴乱，以沅陵叛乱最为严重。3月1日，沅陵情势突变，永顺叛民杨增亚一部，分东西两路猛扑县城东郊和西郊，县府迁到南岸办公，常德援军赶来，与匪激战，方才退回，县城形势稍微缓和。3月2日晚，攻陷沅陵的叛民渡到沅水南岸，侵袭汽车站，一股由距城36华里的横石强渡，侵袭沅桃公路一旁的松溪铺，沅陵旅省人士呼吁，迅速派大军平息叛乱，并请政府撤惩失职军政人员。沅陵危急，县府与叛民和谈失败，3月6日，城内大火，辰豁县城及兵工厂6日陷落，7日，全城已半成灰烬。在攻防战开始时，辰豁有民枪2000支，要求政府配给兵工厂枪支弹药，初遭拒绝，等到发下来时，民枪没有向叛民发放一枪，反与叛民合流，附近的一些县也告叛乱，湘西事件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各地叛民的首领均为当地的富户，过去向政府求官不得，大感失望，目的在于求个人出路，没有其他政治作用，也没有统一组织系统。但乡民受政府侵扰日久，易受匪首蛊惑，参与叛乱。经过叛民侵扰，沅陵已成死城，全城创痍满目，一片荒凉。街区精华毁于大火，灾民达万人，饮水困难，濒临断炊。经过10天兵火，叛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除“杀”之外，几可与“扬州十日”相比。沅陵事件虽暂时平息，继续者大有人在。怀化、溆浦、武冈三角地带“豪杰”蜂起。三省边区“早已成了盗匪横行的世界”。

造成湘西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远的方面说，战后湘西没有很好恢复，民穷财尽，未予救济，加上地方官吏横行，鱼肉善良人民，到了大局纷乱之时，一起进发，不可收拾；近的方面说，其时湖南征兵扩军甚急，省方要改编保安团队警察，以致团队有不稳的现象；绥靖司令李默庵处置不当，对良民轻率以兵力弹压围剿，扩大了事态；事件发生初，省府与参议会的意见不统一，前者决定剿抚兼施，以剿为主，后者则认为事变的政治性不浓，主张疏导，甚至会同省府派出代表到沅陵与叛军首脑会谈，希望湘人团结，结果沅陵谈判失败，城内一片大火。湘西事件是地方官民利害冲突的结果，政治不修明，人民才被迫造反，以致匪民合体，酿成变乱。其他地区土匪恶霸横行，原因与此相似，由于各种矛盾交迭加深，不法力量日积月累，形成尾大不掉，一旦进发，害国侵民。正值解放大军陈兵江岸、大局濒临和战的紧要关头，全国视线都集中到江南，国民党多方调集部队，紧密部署江防，以阻止解放军过江。边境大规模的土匪暴乱，是国民党后院燃起的一把大火，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力量。

1949年，会道门是扰乱地方治安的又一势力，在广大乡村，会道门分布极广。不法会首大多借用迷信手段，拉拢百姓人会，骗取民众钱财，与政府对立。国民党政府虽然曾加以控制，但收效甚微。如1948年底到1949年初，川南僻静县份破获了一个大规模组织的一贯道教匪，会首是河北人常振中、高贺光，他们由北平辗转人川，在全川各地广设教坛，招收青年男女和无业流民人教，并交纳巨额会费。一时间，受惑男女趋之若鹜。该教已在川南各县设立分会，且陆续有专门教徒从北平前来，可见其势力之大。由于会道门数目太多，范围广大，非内外交困的国民党政府所能禁绝，国民党退出大陆

前，竟把土匪、帮会、会道门等作为对付共产党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力扶持，完全不顾恶势力反人民、反社会的本性。所以，对于土匪、会道门，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倡导“剿抚兼用”，但湖南参议员陈鲲的一句“抚的是土匪，剿的是百姓”的评价，道出了政府的真实态度，并成为当时舆论界的流行语。帮会、土匪、会道门的作乱，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但国统区的帮会和匪患，扰乱了国民党统治，牵涉了国民党军事力量，对解放大军南进客观上有一定作用。

在新解放区、新占领区，大量土匪、帮会、会道门的存在，却成了威胁新生政权的极不安定的因素，新政权的一大隐患。他们的活动都与人民的利益违背，与新政权建设和巩固相对立，如果任其继续滋生、存在、发展，于国于民，有百害无一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匪总人数达数百万之多，遍及全国广大农村、乡镇，许多地方甚至是全村、全乡都是土匪。但是，在这些土匪中，绝大多数匪众是因一时生活所迫，以及其他原因，在个人家庭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人伙的贫苦农民。对这些人，不能一味加以剿杀，否则会把大批贫苦民众推到新政权的对立面去。人民政府注意发动群众，把安定民生、发展生产与剿匪行动结合起来。早在1948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就在《中原局关于发动群众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中指出：“创造根据地的斗争，首先的与重要的是必须组织一切力量，坚决消灭一切反动武装，肃清土匪，剿灭土蒋，解散一切反革命组织，与从政治上打击恶霸分子、特务分子；同时严格规定打击的范围，以便争取多数，安定社会秩序，安定民生，发展生产。”11月16日，该《指示》获得中央批准，成为新区反土匪恶霸的指导性文件。共产党的政策是，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究、有功者奖”的方针，首先予以教育，教育无效，武装清除。解决民生问题、镇压反革命和武装清剿多管齐下，解决匪患，效果良好。

如豫西地区素为多匪之区，由于旧社会制度不良，高租重税，苛杂繁重，军阀混乱，灾祸遍地，以致农村破产，农民无以为生，有些青壮年被迫铤而走险；地方土豪劣绅利用权势，豢养土匪，统治农民，称霸一方；国民党当局与地方军阀又纵兵殃民，对成股土匪收编加委，给予合法地位。这样，就使豫西历年匪患蜂起，千万民众在官、匪、霸三位一体的统治下，倍受压榨欺凌。人民解放军进人后，不断对这些恶势力进行镇压扫除。工作人员在农村选好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发动农民，建立农会，动员农民反对负担不公平，反对贪污。斗争从诉苦和阶级教育开始，在许多村庄，妇女因丈夫、儿子都被国民党抓了丁，她们在乡又受尽了土匪恶霸的欺凌，纷纷带头诉苦。通过发动群众，1948年底1949年初，新区形成了反土匪、反恶霸的高潮。河南宝丰县在两个月中，建立村农会85个，乡农会9个，会员达3972人；临汝县1948年12月，已成立了107个村农会，7个乡农会，斗争恶霸97次（新华社［中原］电，1949年2月20日）。西北新区各县在两个月群众工作后，约有42%左右的农户参加农会。对于土匪武装，则予以武力清剿。1948年至1949年2月的1年时间内，毙俘土匪4万多人，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为减租减息及土改扫清了道路。又如，1950年初，进人湘西的解放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全歼了十余万土匪武装，解放了湘西22个县，

创造了湘西历史上空前的奇迹。

为了帮助多数土匪改过为民，人民政府在各地普遍设立土匪自新登记站，允许土匪改过自新，脱匪还田。结果，除了惯匪、国民党特务和少数土匪骨干外，绝大多数都被争取过来，加入劳动人民行列，取得了很好效果。1950 年 2 月 11 日，新华社的综合消息对此报道说："各地土匪的成员，大多是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下破了产，并被特务匪首威迫而参加的农民。这些原来是贫苦的善良的农民，一经了解人民政府、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以及各项主张，便纷纷悔悟、缴械投诚或自动回家生产。这从剿匪的战果中可以明显看出。据河南某地统计，经政府瓦解而投诚的土匪比被歼灭的土匪多达 5 倍，有的地方则多达 17 倍以上。因此，各地对土匪一般都实行军事清剿和争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对于俘虏和投诚登记的匪众，则采取大量集训改造的政策。华中有些地方对投诚的土匪实行短时期的管制制度，进行诉苦、教育、改造，号召他们起来协助人民政府一同去做那些尚未醒悟的土匪匪众的瓦解和争取工作，主动向人民政府立功赎罪。""

也有一部分土匪，在国民党垮台前，受到国民党政权的拉拢网罗。与传统土匪打家劫舍、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性质不同，他们是真正靠杀人越货、拦路抢劫为生的惯匪。有的属于蒋介石临撤退大陆前潜伏下来的特务、游击分子，对现政权深怀敌意，妄想通过开展所谓"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推翻共产党现政权。他们在所有土匪人数中，所占份额虽小，但破坏性极大。如当时福建的土匪大致就有三类：一是政治土匪，是国民党罗致的散兵游勇、武装恶霸、反动帮会有计划有组织地留下来的，像"突击队"、"人民反共救国军"、"海上保安纵队"等均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控制。国民党特务 1950 年上半年，把福建境内的各种土匪拼凑成"福建游击军"，由金门国民党守备部队司令胡琏任司令。这些土匪约万人，是土匪中的主力。二是封建地主恶霸、地方实力派所掌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号称土皇帝，有的拥有大量田产，有的土匪头子就是当地的恶霸，长期鱼肉百姓，约有 7000 人。三是惯匪，主要由无业游民、流氓及部分在旧社会无法生存、被迫铤而走险者组成，专门烧杀抢掠，涂炭人民，是职业土匪，全省共计有此类土匪 130 股，40000 多人；后来发展到 372 股，60000 余人。福建的严重匪情引起了共产党重视，在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福建从 1949 年 8 月，就拉开了剿匪的战幕，沉重打击了境内土匪。

在新解放区，共产党对会道门采取教育与取缔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给愚昧无知的会员进行科学知识教育，帮助他们认清会道门的本质，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对非法组织会道门的会首坚决惩治。如 1949 年春季，正值疾病流行，冀南一带有人利用群众的落后心理，组织发展会道门，破坏群众生产，一贯道、圣贤道、佛教会、西华堂、先天道、一炷香、六合拳等组织头子，欺骗群众为他们上供，骗取农民钱财，供他们喝酒吃肉，还非法捆打村干部。政府坚决加以取缔，违者予以法律制裁，对受骗的群众耐心教育，并通过治病防疫工作，进行破除迷信的教育。晋中不少群众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纷纷退出迷信组织。凡是退出会道门的人，都轻松愉快地加入土地改革，准备生产。

至于以会道门名义，组织武装叛乱，妄图与新生人民政权相对抗的会道门头子和组织，政府以武力强行剿除或取缔。解放前夕，福建共有 70 多种会道门组织，道徒 10 万多人，其中以同善社、达到会、一贯道分布最广，危害极大。这些组织以迷信为联络纽带和手段，以家长制的形式建立团体，其头子多是地主、恶霸流氓、反动官僚，他们依附反动统治阶级，有的还拥有武装，因此不同于一般宗教，实质上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国民党在溃逃前，利用会道门进行应变活动。国民党福建特击司令部发出通知：凡 18 岁至 45 岁的男人一律参加大刀会练武，否则以通“共匪”论处。福建同善会头子倪成、陈有昌到香港、四川、上海等地参加应变会议，组织“中华救国保民会”，接收反革命任务。1949 年 8 月福州解放后，厦门、同安一带的一贯道与金门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成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福建游击总部第十纵队”，妄图负隅顽抗。仅 1950 年，全省 13 个县就发生 19 起大刀会暴动事件。福建把镇反运动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剿匪反霸斗争结合在一起，从 1950 年 12 月～1953 年底，取得了胜利。

在大城市，共产党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也开展了清查取缔帮会、会道门行动。如上海解放初期，大批国民党特务、帮会流氓分子，企图利用共产党在上海立足未稳之际，捣乱破坏，威胁新生政权。在上海解放后的半年内，每月发生抢劫案达 100 多起。人民政府对帮会头子严厉打击，责令参加过帮会的成员到政府部门登记，到 1951 年，登记帮会人员 26800 人，数以百计的帮会头目被监督劳动，对于悔过自新、表示不再与人民作对的帮会头子如黄金荣等，予以宽大处理。1951 年统计，计取缔反动会道 768 个，登记处理会道人员 10621 名，依法惩处道首 3974 名，退道道徒 322400 名。对帮会及会道门的取缔，稳定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从 1951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开始了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帮会、会道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长期扰乱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在较短时间内，被清除出局，获得国人称赞。

从 1949 年开始的两三年内，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了旧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帮会、土匪、会道门、游民等问题，彻底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业绩空前，举世瞩目。人民政府对非法群体和组织采取的教育、清剿、破除迷信、解决生活困难、鼓励参加生产等措施，在实践中行之有效，人民拥护，对今天防治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非法宗教势力，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结束语：成与败——得民心者得天下

国民党政权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转眼4年，就被共产党推翻，残余势力也被逐出大陆，退守台湾孤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戏剧性结局，既出乎国民党的预料，也出乎共产党的预料。何以如此？天意，抑或民心？

抗战胜利后，国共经过谈判，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协会议，一切都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如果政协各项决定都能付诸实施，中国从此有可能走上两党或多党联合执政道路，将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迈进一大步。结果，蒋介石不愿放弃独裁，实行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在国家政治民主化没有实现之前，不肯完全放弃武装，完成蒋介石所希望的"军队国家化"。两党争执不下，唯有诉诸武力，兵戎相见。

决定战争的胜负，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军事实力并非单纯的武器装备，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均衡发展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又取决民众的素质，其中最关键的是民心或大众心态。国民党统治下，民心散失非止一日。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国民党对进步势力实行白色恐怖，镇压工农运动；抗战初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但在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原可以借民心思定若渴之机，迅速收复国土，恢复经济，兴利除弊，改良政治，安定民生，以期民富国强。可是，国民党心襟狭窄，政治上纪纲不振，把国民的愿望置于脑后，只顾急呼呼地与共产党争夺胜利果实，抢占地盘。

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朝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了自己的中央军。各地都举行活动，有的打出标语，欢迎庆祝政府还都。1945年8月，上海新新公司（即后来的上海食品公司）就挂着一条幅："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四周还镶有五色彩灯。"结果蒋介石带领的队伍下山摘桃子劲头十足，致力安抚老百姓措施阙如。南京、上海一带的人民首先遭殃。满世间，尽是天上飞下来、地下钻出来的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结果接收大员变为"劫收"、"劫搜"大员，纷纷抢夺"肥缺"，占据"要津"。人民盼来的是"五子登科"（大员们到达后，房子、婊子或女子、金子、车子、票子照单全收，日占或无人居住的仓库到处可见"劫收"大员们贴的封条），"有条有理"（不管是汉奸、日本人、社会渣滓，只要有金条送给主持"劫收"的大员先生，都可以有理可讲，"既往不咎"，汉奸定罪轻重，以送金条多少而论）。"不怕犯天大的罪恶，只要有等身的黄金"，成了当时上海等地市面上的一句流行语，"劫收"大员们到达后，办什么事都要向当事人要钱，有了法币、金条，一切迎刃而解，否则，无法生活，真正"无法五天"。

连年内战，物价飞涨，民众受到的压迫不减反增。老百姓失望地说："盼中央，望

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负责经济接收的邵毓麟曾经当面提醒蒋介石：“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1945年9月，上海《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评《莫失人心》，明确指出：“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可怜的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而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卖房子吧，卖财产吧，累世的财富转眼转移到手握有金法币人手中……”10月24日，在《为江浙人民呼吁》社评中，作者再度痛心指出：“在胜利到来之初，重庆人到京沪一带是多么被仰望，被亲爱，简直是一切光荣的象征。才短短两个月，京沪一带的人深深地由生活体味中厌恶了甚至憎恨了由重庆去的人。”“劫收”大员收得的是金银财富，政府失去的是民心。

江浙如此，其他地方也不例外。如国民党军队出关后，占领的面积虽然不大，却是东北工商业的精华地区，除去少数几个清廉人士之外，个个把东北当块肥肉，狼吞虎咽。敌伪产业总值两亿零三百一十一万金元，占全国敌伪产业的70%以上。但直到1948年10月30日，国民党军队撤出沈阳那天，敌伪产业政府一文也没有回收，全部在各机关与私人手中。两年多中，当官的嫌官小，有钱的嫌钱少，自己怎么方便怎么做，不管什么叫国家人民。在各自控制的几个大城市内，吃喝玩乐，尽情享受，勾结商人，做起生意；士兵纪律无人管束，民间遭受了比张作霖时代更深的痛苦，军队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人民也不把军队当卫国的兵看，仇恨日生。眼看东北守不住了，则赶紧运黄金、钞票、姨太太入关，有的连日本人留下的花都送到关内。所以，有人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守，“不是林彪太凶，而是国军太糟，政府太无能，剿人不成，反把自己剿了”。就这样，大批果实都被收进了豪门权势的腰包，民众依然在饥寒贫困中挣扎，人心从此涣散开来。被胜利庆贺声熏得发醉的蒋介石并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直到1948年底1949年初，似乎才发现了这颗“定时炸弹”，认为“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可是为时已晚，定时一到，不及排除，已然爆炸。于是，“抢救”、“收拾”人心字眼频频出现于媒体。1948年，《观察》杂志在《大局的抢救》中，提到人心上的抢救和政治上的抢救时说：“三年的内战可以说把人心打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人罪，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元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括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汇兑金元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今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官方的《中央日报》也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

迫于各方压力，国民党也摆出所谓“抢救”、“收拾”人心姿态，可是又令行不止，朝令夕改，连出错招，异想天开地以发行金元券、限价等措施，挽救经济，改善民生，重振军事，却不愿在政治上动大手术。结果，经济崩溃加速，军事节节败退，人心益发涣散，几至天怒人怨。政治腐败，成了国民党失败的总根源。

国民党政治腐败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在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徐道邻的评论《假如政府肯全面革新》中，我们大致可以窥其概貌。为了帮助读者对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治状况有较全面的了解，笔者特将徐文中的主要内容引述如下：

前线打败仗，士兵成千成万的死亡，而高级将领的生活却愈为华奢；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每天成百的饿死冻死，而豪门贪的财富日益雄厚。这是今日的军事和政治。大街小巷到处挂满了衙门的招牌，而社会上应管的事，却没有一个人认真去管。中央和地方，成千成万的机关，天天在开会，天天在颁布法令，在制定办法，而实际上的国计民生，依然如旧，甚至每况愈下。几十万几百万的公务员，拿了穿不暖吃不饱的薪金，一早一晚，向公事房里走进走出，只是在一堆公文纸片里面翻筋头。这是今日的行政？

军事戡乱时期，征兵征粮，当然是地方第一要政……政府向人民要求的，是征兵，征粮，摊派，而所给予他们的，是沿街乞食的难民，是生风惹事的流亡学生，是强买强卖的荣军，是挨家挤进拍桌摔碗的军属。这是今日各地方的人民的生活。

民生今日何以如此困难？是因为一年以来军事的节节失利。军事和政治何以如此腐败？是因为当局者狭隘、虚伪和自私的心理。行政何以如此低能，是因为现行的一切制度法令人事之不合理。

在这样的环境，要争取局面的好转，必须在行政上进行彻底改革。具体办法如下：

(1) 裁并机构。现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需要加以改革的约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名义上的正式职掌而实际上无权无能的经常机构（大半在中央），一种是实际上有权力而本身性质是重叠骈枝的临时机构（大半在都市），一种是无所事事有名无实的一群摆饰机构（大半在地方）。

经常机构（用方印的）之往往变为无权无能，是因为其主要业务，为的是应付人事，往往被剔出来而另成机构（地政卫生警察之脱离内政部是也），或索性另成临时机构（社会部之外有行总，省府之外有司令兼行政长官，财政局之外有物资局是也）。而这些临时机构（用长印的），因为其首长都是当朝红人，所管的事又是一时急务，对其主管机关当然不在眼内。所以重叠之外，因而迟滞，骈枝之余，又加麻木。而其本身组织，因为是天之骄子，当然是广置人员，宽列经费，在政府机关里形成一种广大而空虚阔绰而浪费的特殊阶级！至于一些有名无实的摆饰机构，多半是因为党国要人，为党派分赃，安排人事而成立的许多中央机关，为安置他们系统下的喽罗，就一条鞭地在地方各层普遍设置了子孙饭碗（处、局、所、科），然而事实上既筹不到举办业务的经费，又招不到对这些业务有训练有志趣的人员，而环境上根本没有办理这些业务的迫切需要。自然这些机构只能无所事事，不生不死，暗淡而无聊地度他们的冷静生活。因为连年增加出无数的骈枝机构，和那许许多多有名无实的摆设机构之无法充实，遂使主管官厅无法迅速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公文来往旅行程期又日渐延长而无法减短，公务员的数目日渐庞大而待遇益难改善，于是一般的行政机关变成普遍的无能和浪费！……我们要

裁并机构……如果白养活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员，而强迫其变成废物，对其他人员既有欠公平，对他们自己也太不人道。

(2) 几乎无一处不是人浮于事，吃茶、吸烟、看报、谈话、打磕冲。然而此犹其海之小者，劳逸不紧缩人员。现在全国的行政机关，把几个人员太少而根本无法作事的机关除外，均而引起同事之间之不和协，每人要设法在公事上盖一个图章，而使文书格外迟缓，工作太闲而造成一般空气之松懈，人心之不振作，此其害之大者。……可以裁减下来的人员，我相信至少有2/3，多的我相信可以到4/5。

(3) 提高待遇。裁并了机构和减少了人员之后，我们才可以提高待遇，也可以说后一者是前两者的目的。不把公务员待遇提高到勉强维持生活的标准，而想遏止贪污，提高效能，如同用一群贪污无能的公务员，而政治清明人民康乐一样，犹缘木而求鱼也。……我们对这一批拿改良待遇的公务员，就可以拿绝对不客气的态度和心理，要求他们不得贪污，不许低能；低能的我们可以随时更动而不愁应者无人。贪污的我们可以严厉的惩办而受之者也死而无怨。

(4) 革新几个制度。第一，行政三联制；第二，铨选制度；第三，计政制度；第四，民意机构。

(5) 改进司法制度。抗战以来，最使人痛心者，莫过于司法界声誉之跌落。此乃国家前途命运之最大隐忧，可惜尚不被人重视。司法之受人指摘不外两端，案件积压，往往经年不决，使人不敢问津，一也。任情裁判，不负责任，反正每案必经上诉，使人信仰尽失，二也。

在政治学家眼里，国民政府从军事、政治，到民生、民心，都处于涣散状态，整个国家政治机器已无法正常运转。要是马上能精简机构，遏止贪污，选拔人才，考察政绩，革新制度，改进司法，加强监督，提高行政效率，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作者对国民党政治所作的政治学意义上的透彻分析，既是对国民党当前行政的一次总检讨，也是对行政疾病开出的一剂药方。要是假以时日，按照上述方案彻底改革，尚有挽救的余地。可惜，国民党政府病人膏肓，倾厦难撑，未及改革，即已覆亡。

政治腐败必然导致民心丧失。国民党20多年统治的失败，在于放弃了最广大的民众，总是把“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而这个党的少数党魁，则又把党当作自家的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乱来一气。权力失去了制约，必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国民政府20年的“大烂污”关键在于它的党的烂污；党的烂污又导致了军事、经济、外交的烂污。对此，蒋介石在1949年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时，方才有所清醒。

1949年9月，蒋介石在对前途彻底丧失信心的心境下，终于承认国民党的弱点。9月19日，他在成都接见川、康、渝在成都的国大代表及成都《忠勇社》杂志社社长马昆山等人时说：“国军为什么会弄到今天这个信心丧失、精神解体的地步，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之前，微不足道，消灭已不成问题，抗战固然给它一个发展机会，但连它自己也不会梦想到有今天。由于我们的弱点被它抓住了，遂演成我们今天这样溃烂的局面。共产党打败了我们，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是我们腐败无能，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

己，自己的自卑感吓败了自己……””

1949年12月24日的圣诞平安夜，没给蒋介石带来丝毫平安。刚刚率众仓皇逃离大陆不久的他，此时坐在孤岛台湾日月潭的涵碧楼中，心绪初定：昔日辉煌何以瞬息消失？荣任一年有余的“总统”何以今日遭遇丧家、漏网之物的命运，今后何去何从？千头万绪，直到现在才有时间加以梳理。他承认：“戡乱的失败，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分崩离析”。这些话在他嘴里当然不是第一次流出来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还找出了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就党内而言，由于国民党干部“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内部派系纷争，以及在心理上犯有“失败主义的心理”、投降主义的心理、依赖主义的心理，只有改造重建国民党，才能纠正这些错误；军队的崩溃由于军队纪纲的败坏，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均未能建立和健全，乃至官兵对立、军民脱节等等；政治失败由于“新旧制度脱序”与“政党政治的失败”；经济失败归咎于宋子文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导致通货膨胀；外交失败由于苏联对华“侵略”导致共产党乘机坐大，美国对苏妥协、对华背叛。

有了这些教训，国民党在退居台湾后的最初两年中，才重新整顿了国民党各级组织，在成立各级改造委员会的基础上，全体国民党员开展反省检讨与厉行新作风，并进行整肃与党员归队活动。通过重新登记党员，使国民党各级党部与组织系统相继建立，完成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重建与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国民党这些改革虽然未能完成“反攻大陆”的“宏愿”，却对退台后的混乱政局起了稳定作用；对日后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也有促进之效。到此为止，蒋介石还是没有、也许是不愿再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民众何以抛弃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蒋介石是一个大输家；与孙中山先生倡导并躬行“三民主义”的气魄相比，蒋介石的一生可圈可点之处确实太少了。蒋介石执政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享用了一个世纪的“领事裁判权”及诸多不平等条约被基本废除，在中共领导和推动下，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持下，取得了抗战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这一点，是国民政府为数不多的、足为国人称道的亮点。对此，1949年前夕就有人作过评论：

> 国民党所以为世人唾骂，最大的罪名就是柄政二十多年，天天喊“三民主义”，一直到现在，一民也没有做好，这似乎是应该骂的。但我亦不敢随便骂。试思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初则有江西共军的变乱，有北方阎的变乱，不久便有“九一八事变”，有淞沪的战争，有“人民政府”等等的变乱。到了“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阀肆行侵略，而共产党军队遂乘机蔓延到北方各省，这些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当中，国民党政府不塌台便算不错，我们还能期望它做出什么事情吗？……平心而论，这二十年来，就党的立场而言，国民党是失败的；就国家的立场而言，国民党虽然没有作出什么大成绩，至少可以值得“识大体”三个字的评语。

“识大体”三字即使可以作为国民党秉政20多年的一桩业绩，却不能看成是国民党

失败的开脱词，无法改变国民党内政失败的事实。如果把共产党的"变乱"和"乘机蔓延"看成是国民党"识大体"的佐证之一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共产党那么多"变乱"的条件和可乘之"机"？国民党秉政20多年，政治法律上，按照西方模式，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近代意义的制度体系，具有一定民主特征。司法、行政上，值得称颂者却寥寥无几，许多制度，形式虽然健全，却未付诸实践；即便付诸实践，也常常表现出反民主；民主精神形式上有所风行，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支柱，有时甚至变成专制政治的装饰品；民主运动遇到专制政治强力压制时，往往归于失败。

反民主、反人民的行为，最终使国民党付出了所有老本，到头来，只得自吞恶果。共产党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国民党的"成全"。这一点，早在抗战胜利后一二个月，储安平就著文质问过国民党，并做过准确预测："今日国民党要打共产党，可是请问共产党在中国之有今日，究竟是谁的责任。假如国民党20年来的治绩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生康乐，今日的共产党的势力会不会膨胀到这样大的地步……国民党今日只知攻击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竟不反躬自省釜底抽薪，再从本身改善、革新做起，实可谓缘木而求鱼。即使共产党短于实力，完全打垮，而若政治依然黑暗，人心如此涣散，民穷财尽，鸡犬不宁，如此国家，尚有何为！国家治乱，系于一念，悬崖勒马，固未为晚。"可是，在接下来的4年中，国民党不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躬自省，釜底抽薪，改善、革新自身，反而变本加厉，举凡政治、人心、民生、财经，都愈发黑暗、涣散、穷尽，共产党的大多机会和条件都是国民党提供的。

社会动荡不息，王朝更迭频繁，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同样适用于1949年的国共大决战。对于这段急剧动荡的时局，只有以历史的、公正的眼光来审视，才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判。相对于今人，身临其境者也许感悟更深，看得更清楚，分析得更准确。王芸生曾在《蒋介石的襟度》社评中评论蒋介石说：蒋介石的襟度是"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反民主，反自由，并且蔑视人民……他越是反民主，反自由，蔑视人民，结果他就失败在要民主争自由的人民的手上。"这是新闻工作者考察蒋介石个人政治人格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稔知明亡清兴、清亡民兴历史的文史大家陈寅恪先生，更善于"审音知政关兴亡"，1949年的《青鸟》诗中有"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之句；接下来在该年夏天的《哀金元》一诗中他又写道："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原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这是文史大家分析民心与王朝兴替关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在文史大家眼中，由于"兴亡自古寻常事"，所以他们并不以为国民党之亡值得诧异，只是如此兴亡过程在历史上还不多见；国民党灭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只有一个："民怨所致"。总之，对于人心，国民党政府误诊在先，误治在后；政府不顾人民，人民必然要抛弃。政府。民意如此，还有何说！

实现民主，在中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民党推行独裁，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共产党监督它，制约它，反对它，即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人士经常说的"共军的变乱、蔓延"，那么，尽管它腐朽不堪，也不致如此快地土崩瓦解。偏偏共产党在诸多方面，与国民党尽唱"反调"：国民党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共产党反腐倡廉；国

民党军纪不整，共产党令出如山；国民党几乎得罪了所有知识分子，共产党竭力笼络知识分子；国民党无暇顾及学生，共产党大力争取学生；国民党支持纵容大土地所有者存在，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国民党让民族资产阶级日子过不下去，共产党处处保护民族工商业者……一言以蔽之，国民党处处疏远民众，共产党偏偏亲近民众，一反一正，高下自现。

1949 年，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党广泛纳言，有错则改；事无巨细，认真务实，在各方面都注意兼顾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心理和利益，以求尽可能团结社会大多数。就连新政协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共产党都能精心安排，天衣无缝。新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当时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曾经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几乎尽在其中。

这并不是出于好奇的统计，而是非同小可的政治操作。当时大会所有文件和人们口头上都没有“领导党”一说，而只有“工人阶级领导”这个词。制定的《共同纲领》总纲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明确规定出来。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想更加郑重地看待它，是想让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共产党所作所为，令世人赞叹不已：共产党了不起，真正以天下为公；千辛万苦团结人民打下江山，又真心诚意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治理！不管以后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或民主人士的态度如何，中国要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化、法制化，振兴民族经济，跻身世界强大民族之林，还有待今后数代人的努力，但在 1949 年，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比较民主的，在行政上基本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是在认真为人民办实事；为国家富强谋出路。顺应民心，自然赢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夺取并巩固政权，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篇

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

第一章　“五四指示”

第一节　政策转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明知蒋介石没有和平诚意的情况下，毛泽东仍亲赴重庆与之谈判。接着，又极力促成召开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内战的打算，且利用和谈为幌子，不断地调兵遣将，为全面内战作准备，企图以战争的方式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

1946年上半年，国内的政局仍处在密云不雨的状态之中。接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国共两党又签订了停战协议。中国共产党是诚心诚意维护政协决议和国内和平的。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且明确表示：“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但是，全国人民企盼的国内和平局面，并未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而到来。当时，决定和与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表面上高喊和平、停战的口号，暗地里却在紧张地部署全面内战。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在美国的帮助下，国民党将数十万军队从抗战时的大后方运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控制了这些地区的各大城市，并且收编了大量的伪军，接收了一百多万日军和几十万伪军的装备，其实力进一步膨胀起来。

这时的局势是：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不停地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另一方面，除东北外，关内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还没有发生，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不停地到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但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蒋介石正是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全面内战的准备，和平民主发展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消逝。

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形势的发展曾一度给予乐观的估计。毛泽东在颁布停战令时指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加快，中共中央很快改变了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认识到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全党在全力争取和平的同时，

认真做好全面内战爆发的准备。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要求“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同时要求各地将减租、生产两件大事抓紧推动，以“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到1946年7月，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之比约为3.4:1。国民党统治着全国约76%的面积、3.39亿人口，还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拥有几乎全部近代工业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国土总面积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处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在全面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动员广大解放区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支持革命战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抗战胜利后，广大的新解放区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奸清算运动，老解放区则在原来已经进行过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开展了查租减租工作，使解放区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封建剥削有了不同程度的降低，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减租清算获得了土地。但是，在各解放区，封建土地关系依然存在。例如，苏北的淮海区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之后，全区有地主11052户，占有土地1342950亩，平均每户120亩左右；以每户8口人计算，人均拥有土地15亩多，相当于中农的5倍。晋冀鲁豫的太行区反奸减租后，地主人均土地仍有13.7亩，中农为3.1亩，而贫农只有2.1亩，地主人均土地相当于中农的4.5倍、贫农的6.5倍。苏北解放区阜宁县钱庄乡全乡542户，地主仅1户，占全乡户数的0.2%；富农27户，占5%；中农217户，占40%；贫农297户，占54.8%。该乡各阶级人口的比例与户口相同，而在土地占有上，贫农仅占全乡土地的29.3%，平均每户8.53亩，每人1.83亩；富农土地虽然只占全乡的11.9%，但平均每户有38亩，人均6.5亩，为贫农的3.5倍；地主尽管只有1户，但占有土地1021.2亩，占全乡土地的11.9%，人均占有土地87.6亩，约为全乡贫农人均土地的47.9倍。

在广大的新解放区，随着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进入高潮，“农民要求突破减租减息所规定的具体政策，直接分配土地。这种情况的出现，其直接原因是新区在除奸反霸斗争中收回了一批土地。新区几年来土地关系变动中又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需要调整。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减租减息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土地政策，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干部群众便要求突破它，以便更直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即使是经过多年减租减息的老解放区，虽然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它仍然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生产情绪和革命积极性的发挥”。山东解放区乳山县1942年就实行了减租，但到1946年初，农民仍普遍要求合理解决土地问题。其原因：一是1942年减租的租约将要期满，农民担心失去这部分租地难以生活；二是在减租清算中，地主恶霸抵还给农民的土地财产多未订立转权契约，农民顾虑没有保障，要求政府给予证据，以防地主抵赖倒算；三是减租减息过程中，部分地主愿将其出租的土地低价卖给

农民，但村干部考虑到减租政策，再三劝说双方保持租佃关系，农民要求政府妥善处理；四是相当多的农民将投入自卫战争，希望参战前解决家庭的土地问题。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农民，通过清算、减租等形式，实际上已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

这时，一方面，经过减租减息，解放区农民获得土地的要求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大战在即，迫切需要动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益严重地摆到了共产党人面前。因此，中国共产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

1946年3月以后，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全面内战的企图日益明显，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就愈来愈关注农民土地问题。

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时局和对策。讨论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是此次会议的内容之一。会上，任弼时说：华北和华中各地农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如果按照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办法，目前运动中许多地方妨碍了中农利益，对富农和中小地主斗争过火了，是"左"了；但是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若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又右了。问题不是责备同志，而是中央是否批准。为此，任弼时主张，在彻底减租清算的名义下，克服某些过火斗争现象，争取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他强调，这是巩固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步骤。毛泽东对任弼时的主张表示赞同，他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4月11日，毛泽东就如何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问题致电陈毅："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时机加以纠正。""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需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

为了制订新的土地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

4月初，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到了延安。虽然此时中共中央"已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但全面内战毕竟还未发生，是和是战，仍是两种估计，解决土地问题，暂时也还只能着眼于减租减息"。

邓子恢来延安之前，华中分局曾在淮安县石塘区搞了发动农民向地主算账的试点，组织了全区四千多名佃户，到淮安城里"请"了五六十个地主下乡，清算他们在敌伪统

治时期的非法敲诈。在听取邓子恢关于清算试点的汇报后，毛泽东和刘少奇认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

4月20日，邓子恢在给华中分局的电报中说："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于清算旧账，一般是对付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今后各地对算账斗争应慎重其事。"由此可见，尽管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还没有下决心实现从减租减息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得不为应对蒋介石的全面内战部署作准备，但仍在极力维持和争取国内和平，哪怕是暂时的和平。

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一系列的汇报会，听取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人的汇报。在刘少奇主持的汇报会上，薄一波、邓子恢、黎玉汇报了各地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情况。在汇报中，各解放区负责人提出：

第一，在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贫雇农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超过了减租减息的范围。只要批准群众的这一要求，今年内基本上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

第二，根据一些地方出现的"左"的错误，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比如：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照顾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顾开明绅士；照顾被汉奸恶霸利用人员的贫苦出身者；照顾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业，除大汉奸大恶霸开设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没收外，一律不动；照顾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点土地，家庭是劳动人民者多分点斗争果实；照顾地主人员的生活出路，对豪绅、恶霸、大地主，除依法处死者外，也要留给土地，给他们饭吃，对逃亡地主应争取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

第三，鉴于敌我斗争异常尖锐，对外宜不讲土地改革，仍以减租清算名义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听取汇报后，刘少奇说：批准农民土地的要求，事关重大，须改变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按：即194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因而请你们来延安汇报情况，进行讨论。现在，群众要求土地，而且实际做了。但不能各搞各的，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应发一个指示，以便各地有所遵循。

薄一波等人的汇报，坚定了中共中央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的决心。4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并程子华（时任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邓子恢也于同一天致电华中分局其他领导人："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与讨论，由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5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康生、薄一波、邓子恢、黎玉、胡乔木等。

会上，任弼时首先发言，他重申了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土地问题的看法。接着是康生发言。康生说：减租清算运动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没收汉奸土地，是比较少的情况，主要是清算。结果，地主把土地折价给农民，但有各种偏向。这是一个极重大的问题。是否批准农民的要求，同时提出各种政策，请大家仔细考虑。

刘少奇在发言中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要说服群众，使他们了解只有遵守各项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除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侵犯，一切必须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到，以便运动得以正确地进行。土地问题的方针，今天就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

林伯渠、徐特立也都表示赞成改变以往的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

这时，毛泽东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发言。薄一波说：这个文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因为实际上群众已经做了。有了这个文件，“左”的错误可以减少，特别是党内思想可以统一起来。邓子恢、黎玉也谈了各自的看法。

会议的最后，毛泽东作了发言。他主要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

(二) 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

(三) 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

(四) 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常平分下去。旧式富农实际上要侵犯一些的，新式富农则不应侵犯。

(五) 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

(六) 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更能巩固地团结他们。

(七) 暂不宣传耕者有其田，仍叫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将来一定要宣传。

（八）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与此不同，应该是劳资合作、劳资两利口号，工人与厂方共同订出生产计划，做到原料足，成本低，产品多，销路广，实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解放区的工厂，不论是公营的，还是私营的，利润必须比国民党区域高才行，否则，解放区外面的资本家不来。只管工人眼前的、片面的利益，不顾资本家乃至公营工厂的死活，那是自杀。这个道理，希望各地同志切实说明。

第二节　耕者有其田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因是5月4日通过的，故简称"五四指示"）。"五四指示"指出：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

"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到，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五四指示"强调："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那么，怎样实现"耕者有其田"呢？"五四指示"没有沿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办法，提出应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没收和分配大汉奸土地；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佃农以优先权买得其土地；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二成土地自耕；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五四指示"认为，使用上述种种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各地可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用。

由于制订"五四指示"之时，"和平要破坏，内战要爆发，和平似乎还能争取，我们没有放弃争取暂时和平的企图，但同时用极大的力量，甚至用全力准备战争，所以当时的方针，是争取和平，准备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中的阻力，巩固地扩大反蒋统一战线，"五四指示"强调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运动中，必须"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

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对富农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

此外，“五四指示”还规定，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替他们保留面子。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集中精力同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对于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走狗之属于中农、贫农及其他贫苦出身者，应采取争取分化政策，促其坦白反悔，不要侵犯其土地；在其坦白反悔后，须给以应得利益。对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反奸清算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就曾出现了侵犯民族工商业的现象。如何处理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问题。

中国农民本来就有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而在农村又有相当一部分地主通过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积累财富后，在城市里经营工商业，甚至本人也居住在城镇中，由其代理人经营在乡下的田产。太行区武安县（今河北省武安市）九个区中的四个区，有三分之二的租佃关系在城里，尤以城关五区最多，如该区杜庄村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在城里的地主手中，而这些地主一般都兼营工业或商业。这些地主，在八年抗战中，有的人成为汉奸，他们勾结恶霸，靠贩卖毒品、勒索群众发了财，并利用灾荒年强迫农民卖地，反过来又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对于这些有恶霸行为的汉奸、地主，没收他们的土地是理所当然的。但农民对城里的地主有很深的仇恨。过去地主们说：“城吃乡是平常的，乡吃城万不能。”许多农民在反奸清算中想把这种情况翻过来，认为“乡不吃城就翻不了身”。于是，各地都发生了农民进城找地主减租清算的现象。城里的店员、工人看到农民进城斗地主得了利，也要求参加斗地主的斗争。这样一来，势必发生侵犯工商业的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五四指示”明确规定：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同样地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不可将农村中清算封建地主的办法，错误地运用到城市中来清算工厂、商店，凡是出现了这种现象的地方，应立即停止，以免引起重大恶果。

“五四指示”要求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应迅速发动群众，务必在1946年底以前使问题全部或大部获得解决，不要拖到1947年。但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在农民已经公平合理得到土地之后，应巩固其所有权，发扬其生产热忱，使其勤勉节俭，兴家立业，发财致富，以便发展解放区生产。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凡由于自己勤勉节俭，善于经营，因而

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因此，不可无底止地清算和斗争，妨害农民的生产兴趣。凡我之政权不巩固、容易受到摧残的边沿地区，一般不要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土地，就是减租减息亦应谨慎办理，不能和中心区一样，以免造成红白对立及受到摧残。

要既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又避免农村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关键在于能否在土地改革中坚决地团结农村中90%以上的人口组成反封建统一战线。为此，“五四指示”明确指出：“如果侵犯中农土地或打击富农太重，或不给应该照顾的人们以必要的照顾，那会使农村群众发生分裂，因而就不能保持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一道，就要使贫农、雇农和我们党陷于孤立，就要增加豪绅、地主和城市反动派的力量，就要使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受到极大的阻碍，这对于群众是很不利的。”

为了贯彻落实“五四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召开干部会议，总结经验，讨论“五四指示”内容，向一切党的干部印发并解释“五四指示”；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确定实施“五四指示”的计划；调动大批干部，加以短期训练，派到新区去进行这一工作。同时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

第三节 相关规定

“五四指示”发出后，为了推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行，中共中央又相继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

鉴于内战尚未全面爆发，5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土地改革的指示》，认为中央5月4日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要更加促进各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实现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极大地巩固解放区，极大地增加我们反对国民党政治进攻与军事进攻的力量，农民的土地要求与土地改革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与正义的，并且符合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及政协决议（即《双十协定》），对于中国政治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完全必要。“但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1942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

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为了推动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各地报纸应多找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应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的动人的冤苦经过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制裁。在文艺界中亦应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

中共中央同时要求，各地应于迅速将“五四指示”当作党内文件，印发给进行群众

工作的干部及其他广大干部阅读，使广大干部明白党的政策，迅速实现土地改革。

5月17日，中共中央就如何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致电冀热辽分局："在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和少地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热河地区，中央'五四指示'更加适用，望坚决执行。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减租，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至于大汉奸土地，应坚决明令没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于大地主所隐藏的黑地，抗日政府应当在法律上否认其所有权，这样使农民清算黑地时更有合法根据。对于经营地主的土地，应当坚决拥护雇农要求土地的迫切要求，运用反奸、清算等各种方式，使经营地主的土地，转入到雇农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手中。

"五四指示"发出之后，为了在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向前发展，同时也为了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缓和地主可能出现的逃亡，分化地主阶级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及中间人士对土地改革的怀疑，以巩固反蒋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顺利得以解决，除了用清算的办法从地主手中取得部分土地外，中共中央曾提出应主要采取征购地主多余土地的办法，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表示准备选择适当时期向各解放区政府提议，由各解放区政府制定土地法令，加以颁布。指示同时要求各地研究将"地主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由政府以法令征购之"的办法是否适当的问题。

同一天，中共中央在《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中也说："我党中央正在研究和制定土地政策，除敌伪大汉奸的土地及霸占土地与黑地外，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

接着，中共中央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向各解放区政府提议：

一、确认耕者有其田为人民不可被剥夺之基本权利，政府以法律保证一切用自己劳力耕种土地的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

二、由政府以法令没收下列各种性质的土地：1. 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2. 在日本占领期间各级伪政权机关及其他伪公共机关所有的土地；3. 协助日本占领中国之汉奸卖国贼之土地；4. 在日本占领期间，在日军及伪军、伪政府机关及其他伪公共机关供职，犯有出卖祖国和残害中国人民生命及其他重大罪行者所有的土地；5. 前清政府机关及皇室所有的土地（如旗地）；6. 地主的黑地；7. 一切用不正当方法霸占之土地；8. 其他由法庭判决没收之土地。

三、凡地主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其超额部分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并以法令征购之。

四、由地主保留免于征购土地之定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各区情况规定之，大概

以等于当地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二倍上下为宜。并应注意地主保留土地的质量，不能全保留好地，亦不能全保留坏地。

对于如何确定政府征购地主土地的价格，中共中央认为，可由各县政府和当地地主与农民代表参照当地土地市价，并根据土地质量的不同协议定之。同时认为，征购地主土地每户超过一定数额者（如河北、山东为500亩，陕甘宁为500垧），其超过定额以上的土地，以半价或半价以下递减的价格征购之；地主土地被征购后，多余的农具、耕牛、房屋、肥料等，为农民所需要者亦可征购之，但地主所有的工厂、商店、矿山及其他财产不得征购；至于抗日期间在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务2年以上，且积极协助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主，应保留等于中农4倍以下的土地免于征购；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

那么，土地债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中共中央建议通过分得土地的农民所付出的地价，政府在自己全部收入中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及其他由政府指定的土地基金等方式来获得。因此，一切分得土地的农民，须向政府分年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其数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情况决定。农民分得土地后，其应付的地价，可分为10年付清，但特别贫苦之农民得分为20年付清，并得在分得土地的第三年起开始交付。

中共中央还向各解放区提议：除了法庭依法判决剥夺其公民权者外，所有依法被征购、征收土地的地主，其公民权不受侵犯，凡依法实行并积极赞助土地改革的地主应予奖励。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依法保留之土地及分得之土地的地权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均受政府法律的保障，不得侵犯。

在“五四指示”前的反奸清算中，有的地方曾出现过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在土地改革中能否稳定中农，不侵犯中农的利益，是决定这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而要稳住中农，就必须妥善处理富农的土地问题。“五四指示”明确规定一般不应动富农的土地。8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华东局的指示中，再次重申了不动富农自耕地的原则，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自觉地向富农让步，坚持不动富农自耕地的原则，对待一般中小地主亦应与对待汉奸、豪绅、恶霸有所区别，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生活，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中共中央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地主，稳定中农，顺利进行土地改革；同时也为了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内部巩固，以便能更广泛动员各阶层群众，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与京沪蒋区广大反蒋阶层和民主分子的反内战反独裁运动密切配合，扩大对解放区的同情，孤立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地位。

9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中强调，在反奸清算中要特别注意：（一）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的必需生活，给他们留下不少于中农或多于中农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二）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坚决实行“五四指示”的原则；（三）中农必须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如中农的土地被侵犯者，必须退还和赔偿。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原本希望通过和缓与有偿的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只是因为蒋介石集团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一意孤行发动大规模内战，为了迅速动员广大农民支持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才不得不采取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

"五四指示"的制订，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它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广大解放区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成为土地主人，实现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这一政策的制订，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转化的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状态下，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亦有抗日的要求，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主动地放弃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财产的政策，而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抗战胜利后，阶级的对立再一次明显地凸现出来。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于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还有所顾忌的话，在抗战胜利后就变成肆无忌惮了。八年抗战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不但没有被日本人所消灭，反而比抗战前壮大了几十倍，因而他也就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这时，阶级的对垒已经分明了。一方是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一方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中国处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夜。这时，国共双方都在争取力量。就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他们抗战胜利后的政治立场无疑倾向国民党蒋介石的（尽管他们中仍有一部分开明绅士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对农民阶级来说，他们所要求于共产党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因为只有有了土地，才能改变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才能得到自由和解放。抗战时期，为了打倒民族敌人，他们接受了减租减息的政策。但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后，他们已不再满足于这个政策，而是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了。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共产党就会有可能失去农民这个人口最多的阶级的支持。

"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不是共产党首倡的，而是孙中山在总结几十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基础上最先提出的。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虽然有时也喊喊这个口号，但从来就没有打算实行过，也实行不了。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把通过孙中山改组后已具有革命性质的国民党，糟蹋成了一个仅仅代表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地主阶级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根基，又如何能将地主的土地拿出交给农民？

消除封建剥削制度本是中国资产阶级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但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这个使命，只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来完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但是动员广大农民支持革命战争的需要，也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终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在一个封建剥削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资本主义是无法充分发展的，更谈不上实现现代化。因此，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不但是完全正义的，也是合乎中国历史发展要求的。

“五四指示”制订之际，全面内战就要爆发，但毕竟还没有爆发，和平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但和平之门毕竟还没有完全关死。当时，美国特使马歇尔仍在中国各地穿梭调处国共矛盾，一些中间人士也在国共之间穿针引线，希望国共不要完全破裂。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的：“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假如只根据我们共产党的了解，认为与蒋介石和不可能，与美国和不可能，因而就决定不和政策，那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①这就决定了“五四指示”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一个过渡性质的土地纲领。

一些论著认为，“五四指示”具有某些不彻底性，如未能明确宣布废除土地制度，对中小地主、富农照顾过多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指示”确有它不彻底的一面。但如果考虑它出台的具体历史条件，就不难发现这种“不彻底性”在当时其实是必要的。如果“彻底”了，反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虽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方针，但对承载这种剥削制度的地主阶级，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本人曾在抗战中参加过统一战线，并作为“三三制”政权的参与者，进入了抗日民主政权；或其子女成为党和军队的干部而成为抗日军干属。因此，对地主阶级中的这部分人给予适当的照顾也是必要的。至于“五四指示”对中小地主的照顾，也主要是在于孤立极少数的汉奸、豪绅和恶霸，避免树敌太多。

“五四指示”制订者们，当时就有意识在保留这种“不彻底性”。“五四指示”指出：农民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方式取得土地，“和内战时期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大不相同”，它对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虽然“有重要的改变”，但并“不是全部改变，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这就是说，‘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虽然是要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普遍地变更土地关系，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解决的方式除对大汉奸的土地直接没收分配外，一般并不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样直接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就说明，‘五四指示’所主张的是一种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是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向彻底的土地改革转变的一个过渡性政策”。正是由于“五四指示”的过渡性，使得它有利于统一全党的认识，说服民主人士，争取社会舆论，组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第二章　运动的展开

第一节　贯彻"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各级干部学习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并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文件，推动土地改革的进行。

1946年6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召开土地会议。会议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主持，刚刚从延安返回的薄一波传达了"五四指示"的精神，提出了贯彻执行"五四指示"的具体意见。会议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以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方式，使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解放区的腹心地区，要在七、八、九三个月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在边沿区，集中力量斗争汉奸、恶霸，坚决打击"还乡团"，将汉奸、恶霸、"还乡团"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发动民兵和游击武装，一手拿枪，一手搞反奸清算斗争；既要坚决地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又要团结中农，同时注意不侵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会上，邓小平、刘伯承都指出：内战的危险已十分严重，必须作好一切准备，对付全面内战。要坚决地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尽快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取得广大农民群众对自卫战争的支援。

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采取政府自上而下给群众撑腰和群众自下而上串连酝酿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出题目做文章"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财产搞出来。不论在新区还是老区，农民经过短期的动员发动后，组织"调查委员会"、"翻身委员会"、"评议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等，自己开会划阶级，进行清算斗争。

邯郸土地会议后，晋冀鲁豫中央局下辖的冀鲁豫区党委要求全区各地坚决贯彻"五四指示"和中央局土地会议精神，争取在六个月内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老区则以生产运动为中心，在少数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地区，抓紧生产空隙继续进行查减。6月15日，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再次指示》，对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一）没收大汉奸的财产，除留一部分维持其家庭生活外，分配给复员、退伍、荣誉军人，贫苦军属、工属和贫苦群众；（二）恶霸、地主非法所得及其非法行为使群众遭受的一切损失，应予清算和赔偿；（三）依政府减租减息法令规定的租额与年限彻底减租，其超经济额外剥削应予清算；（四）1912年以后成立的租佃契约，

从契约成立之日起，按政府减息法令予以清算；（五）地主隐瞒的黑地或为逃避负担假卖、假当的土地一经查出，按原有地总数计算，追交其历年所欠的全部负担，并依情节轻重给以一至十倍的处罚；（六）豪绅地主灾荒期间以贱价取得群众之土地，准予群众赎回。

晋冀鲁豫中央局所辖的中共太岳区党委亦于7月12日至8月28日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根据"五四指示"和中央局邯郸会议精神，结合太岳区的实际，提出了"统一思想，集中力量，继续贯彻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反复查减，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方针，要求在土地改革中一定要放手大胆，走群众路线，动员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这次会议确定：在老区已经基本上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区，巩固农民的地权，发展生产，消灭空白区；在群众发动尚不充分的地区，继续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根据群众的觉悟与要求，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在新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反复查减。在边沿区，主要开展反屠杀、抓丁、抢粮、支差、苛捐杂税、贪污、霸占、"兵农合一"等，以解救群众，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太岳区党委还就土地改革中的如何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照顾抗日军人和干部家属，以及对封建剥削阶级中的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政策等，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

6月25日，中共晋绥分局转发了"五四指示"，并通知各级党委，要把迅速实现农村土地改革，作为党在目前最基本的任务和当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去抓。

6月19日至7月22日，中共晋绥分局在兴县召开高干会议，研究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工作。贺龙在会上作了《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将建设人民军队、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开源节流解决财政问题，作为晋绥边区的主要任务。贺龙指出："土改是党在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只要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就会起来，蒋介石打我们五年、十年、一百年也不怕。"

晋绥高干会议认为，1943年以来，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获得了很大成绩，老区有80%的农民基本上获得了土地，不少地区群众运动已有基础；在反攻后新收复的地区，大部分已经普遍进行了反奸清算斗争，其中一部分地区已展开了减租运动，群众亦已开始发动。会议要求把"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使农民获得土地翻身发财，发展生产，解决（边区）五百万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作为中心工作之一。会议同时认为，在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斗争中，也存在着政策思想不明确，错误地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因而阻碍了群众自觉性的增长，形成了土地改革的程度与群众发动的程度不一致。为此，中共晋绥分局要求充分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认真接受经验教训，把全边区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深入进行土地改革。

高干会议之后，中共晋绥分局派出工作组奔赴边区各县，选择不同类型的有代表性的区、村，进行阶级关系和土地情况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中共晋绥分局研究室于9月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这是晋绥解放区土地改革历史上一份重要的

文献。

《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一开头就强调正确划分阶级成分的重要性，并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在执行政策当中，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中农利益和过分的伤害富农利益的错误。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同志不了解党的阶级政策，或者认识得不明确；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很多同志不懂得怎样划分阶级成分，把中农划成富农，把富农划成地主，搞错了的也不少。"针对这一情况，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划分阶级第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根据剥削关系和剥削的性质。"文件根据山西农村的特点和抗日战争以来边区阶级关系的变化情况，依据调查的数据、例证，作出了划分农村各阶级的具体标准，并举出实例进行说明。对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时容易弄错的经营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地主兼商人的区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五四指示"下达后，在晋绥边区的新收复区，地主由于害怕农民斗争，常常采用各种各样的应付办法，如地主们联合起来向公家人（干部）献出坏地保留好地，"或者轻轻屈服，满口应承，或者表面分地，实际原封不动"。在这种表象之下，一些干部便认为地主已经"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或者说地主"不敢应战"、"不敢硬战"，于是"草草把土地接受过来，或者形式分地了事，而忽视群众的发动和教育"。晋绥边区的老解放区则经过多年的减租减息，地主的土地已基本转移到农民手中，但仍有20%左右的农民缺地或缺少好地，因而迫切要求土地或增加好地。然而，老解放区的农民仍习惯于用买卖的方式取得土地，而不懂得土地可以通过无代价的方式获取。这样，老解放区虽然许多地方已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但各县仍存在若干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的空白村。即使已经解决土地问题的村子，无地缺地的农民虽是少数，但缺少好地而又要求有好地的翻身农民占大多数。

针对这种情况，10月26日，中共晋绥分局又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补充指示》(以下简称《补充指示》)。《补充指示》指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其目的在于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之乐于并敢于积极起来在我党的领导下，坚决进行革命斗争。""不管新区和老区，要教育所有干部了解：封建地主的统治，是根深蒂固的，对于他们，不能有丝毫的轻敌观念；农民受封建制度的麻痹，也是长期的，不能看得过于轻易。必须明确了解，一切为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作法是不对的，一切只见于干部活动，不见群众运动，强迫包办的、恩赐的做法都必须避免。"

《补充指示》对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作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规定：

对于有动产（如有银洋商业等）的地主，留给相当于中农的土地，家无动产者，留给较多于中农的土地；是抗属烈属干属的地主及开明地主，可酌量留到多于普通地主半倍至一倍的土地。老区过去的土地转移，多采用买卖的方式，地主出卖了土地，保存不动产，以后又逐渐积蓄动产，这就增加了农民斗争地主的要求，但如果再向地主斗底财元宝，只有逼死或逼跑他们，因此，对于地主的积蓄，只能采取诱导奖励的办法，使之投资生产；地主的工商业，则应予保留。

对于旧富农，要注意区分勤劳起家与靠剥削起家二者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前者，除了封建部分由政府平价征购分给农民外，其余部分不动。富农的成分，应依目前的经济状况来定，对于已经缩小下降的富农，经济上不能再按其旧成分对待。

土地主要是分配给抗属、烈属、干属、复员军人及无地少地的农民，使他们能够满足土地要求。在分配上应尽可能不完全打乱，可采取抽肥搭瘦、抽多补少的方式，以村为单位进行调剂。在分配时，中农也应尽量使之得到一些利益。干部及积极分子不能多分，要让他们懂得真正为农民服务，以免脱离群众。现役正规军人，可给本人分配一个半人的土地，以鼓励前线战士奋勇杀敌；作战中牺牲了的正规军人、游击队员、民兵及干部，仍旧作为人口，分得一份土地，以示对遗族的抚恤。贫苦的旧军、伪军家属应得到和普通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并向其家属说明，如果本人回家也分得土地。

《补充指示》结合"五四指示"的精神，针对晋绥边区的具体实际，为晋绥土地改革的展开作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规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7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传达与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决定》，要求全区分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和边沿区，根据不同的情况贯彻"五四指示"。

该文件规定，在面积和人口均占全区半数的新解放区，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有计划地消灭封建剥削，把地主土地转移给农民。在斗争中要特别注意团结大多数，将斗争的火力集中在汉奸、大地主、豪绅、恶霸身上。

老解放区因为土地已经大量分散，中农比重激增，农民的生活已有相当改善，这些地区解决土地问题的重点，是确定租种和典当地主土地的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对抗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富农，必须将之看作基本群众，不得调剂其土地，或用其他任何方法侵占其财产。对待中小地主，在斗争方法上，应采取调解、仲裁、农民与地主公开谈判等方式，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农民，以免过大地引起社会波动，妨碍大生产运动的进行。对于极少数顽固不化的大地主，应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使之就范。

该文件同时规定，在边沿区的一些地区，如果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敌我斗争不尖锐，应进行减租减息，经过反对汉奸、豪绅、恶霸的斗争，使一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但在国民党兵力强，统治时间久，而人民政权新近建立且不巩固的地区，则不但不能执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就是减租减息也应慎重进行。边沿区的群众斗争应以反对国民党军队烧杀、勒索为主，重点打击汉奸、豪绅、恶霸，以免树敌太多，使群众遭受过重摧残。

晋察冀中央局在这个决定中，还就族田、教堂土地等十二个具体问题如何解决，提出了原则意见。

"五四指示"下达后，中共中央华东局于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召开地委书记、军分区以上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五四指示"精神。

由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徐州小组在外，副书记黎玉在延安开会未回，会议由华东局副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主持。会议认为，不能把"五四指示"决定实现耕者有其田，与此前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对立起来，二者都是正确的。前者是后者在执行中的发展与提高，没有减租减息的政策，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要防止对"五四指示"作断章取义的理解，不能只赞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而忽视各种必要的照顾；也不能只强调“五四指示”规定的照顾情况，而不坚决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必须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在会议结束时，陈毅作了《如何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的长篇总结。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实现耕者有其田政策的重大意义，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坚决地吸收中农参加，而决不可侵犯中农利益，决不能把对农村封建势力的斗争方式，搬到城市里用以对待资产阶级，而应对其采取保护的政策。陈毅号召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在 1946 年秋冬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

随后，山东解放区的各战略区都相继召开地委、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五四指示”，部署本地区的土地改革。例如，鲁中区党委在博山召开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选择莱芜的口镇、大王庄，沂源的鲁村、北麻，沂北的杨家城子，泰宁的楼德、东良庄等村庄，作为土地改革试点，以便积累经验，逐步推广。

正当“五四指示”传达到山东各地之际，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当时，山东各级党委和政府，不得不将中心工作放在组织参军、参战和夏收夏种上，对于土地改革工作仅限于试点和干部培训，到 1946 年七八月份，山东解放区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才陆续展开。

8 月 8 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黎玉和张云逸，要求山东解放区加快土地改革步伐。8 月下旬，华东局在各地土地改革试点取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召开土地会议，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制订了《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并于 9 月 1 日发给各地执行（故该指示又简称为“九一指示”）。

“九一指示”指出，应通过没收敌伪和大汉奸土地及大汉奸的黑地和霸占的土地，清算地主阶级在抗战期间所欠农民的负担、劳役、侵吞、敲诈，动员和鼓励抗工属与中小地主献田，以及对于地主超过一定数额的土地由政府征购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

“九一指示”规定，以一村或数村为单位，组织土地分配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的步骤为：第一步进行人口、土地登记；第二步，根据不同的对象，决定取得土地的不同办法，将应拿出的全部土地，一律交土地分配委员会分配；第三步，由土地分配委员会评定土地等级，确定具体分配办法，召开村民大会公布并组织讨论；第四步，复查出榜，将土地分配情况张榜公布，征求村民意见；第五步，确定地权，烧毁老契，重立新契；最后是召开庆祝大会，动员群众保卫胜利果实。

“九一指示”还对分得土地的对象和对各色人等的照顾，作了具体的规定。如地主拿出来的土地，首先必须分给无地及少地的雇农、贫农和中农，以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对于革命战士及抗工烈属、荣誉军人与复退员军人及其家属，除应按人口分得土地一份外，还应得到较近较好的土地；土地改革中不能清算中农，决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中小地主可留下比中农多半倍的土地；等等。对于各色人等照顾的内容，在后来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曾引起不同的看法。

根据“九一指示”，山东省政府于 10 月 10 日颁布有关土地改革的布告，强调要“扶持与满足农民的正当要求，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为农民所有，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达到我山东解

放区人人丰衣足食，并进而繁荣工商业，以顺利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成为山东民主政府当前最基本的政策之一”。

5月24日，参与“五四指示”制订的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一回到华中解放区的首府淮安，就立即召开华中分局委员会及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五四指示”精神，部署华中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5月28日，华中分局发出《关于贯彻党中央“五四”关于土地政策新决定的指示》，要求“取消解放区内残存的封建土地占有制，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用一切方法使广大农民能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上解放出来”。

华中分局提出，根据华中各地的情形，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应执行如下办法：(一) 毫不犹豫地没收和分配大汉奸用地；(二) 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允许地主以土地抵偿债务；(三) 发动农民与地主清算旧账，目的在于算出地主阶级的土地，对象是汉奸、豪绅、恶霸、地主及高利贷主，清算的内容主要是算利息、算剥削、算负担、算霸占、算敲诈、算侵吞，清算后一律以土地抵还；(四) 赞扬地主献田给农民；(五) 边沿区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鼓励农民赎田买田；(六) 清查地主瞒报的土地分给农民。

华中分局要求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中，必须严格掌握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并给一切应当照顾的人以必要的照顾，如没收和清算得来的土地，应当首先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尤其是贫苦的抗属、烈属、干属及复员军人；绝对不可侵犯中农利益，不能对中农算旧账；一般不变动富农自耕的土地，如群众要求与富农斗争，而不得不侵犯富农利益时，也不能打击过重，只清算其封建剥削部分等。

一个月后，华中分局又就土地问题致信各级党委，进一步规定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做到“人人有田耕，人人得其平”。6月30日，华中分局再次发出《关于在紧张的战争动员情况下，抓紧时间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指出：“无论战争动员如何紧张，决不应放松土地改革。”

在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之前，东北局就根据东北地区的特点，于3月20日作出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肃清敌伪残余势力与遗毒，为了适应农民要求，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迅速进行春耕，以保证东北人民有充足的粮食与发展东北的经济建设起见，除普遍彻底进行二五减租，改上缴租为下缴租，废除押租制，实行减息为一半外，必须将过去日伪所集中之土地立即妥善处理，使农民有地可耕。”

《关于处理日伪土地问题的指示》规定：所有东北境内的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开拓地和满拓地是伪满时期由伪满“开拓总局”和“满洲拓殖会社”用强制手段从中国农民手中低价购进的土地）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产，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有，以利耕种，以增民食，并免至荒芜。上述被分配之土地如有纠纷时，应由当地民主政府召集当地人民及有关方面合理解决。对于被没收土地的汉奸家属之未助敌作恶者，或曾当汉奸而确已悔过自新者，应在人民群众同意下，酌量分配或留给一定数量之土地耕种，以维持其生活。

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后，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发表《解决土地问题是

深入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的社论，其要点是：

（一）放手解决土地问题，是目前发动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我们党必须坚决地拥护农民获得土地这一要求，不仅要减租减息，尤其要坚决地分配敌伪及汉奸之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二）在运动中，不仅要使贫雇农、贫民积极参加，而且要用一切方法使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

（三）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佃富农如所耕地全部为满拓地或大汉奸之土地，在分配土地时，也必须分得一份。

（四）凡是尚未发动分配敌伪汉奸土地的地方，应迅速发动群众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决不能再有什么迟疑和犹豫的现象。应该做到在最短的时期内，认真发动群众，完成上述任务。

（五）分配土地必须把握下列两个原则：第一是最多数的贫苦农民多得利益；第二是能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政权，发展农民自卫武装。

"五四指示"传达到东北解放区之际，正值国民党调集大军向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本溪、四平街等地大举进攻，并先后侵占了长春、四平街、吉林（市）等地，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被迫撤退到松花江北岸，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解放区还没有可能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国民党军队占领松花江以南的地区后，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继续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有困难，不得不于6月6日与中共方面达成暂时休战15天的协议（休战协议后来延长到月底）。在此后近四个月的时间，东北的局势相对平静。东北各级党组织利用这段时间，加紧开展巩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7月初，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统一思想认识。7月7日，会议讨论并发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与任务决议》（简称"七七决议"）。

"七七决议"指出：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必须加以肃清。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并使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迅速普遍执行。只要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了，并积极参加自卫战争，我们就能建立不可战胜的阵地。

"七七决议"要求东北全党全军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共产党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七七决议"号召各级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鼓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7月11日，《东北日报》发表《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社论，号召干部下乡，发

动农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会议之后，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分头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7月13日，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专程从哈尔滨赶到齐齐哈尔，参加西满分局会议，传达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陈云在讲话中强调："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干部下乡。不分男女、新老及哪一级干部，都要下去。军队每个团都要抽三分之一指战员下乡。要当参谋，参群众之谋。城市、机关、学校工作都可放松一点，受些损失都可以。乡村工作的比重应占全部工作的百分之八十。"陈云还号召广大干部深入到群众斗争中去上大课，"不论是中央委员还是区委委员，都是群众一级的干部，大官要做小事"。

一个星期后，西满分局作出了《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决定动员80%—90%的干部，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进行改天换地的土地斗争，以实现农民的土地要求，取得土地，取得武装，取得政权。《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规定：紧紧依靠贫雇农，斗争策略应该集中火力对准汉奸大地主恶霸，向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对于富农一般不侵犯其利益，团结中农，决不可侵犯中农利益，将开拓地、满拓地及敌伪政府军队会社、汉奸恶霸、军阀、官僚、外籍逃亡地主、匪首窝主的地产以及其他地主"自动"交出或群众要求交出的地产，以自然村（屯）或行政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工作方法上，必须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反对"清官断"的包办恩赐办法，集中力量选择重点，创造典型，"使农民翻身的土地斗争，成为广泛的轰轰烈烈的大运动"。

8月23日，东北局又作出《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制订了分地斗争中对各阶层的具体政策：

大汉奸、大地主、恶霸、顽匪头，是农村的封建堡垒，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社会基础，必须发动群众，集中火力，首先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分配其土地，甚至可没收其财产。但对其家属仍应按普通农民留下一份土地。

对一般中小地主，可经过群众酝酿，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使其拿出土地。并且允许他保留的土地可多于普通农民的一倍。

对一般地主经营工业、商业不侵犯。而对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附属财产除酌予保留一份外，均应分配。

对经营地主……应酌量分配其一部分土地、耕畜，但仍保持其当地一般富农的地位。

对富农除分配其出租土地外，不得侵犯其利益。

对中农应用一切办法，吸收其参加斗争，给他分配清算斗争的果实。

雇农和贫农是斗争的先锋与骨干，必须把他们充分地发动起来，才能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总之，我们的政策是：使得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大汉奸、恶霸、土匪头子。

为贯彻执行“五四指示”，各解放区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召开各种会议，传达指示精神，进行组织动员，作出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规定，从而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迅速推进。

第二节　动员组织群众

“五四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派出大量的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农民当中，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被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村，迅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改”、“翻身”成为那个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口号。

虽然在“五四指示”之前，冀鲁豫边区的农民通过查减（检查减租减息，主要在老区）和反奸清算（主要在新区）等方式，取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但由于“五四指示”明确提出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公开表示要满足广大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情。仅湖西地区的鱼台县，湖西地委和鱼台县委共抽调了573名干部，结合区乡干部成立了68个工作组，每相隔三至五里就有一个工作组，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冀鲁豫各地在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时，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一）建立健全领导土地改革的群众组织。没有组织农会的地方先以行政村为单位，以贫雇农为骨干，普遍建立农会，并吸收中农参加；已建立农会的地方，则根据农会的组成成分和表现，或充实、改组农会，或将原农会宣布解散后重新组织农会。由农会具体领导土地改革斗争，在农会的领导下建立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和模范班等其他群众组织。（二）对党员、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土地改革训练，进行“贫下中农与地主到底谁养活谁”，“没收地主土地，实现土地还家是不是合理”的翻身道理大讨论，增强斗争必胜的信心。仅筑先一县受训人员即达4万人。（三）区、村层层召开农民大会。首先以区为单位召开农民万人大会，会前选好的苦主带头诉苦，从而激发到会群众纷纷要求诉苦。就在这群众激愤，一致要求报仇雪恨的口号声中，宣布对全区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予以镇压。在全区群众大会后，再由土改工作队深入各村进行发动。

“五四指示”传达到太行山区后，太行区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学习指示精神，部署全区土地改革工作。仅在1946年7月，全区就组织有1700人参加的翻身队，分赴农村帮助群众翻身。太岳区党委要求全区专区一级各系统集中50%至60%的干部，县区除农会的全体干部外，政府、武委会、公安局等集中70%的干部，在统一领导下，投入土地改革运动，利用一夏一冬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

晋察冀中央局下属的冀晋区党委在1946年8月全区土地会议后，各地先后在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传达与动员，陆续开办了大批的区村干部训练班，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武委会及治安部门，都必须以2/3的力量投入土地改革工作。此外，区党委还组织了3个共约300人的大型工作队，分赴各地帮助进行土地改革。

东北局作出“七七决议”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各地共有1.2万名干部下乡，解放区的大部分县份都组织了工作团。如黑龙江省委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作出四项决定：一、采取“剥笋政策”，先搞大的封建堡垒，在政治经济上搞垮封建统治，满足农民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把清算与解决土地问题结合起来，用清算的办法达到土地还家的目的。三、反对“清官断”，克服包办的做法和恩赐的观点，真正走群众路线。四、采取“蝗蝻”政策，以老干部带领土改积极分子，滚雪球式地组织工作团，集中力量，创造典型，取得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全省抽调了1000余名干部，由省、地负责干部带队下乡。嫩江省的四个地委也派出了800多名干部。合江省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达到1500人。

虽然得到土地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要让他们一下子面对面地与地主进行斗争，又难免有种种顾虑。

吉林省磐石县大榆树屯的农民，在民主政府公布了分配敌伪土地的法令后，开始都有些将信将疑，他们说：

“不要花一个钱就可分得土地，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便宜事，一定不是真的。”

“大约是公家自己种不了，才暂时分给老百姓。”

更有些坏分子故意造谣迷惑群众：“这就是施行‘共产’，分了公地还要分私地！”还有的说：“共产党是先甜后苦，现在是先分土地，将来就要‘出荷，出劳工，要受种种限制。”

土地改革发动之初，山东解放区黄县（1986年撤销，改设龙口市）广大贫苦农民普遍存在两种思想顾虑：一种是由于旧观念的影响，存有向地主要地不合情理、不好意思的想法。有的群众说：“向地主要地，把人家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地是应该要回来的，可是老街旧邻怪不好意思的。”另一种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存在怕“变天”的思想。如有的贫苦农民说：“把地要回来，国民党来了怎么办?”

冀中区九地委在一份文件中说：“因耕者有其田是一新的工作，群、干对此多很模糊。不少的人认为是平均地权，致使富农恐怖，中农怀疑，贫苦群众也存在‘正统’与‘变天’思想，如有的说：‘人家的肉安在自己身上长不住，穷富在命’，‘斗争了人家，国民党过来了呛不住了’。”

怕“变天”是解放区农民普遍存在的心态。各解放区都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的发展而来的，解放区的人民受尽了日本人和汉奸的蹂躏，日本投降后，发动农民反奸清算比较容易，但群众对国民党的仇恨就没有那么强烈，而且内战开始后，一般的群众认为国民党的力量大，担心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现在跟着共产党分地主的土地，万一将来国民党来了为地主撑腰怎么办？农民怕“变天”，不是认为共产党不好，而是担心解放区变成国民党的天下。

由此可见，土地改革运动能否成功，首先在于能否把农民发动起来。

1946年5月26日，一支由松江省宾县县委书记马斌亲任队长、14名工作队员组成的民运工作队，来到了位于哈长线上、松花江北岸的陶赖昭屯。这里照本地干部说法，是陶赖昭地区的封建堡垒，反动派活动最厉害。

工作队到了陶赖昭后，乡长本打算将工作队安排在当地一个大粮户（东北方言，粮户即地主）家住下，但工作队没有同意，理由是住在大粮户家不便开会，也脱离群众，最后决定住在乡公所旁的一个古庙里。

傍晚，干部分散到群众家访问，打算从群众个别谈话中了解情况，发现积极分子。但是由于反动地主造谣威胁，有的基本群众随着粮户的车马跑了。街上见不着车马，见不着青年人，各围墙门口站着三四个老头、老太婆和小孩子，最奇怪的是在十字路口，总有老头子拿着树棍子踱来踱去。后来知道那是粮户放的游动哨。

天黑之际，分散下去的干部相继回来，大家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屯土地在200垧以上的地主和100垧以上的地主各有5户，全屯共500多户人家，其中有400多户属于赤贫，即卖工夫扛活的人，而来时村长说，全屯只有2户土地在200垧以上，3户在100垧以上。

马斌当晚确定，第二天第一个任务就是稳定基本群众，告诉他们不要跑，解释共产党的部队不抓夫，出勤务政府给工价；第二个任务是各组联合卖工夫扛活的及租种粮户土地的小户分组开会，研究群众要求，提出口号及确定斗争对象；第三天组织大会，布置斗争；第四天开斗争会。

可是，第二天工作队干部再去找基本群众时，青年更少了，昨天同工作队谈过话的也走了，工作队后边跟着地主派来的老头子，监视和威胁基本群众，使其不敢接近工作队，工作队干部情绪大受打击。工作队考虑到，如果由自己通知基本群众开会，易使积极分子孤立，乃决定通过乡政府通知一切卖工夫扛活的、租种土地的农民来开会。

尽管如此，群众还是顾虑重重，到会，的群众不足40人，而且来的尽是老头子、老太婆、残疾人及要饭的。这样一来，工作队员的情绪更受打击，大家觉得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也从未遇到过这种局面。那么，这个会还开不开呢？大家觉得，会还是应当开，来的毕竟是基本群众，他们自然有其痛苦和要求，通过他们可以宣传工作队的意见。

会上，干部问："今天开会的是什么人，有有钱的没有？"

会场上个别人说："没有！"

"那么这天开的是个穷棒子会。"干部又问："穷棒子在'满洲国'的时候能不能开会？"

还是个别人回答说："不能开。"也有人说："以前都是有钱人开会，他们说了算，我们穷棒子算啥！"

听了这话，干部们开始有了些信心。于是就说到过去有钱人开会讨论的是"出荷"、劳工、献纳，今天开会是说穷人的痛苦和要求。讲到这时，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便你一言，我一语，他们自己说开了。

此时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于是，干部有意将话题转到积谷的问题上。在伪满时期，这里曾设有义仓，由种地人出谷，年年累积，以防灾荒。陶赖昭屯共有积谷27万多斤。在伪满时期，穷人不分昼夜，不论风霜雨雪都要轮流为义仓打更，为的是饥荒时能吃义仓的积谷。可是，日本投降后，村里的警察署长

摇身一变成了维持会会长，他和粮户们合谋，除二成作维持会办公费用外，其余的粮食被地主和部分中农分掉了，穷人们白辛苦了一场。

工作队干部抓住这个件事问开会的群众："这个粮食是谁的呢？"群众说："是国家的，我们不吃给国家也甘愿，不能给粮户。"

干部又问："现在给谁拉去了？"

群众答："大户拉去了。"

"穷人拉了没有？"

"一粒也没有拿到。"

"该不该要？"

"看官家意思。"

"官家要看老百姓的意思，你们说啥算啥。"

"那也不能不讲理呀。"

干部又问群众，粮食是国家的，为什么粮户们能私分，为什么给饱人不给饿人，为什么一定要打更却得不到粮食？最后，干部对群众说："粮食该要不该要？"群众说："该要！"又问："敢不敢要？"群众异口同声地说："敢要！""什么时候要？""现在就要！"见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工作队就要求来开会的群众明天再邀些人，带着口袋来。

当天夜里，工作队决定全体队员分散住到基本群众家里开展发动工作，并立即逮捕和镇压坏人，首先将曾当过伪警察和伪村长助理的副区长逮捕，使老百姓相信现在的政府是真正为穷人撑腰的政府。

工作队来的第三天，即5月28日，这天正好是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早就来了一百多号人，但依然是以老头子、老太婆、小孩子为多，青壮年只来了二十来个，不过毕竟比第一次开会的人来得多得多。这次群众是想看看是不是真正能分到粮食。

会上，有三个寡妇诉说屯长是如何吓唬她们丈夫出劳工，结果把人命送了，其他人也说了一些摊派不公的事，群众的情绪比头一天开会高了许多。接着，来开会的群众提出要去取粮，可义仓的粮都被粮户们分了，到哪里去取呢？事先工作队对到义仓拉粮的粮户的情况作了了解。拉了粮的一百多户中，有不少是中农，工作队考虑到中农的粮可不退，确定只斗少数几家大户。开始，群众对到大户家取粮有顾虑，他们对工作队说："由你们民主联军通知一下送来就成。"工作队干部说："通知不会送来，他会说没有车拉。"有人说："拿着口袋到人家去不像样。"工作队说："去了顺便就背回去，这才切实。"群众还是不敢去，最后商量的结果是由积极分子带着大家先到一家去拉，一家拉了，其他的人才会给。

到谁家好呢，大家决定到既是屯长又是粮户的吴国顺家去。到了吴家门口，吴国顺不让进院门，群众就一面交涉一面挤了进去，然后每人分了一斗粮食。就这样，陶赖昭屯的群众被发动起来，并由到粮户家取粮发展到反奸清算。

马斌原为松江军区政治部的民运部长，先后调任宾县县委书记、哈东地委书记。当时，北满分局的负责人帮助宾县总结了一套发动群众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还写了题为《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的社论，登载在《东北日报》上。马斌工作队的特点是，每

到一处，都住在赤贫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关心群众疾苦，群众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他们真正是一个屯一个屯地做工作，并把在工作中发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到新区去开辟工作。这样一来，很快就发展到一大片。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很赞赏这种做法，在号召广大干部下乡开展工作时，曾形象地把这种集中使用干部，组织工作队一片一片开辟工作的做法称为“蝗虫政策”。

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中认识到：“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穷根吐苦水算总账是翻心的主要问题。”因此，发动和动员群众是土改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而诉苦算账又是发动群众最常用的方法。

1946 年 5 月中旬，“五四指示”刚刚传达到太岳区不久，晋城县的三区就在坪头村召开了 1000 多人参加的诉苦大会，到会的有债户、佃户、雇工、羊工、贫苦妇女等，多半是过去斗争中的带头人，其中有些是村干部。大会开了 5 天，有 721 人诉苦、找穷根，经过这次大会，群众觉悟与斗争决心有很大提高。

据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在诉苦大会上：

幸壁小组李商保老汉一家三口，哭诉地主把自己财产剥削尽净，害得全家无家可归时，全组下泪；雇工赵全正就想起了自己过去受剥削欺侮的苦境，一夜没睡觉，清早在被子里大哭起来。刘村妇女常银兰诉说地主陈祖秉向她收租，把她赶出自己的家门，大冬天在庙里受冻，卖掉亲生儿子。瘦能村周保兴诉说他爹在宁夏当铜匠，起五更睡半夜干了二十多年，不够债主周士和的利钱，当初借周士和不过五元银洋，结果把家产卖光，又卖了妹子来还账！坪水村王水和他娘（一个穷老太太）本是来听会，也随着呜咽着诉起自己的苦来。

为使诉苦的人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痛苦的根源是封建剥削，领导上进行了及时的启发，让大家展开讨论。比如马坪头村李海水，当过十六年长工，他觉得这是‘命’，并以为地主还不错，曾给他娶了个媳妇。领导上提出“为什么人家给他娶媳妇”的问题，大家根据事实热烈争论起来，最后李海水恍然大悟：人家不是为他娶媳妇，而是要用个老妈子和做饭的！同时也拿这拴住了他，让他死心受一辈子！

冀中区的宁晋县发动群众诉苦时，从小组诉苦开始，一直诉到农民大会，并在各色各样的会议上诉苦。通过诉苦，群众“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经过诉苦群众的情绪高起来，斗争自然易于掀起”。

第三节　清算、献田、征购

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那么，田从哪里来？“五四指示”后的土地改革中，各解放区除了没收大汉奸和恶霸地主的土地外，主要是采取清算、征购和地主献田等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中，清算是最普遍的方式。

采取清算的办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即利用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如大斗进小斗出），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担负（如应由地主担负之地亩捐，转嫁于农民担负），清算霸占吞蚀，清算人权污辱（如地主强奸和霸占农民妻女）等种种方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欠债、交纳罚款、退回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里，折算或出卖到农民手里。5月19日，中共中央情报部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中，介绍了关内各解放区开展清算运动的经验，并且认为：“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

清算的具体做法，“是发动农民同地主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一条一条地摆出地主经济上剥削农民、政治上压迫农民、人格上侮辱农民的事实，使地主低头认罪，不得不拿出土地，而农民则处于合理合法的位置上，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地收回土地。清算，在形式上是有偿的交换，而实质上是在对封建地主的揭露和控诉的基础上，发动农民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

“五四指示”之前，太岳区就已经运用清算的办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该区晋城县天水岭村，以前有七户当权的恶霸地主，以赵敬文与赵凤岐为首，组成一个叫“同太会”的高利贷集团，以贪污所得的粮食做资本，放粮食账。春放秋收，利钱是“一加三”，灾荒年达到“一加五”。每年往回收粮时，打锣下令，一律交齐，最宽的期限为三天。三天期限一满，就算农民天亮鸡叫时交齐，也得加倍，群众称之为“鸡叫利”。

一个叫小根的贫苦农民，借了同太会三斗豆子，到了期限，粮食没干，交不了；连夜打下来弄干送去，恰好鸡叫，连本带利非加倍不可。小根再三哀求，同太会毫不宽容，他家赖以生活的四亩好地，就这样落入同太会之手。天水岭村的群众互相警告着：“宁可叫孩子瘦呀！不敢吃同太会的豆呀！”

1946年4月，上级派来了工作队，天水岭村开展了对恶霸地主的清算。在开始清算之前，工作队在村里召开诉苦大会。群众揭发了赵敬文当维持会长、帮敌作恶行凶、贪赃枉法、谋财逼命的各种劣迹和罪恶，直呼他为“总吃人虫”、“十六两”（罪状已够），一致要求政府枪毙他。并向其他六个地主一一询问：“毙他亏不亏？”地主们回答说：“不亏不亏！就是千刀万剐也便宜了他！”农民们查算了这七个地主应退应赔之数，七个债主都变成了债户。

冀南区鸡泽县的北风正村，共有210户，898人。其中地主18户，富农21户，共占全村总人口的26.25%，占有全村土地的52.5%；中农、贫雇农合计占全村人口的

73.73%，占有全村土地的47.5%。这个村以前为游击根据地，1944年解放后，曾通过减租清债、反贪污恶霸运动，有部分群众赎回了土地，使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有所削弱。土地改革开始时，这个村的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1.61亩，且是地质最好的土地，而雇农、贫农和中农人均只有土地3.4亩，且多是地质不好土地。因此，群众普遍要求彻底进行减租清算，解决土地问题。

1946年5月起，北风正村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开展清算运动。此次清算的内容是：没收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国民党特务、地主的土地财产；不法地主富农假当、假卖、逃避负担的土地，及他们吞没的公地、绝户地等；不法地主的黑地和负担不公、贪污、讹诈、欺压群众等问题；一般地主富农封建剥削的地租、工资、利息、劳役剥削等；赎回农民因灾荒、欺压被迫失掉的土地、房屋、牲畜等。

清算的做法是：对5户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国民党特务、地主，在经群众斗争后没收其土地财产，但给其家庭每人重新分配4亩多的土地，留给生活出路；对一般地主，只进行说理算账，按其家庭土地、财产及生活状况赔偿群众，算账后一般给予其留给人均6亩多的土地；对5户孤寡地主，群众没有算账，每户仍留有人均11.19亩的土地。对富农只算工资、利息，有其他非法损害群众利益者，只清算其封建剥削部分，保留其自耕部分，21户富农共被清算掉土地191亩，其中有87亩是卖出还账的。

通过清算，该村共算出土地1247.72亩，基本群众分得973.19亩，其中9户富裕中农得地13亩，失地12亩；86户中农得地301亩，失地50亩；6户贫苦中农得地25.7亩；60户贫农得地553.75亩；10户雇农得地99.52亩。清算之后，全村18户地主中除1户6口人有60多亩地外，其余的地主人均6.99亩，从数量上看比农民土地多，但其土地质量较差。旧富农人均土地6.66亩，较清算前减少了1.75亩；富裕中农人均土地6.657亩，比原来增加了0.016亩；中农人均5.624亩，比原来增加了0.79亩；贫农人均4.34亩，增加了2.25亩；雇农人均4.54亩，增加了4.33亩。

晋冀鲁豫解放区武安县（今武安市）自翻身大检查后，全县新区243个村16万群众，从8月起掀起大规模的清算运动。农民提出的口号是"和地主算总账，彻底翻身"。武安城南以算劳役血汗账（额外剥削）为主，城北以算对敌伪负担账为主，普遍展开清算。在农民的强大压力下，不少大地主不得不拿出土地财物偿还农民。

当群众起来后，地主惧怕斗争，纷纷要求自动交出土地，或请客赔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均提出要防止和平分地的倾向，对地主这种自动交出土地的态度，应采取明确的拒绝方针。中共黑龙江省工委认为，和平分地有如下坏处：

甲、增加农民对地主的幻想，且中地主奸计，只要有机会，地主即可将地收回。

乙、经过清算分地，农民是理直气壮的，地主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处处理亏，不杀他还算便宜，农民分得地是千该万该的；但地主自动交出，和平分掉，则是相反形势，农民占了地主便宜。

丙、不经斗争，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会下降，其罪恶不易全部暴露；其社会地位、伪君子身份不彻底打垮，不使一切人瞧不起他，则农民始终受着威胁。

丁、不经清算斗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仇恨不会明显，农民阶级觉悟不会提高，而只增加地主对共产党的仇恨（地主与农民都以为他们之间无大问题，是共产党来了，所以地主的地才保不住）。

戊、未经斗争，农民不易保住其已得利益。我们的策略是破产还债，土地搬家，并不提“分地”口号。在策略上，强调清算，避免土地革命式的“分地”，地主自动交出地，则易被敌人造谣说我“共产”。

因此，在农民未起来前，我们拒绝地主要求，而使农民检查搜集算账的材料，并在农民中揭破地主阴谋，在积极分子中鼓动不听谣言，不受骗，不吃地主请客饭，以防止地主活动。但对比较开明之地主（真正开明地主在黑省甚少），则在清算斗争中，多少给他留点面子，以便拉他一把。

黑龙江省工委根据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清算，破产还债”。大清算的内容，在经济方面以算“出荷”账、算出劳力账为主。伪满时候地主瞒地，黑地多，“出荷”粮都背在穷人身上。一算“出荷”账，地主没有不被算光的，再加以算劳工账、贪污勒索账，地主个个算得破产才能还上。在政治方面以算汉奸账、人命账为主，一算地主、汉奸害死多少人命，地主、汉奸分子没有不低头的。

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期，除了清算的方法地主拿出土地财物之外，还有一部分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主动献田，即将一部分或大部分土地交给民主政府分配给农民。

抗日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在政权建设上普遍实行“三三制”原则，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和参议会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开明绅士（拥护抗日的地主），有的还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职务，如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晋绥边区的刘少白担任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革命，经过几年的锻炼，他们中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各级干部。“五四指示”宣布在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后，一部分开明绅士主动献田，也有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劝说其家庭献出了部分土地。

“五四指示”传达后不久，苏皖解放区开明绅士及各级干部便开展了献田运动。苏北名绅、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邹鲁山首倡献田，自动献出110亩土地，分给无地贫民，仅留20亩作为家庭生活必需。淮宝县县长万立谷献田20亩，县委宣传干事佟陇余献田80亩，县仓库负责人高慈航献田100亩，南宁区区长万寿康献田2000亩。

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陈荫南也将其土地1135亩交给农会，分赠少地无地农民耕种。他在赠送土地时致函称：“我在边区工作与广大农民同胞相处八年，得一深刻认识：言抗日必须靠农民，言建国亦须靠农民，广大农民为我国革命之基本动力……应使无地或少地之农民获得土地，加紧生产，提高生产力与进一步提高生产情绪。”对陈荫南献田之举，华中《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予以称赞，认为“这是解放区的光荣”。

1946年7月下旬，时任晋察冀解放区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的阮慕韩（中共党员），协同叔父在其老家怀来县柴沟堡召集群众大会，当场宣布除留少部分自耕外，愿将全部土地3200亩无代价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晋察冀中央局为此致函阮慕韩予以奖贺。

继阮慕韩献田之后，宣化县县长李锋，也将祖田130余亩献出。宣化县一区区委书记冷天贵亦献田54亩。

据《东北日报》报道："继安东省副主席刘澜波之后，副主席吕其恩、实业厅长李大璋二氏说服家庭，献出祖田。李厅长于4月间即说服家庭献出220亩，7月又献出360亩。李厅长家有十几口人，不足700亩祖产，剩余几十亩由患肺病的一个残疾弟弟经营……吕副主席……最后下了决心全家12口人只留下48亩，把110亩亲手置下的良田献给县政府和县农会，委托他们去献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

"（安东）凤城城厢区的开明地主士绅，纷纷献田，拥护政协'耕者有其田'决议。截至8月27日，十天间献田的地主，计有省行政委员蔡贡之、省参议员鄂禹忱、县行政委员赫文博、翰墨村军属伊聚五及王贯一、佟关氏等40人，共献田20300亩零1分，另外献出房屋291间半，献田最多的为王贯一，计旱田1021亩，山地、山林、山场4968亩5分。"

其他各解放区也有一些开明绅士自动献田。据统计，到1946年8月，各解放区开明绅士等共献地33200余亩。

在一些开明绅士自动献田的同时，也有一些地主为了逃避群众的清算斗争，搞假"献田"。据1946年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冀南）故城县四区激村和五户村地主，在群众运动开始后，便秘密开会，假装'献田'，麻痹群众，以保持其统治地位，避免群众斗争。当他们'献田'以后，便造谣恐吓中农也来献田，说什么'每人平均超出三亩，不献便得挨斗争'，借此拉拢中农，破坏群众的团结。""元氏（县）在翻身大检查运动中，纪家庄封建地主纪群兴、恶霸地主纪明德和郑家仁也提出'献田'、'献粮'，以缓和群众斗争，还不断胡造谣言说：'谁有就斗谁。'至于许多中农心情不安，有五户中农也要献田。"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内战的全面升级，在国共两党的较量中，阶级营垒日益分明，献田的方式取得土地，不但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也容易模糊阶级界线，不能有效地动员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作斗争，故此后土地改革中不再采取献田的方式。

制订"五四指示"之时，中共中央曾设想用征购地主土地的方式，来完成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因为当时考虑到，仅用清算和少数开明绅士自动献田，远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采取无代价没收的办法又过于激烈，不但会引起地主阶级的反抗，造成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还会引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人士的恐慌，影响统一战线。用征购的办法既可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又能使各方均能接受。但由于全面内战很快爆发，客观上要求迅速完成土地改革，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已不可能靠和平的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用征购的办法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激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动员其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加之解放区财力有限，农民要支援战争，负担很重，农民在得到土地时不可能付出地价，民主政府也不可能有用于建立土地基金的专款。所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只有陕甘宁边区试行过这种办法。

陕甘宁边区采取征购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是由其特殊情况决定的。这里有一半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建立根据地，早已分配了土地，地主和旧富农已基本不存在。另一半地区虽未经土地革命，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已进行比较彻底的减租减息，地主

和旧富农的剥削受到了很大削弱。边区也未被日军占领过，不需要进行反奸清算。因此，陕甘宁边区决定以征购这种和缓的方式解决全区的土地问题。

1946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二次政府委员会会议作出决议："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以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亦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整理登记，将公地适当分配给无地和地少的农民，调解农民相互间的纠纷，确定地权。"

根据这一决议，边区政府于1946年12月26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要求"凡已彻底减租地区，应即遵照本条例草案实行，在查减尚不彻底的地区，亟须继续发动群众，普遍进行查租减租，在贯彻减租工作的基础之上，依据本条例草案进行征购地主土地，以期在明年春耕之前达成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的"。

关于征购的对象及地价的确定，《条例草案》规定：一般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的50%；在抗日战争及自卫战争中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的1倍。超过部分由政府征购，但地主自力耕种及富农的土地不得征购。征购地主的土地的地价，由当地乡政府协同乡农会及地主具体评定之。其评定标准，应按各地地价与土地质量之不同，最高不得超过该地平年两年收获量之总和，最低不得低于该地平年一年收获量。

关于土地的承购，《条例草案》规定：政府征购之土地，按征购原价之半数，分配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承购地价分十年付清，家境贫苦无力缴付者，经县政府呈请边区政府批准后，可予免付。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进行合理调剂，使每人所有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自耕地的贫苦佃农及雇农，家境贫苦的革命死难者遗族，现役军人的直系家属及复员退伍军人，有承购土地之优先权。以上人员每口承购的土地数，连他自己的土地，一共不得超过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

《条例草案》公布后，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庆阳、关中三个分区随即派出大批的干部，组成工作团，深人未经分配过土地的县、区、村开展土地征购试点。在绥德新店区的试点中，边区政府工作团首先将土地公债条例对群众广泛解释，继以乡农会为主，由村代表及公正人士（既不征购也不承购的农民），合组征购委员会，并邀地主评定超额土地的等级及地价。计上地每垧地价小米四斗五升，中地三斗，下地一斗五升，窑洞每孔一石五斗。征购土地后，地主家中每人所留土地，至少比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多半倍至一倍，最高为一倍至四倍，而其自力耕种的土地，则全部留给。通过征购，当地42%的农户获得了土地，计有225户，991人，承购土地1193垧，及土石窑27孔。

庆阳县王家村乡也通过试办土地公债，以每亩为该地一年至一年半的收获量的地价，共征购地主土地1900余亩，由68户无地及21户少地农民所承购，平均每人购得5—6亩地，地主每人留地至少9亩，仍超过当地中农土地的50%。

陕甘宁边区采用征购的办法，既照顾了地主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条例草案》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这样除了原佃户外，其他农民就难以承购到土地。此外，《条例草案》第三条第三款规定

"地主自力耕种之土地不得征购"，使得可供征购的土地有限，因而不能满足广大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对于这些问题，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很快就发觉了。1947年2月，边区政府公布修正后的《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取消了"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的条款，规定"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人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取消了地主自力耕种的土地不得征购的条文。

用征购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容易使农民错认为土地改革是政府的行为，得到土地是政府的"恩赐"，因而不积极主动地通过斗争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1947年1月27日，西北局在《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中，一方面认为"征购形式很好"，另一方面也指出："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质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如无深入的群众斗争，压倒地主，则地主不会交出土地。"西北局在另一份指示中，再次强调要将征购与群众诉苦清算斗争结合起来，认为诉苦诉得越深，群众就越能发动，觉悟就越加提高。西北局认为："征购本身就是一种群众斗争，在诉苦清算斗争中可同时提出征购，而征购中亦必有诉苦清算斗争。"

用征购地主土地的办法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认为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证明，这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

通报还认为，采用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的办法，如果与群众的诉苦清算运动相结合，不但不会减弱群众运动，而且使群众的清算更加站在合法地位，使群众感觉到有政府的法令保证而更敢于斗争，使地主感觉到非拿出全部余额土地不可。用清算、献地等办法，常不能把地主余额土地算完、献完，或献出坏地保留好地，如果再加以公债征购的办法，则地主无法保留多余的土地，且可使农民避免某些理由不充足的清算，使农民得到的土地更有合法的保证。采用这种办法，还可以解决有些不便清算的抗日地主、开明绅士的土地问题，用之处理外国教堂、外国侨民的土地及其他某些公地，可以避免一些外交纠纷。用这种方法在取得个别富农多余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时，比用清算的办法使富农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也能使土地改革增加一般的合法地位，减少中间派资产阶级的反对。而在土地改革时，地价大跌，公债偿还的时间又很长，故政府和农民全能负担得起。如果各解放区在利用清算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要办法的同时，再加一个由上而下的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来配合，就能发动群众，更能使土地问题迅速彻底而完全的解决。

1947年3月初，国民党集结了25万人的兵力，对陕北进行所谓的"重点进攻"，并于3月15日占据延安，陕甘宁边区顿时笼罩在一片战云之下，征购土地的工作也随之被迫停止。

第四节　翻身农民参军参战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后，各解放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至1947年春，全解放区约有2/3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另有1/3的地区由于战争环境，尚未进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农民的一次伟大的翻身运动。曾亲历过解放区土改的美国友人韩丁在他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的扉页中，曾写了这样一段话：

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这是对“翻身”作出的最精当解释，也是对土地改革意义的最好注解。

通过半年多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解放区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以冀东地区为例，经过清算复仇、减租减息运动，冀东农村的封建势力受到了相当的打击，部分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了一些土地，地主占有的土地开始分散。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冀东全区占农村10%的地主、富农，仍然占有全部土地的50%左右；占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雇农只全部占土地的50%。该区的平谷县（1958年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占总户数4.5%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土地的59.4%，而占总户数78.6%的贫雇农只占有全部土地的24.7%。昌黎县大摊村的地主赵子丰，一家占有土地7000亩，相当于全村贫雇农户均土地的150倍。

在贯彻“五四指示”期间，冀东解放区能够进行土地改革的8190个村庄中，有7096个村庄进行了土地改革，占86.64%，从11272户地主、17536户富农手中清算出土地1869524亩、粮食2258万斤、边币26500万元、房屋11531间、牲畜3177头及大批其他实物，有350万人口（占冀东解放区人口的80%）分到了胜利果实，其中分到土地的农民有170多万人，有150多万农民的土地占有量达到了中农水平。

至1946年12月，山东解放区约有1000万农民，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464万亩。其中渤海区至1947年4月，全区2万个村，即有1.6万多个村初步进行了土地改革，全区870万人口，约有200万农民，分得土地约200万亩。

晋察冀解放区的冀中中心地区，截至1947年1月，土地改革已大体完成，据高阳、

肃宁等37个县市统计，完成土地改革的村庄已达6287处，占全部村庄数的83%。据饶阳以村为单位统计，参加运动户数最高者占总户数的97%，最低者占89%。据安国、饶阳、河间等17个县的统计，共有555659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

到1947年1月，晋绥解放区占全部人口1/3的近百万贫苦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已获得土地300余万亩，其中老解放区农民41万人，平均每人获地6亩；新解放区农民56万人，平均每人获地2亩。

至1946年10月，晋冀鲁豫全区共有20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每人所得土地达3—6亩。其中太行区从1946年6月至1947年4月，从土地改革中得益的人口有330万，农民得到了3762636亩土地，贫雇农人均得地2亩，中农得地3—5分。

至1946年12月，东北解放区农民获得土地3300万亩。至1947年3月，黑龙江省全省初步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据各县统计，全省有677270垧土地（占全省土地面积190余万垧的1/3强），转移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手中，得地户计193839户，共计有868180人（占全省人口总数210万的1/3强，若除去城市人口45万，则占1/2），分配房屋约6万间、牛马约1万头、粮食（仅延寿、方正、拉林）12446石、现金2万万元（东北币）。此外，还分配了大量的衣服、农具、猪、羊等，农民已大体上解决了衣食住用的问题。

全面内战爆发后，华中解放区首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华中军民一手拿枪，开展自卫反击战；一手拿算盘，分田分地土改。苏中一分区的泰兴、泰县（今姜堰市）、如皋、东台、紫石等7县的1005个乡中，除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城镇附近189个乡外，其余的816个乡，至1946年9月底，已有743个乡完成了土改，100万贫雇农得到了土地。

土地改革改变了解放区的阶级关系，地主阶级被大大削弱，中农大量增加，贫农减少，赤贫几近消灭。据太岳区长子县的6个村的调查，地主全数转入劳动，富裕中农由37户增至55户，增加48.6%；中农由464户增至950户，增加104.7%；贫农由638户减至389户，减少39%；赤贫由189户减至7户，减少96.3%。晋察冀解放区北岳、冀中两区地主的土地已比抗战前减少了85%以上，富农的土地占有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贫农、雇农和赤贫仅占农村总人口的1.67%。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不但经济上翻了身，而且政治上也翻了身，他们普遍地参加了各种群众组织，许多人担任了乡村干部。据冀中区的安平、大城、饶阳等16个县统计，农会会员增加128043人，妇女会员增加88482人。土地改革运动中涌现了大批新干部，仅据饶阳、肃宁、安平、安新等4个县统计，有950个积极分子提拔为村干部。又据太行区9个县15个村的统计，参加农会、妇联会、民兵等组织的农民，占全村农民总数的57.2%。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土地改革的全面展开，就显示出了特别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使他们深切地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他们翻身解放，从而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另一方面，党与人民政府又告诉他们，要保卫自己刚刚获得的土地，保卫胜利果实，仅仅推翻了本村的地主还不

够，还要打倒地主阶级的总后台蒋介石，不打倒他，本村打倒了的地主也不会死心，他们会幻想蒋介石来“变天”。要彻底打倒地主，就必须彻底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要打倒蒋介石，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解放区，大家去参军参战，打败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保卫家乡，保卫土地。因此，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各解放区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

冀南的宁南县（今宁晋县一部分）属于新区，经过土地改革，全县13万人口，农民每人平均获得土地2—3亩。为了扩大人民武装，上级给宁南提出了800人的参军任务。

宁南县委召集县、区、小区、村干和小乡长等干部积极分子，开了5天大会和小会，打通干部和群众打败蒋介石、保卫土地的思想。经过充分动员，各村一次自动报名参军的人员达2000余人。

随后，县委干部下到区，区委干部下到村，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工农青妇武各部门召开系统会议，宣传“翻身要彻底”的道理，明确提出巩固果实才算彻底翻身。要巩固果实，只有起来掌握枪杆。于是，在“彻底翻身”、“掌握枪杆子”、“保卫土地”、“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翻身农民进一步被发动起来。个人与个人、干部与群众、小组与小组、村与村开展群众性的参军竞赛运动。200多户的马房村，全村青壮共130余人，集体报名参军的就达74人，其中妻子送丈夫的31人，父送子9人，父子参军的2人，也有弟兄同上战场的，也有复员军人二次上战场的。全县在10天内，集体报名参军的达3200人。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人民就有参军参战的光荣传统。解放战争开始后，这种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广大翻身农民在欢庆土地还家的同时，高喊“保卫胜利果实，打垮奸贼蒋介石”的口号，纷纷报名入伍，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参军参战热潮，一批批的青壮年涌向主力部队，有些大一点的村庄，一次参军就是一个连、一个排。

临沭县五官庄有个青年，参加了八路军的老四团（即一一五师六八四团），在攻打该县的码头镇时牺牲了。消息传来时，庄里正在动员参军，有的干部担心这一消息传开，会影响群众参军的积极性，可土改工作团的大部分人认为，这里的人民经受了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应该相信翻身群众的觉悟。于是，他们把这个战士的遗体运回庄里，开了追悼大会。会上，村党支部书记和这个战士的父亲都讲了话。开会之前，本来没有安排这个战士的妻子发言，可当她的公公刚讲完，她就登上主席台，诉说了自己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改嫁，自己要饭为生的苦难经历和实行土改后过上的幸福生活。她说，没有人牺牲流血，就不会有穷人的好日子。孩子他爹牺牲了，他死得光荣，我也要当女兵去为他报仇，蒋介石不让咱们过好日子，咱就和他拼到底！就在那次追悼会上，不光原先动员的十五个青年，都表示要为烈士报仇，当场又有二十几个人报名参了军。

1946年8月，苏中解放区东台县在“物归原主，土地还家，实行耕者有其田，人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口号下，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县土地分配任务。这时，国民党军队发动对苏中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东台全县掀起大参军运动。县委书记胡辛人带头报名参军，影响了106名区、乡干部当场报名。在“参加新四军，保田

保家保和平”的口号鼓动下，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全县5000多人报名参军，3500多人被批准入伍。

仅1946年的8月、9月、10月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这些翻身战士，不少是党员和乡村干部，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土地改革也激发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每一个指战员深知，他们在前线胜仗打得越多，越能保卫土改果实，因而奋勇杀敌。此外，解放区有300万至400万人参加了游击战和民兵。

为了支援前线打老蒋，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晋冀鲁豫边区农民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牛车、毛驴、扁担和背架，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长期的、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从1946年7月到1947年底，单是战争的最初8个月中，冀鲁豫区就出了120万个民夫，用了3320.8万个工来支援前线。

1946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等指挥下，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苏中东台以南地区，连续打了7个胜仗，歼敌5万余人，史称“七战七捷”。仅在“七战”中的第四战李堡战斗中，苏中区东台县富安、许河两区翻身农民组成民兵后勤队，推着独轮车日夜向前线运送粮草；廉贻区三个小时内动员民船40条随军出征；紧邻李堡的唐洋区组织了1200余人的担架队，扛着400多付担架，开赴前线；唐洋镇家家开工、人人动手，突击磨小麦10万斤，蒸馒头5万斤，送上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战役进行的一个半月中，东台共出动支前民工23000余人，其中民船4000条、船工8000人，担架1000副、担架队员6000人，牛车300辆、车工600人，手推车1000辆、车工1000人，纠察队员7000人。

第三章　土改复查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土地改革中，地主自然不会对农民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俯首听命。他们知道，正面对抗是徒劳无益的，便暗中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土地改革。

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常用手法，就是想方设法隐藏、分散自己的财物。地主疏散财物的办法：银元、元宝、珍珠、金银器皿埋在地下；粮食、衣布、农具、瓷器等品，往地下埋藏不便者，利用各种关系，隐藏到贫穷的亲戚、朋友、佃户和长工家里。这些农民或抹不开情面，或经不起地主的利诱，只好答应地主的要求。这种现象，在太行解放区，农民称之为地主的“防空洞”。仅长治县三区经动员后，群众自报给地主隐蔽的赃物，计土地6600余亩，房屋1700余间，牲口100余头，元宝、首饰6900余两，银洋17000余元，衣服7900余件。五区王庆村25个农民报出给10户地主包庇的土地71亩，粮食82石及衣服、银洋、牲口等物。

腐蚀收买干部和落后群众，甚至不惜使用美人计，也是地主破坏土地改革常用的手段。美国友人韩丁1947年作为一名拖拉机技师，随同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来到中国，派往冀南解放区工作。救济善后总署的工作结束后，应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的邀请，来到晋南潞城县（今潞城市）的北方大学，担任英语教员。1948年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北方大学有一半的师生下乡参加土改。这时，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的韩丁为了亲身感受中国农村的社会巨变，经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同意，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山西省潞城县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回到美国后，他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农民打破封建枷锁、获得自身解放的曲折历程。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有一个年轻的雇农叫张存喜，给邻村高家庄的一个地主干活。高家把他当作牲口一样使唤，吃的是小米和谷糠，睡的是牛羊圈。有一年灾荒，张存喜的母亲来到地主家讨饭，张存喜溜进厨房给母亲盛了一碗小米饭，地主发现后将他打得遍体鳞伤。这家地主的儿媳妇，原来嫌张存喜身上的羊粪味，见了他就远远地躲，土改工作队进村后，这个女人却忽然对张存喜眉来眼去了，还给张存喜好东西吃，补破衣服，最后还将张存喜拉上了

床。张存喜成了地主的俘房后，不但为地主藏匿衣服和值钱的东西，而且当群众斗争这家地主时，他还想方设法保护地主。地主家的地虽然被分掉了，张存喜也回到了张庄，但他不积极参加村里的斗争，还拒绝村里分配给他的土地、房屋和其他任何财物，还要他母亲不要去参加对地主的控诉。原因是他听信了地主的话，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回来惩办那些参加斗争地主的人。

无独有偶，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山东省武城县有一个叫李春林的地主，家中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十八岁的女儿。面对日益高涨的土地改革浪潮，他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就逼自己的女儿去勾引雇农骨干。一天，他将雇农团主席请到家里吃饭。他与他老婆在一张大桌子上吃，让雇农团主席和女儿在下面一张小桌子上吃。过了几天，他又让其和女儿在另一间屋子里吃。不到半个月，雇农团主席就和地主女儿睡到一起了。一天晚上，地主女儿偎在雇农团主席的怀里说："眼下你要的东西都有了，你就别再干雇农团主席了。往后别再搞啥斗争了，你缺啥只管向俺要好了。"雇农团主席听了她的话，渐渐失去土地改革的兴趣。在干部会上，一当有人提出要斗地主时，他就说："算了吧！咱们现在有吃有穿了，还斗个啥呀?"

派狗腿子打人农会，搞假斗争，也是地主逃避斗争，保存自己土地财物的一种手段。东北解放区松江省巴彦县有一个屯子，虽然以前也经过三番五次斗争，但地主的势力并未摧毁，基本群众翻身有名无实，屯子仍被被称为"满洲国"、"老中华"的四大户把持着。县委带领三个区的工作队员到那里集中试点。开始群众不敢同工作队接近，后来深入到最贫苦的农民家了解，才发现从减租、清算到分地，四大户均未受触动。秋收时地主仍然是粮垛成山，牛马满圈；分地时留好分坏，留多分少，留近分远，并霸占青苗，拖延打场，群众没有分得一粒粮。他们还挑拨穷人斗穷人。这个屯换过四次"头人"（村干部），但不是烟鬼兵痞就是流氓警察跳大神的。这些人是在以前区工作队的个别人支持下上台的。群众说，对四大户的斗争，是干部"坐在地主的炕头上算账，遇事同狗腿子商量"。群众从未与四大户撕破脸，分果实是用抓阄的办法，明分暗不分。分了地主的马，也是"地主用，小户不敢动"；房屋是"地主住瓦房，小户住破房"。所以群众对分地分房分浮财的信心不大。这个屯子的自卫队只有一本花名册和一个烟枪队长。洋炮捆放在四大户的朱二八爷家里，后来捆放在农会的角落里。

当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反动地主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土地改革。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全省群众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说：

斗争未深入的地区，封建势力还未垮台，地主威风仍在。原来土地改革运动，已给予农村的封建势力严重打击，经济上大大削弱了，但并没有完全垮台，且采取各种形式在各个角落里或明或暗地进行活动，用各种花样与手段来保存其力量。甚至有些地区，由于和平分地，反革命势力仍然公开活动，造谣威胁，收买干部，保存力量，企图死灰复燃。如果把各地的反映集合到一起，封建势力活动则有以下十种花样：（一）派遣狗腿子打入农会，假装积极分子；（二）利用拜把子、拜干亲戚麻痹群众；（三）发展封建

迷信团体；（四）对群众、干部造谣威吓；（五）贿赂拉拢，甚至地主用女儿嫁干部等办法收买干部；（六）收回土地，不让分青，收回青苗，不给群众粮食；（七）假借献地多留，留黑地，隐藏黑地，隐藏浮物，依然掌握经济优势；（八）勾结胡匪，帮助反革命插枪，同谋同起；（九）地主利用各种办法，保存一部分武装，盼望国民党来，等待时机；（十）拉拢富农、中农，利用狗腿子形成自己的势力。

在晋察冀的冀中地区，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手法有：用美人计、财物拉拢干部；制造假斗争，欺骗群众，蒙蔽县区干部；操纵一两个干部挑拨干部间的团结，转移斗争目标；假开明献田，用“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办法，一见斗争就要求献田；在斗争中采取软磨硬顶的办法；男人逃跑留下女人假装可怜哀求多留地；散布斗争面宽的谣言，制造中农恐慌；勾结顽伪特务进行破坏；派走狗打入骨干训练班和农会进行侦察；利用其参加革命的子女亲友达到保存封建剥削的目的等。

这一阶段的土地改革中，有相当多的地方对封建势力斗争不够彻底。东北解放区的嫩江省，“对某些地主过分强调照顾，忽略了基本群众；某些地方地主留地太多，因而农民分得土地太少，有的地方把‘经营地主’与富农同样对待，连献地都不接受，保留其大量土地”。山东解放区的黄县，在经济上，只注意“土地还家”而忽视没收地主的房屋及浮财。地主自愿献田成为“土地还家”的主要方式。因此，不少地主将好地、近地留下，献出薄地、远地。再加上土地政策中对于地主等人照顾标准过高，致使土地改革后地主阶级手中仍留有较多的土地、房屋及大量的浮财、生产资料，生活条件仍优于一般农民，而分到果实的贫苦农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无足够的土地耕种，又无必要的浮财安家，况且尚有少数未觉悟的群众不敢要斗争果实，因此，仍没有彻底摆脱贫困的境遇。

一些地方在土改中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而是由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团）包办代替，甚至强迫命令。东北解放区的嫩江省，“有的工作队（或带领少数积极分子）到一屯分一屯，或到一村就立即组织农会，分完或组织完就走了，三天两天‘完成’一个屯的‘任务”’。结果工作队以“恩赐”的态度发动土改，到处“发放”、“配给”土地；以少数“积极分子”代替广大群众，参加斗争，获得利益的都是少数人；以“本村不好撕破脸皮”为由，而以外村的少数“积极分子”代替本村广大群众，本村贫苦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反而给地主造谣欺骗以口实，造成外村与本村的对立。这种现象，自然不止嫩江一地存在。

各地土改工作的发展也不平衡。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在一份总结中写道：“由于战争的影响与工作基础的强弱不一，华中各地的土改有快有慢，有好有坏，表现了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地区来说，老区中心区的土改较彻底，边区与新收复区则较差；就在老区亦是不平衡的，有的追浮财彻底了，有的则尚未彻底。从时间上说，有的地区复查比较早，有的地方比较迟。”

由于战争环境，缺乏经验，战争动员后勤参军任务很重，亟待争取时间；完成土改任务，于是造成各解放区在土改工作中，均不同程度存在组织工作不细致的问题。华中

有的地区三天就分配好一个村子的土地，这就使得运动非常粗糙。

在土地改革果实的分配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薄一波在一份报告中提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情况是：一些区村干部、积极分子、民兵以功臣自居，普遍占有多而好的土地、房产、牲畜，分得更多的现金、器具等；政府、部队、机关、团体将没收的汉奸土地或公地、房屋财产，占有已有，不让群众分配，甚至用非法手段占有应归群众分配的土地，名为生产，实则为少数干部所把持；县、区、村都有庞大的合作社，其基金多半是土地改革的果实，包括土地、房产，名义上是群众性的，实则通年不分红，不报账，亦为少数干部所把持。

由于种种原因，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春半年多的土地改革，的确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华中分局将其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贫雇农的土地一般未满足，有的土地是满足了，但生产资料未满足，赤贫未完全消灭。

（二）侵犯中农的利益较普遍，打击面过宽，一般均在百分之十以上，个别村甚至超出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地主所留的土地一般还是比贫雇农要多些，即使相等，但质量好于贫雇农，低于贫雇农则是少数，不少地主隐瞒黑地，地主浮财一般未动，只清算了耕牛、农具和部分房屋。

（四）干部、干属、军属与干部有关之亲属荣军，则普遍多留田，留好田、留近田，有的干部几处分田，有的外来干部分田，有的干部将家里坏田托出，换好田。

东北解放区曾将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比喻为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并总结了“夹生饭”的基本特征：

第一，地主恶霸威风没有打掉，通过他们的狗腿子在农会中有联系，收买积极分子，威胁基本群众，破坏翻身斗争。只要“屯子里的大旗杆没有打倒”，这些“大旗杆依然是农民心理上的统治者，依然在暗地里统治着农民”。

第二，在分地斗争中没有真正发动群众，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对于斗争的决心没有酝酿成熟，没有使群众经过犹豫、动摇、反复考虑之后，自觉下决心斗争。加上干部“包办恩赐”的结果，使群众对于分地以为是“国法”、“上面命令”、“官家的配给”，没有使群众认识到分地不仅是需要而且是应该，并且要群众亲自动手来干。其次是斗远不斗近，斗地不斗人，斗小不斗大，明分暗不分，甚至是地主土地财产分了后，农民还不知道自己分得的“地是哪一块，房子是哪一间”，实际上还没有分。

第三，没有真正的积极分子，或者没有找出真正正派且既穷又苦的人当积极分子，或者是积极分子的作风不正派，农会乱摊款增加农民负担，群众在心目中不承认这些积极分子是代表他们的利益，是他们的领袖。或者是有了少数真正的积极分子，但未与群众结合，因地主恶霸的恐吓而半途消沉下去了，以及因工作团没有提高积极分子的觉悟，而不能起积极分子的作用。

第四，群众的武装是形式的建立了，但群众对于武装并不那样关心和爱护，群众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武装是保卫胜利果实的命根。

据统计，这种半生不熟悉的"夹生饭"地区，东北解放区约占70%。

如果土地改革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提高，地主的威风也不能彻底打掉，土地改革就有可能"走过场"，封建势力就有可能复辟。

针对土地改革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各解放区相继提出要开展土改复查。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是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9月下旬，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土地改革工作。会议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已基本结束，但不少地方的工作很粗糙，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斗争果实分配得不合理（大地主的原佃户分的多，区村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分的多），贫雇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这样分配斗争果实是富农路线。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关于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要求在全区开展"翻身大检查"（又叫"填平补齐"）运动。

"翻身大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一）深入查田、查阶级，清查遗漏、隐瞒、干部包庇和假卖假分，做到从经济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即"挤封建"。（二）干部、积极分子、民兵占取土地改革果实过多的部分，采取各种方法令其退出，分给贫苦农民，即"干部洗脸擦黑"。（三）贫富合村，贫富村联合斗争，做到消灭赤贫和贫农，即"填圪洞"。

1946年10月5日，晋绥分局发出《关于今年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认为要将满足老区20%左右仍然缺地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作为"当前老区的重要问题"加以解决，并提出了五条具体的解决措施：对于空白村或过去减租清算不彻底的村庄，采用现在新解放区的办法，发动群众，以减租清算、反贪污、反恶霸等方式使农民得到土地；将所有公共性质的土地和地主富农的黑地、荒地一概归公，无代价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过去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借政权之力量所调剂耕种的土地，一律退出，其地权原属于中农以下者，一概退回原主；对业已经过减租清算仅保有自给部分土地的地主，原则上不得再分散其土地，尤其要禁止某些流氓分子为企图挤出其底财，而节外生枝地对其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但如个别地主现在仍有过多土地，可劝其献出多余部分，否则由政府采用清算旧欠公粮的办法征收分配，对于过去侵犯中农利益部分坚决退还，对打击过重的富农酌情予以补偿；对土地质量好坏进行调剂，使贫苦农民能分到一部分好地。

1946年11月初，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受东北局的委托，前往南满主持该地区的工作。在路过合江时，时任合江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向他谈了前一阶段合江土地改革工作的种种问题。在抵达牡丹江时，他又找地委书记何伟了解情况，发现这里的问题与合江差不多。陈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1月7日，他在佳木斯和牡丹江之间的桦川县，给东北局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所谓"半生不熟"，是指积极分子的成分不好或很好，群众未真正发动起来，结果是地主虽被打击了，但仍有潜在势力，在心理上仍旧统治着群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一味求成，在群众中酝酿不成熟。估计"半生不熟"的地区在东北一定很多，改进这种地区的状况已成为群众运动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这封信引起了东北局的重视。11 月 21 日，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将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区；二是“半生不熟”地区；三是弄乱了的地区；四是未开辟的处女地。东北局认为，东北全区最多的是“半生不熟”地区。虽然各地“半生不熟”的情况不同，生熟程度也有差别，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群众在斗争后的态度是‘懒洋洋’的，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农会工作任务漠不关心，甚至互相埋怨，而从组织形式上去看却样样都有，如地也分了，斗争也斗过，武装也有，农会也有，积极分子也有，但切实检查起来，则毛病很大，内容甚少”。东北局认为：

产生这样“半生不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没有经过群众的酝酿成熟，使群众自觉地自下而上地起来斗争，贪图快，只顾“点火”，好像“一阵风”，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冷冷清清。也有的第一次是经过酝酿的，工作团干部取得了经验，而工作团把自己取得了经验当作积极分子和群众也取得经验，以后各地就不经过酝酿成熟，贪图快起来。至于其他许多情形，如仔细了解情况不够，检查工作不多等等，也是造成“半生不熟”的原因。

东北局要求东北各级党组织和各工作团将解决“半生不熟”问题，把“夹生饭”煮成熟饭，作为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

对于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始终予以高度关注。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现：“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例如：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原佃户和大佃户分占了更多的土地，军队、政府及其他机关团体，占有很多土地及公田，而许多赤贫及雇农没有分到或很少分到土地。”

1947 年 1 月 10 日，刘少奇就土地改革中的问题，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黎玉、刘澜涛、黄敬、李井泉、张稼夫、高岗、彭真、李富春、陈云，为了深入解决土地问题，请各他们根据各地的情况，答复如下问题：

（一）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形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颁布土地公债法令之时期，是否已到？是否要影响那些土地改革尚未深入的地区及将来新发展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还要用反奸清算等方式来使地主拿出土地。

（二）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党内和党外都有一部分人企图窃取土地改革的果实，分占更多的土地，这就是一种富农路线分配方法；而与贫农平均分配原则相对抗。在这些分配不公，引起农民不满的地区，是否应提出重新分配的口号，或只实行个别填平补齐即够？重新分配办法以在何时何地提出为妥？根据内战时期的经验，土地必须重新分配两三次，才能最后分妥。因为在初分配时，总是急促的，难于调查周到确实。且有一些贫农、雇农不积极要求得到土地，乃便于一部分人多分，但到后来势必重新分配，且一次比一次分得更公平合理，最后才把所有权固定下来，这是贫农雇农的要求，并使他们

得利最大，所以不要害怕重新分配。

（三）解决土地后转入生产，有何困难及如何解决此项困难？是否如有些人所说第一年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

其中的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所加写的。这说明，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在考虑如何使土地改革继续深入，以克服前一阶段工作的不足，不但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要通过土地改革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村生产力。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分析形势和党的任务，并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也称“二一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会上，毛泽东多次作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份党内指示，其中专门讲到了土地问题。指示说：

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必须于今后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以致没收和分配土地都不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意。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此外，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之处，都照《五四指示》办理。总之，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

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各解放区都在初步完成土改的基础上，开展了土改复查。

1947年2月21日，华东局发出《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生产的指示》（即“二二一指示”）。“二二一指示”肯定了半年来华东土改的成绩，但同时认为，“在许多地方土改中仍不彻底不全面，在土地分配上有些地方存在着不公平与脱离群众的富农倾向（如少数人多分到土地或好地，而赤贫现象尚未完全消灭）。个别地方仍有侵犯中农与过分打击富农的现象，使我们尚不能团结更多群众”。因此，必须迅速采取填平补齐和其他公平合理的方法，纠正上述缺点。

“二二一指示”规定，凡已经完成土改及土改不彻底的地区，均须展开深入的复查

工作，复查的目的在于贯彻土地改革政策，消灭明分暗不分的现象，使土地分配公平合理，使赤贫均能获得土地；纠正村干部及少数农民多分土地分好地多得果实，自私自利脱离群众的富农倾向，团结所有农民进行保田保饭碗的斗争。复查中应发动群众检查下列内容：（一）明分暗不分现象；（二）地主黑地是否存在；（三）献出地的地主仍留多少土地；（四）毁老契立新契的情形。

4月底5月初，华东局又分别作出了《关于贯彻土地复查的指示》和《关于土改复查补充指示》，进一步指出：土改与土改复查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土改和土改复查的基本方针，是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足够耕种的土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使农民成为真正的主人。土改复查的任务，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克服土地分配不公的现象，团结90%以上的农民。这两份指示还对土改复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规定。

1947年2月，晋察冀解放区召开土地改革汇报会，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在总结讲话中，肯定了前一阶段全区土地改革的成绩，但同时认为晋察冀的土改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有些地方的土地改革，还未完全按照‘五四指示’的原则执行，还没有彻底走群众路线”，因此，还需要继续贯彻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群众真正“翻透心”。刘澜涛在讲话中专门对土改复查的问题作了布置，要求通过走群众路线，重点复查是否真正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群众是否真正翻身、翻心，广大农民是否有了主人翁的思想，是否有分配不公和伤害中农利益的事情。复查的时间，一般应在秋收之后，个别地区如果群众要求马上复查，也可在春耕之前进行。

4月6日，晋察冀中央局又作出《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要求全区各地“继续大胆放手，全面贯彻土地改革，深入复查，进一步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

早在1946年9月1日，华中分局就发出了开展土地复查的指示，但由于当时华中分局领导的地区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所有的县城和重要城镇均被敌人占领，土改复查只在中心区的农村进行。1947年夏，形势发生改观。6月20日，华中分局就土改复查作出指示，要求在全区开展土改复查。复查的内容，就是要查明贫雇农是否得到足够的土地？是否好坏搭平？是否解决牲口、农具、房屋、青苗等？中农土地、财产是否被侵犯？地主、富农是否多留田、留好地？是否真正实现“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如发现不符合此要求者，必须填平补齐。在复查中必须依靠贫雇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反对包庇地主富农、干部多得地得好地和多得斗争果实的富农路线。

至此，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土改复查。

第二节　煮“夹生饭”

在各解放区的土改复查中，东北解放区的煮“夹生饭”运动颇具代表性。

1946年11月21日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后，东北各级干部纷纷下乡，深入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各地把“夹生饭”煮熟。

桦川县是合江省委的土改试点县，据省委书记张闻天在1946年11月中旬的调查，全县“半生不熟”的村子有83个，占工作总村数的53%，全县总村数的43%。

该县会龙山屯共有72户，包括地主3户、富农2户、富裕中农2户，中农25户，佃中农10户，贫农12户，佃贫农18户，另外还有43户“跑腿子”。

1946年5月间，上级派来的工作队来到了会龙山屯，领导群众清算了4家地主，分了170多垧地、5头牛、3匹马、2辆大车，还有一些现款和粮食。

会龙山屯土改斗争是和平的，由干部和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代替，因而群众没有真正同地主撕破脸皮，地主瞒地不少，威风没有完全打掉，多数“跑腿子”没有参加斗争，农民把分到的地和牲口看成是“官家配给的”，他们只知道“现在这个国家比伪满好得多了”，却没有明确的阶级观念，对胡匪（即土匪）没有仇恨，不肯反映胡匪和通匪分子的情况，有“穷富一心”、“民匪不分”的倾向。

这个村的农会也是有名无实，只有会长，没有会员，民兵则是以中农成分为骨干，“跑腿子”被认为不可靠不让参加，小户则因为“衣衫单薄”不愿参加。工作队培养起来的干部也不是真正的积极分子，乡长是一个暗“胡子”（方言，即土匪），农会会长是地主的外甥，他们与地主勾结，强迫“跑腿子”和小户将分得的车、牛、马低价卖给原来的地主。这种行为被群众揭发后，区里也只是简单地将他们撤职了事，接着选了几个所谓“公道人”当了村干部。但这些新选的干部中，有的是老好人怕得罪地主，有的是旧村长的亲戚。这些人虽然与原来的干部相比，不勒钱，不揣钱，不派款，但不敢得罪地主，对于地主的翻把活动不闻不问，以求相安无事。

为了搞清楚“夹生饭”的具体情况，指导全省农村煮熟“夹生饭”，张闻天曾三次亲往会龙山屯。第一次调查了这个屯的基本情况；第二次来，亲自参加了斗争暗“胡子”李焕章（原来的乡长）的群众大会；第三次来已是1947年1月初，他在这里住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工作队一道重煮“夹生饭”。群众第一次斗争地主洪玺亮，迫使他交地契，后来发现这些地契都是些荒地的地契。于是，张闻天又发动群众再次斗争这个狡猾的地主，迫使他低头认罪，交出了90多垧好地和青苗，并当场将地契烧了。对另外两户地主瞒黑地的问题也进行了斗争。同时，改选了村干部，成立了新农会和自卫队，重新分配了斗争中得到的土地。群众说：“这回分地公平，够数，好地又多，明年都过好日子。”

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土顶子村，在1946年5月间的打“胡子”、分逆产浪潮中，曾将

部分汉奸恶霸的土地转入农民手中，但因当时群众与地主撕破脸皮程度不够（除伪区长郭自俭家被斗外，其他的地主都是自动献地），地主迅速组织反攻，对农会干部拉拢收买，对基本群众造谣威胁，把分出去的地重新收回来，连村政府修围墙，在地边上拉一车土都不行，而村农会主任两面应付，对上级汇报时隐瞒了真实情况，说该村的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

开展煮“夹生饭”工作后，宾县常安区工委向该村派出了一支有三十余人的工作队。工作队到村后不住大户而住进村里最穷的小户家，利用晚上的时间同他们唠嗑（方言，即闲谈、聊天），白天则集中到村政府去吃饭，同时汇报材料研究情况布置工作。经过半个月的细致调查和群众的酝酿，集中力量斗争村上的大地主张三麻子，把村里凡是“翻把子”的坏家伙一一斗倒了，然后用办训练班的办法重新发展农会会员和自卫队队员，撤了坏村长的职，另行选举了出身清白，决心翻身，以前没有地的农民担任村长、农会主任和自卫队队长，使群众真正翻了身。村里的农民们说：“过去翻身只是腿能动一动，现在是头都抬起来了啦，走起路来，还要晃着点哩！”

宾县常安区工委在土顶子村煮熟“夹生饭”后，又决定选择另一锅“夹生饭”来煮，这便是财神岗村。区工委认为，这个村一定是一锅“夹生饭”，理由有两条：一是该村分地时没有经过严重斗争，二是村里主要负责干部的品质不好。

1947年1月1日，常安区工委除留下3个干部外，其余的5个区工委干部全都到了财神岗，区的机关也搬到了这个村。区工委认为，要煮熟“夹生饭”，必须集中力量，深入屯户。这样既可以深入了解该村工作的情况，也便于开展集体学习。

从到村的第二天开始，区干部每天晚上到屯子里工作，并住进赤贫户家，借此接近基本群众，了解问题。5个区工委干部加上村干部，有时分成两组，有时分成三组，吃过晚饭后，背起背包到屯子里最穷的人家住下，利用晚上的时间，同穷哥们唠嗑。

区干部首先来到该村的苏家屯，此时已快过春节了，干部们问群众，今年照去年相比怎样？这一问，一下子把群众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说，今年不挨饿了，得到地有粮了。有的说，今年过年包饺子也不“经济犯”了。就这样，群众东一句，西一句，谈起翻身，谈起过年。谈着谈着，不由自主地谈到了分地的事上，有一个群众说：“我家劈的地不够，还是坏地。”这时，区干部问：“能不能搞到好地呢？”群众回答说：“能是能，还有王有才在这个屯子里有8垧地，他在伪满时是配给所掌柜的，开过粮栈，他别的屯子还有地。”区干部便说：“翻身就要彻底翻身，劈地就要劈好地。还有哪些人分了坏地？好地到哪里去了？还不是地主留下了，瞒住了！还有哪些地主把地瞒住了？”于是群众就提了几个地主的名字，并讲到其中一个叫刘清峰的地主，伪满时当过伪区长，干了不少坏事，村里的群众都恨他。这时，有人向工作队提议说，这批家伙肚子里有鬼，听说工作队来了，一定会跑的，不如去抓了他。区干部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可第二天去抓刘清峰时，此人已经跑了。群众虽然未抓到刘清峰，但把他的家看守起来了。通过这样的办法，区干部对各屯的地主情况、干部的情况、积极分子的情况，都有了充分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工作队把各个屯的积极分子集中起来上课，内容是松江省委编的《农

民课本》、《农村政治课本》等，还有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及《白毛女》的故事，以此启发积极分子的阶级觉悟。接着又召开几个屯子联合的群众大会，让大家找出谁是本屯最坏的恶霸地主，并揭发他们欺压群众的事实。这样，被恶霸地主打过的、骂过的、扣过的、罚款过的群众都把自己的冤仇诉说了出来。区工委把这些情况进行了汇总，并确定了8个斗争对象，其中有恶霸地主，也有任过伪职的经营地主、小地主及个别干部，并决定将恶霸地主刘清峰和高青云作为主要斗争对象。

为了开好斗争大会，先开了一天的群众大会进行酝酿。会上，区干部讲明了要斗争这两个人的理由：如过去他们没有被斗过，也没有斗垮台，所以他们很神气，还想翻把；因为没有斗他们，群众的冤还没有申，气还未出，心还没有翻过来；不经过斗争，群众总是不敢大胆翻身，等等。第二天，区工委组织对刘清峰、高青云进行斗争。群众先到刘家的院子里。因为刘清峰已经跑了，大伙就把刘清峰的老婆拉出来说："刘清峰的坏事一定和你商量的。"说话之间，一个老太婆上去劈脸打了两巴掌，其他的人便一个一个走过去，把受刘清峰压迫的事一一讲了，边讲边打。接着，群众又将高青云进行斗争。斗争会上，高青云说起话来指手画脚，群众很不满，一个民兵走上前去打了其两耳光。经过斗争，高青云承认自己做了许多坏事，并答应五天之内交出20万元（东北币）的清算款子。

从1946年10月开始，黑龙江省北安地区各县就把煮"夹生饭"作为县委的中心工作。到次年2月，煮"夹生饭"取得了重要成果：全地区83个农村区，1166个乡中，已有340个解决了"夹生饭"问题。在斗争中，从地主手中清算出103553.8垧地、16087间房屋、8123头牛马、1227辆大车，其他浮物财宝（包括衣服、布匹、金银、现款、粮食等）约值80亿至90亿元（东北币）。这些浮物的价值，比上年清算出的全部土地和浮物的价值还要大。这批浮物不仅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真正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在解决"夹生饭"的斗争中，还挖出地主藏匿的大小枪支1659把，子弹10万多发，绥棱、北安、庆安等县还破获了地主地下军的活动。通过煮"夹生饭"运动，淘汰了一批混入干部队伍中的流氓坏分子，正派积极分子上了台，初步树立了群众的优势，并在工作比较彻底的乡发展了党员或建立了党的小组、支部。

1947年2月1日至9日，东北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讨论了群众工作、生产、对敌斗争、敌后斗争等问题，认为目前东北群众工作的情况是：真正做得较好和尚未工作的空白地区都是少数，"半生不熟"的地区是绝大多数，因此，目前群众工作的中心还是集中力量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

会后，东北局于2月20日发出《关于解决"半生不熟"与准备春耕的指示》。该指示指出："提出'半生不熟'的问题，并不是泼冷水和否定我们群众工作的成绩和同志们工作的努力，其目的在于根据当前群众运动发展的情况，警惕某些同志的骄傲自满情绪，使大家去注意和改进工作中已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把我们的群众工作继续提高一步。"

《关于解决"半生不熟"与准备春耕的指示》提出，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的基

本标准，主要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来打垮地主恶霸的封建统治，达到基本群众真正翻身，确立基本群众的优势。达到这个基本标准的具体表现是：地主恶霸被真正打垮了；基本群众真正有了自己的组织与武装，不仅在分地中敢于同地主斗争，而且在分地之后，能时时警惕与提防地主、恶霸、国特（国民党特务）、土匪的一切翻把破坏并继续进行斗争；真正公平合理地处理斗争果实，其中主要的是把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能切实保证落到基本群众手里；在斗争中发现与培养一批真正为群众所爱戴拥护的积极分子，农会的作风正派，办事公平，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肃清地主和土匪武装，建立起基本群众自己掌握的武装；热烈地表现出拥军参军与军民之间的亲密团结，发展一些党员及建立起可靠的支部堡垒。

在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之初，由于工作团（队）没有切实贯彻群众路线，未能深入到真正贫苦的群众中了解情况和进行组织发动，采取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方式，未经群众反复酝酿，基本群众并没有发动起来，而被少数游民、流氓和坏分子钻了空子，将其当作积极分子来依靠。东北地区经历了日本人 14 年的殖民统治，加之东北地区比较特殊的历史特点，使这里的游民比关内地区要多得多。他们中有些人长期流动失业，失去家庭，迫于生计，有的当土匪、小偷，有的当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有的当警察特务的爪牙。这些人抽大烟、扎吗啡、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到处流荡，但这些人善于应付逢迎，欺上瞒下，看风使舵。工作团（队）刚下乡时，因为对情况不了解，挑选积极分子不慎重，而这些人为了得到斗争果实，常是敢作敢为，缺少顾虑，充当了积极分子，甚至担任了乡、村干部。但他们往往只考虑个人利益，虽然也有斗争的勇气，但果实分配上常是贪污多占，并容易为地主所收买利用，而对于基本群众则颐指气使，俨然一副“新贵”的派头，因而脱离群众做坏事，为广大群众所不满。这是造成土改工作“半生不熟”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把“夹生饭”煮熟，就要妥善地处理好这些人。为此，东北局明确指出：对他们的处理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要认识到游民阶层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已充当积极分子的流氓成分者，分清反革命与非革命，对于前者经群众罢免和处罚，对于后者使之坦白悔过，在撤销职务后使其戴罪立功，对于积极参加了反封建斗争又作了若干坏事的，则采取调训、调动工作等办法，对其进行争取和教育，不能把群众斗争的目标转向对坏的积极分子，而应集中力量同地主恶霸势力作斗争。

土地改革的目的和任务都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鉴于春耕在即，东北局决定在集中力量解决“半生不熟”问题的同时，积极准备春耕生产，要求在春耕到来时，“不管当时的‘半生不熟’解决得怎样，各地党委和工作团则应集中力量领导全面的春耕”。

春耕开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是地主藏匿财宝，经济没有彻底垮台。土地分配以后，地主尚藏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布匹、衣服、粮食等浮财。如黑龙江省通肯县百祥区刘家乡地主陈万顺，平日依靠 150 多垧土地剥削农民，每年除全家好吃好穿消费之外，还买了许多金银首饰，仅在土改前 5 年就买了一个 5 斤 3 两重的银元宝埋藏在院子地下。在分地斗争中，他拿出了

100多垧地，但元宝仍然暗藏着，还把金银首饰也全都藏了起来。结果他埋藏在地下的财物，比他土地的价值高出1倍以上。这种情况在东北各地普遍存在。这样一来，地主虽然丧失了土地，但仍然保持经济优势，并常以此威胁农民，企图反攻倒算。通肯县三圣宫区大地主刘俊被清算出土地后，暗中威胁农民说："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把犁杖挂到房檐上，也吃他几年。"

二是土改后农民虽然得到了土地，但由于多年受穷，家底子薄，元气不足，生产中还有重重困难。"一般农民受了多年困苦，他们初得土地，贫弱无力，要种，缺种子，缺马料，缺农具，特别是缺牲畜的困难。凑钱、插犋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济大事；借贷换工也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总是人家的，基本问题解决不了。农民分得土地，自己无力耕种，在困难面前容易动摇，甚至对地主不敢决裂，对富农不断依赖，翻身是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想到了斗出地主暗藏的浮财，以解决生产困难的办法。通肯县伦河区孙王乡农民提出口号："没有马，没有牛，斗出财宝就不愁。"该乡农民集中斗争了2户地主，挖出了地主暗藏的金耳环12副，银器5斤，衣服270套，布1800尺，还找出了粮食80石，被子60床，基本上解决了全乡的麦种、马料、牲口等春耕困难。孙王乡"斗财宝"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县140多个乡，全县农民纷纷仿效，80%的乡开展了"斗财宝"运动，结果在不长的时间里，全县斗出大批的金银财宝，其中金子10斤8两，银子659斤，布38089尺，牛马1104匹，猪894头，现款3501150元（东北币）。

通肯县委对这一运动曾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一个'斗财宝'，一方面保证了春耕的顺利完成；全县1547589垧耕地，在芒种前十天完全种完，未撂新荒，争开了新荒。另一方面，给地主经济一个进一步的打击和摧毁。这在分了土地后'夹生饭'地区工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没有这一步，地主经济不能完全垮台，基本群众亦难翻身发展。"

"斗财宝"运动的开展后不久，通肯县委还对这一运动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作了总结，其中说道：

许多次斗争证明，被清算的地主除了土地之外，没有一个不埋藏财富，而且很难斗得干净。所以，我们如果只分了土地，不动浮物是不对的。不注意他们埋藏财宝，只土地即留给中农水平，也是不合适的。留地应小（少）于贫雇农分的地，对于浮物财产，还应尽可能追出，否则，地主经济还不会垮下去。

分了土地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但发展生产之重要前提，则是群众获得适当的果实，作为生产的资本。东北农作牲口占着重大的作用，在分地后，群众翻身的重要环节是"有马"。

地主财宝埋藏秘密，应一方面利用地主内部矛盾发现材料，一方面发动群众追寻。如果真正群众性的阶级自觉，因之捆打自然也不能限制（目前说），但应启发群众了解，只"打"还是盲目性的，应多用具体方法发现材料，是比较实际的。

"斗财宝"可以增加决心，但经济斗争不等于政治觉悟，所以在"斗财宝"中，应注意经济主义的倾向，必须引导到阶级仇恨和觉悟上来，提高到政治斗争。

斗的对象，应是被清算地主，如果增加新对象，打击到中农及一般富农，就可能妨碍生产。

海伦县的情况也差不多。该县委负责人在一份关于材料中这样说：

在春耕以前，我们的工作中心是，集中全力进行消灭"夹生饭"，在消灭"夹生饭"的基础上来准备春耕。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斗倒大树好种田，牛粮种子不困难"。因为这时群众普遍要求解决春耕中的牛粮种子等困难问题，当时县委即决定从解决群众这个最迫切的要求入手，将斗争深入下去，求得彻底打垮封建敌伪势力，挖掉穷根，安上富根。但要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如果不对大地主的经济彻底打垮，那就等于给封建地主留下一块复活的余地——尤其是地下埋藏的财宝，如果不彻底挖出，那封建地主的经济基础会依然存在。

海伦县的"砍挖运动"是从爱乡区的自兴屯、墨乡屯开始的。自兴屯在"斗大树、挖财宝"中，除分了的衣服外，仅金银等就卖了500多万元，用这笔款子买进了60多匹好马，40多万元的豆饼。这样一来，贫雇农家家有了好马。墨乡屯也用同样的办法解决了贫雇农春耕中的困难。"这些胜利的消息都很快传遍了广大的贫苦农民"，"砍挖运动"也就"由基点内突破，很快地发展到各区"。这一运动开展的结果是，据海伦全县9个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挖出金子1383.8两，银子15878.1两，衣服32465件，布47241尺，粮食8815.46石，现款28301480元（东北市），大车321台，牛马1846头，"另外还有不少东西未算在内"。"正因斗倒了大树，挖了财宝，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春耕中的困难"。

这样一来，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也就由煮"夹生饭"发展到"砍大树、挖财宝"阶段（又叫"起浮财、挖坏根"，简称"砍挖运动"）。

1947年夏秋间，东北解放区的"砍挖运动"进入高潮，也确实挖出了不少东西。报载：

（双城）六区花园村群众，（1947年）2月间确定地权后，由于分地不分粮，一般群众普遍未得到现实利益，因此在春耕中，普遍反映没有粮食吃，春耕困难，县府工作队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除提出分地、分粮外，还号召群众进行挖坏根、挖地窖，首先在花园屯伪区长阎超家挖了2个粮窖，并在高粱秆底下翻出了大批衣服、布匹。接着在6个屯挖出地主粮窖8个，粮食95石，衣服533件，布621尺，加上要出租粮154石，解决了群众粮食及冬季衣服困难，大大提高了群众生产情绪。

农民挖出地主隐藏财宝的心情愈切，地主隐藏财物的手段也就愈多。他们知道，土

地是不好藏匿的，但金银元宝只要想办法，多少能保住一点。中国的地主，多是守财奴，虽然其财产主要是靠剥削而来的，但他们却将之视为命根子。地主们为了守住自己的底财，可谓想尽了办法，绞尽了脑汁。

据《东北日报》的报道，东北的老财们隐藏财宝的方法，多达十数种，列举如下：

（一）埋藏财物设“空城计”。地主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埋起来，或放在亲戚、小户、佃户及狗腿子家里，家里只剩下一些破柜之类的废物。埋的地方很多也很妙，如埋在坑洞、烟筒、锅台、鸡窝、茅厕、猪圈、祖宗的棺材、花池、菜池、大树、小庙、围墙、墙壁、炮台内，甚至在女人的裤子里藏首饰。

（二）家人分散逃跑，减少目标。

（三）装穷装饿装老实。

（四）化整为零，彻底分家，然后伪装成中农富农，向群众大喊不许侵犯“中农利益”。

（五）利用军队中个别坏干部、坏战士的落后思想，向他们诉苦请他们吃饭，用他们来打击群众，保护自己。

（六）利用亲戚朋友关系找政府、找工作队讲情诉苦，虽然遭受工作队的白眼，但回去后向群众说：“我已和工作队讲好，不让你们斗。”

（七）送子参军或参加工作，一则利用参军者在战士中活动，二则可假借军属荣誉、假装进步，求得保存压迫群众的优势。

（八）利用狗腿子干部，在布好“空城计”后，做得像模像样，实际上斗群众。

（九）利用村与村、屯与屯的群众都想多得果实的矛盾，要求本屯农会斗争说：“反正我是要斗的，就这么点东西，外屯来斗争，狼多肉少，分不了多少，不如拿出来给本屯穷人还可以多得些，给本屯人，也心甘！”这样企图分裂农民团结，求得农民同情，保存财宝浮物及多留东西。

（十）假仁假义，给群众粮物，企图麻痹群众。

（十一）收买干部，求得假斗轻斗。

（十二）表面上献地献浮物，实际上献坏留好，献少留多，企图避免彻底斗争。

（十三）利用坏人造谣打击好干部，使好干部害怕或站不住脚，不敢大胆利用职权领导群众。

（十四）利用群众“可怜”心理，大哭大闹，装出可怜相，求得群众及态度不坚决干部的怜悯。

（十五）爱财不爱命，打死也不说，不得已时只说出一点点不重要的东西，好的不好，多的不说。

（十六）用自杀威胁群众。

（十七）利用二流子、过去被群众洗刷的坏干部在这次斗争胡搞乱斗，斗外不斗里，斗远不斗近，斗中农不斗地主，转移群众斗争目标，破坏群众斗争情绪。

（十八）污蔑群众斗争为“官胡子”，“不讲理”，企图吓倒群众。

地主藏财宝的办法多，但农民挖财宝的办法也不少，何况还有上级派来的工作团撑腰。

黑龙江省海伦县民生乡，属于一个未煮熟的“夹生”乡，全乡有270户人家，在1946年7月曾进行过一次清算斗争，仅草草分了地，群众并未发动起来，地主及狗腿子仍旧在屯里掌握大权，农会主任于凤生是个染工，好耍大钱（指赌博），和地主相勾结。乡长是个破落地主，武委会主任在伪满时当过“国军”（伪满洲国军队），他们都和乡中最大的地主张守仁串通一气，压得老百姓抬不起头。

1946年7月清算时，张守仁事先早已把值钱的东西和6匹肥马拉走，群众只落些破烂，他搬到城里安然无事，还不时回到乡中打听风声。他一面挑拨干部一面又拉拢小户，在打场时他对小户说：“你们白打，都叫干部搂去了。”还唆使群众说：“去区上告吧，我县上有人。”转过脸又挑拨干部：“小户可要告你们啦，早提防！”于是于凤生等干部，就事先跑到区里谎报说村里的流氓捣乱，要来区上诬告村干部贪污。区干部未经调查就妄信了他们的话，告状的代表一到就将其扣起来。这样，果然中了地主的圈套，打击了群众的情绪，从此群众谁也不敢再吱一声。

春耕时县委提出：“砍倒大树好种田，牛粮种子不困难。”外屯“挖财宝”的风声传到了张守仁的耳朵里，他就联合本屯的地主自动拿出金耳环20副，并对群众说：“把我们仅存的这点‘干货’送给大伙填补填补吧。”群众受了地主的麻痹，不好意思再撕破脸同其斗争，因而地主在屯子中的威风并没有打掉。

1947年6月14日，区干部到了这个屯进行土改复查，帮助煮“夹生饭”。来到屯里时，干部们只说是来检查生产的，未提土改复查的事。这样一来，地主们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为把“夹生饭”煮熟，白天，干部们都下地帮着穷哥们干活；晚上，找些扛大活的到“九大院”（“九大院”是地主刘守礼的房子，搬进去住的九家都是贫雇农，人们称为“九大院”）去唠嗑。这九家都是基本群众，老实厚道。干部从铲镗困难谈起。大伙说：“可困难噢，马饿的像瘦龙似的；人也不够吃，铲地都扛不住劲。”干部问：“咋办呢？”大伙无话了，有的主张让政府贷款，有的主张自个儿想法。干部就从此人手引向正题说：“人家地主的马饿瘦了吗？”大伙就一一诉说地主的日子过的比他们强，不但马养的滴溜圆，而且顿顿吃豆包黄糕。有人提议：“大树还没倒，挖吧！”大伙都赞成，不过他们主张不用斗争，干脆把地主家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就算了。

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彻底打垮地主威风，干部便启发群众要同地主斗争，并最终确定将群众所痛恨的张守仁作为第一个斗争目标，群众于是道出了张守仁的一大堆罪恶：伪满时他当过五年伪屯长，他兄弟当伪警尉，常常仗势勒索店铺物品；贩卖劳工，村上要五十他却要多要七十，只“出荷”六十垧，其余的叫小户出；霸占人家老婆，强买小户土地……这样一来，群众愈说愈恨，唠嗑无形中变成了一小型诉苦会，众人纷纷要求当晚就把张守仁逮住，并决定每个人都去联络人，酝酿斗争。

逮住了大树，扣住狗腿子的消息传出了，人们背地里议论着，十几位积极分子就趁

机到处酝酿……没用两天的时间就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区干部利用晚间召集群众开会，用积极分子诉苦的材料教育群众。不少老百姓说："非斗不结！这次非把他收拾得像玻璃棒子似的。"当场由群众推出16位积极分子领头——他们都是长年扛大活的贫苦正派青壮年。

斗争大会是在一天晌午进行的。三四百人参加斗争，先后四五十人发言控诉张守仁的罪恶。群众一致要求："毙了他！"他们说："要把他放了，我们就别翻身！"接着又斗了几家地主，一个富农吓得自动跑到区干部面前交出一枝枪及二百多发弹药，请求区干部给说说情，让群众允许他坦白并加入农会。群众一听气得红了眼，当面骂他："想的可美，你为啥不早交出呢？早不坦白呢？是逼得没法了吧？"

斗争的结果是：一批坏干部被洗刷掉，地主吓的哆里哆嗦，由斗争中涌现出的正派敦厚的积极分子组成农会，将堆满一院子的胜利果实立时划为等级，公平合理地分到群众手中（内有25副金耳环、3枚金戒指、40副银手镯、20多石粮、700件衣服、500多尺布、100床被等），解决了基本群众吃粮、马料、卤盐、穿衣等困难。

用"砍大树"、"挖底财"的办法进行土改复查，得到了东北局的肯定。6月25日，东北局发出《关于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认为经过一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东北解放区基本上摧毁了农村的敌伪残余封建势力，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牲畜、粮食，农村中基本群众的阶级优势逐渐在树立中。去年冬季煮"夹生饭"以来，又把土地改革及群众工作普遍地深入和提高了一步，现在煮过"夹生饭"的地方，有的已达50%以上，有的则在20%至30%间。这种地区，敌伪残余封建势力已更进一步地被摧毁，基本群众的优势已经确立起来，未煮过"夹生饭"的地区，由于煮过"夹生饭"的影响，流氓干部的更换，以及今年春耕中确定了地权并查出"黑地"、"黑马"，加以前线胜利的影响，也把群众运动推进了一步。但是，仍有相当多地区的"夹生饭"没有煮或没有煮熟，这些地区，土地问题虽然基本解决了，但地主的影响并未被肃清，地主的经济基础也未被彻底摧毁，留地太多，财宝未挖，干部还有不少"二八月庄稼人"（半闲半忙），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够，个别还有与地主勾结者，未经挖臭根、反两面光斗争，长年劳动正派积极分子还未能上台。因此，煮"夹生饭"的工作远未完成。

《关于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肯定了前一阶段农村开展的"砍挖运动"，并且认为，东北地主除土地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布匹、衣服、粮食，而这部分埋藏的货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价值还要大几倍，如果仅分配其土地，对地主的经济基础并未给予彻底的摧毁。因此，对于农民开展的"砍挖运动"应予以积极的支持，做到"大胆满足基本群众的要求，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帮助安家立业，使群众能真正达到经济、政治上翻身的目的"。东北局在该指示中特别指出：对于未煮过"夹生饭"的地区，要特别注重斗财宝挖干货，继续挖坏根与分掉地主留得过多的土地，提拔长年劳动正派的积极分子，树立群众的优势和统治。在夏锄中群众缺粮应从"斗财宝"、挖浮物中来解决，斗出一切金银财宝、布匹、衣服、粮食，应全部分给群众用之生产、买马、造房、安家立业。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东北各省立即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或群工会议，总结上半年群众运动工作，部署下一阶段的土改复查。

6月下旬，松江省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由巴彦、呼兰、双城、五常、宾县五县汇报半年来消灭“夹生饭”及春耕情况，并请东北局副书记高岗到会讲话。高岗讲话中解答了形势与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关于群众工作，高岗说：所谓熟了的地区，就是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把封建恶霸地主阶级，从经济、政治、武装上彻底摧毁，不仅要分恶霸地主的土地、牛马、浮产，而且要挖出他们的家底，这样才能最后摧毁恶霸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

中共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作了总结，并着重阐释了大胆放手的问题。他说：大胆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来说，就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留丝毫余地，任何恶霸地主的哀求与叫骂，我们都毫不同情，必须认识他们的哀求与叫骂，是封建地主阶级向群众斗争的一种方式。整个斗争是尖锐激烈的，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个斗争是最人道的。而在大胆放手中间，又必须像园丁培育花苗一样，要善于引导和培养群众情绪走向斗争。在斗争中，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拘束。那么，大胆放手会不会违反政策呢？张秀山说，不会的，放手就是根据政策来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放手也不是不要领导，放手本身就是有领导的群众路线，一切与此相反的，均是违反群众路线的。

此时，开展挖地主底财的，并非只有东北一地。各地虽然叫法各异，但具体做法却差不多。7月15日，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给东北局发来了一封电报，介绍了华北挖地窖的初步经验：

必须要把挖地窖斗争与彻底解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密切结合，决不可离开农民土地要求孤立进行，必须确定斗争对象是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大汉奸、大恶霸，对农民的地窖决不可挖动，每一地主有无秘密财宝，应依靠群众力量调查清楚，并根据群众意见加以区别。对地主供出的所藏财物的窝主，必须调查确实，不可乱斗，特别是供出的中农、贫农分子，尤应注意，如确系窝主，可用教育说服团结等办法，使之将地主之财物交出了事，不可侵犯中农、贫农自己的财产。

确定斗争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民在生产中缺乏粮食、衣服、耕畜、农具、种子、资本等各种困难。如斗出的果实能够基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不确知地主是否还有埋藏的财物，这样在广大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适可而止，不要主观地漫无边际地斗下去，也不要企图经过一次斗争，将地主隐藏的财物全部斗出，应尽可能地减少地主逃跑或自杀。广泛运用群众路线，这是决定斗争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必须以贫雇农为骨干，联合全体中农共同向地主斗争，特别是耐心说服教育发动被地主欺骗利用的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参加斗争。每一个斗争对象的确定及如何斗争法，须经过群众民主讨论和确定，坚决反对干部强迫命令，及少数积极分子脱离广大群众的恐怖行动。斗争的领导必须掌握在正派的贫苦积极分子和忠实可靠公正廉洁的干部手中，保证斗争果实不被贪污浪费，能真正落到全体贫苦农民手中，流氓和贪污腐化干部当权又没有可靠工作团的地

方，暂时不要进行，也不要在报纸上公布挖地窖的消息，必须制止那些流氓分子和少数坏干部自动进行的现象。

电报中还介绍了华北各地挖地窖的一般方法：

(1) 利用地主家中长工婢女，进行周密调查，并争取教育被地主利用的落后分子，将地主隐藏的财物交出。

(2) 为防财物转移，用忠实可靠的群众和民兵监督地主，为防逃跑必要时将地主扣押。

(3) 逼使地主讲出财宝地窖，可用群众大会的压力和群众斗争威胁。

(4) 用个别谈话等各种方式，分化其家属的内部，或利用亲友及其他地主进行劝说，甚至谈话中只提出一定数量的财物，令其交出了事，不要提他们的全部，并在谈判中讲明，保证地主留下百分之几的数目。

总之，要以群众斗争和个别谈判等软硬各种方法配合斗争。一般情况下，软的方法收效较大，决不可只用硬的方法，弄成僵局。

中央工委在《关于土地改革中挖窖问题的几点意见》中还认为，挖出的一切果实，应由群众大会选出若干忠实可靠的农民组成保管委员会（工作团派可靠干部参加），专负登记看守保管之责，但没有动用和分配果实的权利。同时由群众大会宣布纪律，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和任何手段侵占斗争果实，不经大会决定不准动一钱一物，违者给以处罚。工作团要教育一切团员，严守群众纪律，不得拿取和动用群众果实。上级领导机关严禁任何干部将群众果实作为私人馈送的礼物。必须将全部果实分给贫苦农民，按人口及贫苦程度公平合理的分配，同时，也要部分有利于中农。分果实时，在群众中提倡勤俭节用，反对挥霍浪费，一切分得的果实，都用在生产建设成家立业上。

中央工委《关于土地改革中挖窖问题的几点意见》传达到东北后，在“大胆放手就是政策”的口号下，东北的黑土地上“砍挖”之风愈吹愈烈。据《东北日报》报道：

自6月中旬群工会议后，由于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走群众路线和大胆放手的结果，一个月来，双城全县轰轰烈烈普遍展开的深入斗争，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和运动之深入人性（心），为空前未有。四乡农民结队成群手执扎枪，进城起运浮物，每天总有几百辆大车从四门涌进涌出，每乘阴雨坏天，则更是纷纷冒雨踏泥前来，吆喝连成一片，构成一幅翻身群众气势豪壮的新图景。据初步不完全统计，全县卷入这个斗争的村屯达70%以上，取出浮物底财总值共约21万万零500万元，并有枪支若干。群众响亮地喊出了“割尾巴！”“挖大树根，油水要光，威风要倒，天下是咱们的！”等口号。在群众威力下，地主的地产、浮物与贵重物品，从最隐蔽的地方追了出来，挖了出来。

自本月（按：1947年7月）7日至17日间，（延寿柳河区）全体干部本着“凡事与群众商量”、“满足群众的要求”的精神，又与群众启发讨论“为什么没有彻底翻身?”

和"饿肚子怎么办?"等问题,经过一很短时期的思想酝酿,群众领会我们的政策,"心里有了底",于是很快地9个村(共26个屯)80%以上的群众,如霹雷闪电一样,到处起来斗争大地主,"追浮物","挖底产",仅柳河村一天斗了8家中、大地主,他们扛着洋炮、扎枪,到处起东西,挖地窖,刨院套,搜山搜河,挖出若干浮物底产,初步统计,共获主要果实:金耳环52副,金戒指12个,银元宝1个,银元50余枚,银镯179双,粮食146.6担,牛马239头;大猪342口,蜜蜂109箱,胶皮轮大车15台,铁轮车40台,自行车12台,衣服被褥3000件(坏的不在内),布3601尺,其他如棉线、豆油、食盐、火油、木板、抖板、家具等等很多,估计仅浮物底产总值约1万万5000万元左右。

斗争形式,在这次运动中,是多种多样的:(尚志县)有一面坡清算八大家的两万余人的大会,有城关仁爱分区的各小组轮流过大堂的形式,有元宝村的"过筛子"形式——农会过一次,妇女会过一次,儿童团再过一次,有诉苦会,有公审会,但不管形式的多种多样,基本上也还有群众路线和非群众路线之分。经过群众思想酝酿了的,由群众说,群众问。一面坡两万人的大会,酝酿了七八天之久,附近三十里的大安、马延、老街基的群众都来参加,会议完全由群众掌握,台上台下,挤得满满的,吵成一片。太安(区)荣安村斗争会中,当群众打一个地主时,有人说:"他是残废。"群众说:"他人残废,心可不残呢。"斗争会从学校开到地主家里,男人斗男人,女人斗女人,在这样斗争会里,群众毫无顾忌地说自己要说的话,干自己要干的事。

7月27日,面对波涛汹涌的"砍挖运动",东北局也感到:"挖财宝运动起来很容易,发展也很快,但掌握政策则更困难,尤其在'夹生'地区如果掌握不好,如果不成为正派干部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则挖财宝的果实容易为少数干部所得,挖财宝斗争不能与改造'夹生饭'相结合"。为此,东北局要求在"挖财宝"运动中,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只能挖大中地主、汉奸恶霸及个别为群众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小地主、富农,对一般的小地主、富农不赶大院,不挖财宝,只分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及多余的牛马,只分小地主的多余的土地和多余牛马,不准挖富农、小地主的窨,对中农的利益绝对不得借口侵犯。

1947年10月,松江省再次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上,省委书记张秀山对前一阶段的"砍挖运动"作了总结。他认为,"砍挖运动"的收获有四:一是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消灭了封建剥削;二是解决了群众困难,斗争中获得了大批的粮食、土地、金银、衣物、耕畜、农具、布匹等,只金子便有5000多两,全部果实约值250亿元,几口之家分到了一二十万的很多,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三是提高了群众觉悟,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其成分较过去都好,各地普遍盘查放哨,严厉地镇压了坏人的活动。经过"砍挖运动"之后,农村里再听不到特务的谣言。四是培养了一批真正成分好的干部,发展了一部分党员,在少数地区建立了较好的支部。同时也考验了干部,知道了什么是走群众路线,积累了发动群众的许多经验。

张秀山也指出了"砍挖运动"的毛病,他认为主要是领导上思想准备不够,运动来

得太猛，没有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思想酝酿或酝酿得不够，部分干部没有了解放手的意义，把放手误认为放任，不了解在大放手之下，更须加强领导，更加上对群众启发不够，因此使运动进行得比较粗糙。这些毛病具体体现是：（一）掌握不住，流氓乘机摸鱼，因而侵犯了部分中农；（二）乡下群众进城，过重地打击了城市工商业。（三）差不多是每斗必打，群众见打一下就能拿出果实来，认为不打就不行。杀的人和打死的人多了些。（四）由于运动进行得粗糙、猛、快、广而不'深，没有经过细致的思想酝酿和启发教育，因而有些地方斗争后群众觉悟没有提高一步。（五）有的地方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主要是作风不民主，一种是包办代替，一种是放任自流。（六）某些地区发生了干部、积极分子多分果实，先分果实，贪污果实的现象。

虽然看到了"砍挖运动"已出现明显的偏差，但要克服这些偏差却不那么容易。对挖地主底财，自然极有动员号召力。土地虽为农民所想得到的，但土地要种上庄稼，要付出劳动才能得到收获，而挖地主的底财，得到的是现成的财物，挖底财不但能解决生产资料和生产资金的不足，而且能马上解决吃穿问题，何况土地早已分配了。而且虽然这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改变，东北民主联军已开始战略反攻，但国共两党的决战仍未决出胜负，土地是搬不动的，万一国民党再来，地主进行倒算，土地可拿回去，而财宝、粮食、衣物，吃了，用了，也就收不回了。再加上挖地窖，起浮财，人多势众，热闹非凡，农民岂有不兴奋之理。这样一来，1947 年下半年，东北解放区的"砍挖运动"的势头非但没有减下来，反而愈演愈烈。

第三节　土改运动的深入

东北解放区的"煮夹生饭运动"和"砍挖运动"，只是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的一个代表。

从 1946 年冬至 1947 年夏秋，各解放区都先后开展大规模的土改复查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复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一步深入。其主要表现是：

其一，进一步打击了封建势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

晋冀鲁豫解放区是较早开展土改复查（又叫"翻身大检查"或"填平补齐"）的地区。这里的复查从 1946 年 10 月开展，到 1947 年春进入高潮。1947 年 2 月 18 日，薄一波在给刘少奇询问土改几个问题的复信中，曾这样说：

在填平补齐运动中，对地主追究运动极猛烈，土地、房屋等公开财产全部重新分配，地下所埋藏的现金、衣物、器具等亦全部追出（发生了打与杀的流弊），填补了赤贫和贫农。对地主则先行扫地出门，然后由群众民主评议，赠送一些坏地、坏房以示宽大。对自私自利的干部、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包庇地主替地主隐瞒财产，发动了广泛的挖'防空洞'运动，自私自利的干部、积极分子和落后群众坦白后，所有隐瞒包庇土

地、财产都追出来了。并采取换平办法，按远近地、好坏地、水旱地折合搭配，依全村人口比例一律平均分配（干部与群众同）；贫富村土地、财富悬殊甚大，单独进行不易消灭赤贫，则采取了富贫合村，富贫村联合斗争，共同分配果实办法；太行有些地区将贫村赤贫户移往富村，参与平均分配土地、财产，对干部家属、民主人士，则动员其自动献出多保留、多分和隐瞒的土地、房屋、财产，对坚决不献者经过斗争解决。经过这样猛烈的运动后，封建尾巴大体割掉了。

煮“夹生饭”和“砍挖运动”中，东北解放区的松江省共斗出恶霸地主土地及查出黑地37万多垧，据全省7个县的统计，共斗出粮食4万多石，马7846匹，牛2280头，衣服23593件。该省的巴彦县挖出金子60多两，双城县在一户地主家就挖出金子50两，全省斗出现款1亿元以上。这些斗争果实，全部分给了群众。到1947年7月，东北解放区共有5031908垧地分给了6290824个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最多的一人分得了1垧4亩3分地，最少的也分得了3亩地，平均每人得地8亩左右。据合江全省、松江7个县、吉林延边专区、黑龙江北安专区、牡丹江专区的统计，有44815头耕畜分给了缺少或没有耕畜的农户。又据合江全省、吉林全省、北安专区、牡丹江专区的统计，约有74193间房子分给了缺房或无房的农民。

晋察冀解放区涿鹿县十三区32个村于1947年6月、7月间开展了土改复查，共查出土地1461.2亩，房子1424间，骡、马、驴113.5头，牛149头，羊2948只，粮食300余石，银元11879元，元宝1835.2两，衣服483件，猪115头，共有612户、2176人获得了土地1436.7亩，原有赤贫59户、贫农372户、下中农225户，土改复查后共有516户上升为中农。

据华中解放区1947年秋对14个县又2个区2个乡的统计，在复查中共追查出耕牛8000多头，农具10万多件，水车、风车500余件，农船27条，房屋9.3万间，黄金700多两，白银1300余斤，贫雇农得益者11.4万户，51万余人。

其二，在土改复查中清除了一些坏干部，培养了一批新干部，乡村干部作风有了一定改变，干部队伍素质有了提高。

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中，解放区涌现出一大批基层干部，他们过去在对敌斗争、生产运动，以及领导群众进行双减、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的斗争环境及他们自身素质等多种原因，确实有部分区、乡、村干部产生作风不民主、功臣自居、骄傲自大、多占土改果实等毛病。而且在土改运动之初，也有一些游民、二流子等农村的流氓无产者，利用基本群众对斗争地主还有顾虑，土改斗争又急需积极分子带动的时机，成为土改运动初期的“勇敢分子”，甚至当上了乡村干部，也有少数的地主分子派其狗腿子假装积极，混入农村干部队伍中。这样，使农村干部出现了队伍不纯、作风不正的现象。在发动土改复查时，各解放区都把解决农村干部问题作为复查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当时，农村干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土改果实分配不公，干部多得；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群众；少数干部立场不稳，包庇与自己有关的个别地主。晋冀鲁豫解放区

解决干群关系的办法，是首先开展支部整风，放手让党员提意见，反映群众的呼声。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发表对干部的意见，领导是既鼓励群众提意见，放手让群众讲话，也给干部以安慰，告诉干部只要自己坦白，问题就一定能弄清楚，群众也一定会拥护。在此基础上，组织干部一一坦白，进行检讨，退出多占的果实。最后召开"团结大会"（又叫"一家人大会"、"一条心大会"），由群众给干部一个个评功，记录干部在土地改革运动及历史上的功劳，重新选举干部。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多数干部提高了觉悟，改正了错误，重新得到群众的拥护，干群关系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太行区磁县林坦村在填补运动中，村长王克良等十余个干部，包庇地主，14 户地主均未彻底清算。果实分配也不是统一按需要分，而是作价出卖，谁有钱谁买，没有钱的贫雇农都没翻身，而干部们却分得又多又好，并拿果实开粮店作私人生产。因此，群众对干部很有意见，"填补运动"也陷于消沉。区干部深入检查发现这些问题后，决定在干部中开展"洗脸擦黑"活动。一面给群众撑腰尽量发表对于部意见；一面启发干部阶级觉悟，劝说他们向群众"洗脸擦黑"，退出多分果实。开始时，群众都说："可不敢提意见，你们（区干部）走了，干部就要报复！"区干部再三表明说："保险没事。"群众便三三两两地酝酿，共有 200 余名群众给干部提了意见。干部见群众真正起来，有了"洗脸擦黑"的决心，但又产生怕斗争、怕丢人的顾虑，区干部又作保证："只要彻底反省，群众是会原谅的。"干部也就安心了。双方都有了准备后，就召开了 500 多人的群众大会，村长王克良把多拿的果实摆在会场，彻底检讨了自己的各种错误，讲得痛哭流涕。其他的干部也都做了检讨，并当场退出多分的果实。结果，除农会主席（当过伪军和伪村长）等 3 个坏干部经群众讨论，予以撤职外，村长等其他干部，群众认为他们虽有错误，但也有功劳，所以批准仍当干部。

各解放区在土改复查中，都通过各种方式对干部进行教育，责令其退出多占的土改果实，"对于中贫雇农成分的干部只是作风不好立场不稳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先促其在党内与干部中进行坦白使其悔悟，进而在群众中进行自我批评，以求群众谅解与公允，然后由群众决定是否保留职务"。同时，在土改中开展党内民主检讨，"撤换一批本质很坏教育不好的干部"，"大胆提拔土改中有群众信仰的工农干部到领导机关来"。这样，一批本质不好的坏干部被清洗，多数干部在土改复查受到了教育，一批在土改中涌现出的正派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充实到了干部队伍中。

其三，通过土改复查，更广大的农民投入到了土改的洪流之中，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土改复查中，一向在地主老财面前抬不起头的农民，破天荒地挺起胸膛在地主面前站起来了。这一次，他们在斗争中与地主撕破了脸皮，打破了情面，认识了地主压迫的罪恶。许多过去很少参加活动，很少说话的老实农民，也敢于诉地主的苦，把多年藏在心里的苦水吐了出来，甚至面对面地与地主斗争了。全解放区的农民几乎全都投入到了土地改革运动，他们加入到了农会、民兵等组织之中，有的人还在运动中人了党，成为乡村干部，真正体会到了翻身的含义。

尤其重要的是，一向围着炕头锅灶转的农村妇女，也加入了土地改革的大军之中。

正如邓颖超所说的："在土改斗争中，她们诉苦时所起的动人作用，在复查中，她们对进击封建残余的仔细人微，而且有时起了带头作用。在某些地方，她们成为主要的领导者。在'男人前方打仗，女人后方分田'，'男人支前，女人分田'这样的一些地方，妇女成为土地改革的主力军。"

许多连自己名字也没有的妇女，不但敢同地主斗争了，而且还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据1947年2月的统计，胶东参加土改运动的妇女有50万人。冀中饶阳、任丘等9个县388个村就有137500个妇女参加了运动，占全体妇女的半数。冀中大城县大流源村李风牛的母亲被地主压迫了一辈子，在控诉会的头两天，她联络了38个妇女和80多个贫苦农民，被群众选为"诉苦领头"。

妇女翻身后，热烈支援自卫战争，母亲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故事，比比皆是。

胶东区五龙县妇女送子、劝夫参军者有104名。陕甘宁边区华池县元城区赵克义的媳妇劝丈夫参军，临别时鼓励他说："我在家勤生产，打败蒋介石反动派再回家团圆！"

据黑龙江省龙江县调查，在全县的扩兵运动中，有1500名母亲和妻子送子送郎参军，有700多个姐妹送兄弟参军。松江省尚志县特等劳动状元刘老太太，她有6个儿子，抗日战争时期送走3个儿子参加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又送2个儿子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只留有残疾的儿子在身边。

冀中解放区一个叫李家庄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名叫金花的年轻媳妇。15岁那年，被父母许配给了外村一个姓张的人。按照当时中国农村的习惯，年轻人的婚姻只能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金花从未见过自己那位未来的丈夫的面。媒婆对他父母说，男方只比金花大2岁，可见过张的金花的朋友却告诉她，男方比她大15岁，而且还长着很丑的灰白脸，金花预感到未来的生活注定不会幸福，自此之后情绪十分低落，但此时的她，除了恨父母外，只能埋怨自己的命不好。

迎亲的那天，金花曾以死抗争，找了根绳子上吊，决心一死了之，可很快被父母发现而得救。母亲一边抱着她痛哭，一边又对她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只能听命的安排。"就这样，金花被无情地送进了迎亲的轿子里。

到了婆家，金花第一次见到自己将共同生活一辈子的男人，发现丈夫一张白脸的一边却长着一颗痣，痣上长着一根长长的黑毛，一口七扭八歪的牙齿，塌鼻梁、鼓嘴巴，嘴唇耷着，比想像中还要丑陋。可到这时，木已成舟，金花除了认定自己的命不好外，只能想方设法与丈夫一起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但这也是她的一厢情愿。

金花虽然没有像当时中国大多数的新媳妇那样受到婆婆的虐待，但她那丑陋的男人却十分的苛刻野蛮，挨揍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公公对她也是极严厉。一次，金花的母亲病了，捎信来要她回去看看，金花将这事告诉了公公，公公开始不同意，后来勉强让她回去了，可两天后当她从娘家回来时，公公却说回来晚了，命令她跪在院子里，并从中午一直跪到晚上。

金花就这样在张家苦苦熬了3年。当她18岁的时候，华北农村到处发生饥荒，并波及她所在的村子里。开始，丈夫和家里其他人吃小米，金花却只能吃糠皮和树叶。后

来灾情越来越严重，丈夫决定到天津去做买卖。金花将丈夫送到家门口，可他不但连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反而下了一连串的命令：有饭要先给公公和小姑子吃，她只能吃剩下的；在家里要规规矩矩，否则回来后就打死她；等等。这时，金花的心里彻底凉了，她再一次想到了一死了之，但又觉得这样只能给母亲增加痛苦，就打算在母亲去世后再自杀。

1945年8月，一支八路军的小分队来到了金花所在的村子。接着，县里来了一个干部帮助村里建立了妇女会，金花的女友黑玉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在黑玉动员下，金花把自己这么多年所受的苦一一地讲了出来，妇女会了解这些情况后决定为金花讨回公道。

一天，妇女会的几个干部找到了金花的公公，要他改变对待金花的态度，但老头子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叫嚷着要赶走女干部们。正在僵持之际，其中的一个女干部叫来了村里的十五个妇女，她们人人带来了绳子和棍棒。妇女们对金花的公公说："难道你真的不想改变你的脑筋?"老头子挥舞着拳头说："不改，滚出去!"妇女们一听，十分气愤，便七手八脚地把老头子捆起来，送到妇女会的一间屋子关了两天。第三天，妇女会组织了四五十个妇女对金花的公公进行斗争。在伙伴们的支持下，金花大胆地揭露了公公虐待她的事实，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对金花公公进行批斗。在众人的压力之下，公公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表示再也不敢虐待金花了。

经过这件事，金花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但在家里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而且积极参加妇女会的工作，当上了妇女会的小组长，帮助其他的姐妹争平等、闹翻身。

1947年，国民党军队发动对冀中解放区的大举进攻，金花同其他的翻身妇女一样，担心八路军（华北人民仍习惯称人民解放军为八路军）被打败，她获得的自由将毁于一旦。这时，共产党号召解放区农民努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金花便到处动员妇女们下地干活。她说："咱们现在翻身了，平等了，应该劳动，不要依赖男人。"开始，不少妇女并不听她的劝导，而且说："难道翻了身就要拼死干活?"金花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咱们不下地干活，打粮食就少，前线的战士就没有粮食吃。那样，蒋介石的军队就会打过来，咱们得到的一切就会失掉，咱们又得依靠男人。"妇女们觉得她的话有道理，纷纷下地干活。

但是，有的妇女本人虽然愿意下地，但男人却不同意。村里有一个叫白清的妇女，年轻漂亮，丈夫明确表示反对她下地。在金花的动员之下，白清还是下地干活了。看到妻子下地后家里的收入增加了，白清的丈夫很高兴。一天晚上，丈夫对白清说："一旦我不得不离开家时，你能养活全家了。"白清早就等丈夫说这句话了。她说："是呀，我现在能养活咱们全家啦，你可要参加八路军去。你年轻，不去打反动派应该感到害臊。"丈夫觉得上了她的当，不肯去参军。于是白清就不同他睡觉。丈夫要打她，她就威胁说要告到妇女会去，还扬言如果丈夫不去参军，便就要寻死。丈夫没有办法，终于骑上毛驴参军了。

金花不过是解放区千千万万翻身妇女的一个缩影。

第四节 出现偏差

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运动启动之初，国共两党的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国内和平的大门也尚未被完全关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必须发动群众，为不可避免的战争作准备，而要动员群众，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山雨欲来，而且必然是急风暴雨，但毕竟暴风雨还没有落下来，只要还有一线和平的希望，就必须争取，哪怕这种和平是短暂的。启动土地改革运动的“五四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到1946年底1947年初，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以1946年6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由此拉开序幕。一时间，国民党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的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下午，他便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

按照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必须先进行直接、平等、自由和无拘无束的选举，由此产生国民大会的代表，并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而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显然，蒋介石此时要召开的“国民大会”，就是要强化其一党独裁统治，这必然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抵制，中国民主同盟也明确表示拒绝参加。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民盟的反对，于1947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公开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关闭谈判大门，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将撤回延安。19日，周恩来、邓颖超等15人由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1月7日，来华调处国共关系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并于次日返回华盛顿，公开宣布调处失败。

此前，全面内战虽然已经爆发，但国共之间还在维持一种谈判关系，中国共产党还在为国内和平作最后的努力。到这时，国内和平的希望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只能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这样，国共两党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使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间的对立也就更加尖锐起来。

“五四指示”制订时，中国共产党从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出发，在土地政策上对地主阶级还有较多的照顾，如分地时留给超过中农半倍至一倍的土地，采取清算而不是没收的办法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甚至打算用征购这种有偿的办法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至于对富农则照顾的内容更多。

1946年底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后，伴随国共军队间的激烈战争，双方所代表的农民与地主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原来出于争取国内和平的考虑对地主的某些照顾，随着和平之门被国民党关死，也就没有必要再作为土地改革须顾及的因素了。一方是拥护共产

党的农民，特别它的底层贫雇农，一方是支持国民党的地主。为了得到农民的坚决支持，必须更多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给了地主以照顾，农民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因为土地就那么一些。农民不但要求土地，还要求有耕耘土地所需的生产资料，要求改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不但不能给地主多留土地，就是地主的浮财，也必须拿出来，否则农民的要求就无法得到满足。

所以，伴随土改复查的，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悄然变化。在对待地主问题上，一是不再对中小地主以及抗军干工各属给予照顾；二是不再用清算、征购的办法而是对地主的土地进行无代价的没收，直接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三是对地主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粮食、衣物等生活资料，及地主多年积累的金银财宝等浮财，也采取没收政策（挖底财也就由此而来）；四是给地主不再保留多于中农二倍的土地，而是在没收之后再分给其全村农民平均数的土地（实际上地主土改后的土地常常要少于农民的平均数）。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的规定，而是认为“在复查土地割封建尾巴的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满足农民要求”，“对一般的富农可用协商调解征购等办法使其拿出一部分土地牲畜”，只是“对于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应以不动为原则”。

这种政策的变化是必然的，但如果掌握不好，就不可避免出现偏差。比如，除没收地主土地之外，还可没收地主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及底财，这恰是许多农民斗争地主时最感兴趣的内容。因为这些东西不但可解农民生产、生活的燃眉之急，而且即使地主有机会倒算也难以要回去。中国地主的剥削所得，除了购置土地、修房造屋和日常生活开支外，很少用于工商业投资，而是用于购置金银细软收藏，因此地主们或多或少都有底财。面对土地改革的滚滚大潮，地主在土改中自然要千方百计地保住这些财物。地主不愿交出底财，农民就会想方设法迫使地主交出。在这个过程中，除动员丫环、佣人、长工及其他知情人揭发之外，当面斗争也就必不可少，遇上顽固的地主，农民就难免使用打骂的办法，开展肉体斗争。

长期以来，地主作为统治阶级，一直与反动政府相勾结压迫剥削农民，在日伪统治时期，他们有的又与日伪狼狈为奸，为虎作伥。于是，农民与地主间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许多农民对地主也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如果对这种情绪不加控制和引导，就可能对地主乱打乱杀。“五四指示”规定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主要是考虑不能由此波及中农利益。在中国，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与富农并不容易区别，就是富农本身，其封建剥削部分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部分亦不易区分。在动富农的土地、财产过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严格分清中农与富农及新富农（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与旧富农（带封建性的富农），就可能把一部分中农当作富农对待而使其利益受到侵犯。可是，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恰恰是只较多地考虑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以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农民，对于上述政策性强的问题未能及时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也就发生了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对地主乱打乱斗的“左”的倾向。

在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在各解放区都有程度不同的出现，其中，晋绥解放区就颇具代表性。

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开始之时是健康发展的。到 1946 年底，占全区 1/3 人口的 100 万名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其中老区 40 多万名农民得到了 260 余万亩土地，新区 50 多万名农民得到了 200 余万亩土地。

晋绥土改进入复查阶段后，"左"的倾向逐渐抬头。

1946 年 12 月初，晋绥分局派出工作队，来到兴县木栏杆（也叫木兰干）村进行土改试点。

木栏杆是兴县蔡家崖行政村所辖的一个自然村，距蔡家崖三四里，全村有 50 多户，190 多口人。这个自然村由前木栏杆、后木栏杆和刘家梁三个小村组成。全村有 2000 多亩土地，其中 1000 多亩是蔡家崖牛姓地主的。前木栏杆住着 12 户农民，只有 150 多亩土地，人均不到 3 亩，而且都是坡地，整个木栏杆村没有一户是靠出租放账剥削他人为生的。当时，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的家属大部分住在这个村里。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很快摸清了全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发现除了张守贤、张守进四兄弟土地略有长余外，其他的 40 多户都是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就是张氏兄弟也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常年参加农业生产，既未雇过长工，也未出租过土地，仅是在农忙时雇几天的短工，他们靠勤劳节俭，积存了一些粮食。1940 年边区政府提出"四大动员"的口号后，张氏兄弟积极响应，为抗日政府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谷草。土地改革时，张氏四兄弟分了家，每户的土地就少了，不但离地主差得远，就是连富农也够不上，顶多也只能算个中农。

工作队把木栏杆村的情况向分局作了汇报。分局的一位领导说，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看他们的父亲、祖父是否曾经有剥削行为。即便是现在破了产，也可以划成破产地主、破产富农嘛。

在这位领导的"启发"之下，工作队回到木栏杆重新订成分。按照分局领导的指示，工作队在划成分时采取查三代的办法，哪怕一个人现在是揽工汉，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一种划成分的新办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发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墓是围不起围墙、立不起碑的。农民张守万出身贫穷，从小就揽活受苦，1940 年经过减租减息日子才好起来，由于表现积极，1942 年入了党，后来又担任村长和村支部书记。工作队在查三代时，发现张守万家的祖坟里有三块石碑，就认定他的祖上是地主，他本人则是破产地主。于是停止了他的党籍，还撤销了其贫雇农委员会的职务，并将之定为批斗对象。按照这样的方法，工作队在木栏杆村硬是划出了 4 户地主、4 户破产地主、4 户富农，地主富农占了总户数的 30%。

既然有了地主、富农，就得发动群众进行批斗。可是这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其实条件也是和贫雇农好不到哪里去，并无多少压迫剥削他人的行为，自然产生不了多大的阶级仇恨，斗争也就发动不起来。工作队见状，就带领几个所谓的"勇敢分子"（其实是村里的二流子）去挖底财。结果在全村共挖出了 220 块大洋，其中在刘家梁的张拖喜家挖出的就有 200 块。工作队有了这个收获，便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斗争。其实，张拖

喜家的这200块大洋，是他兄弟俩多年辛勤劳动得到的血汗钱。为了积这点家底，兄弟俩长年辛苦劳作，年终腊月还要磨豆腐卖，根本不是剥削所得。但工作队根本不顾这个情况，还说土改就是反封建、斗地主，木栏杆既然搞出了八九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分子。可是，到哪里去找恶霸分子？张氏兄弟曾和村里的一位农民打过架，挖底财时，又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个“积极分子”，被揭发出来，定为恶霸分子关押起来，家属则被扫地出门。

工作队负责人在木栏杆村挖出了“恶霸地主”后，到晋绥分局汇报了有关情况。分局主持土改的领导人对其表扬了一番，并要工作队乘胜扩大战果。工作队乃组织召开全村贫雇农积极分子会议，要求大家控诉“恶霸地主”分子的罪行，并把张拖喜、张拖长兄弟捆起来，绑在两棵木桩上，要群众控诉。全村的群众都了解张氏兄弟的为人，知道他们没有血债，连那位同张拖喜兄弟打过架的农民，也说打架是自己的过错。可是，工作队干部却说群众觉悟低，没有同恶霸地主划清界限，还说：“恶霸地主心可毒哩，直到现在还骂我们哩！”可是群众还是不动手。这时，工作队便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找两个“积极分子”枪毙张氏兄弟。群众听后大吃一惊，许多人向工作队求情。工作队一个队员站起来说：“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结果，张氏兄弟当场被两个“积极分子”执行枪决。

在木栏杆村的土改试点已出现“左”的倾向之际，中共中央于1947年1月31日作出决定：派康生、陈伯达率中央考察团前往晋绥帮助土改，同时了解情况，总结前一阶段土改经验，为准备在5月召开的土地会议作准备。

现在有些论著中，将晋绥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全都一股脑推到康生、陈伯达身上，甚至将木栏杆村的试点也说成是陈伯达干的，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的确提出了许多“左”的观点，但所有“左”的东西并非都是他们的发明。康生、陈伯达的错误，主要在于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偏向没有认真去纠正，反而加以发展，而他们又是以中央考察团的身份来晋绥指导土地改革，结果大大加剧了“左”倾偏向，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1947年2月中旬，康生、陈伯达来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2月下旬分别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和静乐县潘家庄行政村进行土改试点。

这两个行政村都属于老解放区，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郝家坡行政村包括郝家坡、徐家沟等10个自然村，其中郝家坡自然村有124户，内有地主3户，富农3户，中农49户，贫农69户。由于多年的减租减息以及边区政府合理负担政策的贯彻落实，地主、富农的土地大量出典、出卖和、被贫雇农赎回，村里最大的一户地主转出土地227亩，只保留土地63亩，全家人均近8亩，一些贫雇农获得了土地，人均达到了近6亩。潘家庄行政村包括潘家庄、大圣堂、张家庄和城东沟等4个自然村，共有347户，1239人，除了大圣堂村有5户地主、1户富农外，其他3个自然村均无地主富农。大圣堂村最大的一户地主在1937年时曾有土地565亩，占有全自然村土地的60%，但经过减租减息和清算，到陈伯达来时，这户地主剩下的土地已只占全自然村土地的

7.5%，贫雇农也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土地。这两个行政村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时，并不需要再来一个打乱平分，只需进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即可解决。

康生、陈伯达在试点工作中却没有这样做。康生在郝家坡认为，在以往的减租减息和清算运动中，农民所得到的土地只占极少数，从地主手中转移出来的土地，自由买卖的占90%，农民出了大价钱买土地，地主则卖了地得了白洋又减轻了负担。他还说，干部对带有恶霸性、贪污性的地主勇于斗争，清算办法也熟练，但没有消灭整个地主阶级的思想。他甚至认为这里根本没有贯彻“五四指示”。当然，康生也承认，自己对农村确实不了解，没有经验，从延安来，只有八个字，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了解情况，有经验。他还说：整个的土改，一部分中农得到了土地，得不到土地也得到其他东西。我们要扶植穷人抬头，建立贫农小组，无论如何不能使贫农小组孤立起来。

到了具体划阶级时，康生却提出了自己一套理论。他说：老区的地主近于破落，和新区不同，在土地占有上看，好像不是个地主了，但这些人如果要从经济上看，那就是犯了绝大错误。他还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主，已不再是过去那些地主了。他们狡猾得很，很多人看上去是中农，其实是地主。当时，有人提出对于如何划分阶级，晋绥分局1946年10月印发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已经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可是康生却说，这个小册子只强调了剥削关系，以一般的条件来看，那是搬教条。小册子以为下面提高了成分，把中农提为地主了。其实下面的情况不是那样子。不是“左”了，而是右了。他甚至说按照分局的那个小册子，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了，就不要搞土改了。这个小册子在重庆可以用，在晋绥不能用。不久，晋绥分局发出指示，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收回烧掉。1948年4月，毛泽东路过晋绥时曾说：“在你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

在划阶级成分时，康生提出，不但要看有无剥削，还要看铺摊摊的大小，并推荐了兴县木栏杆村土改工作队的“经验”：进坟地看围墙和石碑，查三代定成分。按照这样的阶级划分法，郝家坡自然村重新划了阶级，地主由3户增加到6户，富农由3户增加到8户，地富的总户数由原来占全村的4.8%，增加到11.3%。

划完阶级后，土改进入诉苦和清算阶段。这时，农民仍习惯于用减租减息时向主席团“提意见”、“提问题”的方式，康生见后认为对地主太客气，提出的要求也不高。他说，要算得地主倾家荡产，要指着地主的鼻子骂，打地主几下也不要紧。在随后的斗争中，农民果然动手打地主。结果，将对地主的说理斗争变成动刑体罚，乱打乱斗现象也就在晋绥蔓延开来。

康生在郝家坡还发明了“化形地主”一词。在一次对地主的斗争会上，群众把一个地主婆往瓦碴上拉，一下子扯破了外面的烂衣服，露出了里面的好衣服。康生说，不要看表面上地主穿了破袄，在土地上装作贫农和破产，在政治上对我们表示开明或同情等，但实际情况常常是在经济上把土地变成白洋藏起，在政治上用一种奸猾的手段来篡夺我们的政权，实际上是化了形。由此，“化形地主”一词便传开了，在找“化形地主”的时候，把许多工商业者也当作化了形的地主对待。

康生还鼓励在土改斗争中挖地主的底财，说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底财要坚决地要，只要不逼死他就行，但地主自杀不要怕。于是，晋绥掀起了挖地主底财之风，挖不出就逼，逼不出就打，一些地主经不起逼打而自杀。

康生在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还认为"我们的党（按：指党支部）还不是土地改革的党"，"政权（按：指乡村政权）也不是土地改革的政权"，"农会干事绝不干农民的事"。因此，"不能下决心彻底改造党政农，那么土地改革不会彻底"。又说："凡压迫过群众的干部，群众要斗争就斗争，要求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结果，以贫雇农小组代替了农村党支部和乡村政权，原来的干部被当作阻碍土地改革的"石头"而搬掉。

陈伯达在静乐潘家庄的做法，与康生在郝家坡的做法如出一辙。由于这里的封建剥削已基本被消灭，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已大体解决，陈伯达就将斗争的矛头对向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村里有一个叫郝圆脸的农民，1939 年入党，1941 年任民兵中队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勇敢，生产成绩突出，1944 年被晋绥边区政府授予"特等民兵英雄"称号。郝圆脸工作虽然积极，但方法比较简单，对群众的态度也比较粗暴，生活作风上也有点问题，有较为严重的自私思想，群众对他有意见。陈伯达率领的土改工作团来了后，部分群众要求清算郝圆脸，甚至提出要枪毙他。参加工作团的静乐县委书记不同意枪毙，认为群众揭发的问题需要查证落实，郝圆脸虽有错误，但罪不当死，而陈伯达则认为，枪毙郝圆脸是群众的要求，工作团应该满足，否则就脱离了群众，乃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将郝圆脸枪毙。

枪毙郝圆脸后，陈伯达认为这里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存在严重的组织、作风和思想不纯，不能作为土改依靠对象，有的干部还成了土改运动的绊脚石。于是不顾静乐县委的反对，将潘家庄行政村及所属的自然村干部，全部隔离关押起来，交给民兵积极分子看管，发动群众揭发、清算和批斗，交群众过关。凡是过了关的干部调往别处工作，过不了关的干部则撤职。

在接下来的划阶级时，陈伯达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不仅要看现在的土地、财产，而且要查历史上，起码是三代以内的土地、财产及有无剥削；二是看政治表现，也就是群众的态度；三是看铺的摊摊的大小。

按照这三条标准，潘家庄重新划分了阶级，全行政村有 2 户中农被错划为地主，有 8 户中农被提升为富农。全村的地主富农比原来多了 1 倍。

划分阶级之后进行土地分配，城东沟自然村的贫雇农要求把土地打乱按等级重新分配，把好地分给贫雇农，次一些的分给中农，再次一些的分给曾经占过便宜的干部。这种意见遭到了中农和土改工作团的反对，因为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二一指示"）中讲过，老区土改执行"填平补齐"，也就是用中间不动，两头扯平，即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而不需要来一次打乱平分，他们据此认为把公地分配给土地较少的贫雇农就可以了。陈伯达却认为贫雇农的要求一定要满足，可这个自然村又没有地主富农，只有中农，怎么办？陈伯达就想出了让中农"献地"的方法，于是夜以继日地做中农的工作，要他们"自动"献地，并将需要献出的数量分配给每户中农，先由

中农杨祥大按要求带头“献出”了36亩地，其他中农也只得照办，共“献出”822.2亩地，加上公地36亩，分配给了贫雇农，还抽出了中农5间窑洞、9件农具，分给了4户贫雇农。

1947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晋察冀主持中央工委工作时路过晋绥，发现这里“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晋绥六地委又向他报告说：全地区5个县共1500多个村，群众已发动者900多个村，农民已分得土地者200多个村。但这200多个村是分散在5个县，不成一片。因此，他们至今没有一个县甚至没有一个区是已经像样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地委也曾用强有力的工作团以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解决一个村子的土地问题，但不能用这个村子作为出发点，去推动附近村庄的运动，把附近村子的问题解决，并改造区政府、县政府及区县其他机构，以便依靠这个区县政府，由上而下的有步骤的发动全区全县的群众，解决全区全县的土地问题，并保障这个村子的群众的胜利。他们只作好一个村子，附近村子及县区机构都不动，这个村子即如海中孤岛，十分孤立。工作团一走，群众的胜利即无保障，工作又可能塌台。

针对在晋绥了解到的这种情况，刘少奇于4月22日给晋绥领导人及康生写了一封信，认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并强调：“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刘少奇在信中认为，为了有很好的开始，不能不依靠强有力的工作团，但仅仅依靠工作团，决不能普遍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有几万个村子，决不能组织这么多工作团去一一解决。所以土地问题的普遍解决，必需而且主要的是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在个别村子的典型运动开始后，周围村子的群众就自动照样开始，使运动成为潮流，成为风暴，才能解决问题。他说：“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自发运动，应加以鼓励促成，并尽可能给以组织性和纪律性。”刘少奇在信中指出：

> 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批评与撤换我们任何干部，在各种会议上令他们报告工作及答复群众所提出的质问。指出他们的缺点，揭发他们的错误，选举或不选举他们到领导机关。群众的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使其不受侵犯。

毛泽东曾对刘少奇的这封信给予充分肯定，他在批语中写道：“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

4月24日，刘少奇和朱德又向中共中央系统地汇报了他们在晋绥了解到的情况，并指出：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农民生活很穷困，生产降低及破产现象，到处可见。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

长期战争。信中建议晋绥分局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并从党政军民各机构中抽调最可靠的干部组成工作团，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建立贫农小组，建立村、区、县及边区的农会组织系统，依靠农会组织及工作团去彻底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将刘少奇和朱德的信转发给了晋绥分局，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信中提出的改进办法。

刘少奇在信中提出土地改革应充分发动群众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土地改革是农民自己的事业，只有他们自己行动起来，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任何"恩赐"的观点和包办代替的做法，都不可能完成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他提出的群众自由批评与撤换干部的权利，在理论上也是对的。各级党政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对人民指手画脚的权力，他们如果不为人民服务，人民自然有权力批评，甚至撤换。但他提出土地问题的普遍解决，"必需而且主要的是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这样做后，如果掌握不好，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造成对干部和党组织的不信任，对群众运动缺少必要的组织和引导，产生尾巴主义①。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晋绥分局的个别领导人和来晋绥指导土改的康生、陈伯达，没有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刘少奇的指示，只强调发动组织群众的重要，而不提信中所讲的必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将刘少奇所说的"群众的自发运动"，理解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对群众运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1947年5月8日，晋绥分局在郝家坡召开有各土改工作团代表参加的土改工作汇报会。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遇事和群众商量》的发言，中心意思是凡群众认为不适当的决定，要听凭群众推翻，由群众重新决定；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改造各级干部和组织。康生则在会上大谈"挖底财"的经验。陈伯达听后表示，他忘了"挖底财"，说要"补课"。由分局主要负责人亲自指导的木栏杆村土改工作队，则提出在划阶级成分时，不但要看有无剥削，而且还要"查三代"，"看铺摊摊的大小"，"看政治态度和思想"。会后，晋绥分局将《关于兴县后木栏杆自然村成分问题的研究》，印发给了各土地工作团。

《关于兴县后木栏杆自然村成分问题的研究》主观地认为："该木栏杆村的地主富农所占的人口和户数的比例是相当大，但是贫雇农人口和户数却相当小，在这样的阶级对比形势下，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来一个大翻身，使贫雇农真正站起来，确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而订成分对于这一斗争过程则是起着决定的启发和推进作用。"

在划分阶级时，这份材料强调要"联系历史"和看"政治态度和思想表现"，认为订成分的斗争，实际上是经济、政治、思想错综在一起的斗争。在订成分时，要着重其政治态度如何，对穷人的态度如何，对新政权的态度如何。这个村在查该村张姓家族时，从满清乾隆年间查起，查的结果是张姓有的人七辈子都是老财。这份材料很欣赏一个农民的话："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粘上点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例如，该村有个农民，虽然没有什么财产，但他是"坏干部"之一，又是张姓后代，就订其为破产地主；有的农民没有得过父辈的遗产，从小当雇工，现在也不富裕，但是个干部，也是张姓后代，祖辈上剥削过穷人，又做过"坏事"，就订为富裕中

农。又如农民张维世兄弟，在订成分时被认为订成地主高了，订成富农又低了，为了这件事讨论了两个晚上，最后有人说，就订成“下坡地主”吧，于是张氏兄弟就成了“下坡地主”。这份材料对这种做法颇为赞赏，称许这是“老百姓创造的说法”。

这份材料还对订成分时“翻三代”的做法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农民觉悟的提高（即地主历经剥削，农民受压迫剥削生动历史的认识）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因此应当承认翻历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是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武器”。

1947 年 6 月，康生和陈伯达离开晋绥，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但他们在土改试点中一套“左”的做法，并未因他们的离开而中止。正是因为他们是中共中央派来指导晋绥土改的，以后一段时间，晋绥分局的个别领导人，不但将他们那一套“左”的做法延续下来，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

6 月 3 日至 7 月 23 日，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研究土改、整党等问题。在会议之前，晋绥分局曾派人到岢岚县的中寨和静乐县的大王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里的土地改革过重地打击了富农和侵犯了中农利益，斗争中使用各种肉刑，群众怕要土地，贫雇农怕翻身，中农怕上升。当时，晋绥的河曲、保德一带流行这样一首顺口溜：“进了村子找头头，找到头头找岔岔，找了岔子就斗他，斗了大的斗小的，筷树林里选旗杆。”对于这个情况，晋绥分局有关负责人没有引起重视，反而提出了一套“左”的观点。

会议认为，“关于彻底坚决地消灭地主，是要彻底执行的，绝不纠正。”“过去的一面消灭、一面照顾的政策，实际上抵消了彻底消灭地主。今后是采取打落水狗的办法，彻底消灭之。”关于如何划分阶级成分，会议认为 1946 年分局《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强调了剥削关系，“是搬教条，假如按那个一般条件划，那就在晋绥找不到地主，因为地主化形了”。“今天定成分要注意他的历史情况，有一般的地主，有转化地主，有破产地主”“富农有多种，一种是生产富农，一种是封建富农”。“不提‘扫地出门’，是提‘彻底’口号，群众愿意‘彻底’到什么程度，我们就领导到什么程度。对地主先搞光，再说别的。让地主也过过最穷苦的生活”。“定成分主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定，不能让群众服从咱们的意见，而是咱们服从群众的意见”。“挖底财”“表示与地主斗争的决心，是最后一关与地主绝缘”；“主要经验还是用群众的压力”，“可以个别地压，群众压也不一定是每个地主都打，一般的群众打是带恶霸性的”。“搞地主工商业以清算封建（名义）把工商业拿出来，不要以搞工商业的名义出现，而以响亮的搞封建的名义出现，关了门也不要害怕。领导上不要大喊大叫，说已经决定了要搞工商业，公开宣布下去，而是要批准群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会议还认为，“目前我们组织的状况，从支部到县委甚至地委，是不能胜任土地改革任务，故须改造。区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出身占 75%—85%，坏干部中有异己、投机、新恶霸三种分子，应该把他们清出去”。

这次会议后，这些“左”的观点逐渐贯彻到晋绥土改的工作中，并一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土改复查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各解放区都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现。薄

一波在回顾晋冀鲁豫解放区土改复查时，曾这样说：

进行“翻身大检查”的过程中，“左”的错误迅速发展。

一是“挤封建”中出现了“挖窖财”（也叫“斗地财”、“挖内货”），捆绑吊打，乱斗乱杀。开始，“挤封建”主要是发动“落后层”群众，特别是一些替地主藏衣物的妇女，以及地主家里的丫环、童养媳，“挤”出地主隐藏的财产。后来有的地方挖出了地主埋在地下的银元、元宝。于是，许多地方都干了起来。有的地方还侵犯工商业，追到城里封门拿账本。

二是把地主、富农“扫地出门”。这是与“挖窖财”联系着的。有的地方，把地主赶到破庙里，破窑里，说“让你们讨饭半个月，尝尝穷人的味道，转变了再照顾你”。

三是在复查划阶级成分时有些地方为了扩大斗争面，多分浮财，有意将中农划成富农甚至地主。定成分不是按文件规定的以反奸清算的前三年为准，而是追三代。有的甚至根据本人政治态度不好及两性关系或干部作风有毛病，就给戴上地主、富农帽子。

四是区村干部纷纷被斗争。有的地方还提出“搬石头”、“反新贵”，把多占土改果实、作风不好的区村干部同地主一样对待。

太行解放区武安县十里店村，在1947年春的“割封建尾巴”运动中，共斗争了84户，占全村420户的20%。在这84户中，后来除2户未改变成分外，其余的82户中，57户是老中农，7户是新中农，18户是贫农。也就是说，有97.6%的户是斗错了的，而且错斗户全是中农和贫农。

晋察冀解放区阜平县在1947年5月的土改复查中，为了制造紧张的斗争空气，搞村与村之间互相清算，造成村与村基本群众互相对立，被地主特务钻了空子，使社会秩序混乱，仅半个月的时间里死于乱打乱斗者130人，地主普遍被扫地出门，中农利益被侵犯纷纷外逃。尽管晋察冀中央局及时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但仍造成了很大损失。据统计，晋察冀土改复查中出现严重打死人的，波及河北七八个县几十万人，仅平山县在5月18日到20日的三天中，即打死人100多人。

1947年4月，冀东第十四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决定在所属各县开展土改复查，地委于6月22日给冀东区党委的报告中说：“运动深入的地区（平谷四、五区一部村庄及顺义各区一部村庄），对地主清算相当彻底。地主封建势力彻底消灭无一漏网，其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余威已彻底搞垮，把地主恶霸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一切物质全部搞出来（农民叫做‘搬家’、‘抄家’等）”。在对地主实行抄家之后，“先令其扫地出门，然后待地主向农民低头投降之后，再由农民民主评议赠送一些坏房（不是其原来的房子）与坏地（不是其原来土地）以示农民之宽大”。冀东土改在抄家、挖底财的过程中，地主的房屋院舍被掘地三尺，富农的自耕地也被拿出一部分，以前是地主、富农现在下降为富裕中农或中农者也遭到清算，在开展“算穷账挖穷根子”中挖算到上三代。

当然，与土改复查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左”的偏向毕竟是局部的。

第五节　“还乡团”

土改复查主要是在巩固区开展的。在各解放区的边沿区，土地改革又是另一番景象。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之初，有计划地放弃了一批城市和县城。从1947年7月至次年2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城市105座。与此同时，这些城市周围的一些农村也为其所侵占，成为敌我拉锯的地区。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70年代“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学会了“还乡团”这一名词，这个带有诗意化名称的背后，却是一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土地改革中，一部分地主或惧怕斗争，或在经过斗争之后，逃跑到了国民党占领的城市，当国民党军队占领部分解放区后，这些逃跑了地主，出于他们对农民的阶级仇视和失掉土地财产的怨恨，组织起“还乡团”（有的地方叫“复仇队”，或者别的名称），跟着国民党军队回来后，对翻身农民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

在华中的淮北地区，“还乡团”回来后，得势的地主不仅要恢复昔日的统治地位，也要恢复往日的经济水平，因此，他们开始向农民（主要是贫雇农）追讨当初被分的田产，并要求农民补缴以前的田租，有的租息竟从开始实行减租减息的1943年算起。对拿不出钱来的农民，地主就扒屋、牵牛、端锅、私设公堂、审问吊打，甚至绑了人还要“绳头钱”，打了人还要“手工钱”。

1946年10月，人民解放军从淮北全线撤离后，当地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以及工、农、青、妇群众组织成员及军、烈属被国民党军和“还乡团”吊打、枪杀、活埋的，仅泗县一个县，即达1200余人，当时人们描述其情景是“安河两岸，遗尸累累；洪泽湖畔，血水滔滔”！

苏中“七战七捷”后，华中野战军主力撤离苏中，这里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反动地主、富农和敌对分子组成“还乡团”，卷土重来，对翻身农民疯狂的开展反攻倒算。大肆追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时堰区戴陶乡乡长王宏达被“还乡团”抓获后，被按在泥水中呛死；城南区孔鹤乡农会会长张春方遭敌“自卫队”杀害，其17岁的儿子张林亦被乱棒打死；安丰区区队副姜文旺与8名保田队员夜间遭敌袭击被捕，因拒不投降被集体枪杀；廉贻区队指导员王珏被敌“自卫队”残酷地砍下脑袋……短短几个月内，牺牲在“还乡团”屠刀之下的干部和群众达数百名。

在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鲁南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国民党军队与“还乡团”一起，对鲁南人民开展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鲁南各县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泗水县有2169人，曲阜县（今曲阜市）有2192人，邹县（今邹城市）有2700人，滕县（今滕州市）有1892人，苍山县有1594人。“还乡团”返乡后，仗着有

国民党军队撑腰，疯狂地向农民反攻倒算。他们每到一个村庄，就宣布土改无效，夺回土地，要回房屋、牲畜，对农民实施罚款，打杀土地改革积极分子。在国民党“重点进攻”时，鲁南已进行土改的近万个村庄中，有80%的村庄被反攻倒算。曲阜县共有495个村，被倒算的有480个村，占97%。平邑县共有688个村，被倒算的有558个，占81%。凡被倒算过的村庄，大多数农民都倾家荡产，造成十室九空。

1945年8月，山东八路军解放临沂。第二年，“五四指示”公布后，临沂县委在封建势力集中的城西东单、朱堡、沙沟崖等村进行土改试点。这里的贫苦农民在土改工作队的帮助下，查封了地主的粮仓，分发他们的土地和浮财，并在吐苦水诉深冤的基础上，人民政府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镇压了两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

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山东解放军主动撤出了解放区的首府临沂。当国民党军队侵占临沂后，逃亡在外的地主组成“还乡团”卷土重来了。临沂城西大恶霸地主王洪九，还当上了国民党鲁南绥靖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王洪九之父王恩堂在土改时被人民政府镇压。王洪九重返临沂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安葬王恩堂，不但所有的开支要土改中翻身的农民负担，而且还在葬礼上枪杀了7名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他还威胁群众把分了的地和财产送回来，否则将手下无情。“还乡团”回来后，许多贫苦农民和土改积极分子被严刑拷打、关押，翻身农民一批批的粮食和财物被迫送到了地主手里。城西的小曹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被“还乡团”血洗了3次，先后有13人被杀害，36人被捕，40多户被抢劫，绝大部分翻身农民被逼得去逃荒要饭。

沙沟崖村的“还乡团”将该村党支部书记陈玉增抓到后，将其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王洪九的亲信要他交出农会会员的名单，承认土改是中了共产党的奸计，并到王恩堂的坟前磕头。遭到陈玉增的严词拒绝后，“还乡团”将陈玉增踢倒在地，然后在脊背上扣上一口大锅，头部和背部扣在锅内，四肢露在锅外，几个匪徒用刺刀轮流朝陈玉增的手上、胳膊上、脚上猛刺扎了几十刀后，将锅揭开，用刺刀对准陈玉增的胸膛继续审问，但陈玉增还是只有一句话：“土地还家，合理合法。”“还乡团”无计可施，就在院子里挖了个地窖，里面放上石灰，然后泼上凉水，将陈玉增割掉屁股后，放在石灰窑里。滚烫的石灰，烘干了陈玉增的胸肺，烧得两眼像铜铃，舌头拉到脖子上，鼻孔、耳朵、眼睛里都向外冒血，最后壮烈牺牲。

道口村妇女会主任乔洪玉和刚满周岁的女儿，被“还乡团”抓进了监牢。“还乡团”使用拉梁头、割手指、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毒刑，企图从她身上寻找土改积极分子的线索。这些手段不灵后，“还乡团”竟用烟头烧她女儿，烧得小孩子身上起了许多的水泡，痛得哇哇大哭。乔洪玉还是一字不吐。最后，“还乡团”竟惨无人道地将她们母女活埋。据1948年临沂第二次解放时公安部门的统计，在王洪九卷土重来的一年时间里，鲁南一带仅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土改积极分子及其家属就有6000余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对冀东解放区进行所谓的“重点扫荡”和“全面蚕食”，反动地主、富农趁机反攻倒算，许多区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惨遭“还乡团”杀

害。反动派在玉田、宝坻的7011个村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火烧北大洼惨案”，共烧毁房屋5145间、大车245辆、渔船898艘，抢走各种物资70大车，使近4万农民无家可归。昌黎恶霸地主赵子丰，带领“伙会”（即“还乡团”）把清算他家的7位农民代表全都杀害，将经清算已分给农民的7000亩土地全部夺回。宁河县皇姑庄“还乡团”大队长潘万岩带领数百人包围南涧区公所，除区长突围时弹尽自杀外，5名被俘的区干部有的被挖出双眼，有的被砍掉双脚，区妇联主任被割去双乳后惨遭杀害。

在晋冀鲁豫的太岳区，胡宗南部占据临汾以后，立刻组织“复仇队”、“倒算队”，还组织所谓倒算“调解会”，在“没地种翻出租种地，有地种者退回土地”等欺骗口号下，无数翻身农民的斗争果实不但被劫夺回去，连原有的家当也贴上。一时翻身农民四出逃乱，地里庄稼无人收割。

安阳县六区阜城村自1946年10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后，恶霸、地主、“还乡团”，向翻身农民实行极残酷的屠杀、无止境的掠夺和倒算。该村964户，仅敲诈地亩、买枪两项款即达9000万元，其他各种勒索摊派，花样繁多，无法计算，农民土地家产尽被倒算。被倒算而乞讨者有50口人，全村有12位农民，不但全部家产被倒算，且被严刑吊打，有的地上钉上铁钉，赤身拖打，最后全被活埋。

这样的事例，还能列举许多。

在这些曾为解放区一度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的地区，广大农民以多种方式保卫已经取得的土地改革成果，打击反动地主对翻身农民的倒算。

1946年1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布告，明令保障群众翻身财产，其内容是：(一) 凡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实现“耕者有其田”运动中所收回之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均为合法财产，任何人不得剥夺或侵犯。(二) 凡地主恪守政府法令，拒绝“倒算”及自动隐藏、躲避“倒算”，或慑于奸特、蒋军威胁被迫倒算而在布告后自动退回农民者，政府当对其生命、财产予以保障。(三) 凡被人民控诉、清算过之汉奸、恶霸，安分守己，不再受奸特利用，欺压人民者，政府当不咎既往，依法保障其人权、地权、财权。(四) 凡死心塌地，勾结奸特，倚仗蒋军一时之势力，组织“爱乡团”、“复仇队”、“还乡团”、“倒算队”等反抗政府、杀害人民、抢夺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者，除发动人民再行清算外，并依法予以严厉制裁。

1947年1月，中共冀晋区党委作出《关于敌后及边沿区开展反倒算斗争的指示》，要求各暂时沦陷区、边沿区和敌我拉锯区，除大力加强土地改革外，应立即组织起来，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反倒算斗争，以保卫群众的翻身利益。该区的具体做法，一是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武装，如“解放队”、“翻身团”、“获地队”，打击“还乡团”、“倒算队”的嚣张气焰。二是坚决打击“倒算队”、“还乡团”首恶分子，并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对一般参与倒算的坏分子加以捕捉，令其如数退还农民的果实，写悔过书和保证书（保证不再参与倒算）后加以释放；对安分守己的地主富农，保证其生命安全；对于向农民、游击队通风报信者，除保证生命财产外，予以表扬。三是在反倒算中夺回的果实不当作敌产和战利品处理，一律退还群众。

冀鲁豫区的做法是：充分发挥游击区人民政权的威力，镇压个别罪大恶极的反动首

领，对地主实施有组织的全面控制。许多地方与地主约法七则，如：指点门户，报告工作人员和农会、妇会成员者杀；报告公粮资财者杀；倒粮倒地者杀；等等。说明谁先出头杀谁，并实行登记管制，要地主自找亲戚宾朋实行连环“人头保”、“财产保”，本人犯罪保人担。

太行区博爱县二区在反倒算斗争中，则发挥武工队和民兵的威力，展开政治攻势，揭破敌人的欺骗宣传。“倒算队”除了反攻倒算外，还对群众进行欺骗麻痹的宣传，同时又恫吓和威胁群众，如说：“过去做的事情，是八路军共产党叫你们做的，不怨你们，只要回来保证没事，如不回来要杀全家。”针对“倒算队”的欺骗宣传，武工队和民兵就拿地主倒算事实揭发敌人欺骗阴谋，又以群众亲眼看见的蒋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来教育群众。在方式上采用了集体开会和个别谈话、捎信传话、张贴传单等，白天不能到的村子，多在夜间去和群众干部接头，安定其情绪。对倒算分子则进行坚决的镇压和打击。武工队和民兵日夜到各村活动，镇压翻案的特务地主和斗争对象，给群众撑腰做主。对于一般的倒算分子，提出只要不翻案不给敌人做事，遵守民主政府法令，保证其身家安全。这样，有力地粉碎了地主的倒算阴谋，保护了群众的翻身成果。

前文提到的苏中区东台县，在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占领县城和主要城镇后，中共东台县委遵照华中一地委提出“决死苦斗”的口号，要求各区撤出来的党员干部返回原地，依靠群众，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各区乡坚持原地斗争的干部，冒着随时被捕杀头的危险，走村串户地发动群众，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食无常时，宿无定所，有的长期夜宿荒野，工作极为艰苦。在他们的顽强努力下，“共产党没有走！”“新四军又回来了！”的消息迅速在群众中传播开来。1947 年夏收时，安丰区委在一个大荒田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几千名群众自带中饭，天不亮离家，从解放区、边缘区和敌占区赶来开会，在区长周乃成的主持下，大会先将作恶多端的敌新丰乡乡长吴仁静和一个敌保长公审枪决，然后一起举手向党宣誓：不投敌、不报信给敌人、掩护干部、按章交纳公粮。城东区一个乡，也有 700 多人在群众大会上集体发誓，坚决跟共产党走。

1947 年 7 月开始，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战场由解放区转向国民党统治区，一度被国民党侵占的原解放区相继被收复。在这些收复区，一面宣布恢复土改，规定凡被“还乡团”倒算回的土地房屋钱财等一律算回，对倒算中有血债的“还乡团”分子坚决镇压。以山东解放区的鲁南区为例，国民党军队撤出鲁南后，全区共镇压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分子 4000 余人，处决倒算的恶霸、地主、富农和凶犯约 2000 人。

第四章　全国土地会议

第一节　会议的筹备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是土地改革运动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这次会议原本打算于“五四指示”发布一周年之际在延安召开。

“五四指示”发出不久，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为了及时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进一步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1947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这年5月4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1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要求他们各派代表1人，在5月4日前赶到延安，并且要求“到会代表不必是负责同志，但须熟悉当地土地改革情况并准备材料和意见，最好能亲自到下层考察一个月后即动身来延”。

可是，这个决定作出刚刚两个月，国民党军队便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撤离延安的决定。3月12日，刘少奇率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开延安，转移到延安北面的子长县。18日黄昏，在国民党军队的炮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了工作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城。在这种情况下，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已不可能。

3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晋察冀待命。”

十天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在陕北清涧县北部石咀驿的枣林沟会合，并于当晚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3月31日，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来到晋绥边区的临县。刘少奇在晋绥停留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开展对土地改革情况的调查。前面提到的他给晋绥分局领导的信，就是在这期间写的。通过对晋绥的考察，刘少奇感到，这里还没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但群众还没

有充分发动起来，“五四指示”发出快一年了，而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方还不多，许多干部“不信任群众，害怕群众的自动性与运动的自发性”，“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因此，他认为，要深入开展土地改革，就必须彻底发动群众，撤换那些阻碍土地改革的干部等。刘少奇在晋绥了解到的土改情况和产生的感受，对他后来主持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产生了明显影响。

4月26日，刘少奇等人来到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5月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的领导建议中央工委留在平山，刘少奇将此建议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批准。中共中央在复电中说：“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此后，刘少奇就土地改革问题作了许多讲话和指示。一方面，刘少奇提出，必须防止土地改革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应集中火力斗争汉奸、豪绅、恶霸，对中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干部家属地主仍应有出于群众自愿的照顾，可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去满足农民要求，但应避免发动专门反对富农运动，对于一般富农可用协商、调解、征购等办法使其拿出一部分土地牲畜，对于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则应以不动为原则。他还特别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使中农在复查中得到利益，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刘少奇出于迅速解决无地或少地农民土地要求，以动员发动农民支持革命战争的考虑，认为前一阶段土改中右的倾向是主要的，因而对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作了过多的肯定。他在5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说：“我劝同志们不要害怕群众犯错误，群众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主张这样办，那就这样办。”“要发动百分之九十的人行动起来，一切由他们去办，由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拥护百分之九十的群众的意见。领导他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他们看不到的问题，引导他们，说服他们，但必须由他们自己去办。我想你们在土地问题上的缺点，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即群众路线不够，群众观点不够。”

在这次讲话中，刘少奇还说：太行经验证明，消灭地主阶级一定要彻底，他们叫做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彻底，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这时候他以为活不成了，农民说，本来是我们的，看你怪可怜的，恩赐你一点吧，于是地主就感恩不尽。一定要把地主打垮了，然后恩赐他一份，他才会感恩，我看是要这样的。对群众，恩赐的观点是不对的，对地主就要这样办。

5月1日，他在一份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材料所写的批语中，肯定了该地区在“填平补齐”运动中挖地主底财，并将之扫地出门，然后由群众评议赠送一些坏地坏房以示宽大的做法，并且说：“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恐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常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

常常落后于群众甚至阻碍群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

刘少奇又说：“为了使群众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应组织经常的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县区农民代表大会等，让农民选举，农民代表会暂时统治一切，并经过他们来改造政府和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被群众批评和撤职的干部，应采取争取教育的方针，调他们学习后改派工作，并在群众中对他们的错误负责。”

5月6日，他在与朱德共同发出的《关于彻底完成冀东土改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尽可能最高限度的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第一，你们应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可从地主方面继续取得一部分土地财产填补给农民。以前主张留给地主多于中农一倍、两倍土地的意见，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和指示，传达到各解放区以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改复查中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的纠正。

与此同时，刘少奇着手进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准备工作。5月24日，刘少奇在致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为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望注意研究几个问题：（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四）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封建统一战线的经验如何。（五）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六）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如何规定。（七）在改革完成后转人生产运动的经验。（八）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需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这些也是即将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

中央工委到达平山后，原定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决定改在平山举行。5月31日，刘少奇和朱德致电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

7月初，除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的代表尚需几天才能到达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均已到达平山。中央工委决定全国土地会议立即召开。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会前准备工作报告，中央工委仅在会前编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些文件，作为参考资料。7月10日，中央工委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提出会议“拟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其他未成熟的若干问题，亦拟进行一些讨论，作些思想准备，但不作决定。会议将延长到一个月以上，工委将集中全力来进行这个会议”。7月27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中央工委的意见。

第二节　会议的经过

7月15日，全国土地会议举行预备会议，组成了会议的领导机构主席团。主席团由中央工委委员及各代表团负责人组成，主席团常委为中央工委常委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康生、彭真，秘书长为安子文。会议的工作机构为秘书处，下设文件编辑委员会，由陈伯达、廖鲁言负责。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村西边一条山沟中的一块空地上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陕甘宁、东北、山东等解放区的代表，共107人（一说110余人）。会议的条件十分简陋，主席台上搭了几块白布，以防太阳照晒，左右有两排长桌子供主席团和记录人员用。各地的代表就坐在主席台前的石头上听报告。此时已是盛夏，每天早上5点30分就开会了，8点在会场上吃早饭，开到10点或11点，代表们回到驻地吃午饭，下午三四点钟开小组讨论会。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月17日至8月31日，主要由各代表团汇报情况，讨论解决办法。第二阶段是从9月1日至9月13日，着重讨论平分土地政策，讨论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在会议开幕式上，刘少奇首先作了讲话。他提出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强调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刘少奇说：

> 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交流经验，以便给以后的运动——群众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运动以新的指导。
>
> “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左”了一切就“左”，右了一切就右，会影响各种问题，今后如何有意识地使其他工作有计划地推进，应从解决土地问题开始。
>
> 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开幕式上，朱德和董必武也作了讲话。朱德说：“五四指示”发布后的一年多，各解放区都发动群众，进行了土改，一般讲都是有成绩的。土改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党的组织得到了整顿，军队壮大了，战争打胜了。但是，有些地方土改很不彻底，这主要是

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发展起来的党员，思想上、组织上都不大纯洁，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进了党。另外，“五四指示”因受当时形势（国共谈判还未最后破裂）的限制，政策上还有不彻底的地方。朱德在讲话中肯定了解放区的工作，认为有的地方土改搞得比较彻底，有的地方搞得不彻底，但是不论怎样，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党虽然不够纯洁，但还有很多忠实坚定的干部和党员；困难是有的，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土地改革政策。因此，土改进行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他强调土地改革要从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各地人口多少不同，地主多少不同，斗争对象不同，所以做法也就不完全相同，不能一切照搬。

董必武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强调指出：“我们是革命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保障满足农民的要求的。假定我们的政权不作这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个政权就是反动的。”“‘五四指示’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党内的指示，还没有公开打出我们土地改革的旗帜。经过这次会议，我们就把土地改革的大旗打出来。”他还鼓励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不要怕讲话，也不怕别人讲错误，以便把各个地方的经验集拢起来，互相研讨，得出总结，把这个会开成功。

7月18日至8月4日，主要是各代表团在会上作报告，介绍本区的土改情况、经验和问题。

晋冀鲁豫解放区代表在汇报中说，全区共有152个县，其中100个县是腹心区，18个县是最近收复区。在腹心地区，基本上地主阶级已经彻底消灭，耕者有其田已经彻底实现。据太行新老区6个县、568个村的统计，土改后，人均拥有土地地主2.4亩，经营地主2.7亩，富农4.26亩，中农4.85亩，贫农4.8亩，赤贫6亩，雇农6.58亩，其他平民阶层3.59亩。太行、太岳的大部分地区及冀南、冀鲁豫经过复查填平补齐的地区，共约700万人口，是土地改革最彻底的地区。至于比较彻底的地区，地主阶级虽已消灭，但在分配上，尚有穷坑未填平，这种地区占的比例较大。此外，尚有1/5的腹心区不彻底，地主留地尚多一些，大部分底财尚未挖掉。

会上，晋冀鲁豫解放区代表介绍了他们开展土地改革的经验：（一）土地、果实的分配，采取依人口和贫穷程度平均分配的原则，将全村土地折合成标准亩或标准产量，满打满算，求得每人应得的平均数，依此标准进行填补，由民选的评议委员会主持，全村男女分组酝酿，划阶级，订成分，自报公议，三榜定案。（二）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是阶级路线的基本环节，必须发动贫雇农，以贫雇农为骨干，运动才能深入彻底。但亦必须团结中农，否则贫雇农孤立，运动就会失败。（三）发动“落后群众”，彻底割掉封建尾巴。（四）对地主的政策是首先彻底消灭之，然后个别安置之；对不同的地主分别对待，但均留给最后生活出路；扫地出门只适用于恶霸大地主，但未斗争前即行照顾，先给留下相当于中农的生活也是不彻底的。地主的工商业，已一律清算了。富农一般留给相当于中农的土地和生活，并保留一部分劳动起家的富农未清算，只有少数汉奸、恶霸和非法致富的富农，才扫地出门。

华中解放区代表介绍了他们开展土地改革的做法。汇报说，“五四指示”到达后，领导上一贯强调“五个不怕”（按：指“五四指示”中提出的不要害怕普遍地变革解放

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等），放手实行耕者有其用，彻底消灭封建，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在土改中普遍建立了贫农团，清理了农会，改造了政权和支部，改造调整了干部，如苏中改造了的村干部达40%，其中妇女又占40%。

华中解放区分配土地的办法是由群众自己动手，诸如报田亩人口、划分阶级成分、评土地好坏、确定分配标准，均由贫农团选举出来的土改委员会召集全村群众共同商议，以自报公议，出榜复议的方式决定之。分地原则一般是"中间不动两头平"（部分是大推平），按人口男女一样分，妇女有所有权。而且分地必分青（苗），青苗随地走，使农民得地又得粮。分地后即进行划地界，废老契，立新契。华中解放区代表在汇报中特别提出："追老契成为土改斗争中最尖锐的一幕，地主挨打，上'望蒋台'等处罚，多在此时，群众对地主，要打一才能儆百，不打个榜样，把点眼色看，地主是不会倒威驯服的。"

全国土地会议召开时，华中解放区的2400万人中，有1500万人获得了土地和粮食(包括租田变自由的佃中农在内)，解决了一部分雇贫农的耕牛、农具和房屋，获得了一部分浮财，但贫雇农生产上的困难还很多，还得两年三收成之后，才能普遍上升。"进行土改的地区，在土地上已基本消灭了地主阶级，各级参议会都在土改中垮台了，所有恶霸地主，除逃亡者外，都由农民按其罪恶大小给以应得的处分，特务的地下线也破坏了不少，一般地主都由农民恩赐以不高于农民生活的土地。逃亡地主除当'还乡团'外，生活无着，别无出路，而当还乡团在战争中又尝到送死的味道，看到我军和群众力量的强大，也产生了'变天思想'，解放区又给他留最后生活，于是回到解放区来求饶。这一经验证明，彻底打倒封建以后，留生活就是拖住地主尾巴的办法，以免他们铤而走险，积极反抗。"

东北解放区代表汇报了他们开展土地改革的经过："五四指示"到达后，除合江、牡丹江因土匪未及时肃清，发动较迟外，其他各省1946年6月间即开始行动。八九月间，运动进入高潮。至1947年新年前后，各地又开始"煮夹生饭"运动。

东北解放区代表在汇报中特地介绍了"煮夹生饭"运动的情况：

首先就从深入贫民小户着手，"到老槐树底"，提出"劳苦青"的口号，着重找长期参加生产的雇贫农，特别是青年，以之为运动的骨干。深入诉苦，挖穷根，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提出"砍倒大树，彻底分地"，"查地查坏根"等口号，进行查黑地，追浮物，挖地窖，查假斗假分；并配合起枪，挖土匪根，挖特务根。在接敌区与敌后，则进行保田自卫反倒算，以纠正前一阶段中不彻底的毛病。群众起来后，在农民内部又展开了"一条心运动"，洗脸，翻心，反两面光，挖臭根，清洗了狗腿流氓伪人员，一批真正劳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取得了领导地位。果实分配比较合理了，也给村的组织工作准备了较好的基础。

其他几个大解放区代表在汇报本区土改情况时，主要是检讨自己的右倾错误。山东解放区代表汇报说：

一年来，各区土改的实际情形是：滨海与鲁南大部地区曾结合反特，发动清算，草草搞了一个多月的土改。鲁中则多为献地，胶东70%以上是用献田方式，地主献坏田、远田，装开明，钻空子，或暗或明地继续统治着群众，而我们则给献田地主颁发奖状，大肆表扬。对富农的封建部分则规定按“三七”或“二八”削弱，唯恐打击太重。胶东土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改革。至于渤海则尤为复杂严重，党内成分极为不纯，如直到目前为止，仍有三分之一以至二分之一以上的村干是伪人员，区党委的领导也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抗战期间，即无深入的群众工作，日寇投降后，除一分区少数县份外，反奸清算运动并未展开，而且由于领导上右倾麻痹，无原则的宽大，已被群众捕押的汉奸，又先后释放，于是局部的反奸清算运动也被压下去了。执行“五四指示”，也是右倾献田（四分区的个别县份曾由右倾献田又一变而为“左”倾的脱离群众的强迫实行打乱推平），群众仍未发动，地主则与汉奸、国特、土匪相结合，武装反抗，数十数百人一股，到处横行，村以上的脱离生产的干部被杀者三千余人，积极分子被杀者两千余，干部恐慌，群众不敢抬头。而领导上仍不觉悟，依然一味宽大或单纯军事剿匪，此剿彼窜，成效不大。

晋绥解放区代表认为，“五四指示”并未在老区掀起运动，只分配了一些公地和机关部队退出的土地，以及一些地方地主献出的坏地。“和平献地，拿出的土地不多。而在分配中又过分强调照顾抗属，所以多数贫苦农民仍然无地、少地的现象并未改变。同时，普遍地进行纠正侵犯中农利益，要群众吐出果实，群众对此是很伤脑筋的”。汇报中说，这种情况经过6月的晋绥土地会议（按：即地委书记会议），对工作作了全盘检讨，并组织工作团，派强有力的干部分区分头开展工作后，才有了改变。

晋察冀解放区代表在汇报中说，在接到“五四指示”时，“思想毫无准备，感到突然，不敢放手”，7月1日虽然作出了贯彻“五四指示”的决定，但犯了“强调照顾地主及抗干烈属，对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不坚决”，“由上而下，规定了许多条例，束缚了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等错误。1947年2月中央局土地会议后，虽然对于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群众路线也有所研究，但又认为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封建已经消灭，土地问题已经解决，因而决定以大生产为中心工作，只准备秋后才在全区进行群众性的大复查。“总之，土改极不彻底。这充分暴露了一年来土改当中领导上的右倾动摇和官僚主义盲目自满。”5月初，中央局决定在全区开展大复查，但又犯了“左”倾急性病，唯恐反右反不倒，有了矫枉必须过正的领导思想，加上党内不纯，结果出现了乱斗乱杀，普遍扫地出门，坏干部假公济私，乘机报复，特务奸细混入运动，借刀杀人，形成农村恐怖，中农恐慌逃跑。

“五四指示”发出之初，各地在进行土地改革时的确存在诸如发动群众不够，对地主照顾过多等问题，但这不是运动的主流。“五四指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而这个文件及按照这个文件进行的土改，按后来的情况看，难免有某些局限。实际上，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各地很快突破了“五四指示”的规定。所以从总体上看，各

解放区这一阶段土改中，右的倾向虽在有的地区有某些表现，但不是全局性、根本性的。上面的汇报中对前一阶段土改中所谓右倾错误的批评与指责，过低地评估了前一阶段土地改革的成绩，并不是完全合乎实际的。这也说明各地随着土改复查的开展，土改运动中“左”的倾向正在滋长，本需要此次全国土地会议加以克服，但会议对这一问题注意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在全国土地会议前期，刘少奇“对运动的掌握比较审慎，一再提醒大家注意防止群众发动起来后可能出现的偏向，特别是要注意争取大多数”。

7月20日，刘少奇在同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发言说：中央的方针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指出，一方面要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在发动之后要照顾某些分子。不要从一个地方出发，要从全国出发。今年“七七”纪念节中央所提的口号中也有保护中农利益和民主人士的口号。要孤立少数，争取大多数。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如果搞的厉害，地主逃走就增加了蒋介石的力量。农民只看眼前，我们要看得远些。要叫地主过得下去，不要肉体消灭。肉体消灭是冒险主义。他还说，土地改革以后，仍有富农经济，只有最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灭富农，消灭贫穷，要把这个真理告诉农民。只要不侵犯中农利益，就不会犯冒险错误。

过了十天，会议主席团与晋察冀代表团进行座谈。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晋察冀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要是政府机关中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了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他同时强调，这些问题的性质还是党内问题，要当作党内问题来解决，不要打人。一打就秩序混乱，就没有民主了，要订出纪律。

7月27日，土地会议已经开了整整十天，中央工委收到中共中央的复电。复电强调：“同意土地会议进行的方法，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

对于在土改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组织不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及干部多占斗争果实等问题，刘少奇一直比较注意，在接到中共中央的复电后，他对党内不纯的问题更为重视。通过会议主席团的讨论和会后同代表的交谈，刘少奇感到，影响土地改革深入进行的主要障碍，是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汇报说：

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开，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和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其中贪

污自私及为非作恶者亦不很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作风并撤换与处分那些坏干部。

他接着说：

从晋绥到阜平，我即注意考察土地改革不能彻底的原因。在阜平反对了领导上的右倾后，很快就看到了冀西的“左”倾急性病，干部在乡村中的无限权力，强迫群众到会，付表决、呼口号，在斗争地主及所谓国特时，强迫群众打入杀人，并用强迫办法做到形式上的百分之九十向上级汇报。我用坚决态度停止了冀西的这种运动，即细心考察党内与干部情况。在土地会议又与各地代表谈话并听了许多报告后，发现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晋察冀及其他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在晋察冀（晋绥亦大体相同）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党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分，其中地主、富农成分直接间接占统治地位者不少。贫雇农抗战初期虽在党内占多数，但现在一般只占少数，且不起作用，他们仍系最受压迫阶层，中农、贫农出身的区、村干部，完全不受党内外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军队干部多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亦大多数娶地主女儿作老婆，在土改中帮助岳父者，晋察冀军队中曾有反土地改革高潮，现已纠正。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许多地主得我干部帮助降低了原来成分，他们主要是利用我们各种形式来保护自己，压迫群众。本地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在土改中多少不一对地主有些包庇，每次群众起来，他们叫嚣过左，每次反“左”纠正偏差，他们乘机报复……

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大多数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他们得罪群众，怕群众揭发报复，因而要控制恐吓群众，有人批评他们错误揭露其黑幕者，即予以打击，他们大多不当兵，不服抗勤，负担较少，降低自己社会成分，而以当兵，派抗勤，出负担，订成分去打击其反对者，照顾其拥护者，选举开会完全包办，村干部有的分成两三宗派，互相反对，轮番上台，但各派作风大多一样，群众则是中立的、冷淡的。……少数最坏者则为新恶霸，各种罪都犯。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一般党员，一般村干虽不都是坏的，内部也常有矛盾，但多被坏干部统制，没有党内民主，正派人受压制，不能得势，邪风上升。……

如何解决农村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是刘少奇具体指导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时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只有经过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但这个方法，又必产生激烈的斗争过程，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也将不可避免要发生。然而，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的自由必须保障，干部作风必须改变，脱

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怎样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刘少奇提出了十点建议，其中主要有：

——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并在适当时机建立全国总农会，暂时代替各级业已残废的参议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实行无明文规定的罢免权与选举权，政府的公粮、预算、征兵、征夫计划等，经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实行，农会决议，亦得交政府执行，经农民代表会直接联系群众，打破官僚主义，树立贫雇农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地位。

——规定每年旧历正月初一（或其他日期）一切村干部解除职务，由农民大会或代表会检讨其工作，并进行改选，十天改选村干部完毕，并召开区代表会，改选区干部，再十天改选县干部。

——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里，行使言论、集会等自由权利，监督、鉴定、选举与罢免各级干部，反对干部非法侵犯人民权利及压迫人民，并对过去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适当自我批评。

——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党员书，号召党员接受群众批评、鉴定，尊重人民权利，服从群众的决定，为人民作长工，有错者认错，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必须劝告家属接受农民要求，不得反抗群众，以免被斗，然后由群众决定给予若干照顾，并号召党员严格遵守纪律。

——根据地党员是秘密的，有些地方群众要求党员公开，并要求由农会或贫雇农组织介绍党员，此要求可接受，无害处，巩固区的党可以公开，群众反对并提议某人不应作党员者，经党审查后，如理由正当，应拒绝入党或退为候补党员。

——为避免在运动中群众随便打人、杀人，要派可靠干部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调查审讯，做出结论。禁止打人及一切肉刑和大会逼供等行为。

——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及犯罪干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

中共中央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于8月13日批示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认为你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

由此，全国土地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

8月9日，会议主席团开会，研究会议下一步的开法，决定小组讨论五天，大会讨论十天，作结论五天。大会讨论发言时间，专门发言者不超过两小时，一般发言者半小时至一小时，重点讨论土改搞不好的原因、群众路线、政策与群众要求、如何纠偏等问题。

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土地改革搞不好的原因时，指出：不能以地主富农的路线去进行土地改革，而是要以乡村的无产阶级——贫雇农的路线去进行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现在党内就在人反对贫农路线，把贫农叫落后分子，晋西北和冀晋就将贫雇农叫落后群众，看不起他们，轻视他们，但我们恰恰就要依靠这个"落后群众"，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来进行斗争，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的问题，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方就是没有实行这一条基本方针。他还强调了在土地改革中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认为土地改

革的中心问题是走群众路线，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要相信群众，不要恩赐包办。

这期间，刘少奇曾设想在各地汇报和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个像“五四指示”那样的决议，以指导解放区下一步的土地改革。他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一万多字，但觉得不成熟，最终没有写成。他把自己的想法及写作的情况同主席团作了交流，主席团的意见是还是先讲，然后再写一个短的文件。

8月20日、21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

“土地改革运动，用一句话来说，基本上就是平分土地，将地主的土地财产分掉，一部分富农的部分土地财产分掉，一部分富农不动，中农不动，贫雇农得到土地，结果土地就大体平均了。”“只要我们做好这件事，就基本上完成了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对全体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他们的土地、财产应该坚决不动。”“要保证中农的土地财产不受有意无意的侵犯，已经侵犯的要想法补偿。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中农，联合全体中农。”

“土地，资本，负担，民主，这是农民的要求，几乎是全解放区农民的要求，这是主要的。在这四项要求中间，土地与民主，是基本的要求。如果你实现了农民这四项要求，农民的土地革命才能胜利，并且才能巩固这个胜利。”

刘少奇认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农民没有很好发动、组织和团结起来。妨碍发动农民的原因大致有三：（一）地主富农的阻碍与破坏；（二）党内不纯；（二）领导上的动摇与官僚主义，加上工作方法上的命令主义，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进行土地改革，所以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群众。刘少奇认为，抗战期间发展党员没有强调成分，没有强调阶级教育，而且是大量地发展，很多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吸收了很多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相反，对吸收贫农入党，有些地方根本不注意；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领导机关中、特别是县以上领导机关中占了优势，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在有些地方是绝大多数，有些地方是半数或半数以上，有的地方是比半数少一点，并在党内形成熟视无睹的状态。所以，必须对地主、富农站在党内反对土地改革的情况引起严重的注意。

刘少奇甚至认为，现在党内普遍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代表着地主富农的路线，一条是代表着农民的路线，这就是造成许多地方土改不彻底的基本原因。因此要结合土改整编队伍，建立一个能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组织，并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党。为此，首先从党内整起，提高党的纯洁性。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实行回避在本地工作的原则。其次，整编群众队伍，以贫农为中心，团结全体中农及其他反封建分子，以农会为主要形式。第三，要建立人民法庭，对于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判调查，执行诉讼。

8月26日，邓颖超作了《土改中妇女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邓颖超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解放区妇女在土改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认为从整个解放区的情况来看，妇女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还存在轻视妇女作用，把妇女工作与土地改革割裂起来等现

象。必须认识到妇女只有消灭了封建制度才能大翻身，同时土地改革必须要有妇女参加才能彻底，要进一步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土地改革运动中来，并保障妇女的土地所有权。

8月27日，董必武作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与负担问题》的报告，具体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分析了解放区农民负担的现状，并提出了如何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

晋冀鲁豫代表团负责人薄一波、晋察冀代表团负责人刘澜涛及其他代表团的负责人或代表，也在这期间结合本地区土改情况作了报告或发言，他们谈得最多的自然是党内不纯问题。

第三节　《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全国土地会议紧张进行之际，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也于7月21日至23日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即小河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及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等。会议主要讨论战略反攻、统一战线和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他还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土地改革中要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

9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社论指出：

> 现在的情势与抗日时期已经不同，我国仍有广大的、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已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相反的，蒋介石集团现在是卖国贼、法西斯和战争罪犯的集团，是人民的公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党的土地政策改变到彻底平分田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粮食、衣服和住所；同时又照顾地主的生活，让地主和农民同样分得一份土地，乃是绝对必要的。坚决执行这个政策，则人民一定能够战胜蒋介石，如果在这时候重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则革命运动会有失败的危险。

9月3日，刘少奇看到了这篇社论，随后同中央工委的其他负责人作了研究，决定在第二天召开大会，提请大会集中讨论彻底平分土地问题。

在第二天的发言中，刘少奇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

平分。这篇社论中根本未提到动不动中农的问题，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

对于平分土地的办法，刘少奇是赞成的，认为这个办法消灭封建最彻底，而且简单明了，贫农容易掌握，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公开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党内问题也好解决了。

刘少奇要求各位代表特别是下边做过土改工作的代表，认真考虑平分土地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这样做是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他说：“过去我们的会议没有集中力量来讨论政策，大家注意力所集中的是党内问题，这是好的，没有错，因为以前麻痹不注意，现在来注意一下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另一方面可能发生缺点，注意党内问题，政策问题就忽视了，这是不大好的。”

9月5日，中央工委将会议讨论的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说：

土地会议已进入结束阶段，四五天即可闭幕，讨论原集中在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因新华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的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分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向各解放区政府提议。

第二天，中共中央对中央工委的报告作出批复说：

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到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个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

在此后的几天时间，刘少奇同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赶写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并两次提交会议讨论。此间，朱德、叶剑英、彭真、康生也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

9月7日，朱德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他说："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打垮蒋介石的最基本条件。要很快地取得战争的胜利，第一个关键就是分田地，消灭封建势力，挖掉蒋介石的根子；第二个关键就是打胜仗。在农民分到了田地之后，要注意大力发展生产，除搞好农、副业生产外，还有发展工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这样对军事和发展经济有利。"

9月8日和9日两天，康生在会议上作了讲话。康生的讲话分五个方面：即政治形势的变化；过渡时期与"五四指示"；彻底平分土地无弊有利；贫雇农路线及妇女、青年问题；党群关系。康生说：日本帝国主义一倒，国内外的敌人都改变了，国共关系变了，必然影响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特别是解放区抗日战争时期，其中一部分地主曾经与群众联合抗日，日本投降后，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反动集团身上，希望蒋介石进入解放区，恢复他们的统治地位，如果这个不可能，他们就用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农民运动，稳固他们封建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在战争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战争中从军事上、政治上发展了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不允许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来夺取胜利果实。在战争中农民获得到了一些土地，但是并未满足，特别是贫雇农在政治上、经济上还受着压迫。因此，在抗战胜利后，便要求彻底解决土地要求，有的就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

9月10日，叶剑英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他对此次土地会议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认为会议成功地决定了两大问题：一个是通过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土地法，一个是为了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而实行改造我，们的党。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讲话的内容，无疑主要是有关军事问题。他强调，后方要支持前方打出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建立新解放区，并做好城市工作。

叶剑英讲话后的第二天，土地会议就《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和整党问题进行了讨论，充分听取了代表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见。

9月12日，中央工委常委彭真作了报告。彭真在报告中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两个很重要问题，带有历史意义，在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是土地问题的彻底平分，一是党改造成为毛泽东思想纯洁的党。"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彭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和在防止平分土地中可能出现的偏向。

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和讨论，全国土地会议对于如何进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和整顿党的组织达成了共识，基本上完成了它预定的任务。9月13日，大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决定在各解放区普遍进行整党。

接着，由刘少奇作会议结论。刘少奇说：

全国土地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在会议上，各解放区同志就土地改革情况作了报告，交流了经验，提出今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并进行了反复讨论。同志们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实事求是。不夸张，不抹煞，有功不骄，有过不隐，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好的。因此就能平心静气，发现真理，发现错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结论对土地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从草案来看，政策已彻底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一部分中农虽然抽出土地，但大部分中农得到土地。就是对抽出土地的富裕中农也要设法团结他们，必要时可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比如在政治待遇方面或分些别的东西给他们。”

《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对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等，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刘少奇认为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对大地主、恶霸可斗得凶一些，对于那些愿意投降的中、小地主就轻一些。不过这要在基本上不牺牲群众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之下，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之下来区别，不能因为区别和照顾而牺牲群众基本利益或不实行平分。

他还强调在土地改革中要保护工商业，提出有的工商业者的土地可以分，其他不动；有些地主有工商业，工商业部分不动；有的地主把东西转移到铺子里，可以命令退出。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

结论认为，政策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党搞好了，其次是群众队伍，群众队伍的整编决定于发动群众。因此，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进行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

结论最后说：“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我们有信心能做好。”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朱德致闭幕词。他要求各位代表认真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并挑选一批好干部去执行。这位受人尊敬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特地提醒大家：土改搞好了，我们的基础就巩固，就能打垮敌人。同时，还要搞好生产，不搞好生产，群众就要反对；搞好了生产，我们就能富裕和繁荣。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决定将之公开发表，付诸实践。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继“五四指示”后，又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农，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

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上述规定，比“五四指示”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由此可见，《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旨在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基本纲领。

平分土地是《大纲》的中心内容，它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这样的规定，既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又克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做法，防止错误地采取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造成地主富农对土地改革的顽固抵抗和破坏，有利于地主富农的改造，同时对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相信并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本精神，它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这说明，全国土地会议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已不单单是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经济的翻身，同时也是农民破天荒地享受到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政治权利，在成为土地的主人的同时，成为乡村权力的获得者和监督者，得到政治上的解放。这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农民们把土地改革运动称之为翻身运动，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

不可讳言，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其不足，如没有明确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照这个文件，干部和群众对哪种人应定为地主，哪种人应定为富农，新富农与旧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如何区分等，难以具体界定，这就有产生扩大打击面的可能；采取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就难以避免地将侵犯中农利益；虽然《大纲》也明确提出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但对于如何加以保护没有具体规定，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各解放区都发生过侵犯工商业的现象；会议和《大纲》对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党内不纯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只注意强调发动农民的重要性，而对于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没有引起重视，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左”倾错误估计不足，以至后来一度发生了搬开党支部搞土改的做法，从而使土改和整党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的偏差。

尽管如此，《中国土地法大纲》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公开举起的一面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战斗旗帜，它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它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率领他们实现翻身解放。美国友人韩丁在他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

的革命纪实》一书中，对《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使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绝无和解的可能，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推动了中国内地的农民骚乱，鼓舞了国民党后方都市中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的示威运动。

这样的评价，绝非夸大之词。

第五章　“左”倾错误

第一节　“查三代”

全国土地会议后，土地改革运动进入平分土地阶段。

为了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各解放区相继召开了本区的土地会议。这些会议一般都开得比较长，少则一个多月，长的两个多月，如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武安县冶陶镇召开的土地会议，从1947年10月2日开到12月26日，总共开了86天。山东渤海区的土地会议，从1947年10月8日开到1948年2月25日，开了138天，比较短的如晋察冀解放区的史各庄土地会议，从1947年10月3日开到11月9日，也开了37天。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比较多。晋冀鲁豫土地会议有地方县级、军队团级以上干部共1700多人参加，山东渤海区土地会议亦有550余人参加，晋察冀土地会议与会者有1100人。会议时间之长，人数之多，都是各解放区历史上少见的。

由于全国土地会议把党内不纯问题看成是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主要阻力，所以各区的土地会议，实际上主要是整党会议。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各解放区掀起了平分土地的高潮。伴随着而来的，是“左”倾错误急剧发展。

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晋绥解放区在土改中就已出现比较严重的“左”的偏向，由于全国土地会议主要是强调反右，是如何动员和组织群众，而对“左”的错误重视不够，所以在1947秋冬，各解放区土改中原有的“左”的偏向非但未能及时纠正，反而有了新的发展。在有的解放区，“左”的错误甚至还相当严重。

1947年6月至7月的地委书记会议后，晋绥土改中“左”的做法被合法化、系统化，并在全区蔓延开来。全国土地会议后，晋绥土改中“左”的做法进一步升级。

9月24日，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在《晋绥日报》上发表了《告农民书》。这是一个不但在晋绥，而且在各解放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内容非常“左”的文件。其中说：

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

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对富农，和地主不同。但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

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

中农是咱们的基本群众。中农当中，有的有长余的土地，不能算是封建部分，但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长余的土地，应当抽出来分。

……

不管任何一级，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共产党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党籍，告诉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

《告农民书》中还说，“大家不仅有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的权力，并且有改造农会、改造一切组织的权利和责任”。“由各级农会，监督和改造各级党政军机关，把党政军机关都建设好”。对于那些好农民，“经过大家讨论，认为可以加入共产党的，可以由群众推荐他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一定要批准他人党”。“将来各地斗地主胜利后，可以彻底改造政权，选举大家愿意选的人，到各级机关，替大家办事。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代替政权”。

《告农民书》虽然是以农民的语气写的，但它不可能出自农民之手，而是晋绥分局某些领导人在土改中“左”倾思想的表现。《告农民书》实际上就是要求农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农会取代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权，可以说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没啥两样。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发动农民开展土地改革，岂有不走弯路之理。

《告农民书》发表半个月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晋绥行署、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出布告，要求各级政府和农会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但同时又要求“前发《告农民书》仍然适用，不足之处以土地法为准”，所以晋绥的土改还是按原来的方针进行的。

1947 年 10 月，晋绥分局举办的《土改通讯》上，发表了《关于兴县木栏杆自然村成分问题的研究》，以指导全区的土改工作。

11月 27 日，《晋绥日报》发表《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这自然不是

《晋绥日报》的主张，实际上是晋绥分局的一个文件。

社论认为，边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存在严重的不纯状态，区以上领导干部，地主富农成分占绝大多数。支部则许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虽有贫雇农，但不起领导作用，而且不少地区则完全是地主富农奸伪人员的集团。“这种严重的组织不纯，也就影响了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和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的实行各种各色的危害农民、破坏党与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这是不能不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

社论指出，只有采取群众路线的审查方针，只有群众路线才能揭露阶级，区别各种不同的情况，既可以达到揭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的目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农民的民主要求。也只有群众真正有了民主，才能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党的纯洁才更有保证。

社论说，今后凡党员和干部，都必须经过贫雇农会议的审查，然而再由农民大会审查（地主富农不参加），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则负责审查各级组织。至于混进各种组织的阶级异己分子，则不受以上规定的限制，当地群众要求拿出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出清算、惩办。社论最后强调：“为了更好实现这个路线，应该把机关的审查与之密切配合，因此，党、政、军、民各机关都应该全部动员起来，深入三查运动。在机关更应该把贫雇农出身的，和经过若干考验思想比较纯正的同志形成核心与相关群众机结合进行对于每一个干部的审查。”

如果说《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把晋绥土改“左”倾推向高潮，而这篇社论的发表，则把这种做法推向了极至。因此，1947 年下半年尤其是冬季，晋绥土改中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一是在划分阶级的问题上，没有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而是除了看有无剥削外，还以“铺摊摊的大小”（即看其住房、穿戴、摆设好坏）、“政治态度”和“查三代”作为标准，甚至更着重于这三条，结果把许多没有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农民，也划到地主富农当中，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晋绥分局所在的兴县蔡家崖行政村，共有 552 户，被评为地主富农的有 124 户，占总户数的 22.46%，其实不少所谓地主富农是“查三代”时错划的。其中，因其祖父、父亲剥削过人，但本人在 1936 年以前，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前已无剥削，或剥削很少而被错划的有 15 户；本人早年虽享受过地主、富农生活，但在抗战前自己劳动即未剥削过人，或仅有轻微剥削者而错划者 5 户；本人勤苦劳动，只有轻微剥削，因“铺摊大”而被错划者 7 户；还有许多是其他原因被错划的。

晋绥各地土改订成分时，普遍把许多贫雇农订成“破落地主”或“破产富农”。朔县下水村全村 130 来户，仅“破落地主”就订了 30 户，订的方法和根据：一是“排三

代”，看其父亲、祖父够什么成分，就决定其成分。把历史条件看成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二是比光景，方法是先订出一两户雇农，然后拿来比别人，比这一两家高的就是贫农，比贫农高的就是中农，依此类推，实际上否认了在同一阶层中，还存在不同的经济情况。看土地的来源亦成了订成分的依据，某人的祖先是地主，现在他的地仍然是祖遗地，就是地主的根子未断，就是破落地主。这样就不只“翻三代”，有的翻到了四五代。

还有的地方以产量作为定阶级的标准。1947 年夏秋，代县县委派工作团到该县峪口村帮助搞土改。工作团来村伊始，即着手秘密发动贫雇农组织贫农团（开始叫贫农小组）。由于加入贫农团的条件很严，全村 200 多户贫雇农中，起初只有 20 多个贫雇农参加，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动，也只有 90 多个贫雇农参加。在这期间，工作团根本没有组织发动过中农，而只是片面地强调贫雇农“捉刀把”。在农民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工作团就组织斗地主。在扣押地主前，该村没有正式划成分。在扣了一批“地主”后，开始定产量，并错误地以土地产量作为主要标准划成分。开始时农民自定的上等地通产为 2 石至 3 石，工作团认为定得太低，增加到 5 石至 6 石。后来又动员了几个无地的积极分子，将上等水地的通产定到 7 石至 8 石。定出产量标准后，工作团规定，无产量的是赤贫，每人平均产量 1 斗至 6 斗是下贫，6 斗至 8 斗为中贫，然后依次评出上贫、下中、中中、上中，产量在 1 石 8 斗以上定为地主或大富农，无剥削者则定为小富农。结果将 21 户中农错定为富农。

据偏关、河曲、平鲁、离石、兴县等县 1 个全县、3 个区、45 个行政村和 83 个自然村的统计，在总户数 39701 户中，原订地主 8829 户，占总户数的 22.3%，其中错订的 5855 户，占总户数的 14.7%，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地主是被错订的。临县 121 个行政村中，原订定地主、富农 9357 户，其中错订 4844 户，错订户占总户数的 8.3%。晋绥老区原订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 20%左右，其中被错订的有 12%左右，同样超过半数以上的“地主”本来并不够地主的条件。

二是严重侵犯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由于订阶级时将大量的中农订为地主、富农，或“破产地主”、“下坡地主”、“生产富农”、“下坡富农”等，强调“彻底平分一切土地”，中农“长余的土地”也要抽出来平分，政治上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对中农采取所谓“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结果，在政治上排挤和打击了中农，经济上不但中农“长余的土地”被抽了出去，就是在平分土地中，其土地也普遍少于贫雇农。临县寺家塔村，以平均产量分配土地，贫雇农每人分到了年产量 1.9 石的土地，中农每人只分到了年产量 1.6 石至 1.7 石的土地，而贫雇农得到的土地，大多数又是从中农手中抽来的。临县白文镇行政村有 179 户中农，由于超过全村平均产量而抽出土地的中农共有 85 家。而这 85 家中农的平均产量中，竟有 1/3 是他们的商业和副业收入。

抗日战争时期，晋绥一些地主在政府的鼓励下，将部分土地出卖或回赎给农民后投资于工商业，由于康生等在试点时将之称之为“化形地主”，所以 1947 年冬土改时，晋绥许多城镇中不少工商业户被当作“化形地主”而遭到清算。

1947 年 9 月，兴县土改工作团来到兴县县城，四乡的群众跟着进城扣押商人，当

即押了40多户，连同此前被农民押回清算的，共有77人。被押的理由是：地主和破产地主，共40人，占被扣者的51.9%；富农11人，占14.3%；其他一些理由26人，占33.8%。这40多家工商户自然关了门，就是没有被扣的，也怕被清算，不敢营业了，于是坐在家里吃好的，等待被扣。

同年11月，朔县城关附近几十个村的农民，纷纷到县城扣地主，把工商业者的粮食、财物、牲口、家具均运回农村当作"斗争果实"。城关的群众见城里的东西被农民搬走，也起来参与所谓清算，造成农民与城关居民因争果实而发生冲突，以至乱斗、乱没收，在前后3天时间里，全城被清算斗争的达558户，其中工商户274户。在清算中则根本无政策可言，随便找一个借口就加以没收，只要在敌顽中做过一点事，如当过小职员、伙马夫、清道夫等，就一律没收。也有的连借口都没有，农民进城碰了某个工商业者，问一声："你姓啥?"等对方一回答，便说："就是你!"就给没收了。

临县招贤镇22座铁厂中，被斗争打击了的有16座。对于地主、富农经营的工矿业，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接收，但实际上由工人全部接收过来，还把8户贫农和翻身工人办的铁厂，也加以斗争接收。

据对兴县、临县等10座县城的统计，原有商号2603家，因"土改征营业税，惩治经济反革命，扩大了范围"而停业者756家，占总户数的29%。

三是乱打乱杀的现象相当严重。1947年10月1日的《晋绥日报》头版，曾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兴县二千余群众集会，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内称：

上月底（兴县）黑峪口行政村及联合各村千余农民，向黑峪口大地主大恶霸刘象坤（即刘少白的胞弟）进行了总清算，同时揭露了刘少白借上临参会副议长的职位与权力，包庇他的恶霸兄弟，压迫农民的事实，大会当即决定调回刘少白，向他进行斗争。各村群众联合斗争大会于9月21日在黑峪口举行，参加的有二区之黑峪口、高家村、赵家川、桑湾、小善、碾子等行政村农民2000多人，三区之水泉塔、五区之沟码头有受刘家四代封建剥削的佃户们亦来参加。当刘少白进到会场上时，群众的情绪都紧张起来了。到会群众争先恐后纷纷提出控诉。

在群众质问中，刘某一再称：他和刘老二没有什么关系，家里的事情管的少。又说：他过去如何革命。群众说："你过去的一些革命事情我们也知道，但是，那不能说就应在老百姓头上屙屎拉尿。"

……全场群众于激愤之中，一致决议撤掉他的副议长的职，并要求在报上把刘少白这些材料公布出来。大会从早饭一直开到天快黑始结束。

刘少白是晋绥著名的开明绅士，早年同情革命，积极营救被反动派关押的共产党人，其女刘亚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在著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后，刘少白因为女儿的关系，曾掩护过许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王瀛和他的妻子朱志翰，以及贺毓秀、何述之、陈原道（刘亚雄的丈夫）、赵世兰（赵世炎的姐姐）等人。在此前后，他还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的活动。抗

战爆发后，刘少白又拿出全部积蓄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后改为西北农民银行）。为此，他动员全县100多位富户入股，很快就凑起6万多元股金。晋西北有一句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6万多元在贫困的晋西北是个很大的数字。该银行后来成为晋绥边区重要的金融机构。土地改革开始后，他又与其弟主动献出450余亩土地、4处房屋、100余株林木分给农民。像这样一个开明人士，也遭斗争，可见晋绥当时的情况了。

不过，在晋绥的开明绅士中，刘少白的境遇还不是最糟的。

兴县蔡家崖的牛友兰，其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抗战爆发后，牛友兰为了支持初创的晋西北根据地（晋绥解放区的前身），他拿出了各种粮食125石，白洋8000元，还将自己开设的"复庆永"商店所有的布匹全拿出来，装备了山西抗日决死队第四纵队第二〇三旅第十八团，并将自己的住房也拿出大部，作为晋绥军区司令部和晋绥行政公署的住地。

当"左"的空气在晋绥蔓延之际，这样一位对革命作过贡献的开明绅士，竟成为重点斗争对象。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召开斗争牛友兰大会，这次斗争还算文明，没有动手打人。这样一个对于革命有功的知名人士，本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但当天"列席旁听"斗争大会的晋绥分局的一位领导人，却对农民斗争牛友兰予以高度评价，说大会"开得好"，还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塌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斗塌。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请各地农民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

"很好的准备"的结果是，同月26日，蔡家崖又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所谓"斗牛大会"。斗争会上，已经61岁的牛友兰反绑着双手，被迫跪在主席台上。斗争会进入高潮时，两个农民按住他的头，将一根铁丝残忍地穿进他的鼻孔，又强迫牛荫冠牵着连着铁丝的绳子，甚至还用烧红的铁锹烙在牛友兰的背上……经过这次残酷的斗争后第8天，牛友兰死在关押他的窑洞里。

1947年9月至年底，晋绥各地在土改斗争中，乱打乱斗成风。朔县土改工作团在次年所作的《朔县土改总结报告》中，这样写道：

由于许多群众是不敢说话的，只是顺着工作（团）的坡坡沿，有的村子的情况是要有人不同意，便是"包庇"，我们的同志也就在那里进行主观的、极左的圈定。有群众之间，有的村子，也是只要有人提出某某家是地主或者富农，便没有人敢说不是。若是群众提出真实情况，就会被我们工作团的某些同志以"包庇地主"、"包庇富农"的铁帽子打下去。……

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因此，一部分地主便以死和我们对抗。一些没有拿出底财的人被打死，群众说："打死了底财"（确定黑了的底财也不少）。尤其是拿出底财，结果又打死，使一部分地主，抱了必死的决心，

"拿出底财也是个死，不拿底财还是个死"，因此，死也不拿出来了。……据说老营一个大老财当群众向其要底财时，公开说："你们贫雇农靠我的底财翻身不顶事，我的钱是多着哩，就是不给，要，就不在这里"，——指着自己的脑袋说："砸吧！"……

群众之间也是普遍存在着恐惧和不安，一般的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怕把自己订成破落户（贫农）或富农（中农）。怕订成破落户的不给东西是小事，在村里没有政治权利、没自由（不给开路条，不让出门）是大事。怕订成富农的是怕没收家产，怕斗争。一种是怕说包庇地主、富农，怕成了"狗腿子"。另外一种是由于普遍恐惧，怕叫人家提出了什么条件，被打死。

据1948年6月纠"左"时的调查，晋绥分局所在的兴县被斗对象死亡情况如表一所示：

表一　　兴县被斗劳力死伤调查表　　（单位：人）

项目	打死					自杀					饿死					合计
类别	劳动力	非劳动力			合计	劳动力	非劳动力			合计	劳动力	非劳动力			合计	
成分		残废	儿童	老人			残废	儿童	老人			残废	儿童	老人		
地主	268	11	16	89	384	157	6	6	86	255	1	6	6	14	27	666
富农	314	1	9	58	382	164	2	7	112	285	2		16	15	39	200
中农	283	6		56	345	209		13	87	309				3	3	657
贫雇	38	1		2	41	8			3	11						52
合计	903	19	25	205	1152	538	8	26	287	859	3	6	22	32	63	2024

四是任意解散党和政权组织，对于部采取惩办主义。1947年冬的晋绥土改中，对广大农村干部，正如《告农民书》所言的那样，"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更重要的是，对干部也随意批斗甚至乱打乱杀。1947年下半年，《晋绥日报》上就发表了大量的由农会开除党员、解散农村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报道。

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和党员是秘密。1947年下半年，晋绥分局决定公开党的组织和党员，并由群众审查。兴县胡家沟村在审查党员时，有群众说："别的事情咱能知道，党内的事咱什么也不晓得，怎么审查呀！"但很多人说："好人赖人咱们穷人能分清，一样能审查。"审查的结果，决定将三个党员开除党籍。其中一个叫刘初生的党员，原本是兴县二区区委组织部部长，这年夏天审查干部时被群众撤职，审查会上，群众说他的"过"要大于"功"，理由是该人"毛病多得很"、"斗地主不坚决"，"不够党员条件"。会上，有人提出还是保留他的党籍，一个叫胡二年的农民说："一个普通农民斗地主还坚决哩，初生还不如一个老百姓。"会议主席问："让他站着（意即留在党内），还是休息（开除出党）？"群众说："让他休息吧。"就这样，刘初生的党籍被群众取消。

保德县三区南河沟的农民，在这年10月11日、12日两天开会审查了该村的21名党员，并将其中的“地主富农、投机分子、贪污蜕化分子”等13人开除出党，有3个“犯有严重错误的旧党员”，决定留党察看，另由群众介绍5个“在农民中有威信的雇贫农和两个中农，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农民不但可决定开除党员的党籍，还可以解散政权组织。10月25日这天，兴县蔡家会行政村的农民500多人，召开大会，审查兴县六区区公所的全体干部。大会开始时，区公所的所有行政人员排成一行，低着头面对群众，接受群众审查。审查的结果是，区委书记兼区长因“包庇恶霸，进行贪污，私用抗勤，剥削群众”而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交临时看守所看管。受此处罚的还有“靠贪污剥削发财”副区长和区助理员，另有1名干部被撤职，4名干部留职察看。大会还宣布解散区公所，由农会代替区公所的职权。

另据《晋绥日报》报道：“（神池）县农会临时委员会接受全县人民的要求，并奉到中共晋绥分局和边区行政公署的命令，如本月四日，在义井召开县扩干会，有工作团与驻军干部及附近村庄的贫雇农代表参加，会上宣布解散县委、县政府，经到会干部及贫雇农代表讨论，一致决定把钻进党政机关的地主富农22人全部扣押。……全部工作由县农会代行职权。”之所以要解散县委和县政府，理由自抗战以来，神池县封建势力“为了继续维持其封建统治，相继混进党内”，该县1940年建立新政权后，这些人又相继钻进政权机关掌握大权，在历年来的县政府本地干部42人中，就有地主富农36人，贫农仅有6人，而且职位很低；12个本地区长中，有10个是地主富农，从而在神池“形成地主封建集团和清一色的地主富农所掌握的县区政府，对全县人民实行封建统治”。

1947年11月间，晋绥解放区西雁北地区的土改“三查”运动中，先后有5个县委、县政府的职权被解除。这5个县的情况是：

朔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成员几乎都被查成地主、富农出身，故定罪为“地主窝子”，说他们站的是“地主立场”，为“地主服务”，既没有做调查核实，又不让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就宣布把县委、县政府解散了，县委书记、县长的职务也随之撤销了。

左玉县：7名县委委员被查出地主出身的有5名，因而以“组织严重不纯”，“不能领导土改”为理由，宣布将左玉县委解散，并停止一大批县委干部的职务。

怀仁县：经过“三查”，被认定是“地主窝子”，县委、政府主要领导是“坏人”，将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等一大批干部撤职，怀仁县委、政府虽未正式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已不存在。

左云县：经过重点审查，以“勾结与包庇地主与奸伪人员，压制群众，破坏土改”的罪名，撤了县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县委、县政府虽未宣布解散，但已是名存实亡。

平鲁县：因县委书记是个老红军，县长家庭成分是贫农，经过“查三代”，在成分上找不出什么问题，便说县委执行的是“右倾路线”，不能继续领导全县工作，就将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以下放到各区锻炼考验的形式解除职权，县委、县政府由土改工作团取代。

1984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批复中共雁北地委，认为“1947年土改‘三查’中解散朔县、怀仁、左云、左玉四个县委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当时因解散县委和‘三查’中受到组织处分的同志一律平反。”

这期间，不但不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被宣布解散，而且相当多的干部被当作阻碍土改的“石头”遭搬掉。对那些所谓“坏干部”也采取斗争地主的方式对待，乱打乱杀，造成党员干部普遍人心惶惶。朔县四区区公所召集了一次村干部会议，村干部们到一块后，情绪非常低落，他们痛心地说：“咱们又能见一次面。”有的要求赶快撤他们的职，有的再三不干了，有的则埋怨介绍他参加革命和提拔他的人。

第二节　“扫堂子”

1947年下半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左”倾现象，自然不仅只有晋绥一地存在。

经过一年多的土地改革运动，东北解放区的土地已基本分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1947年夏秋的“砍挖运动”也把地主们的底产挖得差不多了，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本可停止下来，但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更大规模的土改风暴降临到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1947年12月6日，东北中央局发表《告农民书》，其中说：

彻底打垮地主、彻底消灭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凡属地主，不论大中小地主，不论男的女的地主，不论本屯的外屯的地主，一切土地和财产必须全部没收，交给全体农民和农会接收处理。过去的地主留地太多的，一定要拿出来，底产未追挖的，一定要追挖。

彻底打垮地主的威风，凡是汉奸、恶霸、反动的地主，大伙要怎办就怎办，顽抗、造谣、狡猾的地主，大伙要斗就斗。

揭破地主的花招，凡是混进共产党、解放军、民主政府、公家学校、公家工厂商店、贸易税收铁路及一切公家机关的地主，如果藉公家掩护，进行阴谋破坏，挑拨离间，欺压农民，大伙要抓就抓，要斗就斗。混进工作队、农会、民兵、基干队的地主，一定要清洗。凡是包庇、掩护、窝藏地主的公家人，也一定要斗。

斩断地主的社会关系，凡与地主有联系的狗腿子，为地主藏东西的贫苦人，要争取坦白、悔过。

富农的封建剥削也要取消，富农多余的粮食、房屋、牲口、农具及其他财产也要交出来，由农会处理。汉奸、恶霸、反动的富农，大伙要怎办就怎办。顽抗、造谣、耍尖头的富农，大伙要斗就斗。

这份《告农民书》，显然是《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的翻版。

为了挖尽地主的底产，彻底斗倒地主威风，本已有所停顿的“砍挖运动”再度高

涨，本村地主的底财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到别村去挖，名曰“联合扫荡”，又称“扫堂子”。

1948年1月3日的《东北日报》上，有这样一则报道：

（呼兰县长岭）全区贫雇农约六千人，于本月（按：即1947年12月）23日，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大队人马（爬犁大车），浩浩荡荡齐集刘泉井村开大会，在大会上由县委负责同志根据各地贫雇农高涨的扫堂子情绪，提出与号召“村村扫堂子，全区大扫荡”，在扫荡期间，农民大会戒严二天，并提出不管什么村的贫雇农，凡是在历史上剥削压迫你的，不管在什么村，你想斗谁即斗谁，翻身要翻透，大会上并有县长撑腰，说明贫雇农不会错，错了也不怕，贫雇农起来就是将天顶个窟窿也不怕。这支经过旬日休整的大军，经，过刘泉井开会后，情绪空前提高，队伍空前团结，很多村屯的贫雇农联合本屯中农回去后，连夜都没有睡觉，展开全村的大扫堂子。约计，这次全区又扫出了浮物五六千万元之谱。

就这样，长呼兰长岭区的农民开了“扫堂子”之先河。东北各地的农民，从报道中受到启发，也纷纷外出“扫堂子”。于是，《东北日报》又有了这样的报道：

安东县贫雇农大会后，6万余贫雇农打破本屯界限，向封建势力进行联合拉网大扫荡，北井区2万余人先动了手，他们提出口号：“要得全家福，必须全家干，不要忘记门外自家人。”从扩大贫雇农队伍，并在“每人起码穿上一套棉裤棉袄”号召下将妇女儿童也卷入了斗争，一天内分好浮产。21日拂晓全区戒严，以村屯为单位搜查地主和恶霸浮产，仅被斗四次的地主马文波家，又挖出1斤多金器，全区挖出的浮财约值4400余万元，并捉到蒋匪清剿大队长于国瑞等5人。贫雇农清查搜挖昼夜不息。22日全县分成4个地区联合大拉网，6万余手持木棒、红缨枪的农民，汇成四道巨流，到处红旗招展，有目标地扑向大山和村庄，从山顶到山沟，从屋顶到田园，满山遍野，人声沸腾，声势浩壮。

（双城十区兴宇村）总攻封建声势浩大……与封建势力作斗争，抓抓放放，放放抓抓，关关起起，起起关关，把尚未向农民低头及彻底交出底产之地主全家编成“还劳队”。白日叫地主男女老少给贫雇农军属农会干活，小孩子挨家给扫院子，妇女按户给抬水抱柴，男人打场，晚上放回。如果斗时，全部抓来，斗完一顿再放回去，百姓说：“反正还我们的东西还不够，就得叫他们还上工。”“什么事都得过来，早我们给他们支使，现在我们就得支使他们。”

在1月2号，（双城县四区）下坎五个村在同时举行各村的贫雇农大会（只一天时间），会上简单地讲解了土地法大纲，着重地表明工作队此次工作态度：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做了算，彻底给贫雇农撑腰后，是日晚各屯便几乎同时掀起了对封建势力的进攻。除了个别屯子外，仅两天三晚各屯起出的果实都超过了“砍挖运动”。……这样排山倒海的斗争风暴持续了八九天，绝大多数的队伍日夜不停地扫，很多人七八天没有好

好睡觉。经过了“大风刮小刀刻”，反复扫荡，最少的屯子也有四次之多。封建势力，一般的说是挖的斗的都差不多了。

最近七日来此间群运高潮已达顶点。（双城）全县除四区之外其他九个区均扩大和发展了四区贫雇农与贫雇农见面、自己动手联合扫荡、反复扫荡封建的经验，使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地全面展开。二十余万贫雇农冲破屯、村、区界，向封建势力展开了歼灭性的总攻击，同一日内有千股以上的扫荡队乘数以千计的爬犁，纵横穿梭似的驰骋于全县境内，出这屯进那屯，村村不漏，屯屯不漏。贫雇农给封建势力布下了天罗地网，使他们跑也无处跑，藏也无处藏。若干地富纷纷自投贫雇农团俯首请罪。大半地主被编成“还劳队”，每日给贫雇农做活。按本月18号，四区联合扫荡的经验为各村贫雇农所接受，即日就行动起来，不仅突（破）村、屯界限，并且冲破区界，一时全县境内无一屯不出扫，无一屯不被扫。

一位当年经历过“扫堂子”的老干部回忆说：

在本地地主财宝挖得差不多的时候，从外地传来“扫堂子”的经验。“扫堂予”也叫“扫荡”，各地农会为了多分到果实，纷纷组织扫荡队到外地去挖财宝……由于一些领导人重视满足贫雇农要求，扫荡队组织的又不好，各自为政，无统一指挥，大部分无准确目标。农会组织几十人骑马挎枪，带着大犁、爬犁，插上红旗，拿上农会自己开的介绍信，就可到外地扫荡。……扫荡中发生不少违背政策事件，有的扫荡队见院就进，见东西就拿，妇女会斗地主婆，儿童团斗地主家的儿童，绑人打人比较普遍，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差，个别地方村与村之间发生矛盾。

经过这样的“联合扫荡”、“反复扫荡”，扩大打击面，严重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也就是必然的了。

据后来调查统计，在“扫堂子”中，黑龙江全省打击面平均占农村人口的25%（个别乡在30%—40%）。中农被侵犯者约占中农人口总数的45%—50%。根据鹤立县集贤区大排屯的调查，打击面占全屯户口23.1%，全屯人口的37.4%。该县中农总数为1831户，13318人，其中被斗中农642户，3534人，占全县中农总户数的35%强。其中有6个村子中农全部被斗。勃利县刘家屯中农22户，198人，被斗20户，172人。

在“满足贫雇农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反对敌伪残余”等口号之下，农民被允许进城直接逮捕地主，没收地主的财产和商店。由于“扫堂子”扫进了城，凡被扫过的地方工商业无一不受到侵犯。合江所有县城和市镇的工商业都被侵犯过，只不过侵犯的家数和侵犯的程度有所不同。日本投降后，勃利县城工商业最多时期700多家，“扫堂子”侵犯了200家。富锦（今富锦市）县城最多时有1347家，侵犯了176家。集贤县城最多时有200余家，侵犯了48家。刁翎县城最多时有100余家，侵犯了32家。桦南县城最多时有100余家，侵犯了30家。

此外，在东北解放区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土地改革中，乱打乱斗的现象也很普

遍。这个问题，本在“砍挖运动”中就已出现。1947年9月2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打人的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土改运动和群众报仇申冤运动中，应尽量做到不打人，不要每斗必打，不要打错人。”“凡罪大恶极之汉奸恶霸警察特务地主，为当地群众所切齿痛恨者，在斗争中群众报仇申冤出于自发打人的群众行动，我们不应当禁止，不应当加以阻碍，但在未判处死刑以前不要打死。”“在追浮物运动中，应尽量做到不打人，应教育群众斗智，与地主算账，找地主家庭中之矛盾，说服狗腿子坦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地主的财产挖出来。即使就是要对那些明知埋藏有大量财宝而顽抗不交的地主加以威胁才能使他的浮物拿出来时，也不能打得过重。”“对坏干部，群众斗争他时，应当禁止。”

由于主观上认为土改斗争中打人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这个文件对打人问题作了一些政策规定，但乱打乱斗的问题并没有得以有效遏制。后来东北局也承认：“这次运动中打人的现象很普遍，有些地方甚至于逼死和打死人。农民群众几千年来受尽了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痛苦，其报仇雪恨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发生打人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过分强调挖浮，甚至认为挖浮比分地还重要。农民追地主浮物财宝的时候，想不出好办法，便动手打人。”当然，正如东北局后来所总结的：“有些偏向，如打人、侵犯中农，其他则只是在极少数地区较严重”；“各地情况不同，某些地区各种偏差大都犯了，有些则犯一种或两种，轻重程度亦有差别”。

第三节　“搬石头”

1947年下半年土改中，发生较严重的“左”倾偏差的自然不只有晋绥和东北两地。

1947年6月，华东局在山东诸城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对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等人，以在土改中推行“富农路线”为名，进行错误批判。会后，华东局于7月7日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即“七七指示”）。这个指示认为山东“各地仍普遍存在严重的富农路线”，而这种情形的存在，“是由于华东局去年九一指示的错误指导所产生的必然恶果”，从而全盘否定了华东局根据“五四指示”作出的“九一指示”。

“七七指示”下达后，山东土改复查中本已存在的“左”的倾向更加严重。时任华东局副书记的邓子恢住在五莲县的一个村庄，正好这里开始土改复查，他化装成群众，到村里去看斗争地主的情况。邓子恢发现这里农会是每会必斗，每斗必打，每打必死，乃将这一情况向华东局作了汇报。9月6日，华东局作出《关于贯彻土改复查工作指示》，提出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对大中小地主要区别对待。指示下达后，对山东地区土改中的“左”的倾向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不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全国土地会议后，华东局立即作了传达。1947年10月8日，渤海区党委在阳信县李家桥（后移至何家坊）召开土地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

精神。参加会议的有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干部，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及区党委机关科以上干部550余人。会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第二阶段是整党，解决组织不纯问题；第三阶段是部署进一步搞好土改复查。会议从1947年10月8日开始，至1948年2月25日结束，历时138天。

会议第一阶段由邓子恢主持。11月6日，康生出席会议，此后的会议就由他主持。康生来到渤海地区后，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武断地认为渤海地区乃至山东土改中存在一条“富农路线”。16日，康生在给中央工委的电报中说：渤海区“许多党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他们不仅在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作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所憎恨的罪恶。至于各县县长，包庇地主、镇压农民者也很多——渤海公安局及有些县公安局，成了保护国民党武装匪特和掩护凶手的机关”。“许多贫雇农没有得到或者很少得到土地，没有得到斗争果实，没有翻身”。“渤海区党委，从上到下都烂掉了，干部坏透了”，应“一律开除党籍，重新登记”。还说：“此间情况复杂，稍有不慎，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暴乱和叛乱的危险。”

其实，渤海区的土地改革是有成效的。1946年10月起，渤海区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到会议召开之时，全区完成土改的村庄达到了93%，只有少数村庄因接近敌占区或受战争的影响尚未完成土改。据部分县的统计，土改前，贫雇农人均占有土地不足2亩，土改后人均达到了3.8亩，中农人均占有土地4.1亩；富农土改前人均占有土地9亩，土改后下降为人均3.9亩；地主土改前人均土地24亩，土改后降为2.8亩。这说明土改后贫雇农得到了与中农大致相当的土地，封建剥削阶级已从根本上被打倒了。

在这次会议上，以在土改中“坚持富农路线”，在锄奸和反特中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三项罪名，对渤海区党委、行署的主要干部及所谓其“宗派集团”的60多名县以上领导干部进行批判，并先后撤销景晓村的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李人凤的渤海行署主任、李震的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行署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免去王卓如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委的职务，改任行署主任。与此同时，各地委、县委和区委的部分领导人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免职，有的借支前之机调出。会议所在地阳信县委全部大换班，10个区委书记，只保留了3个，其余7人被撤职。

渤海土地会议召开不久，即10月中旬，华东局在诸城召开大鲁南（鲁南、鲁中、滨海三个区）土地会议，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主持下，继续批判黎玉等人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华东局又在五莲县的大茅庄召开胶东土地会议，批判胶东区所谓的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等错误，会后撤了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的职务。这样，山东解放区各战略区都召开了土地会议。这些会议虽然名为土地会议，实际上主要不是讨论土地问题，而是解决所谓“党内不纯”问题，对原山东解放区的一些负责人进行错误的批判与组织处理。批判他们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山东土改中曾存在一条“富农路线”，也就是对地主富农照顾过多。其实，山东土改是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开展的，被认为对

山东土改产生"错误指导"的"九一指示"，也是"五四指示"在山东的具体化。

既然认为此前的土改右了，是"富农路线"，自然要加以克服，可克服的结果是，全国土地会议前后，山东土改中同样出现了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

1947年7月21日，鲁中区党委作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的指示》。文件认为，"鲁中土改虽有某些成绩，但由于错误的领导，工作上走了弯路"，区党委对土改复查领导上，存在"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一）土改先替地主打算，再给农民土地的非阶级路线，因而产生了地主留地太多、浮财未动，不敢动富农土地，干部、军工属得地多，未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的"富农路线"等。（二）在发动群众方法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采取仲裁谈判、和平献田等方式的和平温和偏向，忽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阶级路线和组织路线，不敢相信群众、包办代替的非群众路线盛行。（三）对土改成绩估计过高，自满自足。（四）单纯任务观点，失掉不少时机。

为了克服上述"严重错误"，鲁中区党委提出要在经济上坚决消灭地主阶级，同时坚决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使贫农不但分到足够的土地，而且要分好，分到耕畜、家具等一切浮财；要发动群众，使农民与地主撕破面子，划清阶级的分界线，在斗争中要回农民的权利、人格、面子，经过土改斗争清算，把地主打翻在地，农民成为农村的统治者，全部将地主控制起来，使其不得再有复辟活动。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必须大胆给群众撑腰与彻底走群众路线，并使二者结合起来。大胆撑腰是为了贯彻群众路线，替群众"搬石头"，使群众敢于自己起来当家作主。

9月1日，渤海区党委也发出《关于目前土改工作的补充指示》，指出："对大地主与豪绅及为多数群众所痛恨之地主，其浮财应予清算，在多数群众要求下，有的可以扫地出门。但对中小地主、对富农，不应一律采取扫地出门办法。""在斗争会上，基于广大群众之尖锐仇恨，对某些恶霸地主、重要特务分子之死，甚至打死，是不可免的，干部不应制止。但如果不是出于广大群众仇恨，干部也不应带头打。""各地对打死人应慎重处理，不应随便打死人。如果真是广大的群众行动，我们当然不应泼冷水。但如果只是少数积极分子或干部命令群众打，则应说服纠正。"这样一来，渤海区土改复查时乱打乱斗相当严重，商河县打死了1000多人，惠民县打死150余人，其中有些是只有一般错误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乱打乱斗造成恐慌和怀疑，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区因此逃往敌占区者达5万人，其中有些是穷苦百姓。①

山东滨海区五莲县在土改复查中，划分阶级成分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随意性很大。华东局土改工作团在一份关于五莲土改的报告中说：

在土改复查中，划分阶级成分缺乏正确的统一的标准……如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单按自地佃地、单按生活好差，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偷盗等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业生活优裕的亦作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地"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就找鬼"，许多中农被升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过恶霸行为的，亦划为地主富农。还有许多是按亲属关系、私人感情定的，和干部关系坏

的，成分就向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本身，阶级成分就向下降；有的则被挟私报复，有的则“查三代”。

由于胡乱划阶级，将大量的中农、贫农划人地主富农的队伍中，如该县仁里区贾古村，土改复查时定的19户旧富农，实际只有5户够旧富农的条件。该县洪凝区土改复查时定地主132户，富农285户，后来改正成分时，地主只有59户，富农仅75户。

山东土改复查中，对地主富农普遍采取“扫地出门”和严格限制人身自由。1947年7月中旬，在农民翻身委员会的领导下，胶东区黄县各村开展向地主的第一次清算活动。做法主要有二：一是在经济上“封门倒筒”。全县各村几乎在同一时间封了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人“扫地出门”，没收其全部财产。与此同时，号召其他富裕户献房、献地、献东西。二是在政治上批判斗争，加强管制。黄县城北区对地主的管制法共有十条：（一）禁止地主恶霸法外活动；（二）罚地主恶霸劳役；（三）不准地主恶霸吃好饭，如果吃好饭，得受农民重新清算；（四）地主见穷人要低头，先说话问候，并要服从农会领导；（五）农会武装中，设地主恶霸管制小组，专门代表农民管制地主恶霸，地主恶霸必须服从管制小组命令，不得违抗；（七）地主恶霸逃跑犯罪时全家连坐；（八）地主恶霸如违犯管制法，轻者处分，重者枪毙；（九）本管制法自公布之时执行；（十）本管制法修改权在农会。

1947年下半年的山东土改中，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据1948年8月渤海区党委给华东局的报告：“各地被斗争之户数，一般的均在15%以上，一般的从20%至30%（按：原文如此），多者至40%，甚至超过50%者。因此，地主富农悉数被斗，中农被斗者很多，贫农也有被斗并拿出土地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渤海区党委认为原因在于：一是划成分没有一定标准，单纯按土地多少去划分，也有按其生活好坏去划分的，政治态度也成为划成分的条件之一，再加上“查三代”，大大扩大了地主富农的圈子，有的村地主富农划到占户数的30%以上。二是执行政策上，地主富农不分，一律斗争，一律扫地出门，一锅端，大小汉奸一齐反，斗流氓，斗“破鞋”，乱打乱杀。三是在对待村干部政策上，对有缺点错误者，撤职成为普遍现象，甚至被扣押打死。

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全区土地会议，会议开了86天，参加会议的共有县级、团级以上干部1700多人。当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黄河，进军大别山，大会由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主持并做报告。徐向前、滕代远、宋任穷、廖承志等边区党、政、军负责人都在会上作了报告或讲话。

薄一波代表主席团所作的开幕词指出：大会的目的是在接受全国土地会议决议及其所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认真检讨本区一年多来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他要求到会代表用阶级观点，老实态度对此展开检讨，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整顿队伍，以新的观点、新的精神详细讨论如何在本区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

会议进行时，国民党飞机经常到冶陶镇上空轰炸扫射，于是，大会决定白天分散找

有隐蔽物的地方开小组会，晚上在用席棚搭成的大会场开大会。会上，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豫皖苏各代表团负责人汇报了各区土改情况。由于对“五四指示”以来土改工作的成绩估计不足，对土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所以大会对各战略区土改作了不是“差不多”，而是“差的多”的基本估计，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地主富农思想相当严重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以致贫雇农没有翻透身，甚至还没有翻身。结果，“代表们为之大吃一惊，警惕起来，旋即在小组会中各自作了初步检查，开始挖掘党内不纯的严重情况”。

接着，薄一波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大会旋即展开查阶级、查思想运动，严格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好多人在大会上、小会上作了典型反省，不少同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痛哭流涕，深悔自己阶级立场不稳犯了许多错误，揭发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暴露了严重的地主富农思想、投降主义和国民党作风”。“在思想斗争中，大家集中火力严厉打击了地主富农思想，绝大多数同志卸下了包袱重新编队，一致痛感到这些错误的思想行为对党对人民的严重危害，下决心要在斗争中彻底纠正错误，改造自己”。

既然对前一阶段土地改革的估计不是“差不多”，而是“差的多”，于是会议的矛头，理所当然对向了所谓“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思想”。“在这种气氛下，有些错误的东西不仅得不到批判、抵制，反而有了新的市场。”因而会议之后，“那种原已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切实改正，反而有所发展”。

太行区涉县更乐村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更乐村是太行老区最大的一个村，全村共有 1620 户，6172 人。1947 年 9 月，在太行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涉县组织了一个有 50 多人的土改工作团，按照平分土地的方针到该村进行土改复查试验。结果在三个半月的土改复查中，严重地侵犯了整个中农阶层的利益。全村被斗争的有 344 户，占总户数的 21%。其中中农 276 户，占全部中农的 31%。这些被斗争的中农中，有 164 户完全是勤俭起家的，77 户是抗日战争前由地主下降的，另有 33 户是抗战以来经过减租减息由地主改变为中农的。在平分土地的运动中，这些中农都遭到地主富农一样的待遇：204 户被扫地出门，住在窄小的破屋或小庙里受“管制”；因逼内货（即浮财）而挨打者 243 人，打残废者 1 人，打死者 1 人；由人民法庭判徒刑者 3 人，判死刑者 6 人，因恐惧而自杀者 9 人。中农对纠偏时来调查的太行区党委领导说：“毛主席讲不讲理？我的粮食、家具哪一件不是我全家劳动得来的？凭哪一条哪一桩把俺当作封建来没收干净？”

在运动中，平均每两户贫雇农分一户中农的房子、浮物和内货，表面上看，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其实不然。因为他们之中，许多人同被斗的中农有着亲族联系，或者因“查三代”，其家庭历史情况也与中农有类似之处。因而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整天提心吊胆，害怕有一天斗到自己头上。事实上，全村已有 4 户贫雇农被当作地富遭到了斗争，其中有 3 人挨了打。许多贫雇农对人民法庭也感到很恐惧，有一个贫农会委员，因犯了些错误而怕上人民法庭，结果自杀。

这个村错斗中农的一条重要原因，在于领导平分运动的土改工作团别出心裁地创造

了一套划分阶级的方法。工作团认为，过去划阶级时，把贫雇农和地富都划少了，结果把一些“化形”的地主富农划到中农里去了。

那么，什么是“化形”的地主富农，工作团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而是按照一些贫雇农的意见，搞了一个“八靠八不靠”标准，就是按照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进行灵活衡量。按照这个标准，贫雇农看见谁家的油水大，随便可找一条理由，给他戴上顶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户仅有两亩薄地的石匠，因其曾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便被划成地主。党员江中泰是一个新富裕中农，两个儿子是铁匠，开了一个铁匠铺，全家共有 12 口人，土改后部共有地 40 亩，因打铁不得不在农忙时雇短工。1946 年土改时，江中泰当过农会总代表，得罪了一些人，结果在平分土地时被订成恶霸富农。江中泰看了成分榜后，因害怕斗争而跳池自杀。

由于订阶级时随意性很大，结果这个村第一次划阶级时将地主富农划到了总户数的 21%，第二次划到了 23%，最后到全村正式划阶级时划到了 25%。其实，全村真正够得上地主标准的只有 25 户。即使这 25 户地主，经过土改之后，已有 7 户被扫地出门，其余的 18 户共 61 口人，只有 148 亩地。富农也只有 43 户，且已被斗争彻底的有 18 户，其余的 25 户虽未斗争彻底，但多是军、干、烈属和孤寡。

这个村在平分土地时，对地主富农采取肉体消灭的政策，认为弄死几个地富没多大关系。在人民法庭判决死刑的 12 人中，有 6 人是地富，另有 4 人当时被认为是地富，实际是中农。这 12 人中，群众认为真正该死的只有 2 人。杀人的办法没有一个是用枪毙的，而采取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残酷办法。平分土地运动中更乐村的党员和原来的干部，也被当作“石头”而搬掉了。全村 182 个党员中，挨群众斗争的 24 人，被开除党籍的 17 人，人民法庭判处死刑的 2 人，自杀的 1 人，判徒刑的 1 人，挨打的 15 人，坐禁闭的 2 人，被扫地出门的 12 户。此外，村里的私人小工商业，因借口“剥削”，几乎全被侵犯。有 10 户手工业作坊，生产工具、货物、资本全被没收。

太行区沙河县三区的毛村，共有 270 户，1947 年 8 月进行土改复查时，被扫地出门的有 76 户，其中 51 户是中农和贫农，共有 316 人，占全村总人口的 30.2%。对于那些被扫地出门的中农和贫农家的妇女，如果娘家是穷人家，就动员其离婚，离了又不准出村，把她们组成所谓“纺织组”。这样，全村有 22 个妇女被迫离了婚。

冀南区永年县二区东大慈村在平分土地运动中，划阶级无标准，谁富斗谁，有一点小错也斗，再加上村干部、积极分子作风不民主，或私人报复，错斗了不少中农，其中有的因亲戚或本家关系被斗。比如一个叫杜国瑞的中农，本来是一个勤劳的庄稼人。未斗争前家里 7 口人，30 亩地，其中有 10 亩是分家后自己努力劳动买下的，从来没用过雇工，也没有其他剥削。只因儿媳的舅父当了 4 个月伪军，也就被扫地出门，完全没收了。他的弟弟杜国栋，情形与他相同，也是有名的勤快人，干活连午觉都不睡，就因为是杜国瑞的弟弟，也被扫地出门了。也有的是因为为人不好被斗。该村一个叫杜经义的中农，一家 3 口人，原本只有七八亩地，老婆纺织赚了些钱，又买地七八亩。因为他为人比较吝啬，牛闲着不叫人使，浇地好抢水，老婆好笑话人，就被斗争了，没收去 6 亩地、1 头牛、10 棵树、600 斤粮、400 斤蒜。

上面列举的虽然是个别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平分土地中的“左”的做法，在各解放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就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同样出现了“左”倾错误。1948 年 1 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在对延属各县检查后发现：“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都是过‘左’。如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都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胡采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打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再就是普遍地冷淡中农。斗争地主不让中农参加。即贫农团的组织，亦缩小在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其风气，不是中农被坚决联合，而是到处给中农以精神上的很大威胁。”

过了半个月，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讲的情况就更严重了。他说：“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按：时任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家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佳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但在平分土地运动中，有不少地方没有严格执行这一政策规定。晋察冀解放区北岳区唐县及涞源县的一些村庄，凡贫农不论其劳动如何，都分给好地。本来经过土地改革，地主、富农已没有多少土地，要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就只能把中农“长余”的土地或好地抽出，这就必然会侵犯中农利益。唐县一些村庄平分土地后，中农的平均土地普遍少于贫雇农。有的村庄在分地时，还规定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的比例数。该县五区高楼村规定，贫农的土地为平均产量 4 石至 6 石，中农 4 石以下，地主 3 石。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结合平分土地各地开展了整党。这期间，各解放区都发表了《告农民书》，其中无一例外地将广大干部当作彻底完成土改的障碍，即压在贫雇农身上使其未能彻底翻身的“石头”，因此，必须“把地主富农当村干的和不好的村干部，统统撤换，让他们下台，村里的一切事，由贫农团领头来办”。甚至对于所谓“坏干部”，是“想斗争谁就斗争谁”，“想怎么斗就怎么斗”。于是平分土地中掀起一股“搬石头”风。

晋察冀中央局在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关于边区土地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干部到村第一步先搬石头，去障碍。村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一律停止党籍，撤销工作，听候群众审查决定，其中比较好者，可保留党籍，但要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1947 年 11 月 27 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题为《搬掉石头整顿队伍》社论。社论说：

去年边区土地改革不彻底，今年五月大复查，有的地方做得比较好，很多地方做得

不好，还有的出乱子犯错误，都是因为我们的队伍不纯洁，不整齐。这几年有许多的地主、富农，有些流氓、奸细和叛徒，见到我们革命力量大，有政权，有军队，到处是胜利，他们就找机会钻到我们党里来，要想仗势欺负老百姓。还有些坏干部、坏党员，自私自利，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跟着地主、富农一股劲欺负农民；他们在哪里当了家，哪里的农民就抬不起头，哪里的农民就遭殃。我们队伍里边有这些坏人，怎么能整齐？怎么能打仗？封建怎么会消灭呢？我们内部这些坏家伙像一堆乱石头，压在我们头上，我们就抬不起头；绊在我们脚跟前，我们就走不了路。要抬头，要走路，要革命，就得搬掉这些乱石头，把我们的队伍弄整齐，才有力量去打仗；才能废除封建，平分土地，真正大翻身。

现在我们要把党的队伍整顿好，混进我们党里来的异己分子，比如地主、富农分子和坏蛋，一律停止党籍，进行审查，该开除的就开除，该处罚的就处罚；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的坏干部一律撤职。所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凡是不能好好领导土地改革的，都调的远远的，不让他

在本地碍手碍脚。

晋察冀北岳区党委在一份文件中，还提出了十种“搬石头”的方法：

（一）各机关自上而下的除留少数干部坚持日常工作外，一切能做土地改革的干部统统集中起来分散到各区各村，统一编制进行工作（统一在县区委领导下）帮助农民翻身，但在领导上不要平均使用力量，以便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盘。

（二）村级一切地主、富农干部，一律撤职，是党员的停止党籍，并停止其一切政治活动，个别想革命的调离本村。

（三）一切为农民所不满、害怕、对土改起破坏作用的干部（不管地主、富农），一律停止职务，并宣布要他服从农民，接受贫雇农意见，去诚心诚意地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四）一切为群众所惧怕干部，不管成分如何，撤职后群众还害怕，可调离本村本区，甚至离开本县，集中整训改造或另行分配工作。

（五）任何机关或任何个人不得用任何方式去阻碍土地改革，违犯者加以处罚，并在群众中公布。一切党员干部要正确地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党的决议，不能用任何形式来反对，或有故意曲解的言论和行动。

（六）党员要利用一切关系一切方法并发动附近村与村互相检举，揭发地富干部腐化堕落分子和一切脱离群众的干部，以便在短期内迅速地去掉群众的障碍，现在如自己不说，以后叫别人说，罪上加罪。

（七）土改之前民兵武器由区委负责，彻底整理，使其能掩护土地改革。有些武器暂时集中经过检查，另行分配，村干部武器和一切分散武器一律收回来再发到贫农团手里。

（八）部队在所在地积极参加土改，用一切力量给贫雇农撑腰，以壮大其势力与威

风，但注意不要强迫命令，包办代替。部队如组织工作团时，可与地方干部统一编制，受地方党委统一领导。

（九）一切部队要有计划地进行作战布置，以达到围困、打击、消灭、扰乱敌人的目的，掩护土地改革。

（十）总之，在我们有计划统一领导下，一面到处开会，一面到处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彼此配合，互相声援，这样声势浩大，造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平分土地的同时，普遍开展了整党，而"搬石头"便是此次整党的重要内容。冀东区密云县（今属北京市）的河东地区在平分土地的运动中，挨打的党员干部有30名，挨捆被扣的有126名。该县六区关上村有党员55名，竟有25名被关押。热河新惠县在平分土地运动开始初期，全县区干部400多人，就有260多人受到不同处理，其中清洗了147人，关押了45人。运动开始后，全县有246名基层干部被拘押，后被杀11人，自杀3人。新东县拘押的7706人中，原基层干部有545人，其中被杀者43人。被杀的干部中，属于犯有强迫命令错误和乱搞男女关系的36人。

不可否认，在土地改革的初期，的确有一些干部对开展土地改革不积极，甚至还有包庇地主、富农的现象。这其中，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家庭等方面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对地主基本上是采取团结抗日的政策，在经济上也只实行减租减息，由这一政策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有些人一时转不过弯来，是有可能的。同时，抗战时期，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青年学生，投身于抗日战争，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或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大多成为军队和地方的各级干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封建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是赞成和支持土地改革的，但也有少数人，从理论上并不反对土改，但一旦土地改革改到自己家庭的时候，感情上也可能有些难以接受，因而对土地改革产生某种抵触情绪，对其是地主、富农的父兄提供某些庇护，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样的干部，其实只占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干部的极少数。至于解放区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大多数都经过对敌斗争的考验，本质和主流是好的。当然，由于战争环境，干部的产生并非经过完全的民主选举程序，少数本质不好但斗争勇敢的分子，当上了干部。这些人在对敌斗争和土地改革中可能是积极的，但参加斗争时可能带有个人升官得利的动机，一旦获得一定的权力又没有有效的机制对其加以约束后，就有可能欺压群众，贪污腐化，以及在土改斗争中多占果实等。由于在全国土地会议前后对党内不纯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过多地估计了所谓"坏干部"的数量，以至片面地认为相当多的干部反对和阻碍土地改革，是压在农民身上使其不能彻底翻身的"石头"，不将他们搬掉土改就不能彻底完成。因此，全国土地会议后的平分土地过程中，各地都发生了"搬石头"情况，使一大批干部受到了伤害。

第四节　“左”倾探因

1947年下半年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是这年上半年土改复查时本已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延续和发展。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其意义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运动中一度出现的局部“左”倾错误，我们也不能回避。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珍惜中国革命来之不易的胜利。

1947年特别是下半年的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一是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的反映。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必须联合最广大而又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共同战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农民不但是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领导农民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其成员也主要来自于农民。中国农民虽然具有高度的革命性，但作为小生产者，他们身上也仍然有着经典作家所指出的落后与保守的特点。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曾对小生产者在革命中的表现，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产阶级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其实也是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可贵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具有列宁所指出那种小生产者的弱点。在革命遭到挫折时，容易产生动摇和悲观情绪；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又容易头脑发热，产生革命急躁病。1947年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转折点。如果说，在一年前，即全面内战刚刚爆发之时，解放区的农民们，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对共产党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多少还有些将信将疑的话，那么，进入1947年，特别是这年6月底7月初人民解放军开展战略大反攻，将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后，他们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场胜利一定属于代表他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增强了广大解放区农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而他们也比以前更迫切地希望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彻底地打倒一直统治他们的地主阶级。解放区的农民实际上是带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参加到土地改革的大潮中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动、组织和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斗争的各级领

导者，就需要比以往更清醒的头脑，来引导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健康发展。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干部，头脑也不冷静了。这也不奇怪。党的各级干部，相当多亦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锻炼，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没有了列宁所说的那种小生产者的弱点，但也还有相当多的人，那样的弱点还残留在其身上，并在一定的时候表现出来。因而他们在革命高潮一个接一个的情况下，革命的急躁情绪也比以往更加强烈，“左”倾急躁病也就难免发生了。这样一来，一边是革命热情正在高涨的农民，一边是头脑也发热的领导者，因而“左”倾错误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是当时国共两党激烈斗争形势的影响。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刘少奇，后来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这样说：“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这一时期内，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地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

1946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动员解放区广大农民，应对一触即发的战争。然而，在“五四指示”制定的时候，战争毕竟还没有全面爆发，毕竟还必须进行和平的努力。虽然当时也知道和平的希望已是很渺茫了，但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面对经历八年对外战争之后渴望和平的人民，哪怕只有一丝和平的希望，也必然去争取。所以在“五四指示”中，对各方面的照顾比较多。然而，“五四指示”刚刚传达到各解放区，蒋介石就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虽然此时战争已全面打响，但国共之间形式上的谈判还在进行，因而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基本上是按“五四指示”的精神，比较温和地进行。1946年11月，蒋介石决定召开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中共代表不得不撤离南京，国共和谈的管道也被蒋介石堵死了。次年3月，国民党军队又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举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就只能完全通过战争来解决了。

这次战争，表面上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生死决战，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为了战争的胜利，国共双方都要争取一切能动员的力量。这场战争不仅战场在农村，就是双方依靠的力量也在农村。虽然蒋介石很少公开承认他代表地主阶级，但他所做的都是在维护着这个阶级的利益。1947年是决定国共两党未来命运的一年，尽管双方均投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兵力的大决战是在1948年下半年，但真正积聚力量，决定胜负还是在1947年。1948年人民解放军取得一系列决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1947年耕耘的收获。在解放区开展深入的土

地改革，是共产党积聚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千百万解放区农民的支持。这种支持，不单单是道义上，更重要的是物质上的。兵力的补充、战勤的服务等，都依赖于解放区人民(主要是农民)。而此时，农民比以往更强烈地产生了得到土地的渴望，因为只有得到了土地，他们才是真正翻了身。也只有让农民得到土地，才能使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土地是有限的，如果还按“五四指示”的规定，显然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于是，1946年底1947年初，各地都突破了“五四指示”的规定，支持和鼓励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长期以来，地主阶级一直压迫和剥削着农民（尽管不能排除个别地主是靠勤俭起家，对农民的剥削还有所收敛，或剥削的方式不那么凶狠，但地主之为地主，土改时之所以被定为地主，主要依据是他的剥削)，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强烈的阶级对立，而土地改革的宣传动员更是强化了这种对立（以往农民认为自己穷是命不好，地主是前世注定命好，土改宣传后他们认识到自己穷的根源是地主的剥削，地主剥削的资本是因为他拥有土地)。过去，农民不敢和地主斗争，即使敢斗争，也因没有人支持而斗争不过地主。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农民背后，有支持他们的共产党和解放军，因而感到腰杆子也粗了，胆也壮了，敢于斗争了。这种长期积累的尖锐的阶级对立迸发出来之后，农民在斗争地主时产生一些过激的情绪和行为，也就成为可能了。而当农民产生了这种情绪时，作为领导者没有加以正确的引导，而是采取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于是“扫地出门”有了，将地主编人“劳改队”加以管制有了，甚至对地主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也有了。解放区的土改出现“左”的偏向时，相当一批干部对农民斗争地主时的过激做法不但未能制止，反而如各地的《告农民书》所说的，告诉农民对地主是“想怎样斗就怎样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许多干部，也是农民出身，与农民有着相同的情绪。

三是对各地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认真的调查，对减租减息和前一阶段土地改革的成绩估计不足。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和抗战胜利后的反奸清算，解放区特别是老区的土地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地主的土地占有量已有了较大减少。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1945年冬至1946年春对老区9个县20个村7年来（新政权建立以来）土地及阶级关系的调查，“地主分化没落，人数减少，经济力量大大削弱”。这20个村原有地主62户，占总户数的5.2%，调查时减少至27户，占总户数的2%，地主占总户数的比重下降了3.2%。原有的62户地主中，能够保持地主地位的只有22户，约占1/3，其余的40户，改变了原来的经济地位，其中6户转为富农，29户变为中农，3户变成贫农，1户变为其他，还有1户绝户。这20个村地主占有的土地总量，也由1939年的38.5%，下降到1946年的5%，减少了33.5%，每户平均减少土地416.2亩。与地主人数减少相伴随的是中农大量增加。这20个村原有中农375户，占当时总户数的31.3%，调查时增加到795户，占总户数的59.9%，在总户数中，中农的比重增加了28.6%。这些新增加的中农中，有240户是由贫农上升的，占现有中农总数的30%，由雇农及工人上升的25户，占3.2%。这充分说明，经过减租减息，晋绥地主的土地已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

了农民手中。其他解放区的老区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

对于这个情况，土改复查时一些地方没有充分注意到，只看到了地主剥削农民的一面，没注意到新政权建立后农民的经济地位上升的一面；只看到部分地主还留有较多的土地，没注意到许多农民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土地。不作深入了调查，或者有部门调查了对调查成果又不重视，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减租减息后的老区农村，仍有大量的地主，仍存在严重的封建剥削。对于一些土地已转移出去的地主，认为是装穷或故意转移土地对抗土改，以至于创造了“破产地主”、“下坡地主”、“化形地主”等名词，也要对其开展斗争，这就人为地扩大了打击面，把许多中农甚至是贫农也当作地主而加以斗争。

与此相联系，1947年平分土地过程中，对1946年底至1947年上半年的土改复查成绩，没有作实事求是的估计，认为土地改革还不彻底，贫雇农还未翻透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东北解放区为例，在平分土地运动开展前，北满各省约有三分之一至半数的地区，经过清算运动、煮“夹生饭”运动和“砍挖运动”，“地主阶级已被打倒了，土地已分配了，土匪已彻底肃清了，地主的反动武装已被解除了，地主的财宝已被挖出来了(也许还不彻底)，封建势力基本上已被摧毁了，广大农民拿到了土地，掌握了政权和武装，已经相当普遍地发动起来”。像这样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地区，已没有必要再平分土地，只需要在较小的范围内适当调剂就可以了。当时，多数解放区的老区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可是全国土地会议后，再来一次平分土地的运动，而且是彻底平分，而地主、富农已无多余的土地可分了，就只能是拿出中农“长余”的土地来分，侵犯中农利益的事也就随之发生了。

四是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划分阶级的标准，政策规定不明确。土地改革最重要的一环是订成分，只有明确成分，才能确定斗争对象。虽然一些解放区在发动土地改革之时，出台过如何划分农村阶级的文件，如晋绥解放区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晋冀鲁豫解放区太行区的《关于农村阶级划分标准与具体划分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常没有严格按照这些文件的规定去划分农村阶级。关于如何划分农村阶级，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1933年10月，毛泽东曾写了《怎样分析阶级》，简明扼要地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的划分作了分析。同时，他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土地斗争中特别是阶级划分时遇到的20个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解释。这两个文件虽然是十几年前出台的，但对于正确划分农村阶级仍是有指导意义的。由于战争环境，指导土地改革的干部几乎都没见过这两个文件，就连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想了许多办法才找到。1946年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要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没有一个与之配套各解放区统一的农村阶级划分标准。这就难免使各地在划分农村阶级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之相反，1947年初晋绥分局在兴县木栏杆村土改试点发明的以“查三代”、“看铺摊摊大小”和“政治态度”作为阶级划分依据的办法，经过康生、陈伯达推介之后，迅速影响到各解放区，有的地方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于是，一些早已放弃了封建剥削的农民被定为地主、富农，或者“破产

地主”、“下坡地主”、“生产富农”之类，一些本是中农的农民因为“摊摊”较同村农民稍大些，于是就拔高其阶级成分。也有一些有小毛病或者与积极分子有过矛盾的农民，被扣上“反对土改”、“不拥护新政权”等帽子，划入地主、富农的队伍中，人为地扩大了打击面。

在依靠力量上，只强调满足贫雇农的利益，却对于团结中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贫雇农是农村的主体，他们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有打倒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有很高的革命热情，是土地改革必须依靠的力量。但是，中国农村中，中农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尤其是老区在经过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后，中农的比重在有的地方甚至要超过贫雇农。在1947年下半年的土改中，特别是各解放区的《告农民书》中，片面地提出“村里的一切事，由贫农团领头来办”、“一切权力归贫农团”，实际上就是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把中农搁在一边。虽然各地《告农民书》中也讲到“中农是咱们的基本群众”，但又要求其拿出“长余”的土地，这就不但使中农在土地改革中得不到利益，反而要侵犯其利益。同时，过分相信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只看到农民革命的一面，没有看到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群众的“尾巴”。

在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上，也是片面地强调运动，不讲政策，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如“运动等于一切”，“运动高于一切”，“运动就是教育”，“领导就是包办”，单纯地追求运动的“规模”和形式主义上的轰轰烈烈。甚至提出为了运动，“不要怕乱”，“需要乱多久就乱多久”等，以至出现诸如东北解放区的“反复扫荡”、“联合扫荡”（即“扫堂子”），不但“扫荡”乡村，还跑城镇“扫荡”，严重地侵犯工商业。

五是对此前土改中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对已出现的“左”倾错误认识不足。1947年土改高潮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在上半年的土改复查时就有了明显的苗头。土改复查主要针对“五四指示”后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土改不彻底、不深入而开展的，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看待前一阶段土改运动的成果，一些地方没有作出正确的估计，只看到“五四指示”对地主、富农有较多照顾的一面，没看到土改已取得的成绩，华东局1947年的“七七指示”对1946年的“九一指示”的全盘否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各地已出现“左”的倾向后，各个解放区和全国土地会议对此没有高度重视，虽然也曾笼统地讲过要防止出现“左”的倾向，但重心却放在如何防右了，认为土地改革运动虽然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但仍很不彻底，地主阶级还没有被打倒，贫雇农还没有彻底翻身，需要来一个规模更大、更深人的群众运动。而此前土改不彻底，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许多“坏干部”在那里起阻碍作用，是严重的“党内不纯”造成的，因此要“搬石头”。结果，把斗争的矛头，一方面对向地主、富农（包括被拔高了成分的其他农民），另一方面也对向原来的农村干部（即旧干部）。

此外，对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想的破坏性，也没有深刻认识，过分相信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只看到农民革命的一面，没有看到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也有其狭隘、自私的缺点。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几千年以来一直是激励农民同地主阶级斗争的动员口号，这也是中国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太平天国的农

民英雄们还把"无处不无均匀，无人不饱暖"，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其实也把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极至。平均主义曾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一面旗帜，但当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发动进攻时，这种平均主义思想也容易冲击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结果不但"均"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也部分地"均"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甚至跑到城里将工商业者的财产也"均"掉了。对于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危害，本应予以充分认识和防止，并教育农民加以克服，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党内相当多的干部普遍认识不足，似乎农民是天然的革命者，农民没有落后性，跟在农民的后面，听任其对他们认为要斗争的人"想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

土地改革运动从它的规模、影响和意义上讲，都要超过我们党所领导的历次群众运动。虽然党有过领导土地革命的经验，也有过领导减租减息的经验，但领导这样一场几乎影响到解放区每一个人的巨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运动，这是从未有过的。对于解放区的各级干部而言，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土地革命的经历，对土地革命时期一度出现的严重的"左"倾错误给革命的危害，没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他们领导和参与这场运动，只能是在摸索中前进，因而出现一些偏差，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在土改复查和平分土地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左"倾错误，有的地方甚至还相当严重，但应该看到，它与土地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绩相比，是次要的，局部的，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既要对其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有正确的认识，以吸取经验教训，更要看到土地改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如果看不到这种作用，那么，人民解放战争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就取得完全胜利就无法解释了。

对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一些地方曾作了一定的抵制和纠正。

在东北解放区农村掀起"扫堂子"之风时，不少农民赶着爬犁、套着大车，成群结队地跑到城里，说是挖地主的底财，实际上是没收地主在城里的工商业。1948 年 1 月初，合江省几个县的农民派了几百辆大车，来到省会佳木斯城外，准备进城挖浮财。面对这种情况，佳木斯市的负责人颇感难办，不同意农民进城，会被指责为包庇地主；同意农民进城，城里的工商业就会一扫而光。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市委领导向省委书记张闻天作了汇报。

对于"扫堂子"的做法，张闻天是不赞成的，他曾明确表示，"'扫堂子'的做法是'左'的东西，不能搞"，他还指示《合江日报》不要转载《东北日报》和其他省报有关"扫堂子"的经验和社论，并制止了合江一些地区的"扫堂子"。听了佳木斯市委的情况汇报后，张闻天亲自召集有关干部开会，并在会上明确表示：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中国土地法大纲》作出的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和合法经营的规定是正确的，农民进城挖浮财是同党现阶段的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他说：如果现在把铁工厂、木工厂分了，以后谁来给农民生产和修理农具，谁给部队缝制衣服？农民进城，看起来眼前多分了一点浮财，但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损害了贫雇农的利益，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前线和满足农民本身的需要，都是不利的。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张闻天起草了《合江省委关于彻底平分土地保护工商业的指

示（草案）》，明确规定："农民不得直接查封工厂、商店，更不得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凡农民人城没收、清算工商业，各区书（记）应负责审查与调查清楚。不能没收者，应向农会解释清楚。同时，在贫雇农大会、代表大会上，必须将工商业政策讨论清楚。"

但是，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在各解放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要对此加以彻底纠正，使土地改革走上正轨，必须由中共中央作出统一部署。

第六章 纠“左”

第一节 决心纠“左”

一些地区的土改运动中出现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通过不同的渠道汇报到了陕北高原上的中共中央。

较早发现土地改革运动出现“左”的偏差的领导人是任弼时。1947年10月1日的《晋绥日报》，以赞赏的语气报道了兴县黑峪口村群众斗争开明绅士刘少白的情况。接着，晋绥分局主办的《土改通讯》上，又发表了《关于兴县后木栏杆自然村成分问题的研究》(即《后木栏杆调查报告》)。任弼时看了这两份材料，甚感吃惊，特地让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渡过黄河来陕北汇报情况。

在此略前一点时间，即9月26日，中央工委在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电中说：“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议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会，县以下代表会由区、村直选，县以上代表由区县代表间接选举；“但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代表会有权审查政府机关的工作和撤换不称职的工作人员。任弼时感到，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他一方面将中央工委的电报转发各地，要求“按情况采择试行”，并加了两个注：一是认为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理由是现在许多地方的农会多系贫农会，其中只有少数的中农参加，如用农民代表会，则将有一批中农也不能参加；二是在原电中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地方，加上“新式富农除外”。另一方面，他于11月1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对中央工委电报的修改情况，并着重提出：

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否应完全如旧式富农同样处理，也值得考虑。下面由富农手里拿出多余财产等，多是采取逼、吊、打的办法；同时，新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也拿出来，在农会中会产生一种怕变富农的思想。这一问题究竟应如何处理为妥，还无成熟意见，可否规定对新式富农多余的土地，劝说他们自动拿出平分(如对富裕中农一样)，对他们多余的房屋、粮食、耕牛和农具，除自愿献出分给贫苦农民者外不动，或直接规定不动他们多余的东西(土地除外，即土地应平分)，以示与对旧式富农处理的分别。

任弼时还建议："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得过火点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成富农等，因此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这时，任弼时想起1933年毛泽东曾写过《怎样分析阶级》，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于是就要时在晋绥的中央机要局负责人曾三查找这两个文件，他为此事询问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从晋绥来陕北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谢觉哉，请他们帮助寻找。11月下旬，任弼时终于找到了这两个文件。

这期间，任弼时还抱病到驻地陕北米脂县的钱家沟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他同时布置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外出去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调查一村一户的人口数、土地数和评定阶级成分的情况，并让工作人员在外出购物时，问小商人生意好不好做，怕不怕没收等，然后写成材料交给他。这样，他掌握了周围三十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

土地改革出现的"左"的偏向，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全国土地会议后，毛泽东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和研究各解放区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情况，以及土地改革中的具体问题，他自己也于10月中下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在陕北的佳县进行调查研究。随后，他又听取了任弼时关于解放区土改情况的汇报，认为如果不克服正在抬头的"左"的倾向，就会失去一部分群众的同情，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

1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略加删节后，发给各地参考，并要求各地提出关于阶级成分分析的明确意见，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指出：这两个文件"其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政策是过左的错误政策，但关于阶级成分的规定（即两项文件的主要部分）则是基本上正确的"。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颁发这两个文件的决定中，曾亲笔写了一段话："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1947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迁到了米脂县杨家沟。杨家沟是县城东40里外的一个较大且地主集中的山村。全村270多户人家中有72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这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以来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此时，陕北战场的形势和全国形势一样，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战略大反攻，因而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集中讨论土地改革和其他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举行一次扩大会议（史称杨

家沟会议或十二月会议)。

为开好这次中央扩大会议，12月7日至24日，中共中央将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员分成三个组，分别讨论政治、军事和土改问题。土改小组由任弼时主持，参加者有林伯渠、叶剑英、习仲勋、李井泉、张德生等，主要是讨论土改中的有关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的问题。

12月25日，十二月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他花了很大精力为会议起草的主题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与会者讨论。

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土地改革总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毛泽东强调，在贯彻这条总路线时，应当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他说："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12月25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作了发言，都讲到了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出现"左"的倾向的问题。他说：

"在土改、整党工作中反对右的倾向，是反对一些干部对消灭封建阶级、驱除党内坏分子的斗争立场动摇，软弱无力。当然也要反对'左'的倾向，内战时期更容易犯'左'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

为了防止土地改革中扩大打击面，毛泽东根据各地的调查，明确提出在农村中按户数计算，地主、富农只占8%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90%，这个阵线不能混乱。毛泽东认为，对地主、富农也要有些区别，土地分配不能搞绝对平均，由于当地地主、富农太少就要同中农扯平，这也是不对的。

他还特地提到了如何对待开明绅士的问题，他说："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

最后，毛泽东强调，现在，反对右的偏向问题上已经解决了，所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是在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问题上新出现的"左"的偏向。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

在十二月会议上，任弼时也就如何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

消灭旧的土地制度，对于在抗日期间发展起来的党组织，这一件大事，党内外都需要进行教育。消灭具体的地主阶级，不可轻敌。地主阶级会利用各种方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现在，在运动已经起来的地方，在联合中农的问

题上有些“左”，山东渤海的情况亦然，恐怕各地均不例外，问题就是侵犯中农利益，认为中农为富农，排斥中农，不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等，在部队中也有所表现。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但领导上应及时注意。

任弼时针对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做法，提出若干政策界定：

——对地主应斗争彻底，经济上交出全部土地财产，按土地法规定分配，政治上要压服。但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必都捆打，更不应打死人。地主一般不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开明绅士可在群众同意下，保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开明的条件是：现在拥护反蒋和土改，愿意把土地财产拿出来分配。

——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政治上也可考虑不同待遇，一般保留选举权，开明的富农，也可保留被选举权。对新式富农，土地平分，多余财产是否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农被错订成分者，如成分降下来，东西应尽可能退还原主。

——地主富农之有工商业者，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其参加公营工商业者，合法的保护，非法的没收。

——对地主分子，一般以强迫劳动来改造，凡继续劳动五年，政治上无反革命行为，地财拿出者，可以改变成分；富农三年改变成分。在新解放区，以我军到达前一年的成分为标准。

十二月会议是中国革命在重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它在土地改革运动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向逐渐得以纠正，使运动很快走上了正轨。

第二节　明确政策

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采取了许多措施，纠正前一阶段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

这期间，任弼时为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做了大量工作。1948 年 1 月 12 日，他在杨家沟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有针对性地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对工商业政策；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反对乱打乱杀。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先作了审阅，并加写了不少文字，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若干政策的具体说明。

没有明确的阶级划分标准，或者乱提阶级划分标准，是造成土地改革扩大打击面的

根本原因。对于这个问题，任弼时指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在农村，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农村阶级的唯一标准。

任弼时具体分析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进而指出："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他宣布了中共中央新近作出的关于富农与中农的区分标准：即使有轻微剥削，但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25%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只有剥削部分超过25%而且连续3年者，才算富农。

能否团结中农，是土地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将一部分中农错误地当作地主富农对待，当作斗争对象，没收中农的土地财产，或在平分土地时强行抽出中农的土地，排斥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是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重要表现。对此，任弼时强调："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应该引起全党来注意，必须坚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因此，要将中农当作永久的同盟者。

土地改革是农民与地主间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斗争要讲策略和方法，不能不分情况，不加区别地乱斗一气。为此，任弼时提出，经济上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一场恶战"。为了赢得这场斗争，"需要很细致、很艺术的领导"。因此，对富农与对地主的斗争应有区别。以后对富农只能采取征收其多余财产的办法，不能没收其全部财产、房屋，更不应用扫地出门的办法去对付一般富农。对地主斗争的方法也应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恶霸与非恶霸。对大地主及恶霸斗争严厉些，借以警告其他地主，但地主拿出土地财产来的就不一定要拿到大会上去斗，只要他屈服，低了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

前一段时间，各解放区均发生过侵犯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一问题，任弼时说：一般工商业应当受到保护，即使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同样是应当受到民主政府的保护。就是地主在过去减租减息时期将土地变卖而投资工商业者，也不可没收。他指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保护和鼓励这些工商业，因为这样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需要的。"

任弼时还讲到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并且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对于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则要采取慎重态度，"地是要分的，但不要去斗。他们有错误可以给以批评，不要去打"。今后还要让开明人士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

土改运动中，由于政策掌握不严，不少地方一度发生了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现象。对

此，任弼时明确指出：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视，他要新华社将这篇长达1.5万字的报告用明码电报拍发给各地，立即在解放区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成小册子。他还特地提醒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注意，不要错译了文字和标点符号。随后，各解放区的大小报纸都用好几个版面的篇幅，转载了这个报告，从而也使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知晓了中共中央有关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

1948年春，毛泽东本人也花了大量的精力解决解放区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1月15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讲话，其中讲到消灭地主阶级与改造地主个人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并解释说，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但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他强调：“我们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会出乱子，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他写道：“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展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③决定草案明确指出了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必须妥善处理的一些问题：

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但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

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的政策，中农及其他阶层订错了成分者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尽可能退回，剥削收入在总收入25%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才为富农；

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认为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是“化形”而加以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予保护；

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

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

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

对地主与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地主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在斗争策略上应有区别；

禁止乱杀多杀，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和土改的地主富农看作国家的劳动力，加以保护和改造等。

1948年2月，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准备了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该文件共25章，有2万余字。前5章分别论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划分阶级的标准，通过阶级成分的方法，家庭成分和本人的成分。后面各章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与党的政策逐一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详细的说明，最后两章是关于犯罪分子的处理和人民法庭的工作原则。

为了写好这个文件，毛泽东先后召集周恩来、任弼时开了好几次会，他自己也作了反复的推敲和修改。2月15日，他让新华社将这个文件拍发给各中央局、分局，要求他们召开会议，逐条进行讨论，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各地对于这个文件的讨论延续了好几个月。虽然后来文件没有公开发表，但由于文件对于划分阶级的方法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政策都作了明确规定，各地高级干部对文件的讨论过程，也熟悉有关政策的过程，因而有力地推动了纠“左”工作的进行。

全国土地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各解放区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土地改革的报道，对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发表了一些介绍“左”的一套的所谓“经验”和做法，如《晋绥日报》上发表的批斗开明绅士刘少白的报道，《东北日报》发表的有关“扫堂子”的消息，对“左”倾错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针对这个问题，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收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认为“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其特点就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对这一问题加以高度重视，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问题。

十二月会议刚刚结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就写了一份报告给西北局并中共中央。报告提出：对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许多情况是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区不同的。内战时期阶级成分一般订得高，群众对此不满意，应按新规定重新评议阶级。老区中农多，贫雇农少，有的乡村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不足总户数的20%，如果再来一次平分土地，会使80%的农民不同意，像这样的老区不应平分土地，最好以抽补的办法解决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老区的地主、富农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户数8%的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订得和新区一样，就可能犯这样三种错误：一是把新富农评为旧富农；二

是会将已经被没收了土地并参加劳动至少八年以上的地主、富农，又订成地主、富农再去斗争；三是把富裕一点的农民订成地主、富农，或把我方公职的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动力者，也订成地主、富农。这在老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慎重处理。

对于这个报告，毛泽东极为重视，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同时，他还提议西北局的各负责人到各县去巡视。

1月19日，习仲勋将他在巡视中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在报告中提出：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农民，现在都有一种不愿当中农的倾向。在边区的劳动英雄中，那些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因有余粮，往往被作为斗争对象，这使广大农民对劳动致富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将对党和人民造成莫大的损失。由于老区中农已占优势，真正的贫雇农已很少。仍为贫雇农的人中，有的是因偶然的灾祸贫穷下的，有的是地主、富农成分下降还未转化好的，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果由这些本在农村毫无威信的人组织贫农团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这样运动中就会出乱子，这也是很多地方运动发生严重偏差的重要原因。

对习仲勋的报告，毛泽东再次作了批示，他要求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相同情形的，一定要密切注意"左"的倾向，并且告诫各级干部："凡犯有'左'倾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

在平分土地中之所以各地均出现"左"的偏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分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土地改革的程度，一律实行平分土地。在那些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的地区，再来一次平分土地，把已经打倒了的地主富农再斗一遍，结果扩大打击面，出现乱打乱杀，造成社会恐慌，农民不安心生产。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在不同地区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不同策略方针。

2月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中，概括地提出了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基本原则。(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而不是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在这种地区，过去的贫农大多数已升为中农，中农已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二）大反攻后的半老区，即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两次。这种地区，必须组织贫农团，必须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三）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

2月5日，刘少奇复电毛泽东说，在晋察冀，经过土改复查，土改彻底的地区只有一部分下中农稍少一点土地，贫农与富裕中农稍多一点土地，这种地区，完全不用再平分，也不必抽补了，如有个别缺地较多者，只需实行个别调整即可。这些地区应以生产和整党为中心工作。太行的情况是有1000万人口的地区已彻底土改，另有1000万人口的地区基本彻底但留有尾巴，那里是贫农特别是干部分得多于中农的土地，地主则只分

得少于中农也坏于中农甚多的土地，富农的土地亦少于中农。故这些地方，也不需要再分了。上述这两种情况，老区和半老区都有，但最大部分还是在半老区。因此，应规定在半老区中土地已大体平分的地区，也不应再平分，只须实行个别或部分的调整。

随后，毛泽东又分别致电各大区负责人，就按三种地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土地改革的问题，征询意见。

各大区负责人很快就回电表明自己的看法。习仲勋在报告中说，陕甘宁边区，约有130万人口的老区，在去年十二月会议前，土地都大体上平分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数（土地革命区，地主、富农过去漏网的是极少数），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如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大部或全部中农土地，甚至还要动10%的贫农（户数）的土地。要分给的是一部分很少或无地的移民，或倒给地主、富农补进土地。这使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对于贫农团问题，习仲勋的看法是，老区贫农团，不能尽其领导一切的作用。因为贫农团本身很复杂：有的因为过去分得地远、地坏，或人口增加，经济不能发展；有的因为偶遭灾祸下降；有的是地富还未转化；有的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者。后一种人，占贫农总数的1/4。因而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旦组织起来，就是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来。

习仲勋说：“土地再平分，农民都感到把农村追死啦。真正劳动的贫雇农，也抱怨我们给他们造好多困难。贫农团除此作用外，就再少其他作用。至于生产吗，在农村，那倒是中农领导贫农。至于起领导作用吗，那又变成少数不纯分子把持村、乡政权。因此，我完全同意，在老解放区的土改方针，是调剂补平，再不能实行平分。在贫农少的地方（边区，老区，有很多乡村，就很少贫雇农），不组织贫农团。多的地方，组织贫农小组，在乡农会之下，起其保护农村少数贫农利益的作用，不能使其起新区或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老区的农村支部，经整党后，仍应是领导一切的组织。否则，将会发生农村工作混乱的现象。”

薄一波在2月5日的报告中说，老区地主、富农一般已经斗彻底、分彻底，60%至80%的贫雇农已经满意，老区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各级干部、党员所包庇的地主、富农没有斗彻底，地主、富农中的军干烈属，多留土地财物；非地主、富农军干烈属，多分土地财物；党员干部，多占土地财物。这就是老区的基本情况。如果不顾这一具体情况，只在土地问题上打圈子，再来一次平分运动，一定不能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而且一定会发生“左”倾错误。因此，老区不应机械地再来一次平分运动。可采取抽补调剂，动少数不动多数的办法。

2月10日，薄一波又就分三种地区进行土改的问题作了专题报告。报告中说，老区地主、富农已经彻底消灭，贫雇农绝大部分已经彻底翻身，土地早已平分，新、老中农合计占全村户数的80%以上；半老区的地主、富农亦已大体斗彻底，土地亦大体平分过，新、老中农合计占全村户数的60%至70%。因此，这两类地区中，均不必再来一次平分土地运动，只实行抽补调剂与填平补齐即可，这两类地区可不建立贫农团，至于第一类地区就是贫农小组也不必建立，只有第三类地区可完全按照《中国土地法大

纲》开展土地改革。

在经过反复征求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了《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于2月22日公开发表。

该指示明确将所有老区与半老区（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前解放的地区），分为三种类型，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

第一类地区，是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土地已经平分，决无再行平分的必要。留下的问题是在较小的范围内，用抽补方法调剂土地及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使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从地主、旧富农，尤其是占有超过农民很多的土地财产的干部家庭那里补进土地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需要抽出新富农甚至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取得被抽者的同意，方可抽动。

第二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地区。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平分已大体实施，但不彻底。因此，一般地也不是再来一次全面的平分，而是实行在较大范围内的调剂。只在某些特殊地方，在多数农民要求并取得中农同意的条件之下，应当重新平分。在这类地区如果不抽动新富农及一部分中农的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时，凡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上下者，在取得本人同意以后，可以抽出中农的一部分土地，但以不超过其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为限度。

第三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地区虽然也经过了清算和土改，但是工作很坏。另一部分地区，则是边沿区或收复区，土改工作尚未进行。所有这些地区，土地并未平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土地关系及阶级情况仅有若干变动，地主、旧富农仍占有大量的土地财产，贫雇农仍然是人多地少。在这类地区，完全适用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方针。

在第一、第二类地区中，在农民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地方，目前应依上述各项规定，于春耕前实行调剂完毕，确定地权，以利生产。在工作尚未做好估计春耕前已不可能完成土改任务的地方，即应将土改工作推迟至夏季以后进行，并保证今年的土地生产物归耕者所有，而将工作迅速转入生产、整党和建立乡村民主生活上去。在第三类地区中，更应将已着手的土改工作赶快作一结束，推迟至夏季以后重新进行，以便迅速转入生产及一般的宣传组织工作。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转战一年多的陕北，渡过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发表了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讲话》肯定了晋绥边区各方面工作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在过去的土地改革中，晋绥边区存在的三个偏向："第一，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

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

在《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他指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强调：

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

至此，"左"倾错误对土地改革和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危害，引起了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各项土地改革的政策已十分具体和明确，中国共产党有关土地改革的理论也大大丰富和成熟。

第三节　典型经验

为了迅速落实老区、半老区土改方针，使土地改革运动走上正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树立典型。毛泽东还向全体

从事土改工作的干部推荐了几个土改成功典型。

典型一：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会议的经验。

1948 年 1 月 27 日至 31 日，崞县一区与城关召开第二届联合区代表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晋绥分局关于改正错订成分及团结中农等指示，解决改正错订成分、平分土地、检查斗争与分配、健全与巩固组织等问题。

这次会议经过初步检查，崞县一区与城关区的 32 个自然村中，富农错订地主者共 43 户，中农错订富农者 106 户，中农错订地主者 26 户，中农错订所谓“下降地主”者 5 户，其他错订为“破产地主”者 51 户。根据 19 个村的检查结果，斗争面一般在 10% 左右。

会议开始后，首先把毛泽东《怎样分析阶级》小册子在各小组宣读一遍。与会代表听后，表现了各种复杂的思想、态度与看法。开始，在以前划成分“错”与“没错”这问题上展开争论，如有的代表说：“订时咱贫雇农都在场，一家一家都讨论过，一点也没错，扣起的都是地主、富农，就没把咱中农扣起！”“戴的帽子正嵌（合适的意思），哪一样也在格格里！”还有的代表则不服气说：“这本本是南方的，咱这地方不能干；一个地方一个样，咱这地方就是由咱！”还有代表怕这个小册子被那些错划的人看到，他们说：“人家（指中农被错订的）知道咱们闹错了，把咱们的门也要打烂哩！”“这书不敢露，地主富农可会说哩，咱们这一伙说不过人家！”“叫订错的‘破产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恼火’哩！”

看到这种情况，领导上就让代表们反复酝酿讨论，并加以启发引导，最终使代表们认识到改正成分对全体农民有利。有的代表说：“按政策，按公心，应该改过来，将心比心，把自己人订错了，不应该！”“把自己人不该送到狼群里去！”

虽然有了这样的认识，但要农民代表公开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他们又顾虑重重，有的不愿说“软话”（公开承认错误），有的怕地富报复，但最主要的是怕退东西，特别是东西已经分配的地方。有的代表说：“粮食吃了，衣服穿了，白洋交贸易局了，怎往回退？”“东西已经分了，吃进肚里去不能往回吐啦！”这时，参加各组讨论的县委干部就诱导启发，进一步组织学习晋绥分局所发的关于分析阶级的补充草案，引导代表具体研究分析各村到底订错几家，应当怎样改正，并分析了订错成分的原因。

接着，会议又讨论了平分土地的问题，讨论前，先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各组自由咯吵，提出问题，大家解决”，“吵了两天两夜”，最后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讨论一般地主富农的分地问题时，开始，代表们原来的意见都是“恩赐”地主富农一小部分坏地，数量也不足维持生活。他们说：“让狗 × 的也受受咱农民的苦处，叫他们掏烂沙地去！”学习有关文件后，改变了认识，他们说：“对着哩！要够他吃的。不然，他们偷咱们，要吃的，还得剥削咱们。”“他要没活法，狗急跳墙，闹得村子里不安，对咱们还是个不利！”于是一致认为要使“富农能生产，地主能生活”。会议还对地主富农出身而为革命牺牲的军人与干部、解放军军人、国民党军队官兵、二流子等如何分配土地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分析了土地分配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

崞县上述纠正错划的阶级成分的做法，在这里领导土改工作的晋绥分局社会部部长

谭政文，向分局书记李井泉作了详细报告。晋绥分局将报告又上报给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对崞县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个报告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典型二：平山老解放区土改经验。

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分为老区和半老区两部分。平山老区已解放十年以上，经过了抗战中的减租减息；半老区也解放了两年半，并经过了抗战胜利后激烈的反奸清算。不论在老区和半老区，都经过了土改和土改复查。新的富农、中农经济已占相当优势，贫雇农的比例已相对减少。在老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一般只有30%至40%，真正缺地，特别缺乏好地和近地的农民，则只占20%。在半老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也只占40%左右。占有较多和较好土地的地主富农，差不多全是党员干部的家庭以及“三三制”中的党外人士。旧富农虽然拥有比斗争过的地主较多的土地，但比新富农甚至比富裕中农还少。

平山在土改中，也曾发生过各种偏向，一是群众自发起来斗争所谓“坏干部”。在不少地区，已有一些党员干部被捕、被打，造成一般党员干部的惊慌。二是已受打击的地主、富农阴谋乘机报复，煽动群众对党员干部胡乱斗争。三是工作团机械地坚持先斗地主再解决干部问题，硬把解决土地问题和民主运动机械分开，将群众反对的大批党员干部当作“石头”搬走。四是工作团利用权力，强调群众对斗过的地主再来斗争，企图掀起所谓“高潮”，制造所谓“轰轰烈烈”，结果犯了“左”的错误。

为了克服上述偏向，平山创造性地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据当时参与领导平山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冯文彬回忆：“经过历次运动，地富的地已大部分散，真正无地的农户已不多，以往土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公平、不彻底。主要是干部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这是广大群众最为不满的地方。”为此，平山在整党中做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动员他们在平分土地中，首先带头交出自己多占的土地，不少村将整党与土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此之前，平山土改在斗争地主的同时，也出现了大批揪斗干部党员的现象，逮捕、吊打，甚至打死干部。造成干部普遍恐慌，逃跑和自杀时有发生。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在1948年初的平分土地与整党运动中，平山采取开门整党，给犯错误的干部办训练班的做法。首先是公开党的支部，把党的会议与群众大会合而为一。其次是从乡到县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首先吸收非党贫农参加，接着吸收非党中农也参加，改变了过去农村支部开会时那种神秘性。最后，党员、干部在群众对证下受到清查，并由群众提出处理好坏党员的意见。

平山整党的办法受到刘少奇的充分肯定，他认为这个办法有三点好处：第一，整党中有群众参加支部大会，非党群众觉得受到党的尊重，有了充分作证、说话、提意见的机会，但他们没有权力在党的会议上打人或胡闹。党既尊重了非党农民，非党农民就加倍尊重党的领导。这样既可主动地处理干部，又不至于陷入群众大会处理干部那种被动过火状态。第二，开门整党，请群众参加，这样大会也是群众大会，具有群众大会的压力，使得干部任何错误都无法隐瞒欺骗和狡赖。再加上强有力的领导，能够了解全盘情

况，被批评的干部可以在会议上说明他们的某些错误是要上级负责，上级当时也可替他作证，这样就可分清责任，避免群众单纯片面的观察党员干部缺点。第三，用这种方式要地主、富农出身的农村党员干部交出土地财产来，也会比一般的把他们交给群众大会去斗争的方式要更适当些。

刘少奇将平山土改与整党结合的经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典型之三：绥德黄家川抽补典型经验。

黄家川是陕甘宁边区绥德县义合区三乡的一个普通村庄，全村共有75户，333人，土地革命时期为游击区，土地未被分配。1940年，黄家川进行过一次“并地”（即由农会主持把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地租减一半，并具有永佃性质，但土地所有权所属于地主）；1947年春天进行过一次比较彻底的土改，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全村消灭了无地户。

平分土地前，该村有3户地主，24人，人均土地1垧6堆3（按：当地1垧为8堆，约合3亩）。31户贫雇农，113人，人均土地1垧6堆4.5户富裕中农，32人，人均土地2.5垧。36户中农，164人，人均土地2垧0.5堆。从数量上看，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所以平分运动开始时，贫雇农因急欲求得地主的粮食和浮财，曾认为“土地没分头”。后经发动群众深入的登记土地和调查，发现不仅山地有好坏，川地也有好坏，并有远地近地的差别，同时发现了不少的公地、合作社地和绝户地以及上年春天土改中分配不公的情形。经过农会组织的精密计算，发觉各阶层土地产量相差很大。地主70%以上是好地和较好地，贫雇农的土地52%是坏地。

这一计算结果，“大大启发了贫雇农，当开始形成力量时，便勇猛向地主斗争，声势很大。”这时，中农表面都赞成彻底平分，但实际上都有着种种顾虑，如担心动了坟地、养老地，分了祖业地，怕把土地分成小块等。针对这种情形，工作组解释说抽补调剂土地不是打乱一切土地平分，同时加强对贫雇农宣传团结中农的重要，使其认识到既要领导中农又要向中农让步。然后召集中农和贫雇农一起开大会，反复解释讨论了土改中要坚持满足贫雇农要求和团结中农这两条原则。经过双方这样深入的讨论，动员中农自动“欢迎”土地（即自动拿出之意）。在此基础上，全村进行调剂土地，经群众反复酝酿，按照全村平均产量及人口，并照顾贫苦和老弱残废，实行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先动用地主土地、公地，不足时再动用中农“欢迎”土地，全村基本上达到拉平。这样分配的结果是，地主每人平均产量6斗8升4合，富裕中农7斗零3合，中农7斗，贫雇农和老弱残废的7斗6升。全村每户都有园子，也都有好地。群众对土地分配都很满意，他们说：“这回才真正彻底了。”36户中农中，有8户分得土地12垧2堆，有7户抽动了土地，但分配了果实及调剂了园子地，并废除债务，减轻负担，动了地的中农们异口同声地说：“咱们是真心欢迎出这一点地。”

毛泽东对这崞县、平山和绥德黄家川的土改经验十分重视。1948年3月12日，他把谭政文关于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经验的报告，取名为《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并加写了一段按语，要求将崞县、平山和黄家川的经验，印成小册子，发给

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他说:"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按照这个指示,各解放区的报纸都转载了这三个地方土改的有关报道,并汇集成册,发给每一个乡村干部和土改工作队员,成为各地指导土改的重要参考文献。

第四节 纠正错误

十二月会议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解放区均花了很大的力气开展纠"左"工作。

错划阶级成分,是土改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表现,也是导致其他错误产生的重要根源。为此,各地在纠"左"时一般都从订正阶级成分入手。

晋绥解放区曾是"左"倾错误比较严重的地区,这里发明了一套"左"的划分阶级的方法。十二月会议后,晋绥分局于 1948 年 1 月 7 日发出《关于纠正"左"倾危险的指示》,强调:"在划分阶级成分、团结中农、工商业政策及三查三审等问题上,普遍存在着'左'的倾向,应立即纠正"。1 月 14 日,晋绥分局又作出《关于纠正错划成分与团结中农的指示》,指出过去在划分阶级问题上,破产地主和富农不少,特别是把富裕中农订成富农,"这种错误估计在老区比较严重",必须根据《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进行改正,并取消"化形地主"与"生产富农"的名称。

纠"左"工作开始后,兴县胡家沟村在进行改订成分的工作时,首先召开中农老汉座谈会,再由贫农会及农会会员大会根据划分阶级的文件数次反复讨论。通过对照文件中规定的阶级标准,农民们认为以前划分阶级时把剥削、历史、铺摊三项平列起来,没有把剥削关系作为唯一标准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农民们说:"咱那时候就觉人家够不上,但怕人说失去立场,走地主路线,不敢说出来。"也有人对改订成分持反对态度,他们说:"已经订住啦,不能改正啦!"于是在农民中开展了要不要改订成分的讨论。多数农民赞成实事求是地改正错划了成分,他们有的说:"改正是为了咱农民,而不是心疼地主富农们。"也有的说:"狼群里寻羊,改正过来咱多了力量,少了敌人,农民才能大胆发展生产。"

会议又分析了过去把部分农民错划为地主富农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犯了偏重"照顾历史"、"看铺摊子"的错误,没有区别清楚剥削关系、剥削的性质和分量。农民胡初初的祖父是个破产地主,祖母是有名的"母老虎",他父亲已参加劳动,只是劳动不太好。胡初初本人则从小就受苦。1925 年他与父亲因生活不下去,到邻近的东山租地种,一种就是 20 年,到 1945 年才回到胡家沟。这样一个农民,在土改订成分时因"查三代"的缘故,被订为"破产地主"。在改订成分的大会上,群众说:"把个贫农订成破产地主多冤枉,这是硬是把一家人往门外推嘛。"另一个叫胡红全的农民,这年 58 岁,曾享过

三五年地主的福，但不久就把自己的家业弄光了，后来揽了近20年的工，又租种了十来年的地，新政权建立后才又买下了地。群众说："他小时候剥削人很少，长大了反倒受人剥削，还能算是破产地主?"于是一致同意改订为中农。经过群众讨论酝酿，原订地主17户地主富农改正了10户，只有7户仍保留原来的成分。

在这次重新划定阶级中，各地均注意听取群众意见，采取群众自报公议、三榜公布的方式，而不是以往那种由少数贫雇农积极分子或工作团说了算。

1948年3月初，晋冀鲁豫解放区武安县九区什里店村重新划阶级，土改工作组事先学习了划阶级的文件，明确了划分各个阶级的标准，并且分别找已串连的贫雇农一起学习，结合具体情况作了研究，使自己和贫雇农骨干都能掌握划阶级的标准。然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即每个人自己把条件讲出来，自己说自己算哪个阶级，然后由群众公议。群众有不同意的，有多少种意见都可以，都写到榜上贴出来。以后大家再讨论，再出一次榜。最后再由全村人来讨论，到被划者自己和大多数群众都同意后，才算定案。三榜之后如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向人民法庭提出申诉。

什里店在重划阶级时还明确规定，划成分的时候要注意几点：（一）老老实实，是啥就说啥。（二）有不同的意见，在划的时候要讲理，可以争论，但不能吵架打架。（三）打破情面，不要包庇。（四）不许公报私仇。宣布工作组没权决定哪个人是啥成分，只是在群众对条件不清楚时进行讲解；划阶级和填补是两件事，划成贫农不一定就填补，划成中农也可能分地，有的贫农多得了果实的也一定要退。通过这种方法，把政策交给群众，掌握阶级标准，避免过去划阶级"比生活"、"比人格"的现象。过去许多农民不敢大胆发展生产，担心粮食多了，生活条件好后，提高阶级成分遭到批斗。这样划分阶级后，农民们说："这样重视劳动，劳动得红，没剥削就永不会被斗，那地以后就有人要了，会要涨价哩!"

通过重划阶级成分，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农民队伍，稳定了社会秩序。东北解放区在"砍挖运动"中，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全解放区受打击者占人口25%，有的地方则更高，达到40%至45%。如哈尔滨市郊区农村自"砍挖运动"以来，各屯的群众运动规模都相当大，随之而来的打击面也很大，打击面最大的村子，如香坊区大沟村占全村人口的44%、东大坝村占46.7%，松浦区李曼屯占65%，一般的屯子均达到16%到25%左右。打击面扩大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订阶级的标准不明确，将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其次，在"砍挖运动"中，农民在地主富农少的屯子里找头子，凡是家底厚，有车马有浮财，就被定为"扫荡"对象。再就是干部存在"左比右好"的思想，有意识地顺应群众的要求，把划阶级的标准年限予以更改，往上推，甚至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又有意识地把政治条件加上作为订阶级的标准，以提高阶级成分。

1948年2月5日，《东北日报》发表《高潮与领导》的社论，认为"这次的打击面是相当大的，应当引起严重的注意，现在来纠正，还不算迟，如果现在不加以严重的注意，那就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为了缩小打击面，分化打击面，社论认为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第一，划阶级只能以剥削关系、生产资料和生活状况为标准，其他一切条件，如历

史和政治均不能作划阶级的标准。

第二，划阶级的时间只能以“八一五”即日本投降前三年的生活状况为标准，不能以其他任何时间为标准。

第三，查“化形”只能查“八一五”土地改革开始后这一段时间。“八一五”前是什么阶级就算什么阶级，“八一五”前分家的，就照分家后的成分计算。“八一五”前由地主富农下降为什么成分就算什么成分。过去各地时间定得不对的一律应根据此条改变。

第四，对中农与富农的区别，应按东北局指示：凡剥削收入分量扣除其被剥削部分，不超过其家中一年总收入的25%者为中农，在某种情形下超过25%但不超过30%，群众不加反对者，也可划为中农。

第五，在划分经营地主与富农时，不要把富农划成经营地主。

第六，对地主与富农应有区别，对大、中地主恶霸富农与对小地主、一般富农也应有区别，对地主应留给生活出路，对富农只分多余部分，对小富农更应从宽。对一般佃富农只分牲口，使佃富农在分出牲口、分进土地的条件下，不会吃亏。

按照这个标准，东北各地重新划分了阶级。在未纠正之前，东北解放区的合江省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15%至20%，人口占20%至25%。重划阶级之后，地主、富农户数一般占总户数的7%到9%，人口占总人口的9%至13.5%。如富锦县五区，未重划阶级前地主、富农户口占14.8%，人口占23.1%。重划阶级之后，地主户口占4.5%，人口占7.2%；富农户口占4.9%，人口占7.7%。桦川县未重划前，地主、富农占户口的17%，人口占26%，重划后据4个区统计，地主、富农户口占9.3%，人口占15.7%。

据晋绥解放区半老区的山阴、平鲁、左玉、左云等12个县（其中8个全县，7个全区）的统计，总户数246091户，原订地主、富农24430户，占总户数的9.9%，改正后为11085户，占总户数的5.5%，地主、富农的总户数下降了4.4%，也就是说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重新回到了劳动农民队伍中。

此前划分阶级出现的偏差，出现是将一部分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各地在纠“左”过程中，除了将错划了成分者如实改正外，还公开赔礼道歉，在经济上予以补偿。例如，东北合江省各县专门召开划错中农会议，对错划者公开道歉，并将农会中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分给他们，帮助中农每户解决一头牲口。确实解决不了的，则在年内换工种地的牲口工不还，秋后再帮助其解决牲口问题。本年内的粮食、种子都由农会帮助解决。

土改运动中，订为什么样的成分对农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政策很明确，贫、雇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富农是斗争对象。在纠“左”中，由于实事求是地改订了成分，缩小了打击面，稳定了中农情绪，使他们能放心地发展生产。山东一解放区五莲县的农民土改复查时说：“生产？生什么劲，够上个中农就来罪了，光够吃不挨饿就行了。”通过纠“左”开展改订成分的宣传后，农民们说：“这样真清楚，上年哪有个标准，反正是有东西斗就是，今年毛主席的标准来了，生产有指望了。”那些被错

划了成分挨了斗的中农，对改订成分的感触就更深，他们说："改订了成分，身上真轻快。""以前没有参加农会，看人家开会心里真馋人，现在改正过来参加了团体，真是喜之不尽，对（土改）复查一点意见都没有，这是潮流转的，俺一辈子也忘不了共产党毛主席。"还有中农说："共产党要胜利了，他们办的一都是安天下的工作。"

在土改复查和平分土地中，冀东地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现象。1948年4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冀热辽分局，"必须排除一切犹豫与动摇，立即坚决补偿中农—被侵犯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空提团结照顾"，要求划错了成分的按新标准划回，摘掉帽子，保证其土地、牲口和粮食至少不低于贫雇农翻身后的水平，组织上吸收其加入农会或政权，对于冤者抚恤其家属。

晋绥分局发出指示，认为前一阶段对中农利益的侵犯，"这是我们的错误，其错误不是贫雇农，而是工作团，但负责赔偿的，不是工作团某人，而是政府，所以我们在赔偿时，应公开认错，并宣布中农的财产是不可侵犯的，除此次赔偿外，并保证今后中农的财产，不得受到任何侵犯。"根据这一原则精神，晋绥分局提出的各类物品的赔偿办法：

——有些中农，缺乏种子和口粮，因而生产无法进行者，应先退够今春的种子和夏收或秋收前的口粮，能够做到多退者更好，所欠部分，先记下账，等政府规定办法后再说。

——农具等物退还，若有长余，暂归缺乏工具的贫雇农借用，限本年内交还。

——牲畜如牛、驴因耕种需要，加之一冬草料的耗费，已分者，可与贫雇农伙喂、伙用，未分者原物退回，所用草料可在其他应赔财物上扣出。

——白洋、元宝、金子、烟土，原物退还，已交贸易局向贸易局取回，不能取回或本人不要金银者，可以烟土或农钞（注：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折还。

——衣服被盖未分者，可原物如数退还，但衣物过多，若本人自愿，可调剂一部分给贫雇农。已分者，酌情收回。

——家具不论已分未分应如数退还，但本人家具很多，保存无用者，争取其自愿调剂一部分给贫雇农使用，分到外村，本人又不十分需要，若本人同意，以木料酌量折还亦可。

晋察冀解放区冀中区十地委对被订错成分的中农采取的纠正办法是，凡财产已经查封但未分配者，启封被封财产，并向其承认错误，已经分配能够退还者尽量退还，不能退还者进行抵偿。如衣物已分给贫雇农用了的，可从今后分地主的浮财中补偿，粮食已经吃了的算作该中农的公粮，等麦熟或秋后由贫雇农收了粮食补还。目前生活困难的由政府用贷粮贷款的办法，维持其生产和生活。

1948年5月23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给太岳区党委的指示中强调，对于过去错斗中农和侵犯中农利益，不能以"这是不对的"一句话轻轻了之。不管有无保存的未分果实，都必须给予补偿。中农被斗者，一律承认错误，无条件地立即启封；被管制与登记

财产者，一律无条件地立即取消；强迫中农贷给贫雇农的款子与合作社强抽中农股金给贫雇农，以及强借中农的车辆、牲口给贫雇农者，立即无条件地退还原主。

前面提到过的永年县二区东大慈村，过去因为划阶级无标准，谁富斗谁，有一点小错也斗，再加上村干部、积极分子作风不民主，或私人报复，错斗了不少中农。工作组在领导纠“左”过程中，决定对于划错了成分的5户中农，首先补给土地让其下种，以免耽误春耕生产；其他财产待贫农团、农代会成立后再说。补地时，尽量退还错斗中农的原地，已分给贫农的暂时补给别的地，等收了庄稼后再归还。犁了未种的，退还原主，给犁地工钱。贷款中，对错斗中农予以特别照顾，多给贷款，帮助他们购买农具等生产资料。群众对这次纠正错误非常满意。他们说：“以前不管剥削不剥削那个斗法，谁还有心干活呢?”村里一个外号叫老海子的农民，50多岁了，当过20年雇工，置了20亩地，家有5口人，以前划成分虽划为贫农，但心里还老是害怕，这次工作组初到村时，他担心提高成分，吓得连饭都吃不下。在得知工作组是来纠错后，高兴地说：“以后咱东大慈街可和平了!”

在对错划了成分的中农予以补偿的同时，各地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被侵犯的工商业给予补偿。

为了保护工商业，各地都作出了许多具体明确的规定。1948年1月14日，晋绥分局发出《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2月1日，晋绥边区行署又作出《关于纠正执行工商业政策中几个错误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指出：“凡属地主富农兼营工商业者，只许动其属于地主富农性质的土地房屋农具财产，其属于正当工商业的部分的店铺房屋财产，则一概不许因土地改革牵涉而停业。”“除汉奸、特务、反动地主兼商人外，对正当工商业者的资财货物房屋家具则应全部退还。对与地富封建剥削有关，无法分别而没收者，可由农民代表会研究判别，除封建部分外，对其正当的工商业部分，退还其固定资本及恢复营业的必需资本，使其恢复营业。”

1948年4月29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就纠正工商业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作出规定：严禁清算斗争工商业者，保持包括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在内的一切工商业；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如已被清算，但资产尚未分配者，均应立即无条件地返还原主。按照这个指示精神，晋冀鲁豫各区均采取切实措施端正对工商业的政策。一年之前，冀鲁豫区党委曾发出《对处理地主经营之工商业》的指示，导致各城镇工商业被没收、清算、罚款的很多，许多工商业者被斗，甚至被扫地出门，据该区第六专署的统计，全专署被斗工商业207家，被斗对象几乎遍及各个行业。根据中央局的要求，1948年5月中旬，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工商座谈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局指示的具体措施，明确规定对工商业者一律不准搞清算斗争，对土改中受到损害的工商业，区别不同情况予以赔偿，不准国营工商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排挤和市场垄断，调整税收，降低过高的税率。通过政策贯彻下去后，冀鲁豫区的工商业很快恢复，到6月中旬，全区坐商发展到1288家，至9月又增加到1573家。

1947年12月以前，嫩江省克山县城区有工商业622家，其中公营的13家，公私合营的10家，合作社2家，私营的597家。这597家私营工商业中，受到各种不同侵犯的

有333家，占私营工商业的55.8%。其中在“扫堂子”中受侵犯的有188家，占被侵犯工商业的56.5%。这188家中，又有168家是被进城农民清算没收而受侵犯的。在纠“左”中，克山县对这些受侵犯的工商业者采取了返还、补偿、免税和贷款等方式，作了合理解决。对于那些被农民、工人处理的工商业，如果东西未拉走，只换上合作社的名字而继续营业者，所斗的股份并没有抽出而继续营业者，及运动中怕斗争而自动献出者，均返还原主；运动中怕被斗而逃跑的工商业者，在逃跑期间如无反动活动，回来之后返还原股份，在其未回来之前，其股份暂由政府经营。对于被斗时受到损害的工商业，如货物、浮财全部或大部被拉走，或拉走了部分，按照损失情况分四等八级给予补偿。补偿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民用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开办的合作社的全部或部分红利。对于被斗的工商业，政府将1947年最后三个月的营业税全部免除，并向部分经营最困难的中小工商业者提供贷款。通过这些办法，克山一度萧条的工商业很快复苏，至1948年5月，原来的622户工商业均恢复了营业，还新增加了184家。

1948年上半年土改纠“左”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对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进行安置，对被错斗死者进行善后处理。

在土改复查和平分土地的高潮中，各地在没收、分配地主土地、财产的同时，还对地主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对少数不法地主采取管制等办法，对于防止不法地主可能的破坏活动，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土改中不少农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阶级报复情绪，觉得地主过去欺压穷人，今天穷人翻身了，掌权了，也该让地主过过穷人的苦日子。于是在对地主进行打斗的同时，查封其全部房屋财产，还令其“净身出户”、“扫地出门”，让他们住破窑烂庙，讨饭求生，不给生活出路。甚至不分大中小地主，都采取“扫地出门”的办法。安文钦是陕甘宁边区与李鼎铭齐名的开明绅士，曾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但他的老家绥德县在土改时，也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也“扫地出门”了。连这样的知名人士都被“扫地出门”，一般地主被“扫地出门”就成了普遍现象。

在1948年上半年的土改纠“左”中，乱打乱杀的现象被迅速制止，对被“扫地出门”的地主也得到适当安置。1948年5月23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太岳区党委，要求对地主、富农的房子立即启封，禁止使用地主、富农做无偿劳动，立即解散村中所有的“劳役队”、“反省院”和拘留所，对于地主的特殊管制，如特殊臂章、牌号、出门请假、来客报告及其他标志等，立即无条件取消。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作出决定，今后在半老区进行土改时，绝对禁止挖底财、强迫勒索的办法，而应号召地主、富农自动拿出底财来，底财除分给农民一部分外，也要留给地主、富农本人一部分，并鼓励其投资于工商业。对于不自动拿出者，也不要强迫勒索，以免重复过去乱打乱杀的错误。

随着“左”倾错误的纠正，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不少逃亡户被争取回来。以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例，冀鲁豫四分区，到1948年4月，逃亡回来户就有3万多人，太岳区5月至8月回来了4000多人，太行、冀南的逃亡户也纷纷回来。就是伪军和伪公务人员也相继弃暗投明，投奔解放区，认为“共产党政策变了，一定要得天下”。

对于在土改中错斗致死的，各地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处理。晋绥临县对过去死人案件，提出的处理办法是：（一）县上立即着手组织人民法庭，人民法庭下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过去死人案件。（二）凡被冤枉死者，或被误打成残废者，可以按合法手续，向人民法庭申诉，人民法庭应接受申诉并负责调查材料，研究处理办法，分别是非轻重，了结案件，并予公布，对错死和错斗而身体残废者，应由政府安慰抚恤。（三）部队干部及在外地工作干部之家属，错死和错打者，也应按一定合法手续，向人民法庭申诉，不得任意向当事负责干部和群众实行报复。（四）如罪大恶极为人民所极端痛恨，而被群众处决之奸伪、特务分子，应由人民法庭公布死者之罪恶，作为了案，以后不得翻案申诉。（五）对基本群众和党员干部，确系被坏人陷害者，应由人民法庭负责追究责任，根据陷害者罪行程度，判处刑法。

在纠“左”的同时，个别地方也曾发生右的偏向。如在纠“左”时只片面地注意补偿中农和安置地主富农，而不顾贫雇农的困难和意见。太岳区翼城县北丁村全村 193 户，强迫其中 70 户贫雇农和 32 户中农，将分得的土地财产不管有无问题，一律全部退还给 14 户被斗争的地主富农，造成 17 家翻身农民降为赤贫或贫农，1 家地主却占有 1 倍于全村平均数的土地，9 家富农所得土地质量超过贫农 0.5 倍。也有的地方，土地问题并未普遍彻底解决，却已不准备继续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有的地方轻率地把地主又错算成富农，或把旧式富农又错算成新富农或中农，并退还其封建财物；也有的地方不问具体情况如何，笼统地规定对于被错斗户必须全部退还原物，强迫一切贫雇农成分的新干部必须承认错误。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通过发表新华社社论的方式，指出：“为了巩固与发展土地改革的成果，正确地结束土地改革工作，各地在继续反对左的思想和错误的同时，必须十分警觉地防止右的偏向和错误的生长。”社论要求各地党委既要继续认真解决由于过去土地改革工作中“左”的偏向所造成的许多遗留问题，但又必须反对和防止右的偏向，绝对不应该不问情况如何，强迫翻身农民吐出他们所应该分得和已经分得的果实，退还被斗户。对于发生了右的偏向的地方，应该予以及时的克服，并且按照错误的性质，分别对于犯错误者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组织上的处置，以达贯彻关于土改和整党的正确政策之目的。

第五节　结束老区土改

在 1947 年下半年的土地改革虽然出现一些偏差，有些地方还曾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但平分土地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大体上得到了满足，土地改革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抗日战争胜利以来，各解放区每年特别是秋冬季节都进行激烈的群众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也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长期的运动使群众产生了厌倦情绪，甚至有不少农民害怕再搞运动。华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

一份报告中说："农民普遍要求安定，建立稳定的秩序和制度，以便安心生产。"根据这种情况，1948年上半年，各解放区在纠"左"、改订成分、补偿中农的同时，着手开展结束土地改革的工作。

为了顺利地结束土改，各地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了必要的土地调剂，满足一部分仍然缺地或缺好地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同时解决以往被"扫地出门"户的土地问题。

因为吸取了平分土地运动中打乱平分容易出现"左"的偏差的教训，这次的土地调剂主要是以村为单位，采取抽补的方式进行。晋冀鲁豫解放区武安县什里店（即十里店）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什里店全村有423户，1427人，平均每人3亩2分地。共有土地4500多亩，总产量为4300多石。该村平分土地后的土地情况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　　　　武安县什里店村平分土地后的土地情况

成分	老中农	新中农	贫农	地主、富农
每人占有土地	3.52亩	3.7亩	2.72亩	1.80亩
每人平均产量	3.44石	2.875石	2.51石	1.66石
各阶层人口总数	524人	450人	447人	6人

从表二看，该村只有老中农的土地和平均产量上高于村里的平均数，占地面积约高于16%，产量约高于13%。但老中农只占全村人口的1/3，总体上讲，该村的土地分配是比较均匀的。因此，需要填补的对象不多，幅度也不是很大。

那么，什里店村是怎样进行填补的呢？上级派来的土改工作队一部分人认为应采取陕甘宁边区绥德县黄家川村的办法，因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刚刚报道了黄家川平分土地的办法，而且这种办法是得到毛泽东推荐的。但另一部分工作队员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什里店与黄家川不同的是，这里的地主、富农的平均土地比贫农还要低，已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土地，如果要平均分配，必定触动许多中农的土地。还有的人提出，为了不触动中农的土地，就把村里的公共土地和绝户地拿出来分给少地的贫农就行了。经过讨论，工作队统一了认识，最后决定填补不是将少地户（即"窟窿户"）的土地面积和产量提高到全村的平均水平，而是提高到老中农以外的平均水平。按照这个标准，将老中农以外的全村人口占有土地的常年产量定为人均2石7斗2升。

这个标准制订出来之后，下一步是确定哪些人属于低于这个标准的，工作队决定采取重新划阶级时采取的办法：自报公议。每10户农民组成的一个小组召开小组会，到会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是"窟窿户"，各组将"窟窿户"的名单交到几个小组片，由片开会讨论名单，对名单进行公议，审定名单，将其中不合条件者去掉，合条件而未自报者则添上，然后将分片"窟窿户"名单交村贫农团审核。贫农团在审核名单之后将之公布，并听取各户意见，最后，由村农民代表大会根据群众的意见，讨论并批准正式名

单。结果，全村有 70 户贫农、20 户新中农、14 户老中农、1 户地主和 1 户富农需要填补，约占全村户数的 25%。

名单确定后，由“窟窿户”自报需要填补的土地数，贫农团对自报情况进行审议，初步确定全村需要填补的土地为 130 亩。

地主、富农的土地早已分了，这些“窟窿户”不够的土地从何而来？全村公产地、移民地、绝户地以及党员主动拿出来的土地加起来后，仍差八九十亩地。这时，能拿出的土地都拿出来了，唯一的土地来源就只有让部分中农拿出一些土地了。但是，中农的利益已明确规定不能侵犯，怎么办？于是，工作队同中农协商，动员他们自动捐出一部分土地。被动员自动捐出土地的中农的条件，是平均每人占有土地的常年产量在 3 石 6 斗以上，即超过全村平均产量 1/3 以上者，并且明确提出是自动捐献，绝不强迫。

经过协商动员，共有 26 户中农共拿出了 90 多亩土地，占全村土地的 2%，产量的 2.1%。这部分土地连同原有的公产地等，分给了填补对象。经过填补，什里店村的土地情况如表三所示。

表三　　武安县什里店村填补后的土地情况

成分	老中农	新中农	贫农	地主、富农
每人占有土地	3.36 亩	3.1 亩	3.17 亩	2.70 亩
每人平均产量	3.314 石	2.887 石	2.90 石	2.55 石
各阶层人口总数	524 人	450 人	447 人	6 人

由此表三可见，通过填补，什里店村各阶级、阶层的土地已趋于合理，贫农人均增加 0.45 亩，老中农人均减少了 0.16 亩，新中农的土地基本上没有变化，地主、富农土地增加较多。对于什里店村的土地填补情况，加拿大记者柯鲁克夫妇在其《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作了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中共中央华东局结束土改试验县滨海区五莲县的做法是，在开展确定地权的宣传之后，确定土地的调剂标准和范围，规定主要是这样几部分土地需要调出：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干部多占的土地；分配过于不公的土地；积极分子过去多得的土地；富裕中农过多的土地；未分的公地等。并规定干部、积极分子多得的土地和富裕中农过多的土地，最高可保留全村平均数以上 1/3，最低不低于本阶层土地的平均数，采取说服但自愿的方式使其拿出土地，但多得过多的土地原则上要拿出来，富裕中农则必须完全出于自愿。地主多余的土地在保留其相当于全村贫雇农土地的平均数后，拿出分配给少地的贫雇农，旧式富农保留相当于中农土地的平均数，若该村土地甚少，贫雇农土地问题难以解决，也可以只留给其贫雇农土地的平均数。补进土地的主要对象是少地的贫雇农、贫苦中农、错斗的中农及地主、富农成分的军工烈属，补进的土地最高可达到全村土地平均数，最低不低于全村平均数的 1/3 左右。至于地主、富农斗争过重、土地过少的，补到少于贫雇农平均数或低于全村土地平均数的 1/3 左右，使其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

在确定上述抽补原则后，接着开展抽补动员，说明抽补的意义及原则要求，然后由党支部和农会讨论全村应补户数及地亩数，并动员缺地户自报。同时动员土地超过标准的户献出土地，对于那些实在不愿拿出土地的中农决不勉强。如果动员之后献出的土地仍然不足，再进行动员，然后按照预定的补地原则给缺地户补进土地。

1948年上半年，各解放区基本上都是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了前一阶段土改中遗留的问题，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

鉴于这种情况，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指示强调：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建党建政和支援前线的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已完成土地分配任务的老区和半老区，立即着手进行土地改革的结束工作。同年5月31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老区土地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抽补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目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安置地富，补偿中农，改正错定成分，发土地证，稳定各阶层情绪，将工作方向由土改转移到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并争取地主富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休养生息。"

土地改革的最后一项工作是确定地权，填发土地证。填发土地证是"为了巩固贫苦农民之既得利益，保护新的私有财产权，使农民认识自己财产有了法律保障，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今后不再变动，稳定各阶层生产情绪，为大生产铺平道路"。因此，各地对这项工作都极为重视。

在填发土地证前，必须进行土地丈量，评定土地等级。各解放区均对土地丈量和等级评定作出明确规定。如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关于颁发地照的指示》中规定：土地必须实地丈量，不可粗枝大叶。丈量出多的土地或黑地，一般归现有土地所有人，不调整重分，只有在个别地区土地分配不太公平合理时，才可采取个别调整的办法，但这种地区也不应提出重新分配土地，以防止平均主义。在评定土地等级时，不能因勤劳细作提高产量或懒惰荒废导致产量降低而提高或降低土地等级。在具体评定时，热河省的做法是先由群众自报、小组讨论再评议，然后由群众大会评定，张榜公布，群众有意见时再加纠正。

丈量和评定土地等级之后，组织填写土地证。各解放区都十分认真地对待土地证的填写，因为它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广大翻身农民也只有拿到一张正正规规的、盖着县政府大印的土地证之后，心里才感到踏实，才切实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对此，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联合发出的《关于填发土地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发土地证之前，要向群众说明发土地证的意义，经过群众讨论，将原有及新土地的旧契一律收回，当众烧毁；在填写土地证之前，必须按户填写草底，经过逐户核对清

楚后，用毛笔楷体字正式填写，不得使用草字、简字，填写好了后再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一次。凡与土地相关连的财产，均须在土地证上批注清楚，以防纠纷。土地证由县政府盖印后，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正式发给户主，并宣布一切男女老少人口均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者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的权利，政府保障任何土地所有权并不受任何人侵犯。以后遇到土地纠纷，均依政府盖印的土地证为准，任何原有私契一律作废，不再生效。

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最为群众欢迎。前面提到的五莲县在确定地权后，该县后栓子村一位丈夫准备去支前的贫农妇女高兴地说："咱男人去支前，咱很高兴，他也高兴，任务一定完成下来，过去八路军来给了俺土地，这回确定地权又补给了地，俺写信给前方，他也回了信，今后咱穷人万不能忘本。"红杏沟村一位新中农说："我过去得的新地不敢多施肥，这回确定地权是真事，今后不管什么地都要多施粪，帮助前方打胜仗。"过去被错斗的中农更是高兴，他们说："以前我像老鼠掉在面缸里，出来也白了毛，这回老少爷们从泥水里把我拉出来，赶忙又一把拉到炕头上，真没想到这样快。"地主富农们也说："过去俺看着干部就害怕，这回懂得干部按政策办事了，今后有话都可以说。""大伙这样宽待我，不说是个人，就是个驴也要转变了。"

到 1948 年秋，各解放区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至此，全解放区大约有 1 亿左右的农民彻底从封建剥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第七章 新区土改

第一节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1947年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万人，经过千里征战，来到了大别山，创建新的根据地，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

大别山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是重要的根据地，部队刚到这里时，原以为老区的群众会出来欢迎和提供帮助，但没想到老百姓见到解放军后，非躲即藏。原因是共产党的军队几进几出，每次离开这里后，国民党都要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群众对这次共产党重来心中没有底，不知共产党什么时候又会撤走。加之国民党在大别山地区强化保甲制度和党团组织，进行特务统治，使群众不敢接近解放军。有的部队进山后，白天黑夜行军找不到一个向导。只要两个老百姓在一起，就互相推托说不知道道路。这样严重的状况是干部战士们从未遇到过的。虽然来大别山之前，部队带了些金子和晋冀鲁豫边区的票子，但是用不出去，买不来东西。

这时，刘邓大军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立住脚。为了生存，只能采取红军时期的老办法——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物以解决部队的急需。正好此时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建议各解放区实施这一纲领，开展土地革命。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土地法大纲指示的当天，邓小平就起草了《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在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10月12日下发到所有部队和地方党委，要求坚决反对右倾现象，把土地改革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在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土地，在5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指示》还建议从每个纵队抽调1000—2000名干部和老解放区翻身农民战士，训练5—7天后，组成若干工作队，直接参与和领导土改，以解决地方干部严重不足的困难。

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战争环境，敌我拉锯剧烈，加之群众对根据地能否巩固还存在疑虑，还在等待和观望；而当时的战争形势又迫切要求迅速完成土改，以争取群众支持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和过激的斗争方式。中原局的指示发到各地后，“不少地方的干部为了急于发动群众，扩大土改区域，完成土改任务，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等过激口号”。中原新区的土改与老区土改一样，

也出现了“左”倾现象。

有的地方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支配下，土改中将中农撇在一边，甚至侵犯中农的土地财产；有的地方只图快分地，在地上插一牌子，就算分地了，而不管地主、富农是否真正打倒；也有的地方群众并未发动，而由工作队包办代替，表面上地主、富农的土地到了农民手中，但农民担心地主反攻倒算，白天分了地，晚上又偷偷将地送回去，改成租佃关系；有的地方虽然分了土地，但由少数所谓“勇敢分子”所霸占，实际上这些人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的是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农民只敢要弱小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主、富农的土地。虽然组织了农会，但由于群众没有真正觉悟与发动，农会很快被流氓、地主的狗腿子所把持，与地主勾结，进行假斗争。这样，农民没有翻身，地主、富农与新政权对抗，土改任务并未完成，根据地也就难以巩固。

打土豪、分浮财的办法虽然痛快，在短期内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并为一些群众所欢迎，但容易发生不分真土豪还是假土豪乱打一通的问题，分浮财也常常是少数“勇敢分子”分得多，真正穷苦的群众反而分得少，而且在分完地主、富农的浮财后，负担就转嫁到了中农身上。中农负担不起，又将一部分负担转嫁到贫农身上。结果，中农的利益受损，贫农也没得到实际好处。中原局副书记李雪峰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曾这样说：“在分浮财的地方缺乏组织，阶级阵营不清，形式是一村一村地辗转去分，实际是吃大户，叫做‘嗡’。好处是满足了群众一些要求，启发了群众进一步分地的要求。但流氓、地富狗腿及伪装分子大批混人，浪费很大。这村打那村，引起群众之间的纠纷。”

在打土豪、进行急性土改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一年后，邓小平在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时曾讲到这样一件事：“皖西一个地方，群众痛恨的几个地主，要求把他们杀掉，我们按照群众意见把他们杀了。杀了这些人后，群众怕和他们有关系的人报复，又开了一个更多的名单，说把他们也杀了就好了。我们又按照群众意见把这批人也杀了。杀了这批人之后，群众觉得仇人多了，又开了更多名单。我们又按照群众意见把他们杀了。杀来杀去，群众觉得仇人越来越多，群众恐慌了、害怕了、逃跑了。结果杀了二百多人，十二个乡的工作也垮台了。”

打土豪、分浮财的结果，没有从根本上发动群众，反而造成社会动荡，农民并未真正翻身，新建立的政权也极不巩固。桐柏解放区有的地方，土改工作组进村两三天就建立起贫雇农小组，由于工作粗糙，基本群众没有发动，结果不少贫雇农代表或者是地主和伪保甲人员操纵的流氓、地痞充当，或者是伪保甲人员摇身一变而成。土改中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五天分浮财，半月分土地”，对地主、恶霸、伪保甲人员不加区别一律斗争，有的地方干部甚至提出“有大打大，无大打小”，“第一要枪，第二要钱，第三要命”的错误口号，造成地主纷纷逃亡，甚至拉起武装或投靠地方反动武装与新政权为敌。如泌阳县在解放3个月后，逃窜的地方反动武装竟由2个团扩充到3个团，人数由2000人增加到3000人。新野县原有地主民团1000余人，在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进行“扫荡”时，变成了2000多人。这其中固然有敌人的欺骗煽动和威逼利诱，但土改中过“左”的一些做法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桐柏区党委检讨说："提出打土豪、分浮财，半年之内赤化桐柏。强调快，一个干部一天走马分浮财二十余村。强调反右，反尾巴主义，认为此地群众比华北强，不用思想发动，把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看成群众运动的高潮（如分浮财时乱抢，部队每次出发，有一大群人跟在后边，到外村去分浮财）。把假斗争认为是群众自动性强（如某村群众半路拦住一个通讯员，硬叫他领导分浮财，一时传为美谈，其实是该村群众事前布置的一套假斗争，以免外村群众来乱抢乱分）。而演变的结果，打土豪分浮财形成村与村的斗争。甲村没收乙村，乙村没收丙村。有一农民出去分浮财，回去一看，他自己浮财也被分，两相比较，反而吃亏，于是再出发去分浮财。"

与此同时，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挺进豫西之后，也搞起了急性土改。1947 年 9 月 13 日，陈谢大军刚刚解放豫西重镇灵宝，兵团前委就在陕县大营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前委副书记谢富治主持，参加者有部分前委委员，陕县、灵宝、阌乡三个县委的负责人及从老解放区随军进入豫西参加土改的五个干部大队的负责人。会议的中心是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制订土改计划，结合整党，快速完成平分土地。

会议开始时，谢富治就明确表示，这次在豫西新区搞土改，就是同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一样那样搞。看见谁的房子好，谁家的门口拴有大骡子、大马，不用问，他就是地主，搞他就是了。会议提出的口号是："放手点火，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解决一切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会议认为，进入新区进行土改的总任务就是点火。这一把火如果不能迅速点起来，根据地就不能创建，继续打胜仗也就成了问题。参加会议的一位负责人在会议作总结时还这样说："蒋管区的农民苦大仇深，群众就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各土改基点应尽快发动群众，平分土地，做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会议决定以灵宝为土改重点县，其他县也确定了一些基点作为土改试点，并要求用 15 天的时间完成土改试点。

大营会议之后，豫西新区土改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的情况下仓促启动，并用所谓的"走马点火"的方法，即一天跑几个村子，马不停蹄抄地主的家，没收其粮食、财物，走到哪里就将火烧到哪里，进行快速土改，结果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几个土改重点村在十几天的时间里，被打死者数十人。栾川县庙子村的土改工作队进村的第一天，就召开群众大会，领着那些敢抄、敢拿、敢打的"勇敢分子"，将地主家的粮食、家具、钱财没收一空，所有财物，谁拿归谁，结果，贵重财物多被少数投机分子所得。有的地方，部队干部把东西挨家挨户地送到贫雇农家里，但部队一离开，往往又被地主夺去。

在土改中已经出现"左"的倾向的情况下，领导土改的兵团前委负责人，还主观地认为"广大农民早已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无需酝酿，无需启发诱导，只要抓住他们没有饭吃的要求，一号召穷人起来分地主的粮就会立即行动起来。这真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要求土改运动要一气呵成，更大胆地放手，更猛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再大干 15 天，全部完成土改任务。栾川县县长邓一川给地委写信，要求对土改中过"左"的做法予以纠正，却被视为"右倾"，在地委的《点火通讯》上加以通报批评。

这样一来，"点火抄家"之风在豫西新区迅速蔓延，表面上运动轰轰烈烈，实际上群众并未真正发动，即使那些分了地的地方，也有不少是由地富领导的假分地或少数

"勇敢分子"分得了斗争果实，广大贫雇农并没有分到土地和浮财。也有的地方勉强分了地和浮财，但农民不敢要，以致出现了"白天分果实，夜晚送原主"的现象。

西北新解放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陕西韩城县（今韩城市）1948年3月解放后，提出"快定快分"的口号，结果是贫雇农并没有分到多少果实，而"扫地出门"，乱打乱斗那一套"左"的东西却很快传开，弄得不少人恐慌逃跑，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时，革命形势很好，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靠近陕甘宁解放区陇东甘边一带的人民，一向受到极其反动的军阀马步芳的统治，当年红军西征时曾吃过马家军的大亏。但现在的形势完全不同了，"听说八路军共产党，都争着来掩护。甚至过去一些反共分子，也帮助我掩护人员，极力表示好感。这种情形，确为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但是，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也隐藏着另一种危机。陕西的西府（关中西部）地区因距离陕甘宁解放区比较远，解放军去了以后，群众热烈欢迎，情绪安定；可是离解放区近的黄龙地区，群众反而存在恐慌，特别是中农以上的农村阶层，担心解放军来了之后在土改斗争中动刑，传言说共产党要开展清算斗争，要组织棒子队、石头队打杀地主、富农。"这其中，虽不免有特务故意散布谣言，但老区'左'倾的偏向，却大大地影响了新区群众，那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第二节　停止土改、减租减息

这时，毛泽东在考虑如何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使土改工作走上正轨。1948年1月14日，他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致电邓小平，征询邓小平的意见。电报中毛泽东一共提出了六个问题：

（一）新区是否应当分两种区域，一种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是否采取不同的政策？

（二）新区土改是按《中国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同我们合作？

（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

（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何筹款？方式如何？

（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和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电报的后，于1月15日和22日两次回电，介绍了大别山根据地的特点：经过两个时期，这里的地主、富农已经有了很丰富的政治警觉和反革命经

验，无论在苏维埃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对农民及革命分子的压迫都很残酷，普遍采取自首政策，充分利用叛徒，消灭我之游击战争和党的组织。基本群众则经过多次失败教训，不敢轻易起来，但起来后则很有力量。

邓小平对大别山地区的土改情况作了如实汇报："地方干部大部质量不强能力太弱，能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特别是走贫雇农路线）的固不缺人，但做坏事的的确不少。我们最近到立煌检查工作，该县进行土地革命，敌情并不严重，但工作坏，在分浮财中贫雇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实行所谓积极分子分果实，使果实落到流氓、地痞、地主狗腿子手里，最好的东西被本地干部吞了，许多斗争果实存在区村，每天开大锅吃饭，部队干部经常还要吃好的，穿好的，逐渐浪费了。另一方面，实际还要向贫农要粮、要鞋、派差事、派慰问品，提拔坏人当干部，田还没有分（少数分了是假的），强迫命令的方式。"

针对在大别山地区的特点和土改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土改中应分两种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而在游击区则暂时不能急于平分土地，而应先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秘密的贫农团，以组织动员群众，避免在土改中搞"一刀切"。

邓小平在电报中说，对于大中小地主和富农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地主的粮食、农具、土地、埋藏的底金必须拿出来分配，但对中小地主的衣物、家具，在分配时应给地主留一部分，而不要一扫而光；富农则要其拿出耕牛、农具、土地的多余部分，其日用家具、银钱则暂时不动，或将来再动；对于中小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则采取没收政策。这样可对反动营垒起到分化作用，对于农民则仍然有利。至于对待中农，邓小平认为新区一般采取自愿或不动的政策为好，切忌强制打乱平分，造成中农的不满。

在收到邓小平第二封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就新区土改的有关问题起草了一封给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粟裕的电报。电报稿中提出，土改工作不能性急，应按照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情况，领导土改干部的多少强弱，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决定土改工作的速度。如果通过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的错误，能够在三年以内大体完成土改，就是极伟大的成绩。新区没收分配土地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中立富农，富农土地原则上不动。在没收地主土地时，还应当分别大、中、小，地主中的恶霸与非恶霸，采取不同的待遇。组织以贫农为主体，除地主、富农以外一切农民参加的农民协会，而不另组贫农团。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此时才动。

毛泽东强调，在群众觉悟程度有很大区别的新区与老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应用必须有所区别，在新区土改中，不能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先从一两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他区群众后逐步推广。新区也应当分两种地区，一种是基本巩固的地区，应当开仓济贫，斗恶霸，分大地主的浮财，组织农会、政府、民兵、游击队，逐步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进行土地改革。第二种是敌人还可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这种地区，只能向群众作宣传，开仓济贫，分发一部分浮财，寻找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精干的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及游击队，并教育群众准备敌人再来时的应

付办法，而不可进行土改。

这份电报稿写好之后，毛泽东并没有马上发出。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征求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2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提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大反攻之后开辟的新区，由于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子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同时，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会（可称为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致信刘少奇，要他对给粟裕的指示“先加审查提出意见”。2月6日，他再次致电邓小平并刘邓野战军后方指挥所，及陈赓、谢富治、粟裕、陈士榘、唐亮，征询他们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的意见，并指出：“土改时间问题，我在几个月前觉得可以快些，后来得到陈（赓）、谢（富治）在陕（县）、灵（宝）、阌（乡）区的经验及晋绥、陕甘宁等老区经验，觉得不能过于性急，应以条件成熟为原则。”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表示同意毛泽东给粟裕电报的内容，认为新区必须树立两个观念：“（一）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提出：中农打乱平分，应绝对采取自愿原则，不要勉强；贫农团在已保证贫农起领导骨干作用后，应迅速扩大为农民协会，吸收中农人会；暂时不斗富农的底财；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复电后，很赞许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立即将电报转发各地，认为“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并强调土改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

在征求各方面后的意见后，毛泽东将他给粟裕的电报作了修改，并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为题，于2月15日作为党内指示下发。指示的主要内容是：新区进行土地改革“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的8%，人口的10%。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隐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要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

2月13日、3月7日，中原局副书记李雪峰两次就新区土改策略问题及淮西新区工

作经验向毛泽东作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到："大地主及与保甲统治有关的地主、恶霸，多与蒋匪结合，破坏土改，利用本庄本姓，自动分粮，挑拨外来与本地贫雇农，组织中农会、假农会，利用狗腿子流氓，破坏贫农团。在战争时逃亡了的乡长、保长，随土匪回来，土豪被打击了的，准备向蒋区逃跑，被杀了保长不埋，等着报复。而肉头地主、一般地主与富农，即是被分浮，则也个别被杀了的，其家人不敢报复。群众在斗争时，一般也愿加以区别。"毛泽东对这段话特地加按语说："必须加以区别，缩小打击面，杀人愈少愈好，只杀少数最反动分子，严禁乱打乱杀。"可见，毛泽东对新区一度出现的乱打乱杀问题是极为重视的，也是坚决反对的。

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新区土改的指示方针，各新区对前一阶段土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研究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办法和措施。3月8日，邓小平代表中原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检查了大别山地区在土改等问题上的"左"倾急性病的各种表现及其危害："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及富农一齐动手，致树敌太多，增加了许多障碍，反于人民不利"；"在实际斗争中相当普遍地采取了拒绝中农的态度，甚至打击到富裕中农，其结果使贫雇农更加孤立，易受摧残，甚至影响到贫雇农不敢起来"；"没有明确的工商政策，税收过重"；"不是估计哪些是巩固区，哪些是游击区而有重点地分布力量，规定不同的策略步骤"等。毛泽东对邓小平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十分赞赏，他将邓小平的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指出："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4月25日，邓小平在豫陕鄂干部会议上作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讲到了战争、土改、整党、工商业政策和杀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重点在于纠正"左"的错误。关于土改，邓小平强调了它的重要意义，认为不进行土改，就不能长期支持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但他同时认为，土改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能完成的，它牵涉到许多政策问题需要解决。他强调，现在防止的主要倾向是"左"。这种倾向表现在土改划阶级中，把地主、富农同样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工商业政策"左"。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就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随后，邓小平集中主要精力全面了解和调查中原各解放区特别是豫皖苏和豫陕鄂两大区的土改情况。此时，中原全区有4500万人口，其中为人民解放军基本控制的区域大约有2000万人口，游击区约有1000万人口，没有到过解放军的崭新区约1500万人口。在控制区和游击区中，实行了分田的只有400万人口，其余的地区大都只分了浮财。邓小平在调查中了解到，各区土改中"左"的倾向大约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1948年1月开始相继得以纠正，其中大别山地区因为环境不许可，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土改，但干部的思想没有打通，有抵触情绪，直到三四月间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各区在纠正"左"倾错误后，群众反映良好。大别山在停止土改、制止乱打乱杀和乱没收后，逃亡的地主、富农纷纷回乡；豫西、豫皖苏内地的地主武装也逐渐减少，集市开始恢复，社

会秩序也在走向安定。陕南的群众说："我们不是马上要地，土地哪个不想要，只是不敢分，只要你们不走，不再受国民党拉丁、派款的压迫，两年内，我们就可以把土地赎回来。"

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感到，在新区马上进行分浮财、分土地是不适宜的，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支持战争上。5月初，他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当前中原局的工作，应将重点放在财经工作方面，至于土改工作，则可推迟到今冬明春再逐步进行。5月中旬，邓小平又召集中原局和陕南、豫西两区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今后工作方针。会议一致认为，新区实行打土豪、分浮财，过早进行土改害处很大。今后这两区不应再分浮财、打土豪，就连地主也暂时不要打。要打的只是那些首恶分子、大恶霸、最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和最反动的乡、保长，以建立反蒋反胡（宗南）的统一战线。

这期间，毛泽东在经过长途跋涉后来到了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通过从陕北到河北一路的调查了解及各解放区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新区土改工作如何进行的考虑逐渐成熟。5月24日，他就新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致电邓小平：

> 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认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而且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提出进行土地改革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就不应当将该地区列入1948年进行土地改革的范围。

指示明确指出，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解放区的接敌区域和中原局所属江淮河汉区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即大反攻以来的新区），因为尚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即不应当列入1948年的土地改革计划内。1949年是否列入，还要看情况才能决定。在这类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酌量调剂种子、粮食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

7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暂不实行土改的指示》，认为这些地区"应执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及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及中立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争取游击战争的胜利；不应过早实行分配土地的政策，致使自己陷于孤立"。

新区由实行土地改革到实行减租减息，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它对于稳定新区的社会秩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发生，并最终保证土地改革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新解放区都相继决定停止土改，改为实行减租减息。1948年6月6日，中原局作出了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土改和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即"六六指示"）。这个文件全面总结了一年来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抓人、乱杀人等等现象"。

中原局还对不同地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在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立即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宣传，并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在各区范围内制订统一简明的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法令和进行步骤，并以此训练干部，教育群众，准备在秋后至明春，形成一个广泛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在已经分了的地方，分清真分还是假分，真分的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说服群众自愿改为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

——在游击区，则应在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对敌斗争为主的方针下，坚决进行反抓壮丁、反掠夺、反保甲特务统治的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和各阶层的利益，并按照环境及群众要求，适当地进行减租政策。

——在崭新区，解放军进入之后，应采取更宽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切不可打倒一切，使自己孤立起来。在社会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财，不作经济上的没收。在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时，也应经过宣传组织，政府颁布正式法令等步骤，不可毫无准备地贸然进行。

毛泽东对中原局的这个文件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对中共中央5月25日指示中规定的新区工作原则的具体化。6月6日，他为中原局的指示加写了一段有关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文字。6月28日，他又在写给刘少奇、朱德、周恩

来的信中建议将中原局指示发给中原局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在信中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与此同时，其他解放区也把他们关于新区土改的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他们准备在新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对大地主和重利盘剥者进行废债，发展生产，实行合理负担。在此基础上，进行建党、建政（权），建立贫农团与农会组织，准备将来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条件。至于接敌区与游击区，一律不进行土改，应视情况进行减租减息或仅作反对国民党捐税、征粮和抽丁的斗争。

7月15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向中共中央反映了一个以前不曾注意到的情况，即国民党统治区"一般农民生活，并不如我们原来所想像的那样穷困，所想像的那样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更需要在开辟新区时制订正确的政策。他说，新解放区不应过早地提出土地问题。现在新区以至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主富农，主要不是怕分地，而是怕乱杀、乱打、乱斗，怕乱"扫地出门"，不少地主故意把自己的土地拿出分配，只要不打死不乱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于地主自动献出的土地，应当接收，调剂给无地农民。否则地主不安，担心随时被斗争。在新解放区一般应实行减租减息，即使在靠近边区的地方，也要看群众觉悟程度如何再决定土改与否。

新区停止打土豪、分浮财，不进行急性土改后，很快安定了各阶层的情绪。贫农的顾虑消除了，中农放心了，地主、富农也大大减少与新政权的直接对抗，逃亡在外的地主、富农相继回家。皖西宿松县团山村的地主回家后对农民说："我愿将多余的土地山林拿出来分给农民，保证不做坏事。过去我们只怕打杀，早知如此公平合理，谁跑在外边受罪呢？你们真是救命恩人。"

1948年8月18日，中原局发布经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减租减息纲领》，正式在中原新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关于减租，《减租减息纲领》规定：所有地主、旧式富农及一切公田、学田、祠堂、庙宇、教会所租之土地，不论任何租佃形式，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即按原租额减去二成半；地租一律于产物收获后交纳，禁止预收地租，尤不得索取其他一切劳力或财物的额外剥削；陈年欠租一概免交；所有押租押金，一律取消；减租后应确实保障佃权。

关于清债减息，《减租减息纲领》规定：过去农民向地主、旧式富农所借旧债，一律按月利分半计算清债。其多年债款，应照下列原则清理之：利倍本（即借本100元已还息达100元者）停息还本；利二倍于本（即借本100元已还利息达200元者）本息停付。旧债清偿后，其抵押债务之土地应即交还农民。农民与农民间（指贫农、中农间，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债务，由农民自行处理之。

为了配合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中原局机关报《豫西日报》于8月24日发表了经中原局常委讨论，又经中共中央修改的社论《停止新区土改实行减息减息》。社论说：中原新解放地区停止土地改革，而改为减租减息，是实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在中原大部分地区尚未充分进行的缘故。如果急于进行土地改革，对多数农民好处并不多，对整个社会生产更无好处。社论明确指出，凡是在抗战时期，或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经过

减租减息、反奸清算之老解放区仍须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凡是去年在大进军后的新解放地区，则应停止土地改革，改为减租减息。

中原局关于《减租减息纲领》发出后，新区急于土改的急性病很快扭转过来了，但对于这一政策，仍有一部分干部不了解或有抵触情绪。与此同时，有的地方又出现了右的倾向，强迫农民把前一阶段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退还地主，解散农会，甚至有人认为实行减租减息也没有必要。更有的地方专门组织有地主参加的"和平救国会"，向地主道歉，要地主回来"造福桑梓"。针对这种情况，中原局于9月9日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又叫"九九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主要危险仍是"左"倾急性病及由此而来的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对此必须坚决纠正。同时必须防右，划清思想界限，坚决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有效地组织群众斗争，发展人民革命力量。《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步骤，要求在较巩固的大块根据地坚决地实行减租减息。

与此同时，其他解放区也发布了类似的文件，以指导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在发动减租减息之前，在防匪自卫、清算恶霸、合理负担的口号下，进行清（土）匪反（恶）霸，打击散布在广大乡村的最反动恶霸分子和地主阶级中的当权派，指导乡村政权逐渐转移到群众手中，安定社会秩序。在经过这一步骤之后，及时转入减租减息。中原解放区减租减息的具体做法是：首先选择几个有代表区村作为重点，创造经验。在这些试点村，通过宣传发现积极分子，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初步处理主要抵抗分子，慑服一般地主，然后在群众中酝酿串连，与地主开展说理斗争，进行减租减息。在重点区村减租减息斗争取得胜利之时，便在其他的区村扩大宣传，酝酿斗争，成立乡、区、县的农民协会作为领导减租减息运动的合法机关，然后由农民协会选择训练先进区、乡的积极分子，培养区、乡干部或派到其他的区、乡帮助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这样，减租减息运动便在解放区迅速铺开。

减租减息政策虽然还不是消灭封建剥削，但严重地削弱了封建剥削。新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后，反动保甲制度被废除，农民协会得以建立并成为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机关，农村的恶霸基本被打倒，地主、富农开始向农民低头，初步摧毁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实际统治，树立了农民的政治优势。通过减租减息斗争，农民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在斗争中产生了一批积极分子，有的积极分子还入了党、当上了农村干部，为下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奠定了阶级基础和作了干部准备。

第三节　部分新区完成土改

在中原、西北新区开展减租减息的同时，华北、东北新区具备土改条件的地区，则开展了土地改革。这两地的土地改革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山西晋中地区实行过所谓

“兵农合一”地区的土改；二是城市郊区的土改。

“兵农合一”是山西军阀阎锡山为解决其支持战争的兵源补充和军需粮棉，巩固其反动统治而推行的一套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一）强制编组出兵。规定18岁至47岁的男子一律以村为单位，编成3—6人组成的兵农互助小组，其中1人当常备兵入伍服役，其他人在家种地或做工，称为国民兵，每人交6石粮、10斤皮棉，负责养活常备兵家属。（二）强制划领“份地”。在不废除原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全村土地使用权打乱搭配分成若干“份地”，每份“份地”包括水旱平坡搭配均匀的土地30亩至60亩不等，每一个国民兵领一份为主耕，不具备国民兵条件的妇女及老幼，做助耕，与主耕者合种一份“份地”。（三）强制负担。每份“份地”规定交纳给政府和负责常备兵家属的生活费用数额，一般达到收获量的70%。阎锡山的这套反动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前曾在晋南农村实行过。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抢占太原，控制了同蒲路沿线，便在其统治区（主要是晋中地区）强制推行。

1948年3月至6月，人民解放军相继发动临汾战役和晋中战役，解放了除太原、大同以外的同蒲路沿线全部地区。194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关于晋中工作的指示》，提出：在阎锡山长期实行“兵农合一”的地区，农民除向民主政府缴纳一定数外，废除向阎锡山政府缴纳的一切捐税；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可根据情况及农民的要求，不缴或减缴；过去债务利息，可减少到不超过年利一分五厘。至于何时在这些地方进行土地改革，则须研究当地情形及大多数农民的要求后再来决定。

1948年8月20日，新成立的晋中行署在《关于晋中新解放之“兵农合一”区土地青苗暂行处理办法》中，曾提出“在我调剂过土地的地区（按：本意是指原属解放区，经过了土地改革，后被阎锡山强占的地区）宣布地归原主”。由于政策界定不明确，使农民对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发生误解，而地主、富农却以为这下可获得原来的土地。8月25日，华北局在获悉这一文件的内容后，发出了《关于在同蒲沿线新巩固区实行土改等问题的意见》，要求“在同蒲线新收复各地区，除接近太原之战区外”，“应考虑在今冬实行土地改革”，并明确指出：“如果暂维阎逆‘兵农合一’所造成的土地关系，则不利于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如果实行地归原主，则有利于地主旧富农，而不利于原来无地少地之贫雇农民”。

随后，中共中央派出调查组，对山西新区由于实行“兵农合一”制度而造成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0月9日作出《关于晋南、晋中新区收复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同意了华北局的意见，并提出除对现在尚未失去土地的中农，允许其保留稍多于平均数之土地外，原则上实行平分土地，并认为“兵农合一”的制度是极不合理而又极不利于农民的，但在客观上却为实行土地改革作了若干准备。

11月15日，晋中区党委发出《关于新区土地改革的决定》，规定在土地关系已被“兵农合一”制度彻底打乱的地区，只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即可；在“兵农合一”的制度虽已实行，但不十分彻底，或实际上仍保留旧有土地关系的地区，则实行“中农不动两头动”的办法，没收地主的封建财产和征收旧式富农财产的封建部分实行平均分

配。晋中区党委还规定，对于地主埋藏在地下的元宝、白洋等，一面宣布其为非法，一面应鼓励其自动拿出，政府保留其本人一份，并劝其转为投资有利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其余的则归农民合理分配。如系大宗的金银，则除了合理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外，应收归国家银行所有，不得分配。如地主不愿自动拿出，也只能延长时间，切实调查，严禁挖掘底财，以防止乱打乱杀。新式富农和富裕中农，只允许在其本人自愿的原则下，抽出多余的土地，其他财产则一概不许侵犯。

1948 年 12 月中旬，晋中区党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布置新区土地改革工作。1949 年 1 月上旬，全区组织了 4000 余名干部、教员、学生组成的土改工作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新区农村发动土改。1949 年 3 月，人民解放军准备发动对太原的总攻击，晋中地区担负起繁重的支前任务，加之渡江战役在即，晋中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南下开辟新区。这样，土改第一线的领导骨干减少，影响了土改工作的进度和质量。3 月底，晋中区党委乃决定暂停土改。此时，晋中新区约有 63% 的地区进行了土改，另有 25% 的地区进行了土地调剂。其余的地区决定暂不土改，执行谁种谁收。晋中新区的土改虽然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最后完成，但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阎锡山的“兵农合一”制度，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如晋中二分区贫雇农在土改中得到土地 91693 亩，牲口 270 头，衣物 29225 件，大、中型农具 2951 件，房屋 7485 间。即使未进行土改改革的地区，由于废除了苛捐杂税，实行谁种谁收，农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

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以来，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特别是 1948 年底 1949 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长江以北的中原、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除少数敌人的据点外，也全部解放。这些新解放的地区，主要是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四周，包括一部分收复区。这些地区，孤立于农村之中的敌占城市被解放后，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因其靠近解放区，受解放区的影响大，群众的觉悟较高，大多数群众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加之有的地方本来就曾是解放区，进行过土改。因此，这些地区一解放，农民就强烈要求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地主、富农也知道土地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如中原新区的地主那样对土改激烈抵抗，他们中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迟分不如早分。因此，这些地区解放之后立即开始了土地改革。

东北新解放区，包括沈阳、长春两大城市郊区，以及吉林、辽北、安东、辽宁、辽西、热河等省一部分地区，共约有 700 余万人口，3000 余万亩土地。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时，东北局就于 1948 年 11 月 12 日作出《对新区土改的指示》，要求尽快解决新区土地问题。

为了搞好新区土改，东北各省土改之前各新区一面发动农民开展反奸特反恶霸斗争，一面对土顽散匪开展军事清剿，稳定社会秩序，为土地改革创造条件。

由于吸取了土改复查和平分土地运动时出现“左”倾错误的教训，东北、华北在新区土改中都作了明确的政策规定，如东北局明确指出：新区总的打击面不得超过人口的 10%，大中地主、恶霸、富农在没收其土地财产后，按平分原则分给其同样一份，给予

生活出路。小地主及旧富农只征收多余的土地、耕畜、农具和粮食，一律不挖底产，不赶大院。中农绝对不得侵犯，对缺少土地、耕畜的中农，分给其应得的一部分。禁止打人，除特务、恶霸分子及封建头子外，不得乱加扣押，个别罪大恶极须处死者，须经县政府批准。绝对不许斗争工商业者。

东北各省均严格执行了东北局的政策规定，各地的打击面一般未超过10%，如辽北省以区单位按人口计算，开原县（今开原市）的打击面最高为8.4%，怀德县各区平均为9.6%。东北各省均采取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与自上而下政府颁布法令相结合，并抽调大批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村干部在进行短期训练后，开赴新区发动土改。东北有土改任务的六省二市参加新区土改的有5000余人，如辽宁省抚顺县集中县、区干部和积极分子250人，举办了土改训练班，学习中共中央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和东北局有关土改的指示，经过7天的学习培训之后，才同中共辽宁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一起进入重点村，深入进行试点工作。由于在土改中做到了充分了解和掌握政策，从而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至1949年春耕前，东北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

平津战役之后，华北全境解放。此时，华北全境约有1500万人口的新区需要进行土地改革。华北的新区实际上分两种地区。一种是纯新区，即从未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如大城市的四郊或重要铁路线的沿线，这些地方抗战胜利后即被国民党占领直到解放。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势力、国民党匪特有基础，地主气焰尚高，地主、富农对土改在思想上、行动上皆有准备，转运资财、疏散土地，对生产不积极，大吃大喝。但这里的贫苦农民因受老解放区土改影响较大，迫切要求土地，对进行土地改革情绪很高也很有信心。

另一种是恢复区，即原本是解放区，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平津战役前后重获解放的地区。这类地区，过去曾经进行过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有的在“五四指示”后还进行过土地改革。在恢复区，土地基本上已经分散，但由于过去的土改和减租减息是战前匆忙进行的，“封建消灭不彻底，地富仍占有较多较好土地。封建势力仍有基础，武装匪特活跃，阶级斗争尖锐，阶级仇恨深刻，过去曾发生赤白对立对杀的情况”。“在实行‘五四指示’，土改复查中，有不少地方曾发生地富扫地出门，侵犯中农利益，错‘搬石头’，打击了干部。地区变质后，发生地富倒算，被侵犯中农报复等。恢复后又发生干部多占果实，地富还乡等，情况最为复杂。”但这类地区群众觉悟较高，要求分房子斗财产，复仇清算，解决过去土改中分配不公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华北局认为，“由于老解放区已经消灭了封建势力，农民已经分到了土地，这就深刻地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新解放区各阶层人民。因此，把减租减息作为过渡到平分土地政策的办法，在这些地区已无必要”。华北局据此于1949年10月10日作出《关于新区土改决定》，决定除绥远全省暂不实行平分土地外，其他各省新区及恢复区一律在1949年冬至1950年春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同时，在对待地主富农问题上，《决定》采取了比《中国土地法大纲》宽松得多的政策。如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其封建财产，征收旧式富农多余的土地及其财产的封建部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同时，须留给旧式富农与地主和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财产，不许再用“扫地出门”

的办法；对于为群众所公认的真正的开明绅士，应予以适当的照顾；对于还乡的地主、富农均应分给和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与财产；察北等地地主、富农之成群牛羊，可不分配；各地区地主、富农用进步方式经营之果园、农场，仍归原主经营，不没收，不分配。《决定》还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在城市或农村的原有工商业，包括已转人工商业的财产在内，以及与工商业相关联的厂址、店铺、作坊、住房、工具、现金等财产及手工工具，均不得没收。地主、富农自动交出的底财应留给其本人一份，不得随意挖地主、富农的底财，以防乱、乱扣、乱杀，等等。

华北各地在实行土改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以河北省为例，该省在新区的做法是充分发动群众，土改与建立党和群众组织、肃清匪特伪政权残余势力相结合，要求不但要完成分配土地的任务，而且要彻底消灭封建，摧毁伪村政权，镇压匪特，扶植基本群众的优势。凡解放之后地主、富农土地疏散者不予承认（如转移给无地少地农民，其土地不超过全村平均数者不再变动，超过部分收回并偿还付出代价），然后根据“两头不动中间动”的政策，进行平分。在恢复区则首先集中打击封建反动阶级与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奸匪恶霸分子，对群众内部问题则不算旧账；对一般伪军、伪组织人员，如须处理者，须政治与经济分开，个人与家庭分开；对过去被“扫地出门”现又还乡地富，予以安置，并分其一部分土地财产，使其能生产生活；对党员、干部多占果实，土地分配不公问题，在整党训干、提高党员、干部觉悟基础上妥善解决。

华北新区在土改之初，一些干部就新区土改实行对地主、富农宽大的政策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他们有的说：“过去对老区那样严，现在新区就这样宽，这不是迁就封建吗?”也有的说：“这不动（按：指不动地主的果园、工商业等），那不动，群众能发动起来吗?”“一般的不打可以，有的地主不打不行。”“不打杀，解决不了了问题。”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地区也曾出现对地主乱扣、乱斗和侵犯中农的现象。为此，华北局于 1949 年底作出了《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再次强调土改中坚决反对乱打、乱扣和一律“扫地出门”的做法，底财一律不追不挖，对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城乡工商业一律不得没收，对“中农不动两头平”的土地分配政策不准修改，不得阳奉阴违，不能五条件地充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随后，各地均按照这些政策规定开展新区的土地改革。

华北各省人民政府为顺利完成新区土地改革工作，都进行了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自 1949 年 9 月开始，各省均先后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有些地区还举办干部训练班，传达和讨论土地改革政策。河北省通县（今属北京市）等三个专区，参加土地改革会议的干部即达 2 万人以上。察哈尔省训练了 2.5 万多个村干部。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干部训练后，已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土地改革政策。当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各地一般都进行了重点试验工作。至 1949 年 11 月，各地实验工作大致结束。12 月，土地改革运动即全面开展。至 1950 年春耕前，华北新区 33500 多个村中，已完成土改的有 25500 多个，占新区总村数的 76%（其余的 7950 多个村，主要是由于遭到严重的灾情而未完成土改）。至此，华北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1949 年上半年，河南全省解放。这年夏天，新成立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在许昌

专区宝丰、郏县、襄城、鲁山、临汝（今汝州市）、禹县（今禹州市）、叶县等7个县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以积累大规模土改的经验。这7个县自1948年秋起曾接连经过了清匪、反恶霸和减租运动，农村中土匪、恶霸的封建统治势力已被基本上打垮；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经过减租运动后，已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广大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政治觉悟已普遍提高，同时各地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农会会员已占全人口的40%左右。经过实际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各地培养出了大批具有斗争经验的农村干部，并普遍建立了农村中的人民民主政权。90%以上的村庄，均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大多是立场坚定、工作积极、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拥护的农民领袖，为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河南省人民政府根据以上情况，认为该地已经具备了进行分配土地的条件，便适时地提出了实行分配土地、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方针。

河南这7个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启动后，首先召开了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县、区、乡各级农民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分配土地的政策和各项具体实施步骤。运动开始后，各地大体上都经过了以下几个工作步骤：第一，广泛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具体调查各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分布状况。第二，为整顿农民队伍，按照“依靠贫雇农，巩固团结中农”的方针，深入发动广大农民，健全与整顿乡村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及民兵等组织。第三，划分阶级，开展说理斗争。为了使阶级划得正确，各地首先采取诉苦挖穷根的方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分清阶级界限；然后召开划分阶级的群众大会，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方法，进行反复讨论评定，最后交由区人民政府批准执行。第四，分配土地。各县分配土地已经完毕的村庄，即进行健全农村各种组织，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使农民及时地转人大生产运动。到1949年冬，这几个县的土地改革顺利完成。

1950年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批准，河南又在36个县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在实行土地改革以前，这些地区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以提高农民的觉悟，进一步组织和训练农民队伍；同时大规模地、反复地训练干部。仅信阳专区和许昌专区的许昌、舞阳、郾城、长葛、鄢陵、临颍等6个县，就训练了土地改革工作干部1.2万人。其中大约1/5到1/4是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其他为有相当农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和在反霸减租中成长的农民干部。

由于河南省在反匪反霸、减租的农民运动中曾发生过一些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等“左”倾偏向，该省在训练土改干部时就着重地注意肃清干部思想上的“左”的残余，同时也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右的偏向。在学习土改政策时，一般干部、特别是农民干部对不乱打乱杀、不侵犯中农、不没收地主工商业等，接受较为容易。但对于“不挖地财和不分浮财”的规定，他们就不易想通。他们有的说：“河南的地主太便宜了。”为了打通干部思想，各地采用典型事例给广大干部算账的办法，以充分的事实说明：没收了一家地主的浮财，结果其他地主偷着把果树砍掉，衣服埋掉，家具也烧毁了，而农民无非能分一两件破衣服，分了一两条板凳，所得无几。如果不动地主的浮财，不仅减少了破坏，使社会财富很少受损害，而且大大减少了运动的阻力。干部们从这样的具体事例当中，逐渐认识到为了减少破坏，避免引起混乱，减少阻力，不没收地主浮财的政策是

必要的。他们说："不能因为捉虱子烧了棉袄。"

划定阶级成分是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环节。河南在土地改革中划分阶级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即讲解、划分、评定和批准。划阶级时允许地主申诉，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中，均召开乡农民代表会议，使农民懂得没收和征收的政策，即：要什么，不要什么。河南这次土地改革中，提出了"五要，五不要"的口号。"五要"是要土地、农具、耕畜、农村中的房屋和多余的粮食。"五不要"是不动工商业、不挖底财、不分浮财、不乱打乱杀和不侵犯中农利益。没收、征收时，河南各地一般都按各户地主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一般地主用协商、谈判、自报公议等方式解决；对少数坚决抗拒、暗中破坏土改的地主，人民法庭依法惩处；对开明的地主就适当地优待和照顾。由于政策明确，方法得当，经过4个月的时间，这36个县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这样，连同原已完成土改的7个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前，河南全省共有43个县、16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第八章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第一节 清剿土匪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作战，解放了南京、上海，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尚未解放的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展开大进军。到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对于这些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无疑必须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农民的翻身解放。但是，这些地区由于解放的时间短，县以上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农村基层政权还来不及改造，广大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而且新区面积广，人口多，干部严重缺乏。因此，这些新解放区还不具备立即开展土地改革的条件。

对于广大新解放区农村如何开展工作，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新解放区在农村中的任务，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反对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反对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

因此，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分为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两个阶段。

1949年4月下旬在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解放南京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制订“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企图在大陆建立15个所谓重点“游击根据地”，并委任各“游击根据地”的总指挥和总司令。同时，国民党开始实施培养“游击骨干”的计划，先后在武汉、成都、贵阳等地开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招收国民党军队中下级退役军官，地方政府的乡长、保长，地方上势力较大的恶霸、地主，各地有名的会道门、青红帮头子，流落江湖的鸦片贩子以及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惯匪等，进行“政治训练”。一时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匪患四起。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100多次，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同年头五个月内，广东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近百次袭击，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福建的东山、明溪、泰宁、光泽、建宁、永安、清流和屏南等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1949年底，溃散在青海的马步芳部骑兵旅长马英等国民党反动军官，纠集散兵游勇、在大

通、门源、湟中一带近10个县内，几乎同时发起暴动。

广西省解放前夕，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部署了3万正规军，化为土匪分散各地。又以管制民枪为名，大量掠夺农民的枪支，交给地主恶霸。在地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所谓“反共救国军”7个军。白崇禧还将各专员公署所辖的保安部队由1个营扩大为1个团。此外，还通过收编、加委等种种办法，搜罗广西各地的惯匪，供其驱使。这样，在广西农村形成了一支以封建地主为靠山，以正规军为骨干，以惯匪作先锋的土匪武装。广西公开的土匪与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仅在1950年一年的时间里，即组织规模大小不同的多次暴动，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7219人，烧毁房屋2.56万余间，抢劫耕牛20余万头。广西土匪残害人民的手法极为残忍，榴江县板里村农民刘兆安，全家四辈51口人，被土匪全部杀光。

湖南的湘西地区，与鄂、川、黔、桂数省接壤，地区广大，境内崇山峻岭，地瘠民贫。这里历史上的匪患本来就比较严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纵匪害民政策，更助长了湘西恶霸土匪的气焰。这些罪大恶极的匪霸，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被杀全家、灭三族、烧全村者屡见不鲜。他们强奸妇女，老幼亦难幸免。匪首汪援华强奸民女即达40余人。1949年该匪攻入沅陵县城，被强奸者达300余人。土匪打家劫舍，所到之处十室十空。

西南因为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在败退大陆前夕，蒋介石曾企图依托封建力量，将大量国民党军队转化为土匪，在西南作最后的挣扎。成都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即在成都招集恶霸惯匪等举办了5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先后训练所谓“游击干部”达5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结束前，有计划地在云、贵、川、康（西康）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匪患最严重时匪徒达50余万，百人以上的股匪有1100多股，个别的达万人以上。

在川北地区，1950年2月5日，包括1000余名起义后又叛变的国民党军人在内的武装匪徒，在成都东北郊的龙潭寺石板滩发动暴乱，杀害过路和派往起义部队的军政人员40余人。2月11日，邛崃、大邑、名山、彭山、温江、崇庆（今崇州市）、郫县、新繁、新津等14个县城相继遭到土匪围攻。3月12日，驻绵竹的原国民党第四七军第三〇二师叛变，匪乱蔓延到温江专区全境、眉山专区大部，杀害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多达400余人。1950年1月至6月，川北共发生匪特暗杀47起，纵火199起，放毒259起。仪陇县恶霸李树林勾结土匪，组织一支20多人的“放毒队”，在几个乡同时放毒，中毒者多达2800多人。

在川东地区，1950年3月，全区35个县市几乎全都发生了武装暴乱，重庆与川东各县城乡处于半隔绝状态。仅据川东行署涪陵专区3个县的统计，1950年被土匪抢走的公粮就达1000多万斤。

在云南，1950年4月下旬开始，在国民党匪特的唆使和煽动下，地主、恶霸组织武装暴乱抗交政府公粮。在暴乱严重的玉溪、楚雄、文山等专区，匪特与反革命暴乱武装一度占据了新平、牟定、盐兴（今禄丰县一部分）、易门、广通（今禄丰县一部分）、西畴等6座县城，致使云南与外省的阻断达2个月之久，杀害我征粮工作队干部（不包

括村干部和民兵）1000多人，抢劫、烧毁公粮425万斤。匪特在杀害我征粮工作队员时，竟使用惨无人道的酷刑。匪特抓到禄丰县罗川区征粮工作队员李粹后，先残忍地用匕首将其舌头、耳朵割下，然后挖出他的双眼，割下生殖器，最后用镰刀剖开其胸膛将心脏掏出。江川县赵官乡征粮队员牛文然被俘后，土匪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吊在大树上要其投降，牛文然严词拒绝，毫无人性的土匪竟用刺刀将其头皮自上而下割开，直剥至耳根时牛文然惨烈牺牲。

由此可见，剿匪是新解放区打开工作局面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剿灭土匪的军事行动，最早开始在解放全国的过程中。当时，解放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建立地方人民政权的同时，对阻碍全国解放、破坏人民政权的土匪武装，进行了坚决的军事清剿。194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严密注意国民党在已解放的地区组织暴动、组织政治土匪、组织各种破坏活动，加强肃反与剿匪的工作，并就肃反和剿匪作出具体部署。

1949年8月6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的社论。社论指出："在人民解放军消灭或击溃国民党匪军，解放广大的城市和乡村以后，如果许多地方实际上仍为特务土匪和反动势力所控制，则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无法推行，旧的反动政权不能改造，人民的负担很难减轻和公平，救灾治水等急要之举也受到阻碍，一切革命工作无法展开，城乡关系不能沟通，人民币不能占领广大的市场，经济生活无法恢复，城市将被孤立，农村将被窒息。""因此，发动大批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学生下乡，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动员广大农民，肃清土匪特务，推翻反革命恶霸分子的统治，安定秩序，发展生产，并进而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便必然应该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社论还对怎样才能肃清匪患提出了三点明确要求：第一，必须抓紧时机，建立统一领导，有计划地配备力量，确实掌握情况，展开全面而又有重点的清剿，不怕疲劳，不畏艰苦，长途奔袭，连续追歼，务求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第二，必须发动群众，争取一切社会力量，组织剿匪反恶霸的统一战线，使这个斗争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第三，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确实掌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打击和瓦解土匪，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这实际上明确提出了清剿土匪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原则。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立即开展剿匪工作。人民解放军参与剿匪的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一些主要股匪，同时展开政治攻势，促使土匪投降自新。从1949年5月到1950年5月，在一年剿匪作战中，共歼灭土匪游击队98万人，初步稳定了新解放区的社会局势。

华东新解放地区在解放前一向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华东军区剿匪部队在1949年5月至7月展开清剿工作的初期，由于缺乏全面统一部署与明确的剿匪方针，在政治瓦解、发动群众和战术改进方面未能很好注意，以致未能予股匪以重大打击；土匪特务因而由隐蔽观望转向公开活动，并利用解放军调整部署、集中力量接管城市的空

隙，纷纷纠合残部，树立名目，威胁利诱农民参加，一时匪患颇为猖狂，当时仅浙江一省即有大股土匪200余股，匪众由2万人增至4万人以上。8月初，华东军区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剿匪战术，统一部署力量，明确提出了以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使全区剿匪工作开始进人了新的阶段。剿匪部队则集中兵力，穷追猛打，进剿工作因而获得重大成绩，全境主要股匪大部就歼。自1949年5月至10月半年中，华东地区进剿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先后于浙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等地区歼灭土匪特务达64798名。华东全境除福建外，股匪基本上已被消灭或击溃。

1949年7月，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决定首先在解放较早的河南及湖北、江西大部地区，对大股土匪实施军事进剿，重点是豫西、大别山区和赣西南等地区。剿匪部队经过近3个月的围追堵剿，基本肃清这些地区的土匪。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11月中旬起，湖南各地相继展开对土匪的清剿。开展剿匪第一个月，即歼灭匪众2.1万多人。至12月底，又歼匪4.6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湘东北、湘南的社会秩序。1950年初，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集中野战军2个军又1个师及地方部队共20万人，全面进剿匪患重灾区湘西的土匪，共歼灭土匪2万多人，解放了湘西8座县城及广大农村地区，初步打开了湘西地区的局面。

1949年12月中旬，广西军区集中10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14万余人，开始进剿广西境内的土匪，剿匪部队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两种手段，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运用和平改编和劝降的方式，就收降改编桂西北滇桂边区国民党残余武装20股，计1.4万多人。

1950年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驻四川的部队开始全面进剿四川各地的大股土匪。2月上旬，西南局召开了全体会议，强调"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要求各级党组织、人民政府、解放军指战员必须坚定完成好剿匪作战任务。2月21日，西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确定先以大力肃清交通要道与经济富裕地区，尤其是四川境内之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岷江沿岸，成渝、渝万（县）与渝筑（贵阳）、昆筑各公路沿线地带之匪特，以保障交通安全畅通。"按照这个指示，西南军区及所属各二级军区，集中优势兵力，对腹心地区及交通沿线的股匪开展大规模的清剿。

1949年11月，西北全境解放，该地区的剿匪工作也拉开序幕，西北军区部队对境内股匪进行了全面清剿，土匪纷纷就歼、投降。人民解放军在甘肃临夏、定西地区歼灭了大股土匪，并彻底平息了青海省西宁周围地区的土匪暴乱。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还展开了对陕南、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宁夏等地股匪的清剿。至1949年底，西北除新疆省外，主要股匪大部就歼，残部被迫分散隐蔽起来。

1949年下半年，新解放区的剿匪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初步稳定了新区的社会秩序。但到了1950年上半年，匪患又出现了抬头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是此前的剿匪由于时间短，群众发动不充分，往往是只对大股土匪予以击溃，而没有予以彻底消灭，结果土匪采取大股化小股、化整为零的方式隐蔽起来，到了春荒时节，便蛊惑群众，呼啸山林，伺机活动。二是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后，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乃通过

各种方式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大陆，特别是潜入人民政权尚未巩固的新解放区，充当土匪骨干，招兵买马，扩大匪特武装。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集团鼓噪要“反攻大陆”，特务分子与各类反动分子沆瀣一气，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使土匪分子有恃无恐。三是一些地方未能正确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只强调宽大，忽视必要的镇压，甚至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对一些罪大恶极的首犯、要犯，也宽大处理，简单登记教育一下之后予以释放，等于是放虎归山。

1950 年 3 月开始，新解放区的土匪在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操纵指挥下，重新整顿队伍，逐渐由混乱分散状态走向有组织的集结，在各地普遍展开破坏抢劫的罪恶活动。土匪暴乱的规模也更大，组织也更严密，手段也更为残忍。据不完全统计，1950 年 1 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 100 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 120 多名干部被杀害。中南地区匪患最严重的要数广西，1950 年 2 月前，全省受降和歼灭了土匪 3 万余人，但还有 6 万余人，而且是一面被剿灭，一面又不断孳生。据不完全统计，自 1950 年 4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 30 多天中，全省发生暴乱达 80 余次，其中 52 个区被土匪攻陷，烧毁桥梁 10 多座，抢粮 60 多万斤。

西南地区的匪患也相当严重。自 1950 年 3 月起，土匪即在各地普遍展开所谓“西南大陆游击战”，杀人放火，破坏生产，抢掠仓库，拦路行劫，刺杀工作人员，水陆交通没有足够的兵力掩护都难以通行。西南地区以贵州省匪患最为严重。自 1950 年 2 月起，匪患开始遍布全省所有的县、区、乡，80%以上的各级地方政权被捣毁、夺占，各地工作陷于瘫痪，贵州省军区遵照西南局的指示，只得暂时放弃边远的 31 座县城，以确保贵阳及公路干线的安全。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1950 年 3 月以来亦发生大规模的土匪暴乱。陕西、宁夏的残匪也蠢蠢欲动。由此可见，如果不彻底剿灭土匪，不但人民的生活财产没有安全保障，新生的人民政权也不能巩固，土地改革工作更是无法谈起。

针对匪患日趋严重的紧张局势，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平息匪患，稳定社会秩序。

1950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于剿匪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1950 年 7 月，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联合签署《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

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该指示对重要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提出了具体的原则：

——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

——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毛泽东为使战争赢得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他对于各地的剿匪工作同样抓得很紧。

1950 年 10 月，毛泽东两次致电广西省委，指出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必须总结剿匪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重点，端正政策，在 1951 年 5 月 1 日前彻底肃清广西全省的股匪。11 月，他又致电华南分局及广西省委，要其认真检讨先于西南解放而剿匪工作落后于西南的原因，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肃清。毛泽东还亲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坐镇广西，令其直到剿匪问题基本解决后再离开。

鉴于华东地区以福建匪患较为严重，毛泽东于 11 月致电华东局和华东军区负责人，要其检讨原因，要求华东军区使用四五个主力师，对土匪穷追赶猛打，并限令在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的土匪。毛泽东还对西南军区每月发布一次内部的剿匪通报的做法甚为赞扬，要求中南、华东两大军区也照此办理，各大军区的剿匪通报除发给所属各省军区外，同时也发给其他两大军区，“以资观摩比较”。

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展开了剿灭匪患的第二阶段大规模作战。

1950 年上半年，中南地区共消灭土匪达 21 万人，中南六省大部分地区的匪患已基本肃清。自 1949 年底河南全省及江西、湖北、湖南大部分地区的股匪被肃清后，经过半年来的进一步清剿，江西匪患已基本肃清；湖北除西北、西南部分边沿地区尚有小股土匪外，广大地区已无匪踪。在湖南南部，数十年来匪患不绝，这时也已基本肃清，全区自 6 月份开始未发生抢案。在历史上即为全国著名匪患地区的湘西之腹心地区沅陵、古丈等八县现已在基本上肃清了土匪，为湘西人民痛恨入骨一批匪首被擒正法。广东除边沿山区尚有小部股匪流窜外，腹心地区的股匪已被基本肃清。这一阶段，广西的剿匪作战中也获重大成就，先后肃清了大容山、六万大山等重要匪巢，活捉“桂南反共青年独立团第二军”军长朱光辉及匪副总指挥李扬威、副师长石子起等重要匪首。

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中南剿匪部队再接再厉，对土匪穷追猛打，集中优势兵力，开展重点清剿。仅 1951 年 1 月，中南全区共剿灭土匪 76044 名，其中毙伤土匪 1812 名，

俘虏35373名，投降自新38859名，毙、伤、俘、降重要匪首166名。

在匪患严重的广西，按照毛泽东限期消灭土匪的指示，以“集中对集中”的办法，对大小瑶山、大明山等土匪集中地区开展重点清剿。其中大瑶山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的地区内，集中了各种旗号的土匪3万余人，成为广西全省土匪的心脏。1950年1月至2月，广西军区集中正规军14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在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对匪区形成一道周长500公里的大包围圈，然后进行分割包抄，拉网扫荡，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就歼灭土匪1.3万余人。在军事进剿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各种方式劝导匪徒自新登记，走投无路的土匪纷纷弃暗投明。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大瑶山外围的土匪基本被肃清，其中半数以上是投降自新的。随后，剿匪部队除帮助当地群众建立政权之外，抽出13个营的兵力，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对大瑶山腹心地区的土匪进行拉网式的清剿，将躲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土匪骨干击毙或捕获，活捉伪桂东军政区副司令甘竞生、伪一二六军军长林秀山，击毙伪六县“清剿”指挥所司令韩蒙轩，彻底肃清了大瑶山地区的匪患。

仅1951年2月，广西省剿匪部队共歼灭土匪6.3万余名。大小瑶山、大明山及宜山、天河、思恩三县交界处等三个重点地区的土匪基本上被肃清。桂东南、桂北、桂西等地71县已基本上消灭了股匪，其中45个县并已大体肃清散匪。到1951年5月，广西全省共计歼灭土匪33万多人，如期完成了毛泽东规定的剿灭股匪的任务。

1950年下半年，福建省剿匪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据7月至9月三个月的统计，共歼灭残余土匪9307名。其中计毙伤986名，俘虏4388名，投降1965名，自新1968名。重要匪首纷纷就擒或被击毙。11月中旬，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抽调5个主力师，在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人民配合下，再次发动剿灭股匪的大规模攻势。自1951年1月开始，福建军区会同浙江、江西有关地区，组织了对闽、浙、赣三省边界地区股匪的联防会剿。2月，又全面展开搜剿，围歼匪首，挖除匪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消灭股匪万余，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特致电表示“（剿匪）成绩甚大，极为欣慰”。与此同时，浙江省内剿匪也取得歼灭3.6万人的重大胜利。至此，华东军区剿匪部队提前完成剿灭股匪的任务。

1950年3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共同下发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从军区直至乡、保均应成立剿匪委员会，作为一元化剿匪的组织形式，并以此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抽调主力部队，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对成股土匪开展会剿。同年4月，川东军区集中3个团共33个连约7000人的兵力，对川东涪陵、南川、巴县三角地区的股匪进行清剿，历时25天，共歼灭土匪7000余人。与此同时，川南军区、川西军区也先后出动部队，开展剿匪斗争，并在军事进剿中开展政治攻势。各剿匪部队组成武装宣传队，一面战斗，一面宣传。各县区则普遍通过各界代表、保甲长、土匪家属等各种会议，讲解政策，进行前途教育，并吸收有威望人士组成剿匪委员会，发动各界人民劝其在匪中的乡邻亲友自新悔过。对已自新悔过的土匪，则给予短期训练后，再通过他们去争取瓦解土匪，以“将功折罪”。1950年，驻川解放军共歼匪60余万人，基本消除了四川境内的匪患。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西界缅甸，南接越南，这里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利用这个复杂的国防边界及深山峻岭，策动其败兵残将及地主特务武装，进行武装暴乱，从1950年4月中旬以后，这些匪特武装便乘人民解放军初来乍到，地方工作尚未展开的空隙，即以“抗粮抗税”以及“配合三次大战”等反动口号为号召，在全省大部地区组织叛乱。直到5月中旬，为匪焰最盛时期，股匪多达260股。云南军区从4月中旬起，按照“坚决剿匪，发动群众，加强统战工作，执行政策，克服命令主义”的方针，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在4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彻底歼灭了流窜滇西的残匪顾介侯、张桐森部，伪滇西纵队侯茂祺部，滇南伪“人民反共自卫军滇总联军”金绍云部，滇东北伪“滇东军政长官”及叛匪王耀云等匪部，共达1.6万余人。至1950年底，云南省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歼匪6.2万余人，收复了一度被土匪占领的十多座县城。

在匪情严重的贵州，则集中军区主力部队，组成东西两个机动作战集团，对全省大股土匪展开清剿。1950年6月，东集团对贵阳东面的瓮安、余庆、湄潭三角地区展开合围，歼匪3100余人。7月，西集团对西部金沙地区的土匪进行围歼，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消灭土匪5100余名。8月，贵州剿匪部队歼灭长期盘踞黔东南的伪“黔东南绥靖区”谢世钦匪部7000余人。11月中旬，贵州军区集中3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歼灭了盘踞黔南长顺、紫云、惠山的伪“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曹织华匪部4000多人。至1950年底，贵州省军区部队进行大小战斗4000多次，歼灭股匪19万多人，基本上控制了贵州匪情。1950年，整个西南区共剿灭土匪85万人，缴枪40余万枝。西南剿匪部队也由此得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通令嘉奖。

1950年5月，西北军区针对土匪活动的新情况，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各剿匪部队在对反革命武装叛乱进行坚决镇压的同时，丝毫不要放松政治瓦解工作，使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密切配合起来。从5月底开始，西北军区对土匪展开清剿，重点消灭新疆的乌斯满、尧乐博斯匪部（乌斯满是新疆惯匪，尧乐博斯是国民党前哈密专区专员，新疆和平解放后投靠乌斯满）。新疆军区剿匪部队于5月17日至5月23日的一周内，将乌斯满股匪主力歼灭殆尽，毙伤俘匪1011人；原误投乌斯满、尧乐博斯匪首的9个哈萨克部落万余人，携械归向人民政府。1951年3月，匪首乌斯满被活捉。与此同时，驻甘肃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平凉地区的土匪暴动。驻宁夏解放军平息了西吉、海原、固原地区的土匪暴乱，歼匪900多人，并迫使匪首马保元及一部匪众投降。1950年，西北全区共歼灭土匪6万多人。

到1950年底1951年初，新解放区的股匪已基本上被歼灭，匪乱已基本子息，社会秩序渐趋巩固，邪气下降，正气上升。但是，虽然经过全面清剿和重点清剿，仍然有极少数的股匪得以逃脱，一些被击溃的散匪、残匪也流窜于腹心地区，仅西南地区残存的匪众仍有近4万人。为此，毛泽东作出指示，要求“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捕，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清剿残匪的工作在各新区相继展开。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以公安部队为主，以民兵为辅，协同公安机关实行清剿。同时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发动群众，群防群治。西南地区的县、区、乡三级均建立清匪委

员会，村有清匪小组。华东地区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网，配合公安部门，利用一切线索侦破和捕捉残匪。各地还普遍组织便衣捕捉队，在残匪活动区进行追踪、缉捕。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布下了肃清残匪的天罗地网，使土匪无处可藏，即使有苟且藏身处，也会被困死、饿死。这样，残余的土匪不是被缉拿归案，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首。到1952年底，大规模的清剿土匪的斗争基本结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共消灭土匪267.59万人，其中华东地区24.6万人，中南地区115万人，西南地区116万人，西北地区9.09万人，华北地区2.9万人。清匪斗争的胜利，不但肃清了危害人民的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也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反恶霸斗争

各新解放区在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的同时，还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恶霸的斗争。

在土地改革前的中国农村，统治农民的主要是是两股势力——地主和恶霸，他们对农民进行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曾指出："反对恶霸即反对地主阶级当权派。"一般说来，恶霸即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但有个别当权派地主也不一定是恶霸。这是因为有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当权不久，还来不及为胡作妄为；或者因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为了笼络和欺骗群众而以伪善的面目出现；也有个别群众痛恨的恶霸地主，过去是当权派，而现在没有当权，但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非作歹。

地主与恶霸是互相依存的，地主往往是通过恶霸实现对农民的盘剥，恶霸则以地主为靠山，充当地主剥削农民的工具。有的地主本身就是恶霸，即通常讲的恶霸地主。当然，恶霸并非都是地主，地主也不是人人都是恶霸。地主经济上的剥削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长期以来，不论地主还是农民，种他人的田交租、借人家的钱付息，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恶霸则横行乡里，欺男霸女，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恶霸尤其是恶霸地主最为农民所痛恨。文艺作品《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收租院》中的刘文彩，《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就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形象。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曾在《谁说"江南无封建"》一文中，对恶霸地主的各种暴行有这样的记叙：

吴县一带，地主因追租把农民抓去坐监牢之后，不但要农民照数交租，还要强迫交"人房钱"（农民把监牢叫作"人房"）、"出差钱"、"稻草钱"、"送饭钱"、"看守钱"、"开锁钱"等花费。苏州郊区地主沈望山，因追租拆了农民周保富的房子，回头并叫周保富出拆屋工钱。真是你越没有钱，越要像石子榨油似的在你身上榨些出来。

无锡地主薛念恩，常使欠租农民"吃毛竹筷"或"坐冷砖头"。吃毛竹筷，是把农民的五个手指头缚牢后，再用铁锤把削尖的毛竹筷敲到指甲缝里去。坐冷砖头，是在寒

冬腊月冰雪天里举行的。把欠租农民的棉裤棉袄剥下来，两只手反缚在柱子上；腰子直挺挺的，屁股坐着一块冷冰冰的砖头，坐热一块换一块。

常熟唐市区地主殷式如，绰号“黑鲢鱼”，有一种毒辣方法叫“滚笆篓”。把欠租农民绑起来，放在一只笆篓里，上面再套上一只笆篓，用绳子缚紧，然后放在地上滚来滚去，抛来抛去。身体再好的人，不几下也就要完蛋。殷式如这方法，无锡和吴县浒关区也有地主采用。

唐市区地主李振声又有一套“扇风车”的办法。在寒冷天把欠租农民的衣服脱得精光，绑在扇米（去糠）用的风车口上，大扇其风车风。据说事后欠租农民还得交扇风车的手工钱。

江阴杨舍镇地主陈春元，有次抓来左近的东北村的五个贫苦农民。把筷子削尖，插在他们的耳朵里，然后双手一拍。五个劳动农民就这样活活的被杀死了。

……

无锡玉祁区地主罗阿平，绰号“三十三个半”，就因为他曾强奸了33个农家妇女，另一个强奸未遂。武进塔进乡地主杨远芳，曾强奸了18个妇女，其中两人当场因奸而死，另90多个妇女因强奸未遂而遭殴打。常熟地主赵培之，1936年强奸古苏乡汪陆氏的女儿。汪陆氏阻止不住，反而被砍断了左手。这只手用石灰保存了13年，今天才见到太阳，在展览会场上活生生地陈列着。吴江溪港乡地主徐子光，曾当过伪保长，霸占过几百亩湖田，强奸过11个妇女。他有一次到一个丈夫在外做工的农妇家去。屋内婆媳小孩三人，听见他深夜叫门，不敢出迎。他就从窗口，“砰”的一声，打了一枪。他进去后，赶走老太婆，强奸少妇以前，还用枪头打死了小孩。吴江震泽区，前后被地主霸占的农家妇女共有47人。

由此可见，不打倒农村的恶霸，特别是恶霸地主，农民就不能翻身。而开展反恶霸斗争，对于激发农民的阶级仇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动员其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必将起重要作用。因此，新解放区各地在开展土地改革前，均开展了反恶霸斗争。

虽然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但恶霸与地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据调查，在农村中恶霸地主一般只占地主的1/10。因此，在开展反恶霸斗争之前，正确地区分恶霸与非恶霸就十分关键。所谓恶霸，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查有实据者”。这就要求将恶霸分子与一般的地主分子区，别开来，同时还要将恶霸与可以教育、争取的流氓、地痞和地主狗腿子区别开来，将罪大恶极的恶霸与一般恶霸区别开来。

由于多少年来农民一直是处在地主的压迫、剥削之下，一旦翻身起来，必然会要求申冤出气，以至发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对于农民这种情绪如果不能很好掌握与领导，放任其发展，就很可能发展到乱打乱杀，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过去老区土改中发生的乱打乱杀，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在新区土改中再度发生，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对恶霸分子必须交人民法庭惩处，主要根据恶霸分子罪

恶的大小和所犯罪行的程度，群众的痛恨程度，在经过群众检举揭发控诉之后，由人民法庭根据其罪行进行判决。对那些犯有血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分子处以死刑；对其他罪行严重，民愤较大的恶霸分子或处以有期徒刑；一般的恶霸分子，在经群众斗争，低头认罪并赔偿受害群众的损失后，交由区、乡实行管训，或交群众管制。这样，避免了农民自发的报复行为，使反恶霸斗争得以保持正常的秩序。

新区在开展反恶霸斗争时，一般的做法是上级派来的干部深入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调查掌握恶霸罪行，通过个别发动，培养"根子"（即积极分子），然后通过积极分子发动广大群众（即串连），将群众组织起来，接着召开群众诉苦大会，受害农民即苦主面对面地揭发恶霸的罪行，激起农民对恶霸的痛恨，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对查有实据、民愤大的恶霸分子，由人民政府依法拘捕，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斗争，并根据罪行的轻重予以不同的惩处。对极少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分子，在经县人民法庭及其分庭审讯判决，报省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特令指定的专员公署）批准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群众事先并不知该恶霸已由上级批准将执行死刑），由受害群众一一揭发其罪恶，等群众的仇恨心理激发到最高点时，由主持大会的干部询问群众对该恶霸如何处治。这时群众往往会异口同声要求政府枪毙。于是，主持人当场宣布人民法庭的判决，由公安人员对该恶霸执行枪决。也有个别民愤极大的恶霸分子，在人民法庭宣布对其执行枪决后，公安人员未及行刑即被愤怒的群众打死。

广西玉林县（即今玉林市）五金乡五岗村开展的对恶霸地主唐进贤的斗争，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使群众在诉苦中揭发了唐进贤为非作歹的许多事实，工作队乃决定采取先开"祭灵会"（即为过去被恶霸直接或间接杀害的群众举行公祭）的方式展开斗争。在祭灵会上，有 11 个受害群众进行了控诉，多数控诉人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工作队在会上当即将决定开展对唐进贤的斗争。群众在激愤之下，把唐氏夫妇抓来令其跪在死难群众的灵位前，进行斗争。但是，由于事先准备不够，斗争会实际上是少数积极分子包办，在斗争过程中又没有充分揭露恶霸的罪恶，而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逼交金钱、枪支。结果，唐进贤拒不承认自己有罪，斗争会形成僵局，造成不少事先已发动起来的"根子"情绪不高，未等斗争会结束就离开了会场。

面对这种情况，工作队当即分析了原因，认为主要是事先未能充分做好准备，摸底不细，情况了解不具体，群众发动不够，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代替。找到原因之后，工作队决定重新发动群众。村里有一个叫唐二十嫂的妇女，在唐进贤家当过十几年的婢女，曾被唐进贤脱掉衣服，用香火烧烫。但唐二十嫂觉悟较差，年前还给唐进贤送过礼。群众鼓励她诉苦，她不承认自己有苦。工作队遂与积极分子研究，决定谁与她关系好，就由谁去动员。经过分析，发现一个叫曾二嫂子的妇女同她关系好，就让曾二嫂子去做工作，果然将其发动起来了，讲出了唐进贤不少情况。

唐进贤有兄弟五人，十几年前就分了家。他的四个弟弟中，二弟是个二流子，三弟是惯匪，在剿匪中被杀，其四弟、五弟是贫农。于是工作队就分工让积极分子去作他四

弟、五弟的工作。积极分子对他们说："过去唐进贤有钱有势，你们占有他的好处。唐进贤打倒了你们还能靠他吗？农民都组织起来了，你们不跟农民一条心，跟地主一条心，仔细想想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你们站到农民这边来斗倒唐进贤，对农民来说有功，真和地主分了家；对地主说也算救了你哥，不然他不缴清农民的血汗钱，他会判死刑的。"通过做工作，其四弟、五弟也被发动起来了。

经过多方发动，工作队摸清了唐进贤大小罪恶事实30多件，如他在船埠开"特察里"（即妓院兼大烟馆），向群众强行摊派谷子2850斤；有驳壳枪4支，常带在身上威胁农民；1940年他的一个婢女得了病，不但不给治，反而丢在破茅屋里，当婢女未死时，就将其活活丢进河里；放高利贷时对群众说是借一石还一石一，但群众借后又要一石还二石，说一石一是利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掌握这些事实之后，又摸清唐家金戒指、银元、衣物、粮食等具体情况，并计算出了应该赔偿给农民损失的具体数字。

随后，工作队又发动群众多次斗争唐进贤。虽然他总不是一次全承认自己的罪行，也不愿退还霸占的农民财物，但由于群众掌握了具体情况，终究抵赖不住，承认自己有罪恶六大条，应赔偿群众钱物折谷25000斤，用其交出的金银等物资折谷19000斤。就这样，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把恶霸打倒了。

应该说，对唐进贤的斗争，只是当时斗争一般恶霸的一个典型，而浙江绍兴对恶霸"六老虎"的公审，就是处治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有代表性的个案。

绍兴漓渚区朱华乡任家坂村恶霸地主任因富、任因生等弟兄六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任意杀人，霸占财产，奸淫妇女，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群众给其取绰号叫"六老虎"。"六老虎"草菅人命，村中一小贩因向其讨欠赊账，被其活活打死。一寡妇的家产全部被他们无理霸占，还将她的孩子和弟弟活活逼死。一农民被诬告人牢，受尽百般拷打，家里7.5亩田因打"官司"卖去大半，其弟被恶霸强抽壮丁送了命，老母亲也活活撞死。后经查明，"六老虎"共逼死人命11条，打伤与打残废的农民共有7人，霸占妇女2人，强奸妇女共26人。此外，还有霸占公产私产，敲诈勒索，明抢暗劫，任意打人骂人，纵火焚毁民房等罪行。绍兴解放后，"六老虎"又造谣煽动，指使其他地主瞒报土地，隐藏粮食，反对人民政府。漓渚区成立了人民政府后一个月的时间，当地群众纷纷前来控告"六老虎"的罪行，要求政府给自己申冤。农民们为防止"六老虎"逃跑，曾自动组织起来，彻夜严密监视。最后，终将企图逃跑的"六老虎"中的首犯任因富、任因来抓获，送交政府处理。

经过司法机关的详密调查和侦讯，把"六老虎"的罪证收集齐全，继续逮捕了六弟兄中的任因生、任因庭、任因孝三人，由浙江省第十专员公署在绍兴市组织人民法庭，举行公审。1949年7月23日，绍兴市的农民、工人、学生、机关及部队代表近3000人，集会公审"六老虎"。附近萧山、嵊县（今嵊州市）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也派代表赶来参加。当任因富等弟兄5人（任因林畏罪潜逃）被带到会场时，群情激愤，争相控诉。各苦主控诉之后，由人民法庭主审官宣布：对打死人、逼死人、打伤人之直接凶手主犯任因富处以极刑；其他各犯虽犯有罪恶，但政府本着宽大改造教育政策，从宽处理，依其罪恶轻重，判处任因来无期徒刑，任因生5年徒刑，任因庭、任因孝1年徒

刑；任因林虽潜逃在案，念其年老罪轻，如能回家向群众低头请罪，便可从宽处理。其家庭财产，除全家每人留下一份维持家人生活外，余均没收交农会作为赔偿苦主及救济灾民之用。

在反恶霸斗争中，由于农民长期受恶霸的欺凌压迫，一旦翻身之后产生强烈的复仇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没有严格地将地主与恶霸、大恶霸与一般恶霸区分，对农民的复仇情绪又不加正确的引导，结果将对恶霸的清算斗争变成了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清算斗争，扩大了反恶霸斗争的对象，在斗争过程中没有将重点放在说理上，而是放任农民对恶霸的打斗，以至每斗必打，甚至还发生过斗争会上将恶霸直接由群众打死的现象。为此，中共中央一再强调，人民法庭是有系统、有秩序地镇压不法地主的机关，对恶霸地主的处理必须经过人民法庭采取司法程序，严禁刑讯逼供和使用肉刑，防止乱打乱杀。

在开展反恶霸斗争的同进，进行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由于不少恶霸分子既是地主，又在国民党时代担任乡、保长，成为农村名副其实的当权派。通过开展反恶霸斗争，原有的保甲制度被瓦解，恶霸的枪支被收缴，对旧的乡保人员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地主武装被民兵取代。同时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的骨干担任了乡村干部。仅中南地区到1950年9月，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就达2500万人，发展民兵103万人。这样，树立了农民基本群众在农村的优势，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政权，改变了农民受压迫的地位，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三节 减租退押

新解放区在进行清匪反霸，建立初步革命秩序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

解放前，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租佃关系上，地主掌握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出租的。全国一般的情形，是农民要把一年全部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苏南吴县农民说："六棵稻里有三棵是要交给地主的。"如无锡梅村区强家桥村，农民耕种1亩田，平均生产费用为大米7斗5升，生活费用为5斗6升，而全年正产物收入为2担2斗，两抵只剩余8斗9升。可是每亩要交50%，即1担1斗作为地租，因之不足2斗1升。为了弥补这不足之数，农民就必须把生活费用由5斗6升减少为3斗5升以内。用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的话说："这种租额的剥削，不但攫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夺了农民的必要劳动的40%。"

如果农民不按期交租，地主就加重租额，苏南农村叫做"逾限加成"。地主每年收租日期有所谓"三限"：冬至前第15天为"头限"，头限内可按规定租额交租；冬至前第10天为"二限"，二限内交租，照原额加收一成；冬至后第7天为"三限"，也叫"满限"，限内交租再加一成。如果过了满限还交不清租米，有的地主就派许多地痞流氓与打手等到佃户家大吃大喝，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要，非强迫着交清了租米不走；有的地

主还勾结反动政府派兵把佃户捉去吃官司。

在旧中国农村，农民与地主的租佃关系中，还普遍存在押租（或预租）制度。也就是说，农民在租种地主的田地之前，要预先交给地主租金或租谷。在苏南农村，奉贤县（今属上海）农民租1亩田，要先交5斗至1担5斗米给地主。金坛县（今金坛市）1亩的押租是大米80斤至100斤。无锡县（今锡山市）更有个别佃户每亩要付出大米5担，押租已和地价差不多。而湖南，押金的数量，最普通的与一年租额相等，称为“平批平租”（批即押金），但也还有所谓“重批轻租”、“轻批重租”等。农民如不能一次将押金交清，地主就要年年加息，在租谷内扣交。有的地主更将押金再以高利贷放给农民。交给地主的押金，按照字面上的规定，退佃时应全部退还，但地主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七折八扣，直至化为乌有。许多农民都是在交押金的时候背了债，长期甚至永远还不清。

沉重的地租是旧中国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也是农民对地主阶级剥削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受。当时，新区不少地方仍有散匪尚待肃清，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安定，农村区乡两级政权多未改造，并仍大部被地主及旧的保甲长所操纵把持，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尚未普遍发动和普遍组织起来。长期以来的封建统治，在农民头脑中形成了租种人家的地，就应给人家交租的旧观念，他们并没有认识到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是封建土地制度，而是埋怨自己的命不好。因此，在此种条件下，如果仓促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先开展减租退押，作为向土地改革的过渡，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得经济上的好处，又可以此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认识到不是地主的土地养活了农民，而是农民的劳动养活了地主。地主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就在于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占有大量的土地。农民要想翻身，就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所以，减租退押虽然只是削弱封建剥削制度，但它为最终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50年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指示》是刘少奇起草后，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并与有关民主人士协商，政务院第二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后发出的。《指示》规定：在1950年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九省，甘肃、宁夏、青海三省之汉人地区，凡是准备工作已经充足、群众的觉悟与组织已达应有水平之地区，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在1951年秋收以后，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在新疆及全国各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在1951年秋收以后，是否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另行决定。

《指示》同时规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减租命令及减租条例由各省人民政府发布之。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地主依法实行减租后向农民收租，仍然是合法的，农民仍应向地主交租，而地主之土地仍归地主所有，但地主不得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出卖及以典当、抵押、赠送等方式分

1950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发了《新解放区农村减租条例》。《条例》规定：“凡地主、旧式富农及机关、教会、庙宇等出租之土地，原租额占土地正产物50%以上

者，其租额按原租额减去30%；原租额占土地正产物不足50%者，其租额减去25%；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35%，超过者应减低至35%。地租以外的额外剥削，一概取消。”“凡出租土地者，均不得预收地租。预收地租属于1949年度者，退还其应减之部分，属于1950年度及以后者，全部退还，但均不付利。”“解放前农民对地主、旧富农的欠租，一律免交，但对地主、旧富农以外业主的欠租，应视业佃双方经济情况酌量交还。”“在减租以后，应确实保障佃权。地主不得收回土地转租、出典或出卖。”

在此前后，中南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农村减租办法》，西南军政委员会也颁发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其具体内容与华东《新解放区农村减租条例》大体相同。

对于退押问题，195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改中退押与债务问题给各地指示电》，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土地改革中，在原则上地主应将押金退还给农民。但只将农民最后所交给地主之押金退还，不应翻老账，亦不应计利息。原交银洋及实物者，即照退银洋实物，或照银洋实物现在的价格退还。原交法币者，即照当时法币的价格退还。”对于地主不能一次退完或根本就退不完者，《指示》规定，地主可以分期退还；实在不能完全退还者，可少退或只退一部分；如果有些地主实在退不出押金，也可完全不退。

要作出这样的规定，一方面肯定农民索还押租（或押金）是正当行为，因为押租本来就是地主对农民的额外剥削，而且让一部分能够退还押租的地主将全部或部分押租退还给农民，有利于帮助农民度荒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地主的实际情况，有的地主已将农民的押租购置了生产资料或投资于工商业，如果强逼其退出，势必要对生产和工商业产生破坏。如果算老账或利息，则可能算得地主倾家荡产，以至地主不能生活，这样对社会反而没有好处，而且规定押租分不同情况退还，也防止出现农民强索押租而挖地主的浮财，对地主乱打乱斗。

各地的减租退押基本上是分为这样几个步骤：一是召开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工人、农民、开明绅士、部队、机关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共同讨论减租工作，组成农村统一战线，动员各界人民赞助农民运动，拥护人民政府减租法令，制定减租退押补充条例或实施办法；开办减租退押训练班，训练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作为乡村开展减租退押斗争的领导和骨干。二是召开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向农民代表并通过他们宣传有关政策，防止在斗争中出现偏差。三是选择有代表性的乡村进行试点。在试点中，工作队（经过训练的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扎根串连，了解当地的租佃关系，掌握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的具体情况，然后开展诉苦、算账（诉地主压迫农民之苦和算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账），以此启发群众觉悟，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骨干，组织改选农民协会，以农民协会出面领导运动。农民协会根据掌握的情况和有关政策法规，研究本村减租退押的方法和步骤，然后，一面召开地主会议，向其宣传减租退押的政策，一面组织农民与地主谈判，确定退还数目。在农民们有证有据的揭发之下，违法地主往往瞠目结舌，只好低头认罪。四是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全

面铺开减租退押运动。

各大区对退租退押斗争都很重视。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称之为西南的“淮海战役”，可见西南局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新解放的各大区中，华东是最早开展减租退押运动的地区。1949 年 9 月，中共中央华东局颁布《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草案》、《华东区农民协会组织章程草案》，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减租退押。至 1950 年底，运动基本结束。

1950 年春，中南区即在全区农村中展开了大规模的减租退押运动。中南军政委员会于 2 月下旬通过与颁布了《中南区减租减息条例》，中共中央中南局也于 3 月 1 日发出《关于开展减租退租运动克服春荒准备生产的指示》。中南地区减租退押运动从此展开，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于 5 月底告一段落。全区除广东、广西两省及河南省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外，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平均有 80%以上的农村进行了减租。广东、广西两省也有部分地区减了租。农民共减租粮 8.86 亿斤。

在运动中，农民协会和民兵等组织获得很大发展。中南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共发展了 1350 万人。仅湖北全省 1.95 万多个村庄中，有 1.3 万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1.34 万多个村庄废除了旧保甲制度，组织民兵 14 万多人。江西省农民协会会员有 180 多万人，在全省 35%以上的地区改造了村政权组织。

1951 年夏收以前，减租退押运动在广东省 63 个县 1500 万人口的农村展开，农民依法减租获得的谷子达 4.37 亿斤。广西在 1951 年 7 月底前，也已有 600 万人口的农村完成了减租，农民获得谷子约 2 亿斤。凡已完成了减租的乡村，70%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分得了一些减租的胜利果实。

1950 年 8 月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减租办法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人民政府都曾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适合于各种不同情况的减租实施细则和工作步骤。9 月，陕西省即首先在陕南汉水流域地区 15 个县的 154 个乡进行试点。到 9 月底统计时，参加运动的农民，就已达 30 多万人。仅据当时南郑县 4 个区的统计，农民已从地主手中，依法减回租粮 19600 多石。同时，甘肃省天水专区试点的 62 个乡的 8500 个佃农，共减回多缴的租粮 8500 石。1950 年冬开始，在西北全区四个省的 100 多个县，4900 多个乡，1200 多万人口的地区，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

西南区减租退押运动，1950 年 7 月着手准备，11 月全面展开，到 1951 年 4 月中旬为止，有 208 个县、7 个市郊，6660 余万人口，即占全区人口 83%的地区，开展了减租退押。全区通过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农民获得的果实达 77 亿斤米，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 2000 万余人，占人口 28%，人民武装已发展到 224 万余人，占人口 3%，同时涌现出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特别在运动后期，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了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

在新区的减租退押运动中，个别地方也一度发生过偏差。如湖南湘潭县五保在减租退押运动中，把地主立在人丛中推来推去，还美其名曰“滚绣球”，甚至还使用饿、冻捆等方式对待地主。重庆郊区一些农村，农民将退押痛快的地主称为“开明地主”，却

把那些确有困难不能一次退完的中小地主当作斗争对象。尤为严重的是发生侵犯工商业的现象，西南一些地方农民进城向那些一时退不出租押的地主兼工商业者算账，甚至提出要将其机器、货物抵作押金。湖北浠水县农民向工商业者追租退押有追十年、八年的。据汉口市1951年1月10天时间的统计，农民进城抓地主者达400余人，引起工商业者恐慌，造成这个月比上个月减少税收2/3。

对此，各地都采取坚决措施进行纠正。中共中央中南局于1951年1月22日出台了《关于限制农民在退租退押中侵犯工商业的办法》，明确规定农民向地主兼工商业者退租，只限于1949年和1950年两年应减而未减的租粮；退押按折半清理，但押金过重者应退额以原田一年租粮收入为限，不得无限清算；解放后变卖田亩者，将所得田价退还给农民协会处理。1月27日，中共中央向华东、西南、西北三个中央局批转了这个文件，要求各地对此充分注意研究并依照执行。中共中央还向各地推广武汉市组织城乡联络委员会的经验，指出今后凡农村方面须向城市逮捕罪犯或须向城市某些人办理减租退押者，一律需经该委员会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

减租退押使农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中南全区通过减租和退押，仅1950年上半年地主向农民退还的租谷或押金，折合稻谷约9亿斤。据广西横县、平乐两个专区的统计，退租退押得到的稻谷，最多的村可得9万斤，最少的也有0.5万斤，平均在2.3万斤左右，贫雇农每人多的可得360斤，最少的也得30—40斤。西南区农民在减退中得益的普及面约在50%—70%。贵州全省平均每人可得减租果实52斤，川东区平均每人可得过200斤至300斤，川南区荣县高山乡贫农在运动中分得果实每户104斤，中农127斤，佃富农686斤。

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广大新解放区肃清了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和新生人民政权巩固的匪患，镇压了一批为害一方、鱼肉农民的恶霸分子，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农民从斗争中得到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开展这些斗争的过程中，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许多农民参加到了农民协会，一批积极分子和斗争骨干成长起来，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被彻底摧毁，新型农村基层政权得以建立，并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这就为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九章　立　　法

第一节　保存富农经济

到1950年6月，全中国业已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1.45亿（总人口约1.6亿），尚有约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3.1亿）没有进行土地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总纲中明确规定："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完成土地改革就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土地改革，情况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土地改革是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开展的，土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动员广大农民支持革命战争，当时城市与农村基本上还处于隔绝状态，不必过多地考虑怎样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将在中国共产党已取得全国政权、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进行，它的直接任务也就从主要是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明确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利用与限制的政策，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必须妥善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

这时，国内外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领导人民革命的党，正在转变为领导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任务的同时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党。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不同了，那么，新区的土改在政策上要不要有所改变，就成为党的领导人所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毫无疑问，土改的对象是地主阶级，这是不能改变的。土改依靠的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是中农，这也是确定无疑，不能改变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富农，对其采取什么政策。

中国的富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农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国家，富农实际上就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富农往往具有双重性，既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性

质，同时又实行某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中国的富农，人数虽然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也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影响很大。同时，对它采取何种政策，也必能给城市资产阶级产生影响。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虽然"五四指示"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发展后，这个规定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这主要是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在土改复查时，各地实际上对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也采取了没收的政策。1947 年 9 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将富农与地主加以区别，但又提出了执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富农的土地自然被平分，其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也被征收。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中，实际上采取的是消灭富农的政策。当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如何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中共中央在决定广大新解放区实行什么样的土地政策时，对富农问题作了慎重的考虑。

1949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12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讲到了富农问题："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土地改革将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有好处，便于保护中农。"

这次会议两天后，毛泽东登上北去的专列，前往苏联访问。当时，新中国一切处于初创阶段，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抱着虚心的态度学习的，中共中央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主动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在访苏期间，毛泽东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向斯大林作了通报。斯大林建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斯大林的建议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1950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就关于发表新区征粮指示致电刘少奇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

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1950年3月，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两个多月的访问回国。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富农问题已有了初步设想，但并没有立即作出决策，而是决定广泛听取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意见。

3月12日，毛泽东致电有土地改革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征求他们对富农问题的看法。电文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

毛泽东还对为什么要保存富农经济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电报还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共中央，"以凭考虑决策"。

为准备秋收后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中共中央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3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出14个问题，要求在20天内答复。这14个问题中，其中与富农有关的占了半数，重要的有：

——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无地少地

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规定：（一）对向来不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二）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

——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

此外，中共中央征询的问题还有：高利贷问题，南方的鱼塘等特殊土地、典当地应如何处理，南方富农的收入与剥削如何计算，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是由县政府内成立吸收开明绅士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还是农民协会负责处理土地改革事宜等。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就上述问题进行算账，是为了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中共中央认为，只有这笔账算清楚了，才能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征询意见的电报发出后，各中央局，新区和部分老区省委、区党委，部分地、县委，一些中央委员，纷纷复电中央，或将意见报告上级党委，一致同意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有些电文还对毛泽东所提三点理由作了补充。如新解放区地域辽阔，干部力量薄弱，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土改中不动富农可以避免弄乱；可以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达到孤立敌人、团结多数的目的；规定富农经济不动，划阶级时，就有可能避免侵犯中农的错误，即使这样的错误再出现，也容易纠正；不动富农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尽快恢复和发展；等等。

有的省还通过算具体账，说明不动富农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例如，福建省委通过典型调查测算，不动富农可使打击面可从10%缩小到5%。中南有些地方测算，打击面可缩小到3%到5%。同时，不动富农土地，在一般地区对贫雇农影响不大，福建省委对此作了典型调查：一个村，如动富农土地，贫雇农每人分地2.2亩；不动富农土地，分地1.9亩。另一个村，动富农，分地2.4亩；不动，分地2.08亩。

各中央局和各省委、区党委对新区土改实行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表明赞成态度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公布于众，并4月20日电告中南、华东、西北三个中央局：从现在起，即可向群众口头宣传土改中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以稳定富农的生产情绪。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更是向全国公开宣布：“在今年秋冬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将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并同样分给地主一份；在土地改革中坚决联合中农，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虽然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总政策没有不同意见，但却在动不动富农的出租地的问题出现了分歧。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为好。即使在同一个大区中，各省委、区党委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华东的浙江省委和苏北、皖北区党委主张动，其他省委认为不能动。中南的江西、湖北、湖南省委认为要动，广西省委则认为不能动。各地动富农出租地的理由，主要是仅靠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不能满足贫

雇农的土地要求；不动的理由则是动了不但社会震动大，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贫雇农的困难可以通过发放贷款、扶持生产、社会救济等方式加以解决。

当时，党内的民主空气是很浓厚的，毛泽东本来是主张暂时不动富农的出租地，但他认为对这两种意见都有展开讨论的必要，乃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继续研究。

在主张富农的出租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的意见中，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是其代表；在主张不动富农出租地的意见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是其代表。由于1950年秋后第一批土改的新区主要是中南和华东，所以毛泽东对邓子恢和饶漱石的意见都很重视。

邓子恢曾3月16日、3月25日和4月25日三次就富农问题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他在4月25日的第三次报告中，详细地论述了必须动富农出租地的理由：

（一）江南各省土地情形，已不像大革命以前那样集中。特别是老苏区及其周围，更加分散，地主富农土地只占1/3左右。

（二）根据上述情况，在土改中如连富农的出租地都不动，则雇贫农所得，比之按人口平分标准，要少20%以上。据湖北调查要少30%。同时，由于划阶级界限难明，估计许多中小地主会混到富农中农中来，更缩小了没收范围。

（三）如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势必减少提供分配之土地。虽然能缩小打击面，减少敌人，减少阻力，但应估计到，如可分土地太少，不能解决贫雇农土地要求，其结果会使贫雇农积极性减低。有些地方甚至土改运动也搞不起来，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

（四）要使富农中立及保持富农生产情绪，单从经济上很难达到，除经济上适当照顾外，还应加上政治条件，如雇贫农之充分发动与中农之紧密团结，对恶霸地主之适当惩办等。如真正有了这个政治条件，再加上对富农财产与自耕地不动，则动其出租部分，对富农中立仍可做到。相反，如果连出租地都不动，一方面雇贫农议论纷纷，另一方面富农也不会相信我们会始终保持其这种非分之财，从而怀着不安情绪。这对中立富农反而有害。

（五）现在不动致农民分地不多，过一两年后再动必须重分，则将影响生产，中农也发生"割韭菜"的疑虑，对生产亦不利。法令上不规定而让农民起来动，就容易乱，不如明令规定动富农出租地为好。

4月30日，毛泽东将邓子恢的电报转发给了饶漱石，征求饶漱石的意见。5月1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一面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一面又在电报中要中南局和华东局根据各自的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过了两天，饶漱石电复毛泽东说："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对贫雇农所得土地数量影

响不大，但对团结多数、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及避免扰乱，益处很多。因此，我们赞成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饶漱石还在电报中说：富农出租土地在减租与公粮累进条件下，估计数年内可能大部廉价转到佃农手中，故对内对外似应宣传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为有利。如果宣传暂时不动，一两年后再动，则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对生产亦可能产生若干不良影响，即发生“割韭菜”的顾虑。

5月13日，中南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连同说明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个草案的第八条规定：“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中南局在说明中认为：关于动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就全区而言，约占全区人口五分之二的地区，地主、富农和公田合占50%以上，这类地区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分田后可达全村水平的85%—95%，有的还可以超过全村水平。另有约占全区人口五分之二的地区，地主、富农和公田合占30%以上50%以下，这类地区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分田可达全村水平的70%—80%。其余的约占人口五分之一的地区，地主、富农和公田合占30%以下，这类地区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分田可达全村水平的60%—70%。后两类地区，贫雇农要求不能满足。动了富农出租土地，也不能解决。因此，同意中央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方针。但在局部地区，有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农手中，有的没有地主，有的佃农很多，不动富农出租土地，不能解决贫雇农的最低生活问题。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可以动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1950年5月底6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讨论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北省委副书记刘建勋、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等。

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刘瑞龙等人。毛泽东首先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大区（按：指华东、中南）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两亿几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刘瑞龙谈了华东局的意见，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毛泽东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

接着由杜润生汇报中南局的意见。杜润生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作当前的中心，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成，并且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是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杜润生还汇报说，据我们调查，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有的地方40%多，最高50%，没有70%的情况。无地少地农民的数量很大，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不够分配。

毛泽东听后说：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解决。"

第二节　依法进行土改

关于土地改革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不同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问题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讨论并作出决定。

1950年6月3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向全会作了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也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要获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现阶段必须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地提到了对富农的政策问题。他说："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6月6日，毛泽东又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对土地改革的艰巨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

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一天，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目的，提出了新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债务问题、人民法庭问题等方面的方针政策。谈到不动富农问题时，刘少奇举例说，有一个人有40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90亩土地，40亩出租，50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40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一下。刘少奇认为，在不动富农土地问题上，不必说得太死。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讨论。8日，邓子恢和饶漱石在大会发言中，又重申了各自的意见。

邓子恢说，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政策，完全拥护。过去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得太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完全理解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希望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死，要有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饶漱石说，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60%到70%；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70%到75%。这样，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有利于生产。

会议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审议时，来自中南的与会者提出：在中南地区，各地的土地占有情况是不同的。在土地比较集中的地区，不动富农的出租地，也可以适当地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而且还能解决其他失业人员的问题。但在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如果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就会使可分配的土地量减少，差不多要减少10%—20%。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建议在动不动富农土地问题上不说得太死，应该机动一些。如果有的地方土地特别少，不动富农的出租地就无法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最低限度的生活，在经过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应当允许这些地区实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政策。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中的“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修改为“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已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6月9日，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

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

七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和研究有关土地改革事宜。6月14日，即会议开幕的当天，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这个长达1.2万余字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基本目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政策。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二）土地的没收与征收；（三）保存富农经济；（四）关于分配土地中的若干问题；（五）在土地改革时若干应注意的事项。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就是中国人民一个极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那就不能算是很慢而算是很快地完成了中国革命中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刘少奇指出：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报告中，刘少奇还对为什么要保留富农经济作了说明。他说，虽然现在新中国还面临许多困难，但困难的性质与过去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现在的困难主要是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恢复、改造与发展社会经济上的困难。同时，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革命大团结，已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地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如果人民政府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一般地是能够争取富农中立的，并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都是必要的，是比较地对于克服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为有利些。

说到这里，刘少奇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

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报告还提出了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鉴于在老解放区的土改中曾发生过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乱打乱杀等“左”倾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因为我们今后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提出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意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

6月23日，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作了闭幕词。他强调：“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他号召一届全国政协的组成人员“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之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共分六章，即总则、土地的没收与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办法、附则。在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就清楚地表明，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目的在于解放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开辟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无疑是会被消灭的，但这不是土地改革最根本的目的，而只是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就是说，土地改革中，除了没收地主上述“五大财产”之处，其他的财产不论是衣物、现金还是底财，都不在没收之例。与此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除没收地主的土地外，还没收地主的牲畜、农具、粮食及其他财产，而“其他财产”实际上包括所有财产。这样的规定容易引导农民在进行土地改革中，把注意力放到没收地主“五大财产”之外的底财（或叫浮财、浮物）上，而与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相比，农民往往对地主的现金、财宝更感兴趣。对于地主而言，他们也知道土地、牲畜、农具、房屋和粮食之类是明摆的东西，无法藏匿，因而千方百计地要保住底财，将之隐藏分散，这就加剧了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和对立。在追索地主底财的过程中，乱打乱斗也随之发生了，而且容易造成社会财富的破坏和浪费。《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出这样的规定，既有利防止对地主的乱打乱斗，也有利于地主利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或转人工商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都有好处。

在老解放区土改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工商业特别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四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相比的另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前面已多次提到的由对富农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人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土地的分配是土地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即实行彻底平分。平分的方法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样一来，使一部分中农多于平均数的土地或质量较好的土地，也被抽出来一部分掉了，损害了中农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吸取了平分土地的教训，其第六条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第十一条规定："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第十二条规定："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农民租人的土地抽出分配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应使原耕农民分得的土地（连同其自有土地在内），适当地稍多于当地无地少地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农民保持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土地为原则。"

高利贷剥削曾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手段之一，许多农民因此而破产甚至家破人亡。有鉴于此，《中国土地法大纲》曾规定废除一切乡村土地改革以前的债务，其目的无疑在于使农民获得彻底的解放。但是，在废除一切债务时却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农村不只是存在地主、富农与农民间有高利贷关系，还存在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甚至地主、富农也可能对贫雇农欠有债务，如地主富农拖欠雇工的工资。此外，农村的借贷也不完全都是高利贷。显然除了属于封建剥削性质的高利贷应当废除外，乡村正常的借贷关系也加以废除就不尽合理了。

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农村一片凋零，农民发展生产所需要资金严重缺乏。因此，当时农村借贷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借不到钱。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有意识地没有提及农村债务的处理问题。然而，债务问题在土地改革中又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必须有妥善的办法加以处理。对于这个问题，195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改中退押与债务问题的处理给各地的指示电》，提

出土改中处理债务问题的原则：即农民欠地主的旧债废除，从当地解放以后欠的新债不废，以后借贷自由，利息亦不加限制。10月20日，政务院第五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了《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规定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债务，一律废除。农民所欠富农的债务如利倍于本者（即所付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停利还本；利二倍于本者，本息停付；付利不足本之一倍者，承认富农的债权继续有效，付利已达本之一倍以上而不足两倍者，付利满二倍后解除债务关系，付利已达二倍以上者，其超过部分亦不再退回。

在老区土改时，曾组织过贫农团并过分地强调其作用，以至提出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等错误口号，把团结中农变成一句空话，甚至以贫农团取代基层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成为一些地方土地改革运动一度失控、发生乱打乱杀的重要原因。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在新解放区土改时再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没有提及有关贫农团的组织与作用问题，实际上是不再设立贫农团。对于农民协会的组成人员，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作了说明：“农民协会中的主要领导成分应该由贫农雇农中挑选，但必须切实地联合中农，首先必须切实地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同时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农民协会的领导，规定各级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中有三分之一的数目由中农中挑选，是完全必要的。除开农民协会外，不要再组织贫农团，在农村中也不要组织工会。”

能否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是土地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过去老区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差，错划阶级成分是重要原因，如将中农划为富农或地主，斗争了一些不该斗争的农民，扩大了打击面。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又很大程度与阶级的划分标准不明确有关。

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保证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划分阶级标准的制订。1950年7月，刘少奇主持制订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这个文件以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后制订的。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并于8月20日正式公布。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规定的基础上，对几个在实际操作中容易混淆的阶级成分作了补充规定。

一是地主与二地主的区别。《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向地主租入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转租于他人，收取地租，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二地主。二地主应与地主一例看待。其自己劳动耕种一部分土地者，应与富农一例看待。

二是地主与小土地出租者的区别。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没有将小土地出租者作为一个阶级成分提出。《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应依其职业决定其成分，或称为小土地出租者，不得以地主论。

三是富农与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区别。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人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人的。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指出：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的富农。富农的土地除特殊情况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外，不能侵犯，而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的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

四是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这是在农村划分阶级时容易混淆的阶层，过去老区划成分时常常将富裕中农划为富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生活状况在普通中农以上，一般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15%，但不超过30%，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民主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这里所谓“某些情形”，是指剥削分量虽超过15%，但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并不丰富，更有遭遇水旱灾荒，或逢疾病死丧，反而转向困难者。富裕中农与富农的区别，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15%，富农则超过15%。

此外，《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还对若干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如强调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劳动，均叫做附带劳动；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破产地主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但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等等。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还专门对地主改变成分作出了明确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老解放区的富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合于上述条件满三年者，亦得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其成分。这样的政策规定，使地主看到了前途，有利于减少地主对土地改革的抵抗，加快了土地改革的进行，也有助于将地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第三节　社会反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1949年冬至1950年春，北京郊区农村用了五个月的时间进行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时，这里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京郊农民对于保存富农经济表示理解，西郊黄村贫农朱文魁说："现在保存了富农的土地财产，大家更没顾虑，更要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了。"小红门村贫农黄宝贵也说："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像在农民前头划了一道线，谁也不敢冒过去，现在谁在生产上都没顾虑了。"还有的农民说："孤树不成林，地主更加孤立了。"

然而，在早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华北老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保存富农经济后，在老区干部群众中引起一些误解。特别是多余土地财产被征收的富农，更有埋怨情绪。"他们埋怨共产党不公平，埋怨当地干部太积极，说那里土改搞早了，使他们吃了亏。"他们甚至提出要收回被征收的土地房屋。河北省唐山专区的乐亭县六区杜家坞村一个富农，向贫农牛树清提出要回房子，还将牛树清的母亲打伤。该区七里店村一个富农把持已分给贫农的房子不让住，还将分得房子的贫农的庄稼拔掉。有的富农说："房子是我的，政策改了，我不是富农了。他们不搬家，房权也是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9月，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这时，老区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美国将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于是向贫雇农进行反攻倒算。河北省天津专区据5个县统计，共发生要求退地还财的事件117起。井陉县微水村119户农民，被地主、富农夺去土地288亩，房屋3间。这些不法的地主、富农，有的逼农民卖地偿还土改时被废除的高利贷，有的夺回农民分得的土改果实并索要地租，有的将农民从分得的房屋中赶出来，如此等等。还有的富农，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欺骗威胁农民。他们拿着登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报纸对农民说："中央颁布了命令，需保护富农，我不是地主，应受保护。""政策变了，地还不退回吗?"还有的地主、富农利用一些农民怕"变天"的思想，要其把土改中分得的土地低价卖出。他们对农民说："这样还得点东西，不然中央军来了，地退回还怕不行。"以此胁迫农民。到1950年12月初，地主、富农要求退地还财的事件，在华北地区延及平原省32个县，河北省24个县，察哈尔省19个县。有些地主、富农分子竟然向贫雇农夺地夺房、索租讨债、烧场焚禾，甚至向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凶残报复。一些农民重新失掉土地，有的忍气吞声退出土地，有的贱价卖掉分得的土地。他们的生产情绪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对于新区土地改中保存富农经济对老区的这种影响，老区各级党组织都保持了较高的警惕。1950年6月2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的前几天，华北局

就向各省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保护过去土改成果的指示》，要求所属各省委在新区实行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时，严密注意老区地主特别是富农的动向，要预作准备，迎击地主、富农可能掀起的反攻倒算，各级党组织必须向党内外讲清楚，过去老解放区实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与现在新解放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都是正确的。华北局在指示中强调："必须坚决保护农民已得的土地财产不受任何侵犯。如有地主和富农趁机夺地夺财者，就是侵犯地权，就是犯法行为，依法应加处分，并彻底粉碎任何地主和旧富农的反攻阴谋。"

与此同时，各地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不法地主、富农对翻身农民的反攻。河北省委要求各已经完成土改的地区，要坚决禁止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向广大群众宣传凡这年5月1日（即"五一"口号中明确提出不动富农土地财产）前所动富农的浮财房屋，不论已分未分均不退还，切实保护土改成果，压制地主、富农的反攻。同年11月，河北省委又发出《关于镇压地主旧富农反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向所有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开展时事教育，克服右倾麻痹思想，随时警惕地主、旧富农的反攻，对地主、旧富农的反攻案件依法严肃处理，在镇压地主、旧富农反攻的问题上实行逐级负责制，村干部不处理或不反映到区者，追究村干部的责任；反映到区不及时处理者追究区干部的责任。这种负责制一直贯彻到省级各部门。

12月10日，华北局也发出《关于镇压地主富农反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保护农民的既得利益。中共中央除将华北局的指示转发其他中央局外，刘少奇还指示华北局："告各省县政府据此指示拟成布告到各老区农村张贴。"由于及时明确了政策，采取了有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少数不法地主、富农利用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而进行反攻的活动，保卫了老区土地改革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反映最强烈的自然是新解放区。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的当天，浙江宁波县的农民，纷纷赶到市区购买报纸，回村自动召开会议讨论。杭县义桥乡马家桥村农民在座谈会说：这是农民天大的喜事。慈溪县（今慈溪市）东邵村当天晚上有150多个农民向工作干部询问土地改革法的内容。

陕西长安县王曲区区公所办的黑板报，连续三天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文，农民们从四乡跑来，围着黑板报，听别人解说，并争相传告。该区八乡竹园坊、圪塔坊等村地主，这年春曾先后非法典卖了将近七十亩原先出租的土地，有些贫农以为应分的土地"瞎啦"（土地分不成的意思）。现在他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上已明确地规定这样的转移分散一律无效，高兴地说："毛主席想得细，土地改革法真个美，地主的投机取巧落空了。"中农则说："土地改革法上说得明明白白：'保护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这真使中农的心宽展了许多，我们一定要劲上加劲把庄稼做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发布，标志着广大的新解放区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序幕。土地改革是一场触及农村每一个成员实际利益的社会变革，它不但会使农村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还将改变各阶级阶层在

政治地位。因此，面对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同的人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反映，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湖南农村的情况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地主们知道自己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将不复存在，在一般的地主看来，现在政权掌握在为农民撑腰的共产党手里，正面抵抗是徒劳无益的，乃采取转移分散财产，宰杀出卖耕畜，变卖或分散农具、家具，大吃大喝等方式消极对抗。狡猾一些的地主表面上积极生产，暗地里打听消息。有的地主买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仔细研究，希望从中找到一点空子；也有的装穷叫苦，拉拢佃户隐瞒其财产；或者搞父子兄弟分家，以缩小目标。另有少数顽固分子则采取毁坏房屋家具，破坏生产，制造造谣，甚至组织暴动等方式，公开反对土改。

富农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态度就不一样了。由于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他们一般情绪安定，生产积极，湘阴县十一区新通乡一个富农对农会主席说："我今年听了一些鬼话（指谣言），搞得田里少收了十石谷，真是吃了亏。"又说："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真是条条合理的。"但也有部分富农仍有许多思想顾虑，对不动他们的土地财产不知是否是真的不动和长期不动。他们说："政府规定有步骤地消灭封建，一定是第一步斗地主，第二步斗富农。"也有的说："富农不动是为着土改后多征粮，三年后还要再来一次土地改革。"也有的富农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气焰嚣张起来，长沙县合丰村的富农互相道贺说："穷鬼们莫再想分老子的田了。"

中农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动富农之后，生产情绪一般都有了提高。湘潭县黄龙四村的中农说："听了土改法，我要安心生产，和大家团结一致搞土改。""过去说不动中农，总是不信，现在说不动富农，我放心了。"

情绪最高的自然是贫雇农。他们说："这（按：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我们穷人翻身的印把子，只要掌握了这个法宝，我们就能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过也有一些贫雇农对不动富农和不斗地主的浮财想不通，他们说："不动富农，穷人翻身翻半边。""不动富农，为什么要称共产党呢？"

第十章　土地改革的完成

第一节　土改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新解放区开始有步骤分阶段地开展土地改革。

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党的各级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由贫农团和工作队共同组织开展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重大政策的发布、重要活动的组织领导，如果再以直接党组织的名义，显然是不相宜的。完成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也是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在执政条件下，土地改革不能单单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完成，它还需要将有关土改的许多重大事项上升为国家意志，运用法律的形式去解决。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华东局建议，在土地改革尚未进行或已进行但未完成的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内，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作为领导土地改革的机关。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认为今后的土地改革，在以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组织的土改委员会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协委员会来直接执行，要比由各级党的委员会来直接执行为好，乃决定在各级人民政府内建立土改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和提出土地改革中的各种法令和办法，研究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为此，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组织由刘少奇负责的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黄克诚、饶漱石、叶剑英、彭真、刘澜涛等。

紧接着，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个有土地改革任务的大区，均设立了土改委员会，其正副主任的人选分别是：

华东区：主任——谭震林，副主任——刘瑞龙、牛树才；

中南区：主任——李雪峰，副主任——杜润生、郝中士；

西南区：主任——张际春；

西北区：主任——习仲勋，副主任——韩兆鹗。

各省、专署、县也相应在成立了土改委员会，负责本省、本专区、本县的土改工作。

土改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订立土改细则，主持土改干部的训练，宣传解释土地改

革法，检查土地改革法执行情况，组织和领导各方面参加土改的人员下乡，进行有关土改工作的调查统计等。

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和帮助农民土改，是老区土改时的一贯做法，在新解放区土改中，组织工作队同样是开展土改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共中央还特地发出指示，要求政协全国委员会、人事部和国家文委的副部长和司处长，在工作不受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轮流下乡参加土改。各地在开展土地改革前，从各级机关、大中学校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和师生，加以农协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仅华东地区各省、区（等于省的行政区）工作队人数就达8万人，其中区长级以上干部约6000人，一般区乡级干部为3万人。湖南第一批开展土改的长沙专区，共辖长沙、湘潭、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醴陵等8个县，95个区，1263个乡，共有人口550余万，土地770余万亩。为此，该专区共组织了工作队5000人。

工作队下乡之前，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训练中着重学习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及其他有关土改的具体政策，以提高工作队员参加土改的自觉性和进行土改必要性的认识，更好地掌握政策。

为了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还制订了严格的纪律，以约束土改工作队员。1950年7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干部在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时的八项纪律》，规定：(一）严格执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不得违犯；(二）坚决拥护土地改革，不得包庇地主；（三）廉洁奉公，不得贪污果实，不得接受贿赂；（四）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得欺压人民；(五）一切重要问题同大家商量，不要个人决定，强迫推行；(六）依照法律手续办事，不得乱捕、乱罚、乱打、乱杀，不得使用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七）坚决服从上级指示，不得阳奉阴违；(八）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得虚报情况，不得各自为政。其他有土改任务的大区亦制订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纪律规定。

集训土改工作队员的同时，各中央局和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先后作出决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土改第一线，及时发现和解决土改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中南区提出的口号是“大员上前线”，即县以上各级领导干部，人人出马，了解和掌握土改情况，指导土改工作。中南各省委、华南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均亲临土改第一线，发现和解决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为了加强各级土地改革委员会之间的联系，中南各地建立电讯和电话的联络。各省也迅速架设了省与各专区、专区与县的直通电话。

与此同时，各地利用各种方式，广泛地宣传土地改革的必要性。1950年7月6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土地改革宣传的指示。指示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各机关、学校、部队，应即有准备地、有计划地组织全体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进行学习；并应有准备地、有计划地组织对人民群众的土地改革宣传。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党委，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均曾分别发出指示和通知，要求组织学习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江西省各书店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售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50万册。该省还组织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青年学生4500多人，在暑假期间下乡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学习和宣传活动，仅南昌市就有27所中小学校的教师、学生所组成的暑期下乡工作队，在该市附近农村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宣传。

要动员和组织千百万农民投入土地改革运动，宣传发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过去老区在土改运动中，一段时间没有很好地把握宣传的度，对运动的过程作某些不恰当的宣传，甚至将一些“左”的做法，也当作经验在报刊上加以介绍，使原本在局部地区存在的“左”倾错误，如对地主“扫地出门”、随意打斗等做法，在更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产生了不良后果。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1950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土地改革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土改工作进行的状况，不要在报纸上多作宣传，要宣传的是旧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残酷性，开展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某一地区土改工作的经验总结，而不要去宣传土改工作的实况。在已经完成土改和未进行土改的地区，也不必多宣传土改，以免引起党内外不必要的注意和纷扰。

各大区和各省全面发动土改之前，均进行了土改典型试验，然后再分批推进。土改典型试验是准备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目的是取得较成熟的经验，用以指导全区、全省土地改革工作。到1950年10月，湖南省共有47个典型试验乡，其中有8个是由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与省农民协会直接领导的，其余为各专区的土改委员会和农民协会分别领导。典型试验乡分布在长沙、益阳、常德、邵阳、衡阳、零陵六个专区，包括滨湖、丘陵地、山地、老苏区、特种作物区和塘坝、水利较多的地区，以便了解有关土改的各种情况，取得在各种不同地区进行土改的经验。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统计，到1950年11月初，华东已有700个典型试验乡完成了土改；中南的湖北省这年10月开始进行33个乡的土改试验，此时已完成了3个；江西省8月份开始典型试验，此时也完成了3个；西北区的陕西省关中地区完成了10个乡的典型试验。

各地开展土改典型试验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充分发动群众是土改成功的关键。1950年11月，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曾对江西、湖南两省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进行了一次检查和总结，发现有20%的试验乡充分发动了广大农民，因而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有30%的试验乡农民根本未发动起来，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未推翻，使土地改革造成半生不熟的状态；另有50%的试验乡介于两者之间，即对农民已有初步的教育和发动，对封建势力也有一些打击和削弱，但工作还不很彻底。为此，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所有土地改革工作队和所有土改工作干部，认真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提高农民的觉悟，开展农村中反封建的群众斗争。

在开展土改典型试验的同时，各大区制订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办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的若干规定，根据本地区的实际，作了细化和具体化，增加了一些相关规定，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更具有可操作性。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以指导新区土改时正确划分农村阶级。补充规定着重对几种划阶级成分工作中不容易把

握的问题，如小土地出租者、半地主式富农与地主的区别，中农与富农的区分等，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各地农村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中，均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在农村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团结广大农民，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一些地方不问具体条件，过早地建立农民协会，或者部分干部对组织农民协会有单纯完成任务的观点，在工作中片面追求数字，加之个别地主别有用心组织地假农民协会，使基层农民协会存在程度不同的成分不纯。据估计，中南地区约有20%以上的基层农民协会被地主封建势力所操纵。为此，各地在组织各级干部开展整风的同时，对农民协会也通过农民代表会议进行评功表（劳）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后，基层农民协会会员的阶级觉悟普遍有了提高。

新中国建立后，新解放区的土改是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下，在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对地主阶级已有一定打击的基础上进行的。与老区土改相比，地主阶级对土改的抵抗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土地改革毕竟是打倒地主阶级，它将使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颠倒过来，长期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将成为土地和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人，这就意味着地主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因此，在土改中地主必然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抗。

在土改典型试点的乡村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曾为苏区的江西宁都县干部在登记地主的财产时，地主就登记干部的名字；曾是老游击区的江西上饶县的地主威胁农民说："小心民国三十四年再来（1935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曾对根据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湖南常德县的地主说："小心我放炮（意即欢迎国民党回来）。"也有的地主，曲解土改政策，他们对农民说："毛主席说过，多划一个地主，多一个敌人。"要求群众划他为两个中农，说两个中农抵一个地主。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认为现在全国是胜利的形势，地主阶级不会抵抗和破坏，他们会自动"投降"，会"守法"。也有的干部认为现在地主已经是"纸老虎"了。江西省一个地委组织部部长说："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跑到了台湾，地主会守法，现在已无敌叭了，只剩下一个敌人就是官僚主义。"在"和平土改"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不但不积极发动农民起来与地主开展斗争，而且遇到地主的抵抗破坏也不予打击。湖北武昌县的试点中，对一个曾压迫过群众，逃亡后又跑回来的大恶霸，也不敢发动斗争，理由是怕刺激其他地主。湖南长沙县、汉寿县的一些土改干部说："只要不出大乱子，和平分田就和平分田吧，包办一点没有关系，要是搞得不好出了偏差，不但分不了田，还得通报全国，真吃不消。"还说："现在前后都是政策，走一步路就要翻一下政策，放不开手只好规规矩矩和平分田。"

针对干部中存在"和平土改"的思想，195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放手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要求各地坚决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方针，广泛放手发动群众，打击地主的抵抗与破坏，充分认识"和平分田"思想的危害，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认为"和平分田"不能真正从政治上彻底打倒地主阶级，经济上的果实也不能

巩固地保持。因此，所有参加土改的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土地改革是最后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斗争的规模必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和带有恶霸性质的地主不会甘心向农民低头，"和平分田"不过是一种有害的幻想，因而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并在斗争中启发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彻底打倒地主阶级，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时翻身。

第二节　扎根串连

新解放区的土改，一般是经过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与征收、分配土地财物、土改复查等五个阶段。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第一步就是发动群众。工作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地，并不了解所到村庄的具体情况，要发动群众，必须有最初的依靠对象。土改是在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后进行的，因而此时地主阶级已受到初步打击，摧毁了旧的基层保甲制度，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产生了一批乡村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

当然，前一阶段的斗争，具体到各个村庄发展也有不平衡，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大多是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品质端正的贫雇农。但不可否认，在农会和基层干部中也混入了一些品质不好的二流子及地主的狗腿子，或者尽管是贫雇农出身，但办法少，能力弱，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或者带着某种个人目的参加了农民协会，当上了干部，但并未在斗争中提高觉悟，改造思想，因而自私自利，甚至庇护地主等。对于这种情况，工作队进村后，没有像老区土改平分土地时那样，将原来农民协会和基层干部一脚踢开，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那些表现较好者，仍旧作为依靠对象，吸收其参加土改斗争；对于那些虽然存在某些问题或犯有错误，但经过教育可以改正的农民协会和基层干部，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使其在土改斗争中提高觉悟、增加能力；至于少数混入农民协会与基层政权的坏分子，则坚决清除出去，以纯洁队伍。

随后，工作队一方面召开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和各阶层座谈会，广泛宣传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地主靠剥削吃饭的不合理，（是）造成我们农民饥饿贫困的原因，农民要翻身就必须土改，土地原是农民的，土地要还家。"另一方面，深入群众之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扎根串连的对象不一定都是苦大仇深者，只要是劳动、贫苦、积极、正派的贫雇农均可作为对象。如果过分强调苦大仇深、历史清白，往往一个村庄找不到几个可以扎根串连的对象，反而使工作队孤立起来，使土改工作陷于冷冷清清的局面。

那么，扎根串连如何进行？试举一例：

湖南芷江县四区黄桑坪乡有576户，2626人，有田2337亩。这个乡土地虽然不甚集中，但过去封建势力比较强大，全乡当过土匪的有100多人，排长以上匪首10人，其中8个是地主。全乡参加过帮会、三青团、国民党的也有100多人。解放之后，经过

剿匪、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地主阶级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统治地位的丧失，采取打人农民协会、控制群众等手法，不断进行破坏活动。

黄桑坪乡境内的宝龙山上有座天王庙，由地主陈昌银、姚本芳掌握。他们利用这座庙宇，对群众进行欺骗、煽动和威吓。1950 年解放军到这里进行重点剿匪，地主们散布谣言说："解放军在这里只住两个月，要抽丁派款，共产共妻，拆散家庭，强迫公公与儿媳，母亲与儿子乱配，天王菩萨为了解救我们，和解放军打仗，衣服都打烂了，大家凑点钱给天王菩萨缝新袍套。"在地主的欺骗下，不少农民人心惶惶，不敢接近解放军。地主们还经常勾结附近的土匪来开展烧、杀、抢劫，破坏社会秩序。经过剿匪、减租后，这里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地主就改变花样，派狗腿子打入农民协会。地主姚本芳用 8 分田收买了一个姚姓农民，让他假装积极，人农民协会当上了主席，操纵农民协会。在反霸划阶级时，这个受地主指使的农民协会主席多方庇护地主。地主还使用美人计等手段拉拢农民协会干部。结果，乡农民协会的 7 个委员中，有 5 个直接或间接地被地主所掌握。

1951 年 11 月 24 日，县里派来的土改工作队一行 30 多人来到了这个乡帮助土改。到乡里后，工作队首先从 3 个本乡的队员中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接着分组找根子，开展扎根串连。

工作队刚来时，不少贫雇农存在"和平土改"的思想。他们说："恶霸地主已被镇压，地主都老实了，土改没有油水，确定一下地权就行了。"底层的一些贫雇农虽然迫切要求翻身，但存在怀疑、恐惧情绪，不敢接近工作队。中农表面上对土改漠不关心，但内心惧怕打乱平分。

工作队进行访贫问苦时，群众不敢说真话，听到的都是"搭帮（湖南方言，感谢之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过去受地主压迫剥削，今天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搞土地改革，打垮了地主恶霸"之类空话，更深一层的话就听不到了。提到地主，群众只讲被镇压了的不讲活着的，说别乡的不说本乡的，使工作队听不到真实情况。有些被地主拉拢了的农民协会小组长，争着将工作队员往自己家里拉，害怕工作队员住到贫苦农民家里去。当问他们地主的情况时，他们说："地主在反霸后都老实了。"

工作队的领导在发现上述情形后，强调工作队员要与贫雇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扎下根子，做到"沉住气、不乱跑、扎下去"。

于是工作队员改变了做法，不是一般地在面上进行了解，而是深入到贫雇农中，同他们交朋友。

该乡六组有个叫李高富高富的农民，外号叫聋子，虽然最穷最苦，但为人正派，夫妻俩只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家里什么也没有，住在乡小学旁边一间连着厕所的破房子里。

工作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就派了队员郝全去访贫问苦。郝全到李家时，正巧李高富外去打短工没有回来，他的老婆吴氏正在做饭。郝全就帮她烧火，同她拉家常，但吴氏不理会，眼看天快黑了，吴氏问郝全："我们聋子犯了什么罪呀？你告诉我吧！他跑不掉的。"虽经郝全多方解释，但吴氏仍有很大的顾虑。

不久，李高富回来了。郝全问他："今天在哪里做工?"李高富正要答话，吴氏马上说："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的。"

第二天，天下着雨。郝全又去了李高富家。屋子里漏得满地是水，李高富盖了一件蓑衣在睡觉，吴氏坐在火塘边双手撑着头在发闷，郝全进去了也不理睬。郝全很亲切地问她："有病吗?"吴氏不耐烦地回答说："有病，不能说话。"郝全就关切地说："不要紧，我们带有治头痛的药，我给你拿去。"

郝全拿来药后，又用开水冲好给了吴氏。吴氏被郝全感动了，态度有了好转，要郝全到火塘边去烤火，并叫醒了李高富，要他同郝全谈话。郝全问："为什么盖件蓑衣呢?"吴氏说："没有被子盖呀。"

于是，郝全就慢慢地引导吴氏诉苦。吴氏忍不住地讲起了自己的苦楚：因为家里穷，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子盖，生了三个孩子，冻死饿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才四岁。父亲年纪大了，还要上山打柴，因为路滑从山上滚下摔死……说到伤心处，吴氏大声痛哭。接着，又说出反霸以后她所知道的地主破坏活动的种种情形，还把丈夫也发动起来了。

工作队在深入发动群众中，还发现了地主的破坏活动。第八工作小组小组长殷咏贤，让本地队员田大林去启发、培养根子对象姚本秀。可田大林总是马马虎虎的，不住姚家，每天都回自己家里去住，搞了四五天，什么结果也没有。于是，殷咏贤决定自己亲自去扎根串连，就与另外一个女队员一起去发动姚本秀。姚本秀开始很冷淡。第二天，两人就同姚本秀和她的嫂子去劳动。经过一天的劳动，姚本秀对殷咏贤建立了信任，慢慢吐出了自己多年的苦水。自此之后，田大林也时常去姚家串门子。有一次，姚本秀正在谈自己的苦，看到田大林来了，马上转换了话题。殷咏贤注意到这一现象后，就将田大林调到另外一个小组。这时姚本秀说，田大林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姚本芳的狗腿子，还说出了田大林到县里开土改干部会回来后一连串的破坏行为。

工作队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将田大林及其他几个被地主利用的本地土改工作队员撤职，又逮捕了幕后指使的四个地主，并召集地主和当过土匪的人开会，号召他们悔过自新。这时，一些当过土匪和受过骗的村干部，也相继自动悔过坦白，揭露了地主的许多破坏活动，地主的阴谋基本上被打破了。

就这样，土改工作队各小组都扎下了根子，多的六七个人，少的三四个人。经过控诉地主过去的罪恶和现在的破坏活动，根子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扎下根子后，工作队又在同他们讲"一个人的力量小，翻不了身"，"人多，主意多，办法多"的道理，启发根子与根子间碰头共同诉苦。通过根子碰头会，工作队掌握了地主的各种罪恶、剥削花样和破坏土改的活动。然后工作队又号召根子去找其他穷苦的贫雇农进行串连，并将串连的情况及时同工作队进行沟通。结果一个根子发动一连串的根子，根子的队伍也越来越大，多数成年的贫雇农都成了根子对象。在此基础上，工作队先召开全乡贫雇农代表会，接着又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控诉地主的罪恶，并改组原有的农会。由于多数贫雇农已经觉悟，黄桑坪乡的土改运动也就很快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贫苦农民诉地主压迫剥削的苦，提高其阶级觉悟的过程。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土改工作进入第二步，划分阶级。这是土改工作极为重要也是政策性极强的一步。只有正确地划分了阶级，才能既不至于扩大打击面，又准确地将斗争矛头对向地主分子。

新解放区土改在划阶级时，一般经过"讲阶级"、"评阶级"、"通过阶级"、"批准阶级"四个步骤。

"讲阶级"，即广泛宣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及其他有关文件，讲清各种阶级成分的定义、标准、界限等问题。

"评阶级"，即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以村为单位召开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民主评议。本人到会参加评定，亦可在会上参加申辩。

"通过阶级"，即由村农民协会委员会（吸收部分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对民主评议的结果进行集中审议通过。

"批准阶级"，即由乡人民政府将各村审议通过后的阶级评定报至区人民政府，由各区人民政府执行最后审批权限。

在"评阶级"、"通过阶级"、"批准阶级"的每个过程中，其结果均予以张榜公布，即实行"三榜公布定案"。如果不同意对自己成分的划分，本人或其他人可于批准阶级后15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人民法庭判决处理。

划阶级关系到土改工作的好坏，各地对这一工作均极为重视，广东梅县在土改试点中，特别强调划阶级必须掌握如下几点：

（一）斗争前开小组会，由苦主控诉地主罪恶，加深群众了解，提高认识，统一意志，集中火力（即是做到群众性划阶级），正确研究敌情和地主自报材料，根据不同对象，作不同的周密部署，才能进行彻底的战斗。

（二）要艰苦地发动后进。因为婢女、长工最懂得地主底细，斗争起来才会有力；发动亲房可陷敌人于众叛亲离的境地。这样，敌人就可赤裸裸地暴露地射程中无法抵抗，只好低头认罪。

（三）培养典型苦主，充分暴露敌人罪行，并应抓住敌人突出罪行，尽量揭露，激发群众斗争情绪，去调动群众，形成斗争热潮。

（四）斗争全过程应由主席团主持布置，斗争前工作同志应协助帮助他们开战前会议，讨论如何适当分工，指挥战斗，会议进行中应放手让主席团领导，让他们积极活动起来，力戒背后牵线的明不包暗包的作风。

（五）每组先划一两个典型户，总结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然后分村进行，布置一个、划一个、总结一个，这样展开对提高干部群众的认识和能力均有很大作用。

在划阶级中，一般是先以地主作为评阶级的对象。采取的办法同样也是地主先在村民大会上进行自报，然后由群众评议。自报的内容包括报成分、报财产，报剥削，报有无劳动等。地主在自报中总是要想方设法地降低自己的成分，于是就以隐瞒或少报财

产，不承认有剥削，强调自己也劳动等方法，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成分。所以在评定地主成分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地主开展必要的斗争。

广西柳城县大埔区六休屯在经过上级派来的土改工作队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后，决定召开一次斗争本屯地主杨朝达的群众大会。

斗争大会之前，工作队已经通过访贫问苦，掌握了杨朝达的基本情况。大会前一天，工作队又组织基本群众进行“八摸、八追”的准备工作。所谓“八摸”，就是土改工作队先摸清地主的占有、剥削、劳动、成分、武器、分散（财物）、造谣破坏、政治罪恶的情况；“八追”就是在斗争会上要地主就上述八个方面的问题自己报出来。

为了开好斗争大会，工作队又在前一天晚上召开全屯群众大会，就划分阶级等问题进行布置，说明划阶级的意义及阶级如何划法，强调划阶级时应打消各阶层的思想顾虑，农民团结一致斗争地主的重要性。大会之后，群众又开小组会，再次对地主进行“八摸”，讨论明天的斗争准备。

1952年3月24日，六休屯斗争地主杨朝达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除了本屯的农民外，附近各屯也有许多农民赶来参加。

杨朝达夫妇被拉来后，工作队一开始要他“八报”。

首先是报剥削。杨朝达说：“我没有理事，（剥削的事）我不知道。”

一个群众说：“你没有理事，我借你的谷子是不是你亲自来称的？”另一个群众接着说：“你收租收息为什么说没理事呢？”

“是我仔叫我来称的呀！我剥削几多，我懵了，我实在记不清楚呀！”

“你今年几多岁了？”

“我六十四岁了。”

“还有哪个欠过你的谷子，欠几多，你说说看。”

“杨二贵还欠我九担没有还！”

没想到狡猾的地主一下中了农民的计。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你不说你懵了吗？别人欠你的，为什么还记得这样清楚！”“你的岁数，为什么也记得，你懵个屁！”“你剥削人太多了，所以你记不得了，是不是？”

群众又问杨朝达：“你的田从哪里来的？”

杨朝达答：“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

“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

“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

“哪来的钱买的？”

“靠剥削来的钱呀！”

“你为什么剥削人？”

“大家还不是一样么，那是从前的潮流！”

“现在还敢不敢剥削人？”

“早就不敢了。”

“从前为什么敢？现在为什么不敢，那是谁给你撑腰？你说！”

杨朝达不说。群众问他：·“是不是国民党替你撑腰？”杨朝达点点头，仍是不语。

群众又要杨朝达报劳动。杨朝达说他家有四个劳动力。群众问他什么叫劳动，他说天天出去累就叫劳动。结果招来群众一顿讥讽。

群众接着要杨朝达报成分，他说：“你们说我是什么成分，就是什么成分吧。”群众说：“要你自己说，自己承认！”杨朝达就说：“我是劳动地主。”

群众听了他的话，忍不住大笑，杨朝达自己也笑了。有人叫他别笑，他说：“笑都不许我笑。”

最后杨朝达只得承认自己是地主，但心里不服气。嘴里嘟哝着：“我生不逢时，没奈何，只好当地主了。”

第三节　分配果实

在划定阶级成分后，接下来就进入了没收、征收阶段。所谓没收，是指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及其在农村中的多余房屋（后四项又称“四大财产”）；所谓征收，是指征收半地主富农出租土地。通过没收、征收，从经济上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

没收、征收工作一般是在乡农民协会的统一领导下，设立没收征收委员会，由乡农民协会主席任委员会主任，下设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若干组，具体负责没收工作，并选定公道正派、认真负责的贫雇农负责没收征收财物的保管。

为了防止没收征收中出现有人贪污多占、包庇地主等现象，各地对此都作了明确的政策规定和纪律约束，提出要做到“六要”、“四不要”。“六要”是要土地，要耕畜，要农具，要多余的粮食，要多余的房屋与家具，要田地房屋契约；“四不要”是不要乱抓、乱罚、乱打，不要底财浮财，不要扫地出门，不要侵犯工商业。显然，这“四不要”是吸取老区土改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它对于保证新解放区土改不重犯“左”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没收的范围，各地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出明确规定。中南军政委员会在关于土地改革法实施办法中，就作了这样的规定：

——应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包括地主的田、地、山以及与之相连的塘、堰、堤与各种林木等，但地主的坟地及坟地上的林木，一律不没收。地主家庭中有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的，其自己耕作的部分土地，基本上予以保留。

——应没收的地主的耕畜，是指地主所有使用于农业耕作以及用以收取租金为目的出租于农民的牛、马、驴、骡等。地主与农民合养的耕畜，属于地主所有的部分没收。至于其他全部或主要用于运输业、手工业、作坊，或系以经营畜牧业，或以贩卖为目的之耕畜，则不在没收之列。

——应没收的地主的农具，是指地主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工具，但地主所有的抽水

机等进步的农业生产设备以及碾米机、轧花机、织布机等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则予以保留，不应没收。

——应没收的多余的粮食，是指地主所有的粮食中扣除应减租粮、应缴公粮，及按当地农民生活水准留给地主全家至下季收获以前所需口粮以外多余的粮食。其收租及雇人耕种所得的各种经济作物，均应折合为主要粮食计算，除留其所必需者外，亦随粮食没收。

——应没收的多余的房屋，是指地主原住房屋中，留下足够本人与家属居住以外的其余在农村的房屋（也包括在集镇中适合于农民居住的房屋）及房屋中的谷仓、家具等。地主为建筑房屋并非直接用于工商业的砖瓦木石等以及所有的谷场、田寮、山寮、牛栏等，也一并没收。

除了上述已有明确规定者外，地主其他的财物不予没收。

将地主的土地和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房屋没收，及将半地主富农的出租土地征收后，土改进入分配果实阶段。分配的果实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没收与征收的土地，二是没收的地主的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房屋。

土地分配的办法是以乡为单位，将全乡应没收、征收的土地与应分土地户的原有土地相加计算，求出每人应分土地的标准，然后在各户原耕的基础上，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予以分配。

在分配土地之前，必须进行田亩和产量的核实，否则就无法进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地亩、产量的核实，自然不能逐户逐地去丈量，那样的话，不但烦琐，也难以算清楚。一般是采取按自然村为单位组成农民小组，以自报公议的办法登记。在出现争执时，派人去实地查验；争执不下时，再进行田亩丈量。在此基础上，由农民协会张榜公布，如有不同意见，准予农民控诉更改。

田亩和产量的核实之后，着手进行土地分配。不论是抽还是补，分配的方式都是自报公议。自报公议以农民小组为单位，进行自报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要求进行“三看”（看东西，看自己，看别人）、“三比”（比穷，比苦，比需要），小组自报通过后张榜公布。接着在全村大会（大的村分成若干组）上再次自报和评定，然后再张榜公布。公布无异议后，进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对于被没收的地主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房屋等“四大财产”的分配，则根据没收得到的财物的多少，以及农民对这些财物的缺乏程度，按“填坑补缺”的原则进行。具体办法是缺啥补啥，缺多补多，缺少补少，不缺不补，首先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耕畜随田地分配，但一头耕畜最多只能分给四户，并由一户饲养，草料分摊，共同使用；农具随耕畜分配，水车、石磨等大农具不宜分给个人，分给几家共同使用，小型农具按“缺啥补啥”原则分配；粮食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分配，并优先分给无粮或缺粮的贫雇农；房屋按先无后缺原则，先分给无房的贫雇和贫苦的军烈属，如有多余再分给缺房户。

新解放区各地的土改在经过上述几个阶段后，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土改复查。

之所以要复查，主要是土改运动“像暴风雨一样地猛烈迅速，往往是几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一次大革命；正因为运动进展迅速，就不可避免地有粗糙现象。敌人被基本打倒了，但残余的敌人尚未肃清；打倒了的敌人，还来不及分别发落，在运动中错打了自己人的，也还没有来得及做补救工作；特别是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有一定限制，在若干地区还不足以巩固住已得的胜利”。

一般来说，已经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存在三种情况：一是群众已充分发动，地主阶级已比较彻底地被打倒，广大农民已有相当的觉悟，贫雇农的要求基本满足，乡村中各种组织的领导成分比较纯洁；二是地主阶级基本被打倒，田地分配已无大的问题，农民的经济要求大体得到满足，乡村组织的领导成分亦大体纯洁，但还有个别恶霸、地主漏网，地主财产没收还不彻底，果实分配有不公现象，少数贫雇农的生产还有困难；三是在实行土地改革中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斗争，但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封建势力尚未摧毁，打击了一般的中小地主，但实际当权的地主并未打倒，而富农受到打击，中农受到侵害，贫雇农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乡村组织领导严重不纯。这三种类型大约各占 1/3 左右。因此，在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并进行分配之后，必须经过一个土改复查阶段，以解决前一阶段遗留下来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

当时，已经进行过土改的地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不法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土地改革后，大部分地主慑于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威力，有感于党和人民政府给予出路的政策，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政治上较为老实。但有的地主分子不甘心于其剥削和寄生虫生活的失去，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不满，对农民群众和农会组织非常仇视。川东区垫江县长安乡元峰村曾当过土匪的地主朱定中威胁干部说：“你们都会搞哟，把老子搞得一干二净，总要搞死几个摆起嘛!”该县董砚乡白龙村地主范金成，被公安局释放回来后，公开叫嚣：“不怕你们（农民协会）办，老子还是回来了。总有一天你们要倒霉嘛!”长安乡还有一地主分子，多次将一名民兵的家畜、家禽整死，最后竟将其小孩杀害。据川北区 10 个县 141 个乡的统计，在 12710 户地主中，有各种反攻倒算行为者有 1994 户，占地主总户数的 15.2%。皖南区宣城县葛林村一地主，勾结民兵队长向一贫农索要 700 多斤稻债，该农民交不出，就强拿了 20 多斤猪肉抵了债。该区太平县黄金村一个地主被斗后还不服气说：“我们是大石板，农民是蚂蚁子，不怕他多。我们这石板，蚂蚁总搬不动。”

二是农村基层组织存在不纯。据对中南区湖北武昌县锦绣乡、湖南长沙县樊塘乡、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广东惠阳县沥林乡、广西宾阳县大林乡的典型调查，这 5 个乡干部总体状况是好的，80%以上的乡村干部是劳动农民出身，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其政治表现上看，斗争坚决，工作积极，作风正派的占 25%；斗争坚决，工作积极，但作风不好，脱离群众的占 35%；本质好，但土改后松劲者占 29%。此外，历史复杂，丧失立场，包庇地主者占 11%，其中有些人是被地主“派进来”或“拉出去”的。

三是错划和漏划阶级成分。在这两种情况中，错划是主要的。据江西省委的估计，土改中划错成分而被打击者在被打击者中占约占 15%，多者占 30%。主要是将一些小土地出租者、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划为地主。江西有个地方错误地提出“斗争中农以上

有恶迹者"，甚至将给地主抬过三次轿子的贫农也给斗了。贵州省平越县三江乡1234户中，被错划的有139户，占11.3%，其中主要是把82户贫农划成中农。川北区遂宁县对7个村的调查，除贫雇农之间错划不计外，共错划了18户，其中主要是把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划成中农富农，也有富农划成地主，把中农划成富农的。

此外，还存在果实分配不公，公地留得过多，干部贪污多占等问题。

根据土改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一般都在土地分配之后，进行土改复查。复查主要是针对上述问题而进行。

首先，坚决打退不法地主的反攻倒算，对逃亡漏网地主依法进行没收处理。对于反攻倒算的地主，按其性质分别处理：凡讽刺威胁农民的，进行说理斗争；向农民夺田夺屋的，对其进行斗争，并令其退还农民；对企图篡夺政权，放火、放毒，发展反动组织图谋不轨的，依法惩办，严加镇压。对于已依法进行没收并低头安分没有不法行为的地主，则不再斗争。在斗争反攻倒算的地主时，锋芒主要是对向少数恶霸地主或大地主中的严重违法者。其中有杀人放火等严重倒算行为，民愤较大的地主，在由群众面对面斗争清算后交人民法庭依法惩处；对有重大劣迹的逃亡漏网地主，由群众配合公安部门缉拿归案，并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

其次，整顿农村基层组织。1951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开始建国后的首次整党。结合这次整党运动，各地在农村干部中进行了整风，以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同时集训农村干部，在集训中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动员其主动暴露思想，交代问题，改正缺点错误。对犯有错误的干部除少数不可救药者外，凡愿意改正者保留干部地位，均予改过立功机会。有的地方还制订了乡村干部守则，要求农村干部自觉遵守。

第三，纠正错划和漏划的阶级成分。因为错划成分是主要的，所以各地在复查中严格控制地主户口的比例，如中南土改委员会规定，以区为单位，地主户口一般只能占4%，对于因有政治劣迹、犯有罪恶或有过大债利剥削的富农、伪官吏、伪军官等，只在政治上予以斗争和经济上勒令赔偿或清理债务，在成分上不将其划为地主或以地主对待。对于错划为地主者，查出并经群众讨论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摘掉地主帽子，其财产已没收尚未分配者，退还原物，已分给农民者原则上不再变动，由剩余或新没收的财产中适当退补，无力退补时，在负担上给予照顾。对退出财产的农民，从另外的财产予以补偿。对于贫农、中农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坚决予以改正，农民之间的成分一般不普查，但明显划错了的也予以改正，

至于漏网的地主查实后，土地予以没收，房屋、耕畜、农具、粮食亦按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予以没收分配，但除留给地主应分的一部分外，如上述财产所余不多，则不没收，并一律不得对其追索、赔偿和斗争。

对于果实分配不公的问题，主要是对尚未分配的果实迅速公平合理地加以分配，不准有积压，所留的机动田一律不得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1%。干部贪污多占的果实，所得不多者，批评教育后不予追究；数额较大且为群众不满者，说服其拿出重新分配；至于个别情节严重者，除退出多占的果实外，还要向群众承认错误

并给予适当处分。

经过复查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后，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的土地房产，均一律由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房产，也发给所有证。在发新证前，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但土地证开列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以此表明该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共同所有。至此，已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全部步骤，该村（或该地区）的土改结束。

第四节　反违法斗争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就整个阶级来说，是土地改革的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是大势所趋，已经无可避免。同时，由于在新区土改中采取了对一般地主宽大处理政策，如分给他们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不动他们兼营的工商业等。因此，有不少地主表示愿意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交出土地财产，认真劳动改造自己。但是，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中最顽固的分子，必然要想方设法地对抗与破坏土地改革。

华东、中南各地部分不法地主破坏活动的花样，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出卖或分散土地、粮食、房屋以及农具。这种现象在各地相当普遍。如湖南邵阳县古奇乡地主李石卿暗地卖掉23石田。苏南常熟县大义区地主陈祖清，将600多亩田，分散登记在亲戚户口上，自己户口上只登记了十几亩田，企图降低成分、逃避土改。还有的地主偷运粮食和大吃大喝。江西南昌县大成乡一个地主，一次偷运粮食500担。湖北宜昌县地主吴炳生将24石粮食大部分大吃大喝浪费掉了。此外，尚有不少地主拆卖房屋和分散农具。据浙江吴兴县8个区统计，有26个地主拆卖房屋42间，另卖出农具1部。湖南益阳县六区也有33个地主变卖农具等物品。

——宰杀耕畜，弄坏土质，抛荒土地和砍伐山林。苏南有的地主竟把钢针给牛吃，或用锄头活生生地将牛打死，有的地主暗地里在田里放石碱，有的地主在稻田中撒石膏，弄硬土质，破坏生产。部分地主肆意砍伐山林。最严重的如浙江余杭县九峰乡地主汪尔强以开荒为名，煽动群众砍伐山林，并放火烧山，致使该乡山林660亩遭受破坏。

——地主造谣惑众，收买干部，并勾结匪特阴谋扰乱社会秩序。地主利用部分农民思想上的某些顾虑，曲解土改政策，如对富农说："土改分三步：先地主，后富农，再平分！"有的地主更以"蒋介石来了，带头土改的要杀头，分到田的要当模范壮丁"的谣言，来威吓贫雇农民。有的地主更用种种卑鄙手段收买某些立场不稳的干部，为其包庇。如苏南武进县周桥乡地主蒋文汉将出租土地40亩送给村干部，叫村干部评他为富农。有的竟将自己的妻、女也当作收买的手段。有的地主甚至勾结匪特，组织秘密活动，鼓动群众抢粮暴动，暗杀干部或农民积极分子。

川东区垫江县地主破坏土地改革、对抗人民政权方式有：

（一）聚众谋反，妄图东山再起。垫江三区董砚乡二保青帮大爷冷德轩、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四科科长闵贤村，纠集一百多名地主、富农，组成“复兴联络社”（后又改为“东方龙门会”），下设军事、宣传、政治、财粮四部及侦察、情报、收买、联络等行动组，派人到重庆购买枪支弹药，企图发动武装暴动。因被及时破获，阴谋未能得逞。

（二）实施暗杀报复，威胁恐吓土改工作队员和农民协会积极分子。该县曹回乡恶霸地主胡文镜，唆使狗腿子谭树林打入农民协会。谭树林伪装积极，当上了保农会主任，骗得工作队发给步枪一支。1951 年 3 月 2 日，谭树林按照胡文镜的指使，带坏分子二十余人，阴谋杀害来该乡进行减退的工作队员，幸亏发觉及时，地主暗杀计划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将谭树林生擒。

（三）采取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干部群众。该县大石乡地主张万发，要农民协会会员张天书为他隐瞒罪行，答应事成后给两间房子，结果张天书就在斗争会上避重就轻搞假斗争。周嘉乡一地主婆利用色相勾引一姓刘的佃户，这个佃户就极力庇护地主。这个地主婆又企图以送衣服的办法拉拢农民协会会员王盛明，王盛明知其有诈，拒绝接受，地主婆就反咬一口，说王盛明强奸了她。

（四）疏散财物，装穷叫苦。这是地主最常用的方法，该县绝大多数地主都将黄金、白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埋藏起来，表面上却装穷。该县大石乡有一大地主，家有近千石的土地，但却一直装穷，对 13 万斤的公粮拖着不交，在减退运动中又将黄金藏人坟墓中，将细软财物分散埋人土坎中、竹林里。

此外，地主还采取变卖田产，隐瞒出租土地面积，造谣惑众，派狗腿子打人农会，舍命不舍财等方式对抗土地改革。

西北区甘肃省永昌县的地主对抗土改的方式有：（1）饿死牲畜；（2）转移财产；（3）荒芜和分散土地；（4）收买干部和群众；（5）造谣煽动，无所不用其极；（6）投机倒把，扰乱市场；（7）违抗公粮；（8）假装开明，口蜜腹剑。还有的地主为了搅浑水，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先改地主，后改富农，再改中农，土改是搅乱世界等。

对于地主在土改中的对抗和破坏活动，中共中央和各大区都明确指示必须予以坚决打击，以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为此，1950 年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严厉制裁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的社论，强调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应予没收的地主土地和其他财产，不论地主在解放后以任何方式转移分散，除一律宣布无效外，并应勒令地主如数退出，其在转移分散土地财产时所获得之代价，不足时可由法庭判决将他们的依法不应没收的其他财产（包括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在内）变价抵还。只有照这样做了之后，仍不足时，才可以酌情准其少交、缓交或免交。对于已经变卖应没收的财产或转移隐藏在工商业中者，也应由法庭判决追取出来。被不法地主杀死与破坏了的耕畜、农具、房屋、土地、林木等，除同样按上述原则责令地主赔偿之外，并应视其情节轻重，由人民法庭判处破坏者以应得的罪刑。

社论同时指出，凡向干部及农民进行威胁利诱收买贿赂等行为之不法地主，除没收

其用以施行贿买的财物外，亦应由人民法庭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凡有造谣惑众、阴谋暗杀、武装暴乱等反革命罪行的不法地主，更应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对其首要分子，更必须坚决予以镇压，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社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也才能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实现。

在此前后，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区军政委员会相继出台《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以惩治不法地主的违法行为。

在开展土地改革过程中，各地农民运用《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为武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地主违法斗争。

形式之一，与地主讲理斗法。讲理斗法的依据就是以《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为武器，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地主违法的事实，并根据情况轻重，判处赔偿罚款。川西区绵阳县丰谷镇地主罗某，被二十多名农民控诉其当保长时的各种罪恶后，当即向群众哀求认罚，第三天即交出大米两万斤。

形式之二，与地主谈判。在掌握地主违法的事实并对其开展斗争后，地主迫于农民的压力，往往主动与农民谈判认罚。川南区内江县义忠乡农民谈判了47户地主，有40户地主低头认罪，自愿依法赔偿，共交出赔偿金3000万元（旧币）。据川北区蓬安县统计，全县有20%的守法地主没有斗争，有50%的地主在斗争中结合谈判解决了问题，只有30%的地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形式之三，区别不同对象开展斗争。在开展反地主违法活动的斗争中，各地都贯彻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守法与违法、低头认罪与坚决抵抗作了严格的区分，以集中力量斗争顽抗的大地主。一般是守法地主不予斗争；对低头认罪自认赔罚的地主，只要交清赔罚款，服从农会管制，不再斗争；对于违法事实多，应赔罚的数目大但又拒不交赔罚款的地主坚决斗争；斗争后还不低头的地主分子则交人民法庭惩办。

形式之四，动员落后群众与不法地主划清界限。分散隐瞒财物是地主对抗土改的重要方式。地主往往使用欺骗、强迫手段，将财物分散隐藏到亲戚、邻居、长工家，将土地挂在他们的名下。这些农民或碍于情面，或得到了地主的某些好处，或受地主的威胁，而不敢将地主财物交出。为此，各地在开展反违法斗争中，就对这些农民采取大会小会动员，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启发教育，使其打破顾虑，报出地主财物。川东区涪陵县对报出地主财物者，农民协会提出四大保证：一是政治上不受污辱歧视；二是经济上照分果实；三是组织上仍可参加农民协会；四是大家一条心打击地主报复。川北区则提出“隐藏无过，自报有奖”的口号。这样一来，农民纷纷交出分藏的地主财物，并表示要和不法地主划清界限。

通过反违法斗争，一批不法地主受到了惩处，从而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五节　运动结束

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征求各地意见的基础上，曾提出了一个大体计划，即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

当时，全国大陆约有1.45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尚有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计划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其中华东约3500万至4000万人，中南约4700万至5600万人，西北约800万人。其余的1.64亿人口的地区，则计划大部分在1951年秋后进行土改，小部分在1952年秋天进行土改。剩下的一小部分地区，即约2000多万人口的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再作决定。

1950年11月，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出现变化，尤其是土匪和反革命分子一时活动猖獗，需要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和动员广大翻身农民参加抗美援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加速进行土改，所以新区土改实际完成时间比原计划有所提前。

由于各地解放的时间早晚不同，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各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时间及进度也不完全相同。

华东地区是各新解放区中较早基本完成土改的地区任务。

华东全区约1.5亿农业人口，其中约有老区4500万农业人口在全国解放前就已经完成土改，没有进行土改的新区约有7000万农业人口。

1950年7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华东新区的土改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约有470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其余的2000多万农业人口的地区作为第二期，在1951年秋后进行。1950年12月，华东局作出《关于提早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认为华东地区地处国防前线，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尚未完成肃清，只有迅速完成土改，才能巩固已有的胜利，并更有利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同时也认为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土改，大部分县以上干部也已从土改典型试验中取得了经验，为短期内和较大范围内完成土改准备了条件。为此，华东局决定除福建部分地区和皖北的重灾区外，华东其他地区应于1951年4月前基本完成土改任务。

到1951年4月，华东全区已完成土改的乡有35636个，占全区43394个乡的82.17%。其中山东完成99%，苏北完成98%，苏南完成100%，浙江完成89.5%，福建完成39.5%，皖北完成47.4%，皖南完成98.1%，如期完成了预定的土改任务。到1952年5月，华东全境的土改任务全部完成。

中南是各新解放区中土地改革人口最多的地区，全区1.53亿农业人口中，只有河南约有1600万农业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前已完成了土改。

1950年9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中南地区的土改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从1950年秋到1951年春，在5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土改；第二期从1951年夏至1952年春，再完成5000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改。第三期从1952年夏1952年底，完成除黎、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土改。

中南各省的土改试点1950年8月开始，准备进行土改的每个县都选定了一两个乡作为试点。1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发现有相当多的土改试点乡工作开展不好，干部存在“和平土改”的倾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南局于12月初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并从局机关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机关抽调了1500名干部到湖南的岳阳县和广东的英德、曲江县帮助开展土改，使运动很快走上了正轨。

1951年4月，中南5000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改按计划完成，并及时转入农业生产。1951年夏到1952年春，中南进入第二期土改阶段。在第一期土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提出了“深入工作、深入斗争”的指导方针，要求各地在土改中改进干部作风，广泛发动群众。各级干部也深入土改第一线，了解情况，创造典型，从而顺利地完成了第二期5000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改。1952年夏，中南第三期土改主要是在广西、广东两省展开。到1952年底，又完成了2000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改。至此，中南除少数民族地区外的全部农村已完成了土地改革。

作为解放最晚的地区，西南的土改是从1950年11月开始的。当时，西南总人口有8400多万（西藏未计算在内），只有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些地方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曾开展过土地革命外（后被国民党重新占据），其余的地方全是新区，这一点与其他各大区的情况是不同的。同时，西南的土地又高度集中，其中又以四川土地集中程度为全国之最。占农村人口3%—4%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许多农民无房无地，此种情形在川西平原及成渝两附近更加突出。据当时的调查，重庆市十区十八保，地主占有土地占总数的95%。成都市附近的华阳县（1965年撤销，并人双流县）白家乡，97户地主占有土地约1.7万亩，平均每户176亩，而3000户中农、贫农每户平均仅有土地0.4亩。大邑县安仁乡大地主刘文彩占有土地1.2万亩，拥有庄园28处。

西南区的土改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完成得较好的地区进行，1951年1、2月开始，4、5月结束。共有17个完整县、37个县的一部分乡及重庆、万县、南充3个市郊区，有1512个乡，1317万人口完成土改，占西南区总人口的15.61%。

西南第二期土改于1951年5、6月开始，10月结束，完成土改的人口有2400万人，占西南区总人口的27%。第三期1951年11月开始，1952年5月结束，共计有37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占全区总人口的41%。即就是说，到此时，西南全区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其余的地区都完成了土地改革。

西北地区约有3000万农业人口，其中原陕甘宁边区及毗邻的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出台前，作为老区或半老区，已有45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尚有2500万人口的新区需要进行土改。西北地区的土改分两期进行。1950年秋到次年春

为第一期，完成了700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改；第二期从1951年秋到1952年春，完成了1500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改。到1952年底，全区除新疆和青海、甘肃的藏族居住区未进行土改外，其余地区的土改均已完成。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土地问题，即城市郊区。、少数民族地区、侨区的土地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城市郊区与其他农村一样，土地制度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郊区土地问题与一般农村的土地问题又有所不同。一是郊区的特殊土地多，如工厂企业用地、地产公司用地、农场苗圃用地等，仅上海市郊区这种用地就达40余种，6万余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2%。二是租佃关系复杂，许多土地的业主（既有地主、富农，也有工商业资本家、手工业者、工人、职员等）并不住在本地，与佃户没有直接联系，而是通过代理人（即"二地主"）收租。这些"二地主"除为业主收租，还通过加租等方式进行额外剥削。三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家与土地关系密切，相当多的工商业者在郊区拥有土地。四是郊区土地价格高，商品率也高，且郊区土地以种蔬菜和经济作物为主，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高。

针对郊区土地的特点，1950年11月10日政务院颁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规定：地主在城市郊区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在农村多余的房屋，予以没收，地主的其他财产不没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和荒地，予以征收；工商业者在城市郊区的农业土地和荒地及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也予以没收，但其在郊区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城市郊区没收和征收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并由乡农民协会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没收来的耕畜、农具等由农民协会接收后分配给缺少这些生产资料的农民，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凡城市郊区使用机器耕种或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以及农事试验场、菜园、果园等，无论是为地主或农民所有，无论其土地所有权有无变革，均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使用。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是以特别谨慎的态度对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和毛择东认为，少数民族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因此，在1949年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内蒙古（其中东蒙地区已在全国解放前完成了土改）和新疆及西北其他地方的回族聚居区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未进行土改。

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进行，要采取比汉族地区更为宽松的政策。如在新疆农区的土地改革中，规定清真寺、拱北及喇嘛寺的土地一律不动；对于一切可以争取和中立的力量都务必争取过来或联合进来；斗争打击面一定要先提出控制数字，直至排出名单，层层上报，经过批准后方可进行。在西蒙地区的土改中，分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和牧业区三种不同经济情况和阶级关系，确定不同的方针，只在农业区进行土改，畜牧区则不搞土改，"不斗不分，不划阶级"。蒙古族地主分大、中、小区别对待，对蒙古族大地主采取同汉族地主一样的政策；对蒙古族中等地

主只没收土地，保留其他财产；至于蒙古族小地主，则土地、财产均不没收。1951 年夏，内蒙古开始在 1500 个行政村，约有 260 万人口的农业区进行土改。1952 年秋起，土改在新疆 1512 个乡，约 400 万人口的农业区展开。至 1952 年底，全国已有 1400 万人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广东、福建两省是我国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华侨将其在海外劳动或经商所得的一部分购置土地，而他们的子女成年后，或出国谋生，或从事别的职业，加以其生活来源大部分依靠侨汇，故许多华侨将其土地的一部或全部租给农民耕种。但华侨出租土地与地主出租土地情况有所不同，其一是总体来说华侨占有的土地数量不大，以二三十亩以下，三五亩以上为多；其二是华侨购置土地的费用是在外劳动或经商的积蓄，不是剥削所得；三是出租土地主要是为了照顾在家的老幼的口粮，其主要生活来源仍然依靠侨汇；四是华侨出租土地虽然带有剥削性质，但他们在海外大多是做工或小商人，同时也受别人剥削。

根据侨区土地的这些特点，1950 年 11 月 6 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规定，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占有并出租大量土地构成兼地主成分者，如果出国前原系地主，其在农村的土地财产按一般地主对待，但除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外，其他房屋不动；如本人原系劳动人民，出国后上升为兼地主者，其土地按一般地主对待，房屋除原由农民居住的外，其他房屋和其他财产也一律不动。华侨及其家属如出租少量土地，按一般小土地出租者处理，但如本人出国前原系劳动人民，其出租的土地虽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的两倍，其超过部分的出租地，也应酌情照顾，不予征收。居住国内的华侨家属，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者，一般分与其他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如经常有侨汇收人，且缺乏劳动力而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者，也可按具体情况少分或不分。

虽然有了这样的规定，但广东个别地方在土改中对华侨的处理，仍发生过根据侨汇任意提升阶级成分，把小土地出租者当作地主，把资本主义剥削当作封建剥削，抓侨眷罚款等偏差。为此，1952 年 1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颁发了《对土改中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九点办法》，规定绝不能把侨眷因主要劳动力在国外而出租少量土地者简单划为地主；也不能把出国后因在国外从事其他职业，积累一点钱汇回国内购置土地出租者划为地主；即使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地租生活，只要其占有土地的数量在当地小土地出租者的最高标准以下，也不应划为地主。上述这三个标准下发后，有效地制止了侨区土改中随意提升华侨、侨眷阶级成分的偏向，保护了华侨、侨眷的正当利益，也促使在国外的侨胞进一步理解土地改革政策。福建侨居菲律宾的华侨林友胜说："我们知道家乡土改，无一个不喜欢，大家相信祖国社会面貌已焕然一新，条件许可时决心回家乡看看新面貌。"

到 1952 年 9 月，全国约有 3 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在 3 年之中完成了土地改革。加上 3 年以前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 90% 以上。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以外，全国只有 3000 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到这时，土地改革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

第三篇

文革前十七年经济事件

第一章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举行了中苏两党、两国的最高级会谈。这是毛泽东首次出国访问，他在苏联停留了9个星期之久。1950年1月周恩来也到达莫斯科，参加了中苏会谈。双方讨论了有关中苏两国的重要政治、经济等问题，也讨论了有关国际问题。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一些重要协定。这对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两国的文化贸易交流，都有相当的作用。

一、毛泽东的首次出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1/4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月2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人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没有经验，我方采纳了苏联人的建议，在仪式之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趣索然。从此，在接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

建国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此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一方面是毛泽东实行“一边倒”方针的结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同斯大林

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前，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元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自己的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问旁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

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可算是很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大约12月6日，毛泽东偕陈伯达等人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将经东北的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专列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奥特堡尔时，苏联外交部付部长拉夫伦捷夫已专程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但因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气温甚低，只得迅速回到车上。行车一路每至一个大站都有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出面迎接。

列车行至西伯利亚时，苏联外交部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并问有什么特殊要求或愿望，以便满足路上的需要，护理好毛主席的健康，安排和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在雅罗斯拉夫车站，王稼祥大使登车迎接，并陪同至莫斯科。

1949年12月“日清晨，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大街小巷银枝拂掠，冰影映漾，四处显得格外地庄重和肃穆。快到中午的时候，空气有了些暖意了。莫斯科人开始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即将来到这里。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大钟敲响了“当当当当”12下深沉而洪亮的钟声，这钟声在莫斯科城内久久地回荡着。火车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毛主席。他们知道主席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因而向毛主席解释说，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主席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主

席。这是很破例的。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地作了这样的安排。斯大林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在一起，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毛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毛泽东是清楚的。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有"南斯拉夫式"的道路。还有，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做法也表示过忧虑，担心这样有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美英的西方路线，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当时的时局和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的、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的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会谈就使人已经感觉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 70 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东西？"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苏联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斯大林仍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应该主动地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与毛主席直接交谈，问主席有什么愿望和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等。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惊慌，我方也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目的。1950 年 1 月 1 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 月 2 日见报。

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讲：“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1950 年 1 月 2 日晚 8 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泽东谈话，询问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毛泽东讲了 3 个意见：

①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②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

③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重点。如果按①②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第一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 1 月 3 日到北京，周恩来准备 5 天，1 月 9 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 11 天，1 月 19 日到莫斯科，1 月 20 日至月底约 10 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 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他们走后，毛泽东于晚 11 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

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二、毛泽东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加上“互助”二字，很合适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泽东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紫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陞、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富、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廉等同志。

列车行至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时，周恩来与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

周恩来在欢迎他的仪仗队面前，发表演说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作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和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了。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的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于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静更深之时。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

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定条约的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总理随机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族还要强烈。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规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规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4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

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争先恐后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地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

毛泽东对苏联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

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慕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周恩来始终位于会谈的主角。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新中国第一项外交使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会谈中周恩来的建议和意见使得米高扬也觉得几乎无懈可击。当最后一轮会谈完结时，米高扬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不久还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照周总理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二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具体内容如下：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苏共管。

《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

规定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10年内分批还清。

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1945年8月7日——14日，宋子文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会谈中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10月20日，国民党派代表监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结果，一致拥护独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

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恩来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

斯大林一听立刻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苏双方在进一步会谈中，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主要是关于他们的国籍问题和居留条件。苏侨中有人即不愿加入中国国籍，也不愿意要苏联国籍。这样就成为无国籍公民，而无国籍公民在中国居住，中国则不能答应。苏方对年轻的苏侨，愿意承认他们的国籍，而对年龄较大，原系革命时期逃离苏联的人则不乐意承认并抱有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大概到1955年才彻底解决。

1950年2月8日，在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一个新问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地点在别的地方，不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一般不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吃饭，毛泽东的请求使他不解。毛泽东看斯大林犹豫、不解的神情，于是就解释说：“斯大林同志，你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斯大林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做出让步：“让我考虑考虑。看来，他准备打破自己从来恪守的信条了，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常不一般的盟友。

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正式举行隆重庄严的条约签字仪式。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

中苏双方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两个盟国“蜜月时代从此要揭开序幕了。”尽管谁也无法预料两个社会主义邻国的关系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坎坷和变化，这份条约的签订毕竟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震动。

条约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变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互助”二字十分满意，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也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至迟不过1952年底，苏联还将交还他们在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在华权益。还签订了苏联提供贷款帮助新中国建设的协定。

2月14日，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结束的告别宴会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举行。斯大林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来到了这里，全场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这么近的看见过斯大林。酒会上，周恩来致酒词，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周恩来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斯大林也起立致词。宴会持续近午夜，尽欢而散。

2月17日，是中国代表团启程回国的日子。2月26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一行回到了北京，结束了他这次并不是很轻松但却很有成果的首次出访。

第二章 新中国反封锁、反禁运斗争

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借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击美帝侵略，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从那时起直至1971年4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结束美中两国之间禁止贸易法令的20年间，围绕禁运与反禁运、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严重政治对抗反映在经贸领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重大斗争。

一、杜鲁门政府反共“遏制政策”溯源

早在二次大战结束前的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指出：随着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更多地意识到胜利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但他同时坚信，只有美苏合作，才能建立起巩固而持久的和平。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于当天继任美国总统。在二次大战后的东西方关系上，杜鲁门是奉行“冷战”政策的始作俑者。杜鲁门入主白宫，从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推翻了罗斯福的对外政策，逐步推行对东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所谓“杜鲁门主义”。他要求美国人在全球承担起反对共产主义的义务，公开宣布要对共产主义实行“遏制政策”。他宣称杜鲁门主义可以作为对遏制政策的本质的说明，要求国会批准美国政府对发生革命的近东各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和杜鲁门本人信奉的信条是：不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赤色分子”取得胜利，都将自然而然地使苏联受益而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曾就此评论道：“杜鲁门主义的反共思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形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1947年7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内乔治·凯南提出号召，修筑堡垒，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封锁。

1948年4月，美国杜鲁门政府批准“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以经济援助为名，渗入欧洲国家，以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并建立反共阵地。其中包括要求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削减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作为先决条件。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相辅相承，构成美国政府反苏反共对外政策的核心，杜鲁门称之为“一个核桃的两半。”

为了在经济上“遏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发起组织“向共产党国家出口统筹委员会”（cocom，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专门检查和管制西方国家对苏联及东欧集团的贸易，规定禁

止“战略物资”输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参加这一组织的有18个国家。

在亚洲，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公开禁止美国向中共控制的地区运送武器、药品和其他物资。1949年3月，杜鲁门政府批准了一项“对华贸易政策”(NSC)，认为“只有在对华经济的领域内，美国才拥有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武器”，拟以中采取的是：对军用物资实行禁运，并对可能转手出口到苏联及北朝鲜的有战略意义的物资予以审查控制，对中国采取较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小的A类物资实行管制。

同年6月，美国指使蒋介石集团封锁中国一切沿海城市，包括永嘉、宁波、天津、青岛、上海、秦皇岛等，不允许任何商船通过，驶往中国大陆港口的商船不断受到拦截和武装袭击。6月23日晚8时，埃及货船“苏伊士之星号”在长江口被蒋介石集团炮舰轰击，被迫就地抛锚。次日不得不改驶日本神户。9月5日，美国驻日武装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提议使用美国空军帮助蒋介石集团封锁和摧毁中国大陆沿海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采取的政策是“通过孤立进行遏制——这是对付共产党中国的办法之一”，即：“政治上不承认、经济封锁和反对自由世界与大陆之间的几乎一切形式的联系。”杜鲁门政府认为它有必要执行更严厉的经济政策，以便“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在经济上日子不好过”。1949年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上海港及其航路是危险区域，美国船只不应冒险驶往该地。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又发出警告，“凡把船驶往国民党封锁港口的美国船主，皆可丧失其航行许可证”。1950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战略物资管制办法》，被管制的范围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及化学原料物资等共达600余种，并声言：凡“战略物资”出口，必须具备许可证。4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其就对华禁运问题写的一封信中称：原则上同意“应该把共产党中国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来对待，对向该地区出口的控制应与适用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原则相一致。”7月17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巴统”对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北朝鲜。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撤废美国货轮驶往新中国的出口许可证，持有人要一律缴回。11月，美国商务部又将“石油及石油产品”列入战略物资正表，至此，美国宣布管制的“战略物资”已由600多种增加到2100多种。

二、美国政府挟制联合国以售其奸

1950年6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6月2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关于武装干涉朝鲜的非法决议，并于7月7日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中愿意“提供军事部队和其他援助的国家将该项部队和其援助交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使用”，“请求美国指派该项部队的司令官”，授权联合国军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

由于美国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和发动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还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地区，直接威胁着新的安全。为抗击美帝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

年10月开赴朝鲜作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12月8日，美国宣布《旧金山执行港口管制法令》，规定无论何种货物经由美国口岸转达中国旅顺、大连、香港、澳门者，均须卸下，如要装运，必须特别许可，在此期间，美国还同英国、荷兰、日本、菲律宾、加拿大以及香港频繁交涉，让它们也参加对新中国封锁的行列。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对于美国政府的所谓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12月25日，周恩来发布命令，决定管制和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财产，立即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美国公私银行的公私存款。

1951年2月1日，五届联大通过了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除号召全世界所有国家与当局对美国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在朝鲜的侵略行动给予一切支持和援助外，还要求成立一个“额外措施委员会”，其“任务是想出措施来补充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专门实施对新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封锁和禁运。参加“额外措施委员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缅甸、加拿大、埃及、法国、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英国、美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5月14日，“额外措施委员会”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决议草案，报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即政治委员会)。5月18日，五届联大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非法决议。该决议“建议每一个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实行禁运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原子弹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有用的物资；确定从它的领土输出的商品中何者属于禁运范围，并实施使禁运办法获得实施的管制；在它的管辖的范围内，使用一切办法防止任何逃避其他国家依本决议实行的货运管制情事；同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此项禁运的目的。”在表决这一决议草案时，投票赞成的国家是：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丹麦、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岛、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利比里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马拉圭、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南非、英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和南斯拉夫，还有仍在联合国窃取中国席位的台湾国民党集团。

联合国的非法决议通过后，有43个国家接受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实施。1951年6月16日，英国就此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输往中国：一、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二、原子能材料和器材；三、石油产品，原油和石油产品；四、运输器村；五、金属、矿物及其制品；六、橡胶及橡胶产品；七、化学品；八、开发矿藏和矿石所用化学品；九、制硝酸用触媒；十、化学和石油工业器材和设备；十一、电子(包括无线电和雷达)器材；十二、精确、科学器材；十三、其他各种机器附近件。1951年7月5日，法国政府也作出禁止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品清单，种类如下：

一、工作母机；二、化学工业（器材和化学制品）；三、石油生产装置及石油产品；四、电气器材；五、工业器材及某些贵重物品；六、空中、铁道、公路及海上运输器材；七、电子器材和精密仪器；八、金属；九、武器和弹药；十、原子研究和生产中使用的器材和产品。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资料称：明确宣布参加对新中国实行禁运的主要国家除美国、英国、法国外，还有希腊、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加拿大、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意大利、日本等国家，以及香港地区。

1951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联合国大会5月18日通过的非法决议发表声明指出，"这个非法决议，赤裸裸地证明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其侵略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所遭受的严重失败，正逼迫其帮凶国家拿出更大的赌注投入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中朝两国人民实行禁运是美国政府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个严重步骤"，美国政府正利用这个……非法决议，破坏世界市场的正常关系，压低某些原料市场价格，以便将这些原料单独占在美国军火商人手中，并操纵这些原料的生产国家的经济命脉。事实是，美国政府这种损人利己的政策给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带来严重的损害和困难。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仍然以港、澳为基点与中国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向中国输入了价值2770万美元的货物。美国国会于1951年10月26日，通过《1951年互相防御援助法案》（即《巴特尔法案》）规定：接受"美援"的国家如将"军械、弹药、战争工具、原子能物质、石油、有战略价值之运输器材，以及用于制造军械、弹药及战争工具之重要性战略性物资"输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就立即停止供给其全部军事、经济或财政援助。1952年4月第一届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以后，中国同英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冲破了美国制造的束缚而有所发展。美国便于1952年9月在"巴统"范围内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作为执行对中国禁运的专门机构（参加"巴统"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巴统"所有成员国均享有临时资格），还专门制定了封锁中国的"特别货单"，同时，美国还坚持同日本签署一项秘密双边协定，以使日本的对华贸易管制保持在"巴统"的水平上。

三、杜鲁门政府封锁禁运政策的破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侵略和经济封锁与禁运，曾给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造成了物资供应的严重困难。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自1950年12月4日起停止对美国、日本、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的结汇输出，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改用"先进后出"为主的易货贸易方式。1951年1月15日，中国贸易部召开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为了逐步改变对外贸易上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局面，会议明确提出在尽可能扩大内销、争取在国内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扩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按照彼此需要，酌量改组生产，以适应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需求。1951年5月28日，中央财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

非法通过对我实行禁运案后对各项工作的指示》指出："自美帝5月18日操纵联大通过禁运案，对我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后，总的趋势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困难将越来越多，危险将愈来愈大。"根据上述情况，中财委作如下部署：贸易方向，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事实证明，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及东欧国家，是打破美帝封锁、禁运，克服物资供应困难的重大决策。1950年，中国对苏联和各东欧国家的贸易额仅占进出口总额的33.5%，1951年增加到65.4%，1952年又增加到81.3%。"一五"期间，中国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全部进出口贸易的77.7%，其中对苏联的占56.3%。中国进口的成套设备主要是苏联供应的，到1957年底已有67套投入生产。东欧其他国家也提供了37套成套设备。这些设备对于中国奠定现代大工业的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供应许多重要机械设备和其他物资，如各种工作母机、各种精密大型机械、各种优质钢材、有色金属、电工电讯器材、科学仪器、交通运输器材和大量石油。这些物资都是美国封锁的重点而又是我国经济建设所急需的。

由于封锁、禁运，自195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追随者的贸易关系几乎陷于停顿，以中日两国贸易为例，1949年、1950年两国贸易总额超过了抗日战争的1936年（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24%）的水平。但从1951年起，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华封锁禁运，中日贸易总额不及日本外贸总额的1%。由此，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联系，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趋缩小，从而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特别是加剧了美国同一些原料产地国家的矛盾。

英国的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对华贸易。中英两国贸易，1950年曾达到7300万美元。1951年5月，英国政府追随美对中国封锁禁运的政策，当年的对华贸易便下降到3500万美元，1953年对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率只相当于1938年的四分之一。难怪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惊呼，英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已触痛了英国自己。1953年2月，英国通用电器公司经理加美兹在香港呼吁说："我们尽力要求政府取消对中国的出口的限制……因为这样，我们活不下去"。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冲破美国损人利己的政策，要求恢复与扩大对华正常贸易，完全符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这种呼声日益高涨，为中国打破封锁禁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1951年10月27日至28日，各国经济界人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集会，成立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委员会，其中中国委员4人。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52年4月3日，第一届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以南汉宸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经过全体大会和小组会议的讨论，认为需要改变由美国推行对中国等国封锁、禁运政策所引起的国际经济关系不正常状况。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分别同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尼、巴基斯坦等10个国家工商界人士签订了贸易协议，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23亿美元。

莫斯科会议之后，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有所改观，双边贸易也有所发展。同日本促进中日贸易的团体两次签订了贸易协议。1952 年 6 月，中国进出口公司的代表同西德企业界代表在柏林签订了贸易总额为 1.5 亿卢布的民间贸易协议；同年 10 月 23 日，同智利贸易公司签订了中智贸易协议；1953 年 1 月，同埃及签订了“棉花交易合同”。1953 年 6 月 5 日，同法国工商业贸易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贸易总额双方各为 1000 万英镑的贸易协定，还同英国工商界签订了贸易总额为 3000 万英镑的商业协议；1953 年 4 月间，比利时贸易代表团到中国签订价值 10 亿比利时法郎的定货单。截止到 1953 年，新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贸易额比 1952 年增加了 52%，接近 1950 年的水平。至此，美国操纵联合国对实行全面封锁、禁运的政策开始破产。

1953 年 1 月，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继续执行杜鲁门的敌视、孤立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阻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的封锁和禁运。1953 年上半年，美国政府所遵循的政策首先是使其盟国间对共产党中国施加经济压力，虽然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认为完全中断同新中国的经贸关系并非明智之举。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封锁、禁运政策一直遭到它的西方盟国的非议和不满，杜勒斯承认：“美国与它主要盟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成为新政府 1 月间就任以来就遭到的多方面困扰的问题之一。”

1953 年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的时候，为了增加谈判筹码，美国对其盟国收紧“缰绳”，纠集英法等国强化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措施。1953 年 3 月 2 日，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发表的关于美国侵朝政策的演说中，提出了把“联合国……加紧（对中国）经济制裁”，以及对朝中方面使用原子弹等内容在内的七项办法，做为可供美国及其盟国扩大朝鲜战争时选择的方案。因此，出现了 1953 年 3 月的美英外长会谈和美法外长会谈。在美英 3 月 7 日的会谈中，英国方面决定采取新措施“制裁”中国，即“对于在联合王国和殖民地注册的船舶实行新的许可证制度，使英国船舶不能载来自英国的战略物资前征中国”，“载运战略物资前往中国和苏联集团或东欧其他国家的船舶不（得）在英国加煤”。3 月 28 日，美法外长在华盛顿谈判，法国方面决定采取同英国类似的措施。此后，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意大利、日本仿效英法、屈从美国强化对华封锁、禁运的措施。美国本身也于 7 月 20 日改变了租船条件，使装运美国航运署货物‘的外国船舶，在前往台湾 60 天内不得驶往共产党中国港口，否则将丧失运费的一部分，对任何前往中国港口的外船、飞机，加紧燃料和粮食控制。

1953 年 7 月 27 日，随着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订，要求恢复与扩大同中国经济贸易的呼声日趋高涨。1954 年，不顾美国的阻挠，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 50 多个，其中双方政府订立的协定和合同有 17 个，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了 40%，就是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德等国家的对华贸易也有所增长，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更比 1953 年增长了 2 倍多。

1955 年 8 月 1 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9 月，中国大使王炳南向美国明确提出取消对中国禁运的问题。1956 年 8 月 21 日，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就禁运问题

提出中美联合声明草案，其中说："为了逐步改善中美关系和缓合国际紧张局势，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约翰逊大使代表美利紧合众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认为，应该各自采取主动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的障碍。"由于美国方面没有诚意，提出以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为双方谈判的先决条件，拒绝讨论中国方面提出的声明草案。

1957年4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根据"美国的一些盟国曾一再要求它把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放松到适用于苏联集团同样的水平"，美国决定解除对运往共产党中国的某些和平用途项目的管制。但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对于同共产党中国贸易一事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将继续单方面禁止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

5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宣布，决定放弃对中国的禁运，即把非战略物资的禁运范围放宽到对苏联集团的管制水平。美国方面无可奈何地表示"非常失望"外，又一次表示，"至于美国自己，它不打算改变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实行全面禁运的政策"。也就在这一天，英国海军宣布，英国军舰准备保护任何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

7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放宽对中国我贸易限制。这样，美国纠集的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集团中的日本最后也冲破了美国的束缚，"巴统"内的"中国委员会"就此名存实亡了。1958年9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在"战略物资"方面的"货单"可放宽一些。

由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敌视的政策，也由于中国内部的一些情况，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的禁运封锁政策不可能根本取消，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末。

从1969年起，美国尼克松政府先后7次宣布放宽对中国的禁运。197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14日，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达20年的中美两国间禁止贸易的法令。1972年2月11日，尼克松又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放松对华贸易关系的一整套新建议。此后，所有美国可以卖给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商品，同样可以卖给中国。这样，从1957年日本冲破联合国1951年5月非法决议起，又经过"年，美国才终于与其西方盟国开始站在同一，条对华经贸关系的水平线上。

第三章 “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发动全民，在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之举。这场运动开创了50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三反”运动之缘起

“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下半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仍处于边谈边打的局面，经济财政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而战争的继续耗资巨大（约占年度财政支出的50%），国民经济建设又刻不容缓，这就给国家的财力物力造成极为沉重的负担。那么，资金从哪里采？出路又何在？恰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增产节约是一条康庄大道。为此，10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同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也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立即开展一场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内经济建设。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都揭露出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据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报告：从1951年12月10日以来的一个月中，据不完全初步材料，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已发现的贪污人数达1670人；浪费现象也相当惊人，仅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1951年一年内因管理不善，就损失汽油7000余吨；纺织工业部所属经纬纺织机器厂，国家投资4000多亿元（旧币，下同），因计划不周，施工马虎，工厂建筑尚未完工，所有厂房的289根柱子中已有280根不平衡下沉，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部化大公为小公金额达730亿元；重工业部领导则有为下属厂假造开支503亿元的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也很严重，贸易部向苏联订购牲畜防疫药时，将3吨误写为300吨，将出口订货单中的“米茶砖”误译为“黑茶砖”，各级领导审批时都未发现问题，致使造成损失62亿元。根据1951年12月2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说：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许多地方已侵入到党政军机关里面，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1月到11月在华东一级司法及监察机关已处理贪污案件179起，贪污金额达288亿元。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1242亿元。上海国营纺织厂从1949年6

月至1951年6月因产品不合格、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费1500亿元。1951年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存有严重官僚主义，造成1000多斤粳米霉烂变质。东北地区自1951年9月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运动不久，就暴露出大量问题。如东北贸易部仅检举的贪污金额即达5亿元；沈阳市仅工商局所属各单位就揭发出3629人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东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

建国之初，"三害"的大量存在和蔓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解放后党政军民机关留用了为数众多的旧人员，由于他们长期为旧中国官贵民贱、奢侈浪费、贪污腐化之风所浸染，积习颇深。解放后虽经教育但尚未得到彻底改造，所以一有机会便旧病复发；有些人员身在人民政府，但不思改悔，我行我素，利用各种方式肆意盗窃国家的财产；有些则是混进或受不法资本家派遣打人机关内部的"坐探"与"内线"，里通外联，狼狈为奸，时刻寻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据有关部门统计，从建国到1951年11月两年中，在发现的贪污案件中，旧职员竟占贪污人数的9996。其次，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许多不法之徒往往采取阿庚奉承、请客送礼、金钱美女引诱等手段，对党政机关干部进行腐蚀拉拢，使一些意志薄弱者成为糖衣炮弹的俘虎。第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城市，由在野党成了执政党。随着形势、环境、地位的变化，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因而"坐衙"当权，疏于政事，玩忽职守，官气十足，脱离群众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滋长，或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盗窃、蜕化变质。曾震动全国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突出的典型。刘、张二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进城之后，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利欲薰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他们利用职权，侵吞公款；勾结奸商，投机倒把；私设"建筑公司"，非法牟取暴利；甚至盘剥民工，克扣灾区救济粮款，共贪污171亿余元巨款，供其挥霍享受，由革命的功臣堕落为人民的罪人。另据平原省1951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处理的違法乱纪干部中，贪污受贿者占65%。由此可见，"三害"在党政军机关也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概述了揭露出的大量贪污浪费问题及开展这一斗争的经验，提出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反贪污腐化斗争；必须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带头层层做自我批评；组织工作组深人下去检查督促等。中央对东北局的报告极为重视，于11月20日转发省（军）级党政军以上各级党委，并严肃指出："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开展"三反"斗争问题。11月25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西南地区将把反贪污反浪费当作1952年的重要任务之一。11月30日中央在转发西南地区报告的批语中说："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

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11 月 29 日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的情况。这更加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于第二天转发各地，尖锐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从中央转发三个大区的报告中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中央发动“三反”运动的决策已酝酿成熟。

二、中央决策搞“三反”，毛泽东亲自抓“三反”

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

中央的《决定》，实际上是展开“三反”运动的动员令，它对为什么必须进行“三反”及如何进行“三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决定》指出：在反贪污斗争中，必须同时反浪费和官僚主义。因为浪费与贪污虽属性质不同，但浪费造成的损失极大，又常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贿赂相接近；而官僚主义则是贪污、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不厌其详地进行宣传解释，使之充分地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督促与检查，大力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严厉惩治一切贪污分子和严肃查处浪费、官僚主义问题。

运动发起之后，中央抓得非常紧，时刻注视着运动的进程，不间断地给予督促和指示。12 月 4 日，中央在转发北京市《关于展开反贪污斗争意见的报告》批语中指出：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在三个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要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的群众，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分子，并责成各级领导在一个月内，务必向中央作出开展运动的第一次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处；凡推迟报告者，必须申明理由。12 月 8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严肃指出：“各级党委应把三反斗争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再次重申：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及所属的一切机关工作部门，在 1952 年 4 月份之前，均应每月分别向中央作一次“三反”斗争情报的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各级领导同志对这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实行奖励和惩处。1952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党政军各级党委必须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召开干部会，限期展开斗

争，并报告中央，如有违者，不管是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并规定在目前三反斗争紧张的时期，各大区负责同志每三天至五天向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报告一次运动进展情况。由此可见，中央对进行"三反"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巨大魄力。

自《决定》下发后，许多部门都行动起来了。为了推动运动发展，1951年12月31日下午召开了党政军各部门处长以上数百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中节委主任薄一波、中央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安子文宣布中央决定和作动员报告，限期1月1日至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必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如有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局长、处长、科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了几个部是做得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许多部是落后的，同时宣布撤消几个单位领导运动不力的负责人的职务。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就连夜开会，元旦也整日开会，许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了，连戏也顾不上看。1月9日，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中央、华北及北京、天津两市的高级干部及各界代表人物2300余人，在北京召开"三反"动员大会，亲自作动员，并让薄一波在会上作了《为深人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经过动员，中央机关的"三反"斗争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对"三反"运动极为重视，不仅对各级抓得非常紧，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经常亲临中节委，参加会议，听取汇报，掌握全国情况。为了统揽全局，加强指导，毛泽东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批阅各地报告，代中央起草决议、指示、批语、电报、信件等。整个"三反"运动期间，这样的文件就达233件之多。毛泽东不仅亲自制定方针政策，而且亲自督办落实；不仅具体交待任务，而且明确指示办法，他非常重视各级领导亲自抓这一条，对好的及时加以肯定和推广，对差的给以严肃的批评和纠正。1951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报告》时，认为习仲勋亲自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认真分析贪污浪费现象，明确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利用整风方式迅速展开"三反"斗争的做法非常好。并说，中央由薄一波负责，北京市由彭真负责，东北由高岗负责，都亲自动手，已发动起来了，望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都要注意此种经验，抽出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会，斗争就可以展开。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亲临"三反"斗争第一线，他坚决为群众撑腰，并指示各单位领导：必须扫清运动的绊脚石，要把群众是否发动起来当作衡量运动好坏的一个标准。当他发现建筑工作中有许多浪费现象时，就带工作组深入下去，用20多天时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看，发现问题，立即命令检讨改正。毛泽东在看到有关贺龙抓"三反"斗争的通报后，于1951年12月30日指示各中央局及大军区：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成绩。同日，毛泽东又收到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同志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电报，毛泽东觉得他们的行动稍缓，即于元旦凌晨2

点起草复电，指示他对所属各军区的“三反”斗争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要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毛泽东将来电中不妥之处加以修改，并指示派专人连夜乘飞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1952年1月5日，毛泽东在批转华东军区党委《关于三反中报告制度的规定》时，又指示各中央局及大军区：对“三反”运动“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在毛泽东的督促与指示下，各级领导都动员起来了，不仅亲自抓，而且带头检查作自我批评，为机关干部和群众做出榜样，使运动很快出现高潮。

全国各地为大张旗鼓地深入开展“三反”斗争，还十分注意宣传发动群众，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并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广大群众纷纷起来，用口头或书面、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大胆检举贪污分子，积极揭发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随着“三反”运动的发展，进一步发现，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行为，大多数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五毒”进攻有关，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全国大中城市迅即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展开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机关内部的“三反”斗争。“五反”与“三反”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既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也十分有利于揭露党政军民机关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

为了通过“三反”斗争，以加强党的思想、组织、缺席及作风建设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相结合进行的指示》，强调指出：要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全面的、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踏、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廉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领导岗位上来。这样，“三反”运动就与整党、机关建设、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有机结合起来了，从而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巩固了三反”运动的成果。“三反”与整党的结合，对于增强党员拒腐蚀防变的能力、强健党的肌体、纯洁党的队伍、净化党的风气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运动纵深发展，注意搜寻“大老虎”

1952年1月中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三反”运动普遍展开后，经过领导带头检讨，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号召有贪污行为者坦白，“三害”问题的基本情况已大体清楚，运动本着“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转人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所谓打“大老虎”阶段。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于1952年1月20日在中财委党组会上作打虎总结报告时，曾提出判定“大老虎”的六条标准：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坐探分子，与私

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等。嗣后，李富春将这六条向中央作了报告，2月2日毛泽东将李富春拟定的六条批转全国省（军）以上党政军各级党委参照执行。

1952年1月19日，中直机关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会后，薄一波将中央机关“三反”斗争情况及今后的意见与应注意的几个政策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并于第二天批转各地参照执行。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指出：党政军民学各系统都必定有大贪污犯，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滞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第二天，又指示各地：每个省、每个大城市及各大军区单位都有100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2月4日，又向党政军各级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2月10日，毛泽东在对《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因此，要增加打虎的勇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留恋或同情。同时，毛泽东还对各地打虎的计划、步骤、方法及进展情况，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及作出指示，对各地报上来的打虎预算数字也一一审核计算。

在毛泽东的严词督责和反复指示下，全国党政军各部门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大老虎”斗争，如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单位首长开会，自报公议，规定打虎指标，责成各首长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个单位的首长认为本单位没有老虎，应签字向党和政府负责保证，上级领导立即派人复查，以此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督促认真组织和领导打虎斗争。

在打虎斗争高潮中，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一些过火行为，如在打虎斗争一开始，就定出打老虎指标，并不切实际地向下层下达过高的打虎数目，以致发生强拉硬凑，或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因而伤害了一些好人。中央发现这些苗头后，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了纠正。如1952年2月9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关于打虎计划报告》的批语中曾指出：个别单位已发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各地如出现这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19日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打虎新预算报告》的批语中说：你们在打虎斗争中关于“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提法很好，在运动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中再次指出：“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四、审理、定案阶段

到1952年3月，大部分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审理、定案、处理阶段。为了慎重而严肃地处理揭发出来的“三害”问题，特别是准确而及时地处理贪污分子，重点打击大贪污犯，中共中央于1952年3月5日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原则：对绝大多数情节较轻又彻底坦白，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或隐瞒欺骗、拒绝坦白者，应从严惩治；对浪费问题亦应以严肃的态度，分别情况，予以适当解决，以教育干部，团结群众。3月11日政务院颁发了中节委《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规定》按照“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贪污、浪费问题规定了具体而明确的处理办法。如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凡贪污未满100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不再犯，不当贪污分子对待，也可以免予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超过100万元未满1000万元者，只要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以免于刑事处分，但应视情况给予行政处分，并酌退贪污款物，对情节恶劣又拒不坦白者予以刑事处分；凡贪污超过1000万元，未满一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程度，退脏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或免刑给予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一亿元以上的贪污分子，一般按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但自动坦白退出脏款脏物，有检举立功者，也可免于刑事处分，给予行政处分。为了防止虎头蛇尾，草率收兵，周恩来在签发《规定》时明确指出：《规定》下发之后，对于所有尚未坦白或坦白尚未彻底的贪污盗窃分子，仍应彻底检举、揭发，不得因大多数的问题已转入处理阶段而稍有放松，以致影响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任务的彻底完成。3月28日，政务院作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采用人民法庭的形式，便于集中时间和力量严肃、慎重、适时地审理重大贪污案件，以免延误时日，影响各项工作和经济建设。3月31日，政务院批准颁发了中节委《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对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范围、办法及处理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为惩治贪污犯罪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法律武器。1952年5月9日，毛泽东在代为中央起草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各级党委注意掌握，“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在运动后期，由于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使真正的贪污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惩罚，使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这不仅达到了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目的，也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为“三反”运动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政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达850

万至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左右。县以上党政机关（未包括军队）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为383.6万人，共查出有贪污行为1000万元以上的10.5万余人，约占参加“三反”运动总数的2.7%。经审理定案，绝大多数免手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对少数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态度顽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者，给予严厉制裁。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第四章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农村自土地改革之后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其间，既有创造性的成功，又有始料未及的失误。

一、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由来与背景

中国的农民有着较长时间的互助合作的实践经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割据时，在革命根据地就建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民生产和消费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是在共产党掌握一个地区的政权之后，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打击，在民间固有的亲族之间临时性伴工、换工、互助的习惯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是根据农民的意愿和固有习惯，因此很受群众欢迎。毛泽东对此也曾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赞赏，并指出它们在现阶段，只能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在"自愿原则下"以"调剂劳动力"为主要任务。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劳动互助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思想理论又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就曾指出：在经济政策方面，"国营经济和创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而是私营，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实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毛泽东还认真综合分析了过去江西农村干部群众的经验和当时陕甘宁边区农村干部群众的经验，条理化地明确了发展合作经济的思想。他强调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性质上，根据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因而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1943年，在河北省饶阳县建立起的闻名全国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个突出的范例。解放战争时期，互助合作组织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又是小商品经济，它们的生产受到市场流通和交换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个体农民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多数人贫困破产，少数人发财致富，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新中国土改后的农村，很快出现的买卖土

地、雇佣剥削、放高利贷等现象，也正是小农经济的必然趋势。再加上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地主富农仍然占有大部分土地，雇佣工人相对较多。据浙江省嘉兴县高照乡的调查，全乡有雇农 144 户，占总户数的 21.79%。出现了长工、月工、短工、牧童等。此外还有外籍雇工 114 人，牧童 35 人。当然，有些人乘人之危进行放高利贷剥削也加剧了农村中的两级分化。据 1954 年的调查，龙游下范二村，90 户农民下降的 29 户，34 户中农下降的有 11 户，6 户富农上升的 5 户，全村真正困难的有 32 户，占总户数的 20.9%。其中典卖土地的 16 户，共典卖土地 21.5 亩，典卖房屋、农家具的 28 户，共典卖房屋 13 间，卖农家具 506 件，送卖子女的两户。这些情况表明，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土改便开始发生了。要使农业有较快地发展，又要防止两极分化，不让刚刚翻身的农民重新陷入受剥削的贫困境地，只能走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展开，党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着日趋紧张的矛盾。一方面，实现工业化要求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而且“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同时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又有赖于农业内部积累的增加。另一方面，虽然在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但我国农业滞后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这种状况突出地表现为：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积极的办法只能是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生产，解决粮食及国计民生的大计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因此，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全过程中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

除经济原因外，促使党中央认为需要大力发展合作化的还有社会政治方面的考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在广大农村中还存在着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广泛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党中央对农村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极为关注，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泽东还告诫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在围绕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展开的争论中，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纪逐步深化，并从巩固和建立新的工农联盟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迅速实现合作化的必要性。同时还认识到，民主革命时期工农联盟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已经过去。而最近几年中，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发展，许多农民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样，不仅贫困的农民不满意，就是富裕的农民也会因为我们不允许他们走资本主义道

路而不相信我们，这样一来工农联盟就很难巩固了。要巩固已有的工农联盟并使其获得新的更加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实行合作化，逐步消灭农村中的富家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整个社会立足于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另外，"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因此说，在50年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系统工程启动的中心环节。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际需要。

二、农业合作化决策的制订及实施状况

通过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针。制订这个方针乃至作出这方面的决策，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初步确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曾明确确定了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方向发展方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针对个体的农业经济实行改造的问题，'不仅就其性质再次明确肯定了"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且也同时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15日颁布执行。决议草案指出，土改后的农民中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中央应特别注意发挥农民的这两个积极性，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提出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明确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社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规定了在发展互助使用运动中，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因为，"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决议草案还规定了农民互助合作的三种主要形式，这就是：简单的临时性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组发展到800万个，参加农户4536万户；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了3600余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0%。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并于26日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出了指导农村工作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指出在农业

合作化问题上既要反对消极态度，又要反对急躁态度。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继续强调说："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1952年底1953年初，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健康发展的，但也在部分地区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急躁冒进偏向，表现于贪多求大，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入社，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指示各地切实纠正正在滋长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央在下发的文件中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要保护个体农民的利益，领导农业生产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生产关系的改变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否则生产会受到损失。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部长邓子恢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要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在全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邓子恢的主持下，中央农村工作部代中央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人民日报》起草了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随后，中央把这两个文件连同1953年2月1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汇编成册，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印发全国。邓子恢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还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如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等，减少水灾、旱灾、虫灾等，以逐步改进生产技术，但是，国家的帮助是有限的，要全部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只有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彼此之间互助合作。可见，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就是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二是目前农村中某些紧张情况及安定团结的方针。这主要是针对1953年春部分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引起一些农民恐慌，怕共产，不积极发展生产而言。因此，邓子恢在报告中说必须把逐步改造小私有者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不把这个问题搞清，就会造成农民恐慌。对农民和公有制问题，必须逐步解决，不能过急，土地分给了农民就不能随便剥夺，要依法保护这种所有权。总之，"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会议总结报告就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的自流等待和急躁冒进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主要的危险"。"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利于向总方向前进。"

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泽东又两次同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虽提出了一些正确意见，但主要还是强调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互助组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化，大合作社才行。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这两次谈话对后来的工作影响很大。12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该决议1954年1月8日正式发布）确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决议进一步指明了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正确道路。并指出："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

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此，农业合作社由试办阶段进入发展阶段。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比原来增长了近7倍。是年秋天，初级社已发展到10万个。

1954年秋到1955年春，由于深入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1955年1月，合作社已达到48万个，这已超过了原定的全年发展计划，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虽然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但也出现较前次更为严重的急躁冒进倾向。主要问题是有些地区超越条件许可发展过多过猛，一轰而起，甚至出现几十倍地增长；归公的生产资料折价过低，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国家在统购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一些地区性农民闹退社，砍伐树木，大量宰杀牲畜等状况。

面对于此，1955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由于有相当部分新社在建立时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等现象。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因此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在基本完成发展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离原计划尚远的地方，要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原计划过高的地方可适应收缩。

但是，《通知》下达后没有得到深入贯彻，各地合作社数量仍在猛增。4月间达到67万个社。3月上旬，毛泽东曾找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陈伯达4人谈话，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4月21日至5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面对当时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农村形势，肯定了成绩，指出今后合作社的工作方针是：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办好互助组，照顾个体农民。会后，各地根据本地区情况，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结果，全国共收缩了2万多个社，剩下的65万个社，秋后增产的达到80%以上。这表明，党领导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正确的。

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以后，中央提出了大规模发展合作化的计划，到1956年可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30万个。此时，党内在合作化发展问题上则出现了意见分歧。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方针和原则。但报告也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调整和整顿工作，大谈反对所谓的"小脚女人"、"右倾"错误。9月12日，毛泽东又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百多条按语，在赞扬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同时，亦提出了一些左的，不切实际的设想。所有这此都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和"左"倾错误的发展，到10月，全国合作的数量比6月陡增一倍以上，合作化运动也出现了更大的偏差。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在六中全会召开，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对合作化运动作了新规划，提出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大体上可以在1958年春季以前，先后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毛泽东在作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总结报告时，

强调了合作社要大发展。会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上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开了一个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将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上纲为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的先例。这次全会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它进一步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由此，在毛泽东和七届六中全会会议的鼓励和推动下，到1955年底，全国初级社已发展到109.5万个，入社农户7545万户，占总农户数的63.3%。高级社在1955年下半年由500个猛增到1.7万个，增加了34倍，入社农户达475万户，占总农户数的4%。

1956年1月，在初级社刚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办初级社为主转变为办高级社为主，此后，高级社迅猛发展，6月底，高级社已发展到30万个，入高级社农户达7600多万户，到年底时，高级社已达到54万个，入社农户已达10742.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7，8%。至此，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评

党中央提出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对我国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它的功绩在于把广大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综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尽管在方针、政策和办法方面，在党内曾出现意见分歧，未能完全统一，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党中央还是在基本上坚持了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和由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逐步过渡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这一指导思想。总的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成功的。

正如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所指出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本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个体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其自发趋势是私有经济；但是，作为劳动者，又可能引导他们走合作的道路。特别是当时的贫农、下中农，存在许多困难，具有互助合作的要求。据统计，1949年每百户农民只有64头大牲畜，50部旧式犁，9.7部水车，6.6辆大车。这表现出很多农民生产要素残缺不全，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分割，只有大家互助使用，才能克服困难，有效发展生产。中央根据这种情况，及时地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相互协作发挥互助合作的优势，发展农业生产，这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实践证明，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曾经创造出许多富有特色的形式，即由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级过渡的办法，其好处是使农民逐步适应了新的制度。1951年和1953年关于互助合作的两个决议，规定了许多符合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和措施，如反对强制和剥夺农民，坚持说服、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法，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强调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步骤和形式；注意抓好生产，实行民主管理，照顾社员的个人活动和发展家庭副业，采用灵活、过渡的分配办法；不能

忽视和挫伤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不能歧视和打击单干农民；领导上既要反对放任自流又要反对急躁冒进两种倾向；等等。这些都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合作化、土地公有，消除了生产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避免了两级分化。第二，在部分地区发展起集体企业，积累了公共财产。第三，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农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29938万亩增加到1957年的41008万亩。第四，在低水平上保证城乡人民对农产品的需要，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贡献，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奠定了有利条件。总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问题是到了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后期，由于毛泽东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过分乐观的估计，导致了他和党中央原来指导思想的改变，以至于陷入“左”的偏向，出现了更大的急躁冒进和偏差，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形势估计上，一方面夸大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的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级、两级道路的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不仅强调了“在这十年的时期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要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作为四项阶级斗争的内容之一，继续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的打击”，“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而且特别指明，要使“小生产也绝种”。为了使“小生产也绝种”，不仅对小农经济从政治上经济上予以种种打击和限制，而且把干部中坚持“稳步发展”的思想，也错误地当作“右倾顽症”，来反复的批评，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另一方面，又过高地估计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认为农村合作化的高潮有的地方已经到来，在全国也即将到来，肯定地认为“群众要求大力发展合作社”。这两种估计的共同点是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否定过去的正确方案，把执行原计划的同志说成是“右倾”，通过党内斗争，以搞运动的方式掀起全国的合作化高潮。事实上，当时农民刚刚分得土地，正热衷于在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出卖土地和雇工经营都是个别现象，两级分化并不明显。就多数而言，农民的产品除了自己消费外很少有剩余产品，能够成为公共财产的东西还不多。而我国农村又缺乏合作化的基础，开展相互合作的时间还长，很多人对初级社不甚了解，对高级社更没有认识，干部和农民还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总之，所谓的“高潮”是缺乏经济基础、思想准备和干部条件的。

（二）把合作化和发展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土改以后，本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分工分业，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然而，在整个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却把农村商品经济视为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来加以反对，禁止农民经商，更不准合作社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夸大了阶段斗争、恐惧商品经济的结果。

（三）由于采取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体制，用行政手段把农民的财产变为公有，用直接管理国营企业的办法管理合作社，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劳动采用集体形式，产品由国家统购派购，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农民和合作社没有自主权。因此，当时农村

普遍实行的这种集体经济体制是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实践证明，那种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规模越大，管理越集中，就越有优越性的观点，是脱离实际的。

（四）在 1956 年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留在全国农村的是一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农村基本上消灭了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甚至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想一起消灭。这种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制度，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极不适应的。因为，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很低的阶段，采取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方式并存是非常必要的，只要加强管理、引导和宏观调节，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可以发展社会主义服务。

（五）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最主要的失误。当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党的八大即明确地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可惜，这个正确结论不久便被推翻了，抓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在社会实际工作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为的斗争愈演愈烈，破坏了人们的正常关系，给社会造成严重的恶果，使国民经济亦濒于破产的边缘。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我国农村合作化制度没有显示出预期的优越性，以致人们头脑狂热，生产发展却很缓慢。据此，还给农村社会留下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顽症，不少地方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经济始终处于一种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

中央对农业合作比后期出现的失误，在当时和其后尽管也曾采取过一些补救措施，但最终未遂人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全面总结了我国农村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使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繁荣的局面。

第五章　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历史背景与客观依据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并迅即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指出："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1949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主义条件发展成热的必然结果"；这个高潮"并不是凭主观愿望任意决定的，而是研究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反对。"

那么，我国当时究竟出了哪些情况和哪些条件，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阶段，促使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形成呢？这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论述。

第一，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及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宣传教育，通过党的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到了1955年，党的领导力量已日益坚强，人民民主专政已日益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日益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必然趋势。特别是经过"五反"运动，我国已开始形成了政府与工人阶级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工人监督已在很多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已丧失了或基本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同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群众，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已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迫切要求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迫切要求资本家接受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不断向政府递送申请书，希望早日实行公私合营甚至改为国营，早日跨进社会主义的门槛。这种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大大上升的客观事实，是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二，公私合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优势日益壮大。到1955年，在工业中，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83.6%；在商业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已占商业批发总额的94.8%，占零售总额的67.6%。银行、铁路、钢铁、矿山、

电力、对外贸易等关键性经济部门，也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前夕的1955年秋天，在大型工厂（使用机器的工业是16个工人以上，手工业是31个工人以上）中，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已有1900多个，它们的产值占56%；全国163户（1954年统计）500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只剩下30家没有公私合营了。所有这些，使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为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石出。

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则大大削弱了。1954年以来，私营工商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部分私营工厂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部分私营商店停业，收入大幅度下降。这些困难，只有依靠政府通过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加强改组改造等措施，才能得到解决。到1955年，私营工业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2%，而在这个产值中，又有45%已经纳人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私营大型工业为国家加工订货的产值已经占93%。如果以私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为100，则私营自产自销仅占9.2%，加工订货占41.4%，公私合营占49.4%。私营零售商业只占全国商业零售总额的32.4%，而在这个零售额中，又有45%已经纳人经销、代销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形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离开国家的安排，就难以生存，它们已经失掉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它们已经有“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剩下的那半只脚也非跟进来不可了。

第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优势的不断加强，资本主义企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暴露得特别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不进一步受到改造，就不可能提高生产力来适应人民的需要。同时，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与未合营的企业之间，私营企业大中小户之间，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矛盾也突出了。如果不突破所有制界限，不突破企业乃至行业界限，统一调动生产力，统一安排，不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改造，则一系列的矛盾就不能克服，生产力就会受到破坏。1955年上半年，上海首先就有8个工业行业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工作，接着北京对棉布商业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其他一些地方也进行了试点。这一系列的实践证明全行业公私合营确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办法。这样，为了进一步解决因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日益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以提高社会生产力，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党和政府采取一个全面改造的重大步骤，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了。

第四，1955年下半年以来，以批判“小脚女人走路”、“右倾保守思想”为先导，在我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5年底，已有不少省、市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已有占全国总农户的64.9%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高潮的到来，意味着有五亿人口的农村最终地抛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割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就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使资产阶级更感到处境孤立，他们除走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出路。

第五，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在党的和平改造与实行赎买的方针下，在利

用、限制、改造政策下，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考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经过学习，受到了实际的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思想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壮大，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接受改造，通过和平转变，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还切身感受到在接受改造过程中，通过国家赎买、政治安排和工作安排，也确实得到了实际的好处。他们逐步有所进步，并涌现出成批的进步分子。这部分进步分子比较了解政策，能看清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靠拢党和政府，赞成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在推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过程中，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中的积极分子起不了的。在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所发生的这种有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分化，是1956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所以到来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正如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所指出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这一切表明：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到一个更高阶段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高潮，注定很快就要到来了。

二、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前
党中央抓紧进行的几项工作

在上述形势下，党中央为了抓住主要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讨论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以适应农业合作化需要的问题。七届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召集了两次重要会议，部署加快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

1955年10月27日、29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和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分别在颐年堂、怀仁崖举行座谈会。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人既明知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社会主义道路不得不走，又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惴惴不安，犹如"十五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思想状况，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中共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殷切希望工商业者要安下心来，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可以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指出：对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共产主义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全国的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当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共产了，而是讲准备共产，要广泛宣传。他指出，现在的对资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年全部没收，一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

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有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统统地安排好。毛泽东又指出，在工商界里面，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高一些，经过他们去教育其他的人。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政策、方针。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全国有几千人。他还对李烛尘等人提出工商界也要掀起一个改造高潮的主张进行说服，说：不要搞一阵风，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个不好，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引起误会，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因为有核心，就能领导，就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

毛泽东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怀疑和顾虑，有力的稳定了他们动荡不安的情绪，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说，毛主席的指示象太阳一样，照亮了全国工商业者前进的道路。李烛尘先生在10月29日那天会上当场表示，要积极推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会员搞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荣毅仁先生讲了荣家的发展史和父辈在旧社会办实业的坎坷经历，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在1955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行委员会议上，他们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认清前途，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坚定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

同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集中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上陈云在分析了几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况之后指出：“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提出了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6点规划。第一，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国营与私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需要统筹安排。必须统筹安排生产，否则，改造就无法进行的。第二，各行各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不改组就不能安排。改组的办法是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即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理。第三，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要给饭吃，工资一般地不降低。要尽可能使用资本家，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第四，实行定息。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

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这样，资本家得到了好处，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第五，组织专业公司。为了把几十万、几百万户的私营工商业组织起来纳入国家计划，为了安排生产、进行改组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需要有专业公司。专业公司有经济任务，也有政治任务。它主要的任务是：管理加工订货，管理生产，指导技术改进，负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职工和资本家进行教育。第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有生产规划和社会主义改造规划。要加强教育工作，要设立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专门机构。全面实行这 6 点规划，就将使剩下未合营的大量分散、落后的私营企业纳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完全集中在国家的控制之下，社会主义的控制之下。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草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民族资产阶级状况，总结了 6 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和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我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这一根本方针的重大意义，批判了党内的改造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出全党要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争取在 1957 年底在一切主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战斗任务。

《决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一致拥护。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党内的思想，有秩序地迅速推进我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伟大变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上述几次会议、几项工作，对于促进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形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经过

在上述“跟中国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趋势的发展基础上，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讲话的过程中。于 1956 年初终于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波澜壮阔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提前实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

1956 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是在首都北京开始的。1955 年 12 月初，北京市委抓紧成立了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及各行各业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训练了准备派到公私合营企业去当公方代表的干部。12 日至 16 日，北京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和学习了中共中央的决议草案和毛主席的讲话，总结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改造的经验，确定了改造规划，接着向全市党团员传达了中央精神，向私营工商业企业中的职工宣传对资改造政策。市总工会专门召开了公私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干部大会，布置全行业公私合营中的工会工作。市妇女联合会召开资本家家属座谈会，要求他们积极鼓励自己的亲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工商联于 20 日至 28 日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会上，由殷玉昆副主委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学习了陈云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几项具体指示，号召工商界努力学习，提高觉悟，用实际行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召集市工商联常委 33 人进行座谈。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会上

针对资本家的思想情况作了报告，要求他们消除顾虑，积极走公私合营这条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会议以后，向全市广大工商业者大张旗鼓地广泛地传达了会议精神，庞大工商业者受到极大鼓舞，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才有出路。与此同时，北京市的棉布业、机制面粉业又先后批准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对其他行业的资本家是个促进。所有这些，已形成了一个推动对资改造工作的群众运动。

据北京市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12月间对588户资本家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资本家积极要求公私合营的约占37%，能接受公私合营的约占58%，不肯接受或有严重抗拒行为的约占5%。自从1955年12月份以来，私营工商业纷纷申请公私合营，到了1956年新年，已进入高潮。1956年1月4日，以北京市工商联主委、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为首的全市327家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8日，连同国药业在内的20个行业、300多家商店一道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那时，各区资本家和工人到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结队游行，仅1月9日、10日两天，就有5万多职工和2万多私方人员参加游行。大街小巷的私营工厂、商店，张灯结彩，纷纷挂上了“迎接公私合营”、“庆祝公私合营”的红幅，全市充满了欢庆节日的景象。

针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北京市委认为，“北京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经到达顶点。全部资本家都已经卷入这个高潮，热烈地要求合营，极力表示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趁热打铁，过去那种由政府派下工作组，一行一业，分期分批实行公私合营的作法，已经不能与这种形势相适应了，而必须采取由资本家和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公私合营的群众运动的办法。”1月10日，市人委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35个工业行业的3990户工厂和42个商业行业的13973户座商，共17963户全部被批准公私合营。北京成为走在高潮最前面，首先基本完成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的城市。与此同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推动下，北京市的郊区农民和全市手工业者也分别进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月15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讲话中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对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共中央作出了如下批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日益普遍地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全行业公私合营，不仅是私营企业中广大职工当前的迫切要求，也已经成为资本家在党的政策教育之下和职工推动之下的几乎普遍的愿望。从庆祝合营的爆竹声中和锣鼓声中我们可以听出群众要求回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脉搏。北京市委由于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具有敏锐的感觉，因而及时地、正确地改变了自己的工作规划和常规的作法，采取了对申请合营的迅即宣布批准，先接过来再进行清产核资等工作的积极方针和办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至于各地的进行步骤和具体办法，应当由党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决定，不必、也不宜强求一致。”《人民日报》于1956年1月26日发表了《在高潮最前面》的社论，肯定了北京市对资改造工作的经验，并且表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经过几年来的实施，已经在各方面打下了巩固的基础，现在已经到了‘水到渠成，

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北京市对资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大大推动了其他城市的改造高潮。到元月底，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集中的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7大城市及50多个中等城市都相继地实现了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都纳入了公私合营等各种改造形式。1956年初，全国原有私营工业88000余户，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亿6千6百万元，到年底，已有99%户数、98.9%的职工及99.6%的总产值，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在总户数中，有1.12%转入地方国营工业，17.56%划归手工业改造，72.32%实行公私合营，8%归入其他改造形式（主要是转为公私合营商业)。全国原有私营商业242.3万户，从业人员313.8万人，资本额84100万元，到年底，已有82.2%的户数、85.1%的从业人员、99.3%的资本额，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在总户数中，有6.1%转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4.9%的实行不定息的公私合营，11%的实行定息公私合营，35.6%的改造为合作商店，24%改造为合作小组，私营饮食业有86%，服务业有77.6%实现了改造，私营轮船业和汽车运输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四、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成就和问题

在1956年初公私合营高潮中，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取得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胜利，这是一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具体地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成就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提前基本上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历史使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奠定了经济基础，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2. 使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为最后实现消灭阶级、改造人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3. 迅速而大幅度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达191.1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32%，1957年又比1956年增长8%，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较1956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15%以上，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1955年提高了20—30%。

在对资改造过程中，由于统筹兼顾方针的贯彻执行，不仅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获得同步发展。以各种经济成分的产值占工业部产值的比重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从1949年的9.5%上升为1956年的32.5%，社会主义工业从1949年的34.7%上升为1956年的67.5%，两者都是逐年上升的。与此同时，包括对资改造在内的三大改造，不仅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与195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7.8%、11.4%与3.5%。

综上所述，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场涉及几亿人、大规模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变

革中，我国不仅在经济上没有遭到破坏，避免了生产力下降的情况，而且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联系，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充分利用这部分企业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积累资金，培训工人与干部，有力地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今后的一切进步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就。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论在指导思想上与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有的还比较严重，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造成不良的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改造的要求过急，速度过快。195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资改造工作会议，针对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取得决定的性的优势地位以及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困难重重等情况，决定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在全国各地按行按业、分期分批地来进行。”在这以前不久，10 月底的工商界代表人物的座谈会上，李烛尘等人曾提出工商界也要掀起一个对资改造高潮的主张。毛泽东对此曾表示不赞同，对李说：“你那样搞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但是，在党内批判右倾保守的调子越来越高，各地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个接着一个到来的形势下，首都私营工商业的资本家与职工出于对实现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终于首先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在作了郑重考虑以后，“改变了原定计划，在全国各地一次批准了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适应当时的要求，这种改变是必要的。”这样，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提前两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改造。这不能不说是步子迈得太大了，许多部门和地区的各项准备都很不足，仓促上马，组织指导工作没有跟上，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损失。

2. 党和政府改造手工业和小商贩的原则是逐步引导它们走合作化道路，同时还可适当保留一些个体经营。但由于大多数个体商业、个体手工业纷纷要求公私合营，认为不给他们定息、发固定工资是“共产党嫌贫爱富”，又由于对资改造主管部门的不适当合并以及盲目追求改造的高级形式，因而造成合营、合作的面过宽，经销、代销、自营的面过窄的错误。1955 年个体手工业者参加合作组织的人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上升，其中相当多数既未经过合作社，也未经供销合作社阶段，一跃而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不仅如此，在高潮中，还有占资本主义工业与个体手工业总户数 40%的 48200 多户，从业人员 126000 人的个体手工业进人公私合营。又据统计，1954 年私营商业中有 96.496 的户数是小商小贩，1.6%的户数雇工不满 2 人，只宜实行合作或保留个体经营，但高潮的结果，在 242.2 万户总数中，保留个体经营的仅占 17.8%，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占 59.696，转入国营、供销社及定息公私合营的占 17.7%。

由于改造的面过宽以及与资本家同样拿定息，使带进公私合营企业的大量的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被笼统称为“私方人员”，被错当作资本家对待，后来又长期没有把他们区别出去。这就混淆了阶级界限，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他们

的家属和子女后代造成许多不良影响。有些"三小"即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认为自己是"小鱼上大船"，"陪着资本家改造"，有的人长期在企业里当"瞎子"、"聋子"和"哑子"，有的有技术也不愿施展。甚至不少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有的还受过不应有的打击，吃了不少苦头。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 年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之后才得到解决。区别的结果是：全国参加公私合营的工商业者有 86 万人，区别为劳动者的有 70 万人，占 80%强。

3. 对于相当大一部分资本家的使用和处理不当，影响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在高潮中，为了改造资本家和把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搞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利用资本长处，安排好资本家的工作问题。陈云在党内外反复地强调指出："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而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这是因为"资本家有本领"，"是因为他有知识，对我们有用处，对发展生产有好处。"他联系过去苏联出美元聘请美国专家的事例作了对比后说："现在我们不需要出美元、洋房，资本家还敲锣打鼓来向我们要求工作，给他们工作就高兴，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不用他们就是傻瓜，这不能说是懂政治。"但是，不少同志感到和资本家相处，"左了违反统战政策，右了丧失阶级立场"，因此，在工作中对资本家"敬而远之"，宁"左"毋右，总是不信任，不使用，以致许多资本家普遍感到有职无权，"坐冷板凳"，说"安排私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不能充分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与这一点相联系的：在高潮中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如精打细算，生产质量优良的名牌货，注意产供销信息，迅速适应市场需要等，不仅没有看作"民族遗产"加以保留，反而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否定了。所有这些，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来说，都是损失。

4. 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经济改组盲目合并过多。针对我国私营工商业十分分散，中小型企业占优势的特点，在高潮中进行适当的经济改组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不能盲目进行。为此，党和政府规定了"大不动，小部调整"及"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等改组原则。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不少地区还是进行了步子相当大的"裁并减合"，发生了盲目合并过多的现象。据 1957 年 6 月统计，全国在高潮中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中，经过生产改组，合并的约占半数以上，实行联合管理的只占三分之一，其中实行统一核算又占半数。在调整商业网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总之，是并得过多，统一计算盈亏的单位太大。"结果，造成生产单调，经营特点丧失。不少商品花色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商业网点不足，流通阻滞，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不利于生产和流通。

5.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由于对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很不平衡的状态不重视，在改造的要求和做法上，存在着"一刀切"的严重弊病，以致影响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些边远地区，经济本来就落后，工商业很不发达，基本上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需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多保留一些私营工商业，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改造得太彻底了。例如，广西由于在高潮中对不少地方，尤其是在农村初级市场的小商小贩排挤过

多，而国营、合作社商业的工作跟不上，造成小商小贩经营不下去而失业，农民要卖的东西卖不出，要买的东西买不到，严重阻塞了城乡物资交流，加深了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这种现象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也有发生。据调查，浙江吴江县铜锣镇，过去以生产肥猪、烧酒出名，在 1956 年的改造高潮中，因大搞商业国有化，市场贸易受到打击，有 200 名经商的小业主和学徒无以为业，只好离镇外出，另谋出路。这样，影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加上农业生产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农民很少有商品拿到镇上出售，就更使小城镇加剧衰落，使农民生产萎缩，向自然经济倒退。

1956 年上半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八大前后，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八大的一系列决策，就是这些探索的积极成果。针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给我国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些弊病，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不怕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作为补充和比较者”，“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相应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执行了很短的时间，及至 1957 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就因党的“左”倾错误而中断了。

第六章　改造个体手工业

中国的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50年代中期，个体手工业同个体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纳人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件大事，值得认真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手工业生产在全国经济中仍占相当大的比重。1951年11月的统计表明，手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的总产值的15—20%，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中，手工业品占80%左右。据1952年的统计，全国农业产值、现代工业产值、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0.5、28.3和21.2。当时，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显著下降了，但对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仍起着有力的补充作用。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工艺手工业品更是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我国是人多耕地少的大国，资金短缺，经济技术发展很不平衡，在相当时期内都将是最先进技术、一般先进技术、中间适用技术和落后技术同时并存，电子化、机械化和手工操作同时并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手工业都将是消灭不了的。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尽管会有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被淘汰。某些特种工艺只适用于手工作业，强用机械化代替将失去它的特点。由于手工业是一个劳动力高度密集而资本有机构成特别低的经济群体，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适当发展手工业，对于解决就业这个难题也是有利的。1957年，朱德同志在中华全国手工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很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这既简明扼要又非常深刻地阐明了手工业生产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

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它又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是手工业的两极分化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私有者，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改造，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发展。但并不是每个手工业者都可以成为资本家的，而只是极少数人发了财，大多数人破产失业。这就说明手工业者向资本主义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其次是我国手工业者在生产上、生活上仍有很多困难，原因就是，他们生产分散，资金缺乏，工具少且落后；他们的生产极不正常，旺季忙、淡季闲；他们在原料与成品的买卖上，又受到商人酌中间剥削。因此，国家必须领导他们组织成为合作社，集中购买原料、推销成品，防止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剥削，使他们的生产走向正常，更好地为农业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一、民族手工业的基本特点

手工业，简单地说，就是主要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和服务业。建国初期的手工业，就其与农业分离程度来说，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从属于农业的自然经济形态的家庭手工业，如自制农具、衣服等；二是农家兼营的商品性手工业；三是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四是雇工经营的工场手工业。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主要是第三类，即个体手工业，其次是第二类中以经营商品性手工业为主的兼业户和第四类中雇工不足4人（学徒不管雇工）、本人参加劳动而且是手工劳动出身的工场主。至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中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都归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第四类中雇工超过4人的工场主，一般归入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

个体手工业同个体农业比较，就其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来说，有一些基本共同点，这主要是：第一，都是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经济。据1952年对16个城市的调查，城市个体手工业户平均每户劳动力不到3人，农村大多只有1人。1954年调查，城市户均2至2.5人，城市绝大部分1户1人。从布点方面来说，农村手工业往往比农业更分散，如有些农村甚至十里八里还不到一个木工或裁缝。

第二，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户中的中农、贫农一样，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都自食其力，不剥削别人，而且都程度不同的遭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的剥削。

第三，生产不稳定，容易发生两极分化，农业有季节性，不少手工业受农业季节性影响，也时断时续。生产的季节性，使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个体经济本来就是脆弱的。由于天灾、人祸、市场竞争和生产季节性影响，使个体手工业者同个体农民一样，很容易发生两极分化。

以上基本的共同点说明，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业一样，采用合作化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行的。

个体手工业有不同于个体农业的特点，这主要是：第一，没有多少生产资料，资本有机构成比农业还低。个体农民种地，一般需要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而个体手工业者却只需要简单的工具。据1953年对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86811户个体手工业户调查，平均每户资金851元（指新币，下同），而其中90%以上的户，资金不过300元左右。在这些资金里，主要凭手艺养家糊口。因此，手工业者常把自己的双手比喻成“十亩良田”。所谓“手艺手艺，无本生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体手工业生产依赖于供销关系的畅通。个体手工业经济是小商品经济，它的生产活动离不开市场，通过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同其他经济和消费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供销关系一断，生产就无法进行。

第三，行业众多，经营灵活。在分工不发达的古代，手工业生产行业之多，使人们通称手工业为“百工”。随着分工的发展，当今手工业就更多了。按其产品用途来划分，

大部分属消费品手工业，少部分为生产资料手工业和服务业。与农业基本上只能布局在农村不同，同一行业的手工业，往往城乡兼有。据1954年统计，按全国商业性手工业总产值计算，城市和农村的比例为42.9:57.1。由于行业多，规模小，兼跨城乡，因此经营方式十分灵活，有的坐店设厂，有的走街串巷，许多手工业者常常频繁往返于城乡。有的加工性的手工业户，则通过传统的“领原料，交成品”的方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城市现代工业联成一体。例如，建国初期，上海有一家行销全国的毛巾工厂，它自己有一套整染设备，但织机却只有40余台，它的生产基础是上海县和川沙县的几千户手工作坊、个体手工业者或兼业农户。它通过发原料，收成品的方式，同分散在城乡的手工业者联系起来。北京市著名的戴月轩、老胡开文毛笔店，自己不制造毛笔，他们的毛笔都是广大分散的手工业者用领来的原料按照严格的规格质量代为加工的。

第四，技术传授主要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由于市场竞争、手工业者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因此，手工业技术是不轻易传人的。传统的传授方式是拜师学艺。为防止师徒间的竞争，常常保守技术秘密。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这种竞争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某些“绝招”还有“传子不传女”的陈规陋习。

上述特点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必须同农业合作化有明显的区别。

二、对个体手工业改造方针的确定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就有通过组织起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经验。建国前后，刘少奇同志集中研究了这些历史经验，对恢复时期手工业合作事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1949年5月，他提出，对手工业合作从供销入手，先办“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为手工业者收购原料，推销出口产品”，“办广大群众需要的、容易办的合作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或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1950年7月，中财委召开了中华全国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法（草案）》中，明确规定在市民和工人中组织消费合作社，农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城乡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商业的和生产的组，去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这种手工业合作是从生产中最困难的供销环节入手，保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不变，尽量不采取开设工厂的方式，也就是先不要改变所有制形式。

1952年8月，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总结组织和管理合作社的经验，手工业的改造处在重点试办的阶段，强调组织一个，巩固一个。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恢复时期的手工业合作事业，一方面，有一些同国民经济关系最密切并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中，选择觉悟较高又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劳动者，重点

试办合作社；另一方面，对一般个体手工业者，从他们最困难的供销上给予帮助，采取从供销入手，组织加工定货，给予银行贷款等措施，支持和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生产自救。建国之初，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为585万人（另有农民兼营性手工业者1200万人）。恢复时期的三年，经过重点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由300多个发展到2700多个，社员人数从8万多人增加到25万多人。这为手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进一步组织起来，打下了基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手工业合作化还处于重点试办阶段，发展较慢。1953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手工业合作化由重点试办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同年11月20日至12月17日，全国合作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了题为《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他主张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应该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绝对不要规定一个格式。会议提出：手工业合作社组织必须根据生产需要和手工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式，由群众自愿地组织起来，坚持“积极领导，稳定前进”的方针。

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经验，明确提出了由低级到高级的三种组织形式：第一种是手工业生产小组。这是组织手工业者的低级形式，也是手工业者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仍然是分散生产，只是从供销方面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第二种是供销性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形式是对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它的特点是，生产资料仍为私有，一般也是分散生产，也是在供销环节上组织起来，但它已在有些生产环节上开始集中生产，并开始购置公有的生产工具。因而这种形式比手工业生产小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三种是手工业合作社。这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和主要形式。它的特点是，生产由分散变为集中，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它根据生产资料公有程度的不同，区分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两种。会议认为，从经济上讲，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即生产资料全部公有了，才算完成。

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1954年11月，国务院专门建立了手工业管理局。12月，第四次全国手工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1954年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布置了1955年的手工业生产任务。1953年以来，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加以对主要农产品和某些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统购包销，手工业的原料供应遇到了困难，个体手工业者困难尤大。会议确定了1955年手工业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摸清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整顿、巩固、提高现有合作组织，在此基础上，从供销入手适当发展新社。1955年5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会议报告时指出，对手工业供、产、销和手工业改造，要同时考虑，要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定前进”的方针。会议精神的贯彻，促进了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近5万个，人数近150万人。这个发展速度是符合当时手工业的实际情况的。

三、批判“小脚女人”加快改造步伐

1955年下半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当时，在批判“小脚女人”的冲击下，农业合作化一马当先，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向高潮作了部署。在这种形势下手工业改造的步伐也急剧加快了。

同年11月24日，陈云向有关部门指示，“手工业改造不能太慢了”，“如果手工业这方面的改造速度慢了，那就赶不上了。”

12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同时，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还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80%。

12月20日，刘少奇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提出：手工业改造不应比农业慢。与其怕背供销包袱，还不如把供销包袱全部背起来好搞些。他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在1956、1957年两年搞完，说“时间拉长了，问题反多”。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国家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与12月21日到2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怕背供销包袱而不敢加快手工业合作化步伐的“右倾保守“思想。随后，中共中央在批转第五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于1956年初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也提出了加快手工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他说：1955年下半年出现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又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1956年3月4日，他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即34个部委汇报之一）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

根据中央加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指示，在紧接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之后，又掀起了手工业改造的高潮。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同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经过调整为9.91万个，其社（组）员达到509.1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至此，手工业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

四、手工业改造的失误

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看，建国后，党和政府根据手工业的特点、现状和发展的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手工业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引导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是及时的、正确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供销入手，重点试办，由供销合作社取代资本家，去给个体手工业者“发原料，收成品”，有力的医治了他们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恢复。1953 年以后，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对手工业的供销关系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从而使手工业成为大工业的有力助手。这六年改造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具体决策基本上也是从手工业实际出发的，因而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好的成绩。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手工业的改造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四“过”的缺点，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的主要表现是：过分追求改造速度，生产上盲目集中，组织形式上一律合作，管理上统一核算。据当时统计，石家庄市将 88 个社合并为 31 个社，其中人数最多的社社员达 1400 人。广东省有的综合社包括 14 个行业，有的跨地区的社纵横达 60 华里。四川省眉山县五金社把 13 个乡的烘炉、制秤、自行车、钟表修理等行业组织在一起，发一次工资骑自行车要走 7 天。上海修理自行车行业 1808 个服务点，改造高潮一开始就撤掉 450 个。沈阳北市区原有 103 户个体服装店。改造高潮时组成一个缝纫合作社，只设 10 个门市部。有些特种手工艺，比如雕刻也组成合作社，每礼拜开一次会，进货、销路都是统一的。

盲目集中，一律合作，统一核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群众生活和生产不方便；原来分散经营的供销关系割断了，而合作社的统一经营一时又建立不起来，致使生产停顿；吃“大锅饭”，出“大路货”，产品品种减少，质量降低，某些传统名牌产品失去了原有的传统风格，合作化后，师徒都成了社员，原有的师徒关系淡薄了甚至割断了，这对技术传授是不利的；由于盲目集中，缺乏厂房和生活服务设施，一时造成混乱，使手工业者本来就不多的财产受到损失。

中央从发动手工业改造高潮开始，就估计到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上述问题一出现，曾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各地按照中央的精神，努力纠正手工业改造高潮中出现的一些缺点。盲目集中合并起来组成的手工业合作社，很大一部分改成了合作小组，通过调整体制，还对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供、产、销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生产任务比较饱满，一改过去生产时断时续的壮态。经过这些工作，使走上合作化道路的手工业者心情舒畅，劳动热情提高了。因此，1956、1957 年内，虽然手工业产品的质量有所降低，花色品种有所减少，但生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56 年，手工业合作社（组）产值 76 亿元，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指标。人均年产值 1702 元，比 1955 年提高了 33.5%。

新社员同入社前比较，老社员同 1955 年比较，50%增加了收入，劳动条件亦有较大改善。

五、手工业合作化后的盲目升级过渡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的指导思想，第一步是实现合作化，第二步继续向全民所有制过渡。1956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听取国家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时指出："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他肯定"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原料还是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制。"在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和刘少奇同志 1955 年 12 月 20 日说的不要怕背包袱的那段话的精神的影响和推动下，手工业在合作化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新阶段。

1957 年 3 月 21 日到 4 月 25 日，国家手工业管理局召开了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关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会议提出，经省市自治区批准，选个别有条件的手工业合作社进行试点。中共中央于 9 月 1 日批转了这个报告。

1958 年 3 月召开了成都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并要求 5 年到 7 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产值。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手工业合作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转为县的手工业联合社经营的合作工厂，取消分红制，改用工资制这以后，许多地方出现手工转厂过渡的热潮。到 6 月底止，已转厂 12500 个，职工约 80 万人。河南省新乡市、广东省佛山市、江苏省淮阴县等，已经基本转完。

1958 年 7 月 25 日到 8 月 4 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省市自治区联社主任会议，集中研究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会议向中共中央作的报告认为："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发展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新阶段。"过渡形式有两种：一是过渡到联社经营的合作工厂；二是直接转变为地方国营工厂。由于联社财产已经完全归地方党政机关掌握。因此，合作工厂实际上也是过渡高潮。到 1959 年 5 月止，全国 10 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500 多万社员中，已经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的占 37.8%，转为合作工厂的占 13.6%，转为人民公社工厂的占 35.3%。继续保留合作社形式的只占 13.3%。

手工业合作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以为生产关系越高级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不正确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社会变革。它把本来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手工业者或手工业合作组织中的绝大部分纳入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的体系，抑制了手工业生产经营的活力，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成为国家的一个包袱。在农村里，手工业合作社的升级过渡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步骤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的说，没有也不可能起到促进作用。

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初步总结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的历史经验，着手对从合作化到转厂过渡中一些不妥当的作法进行纠正。《草案》规定："我国手工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在三种形式中，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集体所有制手工业组织形式，有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小组、手工业合作工厂；城市有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分社的工业和手工业；农村有人民公社社办工业、社社联营工业和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手工业生产小组，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原则上都要实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经济发展、自负盈亏，反对不讲经济原则的'吃大锅饭'的做法，反对依赖国家包下来的'铁饭碗'的思想。"据1962年10月20日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报告，各地根据1961年手工业四十条的规定，初步调整了手工业的所有制关系。到1962年6月底止，全国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包括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供销生产社、手工业合作生产小组、合作工厂）有302万人；由手工业部门管理和领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有50万人。此外，有个体手工业者100万人。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原来由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得不合适的，应当在精简多余人员后，再退回集体所有制手工业合作社。"中央关于调整手工业所有制关系的批语的精神，在手工业工作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

对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极其艰巨复杂的事情。在建国头6年，手工业的改造取得好的成绩，对其中的失误及时进行了纠正。1957年以来，手工业升级过渡，造成又一次失误，虽对手工业所有制关系作了一定的调整，但遗留了一些不利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致使某些特种工艺失传。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这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这一重大认识的取得，是同总结包括手工业改造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这个认识的飞跃，也为正确看待我国的手工业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国手工业的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第七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及“156项工程”建设

古人说：创业难，守成也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长达28年的艰苦卓越的斗争之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然而，革命的胜利仅是历史新的篇章的开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所指出的那样，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中国共产党上升到执掌全国政权的地位后，在有着“百年魔舞”历史的东方大国里，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经济烂摊子上，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业。到1952年，短短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曾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接着，制定和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尤其是“一五”计划中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构筑了牢不可破、巍然屹立的新生共和国的“钢筋铁骨”，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

一、三年恢复，功不可没。但1952年我国人均钢产量尚不及印度，比发达国家差距更大。毛泽东说：我们只会制造桌子椅子，连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不要翘尾巴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苏汉诺夫等人散布谬论，说俄国历史的磨还没有磨完烤制社会主义这块小麦馅饼的面粉，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借以否定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列宁对此给予了反驳，指出，历史发展的顺序不是固定不变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应当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去发展生产力，达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化水平。政治革命是经济建设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富强开辟了广阔道路。毛泽东同志曾预言，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工作重心从军事转移到经济。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49年9月，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一总口号和任务。在中

国共产党的指导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车轮启动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建设，必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多年的战争破坏，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元气大伤，发展经济的基础极为薄弱。1949 年，同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钢产量减少 80%，仅为 15.8 万吨，煤减少 48%，为 3243 万吨，粮食减少 25%，为 11318 万吨，棉花减少 48%，为 44.4 万吨。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 17%。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27 美元，不及亚洲平均 44 美元的 2/3。在这样的底子上，把国民经济治理好，把建设搞起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怀疑共产党有这样的能力。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从来就有的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新长征。

建国后头三年，在进行各项社会政治运动的同时，全党全国人民首先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到 1952 年，工农业生产已经普遍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有些产品的产量还超过了这个水平，国民经济不仅在数量上有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提高。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达 810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49 年的 30%上升为 1952 年的 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 17%上升为 26.6%。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26.4%上升为 1952 年 35.5%。三年恢复所取得的成就，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在恢复时期的工农业生产虽然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但必须看到，解放前的水平是极为低下的。因而，恢复时期刚结束时的我国国民经济，仍然是十分薄弱和落后的。

1952 年，我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 1950 年的印度。如人均钢产量，中国为 2.37 公斤，印度为 4 公斤，美国为 538.3 公斤，日本为 81.7 公斤，苏联为 164.1 公斤；如人均发电量，中国为 2.76 度，印度为 10.9 度，美国为 2949 度，日本为 604.1 度，苏联为 553.5 度。这时，我国许多工业部门还未建立起来，农业生产手段也很原始，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国民经济整体水平仍然很低。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指出：“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中国人还得谦虚谨慎，发愤图强，继续奋斗。

就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全党各项工作树立了不可偏离的灯塔。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党中央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描绘了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蓝图。

二、缺乏编制计划的经验，“一五”计划草案带到莫斯科，苏联领导人

说：这哪象计划，连指令也不够。周恩来指导，陈云、李富春主持，历时四载，五易其稿后，“一五”计划出台

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面临许多困难。除了国力薄弱、物质基础差、底数不清外，再就是缺乏编制覆盖面广、内容丰富、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财委和后来成立的国家计委，曾经编制过几个粗线条的年度计划纲要，也曾试行编制十年或十五年的远景发展规划，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没有搞出成型的东西。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会议指出，这个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根据会议精神，中财委于当年春提出了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成为编制“一五”计划的最初尝试。

一九五二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同年八月，仍由中财委具体负责，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这一草案，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计划轮廓，提出的计划指标过高，但它为以后修订计划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蓝本。

一九五二年底，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时，作出四项指示：一是要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二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国家重点建设上；三是要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四是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能够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央的这些指示，在后来的计划编制工作中得到了贯彻。

一九五三年初，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各大区，在广泛收集资料、数据的基础上，对上年编制的计划草案作了必要的充实和调整。六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央的要求，按照“计划指标应留有余地”的精神，下调了原计划中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等指标，并在计划中强调在重点发展工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这些重大修改对于计划编制工作的最终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4年4月，中央决定调整领导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班子，成立由陈云为组长的8人小组，成员有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8月，在陈云和李富春主持下，8人小组审议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了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精神，对草案又进行了修，改，使之臻于完善。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至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圆满结束。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编制计划工作十分重视。他们不仅对计划的方针任务作出指

示，从宏观上加以指导，而且对一些具体问题也予过问、研究。1954年10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了1个月的时间审议“一五”计划草案。周总理经常主持国务院会议，对计划细节逐一加以计算、商讨、研究和修正。陈云和李富春为编制好计划，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有时彻夜不眠，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富于成效的工作。“一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可贵的成果。

“一五”计划同时又是向苏联学习和苏联帮助的结晶。苏联是最早实行计划经济并且成就最显著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决定了只能向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经验。1952年8月，当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后，中国就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携带《草案》赴苏联，征询对计划的意见。苏政府领导人看过《草案》后说，这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他们表示愿意对《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

周恩来和陈云在苏逗留期间，两次拜会了斯大林，并专就“一五”计划问题作了请教。斯大林指出，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斯大林指出，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为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指出，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和事变。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在后来定型的计划中得到了采纳。

1953年4月，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国家计委和苏有关专家对中国“一五”的意见。其要点是：“一五”计划的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任务是正确的；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要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要注意农业、手工业和小工业的发展等。这些意见虽然是根据苏联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也符合中国实际，成为修改“一五”计划的重要参考。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草创到定案，历时四载，边编制、边修改，五易其稿。透过编制的过程，可以想象出此项工作的艰巨和艰辛，可以想象出年轻的共和国创业的艰难。计划编制能够圆满成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脚踏实地的作风，谦虚学习的胸怀，敢于探索的精神，审慎认真的态度。“一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一笔精神财富。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在通过这个计划后认为：中共中央主持制定的这个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

三、计划投资总额折合黄金达7亿两，如此建设规模乃空前壮举。中共从长计议，施“大仁政”，搞重工业。苏联承诺援建“156项工程”，陈云说，苏援助是真诚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键步骤，是总路线“一化三改”内容的具体化。“一五”计划的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

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根据上述任务，计划规定，在"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属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占总支出的55.8%。工业是基建投资的重点，占58.2%。重工业又是工业基建投资的重点，占88.8%。农林水利在基建投资中占7.6%，运输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质储备占3%，文教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上述支出总额折合黄金达7亿多两，这样的建设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计划还规定，工农业总产值要由1952年的827.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1249.9亿元，增长51%，平均每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270.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35.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及副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483.9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96.6亿元，增长23.3%，年均增长4.3%。此外，计划对运输邮电、社会商品流转额、教育、人民生活增长情况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情况也作了具体规定和安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是工业化建设，而重工业又是工业建设的重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近代中国百年来之所以积贫积弱，原因之一就在于工业落后。新生共和国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文化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逐步实现工业化，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从哪里入手，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决定优先和重点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最为根本的立足点，是擎起社会主义大厦的栋梁，是社会主义能够顶天立地、百摧不折的"钢筋铁骨"。伟大导师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大机器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发展轻工业，固然投资省、见效快，又能直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但如果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设备从何而来？如果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创造任何机械的原材料也无从保证。如果没有能源和交通，整个国民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机器依赖进口，其一我们缺乏资金，其二帝国主义实行封锁，其三全部依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既不现实，亦非长久之计。因而，要建设工业化，要更好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一五"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共势力，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虎视眈眈，欲扼杀之于摇篮之中。他们之所以胆敢发动和扩大侵略朝鲜北方的战争，除了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胆略外，再就是认为中国累年战争，元气大伤，小视新中国的力量。这场战争给人们以教训，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和"武力威慑"必须用革命的钢铁武器来还击和粉碎。战争中消耗的相当部分的军火都是由苏联提供的，这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任何新的战争企图，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增强自己的国防力量。

当时有些人看不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中国历经多年战乱，亟需休

养生息，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应多搞些轻工业。还有人提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可以既利民又利国，这实际上也是没有把重工业放到应有位置。毛泽东把这些观点称为“小仁政”思想，对它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强调我们要改善人民生活，但更要进行重工业建设。

毛泽东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这是毛泽东同志于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的一段话。它告诉人们，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农业一样，都是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计；但发展重工业，为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无远虑必有近忧。从长计议，人民的眼前利益才有可靠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是智举也是善举。

怎样发展重工业，上哪些项目，部门间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当时并不太清楚。所以“一五”计划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作为工业化建设、也是重工业建设的中心和重点。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工业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156项工程”成为联结中苏两国兄弟般友谊的纽带。

“156项工程”项目是中苏双方经过多次商谈才确定下来的，有的是中方提出，有的是苏方先提出。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访苏。中苏双方经过谈判，于次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署了关于苏联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大军港的协议。就是在这次访问中，还商定由苏联援助并贷款进行恢复、改建和兴建50个大型工业企业，这成为后来的“156项工程”中的首批项目。

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由陈云、李富春及政务院各部委领导人参加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征询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并提出对苏联科技和建设援助的需求。有关的基本原则确定后，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李富春等留在莫斯科学习、研究、谈判达9个月之久。直到次年5月，李富春和米高扬才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对91个大型工业建设项目给予经济技术援助的协议。

1954年，双方又商定增加15项。这样，苏联援建项目达156个。后来经两次商定，又增加18项，五次商谈共确定项目174项。后经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合并，有的一分为几，有的推迟，有的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为“156项工程”。

“156项工程”主要是重工业项目。从实际施工的150项看，军工企业有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建设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中部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和西部

的有35个。通过这150个项目的建设以及为其配套的项目的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工业畸重沿海的状态，迅速展开较为合理的工业布局，建立起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

苏联的援助并不是无偿的。比如1953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苏援建项目的补偿。但苏联的援助确实是真诚的。他们动用人力、物力，帮助中方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建设，表现出高度的国际主义。陈云同志曾经身有感触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

四、全国人民建设热情驱动历史车轮驶抵1957。速度快，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成就大，近代百年前所未有；效益好，新中国四十年唯此为上。然而，一个口号、一场争论，却诱使前进车轮滑离正轨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修改完善的过程，也是具体实施、投入建设的过程。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宣告：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满怀极大热情，积极投身到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中。经过五年艰苦奋斗，在提前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又全面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和生产指标，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五年内，完成基建投资总额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建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的建设单位有428个，部分投产的有109个。由于这众多建设项目的上马，使过去没有的许多新工业建立起来，工业结构大为改观。

能源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在"一五"期间，能源工业在施工的重点项目中占很大比重。建成投产的煤矿有：辽宁抚顺矿务局西露天、老虎台和龙凤个矿，阜新海州露天矿和平安立井，黑龙江鹤岗东山、兴安台两个立井，鸡西城子河立井，陕西玉石凹立井。建成投产的电站有：抚顺、富拉尔基、吉林、大连、佳木斯、石家庄、太原、包头、武汉、株州、郑州、洛阳、西安、乌鲁木齐、重庆等电站。扩建的油矿有甘肃玉门油矿。

钢铁是现代工业的脊梁。"一五"计划实施后，不仅充实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而且在内地也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大型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11月先后建成。该公司薄板厂、第二初轧厂也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竣工投产。此外，北满钢厂、本溪钢铁公司基本竣工。武汉钢铁公司及包头钢铁公司的第一期工程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正式施工。

机器制造是现代工业的心脏。"一五"期间有一大批机器制造业工厂相继竣工。第一座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于1956年7月试装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分别于1955年、1957年竣

工投产。第一座飞机制造厂正式投产并于1956年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于1956年10月建成正式开工生产，试制成功了10多种电子管。到1957年底，还有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哈尔滨电机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沈阳电缆厂及兰州石油机械厂等一批重点项目也接近完工。

此外，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轻纺工业、建材和森林工业等，也都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使工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工业经济结构有了改善。五年内，工业总产值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了128.3%。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6.6%上升到43.8%。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45%，使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

中国在"一五"期间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53年到1957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工业生产指数为：美国2.8%，英国4.1%，中国18%；钢为：美国3.9%，英国5.7%，中国31.7%；原煤为：美国0.4%，英国负增长，中国14.4%；发电量为：美国9.1%，英国7.8%，中国21.6%。如此快的发展速度，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工业建设的强劲势头，表明了新中国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和富强的历史真正揭开了新的篇章。

"一五"期间，不仅经济发展速度快，而且经济效益好，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年段。这里拿1957年的数字同后来最好的两个年份作一比较。百元资金实现利税，1957年为34.85元，1984年为24.76元，1988年为.20.063元。百元工业产值实现利税，1957年为34.70元，1979年为24.21元，1988年为17.84元。此外，"一五"时期经济效益好还表现在建设周期短，物质消耗低，能源利用率高，流动资金周转快，劳动生产率高等。

"一五"期间，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一定提高。各行各业轰轰烈烈，蓬蓬勃勃，整个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全社会呈现出崭新昂扬的精神风貌，社会主义的中国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和希望地把社会主义建设的车轮推向新的前程。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笔直的，前进的路并不是平坦的。"一五"计划执行到1956年初，经济建设中出现急躁冒进倾向，造成国家物资和资金紧张状况，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主持下，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从而煞住了建设中超越实际盲目加快的倾向。然而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主要的还是进。1957年1月，毛泽东开始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

说反冒进的结果出了个“右倾”。到了1958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严厉批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是政治问题，是“非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过高的口号。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期间率先提出“赶超英美”的口号。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指出，在1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中国可能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乘风破浪》社论，再次提出超英赶美任务。批评反冒进，号召赶英美，很快酿成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动向，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起来并支配了经济建设大局，催生了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重大挫折的“大跃进”运动。“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6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重大历史转折时刻举行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它总结了“七次”以来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经济建设上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指出的：八大通过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八大”召开前党面临的形势

首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引起党中央领导层的深刻思考。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方面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骄傲情绪，不谨慎了，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搞个人崇拜，以至发展到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国内搞肃反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又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在国际问题上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暴露出苏联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使苏联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提高不快。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斯大林的错误，以及苏联经济建设中长期积累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密切注意和深刻思考。怎样才能避免斯大林犯过的错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得更好，这个重大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第二，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我国发展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高潮，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到1955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已不再是国际生活中的孤立现象。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在广大区域建立的殖民体系已经瓦解，帝国主义阵营更加剧了离心离德，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党中央认为，在世界和平呼声非常强烈的情况下，世界大战不会爆发，而这对我国发展经济建设十分有利。周恩来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讲：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对我们有利的，日内瓦、万隆会议的召开是“精神不死，冷战长存”。……现在的情况是：帝国主义想打又不敢打。

第三，面临国内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党急待制定出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了三年的经济恢复，党成功地领导全国人民医

治了战争的创伤，使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原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上半年已经基本完成，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建立起来，“七大”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崭新时期的客观要求。

面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认为需要对“七大”以来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工作进行系统地总结，作出正确结论，制定出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继续前进的目标和建设任务，所以决定召开党的“八大”。

二、准备“八大”的三大工程

1955年底到1956年初，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抽出大量时间进行调查研究。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每到一处，都找地方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南巡回京后，毛泽东得知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部门的工作汇报，认为很好，在薄一波的组织下，也从1956年2月开始以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各部门的汇报，这就是著名的34个部委汇报。各部委在汇报中主要提出了五个问题：一是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二是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三是国防工业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也就是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四是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五是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在听取了34个部委汇报、毛泽东南巡调查及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提炼并高度概括，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接着（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论十大关系》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文献，它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苏联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为“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6月18日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所讲，我们“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党中央为做好“八大”的准备工作，主要抓了“三大工程”。

1. 文件。党中央、毛泽东重视“八大”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组织了三个文件起草班子。由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组成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邓小平、

谭震林组成修改党的章程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会员；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建议的报告，由周恩来组织国家计委人员起草。

政治报告是“八大”的重头文件，因此，中央在宣布要开“八大”之日起，就着手准备。1956年7月间，政治报告第一稿写成，题名《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报告初稿写成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进行了逐章逐字的修改，仅从1956年8月31日至9月14日半个月的时间，毛泽东亲笔修改达14次。从6月下旬至9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商谈“八大”问题的会议达36次之多，其中27次是讨论政治报告。

毛泽东对政治报告每一章节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如1956年9月7日，毛泽东关于“国家”部分修改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中说：“乔木同志：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的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

对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有三处的修改十分重要。一处是毛泽东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的修改。原文是：“我们党的胜利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我们要永远纪念和感谢为党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的先烈。我们党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这四个“归功于”中的第一个“归功于”之前，毛泽东加上了“首先最主要地”；第二处是，毛泽东在修改政治报告初稿“党的问题”一章时，在有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一段文字旁，打了一个问号，并批写了“反个人崇拜”几个字；第三处，政治报告讲到党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一段，原文：“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之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在此段旁批写：“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以上重要修改，不仅反映了党反对个人崇拜、个人突出的一贯立场，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反对个人崇拜的明确态度。

新党章的修改稿是由胡乔木于1955年10月20日写成，经过中央领导和起草委员会的多次修改，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1956年5月28日，发出了《中央关于印发党章修改稿交给各地方、各单位讨论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方利用最近召开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直属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外组织代表进行专门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直属党委会将所提意见整理起来，于七月十五日以前送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将根据各地方、各单位提出的意见，再加修改，然后提到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另外就党章修改稿中各级代表大会常任制和中央机构组成两个问题，请各地方注意讨论并提出意见报中央。

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报中央。周恩来在抓“二五”计划方案的过程中，多次强调：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能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贤等其他条件。”同计委工作人员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经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努力，9月初终于搞出了一个既积极而又实事

求是的好计划。在七届七中全会修改文件时，毛泽东讲话认为“计划”和“建议”“简明扼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这样长远的计划，许多事情要做到，支票不可开得太多，采取谨慎的态度比较好，年度再去按照情况发展。”后来，这个计划受到了错误的批评，但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又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八大”各项文件经过八、九个月的起草、讨论和修改，1956 年 8 月中旬基本完成，准备提交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讨论。

2. 选举。选举是开好“八大”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对此也十分重视。1956 年 7 月 30 日中央专门成立了研究“八大”选举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认可，提出了“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选举方针。具体就是：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合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制定一个预选名单，然后再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而后再由政治局集合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候选人名单。这样，可以充分反映选举人的意志，充分发扬民主。在选举人提名问题上，毛泽东建议大家选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他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主要是过去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比如两条路线，今天在座的就有一条李立三路线，还有王明同志一条路线，……我们觉得包括他们两位都选出比较有利。……七次大会，……选举了对我们事业究竟有利还是有害？没有害，有利。”“还有党外的观感，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还要他们……。”在选举方针的指导下，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各代表团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了提名。9 月 6 日、7 日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各代表团提出的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9 月 8 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确定八届中委名额为 170 人，并通过了八届中委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候选人名单没有分别正式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9 月 10 日八大第二次预备会议，又将七中全会通过的候选人名单印发给代表，进行讨论，最后八大预备会议大体通过了这个预选的候选人名单。9 月 12 日进行预备性质的选举，这个预选是中央制定正式候选人名单的根据。9 月 13 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候选人名单，准备提交“八大”会议

3. 大会发言。大会发言质量的高低，也是“八大”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同样重视这一工作。邓小平拟定了八大日程的详细方案，毛泽东在审阅这一方案时，对大会发言的安排作了批示：“36 小时发言时间是充分的。”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大会发言，从时间、内容到文体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既要有重点发言，也要有精彩的小稿子；“总之，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发言“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对工作有意见，对党的团结有意见，要有批评，要有丰富的批评。……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是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什么?”“至于发言内容，请各代表团团长同副团长注意，要组织得比较好一点，要生动活泼、要肯定成绩、批评错误

……。”在这种民主、宽松的空气中，各代表团一方面积极准备中央交给的重点发言的稿子，一方面安排了有特色的小块文章。正是有了党中央、毛泽东对大会发言的精心布置和各个代表团的认真准备，会上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发言，为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

“八大”的全部准备工作，以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结束而告就绪。

三、“八大”会议的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在北京新落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21人（大会共有1026位代表，5人请假），他们代表着1073万党员。58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员也应邀列席了会议。

下午二时，当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以及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登上主席台时，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二时零五分，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的开幕词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接着，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王稼祥、邓小平、习仲勋等63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由邓小平为秘书长组成的大会秘书处，由董必武为主任组成的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大会的主要议程和会议规则。

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由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官僚资产阶级已在中国大陆上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也基本消灭，正在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它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界已经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这表明，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已经基本建立。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指出，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报告科学地论证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任务，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今后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巩固国防。政治报告还系统地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充分肯定了七大以来十一年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也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9月16日下午，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指出，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拟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性。报告分析了党的组织现状，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说明了贯彻群众路线对于执政党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与群众商量，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在报告中，邓小平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精辟地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党、阶级、领袖的关系问题。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报告最后讲，党的章程草案由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以后，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就近年来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指出，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第四，必须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报告中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继续完成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和继续厉行节约；争取国际援助，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文化的合作与联

系。最后，周恩来在报告中号召；"全党同志，应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加倍努力，同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起，同全国各民族、各党派、一切爱国人士一起，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9月17日，董必武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17日至25日，大会进行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共有68人作了大会发言，45人作了书面发言。

朱德在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中说，我们具备着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需的一切有利条件。同时我们正处在创立社会主义的家业时期，要靠勤劳，还要靠节俭。勤俭是我国劳动人民固有的美德。"克勤克俭，成家立业"的格言，现在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必须时刻牢记和贯彻执行的原则。朱德在谈到解放台湾时说，我们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尽可能地争取不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朱德还谈到只要我们党能够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而不犯重大的错误，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自己队伍本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巩固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团结六亿人民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他号召大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团结，并向一切不利于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因素作斗争。

彭德怀在题为《胜利完成军事工作的光荣任务》的发言中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走过的英勇奋斗的道路，指出坚决服从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密切联系群众，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这是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军在新时期的任务：就是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和安全，随时随地准备解放台湾，巩固国内的和平秩序。

薄一波在题为《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的发言中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对积累和消费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变化，基本上是合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的，但也发生过某些偏差。"实践证明，当我们对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妥善的时候，国家的经济生活就表现出协调的现象，就对于工业和其他经济部分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产生有利的影响。反之，当我们对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妥善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生活就显得不正常，工业的发展，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薄一波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在若干年内，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这样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他说，这一比例数字的提出，是根据我国近几年来的经济发展的实践，对于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初步分析的尝试，它只作为确定正确比例关系的一种参考。他强调，正确地解决积累和消费关系问题，将既可以保证我国工业建设较高速度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使我国人民的生活一年比年过得好些。

陈云在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格局，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这一极有创见性的著名论点。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

营是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生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产生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在进行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期间，共有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等49个兄弟党代表在大会上致词，大会收到并宣读了十二个兄弟党发来的贺信、贺电。17日，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大会致词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李济深说：包含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事业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说，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互相督促，各尽所能，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也向大会致了词。

9月26日，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中央委员会委员97名。27日，大会选举中央候补委员73名。接着，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决议》批准了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党的工作重点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移的标志。《决议》还明确规定把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在综合平衡中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

在9月27日的闭幕会上，陈云代表大会主席团庄严宣告："我们的大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为具体地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努力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28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

四、"八大"的成就及历史地位

"八大"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道路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大会。

1. "八大"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战略决策。"八大"在分析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发生的巨大变化后，得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结论。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再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降为次要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大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党的工作重点及时的战略转移，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了马列主义的科学总结。

2."八大"总结了"七大"以来的经验，借鉴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方案。为了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早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八大"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在生产上，提出了必须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在肯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阐明了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八大"决议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将反而削弱了重工业。在发展速度上，"八大"提出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燥冒进，综后平衡稳步向前发展的方针。也就是在充分分析了我国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市场等诸方面后，正确估计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性，积极地而又稳妥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八大"还提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八大"根据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中央过分集权的弊病，要求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发挥两个积极性。"八大"提出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加上陈云在"八大"发言中"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就初步构成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案。

3."八大"分析了党执政后的状况，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路线和方针。

"八大"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组织状况，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路线和方针。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党已处在执政党的地位，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地位很容易使一些党员沾沾自喜、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发展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产生官僚主义。因此，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就必须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

主义作斗争。同时要发扬党内民主生活，建立民主集中制。“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个人突出的任务。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作有它的某些反应。”因此，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八大”在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

党的“八大”召开时，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才七年，经验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某些盲目性，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八大”的正确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八大”的辉煌成就在于：面临国内形势和任务作出的判断，同时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经济建设政策，制定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在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中共“八大”的成就，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第九章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当新中国在隆隆的炮中诞生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一个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代——原子能时代。在这个时代来临之际，除少数科学以外，一般中国人基本上对原子能无所知，只是对原子能的威力有所耳闻；而对核战争应持的态度，中共领导人也有明确的认识。

1946 年 8 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原子战争的态度。斯特朗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绳岛以及中国基地轰炸苏联呢？"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三年后，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对原子弹、核战争的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看法，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

一、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创始于 50 年代初。

1949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将于 4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团长郭沫若、副团长马寅初、刘宁一，秘书长钱俊瑞、中国科协会员丁瓒，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等 40 人。钱三强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苦于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他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它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外汇 20 万美元。中共中央对发展新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同意了钱三强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约见钱三强。李维汉对钱三强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定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3 月 27 日，刚刚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才两天的周恩来，又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后来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

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很薄弱，原子核科学，几乎是白手起家。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1953年底近代物理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洽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的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极其重视，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磋商了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

1954年，我国地质部门首先发现了铀矿资源。这一情况，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找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矿资源等等。周恩来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你们作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

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嘱咐，他们向中央领导人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帮助李四光等人补充情况，并提醒科学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问题讲清楚，以利中央作出决策。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时候到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人才培养需要大力加强。

这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在中共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美国继续用原子弹恐吓中国；苏联则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

对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些人很担心。1955 年 1 月 28 日，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在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时，过分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周恩来当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厉害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毛泽东坦然且风趣地回答：“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对苏联许诺帮助，中国政策迅速作出了反应。1955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自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 月 31 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首次在国务院系统通报了情况，并作了动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在和平或者用于战争，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最后，周恩来向国务院系统布置了几件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他提出：“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和宏大气魄，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也激励了尖端科技工作者加速利用原子能的信心和决心。

对于苏联的援助，党中央一开始就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根据这一指示，我国在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

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1959 年 6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 年 8 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有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断言中国“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 1959 年 7 月提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 8 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也风趣地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毛泽东也早在头一年就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 10 年功夫完全可能。”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我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

二、请总理出面加强领导

在1955年1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过："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彭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为加快发展核科学技术，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共关于"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子能研究所需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原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9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机构组成以后，加紧了规划工作。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景，它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引起的工业革命。他提出我国科学界的任务，"就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

会上周恩来还宣布："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原子能利用，就是我国科技事业最急需的门类之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在周恩来亲启领导下，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5月，在全国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五十七门重点学科。原子能被摆在最为突出地位。

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退专家后，我国尖端科技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更加发愤、努力地工作。到1962年上半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

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62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提出了争取1964年至迟1964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就这一规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从更高的层次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11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阅。"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此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项工作时，刘少奇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15人组成。主任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杨。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组成了中国原子能事业（包括核工业、核试验工作、核武器研制、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等等）的领导核心。

三、中国升起第一片蘑菇云

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共召开了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另外，还召开了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地解决了原子能工业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

1962年11月17日，就在中央专委会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专委会议。详细听取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专委会，明确提出了国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弹"。这一战略重点的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明确了主攻方向，用专委会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的话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此后，中央专委会和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

在第一次专委会上，还决定从工业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专委会办公室。在第二次专委会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问题。周恩来提出，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长，要做无名英雄。"在这次专委会上，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他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同时决定有些技术设备要由外国引进。

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第三次专委会，原则同意刘杰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个规划"）。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四点即十六个字：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着重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要求："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963年12月5日，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专委会议，讨论第一颗原子试验的工作安排。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会议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二直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

在实验科研人员进行的上千次爆炸试验的基础上，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不久，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后，也于1964年1月14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科研、生产战线同志们的成绩；周恩来批示："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此后，核燃料的生产和核武器的研制进展更加顺利。到9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

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专委会议。会上，他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会议讨论了燃料保存点火控制、气象、地形、运输、组织等问题。一开始，对1964年10月还是1964年4、5月间进行爆炸试验，有不同意见，经过详细的讨论研究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争取1964年试验：由专委会起草有关报告，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同时，二机部、国防部工办等单位要积极、充分地做好准备。他还提请大家注意：对核试验的利弊要充分地估计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并要严格保密制度。

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被大家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9月28日，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试验。周恩来对专委们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党中央委员、由于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随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带领二机部的刘西翘等人前往西北核试验场，张爱萍把周恩来以身作责严格保密的话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试人员作了传达，使大家深受教育。这对首次核试验保证无一泄密事件，起了重大的作用。

周恩来在主持对爆炸试验时间有关的气象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意见向毛泽东报告后，于1964年10月14日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后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人坐阵北京，亲自守候在连接试验现场的电话机旁，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计时的声音。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也各自在办

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15时，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滚，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爆炸成功后，国外的反映接踵而至。日本东京方面广播，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接着，又收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消息。

当晚22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名演职人员宣布了这个喜讯，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内外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我国第一片蘑菇云升起，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祝贺和支持，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有力地打击了少数大国垄断核武器的阴谋，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四、发展核科技，和平利用原子能

在首次核试验当天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次日，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再次提出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和态度，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研制核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核战争，而正是为了反对核垄断和核战争，最终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核试验则别有用心地到处造谣中伤。对此，周恩来曾说："中国现在才试了一次，就有人叫起来。真好笑！如果中国没有试验，也没有人来谈禁止核试验，但我们一试验，就有人要中国参加裁军会议，说中国参加了核俱乐部。"他指出，美国提出的美、苏、英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是要束缚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足，束缚民族独立国家的手足，而允许美国试验和扩散。"周恩来还明确地说明："我们愿意促进国际合作，没有任何理由责备我们。"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的安排。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提出：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

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花了四年零七个月，而当时已用了四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经过认真，反复分析论证，认为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个飞跃。1965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的试验。"

经过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协作努力，终于在1965年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并立即布置进行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三次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可以装截导弹头的空投氢弹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技术水平也超出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干扰破坏。在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由于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原子能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得这一领域在动乱仍能继续有所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是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1970年2月、7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三次指示原子能工业部门：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根据他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我国的核电站工程被命名为“728工程”。周恩来还提出，建设核电站，要遵循“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从此，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建设核电站，和平利用核能。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周恩来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病痛主持召开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3月31日的专委会议上，审批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今日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会上，周恩来要求，建设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他指示：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要有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要从体制上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尖端科研队伍，等等。

然而，在十年动乱期间，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核电站的建设也难以进行，各方面更无法协同动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只能带着未了的心愿相继离开了人世。

十年动乱结束后，1983年6月，秦山核电站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了前期工程施工，1991年12月15日实现了并网发电。它是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第一座核电站，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国又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于1980年开始筹划位于广东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1984年4月动工兴建。1994年2月6日，李鹏总理在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投人商业运行的庆典上说：“秦山核电站是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和建设的第一座中型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则是我国引进国外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核电站。这两座核电站的建设对我国核电事业的起步，培养技术队伍，掌握核电技术，起了重要作用”。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子孙后代的心愿，正由后人来完成。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上，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第十章　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其功过是非，党中央已经作出了评价。但是，人们的认识并未尽一致。有的人只看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就否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有的人只看到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表象，而对我们党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表示怀疑。有的别有用心的人则不顾历史事实，诬蔑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的"大阴谋"。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究竟是如何酝酿发动起来的？其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变化情况是怎样的？下面根据有关材料，对这一问题作一叙述。

一、决定在全党范围整顿三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一系列民主改革的任务。1953年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经济建设的许多指标已超过或接近完成"一五"计划的规定指标，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这些胜利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历史的发展已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9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及其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社会中间的各种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波匈事件的发生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党中央、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总的是好的，是稳定的，中国不会出现大乱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把中国自己的工作做好。

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的党，已经在国家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

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希望通过党的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带动党和国家制度上作风上的改革，推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建设，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

整风运动的开展，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和准备过程的。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友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又多次谈到了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等。3月20日他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还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

4月初，中央起草《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同日，中央《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指出，整风“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和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办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为了克服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必需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提高

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便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应该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指示》还指出，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指示》的公开发表，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开展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决定开展全党整风，完全是为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所采取的措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及所规定的方法都是毋容置疑的。

二、诚恳听取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意见

在整风初期，党中央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5月4日，在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分析的态度给予回答，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5月16日，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里又一次说：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根据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为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央于5月10日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认为"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要求"包括中央委员在内的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团体中的党的主要干部，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都应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并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这个指示对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和办法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是整风运动初期中央为改进

工作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

根据中央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例如，张奚若在发言中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忽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提出，希望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刘斐在发言中说，现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就有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不正常。黄鼎臣在发言中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部署工作，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还有一些党外人士在发言中提出了应加强法制建设，改进统战工作，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作用等方面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三、右派的进攻与整风运动的转向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放肆地向党发动进攻。他们说“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形势是“一团糟”，“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右派分子别有用心地煽动和阴谋活动，加上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

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变化》一文。其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6月6日，中央在《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6月8日，中央在《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认为，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5月中旬至6月初，党中央制定出了反右斗争的策略。5月20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动》中说："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6月6月，中央《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6月8日，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低落时起，即陆续发表。"到适当时机，对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逐渐"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

《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

6月10日，中央在《关于准备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中提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应当看到，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党的领导和新生

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在这时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他几个月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鲜明地指出极少数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夸大了右派的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另外，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采取先纵后抑的作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当右派言论出现以后，即在适当的范围，采取适当的形式给予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他转化工作，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扩大化的错误。

四、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和教训

在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阶段，斗争在规模上和形式上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中央在《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曾提出：反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使反右派斗争逐步升级，莱用了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方法，扩大化的错误逐渐严重。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

6月26日，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虽然指出了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也不要扩大化。但着重点在强调右派划得太少是右的，也是危险的。6月29日，《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7月1日，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7月9日，中央在《关于对右派骨干分子点名批判和对科学家中的右派分子组织反击的通知》中说，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有八千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四千人，到估计约有八千人。其间相隔仅短短十天。

7月17日至21日，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一开始就强调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

命。”毛泽东还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篇文章于8月2日印发给党内，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步的发展。

5月份以来，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青岛会议以后，反右派斗争一方面在上述单位深入展开，一方面推向地、县两级，并推向全国各地区、各界和各部门。随着这场以反右派斗争和批判错误思想言论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整风”的开展，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迅速地蔓延开来。

8月1日，中央在《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中指出：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右派人数将逐步增多。9月2日，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说：“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已有三千余人”，并批评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的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居三中全会召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理论上的--个重大失误。

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规定了划分右振分子的六条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观定应划为极右分子的主要是右派活动中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标准》还指出了“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六种情况。应当肯定，这些标准的政策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但也存在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有些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2月8日，毛泽东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并说，这样做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2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从《原则》附录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统战部处理右派的典型材料看，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受到较重处分的占大多数。《原则》中规定的处分办法，即便对于真正的右派分子，打击也是过重的。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没有得到遏止，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首先，一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因而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其次，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来的意义，党中央、毛泽东预期的整顿三风的目的未能达到。第三，助长了毛泽东在国内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的“左”倾错误，导致了后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党中央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复查，进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81年底这

项工作基本结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除极少数以外，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这是党中央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对这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科学和公正的结论。

第十一章　1959年的庐山会议

庐山顶上有一块石碑，写着“纵览云飞”四个大字，意指庐山经常是云飞雾幛，气候变幻莫测。岂不知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前期和后期的变化，也是令人难测的。

一、从“神仙会”讲起

1959年7月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原来预计这次会议只开半个月，会议的设想是继续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既定的“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的方针，达到统一党内思想，继续跃进的目的。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在开幕式中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把“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在毛泽东看来，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没想到困难。去年做了一件蠢事，把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达到。象粮食的指标10500亿斤，恐怕要4年才能达到。粮食能否每年增加1000亿斤？钢铁每年增加多少？能增加400万吨？从毛泽东当时的指导思想来看，他是继续推动大家反对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但与此同时，他又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毛泽东7月1日写的一首《登庐山》的诗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从7月3日到10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大家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山观日出、游览风景、名胜古迹，毛泽东诗意盎然，不时作诗，别人也作诗相和。会议气氛轻松、活泼，被戏称为“神仙会”。

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到各组参加会议，和各地同志一起议论问题，交流思想，总结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7月4日，刘少奇在西南组的讨论中说：1958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

子就要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他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向它让步！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发展。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趋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的，不能要求每一年都用同样的速度"大跃进"。

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发言说，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我们对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供给制实际是共产，不能共农民的产。办公共食堂，在生产方面有好处，在消费方面吃了亏。食堂办不好，一时都垮了，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

彭德怀参加西北组的讨论，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共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他说："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上有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热了一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彭德怀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从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他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指出："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问题，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于纠正，右的东西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各种帽子压下来，对广开言路有影响。"他强调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追责任，人人有一份。他还说："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批评的话讲得较多而且坦率和尖锐，表达了他纠"左"的强烈愿望。当然，由于他鲜明的军人气质，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也难免有情绪偏激和用词不当之处。如他在小组发言中曾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周恩来在参加小组讨论的同时，多次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议形势，算细帐，讨论研究再次降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问题。

董必武在发言中强调在党内造成说老实话的空气，建议全党学习党章，每一个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老实。

在中央领导人的带动和启发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也纷纷发了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7月4日的发言中说：1070万吨钢不如800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没有那样快，最多每年增长10%到20%；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动力，农民也吃得不愉快。

在"神仙会"期间，参加各组讨论的绝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都发言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有些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是护短的。他们认为"左"的错误已经纠正得差不多了，现在问题是纠"左"

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出现了右倾错误。这样，会议中便出现了多数同少数人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大跃进和前一段纠“左”的看法不一致。作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也是气氛活泼的表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使意见统一起来。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开了一次会。在会上，他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确实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对今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他的设想仍然过高。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也继续指出1958年以来的一些“左”倾错误，但讲话的重点已转向指责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批评党内干部的“得不偿失”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明显赞成党内少数“护短”同志的意见，认为原来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已逐步得到了纠正，纠错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并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种认识上来。这对于全党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显然是不得力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讲了会议的安排，他说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结束，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大都为“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就要结束会议而忧虑，彭德怀更是忧心忡忡。

二、该不该上书说彭总

毛泽东7月10日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在各小组传达以后，彭德怀眼见会议就要结束，而并未采取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措施，“心中十分忧虑”。他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他认为，如果自己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思想混乱；但如果由毛泽东提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于是，彭德怀萌发了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看法的念头。

对于“大跃进”中带来的严重问题，彭德怀是有清醒认识的。虽然他过去也曾赞成和支持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曾在“成绩”面前产生过自己的思想长期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感叹。但当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后，他对此便开始怀疑起来。庐山会议前，他多次发表过自己的意见。1958年12月，彭德怀到他的家乡乌石、平江等地调查，不少农民找到彭德怀告状申诉。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百姓鼓咙呼！”这些深深地印在了彭德怀的脑海里，使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群众的疾苦而呼喊。

庐山会议前夕，彭德怀刚从东欧访问回来。在黄克诚的敦促下，他顾不得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庐山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他一面开会，一面认真阅读文件。在西北组的发言中，他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然而，到会议快结束时还感到意未言尽，他还希望得到发言的机会。

彭德怀把自己准备给毛泽东写信的意思跟周小舟说了，周小舟认为这样不好。他要彭德怀亲自找毛泽东谈谈。

按照周小舟的意见，彭德怀决定找毛泽东面谈，头一天夜里他就准备了谈话的腹稿。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不料警卫告诉他："主席刚刚休息。"毛泽东入睡十分困难，这是毛泽东周围的人十分清楚的，也是任何人不敢轻易打扰的。曾有一次，彭德怀不顾警卫员的劝阻，直接闯入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虽然对他很客气，但也以风趣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一次，彭德怀犹豫再三，还是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

话没谈成，彭德怀决定还是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当天晚上，奋笔疾书，起草了信稿。14日晨让参谋誊清，派人送给了毛泽东。

彭德怀的信约4000字，开头语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下分甲、乙两个部分。在甲部分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另一方面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农村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在信的乙部分中，彭德怀用了较长的篇幅，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本是正常事，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他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毛泽东本人，向出席庐山会议的同志再次强调纠"左"和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这也是很明确的。就信的内容来说，它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同样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这样直言不讳，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更是难能可贵了，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当然，这封信的个别措词有偏激不妥之处，这是应当斟酌的，但不妨害信的主要思想。

但是，彭德怀的信已大大超出毛泽东划定的纠"左"的范围。虽然信中也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与成绩，信中所谈到的缺点、错误问题，有些已经是毛泽东自己多次谈过的了。但信中看着重强调总结经验教训，这说明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是抱有很大怀疑的。彭德怀认为，只有从政治思想上根本转变"左"的指导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避免今后再犯"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这一点的看法是与毛泽东很不一致的，特别与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精神是有很大分歧的。彭德怀主张继续反"左"，毛泽东则认为反"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词比较尖锐的话，诸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将“失”字摆在前头等等，明显表示了难以接受的态度。加上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中说了些用词不当、情绪偏激的话，更使毛泽东感到不满。他完全曲解了彭德怀写信的目的，认为彭德怀的信与彭德怀前不久访问东欧各国、会晤赫鲁晓夫有联系，以为彭德怀的信是借纠“左”的名义否定三面红旗，是向他“下战书”。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中共党内一场新的斗争即将开始。

三、庐山风云突变

7月14日，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的信。他于16日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此后，毛泽东召集各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要求。

常委会作出决定，从7月16日起用一周的时间重新划分小组，主要讨论彭德怀的信。由于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真实意图，没有领会毛泽东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还由于7月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组讨论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与会的大多数同志没有觉察出会议将会急剧转向。

从7月16日至22日，会议仍按照前段“神仙会”的形式继续进行，大家围绕彭德怀的信，交流情况，敞开思想，各抒已见，畅所欲言。多数人认为彭德怀的信反映的意见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也有少数对情况了解不全面、不深刻的人，尤其是那些护短的同志，表示不赞成彭德怀的看法，而且还从一些措词上加以指责。于是，多数人同少数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争论也很激烈，“神仙会”那种轻松活泼的气氛一扫而光，会议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分别在小组会上发了言。

黄克诚在发言中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他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在发言中表示，他“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说：“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

张闻天的发言长达3个小时，包括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等13个方面。张闻天在发言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的看法，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提出了改正错误的方法和意见。他表示支持彭德怀信的观点：“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本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就感到不满，又看到黄、周、张发言支持，他更为不满了。

7月20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谈话，说耳朵是听话的，口是讲话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头皮顶住。这已表露了不满情绪。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对彭德怀信中所进“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判。他说，所谓比例失调，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市场紧张，以至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他指责“有失有得”，把“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是“张飞粗中有细”。他批驳“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说公社运动嵖岈山、徐水、七里营，每天都有几千人去取经，想早一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不能全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认为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动摇性。毛泽东还带有情绪地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建议1070万吨钢，以此闯下大祸，其结果得不偿失。虽然大家都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另一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北戴河会议时，我建议写进决议的。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等等。毛泽东讲完话后即宣布散会。他的这次讲话成为了庐山会议的转折点。此后，会议气氛马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彭德怀等人成为了被围攻的批判的对象，持“左”的观点者明显占了上风。

彭德怀万没想到毛泽东竟把他的信的问题提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在具体的指责上，他怎么也想不通，但看到自己一封信竟使党内出现如此紧张的局面，遭到毛泽东和大家强烈反对，他又感到不安起来。他担心因自己的信而损害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威信，这将给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损失。起初，他本来持“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后来他动摇了这个念头，“决心从严检讨自己”。7月26日，彭德怀、黄克诚作检查。7月27日，周小舟作了检查。

四、哪来的军事俱乐部

检讨不能停止正在升温的新的斗争。

在各小组会上，持“左”的观点者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展开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的猛烈围攻，斗争在升级。

7月29日，庐山会议印发了一份由毛泽东加按语的参考文件，上面有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上的讲话，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搞的是“超阶段”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有美国国务卿、极端反华反共分子杜勒斯说大陆经济“比例失调”等，从而得出敌人“内外夹攻”三面红旗的错误结论。到这时为止，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央委员已超过半数，毛泽东于同一天又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这就是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会议的主题从纠“左”完全转向反右，从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清算他的历史旧帐，直至臆造出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军事俱乐部”。

为中央全会作准备，由毛泽东主持于8月1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责彭德怀几十年来和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在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站错了立场，“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改指标问题，二是路线问题。他说，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主要提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的讲话和接着印发的他的一系列批语，为全会定了基调。

8月3日至10日的会议，一方面批判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和彭、黄、张、周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发言；另一方面还要他们交代在庐山会议期间彼此的个别谈话和交往，并罗列他们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判。有的说彭德怀的意见是"纲"，黄、张、周等人的发言是"目"，"纲举目张"，互相配合，把他们之间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在会上观点一致视为"阴谋"。有的指责黄克诚对毛泽东"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话摘其所需，"不谈两头，专谈中间"。有的说周小舟虽然没有系统的发言，但给彭德怀当"参谋"，做"宣传员"，"提供材料"。有的说张闻天长达1万多字的发言，谈成绩的只有270多个字，专在"但是"后面做文章，仅"但"字就有30多个，还用了3个"危险"、12个"紧张"、上百个"损失"和"缺点"。

8月11日，毛泽东在全会上把彭德怀等人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他还说，彭德怀等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

8月13日至15日，八中全会举行大会。彭、黄、张、周继续受迫逼和围攻，他们一面说明事实真相，一面含冤受屈地作违心的检讨。为了不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彭德怀在作检讨时采取了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但是，对别人捕风捉影、胡编滥造的"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两项罪名坚决否认。他想：'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张闻天也被迫多次在大会和小组会上作检讨。8月2日，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信。信开头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面对毛泽东的信和暴雨式的批判，张闻天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随着批判的不断升级，大会所谓"军事俱乐部"的迫逼也越来越紧。张闻天暗自想：他们想逼出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军事俱乐部来，"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倒有一个！"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逼问，张闻天始终这样回答，他同彭德怀只谈过相同的所谓"右倾思想"，至于俱乐部的组织怎样、计划怎样，他都一概不知。周小舟、李锐等人也被迫在小组会上作了过头戴帽的检讨。

8月16日，毛泽东再次在全体大会上讲话，说庐山会议有大问题，要总结斗争经验。他还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总帐，并向大会提出了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时，毛泽东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一文，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指出彭德怀等人"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就成了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政治总结。从此以后，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和不同思想的斗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更被进一步归结为两大

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一重大的失误导致我党遭受了将20年的深重灾难。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16日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认定彭、黄、张、周组成“反党集团”，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任务。”

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历时半年多的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是纠“左”的继续，因此大快人心。可是谁也没想到，彭德怀一封直言的上书竟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庐山会议中后期由纠“左”转向反右，并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这是建国以后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助长了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现象的发展，也助长了党内弄虚作假，宁“左”勿右的不良风气。一些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的同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失，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重大的损失。这是我党民主生活不正常，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党永久记取的。

第十二章　六十年代初调整农村政策的决策

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骤然兴起，全国农村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基本实现公社化。时隔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便觉察到公社化发生的急于过渡、共产风等“左”的偏差，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开展了八个月纠“左”。然而，庐山会议后期及会后的“反右倾”，打断了纠“左”的进程，导致了急于过渡、共产风等“左”的错误重新泛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加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央和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接续前一时期的纠“左”努力，深入调查研究，认真纠正错误，调整农村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党中央对庐山会议后重新泛滥的“左”倾错误逐步加深认识

1960年1月，中央在对浙江省委关于分配问题报告的批示中，要求各地认真检查一下是否存在“反右倾”运动中不容易被发现的错误偏向。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和胡乔木按照中央批示的精神，深入到顺德县检查，广东省委农业办公室也对十九个公社作了经济调查，经过认真分析和研究，广东省委2月25日向全省（同时上报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了“值得全党重视”的五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这样三个：一是关于过渡问题。认为从目前广东的情况看，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一般是不具备条件的，不应急于过渡，急于赶先。二是关于发展社有经济问题。认为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公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决不能独立地发展社有经济，更不能削弱大队经济，采用“割肉补疮”的办法。三是分配问题。认为高积累削弱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三包一奖”处理不好，甚至有些地方又把社员的自留地和家禽集中起来，限制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指示》说：“目前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是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广东省委的《指示》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3月1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谈了他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的意见。中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信，并于3月5日将信的内容作为中央转发广东省委《指示》的批示发给各地。批示指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的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

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注意，依照广东的办法，发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3月23日，毛泽东在看了同样反映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简报》后，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批示指出：“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从这些材料看来，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虽然发现了农村工作中重新泛滥的“左”倾错误，并认为问题严重，必须迅速纠正，但还没有认识到产生这些错误的深层原因，而只看作是基层干部不能正确执行中央政策的结果；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是全局性的倾向错误，而只看作是大好形势下局部性的错误。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结合他近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对建国后的经济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回顾和反思。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他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炼钢铁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他提到“大跃进”中指标过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认识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等教训，认为原因是一些领导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承认几年来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例如几次会议上同意钢铁高指标和第二次郑州会议时主张“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等等。他认为“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他写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在当天下午的讲话中，毛泽东宣读了《十年总结》，并作了一些解释。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毛泽东能正视几年来发生的严重错误，作出自我批评，并重视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出他对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讲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各地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加强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在五年内不要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要继续肃清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把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保证农业生产，首先保证粮食生产。9月24日，中央在《湖北省委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的报告》中讲"要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基本的"一段后加批注指出："贯彻执行基本队有制，必须反对"一平二调"和不向大队报实产量的这两种倾向"。当时，除湖北省委报告外，还有福建省委的报告，也反映了不少"一平二调"的严重问题。10月10日，毛泽东给李富春写信说，两省报来的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李富春经与有关同志几次讨论，草拟了《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批示》，于12日送毛泽东审阅。当天，毛泽东即批示下发。中央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纠"左"的决心更大，措施也已经比较具体。

为了更快地纠正"左"倾错误，扭转农村的形势，中共中央又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3日，毛泽东对《紧急指示信》草案亲自作了认真修改，其中重要的有如下三处：（一）《紧急指示信》草案中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制度"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加写了"（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草案中说："五年以后是否需要改为基本社有制，还要看当时情况由中央统一规定。……实现了基本社有制，甚至像现在的国营工厂一样，变为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将草案中讲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改为"至少七年不变"。（二）《紧急指示信》草案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在当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绝不允许对它有任何侵犯，侵犯了的必须坚决纠正。"毛泽东将其中"在一定时期内"改为"在一个长时期内"。（三）《紧急指示信》草案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将这句话修改为"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当天，《紧急指示信》即与《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一同下发。

《紧急指示信》提出，全党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认为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曾再三再四地指出过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不彻底，1959年冬以后又重新刮了起来，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一直没有认真纠正，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等十二条政策，对扭转当时的农村形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也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抓紧贯彻执行工作。11月15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中，要求各地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并强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11 月 28 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批示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1967 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和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失误，对进一步纠“左”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亲自主持制定《六十条》草案

到 1960 年底，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和农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已经大量暴露。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纠正“五风”的实践中，感到要使广大干部认识错误，纠正错误，还需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 1960 年底至 1961 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 1961 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八届九中全会还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毛泽东在上述两个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纠正共产风、急于过渡等错误，总是联系着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1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听取各中央局同志汇报时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的，谁也没有想到它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今后若干年内，要小办社有经济，大办队有经济。有大必有小，不能同时搞两个大办。12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汇报会上谈到退赔问题时说：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为了退赔，把县、社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当汇报到有些省委已就庐山会议以来的失误作了检讨时，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汇报到整风整社开始后，有人提出要讲大办等成绩，也从“一个九个指头”出发时，毛泽东说：先讲“一个九个指头”好不好？现在是八、二，也不是一个指头，要实事求是，有多少就讲多少，不要一个框框。当谈到总结经验时，毛泽东说：总结经验。前后不要搞矛盾才行，过去一个时期反共产风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提高大办这样那样，……又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讲话中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1 月 18

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又说，我们讲情况要明，决心要大，办法要对。情况不明，决心就没有法子大。刮共产风的情况就不明，其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那个时候非反右不可），在全国一宣传，就把共产风没有反彻底的问题掩盖了，又刮起来了。你反右嘛，还加了一些别的，如急于过渡。所谓急于过渡，不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也不是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是急于过渡到社有制。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带领工作组赴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调"的问题（即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财产），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以及体制问题、社队规模问题，等等。为此，从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

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庐山会议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一反右，有人讲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等等，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毛泽东还说：关于人民公社划小的问题，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你明年也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小队就有问题了，有个小字他们就没有权了，小字可害死人，不要小字就好办了，就叫生产队。3月7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说：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目的就是把公社各级的职权搞清，把生产小队不叫生产小队，改作生产队。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这些谈话表明，毛泽东在公社所有制规模的认识上更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把公社、生产队划小，并要变生产小队为生产队，增加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际上，他这时已经有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想法了。他对3月10日河北省委写的《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非常重视，不但认真批阅，而且亲自加了醒目的副标题：主张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点在毛泽东以后的讲话中也几次提到过。

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三南"会议（即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到会），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和农业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等同志也在北京主持召开"三北"会议（即华北、西北、东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到会），讨论农业问题。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两个问题下次会议上作正式决定，文件可以在这一次会议后起草。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同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刘少奇等同志的信，信中也说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并指出领导干部不亲自调查是不懂得也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

3月14日至23日，“三南”、“三北”会议合并召开，这就是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草案）。讨论中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虽然毛泽东已有倾向后者的想法，但由于与会者多不同意，会议对此没有作出结论。经过几天认真的讨论和修改，会议通过了《六十条》草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题为调查研究的长篇讲话。其中谈到《六十条》草案时，毛泽东说：我们把中央（紧急）指示信修改了，那些命令主义的口气都刮掉了。执行改为实行。我们作为君子协定，大体上试一月、半个月或一个半月，你们搞一下，搞出点经验再来修改。这次广州会议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对于解决公社化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十条》草案总结了过去三年多农村人民公社的教训和贯彻《紧急指示信》的经验，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两个平均主义、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草案中仍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与工资三七开，除特殊情形都要办常年或农忙的公共食堂，这反映出中央和毛泽东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实际仍有一定的差距。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将这个草案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以征求他们对草案条文的各种修改意见。

3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个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已经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纠正“左”倾错误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三、党中央认真听取对《六十条》草案的反映，改变了供给制和办食堂的规定

《六十条》草案虽然通过，但它是不是符合农村的实际？能不能得到广大社员的拥护？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广州会议后，毛泽东继续大抓调查研究工作，征询对草案的反映。3月31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张平化谈话。张平化汇报说，湖南农村一些干部群众对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等仍有许多不同意见。毛泽东说：这个条例草案只是征求意见，是试行，就是说还要修改还要补充，还可以减少，还可以推翻某些条文。他还说：将来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这个条例修改后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带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调查；周恩来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朱德于3月26日至5月5日到四川宜宾等地调查；邓小平、彭真于4月和5月上旬直接带领五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

怀柔县调查。在他们向毛泽东写的调查报告或信件中，均反映了广大社员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不赞成，要求取消等意见。与此同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也大都先后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并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对这些调查报告和通信非常重视，仅在4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就批转了10多件。

根据深入调查了解的情况和贯彻《六十条》草案的试点经验，毛泽东4月25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修改《六十条》草案和继续整“五风”，他还要求到会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粮食、供给制、自留山，等等）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为五月会议作准备。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根据中央、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对农村所作的进一步调查，和《六十条》草案试行的情况，会议对这一草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形成了《六十条》修正草案。修改的主要部分是供给制和食堂问题。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修正草案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制，规定“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此外，修正草案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如“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6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了他的感想并代表中央承担了“大跃进”以来错误的责任。他说：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种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毛泽东还说：“一平二调”的彻底解决，是从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这一次中央文件、中央指示上规定，不管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少奇同志插话：坚决、彻底、全部退赔）。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恩赐观点。还有一个，是平反和处罚。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冤枉了也不好。他还谈到当时的形势，说：经过三个月广州会议、五月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并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在检讨。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分别就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甄别平反等问题作出了规定。6月19日，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对退赔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具

体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进行退赔。

《六十条》修正草案在试行过程中，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到8月份，社队规模已普遍划小，平调财物的退赔已经部分兑现，用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食堂大部分解散，许多其他政策规定也基本得到了落实，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了相当的提高。

《六十条》修正草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倡导实事求是传统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一个重要成果。它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政策思想。它使得1958年公社化以来，农村政策中的许多弊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服，对于稳定农村扭转农业局势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个修正草案也有它当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其中一些条文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四、党中央决定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六十条》修正草案通过并试行以后，毛泽东继续关注贯彻的情况和调查了解农村中尚存在的问题。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着手系统地解决工业、教育、科学等战线的问题。因此，会议第一天，他在召集中央和各大区的负责人开会时，就问起贯彻《六十条》修正草案后农村的情况。当大家说到现在农村的情况好一些了时，毛泽东说：是不是好一些了，当然，下面不搞几高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主要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都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在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应加以研究。其实，这个矛盾毛泽东在三月广州会议时就已觉察，并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

9月26日，毛泽东听取了山东、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内容主要是实行分配大包干问题（即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河北等省一度称之为分配大包干——笔者注）。毛泽东说：这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腰在分配。在听了河北省研究和试办大包干的过程后，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讲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在小队。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小队的八权，再加上两个，一是牲畜农具，二是分配权。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但意见已很明朗。

此后，毛泽东又阅看了湖北、河北、山东、广东等省的一些材料，对究竟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作了反复思考。9月29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信，并附去他亲自作的邯郸谈话会记录和几个省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明确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他写道："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

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都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仍然要受到影响。……我的意见是：‘三极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10月7日，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并要求各级党委就此认真做一番调查研究，并选择一二个生产大队试点，把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中央提出问题后，从10月中旬起各省都进行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工作。11月9日，邓子恢向中央报告了他10月下旬听取河南、江西两省农村工作部汇报和在福建龙岸考察的情况，说各级干部和群众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11月23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转发《邓子恢同志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的指示，认为此报告很好。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与当地负责同志作了多次谈话。当讲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当有人说到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倒退时，毛泽东说：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薄变厚，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与此同时，田家英等人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1962年1至2月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这个草案提交到大会讨论。2月8日，田家英报送毛泽东审阅这个草案时写信说：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有一种意见主张写成“二十年”。究竟是“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2月11日，毛泽东在田家英短信上批了一段话：“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从这个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在农业问题上是比较冷静和客观的。经过“七千人大会”的讨论，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认为这样做有四大好处，而其最大好处便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

《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是继《紧急指示信》、《六十条》后调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大措施。这时虽然还保留着人民公社的体制，而就其实质言，已经使农业生产在经营规模上回到初级合作社时期。

第十三章　国民经济的调整

为了克服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从60年代初开始，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党中央、毛泽东在调整思想与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老一辈党的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纠正经济工作的“左”倾错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经济走出低谷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坚持调整政策的决策，使调整的任务得以继续完成。

一、党中央、毛泽东迈开调整国民经济的最初步伐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共产风”再度泛滥，使得农村的困难日益加剧。从1960年二三月间起，党中央、毛泽东对农村“共产风”问题重新有所察觉，并开始领导全党逐步加以纠正。

1960年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的《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广东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以下严重问题：一是急于向基本社所有制过渡；二是采用削弱大队经济、“割肉补疮”的办法发展社有经济；三是高积累削弱了按劳分配原则，有些地方又把社员的自留地和家禽家畜集中起来。要求加以纠正。广东省委的指示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3月1日，他致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谈了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中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信，并于3月5日批示，向各地转发了广东省委指示。批示指出，全国各地凡发生了相同问题的，都应引起注意，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不要使“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

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农村发生“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只看作是基层干部未能很好贯彻中央政策的结果；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是全局性的，认为只是局部性错误。但毕竟对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泛滥的情况重新有所察觉，认为问题性质严重，要求迅速纠正。这是重新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起步。

1960年7月5日到8月1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主要讲的是农村工作问题。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3年5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8月10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各地进一步

巩固整顿人民公社，至少在5年内不要急于向社基本所有制过渡，肃清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搞好生产。10月12日，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性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纠“左”的决心更大。一系列文件的下达，使得农村工作由庐山会议后的反右逐渐转到纠“左”上来。

为了迅速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3日，毛泽东对《紧急指示信》草案作了认真修改。例如，草案中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5年不变”。毛泽东改为“至少7年不变”。草案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在当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绝对不许对它有任何侵犯。”毛泽东将“在一定时期内”改为“在一个长期内”。草案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将这句话改为“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间，至少在今后20年内，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这些修改表明，毛泽东此时期已意识到对待农村的所有制问题，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时间上宁长勿短。毛泽东作修改的当天，《紧急指示信》即与《中共中央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同时下发。《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重申和规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清理一平二调，坚持按劳分配，恢复自留地等12条政策，这是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最早地比较系统地纠正农村“左”倾错误的一份重要文件。

11月15日，毛泽东又代表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并强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11月2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强调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现行体制7年不变，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和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紧急指示信》的贯彻，对于遏制“共产风”，缓合农村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业是重灾区，“左”倾错误的危害最直接，最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再纠“共产风”，一方面是克服农村经济困难的措施，也是60年代初期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最早措施。

二、国民经济走上全面调整的轨道

1960年上半年，继农村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持续两年的“大跃进”，也使得整个工业战线的“跃进”难以为继；财政短收，市场紧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健康水平下降，国民经济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困难。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党中央、毛泽东逐渐冷静下来，对经济工作的方针开始作新的思考。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指出，58年59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求各省公布数字时，总结要少一点，要做得多一点，说得少一点。

6月18日，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一文，结合回顾历史，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毛泽东承认人民公社化运动“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肯定1958年底开始的压缩空气，纠正“共产风”是正确的。认为在农村工作方面，至今仍没有扭转被动局面。从国民经济全局看，“1960年上海会议规定的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性，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的折扣。”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还提出：“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重要的是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在同年11月的一个批示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在庐山会议后的政治空气下，只有毛泽东首先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全党才有可能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进行认真深入的反思，实现工作方针的转变。

此后不久举行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批准和制定了一系列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生产；纠正“共产风”，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决定以后不再搞两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根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精神制定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0年下半年，虽然调整经济的方针已在逐步形成，工业战线、基本建设有所收缩，但是为了炼“争气钢”，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业已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又强行进行了半年的跃进，终使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险恶的经济形势，要求党中央作出决断，迅速实现经济工作方针的转变。

1960年底到翌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在总结近几年工作的教训时毛泽东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则一切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近几年，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凭感觉和估计办事，情况不明，决心不大，工作没有做好。他要求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

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搞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战线。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1961年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尽可能地提高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生产，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缩小基本建设规模。此次会议是从“大跃进”转向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转折点。

三、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制定

在北京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问题尤为关注，为此做了多次讲话，重点仍是纠正“共产风”、一平二调等“左”的错误。1960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中央局同志汇报时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它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今后若干年内，要小办社有经济，大办队有经济。有大必有小，不能同时搞两个大办。12月30日在谈到退赔问题时说，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为了退赔，把县社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退赔。并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有人讲到对去年几个大办，也要肯定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说，先进“一个九个指头”好不好？现在是八、二，也不是一个指头，要实事求是，有多少就讲多少，不要一个框框。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身体力行，亲自带领工作组赴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领导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2月6日，他在听取浙江调查组汇报后，提出一些重要意见。主要包括：克服“五风”问题；要决心退赔破产退赔，谁决定的由谁赔，剥夺农民是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要给农民自留地，不能再反复；关于社队规模，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或把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几个小队悬殊太大，破坏积极性；办食堂要符合群众要求；要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有章可循。等等。在3月5日、7日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人民公社要划小，原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就是公社、大队、队这三级，生产（小）队也要增加自主权。3月10日，他对河北省委写的《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非常重视，亲自加了醒目的副标题：主张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对农村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发现，《紧急指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月下旬毛泽东到广州亲自主持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三南”会议（即中南、华南、西南三

个大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条例初稿和农业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三北”会议（华北，西北、东北三个大区负责人会议）。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同志写信，信中说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

3月14日至23日，“三南”、“三北”会议合并召开，这就是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草案）。23日，毛泽东在会上谈到《六十条》草案时说，我们作为君子协定，大体上试一个月，半个月或一个半月，你们搞一下，搞出点经验再来修改。

《六十条》草案总结了过去三年多农村人民公社的教训和贯彻《紧急指示信》的经验，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出比较系统的规定，使得纠正“左”倾错误已取得的成果制度化。但是草案中仍规定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与工资三七开，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办常年或农忙的公共食堂。说明平均主义的影响确已很深，纠正“左”倾错误的路子还很长。可喜的是，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已发生了转变，并不认为至此已经穷尽了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要通过对草案的试行，进一步总结经验，加以修正。

广州会议后，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基层调查研究。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带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调查；周恩来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调查；朱德于3月26日至5月5日到四川省宜宾等地调查；邓小平、彭真于4月和5月上旬直接带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县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或信件中，都反映了广大社员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不赞成，要求取消的意见。与此同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也大都先后深入到县、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并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根据深入调查了解的情况和贯彻《六十条》草案的试点经验，毛泽东4月25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六十条》草案和继续反“五风”。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根据中央、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对农村所作进一步调查和《六十条》草案试行的情况，会议对草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形成了《六十条》修正草案。修改的主要部分是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的规定。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又对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甄别平反等问题作出了规定。19日，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对退赔问题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下最大的决心，彻底进行退赔。

《六十条》修正草案在贯彻过程中。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到8月份，社队规模已普遍划小，退赔已部分兑现，用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食堂大部分解散，许多其他政策也基本得到落实。《六十条》修正草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倡导实事求是和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结出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使得，1958 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政策中的许多弊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服，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稳定农村氛围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从“且战且退”到“坚决退够”

1961 年，除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取得重要进展，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稳定调剂市场等方面也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在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八届九中全会制定计划是只打算在保持 1960 年总体水平的基本上放慢速度，进行调整，并未意识到要大踏步后退。因此，多项工作生产生产仍大体维持 1960 年水平，基本建设指标虽有所降低，也还过高。这一年，工业和基本建设不是主动后退，以集中力量去加强薄弱环节，而是且战且退，还没有获得工作的主动权。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的讲话中说广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养子而后嫁者也’。”这虽是就农业的《六十条》而言，但对于进一步探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采取更加坚决的调整措施，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此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工业的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来，在 1958 年、1959 年两年大跃进以后，在 1960 年春就应及时地进行调整，主动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不能再犹豫了，要当机立断。近三年必须以调整为中心，要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必须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会后不久，中共中央 10 月 6 日转发的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大大调低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至此，从国民经济总体看，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才进入实质性阶段。

庐山工作会议决定对工业进行大幅度调整。但是由于多年来不断的反右倾，搞跃进，部分干部受急于求成思想影响很深，一时难以转变。特别是经过 1959 年庐山会议的反复，恐右心理在干部中很普遍，怕政策多变，怕被说成是反对“三面红旗”，因而对调整采取等待、观望态度，迟迟不敢做出大的动作。迅速统一全党的认识与行动，这对于认真贯彻调整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无疑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毛泽东根据几年的经验也认为，在反“左”的问题上，一般地按照常规召开会议，很难及时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贯彻到基层。因此，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

就是1962年1月7日到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七千人大会”。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他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济与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及其产生的原因，认为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除自然灾害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所致，在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要求全党团结起来，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

刘少奇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特别是来自地方的干部，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上讲，毛泽东根据会议进展情况，于1月29日提出延长会议时间，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做到上下沟通。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他强调无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又一次承担责任。毛泽东再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在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还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七千人大会”虽然还不可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纠正“左”倾错误，但毕竟使全党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大大加深了认识，会议发扬了党内民主，使与会广大干部心情舒畅。这一点对于动员全党认真贯彻调整方针、团结奋斗克困难，十分重要。

“七千人大会”之后，党中央又相继召开了2月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常委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措施。主要包括：继续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在建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对一大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大力支援农业，等等。

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六十条》修正草案下发试行后，毛泽东仍感到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1961年8月召开庐山工作会议时，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主要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都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毛泽东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应加以研究。在以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9月26日，毛泽东听取了山东、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指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包产单位，这是个大问题。不是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腰在分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现在的生产队即过去的生产小队为基础。这样搞上10年、8年，生产发展就好了。9月29日，毛泽东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信，明确指出：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个问题不解决，生产的大发展仍受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仍然受到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10月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

示》，要求各级党委对于基本核算单位是放在大队或放在生产队的问题认真做一番调查研究，并选择一二个生产大队试点，把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

党中央提出问题后，从10月中旬起都进行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田家英等人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经过“七千人大会”的讨论，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此时，虽然还保持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但已经使得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回到了初级社的水平。加上《六十条》规定的各项政策，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至此，党中央、毛泽东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已经到位。

以上“退到底”的调整措施实施后，经过全党人民的艰苦奋斗，1962年当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便出现了转机。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农业生产摆脱了连续几年下降的局面，开始回升。这是整个国民经济走向恢复发展的基础。当然，此时经济仅仅是刚刚走出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五、“左”倾理论的再发展与继续调整的决策

调整国民经济，不仅是克服困难的措施，在指导思想方面，又是对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理论的否定，在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合国情的道路。由于“左”倾理论没有根本纠正，当调整中出现的某些事物、政策，超越了毛泽东认为必须固守的界限，他的思维热点又发生了转变。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便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这些题目也就成为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其中许多涉及到经济政策与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当作了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一些他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正确的意见，看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发动了对所谓“三风”的批判。

“翻案风”是指彭德怀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进行申述。实践的发展已进一步证明，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已给大幅度调整了政策，又为许多干部进行了平反，但却不给彭德怀乎反，又进而批判“翻案风”。这不仅是在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威信，而且是在总体上维护“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使纠正“左”倾错误受到很大的局限。

“单干风”是指在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创造并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并得到了邓子恢、陈云、邓小平、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的支持。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单干，是对合作化、集体化的否定。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包产到户的出现，使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突破了苏联集体农庄模式，是60年代初期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之一。批判包产到户，中断了这个有益的探索。

“黑暗风”是指陈云、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62年西楼会议到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当时这些领导人多次指出，“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经济形势是严峻的，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应盲目乐观。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毛泽东不同意陈云等人对形势的判断，但当时却不反对坚决退够的决策，在这次会议和以后也主张继续进行调整，这说明毛泽东对生产力方面的调整措施并无非议，只是担忧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走得太远。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为全党接受。但是鉴于国民经济还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鉴于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又掀起跃进新高潮的教训，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就使“左”倾错误暂时没有发展成支配全面的错误。因而，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特别是调整生产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正常地进行下去。

1963年上半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一种急躁的情绪又开始抬头，认为可以进行新的跃进了。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9月6日到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各工业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规格、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改善企业管理的工作。继续调整的决策，对于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条件下，克服急躁情绪，全面完成调整任务，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到1965年，调整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圆满完成。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可惜，这个好势头被随之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断。

第十四章　“三线”建设始末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在我国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亦称三线建设。它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后而付诸实施的，曾一度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庆厂和西南物理研究院等三线建设重点工程时曾指出：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一、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生产力布局看，加速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性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还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决心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

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研究讨论内地建设的会议上又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也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要抓紧时间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撤其它线路的。他还强调，现在再不建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了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同一位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蒋介石的经验也要研究。总之，一线要搬家，二线和三线要加强。

可见，毛泽东当时对三线建设是非常关注的。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强调要搞三线建设，从他当时的一系列谈话来看，其基本出发点是：防止外敌的突然袭击和改变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的不合理布局。

6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在我国周边确实出现了十分严峻的形势。

在东面和南面，我国面临美国军事势力的重重包围。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发表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声明，并下令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用武

力阻挠中国统一。美国凭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急剧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挟迫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东面和南面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军事包围圈。60年代，除了在台湾海峡派军舰、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海，进行军事挑衅外，还以所谓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势力南侵”为借口，在越南南方重新挑起战火。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下令在越南实行所谓“特种战争”，即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出教官出顾问，训练和指挥南越傀儡军队进行镇压南越人民武装力量的战争。当“特种战争”失败之后，1964年8月5日，美国冒天下之大不讳，悍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将战火迫近我国的南大门，这就构成了对我国安全特别是东南部边疆安全的严重威胁。此后不久，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然声称“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们打算坚定不移的反对共产党中国，并将其战略重点从欧洲逐步转向亚洲”。

在北部和西部，我国面临苏联军队的巨大压力。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密切的。自1956年苏共20大召开之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某些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本来是可能通过平等协商、讨论、对话的形式逐步消除的，中国共产党为此曾作出种种努力，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曾赴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当时热衷于谋求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最大的障碍。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不仅不是采纳，反而采取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火所欠的债务，甚至策动新疆少数民族叛乱等种种卑劣手段，向我国施加压力，千方百计想使我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当控制不成，就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于世，并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从间接的隐晦批评发展成直接的分开对抗，导致两国关系由全面友好走向全面破裂。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两国接壤的73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也出现了紧张局势，边界争端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政府大举向中苏边境地区增派军队，由原来的10个师不足20万人逐步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的重要设施，同时还派兵进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并扬言要对我国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这就构成了对我国北部和西地区的巨大军事威胁。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唆使下，当时与我接壤或毗邻的印度、日本、南朝鲜等国对我国也持敌视态度。

当时，我国工业的布局，由于历史的原因，70%集中在沿海一带，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现代工业微乎其微，交通十分闭塞。新中国建立后，为改变这一状况，在“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时期，国家投资在内地新建了一批工作企业，建成了成渝、宝成、兰新等铁路干线，使全国生产力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但就整体而言，内陆地区的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50年代新建的一些国防工厂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内地很少，这对我国的安全是很不利的。

正是基于这一现状，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由于未能建成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致使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的历史教训，作出集中国

力加速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严重性，特别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估计虽然是过重了些，但从共和国的安全看，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和长远战略意义来看，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后来国际局势的发展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当年所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

二、从我国三线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看，毛泽东当年提出加速后方基地建设的决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早在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积极建设好我国的战略大后方基地，改善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要求新建的项目要摆在内地，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沿海地区能够搬迁的项目要搬迁。国家计委据此重新拟定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在《提纲》中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从1965年到1980年，在我国腹心地带的13个省和自治区全面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整个建设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和"三五"时期为第一阶段。196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国家计委余秋里关于编制"三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汇报时指出：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订计划要考察这三个因素。因而三线建设的第一阶段投人资金560多亿元，主要用于成昆、滇黔、川黔三条铁路，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的建设上，三线建设全面展开阶段的重点是放在打基础方面。"四五"和"五五"计划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共投人资金149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6.4%；共安排建设项目1100多个，绝大部分生产能力在这一阶段形成，从而使三线地区基本成为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

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精心组织和统一指挥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从全国各地汇集于三线地区的几百万建设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顶酷暑，斗严寒，栉风沐雨，宵衣旰食，战胜重重困难，谱写了一曲曲胜利凯歌。正是他们的聪明才智、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才使国家有了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工程大部分项目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实施并完成的。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三线建设的干扰和破坏是很大的，但是，奋战在这块土地上的几百万建设大军，尽力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和资源开发程度低下的历史状况。在三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中，国家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优先地位加以安排。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同时还修建了一些支线和专用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里程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比重，由1964年占全国的19.2%提高到34.70%；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公路建设也得到较大发展，新增通车里程22.78万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里程的55%。同时，国家还投资整治了三线地区的内河航道，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万吨，进而使三线地区的交通运输初步形成网络，内河航运能力得到提高。能源工业重点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芙蓉、陕西韩城、铜川、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新增原煤开采能力达11211万吨；建成了葛洲坝、龚咀、乌江渡、凤滩、龙羊峡、秦岭、神头等大中型水、火电站68座，占全国的40%，新增装机容量1872.4万千瓦，比1964年增长4.3倍；开发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形成556万吨原油开采能力和1442万吨原油加工能力。天然气开采能力达54亿立方米。新建攀枝花、长城、水城、舞阳等钢铁工业企业984个，工业部产值达78.69亿元，比1964年增长4.5倍，炼铁生产能力达到1248万吨，炼钢生产能力达到1161万吨；建成有色金属工业企业945个，占全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数41.4%，铜、铝、铅、锌、镍、锡、锑、汞、镁、海绵钛10种有色金属的产量达到62.64万吨，占全国产量的50.2%。

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国防科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和资金均较密集，综合配套性很强，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集中表现。核工业的建成已形成了从铀矿开采、水冶、萃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以及原子能和平利用等比较完整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具有相当的科研生产能力。航空工业先后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建设了生产科研基地，新建和扩建了125个项目，这些项目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航天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尖端，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建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三线地区兵器工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技术先进的重武器。电子工业新建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和陕西等省。已经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品兼容、生产科研结合的体系。船舶工业已经建成了我国内地的舰船生产科研基地。始建于1965年的试验和发射中心，已形成了一个试验设备比较配套、研究手段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研究试验基地，成为我国航空、航天等飞行器以及风工程研究与发展的中心。

三线地区的机械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优势产业，三线地区机械工业的建设，是按照既能为军事工业配套，又能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装备的原则进行规划的。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同时还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重要的配套工厂，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型、重型汽车批量生产能力，汽车的年产量已占全国的1/3。在四川、陕西、甘肃、湖南、宁夏等省区，建立了12个重型机

器、矿山、起重、压延、工程机械制造厂，从而使三线地区形成了的重型机械制造力量。重点建设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等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电机电器工业的制造体制。新建了16个机床工具制造骨干，能成批生产各种型号和用途的机床，在贵州建成了磨料具生产基地。新建了四川仪表总厂、贵阳新天精密光学仪器总厂、甘肃光学仪器总厂等骨干企业，使三线地区形成了较强的仪器仪表科研生产能力。新建和扩建了一批中小型拖拉机和内燃机制造工厂，使三线地区各省、区基本上都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农机工业体系。

国家在加强三线重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兴建了一批轻工和纺织企业，使三线地区的轻纺工业已经形成在比较齐全、产品基本配套、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的重要产业部门，初步改变了过去轻纺产品绝大部分靠沿海地区供应的状况。

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新建铁路的通车，矿产资源的开发，现代工业的布点，使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城镇焕发青春，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分别以功能、特色各具的新姿，展现出勃勃生机，繁荣了地区经济；同时，也使一些老工业城市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国防工业、轻纺工业和一些原材料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为这些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场所，扩大了商品市场，增强了经济实力。

历经十七载的三线建设，我国战略后方交通状况的改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开发和利用，国防科技工业后方基地的建成，机械、电子、轻纺工业的发展，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不仅增强了我国经济和国防实力，改善了我国生产力的不合理布局，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实践证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作出的加快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正如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1991年1月26日《在国务院三线办第8次成员会上的讲话》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三、历史地看，毛泽东在三线建设决策上也存在一些失误

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作出的加速三线建设的决策，历史地看，是正确的，必要的，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也是巨大的。它的建成，对改善我国生产力不合理的布局、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防纵深防御能力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失误，有的还十分严重。

首先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估计与判断上失误。加速三线建设决策是我国处在一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作出的。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确有严峻的一面，正如陈毅当时所比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毛泽东当时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特别是对爆发外国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估计，现在看来过重了。他认为

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特别是1969年3月，苏联军队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流血事件后，毛泽东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更为严重。在同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地和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反复谈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并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在毛泽东对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下，国家计委在制定"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把加速三线建设始终摆在首位，将全国一半左右的建设资金投向三线地区。特别是在1969年至1971年期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型建设项目达1000多个，使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规模十分庞大。由于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资金、设备、原材料难以到位，造成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有些则成为长期不能投产的"胡子"工程，后来只好实行"关、停、并、转"，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国防形势、特别是对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和估计，既看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有可能发动战争的一面；同时又要看到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完全有可能制止战争爆发的一面。对战争危险性估计得过分严重，不仅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会发生严重偏移，而且在特定时间里，势必要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集中投向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失调，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又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其次，对三线建设的进程要求过快、过急。鉴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生产力状况，为了防止外敌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也为了逐步改变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和东强西弱的不合理布局，建立一个强大的后方战略基地，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对爆发战争危险性的过重估计，导致对三线建设的进程要求过快、过急。他在1964年夏、秋两季的多次谈话和文件批示中，反复强调，三线建设要加快，并说内地建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着觉。特别是在同年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三线建设要抢在战争前面，即使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

在毛泽东的三线建设要加快的思想指导下，当时各级三线建设指挥机构，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这虽然加快了建设进度，同时也造成了严重后果。

为了赶进度，有些建设工程对当地的气象、地质、水文、山川、物产等自然资源和生产环境还未来得及进行调查和可行性论证就盲目上马，定点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有的工程建在断裂带上，有的建在溶洞和煤矿采空上，有的建在河滩上，有的建在水库边，建成投产后，经常遭受洪水、坍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损失十分严重。

为了片面追求快，有的工程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讲科学施工，严重忽视工程质量，致使一些工厂建成后，有的发生地基下沉，有的发生墙壁开裂甚至坍塌，遗留问题甚多，国家为此花费了不少资金。

这虽然是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但与毛泽东当时提出的三线建设要快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这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经济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能快则快，切莫赶浪潮，甚至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片面追求数量和高速度。如果不顾客

观经济条件，盲目强调建设速度，轻则造成部分损失，重则将影响整个建设速度，欲速则不达。

再次，对备战强调过了头。三线建设是作为战备工程进行建设的。基于对爆发战争严重的估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三线建设工程提出了必须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就整体而言，三线建设作为我国的后方战略基地，无论当时是现在甚至将来都必须考虑备战因素，特别是关系到我国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是要从未来战争的特点出发，统筹考虑，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强调备战，并不是不讲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但在当时“准备打仗”的气氛十分浓厚的情况下，三线建设过程过分突出了备战因素，忽视客观经济建设规律，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

为了突出战备，一大批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远离交通要道、分散的建在深山沟里，而且实行“瓜蔓式”、“村落式”、“羊拉屎”的布局，不仅企业与企业之间相距甚远，就是车间与车间也分散建的。如湖南三线建设时期新建的40多个军工企业，分布在43个县，最远的相距700公里，最近的也有16公里，生产协作十分困难。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西北铜加工厂等企业，建厂时把一部分关键设备放在离主厂十多公里的山沟里，造成工序之间来回重复倒运，生产十分不便。现在看来，这种不注意物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特点、不看事物普遍联系的内在规律，不看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企业分散孤立地建在深山沟里的作法，不仅造成宏观布局的不合理，而且人为地破坏了现代化生产的合理组织，使企业的优势和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不高。

由于过分强调隐蔽，不少建设项目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务都投到开山、筑路、架桥、打洞等基础设施上，大大增加建设费用。企业建成后，为了在山沟里独立生存，生产上不得不搞“小而全”、“大而全”，尽可能做到设备配套成龙，加工手段齐全；在生活上则全部“包起来”，商店、学校、医院、邮电、治安、影剧院都要自己建立，一个工厂就犹如一个小社会。这种与社会脱节的纵向封闭型的企业，不要说经济效益，有的连自己生存下来都十分困难。

上述情况虽然不是三线建设的全部，但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现在看来，不加区别的，不讲平战结合的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做法是片面的，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但是，在否定这一错误时，我们决不能走到另一极端，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了，再不会发生战争了，不必考虑战备。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因素虽然有了较大增长，国际局势也进一步趋趋向缓和，但战争的根源还存在，世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我国周边也还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一旦有事，三线地区工业企业仍然是我国抵御外来侵略势力的强大物质基础和可靠保证。

第十五章　中苏大论战

发生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不仅对我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它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在各界人士中仍然记忆犹新。

一、中苏论战的起因

中苏两党和两国论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场无原则的争论。

应当说，这场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50年代开始，以多中心、多条道路、多种模式和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等原则处理各国党和国家关系的新模式，冲破和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以及一个权威的旧模式的斗争。

这场论战的起点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联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揭开了改革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序幕，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

会后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苏共二十大在上述几方面确实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苏共二十大是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主要是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上的错误和关于“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提法上的缺点。这些特点是错误，不仅造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影响了各国共产党间的团结，至今有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而成为中苏两党论战的起因。不是上述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中苏论战也很难发生，更不会长期延续。

(1) 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上的错误

苏共二十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展开了规模较大的反对个人崇拜、反对践踏党内民主、反对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斗争。历史证明，这场斗争是非常必要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强调坚持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重视社会主义法制等对中共是有深刻影响的。特别是在中共八大上明显地表现了接受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教训。

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势所必然。在1956年苏联在政治经济发展中，已明显地表现了尖锐矛盾和斗争。主要是由于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已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的专断所造成的错误，已使国内形势十分复

杂，人民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如不改革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纠正大量的冤假错案，国内的政治就不能稳定，社会主义制度也无法巩固。所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全党普遍的要求。

批判和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在他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苏共中央在国内和国际上修改了斯大林制定的一些方针政策，在国内对一批政治犯发布大赦令，对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平反，削弱内务部的权力，不准随意捕人，制定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计划和政策，放松对国内宗教的管理，提出种种改革措施，特别是纠正大量的冤假错案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工作。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已有800多万人被释放，600多万人在死后得到昭雪。在国际上，主张利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同希腊、以色列恢复了外交关系，同奥地利缔结了和约，也改变了以前反对任命联合国秘书长的立场，放弃了对土耳其领土的要求，同意结束朝鲜战争，主张进行裁军谈判。这一切充分说明，苏共中央在1953年以后国内外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开始纠正了斯大林时期作出的错误决定。这些做法，得到国内和国际上的好评。这一切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已作了几年的实际准备。因此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砀事情。然而，事实正相反，苏共二十大原定的议程中没有个人迷信这项，而是在会议进行期间临时讨论决定的，即用《秘密报告》的形式，系统地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不仅使国内外感到非常的突然，而且对个人迷信也可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电缺少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论。这必然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斯大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动了近四十年的历史，他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发展，都是有伟大功绩的。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苏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所以，斯大林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同时，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犯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虽然与他的功绩相比是第二位的，然而给苏联和国际共运都带来了严重损失和影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斯大林的功过的评价，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各自所走的革命道路不同，在一定的时间内出现了不同的评价。这应当说是不可避免的，不应该成为影响国际共运团结的因素。

必须指出，对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必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探讨个人迷信流行的社会历史原因。然而苏共的《秘密报告》却采取了简单的、粗暴的方式，以感情代替政策，以材料代替科学的分析，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和谩骂的语言对待斯大林。对斯大林的功过没有作出历史的全面的评价，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带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以批判个人迷信开始，对斯大林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过去对斯大林的全面肯定，跳到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主观主义的认识代替了科学的结论。这势必引起国内外思想上的混乱，致使不少人走向了极端，采取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态度。

这一切必然导致国际共运中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和争论。中共中央认为，斯

大林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与他的历史功绩相比是第二位的。这个观点就构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与《秘密报告》的基本调子是根本不同的。这就引起了中苏两党最早的原则分歧。

(2) 苏共中央在提出国际共运总路线中的缺点

到 1956 年，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呈现稳定发展的局面。二次大战后，两个世界之间的冷战时期基本过去，和平共处的时代已经开始。

1955 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宣布了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标志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潮流。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和声誉，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已日益强大，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几次大的革命动荡之后，也稳定了下来。对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苏共二十大作了充分的估计，并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即在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当代国际关系国际共运中的三个根本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

苏共二十大认为，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执政的党所奉行的对外战略策略原则，应当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不能采用过去尖锐对立时期的斗争策略原则，人为地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受到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苏共二十大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尽管这样，苏共二十大却设有看到要把它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提出来，或者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总路线，必须要作大量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要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讨论磋商。因为，它关系到各国共产党的对外对内的政策，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更需要有一个讨论酝酿和转变的过程。再加上由于各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和革命道路的不同，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不能用简单的办法、粗暴的态度，要求各国共产党立即接受下来。尤其是后来，把这三个问题概括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后更有了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修正。当然，历史证明后者的看法是不全面、不完全正确的。

所以产生意见分歧，除上述原因外，还主要是由于在国际共运中缺少平等的同志式的磋商讨论，没有民主的气氛和求同存异的态度；同时也是由于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对三个问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各国共产党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是导致中苏两党论战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中苏论战的起因，是由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关于国际共运路线问题引起的。这是当时国际共运中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中苏两党的不同认识，逐步发展成为一场思想上和理论上规模较大的中苏论战，并扩大到中苏两国的关系，延续了较长的时间。

二、中苏论战的全面爆发

标志中苏论战全面爆发的是1960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从此，中苏两党之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战，并扩大到中苏两国关系上，使中苏两国之间发生了许多沉痛的事件。

1960年6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6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交换对国际局势认识的意见。对此，中共中央提出，不应当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应当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主张在条件成熟时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还认为，为开好这次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中共的意见得到了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后来，中共中央派了以彭真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然而，苏共赫鲁晓夫背弃自己的约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采取了突然袭击。6月21日，苏共代表团向参加会议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了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毫无根据的攻击，严重地歪曲了事实真相，是苏共挑起全面论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此，中共代表在6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

6月24日至26日，又举行了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这次会议本来约定是对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日期和地点交换意见。然而在赫鲁晓夫的带头下，在会议中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攻击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说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等等。不仅如此，还迫使会议一定要通过会议公报。这样，使中苏分歧急剧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为了维护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为了顾全大局，又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团于6月26日发表了声明。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之间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会谈前的协议，特别是在没有充分讨论和征求兄弟党意见的情况下，一定要通过会谈公报。“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中共代表团表示，不能接受苏共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并提出了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一个较为一致同意的公报。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采用突然袭击企图压服中共的目的并未实

现。这对他来说是十分恼火和不甘心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在这次会议后苏共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把中苏两党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完全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共施加压力。

1960 年 7 月，也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刚开完不久，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 1390 名专家，撕毁了 343 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使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大批企业无法继续进行。这种做法，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间是无先例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十分罕见的。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建设造成极大的困难和损失，也严重地伤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情谊。

此外，苏联政府还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

至此，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了，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置于敌人的位置上了。

在这样形势下，中共中央仍然寻求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途径和办法。1960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对苏共在 6 月 21 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作了全面的答复。在答复中，仍然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这五项建议虽然没有实现，但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五点建议是：

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遵守这些原理和原则；

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的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

④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⑤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 11 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在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中共中央又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会谈，以求得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解决。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积极的结果。很快又爆发了一场更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从 1960 年 10 月的有 26 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上开始的，到 11 月召开的 81 个兄弟党代表会议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尤其是在会议前夕，苏共中央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份长达 6 万多字的信件，更粗暴地攻击中共，挑起了一场更尖锐的争论。

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苏共中央要在国际共运中指挥一切、控制一切的目的。他滥用苏共的威信和权力，使兄弟党屈服于他。从而造成国际共运的不正常状况。但是，事与愿违，苏共的态度和做法，受到了与会者的严厉批评。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批评不得苏共的错误、苏共说了算的极不平的局面。从此以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只能以独立平等、相互协商的原则处理，“老子党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积极成果；

1961 年 10 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除再一次批判斯大林外，还公开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周恩来用提前回国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这种错误行径的愤慨。

苏共二十二大后，在苏联的报刊上海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这样连篇累牍地攻击，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62 年 2 月 22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继续地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共，强迫中共接受苏共提出的一切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同年 4 月 7 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信中，为响应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而提出了五项积极建议，但均被苏共无理拒绝。

1962 年 4 月至 5 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仍拒绝遣反这些中国公民。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一次赫鲁晓夫对日本议员说，如果征求新疆哈萨克人的意见，如果他们喜欢让苏联管辖而不喜欢让中国管，那么苏联就将吞并这片领土。”可见，赫鲁晓夫的扩张主义野心已暴露无遗。当然，苏共的其他领导绝不与他一样。所以，在赫鲁晓夫下台时指控他的材料中就有这一条。

从 1962 年 11 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全面的系统的攻击中共。在苏共领导人指挥下，有 5 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共，有 40 多个兄弟党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共。对此，中共中央于 1962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3 年 3 月 8 日，发表了 7 篇文章予以答辨。在这些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共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于 1963 年 6 月 14 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中央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共，并驱逐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在会谈期间，即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领导发表了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又一次挑起了中苏论战的高潮。随后在苏联全国性的报刊上发了近 300 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声势之大，超过了过去论战规模。对此，《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从同年 9 月 6 日起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止发表了 9 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两种根

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

这些文章在今天看来，有的属于当时的“左”倾观点和教条主义错误。但是，揭露和批评赫鲁晓夫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错误作法的文章，却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赫鲁晓夫犯了一系列的原则错误，其中包括在处理中苏关系上的错误，所以 1964 年 10 月 12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立即撤销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因此，中共关于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只发到九评，没有再发了。

赫鲁晓夫下台时，中国共产党对于改善中苏关系曾寄予某种希望。当时中共采取了主动的态度。1964 年 11 月 5 日到 13 日，周恩来又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在与勃列日涅夫的接触中，进一步了解到苏共领导仍然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立场，不改变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这样，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希望落空了。

三、中苏论战的历史经验教训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或在社会主义国家间产生意见分歧，应当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是，象发生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的中苏论战，而且长期地沿袭下来，可以说是无先例的。因此，如何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若干评论，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①中苏论战的实质

中苏论战深刻地反映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发展，逐渐走向成熟，迫切地要求改变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兄弟党关系上的不正常的做法，反对以“老子党”自居对别人挥舞指挥棒，积极地主张以独立、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共同合作，相互支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一方面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陷入了他的新的个人崇拜。他滥用苏共的威望，维护对苏共批评不得，苏共说了算，一切听从苏共指挥的恶劣习惯。他在处理各国兄弟党关系上，骄傲自大，主观武断，出尔反尔，不能平等协商，随意指责和辱骂，以苏共利益为原则不顾兄弟党的困难，挥动指挥棒。不仅指挥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要指挥中国共产党。所以，中苏论战明显地表现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在处理相互关系上，不管各自的历史长短、人数的多少、贡献的大小，应当一律平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反对包办一切，操纵一切，指挥一切，对于不同的意见只能采取协商讨论的办法解决，绝不能采取强制压服的办法，更不能容忍以“老子党”自居的蛮横态度。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当时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1000 多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过去，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指挥曾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因此对于赫鲁晓夫的错误指挥无疑也是要进行斗争的。

经过这场斗争，从当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它的积极的成果是，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上，逐渐地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的正常局面，摆脱别国党的控制和指挥已成为历史的潮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领导本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反对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这种生动的团结的局面的形成，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的一个最显著的收获。

可见，中苏论战在结束国际共运中一个党说了算的不正常的局面，为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中苏论战也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和条件进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绝不能以一种模式进行；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必须是独立自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绝不能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以强欺弱，占据别国领土、损害别国利益。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早已察觉到了由于中国经济的不发达，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必须走中国建设的自己道路。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当然，中国在探索自己建设道路中，犯了“左”的错误。不仅没有使国内经济发展起来，而且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教训。可是，苏共赫鲁晓夫在中苏论战爆发后，滥用权力，把支持中国的建设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大量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合同，支持中国经济、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作为要挟中国的资本，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中苏论战反映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从6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各国开始走上了根据本国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独立地处理本国的问题，以平等协商的原则解决国际关系，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各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后所产生的又一个积极的成果。

总之，由于中苏论战的爆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结束了对苏共的错误批评不得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根据本国的情况建设社会主义，并起来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不得不承认这是当前的一个新的历史潮流。

②中苏论战的历史

中苏论战也是在中苏两党两国的情况处在极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从当时中苏两党的历史条件考察，从这场论战中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训。

以苏共说，中苏论战从起因到全面爆发，正是赫鲁晓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时期。在这期间，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1964年10月13日下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对赫鲁晓夫的错误作了全面的总结，其中有这样一段：“他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已被他所犯的严重错误损害了。他所作出的决定不仅是草率的，而且是考虑不周的。他鼓励任意扩大行政管理机关和等级制度。在前两三年里，他把大量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并开始滥用它。他把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所有

成绩和成就占为已有，蔑视主席团的权力。他根本不把主席团委员会看在眼里，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他们，拒绝倾听他们的意见，而且不断地训斥他们和其他人，尽管主席团委员经常呼吁，但他却对所有的批评意见置之不理。"可见，赫鲁晓夫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1964年10月下台前，他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治生活的准则，党内不民主现象日益严重。1957年6月中央全会后，他无论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是在主席团内，再也听不到任何反对意见了。赫鲁晓夫独断专行的作风十分盛行。这一切必然带到中苏论战中，它不仅使中苏论战全面爆发，而且还使它逐步升级，加剧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恶化。

当然也必须指出，在这段时间内，中共以毛泽东为代表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左"倾错误，党内的集体领导制度也受到了破坏，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的作风也日益滋长和盛行。因此在中苏论战中，也表现了思想理论上的"左"倾观点和教条主义。这主要是在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情况下，把铁托、赫鲁晓夫等都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加以批判；同时也把自己的一些"左"倾观点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加以坚持。

这主要是我党从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改变了八大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和科学分析，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这些观点又带到了中苏论战中，把不是修正主义的当作修正主义批判，同时又反过来用在国际斗争中形成的错误观点，指导国内的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迅速发展。

在中苏论战中明显地表现了当时在党内十分广泛的"左"倾观点。例如，当时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是靠不住的，联合美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屈服帝国主义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又例如，当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特别强调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要作好早打、大打的准备，备战备荒为人民；又例如，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特别强调支援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等等。这些观点不仅指导了同国际上的斗争，同时也指导了国内的经济建设。使经济建设摆到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位置上，从而要求大干快上，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事业。同时还要处处体现备战的思想，大搞三线建设，进行深挖洞广积粮，完全打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常发展的规律和计划。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和生产上的过分紧张局面。这不仅不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相反地给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总之，这场论战有着深刻的教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经过几十年的客观实践的检验，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作了充分的总结。在这场论战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有的已经圆满地解决了。邓小平在接见有关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时曾多次说过，过去的争论让它一阵风吹掉吧！一些兄弟党的领导人也表示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第十六章　四清运动

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1963年到1966年，在少数城市基层单位开展了“五反”运动，在部分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以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统称“四清”运动。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酝酿

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在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

当时，我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调整工作努力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美国不仅继续武装侵占台湾，而且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威胁的安全，还加紧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政府关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分歧的建议，多次挑起边界武装冲突，发动大规模军事人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打退了印军的进攻。苏联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线，向中国提出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仍一意孤行，把意识形成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威胁中国的安全，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在国内，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准备窜犯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某些激化的情况。在党员和干部中，以权谋私、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生活腐化、官僚主义等消极腐败现象，有了新的滋长。仅1962年上半年，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受理各种违法乱纪案件34万多件，处理近25万件，受到处分的党员达58000多人。社会风气也发生逆转，许多解放后绝迹已久的社会丑恶现象，如封建迷信、赌博、卖淫嫖娼等，又重新出现。高利贷之风，在某些地区也刮了起来。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国外敌对势力的侵略威胁，对国内阶段敌人的破坏活动，对党内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坚决而有效的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毛泽东把国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化、绝对化，看成是普遍现象，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同时，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也看得过于严重了，把党员、干部中的消极腐败现象，

甚至把党内的认识分歧，都看成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他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中国也有修正主义者。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因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着重讲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把抓阶级斗争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发生“和平演变”的问题上。他在阐明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的同时，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提出在全国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全会的一致赞同。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后，许多地方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 年冬到 1963 年初，毛泽东先后到 11 个省视察工作，只有湖南省委王延春和河北省委刘子厚，分别在长沙和邯郸，向他汇报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

1963 年 2 月 11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批印会议讨论。25 日，刘少奇作了关于反修斗争问题的报告，提出如何在国内防止修正主义思想的发展问题。他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不只是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也不蜕化变质，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28 日，毛泽东又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这次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而揭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

二、城市“五反”运动和农村社教运动的初步开展

1963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规定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机苯、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副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五反”运动；强调这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立即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开展运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重点企业，进行试点，然后分期分批地逐步展开。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还处在准备阶段，各地总结试点的经验和问题，陆续向中央写了报告。有些报告，夸大了阶级斗争和党内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着重研究如何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走了许多地方作调查，先后对《宋任穷同志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共保定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等18个材料，写了批语。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5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语，发出《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制定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现在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地主阶级根本没有打倒的个别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他们就要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一步一步地挖掉他们的社会基础。许多地方，搞社会主义教育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就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决定，把开展“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提出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对于如何开展运动的政策和方法，文件也作了原则上的正确规定。

杭州会议后，这个文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指出：“这个决定是关于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的重要文件，它的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予城市”。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下，各地立即召开各种干部会议，训练干部，在一些社、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城市“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9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其他各级机关和企业、副业单位正在进行或试点。从这一段的运动和试点情况来看，多数单位是搞得比较好的，但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不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情，把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有的地方发生了捆人、吊人、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甚至发生自杀、逃跑事件。经济退赔面偏宽和要求偏严的现象相

当普遍。杭州会议后，彭真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省视察工作时，也发现了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7月4日，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

在9月6日至2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运动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并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反复修改，题目定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但同时也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等问题，规定了许多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后十条”认为“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好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强调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处理犯错误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以县为单位，一般地控制在2%以内。关于团结95%以上的群众，“后十条”提出：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团结中农，特别是正确对待上中农；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后十条”还强调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随着“后十条”的贯彻执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出现了点、面结合，大规模开展运动的新局面。1963年秋冬到1964年春夏，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一部分县、社，成批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五反”运动，也在前段试点的基础上，成批的开展。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向一切人普遍宣读和讲解“前十条”和“后十条”，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经过“四清”和“五反”的许多地方，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开始形成风气，生产和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仍然存在，自杀等事件也屡有发生。

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和《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文件要求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员、与县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干部，凡是能下去的都要下去宣读文件；强调要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运动。

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1964年的夏天，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愈演愈烈，国内加紧进行“反修”斗争，“四清”、“五反”中陆续总结出一些所谓“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

型材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日益发展。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和条例草案。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六个条件。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提出这六条标准，对于搞好运动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会议强调的精神，却明显地向“左”转了。6月2日，刘少奇讲话时认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了高级领导机关中的某些人了，例如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而提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6月8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农村城市，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这样估计形势，对运动的向“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6月1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修正“后十条”。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负责，并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7月和8月，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等地，了解运动的情况。在广州，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加写了一些十分尖锐的话。8月下旬，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对“后十条”修正草案进行讲座和修改。这个修正草案，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后定稿。9月18日，刘少奇签发了《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

“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个文件对“后十条”的重要修改和补充，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以毛泽东提出的六个条件，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还是搞不好的主要标准。第二，领导人员必须亲自蹲点，这是领导好运动的前提条件。第三，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决不要把文件规定的具体政策，变成妨碍发动群众、束缚自己手脚的清规戒律。第四，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团结95%以上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的基础。第五，各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以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第六，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第七，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体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另外，还提出重新划分阶级和追上面根子的问题。在上述修改和补充中，最重要的是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实际上就是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

在一边。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前后，中共中央连续转发《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等后来都证明是错误的文件，对夺权斗争问题发出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同时，刘少还提出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8月16日，他在广州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也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8月18日，毛泽东复信，表示"完全赞成"，"照此办理，迅速实行"。按照这一部署，各地立即训练工作队，于秋冬开始实施大兵团作战的办法。

"后十条"的修正和一系烈"左"的措施的实施，使许多县委书记和不少基层干部中，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刘少奇认为，这是一种宁右勿"左"、怕"左"不怕右的右倾思想。10月1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明确提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要及时地批判"右倾"、"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思想，"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这样，就使"左"的错误进步发展起来。

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的错误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组织，秘密进行扎根串连，不加区别的把广大基层干部放在被斗挨整的地位，并且扭住不放，形成对立的局面，影响了生产。许多地方，错误地进行"夺权"斗争。打人、体罚等现象和自杀、逃跑事件经常发生。经济退赔也搞得很厉害，有些干部被搞得倾家荡产。不仅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重划阶级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也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的处理。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受到了影响。许多已经结束运动的单位，又派驻工作队重新开展运动。工作队包办代替的做法，比较普遍。有的单位，实行错误的"夺权"。有的单位，发生打人、乱斗、挂牌游行、抄家等违法乱纪行为。经济退赔不仅靠毛估推算，而且追算时间过远。运动中发生的错案很多，甚至发生了贵阳问题这样严重的错案。

四、"四清"运动的新阶段

1946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倾错误发展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运动中发生的问题。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先讨论刘少奇提出的关于农村"四清"、城市"五反"的几个问题，然后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经反复讨论修改定为十七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刘少奇认为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认为这种说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强调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前，他在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搞法，刘少奇强调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实行大兵团作战，搞秘密扎根串连。毛泽东认为"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他强调"四清"运动，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无则不清。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十七条"作了大的修改，内容变为"二十三条"，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二十三条"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搞法，作了重要修改。主要有：把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改为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明确宣布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是靠人海战术；对犯轻微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运动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抓好当年分配。这些新规定，纠正了前段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差，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二十三条"仍然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二十三条"还规定城市"五反"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1月14日，"二十三条"正式制定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集训工作队，对运动重新作了部署，纠正了文件指出的一些"左"的偏差，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各地分别召开三级干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或职工代表会议，掀起清经济的高潮，很快解放了大部分基层干部，开始形成"三结合"的局面。但是，又把少数所谓"性质严重"的人当作"走资派"，进行重点批判斗争，使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秋以后，新开展运动的地方，则完全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694个县、市（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32%；加上正在进行的单位，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其他地区，普遍开展了上面的运动。全民所有制的厂矿企业，大体

上也是这种情况。县以上各级机关普遍开展了运动。一部分学校、文化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进行了运动的试点。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四清”运动越来越难以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下去。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但实际上，随着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随着“文化大革命”掀起“夺权”的高潮，“四清”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五、反腐防变的一次尝试

历时三年多的“四清”运动，在几百万工作队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对克服党内和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改善干群关系，起了好的作用；对打击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起了好的作用；对解决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整个运动期间，全国工农业生产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

这次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也犯了“左”的错误。主要是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矛盾，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同时，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例如，包产到户、自负盈亏、集市贸易、自留地等当时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正确措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和纠正；许多工厂企业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和必要的规章制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管、卡、压”，进行批判和纠正。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某些思想理论准备。但是，由于这次运动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中共中央规定了一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具体政策，对运动中发生的偏差也进行过部分的纠正，因而这些“左”的错误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

毛泽东发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把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这些，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的，也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支持。“四清”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次大规模反腐败的群众运动，是一次把反对腐败同防止“和平演变”直接联系起来的新尝试。“四清”运动的结局表明，这次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毛泽东试图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努力未能取得成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反对腐败是历史提出的新课题，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社会主义法制和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用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效果也是不好的。“四清”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今后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四篇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引 子 1958年北戴河之夏

1958年的夏天，雨量充沛。北戴河海滨，风景秀美，凉爽宜人。建国以后，这里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夏季避暑和工作的固定地点，人们戏称为“夏宫”。

8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来到了北戴河。此前和几乎与他同时到达北戴河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几位常委，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中共主要领导同时聚首北戴河并不只是为了避暑，他们要在这里召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史称“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会议从8月17日开到30日，开了近半个月。与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着的大跃进运动相吻合，会议的议题有一长串，包括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会议制定和通过的文件多达40件。

半个月的会议作出如此众多而又重大的决定，真正是大跃进的速度，充分反映出当时只争朝夕的气氛。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最主要的文件有两个：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前一个文件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干脆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从而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后一个文件决定在全国广大农村全面推广建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两个文件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以后的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这两个文件的诞生又都与一个基本估计有关：中国的粮食已经接近和达到了饱和。

在北戴河会议前的三个月，也就是1958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另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那次会上，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用当时总路线制定者的话来说：总路线的灵魂就是高速度。会后，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丰产措施花样百出，高产“卫星”遍地升空，亩产两三千斤已经不在话下，五六千斤也已是“小菜一碟”，能够被称为高产“卫星”的至少也要在亩产万斤以上，甚至出现了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情况。于是农业和农村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粮食多了怎么办?”的考虑，北戴河会议决定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战场由农业生产转移在钢铁生产上来；而在农村，则由发展生产力转为改变生产关系，也就是在全国农村普遍地建立人民公社。

当时著名的“反修战士”康生曾用一句口号来说明人民公社的好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们称之为“三面红旗”，本篇所要讲述的就是三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和台前幕后的故事。

第一章 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第一节 在一个个胜利面前，急于求成的情绪也在悄悄滋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曾经把进城接管政权看成是一场“考试”。应当说，第一场“考试”，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底，他们先后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肃清了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兵力，开展了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剿灭了全国境内的大量土匪，成功地平抑了市场物价，开展了抗美援朝，恢复并初步发展了国民经济。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工人、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刚刚通过了第一场“考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又迎来了第二场“考试”。这是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考试”。也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一化三改”。

按照中共中央在当时的解释，“一化三改”是个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整体。其中“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化”与“改”之间，以及此“改”与彼“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化”和“改”都规定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且规定必须逐步进行和逐步实现。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时间来完成这个“一化三改”。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953年走进这个“考场”时，准备大致用15年的时间来完成这场“考试”，大约到1968年的时候开始“交卷”。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逐渐地，毛泽东等人有些着急了，他们

想快一些完成这次“考试”。

问题首先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暴露出来。

第二节　批判“小脚女人”，呼唤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由于工作繁重，需要增设机构，调各中央局书记来中央工作。

在决定增设的机构中有一个专门协助中央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叫做中央农村工作部。原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奉调进京担任新成立的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从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组建之后，就开始按照毛泽东同意了的工作思路，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他主张普遍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面积较大的老区，适当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可是农村的发展态势，并不像邓子恢想象的那样井然有序。1952年冬天以来，伴随着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热情的提高，互助合作运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中急躁冒进倾向滋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办社，引起社会动荡。春耕在即，农民的生产情绪不稳定。

邓子恢主张及时纠正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3月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部部务会议上，他提出了调整五年互助合作发展指标的具体打算，老区组织农业户数的80%，其中合作社占45%；新区组织农业户数的60%，其中合作社平均达到12%就可以了。他说：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愿望，一定要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进行。我们打算10年、15年或许再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要匆匆忙忙地把两到三个五年计划的事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做完。

3月8日，邓子恢向毛泽东作了农村工作情况汇报，随后又送上书面报告。强调，在新区，土地改革完成不久，贫农确有些生产困难，需要从组织起来互助变工中求得解决，但同时必须广泛深入宣传党的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的政策，克服干部中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打消农民“怕归公”的顾虑，以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为了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他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中央为《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冒进的报告》写了批示。这些代拟的指示、批示，经毛泽东同意，先后于3月8日、14日、16日、1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由于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的措施比较有力，一些地区的急躁冒进倾向得到纠正，广大农民群众情绪趋于稳定，原先一些地区缺耕畜、农具、资金的困难得到缓解，春夏生产得以顺利进行。曾经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并有很大发展。

随着农村的紧张情况逐步安定下来，毛泽东对互相合作运动有了新的考虑。1953

年10月15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对发展农业合作社在数量和规模作出限制，他说："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于（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到1954年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0万个发展到48万个，并计划到1955年发展到60万至70万个。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在一大批新建的合作社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贱卖与滥宰牲口．滥砍林木的现象，农村再度全面紧张。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向刘少奇汇报了农村的紧张情况。他说：现在看来，有些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大了一些。1月4日，他又以国务皖七办简报的形式，向周恩来汇报了农村的紧张情况。简报说：今年12月间中央批准全国共办60万个合作社，下面积极性很高，将计划提高到70万个。现在看来，真正办好60万个都是不容易的。

刘少奇、周恩来将邓子恢的这些意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1月10日，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签署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宣布，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人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列举不同地区应区别对待，有的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有的应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有的要切实帮助整顿社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的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这些原则后来被简化为"停、缩、发"三字经。

3月18日，刘少奇约见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1/3，第二个五年计划1/3，第三个五年计划发展1/3。显然，刘的思路还是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所设想的15年时间完成"一化三改"。

对于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的情况，毛泽东最初是相信的；对中央制定的停止发展、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方针，毛泽东也是同意的。但后来，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

1955年4月下旬，毛泽东到南方考察。他沿铁路公路两旁，看了农田庄稼的长势，听了地方领导人的汇报，对农村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认为："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

在此之时，中共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庆施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这几句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很深。毛泽东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

5月5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向邓提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

4天以后，也就是5月9日，毛泽东约见了邓子恢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农业部长廖鲁言、粮食部长陈国栋等人谈话，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说：今后两三

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他问邓：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邓答道：上次说1/3，还是1/3左右为好。毛泽东不便发作，勉强表示说1/3也可以。接着他又说道：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这种思想党内也有。据柯庆施同志说，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毛泽东在这种场合转述柯的那番话，给谈话平添了不少紧张气氛。

6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约邓子恢谈话，提出原定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同现有的65万个比较，只增加35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65万个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基本上做到全国20多万个乡都有一个到几个社，问邓意见如何。邓说，回去考虑考虑。

邓子恢回到农村工作部，找互助合作处负责人商量。结果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好。第二天，邓去找毛泽东，说上一年由11万个社一下子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下一年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那就超出了现有的办社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双方发生了争论，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7月底，柯庆施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有意将7月28日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向中共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交给了毛泽东。这个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处理好，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份汇报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尤其是汇报中说的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全体成员，并对汇报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一句加了批注：“这种估计不对。”

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一开篇就火药味十足：“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当时邓子恢也在会场，他无论如何想不通：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不同意见，怎么成了“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他立即找到刘少奇对有些情况作出解释，刘少奇劝他要正确对待主席的批评。

8月26日，毛泽东指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这样就等于让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靠边站”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在党内造成一种紧张气氛：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这就大大改变了农业合作化的原定进程。到1955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4.9%；到1956年上半年，达到90%以上。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原来计划用15年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种胜利使毛泽东欣喜不已。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第三节　贪多求快的倾向很快就波及到经济建设领域

毛泽东在批评"小脚女人"的同时，对于经济工作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认为："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提出：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针对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习惯于强调搞综合平衡的情况，毛泽东还说：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问题。按照各部汇报，会议确定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亿吨。毛泽东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

1955年下半年，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开始越来越关注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采用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老办法——批判在这个领域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指出：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他认为，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他还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基于这一认识，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地区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一方面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规划了12年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比原来设想的产量增加了近1倍。

《农业十七条》中关于粮食产量的规划已经有些异想天开的味道了，因为它所规定

的粮食到1967年所达到的1万亿斤的指标，直到几十年后仍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奋斗目标。1990年，中国农业粮食产量达到8400亿斤。那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确定，中国粮食产量将在1995年达到9000亿斤，到2000年达到1万亿斤。

毛泽东还以这个不切实际的指标作为推动力量，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他所认为的右倾保守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以农业十七条为基础，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一文件的中心任务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规模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应分别以8%、10%以上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分别达到1万亿斤和1万万担。

农业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必然会引起其他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迫使它们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是：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一五”计划规定的投资多12.4%，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180亿元、200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1955年这一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当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7.6%，其中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分别增长8.5%、42.6%，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5.6%，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14.5%，手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72%，基本建设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4%，农村水利建设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比上一年增加65%，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这种情况也增强了人们认为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的乐观情绪。

对于毛泽东加快经济建设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是同意的。刘少奇当时说：“经济上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他认为，只要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

1955年12日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集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100多人参加的中央座谈会。会上，刘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并对八大准备工作作出部署。他说：“在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计划。

主席说过，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也是客观要求我们加快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

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因此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需要，是稳步前进。"

刘少奇还转述了毛泽东这样的意思：要站在群众前头，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要鼓励群众，不要泼冷水。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成绩，这就是现在中央所实行的路线，这就是稳步前进。另一条是按常规走路，照老样子前进，时间拉得很长，群众没有士气，成绩不大，这是保守主义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却正在走着这条路。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在西楼座谈会上，周恩来也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在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冲破了平衡是好事，不要怕时，他还插话说：池塘的死水是臭的，活水才不臭。把计划的平衡比喻成"死水"，而把打破平衡说成是"活水"。

半个月后，在国务院第 21 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全面规划和反对保守主义问题讲话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毛泽东主席从外地视察回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这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钢生产 1800 万吨，现在改成 2400 万吨，粮食生产将达到 1 万亿斤。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

12 月 29 日，周恩来向全国厂长、矿长会议的代表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又说道：在国内，目前农业合作化大发展，并在下一步往高级社前进，反右倾时也未估计这样快。私营工商业改造，经过两个会议也可以提前，这就使得两翼前进，主体被动。前进不能慢，不允许落后，所以要求国营工业提前完成五年计划。

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第一次正式公开了"提早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号召。社论指出：现在农业合作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新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早并超额完成。这样，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这个口号到大跃进时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主干内容。

在各方面胜利的冲击下，毛泽东此时已在考虑赶超美国和苏联的问题了。

1956 年 1 月 20 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和 25 日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 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稍后，他还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的头几个五年计划。

第四节　在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几乎逢会必讲反冒进

周恩来不同于毛泽东，虽然他也希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快一些，并且在起初，他也曾发自内心地支持毛泽东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的主张。但是，他是共和国的"总管家"，每天都要处理各方面出现的新的经济问题。很快，他就发现：如果按照各系统提出的这些高指标去做，那么，在1956年，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余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和严重不足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钢铁严重短缺，差额达70多万吨，这将使1956年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害。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大会开幕那天，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主旨是讲，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于看到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出现盲目冒进的苗头，在20日大会的闭幕会上，周恩来在总结讲话中讲了一段似乎与知识分子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的内容。他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大概是最早对冒进提出的直接批评。

此后，周恩来几乎逢会便讲反冒进问题。

1月30日至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会上，当有人提出《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讲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时，周恩来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作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在讨论会上，周恩来说：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然后他话题一转，说道：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时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这次会上，他又一次强调了不能提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他说：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针对有人害怕反冒进会给干部、群众泼冷水的顾虑，他说道：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当时，经济建设方面的冒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各省市、各部门要求的基建投资数字不断追加，造成各方面的紧张。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建投资。2月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开会，对他们说：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10日，经与李富春、李先念等研究，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实施了对各部专业计划指标“压一压”的方针，较大幅度地削减了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计划指标。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基建投资总额削减6%，全国基建投资由170多亿元减到147亿元。会后，国家计委依此决定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2月下旬，周恩来又两次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邀请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和2.5%。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

尽管开了“促退会议”，各项经济指标仍然居高不下。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造成了国民经济相当紧张的局面。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仍旧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为了避免因再追加投资而带来更加严重的物资供需上的矛盾，减轻建设中已经出现的比例失调问题，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这次会上，突出地提出了基建规模同实际所能供应的物资条件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周恩来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生产是主要环节。我们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

在毛泽东几次讲要打破平衡的情况下，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为平衡而奋斗。这一方面表明了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活还比较正常。

针对各地基建项目过多、过滥的情况，周恩来强调：保证重点建设的次序也不是死的，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薄一波也在会上说：现在基本建设遇到的

最大问题不是财政问题，根本的是生产潜力和材料、设备、物资平衡问题。

4月中旬以后，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根据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相当紧张的局面，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了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冒进了。这样，能否从领导干部思想上坚决清除急躁冒进情绪，确立一个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已成为关系到经济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第五节　当毛泽东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建投资时，周恩来直言劝阻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建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劝阻。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反复说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并说他以自己的“良心”担保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了。

周恩来的态度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曾做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的李锐在一部回忆大跃进的著作中讲到，长期担任毛泽东专职秘书的胡乔木曾对他说：主席爱听好事，鼓舞人心之事。透过大量的事实分析，胡的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毛泽东确实喜欢听鼓舞人心的事，听鼓舞人心的话，而对于告诫他遇事要冷静之类的话就难以听得进去。这种情况在大跃进前夕和大跃进过程中尤其明显。当时，他正处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的成功喜悦中，正雄心勃勃地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力图使中国尽快赶上并超过世界各经济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仅向他领导下的干部群众“泼冷水”，甚至当面向他“泼冷水”。对此，他确实难以接受。

“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他感到北京的气氛太沉闷，他要到外面去呼吸些新鲜的空气，去寻求新的支持。

5月11日，国务院召开第28次全体会议，各省市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组织机构的方案》和《关于批准国务院设立专家局的方案》，准备将这两个方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针对急躁冒进倾向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的情况，周恩来在就这两个方案作说明时，再一次强调：“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几天之后，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讨论了双轮双铧犁问题。5月下旬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讨论双轮双铧犁的问题。

双轮双铧犁的推广和应用问题，是一个毛泽东十分重视的问题。1955年，毛泽东曾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指导农业生产及农业发展未来远景规划的文件，开始叫《农业

17条》，后来经过补充修改，成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这个文件中具体规定了推广双轮双铧犁的数量：在3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这个规定当初就受到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的反对。陈云就曾指出过：在南方水田，这种犁不便于使用，尤其是淤泥中更难以使用。因此不宜生产太多。后来，在周恩来主持的有关会议上，将这种犁的生产数量调整为350万部。

在周恩来主持的这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初经过调整后确定生产350万部双轮双铧犁的指标还是过高，坚持这样做会给生产、使用和销售都带来一系列问题。周恩来在5月中旬的会上说：我们并不否定它的作用，但也不要生产太多，可考虑减为生产180万部，到第4季度不够时，还可以设法生产。在5月下旬的会议上，当有人提出生产180万部的指标还是过高，数量太大，因为这种双轮双铧犁根本不受农民欢迎。强行销售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周恩来听后当即表示：既然不行，何必提倡？绝对不要强销给农民。会议最后决定：双轮双铧犁的生产，有些省如果还能压缩的，还可研究再行压缩。

除基本建设和双轮双铧犁的生产之外，计划指标的修改与压缩是反冒进的另一个重要领域。6月1日，周恩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关于1956年度计划的修改问题和编制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的进度安排问题的报告》时，周恩来说：首先要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贴，国务院有责任。超过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去搞，结果不是窝工，就是粗制滥造。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准备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这份由财政部起草的报告初稿上，根据5月中央会议的精神写上了："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在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上半年因为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并提出要加重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会议指定胡乔木对报告初稿作进一步修改，修改后的预算报告进一步加重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报告指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在中共中央提出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第二天，即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议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研究继续压缩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会上，李先念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他说：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针对有人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周恩来说明，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预算高了就一定要削减。强调要打破预算不能修改的观念。他指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

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保守，也反对冒进。周恩来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确定按5%削减国家财政预算，把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再次削减到140亿元。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一道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不同意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财政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问题，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周恩来还说：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向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这个报告是工作报告，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决定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李先念在6月1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写进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内容。报告明确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李先念的这种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完全接受。

第六节　刘少奇为《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开了绿灯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也是支持反冒进的。这年5月，刘主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为即将在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做准备。这次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主义、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这次会上，刘还要求中宣部长陆定一组织中宣部代《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宣传贯彻中央会议的精神。

随后，陆定一在6月1日召开的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透露了中央的这个精神。陆定一说：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人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与此同时，陆定一便安排中宣部的王宗一负责具体起草刘少奇交办的社论。

6月11日，王宗一将初稿送陆定一审阅，同时根据陆定一的意见，另送胡乔木一份。陆定一对社论作了几处修改，删掉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强调了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急躁冒进的"突出的例子。胡乔木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就提到了双轮双铧犁的例子。他补充道："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得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

陆定一和胡乔木的两处修改，都直接触及到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因为《纲要》规定"从1956年起，5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规定："在3年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

6月12日，陆定一把社论清样送刘少奇审定。在社论清样上，陆写道："少奇同志：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认为可用，特送上请审正。"

刘少奇看了社论清样，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四处修改都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刘又将清样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清样上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便退了回来。

毛泽东的批示中，没有讲同意，也没有讲不同意。后来他曾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按他后来的说法，"不看了"就是不同意。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了这篇社论。他说："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了'三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

毛泽东的讲话一出口，与这篇社论有关的中央负责人如周恩来、陈云乃至刘少奇都纷纷作检讨——此是后话。

带有毛泽东批示的社论清样送到《人民日报》社。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看出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这使他陷入两难境地。在《人民日报》成立50周年的1999年6月15日，此时邓拓早已长眠于九泉，邓的夫人丁一岚面对记者诉说了邓当时的两难境地："你说发了吧，毛泽东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泽东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

6月20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诚如毛泽东所言，社论虽从两方面提出问题，但着重点强调了反对急躁冒进。社论在谈到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时指出：

"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这篇社论对于形成中共八大经济建设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第七节　编制"二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从 1956 年 6 月底开始，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几乎全力投入政治报告的起草。而从 7 月开始，周恩来也以主要精力关注准备提交八大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起草工作。

"二五"计划是指 1958 年至 1962 年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鉴于编制计划是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及早编制这一计划，以便提交八大审议。早在 1955 年 8 月国家计委就汇总国务院各部提出的建议，编制出第一个"二五"计划指标的方案，于 10 月 5 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讨论。随后，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出现了新的变化。1955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不断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正在召开或即将召开的计划会议、基本建设会议、财政会议就大大加温。国务院各部门自动否定了原来向国家计委报送的第一个"二五"计划方案，把粮、棉、钢等重要指标都大大提高了。1956 年 1 月 14 日，国家计委将各部门提出的第二个"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中共中央、国务院讨论。

1956 年 6 月，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编制"二五"计划的工作，7 月 3 日到 5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方案。

周恩来指出：制订新方案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个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到 1962 年粮食产量达到 5500 亿斤是不可靠的，有危险的，甚至定为 5300 亿斤也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

作用，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每年：限难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他严肃地指出：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

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要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还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保证不了。因此，这个框框可以推翻，应该压下来。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指出：设想到：1962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万吨至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达到2000万吨钢，但他们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也是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了。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仍不稳妥，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元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减少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基建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可以说，这是一次把高指标的幅度往下降的带转折性意义的会议，从思想上反对和清理了离开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离开综合平衡的急躁冒进倾向。这样，向八大提出一个接近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已经成为可能。

在整个7月里，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王光伟、陈先等不断磋商、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他指示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在7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财政问题时，他又说：今年计划就是冒进了。保守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冒进了更不好受。

从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这时已经将冒进看作比保守主义更为严重的错误了。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月下旬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三方案和该方案的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调整。这样，国务院各部门多次修改计划，国家计委多次汇总上报，先后修改了6个方案。交毛泽东审阅了3次。毛泽东原来对第二个方案是满意的，还认为其中有些指标低了。当国务院提出修改方案时，毛泽东没有坚持原来的意见，最后与周恩来等人取得了共识。

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第一副主任张玺正在苏联商谈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经济援助项目。周恩来要计委副主任薛暮桥负责起草“二五”计划的建议文件，由国家计委长期计划局副局长陈先协助。据薛暮桥后来回忆：“我们根据手中掌握的资料，很快就估算出1957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再以‘二五’时期工业生产年增长15%、农业生产年增长5%计算（‘一五’时期工农业年增长分别为18%和4.5%），估算出‘二五’

时期国民收入总额为4000亿元。积累按25%计算，‘二五’时期的投资总额就为1000亿元，而‘一五’时期积累占24.2%，投资额为588亿元。”

薛暮桥等向周恩来和陈云汇报了上述估算。周恩来、陈云基本同意这个投资总额。陈云还说，农业年增长5%，是高了一些，因为农业有丰有歉，荒年还要减产，要留有余地。接着，薛暮桥、陈先参照“一五”时期的比例，将投资总额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初步分配，与在北戴河的各部部长共同讨论，定出主要产品可能达到的产量。与此同时，国家计委各局进行详细计算。计算的结果与薛、陈估算的数字基本一致。框架定了以后，他们用了大约一个星期时间写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第一稿。

这个文件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组织一些人对《建议》初稿作了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常常是边念边议，讲思路，当场改。周恩来还自己动手，多次作了修改。基本定稿以后，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作了简要说明。讨论后，毛泽东基本同意，决定回北京后再作修改。

回到北京后，张玺已由苏联回国。张玺同薛暮桥便对《建议》再次稍作修改。张玺、薛暮桥都住在北京百万庄，常常晚7点钟开始在薛家客厅讨论，到深夜结束。因为时间紧迫，他们连续讨论了几天。修改完毕后，一起到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对于每处修改都要询问，张、薛等一一作答，一直讨论到次日早晨。

不仅如此，周恩来等人还对一些过高的中短期生产指标数字进行了调整。7月17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国家经委《关于1956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周恩来指出：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他强调说：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

几乎与此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又一次讨论双轮双铧犁的产销问题。会上有人反映，东北有大片旱地，大马匹，马比牛听话，推行双轮双铧犁比较好。南方是水地，用的是牛，90%以上的双轮双铧犁没有用。根据这个意见，几经削减之后的180万部的生产数量仍然显得太多。但对于这样一种毛泽东热心推广的农具，再进行削减，有人感到为难。周恩来在会上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做了些好事，用最大限度的集中权力，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得出了最大的成绩，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上面有官僚主义，下面有强迫命令。反下面的强迫命令，必须检查上面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他还提议，对这个问题八大开会时应该讲一讲，我们每做一件事，总要有所得。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务院作出《关于双轮双铧犁减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最高方案曾达500万部。根据计算，全年最多能销售140万到150万部，因此决定今年的生产计划削减到175万部以下。

关于双轮双铧犁的讨论，至此终于算是告一段落。生产、销售双轮双铧犁的指标从最初确定的600万部，经几次削减后确定为175万部以下，削减幅度应该说是很大的。但即使这样，国家确定的数字仍然过大。事实上，这一年国家虽然加紧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后来又被退回15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在反冒进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的步骤就是向“多、快、好、省”这一冒进口号发起了挑战。

由于反对右倾保守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对于多、快、好、省这一口号，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在对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

9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200亿斤，棉花5200万担”，恢复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以坚定的口气在一旁注明：“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两个比较实际又很重要的指标才最后确定下来。

第八节 中共八大确定了以反冒进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新建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这是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50多个来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9月15日下午2时，当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以及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登上主席台时，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2时5分，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的第一个议程，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是近一年来刘少奇等人的主要工作成果。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刘的主要

精力就转向主持八大政治报告方面来。

为了准备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3月9日，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5月28日，刘又分别听取新华通讯社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为了开好这些汇报会，刘少奇在这几个月内，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和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件事情上，座谈会常常从白天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通过这次调查，使刘少奇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状况，对各部门各行业存在的问题，心中大致有了数，这就使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有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得知刘少奇正在系统地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十分称赞这种方法，表示也要用这种方法做一番调查研究，要薄一波帮他组织。于是，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底，毛泽东也先后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

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过的他在建国后所进行的两次调查研究中的第二次，第一次是为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而阅读了大量的汇报材料。与那一次相比，这第二次调查研究显然要更接近实际一些。汇报会结束后，毛泽东集中这次调查研究中的成果，经过政治局几次讨论，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

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主持的这两次汇报活动，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对经济建设中各方面问题进行的时间最长、内容最系统的调查研究，为中共中央在八大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做了重要的准备。

从1956年6月底，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

为了写好这个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6月30日，刘少奇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李维汉、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开会，布置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以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中间有一段时间移到北戴河，刘少奇几乎全力投入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终于顺利完成了。

报告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八大政治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报告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9月16日，邓小平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特别强调了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

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等内容，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还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一项内容：在必要时，中共中央设立名誉主席。后来毛泽东在解释这一条时说：必要时由谁做名誉主席呢？就是鄙人。联系到随后他就在党内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人们不难从中看出，他这时已经有了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打算。只是由于后来发生了许多他认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对“三面红旗”的不同看法，毛泽东的这一打算才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周恩来在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是用来说明《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由邓力群主持执笔，参与起草的有梅行、房维中，陈先提供情况和数字。张玺和薛暮桥参加了报告的讨论修改。

周恩来所作报告的基调可以说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报告总结了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就近年来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指出，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发展；第三，应该增强后备力量，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第四，必须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这个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性文件。后来，这个计划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但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又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9月27日，大会闭幕。在闭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的建议》。这个决议是前一天在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提交大会的。《决议》明确规定把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在综合平衡中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

第九节　八届二中全会将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在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人将主要精力转到了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研究和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当经委把投资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

面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

1956年10月20日至11月9日，在3周的时间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贾拓夫、宋劭文、谷牧等。

会上，薄一波介绍了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的编制情况，他报告说：基本建设投资现在已压缩到140亿至145亿元，这就要求财政收人能达到318亿元，但达到这个数字有困难。如果就这样定下来，计算一下，损失很大。他为难地说：这个情况，使计划的制定处在想上上不去，想退退不下来的困难状况中。计划到现在还搞不出来，大家意见很多。他还介绍说：苏联1936年冒进了一次，结果物资不够了，工资增加了，消费品供应不上，人民骂娘，很难受，退了3年才扭转过来。

但是，有些人对1956年急躁冒进造成的危害看得并不清楚，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说：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他恳切地说道：三大高潮一来头脑热了，前进得快了。经济建设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也应该批“左”。李先念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指出：今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明年就压不了。认为，搞明年计划，首先要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从统一思想的目的出发，11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自己对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他指出：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39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他说，从我们国家这样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国情和既要建设，又要

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速度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由于反冒进已经进行了几个月，急躁冒进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在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于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上，因此，使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少数人也认识到过去想法有些片面和主观。

国务院常务会议一结束，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形势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开会第一天，刘少奇在全体大会上作了《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主要通报了东欧的局势和最近他访问苏联的有关情况，同时也就中国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积极性。他在报告中还引述了陈云的一段话：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后两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好？

周恩来的报告集中讲经济建设问题，报告的基调是反冒进的。他认为，1956年的经济工作有冒进性质的错误。周恩来说：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钢产量为例，说道：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3000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硬要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周恩来说：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提出的数字，也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他还谈到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说：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12年内开垦1.4亿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1000万亩，就要投资5亿元。这5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他的答案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为什么会犯错误呢？他认为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为了在今后经济建设中不犯错误，他认为待“一五”计划完成后应该做全面总结。这样，就可以得出更多的经验教训，就会比八大时的认识更完全更深入。

这个报告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周恩来提出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他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尽管有人在会上提出了相左的意见，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重要意见和制订1957年计划必须坚持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仍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并且在会后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第十节　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

1956年11月17日，周恩来出访亚欧11国。陈云担负起了主持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担。

陈云在八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中共党内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早在1954年，陈云就提出，经济建设必须按比例发展，搞好综合平衡。1956年初，当大家都争着上基本建设项目时，3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即主持将基本建设拨款削掉了7亿元，由原来的125亿元削到118亿元，削减了6%。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出：根据中国的情况，每年总要有些结余才行。

1956年底，在讨论编制1957年预算和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时，陈云更是多次阐明了反对冒进的观点。

12月4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他在会上发言说：二中全会决定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26亿元，关键是看材料、材料够就搞126亿元，如果材料不够就砍下来。

根据再次摸底后的情况，12月1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商讨进一步减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陈云提出：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计划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当然，削多少要研究。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今后应该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再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会议决定再将基建投资压缩到114亿元。待进一步算账后提交中央讨论。

12月18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41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说：要把建设和民生的关

系摆好，从财政和金融贸易这方面看，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是平衡的，不能有赤字，而应略有结余。二是预算中建设规模应该和物资的供应相适应。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有余再搞建设。三是每年人民购买力与供应人民的消费品应该求得平衡。四是我国的建设需要的外汇大体上依靠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约束力，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

当时，中共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是比较浓的，因此，关于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争论很大。12月27日，陈云再次就这个问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发言。

他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他还说：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要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当然，我们共产党最好是按辩证法办事，但这样不行，不来个绝对主义办不了事。

会上有人提出，投资削减以后，有些项目就不能搞了，工人也不好安排。对此，陈云指出：我看不能搞就不能搞，计划完不成就完不成，工人能做别的就做别的，不能就照发工资。这样对不对呢？我看不会不对，如果到明年8月我们看不对，8月以后再搞也来得及。我们是个大国，明年不稳当心里不安。

他还鼓励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一些干部要敢于负责，勇于负责。他说：经济工作还是大家讨论，我们做决定，我们向中央负责。我们责无旁贷，少奇同志管党的工作，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总司令也不管这些事，总理忙得很，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着6亿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

为了深入总结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1957年计划的制订和今后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讲话。他强调：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1957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据此，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强调：一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二是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是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是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他指出应当用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陈云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压缩基建投资，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国务院进一步对1957年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支出指标进行了核算和压缩，并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1957年计划。到4月，从国外出访归来不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44次至46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对基建投资、行政经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卫生等指标都作了压缩的

《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1957年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第十一节　国际形势风诡云谲，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当国内反冒进势头正盛的时候，毛泽东正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问题。

反冒进是1956年的事。1956年，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所谓“多事”，主要是就国际形势而言。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24日，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当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突然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许多阴暗面。

苏共二十大并不只是苏联一个国家的事情。当时，有55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应邀到莫斯科列席会议。中共也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蛇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据陪同朱德出访的资深翻译家师哲回忆说：“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没有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他们事先对中共代表团解释说：我们对中共代表团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但对其他代表团就不一样了；因为其他代表匠不列席这次会议，你们也就不便参加了。

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立即把这个报告的速记稿送来了。大家看了以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多。

朱德说：这讲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作客的。

邓小平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谭震林认为：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但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

苏共二十大闭幕以后，中共代表团回到国内。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张闻天、王稼祥、吴冷西等人到会，商讨对策。

与会者议论纷纷，愤愤然。一是对苏共事先不向兄弟党通报不满，认为这是突然袭击。二是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显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没有思想准备。

毛泽东却显得特别冷静，并不大惊小怪。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

接着，毛泽东谈了他的最初看法。他说：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毛泽东的两点意见，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定了一个基调。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坦率地表白了他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喜惧参半的心态。

最初，这种喜惧参半的心态中，"喜"的成分占着上风。那是因为"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

1956年4月4日，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后来所说的"一论"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省少用苏联的拐杖。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

建国之初和"一五"时期，中国提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这种学习出于需要，也得到了一些好处。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这种情况使得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国内开始吹出一股"解冻"之风。贝利亚的被清除，一批重要的历史冤假错案开始平反，苏共内部发生了农业政策的争论；马林科夫下台，苏联与南斯拉夫两党恢复关系。所有这些使毛泽东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并非一切正确，一切都成功。那时，中国自己在建设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发现完全照搬苏联不行。据薄一波回忆，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斯大林问题披露后，使毛泽东的"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胡乔木讲述毛泽东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泽东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一些国家引起了程度不同的混乱。当然，各国的波动程度不一样。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引起了较小而短暂的混乱，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则不同，那里的局势本来就不稳，现在更是炸了锅。

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也参加了苏共二十大，当他在莫斯科听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可能是预感到波兰将要发生一场大的混乱，惊惧万分，竟猝死在莫斯科。

贝鲁特的预感真的应验了。1956年6月，波兰西部的工商业城市波兹南发生由于工人的某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流血冲突事件。尽管事件很快得到控制，但它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产生了重大分歧，并且愈来愈公开化。

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了苏共中央的极度焦虑。他们认为在波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必须坚决制止。10月中旬，苏联开始在通向波兰的交通要道

上集结军队，两艘苏军巡洋舰要求进入波兰港口。与此同时，苏联军官指挥的三个坦克纵队包围了波兰首都华沙。10月19日，正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开幕的时候，赫鲁晓夫亲率一个包括3名政治局委员、华沙条约国部队总司令、苏军总参谋长以及10余名陆军上将在内的庞大的苏共代表团，在未经波方邀请的情况下突然飞抵华沙，要求波党暂时休会，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迫于苏方的压力，波党只得停止会议，连夜同苏共会谈，但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蛮横态度并未屈服。波兰局势处在十分严重的时刻。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波兰局势的发展。10月19日和21日，苏共两次就波兰局势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认为波兰局势十分严重，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如何处理波兰问题；并要求代表团的规格要高，最好由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接到苏共来电后，中共中央在20日和21日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的要求。会议认为，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坚决反对苏联对波兰采取武装干涉。波兰局势虽然比较复杂，但看来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走入西方集团，应当承认目前波共中央的领导，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它合作，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苏联。21日和22日，毛泽东两次约请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向苏共中央转达中共中央反对武装干涉波兰的态度和对波兰局势的看法。

23日上午，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启程赴苏，当晚抵达莫斯科机场，在机场受到赫鲁晓夫的迎接。到下榻住地后，赫鲁晓夫不等客人安顿下来，就急迫地向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介绍波兰的情况。

就在中苏两党领导人交谈时，又传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动乱的消息。这一事件被称为“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是继波兰之后在东欧发生的：之一起举世瞩目的严重事件。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政治气氛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强烈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要求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争取独立自主，由此引发了匈牙利党内的严重分歧，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西方势力乘机积极参与。10月23日，布达佩斯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的群众队伍。示威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占领匈牙利党和政府的一些机关，发生同保安部队的冲突，造成了流血事件。23日深夜，也就是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晚，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匈牙利党和政府逐渐失去对局势控制的能力。

24日，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为讨论波匈局势而紧急召开的主席团会议。26日和30日，中共代表团又两次出席苏共中央的此类会议。30日，中共代表团从苏方得知匈牙利国内局势继续恶化、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反政府势力已占优势的情况以及苏共中央准备从匈撤出军队、放弃努力的态度后，紧急讨论了一整天，并把讨论的结果在电话中向北京作了请示汇报。在晚上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认为在现在这种局势下苏军撤出匈牙利，把匈牙利交给使用暴力手段的反政府势力是不妥当的。

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31日晚，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启程回国，赫鲁晓夫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到机场送行。在机场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中共代表团，苏共中央经过研究，已经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尽全力挽救匈牙利的局势。

这以后，波兰和匈牙利国内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但这件事给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层以强烈震动，引起他们的深思。据薄一波回忆，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几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关切波匈事件，是因为这两个事件不仅关系着波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影响，在中国也发生了一些罢工、罢课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中共开展开门整风。

第十二节　中共开门整风，民主人士响应号召积极“鸣放”

1957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来得很不寻常。

这一年的2月27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向1800多位各方面人士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4个钟头。

几天以后，也就是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包括党外专业人员160余人在内的8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2月27日讲话的录音。接着，毛泽东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两次讲话总的精神是解除党内外各界人士、尤其是一些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顾虑，动员他们积极鸣放。

与全国宣传会议召开的同时，3月5日至20日，在北京还举行了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主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发言拥护中共关于推进争鸣的新方针。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结束，经过3天的准备，从3月16日开始，毛泽东启程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党的干部宣讲新的方针，目的是消除党的地方干部的疑虑，要他们不要害怕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发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

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还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还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很赞赏《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当时，他刚从外地回京不久，便把《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和几个副总编辑及编委找去，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人王若水也参加。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与他们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肯定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并询问了写作的过程。

邓拓说：是王若水同志写的。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

毛泽东还与邓拓等人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 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4 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的时候，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对台戏”这种提法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这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斗争中必须同时改造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告知省部一级的党组织，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表达了对于中共开门整风的合作态

度。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中共决策者感到不安的说法。

担任教育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发言中谈到，中共在工作中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也讲到了类似的话。但他的话更加刺激一些，因为他的矛头是直接对着毛泽东的。他曾用四句话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陈铭枢在发言中还讲到了取消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无党派人士陈叔通希望中共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检查一下8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他说，一般说来，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

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这些座谈会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发言在全国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人们上街抗议等事件。

5月16日，座谈会发言完毕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这是开门整风将要转向的一个标志，虽然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据李维汉回忆："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

第十三节　反右派斗争使政治形势紧张起来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党内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一篇宣告决策改变的重要文件。文章一开篇，毛泽东就论证了左比右好的道理。左，或者说是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持有这个立场与态度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而右，或者说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说前一段整风鸣放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那么现在到了把方向转过来的时候了。文章认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而且，这篇文章认为，前一段的批教条主义，有批过头了的，有批错了的，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

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攻击。这种情况当然必须纠正。

经过调整部署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继续座谈。休会之后的第一次座谈会在5月21日举行。表面看来还是那样一些人，还是那样一种热烈的发言，还是照旧每天详细登报。看不出气氛有什么变化。座谈会的主持者，如李维汉等人当然是成竹在胸，但他们还是一如从前的主持着会议，号召人们大胆地"鸣"，大胆地"放"。与此同时，各高等院校、新闻出版单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也在继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社会各界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不知祸之将至，还在不知深浅地对中共和国家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各式各样的批评意见。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向"资产阶级右派"发出了第一支林中响箭。

这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篇社论。社论以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信"为由头，告诫人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

事过几十年之后，当年直接参与其事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道：

"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6月8日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6月9日社论的题目是《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10日社论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11日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12日是《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14日是《是不是立场问题》。

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经过修改的毛泽东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将公开发表的"标准本"与原讲话相对照，可以发现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增加了"六条政治标准"：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种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写道：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这是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盟"这个缩写的专有名词。所谓"章罗同盟"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经过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揭发和批判，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各地的负责人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和北京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陈新桂、储安平、范朴斋、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潘光旦等人，上海有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陆诒、吴茵等，江苏有陈敏之等……。其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被划为右派的。

反右派斗争，不仅在党外进行，而且也要在中共党内进行。

1957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把他在会上谈话的一些要点写成《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说：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7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精神发表社论，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社论提出："必须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从中央机关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一直到县、乡、村党政领导系统中，普遍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将一批党政干部划成了右派。如在中央机关的有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研究室主任鲁明健等；在省市党政机关的有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沙文汉等人；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省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等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检察长杨效春等人；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等；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刘

洪涛，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杜存训等；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人。他们被划为右派大多是由于提了一些改善党委领导方法的意见与建议，而有些人被划为右派则只是由于与党委“第一把手”意见不和。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助长领导集团中的“一言堂”现象。

第十四节　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开始不点名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最初发动整风运动还有一个考虑：就是1956年发生的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本来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充分展开，只形成一个被称作“七条的妥协方案”。毛泽东后来说：那七条是筑一条堤坝，挡一下水，问题解决得不彻底。这一次，他想借整风统一思想。

在1956年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是不满意的，但是，究竟以什么方针来进行建设，他还在思索中。到1957年秋天，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开始着重考虑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反击反冒进的观点也更加明确起来。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

10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修改了八大的政治路线。他郑重表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他批评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他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这样，毛泽东便把反冒进同右派向党进攻联系了起来。

许多党史工作者都已经指出，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带有试探性质，属于一次“火力侦察”。他要看一看自己发动反反冒进的斗争，在党内，尤其是在党的高

级领导干部中会不会遭到公开的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讲：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个东西，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勇气找部长谈话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大概是发自内心的。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也说：对于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和所谓“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遗憾的是，对于毛泽东的上述公开反对八大决议、明显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言论，中共中央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没有出来讲过任何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对毛泽东显然是一个鼓舞。

周恩来此时已经放弃了反冒进的主张。还在反右派运动正处在高潮的时候，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反冒进与新的政治形势的不相协调性。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举行的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1956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1956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因此，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

很显然，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与几个月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周恩来后来回想起这次讲话时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周恩来的话是符合事实的。他不但放弃了反冒进的观点，而且还说1956年是“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人说，“跃进”一词就始于周恩来的这个报告。

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要求，从1956年到1967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这个草案过去曾先后在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纲要。

风向逐渐向左转。经过了一个艰难复杂的探索过程，中共中央正在逐渐接受毛泽东反反冒进的观点。中国经济的车轮正一步步朝着“跃进”的轨道驶去。

第二章　发动“大跃进”，出台“总路线”

第一节　冬修水利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文件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毛泽东认为，现在一人3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

修改后的纲要，于1957年10月25日重新发表。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全民讨论，要求通过讨论，在全民中开展一次大辩论，目的在于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中央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这说明，修改后的农业四十条，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在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即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规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使这一运动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

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后，上至各省、市、区，下至各合作社，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生产积极分子大会，落实农业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修改生产指标，与此同时，舆论机器纷纷开动，不惜版面地大量报导各地区生产大辩论的情况，为农业大跃进大造声势。

大辩沦是以落实农业四十条和冬季生产为主题进行的，辩论的内容自然是农业四十条提出的兴修水利、改良工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增加肥料、推广优良品种等增产措施。大辩论自始至终都鲜明地贯彻着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扫除思想障碍，克服右倾保

守思想。大辩论的对立面，就是那些对落实农业四十条没有信心的干部。

进入10月份以后，在进行大辩论的同时，落实农业四十条的各项措施也在加紧实施之中。

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人。

这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场面热闹，前所未有。

1958年2月上旬，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发言中讲述了他们那里农田水利建设的热闹场面。

广西代表覃应机说：自去冬开始，全省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今年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的巨大，各族人民拿出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计设法把河水拦起来，把山水堵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把地水挖出来，把低水抽上来。经费自己筹，石灰自己烧，粪箕自己编，石料自己打，沙子自己找，木料自己砍。山藤代绳索，柴火代油灯，旧料代新料。

山西省晋宁县代表李能说：每天鸡叫头遍，村子里就人喊马叫，田里、沟里尽是做活的人；天大黑还点着汽油灯马灯干。

湖南省代表谭保余说：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万千群众，冒风雨，破冰冻，开山凿石，修渠引水。入夜之后，打火把，点汽灯，人声沸腾，热火朝天。

黑龙江省肇源县代表巴彦胡说：冻地四尺多深，大镐刨断了，换一个再刨。农民说："一镐没刨动，二镐硬如钢……别看地冻四尺深，冻手冻脚不冻心，镐比地硬，心比镐还硬"。昼夜一齐干，农民创造了多快好省的"冰灯"，从远方沿松花江看去，好像是蜿蜒如蛇的长城，实际就是上万农民干夜班的冰灯，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齐明。

农村冬季生产运动的另一个中心是积肥。为了多积肥，人们充分地发挥着想象力。

还是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云南省宜良县代表张惠英介绍了他们的做法。

这个县肥料来源很少，大辩论以后，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终于找出了18种肥源。提出了"牲畜要有厩，家家有厕所，厕所要加盖，人人勤积肥，路上无粪便"的口号。很快掀起养猪改厩积肥高潮。

张惠英介绍说：社员们提出："要想庄稼像个样，粪箕要挂在肩膀上"，"冬季比粪堆，秋季比谷堆"的竞赛口号。全社不分男女老少，个个积绿肥，铲火土、扫烟筒、挖老墙土、挖沟泥、搜集乱头发，猪毛和碎皮，积小便，打扫房屋和街道卫生，真正形成了家家有尿盆，人人带尿罐的习惯。

上面提到的黑龙江省肇源县的巴彦胡代表也介绍了他们那里积肥运动的情况，为了坚决完成全县的积肥计划，许多农业社自己提出："挖出包泡底，推倒老墙根，所有粪源大翻身，坚决实现400斤"的口号，开展了"粪坑挖净，粪源找净，厕所起净；大街扫光，粪蛋拣光，畜圈起光，城粪下乡；锅台、炕洞、碾台、井台、老尿窝、破房框都来个大翻身"的积肥运动。

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兴起，实际上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第二节　打一场除四害、驱麻雀的人民战争

在大跃进初期，除了冬修水利和积肥运动外，最具声势的要数除四害运动了。

所谓“四害”，当时是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四种小动物。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四十条》中就有除四害的内容。毛泽东本人对此倾注了很大热忱，把它当作移风易俗，建设文明农村的重要目标提出来。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除四害也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毛泽东说：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于是，全国城乡一齐发动。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曾介绍了北京开展除四害运动的情况：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从去年12月开始以来，进入了新的高潮，声势浩大、雷厉风行。在第一次突击周中，两天里就出动了15万人上街宣传。在广大群众中人人传诵除四害，家家动手大扫除。几天功夫，全市绝大部分地方做到了蚊蝇绝迹，面貌一新。今年一月中旬，全市召开了8000人的誓师竞赛大会，城郊各地区、各机关、学校、部队都争先恐后地投入了竞赛运动。在这以前，很多单位已经制定了加快消灭四害的计划。一浪高过一浪，一批赶过一批，接二连三的挑战应战书和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各区和市里来。

在除四害运动中，见诸报道最多的是驱赶麻雀运动。这可能与这项工作更容易形成声势与规模有关，也可能与这项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重视有关。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麻雀。他说：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有人说麻雀可以吃虫子，我看把它消灭，它与人争食。

于是，一场驱赶麻雀的人民战争开始了。

上面引述的吴晗的发言里就提到了驱赶麻雀的事。他说：广大群众说了就做，西四区福绥境的居民捉光了麻雀老鼠以后，在零下22度的严寒里，用双手捉了9只麻雀，还请小学生在房檐上捉了十几只。崇文区85岁的老人常德，一冬来用丝网捕捉了3万只麻雀，他的兄弟常明，也打了2万多只，常德嫁女儿的被褥都是用雀毛絮的。农民们背着火枪下地，歇晌的时候就打麻雀。

这场运动一直延续了一年多，在这场运动中，到底打死了多少只麻雀自然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数量是十分惊人的。1958年12月13日这一天，仅上海一个地区，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

12月13日凌晨，上海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里，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

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成区连夜赶制8万多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徐汇区斜土路居民和榆林区杨浦路居民还制作了大量活动假人。在市郊县几乎抽调了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

这场驱雀运动到1959年才终止，这要归功于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科学家。他们解剖了麻雀的嗉囊，发现四分之三是害虫，只有四分之一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益鸟。

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对此发表意见：麻雀不要再打了，改成臭虫。

第三节　赫鲁晓夫的一个设想，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进行了会谈。自从苏共二十大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之间已经有了不少的分歧，毛泽东本人对于赫鲁晓夫的一些做法也多次表示过不同意见，他们两人在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不管他们的分歧有多么深刻，他们对于经济的看法却惊人的相似。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是经济领导工作中的乐观主义者。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不久，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施政方针的报告中就宣称："我们计划设计者的计算表明，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出量。"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所说的"重要产品"，是指铁矿石、生铁钢、煤、石油、电力、水泥以及消费品如糖、羊毛纺织和皮鞋。

赫鲁晓夫的话对毛泽东显然是一个鼓舞。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期间，毛泽东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他不再像早些时候那样频频指责苏联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相反，苏联在人造地球卫星和弹道导弹技术领域中的成就，特别是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对于未来美好前景的描述，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11月18日，毛泽东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聚会上发表了他对全球两个阵营实力对比的乐观估计：

"现在我感受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据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回忆：毛泽东对莫斯科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

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确实感到胜利在社会主义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的口号。而且毛泽东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出现一个大跃进。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毛泽东的意见很快成为中共中央的正式决策。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工会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正式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赶超英国的口号。他指出：在15年内，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2月7日，李富春在工会八大上所作的《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对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李富春预计，在15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钢产量将达到4000万吨，英国目前生产2000多万吨钢，将不可能达到那个指标。他还表示，中国在15年内将在煤、金属切割机床、水泥及化肥等方面的产量超过英国。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说1956年是正确的跃进，而不是冒进。社论号召大家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颇为赞赏。事隔半年之后，毛泽东重新看了一遍这篇社论，他于1958年5月26日给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说：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通过这番话，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跃进”一词的赞赏。只是他说“跃进”一词始于《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显然并不准确。因为如前所述，还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报告，就使用了“跃进”一词。

在11月份，毛泽东还过问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工作，他在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对这篇社论作了进一步斟酌修改。社论稿带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于12月12日正式发表。这篇社论还以尖刻的语言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的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社论指责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臣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第四节　毛泽东的批评声色俱厉，周恩来被迫公开检讨

195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着的如何取得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他感到北京的空气比较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促北京。于是在12月8日，离开北京，9日到达杭州，到那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

12月16日，毛泽东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等人开会。周恩来正好陪同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到达杭州，也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再次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大致还是上述那些人，只是增加了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人。周恩来这次是陪同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到杭州参观，也参加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发了脾气，对周恩来等反对冒进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毛泽东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他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偶像崇拜"？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

毛泽东还在杭州召开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回到了北京，为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做准备。考虑到1958年预算和年度计划等需要研究确定，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在人大召开前先开一次党内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表示同意。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南宁会议"。毛泽东对于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据当年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他曾接到过一份毛泽东亲笔写的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通知写道：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日完毕（中间休息2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月11日，会议在南宁如期召开。在毛泽东亲笔写的那份名单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为要送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回国，到南宁的时间推迟了两天，其他人全部按时参加了会议。

南宁会议原定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八

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

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是从经济方针来谈。南宁会议时，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多次谈及此事，主要将反冒进同政治联系起来，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是政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澄清，否则，无法前进。

毛泽东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语言上照例生动风趣，但辞锋犀利，有时还不免疾言厉色。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

"十个指头是关系六亿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

"我乃罪魁祸首。1955年12月写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反了右倾保守，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地大小报纸刊物都登了。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大家劲都很足），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1月13日晚，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在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庆施的文章很好，上海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这五人之上的则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当时，陈云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参加南宁会议，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到他批评的主要是陈云。因为陈云是坚持综合平衡以防止冒进的人。毛泽东在会上还讲了一大段哲学，说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

为了给这个积极的平衡作注，2月28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提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

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深夜1点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他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连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第五节　《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社论遭到逐段批驳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那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使会议空气极为紧张。他把这篇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这篇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他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正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泽东还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

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用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毛泽东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沦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第二天，毛泽东又把宋玉的这篇《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与会者。

1958年2月1日至1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先念和薄一波分别作了《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强调，1958年不仅应当使工业生产在数量方面有一个跃进，而且应当在质量方面也有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次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620万吨。

2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还是批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批评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2月18日是旧历正月初一，民间都在热热闹闹地过春节。但在中南海怀仁堂里，空气凝重，批评反冒进的政治局会议仍在进行。

在这一天的会上，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他还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继陈云之后，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也都在会上作了检讨，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

为了巩固批判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

第六节　刘少奇也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

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住在四层楼的宾馆，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这次跟南宁会议一

样，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定于4月1日至9日在武昌召开的会议，即武昌会议。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6次长篇讲话，即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

3月9日，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要大家讨论。

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他说明了发动对反冒进进行批评的目的：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泽东在会上还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一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没有具体措施，工农商文都可能有此情况。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周恩来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26日，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主席的地方。他说：自己的设想同主席的设想是有距离的，主席的设想确实是高明，使人折服。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还是有可能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我觉得快点慢点都可以，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路线的争论。刘少奇接着表示，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慢性病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我们要注意发现慢性病，去及时纠正它。“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也要防止，但即使有些地方在建设上犯了急性病的毛病，也并不可怕。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是中共党内地位仅低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连刘少奇都作检讨了，别人还能说什么？

在上述中小型会议上，毛泽东顺利地开展了批反冒进的斗争，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刘少奇先后都作检讨了，这就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总路线”的制定和“大跃进”的全分的思想、舆论和理论方面的准备。

第七节　毛泽东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和两种不同的反个人崇拜。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鼓吹个人崇拜，反对八大决议，但却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于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气氛已经很不正常了。在成都会议上，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有一个长篇发从多方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一些指导思引发了毛泽东的不少插话。3月18日，陈伯达在成都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他首先讲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他说：昨天同柯庆施同志谈论，南宁和成都这样的会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呢？事实上，这是中央和各省党委的联合整风会议。从去年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国的形势起了根本变化。这个根本变化，可以这样说：一天等于20年。马克思、列宁说过，可能将来会一天等于20年。比如中国搞水利运动。解放以来8年，等于几千年。8年间，我们搞了2亿亩，现在几个月搞了2亿多亩。所以，一天等于20年，毛泽东主席这句话说中了。不仅是我们过去革命有一天等于20年的例子，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一天等于20年的例子。水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跟一些留学生说过，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去年开始的。以前解决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可以说，去年以来，真正开始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生产力发展了，逼迫我们不能不前进。现在大跃进已成为群众的口号，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最近主席了解了一下渤海区的情况，我们去住过几天，就感觉到的确是大跃进。现在北方的水利运动向南方提出警告，将了很大的军。经过民主革命，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中央与地方必须适应这个形势，不能适应，就将落伍，陷人被动局面。整风会议就是摆出问题，交谈认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解决思想问题，达到团结。现在看来，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确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就是说，党更团结了，团结得更好了。

陈伯达接着又讲到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对个人崇拜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没有权威是不行的。恩格斯写的《论权威》的文章，轮船在海上航行，全船命运就交给了舵手。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

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代表人物。

陈伯达还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突破迷信是好事。赫鲁晓夫现在是中心人物，代表中心思想。没有赫鲁晓夫不行，没有群众也不行。没有领袖，没有权威不行，这个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讲得很清楚。

毛泽东在陈伯达发言过程中，作过不少插话。从这些插话可以看出来，他对陈伯达的发言是赞赏的。特别是他对陈伯达讲到的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很有兴趣。

当陈伯达讲到：最近我看到刘晓同志关于王明的那个报告。王明对整风的看法，对过去也是对现在都是一种攻击。王明说，整风的结果，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

当陈伯达讲到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时，毛泽东说：委员会要有一个主任，总要有一个辈员长。

当陈伯达讲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时，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现在人们冷静下来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的说法确实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比如他把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解释为个人崇拜恐怕就属此类。但当时人们并没有谁提出过反驳意见。相反，透过陈伯达的发言和毛泽东本人的插话，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了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沿着这条思路，柯庆施甚至在会上提出：相信毛泽东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在武昌会议上，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中；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的情况；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农业四十条有把握，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中。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说，反冒进问题可以不再谈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4月5日，在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1957年比1956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实的。1957年实际1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

4月8日，叶飞汇报时，毛泽东又插话说：反冒进中强调的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

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泽东在会上还分析了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他认为原因有四个：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他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到了阶级斗争问题。他提出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加上一个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第八节　在鼓吹跃进的氛围内，计划指标节节攀升

与批评反冒进、酝酿总路线同时进行的，还有各项生产指标的节节攀升。

指标升级，首先是从“两本账”开始的。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薄一波在会上汇报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和1958年计划。由于批评反冒进的空气十分紧张，大家的头脑热起来了。为了避免被说成保守，也为了满足地方上的要求，薄一波在汇报中提出了实行“两本账”的办法，即国家一本账，为必成数；企业一本账，为期成数。

毛泽东对薄一波的发言并不满意，批评他是“中间派”。但是对两本账的建议还是接受了，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完整表述为：“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中央如此，地方层层仿效，如法炮制，搞自己的两本账，于是指标层层拔高。同一个指标，从中央到基层一路下来，已经远远不是两本账，而是六七本账的问题了。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搞出来的。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问题。会后，正式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草案规定：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

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5 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6 年或者 7 年可能普遍做到，8 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南宁会议以前，安徽提出 3 年改变面貌的目标，毛泽东接受安徽省委负责人的建议，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规定：10 年决于 3 年，争取在 3 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口号是，苦战 3 年。"毛泽东还采纳了农业部长廖鲁言的意见，提出了一种掌握时机的方法，叫做：5 年看 3 年，3 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认为只要掌握好时机，3 年改变农村面貌，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把握就更大了。

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的省委提出，5 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在这方面，河南一开始就拉开了一马当先的架式，这种架式他们一直保持了将近三年。当时，河南省委向地县部署：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四害"；当年实现纲要规定在 12 年内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因工业集中，历年吃外调粮的辽宁省也不甘落后，他们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对河南和辽宁的计划，毛泽东感到有些离谱。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试，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

1957 年冬天以来，毛泽东抓农业，除了十分重视指标以外，还非常重视农业的增产措施和群众的干劲。后来，《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叫《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可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抓农业的基本要领。毛泽东重视的农业增产措施，除大兴水利建设之外，就是耕地深翻改土、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后来他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字概括农业增产措施，形成"农业八字宪法"。

毛泽东听说山东省有个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鼓励各省搞深翻。他对湖南省的负责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 100 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对陕西的负责人说：订个 5 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河南省长葛县县委第一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专门介绍深翻土地的经验，说他们县到 1958 年 4 月底，33 万亩旱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 1.5 尺左右，计划年内把全县 112 万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据他说，土地经过深翻，可以充分发挥水、肥的效能，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以至一倍。

毛泽东 5 月 27 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号召在全国推广长葛县的经验。他指出：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长葛县的经验向所有各县提出一个问题：如果长葛县今年一年就把全县的耕地 112 万亩深耕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能吗？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后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现场会议，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

毛泽东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密植3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肯定：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3万蔸。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3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按斤折合，一亩共打820斤。他认为北方的小米、麦子也可以算，高粱也可以算，玉米、蕃薯、谷子也可以算。

在农田水利建设和深翻改土运动中，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有伟大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讲话之后，广大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

毛泽东所提倡的这些东西，有的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确有积极意义，但是离开了这种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则可能有害。再加上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推广，往往弄得面目全非。据后来了解，深翻土地，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1丈2尺深的。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给插红旗，而按农民自己的经验下种的，则给插上白旗。结果，插红旗的土地只收一堆秕子，插白旗的土地倒真正增了产。按穗按粒推算产量的方法，在一些地方也演变成为制造高产“卫星”的方法之一。在工具改革中，因为搞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等等，结果也事与愿违，造成很大的浪费。山西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农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实际，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一普遍宣传，并在平原地区也盲目加以推广，搞所谓“葡萄串”、“满天星”，以致给平原地区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第九节　人们的热情极度高涨，总路线在成都出炉

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路线的，搞革命如此，搞建设亦然。搞大跃进运动，也要有一条路线，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这条总路线，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最早出现的是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12月6日，他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稍后，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国农具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提了出来。

后来在反冒进时，这个口号很少被提及。召开党的八大时，周恩来在修改一个文件时曾勾掉了有多快好省的一句话。周恩来的做法被批评为“促退委员会”。经过批评反冒进，又重新恢复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词，是在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乘风破浪》的社论中第一次出现的。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1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谈起元旦社论，周谷城说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最高国务会义、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件事。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完整地提了出来。1958年3月2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点。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

在谈到总路线时，他特别强调了“鼓足干劲”的问题。他说，《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起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为了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确定下来，成都会议决定近期内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决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

报告草稿已经由秘书班子起草出来，3月25日，在成都会议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人员讨论。由于会议定于26日结束，与会人员没有来得及对《报告草稿》进行深入讨论，只有少数人提出了意见。有的人提出，总路线的提法应加上奋斗目标，如10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有的人提出，应当通过这个报告，把总路线在干部中明确，建议从中国的条件讲起，说明应当采取哪种路线，现在的稿子力量不够。有人提出，这个报告主要应当讲总路线，并且在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西南、西北小组提出，全文应突出写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根据南宁、成都两次会议精神，讲得更完善些，讲透，将主席重要指示写进去，写总路线形成过程是进行了斗争的；关于总路线的公式，是否不讲死，提得松动一点，留个余地；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如何衔接起来的，要写清楚，等等。

《报告草稿》发给与会者后，陈伯达又作了修改，毛泽东也作了修改。陈伯达将第

1页上的“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句，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毛泽东又将这段话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结束后，由刘少奇主持，胡乔木负责，对《报告草稿》进行了大的修改。4月7日刘少奇致信胡乔木，谈了他关于修改报告的一些设想。根据他的意见和成都会议上人们所谈的意见，4月17、18日改出报告初稿，篇幅比原：来的草稿增加将近两倍。初稿全文分为6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4月2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第46次会议，讨论准备向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决定对报告稿作进一步修改。4月22日，刘少奇带着修改后的报告稿到达广州，请毛泽东审定。4月25日，周恩来也从西安赶到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为期4天的广州会议。4月30日，刘少奇带着经毛泽东审定过的报告稿回到北京，周恩来也同时回到北京。5月2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杨尚昆、胡乔木等开会商讨有关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第47次会议又对报告修正稿进行了讨论，决定提交八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5月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准备向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各项报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刘少奇原来是支持反冒进的。但是，全国范围内迅速到来的大跃进局面，使他的思想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也开始转向支持大跃进。正如他后来总结教训时所说：1958年上半年的形势，使我们“感到惊喜和振奋”。在这样的心态下，刘少奇对大跃进初期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信心。4月11日，刘少奇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汪戴尔时说：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过去拟定的计划指标太低了，需要大大地修改。我们提出了15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按目前情况看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估计10年就可以赶上了。我们没有公开宣传，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做很大的努力，各方面工作都需大跃进。

第十节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树起了总路线和大跃进两面大旗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规定而召开的。这类会议在中共

历史上没有先例，以后也没有再开过这样的大会。因而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会”。

八大二次会议是一次在全党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会议。关于这次大会的意义，当时的《人民日报》说：“这次大会是整风的大会，是大跃进的大会，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八大二次会议前，5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共八届四中全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外，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全会讨论了八大二次会议议程、各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团的组成，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报告。

5月5日上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预备会议。会上，通过了大会的日程和主席团成员名单，并组成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中直、军队8个代表团。大会主席团由44人组成，主席团常委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伯达、邓小平、彭真、乌兰夫、柯庆施、李井泉。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977人，此外还有列席代表387人。列席代表中有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其他基层党委的书记。

5月5日下午，大会正式开幕。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报告在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深刻改变了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之后，认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

报告还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论断。报告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报告在充分肯定八大一次会议以来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后，对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指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邵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路线提法上有“多、快、好、省”四个方面，但实际上，不仅是后来的实践，即便在最初理解上也只是一个“快”字，突出一个“快”字。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力争上游》就说得很清楚：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社论反复强调“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而当时人们也主要是从“快”的方面来理解和掌握总路线的，这也是总路线的首倡者的本意和真谛。

报告还特别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报告说：在1956年，我国的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报告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育了党，教育了群众。

报告把建设速度问题放在异常突出的地位，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兴奋地说：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刘少奇的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说过的那些意见有条理的综合。毛泽东本人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的大会上，先后作了四次讲话。

毛泽东说：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有些人对多、快、好、省的方针还不清楚，到底对不对，有怀疑的，反对的不少。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经过一些时候，经过反复看，才看到了。总路线的形成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以后是不是没有曲折了呢？不会的，还会有曲折的。这次大会制定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去证明；虽然经过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的大跃进，已经有所证明了。过去三年是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了。有了这个变化，我们

这次会就开好了。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多次号召全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他不只一次地讲了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超过学问多的，并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一个公式，认为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让编印发明家的传记集来证明这一点，以此来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丢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 7 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或者 10 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

第十一节 对反冒进问题穷追不舍，做检讨的人越来越多

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会议上进行检讨。

16 日是陈云作检讨。他说：从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17 日是周恩来作检讨。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的这段时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之一。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恩来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职务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稿，是他花了 10 多天时间，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

后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就住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了。"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5、6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开始作检讨。他说：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薄一波和李先念也分别在会上作了检讨。

薄一波说：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1957年计划是保守的。而且在思想没有完全解放的情况下编制出来的1958年计划的第一本账，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

李先念在检讨中说：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一些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

在陈云、周恩来等人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同时，开展反反冒进斗争的目的已经实现，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

在会上，毛泽东还从另一角度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他说：假如我们党在某个时候，有些人不顾大局，像高岗那样，那就要分裂。因此，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

个精神准备。

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代表们对于总路线给予了高度的赞美。会上批判反冒进和批判右倾保守的呼声成为基调。大家认为，发生反冒进的思想根源，在中央工作的个别领导人来说是思想方法问题，在地方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中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有些人是由于严重右倾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情或严重对党不满，因而借反冒进之名对党进行攻击。就全国说，反冒进的错误虽是思想方法的错误，但不是一般方法的错误，而是在建设路线上带根本性质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的个人崇拜问题，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许多人一方面否认党内有个人崇拜，一方面又把毛泽东作为真理的代表，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人说：经过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的代表；拥护和相信毛泽东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我国人民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发生伟大的作用。还有的中央负责人说：毛泽东主席的建设路线，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经过多次革命烽火的考验、被充分证明了的、无往而不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当前客观实际的掌握和运用，是对于国际的和我国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我们有了毛泽东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十二节　有人描绘出一幅“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前景

在高速度的指导思想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与会者纷纷再度设想加快本地区、本部门各项建设的步伐。

李富春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了经中央经济小组讨论后的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李富春说：按照我们初步设想的指标来估算，1962 年工业总产值大约为 2300 亿～290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23 倍，平均每年增长 26%～32%；1962 年农副业总产值大约为 1200 亿～130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80%～110%，平均每年增长 13%～16%。李富春还介绍各项主要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到 1962 年达到的必成指标和期成指标：发电量分别为 900 亿度和 1100 亿度，原煤分别为 3.8 亿吨和 4.2 亿吨，原油分别为 800 万至 1000 万吨和 1500 万吨，钢分别为 2500 万吨和 3000 万吨，化肥分别为 1000 万吨和 1200 万吨，棉纱分别为 1000 万件和 1200 万件，粮食分别为 6000 亿斤和 7000 亿斤，棉花分别为 6500 万担和 7500 万担，牲畜分别为 44.5 亿头和 5 亿头。

李富春很有信心地指出：只要我们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上述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帐，我国就完全有可能在 1962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在赶上英国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努力，就可能在

1972年或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

冶金部负责人在大会发言中说：最近以来，我们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次地和各省市研究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后，我们的结论是：明年达到1200万吨以上，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7000万吨以上，1972年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就是说，钢产量明年达到八大指标；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化学工业部负责人在发言中说：我国的钢铁和煤炭，能够在15年内赶上以至超过美国，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至今仍然处于严重落后状态的化学工业，敢不敢和美国较量？能不能够在10年内也赶上以至超过美国呢？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在化学肥料工业方面，美国1957年生产化学肥料约2800万吨，今后每年以5%的发展速度推算，到1962年可能达到3580万吨。我国到1962年计划生产3000万吨，预计实际执行的结果还会大大超过，可能达到4000万吨左右。这就是说，化学肥料在5年内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是大有希望的。

一些地方党委负责人则就地方工业农业的快速发展作了发言。李井泉在发言中说：四川省对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已经作了初步规划，我们决心争取提前3年或5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争取在5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在1962年达145亿元，或者还更多一点。比1957年的36.1亿元增长3倍，或者更多一点。我们认为这个指标是比较有把握实现的。

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他说：毛泽东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前人的"乌托邦"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大会发言中，将上面的设想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他认为在15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为人们描述了这样一幅"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图画：

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达理"（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像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r、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等等早已断子绝孙，那时的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们"言必称希腊"时所讲的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经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只能到博物馆里才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化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了社会的新风尚，大家都具有为着社会公众利益进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

综合上面说的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这样描述的发展前景的确诱人，难怪人们热血沸腾。

第十三节　周恩来提出辞职，中央认为他应继续担任现任职务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5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种组织调整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只是政治局委员，林彪的升迁，使他成为十大元帅中地位仅次于朱德的第二号人物，从而为庐山会议后，林彪代替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埋下了伏笔。而国务院农办主任谭震林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则使他在党内的地位高于主持农业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因为邓子恢从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被视为右倾。柯庆施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显然也包含着对他在大跃进初期的一些行为的嘉奖。李井泉当时对于大跃进也是非常积极支持的地方领导人之一。所有这些都从组织上保证了“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曾向中央正式提出过辞职要求。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杨尚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周恩来之间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智慧、能力等综合性的素质，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第十四节 大跃进的战车开足马力向前奔驰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从党中央当时转发的《江苏省委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就可窥一斑。

这个报告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省委召开了三届八次全会（扩大），各地、市、县委书记，高校党委书记和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报告说：与会者听了传达并进行讨论后，个个精神焕发，心情舒畅，雄心更大，干劲更足，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迈进。报告说：省委全会首先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生产可以一翻再翻。报告说：当前对跃进的认识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小跃进还是大跃进，就是增产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十，还是一翻再翻的问题，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怀疑派在这上面做文章。会议认为，有些人把农业增产问题，说得那么神乎其神，玄而又玄，是一种很大的迷信……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使产量成倍地翻，必须措施成几倍地翻，干劲成十倍地翻。其次，是继续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肯定了地方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情况下大发展。南京市有人在会上发言说，他们要在5年之内，钢的产量达到300万吨，超过人口仅次于我国的东方大国——印度，赶上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比较发达的瑞典的水平。第三，是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认为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科学就是生产斗争的经验总结，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有些还是世界科学技术的尖端（如我国小麦亩产4000多斤）。报告还说：“破除迷信没有底，解放思想没有边。”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正像一个中子打进了原子反应堆，迅速在干部和群众中间引起了连锁反应，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1958年7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认为“江苏省委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其在工业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制定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和乱上工业建设项目。

与15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精神相一致，八大二次会议后编制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片面考虑钢产量的赶超，先确定一个过高的钢产量指标，然后再据此制定其他工业品的生产计划，使中国的工业生产建设，走上了“以钢为纲”的道路。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提高到800至

850万吨，将1962年的指标提高到4000万吨。6月，各大协作区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又将钢产量指标提高了一步。华东区首先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600至700万吨，其他大区也随着提出了各自的高指标。在此基础上，冶金部党组向中央提出，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以超过8000至9000万吨。根据上述报告，毛泽东提出了1958年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干脆翻上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成都会议只是提出了各地工业总产值要在5到7年内超过农业总产值的要求，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7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根据自己的资源等条件，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8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工作时，又进一步提出，各省也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这样，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和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任务，全国各地就出现了大办工业、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为了加快各地建立地方工业体系的步伐，根据八大二次会议的规定，中央在会后的短时间内，还把原归中央管理的大部分企业和中央在许多方面的管理权限，迅速地下放给了地方。

首先，下放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6月2日，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要求各工业部门除一些特殊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在6月15日前全部下放。这样，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80%以上，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办完了下放手续，交给了地方管理。

其次，下放中央劳动管理权限。6月29日，中央批准劳动部的报告，决定放松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确定今后劳动力的招收、调剂等项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管理，1958年的招工计划，经各省、市、自治区确定之后，就可执行，不必经过中央批准。

另外，中央还先后作出了下放计划管理权限、下放基建项目审批权、下放财权和税收权以及下放商业、银行管理权等一系列决定，把相当一部分原由中央掌握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结果，更加促使了各地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乱上，不仅使新建的一些小型企业效益很差、浪费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膨胀了全国职工队伍，过大地增强了社会购买力，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章 高产“卫星上天”，钢铁“元帅升帐”

第一节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高产的国家

大跃进运动中最荒唐、最离奇的事情，要算是放高产“卫星”了。所谓高产“卫星”，其实就是高产纪录。之所以把高产纪录比喻成高产“卫星”，那是因为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还不能发射真正的人造地球卫星，但对它又充满了渴望，于是，人们便借用“卫星”来比喻那些远远超出人们想象、超越常规的高产纪录。

高产“卫星”集中在农业，农业的高产“卫星”放得最早，放得最多，放得最离奇。

农业高产“卫星”并非空穴来风，它可以说是农业高产计划指标的产物。

1957年9月至10月间，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草案的第二条，就是“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作物的产量”。围绕着提高粮食产量和其他作物的产量，“农业四十条”提出了一系列增产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草案还提出了10个方面的措施，包括12年内水田和水浇地面积由1955年的3.9亿亩扩大到19亿亩左右，年产化肥达到1500万吨，增加谷种植面积2.5亿亩，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300万亩增加到1亿亩左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等具体指标。

对本来就有些脱离实际的计划指标，毛泽东仍觉得不满足。他在全会上讲话说：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指责主张反冒进的人是“促退派”。这以后，各级领导便把右倾保守思想看成了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障碍。八届三中全会以后，1957年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1956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1955年1000多亿斤。批判反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的兴起，这里的"跃进"不是建立在客观可能性基础上的快速发展，而是把人的意志夸大到极致的结果。从此，外部客观的因素被看得可有可无，而主观意志则被夸大到无所不能的程度。人们主要甚至仅仅凭着自己的愿望，来设想提高农业产量的计划。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代表大会，制定本地实现"农业四十条"的规划。

第二节　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浮夸风"已在不少地方刮起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后，农业产量计划的高指标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河南省2月份提出，1959年就要基本实现水利化，争取在1962年超额完成"四、五、八"，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粮食亩产量，到196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600多亿斤。广东省提出，到1962年就要实现全省粮食亩均年产800斤的目标，到1967年实现亩均年产1000斤，总产量由218亿斤增至480亿斤。陕西省提出，8到10年内使八百里秦川的粮食亩产达到800斤，总产量达到115亿斤。江西省提出，十年规划，五年完成。1958年粮食总产量由140亿斤增加到175亿斤。河北省提出，到1962年即实现"农业四十条"的产量目标，粮食亩产500斤，棉花（皮棉）亩产100斤。

如果说高指标是附着在大跃进温床上的种子，那么，高产"卫星"则是这个种子生成的果实。在大跃进酌气氛下，只要有高指标，就必然会产生高产"卫星"，这是大跃进运动自身逻辑的结果。当然，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高指标和高产"卫星"又是同时并存；彼此促成的，高指标引发了高产"卫星"，高产"卫星"又催生出更高的指标，两者形成愈演愈烈的浮夸循环。

1957年，全国小麦只在五六个地方的一二亩至多三五亩土地上，出现过亩产千斤的纪录；1958年夏收时节，全国所有的产麦区，所有的省，也几乎是所有的县，都出现了亩产千斤的纪录。亩产千斤的面积也不只是一二亩或三五亩了，如果以省为单位，

已经是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了。1957年末制定规划时，尽管不少地方脱离实际地提出亩产千斤的指标，但毕竟还没有敢提出两千斤以至更高的目标，而1958年夏收时报出亩产2500斤、3000斤的纪录已不是个别情况，甚至3500斤、4000斤以上的纪录也出现了。

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5亩小麦亩产2105斤；6月9日，湖北省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6月11日，湖北省光化县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亩产3530斤；6月16日，湖北省谷城县星光乡替民乐社亩产小麦4353斤；6月21日，河南省辉县亩产4535斤；6月23日，湖北省谷城县亩产4689斤；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亩产5103斤。

6月底7月初，国家统计局在河北省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为虚报产量开了绿灯。此后，浮夸风刮得更加凶猛了。

7月12日，河南省发射了当时全国小麦亩产最大的"卫星"：该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社长陈颜理的2亩试验田，收了小麦14640斤，平均每亩达7320斤。陈颜理向记者介绍高产经验：下种前耕了4次，第1次耕1.2尺，第4次耕6寸到8寸；每亩播种70斤，施底肥12万斤；追施杂肥5万斤，返青时又施人粪尿450担，还上了500斤草木灰，50斤硫酸铵，20斤磷酸钙。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发射小麦高产"卫星"的消息，宣称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

第三节　不少专家、学者出面论证高产"卫星"的科学依据

在大跃进的喧嚣气氛中，相信高产"卫星"的不仅有普通的干部群众，还有新闻传播媒介。许多高产"卫星"纪录，就全部是由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报道的。

更加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在相信高产"卫星"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是一贯严谨求实的科学家，他们中有的还颇有名望。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的文章，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章说：

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了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

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篇文章不仅肯定了已经放出的那些高产"卫星"，而且还论证了比现有的高产"卫星"高出20倍的产量出现的可能性。这时全国尚未出现亩产万斤的"卫星"，而这篇文章论证亩产有可能达到四五万斤。在你追我赶的浮夸风中，这样的论证文章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找他的秘书李锐谈话时，李锐曾问他，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那样的事情，毛泽东说是看了这篇文章才相信的。

紧接着这篇文章发表之后，7月5日至9日，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还组织首都科学家同30多位种田能手（包括小麦、水稻、棉花）举行丰产座谈会，他们来自湖北、河南、河北、浙江、江苏、安徽、陕西等省及北京郊区，科学家中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座谈会实为擂台赛，在上面的压力之下，科学家同种田能手展开了高指标大战。这种压力就是政治挂帅，认为科学落后于大跃进的形势，必须打破常规，解放思想，以虚带实，紧紧跟上。大家都表示，要通过试验田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术栽培管理上、理论上和作物产量上来个四大丰收。会前，中科院8个有关单位还决定共同办试验田，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亩产指标共拟定三本账，分别为：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籽棉3000斤、4000斤、6000斤。可是一听到种田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这些指标太落后了，于是改为，争取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在分组会上，就出现了像拍卖一样，竞相抬价的局面，不仅农民能手之间互相竞赛，生物学部同农科院之间，也挑战应战。生物学部争取指标达到：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棉籽2万斤。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社提出小麦10万斤，江苏一个社提出水稻7万斤。

擂台会后，生物学部当真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而且真的进行了试验。在6亩小麦地上，作出不同耕翻深度、播种密度、施肥量的对比试验。其中深耕最深达10市尺，每亩播种量多达260斤到460斤，粪肥多达40至60万斤。试验田里，白天鼓风机齐鸣，以增加二氧化碳，强化光合作用；晚上灯光如白昼，以增加光照。如此使尽了浑身解数，迎来注定要失败的试验：1959年6月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只有900斤。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做法，有些科学家算过细账，如甘薯亩产要达到15万斤，则每平方米土地上，必须长有每个重30斤的7个半甘薯，像7个半小儿一样挤在一起；如果是50万斤，则需25个小儿挤在一起了。可惜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不足以影响上层的决策和群众性的热情。

第四节　高产“卫星”竞相上天

小麦高产“卫星”的竞放，首先导致了对1958年夏季粮食产量的高估。

6月份召开的华东区第一次农业工作会议预计，华东四省一市小麦比上年增产73.5亿斤，即增长57%；油菜比上年增产317万担，即增长76.2%。主持会议的谭震林估计更高，他认为，华东四省一市当年粮食增产是以70%的速度飞跃前进的；这些省市的粮食总产量1957年共715亿斤，1958年夏季即已达到203亿斤。

6月上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本省小麦丰收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河南当年8335万亩小、大麦产量达206亿斤，其中6765万亩小麦平均亩产254斤，总产量达171亿斤，比上年增产1.29倍，有66个县、市增产1至2倍。吴芝圃还说，建国8年来河南省小麦平均每年增产3亿斤多一点，而1958年一年即增产96亿斤，夏粮比上年增产114亿斤。

各地纷纷发出夏粮高产的喜报，新闻机构随之报道全国夏粮高产的喜讯。7月初，《今日新闻》发表当年夏粮增产350多亿斤的消息。消息说，今年全国夏收粮食达到950亿斤上下，其中冬小麦增产220多亿斤，达到640亿斤左右，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消息还说，小麦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冬小麦每亩平均产量1957年为112.8斤，1958年为180斤左右。

小麦高产“卫星”的竞放，还刺激了更高的产量计划指标的出台。谭震林在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上提出，今年就可达到每人平均1000斤粮的目标，而且不需要5年即可完成人均2000斤粮食的任务。谭震林还说：棉花和油料也同粮食一样迅速增长，预计到1959年皮棉和油料的产量都要比1957年翻一番。按全国人口平均五年内达到每人粮食2000斤，是毛泽东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目标，过了不到一年，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也被缩短了。

紧随着小麦高产“卫星”的上天，又开始了新一轮早稻“卫星”的竞放。还在小麦“卫星”上天初起之时，6月20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水稻生产要加油》的社论，其中说道：“去年，我国水稻平均亩产到350多斤的时候，小麦的平均产量才只有110多斤，水稻的产量比小麦高出两倍以上。今年小麦赶上来了，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已经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了。有些省、更多的专区和县、成千上万的农业社，甚至已经以一倍、两倍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了。小麦等夏收粮食作物的总产量比去年增长50%左右。小麦的产量能够如此迅速地增长，素有高产作物盛誉的水稻为什么不能呢？仅以早稻为例，今年我国种植早稻1.6亿亩，如果平均亩产增加50%，由去年的亩产300多斤增加到500斤，全国就能收获800亿斤稻谷，约占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20%以上。争取水稻产量更迅速地增长，对于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对于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农业部发表1958年夏收粮食产量公报的当天，《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社论中说：它们说明，我国的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这是我国全体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贡献。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社论还说：既然一向被认为“低产作物”的小麦都能以71%的速度跃进，那么高产作物水稻、玉米、甘薯为什么不能更加大量地增产呢？棉花的产量为什么不能跃进呢？《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显然起到了一种鼓励各种农作物竞放高产“卫星”的作用。

第五节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新闻媒介一再进行早稻应当高产的鼓动宣传时，各地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场放早稻高产“卫星”的竞赛。据《人民日报》和各地地方报纸的报道：

6月26日，江西省贵溪县早稻亩产2340斤；7月18日，福建省闽侯县早稻亩产5800斤，随后又报早稻亩产7275斤；湖北省孝感县亩产15361斤，这是早稻亩产超万斤的最早的“卫星”。没过多久，该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放出一个震惊全国的更大的早稻“卫星”：该社社长王全成等人的1.016亩试验田，共产干谷37547斤，平均亩产36956斤。这颗巨大的“卫星”一放出，8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连同福建省报出的花生亩产1万多斤的“卫星”一道庆贺。社论说：早稻亩产36900多斤，花生亩产1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又一件大喜事。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这是新闻舆论中最早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来自一份内部报告。1958年夏收时节，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赴山东省寿张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其成员刘西瑞写回来一封反映当地情况的信。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并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为通栏标题。信中说：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出5000斤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有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大跃进时期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批驳。

《红旗》杂志在1958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

章的作者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文章写道：

农业生产是一种人与自然的斗争。对于这种斗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从剥削制度解放出来的人民是力求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呢，还是甘心处于自然的主宰之下而成为它的奴隶呢？在“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看来，大自然神秘得很，不可能为人们所认识，人们更不可能改造它。我们共产党人则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当人们正确地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就能驾驭自然，改造自然。

文章还以高产“卫星”为事例，来证明“粮食增产有限论”对自然界认识的“贫乏”。无独有偶，文章也引用了一个著名科学家的文章来证明粮食的高产“卫星”是有科学根据的。

当时还没有电视，报纸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而《人民日报》又独占魁首，因此，它在“舆论导向”方向发挥了其他媒介所难以企及的作用。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社论讲道：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人民日报》28日的社论《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中，还引述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广大农民在总结夏季丰收的经验时说：“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

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社论说：“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了的”，批判“唯条件论”。

既然广大农民决心使大秋作物像夏季作物一样的速度和更高的速度增产，那就一定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增产。这些意思用当时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定能做得到。”

毛泽东本人也为高产“卫星”助威叫好。8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他来到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城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城一一作了回答。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诚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争取4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8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要达到6000亿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左右。按照7月份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数字新进行的统计，1958年粮食产量估计是1万亿斤以上。北戴河会议似乎还打了点“埋伏”，只公布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毛泽东此时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年七八月，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竞放高产“卫星”一浪高一浪，早稻高产“卫星”升天后，

中稻、晚稻高产“卫星”又相继升空。9 月 18 日，广西自治区环江县放出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该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 130434 斤！除了小麦、水稻高产“卫以外，玉米、高粱、谷子、蕃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果等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卫星”也相继上天。

第六节　高产“卫更”的一面旗帜——湖北省麻城

大跃进中，如果要列一个高产“卫星”数量的排行榜，湖北怕是要名列前茅的。最早的高产“卫星”，最大的高产“卫星”，小麦的高产“卫星”，水稻的高产“卫星”，差不多都是由湖北升起来的。而麻城县又是湖北放高产“卫星”的一面红旗，不仅扬名全省，而且闻名全国。

麻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属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南麓，平原、丘陵、山区各占 1/3。其土壤、气候、地形条件，在农业生产方面都属中等。但自 1957 年年末以来，这个县便成了农业生产的先进县。八届三中全会大批反冒进以后，该县就报出了皮棉“百斤县”的消息。1956 年全县棉花平均亩产 60 斤，1957 年按播种面积计算平均亩产 103 斤，按实收面积计算平均亩产 107 斤，比 1956 年增产 70%。按农业四十条的目标，该县皮棉亩产量当年便达到了要求在 12 年内达到的目标。除了棉花，1957 年全县小麦 37 万亩，平均亩产 202 斤，粮食亩产 801 斤。全县棉麦亩产合计千斤的面积有 3000 亩。县委书记赵金亮还在《人民日报》介绍了自己种试验田的经验：找了一亩多“落后田”作试验，亩产籽棉 600 斤，比全县平均亩产量最高的记录还高出 30%以上。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麻城经验十分欣赏，《麻城报》1957 年 12 月 27 日刊载了他的文章《向麻城看齐—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文章说：

麻城县今年取得了大丰收，成为皮棉百斤和水稻粮食亩产 800 斤的县，提前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麻城县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是跳跃式地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王任重还对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赞麻城和该省另一个县——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领导方法，说：凡是采用了这种方法领导农业生产的地区，落后的很快变成了先进，工作被动的很快变成了主动，生产上立即取得显著成就。他还说：麻城、红安生产条件都不太好，但是广大群众在干部的鼓舞和指导下，革命干劲空前高涨，因此，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得到了大跃进。

1957 年底，麻城县向全省兄弟县发出挑战：争取 1958 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了在争取大跃进的斗争中，能够互相推动，希望和全省各县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粮食：1958 年全县总产量比 1957 年提高 27.5%，达到每亩平均产量 950 斤，争取 1000 斤，并创造小麦千斤亩一万亩。棉花：每亩平均产量保证 130 斤皮棉，并培育 1 万亩平均产籽

棉1000斤的丰产田。

1958年1月4日，王任重到麻城检查工作，对麻城给予鼓励。2月17日，麻城县委发出春节祝词："跃进再跃进，千千万万翻一番"。

4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视察麻城。李先念向来以沉稳著称，但全国热火朝天的"跃进"形势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在视察中，他对麻城的竞赛给予肯定，他说：革命就凭着一股热情，一股干劲！有了热情，干劲，就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困难。他还说：干什么事都要坚持斗争，保守思想总会有的，看嘛，比嘛，保守思想就在先进事物面前甘拜下风了。

尽管如此，1958年上半年，麻城的粮食高产"卫星"在湖北全省还不是靠前的。

6月11日，《湖北日报》一版发表消息说：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有29亩小麦，经过详细验收，每亩产量达2173.7斤，其中有11亩达到亩产3215斤，创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世界纪录。参加这次验收的，除襄阳地委、兴化县委专门组织的验收工作组外，还有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湖北省农业部门的技术干部和不少的新闻记者。他们除了亲自参加打麦、过秤外，还对这块地进行了测量，查实了面积。报纸还配发了图片：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小麦高产的喜讯传到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张体学在观看送来的3000斤小麦样品。报纸发表了王任重6月9日写的诗《新纪录——献给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

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纪录。

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

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点头名。

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

同日，《湖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三千二百一十五》，称："这是破天荒的大喜事。""这是农业生产战线的大胜利。""这是小麦生产上的一面大红旗。"

报纸还同时发表了署名"龚同文"的文章《有意思的对比》，"龚同文"是以王任重为组长的湖北省委机关写作小组的笔名。这篇文章讲到：有一些自命为比农民高明的人物，比方像某些资产阶级"专家"吧，他们自以为比农民懂得多，常看不起农民……可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和农民比较起来，他们显得非常之不高明。就以这个"三千二百一十五"为例吧，某些资产阶级"专家"听说出了"三千二百一十五"这件事，不仅表示冷淡，而且硬说这是不可能的。当然要问他们的理由，不外是什么"世界从来没有这样的纪录"呀，"书本上也找不出理论根据"呀，等等。

大概是受到其他地方高产"卫星"的刺激，麻城县终于放出了早稻高产"卫星"。《湖北日报》在"丰收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眉题下，发表"湖北水稻高产卫星叠出"的消息。其中说：麻城县黄市乡前进五社1.337亩早稻亩产5880斤，木子店乡光明一社0.919亩早稻亩产4228斤，孝感县六合乡五四农业社1亩田产3567斤，应城县盛滩一社1.25亩田亩产31248斤。在这组高产"卫星"中，麻城县成了第一名。

然而，麻城的第一名没当几天，又被别人突破纪录。7月29日，应城县白湖乡春光农业社第12生产队队长甘银发等人，共同培养的1.613亩早稻试验田，总产干谷

17093斤，平均单产10597斤。

7月31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祝贺早稻万斤高产》，社论说：今年夏收以后，水稻赶小麦、“高产”赶“低产”的浪潮，就汹涌澎湃地卉展起来了。敢想、敢做的革新家们，英勇果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似乎寻常的措施和行动，踏踏实实、满怀信心地朝着既定目标驰去，但是，在前进道路上，总还有少数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的“小脚女人”，他们对别人这种大胆的尝试，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对这种群众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潮，抱着一种“观潮派”的态度。革命家们的论点是“思想解放无底，土地潜力无穷”。“小脚女人”们的论点却是“山穷水尽增产到顶”了。这两种论点，究竟孰是孰非呢？如果说本报前两天发表的早稻的高产丰产纪录（5467斤），仍没有达到亩产万斤的话，那末，今天应该说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吧！……这样说来，增产到顶论者，该闭嘴了吧!?

社论发出号召：要及时总结早稻丰产经验，把早稻的丰产经验，运用到晚稻生产上去。争取在晚稻的产量上，放出更大的高产“卫星”。

也就在7月31日这一天，又出了“早稻高产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湖北省孝感县朋兴乡长风农业社水稻一季超万斤，力争晚稻亩产3万斤。该社主任官木生和全体社员写信向湖北省委报喜，王任重当即复信，代表省委向全体社员祝贺。这两封信公开发表在8月1日的《湖北日报》头版，还配发了《敢想》、《敢说》、《敢做》3幅漫画，对全省各地农村放高产“卫星”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在高产“卫星”的擂台赛中，麻城终于后来居上。

8月13日，新华社、《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麻城报》发表了同一条消息：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柄、社委王茂刚、第二生产队长罗学江等人培育的1.016亩籼稻试验田，共收干谷37547.12斤，平均亩产36956.7斤。《麻城报》称，这是创造了世界上水稻最高纪录。这块田的稻谷厚到这样的程度：把鸡蛋放在稻禾上面滚动，它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小孩也能站立在稻穗上面。全国一些农业专家纷纷赶来参观、学习。这些专家所在的单位计有：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农学院农业系、华中农学院等。这些专家和教授说，建国一社创造亩产36956.7斤的高产，是世界上没有的，书本上没有的。这是一个特大的卫星，它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已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还说：这块田的培育者都是土专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是有无穷智慧，是有巨大的创造性的。对照起来，我们有的科学研究人员就缺少这些。建国一社创造的高产纪录，是我们全国的光荣，它对世界农业科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当然农业专家只是参观者的一小部分。当年这块高产田，曾引来10万多人参观。许多参观者说，看了这块田真正解放了思想，想不到田里的稻谷有这么厚。武汉电影制片厂还为这块高产田拍了影片。

8月14日下午，王任重率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人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向亩产36956.7斤的高产创造者贺喜，并发了写有“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奖旗。据8月15日《麻城报》报道，王任重仔细看了谷子和稻兜以后说：多厚的谷子，

连手也插不进，谁不相信高产就让他亲眼来看看。他还说：一亩田今年能产3万多斤，明年能不能高产5万斤、大面积亩产1万斤呢？王任重离开这里以后，社里决定：明年要大面积创造水稻8000——10000斤，高产试验田亩产5万斤。

正当麻城庆祝建国一社的早稻"卫星"上天的时候，天不作美，来了一场大暴雨，接连50多个钟头，随之山洪滚滚。县委提出战斗口号："大灾保规划，小灾超规划，无灾翻规划"；"水涨一寸，堤高一尺"，"人在堤在，人亡堤倒"，100多人像打仗一样，各人守住一块地方，把试验田团团围住，面对着风的人，把竹竿横挡着；背对着风的人，把竹竿倒钩着，使稻禾没有倒伏。

麻城建国一社的这颗"卫星"，一段时间里发挥着示范的作用。8月28日，《麻城报》报道：该县山区熊家沟乡建新六社1.017亩胜利籼中稻共产干谷53493.11斤，平均亩产52599.8斤，该报于9月2日发表文章称：这是山区高产的红旗。9月17日，又报道：白果人民公社中稻亩产突破了十万斤大关，同时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0月1日还报道：龟山公社传捷报，芝麻上天大卫星——1.182亩亩产1182斤。

8月27日晚，在县劳模、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和扩干会上，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作了《全党全民总动员，为实现1959年全面更大跃进的规划而奋斗》的报告。他说：今年我们县是大跃进了，但是麻城目前面临大的形势是一个伟大公社化运动后全面跃进的新形势。所谓全面跃进，就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而是在工农并举方针的指引下，粮食、钢铁、机械三大元帅要升帐，电力、交通运输两大先行官要并驾齐驱。明年是毛泽东主席号召的"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决战的一年，全国各地都在争取更大的跃进。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为首的省委负责同志，要亲自到我县来办高产卫星县。因此，我们一定不辜负省委的殷切期望，鼓起更大干劲，在全国更大跃进的队伍中走在前面，实现卫星县。

11月3日，《麻城报》以通栏标题登出：思想插红旗，跃进再跃进，战胜大灾害，丰收再丰收。宣布全县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101354万斤，比去年增长88.1%；棉花亩产1023斤，比去年增产259.2%；花生亩产1000斤，比去年增长233.3%。县委书记吴德简著文，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大灾大丰收"：高山把头低，人定胜过天。

对湖北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高产"卫星"，王任重是深信不疑的。1958年10月初，他在湖北全省文教、卫生、生活福利现场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年我们湖北省粮食每人平均可以达到1500斤，甚至更多；省委安排明年的粮食生产，每人平均3000斤。生产这些东西作什么？出口吗？给谁？谁也买不起。这些东西卖不出去，要吃要用，谁吃谁用？我这次到宜昌，听他们说，他们种20万亩甜萝卜，可制糖1.5亿斤，全省每人平均有5斤，恩施比宜昌还多。

然而，事实上直到2001年9月初，我国超级杂交稻也才创造了亩产2393斤的世界高产纪录。

第七节　“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

就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言，当年毛泽东魂牵梦绕的，一个是粮食，再一个就是钢铁了，而且对钢似乎看得更重。

从 1956 年开始，毛泽东就比较注意钢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1956 年 2 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就主张钢产量每 5 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这是在小范围内说的，而且是就钢的生产谈钢的生产。

1956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谈到国家建设时说了一大段话：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 22 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 400 多万吨。明年突破 500 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 1000 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 2000 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有 100 多个国家，但是超过 2000 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 100 多：午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 1.7 亿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 6 亿人口干什么？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 1.7 亿人口有 1 亿吨钢，你 6 亿人口不能搞它 2 亿吨、3 亿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 180 年，它的钢在 60 年前也只有 400 万吨，我们比它落后 60 年，假如我们再有 50 年、60 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又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通过这段话，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钢铁生产的重视程度，以至于把它同能否保住中国的“球籍”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又谈到钢的问题。他说：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 50 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 90 多万吨。在 1949 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 7 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 400 多万吨。

还是在这年的 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再三表明了他对钢生产的希望和信心。他说：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 2000 万吨，今年是 520 万吨，再有 10 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 1952 年的钢产量

是160万吨，现在是170多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1949年只有十几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100多万吨，又搞了5年，达到520万吨，5年就增加300多万吨。再搞5年，就可以超过1000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1150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2000万吨呢？是可能的。

看重粮食，“农业以粮为纲”这比较好理解。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自是天下第一大事。看重钢铁，“工业以钢为纲”就难以理解了。这恐怕还得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以及毛泽东本人对于这些理论的理解中寻找答案。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再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要实现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其条件必须是第一部类一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多于两大部类一年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以便第二年有多余的生产资料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个原理表明，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以及各部门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一旦这种正常的比例关系被破坏，再生产过程也就必然出现危机。

最早将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分析，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据此提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方针的，是苏联的斯大林。斯大林在20年代阐述苏联工业化问题时说：“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是按照斯大林所主张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制定的，整个计划的重心都在生产资料（也就是重工业）方面，实际上，从这时开始，苏联国民经济始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中国当年沿袭了苏联的发展道路，从“一五”计划开始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毛泽东在重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生产）中特别注意钢，而且强调提高钢产量，把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渐变成了优先发展钢铁工业。5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弊病包括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轻工业。然而事情好像有些不可理解：当毛泽东看到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病，告诫人们要“以苏为鉴”的同时，他自己的意识中却萌生出一种“钢铁情结”，对钢产量的提高最为关注，甚至把钢产量的多少作为中国能否保持“球籍”的标志。这里的结果似乎同动机正好相反：毛泽东希望能够避免重蹈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覆辙，但过分关注钢产量却更片面。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还注意重工业内部的平衡，钢铁、石油、煤炭、电力、机械等均衡发展。毛泽东只注意钢的产量，则连重工业内部的平衡也忽略了。

这里也许可以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抓住主要矛盾来求得理解，即想通过优先发展钢铁工业来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毛泽东亲临前线搞大跃进，抓钢铁翻番，就是认为国务院领导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的赶超浪潮，使毛泽东的赶超意识更加强化了。在结束了战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作后，世界各国之间均具有某种竞争的意

味。在不同意识形态体系的东西方之间，这种竞争是还带有某种“火药味”，甚至干脆被称为“冷战”。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随后又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弥漫着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气氛。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通过和平竞赛，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此前，苏共中央已通过一个“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上赶上美国”的口号。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接受了赫鲁晓夫实际上也就是苏共关于和平竞赛的提法和主张。

毛泽东不能不被这种赶超气氛所鼓舞。在莫斯科期间，他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中国的钢产量目标。毛泽东说：苏联在15年后，将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

当然，强化毛泽东的赶超意识的，不只是莫斯科会议的赶超气氛，更重要的还有他同苏联比高低的心理。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运的阵营里，毛泽东并没有瞧得上赫鲁晓夫。在理论上，毛泽东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而且认定赫鲁晓夫把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丢掉了。在经济实力上，毛泽东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苏联要强于中国，另一方面又不服输。既然苏联在15年内要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内也得有举世公认的成就。其实在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中，毛泽东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欲同“老大哥”试比高。因此，中国的赶超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同西方大国竞赛；二是同苏联竞赛。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的话就说得更明白了：苏联将变成两个美国，中国将变成四个美国。

第八节　1958年，钢产量干脆翻一番

自从公布在钢铁工业生产上赶超英国的消息后，钢铁行业率先在全国兴起赶超浪潮。1958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消息，国家经委已向国务院建议：今年我国钢铁工业计划生产732万吨生铁，624万吨钢和482万吨商品钢材。按照这个计划，1958年生铁比上年增长24.1%，钢增长19.2%，钢材增长13.1%。冶金部提出计划，1958年将新增103.6万吨钢和138万吨铁的生产能力，等于“一五”计划期间新增炼钢能力的43%、新增炼铁能力44%。这个增长速度显然已经不低了。用《人民日报》的语言说：“钢铁战士们开始15年赶上英国的长征。”

南宁会议后大批反冒进，鼓干劲、争上游，促使各行业、各地方纷纷修订原定计划，给原指标加码。钢铁工业自然首当其冲。1958年3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鞍钢第二炼钢厂青年团结炉，在2月份创造了大型平炉炉底利用系数（即每一昼夜一平方米炉底面积的出钢吨数）达到10.64的全国最高纪录，走进了世界先进平炉的行列。这

个纪录比目前本厂其他平炉的炉底利用系数平均高出 3.03，超过了著名的鞍钢第一炼钢厂青年友谊炉去年创造的 10.22 的纪录；接近了苏联最先进的平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 17 号平炉去年创造的 10.77 的纪录。报道说，如果鞍钢所有平炉都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就可以在完成今年增产计划的基础上再增产 120 万吨钢。

在这种形势下，冶金部在 3 月上旬修订了一个月前通过的钢产量计划，提出当年产钢 700 万吨。这个指标比原定指标提高了 77 万吨多。冶金部不仅提高了 1958 年钢产量计划指标，而且对钢产量赶超英国的整个计划作了修订。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了一篇题为《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文章，谈到了钢铁生产的跃进计划：最近部党组根据主席的指示，又研究了钢铁工业的建设情况，认为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二五”计划指标（也就是 1050 万 ~ 1200 万吨），1962 年达到 1500 万 ~ 1700 万吨是有把握的，2000 万吨可以争取。十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即争取 1962 年达到 2000 万吨左右，1967 年达到 4000 万吨左右；20 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即争取 1972 年达到 7000 万吨，1977 年超过 1 亿吨以上。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赞赏，在成都会议上热情地表扬了冶金部。在 5 月 29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更称赞王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成都会议后，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当年钢产量计划指标，总计为 711 万吨。4 月 14 日，由国家经委上报中央，这样，1958 年钢产量的计划已经有了两本，账：第一本账是 624 万吨，第二本账是 711 万吨。不到 3 个月，指标已经比原来提高了 87 万吨，比 1957 年的产量提高了近 33%。产量提高的根据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

当计划指标层层加码的同时，钢铁行业的生产也在不断“跃进”。《人民日报》5 月 1 日报道：我国钢铁工业基本建设工人发动了“速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的竞赛。现有厂矿的生产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多快好省”的新纪录。1958 年施工的钢铁工业基本建设项目有 49 个（不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型钢铁工业），预计年内开工投入生产的项目，将使国家增加年产 157 万吨生铁和 103 万吨钢的新设备，几乎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全部设备能力的一半。当年开始新建和扩建的湖南、太原、石景山、马鞍山、重庆等 5 个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打破了过去的施工常规，打算以前所未有的新速度着手提前施工。仅仅这 5 个中型企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建成后的钢铁年产量，就超过 1957 年全国的总产量。

同一天该报在《让高炉转炉满布城乡，让铁水钢水全国奔流，24 个省区大办钢铁厂》的标题下，报道说：目前已经动手筹建的地方小型炼铁厂和钢铁厂约有 60 个。河北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乎没有地方钢铁工业，现在正动工兴建 7 个钢铁厂，共 25 座小高炉，有 5 座已投入生产。最近河南省工业厅组织 7 个专区、3 个市、49 个县筹建钢铁厂的人员，到苏州炼铁厂去观摩学习，拟定了一个建设小高炉 100 多座、土炉 1000 多座的具体计划。贵州省第一座钢铁厂已经在贵阳动工兴建，这是一个包括高炉、炼钢和轧钢的联合企业，建成后年产大型钢材 4 万吨。铁矿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今年 7 月份就有 40 座小高炉可以投入生产。石家庄钢铁厂第一批建设的 3 座小高炉，有 1 座已在 4 月 13 日出铁。

风急浪高的生产大跃进，反过来推动了钢指标的再度提高。

毛泽东4月下旬曾找冶金部党组几位负责人谈话。他说：你们不要怕钢铁生产多了没地方放，可以放在我的院子里嘛！1956年投资多了一些，工业生产快了一些，就有人害怕，慌慌忙忙出来反冒进。旧的平衡总是要在发展中被打破的，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就是不懂这个辩证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现在才能生产几百万吨钢，太可怜了，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一个省就有欧洲一个国家大，无论人口和面积都比欧洲的一个国家的人口多、面积大；欧洲没有统一，欧洲的各国都发展起来了；而我国从秦始皇时就统一了，统一当然有好处，但中央集权也限制了地方的发展。你们应该对一个省像对一个国家那样考虑它的发展。当时冶金部负责人曾表示，1958年钢产量肯定可以超过624万吨，达到700万吨，最多可能达到800万吨。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的产量）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9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

八大二次会议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本账。李富春在会上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他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在大会发言时说：冶金部再次同各省、市、区研究了钢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会后，5月26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将1958年钢产量计划指标提高到800万至856万吨。这样便出来了1958年钢产量指标的第三本账。这个指标比第一本账提高了32.6%，比1957年的产量提高约59%。也就是说，第三本账已比1957年翻了半番挥多。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各地工业总产值要在5至7年内超过农业总产值的要求，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等5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根据自己的资源等条件，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协作区一成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新任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就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的工业生产，确定1959年生产钢800万吨。华东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敢于作出这样的规划，对于全国影响很大。据薄一波回忆，柯庆施的这一行动，对毛泽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在谈到了1070万吨钢闯了祸时，他

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

柯庆施回答道：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接着说：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00万吨，我全国只搞1070万吨。

毛泽东的这番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促使他闯下这个祸。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把柯庆施称为"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

6月7日，冶金部向中央报送《1962年主要产品生产水平规划》。规划预计，1958年钢产量为82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6月中旬，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对各部向中央汇报的指标作了研究、汇总，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后，由李富春向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认为，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850万吨到900万吨。"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3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对于这个《要点》，6月17日毛泽东批示："彭德怀、黄克诚：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读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翻半番的计划仍觉得不满足。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在钢铁生产上，薄一波谈到，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18日晚8时至11时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谈话。谈到钢铁生产，毛泽东表示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2500万吨。其间，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这个口号反映了毛泽东以钢铁来带动其他工业的思想，因而颇受他欣赏，当即表示肯定。但毛泽东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此后，"以钢为纲"的口号风靡全国，并有所谓"三个元帅"（钢铁、机械、粮食）和"两个先行"之说。

19日晚，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一些中央负责人，王鹤寿也在被召见之列。谈话中，毛泽东问王鹤寿：去年530万吨钢产量，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回答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当时内部决定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

当时也有一些清醒的人。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泽东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7月31日到8月3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阿尔希波夫作为他的总顾问

随同来访。赫鲁晓夫这次访问，是为了解决双方关系中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事情。结果，双方会谈闹得很不愉快。

不管怎样，双方都是共产主义同志。会谈中，毛泽东把中国当时的雄心壮志透露给了赫鲁晓夫。他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今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万吨到3000万吨。

赫鲁晓夫搞过技术，中国的工业基础有多大的家底，瞒不过他。现在中国一下子搞钢铁翻番，他当然不大相信，但也不想再为这次糟糕的会谈添什么新的分歧了。他来了一句外交辞令：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

阿尔希波夫就不同了。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一五”计划时期苏联驻华专家总顾问。

8月3日，中苏双方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陈云和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交谈。陈云把深藏在心底的疑问端出来问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

阿氏不好正面回答陈云的问题，只是笑了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阿氏好像意犹未尽。在走向宴会厅时，他同薄一波走在一起。他坦率地对薄一波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

薄一波回答：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

阿氏苦笑着说了一句：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阿尔希波夫的话后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愤慨，但一年后的实践却印证了他的话——此谓旁观者清。

第九节　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钢为纲》的文章。从此，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与前一个时期的大跃进不同，此后的大跃进把钢铁行业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指出：一个以钢为纲、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社论用问答式的写法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钢铁翻番的构想：我国的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也许有人会说：“要高速度就有高速度，是否有点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味道呢？”我们说，这里一点也没有唯心论，而是完全从实际出发，是有根据的。根据是什么呢？第一，我国矿产资源丰富。炼铁需要大量的煤，而在我国2000多个县中，就有

1500多个县有煤；钢铁的原料——铁矿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的铁矿已达56亿吨。第二，有党的领导和6亿人民，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多力量大。人民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力量的："我们一跺脚，大地就震动；我们吹口气，滚滚河水让路；我们一举手，巍峨大山胆寒；我们一迈腿，谁也不敢阻挡；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的力量无敌。"

在如此逼人的形势下，各地方、各企业纷纷再次修改计划，提高指标。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钢，于6月份将原计划在1962年达到630万吨钢的指标取消，改为1959年就要达到生产800至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1957年鞍钢只生产了290万吨，1958年就要增产130至140万吨。6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华北区协作会议提出：全区1962年钢产量将达到2000万吨，比国家计委原定的1962年华北区钢产量高出700万吨。会议还确定了1959年全区生产600万吨钢的指标，其中北京120万吨，山西160万吨，河北250万吨，内蒙古70万吨。华东区则报出了两年中赶上日本，4年超过英国的设想；华东区的钢铁厂集中在上海，1957年上海仅产钢50万吨，1958年就要生产100万吨，1959年生产钢600万吨并要达到生产1000万吨的能力。到7月底，全国已建成小土高炉3万余座，仅湖南一省就建成炼铁炉14936座。8月，河南一省建成简易小高炉14300多座。

来自各地、各部门"跃进"的消息，无论是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是对未来的种种计划、设想，似乎给人一种印象，既定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的。

实际情况却远不令人乐观。按照1958年产钢1070万吨的计划，平均每个月需要产钢89万吨多。但是这个指标是6月下旬才布置下去的，而1至6月全国累计产钢才310多万吨，这就是说，后6个月必须月均产钢126.67万吨才能完成年计划。可是翻一番计划布置下去以后的7月份，仅产钢70万吨。这时离全年计划要求达到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毛泽东感到钢的计划有完不便赶快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下死命令，落实全年计划。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最高潮。

北戴河会议的头几天，讨论了钢铁生产问题，分析了未见起色的诸多原因。陈云把讨论的情况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8点指示：一是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二是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三是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和安装；四是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五是各省市自治区常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六是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七是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查看、撤职、开除党籍处分；八是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常委主管工业的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

毛泽东显然是着急了，他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一吨也不行，下了死命令，要用"铁的纪律"来保证。

8月21日，陈云向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25日，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在北戴河开幕，由薄一波主持。

如何完成1070万吨钢呢？薄一波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陈云再次到会讲话。他讲到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统一思想后，30日下午，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吨，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马说可以；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赵也说可以；问武汉市委书记，问太原市委书记，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毛泽东又问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10面红旗，只要10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毛泽东面对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问他的意见。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后来王鹤寿检讨说：他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拍胸脯，是想借毛泽东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

毛泽东最后问到薄一波，薄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万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万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万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薄一波马上打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1070万吨第二天见报。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戴河会议公报，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公报写道：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1倍而奋斗。

9月4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产量》，提出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国人民当前的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为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全力以赴，只能超额完成任务，而决不能少一吨钢。

当时，只剩4个月了，于是有人说，不抽鞭子是不行的。

在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番任务时，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才完成了450万吨，要完成1070至1150万吨的任务，在今后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必须产钢600至700万吨。在钢铁工业早已开始大跃进的情况下，全年2/3的时间才完成1/3多点的任务，要想在余下的1/3的时间内完成将近2/3的任务是不太可能的。就连毛泽东本人，在北戴河会

议上也发出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

到1957年底，中国的钢和铁的生产能力分别为648万吨和696万吨，虽然，原先确定的1958年基本建设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钢铁工业，北戴河会议又在原有基础上确定全国新建小高炉12507座，中型高炉142座，各种转炉设备205套，各种电炉44台，但是即使这些项目在当年全部建成投产，加上原有的生产能力，在4个月内也不可能完成预定任务。

全国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供电紧张问题，特别是东北、西南和山东等地更为严重。电力不足，成为工业生产奉跃进中的一个严重薄弱环节。

但是，既已夸下海口，当然不能食言，难以完成也得硬着头皮上。1070吨这一赶超英国的指标，它的制定和公布，在当时看来，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意义，非完成不可。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各省、市、区党委分管工业的书记会议，提出了强行完成1070万吨钢产量指标的一系列措施。

第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必须亲自挂帅，大抓钢铁和大抓机械。9月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的同时，还发表了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个星期检查一次生产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北戴河会议后；中央曾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催促。在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万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要求到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否则是不行的。9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电话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从省、地、县到乡，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作战的要求。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分管冶金工业，并担任钢铁大跃进领导小组组长，多次主持召开钢铁工业会议，组织各有关部门的协作会议。周恩来也说过：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历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而有了钢铁和机器，也就能够有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二，让钢铁工业先行。规定除供机械铸铁所需的生铁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炼钢。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

第三，下达死命令。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确定：铁，9月200万吨，10月280万

吨，11月320万吨，12月350万吨；钢，9月120万吨，10月100万吨，11月200万吨，12月220万吨。在地区上，钢铁工业薄弱的山西省也要生产68万吨铁，55万吨钢。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而广西在“一五”期间总共才生产了1.7万吨生铁。9月5日晚上的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再次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

第四，大搞土法炼铁。中央对八大二次会议后大办地方工业形势下出现的土法炼钢特别是土法炼铁很感兴趣，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要求各地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以生产炼钢所需的大量生铁。9月底，毛泽东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强调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重要意义，批评了“不正规”、“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等说法，要求在工业战线上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和《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等社论，极力宣传土法炼钢对于钢产量翻番的意义。冶金部等单位还组织召开土法炼铁、土法炼钢的现场会议，以推动全国范围的土法炼制钢铁运动，使“小土群”（由群众自办的小型的土法炼铁、炼钢）同“大洋群”（在原有的大中钢铁企业发动群众突击炼铁、炼钢）配合起来完成任务。

第五，设法解决运输问题。要求各地成立强有力的运输指挥部，指挥当地的交通运输，调动机关、学校、部队等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调集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人力车、兽力车甚至小汽车等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投入全民搞运输保证大炼钢铁运动。

此外，中央及有关部门还相继发出了全民大办煤炭、大办电力、大办地质等指示，要求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保证钢产量指标翻番任务的完成。

切实有效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昂扬的斗志组织起来，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的前进。办法是，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组织战役，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昼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纪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提高产量。

各地党委纷纷搞动员，抓措施，力保钢铁元帅升帐。河北省委成立大炼钢铁指挥部，指挥长由省委书记亲自担任，要求第一抓领导，第二抓组织，第三充分依靠群众，第四抓生产；山西省组织了工作团、技术指导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采取了“五抓”（抓生产、原料、设备、技术、运输）的办法；山东省要求所属各级党委把钢铁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江苏省委要求土炉建设要普遍实行“五定”（定型、定群、定量、定员、定制度）；浙江省委要求领导同志上山下乡，“不流铁水不离炉，不见铁矿不下山”；安徽省委成立了把机械、电力、交通、建筑、物资、商业等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起来的冶金工业指挥部；福建省各地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带领干部群众上山下厂猛攻钢铁。冶金部抽调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派往各省、市、自治区。

第十节 “小土群”上阵，千军万马上山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一路南巡，亲自督战。他首先视察了湖北。到武汉的当天，他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接着视察了一批钢铁企业，如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区、大冶钢厂、武昌第一纱厂小高炉等。视察过程中，他和上述企业约4万名职工见了面，赞扬了他们在大办钢铁中所表现出的充沛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毛泽东非常兴奋，对陪同视察的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全国也一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王任重回答：主席一再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很重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许多发明创造出来了，许多奇迹也出来了。

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了广大工人、干部、学生、居民直到乡村农民。9月24日《人民日报》曾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7万多人找到120处铁矿和51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2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6000多吨焦煤。据统计，7月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上的劳动力已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又增到6000多万人。1958年末，达到了9000多万人，加上其他战线直接和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占全国人口的1/6。

在当时情况下，完成指标单靠大中型企业已不可能，便把希望寄托在小高炉和“小土群”上。8月底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钢在10万吨以下的小高炉。9月以后，新建了几十万个这种小高炉，到1959年春仍保留了10万个。“小土群”的土高炉，在全国更是无处不在，几万、几十万，成百万个一哄而起。不但工厂、公社，而且部队、机关、学校，甚至外交部、安徽省委机关也建土高炉，办炼铁厂。这种高炉，大的不过几米高，小的容积仅1立方多米，不但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都改成土法炼钢炉具。为了解决钢铁战线煤炭不足的突出问题，煤炭部提出，一方面，原有的大煤矿进一步加紧生产；另一方面，全民大办“小煤窑”，采取“小土群”的运动，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土群，仅小煤窑开挖10万多个。煤炭不足，各地还大量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缺乏高品位的铁矿石，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甚至把家庭用的铁锅砸碎当原料，有的家庭许多年之后仍只能使用铜盆、铜勺，在办地质方面，全国上千万人进山找矿；在大办运输方面，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幼，既用现代化车辆，也用原始运输工具昼夜

不停，抢运大炼钢铁所需的各种物资。

北戴河会议之后，报刊不断报道各地大放钢铁高产“卫星的情况。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铁生产计划。曾在农业方面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不甘示弱，马上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产铁11894吨，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9月29日，是中央确定的放“卫星”的日子，全国日产钢近6万吨，铁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县，以及两个日产5000吨钢、一个日产4000吨钢的省。10月15日到21日是中央确定的高产周，10月26日《人民日报》称：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产量增加了85%，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在此期间，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居上，连放几颗特大卫星，环江县产生铁6300吨，忻城县日产煤炭67万多吨，鹿寨县日产生铁竟然高达20万吨。

这种土法炼钢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就有人看到了。但多数人并没有指出它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形势使人们很难讲真话。但也有人明确反对土法炼钢。例如，这年10月中央召开电话会议，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尖锐地指出：土高炉炼铁是弄虚作假，白白浪费煤炭，建议降低钢产量指标，停止弄虚作假。陶铸在大跃进运动中多数情况下思想激进，但在重要时刻敢讲真话。可惜这种声音当时太微弱，不能被中央采纳。

第十一节　数字是完成了，但东西并没有那么多

全国范围内经过4个月的突击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钢铁产量迅速增加。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一年间钢产加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了辉煌一章，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到年底，则宣布完成钢产量1108万吨，生铁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1958年下半年的全民大炼钢铁，从表面数字看，是完成了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指标翻番的任务，似乎保住了“大跃进”的面子；但在实效方面，从短期内的情况看，已经暴露出它对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危害，其代价是十分惨重的。

强调群众运动作用，强迫追求产量，从而忽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在大型企业尤其突出。由于忽视大型企业管理的特点，领导只是号召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共产主义精神”，而不尊重科学技术，否定遵守规章制度的必要性，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造成许多恶果。

全国“小土群”炼铁中，到底搞了多少小土炉？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59年他作过统计：一股风建成了200万个土高炉。当然，“小土群”的效果奇差，后果严重。1958年武昌会议前夕，就全民炼钢发生的问题，毛泽东让王鹤寿写一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王鹤寿在报告中肯定这场“政

治挂帅”、“真正的革命”的全国办钢铁路线时，也谈到“小土群”存在的问题：就是有不少地方，在放高产卫星的时候，所生产出的生铁，有很大一部分是烧结铁，而不是可以用于平炉、转炉炼钢的生铁。钢的生产目前要过的关有两个：一是洋炉（平炉、转炉）用土铁炼钢的技术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有时虽然能炼出钢来，但是转炉不能维持正常的寿命，影响正常的生产。另一个是土法炼钢如何提高。大部分的土钢，只能锻打成不大的体积，而不能铸成较大的钢锭，再由钢锭轧成各种钢材，因此就限制了它的用途范围。

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在《关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曾讲到土钢、土铁在钢铁产品中的比重：1958年1108万吨钢中，合格的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土铁占416万吨。这些土钢、土铁质量差，含硫量超过冶金部的规定，很难加工使用，有些完全是废钢、废铁。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炼钢，成本费用高，1吨生铁的成本费，大高炉是100元，小高炉是345元，而1吨生铁的国家调拨价只有150元。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达50亿元，国家花费了大量补贴。为生产这些土钢、土铁，又过量开采矿石，砍掉大量树林，砸掉大量铁锅铁器，破坏了矿产和森林资源，影响了人民生活。直到1959年春，才停止了这种土法炼铁的“小土群”运动。

为保证实现钢产量翻番指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增加了，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同样增加，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原计划的1135个猛增到1587个，比1957年增加595个。基建投资由1957年的138亿元增加到279.06亿元，增加84.5%，积累率由1957年的24.9%增加到33.9%。这是当时国力难以承受的。同时，由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全民大办工业的需要，使全国职工总人数由1957年底的2451万人猛增到4352万人，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粮销售量，扩大了社会购买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由于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生产指标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忽视经济效益，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首先是工农比例失调。1957年和1958年国家用于农业投资的金额分别为12.7亿元和28亿元，在经济建设中所占比例分别为9.2%和10.5%，但是，由于工业发展过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过程中调用了农村中大量青壮劳力，参加农业劳动的多为妇女老弱等半劳动力。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8～9月正值秋收季节，为完成钢铁翻番任务，约有9000万人上山采矿陈铁，不少庄稼无人收割，不少地区，粮食、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以至当年丰产未能丰收。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看法，1958年农作物估计有10%未收回。其次是工业内部与工交之间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一方面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铁、煤、有色金属的供给满足不了钢的高指标需要，来不及新建大企业，就逼着老企业拚命增产，大量；兴办耗料大、质量差的小企业，造成资源被强化开采；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而大量损坏；又因煤铁等原材料品位、质量下降，需要更大的开采量，加剧了供需矛盾，竭泽而渔，造成巨大损失和浪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新增1吨炼铁能力，相应要增加4吨铁矿开采能力、1吨炼焦能力；而

1958年每新增1吨炼铁能力，只新增1.5吨铁矿开采能力和0.3吨炼焦能力。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还表现为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强调工业生产“以钢为纲”，其他工业“停车让路”，调配给轻工业部门的原料和燃料大大减少，设备得不到应有供应，大量职工被调到钢铁生产大军。如8～9月份，东北三省电力不足，减去轻工业电力负荷的2/3，使纸张减产10万吨左右。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失调表现为交通运输跟不上工业的高速发展。1958年交通运输货运量作很大努力才增长40%，而同期煤炭增长107.7%，生铁增长130.5%，因而到了年底，仍有大量煤炭、矿石运不出去。以铁路为例，有三四千万吨货物滞留在产地。在1958年的货运量中，正常的运输能力只占80%，其余20%靠全民搞运输，特别是发动农民搞突击才达到的，“以钢为纲”没有带动全局，却拖垮了其他行业。

第四章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第一节　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1958年下半年，紧跟着大跃进高潮，在全国农村又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北戴河会议后，一个月之内，迅速地实现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全部转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大办人民公社，从一开始就与向共产主义过渡联系在一起。

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是多少代共产党人的理想。当年马克思不愿为未来共产主义描绘完整的蓝图。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他还是简约地谈到了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国家，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物质极大丰富等等。

马克思简约描绘过的这种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成为无数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讨论何时进入共产主义，多少年来一直是共产党领袖们最热心的话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列宁曾经设想，共产主义就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估计，通过电气化道路，有可能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大约在1930年至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1920年10月2日，他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是15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16年以后，也就是在1936年，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向世人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建成。1938年，他又宣布：整个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日子将是在5年之内，即1943年以前。

后来的历史证明，列宁与斯大林对共产主义来临的日子都估计的过早了。但直到50年代，苏共中央的领袖们仍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1952年，斯大林又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已处在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到1957年1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提出，在今后15年内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又在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用12年时间达到共产主义。1959年1月，苏联宣称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

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许多方面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但在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问题上，两党的观念却惊人的相似。

中国在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就原则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5年3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化为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把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同赶超美国、过渡到共产主义联系了起来。他讲过，大约50年到70年左右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但直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还不是很着急，因为那毕竟是50年到70年左右的事情。而且此时他思想中还没有确定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认为找到了这种途径，这就是人民公社。于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步伐就大大加快

人民公社可以说是毛泽东心仪久之的一个梦他心中已有几十年时间了。

受欧文、武者小路实笃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村主义"和康有为《大同书》等的影响，毛泽东早年就与蔡和森等共产主义者一道，进行过建设"新村"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他们计划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崇尚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制度。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他还为学校安排了每日的生活时间表：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

当年的毛泽东还是一个热血青年，而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他的这种"新村"计划显然无法实现。不久毛泽东投身革命，也就不再提起这个计划。然而，夺取全国政权后，这个"新村"计划似乎又有条件实行了，不过这时，毛泽东要建立的已非几个人的"新村"，而是一个有6亿多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新村"，这个"新村"也已改变了名称，它的新名称叫"人民公社"。

第二节　小社并大社，人民公社初露端倪

1955年夏秋，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毛泽东发生了争论。邓子恢主张发展速度适当放慢一些，巩固现有的农业合作社，老区停止一年，新区小发展或适当发展。毛泽东则严厉批评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

在那里走路。同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更加猛烈的攻势，发动全会批判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并说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

毛泽东批判“小脚女人”，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直接的后果是人为地大大加速了合作化的进程，更深层的后果是这种急于变革生产关系的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天经地义的指导思想。

从实践的发展过程来看，小社并大社可以说是搞人民公社的最初预演。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即提出了搞大农业社的思想。他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中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农村很短的时间里就普遍办起了高级社，而且规模也比较大。例如，安徽有16个社规模在3500户以上，河南千户以上的大社有495个。这就给生产和分配带来不利影响，部分社员开始闹退社、分社。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向辽宁、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了解情况后向中央的汇报：当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社内，出现社员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有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点。浙江省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万户，占社员户数1%，已有102个社垮了台。辽宁省在丰收之年也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

1957年，中共中央针对合作化运动过急过粗、遗留问题较多等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针对1954年以后，生猪生产连年下降的情况，提出继续贯彻“私有、私养、公助”方针，给社员分配适当的饲料地，还将生猪收购价格提高13.6%。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要求各合作社，按时公开财务开支，社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减少社员负担等。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内容包括：(1) 整顿干部作风，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2) 调整社队的组织，合作社规模过大的、不适当的，可根据群众意见划小，由社自负盈亏；(3) 统筹安排，使社员各得其所；(4) 改善管理，拟定生产规划。文件中强调，要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合作社规模大小应照顾技术、经济、居住、历史条件，允许有各种差别而不要千篇一律。现在部分合作社组织规模过大，应根据群众的要求合理调整，或把社划小，或保持原社，下设分社，自负盈亏。以20户左右为宜。而且应长期稳定下来。

这个指示，抓住了当时农业、农村工作的关键，如果照此执行下去，中国农业、农村工作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57 年 10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示各地执行。这个文件是在批评反冒进的情况下发出的。文件下发后，全国农村又开始大辩论，掀起兴修水利和积肥的高潮，与此同时，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于是出现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为了让青年农民学习农业技术，吉林延边、河南登封、湖南浏阳等地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领导人酝酿了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认为一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政治问题，以后永远不许反冒进。当他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就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中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份文件还分析了农田水利建设等对于扩大合作社规模的需要，由此提出把小型农业社合并成一乡几社规模的大型合作社的意见，这一意见的提出，直接促成了 1958 年上半年部分农村大办大型农业合作社，并且成为 1958 年夏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声。

3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苦干三年，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文章，还配发社论，肯定和推荐了徐水通过小社并大社，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从一个工作很平常的县一跃而为先进县的“又快又好的典型”经验。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为题，报道了福建闽候县在 3 月间，把城门、下洋、龙江 3 个乡合并为一个乡，把 23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 1 个社的消息，并以《编辑的话》的形式，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主要观点予以发表。随后，小社并大社工作在各地普遍展开。5 月间，辽宁省将 9272 个社合并为 1461 个社，基本上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 2000 户左右，最大的为 18000 多户；河南省由 38286 个社合并为 2700 个社，平均每社 4000 户左右；河南省嵖岈山卫星社是 4 月份由 4 个乡 27 个社合并起来的，有 9369 户，43263 人；河南省信阳地区于 7 月间，将 5376 个小社合并为 208 个大社，平均每社 8000 户；河北省徐水县商庄农业社由 40 个小社合并为 218 个社，平均每社 1600 户。

农业社不仅规模扩大了，职能也在扩大，在 1958 年 1 月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地方工业的产值在三年、五年或十年超过农业产值的意见。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意见》于 3 月 23 日在成都会议通过，并于 4 月 5 日经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达。农业社办工业，就已突破了农业生产合作这个名称的限制，实际上就提出了给农村主要的合作经济组织另找名称的问题。

第三节　中共高层领导人纷纷“吹共产主义公社”

“大跃进”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一时间，农业方面浮夸成风，似乎粮食会多得吃不完。农业生产开始放高产“卫星”，工业方面也开始浮夸，追求高指标，似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是处于“一天等于20年”的形势下，人们不能不关心如何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2月至3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公社”一词，显然是从巴黎公社引申过来的，它一开始就具有共产主义的色彩。最早议论“公社”的不只毛泽东一个人。

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面对着“三面红旗”的重重阻力，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他说：大办钢铁的“发明权”归“柯老”，即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而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

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1959年11月7日，刘少奇回忆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同志谈过。在广州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牛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建设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牛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

在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中国的情景时讲到：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回到北京，中宣部长陆定一将毛泽东、刘少奇的谈话内容加以整理发挥，同年5月19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时讲道：

毛泽东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1958年6月，中宣部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这时，陆定一发现，恩格斯已经把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作“公社”。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一发现的价值。陆定一将这一发现推荐给毛泽东，后者又向政治局里的全体成员一再推荐。这一来，大家都相信，“公社”不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觉，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

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材料，最早公开宣传人民公社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

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大跃进运动是陈的政治生涯中一个十分活跃的阶段，也是他仕途升迁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全会决定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据陈伯达回忆，虽然决定出版《红旗》是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才作出正式决定，但是筹备工作早就开始了。

创办一个理论刊物，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最初，陈伯达并不想办《红旗》这样的理论刊物，他是想办学术性理论刊物。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的办刊设想。这样，陈伯达只得放弃了办学术性理论刊物的意见。

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以后的第五天，即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便问世了。5月24日，毛泽东就题写《红旗》刊头，致函陈伯达：

伯达同志：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

毛泽东很认真地为《红旗》题写刊名，一共写了20多幅，而且每一幅的旁边还都对文字的特点作出注明。经过陈伯达和编委们细细品评，最后选中了一幅毛泽东注明“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的刊头。

陈伯达本来就是个“文化人”，喜欢舞文弄墨，当上《红旗》的总编辑以后，更是经常写些文章在自己管辖的杂志上发表。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旗》上，就发表了陈伯达的一篇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陈伯达在这里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一名称，这也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宣传人民公社。关于宣传人民公社的事情，陈伯达后来回忆说：

根据当时接触过的一些材料（例如湖北），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办起了工业。

又搞农业，又搞工业，这件事启发我想起恩格斯的一个著名的论点……

我想，既然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同时又搞农业，又搞工业，而仅署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似乎不完全反映这种实在发生的情况，所以，我冒昧在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短文中，说这“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原来的设想就是这样。

6月底到7月初，在晋冀鲁豫陕京农业协作会议上，谭震林讲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革问题。他第一次把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他说：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已开始了新的变革，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革，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些方法、那一套制度、那一套形式来发展了，需要有所改变了。像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

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是1958年4月20日由2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共6566户，30113人。《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于当年7月17日到这里来时，已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8月8日，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写道：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和他们讲了一番“工、农、商、学、兵”办“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公社”这个名词，群众还不习惯，有写“共社”的，有写“工社”的。李友九随信给陈寄去《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第二次草稿）》一份，并说明这是他和河南同志“大汇合、大研究”之后写成的。陈伯达收到后，即将《简章》草稿的复制件和李友九的信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对《简章》作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到各省、县参考。”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农业协作会议上，谭震林还就共产主义社会的好处向人们作了一番描述：

第一，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子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确实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谭震林在其中讲到的一些东西，诸如猴头、燕窝等农民可能从未见过，而电视、电话他们也只是在报纸、广播中读到或听到过，而这一切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不能不使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7月16日，《红旗》第4期又刊载陈伯达“七一”前夕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一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毛泽东

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篇文章为以后成立的人民公社的性质和特点，定下了基调。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用一句使人过目不忘的“对联”概括了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第四节　毛泽东表态：合并后的农业社“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在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毛泽东再也不能安坐北京，他要亲赴乡间，去体察农村的实际情况。每逢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喜欢到外地去。

8月4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第一站，他来到河北省徐水县。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河北省徐水县曾经是一颗光芒四射的耀眼明星。

徐水县当时有人口31万，有土地79万亩。在历史上，徐水是个多旱、涝灾害的县。县境内有漕河、萍河等三条小河流由西自东流人海河。雨水大时，东部闹水灾；雨水少时，西部闹旱灾。1942年发生旱灾，大部分禾苗枯死。1954年遭水灾，粮食亩产110斤。1957年时粮食亩产仅为200斤。据统计，1954年至1957年4年间，遭灾面积共达87万亩，共减产粮食1.7亿斤，从全国各地调入粮食9260万斤。因而群众对根治水旱灾害有强烈愿望。

根据中央大搞水利化建设的精神，徐水县委积极贯彻“蓄、小、群”为主的方针，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掀起水利化建设高潮，把全县10多万个主要劳动力组织起来，打破乡社界限，不分受益情况，实行全县水利建设大联合。还要求工商文教各部门打破常规，全力以赴为水利化建设服务。根据中央指示，县委组织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阻碍大跃进的保守思想，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自我教育，把“整风作为一切工作的纲”，贯穿到水利化建设的全过程。结果，经过三个月苦战，修建山区中小型水库17座，“葡萄串”、“满天星”式的平原水库173座，还挖了自流泉，打了不少机井，即认为实现了水利化。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之后，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保定地区视察，听取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肯定了徐水县水利化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他还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亲自作报告，对徐水县给予大力表彰。从此，徐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名声越来越响。

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国忠的文章——《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同时配发《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社论。文章宣称：徐水在一个冬春就基本上改变了全县的自然面貌，1958年要把粮食产量提高一倍，达到并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亩产400斤指标，达到500斤。社论肯定了徐水县委在组织上加强第

一线，拧成一股绳的措施，肯定了做什么辩论什么等发动群众的做法，并指出，徐水经验可能发展成为一套领导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完整经验。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从一个工作很平常的县一跃而为先进县。去冬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的典型，徐水县就是在全县规模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谭震林离开保定不久，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办副主任陈正人奉命到徐水总结水利建设的经验。3月14日，陈正人写了一份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送中央各负责人。

报告中介绍了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在群众高潮面前，强调“思想大解放”，只要依靠群众，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即使今天不能办到，明天也一定能够办到；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强调加强第一线，一切工作深入现场；坚持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为了统一领导，努力使中心任务与各部门工作互相结合，“一切为中心，拧成一股绳”；立场、态度坚定。报告中还说：徐水县的经验，使我体会到，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高潮，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陈正人在报告中还举了许多例子：有一个乡，由480个妇女三天三夜奋战，修成一座蓄水13000立方米的“妇女水库”；700多个学生和40多个教员，只花了一天时间修成了蓄水15000立方米的“红领巾水库”；“夫妻窑”、“姐妹窑”、“父子窑”、“母子井”也到处出现。他认为，徐水不仅水利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他各项工作也都有大发展。养猪迅速由3万头增加到19万头，1958年准备发展到40万头，达到每2亩地1头猪，平均每1人1头猪。当然，他们的工作不是没有遇到挫折，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去冬发展养猪，因从南方买小猪到北方，没有经验死了两万头。县委一个工作人员就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门口，标题是《大喊救命》，要县委收兵，可是县委绝不畏缩，坚持发展方针。一个水利科长，对水利高潮采取消极反对态度，他们及时地层开了批判，后来发现他是个右派，经过揭露，有力地推动了水利化建设高潮。

陈正人的报告送到中央后，很快就被转到正在主持中央成都会议的毛泽东手中。就在陈正人这份报告上报中央的前一天，即3月13日，在成都会议上，谭震林也上交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初步安排》的报告。这两份报告，一个从微观上手，一个从宏观上着眼。3月21日，毛泽东在看过陈正人的报告后，写出一段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3月28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正式报告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领导经验。29日，又以文件的形式，将徐水经验印发全省各地、市、县。

4月17日，《人民日报》以突出篇幅全文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同时有上千字的《内容提要》，《总结》中这样介绍徐水：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内容提要》认为，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主要经验，首先，抓政治思想工作；其次，加强第一线，指挥准确

及时；第三，通过整风，批判了各部门干部中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单纯的业务观点，把各部门的力量拧在一起；第四，正确地解决了重点工作和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第五，采取试验、参观、推广先进经验和评比竞赛等一系列的办法，使生产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促进先进经验遍地开花。

自从毛泽东对陈正人报告作出批示之后，徐水的“创造发明”接踵而至。7 月 7 日，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基本的要求是“四化”，即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化。“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实行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司令员）、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乡要划分若干战区，乡党委分片包干。使这一军事组织真正成为坚强的农业社会主义跃进兵团。

几天之间，全县打破了地界，建立了 93 个团、299 个营、1099 个连、3365 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从而实现了统一调配劳动力的大协作。同时，社社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缝纫厂，促成了家务劳动的集体化和社会化。县委把公共食堂作为共产主义的萌芽，普遍推广，共办食堂 1693 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 225639 人，占全县人口的 70.5%。

一时间，徐水县成了一个大兵营。

当此之时，8 月 4 日徐水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毛泽东视察来了！

为了迎接毛泽东，徐水县委做了充分准备：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参观的地方；下面按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地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不准回城。

毛泽东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粮食加工厂和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厂等，参观了幼儿园和老人“幸福院”，还察看了食堂、细菌肥料厂、铁工厂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在参观的时候，张国忠和农业社主任等人以及省、地负责人一直陪同着毛泽东，他们之间的对话随即在《人民日报》发表。

张国忠介绍说，当年全县夏秋两季共计划要拿到 12 亿斤粮食，平均亩产 2000 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 35 万亩。

毛泽东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啊！你们夏收才拿到 9000 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 11 亿斤呀！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都被毛泽东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笑答：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大寺各庄农业社主任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你换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

毛泽东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泽东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毛泽东又笑着说道：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后来，毛泽东又补充道：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在食堂问题上，毛泽东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

张国忠说：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吃了大锅饭。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

张国忠答：我们现在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个人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大车、牲畜等等，群众都要求转为全民所有和办国营企业。农村没有小商人，城市也没有商人。社内还有个专管居屋建筑和分配的组织。我们讲，不共产，几千年是贫穷落后、阶级压迫；一共产，就大跃进，拆了旧房搞新的，因此大家都说共产好。

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毛泽东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

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全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吗？随后，他对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和副省长张明河说：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毛泽东对这里军事化表示很满意，于是问李悦农：徐水的军事化，你们推广了没有？他还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斤！

临离开徐水时，毛泽东说：下边真好，出的东西真多，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他问张国忠：北京出什么？

张国忠答：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

毛泽东点了点头。

在徐水视察时，毛泽东曾问农业社主任李江生：这里的农业社叫什么名称，李江生回答说：叫第八瀑河农庄。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离开徐水后，毛泽东的视察还在继续。他来到了河北省安国县。毛泽东对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说在平原地区8000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还说，县也要并大一

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到达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这个乡在全国第一个挂起了“人民公社”的牌子，那是在毛泽东到达前两天的事情。

毛泽东站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8月4日刚刚挂出来的公社的牌子，随即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这个公社的情况，参观了托儿所、幸福院、公共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对这个最早建立的人民公社大加赞扬。在视察公社棉田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没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点点头说对，有这样一个就会有好多社。在七里营人民公社，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有许多好处时，毛泽东欣喜地随口说道：好么，好么，人民公社好。第二天，被跟随采访的记者登报发表了出去。毛泽东看了报纸，连说“糟糕”，因为毕竟此事还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不过，事已如此，毛泽东也只好听其自然，何况从内心深处讲，他对人民公社确实情有独钟。

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了新乡、长葛、高丘三县农村。之后，8月9日，他又到山东省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视察冀、豫、鲁三省后，《人民日报》将“人民公社好”5个字用大号字登在显著位置，中央领导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尽人皆知，随后就出现了各地农村积极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毛泽东在回京途中，余兴未消。专列临时停在丰台火车站，毛泽东又视察了丰台区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那天，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已是夜间11点了。一路风尘仆仆，毛泽东却毫无倦意。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第五节　中央决定：在徐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

毛泽东亲临徐水，给这里的干部、群众以无比殊荣和莫大鼓舞。据《人民日报》报道，徐水的人们兴奋地跳起来，兴奋地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8月4日晚7点半，毛泽东离开徐水的当天晚上，徐水县委立即召开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自觉向党和毛泽东宣誓，保证今年亩产超过2000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当夜，大寺各庄成立了人民公社，为了纪念领袖视察，定名为徐水东方红八四人民

公社。并宣布一切房子、树木、猪、羊、大车、牲畜全部归集体。社员实行了工资制。公社党委还连夜修订跃进指标，粮食产量原计划亩产3800斤提高到5000斤。

第二天，县委又召开全县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张国忠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他说：向共产主义进军，北京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们党领导群众多年，就是要为建设共产主义，使人民进入生活、劳动的幸福乐园，消灭贫困、压迫和阶级。我们这一代，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向幸福的乐园前进。今天是共产主义文化跃进大会，这是我们要向共产主义迈进，使我们的思想、文化、教育都要提高，向共产主义进军。

讲到建立公社时，他说：现在高级社改为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内。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在就把一切劳动工具和部分生活用品全都共产，说：大车、牲口全要公有，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轮车、机器，哪个是个人的？存款还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这就叫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有，私产是贫苦受罪，粮食不能高产。共好了是2500斤。

毛泽东高度赞扬徐水经验，也引起刘少奇的注意。8月6日，他派陈正人再次来到徐水，给张国忠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陈正人此次到徐水，还带来了两本书，这就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前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后一本则是康有为的名著。把这两本书同时带给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徐水人，实在是件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哭笑不得的事情。好在当时人们头脑很热，没有什么人冷静地分析其中包含着的讽刺意味。

8月8日，陈正人召集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胡开明，省委秘书长尹哲和保定地委、徐水县乡村干部进行座谈。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今年钢的产量可搞到1200万吨，明年钢产量达3000万吨，超过英国。这样就逼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提出，要使徐水的发展速度比其他地方走在前头两三年，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和要求，对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生活搞一个具体规划。他要求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和他带来的两本书。

有了中央的意图，有了马克思的著作和康有为的书作为理论指导，徐水县干部们的思想长了翅膀。

由于毛泽东视察时曾鼓励了全民皆兵的军事化措施，赞美了徐水实行军事化以后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跃进的发展，8月13日，经国家特准，徐水县决定给全民皆兵的公社社员发枪。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乡举行发枪典礼。发枪典礼之后，1100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赴生产战场，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追肥96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又有所提高，人们处在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状态之中。民兵们在上工以前和下工以后，都雄纠纠地操练一遍；在生产的时候，将枪架在地边，男战士们甚至做着活还要喊"一二三四！"几乎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畜、房屋、树木等都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

料人社折价款的部分也决定取消。为了把现在规模很小的公社合并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型的人民公社，徐水县于8月15日将全县20个乡镇并为9个大的乡镇。

为搞好规划，中央、省、地、县共同组成一个有100多人参加的“共产主义试点规划小组”。8月22日，《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出台。《规划（草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随着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继续组织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力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为丰衣足食的生活创造充分的物质基础；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群众的高度文化水平创造条件。奋斗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9月1日，《人民日报》向人们透露这样一则信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第六节　北戴河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议题共有17个，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是其中最具幻想色彩的议题之一。而建立人民公社，又与摸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相联系。

会前，“农林口”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准备了一份题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的文稿。毛泽东对这个文稿很满意，称赞这是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中写得最好的一个。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指示将这份文稿连同陈伯达转送他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印发给与会人员。

8月17日至3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5次讲话，他讲得最多的是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8月19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

8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

在8月3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人民公社都有。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了。看起来只要把章程搞好，全国可能很快。秋冬可能搞得差不多了。当然实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还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一下出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 24 条，这是它的宪法。

这个被称之为“公社宪法”的章程，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就是前面提到的，是由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图组织人搞出来的。这个章程的第 4 条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

这份简章的第 5 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有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为全社公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第 13 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毛泽东对这个章程很热心。他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8 月 23 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家都同意在农村办人民公社。29 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建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决议》一方面决定：人民公社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但同时又认为，这个过渡时间不会太长。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同时还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决议》还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8 月 29 日，即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决议的，同一天，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就农业社如何分配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进行鸣放辩论，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北戴河会议上宣布了中央的一项涉及农村工作的人事调整：今后农村工作由谭震林负责。而在此之前，这项工作是由国务院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负责的。

第七节 “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一哄而起

9月1日，由陈伯达主持的《红旗》杂志在第7期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论和嵖岈山卫星公社简章（草稿）。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简章看如何办公社》，赞扬嵖岈山卫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

9月1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11日，《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也公开发表。全国范围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迅速来临。

徐水县仍然走在最前面，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传达后，徐水县于9月15日就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级政社合一，一级核算，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

在分配方式上，徐水县还实行了供给制。徐水县委认为，全县的农业社都已转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配合的全县范围的人民公社，已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广大工农群众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新形势，已不适应继续采取记工分红、工资制等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而需要采取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于是在省委、地委的帮助下，9月20日，徐水县《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也出台了。《试行草案》要求，所有的公社社员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农商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连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等15项都由公社统一包起来统称为“十五包”。为了解决男女老幼之间不同的复杂需要，还补发一定数量货币的津贴。文件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工作的人员。这个方案还分别对伙食、服务日用品、津贴费和卫生医疗文娱等方面的供给标准，作了具体规定，在每一项中都对农民、工人和干部规定了不同的标准。以津贴费为例，农民；的津贴费，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力强弱分三等，每月一等的3元，二等2元，三等1元，每季评定一次。工人则分为七等，最低的一等1元，最高的七等16元。干部则分为四等，县级16元，科局级12元，一般干部及教员8元，勤杂人员6元。这个供给制是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核心。

《试行草案》公布后，当地人举行了游行，大家抬着“庆贺全民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匾，敲锣打鼓，高喊“拥护供给制”、“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

以省为单位来说，河南省走在全国的前面。到8月底，河南全省已经人民公社化了，在原有38473个农业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建成大型人民公社1378个，平均每社7200多户，人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8%。

据中共中央农村部9月底的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共建人民公社23397个，人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市、自治区达到100%，10个省、区达85%以上，4个省区在国庆节前基本实现公社化，云南一省计划10月底完成。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改办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1.2亿多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

人民公社的特点，用毛泽东的话说，可以概括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的"大"，主要是在社的规模上。

在人民公社化前，全国有740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约有170户，2000多亩土地和350个左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则变成了26500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约有5000户，60000多亩土地和10000个左右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庄，一乡数社；人民公社，则变成了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规模扩大了10倍以至几十倍之多。根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在11个省、市、区7589个人民公社中，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到10000户的1718个；10000至20000户的533个；20000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甚至还建立起了94个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

人民公社的"公"，主要表现在所有制和分配两个方面。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消除了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制的残余"；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

这实际上也就是"共产风"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把经济条件不同的社拉到一起统一核算，就是穷社共了富社的产；消灭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集体共了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人民公社，就是公社共了国家的产。

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基本是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制，而人民公社，除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外，已在相当程度上实行了以供给制为主要特点的所谓按需分配制度。当时，人民公社普遍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其在社员的收入中分别占50%、60%和80%；工资制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其在社员的收入中分别占50%、40%和20%。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或"十包"的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

所谓"七包"，是对人民公社全体人员的吃饭、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丧等生活需要部分，均由公社供给。所谓"十包"，就是除上述"七包"外，还包烤

火、理发、看电影看戏等生活费用。

在管理方面，人民公社确立了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

在人民公社化之前，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乡社分立的管理体制，乡是基层政权，社是农业经济组织。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广大农村普遍确立了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它不但负责全社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对工、商、学、兵等统一管理。在人民公社内部，将公社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小队则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此外，人民公社的“创造”还不止这些，它还有一套类似军营化的组织和生活，即实行了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为了便于集中、调动劳动力投入各种“大办”，为了培养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地普遍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成各种军事组织，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各种“大办”中像参加战斗那样进行部署、调动。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当时，各地的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劳动大军，办起了以公共食堂为主要形式的公共事业。据统计，仅到9月底为止，山西省就建立起一支429万多人的劳动大军。甘肃、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区也都按照冶炼钢铁、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筑路运输等方面组织了很多“野战兵团”。河南、湖南、河北、山东等11个省区办起了145万多个公共食堂，126万多个托儿组织。此外，各地公社还普遍建立了粮食加工、缝衣洗衣等组织。

第八节　在极度热情的气氛中，吃集体伙食也成了“共产主义”的象征

在中国农村，农民们在农忙时一向有集体吃饭的习惯。互助组时期，为了早出工，出工齐，多做活，通常实行吃“转转饭”，也就是在张家干活就在张家吃饭，在李家干活就吃李家饭。伙食费用或从换工的报酬中扣除，或由就食者凑米凑菜在一起举炊。

到了合作化时期，特别是高级社以后，由于公有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也扩大了。农忙季节劳动力紧张，于是便实行“吃集体伙食”，“吃劳动饭”，即出工劳力在一起吃饭。这样慢慢演化为“农忙食堂”，但不是常年性的，仅在农忙时开饭十几天或几十天不等。

大跃进开始后，农忙食堂最初是作为扩大生产力的重要方式而得到推广的。例如湖南省桂东县群强社为解决劳力不足问题，提出搭伙煮饭的办法。结果这个办法不径而走，不到一个月就普及了好几个乡。乡领导要求县委表态，终于得到了支持，于是便在

全县范围内推广了起来。

这时的农忙食堂还基本上因地制宜，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自愿结合，统一煮饭，各自备菜；二是集体煮，按时分开吃；三是食堂制，即粮菜入伙，集体吃大灶。一般说来，农民比较喜欢第一种形式，因为有较大的自由，吃多吃少自己掌握，又可以自我调剂，吃到可口饭菜。桂东县委曾撰文总结经验，肯定了农忙食堂的三大优点：一是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效率。以群强农业社参加集体饭劳力占98%的情况为例，在未实行集体煮饭前，经常出工的占70%；集体煮饭后，能达到97%；大大提高了出勤率，改变了早上不愿意出工，中午、下午早收工的现象，同时还节省燃料。二是增强计划用粮。据统计，一乡全年可节省粮食一万斤。三是增强了社员的集体主义观念，逐步养成农村中新的社会风气。

农民根据农活安排，在农忙时节自愿组织起来，集体做饭吃饭，本来是中国小祖经济分散劳动中，尤其是共产党提倡互助合作过程中，行之有效的一种传统，不过是一种自愿的暂时性的吃饭方式而已，并不包含某种政治意义，更称不上代表了什么方向。可是在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大潮中，人们却对那些带有“集体”性质的事物特别敏感，并且习惯于制造声势加以过分宣传。

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原来的农忙食堂，只同生产需要相联系，并没有正式固定的房屋炉灶，也没有专人管理。但由于“大跃进”尤其是公社化以来，农业大上，各种“大办”，突击性大规模的劳动项目越来越多，军事化的劳动生活随之而起，农忙农闲之分渐渐地没有了，集体煮饭便随之向常年食堂过渡。也就是说，集体性程度的提高，促使农村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不管大家有无思想准备，这种变化却蓦然而来，而且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所未曾出现过的。于是被认为这是向更高一级社会结构的上升，具有无限广阔的前途和生命力。

较长期的农忙食堂普遍推广后，立即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群众不满。以江苏省的常熟为例，意见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均主义引起恐慌。由于办食堂的动机已有求公求大的苗头，因而要求农产将存粮一律集中于食堂。这自然引起群众的猜忌与惊慌。特别是余粮户反应更大，认为“共产”了。于是趁还未集中存粮之时，把原来每天吃两稀一干改为三顿干饭。还有的怕粮食被外人吃光，四处邀请亲戚、朋友一起上门，先敞开肚皮吃几顿。更多的连夜把粮食转移到外村、外地，以免被集中。二是强迫调剂，造成不满。在办食堂之际，有的户闹缺粮，社队领导采取简单办法，在存粮多与少的户之间进行调剂，而且带有强迫性质，类似“吃大户”，自然招来群众反感，也助长了闹缺粮户的依赖思想。三是把食堂改成永久式，占用资金房舍，增加了额外开支，例如有的队要拆旧房盖新房，砌新灶买大锅，这些钱都分摊在各家各户，农民是很有意见的。这些弊端对上是有反映的，当地也曾要求加以纠正，可在人民公社化的大形势下，不仅问题很快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了，而且吃集体伙食还成为了“共产主义”的象征。

第九节 开始流行“吃饭不要钱”

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对公共食堂这类“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持积极支持态度的人比较多。

与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对共产主义抱着炽热的憧憬，对各地出现的托儿所、公共食堂、供给制、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的热情。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刘少奇说：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青年团代表都讲了公共食堂问题，江苏省常熟普遍办了农忙食堂，可见大家趋向共产主义。毛泽东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泽东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的单位、教育的单位、消费的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的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个消费单位。

刘少奇还说，现在社会上的劳力也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农村还有磨面等，在没有想出新的办法之前，只有这么做，但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种设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的服务性事业。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多人做饭，变成40人做饭，同时把煮饭变为集体的事业，变为大生产、大经济。

刘少奇还讲到，不只在农村，城市进而也要把生活组织起来。他说，在上海职工宿舍参观，小孩子多得很，像蚂蚁一样，哇哇叫。家属每天是带孩子、煮饭、洗衣服，情绪不高。问她想什么，她想找点事做，可是没人带孩子、煮饭。

刘少奇最后设想说：组织起来搞，怎么搞法？组织形式是什么？是叫合作社，或者叫服务合作社，或者叫消费合作社。规模稍许搞大一些，互助组已经搞了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下，高级化一下，有那几百家，没有几百家不好办，要有个几百家、千把家。大的食堂，大的洗衣房，有这样大经济生产的单位，不是一家一家生活的，这是比较有点规模的生活单位。至于以什么为单位，乡村以社为生产单位，同时也就是消费单位。城市可以工厂、街道为单位。有了一定规模，就有许多工作做，要推广洗衣、烧饭等先进经验。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完全可以设想，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可见刘少奇当时的心态，对那些“共有”形式是颇为向往的。

刘少奇的这番话是1958年6月中旬讲的，当时对于设想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具体组织形式，还没有定型的意见，人民公社的提法还没出现，但大致的设想已经有了，这就是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那个描述。后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又以毛泽东谈话的形式对此加以肯定，并使之定型化；权威化。

公共食堂一经兴办起来，它的意义又有重要延伸，这就是同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15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同时，《简章》也规定了在公社内部实行工资制。粮食供给制和工资合起来，构成了人民公社的理想分配制度。事实上，初期人民公社的架子基本是按嵖岈山这份《简章》搭起来的。

粮食供给制说通俗了，就是“吃饭不要钱”，最早发表这个创见的是柯庆施。1980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夏衍回忆说，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亲耳听到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

吃饭不要钱的载体就是公共食堂，也即是说粮食不再分配到各家各户，都集中于集体食堂，然后实行“敞开肚皮吃饭”。在大跃进年代，这种做法被崇奉为极高的理想境界。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几次提到“吃饭不要钱”。他说：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又说：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这已把话讲得非常明确了。

第十节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会对诸如吃饭、穿衣等简单的“共有”形式发生如此大的兴趣，以至不约而同地赞美它们？这其中可能有一个深刻的理论根源。而这个理论根源，就是要破除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就是这样看的：实行粮食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填补社会鸿沟或差别，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平等。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进城后，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把薪水制说得神乎其神。于是，按等级发薪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有等级，办公桌也有等级。这样一来，脱离了群众，战士不喜欢

军官，农民不喜欢区乡干部，城里的工人也不喜欢我们。他认为：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光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整风反右，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下放，将军当兵，种试验田，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的破坏；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

从这番话看来，毛泽东晚年试图在中国缔造一个共产主义模型的思路，已相当清晰可辨了。在夺取全国政权，进行必要的经济恢复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他开始把思考和实践的着重点放在进行共产主义的"大实验"上。尽管1956年以后，社会的物质生活比建国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套保证经济运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毛泽东内心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深刻矛盾。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距离他的理想不是近了，反而是越来越远了。官僚主义、等级差别，以及脑体、城乡之间的差别，使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社会生活难以变得平均、和谐，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变成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者。此外，人的私有观念随着生活的富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总而言之，不平等、不公平和私利欲望增强了。可以说，这同毛泽东的革命初衷和理想愿望背道而驰。

毛泽东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现行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制度，在事实上保护了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不平等的存在。他在1958年之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如工资制、军衔制以及各种各样的等级问题。后来，在1975年的垂暮之年，他更加明确地讲到八级工资制和按劳分配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东西。

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这件事，在毛泽东看来意义特别重大。它不仅是农民自身革命精神——向几千年私有观念、生活方式的挑战，而且还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既是对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又是在制度上推动更高级公有形式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尝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很快就有人写出了大篇幅的理论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的作者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威风八面的人物，张春桥。

1958年，张春桥41岁。他当时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柯庆施出了不少力，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著名报告，就出自张春桥之手。

1958年6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柯庆施马上效仿，在上海也创办了一个政治理论刊物——《解放》，而且与《红旗》一样，也是半月刊。《解放》杂志于7月1日创刊。

张春桥的过人之处，是善于揣摩领袖意图。在反复揣摩之后，他发现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多次讲话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则

常有非议。于是，便提笔写就了一篇使他本人一举成名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经柯庆施审阅同意后，发表于9月15日出版的第6期《解放》杂志上。

张春桥在他的文章中，对供给制作了多方面的赞美，而对于薪金制则指斥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为全国解放以后废止供给制，实行薪金制丢掉了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是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文章最后写道：

"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遵照柯庆施的嘱咐，每期《解放》杂志都要寄送毛泽东一份。因此，毛泽东很快就读到了张春桥的文章。

毛泽东对于张文很感兴趣，当即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文似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10月11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将编者按语略为改了一点文字。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写道：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毛泽东在信中还对吴冷西讲：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张春桥文发表之后，从10月18日起，《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开展了连续两三个月的讨论。绝大多数讨论文章同意张春桥的观点，把工资制看成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主张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应该继续破除。有的文章认为，现在如推行供给制，将冲破人们"在劳动中斤斤计较、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庸俗习气，势必大大发扬共产主义"。一些农村干部的讨论文章，则结合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上中农对人民公社化的抵触情绪，认为他们"一怕归公，二怕拉平，归根结蒂是幻想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即1958年10月19日；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给他和张春桥安排了一次调查。毛泽东在信中说：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二十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

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飞机即飞郑州。

这是毛泽东在批示中第一次提到张春桥的名字，而且要他与当时被人称为“中共第一枝笔”的陈伯达同行，还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专机。可见毛泽东对他的重视。

在大跃进的动荡年代里，张春桥作为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升起。这一年，他由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市委常委。

第十一节　人们把“共产主义”弄得五光十色、洋相百出

公共食堂大面积铺开以后，由于舆论声势和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攀比欲、新鲜感，温度急剧升高，许多极端的事情都做了出来。比如说当时农民中有这样的顺口溜：“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这是形容人们敞开肚皮吃饭的情景。当时有的地方开出“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一天不断。有的地方甚至模仿张鲁的“义舍”，对来往过客提供免费食宿，真如到了大同之境。

195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吃饭不要钱以后……》，该文报道了江苏省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在国庆节前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不限量的情况，贫农尹积福在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时，还有点不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心里才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佛国了。共产主义才沾了点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这个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一般农民，特别是生活困难的农民，对于初始阶段公共食堂的作法，往往是由忧而喜，最后欢呼雀跃，成为主要的拥护者。因为在直接利益上说，平均主义对他们最有利，使他们成为受益者。在理想层次上，贫穷农民亦易于产生空想。人民公社这种空想气氛极浓的实践，能一时之间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是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基础的。一时人们为它鼓舞，不少人的确出于真诚。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8年11月27日的报告，到10月底，全国农村已基本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26476个，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0%。报告说这还是不完全统计。按上述数字计算，大概每个公社有100个左右公共食堂，平均起来不只每个生产小队一个，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公共食堂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每个食堂要有专人做饭，即占用壮劳力，还要占用房基地，要专门建造房屋，置办锅碗瓢盆，这无疑也是一笔数量可观的开支。此外，大锅饭总没有小锅菜好吃，众口难调，三天新鲜劲一过，人们不免生出牢骚。其实，所谓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的“流水席”，是根本维持不下去的。凡是在食堂干过的人都知道，哪里有不按钟点供应伙食的食堂呢？一个定点开饭，就限制了农民的生活习惯，甚至与紧要农活发生冲突。农民吃饭时间本来就是以农活长短早晚决定的。家里做饭自然要方

便得多，起早贪晚，担到田间地头，汤水干粮很实在的就解决了问题。而冬闲时，自家可以以稀代干，减少顿数，自我调剂，显然这些都是公共食堂无法办到的。

公共食堂还极大地刺激了粮食的消费。劳力多、家底厚的社员，本应多劳多得，现在不仅劳而无获，而且还把存粮剩米也归了公，因此马上就有吃亏的感觉。劳力少、人口多的社员自然乐于吃大锅饭，无形中他们占了别人的便宜。这两种人的心态造成一个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大家都放开肚皮吃饭——家境好的以此来补损失，家境差的则想多占便宜，于是粮食消费大大超过了正常状态。本来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依据，即“粮食多了没处放”。但当年实际粮食打的远远没有那么多，只是略有增产而已，而且各地很不平衡，这当然离“放开肚皮吃”的境界差得很远。因而很快出现了上月吃下月，寅年吃卯年的窘况。况且许多行为不端的社队干部，趁机谋取私利，开小灶，多吃多占，更使食堂乌烟瘴气。到1958年12月底，首先是由于粮食发生紧张，公共食堂越办越糟。

大约至1958年10月左右，大办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荒诞剧已闹得有点不成样子了。1958年10月，山东省寿张县委作出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随后，山东省莒县制定出一个大战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在河南省，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修武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在所有这些荒诞剧中，山东省范县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了。

10月28日，山东省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代表县委，在全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出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并用诗一样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图画。

谢惠玉描绘了1960年时范县的工业情况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的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拿到手。

1960年范县的农业生产是：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根据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规划，范县的目标是：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这位书记最后总结说，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那时将达到：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谢惠玉的报告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11月6日上午毛泽东读到了这份报告。他饶有兴趣地提笔写下一段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

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还有比范县更荒诞的闹剧。10月底，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社党委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那位党委书记无疑是把这个决定当成喜讯公布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宣布散会，社员群众纷纷上街“共产”，拿空了商店，就到别人家拿，你家的鸡，我家抓来吃；我队的菜，你队可以来挖；更荒唐的是，还有去托儿所认个男孩作儿子的。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人们谁也说不清。当时还有人问：老婆还算不算自己的？公社党委吃不准，回答说要请示上级。

第五章　残酷的现实给人们泼了盆冷水

第一节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夭折

徐水名声在外，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据统计，从3月至10月，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了后，也伸了大拇指。赫鲁晓夫知道后，坐不住，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察看究竟。这位塔斯社记者比较“老道”，一眼就看出了徐水的“外强中干”。于是赫氏也就心里有底了。后来他讥讽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这话传到中国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慨，毛泽东反讥赫氏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并在一首词中写道：“土豆烧熟了，还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山东省范县县委书记把人民公社作成了一首诗，毛泽东也很欣赏这首诗。虽然梦幻的理想是美妙的，但现实的生活却很残酷。当时徐水还是一个经济贫穷落后的县，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农民还有人在外讨饭，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搞“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当然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原来张国忠以为，徐水进入共产主义，是全民所有制了，全国6亿人口还养不活一个徐水。然而，国家哪有钱给徐水发工资。两个月后，放开肚皮吃饭的徐水人，就连基本生活品也难以兑现了，不用说15包，连每人每年两条毛巾也只发了一条就发不起了。据一些人后来调查，当年11月间，徐水县曾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和干部发过一次工资和部分生活用品；12月，又筹款90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万元。以后，由于财力枯竭，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搞了3个月的供给制，不得不草草收场。

徐水县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比供给制更糟糕。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全县一级核算，劳力全县统一调配，出现了全县物资和劳务的大平调。为了实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全县共建起工厂30个，小型企业1348个，大学11所，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起。但很快就因资金不足，纷纷垮台。

徐水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这年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到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汇报到徐水问题时，毛泽东特别指出：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民的所有制。6亿人民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徐水实行的全民所有制，还是自己发工资。他们所实行的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全民所

有制。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反映了徐水县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问题。报告说徐水县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回号。在商庄公社庆祝国庆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徐水的情况越来越使毛泽东感到失望。在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批评徐水。他批评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闯"。提醒与会者："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他还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问题，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对于徐水的强迫命令，他也颇为愤怒地批评道："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斗争会，辩论变成一种刑罚。"

11月10日晚，也就是郑州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似觉意犹未尽，便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这最后一句，表明毛泽东对徐水失望已极。

为了解决徐水的问题，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组成了一个大工作组，对徐水进行了整顿。同时，徐水县委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修改了《关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纲要（草案）》。尽管这个《纲要（草案）》还坚持要在徐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但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再宣传、学习徐水的先进典型，不再来徐水参观"取经"。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事实上夭折了。

第二节 "共产风"的败象在一些地方逐渐显现

出问题的岂止是一个徐水县。当"共产风"刮遍全国的时候，败象随之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是农民的家庭财产全部被充了公，有的房子被拆掉，搬进新建的"居民点"，

或者搬到别人的家。公社以建立生产基地的名义，征集所属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人力，作为公社基地的物质来源。比如河南省嵖岈山公社用这种办法，制定了建设“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公社下属各村庄，均须抽出若干人员，携带树木砖瓦之类的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点，建起 305 间畜舍，然后又由农民家中牵去 192 头牛，赶去 89 头猪和 2700 多只鸡。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的报纸称为“白手起家”而广为宣传，农家中之房屋桌椅、锅碗刀筷、鸡鸭猪狗，均为“共产”的对象。按照湖北省沔阳县委的一份报告中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对于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农民当然不会满意。当时虽然公开不敢抵抗，私下里怨言还是免不了的。一个农民在给他海外亲戚的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的远方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家中财产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他说：“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在银行里的钱财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的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的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当时，全国至少有 4 亿人参加了公共食堂。一开始，食堂还真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然而，好景不长，食堂渐渐地捉襟见肘。其实这也是必然的。食堂有什么？不过是农民的粮食汇在一起，农民有多少家底？放开肚皮吃，一年的粮食能吃几天？这个账本来很容易算，但当时在燥热的气氛下却没有人肯去算这个账。结果，农民们渐渐地抱怨吃不好，吃不饱。

1958 年本来是个好年景，农业丰收在望。可是几千万人正在山上大炼钢铁，乡下 10 个人中有 4 人在铁炉子旁边，而且这 4 个人还都是壮劳力。真正出现了“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景象。由于粮食无人收割，开始烂在地里。在家里的农民也不关心，集体的东西不心痛，因为直观看来，收与不收确实与他本人没有什么切身利害关系。结果是，这一年丰产没有能丰收。

然而，高产“卫星”变本加利，越放越高。按照虚报的浮夸的数字，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已达到了 1000 斤以上，许多地方甚至超过了 3000 斤，以至于各地普遍发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感叹。在感到粮食太多的情况下，河北省安国县、山西省长治地区、陕西省长安县和山东省单县还在秋种时实行了用总耕地的 1/3 种庄稼，1/3 种树草，1/3 休闲的“三三制”，搞起了所谓农业耕作制度上的革命。

高估产必然引起高征购。虽然 1958 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到 4000 多亿斤，比 1957 年只增加了 2.5%，但 1958 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 962 亿斤，猛增到 1175 亿斤，增长了 22.23%，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也由上年的 24.6%提高到了 29.4%。

秋收后，又是刮“共产风”的一次机会，许多地方都对农民进行了掠夺式的“共产”。例如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向国家卖出12万公斤粮食，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后来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这个秋天里出卖的产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员拿走了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冬天全国从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钱多至30亿元。

为了筹集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资金，银行还对以前发放给农村的各种贷款，不管是否到期，一律强行收回。

以上三个方面被概括为“一平、二调、三收款”，再加上高征购，便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农村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由于农产品收不上来，而商品粮等销售量却随着职工队伍的扩大大量增加，因此，1958年冬天，市场上就出现了粮食、油料等供应不足的紧张状况。

刚刚到了冬天，已是困难重重，来年日子怎么过?

第三节　刘少奇逐渐从过于乐观的情绪中冷静下来

刘少奇的思想在大跃进前后有过很大的起伏。在大跃进之前，他是支持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反冒进措施的。《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社论也是由他开的“绿灯”。

但是，全国范围内迅速到来的大跃进局面，使刘少奇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例如，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就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15年是赶上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他还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但刘少奇毕竟是个务实的人。随着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一步一步暴露出来，刘少奇也开始从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中逐渐冷静下来。

遵照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破暮气，走出办公室”的建议，刘少奇在1958年2月至11月中，多次外出各地视察，时间累计达到120多天，占这10个月总时间的40%。他除参加中共中央在成都、广州、郑州、武汉等地召开的会议外，先后视察了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的农村和厂矿基层单位。在视察中，他一方面为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所焕发出来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不讲科学、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现象而不安。

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来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遂城和商庄两个人民公社。当县委负责人汇报今年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700至1000斤时，刘少奇产生了怀疑。他对县委负责人说：1000斤种子就是1500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他还说：我提议你们算一笔账，算一算种一亩高产作物用多少人工、肥料、畜力、水等成本费，收多少粮食；种10亩普通作物用多少成本费，收多少粮食，看哪个合得来。

在视察结束后同县委负责人谈话中，刘少奇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你们积极向共产主义迈进，这个积极性是好的；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这是一定要转的，但转的方式方法和步骤要很好研究，不要很急；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共产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呢？社会产品和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化技术水平有极大的提高，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了，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叫共产主义。这个标准很高，不要把共产主义标准降低。

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刘少奇到山东、安徽、浙江等地视察。随着调查的深入，看到全国各地虚报产量的现象愈来愈严重，报纸也不加核实地加以宣传报道，他更加忧虑了。在宁波视察时，他对地方负责人说：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不能全怪报纸，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报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要反对说假话，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

视察外地结束回京后，在一次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参加的支部生活会上，刘少奇坦率地谈到对目前国内状况的忧虑，并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盲目乐观情绪作了自责。他说：我在山东、河北视察时说过要泼点冷水，现在我也要给你们泼点冷水，让大家的头脑都清醒清醒。对群众的积极性要爱护，不能泼冷水。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有些事，我们没有经验，调查研究不够，受点挫折是难免的。但当前的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科学的口号，特别是这股浮夸风、吹牛风，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不足和调查不够所造成的，我们绝不能任其发展了。有时，我的头脑也有点热，说过些过头话，我向支部作检查。

他还对石油工业部的余秋里等人说：政治是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

第四节　对准备继续放“卫星”的人们，周恩来直言相劝：不要再放了

周恩来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心情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

这场运动是伴随着对反冒进的批判而全面展开的。面对“大跃进”的汹涌波涛，周恩来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心情：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以后，这个速度、广度、深度，许多都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没有人民的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冲天的干劲，那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出现。我们东方人受压迫有几百年了，现在我们翻身了，都要求

迅速建设我们的国家，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他还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

作为主持日常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于“大跃进”运动中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有所觉察。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李岩后来回忆说：“1958 年‘大跃进’年代，周恩来总理处在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要尊重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另一方面，他面对一些过头的做法又不能不管，不能看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又不便于公开表露。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有些感觉，但总理从来不向我们说这些。总理处在这样的地位，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主席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并尽可能地采用灵活方式纠正一些‘左’的做法。”

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经抽空参观了附近的“友谊农业社”，他一边细心听取当地负责人介绍情况，一边嘱咐秘书记下来以便回去研究。他详细询问了友谊农业社的耕地面积有多大，亩产量多少，每户社员每年收人多少。当时，这个社提出的计划指标很高，整个计划都是增产的计划。周恩来后来对一位外宾说：当时，我不敢相信，然而由于计划是经过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的，所以我不能泼冷水，而只能向他们表示祝贺，并说，如果在执行中有困难，我们上面帮助解决。从周恩来的内心来说，对这类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等现象从一开始就很忧虑，尽管他当时还只把这些看作具体工作中的问题。

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道：当时，“恩来同志在某市郊区亲自看了一块挂牌亩产 10 万斤的‘卫星田’，田亩上空，电灯通明，像灯光球场一样，这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把几十亩快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亩田里，恩来同志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

从 6 月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到广东、上海等地调查研究。周恩来南下的目的，一是为了带头贯彻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每年要下去四个月的指示；二是他对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常常感觉自己估计不足。因此，他很想下去走一走，接触一些合作社、工厂、学校，从那里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6 月 30 日，周恩来乘飞机赴广东，先后视察了新会、台山、开平、江门等县的工厂、学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新会县青年周汉华用水稻和高粱杂交，育出穗大、粒大、抗病力强的水稻优良品种，引起周恩来的重视。他详细听取周汉华关于育种情况的汇报，还亲自到试验田观看稻苗，要求有关领导一定要保证周汉华的试验时间。他在同周汉华的谈话中，特别问到有没有亩产超千斤的水稻，周汉华说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没有说话。这些调查，对他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大跃进中的一些生产指标很有帮助。

北戴河会议后，大炼钢铁成为全党和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这样高的指标，事实上是难以完成的。9 月 1 日，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一起返回北京。中途，周恩来和刘少奇到唐山，向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唐山市委、地委以及唐山

钢铁厂的负责人了解钢铁生产情况，发现形势确实令人担忧。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抓钢铁生产。

钢铁生产的高指标形成巨大的压力，逼得各省开始“放卫星”。10月底，他听说河南新乡县放出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后，问他的秘书顾明有没有这种可能。顾明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周恩来立刻派顾明到河南去了解情况。顾明把土法炼出的“生铁”带回来，最好的只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周恩来看了样品后心情十分沉重，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样品就一直摆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书架上。后来，有的省的领导再来要求放“卫星”，周恩来总是劝说：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

为了减少盲目性，缩小损失，周恩来几乎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了解情况。当时，有的领导也感到那些高指标、“放卫星”不可靠，但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生怕别人说自己是向群众的生产热情泼冷水，或被说成是反对大跃进。但在周恩来面前，他们还是敢说一些心里话。周恩来能够平心静气地听取意见，细心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真实材料，使他能比较早地发现一些问题。

第五节　田家英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公社的两个突出问题

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样，毛泽东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找来他的秘书田家英和吴冷西，毛泽东对他们说，他在夏天北戴河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现在感到各级干部中有“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倾向，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毛泽东让他们各自带一个小组去河南省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县做一次调查研究。谈话中，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们下去调查的方法。

田家英、吴冷西二人从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出来，便商量如何去河南开展这次调查。他们商定，田家英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抽人组成一个组，以中央办公厅人员的名义去调查；吴冷西则用新华社的名义，由新华总社和河南分社以及人民日报社抽人组成另一个组。田家英提议，他先去新乡的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田家英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从合作社时起了解那里的情况，地熟人熟，了解真实情况比较容易。吴冷西则先去河南省修武县，那里全县13.5万人组成一个公社，是河南的第一个，也可能是全国的第一个一县一社。两个组各自调查4天，然后对调地点，也调查4天，11月5日在新乡会合。按照计划，毛泽东这一天要乘专列去郑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便在新乡上专列向毛泽东汇报。

10月28日下午，田家英、吴冷西二人率领各自的人马乘火车离京，29日到达新

乡，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见面后，当天下午即分头去七里营和修武开展调查研究。当时，下去参加调查的人员，包括田、吴在内，对人民公社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怀疑它。但通过调查，却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使人非常焦急。例如，当时普遍实行的“大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连续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劳动效率大大下降。大家都希望向毛泽东反映，越快越好。

田家英还从下放干部那里了解到当地虚报产量的真实情况。当时，关于人民公社性质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议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田家英着重调查研究的一个问题。基层干部中不少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田家英开始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从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的一席话中得到了启发。那位张书记对他说：人民公社如果是全民所有制，那末，遇到丰年，修武县的农民是不会愿意把粮食无偿调出来的；遇到歉年，国家能够无偿地调粮食给修武吗？田家英听了这话觉得有道理，非常重视。

调查小组还参观了大炼钢铁的场面。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上，只见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做鼓动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当时他们这些参观者尽管对那种做法抱有怀疑，但对群众的干劲不能不表示赞叹。

大炼钢铁不仅造成了大量资财的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农业收获季节。田家英他们亲眼看到，就要到手的丰收粮食，因无劳力收获而烂在地里。

在七里营公社，田家英等人感到了那里分配制度包的太多。七里营公社有 3 万人，年总收入有 1000 多万元出头，但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育、学、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一共 16 项，都由公社包下来。田家英认为，中国农民多少年来，有史料可查的，至少从汉朝起，就有“吃饭不要钱”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包得太多，公社负担太重，以供给制人均折款 78 元计算，就支出共达二三百万元。

11 月 5 日晚，毛泽东南下郑州，路经新乡，田家英、吴冷西一同上了毛泽东的专列。11 月 6 日，毛泽东到达郑州的当天晚上，仍住在专列上，他要田、吴二人到专列上汇报。在汇报中，吴冷西先汇报了修武的情况，主要谈了该县县委书记的顾虑。接着，田家英汇报七里营的情况，着重谈了七里营的 16 包供给制。在他们汇报会过程中，毛泽东边提问题，边评论。

田家英、吴冷西的调查和汇报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从随后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六节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界线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史称“郑州会议”；由于随即他又在郑州主持召开过另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为了以示区别，前一

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一次被称为“第二次郑州会议”。

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主要是主管农村和地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各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一次专门解决“乱子”的会议，或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次“泼冷水”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一条：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显然，这是他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国上下几乎到了各行其是的地步。

会议第二天，有的地方党委的负责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提出要搞个人民公社四十条的文件。最早提这个主意的是曾希圣和吴芝圃，毛泽东同意了，当即让吴芝圃挂帅，陈伯达协助，在会议期间起草这个文件。

文件草稿起初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1958——1967年）》，又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因为起草时有人认为中国农村正在搞公社，城市也很快要建公社，都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叫共产主义建设纲要好。

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吴芝圃汇报了正在起草中的人民公社四十条。吴讲到《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这个题目时，毛泽东当即插话说：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理解不了，尤其我们苏联同志就不懂了。你看，他们还搞社会主义，你就搞共产主义。并且是十年！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母亲肚子里有孩子。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提就提到共产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了，我就不一定相信，看一下嘛，你晓得怎么样。人家过了40年，还没有过。我们就快些，10年加上8年，实际上才18年，你就把一切都过完了？人家到那个时候还没过完；看样子他还不准备过完；他口讲过，还没有动。准备过渡，你加准备两个字，机动一些。不然搞到第9年，说已经过了，还要提前完成，结果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就叫共产主义，消灭商品！

上面的话很能反映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态。这就是期望尽早地实现共产主义，却又不得不顾及左邻右舍，顾及旁人的影响。同时，对怎样就算实现了共产主义，也还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标准，只是在感觉上似乎觉得快了。

在11月6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的时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是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地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还说：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四年是否可以？标准是鞍钢。鞍钢除7200元成本折旧，下余10800元，工人所得800元，为国家积累1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未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凡是可以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毛泽东在11月10日上午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线的问题。他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了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是划了线的，三个先决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 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2) 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的，主要是认为现在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就过渡到共产主义。(3) 提高文化水平。这三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

应该说，在当年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中，毛泽东能明确地讲出要划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大线”，和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小线”，还是很不容易的。他之所以强调要划这两条线，除了认为那些“三五年过渡”是吹牛皮外，显然也是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现实：各单位、各地方间在贫富方面还有很大差别。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实行产品调拨与取消商品是根本不可能的。

与产品调拨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商品经济的问题。在11月9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许多观点。他认为，现在还是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在目前来讲这是有用的，是不坏的。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商品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

同一天，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说道，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当时与会者都能够听得出来，毛泽东所说的“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是指陈伯达说的。当小舟谈到，社会上怕废除票子，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时，毛泽东就明确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再次讲到：现在我们有些人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我认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品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产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

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讲过的最精彩的也是最实际的一段话，尽管他只是笼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个概念，也对商品的属性作了阶级概念的限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但在商品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的阐述上，还是清醒的，尤其是当时那种环境下，毛泽东的话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七节　武昌会议，压缩空气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所造成的“乱子”越来越严重。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开过之后，已近年末。半年大跃进的利弊得失，通过年终的算账与分配，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于是，中共中央接着又召开了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11 月 21 日，武昌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

23 日，毛泽东又说：我说把空气压缩一下，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他强调，路线还是那个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三个结合，还加上土洋结合。在毛泽东看来，“空气”只是过于膨胀了一些，压缩一下就好了，不是减少空气，更不能改变空气，总路线还是要坚持的，三面红旗必须高举。

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大概是冒失鬼。

开会的前几天，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提出苏联未来 15 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要大家看看这个提纲。他说：苏联已经 41 年了，还准备搞 12 年。看它的思想是想过渡，但并没有讲过渡。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经有了 5500 万吨钢，1 亿吨以上的石油，他还那样谨慎，还要 12 年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倒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干部，就是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照顾得不够。这时，毛泽东批评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到共产主义，是个缺点。他说，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现在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

但是，会上有不少人的意见仍然是快些过渡。对此，毛泽东似乎不以为然。他说：

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10年？15年？20年？30年？苏联41年，再加12年，53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9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即1971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12年怎么样？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我看不可能。即令10年，到1968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

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都说过。在第一次讲话中，他就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面，现在他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过渡了，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就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

同第一次郑州会议一样，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的主张。他说，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愈少愈好，时间愈短愈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了，这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期搞久一点好，不要100年，也要30年，至少也得15年，这有什么害处呢？他还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彻底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要破，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有用，这就要保护它，使它为我们服务。

毛泽东在会上讲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降低过高的指标。这也是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北戴河会议曾确定1959年钢产量2700至3000万吨，这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要不要这么多钢，搞不搞得出来这么多钢的问题。他说：钢3000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邓小平说：明年任务，各省自议。3000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定3000万吨，是应该考虑的。薄一波也认为值得考虑。薄一波是经委主任，对工业生产的情况比较熟，他说：今年1700万吨铁，是6000万人搞1000万吨来，实际有700万吨是估出来的，但能炼钢的高估也就是200多万吨。说钢1100多万吨，数量上可能有超过，分析内容，情况大变，好钢不会超过900万吨，可能是850万吨好钢。如到3000万吨钢，就要翻2.5倍。薄一波的估计接近事实，1958；年经过核实的好钢只有800万吨。毛泽东于是说：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只翻一番，今年1070万吨，明年2140万吨。他还谈到，北戴河会议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搞了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了相当的经验。总要有实际可能才好。

毛泽东在会上承认：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真正掌握客观规律、要熟悉地掌握与运用它，整个说来，还是个问题。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

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关于15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毛泽东不主张作为武昌会议的重点。他说：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但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提出来了，很

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再议下去，没有把握，也议不出名堂。他还说，四十条如果传出去，很不好，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

毛泽东提议，把1959年产钢3000万吨降为2200万吨。但他心里仍无把握。当晚半夜里，又找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等人谈指标。他认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22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薄一波建议定为1800万吨，对外公布1600万吨。第二天晚上11点钟，毛泽东找各大区负责人谈钢指标，对1800万吨也表示怀疑。23日的大会讲话，毛泽东说：昨天和大区同志吹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要能说服，才能打通。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远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并为此而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将来又搞“马鞍形”。过去是人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别人的冒进。1800万吨，我觉得现在还是根据不足。如果有充分根据，还要减到1500万吨。

除了提出压缩钢的指标外，毛泽东说，还有什么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也可考虑减轻些。

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会议期间，毛泽东批发了云南省委的一个报告。这个《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说，今年春夏之交，农村中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发病近39万人，死亡3.9万多人。有些干部发现了缺粮是肿病致死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陆良县委委员刘云才坚持反映缺粮的真实情况，反被撤职和开除党籍。该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一位县领导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于是全县捆绑吊打合法化，甚至出现了“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没有干劲”等等说法。云南省委的这个报告对自己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毛泽东的批语虽然没有针对陆良县的打人问题表示意见，但他还是批评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同时指出，这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并提出两条解决方法：第一是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第二是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高指标的产生，同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有直接关系。毛泽东在讲话里特别批评了作假之风。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要出名，就管他作假不作假。没有那么多东西，就要作假。我建议同县委书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嘛，不要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相信。从中央、省委、地委到县委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了。

第八节 人民公社还是要维护的

武昌会议期间，对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和1959年经济计划都进行了讨论，然后将两个文件提交给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审议。

11月27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六中全会拟于12月2日开会，由11月28日起到12月1日止，在这4天内，请同志们阅读文件。

全会按大区分组，共7个组。华北组组长林铁，副组长陶鲁笳、张苏；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曾希圣、江渭清、廖鲁言；华中组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吴芝圃、安子文；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刘建勋、叶季壮；西南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宋任穷、谢富治；西北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王恩茂、王震；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黄火青、李葆华。

11月28日晚7点半，邓小平主持全会的预备会议，讲了会议的日程安排和全会的任务。从29日开始，每个小组阅读了4天文件并分组讨论。这个期间，1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谈过一次话，可以看作是在全会正式开始前的吹风。第二天，各小组作了传达。毛泽东说：今年夏、秋两季，我们国家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郑州会议感到紧张，现在搞出些章程来，心情就比较舒坦了。21日开会，10天了，也比较紧张。斯大林的书过去看过，不感兴趣，现在感兴趣了。人民公社的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工业问题也有所准备，但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中央没跟地方结合，条条没跟块块结合。块块第一书记，过去你们不是干劲冲天吗？华东现在就走下坡路嘛！过去没有经验嘛！

关于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毛泽东说：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3000万吨钢，那时谁听了3000万吨钢不喜欢？现在看来，当中至少有1000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

关于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说：1959年农业生产的指标，究竟提多少？今年粮食是7500亿斤，明年增产3000亿斤，达到10500亿斤，每人平均1500斤以上。苦战3年达到每人2000斤。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的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6700万担，明年1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稳当。现在还未收完，还要看看，这次会议不公布最后数字。明年人代会上再公布。

从以上内容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一方面希望与会者头脑冷静一些，对于生产指标的安排要尽可能地符合实际；但另一方面，他本人的头脑也还没有真正冷静下来。他认为符合实际，甚至是留有余地的指标，仍然属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分组讨论从11月29日开始，一直进行到12月8日。讨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二是关于1959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经历了近一年、尤其是经历了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大跃进运动，不少人感到出了许多乱子，

照这几个月的搞法还会继续出乱子，所以开始从狂热中有所降温。

除了11月30日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的谈话，在正式会议上，毛泽东只作过一次讲话，时间是全会结束前的一天，即12月9日。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一些过高的指标有所降低。比如，1959年钢产量计划，由2700至3000万吨下降到1800至2000万吨；将3年基本改变面貌的时间延长为5年，以至10年、15年；对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头提出了批评，说这是“性急了一点”。毛泽东号召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还认为《15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缺乏起码的根据，主张目前不定这种计划。

然而，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许多由衷的肯定，认为人民公社是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实现两个过渡，便于办很多事。他以徐水、遂平为例，说明人民公社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并认为人民公社总的趋势是巩固、发展。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并印发给与会者一段他亲笔写的批语。这个批语主要是介绍东汉末张鲁行“五斗米道”的情形：“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明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从毛泽东写下的这个批语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对于张鲁的“五斗米道”是赞赏的，认为人民公社与“五斗米道”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八届六中全会于12月10日结束。这天的会议通过了四个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首先肯定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整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产物；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并将成为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决议》也指出，企图在农村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是不适当的，也是不成功的；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主要是对北戴河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划作调整，降低了一些过高的指标。在新华社发表的全会公报中，公布了这些调整后的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亿斤，棉为1亿担。在这四项指标中，钢的指标下降了，粮、棉指标没变，煤的指标还略有提高。而且就是已经降低的钢指标，后来证明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经过调整的指标仍然很高。

会议期间，陈云曾向胡乔木谈到，公报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胡乔木没有向毛泽东

汇报。后来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胡乔木，说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同时毛泽东还表扬了陈云，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第一次郑州会议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大界限问题，作出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遍存在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激动情绪。但是，这两个界限还都是讲的人民公社外部关系问题，对于人民公社内部的管理体制并未涉及。因此，人民公社仍维持着越大越公越好的局面，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扩大核算单位的倾向还存在着。农村中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以及公共食堂这些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东西，还是至高无上的，“共产风”仍有增无已。

第九节　彭德怀对即将公布的产粮数字表示怀疑

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彭德怀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从这个职务来说，他并不分工负责地方的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一个对国家负有很强责任心的领导人。有些事情，虽非他分工主管，但发现问题后，他还是要发表观点和看法。

从 1957 年 11 月中旬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大跃进”。开始他对这个口号有些不以为然。1958 年春节为《解放军报》专栏《元帅和士兵的愿望》拟定稿件时，秘书在为他起草的署名文章里多处使用了“大跃进”一词，而他在修改时全部改为“大发展”。

彭德怀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是在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上二的几次讲话高屋建瓴，彭德怀被他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对大酥进这一口号的疑虑随之烟消云散。

在成都会议后期的谈心会上，彭德怀以，自我检讨的精神说道：回想十年之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主席的认识，不是一见如故，又不是同床异梦，而是在这两者之间。他感到，通过这次会议使他大彻大悟，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新的提高。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他首先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坐落在松江平原上占地 50 多万平方米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正处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一座座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墙壁上，悬挂着鼓舞人们“苦战”、“攻关”、“争放卫星”的巨幅标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成群的人在辩论，在思考，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彭德怀在哈尔滨市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了学院。为的是要亲眼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这座学院是如何迎接正在全国澎湃兴起的大跃进的。

彭德怀深人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组，同教授们进行了交谈，察看了许多实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和进行野外作业的帐篷。考察中，他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

好消息。

彭德怀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回沈阳。一路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景。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到处是一片片刚刚建起的炼铁土高炉，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光冲天。列车经过的城镇和车站的墙壁上，贴满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字标语和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彭德怀在火车上不禁赞叹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

每到一地，彭德怀都热情洋溢地鼓励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向部队干部讲话的时候，他曾激动地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5万亿斤。每人年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

彭德怀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中结束了他的东北之行。在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以后，他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到了内蒙古、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吉普车从青海省的格尔木出发西行。他坚持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彭德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宿，吃两顿饭。一顿在你们机关食堂吃，一顿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跟大家一起吃。

晚上，由敦煌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这是彭德怀初次亲身接触人民公社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兴起的新生事物。刘孟晋是个淳朴老成的中年人。他告诉彭德怀，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试办中群众写了7万张大字报，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被迫的，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里，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于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郊区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近锅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糊看了看，发现里面掺的是土豆块。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问刘孟晋：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

杨家桥大队的一些景象，向他提出不少值得疑虑的问题。12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当讨论到当年的粮食产量时，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

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

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他："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第十节　问题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之后，一哄而起，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风"，虽然受到了批评，但是并没有完全被遏止住。至于关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其他种种问题，并没有缓和下来。尤其是钢铁指标和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仍旧是毛泽东的两大"心病"。1959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几天省、市委书记会议。2月2日，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讲了一番深刻自省的话：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肯定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我们的错误。他还谈到，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我们还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关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现在我们似乎在这里接触到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究竟什么叫按比例发展。

2月下旬，毛泽东又来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作调查研究。他发现公社化后，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公社内部所有制方面问题太多，公社平调生产队的物资、资金和劳力，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搞穷富拉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月中旬，他看到了广东省委批转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报告反映出农村严重存在的社员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问题。所谓瞒产私分，即社员和基层干部不堪忍受虚报高产的重负，故意向上级隐瞒产量，以便能尽量多分：一些口粮，有的干脆就抵制公社的无偿调拨，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因此，瞒产私分既是农民发自内心的一种无奈，又是他们对"共产风"本能的反抗。

毛泽东之所以对瞒产私分和干部高压逼粮现象极为敏感，因为他平时对两种情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民主人士哇哇叫，民群众上街闹。这都是对政治大局具有威胁性的事情。因此，正"共产风"已势在必行，不能再耽搁了。

于是，毛泽东决定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央多了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等人，各大区和中南各省负责人同第一次郑州会议基本相同。

会议从2月27日开到3月5日，主题是如何解决"共产风"和公社内部所有制问

题。当时，毛泽东已认识到，为了解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就不能不从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关系入手，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必要的说明。

“共产风”这个词首先被使用，正是毛泽东在2月27日的讲话中提出的。他说，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个月内又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张，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法的正当权利。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鸭、鸡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在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地谈到了上面这些意思，说明他在思想上已引起高度重视，其批评也是十分尖锐的。

对毛泽东说来，要纠正人民公社中的混乱现象，只能将几个月前设想的那种“大而公”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即降低它的公有程度和组织方式。

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说；目前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接下去，他作了一大段论述：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里说的是生产队，有些地方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对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给予了批评，但是没有认识到公社内部的所有制仍有问题。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

由于对三面红旗不容怀疑，这使毛泽东在“乱”与“左”的性质问题上，有很大保

留。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到"共产风"的原因时，他说："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的过远了一点"；但马上又说："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

"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是人们在大跃进中最耳熟能详的提法了，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着对错误的淡化。

第十一节　一些被当作右倾保守批判过的观点又重新提了出来

经过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中央会议，到1959年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所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上海会议东北组在讨论中说到过一件事：3月份在沈阳召开东北、华北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不许提困难，要工业书记回去动员第一书记在上海会议上也不要提困难；要拍胸膛，坚决保证完成钢铁、煤炭既定指标。

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就是为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同时当年要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新的政府领导人。3月25日至4月1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般称之为上海会议。关于计划指标落实的讨论，是由邓小平主持的。接着，4月2日至5日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上海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作了讲话，主要谈农村人民公社问题，他说：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问题，人民公社管委会、管理区、生产队的组织形式，还没有一个章程。他提出要搞出一个公社章程来，同整顿农村人民公社有关。北戴河会议虽然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但对公社的组织形式只有原则性规定，比较笼统，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之后，实际上是无章可循。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各地开始整顿人民公社。对公社化运动狂潮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进行清理，必须规范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形式。所以需要搞人民公社章程。上海会议和七中全会虽然没有制定出这样一个章程，但会议通过的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作了初步的规定，并要求各省于当年7月在全民讨论基础上提出一个示范章程草案，作为中央起草的依据。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首先否定了现阶段搞公社所有制，指出应该基本上是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所有制。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公社所有制被否定并取消了，但是在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

问题上，地方上产生了两种意见，湖北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则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上旬毛泽东到武昌，专门把周小舟找来，问周小舟的意见，周小舟赞成河南的办法。没两天，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赞成湖北的办法。究竟哪种主张好？3月15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没有肯定哪种办法，要求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这说明他这时不再随意作决策，而注意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了。

两天后，3月17日，毛泽东在另一封致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提出，还应当讨论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次上海会议上，他要求大家重视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把小队搞得好不好的问题看得很重。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大队是两三个高级社的组合，无论以这三级的那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都是从公社所有制退步。这种退步实际是向符合当年农村生产力实际状况的方向接近了一步，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最后谈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工业、交通非抓不可，指标要低于可能性，不要放卫星。不要一要求产1000斤，就布置3000斤，这个做法不行，还是要实事求是。从武昌会议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降低高指标，还说是指标要讲现实可能性，不要讲虚假的可能性。

1959年1月上旬，他找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等谈经济工作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定的指标难以完成。毛泽东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他提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让陈云讲话。陈云以为毛泽东要他检讨，在会上作了一番自我批评，降低指标一事自然未果。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讲过这件事：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一次话的影响，建议开会，开一个星期，仍然不动，我的意见是降低指标。作了报告，还是2000万吨。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到他讲的是自我批评，承认错误。

"事非经过不知难"，毛泽东在武昌会议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是他的心里话。到卑海会议时，毛泽东的头脑比较冷静了，这时说出"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话，无疑包含有对大跃进以来若干教训的总结与反思。

1959年的计划指标始终是上海会议的一个重点。1月份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仍然维持了武昌会议确定的虽有下降但仍较高的指标。降不降指标，实际上是能否进一步降温的关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认识很不一致。不少人从维护"三面红旗"出发，坚持较高的指标。上海会议一开始，柯庆施、李井泉就要各省、市、自治区接受既定的指标。李井泉说，如果其他省完不成粮食指标，四川可以再分担些，

无非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按国家规定，4斤红薯折1斤粮）。柯庆施也说，如果别的省完不成钢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些。一些地方党委的负责人，虽然知道指标难以完成，却感到左右为难，降低指标颇为困难。

中央领导层比较倾向降低指标。3月26日下午，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报告。薄一波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泽东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指基建项目）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

这时周恩来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

毛泽东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

周恩来说：这句话就是决心。

邓小平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

毛泽东接着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1000多项，又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3月28日，李先念作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在此之后，讲了降低指标问题：现在提出一个计划问题，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中央、地方都觉得有些问题，主要是肩膀上的担子重得很，感到为难。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总的就是原材料不足，主要又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按钢材1400万吨（加100万吨进口）来订的计划。王鹤寿讲过，即使搞到2000万吨钢，钢材不会超过1200万吨，加进口95万吨，不到1300万吨。邓小平说，问题摆得很明白，即使是1500万吨钢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险。大家一致赞成这样一个办法，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想把我们的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钢1800万吨。保重点，冶金部18个企业，是1200万吨，赵尔陆的企业是100万吨，吕正操的企业是40万吨。不下这个决心，计划有危险。

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还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来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全会于4月2日开始，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谈了全会日程：全会搞三个问题，一是肯定去年宣布的数字，确定今年的指标；二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谭震林作说明；三是国家机构的组成方案。

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1959年钢的指标落实：经过中央计委、经委、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从冶金设备、焦煤、采矿等方面考虑，今年只能搞2500万吨铁。最后核定钢的数字是1640万吨。即使搞不到1800万吨，搞1600万吨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钢材1100万吨也比去年增加80%，也并不丑。

周恩来讲话谈了三条经验：一是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

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二是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三是实事求是。

自南宁会议批反冒进以来，周恩来很少说话，其实他在这里讲的订计划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的意见，以及邓小平讲的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的意见，早在1956年反冒进时他就提出来了。但是在大批反冒进以后，这些意见被当作右倾主张压制了下去。如今出了问题，重提这些不久之前还遭受批判的观点，大家听起来似觉如梦初醒。

第十二节　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刘少奇当选为新一任国家主席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担任国家主席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此后几年间，对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件事，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已经作了充分的酝酿，195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的决定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

在酝酿新的国家主席人选过程中，曾考虑过几种方案，其中包括当时正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朱德提议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他在给邓小平和书记处的信中说："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的国家主席候选人。邓小平在4月5日所作的《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做，如朱德向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做，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在4月15日召开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提的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

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2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的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合适。是比较起来讲，不是讲朱德同志不适合，比较起来少奇同志更适合一点。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4月17日，刘少奇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了会议议程，选出了97人的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推定刘少奇、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程潜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彭真任大会秘书长。18日，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4月27日进行大会选举。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刘少奇还依据宪法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刘少奇的提名，会议决定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代表们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通过了选举结果，祝贺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当选。

当晚，全国许多大城市披上节日盛装，彩旗招展，霓虹灯闪烁，成千上万的群众敲锣打鼓，举着旗帜标语上街游行，欢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欢庆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当时有不少人在高兴之余就喊出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后来，这件事传进刘少奇的耳朵里，他立即指示各地领导要劝阻群众喊这类口号。

当时有关方面曾就在报纸上登新任国家主席照片的事情向他请示，他坚决表示不同意："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泽东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

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他当即表态说不登照片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提了个折中的建议，是否让登出的刘少奇的照片比毛泽东的照片小一点儿。毛泽东生气地摇头说："为什么要小一些，要一样大！"

从会场出来，刘少奇坐上轿车静静地回到中南海西楼甲号楼住处。西楼甲号如喜事临门。刘少奇的办公室秘书、警卫、服务人员和他的子女家人们，早已等候在门厅。刘少奇一进门，大家一齐迎上前去，高兴地同他握手，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刘少奇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他向大家点了点头，便又像往常开会回来一样，匆匆地走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这件事给予他家里的亲人们印象很深，以至于事过了将近40年后，他的夫人王光美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

"那天知道他要当国家主席，连孩子带我5个，还有工作人员，都觉得应该好好祝贺，还准备了一把花，特别是孩子们，觉得爸爸当选是好事儿啊。他下车以后看见我们这么多人等候在门厅，没表情。他平常见了我妈妈都挺有礼貌，见了孩子也很亲热，那天呢，反而没表情。

大家以为他会很高兴地回来，因为他这表情，大家就有点没想到。我说：'各干各的吧。'孩子们就散了。他上楼直接去办公室了，我跟着也上楼。我理解呢，这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在他那里，官不官的，从来没这概念。……他平时常说这样一句话：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刘少奇没有太多的高兴，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此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他现在所担心的已经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而是许多地方都在闹粮荒。

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使得他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地位更加明朗化了。后来，毛泽东在与陪同英国退役元帅蒙哥马利到武汉的熊向晖谈话时，说起过这件事。毛泽东说："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泽东，现在，一个姓毛泽东，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

可见，毛泽东安排刘任国家主席，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只是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没有出现毛泽东所说的"两个主席都姓刘"的局面。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再次选举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与刘少奇一样，周恩来此时也正在为遏止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而努力工作。在4月30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说：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形势很好，但产量指标搞高了，打被动仗。总想知道一点，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闷不安。去年钢的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会议和人大会议，又把指标提出，还是问题。要注意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向党提出的东西，自己没有把握。不能泄气，要想办法，情况让大家了解后，大家想办法，共同努力。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这次会议决定，委托陈云对1959年计划尤其是钢指标计划进一步研究落实。陈云征求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包括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各有关局的意见，然后召集中央财经小组进行讨论，拟定钢产量1300万吨。

5月1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详细听取陈云的汇报。陈云说：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至于争取的数字，需待听取煤炭、机械、铁道等部汇报后，弄清楚这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再来研究，这次暂时不议。

第十三节　在农村自留地等问题上，邓子恢与谭震林唱起了"对台戏"

大跃进运动中，邓子恢是被批判的对象。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讲话，在批评反冒进时，提到"两个速度的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问题上同邓子恢的分歧，一是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他说：邓子恢完全是资

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就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的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准备。

刘少奇连忙插话：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说：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邓子恢去庐山养病。8月底，从庐山回到北京。一回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就告诉他，中央指示在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9月中旬，他特地随中央农村工作部机关干部去徐水参观。徐水的干部告诉他，徐水县成为一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统一核算。干部还引导他参观了工厂、农田，他发现了棉田里有假，红薯地里不像亩产几万斤。他回来后心情很不平静，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没过几天，北京农业大学邀请他去参观学生种的水稻试验田。他高高兴兴地去了，到试验田一眼就看出是并田，许多亩并一亩。他同陪同的人员说，并田不能增产。随后，他又接到湖北省麻城县的一封群众来信，说该县领导干部强迫群众把成熟的水稻十几亩并成一亩，谎称亩产36000斤，本来是丰产反而弄成减产，要求中央制止这种作法。他立即把信转给杨尚昆，请中央公开制止。

1959年1月，邓子恢为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做准备。他仔细阅读各地的情况报告，从中觉察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解决了人民公社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但对人民公社内部的体制，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制度，仍然说供给制是“共产主义因素”，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这还解决不了农村“共产风”的问题。他心中盘算，一定要设法改变这些引起广大农民不满的问题。

1月13日，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在他的主持下开幕了。会议分析了农村形势，讨论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经营管理问题，整社问题。邓子恢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公社体制原则上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一个大队领导10个生产队。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职权要划分清楚。对社员的生活资料，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慢慢还都可以，但一定要还；对过去入社的投资也不要宣传取消。要实行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副业生产不搞没有钱，第一步恢复有的，第二步发展新的，与有关部门签订合同。要保证多数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要搞好劳动组织，在农业社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不要和去年那样搞大兵团作战。社员在食堂吃饭，粮食要定量，节余归已。

听了邓子恢的讲话，谭震林说是刮西北风，第二天到会大谈大好形势和宝贵经验。邓子恢没有理会这些，他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报告》，对公社、大队、生产队分权问题，特别是对搞好劳动组织问题讲得更具体了，他说：要把生产队和生产小组按照各地生产条件迅速地定型和适当地固定起来，并按照“三定一奖”，即定产、定劳力、定投资和超产奖励的办法，迅速把今年的生产任务包下去。同时，田间管理到组的制度的责任制必须普遍地严格执行，有些地区继续实行农业

社时期按人评工记分的办法，可以这样做。这些是为克服村与村、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平均主义作出的努力。此外还提出了分配问题，说要保证90%以上的社员都增加收入，其余的不减少收入；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一半；使公社分配收入和家庭自产收入大约保持九比一的比例。他的这些意见，好些被后来中央在郑州、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郑州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所吸收了。

4月中旬，邓子恢主持了全国夏收分配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刘少奇、谭震林到会听了他的讲话。他说这是人民公社体制下放后的第一次分配，农民在考验我们，关系到党群关系，要做到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实现这个要求，需要从多方面来保证。这些方面他认为有：第一，要实行少扣多分，收入部分60%至70%要分配给社员，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等各项扣留不得超过30%至40%。县联社不提取公共积累。第二，粮食分配应统筹兼顾，征购任务要完成，种子、饲料要留够。第三，“三包一奖”必须坚持兑现，队与队的口粮可以不一致，社员可以多劳多吃。第四，工分和供给部分要适当调整，力求做到工分部分占60%至70%，供给部分占30%至40%。然后根据供给部分的多少，分别采用伙食供给、粮食供给或半粮食供给等不同供给办法。第五，食堂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时间上可以自由，农忙时参加，农闲时可以不参加。供给部分要发给个人。第六，算账问题，必须彻底算。已算过账的，主要是退款退物；未算清的，现在是大忙季节，停一下，到秋后组织算账组，开社员代表会算。土地归队所有，调剂的要给代价，今后不能乱用地。此外，又一次讲到社队规模不能过大，过大的调整一下。

邓子恢的这些话，讲的是夏收分配，其实好多是向人民公社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发起的冲击。对邓子恢的讲话，谭震林不时插话，讲些不同意见，如说县联社可以提公共积累；粮食多劳多吃不能说；降低供给比例要非常慎重；吃饭不要钱是深得人心的，反对的是少数人；社队规模现在不要动等等，表现出了两人意见明显的分歧。

邓子恢很冷静，还是按自己的想法讲。刘少奇只是在听。不过后来5月26日中央发布的《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主要的还是邓子恢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

邓子恢从4月夏收分配会议上发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很不好，一是1959年的夏季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1.1亿亩，即减少了20%，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今年农业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二是夏粮、油菜籽等的征购刚开始，便出现进度很慢、远达不到要求的苗头。三是副食品供应紧张，市场上鱼、肉、蛋脱销。为挽救危局，他向中央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发个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强调一下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在5、6月两个月内，必须以抓农业为中心；必须加强麦田后期管理，保证增产；并尽量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二是宣布恢复人民公社化以来取消的自留地制度，发个关于给社员一定数量自留地以利发展养猪的指示。

自留地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邓子恢也知道，自留地是在对他的批判声中被取消的。但他还是不顾个人安危提出了这个建议。

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于5月7日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给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过了些时候，邓子恢感到问题

酌解决还不那么落实，他又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除了规定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恢复自留地以外，还提出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为社员私有，由社员经营。县人民委员会要把这四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执行。

6月11日，中央发布了邓子恢草拟的这个指示。

在自留地问题上，谭震林不同意邓子恢的意见。谭震林向毛泽东汇报说：浙江、福建、广东地少人多，每人只有1亩地，甚至7分、8分地，5%的自留地会影响集体生产。毛泽东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6月16日下午，邓子恢去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碰到毛泽东也在游泳池。他俩游了一会儿，一起上岸休息。毛泽东谈起了自留地的问题，提出不要全国统一规定5%，要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并发一通知。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邓子恢当时没有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只是说研究一下。回到家里，他感到事关重大，急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7、8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全国现有耕地16亿亩，按5%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8000万亩。花了这8000万亩地，可以解决5亿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5亿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主张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必再发通知。

邓子恢的信第二天毛泽东就收到了。此后，毛泽东再没有提自留地的事情。农民的自留地算是保护下来了。后来自留地成了农民的保命地。

第六章 历史在庐山拐了个弯

第一节 离开燥热的环境，中共要员聚首庐山开“神仙会”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会议。会议在大跃进期间举行，但其影响却不仅局限于大跃进运动。关于这次会议，人们有着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永远也发不完的感慨。

庐山会议，事实上是包含着两个会议在内的。一个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另一个是8月2日至8月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自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和制止，但问题仍很严重。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决定，7月份在庐山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也包含着让人们休息一下的意思。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为庐山会议做准备。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共30多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转炉，各个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现在是6月13日，今年还可以抓7个月，这7个月就要搞平衡。

周恩来是6月9日刚结束对河北的视察回到北京的。经过半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对生产形势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他在会上说：工业布局上的毛病是生产资料上的指标定高了。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把生活资料的比重提高一些，比较有利。他还说：现在要公开讲增产节约，具体办法是多抓商品性生产、抓食品定量、压缩购买力、减人。他提出：对基本建设的调整，可以采取有的下马不搞、有的休息、有的慢步、有的快步的方式进行。他还要求尽快成立支农小组，先抓机械、化肥、水利。

李富春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年总的经验，第一是有计划按比例的综合平衡不够。工业方面注意了重工业，对轻工业注意不够，特别对手工业注意不够。轻工业中对

大商品注意了，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在李富春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话，讲了许多自己的意见。当李富春谈到综合平衡时，毛泽东说：工农商都要挂帅，只是工业挂帅，农业不挂帅不行，要有点霸道，不要太王道。谈到高指标，毛泽东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定得高了，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中，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

谈到农业究竟增产多少的问题，对"增产三成"，毛泽东表示怀疑。他说：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按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在谈到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至于要不要钱，一种人是吃饭要钱，一种人是吃饭不要钱。老、弱、五保户不要钱，其他的要钱。他还说，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

这次会议为庐山会议做了准备。从这项准备工作看来，庐山会议的初衷并没有什么"火药味"。以后会议的实际进程确实大大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1959年7月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和工交、财贸各部门的负责人。原来预计这次会议只开半个月。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了18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8个问题是：第一，读书；第二，形势；第三，今年的任务；第四，明年的任务；第五，4年的任务；第六，宣传问题；第七，综合平衡问题；第八，群众路线问题；第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议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第十，体制问题；第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第十二，公社食堂问题；第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第十四，三定政策；第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第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第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第十八，团结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人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从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来看，他并不认为大跃进什么都好，但是，他更愿意听到像

"有丰富的经验"这类颇为巧妙、委婉的批评。而对于直截了当的批评还是反感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那位"湖南省的一个同志"就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周小舟和毛泽东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毛泽东在上庐山前，曾回老家韶山住了几天，周小舟一直陪着毛泽东在水库游泳并与村民座谈。"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就是周小舟在陪毛泽东到韶山时说过的话。毛泽东很欣赏他的这句话。但是，在庐山会议进行期间，由于周小舟赞成彭德怀的一封信中的某些观点，竟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这种结果是周小舟、毛泽东当时都不曾想到的。

毛泽东还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 1300 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总之，要量力而行，留在余地，让下面超过。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对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毛泽东还谈到了综合平衡和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此外，毛泽东还讲了公共食堂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 20%也好。讲了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等问题。

从毛泽东提出的 18 个问题及其说明，可以看出，召开庐山会议，是为了进一步总结 1958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将各种指标落到实处，以便更好地实现 1959 年的继续跃进。

周恩来也曾谈到过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他说：那时候，是本着一年的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从 7 月 3 日到 10 日，会议按 6 个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大家围绕毛泽东提出的 18 个问题展开讨论。当时会议气氛比较轻松，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山观日出、游览风景、名胜古迹。加上伙食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还不时作诗，别人也作诗相和。因之，这一段会议被人称为"神仙会"。

会议进行中间，中央领导分头到各小组参加会议。7 月 4 日，刘少奇在西南组的讨论中说：1958 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要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他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需综合平衡的，你不

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发展。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趋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的，不能要求每一年都用同样的速度大跃进。

在相对轻松的气氛中，庐山会议也确实解决和提出了一些问题。

7月3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李先念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7月4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指示。5日，毛泽东批发陈国栋起草的《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要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肥猪收购和农村食油供应问题的几项通知》。此外，还印发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9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稿)》。

7月10日，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的报告》；12日，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一部分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简报》；14日，中央批转《林业部党组关于木材生产问题的报告》；同日，印发了国家计委党组《对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速度的初步意见》。

第二节　彭德怀的发言虽然尖锐，但并未引起太大震动

彭德怀上庐山时，心情是沉重的。

1959年初，彭德怀越来越感到大跃进运动问题严重。于是，他回到湖南家乡去作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在湖南作调查，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

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竟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共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十分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作调查的必要。

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彭德怀向乡亲们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事后，他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1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

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

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以后，又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随后，彭德怀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平江县。在这里他无心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集中精力考察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平江考察中，还有一件事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在株洲，彭德怀与薄一波相遇，谈到当年粮食产量时，彭德怀更有把握地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他便写信给中央，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减到900亿斤。

这是彭德怀在大跃进中，第一次就经济建设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先后在上海举行，议题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通过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上毛泽东有个讲话，令彭德怀料不到的是，毛泽东在会上重提历史旧事，说哪些人曾反对过他，其中说到自己与彭的关系时说："彭德怀恨死了我的。"并说："我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话分量是很重的。

这年5月，彭德怀访问了东欧一些国家，6月中旬回到北京。回国后就接到了中央关于召开庐山会议的通知。由于出国的疲劳，彭德怀本不准备参加庐山会议。他对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黄克城不同意，认为，中央又没有通知我去，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

7月1日，彭德怀上了庐山。据保健人员回忆，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说道："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农民。当时在车厢里还坐着中央各部委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只有彭德怀注意到了车外的惨景。

彭德怀幼年过着极其贫苦的农家生活，老祖母常带着小弟弟出外讨饭，他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终其一生，他没有忘本，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已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朱德在一个发言中还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

彭德怀上庐山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已先后上了山。陈云和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没有上山。

彭德怀分到了西北组。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中他共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主要是讲：

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毛泽东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

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泽东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见反面的东西。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有人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吨钢是毛泽东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泽东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了，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此外，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彭德怀郑重地讲到：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又讲全民炼铁，国家与地方补贴共50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话不大高兴，就说：不会有庐山这样高。

彭德怀说：那就短点吧。

第三节　眼看会议就要结束，彭德怀送出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在“神仙会”期间，参加各组讨论的绝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都发言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左”，有些人还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护短的。他们认为“左”的错误已经纠正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出现了右倾错误。这样会议中便出现了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大跃进运动和前一段纠“左”的看法更不一致。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开了一次会。在会上，他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确实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对今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他的设想仍然过高。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也继续指出1958年以来的一些"左"倾错误，但讲话重点已经转向指责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批评党内干部的得不偿失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明显支持党内少数护短的人的意见，认为原来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已经逐步得到了纠正，纠错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并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种认识上来。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讲了会议的安排，他说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结束，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

按照预定的安排，庐山会议应于7月15日左右结束。14日，会议印发了胡乔木等人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这个记录共包括12个问题：第一，关于形势和任务；第二，读书；第三，宣传问题；第四，综合平衡问题；第五，群众路线问题；第六，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第七，体制问题；第八，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第九，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第十，过日子问题；第十一，公社食堂问题；第十二，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这个《议定记录》反映了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和庐山会议初期讨论的情况，即肯定了成绩，也讲了缺点，并有许多指导性的具体规定。虽然它规定的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仍然过高，即工业增长20%左右，农业增长10%～20%。但这个文件也是一个成果和进步，如能真正贯彻到实际中去，也会起一些好的作用。然而，随着后来庐山会议进程和性质的改变，这个《议定记录》也被一笔勾销了。

彭德怀眼见会议就要结束，而并未采取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措施，心中十分忧虑。他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不能迎头赶上，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他认为，如果自己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思想混乱；但如果由毛泽东提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于是，彭德怀萌发了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看法的念头。

彭德怀把自己准备给毛泽东写信的意思跟周小舟说了，周小舟认为这样不好，他要彭德怀亲自找毛泽东谈谈。

彭德怀接受了周小舟的意见，他决定找毛泽东面谈一次。对这次面谈，他是很重视的，头一天夜里他就准备了谈话的腹稿。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但警卫员告诉他："主席刚刚休息。"毛泽东历来就有夜里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而且毛泽东入睡十分困难，这是他周围的人十分清楚的，也是任何人不敢轻易打扰的。

话没谈成，彭德怀决定还是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当天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参谋记录整理后，他亲笔修改两遍，参谋誊抄两次，于14日下午送与毛泽东。后来追逼这封信的起草过程时，都怀疑周小舟参与其事。为了避免连累身边的工作人员，彭德怀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写出来

的，从来不讲随从参谋作记录的事。

彭德怀的信约4000字，分为甲、乙两个部分。在甲部分里，彭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另一方面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在乙部分中，彭用了较长的篇幅，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第四节　风向初变，毛泽东要求会议"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7月14日，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的信。16日，他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此后，毛泽东召集各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要求。

把一封交给个人的信件冠以"意见书"的名义并印发所有与会人员，毛泽东的这一行为已属超出常规。而且他还要大会评论这封信，也就是说会议的议题开始转变，转为评论这封信。这就预示着中共党内一场新的斗争即将开始。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主要讨论彭德怀的信，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这后一项决定，后来被人们解释为"搬救兵"。

7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重新划分小组，将原来按地区分的六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六个小组。由于代表们开始还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起初意图，没有理会毛泽东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还由于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组讨论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与会的大多数人没有觉察出会议将会急剧转向。

从16日至22日，会议仍按照前段"神仙会"的形式继续进行，大家围绕彭德怀的信展开讨论。对于这场讨论，彭德怀后来在自己的笔记中是这样估计的：多数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还有许多人没有发言。

彭德怀的估计是符合事实的。在讨论这封信的前一段，大家根据自己的认识谈对这封信的看法。很多人同意彭德怀的信。认为这封信既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指出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但有些提法不够确当，需要斟酌，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至于对彭德怀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精神，大家几乎是一致肯定的。

值得稍微详细谈一下的是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情况，因为，后来他们和彭德

怀一道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

黄克诚是17日上山的。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就拿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给他看。黄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德怀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克诚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了黄克城的住处看望。谈起话来，三位来客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黄克减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又和李先念谈了谈，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和谭震林交谈。谭是“激进派”，与黄克诚意见完全相反。而且谭还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黄克诚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然后，黄克诚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了起来。谭震林还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反兵”一词本为随口说出，意思不过是说自己持有一种与谭震林不同的意见而已。但后来被揭发出来，成了他反党并参加“军事俱乐部”的一个证据。此是后话。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黄克诚于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同在一组的罗瑞卿、谭震林不同意他的观点，发言批评他，他还与之争论了一通。

周小舟在19日的小组会上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根据大量事实，客观地、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强调应着重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原因，认为民主风气很重要，领导者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并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他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同大家说的一样，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

即使在总的方面不同意彭德怀信中观点的人，对他的精神也是肯定的，说他有什么意见就讲出来，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

但不管怎样，分歧已经产生，“神仙会”的轻松气氛不复存在，会议的空气变得紧

张起来。

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信的过程中，彭德怀本人在西北组作了一个很重要的插话，说他写信时的心情：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对派）也推翻不了，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绩之后，必须正视缺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他听说15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未讲完，心里放不下，仓促写了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表达本意。建议会后把他的信收回。这个插话虽短，但表明彭德怀在听到许多反应之后，已感到不安，感到那封信在文字上"有懈可击"，怕引起不好影响，要收回自己的信，以免再向下扩散。可是，毛泽东并不想就此平息这件事，后来，彭德怀的这段话被认为是假的，不是本意。

第五节　庐山会议风向剧变

庐山会议的斗争很激烈，但起初，这种斗争却被毛泽东、彭德怀之间称为"骂娘"。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华北会议骂了我40天的娘，难道庐山会议骂你20天娘还不行?"

毛泽东对此当然十分反感，一再提起这话："我们欠了20天的账，我看要补足20天，还是要40天"，还说"再加5天"，"满足骂娘的欲望"。

7月23日之前，会议虽然有了一些紧张气氛，但讨论总起来说还是正常的。没有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对于这一段会议，毛泽东8月2日晚，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小组长通气会议上说道："23日以前，你们并不晓得中央常委对这封信的评论，我们没有跟你们讲过，混乱了一个星期，各人自己打主张嘛！23日以后就起了一个变化。"

诚如毛泽东所言，7月23日，庐山会议风向剧变。

7月23日早晨，会议秘书处通知大家开会，听毛泽东的讲话。据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讲，他们当时根本不知毛泽东要讲什么，还做过种种猜测，而且他还说："据传，其他常委也同大家一样，是临时得到通知的。"如果李锐的这种回忆与分析可靠的话，就是说，毛泽东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便决定召开大会发表讲话，从而改变庐山会议的方向。

毛泽东的讲话，有人说是"乱石铺路"，说古论今，有一定的文彩。

毛泽东开头便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一共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涉及到了许多内容，主要是对彭德怀的信进行批驳。他讲到了"比例失调"，讲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讲到了"有失有得"。他的一些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但态度是明确的：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右倾动摇。

他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

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恩来、陈云的人，这一次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早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就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这部分讲话，通过批驳"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来点明锋芒所向是指彭德怀。后来对这个问题，彭德怀还专门作过解释，说他的信原稿里写的是"有得有失"，但秘书抄写时抄成了"有失有得"。但毛泽东仍不依不饶，一口咬定这是彭德怀"仔细斟酌了的"。其实，"有失有得"与"有得有失"在意思上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咬文嚼字，确实是有些强辞夺理。

毛泽东的讲话有两点格外引人注意：一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二是毛泽东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信是"犯"了他，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此外也不排除其中还有一些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

彭德怀出身于贫寒，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战争年代，他纵横驰骋，横刀立马，军功极大，地位很高。建国后，他对歌功颂德看不惯，而且敢于直言，从不怕得罪人。

曾有一次，毛泽东对彭德怀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顾忌之深，而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导致毛泽东、彭德怀分手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待大跃进运动的不同看法。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也在想方设法做些调查研究。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已很难看到真实的情况了。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曾回忆过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是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农民）就是吃这种面包……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

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这是制度）。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临上庐山前，毛泽东还到了他的老家韶山冲。在那里，他所看到的也是一番丰收景象。他很高兴，还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在这种情况下，接到彭德怀的信，他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通过多次插话，表明了自己站在毛泽东一边。

毛泽东讲："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

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讲："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毛泽东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后，彭德怀心情十分沉重。直到后来身陷囹圄，他仍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呢？"

23日之后，彭德怀就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沉重的。23日早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彭德怀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他反复考虑，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弯转不过来。

彭德怀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他还是作了检讨，承认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关于写信的原因，他说："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和

动机，因而就过多强调了困难和缺点方面，对于全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可能引起在经济建设中快和慢的摇摆。”“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国情况了解甚少。当时只感到截至 13 日的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探讨得还很不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些缺点可能要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 13 日写了一封给主席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 15 日就要结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毛主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他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收回我 7 月 14 日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存人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彭德怀发言之后，在场的朱德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的话，代表了参加庐山会议的相当多的人的看法。可以说，当时大家都把事情看简单了，都以为只要当事者基本承认了错误，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还以为会议就快结束了。

殊不知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第六节　彭德怀的问题被定性为“反党”，支持他的意见的人则成了“反党集团”

尽管有了毛泽东的讲话，但在 26 日之前，在各小组讨论中，发言的人态度都还是比较冷静的，语气也比较缓和。对彭德怀信的批评也基本没有脱离信的本身。

7 月 26 日是庐山会议的又一个关键性的日子，这一天，各小组都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话只有这样几句，但意义可谓巨大。此后，彭德怀的问题被上升为反党性质，批彭不再局限于那封信，而是开始算历史旧账。说他凡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说他在庐山上的行为，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泽东主席。说彭德怀自比张飞，其实他不像张飞，而像魏延。

由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中支持了彭德怀所写信中的观

点，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批判张闻天时，有人还对他21日的发言作了如此的“统计”，说9000多字的发言，讲成绩只有270余字，讲缺点错误却有8300多字。发言利用“但”字作文章，全篇共用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38个都是坏“但”。关于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有人说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副帅；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等等。

由于彭、黄、张、周等四人都是湖南籍或在湖南任过职，便被说成是“湖南集团”；由于这几个人在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到黄克诚的住处谈过话，出门时被罗瑞卿发现，告密到毛泽东那里，于是又被定性为“军事俱乐部”。指责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向党进攻。

7月29日，毛泽东召集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会议形势。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其中谈道：“路线问题，究竟采取哪一条好？扯了很久，开全会再扯几天，差不多了，双方都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多少时候了，不解开，当面不扯。解开了，以利团结和工作。”

此前，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办公厅已经通知所有中央委员都上山。到29日，最后一批中央委员已经上山。于是，这次大区负责人会议上决定，立即宣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30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这几个人，都是在小组会上曾发言支持过彭德怀的。毛泽东这次找他们谈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挖彭的墙角”。

关于这次谈话，黄克诚后来作了回忆：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从来我不了解你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我又说：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泽东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关于这次谈话，李锐从另一个角度作了回忆：

“毛泽东找我们四人谈话，无疑是要我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谈起长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这一点，我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我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能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我也不便多问。这时，田家英还告诉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

为了促动彭德怀作检讨，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进行劝说。7 月 30 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他自己当时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了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舍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8 月 3 日，在小组会上，聂荣臻谈到了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讨论批彭问题。在 7 月 31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彭怀德讲：“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 年，是否如此？”

对这种不顾基本历史事实的指责，彭德怀也真的没有办法解释，他只能是“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回答是：“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五笔记，文件全烧了。”

毛泽东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这时林彪在一旁插话：“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林彪是 7 月 17 日上山的。这次庐山会议，开始没有他，后来发生了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事件，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就将林彪作为“救兵”请上了庐山。林彪上山后，虽然讲话不多，但往往能“击中要害”，在打倒彭德怀的战斗中立了大功。

8月1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又开始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比前一天又要重了。他说：彭德怀“有野心，只是机会未到”，“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除林彪之外的其他常委则多处于消极状态。刘少奇问过长征时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还讲了高饶事件中的问题；周恩来则问了彭德怀与斯大林谈话中的一个情节，也不是大事；朱德的发言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而且态度温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了朱德个大红脸，干脆不再讲了。

林彪的发言与前几位常委不同，一是声色俱厉，二是击中要害。他说：彭德怀写信是要“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他还说：“只有毛泽东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的发言之后，刘少奇的发言调子也明显高了起来。他说：在延安，关向应病危时，我同你去看关向应。关向应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泽东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世界。根本问题在此。

彭德怀也清楚了自己的处境，对他的批判已经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他在会上提出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毛泽东没有批准。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事实上，中央领导人刚下山，军委工作就已决定由林彪来主持了。

彭德怀在会上还作了这样的表态：第一，不会自杀；第二，不会当反革命；第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地，自食其力。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第二是路线问题。在谈第二个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又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中还说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毛泽东讲话后，全会先开小组会，后开大会。不论是小组会，还是大会，其中心内容都是揭发、批判彭、黄、张、周等人；其倾向是“一边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纷纷飞来，除了说他们反对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总路线之外，对他们这样或那样的人身攻击也发生了。如有人说彭德怀伪装爽直和朴素，他对待人可以概括

成“压、打、拉、推、赖、装”。全会完全开成了批判会、斗争会。

至16日，全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等文件，这个决议将彭德怀说成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彭、黄、张也举手赞成。周小舟因是中央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所以无需他举手。

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大会通过各项文件后，毛泽东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头一个阶段，还照我们那个老轨道，那个总结法不对头。后来出来了对立面，引得我们大家注意了，那个时候起草的18个问题，那些东西都放在第二位去了。总结经验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向着反右，反右倾，鼓干劲。毛泽东还说：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这次庐山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庐山会议闭幕的那天，宣布了对彭、黄、张、周的处理决定：“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第七节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讲个人崇拜问题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即8月17日，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的态度》的讲话。

刘少奇这篇讲话最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赞扬毛泽东。他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泽东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泽东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

刘少奇还引用了恩格斯《论权威》的文章，来说明“个人崇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还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地危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刘少奇却还要再讲所谓领袖的威信，还要再为“个人崇拜”正名叫好，还要再现身说法，讲自己如何积极地搞“个人崇拜”。这种行为也真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当然，刘少奇的话也不一定都是他的个人意见，他也许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但不管怎样，他的这番鼓吹个人崇拜的讲话，对于中共党内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是起了恶劣作用的。在纪念刘少奇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刘源曾说过一段话：“作为世纪伟人，一代哲人，刘少奇不应该任随毛泽东的错误而一味发展，也不应该对这种发展的后果完全无知。加之，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之上，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就此来说，刘少奇负有直接责任。”

庐山会议后，中共党内个人崇拜之风日盛。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批示印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这份在党内、军内被广泛学习和讨论的文件，共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四部分就系统地论述了个人崇拜的问题。

文件说：“否认革命领袖的重大作用，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接着文件从六个方面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最后，文件得出结论：热爱党的领袖毛泽东司志，与热爱党、热爱共产主义事业是一致的。反对党的领袖，破坏党的领袖的威信，就是反党的罪恶行为。

第八节　彭德怀被撤职，林彪取而代之

庐山会议不仅是彭德怀被撤职，而且毛泽东也失去了许多东西。他失去了许多有识之士的真心拥戴，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政治信心。此后，庐山会议的斗争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几乎时刻都在担心着有人出来为彭德怀翻案。而这种担心是他在过去与王明、张国焘等人斗争后从未有过。而且这种担忧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之一。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那篇由姚文元写的文章，所批判的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尽管事实证明，姚文元的批判也是一种指鹿为马的行为。

庐山会议的真正赢家是林彪，他大概是会议期间最为清醒的人之一，所以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军权。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次会议的通知是在8月11日毛泽东讲话后立即发出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彭、黄在军队的影响，会议扩大的范围空前广泛：大军区领导除留一人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和野战军的司令员、军长、政委全部参加，其他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领导参加。因此，会议的参加者多达1061人，另外还有508人列席。

军委扩大会议从8月18日开始，至9月12日结束，前后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的大致经过是：8月18日至21日，分14个小组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精神，阅读会议主要文件；8月22日至27日，以小组为单位对彭、黄进行揭发批判；8月28日至9月4日，将14个小组编为两个综合组，彭、黄各在一组，接受批判和追逼；9月5日至7日，分4个小组对受彭、黄牵连的邓华、万毅、洪学智、钟伟等人进行批判；9月8日至12日，召开大会对彭、黄等人进行批判。

如此规模的会议，用这样的方式批判，彭德怀深知，一定是要在军队中把他彻底搞臭。在此情况下，他只有继续检讨认罪一条路可走。因此，9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接受会议对他的批判。他还提出，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9月12日，彭德怀又送上了给会议的一份书面检讨。

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信的当天，即指示印发给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级党组织和军委、外事两个会议的全体参加者。他在批语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此之前，8月22日，黄克诚也在其夫人的催促下，送上了由夫人起草的给毛泽东的认罪悔过信。8月24日，毛泽东给黄克诚复信，表示：很高兴，并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

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合并举行的大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再一次论述了“同路人”的观点。他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入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这样的同路人在各个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9月12日，会议在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后宣告结束。《决议》认定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这次向党进攻完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个人野心发展、利令智昏，不听党的劝告，无视党的纪律的必然结果。要求全军彻底肃清彭、黄在军队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恶劣影响。

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所兼的国防

部部长职务；任命罗瑞卿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免去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至此，林彪终于梦想成真。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不失时机地鼓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在讲话中说：毛泽东就是现在的马克思、现在的列宁。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泽东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

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林彪仍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地赞扬毛泽东。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刊登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19期上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

第九节　反右倾运动开始

庐山会议后，与军委扩大会议同时，还召开了一个全国外事会议，重点批评张闻天。连续不断的批斗和追逼，使张闻天的身心难以承受。先是血压骤然升高，头晕心悸。接着，在庐山上已经开始发作的前列腺肥大症又突然加剧。严重的病情，使批判者不得不允许他住进医院，接受治疗。这使他避开了猛烈风暴的袭击。但外交部的批张活动和"反右倾"斗争并未松懈。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外交部制造了一个"张闻天反党集团"，划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先到北京，写出了检讨认罪书。9月上旬，回湖南接受批斗。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手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同月下旬，决定让周小舟去浏阳县大瑶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

此外，还有一些高层领导人受到了彭、黄等人的牵连。有的是因为发表了与他们的观点相近的看法，有的则仅仅因为曾是他们的部属，与他们看着较密切的工作或私人关系。如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就在庐山会议后不久被撤销了职务，遭遇了许多不幸。

随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席卷全国。

反右倾运动在初期，主要在党政军的中高级机关进行，重点是解决中高级干部的问题。10月下旬，根据部分地区的经验，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基层单位的一般党员干部中也有，基层单位也要开展反右倾的斗争，因而，运动的范围扩大了。

党政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主要方式是自我检查和群众性的揭发批判，斗争对象主要是中共的领导干部。中共中央推荐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做法，反映了党政机关开展反右倾运动的一般情况。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反右倾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学习文件、酝酿准备阶段，约半个月。二是一般交心和重点批判阶段，约一个半月。广大党员干部普遍进行自我检查、向党交心，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批判对象，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三是专题辩论、系统提高阶段，约半个月。辩论的专题主要是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和正确理解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等。

在农村，主要开展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当时，把他们对“共产风”的批评，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代表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认为如不打退这一进攻，人民公社就不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大跃进也无法实现。整风整社的办法，一般是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社员大会，放手发动鸣放，让大家把“糊涂思想”讲出来，然后再选择典型人物，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批判。

在工矿企业，反右倾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负责生产和技术工作的基层干部，同时，也对一些“忘本变质”的工人进行批斗。原因是他们反对在工业企业大搞群众运动，主张恢复正常秩序，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管理生产。这些主张，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提出和支持这些主张的基层干部，则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

在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虽然多次强调要坚决清查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并没有制定出一个判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因而，在运动中，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其是，普遍发生了打击面过宽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于11月4日、11月27日和1960年1月20日，分别下发和转发《关于整社运动中掌握重点打击批判对象的问题的意见》、《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以及《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面的通知》等文件，试图加以适当的约束和控制。规定：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的人，应该限制在国家供给的、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范围以内，不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一律不戴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农村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和农村总人口的1%以下。这些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反右倾运动的打击面，但1%的比例仍然太高，仅按这一比例，受批判和打击的人数就多得惊人。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更多。到1962年8月的统计，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有600多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了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等各种党纪、政纪处分，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群众也受到了围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处理。

第七章 经济调整，一波三折

第一节 反右倾、鼓干劲、再跃进

在庐山会议以后，为了回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诬蔑”，中央改变了此前的一些说法和做法。不再承认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事实，说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不再承认已经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和政治上的紧张状况，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极为良好；1959 年上半年因调低一些过高指标而导致某些方面的生产下降，也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出于上述认识，为了表明大跃进的正确和反右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庐山会议后不久，即重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

在基本建设方面，9 月 24 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确定新上马 230 个限额以上基建项目。11 月 22 日，又确定追加 13.6 亿元基建投资。由于层层加码，到年底，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81 亿元，增长 30%，总投资规模达到 350 亿元。

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 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 1958 年还低 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 33.9%，猛增到 43.8%，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 22 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59 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 15%，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 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 83 元降到 65 元，下降了 22%。

在工交生产方面，10 月 16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制定了 1959 年第四季度的工业生产跃进计划。在第 4 季度内，工业总产值要完成 486 亿元，保证全年完成 16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钢完成 470 万吨，保证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 50 万吨；生铁完成 730 万吨，保证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 200 万吨；原煤完成 9700 万吨。

经过第四季度的蛮干、硬拼，到年底，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48% 以上。钢产量达 1387 万吨，比上年增长 73.4%；生铁达到 2191 万吨，增长 60%。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1959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 35.2%，

提高到43.8%。与此相反，在重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却急剧下降。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棉花实际产量只有3418万担，仅完成计划的74%，比上年减产520万担，下降13.2%。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进一步加重。

更要命的是，虽然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但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却心怀盲目的乐观情绪。这时，全党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继续大跃进的“气”早已鼓起。各地报告的都是些“形势喜人”的事情。有的人甚至认为，如果早反右倾，困难就不会出现。《人民日报》浮夸虚幻之声不绝于耳。每天都有醒目的标题：“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实现大跃进”、“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大搞副业”、“大搞深翻”、“大办文教卫生”、“高速万岁”。

中共中央已经提出1960年经济建设总方针：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3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说：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1月2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无需读其内容，只看标题，就能感觉到领导者的那种浮躁与浮夸。

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1月9日，毛泽东再次向与会者发问：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他的意思是明确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实现大跃进。1月23日，他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了：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上海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0万吨，产粮6000亿斤。会上还讨论了二五计划后3年设想和未来8年的初步设想。3年设想是，提前5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5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8年总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

上海会议后，各地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各种“大办”一轰而起。3至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1960年的大跃进计划。

第二节　坚守公共食堂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继续大跃进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又重新发展起来。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在对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的批文中，把邓子恢等人在1959年春夏为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克服“浮夸风”、“共产风”而提出的主张斥责为“猖狂反对社会主义道路逆流”，要求各地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彻底加以批判。

1959年10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提出了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了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问题。在此之前，华东协作区委员会议提出过分配给社员每人200元左右的过渡条件。座谈会同意这个条件，并认为，要每人分到200元，人民公社的总产值每人平均一般要达到600元到800元。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江苏全省人民公社总产值要在1959年56亿元的基础上提高三四倍，安徽要在1959年57.36亿元的基础上也提高三四倍，上海的现有基础较各省要好，但提高的标准也高一些，平均每人总产值要求达到1100元到1300元，也要提高三倍多。这样，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3到5年或者5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5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会议提出，过渡的时间是一个大致的杠子，具体过渡起来，各公社要有先有后，各生产大队过渡条件的成熟程度有早有晚，条件成熟了不过渡，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生产发展；条件不成熟，勉强过渡，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一般公社的发展趋势，将是分批过渡，成熟一批过渡一批，有些公社，大队情况基本平衡，同时具备了过渡条件的，也可以一起过渡。

为了创造条件过渡，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发展社有经济，特别是社办工业，实现公社工业化，要求采取措施扶持穷队翻身。关于这些要求，上海打算在1960年基本达到，江苏打算在1962年基本达到。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阐明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就实现社基本所有制的条件来说，第一，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人年平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第二，社有经济部分在拿社经济中占有优势；第三，穷队赶上了富队；第四，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这种精神，各省开始了试点。为了快一些发展社有经济，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各种“大办”一齐上；为了扶持穷队赶富队，在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方面搞“共产主义大协作”、“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平调的范围很广，土地、房屋、粮食、生产工具、劳力、家具等无所不有，搞平调的单位，有的上至省市，下至小队，而以公社为多。

在继续大跃进和重新部署过渡时，强化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就成了必然的做法。

庐山会议上，公共食堂问题成为分歧的主要问题之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接连对公共食堂问题写批语，批评解散公共食堂是“悲观主义思潮”，是“腐蚀党的，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

1960年2月16日至18日，贵州省委召集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向中央报告了全省13万个食堂80%是巩固的，20%左右是不巩固的情况，以及整顿食堂的措施。省委报告反映：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不固定、不巩固的食堂立即加以整顿。省委的报告提出：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扯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报告还提出了把社员自留地转交给食堂的问题。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的报告，并将口粮分配的原则改为“指标到户，实物到人，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毛泽东很赞赏贵州省委的这个报告，说这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5日，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向中央汇报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经验。毛泽东在汇报记录上即兴写下了几句话：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

3月15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文件，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批示。批示说抓食堂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要求各地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毛泽东写道：“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但其他各省、市、区，暂时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要勉强，两三年内争取逐渐达到，是可以的。”

贯彻中央的指示，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人数占总人数的88.6%，河南省达99%。

第三节　城市人民公社也来凑兴

1960年的大跃进还有一个新的插曲，即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没有对城市提出要求。但在公社化浪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少数城市一些居民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其性质类似社区服务性组织。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决议指出，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会成为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

不过，此时中央的态度较为谨慎，考虑到城市与农村的诸种差别，《决议》要求在城市中应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然而，1960年初，在反右倾和大跃进的号召下，城市人民公社也凑兴而生。

196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拟发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上批示："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对于指示稿中的一些提法，毛泽东也作了修改，使之更能鼓舞人心。例如，原稿中有一段话：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在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都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

毛泽东显然感到没讲够。在后边加了几句话：

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毛泽东还讲到了城市人民公社的领导组织方法问题。他继续批示道：

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这表明，中央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张稳妥试验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3月3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显得更加乐观。会议认为正在全国城市中大力兴办的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事实已经证明,城市人民公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的成长将是我们实现1960年以及今后的继续跃进的一个新的重大的积极因素。

从4月1日开始到4月8日,新华社接连发表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中央和各地主要报刊都迅速转发了这些消息。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央3月9日批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不要登报的精神。4月9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度的发展,而且还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并表示,大城市也必须逐步分批地实现人民公社化。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以后,在全国迅速猛地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据统计,截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6900万人口中,已建立人民公社1039个,人社人口达3900万余,占全部城市人口的55.6%。公社兴办的工业生产单位达9万多个,兴建的服务站达10万多个,公共食堂9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9.5万个。

然而,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原有工矿企业和街道组织之上,再建人民公社,总使人感到叠床架屋。而且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来势虽然汹涌,却有些生不逢时。此时,大跃进在全,国迅猛地掀起了一个已成强弩之末,1960年下半年中央工作的重点转入应付危机,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虎头蛇尾。对社会的影响远不及农村人民公社那样深刻而广泛。

第四节　农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认为是少数坏人兴风作浪

严重的问题首先在农村暴露出来。在继续大跃进和准备条件向更高层次的生产关系过渡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干部花样翻新,演绎出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来。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再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这种情况,终于引起许多省市的重视。

从1960年2月开始,先是广东,后有山东、江苏、山西等省采取召开省、地、县、区、社、队等五级或六级干部大会的形式进行纠正,解决一些社队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和在发展社有经济中平调生产大队财物问题以及干部多占多吃、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

江苏省委3月报告中说:公社干部多数有早过渡的想法,认为早晚要过渡,晚过渡不如早过渡,富队干部怕过渡,认为过渡就是"一平二调",穷队沾光,富队吃亏;穷

队干部盼过渡，认为“穷家难当，不如交给公社算了。”有人提出“一年铺路，二年试点，三年过渡”，“今年苦干，明年过渡”，“春夏准备，秋冬过渡”等口号。

在抢先过渡思想支配下，各地公社大办社有经济，急于达到过渡标准。于是，平调之风不可遏止。据4月10日中央批转山西省委报告，发展社有经济中平调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偿抽调、低价收买、不平等交换、有价无款、摊派发展社办企业基金、随意占用土地、随意抽调劳力。见什么好就调什么。这引起生产大队的恐慌性破坏性抵制，或藏、或拆、或卖、或杀。生产力遭到再次破坏。

4月4日和11日，中央批转的江苏省高淳县事件的通报和上海市奉贤县事件的报告，反映出少数干部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情况，令人发指。

江苏省委通报说：高淳县在1958年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那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

上海市委的报告说：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攻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丁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盯、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8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犹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司惊心，一片凄凉”。

这些报告上来，给予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少数阶级敌人混进干部队伍搞破坏，因而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中央在高淳事件通报上指示说：上海市奉贤县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坏分子窃夺和把持县委和有些公社的领导权，胡作非为，残害群众。

4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个报告，要求“对坏人坏事彻底检查认真处理”，认为这些都说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相当复杂的。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还是尖锐的。

第五节　各地粮食告急，经济调整提上日程

当时全国最为严重的问题还是各地粮食告急。

1960年2月份，周恩来收到江苏省委的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个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

余人。

3月29日，周恩来收到习仲勋送来的一封群众来信。这封自称“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件，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干部作风恶劣。这时还在年初，尽管对情况的判断一时还没有把握，周恩来认为这封群众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决不能忽视。他立即将这封信批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这时，许多严重情况还被掩盖着，容易被看作一时或局部的问题。薛暮桥回忆说：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

到了1960年夏天，全国性紧张局面暴露出来。

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1960年的夏粮比上一年又大幅度减产。夏收之后收购不快，1至7月累计征购了244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26%。实际是农村早已卖了过头粮库存减少，调拨不灵。5月以后，各应调出粮食的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而粮食销售量却大为增加。1957年到1958年度销售粮食是423亿斤，1959年到1960年度增到590亿斤。

大跃进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6月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8、9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京津沪库存只剩几千万斤，甚至还不到，形势十分危险。一旦发生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另外，1960年粮食出口收购计划是100亿斤，而到5月底只能完成30亿斤，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很被动。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宣布，以免引起人心的普遍恐慌，造成国际影响。这副重担就压在国务院财贸委，尤其是周恩来的身上。当时国务院综合部委有两个办公室，一是李富春、薄一波负责的计委经委办公室，一个是李先念负责的财贸委办公室。薄十波回忆说，他们这一边紧张，李先念那里也不轻松，各地要粮；电话昼夜打来，不能不急事急办，只好采取“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措施，紧急调运粮食，帮助断粮地区渡难关。周恩来的秘书李岩事后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在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星期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负责人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

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各地缺粮食，粮从何来？还得从有余粮省调。在当时，这是件艰难的事。严格地说，并没有余粮省，各省都遇到了困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求调入省份"嗷嗷待哺"，调出省份面有难色。周恩来只得亲自出马，游说各方"大员"：急他人所难，为国家分忧。

对于全国缺粮的严峻形势，此时毛泽东也是比较了解的。这一年，毛泽东七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便充一餐饭，一盘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卫士长李银桥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这一年的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14日，毛泽东在扩大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

会议期间，毛泽东用两个小时时间，写下了《十年总结》。18日印发与会者。名为十年总结，实为三年总结，即对大跃进的总结。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首次，也是惟一一次系统回顾和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文字。关于写这篇文章的意思，毛泽东在6月18日下午讲话时说：你们看怎么样，这是从历史说明问题。使我们认识事物，主动性多一点。主动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准确性，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要盲目性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就是主动多点，被动少一点。我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

毛泽东在他的《十年总结》中虽然还坚持认为，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是一个胜利，但从总体上看，此时毛泽东的头脑较之过去要冷静、清醒多了。

毛泽东在总结1956年的经验时，没有再提"反冒进"的问题，而是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二五计划正是周恩来根据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右倾保守，是消极平衡。1958年初在大批"反冒进"中推翻了二五计划。现在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撤销了对"反冒进"的批评，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问题平了反。

尤其不同异常的是，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还第一次谈到了自己在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问题。他说：我本人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武昌会议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

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等。

对反冒进问题的平反和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为经济调整提供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信号。

第六节　毛泽东号召大炼“争气钢”，周恩来提出“八字方针”

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请周恩来谈谈农业问题。

周恩来刚刚出访回国，但他对农业形势已经心中有数。他明确提出了这些年来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严重后果。针对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反复讲经济工作中的主动权问题，他指出：1956年八大上提出粮食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猪3亿头的计划，这三个数字基本上提得太高，很难达到。从1958年开始，对这三年的产量都估高了，1958年出现第一次被动，一直到去年庐山会议才改下来。今年一月把去年的产量又估高了，粮食报5400亿斤，实际上只有4800亿斤；棉花宣布4820万担，实际上只有3800万担，现在又被动了。因为去年估高了，今年的计划数字也高，就是在去年的数字上头增加10%，即粮食5940亿斤，棉花5300万担，现在看今年是完不成的。今年能够保持去年的产量就了不起，就是很大胜利。现在，我们不但今年陷于被动，而且到1962年的计划也有完不成的危险。

他说：“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1962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毛泽东插话：“一次把主动权拿过来。”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产，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3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

毛泽东问：“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说：既然完不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他还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3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就要把它调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大家都赞成毛泽东的总结和周恩来的意见。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3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

人主动就好了。邓小平也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

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整整用了一个月零五天时间，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等文件。会议还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

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讨论运输问题时，李富春曾根据前段时间的生产情况，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但是，这个想法提出后，计委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北戴河会议上，多数人赞成调整经济，但不赞成降低钢铁指标。7月中旬，毛泽东找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等谈话。他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浙江的情况只有4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今冬可能动员7000万人来干。1962年搞到3500万吨，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2200万吨，如果今年有2200万吨，后年可能达到3800万吨。第二个10年可能搞到1亿吨。"他还说："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毛泽东在这里讲"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是有所指的。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从7月28日至9月1日，将全部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苏联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讲"憋一口气"，号召全国大炼"争气钢"。

北戴河会议后，各省市的报告上来了，群情激愤，大家决心大炼"争气钢"，给毛泽东主席争气，给国家争气。

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作了广泛发动，采取种种措施，钢铁生产的原计划指标还是难以完成，钢铁重要生产基地东北又遭受水灾，眼看着计划就要落空。于是，中共中央一再发出督促令。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把钢的产量指标由2040万吨降为1900至1950万吨，发出了"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全体同志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在今年完成1900万吨到195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采取了全国保钢的各种措施。

8月30日，李富春等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中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使它的含义更加明确。9月30日，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

次正式并且完整地表述了这八字方针。然而此时，最高决策者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到调整上来。

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11月中旬，钢的平均日产量突破了6万吨。但下旬又跌了下来。同时铁、煤、运输也呈现逐日下降的趋势。

第七节 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报告终于送到最高领导层

就在工业苦撑局面的时候，农村的灾荒已弥漫全国。

对于农业生产北戴河会议上已经作出了相关的决议。为了检查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谭震林主持，于9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晋、冀、鲁、豫、京5省市农业书记会议。

会议要求安排好农村人民的生活，压低口粮标准，把12个月的口粮作13个月安排，大种蔬菜，搞代食品，办好公共食堂，实行冬春100天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要求确保把由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回农村的劳动力，80%用于农业生产。会议提出：在今冬明春给广大群众以休生养息的机会。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会议的纪要，要求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特殊化作风，以使广大群众心情舒畅，从而调动起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战胜目前的暂时困难，顺利地渡过灾荒，争取明年的丰收。

10月24日，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书案上。这是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写的调查材料，经李富春之后转送毛泽东的。于是，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空前残烈的事件，终于送达了“天庭”。

信阳事件只是大跃进的一个缩影，但这个缩影震动了毛泽东。

1959年8月中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庐山回到郑州。回来后，他立即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

这一年，河南遭遇水旱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吴芝圃硬是估产为450亿斤，并按此下达征购任务。于是，“共产风”与“反瞒产”结合在一起，与“反右倾”结合在一起。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其辖区内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当初曾是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信阳地委后来敢于大刀阔斧地搞“五风”，也许与这面红旗不无关系。

光山县是一个典型，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参与打人整人。县委第一书记

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活活将他整死。

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可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其中5人被活活打死。

在县委主要领导的带动下，公社干部也都大打出手。据有关资料说明，整个光山县的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竟占93%。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9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是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1960年春天，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了炊，最严重的村子达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也开始大量地外逃或者是饿死。在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检讨中，称这个时期的信阳“形成了一种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以下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

就在农民大量地饿死或外逃之时，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看见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仍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讲到了全区各县打人死人的情况，读来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万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10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13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12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3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4000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

其实，不仅是信阳地区，也不仅是河南省，全国都处在经济困境中。

第八节　实际情况比人们能够认识到的还要严重许多

由于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并且发生在1958年的错误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尚未得到基本缓解、全国许多地区又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因而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膨胀，重工业生产指标太高，加上“共产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粮食产量2870亿斤，比1959年减产530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2126万担，减产1292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3405万担。粮、棉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9%。这是建国1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严重缺粮问题1960年5月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计划的一半。100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30亿斤。虽然中共中央5月28日和6月6日等几次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但是，粮食的调运工作一直进展不快。11月，中央确定调运粮食24亿斤，有关省、区却只完成14.5亿斤。同月，北京、天津、上海共销售粮食5.7亿斤，而调入的粮食却只有3.7亿斤。实际上，当时实在是没有多少粮食可供调运。据统计，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仅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这样一减一加，再加上6月底以前的库存减少数，使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以至于不得不压低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

至于农村，缺粮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1960年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37.1%，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

由于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得太长，196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总额也由1957年的217.6亿元增加到324.1亿元。加上巨额赤字，1960年的社会购买力就从1957年的675.1亿元猛增到716.7亿元。这样，在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1960年的市场供应出现了比1959年下半年更为紧张的状况。社会商品购买力大于社会商品零售额74.8亿元，差额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年终未实现的购买力总额达到了176.4亿元。

1960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7年下降13.6%；人均消费量，粮食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了19.4%，其中城镇由392斤降到385斤，下降1.7%，农村由409斤降到312斤，下降23.7%；猪肉由10.15斤降到3.06斤，下降69.9%，其中城镇由17.95斤降到5.42斤，下降69.8%，农村由8.7斤降到2.44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3.7斤，比1959年减少18%；棉布由24尺下降到不足21尺。在196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禽、蛋等食品的供应，就连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难买到。

大跃进还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危机。1960年7、8月间，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7月份收入53亿元，比上月减少12亿元，下降17.3%；8月份，又比7月份减少2.3亿元，下降4.3%。到年底，国家财政收入共572.3亿元，支出654.1亿元，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货币流通量达到95.9亿元，比上年增加20.8亿元，增加27.7%；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比上年增长9.2%。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1957年上涨了25.4%。

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例如，10月和11月间，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竟占到了35%以上。另外，患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少1000多万。如果加上自然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要大于这个数字。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仍感沉痛。他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到了1960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已经普遍地感到了农村形势的严峻。10月21日，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渡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1958年，19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个灾害怎么办？

第九节　为了刹住"跃进"战车，各项应急措施纷纷出台

如果说，在1960年初总结1959年的工作时中共中央还认为国民经济比例正常、市场繁荣稳定、1960年应该继续"跃进"的话，那么，面对1960年年中之后出现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央就不得不再度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做法，并开始从根本上考虑大跃进战略是否正确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10月27日下发的指示中指出：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人是每天要吃饭的"，这确实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为了弄懂并记住这个道理，我们的国家却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一些应急措施其实在上半年就开始制定并实施了。

首先降低的是棉布的供应标准。5月7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批准商业部的报告和发出通知，分别将人均2.4尺的棉布定量降低了2尺和1尺多。9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决定降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可维持在360斤左右，丰收地区可提高到380斤；淮河以北，则应在300斤左右，灾区压低在300斤以下。城市的口粮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他人

口每月一律压低2斤左右。9月23日，中央还发出指示，把直辖市、省辖市和县城等城镇居民每月的食油定量分别从10两、7两和4两压低到了7两、5两和3两。对于粮、棉、油之外的其他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也大都压低了供应标准，实行了严格的凭票限量供应。以北京市为例，1960年实行凭票供应的商品高达50种之多，零售额占到社会商品总零售额的40.7%。

粮食和副食品的极度匮乏，迫使人们寻找其他东西替代。当时，在农村，不仅食用野菜、野果，就连农作物的秸秆和一些树叶，也被加工制作成了代用食品。在城市，也普遍开展了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的运动。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号召立即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的运动。根据科学院的建议，中央推荐了玉米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多种代用食品，要求人们利用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采集和制作。中央指示，目前应把重点放在群众过去习惯食用的、大量的、制作简单的、"粗"一些的代食品方面；同时，也应有重点地试制和推广一些新的、技术性较高的、营养成份较大的、"细"一些的代食品。为了领导代食品的采集和制造，中央和各地区、各部门还专门成立了各种领导机构。

原计划1960年增加职工200万人，可到6月底，职工总数就达到4796万人，实际增加了235.7万人。8月底，又猛增至4905万人，超过原计划增加人数144万人。鉴于这种情况，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决定：今后3、5年内，一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停止从农村招工；今冬明春减少基本建设职工150万人，精减各类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1960年和1961年，除安排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少数复员军人以及为以后几年培养新技工所必需的学徒之外，不再增加新职工；今后3、5年内不再提高职工工资标准，而且从1960年10月起，逐步降低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标准。12月17日，中共中央为领导精减职工而专门设立的关于劳动力安排和干部下放5人小组还进一步提出了1961年精减职工502万人的任务。

1960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要求全国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在今后5个月内，要把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部分压缩20%左右，全国共压缩5亿元。节约下来的经费，属于地方的，归各省、市、自治区处理；属于中央部门的，50%留归各部门。但这些经费（包括归中央的和归地方的）都应当存放在人民银行，在1961年2月底以前不得动用。为进一步减少市场上流动资金，12月20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冻结、清理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和企业专项存款的指示》，决定自12月25日起，冻结截止到这一天的各单位除工资、伙食费、助学金、救灾款、外事费、企业流动资金和对人民公社的退赔款等以外的所有存款；经审查清理，凡是资金来源合乎国家规定的，应当承认存款单位的所有权，但在1961年6月30日以前原则上不得动用。凡是资金来源不合乎国家规定的，应一律交回中央或地方财政。

1960年上半年，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鉴于这种情况，8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提出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决定，凡

是没有开工的限额以上项目，一般不再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除确保一批增产原料、材料和支援农业的重点项目外，其余项目应停建的停建，应推迟的推迟；规模过大的要化大为中，化大为小；非生产性的公共建筑和文化福利设施，除必要的学校、宿舍、营房外，尚未开工的一律不再开工，刚刚开工的一律停建。根据上述要求，1960 年国家预算内投资计划由第二本账的 382 亿元压缩为 344.8 亿兀，第二本账计划施工的 900 多个限额以上项目，299 项停建和缓建，38 项缩小规模，567 项单项工程减掉。计划外的 116 个限额以上项目，除 13 项列入计划外，其余一律停建。

为了改变财经纪律松弛、资金管理混乱和财权分散的状况，12 月 31 日，财政部作出了加强财经管理的一些规定，包括适当缩小专区、县（市）和公社的财权；一律不搞赤字；控制预算外资金；加强企业的资金和成本管理；监督基本建设投资；工商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由中央决定。为了加强现金管理，9 月 22 日，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严格实行现金管理制度的报告》。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一份重要的文件。指示信在一些经济政策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其中规定：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一制度，从 1961 年算起，至少 7 年不变。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凡是平调的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小队使用。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虽然指示信还坚持公共食堂、部分供给制等政策，但在其他方面的政策规定简明扼要，易于贯彻，易于记忆，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第十节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关于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1960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3 日，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准备提交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审议的 1961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计划安排要点。李富春在会上的报告中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经验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发展国民经济必须真正以农业为基础；人民公社必须坚持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计划指标必须留有余地；必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必须充分注意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必须把权力适当集中于省、市和中央。

1961 年 1 月 14 日到 1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参加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83 人，候补中央委员 87 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 23 人列席了会议。在全会之前，从 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举行了中央工

作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八届九中全会的第一项内容。

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全会在充分肯定了1960年大跃进的巨大成绩后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粮食、其他农产品以及工业原材料供应紧张，工业品质量下降，许多设备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修理，某些地区和部门的“共产风”等错误严重。全会认为，产生上述困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二是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三是没有认真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四是权力下放过多偏下，某些规章制度也没有建立和得到严格执行；五是少数领导干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

基于上述分析，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

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的安排，全会指出，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要认真注意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以便在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维护设备，增加品种，改善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在采掘工业中要首先注意对煤炭、木材、铁矿的安排。这样，八届九中全会就正式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安排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八届九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分析了当前的农村形势，总结了各地整风整社试点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和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问题。八届九中全会，则讨论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的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些政策规定。

为了切实纠正“共产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纪要》规定：提高粮食、油料、生猪、禽蛋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将社员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由5%提高到7%，20年不变；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个人种植的桑、茶、果、木等各归其自己所有；在养猪方面，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允许社员家庭私养母猪；鼓励社员饲养鸡鸭兔羊等家禽、家畜以及经营其他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手工业；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作过多的限制；列人国家计划的生产资料生产，必须保证完成，力争超过；继续调整和压缩各方面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等等。

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针，但在具体政策方面，成效是有限的。全会确定1961年的钢产量与1960年持平，为1900万吨，原煤计划产量比1960年还略高，基建投资略有减少。基本的思路是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上。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分别作了讲话。他强调，要缩短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指标不要太高，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要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今后几年，要着重搞质量、品种、规格，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搞好成龙配套，搞好调整、提高。鉴于大跃进以来许多决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一再强调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讲话中指出，做工作要求三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因此，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61 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八章 调查研究，扭转时局

第一节 毛泽东发出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历来是重视的。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就明确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

1961年1月1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当然，不能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不实事求是，也不能这么讲。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

1月18日，即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这个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毛泽东本人在这方面更是亲自抓，亲自管。

1月20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信，要求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每人带一个调查组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按照毛泽东的布置，三个调查组1月21日即离京赴农村。这三个组出发时，每组7人，共21人，除组长3人外，组员有邓力群、许立群、王力、张超、梅行、王录、杨

波、胡绩伟、逄先知、吴介民等。后来，有关中央局和省委也有一些人参加，如参加浙江组的有华东局农委副主任董家邦，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薛驹。

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回忆，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离开北京，22日便到了杭州。浙江调查组经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调查方法，决定在嘉善县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通过调查，很快发现了一些问题。

三个调查组出发后，1月26日晚，毛泽东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紧迫心情，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7个省委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动员工作。

2月初，毛泽东到达杭州时，田家英将浙江调查组的初步调查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包括：怎样克服“五风”改变面貌问题；关于人民公社的退赔问题；农村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和起草一个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么做工作等问题。这些问题，大体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人民公社以及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有些是已经明确了的，有些是正在酝酿之中。后来他又听了湖南、广东等调查组的汇报。这就为广州会议的召开和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做了准备。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也就是后来常被人们简称为“六十条”的文件，也是田家英在汇报时向毛泽东提的一个建议。后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这个工作条例的由来时，是这样说的：“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毛泽东刚到广州时，就看到陈伯达带领的广东调查组2月19日报送给他的《调查纪要》。《纪要》提到：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关于队与队的平均主义，《纪要》举例说：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原来的两个高级社合并起来的。一个在山上，副业门路多，收入高，原来一个劳动日1.2元；另一个在平地，副业门路少，收入低，一个劳动日0.7元。合并后，收入都降低了，而且降成一样都是0.4元，两个大队的社员都有意见，收入降低多的社员意见更大。关于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纪要》认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的某些制度上。大沥公社平均每月共发工资500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应的粮食、菜、油、盐、柴，合计每月260元，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还占不到总分配数的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给部分却占了总分配数的80%多。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据典型调查，农村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大体都占农户总数的40%左右。人民公社要分配合理，重点就是处理好这两类户之间

的矛盾。《纪要》提供的这些情况和所作的分析，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察觉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的12条，只解决“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即平均主义的问题。

第二节　邓子恢通过调查提出一系列调整农村政策的建议

毛泽东在1960年底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的一年。其实在此之前，邓子恢已经开始就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些急迫问题进行调查了。

庐山会议时，邓子恢因为身体不好，没有上山参加会议，算是躲过了一劫。1960年9月初，中共中央刚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不久，刘少奇得知休养了一年多的邓子恢病情稍有好转，立即约见他。问了问病情后，就向他提出：近年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颇多，造成的后果很是严重，中央正在考虑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赶快把农民情绪稳定下来。希望你到农村去作些调查，了解些真实情况，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邓子恢二话没说，当即应承了下来。

9月上旬，邓子恢带领工作组下乡，首站是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他在这个公社住了两个星期，重点深入到两个管理区：一个是工作比较先进的贾家庄管理区，一个是工作比较落后的金井村管理区。调查告一段落，回京途中，他又在河北省石家庄停留，在市郊铜冶人民公社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他轻装简从，走家串户，同管理区、生产队干部、社员、党员、老农开座谈会，查看农田、养猪场、水利工程、食堂，接触了许多群众。

调查结束之后，邓子恢回到北京，同工作组的人们一起，对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现在要改变反右，继续纠“左”，把庐山会议后中断而现在又重新开始了的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工作坚持下去。从三个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看，当前有些政策急需重申、坚持、执行。这就是：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这个制度。当前不要搞过渡，搞过渡对发展生产不利。坚持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要给生产小队一定的自主权；生产小队利用渠边地边生产的杂粮瓜菜要归生产小队所有；对生产小队的“三包一奖”要兑现，要承认差别；要允许生产小队办养猪场。坚决纠正平调的错误。要满足社员要求，从公社到社员层层算清账目，再不要搞平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分配要合理，要兑现。

他调查很细致，研究更认真，由表及里，抓住了问题症结，想出了解决办法。立即亲自动手，就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和研究的意见，向中央写了《山西、河北两个人民公社三个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报告。

报告送出之后，他同工作组的人们说：我们这次了解的情况是北方农村的，南方农村的情况到底怎样？有了南方农村的情况、问题可能抓得更准些。9月底，他带着急于

了解南方农村情况的急迫心情，又率工作组从北京直奔江苏无锡县。他在无锡县住了20多天，深入到一个公社的几个基本核算单位。仍是走访社员家庭，召开各种座谈会，参观生产设施，多方接近群众。

在无锡调查过程中，邓子恢对同来的调查人员说：我们这次调查，有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从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发了好些文件，但到了基层，有的没有同群众见面，有的执行不认真，有的执行打折扣，甚至走样。这一方面可能与某些具体规定不切合实际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某些具体规定朝令夕改有关。现在有没有条件像搞初级社社章、高级社社章那样，搞个公社社章？搞社章不成，搞个条例也行。现在人民公社内部矛盾很多，有的很尖锐。如果能把现有的处理人民公社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办法归纳起来，使之条理化，规范化，公布于众，这对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稳定农民生产情绪，发展农村经济，将起重大作用。大家同意他的想法。

当调查告一段落，邓子恢同工作组的人们一起，即着手草拟《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并邀请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市委农村工作部长到无锡来参加讨论修改。

回到北京后，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这三省的农村调查情况，并提出搞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于是，他组织一班人协助修改《条例》。经过40多天，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终于于11月底定稿。

《条例》分14章66条，着眼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经营管理问题，特别是解决人民公社内生产大队之间，也就是原高级社之间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问题。《条例》于1月23日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中央，周恩来看到了，很高兴。这个《条例》成了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草案）》的重要参考材料，也可以说是《农村六十条（草案）》的前身。

《条例》定稿后，邓子恢又感身体不适，遂赴海南岛榆林港休养。路经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前来看望。吴芝圃从1941年开始就在邓子恢领导下工作，俩人交往较深。1958年邓子恢曾两次路过郑州，吴都来看望。邓子恢耳闻河南有浮夸，一再提醒吴：河南工作不要搞过了。吴总是漫不经心地说：我知道了。结果河南果真出了问题，饥馑遍地，饿殍遍野。在这种背景下两人再次见面，吴老泪纵横，羞愧难当。只说了一句："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造成了工作失误。"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的创举予以表扬。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那个时候顽强得很。邓子恢同志，为了说服你，我跟你谈过多次话。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去年他在山西、石家庄、江苏南部作了一次调查，作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的。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

这一天的会议，邓子恢到得稍迟一些，就坐在会场的后边。毛泽东讲着讲着，忽然两眼向会场横扫了一遍，未见到邓，就问："邓老来了没有？"大家不约而同的眼找邓子

恢。有的看到邓子恢惊奇的样子竟笑了起来。邓耳朵有点背，没有听到毛泽东的询问，就问坐在身旁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叶说："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了!"邓子恢开始认真地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农村工作部找谁呵，还是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个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创议的是总理。"

周恩来插话说："是他给我说的。"

毛泽东赶忙说："啊！首先创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恢还作了一个大胆的发言。他认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草案)》规定的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基础放在大队一级是不可以的。既名为基础，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经营的实体．和居于最底的层次。因此，把基础放在生产队最为恰当，它是最基层，生产、生活都直接联系群众，又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同时，生产队规模一般只有二三十户，以它为基础和变成经营实体，很适应目前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

邓子恢的这个发言是很有见地的，但在当时，他的意见没有为中央所采纳。

第三节　调查研究的第一项重大成果——《农村六十条》

2月23日，毛泽东派出去的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准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起草工作一直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的。25日，毛泽东邀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赵紫阳等人开会，宣布条例起草工作班子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3月10日起草好。起草工作分两段：前7天拿出初稿，后7天找些人来讨论。会后开始起草。初稿主要由廖鲁言、田家英、王录、赵紫阳分头执笔，胡乔木修改。3月6日写出初稿，不算序言，共8个部分，67条，连序言在内，近14000字。

3月10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开幕，参加会议的是中南、华南、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主要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与此同时，由刘少奇主持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大区的"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也是讨论农村问题。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写了一封信谈平均主义，号召大家亲身到农村去调查情况，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

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信写完后，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三南”会议讲话，反复阐明要搞清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就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道理。他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其他书记的调查研究工作由第一书记抓。他说：医生看病叫诊病，先诊，中医叫望、闻、问、切，先搞清病情，然后开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下决心，然后布置队伍、后勤等。历来打败仗都是情况不明。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就是因为情况不明。

毛泽东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并带去他写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但信写完后，他又改变了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3月14日，“三北”、“三南”两个会议合并召开，在广州继续进行。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信和新发现的毛泽东的一篇旧作《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反映强烈。中共中央随即将毛泽东的信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组成员学习。根据中央意见，由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指示信于3月23日在工作会议上通过后发出。将《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作为附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指示信要求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指出：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在大会讨论这封指示信时，田家英边念信稿，毛泽东边穿插作些解释。信稿不过800字，而毛泽东的解释记录却有上万字。毛泽东坦诚地说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广州会议的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修改、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个草案初稿在3月6日由起草班子写出后，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同时发给10日开幕的“三南”会议与会者。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的讲话，认为条例草案初稿内容太杂，篇幅太长，不能一气读完，要压缩到8000字左右。出席“三南”会议的许多人一致赞成搞一个条例。有人说：1960年11月的“十二条”虽好，但那是党内文件，需要一个公开的条例。还有人提出：目前，农村工作中问题很多，光搞一个条例，内容势必很杂，重点不易突出，建议条例只写经过实践已肯定的制度、政策和办法，另写一个党内指示，着重解决思想认识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也有人认为，鉴于公社体制在调整中间，在体制定型以前，条例可暂不搞。对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他说：这又不是圣旨，今年不行，明年再改；明年不行，后年再改。后来，这个条例始终没有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形成正式法令，一直都只是修正草案，可能与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三南”会议讨论，由胡乔木执笔，又对条例作了一次大的修改，15日上午修改完毕，这就是条例草案的二稿。二稿首次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9个部分，50条，9000多字。

15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谈条例问题，决定将条例印发会议讨论。会议共讨论了两天，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关于是否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会议没有作出结论。

3月15日，刘少奇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有一段插话。他说：第一，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资。所谓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第二，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这段插话表明刘少奇当时已经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持否定态度。

3月19日，开始修改工作条例第二稿，吸收每一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华北是陶鲁笳，西北是白治民，东北是冯纪新，中南是王延春、赵紫阳，华东是林乎加、薛驹、魏文伯，西南是黄流。胡乔木向起草组传达了毛泽东当天中午的谈话：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的，但只是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21日，第二稿修改完毕，是为草案的第三稿。三稿共10章，首次定型为六十条。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各地对条例进行认真讨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人民公社中的问题。

草案坚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的体制，规定：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在生产大队范围内，除了生产队和社员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外，一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草案根据新发现的问题，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公社一般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一般应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草案还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广州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

第四节　刘少奇轻车简从返故乡，深入农家体察民情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号召，刘少奇从来都是积极响应的。1961年3月，刘少奇在广州参加过中央工作会议后，便决定到湖南省做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因为湖南是他的家乡，到那里便于了解真实的情况。

动身前，他去向毛泽东辞行：

"主席，中央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打算去湖南看看！"

毛泽东说："很好。前两年，搞什么亩产万斤、几万斤，那是哄人的。近年遭了点灾，饿了点饭，又搞得人心惶惶。也就是蔬菜少了一点，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嘛。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

刘少奇说走就走。4月1日打电话通知了湖南省委，4月2日上午就到了。

为了迎接国家主席，湖南省委接连开会。首先是选点派人，决定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再就是调配车辆。国家主席的专车理应豪华、舒适一些，湖南又是他的家乡，为尽地主之谊，省委为他安排了一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外还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生活上也作了周到的安排。按照当时的规定，干部待遇分大灶、中灶、小灶，13级以上干部可以吃小灶，现在国家主席来了，更应妥善安排。于是，他们就在宾馆专门抽调了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为他做饭。乡下条件太差，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刘少奇说来就来了。省委以为他要在长沙住几天，但他说时间很紧，马上要下乡。在庐山会议后，张平化接替周小舟担任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便向刘少奇汇报了省委的安排。

刘少奇听了，半天没吭声。一会，他问道：

"平化，我记得你做过鄠县的县委书记，那是什么时候？"

张平化据实回答："鄠县是我的家乡。从1929年秋天起，就当鄠县县委书记，一直到1933年初。"

刘少奇笑着说："时间不短嘛！"

"那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扩大工农武装。任务相当艰巨，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张平化说起当年的峥嵘岁月，显得有些兴奋。

刘少奇又笑着问道："你那时也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了，你们下乡，是不是也住招待所？"

张平化愣住了，他弄不明白刘少奇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少奇开始言归正传：在战争年代，我们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战士

处处爱人民。干部下乡了，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决不打扰老百姓。我这次下乡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

张平化解释说：我们考虑到您年纪大了，乡下的条件又确实太差！

刘少奇摆摆手说：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我仍旧采取老区的老办法，吃住都在老乡家！

张平化说：还是派李瑞山同志去领领路吧！

刘少奇坚持说：李瑞山同志是北方人，你别为难他了。我是去我的老家，通衢大道，山林小径，哪个地方不熟悉！好啦，就这么定了！

当天下午3时左右，刘少奇乘坐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离开了湖南省委招待所，经长沙五一路向西驶去。车前没有警车鸣笛开道，后边没有车队跟随，就像一位普通干部外出办事。与他同行的只有夫人王光美、秘书吴振英和几个工作人员。

刘少奇的吉普车来到了宁乡县一个叫王家湾的小村子，这里距刘少奇的故乡炭子冲只有8里路。由于刘少奇离开家乡将近40年了，估计这里的人们一时认不出他来。这倒便于他开展调查研究。于是，刘少奇决定就先在这个村子里进行调查。

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刘少奇不打算一开始就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交代过身边的工作人员，人家认识就认识，不认识也不要急急忙忙地介绍。朱保密，后公开。时间长了，人家就会认出来。到那时，我们的调查工作可能就有了进展了。

刘少奇把调查组的住处选择在一个“万头养猪场”里。这个万头养猪场其实最多时只养过几十头猪，而且还都是从各农家集中起来的。刘少奇一行人来时，这里只剩下两头猪了。刘少奇要随行人员把他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其他工作人员就住到了旁边的一间空猪舍里。

秘书们找来门板，为刘少奇架床，工作人员则只能打地铺。这里原本是鱼米之乡，此时工作人员竟找不到像样的铺床稻草！

刘少奇信步走到屋后山坡上。放眼望去，只见田地荒芜，杂草丛生，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挖野菜。路边有一堆已经风干的人粪。刘少奇走过去，用脚搓开，仔细瞅了瞅，不禁摇头叹息。他对秘书们说：你们看，这里面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农民吃饭已经成了问题。

在王家湾，刘少奇白天走村串户，深入到社员家里和田间地头，体察民情，了解情况，他的足迹遍及这里的山山岭岭和田垅阡陌；夜间，他就找来干部、社员，或促膝谈心，或召开小型座谈会。每天他的工作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调查获得的情况是令人震惊的。

一个叫张纪富的大队长告诉他，他所领导的大队，原来有830多人，现在剩下740多人了。跑了40多人，死了38人。另外还有100多个病号。这里讲的死亡都是指非正常死亡。有人给他讲述了一个叫王四大汉的社员惨死的故事。

在湘中乡下，大汉就是大力士。这个王四大汉典型的大力士形象：个子很高，背阔腰粗，力气很大，一肩能挑400斤。他的肚皮也大。据说他去为岳丈祝寿，按照乡俗，进门先要吃长寿面，他一口气吃了14碗！他性格豪爽，队里的重活难活都叫他，他从不推辞，因而人缘极好。但在食堂吃饭，吃不饱肚子，饿极了，便饥不择食，竟去挖观音土吃！

湘中的一些地方，在山坡边挖下去几尺深后，会有一种乳白色的胶泥，质地极细，像糯米粉，还粘牙。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此地发生大饥荒，不少人就是以观音泥充饥而没有成为饿殍。这是300多年前的传闻，想不到今天，在国家主席的故乡竟真的有人去尝试。

王四大汉挖来一桶观音泥，撒上一点盐，味道还确实不错，他便大口吃了起来。谁知吃过以后，肚子就开始感觉鼓胀，胃在下坠。晚里睡不着觉。天亮的时候，去解大便，解不出，死用力，肛门竟掉了下来。抬到卫生院，医生给他洗胃。胃里不是食物，怎么洗得下来呢？这样熬了两天，他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死的时候，鼓胀的肚子里全是泥土！

刘少奇在王家湾进行了5天的调查研究。他想找一个先进的地方看看，了解点先进的经验便于推广。经与湖南省委联系，张平化向他推荐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那是省内外都闻名的红旗大队。

4月12日上午，刘少奇来到天华大队。这里是湖南省的一面红旗，全国闻名。就在当月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有一篇近万字的文章，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支书彭梅秀：

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不仅粮食丰收，社办工业也收入达3.2多元，生猪生产也发展了一步。全队98%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今年过春节时，食堂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银耳……

但刘少奇一来就发现了问题。

一天早起，刘少奇在前屋后屋转转，走到一个叫余泽福的家里。自从吃公共食堂以来，他就饿得害病，当时他已几乎不能下床。他对刘少奇说：早几天我还想吃一顿饱饭，现在我只怕没有力气吞下去了。

刘少奇叫王光美赶快去叫医生。经医生检查，余泽福严重的营养不良，患的是重症水肿病。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王光美又送给他一包白糖，还亲自为他泡了一杯白糖开水。

随着形势的好转，余泽福死里逃生。30多年以后，1996年12月5日，有客人来到王家塘找到余泽福寻觅当年的故事。余仍然健在，84岁了。当时他正在坪子里晒太阳。提起35年前的故事，他对来访者说：“我这条命是王光美用白糖开水救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说我吃了修正主义的迷魂汤，糊我的大字报，批斗我。我反抗不得，心里可明白着呢。这主义那主义，能救人性命就是好主义。王光美同志也快80岁了吧，你们如果能见到她，请给我捎个话：我惦着她。好人咧！”

刘少奇在调查中还了解到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问题。一位因为敢讲真话而被定为"右倾分子"的原天华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向他讲了实情：

天华1300多亩田，最好的年景为1957年，产量只有80万斤，1960年田里减了产，实际只收72万斤。：但上报到公社的产量是120万斤，虚报了48万斤。送给国家的征购和超产粮是32万斤。人均口粮不足400斤。这400斤是稻谷，打成大米只有280斤。一年有365天，每天平均只有7.6两米，每餐2.5两米。

段树成说：上级号召以粮为纲，全面跃进。粮食确实是个纲。粮食减产，副业都上不去。1960年生猪年底存栏全大队只有17头，上报的却是500多头。鲜鱼出塘只有几百斤，上报为7500多斤，每天工值只有2角3分钱，上报到公社是5角钱。这2角3分钱的收入，吃饭、穿衣、点灯、治病、小孩上学……全在里边，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与1957年相比，社员生活大大降低了。全队患水肿病的人超过100人，上报到公社只有十几人。1958年全大队死亡48人，报到公社11人，少报了37人！

他还对刘少奇说道：这几年，根本不能讲缺点。动辄扣帽子、批斗，哪个还敢讲呢？

情况调查清楚了。刘少奇召集大会，省、县、区有关领导都参加了。刘少奇在会上说：社员群众生活过得很苦，不能完全怪基层干部，上边也要负主要责任。有些事是中央提倡的，如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根子还在中央。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报喜不报忧，根子在省委，省委听到好的就高兴，助长了浮夸风。

长沙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满成说：我们没有走好群众路线，假如多听听群众意见，怎么会有这么多损失呢！

一位常来天华跟踪报道模范典型的报社记者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写过许多夸大模范典型的报道，感到很沉痛。

国家主席、省委书记、县委领导，还有报社记者都真心实意、深刻沉痛地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当面道歉，人们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决心齐心协力走出困境。

第五节　把饭碗还给百姓，乡间农舍又见炊烟升起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开展的这一次调研，不仅发现了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而且就地解决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率先主持了大面积解散公共食堂的工作。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作调研的时候，有一次，请了七位普通社员重点座谈公共食堂的

问题。通过几天的调查研究，他已经了解到了人们生活的艰辛。他对大家说：

“听说社员群众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多，比如，对供给制有意见；比如，对粮食有意见；比如，对住房有意见。大概意见最多的还是食堂。请你们敞开讲，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也不批评，不戴帽子，不辩论。这几年，我们听群众的意见太少了。这几年，我们办了不少错事，使大家吃了许多苦头。”说到这里，他环视着一张张面带菜色的脸，然后庄重地站起身来，立正脱帽，向大家深深一鞠躬，又说：“今天，你们是先生，我们——”他指指担任记录的王光美和另两位工作人员，“包括我，大家都是你们的学生。学生向先生请教，请放开讲吧！”

七位社员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老实巴交的杨运桂开腔了，说：“刘主席，您来的头天，队里就开会打招呼，不准我们讲落后话、反动话。今天您这样看重我们，我要斗胆讲一句落后话！”

杨运桂说的“落后话”就是：“公共食堂不好。”

有人开了头，其他人也都开始讲了起来：

“每天定量老秤 12 两，新秤合 7 两半。在保管室里老鼠吃掉一点，也许事务长炊事员还要刮掉一点，余下的不够我一餐吃。油很少，菜也不多。讲句不怕您刘主席见笑的话，屙出的屎也像猪粪一样！假如不吃公共食堂，各家各户自己做饭，没有人刮我的粮，田埂地角多种一点蔬菜，至少我的肚子会填得饱一些，干活的力气会大些。我总闹不懂，政府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又不让作田人吃饱饭。人是铁，饭是钢呀。你不让人吃饱饭，怎么去搞生产啊！”

“把住人家的饭碗，政府这一手真厉害！”

“开始办食堂的时候，说可以节约劳动力。就说我们施家冲食堂，72 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 7 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食堂用工占全队用工的 1/3。如果不办公共食堂，整米、种菜的活儿早晚捎带干了，哪里要专门的劳动力？还有刚办食堂的时候，上级要求生活集体化，全食堂 72 个人集中在施家冲居住。因为住得太挤，生活太不方便，不少人又陆续搬回去了。现在分别住在三四个屋场，远的有一里地，近的也要走一阵。一天三餐，来去六次，这要耽误多少工！刮风下雨，打着雨伞上食堂，生活多么不方便！”“办公共食堂，对山林破坏也很厉害。从前，烧柴只劈枝桠，扒地上的落叶，还烧一部分稻草。现在，没人扒柴了，稻草也没人及时收管，在地里沤坏了。食堂要柴火，就派人上山砍树。砍了大树砍小树，几年就把山砍光了。过去，天华的山上有老虎、野猪、鹿。不要害怕老虎，虎啸太平年。好几年都听不见老虎吼了，果然就遭灾、饿饭！”

“我是个困难户，女人去年得浮肿病死了，留下六个小孩。但我还是主张不办食堂。我的大孩子 16 岁了，老二、老三也做得事了。可以捡柴、种菜，我利用早晚的时间也可以开荒种自留地。这样会辛苦一些，但吃进肚里的粮食和蔬菜肯定要多些。老古班说，两脚忙忙走，全为身和口。公共食堂把大家箍在一起，年头忙到年尾，身和口都顾不上，不知政府为何硬要这么做！”

刘少奇还是第一次听到群众对公共食堂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说：“那好，食堂

办不办，由你们自己决定！”

一位社员问道：“假如我们都不赞成办食堂呢？”

刘少奇的回答很肯定：“那就不办！”

在与7名普通社员座谈的第二天，刘少奇接到了毛泽东批转的胡乔木在韶山的调查报告。胡乔木在报告中说：

“公共食堂，多数人不愿意办，据韶山片六个大队统计，153个食堂，1116户中，主张办常年食堂的只有5个，占3.64%；赞成搞公饭私菜的食堂65个，251户，占21.4%；部分人主张，部分人不主张办的食堂18个，152户，占17.4%；坚决要求散伙的食堂65个，674户，占57.6%；在主张办食堂的人中，有不少人是为了应付。这个统计说明，当前农村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办食堂的。”

“民以食为天”，对于这个涉及到亿万农村人吃饭的大问题，刘少奇抓得很紧。他连夜赶回长沙，与湖南省委交换了意见，又去看望了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统一了意见后，很快就回到了天华大队。

时间是4月17日晚上。刘少奇召集大队支部委员和其他负责人开会。会议采取了漫谈的方式进行。

刘少奇首先介绍了自己调查的情况和与省委交换意见的经过，请大家敞开谈。

公社书记讲了自己的顾虑：“公共食堂的毛病，我们也看出来了。只是办食堂的时候，上级有指示，社队干部为了贯彻上级的指示，不知开了多少会，跑了多少路。对那些有抵触情绪的群众，有的批评过，还有的挨过斗争，个别四类分子还以破坏罪关押过。现在叫散，难免不有顾虑，说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巴子！”

刘少奇说：“办公共食堂由中央负责任，不要你们负责。跟施家冲社员座谈时，我就说了这个意思。我向他们道歉，他们都很通情达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有什么错误不可以纠正呢？”

区委书记说：“办公共食堂，我们是犯得有错误。过去哪个敢讲呢？直接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就说家庭副业吧，公社化前，全区有40000多只鸡鸭，去年统计只有4000多只。1958年全区收红薯80万担，堆集如山，去年只有4000多担。”

刘少奇问这位区委书记：“如果准许散食堂，全公社有多少食堂会解散？”

这位区委书记回答得非常肯定：“如果敞开散的话，一个都会留不住！”

刘少奇坚定地说：“那就敞开散，只要是真正自愿。过去，我是主张办食堂的，事实证明不行。卡住人家吃饭比什么都厉害，比捆绑还厉害。你把人家的饭碗拿在手里，这不行。现在要把饭碗还给人家！”

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了，会议就作出决定，分头下去，发动群众开展讨论，还办不办公共食堂。如果还有一部分人愿意办，那就一定要设法办好。如果不办，也不可匆匆忙忙解散。散会时，刘少奇又再三叮嘱。

“公共食堂办也难，解散起来也会有许多难处。群众再经不起折腾了，我们要多替他们想想。想细一些，做好周密安排！”

在家乡炭子冲，刘少奇也重点调查了公共食堂的问题。

公共食堂本来是一个生活组织，但因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小队便成了基层政权的一个小单元。食堂是以小队为单位建立的，公共食堂因此也包含有基层政权的内容。炭子冲属首子冲食堂管辖，刘少奇的调查便从首子冲食堂开始。

首子冲食堂共；有23户，56口人。工作人员5名，另有两个全劳动力负责食堂柴火。事务长领着他参观公共食堂。卫生搞得不错，里里外外打扫得很干净。进入厨房，挂菜篮子的地方挂着一块猪肉，约10多斤；地上的盆子里还有两条鱼，活的。那时猪肉供应紧张，在县城，除了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每人凭票供应2两猪肉外，肉店平时关门。这个食堂有肉还有鱼，刘少奇高兴地说："食堂还办得不错嘛!"

事务长兴致勃勃地层示食堂的经济实力。接着又搬出油盐坛子，满满的一壶菜油，盐也很充足，还有一大箱豆腐。

与事务长告别返回住地时，刘少奇说："如果这里的情况属实，也不能千篇一律说公共食堂不好!"

刘少奇所说的"不能千篇一律说公共食堂不好"的前提是"如果这里的情况属实"。但很快他就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属实。

第二天，他的一位亲属，在首子冲食堂就餐的居民鲁渭媛对他说："假的，那都是假的。您老人家前脚走，猪肉菜油都让人提走了!"

刘少奇吃惊不小。他已经38年没有回炭子冲了，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看到的竟是一场专门对付他的"戏剧"!

在家乡，刘少奇见到了许多早年的朋友，听到了许多在各级汇报材料里看不到的"逆耳忠言"：

"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七分是人祸。'五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都是人刮起来的祸害，这就是那七分人祸!"

"报告刘少奇主席！这公共食堂还要办下去，将来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

"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最好不过!"

"今天我可要讲几句反动话！再这样搞下去，不要很久，连抬死尸掩埋的人都会找不到了。国家主席啊，这人都死光了，这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还办不办?!"

刘少奇这次回炭子冲是来作调研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要抽时间到离炭子冲八里远的赵家冲，去看望他的六姐刘绍德。

刘少奇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六姐比他大八岁。由于那时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六姐没有上过学。家里人口多，母亲的家务担子很重，照顾小弟弟的任务就落在了六姐身上。六姐总是将弟弟驮在自己的背上，用布带捆好，然后，姐弟俩就到屋后的树林里听鸟雀啼鸣。后来不需要六姐驮了，六姐仍然处处帮助他。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六姐是除母亲之外，最亲最爱也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亲人。

姐弟俩见面的场景是让人伤心的。六姐一见面就对他说："你姐夫少陪了!"

当地的乡下老人忌讳说死，只说"少陪了"，也就是告别人世的意思。

刘少奇的姐夫是去年冬天死的。因为吃不饱饭，弄来些米糠饼充饥。年岁大了，消化不了，憋了两天两夜，活活给憋死了。

刘少奇问："刚才，在山坡上看见一片新坡，那是怎么一回事?"

家里人告诉他："那都是今年开春以来的新坟呀。我们队里就死了11个。有的是吃了糠饼野菜树皮，拉不出，憋死的。有的是得水肿病。"

刘绍德哽塞着对她的弟弟说："你姐夫，还有队里的那几位，都是饿死的咧。老弟，你在中央做事，要给老百姓饭吃啊!"

刘少奇从六姐家回到炭子冲。心情还是很不平静，他对乡亲们说：我主张扎扎实实算一盘损失账，算得大家心里疼。然后开一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东西多少。再把这些内容，刻一块石碑，竖在路边上，让过往行人都能看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调查所得是刻骨铭心的。此后，刘少奇很少再讲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很少再宣传"三面红旗"的完全正确。在这一点上，也使他与毛泽东渐渐地拉开了距离。

刘少奇在湖南调研44天，在此期间，他与地方党委一道，果断地调整政策，敞开口子，凡农民自愿的，都可以解散食堂，自己回家做饭。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把饭碗还给农民。

5月9日，刘少奇离开了炭子冲。那天早上，他看到了一座座破败不堪的农舍又出现了缕缕炊烟。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农家炊烟，它表明了生命的延续。但是，从1958年10月开始，在全国的大部分地方，这种农家炊烟竟中断了两年半！于是出现了饿殍遍野的凄惨场景。如今，乍一恢复，人们无疑还面临着许多许多的困难：他们没有锅，一口锅张家炒完菜，李家再借去用，有的一口锅供10来家使用；他们没有灶，不少人家就用几块破砖支起个临时的"灶"；他们没有米，没有柴，没有菜刀，没有菜板，没有碗筷，甚至没有住房——就像是一群群落难逃荒的人。但是，毕竟"又见炊烟升起"，人们就有了一种死里逃生的希望。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为了农家可以自己生火做饭，我们的国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一位叫张步真的作家，当年曾亲历过解散公共食堂的过程，他作过这样一段回忆：

1961年3月初旬，我被分配到平江县瓮江公社金罗大队当驻队干部。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后来颇有建树的工笔画家，他驻在隔邻的生产队。

我们下去的任务是办好公共食堂，组织好春耕生产。我召开社员会议，将上级的指示照本宣科，那当然是走过场了!

大家都愁眉苦脸。这时，有一个青年女子说："开会就讲现话，听得耳朵都长老茧了。在地里干活，饿得腿巴子发软，这种日子我不想过了，我想死!"

我训斥她，队长也训斥她。

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我和队长去坡地里察看。忽然，坡下的坪场里一片闹腾。有哭的，也有叫的。我们急跑下坡，有人跳塘了!

果然是昨天那个说傻话的傻丫头！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她从塘里打捞上来，人已没气

了。姑娘的母亲在坪场里呼天抢地。

我心里难过，社员情绪更加低落。这时，有传言说，隔邻的长沙县，一个叫天华大队的地方，公共食堂都解散了，而且是刘少奇主席下令解散的。

瓮江公社与长沙县搭界，两边互有亲戚。消息是那里传过来的。首先是我不相信。我刚在县里开了扩大会，上级强调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再说，我们也不知道刘少奇主席到了天华。我慎重其事地召开会议，劝告社员不要信谣传谣。眼下生活困难，谣言和小道消息很多，大家要保持警惕。

只过了两天，公社通知所有驻队干部回公社，收听县委召开的电话会议。县委决定：解散公共食堂！与会者全都愕然。电话会由一个小喇叭将音量扩大，不是很清晰，大家以为是听错了。电话会结束，公社书记还打电话去县里核实。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所有的人都喜形于色。太阳快落山了，公社书记留大家在公社住一宿，明天再下队贯彻。不管是路远的，路近的，都不愿意留了。这是天大的喜讯啊，决不能过夜！

金罗大队距公社有10多里地，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到队里，立刻通知全体社员开会。有人已经睡了。我说，不行，睡了也要起来。不来开会，会要后悔的！

我传达县委电话会议精神。人们一片惊骇：这怎么可能呢？

我告诉他们：这全是真事。

屋里静静的，谁也没有说话。忽然，前几天投水而亡的姑娘的母亲，一位年近50岁的老大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妹子，我的苦命的妹子啊，只要再熬两三天，你就熬到头了呀……”她转过脸来朝我发问，“既然要解散食堂，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散呢？早散几天，我的妹子就不会死啊！呜呜呜——”

我的眼眶也潮湿了，不知如何来安慰这位母亲。

哭声也像传染病。有人开了头，一个老汉也哭了。他为他的老伴死于水肿病。一个中年汉子哭了，他为食堂的事挨过斗……

我劝慰他们：“这是喜讯呀。一切都过去了，你们怎么还要哭呀！”

他们反而哭得更厉害。

农民把解散公共食堂称为“第二次解放”。

第六节　周恩来武安调研与农民交朋友

广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提出5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农村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在会前对农村中若干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

为落实毛泽东关于深入农村，进行重点调查的部署，4月底至5月初，周恩来先到河北邯郸，听取河北省负责人的汇报。随后，在5月3日至8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

进行深入调查，走访几十户农民家庭，视察了生产队的集体食堂，还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价格。周恩来在社员家中看到的情况令他十分震惊。他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

抗日战争时期，武安曾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当地群众为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重大贡献。看到这里的乡亲们生活仍旧这样贫困，周恩来感到十分痛心和内疚。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人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周恩来知道是在做假，硬是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子的食堂，但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炊事员一见周恩来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周恩来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这是周恩来在农村吃到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

周恩来召集社员开会，黑压压挤了一屋。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开始，群众不敢说话，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有压力，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会场还是很静。张二廷见总理问他，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问：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他叫"张二廷。""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周恩来说："当然是真话啦！"

张二廷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

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地问："为什么吃不饱？"

张二廷也认真起来："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

张二廷的话像拉开了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张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张二廷愣冲冲地说："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

会场顿时陷入沉寂。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张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张二廷也无所顾忌了："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

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说着，他站起身，拉住张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又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张家。面对和蔼可亲的国家总理，张二廷如实地谈了许多情况，并希望周恩来以后再来伯延。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并代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在伯延公社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认为：“既然摸点，总要摸出个情况来，总要给他一点合理的保证。”所以，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领导说：“我可以保证。”社员们又要求周恩来以后能够每半年来一次他们才能放心。周恩来回答说：“我个人能否半年来一次，还不能担保，有时可能忙于什么事情去不成，但是工作组总是要去。”

5月6日，临离开伯延的时候，周恩来召集社员开会，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呼啦啦地往周恩来跟前挤，想和他握个手。周恩来身不由己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向南走去——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周恩来见此情景，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圈。

在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他二话没说周恩来“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恩来大人给您请安！”

大家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搞懵了，周恩来则一把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起来。

原来这是另一个村的一名单身汉，吃不饱，浑身浮肿无力。有人给他出主意，叫他去找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一早奔到伯延来，没想到周恩来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于是，他的一肚子苦水化为一个跪拜和两行热泪。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他发现《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应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月7日，他请秘书孙岳用保密电话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调查的情况，汇报中说：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

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意见，连夜将这份汇报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先后收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从各地寄来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和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普遍不赞成办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共中央进一步修改《农村六十条（草案）》做了重要准备。

第七节　修改“六十条”，抛弃不得民心的“共产主义因素”

《农村工作六十条》在广州工作会议通过并正式下发后，很受各地群众欢迎，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广州会议后，由各级领导干部率领的调查大军，带着“六十条（草案）”下乡到基层，同群众一起讨论，向群众作出解释，听取意见，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也进行了广泛讨论。各种修改意见，通过不同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汇集上来。

“六十条”从总的精神上是要坚持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对此农民当然是不满意的。各地调查组很快就发现并反映了这一点。

1961年3月，广州工作会议以后，朱德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农村做调查研究。5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他在四川看到的是：社员吃饭“两道烟”。所谓“两道烟”就是，在食堂打饭，自己回家做菜，浪费人力物力。到陕西，反映更强烈，说食堂有五点不好：社员口粮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河南省的调查，河南荥阳县大彦滩食堂，是个模范食堂，得到过县委的锦旗，但全村32户中，只有4户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吃食堂，其余28户都要求回家吃。

广州工作会议以后，邓小平、彭真大多数时间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利用日常工作的间隙，他们还直接组织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顺义县、怀柔县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5月13日，邓、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食堂问题在北京郊区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不办，常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至于农忙食堂，群众意见很不一致。北京市各县、区向群众宣布三条：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结果远郊区的食堂大部分都散了。

4月9日，胡乔木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六十条（草案）”下达后，韶山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对食堂问题有三派：赞成、反对、中间，调查组有意识地把三派人找到一起开

会，持反对态度的队长一开口就问赞成办食堂的队长："把良心拿出来，说真心话：你说你家生活比三年前过得怎样？"几句话问得那个赞成办食堂的队长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4月26日，胡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附有调查组关于韶山公社食堂问题的详细调查材料。报告说，在讨论"六十条"中，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报告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单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写去一封信，嘱他立即将报告及附件印发三级干部会议讨论。

与此同时，中央在广州会议以后，还派出了大批的由其他领导人带领的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谢富治领导的河北省邯郸调查组，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省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省海城调查组，钱瑛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领导的黑龙江省双城调查组，平杰三领导的山东省泰安调查组，陈正人领导的四川省简阳调查组，廖鲁言领导的山西省长治调查组等。这些调查组通过深入农村，与农民座谈，开展调查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发现了一些问题。如，中央河北省邯郸调查组谢富治4月19日给中央报告说：调查组一进村，群众就问"食堂要不要下放到户？"又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初步调查，80%的社员赞成回家做饭。此时，大队一位副支书说话了："食堂不能散，食堂是方向，散食堂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要散，得经过县委批准。"群众听他这么一说，要退出食堂的也不敢退了。为了让群众表达真实的意见，调查组在5个生产队进行无记名投票公决。投票结果是赞成停办食堂的户占90%，赞成继续办的户仅占10%。海城调查组胡耀邦5月6日报告：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干部们说：自从办起公共食堂，通常有一个队长顶着，'不是丢就是坏，不是修就是补，不是吵就是闹，这个说"饼子有大有小"，那个说"勺子长眼睛啦"，伤透了脑筋。干部们还说：宁肯领导两个生产队，也不分管一个食堂。徐水、安国调查组杨尚昆5月20日报告：两县不少社队食堂已经散了，但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出现了一批"支应食堂"或各户轮流派代表去食堂吃饭的"代表食堂"。

一大批来自实践的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终于使这个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农村六十条"起草工作班子于5月上旬着手研究修改，5月22日拿出"草案第一次修改稿"。经过5月北京工作会议讨论，6月5日产生了第二修改稿。6月8日，毛泽东阅后，第二修改稿付印。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印出的第二次修改稿又进行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6月15日由毛泽东审定后发出，这就是"六十条（修正草案）"。

"六十条（修正草案）"明确提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六十条（修正草案）"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彻底否定了供给制。

在广州工作会议制定的"六十条（草案）"第33条第2款规定："在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当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

不能多于三成。有些地方，还可以只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实行供给或者半供给或给以补助，其余的社员都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

"六十条（草案）"下达后，包括调查报告在内的来自各方面的反映，大多数不赞成供给制，只同意把"五保户"包起来，即对农村中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在生活上做到保吃、保穿、保烧、保儿童上学、死后保葬，对困难户给予适当照顾。

经过调查研究和北京工作会议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也一致了，原草案第33条第2款被全部删掉了。至此，从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突出宣传的关于人民公社分配方面的两项"共产主义因素"都被否定了。

第八节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总结经验，我看是时候了

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开了20多天，到6月12日才结束。

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

刘少奇刚结束湖南农村调查不久。5月31日，刘少奇在讲话中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党内外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集中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人坚持把困难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还有的人习惯于把成绩与失误说成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经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公式。他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刘少奇还反问道：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他又说，我们现在所犯的错误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刘少奇要求全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下一个很大的决心，把思想转变到调整工作上来。他大声疾呼：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

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

在会上，周恩来也就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谈了意见。他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倾和工作上的问题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事求是，所以尽管想搞好一点，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一切都搞全民化，动摇了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得罪了小资产阶级。另外，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关系上的命令主义，上层建筑上的规章制度一般化、简单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作风上的“五风”问题，有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如以农业为基础，但是农林牧副渔普遍减产了；以工业为主导，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也不起主导作用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

周恩来讲到这里，刘少奇在一旁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

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

当时，各方面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就像刘少奇所说的：“人人都要吃饭。城里人要吃饭，乡下人也要吃饭，读书人要吃饭，我们这些做官的人也要吃饭。”所以，怎样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

5月31日，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指出：粮食的形势还没有好转，还在继续紧，1960年到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他从产、购、销、调、存几个方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情况，说明从现在的情况看，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因为农村机械化少，水利比例小，化肥少，电力少，“四化”程度不高，农业主要建立在人力、畜力、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所以，每年要供应城市500亿斤粮食是困难的。周恩来提出，要解决问题，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他说：人如何压下去呢？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三年压两千万，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陈云十分赞成周恩来提出的方针，在发言中对城市人口下乡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现在的问题，实质是这样：城市人口如果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现在全国在讨论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征购任务不减少，“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么，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表示：现在就是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减少城市里面的人口。

会上，各大区认真讨论了周恩来的报告。经过对讨论中所提意见的综合分析，周恩来连夜主持起草出《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6月6日，周恩来在会上对这九条办

法逐一作了说明。经过讨论，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个文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6月12日通过，并在6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文件的题目改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供销量的九条办法》。这九条办法一直是调整时期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问题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终于在贯彻八字方针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刘少奇总结会议精神说：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会议最后决定，当年就要下放1000万城镇人口，钢产量也要进一步压缩。会上还决定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这次会议还在调整重工业的计划指标方面取得了进展。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的钢产量与1960年持平，为1900万吨，原煤计划产量比1960年还略高。然而实际情况是，开春以来，产量逐月狂泻，财政收入下降50%。商品奇缺、物价飞涨、货币急贬。这种形势迫使国家计委不得不提出对1961年的计划再作调整。

要确定工业规模、基建规模、城市规模，关键是摸清农业的家底，粮食的家底。于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重新核实几年来农业的实际产量。结果真可谓：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1958年粮食产量不是公布的5000亿斤，而是4000亿斤；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而只有3400亿斤；1960年不是估计的4100亿斤，而只有2870亿斤；1961年估计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700亿斤。

农业的情况见了底，工业上的问题也就全面地暴露。工业规模过大、基建战线过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八届九中全会定的计划显然无法维持，既不是进，也不能站，而必须下决心退。

5月10日，李富春在计委会上说：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把过高的生产建设计划落到实处，国民经济全面被动的局面就不能扭转过来。

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把1961年的钢指标从190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他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

周恩来焦虑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中心是三年内要放慢建设速度。他斩钉截铁地指出：现在光有冷静不行，还要有勇气。

毛泽东表态了：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吨，降下来750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

从口气上可以听出，毛泽东对于如此大幅度地调低钢产量指标是心有不甘的，但现实摆在这里，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毛泽东在6月12日的大会讲话中，特意向大家介绍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还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毛泽东的又一次提倡，使调查研

究之风再度兴起，大批领导干部在会议结束后，打起背包、轻装简从下了基层。

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本人没有能够亲自去做调查。他能够做的只是听取别人的汇报或者阅读别人写来的调查报告。这就不能不限制他对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灾害的认识程度。

第九节 陈云四下青浦，研究解决农民私人养猪和家庭副业问题

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之后，1961 年 6 月下旬到 7 月上旬，陈云到老家上海青浦县开展调查。这是他解放后的第四次青浦农村调查。1955 年 1 月、5 月，1957 年 3 月，他也曾回故乡进行过农村调查。1958 年 6 月还到甘肃农村调查。

出发前，他请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长期搞工会工作的领导人陆铨 3 人，加上与他长期联系的两个青浦农民组成先遣队，先去青浦县小蒸乡、观音堂乡摸底。后来陈云说，之所以选择小蒸乡，是因为 1927 年陈云曾与顾复生和陆铨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解放后又常有联系，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农民也知道他们，比较敢于讲真话。

先遣队于 6 月 19 日抵达小蒸。经过摸底后研究决定，这次主要调查种双季稻、公私养猪等农民最有意见的问题。

一星期后，陈云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同上海市委负责人交谈后，坐火车到青浦县石湖荡镇下车。随后陈云从这里坐上小船，前往小蒸。

小蒸地处江南水乡，湖荡中的一个个村庄，原来树木葱茏，竹林茂密。现在却是一片荒凉，村庄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荡中。看到家乡的情况，陈云心里很不好受。他说，原来这里都是茂密的竹林包围着村庄，远处看都看不见房屋，公社化竹林都归公了，树木也归公了，结果都被砍光。农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这里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具都离不了竹子，还可以制成竹器到市场上换钱用，农民从来不花钱到市场买竹扁担、竹筐用，现在也只好花钱买了。

6 月 27 日，陈云到小蒸后，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亲属、农民廖开弟的家里，作了 15 天的调查。

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并参观了公社的工厂、商店和仓库。

青浦县原来是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调查组到那里的时候，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食堂缺少粮食，结果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稀粥。他们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泽东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这话很尖刻，但确是事实。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

绿月巴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自留地。但各地方执行的时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这样。在小蒸，合作化以后，还给社员留了700亩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声令下，自留地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纠“左”，1959年春天又分给农民300亩自留地。可是春天刚分下去，庐山会议后风向变了，反“右倾”，于是当年秋天自留地又收归公有，自留地里农民精耕细作的粮食，也折价归公。田边地头农民开的一些小块地，当地叫做“十边地”，搞公共食堂的时候，也收去当了菜地。就这么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把农民搞怕了。

陈云对自留地问题很关心。他说，自留地是一个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农民祖祖辈辈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种着，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地，生产队只按计划生产的那几种作物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社员的各种需要的。

陈云很带感情地说：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在当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宣传中，有个“一条龙”的创造。所谓“一条龙”，实际上就是过集体生活的居民点。有一天，陈云踏着泥泞小路去看这个“一条龙”。

陈云等踩了一脚泥，走了好半天才到地方。在一块平地上，建起了几排新房，房与房之间有回廊相通，有食堂、商店、制衣点、医院、托儿所、养老院等等，干部能想到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公社负责人还介绍起这样的社会主义新村的长远规划。对这种做法，陈云很不赞成。他皱眉说，社员群众不会愿意这样生活，这商店里货架上也没有商品，以后不要搞了，已经修起来的房屋要注意管好，不要弄坏了。

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是种一季水稻，种一季夏熟作物，如大豆、小麦。大跃进后非得让种双季稻，虽说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多斤粮食，但陈云找他所认识的老农算了笔细账，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算上因种双季稻给寄秧田、秧田造成的减产，算上每亩多用的种子，算上不能种夏熟作物损失的收成，就少收了250到270斤粮食，还不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麦与水稻差价带来的收入损失。

那时农民明明连饭也吃不饱，干活都没有力气，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要弯腰劳动16个小时以上，这样插秧进度很慢。后来公社决定包插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插秧勉强完成了。

陈云在田头看到，水稻田里的禾苗，有的碧绿，有的却是还没有转青的黄秧。有老农向陈云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加强田间管理。这事引起陈云的深思，回来时路过上海，听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消息，他要薛暮桥同周太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通过调查，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

稻，种夏熟作物，也要看土质情况，多种蚕虫，少种小麦。这样也要相应改变口粮年度安排。

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几次座谈会讲话时，都先说这么几句：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犯了错误，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他还风趣地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

多少年来，对于农民来说，养猪等于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农民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都指望养猪卖钱来解决。大跃进时期，农民私人养几头猪、几只鸡鸭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等到市场缺少肉蛋，又勉强发还。

对农民私养的猪和鸡鸭，曾经两次没收，两次发还。第一次没收是 1958 年秋人民公社化时期，到 1959 年春发还；第二次没收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到 1960 年冬发还。这么两通胡闹，吓得农民心惊胆战，养家禽的积极性一落千丈。

陈云对农村养猪的事情是非常关心的。在小蒸，陈云调查得很仔细，开专题会，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 15 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 10 个，陈云亲自去看了 2 个。

在集体养猪场，陈云看到，饲养员责任心不强，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有人管。在大大的猪棚下，猪圈卫生极差，里面只薄薄地铺了稀稀落落的一点稻草，湿漉漉的，猪滚得遍体泥浆。

公社干部汇报说，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 3.8 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 16 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 7 万元。

以前，即使粮食很紧张的时候，陈云也主张，为了保证肉食供应，粮食分配时要考虑猪的饲料粮，但毛泽东听说后不以为然，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养猪可以不费粮。陈云这次下乡调查，也很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调查以后，他得出结论，养猪还是要用粮的，只喂草，某一段时期可以，长久下来就不行，每头猪少不了 100 斤原粮。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一个老农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那个老农说：“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

陈云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陈云的这个明确表态，开会的老农听了都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苗猪，妇女们把所有的小船都开出去抢捞养猪的水浮莲，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陈云非常高兴，他对调查组说：你们看，现在猪归私养，妇女养猪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她要是不养猪，收工回家，除了做饭，劳力就闲起了。这样算

下来，要闲下来多少劳力呵！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不然就是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7月12日下午，陈云一行完成调查任务，离开小蒸。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进行比较，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个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省萧山、江苏省无锡两县调查种植情况。

在杭州，陈云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随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很好。

此后，陈云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交换了意见。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的群众意见概括为四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3个专题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第十节　再上庐山，毛泽东提出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6月北京会议以后，毛泽东决定再上庐山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工业和城市调整问题。

庐山，景色多变，风诡云谲。庐山，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在不是一块福地。

中共中央曾先后在庐山召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是在1959年的夏季，结果是批判彭德怀，将彭德怀和支持他观点的人们打成“反党集团”；第三次庐山会议是在1970年的夏季，结果是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反目成仇，并随之进行了一番真正意义上的生死较量。所幸的是，毛泽东凭借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战胜了林彪，而林彪则最终摔死在异国荒野。

我们现在叙述的是第二次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61年8月28日至9月16日。

毛泽东上山前对他的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这次庐山会议重点是研究工业问题，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的。毛泽东这时认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意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了关于会议的情况汇报，对中央常委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

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来，我辩过去，需要。

的确，这次会议没有重蹈第一次庐山会议的覆辙。没有紧张气氛，没有批判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畅，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

庐山会议通过了几个重要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其中尤数《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最为重要。这个《指示》在讲到经济调整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毛泽东同意了会议形成的所有文件。但他多次流露出困难已到“谷底”的思想。他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

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

在谈到这几年的错误时他甚至说道：“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会上作《各地贯彻农业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他说：农村形势有好转，但问题还存在。群众反映“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粮食问题不解决，条条是空的。他说：今年的灾情比去年、前年都大。农业恢复要 3 至 5 年。他还说：现在看来，城市还没有发生问题，但是若不注意，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后也感到了不安：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谷底”。田家英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

庐山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为他的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一首旧体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渴望着摆脱一年多来的抑郁沉重的心情，重新回到亢奋的状态。

第十一节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体制基本形成

在 3 月份召开的广州会议通过的《农村六十条（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时所说的“队”，是指生产大队。虽然在那次会议上，邓子恢提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体制，但中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广州会议以后，《农村六十条（草案）》开始付诸试行。

在试行《农村六十条（草案）》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人民公社开始试行了扩大生

产队核算，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分配等办法。9月16日，中央庐山工作会议闭幕以后，毛泽东来到了湖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他报告了两个生产大队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一个叫“大队．委托生产队进行分配”，一个叫“扩大生产队核算”。实际做法是：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试行效果很好，解决了生产队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和生产大队为统一分配的单位的矛盾，瞒产私分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穷队与富队间的“一平二调”问题也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在经营管理上简便易行。毛泽东听了，连连称赞。

9月27日，毛泽东在邯郸，邀集河北、山东两省省委负责人和邯郸、保定、邢台、石家庄、张家口五个地委书记谈话。谈话反映“三包一奖”既繁琐，又没有真正解决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谈话还反映，河北一些单位创造了一种叫“大包干”的办法，来解决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既大大简化了手续，又使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很受群众欢迎。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当即表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10月3日，邓子恢受毛泽东的委托，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座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10月6日，邓子恢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座谈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问题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大家完全拥护主席所提人民公社所有权下放到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对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时土地、耕畜、农具、征购如何处理提出了建议。

中共中央同意邓子恢的《报告》，于10月7日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的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10月22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毛泽东问：你又要下去，下去干什么？

邓子恢答：下去搞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已经肯定了，不要试点了，就这样办。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不过这样办了，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去摸一摸就是了。

邓子恢说：现在有一种思想，以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思想要不得。我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几十年不变。即使几十年后要变到大队所有制，也不能是现在这样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大队基本核算问题，现在根本不考虑这件事。这是30年、50年以后的事情。

10月24日，邓子恢又带领工作组离京南下，经郑州、南昌时，听取了河南、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汇报。28日，来到他的家乡福建省龙岩。这是他1961年内第二次到龙岩调查。

邓子恢一到龙岩，就随工作组到东肖公社的后田、邓厝、孟头等大队搞基本核算单

位下放到生产队试点。经过10天的紧张调查工作，试点工作已接近尾声。11月9日，邓子恢向中央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

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

《调查报告》还对试点中牵涉到的许多具体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列举了10个方面。其中特别是关于生产队规模和生产大队的权力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关于生产队规模，报告说：一般都按照1956年初级社规模作了调整，20户到30户左右，也有十几户的，群众认为这样调整合理。

关于生产大队的权力，报告指出：今后大队主要负担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政权方面的工作；第二，党与政治工作；第三，联村社的工作；第四，办好大队企业。

对邓子恢的这个报告，中央认为很好，于11月23日批转了。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写道："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宣布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作为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至少30年不变。《指示》下达后，全国很快改变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

至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农村基本上恢复了1956年初级社时的经济体制。

第九章　应该结束了，其实并没有

第一节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讲话震撼着七千名与会者的心

1961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说：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刘少奇负责起草代表中央向大会作的报告。报告由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写出初稿，在刘少奇主持下反复修改，至1962年1月9日形成第一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主要领导10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准备。20日晚上，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讲到了形势与责任等问题。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重点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关于形势到底是好是坏的问题，毛泽东说，他感觉去年前年心情不那么很愉快，究竟国内形势怎样？做一个总分析，还是不错的。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

关于对过去几年如何看。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点错误，我们也把它总结起来了，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了，就变成了财富。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好。

关于责任。毛泽东责成中央书记处将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作一研究，中央书记处编了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指示两个本子，认为前者没有错误，后者毛病很多。毛泽东说，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出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

关于有没有希望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应该是有希望，是扎扎实实有希望，

是真正有希望，毛泽东主席的方法，他多次跟我们讲，就是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

1962年1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了为刘少奇准备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第一稿。

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始。这次会议的规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了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的,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2人,地委3人,省委4人,中央部委4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单位的负责人,加起来总共达7118人,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刘少奇代禄中央所作的报告。报告的初稿已经印出来了,长达4万多字。按以往的惯例,报告稿经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大:会上宣读。毛泽东这次提出一个新建议: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直接把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高层次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稿。

这样，"七千人大会"开幕后，首先就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修改后的报告稿准备在1月27日再次发给到会人员。毛泽东这时又提议，刘少奇的报告不要照念了，改为书面报告，大会上由刘少奇再放开讲一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阐述。

刘少奇原来没有打算在这一天讲话。毛泽东提议后，他立即着手准备，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的提纲。1月27日，在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提纲。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看，接力棒似地一页页传阅。好在总共只有10来张纸，字又写得很大，不长时间就传看完了。

7000多名代表早已在会场内坐定。常委们传阅完刘少奇的讲话提纲，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刘少奇用特有的深沉清晰、带湖南口音的声音开始了他的讲话：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他首先讲了全国目前面临的困难形势：

"实是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是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对于形成困难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

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那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的讲话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关于两个"三七开"的分析："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少奇在最后还谈到了对于"三面红旗"的总的看法："'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应当说，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相当有勇气的，特别是关于两个"三七开"的分析，对与会人员震动很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曾亲历那次会议的吴冷西后来评论道：

"少奇同志提出和坚持这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胆略、卓识和韧性，又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说服工作。经过充分的讨论，这两个观点先在起草委员会、后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只是在书面报告最后定稿时没有直书两个'三七开'，而是用比较委婉的词句来表达。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报告中列举成绩12条，主要缺点错误归纳为4条。关于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报告是这样写的：'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

第二节 毛泽东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但林彪的发言却别出心裁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刘少奇还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发扬毛泽东提出过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们所强调

的民主集中制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原则，但在经历了大跃进“一言堂”以后，提倡这样一种原则，其含义是耐人寻味的。

1月30日，毛泽东作大会讲话。他讲了很多问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任的应是我。”

毛泽东公开说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众多与会者很受感动，有人还激动的落下泪来。

在刘少奇讲话的两天前，即1月29日，林彪作大会发言。

林彪发言的主题是军事工作。但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谈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整个基调是颂扬毛泽东。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在议论缺点错误时，林彪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发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颂扬毛泽东的一番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毛泽东主席的警告、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泽东主席的话，体会毛泽东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

林彪接着说：“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泽东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

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泽东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泽东主席走。"

显而易见，林彪这些话并非以深刻总结经验为出发点，而是话中有话，言有所指。在大多数人都对错误进行反思，甚至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时，他偏要讲一番歌功颂德的话，而且把这番歌功颂德与"加强党的团结"联系在一起，其用心可谓良苦且深不可测。

会后，林彪把他的发言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称赞道："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毛泽东有一次私下问罗瑞卿："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回答道："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带着称赞林彪的口吻对罗瑞卿说："讲不出来，要学啊。"他还说："你们这次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报告没有提什么不同意见，但是，5 年以后，1967 年 2 月 3 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说：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显然，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针对刘少奇说的。

第三节　谭震林就"五风"问题主动检讨，承担责任

谭震林是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活跃的中央领导人之一，有人曾评论说他是大跃进中冲锋陷阵的带头人。

但是谭震林又是一个尊重事实、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对于自己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他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思考，逐步有了较深的认识。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后，谭震林到山西、山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八届七中全会贯彻落实情况。不久，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山西不少县和公社中的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建议对权力下放、算清账目、生产指标三个方面进行一次补课。

1959 年 5 月中旬，谭震林深入到湖南省攸县作调查。在调查中，他看到虚报浮夸现象很严重，便严肃地指出："算清楚只有 3000 斤，去年却报了 2 万多斤，多报了七八

倍。本来很漂亮，可是擦了那么多粉就不好看了。吹了一点牛皮，没有讲老实话，这是不应该的！”

通过在攸县调查，谭震林的思想受到进一步的触动。在同年5月召开的南方九省、市农业会议上，他对大跃进的问题和失误，作了认真的回顾。他说，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鸡、鸭都共了。第二是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否定了按劳分配，否定了评工记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是把劳动效率降低了。第三是浮夸风。浮夸是从1958年7月开始的，发展最高峰是大炼钢铁。第四是放“卫星”。你一个，我一个，互相比赛，毛病就出来了。第五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以公社为单位的统一分配。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是“拔白旗”。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坏作用。现在看来，无例外的全国的红旗县没有不出问题的。绝大多数的红旗县都是粮食最紧张的。

难能可贵的是，谭震林在分析了大跃进的失误之后，勇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他说：“这些问题，教训是深刻的，我应该负责。因为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不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他还说：“江苏提出‘敞开肚皮吃饭’，我把它作了介绍，我应该负责任。”

1961年年初，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4月，谭震林到河南省新乡七里营蹲点调查。通过调查，他的认识进一步接近实际。他在新乡地委民主办社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请你们再看看我在1958年写的论夏季大丰收的文章，在郑州农业书记会上的总结，在河南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9年在郑州谈争取小麦大丰收的问题，棉花现场会上的讲话，都是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尤浮夸风更为突出。所以说，我们中央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谭震林多次召集农办负责人开会，认真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并写出了书面检讨，亲自送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请他批交“七千人大会”。邓小平认为他早已作过数次检讨，中央已经承担了责任，不必再在大会上作书面检讨了，便将书面检讨批交他本人。

谭震林认为，中央虽然承担了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减轻自己的错误，承认和改正错误，可以使全党引以为鉴，便于今后少走弯路，把工作做得更好。于是，他先在农口分会检讨，然后将检讨稿批印给农林白各部党员科长以上干部。

在检讨中，谭震林着重分析了四个方面的错误：第一，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方面所以发生的错误，首先是在处理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方面。第二，几年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其危害是严重的。第三，由于单凭热情办事，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在生产方针、生产措施、生活安排等方面，都曾经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第四，在组织纪律方面的分散主义错误。最后，他沉痛地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改正自己的错误，做好工作。”

20多年后，他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中回顾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对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后期批“小脚女人”等一系列重大失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在分析

中他还讲到了自己。他写道："这件事情之所以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还因为在批'小脚女人'之后不久，我曾主管过一个时期的农村工作，我仍然没有从这件事吸取教训，没有当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参谋。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58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我在这里再次提到，以便同志们记取这个教训，使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

第四节　陈云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的调整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陈云说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话，谢绝了。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还曾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第一次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中还有这些话，后来修改稿几经改动，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全被删掉了。但是这句话毕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陈云受到了很大鼓舞。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除毛泽东、林彪离京外，其余的政治局常委都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后来人们就称这次会议为"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在分析国民经济状况和落实调整政策方面比七千人大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30亿元赤字。这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将十分危险。刘少奇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他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针对那种一味歌功颂德的现象批评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全面地谈了目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意见。他列举目前财经困难的主要表现，认为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同时，他

还指出了经济形势面临的其他几大困难：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把当时面临的困难讲得这么透彻、这么严重，是为了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从而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批评反冒进、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大家讲困难都要先把光明面多讲一点，以免被看作是“右倾”、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

但陈云还是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调整措施：第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第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第三，采取严格管理现金、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等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第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第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第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经过 3 天讨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参加会议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陈云提出的几项办法切实可行。刘少奇对他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国务院立即落实刘少奇的提议，通知 2 月 26 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传达贯彻西楼会议精神。到会的大多数是部长、副部长。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重申和发挥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部长们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了他们由衷赞同的心情。

当时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确定可行。会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时，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而且还对怎么写转发批语提了一些意见。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3 月 12 日、13 日，刘少奇再次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批转陈云等人的讲话和另外几个文件。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批转陈云等同志的

讲话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陈云当组长，陈云一再推辞，说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有意见时可以提。于是，当时确定李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组员。

在3月13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说，有人向他建议，恢复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请陈云任组长，李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李富春马上说，陈云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助手。会议就这么定了。

这次会议陈云没有参加，知道后他还是谦让。刘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通过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和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以后，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刘少奇还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

毛泽东看了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发出。

以后，此类事例越来越多，毛泽东越来越经常的不参加中央的会议，而会议的决定却都要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之后才能生效。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刘少奇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二线"与"一线"的关系。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二线"，并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处于"一线"的刘少奇来主持。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在八大修改后的党章中，还专门增加了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

1961年毛泽东在同熊向晖和浦寿昌谈话时特意讲到了党章中的这一条。毛泽东说："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

毛泽东的这段话主要是从接班人的角度来讲的，也就是明确刘少奇是自己的接班人。但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二线与一线之分其实并不很明确，这大概与"日常工作"与"非日常工作"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晰有关。在有些时候毛泽东也会由二线走到一线，比如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实施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调整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交给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自己退居二线到外地去了。而且在此后几年时间里，他没有再回到中央一线岗位上来，因此渐渐地与中央一线领导人疏远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他把一线领导看成是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2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加了批语转发各省市区和各部门。

陈云走马上任后，在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主张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当前主要是恢复。在情况清楚以前，甚至连第3个五年计划指标也可以不忙搞。陈云还主张对1962年计划也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4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陈云在讲话中还开始对总路线的理论基础予以否定。他公开对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同的。他提出，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觉得陈云经济工作的意见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于是，他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讲话和报告收集起来，准备印发有关部门学习和参考。

陈云对此曾几次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劝说道：“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看看。”

邓力群抓紧时间把陈云的13篇讲话和报告编印了出来，并写个1万多字的内容提要。为此，刘少奇特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推荐这些论述：

“主席：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4月19日，经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了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

第五节　周恩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安排经济调整

西楼会议后，繁重的经济工作使身体一向不好的陈云病倒了，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的重担实际上又落到周恩来肩上。

4月上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对1962年的计划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尽可能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尽可能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来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了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从原计划的投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经过这样的调整，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从原计划的1400亿元下调为1300亿元。中央财经小组讨论时认为，国家计委党组这个方案对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不平衡状况仍然认识不够，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按照中央指出的方向进一步暴露问题，没有斩钉截铁地大胆地提出问题。”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要按照陈云讲的“争取快，准备慢”，还要增加：“争取好，准备差一点”；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企业要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报告中提出了几项重大措施：第一，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规模。同时，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和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出口需要的工业项目继续建设并按时投产。第二，除砍掉10万个小高炉外，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和那些原料、燃料、动力供应不上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第三，继续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其中精简职工850万人，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

报告起草完成后，周恩来派薛暮桥送到杭州向陈云报告，得到他的同意。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调整工作，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同时提交会议讨论的还有周恩来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共105人。这次会议，后来通称为“五月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痛切陈词：“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

“从经济上来看，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利困难的形势。”“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

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是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现在还没有那种因为把困难夸大而使工作受损失的危险。将来可能有那种危险，但是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 5 月 11 日的会议上，围绕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有针对性地作了讲话，他指出：中国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扭转好的，只能逐步扭转。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调整要成为一个阶段，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第三个五年计划还可能不够。在调整过程中，首先是恢复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调整。调整的方针是"按照短线，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

周恩来认为，农轻重的次序现在是严重失调，这一点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现在更表现出来。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这个关键来调整。

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向全党明确地摆出了问题，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针，确定了进一步调整 1962 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薄一波回忆道："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又比西楼会议深入了一步。有的同志在会上表示，面对困难，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把国民经济调整好。"

五月会议在扭转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第六节　为了摆脱困境，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

五月会议前后，围绕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有一个问题成为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并对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

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 60 年代初在我国农村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最初出现在安徽省农村。

安徽是大跃进比较积极的省份，后来农村困难形势也表现得极为突出。

1960年初，安徽省宿县一个农民向公社要求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父子俩开荒16亩，收获3300斤粮食，扣除自用，上交粮食1800斤、现金60元。他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向有关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省委了解到这个建议，震动很大，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汇报，柯庆施只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1961年2月，柯庆施路过安徽省全椒县古河镇，几个老农向他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并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安徽省委派一个工作组搞的联产到户试点，也受到农民的欢迎。3月6日，安徽省委讨论了试点情况后，请示了毛泽东，决定全面试行“责任田”的办法。

1961年3月15日、16日，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表态时也只是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使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的其他负责人：“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这边曾希圣正在兴奋不已，那边已经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了。

广州会议期间，田家英将安徽省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田家英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要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时候，又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

田家英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的。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

中南局书记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

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他主张不要急于表态，先派人去调查再说。

在会上，田家英的观点代表了会议的主要看法，曾希圣不再喜悦。他不得不再次给安徽省委打电话，通知暂停推行，同时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解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不是1959年受到过批判的“包产到户”，争取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这一次，毛泽东又是没有表态。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体了解包产到户办法对粮食生产的作用，陈云让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安徽省调查。于是粮食部派出周康民带队前往安徽省。调查的结果，认为他们有五个统一：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大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不是单干，是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份调查报告以“简讯”的形式上报中央。

由于农民和基层干部已经在实践中尝到了包产到户办法的好处，此时想刹车也不容易了，包产到户的办法迅速推广开来，安徽省委也一再向中央解释，极力辩明他们的办

法与1959年包产到户的区别。1961年7月，曾希圣在毛泽东来安徽省蚌埠时当面汇报，毛泽东勉强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随后，包产到户办法在安徽全省推广。不久，河南、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省部分地区也相继出现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

在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曾希圣没有附和，他对毛泽东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终于因安徽省“大跃进”中刮“五风”受到批判，又说他主张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被撤了职。

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省韶山等地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

3月底，田家英等人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人民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同时同调查组的人辩论到深夜。田家英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家英便组织全体组员进行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田家英当时心里很矛盾。他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通过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关重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轻举妄动。

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去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在上海，碰巧，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同时将有关调查报告送给毛泽东和陈云。得到的反应却迥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在此之前，田家英已经把在刘少奇老家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真地看了，也认为很好。而毛泽东却反应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一次明确表态。

包产到户的问题，自然也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的重视。他两次派人到安徽省农村考察，并根据考察所得的结果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1962年5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子恢在谈农村工作问题的发言中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借冬闲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他说：“我认为，当前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过去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危险，我看也有点太夸大了。因此，可以适当扩大小自由。”“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干部是我们的，国家

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以后，他又应邀在军委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作报告，多次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邓子恢提出的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在中央领导人当中认识也不一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没有展开讨论。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一问题，当时他只讲有些零星的生产可以包产到户。但由于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且涉及全国的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毛泽东不在北京，在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为慎重起见，刘少奇没有在正式场合明确表态。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也只是说：邓子恢同志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再来讨论。

为了让毛泽东了解当前农村的情况和问题，并支持解决这些问题，邓子恢把他在会议上讲的问题，写成报告，于5月24日送给了毛泽东，也送给了中央。

在会议期间，邓子恢还收到了安徽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一封来信，向他保荐“责任田”。来信说，符离集区从1961年3月开始试行“责任田”办法，粮食产量当年增长18%，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到1962年3月，省委却又作出了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说这个办法是迎合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我们对这个决议进行了多次学习和讨论，思想仍然不通。恳请调查了解，弄清情况，予以解决。

接到这封信，邓子恢反复思考。因为1961年3月在中央广州工作会议期间和5月路经合肥，他都听曾希圣说过“责任田”是个好办法。可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批判，名义上是因为“五风”错误，实际上也有“责任田”问题。安徽省委改正“责任田”是毛泽东的意思。他感到问题棘手——过问吧，毛泽东面前怎么交待；不过问吧，下边的企盼要落空，与当地农民生死攸关的“责任田”要夭折。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下决心，派工作组去安徽省调查“责任田”问题。5月25日，由中央农村工作副部长王观澜带领的工作组到达淮南当涂。

6月16日，邓子恢收到了王观澜写的调查报告——《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报告说：当地80%生产队的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由于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报告还说：责任田还解决了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料、争时间的矛盾。

邓子恢看了报告，认为既然大多数生产队责任田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就不应全盘否定，而应总结经验，加以提高。为稳妥起见，他又叫工作组到淮北宿县，就是曾经写信给他的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所在县，再作调查。

田家英的调查工作也在继续进行中。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田家英派出两位工作人员又赶赴包产到户搞的比较早的安徽无为县去进一步开展调查。他们调查的结论大致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但是，将来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就可能要受

到限制。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讲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从5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到东北视察工作。6月26日，周恩来从东北回到北京。他多次去看望陈云，就恢复农村经济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也赞成陈云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意见。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关于安徽省"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省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派各占一半。邓子恢说："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做到"五统一"，怎么能说成是方向性错误呢！"责任田"就是社员劳动和产量直接结合起来。加强了社员责任心，是找到了搞好集体生产的一条出路。

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他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邓小平还引用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民谣："黄猫、黑猫，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

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可以由中南局搞一个包产到户的文件，将来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时再议。

6月底田家英一行人回到北京。田家英回到北京后，立即就农村调查中遇到的问题向刘少奇作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们中间酝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家英不要说是他的意见。接着，田家英又向邓小平报告了有关情况，邓小平的话不多，但很干脆："赞成"。田家英还向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同。在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田家英开始起草政策性文件，题目初拟为《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

7月初，邓子恢又收到了一份安徽省宿县符离集区委全体工作人员写来的《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汇报》对"责任田"更带理论性和系统性，其中列举了7条理由证明"责任田"方向是对的，列举了10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得很。邓子恢读着这份汇报，越发感到"责任田"是个创造，为搞好集体生产找到了出路。

第七节 中南海游泳池，毛刘之争，惊心动魄

要想将包产到户在全国普遍推广，就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与批准，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

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田家英也决定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他此时有些兴奋，但心里也有些不安。因为事情虽然看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究竟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还要通过关键的一个关口，那就是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似乎觉得比较有把握，因为几位中央常委几乎都支持搞包产到户，至少是不反对；但是他心里又有些嘀咕，不知道毛泽东现在的态度究竟怎样。他知道提这样的建议是要担风险的，但他不顾个人得失，终于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这时，毛泽东正在河北省邯郸视察工作，田家英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从这句话里，我们已经微微感觉出毛泽东的不耐烦的心情了。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被召见，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他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泽东突然向田家英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意见。没有表态，这就是一种态度，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田家英从游泳池回来，情绪不大好。他说："主席真厉害。"意思是说，毛泽东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使他当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泽东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要害，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迫使对方无法含糊其词，无法回避问题的实质，非把自己的观点确定而鲜明地摆出来不可。

当天夜里，毛泽东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他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样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会议，田家英参加了，还有陈伯达。毛泽东终于说话了，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会上，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从此，田家英这位跟随毛泽东几十年、深得毛泽东器重的才子，日益被毛泽东所疏远，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最先受到批判，并成为这场运动中继邓拓之后第二个自杀身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

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是受到刘少奇影响与支持的。但他为了不在两位主席之间造成裂痕，把全部责任都自己承担了下来。这种品格受到后人的称赞。1980年3

月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田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邓力群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还专门讲到了这件事：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当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家英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保护同志，不惜牺牲自己，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

在批评了田家英之后，毛泽东接着通知刘少奇到中南海游泳池来谈话。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记得父亲对他讲过游泳池里的那一幕：

"刘赶到游泳池时，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动，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也冷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刘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以为得到理解，总算长舒了口气。"

7月17日，邓子恢应约去见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态度已经大致明朗化了，但邓子恢还是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谈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工作人员《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的内容，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明确说："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不是单干；"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只是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才说了一声：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在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后，刘少奇收回了自己的意见。7月18日，他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淡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够巩固，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于干部，要求单干，要求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工作的、到地委和县委工作的同志，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也就是在刘少奇已经公开表态不再支持包产到户的这一天，邓子恢又收到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组从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和城关区刘合大队发来的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与上次王观澜的调查一样，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报告说：由于粮食显著增产，群众感到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我们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书记都认为，包产到户责任田，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找到了一条出路，是增产粮食的

最好办法；他们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他们试验三年，粮食过了关再改。邓子恢越想越感到，安徽省的责任田有“五统一”，不是单干；不但不是单干，而且正是搞好集体生产，防止单干的好办法。对安徽省的责任田应重新评价。

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整理成材料，供中央北戴河会议之用。工作组的陈正人、王观澜、郝中士等人，都劝他调查报告暂时不要送了，中央北戴河会议快开了，看看情况再说。他很生气地说：“责任田”是于民有利的事情，等到北戴河开会，就晚了。于民有利，怕什么！你们怕，我不怕，不怕丢乌纱帽！

7月22日，邓子恢把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写的《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调查》和《安徽省宿县城关区刘合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送给了毛泽东。

第八节　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风声从此一日紧似一日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

会前，中央发出通知。在这个经过刘少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通知中，规定这次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目前农村中的一些问题；第二，粮食问题；第三，商业工作中的问题；第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通知还列举了41个与此有关的问题，请各地准备意见。

显然，按照刘少奇的计划，是要开一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

7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先后来到北戴河。中央各部门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陆续抵达。

在会议开始之前，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邓还在坚持着他的主张，他向毛泽东再次保荐安徽责任田。他直言陈述自己的观点，试图说服毛泽东。他说：责任田不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

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没有说服毛泽东，反而惹得毛泽东极为生气。后来，9月25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讲话谈到“单干风”时，毛泽东插话说：邓子恢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

7月25日会议开始。会议围绕着几个文件的初稿按部就班地讨论。内容涉及形势、农村包产到户、甄别平反等等，虽小有争论，但总的说比较平静。

8月6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完全打乱了会议的原定日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会议的气氛。毛泽东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插话说：单干风从何而来？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接着，在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书记等20多人参加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观点，严厉批评“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样，会议改变了原定议题，转到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开展对“黑暗风”、“单干风”的批判。

毛泽东在前段时间与刘少奇在游泳池交锋时，就指责“西楼会议说得一团黑暗”，现在批判“黑暗风”，显然就是指这件事。至于“单干风”，无疑是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支持包产到户一事。这两件事，都与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直接相关，因此刘少奇便不得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在8月11日的中心小组会上，刘少奇说：“形势问题，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次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批判“单干风”重点是批判邓子恢。8月9日的中心组会上，李井泉揭发邓子恢6、7月间的几次报告有问题，会上就把邓子恢6、7月间的几次报告记录稿拿来批，硬说邓子恢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是代表富裕中农阶层搞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邓子恢不得不申明：这些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有些记的与讲的有较大出入。

陈伯达批判说：邓子恢同志对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有许多荒谬的说法，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实际上他要求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柯庆施批判说：邓子恢同志他是赞成以农业为基础的，因为他是管农业的，但他思想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认为目前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最先进的，他这个思想是十二年一贯制，所以实际上他成了富裕中农的代表。

邓子恢在8月11日的中心组会上开始做自我批评。他说：6、7月间的几次讲话，

说到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有各种不同形式，有些是属于所有制的改变，已成为单干；有些介于集体与个体之间；有些则仍然属于集体经济范畴，是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应区别对待，如果仍属于集体经济是应当允许的，是方向性的错误，也是我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上主观片面、组织上无组织无纪律的具体表现。这是 1955 年以来又一次大错误，应该向党作检讨。

邓子恢虽然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在 8 月 12 日一个文件上的批示，仍然对邓子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 1955 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 1950 年至 1955 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后来，他在会议上又多次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1962 年包产到户的文件就这样胎死腹中。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才大规模地在全国农村推行开来。但此时，田家英、刘少奇、邓子恢已先后离开了人世，中国农业的发展整整耽搁了 20 年之久。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会议决定，紧接着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中央办公厅重新按照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范围调整出席人员，把开会地点移往北京。

8 月 26 日至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期间，又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彭德怀分别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请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这两封信被认为是翻案，是向党提出挑战，在会上受到严厉批判。二是，批判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这两件事在会上被称为是“翻案风”。

9 月 23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在 24 日的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可以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再次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26 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再一次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今年五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他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要划个范围，“不要都卷人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两次提出对会议精神的传达要划个范围，只传达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不向下传达。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毛泽东说：“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全会规定会议精神只传达到 17 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不向下级传达，也不开展全党讨论。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了。全党全国的工作在会后呈现一种复杂的“两张皮”的情形：政治上，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扩大化越来越严重；经济上，调整工作基本上照常进行，生产逐渐恢复和上升。

结束语：
二十年后辨是非　三面红旗尘埃落定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以“多”和“快”为主要特征的“总路线”事实上已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大跃进运动也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而基本划上了句号。但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取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三面红旗”在理论上仍然被肯定。

1966年5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多次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在这场历时十年的动乱中，“三面红旗”在理论上得到了大力颂扬，而在历史上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提出过批评意见，或采取过抵制行为的人们，则被戴上“反党”、“修正主义”等帽子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许多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重要人物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受尽折磨惨死于开封；1971年12月14日，邓子恢受尽磨难与世长辞；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遭受残酷迫害后含冤告别人世；1976年1月8日，过度劳累的周恩来在北京病逝。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带着他的满腹未了心愿撒手人间。同年10月6日，在粉碎“四人帮”的夺权阴谋后，华国锋开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由此结束。

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都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关于“三面红旗”，人们仍坚持原有的认识与主张。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领导职务。邓小平的复出，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此前，他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讲：“‘两个凡是’不行。”

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只有7000字的文章，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

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的讨论招致了“凡是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思想。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场大讨论。邓小平在同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禁区”从此被一个个突破。

就人民公社而言，改变局面的突破口，仍然是那个“包产到户”的问题。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尽管省委号召全省人民“倾家荡产，奋力抗旱”，但全省农业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由于秋季无收，秋后大批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灾民离家乞讨。

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渡过这场特大旱灾的对策。时下正值秋收秋种季节，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土地将被搁荒，来年的境况将不堪设想。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阻止外流，留下搞生产，便成为摆在省委面前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显然，不给农民以土地的自由使用权，而仍采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学大寨”运动的做法，已很难奏效。而给农民少许土地的自主，势必会诱发包产到户的出现，这是被严厉批判和明令禁止的。

人命关天，当时全面主持安徽工作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会上动了感情。他激动而又朴实地说：要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能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大片的土地搁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渡过灾荒。

经过讨论和激烈斗争，省委做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规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这项为战胜死神而作出的大胆决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扭转了被动局面。同时也直接诱发了包产到户的新政策。

安徽省委的做法招来了不少非议，有人提出：“借地”调动起来的不是集体主义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这样做是违反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的。

面对种种责难，万里回答说：土地种上庄稼总比抛荒强，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贯彻执行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也要和各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照搬照套，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教条，那不但不是组织纪律性强，而且还是对革命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就在安徽省委为度荒而研究对策时，肥西县山南公社的一些农村，自发的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附近不少大队起而仿效，包产到户迅速在山南等公社掀起热潮，在肥西县扩展并涉及到其他县。

指责很快就到来了。9月20日，一封署名“人民群众”的匿名信送到了万里手中，这封信尖锐地指责肥西县搞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是曾希圣阴魂不散”。万里将这封信转交省农委，要他们调查研究，不要急于表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全会进行的增选中央领导中，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这次会议标志着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局面的结束，邓小平开始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全会原则通过了两个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农业文件肯定了在一些地方出现的联产计酬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称这两个文件是“抢救农业、富国裕民”的好文件。

1979年春天起，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中的农民们，三家五户地结为一个小组，将人民公社的耕地依照优劣不等、面积大小以及远近不同，重新划块分界，实行起了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等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这一年春耕开始的时候，至少已有200万个大队，推行“划分作业组”，有3亿多社员参加了这一行动。

但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禁区并没有消失，争论仍很激烈。

1979年2月2日，安徽省委派出工作组到肥西县调查包产到户问题，6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工作组汇报。万里在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后说，我主张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试验一下，如果试验成功，最好不过，如果试验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没什么可怕。会议在万里主持下，对山南公社包产到户统--了认识，结论是：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再看看，秋后再总结，让实践检验是否正确。

如果说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是省委认可默许而公开搞的，那么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则是“瞒上不瞒下”的秘密进行的。

1978年冬天，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20户人家划分成4个包干组，不久又分成了8个小组，每组只有两到三户，但仍矛盾重重，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还是干不好。12月的一天夜里，生产队召开社员会，商量解决矛盾，把生产搞上去的办法。穷透，了底、在饥饿中求生的小岗人，斗胆秘密商定，把全队的耕地按人均分到户，并诅咒发誓，一致同意通过了三条保证：(1) 实行包产到户不许向外透露，要严守秘密，“瞒上不瞒下”；(2) 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装孬；(3) 如果干不成，干部为此坐牢，全队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然后，门个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了手指印，3个农民盖了图章。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小岗的秘密很快就让外面知道了。公社知道后，让他们再把户并到组里干，但小岗人硬是不并。县委书记了解了内情后，也来了个“瞒上不瞒下”，他说：小岗已经穷“垮”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

这年夏天，万里亲自来到风阳。他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亲眼看到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种粮积极性格外高涨后，对这种做法给予了支持。

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提高到12万多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上交粮食的小岗生产队，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

了贷款。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围绕安徽省代表作的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性质。如果放任自流，不加以坚决制止，继续滑下去，人心一散，就会丢掉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包产到户调动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治穷的办法多得很，何必非要包产到户，而且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写到《宪法》上的，搞包产到户既违反了中央文件规定，也违反了《宪法》规定。

1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华国锋在讲话中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这次会议结束后，万里奉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他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引起的争论。

正当包产到户争论沸沸扬扬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站出来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

4月，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又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省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在几个月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将自发状态的包产到户加以总结提高，以倡导全国的农村工作。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后，中央于9月27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当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 75号文件。《通知》指出：“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是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产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不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是中央文件首次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了。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也涉及到了“三面红旗”。

关于总路线，《决议》说：“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

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关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决议》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这个决议使全党对“三面红旗”有了统一的认识。

人民公社的堤坝正在被一点点地冲溃。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1982年1月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这是第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便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几年来的争论做出了结论，给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

1982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在两会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的文件，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于1983年1月2日作为中共中央1983年一号文件印发，这是第二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在承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这一制度的同时，还提出现行的人民公社体制要进行生产责任制的改革，逐步实行政社分设。文件说：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骤的改为政社分设，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推广开来，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农村从此开始了真正历史性的变革。到这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3%，有12000多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为了稳定农村改革，及时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忧虑，进一步解放思想，以促使农村商品生产更加蓬勃发展，在分析1983年一号文件贯彻以来农村出现的新形势的基础上，确定1984年农村工作方针，1984年1月1日，中央发出1984年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这是第三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针对农民怕变的忧虑，文件宣布：延长土地承包期，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

1984年，又有近4万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中央1985年一号文件。这是第四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二号文件”。文件针对农村经济改革前进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了十项政策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改革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

市场计划。同时，文件还郑重宣布：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这一年所余的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中终于寿终正寝。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政权职能由重新成立的乡政府行使，经济职能交给了新建立的经济管理委员会行使。“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都不复存在。我国农村不同层次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它们均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相互之间是建立在平等互助、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交往关系；原来的生产关系上的逐步过渡也不再存在，而是根据生产的需要，开展各种经济联合和合作，并且打破了公社内部划地为牢、限制生；力各种要素进行自由流动的框框，允许集体和农民个体的资金、劳力、技术等要素进行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此，“三面红旗”落下帷幕。

第五篇

农村人民公社史

第一章　兴　　起

第一节　农业生产“大跃进”

1958年我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是“大跃进”高潮的产物。要研究农村人民公社的历史，就必须对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进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开始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的15年左右大大提前，取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高速度，这使他感到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应加快速度。

还在1955年底，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认为，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加快。

根据上述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1956年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任务和“多、快、好、省”的要求。社论认为，“在农村，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象到的巨大的生产力”，“这个事实，把所谓‘农业的发展必然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中国人口太多是件坏事’等等悲观论调一扫而空”。而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重工业、轻工业加快发展，以便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和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料，同时还要求科学和技术的水平大大提高，“在不太长的期间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社论还强调，保守主义思想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是妨碍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

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下，农业和工业等部门相继修改了原来的发展战略目标，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改为1962年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导致了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再增加，造成了资金、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

的严重不足，致使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

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出现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盲目冒进，使负责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分着急，于是他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一起，决定在经济工作中开展反冒进。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厂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同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尖锐指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刘少奇等人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冒进思想在上上下下各系统的干部中都存在，下面的急躁冒进许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才能正确地前进。这样，反冒进引起了全党的重视，冒进的势头基本上得到了遏制，保证了1956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随后，周恩来等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继续贯彻了反冒进的思想。周恩来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强调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反冒进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倡导的反右倾保守主义导致的急躁冒进而展开的。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不是很赞成，但他当时对反冒进采取了相当克制的态度。1956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追加1956年的基本建设预算，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反对。在会上，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的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亲自去找毛泽东，说自己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去了外地。上面提到的那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刘少奇修改后曾提出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接到稿件后，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反冒进是有看法的，但他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这个时候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反冒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开展反冒进之时，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同时也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紧接着出现了东欧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合称"波匈事

件")。"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国际形势的观察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上，对于国内进行的反冒进无暇顾及。同时，毛泽东是一个讲究策略的人，他觉得对反冒进有进一步观察的必要。1957年春夏间，他又忙于发动整风运动及由此引发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9月、10月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此时"波匈事件"已经平息，社会主义阵营暂时得以巩固；经过精心组织和广泛动员，反右派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是，毛泽东把注意力再次放到了国内经济建设，而反冒进从根本上讲同他此前提倡的反右倾保守的主张是相悖的。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决心反"反冒进"了。

毛泽东决定反"反冒进"，其实与"波匈事件"和反右派斗争也不无关系。整风运动开始后，曾有个别人利用党内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搞糟了，甚至出现了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的奇谈怪论，从而促使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借口。他在1958年3月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写的按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毛泽东还认为，波兰、匈牙利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这时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不巩固的原因，关键在于经济不发达，物质基础不牢固。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本来是正确的。但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经济，四平八稳不行，一般的速度也不行，唯有较高速度，唯有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工农业产品超过英国、美国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本来就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而右派的进攻在他看来又与反冒进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他也就不可避免地把反冒进的"促退"作用看得十分严重，从而决心通过对反"反冒进"来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以此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并于10月25日公布。"四十条"提出，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在全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

10月27日，《人民日报》配发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社论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于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社论还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媒体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动员，也是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此前的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首先要反对保守思想"，在这年冬季，集中力量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运动，使之"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开展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份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就这样，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正式启动。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期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很有信心地告诉毛泽东：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苏联老大哥要在15年内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既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兴奋，也使他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他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当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竞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回答：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的时间超过英国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他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而按计划中国再过15年可达到4000万吨钢。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用15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在同国内领导人商量后，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公开表示，中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达到1000万吨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达到2000万吨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他还认为，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提出15年赶上英国的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他曾说过："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问题是"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被提前，结果欲速则不达，搞起了得不偿失的"大跃进"。

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

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把全国发动进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毛泽东还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冒”一点。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欣赏。1958年5月25日，他给参加此间政治局会议的人员的信中说：“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接着，他主持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并于12月12日公开发表。社论说：“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随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在1957年12月底至次年初的杭州会议、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提出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则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打击了群众。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不得不一再违心地做检讨。通过这些会议的发动，加上宣传媒体的推波助澜，“大跃进”的浪潮很快席卷神州大地。

第二节　人民公社的酝酿

随着“大跃进”的启动，全国人民以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雄心壮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工农业生产中，全国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景象。但是，当年对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正确地加以运用，而是片面地将

群众的生产热情同现实的生产力等同起来，想当然地认为我国工农业生产将有一个飞速的发展，原来的工农业生产计划已大大落后于形势，必须对计划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了出来。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提前实现几个月前刚通过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问题，要求在今后五年到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定十二年实现的指标。他在会议期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他还说：“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实验。”后来的问题恰恰是许多方针、措施的提出根本没有经过实验。南宁会议还提出了“两本账”的问题。所谓“两本账”，就中央而言，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就地方而言，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地方的第二本账就是地方期成的计划。期成的计划指标总是要高于必成计划指标，加之各级都搞自己的“两本账”，各种计划也就被层层加码，指标被层层拔高。如果有人对高指标、“大跃进”持怀疑态度，就被指责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这些人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开展“插红旗、拔白旗”活动。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一旦不能完成，许多地方就只得采取假冒浮夸的方法去应对。

南宁会议后，浮夸风便开始出现。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的省委提出，用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四十条”的目标。河南省委则要求全省在当年麦收前实现水利化，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等“四害”，在年内达到“四十条”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一直是粮食调入省，但辽宁省委提出要在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广东省委提出，到1962年要实现全省粮食平均亩产800斤的目标，1967年达到1000斤。江西省委则提出了“十年规划，五年完成”的口号。毛泽东对河南的部署虽有怀疑，但认为危险不大，只要求不要登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

伴随高指标的提出，以“放卫星”为特征的浮夸风盛行起来。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受此启发，一些地方把自己假造的所谓“高产典型”称之为“放卫星”。

1957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广东省汕头专区早在1956年就成为全国第一个亩产800斤粮食的专区，这个专区的澄海县，则达到了亩产1257斤。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北省邢台市南园村红光一社亩产粮食1112斤，这个地区有7个社亩产过了千斤；沧县地区（今为沧州市）黄骅县井子村900亩水稻平均亩产1023斤，其中有40亩亩产1500斤。这是“大跃进”运动中的第一批“高产典型”。不久，随着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深入和“大跃进”高潮的到来，所谓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声称，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过了四天，这个农业社又放出了一颗亩产3530斤小麦的“卫星”。从此，“放卫星”之风遍及

全国，“卫星”越放越多，也越放越大。从6月上旬到11月中旬，仅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的各种农业“卫星”就达39次之多。至于各地方报刊推介的“卫星”更是难以计数。“卫星”的产量也就有了亩产水稻13万斤、亩产花生5万斤、亩产芝麻7000多斤、亩产茶叶1600多斤等等。于是，一些违背客观事实、甚为荒唐的话语也出现在党报党刊上，如“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有的报刊还专门发表文章，大张旗鼓地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

随着一颗颗高产“卫星”的冉冉升起，农作物产量的统计数据也不断攀升。1958年6月中旬，华东协作区农业协作会议宣布：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季收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7月23日，农业部发布公报：当年夏粮空前丰收，总产量达到5050万吨，比1957年增产2065万吨，增长69%。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宣布中国的小麦（包括春小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9月30日，新华社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3.5亿吨，全国大部分地方的粮食总产量基本实现了“四十条”规定的1967年的指标；大豆、花生、油菜、芝麻等主要油料作物总产量将达到2000万吨，比上年增长50%以上；皮棉总产量可达350万吨，大大超过美国。

在各地农业生产“卫星”争相竞放之时，一些农村还创办了“红专大学”、“农业大学”；由于组织所谓“大兵团作战”，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按团、营、连的编制进行“共产主义大协作”，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公共福利事业也开始出现，中国农村的确出现了一股热火朝天的新气象。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党的领导人一方面为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鼓舞，一方面又感到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已空前地发展起来，农村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农村的基层组织结构的变革问题。

1958年3月20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向毛泽东报告说，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十分振奋，亲笔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推介文章。文章一开头，他就以饱含激情的笔调写道：“‘一个苦战三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里所说的“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指的是“大跃进”发动之初确定的十五年超过英国，然后再赶上美国的时间。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面貌即将发生巨大变化是充满信心的。实际上，他此时已在思考在我国农村如何尽早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

1958年4月下旬，刘少奇去广州向毛泽东汇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据刘少奇后来自己讲，在火车上，他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吹公社，吹乌托邦，还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要为共

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此外，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车到郑州时，刘少奇还对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一个“吹”字，充分反映了领导人的兴奋心情。

在广州，毛泽东向刘少奇等人谈了他对于农村发展的设想。在1958年5月19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将这些设想透露出来了。陆定一在发言稿中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杨之华等谈话。刘少奇说：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青年团代表都讲了公共食堂问题，江苏常熟普遍办起了农忙食堂，可见大家趋向共产主义。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这将来会统统要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么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庭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因此，他是主张消灭家庭的。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的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的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但家庭还是个消费单位。他又说，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完全可以设想，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提出，三四十年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实验。恐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7月7日，在视察北京市通县（1997年改设通州区）时，刘少奇又说：磨面、做饭、带孩子、缝纫、洗衣这些事实现集体化，这就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生产集体化了，生活也得集体化，否则就和生产集体化不相适应。为生产服务的事业集体化，跟生产集体化配合起来，这就算共产主义的开始。7月19日，在同天津地委的谈话中，刘少奇还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

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社会。

就在这个时候，党的领导人关于农村基础组织的设想，由毛泽东的秘书、新创刊的《红旗》杂志的总编辑陈伯达透露出来。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文章在介绍湖北省鄂城县旭光一社土法办小工厂的经验时说，这个合作社是"把一个合作社变成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党的机关刊物第一次使用"人民公社"一词。

同一天，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在演讲中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这篇讲话随后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题，发表在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

这两篇文章，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58年8月4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在信阳地委召开的公社现场会的讲话中说："在目前并大社中出现了一批公社，或类似公社的组织，陈伯达同志在《红旗》上写文章提出公社这个名子(字)，我们也很同意用这个名子（字），从提法上讲可以叫做人民公社。"8月22日，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也说："(人民公社化）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自留地归集体，大搞公共食堂，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这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公社的雏形，但还没有肯定的统一的名称。在农村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在城市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直至《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同志所写《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证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后，才明确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开始的是遂平县卫星社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接着全县实现了公社化，以后很快在信阳、新乡地区全面展开，其他各县都进行试办。"

在党的领导人开始构想中国农村新蓝图的时候，广大农村的社会组织正处在变化之中，出现了联乡并社的势头，导致了一大批超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生，并由此催生了人民公社。

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毛泽东早在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就有过考虑。1955年12月，他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在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所写的按语中说："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的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由于不恰当地强调大社的优越性，结果1956年上半年办起的一些高级社，规模都比较大，安徽省有16个农业生产合

作社超过了3500户，河南省有495个1000户以上的大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过大，给生产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容易造成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成为1956年秋后部分地区出现农民闹社、要求退社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于1957年9月14日作出了《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出："根据一年多的经验看来，在多数情况下，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合作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对于农业生产管理的好坏，关系很大，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种种特点，又由于目前农业社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高，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农业生产条件的。"并且强调："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了之后，应该宣布在十年内不予变动。"可惜的是，这个"十年内不予变动"的规定，仅过半年就改变了。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伴随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开展，尤其是一些大中型水利设施的动工，土地、劳动力的使用等方面原有的社、乡界限被打破。一方面，较大规模的农用水利设施常常是跨社、乡甚至是跨县的，而且难免出现水利设施建在甲乡甲社，使用甲乡甲社的土地和劳动力，但受益的却是乙乡乙社的情况，社与社、乡与乡之间时常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大中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又往往单靠一乡一社难以建成，需要社、乡间的合作。为此，一些地方打破社、乡间的界限搞起劳动协作，一些干部也产生了将若干小型合作社合并为较大规模合作社的想法。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并提出了"并大社"的想法。

根据毛泽东"并大社"的思想，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并于4月8日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意见》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几个条件：一是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二是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三是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四是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意见》还提出小社并成大社后，一个乡领导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适宜的，但如果乡的规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大乡。

1958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的报道。报道中说，为了解决这个一乡一社小单位的人力物力与农业生产"大跃进"不相适应的新矛盾，福建省闽侯县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把城门、下洋、龙江三个乡合并为一个乡，把二十三个农业社合并为一个社。"在大规模的农村技术改革运动中，对各项大的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全面合作，提倡社与社之间互相协作、相互支援。并且由驻各乡的县、区干部等组成联合工作组，指挥各社的技术改革运动和当前生产活动。"同一天的《人

民日报》还以《编辑的话》的形式，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并为大社的意见》中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

1958年6月底7月初，晋、冀、鲁、豫、陕、京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社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为了适应农业更大的跃进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需要，小社应当适当并大。"关于大社的规模，会议认为，一个社以1000户到2000户比较适宜，有的地方还可以小一些，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大一些。

在此前后，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在各地相继开展。到1958年5月下旬，辽宁将全省9272个合作社合并为1461个社，基本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有2000户。最大的是盖平县花园坨乡由7个社组成的大社，这个大社长宽都有20多公里，总共有1.8万多户，9.5万多人，简直相当于一个不很小的县。河南将38286个社合并成2700多个社，平均每社4000户左右。该省信阳地区在7月间将5376个小社合并为208个大社，平均每社8000户。北京郊区农村由原来的1680个社合并成218个社，平均每社1600户。

各地合并起来的大社，开始时名称各不相同，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有的叫"共产主义农场"、"国营农场"、"合作农场"的，也有称为"公社"的，如浙江省诸暨县城南乡1958年6月中旬成立的大社称为"红旗共产主义公社"，辽宁省安东县（1965年改名东沟县，1993年改设东港市）前阳地区五个社合并的大社叫做"前阳公社"。不久，这些合并成的大社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人民公社。当然，人民公社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而是农村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第三节 究竟谁是第一个人民公社

研究农村人民公社的历史，不能不提到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

嵖岈山地处遂平西部。"大跃进"开始后，这里和全国各地一样，也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高潮。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社与社之间围绕用地、劳动力使用等方面出现了一些矛盾，乡社干部和群众由此产生了并社的想法。1958年4月15日，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兼专员（遂平县当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张树藩和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到嵖岈山地区检查麦田管理和卫生工作，地处嵖岈山的杨店、土山等乡的干部在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并大社"的请求。4月18日下午，杨店、土山、鲍庄三个乡的男女社员8000多人，抬着申请书，汇集到杨店街，向地委领导申请并大社。张树藩当场答应了群众的要求，但提出必须搞好当前生产和除"四害"工作。群众当即散去。

4月18日这天，嵖岈山大社并没有正式成立。于是，这三个乡19个社再加上邻近的槐树乡7个社、玉山乡3个社、张堂乡1个社的社员共计1.5万多人，于4月20日再次集会杨店街，要求上级同意他们并大社，遂平县委当即同意了社员的请求，批准杨

店、土山、鲍庄三个乡19个社和张堂乡友谊第八社共20个高级合作社合并，并按照群众的要求，取名为“卫星集体农庄”（又叫“卫星社”），当天召开成立大会，选出了农庄主席、副主席和管理委员。

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总面积18189平方公里，共6566户，30131人，设有社员代表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管理委员会中又分设了工业、农业技术、林业、畜牧、财经、文化卫生、水利和交通等8条战线，即8个部。原来的20个高级社改为生产大队，分管原有的215个生产队。在生产大队中又建立了20个水稻专业队，在生产队中建立了430个红薯作业组和棉花作业组。另外又建立了34个社办工厂和1个畜牧总场、9个分场。卫星集体农庄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员按团、营、连、排、班进行组织，以生产大队为一个团，设正副团长和正副政委，由原来的正副大队长和正副党支部书记担任；以一个中队（即生产队）为一个营，营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规定社员外出要报告，回家要请假，上下工要集合排队。实行伙食供给制，建立公共食堂，全社共建立农忙食堂198个，参加食堂的农户占总数的92.5%。

对于并社过程中的经济问题，卫星社的做法是：原小社所有的土地、山林、荒坡、公共建筑、牲口、农具、机器设备全归大社所有，在未统一分配前一般由原小社即大队使用。原小社所有的公积金、公益金全部归大社所有和统一使用。原有小社所欠的国家贷款和社员的生产投资，属于购买固定生产资料和用于基本建设者，均由大社负责偿还；属于当年生产消费开支者，由各大队（原小社）负责偿还。原小社的股份基金，由大社接收；原小社欠社员股份基金的剩余部分和社员欠的股份基金，均由大社适当偿还或收回。

卫星社成立后，还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规划，如1958年小麦亩产3000斤，争取4000斤；1959年小麦亩产4000斤，争取5000斤；1962年亩产达到10000斤；1960年全部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1960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1962年普及高中教育，并办大学1所；1962年将全社社员居住住房，全部按照生产的需要，统一建成社会主义式的新农村、新楼房等。

在卫星社成立后不久，即1958年6月底7月初，晋、冀、鲁、豫、陕、京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会上专门讲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革问题。他说：“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已开始了新的变革，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革，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些办法、那一套制度、那一套形式来发展了，需要有所改变了。”谭震林还谈到，有些合作社可以过渡到国营农场，有的地方可以搞公社，大概是一万户左右。会后，谭震林把嵖岈山卫星社的干部找到郑州汇报，并向他们讲了办公社的道理。11月13日，毛泽东为召开武昌会议途经遂平时，找遂平县委和嵖岈山区委负责人谈话，嵖岈山区委书记陈丙寅汇报说：“原来叫农庄，以后到省里给谭书记（即谭震林）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在一旁的谭震林接过话头说：“那时候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

随后，陈伯达领导的《红旗》杂志社派编辑李友九到嵖岈山调查研究。当李友九于1958年7月17日到达这里时，“嵖岈山卫星社”已改名为“嵖岈山卫星公社”。李友九于8月8日给《红旗》杂志写信说：“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同志向他们讲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办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一番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

现在还很难确定“卫星集体农庄”（“卫星社”）更名为“卫星公社”的具体时间。大致是在1958年7月中旬更名的，除了上面李友九给《红旗》杂志的信可以为据外，7月18日，中共卫星公社委员会制订了《遂平县卫星公社1958年到1962年全面规划草案》，由此判断，卫星公社是在7月18日之前改名的。此外《遂平县报》的有关报道也可以印证这一点（这一年，遂平和全国各地一样，创办了自己的报纸《遂平县报》）。该报第一次出现“公社”的称呼是7月21日。这天的报纸上有这样几则报道：一则是《共产主义公社建立幸福院》，一则是《共产主义公社办起十八处农业大学》，再一则是《卫星公社九十五名社员走进农业大学》，这里的“共产主义公社”指的就是卫星公社。

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更名后，遂平县的16个大社立即被合并为10个公社。10个公社中，11000多户的有1个，9000户左右的有3个，8000户左右的有4个，5000户左右的有2个。各个公社根据社员的居住条件、自然条件、各种作物种植的不同特点，划分成1000—1500户的作业区，作业区又根据各区不同的耕作条件分为150—200户的耕作队，耕作队下再分成若干专业生产小组。各公社设立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制度，选出35—47人的公社管理委员会，从中推出主席1人、副主席4—5人。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出监察委员会委员9—17人，从中推选出监察主任1人、副主任2人。公社管委会模仿国务院的机构设置，下设外交（实际上负责接待）、内政、军事、公安、农业、工业、饲养、文教、生活福利、交通、水利、财政、商业、林业、畜牧等部，并设立机械站和各作业区的分站，同时设立公社党委、公社共青团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公社报社。

1958年7月20日，中共遂平县委做出了《关于公社管理工作几个具体工作的意见（草案）》（按：原文如此），除了规定了公社的组织机构外，在生产计划和经营管理上，还提出公社向各作物管理区实行“定产”、“定工”、“定投资”、“定工资”的“四定”管理制度。公社取消产品分配制，实行经济核算的工资分配制，也就是将社员的劳动日折算成工资，按季度预分。分别建立青壮年食堂、老年幸福食堂、幼儿保健食堂，按国家粮油标准发给粮油证，由耕作队依照标准，油票集中使用，粮票发给社员或集中使用，粮食由公社统一调剂。

虽然遂平县及其所属的嵖岈山地区是河南省最早将大社冠名为“公社”的，其“公社”的组织结构也与后来的人民公社相类似，甚至可以说，随后各地建立的人民公社就是卫星公社的翻版，但其名称却在“公社”前缺少“人民”二字，也就是说，它尚没有直接称之为“人民公社”。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最早使用“人民公社”名称的，当属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1958年8月3日，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李玉亭、陈传于与新乡县、

乡、社干部共同研究拟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初步意见（草稿)》。其中说："新乡县七里营乡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根据群众的要求，在26个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于1958年7月20日成立了人民公社（按：开始时称为七里营大社)。"

1958年二三月间，七里营相继成立了杨屯、八柳树、曹村等八个联社。7月初，晋、冀、鲁、豫、陕、京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期间，作为一向以先进单位著称的七里营和嵖岈山一起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谭震林在听取嵖岈山的汇报后，要七里营派代表去嵖岈山参观学习。七里营的代表经过一番走马观花般的参观，回来后就在本乡大力宣传嵖岈山的经验和办大社的好处。

这时，七里营不少高级社纷纷到乡政府要求办大社，一部分群众还敲锣打鼓到乡里表决心、递申请书。七里营乡党委认为办大社的条件已经成熟，乃于7月16日拟定了一份《中共七里营乡党委关于并大社的意见》，报请新乡县委审批，很快得到同意。7月20日上午，由全乡26个高级社并成的七里营大社成立。

七里营大社成立后，一开始叫做"新乡县七里营共产主义公社"，并在乡政府门口挂了这样的牌子。七里营村的一个老汉看后说："我早盼共产主义，晚盼共产主义。我想，我能熬到共产主义活三天就心满意足了。可谁知共产主义的牌子挂出去了，就是这样子。难道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就算是共产主义社会了?"人们一听，觉得这个老汉的话也有道理，认为称"共产主义公社"确实有些不妥。于是又有人建议说："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叫共产主义建设公社吧。"

正当七里营人为自己的大社叫什么名称而犯愁的时候，前面提到的陈伯达那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发表了，文中提到的"人民公社"启发了七里营大社的领导，便决定将"新乡县七里营共产主义公社"更名为"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1958年8月1日，七里营大社在行文中正式启用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称呼。8月4日，又由公社木器厂制作了一块长方形的标牌挂在公社的大门口。

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虽然不是最早使用"人民公社"名称的，但它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起的影响却是任何公社所不能比拟的。1958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听取遂平县委和嵖岈山区委负责人汇报时曾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是第二个。卫星公社获得如此殊荣，与那份《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密不可分。

嵖岈山卫星公社成立前，曾几次放小麦高产"卫星"，一时名声大噪。加之它成立大社的时间早，规模大，又率先将大社更名为公社，反响很大，成为"大跃进"运动中一颗耀眼的新星。8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在嵖岈山召开全省地、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史向生，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正部长赵定远、副部长崔光华，河南日报社社长丁希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办公室主任赵光，《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等。会间，由李友九草拟一个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史向生、赵定远、路宪文等人也参与了研究和修改。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以下简称简章（草案)》）共26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公社对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

和个人财产的处理；公社对农具改良、农村电气化、发展工业的规划；公社设立供销部、信用部及其经营方式；公社的教育及科学研究工作；公社实行全民武装及民兵的组织、训练和任务；公社的权力机关、组织形式；公社的粮食、工资分配及公共食堂的管理；等等。例如，它规定：

——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愿联合起来的社会基层组织，它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在社会产品很丰富和人民有高度觉悟的条件下，逐步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应当各自清理的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所交纳的股份基金，仍分记在各人名下，不计利息。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投资，由公社负责偿还。

——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私有。社员私有的牲畜和林木转为全社公有，但应该折价作为本人的投资。

——公社要建立供销部，它是国营商业的基层机构。供销部的资金由上级国营商业机构拨给，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公社负责。供销部的盈余应当上缴给国营商业机关，但公社可以提取一定的比例。公社必须保证供销部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执行上级国营商业机关的计划和制度，同时有权对供销部进行具体的业务领导。

——公社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壮年和复员退伍军人应该编成民兵，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并且担负国家所分配的任务，民兵在受训和执行任务期间，工资照发。

——公社按照乡的范围建立，一乡一社。为了便利工作，实行乡社结合，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乡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任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乡长兼任社长，副乡长兼任副社长，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兼为乡人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公社在收入稳定、资金充足、社员能够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的情况下，实行工资制。按照每个劳动力所参加工作的繁重和复杂程度，以及本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由群众评定他们的工资等级，按月发给不同的、一定的工资，有特殊技术的，可以另加技术津贴。

——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

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的，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公共食堂、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

《简章（草案)》对公社的工、农、商、学、兵，生产和消费，组织和管理诸多方面都做出了规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合作社和社员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处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以及对公共食堂的规定。

1958年8月6日，史向生将《简章（草案)》给了正在郑州的毛泽东厂毛泽东表示，“如获至宝厂这东西好。李友九也将之寄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又将之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8月17日亲笔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市参考。”《简章（草案)》曾在8月中旬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印发，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即1958年第7期）全文刊登，《人民日报》又加以全文转载。可以说，全国各地的农村人民公社，差不多都是按照这份《简章（草案)》建立起来的。这份《简章（草案)》实际上成了各地人民公社的示范章程，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如果说嵖岈山卫星公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建立，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那么，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时间内席卷全国，则与毛泽东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决定深入农村看一看“大跃进”的火热场面，实地调查农村新的基层组织的实现形式。当天下午4点，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大跃进”运动中崛起的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徐水县。

徐水是一个只有31万人口的小县，全县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足10万人。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其办法是打破社界、乡界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把全县8万多名劳动力组成了若干个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并组织随营食堂，吃住在工地。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文章《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同时配发了《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社论，称赞徐水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从一个工作很平常的县一跃而为先进县”。社论还说：“去冬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的典型，徐水县就是在全县规模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3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正式报送了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经验。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徐水县委作了充分准备：把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到铁路两旁和计划参观的地方，按军事编制明确连、排负责人；规定道路两旁不得留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将一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不准回城。

毛泽东下火车后，先来到了县城郊外的大寺各庄社，询问了徐水夏收和秋收的预估产量。县委书记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内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毛泽东听后说：“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那么多粮食呢?”张国忠回答说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换机器也用不完，大家的粮食都多了怎么办?要考虑怎么着多吃。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只有社员吃，一天吃五顿饭。粮食多了可以半日劳动半日搞文化。明年还可少种些甘薯，多种小麦，多吃细粮。”

回县城的路上，毛泽东又与张国忠等人谈到了劳动大协作、军事化问题。张国忠说这是逼出来的，并汇报说修了一个比十三陵还大一点的水库，是按主席关于一穷二白、多快好省的指示办起来的。毛泽东说：“这是形势逼人。”毛泽东又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张国忠回答说，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吃了大锅饭。毛泽东开玩笑似的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张国忠回答说，现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为公有。毛泽东问：“十个人有三个不赞成吗?”张国忠说，没有，连两个也没有。

到了徐水县委，毛泽东对陪同的人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又说：“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回答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对于这个回答，毛泽东十分满意，不断点头。

在徐水视察时，毛泽东问农业社主任李江生：“你们农业社叫什么名字?”李江生答：“叫第八瀑河农庄。”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在安国视察时，毛泽东问县长焦国驹今年每人收多少粮食，回答说人均4000斤。于是，毛泽东提出：粮食那么多，每人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土地也应该有休整时间。毛泽东在徐水和安国对粮食的询问表明，他对这年的粮食大丰收，以至到了多得吃不完的地步，也是深信不疑的，他的脑海里正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正因为他感到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所以认为有必要变革农村的组织形式，寻找一条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步人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在离开安国去定县车站时，毛泽东同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谈了很多话。

毛泽东问：“是不是搞一乡一社?”李悦农回答：“我们已经有这个酝酿，省委已经有过原则指示。”毛泽东说：“好！是不是搞万人公社?在平原地区万八千人搞成一个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是农业。”又说：“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武装。”

在谈到徐水军事化时，毛泽东问李悦农：“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来?把他们武装起来。”毛泽东又说：“徐水劳动力共11万人，其中青年男女可能有5万人，20%的发枪，共需1万枝。有几十个团，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5万人里1万枝枪，5亿人，1亿

枝枪。全国这样组织起来，就把美帝国主义吓死了。”毛泽东还谈到了并县的问题，说县也要并得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这样更好领导。

当天夜里，毛泽东视察过的徐水大寺各庄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为了纪念领袖的视察，定名为东方红八四人民公社，并宣布：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1958 年 8 月 6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了中共中央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几天时间，全县 248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在社员自愿的基础上，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畜、房屋、树木等都已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料入社折价款的部分也已决定取消。各个公社正在实行或者准备实行工资制。最近几个月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公共食堂、缝纫厂、幼儿园、托儿所和老年的幸福院等，现已完全普及，并已成为新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徐水全县进一步实行军事化，全部劳动力已编成 2 个团、191 个营、666 个连，有的乡还给青壮年民兵发了枪支。8 月 15 日，徐水全县 20 个乡镇并为 9 个大的乡镇。

1958 年 8 月 22 日，徐水县委制订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并在 8 月 26 日的《徐水报》上全文刊登。规划的前景是：1958 年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1963 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一切主要体力劳动都为机械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经不再仅仅是谋求生计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1959 年每人平均可以分到粮食 2000 斤、食油 20 斤、肉类 50 斤，1963 年则可分别分到 2000 斤、50 斤、300 斤，另有棉布 100 尺、糖 240 斤、水果 147 斤，主要生活资料实现各尽所需。1959 年消灭 30 岁以下的文盲，到 1963 年达到高小文化程度。从 1959 年算起，在 7—10 年内，30 岁以内青壮年的都要达到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成为专家。到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将逐渐消失。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规划，徐水要在 1963 年实现共产主义。

1958 年 8 月 6 日下午，毛泽东来到了已经成立了人民公社的河南新乡县七里营视察。毛泽东走到公社大院门口，看到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这块牌子时，停下脚步，一字一顿地念起来。新乡县委书记胡少华随即对毛泽东说：“这是全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旁边的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问道：“他们起这个名字怎么样，行不行呀?”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当毛泽东问到全县有几个这样的公社时，胡少华答道：“全县原来有 60 多个小乡，成立了 60 多个高级社，后来合并成 10 个联社，七里营是我们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我们正在开战地会，准备都改成人民公社。”毛泽东又问：“人们喜欢这个名字吗?”七里营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徐占才回答说：“喜欢!”毛泽东还询问了公社的土地、人口等情况。

随后，毛泽东到了棉花地里，观看了女社员喷射杀虫药剂的表演，并称赞棉花长得好，当得知七里营 10050 亩棉花有 5000 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 1000 斤，争取 2000 斤时，他兴奋地对陪同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1958 年 8 月 6 日晚上，毛泽东到了郑州，在这里接见了从嵖岈山赶来的中共河南省

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并详细地了解了嵖岈山卫星公社的情况。当听到农民劳动已经军事化了，按班、排、连的编制进行生产，又听到一个公社有5万多人口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大得多了，公得多了。""这在古代，一个诸侯国了。"又说，比之古代诸侯国，公社是又大又公，多了公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毛泽东又问起群众的纠纷公社如何调解，史向生告诉他，由公社民政部门来调解处理。毛泽东听后表示："这带政权性质，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实际上是基层组织，这叫政社合一。"又说："大集体，小自由，不要统得太死。"之后，史向生又汇报了嵖岈山公社的组织结构，当听到公社采取工、农、商、学、兵结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时，毛泽东说："工、农、商、学、兵，那么工业、商业、学校都包括了，是五位一体啊。两个招牌换成一个招牌，是政社合一。"另据解学恭、张明河回忆，在汇报过程中史向生还谈到了人民公社的来历，说在参观浙江省诸暨县的农场以后，认为农场这个名字包括不了工农商学兵，就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并请示吴芝圃。吴芝圃说叫人民公社好，所以才定名"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所喜欢的名字。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来到山东济南，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他汇报了山东各项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还讲到了办大社的优越性。随后去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北园乡视察农业生产合作社。

视察中，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北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种植情况。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李树诚汇报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要争取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泽东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毛泽东还视察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试验田，在地边的树林稍作休息时，李树诚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园大社"的办社情况和社员讨论的意见，请示毛泽东是叫"大社"好呢，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并汇报了办起大社以来生产面貌的变化和今后的打算，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陪同视察的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说："现在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这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北园乡于8月20日正式成立了山东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北园人民公社。全公社包括20个自然村，1万多户。在此基础上，历城全县到9月上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原来的5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10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达137606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

1958年8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河北省省长刘子厚汇报说，河北今年每人要求收到1000斤粮食，明年计划每人2000斤。毛泽东问道："后年呢？每人搞5000斤粮食有什么用处？每人5000斤就不好办了。每人3000斤粮食是需要的，多了以后储备有困难。"此时的毛泽东相信，中国的粮食已经完全有了保证。

当汇报到河北农村远景规划和并社规划，平原1万户左右为一社，山区5000户左右一社，乡社合一时，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有多少乡？"刘子厚说："4000个多乡。"毛泽东说："要那么多乡干什么？有2000个乡，2000个社就行了。办大的么，好大喜功么，有小的，有中的，也要有大的。大了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一万户左右一个社，这样好。"

刘子厚讲到，当每人收到3000斤粮食以后，计划用一半的地种粮食、棉花、油料，其余的土地造林种果树或办牧场、养鱼，还要建设工业区、文化教育区、居住区，搞河网，修公路等。毛泽东听后说："好啊！这样农村和城市就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想法，没有别的出路。200户的搞综合不便利，工、农、商、学、兵、交通、机械化、电气化，有几万人，万八千户就好办了。"

8月13日，毛泽东结束了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视察，回到北京。11日起，新华社相继播发了毛泽东视察徐水、七里营和山东的消息。在8月12日关于毛泽东视察七里营的报道上，讲到七里营"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道路，已经在全乡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8月13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视察山东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办人民公社的好处是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于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第二章　大　　潮

第一节　北戴河会议的决策

如果说，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消息的发表，向全国发出了要大办人民公社信号的话，那么，1958年8月中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成为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关键。

北戴河会议共有17个议题，人民公社问题是其中之一。

会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林口”准备了一份题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的文稿，毛泽东对这份文稿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是提交会议的文件中写得最好的。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指示将这份文稿和《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印发给与会人员。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还穿插召开了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毛泽东就人民公社的问题作了多次发言。

在8月19日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合一；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分配，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的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阶级的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搞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在8月21日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是身体健壮。又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党的一些干部进城后变了，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把一些好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渲染着党的干部，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他还说，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他建议进一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还说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干部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各级干部要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都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也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破坏。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钢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在8月24日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1959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穿不要钱，不一定要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还说，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个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

在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的是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这样群众就干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渔、牧、副。大，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

放。实行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工效比合作社可以提高。全国现在有 70 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湖南提 2500 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要三年。决议案上有一句：一两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机关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房屋都公有。苏联私人有房子，我们将来废除私人房屋。又说，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二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而起就会不少。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大家去干，每个人都自觉去干，没有懒汉。我们过了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毛泽东认为，过去没有什么薪水，也没有什么"花"（按：指军衔），但把日本鬼子赶走，打败了蒋介石，现在有了"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结果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使得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出官僚主义。人民公社搞起来后，就逼得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对于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毛泽东颇不以为然，说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没有出几个，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他还说：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在北戴河会议上，刘少奇对人民公社问题也发表了看法。他说，搞人民公社，大小、快慢各地自办，要酝酿成熟，不要勉强、性急，能快而推慢不好，故意发急也不必。要走群众路线，大鸣大放，不要强迫命令。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增加了共产主义成分。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自然，要逐步，可以不声不响慢慢过渡，不必大力宣传。共产主义一方面不是遥远的未来，一方面也不是很快的事。对于公社化问题，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认为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但在步骤上，毛泽东性急一些，刘少奇则主张稳妥一些。

在 1958 年那种气氛下，全国上上下下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在北戴河会议上，对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作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进而由此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乎是全体与会者的共识。会议讨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时，只有黄克诚讲过这样一句话：公社挂个牌子算了。

8 月 29 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关于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理由是：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后，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

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愈来愈迫切；农田基本建设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红专学校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生活，锻炼和培养了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第二，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决议》认为，目前以一乡一社，每社以2000户左右为宜，在某些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的地区，也可以少于2000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6000—7000户。至于2000户或以上的，不要去反对也不要去提倡。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织联社。人民公社实行乡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人民委员会。

第三，关于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的步骤和要求。《决议》强调要依靠贫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好，也可以分两步走。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第四，关于并社中的经济政策问题。《决议》规定，社员自留地可在并社时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可拖一两年后等生产发展、收入增加和人们觉悟提高后自然转变为公有。同时强调在并社过程要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干部群众，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第五，关于公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规定大社统一命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国营农场，因为农场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方面。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中加写了如下一段话：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

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对于这段话中所规定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时间，后来毛泽东也承认设想得过快了。

对于人民公社的分配，虽然《决议》中也认为人民公社建立后不必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但同时又提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改行工资制。至于条件成熟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提及，加之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多次讲到“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分配制度。

第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决议》虽然承认现阶段是建设社会主义，但又强调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做好准备。因此，《决议》最后满怀信心地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由此可以看出，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是建立在主观地认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尤其是经过“大跃进”，我国农村已经“免除水旱灾害”，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等基础上的。而这种既有农林牧副渔，又包括工农商学兵的人民公社一旦建立，又会进一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消灭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三大差别，加速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1958年的中国农村，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的确空前高涨之外，生产力水平、农作物产量等，与几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于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则完全是“放卫星”放出来的。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就奢言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进而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完全是严重脱离现实的空想。

同一天，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入如何分配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为中心，进行鸣放辩论，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指示》强调：“工农商学兵合一，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应该通过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人民公社比原有的农业社具有更伟大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把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并且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与转为人民公社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指示》还要求采取“插红旗”、“拔白旗”的方法，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使“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

9月1日，这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社论，同时刊登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草案）》。9月3日，《人民日报》也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透露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的基本内容。

9月4日，《人民日报》也全文刊载了卫星公社的简章，并配发了题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的社论，总结了人民公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不同特点。

第一，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要像城市工矿区一样同时兴办工业。人民公社将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线，消除工业和农业的差别。除了生产，公社还要自己经办商业（交换）、信用（银行业务），举办文化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专科、科学研究等）事业，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年和复员退伍军人要编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统一体。

第二，公社以乡为范围建立，规模当然比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

第三，乡社合一。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乡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任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正副乡长分别兼任正副社长，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兼为人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些说明公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基层单位。

第四，在所有制方面进一步向公有发展。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逐步转为全社公有，私人暂时留下少量的家畜和家禽，也将逐步转为公有。这样，个体经济的残余就进一步被消灭了。

第五，收益分配和劳动报酬方面，将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实行工资制（包括奖励工资）代替按劳动日分红制。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六，生活更进一步集体化，社员公共福利事业加速发展。设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医务组织、疗养院、幸福院，按照园林化而规划建设新的住宅，家务劳动社会化。

9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并发表了《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社论提出：当前农村工作要抓住人民公社这个中心环节，先搭好人民公社的架子。即先按规划把公社委员会建立起来，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作好规划（包括基建、生产及公共积累的比例等），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分头进行各项工作；对原来的劳动组织、核算单位、分配方案、财务处理等，暂时不动。社论同时强调，搭架子的过程必须是一个充分发动群众的过程，必须是一个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11日，《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公开发表。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如暴风骤雨，迅速席卷全国农村。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农村的广泛开展，是从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办人民公社好”的讲话开始的。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得信息之先的河南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才刚刚离开河南，中共河南省委就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我省在麦收以后，在全省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其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合作化高潮，'建立人民公社'，'走人民公社的道路'，已成为全省人民舆论的中心。""最近毛主席来河南视察工作，对群众鼓舞很大，办人民公社迅速在全省城乡形成了全面高潮。"至8月22日，河南全省原有的42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并成1172个公社，正在建立的有300个，平均每个公社7000户左右。

在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信阳地区走在了河南的前面。从7月中旬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更名为卫星公社起，信阳全地区就出现了小社并大社转公社的高潮；至7月底，全地区537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并社工作基本结束，共建立大型的人民公社208个，每社平均8000户。该地区的商城县超英人民公社由10个乡合并，全社20457户，98275人，总面积135万亩。固始县七一人民公社规模更大，全社共46161户，201075人，规模为河南全省人民公社之最。

在并大社、转公社时，信阳地区对生产、生活资料采取如下原则进行处理：

——所有土地、牲畜、家具、宅基、矿山、工厂、鱼塘、河坝、山林和各项建设设备等生产资料，一律转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

——各小社现有的公共积累（包括现金、实物和储备粮等）统一上交人民公社分配使用，不准隐瞒或私分。

——原各小社所办的工业和各项副业生产，并人公社以后，其现有的机械设备、副业工具、原料、成品、半成品均归公社集体所有，原社均不得动用。

——原有小社债务分别偿还。属于小社用于当年生产的债务，仍由小社偿还；属于基本建设、公共建筑等的债务，由公社偿还。

——社员私有的房屋、小片林木、饲养的牲畜等生产资料一律转为公社集体所有，牲畜、小片林木转为集体所有时合理折价，作为社员向社的投资。

——社员原有的少量家庭副业，如家禽家畜，一般仍允许社员自己经营，如社员愿意交集体经营的，合理作价后归社所有。

——社员的自留地，大片的由生产队接收，统一经营，共同消费。

信阳在并大社、办公社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十大优越性：(1) 能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锻炼培养集体主义觉悟；(2) 能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工农业并举的方针；(3) 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4) 便于进行大型的基本建设；(5) 社大人多，资源丰富，便于发展多种经营；(6) 社大骨干强，而且集中，便于统一调配使用劳动力，并能大量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队伍；(7) 可以大量培养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8) 可以大力促进文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9) 抗灾能力强，更快地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10) 更进一步加强党对社的领导。今天看来，这些"优越性"，基本上是想当然总结出来的。

人民公社是一哄而起建立的，在所有制等重大问题上政策界限很不明确。中共河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河南的农村人民公社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宣布一切主

要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缴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这种公社占少部分。二是虽未向群众宣布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但实质上主要生产资料已变为全民所有，社内的产品在保证上交公粮、税款和完成国家统购物资的原则下，仍由各公社独立分配，这一类公社是大量的。第三类是国营农场和农业社合并建立的人民公社，实行统一经营，分别核算，分别计酬，原农场工人工资不动，原农业社社员采取低工资的办法。

截至8月底，河南全省农村在原有3847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已经建成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1378个，平均每社7200多户。加人人民公社的农户已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98%。至此，河南全省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已告基本结束。

河北是全国较早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又一省份。毛泽东视察徐水、安国后，河北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展开，除徐水在8月初完成了全县并大社、转公社的工作外，到8月20日，张北县原来已由小社并成的26个社再并成7个大社。到8月28日，石家庄专区全区的6850个农业社，已经全部合并建成了141个人民公社；张家口专区已建成109个人民公社；天津市郊区（天津时属河北）352个农、渔业生产合作社全部合并建成15个人民公社。至9月1日，河北全省已有95个县、市实现了公社化，共建成大型人民公社624个，平原地区一般10000户左右，丘陵地区一般5000户左右，山区一般3000户左右。

河北在并小社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各地还挑选出条件较好的县和社，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保定专区确定徐水和安国，唐山专区确定乐亭和大厂，天津专区确定宁津，作为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北还挑选出了36个条件较好的大社，作为共产主义公社的试点社。

北京市顺义县（1958年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原来有19个乡、41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7月份，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合并，建立了8个大型的人民公社，平均每社9600户。丰台区到8月29日，全区已经建成石景山、南苑红旗、上游、卢沟桥东方红和长辛店等5个人民公社。到8月30日为止，海淀区原有的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合并建立了四季青、万寿山、玉渊潭、东升、海淀、清河等6个人民公社。

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至1958年9月16日，已有河南、河北、山西、青海、辽宁、广西、黑龙江、北京等八省（自治区）一市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已建成人民公社1万多个。至9月20日，全国建立人民公社则达1.5万多个，平均每社4600多户。至9月30日，全面实现了农村公社化的省、市、自治区有河南、辽宁、广西、青海、河北、北京、陕西、山东、黑龙江、吉林和上海；农村公社化已达90%以上的有山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苏、浙江和甘肃；农村公社化85%左右的有江西、安徽、湖北、福建和内蒙古；贵州和宁夏月底也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农村公社化；新疆农业区参加公社的农户已达80%。云南省农村已建成200多个人民公社。至此，全国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3384个，参加的农户达总农户数的90.4%，平均每社4797户，我国农村

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195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据10月间分区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统计，全国农村共有26576个人民公社，人社农户12692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9.1%。各地农村在公社化的同时，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共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建立托儿所、幼儿园475万多个，幸福院10万多个。此外，各地公社还普遍组织民兵武装，据河北、辽宁、贵州、江苏等20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共组成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基干民兵4905.7万人。

那么，如此短的时间内，是如何实现由小社到大社再转变到人民公社的呢？主要的办法是大辩论。其实，所谓大辩论，实际就是批判会，也就是用当时认为正确的思想去批判错误的观点。

自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以来，大辩论对中国人来说已不再是陌生的东西，而是经常使用的所谓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手段。1957年秋冬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用的就是大辩论的方法。

应该承认，人民公社的出现，也不完全是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还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前面提到的中共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论城市和乡村都在风起云涌，争先恐后，汹涌蓬勃地发展，到处是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纷纷写决心书，出大字报，开庆祝会，向领导报喜的群众情绪高涨”。这也不完全是夸大之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群众头脑也在发热，也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的小社并大社，就带有一定的群众自发性质。因为当时开展的农田水利建设的确需要打破乡、社的界限，进行乡、社间的协作，在生产工具落后，还基本要靠手工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情况下，人多有时是有力量大的优越性，尤其是人多可以修建一些单靠一乡一社的力量不能修建的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当时，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确实产生了小社并大社的要求。

但是，小社并大社也好，大社转公社也好，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单个劳动者劳动力的简单相加，而主要要靠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实际上，随着社、队规模的扩大，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对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论及）、吃“大锅饭”的现象较之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严重，加之公社化过程中，不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公共积累全归公社，而且社员个人的生产、生活资料如家庭副业、宅基地、自留地等也要归公社所有，所以公社化过程中相当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发表的当天，中共河南省委在向中共中央的电话汇报中一方面说，贫下中农“对并社办公社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承认，“一部分富裕中农有抵触情绪，有的大吃大喝或者是浪费”，“他们怕人公社吃亏，怕不自由”。据该省光山县2946个生产队以上的干部的思想排队，积极拥护并社的占83.5%，思想动摇的占15.5%，消极抵触的占3%。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据中共河北邢台县委给河北省委的报告，全县8260名党员中，有15%左右的党员对办公社不够积极，有右倾

保守思想，认为建立人民公社为时过早，认为小社好办，大社难搞。又据中共河北唐县县委分析，有20%左右的社员对办公社不够积极，其中有5%的人甚至有抵触情绪。中共山西武乡县委办公室分析，建立公社时，在开始发动阶段积极拥护办公社的占总户数的55%，随大流的37%，反对的占8%。这几组数字说明，对办人民公社不积极甚至反对的还是大有人在。

既然有不同的声音，按照当时的思维方式，大辩论就成了统一认识的基本途径。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就明确规定要围绕是不是建立人民的问题进行鸣放辩论。中共河北省委强调："在发动群众中，要广泛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鸣深辩透，使群众了解……把小社并为大社建立人民公社，则又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河南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各地普遍展开了'要不要建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有什么优越性？''怎样建立人民公社？''依靠谁建立人民公社？'等题目的大放大鸣大辩论，展开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并且向破坏行为进行了斗争"。对于这些问题，本来就不是可以辩论的，在各级组织和各种媒体对人民公社优越性和办人民公社的必要性作了广泛宣传的情况下，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反对办人民公社呢？

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又是与宣传舆论的推动分不开的。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办人民公社好"那番话见报后，《人民日报》及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对人民公社的建立及优越性作了大量的报道。

195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人民公社好》为题报道了河南信阳专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其中讲到信阳专区总结出了人民公社的十大优点和四项有利条件。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中共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的文章《人民公社带来的变化——介绍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较早报道人民公社的两篇文章。

1958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了一篇有导向性的文章《怎样办好人民公社?》，介绍了中共信阳地委在卫星公社召开现场会议，研究公社的体制、分配制度、党的领导等问题的情况。报道中说："信阳地区在这次新的伟大的社会变革中，由原有的537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208个大型人民公社。这个伟大的变化，是信阳地区一年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结果。而这个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更加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信阳地区出现了一个胜利再胜利、跃进再跃进的新形势。"报道对建立人民公社的作用做出了极为夸大的评价。文章还详尽地介绍了信阳地区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机构、分配制度、加强党对建立人民公社的领导等内容。

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唐飞霄"的文章《人民公社是万人欢乐的大花园》，用极其夸张的语言介绍作者访问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所见所闻。其中说："在过去，人们麦收以后吃不了多久，可是今年，白面吃不清。社员们反映，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多得没有地方放。""丰收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今年小麦丰收的基础上，有的社员把明年的小麦亩产计划提高到1万斤以上，有的社员把今年的水稻亩产量由1万斤提高到5万斤，有的社员把红薯的亩产量由40万斤提高到60万斤。"

"公社建立以后，劳动组织更加健全和强化了。……今天的新型农民，已经是有组织守纪律的生产战斗部队了。""建立公共食堂以后节省出来的人工，等于给全社增添了四千多个常年劳动力。""实行了工资制以后，社员们就可以逐渐变成工人阶级了。""秋收以后，社里将实行公费医疗和养老制度。……这样一来，就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了。"正如作者所说的，卫星人民公社是一个"万人欢乐的大花园"。

在有关颂扬人民公社化的各种报道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发表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全文 1.5 万字，分 6 天才刊完，分别使用了"全民皆兵的公社"、"工商百业样样全"、"'四化'齐来万众欢"（按：主要内容是公共食堂）、"朝霞与晚香"（按：指幼儿园和幸福院）、"文明而城市化的谢坊"、"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等标题。从中可以看出，报道对人民公社充满了溢美之词。文章最后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当年各种报刊上类似的报道比比皆是，对人民公社各种优越性的称颂，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因为这种将未来的憧憬当作现实的可能，虽脱离实际但攻势强大的宣传，造成了只要办起了人民公社，生产力就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就会有极大改善，中国也就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人间仙境的舆论氛围。这样的好社会谁又能不心向往之呢?

人民公社化的迅速实现，也离不开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确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睿智的远见，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形成了巨大的威望和影响力。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后，一段时间里他对个人崇拜是保持清醒认识的，也强调不要搞对他的个人崇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时，他对个人崇拜就有些欣赏起来了，以至于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要区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并认为前者还是必要的。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已经产生了，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也自觉不自觉地将他视为正确思想的代表，看作真理的化身。凡是他所赞同或提倡的，党内党外几乎没有人会加以怀疑或反对。当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言论并不多，但就那么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却起了一语定乾坤的作用。既然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好，全国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神州大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第三节　"一大二公"与"政社合一"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对人民公社作出的"一曰大，二曰公"的概括，准确地揭示了人民公社的最主要特征。

人民公社首先是"大"。公社化前，全国共有 74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社约 170 户、2000 亩土地和 350 个劳动力。公社化后，变成了 26500 多个人民公社，每社平

均4755户、6万亩土地、1万个劳动力，全国平均28.5个合作社合并成1个公社。据10个省、市的统计：5538个公社中，5000户以下的公社有3343个，5000户到1万户的有1628个，1万户到2万户的有516个，2万户以上的有51个。一县建成一个大公社和成立了全县人民公社县联社的，据13个省统计有94个。规模较大的是广东、上海和北京郊区，平均在一万户以上。其次是河北、辽宁、山东、安徽、浙江、福建、河南，平均七八千户，湖南、广西平均五六千户。其余省区，除贵州、新疆在两千户以下外，都在两千户以上，一般三四千户。此外，河南的遂平县、修武县，河北的徐水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中，都变成了一县一社。

人民公社的规模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片面地认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编印的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宣传教育提纲中，总结出了人民公社的十大优越性。其中前四条都是讲"大"的好处：一是人民公社能够更加"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一方面，人才集中，资金集中，物资集中，就可以更好地利用人力、物力来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对于自然条件，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全面规划，加以充分的合理利用。二是人民公社规模大，人多地多，资金充足，不仅能大办特办农业，也能大办特办工业。三是人民公社大，生产发展快，能更多地积累资金，更快地扩大公有经济。四是人民公社人力多、资金多，土地连片，便于有效地利用资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人民公社"大"的优越性，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在一定的情况下，集体的力量能超过个体的力量，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确实存在不便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开展农业规划的问题。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特别是初级社，由于实行土地分红与劳动分红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较好地处理了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既避免了农村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又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应当说是基本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至1955年上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也是基本上遵循自愿互利原则的。1955年下半年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出现了过快过急、超越了中国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倾向，如果当时停留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的时间长一点，待初级社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之后再转入高级社，对生产力的发展会更有利一些。可是，刚刚建立的高级社还未来得及站稳脚跟，又来一个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使合作社时期本已存在的干活窝工、分配吃"大锅饭"的现象更加严重。一个公社少则几千户，多则上万户、几万户，数千上万甚至几万名劳动力，给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带来许多困难，而所谓"组织军事化"，在全社范围内将劳动力编制为团、营、连等，进行大兵团作战，更是造成了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公社规模大，也容易造成干部在生产工作中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

人民公社的另一个特点是"公"。这个"公"其实就是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社员的财产无代价地收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

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不论是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简章，还是各地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具体政策，都规定将合作社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收归公社所有，甚至社员个人经营的自留地、林木、牲畜和社员多余的房屋也归了公社，目的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残余，并使小集体经济变成大集体经济，进而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公社创办了供销部、信用部，国家将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也下放给公社经营管理，使公社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政社合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实行的是乡社分设的体制，乡是农村基层政权，社是经济组织，一般是一个乡领导几个甚至数十个社。《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根据“乡社合一”的原则，公社的社务委员会一般再下设若干部，如中共山东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中规定，人民公社下设工业、农业、水利、林业、牲畜饲养、水产、财政、供销、信用、粮食、宣教、内政、人民武装、福利、组织等15个部，另设计划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这样，公社具有了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的双重职能。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社下一般设生产队。公社化后，公社下设大队和生产队（小队），大队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有一些地方在公社之下大队之上设立管理区。对于大队和生产队的职能，各地的规定各不相同。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中提出，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山东掖县（1988年改设莱州市）先锋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规定：生产大队是社务委员会的派出机构，负责监督检查和指导生产。生产队是具体组织生产的单位。江西省修水县规定，大队作为公社的派出机构，负责管理本大队和专业队的生产，是经济核算的基本单位，生产队是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这样，公社替代了原来的乡政府并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的规模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但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产品处置权，原有的村级组织被取消，其社会管理职能为生产大队所取代。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各地的人民公社还将青壮年社员以生产队为单位组成连，以大队为单位组成营，以公社为单位组成团，进行军事化管理，按时吃饭、集体上工、统一休息。这些连、营、团既是民兵组织，也是生产突击队，劳动力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调动。

公社化前，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独立地进行生产经营。公社化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变成了组织管理生产的单位，如果公社是一家大工厂的话，那么，大队相当于这个工厂下的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车间，生产队就成了车间的工段。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统归公社调配和使用，工、农、林、牧、副、渔等一切生产建设事项，统归公社经营，由公社统一制定各种生产建设计划和决定收益分配。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既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没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权，公社既是

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工、农、商、学、兵样样齐全。全国的人民公社平均由2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一个公社少则有十几、多则有几十个大队，数万人口，各大队的情况千差万别，由公社统一经营，就势必只能依靠行政命令组织生产，搞"一刀切"，产生工作中的"瞎指挥"和"命令风"。又因为公社掌握了人、财、物统一调拨的大权，搞"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就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所以人民公社的建立过程，也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过程。

第四节 "吃饭不要钱"

人民公社除了"一大二公"的特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及与这种分配制度相适应的公共食堂。

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作为全国人民公社样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都在公社的章程中对供给制作了明确规定。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第十五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照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第二十二条关于供给制的内容是："在保证满足公社全体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定级工资制。即从全年总收入中首先扣除税金、生产费用、公共积累，然后再由公社统一核定标准，扣除全社人员基本生活费用（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医疗、婚丧等一切开支），实行按劳评级按级定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办法。"

人民公社推行的供给制，当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粮食供给制，这是各地普遍推行的方式，其办法是在公社预定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费基金中，口粮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粮指标，统一拨给公共食堂，社员无代价地到公共食堂用饭，菜金和副食品部分仍由社员出钱负担。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实行的就是这种供给制。如果将副食品也包括在供给的范围之内，就变成了第二种类型，即伙食供给制。第三种类型是基本生活供给制，如七里营人民公社的供给范围包括伙食、衣服、住房等七项内容，简称七包，当然也有八包、十包或者十几包的。

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试行办法（草案）》规定：根据公社的经济力量，确定基本生活标准为粮食全年全社每人平均40元，油、盐、烧柴等杂费6元，粮食按以人定量标准发给饭票，凭票在食堂吃饭，普通饭菜无价供应，个人另吃好菜时得向食堂购买，集体改善生活仍由公社开支。穿衣按国家供应棉布证折款发给每人4元，吃穿生活费用合计50元。无房社员由公社调剂住房，今后改善居住条件由公社开支。生育、

教育、看病、婚丧等费用亦由公社负责从公益金中解决。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标准也要不断提高，逐步达到丰衣足食。

七里营人民公社成立后，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到七里营参观后，发现这里搞的是吃饭不要钱，认为是个新发明，回去后向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就把这个口号宣传出来。这样，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最典型，影响也最大的是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的基本生活供给制。徐水实行供给制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及一切工作人员，也就是所有徐水人。徐水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学生、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 5 元，小学生每人每月 4 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月 4.5 元，幼儿园幼儿每人每月 3.5 元，托儿所婴儿每人每月 3 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实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 24 尺、棉花 1 斤、鞋 3 双、袜子 2 双、毛巾 1 条、肥皂 2 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 1 顶。学生、幸福院老人、婴幼儿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也规定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 8 尺、袜子 3 双、毛巾 2 条、帽子 1 顶、香皂 1 块、小毛巾 1 条。

津贴：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分为两等，一等每月 2 元，二等每月 1 元，一、二等各占 50%左右。大学生、中学生每人每月零用钱 5 角，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婴幼儿每人每月分别为 1 角、3 角、1 角，不发给个人，由集体掌握。

其他：农民的医疗费，由县财粮部发给各公社，由各公社统一掌握，农民看病在本公社有效，本公社不能治疗经医生证明转院，转院治疗一律付现款；结婚男女双方每人补助 1.5 元，生育补助 3 元，死亡丧葬适当发给丧葬费；看戏、看电影、洗澡不花钱，每 10 天发洗澡票 1 张，每 20 天发理发票 1 张，每个月发电影票 1 张；取暖以每年 105 天计算，每户每天煤 2 斤，折款一次发给各户。

徐水是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供给制。无独有偶，河南省修武县也是实行全县范围的供给制。

修武县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成立县联社的地方之一。修武县人民公社是 1958 年 7 月 18 日由全县的 245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开始称大社）。公社建立后的第三天，即开始在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将之作为培养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重大举措。

根据修武县人民公社 9 月份制定的《关于全民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的试行方案（草案)》，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具体标准是：

（1）伙食。农民：按实有人数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 3.86 元，菜地 0.1 亩。中等学校、红专大学学生：在县城集体搭伙者每人每月 7 元，在农村者与农民相同。工人：

煤矿井下工和高温作业工每人每月15元，其他工人13.50元。干部：县级干部参加工作8年以上、区级干部参加工作12年以上、一般干部参加工作15年以上者，每人每月18元，其他干部13.50元。此外，县城居民和干部家属伙食费每人每月7元。

(2) 被服、日用品。农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2斤、布鞋2双、袜子1双，以上各项折合市价12.24元，每月1.02元。工人、干部：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3斤、鞋3双、袜子3双、帽子1顶、牙刷1把、牙膏2管、香皂2块，每人每月洗澡费0.5元、理发费0.25元，以上各项每人每月3.25元。

(3) 工资。参加劳动的社员根据劳动态度、体力强弱，干部根据德、才与现任职务，统一划分为十级，干部一至四级，最高者15元，最低者4元；工人为三至六级，最高者7元，最低者1.50元；农民六至十级，最高者2元，最低者0.20元。

(3) 福利。公费医疗全体社员每人每年2元；结婚补助3元；生育补助一般女社员2元（双生4元），女干部8元（双生13元）；社员死亡发埋葬费5元；家在外地的干部经领导批准者往返路费由公社报销。

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民公社率先实行供给制，对于这种制度在全国的推广起了重大的示范作用，而党的领导人对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赞扬，则进一步使其在全国广泛推行。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以赞赏的语气讲到供给制问题。说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毛泽东来到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得知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高兴地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在合肥期间，毛泽东与妇女干部谈话时又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斤、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他还说，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9月29日，《安徽日报》对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情况作了报道。几天后，《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报道。自此，“吃饭不要钱”成为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就供给制问题发表了不少谈话。

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离京前往河北徐水、定县、石家庄、邯郸等地视察。期间，在谈及供给制时，针对徐水的什么都不要钱，刘少奇说，实物工资和供给制还是有区别的，供给制不算钱也不给钱，给实物算钱就是工资形式。搞供给制，也不要搞许多项目，开始先搞粮食，项目少些，逐步来，一项一项增加。粮食为什么可以呢？就是吃不完。

1958年9月下旬，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公社视察，当地领导汇报说，这里秋后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对此非常拥护，有群众说，实行供给制，一个心思丢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

好，不然对不起共产党。听到群众这样的反映，作为党的领导人，自然是很高兴的。刘少奇认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说明，实行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人，而且群众的情绪更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他对陪同视察的当地干部说："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是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地消灭懒汉。"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就供给制和工资等问题发表过不少意见。他于 1958 年 9 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人民公社座谈会期间写的《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人民公社同时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原则，进行分配。实行各取所需性质的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实行主要是各取所需性质的集体福利事业；实行按劳取酬性质的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制。"在这年 9 月 18 日的江苏省委人民公社座谈会上，谭震林说，人民公社既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又按照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原则，来进行分配的。吃饭不要钱，这既是共产主义，又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没有什么钱不钱的话。劳动力少子女多的家庭，或者丧失了劳动力的人，照样有饭吃，这又是共产主义的。吃饭不要钱，主要的部分是共产主义，次要的部分是社会主义。还说，"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很好。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然仍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表示，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仍旧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待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变。但是，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即提倡和鼓励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办法，只是要看条件。可是，当年不论干什么都鼓吹"大破条件论"，甚至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北戴河会议后，各地便不论条件成熟与否，争先恐后地推广起工资制和供给制来。

1958 年国庆节前，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方式。据各省、市、自治区向中央农村工作部汇报，河南、广西等几个省份计划在 1958 年内或 1959 年 1 月普遍推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其他地方也都在重点试点；准备推广。很多公社一建立，就不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量，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公社则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中央农村工作部还报告说，群众对供给制的反映是，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因此，"更加鼓舞了人们的干劲，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人民公社在实行供给制的同时，还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是供给制的重要载体。

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前就已出现。"大跃进"启动后，由于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接着是深翻土地搞所谓"大兵团作战"，加之各地大办工业，特

别是进入夏天后，既要进行夏收，又开始大炼钢铁，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紧张，客观上需要广大妇女摆脱家务劳动的拖累，投入到生产第一线。于是农村先是出现了农忙食堂，一些地方还办起了常年食堂。公社化运动前，河北徐水、河南沁阳都实现了全县食堂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被看作是解放妇女、节省粮食、节省劳动力甚至是消灭私有制残余的“共产主义萌芽”，被大力提倡。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于是，在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农村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嵖岈山和七里营这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有建立公共食堂的内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第十七条规定：“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的，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收取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章程第六十二条称：“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以生产单位建立全民食堂，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之日臻完善。”于是，各地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纷纷仿效办起了公共食堂。

北戴河会议后，至当年的9月2日，河北省已办起食堂21.7万个，在食堂吃饭的群众达272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3%，有98个县（市）实现了食堂化，至10月中旬，河北的公共食堂增加到23万个，全省有94%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

至10月14日，河南全省建立公共食堂26.9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0%，而农村人民公社参加食堂吃饭者占总人口的98%，实现了全省食堂化。

至9月28日，陕西建立公共食堂10.5万个，参加入伙的占总农户的80%。

至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办公共食堂265万个。至1958年底，全国的公共食堂达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人民公社化后办起的公共食堂，是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供给制中最重要的一项供给内容——粮食——并不直接分给社员个人，而是交给公共食堂。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普及。

这段时间，由于刮“共产风”和提倡“吃饭不要钱”的影响，加之想当然地认为这年粮食获得了特大丰收，已经到了多得吃不完的地步，于是许多地方搞没有限量的“敞开肚皮吃饭”，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还有些地方，甚至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

人民公社的“生活集体化”当然不仅仅是办公共食堂，还包括建立幼儿园、幸福院和建所谓共产主义新村。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第六基层社第一大队就建立了“三院两所”。“三院”是指儿童学院、青壮年红专学院、老年幸福院，“两所”是指招待所、托儿所。

这个大队共有585户，2689人，按不同年龄进入不同的“院”，集体住宿。所需的房屋则是将社员所有的房宅宣布为公社所有，然后由公社负责管理维修，由大队规划使用。其具体规定是：

儿童学院：凡是4—6岁的儿童，全部参加儿童学院。该大队共建有4个儿童学院，入院儿童217人。每院设院长1人，教养员2人，建立儿童食堂1座。儿童实行分班分组，每天集体上课、睡觉、劳动、吃饭。

青壮年红专学院：这个大队共建立了4处，住进红专学院的有563人，学员实行军事化，集体吃饭、劳动、学习。在住宿问题上，凡是夫妇俩口者，住单间，一门一窗；未婚的青壮年，男女分住，二至三人一个房间，实行集体住宿。

老年幸福院：凡是年老体弱，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老年人，组织到幸福院，集体住宿、吃饭，并根据其劳动力情况，分配给一定的轻体力劳动，如养鸡、鸭、兔、猪等。

一些地方在实行生活集体化的过程中，还搞集体住宿。湖南省平江县长寿公社第二大队四中队（按：中队相当于生产队）共有864人，公社化后，未婚男女、寡妇等住在7个集体宿舍，112对夫妇，则住单间。河南省鲁山县红旗公社社内的工厂、学校、专业生产队，都建立男宿舍和女宿舍，实行住宿集体化。红旗公社的农业生产队在农忙时，还建立了许多“战棚”，即临时宿舍。这种“战棚”一般分为两种，一种设在田间，由麦秸、茅草盖成，供社员田间劳动时长期使用，社员在“战棚”里吃饭、休息、住宿；另一种是临时“战棚”，用布制作，由数根竹子撑起，劳动到哪里带到哪里。还有的地方规定男女分住，夫妻只有星期天才会面。毛泽东得知一些公社搞集体住宿、男女老幼分开后，曾作了严厉批评，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共产党怎么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中，一位省级领导干部在一篇论人民公社的文章中说，要建设有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的共产主义生活，必须把现在居住分散而且条件很差的农村逐步城市化。因此，改变农村居住条件这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任务，随着生产的发展已提到我们面前来了。而房子的个人所有制，势必限制、推迟对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变，农村房子应该而且必须走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道路。按照这样的思路，一些人民公社还将社员原有的房屋拆除，盖所谓的“共产主义新村”。可是，不久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暴露出来，建新村的计划只得停止。结果，社员新村没住上，旧房子又拆掉了，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第五节　没有根基的“金桥”

对于建立人民公社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今天是看得十分明了的了。其实，这一问题，当时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的，当年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这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因为人民公社能实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包含有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并且能实现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公共食堂、托儿所的建立，实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了妇女，消灭了私有制残余；公社办工厂、办红专大学、建新村等，便于消除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凡此种种，使得共产主义不再遥远、渺茫和神秘，不久的将来人们就能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所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那么，既然“不是遥远将来”，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据薄一波回忆，北戴河会议讨论的一个文件中写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7年前，毛泽东改活了一点，改成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即1967年或1972年以前。后来这个文件没有公开发表，但起码与会者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已是明确的了。无怪乎当时的人们说，“我们这一代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

一些地方甚至还提出更短的时间建成共产主义的设想。山东寿张县（1964年撤销，并入阳谷县和河南省范县）计划两年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山东范县（1964年划归河南省）提出在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山东莒县的口号是大战两百天向共产主义过渡，河南修武县打算在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薄一波后来总结说：“当年，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估计得短而又短，我以为这是理论认识上导致人民公社化错误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战争年代，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者们虽然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但他们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问题，自然不会更多地去考虑共产主义的实现时间。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实现共产主义，更是以后的事情了。为此，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再强调要将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分开来。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又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但是，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作设想时，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情绪就开始有所流露，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这方面

的表现就更为明显。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曾这样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到1956年，原定十五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不到四年就基本完成了，这使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开始有新的设想。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着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从1967年或1972年起，就可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1957年7月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讲的。进入1958年，他亲手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目的就在于要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大跃进"与高指标是紧密相连的。高指标导致了浮夸风和"放卫星"的盛行，这又促使党的领导人一面为农村出现的万马奔腾景象所鼓舞，一面又为浮夸风所迷惑，以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已经有了一日千里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为期不远。

1958年的《新华半月刊》上曾有一份《今年农产品高产纪录统计表》，里面详尽地刊载了截至这年9月25日省级以上党报发布的"卫星"如中稻产量最高的"卫星"是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小麦产量最高的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还有亩产26968斤12两的花生（福建省晋江县集力社自强生产队）、亩产7239斤1两的芝麻（河南省西平县东风人民公社）、亩产202735斤的南瓜（河南省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对于这些离奇的高产"卫星"，人们不一定完全相信（尽管这些"卫星"都煞有介事地进行过验收），但对于这年的粮食大丰收许多人则是深信不疑的。为此，7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天大丰收说明了什么》自豪地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发表文章，专门驳斥"粮食生产有限论"。6月16日，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根据他估算，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据李锐回忆，毛泽东原来对那些高产"卫星"还将信将疑，看了这位科学家的文章也就相信了。1958年12月，两位主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下面报产，有浮夸虚报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八千五百亿斤

左右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少于七千五百亿斤，可以照此类文公布。这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七百亿斤翻一番，还稍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

农业的高指标、浮夸风，又逼得工业和其他部门也搞浮夸、"放卫星"，以至各种"卫星"满天飞，1958 年的中国真是热闹非凡。既然生产力如此飞速发展，生产关系自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以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1958 年急急忙忙地宣布通过人民公社而过渡到共产主义，也有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推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社会制度，许多人洒出了热血，献出了生命。共产主义理想曾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奋斗不止的精神动力。一旦旧制度被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被确立，人们自然会憧憬社会主义的未来，关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1920 年 10 月，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不久，列宁就宣布："现在是 15 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将亲手建设这个社会。"他还说，现在是 15 岁的一代青年，"再过 10—20 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可见，在列宁看来，实现共产主义也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而是只需一二十年的时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俄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虽然主要是当时的形势所迫，但也与列宁当时的急于搞共产主义的想法是分不开的"。

斯大林在 1936 年宣布，苏联已经实现社会主义。1938 年苏联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经济上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在五年内"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1941 年卫国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过几年的重建，苏联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斯大林再次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1952 年 10 月，苏共召开十九大，此次大会决定将有几十年历史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称为"苏联共产党"。改名的原因，是因为苏共的双重名称——"共产主义的"和"布尔什维克的"——是由于历史上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而形成的，目的是为了同孟什维克划清界限。现在，孟什维克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双重名称也就失去意义，而"共产主义的"这个概念最能确切地反映党的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次大会不但改变了党的名称，而且通过的党章指出：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揭露，却没有放弃斯大林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1957 年 11 月，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40 周年纪念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在 15 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苏联在内部确定，从 1959 年算起，以 12 年的时间即 1970 年实现共产主义。1959 年 1 月，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在《关于 1959—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加强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同时日益充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正是因为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上和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毛泽东才提出中国15年赶上和超过世界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苏联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无疑给中国领导人既有启示，也有压力。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苏联进入了共产主义，中国还在慢吞吞地搞社会主义，实在不成样子，所以才有了在1967年或1972年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这期间，中苏之间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此时两党、两国关系实际上已出现了裂缝。1958年春天和七八月间，围绕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两方闹得很不愉快。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不满的，党内也有一种暗中使劲超过苏联、早于苏联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

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然要改变原有的基层组织结构，构想出一种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于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应时而生。

中国古代虽有“公社”之名，但它与今天所讲的公社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是祭祀天地神鬼的地方。《礼记》中说：“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公社”同1958年的人民公社没有什么关联。

1958年把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取名人民公社，既源于空想共产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描绘，更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公社的论述密切相关。

一位研究者指出：“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史上，人们通常认为，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是公社。‘公社’与‘共产’两个词，在欧洲史上是同一来源。所谓共产主义，也就是公社主义；所谓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1958年的人民公社与人们企盼的共产主义，又何尝不是这种关系。

一些空想共产主义者常常把他们的理想社会命名为“公社”。18世纪法国的“平等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袖巴贝夫认为，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应当从在国家中成立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全民公社”开始。在巴贝夫的“全民公社”里，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拥有国内财富。每个人都按照法律向当局领取所需之物。每个公社社员，都获得整洁卫生的房屋、衣服、日用品、照明、取暖、食品、药物等，每个人都应该到公共食堂就餐。巴贝夫还认为，一切劳动人民，都会很愿意加入“全民公社”，至于公社以外不愿放弃私有财产的人们，则不能享受任何权利，并且将之赋以极重的累进税，迫使其破产、逃亡或赶紧加入公社。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卡贝等创立的“协和新村”、“依卡里亚”之类，其实也就是共产主义公社。巴黎公社的革命家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把自己建立的工人阶级政权命名为巴黎公社，因为他们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农业合作组织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农业公社，二是农业劳动组合，三是共耕社。1917年，诺夫哥罗德省召开第一次全省公社代表大会。1918年4月，科斯特罗马省建立了4个农业公社，特维尔省建立了6个公社。

1919年12月，苏俄召开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其中讲到：“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但是，列宁当时并不怎么看好农业公社，因此，他同时又说：“如果公社在实践中表明自己真正在认真改善农民经济，那就很好，那就无疑会提高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威

信。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公社只是引起农民的反感，'公社'这个名词有时甚至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而且这种情形不仅是在荒唐地强迫农民加入公社的时候才发生。"

斯大林曾指出过公社与劳动组合的区别："劳动组合只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公社在不久以前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共化了，就是说，公社社员和劳动组合组员不同，他们没有私有的家禽、小家畜、奶牛、谷物和宅旁园地。"在苏联，农村公社最终没有发展起来。斯大林分析说："在公社中，与其说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把它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不如说是为了达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压抑下去了。很明显，这是公社的最大弱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社没有得到广泛发展，而只有几个或几十个。"斯大林同时认为，公社作为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当将来的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时，劳动组合将发展成为公社。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常常把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1958 年 4 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6 月，这部书初稿编辑完成，随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稿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 1845 年 2 月 8 日《在爱北裴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概况的几段话，其中有两处提到公社。一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恩格斯在另一处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会有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繁杂的运输方法，中央机构可以"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费量"。这部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在北戴河会议上，他一再向与会者推荐这部书。这部书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看来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一再讲，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他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在 1958 年 12 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 3 月成都会议、5 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 4 月已在河南出现，5、6、7 月都不知道，一直到 8 月才发现。北戴河作了决议。这是件大事。他在 1959 年 7 月的庐山会议上还讲，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视察中随便讲的一句话，记者在报道中写上了。毛泽东看到后，忽然拍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有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事后，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是我讲的，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这里，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是事实，但恐怕不能说"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随便讲的一句话"，因为他在河南视察时就做过这样的表态。

客观而论，1958 年"大跃进"中，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其实也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之中。近代以来，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凌，

中国人民忍气吞声了一个多世纪。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中国生产力仍很落后，经济上还没有彻底翻身。中国共产党发动“大跃进”，人民群众投身“大跃进”，都是希望早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以最快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正是“大跃进”没有任何阻力就发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跃进”开始后，原有的社会体系确有与新形势不适应之处，而当时又想不出既不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又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妥善办法，自然只有在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上打主意。于是，小社并大社在一些地方自发产生了，而办大社又恰好是党的领导人提倡的。所以并社运动很快在全国铺开，各个大社也就有了五花八门的名称。

与群众并大社好办大事这样的自发认识相比，毛泽东显然想得更远一些，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暴动”，尽早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重大问题。虽然从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中，还很难看出毛泽东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前，他对人民公社有什么样的认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话绝不是毛泽东“随便讲的”。如果是随便讲的，陈伯达两次转述他关于公社的设想就难以解释了。要是毛泽东没有相关公社的议论，陈伯达又怎会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特地点明是毛泽东的观点呢？而且对于这一点，不只有陈伯达讲过毛泽东关于公社的设想，前面提到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也透露了毛泽东、刘少奇有关公社的构想。另外，谭震林 1958 年 8 月 11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丰收》一文中，也说：“今年 6 月，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应举农业社社长时，曾经向在座的描绘了一幅幸福生活的图景，也就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奋斗目标：全国每人每年一千五百斤粮食，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植物油，二十斤皮棉。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样的幸福生活并不是太遥远的事，而是在短时期内就完全可能达到并超过这个目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目前有些地方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客观要求，开始采取了并大社的方针，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指导思想发展起来的。”这篇文章的发表要早于新华社关于毛泽东视察山东的报道。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谭震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他们讲话也好，发表文章也好，应该是很慎重的，不会随意透露党的最高领导的设想。对此，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泽东有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后，为了不至于太突然，先让陈伯达等人透露出去，起投石问路的作用；二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议论过此事（这一点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可以印证），但也只是一般的议论，而陈伯达在经过一番揣摩后借题发挥，谭震林在文章中又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第一种的可能性恐怕更大些。

其实，“公社”只不过是一个名称问题，当时将这种新的农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定名为公社，看重的不单单是这个名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过，更重要的是它的“公”，也就是它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

1958 年建立的人民公社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空想主义色彩，

这又与毛泽东早年接触过的某些政治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空想主义、国外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旧思想，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自然是不错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为此时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同的路而高兴；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有什么不对，康有为的问题主要是找不到如何去实现大同的路。

《大同书》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写的，写成之后，康有为一直秘不示人，直到 1913 年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对于《大同书》的主要内容，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曾有过概括：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庭，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比邻为肥工厂。

康有为关于大同社会的设想的某些方面，与 1958 年的人民公社是何等相似！

大同世界是古代中国人虚构的太平盛世。《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同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基督教教义、达尔文进化论、卢梭"天赋人权论"等糅合而成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读过《礼记》，对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颇为赞许。1917 年 8 月 23 日，他在致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说："自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青年毛泽东对大同世界是非常向往的。

毛泽东青年时期是否读过《大同书》，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是，当时涌现出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潮，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对毛泽东等渴望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来说，却是心向往之且一一产生了深刻影响的。1919 年 12 月，已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学生之工作》，其中在谈到他的新村计划时说：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

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对东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作都有涉猎，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船山；从资产阶级理论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他在1936年曾对斯诺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西方舶来的"乌托邦"思想等，曾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大的共鸣。这也不难理解，和当时其他的中国先进青年一样，毛泽东在对黑暗的现实强烈不满的同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又驱使他如饥似渴地从中外思想家身上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方剂。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抛弃各种芜杂的旧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个人青年时期接受的思想观念，总难免在脑海中留下某些痕迹。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能正确地处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一部《新民主主义论》，把这三者的关系分析得多么透彻。当然，革命与建设不同，革命有着明确的敌人，也有着明确的目标。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就不那么容易处理了。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样的认识正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得出的。而在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1958年，人们还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将实现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写道："革命军队（按：即共产党）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毛泽东自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矢志不移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社会而奋斗。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主要是革命，是为了建立新制度。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后，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了。如果说，革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间接地做准备，那么，进入建设时期就是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直接创造条件了。早年的毛泽东对大同社会的向往，还只是一种理想追求。那时，他还仅仅是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并不具备将那些空想转变为现实的条件。到这时，毛泽东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偌大一个中国就为他实现大同理想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试验空间。毛泽东认为，他亲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通向大同理想的有效途径。此时，毛泽东已是60余岁的老年人，与普通老年人一样，已是喜欢忆旧、也容易忆旧的年龄，青年时代曾憧憬的理想蓝图，再次从他的思想意识中流露出来，使以前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的他也陷入了空想之中。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选择农村率先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有来一次新的

农村包围城市的用意。民主革命时期，党长期把农村作为工作重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这使许多党的干部不但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也熟悉农民，善于组织和动员农民，做起农村工作来得心应手。虽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宣布从此全党进入了城市领导农村的时期，但党的许多干部还是习惯于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农村，所以“大跃进”运动发源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由农村开始（按照当时的设想，不但农村要公社化，工厂、学校、机关、街道等也要公社化，而且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曾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搞人民公社，农村又走在城市的前头。谭震林在江苏座谈人民公社问题时，当江阴县马镇公社谈到实行“吃饭不要钱”后，一部分家在农村的工人家属如何处理时，他说：“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民主革命是如此，建立农村根据地，而后夺取城市；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先农业合作化，而后才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共产主义革命看来也是如此。”谭震林又说，成立人民公社，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是质的变化，“反正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共产主义化了，你城市不得不化了”。这段话，把为何要先在农村实现公社化，说得很明确了。

第三章　调　　整

第一节　问题初现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在未经试点的情况下，全国一哄而起建立了两万多个“又大又公”的人民公社，实现了公社化，结果很快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导致“共产风”盛行。

公社化过程中“公”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刮“共产风”的过程。

全国的人民公社平均由2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若而成，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成了公社下辖的大队或管理区，成为单纯的生产管理单位。许多公社都是白手起家建立的，而公社建立后，要求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构成一个半独立半封闭的小社会。公社要建办公楼，要发展工业，要建“红专大学”，还要盖所谓的新村等等，这些所需开支，都来自对各农业生产合作社资金、物资的无偿调拨。嵖岈山公社建立后，为了建公社办公楼和招待所，征用土地50余亩，’调用1.46万个劳动日，砍树1.3万棵，调砖瓦31.2万块，名副其实地“共”了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

组成人民公社的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自然条件、社队干部领导能力等差异，贫富程度是不同的，在“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大原则下，原来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被消除，成了社、队“共”社员的“产”，穷队“共”富队的“产”，贫穷的社员“共”较富裕的社员的“产”。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农民过着名为集体、实则平均的生活。

应该说，“共产风”在“大跃进”开始时就已刮起。湖南省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便是一例。

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根据中共湘潭县委的布置，古云高级社开展大规模的投资和积肥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死钱变活钱”，要社员把家里藏的光洋（即银元）拿出来，作为向社里的投资，办法是先由几个干部摸底，对被认定是有钱的农户就送去一张条子，写明什么时候要向社里交出多少钱来，如果不交，就开展辩论、斗争。古云高级社就有近20户被送了要钱的条子，由于不愿交钱而被打的社员有10个人，其中有5

名中农和5名富农。这样一逼一打，弄得人人紧张，有的社员吓得把钱都拿了出来。如此一来，古云高级社一共搞到了7000元，其中有4000元光洋。没钱的农户，有的被逼得出卖被帐、棉纱，有的被赶走了生猪。

公社化后古云的"共产风"有增无减。1958年8月15日，公社为了开煤矿，要调大批的劳力，调人的办法是各生产队站队点名，谁被点名谁走，多数男劳动力被调去。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这个大队的劳动力被集中到石潭镇炼钢。没有炉子，就拆屋取砖；没有燃料，就砍树或拆楼板烧；炼不出铁，就打烂社员家的铁锅做"引铁"。当时的口号是"一天不出铁是大事，三年不出谷是小事"。

炼完钢铁，又去修运河。根据上级要求，必须"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山上要过船，底上15尺，两边跑汽车，中间过洋船"。古云大队一下子被调去了几百人，每个生产队只剩下一两个男劳动力。被调去修运河的社员前后去了40天，这段时间不准请假，凡是回了家的，都得押送回工地。

河北省武清县（1973年划归天津市，2000年撤销，设立武清区）河西务第三社建公共食堂时，社党支部书记、社长召开社员大会，叫社员向食堂送粮食，社员对办食堂有顾虑，拿出来的粮食并不多，社领导就决定到各家各户去翻查，该社147户中只有3户"五保户"未翻，其余的全都翻了，并且连翻三次。在翻查过程中发现社员有值钱的财物，就拿走算作对社的投资。社员王勋伍一家三口都下地劳动去了，结果他家的锅、勺都当作废铁被拿走，还将他家里的30尺布也当作投资拿去了。

河北省安国县为了美化公路，平调了各生产队的树木1.5万棵。该县伍仁桥生产队为了建一座容纳2000人的大食堂，占用了15户社员的宅基地，拆房25间，一切砖瓦木料均无代价使用，还向生产小队平调梁78根，椽子6900根，柱子52根，门26扇，窗户82个。还抽调小队劳力62人无偿使用达三个月之久。

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还"刮"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的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拿东西，去得早的多拿一点，去得晚的少拿一点，最后去的是一位教师，只拿了两筒蜡纸。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别人家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就成了大家的。这个公社只剩下一条还没有"共产"：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该公社党委书记也拿不准是不是可以不"共产"，说还得请示上级。这在今天看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可这件事却是1959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讲到的。

虽然在公社化时，各地都规定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仍归社员个人所有，如河北省安国县规定：除了农业社的全部财产归公社所有外，社员个人的自留地、大牲畜归集体所有，但房屋、院中与宅房的小片土地和零星树木仍归私有；社员个人喂养猪、羊、鸡等仍归私有，对于社员个人使用的生活资料如衣服、被褥、家具、自行车、手表等，一律

不动，仍归社员个人私有。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规定常常走了样。河南省郾城大刘店公社党委宣布："反正现在啥都是大家的了，有衣服都得拿出来，谁需要谁穿。"于是在全公社推行收衣服的办法。这个公社的五个党委书记中，只有第三书记是本社人，结果拿出了七件衣服党委还不满意。安阳县的一些公社则提出，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啦，一人只留一条被子，多余的交公社。该县县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干部回家时发现被子很重，拿不动。他爱人解释说，听说共产主义，一人一条被子，就把五条被子缝到一块了。

"共产风"实际上就是"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农业社或社员的财产。"共产风"的出现，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平均主义的思想，历次农民起义无不是为了实现"均贫富、等贵贱"，这既是农民英雄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揭竿而起的动力。太平天国革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可以说是这种思想发展的极至。如果说，"均贫富"的思想在封建时代，在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方面尚有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之后，平均主义就成为生产力发展、农民积极性提高的阻力了。而平均主义思想作为一份历史遗产，在生产力不发达，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是难以彻底根除的。从现实看，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总结的，我们过去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更不说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问题了。于是，把实现共产主义理解为必须先"共产"，各地大刮"共产风"，也就势成必然了。

人民公社虽然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最好的组织形式，是通向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金桥"，但何谓共产主义和怎样才能进人共产主义，当时实际上是并不清楚的。这样的问题，不要说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不清楚，就是理论界甚至中央高层也没有搞清楚。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这就是对于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接近共产主义，自然也就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越纯越好，也就是"产""共"得越多、越彻底越好。

第二，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搞"吃饭不要钱"，还提倡"敞开肚皮吃饭"，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并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在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为了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各地土法上马，建起了一大批小土高炉，组织大兵团作战，开展全民大炼钢。到1958年9月，全国参加炼钢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10月底达到6000万人，11月更是多达9000万人，农村的主要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被投人到了钢铁生产第一线，留在家里进行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或老弱病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动用了人民公社20%的畜力车、人力车，参加大炼钢铁的运输，并组织农村劳动力参加铁路建设，仅京广、津浦铁路沿线的人民公社，就有150万人参加了这两条铁路的复线建设工程。此外，1958年内，还有约7000万人，多时达1亿人参加了水利建设。由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从事非农业生产，致使这年秋收大忙季节却没有劳动力去收割快要到手的粮

食，造成大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不能收回。河北省安国县共有劳动力16万人，大炼钢铁去了8万多人，修水库又去了近万人，加上各公社建林场、猪场、肥厂又平调了一部分人，结果投人秋收种麦的不足一半人，而且多是妇女。全县不少生产队用耠子耕甘薯地，后边跟着人拾甘薯，丢掉的不少。即使拾起来的甘薯也没有时间和车子运回去，社员怕干部看见挨批评，就用甘薯蔓将甘薯盖住。有的则采取就地挖窖的办法，把甘薯埋在地里。在种麦平畦时，平出了许多甘薯，社员怕暴露内情，又悄悄将之踩入地下。这一年，老天爷很照顾，风调雨顺，庄稼确实长得很好，但丰产不丰收，最保守的估计全国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浪费。

粮食的浪费还体现在公共食堂上。公社化后农村也实现了食堂化，亿万农民告别了自己的小锅小灶，吃起了人民公社的大食堂。由于大放农业生产"卫星"，认为粮食已经多得到吃不完的地步，不但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还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少公共食堂以"吃饱"、"吃好"为目标，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吃，导致食堂浪费严重。一些公社吃粮根本不过秤，结果一人一月平均吃粮食五六十斤。山东省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3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这并非是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如此一来，"敞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公共食堂也搞"实验田"，图为湖北省应城县跃进公社党委领导征求社员对食堂饭菜的意见（刘心宁摄，载《新闻摄影》，1959年第1期）

到了1958年冬天，农村粮食就开始出现紧张，以致部分公共食堂发生断粮停伙现象。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的食堂停伙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1958年12月，馆陶县群众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该县有些村庄食堂停伙，群众外出逃荒。中共中央将来信转给山东省委和省人委，并指示其对此事进行调查。经山东省委组织的省、地、县联合调查组调查，了解到人民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而且停伙和一天只吃一顿或只吃萝卜的半停伙情况还在发展。至1959年1月10日，馆陶7个公社中，已有6个公社出现了停伙半停伙的情况。据各公社党委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停伙者已有82个，而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至于半停伙者更多。很多地方自从1958年中秋节后就没见过粮食，吃了四五十天的地瓜和萝卜。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四个食堂在1958年中秋节后全吃地瓜，到11月后全吃萝卜，12月29日萝卜也没得吃了，食堂只得停伙。

馆陶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委、省人委立即组织了粮食调运工作组，调拨粮食，一个食堂一个食堂地进行生活安排，并根据各公社的实际库存，按每人每天一斤的标准，先给每个食堂调够3个月的粮食，公社库存不够者，由国库拨给。这样，已停伙的食堂很快重新开伙，外逃的群众陆续返回。

在一些地方公共食堂停伙的同时，许多地方的供给制也无力为继，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在勉强维持外，其他的供给已是名存实亡。作为"共产主义试点"的徐水县，以实行全民供给制的"十五包"而闻名，其实到了1958年11月，才发出第一次生活用品，全

县共支出550万元。按原来的计划，全县仅发毛巾一项就需144万条，实际只发了72万条，其他的生活用品只是给幼儿园、幸福院象征性地发了一些。至于看电影、洗澡费等则根本没有兑现。按照徐水当时的经济水平，“十五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里的共产主义试点，只实行了三四个月就夭折了。

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工资与供给的比例各地各不相同，如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就是以著名劳动模范王国藩所在的“穷棒子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供给部分占69.28%，工资部分占30.72%；而河北多数公社是供给占60%左右，工资占40%左右。在人民公社的分配中，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工资仅具有象征性。河南新乡地区是较早实现公社化的地方之一，到1958年11月，全地区有152个公社发了一次工资，34个公社发了两次工资，19个公社发了三次工资，总共发工资710万元，每人平均2元左右。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因为要搞各种“大办”需要大量的资金，只得搞高积累，根本没有多少资金可以用于发放工资。有的公社伙食供给制都难以维持，哪里还有工资可发。即使有那么一点工资，但它与供给部分相比，也是无足轻重。这种名义上具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因素，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正是压抑社员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广东省新会县第一次发放工资后出现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新会县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1) 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2) 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3) 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4) 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新会县各公社发放工资后10天左右，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大泽公社礼成管理区领工资的有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同时，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此受影响而消极。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50担；过去能挑100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新会县两者之间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群众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

第三，公社建立后，规模扩大了，管理的内容增多了，但许多社、队干部的素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导致生产工作中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随之发生。

“大跃进”之初，毛泽东听说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百分之百，就鼓励各地搞深翻，并且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河南省长葛县提出“土地大翻身、黄土变黄金”的口号，将全县33万亩土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五寸左右，成为全国土地深翻的典型。1958年7月，农业部特地在长葛召开土地深翻现场会议，号召全国搞一个“土地大翻身”运动。北戴河会议还做出了《中共中

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要求在今后两三年内，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次，并且每三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根据这个指示，各地农村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体系，抽调大批劳动力，掀起所谓“土地大翻身”的群众运动。有的地方还放翻地“卫星”，片面地认为土地越深翻越好，有翻地数尺甚至上丈深者。这样做不但浪费了劳动力，而且还破坏了耕作层，导致农作物的减产。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还发现，南方一些水稻高产地区每亩植3万蔸，乃号召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合理密植。但“合理密植”在执行过程也走了样，变成了越密越好。1958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洪赵（1958年改名洪洞县）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认定“密植是保证小麦生产飞跃的中心点”，要求“以密植为统帅，实行以最高的密植为中心的一系列技术革新，跨上密植跃进马，突破百万株穗关”。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密植热。河南省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就搞了一个计划亩产10万斤的“七七试验”。该大队选择了7分地，计划收粮7万斤。具体做法是：地深翻了7尺，下了几千斤的腐烂动物皮渣与农家肥混合搅拌的复合肥，边翻地边施底肥，足足花了半个月才将地深翻一遍。以每分地下种100斤计算，试验田共下种700斤，这个数字超过了正常下种量的近百倍，靠木耧根本无法播种，只好将700斤种子全部进行撒播，连播几遍才将种播完。这样的“丰产试验”，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第二年小麦收割时，7分试验田仅获得163斤秕麦。

人民公社建立后，按照军事编制组织团、营、连、排、班等所谓的“作战单位”，进行“大兵团作战”，将劳动力在全公社甚至全县范围内调来调去，造成劳动力的大量浪费。一些地方还大搞疲劳战术，动辄苦战、夜战，不关心群众生活。河北省安国县在公社化后在全县推广“十到田”，即“指挥战斗到田，食堂到田，住宿到田，托儿所到田，技术传授到田，鸣放辩论到田，修配厂到田，物资供应到田，大字报到田，医疗到田，学习书报到田”。有的公社还搞“三无村”，即村内无闲人，夜间无灯火，村村无炊烟。宁津县（1964年复归山东省）红旗人民公社第三营，在种麦期间连续鏖战十八昼夜，有的社员在干活中就睡着了。武清县草园公社提出要鏖战七昼夜，社员坚持不下去，就在晚上留人在地头挂起灯笼摆动，以应付公社的检查。

人民公社成立后，社队干部的“强迫命令风”和违法乱纪现象也很严重。一些公社将停止社员吃饭和劳改作为惩处社员的手段。武清县西浦公社社员翟国杰，年仅16岁，在深翻土地时将脚扭伤了，向社长请假休息，社长不允，勉强干了一天，第二天脚肿了实在不能干活就未参加深翻。社长知道后宣布对翟国杰停饭三天，有一个社员背着社长给他去送窝窝头，被社长看见马上夺回，翟国杰的父亲只得把自己那份饭偷偷留下一点给儿子吃。后来，翟国杰发高烧，他父亲才请假从集体宿舍将他送回家，回到家后翟国杰就死了。这种现象在各地的人民公社并不罕见。有的社队干部动辄以不给饭吃威胁社员。河北农村有的社员说：“干部有了刀把子，稍微有点毛病，就说不让吃饭，你到厕所里去吃。”“还不如挣工分时（按：指高级社的评工记分），自己挣来自己吃，现在吃的是干部的饭。”

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的徐水县，设立所谓的“劳改队”，凡是被认为是“坏人”、“消极分子”的社员，即被送去劳改，从1958年7月至11月，全县被劳改者达3674人。该县大王店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命令该社六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在20分钟内找20根绳子，捆20个坏人到公社，结果找来了7人，全被绑送劳改。社员马玉梅腿上长疮刚从医院回来，劳动中行动迟缓，即被罚了三个小时的“立定”，直到昏倒在地，才被家人抬回。史各庄公社社员葛洛喜，因赶大车时压了豆子，被县工作组看见，葛洛喜说明了缘由，工作组不信，以不服从命令为名将其送去劳改队。劳改队大小便要报告，有专人持枪看守，吃饭有限量。设立劳改队的不只是徐水县，武清县甚至将批准劳改的权力下放到了生产大队，以致出现了社员有缺点和错误就送到劳改队的现象。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强烈不满。1958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郊区人民公社社员有十五个不满的反映》。这份材料中反映的北京郊区社员的不满是：(1) 对大协作不满，什么工作都要大协作，抽调了劳动力，打乱了生产计划；(2) 对有些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3) 对公社向社员要东西（如砖、瓦、木料等）不满；(4) 对常常苦战几昼夜不满；(5) 对食堂粮食不加限制不满；(6) 对干部作风生硬、不民主不满；(7) 对少数干部贪污腐化不满；(8) 对劳动力流入城市，影响农业生产不满；(9) 对丰产田指标过高不满；(10) 对今年水利建设任务过重，影响农业增产的其他措施不能实现不满；(11) 对不搞副业生产不满；(12) 对城里有些单位到农村用高价购买物品不满；(13) 对今年谷子种得少，牲口草料不够不满；(14) 对猪集中饲养，死亡率高不满；(15) 对没有时间积肥不满。

由此可见，一哄而起建立的人民公社已出现了不少问题。几年后，毛泽东承认，“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第二节　“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毛泽东是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导者，也是乱子的较早发现者。

1958年10月中旬，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外出视察，决定深入实际了解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10月17日，他在天津约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领导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并约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定县、唐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汇报工作。在谈话中，毛泽东对徐水的供给制泼了不少冷水。

毛泽东说，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实质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还问徐水县委负责人：供给制是有可靠的保证，还是比较可靠？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的幸福院时，毛泽东说，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

析，幸福之中有不幸福就好。鳏寡孤独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缺乏两端，大中小嘛，一天净是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

当然，毛泽东此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乐观的，对人民公社和供给制也是充分肯定的。在谈话中，他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归根到底还是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工具，比他生产得多，我们和美国还不是同样的工具，但我们组织起来了，过去是一家，后来社也小，才几百户，搞他一万多户的一个公社，力量就大了。徐水16万户当作一个社来调动，力量就更大了，分工也好分了，搞钢铁，搞森林，搞建筑。又说，今年粮食全国可达8000亿斤，去年是3700亿斤，翻一番多。他要河北明年集中搞1000万亩高产，亩产万斤。这样一来，中国17亿亩土地，搞两三亿亩就行，其他的废地15亿亩用来种树或种花。谈话中，毛泽东问道，今年种麦和去年有什么不同，安国县委第一书记说，安国东风公社搞了千亩小麦“天下第一田”，火箭公社搞了2万亩“宇宙最高峰”，都是大面积高产小麦。毛泽东说，好，明年6月上半月去看看。毛泽东又问：有这么多粮，有仓库没有？安国县委第一书记说，安国明年每人平均拿到1万斤粮，每人吃1000斤，余下的9000斤，500斤支援山区，8500斤卖给国家。毛泽东又问：没人要怎么办？回答是：1958年种一年，1960年土地休息一年集中力量搞建设，学文化。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并且说，民兵可以体操了，还可养牲口。安国去年平均亩产464斤，徐水去年平均亩产214斤，100亩才2万斤，日后1亩1万斤，98亩就可以种别的了。

座谈中，毛泽东还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发表了看法，并且说我们过去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结果把日本打跑了，把美国的薪金制打败了，是供给制战胜了薪金制。搞供给制，一不死人，二不瘦，三很健康。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采取逐步破的方针。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就是破了资产阶级的法权。

尽管如此，毛泽东通过接触还是感受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有必要为此作一番调查研究。10月19日，他致信陈伯达，要他与张春桥前往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进行七至十天的调查，为即将召开的郑州会议准备意见，他甚至还提出要为陈伯达等调一架专机飞郑州。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急切心情。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天津谈话后，河北省委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组，由省长刘子厚率领，于1958年10月18日至20日，到徐水进行了三天的调查。21日下午，刘子厚等省委领导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调查了解到的主要问题。

汇报中，刘子厚说，徐水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但他们已经公布了是全民所有制，究竟如何提法为好？毛泽东说，徐水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他们说是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就是了。交换问题要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徐水的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个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不同。他还给徐水泼冷水，提醒徐水应有清醒的头脑，知道事情的正面，还有另外的反面。

毛泽东还谈到，对于劳动力多的户，还是要照顾，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的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他还提出，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椅不能集体，私人债务，一风吹，又“共”一次“产”。这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所得，把它吹掉不好，群众会说你们不讲信用，说了话不算话。这些私人借贷全吹了，吹了老本了，占有别人的劳动。

通过这次河北省委对徐水情况调查的汇报，毛泽东认为，对于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1958年10月23日，他再次致信陈伯达，要调查组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调查卫星公社及所属的大队和生产队的各项问题，然后找遂平县委的领导座谈，研究全县的各项问题。10月26日，他又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谈话，要他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去河南的修武县和新乡县七里营，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

接着，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的石家庄地区、邯郸地区和河南的新乡地区视察。视察中，他不断找人谈话，除了询问生产情况，还特别关心社员的生活问题。每到一处，他总是问：食堂办了没有，办得怎么样？群众是否喜欢吃大锅饭？针对当时一些地方搞疲劳战术，让群众几天几夜不休息的情况，毛泽东说，要下个命令，要休息，睡够。要吃好，睡好，把小孩带好。还说每个社都应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公社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对于供给制，他也很关切，特地询问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徐水县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还说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毛泽东又问河南新乡地委负责人：人民公社工资普遍发了没有？发的是什么？钱是从哪里来的？有几个人民公社不能发工资？当听说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发了工资时，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靠不住，并且说，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只产一点粮食，哪里有钱发工资？虽然下面向他报告的不见得都是真实情况，他还是在视察的过程中发现人民公社存在不少问题。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到了郑州，分别去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和田家英向他汇报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吴冷西重点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问题，田家英重点汇报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十六包”。

汇报中，毛泽东不断插话。对于修武的一县一社，毛泽东认为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情，而且全县各地的生产水平也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富队的积极性。他说，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吃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有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多次找到会的省委书记谈话，做高级干部的“降温”工作。11

月3日下午，毛泽东听取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湖北、山西、山东、安徽、湖南等九省省委第一书记及陈伯达等人对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当汇报到有些地方搞非现金结算时，毛泽东说："每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

11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正在起草的"人民公社四十条"情况（郑州会议的第二天，一些省委领导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人民公社四十条"的文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并决定由吴芝圃、陈伯达等在会议期间起草这个文件），当得知起草小组准备将这个文件取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毛泽东当即插话说，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题目就大了。全世界都理解不了，尤其我们苏联同志就不懂了。你看，他们还搞社会主义，你就搞共产主义，并且十年！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会上，毛泽东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高级干部说，苏联搞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中国才搞几年的社会主义，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过渡。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于尽早实现共产主义还是向往的。他在11月6日讲话中说，斯大林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多少年，未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凡是可以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同一天，他看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报道了山东范县（1964年划归河南）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即县委第一书记）这年10月28日在全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范县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报告的摘要。其中说：

根据全公社工农业生产布局和有利于生产美化环境的原则，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25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每个新乐园村设有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等等，达到八院、二所、四馆、三厅、两池、三站、四场。全县筑八条宽三十米的大马路，贯穿到全公社二十五个新乐园。1959年普及小学教育，两年普及中学教育，并建成大学四到六处，师范学院一处。此外，对科学、卫生、福利、邮电各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划，并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段批语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

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

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思想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感到要区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能急急忙忙往前闯，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另一面，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速度，他还是想争取尽可能快一些。

不过，毛泽东在会上指示印发范县这个规划，主要还是想通过这个材料来给高级干部们“降温”。因为他在11月9日的会上讲到：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产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的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省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内有人主张废除货币和商品流通，进行产品调拨，在人民公社内部搞非现金结算。1958年9月中旬，一位负责农业工作的领导同志曾起草了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提出人民公社发给社员的工资，一律存入公社，发给存折，不计利息。社员存入公社的劳动报酬所得，除分期支取一定数额的零用钱外，社员的生活需要，由公社统一购买，统一分发，可由社员凭存折到公社门市部选购。无论统一分发或自行选购，均采取转账办法，实行非现金结算，以减少商品供销环节和货币流通范围。这位领导同志还认为，实行了非现金结算制度，就不以货币为媒介了，产品直接从批发站到了消费者手里，中间环节抹掉了，这样在公社里已经不存在商业问题，也就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拔掉了。这个文件虽然后来未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但由安徽省委办公厅发给了省外一些单位，造成了很大影响。

为了澄清党内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许多重大问题的糊涂思想，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地、县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号召各级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这几级干部用两至三个月的时间，每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并且“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

11月10日，毛泽东又亲自给与会者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表意见。毛泽东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

针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否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

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毛泽东强调，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毛泽东还讲到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问题：一是增加社会产品；二是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三是提高文化水平。毛泽东认为，只有实现了全民所有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中国现在还只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就是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就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目前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鞍钢式的全民所有制，一种是公社式的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是有界限的。对于河南提出的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提法，毛泽东不无讽刺地说：马列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毛泽东还告诫党的各级干部，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待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也要有耐心，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毛泽东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性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等方面的论述，其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实行产品调拨、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错误思想是有积极作用的。这说明，毛泽东本人也从北戴河会议前后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回到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比较正确的认识上来。

第一次郑州会议经过讨论，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二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当时都没有定稿下发。

《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分为六个部分，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这个《决议（草案)》一方面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的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

毛泽东在 11 月 10 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提议，这个文件由邓小平带回北京，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下发。事后，毛泽东重新作了慎重考虑，他于 11 月 12 日致信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第二天，他又致信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对上述两个文件进行几次过沦，征求意见，为即将召开的武昌会议作精神准备。

第三节　虚幻与现实的交错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乘专列继续南下。在专列上，毛泽东邀集了河南许昌、洛阳、新乡、开封等地的地委书记和鲁山、商丘、信阳、禹县等县的县委书记谈话。车到遂平时，又找遂平县委和嵖岈山管理区（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遂平全县变为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成为遂平县人民公社下的一个管理区）负责人谈话，详细地询问了公社实行供给制的情况。进入湖北境内后，毛泽东又相继找湖北省、地、县委负责人和两个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谈话。通过这些谈话，他对人民公社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段时间，毛泽东对公社化后群众的生活也很关注。11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0期上，刊登了一篇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中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此次患病人员较多，蔓延之快，为历年所未见，已波及全区的21个市、县，70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卫生工作搞得不好，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病疫蔓延很快。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1月16日，谭震林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书面报告。报告中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健康的，比过去的初级农业合作化和高级农业合作化都顺利得多。在这段话的旁边，毛泽东批写道："过去两个多月各地人民公社忙于秋收秋种和大搞钢铁，大多数还只搭起个架子，一大堆问题尚未处理。处理这些问题是今后几个月的任务。"在报告中讲到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必须办好，公社要有社领导专门负责管理生活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写了两段批语："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8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的时间4小时，共计12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8小时，忙时可以有10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12小时，以为持久计。""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要压缩空气。他还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强调不能剥夺农民。

对于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毛泽东强调：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里面提到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毛泽东还说，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在我们这里发生了问题。赫鲁晓夫提出12年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讲得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10年？15年？20年？30年？苏联41年加上12年，共53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9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了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红薯，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人民公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件。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在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是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的时候在河南已经出现，5、6、7月中，我们不知道，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相结合，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这表明，毛泽东虽然觉察到公社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他认为这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通过具体的政策调整便可以解决。他认为人民公社是由集体向全民、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好形式，并为能找到这种好形式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充分肯定，还从他对《张鲁传》的批语中表现出来。

据陈寿的《三国志·张鲁传》介绍，张鲁是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原名张陵）的孙子。张道陵客居蜀地时学道鹤鸣山（一作鹄鸣山）中，后来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入道者须出五斗米，后世称之为五斗米道。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代典籍，他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许多治国的方法，同时也受到传统文化中一些负面东西的影响。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就对张鲁的原始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说过三国时期，汉中有过张鲁，曹操把他杀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八届六中全会印发了《张鲁传》。毛泽东为此写了两则批语。12月7日的批语说：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如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户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过了两天，他仍觉言意未尽，又写了一份批语：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是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手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从中可以看出，1958年的毛泽东，不但有一股难以割舍的人民公社情结，而且在这一问题上确有其空想色彩。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问题，并认为其标准大致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电气化、机械化，钢的年产量至少在一亿吨以上；彻底解决衣食住问题；实现六小时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有条件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基本上消灭阶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大提高。

讨论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此次中央全会最重要的议题。12月9日，邓小平就这个《决议》的草案作了说明。

邓小平在肯定人民公社化运动"总的情况是好的"的同时，指出，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领导。目前党和人民群众中，对人民公社的看法参差不齐，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做法也有一些不一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因此有必要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端正做法，使人民公社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邓小平强调，我国目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在国家经济计划的领导下讲行的，不星资本丰义的；目前供给的范围不宜过宽，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包下来，应该增加工资部分所占的比重；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如公共食堂、幼儿园等，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他还对《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逐一作了说明。

12月10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首先肯定了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整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产物。《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广大劳动人民已经看到了它所带来的显著利益。更重要的是，公社化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农村逐步工业化，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缩小城乡、工农、体脑劳动三大差别，国家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

《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个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决议》的重要之处，在于从理论上和政策上纠正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强调：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空想。

《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对于发展生产是不利的，也是不正确的。

《决议》指出，有人认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这是一种误解。应当向群众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存款，公社化以后，仍归社员所有，并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可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认为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萌芽，但也强调，供给的范围目前不宜过宽。要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及小学、中学和成人教育。《决议》要求公社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要走群众路线，对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产阶级作风来对待群众。

《决议》提出，为了巩固人民公社，促进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根据本决议的要求，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的五个月时间内，对本地区的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工作，即整社工作。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与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相比，划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不再使用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这类表述，而是强调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明确了许多具体的政策界限，澄清了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纠“左”的一个重要成果。

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弊端没有也不可能有深刻揭示，它虽然分清了人民公社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强调国家与公社、公社与公社之间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不能无代价地进行产品调拨，但对于公社内部社与队、队与队及社员与社队的关系，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在管理体制上，管理区（生产大队）仍是经济核算单位（有的地方是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仅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因而没有解决公社与大队、大队与小队、社队与个人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共产风”。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仍然规定得很短，认为从此时起，将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也就是说，还是按照北戴河会议确定的三至四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第一个过渡并为第二个过渡奠定基础。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仍作了充分肯定，没有认识到这两件事正是群众对人民公社最不满意的地方。不过，从这个文件的内容看，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从北戴河会议前后的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冷静下来了，对于通过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已经去掉了许多虚幻的成分。

第四节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还在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进行当中，各地就已开展了整社工作。1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福建、广东等省进行整社的情况。四川整社的重点放在公共食堂的检查和整顿上，并针对有些地区在实行大兵团作战中生产无专人负责的现象，结合小春生产大力推行责任制。12月3日晚上，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有各地委书记参加的电话会议。会上决定，由省委和地委、县委共同组织万人检查团，深入人民公社，进行全面检查。江苏、湖北、江西等省都决定分批抽调省、地、县三级干部，组成检查团，对全省所有的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深人的整顿巩固工作。

12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社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文章强调群众路线是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明确指出：“大跃进的伟大胜利，也冲昏了一部分干部的头脑，违反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又慢慢抬头了，这种思想作风在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必然产物。”党的机关刊物用这样尖锐的语言指出“大跃进”中干部思想作风存在的问题，这在“大跃进”运动以来还是第一次，《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也是第一次。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在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通过对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使广大干部、社员在公社的所有制、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有所澄清。甘肃省西礼县盐官公社中川生产队在开展整社后，召开了一次有8户社员参加的座谈会。在谈及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时，一个社员说：“现在好了，不愁吃不愁穿，我看如今就是共产主义了！”另一个青年社员说：“有一双球鞋，两套衬衣就是共产

主义。”参加座谈的8人中有6人认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还有些社员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平均主义，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平均。平均了，就成全民所有制了。”有社员说：“公社是全民所有制，有啥大家用，家里所有的财产除碗筷被子外，凡能变成钱的都是私有尾巴，都应归社。”更有社员说：“钱也是私有尾巴，有钱能置家具，置下家具就成了私有尾巴。”在整社中，通过当时流行的大辩论，这个生产队的社员“认识了人民公社现在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但是已经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若干成分；在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人民公社也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但是，由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没有触及公社最本质的管理体制和分配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八届六中全会后人民公社的整顿过程中，无偿或低偿调拨生产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分配中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亿万农民仍是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挤在一个公共食堂，吃着名副其实的“大锅饭”。

1958年，以粮食生产“放卫星”为特征的浮夸风，导致了中共中央对农业生产形势判断的失误，以为1958年中国粮食的确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高征购政策。实际上，当年粮食只比1957年增产495万吨，根本不是北戴河会议时所说的增产一倍以上。不但如此，1958年7—10月的4个月中，与1957年同期相比，粮食征购量减少了440万吨，而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粮食的销售加出口则增加了260万吨。这一减一增，减少了国家粮食库存几百万吨。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各地要抓紧粮食的收购工作。

粮食本来就增产不多，加之公社化后搞“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浪费了不少粮食，许多社队自然难以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也有一些地方，原来只顾“放卫星”得表扬，没想到国家征购粮食时是按其上报的产量确定征购计划，征购时拿不出这么多的粮食，便纷纷改报低产，叫喊征购任务完不成，于是又给有关部门造成了这些地方是故意隐瞒产量的错觉。由于怕刮“共产风”，一些社队也确实存在生产队干部支持社员瞒产私分的情况。1958年至1959年冬春出现的粮食紧张局面，必然使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种种“优越性”产生怀疑。这种情况下，在八届六中全会后的整社过程中，一些地方不适当地开展了所谓“反瞒产”斗争。

1959年1月11日，广东省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大会，省委一位负责人参加了大会，提出“保证三顿干饭吃到底”的口号，要东莞拿出0.75亿公斤到1亿公斤的粮食。接着，广东全省都开展了“反瞒产”运动。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在一份报告中说，该省雷南县（1960年复名徐闻县）晚造（稻）生产有很大的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全县召开了一系列的干部会议，结果查出隐瞒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报告还说，必须交代两条政策，一是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

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是明确宣布干部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代，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代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

湖北省委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在1959年2月谈到粮食紧张时，则明确表示："今年闹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作怪，不是真没有粮食。经济作物地区、受灾地区真缺粮食的是少数，这些地方多数没有闹粮食，闹的多数是产粮食区，有余粮，而且余粮很多，统购任务没有完成的地区。是那样的公社，那样的生产队在闹，他们以守为攻，吵粮食是为了少卖余粮，为了瞒产私分，不是真的缺粮。他们为了抵抗统购，硬是把食堂停伙，吃菜。""至于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像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一样坚壁清野的办法，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生产队的干部对待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对待公社干部，公社干部对县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讲实话。"因此，"必须有决心和信心以粮食问题为中心反对瞒产私分，反对贪污多占，打好整党整社这一仗"。

全国不少地方都把"反瞒产"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手段，严重地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积极性。八届六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仍然紧张。

虽然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但人民公社仍是问题不少，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也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人民公社的政策问题。

1959年1月25日，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看到了《新会县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为什么普遍下降》一文，其中说，原因在于分配比例不合理，劳动组织和责任制不健全，群众对公社的性质和政策有误解，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毛泽东对此很重视，认为这份材料"极有用"，指示立即印发给正在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人员阅读，并提出要想一想，研究这个问题。

2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了赵紫阳关于广东省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认为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家所有制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现象，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影响了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影响了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他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转这个报告的指示，并要求立即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而且"越快越好"。

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河北、山东、河南视察，沿途同当地的省、地、县和公社的各级干部谈话，了解公社的生产、分配情况，从中他感到所有制是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

1959年2月23日，在听取河北省省长刘子厚汇报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时，毛泽东说，分配问题，还是基本上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瞒产私分，农民还是农民，还得十年、二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教育农民。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早的四五年，迟的六七年，但真正富起来还得十几年。又说，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2月24日，毛泽东在山东济南找了山东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一名公社党委书记、一名管理区书记及一名生产队长谈话，进一步了解人民公社的情况。2月27日，毛泽东在同河

南四个地委的负责人座谈时说，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这是掠夺，是抢劫。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条，十年偿还。评工记分、包工包产都应该坚持。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要采取死级活评、按劳取酬的办法。他还说，农民瞒产是有原因的，就是怕"共产"，怕外调，这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只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明确公社内部所有制入手，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为此，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就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认为，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就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的倾向，就是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这些就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毛泽东强调，在分配中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所有，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共产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其特征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共产风"的本质，指出："共产风""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当时还不主张算旧账。他说，我们指出这一点，是

为了说明勉强把贫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

在1959年3月1日和3月5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也多次讲到人民公社所有制、“共产风”和瞒产私分的问题。毛泽东说，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入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价值法则。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地瞒产私分，站岗放哨，是一种和平的反抗。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严格按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是正确的，他看到了公社内部“共产风”的实质和危害，抓住了人民公社问题的要害。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当然，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是要否定人民公社，而是如何使人民公社能健康发展，至于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本身，他始终是坚决维护的，而且他认为人民公社只是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也是难免的。他乐观地认为，经过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巩固的过程，党同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团结就会更加紧密，五亿农民就一定更加心情舒畅，充满干劲，就一定能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第二次郑州会议集中讨论和部分解决了所有制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虽然这里强调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还是生产大队，提出要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没有解决生产队（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较之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在所有制、分配等问题上的混乱状态，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上述毛泽东提出的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要从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体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纠正极左政策，调整人民公社内部体制（涉及所有制），进一步煞‘共产风’，不能说不是一套积极的高明的政策。”

此次郑州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草案）》确定了人民公社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十四句话方针”，明确了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小队）的职权范围。这个《规定（草案）》连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一并以《郑州会议记录》的名义下发。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召开的同时，河南召开省、地、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六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当天的讲话，随即在六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引起了强烈反响。

许昌的干部说：“主席看透了农村的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我们成天在农村，看不见问题的实质，非得很好跟主席学不行。”“在下边遇到许多群众怕上调东西，就是没

有办法处理，老认为是群众落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这次听了主席指示才开了窍。”许昌鄢陵县还总结了讲话精神贯彻下去后，会大大激发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等六大好处。信阳的干部说：“公社化后出现的问题，到底也找不到什么原因，毛主席给找到了根啦!”郑州的干部反映：“过去对农村中发生的瞒产私分现象，只认为是由于干部的本位主义，没有了解事情发生的本质，这次毛主席提出是所有制问题，应该首先批评平均主义，然后再批评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

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也有相当多的干部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有的公社干部怕以队为基础后，公社成了空架子，没有权力。南阳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说：“这不成了联社，还算什么人民公社。”有的干部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倒退，对农民太让步了。信阳确山管理区的党委书记说：“这样搞有点倒退吧！这不是削弱全民所有制吗?”滑县有的干部说：“这一下子是否又倒退了，这样搞，右派、地富又钻空子了。”这说明，要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东西，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是个执著的人，一旦他认准了的问题，就会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他看了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讨论他的讲话的记录后，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建议请同志们认真、仔细、热情地读一读河南此次六级干部会议的详细记录，2 月 27 日、28 日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因此，他认为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必要像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一样，集中时间在省城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迅速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他在另一封信中说，春耕在即，公社所有制这个大问题如不解决，“将遇到大损失”。他甚至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可见，这时毛泽东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也是下了决心要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的。

第五节　“旧账一般要算”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为了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且连续批发广东、山东等省六级干部会议的经验，对一些关于人民公社整顿的材料做出批示。

毛泽东写的这些党内通讯、批示，主要是关于基本核算单位和要不要算旧账两个问题。

对于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队为基础”的观点，这里的队是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生产大队或管理区。在各省（区）六级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有的地方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必须加以明确。他在 3 月 15

日的党内通讯中说：

> 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郑州会议记录》上的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不但明确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以生产队为基础，而且还在考虑生产小队要不要有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在3月17日的党内通讯中说："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提出来的，毛泽东觉得很重要，特提出让各省、市、自治区六级干部会议讨论。

人民公社建立后，在管理层次上是比较混乱的。一般的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但也有的地方在公社之下大队之上设管理区，也有的在生产队之下设耕作区（也有设小队或作业组的），变成四级管理。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及毛泽东在上述党内通讯中提到的生产队，相当于公社化前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原高级社下一般都设有生产队，作为组织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公社化后这些生产队变成了小队或作业组。此时的生产队与后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所规定的生产队是有区别的，即后来的生产队相当于这时的生产小队，而此时的生产队相当于后来生产大队，至于管理区这一级后来取消了。之所以这时出现管理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混淆的情况，主要是人民公社是由众多的高级社合并组成的，一个高级社就是一个生产队，原来的行政村变成了生产大队。但也有的公社出于求"大"的目的，将若干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便出现了这种名称混乱的情况，以至毛泽东在讲到生产大队时，都不得不在括号中说明是管理区，而生产队则是原来的高级社。所以，毛泽东在1959年3月17日的党内通讯中所提出的生产小队的所有制问题，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生产队的所有制问题。

对于要不要算旧账的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曾讲过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因为此时毛泽东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乐观，他要求那些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

解决问题”。毛泽东希望较穷的队和社员，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不要有“共”别队、别人的“产”的思想。既然如此，大家都讲风格，过去的旧账也就不要计较。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毛泽东总有一种人穷志不能短的气概。在他看来，中国虽然穷，但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的。他也希望那些较穷的社队，要有一种自力更生、敢于迎头赶上富社、富队的志气，不靠“共”别人的“产”自己也能发展。但是，实际情况是，不算旧账就不能使广大干部、社员认识“共产风”的危害，也不能切实纠正“共产风”。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毛泽东改变了“旧账一般不算”的看法，认为旧账也应该算。3月30日，他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人民公社问题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说：“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

1959年4月3日，毛泽东看了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的材料后，又在批语中说：“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静；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这里讲的算账，主要是算两方面的账，一是县和社两级向生产队清算过去几个月“一平二调”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二是算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及社员的账，解决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也就是解决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其中也包括一些干部的贪污多占问题。算账其实就是算“共产风”的账。这说明，毛泽东已痛下决心要解决“共产风”问题。到这时，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较之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更具体、更深刻了。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即将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做准备。上海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情况，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2个问题提交会议讨论。这12个问题是：（1）公社的组织章程；（2）小队的部分所有制；（3）吃饭不要钱；（4）算账问题；（5）5月各公社都要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6）10—11月间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讨论今年的分配问题和计划；（7）税收、积累的绝对数规定；（8）县一级要不要积累的问题；（9）贷款的收回与下放问题；（10）投资10亿元（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国家每年拿出10亿元投资，扶助穷队和帮助公社）的分配、用途；（11）开会方式，要使层层都到，基层人数要超过上层；（12）管理费和不脱产人员的补贴的规定。

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搞一个人民公社的章程，以利于整顿和规范人民公社。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论是初级社还是高级社，都有一个示范章程，规定合作社的性质、社

员的权利和义务、合作社生产经营的方式、劳动组织和收入分配等内容，使合作社的发展有章可循。人民公社建立后，虽然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但对人民公社社员的权利义务、公社的生产经营、组织结构、劳动报酬和收入分配等，都没有具体规定，所能依据的只能是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简章，而这个简章毕竟只有示范性质而没有规范作用，各地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建立的，以致出现了管理区、大队、生产队、生产小队、耕作区、耕作队等相互混淆的名称，至于生产管理、收入分配更是五花八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地深切感到必须有一个人民公社的章程，来规范公社的各级组织形式和职权范围。此次上海会议虽然未能搞出这样一个章程来，但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事关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这十八个问题中，重要的有：(1) 规定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有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制，而且基本上是生产队的所有制，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一般以相当于原高级社的单位为基本核算单位。(2) 确定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小队对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动力有固定使用权，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不能随意调动。生产小队超产的部分，除上缴一定的比例给生产队外，其余归小队所有；归生产小队的全部收入，公社、大队、生产队要调给别的单位，必须实行等价交换。(3) 规定对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建立新账，县联社、公社无偿调用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人力、物力、财力，或者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无偿调用社员私人财物，如数退还或作价退还，一时退还不了的，可延期或分期付还。(4) 评工记分是从合作社以来群众就熟悉的办法，这个办法与评定工资级别的办法结合起来是适宜的。公社计算劳动报酬要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5) 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但对农村的二流子和懒汉要加以约束，对有劳动能力的社员要规定一定的劳动日或劳动工分作为享受供给的条件。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重点讲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他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几个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经过小队去办。他还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

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4月2日到5日在上海举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对于在整社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通过了上海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这期间，人民公社的整顿进入实质阶段。

第二次郑州会议一结束，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立即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郑州会议精神。3月11日起，广东六级干部大会召开，原定5000人参加，但各级党委和干部对大会异常关心，纷纷要求增加名额。有的公社、管理区和

生产队的干部，不等上级批复就径自前往广州，会议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外地到会的有6000人，省直机关来了4000人，加上广州军区的干部6000人，实际到会人数达到16000人，还有一些干部在会议开始时仍在前往广州的途中，以致偌大一个广州市竟找不出一处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大会场，不得不分四处开会。这是广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干部大会，广大干部对参加会议抱有空前的热情。江西出席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的有7000人，随后召开的各县五级干部大会的人数总共在30万人以上。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情况也差不多。的确，人民公社化以来，由于各项政策规定不明确，“五风”严重，干部、社员思想极为混乱，无不希望有一个好的政策来规范人民公社。可见，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的纠“左”方针是深得广大群众拥护的。

各省、市、自治区的六级干部会议，重点揭露了“共产风”的严重危害，并开始部分退赔工作。

对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抓得很紧。他不断地批发各地召开六级干部大会的经验，并写下了许多按语，要求在此基础上召开县一级的五级干部会议。3月17日，毛泽东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当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所有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党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鸣大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在召开七至十天的六级干部会议后，又相继召开县一级的五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者各地有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湖北省麻城县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麻城县召开为期五天的五级干部大会，除县里的干部外，参加会议的有300名公社干部，600名管理区干部，2500名生产队干部，5600名生产小队干部，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共计1万余人。大会开始后，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作检讨，承认错误。接着算账退赔，县和公社当场兑现，拿出现金320万元，分别退还给生产队；当场办手续，退回刮“共产风”时从各生产队刮来的拖拉机8台，抽水机5部，动力机49部，其他小机器143部，各种运输车子744部，各种小农具2697件，耕牛1025头，生猪9019头，小家畜3589只，蜜蜂2192箱。该县城关公社五四一队，原来只有900人出勤，退赔的第二天，就增加到1700人，其中278个妇女是公社化以来一直不出工的。

麻城召开万人大会算账的情况，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麻城算账的经验在全国很有示范作用，并指出：“（麻城的）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静，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

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他还要求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在整顿人民公社中都开展了算账工作。算账开始时，有些社队干部觉得算账麻烦，或者担心会把自己贪污多占的东西算出来，对算账态度不积极甚至有抵触情绪。他们中有的说，算账把“共产主义因素全都要算掉了”。也有的说，“这笔糊涂账，怎么算得清，把账算清了，一无粮，二无钱，也找不清，现在算账还会影响生产”。但生产小队、社员对算账的积极性很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群众最反感、也是最挫伤他们积极性的，就是“共产风”。因此，算账也最受群众欢迎。吉林省永吉县口前公社通过算账，算出刮“共产风”平调来的现金 17.2 万元，分给各管理区。该公社红旗管理区主任把钱带回去后，社员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社员们说：“共产党说到哪里，就办到哪里，以后永远要听党的话。”四川省资中县在算账退赔后，有的社员激动地说：“我 57 年还分了几十块钱，58 年不但没有分钱，猪、鸡、鸭都被赶跑了，毛主席真英明，要来算账兑现，有搞头了。”

通过算“共产风”的账，各地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增。山西省运城县在给原高级社退回 464 万元现金、58 部动力机械后，该县北景公社阎家庄管理区立即将钱发给群众，结果全部劳动力除病、产者外，全都出了勤。山西省平陆县退回群众 50 万元现金，退回抽调去的劳动力 9000 名，全县出勤率从 60%提高到 96%。

第六节 若干政策调整

为了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做出了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具体规定，各地还建立了“三定一奖”、“四定一奖”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恢复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评工记分制度。

八届六中全会后，山东省委和省人委总结了各地人民公社生产管理的经验，提出人民公社对于农业生产管理，应实行“六定到队”，即定耕作区、定劳力、定产量、定措施、定财务开支、定牲畜农具的责任；生产队对于田间管理实行“四定到田”，即定产量、定措施、定生产成本、定管理人员；实行定期检查评比，并在各项农活中继续实行劳动定额制度。山东省委和省人委认为，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采用定任务、定质、定量、定时间、定人员的办法，评定各项农活的劳动定额，并按照定额的标准包到生产队、生产组或个人去负责完成。

江苏省委从 1958 年 12 月 29 日至次年 1 月 3 日，召开了全省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决定由公社对管理区（大队）、管理区（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定产（产量或产值）、定成本、定工的“三定”集体责任制。生产队对各个劳动组，也要实行定土地、定措施、定时间、定人员、定生产资料的“五定”责任制。

河南省睢县也实行了公社对管理区和所辖的厂、站的“四定一奖”制。“四定”是指定生产指标、定投资、定上交任务、定增产措施，“一奖”就是超产奖励。同时，管

理区对生产队和所辖的单位也实行了“三定一奖”（定生产指标、定投资、定增产措施，超产奖励）制；生产队对专业生产组实行“五定”（定领导、定劳力、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专业组对社员实行“三定”（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的方法。这样，改变了原来的生产管理制度，逐级建立了生产责任制。《人民日报》还介绍了睢县实行“四定一奖”责任制的经验。

195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人民公社要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社论。社论指出，1958年以来的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搞“大呼隆”，造成劳动力窝工，劳动效率低，农活质量差。农业生产的多数活动，需要有明确而又严格的责任制。即使在公社的工、林、牧、渔和副业生产及服务性事业中，也需要有责任制。人民公社要建立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的集体生产和个人责任制。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否定了“大跃进”以来将劳动力调来调去的所谓的“大兵团作战”。

这时的生产责任制自然还不是后来的生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小队和社员也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但它改变了过去所谓的“大兵团作战”时“生产一窝蜂，吃饭打冲锋”的状态，加强了生产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

人民公社化之初，片面认为合作社的评工记分手续麻烦，耽误劳动时间，影响社员间的团结（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又是集体劳动的情况下比较合理的计酬方法），容易造成记工员贪污等，便废除了这种制度，改行工资制。工资制一般都以公社为单位制定工资标准，与社员劳动的多少和质量并不直接挂钩，加之分配中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工资在许多公社名存实亡。于是“干不干，三餐饭”，“出门一条龙，做事大窝工”，出工不出力成了普遍现象。社员生产的积极性大挫。江西省贵溪县的一个公社干部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公社分配样样包，开支多来不讨好。劳模懒汉无区别，长的短的一般高。装病诉苦不生产，争吃争穿争棉袄。”

实行评工记分，能刺激社员积极劳动，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效率，因为谁劳动多，工分就多，分配也多；评工记分体现同工同酬原则，社员劳动的好坏也可从中表现出来，并且能够调动原来没有工资等级的老少社员参加劳动的积极性。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得到了肯定，各地在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中，都把解决分配问题，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许多地方提出，分给社员的工资部分应实行“死级活评”的办法，人民公社按原来评定的工资级别，把工资发给各生产队，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实行评工记分，根据每个社员（包括未评级的）每月评定的工分发给工资。在整社过程中，不少公社相继恢复了评工记分的制度。

评工记分与工资制相结合，当时主要有这几种形式：一是固定级别，按实做劳动日奖惩；二是工资级别按工分活评；三是工资指标到生产队不到人，完全按实做劳动日发工资，工资级别不再直接发生作用；四是把基本劳动日分为两部分，一半同工资部分联系起来，一半同供给部分联系起来，没有完成基本劳动日者按比例扣除供给部分。

“四包一奖”的责任制和评工记分的实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公社生产中的“大呼隆”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因为这些“定”，至多也只定到生产小组一级，而这时

的生产小组或作业组并不小，一般都有数十户。而超产奖励的部分，又不是直接奖给社员，如河南省睢县红星人民公社规定："对生产积极、措施有力、管理好的超产单位，从超产部分提取40%给予奖励，由超产单位作为扩大再生产和兴办福利事业的资金。60%上交公社，公社再从超产上交部分中抽出40%作为对各基层生产单位的奖励。"实行这种责任制后吃"大锅饭"的现象还是没有改变。于是，一些地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搞起了"包工到户"或"定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比较典型的是河南的新乡地区和洛阳地区。

新乡是全国最早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地区之一。新乡多数县份地处富庶的豫北平原，是河南重要的粮棉产区。但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折腾，这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59年三四月间，在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新乡地区也建立了"四定一奖"、"五定一奖"等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包工包产到生产队或作业组。在一些边远山区，还自发地出现了包产到户。受其影响，全地区许多地方也主张在包工包产时，能将工分或产量直接包到各户，以使社员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时，新乡地委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公社化后，实行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自由，农民生产不积极。合作化后，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后，把农民的吃饭权也拿过来了，实际上没有吃饭自由。为此，他在1959年5月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的主张，并提出奖励可达超产部分的70%—80%。为了避免实行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新乡地区将这种做法称为"地段责任制"。这种包工到户、定产到田、几年不变的地段责任制，将社员的生产劳动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深受群众欢迎，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并很快在新乡全地区60%的生产队推行。

洛阳地区则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了《农村工作若干问题讨论提纲》30条，主张实行"包产包工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三年不变"的办法。其具体做法是：将土地分散和固定到户，根据土质好坏确定包产指标，依据包产指标的高低，定出所需的工数，收获后进行评产，超产多少奖多少，减产多少罚多少，并将牲口、农具、土地、劳动力固定到各生产小组或各户使用，不经生产小组同意，任何单位不得随意调动。洛阳全地区大约有8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这种包产到户的责任制。

与此同时，江苏、湖北、陕西、甘肃等省的一些地方，也搞起了"定产到田，超产奖励"、"田间管理包工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责任制。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供给制被吹捧为"共产主义萌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最好途径，事实上它却是人民公社内部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总根源。因为社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家人多人少，供给的内容都是相同的。虽然供给制被认为是具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质的新生事物，号称"吃饭不要钱"，但农民们清楚，这种不要钱的供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吃的还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只不过是大家吃一样的饭而已。农民总是现实主义者，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只会打击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公社化之初鼓吹的实行供给制不会出懒汉，纯属无稽之谈。有的偷懒的社员经常装病不出工，还对动员出工的干部说："我不是吃你的饭，我是吃公社的饭。"

这又引起了勤出工的社员钓不满，以致他们也消极起来。由于实行供给制，一些原本是半劳力或辅助劳力早已辍学的青少年，又回到了学校，有的地方出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读初小一二年级的现象。

至于与供给制捆绑在一起的公共食堂，不但吃饭不自由，还常常成为有些干部卡压群众的手段。同时，公共食堂还存在浪费大量的劳动力和柴煤，浪费粮食，不利于精打细算，也不利于发展家庭副业等弊端，早已为群众不满。据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农村调查中的了解，“迫切要求退出食堂回家自己起伙的户大约占70%左右，剩下的30%多是困难户、单身汉、干部和一些不养猪的户”。另据河北省委工作组对衡水、霸县、石家庄等地农村公共食堂的调查，各地社员坚决要求留在食堂吃饭的，多的有30%，少者10%，一般为20%左右。这些户多是一些光棍汉、孤寡户和小孩多劳动力少的户，还有少数饭量大的人。要求退出食堂和随大流的占70%—90%，一般在80%以上。

针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出现的各种问题，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夏收分配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所占的比例，要适当调整，必须力求做到工资部分占60%—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40%左右。”某些收入水平过低、暂时无力实行供给制的地方，可以按照高级社的办法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并且对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困难户实行定额的粮食补助。对于公共食堂，《指示》要求：“要通过夏收分配，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必须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既要使参加公共食堂的社员真正自愿，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指示》提出，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过大，可以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食用。

八届七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觉察到干部中存在着向上级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的问题，浮夸风还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号召各级干部向敢于直谏的明朝官员海瑞学习，敢于讲真话。4月29日，他致信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强调：“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广大人民公社社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给那些虚报浮夸的干部以很大的震动。湖北省汉川县马口公社一个社员说：“这一下子，一定是有个大胆的干部告了状，说假话的情况到了毛主席那里去了，吹牛说假话再也吃不开了。”安陆县应山公社一个生产队支部书记1958年种了5亩早稻实验田，亩产500斤，向社员提出上

报2000斤。社员讽刺说："现在是说假话的时候了，你报4000斤好不好呀?"他真的报了4000斤，第二天就得了一面奖旗。这回听了毛泽东关于讲真话的指示，社员催他把奖旗退了，并说："你赶快检讨，我们不得假光荣。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不能再哄毛主席。"

虽然自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以来，人民公社在组织、体制、管理等问题上的混乱状态得到了遏制，形势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少，这不是一下子能解决得了的。由于高征购，公共食堂寅吃卯粮，1959年春天许多地方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粮荒，一些公共食堂处于停伙或半停伙状态，农村出现了浮肿病人增多、人口外流甚至因粮荒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

公社化前，自留地、家庭副业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市场提供蔬菜、副食品的重要渠道。公社化中，自留地归了集体，家庭副业不准搞，也没有时间搞，社员家里的猪鸡鹅鸭差不多绝了迹。过去，社员遇到灾荒，还可通过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缓解。现在，这个办法行不通了，吃公共食堂成为社员生活的唯一来源。对此，中共中央接受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建议，于1959年5月7日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5月7日和6月1日，又分别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于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这些指示规定：

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在内，这些家禽家畜养大了，卖得的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合理的报酬。

恢复自留地制度，按原来高级社的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不少于5%为原则。社员在自留地可以种蔬菜、饲料、瓜果或小杂粮，不要过分限制。自留地的产品归社员支配。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不许买卖、出租或私自转让。

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

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归社员私有，由社员负责经营培护，其收益也完全归社员自由处理。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

尤其重要的是，上述《指示》明确指出，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对于5%的自留地问题，党内有人提出，浙江、福建、广东这些省份地少人多，每人只有一亩地，甚至只有七八分地，留5%的自留地，会影响集体生产。对此，毛泽东曾有些动摇。6月中旬的一天，他对主张恢复自留地的邓子恢提出，不要全国统一规定

5%，要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并发一通知。邓子恢感到这是关系到5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当时没有直接回答。一回到家，他便立即致信毛泽东，陈述自己对自留地的看法。他在信中说："以我的经验，按每人分地百分之五留自留地是恰当的。……全国现有耕地十六亿亩，按百分之五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八千万亩。花这八千万亩地，可以解决五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五亿多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事后，毛泽东没有再提自留地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逐渐剥去了一些空想的成分，刹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共产风"得到了初步的遏制，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大体上回到了原来高级社的水平，生产小队得到了一定的自主权，许多混乱不堪的政策问题得到了明确，大兵团式的劳动协作基本终止，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改善，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各级党的组织，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作了大量的努力。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之前所做的纠"左"工作，总体上是在坚持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左"倾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其基本前提是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要解决的只是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只要对这些具体政策作了调整，人民公社就能健康发展，就能实现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正因为庐山会议前的纠"左"，主要是纠正具体政策的"左"，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产物，因而也就没有完成指导思想的纠"左"任务。

第四章　反　　复

第一节　庐山风云

为了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1959年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落实工农业生产的各种指标，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中共中央决定1959年7月间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人民公社的整顿上。对于这件事，他抓得很紧，主持召开了四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两次中央全会（八届六中、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两个重要文件，写了数封党内通讯，批示了大量有关人民公社的材料，督促各省、市、自治区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他认为，经过这些努力，找到了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在于所有制问题，引起群众不满的是“共产风”，而这两个问题通过确定生产队（即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开展算账退赔便可基本解决。如果再进一步解决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食堂问题，人民公社就能健康发展。

在召开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市场等问题。会上，毛泽东对1959年粮食“增产三成”表示“怀疑”。他说：“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按：指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粮食生产计划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对于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至于要不要钱，一种人吃饭要钱，一种人是吃饭不要钱。老、弱、五保户不要钱，其他的要钱。……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

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6月25日，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韶山，祭奠了父母，宴请了乡亲，走访了社员家庭，并写下著名的《七律·到韶山》。从诗的最后两

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心情是比较愉快的，由此可以判断出他对形势的看法也是乐观的。

这种乐观的情绪，还从他在庐山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体现出来。毛泽东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毛泽东认为，1959年的形势与1958年相比要好，因为1958年刮“共产风”，而“共产风”已经得到了制止。现在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1958年的形势本来是好的，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了，因为“共产风”不会刮了，盲目性已经认识到了。

在党的领导层中，有这种看法的当然不止毛泽东一人。周恩来也曾谈到过与会者初上庐山时的心情：“那时候，是本着一年的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有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在上庐山之时，却没有这种心情。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一开始还是赞成的。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时，他参加了讨论，也举了手，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会后一个月，他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流露出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他说，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如今解决了，“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在随后的西北之行中，甘肃省敦煌县县委副书记告诉他，敦煌全县八万人组成一个大公社，分八个大队。办公社中，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强迫的，有些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里，彭德怀对这样办公社有些担心，提醒当地干部要注意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

1958年冬天，彭德怀回到家乡湖南，了解到了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他在自述中说：“会议（按：指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1957年的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生产数字，而将1958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1957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这次故乡之行，使他“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的疑虑”。彭德怀就是带着这样的疑虑和担忧上庐山的。

庐山会议开始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围绕读书、形势、当年的任务和1960年的

任务等18个问题开展讨论。其中直接关系到人民公社的，有公共食堂、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和粮食等三个问题。

对于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在7月10日下午的讲话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会议在讨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是"一个指头"，优点和成绩是"九个指头"，而且就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得到解决。另一种意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有的还很严重，前一段纠"左"成效显著，但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把存在的问题讲透。有的与会者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感到痛心，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针对会上对形势的看法出现分歧，毛泽东认为，对形势的看法如果不一致，就会影响团结，因此有统一认识的必要。在10日晚的各组组长会上，他说："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70%的人赞成总路线的。""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无甚了不起。一年来有好的经验与坏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的态度是："'左'的错误要批评，但不应总是抓住不放；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现在已经批了9个月的'左'，差不多了；应赶快抓工作，争取1959年的跃进。"

在会议开始的小组讨论时，彭德怀多次作了发言，直截了当地批评"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错误，有的话还是直涉毛泽东的。对于人民公社，他在发言中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鉴于会议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的问题，又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毛泽东才能实现，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在充分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强迫命令等。

彭德怀在信中一方面肯定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基本已经得到纠正"，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按：指抢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

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显然，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中的发言和这封信中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评价，已经大大超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限度。毛泽东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彭德怀）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加之毛泽东、彭德怀之间历史上存在一些本能讲清楚却未能澄清的误解，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封信是不满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是为了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和群众的要求，不存在“动机不纯”的问题，内容也是基本正确的。在对问题的分析和遣词造句上，也考虑到了毛泽东接受的程度。就彭德怀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内心认识而言，他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要严重得多。对此，看一看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所写的笔记就清楚了。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他写道：

> 1958 年人民公社化，那一股共产风冲击和搞乱所有制，错误地把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管理区的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几乎都变为公社所有制，造成穷队与富队之间，贫农与中农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同时紧张。对于自留地也是几收几放，增加了农民对发展生产的顾虑，人心不安，大量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这一切当然会打击农民的生产情绪，必须会造成减产的效果。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虽然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上海六中和七中全会，以及 1959 年 4 月 22 日发出《党内通讯》，总的说来，“左”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未酿成动摇总路线的错误，也没有打击那些真正热情高涨的干部和群众，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到现在为此，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部门都纠正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共产风所带来的严重强迫命令，浮夸虚报，脱离群众等现象是异常严重的。某些个别县要在两三年之内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计报酬，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男女强弱分编劳动大军，而不是强弱搭配。根据我国农村现在生产条件，这样的分工和组织是很不适当的。为了急于新建居民点，事先折毁房屋，新居民点尚未着手建设，旧的房屋已经拆毁不少。为了炼钢铁，捣毁铁锅和农具，这些现象绝不是正常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未改造好的干部，被过去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些人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

由此可见，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庐山会议之时，党内党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的不少否定意见，也传到了毛泽东那里。

1959 年 5 月，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80 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在讨论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人民公社的方针时，通过大鸣大放，有些人认为人民公社建立太快了，是早

产儿，理由是：公社化发展速度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几个月实现全国公社化是主观、急躁冒进的结果；公社普遍搭架子快了，没有经过试点，逐步推行，不符合事物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发展规律；人民群众的觉悟还没有达到成立公社的水平，没有贯彻自愿原则，一哄而起；组织准备不够，没有一套管理公社的规章制度；等等。也有人认为，人民公社违背客观规律，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人民公社没有合作社优越，缺点大于优点，建立公社影响了生产，给生产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建立公社后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劳动情况犹如"空摆连环阵，灯光满天红，不见人劳动，只听战鼓声"；"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委、地委应负责任；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提得过早，应该取消；公社目前不能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应以农业生产为主；公共食堂不是共产主义因素，害多利少等。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6月2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45期刊登了《否定和怀疑1958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其中讲到，天津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大跃进"是工业"跃进"了，农业没有"跃进"；政治"跃进"了，经济没有"跃进"；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对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忽视了农村的现实条件，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现实等。

国务院秘书厅党委办公室1959年7月9日编印的第25期《秘书厅学习简报》中说，秘书厅的有些干部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过程中，对人民公社有这样的议论：（1）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2）人民公社所有制与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不太适应；（3）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适应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吃饭不要钱也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4）人民公社的发展太快太猛了；（5）人民公社是群众运动搞起来的，但政策没有跟上去，有的有了正确政策，但在执行中又发生了偏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1959年6月24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上，有一份材料说，据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告，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的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说人民公社成立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

1959年6月9日，原国家建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就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最近一年来，我们的工作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信中列举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表现，其中之一是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可能是跑得太快了，其结果是"一平、二调、三抽款"。在广大农民中就大量杀猪、宰鸡，在粮食方面浪费也很大，劳动力和各种资材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

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尽管今天看来这些基本是正确的），不能不在毛泽东心中留下阴影。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给与会人员进

行讨论。在讨论中，有人说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有人甚至认为这封信实际上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也有人基本同意信的内容，说彭德怀的意见是好的，但不赞同信中诸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的基本观点。

7月21日，在庐山会议风向已开始转变的情况下，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张闻天不但明确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而且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强调要多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探讨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说，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得不同意见，民主风气很重要，领导者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就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张闻天的这番话，很有针对性，也很有见地，说明他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是作过认真思考的。彭德怀信中说及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词，几乎是与会者均不赞同的。但张闻天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点，说了也可以，究竟什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张闻天把批评的锋芒集中在“全民炼钢”和“共产风”上。他指出，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从主观上看，主要是对所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认识出了问题，在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否定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平均主义，是“共产风”的理论根源。他认为，现在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应该将之巩固稳定下来，不要急于改变。他强调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搞平均主义。为此，张闻天指出：

> 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吃饭不要钱”是对的，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按现在的规定，工资部分在社员劳动报酬中，应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比例实际上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还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为社会保险，比例还是嫌大。我主张彻底一点。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俗话说，真言逆耳。这时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已经不健全，在巨大的威望面前，毛泽东已渐渐地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要说反对意见。对于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自己可以进行纠正，但别人指出后他就有些难以接受，而彭德怀、张闻天与他又存在一些未能澄清的历史恩怨，加之一些“左”倾思想比较严重的人又鼓动毛泽东出来说话，说要顶住这股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风，否则队伍就散了。这样，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有缺点和不足，但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何况这些问题已经得到纠

正。彭德怀和张闻天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问题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形势好转、问题即将解决时提，于是他主观地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彭德怀上书的第四天，即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发表了一通关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的议论。赫鲁晓夫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们是指人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在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赫鲁晓夫这些话虽然表面上是总结苏联历史上公社失败的原因，但显然是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含沙射影的攻击。美国《纽约时报》对此借题发挥，说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

对于国际上如美国的杜勒斯之流攻击人民公社，毛泽东觉得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人民公社指桑骂槐的指责，毛泽东就感到非常不满。他在8月1日给王稼祥的信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在毛泽东看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下有江西省委党校学员的议论，中有李云仲这一级干部的否定，上有彭德怀、张闻天这样的中央大员的“挑战”。国内、国际都有一股势力在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任其下去，“大跃进”就要夭折，人民公社就要垮台，必须加以反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庐山会议被延长，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为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集中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

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逐一批驳彭德怀信中的观点。讲话中，自然要对人民公社大加维护。他说，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台。共产党要做好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业，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又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

7月26日，毛泽东在李云仲的信上写了一段长达三千余字的批语，一方面肯定李云仲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

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在毛泽东看来，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现在已经到了反右的时候了。

7月29日，毛泽东看了《内部参考》第2820期《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等三篇文章后，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苏联历史上的公社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其不合乎历史要求，而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是垮不了的。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8月5日，毛泽东看了一份关于湖南省平江县淡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后又恢复的材料后，更加坚信人民公社和食堂是能办好的。他提笔写了一段富有感情的文字：

> 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8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强调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并且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对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缺乏朝气、缺乏干劲的作风，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就不可能贯彻实行总路线，也不可能使各项事业继续“跃进”。因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这个指示的发表，揭开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的序幕。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经过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的猛烈批判之后，于8月16日结束，并做出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其中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几亿农民的伟大社会运动，是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发展、农民要求扩大社会协作的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看不到在贯彻实行按劳分配、明确规定公社生产队基本所有制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正是进一步发展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强大武器”。决议强调：“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至此，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纠“左”进程被中断。在随后开

展的“反右倾”过程中，许多“左”的东西重新出现，已基本遏制的“共产风”再度泛滥，“提早过渡”的思想再次泛起。

第二节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又多次讲到要维护人民公社。1959年9月15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说，农业没有人民公社不行，搞水利化，搞机械化，几十户、一百户的高级社就不适应。又说，“大跃进”不应该搞，人民公社不应该搞，那么总路线还有什么？总路线就要崩溃，所以我们要起来保卫总路线，支持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是不赞成搞人民公社的，但他还是在10月4日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1918年苏俄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了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留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他在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时又说，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中央只是总结经验把它推广。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在毛泽东看来，公社不是强加给群众的，而是人民群众的创造。苏联的公社之所以垮台，是因为苏联的公社有缺点，而中国的公社却克服了这些缺点，是不会垮台的。

庐山会议结束时，正值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周年。为此，8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公社万岁》的社论，其中对人民公社充满赞美之词。社论认为，像人民公社化这样大规模的、迅速发展的群众运动，在获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当然不可避免地也要发生一些缺点。但是，“值得惊奇的并不是发生了一些缺点；值得惊奇的是，缺点同成绩相比是如此之少，缺点的克服是如此之快”。经过郑州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和1959年2月底到3月初召集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从而使这一运动在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得到了透彻的解决。社论最后说：“作为新生的社会组织的人民公社，已经经历了严重的考验，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任凭国内外敌对势力怎样咒骂和破坏，任凭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指责和反对，任凭严重的自然灾害怎样袭击，人民公社都没有垮台，我们因此也有权利说，它将永不会垮台。”

庐山会议之后，各种宣传媒体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人民公社建立的必要性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文章。

8月29日，新华社发表《在跃进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在整顿中壮大——人民公社健全发展稳如泰山》的长篇通讯，强调一年来，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过初期轰轰烈烈的建社阶段，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巩固工作，已

经普遍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现在全国人民公社不仅在发展生产、组织生活等各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优越性，而且在办社、在经营管理方面已摸索出一套比较完善的经验，在我国农村建立了强固根基。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承“穷棒子社”的勤俭传统，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建明人民公社树立了光辉榜样》，介绍了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建立一年来的变化，证明人民公社具有“无限灿烂的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文章《人民公社在安徽》，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取得的成绩，概括为六个方面：(1) 大大推进了水利建设运动，在水利战线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2) 为发展多种经营和社办工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3) 使富队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穷队的生产得到了更快的提高，初步改变了穷队的面貌。(4) 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公社的积累大大增长，社员的生活普遍提高。(5) 公社举办的各种集体福利事业，发展十分迅速，日益走向巩固和健全。(6) 人民公社促使群众的精神面貌起了深刻变化。文章认为，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能够解放大批劳动力，更充分合理地使用劳动力；能够统一规划和合理利用资金、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兴办高级社难以兴办的各种建设事业；能够把工、农、商、学、兵拧成一股绳，保证农、林、牧、副、渔业和工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为了论证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致信吴冷西、陈伯达和胡乔木，要求新华社通知各分社，每个省（市、自治区）选择五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民公社，特别是办得好的典型，进行一次调查，目的是“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华社组织各分社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人民公社调查，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调查报告汇编成书，交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余的由新华社于1960年5月编辑成册，随《内部参考》发行。不需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内容，都是对人民公社种种优越性的论证与颂扬。

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应该的，在一个农民个体生产占主体的汪洋大国中，不完成农业的集体化，改变土地的小私有性质，就不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也不可能实现土地的集约经营和农业现代化，更不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个体农民也的确没有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两极分化。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的形式走上集体化道路，既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相符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隋的。

土地改革之后，广大农民有着实现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不然，农业合作化能那样迅速实现就解释不通。问题是，大多数农民还刚刚感受到土地改革带来的好处，他们多数人的愿望要求还停留在互助合作阶段时，就在批判“小脚女人走路”中，匆忙地完成了合作化；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又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就急急忙忙地完成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转变，有的农民是从互助组甚至是个体单干而直接跨人高级社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转变过程中，的确存在所有制改变过急过快、组织形式简单划一、违背农民意

愿的倾向。初级社的评工记分和股份分红，比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和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作用，社员不但积极劳动，而且爱惜集体财物，愿意集体经济的壮大，因为在集体经济的发展中他能得到实际利益。所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利益与社员的个人利益是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进入高级社后，生产要素退出分配领域，社员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按工分进行分配，虽然评工记分手续比较繁琐，也有不能真实体现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效率的地方，已经存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但毕竟其主体还是按劳分配，社员只有劳动多，才能工分多，也才能分配得多。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供给的部分比重大，这种分配实际上是奖懒惩勤、奖人多劳少惩人少劳多的典型的平均主义，而那点本来比重就不大的工资，又是固定了级别的，社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基本上是一个样，所以严重挫伤了社员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至于与公社化随之而来的“共产风”、“命令风”等五风，不自由的生活集体化，更是使社员对公社的“优越性”不能不加以怀疑。既然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人民公社是“办早了”、“搞糟了”，自然要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大加赞扬。不但如此，而且还要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及由其造成的“右倾的邪气、歪气”加以批判，以此来“坚守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许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甚积极、有所看法的各级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判和组织处理。根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庐山会议后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

当时，对于人民公社已经出现的问题，不是从人民公社的体制本身去找原因，而是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去看待和分析农村的形势，片面认为存在一股反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在《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说：“在五、六、七几个月内，农村中也有局部地方曾经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报告》列举了“右倾歪风”的五种表现：一是改变基本队所有制，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名义上保持基本队所有制，而实际上把收入的50%以上归生产小队分配；二是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三是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变成大私有、大自由，甚至还有一个月只劳动几天的挂名社员；四是吹掉了部分供给制；五是吹掉公共食堂。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按语说，上述表现“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各地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给湖南省委的《关于整社试点座谈会的报告》中也说，虽然公社化一年来，“农村的形势是极好的，前途一片光明”，但在这种大好形势面前，“以少数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思想极为严重的人，向我们发动了猖狂的、恶毒的进攻”。如否定“大跃进”的成绩，说什么“共产党好吹牛皮，讲大话，年年喊增产，年年都减产，就是增了一点产，劳力、成本花得多，得不偿失，劳民伤财”；认为公社化搞快了，搞糟了，搞穷了，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主张把土地、

耕牛、农具和粮食下放到户，把产量、产值包到户；说供给制出懒汉，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张搞清一色的按劳分配，或者给困难户一点救济，吃亏吃在明处；把食堂说成是“死堂”，主张拆散食堂，重建私灶；等等。因此，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认为，在当前农村中开展一次“主要是解决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的整社运动，“十分必要”。“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继续组织大跃进，是关系极大的”。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明确提出，此次整社运动在思想上，“要把少数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的错误言行，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把它在群众中狠狠搞臭，使群众深刻地认识其危害性，划清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从而大大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巩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政治上，积极培养和扩大骨干力量，树立贫下中农在生产队和作业组中的绝对优势，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这些人手里。组织上，要把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各级组织都健全和充实起来，改变目前某些组织机构不适应生产发展的情况。在制度上，要在总结今年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生活管理、财务和民主管理制度，以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和公社的日益巩固。

按照这样的思路，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首先在长沙、平江、浏阳、湘潭等10个地区各选择了一个人民公社，作为整社的试点单位。整社分为四步进行：第一步，发动干部、群众围绕“大跃进的巨大成绩、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等，组织鸣放辩论（其实也就是批斗会）；第二步，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整改，如整顿公共食堂，贯彻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等；第三步，进行党、团组织建设，选举新的领导机构；第四步，制订明年的生产计划和远景规划。这四步中，鸣放辩论是最重要的，“主要的锋芒要对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富裕中农当中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言行的人”。

湖南省委很快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上述报告，并报送了中共中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转发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在农村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实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农村相继展开了以“反右倾”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1959年12月，保定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市农村广泛深入地开展一次全民性的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后，全市5567个生产队分两批开展整风整社，第一批2592个生产队，第二批2975个生产队。运动开始后，全市组织有2428人参加的整风工作队进驻农村发动整风，并将公社各级干部集中学习，同时进行检查、鸣放；然后组织群众批判犯有“严重富裕中农思想”错误的党员干部，批判的主要内容有包产到户、部分生产资料退还生产小队或农户、多留自留地或私自小片开荒、瞒产私分、不实行供给制或解散公共食堂等。全市农村被整风批判的重点对象有19346名，其中富裕中农12658名，党员干部5487名。接着对农村党支部进行分类排

队，并重点整顿全市822个三类党支部，全市共调整支部书记、生产队长以上干部8149名，新提拔干部8487名。保定的整风整社从1959年12月开始，至1960年2月结束。在运动过程中，全市农村党员干部受到各种党纪处分的有430人，其中被开除党籍的85人，留党察看的74人，撤职的76人，严重警告的124人，警告的121人。

随着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刚刚萌生的包产到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庐山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星期，中共江苏省委就发出通知说，不论是全部农活包到户，还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它从根本上取消了人民公社集体劳动这一基本的劳动形式，退到了个体分散劳动的老路。包产到户，实质上是从集体退到单干。这些做法，“就会使人民公社无法统一安排劳动力组织生产，就会使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发展起来”。因此，“凡是发现把全部农活包到户，或者是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论形式如何，名目怎样，都应当立即批判，加以纠正。这种做法，既不必试行，更不能推广”。10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江苏省委的通知，并指出：“把全部或者大部分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实际上是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做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河南省委也在庐山会议后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检查并批判河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对新乡、洛阳的“包产到户、定产到田”进行猛烈批判，赞成包产到户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对其做出撤职或降职处分。9月12日，河南省委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期间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上报中共中央。10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并且认为河南一些地方前一段时间推行的名为“地段责任制”的包产到户，是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到互助组甚至单干户，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民公社，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包产到户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其实质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不彻底肃清，总路线就不可能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因此，对于这种思想，各级党委应该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搞臭。

接着，河南省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彻底改正“地段责任制”，并组织调查组前往新乡、洛阳寻找包产到户的典型以供批判。1959年底，调查组写出了《关于十一个生产队执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罗列了包产到户“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农业生产”，“阻碍社有经济发展”等八大“罪状”。河南省委在转发这个调查报告时强调：为了保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必须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影响，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倾向，加强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这样，河南的包产到户尚在萌芽状态中就窒息夭折了。其他各地的包产到户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同时，各种报刊还发表了大量的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195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文章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喜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反对人民公社”，“所以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们的农村不但不应当前进到人民公社，而且还应当倒退到资本主义。

他们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指责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强调“集体劳动永远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的劳动方式，随着生产工具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适于包给社员个人单独做的农活必将越来越少。这样的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决不能有一点违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包工包产，并不简单的是方法问题、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生产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想在这些地方钻空子，必须谨防。界线必须划清，阵地必须固守”。

第三节　“穷过渡”

第二次郑州会议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要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提出要考虑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庐山会议之后，随着“反右倾”运动的展开，不但使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还主观地认为，1959年六七月间之所以出现生产下降和城乡人民生活困难，是“由于右倾保守、右倾活动，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怪”。庐山会议后，“大跃进”狂潮再起，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再度提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再次被看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核心内容。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问题，作了许多的思考。他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在此基础上就可进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了。将社会主义划分为比较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思考。

毛泽东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大过渡，这个大过渡中又包括两个小过渡，第一个过渡是由资本主义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第二个过渡是由不发达社会主义到发达社会主义的过渡，发达社会主义建成之日，也就是共产主义实现之时。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第一个过渡已经完成，现在所面临的是实现第二个过渡即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因此，必须从目前的基本队有制发展到基本社有制，再由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到全民所有制，而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就是现阶段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指出：“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他又说："我们将来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在他看来，全国一旦实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就会大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能为转变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1959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一份《情况简报》上，刊载了《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四川省顺江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社有制的情况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三年规划》及《广西柳州地委提出从十个方面发展社有经济》等三篇材料，涉及的内容都是一些公社实行基本社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后，社有经济及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的情况。毛泽东看了这几篇材料后，亲笔批示："此件极好。"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有价值的观点，但他关于两个过渡的认识中，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却是根本的一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实现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就成为庐山会议后人民公社体制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9 年 12 月，浙江、安徽、江苏和上海四省（市）就人民公社的过渡问题召开座谈会。会前，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会议曾提出以分配给社员每人平均 200 元作为过渡的条件。座谈会认同了这个条件，并且认为，要达到每人分配到 200 元，人民公社的总产值每人平均应达到 600—800 元。1959 年，江苏全省人民公社平均每人预计 154 元，安徽为 188 元，上海为 325 元，要达到人均产值 600—800 元，需要提高不少。因此，会议提出："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会议同时提出："在一个公社来说，各个生产大队的发展情况也不可能是一样的，有的大队的过渡条件可能成熟得早一些，有些大队的过渡条件可能成熟得晚一些。条件成熟了不过渡，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生产发展；条件不成熟，勉强过渡，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一般公社的发展趋势，将是分批过渡，成熟一批过渡一批；有些公社，大队情况基本平衡，同时具备了过渡条件的，也可以一起过渡。"

为了加速过渡，会议提出必须使农、牧、渔副业和社办工业有更大的"跃进"，必须十分注意扶持穷队发展生产，使穷队在短期内赶上富队，具体办法：一是仍将穷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由国家和公社在基本建设、生产资金、生产资料、计划安排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二是把部分穷队转为公社直属队。同时，对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必须进行适当的控制，生产小队已开垦出来的荒地，收归生产大队，养猪要以公社和生产大队为主。在分配上，生产水平不很高和社员收入还没有赶上原来富裕中农收入水平的，实行按比例分配的办法，社员消费水平的增长应控制在 5%—10% 的范围内；生产水平较高，社员收入已超过原来富裕中农水平的，则应改变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推行固定劳动分值。

1960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 1960 年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三年设想的具体目标是：提前五年实现中共八

届八中全会提出酌十年赶上英国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大力搞农业，争取提前完成农业机械化“四年小解决”的任务，并为提前完成“十年大解决”的任务做好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纲要。八年设想的总要求和基本任务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基本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中要逐步增加其产主义的、楷需分配的因素。关于过渡问题，《汇报提纲》提出，要分期分批地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到基本上为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并且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要以工资制为主，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1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1960年4月初，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讲到过渡问题时强调：“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过渡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他还提出了由基本队所有过渡到基本社所有的四个条件：一是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年人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二是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有优势；三是穷队赶上富队；四是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上述设想，各省纷纷开展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试点工作。

1959年12月，河北开始了过渡的试点。保定地委计划在全地区18个公社进行过渡试点。其中计划3个公社104个生产队全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15个公社的27个生产队向国营农、牧、蔬菜场过渡，其余25个生产队亦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到1960年5月初，已有安国县的祁州、徐水县的白洋淀两个公社及其他试点公社的42个生产队基本完成了过渡。此外，石家庄地委表示要在春季前把全区的1088个富队过渡为公社所有制。天津市农委打算在1960年把近郊的12个公社全部完成过渡。据河北各市（地）委农村工作部拟定的过渡计划，1959年以前过渡为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有吴桥县的城关、邯郸市的伯延、唐山市的张庄子三个公社，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有黄骅县的腾庄子、南大港两个公社。天津、邯郸、石家庄三个地区在1963年全部过渡完。承德地区在1960年地委试点，1961年县委试点，1962年大部过渡，1963年基本过渡完，1964年扫尾。同时，河北各地还开展了合并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至1960年3月，全省合并基本核算单位5312个，占40390个核算单位的13%多；部分过渡的已有1675个队，占总数的4.1%。

1960年3月初，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向山东省委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各地提出并经省委批准的，30个过渡试点已经有了25个全部过渡过来，所有过渡过来的社，都毫无例外的进一步调动了社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建设高潮。”

1960年上半年，湖南选择了攸县峦山公社、沅江县草尾公社、衡南县酃湖公社等20个公社作为过渡试点单位。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在关于过渡试点问题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是农村

生产关系的又一次变革。这次变革，从广度上、深度上讲，都是比较大的。"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后，"社会化、集体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它的性质更接近于全民所有制"，"基本社有制比基本队有制具有更大更多的优越性"。

河南则选择了郑州市的北郊、古荥，淅川县的毛堂，遂平县的嵖岈山，新乡县的七里营等 20 个公社作为过渡试点。这些试点公社共有 215660 户，989704 人，共辖 552 个生产大队，3475 个生产队。至 1960 年 5 月，已有毛堂、古荥、北郊三个公社完成了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对于过渡的经济问题，河南规定：土地、牲口、大中型农具等为公社所有，但管理和使用权仍固定在原单位不变；大队的公积金归公社所有，统一使用，同时适当留给大队一部分，但动用时要经过公社批准；种子、饲料、口粮、化肥、办公用具等，仍留原单位使用，不得无偿调拨；大队欠国家的贷款，预购定金，社员工资、存款、投资等，由公社偿还，欠公社的各种款项注销，国家、社员欠大队的款项，由公社收回；公社实行统一分配，但要照顾差别；社员的房屋、衣物、家具、银行存款、小农具等，仍归社员所有；等等。

山西省委提出，1960 年开始过渡试点，做到"三年小过渡，五年内大部过渡，八年全部完成过渡"。1960 年 1 月，山西省委批准侯马的曲沃公社和新绛公社、运城的虞乡公社作为管理区（相当于生产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单位。以后又陆续批准了长治的荫城、临汾的贾得、大同的平旺等 32 个公社作为过渡试点单位。

虽然庐山会议后在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上，没有像实现人民公社化那样一哄而起，而是强调先要进行试点，但是，既然确定实现过渡的年限只有 8 年，当时不少干部自然产生了越早实现过渡越好的心理。山东省惠民县有的公社干部说："今年小合并，明年来个大合并，走到社有制。"曲阜多数公社干部打算"秋后搞过渡"，认为"核算单位越大越好；并的大，单位少，干部多，好领导，好办事"。夏津县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说："三级核算太麻烦，公社难领导，包产单位不听话，逐步过渡不如走近路好（按：意即一次过渡好）。"

各省选择的试点单位，基本上都是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红旗社，经济基础较好，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高。尽管如此，庐山会议后进行的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穷过渡"。例如，湖南过渡试点的攸县峦山公社，1959 年人均产值只有 200 元，每人平均分配仅 68 元；古丈县巨龙公社，1959 年的人均产值为 118 元，人均分配 69 元；长沙市黄花公社，1959 年产值为 101 元，人均分配 42.1 元。据 1959 年全国 40 多万个基本核算单位的统计，年人均收入在 50 元以下的队占 26.94%，50 元至 79 元的队占 41.9%，80 元至 99 元的队占 19.4%，100 元以上的只占 11.69%。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搞所有制过渡的条件。

当时主观地认为实现基本社有制有无比的优越性，并且乐观地估计"多数党员和干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对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促进生产大跃进，有着迫切要求和思想准备"。河南省孟津县横水公社还提出了大队所有制有"五不适应"：一是不适应大型水利建设的需要；二是不适应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需要；三是不适应社办工业发展的需要；四是不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五是不能适应小麦丰产、田园化建设的需

要。因此，只有实现了从队有制向社有制的过渡，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河南省委在1960年2月召开的省、地、县、社、大队五级干部会议更是认为，公社所有制是“带动人民公社整个生产继续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和主要的物质基础，是代表着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伟大前途”。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也认为，“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是多数群众、多数单位的迫切要求，他们对过渡热烈拥护”。但实际上，广大干部群众对这种“穷过渡”是有疑虑的，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在给山东省委的报告中也承认，“有一部分干部和社员存在着思想顾虑，例如，一部分基本核算单位的干部怕过渡以后当不上干部了，一部分小队干部怕调他们的生产资料，一部分社员怕过渡以后不按劳分配，一部分富队怕重复‘一平二调’”。

在过渡试点中，有些地方也意识到不能重犯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制订了一些相关的具体政策，如山东提出了“三变六不变”政策。所谓“三变”，一是把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资料、公共积累、公共财产变为公社所有；二是在管理体制上一般把原基本核算单位变为包产单位，把原包产单位变为作业组或专业队；三是在分配上把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改变为社对包产单位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包总产值加超产奖励的办法。所谓“六不变”，一是生产小队和社员在不妨碍完成集体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经营零星小副业和自留地的政策不变；二是公社对包产单位实行“三包一奖”的政策不变；三是包产单位对社员实行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的政策不变；四是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不变；五是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管理使用权不变；六是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服和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以及在不妨碍集体劳动的前提下，允许社员个人饲养一定数量的猪、羊、鸡、鸭等政策不变。

但是，由于即使是挑选出来的过渡试点单位，基层干部和群众既没有过渡的愿望，也没有过渡的经济条件，加之当时提出可以过渡的一条重要杠杠，就是社有经济至少要占50%以上，为此必须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一系列的“大办”。人民公社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并没有多少进行这些“大办”的物质条件，各种“大办”一齐上，就只得一切都向生产队“平调”。要实现过渡，还必须使穷队赶上富队，于是在农业贷款、抽取公积金等方面一味地照顾穷队，并且无偿地调拨富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支援穷队。在1960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建议：“对那些生产发展很快，收入增加过猛的富队，应当采取适当的控制办法，如在经营范围上对收入多的项目，由公社经营或社队合营，在分配上提高积累的比例，或扣留工资基金等办法，实行多扣少分的方针。”“为了更快、更有效地支持穷队发展生产，可以采取把全部穷队，和个别比穷队稍高的中等队，合并为一个或几个核算单位，由公社直接负责经营管理的办法，这样做，便于公社以更大的力量支援穷队迅速发展生产。”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让穷队去“共”富队的“产”。于是，在庐山会议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和各种“大办”中，“共产风”再度盛行起来。

根据对湖北省沔阳县（1986年撤销，改设仙桃市）海通公社的调查，该公社的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一个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全公社算了一笔账，共乱调劳动力

349个，土地8082亩，房屋1512栋，资金（包括未兑现的）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0件，耕牛84头，木料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6件。

另据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10月12日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对邕宁县五塘公社的调查，在这个公社范围内的14个自治区、专区和县直属单位及21个公社直属企事业单位，没有一个不刮"共产风"的。生产队被刮走的东西，有土地、劳动力、农具、房屋、木料、砖瓦、小镰刀、资金等。全公社据不完全统计，被刮的有：土地1.17万亩，鱼塘316亩，劳动力651个，耕牛94头，马47匹，猪52头（7个队统计），鸡、鸭321只（3个队统计），房屋44间（3个队统计），砖9万块（4个队统计），木材7000多条，胶轮木车352架，粮食24万多斤，拆毁房屋235间（4个队统计）。五塘公社的许多单位，是完全靠刮"共产风"起家的。这个公社1959年11月建立一个马车站，有马47匹，牛2头，车42架，53个人，全是从16个大队抽调上来的。因为这些家当是"共产风"不费吹灰之力刮来的，所以一点也不加以爱护，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只剩下29匹马，21架车，其余的马累死病死了，马车则烂成废物。这个公社的生产队刮社员的"共产风"也很厉害。如沙平大队提出"大办钢铁拆砖房，大办粮食拆泥房"的口号，仅1960年就拆房两次。3月间，炼油厂拆了4户社员18间砖房，只要好砖不要碎砖，炼油厂给了1000元补偿，全部被大队没收。9月间，为了消灭"三类禾"，大队拆毁51户社员房屋117间，其中17户被全部拆光。拆房仅是为了将房子的墙泥作为肥料，群众对此极为不满。

湖南省衡山县沙泉公社规划在两年内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一声令下，勒令泉水生产队90多户全部搬走，占用房屋200多间，田地400多亩，农具、家具数十件，成立所谓的"农场"。这个公社刮"共产风"真是名目繁多。大体有如下十种：一是下命令、下通知。1960年公社盖礼堂，命令全社每人送砖4块，共4万块，调用劳力3000多个，木材500多根。二是蛮搞蛮要，强行占用。公社为办招待所、卫生院、供销部，命令沙泉镇20多户人家搬走，还挤走了一个作业组。三是合营为名，吞并为实。该社所属的山田大队在1958年办了一个陶瓷厂，水口大队办了一个伞厂，1959年社队合营，1960年即被收归公社了。四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公社所办的许多事业单位，其房子、家具、机器，很多说是向大队借，结果，坏了的不赔，用了的不给租金，还存在的也不承认生产大队的所有权。五是借口发展社有经济，大搞平调。公社办饲养场，就无偿调了各生产队的生猪50头。六是利用现场会，无偿拿东西。湖南省、地、县三级商业系统在衡山召开支援农业现场会，衡山县为此盖了一栋服务大楼，拆改房屋达110间，花费劳力8000个。七是组织协作，抽调劳力，取消等价交换。单沙泉公社就抽调了7万多个劳动日。八是捐献为名，搜刮财物。连学校也刮起了"共产风"，有一个小学就"刮"了学生700多个鸡蛋。九是公款还账，层层扣留。衡山县扣留修筑京广铁路复线民工工资44740元，有个公社则扣留了生产队钢铁补助款9000元。十是非法搜查，没收东西。这个公社将外地回来的社员扣住搜查，没收现款600多元。为此，群众气愤地说："公社要大鱼，大队要小鱼，生产队要虾米，小鱼、虾米一齐要。""除了堂客（按：湖南方言，女人、妻子之意），什么都刮。"

据山西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估计，全省搞“一平二调”的公社约占15%，有70%的公社在制定发展社营经济计划时，有“一平二调”的打算。“一平二调”的方法，一是无偿抽调；二是低价收买，不等价交换；三是不付现金，有价无款；四是摊派发展社办经济基金；五是随意占用管理区的土地；六是随意抽调管理区的劳动力。稷山县里望公社1960年春季搞发展社办经济“开门红”，要各管理区敲锣打鼓把所有好马、来亨鸡、咖啡兔、大母猪一律送交公社。还要求调一带四，如调一口猪带一个喂猪盆，一个猪圈门扇，700斤谷糠，200斤麦秸，有的管理区的马蹄表也被调走了。

虽然各地在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试点中，都允许社员可以保留自留地，可以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禽，但实际上这些政策都没有兑现。用湖南省耒阳县双桥公社社员的话说：“不要说五厘自留地，就是五棵庄稼也都拿走了。”其他的诸如评工记分、“三包一奖”，也形同虚设。湖北省沔阳县的群众形容“共产风”时说：“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

对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中出现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快有所觉察。1960年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了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一是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二是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二是全党必须重视分配工作；四是公社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经纪律；五是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并强调：“从目前我省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来看，一般是不具备过渡的条件的。如果在目前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转变，那就会违背客观规律，那就有可能重复1958年曾犯过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而1958年的经验证明，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重复这个教训。”中共山东省委在1960年3月召开六级干部大会时，也发现“公社干部有的存在急于过渡的苗头”，“穷队盼过渡，要求快过渡”，“富队怕过渡，生产不积极”等，而且一些地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重新抬头。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中提出：“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4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

庐山会议后重新刮“共产风”的根本原因，在于急急忙忙地要实现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虽然各地都规定要先经过试点，但由于规定了过渡的年限只有8年，而各个人民公社并不具备过渡的条件，于是，只好没有条件硬“创造条件”上，各地纷纷办起了各式各样的社办企业、社办的“万猪场”、“万鸡场”，可当时的公社多数是一无资金，二无场地，要实现各种“大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刮“共产风”，把各种物资从大队（管理区）、小队乃至社员手中刮到公社来。可是，当时在制止和纠正“共产风”的过程中，却不是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上和“穷过渡”根源上去找原因，而是片面地将刮“共产风”的责任推到社队干部身上。

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中说：“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

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

随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1960年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人民公社出现的严重情况，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并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会议公开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问题。

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文件中虽然承认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但是，文件将基层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类错误，归结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干部队伍的侵蚀"，"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随后开展的农村"三反"运动中，虽然对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存在的贪污、浪费等行为有所遏制，干部作风有所好转，但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分析和解决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四节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庐山会议前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由于群众对公共食堂的强烈不满，加之一些地方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粮荒，相当多的食堂已处在停伙半停伙状态，中共中央在公共食堂问题上提出了"争取巩固、坚持自愿、积极办好"的方针，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按照群众的要求解散了，山西全省留在公共食堂的农户一度只剩下20%。至1959年6月底，河北全省尚有食堂49004个，较原来减少83.6%，加入食堂的农户有1643990户，占农户总数的19.65%，较原来减少了80%，此时剩下的除了少量主要由单身汉和没有辅助劳力做饭的户组成的小型常年食堂外，还有一些因农忙突击生产办起的农忙食堂和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的工地食堂。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都讲到过公共食堂、供给制问题。彭德怀7月4日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张闻天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供给制、公共食堂不同于社会主义，取消供给制不等于退步，退出公共食堂不等于不搞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两回事，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作为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批评的反击，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批语中，一再为公共食堂辩护。在7月23日的发言中，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他还在一份材料的批评中写道：解散食堂"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毛泽东指责主

张解散食堂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既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不赞同甚至反对公共食堂，那么，在“反右倾”时，坚持公共食堂也就是题中之义，理所当然了。

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社论一开始就如是说：1958年中国出现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定会越办越好。在此前后，各种报刊刊发了大量的有关公共食堂的通讯、报道、社论和评论，自然是毫无例外地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

庐山会议后，一些地方还开展了要不要办公共食堂的大辩论。既然反对办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党，对公共食堂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组织群众进行鸣放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的过程中，一些原来支持解散公共食堂的干部被打成“右倾分子”，党员干部为大势所趋，只得不遗余力地推广公共食堂。农民对加入公共食堂虽极不情愿，但经不住所谓大辩论，谁也不敢承担“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人民公社”的罪名。于是，一度散伙的公共食堂又相继恢复。至1959年底，我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等七省（市）有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公共食堂。

为了推广公共食堂，各地总结出了公共食堂许多的“优越性”，如公共食堂能节约大量的劳动力，能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而这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公共食堂能解决社员吃饭的后顾之忧，贫下中农不再为吃饭问题所累；社员在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可以集体学政治、学文化等。公共食堂也就再次成了“共产主义萌芽”，“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且将“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1960年2月16日至18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全省农村13万个公共食堂，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不巩固的只占20%左右。报告说，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公共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扯垮公共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

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2月26日，中共中央将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在批语中说：“办好食堂是贯彻执行节约用粮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一个关键，也是解决粮食不足时更有计划地用粮的最好办法。”批语认为，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首先就是破坏公共食堂，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公共食堂，

而实行指标到户，实物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是办好公共食堂的先决条件。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又对贵州省委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写下了一段批语，称赞这份报告写得好，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还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在五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在1960年一年，全国公共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他要求全国各地一定要达到贵州公共食堂现时的那种水平，并且还要提高。同时，他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将贵州省委的报告在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后，于3月10日前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手里，远的则干脆用飞机送达。这种急迫的心情，足见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工作的重视，也足见他是何等地看好公共食堂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作用。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材料，并指示抓好公共食堂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要做到“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争取80%甚至90%以上的社员到公共食堂吃饭，实现全民公共食堂化。

为了恢复和巩固公共食堂，各地相继出台了一批关于公共食堂的政策。1960年3月，河南制订《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规定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员生活集体化的基本单位，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农村社会主义的坚实阵地”。2月8日，中共青海省委发出《关于迅速全面安排好人民群众生活的紧急指示》，强调要大量举办和办好公共食堂，称公共食堂“既有利生产，又便于安排社员生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6月4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做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十条管理办法，强调要坚持贯彻执行“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原则，充分发挥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吸引广大群众自愿参加；所有社、队干部和上级派到社、队工作的干部一律参加小队食堂吃饭；在食堂中贯彻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办好食堂；按照国家规定的口粮标准，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原则等。

各地的文件中都强调要按照“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办好公共食堂，有的还明确规定对少数暂时不愿参加公共食堂的人，不要勉强他们参加。但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社员来说，公共食堂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参加公共食堂并非自愿，而且规定“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实际上社员能得到的只是粮食指标，而实物则直接分到公共食堂，这等于卡死了农民分灶做饭的可能性。因此，1960年春夏之交，全国农村公共食堂规模和参加人数急剧扩大。云南办起了10.7万个食堂，97%以上的社员参加；河南共建立食堂33万个，全部农村人口都参加了公共食堂，而且所有食堂都是常年食堂；湖南农村共有41万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99%以上；四川共有62万多个公共食堂，全省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7.7%。全国亿万农民再次回到了公共食堂，吃着越来越稀的“大锅饭”。

第五节　严重的困难

庐山会议后，随着新一轮“大跃进”的启动和农村人民公社一系列“左”的政策的出台，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盆些困难丰要表现在：一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至1960年的积累率分别达到了33.9%、43.9%和39.6%，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本已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的水平，如此高的积累只能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二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了2.3倍，而农业则下降了22.8%。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农民生活极度困难。

粮食作物减产的主要原因，除了“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严重损伤农民积极性外，与下面两点也直接相关。

一是这几年我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据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其中有3亿至4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一部分农田因灾害特别严重而没有收成。这年灾情最严重的是旱灾，全国除西藏没有受灾，新疆地区虽气候不正常但尚未成灾外，其余各省、自治区都先后发生程度不等的旱灾，受旱农田达6亿亩。受旱地区中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四省面积最大，占四省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受灾时间最长，一般持续6—7个月。此外，东北三省和沿海的广东、福建、江苏、山东还遭受子台风和洪涝灾害，辽宁东部地区更遭受了当地有水文记录以来从未有过的特大洪灾。同时，受洪涝灾害的影响，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省大片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病虫灾。陕西、山西、河北、安徽、山东等省还遭受了频繁而严重的冰雹和霜冻。

1958年至1962年的农业自然灾害情况表（单位为万亩）

年　份	受灾总面积	其　中				成灾总面积
		水　灾	旱　灾	风　灾	霜　灾	
1958	46444	6419	33541	2845	3639	11732
1959	62189	7219	50710	2896	1373	20682
1960	80374	15232	57197	5884	2071	34495
1961	80346	13307	56770	6667	3602	40038
1962	52050	14715	31212	3562	2561	25008

二是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了1959年耕种面积的减少。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的一大后果是，使党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于是，领导人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为此，毛泽东、刘少奇都提出了耕地三二制的问题。毛泽东曾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够吃。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在同淮阴地委领导人座谈时，刘少奇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用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1/3的地种粮食，1/3种树，1/3休闲。”些地方领导干部对1958年的粮食丰收也深信不疑。在1959年1月的湖北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我从汉口到襄阳、宜昌、荆州，跑了1800多公里。我们没有看到百斤以下的棉花，千斤以下的稻谷，个别地方有（钟祥靠近宜城交界处有一块），大量是1000斤以上的，还有2000斤、3000斤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赫然写道：“过去我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为此，《决议》提出，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把现在耕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缩减到三分之一左右，另三分之一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其余三分之一的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大种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号召全国农村人民公社都要为此而努力。

由于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中共中央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既然1958年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甚至到了吃不完的地步，在制订计划的时候便决定减少总播种面积，而其中，又缩小粮食作物的比重，而增大棉、油料和其他非粮食作物的比重。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一面是播种面积的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导致1959年单产的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约少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

1960年和1961年的播种面积虽然增加，但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实际上是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减少，其中粮食只有1.435亿吨，比上年减少2650万吨，减少15.6%，而征购量却比1959年增加了300万吨，当年销售大于库存620万吨，国家库存粮食比1957年减少了1180万吨。按每人每年需要250公斤粮食计算，国家这年大约差2400万人的粮食。棉、油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与1957年相比，全国的粮、棉、油人均拥有量分别下降了29.7%、38.5%和56.1%。粮食的减少还导致了生猪数量的下降，猪肉人均拥有量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36.4%。

1958年至1962年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表（单位为万亩）

年份	总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占总播种面积的面分比	比上年增减面积
1958	227992	191420	84.0%	－9030
1959	213607	174034	81.5%	－17386
1960	225863	183644	81.3%	＋9610
1961	214821	182165	84.8%	－1479
1962	210343	182431	86.7%	＋266

1958年和1960年的两次“大跃进”中，全国出现了大办工业的高潮，随着一大批国家和地方工矿企业的建立，导致城镇人口骤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了3124万人。这一方面使得农村劳动力人数大规模减少，另一方面大量城镇人口的增加，必须相应扩大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为此，只得采取高征购的办法。1958年度，全国征购粮食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度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1960年度征购1024亿斤，占年产量的35.7%。

由于征收过头粮，使农村的留粮大为减少。1957年全国农村留粮2940亿斤，1959年减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也就是说，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17.2%。按人口平均，全国农村拥有粮食的消费量，1957年409斤，1959年366斤，1960年264斤。可是，尽管征了过头粮，粮食减产使征购的绝对数却没有比1957年增加，仍不能满足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不得不挖库存。1960年底，全国粮食库存量降到了573亿斤，比1955年的804亿斤减少了29%。农业的减产，粮食库存的减少，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农民生活尤为艰难。

据河北省1960年4月的统计，全省35000多个生产队，社员平均每天吃粮水平达到1斤以上的，有7759个队，占21.7%；12两以上1斤以下的，有21292个队，占59.6%；半斤以上12两以下的有5316个队，占14.9%；不到半斤的有1346个队，占3.8%，最少的只吃3.4两。这里的1斤是按旧制16两计算的，也就是说近80%的社员每人每天的粮食不足1斤，最少的只相当于今天的2两多一点。到1960年冬，吃粮标准被进一步降低。1960年11月河北省宣化市农村粮食消费平均每人每天5.4两。其中，3—4两的有109个公共食堂22565人，4—5两的有805个食堂139316人，5—6两的有286个公共食堂61780人。实际上，在当时的经济困难中，河北省农村的情况还不是最严重的。

1960年4月四川部分地区农村公共食堂人均用粮情况表

地区	公共食堂总数（个）	6两以下（%）	6两至8两（%）	8两以上（%）	10两以上（%）	12两以上（%）	1斤以上（%）
达县	55754		29.69	66.96		3.35	
绵阳	73173		23.8	69.6	6.6		
万县	4088136	2.7	45.41	33.75	9.5	8.51	
江津	39668		2.5	96.5		1	
乐山	28901			99.52		0.4	0.08
自贡	2159			98.9	1.1		
南充	64265	10.5	18.8	48.3	11.8	7.6	2.6
泸州	8989	4.7	75.8	14		4.7	0.8
宜宾	18111		14.2	76.9		7.6	1.3
温江	4869				6.1	93.3	

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上劳累过度，从1959年下半年起，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到1960年2月15日，全省有44个县、235个公社、5600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5.9万多人，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砥（1973年划归天津市）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万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1960年1月至4月27日，河南省内黄县东庄人民公社共死亡572人，占全社总人口的1.9%。死亡最严重的渡店、大村、管庄、卫流河、野庄等5个大队，从1960年1月以来共死亡284人，占人口总数的3.9%；该社渡店大队在此期间，死亡85人，占全队人口的4.8%。除了非正常死亡外，社员患病率也很高。卫流河大队第八生产队有156人，病情严重的33人，其中营养不好，患浮肿病的13人；该大队第五生产队有53户，户户有病人，全家人生病或一半以上人口生病的有24户。

云南省剑川县金华公社从1960年1月到4月中旬，共有各种病人4080人，其中浮肿病人占76.8%；死亡1390人，其中因浮肿病死亡916人，占66%。该公社四个情况严重的管理区，患病的劳动力占总数的25%至39%。剑川县所在的大理地区患浮肿病及其他疾病者有3万多人，因此而死亡者有七八千人。

山东省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从1960年1月至5月，共死亡159人，占总人口的5.19%；外流200人，占总人口的6.25%；浮肿病380人，占总人口的12.3%；牲畜死

亡86头，占42%。在得浮肿病的人员中，属病理性浮肿的17人，占发病人数的4.5%；属营养性浮肿的363人，占95.5%。在死亡的159人中，除了因疾病死亡者外，多数是因为浮肿，或浮肿引发其他疾病，或生活困难家庭不和，或家人侵占本人粮食自己外出讨饭而饿死的。

河南省信阳地区是全国最早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地方之一，也是三年困难时期情况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到1960年春，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竟达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幅度蔓延，大量农民外逃或者饿死。仅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死亡8万多人，新蔡县（现均属驻马店市）死亡近10万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生产队死亡达30%左右。据信阳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1949—1999）》记载：信阳1958年全区总人口是4262350人，1959年为4258316人，比上年减少0.101%；1960年全区总人口3817669人，比上年减少10.348%。也就是说，1960年信阳全地区减少人口40余万人。

这时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连一向供应比较好的广东，1959年至1960年间，农村普遍一个月一人吃不到10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见不到，青菜也少。吃糠、吃蕉头、吃甘蔗渣、吃红薯藤的事，到处都有发生。最严重时，据广东农业办公室不完全的统计，全省水肿病人在80万人以上。1960年底，广东农业办公室对31个县（市）进行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25%，大大超过了正常年份。另一个供应较好的省份江苏，据1960年1月的统计，全省共有浮肿病人12.6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个专区和南京市的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1959年冬至1960年4月，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其中多数是饿死的。

1960年，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消费额是68元，比1957年减少11元，消费指数下降了22.8%；人均粮食消费为312斤，食用植物油消费3斤，猪肉消费2.4斤，分别比1957年下降23.9%、21.1%和72.7%。由于口粮不足，营养不良，全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543%，出生率为2.086%，自然增长率为-0.457%。据推测，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

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后来，我们将这几年叫做“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固然与这几年连续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造成的。

首先，人民公社的管理和分配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小队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且不说那些作为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试点单位，即使大多数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因为一个大队（或管理区）往往由十数个生产小队或作业组组成，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千，各生产小队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由于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也就是各小队间、大队内部的各个社员间，仍然是完全的平均主义。在

分配上，也仍然坚持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虽然1960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中曾明确规定，供给的部分一般不要低于30%，也不要高于40%，但由于供给部分中主要的是粮食，在当时的条件下，工资仅具象征性，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所以在人民公社的分配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供给制，而供给制是彻头彻尾的平均主义。有的地方自公社化以来，没有认真进行过分配。湖南省湘潭县1958年根本没有搞年终决算，也没有找补，谁多谁少，社员谁也不知道。1959年虽然办了决算，但真正进行了找补的只有73个大队，226个大队只找补了一部分，同时，找补的金额，也被七扣八扣扣除了。社员说："干不干，三餐饭。"

正因为如此，生产小队和社员都没有积极性，农村的超支户越来越多，有的生产队竟户户超支。社员说："一年忙收头，汗水白白流，年终搞决算，落个癞痢头。"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出工不出力，不爱惜集体财产的现象普遍存在，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降低。小队和社员自然也不会在粮食丰产丰收问题上多想办法，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的减产也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人民公社中严重存在的"五风"问题，也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是造成粮食产量降低的重要原因。由于大刮，"共产风"，大队、小队的生产资料和各种财物被随意刮走，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家禽、家畜被刮进了公社所谓的"万猪场"、"万鸡场"。这样，社员没有了家庭副业，没有了自留地，大大降低了生产自救和抗灾救灾的能力。同时，虽然在队有制向社有制过渡试点过程中，也强调反对基层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由于坚持"一大二公"，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及干部中存在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等作风。

湖南省衡山县沙泉公社1960年为了实现"全部双季稻化"，竟将各小队的中稻种全部收到大队，已经浸了种的也要捞出来，结果使一些不能种双季稻的冷浸田也种上了双季稻。该公社双全大队有30多亩冷浸田，以前种单季稻，亩产有600斤，改种双季稻，两季一共只收了56斤，而每亩种子则花去了42斤。湖南一些公社在"越早越好"的思想指导下，要求过了春节就浸早稻种，实际上这时湖南的气温还很低，稻种根本无法发芽，于是就采取在田边地头烧上熊熊大火的办法，以此提高秧田水温，这自然只会是白白浪费人力物力。1959年秋季，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为了统一种麦，有11702亩晚秋作物不等成熟就收割，结果少收粮食50多万斤。湖南群众写诗批评生产瞎指挥说："公社化真正好，集体劳动是个宝；就是干部乱指挥，还怪农民没搞好；广播电话排生产，实际工作是瞎搞。"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生产的瞎指挥，必然是通过强迫命令才能进行。有些素质不高的社队干部，动辄对社员加以停止吃饭、打骂等处罚。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透露，该省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计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又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占22.3%。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

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湖南省醴陵县黄獭嘴公社自1959年底开展整风整社至1960年4月，全公社被打的干部、群众达1346人，占公社总人口的3.52%。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2人，打后几天死的4人，打后自杀的21人。打成重伤的202人，轻伤的413人，因挨打或怕打而外逃的1080人。河北省安国县博野公社50名管理区以上脱产干部，有打骂行为者34人，占68%，小队长以上干部1165人，打骂人的388人，占33%，该社有一名大队长，被其亲自吊、打、捆绑、罚跪、斗争的群众达140人之多，其中2人被打死，2人致残。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从1957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018人中有257人打人骂人，占干部总数的22%。被打伤的群众145人，残废的11人，逼死的7人，因被打致死的4人，打跑了的125人。太原市吴村公社党委书记田某某经常打人，全社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他的，也没有不怕他的，以致小孩子哭的时候，大人就用“田某某来了！”吓唬小孩。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有一位姓焦的大队长，他所在的第四队共有社员60多人，他打了54人，群众称之为“焦大老爷”。这里列举的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强迫命令风以及由此造成的对部分干部、社员的随意批斗，打骂体罚，停止吃饭等，绝非是个别现象。

庐山会议后，因为要进行各种“大办”，许多地方除了搞“一平二调”外，浮夸风和形式主义又再度盛行起来。湖南省辰溪县195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6亿斤，虚报为2.6亿斤，虚报60%。1960年全县栽红薯季节上报说已栽6万亩，结果过了两个月上级去检查，还只栽了3万亩。前面提到的博野公社1959年向县里报产量为57696454斤，实际产量只有28618225斤。按这个数字征购粮1210万斤，比1958年增加了13倍。许多村主粮全部被拉走，甚至社员自留地的粮食也收走了。县委来检查，公社干部就让社员在屋里放柴草，外表放上薯干加以应付。群众说：“公社得红旗，社员饿肚皮。”干部特殊化风也严重存在。山西省长治市工农联盟公社，仅1960年春季请客就花去了8000多元。湖南省祁阳县潘家村公社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一年之内大吃大喝的各种物资，折合金额达47374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河南省许昌县榆林桥公社高庄大队5个干部，1959年一年内吃夜饭用去面粉600斤，肉200多斤，粉条200多斤，白酒40多斤。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出现，固然与部分干部的素质低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使然。因为人民公社既大又公，政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组织，社队干部掌握了相当的权力，这就为他们刮“五风”创造了条件。因此，要解决农村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要彻底纠正“五风”问题，就必须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一番调整。

第五章　退　　却

第一节　应急措施

面对农村因粮食短缺而造成的农民生活极度困难，全党上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克服困难的措施，如将农村"三反"运动转为整风整社运动，大力倡导发展养猪事业，降低用粮指标，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强调要办好公共食堂，广泛开展"代食品"运动。有的地方为了解决公共食堂问题，还专门召开"吃饭大会"，甚至还"创造"了各种各样所谓的"增饭法"。

但是，这些治标措施并不能改变农村日益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 年下半年起，农村形势仍呈恶化的趋势。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就必须调整党的农村政策。

严重的困难，使党的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1960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1958 年、1959 年我们曾讲数量，今后要讲质量、品种，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还说，真正的"大跃进"是留有余地的，真正的留有余地不是口头上的。只有留有余地，才能鼓起劲来。6 月 18 日，他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试图对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他在文章中虽然对人民公社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庐山会议打退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使我们基本清醒了"，但他同时指出，时至今日，党内管农业的同志，以及管工业、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他还承认自已"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起犯的"。他提醒全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对此，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对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的东西，进行全面的反思、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清理，并且对所谓的"三面红旗"加以否定。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是毛泽东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存在的问题的一个不能动摇的前提。但是，毛泽东在全党面前公开承认自己也犯了错误，强调一段时间以来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原则，号召全党上下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这对于全党冷静地思考"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对随后进行的政策调整，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上海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于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问题，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对于人民公社，他指出，农村以生产队（即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要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讲三年五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他还说，要有部分人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有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

1960年2月，中共贵州省委在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办好公共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就势必要交给公共食堂，社员养猪要加以限制，一户最多可养一头。这样对搞好集体生产，办好公共食堂，都有好处。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对贵州的做法“一律依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按照这个指示，社员的自留地再度被收回，家庭副业基本不复存在，社员生活一切都要依靠公共食堂，大大加剧了广大农民生活困难的程度。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报告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表明，中央领导层对人民公社的若干政策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重大改变。庐山会议后急急忙忙进行的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试点被中止，这对于稳定农民情绪、调动生产队的积极性、遏制“共产风”的蔓延有重大意义。

8月10日，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日趋严重的粮食问题，中共中央做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示》虽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当前政治的经济的形势是好的”，但强调全党全民要“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并提出了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坚决压缩农村基本建设等八项具体措施。

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1960年7月9日，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农村的十项政策》的规定：（1）保证留足基本口粮；（2）节约备荒，粮食节余归己；（3）包产必须落实，超产奖励必须兑现；（4）给食堂拨够菜地，保证每人每天吃菜1—2斤；（5）鼓励生产小队开发空隙土地，争取每人每年多吃二三十斤豆类和杂粮；（6）留足饲料，拨给青饲料地，发展集体养猪，建立养牛场，发展养牛；（7）留足自留地，实现社员家庭养猪平均每户一头；（8）多种油料作物，争取每人每日一钱油；（9）增加现金收入，争取按季或按月发工资；（10）大队掌握产品，迅速分配收益。

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并指示各省、市、自治区依照广西的办法，做出一些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农村干部和群众共同遵守。指示还强调，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公社干部重复“一平二调”的错误，要向干部和社员反复讲清楚，即使将来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也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现在归基本核算单位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在将来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时候，也并不转归公社，仍归队所有，归队使用。在供给制与工资制的比例中，工资部分应占70%左右，最低不能低于

60%；供给部分一般限制在30%左右，最高不能超过40%。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0月5日，中共山东省委做出了《关于当前农村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共十八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公社体制，队为基础，五年一律不变”。至于五年之后，变与不变，还要看生产的需要与群众的意见，由各队和社员做主，自己讨论决定。10月8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了《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政策的规定(草案)》，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要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做出了类似的政策规定。

为了检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在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主持下，9月20日至22日，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北京五省（市）在北京召开农业书记会议。会议要求安排好农村人民生活，压低口粮指标，大种蔬菜，大搞“代食品”，办好公共食堂，并提出要“在今冬明春，必须划出一百天的时间，在农村严格实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的制度”，做好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集体扣留部分一般只应占总收入的30%，供给制部分一般不应超过社员分配部分的30%，发动干部群众，彻底纠正“共产风”等“五风”，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经营管理制度。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并要求各地以八届六中全会和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两次上海会议上的讲话为武器，“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风”，“把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把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关系，把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彻底搞好，把农村必不可少的制度建立起来”。“其目的，在于使广大群众心情舒畅，从而调动起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战胜目前的暂时困难，顺利地渡过灾荒，争取明年夏季大丰收，争取明年全年的大丰收”。

1960年下半年各地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方针政策，使庐山会议后开始的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风得以制止，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深为广大农民拥护。但是，这些政策措施还没有触及人民公社最根本的体制问题，生产队内部各生产小队间、社员间的平均主义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各地在贯彻政策、进行整风整社的过程中，发现了1960年春各种“大办”时刮“共产风”的严重情况。196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和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常登榜《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就这两个文件做出了指示。《指示》强调：“从1958年冬天以来，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因为这种‘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和农业生产力。但是，从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公社的例子看来，这个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加上某些浮夸、强迫命令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使干部严重地脱离了农民群众，使这类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损害。这种严重情况必须大力改变，绝对不能允许再拖延下去。”“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

关键问题。解决了这类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就会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960年12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对农业问题的汇报，讨论研究如何从根本上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这也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感到“共产风”酿成的危机已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共产风”问题，1960年秋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1月3日，毛泽东对“十二条”做了几处重要修改。当天，中共中央用电报将“十二条”发给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党总支和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在此期间，不再新办基本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已有的试点和已经转为基本社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社、队，办得好的、群众拥护的，可以继续下去；办得不好的、群众要求改变的，重新恢复为基本队有制。七年以后是否需要改为基本社有制，还要看当时的情况，由中央统一领导。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无偿调用的劳动力，必须彻底清理，给以补偿。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管理区或者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作为公社派出机构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得过死，不要乱加干涉。绝不能以削弱队有经济来发展社有经济，更不允许用“一平二调”的错误办法来发展社有经济。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执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干、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随意调换。鼓励社员在不影响集体劳动的前提下经营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一般应占总收入的65%左右，扣留部分占35%左右。县不得从社提取公积金；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社不得提成。社、队动员社员从事水利等基本建设，人数要严格控制，并由社、队从自己的公共积累中给予劳动报酬。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使劳动力强、出勤多的人除了吃饭外还能得到较多的工资。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

要达到农村人口的40%左右，其中整劳动力占2/3。五年内，县以上各级单位都不许再从农村抽调劳动力。公社一级动用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劳动力，须经地委批准，生产队动用生产小队的劳动力，须经县委批准。

（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坚决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只许卖给国家收购机关外，其他的农产品和副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必须坚决保证社员每天睡足八小时。可以实行男社员每月放假两天、女社员每月放假四天的制度。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为了使"十二条"能迅速贯彻，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贯彻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地至迟在12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农村中去，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具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和省直各系统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弄通思想。然后，以地委、县委为单位，召开生产小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动员，其中要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由省、地、县委的负责人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帮助社、队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社员进行传达，以造成一个轰轰烈烈的贯彻紧急指示的群众运动。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这场运动搞得彻底的主要标志是："一平二调"的遗留问题都已经全部解决；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和提高；群众真心满意，情绪高，干劲足；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

这个时候，毛泽东把形势是看得很严峻的。他在11月1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决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他还说："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同一天，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批示信，要求各地"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强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并要求各级干部既要真正学懂"十二条"，又要把政策交给群众。毛泽东认为，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让干部真正懂得"十二条"，并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把局面扭转过来。

为使各级干部认真总结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带头进行自我批

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是发自内心的。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能在全党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表示要改正错误，也是不容易的。严重的困难，使领袖的头脑清醒了。

"十二条"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拥护。许多省、市、自治区召开省、地、县三级或省、地、县、社、队五级干部会议，贯彻"十二条"的精神。河北省保定市从11月17日开始宣传贯彻"十二条"，全市共选择和培训了4420名报告员，对"十二条"作了逐字逐句的宣讲，仅10天时间，15岁以上社员中有98%的人听了传达。一些省委和地、县委结合自己工作的实际，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中共甘肃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自公社化以来，全省的"共产风"问题一刮再刮，"其根本原因，应当也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中共甘肃省委还认真检查了在执行中央政策、工作任务的安排、领导作用等问题上的错误和偏差。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人民检查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分析了产生"五风"的思想根源，提出了改正的措施，并要求各地（市）、县在整风大会上宣读省委的检查，以接受基层干部、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相继做出了贯彻"十二条"的补充规定。

"十二条"在农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的社员说："中央的'十二条'完全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条条入耳，越听越想听。"雅安县多营公社的社员更是说："照这样办，我们睡着了也会笑醒。"河北保定的小队干部说："有了十二条这个靠山，我们一定当好家，过好日子。"在贯彻"十二条"的过程中，各地的"共产风"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十二条"标志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停止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反右倾"运动，开始转向重新纠"左"。这是二个重大的转变，为扭转农村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十二条"仍有很大的不足。如文件中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中的"队"，指的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小队。当时的生产大队规模一般都很大，少则几百户，多则上千户甚至更多。1960年底，全国共有483814个生产大队，2988168个生产小队，按当时的农村人口计算，每个大队约有1000人。辽宁某县东风公社有个大队，有250个小队。这样，大队仍可"共"小队的"产"，小队与小队间也仍存在平均主义。

"十二条"虽然对工资制与供给制的比例作了规定，但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分配制度，而供给制恰恰是社员间平均主义主要的根源，也是社员对人民公社最不满意的地方之一。尤其是作为供给制重要载体的公共食堂，早已为群众强烈不满。公共食堂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在口粮供应一减再减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不但如此，公共食堂还是一些干部搞特殊化、卡压群众的重要手段。对于这个问题，"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只有在北方的严寒季节和

缺乏燃料的地方，在经过县委一级批准后，方可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

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一面对“十二条”表示由衷的欢迎，一面又迫切希望进一步解决困扰生产小队积极性的基本核算单位过大、严重损害社员生产积极性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等问题。

第二节　“农业六十条”的起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农业基础十分脆弱。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业生产的效率并未随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动而随之提高，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生产开始的，而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也是从农业歉收开始的。农业生产出现的困难局面，不但使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难以为继，也严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要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就必须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中央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在“十二条”的基础上，会议确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国家准备再拿出10亿元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拿出15亿元来作为“共产风”的退赔补贴；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与人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十二条”规定的5%提高到?%；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中，着重讲到了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的问题。他指出：“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国际形势等阐明了意见，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的，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同志多少年来不做调查研究，只要不做这种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

能决心大。他还说，今年内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他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要去做调查研究，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于 1961 年 1 月中旬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重申 1961 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他见到了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旧文《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而写的。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由于战争环境，这篇文章曾经失散，毛泽东多年寻找而未得。1959 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龙岩地区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后，将其借来给了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这是他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挫折，面临困难，吃的就是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摸底的亏。这时，毛泽东深感到调查研究的格外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以 10 天至 15 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

1961 年 2 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进行调查研究。在杭州和长沙，毛泽东分别听取了湖南省委、浙江省委以及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的汇报。

毛泽东在听取田家英等人的汇报时，就人民公社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主要内容是：(1) 怎样克服“五风”、改变面貌的问题。问题主要是“五风”，瞎指挥。除自留地、蔬菜地外，再留 3% 归小队机动使用，可以多种多样。(2) 退赔问题。要决心赔，破产赔。谁决定的由谁退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做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3) 自留地问题。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到底是一个道理——还给农民自留地。要把反复的原因向农民交待清楚，基层干部要从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依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4) 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样做工作。我们在全国有几个调查组，以后这些组到广州集合，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5) 规模问题。公社规模太大了，是不是一个公社分成两个。公社太大，把积极性搞掉了，就搞平均主义，瞎指挥就来了。(6) 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一个生产

队管几十里，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什么事情，这怎么行？生产队小一点好，大体就是原来初级社，或者把小队当作基本核算单位。可以不要小队，小队改为生产队，原来的生产队变为大队，把小队变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几个小队悬殊大，拉平分配，破坏积极性。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太大。(7) 食堂问题。按群众要求来办，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动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8) 干部手脚不干净问题。百分之三四十的贪污面，百分之七八十的手脚不干净。统统撤掉不行。处理要按群众意见办，群众允许过关的就放过，不允许的就撤职。

毛泽东在谈话中涉及有关人民公社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要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东北区、华北区都制订过《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1955年11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6年，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又通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在后期尤其是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时，也存在过急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章可循。人民公社建立两年多来，虽然也有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有上海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又有了“十二条”，但这些都是党内文件，而且规定的内容也不具体、全面，各地操作起来不方便，甚至还容易在执行中出现偏差。因此，搞一个类似于合作社章程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对于规范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责、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对此，田家英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调查情况时，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被毛泽东采纳了。在随后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到这个条例的由来时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呼加同志（按：两人分别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和书记）、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随后，毛泽东离开杭州，经江西、湖南前往广州，在途中分别同赣、湘两省负责人谈话，谈得最多的仍是人民公社体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对于前者，毛泽东的认识逐渐深化，他几次提出，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的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甚至可以考虑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1961年2月中旬，毛泽东到了广州，就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同陈伯达、陶铸、胡乔木、田家英等人进行讨论，并决定由陶铸负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及田家英执笔起草。

尽管“十二条”有效地遏制了“共产风”，解决了“调”的问题，但对于小队与小队间以及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却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这个问题更直接地影响到小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关系到农村和农业生产能否复苏。这时，中共中央派到广州的调查组在《调查纪要》中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认为应当划小公社和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3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可以将公社和大队划小，将原来的小队改为生产队。他指出，要解决队与队、社员与社员间分配拉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1961年2月下旬开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农村调查时感到，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出台了好些文件，但到了基层，有的没有同群众见面，有的执行不认真，有的执行中打折扣甚至走了样。这其中可能与某些具体规定朝令夕改有关。如果能搞出一个条例，把现有的处理人民公社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办法归纳起来，使之条理化、规范化，公布于众，对于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稳定农民生产情绪，将起重大作用。于是，邓子恢组织了一班人花了40多天的时间，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这个条例就成了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资料。

为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进一步解决农业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和北京分别召开工作会议。广州会议于1961年3月10日举行，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南、华东、西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又称“三南”会议。北京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又称“三北”会议。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三北”会议全体人员，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在上午八时写完信后，又在“三南”会议上反复阐明解决队与队、社员与社员间平均主义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还强调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一定要深入开展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他指出：“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做调查，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讲话中，他还讲到了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性。

毛泽东认为，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间的平均主义，自从搞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好。因此，他希望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就能够明确公社、大队、生产队、社员的责、权、利，有效地克服平均主义。

毛泽东原打算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的情况，并带去给刘少奇等人的信和《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从3月15日起将“三南”与“三北”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

此次会议对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经营管理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与会者认为，公社化后，公社规模过大，应根据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地理情况、原来基础和群众自愿等条件，适当进行调整，生产队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宜，生产大队一般应维持原高级社的规模，公社应相当于原来的乡；公社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主要是抓政策、方针，抓计划，抓生产资料的供应，以及其他生产队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活安排、技术措施等，主要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当家，公社不得瞎指挥；应恢复高级社时的“三包一奖”制度，做到包产到队，包工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等。

“三南”会议召开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写出了第一稿。全文算上序言，分8个部分，67条，共1.4万字。毛泽东对于这个稿子不太满意，认为内容太繁杂，篇幅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口气读下去，要求压缩到8000字左右。

在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的过程中，与会者认为，搞这样一个条例非常必要。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说，从山东的情况看，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一个公社的示范章程性质的条例，并提议再搞一个党内文件，着重解决党内在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领导方法上几个未解决好的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认为，为了把三年来人民公社的丰富经验加以比较系统的总结，搞两个文件比较好，一个是条例或示范章程，一个是党内指示。条例或章程除了肯定人民公社已有的正确经验，防止和克服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做法外，还可以参考高级社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制度和办法，使之条例化。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会议的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小组于1961年3月15日写出了第二稿，送给了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等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并决定将之印发到当天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以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因为意见分歧较大，会议没有做出结论。

在1961年3月15日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他还说：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在人民公社运动化之初，刘少奇也曾是供给制的热心倡导者，但在1961年开始的经济调整中，他是主张坚决退赔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1961年3月19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二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每一大区吸收一至三人参加条例的修改。21日，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一草案共十章六十条，所以又叫“六十条”或“农业六十条”。这十章的标题分别是：第一章，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第二章，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第三章，公社管理委员会；第四章，生产

大队管理委员会；第五章，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第六章，社员家庭副业；第七章，社员；第八章，干部；第九章，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第十章，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其中，最有突破性的是第一章和第六章。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一章，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第一章规定：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一般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实行生产大队所有制，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的生产和生活单位。

对于公社的规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利子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利于团结，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差距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地应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也不要强求一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不同的规模，由社员根据具体情况，民主决定。"

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定。自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起，"大"曾被认为是人民公社的特点和优点。认为公社人多地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便于加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所以北戴河会议后办起的人民公社规模都很大。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共有23384个公社，平均每社4797户，有相当多的社在1万户以上，还有些地方是一县一社的县联社。以湖南为例，公社化前，全省共有3186个乡（镇），平均每乡2607户，每社155户。公社化后，全省共建成1164个公社，平均每社6960户，相当于原来的3个大乡；全省共有16533个生产大队，平均每个489户，相当于原来的3—4个高级社。1959年上半年在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社队的数量有所增加，规模有所缩小。但随着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的开展，尤其是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8年内完成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后，人民公社的规模再度扩张。

到1960年底，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共有人民公社25204个，平均户数大体相当于1958年底的水平。社队规模大，大队与大队间、小队与小队间的情况各异，不但不利于因地制宜安排生产，也容易导致干部在生产工作中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并造成队与队间的平均主义。加之大队的规模大，又以之为基本核算单位，虽说人民公社也曾规定实行评工记分制度，但根本无法做到，因为一个大队成百上千个社员走到一起都不容易，更不要说进行劳动情况的评议了，评工记分只能是流于形式，有的地方甚至连这个形式都没有。至于集体的生产、分配等各种大事，社员更不可能心中有数，因而对生产队的生产经营发展也不关心，没有主人翁之感。

"十二条"发布后，不少地方意识到必须解决社队规模过大的问题，认为在目前农业生产仍处在分散、交通不便、基本还是手工操作和使用畜力的情况下，社队规模过大，是不利于生产的。"三南"会议前，中共湖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说："对于这个问题（按：指社队规模过大），群众早有意见，说社队规模大了，'看不到，摸不着'，'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是共同富裕，是共同遭殃'，'田种

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按：湖南方言，无所谓之意）'。因此，普遍存在着'混道场'、'坐大船'的思想，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此次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农业六十条"草案中关于社、队规模的规定，与会者都普遍能接受，并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

公社化之初，由于公社的规模过大，加之没有一个统一的条例或章程，公社以下各级组织的名称十分混乱，有的地方设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作业组，有的地方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有的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一个高级社，有的生产大队则由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所以常常是生产队与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难以区分。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是公社，有的地方是管理区，也有的地方则是生产队（相当于后来的大队）。在"农业六十条"草案中，将人民公社的组织明确规定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减少了公社的管理层次，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性质、任务明确具体。

"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另一突破，是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规定。在人民公社成立时，社员的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全部转为公社所有，个人只能保留少量的家禽家畜。由于"共产风"的影响，使社员在公社化之初即将自养的家禽家畜宰杀，大吃几顿后再加入公共食堂。这样，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基本上不存在了。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对此曾有所纠正，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规定："社员可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1959年5月和6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规定属于自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有；属于公有私养的，给予社员合理的报酬。

但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后，这些政策出现了反复，有些地方将社员的家庭副业作为"逆流"、"资本主义尾巴"对待。随后刮第二次"共产风"，社员的自留地被收走，自养的猪、羊、鸡、鸭被刮进了所谓的"万猪场"、"万鸡场"，使社员从事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受到重大打击。河北省吴桥县桑园大队大观李生产队7户社员，1959年在自留地里种谷子，共收了719斤，个人吃了100多斤。到了这年冬天，生产队因为口粮紧张，向社员开展所谓的"挖潜运动"，队干部硬说这7户社员的谷子是偷的，谁不交出就"熬鹰"（即不让睡觉）、"辩论"，翻箱倒柜，结果这几户社员挨了四五个晚上的冻，只得把粮食全交了出来。提起这件事，社员们都说："谁种自留地谁倒霉，今年给也不种了。"

虽然"十二条"中也曾有专门一条提出"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但社员对公社化以来的两次"共产风"心有余悸，以至出现了自留地不要、家庭副业不搞的情况。"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专门列了一章讲家庭副业问题，并且强调："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并规定，自留地长期归社

员家庭使用，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这样，以条例的形式将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肯定下来，经过宣传和动员，终于消除了社员的顾虑，调动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对开展生产自救、救荒渡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农业六十条”草案还规定，公社占用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得超过生产大队劳动力总数的2%；生产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3%。为了巩固大队所有制和发展大队经济，在今后几年内，公社一般应少提或不提生产大队的公积金；如果要提，提取的比例要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超产指标要留有余地，超产的大部或全部应奖给生产队。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人民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既要加强对公社各级和各部门的领导，又不应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日常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这些规定，在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农业六十条”草案也有其不足，如仍然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仅是生产的组织单位，还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小队与小队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虽然提出在分配中，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但对供给制这种社员间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没有加以否定；虽然也提出公共食堂必须坚持真正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同时又强调“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而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恰恰是广大社员最有意见的。当然，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对于人民公社化以来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要想一下子全都得到解决，也是不现实的。“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具体规定，可以说是达到了当时对人民公社认识的最高水平。它与北戴河会议以来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规定相比，表面上是一种退步，但实际上是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体现了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尽管它仍有不足，但这些不足只能是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

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扭转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是下了大力气的。为了使各项政策能真正贯彻落实到群众中去，并在实践加以检验，中共中央决定将条例草案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进行讨论。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目前农村人民公社还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1）在分配上，无论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或者是社员与社员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平均主义现象；（2）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3）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一般管理得太多太死；（4）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5）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上述现象必须及时适当地改变，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这

封信中所讲到的问题中可以看出，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正在恢复。因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直接面向全体党员和公社社员的文件中，如此直截了当地指出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第一次。

在信中，中共中央要求：第一，县级以上各级党委，要详细研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然后领导公社各级党委研究《条例（草案）》，并征求他们对于《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第二，要把《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的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对于同社员关系密切的地方要特别讲得明白，对于他们的疑问要作详细解答，并征求他们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第三，县级以上各级党委要帮助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本地区在试行《条例（草案）》时可能遭到的各种问题，并同群众反复商量，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实施步骤；第四，在讨论和试行《条例（草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妨碍当前的生产；第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根据当地情况和民族特点，拟定自己的补充条例；第六，城市中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和其他单位，也都应当在党员领导干部和适当范围内的群众中讨论《条例（草案）》，以便使他们了解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

为了改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贯彻落实《条例（草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最后一天，结合对《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介绍，再一次讲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同一天，中共中央就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党的高中级干部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并指出，最近几年农业、工业方面的具体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这段时间，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从现在起，县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将调查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订出制度，造成空气。在调查中，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只要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顺利地解决，各方面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1961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 5 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利用会议召开前的这一段时间，就公共食堂、粮食、供给制、山林分级管理等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 10 天至 15 天的苦工夫，切实了解情况，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开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第三节　新的突破

广州会议之后，从党的领袖到省、地、县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农村，宣传“农业六十条”草案，解决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时遇到的问题，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调查中，群众反映最强烈是公共食堂、供给制问题以及山林和房屋问题。

第一，关于公共食堂问题。

广州会议一开完，刘少奇就到了湖南，回到了家乡宁乡进行调查研究。4月初，他在宁乡王家湾住地听取了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央工作组的汇报，并到附近农村同社员作了谈话，了解到了社员对公共食堂、分配、住房、生产等方面的意见，使他对湖南及宁乡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在同中共湖南省委商量后，他来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刘少奇来之前，中共中央曾派一个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调查组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和生活都搞得较好的典型，并把调查情况报送中共中央。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大队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在天华，刘少奇一共住了18天。调查中，刘少奇感到，群众最关心的是公共食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961年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少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说：看来，1958年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是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多数社员不愿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散。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

在天华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去长沙工作了几天。然后，回到了阔别36年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继续对农村情况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刘少奇了解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发现，公共食堂的问题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也坚定了他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心。他在同炭子冲的社员谈话时表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武安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人民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武安，周恩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在社员家里，周恩来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他在这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粮食。”

1961年5月7日，周恩来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记工评分的办法。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极为重视，当即批发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1961年5月11日至13日，周恩来在邯郸市听取中央调查组和河北省委负责人及河北部分地、市、县领导的汇报。就有步骤地解散食堂问题，周恩来要求各级干部做好九项工作：一、房屋问题；二、炉具问题；三、粮食加工问题；四、菜地问题；五、油盐

问题；六、拉煤问题；七、老弱孤寡挑水问题；八、农村工作人员吃饭问题；九、算账问题。在汇报会期间，周恩来还专程派人去武安了解解散公共食堂的情况，并在会上作了通报，还对解散公共食堂后社员节约用粮、生产积极性的调动等一一举例说明，以证明解散公共食堂是符合现实和群众愿望的。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他领导人对公共食堂的问题也很关注。广州会议后，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于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四川的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做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了40%—50%。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了福建的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61年5月13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公共食堂"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群众认为办食堂利少害多，甚至是有害无利"。

中共中央派往各地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组，也有许多的报告历数了公共食堂的缺点和弊端。驻河北邯郸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在报告中说，调查组一进村，群众就问："食堂要不要下放到户？"又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初步调查，80%的社员赞成回家做饭。调查组在五个生产队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公决。投票的结果是90%的社员赞成停办公共食堂，愿留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社员只有10%。中央辽宁海城调查组负责人胡耀邦在报告中说：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干部们说：自从办起食堂，通常有一个干部顶着，不是丢就是坏，不是修就是补，不是吵就是闹，这个说"饼子有大有小"，那个说"勺子长眼睛啦"。伤透了脑筋。中央驻河北安国、徐水调查组的杨尚昆在报告中认为：两个县的食堂情况大体上同其他地区相同，也就是不能不散。

第二，关于供给制问题。

对于与公共食堂紧密相关的供给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仍坚持供给制和工资制三七开。各地在调查中却反映出不少问题，广大群众也纷纷要求取消。广西邕宁县五塘公社永华大队的社员说："按劳分配懒人变勤人，勤人更勤，供给制多了勤人变懒人，懒人更懒。""供给制壮年变老年，按劳分配老人变年轻。"河北省丰润县小集公社宋家营大队的社员说："这样下去，人们生产情绪低落，粮食减产，体质减弱，猪只减少，肥料不足，再过五年，不用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自己就得灭亡。"这些话，充分反映了广大社员对供给制的不满。

邓子恢在龙岩调查时了解到，群众普遍反映供给制有害无利。主要表现在：其一，把工分值降低了。一般比1957年降低了50%—60%，甚至更多，大大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二，一般地区供给比例在30%以内，比高级社时的公益金要高得多。由于供给面广了，供给量并不多，实际上"五保户"、困难户依然困难，超支户还是超支。其三，出了一批懒汉。其中有些人是偷懒不劳动，有些人则是不满供给制而不出工。

杨尚昆在关于河北安国、徐水两县的调查报告中说，许多生产队供给同工资的比例，不是三七开，而是四六开甚至更多。由于供给制的比例大，降低了工分分值，不利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有的家庭人口多的社员，因为供给部分的收入较多，尽管有劳力也不积极出工。徐水县南徐城生产大队第五小队有一姓马的社员，全家 11 口人，7 个劳力，全年应出工 1570 个，但只出了 845 个。如果完全按劳分配，这个社员全家的收入就要比现在降低 67.1 元。社员都不主张实行供给制，而是主张包“五保户”，对劳力少人多的困难户，从公益金中加以补助；哪些户该补，补助多少，都应经社员讨论；其余的户，一律实行按劳分配。

当时看好供给制，除了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它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可事与愿违，受到照顾的不是贫下中农，而多是地主、富农等。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

邓子恢在龙岩的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供给制使“地、富、反、坏、二流子得到好处（据我工作组在龙溪地区了解，这些人人口多，劳力少，劳力弱，劳动又不积极，但供给却占到 40%左右），贫雇反而吃亏（特别是雇农，很多人土改后才成家，现在顶多三四口人，劳力强，他们所得供给只占 25%左右）。由于供给制对地富反坏一视同仁，他们占了便宜，基本群众不满意。他们说：‘二九年分地主（按：龙岩是革命老区，1929 年闽西暴动后即进行了土地革命），五八年养地主”’。

此外，还有山林问题、房屋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

“大跃进”运动以来，山林破坏十分严重。一是 1958 年下半年全民大炼钢铁时，大搞“小、土、群”，土法上马。炼钢铁需要煤，而全国多数地区尤其是南方地方缺煤。于是不少地方从山上砍树烧木炭用于炼钢铁。二是公共食堂建立后需要大量的烧柴，在非产煤区，许多食堂图省事，直接砍伐树木作烧柴。三是山林的所有权名义上是归大队所有，但公社要“平调”不敢管，食堂要砍伐管不住，公社化前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又废除了，山林实际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样一来，使山林遭到严重破坏。据田家英对浙江嵊县长乐公社葛荫大队的调查，这个大队公社化以来，山林遭到了三次大的破坏，第一次是 1958 年大炼钢铁，砍伐林木 1500 立方米；第二次是 1960 年上半年，公社和大队共办了 8 个木炭窑，烧出 30 万斤木炭，用去木材 900 立方米；第三次是 1961 年春烧山开荒种粮，毁林 100 余亩。社员形容这几年山林破坏情况是砍光、烧光、偷光、开（荒）光。

中央驻湖南调查组发现，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原有 55 亩大树林，到公社化后，砍掉 31 亩，剩下的 24 亩、也被陆续砍光；原有 70 亩竹林，到 1961 年上半年也已一根

不剩。湖南省茶陵县有家铁厂用木炭炼钢，仅两年时间，就把周围30里的山林砍光。邓子恢在调查中也发现，沿途山林都被砍光，原因是林权不固定，山林无人管理，公社搞林木大“平调”，国家和公社乱砍滥伐，社员也跟着各自下手。由于山林砍光，社员副业门路断绝，给生产、生活带来困难。为此，他建议原属高级社的山林，应立即归还大队所有，国有山林和公社山林大部分应划给小队经营，没有林木的荒地和被砍光了的山头，分给小队植树造林，山林收益全归小队所有。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也发现山林破坏严重，并指示调查组写出了《关于天华大队山林问题调查报告》。在炭子冲同社员座谈时，刘少奇强调：“要保护山林，要拟几条办法。像现在这样砍下去不得了。山林所有权归大队，包给小队，划出自留山。以后不准生产队、社员随便砍树，要砍得经过大队统一规划，公社批准。”

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大搞生活集体化，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占用了社员的房屋。人民公社在办商业、工业、学校、信用部等机构时，也占去了不少社员的住房。还有些地方在积肥时，又拆掉了一些房屋。结果，不少社员失去自己的房屋，挤住在集体统一安排的房子里。

据中央调查组对湖南省长沙县黄花公社新湘大队廖家冲小队的调查，这个小队原有房屋119间，人均1.05间。公社化以来，因积肥等原因拆掉了37间，大队敬老院和幼儿园占用了7间，食堂占用了7间，空了5间。这样一来，社员住的只有63间，每人平均0.56间。全大队24户中，住自己房屋的15户；自己房屋拆了，住别人房屋的6户；自己房屋被大队占用，住别人房屋的2户；还有一户是自己房屋被别人占了，自己又住别人房屋的。每拆一次房，社员就搬一次家。公社化以来，这个小队有14户搬过家，搬得最多的一户不到3年时间搬了5次。“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以来，湖南省全省共拆毁、占用农民住房3293690间，平均每户0.4间。益阳县的共同、新田两个大队，原有房屋934间，被拆、占513间，平均每户1.6间，占原有房屋总数的54.4%。不少地方出现了“三代同堂”，“两姓一室”，在一间小屋里摆着床铺、锅灶、鸡笼、便桶的现象更是常事。

随着公共食堂的解散，社员必须有自己做饭、饲养家禽家畜的地方，房子问题就突现出来。刘少奇5月11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拆伙后，群众立即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社员住房问题；因为现在社员住得太挤，无法养猪、养鸡、积肥，甚至难得做饭。”湖南省长沙县广福公社工作队在一份报告中说，农村公共食堂分散后，在处理若干具体问题中，社员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是房屋问题。房屋定不下来，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房前屋后的竹木等也都定不下来，社员们说：“房子不解决，‘六十条’讲要发展家庭副业是说空话。”而且房屋定不下来，现在住的只管住不管修，空着的房子无人管，许多房屋的破坏和损坏将更严重。对于房屋问题，“农业六十条”草案中只是笼统地说包括房屋在内的生活资料归社员所有，没有对“平调”的社员房屋如何处理做出决定，成为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过程中群众反映强烈的又一个问题。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客观上造成了少数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也便于其搞生活特殊化。1960年下半年，各地开始了以纠正以“共产风”

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对改进干部作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个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据习仲勋对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的调查，1960 年 11 月"十二条"下发后，"五风"虽然刹了车，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还没有彻底改变。主要表现是：不做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多，自下而上反映群众要求少，文件多，会议多，报表多；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差，事情很少同群众商量，光要群众听干部的话，干部很少听群众的话；党委包办行政事务，书记事情很多，什么事情书记都要管。

干部作风曾较早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 年 12 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要胡乔木借鉴红军的经验，搞一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稿子。胡乔木很快就写出了初稿，毛泽东看后觉得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作了两次修改后，1961 年 1 月底发给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讨论修改，并要求于 1961 年 3 月底将修改意见报送中共中央。由于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时，一些地方没有报来修改意见，加之党内也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广州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没有写上有关"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通过调查了解，中共中央感到，有这样一个纪律约束，对端正干部作风是十分必要的。

各级党组织在边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边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结合了解到的情况，对"农业六十条"草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例如，"农业六十条"草案第三十三条第二段中说："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将这条改为："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中，可以只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给予补助，对其余的社员都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补助的部分一般可占生产大队分配给社员的总额的 5%左右。"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供给制。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中央湖南调查组建议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办什么形式的食堂，应当完全按照社员的意见办事"，同时增加"对待参加或者不参加食堂的人，应当一视同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和歧视"。这些意见，后来都吸收到了"农业六十条"的修正草案中。

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也更加迫切，他对这次各级干部开展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61 年 5 月 6 日，他致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四川简阳作调查研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说：

陈正人同志 5 月 1 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 4 月 25 日通知你们的。5 月 4 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按：指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推迟到 5 月 20 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得深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这里还

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作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内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这次调查研究，在共和国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都深入农村调查，从中央到县级以上各级党委都组织调查组，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了解到了许多曾经不知情的真实情况，发现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并在调查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通过近两个月的调查，许多事关人民公社的政策问题基本明朗，对"农业六十条"草案需要修改、补充和明确的地方也大体有数。

在此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和修改广州会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草案，同时制定精简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的办法，并对这几年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会上，党的领导人对几年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做了认真分析。毛泽东在会上认为，庐山会议的决议不应该传达到县以下，当时，县以下应当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造成了生产大发展的假象，其实不是那样。他再次强调，一定要搞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刘少奇更是明确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他还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对生产大队的山林、社员的房屋和干部纪律做出了明确规定，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与广州会议形成的草案相比，这个修正草案在如下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对于公共食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

"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

"生产队对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但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对于供给制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社员

分配中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的规定，改为社员一切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对于山林问题，修正草案增写了一条即第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原来高级社所有的山林和大队新植的林木，一般都归生产大队所有，固定包给生产队经营；少数不便于生产队经营的，由大队组织专业队负责经营；对于不在计划之内和不合规格的采伐，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都有权制止。

对于社员的房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四十三条规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迫社员搬家。任何机关、组织、团体和单位，都不得占用社员的房屋；如因建设需要必须征用的，应该严格按国务院有关征用民房的规定，给予补偿，并且对移民户作妥善安置。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增设了"公社各级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条。"三大纪律"是：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参加劳动；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办事公道；不特殊化；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治水平。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并且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详细研究这个修正草案，抓紧利用农闲时间，把修正草案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社员听，深入地展开讨论，并且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要将修正草案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一部分干部把那些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指示》还明确宣布，中共中央以前的规定，"例如供给制问题和食堂问题等，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的规定为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原草案的上述重要修改，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表明中共中央在农村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它对于扭转农村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彻底肃清"共产风"，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自人民公社化以来，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凡是违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抽调或者占用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其他财物的，都必须彻底地清算和退赔，并且向群众作检讨。《规定》强调要通过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要使我们的干部懂得，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才能使农民心情舒畅"。"要使干部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对于社员的个人所有制，都不容许有任何侵犯。要通过这一次彻底退赔，来教会干部懂得等价交换和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使他们真正学到，好像上了一次学校"。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各地对"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作了广泛的宣传贯

彻。这是一个顺民心、得民意的文件，自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尤其是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自愿这一条，最受农民欢迎。“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公布之后，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调查组对石龙县的三里、象州、寺村、罗秀等公社，就群众的反映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组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中说：

食堂确实是一个大盖子，只要一揭，如沸汤漫溢，不可遏止。对干部来说，又确实是一个大框框，有许多迷信，破除不了，但只要交给社员讨论，又如疾风卷浮云，很快会吹得天朗气清。盖子是我们上边盖的，框子是我们上边做的。有了盖子和大框框，基层干部才又套上许多小框框。大框是社会主义阵地，小框框是一些清规戒律。大框框一拆除，小框框也随之开放。当把“六十条”和“十七条”（指广西关于“农业六十条”的十七条补充）向社员做了宣传，并且由领导上明确表明态度之后，社员立即沸腾起来，成为一时舆论的中心。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取消供给制也深为社员所拥护。宣布取消供给制后，广西石龙县的社员说：“说一百次，也教育不了懒人，这一下，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了。”河北唐山在贯彻“农业六十条”后，生产队之间的竞赛运动普遍展开，社员的出勤率普遍提高。唐山的社员说：“今年啥都遂心了，啥都由我们做主，多收少收就看我们的了。”“秋后见吧！一定对得起‘十二条’和‘六十条’，对得起毛主席。”湖北省许多群众说：“毛主席的政策又到我们心头了！”“要是这样办，我们保证进一步把生产搞好。”

第四节　下放基本核算单位

“农业六十条”草案和修正草案，是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公布后，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各级党组织还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了解存在的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宣传“农业六十条”，并结合各地的实际制定一些补充规定。在此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农村的“五风”基本上得到制止，党同农民的关系有了改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各地的生产普遍有了起色。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1）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到1961年8月下旬，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公社的总数增加到55682个，比调整前增加了30478个；生产大队为708912个，增加了225098个；生产小队为4549474个，增加了1561306个；（2）退赔已经部分兑现，公社化以来全国“平调”总数大约为250亿元，已退赔20%—30%；（3）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基本上制止了“瞎指挥风”；（4）

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5）普遍地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6）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散了，剩下20%左右是群众自由结合的合伙食堂和农忙食堂；（7）普遍地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8）多数地方对今年夏收比较重视，“三包一奖”、按劳分配等比去年执行得好；（9）各地普遍地重视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10）在中央的正确政策领导下，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

但是，“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在各地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退赔很不彻底，其中退赔到社员手中的，仅占“平调”数字的20%—30%；有的地方没有按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也有的地方没收社员自留地的粮食顶上交任务或顶分配口粮。广大群众对“农业六十条”既热烈拥护，但又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尤其重要的是，“农业六十条”草案和修正草案贯彻落实后，虽然社、队规模有了缩小，但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没有改变，大队仍然承担着“统一管理各生产队的生产事业”，“在全大队范围内统一分配归大队所有的产品和收入”的职能，这就使得生产队与生产队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平均每个大队约有6—7个生产队，各队的自然条件、原有基础、劳动力强弱、队干部能力大小各不相同，而产品和收入在全大队范围内统一分配，实际上还是穷的生产队“共”富的生产队的“产”。山东省历城县仲公公社大涧沟东大队有500多户，有的生产队果树很多，有的则很少，果树多的队原来一年能收入1万多元，现在只能收入700—800元；该县南郊公社东八里洼大队有5个生产队，各队的生产条件基本相同，第一生产队生产好、增产多，超产粮食18000斤，第二生产队只超产4000斤，结果大队从第一生产队提走超产粮食9000斤，从第二生产队只提走了2000斤。第一生产队感到吃亏很大，又听说第二生产队搞了瞒产私分，实际超产粮不止那么多，更感到吃亏，该队队长干脆躺倒不干了。

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办法，没有真正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湖北省武昌县锦绣生产大队的社员说：“养儿当兵，种田纳粮，我们没有意见，就是对明明看到我们队生产的粮食，调给别的生产队吃，思想不通。”这个大队的群众还说，自从办起高级社以来，年年制定“三包”，调整“三包”，处理“三包”，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至少有五次吵“三包”的高潮，每次总吵个半个月二十天，干部会不行，代表会，代表会不行，群众会。开会把人熬到眼泡肿，还是搞不合理，只好说：“算了，算了，今年不说了，明年再来。”

另据河北省委工作组在保定地区的调查，满城县城内生产大队为了搞“三包一奖”和夏秋分配，大队和生产队两级，春、夏、秋三季要搞5次10套方案，要算49个百分比，1191笔账。群众说：“年年搞三包一奖，年年稀里糊涂，吃亏沾光心里不清楚。”干部和会计人员反映，搞“三包一奖”一年有“三愁”：“算账、吵嘴、熬油灯”。实行“三包一奖”，对社员应分部分的分配方法是：把包产以内的总收入刨除扣留部分后，全大队按照一个平均工值进行分配。这样，使收入多的队不能多分，收入少的队也不少分。虽说有超产奖励，但奖励的产量往往只占超产量的很小一部分，超产的大部分交给

了大队。对此，群众不满意地说："这好比新出嫁的姑娘住娘家，带回去的东西少，拿走的东西多。"在"三包一奖"中，因为分配是按一个平均包工值确定的，包工多包产低的队就会多分，包工少包产高的队就会少分。河北涿县西皋庄大队，1960年包产时第二生产队有10亩低洼地，每亩只包产28斤豆子，每亩包工9个。这个队算了一笔账，就按这10亩豆子颗粒不收，按亏产罚30%计算，共要罚款8.4元；每亩包工9个，按每个工决算时分值0.35元计算，能分款31.5元，除去赔款还净得23.1元。如果把这些工用去搞副业，还可得100多元。其他队的社员说："三包一奖好是好，就是投机取巧管不了。"

毛泽东一直把"农业六十条"当作他的心爱之作。生产队之间存在的平均主义，也是他在"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通过后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但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仍主要在农业方面，关注"农业六十条"的执行情况。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说：

> 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的那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现在搞了"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

毛泽东的这段话，大致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对于"农业六十条"，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希望有了这个东西，农村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就有了规矩，就不致出大的乱子。但是，是否有了"农业六十条"，农村和人民公社就不会再出问题，农民的积极性就能提高，农村的形势就能根本好转，毛泽东心中也是没有底的。对于社会主义"不甚了了"，的确是他的肺腑之言。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陶铸、王任重向毛泽东反映，"农业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牲畜、劳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有矛盾。1961年1月，毛泽东在同江西省委、湖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曾几次讲到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是直接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那几位负责人的反应。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就曾批给与会者阅读一份解决这个矛盾的材料，想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

这份材料是陶铸于1961年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调查报告说，这个大队经过整风整社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大队、生产队的经营积极性大大提高，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仍有意见。生产好的队认为增产不能多吃，减产队也和自己一样按标准吃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沥西大队在试行"三包"、"四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实行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定死各生

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为生产队自行处理。试行这个办法后，各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整个大队的生产面貌完全改观。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批写道："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但是，毛泽东的建议并未为广州会议所采纳，在"农业六十条"草案和修正草案中，都没有定死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的内容，而是强调要"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并且重申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实际上，"三包一奖"不是新东西，合作社时就已有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曾在人民公社普遍推行。因此，"农业六十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突破。

为克服"三包一奖"的弊端，前面说及的湖北省武昌县锦绣大队，针对"三包"搞了好几年，各种办法都想到了，变来变去总是搞不合理的情况。这个大队的干部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只有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分配核算，才能解决队与队之间的矛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以外，其余的都归生产队自己分配，社员对生产、收入、分配都有了底，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才能实现，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最后，经过充分讨论，报经地委批准，这个大队决定试行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核算。

针对"三包一奖"的不足，河北保定地区的农民创造了"分配大包干"（群众叫做"老包干"、"砸估堆"）的办法。"分配大包干"的特点是：按照"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的比例，大队从各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提取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生活费、管理费之后，剩下的都归生产队；生产队除按照有关规定提留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外，都按本队社员实出工数进行分配。这样经营好的队可多分而不多摊，经营差的队只能少分而不少摊，从根本上防止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将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群众认为，实行"分配大包干"后，"丝罗子事少了"，"生产队有了底码了"，"大伙的家大伙当"'"生产比着干劲干"。中共保定地委调查后也认为，"分配大包干确是一种正确处理生产大队内部关系的好办法。它是符合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它的实质问题是：更明确划分了大队与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范围，适当地扩大了生产队的经济实权，更彻底地贯彻了'承认差别，多劳多得'的原则，避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回北京的途中，于 1961 年 9 月 27 日在河北邯郸邀集河北、山东两省委和邯郸、邢台、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等五地委的负责人谈话。座谈中反映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用"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办法处理生产大队与生产队的经济关系，既繁琐，又没有真正解决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得知，河北保定地区有些生产大队针对"三包一奖"的弊端，创造了"大包干"的分配办法。凡是实行这种办法的大队，队内部的"五风"问题不大，外部的"五风"到队内也被化小了。因此，这些队的生产有了稳步提高，群众生活也较好。

“分配大包干”的做法，与毛泽东一直萦绕于心的解决队与队平均主义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当即表示：“三包一奖”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成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他还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

1961年9月29日，毛泽东将自己亲笔作的《邯郸谈话会记录》，批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讨论、研究。同一天，他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说：

我们对于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胡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受毛泽东的委托，1961年10月3日，邓子恢主持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10月6日，邓子恢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座谈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问题的情况报告》。《报告》不但完全同意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而且还总结出了这样做的几个好处：(1) 可以彻底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大大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2) 把生产权与分配权统一起来，解决了自高级社以来大队与小队之间长期存在的责权不明的矛盾，从而取消了“三包一奖”这个糊涂制度，结束了大小队干部一年吵几次的情况，减少了许多工作麻烦，使大家能更好地分工合作，搞好农业生产；(3) 便于干部遇事与群众商量，社员也才好充分发表意见，真正建立起生产上的民主管理制度；(4) 分配权下放，大队成为各生产队在经济上的联合组织，大队的支配权只限于各队上交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大队直属企业有限，这也缩小了大队干部贪污、多占，也不致影响社员的生活，有利于防止官僚主义与“五风”为害；(5) 分配权下放可以减少大队干部，节约开支，大队干部也可更好地集中精力把直属企业办好，把党与政治工作做好。

10月4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来北京，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两天后，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并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共识。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连同《邯郸谈话会记录》，河北省关于“分配大包干”

的五个材料，湖北省委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给中南局并报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座谈意见》和山东省委关于"三包一奖"问题的情况报告，广东省委调查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报告，一同下发到各地。中共中央的指示肯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认为"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派得力的调查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各县还可选择一两个生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

1961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北邢台地委《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的通报》。《通报》介绍了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的具体做法，并认为实行"大包干"、实物按劳分配加照顾，是进一步克服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平均主义的重要政策。中共中央认为南宫的经验很好，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参照办理。

1961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邓子恢率工作组回到家乡福建龙岩，就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问题进行调查，并于 11 月 23 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着重谈到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要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邓子恢认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生产队的规模应以 30 户左右为宜，最少不得少于 20 户，各小队划分应经公社批准。土地的调整应采取人口搭配同劳动力搭配相结合的办法，按照初级社时各队所有土地归还原建制，队与队之间的插花地则根据自愿互利对等交换原则加以调整。《调查报告》认为，体制下放后大队的职权，主要是承担政权方面工作、党与政治工作、联村社工作、办好大队企业等四个方面。至于口粮，则采取基本口粮与劳动口粮相结合的办法比较好。中共中央认为，邓子恢的《调查报告》很好，批转了《调查报告》，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采用邓子恢的办法，带工作组下乡，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下放基本核算单位，毕竟是涉及人民公社体制变革的大问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吸取了人民公社化时一哄而上的教训，相继进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还不是那么高涨，集体生产部分的增产也还不那么显著"，还有相当数量的社员，愿意多搞自留地和开荒，不愿多出集体工，表示出集体工所得的工分，只要能拿回口粮就算了。也有一些生产队不愿多要土地，甚至把一部分土地丢下不种，让社员去"开荒"，他们的想法是，反正大队要统一分配，生产少一点也可以得到统一调节。贯彻"农业六十条"后，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都种得很好，集体生产则起色不大。许多社员甚至一部分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由于平均主义得不到纠正，集体生产搞不好，感到没有办法，因而主张恢复单干或互助组。但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上级肯定不同意，因而特别苦恼。试行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后，对当前的生产，"立竿见影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武鸣县腾翔公社伏梁大队第七生产队，44 个劳动力，过去经常只有一半左

右的人出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全都出工了。过去装一窑石灰，8个劳动力要干3天，现在1天就做完了。社员们说："实行队收队分，今后吃粥吃饭全靠自己了。"广西区委给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的报告中说："试点的绝大多数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在确定了生产队核算后，立即动手扩大冬种，增加积肥，增置农具，积极进行备耕工作，社员出工也比过去整齐得多。"广西区委经过研究后认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看来是非搞不可"。

中共青海省委经过试点后总结说："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对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集体生产积极性成效显著，出现新的气象。……争工分抢活干的人多了，撂荒几年的耕地现在都抢着种。许多生产队购置、修补农具，不少社员把这几年乱拉私藏的农具拿出来。……社员们说，这种闹生产的劲头与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十二条'下放了生产权，现在又下放了核算权，保证明年生产能加一番。"

中共山东省委经过试点后认为，凡是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气象焕然一新，广大农民群众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开始出现了新的生产高潮。事实表明，普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对此，必须肯定，不要再犹豫不决"。

对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毛泽东十分关心，也抓得很紧。1961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两省委和南京军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指出：农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贯彻要快一点。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薄变厚，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三天后，在济南听取山东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时，毛泽东又说厂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饿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主动承认了错误。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刘少奇总结了几年来工作中的四个方面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其中第二点就是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他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他强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完成，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如果混淆了这两种所有制的界线，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违反了客观可能的条件和农民的自愿，要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

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要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有准备地、有步骤的、有秩序的、有区别的、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并且不断地总结经验。这样，就会比较好些。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教训，也就在这里。”这是对人民公社化以来党在农村工作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刘少奇还不可能对人民公社本身进行否定，而是将之作为1958年以来的十二大成京之之一。

“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为了让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决策变为全党全国实行的政策，认为有必须起草一个文件，把这个问题交到全党面前进行研究，以取得共识。毛泽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在对山西长治农村进行调查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七千人大会”对《指示》草案进行了讨论，讨论中一个重要意见是许多人提出要规定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四十年不变”。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提议将“四十年”改为“至少二十年内”，并要毛泽东斟酌。毛泽东亲笔将其改为“至少三十年内”。他就此批示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们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经过“七千人大会”的讨论，又经过在此前后的试点，在此基础上，1962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总结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四点好处：一是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三是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四是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指示》强调：

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间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之后，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

《指示》还规定，生产队的规模，大体上以二三十户为宜；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补贴工分的总数，一般不要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左右，最多不能超过2.5%；土地、牲畜、农具等，只要是基本合理的，一般不再变动，群众要求变动的要充分协商，适当调整。此外，《指示》还对大队企业、林木、水利、债务等问题的处理作了具体规定。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后，就将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做完，至于少数生产大队，如果还要看一看、等一等，也应当容许，等秋后再由他们考虑基本核算单位是否改变。

由于基本核算单位的变化，“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许多内容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为此，1962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对“农业六十条”再一次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新的修正草案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

新的修正草案大幅度删改了原“农业六十条”中关于生产大队的条文，只保留了2条，而关于生产队的条文，则由原来的10条增加到22条，也就相应地增加了生产队的责、权、利的相关内容，明确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劳动力，都由生产队支配；生产队集体所有的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有自主权。

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对“农业六十条”的一个重要突破。同时，针对有些地方仍然愿意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党内有少数人不赞成甚至反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情况，新的修正草案对此作了灵活处理，并提出：“有些生产大队，现在仍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只要群众同意，就应该积极办好。这些生产大队，应该参照第四章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处理各项工作。”

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至此，历时一年多的“农业六十条”正式定型，成为农村人民公社的“宪法”。由于毛泽东强调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一制度历经“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直坚持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这对于稳定农村的局势、保证农业生产的平衡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农业六十条”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也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制度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到此时，农村的经济活动虽然还在人民公社这个外壳下进行，但它的实质内容已基本上退到了原来初级社的水平。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各地对社、队规模再次作了调整。据1962年10月的统计，全国共有农村人民公社71551个，比核算单位下放前增加了15534个，增加27.72%；生产大队713385个，增加了5087个，增加0.71%；生产队5468244个，增加了895502个，增加19.58%。平均每个公社有9.6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有7.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23.6户。全国共有基本核算单位5219516个，其中，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5161617个，占基本核算单位总数的98.89%；生产大队41678个，占总数的0.8%；公社77个，占0.001%。此外，还有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结合核算的16144个，占基本核算单位的0.3%。

当然，新的修正草案也有其明显的不足。薄一波将其缺陷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仍然保留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这个重要的僵化的观点；二是堵住了通向包产到户的可能性，使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就戛然止步了；三是八届十中全会修改后的“农业六十条”，贴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记。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概括，准确地抓住了人民公社的症结所在。

就是人民公社这个外壳，因为它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既是政权单位，又是经济单位，而且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也意味着公社、大队、生产队是逐级隶属的三级经济组织，生产队虽然是基本核算单位，但公社、大队是它的上级经济单位。这就使得公社、大队仍可使用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来“平调”生产队的财物，而且也使得公社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经济。这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干部的“瞎指挥风”和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都难以根除。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人民公社这一制度本身的评价问题，要解决它，只能是连人民公社这个外壳也加以抛弃。然而，这

个问题并不是人民公社内部体制和相关政策的调整可以解决的，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做到的。

自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来，庐山会议后出台的一系列“左”的政策得到了纠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较好地调动，受“大跃进”和“五风”严重摧残的中国农村开始复苏。1961年，我国虽然仍遭受了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生产已经开始有了转机，比上年度增产了2.8%，扭转了连续两年大减产的局面。到1962年，农村形势进一步好转，全年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增长了125亿斤，其他经济作物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全国已有1/4的县农业总产量恢复和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1960年，全国农民人均消费68元，相当于1957年的77.1%；1961年上升到82元，1962年又上升到88元，分别为1957年的78.5%和84.4%。到这时，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都走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这一切表明，正确的农村和农业政策，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多么重要。

第六章　“单干风”

第一节　安徽“责任田”

“农业六十条”自起草到修改的全过程中，都是着力调整生产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解决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问题，但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仍然没有克服。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虽然规定了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制度，指出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厂对于某些无法制定定额的工作，采用评工记分的方法。以宁夏永宁县王太大队为例，这个大队根据社员技术的高低、劳动的辛苦程度和生产中的重要性，将农活分为五个等级。其中一级活的标准是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又是关键性的活计，如挖大渠、播种、薅水稻、割小麦等 25 种，二级活如挖支渠、薅草、膛水等 26 种，此外还有三级活 25 种，四级活 12 种，五级活 8 种。这个大队以三级活为基本级，每天报酬为 7 个工分，二级和一级活则上推为 8 分、9 分，四级和五级活则下推为 6 分、5 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评工记分。这种做法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农活复杂多样，轻重不一，制订定额是一件相当麻烦的工作。实际上，相当多的农活是无法制定定额的，而且即使是同样的定额等级，劳动的质量和效果也会因人而异。

人民公社在废除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后，普遍推行了评工记分的方法，按工分的多少与生产队的收益确定分值，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这种方法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评工工作既繁琐费时，又很难处理好社员间的关系，常常是早早收工开始评工记分—评到半夜也评不清楚，社员之间为工分争论不休成为常事。所以，不少生产队都嫌评工记分麻烦，在评工记分时常常确定男女劳动力的基本工分，除了农忙时季，每个人都按照基本工分记分。比如，一个青壮年男劳动力一天 10 个工分，这样，一旦基本工分确定下来后，不管劳动能力的强弱、劳动态度的好坏、技术水平的高低，只要是同一年龄段的劳动力每天的工分固定不变。社员整天在一个生产队中集体劳动，相互之间又往往沾亲带故，真正评起工来谁也抹不开脸面，也不可能天天评工。于是，评工流于形式，记分是平均主义，成了“大概工”。虽然“农业六十条”中也强调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政策，避免社员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但首先是作为分

配基础的工分上的平均，再加上生产队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在粮食分配中人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由原来分配上的“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原来劳动中的“大呼隆”变成了“二呼隆”，社员间的平均主义仍然存在，并影响社员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

要解决社员与社员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显然是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所无法解决的，而是必须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更大的突破。

对于如何克服社员间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更大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扭转农村的困难局面，许多干部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便是其中之一。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安徽曾是最积极的省份之一，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安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及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困难，是有责任的。但是，曾希圣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积极地探求解决困难的办法。

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后，曾希圣就任第二书记，不久又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人同时兼任两个省的党委第一书记，在当时仅曾希圣一人，也足见中共牛央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1960 年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曾希圣听毛泽东说“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很受启发，认为过去的包工到户，由于责任不明，社员只关心工分，不关心产量，只争工分，不讲质量，只关心自留地，不关心大田生产，而且评工记分手续繁琐，等工、窝工、混工现象很严重，恢复农村经济可以考虑走包产到户的路子。1961 年 2 月，曾希圣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之职，在回安徽途经蚌埠时，安徽省委常委张祚荫向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1960 年，宿县有一位 70 多岁的老农，得到公社允许，带着生病的儿子到山区养病和生产自救。父子俩开了 16 亩荒地，交给公社粮食 1800 斤，自己还有自用口粮、种子和饲料粮 1500 斤，喂鸡养猪得了现金 60 元。这位老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向有关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分，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曾希圣听了这件事后，认为这位老人是一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他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方法，值得推广。

回到合肥后，曾希圣立即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研究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曾希圣提出了“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的新办法。安徽省委书记处研究后同意试行这个办法，但考虑到这个办法虽然没有包产到户之名，却是行包产到户之实，而大家对庐山会议后将包产到户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大加批判记忆犹新，建议先请示一下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看看他的态度。柯庆施对这件事也拿不准，答复说，这个办法不推广，每个县先搞一个典型试验一下。

1961 年 2 月下旬，安徽省委组织工作组来到合肥市郊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结果在这个队的 29 户中，25 户积极拥护，3 户赞成，只有 1 户被撤了职的大队干部不赞成。经过讨论，社员侣认为这个办法既不是单干，也不是土地还原，因为土地和大型农具仍

然公有，包产部分也不是谁种谁收，而仍是统一分配。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先按劳动底分划出田块，再根据田块的好坏逐丘定出产量、用工量，并计算出需要统一用工的大农活、技术活与包到户的用工比例，最后逐块定出产量总数，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酬，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户，按大小农活的比例计算奖赔，简称“责任田”。省委工作组在试点中认为，联产到户具有十大好处：一是人人有责，大家都会动脑筋想办法来增加生产；二是所有能够参加劳动的人都参加劳动；三是人人都要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四是自留地和大田在用肥方面能够统筹兼顾，清除矛盾；五是社员能够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更好地做到劳逸结合；六是大家都会更加爱护耕畜农具；七是能够保证农活质量，不窝工，不出废活；八是能够限制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九是户户都会更好地培养丰产田，并且能够更加做到精打细收，颗粒不丢；十是能够更快发展养猪养家禽，以及其他副业。

在试包的过程中，也有少数干部对责任田提出怀疑，担心这样做是变相单干，会使中农合算，贫农吃亏，使困难户没有办法，会发生瞒产私分，队、组干部只顾种自己的地，放松领导等。针对这种情况，根据曾希圣的意见，安徽省委做出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下发到各地、市、县委。意见对部分干部的上述疑虑一一作了解答，并总结出了推行“责任田”的种种好处。1961 年 3 月中旬，安徽每个县都搞起了一两个“责任田”试验点，一些社队则干脆自发地搞起“责任田”。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了 39.2%。

1961 年 3 月 7 日，曾希圣来到广州参加“三南”会议，并将安徽“责任田”的一份材料让田家英转送毛泽东。田家英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母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困难，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给毛泽东致信说：“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 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鼻酸。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下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田家英在信中还说，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对于搞包产到户，毛泽东也是不赞成的。田家英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他立即将这份材料和田家英的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的书记看。当时，有人赞成田家英的意见，但陈云却对此不以为然，并且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该允许人家试验嘛！”

1961 年 3 月 15 日、16 日，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情况。此时，毛泽东正在全力探索如何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所以对曾希圣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立即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过了几天，毛泽东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可以在小范围试验。这期间，安徽省委向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发出了一封信，认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恢

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很大意义。同时附去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这个文件认为："只要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十二条政策，任何有利于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利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办法都可以采用。"

这时，安徽的"责任田"已经不是小范围而是大范围了。为使"责任田"不至于夭折，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于1961年3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进行辩解。

信中说："群众所提的逐丘定产、逐丘定工，按劳动力强弱承包一定数量的田亩，再以工除产，得出每个劳动日的产量，以产量来计算工分，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办法，但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纳这个办法。"信中认为，群众所提的包产办法，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处是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计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讨巧的空子，能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坏处是可能产生"各顾各"的危险，有些农活可能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自私自利的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的困难可能得不到解决等。

曾希圣解释说，"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做法既吸取了包产到户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了它的坏处，这主要是做到了"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等"五个统一"。"所以这个办法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再按产量给奖的办法。也可以说是集体农活与零散农活相结合的包产办法。"他还将这种办法总结了八点好处，即：（1）包产比较落实；（2）包产指标增加；（3）出勤率大大提高；（4）参加农业生产的人数增多；（5）麦田管理有显著加强；（6）男女老少积极积肥；（7）积极修添农具；（8）搞私有的减少。信中最后说，从试点看，情况是好的，增产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这个办法"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对于曾希圣的这封信，毛泽东没有表态。

4月23日，曾希圣在安徽省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又专门讲到了包工包产责任制问题，认为高级社以来的包工包产办法，责任不明，社员只争工分，不讲质量，评工记分手续相当麻烦，且不容易做到合理，这样一来，社员只顾自留地，不关心大田生产。这些情况在高级社时就存在，公社化后，责任制就更差了，并且把高级社那一套包工包产的办法也打掉了，所以省委提出"责任田"这个包工包产新办法，以解决责任制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个办法能加强社员责任心厂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广州会议之后，安徽省委既不想将"责任田"停止下来，又担心这种办法会被认为是包产到户，加之邻近的一些省份听说安徽搞了包产到户，许多生产队也要求仿效安徽的做法。于是，安徽省委于1961年4月27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做出报告，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改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报告辩解说："少数群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至误解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产粮，故意把它说成包产到户"，"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

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报告还要求中共中央把安徽的做法通知邻省，以免在群众中发生误解。

1961年7月24日，安徽省委再次就“田间管理责任制”问题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将这种责任制概括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大农活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农活（即小农活）包工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并介绍了具体的做法，提出了解决困难户的几条办法。

报告认为，“经过几个月的试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理由是：第一，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因为“它并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是集体所有的”，“并没有改变产品收入的分配办法”，“并没有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这种办法“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办法”。第二，这个办法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社员间的收入水平的差别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扩大”，对困难户则有多种照顾，他们的生活会有保障。第三，这个办法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社员管理的“责任田”不是长期固定的，而是会随时进行调整，社员不会将“责任田”视为自己的私有田，而且大农活仍然统一做，社员对田间管理也只有操作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不会增加他们的私有观念。

报告还总结了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的七条好处，并且强调：这种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只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它能够发挥对组织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

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刚开始实施“责任田”的时候，也许仅是一项渡过困难的临时措施，并没有想到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突破。但在随后的实践中，他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安徽省委1961年7月24日对于“责任田”所作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对“责任田”不是分田单干的论述，将土地的操作权（也就是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认为实行“责任田”后，社员只有土地的操作权，而土地、耕畜、农具的所有权仍是集体的，从理论上回答了如何划分单干与包产到户的关系，是很有见地的。

同月，曾希圣又到蚌埠就“田间管理责任制”问题向途经这里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再次讲到了实行这种办法的好处。曾希圣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的办法，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1）可能私心重；（2）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群众反映不光包‘责任田’有私心，评工记分也有私心，过去评工分是抢工分，现在是要把田做好。这个私心比那个私心好，这个私心能提高产量。”毛泽东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扩大。”“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毛泽东认为安徽“责任田”“可以多搞一点”，并不是表明他已经认同了“责任田”，而是此时他正在为解决队与队、社员与社员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寻求办法。在他看来，安徽“责任田”也不失是一种解决两个平均主义的办法，可以一试。

有了毛泽东这个表态，安徽全省的“责任田”迅速增加。1961年8月中旬，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了74.8%，10月中旬增加到84.4%。到1961年底，则更是增加到91.1%。据国家粮食部副部长周康民对肥东等六县的调查，社队干部对“田间管

理责任制”反映良好，他们说在现在生产条件下，这个办法是一个好办法，对鼓舞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增产粮食很有好处。肥东县长乐公社涧南大队有两个生产队，一个在路东，叫路东生产队，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办法；一个在路西，叫路西生产队，实行包产到队的老办法。两个生产队的生产条件大致相当，路西队还稍好些，但由于责任制不同，路东队夏收粮食作物每亩达 112 斤，而路西却只有 100 斤；秋季作物路东队每亩 245 斤，路西队只有 195 斤。

1961 年 9 月，毛泽东通过邯郸谈话会，从河北一些地方“分配大包干”中得到启发，并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也使得他对安徽“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此前他还认为“责任田”也不妨是解决公社内部平均主义的一种试验，那么，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他认为已经找到了克服公社内部平均主义的根本途径，就没有必要再搞“责任田”之类了。虽然安徽省委一再强调，他们的“田间管理责任制”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但其本质还是搞包产到户，而在毛泽东看来，搞包产到户就会有滑向单干的危险。1960 年底以来，毛泽东为解决人民公社的问题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泽东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底线，他认为不能再退了，再退就退到了分田单干的道路上去了。

毛泽东这种态度的变化，从 1961 年 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可以看出来。《指示》说：“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类地方，应当通过改进工作，办好集体经济，并且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

1961 年 12 月中旬，毛泽东将曾希圣找到江苏无锡，以商量的口吻说，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又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曾希圣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对不要再搞“责任田”的态度其实已经明朗了。

尽管如此，安徽省委仍于 1962 年 1 月 27 日发出《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加强田间管理责任制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认为不能否认“田间管理责任制”，不能说这个办法搞错了，一年来的事实证明，凡是搞得好的，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都很拥护。“应该切实总结好的经验，克服存在的问题，继续充实和完备这个办法，不应该全盘否定”。

在安徽大搞“责任田”时，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

1961 年 9 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份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中说：“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尽管这种地区并不占多数，表现形式和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

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监察委员会反映，在广西各县举办的贯彻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训练干部会议上，“主张单干和实行单干的占到会干部的1/4”，“在生产较好的地区，有这种思想和行为的人约占5%”，在“五风”和受灾严重的地区占60%。柳城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417人中，272人主张单干。龙胜县1867个生产队，其中有790个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42.3%；三江县有15.3%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8.4%的生产队包产到组。

当时，明日张胆地提出要搞单干的干部、社员为数是很少的。所谓“单干”，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监察委员会曾将单干归纳为七种形式，其中第一种是分田到户，第二种就是包产到户。广西区党委监察委员会认为，单干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农村有些基层党员、干部，由于几年来受到‘五风’的危害，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发生动摇和怀疑；对‘六十条’政策和调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产生误解；一些社员和干部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这里所概括的第一条原因，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经过这几年的困难，广大农民的确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已有了很大的怀疑。

甘肃的康县、临洮、武威、通渭也出现了形式各异的包产到户，甘肃农民说：“我们已经连续5年没有吃饱饭了，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脑子想进步，就是肚子太反动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许多干部群众热衷于包产到户的原因。

第二节　党内分歧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把大会开成“出气会”的要求，各代表团纷纷开展了自我批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安徽“五风”比较严重，曾希圣在会上受到了批判，遭到了撤职处分。结果，曾希圣推行的“责任田”也被连带批判，说“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

新的安徽省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纠正“责任田”。1962年3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决议》认为，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决议》无视安徽推行“责任田”以来农村面貌发生的变化，认为1961年安徽农村经济的复苏，粮食产量的增加，“责任田”的办法虽然起了某些暂时作用，“但主要还是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不搞‘责任田’，坚决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农村的情况可能更好一些”。其实，正是有了“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才使曾希圣等人的思想有了解放，才敢于冒风险进行“责任田”的试验。《决议》将“责任田”的

"严重后果"归结为六个方面：第一，出现了严重的单干倾向；第二，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苗头；第三，削弱和瓦解了集体经济；第四，影响了国家征购和生活安排；第五，影响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第六，对基层组织起了腐蚀和瓦解作用。安徽省委为此提出，在1962年内要将"责任田"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改过来。

"责任田"得到了安徽广大农民拥护，在新的安徽省委大张旗鼓地纠正"责任田"时，据当时的一份调查，仍有10%左右的社员，主张继续搞包产到户，不愿改正"责任田"；有20%左右的社员不愿搞"责任田"，这主要是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困难户和劳动力少、技术差的户；其余70%的社员处在中间状态。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未必可靠，但即使是这10%和70%，也说明实施"责任田"是深得人心的。

1962年4月14日，中共贵州省委做出《关于解决包产到户问题的意见》。《意见》中说，贵州包产到户的现象，在1961年春夏之间即在少数生产队出现，当时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纠正，但未引起各级党组织的足够重视，因而在1961年冬和1962年春又有了蔓延和发展。《意见》对包产到户的后果所作的估计是："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使我省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从根本上受到破坏，使已经有了将近七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解体，使现在已经受了很大破坏的农村生产力再一次遭到更加严重的摧残，使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逐步丧失，使目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愈来愈加严重，使我们严重地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动摇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贵州省委认为，"包产到户已经成为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必须下定决心，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来解决包产到户的问题"。

其他各省份也相继做出决定，赶快终止正在萌芽中的包产到户。

但是，包产到户的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七千人大会"后，包产到户再起波澜，党内对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邓子恢是党内明确主张可以搞包产到户的领导人。"农业六十条"起草和修正前后，邓子恢深入农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农民要求"分田到户"的呼声很高，他感到既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要防止分田单干，就必须把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而克服各自的缺点。因此，他主张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下，全面推行和建立包工、包产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1962年4月，邓子恢来到广西桂林检查工作，桂林地委向他汇报时说，龙胜县已经有许多生产队包产到户了，希望他谈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邓子恢的态度比较明确，认为"解决包产到户问题，要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他对桂林地委说，不应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而现在已经到组、到户的，就马马虎虎，睁个眼闭个眼算了，等秋收以后再慢慢搞，不要影响生产。他还说，集体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多用劳动力，开辟生产门路，但如果组织不好，窝工浪费，优越性就没有了。单干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优越性，但发展下去，要两极分化，所以我们要走集体化的道路。

回到北京后，邓子恢根据调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他指出："各级干部思想上仍然存在不断革命论，而不

认识革命发展阶段论，对30年不变（按：指基本核算单位），一般认为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干部思想另一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根子未完全挖掉，总想在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上，把穷队富队的经济基础适当拉平。”他认为，个体生产的危险性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之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在农业生产力还处在以人力、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可惜这种思想尚未被全体干部所完全理解，他们不适当地把农民依靠自己劳动、自产自销的经济看作资本主义，又过于害怕它对社会主义会起破坏作用。”

从上面可以看出，邓子恢当时考虑较多的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何使集体经济能够吸取个体经济的优势问题，对包产到户并未明确地加以赞成还是反对。

“七千人大会”后，安徽强行纠正“责任田”，许多干部虽不能公开反对，但内心不赞成这一做法。1962年4月，宿县（1992年撤销，并入宿州市）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给邓子恢来信，向他保荐“责任田”。信中说，符离集区从1961年3月开始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深受干部群众欢迎。对于省委纠正“责任田”的决议，区委的干部进行了多次学习和讨论，思想仍然不通。这封信引起了邓子恢的重视，乃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调查组前往安徽当涂调查。

1962年6月中旬，邓子恢收到了王观澜报送来的《当涂县责任田的情况调查》。《调查》说，“责任田”做到了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交任务“五统一”，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集体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社员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邓子恢看了《调查》后认为，既然大多数“责任田”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只是集体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就不应加以否定，而应总结经验，加以提高。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调查组到符离集所在的宿县调查，结果调查组得出了与当涂调查相同的结论，并且反映当地的干部纷纷要求允许他们试三年，等粮食过了关再改过来。

看了这些报告，结合自己对包产到户问题的了解和思考，邓子恢认为包产到户是可行的。1962年7月11日，邓子恢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报告，着重讲了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他指出，现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主要是社员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不能因材使用，分工合作。他认为，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他强调：“不能把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许的。”

当时，党内赞成包产到户的，并非只有邓子恢一人。“七千人大会”后，受毛泽东委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到湖南进行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的调查。调查组调查了毛泽东家乡湘潭的韶山南岸生产队、毛泽东外祖父家乡湘乡的大坪大队和刘少奇家乡宁乡的炭子冲大队。调查组一进韶山，就发现群众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思想准备，在“三南”会议上，他还是明确地反对包产到户的。通过进一步调查讨论，田家英一方面觉得搞包产到户明显对恢复生产有利，

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问题重大，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韶山是个特殊的地方，对全国影响很大。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前往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结果，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而此时也在上海的陈云看了调查报告后，却评价说："观点鲜明。"

从上海回来后，田家英又到韶山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于1962年6月底回到北京，将调查的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对包产到户内心是赞成的。1961年四五月间，他在湖南宁乡调查时针对包产到户问题就讲过，"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例如田塍、荒地等。所以，田家英的汇报刚开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地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当田家英问可不可以将他这些意见报告毛泽东时，刘少奇干脆地说："可以。"

1961年6月中旬，李富春在上海参加华东局会议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下车到安徽滁县专区嘉山县管店公社的车站、丘郢两个生产队，了解麦收情况，并同当地农民进行了交谈。农民们告诉他，由于搞了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生产积极性高多了，并且说："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受此启发，李富春觉得包产到户是可行的。他在7月10日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生产力破坏严重、群众对集体经济失去信心的地区，除了说服农民和支援农民搞好集体经济外，也可以根据农民的意见采取某些过渡的办法，如安徽的'责任田'，河南的'借地'，等等。"

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也是赞成的。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与会者时说，现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他还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进一步指出："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在这里，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1962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后，中共中央中南局十分重视。6月6日和7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亲赴广西龙胜调查。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原来估计全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事实上单干的并没有那么多。那是因为界线不清，把那些正确地采用'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和其他基本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陶铸和王任重的分析是，目前龙胜的生产队中，大约60%—70%基本上届于社会

主义的集体经营性质；有20%—30%基本属于单干，不过还保留某些集体经济的因素；还有大约10%完全是单干。报告中有价值的是提出了集体经济的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关于集体劳动，他们认为主要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说所有的农活，社员都挤到一块，集体去干。因此，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虽然陶铸和王任重明确表示反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但他们将“田间管理责任制”与分田单干区分开来，不但保护了一批生产队，也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

还有一些地方用变通的办法搞起了包产到户。1961年8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通知，提出凡是集体单位不能充分利用的冬闲田，允许借一部分给社员个人种植冬菜和冬种春收作物，借田的数量，一般地区可以1—3分，灾区可以3—5分。借给社员耕种冬闲田的收入，全部归社员个人所有。1962年3月，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借一部分土地给灾情严重的豫北、豫东地区的群众生产自救。5月，中共河南省委又做出《关于迅速落实借地工作的通知》，允许人均耕地2—3亩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不超过耕地的15%，在人均耕地1亩左右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可不超过20%，借地期限规定3—5年。在盐碱地、沙荒和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还可以酌情多借一些地给社员。

1962年7月30日，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华北局召开的农业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实行“三包到组”责任制的建议。8月8日，他又将这个发言稿打印出来，报送给了毛泽东。

胡开明认为，贯彻“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有了提高，但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胡开明建议实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是：(1)由社员自愿结合组成一个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的生产组，在一般情况下长期不变。(2)生产队把全部土地都分到生产组，耕畜、农具也尽可能分到生产组去使用，在一般情况下也长期不变。(3)根据土地好坏，首先进行土地分等，评出常年每亩产量数、用工数和投资数，然后计算全组的土地总产量、总用工和总投资数，签订“三包”合同，认真执行。(4)到秋收后，包产以内的全部产量，由生产组交生产队统一分配；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完全归生产组按劳分配。如果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少完成了包产，则按比例扣除包工数。胡开明在建议中还总结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如生产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集体的利益与社员的利益就更加接近了，社员都能掏出真心来干，力争多超产；解决了组与组之间评工记分标准不统一的矛盾，彻底消灭了劳动报酬上的不合理现象；便于社员间互相监督，能够保证农活质量等。

胡开明并不主张包产到户，认为这种方法在包产以内的产品虽然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但在经营方式上却是单干的，这就否定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胡开明同时认为，经过工作，如果社员还是要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能硬顶或硬纠，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允许群

众包产到户。对于那些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的农民，也不要歧视，如果他们生产上有困难，也要满腔热情地去帮助他们，而且要采取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的办法，逐步地把他们引导到集体方面来。

胡开明的"三包到组"责任制在生产方式上有些类似于过去的互助组，但分配是集体统一进行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划小生产经营单位。他认为，这样既可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能区别包产到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解决集体经济与农民生产积极性矛盾的方法。

1962年上半年，不但党内高层有相当多的领导人倾向于包产到户，许多基层干部更是希望能坚持包产到户。在明令取消"责任田"的情况下，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还甘冒风险，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保荐"责任田"。

钱让能在信中一开始就说："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委1962年3月20日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钱让能说："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总认为是'好了'、'对头了'，记得去年春，我在推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我十多年来（除土地改革外）的第一次见到。"

钱让能为"责任田"辩护说，搞"责任田"不是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什么方向性的错误，相反，"责任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式，它并未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仍然是按劳取酬，并未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对于安徽省委纠正"责任田"，钱让能不以为然，认为"急急忙忙地收回'责任田'，吵吵闹闹地指责'单干'，很可能因为一部分是好心的同志不知底里。一部分还是以'本本主义'的观点害怕农民不跟我们走"。

钱让能说："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站在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80%甚至90%以上的人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害怕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道理呢！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一面是各地纷纷做决定、下通知，要纠正包产到户，一面是党内相当多的各级干部为包产到户叫好。而在此时，广大农村的包产到户也如地火，在或明或暗地燃烧。

1962年6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党委决定在全州范围内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在前后一二十天的时间内，全州就有5943个生产队实行了这种办法。陕西不少地方也搞起了包产到户，据后来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全省有百分之十几的生产队不巩固或很不巩固，"其中有极少数（大约2%左右）已经瓦解，实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陕西省清涧县的情况尤为严重，"单干倾向严重的占17%，

已经瓦解和接近瓦解的占14%多”。单干的形式主要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过分划小核算单位等。到1962年秋，湖南全省有25200多个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5.5%。这些生产队，“有的实行了分田到户，有的实行了‘井田制’（按：即口粮田分到户，征购粮田集体耕种），有的实行了包产到户”。四川省峨眉县的青龙、燕岗、双福三个公社，“一年多来，在省委一再强调要坚决纠正的情况下，这里的包产到户等单干，却由少到多、由隐蔽到公开地大量发展起来”。其中双福公社1961年大春生产时只有4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1962年小春生产时发展到34个，1962年9月初发展到99个，占99%。浙江嵊县19个公社，1861个生产大队中，土地落户的有68个大队，占3.6%；包产到户的有134个大队，占5.3%。该县儒岙公社60个大队中，包产到户的大队占78%。丽水、泰顺两县也有20%的大队搞了包产到户。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也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所谓“大跃进”，才导致了对中国生产力做出了已经实现了超常规发展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认为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组织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人民公社顺应而生。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农村作为革命的重心，党的许多领导人也都出身农民，应该说，他们很了解农村和农民。长期的农村革命战争环境，使党的干部一方面对农村和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另一方面，又感到处理农村和农民问题能得心应手。的确，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都是首先从农村取得成功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这样一来，使党内许多人产生了一种中国农民觉悟高，搞各项事业从农村开始比较容易成功的错觉。结果，急急忙忙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从而也使中国农民付出沉重的代价。

实际上，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我们许多人并不真正地了解农村和农民，尤其是不了解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对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向往的，也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将一向分散生产和生活的农民组织起来，集体生产劳动，产品大体平均分配后，他们中相当多的人的觉悟，还不足以达到自觉劳动的程度，他们首先会不满平均主义、反对平均主义，而当对平均主义无力改变后，他们又会接受平均主义，觉得少劳动、少付出才不致吃亏。当农民接受平均主义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得不到发挥。而且，在当时农业生产基本靠手工操作的情况下，农村的生产活动，根本还不需要大机器生产那样的劳动者的相互协作，也达不到“田间管理车间化”的条件，多数农活并不需要“大呼隆”式的集体劳动，采取安徽这种“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方法，不失为既保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又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合理办法。遗憾的是，当时人们的认识还达不到这一点。历史的进步总是有代价的，我们今天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正是由于曾经有过20世纪6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曲折经历。

“七千人大会”后，实行以“田间管理责任制”等不同面貌出现的包产到户，已成为党内党外的共同呼声。包产到户其实并不是新事物，早在刚刚实现农业合作化的1956年，一些地方就已出现“田间管理包产到户”、“分户田间管理责任制”等形式多

样的包产到户。在1957年下半年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包产到户遭到严厉批判，这一事物还刚在萌芽时期就夭折了。1959年上半年人民公社的整顿过程中，包产到户再次出现苗头，但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它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再遭批判。然而，包产到户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六十条”贯彻执行的前后，又一次冒了出来，并且涉及的人口和地区，都大大地超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究其原因，就是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地窒息着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农村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使广大农民对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失去了信心，于是包产到户由开始时的星星之火，很快呈燎原之势。

集体经济与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要有机地统一起来，确实是不易做到的。当然，如果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高度的觉悟，都能做到先集体后个人，都把集体的事业真正当成自己的事业，这个矛盾也不难解决，不但如此，还能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但是，精神虽然对物质有反作用，可起决定作用的最终还是物质。单靠人的觉悟，是难以长久维持生产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的，而且在手工劳动，劳动的产品又不丰富，仅能维持温饱甚至还只能维持生命延续的时候，能够刺激劳动者积极性的，就主要只能靠劳动的、质和量与劳动成果的分配直接挂钩，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1960年底以来，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特别是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较好地解决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及生产队与生产队三级四方的关系，有效地控制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生产队间的平均主义，但这些措施都没有解决社员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事实上，如果不将社员的劳动与分配以直接和直观的形式挂钩，搞生产和分配的两张“皮”，生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是难以克服的。广大农民只有当他们感到是真正在为自己生产劳动的时候，才会使出全部力气。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的包产到户，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比较合理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使生产与分配有机结合的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第三节　包产到户的夭折

1962年夏，从上至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把包产到户当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生产队内部平均主义的良方，但是包产到户到底能不能公开合法，还有一个必经的关口，就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因为自“大跃进”以来，党内生活已不大正常，党内民主也遭到破坏，个人专断作风开始滋长。“大跃进”之初，毛泽东对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批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严重地损害了党内的民主决策机制。在重大问题上，最终的决定权在毛泽东那里。他对包

产到户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包产到户的命运。

然而，毛泽东却并不看好包产到户。在他看来，有了“农业六十条”，又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的问题就已经解决。搞包产到户就是搞单干，这也就是在农村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是反对的，所以他才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但他又认为，生产队内部又不能没有一点平均主义，不能搞彻底的按劳分配，否则就不能给贫苦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农村的两极分化。毛泽东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他们的处境十分同情。搞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就是为了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认为，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仍然穷的穷、富的富，那就有悖于党领导农民搞革命的初衷，搞包产到户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1962年7月初，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希望就恢复农业的有关问题同他交换意见。当天下午，毛泽东就找陈云谈话。陈云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并存的问题，认为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陈云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但第二天传出消息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后来回忆说：“一九六二年我同毛主席谈话后，毛主席很生气，在北戴河开会，批了三个文件给我们看，并对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批得很厉害，把问题上纲到主张分田单干。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说，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

接着，毛泽东约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在汇报中说，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搞，不如有领导地搞活经济。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有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田家英汇报完后，毛泽东突然问田家英：你是主张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是田家英个人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说是个人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没有表态。没有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其实，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已是十分明朗，他对邓子恢、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非常反感，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没有抵制甚至还赞成也不满意。1962年7月9日、10日、11日，毛泽东将河南省委的刘建勋、耿起昌，山东省委的谭启龙，江西省委的刘俊秀分别约来北京商谈农村工作问题，并提出要搞一个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由陈伯达主持起草。

陈伯达很快就拿出了初稿，并在1962年7月19日和20日主持召开了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20日，毛泽东找各中央局书记谈话。毛泽东问与会者：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接着又说：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他又说，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

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光明？

在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后，刘少奇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意见，站到毛泽东的立场上来。1962年7月18日，刘少奇给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讲到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够巩固，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而至于干部，要求单干，要求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他要求下放干部下去后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但同时，刘少奇又认为农业生产必须实行责任制，他指出："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

此时的刘少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形势的估计与毛泽东明显不同。毛泽东认为，有了"农业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农村的问题就基本上可以解决，形势正在好起来。刘少奇则认为形势还不能令人过于乐观。他在1962年5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因此，他主张"要退够"，其中也包括要允许包产到户。另一方面，为了党的团结统一，刘少奇不得不公开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并没有就此停止下来。1962年8月2日，毛泽东在同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就是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由此看来，毛泽东已将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看作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表现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这又是一次著名的北戴河会议。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包产到户、阶级问题、彭德怀问题、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问题、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人民公社问题等发表谈话。谈话中，毛泽东说，分田到户，首先拥护的是富裕中农。有的大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是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他还谈到，现在还有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残余还都存在，农村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两类矛盾，第一种是敌我矛盾，第二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北戴河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就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等问题。他说，现在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他还说阶级还要分层。小资产阶级就是要分阶层的，可以分为富裕阶层，比较贫穷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资产阶级、地主富农要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注意，集体化就不能巩固。因为小资产阶级有富裕阶层存在，闹单干的

可能性就长期存在，这是单干的社会基础。

在1962年8月9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描绘了一幅搞单干（也就是包产到户）后的“可怕后果”：（搞单干）一年多就会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抽大烟、放高利贷，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他还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出身，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家庭出身的。有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准备。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国内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农村表现为贫下中农和富裕中农之间的矛盾。

北戴河会议批判“单干风”，首当其冲的是邓子恢。在8月9日的会议上，有人指责邓子恢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是代表富裕中农阶层搞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是富裕中农的代表。为此，邓子恢在8月10日的华东组会议上不得不进行申辩，但他仍然认为安徽的“责任田”是做到了“五统一”的，也是符合陶铸广西龙胜的《座谈记录》关于集体经济的四条标准的，不是单干。他说：“我现在对‘责任田’还是这种看法，要作具体分析，安徽的‘责任田’也是搞好了‘五统一’的。”

迫于压力，邓子恢只得在第二天的中心组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于包产到户的看法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方针相违背，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邓子恢并未因检讨而过关。第二天，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对邓子恢作了措辞严厉的批评：“过了一年……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

北戴河会议后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了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问题，并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再次受到批判。1962年9月25日，当董必武在讲话中讲到“单干风”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会上，毛泽东还多次批评田家英的60%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并批评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插了许多话，其中不少是批评邓子恢的。刘少奇说：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农业才能过关。邓老主张单干，就是违背了最重要的两条，因此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很清楚的，是一枝毒草。毛泽东说：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有的地方开一次会赞成单干，但在执行半年以后，开一次辩论会，过去如何，将来如何，“四属”、“五

保户”如何，没有可能一家一头牛，就又不赞成单干。刘少奇接着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这股“单干风”要打下去。毛泽东说：有一家就是一家，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方向是不正确的。

针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八届十中全会专门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决定》肯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少三十年不变，同时也规定：“人民公社的各种体制、各级规模和条例（按：即‘农业六十条’）中的各项重大规定，经过群众讨论，确定以后，也长期不变。”《决定》提出：“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干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对于这些问题，《决定》的出台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这次全会还通过了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由于这次全会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也就增加了相关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如第八条规定：“公社、大队、生产队，在选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时候，应该注意使老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第五十七条规定，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

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干过一件好事”。邓子恢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自然也当不成了，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当了一名挂名的副主任。

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单干风”后，各地相继做出了一系列的纠正包产到户或所谓单干的决定。1962 年 10 月，中共甘肃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临夏回族自治州“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情况的检查报告》，表示要在 1963 年内将临夏的包产到户纠正过来，并要求全省做到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当作全党当前最根本的任务。10 月 11 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报告说：“现在，农村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单干风基本上刹住了，各级领导干部中没有人公开主张包产到户了，公社、党支部和生产队的干部也不再继续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了。有些瓦解了的生产队，又在重新组织起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表示，将在 1963 年春耕以前把全部“责任田”改正过来。中共湖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单干风”的报告中说：“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许许多多的材料中清楚地看到，产生“单干风”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怪，利用了少数贫农、下中农对集体经济的暂时的动摇，利用了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煽动起来的，这是问题的本质。“已经分户单干的生产队，拟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工作，使之回到集体道路上来。”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做出了类似的规定。至此，包产到户再度夭折，包产到户问

题也长期成为禁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包产到户没有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但也应看到，由于劳动力强弱、技术水平高低的差异，即使是同等条件的包产到户，各个社员间收入的多少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才能克服平均主义，刺激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既然有区别，那么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也是难免的。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加以引导，再加上保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不变，是不可能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的。当然，在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下，对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的照顾，也的确是一个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但如果能坚持统一分配，在政策上对这些人做出明确的保护性规定，就不致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其他社员有太大的差距。实际上，担心包产到户后会出现两极分化，进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是没有必要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难以有这样的认识。

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一再讲要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只有让一部分人靠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并通过一定的政策引导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要想让全体农民都在同一个水平上、在同一个时间段做到共同富裕，除非是农业生产的极大发展、产品的极大丰富，否则，在手工劳动为主体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无疑要考虑公平，但更要考虑效率，只有较高的效率，才能实现较高水平的公平。任何时候，都不会存在绝对的公平。实际上，人民公社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虽然表面上做到了公平，但在这公平的后面，却是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这样的分配方式，对于劳动能力强、劳动态度好、生产技能高的社员来说，又是不公平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对贫苦农民特别同情。这种情感，是值得称道的。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他们尽快地富裕起来，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这种帮助，不应当是劫富济贫式的帮助，而应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提高中去解决。首先是应把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尽快做大，其次才能考虑蛋糕如何分割的问题。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包产到户是既坚持集体所有制，又有效地克服平均主义弊端的较好途径。如果社员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所得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不管如何进行思想教育，都难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是当年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到今天也不能说没有道理。长期以来，中国80%的劳动力在农村搞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因为现代化的前提是要实现工业化，大量农村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工业化就不能完成。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是当年设想的两个互相关联的农业革命的重要两步。农业合作化时，就进行过先集体化还是先机械化的讨论。结果，我们选择了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模式。中国农业集体化实现的速度是异常迅速的，这其中虽然也有不足，甚至有很大的不足，但总体是成功的。

在实现集体化后，一种急于实现机械化的情绪就流露出来。实现机械化既要靠集体的资金积累，也需要土地的连片经营。在中国社会发展条件下，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集约经营，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中国是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且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小农经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家庭经营。古典自

由主义经济学都曾预测家庭经营会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吞并，大部或全部消失，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说农业合作化是对小农经济的初步改造，那么，人民公社化则带有农业生产工厂化的试验性质。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过：我们的集体化，实际上是个农业工厂，不过我们叫生产队，不叫工厂。农业集体化无疑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把千百万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能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但农业的集体化应当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上，至于生产经营活动，在手工劳动条件下，实行工厂化、车间化的管理，只能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农产品不同于工业产品，它的生产不是由若干部件组合而成的。工业生产中，流水线的工艺流程，每个工人的生产环节都是上下紧扣的，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一个工人劳动的质和量，马上可以通过下道工序检验出来。即使非流水作业，也可通过产品的计件建立严格的责任制。这是手工劳动的农业生产无法做到的，因为农业生产这种劳动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进行，不存在上下道工序的相互关联，无法将所有的农活都制定出合理的劳动定额。唯一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劳动与收益直接挂钩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农业的集体化与集体生产劳动是可以适当分离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也是可以适当分离的，但生产和分配却不能分离。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现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装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从而实现农业各部门生产的专业化，农副产品的大量商品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急于求成，只会延缓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第七章　“四　　清”

第一节　“四清”起因

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中国，没有农民的集体化，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也就不能真正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自从实现合作化尤其是建立人民公社以来，集体生产与社员个人积极性发挥之间的矛盾，却一直是一个难以协调的老大难问题。集体化后，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制约着集体化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也长期困扰着广大农村基层干部。

1956年下半年，即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不久，就曾出现了少数社员因人社后收入降低而闹社、退社的事件。为此，1957年下半年进行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制止了闹社、退社风，使退社的社员重新回到合作社，一些解散了合作社也得以恢复。但是，因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采取的是政治手段而非经济手段来巩固合作社，退了社的农民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回到合作社的，而没有改革合作社不合理的管理体制，造成社员闹社、退社的根源——合作社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仍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这场大辩论是在大张旗鼓的反右派运动进人高潮后展开的，反右派运动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这就不能不对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产生影响。在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由于对当时的农村形势没有作客观的分析，将农民对合作社的意见，归结为这些农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但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将一些本与资本主义搭不上界的东西，牵强附会地当作是资本主义对待，而且也容易将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农民对集体生产管理的不同意见，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同时还逐渐形成了一旦农村和农业生产上出了问题，就大抓阶级斗争、从资本主义思想上找原因的思维定式。

庐山会议后，针对部分干部群众对农村人民公社所谓“优越性”的怀疑，中共中央再次提出要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农村中深入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以达到“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

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的目的。

1961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和生产自救工作情况的报告》。信阳地委在《报告》中将此前信阳出现的粮食减产和农村人口大量饿、病和非正常死亡，归结为坏人当权和地方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要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搞土地改革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在运动中，要充分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要贯彻狠、准、稳的方针，既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组织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信阳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即落后社）都应照此办理”。并强调只要充分信任和依靠贫下中农，敢于揭露情况，就能迅速掀起整风整社高潮，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势力”，彻底反掉“五风”，完全扭转三类社的局面，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

在整风整社的具体做法上，1961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提出，对一、二类社的整顿，主要依靠原有的组织力量，并派强的工作团去帮助。对三类社的整顿，“主要依靠上面派去的工作团，经过深入群众，扎根串连，挑选一批真正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同时吸收原有组织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参加，组成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且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领导生产，安排生活”。整风整社运动对于遏止农村“五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整风整社的做法上存在过“左”的倾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共产风”等“五风”问题，而且还对后来的“四清”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196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决定，要求结合“农业六十条”的规定，“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要向农民宣传工农联盟，城乡互助，以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意义；要向农民宣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巩固人民公社。

因为此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农业生产也尚未根本恢复，农村最迫切的工作是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实际上这场运动并未广泛地开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并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再次提出要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八届十中全会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是结合批判“单干风”进行的，并以此追查“单干风”的根源。中共湖南省委在 1962 年 10 月 23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产生‘单干风’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怪。利用少数贫农、下中农对集体经济的暂时动摇，利用了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煽动起来的，这是问题本质。”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清涧县单干问题给西北

局的报告中也说："清涧县的单干活动，早在1960年就有发现，地委、县委也都曾经派人进行过调查和纠正，但是，真正纠正了的很少，有的纠了又闹，闹开了又纠。这一方面说明，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富裕农民的自发思想和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很嚣张，他们利用天灾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兴风作浪，企图引导农民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在批判"单干风"的过程中，中共湖南省委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是农村或者是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气焰很嚣张，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现"，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已经变质或正在演变"，"有些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已经蜕化变为资产阶级分子，个别的基层单位已经烂掉"。湖南省委分析，问题比较严重的干部，在县委书记、县长中占6%—7%，县委部长、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中占10%左右。

1962年12月下旬，湖南对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决定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强调要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层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在运动中，湖南采取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的办法。在教育干部上，自上而下，层层训练，第一批集中训练县、区、社三级骨干，第二批集中训练大队骨干，第三批分片训练生产队骨干。湖南社会主义教育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召开贫农座谈会，一面大讲阶级斗争，"揭发敌情"、"黑风"，一面由干部向贫农交代自己的问题，听取贫农批评；第二，树立贫农优势，造成激烈的舆论，把"黑风"搞臭；第三，处理问题时划清敌我、严重与一般两个界限。1963年2月8日，湖南省委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报告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很快销声匿迹，反攻倒算的地主被迫把土地交回来，搞械斗的交出了武器，赌博的交出了赌具，投机倒把的洗手不干了，有些盗窃的也主动退赃。尤其显著的是，单干的也不干了，凡是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大部分重新组织起来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河北省保定地委决定利用冬春之季的农闲时间，在全区农村继续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在运动中对广大农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决定将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学习、讨论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精神，对农村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解决社会主义方向和"单干风"问题；第二步，宣传、讲解、学习"农业六十条"，发动群众集中解决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问题，以整顿干部作风，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第三步，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社队各种规章制度，并通过民主选举，健全生产队、大队领导班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掀起生产高潮。根据这一决定，保定地委成立了整风整社办公室，选定了试点县，并派出了工作组。

随后，保定各县都开展了整风整社的试点工作，如定县县委就选择了阜头庄大队作为试点。在试点工作进行到第二步时，群众对干部提出了许多意见，主要的问题是干部

不勤俭办社、铺张浪费，账目不清，多记工分。他们说，现在是账目不清，工分不公，钱的来踪去向不明，仓库的粮食没个数。如果不抓住这四个问题弄清，贯彻“农村六十条”就成了一句空话。

根据群众的意见，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决定发动群众对生产队的账目、工分、财物、仓库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查，并逐项向群众作出交代。于是，以清账目、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为内容的“四清”就构成了阜头庄大队整风整社的中心环节，“四清”的提法也就逐渐形成。阜头庄大队共清出粮食13879斤，现款9070元。

1963年1月，定县县委总结了阜头庄大队在整风整社中开展“四清”的经验，并将之报告了保定地委，保定地委又上报给了河北省委。省、地两级党委都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于是，定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县部署“四清”运动，并将“四清”的内容正式确定为清账（收入、支出和分配账）、清工（主要是干部记工和补助工）、清财（集体财物）和清库（库存的粮、棉、油、肥等）。会后，全县训练了5.9万余名“四清”积极分子，并且有县、区、社干部参加，组成“四清”工作队，在全县范围搞起“四清”。

在得到河北省委同意后，保定地委决定在全地区推广定县的经验，在全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

2月13日，河北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向全省推广保定“四清”的经验。到3月底，河北全省已有30%的生产队结束“四清”，大部分生产队进人“四清”阶段。4月15日至5月6日，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整风整社工作会议，对半年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总结，认为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纠正了部分生产队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和过多发展个体经济的问题，整顿了基层干部的作风，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

但是，除湖南和河北两省外，八届十中全会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在农村广泛地开展起来。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后来说，“我跑了11个省，只有子厚（按：指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延春（按：指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全党的注意，乃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问题。

在1963年2月11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提起与会者注意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特地批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在批语中说：“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会上，毛泽东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又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还说，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第一步是找贫下中农开会，然后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对农民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很明显，毛泽东进一步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根本目的是着眼于“反修”、“防修”

的需要。

但是，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也不满意。原因在于，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想延长会期，专门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为此特地安排刘子厚、王延春在第一排就座，想引起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关注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但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事隔三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说，二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

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的注意力逐渐地从对“农业六十条”的关注转移到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问题上来。一方面，通过“农业六十条”的起草、修正，以及随之进行的贯彻落实“农业六十条”带来的农村形势的逐渐好转，毛泽东认为，农村政策的调整已经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安徽“责任田”等各式各样的包产到户，党内有相当多的人对包产到户持支持和同情态度，而毛泽东又是把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的。他认为分田单干实际上是代表富裕中农的利益，是要在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之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个别地方出现了地主“反攻倒算”的情况，一些农村的社会治安也由于经济困难而有某些恶化，一些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也有所增长，城乡投机倒把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已演变成为“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苏联共产党正在演变为修正主义的政党。这样，毛泽东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已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了。苏联共产党向修正主义党的演化，也使毛泽东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出现修正主义的警觉。正因为如此，他在国际上“反修”的同时，提出了国内“防修”的问题。

1962年12月，毛泽东在召集华东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提出要讨论国内修正主义、保卫马列主义路线的问题，并说例子各省都有。1963年6月4日，他在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又说，我们在农村经过几次整顿，总整不好。现在找出原因了，一是过去土地改革不彻底，领导权并不在真正共产党人手里或者共产党起了变化，名为共产党，实际上不是了；二是土地改革后合作化有十年了，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产生了这种现象（按：指贪污、盗窃等）也是很自然的，社会上总是有这些事的，那么干干净净是不可设想的。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6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又说，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四清”，不搞干部参加劳动，整党是整不好的。

第二节　“前十条”和“后十条”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部分地区的“四清”试点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

中共保定地委4月4日在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中说，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四

清”第二阶段基本结束，全地区6128个生产大队中，有70%以上的生产大队“四清”工作搞得彻底，“揭发了大量的铺张浪费、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保定地委认为，“损害集体经济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反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保定地区“四清”工作的具体做法是：第一，认真学习“农业六十条”，统一政策思想，揭发“四不清”问题；第二，对查出的问题先由个人作检讨，并结合进行查证，然后进行退赔处理；第三步，根据“四清”找到漏洞，建立必要的制度；最后是按照“四清”工作的标准进行检查验收。这个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的时候，他正南下视察经过天津。看了报告后毛泽东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在路过济南、南京时，他还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

随后不久，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提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为中心，串连、启发贫下中农进行回忆对比，是一种联系实际的、走群众路线的好方法；要有意识地用村史、合作化史、工厂史、贫下中农和老工人的家史，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通过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用大量的具体生动的史实，教育后代。东北局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1963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认为报告中的这种教育方法“是普遍可行的”。

1963年4月15日，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整个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第二步是开好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这两步都是为了训练干部，组成干部队伍。第三步，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扎根串连，组成阶级队伍，打击敌人。全省已训练生产队以上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150多万人。报告说，仅90个县的三级干部会议揭发出来的材料，大小投机倒把活动就有10万多起，其中“千字号”的上万起，“万字号”的近千起；“反革命集团”活动1300多起；地主富农“反攻倒算”2.6万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8000多起；巫婆、神汉、“阴阳先生”5万多人；续家谱1万多宗；买卖婚姻5万多起。“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党员、干部参与了这些活动，有的甚至是他们带头干的。”总之，“这次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确凿地说明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这些报告使毛泽东坚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已十分严峻，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十分必要。他对东北局、河南省委的报告很重视，提议转发这些文件，并让有关负责人起草了文件的批语。经他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中说：“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按：指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随着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愈加严重起来。1963年5月9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中说，如果“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的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所以，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此作为指导正在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共分十条，简称为“前十条”（因为同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正好是十条，所以用“前十条”与“后十条”来区分这两个文件)。

“前十条”所讲的十个问题是：(1) 形势问题；(2) 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3) 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4) 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5) 依靠谁的问题；(6) 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7) 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8)“四清”问题；(9)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10)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前十条”列举了九种情况，如：地主富农“企图复辟，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地主富农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多处发现”；“商业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很严重”；“雇工剥削、放高利贷、土地买卖的现象，也发生了”；等等。为此，“前十条”得出结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前十条”中所讲到的这些问题，在当时部分农村确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而且也远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前十条”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前十条”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前，在农村中都要依靠贫下中农。因此，要在集体经济中建立贫下中农组织。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的贫下中农为基础，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群众运动。

“前十条”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

析，区别对待，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文件还要求各级党委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关工作要定出规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进行。应该说，这些规定，对于运动不至于发展成为乱批乱斗是有意义的。但是，由于运动是在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的前提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这就势必将本不属于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范畴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也就难以避免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更难以达到“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的目的。

“前十条”出台后，许多地方相继进行“四清”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中共湖南省委于1963年5月底6月初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认为，“红皮白心的生产队”“不下百分之二三十”。省委决定由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工作队，协助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然后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还制订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条标准和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宣传要点十二条。会后，全省组织干部8000多人，到302个大队、3298个生产队进行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试点从这年6月底开始，8月底结束。

湖南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革命阶级队伍”。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选择“根子”的条件是：(1) 出身贫苦，历史清楚；(2) 立场坚定，分清敌我；(3) 劳动积极，拥护集体；(4) 敢说真话，办事公道。“根子”先由大队党支部提供名单，工作队深入访贫问苦，审查“根子”，然后由工作队与支部确定“根子”对象。“根子”选定后，“通过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依靠他们进行串连”，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广泛采取了谈家史、谈村史，实物展览，对比参观等办法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接着教育干部“洗手洗澡”，开展“四清”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干部队伍中的问题是普遍而严重的”，据试点的274个大队的统计，在18278名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贪污多占的有14816人，占干部总数的81%。平均每个干部贪污多占粮食124斤，现金60元，工分54分。同时还存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组织上稀里糊涂”“政治上打击贫农，经济上剥削贫农”等问题，并有相当数量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把持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者手里”。

通过“四清”退赔，即“四不清”干部“洗手洗澡”后，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清理阶级，深挖敌情，再一次开展对敌斗争”。据五个试点公社的统计，“地、富、反、坏”这四类分子搞一般破坏活动的占42.7%，搞严重破坏的占23.2%。社会主义教育进入这一阶段后，“通过广大干部群众揭露，根据破坏的大小，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斗争，大破坏大斗争，小破坏小斗争，谁破坏斗争谁，斗准斗狠斗透”。所谓“大斗争”就是以大队或几个生产队联合起来批斗，“小斗争”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批斗。在斗垮“四类分子”后，清理阶级队伍，即分清贫下中农、中农、地主富农所占的比例，清出和补划“漏网”的地主、富农。社会主义教育第三阶段是规划集体生产，解决公私关系，改进生产管理。这一步主要是清退社员多占的山林、田土、集体财物等。各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的。

虽然“前十条”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应采取“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的方针，但在运动的过程中，在一些地方还是发生了乱打乱斗现象，由此导致自杀事件屡有发生。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1963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6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就明确提出：“不仅在人民内部的教育运动中，绝对不允许采取打人、罚跪、捆、吊这类粗暴办法，对于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也应该依法惩处，而不要用打人等办法对待。”但这些政策规定在实际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另外，在退赔中，有些地方采取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办法，存在着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等“左”的倾向。

有鉴于此，在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制订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这十条是：(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2)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3)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4)关于贫下中农组织；(5)中农问题；(6)团结95%以上的农村干部；(7)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8)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9)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10)正确地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的问题。“后十条”对上述问题都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

“后十条”对前一阶段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后十条”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抓住的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并强调：“这五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

“后十条”提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能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甚至把他们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不能把基层组织和原有的干部抛在一边，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不能包办代替。要团结95%以上的农村干部，至于对那些95%以外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要将其同阶级敌人相区别，对他们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

“后十条”与“前十条”相比，着重对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认为这是“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必须执行的一项根本政策”，并提出了“四个区别”的问题。“四个区别”即：(1)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2)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3)在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中，还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4)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性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后十条”指出，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少数上中农，只能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团结95%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

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一并发给全国农村的每个党支部（“前十条”只发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县、公社和大队），并要求“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部分县、社开展起来。随后，各地组织了大批的干部深入农村宣讲两个“十条”。如河北省参加宣讲的干部达12万人。

“后十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规定，“对于在运动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防止扩大打击面，保证运动的正常进行，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后十条”仍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制定的，因此，一些地方按照这两个“十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式进行的。

作为山东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单位的曲阜县颜家村大队，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对敌斗争、组织建设、生产建设等四个阶段。在对敌斗争中，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采取的方法是：先定目标，对专政对象进行清理、分类、排队，成立大队干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组成的指挥部，然后将全大队的18个生产队分为4个“战区”和20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由干部、知情者、苦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组成，一般5—7人，每个战斗小组斗争一个专政对象。接着，将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分为需要斗争的“尖子”、需要在小会上批斗的对象及一般评审对象，斗争与评审相结合，再在此基础上召开对“尖子”的批斗、控诉大会。最后进行定案处理、落实监督管理工作。经过核实罪行材料，群众提出处理意见，指挥部研究定案，经县委批准，对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分别做出管制、准备逮捕、群众监督改造和摘掉“帽子”的处理。1964年2月18日，中共山东省委批转了曲阜县委关于《曲阜颜家村大队根据中央两个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认为报告“总结的经验很好”，特别是“对敌斗争的工作做得很细致”，要求各地、县“学习仿行”。

这样一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失去了其教育意义，而变成对敌斗争，这明显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

第三节　从小“四清”到大“四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启动后，各地开展运动的过程，也是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的过程，以至于得出了“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并提出了要“追根子”的问题。

1964年3月29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同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谈话时，曾说：“现在看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很坏。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

仍占二分。"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根据部分生产队的排队情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占20%，阶级界限不明，方向不清，随大流的占50%，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问题比较严重占30%，有的已经演变为反革命的两面政权。6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会上，在周恩来、彭真等谈到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基层干部严重蜕化变质的材料后，毛泽东提出："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提出了"追根子"的问题。他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追根子"的话，最早是刘少奇在1964年2月上旬提出来的。在此之前，王光美化名董朴，以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春节期间，王光美从桃园回京，同刘少奇谈起群众反映一些"四不清"基层干部，同公社、县和地区某些干部有牵连，上面有"根子"。刘少奇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边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

1964年7月2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讲道："注意上面的根子是贫下中农提出来的，贫下中农说，'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贫下中农这个意见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要给工作队交待清楚，不要怕，敢追，不要有任何顾虑"。刘少奇自己也未曾想到，这样"追根子"，最后竟"追"到自己头上了。

"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和"追上面的根子"的提出，是党的领导人对农村形势和农村干部队伍的又一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它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广大农村干部，这就不能不使这场运动向着更"左"的方向发展。

196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提出对于过去划错了的成分，都应该认真地审查并改正过来，并规定了贫下中农协会的性质、基本任务、会员、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同社队组织的关系等内容。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中也指出：组织贫下中农协会是党在农村中的一项组织建设，县以下的党组织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后，采取有效措施，使它充分发挥作用。

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农村的"四清"运动和城市的"五反"运动由刘少奇指挥。这年七八月，刘少奇前往全国各地，了解社会主义教育动态，并提出了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问题。7月2日，他在河北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一条重要经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能够确实解决问题，锻炼干部，又出经验。8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把各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分到地委，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中央各机关也抽出人来组成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的准备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这样，工作队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和掌握运动的火候，使运动能搞深搞透有更多的保证，也可少出乱子。毛泽东复信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觉得很好，完全赞成"，并提出要"照此办理，迅速实行"。

于是，全国各级机关和部分高等院校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师生组成工作队，分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人数在100万以上。仅河北一个省1964年11月就集中了10万多名干部（包括1.5万名大专院校师生），经过训练后，在11个重点县和天津市的一个郊区进行"四清"。其中集中在新城一个县的工作队员即达1.5万人。湖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这年底大搞"人海战术"，湖南省委决定将原集中在4000个大队的8万多名工作队员，抽调3.2万人集中到640个大队，使每个大队的工作队员由20人增加到50人。

从1964年8月起，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进行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后十条"修改前，毛泽东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是不要把基层干部看作漆黑一团，第二是不要把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很明显，对刘少奇提出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做法，毛泽东虽然一开始时是"完全赞成"的，但不久他就改变了看法。因为这期间毛泽东在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华北各省、市委的书记谈话时，发现他们并不赞成"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倾盆大雨，而且拖的时间会太长。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第二个"后十条"）。

与第一个"后十条"相比，第二个"后十条"突出的地方主要在于：(1) 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一是看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二是干部的"四清"是否真正解决；三是干部是否参加劳动；四是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否建立起来；五是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六是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2) 提出要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发动群众，是不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分界线。(3) 改变了第一个"后十条"提出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的提法，强调每一个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必须有上面派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4) 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土地改革时漏划的地主、富农，必须查出来，没收他们过多的房屋和家具，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下中农或收归集体。(5) 规定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

第二个"后十条"下发前后，中共中央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加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左"倾的措施。

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认为这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这个总结是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主要是介绍她在抚宁县桃园生产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所以又被称为"桃园经验"。"桃园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四清"与"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桃园大队党支部"打着共产党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基本上不是共产党"，这个党支部书记把持的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工作组进村后，"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敌对斗争"；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在情况还未搞清的时候，就决定"一切依靠基层组织"是错误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敢不敢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发动起来，又有过激情绪时，要注意掌握火候，强调实事求是；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所以"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些干部"大体上在公社、区、县都有靠山、有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搞不彻底；搞"四清"，已经不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库，现在要解决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四不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要补课。

对于王光美的报告，陈伯达极力主张发给各级党委和所有工作队，刘少奇也认为这个报告"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桃园大队的经验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则明确表示："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显然，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中的许多提法，都来自于"桃园经验"。此后，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基本上都是按照"桃园经验"进行的。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都已很"左"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转发《李雪峰致刘少奇的信》所加的批语中，还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向党的各级干部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要求"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9月1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副部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不是"左"倾危险。可以说，从中央到基层，干部的情绪普遍是这样的：早几年是宁"左"勿右，现在是宁右勿"左"；从前是怕右不怕"左"，现在是怕"左"不怕右，说右了不要紧，右了不会出乱子，右了似乎不妨碍生产，右了也没有后遗症。完全反过来了，党内的思想状态是这样的。实际上，右的乱子最大。

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天津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陈伯达直接抓的一个点，天津市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工作组的力量，中央一些部门的干部也在这里蹲点。1964年8月初，陈伯达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汇报了这里抓了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并附有"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图和"历史大事记"各一

份。9月25日，陈伯达领导的工作组以中共天津市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报送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认为，小站地区的“几次民主革命进行得很不彻底”，“建党建政工作，也没有认真执行阶级路线，根子扎得不正；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报告》进而认定，小站地区的政权是“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他们长期“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三个反革命集团”“上面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就是他们的保护人”。《报告》说，工作组进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掌握了不少情况”，但没有打开局面。随后，市委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加强工作组力量，公安局局长带来了一批公安干警，陈伯达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来到小站参加“四清”，“造成像大军压境的局面”。“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群众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把群众发动起来。基层干部有的可以依靠，有的是敌人派进来的，怎么能依靠”?“强调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揭开盖子，彻底揭露这三个集团的问题，展开夺权斗争”。“现在可以说，这里的天下是我们的了”。《报告》总结了小站三个地方运动的共同点是：“都是敌人经过精心策划，有计划地篡夺了领导权，而且统治时间比较长；问题的性质都是敌我斗争，我们的任务是夺权。”

中共中央在为转发天津市委报告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中，肯定了小站的经验，并指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因此，“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前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1964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前一个文件提出：“在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过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按：即贫下中农协会）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没有贫协组织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后一文件规定：“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为及时正确地处理运动中发现的问题，保证运动的彻底胜利，“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上述文件进一步加重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倾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小站经验”。诚然，桃园与小站的做法是有区别的。桃园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是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而小站则完全是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开展夺权的，而且还创造了“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夺权"这样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词汇。但在具体做法上，桃园和小站都是"扎根串连"，都是将基层组织视为"反革命两面政权"，都将斗争的矛头对向基层干部，都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都是进行基层组织的改造。"这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估量一切、把大多数基层干部放到运动的对立面的做法，实际上重复了土地改革中曾经犯过的错误，给广大基层干部造成了伤害"。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两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不但未能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发现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会上的发言中，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1/3打不住。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和"反革命"，自己可能就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

12月28日，会议以纪要的形式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十七条"，即：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相结合，工作队队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生产队规模，基层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最后一条是讲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十七条"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城市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运动的工作方法上，"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把最坏的人，孤立起来。在时间上，一个大队搞半年左右，三年左右搞完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用五六年的时间全国搞完。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是关于农村主要矛盾的提法。刘少奇认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认为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会议讨论矛盾问题时，刘少奇一度坚持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不高兴。在12月27日的会上，陈伯达就矛盾问题作解释时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二是关于运动的搞法。本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主持修正"后十条"前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采取秘密串连、大兵团作战、不依靠基层干部的做法，就有不同看法。在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有针对性地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这样，我们的群众就多了。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

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还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了‘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随后，毛泽东又明确表示，“四清”运动搞大兵团作战是繁琐哲学，搞人海战术不行，扎根串连搞得运动冷冷清清。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讨论了“十七条”，并作了重大修改。文件仍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这一条，全文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提出，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多数；对于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地解放出来，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四清”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也不要搞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对于纠正1964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许多“左”的做法，维护农村的稳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二十三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四清”运动“左”的指导思想，相反，它仍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的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斗争的矛头尖锐地对向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三条”下发后，各地“四清”运动仍在继续。1965年5月8日和5月10日，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分别就今后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问题请示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以县为单位，集中省、地、县各级党委的力量，今冬明春在面上进行初步的“四清”，然后在一个区或几个区进行系统的“四清”，解决在初步“四清”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和落后社队的问题。河北省委的部署是以地委为单位，每个地委搞几个县。两个省委都提出要在农忙季节搞好县、区、社的“四清”，在冬春农闲季节，搞好农村“四清”，在1967年底基本完成农村的“四清”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湖北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湖北、河北的报告，做出本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四清”部署，同时要求在符合六条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快一点地完成农村的“四清”运动。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第四节　“四清”运动对农业的影响

“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组织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在农村进行的一桩大试验，也是当年“反修防修”的一个大举措。对于这场运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做出了客观的评价：“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清”运动虽然在解决当时干部中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场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指导下、在对我国农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它对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四清”运动挫伤了一部分基层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凡是经历“四清”运动的地方，几乎都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干部队伍的不纯情况，做了相当严重的估计。196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山西“全省96个县中，揭出问题较大的县就有44个，占45.3%。其中，完全烂掉的2个，严重右倾的17个，严重闹宗派、闹分裂的5个（包括2个类似地下县委的县），相当右倾的20个。全省96个县委书记中，不赞成这次运动、甚至实际上是反对这次运动的19人，妥协派19人，共38人，占40%”。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估计甚至更为严重。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说，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恐怕有些地方三分之一还打不住，还不止三分之一，可能超过。农村犯有一般性的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各省都说是多数，有百分之六七十。严重四不清，贪污盗窃，多吃多占，几百几千的也不少，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

在“四清”运动过程中，尤其是“后十条”修正草案出台后，对基层干部不但采取了完全不信任和撇在一边的态度，而且还进行批斗夺权，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宽和撤换、处分干部过多的现象，甚至变相体罚和打骂干部。采取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的做法，表面上是依靠群众，实际是不相信群众。因为事先就有了“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的概念，工作组常常一进村，就觉得干部有问题，是“四不清”干部，如果没有发现问题就是工作没深入，群众没发动。只要发现一点“四不清”线索，就穷追不舍，加之工作组以及工作团权力很大，实际上取代了县以下各级组织，有权决定除县委书记、县长以外的县级及县级以下干部、职工的提拔、调整、交流、罢免、撤职、退职、清洗

和补进，对所谓的“四不清”干部可以随意隔离审查，这就难免产生“逼、供、信”，甚至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致使一些干部自杀、逃跑。北京郊区的通县（1958年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1997年改设通州区）1964年下半年“四清”高潮时，来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个工作队打人，发生自杀70多起，死了50多人。陕西省长安县在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甘肃省张掖地区的张掖、高台、临泽、民乐、山丹五个县，在“二十三条”下达前，共自杀212人。对“四不清”的干部，也存在退赔过严的问题，有的地方算干部多占工分时，竟从1958年、1959年算起。不少“四不清”干部只得变卖口粮、房子、衣服、家具等来退赔。而且有的工作组一进村，就主观上认定干部存在“四不清”问题。1965年9月至次年5月，吉林省公主岭市凤响公社泡子沿大队全面开展“四清”，全大队的36名新老干部全成了清查对象，将他们集中起来交代问题，不交代清楚不准回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福祥自土地改革起就一直当干部，工作组认为他当这么多年的干部，一定有问题，就开展内调外查，组织社员揭发，始终没有查出问题，最后硬说他在社员家吃饭不给钱，让他退赔40元，然后免去支部书记职务。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多吃多占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绝大多数通过批评教育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农村干部中也确有极少数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坏分子，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四清”运动中，还存在对干部的处理面过宽的问题。青海省“四清”典型公社被清洗的脱产干部占24.4%，农村党员被开除、不予登记、劝退的占45.6%，公社书记有60%被认为不能继续工作下去。甘肃省“四清”试点县被斗争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1%。据1965年5月对山东曲阜、海阳、齐河、长岛、临沂、泰安、历城7个县的初步统计：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人数占基层干部总数的2.8%；开除党籍的占党员总数的5%—10%；受撤职以上处分的占干部总数的1.5%，属于懒、馋、贪、占、变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福建省连江县第一批“四清”的146个大队和县社机关中，参加运动的干部有79%被定为“四不清”干部。由于“四清”的前提是对基层干部不信任，又采取了不适当的方法，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相当多的干部躺倒不干了。小站夺权是“四清”运动中夺权的样板，“四清”运动结束后，小站地区的党员干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心有余悸。“他们工作上患得患失，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开展工作，恐怕言行有失而挨整。有些村干部动不动就躺倒不干，他们的家属也劝阻甚至哭闹着不让他们当村干部，理由就是一条，干下去没有好下场。结果，区委、公社的领导常常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各村‘扶班子’。”

在“四清”运动中，还过分夸大对敌斗争的敌情，把“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估计得过于严重，又主观地认为他们是“四不清”干部在下面的根子，“四不清”干部是他们的代理人，所以要“追根子”。对他们的斗争则采取了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恶霸的那一套方法，并对其进行管制监督，一举一动都要报告，这样做并不利于他们改造。其实，经过十多年的改造，多数地主、富农已经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想复辟的只是极少数。运动中，又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将一部分群众重新划为地主、富农成分，列人阶级敌人一边，进行批斗，造成了敌我不分，给这部分群众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其次，“四清”运动使“农业六十条”的贯彻受到了严重干扰。“四清”运动起因于对所谓“单干风”的批判，运动中又提出了要批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问题。1964 年 2 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同年 4 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我们党内有--部分同志，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了“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这是一股风，1962 年很猖狂。按惯例，中央领导人接见外宾的谈话要向党内高级干部作通报。毛泽东对“三自一包”的这种态度，必然对农村政策产生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包产到户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而销声匿迹，人民公社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长期窒息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些地方违反“农业六十条”的规定，随意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开展所谓的“拔青苗运动”。

河南省登封县有一个区委规定：自留地全部丈量并重新分配，土地好的自留地要换坏的；自留地打的粮食一律顶口粮，顶分配，有余粮要卖给国家；自留地只准种菜，种“接口粮”，不准大面积种粮食作物；自留地不准多上肥，不准上牲口肥；集体地未种完，不准加班抢种自留地。浙江省奉化县松岙公社强迫没收社员开荒地，说什么“宁肯遍地出青草，不准社员多种粮”。辽宁省本溪县牛心台区南芬镇“四清”工作队规定将社员屋前屋后的零星菜地全部没收，并组织 200 多人到社员菜地里强行毁垅铲苗，连果树也被拔掉了。天津市北郊宜兴埠公社党委书记在一次生产队长会议上说：社员的“小自由”搞得太多，资本主义太严重了，要消灭资本主义。会后，组织基干民兵到社员自留地、开荒地，将已经扬花的小麦，齐胸高的高粱、玉米、青麻全部砍掉。社员心疼地说：“麦子再等一个来月就熟了，可是被共产党砍了头，难道你们就不心疼吗？如果说我们社员犯了条例，可青苗没有犯罪呀！为什么办出这种缺德的事呢?”没收自留地，毁除青苗的事，在福建、广东、江西、山东、甘肃、新疆等地都有发生。

此外，“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现象又在一些地方出现。四川、陕西、山东、吉林等地有些县、社、大队，为了兴修小型水电站和水利工程，“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资金。有的硬性摊派集资任务，致使社员只得卖小猪、卖口粮交款。吉林省海龙县（1985 年改设梅河口市）义民公社在大队会上宣布，凡是参加办水电的队，不论家里有多少钱，一律不准动，在信用社的存款也不准支付，都必须用在办水电上。有的地方不分受益多少，一律分配集资任务，甚至挪用生产队的生产资金，挤占社员分配，影响生产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又据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整理的材料，河南农村部分地区又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如“平调”生产队的资金、物资，办电、办厂；不讲政策，不顾生产队的偿还能力，硬性扣除各种欠账；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力修路、修水库；事事要生产队投资、记工；等等。河南省正阳县采取义务工的办法，修建正阳到

确山的公路，决定从全县各生产队抽调民工2000多人，时间45天，自带架子车，每人每月由生产队供给口粮50斤，现金6元，并要每个大队出3名石工，每人每月由生产队供给口粮30斤，现金6元。

在“四清”运动中，一些地方对社员家庭副业加以限制，对那些经营家庭副业有方或者在集市贸易中赚了钱的社员，当作“单干”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批判。1965年1月28日，《河南日报》发表社论，强调要把发展副业生产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副业生产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集体副业不发展就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留有空子可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为纲去指导副业生产。随着“四清”运动的深人和对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自由贸易也被当作产生投机倒把的土壤和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而被批判，农村集市贸易被严格限制。

还有的地方推行大队核算。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若干问题（草稿)》规定：“队太小有条件合并的，要合并。抓住‘四清’运动的有利时机，解决生产队规模过小的问题，对发展生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建立领导核心，有重要的作用。”这显然是违背了“农业六十条”关于基本核算单位至少三十年不变的规定。广东省普宁县也提出要并队，搞大队核算。

当然，也要看到，农村展开“四清”运动期间，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业生产取得较快发展的时期。1963年至196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6%、13.5%和8。1%。1965年的全国农作物总产值达到了446.8亿元，比严重困难的1960年增长了34.3%，比1957年高出3.3%，从整体上已超出1957年的水平。1965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9453万吨，比1960年增长了35.6%，接近1957年的水平。1965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544斤、棉花5.9斤、油料10.1斤，分别比1960年增长了26.5%、150%、74.1%。1965年农村人均用粮、消费的蔬菜、食用糖及货币收入都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这些说明，经过亿万农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走出了1959—1961年的低谷，凋敝的农村重新有了生机，农业生产已走上恢复性发展的轨道。

1963年至1965年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为克服困难所作的艰苦努力。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即使在严重困难面前，他们也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农民可贵的品质。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中国农村涌现出了大寨这样的先进群体，农村干部中涌现出了焦裕禄这样的模范人物。其次，这期间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要归功于“农业六十条”对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正因为这种调整，使人民公社去掉了成立之初的空想成分，使其规模、组织结构及各项方针政策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虽然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未必是合理的，但这些政策是在人民公社这个外壳之内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的调整，从而调动了广大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期间，全国各条战线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第一节　“生产队一般不要搞夺权”

由于对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认为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1963年至1965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因为这场运动是在夸大敌情的前提下开展的，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使斗争的对象由党外发展到党内，由整“地、富、反、坏”到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追“下面的根子”到追“上面的根子”，以致发展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使指导思想越来越向“左”的方面发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未能解决“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反而使毛泽东认为，中国城乡已有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中。更严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有出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危险，过去的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时能同他合作，但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实现农业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正在演变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逐渐形成了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已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他看来，问题的严重程度已不能通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解决，而必须来一场自下而上的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66年5月，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于农村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规定：“全会完全同意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农村参与“四清”的干部和大专院校的师生，都回到机关、学校“闹革命”去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逐渐瘫痪，农村“四清”不了了之。

鉴于1958年以来农村政策的混乱等原因造成1960年前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还是十分注意农村稳定的。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生产运动，是相互联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我们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指出：“现在，秋收快到了，看来是一个好年成。各级领导，特别是县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领导，一定要不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农忙的时候，‘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勤劳、革命干劲和优良的劳动品质。”

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出：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均不得去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季节，“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群众和本部门干部的帮助下，批评错误、改正错误；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由上级党委决定；对于上级党委任命的干部，不能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

196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抓好秋收》的社论，要求“农村各级干部，人民公社社员，都应当全力以赴，抓好秋收，把丰产的果实拿到手”。社论还提出，在秋收秋种秋购最紧张的日子里，“四清”运动可以暂停。农村“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可以在以后农闲时间进行。

196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再次就“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发表社论，认为“在城乡生产单位搞文化革命，同学校搞文化革命，条件是不完全一样的。为着闹文化革命，学校可以暂时停课，搞内外大串连。而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却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群众可以向上级，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决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连”。

上述这些规定，在“文化大革命”已出现全国性动乱的情况下，对于稳定农村形势，搞好当年的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6年下半年，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形式是学习毛泽东著作。

1966年8月，为配合“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共中央决定将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由此引发了一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据《人民日报》报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已经遍及我国南北广大农村。在4000万人的广东省，目前已有约1000万人参加学习。山西省参加学习的农民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0%。江苏省凡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区，差不多全部社员都参加学习。其他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今年以来参加学习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学习内容之深和效果之大，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农村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自然搞了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到处大搞毛泽东语录牌，大写语录标语，大唱语录歌。湖南省衡阳县自10

月中旬到11月底，“张贴语录120万张，平均每户7张，购置和制作扛式、背式、胸章式语录牌和流动语录红旗58万多件，平均每户3件多，还在家具上、农具上、墙壁上书写大量语录，许多水利工地变成了红旗语录的海洋”。

1966年12月1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 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一般不派工作队。(2) 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之中。(3) 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选举产生。(4) 建立和发展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中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领导职务。(5)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社、队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6) 对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地富反坏右”是专政对象，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反”。这个指示下达后，本来还比较稳定的农村迅速动荡起来。不久，上海发生了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夺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领导权的所谓的“一月风暴”。从此，引发出了全国性的“全面夺权”，并殃及广大农村。

上海“一月风暴”后，一些地方发生了夺大队、生产队领导权的事件。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山东省莒县莒国大队党支部书记吕鸿宾就被大队的“造反派”夺了权。吕鸿宾被“造反派”污蔑为“假劳模”、“黑旗”，批斗了39次。大队的其他党员干部也都靠边站或挨了斗。“造反派”们只管“造反”，不管生产，结果水利设施被毁，集体财物被挥霍，田地荒芜，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山西省阳曲县黄寨公社北留大队党支部书记朱文华，也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大队时“造反派”夺了朱文华的权，并对朱文华及其家人进行残酷迫害，造成这个大队集体经济严重破坏，公共积累全部花光，粮食大幅度减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内蒙古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人民公社白音吐门大队成立了“八一”和“东方红”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1967年秋；又成立了大队“文化大革命”小组，宣布解散大队党支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等干部被赶下台。随后，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文化大革命”小组名存实亡。两派组织为了表示自己最“革命”，竟轮番批斗所谓“当权派”，批判各种生产管理制度，生产和管理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致使1967年的粮食产量由1966年的38.65万公斤猛跌至15.45万公斤。

在“夺权风”的影响下，一些劳动模范也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1967年1月，山西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等倡议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下辖35个“造反”组织，总人数达到30多万，表态支持山西“造反派”1月12日夺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权。2月9日，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县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会上残酷斗争了中共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的主要领导人。2月11日，陈永

贵又主持召开"昔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大会"，宣布成立"昔阳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陈永贵任总指挥，并宣布夺了昔阳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3月5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昔阳夺权的消息，内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中，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陈永贵同志同昔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造了昔阳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把昔阳县的党、政、财、文大权，全部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陈永贵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干部。他为全省、全国的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陈永贵领导的"昔阳夺权"事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部分农村出现的"夺权"活动，不仅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它发生在春耕大忙季节，如果不加控制，必将严重影响到的农业生产，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如果再出现1960年前后那样的粮荒，后果将不堪设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也将进行不下去。为此，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信中同时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明确规定：(1) 在春耕大忙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2) 已经夺权并经革命群众和上级同意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应该切实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搞好春耕生产；(3) 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批评教育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春耕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的社论，强调中共中央3月7日的指示，是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又一重大措施，要求"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革命干部，必须认真学习这个指示，坚决贯彻执行"。

但是，"抓革命，促生产"是一句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的口号，既可以把重点放在"抓革命"上，也可以把重点放在"促生产"上。所以，"革命"与"生产"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起来，1967年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抓革命"而"促"上去，这年的农业生产总值仅比上年增长1.6%，粮食和棉花产量也只大体维持了上年水平。

上述这些文件下发后，并未从根本上遏制农村形势滑向动乱的境地。各地"夺权"之后引发出了一系列的派性斗争，最后演化为大规模的武斗。一些城市的"造反"组织来到农村，挑起农民进城武斗，严重干扰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秩序，也引发社员间的派性斗争。山西省长治地区1967年4月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派性斗争非但未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严重的武斗。双方各自调集民兵进城参与武斗，参加的民兵达数万人，武斗中双方死亡数百人，伤残3000余人，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数亿元以上。针对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这一严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67年7月13日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通知》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

南、河南、安徽、宁夏、广西等地，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有的还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口号，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通知》规定：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已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必须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参加武斗的社员所得到的工分补贴等“优待”一律无效，因进城武斗而造成的伤残事故、生产损失和误工补贴等，一律由挑动者负责。《通知》发出后，对于制止农村的武斗、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1967年全面动乱的情况下，农村形势仍然混乱，许多地方无视党的政策，乱打乱斗所谓的“阶级敌人”，农村“地、富、反、坏、右”这五类人（即所谓的“五类分子”）动辄遭到批斗，随意被打骂体罚和变相体罚、强制劳动。个别地方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恐怖杀人事件。1968年七八月间，广东省阳春县一些持极左思想和派性严重的人，鼓动全县各地以“抓阶级斗争”、“保卫红色政权”、“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为借口，制造乱打乱杀。该县合水公社共打死663人，其中地主25人，所谓的“坏分子”15人，地富子女445人，“坏分子”家属1人，小土地出租者8人，中农3人。据后来调查，阳春全县有298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86.5%）发生过乱打乱杀事件。1967年7月上旬，湖南省道县在一部分品质极其恶劣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的煽动下，以保卫所谓的“红色江山”为旗号，肆意杀害地主、富农及其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与其家属，另有一些干部、教师和医生也被杀害，直至9月人民解放军某部进入道县，才将这一事件制止下来。

1967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第5290号快报上，刊载了时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谈话。7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了陈永贵的谈话。谈话中除谈到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之类外，还提出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绝不能将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广大农村干部多是作风、态度、方法上的错误，属于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很少，应当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要让他们在贫下中农中检查后站起来工作；对待农村干部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和发动贫下中农，城市学生下乡要以贫下中农为师，不要当先生，指手画脚，扶持两派势力等。这篇谈话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冲击，对稳定农村的局面，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篇谈话也反映出陈永贵的矛盾，一方面，他也参与了“造反”的行列，“造”了中共昔阳县委的“反”，支持刘格平等“造”中共山西省委的“反”；另一方面，他对于年轻学生鼓动一些农民“造”他这样的基层干部的“反”，又是反感和反对的。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待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

196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方面强调要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另一方面也表示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指示》重申“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

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解决"，再次肯定"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这些措施的出台，减少了因"文化大革命"而对广大农村干部的冲击，稳定了农村干部队伍，便于他们组织和安排生产，也减轻了"全面夺权"对农村的冲击，降低了"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生产的损失，与城市相比，"文化大革命"头两年，农村的局势基本上没有失控。

"文化大革命"之初农村没有出现全面动乱，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共中央采取了保证农业生产的相关措施。如上述一系列文件的制定，对稳定农村形势、减少"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是有积极作用的，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左"的成分。二是农村不同于城市，农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不便于组织城市中那种人数众多的"造反"组织。三是广大农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造成1967年全国范围的动乱的根本原因是"夺权"，但对于大多数生产队来说，生产队队长并没有多大的权。相反，要领导一个生产队，既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又要应对公社、大队的"平调"摊派，还要解决社员基本的生活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产队队长权不大，但麻烦事不少，把这种"权""夺"来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另外，城市的工人、干部、学生"造反"，不影响他们的生存问题，对于农民来说，如果天天"造反"，不搞生产，不但国家的上交任务完不成，而且自己的温饱也成问题，因为天天搞"革命"不能多打粮食。所以，"革命"当然不能不搞，但生产更不能不搞。四是人民公社的体制和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也在客观上抑制了这场"革命"对农村的渗透。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如果一部分社员去"革命"而不生产，就必然引起另一部分社员的反对，就算"革命"可以记工分，但这种"革命"工分多了，就降低了每个劳动日的分值，直接影响到全体社员的收入分配。五是经过"四清"运动后，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已不在农村，因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见"十六条"）。显然，"当权派"不在农村，也不是依靠农民就可以斗倒的。如果通过开展农村的阶级斗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不需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了。正是因为"四清"运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政治化

1966年至1976年的农村"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特点，是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是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交错进行的。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先进典型能像大寨一样，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寨曾是我国农业战线上一面鼓舞亿万农民的旗帜。它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小山

村，人口不足百户，虽然离县城只有几里地，但自然条件很差，有“七沟、八梁、一面坡”之称。1952年大寨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人都入了社。1956年，转入高级社。1958年公社化后，大寨成为大寨人民公社下的一个生产大队。

公社化后，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现场会，号召全地区学习大寨的管理经验。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中共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并且号召全省农村基层干部“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同时，《山西日报》配发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陈永贵的先进事迹，在山西全省引起了很大反响。

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合作化以来经过十多年艰苦努力整修的土地全被冲垮，社员70%的房屋被冲塌，长势正旺的庄稼水泡倒伏。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大寨人没有退缩，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战胜了洪灾。这年秋天，大寨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700多斤，总产达到了20多万斤，除了留足口粮、种子粮和饲料外，还卖给国家余粮12万斤。大寨大灾之年夺高产的事迹，引起了中共山西省委的重视。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学习，并在全省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大寨的运动。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和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1963年后，虽然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但还未实现根本的好转。此时特殊的国际环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显得特别重要。大寨的事迹传出后，的确感动了许多人，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寨，中国农村的发展需要大寨精神。1964年1月19日，应中共北京市委的邀请，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一万多名干部、群众介绍大寨抗灾夺丰收的事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现场录音。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莎荫、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

1964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邯郸车站听取山西、河北两省委“四清”情况汇报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介绍了大寨抗灾自救、重建家园的情况，讲到陈永贵创造了一个好的劳动管理办法，特点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回到北京后，他详细地阅看了大寨的有关材料。4月20日，受周恩来的委托，陶鲁笳到大寨做了20天的实地调查，于5月25日向毛泽东、周恩来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并对大寨精神和大寨经营管理的经验作了初步总结。《报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六个方面：（1）树雄心、立斗志，不断革命；（2）始终坚持着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3）不仅有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4）干部参加劳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5）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6）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

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汇报，当议论到建设四五亿亩高产、稳产田时，毛泽东插话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这是毛泽东对大寨的第一次公开肯定。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认为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并将大寨的基本经验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从1965年起，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广大农村以大寨为榜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建设高产稳产田，涌现出了一批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如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大队，福建省连江县东升渔业大队，湖南省岳阳县毛田区，河南省林县（1994年改设林州市）等。

为检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成果，推广大寨式农业单位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把学大寨运动引向深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谭震林的直接指导下，1965年11月，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参加展览的共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这次展览引起了巨大反响，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向纵深发展，促进了1965年、1966年两年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是大寨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他们当初的苦干，目的就是为国家做的贡献大一点，自己的生活好一点。大寨精神是时代的产物，大寨成为典型也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大寨艰苦创业的精神，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发扬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于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干劲，推进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改变当时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都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也应该看到，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之际，正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因此，对大寨精神的总结，就不可避免地带上这场运动的某些烙印。1964年初，中共晋中地委宣传部编写的《晋阳大寨先进经验宣传要点》中，第一条就是介绍大寨"坚持党的阶级路线"的经验。其中说："办好集体经济，必须有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大寨生产大队革命的红旗举得高，集体经济办得好，首先是因为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深切地领会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又如上面提到的陶鲁笳总结的大寨精神的第二条，就具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陶鲁笳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1期上发表的《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山西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中，更是提出大寨"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的各个时期，从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并认为"学大寨的运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的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步总结》对大寨精神作了新概括，将其归纳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一条红线"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总路线"挂帅。"五个要点"即：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有大胆踏实、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有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高尚风格。

在"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下，大寨人自己也在有意识地强化这种观点。1966年3月，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时，着重提出："首先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他还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这种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寨经验也就逐渐地演化抓阶级斗争的范例，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昔阳夺权"后，长期以来成为昔阳县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又成为晋中地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从一个劳动模范成为一名有相当影响的政治人物，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同时，大寨的经验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不断地政治化。1967年6月，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在大寨召开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农业学大寨现场会。陈永贵在讲话中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要坚持四条基本经验：第一，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学大寨，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第二，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第三，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才能学到大寨经验；第四，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四点大寨经验，没有哪一点是与生产相关的。大寨由原来的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典型，大寨的生产建设经验也演化成阶级斗争的经验。

1967年9月10日至17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昔阳召开学大寨现场会，即第一次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会上，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昔阳县革委会主任陈永贵做了《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报告，系统总结了大寨"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报告回顾了大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说"大寨是在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多少年来，黑省委、黑地委干了一系列的反大寨的罪恶活动，最主要的是树黑旗，压红旗，树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其实，没有原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对大寨的发现和培养，大寨哪能成为全省、全国的典型？会议结束时，《山西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次会议是"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伟大起点，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全省学大寨运动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社论中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这时起，山西和全国的学大寨运动的确发生了质变。

1968年10月15日至11月2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昔阳召开第二次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山西的代表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是学习大寨的"新成就、'新经验"，其实也就是"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经验。会议提出，学大寨根本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大抓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也要学大寨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发

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次会议继续和发展了山西第一次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的“左”的错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狠抓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记大寨大队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坚持革命斗争的经历》的文章，将大寨的基本经验总结为：“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坚持不懈地与人斗。”

同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昔阳县学大寨所取得“重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这就是“把学大寨当作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把学大寨和农村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昔阳在全县学大寨中，将大寨精神具体化为五个方面：（1）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当作第一需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大破资产阶级“私”字，实现思想革命化；（2）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3）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勤俭创业；（4）干部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5）大公无私，助人为乐，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

1970年8月18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决议》，把昔阳县能在全县推广大寨经验，建成全省第一个大寨式的县，归纳为三条经验：“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整党结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揭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盖子，重点放在清除混入党内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坏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社、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人——贫下中农手中。这是推广大寨经验的要点所在。二是用革命化领导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三是狠抓基层，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寨，就是要大搞阶级斗争，这就把学大寨运动引向了“左”的轨道上。

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大寨不惜人为地编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如所谓的“老少组”与“好汉组”的对立。在1966年到1968年的三年时间里，大寨这个不足500人的小山村，参加各种批斗会的总人次数竟达10万之多，仅社员贾承良的家庭批判会就有120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来许多的先进典型已风光不再，唯有大寨成为一面不倒的旗帜，谁也不能对学大寨有疑义，不但如此，大寨经验也成了不得违反的“金科玉律”。在当时，反对学大寨，是严重的政治问题。1970年11月，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山东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报告》，其中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学大寨，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是一句空话”。这几句话，可谓抓住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学大寨运动的本质。

第三节　“割资本主义尾巴”

本来，大寨精神和大寨经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文化大革命”学大寨的过程中，虽然也提这个问题，但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附属物，而且将一些大寨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做法，也当作大寨经验去学习和推广，导致一些地方推行一套与“农业六十条”相违背的“左”的做法。

第一，没收或减少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

应该承认，大寨的集体经济是搞得比较成功的，这应归功于大寨有一个能力强的带头人和一个有号召力的党支部，对陈永贵如何进行评价是另一个问题，但陈永贵与大寨大队党支部对大寨所做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事实。也正因为集体经济比较好，大寨才可以在 1963 年特大洪灾之时，利用社员对集体的高度信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渴望，趁机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本是违反“农业六十条”的相关规定的，但大寨较雄厚的集体经济和较好的集体生产，使社员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对于全国大多数农村来说，并不具备大寨这样的条件，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社员的收入和生活中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多一分自留地就多一分私心”的“左”倾思想支配下，许多地方在批判“三自一包”的过程中，夸大社员种自留地与从事集体生产的矛盾，错误地认为“谁的自留地种得好谁的私心就重”，将社员的部分自留地收回，仅黑龙江省阿城县在 1969 年的 9—10 月，就收回社员的自留地、小片开荒地 44000 亩。也有一些省、市、自治区将社员自留地由原来占总耕地的 7%降至 5%。山西省长治地区 80%以上的农村的自留地被收归集体代种，每个社员年终发给不足 30 斤的“自留粮”；约 20%的农村则干脆取消自留地，也不发给“自留粮”。即使允许社员有少量的自留地，也对其种植范围加以种种限制。如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红光大队规定，自留地只准种粮食、油料、饲料和少量蔬菜，不准种花草、高档商品菜和其他经济作物。

公社化时，曾一度将社员饲养的家禽家畜、房前屋后的小片林木作为“私有制残余”而收归集体，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将社员的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和“资本主义尾巴”加以严格限制。一些地方规定社员只能每人养一只家禽，一户只能养一头猪。有的地方甚至取消社员养猪、养蚕、养蜂、养兔等家庭副业，代之以集体统一经营。河南一些地方规定，社员不准上山采集野生植物，不准私人养母猪，不准在自留地种生姜、药材等经济作物，不准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树等。

集市贸易也被严格限制甚至被取缔。在批判“三自一包”的过程中，农村集市被扣上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的罪名，农民将自己生产的鸡蛋、蔬菜等拿到集市上出售，被指责为“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而遭批判甚至被没收，正常的商品贩运被当作“投机倒把”而严格禁止。1967 年 9 月 13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

出《关于加强农产品市场管理的通令》，规定凡属国家征购的品种，不准上市买卖；生产队集体的粮食、油脂、油料只准卖给国家，不准上市成交；棉花市场长年关闭，社员自留棉只能由供销社进行收购；大麻、苘麻在国家收购期禁止上市买卖，收购结束后经地、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后开放市场，购买者一次限购大麻2斤、苘麻5斤；等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农贸市场几乎全处于关闭半关闭状态。1961—1963年的经济调整时期，集市贸易曾有相当的发展。1963年，全国共有农村集市数38468个；到1975年，只剩下32000个，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少了5000个。

第二，在批判“工分挂帅”中推行大寨式的评工记分方法，造成平均主义泛滥。

1966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分挂帅，铜臭熏天》的文章，认为“搞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就是走地主、富农路线，有害于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害于社会主义革命”。“搞工分挂帅，还会助长社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较早批判“工分挂帅”的一篇文章，不过这篇文章把鼓吹“工分挂帅”的罪名挂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身上。

到了1967年，“工分挂帅”就是“革命大批判”中批判刘少奇的罪名了。1967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批判文章说：“毛主席给我们开辟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阳关大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施展条条毒计，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唱对台戏。他胡说什么‘工分越不值钱，大家越不干’，鼓吹‘工分挂帅’。”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的所谓的“革命大批判”中，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刊发着这类文章。

在批判“工分挂帅”的同时，一些地方不顾自己的实际，推行大寨实行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记分制度。

公社化初期，大寨大队实行的是按劳动定额、计分付酬的分配办法。这套办法实行了三四年，制订了一百多种劳动定额。由于劳动定额太繁琐，而且地块多，质量是否合格也无法检查，容易产生抢工分、不顾质量的问题。加之一个组里，生产技术、劳动态度也各不相同，每天干完活后还得评工分。结果，“当天干活多的人，说自己干劲大，应该多记工；干活少，多挣不了工分的人，却说那些人是瞎报哩。评不下个结果，还是按底分记分”。从1963年开始，大寨逐渐形成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计酬制度。

这种计酬制度的具体做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工天数；到月底总结评比。方法是先看这一段数哪个社员劳动态度最好，出勤最多，干活质量最高，就评定这个社员为标兵，其余的社员按照自己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己报自己应得的工分，大家评议。评议没有意见的按自报记工，自报不合适的，经评议后修正。1966年3月22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大寨的这种做法，认为这种计酬制度摆脱繁琐定额制度，能腾出更多时间；报酬不悬殊，更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干部不包办代替了，更充分发扬了民主；省了检查验收等好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编者按，肯定了大寨的这种做法。

“文化大革命”前，个别地方从报刊上看到大寨大队的这种评工记分制度后，也采

取了类似的办法。如湖南省南县武圣宫公社天福大队从1966年4月起，就仿行了大寨的计酬办法，确定记工员只记社员的出工时间，工分到月底根据劳动态度进行总评，并议定标兵工一天为10分，早晨出工占15%，上午占45%，下午占40%。

陈永贵领导“昔阳夺权”后，乃将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制度推广到昔阳全县，并改名为“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而将此前昔阳大多数生产队实行的劳动定额制度斥之为“修正主义、工分挂帅”。1967年5月，中共晋中地区核心小组在昔阳举办大寨劳动管理训练班，接着在全地区推行了这种劳动管理办法。

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生产领导班子两次在大寨召开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全国除西藏、台湾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1968年4月3日，农业部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军管会印发了两次会议的纪要，强调“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的问题”，要求“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高潮”。

在“革命大批判”批判“工分挂帅”的过程中，大寨这种劳动管理办法被广泛推广。到1968年9月，山西、山东、黑龙江、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推广这种办法的社、队占到全部社、队的半数以上。

这种“自报公议”的计酬方法，在劳动力紧张、社员觉悟比较高的个别地方可能是行得通的，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劳动定额繁琐、评工记分麻烦的不足。但是，当时大多数的生产队并不具备能够实行“自报公议”的条件，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要“突出政治”的情况下，政治思想好不好成为评议工分的重要依据。那些劳动力弱、技术水平低、劳动贡献少的社员可以因“政治思想好”而得到较多工分，而劳动力强、技术好、贡献大的社员，却又因不能搞“工分挂帅”而得不到应得的工分，实行这种制度的生产队评出来的大多是“大概工”，严重地损害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助长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大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中，少数地方还公开推行“吃粮不要钱”的分配政策。1968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革命委员会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当作“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遗毒”而加以取消，做出在全县农村实行“吃粮不要钱”的决定。由于干不干都吃饭，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许多公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数大为减少，不少社员外出挣钱而不参加生产劳动。该县昝岗公社丁庄大队有一个生产队，36户中有34户外出，42个劳动力中有37个外出，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5人，干部也无人愿意当，一年之中换了八任生产队长。

第三，合并基本核算单位，“穷过渡”风再度刮起。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地方违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关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少三十年不变的规定，大搞社队合并。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虽然规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也规定允许部分地方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寨就一直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寨坚持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有其特殊性。一是大寨大队的人口并不多，1964年，大寨大队只有2个生产队、83户、359人，这只相当于一个较大的生产队的规模。二是大寨多年来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群众中有号召力，党支部有凝聚力。三是大寨从1959年起就一直是昔阳县和晋中地区的先进典型，集体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的一切都具有神圣的光环，对全国农村产生特殊的影响。1966年11月，大寨所在的大寨公社就提出了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问题，并提出了“建立起革命左派政权、大寨式党支部”等四项过渡条件，及有利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根子，有利于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有利于加强党的生产队的领导”等十大好处，并借用群众的话说：“只要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才能真正地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1967年上半年，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即在全县推行大寨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将之作为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大措施。1967年11月，中共昔阳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提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已经适应不了生产需要，狭小的生产范围，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由生产队一级核算单位变为生产大队一级核算，已成为人心所向，势在必行”，并总结了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九大好处，要求全县在这年11月内“把变革核算单位搞下来”。

在大寨和昔阳的影响下，一些地区又开始进行社、队合并和不顾条件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山西省长治地区1962年有23.2%的生产大队是核算单位，1970年上升到62.8%。湖南省长沙县1970年11月至次年1月合并生产队1512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2%。河南省南阳地区1970年比1967年减少了1018个生产队，减少了243个生产大队，减少了175个公社，其中公社减少了近50%。据山西、河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62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仍有5%的生产大队是核算单位，到1970年上升到14%。其中山西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公社超过半数，浙江有1/4的公社实行了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

下放基本核算单位是经济调整时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它较好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深得广大群众拥护的一项政策，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恢复性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大队和公社的集体经济没有根本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所有制的过渡，仍然是“穷过渡”，只能是穷队“共”富队的“产”，侵犯富队的利益。

在1970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急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初步败露。会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展了批陈（伯达）整风。在这种情况下，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尽可能地采取了一些纠正极左的措施。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与关怀下，国务院召开北方14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

务院关于北方农业会议的报告》。《报告》强调，“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作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但“农业六十条”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贯彻执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对于所有制问题要谨慎对待。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影响社员当年的收入。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要发展社队经济，但切不可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不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对现有一些社、队随意增加非生产性人员和非生产性开支，降低社员收入，影响社员积极性的做法，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1971 年 2 月，全国计划会议就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会议指出，要正确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能把粮食生产同多种经营对立起来，要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重申要划清多种经营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同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的界限，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在所有制问题上，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已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如果增了产，多数群众确实满意，可以不再改变，多数群众不满意又减了产的，应当根据多数群众的意愿，作适当的调整。在分配问题上，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防止平均主义。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协作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抽调非受益社、队的劳动力，要付给合理报酬，任何单位都不得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工具、物资，不可摊派资金和发动社员捐献或投资。不能随意拆民房、盖“新村”、“划方块田”，以及搞应付参观评比的形式主义；改革农业耕作制度，推广技术措施，不能强迫命令、“瞎指挥”。这些问题的提出，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

1971 年 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针对农村中存在的“分光吃净”、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提出：积累不能太多，要使农民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增加收入；口粮分配要采取基本口粮与工分分粮相结合的办法，或者大多数社员拥护的其他办法；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生搬硬套，要坚持当地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欢迎的、简便易行的方法；社、队不要任意增加脱产人员，社、队干部的工分补贴不能超过“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等。

上述几个文件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等“左”的做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也使我国农业生产摆脱了 1967—1970 年连续低迷的状态，在 1971—1974 年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1971 年 11 月，《人民日报》有针对性地报道了中共河南新乡县委在对待社员房前屋后林木、工分等问题的做法。报道介绍了两个具体的事例。一是 1970 年春，合河公社永康大队党支部个别成员认为，社员在房前屋后种植树木，是“资本主义倾向”，打算

收归集体。为此，"县社负责同志就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政策的论述，联系实际，回顾本队林业发展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停止了这种错误做法。二是洪门公社洪门大队在批判了"工分挂帅"以后，有的干部错误地认为，社员向集体交肥料给报酬就不是政治挂帅，取消了社员投肥计酬的规定，挫伤了社员积肥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洪门公社召开现场会，"讨论政治挂帅与执行政策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搞'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取消合理计酬，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同样不是政治挂帅"。在此前后，《人民日报》还相继刊发一些类似的报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它的报道和言论，所产生的政治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节　普及大寨县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了普及大寨县阶段。

1970年的北方农业会议虽然重申了"农业六十条"所规定的基本政策保持不变，对于纠正人民公社一些"左"的做法、稳定农民思想、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次会议的主题，却是"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

为了配合北方农业会议的召开，《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建设大寨式的县的问题。社论说："为了更快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寨式的先进大队，满足于部分县、地区和几个省、市跨过了《纲要》，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昔阳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以比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社论向县一级领导班子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从大寨大队到昔阳县——山西省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的文章，称"昔阳县已成为大寨式的县"，并介绍了昔阳县成为第一个大寨式的县的经验。

大寨所在的山西省率先开始了普及大寨县的步伐。

1971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太原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学大寨、赶昔阳的根本"，"县委领导班子革命化是建设大寨式的县的关键"。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根本。这次会议标志着山西的学大寨运动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发展成为建设大寨式的县。

1973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山西再次在昔阳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学习大寨在林彪事件后"批林整风"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新套套"、"新经验"。会议将学大寨运动的新认识总结为三条：第一，学大寨，首先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向农民群众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第二，搞社会主义

农业，必须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第三，建设大寨式的县，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

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将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与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要挂在业务上"，在农村要贯彻落实"农业六十条"的基本政策，学习大寨不能搞形式主义。这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有所纠正，对于一些学大寨运动中的先进典型的介绍和报道，也着重是在如何带领群众发展生产。1973年7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苏省吴江县学大寨赶昔阳的事迹，介绍了吴江县是如何抓好粮食生产和搞好多种经营的，通篇报道中都没有以往学大寨经验中不可缺少的如何抓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大寨经验、大寨精神的本来面貌。

但是，这段时间延续并不是很长。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左"倾错误的纠正，遭到了江青等人的阻挠和破坏。他们利用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提出批判林彪要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鼓动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并借机大反所谓的"复辟回潮"，大批"唯生产力论"。由于江青集团的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又重复过去"左"的一套。

1974年8月31日，为纪念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周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昔阳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将昔阳学大寨的"新的认识"总结为两点：第一，办社会主义农业，不是简单的人和物、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土地、肥料加技术。只有不断同阶级敌人斗争，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同资本主义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办好社会主义农业。第二，必须注意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韵阶级斗争，教育农民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树立起为革命种田的思想，社会主义农业才会越办越好。这样，"大寨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所有制变革以后，农村如何继续革命的一面旗帜。学大寨，首先要抓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解决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大寨和昔阳还总结出了一套"消灭资本主义"的经验："把资本主义从山上赶到坡上，从坡上赶到村里，从村里赶到房前屋后，从房前屋后赶到家里，从家里赶到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再专好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政，彻底消灭它。"按照这一思路，许多农村又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活动，收回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取消农村集市等。

在大寨、昔阳"左"的做法影响下，1974年11月，昔阳县所在的晋中地区开展了一场所谓的"围歼资本主义倾向"的运动。晋中地委认为，晋中地区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在农村存在"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无限制地发展家庭副业；大种自留地、以副伤农、弃农经商、损公肥私、多吃多占、城乡资本主义勾结起来侵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等13种"资本主义倾向"，要求全区各级党委"狠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结果，农民韵家庭副业被严格限制，只允许养猪、养鸡，许多家庭副业搞得好的农民被批斗；大多数农村集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被取消；社员部分自留地、自留树被收归集体；大寨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计酬方法在全地区全面推行。

1975年8月，陈永贵向毛泽东建议，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同年9月13日至10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结果只有个别人赞成，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会议决定暂不改变现行政策，待以后看条件是否成熟再考虑这个问题。

自1970年提出建设大寨式的县以来，几年时间过去了，真正称得上是“大寨式的县”的也就只有山西昔阳。为了加快建设大寨县的进程，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中共中央先在昔阳、后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各地代表3700多人。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主持。

在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着重讲了农业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和全面整顿的问题。邓小平说，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是基础，如果农业搞不好，就有可能拉我们国家的后腿，因此，一定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个方面都要整顿，强调“农业要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问题”。

会议期间，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分别介绍了大寨和昔阳的经验。郭凤莲将大寨的经验概括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顿过在政治、思想、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天也没有放松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王金籽则将大寨的道路总结为：“大寨的道路，不是一条简单的治山治水的路，也不是一条简单的提高粮食产量的路，大寨的道路是一条继续革命的路，也是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路。”并且说，昔阳学大寨的经验，就是“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

会议结束时，华国锋作了总结报告。报告提出了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1) 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2) 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3) 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4) 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5)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6) 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要在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要发展与农业机械化相适应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地方“五小”工业，发展公社和大队企业，促进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报告要求苦战五年，到1980年，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其他的县也都要建成更多的大寨式的大队和公社。

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和江青集团正准备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背景下召开的。由于“左”的干扰，会议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和目标，大寨和昔阳的经验也都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左”的一套。但

是，会议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东西，如要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社队工业等，这对于农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普及大寨县运动，还未来得及全面铺开，就被随之而来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冲淡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复辟”、“反倒退”的口号下，许多已经得以纠正的“左”的政策和做法，又重新推行。

一些地方在“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口号下，将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副业生产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和限制；在集市贸易上强行推行“哈尔套经验”，只许“赶社会主义大集”；在所有制方面，一些地方又搞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到生产大队的过渡。政策的反复再度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致使1976年全国共有17个省、市、自治区粮食减产，其他主要农产品都较之1975年有大幅度下降，其中油料减产竟达50%以上。1976年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的收入比1974年还少3元多，全国有1/3的农户是超支户，安徽全省人均年纯收入在5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30%以上。

当然，也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农田基本建设及农业机械化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1966年至1976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十年共增50%；农业机械总动力1970—1978年间年递增24%，1978年是1970年的5.4倍；机耕面积年递增11%，1978年是1970年的2.2倍，1979年全国农田机耕率达到了42.4%。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转向建设大寨县之际，西藏自治区于1974年完成了全自治区的人民公社化。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基本上维持了原有的政治制度。1959年，西藏的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叛乱平定后，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196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同意西藏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试办人民公社，同时强调，西藏建立人民公社时，宁可时间用得长些，准备得充分些，搞得稳些，应该先在专区和少数力量强的县的领导下搞人民公社试点。1965年7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工委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通嘎乡试办了一个人民公社，到1966年底，全区试办了150多个人民公社。至1970年，全区已有30%的乡办起了600多个人民公社。

1970年6月，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会同国家农林部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同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可以分为两级，也可以是三级，生产队的规模不宜一律为30户，可大可小，因地制宜。生产资料入社，采取何种办法，由群众自己决定，要给社员留自留地、自留畜。建立人民公社要实行“积极领导，分期分批，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已办起的人民公社要进行整顿。按照这个指示精神，经过四年的努力，1974年10月，西藏全区的2096个乡中，90%以上建立了人民公社。鉴于特殊的条件，西藏的人民公社一律只设公社和生产队两级，由

公社直接领导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75年，全区1929个乡（不含阿里）中，先后建立人民公社1921个，共有生产队1万多个，平均每个生产队28.8户。

第五节　社队企业的发展

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民公社，值得一提的是社队企业的发展。

社队企业最早出现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初。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提出：“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随后，各地出现了一批社办企业。

按照当时办人民公社的设想，公社本身就是由工、农、商、学、兵组成的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办公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工农业并举，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办工业自然是办公社的题中之义。195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强调人民公社要在“切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于是各地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建起了一批农具厂、修配厂、小水泥厂、土化肥厂、土农药厂及其他各类“小土群”工厂，原来的合作社办的小企业，自然也转为公社所有。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起社办工业企业602万个，产值62.5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8%。

人民公社初期的社办企业，基本上是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四无人员的情况下，采取“空手套白狼”的办法，按照“有啥办啥，要啥办啥，要多少办多少”的思路，靠“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办起来的。它不但占用了大量的生产资金，而且由于设备简陋，缺少技术，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益，很多所谓的企业，没有多长时间就自生自灭了。1959年上半年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对社办企业也进行了一次整顿，精简了部分社办企业人员，改变了“要啥办啥”的方针，规定社办工业的任务是农具的简单制造和维修，本地农副产品的简单加工，生产当地的传统产品和小型的矿产开采如砖瓦、石灰等建材的生产，凡是与现代工业争原料的公社工业，要给现代工业让路。这样，一哄而起的社办企业大多停办了。1959年5月，全国社办企业减至87万个，1959年底进一步减至70多万个。

1960年的“大跃进”再次提出了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口号，但由于国民经济很快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尤其是农业生产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必须将人力物力充实和加强农业生产。首先解决与人民生存密切相关的粮食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1960年11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明确规定：“凡是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应该集中全力做好对生产队的检查督促工作，不要直接经营生产企业。”同时规定已办的生产企业，或者交给公社，或者下放到生产队经营，以减少同生产队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为了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从“十二条”出台起，中共中央对“共产风”问题花了大力气进行纠正，并制定了坚决退赔的政策，而且规定原则上必须退还原物，只有原物已无法退还的才可以折算为现金。人民公社社队企业的厂房、资金、设备等，绝大多数是通过刮“共产风”刮来的。现在要将这些东西退还给生产队或社员，企业也就只好倒闭垮台。加之为了加强农业生产，中共中央要求“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整顿县社工业、精简人员”。按照这个要求，社队企业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精简。这样，社队企业已所剩无几。1961 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都对社队企业作了严格的规定，强调社队企业的举办，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占用大队的劳动力不能超过总劳动力的 2%等。

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同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重申“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有的公社、大队企业下放给生产队经营。这样，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迅速萎缩，社队工业的总产值，从 1959 年的 100 亿元下降到 1965 年的 29.8 亿元，社队企业的收入在整个农业收入中只占了微不足道的比重。1964 年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别地方在工作队队员的帮助下办起了少量的社队企业，但总的规模和产值都不是很大。

“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客观上刺激了社队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是农村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20 世纪 60 年代，除了头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我国人口曾出现负增长外，从 1963 年起，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1960 年，我国人口为 6.62 亿人，1966 年达到了 7.45 亿人。农业人口从 1956 年的 6.04 亿人增长到 1970 年的 7.03 亿人，增长了 16.4%。人口的增长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由 1956 年的 0.17 公顷下降至 1970 年的 0.14 公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江浙地区更是如此。当时，社员家庭副业受到严格限制，而农业生产又不需要如此多的劳动力，必须寻求新的出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农业机械化的促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在当时是一句世人尽知的口号。1970 年的北方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不搞农业机械化，光靠手工劳动，就不可能更快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不可能改变六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也不可能腾出劳动力加快工业建设。为此，会议提出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争取耕作机械化水平达到可机耕面积的 50%左右，排灌机械化水平达到 60%左右，在今后十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会议提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办大大小小的企业要逐年增加，要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做到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发展以钢铁等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地方“五小”工业。当时，国家不可能对农业机械化投入大量的机械设备和所需资金，而需要社队自己解决。为此，建立与实现农业机械化相适应的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等小型企业，既可直接为农业机械化服务，也可为农

业机械化积累资金。

三是“文化大革命”为社队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其一，由于这一时期许多工厂搞派性，打派仗，“停产闹革命”，造成了市场供应紧张。1966年至196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连年下降，许多工业产品产量大量减少，棉纱、棉布、丝及丝织品、保温瓶、灯泡、服装等12种产品的总产量，1968年比1966年下降了12%—54%。一些重要产品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或出口任务，有关工业主管部门和工厂于是派大去农村帮助社队建厂，以完成生产任务。其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客观上沟通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一些下乡知青，或者本人出于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意愿，或者其家长为改善与知青所在社、队的关系，改变知青所在地的落后环境，主动为社、从与相关单位牵线搭桥，为社队企业提供项目、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资，推动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一些地方为了使知青扎根农村，也投资办起了一些知青工厂。其三，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某种保护作用。社队企业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自然不能纳入国家计划，而它又必然要与国营企业争市场、争原料，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办社队企业常常被指责为破坏“以粮为纲”的方针。但毛泽东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讲过：“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毛泽东语录神圣不可侵犯的情况下，这就为社队可以办企业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文化大革命”期间，社队企业在这种的特殊机遇下有了较快的发展。1965年，全国有社办企业1.2万个，到1970年达到了4.5万个，产值由。5.3亿元上升到26.6亿元，分别增长了3.8倍和5倍。

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国务院专门召开农业机械化会议（即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提出到1980年农、林、牧、副、渔业的主要机械化水平要达到70%以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议要求社队企业逐渐增多，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发展以钢铁等原材料为主的地方“五小”工业，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物质基础。

此后，各地人民公社陆续办起了一些农机修理、修配厂站，许多生产大队办起了农机修理点，随后又在这些厂、站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机械加工企业，从而使社队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社、队，靠近上海等大城市，利用有一定技术的退休退职回乡的工人较多，一些国营工厂停工停产完不成任务等条件，开办了一批社队企业。江苏省无锡县（1995年改设锡山市）是社队工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由于社队工业的发展，该县1971年社队工业积累达1261万元，1972年达到1649万元。

其他地区的社队企业也有较大发展。1973年，河北省束鹿县（1986年改设辛集市）31个公社，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办起了棉油加工、毛毡、烧碱等70多个轻工业小厂及柳编、瓦盆、槐胶、制皮等多种副业，生产上百种产品，一年收入200多万元。到1975年，湖南省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办起了农机修配厂、水泥厂、石灰厂、农机站和园艺场等14个企业；大队一级，队队办有综合加工厂、园艺场，有的兴办了陶器厂、采

石场等。湖南省醴陵县所有的公社和90%的大队在1975年都办有企业，共达1780个，社队企业的总产值达2700多万元，占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3%。

1974年12月28日，华国锋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肯定社队工业对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信中批评了那种企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的错误思想，认为应该热情地支持这一新鲜事物。

1975年9月5日，浙江部分财政、银行干部得知即将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国锋，反映浙江省有部分领导干部对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态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致使一些社队企业自流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了弯路。对一些搞得好的社队企业，省、地、县领导部门就千方百计将其转为大集体专业社、厂，又将大集体专业社、厂转为全民所有制国营工厂，还说这是社会主义方向，否则就不分配原料，不安排销路。信中恳请中共中央对这方面做些新的指示。

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将其批给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请邓小平考虑可否将此信及华国锋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和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发表的题为《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一同批给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阅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指示将这些材料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至全国县级以上党委。随后，邓小平又将这三份材料印发给了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接着，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充分肯定了社队工业发展对促进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加快农业机械化所起的作用，要求各级党委"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推动社队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1974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介绍了回郭镇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并配发了题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企业》评论员文章，认为社队企业是壮大集体经济，加速实现机械化，从三级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

这样，社队企业终于从原来的遮遮掩掩的半地下状态，变成了光明正大、"光明灿烂"的事业。到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发展到111.5万个，总收入达272.2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23.3%。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43.5亿元，比上年增长43.7%。

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农村曾掀起了以"滚珠轴承化"为主要环节的农具改革高潮，由于缺乏物质、技术准备，土法上马，以致生产出来大多数农具都不能使用，造成巨大的浪费。与此同时，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107个国营拖拉机站，也将大多数的拖拉机和农具下放到人民公社经营。到1960年，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普遍都有了自己经营的拖拉机站。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群众性的农具改革停止下来，下放给公社的拖拉机站也因管理不善、损坏严重而重新收归国营或国家、公社合营。

1966年2月，中共湖北省委提出，要采取集体办机械化为主、国家扶助为辅，"以

机养机”，分期购进，无息贷款等办法，在十年内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并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的政治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个设想“很好”，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66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精神，确认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但是，会议进行之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回去之后，还未来得及传达会议精神就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接着，全国出现了大动乱的局面，农业机械化事业也陷入无政府状态。

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理网。1971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提出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通过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纲要》(讨论稿)。随后，中央有关部门又多次召开有关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全国性专业会议，在1975年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也强调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地、县领导机关，必须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快农业机械化工业的速度，保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在此之前，国家已陆续将国营农机站全部机具下放给农村社队，一部分驾驶人员也随机下放。国家为支援部分资金困难的社队发展农业机械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无偿投资。1973年起，全国组织1万多个凿井队，开动10万台钻机，每年在北方地区打机井20多万眼；在南方地区则兴建了一批中小型排灌站和一批大型的骨干泵站，加快了排灌机械化进程。这期间，农副产品的机械加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粮油加工的单机作业机械化。到1974年上半年，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农机管理站的公社共达2.9万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58.7%。

第九章　解　　体

第一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终结

1976年10月，江青集团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留下了大量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问题，各个领域都必须进行拨乱反正。经过多年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之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热切期待生活的改善。自1958年到1976年，我国农业生产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扣除人口增长因素，农民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他们迫切要求党调整农村政策，给其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是，"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没有对长期的"左"倾错误的危害进行清算和反思。相反，还仍然延续"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的政策和做法。粉碎江青集团后头两年，农业战线的最大举措，就是继续强化学大寨运动和普及大寨县。

1976年12月10日至12月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代表。会议的规模和隆重程度都超过第一次。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中说："一年来，围绕坚持农业学大寨还是反对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的大搏斗。"报告强调："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当前，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放手发动亿万农民，打一场大揭大批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这一仗打好了，就能大大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就能大大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步伐。"报告提出：到1980年要把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切实做到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会上，大寨大队和昔阳县的负责人也分别作了发言，主要的内容则是介绍大寨和昔阳是如何同江青集团进行斗争的。

会议结束当天，华国锋作了讲话，重点是布置1977年全党的工作，关于学大寨问题，华国锋表示："学大寨、学大庆，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实际上也是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主题。而《人民日报》就会议召开发表的社论，更是明确地提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群众运动。""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走大寨的道路，就是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在农民这一部分最众多的人口中，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这样的主题之下，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就不可能回复到它的本来意义，而只能是延续"文化大革命"期间学大寨运动中的"左"的那一套。

1976年底，大寨所在山西晋中地区全面推广昔阳完成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到基本大队所有制的过渡"经验"，认为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为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经济领域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今冬农业学大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晋中各县纷纷加快过渡步伐，已实现基本大队所有制的昔阳则开始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过渡问题也引起了华国锋的重视。1977年11月，根据华国锋的指示，中共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指出，要抓住揭批江青集团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来一个高速度。1980年粮食要达到7000亿斤，今后三年都要有7%的增长速度。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实现由生产队到生产大队的过渡，是我们的前进方向。各级党委一定要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成熟一个过渡一个，成熟一批过渡一批。会议共讨论了12个问题，形成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汇报提纲》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提出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普及大寨县"结合起来，开展"一批二打"运动：即揭批江青集团，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这是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最好形式。《汇报提纲》夸大阶级斗争形势，强调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连，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所以要发动群众，城乡结合，内外结合，统一部署，统一指挥，打一场"一批二打"的人民战争。

在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上，针对近年来社员收入降低的情况，《汇报提纲》提出，要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认真清理工分、账目、钱粮、物资，加强农村劳动力管理，严格控制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性开支，严禁乱摊派，推广大寨式的劳动管理经验，实行定额管理，但不能搞高工分、高奖励。

《汇报提纲》最显著的特点是重提所有制的过渡问题。座谈会根据原定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实现每人建成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的目标，认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不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因此，"各级党委应当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仔细的工作，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汇报提纲》提出了过渡的三个条件，一是经过整党整风，切

实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二是大队经济有一定的基础，生产队之间贫富悬殊不大；三是群众自愿。

1977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原则同意了这个汇报提纲，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认真研究执行”。中共中央同时在通知中强调，“加速发展我国农业，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学大寨，要真学大寨，高质量地学大寨”。

各地“研究执行”的一大结果，就是仍然沿袭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去解决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各地提出的建设大寨县的评比考核标准中，仍坚持华国锋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提出的六条标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1978年2月制订的《关于全面落实大寨县目前六条标准的具体要求》中，对于如何“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以便“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提出了两条具体要求：一是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贫下中农占2/3，保证领导权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二是在没有从原中农中划出下中农的地方，通过抓1/3，把下中农划出来，进一步壮大贫下中农队伍。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前后，再一次刮起一股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之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开始了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试点，更有一些地方不顾条件大搞“穷过渡”。1977年12月底，山西省委在全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基本大队所有制。到1978年1月，陕西已完成过渡的大队占大队总数的10%以上。从1977年12月下旬至1978年3月底，陕西省韩城县抽调290名干部组成过渡工作队、组，先后到全县77个大队开展向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到生产大队过渡的试点，加上5个自行过渡和5个已经过渡的大队，共有87个大队实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占全县大队总数的32.6%。这种不顾群众意愿的强行过渡，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动荡。陕西省长安县有的大队干部说搞过渡是“逼上梁山”，河南省南阳地区有些县社员害怕再刮“共产风”，或者存棉不售，或者不搞集体积累。

所幸的是，这次所有制过渡风还未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刮开，1978年5月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了。这场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农业学大寨运动。

作为学大寨运动发源地的晋中地区，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就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回顾。1979年10月27日，中共晋中地委向中共山西省委报送了《关于联系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报告》，认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指导思想上犯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在实践中违背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妨碍了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妨碍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晋中地委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把大寨这个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典型，“神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典范”和“全面专政”的典型，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第三，把农业学大寨同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对立起来，妨碍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

1979年12月27日，中共昔阳县委向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报送了《关于彻底肃清我县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极左路线对学大寨运动的影响和危害，一是在“批资批修”中，批了社会主义；二是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搞了平均主义；三是在大干社会主义中，办了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四是整党整风中有乱批乱斗现象。报告认为，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思想的干扰是多方面的，应吸取的教训也很多。主要有三条：第一，对待先进单位的成绩和经验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绝不能搞现代迷信，神秘主义；第二，搞社会主义，一定要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社会主义，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第三，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80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成为农业战线上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因而学大寨运动也就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全省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同时，《总结》对大寨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认为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它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倾路线需要一个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总结》将大寨、昔阳经验中“左”的东西概括为：(1) 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2) 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3) 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4) 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总结》中，山西省委还承认了自己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总结了从中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在批语中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境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批语针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提出：推广先进经验时，不能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和永恒化，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对先进典型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农业建设要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先进人物应当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重，但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以来，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无形终止。山西省委的总结和中共中央对总结的批语，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此，大寨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二节　新“农业六十条”的突破与局限

客观而论，粉碎江青集团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仍未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窠臼，并且提出了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但其出发点还是为了尽快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自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进展，但由于受人口增长因素的影响，不论是人均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粉碎江青集团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加快我国的农业发展，中共中央除了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普及大寨县作为主要的措施外，也作了一些有限的农村政策调整。

针对当时农民不合理负担多、负担重的问题，1978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湖南湘乡县委给湖南省委的《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指出，要坚决打击那些大量侵吞人民劳动成果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坚决刹住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歪风；任何部门和单位，一律不准无偿平调社队的劳力、财力和物力搞非生产性建设，已经平调了的要向群众公开检讨，坚决退赔；各地、各部门不得以“群众大办”之类的借口乱行摊派，任何单位不准扣留和挪用国家为发展农村各项事业安排的资金或支援人民公社的基金；要坚决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保证多劳多得。

多年来，陕西省旬邑县少数干部作风粗暴，动辄打骂和惩治群众，而且巧立名目，乱罚乱扣社员的粮款。这些干部的恶劣作风，严重地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中共陕西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作了严肃处理，并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陕西省旬邑县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在全国不少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陕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7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以很长的批语，重申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农业六十条”中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改变工作作风。

这期间调整人民公社政策的最大举措，是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此前，“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曾作过几次修改。早在1970年4月，毛泽东就提出过“农业六十条”的修改问题，后来调查了一下没有下文。1972年3月，华国锋主持修改过一次，但只改了一半。1975年5月和1976年又作了两次修改。

1977年10月，根据华国锋指示，中共中央组织有关人员再次进行“农业六十条”的修改工作。当时确定修改“农业六十条”的指导思想是：要体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办好人民公社，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突出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划清路线是非，划清政策界限，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把大寨的根本经验体现在"农业六十条"中；既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又要考虑管一个历史时期，修改后的"农业六十条"至少要管到本世纪末。

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新"农业六十条"），并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众所周知的原因，新"农业六十条"的修改未能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有着明显的"左"倾痕迹。同时，新"农业六十条"也根据情况的变化，增加了原"农业六十条"中一些不曾有的内容。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相比，新"农业六十条"内容的变化，主要在如下几点：

（一）强化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原"农业六十条"虽然也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因素，这主要体现在第八条："在选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时候，应该注意使老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新"农业六十条"则大大强化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如第一章第三条"人民公社的基本任务"规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一起抓"。第十三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对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要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给以出路。"第十五章第五十七条规定："要组织干部、社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宣传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提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

（二）大大减少了关于社员家庭副业的内容。新"农业六十条"去掉了原"农业六十条"中有关的"人民公社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等语。对于自留地和自留山，也删去了"长期不变"等词。此外，还删去了"家庭副业的收入归社员支配"，"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予必要的指导与帮助，不要乱加干涉"等内容。增加了关于"集市贸易"的规定，但强调"对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分子"。

（三）大大弱化了生产队的权限。新"农业六十条"将原"农业六十条"中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3章共31条的内容合并为"管理体制"1章6条。原"生产队"这一章共18条的内容全部被删除，这显然是为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生产大队所有制埋下伏笔。在新"农业六十条"的起草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山西、陕西等省主张向大队核算过渡，华国锋和陈永贵也有这样的想法。陈永贵还说过，昔阳的大队没有什么经济，但如果等大队都有了经济条件再过渡，还得等多少年，怕十年八年都等不到，就是过渡以后搞经济。而其他许多省则不赞成过渡。所以，新"农业六十条"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一方面弱化生产队职权，一方面又规定"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条件具备的过渡，要报省一级领导机关批准"。

（四）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新"农业六十条"根据当时的形势，增加了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社队企业、供销与信贷、文化福利事业、收益分配等八章，原"农业六十条"中的"人民公社的党组织"一章被改

为“政治工作”。在“干部”一章中强化了干部作风的内容，强调干部不能假公济私、“走后门”、多吃多占、贪污私分等。

此外，新“农业六十条”还去掉了原“农业六十条”的“人民公社的各级监察组织”一章，并缩小了社员的权利。增加了定额管理的内容，规定凡是适合制订劳动定额管理的农活，都要制订劳动定额。新“农业六十条”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要根据生产的需要，建立小组的或个人的岗位责任制，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励的制度”。还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同时又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197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会议原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新“农业六十条”。但会议一开始，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假错案子反，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又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就使这次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原定的只讨论经济问题的议题，成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不解决思想上的“左”倾束缚问题，农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出现新的局面。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没有详细讨论而被原则通过，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起，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关于后一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在会议通过的全会公报中可以看得出来。公报中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要坚决执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上面的这些规定，其基本内容是比较好的，但也很原则，因而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大。

上述两个文件中，都没有提农业学大寨的问题，也没有把大寨的一些“左”的做法写进新“农业六十条”，如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大寨实行的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制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新“农业六十条”本身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这两个文件不能摒弃原来“左”的那一套；另一方面，不论是文件起草者还是讨论者，又深切地感到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如果不作适当调整，农民的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问题的解决都将落空。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这时的中国正处在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解放思想的矛盾冲突中，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这种矛盾斗争的体现。

虽然新“农业六十条”还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有许多的不合实际的

"左"的规定，但当时"文化大革命"毕竟已经结束，人们已不再把关注点放在阶级斗争上，对于新"农业六十条"而言，广大干部群众最感兴趣的，也就不是如何去"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而是其中所讲的"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就在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包产到户由星星之火很快变成燎原之势，最终成为全国范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业六十条"还来不及发挥它的作用，就进了博物馆。

第三节　包产到户风潮再起

粉碎江青集团后，为使一片凋零的农村恢复生机，各地曾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1977年11月，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其中最有突破性意义的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规定生产队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1978年初，中共四川省委也出台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改革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个文件肯定了一些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这些政策措施，在当时都有突破性的意义。

新"农业六十条"关于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对于"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规定，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是衷心拥护的。1979年春开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各地广泛兴起，比较普遍的是恢复和发展"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责任制。

在这个过程中，安徽、四川、贵州、甘肃、广东、河南等省一些生产发展较缓慢的生产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这其中，也包括了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户农民秘密进行的包产到户。

1979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组织工作队深入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向社员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新"农业六十条"。在讨论这两个文件的过程中，山南公社的干部社员最感兴趣的是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且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对于包产到户，不仅劳动力强的社员拥护，而且劳动力弱的、甚至"五保户"也都拥护。对于这一情况，工作组负责人立即向省委书记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认为，群众的意见应该重视，乃决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结果是安徽省委决定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

自从1962年强行纠正"责任田"以来，安徽农民一直对包产到户念念不忘。他们深知，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安徽省委在山南公社试点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开后，肥西全县各生产队纷纷仿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县有40%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山南公社和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又直接推动了安徽全省的包产到户。顿

时，包产到户有蔓延安徽全境之势。

包产到户毕竟是刚刚通过的新“农业六十条”明文禁止的，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安徽省委决定向中共中央汇报。1979 年 3 月 4 日，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安徽推行责任制的情况，其中讲道：“关于责任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不改变核算单位，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三包一奖到组可以普遍地搞……少数边远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岗位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人民公社的生产责任制并不是什么新事物，1959 年春整顿人民公社以来就一直强调要实行这一制度，但以往的责任制总是局限在“三包一奖”的范围内，实行生产队统一分配，不能从根本上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贯彻落实新“农业六十条”的过程中，各地建立的生产责任制，也主要是分组作业、小段包工、按定额计酬的办法，也有些地方实行的是常年包工包产到组的办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思想虽然有了很大的解放，但“左”的思想对人们的束缚不是那么一下子容易解除的。就是这种分组作业或包产到作业组的办法，一些人也一时转不过弯来。

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封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信中说，最近，洛阳地区的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听社员说，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但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人民日报》加的编者按则指出：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统一使用劳动力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这里讲的包工到组，主要是指田间管理，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

当时，《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曾对各地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作了大量的有引导性的报道。1977 年 9 月，云南省元谋县元马公社星火大队大塘子生产队会计李国有给县委书记写信，建议包产到组。这个建议不但被元谋县委采纳，而且李国有还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先进单位（个人）代表大会上，受到了自治州党委的表彰。1979 年 1 月 14 日，《人民日报》以《元谋县生产队会计李国有给县委书记写信提出包产到组的建议，建立严格责任制促进农业大增产》为题，特地报道了这件事。为什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并不是自己的主张，而是当时中央农口一位负责同志的指示。实际上，对于人民公社建立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的问题，中央高层有着不同的看法。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的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当前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围绕包产到户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包产到户虽然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的必要性，但在本质上与分田单干没有什么区别。安徽等地的与会者则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它与分田单干就有本质的不同。

这次座谈会并没有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形成共识。会后报送给中共中央的《座谈纪要》认为，"把主要作物的全部农活由个人承担，产量多少也完全由个人负责"的包产到户，"失去了集体劳动和统一经营的好处"，"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是一种倒退"，强调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认为基础"的体制必须稳定。《座谈纪要》还提出："除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外，都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但是，《座谈纪要》又明确表示："喂养家畜、家禽、管理鱼塘、经营小宗作物等农活，实行个人岗位责任制，并且规定产量（产值），实行超产奖励，是统一经营下的专业化生产，不是对统一经营的否定，应当允许。深山、偏僻山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从中可以看出，党内领导层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正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之中。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2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应该牢牢记取以下的主要经验教训：(1) 一定要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 一定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村以及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正确地进行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左"的或右的干扰。(3) 一定要集中力量抓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力。(4) 一定要持续地、稳定地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政策。(5) 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6) 一定要正确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7)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一刀切"。《决定》还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重要的有：(1)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2) 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3) 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4) 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相反的，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5) 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决定草案相比，最耐人寻味的是将草案中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改为这样一段话：“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从强制性的“不许”到规劝性的“不要”，表明中共中央对待包产到户的态度已出现了明显的松动。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80 年 1 月，全国有 84.7% 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定额包工责任制的占生产队总数的 55.7%，实行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占 29%，而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为 1.1%。

实际上，当时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的实际数目远不止如此。据新华社从各地分社了解到的情况是：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安徽有 23%，其中肥西、凤阳、来安、定远、芜湖、宣城等县较多，有的县占 80% 以上；广东有 10%，其中惠阳地区较多，大约占生产队总数的 35%；内蒙古的 53 个县、旗的 47849 个生产队中，实行包产到户的有 13894 个，占 29%；河南有 10%左右。此外，贵州、云南、甘肃、山东、河北及其他一些省份也有生产队在搞包产到户。没有搞包产到户或搞得很少的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市郊区，东北三省和湖北、湖南等省。

1980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2 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上，安徽代表作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介绍了安徽建立各种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情况及其效果，并且强调“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包产到户，因为它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和按劳分配原则，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这个发言引起了与会者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半社会主义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沾不上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更有人将包产到户戴上违反中央文件和宪法规定的“大帽子”。1980 年 1 月 31 日，有关负责人在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汇报会议情况时，华国锋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邓小平则表示，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1980 年 3 月 6 日，国家农委印发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除了重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于包产到户的规定外，还表示“至于极少数集体经济长期办得很不好、群众生活很困难，自发包产到户的，应当热情帮助搞好生产，积极引导他们努力保持、并且逐渐增加统一经营的因素，不要硬性扭转，与群众对立，搞得既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没有个体积极性，生产反而下降。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这次会议后，主张包产到户的万里从安徽调到中央工作，表明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的某种认同。就在这时，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 年第 2 期和第 3 期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对包产到户进行了公开的责难，批评包产到户并没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倒退到单干。其他一些报刊也刊发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批判。3 月 20 日，山东《大众日报》发表《包产到户不是责任制》的文章，认为包产到户同集体经营、分工协作的责任制有本

质上的区别，包产到户有滑向单干道路上去的危险。8月14日，《湖南日报》也公开发表《大田生产不宜包产到户》的文章说，大田包产到户，如果领导不好，生产队很难搞统一核算和分配，容易变成变相单干，成为个体经济，这就违背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

还有一些地方则是明令纠正包产到户或不准包产到户。1979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就渭南地委报送的《关于个别地方发生"口粮田"的情况报告》做出批复，认为分给社员"口粮田"（按：所谓口粮田，就是从集体耕地中划出一部分由社员自己耕种代替口粮分配，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通），势必形成社员热衷于经营"口粮田"而影响大田生产，不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安徽在万里调离后，也引发了关于包产到户的大争论，安徽省委个别人给包产到户扣上了"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福利主义"等大帽子，指责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迁就农民落后意识"。一些地方还不顾群众反对，强行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县委负责人宣布，谁搞包产到户就以"破坏生产"论处，要加以逮捕。刚刚萌生的包产到户面临再次夭折的危险。

这个时候，几个月前对包产到户"不好回答"的邓小平，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了肯定的回答。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上，邓小平指出，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1980年5月31日，他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更是明确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按惯例，当一些重大问题党内出现不同意见或争论的时候，需要党的最高领导人出来说话，问题才能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关于包产到户的表态，对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开始时，只有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等少数人赞成包产到户。会上，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作了《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说明》的发言，着重讲了如何处理包产到户的问题，强调"要区别包产到户和单干，单干和资本主义"，认为包产到户"虽然成了独户经营，自负盈亏，但它仍然通过承包与集体相联系，成为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与过去的单干有所不同，因此也应算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经营形式，即一种责任形式"。杜润生在发言中还指出，对于中西部地区的穷队来说，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温饱。解决温饱当然不限于包产到户一种方法，但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突破"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也办不好"的恶性循环，

不失为较好的选择。包产到户虽然有一些负面作用，但只要有领导地搞，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

对于这些参加会议地方大员们来说，没有比如何才能解决群众温饱更揪心的问题了。经过讨论，与会者对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包产到户至少在贫困地区是必要的。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座谈纪要。座谈纪要强调："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中共中央随即印发了这个文件（即1980年第75号文件），并要求"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1980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我国近一亿人口的贫困落后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工作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多年来，集体经济办得不好，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在这些地区，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又受到挫折，两种积极性都处于受压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为摆脱目前境况，自发地采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于高级的集体化形式来说，似乎是一种后退。但这种后退，能调动当地群众的积极性，鼓励群众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尽最大努力解决温饱问题，渡过由于"左"倾路线和政策所造成的困难，并使党和群众的关系得到改善，为将来前进到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来说，比原来的状况实际是一种前进。在当地条件下，这是一种好的办法。这篇社论，实际上透露了中共中央第75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第75号文件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的规定，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对包产到户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都可以说是"贫困落后地区"，有了这样一条政策，农民就可以放心地搞包产到户了。随后，包产到户发展很快。据1981年6月底的统计，当时实行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377.7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64.2%。其中包产到户的生产队166.9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28.2%。到1980年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区别在于：包产到户是先按估产进行包产，等实际产量出来后，用实际产量除去包产，两者之余额，上缴国家、集体后，剩下的都是承包人的；包干到户是不算细账，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其余都是承包人的）已在全国2/3以上的省、自治区得到普遍推行。另据1980年10月的统计，全国已有45.1%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贵州、甘肃、安徽、宁夏、广东、内蒙古等11个省、自治区已有50%至95%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第75号文件虽然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厂但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只是说："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

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也就是，这个文件对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没有十分明确说“是”还是“不是”。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行包产到户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些贫困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生产队，很快就翻了身；长期为吃饭问题而发愁的农民，也因实行包产到户，而有了余粮。较早推行包产到户的安徽省，1979 年全省粮食部门比前年多收购了近 20 亿斤粮食和 8500 万斤油脂，销粮减少了 100 万斤。许多地方因思想上估计不足，收购时措手不及，发生了“涨库”现象，使不少农民有粮无处卖。安徽在粮食上出现如此宽裕的情况，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安徽凤阳是个有名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穷县，1979 年全县大部分地方实行“大包干”制，一年大翻身，粮食总产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 20%多，油料总产增长 3 倍。

1980 年 11 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大寨和学大寨运动，从而也中止了学大寨运动中的许多“左”的政策和“左”的做法。1981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认为：“回顾当时实际情况，在一些经济极端困难的地区，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是必要的，也不算什么错误。”这等于也给 1962 年的包产到户平了反。

198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 1982 年第 1 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 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它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吃“大锅饭”的弊端，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针对一些人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误解为“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等作了必要的说明，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统一安排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所以，它不同于合作社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2 年第 1 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界定，彻底地解决了人们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后顾之忧，促进了“双包”制在全国的广泛推行。到 1982 年 11 月，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 92.3%，其中“双包”的占 78.8%，贵州、安徽、宁夏、甘肃、福建等 11 个省份，“双包”都在 90%以上。到 1983 年末，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了 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

生产队总数的97.8%。1983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在1月1日发出第1号文件，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此，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成为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

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极大地冲击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并最终导致了人民公社的解体。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它一方面承担着原来乡人民政府的行政职能，另一方面又起着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本来，按照"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规定，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既要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决定权，也要有自己的产品决定权。但是，由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是上下级关系，生产大队实际上成了公社的派出机构，代表公社对生产队进行管理。这样，生产队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公社可以通过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下达行政命令，使生产队失去了应有的生产、分配自主权。生产队则是公社这张算盘上的珠子，由公社任意拨动。

由于公社的政权性质，使得公社的干部成为国家行政人员，也就是国家干部，拿的是国家工资，端的是"铁饭碗"，生产队生产经营的好坏、农业的增产与减产，他们既不要承担经济责任，也不影响个人的收入。这种体制下，公社是生产经营的最高决策者，生产队不过是组织生产的"车间"，只能按计划完成各项生产任务和农产品的交售任务。这就为公社在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工作上的强迫命令开了方便之门。多年来，一直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但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核心问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没有改变。

长期以来，人民公社一直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队为基础"也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生产资料的基本生产队所有制。但"三级所有"则意味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所有权，造成了产权的不明晰。这样一来，如果所有权全归生产队，"三级所有"中的公社、生产大队所有权就成了一句空话。既然是"三级所有"，也就意味着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以及与所有权相关联的产品处分权，那么，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队搞"一平二调"也是合法的。对于公社来说，自然是越大越公越好行使权力。于是，对于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公社特别积极。而要完成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就必须发展公社、生产大队两级的经济，而这两级既无生产资料，又无劳动力，要建立自己的家底，包括开办各种社办工业、社办林果场、社办鸡场猪场等，都只能是白手起家，向生产大队、生产队"平调"人力、物力。而公社作为上级单位，可以向作为下级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下指令，生产队则不得不按公社的指令，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给人，要地给地。这是

"一平二调"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根本原因。

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组织。这种结构，使得公社的机构多，干部多，加上公社又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有严格的地域界限，一个公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县级各行政部门为在公社行使自己的行政职权，必然要在公社建立各种派出机构，否则这些部门就没有根基。除了脱产的公社一级干部外，每个生产大队为了应对公社的各个部门及附设在公社的各种县级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除了生产大队、生产队本身的干部，还需要大量的半脱产的干部，如农技员、水利员、畜牧员等"八大员"、"十大员"。1968 年开始，农村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并将原来国家办的小学下放给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都有数量不等的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这对于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生产队的非生产人员。这些脱产半脱产人员的工分补贴，常占生产队工分的 10% 以上，更有高达 30% – 40% 的，加重了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也大大地降低了社员工分的分值。结果，社员活没有少干，钱却没有多拿，生产的有限发展赶不上负担的日益加重，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还造成了党政企不分。由于权力集中在公社党委，公社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社和大队一级的管理委员会被革命委员会取代，1979 年前后恢复管理委员会名称）。党委既要抓农业生产，又要抓社队企业的发展，还要抓政权建设，结果样样都没抓好，生产没上去，"党不管党"成为普遍现象，政权建设根本无暇顾及，乡村民主建设更是遭到破坏。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半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注重的是上下关系，因而不利于加强跨公社的各生产队的横向经济联系，不利于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也不利于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人民公社体制的各种弊端，早在公社化之初就被发现。1961 年至 1962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和一再修订，就是试图在保持人民公社体制的框架内，解决公社内部存在的"一平二调"、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也曾取得过一定成效，对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经过 1963 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一些曾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纠正了的"左"的做法又重新回潮，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反而被强化，严重地压抑着生产队和社员积极性的发挥。

由于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于毛泽东亲自办起的人民公社所谓的"优越性"不敢怀疑。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和"大跃进"人们已不再提起，唯独对人民公社却一直大唱赞歌。1978 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破了一系列的思想禁区。在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时，全党上下对解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对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发生怀疑，并逐渐地发现其弊端，提出了"政社分离"的设想。

与此同时，随着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村微观经

济组织由原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变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公社化以来一直令人头痛的生产队的自主权问题，由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实行而得到顺利解决。原来公社可以凭借行政命令来管理下属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而任何社员都不能离开生产队而生存，因而人民公社的干部有无上的权威，可以直接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干预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包产到户前，社员集体劳动，靠挣得工分获取收入；一旦离开集体，就会失去生活来源。因此，社员与生产队有着极强的依附关系。包产到户后，生产队与社员间变成了承包关系或者说是契约关系，社员的劳动产品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后，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具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性质，生产队对社员的生产经营也不能直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真正成为了生产经营的实体，而不再是作为行政组织的人民公社的附属物。人民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既不能直接干预，也无法直接干预。人民公社对生产队的领导，单纯依靠过去的行政命令那一套，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已经行不通了。如果此时对人民公社的体制不加以改革，人民公社作为一级政权组织的权威就会丧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也会变成空壳。这对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都是不利的。显然，在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实行政、社分离，乃至废除人民公社而重建基层政权组织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地方开始了撤社建乡的试点。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便是其中一例。

1979 年 9 月，广汉县选择该县向阳公社进行政社分开的试点，把向阳公社的干部分成三个班子：一是行政班子，共 6 人，负责抓全社的青年、妇女、民兵、治保、民政、调解、文教、卫生等工作及日常行政事务，参加上级召开的除农副业、工业以外的会议；二是农副业班子，由原来分管生产、水利、沼气、会计辅导工作的 6 名干部，加上多种经营员、林蚕员、植保员、农技员 4 人组成，负责全社的农副业生产；三是社队企业班子共 4 人，负责抓全社的社队企业工作。

随后，向阳公社撤销了原有的企业办公室，成立了公社工业公司，社队企业改公社独家经营为生产队集股投资联合经营，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工业公司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代表股东大会任命工业公司正副经理。公社又成立了供销经理部，并与供销合作社合并，组成商业公司，接受县供销社和公社的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向阳公社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负责全公社的经济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1980 年 3 月，广汉县委提出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建立乡人民政府，大队改为村，并为此请示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允许和支持广汉的改革，先在一个公社搞，如果不成功，改过来就行了，一个公社影响也不大。

接着，广汉县委正式做出决定，在向阳公社进行撤社建乡的试点，撤销向阳公社党委，建立向阳乡党委；撤销向阳人民公社，建立向阳乡人民政府。1980 年 6 月 18 日，“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了下来。当时既未举行仪式，也未发布消息。恰巧此时，有一位新华社记者路过广汉，得知此事，写了一份内参报了上去。6 月 23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打电话给广汉县委，批评摘公社牌子是错误的，结果摘下来了的公社牌子又挂了出去。其实，此时的中央高层也正好在考虑农村基层组织的改革问题，过了半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打来电话说，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广汉县委搞试点。10 月，向阳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乡人民政府。

1981 年夏天，国家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的委托，前来广汉进行撤社改乡的调查。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组织调查组，对人民公社体制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并写出了《关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制度必须改革。这种体制主要的弊端是：(1) 难以维护集体经济，尤其是生产队的自主权；(2) 政社合一加重农民负担；(3) 造成党政企不分，权力集中于党委少数人，削弱了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4) 不利于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5) 不利于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6) 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查报告》提出了政社分开的具体设想：一种是采取广汉模式，即实行政社分离，分别建立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联合公司，把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大队一级经济组织，把社队企业改为各生产合作社联办企业，由农工商联合公司按经济办法组织农工商各业的生产和流通，原来的大队一级建立村政权，在乡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第二种方式是建立乡党委和乡政府，保留人民公社作为经济实体，三级所有的经济体制不动，同时可建立跨队、跨社、跨县的联合经济组织。

鉴于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修改宪法的决定。1975 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1978 年在修改宪法时，上述内容基本上被保留，而且还增加了"生产大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向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内容。这些规定显然已经过时。1980 年 9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作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着手进行宪法的修改工作。当时，法学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宪法修改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不少是涉及人民公社体制的。例如，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室提出，应改变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废除政社合一，恢复乡、镇政权建制，公社专管农业生产。一些群众在给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信中，也建议将人民公社改为乡，生产大队改为村。宪法修改委员会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时，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按照改变现行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原则，规定设立乡人民政府，人民公社为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兼负政权的职能。1982 年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宪法修改草案）中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人民公社政社分开是一件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不可轻率，匆忙改变，必须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当前及宪法正式通过以后的一两年内，各地都应维持现有体制，但可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规划进行试点，总结经验，然后有领导地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分期分批逐步改变。

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彭真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说明》时强调："为了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草案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规定设立乡政权，保留人民公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这既有利于改进和加强政权工作，密切政权同群众的联系，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政社分开，只是把政权那一部分职权分出去，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企业和其他一切财产的所有权，仍然不变。"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同时还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发布决议和命令；（二）领导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四）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政、公安等工作；（五）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六）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八）保障妇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九）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在此前后，许多省、市、自治区开展了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的试点工作。到1983年1月初，全国已有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浙江、湖南、四川、贵州、甘肃、新疆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69个县、市的部分公社进行了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的试点。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原有体制中，生产大队是公社管理生产队不可或缺的中介，起到公社派出机构的作用。"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明确规定："生产大队的管理委员会，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管理本大队范围内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生产大队具有帮助生产队作好生产计划，对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财务管理工作和分配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管理全生产大队的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工作等职能。因此，它既承担生产组织的职能，也承担行政组织的职能。生产大队的管理委员会相当于公社化前行政村的村公所，但与行政村不同的是，生产大队作为"三级所有"的一级，又可以直接干预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也可以在生产大队范围内搞"一平二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后，生产队虽然具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但社员具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生产队组织生产、决定分配的功能大大弱化甚至丧失，不再构成一级农村基层组织。实际上，生产队这时已成了空壳，对于社员不再具有强制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指导、监督、检查等职能也就没有了实际意义。因此，推行"双包"制后，公社以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不论是其名称，还是其实际功能，都不适应新的形势，必须进行改革。同时，生产大队干部原来可以得到

工分补贴，可以不参加或少参加生产劳动，“双包”制推行后，他们同样需要去经营自己的责任田，这就使得生产大队干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失去积极性。这样，生产大队的行政职能就不能很好的履行，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民政、治安、文教、计划生育等工作，有些农村出现了无人过问的现象，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出现了一时的“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又一次发挥出了自己的创造力，自发地搞起了村民自治。

根据现有的资料，广西河池地区宜山县（1993 年改设宜州市）、罗城县是我国最早实行村民自治的地方。宜山县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1980 年第？5 号文件后，全县农村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上交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双包”责任制是农村经营体制的新突破，“领导缺乏思想准备，工作跟不上去”，加之责任制有一个发展、完善、提高的过程，开始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矛盾，如瓜分集体财产，乱砍滥伐山林，水利设施无人负责维修管理等。“特别是村屯较大、生产队又多的地方，这些问题大队管不到，生产队管不了，矛盾更加突出，群众十分焦急”。“面对这种情况，老党员、老贫农、老干部积极倡议，把群众组织起来，搞好治安防范，搞好水利维修，搞好封山育林。群众推选了自己的村长，也有叫村主（按：原文如此）。有的觉得这样称呼名声不好听，改叫它做村委会主任”。

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今属屏南乡）的果作村村民委员会有“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之称。果作是合寨大队的一个自然屯（广西不少地方将自然村称屯），当时有 6 个生产队。1980 年 2 月，6 位原生产队队长，鉴于包产到户后村里的事没有人管，决定成立一个管理村公共事务的组织。由于生产队实际也不存在了，队长的名分也没有了，他们不便再以队长的身份出头，联想到城里人叫居民，原来大队的机构叫管理委员会，就把这个组织叫做村民委员会。于是，他们召集 6 个生产队的社员代表来开会，选举村民委员会的 5 名成员，并按得票多少选出村民委员会的正副主任。随后，合寨大队的每个村都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屯屯制订了村规民约，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与此同时，宜山矮山公社的洛德村、北牙公社的冷水村，及相邻的罗城县一些农村，也成立了类似的村民自治组织，有的叫“村治安领导小组”，有的叫“村管理委员会”，也有叫“村民委员会”的。这些组织在解决农村出现的乱占耕地、打架斗殴、乱砍滥伐、盗窃赌博等问题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中共宜山县委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出现，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态度。在 1981 年 5 月初该县举行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县委负责人在总结讲话中专门讲到了村民委员会的问题，认为一些村屯成立村民委员会、订立村规民约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效果是很好的”，并要求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防止坏人、派性钻空子。中共河池地委在得知宜山、罗城出现村民委员会这一村民自治组织后，十分重视。1981 年 10 月 31 日，河池地委以“地发［1981］26 号文件”的方式，转发了宜山县三岔公社关于合寨大队村民委员会的情况报告和中共罗城县委关于小长安公社牛毕大队新回村民委员会的调查，认为村民委员会“是农村中一种群众性组织”，并要求各县、各公社“积极推广，逐步的、普遍的把村委会建立起来”。

1980 年 6 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调研通讯》刊登了自

治区农委一位干部所写的调研报告《宜山县冷水村建立村管理委员会管理全村事务》。这份报告引起了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的注意。1981 年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民政部派出调查组，对宜山、罗城的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随后要求各地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委员会的试点工作。1982 年 4 月，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我国长期行之有效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在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办好公共事务等公益事业、搞好卫生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并建议将村民委员会写进宪法，规定它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1982 年 12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农村按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从此，建立村民委员会就有了法律依据。

1983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好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争取在 1984 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通知》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通知》规定，乡的规模一般以原有公社的管辖范围为基础，如原有公社范围过大的也可以适当划小。《通知》同时还规定，政社分开以后，现有社队企业要继续完善生产责任制，加强群众的民主管理，办成名副其实的合作经济企业。农业技术推广、林业、畜牧兽医、农业机械、经营管理等基层事业单位，供销社和信用社，都应进一步做好改革工作，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逐步形成一套技术、管理、流通、金融等服务体系，以利于农村多种经济形式和商品生产的发展。《通知》对村民委员会也作了具体规定，指出：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按村民居住状况设立。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要由村民选举产生。通知指出，有些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的地方，当地群众愿意实行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兼行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能，也可同意试行。

随后，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据新华社的不完全统计，到 1983 年的 10 月下旬，全国已有 902 个县（市、区）的 9028 个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分开，共建立了 12786 个乡人民政府。其中 176 个县（市、区）已在全县范围内全部建立了乡政府。截至 1984 年底，全国共建乡 84340 多个，新建村民委员会 822000 多个。全国已有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完成建乡工作，已经实行政社分开的公社占公社总数的 98.38%。各地在建立乡政府的同时，在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了建立民族乡的工作。1984 年底，全国已建立民族乡 2700 多个。至此，全国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基本结束，在中国农村维持了 20 多年的人民公社不复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农业生产没有受到影响。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党和人民都在走向成熟。

第六篇

“文化大革命”简史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像突然袭来的飓风，短时间就席卷中国大地，把中国人民带进一场长达10年多的浩劫之中。这场灾难临头时，人们普遍不知它从何而起。且不说普通老百姓，就连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普遍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人们只能从最高指示、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中去“领会精神”，从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中去“猜测动向”。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使“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混乱而朦胧的色彩，人们难以窥其究竟。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同时，党内外人士、中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大量评述，对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索，更成为研究的热点。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等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去寻找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些可贵的努力，开始拨开笼罩着“文化大革命”的层层迷雾，使大家能看到一些因果联系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但是，由于众说纷纭，头绪繁多，使人目不暇接而又不明晰确知。似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切弊端，都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紧密相关。甚至有人说：“五十年代的道路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认定“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然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别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主要弊端，如政治经济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等，在别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尽管表现形态和严重程度不同。而那些国家虽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把那些乱子如有的同志那样称作“小文革”或是“文革的派生形态”呢？显然不能。事实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笼罩着反修防修的神圣光环，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全面夺权。显然，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借助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揭示出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俾能成为借鉴。探索“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只能对当时和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具体的、主导的原因。以“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为实例，加以推演，同“文化大革命”挂上钩，虽然

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也能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但那还不能弄清“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还不能成为历史科学的解答。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出了科学的论断。经过二十几年时间的考验，证明那些主导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深刻中肯的，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权威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节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

这里说的“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为什么要以1957年作为一个分界线呢？因为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前，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那时党内发生的“左”倾错误，主要是把朋友错当作敌人，扩大打击面，缩小同盟军；在斗争中采取了不适当的策略和手段等。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客观状况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剥削阶级已基本上被消灭。因而党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即从主要是“打碎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所以，1957年后的“左”，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认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等问题。这时的“左”倾理论和实践，既与过去的“左”有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等方面的联系，又有客观社会条件和理论实际内容的重大不同。弄清楚这一区别，对于搞清楚是何种“左”倾理论和实践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

从客观历史进程看，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也确实是从对国内阶级形势估量的不当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的。

本来，在中国大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作出了正确决议，提出主要矛盾转化、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表述，在文字上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一则是容易使人误解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都超越了生产力，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一种好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好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在于它能适应并推动生产

力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它的先进性就值得怀疑，并不是越大、越公就越先进。二则是容易使人误解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存在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了。尽管“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达在文字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它们要表达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能够给人一个很明确的认识：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否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宣传的那样，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货色”呢？不是。事实是：刘少奇在主持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和毛泽东一起多次反复研究，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认真修改。毛泽东认为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题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下边又写了“刘少奇”三个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称赞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可见，对政治报告毛泽东是亲自参加了修改的，是赞同的。

在“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中有关主要矛盾的文字表述，的确表示过需再斟酌。比如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从人与自然界的矛盾来概括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此前后，他曾多次提出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好各种矛盾，以便集中力量“向自然界斗争”、“向地球开仗”等意见。但是，他没有进行理论概括，这表明他还没有考虑成熟。可见，在主要矛盾转化的根本问题上，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审议“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时提出了一种意见，指出如果单提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容易使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提法，虽然有些勉强。

“八大”以后，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山，西方国家趁机掀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在这场大风暴面前，中国共产党是沉着的、冷静的。从总体上看。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判断。但是，由于毛泽东从匈牙利事件中总结出的一条最基本教训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以后对国内发生的矛盾和事件的分析和决断。

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也促使毛泽东用很大精力去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围绕着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在北京和外地发表过多次讲话。1957年3月他在天津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结束了。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不完全结束，是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作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在同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上面所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出直到1957年初，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仍然是同“八大”决议一致的。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影响

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反右派斗争爆发了。这被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这场“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反右派斗争不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其家属遭到很大的不幸，而且迟滞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助长了“左”倾思潮的膨胀，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有重大影响。

反右派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发生的。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为了适应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便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 月 30 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公开发表。5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号召动员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全国出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的热潮。绝大多数人都是善意的。但是无可否认，在某些地方和单位确有极少数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敌视的分子，他们受到匈牙利事件后国际反共高潮的鼓舞，趁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兴风作浪，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地位。一部分群众在帮助党整风中，或由于缺乏社会经验，或由于思想偏激，发表了一些措词尖锐、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言论，进行了请愿、游行等活动，一时间产生了混乱。对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起先是估计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看得并不严重；甚至还通过各种渠道和舆论宣传，鼓励大家大胆鸣放。后来，他改变了对形势的看法，认为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如不反击，有些党组织可能垮台。于是就动员全党反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从而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

这中间的变化，从 1957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份党内指示中可以看出端倪。文件认为，在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在事隔两年之后的 1959 年，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事件。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判断中国情况的影响，也可以作为反右派斗争所以采取“钓鱼”、“引蛇出洞”等做法的注脚，从中还可以看出这场“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的。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的后果，其中最直接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是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失误和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突然改变。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毛泽东接连写了许多篇指示、文章和社论，对阶级斗争问题都作了过分严

重的判断。如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作出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判断，这就把资产阶级又看成是一个完整存在的阶级。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泽东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并且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为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以这一系列“左”的判断为基础，在 1957 年 9 月至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断然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段话是对一年前召开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根本性改变。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得到了这次中央全会的赞同，由此必然引起全党主要任务和整个政策的相应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和决策失误。

对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在八届三中全会一次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曾加解释。他说：“八大”文件中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服服帖帖，问题没有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中的问题，当时都看得很不清楚。经过这次大鸣大放，资产阶级要造反，问题就看清了。因此应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这段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八届三中全会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的反映。

对错误的实践进行概括，抽引出错误的理论观点，以此指导实践，再进行理论概括，使错误理论一步步升级，又据以指导实践，这种交互作用，始自反右派斗争。

派生出一系列错误

由于对主要矛盾作出错误判断，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上，必然会派生出一系列的错误判断。

首先，要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一个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这一观点在同年 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中加以确认，并解释为：两个劳动阶级是指工人和农民，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样，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就以代表大会的权威，正式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同时。也改变了 1956 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知识分子属性的正确判断，即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八大二次会议重新把知识分子一般地错划人资产阶级范围，其原因是清楚的。反右派斗争中划了55万右派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所以当时出现一种理论，认为老的资产阶级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财产被剥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能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而知识是在头脑中剥夺不了的。所以他们有本钱，能够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对知识分子属性的错误判断，显然也是从反右派斗争错误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认定已经进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大陆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在理论上必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只能从经济关系中，即从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中，才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特征，也才能提出判别和划分阶级的依据。这些理论观点，马克思、列宁都已经作了充分论证，本来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在实践中也是照此办理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工作中，无论是土地改革或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根据人们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占有什么，占有多少，如何使用等经济状况去区别阶级的。因此，认定国内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国土地改革早已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根据什么说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呢？这是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力图对此作出回答。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在同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一份手书的发言提纲上写道：不忙于宣布消灭剥削与消灭阶级问题（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就提出了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背离的，所谓除了有“经济剥削的阶级”之外，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的逻辑推演，必然会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从历史唯物主义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开端，从而在指导实践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有害影响。

这个失误仍然是来源于错误的实践。反右派斗争划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按照历史上和当时人们政治思想的表现进行的。运动后期还制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虽然订出了16条“标准”，规定什么情况该划，什么情况不该划，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还是划错了。要想找出一种能够衡量人们政治思想的尺度，据此区分其阶级成分，这是不科学和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的政治思想情况不可能是单纯的、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变的，表里可能是不一致的。按政治思想划阶级的非科学性也表现于此。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确立后，按照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能迎刃而解的哲学观点，抓阶级斗争逐步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至经济生活的主题；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思潮，逐步在党内和社会上急剧发展。

"左"倾理论的重大升级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其内容虽然主要是同自然界的斗争，但却是在反右派运动后，"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插红旗，扒白旗"、批判"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等政治压力下，大轰大嗡地掀起来的。也可以说是企图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尽快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尝试。"大跃进"运动初期，"左"倾思潮泛滥，"共产风"盛行，给各方面工作带来恶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注意到这种情况。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一直到上海会议，都为纠"左"作了一定努力。但这一系列纠"左"工作的重点均放在一些实际工作方面，而没有涉及运动的指导思想。待到1959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上，突然由纠"左"转而反右，以更"左"的形态，提出了共产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使"左"倾理论观点又一次重大升级。

庐山会议召开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会议是为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的信，其内容归结起来。只不过是认为除了纠正实际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外，还应清理一下指导思想方面的"左"的问题。这封信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表达方式上，历史已经作出结论，都是正确的。可是，这封信却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成为当时压制、打击党内外对"三面红旗"有怀疑的人们，发动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全国性运动的由头。批判彭德怀的错误实践，又推动毛泽东作出理论上的新概括。他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错误地认定是阶级斗争，从而把阶级斗争直接引申到共产党内。

紧接着庐山会议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把在庐山会议上发言表示基本同意彭德怀观点的黄克诚（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周小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同志打成所谓反党集团。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全会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本来当时全局性的错误倾向是"左"，却反其道而行之，号召全党全国反右，必然推动"左"倾思潮更加泛滥，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八届八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掀起一场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右倾"斗争。有些干部在"大跃进"中已经"左"得可爱了，仍然要检查自己的"右倾"；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讲了几句真话的人，被打成"右倾分子"。从此，"三面红旗"被奉为神明，不允许对它有半句不敬之辞。

在"反右倾"的冲击下，不仅纠"左"的进程被打断，而且不顾已经逐步展现的经

济领域的严重困难，又提出了“持续大跃进”的口号，从而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这成为造成经济比例失调，物资严重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不幸局面的主要原因。

关键的八届十中全会

按政治思想区分阶级和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左”倾理论的一根重要支柱。这种观点的确立，导致人们将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党内，致使党内关系紧张，政治生活不正常，这已经蕴含着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基因。不幸的是，理论认识的错误不仅没有及时得到纠正，而且在实践中步步加深，终于形成完整的形态，并被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成为进行各项工作的指针，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群众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196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及其前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多次讲话。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他要求全党对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要搞一万年。这些话后来被概括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教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他这次是“重提阶级斗争”。这话需要分析。如前所述，阶级斗争一直是他谈话的重要内容，是他抓工作的重要领域，从来没有放松，更没有放弃过，无所谓“重提”。但是，这次“重提阶级斗争”，确有某些特殊背景。

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人们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对“三面红旗”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思考。1962 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在讨论 1958 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时各地、各级负责干部都在发言中相当普遍地对涉及“三面红旗”引发的一些问题，表现出不满情绪。毛泽东虽然宽容地提议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并在讲话中原则上表示对某些错误要承担领导责任。但是，据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透露，毛泽东对那次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有对林彪（中共叶央副主席，1959 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部长）在会上的发言，“内心是感激的”。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发生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这些严重违反客观实际的有意阿谀之辞，却得到毛泽东的欣赏。

当时，党内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

对于经济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鉴于1962年财政有很大赤字，商品供需差距很大，认为还处在“非常日寸期”。对于某些政策措施，如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给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平反等工作，都有不同认识。党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甚至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的，经过调查研究、民主讨论，也是町以解决的。而毛泽东却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和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实践作了错误的判断和总结。把与他不同的意见，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把这种分歧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甚至认为这就是在党内，在上层出现的修正主义，进而提出了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迷误急剧发展。

在这个期间，国际国内形势的某些变化和发展，也对党内“左”倾思潮产生了促进作用。例如：中苏两党的争论日益加剧，分歧公开化，并影响到国家关系。苏联领导人持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在1961年后逐步介人越南战争，由出钱出枪的“特种战争”，到美军直接参战，战火逼近中国南大门。印度军队也在苏联的支持下人侵我国新疆、西藏地方。在国内，台湾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利用当时大陆的暂时经济困难，叫喊“反攻大陆”。社会上一些反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趁机进行活动，各种犯罪现象有所增加。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及时提醒全党注意抓阶级斗争问题，这无疑是有相应的客观需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时期、一定范围出现阶级斗争某种程度的激化，却被看做全面的阶级斗争，并把阶级斗争置于笼罩一切的地位。这是对党内矛盾和国内外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量的结果，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在理论上的一次后果严重的失误。

社教运动掀起“阶级斗争”

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会后，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河北省保定地区进行了“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查出一些干部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中共湖南省委则用3个月的时间，以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训练了生产队长以上各级干部120万人。通过训练，使这些干部接受这样的认识：“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也是严重的”。湖南省委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应该“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

毛泽东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保定地区“小四清”的经验，据此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就这样，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又一次逐步地向全国推开了。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指导下，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地区和单位中，一抓就抓出许多所谓的阶级敌人，揭露出许多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就在1963年9月，毛泽东正式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把阶级斗争放在“纲”的位置，实际上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已经得到确认。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势必把一切工作统统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指导，采用许多强制方法，把一些被怀疑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对一些生活作风、工作作风有这样那样毛病的干部，往往在证据不实的情况下，视为坏人。这样就抓出了一批所谓的阶级敌人。这就造成“不搞不知道，一搞吓一跳”的错觉。吓了一跳之后就检查右倾，反右倾，然后再去抓“阶级敌人”。越反右倾思想就越“左”，“阶级敌人”抓得也就越多。多了就再吓一跳，再检查“右倾”，再去抓，形成一种交互作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只在局部地区和单位开展，后来又纳入“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形成席卷整个大陆的全局性政治运动，但它在社会上造成的震动和影响却是极大的。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曾经对政策进行过几次调整，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中造成的损失。但是，通过这场运动，“阶级斗争”的范围越斗越广，“阶级敌人”的数量越斗越多，造成了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重的假象，这种假象对于领导决策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左”倾理论的升级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1965年1月，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认为：“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进一步为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共产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提供了理论政策的依据。

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由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组织人写的文章，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即当时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政治批判，声称这些文章和作品，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此后，全国报刊上对一系列小说、电影、戏剧，如《刘志丹》、《怒潮》、《谢瑶环》、

《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进行批判。这些受到批判的作品，多数是这一时期创作和放映的比较优秀的作品，而在当时，却被认为都是文艺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给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大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看过这些相当受欢迎的作品的人，对于这种严厉的政治批判，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下，在言过其实的阶级教育影响下，人们真诚地或是违心地检查自己“阶级斗争的观念太薄弱”、“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广大群众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1963年底和1964年中，毛泽东先后对文学艺术工作写了两个批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他认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对于当时各文学艺术协会，毛泽东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工作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是不公正的、言过其实的。不能说当时文艺界不存在任何不良现象，也不能说没有资产阶级影响，但就总体上看，当时文艺界主要是存在“左”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真正贯彻的问题。毛泽东以更“左”的眼光看待文艺界，从政治上加以批判，对文艺界震动很大。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以及文化部直属各文艺单位，根据两个批示立即进行检查，开展整风。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都遭受到错误的、过火的批判。文化部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

从1964年夏开始，这种批判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在批判中，把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错误地给有关人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等政治帽子，作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更有甚者，凡是某一学术观点受到批判，许多持相同意见的人，尽管有的同被批判对象素不相识，也要受到株连，遭到不应有的打击。后来发生的全国性的、猛烈的政治运动，被冠以同它内容毫不相干的“文化大革命”之名，于此可以找到缘由。

可怕的形势估量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理论和实践交互作用下，到了1965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量，描绘出一幅可怕的情景：

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

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对形势作出了如此严重的估量，在毛泽东眼里，"党变修，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因此，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而毛泽东自己如何考虑来扭转这种局势呢？他认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那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抓。因此，他认为需要通过一种形式，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种他心目中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群众运动，后来就被叫做"文化大革命"。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上边只是对"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和"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左"倾实践，及其交互影响作了一个概括性的分析，描绘了一个总的轮廓。至于详细的条分缕析则不是这本简史所能够完成的任务。

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没有其他原因的交互渗透、交互影响，并不一定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将在下面作一些探讨。

第二节　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领袖的能力，这一组织制度方面的重要缺陷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仅仅是理论上的失误和对形势的误断，依靠充分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并不是不可以纠正的。政治理论上的错误加上组织制度的缺陷，就使领袖的错误难于约束和纠正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邓小平曾作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说，制度是决定的因素，那个

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这里所说的“那个时候的制度”，显然是指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而不是指党的正确组织制度。那么，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狂热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什么作用？需要做一些历史的考察。

权力过分集中的产生和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自从列宁明确提出这条组织原则之后，为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普遍接受。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并写入自己的党章。从理论上说，民主集中制是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正确组织原则。毛泽东也曾反复讲到，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实行这样的制度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但是，由于这个组织原则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备，并形成可操作的具体规范，特别是由于各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投入严酷的阶级斗争之中，使得民主的一面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集中的一面则受到了过分的重视和强调，使民主集中制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很少能够得到正确的贯彻实行。客观地说，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共产党处于地下斗争、武装斗争的情况下，适当强调集中这一面是正确的，有其历史的必要性。1919 年第三国际成立时，考虑到推动和领导革命的需要，鉴于第二国际过于松散的教训，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采取了集中领导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要受其影响。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证明第三国际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指导弊多利少。1935 年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对此作了重要改变。后来共产国际也解散了，但其影响却没有随之消失。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期处于武装斗争的特殊环境，为适应残酷革命战争的需要，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鉴于对敌斗争尖锐，根据地分散，干部素质不整齐，存在一些不协调现象，于 1942 年 9 月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这个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些规定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对于在战争环境里，协调党政军民各种组织的关系，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党决定一切以至党管理一切。虽然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是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而实现的，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也不可能制定明确的条例，使各方面工作各得其所。党决定一切、党管理一切的状况，在“一切服从战争”的前提下，从现象上也看不出有多大弊病。

建国以后，一元化领导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被沿袭下来。在建国初期，一方面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另一方面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各方面工作繁杂，斗争尖锐，需要统一步伐，集中力量。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要求，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口号，也是必要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注意到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是不适宜的，需要相对地、适当地分权。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著名报告《论十大关系》中，特别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还指出：“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政治报告的这些论述，反映出中共中央已经看到权力过度集中是产生官僚主义，不利于发挥人民群众创造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指出了“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因此，在党章中规定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应作适当的划分。邓小平在这一报告中阐述历史经验时还指出：“‘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

“八大”通过的各项重大决策刚刚开始贯彻，就被反右派运动打断了。随着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思想的发展，权力过度集中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一步一步地强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中曾提出党委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类不适当的提法，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更加明确、更加肯定地概括为“党领导一切”，并且在实施中演变为党决定一切，党管理一切。甚至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一切，大权独揽、个人专断。并且多年相沿成习，在党内外习以为常。

助长个人专断的规定和惯例

从党的组织原则看，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体现。即使规定了党领导一切，应该是指党的集体即各级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制度执行得好，也能够避免许多失误。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邓小平“八大”报告）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固然同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有关，但是，同一些可能助长个人专断的成文规定或不成文惯例，也有很大关系。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

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问题。”“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在这个决定中，虽然规定了书记处的性质和职权范围，但在根据地分散的战争环境，政治局会议不可能坚持按规定每月召开两次，书记处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赋予毛泽东的“最后决定之权”也就越来越扩大。由于毛泽东具有非凡的智慧、丰富的政治经验、广博精深的学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应当承认，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滥用“最后决定之权”。从史料中可以了解到，毛泽东不仅在立场坚定、目光远大、多谋善断等方面有过人之处，而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既能力排众议，坚持正确决策，又能尊重多数，不固执己见。这些都是他能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建立不朽功绩，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重要原因。

党的七大和八大都没有再规定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但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权力高度集中，事实上的不容许反对，造成了领袖独断的可能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领袖的个人素质，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往往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当领袖能够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条件，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正确反映人民的愿望，代表人民的利益，执行人民的意志时，事业就胜利发展；反之，事业就要受挫折，遭失败。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样的例证是颇为常见的。

对于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状况，邓小平曾作过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让我们再引邓小平的一段话相对照，就可以看到领导工作状况的变易，是同领导作风的变易同步的。“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发生领导作风上的变易是什么原因呢？还是让我们引一段文件：“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从上面三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走上犯错误的道路的契机和轨迹。

个人崇拜是强化剂

权力过度集中，再加上个人崇拜，这就形成一种交互作用：权力过度集中助长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强化个人专断，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在这个交互作用中，个人崇拜是强化剂，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个人崇拜是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腐朽的历史遗产。反对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

贯原则。但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它的影响和恶果却不可忽视和低估。先后发生过两次严重的个人崇拜，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都造成了巨大的不幸后果。

本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的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等。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有远见的决定，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单有这样的措施，还不足以对防止个人崇拜思潮的发生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还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语言用得很委婉，但问题毕竟是明确地提出来了。遗憾的是，中共八大没有在这种明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全党的认识并采取防止个人崇拜的有力措施，以致未能有效地制止以后个人崇拜思潮的大泛滥。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1957 年以前，党内外政治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健康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些时候，已经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理论上、宣传上越来越多地把领袖说成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说成只是个人的贡献，不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者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等等。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而没有被及时纠正，使得个人崇拜现象能够无阻碍地发展。

推动个人崇拜的三种力量

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得到三种力量的推动。

一种是广大群众出于对领袖真诚的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使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脱而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群众很容易把这种对党的感激之情集中于党的领袖一人身上，把领袖歌颂为红太阳、大救星、大恩人。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显然是掺杂着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以及小生产者自身的思想束缚。马克思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小农的政治思想特征，他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旧中国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这种来自旧社会的传统影响，自然不可能很快消失。不过只要教育得法，引导得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传统势力并不一定就会成为个人崇拜思潮的顽强推动力，但它却是个人崇拜的深厚社会基础和良好土壤。

另一种是从领导上默许、欣赏甚至提倡个人崇拜，这就必定会造成重大影响。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似是而非，要害是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两种根本

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它的客观效果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内已经萌生和发展的个人崇拜开了绿灯。就在成都会议上，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闻风而上，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种绝对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话，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驳，反而得到欣赏。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还将其作为会议内容，在一部分党员中进行传达。过了两个月，就在同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这位提倡迷信和盲从的领导人就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还有第三种推动力量，就是党内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和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早就在处心积虑地谋求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登龙术"。"正确的个人崇拜"这种观点一立起来，使一些野心家探测到了"政治气候"。他们把个人崇拜看成是"得一人者得天下"、谋取个人权位的终南捷径。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请注意，当时所说的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只属于一个人，并非现在所阐明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应当指出，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当数林彪。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在军队系统中，以推行"突出政治"为名，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此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对于"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在讲话中，从原则上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林彪在大会上发言却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并且反复强调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泽东的指示去做，"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1966年初，林彪更提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的这些话，实际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论点，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6日给军队领导人的一封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林彪搞的一套，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下，迅速推向全国。林彪、康生等人由于在党内身居高位，掌握着某一方面的权力，又披着"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等吓人的外衣，因而颇能迷惑一部分人，发生较大的煽动蛊惑作用。

领袖态度起关键性作用

个人崇拜现象如果得不到领袖的欣赏（至少是默认），是不可能形成气候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多次表示了对工人运动中时有发生的对领导人无原则地歌功颂德现象的极端厌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也坚决反对别人对他无原则地歌功颂德。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并没有发生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个人崇拜。中国在1957年以前，个人崇拜现象并不突出。这以后，个人崇拜就愈演愈烈了。这中间毛泽东本人的重大责任是无可推卸的。1970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

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过去提议通过决议，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个人崇拜的人，怎么会公然提倡个人崇拜呢？按常理说，一个领袖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并遭到一些负责人反对时，领袖应该冷静地、正确地来对待问题了。但是，领袖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力排众议，要“反潮流”。当他继续推行错误的方针而不可能按照正常民主程序获得多数人支持时，就不能不更加需要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因此，在他看来，个人崇拜确实是“需要”的。

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交互作用下，党员群众以至党的组织，失去了对领袖的监督和制约作用；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个人完全凌驾于集体和组织之上。这种情况“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后，越来越明显（见前引邓小平的论述）。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当时，在工农业生产以及农村扫盲等工作中，都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社论指出：“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在3个月后召开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可是，毛泽东却坚持说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又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骂我的，所以我不看。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以致主张发这篇社论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先后作检讨。从此，反“左”倾、反冒进成了禁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左”的思潮更加发展，紧接着就发生了“大跃进”。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就不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往往是他在会前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会后向他汇报，他同意了才算数。否则，或者是重议，或者是按他的意见办。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实际上成了上下级关系。

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也日益不正常。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决定批判彭德怀后，在一次小范围的批判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发言批评彭德怀性情粗暴，固执己见。毛泽东认为是“隔靴搔痒”，打断了朱德的发言。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中，朱德又受到无端的批判。这说明政治局常委之间，已经不是平等的关系。在196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个人对中央的重要领导机构提出没有根据的指责，这也反映了领导关系的不正常。在讨论《二十三条》时，对于运动的性质以及“走资派”等问题上，毛泽东同刘少奇的意见有分歧，在会上形成各讲各的。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却被认为是对毛泽东的大不敬；为此，刘少奇专门向毛泽东道歉。类似上述的情况表明，中央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这种分歧从来没有公开，而且作为最高机密加以保护。这一方面说明中央

领导人都是以党的团结为重，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这种别的领导人委曲求全顺从毛泽东的做法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作用，损害了党中央的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

个人崇拜的认识原因

从领导体制上形成个人专断还有理论认识上的原因。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籍和文件中，在讲到历史上党内路线斗争时，都有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既然有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也就要有正确路线的代表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曾经多次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这本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把路线问题讲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神圣，就产生了绝对化的弊病：路线错了，一切皆错；路线正确，就一切正确。毛泽东既然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很自然地就会被认为是不同意正确路线，甚至被说成是反对正确路线，这顶政治帽子的分量是很重的。因此，毛泽东坚持一种主张时，经常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大家只能是努力“领会精神”、“积极贯彻”。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本来是否定独立思考，提倡盲目服从的愚昧论，却能够得到相当多人的赞成或视为行动准则，也是由于有这样的客观环境。对于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埋怨别的中央领导人“愚忠”、“没有勇气”、只图“保住乌纱帽”等等。“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领导人，除了林彪、康生、陈伯达等极少数野心家外，都是主要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当时认为这是党的宝贵财富）。而且，在个人专断的状况下，对领袖的态度如何，往往被视为最高纪律。谁要是坚持反对毛泽东已下决心的某种主张，不仅为毛泽东所不容，而且也不会得到领导集体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见前引邓小平语）。

当然，从毛泽东一生的言论看，他从来没有从理论上否定过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这些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事实上，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是他经常讲的一个题目。他作出的重大决定，一般都要交给中央领导集体在一定会议上讨论通过。但在党的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作出决定的事总是能够通过的。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状况，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意志，使他认为真理总是在自己手里，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他自以为是坚持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排众议、“反潮流”时，他认为，这样做比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更为重要。因而，为了坚持他认为的正确政治路线而实行个人专断。仅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几件事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现象，他并不认为是违反民主集中制。

个人专断的几个事例

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是一件要发动全党、全国进行所谓大批判的大事，而且文章攻击的矛头是直接对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后面还牵涉到更多的中央负责人。因此，这样的文章就决不仅是一篇普通的批判文章，而是有

重要政治意义的大事。可是从文章起草到发表，却向中共中央保密达八个月之久，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全不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也不知道，都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这是个人专断决定全局性大事的一例。

1965年12月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批判，是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陷，临时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的。当时在北京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刘少奇，接到开会通知却不知会议内容，去问负责军委日常事务的政治局委员贺龙元帅。贺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前不明底细，只能面对既成事实。这是个人专断后加给集体的一例。

1966年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是经在京中央常委讨论同意，并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时并未表示反对）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不久，毛泽东个人决定撤销和批判《二月提纲》。这是个人否定集体决定的一例。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的内容，如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定为"反党集团"，通过《五一六通知》等，都是会前由毛泽东主持决定的。但正式开会时，毛泽东却住在外地不回北京。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这是形式上通过集体贯彻个人决定的一例。

党中央政治生活极端不正常，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召开的状况也反映出来。按"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改作常任制，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两次。"八大"党章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实际上，自1958年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没有开过全国代表大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后，竟相隔四年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不能按时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原因固然不止一个，而在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的条件下，毛泽东认为根本不需要什么"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遭到无理批斗、关押，各级党委被砸烂，集体领导的形式也不复存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直接以"最高指示"的名义向全国发布并付诸实施。这是个人专断发展的最鲜明也是最高的形式。

个人专断同个人崇拜交互作用，把领袖个人推到凌驾于群众和中央领导集体之上的带有神圣光环的权威地位，具有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的大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处理是否得当，很大程度取决于领袖一个人。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亿万人的悲欢离合，甚至生死存亡。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肯定地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错误，不只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不幸，同时，也给实行个人专断的领袖本人带来不幸，造成深重的历史悲剧。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是我们在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时，不能不把制度问题放到相当重要地位的原因。

第三节 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

上边两节我们是着重从国内，特别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状况和组织状况，进行回顾和分析的。但是，在当代世界，任何国家发生的任何重大的政治变动，都不可能没有国际背景，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何况是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反修防修"、"打倒帝修反"为神圣目标的，在全球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大风暴，它的发生和发展都不可能不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其中的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一方面进行概括的考察，并找出它与国内政局发展变化之间的联系。

中苏关系演变与反修口号的提出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为强大的"老大哥"，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中间，威望是很高的。那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家喻户晓的宣传口号，也确实是很多人的憧憬和理想。但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而中苏关系发生转折性的大变化，则始于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国内外学者均有不同的评价，我们在这里也不准备展开去评论它。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大肆攻击、全盘否定党的领袖斯大林，并由此而引发一场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损失的政治大风暴，是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和认识向"左"的方向变化，并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口号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来在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除了对和平过渡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外，对整个大会还是给予相当肯定的。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但不到一年后，特别是经历了1956年6至10月的波兰事件和同年10月下旬到11月的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对于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其标志就是在1957年2月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反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不过当时提出的"反修"，只是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与"文化大革命"时把"反修防修"作为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中间经历了客观形势的变化与主观认识从"左"的方向加深的曲折发展过程。

1957年冬，毛泽东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并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协调中苏两党的关系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会议宣言中采纳了中共代表团的很多意见，并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遵循的一些共同的主要规律取得了共识。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在15年后要在最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毛泽东则提出，中国要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这成为发动1958年"大跃进"的契机。这次会议的积极成果使毛泽东深受鼓舞，以致他宣称在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上，东风已经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

但是，随着赫鲁晓夫对中国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讥讽嘲笑，对金门炮击的指责和提出成立中苏联合舰队、在中国设立由苏方管理的长波电台妄图控制中国海军的无理要求，遭到毛泽东严厉拒绝等事情的发生，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又急剧恶化了。特别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认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这其中就包括"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他提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毛泽东还指示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等编一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并表示："我准备写一篇万字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这本书后来虽然没有编成出版，也没能看到毛泽东的长序，但对"赫鲁晓夫们"的憎恨之情已溢于言表。毛泽东这时已把修正主义同"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一道看作"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但一直到1959年底，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林彪、陈毅、康生、王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等人到杭州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时，还要大家研究："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他还是认为："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就是仍然希望"赫鲁晓夫们"改恶向善，而不是走向决裂。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而转移。赫鲁晓夫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蓄意发动对中共的攻击。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成为两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会议前夕，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突然向各国代表团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

共中央的通知书。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共产党围攻，诬蔑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对印度侵占我领土的自卫和抗议是"纯粹的民族主义"，对待苏共的态度是"托洛茨基方式"等等。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遵照党中央既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一方面据理力争，进行严肃的斗争，并在会上散发书面声明，指责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搞突然袭击的恶劣做法；另方面，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签了字。苏共领导见在会议上没有能够压服中共，就在会后施加压力，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从7月28日至9月1日，共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同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份，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个。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尚在建设中的项目还有201项。而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停工或中断，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此外，还在两国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政策。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分别在对方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此后，两国边境的纠纷和事件也不断发生。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并参加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苏共又重施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故伎，不顾26国起草委员会上多次交谈的协议，在会议前夕，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一封长达6万字的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会上又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几乎使会议濒于破裂。由于大多数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作了积极的努力，中苏两党各作了一些让步，会议最后还是通过和发表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但是，中苏两党和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无可挽回地继续恶化下去了。

1961年10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参加。但当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公开攻击斯大林时，周恩来提前退场以示抗议，并专门到红场墙边的斯大林墓去献了花圈。而后发生的在中印边境事件中，苏联公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向美国妥协退让。这些都加深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修正主义危险性的认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公开决裂已经不可避免了。

正是这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断升级。到1962年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责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强调：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把中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同国外的修正主义归为一类。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修正主义。这样，在毛泽东心目中，修正主义已经定性和定位，剩下的问题就是采取反对的具体措施了。这种态势外国学者也看得很清楚，一位美国教授这样写道："毛在此以前一直以为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浪子回头。从

此以后，在毛看来，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了。”

一场空前规模的国际大论战

从1963年3月开始到1964年10月为止，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中苏两党围绕着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并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和巨大影响。

1963年3月，苏共中央发出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说，世界形势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因此，信中谈了苏共中央认为应是“兄弟党注意的中心”和“为我们共同事业而斗争的中心”的“若干原则性的问题”。6月14日，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答复，即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长信，内容共分为25条。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双方都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但双方的很多看法又是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于是商榷就成为必要了。

7月5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开始举行会谈。会谈气氛之不和谐是可想而知的。会谈正进行期间，7月14日，苏联突然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报刊和电台上发表，这样就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公诸于全世界。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在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谈前夕，“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既然苏共对两党会谈毫无诚意，中共代表团建议会谈暂停，并离苏回国。

会谈既已破裂，代之而起的是双方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各种传媒手段开展全面的激烈的大论战。苏联方面，仅从公开信发表到10月底3个多月的时间，就发表各种反对中共的文章2000多篇。其他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随苏共中央的指挥棒鼓噪而起，发表了不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除了各报刊宣传单位组织的反击文章外，还由中央理论小组负责组成专门的写作班子，撰写了系统阐述中共中央观点并驳斥苏共中央的谬论和诬蔑的重头文章。这类重头文章从1963年9月6日发表第一篇《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始，到1964年7月14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为止，共9篇，简称为“九评”。在这些文章中，以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仍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的观点为指导，去分析和论断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运的情况，强调：“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现在也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一切领导职务后，11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一篇

总结性的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文章说：“十一年来，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处处都说明了他执行的政策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上纲是很高的，用词是很激烈的。当时，因为论战的主要对手赫鲁晓夫已经下台，这场大论战也就自然结束了。

关于这场大论战，邓小平在 1989 年 5 月 16 日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讲过下面这样一段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又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这场大论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许多方面，核心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许多问题需要清理和总结，这不是本书所能做到的。但有一点，从本题所论述的角度看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通过这场大论战，使中国共产党内已经产生的“左”倾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了，并且一步步更深入全党的思想教育和每个党员的头脑。同时这场大争论更加使毛泽东确信在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颜色，并转而反察中国，得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也可能出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结论。从而增加了要在中国进行反修防修斗争的急迫感。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不能不对后来的历史进程发生深远的影响。

赫鲁晓夫后的中苏关系

赫鲁晓夫下台，客观上为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种转机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因此，利用纪念十月革命 47 周年的机会，在并非逢五逢十大庆祝的情况下，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规格很高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到莫斯科。但是，中苏两党的正式会谈还没有开始，就为一位苏军高级将领的严重荒谬的行动破坏了。就在 11 月 7 日晚间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贺龙同苏联元帅崔可夫等一些军界领导人谈话中，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

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质问。勃列日涅夫以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相掩饰。周恩来立即指出，这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在随后举行的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这件事联系到其他情况，使党中央得出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结论。此后，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增兵到百万之众，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驻军队，对中国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这件事对毛泽东的触动有多大，自然是无从作出准确考证的。但是，在共产国际时期，苏联可以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手段，改变别国党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解散后，在斯大林时代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苏联惯于从别的国家党内找到内应并施加影响和压力，从内部进行颠覆，以改变不按其指挥棒转的领导人，这已经不是秘密。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当然深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他不可能不加以防范。由此，他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放在洞察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上，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不幸的是，在这个影响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常常会有很多偶然性的事件，例如上述的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但是，这些表面上看似偶然的事件，常常包含和反映了客观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而且随着偶然性事件中人物的地位和权势不同，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方面也有所差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尊重历史必然性，但同时绝不忽视种种偶然性。马克思曾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这个观点对我们探讨"文化大革命"起因，是有指导意义的。

国际反修对国内反修的催化

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是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而引发的。开始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反修主要是对外，反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但是随着中苏两党矛盾的激化和国际性的大论战的展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观点逐步系统化和理论化。用这种"左"的理论去观察分析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得出苏共领导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颜色，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这样一些根据不足、判断不准的结论。同时，也就必然要转而用这种理论来观察和解剖我们自己、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是否也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条件，是否修正主义势力已经产生和滋长。这样，国际反修和国内的反修防修就直接联系起来。

事情发展的过程是，毛泽东提出国内反修防修的任务，起初重点是放在防修上。即如何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如何预防性地先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例如，1963年5月，毛泽东对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的7个材料作了批示。他认为干部参加劳动是“防修”的一个好办法，并且警告全党，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就在当时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直到此时，毛泽东提出国内的“反修防修”任务，重点还放在“防修”上。对于党变修、国变色的忧虑，只是反映了他过分的政治警惕性。

本来，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经常注意揭露和克服党和国家确实存在的阴暗面，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错误道路，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主张，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并且得到党内外广泛的支持和拥护。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一种政治警惕性，即使有些过分，还不致于造成太大的恶果。但是，当这种警惕性已经转化为现实的估量和政策的时候，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当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以及社会阶级关系作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时，必然就形成了初衷和后果的严重背离，这正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正是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局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量，毛泽东就逐渐把自己注意力的重点，从防修转向反修，而反修的重点又从下层转向上层，直至中共中央的一线主要领导人。这从他的一些批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批示还说，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这里已经提出“清查改造”中国的国营企业的问题。而同月12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委员、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就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严重了。批示中提出两个阶级敌人的新概念：“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稍后，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其中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会上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到1965年秋，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了。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问：“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

么办?”并且认为“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这就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已经把党变修、国变色视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危险，并且把国内“反修防修”的重点，转移到“反修”上来，特别是要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上述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必然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全体党员干部中产生一种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已经迫在眉睫，从而造成一种普遍的急迫而强烈的政治危机感。同时，一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推进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感又油然而生。这种盲目的狂热的信念，曾是许多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思想动力。

第二，在国际大论战的推动下，原已存在于中共党内的“左”倾理论日益发展和系统化，理论形态更完备，被称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伟大的标志”等等。这在一段时间里为许多人所信从。

第三，通过大宣传和大学习，使反修宣传日益深入和普及，真是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第四，促进和发展了一种以“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扼杀了任何敢于提出怀疑和否定意见的创造性的批判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这段语录被绝对化，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观点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歧视、批判和打击，甚至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折磨。这种状况只能鼓励盲从而扼杀独立思考，使整个民族在错误的指引下陷人灾难的深渊。

综上可见，这场以中苏两党大论战为焦点的所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确实是一副强烈的催化剂，成为有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急剧膨胀的重要因素，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

第四节　在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

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影响和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严重误断甚至使他担心会在首都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并且为此还作了实际的预防性部署。林彪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

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林彪这篇讲话，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毛泽东并没有删改这些话，表示了对其所述的默认。

最善于揣测毛泽东心态的林彪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声疾呼："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话是说到毛泽东的心底里去了。林彪能在3个月后就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这篇讲话可能是他为自己上升搭设的重要一级阶梯。

毛泽东是一个终生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性格倔强、从不屈服的革命家。只要他认定是对的事情，就是遭到再多的人反对，也要坚持到底。在他一生中很少有认输的事。这也是他提倡的"反潮流"精神。这种状态在他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有颇为明白的表露。他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毛泽东在信中还说，中国的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把形势看得这么严重，完全是出于主观臆断。基于这种判断，他觉得必须挺身而出，坚持"反潮流"的原则，从修正主义的狂涛中，拯救马克思列宁主义，拯救中国和世界的革命事业。为此，即使自己被"打得粉碎"，也在所不惜。面对他所估量的中国"修正主义"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他下决心，发动亿万群众，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造成天下大乱之势，以求把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扫除，最终达到天下大治。这也就是毛泽东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动机，到这里似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说明了。但是，我们考虑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应该忽略的。

对接班人问题的忧虑

接班人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泛指的，年轻一代对老一代革命者的接班；一个是特指的，即对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的接班。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毛泽东是极为不满的。1965年8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加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老样子。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他又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他认为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对建国后十七年我国的教育状况作出这种估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他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

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毛泽东注意到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的一些演说和文章，主张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在这期间，他对青年人的教育问题，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64年6月，他提出了接班人的5个条件。他要使全党，特别是年轻一代，从阶级斗争中得到反复辟的锻炼。为此，他不惜冒“天下大乱”的风险，亲自发动和领导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风雨，让青年人去经风雨，见世面。

而当时，在毛泽东看来更为紧迫的问题，则是党的领袖毛泽东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他要亲自动手为自己再挑选一个满意的可靠的接班人。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对挑选和培养接自己的班的人十分关注。1962年以后，他越来越感到刘少奇不是可靠的人选，需要重新考虑。1966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说明，对更换接班人的急迫考虑，确实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对“破”的过分强调

另一个影响到毛泽东对形势分析和判断的是对“破”和“立”关系的片面观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包含着“破”和“立”的双重意向。而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破和立的关系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等，总是把“破”放在先头的。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带有某些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倾向，但也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的性格特征。当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即将全面实现“破”国民党的统治时，也曾提出“立”的任务。他号召全党，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工作，“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话是这么说的，建国初期的实际工作大体上也是这么做的，并且取得了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辉煌成就。而毛泽东本人的注意力，却仍然主要是放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旧的生活习俗等方面。他曾经说过：“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就是实践的证明。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不关心、不主张发展生产力。相反，有时他把发展生产力的某一方面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如“大跃进”时期的扶保“钢铁元帅升帐”即是一例。但是，从更多的情况看，他确是侧重于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这也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哲学思想，即不区分不同的历史条件而一贯地过分强调生

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主张以革命去促生产。因此，他欣赏并肯定“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突出政治”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而当这种主张在实践中碰壁之后，例如“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又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笼统地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方面找原因。以致他把党内的分歧看得越来越严重，把建设社会主义不同方法的分歧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内和社会上的“黑暗面”看得越来越深广，从而产生了危机感。促使他以超人的魄力，下决心要在中国大地扫清一切牛鬼蛇神，在大破中建立起一个纯洁的、完美的理想社会，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树立光辉的榜样。

“天下大治”的模糊蓝图

那么，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呢？他自己从未明确地讲述过。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天下大治”的蓝图是什么样？这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并未提及。《五一六通知》只是说要“夺取”什么，“批判”什么，“清洗”什么，讲的完全是“破”，而要建立什么，那里边并没有说。《十六条》倒是提出要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四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谁也没有说清楚，仅仅是一堆抽象的口号。所以，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完整的纲领的。因为一种革命的纲领，总要规定所追求的建设性的社会目标。连目标都是含混不清的，就至少不能算是完整的纲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追求的社会目标，只能从别的史料中去探索。

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廓，即工人、农民、学生、军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都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看来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的“大学校”建成了，“三大差别”似乎就会自然消灭，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就不需要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对于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

件和物质基础，以及为此而必须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无论是“五七指示”还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却一句也没有说。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毛泽东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的带有浓厚历史遗痕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模式之中。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的社会构想，绝不是他一时兴之所至，而是有深远的思想基础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958年。就在这一年以及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富于鼓动性的命题。他认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并按照这一思想指导，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他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上，印发了选自《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并写了一个说明。他很欣赏张鲁的建立在小农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并用来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推行的平均主义措施作历史的比较和论证。包括张鲁主张的近乎政社合一的组织，劳武结合，道路旁饭铺里吃饭不要钱，以说服为主的方法等。从这里可以看到“五七指示”的思想渊源。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认为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穷是好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白则更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提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他提出要破除迷信，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他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甚至说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能读太多，“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成了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他主张不断革命论，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这种革命的内容和形式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这些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构思社会主义蓝图的思想特征。但是，即使是富于非凡才智的杰出人物，他的认识也不能超越时代所能提供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限制的条件。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才刚刚起步，我们自己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苏共二十大之后，更多地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不足为法。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但那是他十分憎恶的资本主义，当然更是不足为法的。因此，毛泽东在构思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蓝图时，只能借助于战争年代的经验和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大同世界”的各种设想，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并非完全准确的预测。在这种历史局限性面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是能够在社会舞台上随意驰骋的。想象力越丰富，魄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出大错。

毛泽东始终没有完成他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总体设计，他没有留下完整的图纸。我们只能从那时他的一些讲话和文字中，看到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一个并不清晰的轮廓。

在那样的社会里，分配应是大体平均的，实行供给制是一种较好的形式，逐步实现吃饭不要钱，穿衣服也不要钱。有趣的是，据曾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回忆：“毛泽

东最讨厌钱。毛泽东曾经同蒋介石握手，但是毛泽东从来不摸钱。毛泽东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摸钱。”毛泽东说：“唉，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东西，可是我拿它也没办法。”毛泽东在谈到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时，总是充满了美好的怀念。他赞扬供给制，厌恶工资制。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针对有些同志对实行供给制持不同意见，毛泽东争辩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差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他还说：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对工资制，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他说：解放后，统统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说服工作。他责问道：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显然是来源于过去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他把这些在特殊条件下，从全国范围说是少数先进分子中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普遍化、固定化、绝对化了。他以为在战争环境适用的，在和平环境也能适用，并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构筑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终不免陷于空想。

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城市的、乡村的人民公社组成的，这是实现在分配上大体平均所需要的基层组织单位。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他说：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基层单位，它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的部分作用。他认为，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指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显然，毛泽东憧憬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千千万万个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具体而微的社会群体，由此组成“共产主义大学校”。这样的设想，是同经济发展趋势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那样的社会里，实行分配上的平均，是为了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保持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干部特殊、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等十分不满。他指责说：发薪水都要分等级，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他还把“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等现象，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他说：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根除。毛泽东对于这些社会弊病的厌恶，更引起他对战争年代根据地生活的怀念。他说：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他认为，那时的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毛泽东的这些看法，表现出他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的主观构想。但是，那些千百年积留下来的社会弊病，在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水平低下的现实生活中，期望通过若干次群众运动的冲击，就能把它扫除干净，这样的想法已被实践证明只是一种有害的空想。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产生的一些断想，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未能继续发展并形成体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那些设想。他认为，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设想，就是不断革命。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搞修正主义。毛泽东在逝世前不久还愤慨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认为："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由此，他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惊人误断。可以看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强烈的主观意念。从而产生了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主流并非权力之争

这里顺便回答一个颇为流行并很有市场的观点。这就是国内外都有人宣扬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权力斗争的说法，是什么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总爆发"；也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等。这是对中国政治状况缺少深刻了解的一种误解，是把结果视为原因。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指明了要夺权，"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也贯穿着夺权，而且，林彪、江青一类野心家也确想乘机夺权。但是，就毛泽东来说，如果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根据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不是开几个小会就"搞下去"了吗？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是在一张旧报纸上用铅笔写上 203 个字（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搞下去"了吗？而且，刘少奇、邓小平被"搞下去"之后，"文化大革命"还进行了十年，这又怎么解释呢？对于那时拥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来说，要撤换几个中央领导人，总是能够找到理由按"法定的"手续去实现的，并不一定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显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破除的，是他以"左"的目光所看到的弥漫中国大地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以及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期望"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所以他主张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性斗争，"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况且，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再加上个人崇拜的日益盛行，没有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敢做"彼可取而代也"的梦。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产生领导人的程序，也不可能使某个人得以违反众意，夺取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建国后也发生过高岗、饶漱石妄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事件，

结果不是在“游说”期间就被“搞下去”了吗？而且，他们也绝不敢公开图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有的人引用毛泽东1970年会见斯诺的谈话中所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以此证明毛泽东的“大权旁落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夺回失去的权。对于毛泽东说的这段话，确有争议的余地，因为话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但是，这是对外国记者说的，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这两个问题似乎确是很难作出别的解释。但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那段历史稍作考察，就不难了解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还可以反问一句：如果真是毛泽东大权旁落了，他能够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这类话，不过是抓住某些表面现象，而用资产阶级政党斗争的常规去解释罢了。

复杂起因仍需多方研讨

这是否说，只有我们的观点，即“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是说明“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切矛盾、一切因素的正确结论？当然不是这样。

关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总体上已经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列举的社会历史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领导思想上习惯于过去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引申到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等。《历史决议》还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对于它的起因自然应该作更加深入的、更细致的、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只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十年的历史发展中作了概括的考察，希望读者能够从下文即将展开论述的“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得到更为明确、更为具体、更有实感的认识。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三个交互作用的结合滚动，恶性膨胀，终于把神州大陆推人全面大动乱的深渊，这是今日史学工作者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梳理出的一条线索。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文化大革命”的绝大多数亲历者来说，普遍感到这场政治大风暴来得十分突然。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之火已经在越来越旺地燃烧；另一方面，全国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却浑然不觉巨大厄运之即将降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反差呢？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种客观要求，广大群众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从经济方面看，经过几年的调整，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比较迅速，社会生活比较稳定。到了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984亿元，比“大跃进”前最高水平的1957年增长了59%。国家财政状况好转，收支平衡还略有节余；国内市场稳定，物资供应逐步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出乎人们预想地迅速好转了。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几大部类的关系比较合理，又出现了重新高涨的势头。从1966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广大人民在困难时期紧锁的眉头，逐渐得到舒展，满怀信心地积极工作，努力生产。这就是说，广大群众关心的是发展生产，搞好建设，改善生活。

在政治生活方面，虽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在进行，但是，运动是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党委领导下由工作队主持进行，经过贯彻《二十三条》，一些过分打击基层干部的过“左”的规定和行为得到某些纠正，还把“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促使领导运动的干部把部分精力放在组织生产方面。而且，到1966年春，全国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根据1965年7月的统计，工交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只占总数的3.9%；其他如财贸、文教卫生、街道企业和城市居民中，只在极少数单位进行了试点。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全党和全国没有产生全局性的震动，运动中过“左”做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从全国来说，还只是局部的。当然，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恶果，人民内部的矛盾很多，有些还相当尖锐。这些矛盾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正确处理，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就在国内形势发展比较好，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搞好建设，改善生活的时候，一场新的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却在绝大多数人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

第一节 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一场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惊的政治大风暴，其导火线竟是在一份地方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并非大人物评论一出戏剧的文章，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奇异而特殊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这篇文章就是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署名姚文元。

姚文元是小有名气的"左"派文坛评论家，以"棍子"著称于文艺界，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对于姚文元以往的文章，当时很多人都理所当然地给以藐视并置之不理。但这篇文章却不同寻常，有着十分重大而特殊的背景。党内最高领导层内的分歧，通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文坛棍子之笔，以批判一个历史剧的面目出现，而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确实是一种曲折而特殊的历史现象。

发端文章的由来

姚文元的文章所批判的《海瑞罢官》，是著名明史专家、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共产党员、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个描写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吴晗写这个剧本，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倡议。早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都谈到要提倡敢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宣传海瑞、学习海瑞。他还讲了一段反映海瑞不惧权贵，刚直不阿精神的故事，并且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有海瑞出场的清官戏《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表示称许，并且提议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些文章。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参加上海工作会议返京后，约请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全面地评价海瑞的文章。谈话中，吴晗还答应再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在此之前，吴晗已经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于1959年6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上，毛泽东对上海会议时的讲话作了一些修改补充，提出要区分所谓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的问题。他认为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

1959年9月，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海瑞》一文。文章的结尾特别写上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此表示提倡的是"左派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这也是当时写文章习惯使用的保护自己的方法。

在这以后，各地还演出了一批宣传海瑞的戏，如《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1959年下半年，北京京剧团著名演员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一出海瑞戏。1960年底，

剧本写成，原名《海瑞》，主要反映海瑞任应天府巡抚时除霸退田的事迹。后接受植物学家蔡希陶的意见，认为剧本是写海瑞的一件事，并非写他一生，遂改名为《海瑞罢官》。显然，吴晗采用这个戏名，并没有影射彭德怀“罢官”的意图。京剧《海瑞罢官》于 1961 年 1 月在北京首次演出。

到了 1962 年，中国共产党内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 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话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同时，刘少奇也谈了彭德怀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们“都有国际背景”等问题。6 月，彭德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约 8 万字的长信，详谈了个人的历史，既作自我解剖，又据实申辩，要求党组织审查。在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辩信被作为“翻案风”的一种表现，受到毛泽东指责。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称病，不做工作，当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突然兴奋起来，她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1964 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

1965 年 2 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她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从 3 月初开始动笔到 11 月发表，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毛泽东在 1967 年 2 月有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毛泽东前后看了三遍，可见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和支持。江青后来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其所以要对中央其他领导人保密，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她还说：“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这就是说，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组织写这篇文章，是怀着重大的政治目的，是精心选择的打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 1961 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奇怪的是，1960 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 1961 年才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 1962 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一篇文章引发政治狂澜

这篇蛮横无理、断章取义、点名批判、任意上纲的文章发表后，在舆论界引起了各种猜测和议论。学术理论界普遍反感，很多人投书报社表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当时并

没有人要求全国报刊予以转载。除江青等人外，也没有人知道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由于姚文元文章蛮横无理，并且公开点名批判著名学者、高级干部，所以除华东各省市报纸迅速转载外，十多天内北京和其他省市报刊均未转载。中共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态度，经大体了解文章发表的背景后，在18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这引起了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不满，由此他更加确认北京市委是所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人民日报》于11月30日转载姚文元文章时，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意见，加了编者按语，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显然，这种提倡平等地进行学术讨论的方针，是同毛泽东批准发表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意图和政治目的不相符合的。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少量批驳姚文元文章的稿件。

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文章时，并没有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极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看来，在批判《海瑞罢官》已经展开的情况下，需要点出“要害问题”了。毛泽东的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对于政治运动，特别是毛泽东明确表态的政治运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是十分敏感的，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也只能是拥护和响应。因此，批判运动迅速扩大。到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和文艺作品，而且扩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吴晗及其他一些教授、专家、学者的文章，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政治批判浪潮。

两个对立的中共中央文件

面对这种形势，党的各级组织强烈要求党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这个小组是1964年下半年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经中共中央指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为组长，组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北京市委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左”的提法和词句，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把它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

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

2月5日，刘少奇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了《二月提纲》(草案)。后经彭真修改，在京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吴冷西和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反对，遂于2月12日经邓小平签发，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

后来有一种说法：对于《二月提纲》康生是不同意的，是“背着”他搞出来的。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从讨论、起草文件到向毛泽东汇报的全过程，康生都是参加了的，而且没有提过任何不同意见。这种谎言是康生利用《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负责人的便利条件，在编写作为《五一六通知》附件印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时授意别人制造出来的。

《二月提纲》尖锐地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利用，挑拨性地歪曲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就在中共中央研究和拟定《二月提纲》的同时，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由江青出面，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部长李曼村。这个会议很奇特，召集会议的江青既无军职也无党政领导职务，只能用林彪个人委托的名义。会议是仓促召开的，会前连解放军总政治部都不知道要座谈什么问题，无从做任何准备。名曰座谈，实际上只是江青一人谈她的一套“左”的文艺观点和对文艺形势的估量，并不听取，也不允许到会的同志自由发表意见。在十多天的座谈会期间，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戏剧。

会后，参加会议的成员整理了一份准备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的会议纪要。江青看后很不满意，又把这份纪要交给并无军职的张春桥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专程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修改。毛泽东对这个纪要稿先后修改过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批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这份被林彪赞扬为“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文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纪要》首先极力抹煞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主观臆断地判定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接着，又全盘否定三十年代以来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发生巨大影响的进步文艺运动，捏造出一条从三十年代一直贯彻到建国以后的所谓的“文艺黑线”，胡说：“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在这一系列错误论断的基础上，《纪要》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这个《纪要》为“文化大革命”风暴首先从文艺界刮起，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借口，同时，也成为全国文艺界的沉重的精神枷锁。《纪要》的直接炮制者虽然是江青，但它也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制定《纪要》的经过，透露了林彪同江青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还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前，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到苏州与林彪密商。1月22日，林彪口述了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由当时的“林办”主任叶群电话传达。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后来也露骨地说，她找到林彪，是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通过林彪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分，以能获取更高权位；江青则要利用林彪的权势，实现其政治野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开始。

在几乎同时讨论和制定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倾向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支持的是江青搞的《二月纪要》而不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搞清楚的。而后来的实践证明，江青搞的这份《纪要》的危害极大。“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不仅整个否定了文化艺术界的成就，而且搅乱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助长了“怀疑一切”的思潮。“黑线专政论”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为否定建国后17年的全部工作，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制造了依据，给当时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的政治批判运动火上浇油。

震惊全党的“彭罗陆杨事件”

在毛泽东所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思想影响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进一步深入到中共中央内部，接连发生震动全党的事件。

1965年11月10日，即发表姚文元《海瑞罢官》文章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了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外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被审查。他的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这些罪名都是康生、江青等的诬陷，是一起冤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杨尚昆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所谓抄录档案问题，是由于编写党史、军史、战史的需要而对档案资料的正常利用。事先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手续，并不存在“泄密”问题。完全是强加的罪名。

善于窥测风向的林彪，立即利用这个机会行动起来。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并让叶群同时带着他们指使别人写的几份诬陷中央军委秘书长、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的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这一诬告使毛泽东相信了，并加以支持和批准。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段批示既明确肯定了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又给了他打人的武器。谁要是反对林彪的“突出政治”，谁就是“折中主义”，而“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罗瑞卿被戴上这样的政治帽子，虽然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并不同意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无理批判，但也无能为力了。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所谓背靠背的揭发。会上印发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那些诬陷材料。12月10日，用专机将当时在昆明视察部队的罗瑞卿接到上海，并立即隔离审查，剥夺了他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对罗瑞卿的审查结论。

这个结论中有一段话很生动，颇能帮助人们了解在个人崇拜笼罩下，是如何颠倒是非，陷人以罪的。结论列举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的头一条是：“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的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人敢用个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同志却反对向外国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同志却嫌搞多了。”这段今天看来是非鲜明的言论对照，在当时却成为罗瑞卿被定罪的根据，这真是时代的悲剧。一个战功卓著、勋业显赫的老革命家，党政军的重要负责人，就这样被打翻在地了。对罗瑞卿的错误批判和处理，加剧了党内斗争的紧张气氛。

接着受到批判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彭真在不知道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了抵制，引起毛泽东的愤懑。在批判罗瑞卿时彭真又说了几句公道话，被认为是“包庇”、“袒护”。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向毛泽东进谗言，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当即指责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并且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

反，向中央进攻。他提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上海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并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会议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对彭真进行揭发批判。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从彭真被打倒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的条件下，对领袖的错误稍有抵制，大祸就要临头。所以，邓小平说：“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中共中央宣传部既然被指斥为“阎王殿”，作为部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自然就是“阎王”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陆定一的厄运也就注定了。后来又加给陆定一一些罪名，如“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等。其实，这些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于说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反党反革命匿名信”同陆定一有“密切牵连”，则是没有根据的推演。况且，匿名信的内容是指责林彪、叶群，写的主要是生活问题，是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虽然写匿名信这种方式不能说是适宜的，但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而把它说成是“反党反革命”则毫无道理可言。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本来是以不同的情况和问题，分别受到批判的，但后来却硬被联系起来，定为“反党集团”。这些在党中央身负重责，分管党务、军务、宣传、机要、首都工作等极为重要的任务，有很大声望并受到全党信任的老同志，突然间都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在党内受到揭发批判。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惊疑，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党内生活中，增加了新的紧张因素，而且为已经点燃的批判之火注入了新的助燃剂。

1966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7次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会议决定将这个通知提交近期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大批判之火越烧越烈

在此期间，“革命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猛。对吴晗的批判，株连到同吴晗一起用“三家村”的专栏写文章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接着又株连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位置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文章宣称："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同日，《光明日报》发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关锋署名为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篇文章其势汹汹地质问《前线》和《北京日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阵地，还是资产阶级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那里去？"这两篇直指中共北京市委，杀气腾腾的文章，识者均知其"来头很大"，暴风雨还在后边。

仅隔两天，上海《文汇报》、《解放军报》同时抛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5 月 11 日，《红旗》杂志发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这些文章都是对会议批判彭真等同志的直接配合。这样，中共北京市委已处在被围攻之中，而且更进一步向上"挖根子"的意图也呼之欲出了。

这一切，显然是江青、康生等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段话的论断虽然是错误的，但从中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发动批判《海瑞罢官》者的某些主观意图和那段历史的发展情况。

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发端，迅速发展到对《二月提纲》、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触及党的许多高级干部，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中央内部，"左"倾错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已经如箭在弦。

第二节　全面发动的纲领和领导机构

经毛泽东同意，在江青直接指挥下，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为导火线引发的"革命大批判"之火越烧越大，在半年的时间里，逐渐扩及全国。许多作家、学者和报纸、刊物被指名批判，理论宣传战线一片混乱。从地域上看，已具有全国性。但是，这场批判运动的范围此时尚属有限，基本上没有超出意识形态领域，也没有引起广大工农群众和在实际部门工作的大多数干部的充分注意。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的陆续被揭发批判，并且株连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但当时此事仍限于党内较小的范围，不为广大党员干部所知，对实际工作部门，尚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状况，自然是企图发动一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运动的毛泽东所不满意的，而

要动员全国亿万群众投入运动，就需要中共中央通过正式的指导文件，发出公开的号召。因此，有必要召开中共中央的正式会议。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简称五月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共76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未回京参加会议，委托副主席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情况指定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这次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所谓“反党错误”，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会议一开始，即由康生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讲话，传达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有关批判彭真、陆定一等同志的讲话或批示。还介绍了会议将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特别强调了毛泽东修改7遍，并指出哪些段落和字句是毛泽东亲笔所加。这样的文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自然是要一致通过的。接着是张春桥的长篇讲话，他主要介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重点是攻击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再就是陈伯达讲话。他是用“算总账”的办法，专门“揭发批判”彭真。从历史攻击到现实，似乎彭真自1923年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反党反毛泽东的。会议开头4天的3篇讲话，实际上给整个会议定了调子。特别是康生传达的一系列“最高指示”，只能是努力去领会，容不得半点怀疑。

会议在听取了关于半年来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揭发批判情况的介绍后，开展了对这四位同志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只不过是把会前对他们的错误批判，拿到更大范围的中央正式会议上来进行，并进一步提高嗓门，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罗瑞卿、杨尚昆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彭真、陆定一虽然出席会议，但只能参加部分议程，也无申辩之权，完全处于受批判审查的地位。林彪在大会发言中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四人联结在一起，提出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诬陷“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要搞反革命政变。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会议对一些身负重责的中央领导人进行的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并决定组织专案审查，似乎证明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从而使全党产生了复辟危险迫在眉睫的严重错觉。

《五一六通知》略析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从形式上看，是针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而实际上系统

地表达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比较完整全面的论证。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彭真“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如前所述，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是康生利用他主持《五一六通知》起草工作的便利条件，指使他人为自己开脱而捏造的词句。可是，彭真虽然参与了这次党的高级会议，却竟然没有据实申辩的可能，这表明党内政治生活已极不正常。在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盛行的条件下，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说，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极度夸大敌情，严重脱离实际的形势估计和对应方针，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建国以来十七年，文化领域各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在一个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和错误，是形势发展、事物发展、认识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这些问题和错误，就其实质来说，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更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阶级敌人的有计划的“夺取政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复辟活动。只要领导思想上注意及时对客观事物作出正确反映，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各种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而实际上存在的问题中，有右的问题，但主要是“左”的问题。认为当时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需要进行全局性的夺权斗争，这完全是主观臆断。而且，把文化领域的夺权，同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联系在一起，发出我们已面临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的警号，要求通过以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去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是极端错误的决断。其结果是：自己打乱自己，自己否定自己，混淆敌我和是非，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大内乱和大灾难。

《通知》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不仅对国内政治局势、党内状况和建国后十七年功过的论断是根本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在分列十条对《二月提纲》所谓错误观点的批判中，也有一系列理论观点明显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例如：

《通知》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著名论断为根据，认为主张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这是对马克思原著的一种曲解。《共产党宣言》的本意是说，阶级斗争就其核心和最终目的来说，必然是政治斗争。这里没有把阶级斗争的任何形式都说成是政治斗争。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很多是同阶级斗争有某种联系的，但并非一切皆是。在已经基本上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革命队伍内部，很多学术领域的不同见解和分歧，是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把它们统统认作是政治斗争，显然是不恰当的。《通知》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学术问题统统视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把与“左”倾理论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思潮，从而否定了发展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必需的自由的学术讨论，轻率地抛弃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这种把阶级斗争任意扩大的理论，显然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不相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理论工作者、学者、专家、党政干部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残酷迫害，正是在这种错误观点影响下，把学术问题定为政治问题所造成的恶果。

《通知》还提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个错误命题。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各种制度、设施的总和。其中又可分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两大部分。在政治的上层建筑中，无产阶级要专政，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要占据领导地位，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十分复杂，笼统地提出都要专政就不恰当了。专政是一种强制手段。列宁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也曾经指出：“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提出“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样的命题，必然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人们误以为应当采取专政的强制手段，去解决各个文化领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做的。不仅建国以来的各种文化艺术作品，包括文学、戏剧、曲艺、音乐、美术、电影、舞蹈和诗歌，等等；还有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论著，都被林彪、江青一伙咬定为“封、资、修黑货”；而且建国前为革命胜利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各种著述、作品，也被诬为“黑线”的产物；大批“各个文化领域”的工作人员，被“打翻在地”，“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文化专制主义的盛行，造成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严重局面。毛泽东五十年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通知》关于在各个文化领域专政的论点，不仅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同毛泽东本人的上述论断也是完全对立的。

《通知》还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斥为“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在“左”的观点支配下，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认

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在人们思维中的正确反映，是主观思维与客观实在的一致。真理的客观性是任何唯物主义者都公认的首要特征。它不以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论什么人都有权认识真理、掌握真理、坚持真理。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认识和掌握真理不能不受到阶级烙印的影响，特别是在认识社会领域的真理方面。因此，在这方面各个阶级事实上又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不承认这一方面．认识是不全面的，而如果片面地夸大这一方面，导致否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正确原则，则更是错误的。《通知》反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但表现了理论观点的混乱，而且在客观上是一种封建特权思想的表现，是支持迷信和盲从。实际上就是主张真理只能为某个人、某些人所掌握，旁人不能问津，只能俯首听命。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为权力真理观：权力即真理。谁的权力越大，谁的“真理”就越多。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造成了夺权抢权争斗不休，批臭打倒代替摆事实讲道理的严重局面。

《五一六通知》对国内和党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量，错误斗争对象的提出，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左”倾错误观点的宣扬，不能不在日后的运动发展中，产生严重恶劣的影响。

林彪“五一八”讲话和组织调整

在这次会议上作主旨报告的是在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排名最后的林彪。他 5 月 18 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与众不同，首先是大念“政变经”。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制造中共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他煞有介事地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险就是出在上层”。他还说：“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他歇斯底里地叫喊：“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林彪这些耸人听闻的话，在党中央内部造成人人自危，极度恐怖的气氛。

林彪在讲话中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他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这些粗暴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把个人崇拜鼓吹到顶峰的话，对会议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阴谋搞政变，反对以至妄图谋害毛泽东

的，恰恰是林彪一伙人。

林彪的讲话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和煽动性。不仅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烈地影响到会议的气氛，而且被当作中央的新精神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中去，使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中央真的出了修正主义，而且正在准备搞反革命政变，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在下面喊出“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口号，就同林彪的讲话有很大关系。

林彪这篇既不符合实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极坏讲话，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受到任何批评或抵制，反而为会议所接受。加上两天前《五一六通知》的一致通过，表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观点在当时极端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已经为中共中央所接受。虽然这些理论观点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迷误逐渐加深，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未能及时觉察。在党中央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对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文件，很难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讨论。面对文件中那些康生在会上讲明的毛泽东手笔，只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采取林彪所谓“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态度。同时，限于当时的认识条件，不可能有人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发展到后来的那种地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错误方针已经占了统治地位。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23日通过的决议中，除前述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的职务外，还决定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任命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中央政治局五月会议后，按照《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规定，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发出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8月2日陶铸被任命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到1967年1月被打倒，兼顾问时间只5个月）；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另有四大区派来参加的成员，他们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均是大区中央局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但这四位同志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过几次中央文革的会议，很快就被排除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按规定，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实际上是在毛泽东一人领导之下的一个特殊机构。因此，从一开始它的工作就撇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就是说，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此后，中央文革的权力日益膨胀，王任重、刘志坚等一些成员被排挤出外，逐步形成江青独揽大权的局面。

这里还必需说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的“五七指示”。关于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在前一章第四节中我们已论及，这里不再重复。值得注意的是，“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最高指示”广为传播，它所包含的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经济建设相抵触的要求和观点，曾经在许多方面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把建国后十七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类学校，统统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领地，这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正好相反，十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左”倾错误，知识分子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他们大都处于受压抑、被改造的地位，根本谈不上所谓对学校的统治。这一条“最高指示”，是“文化大革命”兴起后，广大教师立即受到迫害的依据之一。

全面发动的一系列措施

为了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普遍而猛烈地燃烧起来，毛泽东及在其指挥下的中央文革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

《五一六通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旋即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以后并通过报纸社论，把它的内容传播到社会。有了中共中央正式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又有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样实际的指挥机构，“文化大革命”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和势头，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对中共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提出的在运动中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坚持讲道理”，“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等要求横加指责，硬说这是“压制群众革命”的清规戒律，“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贴出后，当即受到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在半天内就贴出一千多张驳斥的大字报，许多人并找到写大字报的人进行辩论。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是支持的。

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将这张大字报的印件送给当时还在南方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通知此事。当天，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充分表明，这份大字报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其他不同寻常的措施。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于5月31日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由他们“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到后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

就发表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社论按照林彪 5 月 18 日讲话的调子，强调“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署名评论员的文章，诬指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同日，经毛泽东同意，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派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

6 月 4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市委第二书记。对堂堂首都的党的委员会进行改组，而且迅即在报刊、电台广播中公开宣布，这在建国以来还是头一次。上述一系列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发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学习、“取经”者，日达数万人，交通为之阻塞。

派工作组问题之争

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首先响应号召，效法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榜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高等和中等学校的学生率先行动，贴大字报，开批判会，并使运动从首都和大城市很快在各地展开。中共基层党委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的目标，不能进行正常的领导工作。许多学校、机关、工厂的负责人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揭发、批判和斗争，发生了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等严重的混乱现象。一些基层单位纷纷要求上级派人加强领导。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通常做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许多省、市也起而效仿，相继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

采取派工作组领导运动这种传统的做法，目的显然是希望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试图消除许多基层单位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但是，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也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并且展开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工作组派到各单位之后，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两派斗争之外，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唆，以致发

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的困难地位。

为了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并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于6月3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八条指示，规定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要求。中央八条指示的传达和贯彻，得到了大多数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拥护和支持，但却遭到“少数派”以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因而在一些学校发生了激烈对抗的事件。

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由于批评了某些学生的过火行动，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被戴上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的大帽子。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件事，并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社论认为：“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手脚。”社论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在陈伯达主持下发表的这篇社论的精神，同中央的八条指示显然是相对立的。反映出在指导这场运动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针。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大学发生的“六·一八”事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人趁工作组集中开会的机会，大肆活动，设立所谓“斗鬼台”，乱揪乱斗40多人，其中有党团干部和教师、学生。斗争时，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的现象。工作组闻讯后立即出动加以制止，工作组组长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并关闭校门，进行整顿。工作组在向中央反映这一事件的简报中说，这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要严防坏人破坏，号召学生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工作组还要求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要斗争什么人必须经过工作组批准。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于6月20日转发了这份简报，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一个多月后，这份简报被撤销，并成为刘少奇的一条罪状。

各地各单位的工作组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条指示”和批发的北京大学简报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乱揪乱斗的现象，使已经出现的混乱局面略有克服。但是，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少数造反派的极端不满。认为工作组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压制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是镇压革命的反动行为，从而加剧了工作组同“造反派”的对立。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支持和挑动下，不少学校发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

伙却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

7月18日，毛泽东在当时报刊大肆宣扬的“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25日，他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会上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的，后来不赞成了。”这表明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看法还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显然，这中间江青、康生一伙所作的汇报和提供的材料对毛泽东有极大的影响。更带根本性的原因，是他相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认为此时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他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委于7月28日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当众宣布了这一决定。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宣读中共北京市委28日决定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讲了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邓小平则说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党中央的最高层领导人，在上万的群众面前作这样的表露，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在大会结束前走上主席台，环台一周向群众招手致意。这次大会的录音，会后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工作组相继撤销。此后，加给工作组的罪名逐步升级，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党内关于派工作组的争论，实际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只有实现文化革命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出来的。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进行五个革命，其中就有文化革命。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还对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作了论述。因此，对于要搞文化革命大家都是赞成的。但是，无论是列宁还是我们党提出的文化革命，都是指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以及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卫生事业等方面。像当时那样的离开党组织领导去大搞群众运动，在一片大混乱中能否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很多人是有不同看法的。特别是对于当时出现的“乱”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

对“乱”的不同看法

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对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动乱怀着忧虑，希望能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要求对猛烈发展的运动有一定的约束，派工作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一种措施。刘少奇在6月21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在运动中，党团生活不过了，组织涣散了，这个要恢复。烂掉的党委，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他8月1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还谈到，陈伯达自6月中旬以后曾三次提出不派工作组或撤出工作组，中央“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而且，当时党中央绝大多数

同志是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衔接起来看的，而“四清运动”就是由上级派出工作队，有步骤、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毛泽东于6月12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也是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包括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也是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相衔接的。

毛泽东的基本想法是“不怕乱”。他先是同意派工作组的，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是经过他同意和批准的。而到6月中旬，他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又说，现在不忙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不怕乱。可是这时大批工作组已经派出去了，立即撤回势必加剧动乱，这是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最为忧虑的。而毛泽东的主张的改变，是同他对“乱”的看法直接相关。他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谈到他对“乱”的看法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他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的这个关于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所谓右派的想法，同他后来提出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号召，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这事实上就是要打倒被他认为是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毛泽东认为已经不能采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而只能直接依靠广大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形势，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无所逃遁，方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所以他赞美乱，鼓吹乱，支持乱。可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并不知道他的这些想法。像前面说到的在7月29日召开的“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更公开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总书记都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要怎样进行和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个人专断下形成的反常现象，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特点。

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和主张，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煽惑不明真象的学生、青年工人和青年干部，冲击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制造社会动乱，妄图实现“乱中夺权”。林彪在8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中，公然声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乱”，当时解释为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位大区的领导同志在检讨派工作组的错误时说：“我们派工作组，就是怕乱。主席不是讲了嘛，大部分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怕什么乱！”这也是对“不怕乱”的一种解释。而事实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政权为人民所掌握，发生动乱只能是乱了人民对国家的治理，造成各方面工作的破坏和损失，使经过多年努力建设起来的社会秩序和良好规章制度被摧毁，这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的道理。

第三节 "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反路线"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广大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和许多做法的抵触和不理解，统统被毛泽东看作是"阻力"。这使他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制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决定，排除所谓"运动阻力"，使"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燃得更旺。为此，他在回京前临时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经过短暂的仓促准备之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北京召开。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41人（有26名中委和候补中委被"决定"不参加会议，13名中委、候补中委请假）。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也以"革命师生"代表的名义，参加了中共中央全会。会期原定为5天，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批准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一些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

8月1日，刘少奇在大会上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并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这次会议是在开始出现全国性动乱，许多领导干部已经受到冲击和围攻的情况下突然召开的。与会者对会议的内容心中无数，加以听到毛泽东对工作组的严厉指责，更使会议的气氛异常紧张。

在以后两天的大会和小组会上，担任中央一些部委和各大区负责工作的中央委员在发言中，都没有就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提出系统的意见或建议，而是纷纷作检讨，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跟不上主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等。

在8月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并且公然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宣布："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这个会议突出地表明，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已经完全不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一切听命于一个人。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按照全会原定议程，8月5日要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然后闭幕。但是，由于毛泽东在8月4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十分尖锐的讲话，由于他还酝酿着更加重大的决策，全会日程推延了。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并且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大字报上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从内容看，被指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首领并需炮打的人是谁，是明白无误的。这张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写在一张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边空上的，经誊清后，由他修改并加标题，于8月7日印发全会。这张大字报的发表，改变了中央全会的议程和方向，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揭发批判，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以派工作组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1962年以来中共中央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这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恰恰是这张“大字报”，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8月1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散播，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各省市各级领导机关的浪潮由此喧腾翻滚而起。事实上，经过“文化大革命”揭发批判十年之久，也没有能够证明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另外，一位中央负责人突然给另一位中央负责人写“大字报”这种方式，也是不可取的。

《十六条》的主要内容

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没有也不可能对“走资派”这样的非科学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因而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必不可免地把斗争目标普遍地引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造成敌我关系上的混淆。以主观虚构的假想敌人为运动的重点和攻击对象，这是《十六条》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十六条》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文件还提出要“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但是，文件同样没有能够提出明确的划分左派、中派、右派的标准。这

种划分派别的不确定性，给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很大方便，使他们可以任意封赠左派桂冠，也可以滥用右派帽子整人，从而加剧了群众中已经发生的分裂和派别斗争。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说："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后来又提出"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的论断。把派别和派性合法化，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提倡"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公开号召"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由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对大字报等不适宜方法和助长自发性过火斗争要求的再次肯定，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乱打乱斗的情况下，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运动很快失去控制，民主和法制遭到更无顾忌的肆意践踏。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十六条》虽然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坚持正确的领导"等字句，但是没有相应的具体的条文规定，这就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留下了通道。

在讨论《十六条》草案的预备会议上，由于周恩来、陶铸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同时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等。这些规定是在会议过程中经过一些同志的努力争取而添加上去的。但是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只是附带提到的软弱无力的规定，由于它们是同如上所述的鼓励用大民主的方法向所谓走资派造反的主体规定互相矛盾的，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约束力。

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领导等根本性问题都作了有严重错误的分析和规定。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既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又没有正常而平静地参加讨论审议的可能，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这份根本错误的决定获得了全会的通过。《十六条》的通过表明，中共中央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完成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

中央机构改组和全会公报

全会的最后一天，8 月 12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改选结果，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 7 人扩大为 11 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名次排列在紧接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被废除了接班人的资格。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全会没有改选主席、副主席，而会后在任何文件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而林彪仍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是唯一的副主席。会议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

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说："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全会公报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完成了正式的组织手续，"文化大革命"就强加给全党全国了。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审查和批判。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机构并没有正常运转。只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毛泽东个人的直接领导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开展起来的。

红卫兵充当急先锋

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支持青年学生，让他们成为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急先锋。

早在6月初，北京的一些中学就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当时，对于发展这样的组织是否适当，在学校中和社会上都有争议，因而没有得到发展。为了得到领袖的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他们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张大字报。这份"左"倾激进而幼稚的大字报，意外地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并且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并且很快传遍全国。对于青年学生，《十六条》赞扬他们是"勇敢的闯将"，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过分的评价，特别是毛泽东的信，对鼓动大批青年起来"造反"起了巨大作用。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他宣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号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此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

伴随着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是全国大串连。"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

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全国各地学生蜂拥而上，奔赴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趁机散向各地，这样就开始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全国性的大串连。截至11月下旬为止，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在大串连期间，全国交通异常拥挤，各大中城市社会秩序紊乱，直接影响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是全国大动乱的前奏。

红卫兵运动的内容最初主要是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在林彪、江青等人煽动下，北京和全国各地红卫兵由校园“杀向社会”，“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并采取了不少过火行为。一部分红卫兵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事物”实行砸烂；很多老字号的店铺和街道的名称，都被改成“东风”、“反修”、“红卫”一类千篇一律的名字。当时，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被当作“黑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抄家；大批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和著名的教授、编辑、记者等，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抄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教师、劳动模范被当作“保皇派”、“牛鬼蛇神”、“黑爪牙”来批斗。甚至一部分学习好的学生，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而受到孤立和打击。一部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焚烧和捣毁他们抄到的中外古典名著、珍贵文物字画。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到1966年9月底，被抄家的达32600多户。上海市仅从8月23日到9月8日半个月间被抄家的达84200多户。天津市被抄家的有12000多户。全国各地的许多古代庙宇、祠堂、牌坊等著名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如北京市1958年确定保护的文物古迹6843处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甚至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的许多古迹，如山东曲阜的有二千年历史的孔庙和孔林，也受到红卫兵的破坏。只有很少数受到特殊保护的地方例外。

红卫兵的这些活动，不可能不引起社会的反感和反对。在一些地方，红卫兵同工人、农民以至解放军战士发生冲突。为此，中共中央接连发出通知，严禁出动警察和武装部队镇压学生运动。9月1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一个批示的精神，发表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肯定了学生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社论说：“我们工人农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形式，来挑动工农斗学生。”社论号召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战斗。在这样的倡导和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越发狂热，随后就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炮打”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围困、进驻、揪斗等方式，使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政领导机构普遍受到严重冲击，难以正常工作。党的基层组织除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外，都停止了活动，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

“文化大革命”初期卷人红卫兵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响

应“造修正主义的反”的号召，怀着“捍卫红色江山永不改变颜色”的一片赤诚。但是，由于年轻、缺乏社会经验和政治上的幼稚，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往往表现出狂热和盲动。但除极少数极端分子外，红卫兵们并不赞成运动中的许多极左做法，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在后来的实践中，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曲折道路，提高了觉悟，逐步对“文化大革命”发生怀疑，从积极参加而消极观望，一部分人进而采取抵制、反对的态度，并因此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则是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林彪、江青等的指使，趁机兴风作浪，作恶多端。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兴起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给党、国家和人民，也给青年人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法制的做法，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不同程度的抵制。红卫兵组织中间也由于认识和行动的分歧而不断发生分裂和改组。例如北京的红卫兵，就由一个统一的组织分裂出第二司令部，后来又出现第三司令部。他们各自争取一派群众组织，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辩论和争斗。这里既包含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的某些认识分歧，又包含对某些领导干部评价的分歧，也有的只是派性在作怪。这期间发生一起一部分中学红卫兵质问和反对中央文革的著名事件，这便是“联动事件”。

所谓“联动”，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联动”的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曾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过运动，甚至有狂热过分的举动。然而几个月运动的实际发展，使他们逐渐产生了很多疑问，激情逐渐降温。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上至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一批战功赫赫的老帅、老将，下至各地区、各单位的负责人，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在内，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难道一个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之下，就只有中央文革等少数几个人才是正确的吗？曾几何时，这些受到毛泽东肯定和支持的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自己也成了“黑帮子弟”、“狗崽子”。这样残酷的现实促使他们思索，并大胆地向江青等人提出质疑。1966 年 11 月 27 日，他们在北大附中集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酝酿成立组织。12 月 5 日，正式发布“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的宣言。“联动”发展很快，在很短时间里就联合了北京几百所中学的红卫兵，还联络了上海、沈阳、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成群结队骑自行车穿过京城，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等大标语贴在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12 月 26 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数千人的大会，会上宣读了一份“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的传单，引起了轰动。

“联动”的一系列行动触怒了中央文革，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镇压。江青等人一方面指使蒯大富、聂元梓等人率大学红卫兵冲击“联动”的集会，批斗“联动”的负责人；另一方面，由谢富治下令派出公安干警以“联动骨干分子”为名拘捕了一批青年人

和高干子弟。当时被投入监狱的多达139人。此事后来被周恩来察觉，报告了毛泽东。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亲自下令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联动分子”。“联动”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种群众组织不复存在了，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力量。

批判所谓“资反路线”

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制，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和互斗，一些地方的工农群众起来保卫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并和冲击党委的红卫兵发生冲突。这些信息的反馈，并没有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去重新审思“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反而使他们更加坚信敌情严重，必须突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并把上述现象一概归结为走资派活动的表现，硬说是他们在“挑动群众斗群众”。为此而构想出一个新的罪名，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1日，由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公开抛出这个新罪名。他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更明确地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社论强调：“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并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由此，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又顷刻刮遍全国。

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干部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受批判的主要对象。10月5日，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在这份经中央文革修改并经毛泽东审定批准的文件中，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说：“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有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10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大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党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批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一紧急指示助长了正在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中恶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把党组织的领导排除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正式的文件依据。在紧急指示的冲击下，全国掀起了“造党支部反”的浪潮。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负责人普遍受到批斗，党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由《紧急指示》而合法化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场长时间大内乱的症结所在。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呢？毛泽东在25日的大会上解释说，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他慰勉大家：“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也许从毛泽东的主观上说，他确实只想打倒刘少奇等少数人，而不是要打倒大多数干部。但是，既然已经确定了错误的方针、错误的对象，采取了错误的方法，那么出现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冲击、被打倒的局面，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也就很自然了。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竭力为“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辩解。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把混淆敌我、颠倒是非的种种做法，说成是“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这类情况，在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表现出来了”，“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确是这样：原来站在革命方面的一些人，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就站在同革命对立的方面去了”。他明确宣称：“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他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制，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否定党的领导，助长自发性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主张，歌颂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陈伯达说，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以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不科学、不合逻辑的罪名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阴险地宣扬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妄图煽惑群众起来赶走“旧人”，即打倒老干部。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极力宣扬“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说什么“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因此，搞“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极其光荣的伟大任务”。他还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以此为已经发生的种种破坏法制、侵犯人权、妨碍生产、扰乱秩序的那些恶劣行为作辩护。

他还说这只是“一点小乱”，“主流是好的”，要敢字当头，不要怕乱。他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且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旨在把斗争的锋芒，更明确地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全国各级党的委员会。

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这就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由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提出的，有“副统帅”在北京天安门上的公开号召，《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加以论证，又经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予以肯定和强调，红卫兵狂热地到处“点火”和“炮打”，批判运动的范围迅速扩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风不仅在大中城市刮起，而且席卷了全国工交企业和广大农村。

企业和农村的普遍卷入

按照中共中央原定部署，“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工交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7月至9月曾多次发出有关通知和规定。如7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要“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9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并规定，“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等。表现了周恩来等人对经济工作受冲击的担心和力求“革命和生产”双胜利的主观意愿。但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下，这些通知和规定完全失去了效力，整个工农业生产战线开始陷入混乱状态。

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和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主持召开5部、7市（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十七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指出由于生产不能中断，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与文教部门、党政领导机关有所区别；主张“文化大革命”仍应分期分批进行，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单位间进行串连；要求采取措施，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这次座谈会开了20天。大家对中央文革起草的，主张在工交企业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是一场试图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

斗争。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汇报，讨论通过由中央文革起草的，主张“文化大革命”在工交企业全面铺开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多数同志的正确主张，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无理指责。

江青在会上指责工交战线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我看不在这场大革命里搞，没有办法”。康生武断地说：“工厂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存在的问题少”，“现在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工厂”。张春桥攻击反映工交座谈会讨论情况的《汇报提纲》“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看不到工厂企业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彪在总结讲话中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强令工交战线“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指责陶铸关于维护生产秩序的主张是“用生产压革命”。这是陶铸与江青等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一次公开爆发。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十条》。这个文件于12月9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正式改变了中央原定部署，在工交企业普遍开展“文化大革命”。文件虽然规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规定工人可以进行“革命串连”，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学生也可以到厂矿进行“革命串连”。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由此，“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并且同大、中学校学生联结起来。这就冲击和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使工业生产开始陷入全面混乱的状态。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农村蔓延。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其中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从而改变了原定的在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还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社队之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广大农村。

对干部的强烈冲击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猛烈冲击下，“文化大革命”横向发展，迅速扩大到工交企业、财贸部门和广大农村。《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的发布，是造成全国大乱局势的一个严重步骤。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处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干部首当其冲，一大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尚能坚持工作的干部，又被纷纷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是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首恶。当时闻名全国、引起很大震惊的几件突出事例是：（一）在他们的指使下，由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带头，从

12月起，在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在首都和其他城市张贴大标语，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二) 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把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打成“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陶铸遭受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省合肥市。(三) 他们指使戚本禹出面唆使一些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前夕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元帅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从四川省成都市绑架押解到北京，监禁起来。彭德怀遭到连续不断的批斗、折磨、殴打，造成肋骨骨折和肺部重伤，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四) 他们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是“大土匪”、“大野心家”，是要搞所谓“二月兵变”的“大阴谋家”，使贺龙遭到残酷迫害。虽经周恩来勉力保护终难以解脱，于1969年6月9日在“隔离审查”中含冤逝世。此外，他们还把朱德诬蔑为大军阀，要求打倒他。并煽动红卫兵冲击了许多著名民主人士。

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下，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尽力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专家学者。但是，他的努力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摧残。“文化大革命”既经发动起来，它就必不可免地带着巨大的破坏力量，继续恶性发展。

第三章　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

经过几个月的“炮打司令部”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历了狂热群众运动的围攻、“火烧”、“炮轰”、砸烂、打倒，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普遍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揪斗关押，不能理事；机关工作无人办理；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已濒于崩溃状态。很显然，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是很难长时间维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关头。

这种情况，毛泽东已觉察到了。在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的生日家宴上，他估计 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这就是说，毛泽东准备以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阶级斗争的方针，去解决面临的困难局面。他还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表示寄希望于上海为全国作出解脱困境的榜样。

196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社论本文虽然没有使用“夺权”的字眼，但从全文的内容看，所谓“总攻击”的实质，正是“夺权”。

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已经提出要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十六条》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此，全面夺权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篇号召“展开总攻击”的元旦社论，无异是发布全面夺权的动员令。而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的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则为全国的造反派全面夺权树立了一块样板。

第一节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工总司成立后的几次严重事件

由于上海在政治经济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林彪、江青一伙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

都十分重视。江青、康生曾指派聂元梓等人到上海活动，煽动青年“炮轰”上海市委，但没能达到搞垮市委的目的。1966年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造反派的支持下，以上海国营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召开大会宣告成立。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并到上海市委，要求承认他们为“革命群众组织”。当遭到市委拒绝后，他们便以赴北京上告为由，强行登上火车北上，被阻在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达30多小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共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经打电话，要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持中央关于不允许成立跨行业工人组织的规定，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张春桥当时也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上海市委据此，一方面不承认工总司的要求，一方面派人到安亭，送去衣服、食品，派人做思想工作，动员工人回厂一抓革命、促生产。事件本来可能不要太多时间就可以妥善解决。可是，11月12日，张春桥奉中央文革之命飞到上海后，情况却突然变化。他撇开中共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市长公开检查错误。张春桥这一做法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强加给中共上海市委以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罪名；二是扶植了反中共上海市委的力量，使工总司成为搞乱上海的主力；三是收罗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批帮派势力，以为己用。

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上海出现了红卫兵之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抄家、游行、集会、刑讯逼供等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迫害，使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12月上旬，发生了持续8天8夜的围攻解放日报社事件。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又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这次大武斗，既以捏造的“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打垮了另一派最大的工人组织赤卫队，使上海市成了工总司一派的天下；又由于武斗的地点就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所在地，而进一步打击了市委的威信。事后，张春桥得意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这些连续发生的严重事件，使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

张、姚回上海指挥夺权

中共上海市委的瘫痪和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使江青一伙认为夺权的条件已经具备，用张春桥的话说，“桃子已经熟了”。于是，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并发表了夺权宣言。第二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夺了权，声明不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1月5日，张春桥向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

要害部门控制起来。”1月6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被揪到会场接受批斗，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这次大会的口号和发言稿都是事先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审定的。

这次大会以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1月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张春桥称之为“经济苏维埃”。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他们还企图用上海市“造反组织联络站”，取代中共上海市委。这样，全市领导权力实际上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手中。

上海的夺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并不满意于工总司在张、姚支持下独掌大权的局面。因此，在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其他组织曾经发动过四次全市性的夺权，但都被张春桥等人搞垮。由此激发的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于1月28日“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电”。公开支持张春桥，而遭到残酷镇压。在打垮了这些不听话的组织之后，才于2月5日正式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出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任副主任，形成符合“文化大革命”需要的新的权力机构。这就是张春桥等人吹嘘为可以比美于巴黎公社革命的上海“一月革命”。

毛泽东对上海夺权的支持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月8日，他在一个会上谈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问题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10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这份贺电于1月1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合名义发出。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这是第一次。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贺电中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中央名义正式作出的这种肯定和赞扬，大大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对所谓上海经验加以集中提炼说：“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文章明确肯定上海“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上海经验。1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社论说：“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所以，“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为了推动全面夺权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要求公安机关，“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以“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中特别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个规定在执行中，实际上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这几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表示不满的，便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都要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些高压手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广大群众的手脚，减少了夺权的阻力，同时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

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文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要介入地方运动的规定。《决定》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因此，要求部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人民解放军不仅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而且由于中国革命是依靠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人民解放军历来在全国各族人民中有很高的

威望，受到广大群众的尊重。它的介入，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军队的支持，常常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里应指明一点：解放军的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

此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给军队增加了新的任务。2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报告上作了关于高等院校、中学和党政军民机关实行军训的批示。把提高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的政治素质（当时突出强调的是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任务，交给了军队。鉴于很多地方的造反派在夺权后不会管理经济，工农业生产问题甚多，又给军队增加了这方面的任务。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军委收电》上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对于一些领导已经瘫痪，但又不能像地方一样实行夺权的中央机关和不便夺权的电台、机要、档案、粮仓、金库以及监狱等部门，也只能派军队干部去领导管理。为此，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国务院某些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赋予解放军的上述任务，当时统称为“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交给军队这些任务总的前提和指导思想，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文化大革命”。

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而军队奉命支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正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最积极、最坚决的一部分人。支左就是支派。当时虽然提出要“一碗水端平”的口号，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不论这一派或那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都是“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又都是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服务的。虽有某些具体分歧，但并无性质上的根本差别。

军训和军管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不是极左的。在支工、支农中，解放军指战员做了大量工作，但更多地则是支持当地的“左派”掌权，通过他们去抓工农业生产和维持社会生活运转。

因此，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为“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极左的方针、路线、政策和方法服务的，执行了不少错误的东西。特别是林彪、江青一类野心家、阴谋家的插手、干扰、破坏，使三支两军工作中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了一些严重的消极后果。既造成了军队和地方、军队内部的一些隔阂，又影响了部队本身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声誉。通过三支两军，军队全面参与了地方工作，直接卷入地方的派性斗争，在一段时间内，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使地方和军队都受到损害。这些对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评价都是后话，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写在这里。从1967年1月当时的形势看，人民解放军的支左，对于把夺权斗争推向全国，对于几个省市夺权的成功，都是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特别是毛泽东公开表态并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的积极支持下，全国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使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首先迅速行动起来的夺权省份是山西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在北京得到康生的指示之后，连夜赶回太原市，组织起"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967年1月12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管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这次夺权得到了山西省军区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寨大队负责人陈永贵的支持。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肯定了这次夺权。社论说："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山西省夺权早，但夺权后矛盾不少，以致两个多月后的3月18日，省革委会才正式成立。刘格平当了主任，陈永贵等当了副主任。

接着行动起来的是山东省，带头造反的是原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此人同康生之子张子石（当时在青岛市工作）相勾结，通过张子石得到康生"要立即夺权"的指示后马上行动。1月22日，夺了青岛市的党政大权。接着又率众到济南，得到了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的支持，夺了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于2月3日建立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说："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按照这篇社论的说法，即："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长期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三结合"就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三个是贵州省。率领夺权的叫李再含，是省军区的副政委。"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同江青等人挂上了钩。上边有人支持，他就起而造反，并组织"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月25日，这个总指挥部发表通告，宣布接管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和中共贵阳市委、市人委，"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并说："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第四个是黑龙江省。原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潘复生，得到由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等为骨干的著名造反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支持，1月31日召开誓师大会，夺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权，宣布全省的临时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的夺权虽然

并不在最先，但在省、市、自治区一级夺权后建立的机构中，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却是第一个。因此，在当时出版的关于革命委员会的资料中，黑龙江省名列榜首。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社论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都夺回来了。"这就是说，除军权和外交权之外，党、政、财、文四权都是要夺的，是夺权的主要内容。社论肯定黑龙江造反派的话："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并说："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头等大事。"这为夺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由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的一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1967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至于地、县和各部门、各单位的夺权，则如急速旋转的走马灯，这一派夺了权，另一派又夺过去。夺权之事几无日无之，甚至一日数起。夺权斗争使两派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了，派仗乃至武斗恶性发展，全国出现了更大的动乱局面。

夺权的性质和后果

从上海开始的这种全国性的全面夺权，曾被宣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而受到当时报刊的高度赞扬。上海《文汇报》"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题目就叫做《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社论自吹自擂地说："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提供了无产阶级重新夺权的重要经验"。"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出现了，它丰富和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具有无比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必将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永葆其美妙的青春。"可是，历史的风风雨雨早已剥尽了这些用华丽词句编织的外衣，无情地暴露出这种夺权的错误而荒谬的本质，证明它不过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一次反动。它不是对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苏维埃经验的丰富和发展，而是对这些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尊重的宝贵经验的歪曲、篡改和倒退。

总之，全面夺权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行动。全面夺权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出于对夺权的强烈不满，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以各种形式，进行反夺权斗争。许多领导干部挨批挨斗，顶着压力，坚持不向"造反派"交权。与此同时，一些极端分子、社会渣滓以及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趁机伸手抢权，借机打击报复。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使整个社会生活陷人极度混乱之中。

第二节 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

为忧国忧民而奋起抗争

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狂潮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导致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破坏，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生活供应也陷于困境。这样的严重局势，引起了为新中国诞生而出生入死奋战多年的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担心和忧虑。

当时发生了一系列使人愤慨的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未经中央任何会议决定就被突然打倒；功勋卓著的贺龙元帅遭到诬陷被揪斗、抄家；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张霖之被红卫兵批斗、鞭打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阎红彦因不堪造反派的围攻和陈伯达、江青的恶语咒骂而含恨自杀；很多省、市党的负责人，如上海的陈丕显、安徽的李葆华、福建的叶飞等被造反派批斗揪走，多方查问，下落不明；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也突然被诬为"叛徒"而打倒；甚至年高德劭、功勋盖世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被诬为"大军阀"，公开贴出"打倒"的大字报。如此等等纷至沓来的坏消息，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感到强烈震惊和愤怒。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和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无比愤怒之情，终于导致1967年1月下旬和2月中旬，他们在党和军队的高层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和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对抗。当时被称为"两个大闹"，即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因为2月在怀仁堂的一次斗争影响更大，故被诬为"二月逆流"。经过拨乱反正，应改称为二月正流，是一场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

实际上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由不理解而怀疑，发展为不满、批评和抵制，这种斗争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愈积愈深，愈演愈烈。老一辈革命家实际上是他们的代表和代言人。早在二月抗争之前，已经有多次公开的表露。例如，1966年11月8日，在北京发生了军队内部（主要是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冲击国防部的恶性事件。事后，中央军委在13日和29日，两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化、体育单位来京人员的几万人大会。会上，几位老帅都公开提出批评意见。陈毅说："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否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认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他说自己的讲话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叶剑英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荒谬。""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少数人我愤恨！这些人没

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他们把国防部当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误的啊！”徐向前和贺龙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老帅们的这些话，自然很不合造反派的口味，当场就有人递条子质问，事后又有人告状，使老帅们受到了批评。但这并不能压住他们心头日益强烈的怒火。

抗争的第一次高潮

1967 年 1 月 19 日发生的揪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事件，引发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高潮。这天下午，中央军委召集各大军区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亦称军委碰头会），研究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应邀到会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和江青突然发难，大骂萧华“把部队工作引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看不起中央文革，不尊重中央文革”，“请四位老帅出面接见……完全是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等等，并给萧华戴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大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会后萧华刚刚到家不久，得到消息来抄家抓人的造反派已咚咚敲门。幸而叶剑英在会后立即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萧华及时得到“毛办”不要参加批斗大会的通知，才免遭一难。而家则被查抄，妻子被作为人质抓走。江青一伙得知毛泽东不同意批斗萧华的意见后，只得调动另一派去冲击会场，搅散了批斗大会，并强迫周恩来出面替他们“辟谣”。周恩来则按照毛泽东的交代，尽量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强调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

第二天，1 月 20 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已经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的元帅和将军们，知道毛泽东不赞成揪斗萧华，更壮了胆气。他们争先恐后发言，愤怒揭发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造反派迫害老干部、冲击军队以及其他各种无法无天的罪行。十天前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严厉质问中央文革小组：“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萧华同志怎么是资产阶级政客？”“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毁掉吗？”说到激愤之处，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严正警告：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由于拳击过猛而致右掌骨震裂，造成骨折。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1 月 22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高级将领。在接见的过程中，这些老战士又向自己的统帅汇报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东海舰队司令员、著名战将陶勇夫妻的惨死，不能不对毛泽东有所触动。此后，他对中央文革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批评。2 月 10 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

徐向前、叶剑英等军委负责人综合了军委碰头会上大家的意见，经过几次商谈，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等也参加，最后商定，为了防止中央文革小组借故挑起事端，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必须以中央军委名义拟出一个文件，报送毛泽东批准，迅速发往全军。1月24日，徐向前亲自到林彪家中汇报，征得林彪同意，林彪口授了九条意见。1月25日，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商讨后，拟出七条，当天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请去，对文件逐条进行研究，并提议再加上不准搞“喷气式”（指当时流行的一种叫被批斗者弯腰，双手后背的折磨人的姿势）、不准戴高帽子等规定。1月28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即《中央军委命令》。

这个命令共八条，亦称《八条命令》。它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和“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前提下，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作了若干限制性的规定。如“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等。这个命令的下发，对于保持军队的稳定起了有益的作用。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正迅猛发展，林彪、江青一伙又不断干扰破坏的条件下，这个命令的有益作用也只能是十分有限的，并不能阻止局势的继续恶化。

多种矛盾的积酝

日益恶化的局势，给负责党、政、军日常事务的周恩来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理解，也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开始，他也怀着真诚善良的愿望，努力从好的方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但客观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灭了真诚的理想。他既不能违抗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大动乱中基本保证亿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和整个国家生活的起码正常运转。在这样一种难以协调的矛盾中，周恩来以一种“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以其对党对人民的全部忠诚，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特有的方式，忍辱负重，苦撑危局。

在当时夺权狂潮席卷全国的情况下，鉴于张霖之、阎红彦、陶勇等人惨死的教训，保护党政军高级干部成为十分急迫的大事。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尚能工作的副总理紧急协商后，拟定出一个名单，并取得毛泽东的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30多位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

轮流住进中南海，使他们得到保护和休息。同时把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大区和省、市党委书记接到北京。他顶住江青等人"保护走资派"、"打击群众的革命情绪"等攻击，避开受江青等人唆使的造反派的搜索和袭击，煞费苦心地多次把这些负责人转移到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当然也有些省市负责人，虽然单上有名，也经过毛泽东批准，但当地造反派在江青一伙支持下，硬是揪住不放，上海的陈丕显就是一个。这件事也使老同志们很恼火。

这时，又发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问题。张春桥等人所以给上海夺权后的机构取名人民公社，本意是想投毛泽东之所好。因为毛泽东不仅 1958 年讲过"人民公社好"，而且几个月前还讲过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们自称上海人民公社，既可以自诩为"发扬巴黎公社革命先驱者的革命精神"，又可以说，"毛主席的这个天才的预见，又在上海地区实现了"。可是，没想到毛泽东另有考虑。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文汇报》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广播，《人民日报》也没有发表。2 月 12 日，张春桥、姚文元奉召进京，毛泽东同他们谈了话。毛泽东说，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呢？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称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就要发生外国重新承认的问题。因此，他考虑各地夺权后的新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至于上海的改名问题，叫他们回去同群众商量。2 月 19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这无异于对张春桥等人的一次批评。所以，在 2 月 17 日，王力等人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曾说这次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可见，怀仁堂碰头会上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一场大斗争，和这件事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抗争的第二次高潮

就是在这样多种因素汇总的条件下，一场大的面对面的斗争终于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中央碰头会上爆发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都已不能正常开会，因而由周恩来主持的有尚能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和国务院部委一些负责人，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就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层会议。2 月 11 日和 16 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 月 11 日会议，原定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所以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也参加了。但实际上主要是围绕军队的问题展开了辩论，并涉及党的领导和其他问题。在讨论中，叶剑英指责中央文革：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冈山兵团的头头）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他再次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诬为叛徒的事质问陈伯

达，明确说：刘志坚不是叛徒。可是陈伯达却蛮横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老帅们对陈伯达的无理态度十分气愤。叶剑英抓住上海人民公社问题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幽默地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聂荣臻还就中央文革把主要由中学生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定为反动组织，并关押了不少青年人一事提出质问。他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这次会议就在争吵声中无结果而散。

16 日会议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而且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斗争就已开始。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门口，谭震林碰见张春桥，就问张：“陈丕显同志回来没有？”因为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进京的名单中有陈丕显，但陈却被扣在上海。出于对老战友的关心，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可是，张春桥却打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听了十分生气，因此，在会议开始后，又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等人的问题。谭震林说：“陈丕显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他尖锐地指责张春桥一伙：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参加会议的老同志纷纷发言，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他还指出，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做法是从 1966 年《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的。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明明参与了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却当面撒谎说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他针对林彪、江青一伙攻击诬蔑朱德、贺龙元帅的活动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还联系到延安整风的历史，强调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要历史实践证明。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老一辈革命家正气凛然、义正词严的批评使得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有谢富治一再插话，为江青一伙辩解，说什么：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多次保谭震林，并不要打倒他；大家“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等。当即遭到了谭震林、李先念等的严厉驳斥。这是一次正气压倒邪气的会议。那么多的老同志在高层会议上痛快淋漓地当面斥责陈伯达、康生等人，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是仅有的一次。

当天晚上，陈毅又对归国的留学生代表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指出：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他说：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他愤怒地说：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最后陈毅说：我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这番话，充分表达了一位老革命家赤诚而焦虑的心情。

2月16日怀仁堂会后，谭震林余怒未息，17日，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批评江青等人：“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他不指名地说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他表示：“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这些文字，充分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品质。但从他把信写给林彪这一点看，似乎当时他对林彪的本质尚无充分认识。结果是这封信被林彪转给了毛泽东，林彪还在这封信上写了这样的话：“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件事当然也只能起火上浇油的作用。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二）搞“文化大革命”应该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这三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自然也联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和评价问题。因此，分歧是带根本性质的。这是一场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的尖锐斗争。

毛泽东的错误批评

康生之流在公开的会议上无词可辩，但在背后搞阴谋上却大有神通。经过密谋策划之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连夜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材料，由江青安排他们于17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信了这种单方面的汇报，并明确给予

支持。

毛泽东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态度呢？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大革命”。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始终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防修反修的重大战略措施，而且始终认为群众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他可以允许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过火行动加以纠正，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从整体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老同志的发言，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一些提法已远远超出纠正个别过火行动的范围。如说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等提法，都直接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评价的问题，很显然，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发动和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被当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助手。因此。毛泽东一直对它采取扶植的态度。对于老同志们严厉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也是不能容忍的。

还有一点，就是陈毅在发言中提到延安整风的话，被康生作了歪曲的挑拨性的汇报，引起毛泽东的反感。延安整风运动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二次总清算。正是经过这场联系党内路线是非，认真阅读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学习运动。才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延安整风运动也发生过偏向和错误。因此，康生诬蔑陈毅否定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难道要再请王明来吗？这样，在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汇报之前，江青等已恶人先告状，使毛泽东从片面汇报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2 月 19 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会上，毛泽东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本人以及林彪、中央文革，是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按照康生的说法，这是“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位政治局委员请假检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 2 月 25 日到 3 月 18 日，在怀仁堂召开七次所谓“政治生活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强词夺理，无限上纲，给这些老同志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否定延安整风”，“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这些老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讨，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此后，原由国务院副总理和有关负责人和中央文革部分成员组成的、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消失，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仍由周恩来主持。所以，当 3 月 18 日这种无理的批斗会告一段落时，陈毅曾激愤而感慨地说：“四十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浪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几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批判本来是限制在中央内部的小范围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千方百计地把这场斗争捅到社会上去。恰好这时，他们利用一份材料获得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快报》刊载了一篇该报派往天津记者写的名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支持了谁?》的材料。这个小站，就是陈伯达曾去蹲点搞“四清”，并总结出当地党政组织已被阶级敌人腐蚀篡夺，需要组织夺权的经验的地方。这份材料认为：“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篙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陈伯达在材料上批：“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他特意将这份材料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林彪、江青一伙接过这份批示，立即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加以渲染、歪曲、扩大，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最高指示”、“首长讲话”、“接见革命群众”等方式，扩大到全国各地，似乎这个指示就是针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们。这就为“反复辟”找到了“最高指示”作依据，于3月间开始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

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攻击谭震林。当时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中正好有一个学大寨的展览。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是全国农业模范单位（对于大寨经验的演变及其是非，这里暂且不论），“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亲自发出的号召，这个展览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的。但因为这个展览是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批准的，这就被作为攻击的靶子。

先是康生到展览会场上装模作样地审查一番，然后煞有介事地说：“这个展览有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罪名。同时，戚本禹又按照江青的指示，找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作了布置。于是，3月8日，谭厚兰率1000多名学生冲击并占领了整个展览馆，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3月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

3月10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到农展馆，对谭厚兰等人进行慰问，同他们一起高呼“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等口号。

3月14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指挥下，首都举行十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并要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

3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掉了陈毅的镜头。

3月27日，他们又策划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

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

北京的这些活动迅速影响全国，各地造反派起而仿行，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浪潮，使全国全面夺权斗争发展得更加剧烈。这是林彪、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的一个实例。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林彪"三二〇"讲话和浪潮的暂息

就在这场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3 月 20 日，林彪在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问题；二是主流、支流问题；三是军队支持地方问题。他利用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为"文化大革命"作了系统的辩护。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他诬蔑"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不允许人们批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极力为"乱"唱赞歌。他说："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他不顾事实地夸张说："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总的看法。"据此，他说出了一句当时流传颇广而今则成为笑柄的"名言"："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林彪、江青一伙掀起"反击二月逆流"活动的理论纲领。

4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播放林彪同志讲话录音的通知》。通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林彪副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讲话的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通知对林彪讲话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对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的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4 月 24 日，又把这份讲话的整理稿，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印发全国。

因此，林彪这份得到毛泽东支持和批准的讲话，事实上就成为当时对这场斗争的一份官方总结，为人们认识和评价这一事件规定了不得违反的准绳。但是，毛泽东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支持又是有限度的，他并不赞成把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统统打倒。正如邓小平所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甚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毛泽东不满意老帅和副总理们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激烈批评，但并

不想打倒他们。所以，4月30日晚上，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当时，一位领导人是否能参加较大的集会，名字能否公开见报和广播，被认为是一种信号。因此，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消息，《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上天安门观焰火的名单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不得不暂时平息下来。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毛泽东对此事件的看法，后来也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有了改变。

第三节　在“抓叛徒”声中刘少奇冤案铸成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全面夺权的开展，已经使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打倒、关“牛棚”或靠边站，各级党政机关瘫痪，社会秩序混乱，生产急剧下降。反击所谓“复辟逆流”的运动，进一步加剧了全国的大混乱。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把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主观臆想推向极端，寻找各种由头，不断地乱上加乱。从1967年3、4月份陆续展开，齐头并进的“抓叛徒”活动和“革命大批判运动”，在制造“天下大乱”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抓叛徒”的风波

“抓叛徒”活动于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后正式开始。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加了按语，给一大批经过敌人法庭和牢狱考验，并为革命建立了功勋的老同志加上了“叛徒”的罪名。并说：“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号召全党引起“极大的警惕”。其实，这是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蓄谋已久的阴谋。因为他们知道，仅仅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不足以彻底打倒这批老同志，并置于“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因此，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们就唆使红卫兵追查干部的历史问题，搜集捏造各种伪证，栽赃陷害。

1966年8月，康生就指使某红卫兵组织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从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根据康生的指示，天津南开大学“揪叛徒战斗队”“发现”了有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康生得到了这个材料后，就迫不及待地诬陷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等人，“有叛变行为”。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是‘坚定反共’的叛党行为”。

其他“中央文革”的成员们也一齐出动，大造舆论。1967年1月，戚本禹对解放

军总政文工团的部分人说：“红卫兵小将查出了安子文（中共八届中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2月，关锋对参加军训的解放军代表说：“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3月中央批示下达后，他们更煞有介事地大肆宣扬。江青在4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康生则上纲上线地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话里埋下了更大的杀机。

事实真相是和他们的诬陷完全不同的。在1936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面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同时，在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宪兵团退出北平的情况下，也有了营救的可能。因此，在刘少奇主持下，北方局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当时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征得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批准了这个决定。薄一波等人于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分9批履行了北平当局规定的手续出狱。这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对此，中共中央早就进行过多次审查，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特别是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正式审查，作了这段历史清楚的结论。康生当时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对此也是一清二楚的。

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接到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出狱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后，曾给毛泽东写信说：这一“案件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阅后批：“照办”。周恩来当即以中共中央名义给西北局回电，指出：“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时隔二日，中共吉林省委于26日急电中央，报告红卫兵揭发省委第一书记赵林为“叛徒”的问题，中共中央又以同样内容的电报给予回答。30日，周恩来又亲自打电报给吉林的红卫兵，重申：“他们揭发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希望他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但是，江青、康生等人依然故意将这件事加以歪曲，继续煽动群众肆意扩大事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各地的“抓叛徒”群众组织和各种各样的专案组，把干部中已有正确审查结论的历史问题，又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他们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等重大冤案，使成千上万的干部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伍豪启事”事件的由来

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竟连周恩来都不能幸免。1967年5月17日，江

青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声称“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并附上三十年代国民党报刊上发表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事实上，这一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手伪造的。周恩来既不知情，而且当时根本不在上海。

事情的经过是，1931年4月，在中共中央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面临严重危险。有赖于我地下工作者冒险及时送出消息和周恩来等机智地采取紧急措施，中共中央及时转移，方转危为安。同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这一次危机又由于周恩来的妥善处理，而挫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先是“悬赏通缉”周恩来；在失败之后，又不惜使用造谣方法，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合谋伪造了《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于1932年2月刊登在《申报》、《新闻报》上。而在这之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已离开上海，当时已在江西苏区首府瑞金。

为了消除这件事的影响，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立即采取了反击措施，通过申报馆刊登了机智的广告，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谣言》的传单，地下党报《实报》专门发表了辟谣文章。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的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诬蔑。”

可是30多年以后，这种早已弄清了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无耻伎俩，却又被江青拾起来，作为企图打倒周恩来的一件武器。为了揭穿江青的阴谋，周恩来于5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了有关历史材料。信中说：“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但是，到1967年底，又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从而使江青等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抓叛徒”的旗号下，许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功绩卓著的共产党员；许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统统被安上“叛徒”、“特务”等罪名遭受迫害，有些惨遭摧残致死。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抓叛徒”，是他们制造各种名目，借以打倒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篡党夺权扫清道路的一个重大步骤。

对刘少奇的批判和诬陷

林彪、江青打击迫害干部的最大一个目标是彻底打倒刘少奇，千方百计地要置刘少奇于死地。主要是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秘密地设立专案制造伪证，极力把刘少奇打成特务、叛徒；一是公开地发动了一场针对刘少奇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运动”。二者是互相配合，同时进行的。

1967年3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6个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他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

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这个报告3月21日经中共中央常委会批准，决定把刘少奇被捕问题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就成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专案审查开始，报刊批判同时升级。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这篇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给刘少奇加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等罪名，说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接着，中央各报刊发表社论，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据刘平平等的回忆文章说，刘少奇看到戚本禹的文章时，“气愤已极，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这种合理要求在当时已不可能实现。虽然刘少奇名义上还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没有发言为自己申辩的权利。连他4月7日答辩的大字报，在中南海只贴出几小时就被撕得粉碎。这就是所谓的“大民主”。

5月8日，《红旗》、《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手法，利用刘少奇在书中引用列宁一句话时，略去了与所论问题并无直接联系的“无产阶级专政”等一小段话这一微不足道的事例，扣上了吓人的大帽子。文章说：“《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全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名的对党的建设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最坏的反革命的“大毒草”。

随后，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对刘少奇等进行批判。据粗略的统计，从5月至9月，各报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主要文章，即达150多篇。各种小报、大字报的批判文章，更是不可计数。这些大批判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组织生活准则，判断是非的通常标准都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进一步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助长了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这里有一个人们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1939年出版于延安，1942年整风运动中，曾被列入全体党员必读的22个文件之一，难道毛泽东当时没有看过吗？康生在1967年曾讲毛泽东没有看过，但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毛泽东在1970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也承认他看过老版，不过他说：“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康生当时也传达过毛泽东这样一段话：“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人唯心主义泥坑。”两段话从内容上看是一致的。所以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毛泽东本人的观点后来有了改变，误解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原意。从极左的角度看问题，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修正主义，唯物主义也会被看作唯心主义。这也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

林彪、江青一伙在发动“革命大批判”的同时，加紧了对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身迫害活动。早在1966年12月，在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就成立了以审查刘少奇夫人为名的“王光美专案组”。采取各种手段企图首先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然后再诬陷刘少奇为美国战略特务。1967年3月以后，设立“刘少奇专案组”，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诬陷活动。他们随意捕人，刑讯逼供，制造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戚本禹于7月18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即剥夺了刘少奇的行动自由。8月5日，以庆祝毛泽东所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为名，又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数以万计的人们，组织所谓“揪刘火线”，围困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在北京发生的这类围困、冲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严重事件的浪潮，迅速蔓延全国。大批判的打击面越来越广，揪斗干部的手段越来越狠。派性斗争由“大字报战”、“标语口号战”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使用的武器从原始的棍棒刀矛直到现代化的机枪大炮。对干部群众的人身迫害从“戴高帽”、“喷气式”等形式，发展到采用各种酷刑，摧残人身、侮辱人格。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并以不同形式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

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即“七二〇”事件)，这是积酝已久的矛盾的一场爆发。早在1967年春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中，林彪、江青一伙就把武汉军区作为打击重点之一。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江青也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中央文革认定武汉军区领导在“支左”中犯了“路线错误”，煽动群众揪斗武汉军区领导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唆下，武汉地区群众组织分成以“百万雄师”和“工总”为首的两大派，派性斗争激化，武斗规模越来越大。全市党政机关瘫痪，工厂大部停工，交通被阻断，社会生活十分困难和紊乱。

为了解决武汉问题，原定要两大派群众组织各选派代表到北京去汇报。后因毛泽东要巡视大江南北，并要在武汉横渡长江，改为两派代表不去北京，问题就地解决。7月14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到武汉。同日，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到武汉，以中央代表名义，协助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在同武汉军区领导人谈话时说：“你们想一想，一

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驻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接连四天开会，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会议。周恩来在18日下午作总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主动作检查，给工人总部平反，尽快释放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要军区对两派都支持，把部队同志的思想工作做好，也要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然后再逐步协商解决问题。这些话表达了中央要求武汉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促使他们联合的方针。

但是，谢富治、王力等背地里四出活动，继续支一派、压一派，使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强烈愤慨。18日晚，周恩来回京。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马上驱车去"工总"派的据点，公开接受和佩带该派的袖章。宣称："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王力还说，"工总"是革命左派，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19日，"工总"派群众组织用高音喇叭和广播车，到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引起"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极大愤怒，终于引发了"七二〇"事件。

7月20日晨，一部分军民冲进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客舍（他们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该处)，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数以十万计的军民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飞返武汉，采取措施把王力解脱出来。毛泽东也于21日凌晨转往上海。22日，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

林彪、江青立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蔑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22日晚，林彪亲自出马主持会议决定：①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②起草文件通知全国；③召开百万人大会。这三条都被迅速执行。23日，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24日，陈再道等人奉命飞到北京接受批斗。25日，在天安门广场开了百万人大会，王力、谢富治成了英雄，武汉百万军民成了"反革命"。林彪对江青等人说："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作文章。"

根据中央文革指示，北京的这次大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拍成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在全国放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〇"事件的文章、社论、评论连篇累牍，形成一场大规模的舆论围剿。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迫害，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很多人被武装押赴农场劳动。据中共湖北省委在10年后为这一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这一事件中被打伤、打残和致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人。其中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6.6万多人，打死600多人。徐向前、徐海东等也被诬为"黑后台"，被抄家，后果极其严重。

"七二〇"事件是广大军民抵制极左错误的斗争，也是武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激化的表现。这种斗争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插手而加剧。全国各地的派别组织和派性斗争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畸形产物。今天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从指导思想上说，都是奉行"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错误方针服务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夺权阶段"，两派都积极参与了夺权，并力图使本派掌权，为此而相互进行不断升级的派性斗争直至武斗；两派都争相打倒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都采取了各种粗暴的方式方法。因此，从总体上看，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错误的，无论支持哪一派，也都是错误的。即使在某些时间、某些问题上这一派或那一派有正确的方面，这都是次要的。然而，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自己的权势为所欲为，把拥有号称百万人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把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打成"叛军"，残酷地镇压武汉广大军民抵制"左"倾错误的斗争，这才是十足的罪恶暴行。

全面内战天下大乱

"七二〇"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她要求造反派，"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以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广为宣传。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与此同时，早在1967年1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七二〇"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大肆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8月上旬，在南京、常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3万多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打伤、打残650人。这类武斗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祸及全国。

在这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8月7日，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发表讲话。他不是要求公安、司法、检察机关执行自己的职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而别有用心地发出"砸烂公检法"的号召。他说："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这样就使公、检、法处于自身难保的地位，失去了制止混乱的功能。

8月9日，林彪发表一次讲话，在当时影响颇大。他首先肯定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处理，称"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他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这里林彪根本不提共产党，反而把解放军的作用估量得十分高。他不顾已经天下大乱的事实，继续鼓吹乱。他认为："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公开表态支持他的亲信干将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说："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林彪提出了一个念起来颇为咬口但含义十分明白的矛头指向老革

命的荒谬口号：“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他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样包含着许多重大错误的一篇讲话，却被以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形式发向全国。中共中央的按语认为：“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切实执行”。这对当时混乱不堪的局势，更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许多地区连续发生抢银行、抢仓库、劫车船、冲监狱等恶性案件。在全面内战中，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远远不限于国内，在我驻外使领馆和留学生中，也发生了重大影响，以致不断出现涉外事件。例如，我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去某国援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立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我留欧学生在莫斯科红场高呼打倒修正主义等口号，同苏军警发生严重冲突。我国与印尼、蒙古、缅甸等国的关系也急骤恶化。

在这急需加强外交工作领导的时候，外交部部长陈毅却遭到造反派不断升级的批斗围攻，周恩来多次出面干涉也无济于事。8 月 7 日，从武汉回来以英雄自诩的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发表了肆无忌惮的狂妄讲话，公开煽动和支持夺外交大权，以致发生封闭外交部党委、砸烂外交部政治部、以外交部名义向外滥发指示等事件。8 月 22 日又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严重损害我国外交声誉，使我国外交工作陷入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空前混乱之中。毛泽东后来同斯诺谈话时也承认：“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1967 年 7 月和 8 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视察三大区

1967 年 7 月至 9 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调查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不同场合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从他“左”的观点和一贯坚持的论断出发，继续肯定：“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最混乱的这一段时间，对形势作出这样的估计，显然与实际相去甚远。这既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已经很难了解到客观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反映他对乱的独特看法，以及所谓“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主观意愿。但是，过于混乱，以致“失去掌握”的局面，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利于实现他所期求“文化大革命”达到的目标。因此，他在谈话中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

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并强调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他提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告诫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于10月7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这对于解放一批干部、促进各派联合、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了扭转严重动乱局面，毛泽东还批准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8月底，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交杨成武带到上海给毛泽东，并反映外交部夺权的严重情况。经毛泽东指示，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关、戚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左”派，是制造动乱的“前线指挥”。对他们的隔离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某些活动最嚣张的造反派，有利于混乱的减少。9月5日，毛泽东批准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9月13日，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在这期间，毛泽东还作出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部门实行军管。他还批准发出多项布告、通令等，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交通运输，制止武斗蔓延。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都收到一些效果，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必然伴随的动乱局面。

学校复课和工宣队进驻

当时，为了稳定局势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是宣布“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学校即“停课闹革命”。大批青年学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积极参与了社会各方面的夺权活动和派性斗争，并起了先锋、骨干作用。有些著名学校的某些群众组织，成了当地派性斗争的指挥和联络中心。因此，要稳定局势必先稳定学生。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规定，北京和各地设立的招待外来串连学生和其他人员的机构，“9月28日前全部撤销，各有关单位再不负责招待”。外出学生和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当时动乱局面正在发展，相当多的学生仍散在社会没有返校，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也普遍因受到批判和审查，不能恢复正常工作，因而这一通知实际上难以普遍执行。很多大学、中学迟迟复不了课。学校秩序混乱，武斗仍然在蔓延。

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在一度发生对抗之后，工人控制了全校的局势。这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

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人各学校”，“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8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于是，各地纷纷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各类学校。不久，这种办法，又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工、军宣队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队。工、军宣队的进驻，对于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起了某些积极作用，这是不应否定的。但是，这种办法本身，却是难以肯定的。从指导思想上说，它是建立在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当成改造对象的基础之上。因而“知识分子成堆”，不是当作文化结构高的优势，而被视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势力，必须掺进工人和解放军。从形势估量上看，是把新中国的学校，错看作是“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因而决定派工人和解放军去“打破”。特别是由于工、军宣队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方针下进行工作的，它本身也存在对进驻单位情况不明、成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弱点，工作中不可能不犯各种错误。至于把工宣队领导（在农村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永久化，则是完全悖于常理，是外行领导内行错误观点的扩大和引申，已被实践证明是根本行不通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复课闹革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它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整个社会缺乏容纳岗位，致使当时的1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安排。这些毕业生不离开学校，必然影响到招收新生的工作。面对这项急迫需要解决的任务，也出于对知识分子情况的“左”的估量，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个号召发出后，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从50年代就开始组织过，它是中共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不发达、就业困难，而农村很广阔又缺少文化知识的国情，探索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并提高农村文化的一种试验性的措施。但是，1968年底开始的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主要是对建国以来教育状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

使这一本来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上山下乡，变成了“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成了当时风行一时的口号。

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内地和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这些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这些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而是广大知识青年在逆境中奋斗的成果。还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政策、措施、方法都存在严重错误。在下乡的政策上搞“一刀切”，不区别各个地区、各个对象的具体情况，中学毕业生一律要下乡，就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在动员方式上偏重行政手段，有的地方甚至搞强制、压服；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使有些地区的知识青年在生产上和生活上产生了严重困难。在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使用和管理上，过分强调接受“再教育”，使青年们在政治上受到压抑，并且既学不到科学知识，也难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业荒疏，身无专长，影响发展。这些错误的做法，带来了许多不幸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和企业、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实践证明，这种以下乡插队为主要形式的，采取政治运动方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国家，对农民，对知识青年都是不利的。

随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进驻和领导学校，随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原来喧嚣如潮、不可一世的各种红卫兵组织，无法再进行活动。红卫兵也因完成了它对发动和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而名存实亡了。

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纠正具体工作中的一些过火的错误行动，起了一定的制止和控制作用。从1968年秋冬以后，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局面逐步有所缓解。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继续坚持进行的条件下，矛盾仍在继续发展，不断发生新的斗争和事件。

林彪、江青制造“杨、余、傅”事件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亲自下手，制造了“杨、余、傅事件”。他们诬陷在人民解放军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根据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骗得毛泽东的同意，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事前毫无所知的情况下，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发出命令：任命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军事院校以及其他单位的团以上干部一万余人的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接

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出席，会上由林彪作了所谓“极其重要的指示”。林彪宣布了中央22日的决定，并作了歪曲事实、强词夺理的解释。他说：“最近从空军里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与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是把他打倒的做法。”在党内斗争中、并且在万人大会上公开这样宣讲，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因为这种怪论是出于副统帅之口，虽然不符合毛泽东讲的反潮流精神，还是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人敢提出半点不同意见。

林彪在讲话中，借口批判杨、余、傅所谓“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公开地吹捧江青。说她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等等。林彪的妻子叶群趁机振臂高呼：“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林彪的死党吴法宪也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而江青也回报以：“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江青的“金棍子”姚文元也及时紧跟地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一时口号声此起彼伏，演出了一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互相吹捧的闹剧。

3月25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宣布改组。军委办事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设立的一个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机构，成立于1967年8月。最初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同年9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这次改组后，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仍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使林彪集团完全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3月27日，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江青在大会上宣布说：杨成武搞小山头，背后搞阴谋，招降纳叛。康生说：杨成武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两面派，两面三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陈伯达则摆出一副理论家的面孔，把这次事件作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似乎反映了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谓“五个回合”是：第一个回合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击退去年的“二月逆流”；第四回合是击退所谓“刘、邓、陶的小爪牙”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回合，就是揭露杨、余、傅的反革命阴谋，把他们打倒。这五次所谓斗争的性质和情况完全不同，却说成都是阶级斗争的回合，真是不伦不类的概括，但当时却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精心策划，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件重大冤案。毛泽东后来在一封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杨、余、傅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煽动挖“黑后台”，进一步打击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从而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同时，报刊上连续发表社论，反复号召全国“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在派性泛滥，武斗成风的情况下，公然提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鼓吹“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杨、余、傅事件”，实际上形成了一场声势很大的“反右倾”运动，从而更加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并使在天下大乱局势逐渐缓解和社会秩序有所恢复的过程中，又卷起了一场逆向的巨浪，增加一次大反复。

在这“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夺权阶段，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被打乱，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陷入紊乱状态。全面夺权使中国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仅从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 年比上年下降 9.6%，1968 年比上年再降 4.2%。政治上、思想上遭受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同时也应看到，在那混乱的岁月里，广大党员没有放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许多党的干部被游街，被批斗，被审查，只要未被“罢官”，他们就不顾困难，领导周围群众，坚持工作和生产，尽力维护社会生活的运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党长期教育下，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用积极工作的实际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此，在 1967 年和 1968 年两年中，生产虽然下降，但一些重要的建设和科研项目并未停止。例如，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8 年 10 月 30 日，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样一些重大工程技术项目取得的成就，显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艰难困苦中的奋斗精神。广大农民也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辛勤耕耘，给全国人民提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第四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和缺员甚多的中共中央全会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自 1967 年 1 月上海夺权到这时，经历了 20 个月错综复杂的斗争，全国（除台湾外）29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省级革委会建立简况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简况，当时出版的一本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书中，曾有一份简表，现略加修改抄录于下：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简况

次序	地区	成立时间	革委会主要负责人
1	黑龙江省	1967．1．31	潘复生、汪家道
2	山东省	1967．2．3	王效禹、杨得志、韩金海
3	上海市	1967．2．5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4	贵州省	1967．2．14	李再含、张明、李立
5	山西省	1967．3．8	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
6	北京市	1967．4．20	谢富治、吴德、聂元梓
7	青海省	1967．8．12	刘贤权、张江霖、达洛
8	内蒙古自治区	1967．11．1	滕海清、吴涛、高锦明
9	天津市	1967．12．6	解学恭、萧思明、郑三生
10	江西省	1968．1．5	程世清、杨栋梁、万里浪
11	甘肃省	1968.1.24	洗恒汉、张、忠、胡继宗
12	河南省	1968．1．27	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
13	河北省	1968．2．3	李雪峰、刘子厚、马辉、耿长锁
14	湖北省	1968．2．5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
15	广东省	1968．2．21	黄永胜、孔石泉、陈郁
16	吉林省	1968．3．6	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
17	江苏省	1968．3．23	许世友、吴大胜、杨广立、彭冲
18	浙江省	1968．3．24	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
19	湖南省	1968．4．8	黎原、龙书金、华国锋、章伯森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68．4．10	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
21	安徽省	1968．4．18	李德生、廖成美、宋佩璋
22	陕西省	1968．5．1	李瑞山、黄经耀、胡炜
23	辽宁省	1968．5．10	陈锡联、李伯秋、王良、毛远新
24	四川省	1968．5．31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
25	云南省	1968．8．13	谭甫仁、周兴、陈康、段思英
26	福建省	1968．8．14	韩先楚、皮定钧、蓝荣玉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68．8．26	韦国清、欧致富、安平生
28	西藏自治区	1968．9．5	曾雍雅、任荣、巴桑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68．9．5	龙书金、赛福鼎

革委会建立费时的原因

建立省、市、自治区一级革命委员会为什么需要经历20个月之久呢？这是由“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夺权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首先是夺权的对象难以确定。当时宣称的对象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前所述，这个对象是没有确定内涵的，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这一派可以说某领导人是走资派，要打倒；而另一派却可宣称同一领导人是革命干部，要结合。争论不休，难以统一，甚至导致派仗和武斗。

其次是“三结合”难以实现。毛泽东曾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确定谁是“革命干部的代表”颇不易，确定谁是“革命群众的代表”更难。当时数量众多、名称各异的群众组织，纷纷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唯我独革”之风气甚浓，都要“以我为核心”，由自己作为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常常为了某个组织有几名革，命委员会委员，是否参加常委，是否当副主任而争论不休，达不成协议，以致造成武斗和反复夺权。军队的代表，确定容易一些，但也存在野战军和地方军区，这一部队与那一部队的矛盾。

再加上地区性的特殊矛盾，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积怨，某些地区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等。而是否参加革委会，在其中居何种地位，又是利益攸关的大事，如此等等。这种种矛盾就使一些省、市、自治区虽然宣称夺了权，却迟迟难以建成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内部争夺仍持续不休。这些说明，“三结合”的基本经验并不是成功的。

如何评价革命委员会

为了庆祝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9月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说：“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一些评价，很显然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吹捧叫好，是经不起历史实践检验的。今天需要对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重新作出评价。

夺权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并不是“具有无比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而只不过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产生的不正常的缺少生命力的临时性的畸形机构。它起码有

以下三个带根本性质的缺陷：

一曰名不正。革命委员会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名称，通常是指一个先进阶级或进步集团起来推翻反动阶级或落后集团的统治后建立的临时政权机构，它标志着社会的进步，起码也是朝代的更迭。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不然。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阶级，没有占统治地位需要推翻的剥削阶级，根本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问题；所谓向走资派夺权，历史实践也早已证明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同风车作战，因为"走资派"这种要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10年多，也没有判定出一个"走资派"。因而，这种夺权只不过是一些共产党员率领一些群众向另一些共产党员夺权。夺权之后，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权，不发生改朝换代的问题。夺权之后的领导力量仍是中国共产党，不发生改换领导的问题。夺权之后，政权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革谁的命成了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自然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至于一个学校、工厂、商店的机构也称为革命委员会，更是把政权机构同商业、教育、经济等不同性质的机构混为一谈。其名称之荒谬是无须多说的。

二曰任务不对。人民民主专政具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种职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剥削阶级的基本消灭，政权中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政治职能逐渐减弱，当然还存在防御国内外敌人进攻、保卫人民政权的职能，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职能逐渐加强。发展生产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也是政权的中心任务。这点本来是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就已阐明了的，可惜后来走了曲折的路。而革命委员会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主要任务是搞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求："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其完整意义上来说，本来是包括发展生产力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在内的。按照革命导师的教导，这还应该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放在首位的任务。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所强调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是"把上层建筑包括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各个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进行到底"；是"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肃清其余毒"；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而实践已经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革命委员会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工具。很显然，这样的任务既不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和需要，也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三曰体制不好。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原则是"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党政合一，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可以说是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极端发展。如果说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统一指挥、集中各方面的力量，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有益作用的话，那么建国以后，特别是随着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已经不再适应需要。按照历史发展的潮流，本来是应该向着党政分开的方向发展，可是革命委员会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党政机构合而为一。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东西，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后来革命委员会的被取消，正是历史的必然。

尽管建立的是畸形的内部矛盾甚多而效率不高的政权机构，但有了统一的权力机构总比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是一个前进。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有利于稳定“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既定格局，也为酝酿已久的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恢复和重建党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既是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虽然由于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城之后不那么好了，而发动亿万群众“踢开党委”，打乱了党的各级组织，停止广大党员的组织生活，造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然而要遂成他主观设想的“天下大治”，还是不能不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因此，党组织必须重建，但又不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党组织的那种状况的问题，就成为毛泽东探索和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为了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也就必须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就提出了筹备和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他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1967年秋，他委托张春桥、姚文元就召开九大的问题在上海作调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集了一些意见，写成调查报告。报告借口群众意见，提出在九大召开前先修改党史，搞一个适合需要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并说，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不能用了，因为那个决议中肯定了刘少奇。中共中央于10月21日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附发了姚文元的报告。此后，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征询对九大意见的工作。

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为筹备召开九大的领导机构。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提出就各地关于召开九大问题的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各地”，以利于继续征求意见。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这份通报以群众意见的形式实际上向全国通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通报说：“九大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修改党章，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选举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委员会”。“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要“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代表产生的方法，“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各方协商的方法产生”等等。表露了林彪、江青一伙企图借九大的召开，排挤老一辈革命家，而自己夺取更大的权力的野心。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通报了上海开展“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的经验，要求各地“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

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此后，各地开展的修改党章工作，虽然层层组织了修改小组，从表面上看似有广大群众参加讨论，而实际上中央文革发出的《通报》，早已成为不可逾越的准则。群众的所谓讨论、修改，不过是在既定的框子中，作一点文字的修饰而已。

对刘少奇的荒唐指控

召开九大的一项主要准备工作，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早在 1966 年 12 月 18 日就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对刘少奇进行秘密审查。他们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提供的反映历史真相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经过多方策划，费尽心机，终于在 1968 年 9 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预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通过。这份审查报告指控刘少奇在 1925 年、1927 年和 1929 年 3 次“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诬陷。

1925 年冬，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是事实，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和投敌叛变的问题。刘少奇回长沙是因病回家休养，当时是完全公开的。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后，全国总工会、各地学联等群众组织团体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致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此外，还有亲友同乡等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从长沙到广州后，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全总负责人邓中夏在欢迎会上称赞刘少奇是“工人阶级最勇敢的战士”。可是，江青等人却置这些确凿事实于不顾，仅凭一名在押犯 1952 年的一段说刘少奇接受过赵恒惕送的“四书五经”的笔供，竟引申出刘少奇是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如此推论，实属荒唐。

所谓 1927 年当内奸一事，证据只是丁觉群的供词。丁在 1927 年时曾任汉口特别市国民党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1928 年被捕后脱离共产党。1967 年夏，他被监押起来，专案组逼他写诬陷刘少奇的伪证。他开始说：刘“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但后来在压力下写了伪证。第二天又写了否定材料，声明“这些都是假的”，“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但这种“打破事实框框”的伪造，却被收入《审查报告》，居然成为最重要的证据。

1929 年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任内，确曾被捕过。但因为坚决斗争，身分又未暴露，法院只得以证据不足而取保释放。此事当时省委曾有报告给中共中央，刘少奇也从不曾隐瞒过。可是，江青一伙却逼使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写了伪证。虽然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写了 20 多次申诉材料，要求推翻伪证，但一律不准上报，《审查报告》中只选用了伪证。栽赃陷害、置人死地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而且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刘少奇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林彪、江青一伙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

代理人”统统打倒。目的之一，显然是为他们在将要召开的九大上，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吸收一批，清洗一批”制造口实。

缺员甚多的中央全会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而且被非法关押，剥夺了一切权利，但他名义上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要彻底打倒总要经过适当的组织形式，完成必要的手续，并且必须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完成。为此，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中央委员刚从被非法关押的地点——当时俗称的“牛棚”中放出来出席会议，一些中央委员在会上继续遭受诬陷性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会议召开前的 7 月 21 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给江青的绝密信。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康生开列的这份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193 人（其中 28 人已去世），有 88 人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因而不能参加会议。另有一些中央委员还被造反派扣压批斗，未能出席。在此情况下，第八届中央委员 97 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 10 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 40 人。开会时，因不够法定人数，在开幕会上宣布，“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 10 人为中央委员，这才刚刚过了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98 人中，除递补为中央委员的 10 人外，能出席会议的只有 9 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 74 人，占会议成员总数 133 人的 57%还多。这些人不仅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而且一些人还被指定为组长、副组长，领导中央委员。如王洪文就被指定为副组长。以后还发现，从省里派来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成员中，竟有 1 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与会的非中央委员多于中央委员，非中央委员担任组长领导中央委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严重背离组织原则的一大怪现象。

在 8 月 13 日的开幕会上宣布，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召开九大做准备工作。议程共四项：讨论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讨论修改党章草案；讲一讲国内国际形势；讨论通过关于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大家讨论一下：究竟“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占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毛泽东明确表示，他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林彪、江青一伙借着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在分组讨论一开始时，就组织围攻所谓“二月逆流”参加者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

子恢。林彪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康生等把"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乱军"、"搞修正主义"等罪名强加到受批判的老同志头上，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交代和检讨。这种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的诬陷性的批判，给会议造成了极度紧张的气氛。

全会在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已明确赞同专案组的审查意见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虽然有一些老同志在讨论中表示了怀疑，但在压力下没有能够坚持。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在表决时没有举手。上述调查报告和附件，于 11 月下旬以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最终铸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 9 月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 2.6 万多件，祸及 2.8 万多人。由此在各种不同层次上遭到批判斗争的人，则难以计数。刘少奇于 1969 年 10 月 17 日被押往开封，11 月 12 日含冤病逝，终年 71 岁。

全会通过了《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规定代表产生的原则，是"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这就为把传统的民主选举原则撇开，广泛采用指定代表的方法提供了依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全会通过的公报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所谓"黑六论"的批判

八届十二中全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并通过全会公报而昭告于世，因此，在报刊上也就不再使用哑谜式的"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称，而直呼其名。会后，又广泛展开了"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的"革命大批判"。目的显然是要通过对刘少奇大规模的、公开的、指名的批判，进一步把"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搞臭，更加广泛地宣扬"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左"倾错误思想。

还在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于 1968 年 10 月 16 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六论"（即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组织、授意写成的。其特点是断章取义、随意引申、捏造事实、歪曲历史，以"左"倾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

他们所批判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观点，批判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正确论断。而这些论断是中共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过的，也是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都讲过的，并非刘少奇一人之独创。

所谓“驯服工具论”，是针对刘少奇的一次讲话。尽管共产党员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一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可以研究，但当时的批判实际上是以否定党的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造反有理”的片面口号，批判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纪律、听从党的调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党性原则。也批判了加强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正确方针。

所谓“群众落后论”，并非是刘少奇的原话，而是对刘少奇某些话加以断章摘取后的歪曲概括。而当时的批判实际上是以“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等自发论，批判在群众工作中，应加强党的领导，抓紧思想教育，提高群众觉悟等正确原则和成功经验。

他们批判所谓“入党做官论”，刘少奇本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完全是歪曲和捏造。实际上是借此丑化广大党员，攻击党的积极分子，歪曲党的性质。

他们所批判的“党内和平论”，是从“左”的方面对刘少奇所总结的正确对待党内斗争经验的错误批判。实际上是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哲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关于既主张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又承认在坚持原则基础上必要的和平与妥协，以维护党的团结的正确态度，以及不要把党内一切分歧和斗争都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正确观点。

他们所批判的“公私溶化论”，实际上是以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空洞口号和否定个人物质利益的极左观点，批判刘少奇所正确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一的原理。

这种混淆是非的“革命大批判”，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抹煞了建国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了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各方面极大的混乱。

第四章 稳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出一个问题：现在都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他的回答是：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这就是说，在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提下，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而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发挥党的最高组织形式的权威，重建党的各级组织，运用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在稳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既定格局的基础上，去夺取新的更大胜利，无疑被毛泽东认为是最适宜的措施。党的九大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召开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火既然已经熊熊燃烧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止熄的。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借“文化大革命”之势而窃得巨大权力的反党阴谋集团，更是不愿意“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的。因而在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斗争。

第一节 “造反派”胜利的中共九大

九大前的国内外环境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缓解了天下大乱的局势，创造了相对安定一些的环境；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又进一步做了组织方面的准备；中共中央全会后，各地纷纷协商产生了出席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样，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就基本上具备了。

中共九大召开前的国际环境还是相当严峻的。从1965年开始，由于美军增兵越南南方，连续轰炸越南北方，在中国南大门剧烈燃烧的战火，虽然受越南军民1968年新春大捷迫使美总统约翰逊要求和谈，并于1969年1月开始了两国四方（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南共和国〈西贡〉）的巴黎和谈的影响，而有减弱的趋势。但是，当时战火尚未平息，驻在越南南方的美军仍多达54万人，还有6万多名帮凶军队和近百万的南越伪军。中国的南大门并不太平。

而在北方，中苏关系很紧张。两国边防部队武装对峙，边境冲突以致流血事件时有

发生。据我国政府统计，自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的53个月里，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发生的各种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特别是，正当党的九大召开前夕，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东部地区黑龙江省的珍宝岛，接连发生两国正规军武装冲突，动用大炮、坦克的严重流血事件。这是自中苏两国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我国外交部接连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珍宝岛事件不仅引起我国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对于广大的党员和群众也产生严重的心理冲击。

上述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日益紧迫这种对国际形势的“左”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准备打仗，不仅成为九大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被规定为指导方针，对全国各项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如稍后即开始进行的全国性的深挖洞（即挖防空洞和防空壕）、建设人民防空工程活动，许多大中城市疏散人口，把过多的资金投入三线建设等，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这都是在战争迫在眉睫的估计下发生的。

不正常的九大代表构成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

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出席大会的代表是按照所谓“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的原则，听取“群众的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当时的所谓集中，就是中央集中到中央文革，地方集中到各级革命委员会。而所谓群众意见。主要是听取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意见，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有意地指定自己的一些亲信骨干要有关地方和部门提名，这样“推选”出来的九大代表自然主要是革委会的负责人、“造反派”的头头和支左的解放军。这就使参加中共九大的人从组织成分上说是一次“造反派”占优势的大会。有些“造反派”还不是中共党员怎么办？就突击入党。这些代表中，有的是确定为九大代表后才补办入党手续的，有的是在来北京的列车上突击入党的，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履行入党手续就当了代表。这反映了九大本身的组织严重不纯。

大会的议程共三项，即：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这次代表大会的开法与八大不同。事先没有公布开会的时间，不邀请外宾，也不准记者自由采访。代表们到京后，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开会时秘密进入会场。一直到大会秘书处4月。1日公报发表，中共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才知道九大已经召开了。这种做法在执政的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4月1日下午5时，九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讲了话。他概要地回顾了党成立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并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先通过主席团名单，并推举大会主席。这时发生了一个值得玩味的小插曲：毛

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立即举起手来。毛泽东看见大家举手，就同意当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周恩来当秘书长，会上一致通过。接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

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九大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在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任务。

政治报告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时，断章取义地摘引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几条论述，用来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就混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已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社会，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的原则界限。按理应如列宁所说：“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把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但九大政治报告却把反映过渡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断，原封不动地搬到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发动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政治运动的理论依据，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样的论断从实践到理论都是错误的。

政治报告用很大篇幅，对中共党史作了歪曲性的叙述，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历史根据。党的历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以及党自身的建设等方面。而政治报告却把全部党史归结为“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政治报告诬蔑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并且说，是“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以此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对党史作这样荒唐的歪曲和篡改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后来在1980年3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已经庄严通过决议，在全国范围内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十年的原因，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科学的结论。

九大政治报告无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客观规律，不顾广大人民当时经济生活贫困、政治生活动荡不安的状况，而把“认真搞好斗、批、改”确定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并要求“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报告中只有很小的篇幅谈到“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而这一段的中心又是强调突出

政治。报告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除了这样极左的错误空论之外，报告中没有一处谈到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方针等。对于党应该怎样去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一字未提。似乎只要所谓的革命抓好了，生产就自然会上去了，经济计划就自然会超额完成了。实践早已证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越是"狠抓"，对生产的破坏就越大。

政治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种"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下确定的任务，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违背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九大党章中的错误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新党章同样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包含许多"左"的错误观点。如肯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左"倾论断；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还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写人党章的总纲，这也是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党章上都没有的。

在党章的总纲中，对作为党的行动指南的毛泽东思想作了不正确的表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写道："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抹煞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主观臆断的夸大。九大党章还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一个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党的其他卓越领导人的重大作用被全部否定。

九大党章明文写上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林彪的内容，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组成的一个集体。他们是经过实践的考验，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他们受到广大党员的信任，被推选出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并对全党的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党的领袖们既不能保证终身任职，更不能由一个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而九大党章却在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并且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赞扬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做法，是同无产阶

级先锋队的性质根本不相容的。两年后林彪的叛逃，正是历史对这种错误做法的无情嘲弄。

九大党章还取消了有关党员的权利的规定，使广大一般党员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应该有不尽义务的权利，同样，也不应该有没有权利的义务。九大党章的这种规定，使党员无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又可以使极少数人成为享有各种权利而不尽任何义务的特殊党员。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就是这种特殊党员。把广大党员在党内应享的权利取消掉，必然使党蒙上一层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使党的建设遭受严重损害。

九大的选举和会议特色

大会选举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4 月 15 日，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发出关于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办法。其中规定，毛泽东和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和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还规定，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候选人的，限定为 53 人。九大代表的特殊构成和中央委员选举办法中这些违反民主原则的错误规定，都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文化大革命”既定政治格局的稳定。九大主席台的座位排列十分有特点，毛泽东居中，左边是以林彪、康生、江青为首的所谓“新文革”的成员，而右边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旧政府”的成员，对照鲜明，意味深长。

4 月 24 日进行大会选举，当选的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占 19%。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相反，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相当一批骨干和亲信，还有各地造反派的头头，如王洪文、王秀珍、刘结挺、王效禹、聂元梓等这种所谓“火箭式”的干部被大量塞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九大从始至终是在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议的基调是“大赞大颂大批”。赞颂的对象首先是毛泽东。很多代表说：“能够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是我们的最大幸福”。代表们的最大要求是两条：一是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多听他的“伟大声音”；二是“敬请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大家合影。其次，是赞颂林彪和他的报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划时代的伟大报告”，“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伟大纲领”等。再次，是赞颂江青和“样板戏”。大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和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其次，一批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和“一贯右倾”的老同志，在大会和小组会上也又一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在 20 多天的会议过程中，始终看不到认真地研究讨论问题的现象，更听不到任何不同意见。

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

4月28日，在北京举行了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对于党面临的任务，他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联系到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似乎有在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将逐渐收缩以至结束的意思，不过讲得十分含糊，同他布置的继续搞斗、批、改也不完全协调。他要求大家研究工厂里的问题。他武断地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这番话以后被江青、张春桥等发展成"全面专政论"的依据之一。

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使他们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通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虽然部分实现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他们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毛泽东主观预计的那样趋向结束，出现"天下大治"的局面。反而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和地方取得了更多的控制权力，以及他们之间日益加剧的互相争夺，而使"文化大革命"继续沿着错误的轨道滑行。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不仅不能趋向正常，反而继续紊乱，使党和人民遭到更多的灾难。

第二节　"斗、批、改"引发新混乱

"斗、批、改"成为中心任务

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斗、批、改"最初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

的《十六条》中的第一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话，以后就被简称为“斗、批、改”。广泛地使用简化语言，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三两斗争”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僵化、语言刻板化的一个特征。

当大批“资反路线”、全面夺权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时，由于派别林立、武斗频繁，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斗、批、改”是无从谈起的。到了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9月7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强调提出运动进入了“斗、批、改”阶段。社论说：“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原在《十六条》中作为“文化大革命”目的的“斗、批、改”，此时又成为阶段性的重要任务，并赋予了新的内容。这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就把“斗、批、改”具体化了。虽然意见本身是针对工厂说的，但社论中已明确指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

既然是“明确地指出”的“中心任务”，当然各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都要贯彻执行。可以看出，把“斗、批、改”这样具体化，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以达到他“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包含着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产物，又是贯彻“左”倾方针的手段。旨在通过“斗、批、改”，“把各个单位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显然是没有可能实现的。因此，随着“斗、批、改”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并没有消除或者得到缓解，矛盾反而越来越多，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刻。

内容错误、方法粗暴的大批判

在进行“斗、批、改”的各项工作中，一再强调要“大批判开路”。这种大批判的特征，是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容分辩，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

从内容上说，不仅蛮横武断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重大成就和一系列政策法令、工作条例、规章制度等，硬说那些都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货色”，而且把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把反对只抓政治运动忽视生产的正确主张，称为

“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

在经济工作方面，把加强经济核算、提高企业利润的各种措施，统统说成是“利润挂帅”；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和关心群众物质生活当作“物质刺激”而戴上修正主义帽子；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当作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

在教育科学工作方面，把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科技人员钻研业务，当作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而横加批判。

在文化艺术方面，把解放前30年代的革命文艺和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和文艺作品，几乎全部说成是“封、资、修大毒草”等等。

大批判的直接后果是，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信念，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给生产、科研、教育、文化各个领域带来巨大的破坏，造成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思想被禁锢的局面。

矛盾甚多缺乏活力的革委会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要求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后，还要在地、县、乡以及各个工厂、学校、公社、商店等基层单位，普遍建立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作为一种特殊条件下的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而建立的。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避免的缺陷。工厂、商店等是经济组织，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分清机构的性质，普遍建立革命委员会，显然是不恰当的。它助长了强制权力的滥用，使冤假错案极端扩大化。

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从上到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局面，改变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稳定“文化大革命”的既成格局。然而在当时，各地都是派别组织林立，各派都自诩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老造反”、“贡献大”，理当在革命委员会中占有更多更重要的席位。为此，互相极力贬低和打击对方，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十分激烈；人们对本地区、本单位革命干部和革命委员会成员的看法普遍存在巨大而深刻的分歧，某人在这派口中是“革命领导干部”，而在另一派眼中则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一派说革命委员会“好得很”，另一派则说“好个屁”！以致被称为“好派”和“屁派”。类似现象不一而足。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的把持和操纵，勉强成立起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抵只具形式上的联合。实际上则或是一派掌权，压制多数，矛盾和斗争更为严重；或是两派、几派分权，互相掣肘，争权夺利的纠纷更趋复杂。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两个革委会”的局面。

上述情况表明，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革命委员会，既不符合客观需要，也没有生命力。

冤假错案剧增的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从原则上说，要求阶级阵线分明并不错。但在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已十分过火的情况下，再搞一次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实在很难说是必要的。

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他还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规定，并且要求“过细地做工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方针的错误，对于何谓“阶级敌人”没有明确的规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加上林彪、江青一伙散布和助长的极左思潮的影。向和派性的干扰，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又由于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人权没有保证，司法监察机构被砸烂，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加以刑讯逼供的野蛮方法盛行，因而造成了打击一大片、冤假错案遍于域中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大批在全国解放后积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的同志，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多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背叛了反动阶级和反革命阵营，并在革命实践中为人民事业作出了贡献的同志，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特务分子”；许多历史上曾经被捕、被俘，经过多次审查，早已作了正确结论的同志，又被重新审查，被错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叛徒”；在过去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战斗，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某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竟被整个打成“叛徒集团”、“假共产党”、“叛徒窝子”；许多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进行了抵制，对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意见的同志，被认为是“恶毒攻击”而定为“现行反革命”，加以批斗、殴打、虐待以至判刑。大批干部无辜受到迫害，有些被关进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并且株连到他们的家属和亲友。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大错案，如“内人党”冤案中，遭到迫害、诬陷的内蒙古干部和群众达34.6万人，其中1.6万余人被迫害致死。

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亿人，确是史无前例。这场毫无客观需要的“清理阶级队伍”，使大批干部和群众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仅没有做到“纯洁组织”，“划清阶级阵线”，反而给革命的基本阶级队伍造成极大的损害和混乱。

方针错误、遗患甚多的整党建党

“整党建党”是对被“文化大革命”冲击而停止过组织生活三年之久的党员和党组织进行的整顿和重建。

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1967年10月在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报告上的一个批示。即所谓“五十字建党大纲”：“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50个字被称为“确定了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而毛泽东另一条“吐故纳新”的指示，即：“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则被称为“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当时要求全党以这两个批示为“最根本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这样的指导思想同样是“左”的，不符合实际的。

在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成为残余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和要求，而对生产建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任务只字不提，这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以此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也是不恰当的，实际上降低了党员标准。

在“整党建党”中，还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党员都要进行“斗私批修”，党组织要“吐故纳新”。所谓“吐故”，按照文件和社论的说法，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上述各种“分子”，除“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纯属虚构外，其他的如果真是“证据确凿”，当然不能留在党内。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证据确凿”往往可以任意解释和编造。因而就为林彪、江青一伙以至某些“造反派”打击陷害干部和党员，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利用这一条，错误地不许一部分党员恢复组织生活，错误地开除一部分党员的党籍。所谓“纳新”，文件讲得很明白，就是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吸收入党。根据当时的一篇报道，上海市工交战线党组织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6月共吸收新党员33600多名，“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批修整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北京市各条战线党组织，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发展了6万多名新党员，也“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按照这些要求，许多派头头，有野心、搞阴谋的分子，打砸抢分子涌人党内，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按照“文化大革命”要求进行的“整党建党”，其结果是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一次大破坏。但是，也应当看到，通过“整党建党”，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党的委员会、然后又逐步建立了各地方和各单位党的各级组织，先后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特别是许多老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以后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稳定局势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

毫无章法的改革规章制度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要求按“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精神，对建国以来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大破大立”。

江青一伙甚至提出了“跟前十七年对着干”的荒谬口号，煽动否定一切。特别是对

于60年代初制定的一系列工作条例，诸如《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已经被实践证明其中许多规定是正确的，起过积极作用的条例，统统被当作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条例”，进行批判和否定。

对于各企业事业单位多年来为了保证工作和生产有秩序、有效率地进行而建立起来的许多规章制度，也统统被当作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被“彻底砸烂”。

这种完全否定建国以来经验的“大破”，当然不可能带来“大立”，以致在工作和生产中无章可循，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损失和破坏。

弊端甚多的精简下放

“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这项要求从原则上看并没有错。但其前提应该是转变职能，下放权力。

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力高度集中，政权职能并没有任何转变的情况下，这项要求的贯彻，实际上只是简单的、形式主义的减人简事。例如，国务院原有机构为90个部委级单位，1970年6月决定精简为27个部委级单位；原有机关工作人员53748人，只规定编制9710人，仅占原有人员的18%，其余人员统统精简下放。这种大破大砍的办法，使工作已经很困难的国务院，遭到更为严重的削弱。但原有任务并未精简仍需完成，只好增设各种临时机构，采取各种名目调借人员，其结果是机构、人员并没有真正精简。基层单位也是照此办理。这种“革命措施”曾广为宣传，造成压力，助长了许多基层单位搞明减暗不减，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歪风。

在“精简下放”的名义下，把大批干部、教师、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等等，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许多国家急需的有用人才，精力和时间付诸东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的支配，这种下放干部的办法，往往成为排除异己、惩罚干部、摧残知识分子的措施。

结果，这次精简下放，既花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力和物力，又使成百万干部经受了一场磨难。不仅没有真正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反而造成各方面工作上的损失和许多不良后果。

不成功的教育革命

在这个“斗、批、改阶段”，还进行了所谓“教育革命”。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已长达4年之久。根据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在一份调查报告上的批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

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出《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于1970年6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试行。

文件把高等学校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诬为“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明令废除，而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2至3年。课程设置为：“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在教学工作中，还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对高等教育进行合理的改革当然是需要的，但这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教学改革”，实践证明不仅不能达到原来预想的“反修防修”、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目的，反而给大学教育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其主要的恶果是：总结多年经验而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都被破坏了，致使大专院校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遭到破坏；学员入学时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由于取消考试，改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就为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跨入高等学府大开方便之门，致使“走后门”上大学成风，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恢复招生的形势和贯彻“左”倾指导方针的需要，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同志和大专院校的代表共630余人。经过长达100多天的报告、学习和讨论，会议通过了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在这个《纪要》中，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全国教育工作强加罪名，全盘否定。宣称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种完全背离实际情况的“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纪要》充分肯定和赞扬“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错误做法，宣称“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并作了若干“左”的规定。《纪要》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大学的指导文件，产生了严重的恶劣影响。

经过如上所述的“教育革命”，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积极性，而且影响所及，在社会上和中、小学中，广泛产生了“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错误观念。中、小学生普遍不用功读书，学校秩序持续混乱，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到巨大破坏。“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方针下的“停课闹革命”和“教育革命”，其最严重的后果，是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并造成我国科技队伍和各方面人才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拉大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无中生有的清查“五一六”

在进行“斗、批、改”的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一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反动传单和标语，并将这种传单和标语张贴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

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丑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纷纷自发进行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有用多少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代”，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因为“破坏和分裂”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难道还不反动、还不要打倒吗？但是，第一，什么是“破坏和分裂”并没有准确的界定；第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哪些人，反对某些元帅和将军是否算“分裂”解放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这两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极左狂热造反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为“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

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打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身为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被名列操纵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的主任也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

经济工作的得失

九大后的一段时间，全国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工作取得一些进展，但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失误。

1969 年基本上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这一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 1968 年增长 23.8%。这样高的增长幅度，显然是带有恢复的性质。

1970 年的经济发展较快，不仅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而且达到和超过了 1966 年的水平。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5.7%。其中，工业增长 30.6%，农业增长 11.5%。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科技项目取得了成就。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70 年 7 月 1 日，全长 1083 公里的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蜿蜒于地质构造复杂多变的崇山峻岭，桥梁和隧道占线路总长度的 40%，工程十分艰巨。同月，全长 816 公里的焦枝铁路，经河南、湖北两省 86 万多民工、3 万多铁路专业队伍日夜奋战，仅用 9 个月时间即告建成。1970 年上半年，全国有 1000 多万人投入基本建设战线，完成投资额比上年增长 76%。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表明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竭力抵制和克服“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也说明搞经济建设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在这期间，由于“左”倾方针的影响，经济工作又出现了一次大的失误。

1970 年 2 月 15 日至 21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中央正式召开计划会议，制定 5 年计划，说明经济工作又开始受到重视。有人抓，比无人管要强，有生产计划比停工停产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由于指导思想不当，却又产生新的问题。

会议遵照中共九大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性和“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国际形势总原则；关于要准备打仗，“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的方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

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把"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作为"四五"计划的重点。这样的建设战略重点的确定，显然是不妥当的。

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会议规定，1970年比196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事工业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

在会议拟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中，为了显示"文化大革命"对促生产的积极效应，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如，根据毛泽东关于经过4个五年计划"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吨至四千万吨钢"的设想，规划提出1975年产钢3500万吨至4000万吨（比1970年要增长106%至135%），生产能力达到4000万吨以上；要求到1975年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达到一亩高产稳产田，耕作机械化程度达到40%至50%，等等。

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虽然以后没有正式下达，但对经济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实现那些高指标，人们习惯的不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而是增资增人的老办法。结果1971年以后大幅度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大量增加职工，导致1971年底出现"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和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资金投放和物资消耗增加过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产品质量明显下降，各种事故增多。历史上急于求成造成的各种弊端和恶果又开始显现。面对这种情况，又不得不再次调整。大量精减吃商品粮的职工和城镇人口，在群众中造成困难，引起不满。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占国民收人的比重由1969年的23.2%陡升到1970年的32.9%，挤了人民的正常消费。这次新的冒进，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以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的状况更加严重。

综上可见，九大后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斗、批、改"，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不仅没有达到"争取更大胜利"的目标，反而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造成各方面工作的混乱和损失。"斗、批、改"运动因林彪事件的发生而中断，以后也实际上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

第三节 庐山上的风云突变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解决，转而把考虑重点放在政府的重建方面。因为在当时，宪法和法制被破坏，依法选举的国家主席被迫害致死，政府机构残缺不全，效能不高，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这种状况是任何现代国家都难以长期容忍和维持的。而要按照"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格局重建政府，修改宪法和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成为当务之急。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

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会后，中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宪法工作小组，成员是：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

修改宪法中的明争暗斗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认为这是夺取更多权力的好机会。

这个集团本来就是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形成的。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居于“副统帅”的地位，得到了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的主动投靠，又利用“支左”，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使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了顶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还有一批骨干和党羽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黄永胜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担任副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并实际上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军权。随着林彪集团权势的扩大，他们的野心也恶性膨胀。

与林彪集团平行发展，通过九大也取得了更大权力的还有江青集团。原来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跃而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等人也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本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要请林彪这位“尊神”保护，现在似乎已经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

而且，林彪等人还意识到江青集团势力的发展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以上这些情况，加上对林彪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促使林彪集团妄图提前“接班”，为此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

九大以后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集团的“接班”阴谋活动，主要是采取“和平过渡”的办法进行的。他们阴谋凭借在组织上占有的优势，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以作为“接班”的第一步。他们采取的策略是：表面上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赞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以骗取毛泽东的信任，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在实际上把毛泽东架空，由他们掌握实权。

4月11日，林彪不顾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数人的意见和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他说什么“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最后一次是在6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愤慨地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以加上”。他还引用三国的故事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历史的比喻可能不尽恰当，不过却鲜明地

表示了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坚决态度和对劝进的反感。

但是，林彪却违反他自己倡导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名言”，为权欲所驱使继续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提出在宪法中写上“国家主席”一章。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本是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不能因为毛泽东讲了不设，别人就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林彪等人考虑这个问题完全是另有图谋。7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李作鹏则公开向别人说：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较合适，因为他既是副统帅，又是接班人”。显然，林彪是自己要当国家主席。

林彪集团这种露骨地抢夺最高权力的活动，使他们同本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步尖锐起来。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同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种表述方式之争，而且是纯理论性的。不懂理论的吴法宪，却敢于在这样的问题上，向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康生、张春桥挑战，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借题发挥。因为吴法宪清楚地知道，三个副词是林彪一贯坚持的。他也知道删掉三个副词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是康生、张春桥。这种争论的实质，是要争夺党政的最高领导权，而表现形式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种表里不一、曲曲折折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个特殊而值得玩味的怪现象。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公开展开争斗的时刻，性喜投机而又由于受到江青等压制怀恨在心的陈伯达，错误地估量了形势，公开倒向林彪集团一边。他对吴法宪的发言表示赞同，并且吹捧吴法宪“能坚持原则，风格很高”。这些情况表明，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迅速激化，酝酿着一场大的较量。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交锋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到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53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经过常委商定的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全体会议上抢先发表讲话。他强调宪法草案的特点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林彪在这里使用“无产阶级专政元首”的提法，显然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在讲

话中，反复称颂毛泽东的功绩，批驳实际上并无人公开主张的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的观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的这些话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基本主张：政治方面是坚持设国家主席，理论方面是坚持天才论。这篇讲话，对于林彪集团的成员来说，无异是一个向江青集团发难的信号。

在这次会上，康生代表宪法工作小组，介绍了毛泽东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对各地提出的修改宪法意见采纳情况作了说明。在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次日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获得会议同意。

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事先的秘密串连和约定，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一份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他们在发言中，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但是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攻击张春桥，亦即攻击江青集团。

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发言，引用了林彪的三段话，以证明他们所说的"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的正确性。他意含讥讽地说："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他说："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他武断地说："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陈伯达这些话带有很大的煽动性，当即有些人跟着起哄，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华北组当晚抢先发出"第二号简报"，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简报写道："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这份煽动性很大的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

在当时极左思潮猖獗和个人崇拜浓厚存在的条件下，人们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一部分高级干部也不例外。加上带头发难的是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又事先秘密串连了一些中央委员响应支持，造成声势，这样就一时蒙蔽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成员。有些人用激烈而粗暴的语言表示极大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从而造成了一场混乱。

8月25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告状。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会议因此即告中断。

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他说："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他联系历史，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他指责

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强调：“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转入揭发和批判陈伯达。在 24 日分组会上同陈伯达互相配合、煽风点火的吴法宪等，也受到了批评。在分组会上表示过同意陈伯达意见的人，纷纷进行自我批评。当时，毛泽东对林彪本人是采取了保护的态度，没有指名批评林彪。

全会于 9 月 6 日恢复了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全会于当日闭幕。

全会闭幕前夕，9 月 5 日晚，林彪和叶群亲自到江青住处拜访她，表示歉意与和解。6 日晚，叶群又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住处，登门道歉。表演了一场面和心恨的闹剧。

九届二中全会对于林彪集团的发展到覆亡是一个转折点。一是林彪妄想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二是在同江青集团较量中，由于毛泽东明确支持江青等人，点名批判陈伯达，不同意林彪鼓吹的天才论，而使林彪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此后，不甘心失败的林彪集团，转而准备采取武装政变的方式，妄图用暴力夺取最高领导权，从而走上了加速覆灭的道路。

毛泽东在会后的种种措施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了，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已经结束，也不想仅限于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而是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这些办法，毛泽东后来自己概括为：“抛石头”（即写批示发下去），“掺砂子”（往林彪控制的机构里面派人），“挖墙角”（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

按照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所谈的意见，中共中央于 1970 年 11 月 6 日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当时规定要学习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六本著作和毛泽东的五篇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毛泽东的著作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当时的领导意图看，学习马列六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配合“批陈整风”。但在久已不学马列，只读《毛主席语录》的情况下，提倡党的高级干部学马列，总是一件

有益的事情，而且会发生比较长远的影响。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还管辖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均撤销，所遗事务亦由该组管理。由于康生自九届二中全会后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去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逐步落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出"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阴谋家、野心家"；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然后逐级发展到全党，并根据运动的要求，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

12月16日，毛泽东在华北某野战军部队《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陈伯达在军队中影响很小，他到军队去视察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毛泽东对他活动的严重性估计如此之高，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军队，特别是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和批评指责。

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晚开会，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于12月22日召开华北会议。到会的有北京军区机关和部队，河北、山西、内蒙等省军区负责人共340多人。1月9日后，被毛泽东批评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被并人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揭发、批判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李雪峰的所谓"严重错误"（关于郑维山、李雪峰一事应属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已批发文件作了改正）。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免去郑维山和李雪峰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李雪峰不仅被免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的职务，后来还被错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被开除党籍（1982年已平反并恢复党籍）。这在当时曾被称为"挖墙角"。1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中共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在"批陈整风"中，毛泽东作了许多批示，点名批评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地对林彪有所批评。

1970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信上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上风了。"在这里，毛泽东含蓄地把由林彪、陈伯达主持

起草，在江青、康生、张春桥等鼓噪反对下，经毛泽东予以否定的一份九大政治报告草稿，称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这里边的原委是：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原来毛泽东是指定林彪、陈伯达主持的。初稿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江青一伙提出否定意见。张春桥并讥之为“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报告”。实际上那份报告草稿，也是通篇谈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是对经济工作多讲了几段。草稿被否定后，毛泽东另指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份报告草稿，又被陈伯达讥之为“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至此翻出老账，指责“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显然包含着对林彪的批评。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他一方面认为在过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同时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四个伟大”是受到广泛宣传而尽人皆知的林彪的一个题词。说它“讨嫌”，显然是针对林彪而言的。

1971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这些措施，都是旨在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从1971年4月15日开始，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迫于形势，在会上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错误。4月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黄、吴、叶、李、邱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现自己的申明。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向全体党员传达陈伯达的问题，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

第四节 林彪集团的覆灭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上述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阵脚，使他们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林彪眼见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反党集团濒于瓦解，决心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

林彪集团策划武装政变

早在1969年10月，林彪就指使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当兵刚两年多一点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自授予林立果指挥、调动空军的权力，以便让林彪通过林立果亲自掌握这个“机动能力强”的军种。林

立果的这种破格升迁，被群众讥讽为："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后，林彪就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1970年10月，林立果秘密组织空军的某些人员作为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由林立果于3月在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分为"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等9个部分。站在反革命集团的立场上，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者"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接着，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有驻上海空×军政委王维国、驻杭州空×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参加的四人秘密会议。在"用枪杆子保卫林副主席"的反动口号下，确定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指挥班子。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计划，紧锣密鼓地暗中加紧进行。

毛泽东的防范措施

正当林彪一伙积极准备，酝酿发动一场尖锐斗争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也警惕地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1971年8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去北戴河林彪住地，向他汇报了全国情况，并通知他中共中央已决定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当面表示"坚决拥护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却十分不安。因为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到四届人大，林彪可能连副总理、国防部长也当不成了。因此，他背地里一方面派人四处打探消息，一方面加紧了武装政变的准备。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明确指出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他指名批评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说："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这样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把林彪视为"接班人"，而且认为林彪已充当了反对他自己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被接见的各地党政军负责人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所以谈话实际上是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思想酝酿和准备。

林彪决心发动政变

林彪一伙十分焦急地打探毛泽东讲话的内容。9月6日，李作鹏利用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的机会，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处了解到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一回北京就紧急地向黄永胜、叶群作了密报。同时，林立果也通过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得到毛泽东在长沙大体相同的谈话内容。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匆忙赶来的林立果研究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进而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即周宇驰，当时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联合舰队”参谋长）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份手令赶到北京，进行了具体部署。他们密谋在上海与苏州之间的一个叫硕放的小火车站附近用爆破铁路桥梁、地面攻击、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毛泽东乘坐的专车，置毛泽东于死地。同时，林彪等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了杭州，计划在杭州住到9月下旬。当他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引起警惕。9月8日晚，毛泽东下令将他乘坐的专列趁夜转移出杭州，使人摸不清他的行止。9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调回专列，离开杭州；当晚抵达上海，在专列上住宿。11日上午，毛泽东就在专列上办公，并在车上会见了上海市和南京军区的一些负责人。当日下午，毛泽东突然下令列车立即出发，要求铁路全线绿灯，沿途昼夜不停，直驶北京。12日中午，列车到达北京丰台，毛泽东下令停车，并召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到列车上谈话，了解北京地区的形势并作了适当部署。他再次谈九届二中全会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下午4时多，毛泽东换乘汽车回到中南海。毛泽东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所采取的机智措施，使林彪集团的谋杀计划无法实现而破产。

林彪仓皇出逃丧命异国

9月11日晚，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12日，林立果按照林彪等的决定，指挥“联合舰队”骨干，仓皇准备飞机，拟定名单，妄图于13日晨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林立果于12日晚8时，私调专机（三叉戟型、256号）飞抵山海关机场，立即乘车赴北戴河与林彪、叶群会合。

9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10时30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乘飞机叛国出逃。”周恩来立即下令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的事，并要飞机马上飞回来。吴法宪汇报说，他已查问过，确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改装后试飞，但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周恩来告诉吴法宪，飞机修好马上飞回来，但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同时指示吴法宪立即在北京西郊机场查明情况，并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工作。对此事放心不下，周恩来又打电话给海军政委李作鹏，让他向山

海关的海军机场下达命令：三叉戟专机起飞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有效。李作鹏立即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出了事情，因而有意篡改了周恩来的命令，改为：四个人中有一人指示放飞才能飞。晚11点半，周恩来接到叶群打来一个奇怪的电话，说："林彪同志想动一动。"周问："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答："空中动。"周又故意问："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答："没有调。"林彪等本意是要制造假情况，迷惑党中央，但反而弄巧成拙，引起了更大的警觉。

林彪、叶群、林立果感到南逃阴谋已经败露，不顾北戴河住地警卫部队的拦阻，迅速乘汽车狂奔至山海关海军机场，登上256专机，并于9月13日凌晨不顾地面拦阻和机组缺员而强行起飞外逃。

得到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立即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向全国下达了"任何飞机不准起飞"的禁飞令。当林彪乘坐的飞机明显要飞向国外的时候，毛泽东决定不要拦截。1点55分，专机飞越国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事后得知，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飞机因燃油告罄不得不迫降时在地面烧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拘捕。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

林彪事件的教训

像林彪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内身居高位的人，竟然组织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党的领袖，这样的事件是极其严重的。它的被迅速而顺利地粉碎，说明党心、民心和军心，都是不赞成、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即使像林彪那样声势赫赫，经营多年，又网罗了一批党羽，在军队中有很大权势的人，一旦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也就立即众叛亲离，顷刻瓦解。林彪集团的被粉碎是党和人民的一个胜利。

但是，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究其根源却是"文化大革命"推翻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在已经进行了5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被彻底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涣散以至完全瘫痪，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实事求是的原则被抛弃，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混乱。这些就造成了林彪集团能够产生和发展，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的条件。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用党章肯定下来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新擢升的5名政治局委员参与阴谋夺权活动，等等。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促使人们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不对?"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它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效果?等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加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成为10年"文化大革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第五章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同时，也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使得有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从而把整个中国导向正常的发展轨道。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在当时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去抓住这个历史转机，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发展。可惜，由于毛泽东未能充分领悟林彪事件的教训，继续迷误和坚持“左”倾路线，而使这一历史转机被丧失。加以江青集团由于竞争对手的灭亡而攫取到更多的权力，野心更加膨胀。他们不断地制造风波，挑起事端，向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力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这样，就使全国各族人民在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笼罩下，依然走着曲折崎岖的道路，继续遭受着痛苦和灾难。

第一节 “批林整风”和周恩来纠“左”的努力

“批林整风”的开展

林彪事件是一件十分严重而又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事件，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适当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和减少这一严重事件所造成的震动。不仅国内局势平稳，顺利地进行了国庆活动，也没有影响美总统特使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后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向全国的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传达了林彪事件。9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令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身居军队要职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成员为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干、刘贤权共10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从而顺利地解决了被林彪集团篡夺的那部分军权。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成立负责彻底审查林彪集团问题的中央专案组。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

10人组成，下设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进行日常工作。

像副统帅叛逃这样大事是不可能长期保密的。所以在进行上列工作的基础上，国庆节后，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普遍传达。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林彪事件的发生感到极大震惊，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表示极大义愤，对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坚决拥护。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很多老同志写了揭发林彪的材料。

“批林整风”的主要内容按当时的规定是：对林彪一伙阴谋抢班夺权，制定《“571”工程纪要》，策划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同时，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宣扬的“天才论”等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结合批林，除了学习马列的6本书外，当时还下发了毛泽东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和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提高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给“左”倾狂热降温，促进冷静思考，并能够较多地注意经济工作，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一定程度的好转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左”的，又有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作用有限，问题不少。

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某些政策，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个转折关头毅然宣告结束这场“大革命”。相反地，毛泽东依然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一套“左”的观点去分析和判断林彪事件。他认为林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事件是激烈阶级斗争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认为林彪集团代表某一阶级缺乏充分的根据。他们实际上是一伙以夺取最高权力为目标的野心家、阴谋家集团。他们本身从来没有公开提出过任何一项独立的政治主张，因而也很难说是什么路线斗争。他们所以能嚣张一时，恰恰是利用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全局性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依然在全局上坚持“左”的错误方针，并且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能不延长和加深“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阴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他为纠正“左”倾错误作了极大努力，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解放”和任用一批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疯狂地打击和迫害老干部，冤假错案遍及全国。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费尽心血，采取各种方式保护大批党内外干

部。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某些事情，并改变了对一些老同志的态度。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就为所谓“二月逆流”的大错案平反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为“二月逆流”平反的决定，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被迫害而不准参加九大的谭震林，也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回到北京并恢复了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在建国后亲自参加某人追悼会的事是比较罕见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席像陈毅这样屡遭批判的老同志的追悼会，更不寻常。这件事经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正式渠道布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追悼会上，毛泽东在同陈毅的夫人张茜谈话时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讲了邓小平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这些话传出去后，起了积极的影响。周恩来致悼词，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了名誉。

周恩来抓住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1972年4月间，他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阐述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并亲自审阅。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于4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排除“左”右干扰。在干部问题上，不能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社论特别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本是客观事实，但“文化大革命”后久已不提。这篇社论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使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等，从关押、审查、批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许多同志并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

12月，毛泽东根据一位领导干部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要求“一律废除”并“请总理办”。周恩来立即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不准对“犯人”虐待、殴打，“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这虽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干部问题的办法，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江青一伙对干部的迫害。

由于上述一系列工作，在这个期间，恢复了一些负责干部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和“靠边站”（当时对一批既定不出明确罪名，但又不给任用、不准工作的干部的特定名称）的原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其中最突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在8月3日邓小平来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他虽然仍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

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没有屈服于苏修”等。根据这个批示，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积极努力才产生了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使邓小平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努力扭转国民经济下降局面

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这段时间内，他为扭转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作了很大努力。他指出：“不能违背科学，……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

1971 年 10 月 5 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等 7 项制度；强调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 7 项指标。这些本是建国后积累多年经验规定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措施，也是任何经济部门所不可缺少的必要制度，但在几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全部被破坏，造成企业管理严重混乱、生产连续下降的局面。因此，要扭转经济工作的局面，必须从建立和恢复这些基本规章制度做起。

1972 年初，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 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的问题。他在 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 5000 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 300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 800 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他还说：“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 1973 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

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 10 条不得违反的纪律。这些规定旨在纠正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随意增加职工等现象，消除林彪一伙破坏国家计划，叫嚷“我说的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等恶劣行径对经济工作所造成的影响。文件提交 1973 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28 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上海反对。张春桥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强令把文件收回。

1972 年和 1973 年两次全国计划会议的两个文件草稿，由于张春桥的阻挠，都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是，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它对实际工作还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中的若干过高指标，特别是把 1975 年的钢产量指标，从 3500—4000 万吨降到 3000 万吨；加强了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控制了任意上项目和扩大规模；加强了劳动工资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

防止任意招工和违反政策随意调工资。这样，就使“三个突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使失衡的各种比例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增长。1972年工业比上年增长6.6%，1973年比上年增长9.5%。

值得提出的是，1972年我国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1973年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国外引进共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加上后来的追加项目，共达51.4亿美元）。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1.7米轧机及透平发动机、斯贝发电机等。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陆续建成投产。不仅扩大了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现代化生产技术水平。

调整农村收益分配

在农村工作方面，也着手纠正一些“左”的弊端。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多劳不能多得；经营单一落后，很少现金收入；分配不能兑现，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等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提出解决措施。文件重申：“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2年由于有6.1亿多亩庄稼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这一年农业总产量没有增产，到1973年农业总产就比上年增长8.4%。

外交方面的重大进展

在对外工作方面，这个期间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极左思潮，制造了一系列重大的涉外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声誉和对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的前5年，整个对外关系处于停滞和倒退的状态。九大后，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和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同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关系。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1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到达北京。2月27日，中美两国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在对抗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和解与关系正常化。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中国对外关系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1972年9月25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邀请访问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2年底共27个月的时间里，还有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土耳其、伊朗、墨西哥、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总共41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差不多相当于从1949—1969年20年间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总和（20年建交国家为47个）。英国和荷兰亦由于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使代表机构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在外交上获得了重大成功。

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对外关系上的重大决策，开始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封锁和我们自己闭关锁国的不正常状态，为开辟新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

利用1973年三八妇女节的机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招待会，邀请了在华的外国专家和家属出席。会上，周恩来严厉地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破坏干扰，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中国的外国专家表示真诚的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工作。一位英国女专家曾感情激动地回忆起这次会议。她说："在数百名客人面前，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延误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对待外国专家的指示，公开向全体外国专家表示道歉"。"一个微贱的英国陶瓷工和烧饭女工的女儿，接受强大中国的总理的道歉，请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感受吧。"这对挽回对外关系上的不良影响，纠正极左错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期间，周恩来对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视，加强了领导，并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要求，推动这些部门的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批判极左出现的曲折

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这段时期，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过程中，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普遍存在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情况，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他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极左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思想基础。在当时还不具备扭转"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总方针的情况下，提出并组织批判极左思潮，是可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周恩来正是抓住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使当时各方面工作出现了转机。

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恶劣影响而作的努力，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当时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写的。据作者本人说，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1972年春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参观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时，提出希望我们提倡一下基础物理的学习和研究。杨振宁的意见受到

了毛泽东的称赞。7月，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时，周恩来又当面告诉陪同会见的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回校传达后，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教育的三点意见。北大、清华草拟了一个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周恩来看了，也作了批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才写了文章。

文章本来是应《人民日报》之约写的，由于姚文元反对，才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针对当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却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派人到北京大学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他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他们批判的矛头，显然是对着周恩来的。

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些文章是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和国务院领导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1972年3月听取黑龙江省的同志汇报哈尔滨几个工厂的问题时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精神组织撰写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广泛关注。上海方面打电话向人民日报社查问文章作者是谁，文章是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随后，《文汇报》内部刊物以上海工人座谈的名义，指责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是"大毒草"。姚文元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邪运动"，批判"右倾回潮"，以此为契机，使周恩来无法再过问人民日报社的事。人民日报社完全被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所控制。

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要把"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周恩来作了同意的批示。江青、张春桥却针对周恩来的批示加以反对。他们分别在报告上批写什么"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等等。显然，批判极左思潮，触及了江青一伙蓄意鼓吹极左思潮、赖以乱党乱国的要害。

在周恩来同江青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有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赞同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1973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新年献词》中，按照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精神，强调在"批修整风"中要着重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十大正式点林彪之名前一直以此为林彪的代名词）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认为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目的是，对内"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还不

是“右得不能再右”了嘛！从此之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谁要是再敢批“左”，那就是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缺乏认识，就是搞错了“斗争的大方向”。一时批“左”成了禁区。

周恩来正确地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如果能坚持做下去，“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是可以逐步减轻以至有所纠正的。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毛泽东在全局上又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因而他敏感地把批判极左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了不允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

在粉碎林彪集团后的两年间，尽管江青集团进行各种干扰和破坏，但是由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工作，努力生产；也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人心思治，所以，在1972和1973两年间，社会秩序、生产状况逐步好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转机。然而，周恩来主持的批极左及其带来的好转局面，很快遭到阻挠和破坏而中断，在所谓的批“极右”声中，使党的“左”倾错误不仅得不到有力的纠正，反而继续发展，也就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继续发展下去。

第二节　继续九大错误的中共十大

林彪事件发生后，产生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例如，九大党章总纲中关于“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提法，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7名已属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首脑和骨干受到审查，缺额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难以正常工作；由此引起的普遍疑问：九大路线是否仍是正确的？很显然，这些问题不给予回答和解决，是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也是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的。而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又只能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完成。而九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大的准备

为召开十大作准备，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关于代表的条件，决定的要求主要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锻炼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这就是说，要把林彪集团成员和追随林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从代表中排除掉，但代表的主要成分，仍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考验表现好”的造反派；同时，也要更多地吸收一些“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和批斗的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作“检讨”。这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干部问题上作了某种程度的政策性调整。

决定规定的关于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中，把“革命的知识分子”列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之外，代表名额仅占总数的5%左右。反映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排斥，在中国共产党员中也不例外。

会议讨论并同意经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决定由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在政治局领导下进行工作，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关于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议着重讨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等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972年夏，中共中央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和王洪文陆续被调到中央工作。吴德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王洪文是上海地区“造反派”的头头，九届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赋予王洪文领导党章修改的重任，说明这时王洪文已是由毛泽东选拔到中央培养的又一个接班人。

从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到大会正式举行，中间只有3个月的时间，准备比较仓促。十大的代表并不是经过充分酝酿，逐级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所谓“民主协商”，由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选举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的。在代表大会之前，也没有举行中共中央全会。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十大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十大也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些都说明十大的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比较草率的。

十大开幕前的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李雪峰也被错误地列入集团主要成员，一并被开除了党籍。同日，党中央召开了选举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委员共104名。周恩来竟然成了王洪文的副手，这明显地表示了毛泽东对党的十大人事安排问题的倾向。

继续坚持“文革”错误的十大政治报告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有三

项：(一) 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 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 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指出"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对全党毕竟是一次十分有益的深刻教育。但是，报告没有深入地、具体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也没有把林彪事件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认为"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是证明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所谓基本路线的正确等，并且再次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些都表明十大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主要论点。

关于今后任务，报告指出："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求全党"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说明对经济建设问题的重视程度比九大有所提升。但是，报告中强调的主要任务，仍是搞好阶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报告把"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列为首要任务。同时强调："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等。

十大党章和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这次提交大会讨论通过的"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报告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再次宣称："还要进行多次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报告再次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除了把九大党章中颂扬林彪，肯定林彪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之类话删掉外，基本上全部沿袭了九大党章的"左"倾错误内容。正如王洪文在报告中承认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新的内容是在总纲中加上了"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新要求，在党员必须做到的五项条件

中，列人“批判修正主义”，使“左”倾色彩继续保持。

“反潮流”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加以肯定或否定，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在于反对的是什么样的潮流。对于反动的逆流，革命者当然应该勇于反对，而对代表客观历史规律的正确潮流，则不仅不能反对，而且应该是这种潮流的带头者和推动者。在当时全党和全国大多数人已经从实践中逐步觉察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求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情况下，毛泽东强调地提出“反潮流”，并作为“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其含义只能是表明，毛泽东要继续坚持“左”的一套，“顶住”大多数人代表的正确的历史潮流。

大会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95 人当选为中央委员，124 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人数多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不是九届中央委员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赵紫阳、李葆华、秦基伟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这并没有从组织上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十届一中全会埋下新的祸根

1973 年 8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共 21 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青云直上，当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阴谋家康生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就大大加强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中央的势力。

中共十大虽然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但从整体上看，仍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十大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并且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越拖越久，破坏性后果越来越严重。尽管毛泽东在十大召开前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要求：“希望这一次十大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但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团结、胜利是不可能相容的。

十届一中全会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更得到加强。这就为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十大后全国的继续动乱埋下了祸根。

第三节　借题发挥的"批林批孔"

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凭借他们膨胀了的权势，加紧进行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王洪文虽已被指定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但他人望很低，能力薄弱，难堪此任。实际上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仍是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就被江青一伙看成是夺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成为他们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把批林同批孔联系起来

中共十大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再一次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和怀疑情绪仍然在增长。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虽然被中断，但已经显示了人民群众对纠正"左"倾错误的广泛支持。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出现"复辟倒退"、出现"修正主义"的错觉和忧虑。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批评外交部编印的第135期《新情况》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说：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他还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实际上，外交方面所有的重大事情都是请示毛泽东决定的。"外交无小事"，遇事认真请示报告，正是外交部门的优点。可是却被指责为不讨论"大事"，并被加以"势必搞修正"的罪名，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种随意性很大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成绩很大的外交部门莫名其妙的不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领导外事部门工作的周恩来的不满。在谈话中，毛泽东谈了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这说明在毛泽东的主观认定上，已开始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

据江青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找她去，给她看了两首自己写的批孔的诗。一首是"五言绝句"：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一首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的"郭老"是指郭沫若，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十批"则是指郭沫若的古代史研究主要著作《十判批书》。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毛泽东对历史学

家的学术著作提出不同意见，而在当时却是为了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封建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是代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对立的一派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还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这些都鲜明地表示了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

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采用的惯伎，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以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为江青一伙再次兴风作浪，攻击周恩来，找到了依据。

10月，江青等在他们直接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他们还指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他们利用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住所之便，在林家找到一些林彪让人摘录的儒家人物的语录，按照政治需要编辑成一份资料，取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他们谎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实际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还不知道要开展“批林批孔”这件事，根本谈不上“迫切需要”这种材料。毛泽东批准了江青、王洪文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这份材料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从此，中共十大要求放在首位的“批林整风”运动，忽然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

批孔，即批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著名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就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毛泽东批孔也是多年一贯的。不过在以往的批判中，他对孔子的积极方面还是给予肯定的。如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对于孔子的学说进行批判当然是可以的，而且至今也仍有不同意见在探讨和商榷。问题是把批孔同批林彪联系起来是否适当。而且当时开展批林批孔的目标，实际上既不是林彪，也不是孔子，而是另有所图。这从当时的文件、社论和大批判文章中，已经是有迹象可察的。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因为“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只有深入批林批孔，“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就是说，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观意图，是为了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扼制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以维护和继续推行“左”倾错误方针。而“四人帮”竭力推行“批林批孔”运动，更是另有图谋。

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根据片面的汇报，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谈了他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并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在当晚召开的会议上，江青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11月21日至12月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错误”。会上，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北京两次动员大会和江青的活动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中共中央同意，突然下令在首都体育馆接连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江青指令她的两个助手，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宣队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在会上以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辑经过和毛泽东的指示为名，发表煽动性演说。他们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插话，一唱一和，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突然袭击。

在这两次大会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她还派亲信给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送材料，鼓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煽动“点火放炮”、“夺权”，妄图把军队搞乱。江青还给国务院文化组、中国科学院、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信、送材料，要求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下去，开花结果”。他们这些活动的目的，显然是要制造一场新的天下大乱，以便趁乱篡权。

江青等人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既不是认真地批判林彪的各种罪行，也谈不上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他们不过是利用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语句，借以影射批判所谓“修正主义逆流”、“复辟资本主义”。

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阴谋已经3年多，林彪的党羽已基本上揭露和清除的情况下，江青一伙竭力叫嚣“反复辟”，其用心就是借批孔影射攻击坚持纠正“左”倾错误的周恩来和在落实政策中得到解放并重新恢复工作的一批老干部，把他们诬蔑为“逸民”，以扫除他们夺权的障碍。所以，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来影射攻击周恩来。

1974年2月，江青亲自出了《孔丘其人》的题目，令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即梁效写稿。这篇文章用画像的手法，从出身到作风、到行为特征，以至“重病在身”，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6月14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御用写作班子开会。她公然声称现在党内仍“有很大的儒”，要重点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肆无忌惮地暗示“大儒”就是周恩来。

军队一直是“四人帮”注视的目标。他们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位，但又深知不掌握军权就难以实现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因而借“批林批孔”，蓄意把军队搞乱，篡夺军权。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可以夺权”；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又召集军队和地方的一些人开会。江青直截了当地说，“就要整一整军队”。她亲自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并派人夺了全军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江青制造一系列古怪事件

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各种古怪的事件。如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在豫西山区一个公社中学中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便在考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声称“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因此而受到批评，这位小姑娘便自杀了，这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当地领导已对这件事作了处理。可是，江青知道这件事后，抓住大做文章。她又是哭闹，又是“控诉”，把这事说成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智育第一”的结果。并将这个事件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煽动青年学生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行批判。她派人到河南调查，施加压力，把该中学校校长和当事的教师逮捕判刑。

“白卷英雄事件”。高考交白卷历来被看成是羞耻之事，但有一人却因交白卷，而被“四人帮”封为“英雄”。此人名叫张铁生，事情发生在辽宁。此人1973年参加高考，化学6分，物理白卷，自知录取无望，便在物理考卷背面写了一封信发泄不满。此事被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得知，认为可以作为一块打人的“石头”，而指示《辽宁日报》把信加工删改后发表。《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加以转载。这样一来，张铁生就成了“反潮流英雄”，不仅被某农学院录取当了大学生，而且入党作官，成了全国人大常委。此人做了许多坏事，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受到应有的惩处。

“小学生日记事件”，发生在首都北京。一个小学的女孩子在日记中写了一点对老师的看法和意见，被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发现，说什么：“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接着又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和报道，把这位小学生吹捧为“反潮流”的英雄。江青一伙利用此事，煽动师生对立，批判教师，破坏学校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对北京乃至全国的教育界发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3位年轻人不赞成对小学生日记的宣传。3人以王亚卓的署名，合写一封信给小学生日记的作者，指出她的“矛头错了”。结果这3个人在“四人帮”派遣的工作组主持下，遭到20多次大小会的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并被遣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

“蜗牛事件”。为了发展我国的电子工业，1973年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向中央报告，准备引进彩电显像管成套设备，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批准。当时江青等人也是同意的。为此有关单位组织了技术考察团赴国外。回国时，一家生产玻壳的美国公司，送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件该公司自己生产的工艺品——玻璃蜗牛。这本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在“批林批孔”中有一好事之徒却写小报告给江青，以有所图。江青正愁缺乏攻击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的材料，立刻抓住此事，作为炮弹。硬说送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是爬行，背上还背了一个壳壳。大骂有关部门是“卖国主义”、“洋奴”，下令要把礼品退回去，还要提抗议。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提议先由我国驻美国联络处查清事实真相和美国的风俗习惯。经调查，按当地风俗，蜗牛是节日礼品，象征幸福、吉祥，并无恶意。这样才把此事平息下来。但经江青这么一闹，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成套设备一事就被取消了。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迫推迟了几年，其他引进工作也受到很大冲击。

“《三上桃峰》事件”。《三上桃峰》是一出新编的晋剧，是山西省派到北京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可是江青一伙捕风捉影地硬把“桃峰”说成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蹲过点的河北省唐山地区的桃园大队，从而强加上“为刘少奇招魂”的罪名。此外，还有批判湘剧《园丁之歌》的事件等。这种对文艺作品随心所欲的政治批判，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百花凋零”的局面更加严重。

“批林批孔”的恶果和当时的某些纠正

“批林批孔”运动，使“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以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他们的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派仗。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一些人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煽动停产停工。一些领导干部或重新被打倒，或自动离开领导岗位，或卷人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使许多单位领导班子重新瘫痪。一些铁路交通部门，也由于派性斗争而造成压货、压船、压港、运输阻塞。“批林批孔”引起的混乱，使工业生产再次下降。据1974年1月至5月统计，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6.2%，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钢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9.4%，化肥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3.7%。由于生产下降，影响到财政收支不平衡。1月至5月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毛泽东虽然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此时他对可能引起新的大动乱的因素也极为关注，并尽量避免，因而对江青等人的这些做法并不完全同意，有的还提出了批评。2月15日，他在叶剑英写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后来还批评他们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

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扭转生产下降的状况，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言论，并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7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并重新安排工作。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通知指出，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但“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经中央查证甄别，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上述各项措施都对克服“四人帮”借“批林批孔”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面批评了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从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可以看出：一是对“批林批孔”运动加以肯定，只是担心江青等人搞的“反走后门”一类新活动，可能使“批林批孔”运动受干扰、被“冲淡”。二是对江青的态度，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作风、方法上的缺点加以批评。劝她批评别人时讲究方式，不要“给人戴大帽子”。“四人帮”一词是毛泽东在这时提出的，但含义是指“小宗派”，与后来当作反革命集团使用的“四人帮”，性质有根本区别。虽然如此，但在当时条件下，毛泽东能批评江青等人，总是会发生有益的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看来，毛泽东主观上是把召开四届人大作为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4年前，毛泽东也曾把召开四届人大作为实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一项重要条件，结果由于林彪集团阴谋夺权而未能实现。拖延了4年，问题并未解决。

召开人大必然要讨论和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安排和调整。“四人帮”意识到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不顾毛泽东的批评，加紧了阴谋活动。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极为不满。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经过预谋，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突然发难。

风庆轮是一艘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1974年奉命出航，把1万多吨大米运送到罗马尼亚，在国庆节前顺利返回上海港。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江青一伙却用来作反面文章。他们说，国产万吨轮早就该远航，没有及早远航，是因为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造成

的种种阻力。他们指责国务院同意进口船只就是“崇洋媚外”。王洪文还下令把交通部派驻在风庆轮上担任领导工作的一名干部扣留在上海，进行批斗，责令交通部严肃处理。其主要借口是这名干部拒绝把进口船只作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加以批判，并对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亲信表示过不满。

“四人帮”坚持要处理“风庆轮事件”，很明显，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因周恩来当时已生病住院未能出席，他们在这次会上就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要邓小平对“风庆轮事件”的处理立即表态。江青气势汹汹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严正地回答：“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我要调查！”张春桥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在“四人帮”围攻下，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政治局会议不能继续开下去，无结果而散。

王洪文长沙告状受挫

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秘密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抵长沙。他向毛泽东汇报时耸人听闻地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并且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还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在这里讲的庐山会议是指林彪阴谋夺权的九届二中全会。他恶毒地把周恩来等的正常工作往来，比作林彪的篡权阴谋活动，企图蒙骗毛泽东。他在汇报中还大肆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其目的是想阻挠邓小平出任副总理，把周恩来撇在一边，由“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王洪文长沙之行没有达到“四人帮”的目的，而且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江青等人仍然不肯罢休。11月，江青多次给毛泽东写信，企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和影响，尽可能多地把同伙安排到重要领导岗位。她提出让王洪文、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并以自己没有工作为名，向毛泽东伸手要官。毛泽东明确地拒绝了江青的要求，在江青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看出了江青的意图。他对替江青转达人事安排意见的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些话说明毛泽东对江青其人是了解的，知道她不堪大任，要她“有自知之明”。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病情加重住进医院，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工作。接到毛泽

东仍要他主持四届人大的指示后，12 月 23 日，周恩来带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 23 日至 27 日间，同他们进行了四次谈话。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他对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毛泽东自 1974 年初开始，对江青一伙进行了多次批评，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且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些说明，当时毛泽东虽已年老病重，但头脑仍是清醒的，仍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党和国家大事，亲属关系在他的决断上并不占重要位置。他的上述一些做法，对于挫败“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六章　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 “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5年1月到1976年10月近两年中，神州大地风云起伏，不仅政坛上出现戏剧性的巨大变化，而且人民群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显示了经过10年动乱之后的中国民心所向。邓小平从重新主政，奋力整顿，到被突然打倒，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又一个大起伏，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与党内健康力量的又一次，也是10年中最大的一次全局性较量。虽然党内健康力量从表面上看暂时失败了，但广大各族人民群众却从整顿与“批邓”的鲜明对比中，进一步提高了识别能力和觉醒程度，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发出了巨大的正义吼声。民心所向，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而毛泽东逝世后，由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的十月胜利，则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行程，为中国重返正确的发展之途，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第一节　邓小平主持工作与全面整顿

邓小平被委以重任

1975年初，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被接连委任以党、政、军的关键性重要领导职务。这种情况不仅在建国后没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首先是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取代了李德生的职务。

接着，在1月8日到1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稍后，在1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被任命为排名在第一位的国务院副总理（关于这两次会议我们将在后面论及）。这些消息的公布和传播，形成一股引起震荡的巨大激流，使广大群众、党员、干部感到振奋，对社会生活稳定寄予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为什么当时邓小平能够复出担任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重任呢？当然同他本人的卓越才能是分不开的，但主要的应该说是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首先，当时的客观形势迫切需要选择一个人来接替生病住院的周恩来的工作。周恩来是既有远见卓识，又踏实细致的难得的杰出政治家，他几乎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一个无可取代的人物。但是无情的自然规律和不治之症，迫使他长时间卧病在床。他在四届人大作报告，是从医院直接去会场，抱病坚持的。这种情况不能长时间持续下去，必须找出人来接替他。其次，毛泽东挑选过几个接班人，但都不行。林彪是写入九大党章的，但已折戟沉沙，葬身异国。九一三事件之后选了王洪文，说他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兼工农兵于一身，又是中国最大工业中心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头头，似乎是理想的人物。但实践证明，他缺才又无德，只会跟在江青后边，搞点小阴谋，不堪重任。毛泽东也考虑过要张春桥接班，但张也难孚众望。第三，毛泽东对邓小平有较全面的了解，虽然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的评价还是好的。认为他在王明路线时是坚持正确路线被整的，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与所谓苏联"修正主义"斗争是坚决的，"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重新任用邓小平是当时毛泽东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当然也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最有利的选择，因此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说明，毛泽东当时虽已重病在身，但头脑是清醒的，而且始终是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的。

周恩来主持十届二中全会

1月8日到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受委托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李德生由于江青一伙诬蔑他"推行林彪路线"、"上了林彪的贼船"，而主动提出免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全会批准了他的请求。（1980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的报告，为李德生平反。）

四届人大重提经济发展蓝图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2864人。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宪法；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新展示了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

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宏伟奋斗目标的重新郑重提出，既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又重新燃起广大群众心中的希望之火。

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这部宪法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设国家主席的规定，但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 22 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12 人为副总理。

在四届人大批准的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中，有许多经受长期考验、富有工作经验、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同志，如国防部部长是叶剑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是余秋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是谷牧、教育部部长是周荣鑫、铁道部部长是万里、财政部部长是张劲夫、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是康世恩等。只有少数几个部为"四人帮"的党羽所控制，如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女）。这样，就为开展全面整顿提供了比较得力的领导工作班子。

四届人大重新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但是，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求"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条件下召开的，会上所作的报告，代表们的讨论以及通过的决议，都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

大会通过的宪法存在严重错误。例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宪法中完全肯定下来；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点，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宪法；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滥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作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并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障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这些错误的条文和规定，给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四届人大虽然存在缺点和错误，但能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讨论通过宪法，较之"无法无天"的大混乱总是一种进步，是向恢复社会主义正常民主秩序的前进。特别是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重申了党的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明确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都给人民群众以鼓舞。同时也是对江青集团的沉重打击，挫败了他们组阁夺权的阴谋。

力挽危局全面整顿

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他勉力于 2 月 1 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各副总理的分工，并于 2 月 2 日就副总理分工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提出请示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工作，并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样，

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四人帮”及其党羽到处干扰破坏，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又有江青一伙捣乱的困难处境，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排除各种干扰，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从整顿铁路入手，打通运输命脉

197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枢纽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的局势，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这些针砭时弊、铿锵有力的讲话，既是对各地方领导人的支持，也是对他们工作的鞭策。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因此决定对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统一。同时要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要及时处理。

全国铁路系统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这个决定。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会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了重点整顿，使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以外，都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多装1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到7800多车，是5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运输指标。

钢铁和其他工业的整顿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前4个月，全国欠产钢铁195万吨，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等大钢厂欠产严重。邓小平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4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要特别注意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批示》指出，在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九号文件发出以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石油工业一直是领先高速度地发展着，近两个月煤炭生产也上去了，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都达到或超过了国家计划指标。钢铁工业虽然也有进步，但上升缓慢，至今还没有改变月月欠产的状况。因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领导状况一改变，马上就见到效果。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生产情况迅速好转，反映了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存在问题还很多，成效只是初步的。

军队整顿的重点是"肿、散、骄、奢、惰"

军队的整顿是全面整顿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队整顿问题，邓小平提出最早。1月25日，在他就任总参谋长后首次召开的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可是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在毛泽东、党中央领导下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

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主题，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即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于7月14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军队的状况，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他说："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他指出："在步骤上，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要好好了解。"他说："我们解决地方问题，包括企业单位的问题，就是首先解决领导班子"。当然，整顿决不只是解决这一个问题。邓小平说："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叶剑英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搞好精简整编和军队的建设，关键是调整和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要调整和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闹不团结的散班子。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的，要坚决调离。"徐向前、聂荣臻也在会上讲话，表示赞成邓、叶的意见。

这次会议及其精神在军队中的贯彻实施，对于解决"文化大革命"给部队建设带来的各种问题，消除林彪的恶劣影响，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电影《创业》引发文艺调整

文艺界不叫整顿叫调整。这次调整是由电影《创业》而引发的。《创业》是以大庆油田的开发为背景，歌颂了石油工人"头顶青天，脚踏荒原"为祖国献石油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和辉煌业绩。1975年春，这部影片准备公演，但遭到江青一伙的猖狂反对。江青说"此片有严重问题"，是"为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她指责创作人员："你们给什么人树碑立传?"下令"停止洗印影片，停止宣传，停止向国外发行"，而且要抓影片的"黑后台"。她还指使亲信给《创业》捏造了所谓"十大罪状"。

电影剧本的创作者不服，上书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批准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后来毛泽东又批评了当时"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批评"的状况。确实，"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状况，连毛泽东也感到难以容忍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恢复出版，批准举行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纪念演出会，对一小批被江青等污蔑为"毒草"的影片解禁放映，还出版了鲁迅著作和其他少数文艺作品。这些举措使文艺界的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但不久就因重新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文艺界陷入更坏的境地。

工业二十条的起草

为了系统地解决工业整顿的问题，国务院指示国家计委起草一份文件。8月18日，国务院讨论了这份文件。在讨论中，邓小平就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

意见。他指出："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他明确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的任务，以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他重视"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还对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方面，谈了指导性的看法。9月2日，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简称"工业二十条"）。

《工业二十条》规定对企业领导班子要坚决整顿，"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因为"这些人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经验，却指手画脚，一味整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一类帽子，压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要"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有些企业"坏人掌权"，"他们利用职权，胡作非为，一方面拉拢、腐蚀一部分人，培植自己的权势，另方面打击、陷害好的革命干部和工人"，"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工业二十条》强调指出："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并且指出："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万年也需要"，"一概反对企业管理，反对规章制度，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工业二十条》还指出："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针对当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的一些误解，还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对群众的生活困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根本要不得的。"

《工业二十条》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试图纠正工业生产中的"左"倾错误，系统整顿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文件。它旗帜鲜明，切中时弊。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但是通过各种范围的讨论，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推动工业恢复和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也先后起草了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这些条例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出。

科技部门的整顿

工业战线的整顿，对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部门不整顿难以适应需要。"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的各种研究机构绝大部分长期处于瘫痪状态。1975年7月，中央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并要求他们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尽快向中央汇报。胡耀邦等根据邓小平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9月26日，胡耀邦等向国务院作了汇报。针对当时在

极左思潮笼罩下存在的把知识分子视为专政对象，大部分科技人员不敢钻研科学技术，否定专业科技队伍的作用等不正常状况，《汇报提纲》澄清了党的科技政策，提出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室、所领导班子的意见。

《汇报提纲》（讨论第一稿）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为此，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还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汇报提纲》还正确解释和处理了一些重要的关系问题，如：“讲自力更生，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邓小平赞赏这个文件，并且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解决科技人员生活中的困难，给他们创造搞好科研工作的条件。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再在科学院的领导班子里。邓小平还强调，要使科技事业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邓小平对科技、教育问题的谈话和《汇报提纲》当时也未能正式下发，但通过各种渠道传出后，使深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论总纲》的起草

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1975 年 6 月由邓小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一文，于 10 月中旬写成初稿。

《论总纲》指出：“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法西斯专政”，要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论总纲》着重论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有些人“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论总纲》还强调“不仅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活，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这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当时的“左”倾禁锢，表达了正确观点，言辞锋利的文章，由于突如其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被迫中断写作，既没有定稿，更没有发表。只是后来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时，人们才看到它，并感到文章的某些论述切中要害，痛快淋漓。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1975年秋，还召开了一次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会议，就是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共开了1个月零5天。参加会议的共有3700多人。会议9月15日先在大寨大队所在地山西省昔阳县开始，后在10月19日于北京结束。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以及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问题。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着重指出搞好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农业搞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并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正确主张。他还提出了各方面工作整顿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国务院副总理、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致开幕词。他说：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样就把原来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了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他还把"大寨的道路"说成是全国农民的方向。江青也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借评《水浒》为名攻击邓小平，咒骂中央负责人"架空毛主席"的毫无根据又"文不对题"的讲话。她还在邓小平讲话时多次插话，表示不同意见。会上各唱各的调，明显地表现了政治上的分歧。

华国锋作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主持这次会议，并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他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报告中要求到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省、地委在一年内把县委领导班子整顿好，省地县要派大批干部下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社队的整顿。报告中还规定了建成"大寨县"的6条标准和其他方面的具体要求。

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华国锋的总结报告。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及大寨县》。社论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我们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识大寨的经验"。

此后，各地区抽调上百万干部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由于所谓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左"的，错误的，采取的方法又是不适当的大搞群众运动，大轰大嗡，一刀切。没有区别地要求一律尽快建成大寨县，按照大寨的一套去做。结果是，使得很多地区出现了在生产上脱离当地实际，片面追求粮食产量，挤掉副业和其他生产事业；在分配上抛弃按劳分配，采用大拉平的"政治工分"；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强力封闭农村集市贸易；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等问题，使农业经济进一步受到破坏。

会议提出5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多年前的一个设想，而根本不考虑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和农业机械工业的水平和产量，因而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因而这次会议的决议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的强力推行，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造成的广泛影响（包括某些积极的成果和广泛的消极影响），却在相当长时间内留存在中国广大农村之中。

整顿的初步成果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坚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同志的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对“四人帮”的批评，也由于人心思治，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受到抑制，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75年达到4504亿元，比1974年增加了480亿元，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粮食5690亿斤，比上年增长3.3%；钢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1%；原煤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8.8%；铁路货运量8.9亿吨，比上年增长12.9%。基本建设投资完成情况较好，施工大中项目有153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167个，部分投产的310个，新增固定资产250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9.2%。进出口贸易额达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财政收入815.6亿元，财政支出820.9亿元，财政赤字只有5.3亿元。这一年尽管还存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过高（33.9%），财政有赤字，职工人员增加过快等问题，但从总体看，国民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倒退的局面，又开始了新的恢复和发展，应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人民群众是看实践的，实践效果的威力胜过漂亮的空话何止百倍。

第二节　整顿中的较量和曲折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8年，而且仍在继续进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实施的，因而其本身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地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以三项指示为纲”中。“三项指示”即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和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三项指示确实都是毛泽东的。但就他的本意来说，只能有一个纲，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因为他认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公开提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的。不仅不可能公开反对而且还要在肯定这个“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

提下，进行全面整顿工作，并逐步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那么惟一可能的办法，就是既不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提升经济建设工作的地位。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它既肯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纲，而且是位列第一的纲，同时，又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到了纲的地位，给予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但是，矛盾或互相对立的趋向也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潜伏于其中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纲，两者是不可能长期并行不悖的。这样，在整个整顿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形式的较量，出现曲曲折折的斗争。在 1975 年开头 10 个月的主要较量有以下几件事：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下达

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并对进行的整顿工作表示支持。但他并不是要由此而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就使整顿工作受到很大的局限，遭到种种特殊的困难。

毛泽东不仅在总体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不允许任何人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而且不断思考，从理论上加以深化，沿着他自己的“左”的思路“不断革命”。还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前的 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就对中国的现状作出一种新的判断。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 月 26 日，他同周恩来等在长沙围绕四届人大问题谈话时，又谈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这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反映出他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客观事物不能正确理解，同他头脑中的某些带有空想因素的“左”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冲突。因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中某些必不可少的、有益的东西，错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对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怀着深重的忧虑。

毛泽东在谈话中，显然把按劳分配原则中包含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这是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的误解。

毛泽东还把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一部分从事投机活动的俄国小生产者的论断，扩大化和绝对化，并用来从总体上观察70年代我国在公有制条件下平等地从事劳动，原则上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领取报酬的社会主义农民。把已经集体化20年的农民仍等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体小生产者，这显然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的误解和教条化。

谈话中还把具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工人和干部，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势力，这显然是混淆了不同问题的性质。这也都表明毛泽东已经相当远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背离了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和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社论要求“各级党委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抓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要继续批判孔孟之道，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

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到全国，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春桥、姚文元奉命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简称“三十三条”）。他们断章取义地摘编的这些语录，是为了使毛泽东的“左”倾论点显得更加有理论依据，从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辩护。这种学习，实际上等于为邓小平主政后从事的各项工作，划上不准逾越的大框框，不准越雷池一步。同时也使参加学习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陷于更严重的迷误中而难于解脱。

在农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奇想

由于大肆宣传和组织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引发了某些人的奇思异想。1975年5月22日，人民解放军某军政治部一名干事给毛泽东写信。他认为，国家是按同一价格收购粮谷的，农村社队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产粮的多少。因此，自然条件好，劳动生产率高的社队，产粮多，收入高。自然条件差，劳动生产率低的社队，产粮少，收入低。他说，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它是造成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实行按自然条件好差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情况，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

这种显然既违反价值规律又脱离实际的认识和建议，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由于提出了“均贫富”的问题，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把它看作是在农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可行的设想。他于5月23日在这封信上批示：“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再说。”国务院当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并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26名干部，组成3个调查组，到山西、河北各选3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调查组于8月间陆续写出调查报告，对能否根据自然条件好

坏和劳动生产率高低，采取不同的粮食收购价格的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调查报告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第一，穷队与富队互相交叉，在有些生产大队里，有穷队，也有富队。丰年与歉年，穷富队都有变化。如果穷富队分别订价，同一地区，同一大队，势必出现几种价格，甚至要年年调价，这容易引起混乱。第二，富队之所以富，除了自然条件外，主要是自己的劳动。对富队收购价格低，对穷队收购价格高，富队可能不高兴，当穷队生产有了发展，由穷变富以后，取消高价收购，他们也会不高兴。第三，大多数穷队余粮甚少，甚至还要吃返销粮，提高给穷队的购粮价格，对他们帮助不大。调查报告所作的分析表明，企图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平均主义办法，以求达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目的，是根本行不通的。好在毛泽东没有坚持已见，使这一建议得以搁置。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奖懒罚勤，如果实行，必然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

又一次想搞“穷过渡”

陈永贵看准毛泽东兴趣所在，于 1975 年 8 月 14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竭力主张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向大队核算过渡，以解决农村的贫富不均问题。他说：昔阳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全县四百一十个大队就都实行了大队核算”，“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是势在必行”。毛泽东于 9 月 3 日把《建议》转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并加了批语：“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批语很委婉，而批转这个文件本身，实际上就表示了对《建议》的赞赏。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于 1975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大体上与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平行召开。会议由纪登奎、吴德主持，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 17 人参加。会议集中讨论了陈永贵关于短期内将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问题。

座谈会一开始就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与会者表示赞成陈永贵的意见，主张“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过渡”。对于这种急于过渡的“左”倾主张，广东省委负责人赵紫阳等在多次发言中，表示了反对的态度。赵紫阳说：“我看现在最好不要一下就大量地改变核算单位，这样容易引起波动，也巩固不下来。”他指出：“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过渡，这个提法值得考虑。”“说是分期分批过渡，有的不甘心落后，怕说右倾，就会一哄而起，实际上没法分期分批。如果真的分期分批搞上几年，搞这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就会等待、观望、动荡。有的人就会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了，拖拉机也不买了，积累也不搞了，分光吃光。”他说：“我主张搞试点，宁可把准备时间拖长一点。”浙江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主席讲过至少三十年不变，已深入人心。如果风一吹下去，搞得不好，对群众有影响。”

在座谈会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1975 年 10 月 8 日，会议写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意见》（送审稿）上报毛泽东。关于所有制问题，《讨论意见》仍然提出：“从现在起，可以考虑大体上在今后五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内，基本上

过渡到大队核算，以便和一九八〇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至于完成过渡的实施方案，《讨论意见》不得不把分歧的意见都列出来：一种是从现在起就分期分批完成；另一种是"用三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集中做好准备，使条件更加成熟，并认真总结已有大队核算单位的经验，然后在一两年内分期分批完成"。后一种意见，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所能采取的对"左"倾错误进行迂回抵制的一种拖延办法。毛泽东考虑了不同意见，没有批发这个文件。后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仍然有一些地方搞向大队核算过渡，但没有形成一次全国性的浪潮，使我国农村避免了又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

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许多带强制性的办法，以追求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一个样，知识分子同工农划等号，在分配上缩小差别，"穷过渡"，等等，都带有中国农民长期追求"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理想的遗痕。把在手工业和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平均主义"理想"，误认作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实践证明，这种主张是极端有害的。

"四人帮"鼓吹反经验主义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旗号，抓着各种题目，贩卖他们的私货。1975 年 3 月 1 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借谈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抓住毛泽东 1959 年的一段批示，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张春桥念了毛泽东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的批语中的一段："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说："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他说："林彪搞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同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 3 期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以批判林彪为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人际关系进行了歪曲的描述。他把马克思表达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时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平等的，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只因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劳动条件不同而造成收入有多少的不同。但这种差别，只是生活水平富裕程度的差别，而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以致形成新的阶级的差别。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肆意歪曲。其目的在于把级别高低、工资多少，当作划分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标准，为他们鼓动"抓走资派"、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依据。姚文元的文章也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4 月 1 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把革命导师早已反复阐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丰富内容统统加以抹杀，而歪曲为就是单一的、不区分具体情况的"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样一项任务。他完全不顾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已近 20 年的客观实际，硬说："我们的经济基础

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他根本不承认我国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说什么“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还说什么“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他还诬蔑当时的一些“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刮“资产”风，叫嚷要“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与此同时，江青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叫嚷“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全国各地许多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鼓动“打土围子”。

实际上当时生活上最腐烂奢侈的正是“四人帮”一伙。江青一人就占用40多间房子，一切都要专用精选。吃的武昌鱼要新鲜的，不能掉一片鳞，鸡蛋要当天下的，大米要一粒粒挑。姚文元一家住有125间房的一个大院，高围墙上加铁丝网，是地道的“土围子”。王洪文在上海和北京有多处住房，8部汽车，到处吃喝，动辄挥霍几万元。有一次到崇明岛，要吃猪舌头，就一下子杀掉10头猪。张春桥到南京一定要住国家元首住的房子。为进口录像设备，一次就花费5万美元。所以，真正刮“资产风”的正是他们自己。写文章摆出一副正人君子、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面孔，不过是为了更便于陷人于罪，以达到他们的罪恶的政治目的。

“四人帮”提出反“经验主义”，是把维护党的基本原则和革命历史传统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四人帮”提出“全面专政论”，目的是把刚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脱，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把一切反对“左”倾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全面地对他们实行专政。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

4月14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向毛泽东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赞同。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在谈到反“经验主义”问题时，他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按：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是从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开始），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我放过了。”表示给张春桥道歉。他对江青等人强调反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作了批评：“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毛泽东再次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江青等作自我批评。但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反刘少奇、反林彪“有功

劳”，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因此他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

限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又是在肯定江青等人“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劳”的前提下，这种批评只能是浅层次的、十分有限的。但批评与不批评总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毛泽东亲自出面的批评效果更大一些。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使“四人帮”的篡权活动稍有收敛。这在一段时间内对整顿工作的开展是有利的。

从评《水浒》中生发出政治题目

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难以遏制的，总是在寻找机会，以求一逞。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教师谈话中，讲到自己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种对《水浒》的评价，与通常对《水浒》基本肯定，认为是赞颂农民起义的评价不同。尖锐地指出了书中宣扬的接受招安、维护封建皇帝的另一方面，应该说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把整部书说成是“反面教材”，说宋江“搞修正主义”，显然是不客观、不科学的。

姚文元于当天闻讯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议把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和上海的“大批判”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看了姚文元的信后批：“同意”。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和姚文元的信。

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短评说：“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所以评《水浒》“有着重大的意义”。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说这次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对于“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接着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又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运动。把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演化

成“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也是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会发生的十分曲折而奇特的怪事。

江青等人借评《水浒》又生发出另一个题目。8月下旬，江青召集自己的党羽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2日，江青借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机，在山西省大寨大队的群众大会上大讲《水浒》问题。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样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她强调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篡夺了领导权”。她造谣说：“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吧！你看宋江怎么样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17日，江青在大寨召集文艺界、新闻界100多人谈话时又说：“《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江青反复讲“架空晁盖”，显然是诬陷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她把四届人大后安排一些老干部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诬蔑为“收罗土豪劣绅占据重要岗位”。江青还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泽东得知后很气愤，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受到打击。但是，“四人帮”并不甘心。由于他们处心积虑的策划和多方面向毛泽东进言，不久之后，终于给他们抓到了再一次打倒邓小平的机会。

第三节　突如其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对此，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满意的、抱有很大希望的。但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既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对立的矛盾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这场运动开始时，既没有召开正式会议讨论，也没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是从北京市委书记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开始的，而后扩及全国。以这样方式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不能不使广大群众感到突如其来。

事情是怎样演化过来的呢？

毛泽东听信挑拨性汇报

毛泽东自经历九一三事件的沉重打击，患了重病以后，身体一直不好，病情时轻时重。但是，无论在他患病期间或休养期间，他仍然负担着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根据他的意见，由他的侄儿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之子。他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以后又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同江青等人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个联络员的设立，使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更难于直接见到毛泽东。处于这种不仅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且严重脱离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的状况，使毛泽东更加依靠毛远新等人的汇报，而很难准确地了解全面情况。正是利用了毛泽东处境的这一弱点，“四人帮”、毛远新等多次作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逐渐影响毛泽东对事物的判断，从而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偌大中国万般繁杂的事务，最终要由一个重病在身几乎与世隔绝的老人作出裁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在这时最直接、最尖锐地表现出来。

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他表示：“担心中央，怕出反复”。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又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当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的信给毛远新看时，他当即为迟群辩护，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

毛远新的这些挑拨性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就是说，这时毛泽东已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重新估价和衡量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他是不能容忍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同邓小平“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毛泽东起初并不是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还在不同场合几次说过保护邓小平的话。从各种迹象看，他只是想通过批评，让邓小平认识“错误”，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

度。他还提出要邓小平主持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邓小平以自己长期被隔离于运动之外，是“桃花源中人”不适合主持做决议为辞加以拒绝。此事对毛泽东触动甚大。

“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清华大学发端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会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的主要内容。

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内容是反映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平时工作中专横跋扈，争权夺利，特别是迟群在党的十大上没有当选中央委员，四届人大后又没有当上部长，有严重不满情绪，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成恶劣影响等，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调查解决。信件是由邓小平转交的。一个共产党员通过正当的组织手续，向党中央主席反映他们单位负责人的问题，这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原则的，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而毛泽东却提出这两封信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谢静宜，矛头是对着他（毛泽东）本人的；邓小平转了刘冰等的信，就被认为是偏袒和支持刘冰。这样一些断语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开始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先是在党委扩大会的范围内批判刘冰等人，然后，有组织地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捕风捉影，上挂下连。积极进行整顿工作的铁道部部长万里、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无一幸免，最后上挂到邓小平。并通过参观、传送大字报、印发材料等形式，逐渐向其他大专院校及全国各地扩散。

11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干部，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这个文件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四人帮”以清华大学为基点掀起的浪潮，虽然有相当的影响，但总是非正式的。而中共中央打招呼会的召开，表明了中央的支持和肯定，这样就使“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邓小平。

周恩来逝世与新的人事安排

正当中国大地上空又一次乌云翻滚的时候，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声

中，人民寄予巨大希望与重托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1976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周恩来逝世。周恩来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对发展统一战线，巩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对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党和国家进行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1月8日，中央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隆重追悼周恩来同志"的通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共1万多人，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5000多人参加的周恩来追悼大会，由邓小平致悼词。这一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邓小平说："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逝世后，谁来当国务院总理，成为当时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按副总理的排列顺序，第一名是邓小平，但他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处于被打倒之势，没有升任总理的可能。接下来是排名第二的张春桥，他自认为是非己莫属了，他在上海的党羽也迫不及待地在街头贴出"强烈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但是，毛泽东却另有考虑，他选择了排位第六的副总理华国锋任代总理。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华国锋原在湖南省委工作，1971年调任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197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是十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在当时"批邓"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命担任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

关于为什么选择华国锋而不是张春桥任国务院代总理？至今没有看到有关毛泽东如何考虑权衡的第一手资料。一位外国传记作家曾作过这样的分析："妄图操纵患病的毛泽东的'四人帮'，当然不是想为华国锋这位人们不大熟悉的外地政治家掌权铺平道路。但是，他们疯狂地反对邓小平无疑有利于华国锋的晋升……华国锋的有利条件正是在于他不参加任何一派，而是长期无限忠于毛主席。"所以，"他是务实派和激进派都能接受的人"。虽然"务实派"、"激进派"之说并不科学，但这位外国人的分析不能不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个通知另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把叶剑英"生病"情况通知全党，而当时叶剑英身体健康，并无不适。显然，这是用一种变相的办法，把叶帅"挂"起来，使他不能掌握军权。这是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组织措施。

毛泽东讲话的传达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深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一开始就遇到广泛的、不同形式的抵制。

为了“帮助各省领导思想上转好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自2月上旬至3月上旬，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继续打招呼”。会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

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一再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认为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说：这些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他强调：“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明确表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但又说：“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这些谈话，无论从理论方面或实际方面，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既然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就显然是犯了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而又说成只是三分错误，这也是说不通的。

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打招呼会上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和华国锋2月25日的讲话。此后，批判邓小平运动在全国报刊上闹哄哄地铺开了。

“批邓”运动的开展与恶果

“四人帮”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最卖力气的鼓吹者和急先锋。他们趁机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首先集中攻击邓小平。

江青于1月7日在政治局发难，诬陷邓小平“在全国搞右倾翻案，复辟倒退，并且号召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拼老命也要干”。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继续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于3月2日擅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是“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江青说：“邓小平……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

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这些本来是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的正确措施，可是到江青那里就成了“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她还荒谬地主张把大庆进口的美国设备拆掉，理由是“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我说要拆掉”。江青在谈话中还不忘表露自己的政治抱负。她说：吕后和武则天是“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等等。与此同时，张春桥也多次诬蔑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在此期间，他们指使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对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进行全面攻击、诬蔑和否定。这方面由迟群直接指挥的“梁效”（即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他们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批”和“层层揪走资派”的阴谋，先是抛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反动文章，从教育界打开缺口。接着又抛出《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等反动文章。1976年2月，又发表《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等反动文章，直接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仅“梁效”一个御用写作班子，从1975年9月到1976年10月，就炮制了60多篇反动文章。其中39篇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有的还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广播。他们还私自编印《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言论与马列毛主席教导对照》、《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言论对照》等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散播。“梁效”和其他御用写作班子的活动，为“四人帮”大搞“批邓”尽了犬马之劳。在他们笔下，各方面工作的整顿是“右倾翻案风”，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措施说成是“唯生产力论”，号召进行批判，并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这些写作班子确实不愧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能手。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四人帮”在大搞文章舆论的攻击诬蔑之时，也对很多老同志批斗围攻，极尽人身迫害之能事。他们编造了一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唐公式。张春桥说：“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把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诬蔑为“还乡团”，煽动层层揪“代理人”、“复辟派”。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就是“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的一个典型事例。1976年2月，迟群按照张春桥的指使，伙同“四人帮”安插在教育部的党羽，成立“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完全剥夺了周荣鑫教育部部长的职权。接着在周荣鑫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强迫周每天到教育部接受批斗。4月12日，周荣鑫昏倒在批斗会上，又被无理拖延没有及时送往医院。迟迟送到医院后，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正确的治疗，以致当夜含恨去世。胡耀邦、万里等也受到多次批斗和迫害。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了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

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采取的措施被肆意批判，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受到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用。一些地区的派性和武斗重新泛滥。许多地区停工停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1976 年 1—5 月份，钢欠产 123 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影响市场少供应商品 14 亿元，影响财政减收 20 亿元，使年初全国计划会议上确定的 1976 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7 月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建议下调原定的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如钢产量从 2600 万吨下调到 240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比原计划减少 20 亿元等。但调整后的计划实际上也未能完成。1976 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 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的 7—7.5%的速度。钢产量只完成 2046 万吨，只达到计划数的 79%，低于 1971 年的水平。铁路货运量 8.4 亿吨，只完成计划数的 93%。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 58.9%，比上年下降 5%。全部建成的大中型项目 85 个，比上年少 82 个，是建国后投资效益最差的年份之一。这里当然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唐山大地震，但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干扰破坏，毫无疑问是造成如此经济形势的主要原因。

第四节　悼念周恩来　天安门事件爆发

11966—1976 年，十年的风风雨雨，把“文化大革命”的神圣光环消散殆尽，美好的空洞理想代替不了凄苦的生活现实，种种“伟大”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人们的衷心激情。绝大多数人已经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而不再对它抱任何幻想。相反地，种种积怨、不满和愤慨却已越积越多。人民愤怒的爆发，只是时间和条件的问题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积聚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通过天安门事件迸发出来了。导火线是“四人帮”压制和反对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与人民为敌，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除了禁止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之外，还特别控制舆论媒介，不准报道群众的哀悼之情。1 月 9 日，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新华社就向姚文元请示，怎样组织亿万人民悼念周恩来的宣传报道、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姚文元的回答是：“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应，仍应再请示”。在他的禁令下，从 9 日到 15 日追悼大会前的 6 天中，总共发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代表向周恩来遗

体告别的两条消息。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沉痛悼念的感人情景，在新闻报刊上竟没有丝毫反映。特别是11日首都百万人民扶老携幼，洒泪数十里长街，为周恩来灵车送行，新华社记者含泪写成长篇报道，竟被姚文元一刀砍掉，不准发表。江苏省《工农兵评论》编辑组写了一篇《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四人帮”竟下令把它列为“反动文章”，要追查背景。这些卑劣的行径只能激起人们无比的愤恨。

1月14日，正是周恩来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却在头版头条上刊出一条题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专题报道，强奸民意地硬说全国人民当时最关心的是清华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辩论。胡说什么：“革命大辩论，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各项工作，看作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实际行动。群众的革命热情，造成了各项工作热气腾腾的局面。”如此等等。结果引起信电纷至的强烈抗议。甚至有人写信把“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的那个总编辑称为“戈培尔”（指德国法西斯的以造谣为能事的宣传部长）。

2月13日，“四人帮”写作班子发表《孔丘之忧》一文，大批“忧”字。说什么“以后的孔孟之徒……同孔丘一样，他们的‘忧国忧民’，完全是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妄图使人们对新生事物发生怀疑，对革命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丧失信心。”文章以挖苦的腔调说：“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这些人把悼念周恩来的广大群众讥讽为“哭丧妇”。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纪念雷锋的一篇新闻稿时，竟把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删去。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句子，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文汇报》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是“四人帮”的重要舆论工具。这两篇文章刊登后，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在数日之内，《文汇报》就收到抗议电话1000多次，抗议信和电报420多封。可是，张春桥等人却公开对《文汇报》表示慰问，给予嘉奖。消息传出，更加激怒了群众。

从雨花台到天安门的群众抗争

邻近上海的南京市学生和群众首先行动。3月20日和28日，南京市许多学生、工人和居民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和集会，贴出“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并将标语刷在开往北京和上海等地列车上。3月底至4月初，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福州等城市的广大群众，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很多诗词带有强烈的感情和政治内容，抒发了广大群众想言又不敢明言的内心思想。如：

神州欲变，风雨已迷天，
昏星暗月，红日当空已难显。
……
妲己想统赤县，
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又如：

红心已结胜利果，
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
自有擒妖打鬼人。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大量的声讨檄文、战斗诗词的展示，激起人们发自内心的强烈共鸣，争相传抄，迅速流传。"四人帮"对此十分恐惧，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压制。4月2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电话通知，对南京群众的正义行动加以错误的指责。认为："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各地领导机关，"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同时，北京市各单位普遍传达姚文元关于"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不让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所谓指示。但是，已经燃烧起来的群众烈火决不是那么容易被扑灭掉的。

早已忍无可忍的群众怒不可遏。有的诗词针锋相对地问道：

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
莫道《文汇》亮鬼火，自有人民写春秋。
寄言魑魅慢猖狂，勿学林贼把命丧。

4月4日（丙辰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的重重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到200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以及党提出

的实现“四化”等正确主张的指引下发生的。这个运动的表现形式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实际上显示了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反对和对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支持。

对四五运动的错误镇压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态。华国锋等听信“四人帮”亲信所编写汇报的材料，错误地支持了“四人帮”对广大群众的诬蔑。华国锋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七四年至七五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会议决定“采取一些必要措施”，“防止挑起更大事端”。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再去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准备”。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和决定写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都被撤走了，诗词、挽联、条幅都不见了，一些自愿彻夜守卫花圈的群众被逮捕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已布上3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自清晨即涌向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对此异常气愤。因为传闻被搜走的花圈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上午9时至10时许，数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正义要求，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怒不可遏的群众同一部分在天安门广场执勤的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公安部门出动的“广播宣传车”和几辆汽车在混乱中受到损坏。下午，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着火，群众和民兵、警察都有受伤的。

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些带暴力性质的事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常生活中不应该发生的。它之所以出现，一方面表示了广大群众的极端愤怒，难以容忍又无可表达，只得采取以暴力对暴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堵塞了一切言论渠道，使广大群众没有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意志的结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压制的结果总要爆发，这也是物极必反的一般规律。不过在当时，这些行为也为“四人帮”实行镇压提供了口实。江青、张春桥等当天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商讨对策。

晚上6时30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奉命出面发表广播讲话，他宣称“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他命令“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这个讲话在天安门广场反复播送，许多群众闻讯逐渐走散。9时30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照明设备一齐开放，1万民兵、3000警察奉命跑步进入广场。他们带着木棍包围坚持留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并加以殴打和逮捕（先后共逮捕388人）。还有2万多民

兵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在附近作为预备队待命。

4月6日凌晨，部分政治局委员听取中共北京市委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指示公安部门要“揪出司令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会议估计群众还会有所行动，所以又组织了3万民兵集中在天安门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但是，这一天是平静的。在森严的戒备下，群众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的活动。

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4月5日晚吴德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经姚文元组织炮制的所谓“现场报道”，诬陷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因为它“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这些当时最大的罪名被扣上，真该“十恶不赦”了。毛泽东听信这些汇报，表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变了。要求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登报，公开发表。他还提出以天安门事件为根据，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待以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已经准备好的两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决议。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两个决议在政治局通过后，急如星火地于1小时后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立即召开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宣读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并由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各地奉命行事，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向中央打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两个决议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各主要城市都组织了拥护中央决议，声讨邓小平的游行集会。一时之间，全国大小报刊上塞满了这类表态性的东西。同时，按照规定追查所谓“政治谣言”，逮捕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许多人被拘捕或判刑。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决议和强制组织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既不能改变事件本身的客观性质，也完全不可能改变群众的思想认识，只是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爱国爱党的感情和意志，进一步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挫伤。

天安门事件的应有评价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恩格斯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已经持续近10年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沉重灾难，激起广大群众越来越大的憎恶，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人们曾经把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方针的强烈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发了人民长期积压在心中的强烈怒火，于是在天安门事件中以民族传统的悼念形式而自发地、不可遏止地形成总爆发。

天安门事件不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关的纯粹自发的群众运动。虽然从整体上看，这场革命群众运动是没有任何一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的，但是许多党的基层组织直接、间接地组织和支持本单位职工参加斗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投入了斗争，并且成为斗争中的中坚。从这场革命群众运动表现出来的斗争目标看，是要求实现党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反对"四人帮"祸国殃民。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四届人大重申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率领全国人民所努力争取的。广大群众是要求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所制定的奋斗纲领。在天安门事件中，党的作用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形式实现的。这次抗议鲜明地表示了全国人心的向背。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第五节 毛泽东逝世 粉碎"四人帮"

更为猖狂的"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的被错误定性，广大党员和群众遭到残酷镇压，给"四人帮"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他们胜利了。4月7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镇压群众的"有功之臣"时，就高叫为"我们胜利了"干杯。于是，"得志更猖狂"，在"批邓"的旗号下，进一步开展野心勃勃的篡权活动。他们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形形色色的所谓"批邓"文章。

1976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号召"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这篇社论竟从天安门事件中，论证出这一事件"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论说："像邓小平这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阶级斗争的发展，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

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如此等等。

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文章《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进一步论证这种荒唐的论点。姚文元在修改这篇文章时，还惟恐说得不够明白，特意加上了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字样。他们反复鼓吹“党内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既违背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又完全违背实际情况的谬误概念，其目的不仅是要整倒邓小平，而且是要整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这期间，“四人帮”的亲信们一再扬言“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等，其险恶居心昭然若揭。

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1976年，不仅政治形势险恶，而且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来。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朱德逝世。朱德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侮辱，幸而受到毛泽东的保护。他的逝世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国各族人民深为悲痛和怀念。

时隔22天，7月28日，在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震中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百万人口的中等工业城市唐山变为一片废墟。死伤惨重，共计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如此强烈的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如此重大伤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罕见，而且在全世界也是20世纪最大的一次。它自然引起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关注。发生地震的当天，中共中央即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随后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省、市、自治区、中央有关部门，从四面八方火速组成抢险队、医疗队、建筑队等赶赴灾区抢救，大批救灾物资迅速运到受灾地区。灾区人民英勇奋斗，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在全国人民为唐山地震焦虑并积极支援救灾斗争的时刻，“四人帮”却完全是另一样的感情。他们不仅完全不关心人民的死伤疾苦，反而对救死扶伤的抗震救灾工作无理攻击。胡说什么“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抓抗震救灾工作是“以救灾压批邓”。江青甚至无理攻击中央和河北省、唐山市的负责同志领导抗震救灾是“走资派惊慌失措”。在他们的鼓噪下，拒绝了一切主动愿意提供的国外援助。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姚文元的讲话写成的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社论说：“党的机会主义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此时，邓小平已被撤职。“党的机会主义头子”，显然是指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

在此期间，江青等擅自印发《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等3个由邓小平指导起草

但并未发表的文件，并诬蔑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胡说什么《论总纲旷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翻案复辟的罪证”。《工业二十条》“是一个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汇报提纲》“是在科技战线上推行‘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如此等等，横加罪名，在全国发动批判。“四人帮”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已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恶痛绝。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遭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抵制，有的群众公开说，按这 3 个文件办，我们国家就好了。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篡权

在人民寄予巨大希望的整顿被突然打断，“批邓”遭到普遍强烈抵制难以进行，社会动乱又起，而周恩来、朱德等国家栋梁又相继离去，全国出现深刻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9 月 9 日，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

9 月 9 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同日，宣告成立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为首的“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并发出公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 7 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 10 天。9 月 18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隆重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表示要“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逝世，使已经存在的深刻政治危机更加严重化和急迫化。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深为忧虑，这种忧虑是有事实根据的。“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早就积极策划夺取军权。这一图谋失败后，又策划建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妄图把民兵变为他们掌握的“第二武装”。这个阴谋又未能得逞，就千方百计地扩大和武装已经由他们控制的地方民兵。

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的 8 月下旬，“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就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共发枪 7.4 万多枝、炮 300 门、枪炮弹药 1000 多万发。他们还密谋策划、炮制了一个以“反击”为代号的所谓“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命令每天有 1 万名民兵、200 辆汽车值班待命，并组织民兵“夜间拉练”，实际上为反革命暴乱作预演。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他们又在 20 小时内突击下发子弹 600 多万发，炮弹 1.5 万发。进行所谓“战备演习”。上海的几个头头还到民兵

指挥部突击检查，部署应急力量，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具体准备。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他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设立的值班室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

“四人帮”还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有的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挑起这副重担”，为江青上台造舆论。江青等还积极为自己上台作准备。江青叫天津市为她特制了一身礼服，王洪文也拍好了准备让全国悬挂的标准像，还下令文艺界拍摄“盛大的节日”等影片。

“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夺取中央党政领导权力的基地，他们暗地对上海的亲信作了许多布置。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了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他嘱咐来人“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3日，王洪文在同上海的亲信通电话时说：“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9月28日，张春桥派人送口信给中共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示意“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万民欢庆的十月胜利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陈云、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十分焦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向叶剑英表达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期望。9月下旬，徐向前、聂荣臻派人转告叶剑英，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也多次交换意见，研究消除“四人帮”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的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代表他去找叶剑英。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寓所同他商谈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后，叶剑英同华国锋又当面认真磋商，形成了正确的决策。一场不可避免的严重斗争已经来临。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中发表。社论说：“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们下令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在报刊上占据主要版面，连篇累牍，反复宣传。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的忠实继承人，以党内“正统”自居，抬高自己，打击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

国庆节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露骨。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她要大家警惕“还会有人要为他（指邓小平）翻案”。并说：“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10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市平

谷县讲话时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月4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在《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些事实：1976年4月30日晚，华国锋在陪同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受到毛泽东接见之后，又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形势等问题。毛泽东当即亲笔为华国锋写了三句话，一是“慢慢来，不要招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前两句话，江青等人都是在场的。但是，江青等人却把“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作为毛泽东的“嘱咐”大作文章，这就使华国锋不能不出面纠正。10月2日，华国锋在外交部长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张春桥却在这个文件上批：“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圈阅后，划了一根线表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四人帮”一方面极力阻挠下达华国锋的批示，以防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骗局被揭穿；另一方面，又指使自己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炮制和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大文章，而且调子很高，说谁不遵照这个所谓“嘱咐”，谁就是“修正主义头子”。这自然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这篇文章暗指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头子”，并叫嚣“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因此，很自然地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表明“四人帮”实行全面夺权已经迫在眉睫了。事后，在张春桥亲笔写的一个提纲中发现这样的话：“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证明“四人帮”确实要下毒手了。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采取了断然措施。确定以召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出版问题的名义，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理。华国锋亲自主持，叶剑英坐镇指挥，有关具体事宜由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负责人汪东兴负责。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后，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住所宣布执行这一决定。对“四人帮”在北京的死党，也同时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不到一个半小时，不费一枪一弹，千夫所指的江青集团就被粉碎了。同时，还派人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等被“四人帮”掌握的新闻舆论机构。当晚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于7日晨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探知江青等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他们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调集和部署民兵3.35万名，动用各种枪

炮2.7万余件，调集车辆225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部署了叛乱的具体步骤，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他们还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并配合发表“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制造舆论。规定的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妄图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

中共中央对上海问题早有预料，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先后将“四人帮”在上海的首要分子召到北京，并调派一批领导干部到上海控制局势。人民解放军做好了应付事变的准备。“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遭到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大众举杯相庆，很多地方酒类销售一空，全国一片欢腾。上海人民声讨“四人帮”的怒涛席卷全市，江青集团妄图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顷刻瓦解。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与人民为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毛泽东始终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并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揭露，减轻了党在这场尖锐斗争中的困难。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汪东兴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护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附 录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5—12月）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共76人。会议通过的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后为区别于其他中共中央通知，称《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解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问题，成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即《五一八讲话》），成为会议的主调。会议还对中共中央机构负责人作了重要调动。设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样，会议就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使“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成为十年全国大动乱的正式发端。

5月18日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政变的危险，声称中共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以制造恐怖气氛；二是大肆颂扬毛泽东个人的天才，鼓吹个人崇拜，以便为他本人捞取政治资本。在讲话的最后，林彪发出慷慨激昂的誓言：“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说，这个讲话“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从而使这篇讲话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5月24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进行专案审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5月28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其人员的组成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陶铸调北京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8月2日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仅半年多时间，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等或被打倒，或被排挤。中央文革小组完全被江青一伙所控制。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生病或外出时，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 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又连续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向社会。。

6月1日　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全国震动，北大校园立刻沸腾。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这张大字报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写的评论员文章，诬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并号召："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月3日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串连、不准打人侮辱人等八条规定。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

6月4日　《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这个决定免除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等市委负责人的职务。任命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调任北京市委书记，重新组成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班子。

6月10日　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进行长时间谈心。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6月18日　一些人在北京大学院内设立所谓斗鬼台，四处抓人，乱打乱斗。有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被戴高帽子，涂墨汁，罚跪，揪打，甚至出现污辱妇女的流氓行为。工作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加以制止。当晚，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他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工作组并把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写成简报上送中央。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不少地方党委参照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办法，使乱批斗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后来转发简报这件事，被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

7月8日　毛泽东从武汉给在上海的江青写了一封信，内容深奥，文字隐晦，包括了毛泽东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设想。

7月16日　毛泽东到长江游泳，"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破浪前进，畅游1小时零5分，游程30公里"。对这次畅游长江，当时的报刊上曾广为宣扬，《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7月18日　《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宣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回到首都北京"。

7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新领导成员名单如下：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常务副部长张平化，副部长张际春、雍

文涛（兼国务院文办常务副主任）、熊复（兼新华社社长）、刘祖春（兼秘书长）。这次改组后的中央宣传部并没有存在多久，到1967年初，陶铸被打倒后，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

7月25日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下令“统统驱逐之”，“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7月29日 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出现在主席台上，向群众招手致意。

8月1日至12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原定会议议程共四项：一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是讨论和通过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是通过会议公报，四是对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决定补行批准手续。会期原定5天。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改变了会议的议程。会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8月1日 毛泽东写信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18日 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毛泽东身穿军装，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一些红卫兵的领袖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检阅。林彪在这次接见大会的讲话中，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下旬为止，共接见8次，参加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在毛泽东的信和8次接见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行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使“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遍及全国各个角落。

8月下旬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红卫兵以“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走出校门，“杀向社会”。他们砸毁老字号的

店铺招牌，更改街道名称，任意揪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闯人民宅查抄私人财物，焚烧古典名著，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此口一开，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倒纷纷奔赴外地，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参加这些串连的青年和红卫兵，自认为肩负着保卫“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重任，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奔走呼号，四处冲杀，到处“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成为制造天下大乱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10月1日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随后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10月6日　由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组织发起，在北京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此后，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大浪潮。

10月9日至28日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的这份检查是事先送毛泽东看过的，毛作了批示“基本上写得好”。

11月13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5位老帅到会讲话。他们批评了军队院校某些造反派头头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冲击国防部，殴打警卫战士的事件。

11月29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几位老帅又作重要讲话，再次批评了冲击国防部的错误。

12月4日至6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林彪批评由谷牧、余秋里主持的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交座谈会，“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十条》。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

示》改变了原来的县以下各级仍按“四清”部署进行的规定，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样，“文化大革命”之火就在全国城市乡村和各种单位无一例外地全面燃烧起来。

12月26日 毛泽东通知一些人参加家宴。参加者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通知林彪、周恩来、康生等。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并举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1967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规定1967年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的政治任务是：“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4日 下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利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的机会，诬陷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背着中央文革独断专行”等等。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号称中共党内“第四号人物”的陶铸，没有经过任何会议和组织手续就被打倒了。陶铸在遭受种种迫害与折磨后，于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逝世，终年61岁。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月6日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党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并强令市委、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开创了全国夺权的先例。

1月8日 毛泽东对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表示肯定。他说：“这是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给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发表社论和报道，对上海的夺权加以肯定，并号召各地学习上海经验。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1月13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它明确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祸源之一。

1月19日和22日 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军委碰头会，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

的问题。江青、陈伯达等人要军队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康生说军队不能搞特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坚决不同意。当谈到军队许多高级将领接连被揪斗、抄家等情况时，老帅们十分愤怒，敲桌子，推倒茶几，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1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中央又发出新的指示，把人民解放军的任务，由支左扩大为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这些合起来，统称“三支两军”。动用人民解放军支持所谓“左派”，进行夺权斗争，是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1月28日　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

1月31日至3月8日　黑龙江（1月31日）、山东（2月3日）、上海（2月5日）、贵州（2月14日）、山西（3月8日）等五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2月8日　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希斯尼·卡博和贝基尔·巴卢库谈话，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并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和问题。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叶剑英和徐向前就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继续对陈伯达等人进行尖锐批评。

2月16日　在中央碰头会上，矛盾更激烈地爆发。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等对残酷整老干部、搞“百丑图”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第二天，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给林彪，把江青比作“武则天”，表示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已“忍无可忍”，已经“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这些后来被叫做“大闹怀仁堂”。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当天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信了他们的汇报。

2月19日　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对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谭震林等老同志作了严厉的指责。并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请假检讨”。

2月25日至3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七次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歪曲事实，无限上纲，强加以“反党”、“二月逆流”等罪名，对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批判。从此，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书记处也不再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2月26日至3月15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是提高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便做好支左工作，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到会的全体同志。

3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此后，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

3月20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讲话，提出"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他说："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据此，林彪说出一句在"文化大革命"中广泛流传的"名言"："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4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专用代名词对刘少奇大肆攻击。戚本禹的文章成为一个信号，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高潮。

4月12日至18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到会祝贺。

5月8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5月17日 江青利用20世纪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诬陷、攻击周恩来。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说明此事原委，并附送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阅后批示，交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2月又有人为此事写信给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5月18日 《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文章说，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里程碑"。

5月31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6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花时七年，苏联是四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功。

7月2日 新华社发表短评：《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仅1967年《毛主席语录》就出版三亿五千万册。

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18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7月20日　武汉发生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揪斗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数十万群众上街游行，高呼“打倒王力”的事件。林彪、江青诬蔑这次事件是“反革命政变”，说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等是主使者，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是后台。他们不仅在王力返京时，组织了盛大的示威性欢迎，而且决定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大会。林彪、江青等亲临会场。同时，在全国大造声势，各地纷纷揪斗本地的“陈再道”，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陈再道、钟汉华等被撤销武汉军区的领导职务，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解散并撤销了番号。“百万雄师”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百匪”，在湖北全省开展大规模的清查批斗。据统计，在这次清查中，被打死、打残、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被打死的就有600多人。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委的报告，为“七二〇事件”正式平反。

7月22日　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8月7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彻底砸烂公（安）、检（察）、法（院）”的口号。许多公安干警被逮捕入狱。仅公安部内，就有225名干部和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等，其中47人被捕入狱。“文革”前的七名公安部副部长中除一名兼职副部长（汪东兴）外，其他副部长都先后被逮捕、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系统的干部和民警中，受打击迫害的多达3.44万多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1100多人，打伤致残的3600多人。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10人，无一幸免，处级以上干部有一半被打成各种“敌人”。结果造成整个公检法机构的瘫痪，最后只能对公检法机构实行军管。

同　日　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时，肯定“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在王力的唆使下，造反派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宣称已经夺了外交大权。并擅自以外交部的名义向我驻外机构发号施令，造成一系列涉外事件。

8月9日　林彪发表讲话，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构”。

8月1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8月12日至年底　青海（8月12日）、内蒙古（11月1日）、天津（12月6日）三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22日　所谓“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以港英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为由，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声讨大会。会后造反派冲进代办处，放火烧

了汽车和办公楼，造成一起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8月26日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对外关系失控的情况逐步有所好转。

7月至9月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并发表多次讲话。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为“乱”作辩护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的。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他强调，“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毛泽东的谈话在1967年10月7日，由中共中央正式转发各地学习。它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在审阅此文时加写了一段话，点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9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的通知》。

10月1日 林彪在国庆18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号召把“中国赫鲁晓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10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11月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2月2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意见和问题》。

1968年

1月重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1968年的五项任务。首次公开发表了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的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社论称它为“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

1月5日至3月20日　中央陆续批准江西（1月5日）、甘肃（1月23日）、河南（1月25日）、湖北（2月1日）、广东（2月20日）、吉林（2月22日）、浙江（3月18日）、江苏（3月20日）等九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机关、部队团以上干部的万人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命令。林彪作长篇讲话。他列举杨成武的三条罪状是：一搞宗派主义，二搞两面派，三是写了一篇《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的文章。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此事的看法有了改变。杨、余、傅三人陆续解除了被监护的状态，重新担任了相应的领导工作。1979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

4月至5月　又有宁夏（4月4日）、湖南（4月6日）、安徽（4月14日）、陕西（4月30日）、辽宁（5月8日）、四川（5月28日）等六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15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作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讲话。

5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要求"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7月21日　康生在"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的绝密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中，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被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有7名，"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察的"有29名。其中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等。此后，康生等又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7月27日　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蒯大富下令开枪抵抗，造成流血事件。但很快工宣队就控制了整个校园。

7月28日　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5人，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座。谈话持续五个小时。

8月5日　毛泽东把外国朋友送的芒果，转赠工宣队，报刊对此事作了大张旗鼓的报道。15日，毛泽东又接见工宣队代表，表示了支持和关怀。

8月13日至26日　云南（8月13日）、福建（8月14日）、广西（8月26日）三

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8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姚文元说：“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至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逐步扩大到全国城乡。

9月5日 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祖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为此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9月12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认为“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10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通讯。通讯按语中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各地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干部和高等院校的教师送去劳动和学习。全国有数十万干部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10月13日至3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外，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等多达74人，占出席会议人数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明确表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赞同了毛泽东的论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全国因此案被株连的党员和干部不计其数，仅因此而被判刑的人，就多达2.8万

人。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冤案彻底平反。

10月1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篇社论首次明确提出要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此后，在全国报刊上一度掀起批判所谓“黑六论”的浪潮。

11月10日　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

11月12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史。”“文化大革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大决战”。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通讯，其中的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此后，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1600多万人，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2月29日　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

1969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社论说：“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因为只有做好了这项工作，把极少数隐藏的敌人挖了出来，才能使阶级阵线分明，才能使斗、批、改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进行。”全国各地区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例如，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和荣国团，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致死。

3月2日　苏联军队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国边防人员开枪开炮，我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造成严重流血事件。15日，双方军队再次发生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打仗的问题。“准备打仗”后来成为中共九大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3月15日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谈话。他批评清理阶级队伍“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强调“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有区别”。

3月21日 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并特地找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参加，要他们“研究国际问题”。并提议九大报告不讲“二月逆流”。

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大会的主要议程共三项：(1)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3)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1/5。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4月28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6月9日 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被迫害致死，终年73岁。1974年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6月 黄永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在“准备打仗”的口号下，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由于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34%。1970、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8月27日 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

8月28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边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9月1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在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晤，双方同意采取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并确定于10月在北京恢复1964年中断了的边界问题谈判。这次两国总理会晤，对缓和当时的极度紧张的中苏关系，起了有益作用。

9月29日 中国第一台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在上海制造安装完成，并正式发电。

10月17日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图签署命令，提升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干部宣读这一命令时

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简称"两个一切"）

10月17日　林彪下达了紧急加强战备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1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因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在开封逝世，终年71岁。

12月20日　新华社播发《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在首都普遍开花结果》。所谓六厂，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二校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当时称六厂二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1970年

1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后又于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以上合称"一打三反"）。根据上述指示，各地纷纷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到同年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万多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达9000多人。这次运动，确实打击了少数各种犯罪分子，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

2月25日至3月21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过高的指标，造成新的冒进。

3月17日至20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一方面提出要防止扩大化的倾向，但同时又强调，反革命秘密组织并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

4月11日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曾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

4月24日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4月28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5月20日　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的声明；支援印支人民的抗美救国行动。北京和各省会分别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拥护毛泽东的声明。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随着这个报告的颁行，全国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四年后，开始招生复课。

同 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1969、1970、1971年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从1970年7月份开始分配。通知要求毕业生到农村、工矿、边疆、基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7月1日 成（都）昆（明）铁路建成通车。

7月31日 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查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致死问题，决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家属子女不受任何牵连。

8月23日至9月6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是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并登简报，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分别在各组发言，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这样就给了林彪集团以沉重打击。

9月25日至10月5日 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参加会议的有北方14省、市、自治区代表1259人。会议的中心解决农业发展缓慢、粮食不能自给的问题。

10月26日 坦赞铁路破土动工。这是当时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工程项目。

10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在1971年7月1日建党五十周年前，把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委基本上建立起来。

11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同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和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及它们的五七干校，并负责已被撤销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善后事宜。此后，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1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按照党中央作出的部署，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8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这次内容广泛的会见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他表示赞成同美国最高级官员进行谈话。另一个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其中不点名但明确无误地批评了林彪。说：“四个伟大’，讨嫌！”这次谈话的《纪要》，1971年5月由中共中央印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12月22日　华北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华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共449人。1971年1月9日后，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一并参加。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撤销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第二政委，刘子厚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会议最后由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1971年1月24日会议结束。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工程。直至1981年1月，较原计划拖延5年之后，第一期工程方基本建成，累计投资额为26.95亿元。

1971年

1月8日　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出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1月8日重要批示的通知》，要求“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2月19日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作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的名。20日，军委办事组写了检讨报告。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军委直属单位负责人会上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他们的书面检讨上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3月5日　我国党政代表团赴越南访问。8日，周恩来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公报说：“如果美帝国主义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3月15日　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写批语：“我党多年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

3月21日至24日　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4月10日　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应邀访华的美国团体。他们在北京进行了比赛和参观游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惊，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

4月7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派纪登奎、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当时称为“掺砂子”。

4月15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到会的共有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449人。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总结。他明确指出，黄永胜等人“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

4月15日至7月31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由清华大学军宣队负责人迟群主持起草，并经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份《纪要》经毛泽东同意后8月13日由中共中央批准下发。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5月30日 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阐述在新形势下的外交政策，批评纠正对外宣传工作上的偏差。

6月18日 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在讲话中批判了极左思潮，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主张出兵香港，随便提断交，冲砸大使馆，到外交部夺权等。

7月9日至11日 周恩来总理和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

7月16日 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一事件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8月中旬至9月12日 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认为，林彪一伙在庐山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9月13日 发生林彪叛逃并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事件。5日，林彪、叶群从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决定实施《“571”工程纪要》，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交由林立果的特务组织“联合舰队”执行。毛泽东由于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提前离开杭州，又突然离开上海，使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毛泽东安抵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9月18日 中共中央向高级干部发出林彪叛逃事件的通知。此通知稍后逐级下达。

10月3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负责军委日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离职检查。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等10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式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的全体会议，乔冠华团长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受到热烈欢迎。

11月14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人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简称工业十条），其中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这个会议纪要因张春桥的阻挠没有发下。

12月26日　周恩来指导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下发。《指示》强调农村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2月30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和日本把我国的钓鱼岛等岛屿划入日本"归还区"，重申我国对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

1972年

1月6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还表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的这些话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2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

2月21日至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3月26日　谢富治病亡，终年63岁。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直接参预林彪、江

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籍，撤销原先对其所做的悼词。1981年1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4月7日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充分挖掘现有劳动潜力的通知》，针对1971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等问题，作出若干具体规定。

4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说："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好的。"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5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5月21日至6月2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到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312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和《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辱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的真相》等报告。

8月1日 国防部为庆祝建军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招待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老干部出席并见报最多的一次建军节招待会。

8月14日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1) 他在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2)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敌人。(3)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8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肯定"整个三支两军的成绩是巨大的"，同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破坏，使三支两军工作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干扰"。《决定》说："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此后，各地的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机构陆续撤销。三支两军人员除已确定留地方任职者外，陆续撤回军队。

8月 江青同访华的美国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女）在北京、广州等地长谈多次，约60小时。江青在谈话中编造历史，极力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中央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9月1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何香凝，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6日，何香凝的灵柩运到南京，根据她本人的遗愿，安葬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下的廖仲恺墓地。

9月25日至29日 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

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其中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10月6日　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针对当时大专院校的情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提出要对理科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此文原是《人民日报》向周培源约稿。但姚文元一再阻挠，只好改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派人到北京大学秘密调查文章的“出笼背景”。还指使上海《文汇报》，盗用一些教员和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周培源文章进行了不指名的批判。

10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两国正式建交。自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一个同中国建交或恢复邦交的高潮：1970年第四季度，有5个国家；1971年，有17个国家；1972年，有19个国家。27个月内与我国建交或恢复邦交的国家达41个，差不多相当于建国后前20年的总和（1949—1969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共47个）。这41个国家中，包括：伊朗、土耳其、日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突尼斯、扎伊尔、智利、秘鲁、墨西哥、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比利时、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10月14日　《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多次批判极左思潮讲话的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但是，发表这些文章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攻击。同时，在人民日报社内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1月26日　我国政府和越南政府在北京签订1973年中国无偿给予越南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协定确定的援助价值为21.07亿元。1972年已无偿援助26.57亿元，占该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7%。

11月28日　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要以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会议的中心内容。得到周恩来同意，但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

12月14日　我国选派留学生36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首批派出的留学生。

12月17日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并说：“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点吧！”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12月18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被拘押的干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李淑清反映情况的信上的批示，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这次清查中，一批无辜被关押的老干部获释出狱。

1973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新年献词》的社论，强调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社论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党的九大路线继续前进"。

1月2日 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其中包括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实施。加上以前确定和后来追加的进口项目，总额达51.4亿美元。到1979年底，这些引进项目绝大部分建成投产。

1月7日至3月30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其中28个省、市、自治区赞成，上海反对。张春桥却说这是"光荣的孤立"，并阻挠文件下发。

2月28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许德珩以及各界人士和北京的台胞代表共100多人参加。大家一致表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以政协的名义公开召集并见报的第一次会议。

3月8日 周恩来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会上，他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这次会议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3月9日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简要说明了自己病情的发展情况，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进行检查治疗。

3月10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上年8月14日的批示，正式发出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20日至31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召开中共十大作准备。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同意经毛泽东核准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6月10日 毛泽东给福建莆田一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为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国务院在6月22日至8月7日召开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问题。

7月4日 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谈到批孔问题。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并批评了外交部。

7月19日 《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写在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察的物理和化

学试卷背后的一封信。江青等利用这封信掀起“反对复辟回潮”的歪风。物理考。分、化学考6分的张铁生，不仅被录取上大学，而且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当上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83年，张铁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8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批发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持封建奴隶制的思想家》。文章作者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

8月20日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事先在毛泽东主持下准备好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8月26日　新华社宣布：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设计制造成功。

8月30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9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9月12日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决定成立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代组长；组织工作小组，王洪文任组长。

9月23日　毛泽东接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沙非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0月　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以后逐渐扩及到一些地区和更多单位。

12月9日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中，肯定由他提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批评周恩来所谓外事错误的会“开得好，很好”。同时批评江青：“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2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21日，在接

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自己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22日，中委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即：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并限令10天内到职。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12月28日　《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作者署名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迟群、谢静宜看到此文后，认为很符合他们"反右倾回潮"的需要，于是授意《北京日报》派人把日记重新编排，加编者按语公开发表。编者按语说："小学生日记"证明，"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错误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1974年

1月12日　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要求将《林彪与孔孟之道》向全国转发的信。18日，中共中央转发在江青主持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共中央在转发材料的通知中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因此，要求在批林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1月19日　人民解放军进行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并警告南越当局，为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行动。

1月24日、25日　江青以贯彻中央通知为借口，擅自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群、谢静宜等在会上讲话，指责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

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

2月10日　江青制造"蜗牛事件"。从此，在科学技术界大批"爬行主义"、"卖国主义"、"洋奴哲学"，推迟了我国同国外的科学技术交流和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

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名青年，因以王亚卓为笔名写信不同意"小学生日记"的观点，被打成"反革命"。

2月15日　北京举办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所谓"黑画"展览。被株连的美术工作者多达百名。

同　日　毛泽东在叶剑英的来信上写下批语："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

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2月23日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该工程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

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硬说这出戏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三上桃峰》被打成"黑戏"、"黑典型"。

3月5日　江青、张春桥召见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叫嚷要"整一整"军队，"放火烧荒"。

3月6日　王洪文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叫嚷要"揭盖子"。并说："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11日，他们命令《解放军报》停止自己编发稿件，只准转发新华社的消息，实际上是变相停刊。

3月21日　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部《外交通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问题的谈话。

4月5日至15日　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十五省市和十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解决在"批林批孔"冲击下发生的生产困难问题。

4月6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

5月15日　新华社报道：在华北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已探明油田可采原油估量9000多万吨。

6月1日　周恩来因积劳成疾住进305医院。

6月14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以讲儒法斗争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吹捧自己。并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根据江青的授意，"梁效"即"两校大批判组"很快写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战线的斗争》、《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批评"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谬论，要求撤离岗位的人，必须迅速回本单位搞生产，否则按旷工处理。《通知》下达后，少数地区单位情况有所好转，但全国工业交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

7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8月5日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

9月15日　新华社报道：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在渤海地区建成胜利油田，探明可探储量近3.9亿吨。

同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0月4日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10月17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为借口，对邓小平进行攻击。

10月18日　王洪文在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后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王洪文在长沙住了三天，并写了书面检讨。

11月12日　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指出：江青等人是“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并鼓励邓小平把政府和军队工作的重担“担起来”。

11月29日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彭德怀在囚禁中逝世，终年76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1978年12月24日，在北京为彭德怀和陶铸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

12月23日　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再次当面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并说：“江青有野心。”他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再次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决定：总理（周恩来）仍然是总理，负责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回京后，把毛泽东的谈话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获得政治局的赞成。这就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1975年

1月5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9日　李富春逝世，终年75岁。李富春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经磨难却始终坚持工作，没有被打倒的几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1月13日至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议程

是：(1) 修改宪法，(2)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3) 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在朱德主持下，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设想。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女）、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女）、姚连蔚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12人为副总理。并任命国务院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月25日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

2月4日　黄河上游刘家峡水电站全部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

同　日　19时36分，辽宁省南部营口、海城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度7.3级。

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军委常委会议由叶剑英主持。

2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22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共33条。随之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1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工、青、妇三个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组。工会筹备组组长为金祖敏，共青团筹备组组长为谢静宜，妇联筹备组组长为杨坡兰。

2月25日至3月8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

3月1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同　日　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在他们授意指挥下，掀起一股“反经验主义”的歪风。

3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过整顿，截至同年4月底，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局超额完成了装车计划。

3月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包括原属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战犯290名，其中蒋军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洲国战犯2名；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1名）。至

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4月1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月2日 董必武逝世，终年90岁。董必武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4月4日 以“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宣布为张志新彻底平反，并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4月23日 毛泽东对“四人帮”批经验主义提出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还指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5月3日 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告诉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同时，毛泽东又强调；“这和庐山会议不同”，“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

5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上写批语：“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这个批示的下达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6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

6月16日至8月11日 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会议认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议提出了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意见。

6月24日至7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高级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70多人。邓小平在7月14日作《军队整顿的任务》的报告，强调军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他指出：“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叶剑英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指出，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的存在。这次会后，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认真地压缩了军队定额，并对军队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

7月1日 宝（鸡）成（都）铁路电气化工程完工。这是我国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7月4日 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即毛泽东的三条指示：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二、要安定团结；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7月10日 新华社报道：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陶俑坑。这一考古重大发现被称为世界奇观。

7月14日　毛泽东找江青、张春桥谈话，批评文艺界的状况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的来信写下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恢复出版，批准举行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纪念演出会，对一批被江青等人污蔑为"毒草"的影片"解禁"，还出版了鲁迅著作和其他少数文艺作品。文艺界的形势略有缓解。

7月17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方针是有成效的。

8月14日　毛泽东在同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教师的谈话中谈到对几部我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姚文元立即起草了一份如何宣传贯彻这次谈话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圈阅同意。经过一番策划，8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发表经姚文元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同时，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的长文《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称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9月17日，江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一次讲话中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9月2日　在邓小平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提出讨论稿。

9月12日至28日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与"文化大革命"前相比，这次运动会的成绩很不理想。

9月15日至10月15日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700多人。邓小平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陈永贵致开幕词。他说：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华国锋在会上作《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开了一个多月，地点后从昔阳县移到北京。江青出席了这次大会，在邓小平讲话时几次插嘴表示不同意见。她还作了关于评《水浒》的长篇讲话，并要会议印发。毛泽东得知后，明确指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9月26日　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

10月中旬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几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当时尚未定稿）。

10月20日至31日 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有2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的杂交水稻鉴定会，对从1964年开始研究、试种的灿型杂交水稻进行鉴定，肯定了这一科学实验的成功。灿型杂交水稻在国内逐步大面积推广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增产效益。

11月3日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的意见。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战线斗争的反映。”从此开始进行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为由拒绝。

11月26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

同　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经过7天的正常运行后，卫星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

12月14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教育革命大辩论”从此推向全国。

12月16日 康生病亡，终年73岁。“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与林彪、江青勾结，玩弄阴谋，捏造罪名，打击陷害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犯下严重罪行。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原先对其所做的悼词。1981年1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1976年（1—10月）

1月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悲痛。但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却受到“四人帮”的无理限制和阻挠。

1月15日 周恩来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追悼会后，当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冒着严寒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别，出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悲壮的送灵场景。遵照周恩来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2月2日　根据毛泽东1月21日和28日的两次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1)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2)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华国锋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3月2日　江青擅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把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等，骂为"汉奸行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3月5日、25日　上海《文汇报》连续制造反周恩来事件，引起全国人民极大反感。各地向《文汇报》发表抗议信、电421件，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3月下旬　南京市出现大规模群众游行，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称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4月5日　发生天安门事件。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施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当夜清除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花圈、花篮、标语和诗词，还抓走自愿看守花圈的群众。5日，天安门广场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四五运动），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支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它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4月13日　中共中央就河北省保定地区发生抢劫武器和粮食事件发出电话通知，责成河北省委和河北省军区限期解决问题。

5月1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编辑部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文章把邓小平与刘少奇、林彪并列，称为"修正主义战线头子"；声称同走资派斗争，"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6月14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下半

年安排的意见》，指出1—5月份工业生产情况不好，财政收入少收20亿元。

7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11日，朱德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

7月6日至8月1日 中央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四人帮”乘机捣乱，指使上海、辽宁的几个党羽发难，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向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7月20日晚，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规定不许追国务院务虚会问题，使“四人帮”扭转会议方向的阴谋未能得逞。

7月28日 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8级以上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11级并波及天津、北京。地震中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损失惨重。国务院迅速向灾区派出10多万人民解放军指挥员，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会同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四人帮”却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的社论。社论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诬蔑为“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集中反映了邓小平“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在“四人帮”的策动指挥下，一时间批判三个文件的文章充塞全国各种报刊。仅《人民日报》从8月13日至10月6日的50多天里，发表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多达110篇。

9月9日 0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他虽然在晚年犯了“左”的错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他的逝世使全国人民极为悲痛。

9月18日 首都10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全国各地亿万群众同时追悼默哀。华国锋致悼词。

9月11日 “四人帮”加紧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

9月1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抛出“四人帮”伪造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即“按既定方针办”，并在全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9月19日 按江青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江青要求并非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和毛远新参加会议，却不让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上江青大吵大闹，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经过争论，最后决定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书籍暂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封存。“四人帮”控制毛泽东遗稿的企图没

有得逞。

9月2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张春桥说："今天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公开伸手要权。他们还拒绝叶剑英、李先念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并非中央委员的毛远新"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毛远新回辽宁，三中全会准备问题由中央政治局研究解决。

10月1日　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煽动说：还会有人为邓小平翻案。她说："我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她要青年人准备迎接"盛大节日"。

10月2日　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指出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与毛的亲笔手书不同，要避免再错传。

10月3日　王洪文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发表讲话，叫嚣："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要大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月4日　《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

10月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随后又迅速瓦解了"四人帮"余党在上海酝酿策划的叛乱。全国亿万群众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第七篇

农业学大寨始末

第一章　大寨：一个孕育着无限生机的贫困山村

第一节　虎头山下大寨村

大寨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不大的村庄。

按照中国古典名著《列子》的说法，太行山原在今天河北省的南部，与它并排着的还有一座王屋山。相传很久以前在山北住着一位叫愚公的老人，见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便率领他的儿子和孙子要把这两座大山搬走。有个叫智叟的人看到他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就对他讲：这两座山太大了，你怎么能搬得走呢？愚公回答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你难道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不会再增长，搬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搬不走呢？于是，愚公一家老小每天挖山不止。后来这件事感动了"天帝"，他派了两个神仙把两座大山给背走了。太行山这才被移到了今天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地方。

《列子》一书讲述的很多故事属寓言性质。寓言主要用来说明道理，故事本身却不可以太当真。

我们要讲述的大寨村，就位于愚公当年曾试图迁移过的太行山的深处。而大寨人所做的事情，竟真的与愚公移山相似。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城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平均海拔1000米，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全村现有居民约160户，500多口人。

关于大寨村的形成，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只能根据传说推测。相传在北宋年间，宋军为抵御金兵，曾派兵把守距今天的大寨东北方约5公里的虹桥关，大寨就是宋军的一个驻军营寨。据说当时守军建有两个营寨，大的叫大寨，小的叫小寨。这便是大寨村名的由来。据当地人讲，小寨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存在，但住户已经很少，再后来就没有了。

山西自古战事多，因此叫"关"、"堡"、"寨"的地方也就多。在山西，有名的大寨就有两个，除了昔阳县的大寨，榆社县也有一个叫大寨的地方，一度也较有名。因为那里也出过一个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叫张志全。还在1950年，张志全就成了全国劳模，

而陈永贵当时还少有人知。

昔阳县的大寨位于虎头山的一个坡面上，村中间是一条沟。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全村有约 800 亩耕地，64 户人家，190 多口人。这些耕地如果平均占有的话，每户约合 10 多亩。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大寨展览馆提供的数字，当时全村约 800 亩土地，有 60%，也就是大约 480 亩为 1 户地主和 3 户富农所占有；另有 22%，即 170 多亩为 12 户中农所占有；而其余 48 户贫农、下中农一共才占有不到 150 亩耕地。太行山区的耕地十分贫瘠，生产条件又极为简陋，粮食产量很低。1 亩地 1 年能收获 70 公斤粮食就算不错了。广大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大寨人说他们过去有三穷、五多。三穷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是：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后来使大寨闻名天下的陈永贵，他的母亲和姐姐就被卖掉，而他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就是上吊寻死的。由于人穷，大寨村的住宅也十分简陋。人们多在山沟的两边土坡上挖土窑居住。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

大寨穷也没有穷出名来，因为太行山深处的乡村普遍很穷，大寨并非特殊。

大寨村之所以名闻天下，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出了个陈永贵。在他的领导下，大寨村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艰苦创业，重新安排家乡的山河面貌，从而引起了世人的景仰。而在陈永贵之前，大寨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印记。民国年间编修《昔阳县志》，尽管大寨距县城只有 5 公里，但由于“无可道也”，县志竟连大寨的村名都不记载。

昔阳在 1940 年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沦陷区。不过在当时，凡有日本军队的地方，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太行山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的重点区域，除了正规军，还有许多抗日游击队。当时在昔阳一带活动的就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营。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斗争中发展壮大，也教育了广大生活在太行山区的老百姓。

1945 年 8 月，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大寨的贫苦农民盼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在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中，大寨 35 户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 400 多亩、房屋 411 间、窑洞 32 眼，还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产工具。第二年，大寨贫苦农民贾承福、贾承财、贾进财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寨村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开始，他们被编人邻村武家坪的党支部。1947 年，便在大寨正式建立了党支部，贾进财为首任党支部书记。

第二节　成立互助组

为了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防止农村出现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昔阳县解放早，属于老解放区，土改进行得早，合作化进行得也早。

还在1946年，共产党员贾进财就在大寨组织起了第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由15户农民组成，当时叫“变工组”。即在农闲时，各家干自己的活，到了农忙时节，便采用换工互助的方式，今天帮这家干活，明天帮另外一家，群众称这种办法是“工换工，不敢啃”。这个互助组后来被人称为是“临时互助组”。

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大寨，互助合作显然比一家一户的单干有优势，再加上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互助合作发展很快。1947年，贾进财的“临时互助组”已经发展到了20户农家，另外，还出现了由陈永贵组织起来的由11户人家组织的第二个互助组。

陈永贵此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已经成为贾进财下一步准备发展入党的对象。本来，贾进财这个互助组也是想争取让陈永贵参加的，因为陈永贵是大寨村数一数二的庄稼汉，凡是地里的活，哪一样他都拿得起，放得下。起初陈永贵也答应参加这个由村支书牵头组织的互助组。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陈永贵决定另起炉灶，自己牵头组织另一个互助组。

互助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一方愿意参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与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个组里。因此，各村开始成立的互助组，组里各家各户的劳力、牲畜和其他生产条件大多比较接近。因为只有彼此相接近，各方面才都不会感到自己吃亏。但是在大寨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些缺乏“整劳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组，但组里有人不同意接收，因为如果让他们加入进来，别人就感到吃亏了。身为党支部书记的贾进财此时似乎也爱莫能助，他总不能违反自愿互助的原则强行吸收他们入组吧。这便给了陈永贵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那些老的老、小的小不被互助组接收的人们找到了陈永贵。人们在困难的时候之所以会找他，说明他平时就具备济危助困的品格，说明大家信任他。陈永贵也确实没有令他们失望；他说：“咱们都是贫下中农，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土地。他们不收你们，我们就再成立一个组。”

对于陈永贵的表态，大家在高兴感激之余，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这样太让他吃亏了。而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条，要跟着我干，就要齐心。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

他说了就干，一共联合了4个老汉和6个娃娃成立了大寨村的第二个互助组。

陈永贵出身贫寒，小时没有读过书。但从他创办互助组及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懂得人的心理，懂得辩证法。他知道在这个除他以外全部是老汉和娃娃组成的互助组里，一定会十分团结，一定会充满了干劲。人的力量来自体质，也来自精神与意志，来自团结奋斗。当听到有人讥讽他这个组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时，他一点都不在乎。他对组里的人们说：“不怕，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这句话里，不仅有了辩证法，甚至还体现出一种关于未来的发展战略。

陈永贵率领他的小组，与贾进财的大组暗暗展开了竞赛。全组在患难之中，团结奋进，人人争先，谁都怕落在后面，谁都不愿意拖累大家。陈永贵当时已是村里的干部，

是个忙人，夜夜有会开。他早上还没起床，老老少少们就已经下田了。

贾承联是这个组年龄最小的，那年才 14 岁。按照现在人们的看法，这正是一个读书上学的年龄。但在当时的大寨却没有那个条件。贾承联人互助组前，母子二人种着几亩土改分得的耕地，度日十分艰难。加入互助组后，他总怕自己干在别人后面，每天早早地就起来干活。他往地里送粪，跑六个来回天还未亮。锄草时，陈永贵在前面，他就紧紧地跟在后面学习。几十年后，当年的孩子已成老人，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仍激动不已："我在'老少组'是最小的一个，比梁便良还小几岁。父亲很早就去世，家里就我和母亲，可是还耕种着土改分下的几亩地。当我刚进'老少组'的时候，一直为自己这么小，却种着那么多地而感到理亏。可是老陈却说，你跟着我干就行了，且不说几亩，就是 20 亩也保证你荒不了。从那时起，我就脚踏实地跟老陈干。他在前面锄地，我就紧紧地跟在后面。挑担子他担多少，我也担多少。我老怕老陈骂我不干，结果老陈不是骂我不干，而是骂我不听话。比如说，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事先就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一两把谷子。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批评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而且还要保护劳动力。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多把身体搞坏。那时候有他掌舵，干起来比一个成年人也不差上下。"

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 75 公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一路跌跌撞撞，虽说辛苦，却也充满了欢乐。后来陈永贵又想了个办法，将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满全程，一段一段地接。每个人每次少跑路，在接担时还可以互相说说话，将劳累的事情变个方式，加进欢娱的成分，便轻松了不少。

这两个互助组劳动竞赛的结果是双赢。两个组都提高了劳动效率，都表现出了组织起来的优势，都增加了粮食产量，都获得了上级的表彰，也都使自身获得了大发展。

当然如果细分析起来，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们的粮食产量增加得多，由互助前的亩产 50 多公斤，猛增到亩产 100 多公斤，个别地里还甚至达到了 250 多公斤。平均亩产也比贾进财的组多出了 15 公斤。特别是他济贫济困，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带领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宗旨。而且，经此一搏，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个组里的许多人后来忠心耿耿地跟着陈永贵干，即使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可是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十几年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人们把贾进财的互助组称之为"好汉组"，把陈永贵的互助组称之为"老少组"。这种称谓本身就褒贬分明，就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了很大的出入。而且人们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好汉组"说成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把"老少组"解释成代表贫下中农利益的，把两个组的劳动竞赛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显然是对历史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通过组织互助组，陈永贵逐步显示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杰出组织才能。他是组里惟一的壮劳力，可是在评分时，他才比一般劳力高一两分。大家都说他评得太低，他却说："行了，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娃娃们，他也要给到 8 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了，他却说，评分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互助组之间的劳动竞赛，形成了热烈的劳动场面。区里的干部在综合了各地的情况后，总结出几句“顺口溜”式的话，叫做：大寨好生产，武家好意见，留庄好寺院，金石坡好剧团。留庄和金石坡都是村名，武家就是大寨的邻村武家坪。在所有这些“好”中，只有大寨的“好”是真正的好，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寨已经在区领导干部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名声。

1949年，大寨在临时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常年互助组。贾进财的互助组与陈永贵的互助组也合并在了一起，其规模比后来上级要求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大。在农业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大寨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0年11月，昔阳县人民政府授予大寨互助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八个大字。这是大寨所获得的第一面锦旗。

第三节　迈出第一步

1947年冬，大寨所在的昔阳一区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准备吸收一批新党员，陈永贵是发展对象之一。陈永贵平时就积极靠近党组织，又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加互助合作，并做出了突出成绩。加上大寨村党支部成立不久，党员人数少，急需加快发展。而且村支书贾进财对他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当陈永贵又一次向贾进财表示了入党的愿望后，贾进财满口答应。按说，有了这些条件，陈永贵入党应当不会有什么障碍。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级下达了新的指示：发展新党员要从严掌握。在过去入党只要党支部决定吸收，报到区委就可以了。但这个新的指示要求，凡吸收新党员要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区党委批准，还要由区党委书记亲自签字才算生效。之所以会有这些新的规定，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已经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要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已经出现了组织不纯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坏人混进党的队伍的现象。因此，当时共产党在解放区普遍开展了整党运动。运动过后，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便对入党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严格入党手续，不仅表现在要有二名正式党员介绍，区党委批准，区委书记签字等具体程序上，还表现在对入党申请人建立了一种比以往更加严格的审查制度。

就是在这个审查过程中，陈永贵险些栽了跟头。

当陈永贵的入党问题被提到区委审批时，区委有人提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当过“伪代表”。

人们的反映确有其事，陈永贵确实曾经在日伪时期当过伪代表。不过那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使命。

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在各地乡村都要有代表为他们办事。日本人进村先找这些代表，有事也找他们办。这是个既危险又没有脸面的事，村里没有人愿意干。特别是在太行山区，白天是日本人的天下，夜晚就是八路军的天下；日本的大部队来了是日本人的

天下，大部队刚走，游击队进来，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当伪代表更是个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差事。

在中国的乡村里，宗族是一种很强大的势力。一个村里的多数人家姓一个姓，就是大姓；只有一两户的姓是小姓。大姓有势力，小姓就要依附于大姓，听命于大姓。在大寨贾姓是大姓，陈永贵是从本县石山村流浪来的。于是，贾姓人家便把他推举出去当这个为日本人办事的代表。陈永贵虽然势单力薄，但为日本卖命的事却坚决不干。正在这时，八路军独立营一位姓曹的人找到了他，要他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干，说这样还有可能探出一些对八路军有用的情报，为自己人提供点情况。于是，陈永贵就答应下来了。

1945 年 8 月昔阳解放时，陈永贵被村里抓起来审查，还开大会斗争了他，说他是伪代表，为日本人卖命。陈永贵争辩说自己是受共产党派遣去干的，是独立营姓曹的让他去的。但此时，那位姓曹的人已不知去向，他的话也就没有人相信了。好在他在当伪代表的日子里，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事，而且还曾被日本人关押过，靠了村里的担保才被放了出来。有了这些因素，他没有被镇压，否则的话，也就没有大寨后来那段风云历史了。

当陈永贵的入党材料报到区委时，区委书记是 24 岁的张怀英。这又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决策和行为对于陈永贵以及大寨村影响重大。如果放在别人手里，陈永贵的入党可能就“泡汤”了，但张怀英当时是个办事很负责任的人，他知道自己下笔之处将关系到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人一生的政治生命。于是便决定把陈永贵的这个历史问题弄清楚。

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岁月里，要想弄清这样的历史问题也实在不容易。在战争年代，敌后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工作人员行踪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可能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在这里的时候姓曹，到了另一个地方就可能姓刘了。时间过了这么多年，世事变化翻来覆去，要想再找到当年那位姓曹的人可谓大海捞针。但张怀英还是找到了一些间接证明材料。他在当年独立营常驻的后龙铺堖村找到了村支书李先模，李先模证实陈永贵确实曾经与独立营一位姓曹的人有联系。至于姓曹的现在何处，他也说不清楚。张怀英又到了陈永贵的家乡石山村，看了陈永贵一家人原来住过的破窑洞，他不相信住在这样破烂地方的人还能给日本人卖命。是当年提倡的阶级感情帮助张怀英明辨了是非，终于，他在陈永贵的入党申请书上签了“同意”二字。

当贾进财通知陈永贵，区委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时，他心中的激动是我们今天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曾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当然也曾出现过严重的失误。但无论怎样，他从未动摇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陈永贵政治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张怀英多少冒着些风险批准了陈永贵的入党申请，对于他的这个决定，用“英明”二字来形容也毫不过分。

第四节　贾进财“让贤”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的生日。毛泽东平时不喜欢操办庆祝生日，但这次有些异乎寻常。因为当时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作为大会代表都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借生日之机，用自己的稿费设宴，将几名在全国最为著名的劳模请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那天毛泽东在与陈永贵交谈时就说：“贾进财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

十几年以后，1977年9月12日，叶剑英刚刚过完他的80大寿就来大寨视察。他走进贾进财的家，当时贾进财正在地里劳动，家里只有宋立英一个人。叶剑英突然冒出一句：“让贤。”随行的汪东兴、郭凤莲没有听清他的话，女儿叶向贞则以为他记错人了，就说他“乱点鸳鸯谱”。随行的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则解释说：“贾进财和宋立英是两口子。”但叶剑英又用更清楚的语言说了一句：“让贤。”这次人们都听清楚了，大家随之附和道：“对，对，让贤。”

毛泽东和叶剑英所说的都是贾进财在50年代初期，坚持推荐陈永贵代替自己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事情。

贾进财是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又是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但通过组织互助组及随后两个组展开的劳动竞赛，贾进财意识到，陈永贵比自己更具备组织领导才能，由他来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对大寨的发展更有利。于是，他便打定主意推荐陈永贵代替自己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入党后，工作更积极，干劲也更大了。入党不久就被推荐担任党支部的副书记。贾进财的想法是进一步让他担任支书，自己担任副支书。在一次支部会议后，贾进财将陈永贵留在自己家里。他对陈永贵说：“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想把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让给你……”

陈永贵有些不理解他的意思，说：“你干得就挺好嘛！”他甚至还问：“你是不是觉得开会点了你的煤油，上级的同志来村下乡吃了你的派饭，你怕吃亏？”他进一步说：“那好，开会点灯，煤油钱我出。”

贾进财只好再给他解释：“你比我有能耐，你当书记我放心。我是想把咱俩的职务换一下。你当书记，我当副书记。我从不反口，也对你没有二心。你给我提意见我没二话。我只是跟着你好好干就行。开会的时候，你主持会议，如果同时开两个会，你主持一个，我再主持另一个。”他还说到了开会点灯用油的问题：“点灯的煤油咱轮着出，我一心想着是如何出一个能人把大寨的事情办好！”

当天晚上，贾进财又把自己的心事与妻子宋立英讲了。他的妻子小他20多岁，也是村里的党员。妻子支持了他的想法。

第二天，贾进财又到县城找到区委书记张怀英。张怀英对这件事比较慎重，第一次

没有同意。第二次贾进财又来找他时，他仍没有明确表态，但说话时已有了松动，表示要与组织科长商量商量。

当时区委的组织科长叫张永顺。既然区委书记态度都松动了，张永顺自然不会坚决反对。于是，贾进财终于争得了区领导的同意。他回到村里再找陈永贵时，已是成竹在胸。他对陈永贵说：事情办成了。张书记开始不同意，后来叫我找张永顺商量一下，老张叫商量着办，我看就这样吧！

到了这一步，陈永贵自然也不好推辞。再说，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也是个乐意承担责任的人。他所担心的只是贾进财不能就这样撂下担子，什么事情都不管了。而贾进财也安慰他："我那天黑夜怎么说的？我对你没有什么二心，你走着看！"

在贾进财的提议下，大寨村党支部大会重新进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陈永贵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贾进财担任副支书。两个人果真换了个位置。

几天以后，贾进财再次进城见到张怀英。张怀英还在考虑着大寨村党支部的事情。当贾进财告诉他，陈永贵已经当选为大寨村党支书时，他虽事先听贾进财说过两次，但仍吃了一惊："换了？"

贾进财说："换了。我管保没有二心！"

这就是大寨村有名的贾进财让贤的故事。后来人们说，用"让贤"这种说法来表述贾进财推荐陈永贵代替自己当村支书并不贴切，因为说到"贤"的话，贾进财堪称大寨第一贤人，他推荐陈永贵当支书，自己甘当配角，更表明了他的贤者风尚。他是大寨的伯乐，是他发现并培养了陈永贵这个大寨的"千里马"。他介绍陈永贵入党，并推荐、支持他担任支部书记，为大寨村日后的大发展建立了第一功勋！

陈永贵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没多长时间，就成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在山西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他曾随山西劳模代表团到天津市郊区农村参观学习办社经验。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太行山，见到了华北平原。有人说，这对于他日后大搞"人造小小平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五节 办农业合作社

昔阳县是老解放区，到1951年，中共党内领导层对老解放区的农村政策发生了一场重要争论。这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报告主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

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先后

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认为，土地改革后农村小生产者的自发力量是不可避免、不能阻止的，也是不可怕的。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使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使农村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破产变成贫雇农。"刘少奇这样设想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土改后，一方面是广大的自发势力、富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发展。两种潮流同时发展，其中有斗争，最后要依靠国家领导，只要共产党人的脑筋不糊涂，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是自发势力的胜利。"

毛泽东知道刘少奇对中共山西省委的批语和谈话后，把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而不支持刘少奇等人的意见。随后，毛泽东要陈伯达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 1951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通过。12 月 15 日，毛泽东把这个决议草案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互助合作运动由此在全国农村逐渐大步开展起来。

1952 年，中共昔阳县委按照山西省委的意图，开始在白羊峪、赵壁等村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年底，昔阳县委决定，在全县原有 5 个初级社的基础上，1953 年要发展到 34 个。为了办好初级社，已经升任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派出县里的三个劳动模范，即畜牧业模范刀把口村党支部书记张老太、林业模范白羊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殿俊和农业模范已经成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晋中地区参加培训，学习有关试办初级社的办法。陈永贵等人本来就有走合作化的积极性，再加上领导提倡，又学习了先进经验，便越发热情高涨。回村后陈永贵逢人便讲集体化道路的好处，讲合作社的优势。随后，他就向县领导提出了办社申请。县委随即就批准了他的申请，于是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陈永贵任社长。

当时合作社尚属试验阶段，县里对此事比较慎重。上级有一项原则规定：每个合作社在初办的时候不得超过 30 户。但大寨的常年互助组已达 49 户的规模，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都要求加入农业社，在这个局面下，人们看出了陈永贵的能力。他搞了个变通办法，向上报的时候初级社为 30 户，对有些农户暂时不上名册，但实际上凡愿意参加合作社的随时都可以参加。用他的话说，这个办法是既考虑到上级的精神，又要照顾到具体情况。像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贾进财当家的话，可能就办不成。

大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了。合作社采用劳动日分配和土地股分红相结合的方法，规定：劳动日分配占 55%，土地入股分红占 40%，公积金、公益金占 5%。因此这种合作社通常被称作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为了充分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在劳动管理上，大寨初级社由原来的"死分活评"改为"包工与评工相结合"。即对于责任明确的农活，确定出劳力、时间、报酬和完成任务的数量与质量，然后包给社员，到期后经过验收，给社员记工。对于那些一时看不透，不好包和不能包的农活进行评工记分。与此同时，在社里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按照陈永贵的提议，为了加强党支部对没有入社农户的领导，由贾进财负责他们的

工作，这就意味着贾进财将要留在社外。陈永贵征求贾进财的意见。本来，贾进财也是打算入社的，但此时他信守了“让贤”时的诺言，对陈永贵说：“只要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我办就是了。”于是，社外的3个互助组、4个单干户的工作就由贾进财负责了。

由于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激发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大寨村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粮食产量全村平均达到亩产125公斤，其中农业社亩产131公斤。集体化的优势明显。到1955年，大寨除一户地主被留在社外，73户农家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寨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又一次走在前列。

大寨村的成绩和陈永贵的才干在这个时候不仅受到县委的表扬，也开始引起晋中地委领导的重视。1953年，在晋中召开的一次号召成立初级社的学习会上，陈永贵作了典型发言，时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的姚宗泰听后大为高兴，他对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说：“你们县大寨村的陈永贵发言质量高，讲得好，有水平！”

1954年，王成旺接替姚宗泰任晋中地委书记。1956年5月，他来昔阳县视察工作，在大寨住了一夜。看到大寨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高兴地对陪他前来的张怀英说：“大寨各项工作做得不错，陈永贵有能力。宋立英同志不错，要好好培养这样的妇女干部。”

第六节　响应统购统销

就在大寨取得丰收的那一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如何既要圆满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又要安排好村民的生活，是对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的陈永贵的一次考验。

1953年大寨农业获得了丰收，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更为明显，陈永贵也就名声在外了。但大寨村里还有人对他不服气。初级社刚成立的那年冬天，粮食已经收下来了，一个在社外的单干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村里说起了风凉话。他说：“不要再吹农业社的优越性啦！亩产125公斤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还打了150多公斤哩！”

在今天我们听起来，一个人对新成立的农业社有成见说几句风凉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但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他知道那个人的地里不可能打下那么多的粮食，他认为那个人说这番话的本意就是向初级社挑战，不承认合作社的优越性。但是，那人毕竟没有直接攻击合作化，陈永贵也不便正面追究他的什么责任。但这难不倒陈永贵。

陈永贵马上召集了全村会议。他先在大会上宣布国家今年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这是一项新的政策，它禁止粮食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要求农民要把口粮之外的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国家把粮食的价格定得比较低，以此来增加国家积累，增强工业化的实力。陈永贵当时不可能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了解得这样清楚，但国家要求农民卖余粮这个关键环节他把握住了。他说：“今年，农业社、互助组、

单干户都丰收了，这很好！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把余粮卖给国家吧！"

那位说风凉话的人，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他本来没有产那么多粮食，实际上他的亩产只有100公斤多一点，如果按亩产150公斤卖余粮，就意味着连口粮也不够。这可是涉及到全家人能否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于是也就顾不得脸面了。陈永贵后来多次讲到过这件事，说那个人这时的行为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会儿蹲在脚角，一会儿又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还一边作贱自己，说自己的嘴"是坏嘴，是屁嘴"。说这张屁嘴"不值钱，净是胡说"。他一再说明实际情况："我每亩地的产量，不管怎样也打不够150公斤。"

村里的人爱看热闹，这时都跟着说："产量是你自己报的，不能有假？就按你说的数字算统购粮吧！"

在关系到是否饿肚子的问题面前，那人只好四处讨饶。他"交待"说："俄自己不入社，还反对别人入社。我是怕入了社吃亏，才这么捣乱。"

陈永贵当然不是真想让那人按亩产150公斤的数量卖余粮，他要做的其实就是要扫除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障碍，完成好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他见"电影镜头"表演得也差不多了，便说道："共产党从来讲实事求是，反对说谎话。你究竟打多少粮食，一看你的庄稼还不知道？你想把产量降下来，就得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

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实行统购统销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财经战线上曾经领导了三大战役：第一个战役是稳定物价，第三个战役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个战役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家。粮食问题是历代政府都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建国初期的几次剧烈的物价波动都与粮食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过土地改革和几年的经济恢复，这一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这一矛盾即迅速激化。这一年城镇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600多万，农村吃商品粮的人口也增加到1亿人。农民的粮食虽然增产不少，但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粮食都由农民自己消费掉了。由于供需矛盾的突出，加上粮食自由买卖及投机商的扰乱市场行为，使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完成，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当时山西省的粮食市价就高于牌价10%～20%。

为了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粮食问题，陈云提出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的办法，也就是后来说的粮食统购统销，即实行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粮食的办法。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11月23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接到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

命令后，全国各地在 1953 年 11 月底和 12 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仅山西省投人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 130 万人。

统购统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多向国家卖余粮是各级领导反复提倡的事情。凡是国家的政策，陈永贵都要模范地执行，凡是领导提倡的事情，陈永贵都要带头照办。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在大寨村的几次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总是经常讲。那时老区的共产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比较高，只要是上级号召办的事情，即使一时思想上想不通，也会去照着执行。陈永贵自己更是发挥了带头作用。他这年一下子卖了 2500 多公斤“余粮”，贾进财和其他党员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卖了太多的“余粮”，以至于连口粮都没有留足。在党员带动下，大寨当年向国家卖出了 20000 多公斤粮食。

统购统销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但来年开春大寨村民却面临着缺粮难题，陈永贵卖的粮食比谁都多，劳动强度又最大，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可以说，这是前一年卖过头粮的必然结果。

当然，由于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经验，卖了过头粮的不仅只大寨一个村，别的村也有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县委在第二年曾三次下放“返销粮”，也就是政府按照牌价向农民“返销”一部分粮食。但大寨村没有去要返销粮。此时大寨已经成为县里的一个先进典型，为了保护这个典型，县委书记张怀英徒步 5 公里来到大寨，找到陈永贵了解情况。

陈永贵在与张怀英的谈话中，虽然承认自己由于没有经验而使村里卖了过头粮，村民生活有些困难，但是坚持不向国家伸手。他说：“大寨群众的吃粮倒是紧一点，但差不多都还能吃得下来。倒是我的粮食成了问题，又三天两头有下乡的同志。可是瓜豆也快下来了，没粮有菜还能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在困难面前谢绝了上级的支援，以后他曾多次这样做。这也成为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

第二章　重新安排河山，大寨人用自己的双手改写历史

第一节　重新安排河山

大寨是个农村，大寨的辉煌离不开土地。

大寨的自然条件原本很差，全村的耕地都挂在虎头山一侧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解放时，全村约800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块，每块的面积小得可怜。这些坡梁地缺边少堰，“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由于耕地面积小，又缺月巴缺水，自然就十分贫瘠，产粮很少。

为了改变自然面貌，初级社刚成立，陈永贵就在酝酿着大寨的《十年造地规划》，要将七沟八梁变成田地。陈永贵也有他的道理：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沟多坡多潜力大，深沟筑坝能淤成“刮金板”，山坡里切外垫是好梯田。没有长流水，蓄住洪水也能种好田。没有机器，就靠人、靠扁担。他的具体设想是，将沟垒起一层层石坝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块变大块，斜坡变平地。

为了动员大家共同奋斗，识字不多的陈永贵还根据一篇文章给人们讲述过愚公移山的故事。他用自己的话表述着文章中的意思：“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一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

庄稼人都没什么好饭食吃，但吃饭时的乐趣却不小。每个成年男人到了吃饭的时候，就端上一个大碗在村子的场地里边吃边聊，人们都把这种场合叫做“饭场会”。在最近的饭场会上，他们议论最多的就是修地、造地的事。大家又想起了贾举元和贾升元修地的事。这兄弟俩旧社会在赵北峪有3亩地，两人就在这3亩地周围的荒坡上，整年整月地开荒、修梯田。修地，累弯了腰；修地，把贾升元的胳膊也砸断了。到底修下了10亩好地。可是，贾举元和贾升元修下地，却没有种的本钱，不得不向富人家借钱，结果，他们一滴血一点汗修的10亩地，最后又都成了有钱人的家产。人们都说，如今地主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60户人家合成一家，难道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

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才50多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把地修好？陈永贵又

用他所学到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回答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

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争了又争，党员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村民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山川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的冬天开始了。

第一个改造的对象是白驼沟。那是一个斜挂着的山槽，长0.75公里，宽约10米，是大寨村的7条大沟中最小的一条沟。虽然说它小，但改造起来也不容易。他们数了数，为改造白驼沟并把这条槽砌成梯田，共需筑24道堤坝，其工作量不算不大。

改造白驼沟的行动在冬天开始，这也是大寨人"修地"工程的特点，他们从来都是利用冬季农闲时节改造山梁。在合作化以前，依靠个人的力量造地、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人们冬季就只能闲着，依靠少运动，多睡觉，少吃饭来减少粮食的消耗。只有在走上集体化道路的情况下，集中大家的力量，才能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宣战。

太行山区的冬季，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但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大寨人，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冰天雪地毫无畏惧之情。50多个劳力全部上阵，就连70多岁的贾金元也乐呵呵地到了劳动工地。人们见他年纪大了，劝他回去，他却说："我喜欢修地，可一辈子也没能修一亩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是没有工分，我也高兴。"

虎头山大雪纷飞，劳动工地上却热火朝天，人人干得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壮劳力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就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板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在冰天雪地里筑坝造地，饭都要由村里的妇女们做好后送到沟里。天冷路远，刚出锅的热饭，挑到工地上，饭的上面便冻上一层冰，这就是大寨人常说的"冰碴饭"。梁便良后来回忆说："冰碴饭不是大寨人实在想吃，因为这也和打仗一样，形势逼着我们非吃不可。"陈永贵也说到过冰碴饭："谁不想吃好的？如果把冰碴饭和热面条同时端上来，谁也是先端起热面条吃。可是，在冰天雪地里，哪里来的热饭吃？"

困难没有压倒大寨人，相反，是大寨人战胜了困难。人们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才收工，刚过完年，正月初三，他们就又上了工地。

冲天的劳动热情使工程进度大大提前，原计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的工程，结果只用了18天就干完了。完工后经过丈量，他们新造了5亩耕地。这个数字与后来的造地数字相比还是很小的，但它毕竟是大寨人破天荒地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取得了胜利，对于坚定村民改天换地的信心意义重大。为了纪念合作社依靠集体的力量所取得的这个胜利，人们将白驼沟改名为合作沟。

大寨村民治理白驼沟的行动，引起了中共昔阳县委的重视。这年年底，昔阳县推举陈永贵出席了晋中地区劳模大会，陈永贵还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在大型会议上发言，他讲得客观实在，还有一定的逻辑性。晋中地委书记岳太忠在总结讲话时说："大寨的陈永贵就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逐步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展出来！"

也就是在治理白驼沟的先后，《十年造地规划》在陈永贵的头脑里渐渐成型。其基本内容是：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使大寨的土地旱涝保收。

《十年造地规划》的具体做法是：沟里分段打坝，坡梁地打桩筑埂，对于土层薄的地块担土垫地，对于坡度大的地块起高垫低。在具体实施中可以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全面规划，集中治理。在时间安排上，一般是每年秋收以后集中劳力治沟，春节到春耕前集中劳力平整土地，夏秋两季抽空打埂，并维护现有土地。

陈永贵把这个规划先拿到支委会，又拿到支部会讨论，征得支部大会同意后便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此时的陈永贵已经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他是个天生的鼓动家。他对乡亲们说：“十年规划是长远之计，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目标。比如眼下我们要大战狼窝掌。尽管山沟深，可山是死的，人是活的。垒了一条坝是一条坝，垫了一堰地是一堰地，为什么干不成呢?”这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愚公移山》了。他又说：“工程倒是大一些，但工程越大，越要及早动手。只有干才能变。不敢动手，消极等待，再过几辈子，大寨还是老样子。所以，不要有任何幻想，要有长期战斗的准备。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二十年；这一辈子不行，还有儿孙后代嘛！只要像老愚公那样，挖山不止，总有一天大寨会变样的！”

村民被说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造地行动紧接着就展开了。

闸住了白驼沟，大寨人又乘胜前进，1954 年冬天到 1955 年春，把后底沟闸住了，赶牛道沟闸住了，念草沟闸住了，小北峪沟也闸住了。

但是，哪一棵树不经过风吹雨打？哪一条船不经过浪击潮颠？大寨人在改造山川的第六个回合——闸狼窝掌的时候，就一连失败了两次。

狼窝掌，又叫“黑老山沟”，是大寨村的 7 条沟中最大的一条，这条沟长有 1.5 公里多，宽约 13 米，高低落差约 200 米。这条沟山高坡陡，乱石堆积，野草杂生，相传常有野狼出没，因此得名狼窝掌。

狼窝掌最凶险的时候是每年的夏秋时的雨季。由于山高坡陡，高低落差大，每逢大雨时节，雨水就会沿着两旁的山坡泄入沟里，狼窝掌便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一块块巨石在洪水的冲击下顺势乱滚，肆虐横行。如果不是有了陈永贵，大寨肯定不会有第二个人想要治理狼窝掌。

在治理狼窝掌的会战中，大寨村 58 个劳动力全部上阵。也是快过春节的时候才收工，春节刚过就又接着干了起来。依然是起早贪黑，依然是吃着冰碴饭。经过艰苦奋战，他们筑了 38 道堤坝，填了几万方土，造出了 30 多块地。量了量，足足有 20 亩！

开春以后，大寨人高高兴兴地在新造的地里播下了种子，眼看着种子破土出芽，长成禾苗。社员们在地里施肥、松土，期待着秋天的收获。

然而雨季来了，一场暴雨冲垮了大坝，也冲走了地里的土、肥和禾苗。社员们心痛，陈永贵更是心痛。但是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而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要带领着大家再次上阵，二战狼窝掌。

这年的冬天，狼窝掌第二次响起了劳动的号子。这次他们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教

训，认为是坝基不深，坝身不厚，石块太小，阻挡不住洪水的冲击。于是这一次，他们便加深了坝基，条条石坝的基础挖到1米半深，坝身的厚由1层加到4层，石头也全找那些一个人搬不动的大石头用。为了减缓洪水的冲击，他们还在沟的上方修了一个一亩地大小，约7米深的“水库”，并在山坡上刨了些鱼鳞坑。

将近一个冬天的时间过去了，在春耕前，狼窝掌再次呈现出喜人的景象：30多道大坝整齐排列，20多亩耕地平平展展。春耕播种，夏季锄草，他们又一次期盼着秋季在昔日野狼出没的地方能收获粮食。

天公又一次考验起了大寨人。一阵电闪雷鸣之后，接着便是倾盆大雨。据人们后来回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陈永贵从睡梦中被大雨唤醒，他披了件衣服，提着盏马灯就奔狼窝掌去了。在暴雨中，他仍能听得到那一条条石坝轰然倒塌的巨大声响，这一声声的巨响告诉他：狼窝掌仍是野狼的家园，那里长不了庄稼。

苍天这一次给予大寨人的打击不能算不重，除了陈永贵以外，许多人都动摇了，各种风凉话、泄气的话、讽刺挖苦的话都在村里传开了。什么：“人有人道，鬼有鬼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水闸住，水往哪流？”什么：“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人有多大本事，还能斗过龙王爷！”还有人说这是“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更有人说：“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冬冻，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陈永贵认定的事，就不会半途而废，他一定要干下去，而且一定要干成功。这种性格在以后的岁月里，助他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当然，后来也给他惹下了不少麻烦。

在第三次会战狼窝掌之前，陈永贵和大寨村党支部的干部们一起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共同寻找失败的原因，制定了新的方案。这个新方案变直线坝为拱形坝，拱背朝着来水的方向，以增加石坝承受洪水冲击的能力。据说这个方案是陈永贵躺在他家的土窑洞里想出来的，是窑洞顶的形状给了他启发。他抬头望着窑洞顶想：窑洞的上面是一座土山，但窑洞为什么不会被压塌呢？他想明白了，因为窑洞顶是拱形的。由此他又想到了天天走过的那座石桥，那桥是什么年代修建的，陈永贵也不知道，反正是很早以前了。这么多年，天天那么多的人、车负重从桥上通过，但桥却从不会倒塌，为什么？还是由于拱形承受着重量。如果将狼窝掌里的石坝也筑成拱形的，洪水来了不是也不会被冲垮吗？

陈永贵虽然没有学过什么物理力学，但他勤于观察，肯动脑筋，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情况，想出别人想不出的办法。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自己有了主意，还要说服党支部委员和全体党员。陈永贵又召集了支部会议和党员大会。他把自己拿定的主意说给大家听，让人们讨论。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怕摔跤还能爬山！不能从狼窝掌撤退，不能挫伤人们革命的锐气，不能让阶级敌人高兴，不能给共产党、集体经济脸上抹灰！大家的劲头又被他鼓动起来了。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的？”

关键时刻村党支部支持了陈永贵，陈永贵激动地噙着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

自己人!"

第三次大战狼窝掌的劳动号子又吹响了。这次的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 32 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 8 米多，灌浆用的石灰就要 3 万公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水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大家都争着要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 17 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 户社员全家上了阵。当时，只有 60 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 70 多人出了工。

陈永贵把三战狼窝掌当成了一场战役，他就像个战场指挥官一样调兵遣将。所不同的是，作为一名指挥官，他永远是身先士卒，出现在最危险、最艰难的地方。陈永贵是个垒坝的能手，石头不论大小、方圆，只要到了他的手里，就变成了听凭摆布的东西，放在哪里都合适。太行山区的冬天，北风刺骨，但有陈永贵带头，人们个个奋勇争先。陈永贵一边干活还一边鼓舞士气，他说："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

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财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如今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工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

开工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财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了冰凌，又叮叮当当干了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这可不是冰碴饭了，而是整个冻成了冰疙瘩。贾进财感到肚子饿了，拿起饭来就啃。有人劝他点火烘一烘，他说："这算什么！咱这苦里生穷里长大的人，没那么娇嫩!"大家听了，更感动了，议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财却笑着说："狼窝掌 20 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贾进财就是这样，哪里条件最艰苦，哪里活最累，他总是在哪里出现。因此，他也被大寨村民誉为老英雄。由于常年的过度劳动，贾进财的身体也落下不少的病，因为一辈子握锤把打石头，他的手已变了形，这双手，谁看了都会为之感动。许多人都用文学语言形容过这双手，有人形容这双手像"百年老松的树根"，有人形容像"磨损了短了钝了的铁耙"、像"铁一样的老茧，敲上去铮铮有声"；有人形容他那关节大得像"叽枚乒乓球"。他由于常年抡锤击石，下肢长期过力地支撑，使他的脚板变得扭曲，尤其是到了晚年，每一个脚趾骨节都粗大变形，第二个脚趾被挤翘起来压在大脚趾上，无法穿鞋，无法行走，最后，竟不得不动手术把第二个脚趾割掉！

1992 年 5 月 28 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山西省领导的陪同下视察大寨，当他在贾进财家与老人握手时，朱镕基握着那双因为长期劳动已经严重变形、布满老茧的手，心情沉重地说："你是一个老功臣，一辈子吃苦了。"

那时候在工地上拼命干的决不只是一个贾进财，在征服狼窝掌的战场上，大寨人个个都在往前闯。此时，当年跟随陈永贵在"老少组"里劳动的娃娃梁便良已经成为第一

生产队的队长，他与村支部委员贾来恒等四人在没膝深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山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任务。

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大干了 27 天，比计划提前 3 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这个自然界给大寨人设置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终于被攻下来了。

从大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整整过了五个冬春。在这五年时间里，大寨人把七条沟的"命"给革了。在那里垒起了总长约 15 公里的 180 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 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 300 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 4700 多块地修成了 2900 多块，还新增加了 80 多亩好地。

把大寨人艰苦创业的过程说成是战天斗地，一点都没有夸张。从 1953 年到 1962 年，十年功夫，他们把 200 亩梁地大部分围起了一尺多高的地埂；400 亩坡地修起了笔直如墙的石堰，变成了水平梯田；7 条共 14 里长的山沟，治理成 30 尺一坝、20 尺一埂的 80 亩好地；经过土地加工，使原来 4700 多块地连成了 2900 多块。在没有水浇、电力和机耕的条件下，粮食亩产量从 65 公斤增长到 387 公斤，家家户户丰衣足食，78 户有余粮存款。11 年中，共向国家卖余粮 85 万多公斤。

第二节　营造"海绵田"

大寨人有文化的少，像陈永贵也不过是后来读了几天扫盲班识了几个字。大寨人干事情肯吃苦，肯出力，甚至不怕牺牲。有的人就是在大寨改天换地的劳动中落了疾病，留下伤残，还有人献出了生命。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大寨人只知蛮干，不讲科学，那就错了。

大寨村早先流行过一句顺口溜："这块好，那块好，哪块也不如贾承恩的掏银垴"。贾承恩是大寨村的一个农民，土改前他在掏银垴那里有一块地亩产能打到二三百斤，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产量了。但到后来，大寨随便一块地就比他的那块地原来的产量高。

大寨村的自然条件很差。修水库防洪、灌溉，没有合适的库址。引水灌溉，山上没有水源，引远处河水提水灌溉，扬程太高。而且灌溉只能解决旱的问题。但是，这并没有难住大寨人，大寨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根据当地常年雨量并不算少，坡地、梁地的土层也比较厚的有利条件，采取提高耕地蓄水保墒能力的办法，抗旱、抗涝。即：设法使雨季、雨天既不致造成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又能把雨水保存起来供应旱季、旱天农作物生长的需要，由土壤承担起对农作物供应水分的调节作用。

在土地治理中，大寨人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步，修水平梯田、闸山沟淤地，做到"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克服水土流失；第二步，通过深耕、深刨、客土和大量施用有机肥料等措施，加深了耕作层，改善了土壤团粒结构，大大提高了土壤蓄水保肥的能力。大寨耕地疏松的活土层几乎都在一尺左右，就像一层一尺厚的海绵。另一方

面，又采取相应的措施，培养土壤的肥力，使土地成为农作物的一个储存养料充足的供应仓库，促使农作物生长，增强抗灾能力。大寨村经过加工改造的土地，经受了一般旱涝的考验，保证了农业的稳定增产。这是大寨人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这种加深土地耕作层，提高蓄水保肥的能力，培养土壤肥力的经验，在农业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那些发展水利灌溉的条件十分困难，但常年雨量并不太少的旱作地区，则具有特殊意义。

大寨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高产稳产的代名词，在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地都在修大寨田，人们把山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就叫大寨田。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寨田，并不是实际上的大寨田。真正的大寨田，应该是水平的“海绵田”。

大寨人除了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还通过不断深耕土地、连年不断地大量施用秸秆沤制的农家肥，使耕地里腐殖质增加，团粒结构增加，微生物增殖快，结构绵软，十分有利于农作物根系发育。这种地，一脚踩进去，像踩在棉絮上一样，国家农业部将其总结为“海绵田”，并在北方普遍推广。这种田，保水性能好，肥力高，抗旱能力强，因此是稳产高产田。

大寨田并非古来就这么肥沃。恰恰相反，陈永贵等大寨人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是一小块一小块贫瘠的土地，人们形容当时的土地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了个严。一亩地好年景打不下 70 公斤粮食。合作化以后，大寨人多采用“土掺沙”、“沙掺土”相互调剂的方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们便在增加土壤腐殖质上下了功夫。

他们的具体做法简单说就是秸秆还田。这就是在秋后把玉米、高粱等秸秆铡碎铡烂，然后掺水，拌上圈肥或人尿粪，搅和后用土蒙盖起来，使其发酵。等秸杆完全腐烂后，撒在地里。采用这种办法，每年大约有 20 万公斤秸秆还到田里，每亩要有 250 多公斤玉米秸杆沤肥还田，加上其他农家肥，每亩地一年施肥多达 80 万担。年复一年的大量施用农家肥，使土壤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厚厚的活土层，既松软，又能够吸收水分，这便大大提高了耕地的蓄水保墒能力。山西大同市郊区的农民有一次来参观，用自己戴的毡帽装了一毡帽大寨土和自己那里的土做比较，同样一毡帽土，大寨的土要轻 7 两。这就是全国有名的大寨田。因为它踩上去很松，所以被称为“海绵田”。

大寨人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又抓住了扩大种植玉米面积这一重要环节，充分发挥玉米的高产潜力。

玉米是当地的高产作物。但是，由于玉米生长需要水肥比较多，过去只有 30%左右的好地勉强可以种上玉米。大寨有个老传统，即沟地、肥地种玉米，坡地种谷子，梁地薄地种豆子和高粱。按过去大寨的气候、地力、土质，这种布局安排是合适的，可集体化以后就不行了。以前，地是各家的，豆子烟叶瓜菜都要种。后来地成为了合作社的，各社之间产量竞争越来越厉害，而玉米产量最高，可大寨满打满算也不过 200 来亩沟地、肥地，要扩大高产作物就得往坡上挤、梁上挤，于是玉米便把其他的农作物都挤跑了。在当时人们生活还普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在农民眼里确实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1957 年大寨将 80 亩种那 4 种农作物的地减成了 5 亩，粮食总产量也就由过

去的10万公斤增加到了20万公斤，也就是说产量增加了一倍。可豆子少了，谷子少了，还有瓜菜等都减少了。可村民们的生活中又不能没有豆、麻和瓜菜等品种，总不能天天光吃玉米面吧？这一年增产了反倒弄得村民们有意见。

又要产量高，又要花样多，怎么办？他们就搞试验，试验带种、地区间作。先试几分，再试几亩；先试一种，再试几种。几年工夫，他们就试验出了一个新套套，叫做“四不专种”和“三不空”。

“四不专种”和“三不空”是大寨人在种植方式上的一种创新。所谓“四不专种”就是：黑豆不专种，菜不专种，麻不专种，瓜不专种，都带种在玉米地和谷子地里。所谓“三不空”，就是地边不空，地头不空，地角不空。这就是说没有地方能空了。陈永贵算过一笔账：大寨有2900块地，每块地有一道边，两个地墙，四个角，加在一起就有30多亩地，能种7万多株苗。如果按亩产350公斤计算，就可以多打1万多公斤。他把这笔账算给社员们听，社员们觉得是这个理，就按着他说的办了。“三不空”配合起那个“四不专种”，高产把稳了，品种也全了。人们高兴地说：“这是大寨的一件宝”。后来在大寨还有几句顺口溜专门称赞这种种植方法：高垅地掉塄瓜，低龙种小麻，垅堰根底种高粱，大豆满地爬。春天吃菜有芥辣，秋天摘回大倭瓜。

由于搞了“四不专种”和“三不空”，到60年代，大寨村的玉米种植面积已扩大到占耕地面积的65%左右。

第三节　“三浅”变“三深”

大寨人种田有不少创造，“三浅”变“三深”就有大寨人创造的成分。玉米“三深”种植法，是大寨人粮食高产的主要技术经验。这一套成功的经验，是大寨人总结本地经验和学习外地经验，并经过长期的科学实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浅”是指浅耕、浅种和浅锄，“三深”就是与三浅相对应的深耕、深种、深刨。

农业合作化以后，大寨人首先抓住了春旱、土薄、水土流失等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闸沟垒坝、修水平梯田等农田基本建设工作，初步控制了水土流失。在治山治水、增施肥料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和可能，扩大了玉米种植面积，并且逐步创造和推广了玉米“三深”种植法，即由秋季浅耕改为秋季深耕，浅种改为深种，定苗后浅锄改为深刨。大寨后来的生产实践证明，玉米“三深”种植法是当地玉米稳产高产的综合措施中一个重要内容。

大寨位于晋中东部海拔1000米左右的太行山麓，是个典型的土石山区，自然条件的特点是：“沟深坡陡土瘠薄，出门上地就爬坡，一亩土地五六块，旱、洪、风、雹灾情多。”全年无霜期仅160至170天，年平均温度9.1度。年降水700毫米左右，但分布很不均匀，主要集中在7、8、9月。这里又缺乏水利资源，全是旱地，经常遭受春旱秋涝和夏季洪灾的威胁。过去是“地里上粪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水、土、肥三不

保，农作物产量很不稳定。

为了战胜春旱秋涝和夏季洪灾，大寨人除积极采用工程措施，闸沟修坝、蓄水排洪以外，还根据玉米的生物学特性，采取耕作栽培措施——“三深”种植法，中心目的是把大部分雨水蓄存在较深的土层里。这样，既满足了当年玉米生长发育的要求，又有保水、保土、保肥的作用，把当前生产和长远利益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没有水利条件的土石山区创造了玉米连年稳产高产的范例。

玉米“三深”种植法的主要内容是：秋后深耕蓄墒，变秋涝为春墒；深种防旱、保苗、蹲苗；深刨蓄水养墒、蹲苗。

“三深”种植法也不是一步实现的。1956 年秋后收割，陈永贵发现改出来的沟地亩产 250 公斤，而坡上的耕地亩产好的才 150 来公斤，差的只有 50 多公斤。后来他悟出了道理，沟地里每年淤土，土层厚，旱时有水，涝时又滤水。

合作化以前，由于耕畜少，体力弱，秋耕深度只能达到 3 寸左右。因此当地流传着“三寸三，走遍天”的说法。合作化以后，耕畜多了，为深耕创造了条件。大寨大部分是用牛耕地，不能一次耕得很深。从 1954 年开始，他们用套耕的方法，前面用一犋牲口犁过去，后面用一头牛走犁沟内，带上去掉犁镜的犁铧，深串 2 寸，总深度可达五六寸左右。这样就突破了犁底层，使耕作层加厚，促进土壤熟化，增强了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减少水土流失，变秋涝为春墒，缓和了春旱，为玉米稳产高产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从 1954 年到 1958 年，他们用套耕的方法，将大寨土地轮耕过一遍。以后由于活土层已经增厚，并采用了玉米深刨的中耕方法，就停止了秋季套耕。这是一深。

有一年贾承让给一名军属耕地，种得深了，迟迟不出苗，长出来也不好看。而陈永贵种得浅，出苗早，又长得壮。但拔节的时候，陈永贵种的那块地就越来越落后了，而贾承让种的地里庄稼越长越好，一亩地多收了六七十斤。这件事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也使他对深种有了新的认识。

昔阳一带长期流传着一句农谚：“深耕浅种，强如上粪”。按照这种传统，玉米一般种 2 寸深。过去土薄肥少，为了利用表层肥土，浅种是合理的。但经常由于春旱，很难全苗。合作化以后，生产条件改变了，需要采取新的栽培措施。

经过试验，大寨改用犁开沟点播玉米。播后用脚踢土少许将种子覆盖，再在上面踩一脚，使种子覆土深浅一致。如果地墒不好，要死踩，踩实，可起提墒作用。如果土壤湿润，要活踩，轻踏一下，以免形成土壤板结，不易出苗。踩后集中穴施沤制成熟的磷肥和条施有机肥料，起到保温和节约用肥的作用。然后再覆土耱平。这种播种方法，在深播的情况下，有利于种子发芽出土。大寨玉米深种的深度，因地因品种而不同。向阳的坡梁地，地温上升快，土壤湿度低，出芽快，适宜深种 3 至 4 寸。背阴沟坡地，地凉潮湿，发芽慢，只能播种 2 寸半至 3 寸深。活土层薄的种浅些，活土层厚的种深些。这是二深。

玉米深种，在春旱严重的土石山区，不仅有抗旱保苗的作用，而且可以蹲苗发根，控制幼苗早期生长过旺，促进根系下扎，扩大吸收面积，增强后期抗旱能力。因此，深种的玉米后劲大，越长越好，产量高。

玉米深刨是1958年大寨从外地学来的先进经验。当时人们还议论纷纷，有的说："自古以来用锄头锄地，没有听说庄稼用镬头刨。"有的说："深刨会刨断根子，跑了墒。"原规定深刨6至8寸，有的人赌气就刨了1尺深。刨后一连10多天不下雨，玉米苗子蹲得好。以后暴雨一来，由于深刨地松，蓄水能力强，一点水也没有流走，为玉米旺盛生长时期需要大量水分创造了良好条件。秋后，深刨玉米比上年增产100多公斤。以后他们就年年坚持玉米深刨，并在实践中发展了深刨的技术。

后来深刨成为大寨人最具特点的一种田间耕作方式。它要求在玉米定苗后，当苗长到1尺高之前要进行深刨。即用9寸的镢头，在玉米行间距苗2寸半到3寸的地方刨一个鱼鳞坑，要求刨得深，刨得匀，刨得细，刨后不留草，不碎土。刨的时候，人要光脚入地，脚不乱动，以免把地踩实，刨过以后留下一个一个脚窝子，下雨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一个盛水的坑，对土地吃饱水分特别有利。刨的深度因地看苗而异：苗小深刨，苗大浅刨，以免大量伤根和打叶。沙地、漏地（土层很薄，下面是石头底子的地）和淤土地不宜深刨，以免水肥下渗流失。通过深刨，早期可以蹲苗发根，以后又能蓄水保墒，还能减轻地面径流，控制水土流失，防止夏季洪灾。深刨对于清除杂草，特别是宿根性杂草，作用更大。这样做既对当年玉米生长有利，又能促进土壤熟化，加厚活土层，符合长远利益。因此，大寨人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坚持玉米适时深刨，从不动摇。

大寨人办这件事还在太行山区造成了一场小小的社会革命。因为那里的妇女还挺传统的，过去在外人面前，妇女脚上不能没有鞋，因此，也就不能光着脚下地干活。大寨妇女后来光脚下地，党支部还做了不少工作。

大寨玉米"三深"种植法，是在长期科学实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针对当地的自然条件，以农田基本建设为基础，水、土、肥、温四结合，以蓄水保墒为中心。"三深"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秋后深耕有利于缓和春旱和熟化土壤；春季深种有利于保苗扎根，更好地利用土壤水分养分；夏季深刨可以蓄水养墒，提高土壤温度，有利于玉米发根蹲苗，也可以促进土壤养分分解，增加土壤有效养分，有利于玉米旺盛生长，还可以减轻夏季洪灾的威胁，变水害为水利。"三深"的一整套做法，把当年玉米增产措施和长远的培养肥沃土壤、加工改造耕地结合起来。深耕为深种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深种以后再加深刨，就能更好地满足玉米对土壤深层水、肥、气、热的要求。大寨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产高产，"三深"种植法立了大功劳。

第四节 种试验田

大寨人种田有不少创造，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年年要有"新套套"。这些新套套有的来自长期种田积累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来自种试验田。

一次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告诉大寨人：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

拉下粪，上到地里要传染。村民们听了半信半疑，他们觉得技术员是故弄玄虚，因为大寨人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谷草喂牲口，也没有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对此，陈永贵主张试验。他弄了 8 分谷地，专门施用白发病谷草沤成的农家肥，春天苗出得不错，夏天长得也好，到秋天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 根苗就有 82 根害上了白发病。村民们也都服气了，都承认科学技术厉害、管用。

按新技术要求，作物要适时播种。所谓适时，就是要适合地温。大寨是山地，谷子宜迟不宜早，玉米宜早不宜迟。这与老辈子的说法也不一样。老年人都说："小满玉茭，不迟不早"，所谓玉茭就是玉米，也就是说农历小满时节播种玉米。又说："小满谷，不如不"。意思是说，小满播种谷子就太晚了。到底哪种说法对？大寨人又作了试验。试来试去，发现新的说法对，旧的说法不对。芒种种上谷子，二伏天吐穗，既防了旱，又不怕"雾花"；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水浸倒伏。村民们看了试验，都信服了。他们说："要增产，还得靠这些新套套哩！"

为了提高产量，大寨人搞合理密植。大寨搞密植也有便利条件，这就是大寨的坡地、梁地多，地块小，通风透光比较好，而且经过改造，土壤肥力已大大提高。密植当然要有个数据，一亩地种多少株苗才算合理密植，这也要搞试验。他们分别在三块地里试验，将一块地种了 2000 株苗，另一块地种 1500 株，还有一块地种了 1000 株。结果发现只要管理得当，合理密植可以增加产量。当然，土质不一样，株数也不一样。于是他们就反复试验，一次看不清，再试一次，最后，将玉米种植由过去的每亩 800 至 1200 株，增加到 1600 至 2200 株。而且，同一块地里因为边行比中间通风透光条件好一些，所以，地边又比地中间种得稍密一些。于是密植就成了玉米大增产的手段。

庄稼有几十种，每一种又有许多品种，大寨光谷子就有十种，哪种最好？哪种产量高？也要搞试验。试验来试验去，最后定下来两种，一种叫大寨谷，一种叫毛植红，它们的产量比其他品种产量高许多。在玉米种植方面，经过试验，播种期提早了半个多月。并随着播种的提早，相应地淘汰了生长期比较短的玉米品种，扩种了生长期比较长、生产潜力大的金皇后等良种。

听说化肥能提高产量，他们就买回了许多磷肥，开始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往地里上化肥。结果，春天撒到地里，秋天还是灰面面，没有任何作用。他们便再次试验，又失败了，就第三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成功的途径。他们把磷肥和成泥汤汤，与农家肥拌在一起，发了酵，再配上 5% 的氨肥，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肥使用起来。经过试验后，他们给玉米施用了过磷酸钙的磷素化肥，促使玉米茎秆坚韧，子粒饱满，子粒出粉率比未施磷肥的提高 5% 以上。

原来大寨的大田作物就是玉米，从 1958 年开始，大寨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试种小麦，结果也成功了，这就使得大寨的粮食品种更丰富了。

庄稼种在地里，如果遇到一场灾，地里缺了苗，再种是不可能的了。而太行山区天灾随时可能发生，他们就寻找解决的办法。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个村民说："每年雨天锄苗，把拔掉的谷苗扔在地边，雨后，有些谷苗还大模大样地长了起来，咱们能不能试试谷子地里移苗？"

他们就开始试验。他们将间下来的谷苗移栽到缺苗的地方，浇上水，果然有效，谷苗大多数都能成活。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成果推广开来。后来，他们又针对高粱和玉米的断垅进行移苗试验。开始有人说，玉米不比谷子，它根大茎粗，不好成活；还有人说，移苗时必须带着土胎，否则活了也不会出穗结子。为了证实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就试验。经过反复试验，他们发现高粱、玉米都可以移栽，而且带不带土胎都可以结出穗子结出果实。

大寨的试验田越搞越红火。山后的试验田搬到山前来，差地的试验田搬到好地里来；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也有试验田；两个生产队长有试验田，村民们也都有试验田。坡地有坡地试验田，沟地有沟地试验田，梁地有梁地试验田。他们试验各种作物、各种技术，真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第五节　干部，先干一步

陈永贵有一句名言："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从互助组时起，大寨的干部就坚持做劳动的楷模。合作化以后，农业社无论干什么活，总是由陈永贵、贾进财、贾承让、梁便良这些人干在前面，由他们带领村民们冲锋陷阵。收工的时候，其他社员扛起工具回村，陈永贵等干部还得留下来检查当天的农活。正是由于干部们本身劳动过硬，大寨的社员们才干劲冲天。

陈永贵在入社以后的第一个支部会上就宣布：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人就不能算是好干部。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陈永贵用人的一条原则，哪个干部劳动不积极，首先就过不了他这一关。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稳妥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主张。同年 10 月 4 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开幕。248 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致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此后，合作化跳跃式发展，在初级合作化基本完成的同时，高级合作化的高潮也随之而来。

这一年的 12 月，大寨与几个相邻的村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陈永贵由于忙于高级社的事务，就安排一个党员负责大寨村的生产。这个人只注意抓村里的各项工作，而忽视了参加劳动这一环，陈永贵回村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大为不满。在一次由他主持的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叫这个党员汇报近期的工作。他刚汇报了一半，就被陈永贵打断了。陈永贵问他："这三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那人知道陈永贵不高兴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说，最近事情太多，工作太忙，没有顾上参加劳动。陈永贵提高了嗓门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忙还是你忙？我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你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都不到，还能把工作搞上去？"就为这件事，陈永贵在会上当场宣布撤销他的代理生产队长职务。

有一句从大寨讲起的话，后来曾经传遍全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车头就是指领导干部，领导干部靠什么来带动火车跑得快呢？陈永贵认为，就是靠参加劳动，而且要在劳动中发挥模范作用。

根据陈永贵的提议，大寨党支部曾经为干部参加劳动作出了一则"三不准"的规定：一是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二是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三是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干部给社员做工作，都要利用"三会"时间，即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每天晚上，党支部委员们要在一起开碰头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安排。安排的结果在第二天的饭场会上宣布，也就是边吃饭，边开会，边议论。这是一种不占用劳动时间的开会方式，大寨的干部很重视这种饭场会，虽然参加饭场会不记工分，但谁要是不参加，还要说出个理由来。据说陈永贵以后到中央做了大官，还曾在大寨询问过某某人几天没有参加饭场会了。饭场会开过以后，放下饭碗大家就一起下地干活了，干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找社员解决，那就只能利用劳动中间的休息时间，大家坐在地头上，抽袋烟，喝点水，干部们乘机谈些劳动安排或其他事情，这就叫做地头会。后来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地头会又与政治学习、社员讨论、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成为大寨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是后话。

大寨党支部的许多工作能够布置得开，群众能够指挥得动，有时主要并不是靠开会动员，而是靠了干部的率先垂范。

一次村里决定要盖房子。在社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提出石头从哪里来，怎么往村里运石头的问题。还没等会议统一意见，陈永贵就说："算了吧，这个事不讨论了，到时候就有了办法。"自从农业社开始，陈永贵在村里就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凭着率先垂范取得的。尽管房子过几天就要动工兴建了，马上就要用到石头，但陈永贵不让讨论，会议也就不再讨论，但大家心里并没有底。

第二天上午劳动，中午收工的时候，陈永贵走在路上，找到路边的一块大石头，把工具放下，叫过一个社员指着那块石头说："你给我搬上肩。"在那人的帮助下，陈永贵扛起石头往回走，别人看见陈永贵这个架式，也都纷纷找到石头扛了起来。一些走在前面的人这时也只好折回来扛石头，而头一天晚上参加社委会的人们此时方如梦初醒，不得不跟上陈永贵的节拍。团支部由此得到启发，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并规定了"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临时制度，上工时"捎带着"担粪，下工时"捎带着"扛石头。当天晚上，陈永贵夸奖说："孩子们干上来了，老的怎么样？老将上马，一个顶俩嘛！"从此，他们就利用下工的机会，一天每人捎带两块石头，不几天就把盖房子需要的石头都捎回来了。陈永贵面对那堆石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说："要在会上讨论，怕到现在也讨论不出个办法来。可这几天一不派劳力，二不出工分就把石头搞回来了！"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没有通过会议作什么决定，没有通过干部搞什么动员，没有占用什么劳动时间，完全凭着群众"自愿"就把盖房子用的石头"捎"回村里。这件事后来传到昔阳县委，被作为"身教重于言传"的典型事例而广为流传。

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昔阳县委所说的身教重于言传。陈永贵和他所领导的大寨党支部中的一班人，是否读过孔夫子的书，是否知晓这些古典语录，我们不得而知，但出于中国农民朴素的务实心理，他们在工作中确实在不断实践着先哲所提倡的这种"身教"。

陈永贵从互助组时起，一直坚持着"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就是到区里、县里参加会议，他也很少空着手去。走的时候，他要么捎上一些村办企业生产的粉条拿到县烟酒公司卖，要么就拉上一车水果先到市场里出售。散会回来的路上，他也总要找点活捎带着做。在一次县委召开的会议上，县领导还公开表扬了他，赞扬他来县城开会还要利用来回的路上为村里办事，说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后一些社长们就留心观察他，看他这次回村捎带干什么。结果发现他早已买好了一头猪正往村里赶。原来最近大寨社委会决定要扩大集体的养猪场，他给村里便买了一头怀仔猪捎带着赶回去。

大寨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事迹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重视。县委发现，除了大寨村，其他两个县里的先进典型——刀把口和白羊峪也有同样的特点，而那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合作社，大多存在着干部不参加劳动，而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这种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阳县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时昔阳各乡村刚实行集体化不久，干部的比例较大。一个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等，他们都不参加劳动，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危害：一是养的闲人多了，增加了群众负担；二是基层干部却高高在上，不深入生产实际，也就难以指挥好生产。当时群众心有不满，但又不敢公开讲，就凑了一些顺口溜。其中说道："头等人地边串，二等人打算盘，三等人过阳泉，四等人下河滩。""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秋收时节地没耕，男女老少一肚气，埋怨干部不上地。"调查中，昔阳县委还发现，在洪水乡的一个村里，由于干部脱离劳动，田间管理松懈，到了秋收季节竟发现有一块地没有下种，搁了荒。这在本来就缺少耕地的昔阳来说，实在不能算是一件小事。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大寨干部参加劳动的好经验自然就容易引起县委的重视，县委还专门为此作出了一个规定，要求全县四级干部都要向大寨、刀把口、白羊峪的干部学习，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使干部参加劳动在昔阳制度化。

昔阳县委领导人像大寨等村干部一样，也搞了个率先垂范。县委书记张怀英、县长王贵科等一班人扛着劳动工具到城关西大街的赤土坡帮助社员整修土地。

大寨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一直坚持了下去。后来陈永贵名声越来越大，成了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会议越来越多，来大寨找他"取经"的人也络绎不绝。但陈永贵一直心系他的那些土地。许多人事后回忆，陈永贵经常为不能下地干活而头痛。一次他到县里开会，在闲谈中对人说："哎呀，自从廖部长走后，三个月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中午饭了！"他所说的廖部长是国家农业部长廖鲁言。廖鲁言在1964年视察过大寨之后，大寨就成为中国农业的一个先进典型，来访的记者，来参观的各方人士越来越多，他们都想采访陈永贵，都想与陈永贵谈一谈。为了不影响参加劳动，陈永贵就躲在地里，连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说："咱是劳模嘛！不劳动

还能当模范！”“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中央的大官，但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却从没有放松。在他的带动下，党支部一班人个个都是参加劳动的模范。据统计，接替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平均每年田间出勤288天，大队长贾承让每年出勤351天，副支书梁便良每年出勤350.5天。

第六节　众人齐心热情高

大寨人向穷山恶水宣战并取得辉煌成就，根本的一条就是靠了集体的力量。大寨村党支部依靠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并通过种试验田的办法，将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山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认识自然，进而改造自然，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实现。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人十年间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量是逐年增加的。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每年用工量达3万多个劳动日，比合作化前增加近一倍。全村男劳动力全年出工一般在300天以上，多的达到340多天，做劳动日380多个；妇女出勤率也很高。在十年里，他们土地加工改造用劳动日10万个，平均每亩120多个，男女整半劳动力平均每年每个劳动力为土地加工改造做劳动日近100个。实行精耕细作后，农业田间管理用工量也大大增加，平均每亩投工20个左右。由于农业生产季节劳动力的紧张，土地加工改造则主要依靠冬季进行。一年有5个月左右时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其中3个多月是冒风雪严寒苦干的。他们在冬季施工中摸索规律，总结出一套办法，例如，常年备石料；选择向阳的地方施工；工地在秋收后即清好垒地边地堰的地基；未封冻前在准备取土的山坡上挖松一层土，上冻后施工取土就比较容易；施工时松土取完后立即再挖松一层，供下一次施工取用，等等。就是这些简单易行的办法，保证了冬季施工，提高了工效，加速了家田基本建设的速度。

改造自然，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还需要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在这方面，大寨人的做法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他们采取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具体做法，花钱少，收效大。例如，施工所需石匠、铁匠本村都有，土地加工改造所需的土、石头，也可以就地解决。需要购买的只是一些钢材和炸药，一年也不过花百十块钱，集体的积累也完全能够解决。如果要计算投资的话，每亩用劳动日120个，每个劳动日值按1元计，即达120元，数目当然也不算小，但是完全是村里自己解决的。大寨村十年来购买了30多头大牲畜和脱粒机、铡草机等农业机械，购买化肥农药等也增加了生产费用。但除1954年曾经用了贷款7000元购买牲畜，并于1955年全部偿还外，再没有向国家要过1元贷款和投资。

当然，大寨人在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中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社会合作。大寨从附近煤窑买煤，解决了燃料，这就可以腾出玉米秸等沤肥还田。国家供应给大寨农业机械如脱粒机、铡草机和米面加工机械等，又派汽车运公购粮，使大寨节省出一部分劳动力投

人农业生产。每年国家供应给大寨大量化肥。粮食部门每年拨出1万公斤粮食委托大寨加工制粉条，使大寨增加了饲料来源，有利于发展养猪积肥，等等。这些支援在大寨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一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不讲这些支援与合作，好像大寨人什么事情都是独往独来，这显然是片面的。当然，讲国家的支援，讲社会各界的合作，其实也并没有否认大寨的成长与发展主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三章　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大寨人坚持做“冷锅上的蚂蚁”

第一节　敞开肚皮吃饭？

作为一个翻身农民，陈永贵对于共产党是有感情的，对于党的每一个号召他都从心里拥护，都要积极响应，坚决照办。他没有多少文化，据熟悉他的人估计，他能够认识的字不超过1000个，能够写下来的字就更少了。这样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的理性判断，使他不可能懂得更多的理论是非。但农民的朴素感情告诉他：凡是上级提倡的，就是对的，就应该照着去办。这成了他的一个特点。他作为大寨村的一村之主，在以后做的许多事情，并不是首先来自大寨村民的意愿，而是来自上级的号召。他认为，上级号召的肯定就是大寨人所需要的，即使一时大寨人得不到实际利益，甚至承担一些牺牲，但那肯定也是为了世界革命，为了亚非拉美人民的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年代。从1957年秋天起，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反冒进”。所谓“反冒进”，就是指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发表的一些批评性意见，采取的一些纠正性措施。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是“反冒进”的一大成果。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在党内一系列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1958年1月，他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提出：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样东西。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反冒进问题，说就是要和反冒进对立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指责，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在这种气氛下，“大跃进”的宣传调门越来越高。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无论是从当时人们的理解，还是党中央所赋予它的确切含义，都是强调高速度。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大

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号召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8年的8月，骄阳似火。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的部分农村。在视察途中，他多次赞扬各地在"小社并大社"基础上新成立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并认为这种组织的名称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他在河南省新乡县赞扬了七里营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他还特别赞赏七里营公社的"一大二公"。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的消息传到了昔阳。毛泽东的赞扬就是对陈永贵的号召，他听了这一消息兴奋不已，第二天就到了邻村武家坪，接着又鼓励几个邻村的党支部书记联合起来创办人民公社。当时人们的热情都很高，上面对于先进集体又是一路绿灯，也不用搞什么试点、论证。于是陈永贵便一呼百应，几天时间就串通了7个村的几十个代表，成立了昔阳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公社建在武家坪，后来又改称为大寨人民公社。它包括了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809户人家，1370口人。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提倡的"一大二公"。

几乎在大寨成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北戴河虽属避暑胜地，但火热的气氛却一浪高过一浪。会议作出了两个对于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一个是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决定要在全国全面推广建立人民公社，快步奔向共产主义；另一个是关于全民大炼钢铁的决定，号召全党为在当年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这就意味着1958年要比1957年的钢产量整整翻一番。

华夏大地热浪滚滚，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发达起来，一些原来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就要实现了，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在中国一国首先实现，而且在一个国家中一些敢想敢干的地方也可以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当时，河北省的徐水县就开始了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工作。还有些地方，更是急不可待地宣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跃进规划。保守一些的是十年八年，中间的是五年三年，心急的是几个月，还有更着急的今天开会宣布，明天就"共产"。湖北省的一个叫跑马乡的地方，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结果会一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个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也不分你的我的了。有人问：老婆还算不算自己的？党委书记吃不准，说要请示上级。

对于大多数地方来说，所谓"共产"，首先表现在吃食堂上，把农民自家的粮食集中起来办公共食堂，搞"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实行吃饭不要钱。

毛泽东此时头脑也很热。在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他曾提倡过为了让农民多吃些粮食可以实行一天吃五顿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提倡过实行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搞"义舍"。在这种风气下，全国许多地方都搞了吃饭不要钱，搞了随来

随吃，吃完就走的“流水席”。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这些号召，对昔阳县和大寨村的工作影响很大。大寨也办起了公共食堂。难能可贵的是，农民出身从饿饭中长大的陈永贵，容忍不了人们浪费一粒粮食。他不相信靠着大寨各家各户的那点存粮就可以搞“敞开肚皮吃饭”。因此，即使在那些沸腾的岁月里，大寨也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没有搞“流水席”和“义舍”，更没有实行一天吃五顿饭。

1958 年 8 月“大跃进”高潮中，中共晋中地委书记王成旺在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的陪同下，在大寨住了四天四夜，总结大寨的经验。那时候，干部下乡吃派饭，还到陈永贵家吃过两次。饭后，王成旺非要如数交钱和粮票，陈永贵笑着怎么也不肯收，张怀英在一边解围：“大寨粮食多，算了吧。”可见大寨粮食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在陈永贵的控制下，大寨人还是苦巴苦结地过日子。他们实行的是一种以人定量的办法，即基本口粮和按劳动日分配相结合，人劳比例是二八开；基本口粮按人定成，一至三岁定四成，四至六岁定七成，七岁以上定十成，一个劳动力要分到 0.5 公斤粮。全村 1959 年的平均口粮为 202.5 公斤，其中基本口粮占 80%，每十成为 171.5 公斤，劳动粮占 20%，每个劳动日多吃 0.565 公斤，指标到户，按月分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实行这种办法，既保证了社员的生活，也节约了粮食。对此，大寨村民确实应当念陈永贵的好，因为是他使得大寨在全国各地普遍闹饥荒的时候，仍能大致吃饱饭。这在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年代里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960 年 11 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池必卿陪同在太原养病的国家化工部部长彭涛到大寨，彭涛在战争年代曾任太行特委书记。那时全国各地的集体食堂还没有解散，池必卿陪着彭涛在大寨食堂里与社员们一起吃了顿饭。饭后彭涛高兴地赞扬说：“大寨的饭不错，比我在省里机关食堂里油还多!”可见大寨当时食堂的伙食还真搞得不错。

第二节　不放高产卫星

搞“敞开肚皮吃饭”、吃“流水席”的前提假设是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没办法处理了，因此才有了一天吃 5 顿饭的必要。那时各地都在追求高产，开始是亩产几百斤，接着是两三千斤，后来就是放“卫星”。能算上卫星的至少也要达到亩产万斤。这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于搞所谓“耕作革命”，实行所谓“科学种田”的人民公社社员和一些头脑昏昏然的农业科学家来说却是敢想敢干的事情。

大寨不乏种田能手，陈永贵就是个公认的种田高手。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通过艰苦奋斗，那一年亩产达到了 270 公斤。这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只能搞到亩产 50 多公斤的穷山村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样的产量与别人的“卫星”相比，就有些不足挂齿了。当时陈永贵已经是山西省的特级劳模了，据后来有人回忆，那一年上

级本来是准备推荐到他进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的，但他却不识实务，不搞浮夸，不吹牛，不撒谎，这使得领导也很为难。

那一年秋后，在太原召开了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陈永贵与昔阳县的几名著名劳模张老太、王殿俊、张银周等人一道出席了大会。在那次会上，陈永贵与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前列就座。李顺达是老劳模了，在合作化初期就因成绩突出而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这次会议的这种安排本身也说明，中共山西省委对陈永贵是非常看重的。在会议讨论中，不少人都在谈论炼钢的事，讨论放高产卫星。陈永贵对此都不热心，他有一个坚持不改的观点：农民就是要种地，把地荒了去炼钢铁，就是不务正业。因此，这也是当年大寨的一大特色。全国几千万人大炼钢铁，大寨居然没有什么动静。

说到高产卫星，陈永贵与人们争论起来。他叼着旱烟袋，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说："亩产千斤、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能打几万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请他们去大寨吃拉面！"拉面那时是昔阳待客的好饭食，但别人好像并不领他的情。有人说，人家打了那么多粮食，谁还用得着到你那里吃拉面。陈永贵又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着。

浮夸当时已成一种社会风气，非一两个人的行为。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位领导在会上摸底，先问李顺达："你的产量能不能上去?"李顺达对浮夸风也极为不满，他回答说："我的产量上不去了。"领导又问陈永贵："你的产量还能不能上?"陈永贵笑笑说："我要能上去，早就报上来了！"省领导对这两位国家和省级劳模的回答很失望，也有些情绪地说："看来你们是落后了！"

为了做通劳模的工作，上级还派晋中水利局的一名干部到大寨找陈永贵谈话。那人劝陈永贵：只要把产量报到 1000 公斤，就可以保证他进北京。陈永贵不为所动，他说："我没有打下的，一斤也不多报，打下的，一斤也不少报。"因此，陈永贵失去了这次进京当劳模的机会，但他的这种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品格在后来也受到了人们更多的称赞。

还在陈永贵在太原开会期间，昔阳县的一些地方已经为提高粮食产量瞎折腾起来了，而且大寨也被裹挟其中。大寨人管那种做法叫刨穴窝竞赛，即刨一个大坑，装进切碎的秸秆，然后再用土埋起来，大概这是要"深翻土壤"吧。为了将这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县里还弄了一面流动红旗，红旗总是在先进村里飘着。如果先进村被更先进的超过去了，就要敲锣打鼓地把红旗送给人家。陈永贵的会刚散，本来想在阳泉住两天，但村里的人眼看红旗保不住了，也怕他回来发火，赶紧派了团支书贾害和到阳泉去找他。

要说阳泉城也不小了，在这里找一个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大家都知道，他肯定是住在最便宜的旅社里。于是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果然，就在一个澡堂里找到了他。

贾害和告诉他，大寨由于没有刨穴窝，流动红旗恐怕保不住了，三天以后就要敲锣打鼓把红旗送给别的村子。陈永贵主动承担责任：穴窝是我不让刨的，丢了红旗我来送，一杆红旗也没多重，我一个人就可以扛着送给他们。别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眼下

就是第一搞土地的里切外垫，第二是组织劳力把秸秆切碎沤肥。

陈永贵原打算在阳泉住三天，因为担心误了送红旗的时间提前一天回到大寨。在路上他看到沿途许多人都在刨穴窝，担心大寨也跟着起哄。回村后他没有进家，直接来到地里，看到大伙都在切秸秆沤肥，心里总算踏实了。他是个农民，农民都明白一个理：人糊弄地，地就要糊弄人；人在地里瞎折腾，土地来年就不肯长庄稼。要想多打粮食，就要多施肥，勤管理。

第二天，陈永贵去给厚庄送红旗。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随行人员。当他把红旗交到厚庄领导人手里时，倒是对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彼此都是庄稼人，谁也明白这种干法对于种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能够顶住瞎指挥风，坚持按部就班种田，当时还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第三节　支援困难社队

大跃进的败象终于表现出来了，中华大地普遍处在了空前的经济困难之中，当时舆论称这种困难是“自然灾害”，又说这是苏联人要债造成的。两种说法都不是空穴来风，多少都有点道理，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造成那几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大跃进”违背了自然法则和经济建设的规律，是 1958 年以来，各地大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的必然结果。这是一次真正的经济危机，它造成了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在不少地方都发生了营养不良、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事情。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去搞社会调查，乡亲们对他说，再这样搞下去，就会弄得路死人绝，到时候恐怕连抬死尸的人都会找不到。作为一个太行山区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不可能知道更多的内情，但邻村普遍没有饭吃他是知道的。至今大寨人在他们办的展览里还称那几年为“自然灾害”，但他们也说到了，那种自然灾害邻村有，大寨几乎没有遇到。为什么呢？他们不肯说，估计心里是清楚的。

经济困难实际上是对前几年瞎折腾的一种惩罚，大寨人没有瞎折腾，也就没有受到惩罚。这不仅在太行山区，就是在整个中国农村也是不多见的。

太行山区非旱即涝，天灾年年都有，但只要在一个可承受的限度之内，就算好年景了。1959 年是先旱后涝，但没有成大灾，大寨亩产量达到了 300 公斤，人均口粮达到 225 公斤，大队的储备粮也比上年增加了。1960 年又遇到比上年严重一些的干旱，但大寨有了“海绵田”，普通的干旱能抵御过去，亩产量又比头一年提高了不少，达到了 325 公斤。但此时，大环境是经济困难时期，穷村挨饿，富村难免要被“共一点产”。那年晋中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落实当年的生产和生活。会议确定，由于困难户多，有粮食的村子，社员人均口粮定为 175 公斤，最多不超过 190 公斤。175 公斤也好，190 公斤也罢，都是指原粮，也就是带着皮的粮食。把皮去掉后，也就是 150 公斤左右。

在几乎没有肉蛋，很少副食品的情况下，一年吃这点粮食是很难填饱肚子的。在讨论中，地委书记贾俊介绍了大寨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从太原赶来参加会议的省委副书记王谦明确表态，大寨人的口粮不低于200公斤，这算是体现了多劳多吃的原则。即使这种在当时说来属于“格外开恩”的政策，今天看来仍很不合理，因为大寨村1960年比1959年每亩地多收了25公斤粮食，但每人的口粮却比上年少吃25公斤。

不管怎么说，大寨人当时是幸运的。他们在那样的年头，每人还能有200公斤原粮，蔬菜瓜果也比别的村好些，虽然不能保证人人吃得饱饭，但饿死人的事情确实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充实。那一年大寨户均向国家卖“余粮”1750公斤。

大寨人关于吃亏、合算的账确实与众不同。一天，县里打来电话，说是某公社的供销社有一套马车连带四匹骡子一并出售，价格十分低廉。这种事情在经济困难时期倒也不少，县里通知大寨无非是觉得他们还有这个购买能力。大寨正在发展的势头上，当然需要马车和骡子。但他们又觉得价格太好了，自己买来就占便宜了。此时，陈永贵想到了金石坡大队，那个大队没有马车，甚至连路都不通。他的意见是让给金石坡。但这样他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说服大寨村的一些人，因为人们毕竟不可能都达到劳动模范的水平；二是即使价格已经很低了，但金石坡仍买不起。

大寨村里有不同意见，陈永贵有办法。后来大寨党支部做过一个总结，说大寨人的脾气就是“好斗，七斗八斗，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后来的总结，60年代初，还不是这样的说法。陈永贵当时的法宝是开会。先开支委会，说服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支委们统一思想了，再开党支部大会，就这样一层层地开下去。谁要是不同意，就说服教育，给他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给他讲亚非拉美人民还没有解放。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五次，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说服不止，早晚让他同意了就算解决了问题。大寨人的这种做法后来推广时被概括为“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这种办法应当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一个村子总要有个权威性，陈永贵的说服教育总要比强迫命令来得温和些。但如果说村民们真的心悦诚服了，恐怕也言过其实。因为对于太行山村的农民们来说，用支援世界革命，支援亚非拉美人民来说服教育他们，显然有些云山雾罩。他们嘴上同意了，但心里不一定服气，甚至都不一定真明白那些大道理。例如有人在谈支援亚非拉美人民的体会时就说过，“压肥”我们倒是天天干，但“拉煤”就要跑很远。他们都不知亚非拉美为何人何事，谈何提高思想觉悟？其实就是大寨的干部们，真正弄清楚了亚非拉美革命的人也很少。70年代中期，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访墨西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那里的人们远不是大寨人所想像的那样急待“解放”。

不管用什么办法，大寨人算是都同意把马车和骡子让给金石坡了，但金石坡既然是穷村，就要穷出个样子来，他们没有钱买这套车马。但陈永贵认准了的事情，就要把它办成。在他的主张下，大寨人先把那套车及骡子买下来，然后再给金石坡送去。这才算是了了陈永贵的一桩心愿。

别人挨饿，大寨村有粮，来借粮的人自然不会少。有集体来借的，也有个人来借

的；有的来借吃的，也有人来借种子。有的人原来帮助过大寨，或者赞扬过大寨，此时来借便觉得心安理得；有的人过去讽刺挖苦过大寨，此时来借粮自然就有些不好意思。大寨人在这件事情上确实表现出了高尚的风格与非凡的大度，不论是谁，只要张开口了，都尽量给予满足。到了该还的时候，有粮食的就还粮食，实在没有粮食的，就按交给国家的价格收钱。在那个有粮就能保住人命的特殊时期，能够像大寨这样处理事情的村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一些邻近的村子原来与大寨不免会有些矛盾，但到了这个时候，几乎都得到了大寨的接济，都对大寨人心存感激，以往的不愉快也就随风而去了。

如果说对于前来借粮的人给予帮助还碍着面子的话，那么对于前来偷粮的人也给予关照就更不是普通农民能够做到的事情了。

一次守护庄稼的人抓到了一个小偷，交给陈永贵去听候处理。既是小偷，就不会是偷大东西，无非是偷点吃的，因为太饿了，就顾不上体面与修养。小偷被送到陈永贵面前，心中十分害怕，认定要受到严厉惩罚了。没想到陈永贵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让他吃饱了饭，给了他几元钱和几斤粮票，告诉他缺粮食吃就来要，但不能糟蹋庄稼。那个小偷非常激动，以为是遇到了菩萨。陈永贵借机教育他："要是在旧社会，你偷在地主门下，跑不了吊在柳树上挨皮鞭打的下场，可现在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我就活，你就死，这难道说得下去吗？我只希望你们一点：你回去以后，想办法战胜灾害，克服困难！"

别人抓来的小偷，陈永贵给放了不算，还给吃给喝给钱花，抓小偷的人当然有意见。陈永贵听到议论后，又拿出了他的法宝：开会。在会上他教育大家说："我们过去打仗，讲优待俘虏，现在搞建设又要优待小偷；你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你们仔细想想，我们的秋粮为什么过去不丢，今年却老是丢？小偷为什么不偷别人，就偷我们？道理很简单哩！过去他们的肚子不饿，今年饿了。别人没有粮食，我们有嘛！这么说，我们如果见死不救，还犯罪呀！你们也反映了，邻村的人不偷，外地人偷，这又为什么？不就是邻村吃过我们的借粮，赞皇、和顺他们吃不上吗？道理也明白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找上门来，正是个机会，我们贴上一顿饭，正好向他们宣传艰苦奋斗，给他们一点克服困难的办法，把生产搞起来，这不是个意外的收获吗？他们学了我们的经验，有了粮食，叫他们偷，他们还来不来？"

陈永贵是个农民，但又不是普通的农民，从处理小偷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很有一些政治头脑。就是这些政治头脑，使他一有机会，便可以从农民群中脱颖而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了一番风云。

第四节　反对"投机倒把"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渡过难关，国家在政策方面放松了一些管制，只要能救人一命，对于做点买卖之类"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开始睁一眼，闭一眼。于是，濒临灭

绝的市场又开始有了一点复苏的迹象。当时货物奇缺，只要有东西，无论要到什么价格，都不愁没人买。大寨就属于少有的有东西的村子之一。大寨村有粮，这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东西，不能拿到市场上卖，其实即使国家允许，凭着陈永贵这样的当家人，也不会拿去卖。陈永贵对于市场买卖关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于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后来陈永贵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除了劳动模范以外，对于“资本主义”的仇视，不能不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作为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他不可能真正弄懂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他所憎恶的资本主义，大多不过是一种想过舒适生活的要求，想通过倒买倒卖挣钱的行为，想穿件漂亮点的衣服，或者与漂亮的年轻姑娘说几句话。这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然的事情，在当年的陈永贵眼里，就是“资本主义”了。

大寨粮食收得多，谷草谷糠当然也就多。在粮食紧张的年代里，这些都是好东西，谷草可以喂牲口，那时的牲口饲料早就被人吃光了，但农活又离不了牲口。至于谷糠则是上好的代食品，因为它总要比树皮、草根、白粘土可口得多。大寨有这些东西，想买的人就很多了。开始村里有人对他讲，平定县城有人收这些东西，价格不低。平定是昔阳的邻县，那人的意思显然是劝他趁价格合适的时候把谷草谷糠卖掉。但陈永贵的答复是：“我们不能搞投机倒把”。所谓“投机倒把”，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概念，意思是抓住一个变动中的机会，把便宜东西转手卖个好价钱。这是很典型的“资本主义”了，所以陈永贵坚决不干。

但村中有好货，不愁人不来。有人逐渐找到大寨，找到了陈永贵。一方是做买卖，另一方是要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思想境界，他们到了一起，就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

来人问谷糠多少钱一斤，陈永贵默不做声。来人主动开出价格：两角钱一斤行不行？陈永贵摇头说不行。那人过了两天又来了，说两角钱不卖就三角吧。陈永贵还是说不行。那人问，你到底想卖多少钱一斤？看来他是准备出大价钱了。但令他大为不解的是，陈永贵报价是：三分。但补充了一个条件：不过不卖给私人，要想买的话，得拿大队介绍信。这一下真的把商贩堵住了。后来大寨果真按三分钱一斤的价格把谷糠卖了出去，当然买方一定要持有某个生产大队的介绍信。这种做法算经济账，大寨人是吃了亏，但算政治账，大寨人觉得他们做得对。

大寨人反感投机倒把，他们自己首先做到不投机倒把。他们村里有一头牛，因为受了伤不能下地，但从外表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寨要把这头牛卖掉，别人去卖陈永贵还不放心，担心卖得价高了，他便自己赶着牛进县城。路上就有人要买他的牛，他一再说这头牛中看不中用，但别人却以为眼见为实，看到的好牛不会有假。后来又上来几个人，他越说不卖人家越是想买，价格也一个比一个给得高。从第一个报价 60 元开始，有人加到 70、80 元，最后竟加到了 100 元。那阵式真有些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拍卖会。所不同的是，拍卖会上谁给的价格高就卖给谁，在这里，你给的价越高越是不卖。我们不知道当时陈永贵在想些什么，估计他一定觉得自己亲自出来办这件事是正确的，换了别人真有可能禁不住诱惑高价把牛卖出去。最后陈永贵还是将牛卖给了县食品公司，对

方给了他27元钱，这才使他如愿以偿。

大寨人不仅自己不搞投机倒把，自己不卖高价谷草谷糠，还见不得别人搞这种投机倒把的行为，并且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他们展开斗争。

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市场上不能公开卖粮食，但可以卖馒头，当然价格是比较高的。开始的时候在昔阳县市场上，馒头卖到了2角钱一个。那时人们劳动一天挣十分工，大多还合不上2角钱，自然买得起这种高价馒头的人不多。大寨人看着这种买卖人不顺眼，就要搅一搅他们的生意。他们派出了不少人，满市场的叫卖声。别人的馒头2角钱一个，他们只卖5分。这么大的差价自然有吸引力，许多人就围住了他们要求购买。当然，他们只是想搅一搅市场，并不真想卖多少馒头。通常的做法是把人喊来了，他们就走，只是在人少了的时候才卖两个调动调动买者的积极性，人多了就又走。因为如果认真卖的话，大寨粮食再多，可能也顶不下一天来。如果今天有谁也学着大寨人的样子，干那样的事，非得让有关部门以扰乱市场的名义给处理掉不可，但在那个年代，搅一搅投机商的生意是受政府表扬的事情。

第五节　成为“太行明星”

大寨村在全国普遍发生经济恐慌的时候不仅自己的人有饭吃，还能超额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而且还尽力帮助周围的社队。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使大寨作为一个明星脱颖而出。

1959年冬，新任晋中地委书记贾俊利用来昔阳大寨开现场会的机会，在张怀英的陪同下，深入大寨搞调查研究，当他看到大寨的土地和庄稼后连声叫好。有人给他讲述大寨50条好汉修地造地的故事，他笑着说：“50条好汉，陈永贵是宋江”。看到大寨的整个情况后，他讲，要树大寨，它是晋中的榜样。又说，大寨的基层支部好，要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学习。

于是，晋中地区掀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热潮。晋中地委的报告报到山西省省委，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作了批示。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同年6月，《山西日报》发表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动员全省党员，特别是各村党支部书记学习陈永贵的榜样，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

1960年9月上旬，山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黄志刚来到昔阳和大寨视察工作。他一路走一路看。那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到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但在大寨看不到这样的情况。他颇有感触地说：“我转了不少地方，哪儿也没有昔阳县的情况好；在昔阳，哪儿也没有大寨好，竟看不出任何灾情，简直就是个‘世外桃园’！”

1961年4月，昔阳县委做出《关于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12月30日，《山西日报》又刊登出署名文章《太行山上一面高产红旗——介绍昔阳县大寨大队逐年增产经验》。

1962年2月，陈永贵出席了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大寨被评为“特等模范单位”，获得省里的奖励。1963年4月，陈永贵再次出席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大寨再次被授予“特等先进单位”称号。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讲话中对大寨大加表彰，要求全省每个农业先进单位都要像大寨那样，不仅自己要把自己队的事办好，还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带好两个落后的队，否则下次不要来开会。这就是随后在山西省农村开展的“学大寨，一带二”运动。

第四章　战胜特大洪灾，坏事变好事

第一节　李顺达来访

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及随后在全省开展的“学大寨，一带二”运动，对在山西的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也是个刺激。据说他散会后从太原回到长治，连中共长治地委的门都不进，马上搭上一辆运木头的卡车连夜回到平顺县西沟村。然后连着开了两天的会，讨论西沟怎么办，会上决定，西沟放下架子，学习三个先进单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业要学大寨，干部要学陈永贵。到了6月，李顺达又决定要来大寨参观，学习“取经”。

李顺达是平顺县西沟村的党支部书记，老劳模了，陈永贵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1951年省里组织劳模代表团去天津郊区参观学习时，陈永贵还在火车上见过他一面。但那时李顺达早已是大名鼎鼎，而陈永贵则鲜为人知。在火车上陈永贵一口一个“李老师”地叫着，但“李老师”似乎没怎么把他放在眼里，只给他讲了几句关于愚公移山的大道理。其实愚公移山的故事陈永贵早就听说过了，在教育别人的时候，他还用过这个故事，但这次从著名劳模李顺达口中再次听到这个故事，他仍觉得那么新鲜有趣。

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大寨早已今非昔比，陈永贵早已今非昔比，李顺达的登门求访就说明了这种变化。

与李顺达同时来访的，还有郭玉恩、武候梨等22人，他们都是著名劳动模范。这是大寨接待的第一个大型访问团。这么多劳模一道来访，就不仅是大寨的荣幸，也是昔阳县的一件大喜事了。李顺达一行人到达阳泉火车站，昔阳县的吉普车已经等候在车站门口。县委领导及陈永贵本人都热情地迎接客人，与尊贵的客人亲切握手。大寨党支部的领导成员更是全体出动，还组织了一些社员在村口搞了个夹道欢迎的仪式。

李顺达等人参观了大寨的山山水水，他们深为大寨人所发扬的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所感动，对于大寨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寨人设便宴招待客人。陈永贵给客人斟满了酒，然后举起酒杯开始了他的祝酒词：“我们首先为李老师前来大寨检查指导工作干杯！”

李顺达赶忙说：“这一杯我不能和你碰了。我今天到你家是向你学习的。你已经走在山西前头了，省委号召向你学习，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应该称你为陈老师才对！”

陈永贵依然举着酒杯，充满感情地说："你在50年代就成了我的老师啦！毛主席为你的合作社作了批示！记不得咱们一块坐火车时我就认识你啦？这师生关系可不能变啊！我提议，拿起酒杯，为李老师登门指导干了这一杯！"

不要小瞧这个农民，他有着一副绝佳的口才。一年后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着上万名党政军各界听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时间，凡听过他报告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以后他能够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大出风头，与这副口才也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李老师"不是他的对手。

酒过三巡，话也就说得多了。李顺达是个实心人，他不仅唱了大寨的颂歌，也实事求是地谈起了大寨的不足。比如他说大寨的水利工程还发展不够，林业是个薄弱环节。此时的陈永贵还远没到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时候，再加上给他指出不足的还是大名鼎鼎的李顺达。他很诚恳地说：我有机会，一定要去西沟看看，看你们怎么发展果园！

那天，大寨人还为李顺达安排了一场报告会，会名就叫大寨大队欢迎李顺达登门送宝大会。会议由陈永贵主持，李顺达作报告。作为一名国家级劳模，李顺达也是见过大世面了。他讲了西沟村的创业历程，讲了毛泽东主席给他们的批示，还讲了他的访苏经历。大寨村民听得也心情激动，掌声一阵接着一阵。

这一年秋收过后，大寨村的陈永贵、宋立英等人又到西沟作了一次回访。同行的还有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在西沟村，最令他们大开眼界的是那里的农林并举。西沟村不仅农业搞得好，还栽了大片的果树。那一棵棵结出果实的苹果树，给陈永贵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回村以后他还多次对大寨人不无羡慕地讲："你们钻在大寨，就总以为咱们干得如何如何，可差得多哩！啊，天外有天呀！看人家西沟，你躺在地下一张嘴，就能咬住树上的苹果！"

那年夏天，大寨刚刚经历了一场洪灾，李顺达问陈永贵有什么需要西沟帮助的，陈永贵笑着回答说："不用，上级给我们送去的救济物资、救济粮食，我们还一概不要哩。你要愿意支援我们，就给我们拿一些好经验、好办法，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吧！"大寨人这种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精神，也给西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节　洪水自天降

中国古代的智者贤人老子有两句名言，叫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两句话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讲的是祸与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大寨村在1963年的经历证实了老子的这两句话。

"大跃进"运动中，大寨人由于顶住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在其他村子闹粮荒，集体经济摇摇欲坠的时候，不仅能够使本村的村民都大体吃饱饭，而且还向国家卖了大量的"余粮"，受到了上级的多次表彰。山西省委号召全省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陈永贵的好榜样，《山西日报》多次刊登文章介绍大寨的先进

经验，不少人都到大寨参观“取经”。大寨确实是名声在外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大雨从8月2日一直下到8日，整整下了7天7夜。

这场洪灾后来曾被大肆渲染，通常的说法是“百年不遇”。直到最近，一些介绍大寨及陈永贵经历的书中，谈到这场洪灾时，仍说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其实大寨村根本没有什么水文资料的历史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某次洪灾为“百年不遇”。

大寨刚遭灾的时候，没有人说那是“百年不遇”的洪灾，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浓笔重彩地写了这次洪灾，但也没有说它是百年不遇，只说是“遮天盖地的暴雨”。“百年不遇”是陈永贵的说法，但他以后又说大寨在1968年遇到的雹灾，1969年遇到的旱灾也都是“百年不遇”的。没有人对这三次灾害作过对比，但我想，如果真有所谓“百年不遇”的话，这三次灾害最多只能有一次属百年不遇。

有资料表明，1996年太行山区又遭洪灾，大寨也不例外，而且比以往几十年间中的任何一次洪灾都要大许多。这样看来，1963年的洪灾也许并不是“百年不遇”。

但不管怎样，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洪水灾害。那7天7夜下的雨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树根高高地翘了起来。大寨村的每块耕地都受到了损伤，20%的土地、石坝、地堰，甚至连地基也冲得净光。全村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在村里，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

这是一次真正的飞来横祸。

但是，此时的大寨人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在狂风暴雨的7天7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些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色如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地塌下来，抢救粮食的工作十分危险。但是，贾承让毫不犹豫地冲进去了，贾吉义也随着冲了进去，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也冲进去抢救粮食。接着又有更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冲了进去。他们冒着窑洞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危险，虎口抢粮。扛的扛，担的担，只用两个小时就把1.5万公斤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轰隆一声响，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地塌下来。

7天7夜，大寨人很少合眼。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村民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有地方住，贾承禄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好火坑。陈永贵的儿媳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但她宁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房子让给更加困难的人家。随着被冲毁的房子越来越多，大家就干脆挤在一块住。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人代会。他是县委候补委员，县里的许多会都要去参加。在会议期间，暴雨自天而降，会议也就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讨论如何组织

全县人民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陈永贵此时的心思实际上已经不在会场上。村里人把电话打到城里向他汇报灾情，但话刚说到半截就断了，原来洪水冲倒了线杆，大寨与县城的联系也中断了。

散会后，陈永贵心急如火地往回赶。但途中的松溪河正发洪水，滚滚洪流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作为在山区长大的农家汉子，陈永贵不会游泳。再说像这样的河流，即使会游泳也无济于事。但是，人一旦坚定了意志，办法还总是能想出来的。结果在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前拉后推的他总算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大寨人又有了主心骨。在洪水面前坚强不屈的大寨乡亲，见到陈永贵后一个个都哭出声来。人们七嘴八舌地哭诉道："金小，咱们的庄稼冲了！""庄窝也塌了！""往后，这日子咋过呀！"金小是陈永贵的乳名，大寨村的一些老人总习惯于这样称呼他。

其实陈永贵也很难过，大寨的山山水水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心血，11年的艰辛毁于一场大雨，他可能比谁都更难过。但此时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金小了，他已经成为一个见过世面，有了涵养的农民领袖。他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他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都会在他的村民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自己表现出悲伤，大寨人就可能灰心丧气，那就真正是前功尽弃了；而如果自己能够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先进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陈永贵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因为谈论那些会使人越谈越泄气，而气可鼓不可泄是毛泽东教给他的一种最基本的领导方法。于是，他便向着没有受到损害的方面问了去：

"人怎么样？"

大家回答说："人都在。"

"牲畜怎么样？"

"牲畜也都在。"

"那，粮食怎么样？"

"大部分都抢出来了。"

陈永贵于是开始给大家鼓气："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说：世间万事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接着陈永贵又详细地给人们"道了喜"。他说："我真的给大家道喜嘛！不承认是喜？第一，遭了这么大一场灾，一个人没有死，人在就是大喜事呀！第二，遭了这么大灾，几十头牲畜没有损失，这是不是喜？第三，咱们的粮食保住了，饿不了肚子，道不道这个喜？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走了旧大寨，来了个新大寨，该不该道喜？"

本来是一场大灾，经他这么一番"道喜"，人们真的开始转悲为喜了。陈永贵还给乡亲们搞了"亿苦思甜"，也就是说一说旧社会的苦，思一思新社会的甜。他说："要是这次大灾发生在旧社会，那就算完了，不知有多少家要死人，要卖儿卖女，要去逃荒要

饭。咱们上了点年纪的，不都还记得1920年那场灾，那时我们陈家整5口，被俺爹卖了3口。如今，俺陈家又整5口，要是我现在张罗着卖老婆孩子，大伙儿不把我当疯子吗?"

陈永贵的乐观态度感染了大家，人们从他的话中得到了力量，一个个新的希望又向他们走来。

第三节　先治坡，后治窝

安排完村里的事，陈永贵又到虎头山上转了一圈。地里的损失确实是严重的，据陈永贵估计，有180亩地不仅当年收不了粮食，第二年的庄稼也不好种。其余的600多亩地里，庄稼倒的倒、歪的歪，还有的被埋在泥里。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蹲下身子把一颗倒伏在地上的玉米苗轻轻地扶起来，又用脚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轻轻地踩了踩，玉米苗还能够站住。这说明，只要抢救及时，粮食还不会绝收。

当时大寨遇到的灾害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地里的庄稼被冲毁严重，另一方面是村里的窑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了。两方面都要及时抢救，但大寨的劳力只有那么多，外面的救济陈永贵又不要。那么就有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了，即救灾先从哪里人手。陈永贵的方针是六个字：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冲倒、被埋起来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窑洞。陈永贵将村里的劳力兵分三路：一路是拿出60%的劳力去扶苗修地，准备种麦；二路是拿出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

把倒伏的青苗扶起来是生产自救的当务之急。大寨人紧急动员起来，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扶起倒伏的庄稼，扶不起来的就几株合起来捆扎，他们戏称这是“组织起来”。大寨在大灾之年仍能夺得粮食丰收，扶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成了大寨人对付天灾的一个法宝。此后，每当遇到灾情，大寨人就要挨着苗走去走来，少了的补，长得不好的下肥，歪倒了的扶正还绑上一根棍子。这就是大寨人田间管理的独特方式——单株管理。

后来，在一次大寨村的社员大会上，有个叫赵小和的人又提出了一个改进意见。他提出，咱们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点上汽油灯给新房平地基、抬石头。他的这个主意获得了大家的赞成。于是，大家便在白天到地里去扶苗修地，晚上则集中在规划好了的宅基地上抬石头，垒砖头，为建设他们的新家园而加班苦干。赵小和提出的这个新方法，后来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今天，当人们走进修建在虎头山上的大寨纪念馆时，还可以看到介绍赵小和事迹的展览。他小时候是一个穷孩子，长大了赶上了合作化。据说开始他并不怎么喜欢陈永贵搞的那种超强度的劳动，表现很不积极，经常受到批评。陈永贵、贾进财曾一遍又一遍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他讲述革命的道理。后来这些道理真的就管了用，赵小和的思想

竟转变过来了。当然，身为一个普通的劳动农民，他的思想境界还不可能达到陈永贵那样的水平，所以，陈永贵仍时不时要对他进行继续教育。他是个赶马车的人，一次他赶着马车给县里某厂家送钢筋，卸过车后他又拿了人家的一根钢筋放在车上弄回村里，因为他见村里建房用得着这东西。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又不是往自己家里偷？但陈永贵批评了他的做法，还给他讲道理，教育他不要拿人家的东西，说这等于损了公家，肥了自己，还要他把钢筋给人家送回去。还有一次，村里派他去买牛，他买了 4 头，却弄了 5 头牛回来，原来有 1 头牛是跟着别的牛自己走来的。赵小和认为这次不同于弄钢筋，牛又不同偷的，是它自己跟来的。这次又是陈永贵教育他，对他讲丢失了牛的主人此时肯定很着急，要他赶快给人家送回去。赵小和不肯，陈永贵就决定自己亲自去送。恰在此时失主找上门来了，大寨把牛给了人家，陈永贵还向人家道了歉，事情才算完结。

赵小和就是死在他所提议的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劳动中。大寨人干活就是拼命，用当时的话说，叫做“革命加拼命”。人们白天在地里干，晚上还要在村里干，而且两个地方都是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咬牙坚持着，没有谁说一句“草包”话。但人毕竟都是血肉之躯，长期超强度的劳动事实上已经伤害了他们的身体。有人后来做过调查采访，发现大寨许多人都留下了腿脚病或者是腰病，这就是长期超强度体力劳动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在那些日子的劳动中，赵小和付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按展览馆的介绍，他是在驾车的路上，马惊了，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在顶住马车滑人山下的搏斗中不幸牺牲。但也有人讲他是太困了，坐在车上就睡着了，大车颠簸，把他从车上颠了下来，轧死在自己马车的车轮下。悲剧发生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他又已经离开了人间。那是一个怎样发生的悲剧，恐怕我们永远也弄不清了。

第四节　“铁姑娘”队

在与特大洪涝灾害的搏斗中，大寨还涌现出了一支“铁姑娘”队。

在抗洪救灾的行动中，大寨妇女接受了扶苗、抢救庄稼的任务。她们卷起裤腿，拿起镬头，在泥泞不堪的陡坡上，重开道路。摔倒了爬起来再往上爬。爬上陡坡，踩着泥水干。大寨的“刘三姐”郭凤莲，领着姑娘们大声唱起歌来：“高山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英雄汉；脚踏岩石头顶天，大寨人民意志坚。……”她们像侍弄自己的孩子似的，聚精会神地细心地把一株株倒下去的庄稼，轻轻地扶起来。腰弯得酸痛了，顾不得直一直；汗流在脸上，顾不得擦一擦。不到 5 天，扶起了 300 亩玉米、200 亩谷子。哪知道，过了 5 天，一场大风，又把几百亩玉米、谷子刮得东倒西歪。看到这种情景，妇女们不气馁，不怕难，她们说：“刮倒了，再扶起来，看‘老天爷’厉害，还是妇女们的干劲大。”开始，大家费了很大劲，一根谷苗总是站不起来，不知是谁想出个好主意：把几根谷苗捆在一起。一试验，成功了。看到谷苗又站起来，别提妇女们那股子高兴劲

了，她们说："那比怀胎十月，孩子呱呱落地都高兴。"这就是被大寨人戏称为"组织起来"的单株田间管理经验。

经过几天的苦干，"老天爷"比输了，几百亩谷苗又全部站起来了。秋收时，大寨在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以后，又获得了大丰收，除留够种子和饲料外，还斤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12万公斤征购任务。看到地里的好庄稼，大队长贾承让夸奖说："大寨共有800来亩土地，分成2900多块，亩亩地里都有妇女的脚印，块块田里都有妇女的汗水。这800来亩土地，从下种到秋收，哪一道工序也离不开妇女，哪一株庄稼也和妇女有密切关系。"陈永贵也说："住稼长得好，有妇女们的大功劳。她们，特别是贫下中农妇女们，个个能够严守阵地，把好关口，有一套过硬的生产本领。"

合作化初期，大寨妇女参加集体劳动是新事，下地时，不敢把镬头扛在肩上走；学习深刨技术的时候，她们还不好意思脱掉鞋光着脚刨。那时，男人也看不起妇女，有的说："要妇女下地干什么，不过在地里多踩几个坑。"有的说："妇女担不能担，刨不能刨，下地只是白混分。"妇女们自己也有自卑心理，怕男人们瞧不起，认为妇女只能在家里做做针线活，做做饭，哪能参加农业生产。

在这方面大寨的共产党员起到了带头作用。别的妇女怕羞，共产党员宋立英就扛着镬头走在前面。陈永贵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办法，向村民进行教育，宣传阶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宣传妇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还向妇女进行补课，说明劳动光荣，妇女只有进行劳动生产才能彻底解放。同时，耐心帮助妇女学技术。

妇女们刚参加劳动时，别说掌握农业技术，就是担三四十斤的粪担也干不了。但她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她们说："没有生产本领，怎么能和男社员一起使穷大寨变富大寨?"她们先练基本功，练粗活。在学挑担上山时，一个个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她们还是有说有笑："这不能担担的肩膀，真是个'财主'肩膀，必须加紧'改造'它。"她们担着粪担跑得更快。干部们怕她们累坏，要调她们干别的活，她们说："不受点累，怎么能学会?"仍然坚持干。"财主"肩膀终于被"改造"好了。接着学细活，技术活：下种、间苗、追肥、深刨等等。

大寨对下种的要求十分严格：种子大小一致、肥料多少一致、深浅一致、株距行距一致。功夫差一点也不行。妇女们开始学时，不是肥料撒得不均匀，就是点种深浅不合标准。有个叫贾田环的妇女，因为过分紧张，不是捏籽时捏多了，就是该放玉米时放了豆子。陈永贵便耐心地帮助她，在地头用木棍划道道，说明玉米和豆子间作的规格和要求，还给她编成顺口溜："玉茭、玉茭、豆"。贾田环也十分用心地学，连走在路了也学习。她还用大石子当玉米，小石子当豆，一边走，一边点；回到家里还练习捏籽。她们经过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

在学锄地时，妇女们开始不会换手，不会走脚步，锄得深浅不匀，锄过的地又踩得平光光的。陈永贵就亲自给她们做示范，一边做给她们看，一边讲如何换脚，如何使劲，如何刨土。还叫每一个老农带一个妇女学着干。妇女们怕把地踩平了，在宋立英和陈永贵的老伴李虎妮的带动下，干脆脱了鞋，光着脚，一脚一脚、一镬一镬地练着干。

经过勤学苦练，大寨的妇女们变得能干起来。特别是几场竞赛，如间谷苗，妇女完成任务又快又好，赛过了男劳力。事实证明，妇女是可以干得好的，男人们也就相信妇女们是能干的。连早先瞧不起妇女劳动的贾来恒也说："妇女们有志气，学会了担担，推平车，深刨，再苦也不叫苦，队里任务紧张，不用妇女可解决不了问题。"

第五节　"三不要"和"三不少"

说祸兮福之所倚，大灾使大寨因祸得福，主要是因为大寨在大灾之年不要国家的救济，完全凭着自己的力量战胜了灾害，夺取了恢复生活和重建家园的胜利。

大寨遭了灾，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派来了慰问团，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从四面八方寄到大寨。从各种渠道还先后有多批救灾钱物拨发下来，大寨人心想，能够自己渡过去的难关就不要伸手讨救济。此时大寨通往县城的电话线也修好了。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了80元的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第二天，公社又打来电话，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又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的干部又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后来公社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大寨的干部又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陈永贵的倡导下，大寨党支部就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一句话，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三不要"大寨人已经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也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鸿义为此还专门找陈永贵谈话，劝他说，今年遭了灾，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购任务，给你减一减吧。陈永贵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后来总结说，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不分农忙和农闲，不分好天和坏天，一股劲地为集体干活。全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105个男女全半劳力，从遭灾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一般的农活外，每人平均恢复、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修建房屋每一个劳动平均投工40多个。

灾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设，需要的石头很多。开山打石头的工具，以往都是由集体购置的，现在遭灾了，要大量添置工具。为了减少集体的开支，党支部还没有号召，村民赵裹小、李银良等人，就自动地购置了一套石匠家具，跟着贾进财学习开山凿石技术。随后又有28个村民自动打制了开山用的工具。

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都离不开钱。大寨党支部决定不向国家伸手，村民们也表现出

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村民李喜庆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来借给大队。他说："集体是大家庭，别人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我不能自己存着钱，让别人受难。"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共83户人家，有57户借出了款，总额是12000多元。

在救灾中由于不要国家的救济，大寨人便格外珍惜每一分钱。搞土地建设，原来计划得花3000多元，实际只开支了300多元。比如，开山抬石头需要12根铁绳、12根铁棍，买新的要花300多元。村民们说：不用买了，自己打吧。他们有一个铁匠，又带了个徒弟，村里只花了3元多钱，把各户的废铁收回来，不但够打铁绳、铁棍用，还打了些其他开山用的工具。

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大灾之年，地里的庄稼仍长势很好，秋天收得了20万公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还向国家卖了许多余粮。

在村里，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40间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窑洞。而且，大寨党支部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5年恢复土地，10年建成新村。当时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后来他们仅用了2年时间就恢复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复土地130亩，整修土地500多亩。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1964年，大寨的粮食亩产达到了404.5公斤，按当时的说法，是跨过了长江。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让社员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大寨新村的住房设计也很独特。它倚着山坡，建起一排排石窑，石窑上面，又盖起一排排青砖瓦房。远处望去，像是一片楼房，又像是一列列的火车车厢。所以人们说它是"似楼非楼"的"车厢新居"。窑洞的两端有车道可以出入各种车辆，中间有楼梯使排排相连，村民上下出入十分方便。后来周恩来到大寨时还曾称赞过大寨新村的民居。

今天到大寨观光的人们，仍可以看到当年的大寨新居，这些窑洞与房屋现在都还住着人。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今天住在这些窑、房里的人开始感到了不便，那就是各家的生活空间比较狭窄，住户没有独立的院落。这是因为那一代大寨人没有想到后人还需要独立空间，他们认为集体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陈永贵说到的事情，大寨人给他做到了。尽管遭了大灾，但通过全体大寨人忘我的劳动，当年就取得了亩产352公斤的好收成，全村粮食总产达到28万公斤，比上一年只减产4%，大灾之年还卖给国家12万公斤粮食，社员的口粮也吃到了200多公斤。由于遭了灾，总收入比1962年少了2万多元，干部和大家商量：今年积累不积累？大家热情都很高，纷纷说：应该多积累，如果不是前几年积累多，这场大灾就过不去。按照大家的意见，这一年大队留的公共积累占总收入的15%。

大寨人自力更生战胜洪灾，在大灾之年做到"三不要，三不少"，使本来就已经名声在外的大寨更加人气旺盛。11月28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中共山西省委又发文件，号召各级党委组织学习大寨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风格。

第六节　自力更生十大好处

凡有人群的地方遇事都会有不同意见，大寨也不例外。在遭受灾害之后，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大寨干部坚持一份也不要，但有的群众就有意见，认为这些东西又不是自己伸手要的，人家给送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要？再说，大寨是重灾区，送来的钱和东西并不是不需要，单凭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要多吃多少苦？多受多少罪？

群众中的这些意见，不可能不反映到村党支部那里去。于是陈永贵就开始给大家做工作。有一次他在党支部会议上说：咱大寨的土地遭了灾，但是咱大寨人的思想上可不能遭灾，如果我们屈服于灾害的压力，就是思想上遭灾，这个灾比什么都厉害！

为了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大寨党支部一连召开了7次群众座谈会，支委们与村民广泛交流思想，以便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那时，陈永贵家的窑洞让给了一个产妇住，他同许多人一样，住在大队办公室里。晚上，别人劳累了一天，一躺下就鼾声大作，沉沉地睡着了，可他躺在坑上，还在翻来覆去地思考问题。他觉得应该多讲自力更生的好处，把自力更生的好处给大家说透。于是，他就总结起了自力更生的好处来。

据一位长期采访大寨新闻的新华社记者介绍：有一天晚上，陈永贵和一个叫李锦荣的下乡干部一起熬夜总结自力更生的好处。陈永贵想一条，李锦荣就记一条，李锦荣想出一条，陈永贵同意，也记上一条。就这样，你一条，我一条，最后凑了十条，这就是后来很出名的那个“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

陈永贵拿着这十条总结要支委会讨论，支委们听了都说很好，就顺利通过了。他又把这十条拿到社员大会上讨论。社员大会在大寨俱乐部的大屋子里进行，会场前面的桌子上放着很多慰问信。陈永贵先叫会计念那些慰问信，念完后他就开始讲大寨的村史，尤其是讲大寨卖谷草、让马车这样的事。党支部还组织老年人给大家讲述1920年旱灾后的悲惨遭遇，并和今天遭灾后的情况做比较，同时讲兄弟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的情形，用以激励大寨人自力更生、苦干实干的精神。陈永贵在会上问大家：“过去遭灾谁来慰问?”大伙说：“死了也没有人问。”陈永贵又问：“你们看现在和过去一样不一样?”大伙说：“那还能一样了!”陈永贵说：“既然和过去不一样，咱们就办和过去不一样的事，不要国家一文钱，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把土地和庄窝重新建起来。”于是，自然导人主题。陈永贵把他的自力更生的十条好处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念一条，讲一条。听他这么一念，这么一讲，村民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陈永贵这个“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后来还登在了《山西日报》上，《人民日报》也作了转载，于是这些经验也就广为流传了。后来陈永贵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着上万人讲过它，使它既成为大寨人艰苦创业的一笔精神财富，也成为陈永贵以后跻身中国政坛的一大资本。

第一，自力更生激起了干部和社员更大的革命干劲，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大寨在大灾之年能够做到“三不要”和“三不少”，靠的就是全体村民的冲天干劲。干劲是从哪里来的呢？陈永贵认为就是从自力更生来的。他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总结道：社员们说得好：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园，谁也愿意建设得快一点。为了早日战胜灾害，原来积极的社员更加积极了，过去劳动差的社员也变得积极了。

第二，自力更生能使社员更加热爱集体、依靠集体，自觉维护集体的利益。陈永贵后来总结说，十多年来，我们坚持自力更生搞建设的方针，把穷大寨变成了富大寨，一步一步地吸引着广大社员心向集体。1963 年遭灾后，社员们损失了口粮补上，塌了旧房集体给修建新房。通过这些事实社员们更看清了集体的力量，把集体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陈永贵说：“自力更生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如果没有自力更生，不去艰苦奋斗，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

第三，自力更生进一步增强了社员之间、干群之间的团结，形成了一种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新风气。陈永贵总结说，大寨遭灾后，大队统一制定了恢复土地和庄窝的计划，这个自力更生的计划完成得好坏对每个社员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它把社员的心连在一起，促进了社员相互团结，相互帮助。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也使大家养成了齐心合力想办法的习惯。

第四，自力更生医治自然灾害创伤，不仅有利于当前，而且有利于长远。陈永贵事后总结说，遭灾前，大寨最大的地块是 5 亩，灾后，村里建成了 15 亩大的地块。遭灾前，大寨不少耕地的石坝石块小，地里缺少完整的排灌渠道。灾后，大寨人以更高的标准来建设农田，垒坝，小石头变成大石头；整地，小块连成大块，新增加了排灌两用渠。村民们说：灾害逼着咱们往高处走，咱要一年建成“永久田”，不光咱们这一辈子，下一辈子也不让它坏。

第五，自力更生促进了勤俭办队，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陈永贵引用了村里人常说过的两句话：“顺手飞来的钱花一元也不可惜，自己劳动赚下的钱花一分也心疼。”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就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集体的资金来办事情的，因此，大家处处注意精打细算，尽可能地少花钱多办事。自力更生还培养了社员勤俭持家的好风尚。许多人说：集体的家业来得不容易，自己不能轻易给集体增加负担。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第六，自力更生考验了干部，锻炼了干部，增长了干部的才干。陈永贵认为，办法是困难逼出来的，本领是斗争中炼出来的。如果单纯依赖国家，拿上国家的钱买东西，谁还干不了！哪里还能锻炼出好干部？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就迫使干部在困难面前动脑筋，想办法。1963 年遭灾后，大寨遇到了许多困难和矛盾，克服一个困难，解决一个矛盾，干部就有一次新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是，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了。通过实践，大家认识到：灾害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被困难吓倒；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生产队长梁便良说：“过去常说群众路线，体会不深。这一年可是看清楚了，自己不敢想的事情办到了，自己想不出的办法群众给想出来了。”

自力更生也促进了干部更好地参加劳动。因为干部不带头实干，就不能带动和影响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第七，自力更生能使干部和社员看到自己的缺点，找到差距，并积极想办法消灭差距。大寨灾后搞建设，需要很多木材，不得不花许多钱去外边买。为什么？大寨党支部找出了差距，认为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植下树。这件事也使大寨的干部和群众认识到，生产发展不全面，造林工作没有赶上去。他们又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没有赶上去呢？党支部认为就是干部过去对群众的革命干劲估计不足，常说是劳力缺乏，没有认真地发动群众植树造林。自然灾害逼着大寨人抓这项工作了，结果第二年各项工作任务最繁重，可是造林成绩也最大，一个春季，全村共植树 7500 多株，荒山播种 300 多亩，等于前十年的总和。陈永贵据此认为，"可见，工作上的差距，首先是思想上的差距，自力更生的要求，使我们认识了这个差距，也就有了消灭差距的可能。"

第八，自力更生对巩固人民公社有利。大寨公社共有 23 个生产大队，大家都遭了洪灾，有的队家底比大寨薄，困难多；大寨不向国家要钱要粮，国家就可以重点支援困难多的大队，进一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增进全公社的团结，促进全公社生产的发展。

一年以后，显然是由于阶级斗争风声日紧，也可能是在某个文化人的帮助下，陈永贵修改了第八条好处，将其改成：自力更生打击了阶级敌人的气焰，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陈永贵总结说，刚遭灾，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眉开眼笑，幸灾乐祸，他们说："国家不救济不行，大寨没有那么大力量战胜灾害。"可是我们没有要国家一分钱、一斤粮，依靠集体的力量，恢复了 70% 的土地，把大寨建设得更好，自力更生战胜了灾害，使贫农、下中农更加扬眉吐气，腰杆子挺得更直了，说话做事更理直气壮了，使阶级敌人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认输了。

第九，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给革命接班人树立了好榜样。陈永贵认为，现在的青年人，都是吃蜜糖长大的，他们没有经受过旧社会的苦，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困难。我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就使他们懂得了应该怎样对待困难。大寨村的青年人，经过一年的奋斗，已经认识到：困难并不可怕，只要有革命干劲，靠自己的双手能把幸福争回来。

第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推动了"一带二"比学赶帮运动的发展。通过灾后的生产自救，大寨周围的社队，更主动地和他们联系，互学互帮，积极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虽然这个"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但就其主要方面来讲，还是正确的。当时我们的国家还很困难，需要国家做的事情很多，如果大家遇事都向国家伸手，国家将不堪重负；如果人们都能像大寨人那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则国家的经济调整就容易走向正轨。陈永贵作为一个山村农民，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问题，以国为怀，的确很不容易。

需要指出的是，在医治自然灾害创伤的过程中，大寨村也得到了国家和其他社队的支援和帮助。如大寨公社、白羊峪公社、沿尚公社的许多生产队，有的支援他们工匠，有的支援他们树苗。阳泉市的工业企业，给他们运来了钢瓦和木料。这些尽管都是在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现的，但这些毕竟都为大寨村顺利地进行生产自救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也是后人不应当忘记的。

第五章　大寨开始引起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关注

第一节　学大寨，一带二

大寨是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很早就发现并且一直培养的一个先进典型。还在1959年，晋中地委为了在全专区推广大寨党支部工作的先进经验，就在大寨开过现场会议。1962年，晋中地委为了推广大寨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经验，又向全专区农村提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大寨经验引起中共山西省委的重视，最早是在1960年。这一年的2月，山西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指示，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一个学习陈永贵同志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但是，这个号召并没有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直到1963年3月，在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陈永贵生动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才给了人们深刻的印象，并且又一次引起了省委的重视。在那次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省委总结了大寨的经验，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提出了学大寨的口号；也总结了大寨带动井沟的经验。

井沟是大寨南面的一个贫困村。从1959年开始，大寨开始在经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帮助井沟村追赶自己。到1962年，井沟村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1959年的135公斤提高到202.5公斤，成了全省的先进单位。对此，后来省委总结了陈永贵常说的几句话："咱们爱集体，要爱自己的集体，也要爱别人的集体，更要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一个大队算不了什么，国家是大海，自己不过是一滴水。一个大寨生产再先进，卖的余粮再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全省、全国的生产大队都办得比大寨好，国家还怕不富足，我们还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捣乱！所以，我们诚心诚意希望各兄弟队，都能赶上大寨，都能超过大寨，赶得越快越好，超得越多越好。""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省委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提出了一带二的口号，要求所有的先进单位，都来学大寨、一带二。当然，一带三、一带四更好。总之，要把自己周围的队带动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1963年8月，大寨大队遭到了特大洪灾，他们提出了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三不要"口号。秋收后还斤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疾风知

劲草，山西省委认为，大寨确实是一株社会主义的劲草。当年11月，省委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同时，省委又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大寨十多年来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这样，大寨就成为令人更加信服的一面旗帜，全省的学大寨运动也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学大寨运动中，山西省委还将大寨精神归纳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一条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总路线挂帅。五个要点，就是：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有大胆踏实、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有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高尚风格。

从1963年到1965年底，山西省有组织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县、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已经近20万人。省委认为，这对于推广大寨经验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人们经过实地参观，就对大寨有了感性认识，就便于找到自己和大寨之间的差距，就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学大寨的运动。在运动中，山西省委还批判了阻碍学大寨的两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一种是借口条件特殊，不承认大寨经验的普遍意义；一种是缺乏雄心壮志，自甘落后，不敢学大寨的革命精神。在批判中，省委注意树立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第一个方面的典型是李顺达领导的西沟村。西沟村的干部在李顺达的带领下，1964年春季又来到大寨参观学习。在参观之前，他们组织干部、党员、社员学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检查了盲目自满、故步自封的思想，大破“生产到顶”和“条件不好”的论调。在参观之后，又开展了一次大讨论，促进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提出了“革命精神学大寨，粮食产量赶大寨”的口号。结果，1964年粮食单位亩产量达到了300公斤，改变了1956年以来单位亩产量一直在225公斤左右打转的停滞不前的状态。

第二个方面的典型是晋北专区平鲁县的小庄窝大队。在1963年以前的4年时间内，这个村共向国家要了5万公斤供应粮，2万多元贷款，还欠了一年农业税。1964年春，这个大队的干部在参观大寨之后，用大寨的革命精神，发动群众，大破悲观论调，大立雄心壮志，大鼓革命干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革。果然，1964年来了一个大转变，粮食总产量增长了73%，破天荒地交售了余粮20500公斤，归还了国家贷款2400元，补交了一年的农业税。

在山西省委的领导发动下，晋中、晋南平川，雁北高寒地区，以及太行、吕梁等山区，各地都有不少公社、生产队在学大寨、赶大寨。许多人说：大寨是穷山区，依靠集体，艰苦奋斗，变成了高产单位。这种革命精神山区该学，平川也该学，学了大寨，思想解放，精神振奋，等于上了一堂革命教育课。

当时，山西各地正在紧张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积肥，争取农业丰收。大寨精神的传播，更加激发了广大农民改造农田夺取高产的热情。晋中地区有相当一部分棉田，亩产不过10公斤皮棉。全区决心以大寨精神改造低产田，消灭亩产10公斤以下的低产现象。为此，1963年入冬以来，晋中各地的冬季生产出现了出勤人数多，工作效率高，

完成任务多，农活质量好，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新气象。晋南高产区也有不少公社、生产队学大寨，主要学大寨改造农田的革命精神。

太行、吕梁等山区学大寨的公社、生产队更多。太行山区的晋东南专区为便于各县社、队学习大寨，特在全区选了十个建设山区成绩显著的先进大队，作为学习大寨的“梯子”。雁北高寒地区在宣传大寨精神之后，也掀起了学赶大寨的热潮。各地社、队提出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战胜塞上的风沙，改善高寒地区的生产条件。

在开展学大寨、一带二的运动中，山西省委强调用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培养标兵，强调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点面结合，共同发展。后来他们又推广盂县学大寨运动中，分批分期树立标点，为后进队“搭梯子”的经验。由一带二发展为以一个先进队为中心组成先进经验推广网。按照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说法，这种先进经验推广网不是一级行政组织，而是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群众性组织。推广的先进经验内容，包括政治工作、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三个方面，而以政治工作为主。在网的范围内，先进的队经常派人到其他队传授经验，一般队、后进队也经常派人到先进队去学习。有的地方，在一个网之内或者在网与网之间，还联合起来种样板田，探索大面积高产经验。有些地方，网与网之间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学习和传播某一项先进经验。在一个生产大队或者一个生产队内部学习解放军的“一帮一”的经验，开展干部学陈永贵、群众学大寨人的运动。

第二节　李一清的故乡行

大寨虽然已经成为一颗耀眼的太行明星，但在全国范围来讲，大寨还不知名。大寨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并被树为全国的先进典型，得益于当时的一些省部级领导人。李一清就是较早向中央领导反映大寨情况的省部级领导人之一。

李一清当时是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老家在昔阳。1963年年底，他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感到广东省经济工作困难不小，想伸手向国务院要些钱或物，但又不好意思张口，便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李一清，让他乘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机会，向周恩来要点钱。李一清当然也不愿意张这个口，但一来广东省经济确有困难，二来领导交给的工作也不能不做。于是，他便在会议的间隙向周恩来讲了广东的困难，希望国务院能给拨点钱。周恩来作为全国的管家，那年头整天为各省、各部门伸手要钱、要物弄得没有办法，听了他的话，当场便批评道：“一清同志，南方不能再要钱了，难道南方比北方的经济还困难吗？”不过批评归批评，周恩来是个办事细致的人，他也知道陶铸的性格。如果不是确有难处的话，他是不会伸手要钱的。因此，尽管他当面批评了李一清，但会后，还是给广东拨了一笔救济款。

在这次会议上，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闲谈中对李一清讲起了大寨的情况，告诉他，你的家乡出了一个大灾之后不向国家要一分钱的大寨。李雪峰在讲这番话的时候，

是否有讥讽广东之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讲到的大寨事迹却令李一清为之心动。

李一清对大寨的过去是熟悉的，那里离他的家乡只有5公里的路程。作为昔阳人，对于家乡的山水他是了解的。那么穷的一方水土，出了这么一个先进的典型，他决定去看一看。于是，会议一结束，他就奔太原而来。

在太原，他受到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热情接待。陶鲁笳向他详细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并具体安排省计委副主任李进军陪同他去昔阳和大寨参观。

李一清是昔阳人的骄子，昔阳县招待所专门为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煎饼。吃过饭，王贵科、赵满仓等县领导便陪同他去大寨考察。大寨人得知这位在中南局担任高官的同乡要来村里考察，大家都很高兴，党支部还为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李一清进村后先与陈永贵握手。他见陈永贵的手上长满了老茧，便问了一句："你也经常参加劳动吗?"

陈永贵笑着回答说："劳动模范不劳动就没有资格当劳模。一天不干，一天心里就没有底子!"

李一清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应该是这样!"他品尝了大寨的苹果和红薯以后，就提出要看看大寨的灾情和恢复家园的情况。于是，陈永贵就给他带路。他们一边看，一边谈。在后底沟，大寨的铁姑娘们正在整修地，李一清看到被洪水冲毁的耕地，惋惜地说："真可惜啊，冲坏了这么多的地!"陈永贵却轻松地说："不要紧，坏了就修，减了产还不让它哩!"

陈永贵领他路过石窝，一阵阵铁锤击石的声音引起了李一清的注意，他寻声见到了正在抡锤打石头的贾进财。他走上前去与贾进财握手，贾进财的那双手使他颇多感慨。他说："这手还能打锤？两手都破了，该休息呀!"而贾进财却说："惯了，也不疼!"陈永贵插话说："三战狼窝掌时，有人就说给他立个碑，进财说垒起了坝就是一面好碑。"

陈永贵又领李一清看了狼窝掌。那一年发了那么大的洪水，狼窝掌却没被冲垮。李一清看了很吃惊，他问道："怎么这道沟冲不了?"陈永贵给他介绍说："下了三次功夫，下面的坝基又宽又深，看来还是人比水厉害，'狼'是治住了，今年要治'虎'，今年的工作量更大。"陈永贵所说的"狼"是指狼窝掌，而"虎"则是指虎头山。

参观了大寨使李一清动了感情，他说："遭了这么大灾不要钱，难能可贵！像大寨人的这种干劲，这种战天斗地的毅力，在当今中国还是少见的。对大寨，也应该像主席批示昔阳四级干部那样去对待。"

李一清离开大寨后又去了太原。山西省领导说他此行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说，看了老乡真是要下泪的。他特别赞扬了大寨的领导人陈永贵，说他是一个农民，但却像个政治家一样去看待国家与集体的利益，夸他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还讲到了他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农民的朴素作风。对于他所讲的这些内容，陶鲁笳也了解一些。陶鲁笳建议李一清在方便的时候，把大寨大队和陈永贵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李一清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此后李一清成了大寨的义务宣传员。在北京，他先是对李雪峰谈起了自己的大寨之

行，对大寨人及陈永贵赞不绝口。接着，他又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国家计委主任张劲夫汇报了考察大寨的感受。他还向在京的老同学、老战友介绍了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

李一清回到广东后，又将自己的考察所得通报给了中南局的一些领导干部。在一次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有关方面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他还系统地介绍了大寨艰苦创业、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发展过程，谈了自己考察大寨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参加那次会议的领导干部有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及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等。大家结合大寨经验和本地实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参加那次会议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按原定计划，是准备从广东去四川的，听到大寨的事迹后便改变了主意，离开了广东直奔大寨而来。在大寨，他与陈永贵进行过多次接触，详细了解了陈永贵的事迹。王光伟回到北京以后，先是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然后又分别向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

第三节　陈永贵走出寨门

国家计委主任张劲夫听过李一清的汇报，很快也来到大寨。回京后促成了有关部门请陈永贵进京作报告一事。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和其他几位全国劳动模范应邀来到首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10000多名来自党政军各界的代表作报告。陈永贵所作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大寨人民以革命精神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自力更生、战胜严重灾害的报告》。这是陈永贵第一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坛。

伴随着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陈永贵开始了他的报告。第一次面对上万人讲话，又是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一开始他不免显得有些腼腆，但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他从创办"老少组"开始讲起，讲到三战狼窝掌，特别是重点讲了1963年的特大洪灾及大寨人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事迹。当他讲到自己总结出来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时，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听众给予他的肯定，是人民给予他的奖赏。

至今人们谈起那次报告会，仍感到很惊讶：陈永贵作为一个很少识字的农民，讲起话来却有很强的吸引力。他那天在人民大会堂整整讲了半天时间。与有些劳模不同，他的话一点都不啰嗦，通篇讲话没有什么重复的地方，条理性很强。虽然不讲究文彩，但有些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话，经他一提炼、概括，既能说明问题，又容易打动人心。比如他所讲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又比如他说："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还有他说："靠向上伸手，越伸人越懒，越伸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坚，越走路越宽。"这些话，内容实在，思想还挺深刻，使一些听惯了空洞乏味的长篇报告的人，听了他的这些话，竟有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由于他的报告大受欢迎，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多次播放了他的报告录音。随着这个报告在全国城乡的收音机和有线广播中的反复播放，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村的名字也就传遍神州了。

其实他的这种演说才能并不是在人民大会堂才表现出来的。1963 年秋天，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李琦把电话打到昔阳，请陈永贵到省城太原给干部群众作场报告。陈永贵按时赶到了太原。那天的报告会由李琦亲自主持，陈永贵问李琦："允许我讲多长时间?"李琦回答说："你愿意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于是陈永贵就手持一份简单的提纲上了讲台，那是一位昔阳县委宣传部干部给他准备的报告提纲。那次他也是讲了整整半天，台下除了不时爆发出的热烈掌声和会意的笑声外，秩序非常好。会间休息时，陈永贵问李琦："你看这么讲行不行?"李琦这位党委宣传部门的高级干部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连着说了两个"行"，他还高兴地说："你把大寨的历史讲活了。"

陈永贵那次的报告轰动了省城太原。在各界人士的要求下，他又连着讲了 4 场，而且场场掌声如潮。举凡山西省、太原市的党政军领导、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大多都听了他的报告，而且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他的报告后评价说："陈永贵讲的真是生动，人才！人才呀！他没有提到毛泽东，但整个讲话都充满了毛泽东思想；他没有学过辩证法，但从头到尾都讲的是辩证法。太好啦！陈永贵了不起!"

陈永贵已经成为神州大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中的偶像，在许多人眼里，他那副头扎白毛巾，身穿对襟棉袄的打扮，要比任何电影明星都更加富有光彩。

那次陈永贵从北京返回大寨，同往常一样，他还是乘坐火车先到阳泉，然后再坐汽车回大寨。但这时，他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普通的山村农民。在火车上人们认出了他，整个车厢都为之轰动，人们很快就围住了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其他车厢的人们听说了也向这节车厢拥。为了维持秩序，列车长决定领着到他在整个列车上走了个来回，接受人们用掌声表达的敬意。

第四节　向毛泽东汇报

经过李一清和王光伟的宣传与汇报，大寨的情况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但当时中国的事情，没有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点头发话，是很难搞出起色的。

1964 年 3 月的一天，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车站。这是一座位于冀南的古城，与它相邻的是山西省。毛泽东临时决定要听一听河北省和山西省领导人的汇报。于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奉召来到邯郸。毛泽东不进城，就在专列上听汇报。

林铁、刘子厚的汇报内容史无记载，估计不太重要。轮到陶鲁笳汇报了。他先是把山西的农业情况作了个全面性的汇报，对于这类汇报毛泽东一般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兴

趣的是典型材料。果然，当陶鲁笳重点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顿时有了兴趣。他津津有味地听着汇报，还不时插话提出些问题。

作为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对于出现在自己所辖境内的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可以说是关爱有加。他曾三次去大寨蹲点，曾多次表彰大寨和它的领头人陈永贵，曾多次号召全省各界、尤其是全省农村及农村党支部书记认真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学习陈永贵的好榜样。对于大寨的情况他是十分熟悉的，谈起大寨来，他可真算得上是如数家珍了。

陶鲁笳汇报了大寨艰苦创业的历史，汇报了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战胜巨大自然灾害的事迹，这些无疑都让毛泽东听了心动。陶说，自己在大寨蹲点了解到大寨大队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个政治思想工作的能手，管理工作抓得严，公私分得清。山西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特别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是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陶鲁笳汇报说，大寨在工分管理上的办法简便易行，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清清楚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毛泽东插话说："评工记分有差别，不悬殊，又不太繁琐，这是个好办法，体现了政治挂帅，又不耽误劳动时间。"陶鲁笳见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感兴趣，便越发说得详细。

陶鲁笳又汇报说，大寨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支部委员。陈永贵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到这里立即表示赞赏："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谈论经济问题的场合，他总喜欢用打仗作比喻。

陶鲁笳又汇报了山西学大寨的情况，还讲到了《人民日报》关于学习大寨精神的社论发表后，到大寨参观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大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他还没有读到过《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那几个字？"陶鲁笳赶忙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毛泽东又用手指着这三个字问："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据实回答："陈永贵43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说陈永贵的报告，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通过这番对话我们也不难发现，陶鲁笳对于大寨的情况确实已经烂熟于心了；他甚至连陈永贵哪一年参加的扫盲班，现在识字识到怎样的水平都能随口答出。

听了陶鲁笳的回答，毛泽东感到由衷喜悦。他每逢高兴时都格外健谈，谈古说今，旁征博引，天上人间，趣味盎然。他笑着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有个柳宗元，是你们山西人，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出过许多好文章啊！"

谈完了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又回到大寨的问题上来。他说道："山沟里出好文章

啊！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末了，他又问陶鲁笳：“你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边说边要秘书去找那天的《人民日报》。在场的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阴发祥马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毕恭毕敬地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接过材料后说：“我要先看一看”。

阴发祥递到毛泽东手上的材料，最上面的是大寨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材料写得很简单，只一页。毛泽东很快就看完了。陶鲁笳也在旁边说，陈永贵对大寨现行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的概括是：有区别，不繁琐；有差距，不悬殊。

陶鲁笳这次在列车上的汇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寨因合作化而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因“一大二公”而调动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战胜各种困难，夺取了一个个大丰收。而且，大寨人在那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战天斗地，使粮食亩产在1963年就接近了400公斤。这是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长江以南地区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这也说明，他所钟爱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非海市蜃楼，只要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大寨人所实行的“政治挂帅”、“思想教育”等做法，与他的“反修防修”战略又是那么的吻合。从此，他就抓住了大寨这个典型。每论及农业，他言必称大寨。

听过陶鲁笳的汇报，毛泽东继续他的南巡。他每到一地，就同当地的党政要员谈大寨经验，讲大寨人的自力更生。他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1964年4月，在一次中央工作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毛泽东对于大寨的这种表扬，当时没有作公开报道。

第五节　廖鲁言带来调查组

中央决定要树大寨这面红旗了。为了稳妥起见，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委派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调查研究，考察实际情况。

廖鲁言的考察一共进行了20多天。此间，按照当时的要求，他们与大寨人实行了“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廖鲁言在考察期间，认真阅读了《大寨公社广泛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大寨的自然条件》、《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寨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陈永贵种试验田》、《自觉让贤的大寨大队前任支部书记贾进财同志》等十几份材料。对大寨的气候条件、土质成份和地理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考察了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劳动管理以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对于大寨的粮食产量，国家和兄弟社队对大寨的支援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人微的调查与

核实。在考察期间，他们还组织了8次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反映。最后，他们认为考察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大寨的成绩突出，他们的汇报实事求是，没有任何夸大与虚报。

在考察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5月21日下午，廖鲁言在大寨村召集了有中央有关部门、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及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这次会上，廖鲁言对20天来的考察工作作了总结。他说："来大寨已经20天了，看了许多东西，回去要向主席、总理汇报。现在把准备回去说的给大家说说，看对不对。"

廖鲁言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寨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具体措施和经验；二是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三是关于大寨的劳动管理；四是怎么把大寨红旗举得更高。他在讲话中说："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是中央定的，是主席和总理说了话的，这对全国是有普遍意义的。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他还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听到这里点头笑了笑。廖鲁言又接着说："总理很重视劳模，最近也很重视大寨，叫我们好好调查一下，就是想让大家学的。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搞垮。总理是非常关心大寨的，在大寨问题上和我谈了很多，不要搞垮了。不要把自力更生的牌子坏了，其他几位副总理都是这么说的，一定要保持下去。"

光阴如箭，转眼几十个春秋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品味廖鲁言的这番讲话，感到颇有道理，也颇有预见性。特别是他所讲的"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搞垮"，确实是我们对待先进典型所应有基本态度。

当晚，廖鲁言又专门为大寨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大寨的党员、团员、贫协委员和积极分子，一共有50多人。陈永贵主持了会议。在主持会议的时候，陈永贵还特意说明，这个会是应大寨村民的要求而召开的，然后他就请廖鲁言讲话。

廖鲁言在大寨人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讲话。他对大寨人说，他及他所带来的那些人此行主要办了三件事："一是学习你们；二是看你们的好经验，摸摸你们的具体情况；三是研究红旗如何举得更高。"

在这次讲话中，廖鲁言将大寨经验总结为六条：一是大寨的革命精神；二是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三是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五是改造人的工作，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六是共产主义风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他还特别讲到了贾进财的让贤问题。他说，你们有永贵的好当家，这是进财发现的，让给永贵的。这种事不容易，如果说现在大寨搞得好，第一归功于进财。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廖鲁言特别强调说："现在大寨闻名了，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大家都学，全国都学。大寨红旗红下去，这一条很重要。一支花红不算红，万紫千红才是春嘛！"

廖鲁言从大寨回到北京后，将考察情况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于5月下旬

呈送中共中央、毛泽东阅示。这个调查报告共分8个方面：一是“党的政策在大寨开了花，人民公社棒打不散”；二是“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大寨田”；三是“加工改造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四是“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实行‘八字宪法’”；五是“自力更生，苦干实干”；六是“大寨干部，大寨人，大寨田”；七是“大寨大队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八是“保证大寨这面红旗越举越高”。

廖鲁言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大寨大队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八字宪法”，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报告中所说的“农业八字宪法”是指毛泽东在1958年把农业增产的基本措施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字。调查报告还把大寨大队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概括为六条：第一，树雄心，立壮志，不断革命；第二，始终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第三，大寨不仅有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第四，干部参加劳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

大寨大队的经验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第六章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正式发动

第一节　大寨之路

关于大寨事迹的新闻宣传和经验介绍越来越多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市的新闻媒介都大量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大寨成为中国官方媒体中宣传最多的村庄，陈永贵成为被宣传最多的农业劳动模范。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赞扬了大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就是这份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报纸首次就学习大寨精神发表社论，它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见解对以后全国范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社论向全党和全国各界提出了学习大寨革命精神的要求，并把这种学习概括为学习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社论在总结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时指出：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的力量有多么的大。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山峰遮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下，大寨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贫农和下中农，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集体，而且看到别的集体，看到我们整个的国家及它的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们对

于自己的集体，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正是在这种远大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的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在总结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时指出：大寨人民在同自然作斗争，建设山区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很大的。大寨人既敢于藐视困难，又认真地同困难作斗争。他们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困难没有吓倒他们，失败也没有使他们后退。正是这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顽强的革命精神，使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成倍地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同时使林业和畜牧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仍处在困难之中，国家的财政状况还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社论也就特别强调了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社论指出：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兴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社论还采用了陈永贵关于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中的一些说法，指出，大寨的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更好的锻炼，更加坚定信心，夺取更大的胜利；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总之，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

《人民日报》的社论最后强调：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文章系统介绍了大寨的创业历史，并总结了大寨取得光辉成就的几点主要经验，对于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份长篇通讯和社论，还有个故事。

1963年的秋天，大寨收成不错，《山西日报》记者郝战敖去大寨采写了一篇大寨战胜灾害获得丰收的报道。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将发表在《山西日报》上的这份报道删短了一些送给分社副社长马明审发。马明看了以后，马上叫来四五名记者，一起议论这篇报道。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大寨这么好的典型，光发这么一条消息，可惜了，应该派人到北京去向总社和《人民日报》介绍，做突出报道，还应发社论。于是，冯东书就与另一名记者范银怀一道去总社做游说工作。

冯、范二人到了北京，就开始在新华社总社和《人民日报》社有关领导中做鼓动工作。先后说动了新华社国内部农村新闻编辑组组长穆家军，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庄和副主任何燕凌。其中何燕凌还去过大寨，也对大寨很感兴趣，他又是《人民日报》分管农村社论的人。写社论的事就由何燕凌承担了。

在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些人在考虑长篇通讯的题目。他们每人出一个题目，宋莎荫提出："我们就写大寨这条道路。"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这就算把主题定下来了。最后，分社派宋莎荫和范银怀二人去昔阳、大寨搞写作，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初稿。穆青看了初稿，立即带上福建分社社长孙明从北京乘飞机到了太原，指示宋莎荫该怎么修改。定稿后，就与何燕凌写的社论同一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第二节　大寨经验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前，有一次还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寨，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此前，中共山西省委、国家农业部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曾对大寨精神作过概括。自从周恩来作过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后，关于大寨精神，全国就都统一到这个报告的表述上来。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也实事求是地讲道，大寨大队"并不是一切工作都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缺点的。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他强调，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种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就成了毛泽东的语录。“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报纸上和书籍中引用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以示格外重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被用黑体字突出出来，没有什么人怀疑毛泽东曾经说过这句话。但至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准确说出毛泽东究竟在什么时候说过“农业学大寨”这句话。

如前所述，毛泽东第一次赞扬大寨是在1964年3月底，但那只是边听汇报边谈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同年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插话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以后毛泽东又几次讲到“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但从没有说过“农业学大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四清”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有这样的话：“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草拟的，如果当时毛泽东已经讲了“农业学大寨”这句话，文件里应该写进去。同年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开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精神》。这篇社论也没有把“农业学大寨”当作毛泽东的原话。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也提到了学大寨的问题，公报说：“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这也不能说明“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的原话。

后来许多《农业学大寨展览》都用了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五个亲笔字，但是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写过这五个字。

第三节　毛泽东宴请劳动模范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陈永贵终生难忘的事情。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很重视那次宴请客人的生日酒会，就连哪位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他都亲自列了单子，交给汪东兴等人去办。

那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大会刚刚开过，陈永贵像往常一样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在背后喊他的名字：“永贵同志！”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周恩来也快步走了上来。周恩来告诉他：“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

周恩来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他也不便多问。随着周恩来七拐八折，就到了毛泽东休息的地方。这时周恩来才对他讲："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特意把你请来。"陈永贵一听是毛泽东请他吃生日酒席，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周恩来接下来又介绍说，今天应邀参加毛泽东诞辰宴会的还有大庆工人代表王进喜，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的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

他们来得早了一些，席间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就绪。周恩来便领他到刘少奇的办公室。刘少奇是个大忙人。当时在北京正开着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是中央工作会议，一个是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前一个会议上，作为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副主席，他要唱主角；在后一个会议上，他是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自然也是主角。而且会外的大量中央日常工作也要由他来下达批示，正在全国进行着的"四清"运动他也是总指挥。陈永贵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审阅一份关于"四清"运动的材料。周恩来向刘少奇简单介绍了陈永贵，但刘少奇工作太忙，而且他又是一个说话办事十分严谨的人，没有考虑好的事从不轻易表态。对于陈永贵的到访，他除了礼节性地问候外，没有再多说什么。

周恩来又将陈永贵领到毛泽东那边去了。此时毛泽东已在屋子里等候他的客人了。毛泽东对于陈永贵表现出了充分的热情。毛泽东边与他握手，边说："永贵好啊！"然后毛泽东又与王进喜、钱学森等人一一握手，请他们坐在自己身旁。

在与陈永贵、王进喜等劳动模范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是轻松的。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噢！"

毛泽东是湖南人，终其一生仍是乡音无改。陈永贵听不懂湖南话，再加上心情紧张，在没有听懂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地点头说"嗯"。毛泽东知道他没有听懂自己的话，便对他又重复了一次。周恩来也在一旁向他解释毛泽东的意思，陈永贵这才知道自己弄了个笑话出来，赶忙红着脸纠正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

他们正在聊天，服务员过来请大家人席。等毛泽东等人进人小宴会厅时，不少人已等候在那里。根据曾志的回忆，那天是李富春、陶铸、曾志、胡耀邦最早来到宴会厅。其他人也陆续来到。毛泽东进人宴会厅后，环视了一下四座，说道："东兴和罗长子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去搞'四清'了。她没有资格来。"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东兴同志"，是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罗长子"是指罗瑞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李敏、李讷都是毛泽东的女儿。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座席安排得也很有特点。毛泽东将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安排在自己的座位旁，坐在这一桌的领导干部只有罗瑞卿和从广东来的陶铸及陶铸的夫人曾志等人，其余的领导干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安排在了别的桌子旁。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毛泽东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毛泽东的开场白讲完后，举起酒杯提议为大家干杯，大家也起立为毛泽东的健康长寿干杯！

毛泽东不喜欢喝酒，杯里的葡萄酒也只是沾沾嘴唇便放下。但作为席间的主人，他不断地劝陈永贵与王进喜等人吃菜。他见陈永贵有些拘谨，就说："永贵，吃菜，吃菜嘛！"

陈永贵确实是在紧张拘谨中吃了那顿饭，以至于事后他竟说不出那天究竟吃了些什么。多亏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他先是自己和陈永贵碰了一杯，又提议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互相碰一杯，这才使气氛活跃了点。

席间毛泽东还问起了陈永贵的年龄，陈据实回答说今年 50 岁。毛泽东一听这个岁数，又来了兴致。他风趣地说："噢，五十而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

"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的一句话。这是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他说话时就喜欢引经据典。问题是陈永贵不知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也就更不可能知道它的出处。好在"君子不二过"，他不会重牙巳刚才的错误。这一次，他既没有点头，也没有"嗯"着附合，而只是不住嘴地笑。

也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还对陈永贵说起了贾进财。看来他对于大寨的故事已经知道了不少。他说："贾进财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说到这里，他又对另外的几位劳模讲："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作一点不要翘尾巴，作两点不要翘，作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做客令陈永贵终生难忘，终生感激。

第四节　周恩来亲临大寨指导

周恩来对大寨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生曾三次到大寨，他的亲切教诲、平易近人和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每一个大寨人的记忆中。

周恩来三次去大寨，都是陪同外宾去的。第一次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一个外国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中国外出参观，按照外交礼仪，周恩来可以不必陪同。周恩来此次陪同科列加参观大寨，可以说是破例之举。

1965 年 5 月 21 日，周恩来带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陪同科列加一行由北京到大寨参观。他们先到了河北省的石家庄市，然后再由那里乘坐两架直升飞机来到大寨。那时昔阳连个平一点的停机场都没有，直升机就停在了离大寨 2.5 公里的松溪河的乱石滩上。等候在那里的山西省省长卫恒、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和晋中地委、昔阳县委的有关领导迎上前去，欢迎外宾及中央领导。

吉普车开到大寨村口，村民们已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客人。周恩来陪同客人下车与群众招手。科列加在周恩来、陈永贵的陪同下走在最前面，欢迎的村民们挥动着花束彩带喊着"欢迎！欢迎"的口号。阿尔巴尼亚客人似乎觉得这样不足以反映两国的特殊关系，带头喊起了新口号："毛泽东！恩维尔！"恩维尔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最高领袖，

这样一喊就显示出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了。群众于是也跟着喊："毛泽东！恩维尔！"周恩来马上给予纠正，带头喊起了："恩维尔！毛泽东！"群众便也跟着喊："恩维尔！毛泽东！"

阿尔巴尼亚是个欧洲小国，农业生产情况与中国大不相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参观了大寨似乎也没有什么感动的表现，至少从现有的文字材料上找不出他们受了感动的例子。倒是周恩来此番大寨之行给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关于他在大寨的故事也格外多。

周恩来在人群中发现了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上一年陈明珠进京出席共青团九大会议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当周恩来与他握手并说起上次相见的事情时，陈明珠大受感动，想不到一个共和国总理工作那么忙还能记住自己。

在陈永贵的介绍下，周恩来与贾进财握手，周恩来还称呼贾进财为"老英雄"。

在人群中，周恩来看到站在第三排的牛国栋似乎想和他说点什么，就越过前面的两排群众，伸过手来与他相握，还与他聊了几句。1967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第二次来到大寨，那天牛国栋因患感冒没能出来迎接。没想到 6 年之后，1973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寨时又见到牛国栋，竟问起了第二次来时怎么没见到过他！此事令这位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农民激动不已。他说，在旧社会就是个村长也不会正眼看我一下，如今周总理竟这样看重我！

周恩来随陈永贵来到郭凤莲家。郭凤莲指着周恩来向她姥姥介绍说："这就是咱们的周总理，他每天晚上都不休息！"周恩来忙说："夸大，夸大。"郭凤莲的姥姥把一个玉米面窝头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接过来分了一半给阿尔巴尼亚客人，留下一半自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时，院子里的孩子们要为外宾和中央领导表演《找朋友》舞，周恩来便一手拿着窝窝头，一手给孩子们打拍子，还时不时高兴地亲亲孩子们的脸。

在贾进财家，周恩来像庄稼人一样盘腿坐在炕沿上与贾进财聊大寨村史，宋立英又递给周恩来一个枣窝头，周恩来又是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吃了一半大概吃饱了，他便掏出手帕将另一半包起来说："我把它带回去，叫其他中央首长也尝一尝。"

参观了大寨新村，周恩来又陪同外宾登上了虎头山。在路上，周恩来看见远处有一片松林，就问："那是什么地方？"陈永贵说："那是武家坪，大寨的邻村。"周恩来又问："虎头山为什么不能栽松树？"陈永贵说："大寨也准备搞。"

在山上，陈永贵向客人们讲述了大寨村过去的穷苦生活，讲述了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治山治沟，增加生产的不平凡经历。还特别讲到了 1963 年的大洪灾，当时地毁房塌，但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一斤粮、一件物，依靠自己的努力建设起一个新的大寨。周恩来还详细询问了大寨的水利建设情况，他说："你们这里十年九旱，不解决水利可不行呀！"他又扭头对陪同上山的山西省省长卫恒说："全国只有一个大寨，连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还行吗？"

陈永贵还领外宾与中央领导来到狼窝掌，看见狼窝掌的几十条大石坝，周恩来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这就是三战狼窝掌的地方。"陈永贵在一旁补充说："现在是四战了，加高石坝，小块变大块。"周恩来说："可以修一些排水沟，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危害。"

从狼窝掌回来的路上，看见在一块地头有沤下的秸杆肥，周恩来抓起一把看了看，高兴地对陈永贵说："要多施农家肥，土办法就好。"他又说："永贵同志，你们也要注意改革农具，向机械化要劳力。"

中午吃饭的时候，按照周恩来的吩咐，餐桌上要上大寨人天天吃的玉米面窝头、蒸山药蛋，喝大寨人平常喝的小米稀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

下午 4 时，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离开了大寨。

周恩来此行虽然是陪同外宾来参观，但在大寨人心目中，周恩来比谁都重要。在周恩来离开大寨的当天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大寨党支部会议，讨论对周恩来来访的感想。陈永贵在会上说："总理指出我们大寨的林业和水利没有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山西省省长卫恒也出席了他们的会议，他在会上说："大寨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是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了！"

此后，周恩来又曾两次踏上大寨土地。一次是在 1967 年 4 月 9 日，周恩来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和副总理武元甲来大寨访问。另一次是 1973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和夫人来大寨参观访问，与他一道陪同墨西哥客人前来的还有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等人。

第五节　关于大寨红旗的冷静分析

在树立大寨红旗的过程中，无论是《人民日报》社论，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曾明确指出大寨的工作并非尽善尽美，大寨人也经常讲自己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与错误。但有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中央领导和《人民日报》的文章都没有说明大寨工作中究竟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而大寨人在谈起自己的不足时，最多也只是说自己在发展林业方面不如更先进的单位等，而没有作出更深层次的总结。我们不应当苛求于前人，是历史遮住了人们的眼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没有能够在系统总结大寨先进经验的同时，也系统地总结出它的缺点与不足。

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没有严重缺陷的。

大寨大队从 1961 年开始改变定额包工管理办法，随后经过几年的修订补充，逐渐演变成一套完整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和分配办法。他们认为，第一，定额包工劳动管理是"卡君子不卡小人"的制度，"一年下来，老实人收入少，奸滑的人收入多"，"集体化，是一家人了，为什么还你干多少活，我给多少分，这不跟过去当长工一样？"第二，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制度的结果，仍然是"贫的贫，富的富，悬殊越来越大"。大寨实行"自报公议工分"劳动管理制度，就是在全大队选定三个标兵工分，男的一个，成年妇女一个，铁姑娘一个。然后由社员"自报工分，大家合

评”，由一天一评改为五天、十天一评，又改为一个月、二个月一评，至1966年改为三个月一评。实行这种劳动管理制度后，社员干活不考虑工分，干部也不考虑工分，评分“主要不是评别的，主要是评思想”。这种办法后来被人称为是“大概工”，也有人说它是“神仙一把抓”。它的特点是：“有差别，不悬殊”，也就是差别不大。它忽视甚至鄙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把劳动者的政治思想，以及人际关系特别是同干部的关系等，都作为评议工分的依据。劳力弱、技术低、劳动贡献少的社员可以因“政治思想好”而得到较高的工分；而劳力强、技术高、劳动贡献多的社员，则要遵循社员之间“工分不悬殊”的原则，不能得到应得的工分。有些干技术活的社员，原来的劳动报酬高于农业上同等劳力，也按照“与农业上同等劳力挂钩”的办法被拉平。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办法。同时，它也明显违背了《农业六十条》的有关规定。

大寨从1963年战胜特大洪灾时起，就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陈永贵早就说：“有的社员在集体地里养精神，在自留地里打冲锋。”认为自留地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有人用自留地跟集体经济唱对台戏，为‘单干’扫清道路。”随之，大寨又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的过渡。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一些具体的政策尝试，而且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有利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不仅允许，而且应当给予鼓励。但是，对有些关乎全局的政策变动，必须十分慎重；有些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属于正确而党中央又作出明确规定的政策，各级党组织都应当坚决执行。大寨党支部所变动的一些政策，有的就属于这一类。例如农民的自留地问题，就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几收几放，经过了多次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最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了严肃规定。实践证明，农民应当拥有一部分自留地，它并非如陈永贵所说，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调剂、丰富农民家庭生活的必要措施，在一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地方，自留地甚至被农民称之为“保命地”。

一个“自报公议工分”，一个取消自留地，一个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些做法都不符合党在当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但由于大寨人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在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在发展粮食生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们的一些错误做法就不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也没有受到批评。其中有的做法，如“自报公议工分”，还受到了表扬。

随着大寨先进事迹与经验的广泛传播，大寨大队的一些错误做法也作为大寨“经验”传到了各地。起初，这些做法还只是作为大寨的“具体经验”被介绍传播，后来随着“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大寨的这些错误做法便被提升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并运用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强行在各地推行，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造成了灾害性的影响。此是后话。

第七章　全国迅速涌现出一大批学大寨先进单位

第一节　盂县盛开"大寨花"

盂县与昔阳县相距不远，也是山西省太行山区的一个贫困县。在学大寨运动初期，这个县就成为闻名全国的学大寨先进县，被认为是创造出全县学大寨的好经验。国家农业部曾在那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他们学大寨的经验，《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之花》的长篇通讯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编者按"说："大寨精神、大寨经验，在盂县遍地开花、结果，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盂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两年，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全县学习大寨的好榜样。"

盂县县委1962年就响应晋中地委的号召，在全县开展了学大寨运动。这一年，由于从上到下只注意学习大寨治山治水的具体经验，结果并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直到1963年，他们根据山西省委的指示，强调了学大寨先学大寨精神，情况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们从总结盂县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用大寨的历史经验对比盂县的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大寨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以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藐视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大寨也经历过曲折和失败，但是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迷失方向，而是不断从失败中找到教训，继续大踏步地前进。而盂县在1956、1958年两年也搞过大规模的治山治水，都没有成功。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4034万公斤。1958年到1962年，这5年平均每年总产量为4564.5万公斤，与1957年相比，平均每年只增长2.62%。

县委找到了这条根本的经验教训，思想豁然开朗了。于是，他们重整旗鼓，先后组织了县、社、队干部和群众8000多人到大寨参观学习。同时，从上到下，开始认认真真地学大寨。县、社领导干部首先走出办公室，带头下乡蹲点，帮助各村解决实际问题。各村都以大寨为榜样，照镜子，找差距，并且开展了比革命精神、比依靠贫下中农、比干部参加劳动、比自力更生、比对国家贡献的"五比"活动。经过反复检查比较，有些基层干部说："这几年思想睡了觉，前进方向不明确了，农村要建成啥样子，眼里缺样板，心里没谱谱。有了大寨，心里有了灯，身上有了劲。"这样，盂县学大寨的运动一浪高一浪，真正成了最广泛的群众性的行动。

按照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中的说法，由于开展了学大寨运动，1963年秋后，盂县学大寨的捷报就传出来了。这一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5520万公斤，创造了盂县历史上粮食总产量的最高纪录。

取得成绩后的盂县人并不满足。他们继续对照大寨找差距。县委书记、县长和大寨的干部比，比革命思想，比革命干劲，比领导作风，比工作方法……比来比去，又比出个不足来。他们承认自己没有陈永贵那样不怕吃苦、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他们认识到，要走大寨之路，必须先学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而且，县委一定要学在前头，走在前头，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彻底革命的大旗扛起来，站在学大寨的运动中领导学大寨。

1963年11月间，盂县召开了一个240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他们还特意从大寨把陈永贵请来，给全县的干部上课，传大寨的革命精神，讲大寨的革命作风。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公社干部，直到县委书记、县长都坐下来听。听了就比，队队比大寨，照镜子，找差距。

盂县县长张国英，有魄力，实干，和大寨的干部一比，也说起自己不行来。他说："比起陈永贵来，他的觉悟比我高，革命干劲比我大。"

被称为盂县的"大寨"——上社公社白藏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海亮说："这下子比得好，革了一场命（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栽了一条根（依靠贫下中农）；死了一条心（立了共同富裕之心）；取了一本经（学到了大寨真经）；戴了望远镜（有了国家观念，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就在上上下下照镜子、找差距的那些日子里，在全县范围内，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大寨革命精神的活动。在各个民校里，教师们讲大寨；在群众会上，干部们讲大寨；农村俱乐部演学大寨的戏，唱学大寨的歌；广播站一日三次向全县人民报告学大寨的消息；县剧团把学大寨样板队——苌池公社熬子坡大队的事迹搬上了舞台，演起了《万紫千红》。从县城到边远的山庄窝铺，处处都开展了学大寨的活动。

"做大寨人，立大寨志，走大寨之路！"盂县人到处都在讲学大寨，人人都按照大寨人的样子去做。这一年冬天，全县有170多处坡梁的治理工程动了工，300多个沟壑的打坝垫ii程和成千上万亩造地、整地工程也开始了，几十条大坝奠基了。

在学大寨运动中，盂县领导一直坚持走在最前面。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干部有70%以上背起行李下乡了。县委机关只留下20个干部，县人民委员会只留下18个干部。全县200来个公社干部，只有25个住在机关。

县长张国英背着行李到了熬子坡村。农民们正在大战黑龙沟。张国英不进村，一直去了工地。县委代理书记梁和义到白藏村，正是冰封地冻的"三九"天。当时土方工程不能搞了，大队管委会计划把劳动力从长条沟工地上撤下来，上山割蒿积肥，谁知偏偏下了场大雪，把山封了。有的生产队干部和村民就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想上山了。大队干部没有办法，去问梁和义。梁说："天冷，上大山，你们先上。"第二天；他就拿了一把镰刀、一条绳子，领着干部们上山。村民见干部上山，也都跟上来，全村106个劳动力出了工。

王村公社党委代理书记李志清，决心当陈永贵的好学生。参观大寨回来后，蹲到了水岭底村，和村民干了一冬一春，筑坝，修地，垫土，把个平平常常的生产大队一下弄了个热火朝天。他又把周围几个大队干部叫来，让他们看看水岭底比比自己。这些大队干部实在没想到，原来和他们差不多的水岭底，一下跑在前边了。回去以后，也都干起来。

盂县学大寨运动确实形成了相当壮观的场面；从1964年春节过后，到5月底春耕大忙，盂县共出动4万个劳动力，投工91万个。他们依靠人抬、人担、小车推，移动了3万立方米石头和30万方土。完成了总长1500多米的26条大坝，治理了总长60公里的101条山沟和122个小沟壑，把4200亩坡梁地变成了水平梯田，还整修了沟湾地和沟坝地7500多亩。

那一年，盂县还全面地推广了大寨精耕细作的经验，普遍采用良种，14万亩玉米有10万亩进行了深刨，每亩粮田施肥量也增加了。

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盂县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这期间，全县又修成了101000亩大寨式农田，占两年来所修大寨式农田的一半以上。

盂县的学大寨运动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1963年到1965年年底，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全县55万亩耕地普遍进行了整修，近40%的耕地基本建成了大寨式农田，1963年、1964年两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增长了45%，1965年全县的小麦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而且，他们在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具体经验，有不少新的创造和新的发展，有些工程的质量和艰巨程度还超过了大寨。

在学大寨运动中，盂县县委从1963年开始，就在全县采取了梅花式的撒网布点的办法，分批分期培养学大寨的标兵。这种办法，他们叫做给后进队“搭梯子”。那一年，县委在五类不同地区选择了12个生产大队，由县级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县委搞的12个点都很成功，粮食增产都在30%以上，成为盂县自己的“大寨大队”。这些大队的特点鲜明，学大寨成绩很大，人变了、地变了，产量也变了。这些先进大队不是靠“吃偏饭”长起来的，而是诞生于群众之中，自力更生地成长起来的。它们的成长被群众看得一清二楚，人们信服这些先进大队的经验。在学大寨运动中，它们成了学大寨、赶大寨的活样板。

有了县委的榜样，各个公社的领导干部也搞了自己的点，全县各公社共搞了77个点。这些点大多数也是成功的，从而使县、社领导干部取得了学大寨的第一手经验。第二年，作为标兵的生产大队就扩大到了109个，第三年又扩大到149个。每个标兵一般带动周围的3至5个生产队，形成了一个先进经验推广网。这样，就星罗棋布地把全县的531个大队全都“网”起来了。

盂县的县、社干部，经常有二三百人分头到全县所有的先进经验推广网，采取既蹲点又跑面的方法，具体组织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同时，县委还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了流动检查组，在县委负责人的亲自领导下，组织队与队、网与网、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相互检查。通过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传播好的经验。

第二节 穷队变富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榜墟公社第一生产队，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等吃队”。这个队的生产长期落后，从解放以来直到1964年，虽然不断得到国家的扶助，总是翻不了身，要靠国家返销粮食和拨发救济粮。

这个生产队当时共有43户，152口人，78个劳动力，平均每人有7分田地。这些田都在达洪江水利灌溉区内，全是保水田，而且有部分坡地可以改为水田，自然条件并不差。但是，由于人们缺乏劳动积极性，历年来耕作粗放，很少施肥，粮食产量很低，农民口粮不能自给。仅1962年到1964年的3年间，平均每户就吃了国家的统销粮和救济粮525公斤以上。

对于这个穷村子，上级领导也很关心，想过很多办法。1962年以来，榜墟公社党支部书记覃汉祖常到这个队去，帮助他们搞生产。区领导也曾到这个穷队蹲点。可是由于没有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只能是听到干部和村民喊困难，就采取“恩赐”的办法，缺粮给救济粮，缺钱给救济款和贷款，缺肥就给化肥。1964年春耕生产大忙时，社员出集体工少。领导听到队干部说：“现在困难多，缺乏生产资金，社员缺粮所以出工的人不多。”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上级连忙发了救济款和贷款1100多元，发了救济粮4800多公斤，平均每户有110多公斤。以为给了这样的帮助，一定可以解决问题了。殊不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不劳动，也可以得到粮食，有人就更不愿意劳动了。有人说：“做也得吃，不做也得吃，反正不够吃有国家补！”因此，虽然有了粮和钱，社员出集体工仍然不够积极，全队78个劳动力，出工最多时也只40个。部分早稻因此误过了种植季节，收获时粮食仍是减产，全队要国家统销和救济粮食6500多公斤。

这个队越帮越穷的原因在哪里呢？各级领导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它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但当时的人们不可能这样考虑问题，就是想到了也不敢这样解答问题。1964年秋收后，公社党支部发动各生产队总结生产经验教训时，覃汉祖从第十七生产队的变化中得到了启发。第十七生产队原来也是个穷队，他们的水利、土质等条件与第一队大致相同，田地面积也差不多。这个队上一年春天学习大寨精神以后，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对水田加工加肥，精耕细作，把部分坡地改为水田，很快就改变了落后面貌。结果，秋天这个队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平均每人每月有口粮25公斤，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实实在在的对比，使覃汉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后来总结说：过去蹲点帮穷队时，没有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没有教育干部和社员树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也就是没有通过“内因”去解决问题；相反地带着“恩赐”观点下去，缺粮给粮，缺钱给钱，缺肥给化肥。这样就助长了干部和社员的依赖思想。难怪第一生产队的问题长期

不能解决。

找到了病根，就对症下药。1964年12月底，这个队开展了学大寨运动，覃汉祖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改变穷困面貌的革命精神。他给人们讲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大寨之路》等有关文章。相信当时全国这样做的地方一定很多，但不一定都能起作用。但这一着在第一生产队还真的起了作用。社员们听到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和三战狼窝掌的事迹以后，很受教育，纷纷用大寨精神对照检查自己。一位叫韦妈的女社员说："人家大寨人有两手两脚，我们也有两手两脚，为什么人家能战胜穷山恶水，改变穷山面貌，每年有大批粮食卖给国家，我们生产条件比大寨好，却年年靠国家统销、救济？我看主要原因是我们有依赖思想，缺乏大寨人自力更生的精神！"共产党员苏家权说："我们穷，主要原因是有'等吃'思想。只要我们学大寨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家团结一心搞好集体生产，就一定能够脱掉缺粮帽子！"

于是，他们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挖潜力，找窍门。结果找出了很多改变穷困落后面貌的门路。他们根据本队所有的田不缺水的情况，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1965年由原来计划种65亩扩大到71亩，晚稻由原计划种78亩扩大到88亩，并改疏植为合理密植，力争稳产高产。同时，开沟引水，把过去产量很低的15亩坡地改为梯田。另外，克服过去依赖国家贷款买化肥的思想，大积人粪尿，争取消灭历年种"白田"的现象。

学习大寨精神以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挖半里多长的巴独水沟的时候，30多个社员努力开挖，7天就把水沟开通了。在改7亩坡地为水田的过程中，铲子、馒头等工具不足，有的社员就把自己家里的借出来用，不够再向别队借用。有好几天下着雨，但是，在干部的带动下，农民们还是冒雨劳动。这样足足干了20天，花了1000多个工，终于把7亩坡地改成20多块梯田，及时插上了中稻。

过去，队干部和社员中既然有依赖国家买化肥的思想，就很少积农家肥。学大寨以后，大家决定自力更生，依靠双手大积农家肥。大部分劳动力还到榜墟街上担回大量的人粪尿。1965年种下71亩早稻，平均每亩施了基肥25担，还追了两次农家肥。早稻因此大幅度增产。晚稻也由于施肥多，生长良好。同时，他们还发展了一些集体副业。

第三节 大寨经验与三沟经验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西部风沙干旱地区，荒山秃岭占全县面积的一半，森林覆被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全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加上人少地多、耕地粗放，粮食产量很低，1964年前平均粮食亩产只有七八十公斤，是辽宁粮食单产最低的一个县。合作化以来，全县各族人民曾经采取修水库、截山沟、打深井等办法，蓄水防旱，控制水土流失。但由于没有进行综合治理，收效很差。他们也曾试图通过发展畜牧业，以牧促农。由于缺乏统一规划，牛羊头数增加了，农林牧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增加一些粪肥，远抵不住流失的土壤肥力。因此，农业生产一直

发展很慢。

从1964年2月，阜新县委以大寨精神重新分析了全县农业生产面临的形势，认真总结了本县一些先进生产单位的先进经验，特别是重新总结和评价了“三沟”经验。

所谓“三沟”经验，就是阜新自治县的三个生产队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分别是：七家子公社毛岭沟大队的封山育林控制水土流失的经验；招束沟公社后拉格生产队治理坡耕地连年增产的经验；蜘蛛山公社塔子沟大队营造护岸林保田增产的经验。县委认识到，“三沟”经验是实现全县农业稳产高产的方向性经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三沟”经验。他们的口号是：外学大寨，内赶“三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

阜新县委发动群众将大寨精神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改天换地，治理坡耕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曾经历了一场大的争论。一部分人学大寨以后，主张一次修成水平梯田，一劳永逸；另一部分人认为水平梯田是好，可是太费工，还是推广招束沟的经验，修水平撩壕，省工，见效快。他本扎兰公社按照招束沟治坡的原理又创造出一种“过渡式水平梯田”的新形式。修这种梯田和修撩壕工程的区别在于，修撩壕是从上往下取土培埂，修“过渡式水平梯田”是从下往上取土培埂。因此，修这样的梯田用工少，成本低，收效快。县委对这种形式进行了全面分析：水平撩壕，是一种既简单省工，又能够迅速控制水土流失的好办法；“过渡式水平梯田”，是适宜土层较厚的15度坡以下丘陵地区大面积治理，并逐步达到水平梯田的一种好办法。水平梯田的增产幅度很大，可是它的工程标准高，用工量大，修一亩水平梯田要四五十个工，坡度大、地少人多的地区可以修，在地多人少地区短时间难以完成。经过分析比较后，县委确定从本县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先“过渡化”后“水平化”逐步建成“大寨田”的方针。对当前治理坡耕地提出了“一为主、两结合、三配套”的综合治理方法：“一为主”就是以“过渡式”水平梯田为主；“两结合”是“过渡式水平梯田”和水平撩壕相结合；“三配套”是工程措施、生物措施、耕作措施配套。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治坡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推广“三沟”经验，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中，阜新自治县还注意全面安排，重点突出，集中力量，努力提高工程效益。在治山、治水、治坡工程中，各个社队都采取统一规划、集中治理的方法，一个山头、一面坡、一道沟、一条河地集中成片治理，治一坡是一坡，治一沟是一沟，沟坡兼治，沿河两岸都造林。对几个生产队都可以受益的较大工程，由大队统一规划，实行“联合协作，等价换工”，各生产队一齐出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施工方面，实行春秋两季突击，常年维护的办法。每年春季解冻以后和秋季封冻以前，搞两个大的战役，突击治理；平时组织专业队进行工程养护和维修，把群众性的治理和专业队伍的治理结合起来，做到了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两不误。为了打好春秋两个治坡、造林的歼灭战，事前注意从各方面做好准备。

阜新自治县在推广“三沟”经验中，认真接受过去几年农林牧各自为政，农牧挤林，加剧水土流失的教训，贯彻“以粮为纲，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林业先行”的方针，在全县范围内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对农林牧进行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重新调整了农林牧业生产的布局，划清了农田、牧场、林地的界限，基本上做到了各得

其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为了尽快增加荒山坡地的覆被，在大力进行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的同时，全县合理固定牧场和实行划区轮流放牧，并适当调整和控制了羊群的发展，坚决淘汰了危害山林的山羊，积极改良和发展绵羊。为了补充山羊减少带来的粪肥不足和加强积肥基本建设，各地大抓了“三种”（种草苜蓿、紫穗槐、甘薯），建立和扩大绿肥基地。1964 年和 1965 年，全县种草苜蓿 70000 多亩，紫穗槐 47000 多亩，甘薯 70000 亩，办起粉坊 896 个，大大发展了养猪事业。全县 1965 年的猪只头数比 1963 年末增长了 98.8%。

第四节　学大寨，搞副业

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各地的学大寨运动也主要是学习大寨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搞各种增加粮食生产的措施。但也有的地方是用大寨精神发展社、队工业。这在当时叫做“副业”。意思是农业是农村的主业，社、队工业只能是副业。但不管叫什么，发展了社、队工业，毕竟可以活跃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可以增加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收入。因此，对这些经验我们也就应当格外重视。

辽宁省海城县东四公社红旗大队，在 1964 年遭受严重涝灾以后，发扬大寨精神，依靠群众智慧，广开门路，发展队办工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5 年虽然多灾，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好收成。这个重灾队在短短一年间就变成了富裕队。村民们说：自力更生搞生产，腰板子越干越硬。

红旗大队是个平原产粮区。除了粮食生产外，人们一向认为，这里没有发展社、队工业生产的条件，5 个生产队过去基本上没有集体工业。1964 年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全大队粮食生产只有 3 成收成。灾后初期，有些村民外出打鱼摸虾，有的蹲在家里等待救济，有的干部也很发愁。这时，大队党支部响应公社党委组织社员开展生产自救的号召，首先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学习了《大寨之路》的小册子。通过学习，他们逐步消除了悲观畏难情绪，坚定了生产自救信心。生产队长徐新甲说：“咱们不能挺着脖子吃，得向大寨学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人家愚公一家能移山；咱们红旗堡一千几百口人，还不能生产自救!”干部的思想提高后，接着又通过开展“两摆”，即摆劳动力和副业门路，“两算”，即算政治账和经济账活动，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摆了劳动力情况和副业门路，使村民们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算了政治账和经济账，使村民们懂得了以国为怀、自力更生地进行生产自救的重要意义。一些村民说：人是活的，有人就有一切。只要咱们大家抱成一个团，拧成一股绳，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克服暂时的困难。于是，他们便把国家给的 500 多元救济款，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国家，下定决心：农业丢了，要从副业找回来，自力更生渡过难关。

他们这也是因祸得福。如果不是遭了灾，就不可能想到办集体工业，即使有人想到了，也可能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如今遭灾了，粮食减了产。通过办集体工业搞生产自

救，总比伸手向国家要救济更符合大寨精神。于是，他们就坚定了信念，动手干了起来。

在发展队办工业生产时，他们碰到了没有资金、没有原料、不懂技术等一大堆实际困难。大队党支部认为，要战胜困难，除了鼓起群众的革命干劲外，还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闯出一条路来。于是，便组织了40多人的骨干队伍，分成几个小组，群策群力，分头寻找门路。通过研究，他们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发展队办工业生产。这个大队有个小自然村，叫蚂蚁屯。那里的很多村民会用玉米皮编套包，套包是一种车马用具。编套包虽然收入少，但可积少成多，特别是这种手工业有现成的原料，技术又简单。于是，大队领导便普遍推广了蚂蚁屯的经验。不久，全大队80%的妇女、老人和少年儿童，都参加了这一手工业生产。1965年一冬，就收入6200多元，部分归集体，部分归农产。

头一炮打响后，群众精神大振，信心增强。接着，干部便因势利导，进一步发挥群众的智慧，办起苇席、筐篓、草袋、草绳等编织工业。编织苇席的技术比较复杂，他们就请从产苇席的邻乡嫁过来的7个妇女带徒弟。一些心灵手巧的姑娘，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她们掌握了这门手艺，再带徒弟。就这样，半年内有90多名妇女学会编苇席。她们共编席子1200多领，收入5000多元。编织筐篓、草袋、草绳，也都是这里从来没有搞过的营生。织草袋子，买机器得300多元。木工组长彭学谦建议自己制造机器，他说："既然人家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学着做呢?"大队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他到海城镇附近的合办村学艺。彭学谦不辞辛苦地跑了两三趟，终于把造木制草袋机的技术学到了手，为大队仿制成功了5台草袋机，节约了200多元开支。安装草绳机时没有厂房，大队就腾出了部分办公室当车间。

这个大队在抓大宗工业的同时，也不放松小宗工业生产。一个会做笔帽的村民，看到编苇席剥下来的短苇子扔掉很可惜，便建议利用它来做笔帽。大队根据他的建议，组织了6名村民，开办了一个小小的"笔帽加工厂"。虽然每个笔帽只值3厘钱，但积少可以成多。到1965年年底，他们已生产了17万个笔帽，收入数百元。

这个大队在开展队办工业生产中，贯彻了"三结合"的方针，即：农业和"副业"结合，以农业为主；农闲和农忙结合，以农闲为主；集体和个人结合，以集体为主。这样，就使队办工业生产常年坚持下来，增加了集体收入，支援了农业生产，巩固了集体经济，改善了村民生活。为了给今后发展队办工业生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个大队1965年种植了120亩水稻，栽植棉槐30亩、大叶杨1万棵，并培植芦苇20亩。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它表明在我国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蕴藏着发展经济的无穷活力和创造力。只可惜，在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严重扼杀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创造精神。

第五节　用大寨精神修水利

1965年9月上旬，全国水利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谭震林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报告。

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各地水利部门讨论和总结了建国以来16年间我国水利建设的经验。这次会议集中了各地讨论的意见，交流了经验，研究了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各地提供的材料表明，解放以来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依靠广大农民的集体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建设起来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和许多大、中型骨干工程，以及部分机电排灌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从而使不少地区提高了防洪、排涝和防旱、抗旱能力，灌溉面积比解放前成倍增加，出现了一部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

会议指出，当前各地正处在水利建设的新高潮中，保证和促进这个高潮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发挥水利对农业生产的保证作用，战胜水旱灾害，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充分运用已有的经验，认真贯彻“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建设基本方针，特别是要十分重视调动5亿农民的积极性，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继续兴修适合生产需要的水利工程，并且管好、用好现有水利设施。会议认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应坚持以兴修小型工程为主，大、中型工程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兴建。会议特别强调水利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从各地不同条件出发，要因地制宜地坚持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征服大自然，变水害为水利，使江河湖泊为人民服务，为农业生产和其他国民经济服务。

这次会议以后，一个群众性的冬修水利的活动就在全国各地农村广泛展开。广大干部、群众在这场冬修水利的活动中，认真学习大寨经验，自力更生办水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规模上讲，这次冬修水利比往年都要大。各地都在努力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争取农业生产更快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65年11月底，全国各地参加冬修水利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达到3200多万人。冬修的内容很广泛，水利方面主要是现有工程的配套工程和多种多样的小型水利工程。此外还包括除涝治碱、水土保持、改良土壤等等。北方大部分地区还在抓紧进行打井、淘泉等开发地下水的工程，以及平整土地工程，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提高防旱抗旱能力。淮河、东北松辽平原部分地区，主要是修排水工程。山东、河北、河南和苏北、皖北的洼涝盐碱地区，主要是因地制宜地修建台田、条田除涝治碱。西北黄土高原区在修水土保持工程，大修梯田和坝地。山西各地在大力整修原有的水地和建设大寨式农田。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在大搞

铺砂田。南方各地除继续发展小型水利和配套工程以外，还在进一步健全排灌系统，消灭串灌串排，适应水稻高产的要求。改造烂泥田、冷浸田等低产田，也是南方各地冬修的内容之一。西南地区主要是大抓蓄水保水工作和蓄水、引水、提水等各种水利设施的整修和建设。

1965年受旱严重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北京、内蒙古等地，秋收还没有完全结束就开始冬修水利。南方各省秋收结束得晚冬修开始也较晚。但入冬以来，各地冬修水利的活动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1965年冬修水利的特点是：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工程。各地还注意了把长远建设和当前受益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地多修对来年生产发挥实效的工程，真正做到修一处、成一处、用一处。

那一年各地对冬修水利工作的领导一般抓得较好。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发动、规划设计、技术培训和物料准备等工作，都比往年抓得早而且抓得好。冬修开始后，各地都派了不少干部深入基层和工地蹲点抓样板，并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加快冬修的进度。由于各级领导抓得紧，水利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大部分地区对于冬修和冬季农副业生产的劳动安排也比较合理。

由于注意发扬大寨人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那一年的冬修水利中，各地大部分工程都是社队自己动手搞起来的，一般花钱少，见效也快。

第六节　全国处处有大寨

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从首都北京，到大江南北、雪域边疆，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各地的干部、群众在运动中所发挥出的聪明才智和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感人至深。

大寨的事迹和先进经验，在北京郊区农村干部和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县区、公社的党政领导干部认真进行了讨论；不少党支部也学习了介绍大寨经验的文章。他们认为，大寨是发扬革命精神、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活样板；大寨为他们树立了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榜样。房山县十个山区公社学习了大寨经验以后，计划先培养14个“大寨式”的村庄作为样板，用以带动整个山区的建设。这些公社的主要领导干部纷纷搬到重点村居住，深入地进行工作。

大寨的经验，成为北京郊区许多社队“找差距”的一面镜子。他们以大寨精神对照本单位，进一步挖掘潜力，增添了干劲。与大寨的自然条件相似的房山县六渡人民公社，过去曾派人下山取“经”。他们看到一些先进单位有水有电，总认为自己条件太差，不好比；在学大寨运动中，他们听说大寨既无电又缺水，全凭两只手和一把馒头，战胜自然，夺得高产，便决心以大寨为榜样，大抓治坡、闸沟、改良土壤三项措施，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连年获得较大幅度增产的房山县石楼人民公社，听到大寨大队耕地都是

梯田小块，而本公社一抹平川，土地连片，条件比大寨好得多，感到增产潜力还很大，全公社立即掀起了除治玉米钻心虫的热潮，仅两天时间，就发动了近3000名社员，一鼓作气在100多万公斤玉米秸中除治了越冬钻心虫，为当年粮食增产多增加了一项新保证。位于丘陵地带的崇各庄人民公社岗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市劳动模范吴春山，学习大寨经验以后，提出一个问题："大寨有七道大沟，岗上有七条小沟；大寨大旱缺水，岗上的水地比人家多；可是为什么大寨粮田亩产很高，岗上亩产只有150.5公斤？"党支部委员会上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照大寨精神找到了两个不够，一是做人的工作不够，一是学习先进技术经验不够。会后，在进一步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由吴春山负责积极筹划建立试验田，准备先从棉花、谷子两项作物做起，全面试验推广先进技术经验。

有些公社学习了大寨大队不依赖国家支援、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高尚风格以后，提出"不坐等机械、化肥，不坐等国家贷款，不坐等成套经验，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平谷县熊耳寨公社北土门大队原计划依靠国家修建一条2公里长的马路运输果品，现在决定由社员自己动手修建，不向国家要钱。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白盆窑大队，沙岗地很多，学习大寨以后，决心不用国家一文钱，依靠自己双手，苦干几年，把所有沙地改造成良田。1964年人春以来，这个大队每天出动150多人，冒着寒风，推运黄土，改良沙荒。朝阳区东北部受到严重涝灾的一些公社，也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组织了上千名社员，开始大规模平整土地，扩大水田，争取在1964年弥补上一年受灾的损失。北京郊区一些公社生产队在深入学习大寨经验和精神的同时，还针对学习中发现的问题，制定进一步学大寨、赶大寨的具体计划。

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所在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1964年获得了好年景，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加了3成，亩产量达到了300公斤，林业、畜牧业、副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他们在取得好收成以后，马上就在全体干部和社员中间开展了一个"打了胜仗找差距"的讨论。他们跟大寨比产量，比干劲，比对国家的贡献。一比，大伙吓了一跳。发现他们比大寨还有很大的差距。总结了一下，找出了8条差距，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不如大寨好。他们认识到，去年的生产成绩虽然不小，可是一点也不能自满。一自满，就会走下坡路。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四川省新繁县新民公社的罗世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候，听了陈永贵的发言，立刻写信给自己的公社，要求大家学习大寨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社员黄德永在学习中说："人家大寨硬是在冰天雪地里搬大石头，人家那么大的困难都不怕，我们这里只落一点霜，挑几挑泥巴算不了什么。"一大队二队有个老农民亢良五，起初不信低产田能改造。人家改土，他站在一边看，看着看着，他的思想也改变了，也摸起扁担，下田干起来。

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公社南王庄大队大队长王玉坤，1964年12月来到首都参加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听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学习了大寨精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很大的鼓舞，脑筋大大地开了窍。

*1964*年，王玉坤领导的南王庄大队虽然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但是总结起来，

王玉坤认为生产上毛病不少。由于前一年夏季遭受涝灾，使粮食和棉花这两项主要作物都减了产。由此，王玉坤想到1963年到大寨参观的情形，对比一下，更觉得自己生产中有很多方面要加以改进。王玉坤说，大寨是个穷山沟，我们大队的条件要比他们好得多。他们决定在新的一年里，要学着大寨的样子，一定好好干，做出成绩来。

他们决定要大抓平整土地和积肥两件事，要把村里所有高低不平的地都填平，这是防止地涝的重要一条。王玉坤说，填平土地，社员们倒不反对，但怎么个填法，用什么工具填，大家的意见却不一致。有人主张用推土机推土填地，说是用起来痛快，填得又快又平，还节省很多劳动力。王玉坤和他们算了一笔账：用推土机费用较大，如果买些小推车，每辆不到40元，除了推土填地外，平时还可用来积肥，用处大，又省钱。王玉坤说："我参加这次会议，更觉得勤俭办社很重要，我回去一定要发动群众，用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把队里的地平整好。"

在青海省日月山下，青藏路旁，有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湟源县和平公社小高陵村。这个村有汉、藏、回三个民族，217户人家，1300多口人。他们的6000多亩耕地，90%是旱地。这里海拔2700至3100米，农作物生长期只有90至120天，没有绝对无霜期，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度左右。解放前，这里山穷、地穷、人穷，许多土地"树不长，牛不站"。

1949年青海解放。1953年，小高陵人开始植树造林。那时，人们想得不远，只希望有些烧饭煨炕的燃料，有些生活用材。1956年，农业集体化把各族农民联结在一起，改天换地的斗争从此全面展开。

小高陵人改天换地靠的是自力更生。他们说：自力更生激发起来的革命精神最旺盛；自力更生摸索出来的经验最顶用；自力更生培养的人才最有本领；自力更生办起的事情最巩固；自力更生能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也能减轻国家负担，等于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通过学习大寨的先进事迹，他们同大寨比思想、比干劲、比产量、比贡献，发现最大的差距是：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大寨过得硬；粮食产量和现金收入没有大寨高；对国家的贡献没有大寨多；科学实验不像大寨年年都有新套套。最主要的差距，则是跟不上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为了学大寨、赶大寨，1965年他们又制定了五年建设规划，掀起了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

在喜马拉雅山主脉冰峰雪岭之间，在海拔4200米的雪域高原上，有一个叫帕里的地方。这里自古不产粮食，过去人们只在帕里种马草，吃粮完全靠外地供应。1960年，帕里人在历来不长庄稼的喜马拉雅山台地上试种青稞，获得了成功。这是西藏从来没有的奇迹。但帕里人并不因此而自满。1964年他们组织了一些互助组和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受到很大的启发。他们说，平时看不出松柏的硬劲儿，要看松柏的硬劲儿，需要在严寒的冬天。帕里人一定要学大寨，做雪山上的松柏，创造出更大的成绩。1965年他们扩大了青稞试种面积，尽管遇到了5场酷霜，在庄稼扬花吐穗时节又遇到早雪，2000多克（克相当亩）土地，仍然产了10多万公斤粮食。至此，当地需要的口粮一大部分已经可以自给，有不少户的口粮还自给有余。

河南省林县，原来是一个“光坡秃山头，沙石枯河沟”的穷地方。从农业合作化时起，他们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引漳入林，重新安排全县河山，逢山凿洞，遇沟架桥，走陡坡，过高崖，穿过50多处悬崖绝壁，闯过130多个山头，凿通了42个山洞，在太行山腰挖出了长达71公里的山间渠道，使一向缺水的山区土地得到了灌溉。1964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200公斤，林、牧、副业也有很大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大队，1949年以前是一个几乎被风沙吞没的地方。他们从50年代初开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营造了林带和片林以防风固沙，修渠引洪淤灌以压沙，并用人力、水力和风力搬掉几百个沙丘，大大减轻了狂风和“沙龙”的为害。1964年学大寨运动中，他们又将2500亩耕地打上地埂，把大水漫灌改进为畦田浇灌，粮食亩产提高到179公斤，比1949年增长了5倍。大牲畜由1950年的47头发展到240头。

福建省连江县东升渔业大队，300多户渔民，从1955年起，依靠集体力量，艰苦奋斗十年，走出了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他们厉行节约，积累资金，建造大渔船，安装机帆船，使渔业生产跨出闽江口，远航到浙江渔场。1964年，全大队实现了渔船机帆化，生产好似跨上“千里马”，当年捕鱼500多万公斤，比1958年以前翻了两番多，全大队积累起100多万元的财富。这个大队50年代初常年住“连家船”的贫困渔民，逐步富裕起来，在岸上盖起了一排排新楼房。

当时在全国确实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热火朝天的学大寨运动，各地涌现出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寨”。在北方的如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的下丁家村，十几年来年复一年地苦干，劈山造田，在石山区凭人力修垫了大量的平整、块大和土层深厚的耕地，并且实现了水利化，从而把一个产量很低、生活很苦的地方，变成了产量高、生活富裕的农村。在南方的如广东省四会县清塘公社的芙蓉村，苦战7年开挖了20多条排水沟渠，引出了田里的冷泉和铁锈水，把总产量极低的烂泥田变成了高产田。他们还用植树造林、建筑沙坝谷坊、挖环山沟等等办法，治理了日益崩坍的红土丘陵。这些先进的生产单位，像大寨一样都是些集体的“愚公”。它们都处在生产条件较差的山区，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多年来自力更生地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治山治水和农田建设，把过去的穷山恶水变成了青山绿水，把穷困的山区变成了农林牧三业繁荣的山区，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通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精心组织，通过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学大寨运动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当时，县县有大寨，国营农、林、牧生产单位也有大寨；山区有，平原也有；干旱的沙漠地区有，低湿易涝的盐碱地区也有。新疆、内蒙古出现了自力更生改造沙荒干旱面貌的大寨式的先进生产单位。江苏盐城专区和山区临沂专区出现了自力更生改造低湿盐碱面貌的大寨式先进生产单位。这样的先进生产单位也不仅是社队，还有一些县或者一大片地区，发挥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如河北遵化县、河南林县、江苏启东县、江西余江县、山东临沂专区、北京和上海市郊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四川温江专区等等就是。所有这些先进单位的共同特点是既有征服自然的大无畏精神，又具有一点一滴地做艰苦扎实工作的

决心和毅力。它们的成就都是靠自力更生为主取得的。他们的经验在各地农村推广以后，对于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全国农业总产值来看，1964年、1965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3.5%和8.1%。196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589.6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超出1957年536.7亿元的9.9%。在农业内部，农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都有了幅度不等的恢复或发展。

第七节 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

全国的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大寨人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的考验。考验既来自自然，也来自社会；既来自外界，也来自大寨自身。

1965年，太行山区遇到了严重的干旱。以大寨说，从4月中旬开始播种起，除4月下旬下过一次小雨，到7月中旬近90天没有下雨，中间又刮了一场暴风。7月19日下了1小时暴雨，雨量达60多毫米。暴雨引起的山洪把大寨村最好的沟地庄稼冲毁了50多亩，冲断了狼窝掌沟中一些石坝。一场暴雨后接着又旱了，却在8月19日下了一场冰雹。陈永贵和大寨的村民们都说，这次的灾比1963年重多了。这次是旱、风、洪、雹一灾未平，一灾又起，其中最严重的是旱灾。

为了夺取当年的农业丰收，大寨人一开春就有防旱思想，就有两手准备。春播前整地，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利于保墒的措施，播种又实行了适当深播。播种后一个时期没有下雨，就及时采取了间苗和提早开锄等等防旱措施。旱象一形成，全村立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旱斗争。

6月过去了，到7月还不下雨。大寨村党支部就发动村民讨论：受了灾可怕不可怕？有没有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办法？这次讨论把全村动员起来了，为了抗旱，人人出力，人人开动脑筋，玉米深刨，谷地培土，一个接一个的抗旱办法都用上了。这样一直搞到7月19日下雨，全村的庄稼一直长得很好。7月19日的1小时暴雨，大寨又遭了一次洪灾，受了一定的损失。有些人对盼来的这场雨很扫兴。党支部和陈永贵却认为，尽管受了灾，这场雨对抗旱还是好处大于坏处，雨后立即发动全村锄地保墒，作持久抗旱的准备，同时组织劳力抢救了部分被冲的庄稼。对于被冲的石坝，陈永贵等村干部仔细作了检查，同没有被冲垮的石坝作了对比，找到了教训。之后，全村一鼓作气，针对过去修坝的缺点，用8天时间修复了全部被冲的石坝。

7月暴雨后又旱了。三伏天气，旱情更加严重，抗旱也更加紧张。党支部又发出了“抗旱好比攻碉堡，越往后越困难，越困难越要抗，加紧找水，突击浇苗”的号召。当时，大寨正在国家派出的钻机帮助下钻机井，而且已经见了水。大寨村一面给钻机增派了劳力，希望机井迅速成功，一面组织掏废井和在沟里挖水坑，找泉水。大寨多年兴修梯田和其他水土保持工程，这时也见了效，有些沟底已经开始见水，一挖水就出来了。

大寨村里过去枯了的废井，这时一掏也有了水。在废井重新出水的鼓励下，村里又组织打了几眼新井。人们一面找水，一面就给部分不耐旱的耕地突击浇苗。8月上中旬，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挑担的、提罐的、捧盆的都上了阵，先后突击浇了50亩左右，使一块块、一亩亩开始受旱发黄的庄稼又变成了墨绿色。对于大多数比较耐旱的耕地，大寨坚持多锄保墒的方针，提出今年不挂锄了，旱到什么时候锄到什么时候。多锄不仅是为了这一季抗旱，也为下一季抗旱。陈永贵说，不怕一年旱，就怕连续旱。地旱得干了硬了，如果不锄，秋后下的雨也会流失，明年春播还会受旱。多锄不仅可以减少蒸发，保证这一冬庄稼，秋后下的雨即使这一季庄稼用不上，还可以把它留在地里给明年春播用。

大寨能够战胜这次严重干旱，还得益于它的农田基本建设，得益于它的“海绵田”和“三深耕作法”。大寨进行了多年农田基本建设，把坡地修成梯田，加厚耕地的土层等等，都是为了保土保水，使农田逐步达到稳产高产。因而大寨的耕地比较耐旱。在这个基础上，大寨又实行深耕细作，使耕地的表土松软得像海绵一样，再加适当深种、深锄和许多抗旱措施，就使它在大旱之年仍然获得了高产。

大寨不仅抗住了当年的干旱，还为以后的水利建设打下了基础。陈永贵在谈到那次抗旱的经验教训时说，这次抗旱解决了我们在发展农田灌溉事业方面的保守、麻痹思想。在此以前，我们以为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的耕地能够抗住一般的旱灾。对于发展灌溉，总认为山区缺水，信心不大。今年春天，中央负责同志就指示我们要搞水利，预防干旱。我还以为不要紧。当时他就提醒我大旱三年怎么办？现在看起来还是领导看得远。当时我就没有料到今年会发生这样的大旱。大旱教育了我们，抗旱中我们对解决水的问题找到了一些门路，国家派来的钻机在山上又钻出了水。这就是自然灾害对我们的促进。

这次大旱使大寨人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1965年11月24日，陈永贵在《山西日报》上发表文章：《以更高的标准建设高产农田》。文章总结了1965年大寨抗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大寨人今后的努力方向。文章说，多年来，尽管我们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拿更高的更严的标准来衡量，还有很大差距。直到现在，我们大寨连一亩真正的水浇地还没有。为什么不发展水利？不完全是条件不好，主要是我们有保守自满思想。现在看来，我们的水利事业已经落后了十年，特别是今年的大旱，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发展水利不行。不怕一年旱，单怕两年灾，明年再旱怎么办？大旱三年怎么办？因此，积极地、千方百计地发展水利事业，已经成为我们迫不及待的任务。我们初步规划要在今后三年内，保证每人发展一亩水浇地。

陈永贵还说，林业建设是我们的最大差距。不怕有差距，单怕不认识。1963年以来，我们大抓植树造林，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决心乘胜前进，争取在今后三年内，绿化荒山秃岭。

大寨的土地是不是完全合乎稳产高产的标准呢？陈永贵认为还不是。他说，今年大旱给我们土地排了排队，还有近200亩地建设质量不高，不用说高产，稳产也没达到。就是经得住大旱考验的大部分土地，也和这个标准有距离。因此，在今冬明春，仍要狠

抓土地基本建设，保证每人整修更高标准的大寨田一亩，标准要达到：地平、堰高、土厚。

1965年11月，陈永贵参加了中共晋中地委组织的参观团，对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市的一些先进单位参观访问。他所到之处，看到广大干部、群众意气风发，扎扎实实地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比学赶帮超运动。他看到有不少单位快要赶上大寨了，有不少单位的生产水平还超过了大寨。陈永贵从中受到了鼓舞，也深深感到大寨必须急起直追，虚心学习各地的先进经验，才能继续前进，取得新的成绩。因此，他在参观访问途中，给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

陈永贵在信中说，这次参观，对我们来说，教育太深刻了。所有的单位，尽管情况不同，但成绩都十分突出。没有别的话好讲，只能用老话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个比一个先进，一个比一个突出。特别是到了下丁家村，叫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看山，山青；看地，地平；沟沟有水，库库相连；看人，个个精神奋发，干劲冲天。今年粮食产量达475多公斤。是超大寨的一个典型。其实，超大寨的何止一个下丁家。看来，我们的工作落后了。如果不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有被甩在后面的危险。

陈永贵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他说，这个问题，要回答多久，看来，永远回答不完。要一直回答下去。全国学大寨，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干劲消灭差距。我们要向全体社员算一笔账：拿1963年前和1963年后作比较，我们少做了多少事情，少产了多少粮食，少收人多少现金，这个账要算到户，算到人。使大家进一步明白人勤地不懒的道理，人的因素第一的道理。是不是我们的潜力挖尽了呢？劲头鼓足了呢？不能这样想，也不能这样说。现在仍然要在挖潜力、鼓干劲上做文章。

陈永贵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发现了我们自己有点自满情绪。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现在全国各地学大寨学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不仅学，还在赶，还要超，有的已经超过大寨。不管农业，还是林牧副业，好多单位都比我们好。人家学大寨认真学，我们学全国先进兄弟队，学得很不够。所以，要将“大寨式先进单位”的材料，认真地向全体干部与社员进行宣传。使大家开眼界，长见识，找差距，鼓干劲，把大寨和各先进单位的差距，消灭得愈快愈好。

陈永贵还谈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他说，天津市专门组织了报告会，让我报告后，又组织劳模和我们开座谈会。烟台党、政、军也组织了同样的会。济南组织了28000人的报告会，而且将我的报告连续广播，当作政治运动在山东范围内开展，以推动当前的农田基本建设。学大寨学得认真极了。河北、山东，听说大寨人出来学习，真是轰动全省。人家虚心好学的态度，对党中央指示认真执行的态度，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绝不能辜负他们对我们的希望。总之，人家是惊天动地，翻天覆地，我们有点小手小足，小天小地。差距越看越清楚，越看越大，越看越多。我们在外面找，外面学，你们在家中找，家中学，成绩夸大有坏处，差距找得多些没有坏处。

谈到今后大寨的工作，陈永贵在信中说：“土地建设的质量一定要好上加好，不能

含糊。不平地要搞平，起高垫低，真正达到高水平。活土层，要达到最低一尺以上，给水利化打基础，16眼水井，要继续打，不能停下来。这是我们实现水利化的根本办法之一，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虎头山下造林地的修整，请检查一下，要整好，整细，也要摆一个样板。我们在下丁家，到处可以看到鱼鳞坑，这一看，再不能不抓了。"

陈永贵在信中多处提及的下丁家，是指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下丁家大队，是当时全国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典型。下丁家人在学大寨运动中，向穷山恶水宣战。他们把山地削成平地，把地下的大石头一块块掀上来，把地上的大石头一块块搬走，把土里的碎石子一筛筛滤出去，然后又在一条条山沟里筑起水库池塘，建造成"三层楼式"的灌溉网，分别浇灌山上、山腰和山下的农田，使这个原来"山高地薄石头多、天地自带三分灾"的穷山村，变成了一个山清水秀、高产稳产的富山庄。

1965年，下丁家村也战胜大旱，夺取了又一个大丰收。随后，他们又对照大寨找差距。秋收前后，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幸到大寨参观学习之后，又把大寨精神带回来，在全村开展了一个进一步学大寨、赶大寨的热潮。陈永贵来到下丁家参观，使下丁家人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把下丁家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大会、小会、民校、工地，到处都在用大寨的尺子量自己的短处。下丁家人通过总结、学习、对比，一致认为比大寨有三个不如：一是稳产高产不如大寨过得硬，不怕困难、不怕灾害的劲头不如大寨大；二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如大寨抓得深、抓得细、抓得透；三是虚心好学的风格不如大寨高。他们说：大寨提出"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家面向全国，找了差距，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下丁家也要学习大寨这种精神，不断提高，不断前进。第十四生产队队长丁学选说：大寨是全国闻名的先进单位，还口口声声说向咱学习；咱比大寨还差得远，再不加倍努力，就要落后了。

那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一杆红旗树全国，万杆红旗映新程。后进学先进，先进找差距，大家都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一个比学赶帮超的伟大行动中。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场运动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甚至连靠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经济建设本身，我们今天也有了冷静而理智的认识。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应当赞美当时的人们在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应当赞美他们那种不向穷山恶水低头的伟大气概，应当赞美他们为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所付出的艰辛探索，应当赞美他们在这场探索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精神。将这种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念相结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第八节　农业靠大寨精神

1965年11月，在首都农业展览馆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共展出了52个大寨式农业典型，它们是从各地涌现的成千上万个先进单位中选拔出来的。展出的单位中，有长期艰苦奋斗改变自然面貌的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有充分利用当地自

然资源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区和县，有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高产稳产的专区和大城市郊区。《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社论的题目是《农业靠大寨精神——祝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开幕》。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大寨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当大寨的先进事迹一经传播开去，立即吸引了、鼓舞了千百万群众，一个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群众运动，很快就在各地开展起来。大寨精神所到之处，人们的思想面貌在变，生产面貌在变，社会风气也在变。各种各样听天由命、不相信人的力量的论调，认为农业增产已经到顶的论调，特别是那种对上依赖，对下恩赐，以为只有依靠国家才能发展生产的论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大寨为榜样，走自力更生的革命道路，已经成为亿万农民的行动准则。现在，不但每个省、每个专区，而且每个县甚至每个公社，都有了自己的大寨。大寨精神已经成为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

社论指出，全国各地大批大寨式的农业先进单位的涌现，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战线上的比学赶帮超运动，将发挥极大的促进和鼓舞的作用。从总的方面来看，我国农业的底子仍然比较薄，生产水平还不够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我们能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这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我们有几亿农民，他们不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力，而且是用大寨精神武装起来的伟大的革命力量。只要发扬大寨精神，继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他们的双手，加上国家必要的支援，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建设更多的稳产高产农田。

当时对于大寨精神的宣传，尽管不断地讲要突出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原则，但从全局上看，人们更多的是强调大寨人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1965年11月《人民日报》为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发表的长篇文章《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道路》，就重点宣传了大寨和大寨式先进单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改变贫困面貌的事迹。文章说："这次展览，也是一个进行自力更生思想教育的课堂。这次展出的所有先进单位，不论是处在条件较差的山区，还是处在条件较好的平原，凡是面貌变化最大的，生产上升最快的，都是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时就学大寨运动，全国进行过无数次座谈、讨论，社会各界的人们也写过大量文章，谈认识，谈体会。人们谈论最多的，也是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黑龙江省爱珲县位于大兴安岭北坡，黑龙江南岸，地域辽阔，土地比较肥沃，资源丰富，增产潜力很大。但是，这样一个好地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国家贡献很少，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县委对照大寨经验经过认真讨论，发现主要是由于县委缺乏自力更生的思想，由此影响到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有少数队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生活困难靠国家救济。农民们说：我们这里已经"国有化"了。人们对这种只依赖国家的现象非常不满，说这是大寨精神的对立面，是"大赖精神"。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许多基层领导干部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1965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河北阜平县委代理书记曹桐风的文章《发扬大寨精神，革掉“大赖”思想》。文章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阜平来说，根据我们的体会，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搞生产革命，是靠大寨精神还是“大赖”思想。我们县多年来粮食搞不上去，长期不能摘掉缺粮帽子，检查起来，主要是吃了“赖”字的亏。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的深山区，自然条件不好，地少人多，土地瘠薄，全县每人平均只9分土地。解放以来，年年靠统销吃饭，真是成了种地靠老天，吃饭靠统销，花钱靠贷款，受灾靠救济。自己种地不能养活自己，靠别人养活着。问题更严重的是，面对着这种情况，很多人却心安理得，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多年来，阜平人一直认为自己缺粮是由于地少人多，穷山恶水，自从1964年学习了大寨精神，他们以大寨为镜子，一次又一次地对照自己，找差距，照一次，就明朗一点。他们的山比大寨强，他们的水比大寨多，为什么大寨能够把粮食搞上去，而自己却抱着“讨饭碗”不放呢？这样一讨论，问题就明朗了。阜平是个多灾的地方，几乎年年有灾。1965年这个县遭到旱灾，从开春以来没有下过一次透雨，雨量仅相当于1964年的五分之一。但他们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通过修大寨田，大搞盘山渠和群众性的担水浇地，不但保住了绝大部分庄稼，而且使1万多亩旱岗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水浇地。大旱之年，得到了比较好的收成。全县出现了平均亩产200公斤以上的公社13个，其中西庄公社亩产达到了400公斤，还出现了千斤大队5个。有些过去靠“赖”过活的队，也一跃变成了余粮队。

这个县过去常常以所谓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大赖”的理由。认为伸手向上级多要点东西，是为了群众，是关心群众的疾苦。结果却是害了群众。实际情况是，国家给的越多，人们的依赖思想越严重。有的农民说：这样办就把一部分群众惯坏了，越给越赖，越赖越懒，越懒越等，越等越改变不了生产面貌。

曹桐风在文章中说，什么是真正的“摇钱树”，看来不是别的，那就是大寨精神。阜平县龙王沟村，就是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创业的，他们的粮食亩产超过了200公斤，核桃每年产4万多公斤，大牲畜发展到了142头，两年就繁殖了幼畜98头，羊发展到1578只，农民丰衣足食，户户有存款，成了全县有名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红旗。

曹桐风说，现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劲头很大，坚决要走大寨之路；许多先进的兄弟县，也都远远地走在前头去了；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再也不能“赖”下去了。我们县委会下定决心，要以大寨作榜样，快马直追，力争上游，决心改变领导作风，依靠群众，大搞以“林、梯、坝”为中心的综合治理，使坡岗地变成大寨田，旱地变水田，穷山变富山。我们的口号是：大战1966年，坡地变成大寨田，旱田变成水浇地，坚决摔掉“讨饭碗”。要发扬大寨精神，坚决革掉头脑中的“大赖”思想。

由于当时我国的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因此，在学大寨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对大寨的宣传还比较客观；对于各地学大寨的要求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动与布置，大

体上能够结合各地的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因而，学大寨的内容比较丰富多彩，成就也是各种各样的。

云贵高原乌蒙山上的松林公社，解放初期这里的少数民族农民还是刀耕火种，在党的正确引导下，他们十多年来不断改革耕作技术，生产得到大发展。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新疆皮山县各族人民，用8年时间在戈壁滩上修新渠道，改旧渠道，大量营造防风林，使旱乡变水乡。1965年粮食总产量比1956年增长92%，棉花增长1倍多，油料增长2.8倍。向称“鱼米之乡”的浙江嘉兴县，农业生产的成就振奋人心，粮食亩产平均达到423公斤，全县10万多农户平均每户养猪2.8头。

当时，对于先进典型也还较少片面化、绝对化倾向，各地在学大寨运动中，不仅提学大寨、赶大寨，而且还提出了超大寨的口号。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一文中就提出：“在点和面的矛盾中，包括着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带二的方法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在这里，‘超’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落后敢于超过先进，对先进是个压力，是个推动力，推动它先进更先进。”

一些在基层工作的人在学大寨运动中，也敢于提出超大寨的口号。山西省平定县立壁村第一生产队队长赵三虎就说：“学大寨，光跟着陈永贵同志的脚印走路，不是好学生。我们要敢于当探险家。”而且由于他们创造性地学大寨，1964年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1960年的78.5公斤提高到了315公斤，用了4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大寨10年的路程。不仅如此，1964年这个队的谷子的单位亩产量达到696斤，超过了大寨。1965年，大寨人就来向他们学习种谷子的经验了。

1965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怎样对待先进》的社论。这篇社论虽然是针对湖北省浠水县望城公社十月大队而发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党中央当时在对待先进单位的问题上，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社论指出：“在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都在学先进、赶先进。先进单位在革命运动和生产运动中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示范作用。先进单位怎样不断提高自己的先进水平，这不只是同先进单位本身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也是对整个生产高潮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问题。”社论说：“任何先进单位都离不开党组织的正确领导。领导上对一个先进单位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先进单位能不能继续前进，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一个先进单位，以为它在一切方面都很完善了；或者虽然也看到了它的缺点，但是为了‘爱护’它，而不及时地指点出来。这种做法其实是‘欲爱之，反害之’。有些先进单位之所以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的领导机关对这些先进单位缺乏全面分析，往往只喜欢夸奖它们的成就，当兄弟单位诚恳地指出它们某些缺点的时候，还很不高兴，甚至有意地替它遮掩。可是，缺点并不因为遮掩住了就不再存在。实际存在的缺点，不正视，不克服，就会发展成为更大的缺点。只有用辩证观点对待先进单位，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说，既要积极地推广它的经验和成就，同时又准确地指出它的缺点和短处。当然，这决不是说，要对先进单位故意挑毛病。先进单位的主要方面是好的，忽视了主要方面而只看它们的某些缺点或者夸大它们的某些缺点，这种

态度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对先进单位的真正爱护，才能够鼓舞他们更加振奋起革命精神，同时又帮助他们防止和克服自满情绪，不断前进。"

《人民日报》的社论还特别指出："有缺点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对待缺点的错误态度。尽善尽美的先进单位是不存在的。如果真是一切都十全十美了，那还怎能再前进一步呢？先进单位被人们称为'火车头'，这是对的；可是，世界上哪有不需要检修的火车头呢？又哪有不需要再革新的火车头呢？""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农业行政部门，要认真地把农业战线上的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领导好，注意引导大家不要从形式上学先进，也不只是从某些具体做法上学先进，而是要从不断革命的实质上学先进。学先进，既要学他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更要学他们一分为二、不断前进的精神。只有一分为二、不断革命，才能更好地做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才能真正把先进单位的革命精神学到手。"

196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先进的学问》的短文。文章讲述了山东省菏泽县安兴公社张楼大队打井中遇到的问题。张楼大队过去打井用"木盘"，后来学习郭庄大队的先进经验，改用"砖盘"。结果井筒下落时极不稳定，严重地影响了工程质量。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登爱为此访问了一个叫张兆兴的打井"行家"，问他"木盘"是不是比"砖盘"好。张兆兴告诉他："学人家，也得看合适不合适。好比你的帽子戴在我头上，就一定可巧正好吗？咱这里用'木盘'合适，就不必丢掉'木盘'，硬去学人家的'砖盘'法！"

文章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拿别人的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硬往自己头上套的人是没有的。然而，在学习外地经验中，不从自己的条件出发，不是学人家的精神，而是学形式，生搬硬套的现象却是不难找到的。"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学习先进经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是'死学死用'。就是不管自己的具体情况，也不管是否适用，只要听说是先进单位的经验，就统统搬来，盲目地照着干。应该说，这叫'搬'，不能叫'学'。另一种态度是创造性的活学活用。在学的时候，肯子动脑筋、想问题，学那些适合自己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是学形式，学皮毛；在用的时候，更注意从自己的条件出发，用别人的经验去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外地的经验真正学到手。"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当我们重读当年的这些社论和文章，仍能感受到它所阐发的真理的力量。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没有能够牢牢地掌握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正确思想，在对待大寨这个先进典型的问题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将大寨经验绝对化、神秘化、公式化，只准提学大寨，不准提超大寨；只准讲大寨的成绩，不准说大寨的不足；只准照搬照抄大寨经验，不准结合本地实际做出某些变通。将大寨的某些具体做法与大寨精神混为一谈，甚至用大寨经验来代替党的农村政策。几十年的岁月沧桑过去后，当着我们回首那段火红的经历，思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蜕化，不禁扼腕叹息！

第八章　“文革”内乱，农业学大寨也出现了混乱局面

第一节　参观者云集

大寨村出了名，来参观的人就多了起来。从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大寨参观，但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多也不过一年来几万人。参观者真正络绎不绝达到高潮，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事情。1967年开始形成高潮，那一年，来大寨参观的人共有370多万，逢年过节，下雨下雪天都算上，每天平均一万多人，高峰期竟然达到每天数万人。这对于一个只有400多口人的小山村来说，实在是个奇迹。

有人是发扬着大寨精神来大寨参观的。山西省雁北地区灵丘县谢家坪大队的11名干部和党团员，严冬时节来大寨，不坐火车、汽车，坚持步行了四五百里路。途中走过一个个村镇时，学着当年老八路的样子，不住民房，不扰百姓，当然更不能进饭店吃饭，靠着吃自己带的干粮到了大寨。

许多人是抱着旺盛的革命热情来到大寨。甘肃省的一支二三百人的参观队伍，每人身上穿着一件没有布面的白板羊皮筒大衣，在脖子上挂着一个用红绸带系着的搪瓷彩盘，彩盘的直径约有一尺长，上面印着毛泽东的画像。他们所到之处，都能赢得人们的热烈掌声。

来大寨参观，除了看虎头山、狼窝掌和那些沟沟坎坎的地方，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大寨的干部，特别是看到陈永贵了。但每天来那么多人，别说陈永贵不可能人人都能见到，见一见贾进财、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大寨党支部的支委们也很不容易。那时陈永贵为了能坚持在地里参加劳动，每天很早乘参观的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就下地干活了，为了怕人们见到他，他总是要躲在参观的人到不了的地方干活，而且中午也不回家，就让家里人把饭送到地头上。他有一次对熟人们讲，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回家吃午饭了。可见陈永贵为了能坚持劳动，也克服了许多困难。但从参观者的角度讲，他们长途奔波来一趟，而且也许一生只能来这一趟，见不到真人也是蛮遗憾的。有一次几个参观的人意外地在一块庄稼地里看到了正在劳动着的陈永贵，他们心情激动地对着

陈永贵欢呼，引来更多的人参加进来一道欢呼。陈永贵只好干笑着过来与他们握手。那一次，陈永贵有半天时间没能干地里的活。

为了满足来参观的人们能够看到“真人”的愿望，在1969年以前，大寨的干部每隔四五天出来接见一次参观者，让大家见一见大寨干部的风采。接见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大寨干部从地里劳动回来，吃过饭后，大寨接待站的人把参观者集中起来，让他们沿着公路排成两列，由大寨干部在两列参观者中间走一个来回。

这种活动一般安排在中午进行，过程虽然简单，但场面却是激动人心的。常常是大寨接待站的人在麦克风前宣布：“现在，大寨干部和大家见见面。”参观者中间就爆发出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人们自觉地排起长队，有时参观者很多，队伍要排0.5公里以上，一直排到大寨的邻村武家坪。队伍刚排好，大寨的几个干部就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参观者面前，他们每人手里都摇晃着一本“红宝书”，也就是一小本用红塑料皮包着的《毛主席语录》。他们行走得很快，两旁的队伍里则是群情激动，人人都挥动着“红宝书”向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不断地有人挤上前去，大把大把地向大寨干部的口袋里装他们那里生产出的最新式样的毛泽东像章。大寨干部这时一般也要回赠几枚印有虎头山或大寨新村图案和毛泽东人头像的纪念章。偶尔大寨干部也向参观者讲几句话，大意是：大家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大寨学习，但是大寨人不能接待大家，大寨的干部如果天天忙于接待大家，就不能下地劳动，那样，大寨就没有了，希望大家理解这点。这些话对于参观者来说，听了感到很温暖。但对于大寨干部来说，则成为格式化的语言，他们几乎天天都要说好几遍这样的话。

后来等待大寨干部接见成为参观者来大寨的重头戏，人们参观完了，还要等着大寨干部接见。这无形中就增加了人们在昔阳与大寨逗留的时间，影响了大寨人的正常生产。不知是谁建议的，1969年以后，接见仪式取消了。这就使得不少人参观了一趟大寨，连个大寨干部也见不到。

即使把能推掉的接见都推掉了，大寨的干部仍很难安心劳动，因为有些人来到大寨，干部们是不能不出面陪同接待的。这些人大致包括五大类：一是中央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领导，规格一般掌握在中央副部级以上和省、市、自治区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以上，及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二是重要外宾，即国外政界、军界及其他各界要人，他们来大寨一般都由国家领导人陪同；三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代表，如李顺达来访，南京军区硬骨头六连来参观等；四是革命圣地的代表，如井冈山、延安来的代表；五是少数民族代表，如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代表来参观。就是这几类人物也已经使大寨干部应接不暇，开始大寨党支部的支委们还集体陪同，后来就只能是单个陪同了。

参观者见不到大寨干部，要想见个大寨村民，或者再与他们谈谈话，用当时的语言讲叫做“取经”，那更几乎是不可能的。参观者一来到大寨地面，就处于一种高度的组织状态中。他们要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决不容许单独走动。他们常常是被要求排成长队，在一名手持半导体扩音喇叭的讲解员带领下，一路小跑般地沿着一条事先确定了的路线参观虎头山、狼窝掌、团结沟、“乐人树”等“景点”，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自己去学

习体会了。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大寨，对大寨村乃至昔阳县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接待外宾和中央领导人，有关部门在大寨村口推平了一个小山，建起了一个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有青石窑洞和平房，设备很好，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来大寨都在这里休息。后来，在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旁边又填了一条小沟，建起了一个国际旅行社大寨支社，是现代化楼房，专门用来接待外国高级宾客。如缅甸总统奈温、荷兰王储等，都在这里休息过。

一般去大寨的参观者都不能在大寨住，他们只能住在昔阳县城。当时昔阳县城有第一招待所、第二招待所、新第二招待所，还有国营旅馆，一共约5000张床位，但还是满足不了大量参观者的住宿。城里的床位不够用，就要占用县城周围的房子。如河东、北关等生产大队集体盖了一批新房，本来是要给社员住的，但后来社员没有住成，也用来接待参观者了。即使这样，时常还显“僧多粥少”，就只好让参观者住在平定县和阳泉市，这些地方也都设有参观大寨的接待站。住在平定、阳泉的参观者，每天由汽车拉到大寨参观，晚上再回去住。高峰时，参观的人太多，连平定和阳泉也住不下了，有些人就只好先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等着，等前边的人走了，他们再来。

人是要吃饭的。参观者可以不在大寨住，但一般都要在大寨吃一顿午饭。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在那时让每天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吃上一顿饭，就是一个大负担了。大寨人准备不了这么多饭，只能由来参观的人自己带干粮，在大寨村喝上点水，就算吃了一顿饭。

我们可不能小瞧喝水这件事。大寨是个缺水的小山村，原来的一口水井，只够供本村人畜饮水。以后参观的人多了，大家都要喝水，有人还要洗脸，外宾房间里的抽水马桶更要用水。大寨井里的水不够用，县里只好接一根管子，从武家坪的井里把水抽给大寨用。但武家坪的井水也不是取之不竭的，后来也供不应求了。县里就只好用卡车，从远处拉水灌进大寨的水塔里，供庞大的参观群体消费。吃饭可以收个成本钱，喝水总不能收钱吧。因为那年头，还没有过喝水要钱的事情，可这水确实是有成本的呀，这笔钱就只能由昔阳县支付。

第二节　要什么经验，有什么经验

参观的人来到大寨后，大多数是住几天，各处都看到了就回去了，但也有人还要在昔阳办学习班。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参观者，路途遥远，往来不便，来了以后也就格外郑重其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参观者，学习班就办得十分认真。他们的学习班每期十天左右，大寨的干部还轮流着给他们讲述大寨的事迹。他们在西安和石家庄设了转运站，还自己带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翻译，有自己的油印机。在昔阳他们就把各种学大寨的材料翻译成民族文字，印出来发给大家。他们去大寨的人也多，先后有

1000多人。这些人有些据说还是通过巴黎公社选举代表的方式选出来的，因此也就特别虔诚。他们来趟大寨很不容易，南疆的人们光在路上就要走十来天。还有从西藏来的人，有的是坐飞机先到北京，然后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人陪同来到大寨。

办学习班的人们还有不少是来自部队的。“文革”期间，海军办了一个干部学习班，由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带领到大寨参观学习。苏振华在学习班上就提出：“我希望不要把学大寨当成耳旁风，你们回去，要好好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他还说：“我们准备作个学习大寨的决定。如果把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和干劲用到海军建设上，我看十年奋斗目标可以提前完成。”海军政治部在一份《参观学习大寨简报》上还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海军战士学大寨，万里海疆添新彩，军舰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

海军在全军学大寨运动中带了个头，其他各大军区都由军区负责人带队，把军官组成临时连队，来到大寨。北京军区发挥近水楼台的优势，把各军的野外拉练和学大寨结合起来。28军、63军、69军，都到大寨来拉练。38军还在昔阳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并请昔阳人来参观，参观者达一万多人。38军还派过两台推土机帮助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南京军区虽然相距比北京军区远，但也派了工兵到大寨帮助搞定向爆破，南京军区的硬骨头六连则在大寨受到了高规格的欢迎。

来大寨的参观者中，文化人不少，有写诗的，写散文的，写小说的，写报告文学的，画画的，摄影的。他们参观了大寨以后都很激动，回去就动笔，写了就发表，发表在报纸上、杂志上。有人还出了书。学大寨在全国都是件大事，各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也都愿意出这方面题目的作品。那时出版过许多学大寨的书籍，如《大寨》、《大寨红旗》、《大寨人的故事》、《大寨的经验》等。关于学大寨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汇编成书，然后免费发下去供人们学习。出版社出的书就通过新华书店向外卖。在这方面大寨也走在了前面，因为凡来这里的人，都是学大寨的积极分子或领导干部，他们对于学习和推广大寨经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这类书最积极的购买者。因此，学大寨的书在大寨卖得最火。昔阳县在大寨设了一个新华书店，主要是卖学大寨的书，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每人常常几十本成百本地买，买了当场就打包，送到旁边的邮局里就寄回去了。这样一来，大寨又成了有关学大寨专题书籍的批销中心，大量学大寨专题的书都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那时书的定价很低，一本有48张照片、279页文字的《大寨红旗》只卖到7角2分钱，那些只有文字的书籍价格就更便宜了。即使这样，大寨那个只有3人的小书店，一天的营业额竟能达到2000元。可见图书销售数量之多。

大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山区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而是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先进大“熔炉”，凡是中央发出的号召，凡是上级提倡的活动，大寨都可以很快就产生出一整套先进经验。

来大寨参观的人里面，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来开会的。那时，大寨不仅是个农业生产先进单位，而且成为一个什么经验都可以出的“风水宝地”。无论是什么工作，只要大寨有，就会产生出先进的经验，大寨实在没有，这个经验也会出在昔阳县。各行各业

都来大寨、昔阳开会。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林业、水利、畜牧、农机等部门在大寨开会，总结先进经验；组织部、宣传部去开现场会总结党组织建设的经验和基层思想工作经验。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部门也都去开现场会去总结先进经验，文化部在那里开现场会，教育部也来开现场会，广播事业局也开现场会，其他如工业、商业、金融、交通、卫生、体育、档案、司法、公安、青年、民兵、妇女、气象、图书发行、优抚工作等等都要学大寨经验。有的推广先进经验的会还年年重复着开，这使大寨与昔阳县的现场会一个接着一个，有时还同时开两个现场会。各地去开会的人和去参观的人一样，在街上贴出许多大字标语，什么“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大寨精神万岁”。这就使得昔阳县红绿纸的销售在全国各县中，创了记录。大寨村和昔阳县城地方不大，贴大标语的地方不多，全国去的人天天换，标语贴了一层又一层，于是，就又出了一个新的从业群体：撕标语卖废纸。昔阳县在这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面。

第三节　“无冕之王”在大寨

大寨的迅速走红离不开记者的大力宣传，大寨人头顶上的神圣光环有记者的一份功劳。在全国学大寨的15年当中，对大寨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的宣传，就其宣传量来说，堪称世界之最。

最早宣传大寨的是地方报纸，如《晋中报》和《山西日报》。1963年8月，大寨开始在《人民日报》上露面，1964年以后对大寨的报道迅速多了起来。到1978年年中，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各地、各县的新闻传媒里，有关大寨的宣传便成了倾盆大雨。有人作过估算，仅新华社对于大寨的报道，不算大寨公社和昔阳县的报道，一年不会少于3万字，加上大寨公社和昔阳县的报道，那就翻一番也打不住，这些报道一般肯定都要上《人民日报》。其他如《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晋中报》有关大寨的报道量更大。单只这几大媒体加起来，每年关于大寨的报道就不会低于10万字。把15年学大寨运动期间的报道加在一起，数量之大是惊人的。

为了搞好对大寨的报道，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晋中报》都在大寨建了长驻记者组。新华社还安装了固定的新闻照片传真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在那里驻着摄影师，后来随着电视新闻的发展，电视记者也到了大寨。

记者在大寨，不能参加大寨的社员大会，更不能参加支部大会或支委会，也不能不经大寨党支部的批准找社员进行单独采访。其实如果不是党支部同意了，即使有个别记者找到了某个村民，也不可能了解到什么真实情况，因为那个人第一句就要问这个记者：“你经过支部同意了吗?”或者说：“你还是去找支部吧!”

记者采访要走正式渠道，办理正规手续。这就是要通过大寨接待站向大寨党支部递交采访计划，然后等待统一的安排。但等待统一安排并不是个轻松的事，你得有充分的

耐心。

曾经长期从事大寨新闻采访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回忆过他在大寨的一段经历。他说，1968年初他开始正式长驻大寨从事新闻采访。他去后，先向大寨接待站的负责人说明来意，递交了“国书”，这是记者们对递交采访计划的戏称，对方让他等着。等了两天，没有任何消息，又不敢到村里去随便找人谈。因为这是纪律，没有经过大寨党支部，不能进村乱找人采访。他也不敢去冒这个险，因为那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社员额头上也没写他们是什么阶级的人，没写他们是思想先进还是思想落后的人，万一去找了一个地主、富农，找了一个思想落后的人，那可是一个立场问题，是采访中的阶级路线的大问题。

冯东书去的第三天晚上，很巧，大寨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到接待站来了。冯便凑上去，自我介绍，表示要进行采访。梁说：“你先熟悉熟悉材料吧。”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讲得很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冯只好继续熟悉已有的材料。又过了一星期，冯想，不能采访，干脆去和社员一起劳动好了，那也能了解许多情况。有一天，梁便良又来了大寨接待站，冯又凑上去，说：“一下采访不了，我去参加劳动吧。”梁听了，还是只有一句话：“你还是先熟悉熟悉材料吧。”脸上还是没有一丝笑容。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冯连大寨的门还没有摸着。

第四节　神秘化、绝对化、公式化

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动乱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上层建筑和领导机关，加上中共中央专门作出规定，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农村生产秩序的政策措施，也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农民群众仍坚守岗位，搞好农业生产，使196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640.9亿元，比1965年增长8.7%；全国粮食总产量达21400万吨，比1965年增长10%；棉花总产量达233.7万吨，比1965年增长11.4%。其他如生猪存栏数、水产品总产量、植树造林面积等都比1965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是，从1966年底开始，“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了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领域，由于“左”倾错误在农业战线的泛滥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急剧向“左”转，在农村开始激烈地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推行一整套“左”倾错误做法，使农业生产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全国农业总产值1967年为651.3亿元，仅比1966年增长1.6%；1968年下降为634.5亿元，1969年为641.8亿元。全国粮食总产量，1967年为21782万吨，比1966年略有增产；1968年减为20906万吨，1969年为21097万吨，产量较之1968年虽略有回升，但仍低于1966年的水平。全国棉花总产量，1967年和1968年两年产量徘徊在230多万吨的水平上，1969年下降为207.9万吨，比1966年减产11%。其他如林业、水产品、生猪饲养量，1967年至1969年间的生产形势均较1966

年严峻。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全国农村带来了不良后果，其原因不仅在于大寨的一些“经验”是错误的，是“左”的路线的产物，而且还在于采取了一整套错误的宣传、推广典型的做法。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和耕作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很大。但在学大寨运动中，不分东西南北，都要“念大寨的一本经”，生搬硬套，强迫命令，并强调不仅要学习大寨的所谓“根本经验”，还要学习大寨的“具体经验”，要“一整套地学”。用大寨这样一个“样板”的“经验”硬性指导全国农村所有地区、所有社队，这显然是十分有害的。

“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大寨“经验”，包括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和表现，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三条根本经验”，又常被概括为“大批促大干”。

1967年4月5日和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前进》和《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两篇文章。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狠抓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记大寨大队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坚持革命斗争的经历》的文章。文章宣扬大寨大队最基本的经验，“是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坚持不懈地同人斗。”

这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使农业战线的工作不可避免地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许多地方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许多干部遭到错误的批判。

在各行各业学大寨的高潮中，一些本来只是大寨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具体做法，也当成了大寨的基本经验四处推广，甚至将大寨实行的一些明显不符合党的政策规定的做法，也推广到全国去，以大寨经验、大寨办法代替党的农村政策，给我国的农业经济和农村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

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生产领导班子先后在大寨召开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除西藏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大寨经验”，组织了现场参观。据会上反映的材料，当时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省、直辖市已有70%以上的生产队推行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广东、广西、河北、陕西、黑龙江等省、自治区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生产队也超过了半数，其他各地也都在积极试点和推广。1968年4月，当时的农业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军区生产指挥部和农业厅（局）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再次强调“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方法问题……而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的问题”。《纪要》还提出，要“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

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高潮"。

那时，人们把一些先进单位看得神乎其神，把它的经验说得完美无缺，有时简直就抬到了吓人的高度，任何人不能有半点非议，似乎"一分为二"不适用于那些先进单位。更有甚者，把如何对待这些单位的经验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学不学，怎样学，都成了立场问题、感情问题，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当时的一些文件、报纸、刊物、广播，以及某些领导人的讲话、报告等等，对先进单位渲染夸张、任意拔搞，说它"一贯正确"、"一切正确"。每件事先进单位都表态，每个运动都出经验，什么时髦就有什么，什么新鲜就出什么，各行各业都得学，简直成了无奇不有的"百宝箱"，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总结先进单位的经验时，往往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找出事物发展的固有规律，而是千篇一律，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公式：增产了，就是学习大寨学得好，减产了就是不学大寨、假学大寨或半真半假学大寨。这样就把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矛盾运动简单化、概念化和庸俗化了。

这确实是我们在学习推广大寨经验时的严重偏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其中的深刻教训。

第五节　"亮点"与"暗点"

大寨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大寨的"亮点"多而又多，但用当时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大寨也并非一切都属"亮点"，它也有属于"暗点"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立刻就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无论手头正在干着什么，心里都要去背那本小红塑料皮书里面的"毛主席语录"，走在马路上都有可能被红卫兵拦住，要你背上段毛主席语录。甚至有的红卫兵到公路上拦截过往的车辆，要求司机背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放行。于是，人们干着活，走着路，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背语录。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但在那个可笑、可悲的年代里却是很正常的事情，否则反到不正常。

可笑、可悲的事情当然远不止这些。相当多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农村生产队，每天早晨起来或上班时要先集中在一起，大家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念几条毛主席语录，歌唱颂扬毛泽东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这叫"早请示"。晚上或下班的时候，还要如前再搞一遍，叫做"晚汇报"。这样的仪式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前也都要如法炮制，否则就是大不敬，就会惹来大祸。

大寨作为全国的一面红旗，按理说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吧，但大寨人没有。陈永贵对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说："咱们不搞那个'请示'、'汇报'，毛主席不在跟前，他也看不到，听不到。"地头会是要开的，在地头学毛著也搞过，但

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大寨人并没有走到前面，而且很可能属于落后一派。因为他们远没有达到“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的程度。经常有记者来给他们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他们就按那时格式化的要求，摆上样子，照片拍完了，他们还要去干活。他们知道，大寨之所以能够成为红旗，是因为他们把地修得好，庄稼种得好，离开了这些，只靠读“红宝书”，大寨当不了先进典型。

在极左盛行的年代，全国到处都在斗“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种斗争大量地伴以非人的折磨，在当时叫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斗争在全国的学大寨运动中也到处可见。既然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那么在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时候，顺便也就批了“黑五类”。但是在大寨，即使在极左最为严重的时候，也没有专门去批判过“黑五类”。大寨村在土改的时候也划出了 1 户地主和 3 户富农，但合作化以后，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特别地去处罚过他们，没有剃“阴阳头”，没有挂“黑五类”牌子等侮辱人格的过激行动。有一些时候，几乎在全国各地，扫街道、掏厕所都是“黑五类”的活，但大寨村是个例外。在大寨，上述活是党团员抢着干的事情，而地、富出身的人只要像普通人一样好好劳动就行了。他们像普通社员一样劳动，也像普通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村里从没有因为谁是地、富就少给工分或少分口粮的事情。那个年代，来大寨采访、照像的人多，有人担心照相的时候照上地主、富农怎么办，陈永贵安慰他们，你照不上他们，他们都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事实也真的如此，地、富出身的人都被安排在参观者走不到的地方干活。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在全国范围内，地、富出身的人处境普遍凄惨，对于那些人来讲，生活在大寨就算是天堂了。当然，像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大寨人才敢做，他们是一面罩着神圣光环的旗帜，没有人敢说他们的不是。如果换了别的地方这样做，非要让他们尝一尝“呒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可。但不管怎么说，大寨人是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办了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很快就陷人一片混乱之中，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冲击。大寨在这场运动中处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但大寨的干部、群众却始终坚持生产不放松，而且取得了很明显的成就。

60 年代中期，大寨村有约 800 亩地，分成 2900 多块，其中最大的一块不到 5 亩。后来他们又制定了一项新的十年造地规划，并很快付诸行动。每到冬天，大寨人都要到他们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去奋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时候，他们冬修耕地的工程也没有停下来。经过几年的搬山填沟造平原，大寨的耕地已由 2900 多块连片并成了 900 多块，出现了 10 亩以上的大块地十几处。水浇地由原来的几十亩扩大到 500 多亩，几乎占了总耕地面积的 70%。原来光秃秃的虎头山，已变成青松翠柏，郁郁葱葱。粮食亩产 1970 年就突破了千斤大关，以后又连年超过千斤。他们的田间耕作不但用上了农业机械，而且还安装了喷灌、滴灌的水利设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寨村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村里建成一排排新房新窑，人均居住面积已达 20 平方米。还新建了医院、中学、幼儿园、托儿所、大礼堂、展览馆、青年之家、书店、图书馆等卫生、文化设施。

第六节　来大寨的外国友人

来大寨参观的人里面，不仅有中国人，还有许多外国人。有各国的国家军政要员，还有一些艺术家、科学家、新闻记者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们。据统计，从60年代以来，到大寨参观访问的外宾有2288批，25000人，他们来自五大洲的134个国家。其中包括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其他著名外籍人士还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美国友好人士威廉·韩丁、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他们有些人在大寨还留下了十分有趣的故事。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是到大寨访问的最高级别的外国客人之一。1973年4月23日，他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陪同来到大寨。大寨人以锣鼓、乐曲、歌舞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气氛十分友好，埃切维里亚说他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

埃切维里亚兴致勃勃地登上虎头山，观看了层层梯田和引水上山工程，俯瞰了大寨新村的全貌。陈永贵边走边向客人介绍大寨人劈山填沟、修建大块平地和兴修水利的情况。

墨西哥的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生产水平也比较先进，大寨人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他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大寨人在艰苦贫困的条件下不向命运低头，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仍令海天相隔的客人深受感动。埃切维里亚说："俄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们修建了伟大的工程。"墨西哥客人还赞扬说，大寨人民的劳动精神是中国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

令总统先生感兴趣的还有大寨的"海绵田"。他说："陈永贵的有机农业战略，对我们很有启示。"

墨西哥客人走进陈永贵家，陈的4岁小儿子拿起炒玉米花请客人品尝。埃切维里亚十分高兴地把他抱在怀里。在宋立英家里，总统夫人热情地拥抱着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宋立英的女儿，说："我们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也在培养妇女干部，像你一样工作。"

那天中午，陈永贵设宴招待埃切维里亚，桌上摆着的都是中国北方的传统食品。陈永贵向客人敬了酒，对总统和夫人及其他墨西哥客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和深切感谢。埃切维里亚的夫人也在宴会上祝酒，向大寨妇女转达墨西哥妇女热情友好的问候。她说，我们尊重大寨妇女的劳动，我们需要理解，男人能做到的事，妇女也能够做到。墨西哥全国财政公司副主任普恩特在宴会上宣读了一批墨西哥青年农民请埃切维里亚总统带给大寨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墨西哥农民希望同中国农民加强友谊的诚挚愿望。墨西哥查帕斯州州长贝拉斯科向大寨赠送了礼品，那是一个印第安农民的木雕像。来而

不往非礼也，陈永贵也向客人回赠了礼品，那是一些大寨人种植的玉米、谷子和核桃、红枣。

美国人韩丁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谊，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世家”，他本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韩西曾到过我国的昆明、重庆；40年代土地改革时在山西长治地区的潞城县张庄体验生活，写出了著名作品《翻身》。他的女儿卡玛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的妹妹寒春、妹夫阳早长期在中国工作，他的外甥阳和平也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所有这一大家人都曾长期住在大寨。他们同大寨结缘，其牵线人就是周恩来。

那是1971年，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韩西携妻子、母亲、妹妹、妹夫、等假道加拿大、法国来到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他们。周恩来对他说：“大寨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农村的典型。你如果有志于研究探讨中国的农业，就应该到那里看一下。”于是那年7月底，韩丁首次来到大寨。

韩丁与陈永贵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是科学种田。韩丁向陈永贵了解“海绵田”，热情称赞大寨多年实行的秸秆还田。他对陈永贵说：“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但只要有大寨的奋斗精神，加上科学化和机械化，中国的农业完全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当然，韩丁和陈永贵都是直性子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会有分歧。韩丁说美国的免耕法好处多，建议大寨也这样搞。陈永贵却强调“三深法”的作用，说：“我们一口人才两亩地，就得在‘深’字上做文章。”两个人甚至因此抬起扛来。陈永贵说：“老韩，你那一套我用不上，我只能用我的‘三深法’，你用你的免耕法。”韩丁则用徐缓的口气说：“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还得靠‘三深法’，等将来实现了机械化可以实行免耕法。”

这还不算，韩丁的母亲80多岁了，还从美国带着一个青年参加团来到大寨。这个参观团还不是参观几天就走，而是像中国的干部下农村那样实行“革命化”，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人们估计这可能是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寒春、阳早的主意，既然是搞“三同”，就不能住在大寨的国际旅行社，也不能在旅行社吃饭了。大寨人看来也是宠着他们，真的就在村里给他们找了几间房子，又从旅行社给他们派了一名厨师。于是，他们就实行起“三同”来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三同”，不过是一种带点刺激性的游戏罢了。这些美国的年轻人，大概大手大脚习惯了，吃饭的时候边吃边丢，用美国人的观点看这可能很正常，但在大寨人眼里这种行为说轻点是浪费，说严重了就是犯罪。而且他们吃完饭也不收拾干净了，经常是杯盘狼藉，一副美国现代青年那可以有许多办法对付，但麻烦的是，他们都是美国人，而且是美国友好人士韩丁请来的客人，这就比较伤脑筋了。

例是陈永贵点子多。他把这些美国年轻人包括韩丁一家人都请到了大寨会议室，还把驻大寨村的记者和农学家们也都请了来。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明里是批评大寨村的某些人，实际是要教育这些大手大脚的美国人。会议一开始，陈永贵坐在讲台前，让两个社员挑进两担谷穗。

陈永贵让挑担进来的社员把筐子举起来给大家看看清楚。筐子不大，装得也不满，两担大概有20公斤谷穗。陈永贵说，这两担谷穗是今天在一片收割过的地里拾来的，是由某某人领导的一班人收的。他们这样不负责任，一小片地就丢这么多粮食，全大寨要丢多少？这个事大家得讨论讨论，旧社会贫下中农没有粮食吃，吃糠咽菜，有这么些粮食，要救活多少贫下中农？

陈永贵讲完了，贾进财首先站起来“亿苦思甜”，即回忆旧社会生活之苦，想新社会生活之甜。贾进财说，旧社会许多穷人没有饭吃，饿死病死，他自己从小就是给人当小长工，给人放牛，是吃糠吃野菜长大的。继贾进财之后，还有许多老贫农也起来忆苦思甜，主要是忆旧社会之苦。在那片地里割谷的年轻社员也站起来作了检讨。

这整个过程本来就是要给美国人看的。会议进行中，寒春等几个中国通，就开始轻声给那些美国青年翻译。会散了，他们回到住地，寒春、阳早连夜组织他们结合几天来生活、劳动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据说这一着还挺顶用的，第二天饭桌上就干净了许多。

1978年金秋时节，韩丁应陈永贵之邀在大寨礼堂演讲。当地群众、附近村民和县城各界人士都来听他的这场充满异国情调的演说。韩丁用比较生硬的中国普通话将中国的农业和美国的农业做了一番比较，讲他自己在美国经营的农场，讲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的专门服务体系，也讲美国社会的高消费。他所传递的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给了太行山区的听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七节 身不由己

在大寨这个“红色殿堂”的当家人其实是很苦的。毛泽东号召干部参加劳动，这个“劳动”当然不包括脑力劳动，是特指体力劳动。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干部腐化变质，防止社会主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大事。大寨的干部在这方面一定要发挥表率作用，他们要带头干重活、脏活、关键活、危险活，而且要干得比普通社员好。经过一天劳动，社员吃过饭就睡觉了，干部们还要开会，总结今天的工作，安排明天的活。在这种情况下，应付大量的参观者、来访者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大负担。有人回忆说，郭凤莲就曾多次劳动回来边做饭边接受记者采访。

来大寨的文艺界名人和著名团体也很多。那时大寨几乎三天两头有人在搞演出。这些文艺团体能来大寨，都是因为他们学毛泽东的著作学得好，演出效果好，因此来大寨演出本身就是一种奖赏。他们为了给大寨人演出，也都做了大量精心准备。但他们也会遇到些麻烦：麻烦之一是节目太单调，麻烦之二是大寨干部实在太累了，他们无福消受这些红色经典作品。

那时，全国舞台上只有那么8个“样板戏”可以演，无论谁来也是在这个圈子里表

演。这个圈子就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海港》、《交响音乐沙家浜》。参观的人来了，大寨的干部可以不接见，但人家文艺团体专门来演出总不好不参加，再说这里面也有个对革命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这也成了大寨干部的一大负担。有时，头一天晚上是空军演的《沙家浜》，第二天晚上工程兵演的也《沙家浜》，第三天晚上海军来演的还是《沙家浜》。这些样板戏都是千锤百炼过了的，把任何一点有生活情趣，能够吸引人的内容全部锤炼掉了，只剩下教育人干革命的一种功能。而且台上的道白、演员的唱词，人们都已到了耳熟能详、出口能唱的程度。尽管演员在台上很卖力气，但大寨的干部们超强度劳动了一天，他们实在太累了，台上阿庆嫂一亮开嗓子，他们便坐在座位上合上眼睛睡了起来。一场戏演完了，台下掌声雷动，把他们从睡梦中吵醒，他们就跟着鼓掌。他们鼓掌的动作使台上的演员激动万分，演出就更加卖力气，但他们鼓过掌后，又开始合上了眼睛。

大寨这个小社会，只有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但组织性非常强，用陈永贵的说法，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组织起来的。在最中心位置的是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他周围是几个党支部委员，再外面是其他干部和党员，然后依次是共青团员、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最外面的是全体社员。大寨的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严密的、层次分明的组织系统中。有这样一套组织系统作保障，大寨领导人就不怕记者“刺探情报”。

新闻记者都想搞点时间性强点的材料，但大寨村毕竟不是专职的新闻社，大寨党支部的人们白天要干活，晚上要开会，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参观、学习、开会的人需要应付，他们不可能及时地接受记者的采访。可记者也是肩负重要使命的，他们要赶快把学大寨的材料采访来，把稿件写好，供广大读者学习应用。耽误了时间，影响了工作就会成为对学大寨的态度问题。所以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早点采访到人，早点弄到新闻材料。赶上毛泽东发表了“最高指示”，或者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政治事件，再或者上级的什么重要人物下了重要指令，记者便要连夜赶写出新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因为手里有了“尚方宝剑”，大寨的干部就得听他们的调遣，赶紧给他们提供材料。为了这种事，记者也真是把大寨干部害得够苦的。

大寨干部就是这样，凡有重大政治事件都要表态。这些表态有的属于发自内心，是真心的表态；有些是他们不大懂的事情，需要记者或其他人提示他们如何表态，是非真心的表态；还有些表态是他们不赞成，但又不得不按照上面的意思去说，是违心的表态；另有些是他们来不及说的话，别人以他们的名义先说出来，记在他们的账上，然后由他们去认账，是别人代他们表态。但不管哪种情况，在全国人民看来，他们是些对什么都懂得，对什么都积极，对什么都热心，对什么都干涉，对什么都好说三道四的人。这在当时为他们赢得了太多的荣誉，事后又让他们背上了过多的指责。

第九章　运动升级：普及大寨县

第一节　北方农业会议

1970年，农村局势开始趋于相对稳定。各级农业领导管理机构相继恢复或建立；一些在“文革”初期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技术人员陆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使农业生产的领导管理工作逐步恢复和开展起来。为了扭转1967年至1969年农业生产连续三年下降、停滞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恢复和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1970年5月，国家农林部成立，6月开始进行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筹备工作。

8月25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有北方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地、县级领导和部分公社、大队的代表，南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一级和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到会的共有1259人。会议第一阶段在大寨、昔阳“参观学习”。9月1日转到北京继续举行。会议第二阶段主要是开展“革命大批判”，总结和交流各地农业学大寨的经验。9月14日，会议进人第三阶段，着重分组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12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会议针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动乱、农村的一些重要经济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下降等情况，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现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对运动中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谨慎对待。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既要批判“分光吃尽”的错误倾向，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影响社员的当年收入。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不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目前有些社、队，随意

增加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开支，降低社员收入，影响社员积极性，各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强调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提出要解决农村干部中“五种人”掌权的问题，并推广了昔阳县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经验。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排除影响学大寨的拦路虎问题。会议认为，昔阳县工作搞得好，首先是抓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果，是因为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的结果。会议提出，要排除妨碍学大寨的拦路虎，就要解决走资派、民主派、老好人、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等五种人掌权的问题。这五种人里面，走资派是从“四清”运动开始后就在党内清理的阶级敌人，是一个极为模糊、随意性很强的概念。而民主派，陈永贵在汇报提纲里作过描述：“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恼”。

北方农业会议提出的“五种人”，给农业学大寨运动蒙上了更加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强调“大批促大干”，在全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产生了一篇叫做《北方地区 14 省农业会议纪要》的文章，肯定了“想新的，干大的”和“一年一个新套套”的思路与做法。

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个是各地农村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二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向“左”发展。

1970 年冬和 1971 年春，各地农村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国共有近百万名干部、1 亿多农民群众参加。除普遍兴修小型水库、水渠、塘堰和打井外，还修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如黄河下游的引黄排灌工程，经过大规模开挖排水系统之后，又逐步恢复引水，先后修建引黄涵闸 70 多处，加上虹吸管及抽水站的建设，引提水能力达到 4000 多秒立方米，灌溉面积达 10670 平方公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淮河流域广大人民，在多年治淮的基础上，又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建成了一批大型和中小型水利工程，兴修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了河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人海出路。这些工程的建成，使淮河流域抗御洪、涝、旱灾的能力大大加强，灌溉面积迅速扩大，使多灾低产的淮河流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农业基础工作，加之 1970 年全国的气候条件较好，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成灾面积仅有 3.3 万平方公里，比 1949 年以来成灾面积最少的 1951 年还少 4800 平方公里。特别是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使得 1970 年的全国农业生产摆脱了连续三年下降和停滞的局面，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规定的各项生产指标。

1970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 716.3 亿元，比 1965 年增长 21.5%；粮食总产量达到 23996 万吨，比 1965 年增长 23.3%；棉花总产量达 227.7 万吨，比 1965 年增长 8.5%。其他如猪牛羊肉、油料、糖料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北方农业会议强调学大寨要坚持“大批促大干”，给山西省造成很大的压力，为此，在省革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决议。决议提出“大寨

在山西，山西怎么办”的问题。强调学大寨要“学根本”和解决基层领导班子中“五种人”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加打乱了山西省的农业生产秩序，影响了农业生产质量。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当时农村的经济政策，被践踏无遗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大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割掉了，把发展多种经营和集体工、副业的路子堵死了，把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批掉了。有的县还搞过没收社员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小平车、缝纫机的所谓“五大革命”，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破坏很大，出现群众缺粮外流的现象。

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在贯彻会议精神，纷纷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即由省、地、县、社领导参加的会议，做了各自的学大寨决议。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在检讨中都谈到，自己原来只是把大寨看成是生产典型，把学大寨当成增产的措施，没有看作是方向、路线的问题。有的地方把学不学大寨提升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的高度来认识，还有的地方把学大寨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把学大寨和“一打三反”结合起来，和整党建党结合起来。

这年 11 月 9 日，山东省为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这个报告在 11 月 19 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更加提高了学大寨运动的调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学大寨的问题上也逐步实行了拨乱反正。1980 年 7 月 9 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的文章，其中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学习推广先进经验时，如何正确对待先进经验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文章指出：“先进经验不等于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把先进典型的经验同党的方针政策混为一谈，更不能把两者的关系搞颠倒，用某个先进典型的经验代替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人们在总结了学大寨运动的深刻教训后得到的认识。

第二节 全国首家大寨县

1967 年，陈永贵担任了晋阳县主要领导人。此后，他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大寨模式，使晋阳县迅速成为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并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被认定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

应当承认，昔阳在学大寨运动中，通过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农业生产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县主要几条河川，经过几年的治水治山，控制水土流失，在宽广的河滩上打坝填土造平原，全县增加了 5 万亩既能机耕又能浇水的良田。1970 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超过 200 公斤，提前两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到 1972 年黄河以北粮食亩产的目标，用 3 年时间，使全县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

但是，昔阳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除了粮食生产之外，其他各业都受到严重冲击。昔阳县领导推行的一些极左政策，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昔阳县以打击“黑市”为名，严厉限制集市贸易。按照当时的说法，人们将集市贸易称为“自由市场”。在限制集市贸易的同时，昔阳县还基本取消了农民的家庭副业，一家农户只准养几只鸡和一两头猪。昔阳县赵壁公社有两个村子，历史上人们习惯用麦秆编草帽辫，这种家庭副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但 1967 年以后，县领导规定，草帽辫只准集体组织编织，个人业余时间编织要受到批判。昔阳的山上有一种白草，农民原来常常割些拿到市场上卖，换点零花钱；昔阳县是深山区，有的山洼里可以开小块地种，农民就自己开了地种点蔬菜、瓜果调剂生活。但后来这些都被禁止了，谁要自己割草卖，或去开小块地种，要受到严厉批判。当时“白草、黑市、小块地”，在昔阳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不仅如此，昔阳县还通过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严格限制了各社队的工副业生产。

在昔阳县，还有一条不成条文的规定，就是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超过大寨。城关有一些大队在发展工副业方面，本来具备较好的物质条件和技术能力，但就是因为怕“压”了大寨，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去发展。无论什么工作都只能说是学大寨、赶大寨，不能说“超大寨”。就昔阳范围来说，大寨在林牧业生产方面不如白羊峪大队搞得好，但也不能提倡学习并推广白羊峪发展林牧业的经验；大寨在发展队办企业方面不如李家庄公社搞得好，但也不能提倡学习并推广李家庄发展队办企业的经验。结果使得有的社队偷偷到邻近的阳泉市搞副业。他们为了不挨批判，借的是相邻的寿阳县一些社队的户头，不敢说自己是昔阳人。后来，昔阳人将那时的政策概括为：“光种玉茭（玉米），甚也不要”，还有人将其称之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自杀政策”。

昔阳县农村原来大多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本来是符合当时党的农村政策的做法。但从 1967 年上半年起，昔阳县普遍推广大寨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并把这作为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学大寨运动中，昔阳在全县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而且由于怕农民成为“暴发户”，怕他们“掉进资本主义泥坑”，县里决定把社员房前屋后栽种的树一律收归集体所有。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民生活。

1967 年 4 月，昔阳县革命委员会把仍在全县大多数生产队实行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斥之为“修正主义、经济挂帅”的劳动管理制度，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是“明明显显的两个对抗的东西”，“是劳动管理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批判中，一方面指责实行劳动定额管理是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使“强劳动力肥得不得了，弱劳动力生活不下去，导致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把大寨“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制度说成是“突出了政治，突出了人的因素，反对了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反对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是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道路”，是农业“经营管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这就使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很快在昔阳县

推开。

完成以上的几项变动后，在昔阳县境内，实际上就把《农业六十条》所赋予农民的一点私有、自由权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革命”，又割了一段“资本主义尾巴”。

由于大寨村的房屋、窑洞在1963年的洪灾中大部被冲毁了，此后，他们依靠集体力量重新建设起大寨新村。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昔阳在全县推广大寨建设新村的经验。于是，各个大队都集体盖了一些新房子，不少社员迁人新居。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可是有些大队在修建新居的时候，拆了社员的一部分旧房，对拆了的旧房作价偏低，有的甚至没有作价，等于无偿剥夺了农民的一部分财产。而社员住新房仍要出一些房费，虽然费用不是很高，但农民也有意见。有些大队的集体经济本来就不厚实，也要拼命建设新村，好像不这样就是不学大寨，结果是对农民的旧房不管户主愿意不愿意都要拆除。而修建成的新村，也都学着大寨的样子，一没地方养鸡，二没地方喂猪。农民感到没有原来住的四合院适用。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生活资料的一种剥夺。农民群众有怨言，许多基层干部也有意见，但是不敢向上讲，怕被说成是破坏学大寨运动。

在1970年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昔阳被确认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为了表明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在这次会上还点名批判了昔阳县著名的劳动模范张老太。

张老太是昔阳县刀把口大队党支部书记。刀把口是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张老太因领导群众发展畜牧业成就显著，被誉为太行老劳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是昔阳原来的“三枝花”之一，与白羊峪和大寨的党支书齐名。在这次会议上为了把张老太打成对立面，就给他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将张老太定性为民主派、走资派的代表。

昔阳县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所谓“大寨县”，就是说全县都已经成了大寨式的了。于是，昔阳县也就成为全国性的先进典型，拥有了几乎与大寨相等的地位。以前的学大寨运动还只是宣传大寨，随后，对昔阳的宣传也开始逐渐加温。出版社还出了不少宣传昔阳的书，如：《昔阳学大寨》、《昔阳散记》、《昔阳新故事》、《昔阳新歌谣》等。

昔阳仍不断地搞“新套套”。在财贸领域，实行了更为严厉的极左政策。县委以“社会主义商业要全面占领农村市场阵地”为由，对集市贸易再次进行“大围剿”。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三令五申要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学大寨“站好岗”、“放好哨”，对集市贸易要“管紧、管严、管死”、“宁左勿右”。在限制、管制、处罚三项打击下，全县集市贸易终于在1970年到1971年间被强行关闭，严重地影响了农副产品的收购，影响了昔阳县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危害了人民的生活。当时还提出：“只抓购、销、调、存，必然要为资本主义服务。”要财贸职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冲锋陷阵，提出要“狠抓商品流通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什么“三尺柜台不平静，一买一卖有斗争”、“一个鸡蛋两条线”的极左言论盛极一时。结果，砂锅、砂制茅勺、茅桶等土特产绝迹了，苇席、麻皮、笤帚由调出变成调人，菜羊、鲜蛋收购显著下降。

为了建设大寨县，昔阳几乎把所有与农业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部门和行业全部限制起来了。弄到后来，为了解决机关落后于农村的情况，昔阳县竟然将农民派往机关厂

矿，学着毛泽东派"工宣队"的做法，创造出一支"农宣队"，被人称其为"倒蹲点"。即原来总是机关干部到农村去蹲点，现在要让农民到机关来蹲点。这种"农宣队倒蹲点"的经验后来也在全国推广开了。

1975年4月，"四人帮"鼓吹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大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受此影响，昔阳县也提出"要专资产阶级的政，必须首先专好自己头脑里资本主义思想的政"的口号。他们把社员要求在自己院内、屋内经营家庭副业，如搞缝纫、编织、修理或制造木器到市场出售以增加经济收入的想法，都当作"资本主义思想"去批判，并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多年来我们把资本主义从山上赶到坡上，从坡上赶到村里，从村里赶到房前屋后，从房前屋后赶到家里，从家里赶到每个人的头脑里，再专好头脑里的资本主义思想一的政，彻底消灭它。"

第三节　大旱之灾

1973年春天，昔阳遭遇大旱灾。

那年的干旱确实很严重，整个春天都没有下雨，地里的土层都是干的，下不了种。当时陈永贵正在北京，家里由张怀英出面主持工作。张怀英做出决定，挑水抗旱！为此，县里买了几百个橡皮水袋，大的能装三四吨水，放在卡车和大拖拉机的拖斗上，往地里拉水；小的能装半吨水，放在小平车上，也往地里拉水。他们把全县所有的卡车、拖拉机、马车、小平车，全部动员起来拉水。水拉到地头，由人担到地里。地里先由人刨好坑，将水担来浇到坑中，等水渗到土里后，再把玉米籽种在坑里。昔阳县是个大山区，车辆少，水源也缺。为了抗旱，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有的村里没有汽车和拖拉机，就完全靠人力担水。一担水来回要跑15公里路，一天只能担3担。每担一担水可以浇十来个坑，一个人一天也就只能种30个坑的庄稼。所以被称之为"千里百担一亩苗"。

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要想抗旱抢种，就只能搞人海战术了。昔阳县把所有可以动员出来的人全部动员了，所有的机关、工厂、学校全部放下工作，放下工具，放下课本，统统参加抗旱。这种情况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是好事，各地几乎都这样做过，叫做"全党全民总动员"。有些小学生，人小体弱，担不动担子，就一人拿两个盛酒的瓶子，或者拿上暖壶、脸盆。总之，凡能盛水的东西都用上，凡能运水的人都派上，凡能想出的办法都使上。反正当时人力不花钱，种粮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切为了抗旱，一切为了抢种，一切为了秋后的收成。

有些参加过当年那场拼死劳动的人，回忆起当时的劳动场面都深为感动。那确实是一个打动人心的劳动场面，男女老少齐上阵，各行各业总动员，起早贪黑拼命干。有人说，那场面使人回想起解放战争中群众千军万马支援前线打仗的情景。

当时的人们都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人定胜天。从大寨到昔阳，他们的创业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战天斗地的过程，就是一个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过程。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所谓“七斗八斗”，事实上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附会上去的。实际支撑他们干下去的，是人定胜天这一信念。

但人定胜天这一信念，也只是在强调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不能无所作为这一点上，才有它的积极意义。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人们片面夸大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承认自然规律的作用，不尊重自然规律，办了很多蠢事。此是旁话。

也许是昔阳人的这种不畏天灾，拼命劳动的场面感动了上帝吧，类似《愚公移山》的故事真的发生了：6月12日，老天终于下雨了。如果天再不下雨，这场昔阳县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抗旱大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能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到后来有些人实在也坚持不住了。人嘛，力量总是有限的。孩子不可能像大人那样一直坚持下去，病人不可能像健康人一样长期坚持下去，老年人与中年人不一样，女人与男人也不一样，都是中年男人也有身体好些与差些之分。坚持不下去的人退下来后，剩下来的人劳动强度就要加大，而事实上他们也已经超强度劳动了很长时间，也已成为强弩之末。当时县里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提出，是否可以将全县40万亩耕地，放弃20万亩，集中保20万亩。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县里经过研究，认为还没有到最后关头，不松口。也就在这个时候，天下雨了。

天下雨后，陈永贵也回来了。他说这场抗旱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又有一些人整天搜集、整理他的话，于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题目就是他的这句话《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

这还不算，到了秋天陈永贵又在他的那两句话后面加了一句：“没见过的大丰收”。而此时庄稼还长在地里，究竟收多少粮食还是个未知数。

本来那一年昔阳全县人民拼死拼活，各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学生连课都不上了，全县都弄粮食，在粮食生长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当年全县产粮0.7448亿公斤。但毕竟是大灾之年，不可能达到“没见过的大丰收”。但老陈说话了，总要想办法兑现。

秋天开汇报会时，大家都知道上边一定要实现“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的诺言，因此，都放着胆尽量多报。结果报上来的数字为0.95亿公斤。这个数字已经比实际产量高出了2500万公斤，但离“没见过的大丰收”还差“十万八千里”。县里要求推翻重来。几经反复，最后一个大体上符合要求的产粮数字终于报上来了：昔阳当年的产量“达到”——事实上是报到——了1.195亿公斤。比实际产量多报了4500万公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60%以上。到了秋收以后，县委感到1.195亿公斤太离谱了，就又压低了点数字，按1.095亿公斤在山西省粮食厅人的账，但这个数字仍与实际产量相距甚远。

世间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有了开头，就不怕没有继续。昔阳县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从1973年开始，昔阳县连年虚报产量，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还又虚报了3000多万公斤。

虚报粮食产量在为一些领导人骗取成绩的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由于连年虚报，弄得有些社队增了产却闹粮荒。群众埋怨说：“他们出名升官，我

们出力受苦，还得跟着遭饥荒。”

后来事情败露了，人们对此就有了新的说法。有人说1973年的昔阳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没见过的大骗局。

第四节　普及大寨县

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针对不少地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陆续暴露出来的问题集中进行了讨论，重申了各项农村经济政策。会议以《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为题，发出综合简报第三期，强调指出：要正确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可以把粮食生产同多种经营对立起来，要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对已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多数群众不满意又减了产的，要作适当的调整；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防止平均主义。等等。会后，各地农村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为了克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着手纠正某些“左”的错误。在农业生产上，强调落实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1971年12月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要加强经济核算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农业六十条》仍然有效，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执行。由于坚持纠正“左”的错误，重视贯彻了各项农村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和1972年虽然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中1972年全国农田受灾面积达40.46万平方公里，为1962年以来所未有，但农业生产仍有增长。

1974年初，“四人帮”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他们把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采取的纠正“左”的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措施，诬蔑为“复辟”、“倒退”，并继续利用大寨这块牌子推行“左”倾路线。这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展署名大寨党支部的文章《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攻击批判极左是“一股复辟倒退歪风”，说大寨“顶住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思想”。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昔阳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颂扬“大寨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所有制变革以后，农村如何继续革命的一面旗帜”。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刻的变革——大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的文章。文章说：由于大寨善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深刻的革命”，因而“识别能力高，斗争精神强，经常有个新套套”。“批林批孔”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由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中央又召开了一个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人们便将这次会议称为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亲自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议，这就决定了会议的规格和规模。

这个会议的规模很大，共有代表3700人参加，其中包括2300个县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这对一个不大的昔阳县城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首先是能够容纳3700人的礼堂就不好解决。不过还算凑巧，国家在昔阳县投资建一个拖拉机厂，这也是国家当时给昔阳县"吃偏饭"的一个项目，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它，现在要提到的是，这个工厂有个大车间已经建成，但还没有安装设备，空在那里，县里就决定用它作为大会的礼堂。开会时给每个与会者发一个小凳子作为座位，条件是艰苦了点，但与大寨精神还算吻合。

3700人的吃饭和住宿也是个大问题，不过好在可以分开吃住，而且昔阳与大寨这些年来参观的人本来就多，接待人员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太困难。只是有些与会者住的地方远了点，不少代表住在城外的工厂里。

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空荡荡的昔阳拖拉机厂热闹了起来，几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坐满了一个大车间。

陈永贵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以来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参观大寨和昔阳抓革命、促生产的成就，学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交流各地11年来，特别是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的问题。同时，总结交流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讨论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

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当作"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打倒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他又重新开始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在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补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随后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上任伊始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使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人们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也再次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1975年年初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名他担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当华国锋宣布请邓小平同志讲话以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邓小平几次招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掌声反而更加热烈了，不少人还站起来鼓掌。一些当事人回忆，当时有不少人还激动得掉下了热泪。

邓小平讲话不看讲稿。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还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据说现在全国有300个县学大寨程度不同地比较好；但是，这300个县是不是都能像大寨那样，25年如一日？全国2200个县才有300个县，太少了。"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和同期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情况，明确提出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强调"农业要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

对于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邓小平是爱护的。1973 年 6 月 25 日，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就曾陪同马里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特拉奥雷访问大寨。这次出席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开幕式后，他又一次登上虎头山。

据长期在昔阳县从事党政工作的孔令贤在他的《大寨》一书中披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有的记者写内参反映山西舆论说陈永贵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邓小平对陈永贵和大寨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讲了两条：第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第二，大寨卖粮是真的。邓小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陈永贵的为人和大寨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他对大寨和陈永贵本人的真心爱护。

大会的第二阶段移到了北京，华国锋代表中央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共有五个部分，分别是：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报告重要的新提法有两个，一个是提出了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一个是提出了解决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四个问题。

报告提出的关于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是：（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林牧副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谈到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时，报告提出了妥善解决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四个问题，即：收回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组织起来；把社员超过党的政策规定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收归集体；纠正分配中的不留积累，分光吃净等倾向。

华国锋的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圈阅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10 月 19 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闭幕大会，陈永贵致闭幕词。

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虽然对在全国农村进一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推动社队企业的发展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会议提出的要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在农村继续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等口号，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五节　加快普及大寨县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不久，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席卷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随之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挂钩，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再度遭受严重损失。

1976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经国务院批准，农林部先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了北方“三夏”和南方水稻两个生产现场会。两个会议都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农业学大寨联系起来，要求农村也要广泛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复辟”、“反倒退”的干扰下，许多已经得到纠正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左”的政策和做法又出现了回潮。一些地区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旗号下，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取缔农村集市贸易，不准农民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生产的蔬菜、禽蛋等农副产品，剥夺了农民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自主权。

有些地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又搞了不少“大办集体经济”的活动。如安徽省农村1976年又大办集体养猪场，限制农民家庭养猪养禽，禁止农民家庭饲养大牲畜和母猪，将耕畜全部收归集体饲养。1976年全省办起集体养猪场22.42万个，有77.2%的生产队办起了集体养猪场，共养猪280万多头。由于饲料不足和管理不善，这些养猪场普遍存在“三低一高”现象，即饲料报酬低，母猪繁殖率低，存猪成活率低，养猪成本高。全年生猪出栏率由1973年的70%下降到48.1%，为历史最低水平。而生猪死亡率却创历史最高纪录，给养猪业和集体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影响，1976年，国家虽然继续从财力、物力上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但较好的生产条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农业生产再度遭受挫折。1976年，粮食、棉花、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等主要农牧渔业产品的生产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停滞在1975年2.8亿多吨的水平上，棉花总产量比1975年减少32.6万吨，下降13.7%；油料、猪牛羊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1976年10月，党中央代表人民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党中央能带领人们拨乱反正，农业学大寨运动当然也面临着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但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却急急忙忙地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到这个时候，对大寨的颂扬更高了，它被称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敬爱的周总理精心培育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高高举起的大寨红旗”。虽然提法过于啰嗦了，但却强调了大寨红旗的神圣与庄严。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规模

超过了第一次，共有 5000 多名代表参加。出席会议的 5000 名代表中，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地区、各县和部分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大庆油田的代表，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学、教育单位的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12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社论写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社论提出："这次大会是总结经验的大会。一年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前进。原有的三百多个学大寨先进县进一步巩固提高，今年又有一百多个县跨人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陈永贵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的主题还是普及大寨县。与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不同的是，"四人帮"被打倒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也就与揭批"四人帮"联系了起来。陈永贵在报告中提出，要批判"四人帮"在学大寨问题上的"三反一砍"罪行。"三反"是说"四人帮"在学大寨运动中，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一砍"是说，"四人帮"妄图砍倒大寨红旗。陈永贵说，这"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说，"四人帮"用"三反一砍"干扰破坏学大寨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

"四人帮"确实干了大量祸国殃民的事情，但说他们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显然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他们就是靠了"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起家的，乱批乱斗是他们的职业，离开了大批大斗，乱批乱斗他们就无从施展伎俩。陈永贵的这些说法，维护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整套"左"的错误，谁要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某些做法有意见，有抵触，就会被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批判和清理。

陈永贵在报告中再次重申了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任务：1980 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这些要求显然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可能，也给以后的经济工作和农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江苏省委书记王敏生，分别代表所在队、县、省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第六节　解析“大寨县”

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走了样。以1970年的北方农业会议为转折点，这场运动又发展到了它的一个新阶段，即建设和普及大寨县的阶段。从那时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经8年多时间，按当时的说法是在全国建设了几百个“大寨县”。这些“大寨县”就自然条件而言，大多比昔阳县好一些，由于那里的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加上各级领导和各行各业的大力扶植，这些县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一般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大寨和昔阳的做法，使不少地方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没能有效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少地方粮食产量的提高还以林、牧、副、渔各业的衰退为代价，使人们增产不增收，广大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

198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解剖了一个从“大寨县”到“大债县”的例子，颇能说明这场遍及全国的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实际效果。

《人民日报》的文章解剖的是吉林省榆树县。榆树县是吉林省的粮仓，一个著名的“大豆之乡”。但从1972年，该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提出了一个“双百万”口号，即年产100万吨粮、100万头猪。以后每年都要重复这个口号，可这个目标一直也没能实现。之所以没能实现，是因为这是一个脱离榆树实际的高指标。

榆树县为了完成百万吨粮的任务，不断扩大高产作物玉米的种植面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3至1957年，玉米占整个粮食作物面积的7.2%，以后逐年扩大，到1980年扩大到了60%以上。这种做法当时叫做“保大王”。为了“保大王”，拼命压缩经济作物和其他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建国初期，榆树大豆种植面积占整个粮豆面积的38%，1980年下降到18%，种植方式也由清种变成混种、间种和套种，实际上是发展玉米，苛待大豆，使大豆变成了玉米的通风道。在生产措施上，如农业贷款、机耕机播、施肥，也是首先保证玉米的需要。县里一位干部说：“榆树县实际是以苞（玉）米为纲”。玉米面积过大，打乱了轮作茬口，土壤得不到休养。一般大豆茬比其他粮食作物茬增产10%～13%，每亩大豆从空气中固定氮相当于6.65公斤硝氨。实行间作，年年翻地，把豆茬也翻了，根瘤固氮菌受损。加上马牛减少，猪羊增加很少，有机肥数量少，质量差；化肥数量虽不断增加，但85%的地块缺磷，更缺钾肥。本来榆树主推的玉米品种吉单101、102，土壤适宜，水肥跟上，单产可达千斤以上，而1979年玉米单产加上“帮忙地”平均才345公斤，空杆率和无效果穗率增加。由于农业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土壤中病毒细菌增加，病虫害越来越严重。“苞米为纲”的结果是其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产量下降，苞米本身也没大上。

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全国开展建设大寨县的活动，榆树县也成为当地的“大寨县”，但这个“大寨县”对外债台高筑。1970年这个县就欠国家贷款1347万元，1980

年11月末，也就是正式停止学大寨的那一年，全县欠国家贷款达到9733万元，加上300多万元的利息，超过1亿元，全县100万人口，每人平均欠100元。吉林省每年农业生产贷款1亿元左右，榆树县贷3000多万元，占1/3。全县39个公社，社社都欠国家贷款，多的欠300多万元，少的欠20多万元。富安公社东沟大队第五生产队67户，平均每户欠款2000多元。不少队多年不分红，社员说："这种状况再维持一二年，恐怕小孩连人民币都不认识了。"

集体经济效益差，农民收入也就很低。这个吉林省有名的"大寨县"，1979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4亿多公斤，成为全国贡献粮食最多的一个县。但农民每人平均收入只有127元，扣除口粮、烧柴等，平均分得现金30多元。超支户6万多户，超支金额2万多元。

榆树县终于建成了"大寨县"，但经济效益很差。县长张占岐算了一笔账：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再提高就要追加更多的投资。而新增加的产量往往补偿不了新增加的劳动力、机械设备、化肥、农药等，结果投资越多，成本越高，所得纯收入越少。以化肥为例：榆树县1971年每吨化肥增加的粮食是15.06吨，1979年为7.69吨。1979年种植业费用占整个农业费用95%。而化肥和农机这两项费用占大宗。饲草、饲料费又不减少，两套成本，是增产不增收、经济效果差的重要原因，农业只能维护简单再生产，要扩大再生产就得靠贷款。恶性循环，债台越筑越高。

榆树县的情况，是当年全国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一个缩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1月，吉林省决定对榆树等三个商品粮基地县实行特殊政策，搞农工商联合企业，很快给这个县的经济注入了活力，大豆之乡重新出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兴旺景象。

第七节 又要搞穷过渡

大寨1963年战胜特大洪灾后，在收回农民自留地的同时，还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1967年上半年，全县开始推行大寨关于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验。昔阳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已暴露出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则不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只能修修补补维持简单再生产；二则不能像大寨那样实行土地连片、因地种植，挖掘土地潜力；三则妨碍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四则不能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当时昔阳县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经济收入水平都很低，搞"穷过渡"的结果，使原来由于生产条件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穷队与富队在收益分配上"一拉平"，实际是穷队"共"了富队的产，既侵牙口了富队的利益，也不利于调动穷队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大寨大队这种"穷过渡"的做法在全国农村宣扬和推广以后，在许多地方都造成了不良影响，部分地区刮起了一股扩社并队的"穷过渡"风。据山西、河北、北京、上

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1970年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队已占到大队总数的14%，其中山西省的大多数生产队已合并为大队所有制，浙江省有四分之一的社队实行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1970年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特别是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中央开始在一系列会议和文件中重申《农业六十条》的政策规定，强调继续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有效地遏制了一些地方搞起的“穷过渡”。

1975年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突起，“穷过渡”又一次遇到了合适的气候与土壤条件。1976年，全国又有一些地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搞起了“穷过渡”。例如，湖北省农村就在这一年进行了撤区并社。即将1961年经过体制调整后，人民公社缩小为一乡一社的规模，基本上又恢复到1961年以前的一区一社；同时将一部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扩大为生产大队。1970年，全省有农村人民公社4432个，全都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76年撤区并社过程中，人民公社合并为1330个，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有2594个，占全省大队总数的8.7%。中共湖北省委当时认为，“撤区并社是农村党政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重要措施，可以更好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1977年是全国学大寨运动进入顶峰的一年，陈永贵再一次试图把昔阳县的农村人民公社从生产大队所有制，提高到公社所有制，直到把公社纳入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在1977年5月23日举行的中共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他曾问与会者：“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县呀?”他说：“昔阳愿冒这个险，你们那里不愿干的，我们愿多作这样革命的事。”

大寨公社先行一步。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拿出了《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提出今后“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的职工都是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声称要把大寨公社建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们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提出公社要办好学校、合作医疗、幼儿院、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

应当说，这些设想实在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都这样胡闹过，结果曾造成了全民族的大饥荒。此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时候，虽然有人也曾动过在农村再刮“共产风”的主意，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松口。因此，《农业六十条》仍是党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纲领性政策文件。

“穷过渡”是不得人心的。大寨公社一动手做这项工作，马上就遇到了麻烦，原本还比较团结的各大队，一“共产”就出现矛盾了。大寨公社各个生产大队，经济水平有高低之分，拥有的财富有多少之别。平时讲支援亚非拉美好办，因为那是很远的地方，无非是说几句套话。现在要玩真的，真搞起“共产”来了，许多原来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首先就是过去努力生产、尽量节约的生产队感到吃亏。

“穷过渡”仍在继续。1977年底，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

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应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过细的工作，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并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这一错误决策的实行，再次刮起"过渡风"，在群众中引起很大波动，有的存棉不售，有的乱砍树木。

斗转星移，大江东去。1978年11月11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把农业问题列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并为此作了充分准备。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坚决批判了"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已经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并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这个决定于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作了必要的修正，正式通过并公布实行。《决定》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中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在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决定》提出了25条政策和措施。其中就有：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等政策规定。至此，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及基本核算单位方面的"穷过渡"终于被叫停。

第十章　陈永贵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第一节　由劳模到高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永贵迅速由一名大队党支部书记升为晋阳县革委会主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当时全国形势大乱，山西省、昔阳县以及大寨村都不能避免。陈永贵从来都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的，这次他也积极行动起来，投人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行列中。

当然，陈永贵作为一个农民，也不是一开始就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所熟悉的一些省、地、县领导人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有人挨斗，有人挨打，还有人被逼走上了绝路。据有关资料显示，对于这些混乱现象，他也有些不理解。那时，大批红卫兵走到大寨，乱批乱斗，严重干扰了大寨正常的生产秩序。还有的红卫兵向大寨党支部“叫板”，弄块大石头让郭凤莲扛，要试一试她到底是不是“铁姑娘”。在“怀疑一切”的混乱局面下，也有人还对陈永贵本人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提出了疑问，有人说他出身于河北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又有人抖出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伪代表”的事。对于这些冲着大寨和他本人的“革命”行动，他也有些不知所措。据有关材料说，在运动初期，他还装病到医院里躲了一段时间。

1966年11月，陈永贵在医院里遇到了一个记者。那位记者劝他去找周恩来。他说，别人见不着，你应该见得着。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记者的一句话，拨亮了陈永贵的心。说走就走，他从大寨弄了十几个大苹果，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据秦怀录在《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一书中披露，周恩来得知陈永贵到了北京，很快就接见了他。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会客厅里，周恩来与陈永贵热情握手，询问他大寨的近况。陈永贵向周恩来汇报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大寨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四五千人，多则上万人，大寨感到压力太大，接待不过来，有人为了带纪念品，把地里的玉米穗也掰走了。这样的参观效果也不好。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批准昔阳办个化肥厂，因为昔阳干部为买化肥，经常会出现“犯错误”的事情。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他说有些事他不理解，有些他的老领导都被打成反革命了，红卫兵

要造他的反，不造反就夺权，还要试试铁姑娘到底硬不硬，抬起大石头往她们肩上放，生产无法搞。

听过陈永贵的讲述，周恩来逐一解答了他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周恩来说，你也想点办法，我也想点办法，上下努力，控制人数。关于第二个问题，周恩来说，昔阳有煤，化肥厂的事可以考虑，正好给延安安排的一套设备，因为武斗不能实施，给你们吧。关于第三个问题，因为涉及到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他能够做到的只是给了陈永贵几个红袖章，并对他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他们破坏了生产秩序，你组织红卫兵维护生产秩序。

接见结束时，陈永贵把带来的苹果送到周恩来面前，说这是大寨的果树上结的，请总理尝一尝。周恩来很高兴地接过来，边看边赞扬说，这么好的苹果，我代你转送给毛主席吧！

陈永贵此番进京请示了三个问题，他最着急要解决的还是第三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虽然不可能给他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但给他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要维护生产秩序，保障正常生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永贵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昔阳县。1967年2月11日是农历春节，昔阳县的30个造反派组织在县城南寺坪广场举行夺权大会，人称“2·11夺权”。4月8日，在“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按照“三结合”的原则，又成立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陈永贵担任县革委会主任。从此，他成了昔阳县说一不二的实权人物。

陈永贵是个劳动模范，他是靠着艰苦奋斗搞好生产受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至于最后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周恩来表彰的，即使是在动乱岁月里，陈永贵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农民，是个劳动模范，没有忘记农业生产。

陈永贵在昔阳县执掌权力以后，马上就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大寨运动。他想把生产搞上去，改变群众吃不饱饭的局面。那时，昔阳县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农民秋收时分到家的粮食吃不到第二年秋天就没有了，只好借大队的储备粮。借了粮食就得还，来年把借的粮食还上了，分到家的粮食就更不够吃。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陈永贵就听到了农民的怪话：“学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他派人了解了情况，发现80%的生产大队中的80%的社员欠集体的储备粮，总量达1000万公斤，相当于全县每人欠50公斤。问题相当严重！陈永贵是个农民，对于种田人连肚子都吃不饱，他深为同情。1968年春播结束后，他在大寨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学大寨会议，陈永贵在主席台上说道：“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年年欠集体的粮，吃不饱肚子，这是给社会主义败兴。这不是群众欠集体的，是领导欠大家的，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没有把生产搞好。”接着，他又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免了。”

陈永贵的讲话对全县的农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大家的干劲很足，当年秋天果然就取得了大丰收。年底，陈永贵许下的诺言就要兑现了。那几天，陈永贵正有事在北京，县里领导开会讨论怎么兑现。有人提出要讲阶级路线，按照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的办法兑现春天的诺言。等要拍板时，县里把电话打到北京，问

陈永贵该怎么办。陈永贵当时讲了几句即使在今天听来仍觉颇有道理的话，他说："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实事求是地讲，陈永贵说的这几句话，在当时是需要一定胆量的，一般人不敢讲，讲了也可能被当成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打倒。陈永贵有毛泽东的支持，就等于有了金刚不坏之身，所以才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话。不过，他能够把这种别人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用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大家还是应该说他的好。

陈永贵在昔阳县掌权之后，就把昔阳县当成了一个放大了的大寨，提出要把昔阳建成一个大寨县。他用当年治理大寨的思路来治理昔阳。上台之初，他就开始在昔阳县推广大寨的"海绵田"建设经验，抓坡地加工，调剂土壤。从 1967 年 9 月开始，又搞了界都河造地工程，在界都河畔筑起一道大坝，坝内垫土造地 200 多亩。随后，又搞了南河大会战、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和水峪水库工程等。这些工程当时叫做"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后来许多人都承认，他领导搞的这些农田基本建设项目，对于提高昔阳县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粮食产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永贵是一个劳动模范，不劳动就不能当劳模，劳动不好就当不好劳模，这是陈永贵坚定不移的认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段时间里他参加劳动少了些，后来局势稍微平稳了，他又恢复了劳模的本色，坚持参加体力劳动。他在昔阳县掌权后，不仅自己参加劳动，而且还要求全县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参加劳动。在陈永贵的脑子里还有个认识，一讲劳动就是下地干活，坐在办公室里不算劳动，文人摇笔杆子更不能算劳动，而且他还特别不习惯 8 小时工作制。他的这种认识与昔阳县的机关工作人员无疑也会弄出矛盾来，但他来头大，别人都要听他的。

这里有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背景：当时几乎全国都在打派仗，搞武斗。陈永贵在昔阳县领导搞的那些农田基本建设项目成就大小可以由专业人员去论证，但有一点是不需要论证的：把人组织起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总比相互武斗要好得多。

陈永贵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还讲过几句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话，对于稳定全国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那是 1967 年的事情。那年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一位记者采访了陈永贵，记下了他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一篇谈话。在那篇谈话里，陈永贵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谈了五条意见，重点是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说了不少好话，说他们"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反对学生到农村去串连、夺权，提出对学生造反夺权，大队、生产队干部"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他还说："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大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对于社会上说的保当权派就是"保皇派"，陈永贵说不要怕戴"保皇派"的帽子，"冬天很冷，戴下去暖和！"

可以肯定，这篇谈话中所列陈永贵的话，不可能是他的原话，必定经过了记者的文

字加工，以使它更加符合当时的政治品味，但它反映了陈永贵的思想观点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正如后来有人评价的那样："这是一篇胆大包天的讲话"。确实如此，换了别人，说这样一番话，早就被打倒了。但他是陈永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别人谁也奈何他不得。

毛泽东很欣赏陈永贵这种敢说敢为的风格。经毛泽东批准，1967年11月7日，陈永贵的这篇谈话作为中发（67）339号文件批发全国。中共中央的按语写道："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随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此发表题为《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文章，高度评价了陈永贵的5条意见。可以肯定，陈永贵的这些话，对于制止农村基层的夺权活动，稳定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权，大会代表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来自基层的人也明显增多了。陈永贵出席了"九大"，并且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曾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主持过一次会议。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在山西省，他成为仅有的两个中央委员之一，另一个中央委员是李顺达，李顺达并不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他的上级，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则只是一名候补中央委员。这就使他成为山西省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

第二节　政治局里的农民委员

在虎头山陈永贵的墓地，有三组石级，分别有72阶、38阶和8阶。它分别代表了陈永贵一生重要的三个数字，即72岁的阳寿，38年的党龄和在中央工作了8年时间。

陈永贵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成为中央领导人了。但中央委员并不是个专职，他也没有到中央去工作。在山西省他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其职权相当于"文革"前的副省长，但他也没有实际在太原工作，他的实际工作岗位是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因此，大寨村委会在为他立碑时，没有将"九大"后的几年时间算作他在中央工作是符合事实的。

1973年8月30日下午，中共"十大"在北京开幕。陈永贵出席了这次大会。在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大"闭幕以后，陈永贵于9月中旬回到昔阳。他在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十大"的"盛况"。在会上他还讲了一番毛泽东让他进中央政治局的"伟大意义"，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列宁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的依靠和重用。"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以后，分管农业。他是种田的能手，但不懂农业科技。在识字上他是文盲，在科技上他是科盲。他不知道水是氢氧原子的结合，不知道什么是原子，什么是分子。即使在农业领域，他的那些知识，也是经验型的，而且限于太行山区的农村经验。一次陈永贵听汇报时谈起杂交高粱的事情，谈着谈着就发了火。他怒气冲冲地说："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谷子，种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种！"当时在场的人谁都不敢指出他的错误，更没有人敢笑话他。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人工配制的杂交高粱种子，就是只能种一代，第二代就退化了。

陈永贵缺乏起码的地理知识，尽管他身在高位可以到处视察，但他不懂地理，不懂气象，更不懂土壤学。他在大寨种地可以因地制宜，搞"四不专种三不空"，但一到外地，他还是拿了大寨的那点经验到处乱套。他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除了凭着一种农民特有的聪明，对于政治理论他可以说一概不懂。他弄不清哪些是大寨的基本经验，哪些是大寨的具体做法，哪些符合党的农村政策，哪些是为党的政策所不允许的。他一再反对各地对大寨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就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他根本混淆了大寨的基本经验与具体做法的界限，要求人们照搬照抄大寨的一套"左"的做法。他不懂得《农业六十条》是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他所批判的许多东西，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肯定的。这种思想随着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就给中国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经济造成了消极影响。

第三节　"布衣宰相"

陈永贵进了中央政治局，这就意味着他将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因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中国党、政、军界的要员。依他的背景来讲，他没有军职，也不可能专职做党务工作。惟一的可能就是在国务院任职。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永贵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是满载而归，他成为11名副总理中的一人。在这11名副总理中，他的名字排在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人之后，名列第8位。在他的后面，还有吴桂贤、谷牧、孙健3位副总理。

陈永贵对于自己的当上副总理也没有感到意外，开会之前周恩来就找他谈过了。按照大会的程序，副总理是由总理提名，大会通过产生的。我们无法理解周恩来当时提名陈永贵时的复杂心情。从一些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周恩来对大寨是有感情的，对于陈永贵是关心、爱护的。但他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伟大政治家，他不可能不知道陈永贵的水平和能力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多么不相称。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当然特别需要德才兼备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提名一介文盲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我们想，此

时周恩来的心情肯定不会平静。

陈永贵的办公室与其他高级官员布置得没什么两样，也是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儿，上面放着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政治、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学，各个部门都有。读这些东西显然不是他之所长，他也确实很少读。对于每天需要他来批阅的材料，都是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字给他念念，听不懂的再给他讲一讲。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这是当时中共领导处理文件的一种常用办法，用当时的行话说，叫做“圈阅”。这个办法倒是省了陈永贵的事。据说还有些经过秘书讲解他仍不懂的事情，他就看别人怎么办，主要是看李先念等人，他们画圈陈永贵也就跟着画圈。

当然，农民出身的陈永贵也有他的可贵之处。他虽然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国家副总理，又是农民的身份，建国以来除他之外也没有第二个人。在“文革”期间，陈永贵掌握了昔阳县的领导权，不过他本人仍在大寨住，仍担任着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党的“十大”以后，他搬到了北京，将大寨党支书一职交给了原副支书郭凤莲，但他仍保留了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职务。这就使他成为一个很奇怪的官，他的职务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大寨大队党支部委员。这种情况不仅当时没有，以前和以后可能都不会有。由于他从中央最高层到地方的最低层都有职务，也使得一些党政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例如，大寨公社本来是大寨大队的上级，但由于大寨大队有陈永贵这样一名大人物，他们从来不敢过问大寨的事情。相反，有什么事，倒经常向大寨“汇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昔阳县委、晋中地委甚至山西省委与大寨的关系上。连山西省委书记在陈永贵面前也要汇报工作，更不用说各级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省、地、县、公社各级评先进，大寨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获奖者，但发证的一方却心有不安。因为颁发证书常常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奖励，但他们在大寨党支部面前不敢以上级自居，不能写“奖给”这样的字样。最后只好写成“赠给”。

陈永贵人进了北京，但户口还留在大寨村，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另外，作为不脱产的干部，山西省每月给他 60 元的现金补贴，后来这笔钱涨到了 100 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 1.2 元的伙食补助，这就是他每月的全部收入。这当然要比他担任副总理所应当享受的待遇低得多了。有一本写陈永贵的书，名字就叫《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书名很传神，道出了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的一个重要特点。确实，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以后，仍是一身的农民打扮，头扎白毛巾，脚蹬布底鞋，身穿对襟衣，一副“布衣宰相”的样子。在吃饭方面，他要求的标准也很低。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派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被他打发走了。他的理由是：“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每天给他做昔阳面食。有人说，他当了副总理以后的饭菜水平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庭的水平。

第四节　钓鱼台无鱼

陈永贵进京以后，开始住在京西宾馆。陈永贵住进来后，中央给他配备了秘书、警卫和服务员，室内所有设施都是国内一流的。陈永贵出身农民，住在这样高级、豪华的环境中，他并不感到很舒服，反倒觉得很不自在。后来，他又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原本是清朝皇帝钓鱼的地方，乾隆帝时在这里修了个行宫，但规模不大，他也没来住过几次。以后随着清朝国力衰微，政府拿不出多少钱来修，皇帝也没有这等雅兴临池垂钓，钓鱼台处于一种半废弃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斥巨资在这里大兴土木，建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国宾馆，成为国庆十周年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

陈永贵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后，感到很不方便。除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他在那里没有熟人。如果中央开会他就有事干，但中央不可能一天到晚总开会，不开会的时候，他就苦了。他没有文化读不了小说，没有艺术鉴赏水平也就不爱看电影、节目之类。他是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一旦离开了土地，他真的就无所事事了。

陈永贵实在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就由秘书捉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搬出钓鱼台，二是实行“三二制”。所谓“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在面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搞蹲点。

毛泽东接到陈永贵的信后大为赞赏，当天就提笔批示说：“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第二天，毛泽东还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陈永贵，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啦，那里没鱼可钓！”

陈永贵搬出钓鱼台国宾馆以后，经国管局安排，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 23 号。那是一套平房，原是清代高官李鸿章的住宅，院子很大，经过重新装修，设施也十分高档，有一个班的战士专门保卫着他。住在这里的陈永贵心情也变得比较舒畅了，大寨来的人、昔阳来的人可以随便出入。而且他还争取到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回大寨，这对于他来说就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陈永贵每次回昔阳或大寨，都要有警卫员，这是规定。陈永贵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周恩来就给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打电话，要求省军区给陈永贵配备个警卫员。但陈永贵不愿意让省军区来人，他提出由昔阳县出人。于是，就从昔阳县委找了个办事员，经过几个月培训，成了他的警卫员。但这个警卫员从来不跟他去大寨，他不准许警卫员进大寨村。一进大寨村，他就成了一个普通人，下地干活，找人聊天，还下厨房做家乡饭请乡亲们吃。

第五节　昔阳干部满天下

陈永贵有句名言，叫做“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为了推广大寨经验，他便不遗余力地提拔、重用那些对大寨“有感情”的人来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开始，他主要是在昔阳县境内提拔重用这样的干部。从1970年北方农业工作会议以后，昔阳被认定为“大寨县”以后，全国都在“学大寨，赶昔阳”，在他所管辖的领域内，就又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昔阳干部遍山西，甚至遍全国的不正常现象。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山西省及其他相关的省份和部门开始着手解决昔阳干部满天飞的问题，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调查，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有一些人调出时只是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等，但调出后就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分布在山西省直单位、各地市县和外省工作。他们多数是为推广大寨经验而调出的，其中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这38人中，绝大多数是从一般干部或基层提拔起来的。这些人所任职务有的还很高，有的甚至当上了省委书记、国务院的副部长。据统计，这38人的任职情况是：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从昔阳调出这么多干部，而且担任这么重要的领导职务，的确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在目前国内出版的一些有关著作中介绍了昔阳县外调干部的一些具体细节，使我们了解到这件事情在当时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但为了贯彻“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许多昔阳基层干部还是以“对大寨有感情”、“敢批敢斗”等原因被提拔了起来，安排到各地区、各部门去掌权，使一些本不属于德才兼备的干部得到了提拔与重用。一些基层干部被从昔阳调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往往又凭借职权，把自己所熟悉的干部或亲戚朋友拉到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或部门工作。这样，就使昔阳干部调出越来越多。

在解决昔阳干部遍山西的问题时，中共山西省委派人对从昔阳调出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做过认真的调查分析，经过调查分析，认为这些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他们的本质是好的，工作是积极的，但由于提拔太快，缺乏领导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担负不起所主管的地方和部门的工作。而且在省委的调查中，有的昔阳调出干部自己也感到了力不胜任，主动要求上级调整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中共山西省委认为，这样的干部是多数。这些人有的到新的领导岗位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有的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盲目推行大寨、昔阳一套极左的经验，起了不好的作用。如一位从昔阳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提拔到别的县任县委书记的干部说：“我过去就凭昔阳大寨那套干，自己没本

事。”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中共山西省委同时还指出，昔阳外调干部还有另外一种类型，他们是文化革命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头头，有的甚至是打砸抢分子、违法乱纪分子。这种类型的干部是少数人。他们调出昔阳担任领导职务后，不仅积极推行大寨极左经验，而且大搞封建家长式领导。在政治上，坚持七斗八斗，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在经济上，“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盲目上项目，“想新的，干大的”，给所在地方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在组织上，拉帮结派，以我划线，任人唯亲，大搞裙带风；在作风上，搞一言堂，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在生活上，追求个人享受，大搞特殊化。

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干部标准。但发生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昔阳干部满天飞现象，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而是搞了“任人唯昔阳”，以地域来任用干部的错误干部路线。所谓“念好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就是这种干部路线的直白表述。在“任人唯昔阳”这样一种干部路线的指导下所提拔起来的干部，也就不可能符合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山西省委后来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昔阳外调干部实际上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德无才”，用山西省委的评价说，就是本质是好的，但缺乏胜任工作所必须的领导经验和组织才能；另一种是“无德无才”，即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出现这两种情况是执行“任人唯昔阳”这种错误干部路线的必然结果。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永远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第十一章　拨乱反正，历史回归

第一节　凤阳花鼓唱神州

安徽省凤阳县以花鼓戏闻名，这种花鼓戏就被称为“凤阳花鼓”。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使凤阳闻名全国的却不是这种花鼓戏，而是这个县的小岗村搞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秋天，这个村的村民秘密聚会，对天盟誓，一夜之间就把土地、牲畜全部分到各家各户。当时在全国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载明了的内容，小岗村的行动也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无法无天”行为。但出于人的求生本能，杀头坐牢村民们都认了。他们写下盟誓，按下手印，约定如果事情败露，带头的人被抓被杀，全村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周岁。

小岗村的行为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人民公社把这个村子已经逼上了绝境，1958年搞人民公社，紧接着就是三年经济困难，这个村里饿死了60口人，有几户死得灭了门，绝了户。后来国家松绑，《农业六十条》给人们留了条活路，但接下来的学大寨运动又把人们要往死路上逼。全村成年男子能当干部的都当过了，但集体经济一点指望都没有，197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

小岗村不大，当时他们的行动是极端秘密的，包括小岗村的村民在内，没有人想到由他们发起的这个行动会扳倒大寨红旗，会冲垮人民公社的堤坝。

包产到户最早发端于安徽，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上看，穷则思变，从60年代初安徽省的许多地方就搞过包产到户。开始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责任田成了农民的“救命田”。但人命一旦救过来了，毛泽东又坚持要他们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次包产到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留给人们的记忆是深刻的，使农民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认识：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包产到户，就饿不死人。小岗村的人们敢于铤而走险，完全是出于人的求生本能。

当然，如果没有大的政治环境的改变，没有中共安徽省委的默许，小岗村的行动可能也弄不出名堂，至少也不会成大气候。从全国的形势来说，粉碎“四人帮”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不能不给人的思想以极大的震撼。尽管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还坚持“两个凡是”，但实际上已经很难说得通，行得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

在是太明显，农业学大寨实在是搞得太不像话了。拨乱反正成为人心所向，非一两个人所能阻挡，尽管这一两个人还手握大权。

中共安徽省委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是第一个向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

万里是1977年6月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到安徽后，他拖着一条伤腿，走遍江淮大地，行程1500公里。安徽的贫穷令万里震惊。在金寨深山区一户农家访问时，万里竟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连裤子都没有，只能在严寒里蹲在锅灶口取暖。万里感慨道："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万里于1978年2月4日大胆提出了"以农业为中心"的思想。他说："农业生产有其固定的特点和规律……一定要自觉地把农业生产作为中心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进行。凡是有利于生产的事就干，凡是妨碍生产的所谓任务都要改变。谁耽误了农时，谁就会犯新的错误。"万里在这里也提出了"两个凡是"，但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完全不同。

在万里的直接倡导与支持下，1977年年底，安徽省委制定了一个《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后来所说的"省委六条"。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万里还对当时正在全国进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提出质疑。1978年春天，万里在安徽省委党校的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这是从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次由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大寨说"不"。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后来，在这年的秋天，万里在听取滁县地委书记汇报农村工作时，又说起大寨。他说道："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还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正因为万里有这样的看法，又有这样的勇气，使安徽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带头省。他们带头反对搞大队核算，反对取消自留地，反对取消自由市场，反对实行大寨搞的那种"神仙一把抓"的记工法。

从后来披露出来的资料我们得知，偷偷摸摸把地分了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小岗村村民秘密开会、写誓言、按血印的同时，在陕西省米脂县一个叫孟家坪的生产队，也悄悄地把地分了。这样干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结果，他们在经济上全部翻了身。

第二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

从1978年春天开始，各地就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口号下，开始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养猪、养鸡，要求重新恢复定额劳动管理制度等。这些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和自由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现在人们又重新拿起了《农业六十条》这个武器。这种说法合乎法律，合乎党的政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候，党中央也从未公开否定过《农业六十条》；即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最热闹的时候，尽管《农业六十条》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但也没有谁公开说可以不执行《农业六十条》。于是，人们就抓住了这一点可以利用之处，开始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发表了记者写的关于安徽“省委六茶”的新闻报道；3月，新华社播发了万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肯定。邓小平表示，我们现在需要有些新概念，不能老是原来的老框框。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

新闻界总是最敏感的。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回忆，1978年的年初，他从大寨回到北京，就听到有人对新华社国内部的领导人说：“你们新华社再向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是一个信号，虽然还不正规，但却十分明确。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如日当空，但一种向其挑战的力量已在形成。此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电台，陆续以落实党的农村政策为总题目，报道一些地方纠正极左的做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理论支撑点就是“两个凡是”，只要“两个凡是”不倒，大寨红旗就不会倒下去。

最早批评“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正式恢复工作以前，已经在1977年4月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5月，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全党上下对“两个凡是”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

1978年5月，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全国各界的

关注。文章先是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随后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5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并由此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多少年来，现代迷信盛行，“最高指示”成了人们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如今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就意味着连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是时代赋予了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以鲜活的社会涵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确实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各地都有争论。当然，支持者众多，而且理直气壮，反对者较少，而且除了给作者扣顶“砍旗”的大帽子以外，也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

以往凡有重大理论问题，或者又要批判一个什么新的人物，新的观点，总要有人找大寨的领导干部们表态。但这一次是个例外，没有人去找他们，没有报纸报道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他们也就没有参与这件事。虽然这场讨论关系到大寨在这个社会上的“定位”，但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完全是局外人。

陈永贵对于中央的动态应该说是清楚的，但这一次他也显得有些迟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到了这个时候陈永贵才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说三道四了，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在农业经济和农村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对于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也不是不可以检验的；既然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搞了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有必要检验一番。这一下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惨了，那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大批促大干”的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批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验，等等，一个个全都给检验下来了。算来算去，只有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给总结出来的那三条经验能够站住脚，其他都被否定了。

今天回想起来，一个小山村能够为一个拥有几亿农民的大国提供三条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经验，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但由于大寨人曾经头顶过太多的光环，出了太多的经验，现在几个书生写了点文章，人们七嘴八舌地一讨论，那么多大寨经验一下子就只剩这么一点儿了。还有那些“大寨县”，竟连一条经验也没剩下来。在这种历史的大转折中，他们真是感到了失落。有人后来说，那时他们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第三节　拨乱反正新气象

1979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遍大江南北，中华大地到处春意盎然。

《人民日报》刚刚报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消息，记者就来到了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采访了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李顺达与陈永贵原本同为劳动模范，李顺达比陈永贵当劳模的时间早，但陈永贵后来居上，从1964年起就超过了李顺达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表”。毛泽东去世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后中央部署在全国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本来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好机会，但在山西省却有人利用这次清查工作，又制造了一批“反大寨”的新的冤假错案。在1977年的一次大会上，山西省委的一位负责人说，李顺达是“反大寨”的代表人物，晋东南地委书记也跟着指责李顺达在“四人帮”对大寨“三反一砍”的活动中，充当了可耻的角色，于是晋东南地区就大抓以李顺达为头目的“反大寨帮派体系”。晋东南地委还派出工作组到西沟查李顺达反大寨的罪行，大喇叭天天对着李顺达家叫，搞神经战。还撤了李顺达的山西省人大代表资格。

这是山西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制造的一个大的冤假错案。在办案过程中，再次使用“文革”手段，牵连无辜，无情打击，仅平顺县就牵连100多人。有个曾给李顺达当过秘书的人，在清查中，因被逼供李顺达的材料，惨遭折磨而死。阳泉市下章召大队，有个叫王进军的老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前些年主动回乡务农，带领家乡群众三年改变了落后面貌。他也被说成是“反大寨”的急先锋，理由之一是，他去大寨参观以后又去西沟参观了。

有了这样的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记者对李顺达的采访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虽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顺达并没有公开批评学大寨运动，但他说的要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因地制宜搞好农业生产，还说在山区要重视发展林业，不能一味地搞黄土搬家等等。这些话，人们不难听出其中的话外之音。

《人民日报》刚报道了对李顺达的专访，又在1月12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是甘肃省张掖地区农机局的史荣福，他反映的是各地组织到大寨、昔阳参观的问题。他说：

“去年十月，我参加了统一组织的赴昔阳、大寨参观团。这次参观是第二批，共800人。第一批是上半年，也是800人。参观的时间，不计路途往返，都在6天左右，现在就此算一笔经济账。

“这次我们参观的人，除部分地区单独前往昔阳集中外，有600人左右在兰州集中，乘专列到阳泉后转乘汽车至昔阳。乘坐专列的人，每人预交150元（包括兰州至昔阳的全部往返车旅费）。后经结算，每人车费约140元。这样，600人就需8万多元。另有单

独前往昔阳的200人，因路程较短，每人按100元计，共2万元。一次参观的车旅费，以最低标准计算就是10万多元。再加上路途和住勤补助，平均每人每天按6角计，又得好几千元。全年两次参观，少说也得20多万元。

"前往大寨参观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这次我们在昔阳就遇到福建、宁夏等地和部队等不少单位。我国还有不少先进典型，如果每年都要组织人前往参观，一年就不知要花多少万元了。

"此外，为了组织人参观，需要动用多少交通工具，多少住房，多少服务人员？如果将这些交通工具、住房、服务人员用于建设事业或旅游业，又将增加多少收入？这一进一出的账，不能不算。"

这位读者进一步说道："我不是一概反对组织参观学习，但参观的人数要尽量精简，要让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同志去。就我所知，仅张掖地区这几年到大寨参观的人，农村中几乎遍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有的还去过几次。效果如何呢？不能说没有，但属于游逛性质者有之；参观回来后汇报一下，交差了事者有之；有的只学大寨的具体做法而把经验学歪了，收自留地就是突出一例。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

史福荣的来信所反映的是一个老问题了。早在1967年年初，陈永贵就曾向周恩来反映过，到大寨参观的人太多，影响了大寨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周恩来也答复说，你也想点办法，我也想点办法，把人数控制一下。但在当时的局面下，全国形势都很乱，大寨也不可能安稳了。后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总是再三强调学大寨"不走样"，实际上等于动员人们多去大寨参观"取经"。如今，在全党、全国人民开始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人民日报>》通过一封读者来信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不能不使人感到另有含义。而且来信还将去大寨参观说成是"劳民伤财"，其措辞不谓不重。

史福荣的信见报后，《人民日报》编辑部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全国农业展览馆的赵廷俊在信中说："我是一个搞农业展览的工作人员，向你们反映一个情况。现在不但存在参观成风，而且存在办展览成风。"

赵廷俊在信中说：1977年至1978年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第三届农业学大寨展览，两个馆共展出30个典型，每个典型由省里花钱，少则5万元，多则7万元左右，共花费200多万元。制作一台大寨模型就用了2.3万元。每个展出典型和项目都要印发小册子1万至2万份，有的要3万份。有个展出县印发两万份，花了2.2万元。有的小册子直到农展馆已经停展才运到北京，只好堆放起来。10个馆共展出150个典型，97个项目，用的钱和纸张是多少，细心的读者可算而知。我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反映，用了这么多钱和物，要多少工人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啊！效果又怎样呢？据统计，去年一年全馆共接待观众62.7万人，除接待了各省市区农业战线代表3000多人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北京市的观众。因为馆大，展品多，参观半天看不完。他们说：看这个展览，要跑马看花。有的反映：典型重复，内容相似，标语口号多，具体经验少，内行看不到门道，外行看不到热闹。

显而易见，赵廷俊的来信比史福荣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批评又进了一步。如果说，各地去大寨、昔阳参观大多还属于自发行为或者是由基层单位组织的话，那么，第

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则是由高层领导决策的；如果说，批评各地去大寨、昔阳参观是劳民伤财还只是对学大寨运动形式的批评，那么，批评学大寨展览“典型重复，内容相似，标语口号多，具体经验少，内行看不到门道，外行看不到热闹”，则已经涉及到这场运动的内容了。这样的信以前不可能有人写，即使写了也没有报纸敢刊登，而如今，这封信却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形势的变化应当说已经明白可见了。

第四节　问题被揭了出来

如果说《人民日报》记者对李顺达的采访和史福荣等人的来信还只是提供了某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不利的信息，那么接下来舆论对于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的一些做法直接提出批评，则是向大寨模式发出的严峻挑战。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会上承认，昔阳县1973年虚报了粮食产量。他承认，那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是0.7448亿公斤，但是，上报的数字却是1.095亿公斤，虚报了3500多万公斤。他解释说，那一年大旱，春天抗旱播种，在庄稼生长过程中就估了产。没想到后来秋雨连绵，收获时败了兴。但是为了套原来已经讲出去的“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向上报的产量就不实事求是了。

1979年年底，山西省委对昔阳县委进行了人事调整。7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消息，披露了新华社记者张进兴等人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的准确数字：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的5年间共虚报了1.36多亿公斤粮食，比这5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文章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继续说假话，只向中央报告1973年虚报了3500多万公斤，并由当时主持县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等人向各公社布置，按照县委决定的历年虚报数字，更改公社粮食产量账。”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假话者戒》，文章写道：

“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共虚报粮食产量二亿七千多万斤。一个曾经名扬中外的县，在粮食总产量这个极其严肃、极其重要的问题上，说了五年假话，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们党历来强调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历来反对言行不一，反对说假话、搞假汇报。多少年来，我们党以有这样一个优良的作风，博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昔阳县在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几年就有人怀疑其中有假，而且昔阳县委个别领导开始也承认过，后来又矢口否认，还迫使别人改口赖账。为什么同说假话的行为作斗争，竟是这样的困难呢？原因也很清楚，有少数领导人依仗权势，竭力维护谎言。你要敢讲真话，那就给你扣上‘反大寨’、‘砍红旗’的帽子。这种政治迫害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它掩盖了事情的真相，才使谎言不得拆穿，假话

横行无忌。

“昔阳粮食产量年年大幅度增长的谎言，终于揭开了。这是不幸中之大幸。脓疮与其让它长在身上，危害人体的健康，不如把它戳破了好。这里有一条经验，如果不对造假话的主要责任者加以更换，要他们承认错误讲出真话是不容易的。昔阳县委正是在更换了主要领导人，端正了思想路线，学习和贯彻《准则》的过程中，才把说了五年的谎话纠正过来的。纠正比不纠正好，所以说这还是一件好事。”

“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责任主要是前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昔阳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好的，他们是说假话的受害者。原县委的个别领导人弄虚作假，不仅欺骗了党，欺骗了全国人民，同样欺骗了昔阳的人民群众。”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报道，同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所谓“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从昔阳县境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这样，可流经昔阳的5个公社，发展74200亩水地，改善15800亩灌溉面积，共计9万亩地。据说将潇河的“西水”，“东调”入昔阳的设想，有人在60年代就勘察、设计过，但由于工程量相当大，耗资也相当多，谁也不敢轻易拍板。为什么不敢轻易拍板？估计就是因为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吧。因为这笔钱昔阳县自己肯定掏不起，国家有这么多钱搞这项工程吗？至少当时不可能有。但到了7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昔阳县成了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各方面对它就都开起了绿灯。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的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人民日报》的社论由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引发出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发展农业究竟靠什么？社论指出：“多少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当然很可贵，很需要发扬，不仅现在需要发扬，将来也需要发扬；问题是‘大干’干什么？近十几年来，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这些工程里边，当然有很多是搞得对，搞得好的。所谓搞得对，搞得好，就是说这些工程是切合实际，投资少的。但是，其中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例。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社论还对十几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些蛮干行为提出批评。社论说：“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水利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农业生产应该鼓励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农林牧副渔五

业并举。搞农业基本建设，也应该从各个地区的特点出发，扬长避短，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技术条件等具体情况，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趋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种'一刀切'的错误方针，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上，突出的就是到处硬搞整齐划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绵田'，硬搞'连成片，一条线'的园林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小的黄土大搬家上，甚至不但没有收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了子孙后代。"

《人民日报》社论最严厉的部分，是对"西水东调"工程随意性的决策方式和封建家长式统治的批评。社论说："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愿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社论进一步剖析了封建家长式统治的危害："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人民日报》的社论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既指出了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违反科学、劳民伤财的严重错误，又从这个典型事例中剖析了影响当时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社论提出的尊重科学，反对封建家长式瞎指挥的问题，切中时弊，针对性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第五节　陈永贵淡出政坛

1979年年底，中共昔阳县委进行人事调整，陈永贵不再兼任昔阳县委书记。这一人事调整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发展形势决定了的，也是昔阳县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补课"的必然结果。1980年5月，中共晋中地委进行人事调整。在这次

调整中，陈永贵的中共晋中地委书记职务被调整下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永贵请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接受了他的请求。

陈永贵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与他谈了一次话。据孔令贤所著《大寨》一书披露，邓小平对他说："永贵同志，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后来有记者写内参反映山西舆论说陈永贵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邓小平讲了两条意见：第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第二，大寨卖粮是真的。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陈永贵对于大寨和他本人过去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曾对来京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他还说："咱们过去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错，可是一些具体做法值得考虑。尤其一些分配办法和打疲劳战，统得太死，对外面一些地方是不适应，这点要逐步认识。我常常看不惯机关的八小时、礼拜天，不想这还是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工人和资本家作斗争才争下的自由。唉，我老了，以后你们做工作，就要取长补短，我的长处，你们发扬，我的短处，你们可不要再犯！"

1981年，中央对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作出批语，陈永贵很重视中央的这个批语，他自己说："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

陈永贵尽管不再担任副总理了，但中央对他还是照顾的，生活上仍保持着原有的待遇不变，他的住所仍然按副总理待遇继续留在交道口的那处大院子里。但陈永贵是个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他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说："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他多次提出要搬出交道口，撤去警卫。当时国管局领导没有答应他搬出，但答应把那个院子让出一半。陈永贵还是不同意，说这样还有点特殊。国管局又为他在禄米仓找了一处房子，陈永贵看后直摇头，说这处院子和交道口的差不多一样大，与他现在的平民身份不相称。后来，中央决定让他住复外22号高干楼，按部长级待遇，陈永贵这才同意。

陈永贵任职期间有两辆汽车，红旗轿车为他使用，另一辆为生活用车。解职之后，他退了红旗轿车，说耗油太多。解职后不长时间，他就辞去了炊事员，自己和老伴动手炒菜做饭，他说自己想吃什么也方便些。

在任期间，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农民身份。解职后他才开始领上工资，工资标准是每月200元。当时物价已经开始上涨，他家人口多，负担重，这点钱过日子也是蛮紧张的。在这方面陈永贵倒是很达观，他总是要求家里人，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

关于陈永贵在北京城度过的这段平民生活，不少人在文章和书籍中都讲到过。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在他的《岁月随想》一书中写道：

"我家离他住处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门，偶然对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没注意我，他目不斜视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人行道上。给我的感觉，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复有当年在大寨时我见到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形象了。然而，他还是他。在北京的街头，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头的老乡，因为，他还穿着对襟的布衣，

穿着一双布鞋。这非常短暂的路遇，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忙忙碌碌大半生的人，陈永贵过着清闲日子反倒不舒服。他向中央要求做一点具体的工作。中央有关领导表示支持，还征求了他的意见，问他是否就在中央当个顾问。他不愿意。后来，有关部门就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了个顾问。其实这也是一个闲差事，但陈永贵挺满意，还真的到那里去上过班，参加过党组织的生活会。但时间不长，医生从他的身体内查出了癌细胞。于是，他住进了医院。

陈永贵住院期间，不少原来的同事、同乡、朋友都去看过他。这其中就包括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陶回忆说：

“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我曾先后两次去探视过他。每次他总是说：“我在工作中有严重的“左”的错误。但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人，大寨是“四人帮”的黑样板，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自己的错误向中央作过检讨。小平同志也对我说过，你有错误，但和“四人帮”无关，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有了小平同志的这句话，我死也就可瞑目了！”

1986年3月25日20时35分，陈永贵病逝于北京。随后，新华社向外界公布了陈永贵病逝的消息。在那篇消息中，对陈永贵作出了最后的评价：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西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新华社的这段文字，成为对陈永贵的权威性“盖棺定论”。以后在正式场合，人们都是采用这样的口径来评价陈永贵，包括大寨村在虎头山上为陈永贵立的碑，碑文也大体上采用了这段文字。

第六节　昔阳新局面

1979年8月以后，中共昔阳县委常委连续召开常委和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和县级机关科局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联系学大寨运动的实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在昔阳县进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通过讨论，端正思想路线，解决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几个问题。

在这场大讨论中，大家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对全县十多年来开展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进行了回顾和检查。许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为什么我们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不那么得力？为什么落实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不那么彻底？为什么对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不那么认真？就是县委常委本身思想不解放，心中有顾虑。县委领导深切地感到，过去把大寨抬到了不适当的地位，把大寨的具体经验当成不可逾越的"本本"，干了许多蠢事。当前，昔阳面临着"问题不揭不得了"这样一个状况。现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要把矛盾揭透，把问题说够，端正思想路线，卸掉思想包袱，发扬成绩，修正错误，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尽快把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全力以赴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

通过这段讨论，昔阳县委解决了以下九个问题：

一是关于落实自留地政策的问题。1979 年春天，昔阳县委在落实自留地政策时，总认为集体代种比社员自种好。结果，全县社员户自种自留地的只占总户数的 10%。大家说，现在县委要解决自留地下放是不是"右了"、"倒退了"的糊涂认识。自留地收归集体代种的做法，是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浪潮中产生的。现在我们来个拨"左"归正，正是一件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事情，根本不是什么"右了"、"倒退了"。通过讨论，县委也明确了自留地实行自种，并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县委决定打破今年春天定的那些条条框框，秋收以后，全县的自留地全部下放，并且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社员群众种好自留地。

二是关于劳动管理问题。实行大寨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办法好，还是实行定额记分好？昔阳一些社队在过去早已有过争论，而且有的大队一直在实行定额记分的办法。但是他们怕戴"反大寨"的帽子，对外说是实行大寨的劳动管理。县委不实事求是，搞"一刀切"，让全县各社队一律推广大寨的一套评工记分法，实际上导致有些大队的干部说假话。这种情况，县委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是不知道，但他们认为昔阳特殊，再搞定额管理是后退。在讨论会上，县委常委们和大家一起摆了大量事实，对各种劳动管理办法作了认真比较，相比之下，大家感到，还是定额管理好：一是社员容易接受，有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二是队干部便于管理。1979 年有些大队恢复了定额管理以后，节省了劳力，提高了效率，农活比往年赶前了，也不像以前紧张了。大家说，我们要想贯彻好中央的两个农业文件，必须破除"昔阳条件特殊"的错误认识，向全县公开宣布：只要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只要有利于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各社队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需要采用哪一种管理办法就采用哪一种办法。考虑到大寨人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县委也允许他们再观望一段时间。会议决定，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宜搞则搞，不宜搞则罢，全县要积极采用定额管理，也可以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办法。大寨党支部则表示，大寨也要实行定额管理。

三是关于集市贸易问题。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会上，县委的人们说，过去咱们怕这怕那，始终不敢开放集市贸易。其实，县委不开，群众就自动开。1979 年春天，县城附近一些大队的社员陆续进城卖菜，城里的职工都愿意买社员们出售的新鲜蔬菜。实践证

明，开放集市贸易，社员欢喜，职工满意，既搞活了市场的供应，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县委的一些领导人深切感到，过去卡集市贸易的做法，既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也违背群众的意愿，如果这样继续搞下去，就会更加脱离群众。当年7月，全县已经开放了集市贸易，"八一"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物资交流大会，人们高兴地说："咱昔阳的经济也活啦！"

四是关于社队工副业问题。过去，昔阳全县曾经批判过"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各社队的工副业生产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社员的家庭副业也基本上被限制死了。在昔阳，还有一个不成条文的规定，就是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超过大寨。城关公社有一些大队在发展工副业方面，本来具备较好的物质条件和技术能力，但就因为怕"压"了大寨，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去发展。大家说，过去咱们只能说"学大寨"、"赶大寨"，不敢说"超大寨"，以为这样就是"爱"大寨，殊不知这正是害大寨。正如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样，任何先进典型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大寨也是这样。过去我们学大寨的艰苦创业精神，今天在建设四化的过程中仍然要发扬这种精神，大寨的科学种田和其他一些经验，我们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学习。可是，就昔阳的范围来说，大寨在林牧业方面就不如白羊峪大队搞得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白羊峪学习发展林牧业的经验呢？大寨在发展队办企业方面就不如李家庄公社搞得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李家庄公社学习发展社队企业的好经验呢？过去有的社队偷偷到阳泉市搞副业，他们为了不挨批判，借的是寿阳县一些社队的户头，不敢说自己是昔阳人。许多人说，回想起往年干的那些事来，真蠢呀！"光种玉茭（玉米），甚也不要"，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社队集体经济非垮了不可。县委决定，今后要大力发展社队的工副业生产。

五是关于自留树问题。前些年，昔阳县怕农民成了"暴发户"，"掉进资本主义泥坑"，把社员房前屋后栽种的树一律收归集体所有。1978年以来，社员们纷纷要求县里归还他们的自留树。当时由于县委没有摆脱极左的框框，名义上宣布下放，但具体做起来却不放手。现在，县委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全部归还了社员的自留树。

六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问题。那些年来，昔阳县的各个大队都集体盖了一些房子，不少社员迁入居住，这是一件好事。可是有些大队在修建新农村的时候，拆了社员的一部分旧房；对拆了的社员旧房作价偏低，有的甚至就没有作价，而社员住新房仍要出一些房费，群众意见很大。有些大队的集体经济本来就不厚实，也要拼命盖新房，好像不这样就不是学大寨，结果违犯了政策，社员的旧房不管户主愿意不愿意都拆。修建新农村，还有形式主义的毛病。新农村盖成排房，一没地方养鸡，二没地方喂猪，不如过去住的四合头院适用。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生活资料的一种剥夺，群众有怨言，许多基层干部有意见，但是不敢向上讲，怕被说成是"破坏学大寨运动"。现在县委已经作出决定：凡是被拆掉的社员的住房，没作价的要重新作价，作价不合理的，要重新调整，一定要让群众满意。

七是关于分配问题。这些年昔阳在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口粮分配上搞"自报公议"。名义上是"自报公议"，实际上是只报

不议，这样就不适当地扩大了按人分配的部分，缩小了按劳分配的部分，带来了“干多干少一个样”，不符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按人均分配的实物过多，甚至把本来不应该按人头分配的东西，也不管大人或是小孩、劳动的还是不劳动的，一律实行“大锅饭”。另外，其他大队不管生产搞得怎么好，在实物和现金分配上一律不得超过大寨的水平，这样就使许多大队多劳不多分。大家认为，口粮分配的“自报公议”，应该予以否定。分配水平不能超过大寨的做法，更是错误的。县委决定，今年秋收分配，全县不再搞“自报公议”那一套了，要认真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县委还宣布，各社队在分配上要从实际出发，可以超过大寨，真正超过大寨是大好事。

八是兴办集体福利事业方面存在的问题。过去，昔阳总爱讲“扩大共产主义因素”，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往往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的因素去提倡。在兴办集体福利上，不适当地实行了“几不要”。县委要求各社队整顿集体福利事业，一定要从本大队的实际出发，不要搞“大包干”那一套，杜绝平均主义。

九是关于干部补贴工的问题。昔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有光荣传统的，但近些年来，要求社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年要达到300天，并号召尽量不要补贴工，全年工分不要超过同等劳力。这样做的结果，有些人本来劳动不多也记300天工，有些人劳动多也不能多记工。县委决定，过去的错误做法，要一律废止，坚决按《农业六十条》办，干部实行定工劳动，定额增产奖励。

通过讨论，原先还有一些人顾虑执行现阶段的政策是“砍旗”。现在认识到，不管是大寨的经验，还是什么本本也好，都得用实践来检验。今后要坚决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

昔阳县委开展的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较全国来说，进行得晚了一些，但其效果却是明显的。它标志着昔阳县的工作从此一步步走人正轨。

第七节　尘埃落定

1979年11月，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认真学习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思想武器，总结前几年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澄清了许多思想问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上提高了认识，并总结了四条主要教训。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第一，把大寨这个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典型神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典范”和“全面专政”的典型，从而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第三，把农业学大寨同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对立起来，妨碍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

晋中地委常委扩大会议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四条主要教训是：第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第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必须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保持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第四，任何先进典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培养成长起来的，对先进典型必须始终加强党的领导。

10月23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罗贵波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在山西省，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这是山西省当前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罗贵波列举了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的四个突出表现，其中前三项都是关于学大寨运动的。(一) 在学大寨运动中，各条战线、各个方面都推行了一套极左的东西，危害很深，流毒很广。(二) 在清查问题上，有些地方和单位，把反大寨作为清查内容；有些地方和单位，由于派性的干扰，不按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运动的有关政策和规定进行清查，而是自行规定清查标准，无限上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运动出现了一些偏差，至今还没有完全纠正。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至今还有一些没有平反昭雪。(三) 1978年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山西没有及时组织讨论；1979年也没有很好地抓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严重影响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的解放，影响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

该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正式结论的时候了。1981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作出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报告说，大寨、昔阳的经验中“左”的东西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这三条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大寨、昔阳十年的实践来看，这个“继续革命”的内容就是：

第一，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大寨的代表人物说：他们的脾气“就是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他们混淆敌我，把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干部和群众当作“敌人”，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对社员群众的一些生活小事也要进行批判。这样乱批乱斗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实践证明，一切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做法，归根到底都只能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上割掉的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堵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路”，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使农民由穷变富的路。

第四，不断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山西省委在检查报告中总结了在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主要错误。包括提出不但要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还要学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混在一起，整了许多人；为了推广大寨经验，省委陆续从昔阳调出一批干部，到一些地、县和省直一些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在一段时期内，省委同大寨、昔阳之间离开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把大寨和昔阳看成特殊的地方和单位。

山西省委在总结中指出，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责任在省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是没有责任的。在总结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时，绝不能层层追究责任。

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的这个检查报告，并作了重要批语。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大寨工作中的错误，是违背大寨社员群众的意愿的。“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中央的批语强调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对先进典型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予正确指导，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甚至夸大先进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农村经济水平也很不相同。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发现、培养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还指出，任何先进技术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

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例如，农业基本建设还是要搞的，但是必须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凡未经群众同意，采取强制手段，搞瞎指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者，农民有权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判处有关负责者给予一定的赔偿。

中央的批语最后说，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验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进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这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今后我们还应当而且需要从劳动模范中选拔优秀的干部，同时也要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

历时 15 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至此尘埃落定。

尾声 春风又绿虎头山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大寨曾一度落在后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寨也落实了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大寨人在向全国学习的口号下，开始了二次创业。

1981年，全国到处都在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大寨党支部经过再三研究，也决定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但由于党支部的思想没有真正统一，也由于大寨固有模式的影响及人们的思想一时适应不了新的形势，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1982年，大寨又走了段回头路，重新实行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一行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思想的严重混乱，也引起昔阳县委和大寨乡党委的重视。这一年大寨的农业生产也严重滑坡，粮食总产量由上一年的40万公斤下降到32.5万公斤。于是，这年10月，昔阳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大寨。在县委工作组的反复劝说和细致工作下，大寨党支部“一班人”又重新统一了思想，重新走上了改革之路。

从1981年开始，经过曲曲折折的改革探索，大寨村终于走出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农业模式，开始了自己的“二次创业”。大寨在村集体收入增长和固定资产总额增长的基础上，对农业生产的内部结构做了调整，下放了自留地，家庭副业从无到有，铁、木匠和豆腐坊重新开张；调整了农作物布局，增加了谷子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了玉米播种面积；在粮食生产上以科技投入、提高单产为主要措施。大寨的产业结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上。改革开放前，工业收入只占全村总收入的15%，1989年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已上升到82.5%。

通过近十年的改革，大寨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来的专一务农向兼业化发展。尽管农民的职业分化尚处在初级阶段，不那么明显与稳定，但是除个别没有壮劳力的农户外，绝大多数农户走向兼业化和收入来源多样化。尤其是男劳力，几乎全部从事兼业生产，或亦工亦农，或林农兼顾。

对于大寨村民来说，生活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吃得好了，住得更宽敞了，而且生活也更自由了。过去大寨人的生活方式，在很长的时间里，生产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谈不上对生活享受的主动追求，他们的时间大多被集体劳动和集体活动占据，由家庭和个人支配的时间极少，追求个人享受常常会遭到批评与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他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起来，不用天天“绑缚”在农业生产上。按原大寨党支部委员宋立英的话说：“还是现在更好，生产上自由了，生活上也自由了。”

大寨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但与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一些村镇相比较，大寨的发展并不突出，与它在历史上曾有过的显赫地位相比较，更给人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

大寨面对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它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特点，它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为自己在社会发展中进行“定位”。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想到了郭凤莲。郭凤莲原是大寨“铁姑娘队”的队长，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陈永贵进京任职后，她接替陈永贵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在陈永贵被解职的同时，她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1980 年，32 岁的郭凤莲卸去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两年之后，她被分配到位于榆次市北郊的晋中地区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

1991 年 11 月，郭凤莲又回到了大寨村，那一年她 45 岁。她此时的身份是：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大寨乡党委副书记、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这种在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中同时任职的情况，在如今不说绝无仅有，可以说也是十分罕见的。这至少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上级领导对于大寨的关心与重视，说明上级领导对于郭凤莲的信任与重视。

郭凤莲上任不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一些省市。邓小平在视察途中一再要求人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点，步子要再快一点。东风吹来满眼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也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大寨人。

大寨正迅速赶上市场经济的大潮。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间，大寨曾一度沉寂落后，当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 335 元，大寨人深切感受到贫穷落后的滋味。在经历了“穷则思变”的思想变革后，大寨迈出了“二次创业”的坚实步伐。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精心打造大寨品牌，使大寨从政治品牌转向经济品牌。

大寨村办的 8 大集体企业，9 大系列产品均冠以“大寨”牌。如“大寨”牌系列酒，大寨核桃露，大寨醋，大寨小杂粮，大寨羊毛衫，大寨衬衣，大寨水泥，大寨铝塑等。让世人重新认识大寨。郭凤莲还专门请来北京著名专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为大寨的品牌、发展进行策划，并将大寨品牌在国家工商局进行了注册。

如今大寨因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突出成就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 1996 年到 2000 年 5 年间，大寨村累计上交国家各种税收 1280 余万元，户均 8 万元，人均每年纳税 5000 元，成为昔阳县 421 个行政村的“纳税第一村”。2001 年 1 至 8 月，全村实现税收 285 万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 48 万元，同比增长 25.8%。

依靠“名地”开发特色旅游，是大寨人精心打造大寨品牌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寨人富了之后，很快将目光瞄准了生态旅游开发上，先后投资 1000 多万元绿化了虎头山，绿化面积达 1300 亩，森林覆盖率达 70%。

如今的虎头山万木葱郁，大寨人在虎头山上建起了森林公园，原来修建的梯田也有不少退耕还林。他们还在山上修建了大寨纪念馆、陈永贵墓、郭沫若诗魂碑等历史人文景观，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此凭吊历史遗迹，接受传统教育，或旅游观光度假。

大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大寨对于四面八方的来宾有了一种无形的，同时也是巨大的吸引力。近年来，到大寨来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每年 30 万游客给大寨带来 600 万元的毛收入。据统计，2001 年来大寨的游客日均 1500 余人，1 至 7 月份，旅游综合收入达 380 万元。旅游已成为大寨的支柱性产业，而且旅游还带

动了宾馆、饭店和旅游纪念品等一系列相关行业。如今，农业收入在大寨的经济收入中已居末位，全村 508 口人、100 余户农民，现在已没有单一从事种植、养殖的"纯农户"，80%以上的农民实现了向二、三产业的转移。2001 年，大寨人均纯收入超过 4000 元。

第八篇

工业学大庆始末

第一章　石油：中国经济命脉之所系

第一节　延长石油露头

石油，按照业内人士的话来说，是存在于地下岩石孔隙中的可燃有机质，由各种碳氢化合物与少量杂质组成的液态可燃矿物。石油，在今天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被誉为工业的血液。从石油中提炼的汽油、煤油、柴油是汽车、拖拉机、飞机、轮船的优质动力燃料；火箭、导弹、飞船等航空器的燃料也离不开石油产品；化学工业利用石油作为基础原料已经提炼出7000多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塑料、纺织等领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并使用石油的国家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中国的古代居民就在陕西延长一带发现了石油。当时人们将石油称之为"可燃之水"。继《汉书》之后，对石油作进一步记载的是晋人张华的《博物志》，这本书对石油形态作了详细而准确的记述。据从魏晋到唐宋年间的史籍记载，不仅陕西，而且甘肃酒泉、新疆库车以及准噶尔盆地南缘，都在很早就发现了石油。在北宋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中，第一次出现了"石油"一词。从那时起，"石油"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了。

中国古人不仅对石油认识早，利用石油也早，而且相当广泛。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人们就将飘浮在水面的石油收集起来盛入容器，用来点灯。北魏时期人们开始用石油做润滑剂。唐宋以来发展到用石油制作"石烛"和墨。北宋时，京城开封出现了炼制"猛火油"的作坊，所产猛火油主要用于军事。元代以来，又有将石油用于医药并作为一种税赋上缴的记载。

此外，中国古人还最早发现并使用了天然气，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钻井技术。

但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却远远落在西方人的后面，当美国、法国和英国人在他们的本土和海外领地已经发展起了规模庞大的现代石油工业的时候，我们却还停留在古老的"淘油"阶段。

1861年，我国台湾苗栗发现石油，当地人用土法开采。1877年，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祯去台湾巡视，与福建巡抚丁日昌合议，拟将此地油矿收归官办，并于当年奏请朝

廷批准。他们在1878年从美国聘请了两名钻井技师，购进了一套石油钻井机械，组成了中国近代石油史上的第一支钻井队，在苗栗钻了第一口井。该井约120米深，大约日产750公斤原油。这是中国使用近代顿钻打成的第一口油井。清朝在台湾设省后，1887年台湾省还成立了矿油局。1895年以后，台湾为日本侵占，台湾的民族石油工业也落入日本人之手。

中国大陆最早的油矿是陕西省的延长油矿。延长的石油露头早为世人所知。1903年，德国人汉纳根以旅游为名，到陕北私自勘查石油。查得结果以后，他与德商世昌洋行共同商议，要开办延长油矿。他们的行为引起了陕北民众的反抗。清政府也担心引发流血事件，便阻止了德国人的开发计划。

1904年11月，陕西巡抚曹鸿勋上书朝廷，要求创办陕西延长石油矿。朝廷很快批准了这一要求。曹于是拨出屯垦白银8.1万两，任命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在1905年筹办起“延长石油官厂”。那时中国还没有开采石油方面的专门人才，洪寅从延长取了油样，到汉口请日本化学博士稻田辛吉与他的助手化验，化验的结果是：延长的石油“胜于东洋，能敌美产”。有了这样的结果，洪寅放心了。1907年，他从日本新鸿购买了钻机和炼油设备，聘请了7个日本人做技师技工，于当年6月在延长县城西门外勘定了井位，开始凿延长一号井。该井于9月完成，井深80多米，日产原油1吨多。这是中国大陆开凿的第一口油井。

到了辛亥革命，日本技师回国去了，延长的油井没人管，停产了。

1914年，美国的美孚洋行也看中了延长，准备投资办油矿。当时正是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与美孚签订了《中美合办油矿条约》。美孚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了陕北中美合作油矿公司，袁世凯派他的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兼任“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督办。督办公署设在北京，熊希龄从来没有去过陕北。在此后的三年中，中美合作油矿公司的14名美、华技师组织了地质测量队，向美孚洋行购买了4台3600升汽动顿钻，在延长及周边几县共钻了7口井，效果都不理想。美国人由此断言陕北一带的油层是石灰系，没有开采价值，遂于1916年3月与中国方面解除了《中美合办油矿条约》。在消耗了270万资金以后，美孚带着全部设备和资料黯然而去。陕北的石油从此就只有民间零星地开采。到1934年，延长只剩下一口油井仍在出油，每天出150公斤。这点油，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陕北的地下到底是否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此事牵动着许多关心中国石油工业的仁人志士之心。1932年，民国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派地质师王竹泉、潘忠祥到陕北进行过一次地质调查，发现永坪、延长的地质有储油构造。王、潘二人对那里的三个层面作了重新划分，并在延长、永坪定了20多个井位。

1934年，已经担任民国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又派孙越崎赴陕北调查地质资源情况。孙越崎等人在陕北高原上调查了半个月，行程800多公里，发现几乎每个县都有油苗。翁文灏接到汇报后，下决心开采延长的石油。

当年夏天，孙越崎等人采用人抬、牲畜驮的方式，将200马力的柴油机和两套汽顿钻机、发动机等设备运到延长，并组成了一支100多人的钻井队伍。

孙越崎等人开始在延长定位钻井，并很快打出了油井，生产出了石油。这是中国大陆开发的第一个油矿，虽然产量不高，却揭开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篇。到1935年，延长油矿逐渐发展，钻井队伍扩大了，分成两个队。严爽担任第一队队长，侯宝政任第二队队长。

1935年以后，陕北红军解放了延长，在油矿的基础上，成立了延长石油厂。从1935年至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下，延长石油厂共钻井20口，有16口见油，其中旺油井6口。特别是1940年钻凿的七里村一号井，日产石油曾达96吨，一时轰动了全边区。延长石油厂为边区提供了为数不少的汽油、煤油、柴油、机油和蜡烛等产品，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军需民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石油厂的厂长陈振夏被评为边区工业战线特等劳动模范，毛泽东为他写了"埋头苦干"的题词，边区政府为他颁发了"苦心经营，成绩卓著"的奖状。

第二节　玉门找油

旧中国投入开发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田是玉门油矿。中国老一辈的地质家和矢志开发祖国石油资源的仁人志士，为兴办玉门油矿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距今1600多年前的西晋初年，人们已经发现玉门有石油。到了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池》记述过玉门的石油。

从19世纪末期，中外地质家已经开始重视玉门一带的油苗。1892年，俄国地质、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来到中国，专门去调查酒泉、玉门的地质情况。1905年，比利时人林辅臣从玉门取来油样到上海化验，结果显示"油质甚佳"。于是他雄心勃勃地向甘肃当局提出开发申请。这一年，甘肃洋务总局为开采玉门石油，改为矿务局，正式聘用林辅臣为公司总办，双方签订了共同开发玉门石油的合同。没想到，此后林辅臣去世，开发玉门石油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1920年底，西北地区发生8.5级的强烈地震。地质学家翁文灏到甘肃一带作地质调查。第二年，他和谢家荣又一起调查了玉门的石油地质情况，并写下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刊于《湖南实业杂志》第54号上。1928年地质学家张人鉴对赤金堡、白杨河的石油也进行过调查。玉门有石油，这已经是当时地质学界的共识，而且这一共识也已经被当时的中央政府所接受。但是，玉门距离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遥远，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环境艰苦，社会开发程度太低。加上中国经济落后，中央政府没有力量，地方政府更没有力量来开发一个正规的大油矿。这就使得玉门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又拖了下来。

1935年7月，顾维钧等五人旧事重提，他们向国民政府实业部呈请特许专探专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当时担任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将此呈及条款报告了蒋介石。8月7日，蒋介石电复陈公博："原则同意。"并要求："油矿开采必须全用华资"，

"遵照中央政府颁布之法令，各种运输方法皆须先得政府核准"等。陈公博于8月中旬向行政院写了提案，行政院8月28日第226次会议作出决议："交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五部，并函请全国经济委员会暨军事委员会会同审查。"这样的处置不可谓不重视，可是后来由于国库拿不出相应的资金，无力经营，开发玉门油矿的提案再度搁浅。

1937年6月，在民国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任职的地质学家孙健初与美国石油地质专家马文·韦勒博士、萨顿工程师一行，从上海出发奔赴大西北。他们经兰州，过酒泉，一路跋涉，于10月到达甘肃玉门的老君庙。在这里，孙健初等人认真考察了石油河两岸地层的断裂情况，发现了干油泉。随后，他们联名写出了一份《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对玉门石油开发做出了明确的论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国民政府不得不加紧寻找油矿，力图在国内解决油源。当时国内有四个地方有原油流出地面，即：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青海柴达木和陕北延长。其中开采价值最大的就是玉门。于是，玉门的开发又一次受到关注。

1937年到1938年，应煤矿探矿公司邀请，受美孚石油公司派遣，美国地质学家约翰和威廉在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的陪同下，考察了玉门、西安以及青海东南部和甘南卜楞一带。他们考察的结果是"玉门一带地质条件非常好"。

此时，我国沿海地区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已经迁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被断了"洋油"的来路。抗日后方出现了严重的油荒。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少汽车、轮船改烧酒精、天然气、木炭。为应付困难局面还不得不建起了一些从植物油中提炼石油产品的工厂。

已经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对玉门石油的开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早年曾参加过对玉门的地质调查，如今又听取了孙健初勘探玉门后的开发提议，遂于1938年6月，在汉口成立了甘肃油矿筹备处，由参与创办延长油矿的严爽任筹备处主任。当时严爽正在美国学习石油工程，筹备处由张心田任代理主任。

筹备处一成立，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开发油田的机器设备。向国外购买的话，一无资金，二无渠道，远水不解近渴。比较之下，资源委员会决定拆运陕北延长的机器。

翁文灏在汉口找到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周恩来，说明开发玉门油矿需拆运延长油矿的两部钻机，希望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

周恩来听了翁文灏的话，非常爽快地回答道："这是关系支援抗战的大事，开发大后方石油，我们一定全力支持，翁先生尽管放心，可以尽快派人去调运。"周恩来并且主动提出办油矿需要特殊工程技术人才，延长油矿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可以去开发玉门油矿。周恩来当即派钱之光负责接洽此事。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周恩来还同时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了电报，请有关人员协助资源委员会调运钻机。

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随即赶赴陕北。在延安，高岗、肖劲光、高自立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会见了他。这些中共高层领导对开发玉门油田都很支持。他们对张心田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一定帮助解决。边区政府第三局和八路军后勤部军工局派

出熟练技工共同拆装机器设备。在拆迁过程中，边区政府帮助解决了很多具体困难，从钻机到原动力，从钻头到钻具，全部配齐，使之一到玉门即可安装开钻。延长的两台钻机准备好以后，国民政府派不出车来运输，张心田又打电报给李强，请求中共派车帮助运输。尽管当时边区的车辆十分紧张，但八路军总部还是先后派出13辆汽车，把两台钻机及其配件运到了咸阳。在装运中，由于钻机不在公路旁，边区政府动员了很多群众，把钻机搬到公路边，装到汽车上。

延长的这两台钻机运到玉门后，油矿筹备处就是用它们一连试打了6眼“发现井”，证明了玉门油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

国共合作开发玉门油矿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1962年，周恩来到大庆油田视察。在与大庆人谈话时他还很有感情地追述了发生在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第三节 在老君庙

严爽回国后，于1938年12月和孙健初等人，骑着骆驼，带着仪器、资料、帐篷、行李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向玉门进发。年底他们到了老君庙。

老君庙，当时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庙，残垣败瓦，金粉斑剥。小庙内供的老君神像，经年忍受着荒野中的寂寞和戈壁上的酷暑严寒，几乎享受不到一点儿香火。小庙的坡下有一条小河，是祁连山上的雪水冲流而成。老君庙地处海拔2400米的荒原上，水源枯竭，若没有这条小河，则玉门油矿完全无法开发，所以后来人们称这条小河为“石油河”。

第二年2月，甘肃油矿筹备处又向玉门加派了测量人员，从四川油矿调的职工和其他办矿人员、民夫和工人等相继来到玉门。3月，根据孙健初所确定的井位正式开始钻探1井。1井位于石油河东岸，距老君庙仅15米。到了8月中旬，钻到115米时开始大量涌现石油。随后，老君庙的2、3、4、5井都先后开钻。

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成立，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孙越崎走马上任后，迅即在重庆招兵买马，筹备物资。各项准备工作大致就绪后，孙越崎率甘肃油矿局重庆各部门的负责人西行来到玉门的老君庙矿区。

在战争期间，在远离重庆2500公里的沙漠上创办一个大型油矿，其困难非常人所能想象。为了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孙越崎制定了建立现代化大型油矿的计划。为完成这个计划，资源委员会第一次向国外采购大批钻井、采油、炼油和其他设备。这些设备原定运到越南海防，但不久海防被日军占领，一部分机器只好运到仰光。不料，仰光仓库又被炸，机器损失很大，后来几经周折，4500吨重的机器运到玉门以后，只剩下350吨，仅能拼凑出三套半钻机。而向美国订购的其他炼油设备则一点儿也没能运到玉门油矿。

为了开发油矿，生产石油，支持神圣的抗战大业，玉门油矿的开发者们决心靠自己

的力量来制造开矿所需的各种机械设备。

制造采油炼油设备，最困难的是没有钢材。在战争年代，钢材奇缺。为了寻找钢材，孙越崎等人想了很多办法。有一次，他们打听到重庆附近的长江里有一些沉船，便马上组织人去打捞。打捞上来以后，再把船上的钢板切割下来。重庆还有一些内地迁来的工厂里堆放着一些废钢铁，他们也搜集起来加以利用。

开发油矿需要设备器材，石油工人需要吃饭穿衣，生产出的石油产品需要外运销售。要生存，要生产，一切都离不开运输。玉门油矿远离城市，地处戈壁，生产设备一般要从重庆、昆明转运，生活给养也要从酒泉、张掖一带运入。为了保证油矿开发建设，他们成立了自己的运输队伍。甘肃油矿共有540辆汽车，这在当时是一支相当庞大的运输力量。但由于战争的影响，汽车配件奇缺，待料停修的汽车常有半数左右，又加上国民党军队经常征扣车辆，油田运输力量仍感不足。当时的运输线路，南起昆明，北达新疆乌苏，跨越西南、川陕、西北、新疆四大公路，干线5000公里，运输任务十分繁重。为了增加运力，特别是将油田生产的石油制品运往重庆，支援抗战，他们又采用羊皮筏运输，即用360只羊皮胎编组成羊皮筏，每个筏子上可装168桶汽油，合24吨。一般用四个人驾驶，先用汽车把油晶运到广元，上船经涪江、嘉陵江运到重庆。

油矿初建时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老君庙在没有开发之前，惟一可以称得上房屋的就是那座老君小庙。油矿最早的先行者到达后将蒙古包搭在小庙边上，人们住在蒙古包里，借用小庙埋锅做饭。后来用泥土和芨芨草在山坡上搭起矮矮的土屋。员工食于此，居于此。早期，这些房子十分简陋，密密地排在东岗脚下。

老君庙地处祁连山北麓，不但纬度高，海拔也高，一年中有半年冰雪封冻。随着生产的发展，宿舍和办公处所的建设迫在眉睫。但是戈壁滩上的沙质土，根本不能烧砖瓦，盖房子全靠“干打垒”。

玉门油矿孤悬于荒漠中，最初的食品是靠牛车、骆驼车运，后来才有了汽车。西北沙漠，公路简陋，运输成本很高。因此，油矿开始只能努力保证员工的粮食供应，新鲜蔬菜、瓜果根本无法运到。

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发、建设了玉门油田，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玉门油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非海相油田之一。1939年至1948年的10年中，玉门油矿共钻井44口，总进尺2.2万米，生产原油45.5万吨，约占旧中国1904年至1948年44年天然原油产量总和的72.3%。到1949年，玉门油矿已成为一个具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修、运输等生产部门和一些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的综合性石油企业，原油年生产能力8万吨，原油年加工能力10万吨，能生产12种油品。

玉门油矿的开发、建设，为中国培养了能够掌握近代技术的石油工人和技术干部。但是，从全国总体上来讲，中国的石油工业规模很小，水平很低。据有关资料记载，除台湾和新疆独山子油矿外，从1907年至1948年的42年中，全国共钻井169口，总进尺6.7万米。在辽阔的国土上，做过石油地质调查的仅有陕西、甘肃、新疆、四川、贵

州、黑龙江、辽宁、浙江和台湾等几个省、区的部分地区。1948 年，全国投入开发的只有台湾出磺坑、陕西延长、新疆独山子、甘肃玉门 4 个小油田，四川自流井、石油沟、圣灯山和台湾锦水、竹东、牛山、六重溪等 7 个气田和东北地区几个人造油厂。旧中国原油产量最高的年份是 1943 年，年产量 32 万多吨。到 1948 年，中国大陆原油年产量只有 8.9 万吨。从 1904 年至 1948 年的 45 年中，全国共生产原油 278.5 万吨，而在这期间中国共进口“洋油”2800 万吨。外国石油公司的油品倾销中国市场，民族石油工业岌岌可危。1949 年，全国石油职工总数为 16000 人，其中油田职工约 6000 余人；各级各类工程技术人员 623 人，而地质勘探、钻井、采油技术人员只有 172 人。由此可见，中国石油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

第四节　挑战“贫油”论

与中国脆弱的石油工业相伴随的，还有一个西方石油地质界强加于中国的“贫油”理论。

石油深藏于地下。为了找到油，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石油的成因问题。1864 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质学家亨特第一次提出了石油成因理论。他详细阐明了低等海洋生物可能是石油的原始母质，在北美古代岩石中，曾产生沥青的有机物质或是由海洋植物衍生而来，或是由海洋动物的残余物衍生而来。此后，绝大多数西方石油地质学家都认为，几乎所有石油都产生于海相沉积物中。他们认为，海相沉积盆地易于生油，而陆相沉积盆地不易生油，因为陆地森林更易生成煤层。

这种海相生油的理论就把中国划在了贫油的圈子里。由于中国大地构造大都属于陆相沉积，于是许多西方学者便认定中国的陆相沉积环境不可能形成大油田，由陆相贫油推导出中国贫油的结论。

最早提出中国“贫油”理论的是两个到延长油田考察的美国人，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叫马栋臣和王国栋。此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组织地质专家，对我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为期一年半的石油调查勘探，并钻井 7 口，结论是：“从整体来看，石炭纪以后的地层，主要是陆相成因，绝大部分地层缺乏能够生成大量石油的富含有机质的页岩，适当盖层很少，因为以沙盖为主的地层易于造成石油的散失，而不利于石油的聚集。”通俗些说，就是中国的地质构造不会有大油田。这一结论对世界影响很大，它更印证了中国贫油的理论。

20 世纪 20 年代初，美国地质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勃拉克·韦尔德也到中国进行石油地质调查。1922 年 2 月，他在美国矿冶工程学会举行的年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也和华北地区一样，不会大量含油”。

与中国的仁人志士坚持不懈地发展民族石油工业几乎同时，一些中国的地质学家也

向中国贫油理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挑战。1923年，中国石油地质学家王竹泉去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他根据采到的鱼化石，纠正了美国地质师马栋臣对地层划分的错误。1931年，王竹泉又与潘钟祥等调查侏罗系与三叠系的接触关系，次年继续在绥德、清涧、延川、延安等地进行地质普查，其调查成果成为后来潘钟祥创立陆相生油理论的基础。1928年，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批驳了“陆相无油”和“中国贫油”的理论，他说：“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出油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以后，他又提出了“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索’工作是值得进行的”，“通过深钻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等论点。

1941年，潘钟祥根据西北和四川发现的油气情况，并参考了莱亭格尔论文中关于美国科罗拉多西北部的泡德瓦胥油田石油产自陆相始新统砂岩中的实例，发表了《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的非海相石油》一文。文中明确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指出：“石油不仅来自海相，也来自淡水沉积物。”1947年，阮维周在《东北石油资料及石油工业》一文中，分析日伪找油失败的原因后认为，在东北是能够找到石油的。1948年，翁文灏在《中国石油地质概论》中，又把松辽盆地列为具有含石油远景的地区。

中国地质学家的上述研究成果，初步探讨了陆相生油的机理和石油分布规律，为陆相生油理论的最后确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能够真正推翻中国贫油的结论，直到1950年美国出版的《石油事实与数据》统计中，还把我国同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一并列为石油远景最差的国家。

中国是否贫油，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找出石油储量并最终从地下搞出大量的石油，中国人才能真正摘掉“贫油”的帽子。

第五节　石油工业受重视

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在谈到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米高扬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认为，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橡胶，一个是石油。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层高度重视石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就设置了燃料工业部，主管煤矿、电业、石油等方面的工作，由陈郁任部长。陈郁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那时，他以很大的精力，领导和组织东北地区煤炭、电力和石油工业的恢复工作。在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燃料工业部长后，他和部里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彳艮快组建起燃料工业部机关，以及有关的专业工业机构。

1950年4月，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研究部署石油工业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为加强对石油工业的领导，决定组建石油管理总局，由徐今强任代局长，唐克、刘放、严爽等为副局长。当时，中国的天然石油生产集中于西北，而且产量很少，全国的资源情况不明，亟待进一步勘探。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按照国家关于经济上重点恢复的要求，确定石油工业的基本方针是："在三年内恢复已有的基础，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提高产量，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勘探与建设工作，以适应国防、交通、工业与民生的需要。"

旧中国在大陆共建立了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三个油矿。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生产，至 1952 年，三个油矿的年产量达到了 19.54 万吨原油。

1950 年 3 月，燃料工业部邀请国内各方面的 30 多位地质专家进行座谈，就中国石油资源的前景和勘探方向征询意见。与会的专家提出：除已知陕、甘、青、新、川的油、气资源外，东北、西南、中南和华北广大地区，都可能蕴藏石油，值得进行勘察。考虑到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应该把原有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作为钻探重点，同时，有计划地进行广泛的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燃料工业部充分考虑了专家的意见，确定集中主要力量，以过去有一定工作基础和已发现油田的陕、甘地区为勘探重点，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陕西、四川、新疆的部分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和钻探工作。

国家对开发西北的石油工业十分关心。1952 年，陈云、李富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信，信中说，积极地大力开发西北天然石油，并将石油工业的建设放在今后国家工业建设的主要地位是必须的。请他对陕北和甘肃河西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予以支持和重视。

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各方面的支持下，西北地区的石油勘探取得了明显成效。从 1950 年至 1952 年的三年间，共普查面积 2 万多平方公里，发现适于储油的构造 50 个，并在老君庙及延长两个老油田的外围，即陕北的四郎庙、永坪，酒泉盆地的石油沟、青草湾，潮水盆地的窖水等 7 个构造上进行了钻探，扩大了老君庙油田的含油面积，增加了地质储量、探明了永坪油田。同时，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天山山前坳陷区和南疆的喀什及库车地区进行了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及钻探，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克拉玛依地区进行了少量的地质调查及电法勘探，并在浅井中见到了油、气显示。

为了壮大石油职工队伍，建立石油产业大军的基础，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老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接管或参加石油厂矿的工作；二是对旧中国从事石油生产、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的石油工作者和建国初期从国外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采取政治上信任、工作上重用和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三是将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石油厂矿担任技术干部。特别是 1952 年 2 月，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带领 7747 名指战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石油工业建设。经过专业培训、学习和生产实践，他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职工队伍的骨干力量。特别是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带进了石油工业队伍，为建设一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高度献身精神、能够艰苦创业的石油产业大军打下了一良好的基础。

第六节　石油拖了国家建设的后腿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1月，康世恩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康世恩曾是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学生，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一野战军做政治工作。1949年9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余部于酒泉宣布起义。奉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司令员之命，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黄新亭率领装甲部队日夜兼程到达玉门油矿。在此之前，中央曾指示第一野战军选派得力干部去玉门油矿当军事总代表。当时，康世恩正在第三军九师担任政治部主任。经王震将军推荐，朱德总司令批准，解放军总部决定由康世恩出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

在当时国家工业的诸多部门当中，石油工业是最薄弱的环节。1952年国内石油产品只能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大约四分之一，进口石油产品花费外汇已上升为进口项目的第一位。石油工业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康世恩走马上任不长时间，朱德总司令在一次谈话中对他讲：“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有了这两样，打起仗来就有了物资保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产一吨石油，一点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应的任务。这是给你的命令。”

1953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向他询问中国石油发展的前景。

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根据新华夏系沉降带理论，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李四光的观点，同燃料工业部与国内其他方面的许多地质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同李四光谈话的情况时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

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天然石油的潜在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只是勘探周期较长，投资较多。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长远地、根本地解决石油问题，只有大量开发天然石油才有可能。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石油工业在我国特别落后，不但产量很低、设备能力很小，而且是资源情况不明。因此，要求我们大力地勘察天然石油的资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长期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讲到的人造石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石油资源贫乏的德国人发明的，它主要是通过化学方法，以煤为原料生产石油，所需费用昂贵。日军侵华时，在东北勘探石油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在锦州和抚顺建立了合成油厂和页岩油厂。解放后，我国的人造油大都出自东北地区。1952年，全国石油总产量为43.5万吨，其中天然油19.5万吨，人造油24万吨。人造油占了石油总产量的半壁江山还多。

为了查明地下资源，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他说："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必须先行。"他还用军事术语形象地说："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国家"一五"计划确定的方针，大力加强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国务院于1954年12月决定，从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负责石油的勘探、开发外，还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承担石油资源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成立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电力工业部。毛泽东主席任命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担当石油工业部部长，周恩来总理任命李范一、李人俊、周文龙为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徐今强、刘放、黄凯为部长助理。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的牌子正式挂出。

从1953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3年时间里，由于石油工业的装备落后，经验很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勘探力量集中在酒泉、潮水、民和、准噶尔、吐鲁番、柴达木等盆地的局部地区，只有少数队伍在四川及其他一些地区工作。在此期间，只在甘肃发现了白杨河、石油河两个小油田，在青海油泉子构造和新疆克拉玛依地区各有一口井出油，勘探效果不理想。

1955年9月5日，石油工业部李聚奎部长主持第一次部务会议，决定派出以周文龙和康世恩任团长的两个石油代表团，分赴东欧和苏联考察。两人领命后即组团出行。第二年1月，石油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正在苏联考察的康世恩给大会寄来一份题为《在中国如何寻找石油》的长信，提出要将全国含油地区作出全面规划，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有步骤地进行勘探。他说，根据苏联的经验，小盆地和构造复杂地区不易找到大油田，应集中力量在大盆地和地台上展开区域勘探，把勘探重点从山前凹陷及山间小盆地移向大盆地，果断地从围着山根转走向盆地中央的地台，采取打区域大剖面和基准井的勘探方法，利用多种勘探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的区域勘探。大会接受了康世恩的建议，李聚奎在信上批示："康世恩同志所提问题均好，许多具体方法应加以研究执行。"

1956年4月，康世恩从苏联回国后到克拉玛依做调查，按照石油工业部的部署，把新疆石油勘探的重点转向盆地西北缘，采取"撒大网，捕大鱼"的做法，部署了10条东西向大剖面。当年7月，就有10口探井喷油，年底已控制了5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油区，新中国石油勘探出现了第一次突破。这也是新中国开发建设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以后，在全国各方面支援下逐步扩大勘探，到1959年，已探明含油面积200多平方公里。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克服了资金缺乏、技术水平低下、材料设备靠进口等一系列困难，有了较大的发展。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145.7万吨，其中天然油86万吨，人造油59.7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11倍多；石油职工总数增加到14.1万人，其中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有4.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8倍多；技术装备水平也有了提高，开始形成了一支石油产业大军。天然石油勘

探，结束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状况，有了前进的阵地。

在这段时期，中国的石油地质理论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51年，潘钟祥在《略论中国石油》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石油大多生于沉积盆地之中的“盆地理论”；1953年，谢家荣在《探矿基本知识与我国地下资源发现》一书中指出：从我国大地构造角度来预测探矿方向，华北、松辽两大平原下面，都可能有石油蕴藏；1954年，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远景》一文中进一步肯定，在华北与松辽平原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随后，李四光在向石油部机关干部和地质技术人员作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的勘探”的报告中，以他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研究成果为基础，认为中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三个：一是青、康、滇、缅大地槽；二是阿拉善—陕北盆地；三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所有上述成果，都为我国石油工业在更大范围内布局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石油工业非常重视。朱德、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先后到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考察。朱德在玉门鸭儿峡油田视察时，油井喷的原油沾满了他银灰色中山装的前襟，他兴致勃勃地欣然赋诗：“玉门新建石油城，全国示范作典型，六亿人民齐跃进，力争上游比光荣。”陈云是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他视察玉门后对康世恩说：“看了玉门我才明白，你们是埋管子大王，人家的管子是横着埋，你们是竖着也埋。”康世恩说：“竖着埋的套管跟不上需要，因国内还不能生产。”陈云回京后告诉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今后头一年就要把第二年石油部所需的管子订够，并决定拨给石油部700台大卡车，解决原油东运紧张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的石油工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油田分布不均衡，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石油产量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当时，已经发现的油田都集中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有油也很难运出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而经济较为发达、人口众多、消费量大的东部地区，除东北几个人造油厂外，没有一个油田。全国探明的天然石油工业储量只有0.56亿吨，实在少得可怜。1957年在全国很低的石油消费总量中，国产油只占38%，进口油高达62%。当年为进口石油花了1.34亿美元，占国家进口用汇总额的7%。特别是石油工业没有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惟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石油工业成为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这也使得石油系统从上到下都感到压力很大，脸上没有光彩。有的石油劳模说，走过天安门，头都抬不起来，见人都矮三分！

第二章　发现大庆油田

第一节　向毛泽东汇报

1956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随着苏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的逐步暴露，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要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为了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正确指导即将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1955年12月起，刘少奇开始分别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了解经济领域以及其他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这项工作也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做准备。毛泽东很赞赏刘少奇的这一做法，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底，毛泽东也先后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

按照日程安排，2月16日毛泽东要听取石油工业部的汇报。上午9时，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准时来到丰泽园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同时听取汇报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断提出问题，追根问底。中午没休息，让炊事员给每人做了一大碗面条，边吃边谈。李聚奎当石油部长还不到半年，有些问题回答不上来，感到不太好意思。毛泽东看了看李聚奎，笑着说："你谈得不错嘛！才去了5个月，有些情况不知道，不能怪你，时间太短了嘛！"下午散会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决定安排时间再谈一次。李聚奎请示说："下次再来汇报，让我们的部长助理康世恩一起来好不好？"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2月26日，李聚奎带领康世恩再次向毛泽东汇报石油工业情况。毛泽东这次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汇报。同时听取汇报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

为了这次汇报，康世恩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春节前夕他从苏联考察回国，刚进家门就接到李聚奎要他向毛泽东汇报的通知。康世恩听说有些部门已经汇报过了，便打电话给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孙志远，问他们应该如何汇报。刘澜波是在2月15日，也就是李聚奎汇报的前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那天他从上午9时40分开始汇报，一直汇报到中午13时左右。然后毛泽东去勤政殿会见柬埔寨客人，等到晚上19时以后又继续听他的汇报。刘澜波对康世恩说，毛主席问得很详细，曾问他电是怎么发出来

的。而计委的孙志远则告诉他，从石油如何生成，是什么样的矿藏，怎么勘探、开采，直到石油发展战略，都要详细准备。于是康世恩便利用春节假日期间，抓紧准备资料。他对炼油方面有些问题不太清楚，又找来炼油化工专家侯祥麟请教。为此，他还整理了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中央办公厅。

汇报开始后，康世恩拿出准备好的提纲念了起来，没想到刚念了开头的一段，就被毛泽东打断了。毛泽东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

孙志远的告诫果然有用，毛泽东开始就问康世恩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康世恩说，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地质标本。毛泽东又问，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康世恩解释说，这是按照世界统一的化石标本来划分。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出露的地层；侏罗纪由于法国和瑞士之间的侏罗山而得名；震旦纪来自中国南口的出露地层，等等。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问他石油是怎么生成的。康世恩讲了世界上关于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毛泽东问康赞成哪一种学说，康说自己赞成有机生成学说。接着毛泽东又问有机物为什么会变成石油，怎么找石油，什么叫构造等问题。康世恩拿纸边说边画，说明各种不同类型储油构造。

关于中国怎么找油的问题，康世恩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当时新疆黑油山已有一口井出油，正在继续勘探；玉门老君庙油田是主要生产基地。毛泽东说，美国人讲中国地层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康世恩汇报新疆、玉门都是戈壁、荒滩。毛泽东说，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康世恩在汇报中还介绍了苏联的石油工业情况。他说，苏联老巴库油田，已开采100多年，这个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康世恩还汇报找油从普查、详探到开发三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步的普查。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需要一个县发一台钻机，叫他们到处凿一凿。毛泽东的意思是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这对于以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勘探找油起了重要作用。康世恩汇报到苏联一年打井很多，石油投资占总投资的12%。毛泽东问李富春，我们的石油投资占多大比重？李富春说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说，我们全国一年要钻100万米进尺。康世恩汇报石油部成立晚，干部少。毛泽东当即插话说，调一些给他们，各部门要平衡。毛泽东还要求石油部搞区域勘探要有全面规划。

毛泽东两次专门听取石油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表明他对石油工业的高度重视。他提出的发展石油工业要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成为石油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座右铭。他所期望找到的几个"楼房式的油田"，后来随着大庆油田及华北、辽河等多油层油田的发现，也已经变成了现实。

此前，刘少奇也曾专门听取石油工业部的汇报。在谈话中，刘少奇说："搞石油的人要正确处理好人、机器和石头的关系。"要求他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主观与客观很好统一起来，多打井，多找油。

毛泽东听取石油部领导的汇报后，3月6日，陈云召集李人俊、何长工、康世恩等讨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研究李四光提出的关于加强石油勘探的意见。李四光把自己的地质力学理论运用到中国大地找含油构造，有很多独到的建树，他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加强石油勘探工作。中央领导很重视他的意见，陈云还专门写信给李聚奎，并附上了李四光的信。陈云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田

第二节　邓小平的战略构想

由于历史上中国最早的石油开发与利用都是在西部，加上建国初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国民经济恢复及“一五”时期，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重点仍集中在西部地区。这种状况虽事出必然，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西部地处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运输很不便利。而国家经济建设的用油大头，都集中在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建设的需要，石油工业必须实行战略东移，即把勘探、开发的重点由西部偏远地区，转移到沿海和重工业重地的东部地区。这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向石油工业提出的历史性要求。

50年代上半期，李四光等中国地质学家和一些苏联专家，曾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沉积盆地作过不少研究，主张尽快展开石油勘探工作。从1955年起，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先后在华北平原与松辽盆地开展勘探。经过几年的勘探工作，对中国东部地区含油远景有了初步的认识。

为了加快石油工业的发展进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调整和充实石油工业的领导力量。

1958年1月，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叫到一旁，对他说：“我们准备让你和李聚奎同志对调一下，请你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当时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间，人们都知道石油部长是个责任重大的职务。余秋里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思想毫无准备，稍加考虑后说：“总理，这个任务我可承受不了啊！”周恩来也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只对余秋里讲了句：“你考虑考虑，毛主席还要找你谈话。”’

按照新近出版的《余秋里与石油大会战》一书披露的材料，由余秋里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是彭德怀提议的。书中介绍说：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分析了我国工业的发展形势，会议气氛很热烈。可是一谈到石油工业，会议骤然冷场。在一瞬间的沉寂之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突然冒出一句：“我建议余秋里同志和李聚奎同志对换一下，由余秋里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然后他就开始介绍余秋里的情况。他讲完了，周恩来对与会者说：“彭德怀同志提议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同志们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1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余秋里当天下午到毛泽东办公室开会，并特别嘱

咐要早一点到，毛泽东要与他谈话。

下午，余秋里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让他坐下以后说："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总理和你谈过了吧？"余秋里说："总理和我谈过了。我考虑，我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余的话，只是问了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余回答说："43岁。"毛哈哈一笑说："43岁，儿童团嘛！"接着毛泽东严肃地说：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稍停了停又说：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打仗、搞经济建设都是如此。毛泽东还幽默地问了余秋里一句："你是不是不愿脱军装啊？"余秋里赶紧说："不是。"毛泽东又说："部长以上干部调动，是中央决定，不是转业。你如果转业，要发一笔财呢！"

毛泽东又说："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

这时，参加会议的人们陆续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谈话也该结束了。余秋里表态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满意地说："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

几十年后余秋里回忆起毛泽东与他的这次谈话，记忆仍很清晰。他回忆说："主席和我谈话的时间不长，但给了我深刻的启示，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

余秋里还没有走马上任，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又作出了一项与石油工业关系重大的决定，中央决定由总书记邓小平主管石油工业。邓小平从成都打电话到北京，要地质部和石油部派人到成都向他汇报四川石油勘探的情况。接到电话后，何长工和康世恩立即赶赴成都。何长工当时担任地质部副部长，康世恩已升任石油部副部长。当时地质部在川中岳池打了一口浅井，一天出油200至300公斤。何长工汇报了这口井的情况，对四川找油表示乐观。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这个油找得好！比克拉玛依值钱！"邓小平所说的"值钱"，显然是说在四川找到油，距离工业重点近，使用起来更方便。

从四川开会回到北京以后，2月17日、18日，邓小平又用两个下午，在中南海居

仁堂听取石油部的汇报。参加汇报的有李聚奎、余秋里、唐克、翟光明等。李聚奎此时虽已接到新的任命，但还没有离任，余秋里也还没有在石油部正式上班，唐克当时担任石油部勘探司司长，翟光明是位地质师。

会上，李聚奎汇报了石油工业的形势和基本情况，唐克汇报了各地区的勘探开发情况，重点汇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石油勘探部署。邓小平听得很仔细，不时作些记录，有时提问，有时插话，对石油勘探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针对石油系统长期存在的以发展天然油为主还是以发展人造油为主的讨论，邓小平提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要天然油和人造油并举，以天然油为主。他说："听说你们石油工业部有搞人造油和天然油的讨论。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是两条腿走路。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从长远看，当然要靠天然油。"

邓小平反复讲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和战略布局问题，提出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把战略、战役、战术三者结合起来。石油勘探要选择突击方向，在建设西部天然石油基地的同时，要把石油勘探的重点放到东部地区。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全国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的地区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他强调要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条件好的地区加快石油勘探工作。他说："就经济价值而言，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就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该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3年搞成，也可以5年搞成，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如果龙女寺钻出油来，四川石油工业就会跳到前面，东北搞出油来了也会跳到前面。""对于松辽、苏北等地的勘探，都可以热心一些，搞出一些初步结果。苏北就是搞个玉门油田，一年30万吨，那也很好嘛！吐鲁番就在铁路线上，搞出油来就很好。""柴达木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用不上，塔里木可以不忙。搞油和打仗一样，过分分散就不利。"

邓小平强调，发展中国石油工业必须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你们打钻子加一番行不行？现在你们的地质队和地球物理队可不可以加一番？石油钻机要自己做，可以和机械工业部商量一下，你们也要促进一下。套管、钻杆应当努力设法在国内解决。"

邓小平还指示石油部门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他说："现在，有些事情应该走在前面：一个是打钻子，还有一个是科学研究。钻了一口井，资料就不能浪费掉，要好好地研究。"

邓小平所谈的一些重要意见，特别是他关于石油工业的重心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转移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此，中国的石油工业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参加完向邓小平的汇报，余秋里就开始着手新的工作安排。3月3日，他第一次参加石油工业部党组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邓小平关于石油工业实施战略重心转移的一系

列指示。此后，石油部又召开了4次党组会议和两次部务会议，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组织制定石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具体研究如何把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东部地区。

通过讨论，石油部领导成员统一了思想。认为石油工业战略东移是国家对石油工业发展的要求，是我国石油工业的现状和石油地质客观情况所决定的。1958年以前，我国石油勘探主要在西部地区进行，东部地区勘探程度很低，许多地区仍是一片空白。西部地区虽然找到了一些中小油田，但储量很少，产量很低，远远满足不了国家需要。即使有油，也很难运出来。当时，铁路只修到甘肃柳园，运输能力有限。这是制约西北地区油田勘探和原油生产的重要因素。继续偏居西北一隅，就不能改变油田不均匀的状况，不能很快发展石油工业，也就不能满足国家需要。因此，尽快在东部地区找到石油，使原油生产、加工和消费就近就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石油部党组在讨论"二五"勘探规划时，首先讨论了指导思想和战略布局问题。李人俊认为："目前石油储量有限，产量很少，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首先解决储量问题。只要储量解决了，把产量搞上去，就有了基础。"康世恩提出："评价开展勘探的地区，不能单纯考虑地质条件的难易，而应将地质条件与经济地理条件并重，考虑确定进行勘探的地区。"余秋里说："小平同志的指示，给我们明确了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方针、布局、方法。道路，就是天然油、人造油并举，以天然油为主；方针，就是把石油勘探的战略、战役、战术结合起来，选好突击方向，实施勘探重点东移；布局，就是把地质条件与经济地理条件结合起来考虑，合理安排石油勘探的轻重缓急和先后主次；方法，就是采取科学的、革命的办法搞石油勘探，不能用旧观点、旧办法看待和解决新问题。"

第三节　松辽大地勘探忙

1958年3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石油工业部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主战场之一。

松辽盆地是我国东北地区由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环绕的一个大型沉积盆地。盆地跨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松花江和辽河从盆地中穿过。在距今7000万年以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和白垩纪，这里曾是一个大型的内陆湖盆，湖中和四周繁衍着丰富的浮游生物和其他动植物。进入新生代以后，大量的沉积物堆积下来，湖盆逐渐上升、萎缩，形成了现今广袤无际、沼泽纵横、泡泊遍布的大平原。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日本的地质工作者都曾在这一带进行过石油调查和勘探，但没有发现石油。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至1954年，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及所属东北石油管理局，曾多次派人到东北地区进行过油苗调查，发现和证实了阜新和承德的石油、扎赉

诺尔和安图的沥青、依兰的油页岩等矿苗。

1955年，地质部在松辽平原正式开始了以找油气为目的的石油勘探。当年8月，地质部东北地质局派出6个石油踏勘组，沿第二松花江、沈阳至哈尔滨铁路两侧，锦州至阜新一带进行地质线路踏勘和油苗调查，初步了解了松辽盆地东部边缘地层出露情况、地层及构造概况。

1956年2月，地质部成立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到1957年，除在盆地边缘进行地质概查外，还开展了大面积的重磁力普查，在吉林省部分地区进行了地质剖面详测，完成了一批浅层探井。地质部物探局904队在松辽盆地及其附近40万平方公里地区进行了航空磁测普查，112物探队进行了重力预查和少量电测深剖面测量。通过这些工作，划出了盆地边界，勾出了盆地内部构造格局，初步建立了盆地内部的地层顺序，发现了很厚的可能生油层。

1957年7月，石油工业部西安地质调查处根据石油工业部的指示，派出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地质综合研究队奔赴松辽盆地。这个队的编号为116队，邱中建任队长。该队的任务是在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工作的基础上，专门搜集松辽平原地质资料，整理汇编各项综合性图幅进行研究，提出初步含油评价与下一步工作意见。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松辽盆地是一个石油地质条件优越、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白垩纪松花江系地层生油储油条件良好的盆地。

东北地区大规模的石油勘探是从1958年开始的。这一年的4月，在西安地质调查处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大队，由宋世宽任大队长。5月，又成立东北石油勘探处，任命宋世宽为处长。除西安地质调查处部分人员外，还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石油管理局抽调了一些干部，勘探处机关设在长春市。6月，石油部又决定将松辽石油勘探处改建为松辽石油勘探局，任务是开展基本地质普查，选择有利地带进行详查细测，钻探基准井并开展区域综合研究，准备可供钻探的构造。三个月内，将负责松辽盆地石油勘探的单位从组织机构上连升三级，充分显示出石油工业部实施石油勘探重点东移的决心。8月，原石油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李荆和走马上任，担任松辽石油勘探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随着石油勘探事业的发展，石油工业部陆续从克拉玛依油田、青海油田和石油工业部机关，以及东北三省支援抽调一些干部和职工，充实和加强松辽石油勘探局及其所属各大队，使勘探队伍不断壮大。到1959年4月底，全局职工已经达到3000多人。

松辽石油勘探局所领导的这支勘探队伍非常年轻，技术力量十分薄弱，整个勘探局只有一名主任地质师、两名地质师和30多名地质技术人员，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平均工龄仅3年多。他们从西北第一次转移到东北广大的平原覆盖区搞勘探工作，缺乏经验，遇到重重困难，勘探工作在探索中进行。第一年，他们通过与地质部门的有效配合，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发现了黑龙江省大同镇等13个可能储油构造，并于1958年4月17日首次在吉林省前郭旗南17井取心发现油砂，接着在杨大城子构造南14井等30口浅井中见到了油气显示。

第四节　松基3井出油了

按照重力勘探资料，这年7月，松辽石油勘探局的钻井队首先在盆地东北斜坡地区，即安达县任民镇以东14公里处钻了第一口基准井——松基1井，井深1879米，钻穿了白垩纪地层，到达盆地基底的古老岩层上，结果一无所获。同年8月，又在盆地东南部的隆起区即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登娄库构造打了松基2井，遇到了一套致密的下白垩系地层，仅见到了少量的油气显示。

前两口基准井出师不利，第三口基准井的井位选择就成了突出问题。9月，石油部和地质部参加松辽勘探的技术人员联合召开会议，进行深入的讨论。经过分析利弊，达成共识，同意将松基3井井位定在大同镇高台子隆起上。因为这里与松基1井、2井相距90公里以上，略成等边三角形，符合基准井井位分布原则。而且这里交通较为方便，靠近哈尔滨至齐齐哈尔的铁路，具备较好的经济地理条件。11月14日，松辽石油勘探局向石油部呈报了松基3井井位图。图中说明："松基3井井位已定，在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200公尺，高台子以西100公尺处。"经过反复论证、修改、补充，石油部于11月29日批准了松基3井的井位。

1959年1月，正是北京滴水成冰的季节。石油部局、厂领导干部会议却开得热气腾腾。石油部党组用二天时间，听取了松辽、华东、银川、贵州几个新区的地质勘探情况汇报，对松辽局的汇报和勘探布局最为满意。这个部署的核心是横贯松辽盆地做4条区域综合大剖面，开辟2个探区，做好10个构造的详查，钻探3口基准井。部党组批准了松辽石油勘探局1959年的勘探总体部署，要求他们集中力量，把这个部署落到实处，争取在195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那一年的2月8日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千家万户都在喜气洋洋地欢度这个传统节日，但石油部办公大楼会议室里却正在开会。会议的议题就是松基3井。会议由康世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石油部总地质师余伯良、副总地质师翟光明以及松辽局的李荆和、张文昭等人。他们要对松基3井的井位及钻探进行最后的研究部署。会议从初一开到初三。最后康世恩拍板：现在松基3井的井位与松基1井、2井形成等边三角形，处在不同构造上，又是"坳中之隆"，位置十分理想，要尽快准备好开钻！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四，康世恩将松基3井的情况向余秋里作了汇报，然后他们又一起到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去拜年。说是"拜年"，其实他们见面刚寒暄了几句，就开始商谈起石油勘探的事情。余秋里用手指着松辽盆地地质图作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我们打算用3年时间攻下松辽！"

何长工开怀大笑："哈哈，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吧，4条地质综合大剖面由地质部来承担，松基3井等基准井的任务由石油部来完成。咱们携手并肩，团结一心，争取早日拿下松辽。"

松基3井的钻井施工任务是由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负责的。在缺少吊车和大型运输车辆的情况下，工人们把钻机拆成几大件，化大为小，用倒车坑、倒链、滚杠、撬杠等土办法，靠人拉肩扛装卸，依靠仅有的5台解放牌汽车，硬是把几十吨重的钻机设备运到了松基3井井位。接着，又冒严寒打好基础，安装井架设备、挖泥浆池。4月11日，松基3井正式开钻，7月份，钻至1050米时开始连续取心。钻井设计中要求取心的长度为411.76米，由于取心工具简陋，井队经验不足，只取出岩心202.51米，见到含油显示层3.15米。取出的油砂呈棕黄色，含油饱满，气味浓烈。并两次从泥浆中返出原油和气泡。现场技术人员将这些气泡收集起来，可以点燃，火焰呈蓝色，证明是石油气。中途电测资料解释，也说明井下有较好的油层。

按照原定设计，松基3井要钻完3200米井深，然后由下而上逐层试油。为了争取时间，尽快搞清松辽盆地是否有油，康世恩提议松基3井提前完钻试油，余秋里支持他的意见。为了保证固井质量，石油部还专门从玉门石油管理局调彭佐猷总工程师带着助手到松基3井组织指挥固井工作，还派出由石油部机关和北京石油学院有关人员组成的试油工作组到现场组织射孔试油。8、9月份，草原上阴雨绵绵，没有公路，交通阻绝，井上又缺少机械设备和维修力量，所有的机械工程故障和射孔试油必需的配件，都靠自己动手解决。

8月29日，松基3井固井作业完成。9月6日，第一次射孔试油。然而，这条深藏于地下的油龙睡得实在是太久了。当技术人员射开1357—1382米井段的3个薄油层后，起初井口无任何显示，液面还略有下降。

为了把原油抽出来，康世恩提出轻提深部捞水的方法。工人们不辞辛苦地奋战在井台周围，经过近20天的努力，一桶桶清水被提捞上来，直到井底的泥浆都被清除干净，沉睡在地下的油龙终于被惊醒。

1959年9月26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日子，松基3井终于喷出了棕褐色的原油！在场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跳跃。喜讯迅速传遍松辽盆地，传到长春、哈尔滨、北京。

松基3井是松辽盆地的第一口喷油井。这口井的喷油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在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如余秋里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松基3井的喷油，松辽油田的发现，不是偶然的碰运气，而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贯彻了正确的方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进行了大量艰苦工作的结果。"

松基3井喷油和大庆油田的发现表明，一个地区有没有油，不在于它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关键在于有没有石油生成、运移、聚集和储藏的地质条件。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陆相地层不仅可能形成油田，而且有可能形成储量十分丰富的特大油田。至此，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所谓中国石油资源丰富还是贫乏的论战终于结束了。邓小平所提出的以天然油为重点的论述和将石油工业战略重点东移的构想，终于在实践中显示出了无比的睿智。

第五节　石油部决心大干一场

余秋里在20世纪90年代所作的回忆录中说："松基3井出油以后，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松辽盆地可能会有大的突破。"但鉴于以往的教训，为了避免再像川中会战那样放空炮、说大话，石油部党组商定：这次松基3井出油，不急于对外宣传。而是先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工作。在整体工作上，也不要打乱原有的部署，首先是要稳住西北的天然油基地和东北的人造油基地建设，同时进一步加强松辽地区的勘探工作。

9月29日，石油部党组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说："目前原油生产已处于主动，第四季度可以腾出手来，以更大精力来抓勘探。""松辽地区目前已有一口探井出油，需要采取更快的速度把油田早日定下来。"

9月30日和10月3日、5日，石油部党组先后3次听取松辽局汇报，研究扩大勘探问题。会议前夕，地质部现场地质队又送来新的地震资料。这些资料进一步反映出，高台子、葡萄花、太平屯这些局部构造，在整体上被一个更大的构造带——大同镇长垣所控制。这个长达百余公里、宽十余公里的构造带，横卧在松辽盆地中央，像个大鱼盘似的，葡萄花、高台子等构造就像盘中排列的大小不一的水果。尽管地震勘探仍在进行，长垣北部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但大致轮廓已经出来。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石油部党组决定要加快大同镇地区的勘探。确定先布置63口探井井位，分两步上：第一步以高台子、葡萄花地区为重点，1959年底前先拿下一批探井；第二步1960年初再铺开一批探井，扩大钻探。为此，石油部党组还决定从四川局调给松辽局一批打中深井的钻机和井队，并指定地质司、供应局、人事司等部门共同组成钻机设备、人员调度小组，专门办理此事。到1959年底，松辽局的大中型钻井队已经增加到23个，并配备了相应的电测、固井、射孔、试油等配套队伍，地球物理勘探和地质综合研究力量也大为增强。会后，石油部党组又讨论了松辽勘探部署及组织落实问题。决定由石油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俊带领翁文波、李德生、童宪章等专家组成工作组，赴松辽现场收集、分析、研究有关地质资料，协助松辽局编制整个长垣的勘探计划。他们于1959年12月下旬到达大同镇，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1959年10月26日，石油部党组扩大会议在北京华侨大厦举行。参加会议的人员除石油部的领导和司局长以外，还有各石油局厂的党政主要领导。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明确今后的方针任务，迎接1960年大发展。会议开始时不作报告，而是先提出问题，大家讨论，然后再做总结。预备会议以后，会议即进行分组讨论。

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和激烈的争论。争论之一，就是要不要提倡全局观念，集中力量保重点？当时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碍，是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为了教育大家，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余秋里

强调指出：实践证明，集中使用力量，绝不是一个暂时性措施，而是一个带有长远性指导工作的原则。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分主次、轻重，而平列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即使是在次要的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甚至是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任务，也仍旧不能获得全局的、决定性的胜利。而只要在重点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即使在其他方面发生了一些缺陷，就全局来讲，仍然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党组扩大会议进行中间，分别穿插召开了计划、勘探、开发、基建等专业会议，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石油局厂领导干部会议，讨论、安排了1960年计划和各项专业工作。与会者进一步讨论了松辽勘探问题。提出拟在松辽地区组织大的战役，并分两个阶段来打：第一阶段于1959年冬1960年春在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打一批探井，1960年3月打下来，找出高产区；第二阶段是根据第一阶段结果，如果情况好，再组织大规模力量突击上，大会战一场，查明面积和储量，并且搞一块开发试验区。会议确定松辽局当前的任务是勘探，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把已确定的葡萄花、高台子地区第一批探井打好，做到"四快、四好"，即运输快、安装快、开钻快、钻进快，取心好、电测好、固井好、试油好。特别要重视取好资料。在工作中要抓住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油田面积；二是油层厚度；三是采油的技术措施，保证能把油采出来。

在会议期间，余秋里就松辽地区勘探的初步设想，同各厂矿领导通了气。余秋里提出，1960年我们拟在松辽地区组织一个大的战役，争取拿下面积，当年就生产一定数量的原油。希望大家做好大战松辽、支援松辽的思想准备。大家听了以后，情绪高昂。纷纷表示，为了大战松辽，要人给精兵强将，要设备给好的。几个石油管理局的主要领导还主动请战，表示随时听候调遣，一声令下，立即奔赴松辽。

第三章　一场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会战

第一节　中央批准了会战报告

12月底，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经济计划问题，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刘少奇参加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汇报。余秋里此时正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实地考察，由周文龙在会上汇报了石油工业情况。当周汇报到明年一季度拟在松辽摸出样子，上半年见个分晓，3年内拿下松辽、四川，突破鄂尔多斯、苏北、贵州，巩固和扩大现有油田时，邓小平表态说："这样搞完全正确。要集中力量，不要把力量分散！"邓小平还向刘少奇解释说，我们沉积岩分布面积，原说200万平方公里，现在是400万平方公里，是做了工作的。大小盆地是200多个，大盆地有10个。要建立几个经济体系，可使每个经济体系都有油。刘少奇听后满意地说："这就很理想！"邓小平也说："东北出油很理想！"

新年刚过，从松辽大地便接二连三地传来喜讯，部署在葡萄花构造上的葡7井于1月7日喷油，接着，葡20井、葡11井、葡4井等相继喷油。粗略计算结果，这13口探井控制的油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约1亿吨以上，大体上相当于克拉玛依油田初期的规模。

1月7日，余秋里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他："余秋里同志，你那里有没有一点好消息啊？"余回答说："从目前勘探情况来看，松辽有大油田！"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呵，有大油田？"余说："是的，主席！我刚从黑龙江回来，留有余地地说，有可能找到大油田；如果不留余地，大胆地说，大油田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加紧勘探，半年左右就有眉目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有可能的。能在半年内找到也好啊！"

从2月1日起，石油工业部连续8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余秋里、李人俊、周文龙、孙敬文、康世恩、刘放等党组全体成员和部机关部分司局长参加了会议，赴松辽专家工作组的一些成员也列席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专家工作组的李德生、童宪章、翁文波和张俊等人汇报了大庆长垣的地质情况和勘探形势，以及下一步勘探部署和开辟生产试验区方案的意见。根据专家工作组的汇报和分析，在葡萄花构造上，最先喷油的是葡7井。这口井于1959年11月12日开钻，12月29日钻完设计井深992米。1960年1月6日射开3个油层，共厚3.8米，1

月7日喷油。先后用3至7毫米油嘴试油，日产原油分别为9至39吨，明显高于松基3井。接着，葡20、葡11、葡4等井也陆续喷出工业油流。到1月底，在大庆长垣南部的高台子、葡萄花、太平屯地区，已经完成了6口井。这些井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试油试采，产油情况良好。用5毫米油嘴试采，自喷日产10至24吨。估计将来油田开发以后，日产12吨是可靠的。另外还有7口探井，已经钻到油层，根据取心、电测和钻进过程中的油气显示，证明油层情况也很好。这13口井控制的油田面积是200平方公里，初步估算地质储量在1亿吨以上，也就是说相当于克拉玛依油田的规模。专家工作组还对1960年的勘探工作部署和油田开发试验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党组的几位领导成员都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松辽盆地石油勘探形势很好。虽然有些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但是，我们毕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可靠资源，有了进一步开展勘探的牢固阵地和必要条件，再加上油田处于富饶的东北平原，工业基础雄厚，交通发达，在勘探和开发建设速度上可以比其他地区来得快。

有了这样一个油田，怎么把它拿下来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很明显依靠外援这条路走不通。只有靠我们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拿下油田。1959年，全国石油消耗量是504.9万吨，其中自产的仅205万吨，自给率只有40.6%。国家不得不耗用大量外汇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当年，国家用于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的外汇为1.83亿美元，占全国进口用汇总额的6.7%。即使如此，油品的供应情况仍然十分紧张。民用油中数量最大的煤油和柴油，商业部门年底库存量1959年比1958年分别下降15%和24%。1960年的形势更为严峻，国家对石油及其产品的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而国内最大的生产能力是500万吨，缺口高达500万吨。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进口原油非常困难。到处都喊缺油，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也背上了煤气包，空军的训练和执勤飞机因油料紧张不能正常起飞。另外，作为石油工业基础的天然石油资源，偏居西北一隅。1959年时，98%的天然原油产量和61.7%的原油加工能力在陕、甘、青、新四省区，而90%以上的消费量在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面对这种情况，余秋里在会上说：我们搞石油勘探，要勇于解放思想，敢于在情况基本搞清的情况下作出决断。有充分根据而不敢作决断，就会贻误时机，就会一辈子落后。现在国家迫切需要石油，松辽资源又比较可靠，地质情况也搞得比较清楚，改变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在此一举。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尽快拿下这个大油田。松辽石油会战，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水平，把这个大油田勘探、开发、建设好，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会战中从各油田、厂矿抽调的队伍，兵要精，将要强。头等的队伍，头等的技术，头等的设备，头等的材料，都要上去。还要组织2000人的专业技术队伍，石油科学研究院、各油田的专家、老总，石油学院的教授、讲师、学生，都要到现场参加会战，搞技术攻关。不仅要打出高速度，更要打出高水平、高质量。会战的各项工作都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旁人的分析和批判。同时，还要通过会战，调动

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掀起你追我赶、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提高我们的领导水平，丰富我们的工作经验，培养锻炼出过硬的石油职工队伍。

这次会议最后决定组织松辽石油会战，由石油部党组直接领导，党组成员中，余秋里、孙敬文、康世恩到前线指挥，李人俊、周文龙、刘放主持部里日常工作，负责后方支援。部机关抽调一半干部参加会战。会战队伍由石油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抽调组成，各单位带队的主要领导干部由石油部点名指定。会议还讨论了会战的部署和任务，待向中央的报告批准后，再作安排。

2月6日，余秋里给李富春、薄一波写了封信，汇报了松辽石油勘探情况和石油部准备在松辽地区组织石油会战的设想，请求国家增加部分投资、设备、器材和劳动力。因为当时经过几年的"大跃进"，国民经济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各方面都在努力压缩项目，尤其是对于新铺的摊子，中央控制相当严格。李富春读过余秋里的信后找他谈话。李说，各部门都在下马，而你们却要上马，这是个大行动，要给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几天以后，余秋里和李人俊直接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余秋里提出，准备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在松辽地区开展一场勘探开发石油的大会战。邓小平当即表示同意，让他们正式给中央写一个报告。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石油部党组2月13日给中央写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上报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并中央。报告说："最近，我们对东北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形势很好，来头很大。目前，已经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地区，探明了一块200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步估算，地质储量在1亿吨以上，大体上相当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产油情况很好，现在已经打出来的探井，经过1个多月的采油试验，平均每口井日产量在12吨左右。""油层产油性能良好，出油稳定。而且地层松软，打井容易。总起来看，开发和建设这里的油田，有很多便利条件。""整个大庆地区，从地质资料上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现在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边界尚未摸到。看来，储油面积还会有大的扩展，远景非常乐观。""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会战。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其他有关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和必需的采油、地质及其他工种队伍，加上2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参加这个大会战。抽调的人员都要精兵强将，在现场大搞比武竞赛，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鼓作气地拿下这个地区。"

报告送上去之后，仅仅过了7天，中央就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华东局、黑龙江和其他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地质部和其他有关部的党组。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石油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望予支持和协助。石油部为了加快松辽地区石油勘探和开发工作，准备抽调各方面的部分力量，进行一次'大会战'，这一办法是好的，请各地在不太妨碍本地的勘探任务的条件下，予以支援。我国的石油工业特别是石油地质

勘探工作，在两年中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目前仍然是一个薄弱的方面。积极地、加快地进行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工作，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接着，周恩来就此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于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石油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第二节　茫茫荒原布战场

1960年年初，石油部党组酝酿组织会战时，曾经计算过，要搞好会战，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人力不足。组织会战的决定作出后，周文龙副部长给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写了封信，汇报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准备组织会战的打算，请求在当年安排军队转业计划时分配大庆会战3万名官兵。2月间，余秋里又将这一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个想法很好嘛！主席正在广州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你快到广州去！”当月中旬，余秋里专程飞到广州。在那里，他首先见到了罗瑞卿。罗瑞卿风趣地说：“余秋里哟，一下子就要改编我们的3万部队呀！就你想得出来！你真会找窍门啊！”

随后，余秋里又向刘伯承、贺龙汇报了这件事。刘伯承说：“对头嘛！打虎要靠亲兄弟，出征还得父子兵嘛！”

余秋里还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松辽石油勘探的新进展。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听汇报，还不时地点头说：“好嘛……好嘛……这很好嘛！”这时旁边有人插话：“余秋里要在松辽搞个大会战！”余秋里接着说：“正准备调克拉玛依、玉门、柴达木、四川的队伍到松辽会战。”毛泽东说：“听说你们有个报告，要搞会战。好哇！准备上阵喽！”

关于这次汇报，余秋里后来回忆道：“毛主席没有说多少话，从他听汇报的神态和讲话的语气，我感到他对我们的计划是同意的，寄予希望的。从毛主席住处出来，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充满了信心。”

2月22日，中央下达了《中央决定动员3万名退伍兵给石油部》的指示，指出：“为了集中力量迅速开采在东北大庆地区发现的新油田，决定从部队今年度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交石油部参加开采大庆地区新油田的工作。”以后，中央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3000名转业军官。从3月份起，转业、退伍的官兵陆续来到大庆。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党团员，有的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给大庆会战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准备搞石油大会战，困难当然很多。石油部经过反复计算，要把会战搞上去，只靠石油部自身的财力、物力是不够的，仅1960年就有2亿至3亿元资金和几万吨钢材设备的缺口。石油部为此又给国家计委、经委写了报告。当时，国家计划的投资和物资已经分配完了，而且在资金、物资上已经出现了严重困难，计委、经委在自己的权限内无法平衡、解决，便将报告又送到了中央书记处。邓小平问明情况后，表示同意解决。于是中央又在计划外给会战拨了2亿元投资和几万吨钢材、设备。这些无异于为会战的准备工作雪中送炭。

石油部党组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石油大会战的文件精神，从2月21日起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委107招待所召开了大庆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康世恩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石油系统37个局、厂、院、校的主要领导。会议首先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讨论了大会战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主要任务，确定会战的组织机构。会议确定了石油会战的三项任务：第一，在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甩开勘探，争取打200口左右的探井，迅速探明油田面积，找到10亿吨的可靠储量。第二，选择已经探明的有利地区，打出200口左右的生产试验井，进行油田开采试验，实行早期注水，当年生产原油50万吨，年底达到日产4000吨的水平和年产150万吨的生产能力。第三，在大庆长垣以外的附近地区，进一步开展地震勘探，完成地震细测4万公里，选择有利构造进行钻探，争取再找到一些新的油田。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会议决定石油部党组亲临会战前线指挥，并组成了大会战领导小组，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担任组长，勘探司司长唐克、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吴星峰担任副组长，小组成员由石油部科研院及新疆、玉门、松辽、川中、青海各石油管理局主要领导干部组成。会议宣布了部党组关于全国石油系统37个局、厂、院、校由主要领导带队，组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参加大会战的决定。会议将参战的单位划分成5个战区：葡萄花地区，太平屯地区，萨尔图地区，杏树岗地区，高台子地区。明确了各参战单位的任务及所负责的战区。对参战单位的队伍组织、人员集结、设备材料调度等提出了具体要求。按照当时的安排，会战的重点地区是长垣南部的大同镇附近地区，在葡萄花、高台子、太平屯构造上部署了比较多的探井，油田的开发试验也准备放在葡萄花一带。

当时组织会战队伍，主要采取三种形式，康世恩赋予每种形式一个形象贴切的比喻：一是“拔萝卜”，点名抽调一些标杆队。比如，玉门的王进喜钻井队，新疆的张云清钻井队等。二是“割韭菜”，把原来的队伍成建制一个不剩地调来。三是“切西瓜”，把原来的队伍一分为二，调来一半，留下一半。在时间安排上，会议提出，3月份调动人马，4月份开始上手，5月初正式打响。各参战单位的钻井、安装队伍及指挥机关必须于3月15日前赶赴会战现场。

第一次筹备会议于3月3日结束。各单位参加会议的领导人急如星火，从哈尔滨赶回原单位，立即传达贯彻，搭班子，调队伍，拆钻机，运设备。经过层层动员，宣传教育，会战队伍迅速开赴大庆。各单位的石油工人都以能参加会战为荣，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个个争先恐后。各路会战队伍一路上集体行动，纪律严明。在北京换车时，许多第一次到北京的人，顾不上到天安门广场拍个照片。到第一次筹备会议规定的3月15日，各单位到达大庆地区的工人已有1000多人，部队转业官兵11000多人也到达了会战现场。加上松辽局原有的5000余人，集结在大庆油田的会战队伍已达17000人。运抵安达的设备、器材已有247个车皮，1万余吨。

党中央批准石油部党组关于组织松辽会战的报告后，中央书记处指示，对会战的检查督促和组织支援工作由薄一波主持，国家计委、经委、建委负责。并由三委的三位副主任组成领导小组，负责日常组织领导工作。

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根据中央批示精神，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省市支援大庆石油会战。3月3日，三委给冶金、水电、农机、外贸、交通、一机各部和上海、黑龙江省计委、经委发出电文，要求迅速调剂一批钢材、设备，支援松辽石油勘探。当时决定调剂的物资和设备有：钢材1.8万吨，发电机组6000千瓦，载重汽车100辆，吉普车30辆，45匹马力拖拉机60台，机床50台，压路机2台，油井水泥1万吨，轴承4000至6000套，木材由黑龙江省就地调整支援。

3月9日，薄一波主持召开支援大庆石油会战的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黑龙江省陈雷，吉林省肖靖，辽宁省孙洪志、余迈，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倪伟，石油部余秋里、李人俊、康世恩，地质部何长工，中央工业部于江震，国家计委安志文、董铣，国家建委柴树藩，铁道部郭鲁，水电部程明升，化工部李苏，建工部刘裕民，商业部阎顾行，冶金部王大伟，一机部李克，交通部伍坤山，邮电部赵步云，劳动部李正停，中央办公厅贾步彬以及国家经委孙志远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关于大力支援东北松辽油田的勘探与开发问题。余秋里、康世恩汇报了大庆油田的勘探情况、会战的工作部署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陈雷汇报了黑龙江省支援油田勘探开发的情况以及从本省的角度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薄一波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一是从毛主席到党中央对大庆油田十分关心。它对于全国解决石油翻身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开采原油按年产2000万吨规划，修两条输油管。三是黑龙江省支援石油开发的办法很好，今后要继续照办。四是具体问题，如建设项目与投资，指定安志文负责审查提出方案；物资问题由孙志远负责研究解决；运输问题由郭鲁等人负责解决。在会议产生的纪要中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很关心松辽石油会战，“中央对于开发这块油田很重视，决心很大，决定大力支援。”国家经委随后发出〔60〕31号文件，要求：“关于松辽油田大会战的进展情况，石油部每隔十天、半月要向中央和有关部委写一个报告。”

3月13日、17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发出电报，督促有关单位迅速调拨钢材、汽车、水泥、拖拉机、机床、木材等设备物资，支援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21日，国家经委向毛泽东写报告，汇报了大庆会战部署和组织支援工作情况，正式提出增加投资2亿元、钢材3.8万吨；会战按年产2000万吨原油安排工作。

这样，大庆石油会战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指导下，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和黑龙江省的组织和大力支持下，经过紧张的准备，迅速展开了。

第三节　三口油井定乾坤

开展石油大会战，会战的主攻方向定在哪？主战场摆在哪？这是当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1959年12月中旬，东北经济协作区会议在哈尔滨举行，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会议，石油工业部的领导人余秋里、李人俊也出席了会议。会后，余秋里从哈尔滨乘火车

到安达，于12月26日到达大同镇，实地考察石油勘探情况。

那时的大同镇，是黑龙江省肇州县管辖的一个不足500户人家的小镇。镇子只有一条街，镇里大部分是“干打垒”房屋，只在临街的地方有几间砖房的小商店和饭馆。松基3井喷油后，黑龙江省紧急修了安达到大同镇的公路，当时刚刚通车，还没有铺上沥青路面。当时，松辽石油勘探局机关已经在大同镇设立了前线指挥部，局的主要领导都已搬到这里办公。石油部派出的专家工作组也已来到这里，他们少数人住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大部分人住在临时腾出的民房里。这个一向平静的小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顿时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景象。

那时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最低气温已经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寒冷的气候给钻井工程造成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柴油机难以发动，钻机设备需要保温，水源供应得不到保证，不少井队不能正常钻井。

余秋里这次到大同镇，主要是了解这里的地质条件和勘探情况，了解石油资源是不是落实。围绕这个问题，余秋里和松辽局的领导、石油部专家工作组的专家以及有关地质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天的座谈。大家一致认为，松辽盆地的勘探基础工作比较可靠，地下的地质构造、地层划分都搞得比较清楚。大同镇地区，松基3井已经稳定生产了3个月，正在钻进的葡1井、葡7井、葡20井都见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更主要的是，这几口井打到的标准层、油层、水层，都能对比得上，证明这里的油层是稳定的，可以断定具有一定含油面积。现场的工作人员给余秋里拿来了一块刚刚从葡20井取出的油砂，原油的气味特别浓，用放大镜一看，质地很疏松，孔隙度和渗透率都不会小。这就是说，这里确实是一个油田。

鉴于大庆地区的地层发育稳定，在不同的井口，地层都能对比得上，岩心、地质录井和测井资料互相比较吻合，为了加快钻探速度，经过同地质技术人员讨论研究，余秋里提出在钻探部署上采取“三点合一”的办法，即把探井分为三类统筹安排：第一类井不取岩心，加速钻进，加强综合录井，搞好电测工作，取得完整资料，迅速控制含油面积；第二类井在油层部位全部取心，掌握油层特征，为计算储量取得参数；第三类井是在构造边部的探井，通过分组试油，确定油水边界。这样，把三类井中取得的录井取心、电测和试油三方面资料合在一起，互相验证，就能够大体了解和圈出含油范围和油层情况。此外，在每个构造上，还要选一口井长期试采，了解产量的递减情况。余秋里后来评价这种办法时说：“这种办法对于加快钻探速度，争取时间，尽早探明大庆油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2月30日，松辽勘探局在大同镇一个陈旧的剧场里召开了大庆地区井队、车间以上干部大会。当时剧场里很冷，哈气成霜，参加会议的人都穿着棉大衣，戴着皮帽子。可是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余秋里在会上表扬了松辽勘探局广大职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援和地质部勘探队伍的密切配合下，取得了重要的勘探成果。接着，他分析了大庆地区找油的有利条件。主要是构造很多，面积很大，油层很多；含油层位比较稳定，埋藏不算深；地层比较松软，有利于钻井。他的结论是，在这里有可能找到较大面积的油田。

余秋里提出勘探工作在1960年的主要任务是：以大同镇为中心，在葡萄花、高台子、太平屯这几个主要构造上，或者是从萨尔图一直到扶余、大赉这条线上，打出一、二级含油面积500至700平方公里，得到三个结果：打出可靠的面积；通过试油试采搞清油田的生产能力；取得反映油层性质的一套完整的地质资料。会上，从四川局设计院出差到大庆收集资料的青年技术员王毓俊发言说，萨尔图一带可能是大庆长垣上的油气富集地带。他建议在重点勘探南部葡萄花等构造的同时，可不可以把钻探的步子向北甩得更大一些。

余秋里很欣赏这位年轻人肯动脑子、敢想敢说的作风。散会后，他找到小王，问他有什么根据。小王说，前一段他收集了地质部在长垣上打的一些浅井资料，经过对比，发现萨尔图地区的地层逐渐变浅，砂层逐渐增多。从浅部地层的变化上可以推断，萨尔图地区的油层可能比南部更多、更厚。余秋里认为这个分析有道理。在干部大会上，他表扬了王毓俊，建议大家认真研究他的建议。

余秋里和张俊及石油部工作组其他地质专家交换了看法，是不是向北部大距离地甩几口探井，侦察一家伙。这在当时是一个解放思想、打破常规的大胆设想。因为按照一般勘探程序，一个地区打出见油井后，都是采用十字剖面布井的办法，以2公里左右的井距依次向四周展开勘探。一方面扩大面积，一方面探明油水边界。但余秋里等人设想从南部的高台子、葡萄花地区，一家伙甩到北部的萨尔图地区，这个距离足有70公里。这是许多人所不敢想的。

这是一个非常形势下的非常决策。为了进一步弄清松辽平原的石油构造，选准选好会战的主攻方向和主战场，1960年初，石油部党组将松辽一带划分为三个探区。第一探区负责敖包塔、葡萄花、高台子一带的勘探；第二探区负责杏树岗、龙虎泡地区；第三探区负责萨尔图、喇嘛甸等地区。为慎重起见，还派第三探区党委书记张文彬去看了井位。当时在松基3井以北的广大地区，确定了“三口关键探井”：一口是位于萨尔图构造上的萨66井，一口是位于杏树岗构造上的杏66井，一口是位于大庆长垣最北端的喇嘛甸构造上的喇72井。

3月1日，萨66井在钻井过程中见到了油砂。12日，在试油中喷出了高产油流。这标志着大庆长垣高产富集区的发现，是一个新的突破，对加速会战进程，完成会战任务有重大意义。

继萨66井之后，杏66井于3月17日开钻，30日完钻，4月8日试压合格完井。经过试油，通过9毫米油嘴，日产原油90吨。大庆长垣最北部的喇72井，于3月28日开钻，4月18日完钻，喷油后用5毫米油嘴测试，日产油48吨。

这三口井的相继喷油，证明了大庆长垣南北140公里长，东西10多公里宽的8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都有工业性油流，令人振奋地显示出大庆油田的轮廓，而且越往北油层越厚，原油产量越高。因而，曾被誉为“三口井定乾坤”。

3月初，参加过大庆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的康世恩由哈尔滨回到北京，向石油部党组汇报了筹备会情况和萨66井见油情况。余秋里提出，目前先按已定的部署，以高台子—葡萄花地区为重点，分5个战区来安排工作。但要密切注意萨66井试油情况，如

果出油情况好，就要调整部署，调集力量，猛攻萨尔图。

过了几天，从前方传来萨66井喷出高产油流的喜讯。石油部党组在3月14日召开会议，分析了萨66井出油后的会战形势，研究调整勘探部署问题。考虑到萨尔图地区油层厚、产量高，又地处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的滨州铁路线上，对石油大会战更为有利。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采取点面结合、先肥后瘦的方针，把石油大会战的重点从大同镇附近移往萨尔图。在萨尔图摆开主战场，这就是当初划分的第三探区。后来第一、二探区陆续撤销。

曾参与作出"挥师北上"决策的第三探区党委书记张文彬，后来谈起"三日井定乾坤"这件事时说："勘探是有风险性的，不敢承担一定的风险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当然，对地质资料的准确研究、规律性的判断等对决定一个重要部署，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月17日，石油部党组召开了全国石油企事业单位电话会议，康世恩在会上通报了萨尔图地区勘探的最新成果以及部党组调整大庆会战部署的决定。他以会战领导小组的名义下令，把玉门局参加会战的队伍由太平屯迁往萨尔图铁路线以南，新疆参战队伍由葡萄花北上至萨尔图地区铁路线以北，青海和四川局队伍从高台子调往杏树岗地区。所有正在搬迁的队伍、设备，一律改变方向，直接北上。这就是大庆石油会战史上有名的"挥师北上"。当时，松嫩草原仍是严冬，广大会战职工不避艰辛，进行了百里搬迁。有的工人曾用"打油诗"来描绘当时的情景："迎面刮风沙，遍地冰雪滑；北上闹会战，艰苦算个啥！"

"三口井定乾坤"和随后的"挥师北上"，对于尽快拿下大油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靠"两论"起家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打上去的。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石油工业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形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全国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想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石油工业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也搞了大跃进，参加了大炼钢铁。那个时候，我国只有一个玉门石油工业基地，克拉玛依油田正在勘探开发中，玉门油田的原油产量占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一半以上。大跃进的结果，玉门油田的自喷油井几乎全部停喷，原油产量急剧下降。当时，集中石油系统的主要力量，在四川川中地区进行了石油会战，但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大跃进"、"反右惯"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

3月25日至27日，石油部党组在哈尔滨召开了大庆会战第二次筹备会议。康世恩主持了会议，唐克在会上做了关于4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出席会议的除会战领导小组

成员外，还有有关石油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根据部党组调整会战部署的决定，会议着重讨论了4月份工作，重新划分了各单位会战的区域。

会议确定4月份工作方针是："全面完成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拿下萨尔图油田，打响第一炮，迎接大会战。"主要任务是全面完成会战的准备工作，继续调动队伍，调整就位，大抓钻机安装和探井开钻。要求完成20口探井，在萨尔图探明一、二级含油面积100平方公里，可供开采试验的面积50平方公里。会议要求，在以萨尔图——喇嘛甸为重点进行钻探的同时，要加快杏树岗的钻探速度，不放松葡萄花、高台子、太平屯的工作。

这次会议还宣布了石油部党组的决定：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由部机关党委组成会战期间党的办事机构，立即迁往会战前线安达市办公。余秋里兼任书记，吴星峰、雷震为副书记，也同时到达会战前线办公。

3月底，余秋里、康世恩来到会战指挥机关临时驻地——黑龙江省安达县城。3月底至4月上旬，石油部机关党委、各司局参加会战的干部和原驻吉林省长春市的松辽石油勘探局机关先后搬到安达，会战领导机关正式办公。这时，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已达4万人，其中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和地质师等各类工程技术干部达1000多人。同时，从全国各地运到大庆的各种器材、设备等物资已有几十万吨。开始，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领导住在原安达县政府财政局的一栋两层小办公楼。会战机关干部和科研设计技术人员，有的住民房，有的住板房和帐篷。会战一线队伍住在老百姓临时腾出的房子或者牛棚、马厩里。

4月9日，余秋里主持召开了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这是会战领导小组组织的第一个大型会议。根据当时的勘探情况，初步确定的开发区是大庆长垣南部的葡萄花油田。这次油田技术座谈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讨论这个油田的开发部署和方案。在会场里，地质技术人员摆出了一张根据探井试油资料绘制的油田地质图。按照当时的做法，探井试油的不同结果要以不同的颜色标在油田地质图上，出油井标成红点，出气井标成黄点，出水井标成蓝点。这样，在这张油田地质图上就出现了许多红点点、黄点点和蓝点点。由于当时探井试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所取资料不够齐全，不够准确，油田地质图上所标出的红、黄、蓝色的点很不规则。对这种情况地质技术人员也说不明白。

还在1959年12月的时候，东北协作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会议。当时，石油部党组正运筹着松辽石油大会战。会议期间，余秋里、李人俊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说，松辽石油勘探有新的发现，石油部准备组织一次会战，迅速拿下油田。周恩来对此非常关切，对组织会战表示同意。他预见到会战将遇到种种风浪，重重困难，是一场大仗、恶仗。周恩来对余秋里等人讲，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余秋里在石油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这一指示。大家认为，总理的指示，为即将进行的石油会战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只有靠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夺取会战的胜利。

在会战开始之后，面对着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余秋里等会战领导者想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他们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从领导思想上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为此，他们决定组织全体会战队伍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会战领导者认为，组织学习这两本著作，不仅是当前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加强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余秋里说："学习'两论'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由党的组织正式作出决定，对党、团员和干部、群众提出明确的要求。"经过会战指挥部主要领导成员集体讨论，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于4月10日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松辽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发表在4月13日会战指挥部机关报《战报》的创刊号上。

《决定》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会战的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都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风格，闯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学习要根据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边读、边议，边议、边做的方法。各级党委要订出学习计划，并列入向上级党委汇报内容。

4月26日，余秋里在会战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指针，'两论'是会战的灵魂。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读，反复地读。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就会感到头脑清醒，浑身是劲，就有办法；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会战领导小组把组织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学习"两论"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书，就到安达县新华书店去买。县书店的书卖光了，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石油部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实践论》、《矛盾论》的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萨尔图，发到职工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手一册。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职工把"两论"带上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技术人员下现场、到工地，都随身带着小书包，里边总是装有"两论"。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开会时学，总结工作时学，遇到问题和矛盾时结合实际深入学习，并逐渐成立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中心学习小组，建立了学习日制度。除了个人自学、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之外，各级领导成员还经常深入基层讲解辅导，畅谈学习心得，也时常了解基层的学习情况，总结、推广职工的学习经验。每到夜幕降临，人们便围着篝火学"两论"，整个会战现场出现了"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人人手里捧毛选，'两论'学习方向明"的动人画面。

学习“两论”，成效是显著的。几万名会战职工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会战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坚定了搞好石油大会战的决心和信心。大家说，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我们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产量太低，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困难，是所有矛盾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矛盾。石油工业如果上不去，不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而且帝国主义还会利用这个缺口来卡我们的脖子。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看，上的话，无非是石油职工多流些汗、多吃些苦，是局部的、第二位的困难。如果不上，国家没有油，这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困难。因而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要躲开这个困难，是万万办不到的，也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穷则思变，知难而进。

通过学习毛泽东的“两论”，会战指挥者体会到，要办好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油田，必须首先要讲革命化。革命化，就是讲人的觉悟，讲人的作用，讲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有了广大职工群众革命化，油田才有旺盛的生命力，生产、建设才会蓬勃发展。即使是比较落后的技术装备，也能够生产出国家急需的产品；如果有了先进的技术装备，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威力。为此，会战领导小组引导职工正确对待、解决众多的具体困难，使主要矛盾的解决落到实处。

随后，会战党委在油田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三要、十不”，并写进了《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三要”是：一要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二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三要在会战中夺世界冠军、争集体荣誉。“十不”是：不讲条件、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不分级别、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你我、不分东南西北、不管有无命令、不分部门、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为会战。

第五节　立脚萨尔图

4月份，大庆会战初战告捷。继杏树岗、喇嘛甸第一口预探井喷油后，以萨尔图为中心布置的一批探井先后出油，控制了200平方公里含油面积，证实萨尔图是个大面积高产区。

为了总结准备阶段的工作，部署展开全面会战，4月下旬，在萨尔图召开了有各战区领导干部参加的会战领导小组会议。唐克代表领导小组作了关于5、6月份会战任务的报告，吴星峰就会战中大搞群众运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作了发言，康世恩作了总结报告。会议确定，5、6月份要进一步组织力量猛攻萨尔图、喇嘛甸、杏树岗，全面展开会战。会议结束时，余秋里讲话，提出5、6月份战役总的部署是：初探与工业勘探并举；广大范围内甩开勘探与重点突破并举；勘探与开发试验并举。

大庆石油会战的核心地带萨尔图在蒙语和满语中分别是“多风之池”和“大酱缸”的意思。清朝时期，这里曾是满族贵族世袭游牧的地方。春天的草原，大地依然覆盖着

一米多深的冻土层。数万人马的突然到来，在这片只有几处民房和少许牧场住房的荒原上，住首先成了一大难题。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有的住在牛棚、马厩、地窖或临时支起的帐篷里，有的干脆蓝天当被，大地当床，在大草原上过夜。吃饭也很困难，缺粮少菜，连锅灶、炊具都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熬汤。

随着几万大军挥师北上，会战前线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机关也离开了安达市那幢简陋的小招待所，来到萨尔图。当地的红色草原牧场正好有一些没有盖顶的牛棚闲置无用，指挥部机关的人们自己动手，找来苇席，和上泥巴，将牛棚封了顶。余秋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就住进了这又冷又阴的牛棚开始办公。以后，他们又陆续在牛棚周围盖了些活动板房，形成院落。当时人们把这里称作“二号院”，它成了会战指挥部的代名词，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

石油会战的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由于队伍上得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都很突出。从安达站到萨尔图站，沿途50多公里的铁道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钻机、设备、器材、行李，由于缺少吊车和运输设备，物资无法疏散。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井队工人为了开钻，只能在水泡子里破冰取水，一脸盆、一脸盆地端到井场；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靠步行。

4月26日，第一场春雨浇透了草原。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雨三天两头下，有时一下十几天。由于雨靴雨衣不足，大多数职工赤脚淌水去上班。雨把身上的衣服淋湿了，又焐干了，干又干不透，一天到晚贴在身上。回到住处没有热水洗脚，只能在积水的洼地擦擦脸，涮涮脚。职工住的牛棚、马厩、活动板房、窝棚、地窖，更是四处漏雨。一天到晚，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屋外不下，屋里还滴答。帐篷里也常常积满了水，有时候甚至脸盆都漂起来，青蛙还在里面蹦蹦跳跳。连康世恩的“卧室”里也是多处漏雨，有一夜他连挪七次床位避雨。

恶劣的自然环境加剧了生产的困难。萨尔图一带地势低洼，没有河流，是松花江、嫩江的自然泄洪区，油田建设的一些工地和井场上，遍地积水，处处泥泞。原来仅有的几条土路，经过人踩车辗，已经完全不可辨认。那些载着沉重的钢管、井架、机器部件、钢板、水泥、粮食的卡车，尽管加大油门发出轰鸣，排气管喷出浓烟，车轮飞速地转动，也只是空转，很难前进一步。成百辆汽车陷在泥塘中，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以至于汽车出去，要拖拉机保驾。就是拖拉机，有时也陷进泥潭里，难以自拔。

当时天气还很冷，水里冰凉。汗水和雨粘在身上，冷得人浑身打颤。炊事班得准备姜汤、辣子汤救急。井场、工地分散，三五人的小分队作战，撒遍百里荒原。生活用品上不去，器材设备上不去，支援队伍上不去，连音讯都断绝了。油建有一个小分队，在荒原深处施工，被暴风雨隔绝，失去联系，困在荒原。小分队5个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他们的班长是个党员，带头把吃的留给群众，自己吃野菜，坚持施工，毫不动摇，度过了艰苦卓绝的7昼夜。

面对困难，会战队伍没有退缩，而是向大自然宣战。大家提出了“抢晴天，战阴

天，无雨特干，小雨大干，大雨猛干”的口号，想方设法克服雷雨风暴带来的困难。

那些天里，康世恩和会战指挥部的领导，分别冒雨、涉水赶到现场。他们披件雨衣，挽着裤腿，边观察，边与司机们商量，提出建议，就地试验。经过几天调查研究，康世恩召开生产调度会，向全战区宣布了战胜雨季的命令：

第一，不管雨下多大、多久，哪怕天上下刀子会战也不能撤，只准前进，不许后退，千方百计战胜雨季困难，这里夏秋雨季很短，是施工的黄金季节。

第二，全战区不分干部工人，不分前方后方，不分你的我的，要一切为了第一线，哪怕人拉肩扛也必须确保会战顺利进行，还要保证职工吃饱、吃热、穿干、住暖。

第三，把所有车辆组织起来，由领导干部带队，派出勘察道路的侦察人员，选择最好的路线，并同时预备第二、第三条预备行车路线，保证最好的车况和出车率，以及适当的载重量。

第四，不管哪个地段出现了陷车，驻在附近的队伍，都要有求必应，主动支援，作为自己的责任。

第五，各级政治部派出人员，到附近的国营农场和生产队去商量，请求他们把所有的拖拉机动员出来，摆在陷车最多的地段，把汽车拖出来。把马车、牛车、人拉的架子车也动员出来，以便为汽车不能到达的分散单位运送粮食和材料。

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张文彬深入到运输处和司机们连夜研究，先后搞了30多套行车防滑方案，经过反复试验，一种“汽车轮胎穿铁鞋”的办法，解决了泥泞道路上行驶困难的问题。康世恩立即召开会议，全面推广，并决定全体总动员，日夜出车，人不下班，车不熄火，只用7天时间，就把40口井的32255吨物资抢运到分布在荒原各处的井场，保证了生产急需。

第六节　万人誓师

队伍上齐了，设备也运得差不多了。会战领导小组考虑大会战的条件基本成熟，下一步如何调动千军万马去夺取石油大会战的胜利，关键是这支队伍是否有战斗力，是否过得硬？会战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召开一个万人参加的石油会战誓师大会，既是前一段勘探工作的总结表彰大会，也是石油大会战的誓师动员大会。通过这个大会使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石油职工、部队官兵、地方人员组成的会战队伍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扭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据当年担任第三探区指挥的宋振明回忆：“有一天康世恩副部长把我叫去，一见面，他高兴地说：‘老宋！要在你们第三探区开一个大会，开一个万人参加的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会议由你这东道主具体负责筹备。’并交待了会议的开法等。我领了任务，急忙赶回驻地，我和李云同志连夜进行研究，负责部署。”

宋振明回忆中提到的李云当时担任第三探区副书记。

具体筹备工作也颇多周折。首先是选择会场。萨尔图是一片茫茫荒原，虽有几十户人家，可哪有容纳万人的场所。跑了几个地方，最后才选定萨尔图一块地方，也就是现在大庆一中的大操场。开这么大的会，要有一个主席台，现成的没有，他们就找了一些旧板子、废木头搭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大台子，又将会场四周扩大了点面积。会场的划分，主席台的布置以及车辆停放、会场秩序等等都作了安排。宋振明向康世恩汇报后，康世恩很满意，并风趣地说："老宋，你提前几天把会议筹备完，是不是让我也把会期提前啊！"

4月26日、27日，康世恩在一间牛棚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创纪录的长会，听取各路大军的汇报，落实5、6两月的会战任务和要求，研究怎样把29日的万人大会开好。他要求，这次大会要开得内容实在，目标明确，典型突出。在形式上要隆重热烈，生动活泼。

4月29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各探区和会战总部的广大石油职工早晨3点钟从驻地分乘火车、汽车奔向萨尔图会场。参加誓师大会的还有地质部地质调查大队代表，当地人民公社的农民、地方工业的工人、民兵，还有商业工作者、学校教师、学生以及文艺工作者，共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石油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曲常川，会战指挥部领导小组的成员唐克、吴星峰、张俊、阎子元、张仁、宗世鉴、张文彬、焦力人、李荆和、陈理中、李镇静等，以及先进井队代表王进喜等被选为主席团成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还有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和解放军代表、人民公社的负责人、农业劳动模范等。

大会主席台布置得庄严朴素，主席台上高悬的"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巨幅会标鲜红耀眼，主席台正中的毛泽东画像两旁簇拥着五星红旗，会场四周五彩缤纷的彩旗迎风舒卷。会场内，捷报、彩画、标语牌和各种模型、图表熠熠生辉。除各单位的锣鼓队外，还把附近几十里内老百姓的锣鼓唢呐都请来助兴，并借用了牧场十几匹高大肥壮的漂亮好马，让劳模标兵绕场时乘骑。

上午10时，大会在撼天动地的礼炮声和雄壮的《社会主义好》军乐声中开始。大会由余秋里部长主持。中共黑龙江省委向大会发来贺电。余秋里作了大会战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简要地总结了前一阶段勘探工作的成绩，接着阐述了油田的大好形势以及大会战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大会战的任务和做法。接着，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曲常川讲话，他要求附近地区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各行各业都要全力以赴，为早日拿下大油田做好后勤供应工作。

曲常川讲话后，各探区和各人民公社、商业部门向大会报捷献礼。人们捧着捷报、抬着模型，涌向大会主席台。

下午大会继续举行，康世恩代表石油部党组宣布石油大会战第一战役从5月1日正式开始。并下达了第一战役的作战任务："拿下大油田，探明几个构造是否含油，搞出一块油田开发的生产试验区。为完成这三大光荣任务，一切工作都要高速度、高水平。"接着对各路会战的队伍分别下达了战斗令：

钻井队伍要打头阵，猛攻猛打，钻得快、钻得多、质量好，拿出生龙活虎的劲头

来；采油队伍，要爱护油田，做好试油、试采工作，做到“四全、四准”，使每口油井的产量正常，井井高产；基本建设队伍，必须在5、6两个月铺设各种集输管道，解决供水问题，保证搞出一定容量的非金属油池，要把从探井喷出来的原油收集起来，运出去，并抓紧建设目前生产急需的一切工程。同时，对地质调查队伍、测井队伍、实验室、修路队伍、电讯工程队伍、建筑队伍、运输队伍、后勤供应队伍及各指挥部的科室机构也都具体地布置了任务。他的讲话不时引起热烈的掌声，人们为这激动人心的石油大会战和自己的光荣任务而感到鼓舞和骄傲。

康世恩的报告结束以后，打擂比武开始。主席台前后排满了要求发言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向大会表决心、发誓言，要在这雄伟、壮丽的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就在打擂比武的高潮中，会场西面突然锣鼓喧天、掌声雷动，军乐队声中，以红旗和锣鼓队为先导，17个一级红旗单位、14个先进集体和223名红旗手的代表步入会场。铁人王进喜以及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五大标兵披双红，戴大花，骑在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上，由探区领导牵马引镫，从松枝搭成的“英雄门”进入会场并绕场一周。当铁人王进喜走近主席台时，主持会议的余秋里面对麦克风带头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顿时，会场沸腾起来。“人人学铁人”，“人人做铁人”的口号声响彻会场。

王进喜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他说：“盼了多少年了，大油田终于找到了。我们1205队一定要创造条件上，快安装，早开钻。没有水，尿尿也要开钻。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我们要把地球钻穿，让大油海翻个，把大金娃娃抱出来！”说到这里，他摘下戴着的前进帽举过头顶高声说：“人活一口气，拼死干到底，为了把贫油落后帽子摘掉，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铁人的发言，说出了广大会战职工的心声。当时，人人劲头十足，个个摩拳擦掌，几万人的会战队伍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此时此刻，在场的领导也都眼含激动的泪花。

第四章　从千难万难中锤炼出的大庆精神

第一节　“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是大庆工人的优秀代表，在大庆石油会战中，他始终坚持在最艰险的岗位上，任劳任怨，拼死工作，被誉为“铁人”。

1923年10月8日，王进喜出生在陕西省玉门县赤金村一个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因家里穷，他从小没有上过一天学，目不识丁，1937年开始到玉门鸦儿河一带挖油。解放后，王进喜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钻井工人。1956年4月，王进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提拔为贝乌钻井5队的队长。1958年，石油部在玉门和新疆发动了以“高速优质钻井”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王进喜以主人的姿态，带领他的贝乌5队以前所未有的苦干、实干精神，创出了月钻5009米的全国最高纪录。从而使贝乌5队成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也被誉为“钻井闯将”。

1959年10月，王进喜被甘肃省劳模会议推举为国庆观礼团代表和出席“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在京期间，他亲眼看到由于缺油，连首都的公共汽车上都背着又笨又难看的煤气包，心如刀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远在东北的松基3井喷油，一个特大油田渐渐撩起了面纱。回到玉门后，王进喜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松辽石油大会战。

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与他的贝乌5队在玉门登上东去的列车，10天以后，到达萨尔图车站。当时的萨尔图小站条件简陋，在站前的土路上，人来车往，机鸣马叫。王进喜下车后，一不问吃，二不问住，而是问搞接待的王廷锦大队长：“我们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

当时的现场十分热闹也十分杂乱，王进喜逢人便问他的三句话，以至于事隔多年，有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比王进喜早到几天的玉门油矿贝4队队长门广福回忆说：“王进喜下了火车三句话非常感人，我就被他问过。……他见了我就急渴渴地问他那三句话，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这就是战士的表现、指挥员的思想。5队很快就能打上去，势在必然！”

当时担任大队党总支书记的李玉生也回忆说：“王进喜一见劈头就问见了他们的钻

机没有，我说没见，他又说你是大队的，一定知道情况多，新疆都谁来了，张云清来了没有，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我说 1202 队、1203 队都来了，张云清也来了。还没听说谁创了最高纪录。王进喜说他们来了好，我要和他们好好比一比，创它几个高纪录。我当时想，这王进喜可不得了，一脑子工作，一脑子活，抓得很紧，一心要往前抢，这才叫思想领先。"

贝乌 5 队来到大庆后被编为 1205 钻井队，他们的井位在离萨尔图十几里远的马家窑附近，这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屯子。队里除了十几个年纪大体质弱些的工人住在老乡的房子里，其余的人就住在饲养棚、粮仓、磨房里。

王进喜和 1205 钻井队的人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钻机、设备什么时候能够运到。那些日子里，他们天天都要到萨尔图车站沿着铁路找他们的钻井设备。4 月 5 日，他们终于在车站看到装着他们设备的货车，全队都十分高兴。但随之问题也出来了：钻机虽然到了，但没有吊车，没有拖拉机，就连搬家用的大卡车也找不到。怎么办？在全队职工大会上，王进喜说："我们 30 多人就是吊车、就是拖拉机、就是大卡车，绝不能等！"

大家都赞成王队长的意见。于是，王进喜领着全队 30 多人各自带卸车工具，直奔火车站。工人们在王进喜的指挥下，撬的撬、拉的拉、拽的拽，一件件、一台台将设备都从货车上卸下来。然后，同样依靠人拉肩扛，又奋战 3 天 3 夜，把钻机搬到井场，把所有的设备都组装起来。4 月 11 日，随着王进喜的一个手势，两台柴油机开足马力，10 股钢丝绳徐徐绷紧，1205 队的井架终于在标明"萨 55 井"的井位上立了起来。

当时，王进喜住在赵大娘家里，可钻井队进屯后，他只在赵大娘家住过一天，第二天起床走了以后，就再没回来睡过觉。赵大娘问住在她家的孙秉科："王队长这几天干什么去了？这大冷的天怎么也不回来睡睡觉？"孙秉科解释说，这是我们王队长的习惯，工作一忙他就没黑夜没白天了。

井架立起来以后，王进喜还是没有回赵大娘家的那间"干打垒"睡觉，赵大娘不放心，又做好饭，提着柳条筐来到井上看王队长，想叫他吃上一顿热饭。赵大娘在井场看到许万明，许万明把大娘领到发电机旁的一个泥浆槽子边，大娘看见王进喜正躺在里边睡觉。身下铺的是一些羊草和一条被子，身上盖着老羊皮袄，头下枕着一个铁疙瘩。许万明告诉她，那是个牙轮钻头。赵大娘感慨地说："活了大半辈子，除了那些打鬼子打土匪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人外，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唉，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30 多年之后，许万明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大娘叫铁人，当时我在场。王队长住大娘家，但老是不回去。大娘怕他饿着，就把饭送到井场。那天我和架工何珍贵在场，大娘这样叫是个历史功绩。"

许万明所说的"历史功绩"是指，赵大娘第一个称王进喜为"铁人"。这件事立即反映到指挥部驻 1205 钻井队工作组。工作组员、大队书记李玉生立即向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作了汇报，李光明又和李玉生一起到党委全委会上做了汇报。党委书记兼指挥宋振明听完汇报高兴地说："大娘叫得好，王进喜当之无愧！我们要立即向上级汇报！"

当石油部长余秋里听到关于“铁人”事迹的汇报后当即对宋振明说：好！这是一个好典型，我们就借用老百姓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叫他王“铁人”。他还说，王进喜代表大会战的方向，铁人就是我们的旗帜。我看可以下决心，大会战的第一个英雄就树他。为了更好地宣传王“铁人”的模范事迹，余秋里特地派《战报》记者去1205钻井队，调查核实王进喜的事迹。

1960年4月9日至11日，大庆油田第一次技术座谈会在安达铁路俱乐部一个大会议室召开。按照余秋里的要求，会场没有主席台，中间摆了几张桌子，周围一圈一圈坐满了人，墙上挂满了各种图表。参加会议的工人、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180多人，最后一天吸收总部机关参加，与会人数达到500多人。

这是在大庆油田召开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开得热烈、生动，各路代表发言很踊跃，坐在中间的余秋里、康世恩、唐克、张文彬等人不时插话提问或做补充。最后一天，余秋里做总结。他讲完了形势讲任务，提出了大会战的目标，就是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讲到怎样完成任务时，余秋里高声说：“我们必须具有猛攻猛打、雷厉风行、严肃认真、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刻苦耐劳、艰苦奋斗、顽强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最后他又提高了声音说：“总之，我们每个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气概！”

说到这里余秋里大声问：“王进喜来了没有？”

王进喜正蹲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余部长讲话，突然听到部长喊自己，马上站起来说：“来啦！”

余秋里微笑着对他说：“来来来，到中间来，叫大家看看！”

王进喜不好意思去，最后被一个干部拉到中间站在高处。余秋里指着他说：“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王铁人。他来到这里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钻机到了，没有吊车拖拉机，他就带领全队靠“人拉肩扛，把钻机抬了上去，立了起来。为了工作，他连续54个小时没离开井场，把自己买的摩托车用来跑配件，这是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房东大娘管他叫‘铁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因此，会战指挥部号召参战的全体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学习他的高度阶级觉悟和共产主义风格。”讲到这里，余秋里带头举手高呼：“向王铁人学习！向王铁人致敬！”全场都站起来跟着余秋里高呼。

等会场平静下来，余秋里又说：“铁人来自大会战，大会战需要铁人。有了这样一批人，困难再大会战也能打下去，必然夺得胜利。我们要人人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都来做铁人，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把‘贫油落后’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为大会战立功！”

这时几位领导带头把王进喜抬了起来，然后绕场一周，全场再次响起“向铁人学习、致敬”的口号声。

油田技术座谈会以后，各单位都在开展学铁人、做铁人的活动。这对于1205钻井队是个很大的鼓舞。钻井队指导员孙永臣在学习会上对大家说：“铁人出在我们队，我

们队更要人人学铁人，人人做铁人。咱5队个个都是英雄汉，人人要在困难面前当英雄，不松劲，不退坡，决心实现已定的目标，打响会战第一炮。”

打井离不开水，1205队使用的是BY-40型旋转钻，是通过泥浆泵、立管、水龙带和水龙头组成的一个循环系统把用水配制的泥浆通过空心的钻杆注入地下，经过钻头的水眼灌到井筒里，再从钻杆外边返回地面。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水。每口井大约要耗水60多吨。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水是专业供水队专门接管线输送的。可当时马家窑的管线还没接通，去要罐车，调度室说得排队，大约得等3天。

在困难面前，王进喜又一次将他的队员集合在一起。他说：“活人不能叫尿憋死。还是那句话，有也上，无也上，创造条件上！就是尿尿也要开钻！”于是，大家找来脸盆、借来扁担，开始动手端水、挑水。先从屯子里的井和自己挖的井里打水，把所有的井掏干以后，他们就到井场西边一里多远的大水泡子里破冰取水。附近各屯的老乡和指挥部的机关干部也纷纷前来支援。很快就有了一支100多人的运水大军。工具不够，就四处借，甚至连铝盔、饭盒、灭火机外壳都用来运水。有些人实在没有盛水的东西，就干脆把刨下的大冰块扛在肩上，送到泥浆池里。有人还从附近井上找来油管接上泵水。他们就是这样用各种各样的土办法，一天一夜端了50多吨水，足够开钻用了。

40多年之后，即2003年10月，在纪念王进喜诞辰80周年的时候，“铁人”的大徒弟、当年是他左膀右臂的周正荣忆起第一口井开钻的情景时仍有些激动。他说：当时钻机设备已经装好，准备开钻，正值这个关键时刻，没有水管车、水供不上。怎么办？铁人带领大家到一里外的一个水泡子，用脸盆端水，一条取水长龙，源源不断地把水运送到了井场。就这样，55吨水保证了第一口井的准时开钻。大庆开发的第一口井是王队长带领我们打的。从安装钻机到完钻，他一连7天7夜没有离开会战现场。

1960年4月14日，1205队到大庆打的第一口井——萨55井开钻。萨中指挥部也借55井开钻之机召开了一次向铁人学习的现场会。参加会战的各大局的先进钻井队，无论是已经开钻的，还是没有开钻的，都派来了“观察员”，学习1205队的经验。王进喜在现场会上讲了话。他站在一个钢丝绳的滚筒上大声说：“我一到大庆就想开钻，恨不能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黑天盼，白天盼，这一天终于到了，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细心地打，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萨55井打好。创出一个全国高纪录，向党报喜！”

萨55井开钻后，王进喜日夜围着钻台转。饿了就吃口工人带来的干粮，困了就裹上老羊皮躺在钻杆上枕个钻头睡一会。工人们为了让队长能休息，给他在井场挖了个地窨子，他也总是忘了进去。一位当时在5队实习的学生回忆说：“从没见过他正经吃过饭睡过觉。”

在队长的带动下，全队工人都自觉从严，积极工作。当班的坚守岗位，休班的“瞪大眼睛看着井上”，随时准备上井干活。

4月19日上午，1205队胜利打完了第一口井，实现了“3天上千，5天完钻”的目标。这也是整个大庆石油会战打出的第一口油井。这口井只用了6天时间，质量达到全优。

经过电测、下套管、固井、射孔、安装采油树、接油管等工作，到4月28日萨55

井正式喷油。这一天，上级领导、附近井队的工人代表都来参加，周围几个屯子的乡亲也都来看热闹，井场上人山人海。当黑色的油柱像黑龙一样腾空而起时，整个井场欢声雷动。当时还没有计量装置，用一个木斗土法量油，计算出萨55井每天产油100多吨。

这第一口油井于5月20日正式投产，用小油嘴控制日产原油19吨。以后随着整个油田开发方案落实，调整配产方案，最高日产到过113吨。几十年来已为国家生产原油近20万吨。

如今人们把这口井称作“铁人一口井”，“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就建在这里。

1205队打的第二口是油田试验区“开山井”，这里地处高压区，打到700多米时，突然发生了井喷。强大的高压液柱冲出井口，把方补心冲起十几米高，一场大事故就要发生，情况万分危急！当时王进喜腿部有伤，但面对险情，他早已忘记了伤痛。他对大家说：“现在情况紧急，就是搭上命也要压住井喷。”

为了压住井喷，当时惟一的办法是往泥浆池中加水泥和黄土。王进喜组织大家迅速搬来水泥往浆池里倒。不一会儿就将几十袋水泥和黄土加到泥浆池里。可是问题也跟着出现了：大量的水泥沉入池底，泥浆溶和不好，比重上不去，而且还糊住了池底的上水管口，泵不上水来。现场又没有搅拌机，连个泥浆枪也没有。

井在喷，水柱越喷越高，井喷的吼声震耳欲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王进喜不顾自己的腿伤，不顾泥浆烧人，扔掉双拐跳进两米深的泥浆池中，手划脚蹬，用自己的身体搅拌起了泥浆。在他的带动下，队里的实习生段功武、司钻戴祝文、工人赵元和等7人也跟着跳进泥浆池中。大家奋力划动搅拌，上水管线通畅了，泥浆比重升高了。经过整整3个小时的紧张搏斗，井喷终于被压住了。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压井方法。

这时仍在池子里的王进喜已经精疲力竭，伤腿上的绷带纱布已不知去向，伤口被碱性很强的泥浆浸泡冲涮变得血肉模糊，身上、脸上、手上也被泥浆中的烧碱、化学药剂烧出了血泡，大家刚把他拉上来，他就昏倒在工地上。

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党委书记的陈烈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样艰苦的大会战，需要有个带头人。面对种种困难，领导上有了指导思想，但必须得有人体现，有人贯彻，有人带头干。革命战争时期，打仗要有先锋官。搞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有人打冲锋。铁人就是这样打冲锋的先锋官，他带动大家把会战打了上去。”

关于“铁人”精神，直接领导了大庆石油会战的余秋里概括说：“‘铁人精神’，概括地说，就是：为国分忧、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的认真负责精神；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无私奉献精神；当了干部还是个钻工，永做普通劳动者、廉洁奉公的公仆精神；同志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团结友爱精神等。”

第二节　有热情，更要讲科学

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会战开始以后，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但会战领导集体最关心的问题是：油田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储量有多少？油层的结构和物性如何？怎样才能把油打出来？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对油田开发建设做出正确的部署。

在一次石油部党组的会议上，余秋里分析说，大会战面临着千难万难，无非是两类困难：一类是生产、设备、生活设施等方面的困难。这些都是物质条件上的困难，是死东西的困难。通过分析他们认识到，物质上的困难仅仅是暂时的、相对的。只要紧紧依靠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些暂时困难。如果被困难吓倒，那就不仅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会使那些能够克服的困难，变成长期难以克服的困难。另一类是主观上的，是技术性的困难。即这个油田究竟是好油田、坏油田，怎样开发好？对此，我们没有经验。从长远来看，这是主要的矛盾和最大的困难，是一个如何搞清油田地下情况，掌握油田客观规律，科学地开发大油田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参加会战的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自己来解决，别人帮不了什么大忙。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油田可能看成小油田，好油田可能认为是差油田，高产油田可能搞成低产油田，在勘探开发中，就会成为盲目的、不清醒的人。

为了树立地质工作的科学态度，进一步搞清油田地下情况，1960 年 4 月 9 日至 11 日，余秋里和康世恩在安达铁路工人俱乐部主持召开了大会战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所谓“五级”，是指部、局、指挥部、大队、基层，“三结合”是指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参加会议的有部、局领导、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和工人代表共 180 余人。技术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如何做好钻井、试油、试采工作，如何取好地质资料，如何搞清地下情况等问题。与会者认真总结了过去油田勘探和开发工作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搞好油田勘探、开发，首要的是搞清油田的情况，而要搞清油田情况，必须从地下入手，掌握充分的地质资料。重视还是不重视第一性资料，是尊重或不尊重科学的分界线；工作有没有把握，首先取决于是不是认识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不是掌握了客观事物的规律。

会议进行中间，余秋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了要搞清油田地下情况，必须取得哪些资料数据？怎样取得这些资料数据？现在看来这是个很简单、很基本的问题，但此前却没有人认真考虑过。会场沉默了几分钟以后，有人开始发言，提出了一些具体项目，会场气氛很快热烈起来。你提一条，他提一条，互相启发补充。最后，余秋里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在油田勘探过程中，要搞清 13 个问题。再经过讨论补充，变为 16 个问题。后来，康世恩又组织地质技术人员讨论，补充为 20 个问题。根据这 20 个问题，确定了 72 个需要了解掌握的数据。然后由李德生执笔，起草了“大庆长垣钻探和开发过程中取全取准 20 项资料 72 个数据”的“调查提纲”。经过石油部党组批准，形成了地质技术规

范。党组要求，在勘探和开发过程中，必须取全取准"20 项资料、72 个数据"，做到一个不能少，一点不能错。会议还对录取资料确定了"四全四准"的要求，即：录井资料全，测井资料全，岩心资料全，分析化验资料全；各种仪表校准，压力测准，油气量准，各种资料取准。

大庆石油会战第一次技术座谈会在油田的开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次会议，余秋里评价说：会议"明确了油田勘探、开发的对象和根本任务；明确了油田勘探、开发工作必须从取全取准第一性地质资料人手。这对于搞好会战期间及以后的油田勘探、开发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以后的工作中，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反复强调"把一切工作立足于油田地下"这一思想。在 6 月召开的一次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上，康世恩又提出："我们搞石油工作的人，工作岗位在地下，一切工作都要做到地下油层。"余秋里随后又将其概括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

技术座谈会以后，会战指挥部和各探区、各单位加强了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开展了"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资料"活动。指挥部组建了地层对比大队、测压大队、注水大队、综合研究大队和地质分析试验室等科研机构，集中了 1000 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地质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从事地质资料录取分析和油田地质研究工作。同时成立了许多三结合小组，深入井队，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在基层宣传鼓动、发动群众，向工人讲地质课。

要取全取准地质资料，必须下狠心克服工作粗、责任心差的毛病，培养、树立一个好的作风。为此，各级管理者注意从大量的具体事物抓起，抓典型，树样板。有一个井队的地质员，在打井过程中，由于疏忽漏取了岩样，没有发现标准层。会战指挥部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多次开会对其严肃批评，对各级干部进行教育。这件事教育了很多人，使大家觉得录取资料工作不是一件小事。后来，那个地质员接受了教训，资料收集得很好，被评为劳模。指挥部又宣传了他的先进事迹。

由于领导重视，群众发动充分，全油田很快形成了视第一性资料为生命的良好风气，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王晓云是位年轻的女地质员。一次，她从钻井队背回 25 包砂样，到大队一查，发现只剩下 23 包，丢了两包。砂样是重要的原始样品，通过分析、化验和计算，可以知道每包砂样所对应的地层情况。王晓云执意要回去把砂样找回来。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还下起了瓢泼大雨。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疼痛难忍。但是，她仍找来电筒，在工友的陪伴下，闯进了茫茫的雨夜。她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经过的小路反复搜寻，终于找到了那两包丢失的砂样。

取全取准资料当然不仅是地质技术人员的事情，全体职工人人都把这当成自己的重要职责。3249 钻井队的方永华班在钻井取心时，打了 6 米多进尺，把岩心取上来一看，只有 4 米多，有 1 米多岩心掉在井底了。班长方永华说："岩心是认识油田地下最有用的资料。岩心缺一寸，判断地层情况就少一分科学根据，多了一分困难。掉到井底的岩心取不上来，咱们就欠国家一笔债。"全班决定，一定要把岩心捞上来。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下钻、套心、割心、起钻。为了这筒岩心，全班人一共奋战了 26 个小时。

原油样品化验分析资料是正确认识原油性质、研究制定采油工艺的重要依据。一个原油样品要得出比重、凝固点、黏度等6个数据，经过原始记录、综合汇总、填写日报3道转抄手续。负责原油样品化验的采油三矿化验室的职工，为了保证工作质量，建立起了每天集体审查和半月数据普查制度。每天下班前，把自己化验所得的数据，交给大家看，读给大家听，互相监督，避免误差。这个化验室，1年中进行了8800多次原油样品化验，共取得了3万多个数据，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五。为了检验他们化验资料的准确性，康世恩曾叫人把萨尔图的原油样品拿到葡萄花去，作为葡萄花的原油样品送到化验室。化验室马上发现了问题，提出原油样品的各项化验数据，不像是葡萄花的，而像是萨尔图的。他们怀疑是原油样品弄错了，不然就是取样器漏气了。当康世恩说明实情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领导集体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大庆油田会战的科学研究队伍、工程技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总地质师、钻井总工程师、采油总工程师也只有三十几岁，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大庆党委对他们采取了“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的方针。考虑到在“大跃进”和随后的反右倾、拔白旗等政治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7月10日，大庆石油会战党委主要领导在技术干部会议上式宣布：“所有受过批判、戴上右倾及白旗帽子的一律取消。当时有材料存档的，一律取出销毁，这叫一风吹”。并明确指出：会战的技术干部，绝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的，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教育，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党委规定：工作上的意见，技术上的争论，与政治混淆起来是不对的，技术干部对国家的最好贡献，就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成绩。在组织上，会战初期就设置八大总工程师，实行技术责任制，让他们有职有权地进行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余秋里还多次鼓励技术人员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要看着领导的脸色讲话。

为了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余秋里提出，要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1960年、1961年开展农副业生产时，指挥部规定，科研地质技术人员平时一律不参加农业劳动。在一次会议上，余秋里讲话说，科研地质人员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渗透率”。在生活上，也对科研人员给予照顾，让他们吃饱，定量不够可以补助。北京石油学院副教授秦同洛饭量大，指挥部专门规定，他吃饭不受定量限制，可以放开肚皮吃。以后又请一些专家吃小灶。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这样一种气氛下，广大科技人员发扬独创精神，树立“敢想敢说敢干，严格严肃严密”的作风，勇于同世界先进技术较量，努力攀登油田科学技术高峰。有的年轻科技人员在自己的房门上贴出“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的对联，表达了他们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雄心壮志。由大学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组成的油层研究队，白天上井搜集资料，晚上在干打垒里，有时还需要在油灯、烛光下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教授张英、设计工程师宁玉川和群众相结合，深入现场调查了232口井的情况，取得9700多个数据，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创造出一套有自己特点的工艺流

程，解决了严寒地区高含蜡、高凝固点原油集输方法。为了弄清油田土壤传热系统，解决保温的合理温度问题，设计工程师谭学陵等人从1960年到1961年连续10个月，在夜里最冷的时候进行现场测温，共步行6000公里，观测1600个点，取得5万个数据，进行了1100次分析对比，终于取得了科学数据，并校正了前苏联沿用的集油管线设计的计算公式。技术员蔡升等人在严寒季节，怀揣窝头，跟随油槽车，行程1万公里，测气温800次、风速600次，取得油温数据1400多个，弄清了冬季铁路油槽车在运输途中原油变化的情况，确定了油库合理加热温度。井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进行了1018次试验，创造出多级水力封隔器，解决了分层控制油层的重大技术难题，获国家重大发明奖，并为推行我国自己独创的分层采油、分层注水、分层测试、分层改造的采油新工艺提供了条件。

为了合理开发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长期稳定高产”的开发方针。要实现这一方针，必须使制定的计划目标切实可靠，留有余地。为此，在计算油田地质储量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当时尚无能力开采的薄油层、细密油层的储量暂不计算在内。同时在油田开发初期，不是一下子动用全部可采储量，而是将一些可供开发的含油面积留下来，暂不投入开发，作为“小仓库”、“大仓库”，以备分阶段地投入开发。像喇嘛甸油田就是当时留下的“大仓库”，到1973年才开始投入开发建设。在油田开发中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分阶段地动用可采储量，这也是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上5000万吨后，连续稳产20余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节　“干打垒”精神

大庆石油会战进展很快，面临的困难也是多方面的。那时，一个重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解决几万职工的住房和上万台设备、车辆入库以及储存蔬菜过冬的问题。油田建设地区，原是以畜牧为主的嫩江草原，远离大中城市，农民村落也很稀疏，而且没有公路网，气候酷寒，最冷时达零下40摄氏度。会战第一年夏季多雨，冬季来得又早。雨季刚刚过去，9月的草原又刮起阵阵寒风，国庆节前后就下雪。会战初期，几千台设备在大草原上运转，连个修理设备的房子都没有；广大职工住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这些临时措施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解决不了长期站脚扎根的问题，冬季肯定过不去。在如此严寒的地区，集中众多的职工和大量的设备，没有可靠的御寒手段，就可能冻伤大批的人，甚至会冻死人，也可能冻坏大量的设备。若遇上当地群众都怕的“大烟泡”的风雪，就可能使会战陷入全局瘫痪。曾在东北地区长期工作的王鹤寿等人对余秋里、康世恩说，这里没有房子，过不了冬啊！出于关心和好意，他们曾劝余秋里，如果冬天实在过不去，可以在入冬前，把队伍和设备撤到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等地，来年春天再开上来。他们准备动员地方腾房子给会战队伍住。对此，余秋里后来回忆说：“我权衡再三，感到不能走这条路。因为如果这样做，会战的有效工作时间，

一年只有6个月左右，党中央批准的这场大会战，就会变成拉锯战或消耗战。势必推迟油田开发的时间，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会战队伍安全过冬的问题。听说会战指挥部里也有人主张冬季将队伍撤走，正在北京的余秋里通过电话表达了他的意见：“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这个决心决不动摇。”

怎样既坚持会战，又保证会战队伍安全过冬呢？当时参加石油会战指挥工作的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建设资金，充实的建筑材料，各种现代运输工具和施工设备及施工技术队伍，那么，也完全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上百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然而，那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不用说盖大面积楼房是不可能的，即使盖砖瓦平房，在短期内也难以采运到大量的建筑材料，集中大批的建筑队伍，所以，这也是行不通的。”

为了解决安全过冬问题，从会战领导机关到基层小队，大家都在出主意，想办法。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也在想办法。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向余秋里和康世恩建议：有一种办法，就是搞东北老乡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凉。

会战指挥部为此派出了一批批建筑设计、施工技术人员，深入到附近的城镇、村落，尤其是找民间木瓦匠，调查居民建筑的用材、设计、施工情况，发现附近城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干打垒”。

所谓“干打垒”，就是北方农村都有的、最简便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抗日战争时期，孙越崎领导开发建设玉门油田时就曾用过这种房子。这种房子在东北尤其被普遍采用。这种干打垒房子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墙壁就地取土，把土装入活动木板内，用木夯铁杆分层夯实，房顶用当地的羊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看起来土气，但厚墙厚顶，结构严实，防寒性能好，暑天也不太热，适合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特别是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大面积地进行建筑。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多方案的比较论证，会战指挥部决定采用干打垒方案，发挥人多的优势，发动广大职工建造干打垒房屋，渡过难关。决心一下，说干就干。在石油会战的萨尔图草原上，一场人人动手，全民动员建造干打垒的人民战争就这样打响了。杏树岗青年突击队率先示范。他们在当地干打垒老把式的指导下，于1960年4月底建成512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和2500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主体，还总结出了一套干打垒施工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改进了打筑板、规格夹板，试制出了电动打垒机，使建筑工效从每人每天不足1立方米提高到2.4立方米，成功地完成了试验和示范的任务，并在五四青年节向全油田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发出了利用业余时间，“突击‘干打垒’，高效率建设新基地”的挑战。会战指挥部因势利导，动员全油田各单位从6月1日开始，采取组建部分专业队伍和广大职工义务劳动自建相结合的形式建筑干打垒房屋。专业队伍主要负责开赴林区拉运“困山材”、加工门窗、制造施工工具、打羊草绺把子。

建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难以尽述。进大兴安岭拉运“困山材”的运输队，冒着严寒，跋山涉水，自己收集木材，吃冷馍、喝凉水，战泥泞，千里迢迢，人不歇气，车不停转，充分发挥了当年志愿军汽车运输的大无畏精神，拉出了大量的木材。采油、水电、机械加工等工种采取一部分人一人顶两人的岗位，挤出一部分人突击干打垒；钻井队伍和各级机关、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干工作，业余时间搞干打垒。部长、司局长等领导干部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卷起袖子动手打夯掘土，和工人们一起流汗水、挨蚊叮虫咬。地方政府派出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带队组成干打垒技术辅导团进行现场指导。整个油田变成一个大工地，人人劳动，大家动手，群策群力，起早贪黑。每到夜晚，各工地灯火通明，人声夯声震天，场面十分壮观。油田《战报池》及时刊登了建筑工地上的感人事迹。一位工人将自己的心情化成一首诗：“抗日延安挖窑洞，今朝处处干打垒，革命红旗辈辈传，艰苦奋斗最光荣。”

由于群众发动充分，各级领导干在前面，上上下下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从6月全面铺开，到9月底为止，历时120天左右，全油田完成了近10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出现了“七一村”、“八一村”、“新市村”等新的居住点，真正实现了会战指挥部提出的“人进屋、机进房、车进库、菜进窖”的目标。职工风趣地说，这是“四进士”，即四个进室之意。他们建造的这些干打垒房屋，都有火墙或火炕取暖，用天然气做饭，电灯照明，并装有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基本适应了生活需要。

“干打垒”体现出大庆人勤劳节俭，乐于奉献的精神。建造干打垒，一次投资比建筑楼房省钱六分之五。仅以1960年在油田中心区建成的60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粗略算一笔账：由于就地取土搞主体，人工又主要是靠业余义务劳动和从生产队伍中挤出来的，不用另行列支劳务费，干打垒房屋每平米的平均造价最多不超过30元；如果采取当时中档的楼房标准，按常规承包，建设能够抵御高寒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每平方米的平均造价不低于200元。两相比较，前者只需投资约2000万元，而后者则要投入约1.2亿元。在60年代初期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一次节省这样一大笔投资，意味着他们为国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贡献。

30年后，已经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孙敬文回首那段往事，仍感慨万千。他称赞大庆会战时的干打垒，“是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大庆石油会战中的体现，是延安窑洞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的继续，是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孙敬文接着说：“干打垒建筑也有其缺陷，如使用年限较短，维修次数较频等等。大庆油田没有把它作为永久性的建筑，而是作为节约投资的过渡形式，现在已被楼房所代替。”

第四节　发展生产，战胜饥荒

大庆会战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职工吃不饱肚子。刚开始会战的时候，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能按工种定量供应，副食品从黑龙江省和南方调进。虽说职工们劳动紧张，体力消耗大，伙食倒还过得去。但是到了9、10月份，在全国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被称为我国北方粮仓的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已经超过了“危险线”，再也无法坚持原来的粮食定量标准，不得不按国家规定，把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减下来。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专程来到萨尔图，向康世恩抱歉地表示，黑龙江再也无法供应本来就不够的粮食定量标准了。

会战职工定量减的幅度很大，从几斤到十几斤。钻井工人从每月28公斤减到22.5公斤，采油工由22.5公斤减到16公斤，干部、专家等一律减到13.5公斤。同时，副食品明显减少，肉食几乎没有供应。那是一场全国性的粮食大饥荒。许多职工的家属和子女，由于家乡闹粮荒，为寻活路也来到油田。这更加剧了油田缺粮程度，许多职工一人的定量一家人分吃。当时在自由市场上，土豆按个卖，甜菜切成片卖。绝大部分会战职工工资在50元以下，一天的工资只够买几个土豆、几片甜菜。有的职工没办法就跑到冻土地里拣冻白菜帮子和甜菜叶来充饥，还有的靠开水里加点酱油度日。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体力消耗比夏秋更多，职工体质开始明显下降。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会战真是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了。半年多的会战使职工队伍已成疲惫之师，长期吃不饱肚子，人们的体力渐渐支撑不住，很多人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当时，石油部党组正在北京开会，张文彬在会战前线主持工作。他通过萨尔图直通北京的电话专线向余秋里汇报说，职工队伍中出现了浮肿病，蔓延很快。得浮肿病的职工，开始是几百人，很快上升到1000人，以后是2000至3000人，最多时达到了4600余人。治疗浮肿病，制止浮肿病蔓延，尽可能地改善职工生活，成为关系会战大局的最尖锐、最紧迫也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石油部党组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康世恩就奉命赶回大庆解决会战队伍中的浮肿病问题。余秋里给他的指示是：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毫不动摇，坚持会战，天塌下来也要顶住！

康世恩一下火车，首先来到一线钻井、油建工人住地，了解情况。有个转业不久的青年工人，看样子身材魁梧、壮实，却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可就是起不来床，说话也有气无力。康世恩走上前去，按按他的脸部和腿部，一按一个坑，好久恢复不过来。很明显，这是得了浮肿病。

康世恩了解情况后，便主持召开了会战领导小组会议，作出一系列规定：第一把手既要抓生产，又要管生活，第二把手专管生活；食堂设立政治指导员，就餐人数在200人以上的要建立伙委会；指挥部派车出去搞生活物资；得浮肿病的职工一律停止工作，

为他们办专门营养伙食，每人每天 2—3 两肉；大搞代食品；粮食按定量吃够；组织打猎队、捕鱼队。

石油部党组会议刚一结束，余秋里也急匆匆地赶回大庆。在安达一下火车，他就问康世恩："你哪只手有劲?"康世恩说："当然是右手了。"余秋里挥了挥他的独臂说道："那好，我们就用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

与康世恩一样，余秋里到大庆后，第一件事也是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他同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反复研究，统一了思想：会战一定要坚持，困难一定要克服。为了加强生活方面的组织领导，除了松辽局原来主管生活的副局长以外，还指定领导小组成员张文彬用主要精力抓生活，吴星峰也用一部分精力抓生活。同时，还严格规定，不管这里的冬天何等寒冷，寒流如何厉害，会战队伍必须坚守阵地。一个人也不准撤走，生产一刻也不能停顿，输油管一寸也不能冻坏，人一个也不准饿坏，设备一台也不准趴窝。

数万人的大会战，在粮食极度紧张的时候，食堂就成了关键。余秋里和会战领导小组成员经过调查发现，能够利用有限的物资，让职工吃好、账目清楚、没有贪污、群众比较满意的食堂，约占食堂总数的 31%；基本上过得去，群众意见不大的约占 60%；问题较多，账目不清、粮食超支又吃不好、吃不够定量，群众意见很多的约占 9%。为此，会战指挥部专门召开了生活会议，作出了《关于安排当前职工生活的紧急指示》，提出"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口号。规定每个基层大队和中队，必须保证有一名干部在食堂同炊事员同做、同吃、同算、同议，不准有一个食堂出现空档；抽调部分优秀干部和红旗手、劳动模范以及关心群众、办事公正的人，担任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加强食堂的力量，改变食堂的服务态度，减少就餐排队的时间；食堂必须达到一清、二无、三好以及三热一暖。即账目清楚，并能公之于众，无贪污、无浪费，饭菜花样调剂好、服务态度好、清洁卫生好，饭热、菜热、汤热、餐厅暖和。

余秋里回忆："1961 年 4 月至 5 月份，我在大庆期间，除了主持党组扩大会，研究大庆油田开发和石油工业发展规划外，主要精力放在抓生活。我经常去基层单位了解职工生活，包括食堂工作及代食品采集、加工和粗粮细做的情况。油建公司有个食堂用玉米面、高粱面加代食品制做烤饼，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亲自观看了烤制过程，亲口尝了烤好的饼子，味道还真不错。我同主管职工生活的领导商量以后，在油建食堂召开现场会，介绍、推广了油建和其他单位食堂制作烤饼、代用食品和节约粮食、调剂生活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级干部要花大力量抓生活，在抓开荒种地、增加主副食品的同时，还要认真抓好粗粮细做、节约代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困难，坚持和发展大会战。"

各级领导的表率作用也带动了广大职工。工人们自觉地把办好食堂当成坚持会战的大事。1202 钻井队工人卢兴山回家探亲，父母妻儿倚门而望。可卢兴山没有先到家，而是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为队里买了一副石磨。他知道队里有人得了浮肿病，上级给了点黄豆，钻井队只能煮着吃，炒着吃。他便利用探亲的机会，千里运回一副石磨，让队里的人可以吃上几顿豆腐，调剂口味，改善营养。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再加上黑龙江省和部队的支援，一两个月内，浮肿病发病率和病情得到了控制，并逐月下降。整个冬春，没有饿死一个人。这在那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实在是件非常不容易的大事。后来，他们又通过挖野菜，找代食品，特别是后来通过大搞农副业生产，有效地改善了职工生活，使石油大会战在千难万难之中终于坚持下来。

第五节　“三老四严”与“四个一样”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一年年底，当石油部研究部署1961年工作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大庆会战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二是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是否继续由石油部直接领导。1960年底和1961年初，石油部党组多次开会，结合总结1960年工作，研究1961年任务，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党组会议认为，虽然1960会战任务已经完成，而且有些成果超出原来的计划，但是，要把油田面积探明，把地下情况搞清，还要做大量艰巨的工作，油田建设、油田开发还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必须继续集中力量，加强统一领导。因此，会战不能结束，还要继续深入进行下去，直到取得勘探、开发、建设的全面胜利。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会战应继续由石油部指挥。他们还提出，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在大庆设立党的工作委员会。

周恩来支持石油部的意见。他认为集中力量搞会战是个好办法，工业战线应该推广。在1960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讲到工业战线集中力量搞会战，像军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时，提了八条：“(1)书记挂帅，亲临前线指挥；(2)一定要综合计算；(3)缩短战线，面面照顾打不好仗；(4)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搞成一个是一个；(5)搞工业要全面安排，政治、组织工作要配合上；(6)统一调度，统一指挥；(7)要实事求是，抓具体措施；(8)要有一个政治上的保证。”

周总理的讲话进一步坚定了石油部继续领导会战的决心。1961年，余秋里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石油工业生产建设和大庆会战情况时，提出大庆会战要继续进行，石油部要继续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示：“大庆会战，石油部要抓20年，不要抓一年。双重领导，以石油部为主。”同月，余秋里向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薄说：“我完全支持你们，继续组织大会战，至于从青海、新疆调些人和设备，你们调就是了。设立工委，边成立，边报告。欢迎地方支持，但必须由石油部直接抓。”3月14日，余秋里在一次由薄一波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汇报了大庆油田现状、开发方针原则和会战领导问题，薄一波再次表态：“没有石油部直接领导，就没有大庆这样大的成果。”“你们埋头苦干，好消息很多，从现在看，条件是很好的。今年我们研究，总要尽一点帮助之责。”4月18日，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又正式提出关于大庆会战的领导问题：“为了便于一抓到底，迅速展开工作，我们同意石油部党组仍然到第一线，直接指挥这一会战。”

1961年，经过中央批准并同黑龙江省委商妥，石油部调整了大庆会战的领导机构，原会战领导小组改为会战总指挥部，由康世恩任总指挥，唐克、张文彬、焦力人等任副总指挥。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成立党的工委，由余秋里兼任书记，吴星峰、张文彬、李荆和任副书记。

随着油田建设的不断发展，为了适应石油大会战的需要，从1962年9月起，大庆工委号召全油田大搞规范化。全油田各勘探队、钻井队、采油队积极响应。“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最早提出“三老四严”作风的是大庆三矿四队。据当年担任三矿四队队长的辛玉和回忆，“三老四严”原本起于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

一天，队长辛玉和到这个队负责的西六排2号井去检查。途中发现新来的徒工小孙手里拎着一个崭新的刮蜡片急匆匆地上井。辛玉和有点纳闷：小孙井上的那个刮蜡片刚领几天，怎么又坏了？于是，他返身走向材料库，问材料员。材料员拿出一个变了形的刮蜡片说：“小孙今早清完蜡，也没有注意检查刮蜡片是不是起到井口就去关清蜡闸门，结果，把刮蜡片挤扁了。还让我替他保密呢。”

辛玉和走出库房，思潮起伏。他认为这不单纯是一个刮蜡片的问题，小孙隐瞒事故，缺乏一个石油工人起码的老实态度，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特别是这件事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队里只忙着新井投产，放松了抓队伍的思想建设，对职工没有提出严格的要求。有了这种认识，辛玉和就这一问题严肃地与小孙谈心。辛玉和讲：“要干好工作，没有一个老实态度是不行的，对任何事情，钉是钉，铆是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小孙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检讨说：“当时自己想，反正刮蜡片没掉到井里，换一个算了，别人也不知道。以后在工作中注意一点就行了，没想到这种说假话的行为欺骗了组织，欺骗了领导。”

一般说来，因工作疏忽挤扁了一个刮蜡片，领导批评了，本人承认了错误并作了思想检讨，事情也就可以过去了。但三矿四队却不这样认为。为了用这件事教育全队的职工，党支部决定第二天在小孙管的那口井上召开‘事故分析现场会’。党支部书记李忠和重点讲了事故原因及对待事故的态度问题。他说：“采油工人的工作特点是单兵作战，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严格的要求，是管不好油井的。”小孙越听越坐不住，当即站起来，眼含热泪，激动地表示，要求把那个变了形的刮蜡片挂在自己管的油井上，要时刻不忘这个教训。辛玉和激动地说：“干部是带队伍的人，我们怎么带，队伍就怎么走。我们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队伍就不可能具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事故出在小孙，可根子在我身上，我这个队长只埋头抓生产，放松了职工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表示：应该把那只变了形的刮蜡片挂在队上，让全队的人天天看到，时时想到，小孙的教训也是大家的教训，要说老实话，要办老实事，做个老实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对每一件事要具有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样才能管好油井。

不久，在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全队开展了一个“当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严格要求，严明纪律”的活动。党支部还订出了“干部上岗，工人监督，要求工人做到干部首先要做到”的制度。

1962年底，党支部发动全队职工对所管的油水井、站进行了详细认真的检查。技术员傅孝余逐井逐站认真细致地检查验收。除夕晚上，他检查到最后一口油井时，发现套管法兰缺一个螺丝，这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为了装上这个螺丝，他从一个井排找到另一个井排，从材料库找到维修队，终于找到一个适用的螺丝，然后回到井上把它配好。

老工人李广志，在西七排3井检查闸门池的设备时，发现回压闸门下面有颗亮晶晶的油珠。“这油珠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反复检查了各个闸门，并无渗漏，也不像是外面沾上的。晚上，他把情况向井长作了汇报。第二天，井长和他一道来到井场，顺着油痕的地方，一段一段挖出管线，接着又擦干净，逐段检查。经过4天紧张奋战，终于查出了油珠的来历，原来是干线穿孔渗漏出来的。通过这番检查，他们及时消除了一个重大的事故隐患。

有一次，队里小尹家来了客人，喝了两盅酒。接班时，被19岁的徒工小李闻出来了。小李不准他接班，叫他在井场上铲草，等酒味没有了再来接班。小尹无可奈何，只好拿着锄头铲了两个小时的草。

就这样，在全队逐渐形成了严细的作风。全队职工对每盘长达1500米的清蜡钢丝都要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检查，确认合格后才准使用。在交接班时，发现刮蜡片直径差0.2毫米，生产报表涂改一个字，灭火器上有一点灰尘，开关闸门差半圈或工具摆得稍微不整齐，都要交班人一一改正，才能接班。由于大家严格执行制度，坚持严细作风，扎扎实实地干工作，确保了油井的安全生产。这个队建队3年共录取3万多个数据，无一差错，在用设备台台完好，井井站站达到一类，连续多年被评为油田标杆单位。

1964年2月20日，三矿四队在石油部召开的全国油田电话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大庆工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采油三矿四队学习的决定》。全油田迅速掀起了“学三矿四队、赶三矿四队、超三矿四队”的群众运动。同年5月，石油部在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把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并创造的一些经验，概括为“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并授予这个队为“高度觉悟，严细成风”的石油部标杆单位，石油部领导还为全队职工每人胸前戴上大红花。

大庆石油会战中的“四个一样”，最早是由李天照任井长的采油二矿五队5—65井组提出来的。这个井组自从1961年7月成立以来，到1964年，安全生产2045天没有发生任何大小事故，成为安全生产过得硬的井组。他们累计录取各种资料数据上万个无差错。他们的设备配件定期维修保养过得硬，井组1860个设备部件不渗、不漏、不松、不锈，井场清洁平整。由他们管理的3口油井始终保持标杆井水平。在原油生产上，天天超产，月月超产，年年获油田“标杆井组”的光荣称号。几年来，经过上级领导3000多次明查暗访和20多次大检查，没有一次脱岗、串岗、睡岗的。在井上录取的2万多个地质数据无一差错；油井各种设备上的863道焊口、156个大小闸门没有一处漏油跑气的，管理水平在全油田多次被评为五好红旗井组。

1961年，大庆石油会战工委提出“从大量的、常见的、细小的工作入手，全面管

好生产”的号召，要求全油田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每个井组都把岗位责任制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每个人能否认真执行，是摆在全体职工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李天照对他的井组说：执行岗位责任制的灵魂是责任心，只有树立起主人翁责任感，才能自觉地、始终如一地执行岗位责任制，才能管好生产。

1963 年 7 月的一天，天气突变，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片刻间，井场周围积满了没脚脖深的雨水。一小时一次的检查时间到了，雨还是下个不停。上 4 点钟班的学徒工刘玉智从值班房探出头来，望了望西边露出一线亮光的天空，转身问李天照：“井长，这雨下不长，等它住一住，咱再去检查吧!”李天照毫不犹豫地说了声：“不行!”抄起工具就冒雨冲出值班房。他按巡回检查路线逐点逐项地检查了采油树、分离器，最后沿着干线堤去检查加热炉。见到加热炉底部已经进水，便拿起铁锹挖了三条小沟，排出积水，重新调好合封。等他回到值班室，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他对刘玉智说：“小刘啊，越是坏天气，越是容易出问题，以后可得要注意。”刘玉智感动地掏出钢笔，把井长的话一字一句地写在工作记录本上。

由于李天照的率先垂范，整个井组形成了“四个一样”的好作风，这就是：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有一次新工人张学玉操作不小心，把千分尺上的一个小螺丝弄丢了，他立即报告井长并作了检讨。当天，他从下午找到傍晚，没有找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又到井场上找，还是没找到。他想，我们井组自成立以来，管理和使用的几十件工具、仪表及生产设备至今件件完好，没有丢过一个螺丝，今天自己弄丢了一颗螺丝事小，破坏了老师傅们辛辛苦苦养成的好作风，这可是大事。于是，他请了半天假，赶到萨尔图，问遍了所有的自行车修理部、钟表和收音机修理店，想买一颗小螺丝配上，结果不是没有，就是规格不合适，都未如愿。想来想去，他想到了生产厂家。他工工整整地给厂家写了封信，说明事由，请技术员根据形状画了一张草图，标明尺寸，并附上一元钱，要求厂家破例卖给他一颗小螺丝。厂家被他的这种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所感动，破例送给他一颗螺丝。他们扣除寄信花去的两角钱邮费，把剩下的钱附在一封信里用挂号信又给寄了回来。在信中，厂家写道：“你们自觉地爱护设备，在自己的岗位上严细认真，一丝不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大庆会战中，指挥部结合三矿四队和李天照井组的典型事例，狠抓队伍的作风建设，使全油田涌现了一大批作风严细，真正体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作风的先进集体。

大庆有个采油队所管的油井在中心广场附近，在井场上班的工人只要一抬头就能望见露天放电影的银幕，但是值班采油工硬是不看电影，坚守岗位，集中精力巡回检查油井。有个注水站距食堂只有 200 米，但站上的职工常年坚持带饭上岗，吃饭不离岗位。有位女泵工因临时替班，连续工作了 20 多个小时，没离开岗位一步，始终按要求定时检查设备。她只要脱离几分钟，就能把饭取来，但她没有这么做。运输十三队差不多年年夏天突击运基建用料，冬季进山拉“困山材”，在远离领导、冰天雪地的深山密林里

完成集材任务。他们车过果园，不动百姓的瓜果；行车压死一只鸡，便挨门询问，直到找到鸡主，照价赔偿。他们车行万里，一尘不染，被当地老乡称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1963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大庆召开工交企业基层工作经验交流会。余秋里在会上介绍了大庆的工作，欢迎与会代表对大庆进行检查、批评、指导。代表们用各种方法检查了大庆的工作，特别是岗位责任制的执行情况。除了会议安排的参观、检查外，还在会议安排之外进行了多次访问检查和突击检查。有的代表除了白天进行明的检查外，还在夜晚暗地检查，不是检查一两个点、一两次，而是多个点、好多次。经过这样明的、暗的，多次反复的检查，代表们普遍认为，大庆工人觉悟高，工作认真，经得起检查。坚守岗位、执行制度真正是“四个一样”！

第六节　“五把铁锹闹革命”

1961年，随着石油大会战的展开，一批职工家属来到大庆。为了解决困难，会战工委作出决定：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支援石油会战的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钻井指挥部首先响应会战工委的号召，一面把家属组织起来学习，一面组织家属大搞积肥活动。1962年春天，大庆油田的第一个家属生产队便诞生了。

当时，很多家属都报了名，最后确定薛桂芳、吕玉莲、王秀敏、杨晓春、丛桂荣等五人第一批去“八一新村”开荒种地。

1962年4月16日，是一个令薛桂芳等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天气很冷，又刮大风。上午9点，薛桂芳等5人背着行李、粮食，领着3个不满4岁的孩子，扛着铁锹，提着一盏油灯，搭了个便车，就向目的地出发了。

车缓缓地把她们带到30公里以外的地方。下了车，离她们要去的“八一新村”还有3公里多路。由于茫茫草原草深无路，她们几个人只好背着行李、粮食，抱着孩子，扛着铁锹，深一脚浅一脚，一步步地艰难挪动。到下午1点多，才到达了“八一新村”。

到“八一新村”后，她们就动手修房子。原来钻井队留下的一幢破房，只有四根柱子，上面没有房盖，四面没有墙。看到这种情景，5个人二话没说，放下东西，卷起袖子，挽起裤腿，就开始干起来。没有房盖，她们从附近的副业队借来一块帆布，把房顶和四周都盖上；没有床，到1.5公里多远的地方抱些干草来铺在地上，搭起了地铺。在副业队的帮助下，终于算把房子修好了。

晚上，经过一天的劳累，几个人又困又乏，但又不敢睡觉，因为那时荒原上经常有野狼出没。为了能让大家睡好觉，薛桂芳便把4把铁锹插在门口，一把铁锹枕在头下，并说，你们就放心睡吧，我给你们放哨。几十年后，薛桂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感记忆犹新。她说：“因为我的年龄最大，大家都很尊重我和我的意见，我感到，我有责任

多关心大家。”

第二天，天刚亮，吃过早饭，她们就扛着铁锹，领着孩子下地了。

4月的早晨，天气很冷，地还没有完全化冻，草根又深，挖起来非常费劲。她们一锹一锹地挖，从早上7点多，一直到晚上5点多钟，全天苦干11个多小时，才挖了一亩地。

进入5月，天气渐渐暖和了，但其他的困难也接踵而来。她们住的房子十分简陋，每逢下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在滴答。地铺上的草又湿又潮，几乎每天都要把草抱到外面去晾晒。草原上的蚊虫也格外多，5个人浑身被咬得到处是包，痛痒难忍。

薛桂芳她们吃饭是在副业队搭伙，没有菜，天天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喝的是水泡子里的碱水，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5个家庭妇女在“八一新村”开荒种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会战指挥部，其他妇女听了也深受鼓舞。4月12日，迟翠英又带着第二批家属来到了“八一新村”。接着，第三批也来了。两批共计18人。人多了，队伍也正规了起来。迟翠英被任命为队长，邵香荣任技术员。为了能适时种上地，在队长的带领下，她们开始用人拉犁翻地。犁是借来的，开始大家都不会用，干起活来，不是你挤我，就是我踩你。扶犁杖的也是忽深忽浅。为了让大家都能学会这套农活，技术员邵香荣到附近农村向老农请教，并将老农讲的道理与实践结合起来，带着大家边学边练。就这样坚持了几天，终于学会了用木犁开荒，而且越干越熟练。几天时间，她们在“八一新村”附近种了16亩地，到秋天，收了1750公斤粮食。

随后的事情就比较顺畅了。到1963年，家属垦荒队伍扩大到71人，种地92亩，收粮食1.5万多公斤。每人分粮食200多公斤，菜300公斤。不但自己改善了生活，支援职工食堂2000多公斤蔬菜，还响应党的号召，卖给国家3000多公斤余粮。这一年秋收以后，队伍又扩大到142人。

上级领导充分肯定了薛桂芳等家属垦荒队取得的成绩，石油部奖给她们一面“发扬穷棒子精神，走自力更生道路”的锦旗，鼓励她们坚持发扬“五把铁锹闹革命”的精神，不断前进。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大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副业生产劳动蔚然成风，五把铁锹发展为万把铁锹。到1965年年底，大庆已有95%以上有劳动能力的职工家属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单是1965年一年，大庆家属就生产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1500多万公斤蔬菜，12.5万公斤禽蛋肉食品。家属们还同矿区职工一起利用农闲和工余时间建设矿区，从大庆石油会战至1965年，她们和大庆职工先后建设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宅。由家属们举办的各种作坊、食堂、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店等服务部门，遍及矿区各个居民点。

第七节　“缝补厂精神”

1960年冬，是大庆会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万人一下子来到了千里冰封的大草原，不要说找油打井，就是衣食住行也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石油工人艰苦创业，拼命抢夺大油田。他们没黑没白地奋战在油田，衣服破了顾不上补，脏了也顾不得洗，手套磨得露了手指头，还照样在冰天雪地里劳动。看到这种情况，后勤工人和职工家属，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千方百计为一线职工分忧愁，解决困难。在会战党委的支持下，共产党员鄢长松等3名转业战士和5名职工家属，在两栋破牛棚里，办起了大庆油田的第一个缝补组。

大庆缝补组刚办起来的时候，真可谓是千难万难，白手起家。他们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工作。没有设备，就找来两口大锅，一口烧热水，一口煮油工服；没有洗衣盆，就用喂牛的木槽子代替；没有针线剪刀，就从家里拿；缺少补丁布，就背着麻袋去拣破烂。寒冬腊月，他们的手被冻得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又整天泡在碱水里洗衣服。裂口疼得钻心，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就是凭着这股子劲，他们在第一年里就拆洗缝补了一万多件劳保用品。

对于后勤工人和职工家属创办的这个缝补厂，大庆油田的各级党政部门都很重视。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生活办公室多方努力，陆续给他们增加了人员，还添置了几十台缝纫机，使他们由一个“小打小闹”的缝补组办成了正式的缝补厂。

缝补厂起初的主要业务是为油田工人加工“两旧一新”棉工服。所谓“两旧一新”，就是把已经实在不能穿的旧服收回来，拆洗干净，用旧布拼里子，把旧棉花弹好絮上，再配上新布面。照这个办法，原来只能加工一套棉衣的新布就能够做两套了，使有限的物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缝补厂的工作看起来不像勘探打井那样有声有色，但同样充满了艰辛。比如说搞“两旧一新”棉工服，单靠手工洗衣，自然晾干显然远远满足不了批量生产的需要。缝补厂党支部带领全厂职工靠“两论”起家，自力更生，装备自己。他们先是和泥托坯，把东倒西歪的牛棚改建成流水作业的生产车间。又拣来废砖头，盖起了简易的锅炉房和洗衣房，并用木板制作了土洗衣机和其他必需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们又结合开展学雷锋活动，号召职工以“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的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岗位技术大练兵，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配成一件“两旧一新”棉工服的里子，要经过拆、洗、烘干和拼缝等四道工序。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它和拆洗一般的旧衣服不一样。一件棉大衣，发出去的时候只有3.5公斤重，可收回来的却要重得多了。缝补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凤允回忆说：“有次，我亲手称了一件，竟足有10.5公斤！那真是一摸一手油，一抖一阵灰。加上油田上的工作服又绗了四五十道线，被油浸透了，变得死巴巴的，拆起来既费劲，又容易

把布撕破。"

遇到困难，缝补厂的职工就集体想办法，在工作中摸索。拆旧组的曾阳春、冯淑贤等人用废钢丝磨成锥子，一针一针地挑，然后再细心地把棉花和布分开。刚拆下来的布上挂满了线头，刷子刷不干净，他们就用手一根一根地摘下来。拆旧工服的房子很小，又没有什么工作台，大家就坐在地上工作。衣服脏，工人们干得猛，弄得满屋子都是灰尘，戴上两层口罩吐出来的痰仍是黑乎乎的。

拆衣服不容易，洗衣服更加不容易。拆下来的油污布必须先放在碱水里煮过才能洗净。原来的小锅煮不下，他们就用拣来的废砖头砌了个大池子。水开以后，池水中浮上一层油泥，味道特别难闻。为了把每一块布都洗干净，职工们谁也不在乎油脏和气味难闻。他们全都站在池子边，上下不停地翻弄油污布。等水晾凉了，他们又争着脱下鞋，挽起裤腿跳进池子里踩踏。有的工人身体不适应，皮肤过敏，有人腿上的皮肤都烂了，但他们仍坚持工作。

从拆旧衣服开始，缝补厂的工人们不仅认真仔细地把布拆好、理好，还要把旧衣服上的纽扣和领、裤钩收集起来。纽扣脏了，用碱水刷洗干净；领、裤钩生了锈，用砂纸打磨一下再用。有时谁干活时纽扣或领、裤钩崩丢了，下了班就主动留下来，一直到把东西找到了再回家。

拼里子和裁剪更是一件细心的活。工人们本着"废材利用，缺材代用，小材大用，好材精用"的原则，把大块布用来拼袄里，小块用来补洞眼。剪裁的时候剪刀靠边走，剪下的布条用来包袖口。剩下一些不结实的"麻花布"也不轻易丢掉，或者衬在棉衣领子里做领芯，或者收集起来送给生产单位擦机器。这样拼成的一套棉工服里子，少的有一百多块，多的还有达到二百多块的。为了力争把"两旧一新"棉工服做得既结实又美观大方些，工人们还注意把大块拼的、颜色又相同的旧布用在上衣的前襟后背，小块或颜色杂的用在袖子和棉裤里。

裁剪车间为了节约费用，先是把画样子用的新蜡笔加温搓细，延长使用时间，后来又将剩下的蜡笔头攒起来，熔化后做成新蜡笔用。

加工车间的工作是把前道工序准备好的半成品做成衣服，工人们也处处精打细算。机工们算了一笔细账：棉工服每套上面要跑 54 道杠，需要出现 52 根连接线头。如果每根线头少留一寸，每件棉服就能少用 1.7 米棉线。厂里每年加工两三万套棉工服，就可以省 4.5 万米线。这样一个由小变大的数字，使机工们看清了点滴节约的重要性，生产中都尽量避免留长线头。就是偶然出现了长线头，也要主动揪下来收好，转交给钉纽扣的工人用。车间里还加强了对机油的管理。保养机器时，对准油嘴，防止跑冒。油壶里没用完的底子，也有人主动收集起来。

修理厂的技术工人，除了坚持做到机器坏了自己修，配件断了自己焊，积极主动保养好设备外，还处处当节约挖潜的有心人。他们经常从"合理的消耗"中发现不合理的浪费。在加工服装的车间里，缝纫机皮带钩易损易坏，虽然每个只值 5 厘钱，但节约起来仍可积少成多。修理工陈维汉主动放弃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到处去拣废钢丝，做了两千多个皮带钩。厂里加工好的棉工服，每道线缝里都要沾着一缕缕棉绒。打包出厂前，

一般都被用条帚沾水扫掉了。老工人陈志训和张祝三等人看后很心疼。他们说："每一缕棉花都是国家的财产，用不到生产上就是一种浪费!"他们找来废料，研究制造了一台土扫棉机，在提高工效的同时，每天还能扫下3两多棉花。

缝补厂不仅缝补回收旧棉衣，还千方百计为一线工人缝补衣服。他们先是采取"三人工作两人干，抽出一人上前线"的办法，不定期地组织工人抬上缝纫机，背上旧布和修鞋、洗衣工具，到附近的井队和施工现场，为工人拆洗缝补。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和条件的改善，厂里又专门成立了相对稳定的缝补小分队，定人、定车、定期到边远生产单位去服务。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王凤允回忆说："记得1963年入冬后的一天，我和家属工胡文玉、郝大嫂等十多个同志一清早就上了路。走着走着，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得脸生疼。可是大家背的背、扛的扛，等赶到井队驻地就都满身是汗了。我向值班的干部说明了来意，他说钻井工人的衣服太脏太破，不好意思拿来。可是女工和家属大嫂们没等他说完，就从各个帐篷里拿出脏被褥和衣服等，洗的洗、缝的缝，忙活开了。为了不影响倒班工人休息，钉鞋和补衣服的同志把空着的一间帐篷让给洗衣服的同志，自己在外面摆开了摊子。没干多久，有的人手脚冻麻木了，有的人手上被针扎出了血……"

随着油田开发面积的不断扩大，小分队的战线也不断延伸。一次，他们看见有个井架工，在上二层平台之前把皮大衣脱掉了。他们便分析：平台有20多米高，上面的风更硬，为啥反倒不穿皮大衣呢？经过了解，原来是工人嫌皮大衣又厚又重，蹬高不得劲。为此，大家想来想去，决定把回收的破皮帽子进一步利用起来，像加工"两旧一新"棉工服一样，把拆下来的碎皮子一块块拼好，絮上旧棉花，配上新布面，做成了既轻便又暖和的皮背心，很受钻井工人喜爱。他们发现不少工人劳动强度大，整天在油里泥水里蹚来蹚去，发的工鞋很容易破损。他们便成立了专业修鞋小组，把修复后的旧工鞋送给这些工人替换着穿。

缝补厂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一线工人服务的精神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1963年8月，石油部长余秋里亲临缝补厂检查指导工作。他热情地勉励职工说：有人说缝补厂是个破烂摊。依我看，这是个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还亲自组织油田会战领导机关和有关单位的人到该厂学习。同年11月17日，在全油田代表参加的总结庆功大会上，缝补厂被授予"勤俭办厂模范单位"的称号，党支部书记王凤允和厂长阎勇一起上台，接受了会战工委颁发的锦旗。1964年，在余秋里亲自主持的一次祝捷大会上，缝补厂又被石油部授予"勤俭办厂的模范"的光荣称号。

第八节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

大庆会战初期，有些热心人提出要建设一座石油城市，并忙着要搞规划蓝图。他们设想，在原来安达市附近建设一座石油城，在那里建设职工住宅和生活设施。职工上下

班用汽车接送，或往返乘坐火车。这种设想反映到石油部以后，余秋里等人认为不现实。一是当时油田正处在勘探过程中，地下有没有油，油田规模有多大，还未搞清楚；二是缺乏资金，缺乏材料，缺乏施工力量。必须“有钢用在刀刃上”，把国家给拨付的建设资金集中用来生产石油。

1960年，为了迅速甩开钻探，尽快拿下大油田，开辟生产试验区，进行原油试生产，以解决国家缺油的燃眉之急，会战领导小组在以主要的建筑施工队伍建设正规的管线、泵站、油库、厂房等生产设施的同时，在油田生产设施附近，就地取材，大家动手，分片盖起“干打垒”，度过了第一个严冬。随后，他们又在已有分片“干打垒”区的基础上，适当连片、集中，增加一些生活设施，新增一些商业网点，逐步按单位形成了若干个大小居民点。

1962年，大庆总结前两年的实践，进一步在生产岗位固定的采油队和油水泵站等生产设施附近建设居民点，相近的几个居民点，逐步建成一个中心村和若干卫星村。对流动生产和施工的钻井队、井下作业队和基本建设单位，就在油田边缘地区建设居民点、中心村，作为职工的后方生活基地。家属们则在油田外围开荒种地。

周恩来视察大庆时，对大庆矿区建设十分关心，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很赞赏。后来周恩来又提出，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1963年10月25日，周恩来讲到伊春林区矿区政权建设问题时说：“我看今后林区、油区没有其他工业的，就不要搞大城市。我看就是萨尔图这个办法，他们有四句话，叫做工业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样就是可以缩小城乡差别。”根据这一方针，大庆石油会战工委确定，每个居民点都要把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统一管理起来，实行工农业紧密结合，做到工、农、商、学四位一体，人人生活在组织之中。到1963年底，大庆已初步建成了萨尔图生产管理中心、让胡路科研中心和龙凤石油化工中心三个较大的居民镇，以及分散建立的10个中心村和40多个居民点，一个新型的石油矿区崛起在松嫩平原上。

在油田的矿区建设上，大庆人根据油田勘探、开发的需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条件下，坚持做到两条：一条是，生产设施、科研设施和医疗教育设施，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力求达到现代化的第一流水平。对于钻井工程、油水泵站、原油集输、注水管线、油库、变电站所以及机修等生产厂房，都根据生产需要，正式设计，正规施工，保证高质量、高水平。另一条是，在生活设施上，实行低标准，坚持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职工住宅、宿舍一律建“干打垒”。办公一律住简易房子，不盖办公大楼。

分散建设居民点，职工住宅离矿井近，便于组织职工家属种地，既有利于工业生产，又发展了农业生产。到1965年，大庆工矿区生产的粮食，解决了几万名家属的口粮，改善了职工生活，减轻了国家的商品粮负担。根据《人民日报》记者对大庆一个管理站的统计，1962年该站粮食产量每个劳动力平均500公斤，1964年已提高到1500公斤左右。

分散建设居民点，还有利于降低建筑标准，市政设施可以适当简化。大庆居民点的

用水、用电、道路等大部分是和生产设施结合使用的；污水、粪便就近用作肥料，因此不必建设很多专用的市政设施。根据人民日报记者在当时所作的典型调查，大庆每个居民平均的住宅和市政建设投资约合400多元，比一般新建城市大致低一半，既节约了国家投资，又较快地解决了广大职工的需要，也节省了职工的生活开支。

居民点的布置，兼有城市和乡村的特点。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一个中心居民点和三五个一般居民点围绕组成一个生活基地。工人在“前方”生产，家属在“后方”种地。集中生产的工厂，也突破了过去工厂福利区集中建设的框框，根据周围的耕地条件，把居住区分成几片，将单身和双职工宿舍建在厂前，家属住宅分布在厂周围不很远的几个居民点上，便于家属参加农业生产。

居民点之间的距离一般在两公里左右。中心居民点是生活基地内社会活动的中心，居民点里设有基地管理委员会，把农业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统一起来。这里的生活福利设施比较齐全，有医院、半工半读的中学、商店、邮局、理发室、浴池等各种设施十七八项；还有一套农业生产设施，如拖拉机站、技术研究站、畜力运输队等。中心食堂可以开会，也可以演戏、放电影。一般居民点也设有小学、托儿所、杂货店等七八项设施，在一些不适宜建立固定设施的地方，就以流动巡回的方式来解决，例如有巡回大夫、串村理发员、登门送粮员等等。这些设施适应了广大职工和家属需要，基本上做到不出基地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居民点内有电灯，有自来水，有的还能就近用上天然气。点与点之间都通公路，有交通车。

大庆这样的布置，职工上下班和家属种地都比较近，适合油田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特点；买东西、看病、孩子上学等也不太远，又基本满足了城市生活的要求；既像城市，又像农村，两者的优点都有，是一个新的创造。

在学大庆运动中，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成为舆论宣传最多的内容之一。在当时的舆论宣传中，对于大庆油田分散建居民点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五章 黑龙江：石油会战的大后方

第一节 为“大庆”命名

“大庆”是随着油田的勘探开发而产生的新名称，在油田勘探开发之前，黑龙江省的地图上本没有大庆这个地方。

1959年9月，松基3井喷油以后，松辽石油勘探局黑龙江大队立即向黑龙江省委报捷。当时，省委正在107会议室开常委会。省委听取了松基3井出油的情况汇报后，第一书记欧阳钦、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和其他领导人仔细观看了送来的原油样品，并详细询问了石油的勘探和生产过程。欧阳钦高兴地说：“找出天然石油是一件大事，由于我省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生产的石油能够很快地用于工业、农业机械化的需要。这对于促进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继续加强工作，兢兢业业，作好石油勘探工作。”同月，省委在风景如画的太阳岛极乐村召开第365次常委会。会议讨论了黑龙江省对石油勘探工作中的修路、建房、动力设备、党群干部及勘探队职工福利等各种急需解决的问题，决定上述问题均由省长李范五组织有关部门和地区协调解决。

10月12日上午，黑龙江省委在花园村一号会议室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支援大庆石油勘探与开发的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省委《关于大力开发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的决议》。决议指出：第一，黑龙江省石油工业的开发和建设已进入边普查、边勘探、边建设、边生产的新阶段。因此，省委认为必须特别重视，加强领导，大力支援，以更快地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一个新的石油工业基地。第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从各方面支援这一新兴工业的发展，使其迅速地成长、壮大。第三，要求在全省所有的石油地质普查勘探队，保证按期完成中央部局交给的任务。第四，在国家总的规划下，黑龙江省明年应积极建设部分中小炼油厂和一批简易炼油厂，并安排建设一些为石油工业所需要的配套工厂。

11月8日，黑龙江省在安达市大同镇召开油田勘探成果庆祝大会，欧阳钦、李范五、强晓初、李剑白、陈剑飞等黑龙江省党政领导亲临会场，欧阳钦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此地出了油，是天大喜事。听到你们的介绍，感到石油事业在黑龙江大有希望。你们搞油的是野战军，找油、开发以及将来的建设是很复杂的，也是困难的。

你们的事业，是全党的事业，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大发展可以带动我们的机械化、现代化，使国家更富强。你们到这里搞石油，全国要支援。我们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有关的县、乡和广大人民群众是这里的“地主”，要尽“地主”之谊。他还说，石油工人是好样的。你们大部分同志是从部队转业的，为了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继承发扬了我们解放军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我们要像热爱志愿军那样，把石油工人当作最可爱的人。

欧阳钦在讲话中还提出要把大同镇改为大庆区。这是欧阳钦在从哈尔滨到大同镇的路上想出来的主意，征得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与欧阳钦一道参加庆祝大会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李剑白事后回忆说：“11月8日，在大同镇召开了庆祝大会，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陪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前来祝贺。在途中，欧阳钦同志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在我们北大荒发现了油田，看来我国石油发展大有希望，苏联在石油上卡我们的脖子也卡不住了，我们自己出油了。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是一个关键而伟大的发现，对全国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全省人民都应庆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我说：‘很值得庆贺，松基3井喷油正值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前夕，是向“国庆”献了大礼，喜上加喜，应该大庆。’欧阳钦同志兴致勃勃地脱口而出：‘那咱们就给油田改个名吧，把大同改为“大庆”，你说好不好！’我回答说：‘太好了！名副其实。山西省已有个煤城大同市，我们再叫大同市就重复了，改了吧。’

随后，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根据欧阳钦的提议，作出了《关于成立大庆区和将大同镇改为大庆镇的决定》。对此，余秋里曾有过评论，他说：“欧阳钦同志命名的‘大庆’，言深意切，含义深远。后来制订松辽油田勘探、开发方案时，我们都同意把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第二节　会战后勤部

1960年1月2日上午，黑龙江省委在哈尔滨颐园街三号会议室召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欧阳钦、李范五、强晓初、王一伦、王鹤丰、杨易辰、李剑白、陈雷、任仲夷、张开荆等。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到会介绍了大庆石油钻探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打算。与会者完全赞同余秋里所提出的加强钻探工作的方针和做法。常委会认为，随着石油会战人员的集中，必须相应地做好一切有关的支援工作。省委责成省公安厅党组对大庆油田的保卫工作进行一次专门的研究和部署，建立相应的机构，确保勘探工作的安全。关于勘探队员的粮食、副食品、煤炭、服装等物资供应问题，会议决定由杨易辰负责检查、安排。有关油田勘探的机修厂、卫生医疗机构、学校的建立和电力供应与筑路等问题，由陈雷负责安排。会议还决定1月10日，由李范五率机械、粮食、商业、交通、卫生、公安、教育、电业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大庆检查石油勘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凡是能够解决的，就地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积极安排设法解决，以保证石油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

按照省委常委会议的部署，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省长李范五和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经委主任陈雷到大庆实地解决油田勘探中遇到的问题。松辽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李荆和等人一路陪同。

一行人到了葡萄花，葡萄花石油勘探大队党委书记关耀家陪同李范五参观了葡1井、葡7井、葡21井。当时，正值葡7井出油。工人们为省委领导做了油井喷油示范。望着喷射出来的黑色原油，在场的领导都心情激动。陈雷问身边的关耀家："一口井日产原油有多少?"关耀家回答说："二三十吨。"陈又问："淌在池子里的油不会浪费吗?"关笑着回答说："都可以回收起来。"

葡萄花石油勘探大队会议室就设在一栋"干打垒"的屋子里。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木板钉的简易桌子，凳子是木桩打在地里，上面钉着木板。葡萄花石油勘探大队的领导人汇报完基本情况后，石油部研究院试采总工程师童宪章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向省委领导介绍采油的基本原理。听了介绍，省委领导很高兴。李范五说："大庆石油工人战天斗地，不畏严寒，克服了许多困难，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还坚持工作，我代表省委、省人委和全省人民对你们表示感谢和慰问。我们黑龙江省人民一定全力以赴支援你们的会战。"

2月中旬，康世恩由北京赶到哈尔滨。此时的哈尔滨正是冰雕玉砌的世界，但康世恩无心留意窗外的美景，一心想着石油会战。他首先到黑龙江省委向欧阳钦报告了石油部关于开展松辽石油大会战的决定和部署，欧阳钦听了很高兴。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对大庆石油会战极为关心，它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摘掉贫油的帽子。黑龙江人民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援大庆石油会战，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2月13日和18日，欧阳钦两次主持召开黑龙江省委常委会，专门研究为大庆石油会战做准备的事情。会议决定，全省对大庆石油会战要采取"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主动支援油田的开发工作。党中央批准组织石油会战的第二天，即2月21日，陈雷与陈剑飞一起参加了石油部在哈尔滨召开的松辽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会议一结束，陈雷等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接着，2月25日，省委致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石油工业部的安排，并决心全力以赴，全面支援石油会战。为了保证石油会战的顺利进行，决定成立省委支援大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省委常务书记强晓初任组长，副组长有省委常委、副省长陈雷，嫩江地委第二书记、专员于杰，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市长吕其恩。领导小组成员有：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曲常川、省公安厅厅长卫之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晋、省财委主任关舟、省经委副主任封仲斌和叶方、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张立信、省交通厅副厅长陈法平、省邮电局局长白景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封仲斌兼办公室主任。这是大庆石油会战的强有力的后勤部。用欧阳钦的话说：要把这个领导机构作为支援大庆区石油工业基地的政治部和后勤部。欧阳钦还对余秋里讲，我来给你余秋里同志当这个后勤部的政委。

黑龙江省委组建支援石油会战的办事机构后，又考虑到大庆油田地处安达地区，应尽快调整安达的区划，加强这个地区的领导力量，保证石油会战第一线的支援工作。4

月7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安达市，将原来的安达县和肇州县的大同地区划归安达市管辖。5月3日，省委任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曲常川为安达市委第一书记，松花江地区副专员李介民任安达市委书记兼市长，松辽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局长李荆和兼任安达市委书记，哈尔滨市人委副秘书长杨祝民任安达市委书记兼副市长，齐齐哈尔市委财贸部长宋月涛、肇源县委第一书记张克孝任安达市委书记，省交通厅公路局局长刘华任安达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从这个名单看，当时的安达市委是一个较强的领导班子。

在讨论安达市委班子时，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曾汇报说，省交通厅和齐齐哈尔市委不同意调动刘华和宋月涛的工作。省交通厅提出刘华对全省的公路非常熟悉，不愿放走骨干，并建议可从合江或嫩江地区的交通局长中挑选一人顶替。齐齐哈尔市委的理由是，当时市委主管财贸的书记高衡刚刚调省里工作，主管财贸的副市长刘青萍又调到大学工作。宋月涛再调走，就没有人抓财贸工作了。省委常委讨论决定，就是要选派优秀的干部去支援大庆，局部要服从这个全局。

第三节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1960年初，正值特殊时期。天灾人祸，整个国家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各类物资奇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黑龙江省委组建的这个“后勤部”，要想拿出大量物资支援石油会战，困难的确很大。

3月初，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雷赴京参加薄一波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支援松辽会战协作会议。临行前，欧阳钦对他讲：“要将省委对大庆石油区工作的领导、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充实和加强领导力量、加强治安保卫工作以及物资供应工作等向会议作详细汇报。并请中央解决大庆区铁路、炼油厂、输油管、电站、工业用水等基本建设的投资、建筑材料、设备及交通工具等问题。”陈雷回答：“一定按省委的指示向中央详细汇报，力争解决所需的物资。”

3月9日下午，薄一波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中央各部委及黑、吉、辽三省均派人参加。会上听取了石油部和黑龙江省委的工作汇报。最后，薄一波在讲话中指出，黑龙江支援石油开发的办法很好，今后要继续照办。

当晚，陈雷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与同来开会的东北经济协作区办公厅主任倪伟商量，感到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落实。当即，用长途电话向强晓初作了汇报。强晓初赞同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陈雷到石油部与康世恩商定，将石油部和黑龙江省提出的要求汇成一个单子，统一口径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提出。

次日，国家经委副主任孙志远召集会议。听了陈雷的汇报后，孙志远说，你们支援石油会战的物资，原则上都可以解决。现在能拍板具体确定的就是调给你省100台汽车。有关修路、建设砖瓦厂等所需的机械设备，尽量找现货，如没有则拨给材料由省里

组织加工。其他物资，责成国家经委委员谢北一负责研究解决。

3月12日，陈雷再次找余秋里、康世恩、李人俊等石油部领导，就大庆地区当前建设与长远考虑，石油建设与其他各方面事业的相应发展，以及会战中石油部与黑龙江省在各项工作中的分工负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磋商，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也是在这一天，陈雷和倪伟分别与国家计委副主任安志文、铁道部副部长郭鲁面谈，确定对萨尔图至大赉的150公里铁路，立即着手勘察设计，做好施工准备。萨尔图、让胡路两个车站的扩建工作立即进行。20万千瓦的发电厂和炼油厂、钢管厂等基本建设项目，列入三年计划。运输修公路所需砂石的车皮，铁道部同意从3月份开始，省里能装多少车皮，就拨多少车皮，并列入正式计划。这些措施，对大庆石油会战和大庆日后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后，黑龙江全省上下不论是省委领导，还是普通工人，心里都像燃烧着一团火，恨不得一锹挖出石油来。省委几位领导多次表示，大庆在黑龙江，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石油会战。只要我们有的，需要什么给什么。

大庆会战，首先需要人。为了接待安置好中央调给大庆的两万名退伍官兵，强晓初与领导小组的人研究，决定责成王丕年、肖君盛、陈国润组成接待小组，以省民政厅为主成立接待安置办公室。由省委组织部从各地市县抽调300名干部，搭起12个修筑公路作业大队的架子，先把这些人安置下来。由于各方面重视，工作到位，仅用一个月的时间，2万退伍官兵就在北大荒安下了家，并陆续投入到石油探区的公路建设中。这些人后来成为大庆石油工业的骨干力量。

为了保证会战工程的进度，省委于3月1日批转了省建委党组《关于松辽石油施工力量安排方案的报告》。决定从齐齐哈尔一公司抽调两个完整的大工区，从佳木斯公司抽调一个完整的工区，再补充一批新工人，组成省公司第一工程处。将肇源、庆安两县在大庆施工的500名工人调给松花江地区，再补充500名临时工，组成专业公司。从松花江地区各县抽调100名技术工人和400多名工人充实大庆工程队，组建成新的大庆工程公司。再由嫩江地区抽调600名工人补充地区公司、安达工地和安达县公司，从而形成一支力量较强的施工大军，完成石油会战中的各项施工任务。

为会战作准备，关键是把路修好。没有路，参加会战的千军万马和大量物资就运不进来。早在1959年9月，松基3井一喷油，黑龙江省委就注意到这一点。省委、省人委于1959年10月26日联合发出了修筑肇州至石油矿区公路的指示。会战前夕，省委专门成立了大庆石油会战公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安达县，总指挥是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法平，下设嫩江、松花江、哈尔滨三个分指挥部。松辽勘探局初步规划当年筑路1040公里。经省委支援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反复研究，确定1960年筑路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为540公里，其中四级公路140公里，五级公路179公里，简易支线221公里。任务由三个地市分段包干。

在大庆筑路，第一位的困难是当地不产砂石。为此，陈雷带领支援石油办公室和省经委交通处的人经过研究，决定以五常县的杜家，尚志县的马延、苇河，阿城县的玉泉、亚沟等地为砂石定点场，并与铁路部门协商组成专列，每天往大庆运2至3列车的

砂石，从而保证了筑路的需要。

几万会战大军一下子拥到大庆，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住的问题迫在眉睫。会战开始的当年，就要完成32万多平方米生产用房的建设工程，并要求6月底前竣工16万平方米，任务十分紧迫。黑龙江省委支援石油领导小组决定把基建工程由嫩江、松花江、省工程公司及安达、大庆施工队分别承包，按期完成。此外，1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任务，由所在县组织当地人民公社进行修建。同时，为解决石油工人的临时住宿，除责成当地动员居民腾出部分民房外，又在哈尔滨木器厂建立了一条活动房生产线，为大庆会战昼夜赶制出1000座活动房。

松辽会战进行了六七个月之后，又面临着几万人如何度过严冬的问题。他们想到了搞“干打垒”的办法。为此，会战指挥部专门成立了“干打垒建筑指挥部”，由孙敬文负责。不久，黑龙江省委给他们派来了技术顾问。

在“干打垒”的墙打起来以后，又因缺少木材，上不了门窗、封不了顶，工程停了下来。李范五、陈雷、陈剑飞等省委领导立即请示欧阳钦。当时，计划内木材早已调拨完毕，一时也有些束手无策。省委认为其他省市计划用的木材当然也是急需的，但几万会战大军亟待解决的过冬问题，是更为急迫的问题。省里决定从计划外拨给大庆3万立方米木材。为使这些木材尽快运到油田，解决建筑“干打垒”的燃眉之急，省委、省政府采取非常措施，下令在大庆的“干打垒”用材尚未解决之前，从小兴安岭发往全国各地的木材列车，在南岔编组站一律换牌运往大庆。

保证会战的物资运输，当时是整个会战中的重要工作。铁道部在哈尔滨专门成立了支援松辽会战指挥部。60年代初，安达站归哈尔滨铁路局管辖，而大庆石油区又在齐齐哈尔铁路局范围内，一点小事也得惊动两个铁路局，工作极为不便。黑龙江省人委就此给铁道部写了报告，请求把安达站划归齐齐哈尔铁路局。报告送到铁道部仅三五天就批复回来，这样的效率在今天也是少见的。

油田开发前，萨尔图地区只有一个7人值守的小邮电所。会战开始后，黑龙江省邮电局派出邮电工程队到油田架设通讯线路，安装设备。到1960年4月底就架通330对公里电话线路，年底完成了1900对公里。

1960年5月25日，余秋里、周文龙、康世恩等石油部领导来到哈尔滨市，向欧阳钦和黑龙江省委常委通报了石油部党组关于指挥石油会战的一些想法。余秋里首先谈到，石油部党组已经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一是对油田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大庆油田是一个大油田、好油田；二是对大会战的看法，大家认为，同国外的油田相比，我们的勘探是高速度、高水平的，它说明大会战的决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大庆会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是靠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二是靠黑龙江省的大力支持。欧阳钦插话说：“我们支持得不够，主要是靠你们艰苦奋斗。你们住牛棚指挥会战，很令人感动。”余秋里说：“不是支持不够，而是很关心，很支持。我们艰苦奋斗，没有牛棚就不行，否则地图都没有地方挂。”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余秋里说有两个问题，要下功夫研究解决。一是油田弹性驱动能量小，准备采取早期注水的方法进行开采。因此，要开辟一块生产试验区，看水

能不能注进去，效果如何。二是原油含蜡量高，凝固点高，要通过加热，才能把原油集中起来，输送出去，如何加热，也要通过试验。

余秋里介绍情况后，欧阳钦说，石油部的工作很有创造性。你们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庆会战，这个经验对于各条战线都有普遍意义。至于说到支援，首先是大庆支援了全国，支援了黑龙江。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将会把各行各业带动起来。我们从来都把支援大庆看作是支援自己，看成是自己分内之事，而不是看成负担。我们要同心协力，把油采出来，送到各条战线去。他还说：今后东北三省要继续努力，支援大庆的开发建设。工作中有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困难，不符合辩证法的规律。有困难大家分担，一起克服。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互相支援，夺取世界冠军！"

几十年后，余秋里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欧阳钦同志讲的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讲话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牢记在我的脑海里。"

第四节　节衣缩食保石油

在全国人民紧衣缩食，以野菜代食的60年代初，搞数万人的石油大会战，解决粮食困难成了天大的问题。会战刚开始，没有粮食，情况反映到黑龙江省委，省委的几位书记对此非常重视，认为粮食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会战的成败。省委、省人委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每月再从全省节约出7.5万公斤粮食，支援大庆。当时，分管财贸工作的省委书记、副省长杨易辰亲自落实此事。他对省粮食部门的负责人说："粮食困难，省委知道。但就全国而言，石油更缺。宁可我们自己挨饿，也得解决油田会战大军的吃饭问题。"

1960年2月，西伯利亚寒流袭来，松嫩平原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北风呼啸，寒冷刺骨。从新疆、甘肃、四川等地云集北大荒的石油大军，一下火车，不能很快进入驻地，又冷又饿，发生了不少冻伤、饿晕的事情。省委支援石油办公室向陈雷作了汇报，陈雷立即向强晓初建议，在安达、萨尔图车站搭起暂时休息大棚。让南方来的人下车后每人能喝上一碗热面汤—，吃上两个面包，然后再落实去处。省委领导同意这个建议，责成专人去落实。

萨尔图一带原来一无电厂、二无输电线路。水电部门专门派来4个列车发电站，保证了会战初期的用电，并用2年时间建立了龙凤热电厂和新华电厂。在会战初期，为了保证大庆的用电，黑龙江省还相应减少了齐齐哈尔市的供电量，直接影响了齐齐哈尔的生产和居民生活。但为了保证大庆石油会战，没有人发过怨言。

石油会战开始以后，欧阳钦指示黑龙江省"支援石油会战领导小组"负责人与会战指挥部领导住在一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省委领导看到大庆的钻井、油建工人都在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进行工作，而每人每月仅15公斤的粮食定量，实在太少，感到这是关系到会战成败的大问题。而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到处都缺粮食，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已

到了“危险线”，不少地区因农民缺粮，已向省里频频告急。余秋里后来回忆说：“我们再也不能向省里伸手了。但会战队伍因粮食缺乏而出现的疲惫、浮肿，严重地困扰着我们。”欧阳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焦急，彻夜难眠，省委在千难万难当中，再次决定给会战职工每人每月增加1.5公斤大豆。这一消息传到大庆后，很多干部职工都激动不已。

与此同时，省里动员各方面力量，为会战队伍赶制的过冬被服，在入冬前源源不断地运到会战前线。这就保证了会战职工安全顺利度过第一个严冬，坚持了会战。余秋里回忆说：“记得1960年12月的一天，大庆的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采油工人却在这一天创造了日产原油7000多吨的最高纪录。这一年，生产了97万吨原油，勘探工作也取得了决定性成果。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不是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全力以赴地支援，夺取石油大会战第一年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黑龙江省对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支援是多方面的。仅1960年7月，黑龙江省就拨给大庆过冬商品煤炭28万吨，棉大衣3.6万件，皮大衣3万件，皮帽8.4万顶，棉皮鞋3万双，大头鞋3万双，棉工服6.7万套，棉手套30万副。

第五节　要“牛”还是要“油”？

大庆油田这片土地，位于一望无垠的松嫩平原上，在这块面积为136万亩的土地上，生长着一望无际的优质牧草，是世界上少有的百万亩优良牧场之一。早在解放初期，根据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的指示，就在这里建立了“红色草原牧场”。

1960年春，萨尔图、喇嘛甸地区一批探井相继喷油。所获得的地质资料表明，大庆油田越向北延伸，地下油层越厚，原油产量越高。石油会战指挥部果断决定，挥师北上，集中力量探明萨尔图、喇嘛甸地区油田情况。而萨尔图正是红色草原牧场的中心。牧民们因家乡发现了石油，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他们热情地为会战职工腾出房子，连牛棚也腾了出来。仅1960年4、5月份，就帮助会战指挥部接待安置了约10万人次的会战大军，还为萨1井挖了第一个试油用的土油池。

但是，随着大会战的发展，一口口油井、一座座泵站和油库建设起来，这些设施占去了一块块肥美的草原。牧民们发现，开发建设油田必然要破坏他们生息发展的草原，于是，油和“牛”之间存在着矛盾，牧场和油田的争执随之发生。甚至出现了牧民强行扒掉盖在“万斤垧”田上的小型炼油厂。官司打到了黑龙江省委、石油部、农垦部，状纸递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在油与“牛”的矛盾面前，黑龙江省委经过反复研究，确立了“服从大局，‘牛’给油让路的总原则。鉴于石油开发还处在初级阶段，牧场暂时保留。1961年11月5日，省委责成曲长川和省农业厅长房定辰在萨尔图召开了油田土地会议，通过与牧场、油田等有关部门讨论协商，确定了大庆地区利用土地的具体原则：“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保证油、牧、农全面发展。地上服从地下，油区内牛让油，油区外油让牛。”

但问题很快又出来了。由于缺少粮食和副食品，会战职工体力下降严重。为了坚持会战，指挥部决定发动职工和家属自己动手开一些荒地，种粮、种菜，改善职工生活。这就使得油与牛的矛盾再度突出。为此，欧阳钦亲自找有关部门做思想工作。李范五、强晓初、陈剑飞和陈雷也多次做省农垦部门和红色草原牧场领导的思想工作。黑龙江省委再次重申：“宁可牺牲牛，也要确保油。”为了确保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用地，1963年5月13日，经省人委第92次会议讨论决定，红色草原牧场所属9个牧场中在油区的4个牧场陆续迁出，把2.3平方公里土地移交给大庆油田使用。为此，黑龙江省迁出牧户2790户，14180人。其中部分职工分别调往九三、査哈阳、赵光农垦局和万宝、五大连池农场及巨浪牧场。截至1965年，迁场工作全部结束。红色草原牧场减少了300平方公里土地，其中采草、放牧地减少了133平方公里。从而导致奶牛、马分别减少53%和7.8%。

那是在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年代，这一串串数字后面，是黑龙江省人民节衣缩食的奉献。难怪几十年后，当年指挥石油会战的余秋里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满怀深情地说：“那时，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处于极端的困难之中。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的无私支援，使大会战前夕就出现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局面。我们对黑龙江这种天高地厚之情，只有由衷地感激，只能下定决心，率领会战大军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以回报党、回报人民。”

第六章 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

第一节 邓小平首次到大庆

1961年7月，正是大庆石油会战十分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亲临大庆视察指导工作。

7月23日上午8点多钟，邓小平到达大庆后，随即视察了孙玉廷钻井队、北1—58喷油井、北一排2号转油站、干打垒住房、三排1号注水站及西油库。

邓小平对大庆石油勘探工作很关心。康世恩到哈尔滨迎接他时，首先汇报在泰康打的6号探井喷了气。邓小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一件新闻。你们要搞快一点。找到气，能解决大问题。康世恩汇报说：已在松6井以西、以北地区及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地打了几口井，没有见到这个气层。邓小平说：气比油更活跃，你们要好好找。

在从哈尔滨到大庆的火车上，邓小平问康世恩：你们现在注水还没有过关吗？康世恩回答：按现在的情况，都是好消息。水注得很顺利，效果也很明显，比预期的情况好。但这里也埋伏着问题，就是担心水推进得不均匀，会沿着渗透率较好的油层跑得较快，形成单层突进，油井过早地被水淹。邓小平接着问：多少时间就会淹掉？康世恩回答说：今年就可能看出来。邓小平说：要出问题就早点出，好早点想办法。康世恩又汇报说，今年大会战的任务就是搞好10项试验和14项技术。邓小平问什么时候可以搞完，康世恩回答说，有的年底可以见到初步结果，有的明年还要继续搞。

康世恩汇报了大庆油田已探明的面积和储量后，邓小平说：现在7亿吨是肯定了，你们要搞到10亿吨。有了10亿吨储量，一年就可以生产3000万吨。他对10亿吨特别关心，在谈话中有4次提到要搞10亿吨。后来勘探证明，大庆油田可采储量超过了10亿吨。

在视察中，邓小平对油井产量问得很详细。在参观北—58井时，他问这口井每天的产量有多少，值班工人回答说，用12毫米油嘴每天产量120吨。康世恩解释说，这口井是排液井，生产井不能用这样大的油嘴，只能用5～7毫米油嘴生产。邓小平问：用7毫米油嘴一天能产多少吨？工人回答说：可以产50吨。邓小平说，恐怕不止这个数字，要有70～80吨。邓小平又问：正常生产时一天能产多少吨？康世恩回答：按全

油田平均一口井30吨左右。邓小平又说：恐怕也不止这个数。在汽车上，邓小平就按70吨、80吨计算一下，说一口井一天生产70吨，一年就是25000吨；一天生产80吨，一年就是28000吨。他连连说，这是高产量的井，是好井。

邓小平这次视察，对职工生活问题特别关心，谈的也最多。在哈尔滨见到康世恩时他就问：现在职工生产如何？一个月吃多少钱？康世恩回答说：按过去一个工人平均一个月吃13、14元钱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3角2分，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的工人很紧。邓小平当即对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价格调拨。后来李剑白对康世恩说：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按国内价格，以前多收的钱要退。

邓小平问康世恩：职工冬季服装解决了没有？康世恩说，黑龙江省委已帮助安排。邓小平又问大庆职工食堂办得如何？康世恩说：总的来看不算好，一是管理员的质量较差，二是炊事员技术不高，做的质量差。邓小平说：有些人愿意在家吃饭也可以，并说食堂要好好培植，不宜过大。

邓小平在大庆看了工人们正在搞干打垒住房，很满意。他问干打垒搞了多少，康世恩回答说，去年搞了30万平方米，今年原打算再搞30万平方米，现在看来只能搞到20万平方米。邓小平问明原因后计算道，30万加上20万，就是50万，平均每人10平方米。然后乐观地对随同前来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说：你们哈尔滨住房一人才平均1.8米，这个地方一人平均10平方米。他的意思显然是说，还是搞干打垒来得快。他还问康世恩这种干打垒每平方米要花多少钱，康世恩告诉他，如果不算人工，一平方米只要十二三元钱就可以。邓小平听后肯定地说：这就能多搞。

邓小平还问油田日用品供应如何，康世恩介绍说，职工日用品很困难。一方面是东西少，另一方面是住地分散，工人没时间去街上排队，所以应买到的东西也得不到。邓小平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最好办几个供销合作社，送货上门，不然懒人不去上工，去排队能买到东西，好工人什么也买不上。供销社实行集体所有制，按批零差价办。

邓小平对大庆油田所处的萨尔图草原很感兴趣。当他看到沿井播种的庄稼时便高兴地说：这个地方靠着铁路，有火车站，草原很平，汽车到处可以跑，土地肥，到处能种地，这个地方太好了！青海、玉门、新疆没有这个条件，四川也没有。他还对康世恩说：你们要好好种地，成立专业队，实行单独核算。开头两年要补贴点，以后就要自给自足，农副业队生产的东西，也要实行等价交换。专业队是集体所有制，不要和企业混在一起。你们要争取做到蔬菜、副食品自给。

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还对油田发展养猪、养牛、植树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964年7月16日，邓小平第二次来大庆视察工作。与他一道来大庆视察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陪同他们来大庆视察的有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等人。

邓小平到大庆后，顾不上休息，首先来到了铁人王进喜曾经带领的1205钻井队，亲切问候了当班工人，详细询问了生产情况。接着，他又来到中三转油站、中二注水站，视察了采油情况。

第一次来大庆时，邓小平曾担忧过油层过早被水淹的问题。经过大庆人三个春秋的科研攻关，已经研究出了“糖葫芦派克”，降住了注水的单层突进。随后，邓小平又视察了在执行“三老四严”中首创“四个一样”的李天照井组，还视察了龙凤炼油厂等工程项目。在听取油田领导汇报后，邓小平希望大庆这面红旗树起来就要树得住；希望大家戒骄戒躁，夺取更大的成绩。

第二节　刘少奇亲临指导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在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千方百计地帮助大庆解决油田开发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当得知大庆职工看病就医有困难时，1961 年 7 月，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批转了石油部和卫生部关于建立大庆油田职工医院的请示报告。7 月 23 日，党中央专门下发通知，批准在大庆建立一座有数百张病床的职工医院。当时各地都在压缩基建项目，中央批准大庆新建这座医院是很不寻常的。通知下达后，大庆的干部、职工都很激动。他们没有想到国家会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给他们建这么大的医院，而且还是国家主席亲自批示的。

那一年的 8 月，刘少奇在结束了对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林区考察之后，于百忙之中视察了正在会战中的大庆油田。

8 月 7 日上午，刘少奇等人在康世恩的陪同下，从齐齐哈尔登上了开往大庆的列车。刘少奇走进车厢刚坐下，就开始听取康世恩的汇报。

刘少奇首先询问了大庆油田有没有一个长远规划。康世恩答道：“今年二三月间，邓总书记找部党组询问过，党组曾提出过一个规划。5 月份，部党组在萨尔图召开会议，又专门讨论了这个规划。原来设想这个油田在 1964 年建成年产 1500 万吨原油规模，包括钻井、油田建设、炼油厂建设、输油管线、铁路运输等方面，这样在 1965 年就能生产 1500 万吨原油。按目前情况看，时间可能要延长一点。”

刘少奇进一步问道：“实现这个规划需要多少投资？”

康世恩说：“建成这一套要十二三亿投资。”康世恩还汇报说，大庆会战去年投资将近 3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2.1 亿元。刘少奇边听边点头。他对石油部根据实际情况，在国家经济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运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做法表示满意，称赞说：“这样做法效果很好。”

接着，刘少奇又询问了油田目前生产能力有多大。康世恩回答说：“如果今年钻井、油田建设任务完成，这个油田就有了年产 100 万吨的能力，明年大体上可以生产 400 万吨。”

刘少奇听后又提了一个问题：“炼油厂跟得上吗？”

康世恩汇报说，炼油厂能力不够，现在正在油田附近的龙凤建设一个炼油厂，但

是，利用管道长距离输送还有许多技术上的难题过不了关。刘少奇以商量的口吻问道："是不是可以在当地设炼油厂？先加工，再输送成品油？"

听了刘少奇的话，康世恩受到了鼓舞。他说："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减少输送原油的困难。不过炼油厂规模太大，要处理1000多万吨，但也有好处，那样可以跟上一个大的化工厂，产品就更多了。炼油厂、化工厂加电站，是一个庞然大物啊！"

刘少奇接过话茬，从积极备战、准备打仗的角度分析说："也可以分散设几个点，离上10公里、8公里，中间摆上个化工厂，把炼油厂的废气通到化工厂做化工原料。这样，即使丢个炸弹，也只能打掉一部分。"

下午2时30分，列车缓缓地停在了大庆油田的让胡路车站。刘少奇一行首先来到正在施工的西油库。他参观了油泵房、压缩机室，还察看了5000立方米的金属罐，详细询问了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和装油能力。当他听说油库全部建成后，半小时就能装满一列车原油，原油外运能力将提高一倍时，十分高兴，连连点头称赞。随后，刘少奇一行又来到油田中部的开发试验区，视察第一批投产的转油站和三排1号注水站。他很赞赏大庆人实行的"早期内部注水、保持压力采油"的办法，说："先注水，后采油，保持压力开采，这个办法好！"下午4时，刘少奇又兴致勃勃地来到正在打井的钢铁1202钻井队。陪同的人们向他汇报说，1202钻井队从年初开始，就瞄准苏联的功勋队——格林尼亚钻井队，苦干、巧干、拼命干，一年打井要超过31300米。现在他们累计进尺已近2万米。刘少奇听后再次同这个队的干部握手，满怀喜悦地说："祝你们成功！"接着，他又告诫陪同参观的油田负责人："工作和生活条件越艰苦，越要搞好职工生活，越要注意劳逸结合。"

当刘少奇离开井场时，看到远处的牛群，深有感触地说："这里地下有油，地上有牛，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刘少奇最后来到油田领导机关所在地——二号院，同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刘少奇很乐观地讲着开场白："大庆到处热气腾腾是一片兴旺景象！这个油田搞得满像个样，希望很大。"在详细询问了当年国家投资、目前生产规模和炼油厂的筹建以及油田开发的长远规划后，他又一次告诫油田负责人："在暂时困难时期，一定要关心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和福利。"他反复询问："这里的工人生活好不好？""粮食、副食供应怎么样？""商业和服务行业能不能跟得上？""开荒种地有没有拖拉机？职工家属来矿的有多少？"他语重心长地对余秋里、康世恩等人讲："大庆这个地方最近几年要增到几十万人，怎么建设？要很好地规划。几十万人，不能长期没有家呀！暂时没有可以，长期没有不行。所以要盖房子。职工宿舍、家属宿舍，要分期搞，不要集中到一块，炼油厂、化工厂、机修厂、电厂可以增加一批劳动力。可以组织成合作社或生产队，又盖房子、又开地、又种菜。否则这么多人吃饭全部依靠从外地调入问题很大。"当座谈临近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还再三叮嘱油田负责人："要在工业发展的时候，就要把农业组织起来，要关心职工生活，要好好组织家属种地，企业先用拖拉机把地开好，再交给她们去种，这样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了，事情就好办了。"

在国家经济困难关头，刘少奇肩上的担子非常重。他此次外出视察，一路上很少讲

话。但在大庆看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也受到了感染。他不仅在大庆干部会议上讲了话，还主动提出要和职工代表合影。

第三节　周恩来评价大庆成就

1962年夏天，大庆石油会战已经渡过了最艰苦的关头，但困难仍很多。这年6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大庆视察。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视察大庆。

6月20日，余秋里和康世恩专程赶到齐齐哈尔迎接周恩来。晚上，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恩来听取了关于大庆会战的情况汇报，一直到深夜1点多钟。陪同总理视察的童小鹏见时间太晚了，就说："总理年纪大了，该休息了。"周恩来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6月21日上午10点，周恩来乘坐的客车缓缓进站。周恩来敏捷地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大庆会战指挥部成员一一握手，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当周恩来看到会战领导穿着布衣、草鞋时，满意地点了点头。余秋里等人请周恩来先休息一下，周说："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恩来每到一处，总是和蔼地与工人们亲切交谈。在1202、1203钻井队，他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擦拭，周恩来发现后主动上前紧握着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毁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工人拉家常。问他们多大岁数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了？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保暖不保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边细心询问，一边倾听大家的回答，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当听说国产钻机性能还不错，年钻井进尺已经超过苏联"功勋"钻井队时，他非常高兴，一再鼓励工人们要再接再厉，多打井、打好井。他看到一位柴油司机坚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就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那位司机激动得久久不肯松手。快要离开时，他听说钻井工人想与他合影留念，感到非常高兴。他伸出两个胳膊，搭在身边两位老工人的身上，留下了令工人们难忘的珍贵镜头。

大庆北二注水站是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在那里，周恩来看到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他还对化验员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

在职工食堂，周恩来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深情地对炊事员说："你们很艰苦啊！"炊事员很感动地回答说："不艰苦。"周恩来马上纠正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的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陪同人员又一次催促总理上车。周恩来回身发现200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向地窝子走过去。陪同人员劝他不要下去了，周恩来却一个劲地向前走。那位倒垃圾的家属叫杨德群。她又激动又担心地对总理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周恩来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他一面弯腰往地窝子里走，一面问小杨是哪里人，生活习惯不。小杨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地窝子里，周恩来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坑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在视察中，周恩来看到油田很大，非常高兴。他充分肯定了大庆取全取准资料，讲求科学态度的做法，特别强调要把高度革命精神与严格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周总理来到大庆视察的消息，迅速在油田上传开来。当晚在火车站自发地聚集了大批群众，秩序井然地等在那里，都想看一看敬爱的总理。周恩来由余秋里陪送去哈尔滨，他上了火车后，又再次下来，再三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1963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420多万吨，为实现石油基本自给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年的6月19日，周恩来第二次到大庆视察工作。

周恩来这次到大庆，由会战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去哈尔滨迎接。周恩来在列车上向张文彬详细询问了大庆一年来的变化，对会战的迅速发展十分高兴。上午11点，周恩来一下火车，就乘坐普通的蓝色大客车直奔1205钻井队的井场。周恩来热情地与钻井工人们握手。在人群中，他一眼认出了一年前见过面的小李。他大步走过去，紧紧握着小李的手说："你是李……"小李回答说，我叫李清明。周恩来高兴地大声说："李清明同志你好！"此情此景，使在场的人们激动不已。随后，周恩来又健步登上高高的钻台，把手伸向每一个当班的工人。当班的柴油司机正要找东西擦手，周恩来大声说："不用擦，你们很辛苦，整天和油、泥打交道，这是你们的光荣啊！"周恩来还询问钻井进尺多少，指标多少。当工人们回答说要用3年时间打10万米时，周恩来高兴地鼓励说："好！要有雄心壮志，要敢于创指标！"

这次视察，周恩来所到之处都与工人们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交谈，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生活和职工家属的情况。尤其是对职工的生活，周恩来问得最多最细。他问大庆今年种了多少地，苗长得怎样，职工的家属都接来了没有。当周恩来来到大庆最大的油库——西油库时，他环顾四周的油罐群，遥望远处的装油栈桥和长长的油龙，感到非常高兴。他语重心长地说："这地方很重要，一定要搞好安全生产。"周恩来见远处站着很多群众，就一面热情地招呼让大家过来，一面快步迎上去，握手问候。当周恩来听说身边的一位工人是湖南人时，亲切地问："湖南都吃大米，你在东北要吃粗粮，你能习惯吗？"那位工人回答说："总理，粗粮细粮我都能吃，只要为国家多产油，吃什么都行！"周恩来听了高兴地带头为他鼓掌。

来到西油库的栈桥下面，周恩来要上去看一看。栈桥很高，大家劝总理别上去了。可周恩来还是踏着扶梯，登上4米多高的装油栈桥，值班工人给他做了罐车装油的表演。周恩来见栈桥上没有一点油污，赞赏地点了点头，并关切地问当班工人："冬天和雨天怎么办？"工人回答说："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周恩来

听了极为高兴："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细作风，四个一样好，我要向全国宣传！"

第四节　朱德赋诗赞大庆

随着大庆石油会战进程的加快，来大庆视察指导工作的中央领导也渐渐多了起来。1963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周总理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视察大庆，他对大庆人提出的"三老四严"赞不绝口。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来大庆视察，还在采油前线召开群众大会，讲红军传统，提出奋斗目标，对职工鼓舞很大。

1964年，中央领导到大庆来的更多了。5月6日，彭真一行30人到大庆视察。7月17日，邓小平和李先念、薄一波、杨尚昆在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等陪同下到大庆视察。7月28日，刘伯承一行35人到大庆视察。

1964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被誉为"红军之父"的朱德总司令来到大庆。与他同行的还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上午10时53分，朱德和董必武在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两位老人顾不上休息，立即在康世恩、徐今强两位石油部副部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龙凤参观大庆炼油厂。在途中，康世恩向朱德等人汇报了炼油厂艰苦创业的过程。朱德听后非常欣慰，赞扬大庆人这种爱国奉献的精神。他说："你们大庆油田闯出了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道路。"

在炼油厂参观时，朱德和董必武详细询问了炼油厂的规模、生产的成品油品种。听完汇报后，朱德在充分肯定大庆人取得成绩的同时，勉励他们说："你们要继续努力啊！"

当康世恩汇报说，1952年转业的石油师已成为石油战线骨干力量时，朱德高兴地说："部队转业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革命传统坚持下来了，一种是跟着人家走。1952年转业40多个师到各个部门搞建设，你们石油部门把革命传统坚持下来了，新疆建设兵团也把革命传统坚持下来了。"

接着，康世恩汇报了组织家属搞农业生产的情况，说家属生产队有政治指导员，各单位设有家属政治部。朱德强调："全国各方面都要设政治部，我们解放军就是靠政治工作建设起来的，大家要学习解放军！"他还说："你们把家属组织起来，要做好思想工作。这里种地时间短，季节性很强，农忙时要集中力量搞农业，工业忙时，家属也可以搞工业。"

下午，朱德、董必武又视察了松基6井、中6—17井、中三转油站和西油库。途中，康世恩指着窗外的干打垒平房对朱德说："这就是1960年职工、家属们搞的土房子。现在也是分散建居民点，这样既便利于工业生产，又便利于农业生产。"

朱德边看边点头，他乐呵呵地说："你们树立了一个艰苦朴素的样板，要坚持下去，

把家属组织起来搞农副业生产，还可以搞点放牧。人人都劳动，给国家创造的财富就多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人口这么多，只是一部分人劳动，我们就富不起来。"

在视察过程中，朱德还对康世恩等人说："国家整个形势，各方面工作都好，外贸也好，就是要有硬东西才有力量。你们还有那么多面积，可否多搞些油。现在是石油时代，石油太需要了，以后要的还多。你们要继续前进，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这是革命的传统，生活上不能和资本主义比，要艰苦一点，要把生产搞好。"董必武讲："你们要搞一个建设规划。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你们是工业战线上的标兵，将来你们也要做建设共产主义的标兵。现在你们已经闯出一条路，沿着这条道路，根据这次中央会议精神，继续前进，就会闯出一条更广阔的道路。"他还说："你们要好好种树，要多栽成材的树，多少年后就可以用，也可以种些果树。"

在大庆会战指挥部的二号院，朱德兴致盎然地为大庆题词："大庆是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的标兵，戒骄戒躁，永远前进。"他放下笔，兴致依然很高。凝神片刻，再次挥毫，写下下面的诗句：

"八一参观大油田，采油部队建功全。围攻四载荒丘灭，创造百年企业坚。政治恰符群众意，指挥亦并士兵肩。大军十万开天地，结合工农典范编。"

1964年先后到大庆视察的还有罗瑞卿、张鼎丞等中央领导。这一年，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到大庆油田参观和检查工作的也特别多。为了接待来参观的人们，大庆把几十栋"干打垒"土房腾出来，清扫干净，摆上木床，当做接待站。用自产的豆腐、猪肉和蔬菜款待客人。

第五节　新华社的公开报道

大庆石油会战经过3年多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成就。从1960年5月会战打响，到1963年，大庆探明了一个含油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22.6亿吨的大油田，这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油田之一。到1963年底，已开发建设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建成年产原油生产能力6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450万吨，对实现我国石油的基本自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大庆石油会战的3年半当中，共花国家投资7.1亿多元，为国家生产了原油1155万吨，相当于同一时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58%，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和折旧费11.6亿元，投资回收率为149%。全员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1960年为人均4886元，1961年增长到10823元，1962年增长到12530元，到1963年又提高到16265元。

随着大庆石油会战的进展和大庆油田的开发，我国原油产量和储量逐年增加。1962年与1957年相比，原油产量增长3倍多，天然气产量增长13倍多；石油储量增长近20倍；天然气储量增长约60倍；原油加工量增长2倍多，主要油品产量和产品品种增加约2倍；基本建设投资省、速度快、质量好、效果大；成本大大降低，财务总上缴大幅

度增长。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石油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63 年 12 月 3 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庄严宣告："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回荡，整个大厅沉浸在掌声和喜悦的气氛中。在这个庄严的会场里，只有一个人没有鼓掌。他端庄地坐着，抿着嘴恬然地微笑。他就是石油工业部部长、独臂将军余秋里。

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出于战备和诸多因素的考虑，会战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油田对外的称呼是"安达农垦总场"。随着中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大庆石油会战的情况也应告知于国人了。

1963 年 11 月 19 日，余秋里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汇报了我国石油工业的现状。余秋里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一直是个上升的局面。原油和油品产量逐步上升，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资源上，已经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可以完全满足近期生产发展的需要；在技术上，我们依靠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地质勘探、油田开发、炼油、基本建设设计和施工等方面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问题。这就为今后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使石油产品的需要全部立足于国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3 年 12 月 24 日，康世恩应邀向北京市 1 万多名干部报告了大庆会战的情况，这是第一次公开进行的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康世恩在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历程、成果、做法和经验等，使首都人民开始认识并了解了大庆人和大庆石油会战。

报告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主持。在整场报告会上，彭真先后做了 60 余次插话，高度评价了大庆经验和大庆精神。

当康世恩讲到石油会战初期，4 万多人头顶青天一顶，脚踏荒原一片，一无房屋，二无炉灶的时候，彭真说："上面'盖'的是天，地下'铺'的是草地。没有房屋，也没有床铺，几万人吃饭怎么办呢？没有锅碗，把饭放在牛槽里，用手捧着吃，他们从部长一直到全体干部、全体职工，就在那么一个草原上打这一仗，所以他们叫会战。"

康世恩讲到，为了在高寒地区过冬，一方面要大搞勘探，搞好生产；另一方面，还要挤时间盖土房子，当地老百姓叫"干打垒"。又发动职工，在草原上搞代食品，挖野菜，渡过了困难。彭真插话说："他们那个时候很困难，有人说搞工业还有这么个搞法？余秋里他们简直是胡闹，那一下子要死多少人啊！所以他们就下了个决心，准备这个会战打下来，伤亡两千人，但争取一个不伤亡。这也是个辩证法哩。"

当康世恩在报告中讲了"铁人"的故事，人抬钻机的故事等，彭真站起来大声说，"他们决心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不是他们石油部落后，是咱们国家石油落后。你说他那个条件，上面是天空，底下是草原。条件也要看是什么条件，有最完备的条件，有最理想的条件，也有中等条件，也有极恶劣的条件。咱们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极恶劣的条件，抗日战争、反扫荡、解放战争都是这样的条件。共产党员就是要在极恶劣的条件里

面去完成光荣的任务。这靠什么呢？就是靠一个革命精神。"

当康世恩讲到队伍建设的时候，彭真说："就得搞这么一支队伍，搞产业军。我们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解放军的战斗作风，它的来源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解放军天天练打仗，打仗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点一滴的毛病，都是生死存亡问题；所以它就把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更加集中提高了。我们产业这个军，马克思叫产业大军，就是要按这样一套办法搞，组织这么一个队伍。"

12月25日，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一条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成功的消息，第二天，中国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配合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庆宁的长篇科普文章——《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文章从三个方面对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说明：第一，石油是动力和热力的源泉；第二，石油是优质润滑材料的重要原料；第三，石油和人们吃、穿、用紧密相关，是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

第六节　石油部的总结报告

在余秋里和康世恩报告的基础上，石油工业部党组又就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经验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于1964年元旦正式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

石油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庆石油会战，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取得了一些什么成果。第二部分，总结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里，石油部党组向中央汇报说，大庆石油会战，已经三年多了。这一仗，确实打得很艰苦。那时候，几万人一下子拥到一个大草原上，各方面遇到的困难确实很多。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大庆油田的同志们，硬是鼓足干劲，苦干、硬干，团结一致，千方百计打上去。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对我国石油产品做到基本自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斗，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取得了一些什么成果呢？石油部党组概括地讲了六个方面的成果：第一，拿下了一个大油田。这个油田是目前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现在已经探明的储量，大体上可以适应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第二，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第一期工程，质量良好。第三，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一千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第四，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油田开发上的几个重大技术难题。第五，经济效果好，国家投资已经全部收回，并开始为国家积累资金。第六，更重要的是，锻炼和培养了一支有阶级觉悟，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并且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关于会战取得巨大胜利的原因，石油部党组在报告中说，最重要的是："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解放军、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支援，特别是油田所在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委的大力支持。还应当指出，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在地质部做了大量的普查勘探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地质战线上的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石油部的报告重点是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他们共总结出大庆石油会战的九条基本经验。这九条经验是：

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讲人的作用，讲阶级觉悟，讲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革命干劲和革命风格。

第二，高度的革命精神必须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要把人们的革命干劲鼓到搞科学研究上去，鼓到搞第一性资料上去，鼓到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上去，鼓到扎扎实实的工作上去，鼓到生产上去。

第三，现代化企业要认真发动群众。大庆石油会战本身就是大规模发动群众，以搞生产为目的，充分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

第四，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把各项工作的根基打得扎扎实实，牢牢靠靠。

第五，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做到在前线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现、解决问题，总结先进经验；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积极为基层创造方便条件，为生产的需要月盼。

第六，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坚持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打破"唯资格论"和"睢学历论"的框框，从一个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出发来了解干部，做到看根本、看主流，大量发现和培养人才。

第七，培养一个好作风。遵循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教导和中央历次指示，以解放军为榜样，针对石油工业的具体情况，强调树立企业的优良作风，提高队伍的战斗力。

第八，全面关心职工生活。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组织职工搞农副业生产，组织家属开荒种地，走生产自给的道路，对职工生活负起全部的责任，使职工保持充沛的精力，饱满的情绪。

第九，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石油工业的特点，在政治工作中树立生产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和革命化的观点。坚持以提高思想觉悟为主、以表扬为主、以正面说服教育为主、以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为主，全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从生产实际出发，为生产服务。

难能可贵的是，石油部在报告中还总结了会战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错误主要表现在：在会战中，由于职工的觉悟比较高，干劲大，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掩盖了我们在组织领导方面的许多缺点、错误；从勘探到油田开发，发展很快，企业管理上出过很多问题，曾经发生过一些严重事故；虽然我们也解决了一些重大技术难题，但至今还有一些重大技术问题，尚未解决；由于生产发展得很快，新投产的油井和装置

都很多，人员培训工作没有跟上，安排得不及时；有些生产人员，技术水平低，操作不熟练，增加了老工人的劳动强度；在职工生活上，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应该解决而没有得到解决。

石油部的报告最后总结说："今后大庆油田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兢兢业业，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认真地克服缺点，把工作做得更好。"

中共中央很重视石油部的报告，1964年2月5日，中央决定在全国工交、财贸、文教系统和各级机关、团体、部队中普遍传达这个报告，一直传达到基层单位。中共中央在为传达这个报告所发的通知中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

第七节　升华大庆经验

自从党中央肯定了大庆石油会战的成绩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宣传大庆的热潮。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学习大庆经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

《大庆精神，大庆人》是介绍大庆油田精神面貌的一篇综合报道。文章从"延安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为了全国人民的远大理想"、"岩心和赤胆忠心"、"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等方面介绍了大庆油田的精神面貌。文章赞扬大庆人"是一支穿着蓝制服的解放军"，说到了大庆，好像又回到了延安，看到延安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编后语，题目是《崇高的榜样》。其中讲到："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大庆油田的一切成果，集中到一点上来说，那就是由于他们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把高度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学习大庆，首先就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此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了《永不卷刃的尖刀——记大庆油田一二〇二钻井队》、《在岗位上——大庆油田李天照采油井组纪事》、《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大庆油田工人座谈会记录》、《他们是怎样看、怎样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庆油田基层政治工作人员座谈会记录》、《康庄大道——大庆油田自力更生赞歌》等多篇通讯报道。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大庆人的英雄业绩。《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除了宣传大庆这个先进典型，还特别注意宣传大庆人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精神。如《永不卷刃的尖刀——记大庆油田一二〇二钻井队》一文的编后按语《要鼓实劲》讲道："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没有冲天的干劲，当然是无法取胜的。但是，这种干劲，必须建立在对主观和客观条件冷静地分析、正确地判断的基础之上，必须辅之以切实可行的

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使这种干劲成为实劲，而不是虚劲。”与此同时，中央和各地报刊、电台都连续宣传报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事迹和经验。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庆的先进事迹，总结了大庆经验，并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庆的号召。

关于大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道：“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工程，包括设计、钻探、采油以及现代化的炼油厂的建设，完全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的。”周恩来指出，大庆油田的建设，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个油田的建设，也是学习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这个油田的建设，自始至终地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

周恩来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庆石油会战的成绩。他说：“这个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速度是最快的，建设质量是优等的，采油技术和管理水平是很高的，有一些是世界第一流的。”

在肯定了大庆油田的成绩之后，周恩来满怀豪情地说：“现在，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和一些新炼油厂的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站在更高的层面上阐述了大庆经验的意义。他说，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石油工业部、大庆油田，就是这方面的先进典型。

周恩来在报告的最后还特别强调，要在全国各行各业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运动，形成学解放军、学大庆的热潮。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种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要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对大庆基本经验的概括，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它表明，大庆经验并不是哪个人或是哪一些人的创造，而是毛泽东思想与石油工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石油大会战中的生动体现；是党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在特殊条件下的创造性应用。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发至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随着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大庆”这个原来鲜为人知的名字开始传遍全国各地。人们赞颂大庆精神，学习铁人的榜样。表达崇敬之情和学习决心的来信开始从四面八方飞到大庆，飞到王进喜手中。有一段时间，王进喜每天都要接到10多封各地的来信。1964年上半年，王进喜应邀到北京作报告。他的报告，在中央机关、北京市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人们经历了重重困难和曲折之后，听到这样

一个长我志气、扬我国威的生动报告，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感到了振奋和鼓舞。年底，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他还代表全国工人作了大会发言。

关于那次发言，他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康世恩还手把手地教他怎么讲。在繁星满天、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王进喜面对万余名听众开始了讲话。开始时，他多少有点拘谨，为了不讲错，他用手在讲稿上比着一行一行地讲。他的讲话以大庆会战为背景，以1205队和钻井二大队工作为主线，重点汇报了大庆工人阶级迎着困难上，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与各种困难斗，终于取得了会战的伟大胜利。他的讲话内容充实，事迹感人，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鼓掌时，王进喜也跟着鼓掌，但是等鼓掌过后，他却找不到自己刚才讲的那一行了。他索性脱开讲稿，按照自己准备好的内容讲了起来。他讲得自然、生动，又有气魄。当他在大会堂朗诵起自己的那一首短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整个大会堂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王进喜成为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被请去参加座谈，到各单位作报告。在北京作报告时，他经常被热情的听众围住，人们请他签名，请他合影。有时他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立刻会有成百成千的人围住他，以至于不得不请警察出来帮助维持秩序，疏导交通。

王进喜成为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明星，成为那个时代最受人爱戴的英雄。

第八节　"工业学大庆"

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成绩及其成功经验，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坚持会战，拿下大油田，大庆人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当时经济形势严峻，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投资，但搞会战，拿下大油田又必须有财力支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买醋的钱不能打酱油，打酱油的钱也不能买醋。当时担任石油部分管财务和农副业工作的副部长李人俊就想出了几条非常措施：一是将开发试验区生产的原油，作为试生产出油，只上交税金，不上交利润。1960年生产原油97万多吨，李人俊建议每吨定价130元，当年就筹措资金上亿元；二是建立油田维护费，每出一吨原油，提取6元油田维护费，作为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费用；三是加快提取油井、设备的折旧，用于设备更新；四是每吨油提取1元钱的科研试验费。这些重要措施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得到实施，不仅解决了大庆会战时资金紧迫的问题，而且对石油工业长期稳定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大庆的的这些做法表示赞许。他说："大庆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他们打破了一些框框。

1964年1月下旬的一天，余秋里接到通知，说毛泽东约他去中南海谈谈。等余秋

里按时到达毛泽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会额厅时，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领导人已经坐满了会客厅的沙发。余秋里和毛泽东握了手，又向在座的各位领导一一致意，然后在李富春身边坐下来。

毛泽东当时心情很好，满面春风的样子。他笑着说："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石油大会战吧！"

余秋里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出这个题目，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据《余秋里与石油大会战》一书披露，余秋里在去丰泽园的路上曾盘算过向毛泽东汇报些什么内容。当时他想，自己汇报石油工业发展情况时，毛泽东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讲过了的内容没必要再讲。还不如讲一讲今年计划在渤海湾盆地的会战，这场会战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准了。想好内容后，他还在路上为自己草拟了腹稿。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还是要听他讲大庆石油会战的情况。

陈云似乎是在给他壮胆。陈云说："余秋里，讲嘛，讲讲大会战的情况嘛！"

"主席，我有一个想法，"余秋里开始讲道："我们在松辽搞的这个石油大会战，能这么快地取得胜利，关键是靠'两论'起家，靠学习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

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着说："余秋里呀，我那两本小书有这么大的作用么？"

余秋里严肃地说："主席，我觉得这两本书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

毛泽东收起笑容说道："这个《实践论》比较好看，《矛盾论》比较难读。"

余秋里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主要学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接下来，余秋里就开始向毛泽东和在座韵各位领导系统地汇报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经验。他虽然对这样的汇报事先并无准备，但对他亲身经历的那场大会战可说是如数家珍。因此，讲的内容丰富，有条理。他原来计划讲半个小时，不知不觉中竟讲了两个半小时。

听过余秋里的汇报，毛泽东感到很满意。他笑着说："我看这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嘛！"

这次汇报后不久，在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业学大庆"。毛泽东的号召，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促进了各行各业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深人开展。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那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很重视那次宴请客人的生日酒会，就连哪位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他都亲自列了单子，交给汪东兴等人去办。

那些天王进喜正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人代会散会时，王进喜被通知不要走。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人。不一会儿，周恩来把他们领到一个休息室，朱德已等在那里。见面后聊了几句，周恩来又把他们领到一个小宴会厅，看到那里已经摆好几张桌子，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等在那里。他们这才知道是毛主席过生日，请他们几位来吃饭。

没过几分钟，毛泽东来了。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王进喜等人被安排在主桌，挨毛泽东依次落坐。董加耕坐在毛泽东左边，挨着董加耕的是王进喜，邢燕子在毛泽东右边，她身边是陈永贵。王进喜左边是余秋里，依次还有曾志、钱学森、彭真、罗瑞卿等。

人们坐定后，毛泽东开始讲宴会的开场白："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

对于几位劳模，毛泽东一个一个地问情况。谈到大庆时，毛泽东说，余秋里和石油工人们一起搞出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

这顿饭吃得很简朴，桌上摆了红、白、黄三种酒，共有12道菜，以蔬菜为主。王进喜没喝酒，吃的也不多，很少说话，就是坐在那里看毛主席，听毛主席讲话。他看到，毛主席71岁的人了，身体很健康。席间，毛泽东给四位劳模都夹了菜，还不断地吩咐服务员给他们添饭添菜，叫他们一定吃好。

毛泽东过生日，自己的孩子不叫参加，特意请劳动模范和那么多国家领导人一起吃饭，这对王进喜来说是最高的奖赏。王进喜把这看成是大庆工人的光荣。毛泽东在席间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要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第七章　学大庆带来中国工业新气象

第一节　大庆经验现场会

大庆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高质量、高速度拿下大油田的成就，很快引起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广泛关注。东北三省的工交企业由于地理的便利，“近水楼台”，在学习推广大庆经验中一开始就走在了前面。

1963年10月，在党中央正式号召学习大庆之前，中共东北局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推广大庆经验。与会者一致认为，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不仅适用于石油战线，而且具有普遍意义，是东北地区工业交通战线出现的新事物，应该在全区推广。会议决定召开大庆油田现场会议，推广大庆精神。会前，东北局派出工作组到大庆油田，与石油部领导一起搞调查研究，为开好现场会作准备。10月下旬，东北局在大庆油田召开了东北地区工业交通企业基层工作经验交流会。东北三省和15个市的工交部门及101个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石油部长余秋里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的负责人也亲临会议。顾卓新代表东北局在会上讲了话。会上由会战副指挥张文彬等人作了“关于油田会战概况”、“在油田建设中打歼灭战”、“建立基层岗位责任制”、“油田地质科学研究”、“井下作业十大技术”和“会战政治工作”等报告。阜新机械厂、辽源发电厂、齐齐哈尔华安机械厂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现场会结束后，东北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大庆油田现场会议的报告》，报告从大庆油田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做大量细致艰苦的基础工作、加强基层建设、大胆突破技术关、搞好职工生活、建设好领导班子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总结概括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

为了进一步推广大庆经验，1964年1月，中共东北局发出《关于切实推广大庆油田经验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说：东北局决定在全区工业部门和工业交通企业中普遍地学习和推广以大庆油田为主的各项先进经验。大庆油田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农业、财贸、科学、文教部门也要认真学习和运用。

1964年初，大庆油田组织报告团到沈阳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直属机关干部作报告，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还会见了报告团的宋振明和王进喜等人。

第二节　“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工业、交通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都十分注意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和大庆精神，注意学习大庆“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学习大庆人为国分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太原化工厂七车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个车间从1964年年初开始学大庆。当时领导干部只是在会上给工人们讲要学大庆“三老四严”的制度，学大庆大搞技术革新和苦练基本功。但没从思想上帮助工人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没有从“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下功夫。结果刚开始，规章制度制定了不少，执行起来也还有板有眼。但时间不长，就有些人松劲了，执行制度不再那么严格了，干部夜间也不来“止岗”了。有些人一看干部尽放空炮，也跟着松了下来。这样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学大庆就变成了“一紧二松三落空”。

1965年第四季度，这个车间重新组织学大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厂领导干部反复给大家讲学大庆的重要意义，并组织大家学习有关大庆的文件。车间领导在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指出过去只是学习人家的制度，没从大庆人的精神学起，只是追求形式，所以全车间没学好大庆。在大家自觉学习的基础上，车间还发起了找差距、找教训的活动，全车间总共找出72条差距。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这教训那教训，最主要的教训是前一段只学形式，不学精神，只摆样子，不出实力。

差距找到了，他们就以大庆精神之“矢”，射自己如何实现革命化之“的”。有些人过去总觉得在化工厂工作，车间里气味难闻，技术低，没前途。通过学大庆，他们懂得了干化工也是为了革命。大伙在操作中都能自觉地遵守制度。在苦练技术基本功的时候，他们从严、从难出发。以前如果谁提出，要在夜间关了灯能操作设备才算技术上过硬，别人就觉得难度太大了，根本达不到。通过学习大庆精神，勤学苦练，大家都能在夜间关了灯熟练地操作设备了。

通过学习大庆精神，整个车间上上下下信心都很强，劲头足。他们决心把大庆精神真正学到手，誓作‘王铁人’式的工人，建成大庆式的车间。

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还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注意培养自己的先进典型，树立自己的“大庆”。

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我国工业领域的重点单位。用这个厂党委副书记王黎山的话来说，在学大庆以前，他们对自己周围的先进事物缺乏敏感，对于群众中的许多先进典型没有进行认真的培养和总结；有些好的经验，虽然被发现了，但是树得不高，推得不广，没有坚持下来。

大庆经验在这一点上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很大启发，他们开始认识到，要学好大庆

必须抓住树立先进典型这一条。因此，从1964年以后，这个厂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挂帅，深入基层，注意培养、总结自己的先进典型。这个厂所属的车身厂有一条车轮生产线，职工们坚持八年大搞技术革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在这条生产线上搞了60多项革新，台台机床、道道工序都有革新。通过革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把工人从每天需要搬运15吨零件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大大改变了车轮生产面貌，使产量由53辆份提高到120辆份。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蹲点以后，类似这些长期埋藏在基层中的"宝贝"被一一发掘出来。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蹲点，还和基层干部一起，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大庆式经验。如发动机厂开展家属工作的经验和加强集体宿舍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热处理车间电气焊小组做后进人工作、改造落后小组等工作经验，底盘厂大搞"三变样"的经验等。从1964年初到1966年初的两年时间里，这个厂先后四次比较集中地总结、树立了自己的样板，使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有了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先进典型，这就有力地推进了学大庆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学大庆运动中还注意学习其他先进单位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注意将别人的先进经验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意在运动中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1965年第三季度，他们听说马鞍山钢铁公司文明生产搞得好，就号召全厂学马钢文明生产经验。但是，号召是提出来了，行动却不快，声势不大，成效不显著。不久，这个厂所属的底盘厂提出了"三变样"的口号，他们提出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争取在职工的精神状态、生产技术、文明生产三个方面都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厂党委发现这个苗头以后，领导干部亲自挂帅，深入基层，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并在适当时机，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这样一来就把全厂文明生产活动带动起来了。现场会以后，每天都有不少人去底盘厂参观、学习，很快形成了一个"学底盘、赶底盘、超底盘"的热潮。这种形势又促进了底盘厂，使他们感到"形势逼人"，要不断前进才行。这样，全厂的学大庆运动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锦州铁路局的例子也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局在学大庆运动以前，也曾树立过一些自己的先进典型，例如在全局开展的机车满载、超轴和安全运行500公里的"躺超五"运动中，就注意总结和推广孙福佑调车经验、袁成龙机车操纵经验、杨维学机车焚火经验等。这些经验的总结与推广，尽管对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些技术业务领域的具体经验，局限性较大，只能在相关技术业务部门和个别工种推广，其他部门、工种的职工很难学习。

通过学大庆，使这个局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们发现大庆树立的王铁人、三矿四队等典型，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典型。大庆的这个经验给他们很大启发。后来这个局在总结孙家工区经验的时候，就没有单纯去总结他们的养路方法和怎样搬砂丘、治病害、灭草荒，而是着重总结他们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愚公移山"的革命气概，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作风。在总结新民车站经验的时候，就不是单纯总结他们怎样美化站容，装饰图表等，而是集中地总结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总结张德有的经验时，不仅总结他怎样练硬功，更重要的是总

结他用什么思想去练硬功，突出了他“为人民而练”的思想。这样总结出来的典型不受部门、工种的限制，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生命力强，能巩固持久。

锦州铁路局在树立自己先进典型的过程中，注意学习大庆“两分法”走路的经验。过去他们一讲典型就追求完美，在总结典型经验的时候，只注意总结成绩的一面，对缺点和问题注意不够。通过学习大庆的经验，他们认识到，对先进典型的态度应该同任何事物一样要一分为二。首先，发现典型时要全面衡量，看主流，看本质。只要看准苗头，就要抓下去，帮助它，扶持它，提高它，使其健康成长。这个局的先进单位孙家工区、新民车站和陈淑华、张德有等先进人物，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新民车站，最初各部门发展不平衡，客运部门好于货运和运转部门，而且安全生产方面还不够稳定，但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主导方面。锦州铁路局领导抓住这个先进苗头，不断帮助培养，使其不断得到提高。

第三节　对照大庆找差距

1966年2月，《人民日报》社记者邀集西北五省区部分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座谈学大庆运动的经验和体会。与会者在发言中，交流了学大庆运动的经验，畅谈了学大庆的体会，有的还对下一步的运动作出了计划与安排。

青海石油管理局政治办公室主任陈启发在发言时说：我们同大庆的差距很多，人的革命化不如大庆，这一条是最根本的差距。刚开始学大庆时二我们那里有人说：“像大庆人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地干，三天五天可以，三年五年就难了。”也有人对大庆“会战六年如一日”感到不能理解。这就是人的革命化的差距。思想没有革命化，对大庆经验就感到不能理解，接受不了，也就学不到手。大庆经验告诉我们，带队伍，一带思想，二带作风，三带方法和技术。因为职工队伍有了革命思想，有了革命作风，才会有顽强的战斗力；再加上好的方法和技术，就会使任务完成得更出色。陈启发还介绍说，从1965年以来，他们从上述三个方面下功夫学大庆，使大庆的革命精神在群众思想上扎了根，就开始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石油部六五〇二生产队中队长朱和增谈起自己所在单位学大庆的经验时发言说：我们学大庆，一学大庆“严”字当头，从操作上、技术上、管理上严格要求；二学大庆生活设施从简，自己动手盖房子；三学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实行岗位责任制；四学大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励全体职工同大庆比干劲，找差距。他还介绍说，前一个时期，我们的材料部门学习大庆送材料上门，没有学好。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没有把人家的精神学到手。大庆职能部门为基层服务的思想明确，熟知生产情况；我们不了解生产需要，送下去的材料用不上，工人自然不欢迎。

兰州化肥厂徐永春工长介绍他们厂学大庆的经验时说：以前我们学习大庆那样建立交接班制度，处处严格要求，但是由于人的思想没有跟上，收效不大，“严格要求”变

成了互相挑剔，甚至影响到工人之间的团结。后来我们体会到，人的思想没有革命化，光是要求严格，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于是，我们便着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还轮流把班组长送到兰州炼油厂，学先进找差距。这样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收效就比较大。过去我们厂的设备状况不很好，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现在设备的完好率大大提高，生产计划也完成得比较好。

新疆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政委杨培臣发言说：我们开始学大庆时，先学职工宿舍“五条线”，后来体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是首要的，便从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人们思想面貌改变了，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文明生产，搞五好设备和工作条理化，树立了严细作风。过去，我们厂因为修理质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台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学大庆以后，修理质量提高了，许多农场都争着把拖拉机送来修。

西北国棉一厂厂长边丰在发言中谈到，企业学大庆，关键在领导。他说：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是领导的问题，是企业党委的问题。我们认为，哪里有好领导，哪里都能出“王铁人”。工人都愿意学大庆，都愿意像大庆那样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就看领导得好不好！

边丰还从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进一步谈了学大庆的问题，他说：要真正把一个企业办好，非学大庆不可，非走大庆的道路不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然是方向，就要从上到下目标一致，有一个通盘的规划，不要只是喊一喊，抓一阵，就算了事。石油部系统为什么学大庆学得好呢？是石油部抓得好，抓住不放。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学大庆学得好不好，要上面来负责。责任还在我们自己。但是，要使本系统的企业成为大庆式的企业，领导机关就要学石油部那样从上到下，一抓到底。

玉门石油管理局代局长余群立对此深有同感。他在座谈会上说：群众学大庆的心很切，情绪很高，斗志很旺盛。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问题在领导方面。大庆的群众路线就贯彻得很好。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从哪里来的？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什么就抓住不放，抓什么就什么成风。玉门很早就搞过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当成基层建设的根本问题抓住不放。因此，起来了，又下去了。

余群立还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角度谈了学大庆的体会。他说：大庆的干部有很多都是从玉门去的。到了大庆以后，他们生龙活虎，办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庆的领导干部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去启发干部的思路，使人开窍，敢于破旧，敢于立新。我们对干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许多活事都办死了。大庆对干部的批评也很严，有时批评得你满头大汗。但是，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为什么呢？因为大庆领导干部很了解人，批评的是地方，能够激发人的干劲。要把大庆的这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学到手，需要我们狠下功夫。

第四节　把亏损丢进富春江

经过两年的宣传推动，到1966年上半年，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纸上关于大庆经验的报道越来越多。尽管当时我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刚刚兴起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但是，从总体上看，初期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对于调动工业交通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各地狠抓企业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效率，严把产品质量关等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66年1月27日至3月5日，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提名，推荐出70个大庆式先进单位。会议认为，这70个单位，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先进单位的代表，是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的学习榜样。

这一批大庆式先进单位当中，有全国闻名的大庆油田；有襄樊棉织厂、潞安硬设备局石圪节煤厂、兰州炼油厂、湖南橡胶厂、上海嘉丰棉纺织厂等5个在1963年受到国家经委表扬的勤俭办企业的先进单位；有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所属的企业，也有各省、市、自治区所属的企业；有冶金、化工、煤炭、石油、电力、建筑材料、林业、机械、农业机械等部门的重工业企业，也有纺织、轻工、手工业部门的企业，以及铁道、交通、邮电、地质和物资部门的企业；有工业交通企业，也有新兴的工业地区。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认为，推广这70个大庆式企业的经验，将会进一步促进工业交通战线学大庆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达到新高潮。

富春江冶炼厂是这次会议推荐的大庆式企业之一。《人民日报》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称这个厂“学大庆学到了点子上”。

富春江冶炼厂，是在1958年用土法建成的一个小工厂，初建时，全靠手拉风箱的土炉生产，炼出的第一炉半成品只有4.15公斤重。经过职工几年来的努力，特别是学习大庆以来，这个工厂的生产水平迅速上升，逐步建成了一个土洋结合、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小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在建厂最初的几年里，这个工厂虽然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但由于企业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经济核算起来连年亏损。1963年企业党委书记伊方安和厂长于金銮参加杭州市委召开的工业会议，听到许多兄弟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开始感到自己头上戴的“亏损帽子”是一种压力。1964年年初，企业开始响应上级号召学习大庆的先进经验。工厂领导召开专门会议向全厂职工传达了大庆经验，职工群众情绪激动。大家立志摘掉亏损帽子，要把亏损帽子“丢到富春江去”。职工们的决心书、保证书，在几天之内贴满了车间、宿舍、食堂的墙壁，要求工厂党委马上挥动大

旗，领导大伙闹革命，摘掉亏损帽子。

职工群众的决心，使企业领导感触很深，工厂党委一连开了多次会议，最后在领导干部中统一了认识。他们认识到，要领导职工群众革企业落后的命，首先要革思想落后的命，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自我革命。通过学习大庆经验，富春江冶炼厂的领导干部认识到，一支好的职工队伍，是靠好的领导干部带出来的。而领导干部要有过得硬的好作风，跟职工群众保持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的联系，必须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参加劳动，真干、实干。

工厂党委书记伊方安是参加劳动最过得硬的一个干部。他从大庆学习参观回来后，第一个搬到工人宿舍去住，到最艰苦的岗位，拣最脏、最重的活干。他赤膊背石头，手脚都磨起了泡，背脊晒得油黑，从不叫苦。工人们说他活像个人民的“老黄牛”。

全厂各科室工作人员在企业领导的带动下，也纷纷下到车间去参加劳动。哪里困难，哪里是关键，他们就到哪里干。严冬时节，矿山最冷，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推矿车；三伏酷暑，炉前最热，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搞冶炼。各主要工种，不论日班、夜班，都有干部在那里顶班劳动。他们逐步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做到既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在1964、1965两年间，全厂干部平均每人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

干部通过参加劳动，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加关心工人的劳动状况。冶炼车间的烧结工序，是全厂劳动条件最差的地方，温度高，硫气重，灰尘多，费力大。过去，干部一般不到这里参加劳动，对工人的疾苦没有体会，因此，当烧结块的生产跟不上生产需要时，厂长批评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埋怨工段长，工段长就责怪工人。工厂党委和有关科室的干部在这里顶班劳动后，亲身体会到操作中的劳累，把改善这里的劳动条件看作是一个关系群众观点、生产观点的大问题。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用机器制团的新工艺代替了原来的落后办法，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节约了三分之二的劳动力，降低了成本，产量也成倍增长。

通过学大庆，这个厂生产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学大庆的第一年——1964年，他们摘掉了建厂5年来连年亏损的帽子，向国家上交了数目可观的利润；学大庆的第二年——1965年，他们又在生产上实现了大的发展，产量比上一年提高了一倍，上交利润超过了1964年的三倍以上，有些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赶上或超过了国内先进水平，手工操作基本上改变为机械化。他们还大搞综合利用，除主产品外，又搞成了包括两种贵重金属在内的五种副产品。

第五节　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上海卫海铁工厂是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推荐的另一家大庆式企业。

这是大上海的一家小工厂，1958年，卫海铁工厂刚成立时，厂里的工人还天天与铁锤、风箱打交道，沿用着传统的手工方式从事生产。从1960年开始，由于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这个厂面临着原材料不足、燃料不足、生产任务不足等困难。由于前几年盲目贪多求快，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当时厂里的产品，三分之二是等外品，三分之一是二等品。企业内部不团结，部分人自由散漫习气比较严重，劳动纪律松弛。

在困难面前，工厂党支部带领职工奋发图强，他们通过"亿苦思甜"，忆出了一个坚决克服困难的精神面貌。干部和工人，在困难面前，亲密无间，无所畏惧。

这个厂的主业是生产钢板弹簧，但当时生产任务不足，他们就主动承接了其他大型设备的加工任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厂从上到下都努力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意识。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没有文化，以往工作多凭自己的经验，因此操作很不统一。副厂长吴庙祥也只读过5年小学，但他肯动脑筋。他带着几个工人，在热处理工段观察老师傅们的操作，并如实地把三个技术最好的工人的操作描绘记录下来，又组织群众反复总结、讨论，最后制订了41条热处理工艺。制造钢板弹簧的40多道工序，就这样有了新的工艺操作规程。一套严格的检验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一套科学的测试设备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了。而且，企业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到1963年，他们自己制造的设备增加到50多台，全厂85%的操作实现了机械化、半自动化。

卫海铁工厂的产品质量从此迅速提高。单片钢板弹簧的寿命，从七八万次提高到25万次。1963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产品的质量被评为先进。

当上先进之后，卫海铁工厂没有止步不前。工厂党支部组织全厂职工学习毛泽东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职工们把自己的钢板弹簧质量，跟国内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厂比，比出了6项差距；与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更大。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工厂领导及时提出：在1964年内赶上长春第一汽车厂！

卫海铁工厂的设备经过几年的技术革新与改造，虽然较之从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与长春第一汽车厂相比，毕竟还相差很远。有人说，长春是"三新"，即现代化的厂房，现代化的设备，第一流的技术队伍。而卫海铁工厂是"三老"，即厂房"老"，三分之二是芦席棚；设备"老"，绝大部分是土设备；人也"老"，文化水平低。

小厂能不能赶上和超过大厂？"三老"能不能赶上和超过"三新"？卫海铁工厂的职工们从学习大庆精神的过程中，看到了这种可能。职工们说："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草原，凭着一股革命志气，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技术第一流的大油田。我们头上还有芦席棚，脚下还有煤渣地，条件比大庆好，为什么赶不上长春？"大家分析："三老"是赶长春的不利条件，但是也有有利方面：设备是自制的土设备，专用性强，工人使用熟悉；厂房破旧，可以激发自力更生的精神；老工人在旧社会受苦深，阶级觉悟高。于是，卫海铁工厂的职工提出："头顶芦席棚，脚踏煤渣地，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要消灭与长春的6个差距，关键在于制造"三机"：造出喷丸机；造出更高水平的卷耳机；造出一批新型的淬火机。

全厂抽调专人组成了造“三机”的攻关队伍。“三机”的零部件上千，需要有加工设备。厂里没有足够的机床，他们趁兄弟厂休息的时候，借人家的设备干。试制新的机器，厂里没有合适的场所，他们把放废料、堆煤的地方清理干净，搭个架子，拉上油布，就在油布棚下干。大热天，喷丸机机身像个烘箱，他们还是钻进机身去凿、去锉、去刮。台风暴雨季节，一阵雨过，场地一片泥泞，大家还穿着套鞋继续干。有的零部件，是工人们用凿子凿、锉刀锉、手提砂轮磨，一点一滴“修”出来的。

1964年，“三机”制造出来了，卫海铁工厂实现了“三老”赶“三新”的目标，赶上了长春第一汽车厂。这一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又被评为全国新技术先进厂。

卫海铁工厂在学大庆运动中注意学习大庆人敢于迎着困难上的勇气和志气。副厂长顾耀祖谈起学大庆的体会时说：“不怕生产上一穷二白，就怕思想上一穷二白，没有志气。只要有志气，即使没机器，也可以造出机器来。如果没志气，即使有机器，也可能没有多大作为。”他还说：“机器都是人造出来的，技术都是人去掌握的。外国人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只要有志气，又肯下功夫，为什么他们能干出来的事，我们就不能干出来呢?”

第六节　全国处处有大庆

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国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在这场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对大庆的宣传还比较客观；对于各地学大庆的要求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动与布置，大体上能够结合各地的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因而，学大庆的内容比较扎实，成就也是丰富多彩的。

当时，对于先进典型的宣传还较少片面化、绝对化、神秘化的倾向，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十分强调要将大庆经验与本地、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注意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树立自己的“大庆”。

坐落在北部湾畔的北暮盐场，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原来，这里的盐田总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生产落后，产量很低，最高年产量不过3000吨。解放后，生产有了发展，但企业的规模仍比较小。1964年，党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北暮盐场的干部、工人决心以大庆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盐场面貌，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1965年底，北暮盐场学习了兄弟省改造旧盐田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造旧盐田的计划。这就是，把盐场一工区1.05平方公里高低不平的旧盐田加以改造，实现扬水、顺水自流化；同时，把这些盐田上的500多个石子铺底的结晶池，挖去石子，铺上陶片，实现结晶池陶片化。

计划做出后，全场130多名盐工便顶住各种压力，投入了改造旧盐田的斗争。他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要投资。没有陶片，他们下班后挑上泥箕，步行二三十公里，到合浦县城附近的一个陶器厂去拣碎陶片。有些盐工还回家动员自己的亲属也东村西舍地帮助找陶片，然后一担一担地送到盐场。在工人、家属的共同努力下，盐场没花国家一分钱，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将61块盐田铺成陶片结晶池。这些结晶池，由原来开晒四天才产盐，变成只要有半个连晴天就可以收盐，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

1966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锦州建成大庆式新兴工业区》的长篇报道，在同一版，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全国都能有大庆》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我们伟大的国家里，大庆精神到处可以发芽、滋长、开花、结果。……应该说，全国各地都能有大庆。"社论强调："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各地区、各企业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3月21日，《人民日报》在《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创造更多的大庆式企业》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各地学大庆的先进典型事迹。

《人民日报》在为此发表的"编者按"中指出："学大庆应该从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应该把大庆的先进经验同本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兄弟单位的任何先进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不通过总结和推广自己的经验，是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学大庆，都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才能把大庆的经验真正学到手。"

值得重视的是，在上述《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编者按"中，不仅讲到了学大庆、赶大庆，还提出了"超大庆"的口号。而且各地在总结出的学大庆的先进经验中都反复强调，学大庆首先要学大庆精神，不能单纯照搬大庆的某些制度。

第八章　大庆靠“两分法”继续前进

第一节　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兴起后，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摆在了大庆人面前：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

在成绩、荣誉、赞歌和颂词面前，多数大庆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但也确有一些人头脑昏沉沉，脚步轻飘飘。有人头脑开始发热，看成绩多，看缺点少；看有利因素多，看不利因素少，不重视实际困难和解决具体问题，一味盲目地带领群众打冲锋。因此，1964年初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有一个钻井队，安装的井架还没有校正好，就急忙开钻，井只打到一半，井斜就超过了规定。这种情况引起了石油部和大庆工委领导的警觉。余秋里等人意识到，大庆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这个考验，不是过去那种艰难困苦，而是成绩和荣誉的考验。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关系到大庆油田乃至整个石油工业能否继续前进。

还在石油会战正紧张进行、成功已经在望的时候，石油部领导就已经警觉到在成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重要性。

1963年6月，余秋里在一次全国石油系统电话会议上专门讲了一番如何正确对待荣誉的问题。他说：“我最近看到一些简报，想说一个问题：不要居功，不要贪图名利，不要宣传我们个人，不能接受这种精神享受！谁要搞这个精神享受，突出个人，我看就要身败名裂，受到历史的惩罚！当然，我们的英雄人物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们是革命的红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干部就不一样了，我们要谦虚谨慎，埋头工作，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分。玉门送来的一个材料上说，洛阳拖拉机厂去那里参观，里面有两句话，我看是胡说八道！一句是‘以余部长的作风为榜样’，一句是‘我们厂的领导享有很高的威信’，太不严肃了！谁对这样的话满意，听了心情舒畅，说轻一点是头脑发昏，说重一点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什么余部长的作风？什么厂领导的威信？简直是胡吹！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普通干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党员的义务，应尽的职责！任何成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人民群众努力的结果，这个基本点不清楚，有点成绩不头昏脑胀才怪！我再重复一遍：从今以后，第一，报纸再不准出现领导的名字；第二，不要随便题字；第三，不要吹嘘自己！”他的这个讲话传达到基层，在大庆乃至全国石油系

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此后，在大庆《战报》上再也看不到“余秋里部长”这样的字句，取而代之的是“石油部领导”。

1963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党内指示传达下来。毛泽东在这个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很少认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去思索、去工作，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更怕别人批评。毛泽东强调要进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教育，要把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1964年2月19日、21日，石油部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怎样对待成绩和荣誉。余秋里在会上强调：“面对中央的表扬，我们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前进，一种是踏步不前，一种是后退。现在不是你想前进不想前进的问题，大家都在前进，你不前进就落后。我们一定要坚持前进，决不后退。工作要做得更好，做出个好样子。要善于学习别省、别市、别部门的好经验、好方法。要坚持学习解放军。”康世恩说：对于大庆“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靠‘两分法’前进。”根据余秋里、康世恩的意见，会议形成决定：为了防止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组织全体干部和职工学习毛泽东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号召大庆和全体石油职工，以“两分法”为武器，“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对照先进找出差距，并制定改进工作的措施。

3月初，陈毅副总理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归来，在机场见到石油部副部长邓洁。陈毅关切地问起石油部的情况。邓洁对陈毅讲：我们党组讨论了，提出要打着灯笼找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陈毅说：“这就对了，中央表扬了，石油部更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你们自己可要谦虚谨慎，好好做工作。”

3月7日，石油部召开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余秋里在会议上讲话说：“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掌握‘两分法’这个武器，既要看到有利形势，又要看到不利方面，既要看到积极因素，又要看到消极因素；既要保持发扬成绩、优点，更要着重看到缺点，认真地找差距。”他还说：“中央这次表扬我们，我们自己是没有想到过的，我们的缺点、错误和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总的来说，在大的方面我们要看主流，成绩是主要的；而在具体工作中，就必须着重发现缺点，认真改正缺点。”12日，大庆油田专门召开“五级三结合会议”，康世恩在有3000人参加的大会上专门讲“两分法”。他强调：“不但要懂得‘两分法’，而且还要把‘两分法’具体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之中，成为每个人应有的思想武器，成为我们的领导方法。”

为了让事实教育全体干部，康世恩组织大庆会战工委领导成员一面学习，一面到基层蹲点，先后去了35个钻井队，包括1202、1205这样全国著名的先进队，用“两分法”一个队一个队进行分析：成绩是怎么取得的？缺点是如何发生的？用活的事实，大张旗鼓地向职工宣传“两分法”。大庆石油《战报》从年初到年底，经常刊登职工学习“两分法”的体会和用“两分法”找差距的文章。

与此同时，余秋里、康世恩还按照毛泽东关于要把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的指示，派出学习团到外地学习取经。其中有的到沈阳军区和解放军政治学院去学习，有的到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先进部门学习；还专门请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和技术能手钻头大王倪志福、刀具大王金福长、革新能手苏广铭到油田来为职工表演献艺，传经送宝，使大庆广大职工亲眼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随后，大庆会战工委领导成员，对照先进部门、先进单位，对照解放军找差距、找缺点，找自己的不足。不仅领导班子找，还在全油田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暴露缺点找差距。他们从外部找到内部，从工作找到思想作风。找出的大量差距、问题，反映了队伍的思想作风不过硬，也反映了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会战工委领导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首先检查了自己思想作风上的问题。随后，各指挥部的领导干部，分别在大小会议上，向职工面对面进行了检查。他们对照解放军和先进部门，找出18条差距，印发给油田职工进行讨论。康世恩认为，这些问题，有些虽然是基层的具体问题，但反映了我们的工作和思想作风还大有缺点，大有差距。他说：“基层和职工是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问题出在基层和职工手上，根子却在机关和领导干部身上。”康世恩决定召开各级干部和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由领导干部带头在会上用“两分法”检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各指挥部有52名主要领导干部分别在74个会场向3万多名会战职工面对面、实打实地作了检查。

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很多工人也主动检查了自己。他们说：“井打斜了，不能都怪领导，主要是我们思想上有问题。人的思想出了毛病，井就打不好。”在党委带动下，全油田从人到物，从工作到思想，从施工质量到执行规章制度，找出了120万个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震动了领导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和麻痹思想，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这是对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的一次大暴露，将了领导上的军。我们领导思想、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上，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工作上不够扎实，对日常生产中的具体问题要求不够严、工作不够细。

在狠抓整改、反对工作中的低标准、低水平、老毛病的基础上，会战党委根据广大职工的愿望提出了“项项工程质量全优，事事做到规格化，人人做出事情过得硬”的三条要求，各级领导亲自蹲点、总结，树立做到“三条要求”的样板工程、先进单位。总结出了“严细成风”的三矿四队，思想过硬、作风过硬、技术过硬的“硬骨头32139钻井队”等经验。

会战党委在总结1964年工作时指出：第一，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两分法，成绩越大，形势越好，越要一分为二。只看成绩，只看好的一面，思想上骄傲自满，成绩就会变成包袱，大好形势也会向反面发展。第二，对待干劲也要用两分法。干劲一来，引导不好，就会只图速度，不顾质量，结果好心肠出不来好效果，反而会挫伤职工的积极性。第三，领导要及时提出新的、鲜明的，经过努力能够办得到的高标准，引导职工始终向前看。第四，以两分法为武器，坚持抓好工作总结。走一步总结一步，步步有提高，方向就始终明确。与此同时，广大职工也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用两分

法总结工作的制度和做法，如完井整训、阶段整训、单项工程总结、战役总结和年终的全面检查、总结、评比。群众说："脑子里有了两分法，取得成绩喜不倒，有了困难吓不倒，碰了钉子弯不了。我们是靠'两论'起家，又靠两分法前进。"

第二节　解决"注水三年，水淹一半"

1964年8月28日至9月25日，大庆油田召开了一年一度的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当时，中部试验区的开发已进入第5个年头，油田地下暴露出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注水反应问题。油田注水后，一方面效果反应灵敏，油井压力、产量明显上升；但同时问题也很严重，第一排生产井已有60%见水，综合含水已达16.6%，而且平均每个月含水上升1%至1.5%，每采出1%的地质储量含水上升6%至7%。

康世恩对油田开发的形势非常担心，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严肃地指出："注水三年，水淹一半，采收率不到5%，水都淹到脖子上了，这样下去可怎么了得?"

会上大家就此展开激烈讨论，摆差距，找原因，想办法。一次讨论中，小层动态攻关队的人分析说：油田水淹严重的形势主要是少数几个高渗透油层影响的结果。如中区45个小层中，含水较高的只有5个小层，绝大多数小层尚未见水或含水很低，假如依照这个形势自然发展下去，预测采收率只能达到20%左右。康世恩非常赞同这个发言和分析。他说，你们挖出了地下两个"定时炸弹"，一个是照这样开采下去，大量中低渗透油层的原油可能会被高渗透层的水淹没而采不出来；再一个是按照这种趋势任其自然发展下去，采收率将大大降低。他在会上明确指出，在认识油层、分析油田动态上，我们的主要毛病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搞了大量第一性资料，这是好事，是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的，但只是在大量资料、大量数据、大量的名词中兜圈子，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我们的认识只停留在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而不能通过大量的资料，大量的数据消化上升为理性认识。第二，我们对油田动态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实际情况。我们油田是早期注水、内部切割注水，事物已经发展了，而且注水有些太强了，可有些人还是担心注不进去，压力保持不住。这和实际情况距离多远！第三，在分析油田动态时总是千头万绪，矛盾百出，抓不住中心，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第四，缺少"两分法"。我们的油田早注水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但是，有利的一面是根本的，主要的，因为它保持了压力。他还提出，要建立地下岗位责任制，把油层管好。要在全油田开发区内，开展"四定、三稳、迟见术"活动。对每口油井进行"四定"，即定产量、定无水采收率、定见水时间、定压力。要求所有油井在"四定"基础上稳定生产，实现产量稳、地层压力稳、流动压力稳；油井见水要迟，力争较长的盂水采油期和较高的无水采收率。

会后，大庆油田成立了"四定、三稳、迟见水"指挥部，组织50多名，技术人员奋战一个月，编制了注水井分层注水方案。为了迅速使这个方案得到贯彻，组织了有名

的“101”、“444”分层配注会战。就是要对101口注水井、444个层段分层配注。广大井下作业职工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身穿冰淇淋，北风当电扇”，英勇奋战，写下了大庆油田开发史上又一光辉篇章。

在这场分层配注会战中，大庆人发明的“糖葫芦封隔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分层注水后，水淹问题得到基本控制，中区含水率1964年高达12%，1965年下降到9%，1966年进一步降到50%。

1966年，大庆第一次将油田分层开采的科学技术总结概括为“六分、四清”工艺技术。“六分”是：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分层测试、分层改造、分层研究、分层管理。“四清”是：分层注水量清、分层采油量清、分层出水状况清、分层压力清。这一套采油工艺技术，不仅保证了大庆油田的长期稳产，而且对国内各个油田的开发，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创立了多层、非均质砂岩油田开发的基本模式。

第三节　油田上《初升的太阳》

1965年“三八”妇女节，全国妇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请大庆家属代表薛桂芳作报告，介绍大庆职工家属奋发图强、战胜重重困难的先进事迹。全国妇联主席蔡畅主持了那天的大会。蔡畅说：“大庆职工家属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她们为我们全国职工家属，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全场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中，薛桂芳走上了讲台。她心情激动地说：“我们过了好日子，不能忘了旧社会的苦，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没解放的人民，我要在油田上干一辈子劳动，闹一辈子革命。”

在同一天，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还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妇女以大庆妇女为榜样，学习她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她在讲话中说：“大庆职工家属在革命化、劳动化方面，为全国职工家属树立了光辉榜样。”“英雄的大庆职工家属，坚决贯彻执行了大庆油田党委的矿区建设方针。从五把铁锹闹革命开始，到现在全矿区95%以上有劳动能力的家属，都参加了集体劳动。她们积极响应党委的号召，除参加工业生产，还担负起全部农、副业生产的任务。”

大庆职工家属的事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64年春天，孙维世等一批艺术家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到大庆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在此基础上，1965年冬天由孙维世执笔，写出了一出反映大庆职工家属艰苦创业事迹的六场话剧——《初升的太阳》。这年12月中旬，石油工业部党组和大庆党委决定由大庆职工家属自己排演这出歌颂大庆精神的话剧。

由职工家属排演大型话剧，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大庆上上下下对此都很重视。12月12日，大庆家属政治处主任钟珊召开全体大会，宣布接受演话剧的任务。据《人民日报》后来报道，各单位、各部门接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选送了一批思想

好、生产好的家属和工人，几天之内就把演员队伍组织起来。

《初升的太阳》反映的是大庆职工家属破除传统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五把铁锹闹革命"的精神，积极参加石油会战，开展农业生产的事迹。热情讴歌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建设方针。演员们都是在大庆劳动、工作的职工家属和工人。在话剧里扮演家属生产队长辛玉红的是家属缝补工邓淑琴，扮演指导员郭德英的是家属售货员范桂林，扮演铁蛋妈的是大庆五好家属、生产队指导员曲淑琴。曲淑琴还是大庆群众性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1965 年在全国发行的唱片中，有一首《大庆妇女学大寨》的新歌，歌词就是她创作的。

大庆职工和家属们对排演这出戏都很支持。在排戏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来到排练场地，有的当义务"导演"，有的当义务"勤务员"。当演出需要增加个什么布景、道具的时候，一些家属、工人不声不响地做好，送上门来；当谈到某一段戏难演的时候，在场看排练的家属、工人就随时议论起来，帮助设计动作，修改台词。不少家属、工人甚至远路跑来，向演员介绍和角色有关的真人、真事，帮助演员理解、塑造人物形象。著名艺术家孙维世、金山更是一遍一遍地为演员们讲解表演要领。当时扮演家属生产队指导员的范桂林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些演员有生活，但不懂得表演，更不知如何塑造人物。因此，孙维世在导戏时是那么亲切、那么细心，又那么有耐心，从不说我们不懂的专业术语。我们紧张的心情消除了，也渐渐地进戏了。每当表演不合要求让我们停下来时，她总是先说：'好极了，非常好……'而后再指出该如何做、如何演。于是我们也一遍遍地练习，每个人都很努力。"

在各方面的努力与配合下，《初升的太阳》只用了 12 天便排练好了。1965 年 12 月 30 日晚，家属演出队在采油一部礼堂向大庆党委领导做了汇报演出。孙维世和金山比较满意，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第二天上午，孙维世和金山又领着演员找差距，以求使这出话剧尽可能地完善些。

1966 年 1 月 10 日，演出队领导钟珊宣布：《初升的太阳》即将赴京汇报演出，同时还要带上一台歌舞节目。几天之后，这支成立不久的家属职工演出队，便带上他们的话剧和歌舞节目，踏上了进京的列车。

进京后，演出队先是向石油部领导汇报演出。康世恩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亲切接见了演员。随后，郭沫若、刘白羽、杨朔、曹禺、荣高棠等作家和体育名人观看了演出。1 月 31 日晚，他们又在国务院小礼堂向中央机关各部门领导汇报演出。第二天，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他们的表演，并在演出后走到后台与演员亲切握手。在后台，周恩来还指挥演出队全体人员高唱当时人们经常演唱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

1966 年 3 月，《初升的太阳》开始在北京公开演出，观众反响强烈。从 3 月到 6 月，3 个多月时间里，《初升的太阳》在北京总共上演了 133 场，观众达 22 万人次之多。广大观众对来自大庆职工家属的演出给予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和赞扬。几乎每一场演出，都有许多观众流下激动的泪水。观众对演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有时候，戏演完了，许多观众还不肯退场，非要演员们出来讲话，介绍大庆精神和大庆经验。看戏以

后，有些观众跑上后台，赶到住所去探望演员，有些观众自发组织座谈会，畅谈从戏里受到的教育。还有些观众，干脆把台上的人物当作自己的领导和战友，找着去汇报思想，争取帮助。

由于观众反响强烈，一支表演队伍不能满足众人观看演出的愿望，大庆油田又成立了家属演出二队。经过紧张的排练，2月中旬进京。这支队伍较之一队更加年轻，而且排练时间更短，如果从艺术角度衡量，演出可能更显不成熟。但广大观众对他们的演出仍报以热烈的回应。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家属演出二队除了在北京演出，4月中旬又赴济南、烟台等地演出了100余场。而且场场爆满，反响热烈。

第四节　千万不要忘了一分为二

1966年的大庆，春天来得特别早。五一刚过，周恩来总理便第三次来到大庆。

周恩来这次是陪同外宾来大庆的。5月3日中午，康世恩陪同周恩来乘坐直升飞机降落在大庆临时停机场。周恩来一走下飞机，就挥动双臂，向大家问候。

按理说，不管大庆的条件多么差，总可以想办法让总理吃上一顿比较丰盛的饭菜。可事前周恩来就严肃指示：顿顿要有粗粮，餐餐不上酒，菜要吃大庆自产的。

吃过午饭，周恩来顾不上休息，就在大庆工委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南二区6排32井。采油一部副指挥孙燕文介绍说，现在全部油井生产旺盛，保持自喷。周恩来笑着说："你们没有自己夸自己吧？"大庆领导认真地回答说，实事求是。周恩来听后满意地说："实事求是好。"

在炼油厂，周恩来对岗位责任制和巡回检查路线图很赞赏。他说："这么搞责任就明确了。"他还细致地询问了工厂的人员、设备和技术革新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说："你们厂管理得不错，很先进，要继续努力！"

这一天，周恩来一刻也没有休息，从钻台到油井，从工厂到车间，一直毫无倦意，谈笑风生。晚上9点半，大庆工委召开座谈会，周恩来听取了大庆全面工作汇报。周恩来一再嘱咐大庆人："不能忘记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他非常关心家属来矿的安置，农副业生产和计划生育问题。座谈会结束，他又邀康世恩和徐今强谈了建设新型矿区、改革教育制度的情况。周恩来强调要办好半工半读，在油田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对于汇报中讲到大庆油田人人生活在组织之中，人人生活在制度之中，人人参加学习，人人参加劳动等情况，周恩来十分赞赏，并谆谆告诫大庆人一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谈话结束时，已是5月4日凌晨1点30分了。可周恩来仍旧不肯休息。他又到生产会议室看了生产模型、技术革新和油田建设图表。

5月4日上午，周恩来到油田丰收村视察。汽车快进村时，周恩来从车窗看见村北有10名职工家属正在播种，马上让汽车停下，快步向她们走去，和家属们一一握手。

他问身边的一位家属："你这地一埯几株，株距多少，预计亩产多少？"一面问着，一面蹲下去伸手扒开冰凉的泥土，仔细察看播种的深度和株距。他还和蹲在身边的家属们拉家常。听说家属们分别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时，他高兴地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他那和蔼可亲的作风很快使家属们消除了拘谨，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大庆家属闹革命》。周恩来挥动双手为她们打着拍子。唱完后，家属们为总理热烈鼓掌，周恩来笑着说："来大庆，不学会几首大庆歌儿还行？"

随后，周恩来邀请家属们和他同坐一辆大客车回村，还把一个家属让到自己身边的椅子上坐。进村后，周恩来先看了丰收管理站食堂里的全村远景规划图和家属们自制的生产生活用具。站教导员李春云向他介绍了这个站建设新型工农村的成果，他非常高兴地说："好！这样做很好，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

随后，周恩来走进加工食品的作坊参观。作坊里正用机器加工白面面条和玉米面烙煎饼。李春云介绍说，有了这些加工好的食品，家属下工后，拿点粮食兑换一下，一顿饭20多分钟就行了，非常方便。周恩来点点头说："这样很好，粗粮细做，改善了生活，又解放了生产力。"他边说边拿起一张刚烙好的煎饼，细细地品尝起来，边吃边称赞说，比昨天在机关吃的煎饼好。他还风趣地对李春云说："我可没带玉米面来，吃煎饼可不能兑换哪！"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从作坊出来，周恩来又看了村里的理发室、卫生所。最后又到李春云家里作客。周恩来盘腿坐在李春云家的土炕上，从家庭人口谈到丈夫孩子，唠起了家常。周恩来说："干打垒来得快，等条件好了，还可以逐步改善。"

那天11点多，周恩来不顾劳累又来到大庆缝补厂。在厂里，周恩来拿起一件用160多块旧布拼成里子的棉工作服，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高兴地说："好、好，你们要永远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接着，周恩来又由缝补厂党支部书记王凤允陪同，视察了各个修旧利废岗位。他首先走进又脏又累的拆旧班。这里遍地油衣，满屋灰尘。正在紧张工作的家属们，发现日夜思念的周总理站在面前，激动得光知道笑，谁也说不出话来。周恩来仔细打量着屋里的一切，满意地点点头。他一面同大家握手，一面亲切地鼓励说："你们这样做很好，要永远艰苦奋斗！"有个家属刚把手伸到他面前，猛然想起自己手上沾满了油污，就急忙要收回去擦，谁知手已被周总理紧紧握住。这个家属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当时的弹棉房，又矮又窄。陪同的厂党支部书记王凤允考虑到总理的身体健康，在路过弹棉房时就没有多作介绍。可是，周恩来听到机器的响声，又见灰尘不断从敞开的门里飞出，便不顾劝阻，进去同当班的工人一一握手。

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庆视察，一共在大庆度过了28个小时。临回京前，他再三告诫大庆工委的领导成员："大庆是成功的，你们自己可不要忘了一分为二呀！"

第五节 组织进京报捷团

1966年是我国“三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年。大庆工委按照“两分法”前进的指导思想，适时地提出了“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的严峻课题，确立了“支援四川，发展大庆，再创新水平”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形势下，1202、1205两个“标杆钻井队”坐不住了，他们瞄准苏联的一个“功勋队”曾创造年钻40861米的高纪录，提出要在1966年实现“年钻5万米，超过功勋队”的口号。这两个队，一个是连年跃进“永不卷刃的尖刀”，一个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钢铁钻井队”。两队在1965年双双打上了3万米。经过冬训，思想产生了飞跃，设备经过整修和部分更新，战斗力更强。

会战工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两个队要“上5万”，王进喜高兴得睡不着觉。他此时已经被会战工委任命为钻井党委常委、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但他当了干部仍像工人一样坚持劳动。他抓紧一切时间穿梭来往于两个队之间，和他们一起研究技术措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和他们一起一点一滴地想点子，定措施，挖潜力。为了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他们改接单根为双根，把高压管线接头改为连接，把所有零碎备件、小工具分类上爬犁，易损易坏部件配双套等等。

一切准备就绪，1966年1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一，1202、1205两个钻井队打响了“上5万、超功勋”的战斗。

他们确实不愧是标杆队，第一口井就创出了冬季打井的最高水平：用3天二十几个小时，打出一口优质井，井斜在1.9度以内。以后，两个队越打越勇，到4月底就打到了2万米。

5月3日，周恩来陪同外宾来大庆视察。当他听说1202、1205两个队要“上5万，超过苏联功勋队”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对身边的工委副书记宋振明说：“这两个队打上5万米时，国务院要给予鼓励，你要向工人们讲。”说完后，他还亲自到1202队视察。他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钻井大队长王进喜亲自手扶刹把，给总理表演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王进喜对周总理说：“您上次来，钻机用的是柴油机，现在改成电动机了，快多了。”周恩来高兴地边看边问：能打多少米？铁人说，今年保证上5万米。周恩来高兴地举起双手，连声说了三个好。临离开井队时，周恩来又握着王进喜的手一再嘱咐说：“你们这两个队，今年如果都打上5万米，要告诉我。”

周恩来走后，王进喜向工人们传达了总理的心意和嘱托。总理的关怀给两个队的工人以巨大的鼓舞。他们6月份打上了3万米，7月份双双实现了“九开九完”，只用6个月零10天就打井42718米，超过了苏联“功勋队”。到8月18日，两队双双打了上5万米，实现了年初提出的奋斗目标。

当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但在石油系统，运动对生

产的冲击还没有很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大庆1202、1205钻井队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其他油田也不断有好消息传出。比如，胜利油田的32104钻井队登上了一次取岩心102.32米的世界取心技术高峰；四川会战前线打出了产量大、压力高的天然气井。在一口井井喷着火时，32111钻井队全体职工经过30多分钟拼死搏斗，扑灭了大火，保住了这个高产气田。《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向这个钻井队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对运动可能对生产造成的冲击已经有所感觉，为稳定经济并兑现在大庆许下的诺言，进一步促进大庆石油生产和全国工业生产的发展，他指示石油部组织报捷团进京报捷并参加国庆17周年观礼。石油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迅速行动。报捷团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报捷团由大庆1202钻井队、1205钻井队、大庆职工家属的代表和四川石油会战的32111钻井队、胜利油田的32104钻井队的代表组成。王进喜任团长。

9月3日，王进喜带领大庆部分代表来到北京。27日，国家经委、计委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报捷大会。余秋里、谷牧及国务院20多个部委的领导及司局级以上干部2000余人参加了大会。在会上，4个钻井队和大庆家属代表报了捷。王进喜汇报了大庆油田的情况和1202、1205两个队打井上5万米的好成绩。他讲得生动、具体，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当场就有几十张条子，要求他到各部委去做报告。第二天，王进喜与1202队队长屈清华、1205队队长王作福应邀到北京电视台向北京市民介绍大庆先进事迹及大庆经验。

9月29日下午，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报捷团。参加接见的有陶铸、李富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时，周恩来和站在前排的人们一一握手，并和大家一起照了相。周恩来把大庆家属送的南瓜、土豆、玉米看了又看，不断地说："很好，很好，这么大！"报捷时，王进喜把大庆职工和家属的两份报捷书放在一起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没看到家属的报捷书，就问大庆家属怎么没来。王进喜说来了。周恩来又问：报捷书呢？王进喜说放在一起了。周恩来说，还是叫家属们自己来报捷嘛。于是，家属代表又拿着报捷书重新报捷。

报捷结束后，周恩来又留下部分成员参加座谈会。座谈中，当王进喜汇报到1202、1205钻井队的情况时，周恩来问："打到多少米了？"王进喜说："8月份已上5万米。10月2日打到7万米。年内一定要打上10万米！"周恩来说："你们一定要超过美帝！"王进喜说："12月份一定上10万，超过它！"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王进喜等人坐在西平台上接受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那天的庆祝大会上，安排了工农兵代表讲话。代表农民讲话的是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代表工人讲话的是参加四川石油会战的32111钻井队的工人代表王有发。据说，原来安排由王进喜代表工人讲话，但周恩来考虑到32111英雄集体刚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所以就换成了王有发讲话。

在王进喜等人进京报捷的同时，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大庆展览。全国范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第九章　十年内乱：学大庆运动面临严峻考验

第一节　有人要搞乱大庆

1966年，大庆油田原油产量达到了1060.89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72%，在石油工业生产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资源基础来看，虽然大庆油田已经开发了7年，但1966年以前，在大庆已探明的油田中，只运用了一个萨尔图油田，后备资源比较雄厚。开发好大庆油田，对石油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可是，1966年下半年出现的全国性动乱，使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有意扰乱一些经济建设成绩突出的地方和单位的秩序。大庆自然成为他们要搞乱的重点。从这年的8月、9月份，他们就开始了对大庆的围攻。他们先是说，"大庆和平演变了"，说大庆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试验田"。后来又进一步试图全面否定大庆成绩。

1966年10月，大庆展览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尚在初期，国家主席刘少奇虽然受到了严重冲击，但还没有被公开打倒，刘少奇视察大庆的巨幅照片仍挂在展览馆的显要位置。江青一伙发现后，攻击这个展览是"突出刘少奇的黑展览"，说这个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并唆使北师大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去批判。他们在北京大造舆论，说大庆是"刘邓修正主义的典型"，是"刘少奇假共产主义试验田"。陈伯达指使一些人砸了大庆展览，还亲笔写信派所谓"战斗队"、"调查组"到大庆煽风点火。这些人到大庆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鼓吹"踢开党委，停产闹革命"。一时之间，把大庆搞得一团混乱。大庆领导班子17名成员中，16名被揪斗，12名被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后，关进了"牛棚"。钻井、采油、油田建设等二级公司、厂的300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专家都被戴上各种帽子统统打倒"靠边站"。到1966年底，全油田共有6000多名干部被揪斗，占科以上干部的90%。数以万计的一线生产单位的班组长、劳模、技术骨干甚至家属标兵也都受到批判。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被辱骂为"只知生产干活，不懂路线的'老瞎牛'"。大庆油田的生产失去正常的指挥，受到严重的破坏。

1966年10月7日，王进喜带领几名报捷团成员兴冲冲地回到大庆。没有想到的是，他一下火车，来到“二号院”，竟连一个工委领导也没有找到，出出进进的全是一些臂带红袖标的人。在走廊里、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什么“踢开党委闹革甜”，“砸烂工委”，“打倒宋陈季王”。

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王进喜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王进喜最初是衷心拥护的。他曾经喊过“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1966年5月，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王进喜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想要复辟资本主义，在批判会上便情绪激昂地说：“想把我们拉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和藏着黑心肝，戴着红帽子的阶级敌人斗到底！”7月份，大庆成立“赤卫队”，王进喜积极热情地参与，定章程，组织队伍，还当上了“总司令”。8月底，大庆召开“赤卫队”成立大会，王进喜很郑重地给第一批队员戴上红袖标，发了队旗。他当时的想法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引，有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有广大职工的积极努力和实干，这样把革命搞好了，生产也就上去了。

但眼前的情况却使王进喜开始感到不可理解，种种疑问随之产生。随后，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人们做工作，说服群众不能揪斗干部。

那个时候，群众运动还没有触及到王进喜本人，有些造反派组织觉得他是一面可以利用的大旗，想拉他到自己一边。这些人把他请了去，给他戴上红袖标，让他当“顾问”、做“高参”。但他在各种场合的群众大会上总是说：对干部，“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揪斗，不能不让他们工作。”他反复呼吁工人群众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岗位，搞好油田建设。在一次各种串连组织召开的“纪念一二·九大会”上，他情绪激动地说：“红卫兵小将们、工人同志，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不能看着油田工作瘫痪，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油田生产垮下来。大庆原油总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可不能有一点伤风感冒。不得了呀，同志们。我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就要搞好大庆油田的生产！”

单单凭王进喜的呼吁当然不可能平息动乱不已的局面。到了1966年年底，大庆油田各级党组织已基本无法工作，各种造反派组织纷纷“揭竿而起”。“造反”、“打倒”、“砸烂”之声弥漫整个大庆油田，局面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12月26日，大庆1202队、1205两个钻井队双双超过了美国“王牌队”，钻井10万米。这本是大庆乃至全国石油工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但在大庆却连个庆功会都开不起来。当时，主管生产的一位工委副书记看到王进喜还可以在群众组织间活动，就偷偷找到他，请他想办法无论如何要召开一个庆功会。于是，王进喜便在打虎庄原钻井指挥部调度室召开了一次钻井系统100个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联席会。王进喜在会上反复说明，两个队“上10万米”是大事，是周总理关心、鼓励的，是向毛主席报过喜的，不管怎么说也要开一个像样的庆功会；油田这样乱下去不得了，应当有人管生产。他还建议让宋振明、陈烈民主管生产。

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文化大革命”正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演进，任何试图稳定局势的努力都将与这场运动发生冲突。就在王进喜为维持大庆生产秩序而不懈

努力的时候，在北京，有个在“文革”初期迅速窜升的大人物却向他射来一枝枝毒箭。1966年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一个上海代表团时讲话说：“王铁人也表现得很不好，可能走向他的反面。”“他地位发生了变化，影响很大，是个既得利益者，有名有利有地位，还有什么革命要求呢?”

有了上面的“旨意”，北京、哈尔滨和大庆的一些造反派组织便联合起来，要在大庆油田“刮十二级台风”，声称要揪“大人物”，揪“有影响的人物”，要把大庆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他们给王进喜扣上“叛徒”、“工贼”、“铁杆保皇派”等大帽子，开始对王进喜进行批判、迫害。

第二节　庆功会开成了批斗会

1966年12月29日，1202钻井队、1205钻井队双上10万米的庆功大会在大庆八百垧新建的钻井礼堂召开。由于钻井队是大庆油田的“火车头”，这次庆功会引起了全油田的注意。各单位大小造反派组织都派人来参加，北京的《红旗滁志》和新华社也派记者到了会场。

尽管王进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会一开起来，局面马上失控。造反派不仅把油田和钻井指挥部的“当权派”揪上台，还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剃了“鬼头”。王进喜对此非常气愤，在庆功大会的筹备会上，他曾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坚持不揪斗、不批判，好好庆功，但眼下还是出现了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在讲话中，王进喜再次大声疾呼：“02队、05队打上10万米是扬眉吐气的事情，立了大功，我们就要奖励。大庆油田生产是保证全国人民对石油的需要，一点也不能伤风感冒。我们一定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保证油田生产正常进行。特别是采油、煤厂、水电、运销等等单位，生产一天也不能停。相信广大群众有这个觉悟，红卫兵小将更有这个觉悟!”

王进喜的讲话令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大为不满。他的讲话不时被打断。在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们的策动组织下，庆功会开成了批判会、点火会。会后，造反派让那些“当权派”把两头大猪抬上游行，从八百垧转到让胡路，又转到萨尔图，最后到龙凤。使这些在大会战中冲锋陷阵的油田的领导干部无论在身体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迫害。

为了尽量稳定大庆的生产局面，王进喜决定到北京向石油部领导汇报工作，请求指示。1966年的最后一天，他坐上了从哈尔滨至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1967年元旦，他带着一个工作人员来到石油部办公大楼。但那里同样是一片混乱，部机关的造反派、北京石油学院的红卫兵，还有许多油田的、炼油厂的造反派成员进进出出，而石油部的领导都在接受批判。王进喜没能见到康世恩等他所熟悉的石油部领导。

王进喜决定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总理在百忙中出面制止一些人的混乱行为。1月2日晚间，王进喜来到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接待站。通过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给周恩

来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总理，请您抽出一点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大庆的情况。"工作人员在送纸条的时候，请他在后院二楼等候。不长时间，周恩来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的北京，要汇报哪方面的内容。王进喜说主要是油田运动和生产情况。周恩来在电话里说："现在我很忙，大概要你等个十多天！"

当时大庆已经陷入混乱之中，王进喜心里很着急。他急迫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不知道，大庆已经乱了，我担心油田生产……"

周恩来能够理解王进喜的心情，但全国到处都在混乱之中，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想了想说："好吧。你明天先向余秋里同志汇报一下。大约一周后我见你。"

当时余秋里已经奉调担任国家计委主任。1月3日下午，余秋里在京西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听取了王进喜和大庆代表的汇报。王进喜对这位老领导讲，大庆工委已无法工作，基层队长指导员也遭到揪斗，油田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可现在有的人竟然还嫌乱得不够，提出要停产闹革命。这时，一个"群众代表"情绪激动地说："应该停下来。每年冬训不也是停下来吗？今年更得停。"余秋里表态说："停也不是不可以的。咱们来商量一下看看停什么？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业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不能停。停注水行不行？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不能停。供应部门停喽？可油田生产物资、套管、钻杆得提前调进，为全年做准备，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喽？但油田生产需要及时了解地下动态，不能停。运输停喽？那咱们靠什么走路呢？油田生产、生活、吃饭离了运输寸步难行，不能停……"余秋里越说越激动，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大声说："采油不能停，井下不能停，炼厂不船停，水电不能停，科研不能停，维修不能停……"一连说了十几个"不能停"。余秋里接着说："大庆生产不能停。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们和群众组织一起商量在各指挥部建立起一个管生产的班子，人员不要论资格，只要能干起来就行。把真干工作的选出来，把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起来。如果重要岗位人不够可以从其他油田厂矿调一点补充，一定要保证生产正常运行。"

余秋里最后对王进喜说："这次运动不少劳模都受冲击，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不管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临别时他又握住王进喜的手，嘱咐了很多话，最后笑着说："铁人，你铁人也可以造反嘛。但一定要造错误的反，我有错误你就造我的反！"

第二天，周恩来几经调整日程安排提前接见了王进喜。石油部的康世恩、李人俊、唐克等人也参加了接见。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王进喜说："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谈主要的。"

王进喜说："总理，现在大庆乱得不行，眼看生产受到影响啦，实在让人着急。"接着，他把领导干部被揪斗，基层干部受冲击，技术干部被打成"反动权威"不能工作，生产没人管，一些青年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大批的人进京等等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插话问情况。

听完王进喜的汇报，周恩来说："前些日子陈永贵同志也来了，也是为了山西的革命形势。今天你谈的情况很重要。石油是保证国计民生和国防的重要物资，出了问题不

好交待。毛主席很关心石油工业，很关心大庆，我们可不敢掉以轻心。你回去要向干部工人传达，向大家讲，一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决不允许停产闹革命。现在形势很复杂，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清醒。我们都要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原则，不能落井下石。防止在大风大浪里摔跤犯错误。"

第三节　"铁人"遭迫害

带着周总理的嘱托，1月10日，王进喜转道哈尔滨回到了大庆。虽然离开仅10天时间，但大庆更加乱得不成样子：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各级干部、包括班组长都被揪的揪，靠边的靠边。正常工作秩序完全被打乱。这些群众组织都有油印机，都可以贴大字报，出小报，撒传单。他们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大造夺权舆论。

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和讲话精神，王进喜一面深入基层井队、车间、管理站直接向群众传达；一面想争取得到油田群众组织的支持，造成较大的声势，形成统一的舆论。1月13日，经过多方工作，油田几十个有影响的较大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职工医院召开联席会，王进喜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提出要开一次全油田的大会，贯彻总理讲话精神。

王进喜的传达立即引起激烈争论，会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最后会议围绕着"大庆是红旗还是黑旗"，"王铁人是红线人物还是黑线人物"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王进喜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王进喜是铁人是泥人问题不大，我才值几个钱？但大庆油田必须肯定，她是我们广大干部、工人、家属苦干6年干出来的。大庆就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谁要是造大庆红旗的反，广大职工决不会答应，就要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当前革命要搞好，生产更要搞好！怎么搞好？我想最最重要的是贯彻总理指示和'一八讲话'精神。希望大家可不能糊涂，不能含糊。"

王进喜反对停产闹革命，努力维护大庆生产局面的努力，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也成为一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们的眼中钉。在张春桥攻击王进喜之后，1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又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大肆攻击先进人物，号召起来造标兵模范的反。

危险正一步步向王进喜逼近。1月25日，王进喜来到大庆总机厂宣传周恩来指示，动员职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他正和几个工人谈话，突然进来几个人把他抓了起来，弄到一个小黑屋里。造反派的人们拿出皮鞭、尖刀、棍棒，摆上录音机，逼迫王进喜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有男女作风问题"要承认上北京向总理汇报的是"假情况"，要他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他们在大庆召开了对王进喜的批斗大会，大会除中心会场外还设了114个分会场。当时的斗争很残酷，王进喜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让他跪玻璃碴子，要他承认是叛徒、工贼，是"保皇派"。王进喜只是说："我是苦出身，根本就不是什么叛徒、保皇派。我只保毛主席，保党中央，我们打井没

有错。”

当时，大庆的形势十分严峻，有的单位把王进喜“锹走”，轮流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人正声嘶力竭地批判大庆、大庆红旗、大庆精神，王进喜越听越气愤，他呼地站起来，甩掉身上的棉大衣，大声吼道：“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造反派将王进喜关进了“牛棚”，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拿着一份写好的攻击大庆红旗“十大罪状”的材料对他说：“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但铁人不为所动，他说：“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些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这些人在王进喜身上施加暴刑，脖子上挂开水桶，用烟头烫后背，扒掉身上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地，又脚踩在身上。王进喜硬是挺住，没说过一句软话。

由于大庆生产指挥系统被打破，各项行之有效的生产制度和工作制度无法坚持，注水系统不完善，泵站生产不正常，该注水的不注水，新井投产大量增加，而注水量反而下降，油井含水量急剧上升，油田的形势越来越危急。

第四节　周恩来关注大庆

周恩来一直关注着大庆和王进喜的情况。王进喜遭受迫害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庆油田生产形势恶化，周恩来非常痛心，也十分着急。一次石油部的几位领导到周恩来那里开会，当石油部汇报到王进喜受迫害的情况时，周恩来听着听着竟流下了泪水。他哽咽着说：“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王铁人是大庆红旗的模范代表，他对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有功，听说有人把他抓起来，还要打倒他，我很痛心。”后来康世恩回忆说，他一生见到周恩来流过三次泪，为王进喜流泪便是其中的一次。

后来周恩来亲自安排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负责将王进喜接到北京。2月26日，主管石油工业的李富春副总理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王进喜和石油部机关及大庆的群众组织代表。随后周恩来又抽出时间接见了他，并当着一些群众组织代表的面表态说：“铁人是大庆红旗的模范代表，怎样对待铁人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大庆，关系到一大批劳模标兵。”

面对大庆的混乱局面，周恩来心中十分焦虑。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大庆不能乱”。

1967年1月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周恩来接见了大庆油田及其他油田群众组织的代表。为了防止有人借机闹事，在接见之前周恩来作出明确规定：我是接见石油系统群众组织的代表，会场不能有任何带有“打倒”字样的标语；不准揪石油部领导，开批判会我就走；不能喊打倒口号，可喊毛主席万岁。不准录音。

在接见时，有人提出“大庆要停产闹革命”。周恩来说：“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要继续抓好革命，促好生产。”有人提出中央应当派人去大庆了解“文革”

情况，指导运动。周恩来说："大庆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些，大庆红旗不能倒，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我们要爱护这面红旗。"接着，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为什么有的人硬要反对这面红旗？为什么他们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这是为什么？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他还对工人们讲：工友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这么多人离开大庆油田，放弃生产不管，无数的油井停下来了，我们忍心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的抓法？革命串连，我不反对，但总要有个规定嘛！生产部门跟学校不同，学校放假闹革命，生产部门、党政工作机关、事业部门及农村人民公社我看是既要闹革命又要促生产、促业务，革命总不能革得使我们的工作瘫痪吧？你们造什么反？如果你们造反把应该进行的业务工作停下来，那就是造错了方向。

讲到这里，周恩来以自己为例说：比如我吧，我每天几乎都要接见学校的红卫兵，他们是放假闹革命，但我不能放假。我既要革命，还得做工作呀！

针对大庆油田领导干部被揪斗的情况，周恩来扳着指头一一阐述了大庆会战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说："大庆会战，我们靠什么打了胜仗？首先，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其次，靠广大会战职工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再其次，就是全国各方，可以说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单单有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组织这次会战的领导人，没有组织这场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了一个胜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你得承认他们的功绩嘛！"周恩来又回顾了自己视察大庆的情景，他说："我曾三次到大庆，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厂矿像大庆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除了学习解放军，还要学大庆、学大寨，他们是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了的。"

周恩来正讲的时候，秘书走到他身边，轻声对他说："主席来电话，要你到他那儿去。"周恩来只得结束这次接见。临走时，他还讲道："毛主席说，大庆精神是好的，铁人精神是好的，会战很艰苦，应该发扬会战精神，保卫大庆红旗，保卫大庆精神。我相信王进喜同志能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把大庆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搞好。大庆95%以上干部是好的，要解放大庆的干部，大庆生产不能停，停了生产还搞什么革命！"

1月10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代表时又提到大庆。他说：大庆油田1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使许多油井停了下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革命不就落空了吗？

1月16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代表。他非常关注大庆的夺权问题，说，夺权只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业务还是监督好。大庆这面红旗不能倒。大庆的生产已经受了影9向，你们要照顾大局。

2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同工交口的造反派代表谈话，对大庆的情况表示担忧。他说：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甚至反对铁人王进喜。

这时台下的一个代表插话说：还游了街。

周恩来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大庆前几年确实不错，很有成绩，罗马尼亚都承认我们先进。这样一面红旗，我们为什么自己要毁掉呢？有错误允许改嘛！我一提起这件事就很激动。

第五节　非常措施：军管

2月1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代表，他警告说：有人要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注意。我们不得不准备用军队来接管大庆。

针对大庆的混乱状况，周恩来在1月份就考虑过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他曾把余秋里、康世恩找去商量起草一个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稿起草出来以后，周恩来亲自作了修改。在决定的开头，周恩来加写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典型”。在另一处，周恩来加上了大庆军管会由石油部、沈阳军区共同领导。

关于大庆军管的问题，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最后决定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这是继鞍钢之后，中央作出的第二个对大型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

3月23日凌晨，周恩来对《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作最后的审阅。《决定》指出：从3月27日起，由沈阳军区驻各地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管会，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主要任务是：接管大庆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决定》还指出：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要迅速健全和改选各级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工作，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驻大庆油田的外地师生和职工应立即回到本校本单位。

周恩来阅改完毕后，用毛笔在文件首页的上方空白处写下几行意见：

“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这一决定。现送上请予审批。”

文件连夜速传，天快亮时，送到了毛泽东处。毛泽东阅后批：照办。

当天下午，周恩来接见大庆职工代表。周恩来说：中央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等了半个月。今天主席批下来了。这个文件，中央6个常委都看了，军委几位副主席也看了，主席亲自批的。文件第一条说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句话，关系到大庆的政治生命问题。这是总体。这个文件是很慎重的，我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要把这个文件看成是中央的精神。他深情地回顾了大庆会战的历史，说：大庆会战是党中央决定的。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这是考验。大庆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五年工夫石油年产量由97万吨跳到去年的1060万吨，这是伟大的成绩。毛主席从井冈山时就讲自力更生，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谈到下一步大庆的工作，他说：我们要有三个相信，一是相信95%以上的群众；二是要相信解放军；三是要相信多数的干部是可以信赖的。主席说今年三四月看出个眉目来，现在看来要推后到四五月了。

一些代表反映：在大庆串连的院校学生怎么办？周恩来说：军管会管起来，不让他们来串连，叫他们搞整风。毛主席讲，军管后也要整风。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又说道：我对大庆是有阶级感情的。

周恩来对大庆油田的特殊关怀和保护，给大庆油田广大干部和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使大庆油田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没有垮掉。对此，康世恩回忆说：“敬爱的周总理保护大庆油田的举动震慑了‘四人帮’一伙破坏大庆的嚣张气焰，给处在困境中的广大干部职工以巨大鼓舞和支持。不少基层干部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去抓生产。很多老工人把行李搬到油井上，一连几个月黑夜白天连轴转，坚持采油。”

按照中央的决定，3 月 27 日，沈阳军区派出部队进驻大庆，油田所属各单位都派了军代表，成立了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广大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岗位，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作为大庆的代表，王进喜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而且还成了主席团成员。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那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投完票后，主席团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投票。当王进喜投票返回自己的座位时从毛泽东面前走过，周恩来起身把他叫住。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大庆的铁人王进喜。”

其实毛泽东早就见到过王进喜，在 1964 年他还请王进喜出席过他的生日宴会。听周恩来介绍后他站起来伸出手笑着说：“王进喜我知道，是工人阶级的代表。”王进喜也赶忙伸出自己的双手与毛泽东相握。毛泽东风趣地对王进喜说：“你长得很结实，像个铁人嘛！”这时，正好有一位摄影记者在旁边，按动快门拍下了这历史的瞬间。

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王进喜与毛泽东的惟一一张握手的照片。

“九大”选举结果公布了，王进喜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对他讲：“当了中委就有了责任。大庆地位很重要，回去要抓紧工作，要尽快把工委主要领导干部解放出来。”

1970 年 4 月，“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他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大会安排王进喜作报告。他精神饱满地讲了自己对全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设想。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什么也干不成。过去我们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今天我们还应当大吼一声，让世界吃惊。我们有 7 亿人口，如果能生产 3.5 亿吨石油，就实现了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我国是富油国，应当有这个志气，有这个理想！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早已藏在他体内的病魔正在发作。他早就有胃疼的病，会议期间胃疼得突然厉害了，有时疼得豆大的汗珠往下流。玉门医院的大夫给他开设了专门病房，还从酒泉、兰州请来大夫。经过会诊，怀疑是胃里有肿瘤，但不敢确诊。

王进喜很快被送回北京，住进了解放军 301 医院。经多方会诊，最后诊断为贲门癌。

1970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 21 周年庆祝活动，王进喜以中央委员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个半月之后，11 月 15 日，铁人王进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王进喜有句名言：“宁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 47 岁英年早逝，真

的比普通人少活了20多年！

11月18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几天以后，周恩来在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讲到了铁人王进喜。他说："说到大庆，我们大家想一想王进喜同志。他的精神值得学习，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同志！"

第六节　恢复"两论"基本功

虽然实行了军管，但运动对大庆的冲击仍很严重。到1970年一季度，已开发的萨尔图油田和1966年新投产的杏树岗油田生产形势陆续恶化，并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据大庆油田对583口油井的调查，平均单井日产量下降了7%，有61%的油井减产。与此同时，油井含水上升率高达6.78%，超过正常速度两倍多。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1970年3月18日，周恩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并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在贯彻周恩来这个批示的过程中，大庆油田又恢复了岗位责任制大检查。3月26日，大庆召开了与"文革"以前相连接的第51次岗位责任制检查总结大会。10月，又恢复了由于"文革"而中断的一年一度的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这年4月，燃化部副部长孙晓峰率领工作组到大庆。为解决地下形势恶化问题，经过研究，决定开展"八四三"会战。到年底，抢建油井682口，注水井190口，全年产量有了回升。从1971年起，恢复了每年一至二次地下情况大调查，加强资料录取和分析研究，使油田调整更有针对性，逐步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到1973年，地下亏空得到弥补，地下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油田开发重新走上科学的轨道。1973年，全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

在大庆油田进行调整的时候，国家能源缺口越来越大，不得不大量烧油。1970年，全国烧油达1075万吨，比1966年的234万吨增加了三倍半。到1975年，烧油已达3000万吨以上。为了适应当时的紧迫需要，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将原来作为后备的喇嘛甸油田投入开发。

大庆油田于1972年10月开始编制喇嘛甸的开发方案，1973年4月开始钻井。经过两年建设，1975年全部建成投产，原油产量达到1099.2万吨。在此期间，萨尔图、杏树岗油田经过调整，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个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4625.9万吨，为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奠定了基础，并且取得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建设这类特大油田的丰富经验。

第七节　“蜗牛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民经济受到社会动乱的破坏而急剧恶化。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的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叛逃外国，途中机毁人亡。是为“九一三”事件。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对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将一些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等等。当时国务院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1972 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接受任务后，由四机部对外司牵头，上述四家联合组成了一个 12 人的考察团。当年年底，他们先赴日本考察，五十多天，连春节都没有回国，把日本的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等电视机厂家看了个遍。一考察才发现，以当时国内的生产条件而言，第一步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他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 RCA 的厂家具备上述四种技术，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 RCA 寻价。接到对方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谈判。当时 RCA 报价为 1.3 亿美金，谈判结果降到 7300 万。1973 年 11 月，还是上面那 12 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 RCA，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公司，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国了。

在机场，他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他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气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 55 美元。

此时，正赶上 1 月底 2 月初，快过春节了。代表团向部领导汇报后，决定不放假，家在外地也别回去了，抓紧总结，研究到底从哪个公司引进哪项技术。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风波正在悄然兴起。

当时的中国社会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场运动未等结束，下一场运动又已经到来。1973 年 7 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

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影射周恩来 1972 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

在这种背景下，1974 年 2 月，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一位青年写信给江青反映了四机部出国考察组接受“蜗牛”礼品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们的侮辱。江青接到信后如获至宝，驱车到四机部去找这位写信人。她进入四机部机关大院，便对美国人所送蜗牛礼品一事大发雷霆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她愤怒地指着四机部领导叫道：“蜗牛放在哪里？给我拿来，中央要用它作展览！”“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她还给那位青年回信说：“我十分赞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讲话和那位青年的信，感到压力很大，迅即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和全体大会进行传达，会上谴责对方以赠送礼品为名，而“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部领导不再从美国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随后，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大小会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蜗牛事件”正像一个无形的雪球在京城滚动，越滚越远，越滚越大，眼看就要波及到中央各部门和全国所有涉外单位。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就是要把“蜗牛事件”作为外事方面的一个突破口，把事件闹大，与批林批孔挂钩，矛头直指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周恩来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心若明镜。他几次指示外交部就“蜗牛事件”认真调查，再作定夺。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当时担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是老资格的外交家韩叙。关键时刻，韩叙以他惯有的求实与严谨，向国内发回了一个公正客观的调查结论：蜗牛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蜗牛造型的工艺品经常被人们作为礼品或陈设品，因此，赠送蜗牛并非含有恶意，而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2 月 21 日，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向国务院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说明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反驳了江青的论点，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

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至此，由江青制造的、喧嚣一时的“蜗牛事件”遂告平息。

第八节　“风庆轮事件”

远洋事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从50年代起就十分关心这项工作。1956年，毛泽东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部学习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组织上海造船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造了9艘万吨级客货轮。与此同时，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

“风庆轮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期间。

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9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这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承造的，于1973年完工。随后，在上海远洋分公司的参与下，先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并在1974年春季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

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万吨级的风庆轮，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此引起的政治动荡并最终波及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在风庆轮轻载试航中，上海远洋公司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0.15毫米，质量尚不过关，需要采取改进措施。但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公交组却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百般挑剔刁难，是“崇洋媚外”的典型。

“崇洋媚外”是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常用语”。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上报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化肥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份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些引进项目，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行动却被“四人帮”指责为“崇洋媚外”。

1973年夏天，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气势更盛。在随后筹备四届人大时，他们紧急行动起来，想由他们来组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排除一些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而“崇洋媚外”则被“四人帮”认为是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进攻的最为有利的武器。

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有些设备明明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喜欢进口，包括电机厂、造船厂出的产品。可见，“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听后立即表态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给他搞几个材料。

有了姚文元的表态，下面的人就有了胆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人物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煽动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经陈阿大点火，江南造船厂的一些人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随后，这份大字报被刊登在《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马天水看后立即批示，要求远洋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之后，工交组又派人到远洋分公司，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指责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上海远洋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间，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金祖敏让江南造船厂写了一个典型材料，题为《从万吨机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材料列举了上海机电一局系统的电机、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例子，重点之一是就风庆轮试航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分歧。材料攻击交通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路线”。为此，金祖敏于1974年春节写信给姚文元：“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教导，进口一点技术先进的样品、样机，作为借鉴是可以的。而有些可进可不进的设备、原材料，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但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信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对于这问题，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

姚文元很赞赏马天水所上报的材料，他在这份材料上批示道：“相当深刻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他还要王洪文、张春桥考虑是否将这份材料印出来给政治局的同志看看。之后，这份材料果然以《金祖敏的一封信》为题印发政治局全体委员。姚文元还专门给马天水送去一份印发出的材料。

马天水立即让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翻印了此件，并补拟一个通知，发到上海市工交系统。于是上海全市立即展开了借风庆轮问题批判“崇洋媚外”。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攻击买船是“崇洋媚外”、“依赖进口”，是“投降卖国”，是“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制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等等。

这边的大批判搞得沸沸扬扬，那边风庆轮结束了重载试航并移交给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使用。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建造情况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技术状况，批准了远洋运输总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决定在近期让风庆轮远航欧洲。

风庆轮于1974年5月9日从上海启航，同年9月30日返抵上海港。此时，第四届

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正进入最后确定国务院领导人选的阶段。这是“四人帮”组阁的最为关键的时期。

10月4日，毛泽东就国务院组成人选第一次表态：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因病住院已经四个多月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项提议意味深长。当晚8时，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意见。眼看组阁计划成为泡影，“四人帮”当然大不甘心。他们要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反对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风庆轮问题便成为他们认为已经导演成熟的一出好戏。

10月14日，江青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一份反映风庆轮问题的文章上写下批示：“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导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她还写道：“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同日，王洪文也作出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张春桥跟着批示道：“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他还进一步写道：“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紧接着姚文元也作了同意江、王、张意见的批示，他还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在会议末尾，江青蓄意挑起事端，责问邓小平：“你对风庆轮是什么意见?”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江青不依不饶地说：“你要表态。”邓小平气愤地说：“那我还要调查。还要调查。”李先念见会议气氛不正常，就把邓小平劝走了。

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什么收获，随后还派王洪文专赴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但毛泽东看清了江青想组阁当“后台老板”的野心，告诫王洪文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这段时间，上海方面大力展开了一场超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组织了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借机批判所谓“崇洋媚外”，批判“卖国主义”，还组织了《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第九节 电影《创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百花凋零，银幕上只有几个“样板戏”和少得可怜的几部旧影片。1973年1月，周恩来在接见电影工作者时说：今

后两年电影技术要在许多方面赶上去；过去帮助关心不够，抓迟了。又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为了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反映以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的电影。编剧张天民几次深入大庆采访，从真实的故事中提炼出了一部名为《创业》的电影剧本。

《创业》的剧情很简单：1949 年，裕明油矿工人英勇护矿，迎来了全国解放。十年后，我国石油落后的面貌还未改观，“中国贫油”的论调还在扩散。这时，北方草原上有几口探井喷油，石油部在那里举行了石油会战。周挺杉率钻井队前去参加会战，他和华政委一起，提出打破洋框框，放开手脚，拿下大油田。但是总地质师和会战前线副总指挥冯超仍旧被“贫油”的旧思想所束缚。冯超还用两面派手法为周挺杉等人制造障碍。周挺杉带领钻井队工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艰苦创业，经受了种种严峻考验。苏联背信弃义，断绝油料供应，冯超又里应外合，蓄意制造停电和井喷事故。周挺杉带领全队职工及家属在党的领导下，揭露了冯超的反革命罪行，教育了总地质师章易之，在他们及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为国家拿下了大面积高质量的创业油田。不久国家实现了原油自给，使帝国主义的预言归于破产。

该片以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我国石油会战为背景，反映了中国石油工业艰难多舛而又轰轰烈烈的创业史。以周挺杉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具有博大的襟怀、钢铁般的意志和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影片以他们艰苦奋斗的史实为依据，真实地再现了创业时期的艰难和油田的风貌，为石油工人的豪迈壮举谱写了一曲颂歌。影片场面宏大、气势雄浑，是我国工业题材影片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影片在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描写，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创业》影片拍摄完成后，由国务院文化组审查通过，确定为重点影片宣传，向国内外发行。影片公映后反响强烈，在当时沉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已经许多没有看到这么“好看”的电影了。广大观众热情欢迎和高度赞扬这部影片，认为影片是“高唱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志气歌，是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推动革命和生产的生动教材”。

“四人帮”对工业学大庆一直持消极态度，对于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一贯百般刁难。1975 年 2 月 10 日，江青读了《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赞扬电影《创业》的文章，很不满意，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今天《人民日报湘极大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评论权利我们不能放弃。”接到江青的电话后，姚文元马上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指示以后不要再登赞扬《创业》的文章，要登，需经他同意。接着又让秘书给《光明日报》莫艾打电话：“对《创业》电影的评论、剧照、材料都要送文元同志看，未看以前不要登。”

江青不满意《创业》，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人，就顺着江青的意图，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创业》定了十条意见。什么有意给刘少奇、薄一波涂脂抹粉啦；什么许多警句是余秋里的语言啦；什么技术语言太多、结构拖沓啦等等。影片随之被禁映。因为影片是在周恩来谈话精神指引下拍摄的，因此，江青发难，矛头还是对准周恩来和他所

支持的邓小平。

影片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对国务院文化组的指责不服，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在信中张天民申述说：我和文艺界不少同志对“十条意见”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影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创作怎样搞的问题。从实践、从效果来看，《创业》是部好影片，它不是毒草，“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信送给邓小平后，邓小平将信送呈毛泽东。

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给邓小平的信上写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在批示中还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毛泽东作出对电影《创业》批示的第二天，7月26日，批示送到邓小平的手里。当时，邓小平正在三座门同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同志开会。他看过毛泽东的批示以后，当场就宣读了一遍。邓小平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会上，胡乔木向大家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支持了《创业》的作者，批评了江青及其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实际上是对近半年来围绕《创业》展开的争论作了结论，为受指责的《创业》翻了案。加之毛泽东在批示上注明要将张天民致邓小平的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这样“四人帮”想要封锁也封锁不住。

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和张天民写给邓小平的信迅速传播开去，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特别感到振奋的是石油系统的干部和职工。《创业》遭禁，石油部受压。上至领导，下至大庆工人，都憋了一口闷气。毛泽东的批示使他们昂首挺胸，扬眉吐气。余秋里得知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后，立即叫石油部政治部向长春电影制片厂订购了20部《创业》的拷贝。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以后，《创业》仍未能解禁。影片的男主角张连文后来回忆说：主席给了批示以后，并没有让《创业》复映。我跟《创业》的另外一个演员李仁堂一起正在黑龙江拍戏的时候，有电话打来把我们俩叫回北京，说有领导接见，到北京连家都不让我回就跟两个信使一起很秘密地被送到了山西大寨。我们俩始终都糊里糊涂。当时有很多文艺界的人都被江青叫去为她本人树碑立传。我们刚到，发现已经去了很多人，满满地坐了一屋子人了。要开饭了，我们放眼望去谁也不认识。突然一个人站起来：“张连文你怎么才来？过来，坐这儿！”我一看那不是江青吗？没办法，我过去坐在她身边，同桌的都是文化部的领导。突然江青又喊：“张天民来了没有？”张天民其实就在江青身后的桌子边坐着，两个人背对背江青没发现他。张天民不得不应一声：“我来了！”这下可好，只听江青大喊一声：“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无大错，有小错！”我们在大寨的一个星期，心情始终很紧张，对江青避之惟恐不及。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中央粉碎“四人帮”，电影《创业》终于重见天日。

第十章　粉碎“四人帮”，工业学大庆再掀高潮

第一节　运动再掀高潮

1976年10月，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持续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度沉寂了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再掀高潮，运动的内容也转为创办“大庆式企业”。1976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会议宣布，为了动员全党，动员全国工人阶级，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基础上，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高潮，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中央决定于1977年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号召全国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要在全国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迅速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2月19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在革命生产一派大好形势下，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动员全党，动员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党中央即将在明年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作好充分准备。”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精神。云南、陕西、湖南、广东、山东、江西、四川、青海、河北等省先后召开了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地都总结了本省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经验，命名了一批大庆式企业，表彰了一批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

197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几十年来，大庆坚持“二论起家”的基本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建设了一个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锻炼了一支反修防修，又红又专，压不倒、摧不垮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造就了一代新人；发扬了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和"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组织大会战，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建立了一套依靠工人阶级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创造和运用自己的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油田开发新工艺、新技术，做到了原油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28%的高速度持续跃进，达到了原油年产5000万吨的水平，走出了一条全面贯彻《鞍钢宪法》的我国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中央号召：全国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把大庆工人提出的"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战斗口号化作实际行动。

接到中央的通知后，各地都进行了传达、贯彻。不少地方还将学习中央通知与学习新近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结合起来，并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围绕着学还是不学大庆、真学大庆还是假学大庆的问题，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展开了热烈讨论。广大干部和职工在讨论中发表了不少很好的意见，但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也有不少意见带有绝对化、片面性的倾向。例如，不少代表们在讨论中说，学不学大庆，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方向的问题。大庆，非学不可。不学大庆，办企业就没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要横下一条心，大庆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办到。还有不少人讲，学大庆，首先要抓好阶级斗争。

继云南等省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之后，1977年3月至4月上旬，又有北京、广西、甘肃、西藏、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等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了工业学大庆会议。从当时各地的报道来看，这些会议的共同任务就是以大庆为榜样，让大庆经验遍地开花。

1977年4月初，全国各地财政金融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代表在大庆集会，学习大庆经验，特别是大庆油田财务工作的经验。大庆油田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办好企业的经验。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把企业的财务工作整顿好，把经济核算切实加强起来。各地财政金融部门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千方百计支持工农业生产，努力增加收入，提高积累水平。要严肃财经纪律，同一切违法乱纪、随意破坏国家财政制度的现象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工业学大庆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影响，特别是在关于学大庆的舆论宣传方面，"左"的倾向更为明显。但即使在比较混乱的形势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大庆人仍坚持生产不放松。用当时的语言讲，叫做"抓革命、促生产"。而各地树立起的学大庆先进单位，多数也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第二节　学大庆、赶开滦

开滦煤矿在当时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庆式企业，当时的全国工交系统有一句十分响亮的口号，叫做“学大庆、赶开滦，普及大庆式企业”。

开滦煤矿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是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矿坚持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他们先后两次派出代表团到大庆参观学习，回来后对照检查。通过学习和讨论，这个矿的干部、职工认识到，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于是，煤矿党委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做出了学大庆的决议。他们以大庆为榜样，深入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矿党委还作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决定。他们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老矿，得出了新的结论：开滦是老矿，但不是“死”矿，生产没有到顶，潜力很大，老矿不是无为，而是大有可为。他们像大庆油田那样，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抓思想，练技术，树标兵，订规章制度，建设起了一支以吴旭芝、侯占友为代表的“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造成了一个大干社会主义有功，争当先进光荣的政治空气。生产一年一个新起点，一年一个新水平，年年都上大台阶。

开滦煤矿认真学习大庆的先进经验，重视抓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将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到职工心坎上。他们一是抓先进，立标杆。煤矿每年都进行大总结、大评比、大表扬，评选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造成人人争先进、赶先进的浓厚气氛。二是抓后进，促转化。他们对后进工人不歧视，不怕麻烦，把工作做到家，同时还认真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这样，不断促使后进向先进方面转化。三是人人抓，处处抓，政治工作人人做。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抓得实，使全矿出现了“好人好事有人夸，不良倾向有人抓，思想工作大家做’的政治局面。

在生产和技术改造方面，这个煤矿以大庆为榜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对老矿山进行改造。在“四五”期间，他们完成了46项矿井延伸和技术改造工程，总长度达100多公里；开拓巷道120公里，对矿井的提升、运输、通风、排水、供电等五大系统，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进行了“开膛破肚”式的改造，使矿井综合生产能力翻了一番。工作面单产在1970年为1300多吨，到1975年提高到1800多吨；机械化程度在1970年为30.65%，到1975年提高到了45.39%，使整个矿井向着综合机械化进军。

除了抓技术改造，煤矿还狠抓了职工的技术训练，把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作为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学，抓练。在这方面，煤矿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矿里层层举办脱产和不脱产的学习班，搞好职工的技术培训。他们在基层队建立了每周一次的技术学习制度，许多单位还组织生产技术经验传播队，开展技术表演。

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这个矿征服了上万次坍塌冒顶，闯过了几千个流沙断层，打

开了上百个“禁区”，战胜了十几起较大的自然灾害，“四五”期间不但使原煤产量翻了一番，洗精煤也翻了一番；老矿翻一番，新矿也翻了一番；其他所有辅助生产单位的产品或产值绝大部分也翻了一番。

总结学大庆运动的经验，这个矿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坚定不移地学大庆。要像大庆那样，造成一个大干社会主义有功，争当先进光荣的政治空气。生产一年一个新起点，一年一个新水平，年年都上大台阶。第二，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队伍建设的中心环节，做深、做细，做到职工的心坎上。抓技术训练，把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作为建设队伍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学，抓练，抓过硬，抓基层领导核心。对基层党支部领导班子的建设要下苦功夫，花大气力去抓。第三，依靠工人阶级管理企业。在基层班组成立“群管核心组”，在党支部领导下，管学习，管思想，管生产，管核算，管安全，管生活，管家属工作。依靠工人群众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第四，发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他们提出，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亿万人民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第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办社会主义企业的一条基本方针，也是工人阶级的本色。在“四五”期间，他们学大庆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搞设计，依靠自己的力量搞施工，依靠自己的力量搞改造，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解决材料设备，终于实现了生产的翻番。第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在选拔干部问题上，他们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坚持层层推荐，反复考查，反对突击提拔。对于从基层提拔干部，他们还规定了“三不”，即：不经政审的不提干；不经过培养、考察的不提干；不征求群众意见的不提干。

几十年过去后，人们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提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回过头来看开滦煤矿学大庆的这些经验，就其基本点来说，仍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他们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分忧，努力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些做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可圈可点。

1976年7月，唐山发生了一次7.8级的大地震，百万人口的唐山市顷刻间变成一片废墟，开滦煤矿的生产陷入全面瘫痪。地震发生后，党中央派出了慰问团，全国各地运来了大批食品和其他物资，大批解放军迅速赶到抗震第一线，矿山救护队来到开滦煤矿。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这个矿的干部、职工，学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不等、不靠，尽可能少地向国家要钱、要物，立足于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了一场抗震救灾，重建矿山的人民战争。广大职工豪迈地说：“开滦虽然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他们像大庆石油会战那样，头顶蓝天，脚踏废墟，日夜奋战。在解放军、全国人民及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援下，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夺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打了一场重建矿山和重建家园的硬仗。

在抗震救灾、重建矿山的行动中，开滦工人吃在露天，睡在露天，日夜奋战。他们感到，现在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煤，煤矿工人不能出煤，比什么都难受。他们不等余震过去，不等厂房盖好，不等生活安排妥当，只争朝夕，排险抢修，千方百计恢复生产。他们提出：地震吓不倒英雄汉，社会主义照样干，就是用手抠、用人背，也要早日产出

"抗震煤"。整个矿区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大会战。厂房坏了，就用柱子把它支起来；设备被淹了，就把它捞出来，烤干修复再用；没有照明灯，就打着手电干；没有风就打开自然通风孔；没有洗澡的地方，就在大坑里洗澡；没有休息的地方，就以大地当床，青天当被。为了早出煤，多出煤，他们千难万难脚下踩，争分夺秒往前赶。

地震发生时，唐山矿工会副主任李玉林，家里的人和亲属被埋压，他自己离父亲的住处只有二三百米远。他顾不上抢救自己的亲人，只想要立即将灾情报告给党中央。他开车直奔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了唐山地震灾情。吕家坨矿党委第一副书记贾帮友，当时正在井下参加劳动，强烈地震发生后，电断了，灯灭了，风停了，在危急关头，他与被困在井下的党员组成了临时党支部，紧急研究决定了撤退的路线。这个临时党支部确定的撤退顺序是：群众先上，党员后上；工人先上，干部后上；党委委员最后上。在临时党支部的指挥下，六百多名职工安全返回地面。贾帮友最后一个上了井。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道道难关之后，在大地震后的第十天，开滦煤矿的马家沟矿就生产出了第一批"抗震煤"。其他矿也陆续出了煤。到当年 11 月底，整个煤矿已经全面恢复生产，不到一个月就达到了震前水平。

第三节　"三结合"搞革新

天津自行车厂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厂，也是全国轻工业系统著名的学大庆先进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厂的发展经历了几次反复。从 1949 年到 1957 年的 8 年间，企业发展平稳健康。1958 年及随后几年的"大跃进"，天津自行车厂大搞所谓"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所谓"技术革新"，使企业生产设备遭受重大损失。1961 年，自行车产量下降了一半。在以后的几年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步伐，企业的生产能力处于恢复性增长中。从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自行车厂的正常生产秩序，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自行车产量又一度下降。1968 年以后，由于广大基层干部、职工对乱批乱斗等错误行为的抵制，企业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1969 年，企业达到年产 57 万辆自行车的生产规模。

1970 年初，上级要求这个厂在上年产量的基础上再增产 8 万辆自行车，即达到 65 万辆。当时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政治运动对企业生产的冲击仍较严重，能不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企业领导成员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厂党委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全厂职工去讨论，这是当年企业领导常用的方法。

尽管处在比较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仍很高涨。这个厂后来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广大职工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方针给我们引路，困难再大，条件再差，也要坚决完成任务，为国家多作贡献。

工人们说干就干。在厂党委领导下，组成了由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

合”小组，他们首先对企业设备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摸底，发现全厂主要工序中有20%的环节已经超过年产60万辆自行车的生产能力，但有些薄弱环节影响了产量的提高。比如，零件车间的“桥式”烤漆炉既笨重又落后，产量低，劳动强度大，是影响整个生产的“瓶须”工序。找到了薄弱环节，他们就集中主要力量，砍掉了这个“桥式”炉。然后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建成了一条自动化的烤漆生产线，使烤漆产量翻了一番，质量也提高了。随着生产中薄弱环节被这样一个个突破，不利条件逐步向有利方面转化。这一年，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共搞了两百多项技术革新。到年底，全厂自行车产量达到68.4万辆，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厂党委又适时地提出新要求，号召职工再鼓干劲，向年产80万辆自行车进军。全厂职工积极响应党委号召，苦干两年，到1972年又突破了年产80万辆自行车的大关。

1973年以来，这个厂的党委继续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学大庆运动，掀起了三次技术改造的高潮，比较有效地动员了全厂的力量。在技术革新中，不仅机修工人、技术人员有用武之地，广大生产第一线的操作工人也大显身手。老工人打头阵，青年工人不示弱，就连科室人员和食堂、托儿所的后勤人员也积极参加会战。由于群众发动充分，这一年共实现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项目594项，其中不仅有一般的小革新，还包括一些较大的技术改造项目。比如，准备车间发动群众改造单机切管设备，全车间90%以上的工人都献计献策献技巧。他们搞成的多刀自动切管机，其产量比单机切管提高了五倍。

这个厂车圈车间的磨口工序，一直沿用的是20世纪30年代落后的手工操作工艺，每人一天最多磨600个车圈，磨一个车圈要翻转四次，而且手、腿、头、腰全身都得动作，劳动强度很大。这次技术革新中，磨口工人决心自己动手搞自动磨口机。他们在工余时间凑在一起，把各自的操作手法归纳、分解为机械动作，提出了五个设计方案。先是分别在自己使用的设备上进行试验，然后取长补短，确定了一个设计方案。在技术人员、机修工人的指导与支持下，从设计到投产，他们只用了7天时间就制成了一台车圈自动磨口机。有了它，可以一下就完成人工磨口的四个复杂动作，使磨口工人从笨重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生产效率成倍提高，节省了一半劳动力。

1974年，“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兴风作浪，刚刚出现好转的生产形势再次面临考验。难能可贵的是，天津自行车厂坚持把群众的积极性用在生产上，用在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方面。他们发动群众搞会战，两百多名生产技术骨干从家里把行李搬到车间，吃住在厂，上千名职工昼夜奋战不下“火线”。这次会战搞了25天，完成了大型卷钢纵剪连续生产线、曲柄加工自动生产线、挡泥板自动画线机、车把高频焊接等一百多个技术改造项目。

由于天津自行车厂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下坚持生产，坚持搞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注意在提高自行车产量的同时严把质量关，他们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在广大消费者中树立了很好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公认的信得过产品。

第四节　调整布局创佳绩

上海第五印染厂是一个解放前创办的老厂，1965年曾被评为上海市学大庆先进单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个厂与其他企业一样，生产秩序受到很大冲击。但全厂基层干部和广大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坚持生产。从1971年开始，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平稳，这个厂开始搞了一个五年全面进行企业改造的规划，决心把发展生产和改变老厂面貌结合起来。

这个创办于旧上海的老企业，生产布局很不合理，一个厂被一条马路分割成南北两部分，由此造成了企业生产工艺不合理和运输上的麻烦。但是，要把两部分合到一起困难也不小。在制定工厂改造规划时，厂党委反复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群众一起，结合当时国内外市场对印染布的需要和发展方向，对全厂的厂房和设备作了调查，决定对漂练车间厂房进行翻建，对漂练、染色、成品三个车间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并且发展印花新技术、新设备，使高中档产品达到全部产品的70%，把单一的棉布印染厂改造成为棉布和化纤混纺产品的全能印染厂。

总的改造目标确定之后，他们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地进行，根据需要和可能，每年安排一批技术改造的重点项目。

工厂改造的目标确定之后，职工看到了企业的发展前景，干劲也就鼓起来了。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大庆工人不靠天，不靠地的意志，不但自己动手改造了绝大多数旧设备，还自己动手制造了一些新型设备。

早在60年代中期，上海印染五厂就曾设想过生产的确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新的化纤产品。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此议一直未能付诸实施。1973年，这个厂在学大庆运动中再次提出上马生产的确良，而且说干就干。他们在厂里组织起一支由260多人组成的技术改造大军，提出“厂举大庆旗，人学王进喜”的口号。他们把一台报废的拉幅机改造成了生产的确良的关键设备——热定型机。这台设备的改装，需要800多只针夹，是马铁制品，比钢还硬。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在5天内就完成了这些针夹的生产任务。他们共用了46天时间，制造出了一批专用设备，开始生产的确良印染布。随后，他们对这些设备进行不断的改进、完善，使的确良达到了批量生产能力。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工厂的产品质量普遍下降。难能可贵的是，上海第五印染厂坚持对待产品质量的高标准。这个厂有一句深入人心的口号，叫做：“用户的要求，就是检验我们质量的标准。”他们意识到，工厂面临的生产任务越重，越要坚持好字当头。为了对消费者负责，宁愿自己辛苦一些，也要按规定分等，按要求检查，没有达到国家质量标准的产品坚决不出厂。开始，由于生产工艺中使用的一种黄色还原染料会使的确良发脆，影响了产品的使用寿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学习大庆人把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作风，会同科研部门，翻阅了16年的技术

档案资料，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证明问题出在一种二级光脆性染料上。于是他们就找来其他染料代替，果然解决了问题，提高了产品质量。由于他们一丝不苟的精神，产品质量得到保障，商业检验部门对他们的产品实行质量免验制度。

在印染行业中，生产高档产品难度大，要求高，用人工多。如印花精梳府绸、印花线绢、深色印花的确良、多层次印花等，在当时都属于高档产品，被同行业称为“硬骨头产品”。这个厂的工人以啃“硬骨头”为荣，承做了大量难印花样。为了增产消费者喜爱的品种花色，产品设计人员还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有一种大花白孔雀花样，就是产品设计人员三下农村征求消费者意见后创作的。产品一推出，就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创造了订货的最高纪录。

第五节 学王铁人，近学秦启文

宁夏燃化局基建公司建井队，是矿山建设领域的“大庆式企业”。这个队自 1970 年建立以来，一直转战在“五月飘雪，九月冰封”的海拔两千多米的贺兰山上。

数九寒天，这支建井队的工人们每天上下班都要往返十多公里。饿了，就啃几口冻馍；渴了，就往嘴里填把雪。工程急需用水，工人们抡锤凿井，开挖地下水源。大家硬是用钢钎大锤，啃掉了 1 万多立方米土石方，修通了公路，架设了高压输电线路，安装了设备，盖起了房子，在荒山秃岭上安下了家。

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井巷工程开工后，设备工具不全，连台矿车也没有。为了坚持生产，他们从兄弟单位买了十几台废矿车，七拼八凑组装成三台能用的矿车。工人们推起这三台矿车，拼命大干，不断加快掘进速度。后来，他们又制造了翻车器等设备，提高了排矸能力，只用 10 个月的时间，就开凿了一条全长 1900 多米的大断面运煤平峒。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这个队的职工还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三年间制造了液压钻装机等 70 多台施工设备，基本实现了下山和平巷掘进机械化。他们使用这些自制的设备，穿过了 100 多米断层破碎带，战胜了淋水，创造了下山岩巷独头掘进月成井 361.1 米的好成绩。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成绩不仅在国内是最好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好的成绩。

河南省辉县化肥厂也是一个学大庆先进单位。这是一个成立于 1969 年的小厂，企业的工人和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泥腿子”。建厂初期没有一个懂化工生产的技术人员。但是，工人们坚信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企业坚持岗位练兵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厂工人基本上做到了“三懂四会”：懂设备性能，懂工艺流程，懂岗位技术；会操作，会维修，会安装，会开车。

共产党员秦启文是 1969 年第一批进“辉化”的工人。他坚持以“王铁人”为榜样，担子拣重的挑，脏活累活抢在先。数九寒天，安装设备时，他抱着喷枪，钻进滴水成冰

的炭化塔里打砂，手冻裂了，脚冻肿了，两眼熬红了，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由于他工作踏实，任劳任怨，干活有股拼命精神，被工人们称为“秦铁人”。这个企业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中，还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了“远学王铁人，近学秦启文”的活动。

辉县化肥厂在全体职工中广泛开展了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活动，工人们都能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即使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也没有人去搞“停产闹革命”。全厂600多名工人每年平均出勤349天。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事例所涉及的企业在当时全国工业系统中只占极少数。就大多数企业而言，由于“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的影响，生产形势严峻，经济效益不佳。就是上面涉及到的几个企业，也并非光明无限。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在生产特别是职工生活方面照样面临着许多难题在当时无法解决。从全国总体上讲，当时的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运动，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仅在舆论宣传上讲了大量标语式、绝对性的话，放了些“空炮”，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大多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在运动进行中走过场，搞了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至于不注重经济效益，忽视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生活需要，则更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不可避免，也无法解决。

第六节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7年4月20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新建成的大庆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70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致大会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普及大庆式企业，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他号召大家，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作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要加快工业发展，必须狠抓企业整顿，要求1977年首先把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领导班子整顿好。各个企业要以大庆为榜样，认真学习解放军的经验，建立健全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切实加强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像大庆那样抓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要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掀起增产节约新高潮，使各项技术指标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本企业的历史最高水平，在两三年内达到本行业的目前国内先进水平。已经达到的要向更高的目标进军，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会议认为，大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怎样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和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和建设企业的问题。因此，学不学大庆，是走不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会议要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按评比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把全国三分之一

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都要作出把所属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的具体规划，定出有效措施，并组织落实。

4月23日，《人民日报》为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开幕发表社论。社论指出，这个大会不同寻常。大会开得空前盛大、劲头十足，开得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社论满怀激情地说："大庆的同志们已经立下誓愿，要把这次大会作为新的起点，走向新的境界，夺取新的胜利，创造新的水平。全国工业战线的同志们，特别是各省、市和大企业的同志们，让我们听听、看看、比比、算算、想想、谈谈，自己应该怎么办？不学大庆行不行？不行。假学大庆行不行？也不行。是下定决心，认真大学的时候了！对于大庆的革命精神和一整套经验，学四分之一行不行？不行。学一半行不行？也不行。一定要力争百分之百地学到手。磨磨蹭蹭地学行不行？不行。马马虎虎地学行不行？也不行。一定要只争朝夕，迎头赶上，并且像大庆人那样高标准、严要求。学了就要干，要大干，拼命地干。"

大庆油田党委书记宋振明代表大庆党委在大会上作了《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石油会战以来17年间大庆取得的主要成就，总结了大庆的基本经验。

关于大庆取得的主要成就，报告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第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高速度、高质量地开发建设了一个大油田。第二，大搞综合利用，初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第三，打破旧传统，建设起"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关于大庆的基本经验，报告概括为：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第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建设一支反修防修，又红又专，压不倒、摧不垮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第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第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建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第五，坚持"五七道路"，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第六，加强党对企业的一元化领导，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

与会代表在会议期间还参观了大庆油田的许多标杆单位，访问了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代表们珍惜在大庆的每一分钟，白天参观访问，晚上回到驻地，就认真地订规划、找差距。河北、山西、甘肃等省的许多代表还深入到钻井队、采油队、井下作业队和后勤部门，和大庆工人实行"三同"，在生产现场学习大庆人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代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参观了大庆党委机关、大庆领导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后，受到很大触动。他们说，大庆的领导干部，至今还住在60年代盖的"干打垒"土房里，经常深入基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反映他们保持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我们回去后，一定要像大庆的领导干部那样，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带领本地区、本单位的群众，把大庆经验真正学到手，把大庆红旗扛到底。

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开新局，工业学大庆渐渐尘埃落定

第一节　把大庆建成美丽的油田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夕，1978年的9月，邓小平在结束了对朝鲜的友好访问回国时，由平壤乘车来到大庆。这是他第三次来大庆视察工作。陪同他前来的是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邓小平这次视察大庆距他第二次来大庆已经14年了。这期间，我国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波及全国的内乱中，大庆红旗被“左”的思想歪曲了。从1978年5月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兴起，中国的历史将要翻开新的篇章。在这个伟大转折的前夕，邓小平又一次来到大庆。

9月14日早晨8点，邓小平一行在萨尔图车站下车。尽管连日旅途疲劳，但他兴致很高。他望着眼前的油井、厂房，深情地说：“十多年没来了，大庆变化很大！”

大庆党委书记陈烈民走上前去，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邓副主席，大庆人很想念您，早就盼望您来视察大庆。”

邓小平首先来到大庆研究设计院地宫。这个地宫是在1960年石油会战时全党抓地质、人人办地质的背景下创办的，是一个有井史、图表和实物的丰富生动的地质资料室。邓小平以前曾来过这里，因此一上楼就有旧地重游的感觉。他很有兴致地说：“这是老地方，我来过。”

大庆设计院副院长马启富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他先是汇报了陈列馆收集的全国各油田的油样，又汇报了各地的打井情况。邓小平听得很有兴趣。他详细询问了钻井的钻头行不行，有没有大钻头，用的钻机是哪个国家的，地质勘探中用没用电子扫描这项新技术。当听说罗马尼亚的钻机不太好使时，他直率地说：“向美国买，它厉害，要快！”

马启富还汇报了石油工业理论研究的情况。当汇报到陆相生油理论时，他说：我国地质有好几派，有六种不同的观点。邓小平听后表态说：“百家争鸣嘛！不能把人家否掉，在找矿中大家都起了作用的。”

当时，我们国家刚刚从十年浩劫中挣脱出来，可以说是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中，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尤其需要挣脱枷锁，轻装上阵。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重提百家争

鸣，并且肯定了各种不同学派在国家建设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话，对在场的人和全体科研工作者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邓小平一行又来到新技术馆，他们参观了那里的电子计算机。邓小平问大庆的电子计算机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并建议说："要搞电子计算中心，一天 24 小时工作，不然就是浪费。"

随后，邓小平一行又视察了采油现场、大庆展览馆、二号院、三号院，还参观了大庆人种的三块"大寨田"。在喇二联，邓小平视察了展览台、电岗、注水岗、污水岗、输油岗和脱水岗。他与工人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生产情况，认真查看了污水处理情况。在电岗，几名女工正在值班，邓小平关切地对她们说："你们一天几个班，这劳动可不轻啊！整天站着。"有关部门领导汇报说，现在实行三班倒。邓小平建议说："三班半可以倒着休息。"接着，他翻阅了工人记录下来的采油资料。他指着资料本对当班的女工说："这可不能出差错啊！"

在采油一部中 6—17 井，邓小平望着墙上挂的油井综合图、锦旗、奖状和岗位责任制，不住地点头称赞。采油一部的领导人汇报说，这口井开发 18 年来，高产稳产，如今产量比原来翻了一番。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连着说："好，好！"

走出值班房，迎面遇到 20 多名女工，邓小平主动与她们打招呼并与她们合影留念。

将近中午，邓小平一行来到大庆机关二号院，800 多名职工、干部前来欢迎。邓小平与部分英雄模范及当年石油会战时的老领导亲切握手。他走到失去双臂的耿玉亭面前，关切地问候他："不容易啊！你的身体怎样？"一句问候，令耿玉亭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双眼噙泪。

下午，邓小平等人来到萨尔图仓库视察。在工具组门前，他向欢迎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接待员高杰向邓副主席汇报了萨尔图仓库担负的主要任务和管理情况，重点汇报了他们的岗位练兵情况。高杰汇报说："我们保管员管啥练啥，这个组的保管员刘金柱管砂轮，他可以用手代替尺，蒙上眼罩能摸出每只砂轮的直径、厚度、内孔和粒度。"

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李德生补充说："蒙上眼罩就像黑天一样，啥也看不着。"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他顺手拿起一个砂轮，放在已蒙上眼罩的刘金柱手里。刘金柱摸了摸，平静地回答："这个砂轮的直径是 150，厚度是 32，内孔是 65，粒度是 60。"

邓小平看了看砂轮上的标签高兴地说："对了！好！"

在大庆 30 万吨乙烯工程会战指挥部，邓小平指示他们一定要把污水处理好。在详细了解大庆的蔬菜、肉食供应及职工住宅情况后，邓小平提出："大庆贡献大，房子要盖得好一点，要盖楼房。"

临离开大庆时，邓小平再次指示大庆的领导干部："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油田。"

领袖的关怀使大庆人备受鼓舞。大庆人按照总设计师规划的蓝图，在松嫩平原上续写着中国石油工业的新辉煌。邓小平第三次视察后不久，大庆人便再绘宏图，把大庆从矿区规划转向城市规划。根据让开油田、占领两厢的方针，重点发展油田外居住区，开始了大规模的住宅楼和城市基础结构建设。随之，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使大庆逐步成

为一座以东风新村为中心，由让胡路、龙凤、卧里屯、乘风庄等城镇群落构成的新型城市。

第二节　继续学“两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到大庆后，大庆职工群情振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大庆油田人人学公报，队队议公报。经过深入讨论，大家表示：党的工作重心由多年的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决策太伟大，太符合民意了！对于咱大庆，就是要多出石油，为国家多做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问题被揭露出来，社会上对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也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为了澄清认识，搞好企业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就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一些问题对《工人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工人日报》在1979年4月4日刊登了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

袁宝华说，1978年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主要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在肃清流毒、治内伤上下了功夫；二是突出抓了企业整顿工作，特别是把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促上来了；三是各行业、各地区基本上都有了影响较大的排头兵——自己的大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加蓬勃开展；四是三大革命一起抓，推动了生产的持续增长；五是加快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步伐。总的来看，1978年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发展是健康的，主流是好的。

袁宝华说：1978年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主要经验是：第一，学大庆运动必须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把企业各项工作捆起来，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推动力强，效果好。第二，必须把整顿企业作为普及大庆式企业的基础来抓。第三，抓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是整顿好企业的关键。第四，学大庆必须突出重点，抓好典型。第五，领导作风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

袁宝华还谈到，过去一年，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缺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单位有急于求成和降低标准的倾向。二是有些单位出现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主要表现是会议多，检查多，参观多，条块结合不好，重复太多，加重了企业不应有的负担，分散了企业领导的精力。有的单位学大庆没有很好结合自己的实际，提出“大庆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这就有点绝对化了。对大庆的基本经验，都应当学；对大庆的具体经验，要看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

袁宝华指出，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作的统一部署，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都要适应新的形势。总的要求是，以生产为中心，以企业管理为重点，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推动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为此，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坚持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扎扎实实地把普及大庆式企业的工作做好。大庆的基本经验，如“两论”起家的基本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实事求是、“三老四严”的作风，革命化统帅工业化，建设一个好班子、好队伍，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以及多快好省发展生产等经验，绝不能丢掉。二是继续整顿企业，加强企业管理，大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三是抓好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和企业性公司的组织试办工作，总结交流试办的经验。四是加强干部培训。五是加强政治工作。六是继续抓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袁宝华的这个谈话有两点内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明确提出学大庆要坚持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而对于大庆人在具体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不能照搬照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学大庆运动中的绝对化倾向。二是强调工业学大庆运动要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新形势，运动要以生产为中心，以企业管理为重点。这就克服了在这一个较长时期里存在的学大庆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向。

第三节　新形势，新认识

在新的形势面前，大庆人也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大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1979年10月上旬，大庆油田广大干部群众结合学习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就大庆如何坚持“两分法”前进，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如何为加快四化建设作出新贡献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油田党委通过学习和讨论一致认为，大庆油田靠“两论”起家，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会战，取得了一定成绩，党中央给了大庆极高的荣誉。大庆油田获得的荣誉，受到的表扬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将来。党中央过去表扬大庆是根据过去大庆在发展石油工业中做出的成绩，创造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庆能否先进，不是以谁肯定或否定为标准，标准是实践。大庆如果继续坚持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为四个现代化创造了新成绩，作出了新贡献，总结了新经验，那就可能继续保持先进；否则，实现油田现代化步子不快，对国家贡献不大，就不能学大庆，也不应该学大庆。

大家说，党中央表扬大庆并不等于大庆一切都好，肯定大庆经验并不是说大庆每一条具体经验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大庆也存在着新矛盾以及新的问题，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薄弱环节。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干扰破坏，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同国内外先进水平比较，在不少方面还有差距。即使是党中央肯定的大庆经验，也不是永远不变。一些具体经验，当然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完

善。就是对基本经验，也要在实践中不断赋予新的内容，作出新的结论，以适应新的情况。要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防止固步自封，更不能听到批评就不高兴。

在学习中，大家表示，大庆要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学先进，必须学人之长，补己之短，特别是在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高潮中，必将涌现出大批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大庆要向这些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习。同时，还要向国外学习，大胆学习和引进他们先进的东西。

1980年9月，中共大庆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总结历史经验，肃清"左"的影响，恢复"两论"起家传统。大庆市委副书记、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王苏民代表大庆市委在会上讲了话。在讲话中，他一方面肯定了大庆已经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庆在工作中的不足和面临的新挑战。他强调指出：由于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思想，我们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过了时的经验和一些已经不适应现在情况的做法加以清理，而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了普遍的经验。他列举了大庆在领导工作中一些"左"的表现：

——在组织生产建设方面有时强调革命精神多，强调科学态度少，片面强调革命加拼命，习惯于猛打猛冲，满足于大干苦干。尤其是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时候，要求职工不怕"脱皮掉肉"，鼓吹所谓的"死打硬拼"，"苦战恶战"，搞突击，拼设备，拼体力，甚至不适当地提倡加班加点，搞连轴转。

——在制定计划，安排工作中，往往考虑需要多，考虑可能少，片面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满打满算，甚至超打超算，干了一些超越客观可能性的事情。在资金、运输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上大项目，贪大求全，不量力而行。

——在油田开发和基本建设等方面存在着违背客观规律，不严格按正常程序办事的情况，造成一些方面的比例失调，市政建设、职工生活方面欠账很多。在油田开发上，曾搞过边勘探、边开发、边生产，特别是基本建设搞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结果造成地面工程不够完善。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一些钻机超负荷打井，油田至今还在超越实际生产能力采油。有时讲生产指标多，考虑安全方面措施少，曾发生不少事故，其中有的是严重事故。在企业管理的其他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科学、不正规、不严格的问题。

——在领导工作中，搞了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只图形式，不讲实效，动不动就兴师动众，搞"人海战术"，"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搞什么"零点起步"、"大会战套小会战"，满足于出工人数、会战次数，不讲工作效率。不愿作细致的科学分析，习惯于大轰大嗡甚至搞，打擂比武，在大会上抢喇叭筒，调门喊得很高，实际上有不少做不到，反而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王苏民说，大庆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科学看待大庆经验。大庆经验是在大庆油田这个具体环境中产生的，一些做法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当时是对的，起了积极作用。随着情况的变化，必然有一些东西不那么适用了，或者不能处处适用了。比如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中群众提出的一些口号，有很多是起了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口号，虽然反映了群众的良

好愿望，反映了职工加快发展石油工业的迫切心情，但提法不太准确，或者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而对大多数群众来说一时还办不到，超越了现实可能性。因此，我们对大庆过去总结的经验有一个进一步科学总结、重新认识的问题，必须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东西，不断修正那些过了时的东西，坚决纠正那些不大科学甚至违背客观规律的东西，摸索、总结出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经验来。

第四节　中央作出正式结论

1981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国家经委党组对大庆精神的概括，即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四严”、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的通知中肯定了大庆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大庆油田在生产建设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最可贵的，是他们从油田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在实际斗争中培育出来的大庆精神。”指出：“过去我们靠这种精神，甩掉了石油工业的落后帽子；今后还要靠这种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知强调：“大庆的许多宝贵经验，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希望，全国工交战线的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和发展包括大庆在内的一切先进典型的好经验，以改进领导作风，建设职工队伍，加强企业管理，推进四化建设。”中央在通知中还分析说：“大庆石油职工所以能够创造出那样的英雄业绩，为国家做出那样大的贡献，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就在于他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有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高度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他们的这种精神，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本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央的通知在充分肯定大庆精神和大庆基本经验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大庆有些经验绝对化、模式化，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们已经改变了依靠群众运动推动经济建设的做法，中央不再推广工业学大庆运动，学大庆的口号也不再继续宣传了。

第十二章　以更开放的胸襟，赋予大庆精神新的内涵

第一节　摆脱单一生产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为计划经济年代的石油工业基地，大庆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庆是政企合一，这种状况显然不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1979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大庆市。随后，中共黑龙江省委批准成立大庆市委。1984年1月，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大庆政企分开。大庆市政府负责市政工作，隶属黑龙江省政府领导；大庆石油管理局负责油田生产建设，隶属国家石油工业部领导；大庆石化总厂已于1983年9月划归中国石化总公司领导。

作为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占据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大庆保持原油稳产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做好原油高产稳产这篇大文章，大庆人注意以科技领先。为寻求一条既能保持稳产又经济可行的油田开发新路子，广大科技人员系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认真研究了国内外的先进科技资料，提出了高含水期开发结构调整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技术，进一步扩大水驱开发效果。为此，他们狠抓了以聚合物驱油技术为重点的科研攻关，在三次开发上做好文章。特别是近年来在大面积推广科研成果开发油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2002年底，大庆油田已将连续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的记录保持了27年。为国家上缴税金4000多亿元，是国家总投资的近90倍。

作为一座新兴的石油城市，石油和石油化工是大庆的主干产业。石油作为一种深埋于地下的矿藏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尽管人们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延长油田的寿命，但随着油田的开发、建设，地下可采储量必然要逐年减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世界上没有取之不尽的油田。纵观世界大势，石油城的发展前景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随着地下石油资源的枯竭而停滞或衰退，前苏联的巴库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巴库是前苏联的一个著名石油城市，由于产业比较单一，多元产业发展缓慢，随着石油开采业的大幅度衰退直到完全消失后，城市也就处于停滞、衰退的状态。第二种前景是保持持续繁荣。这类城市在油田开始衰退、石油可开采量枯竭后，仍然能够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美国的休斯顿市可算是典型之一。休斯顿市由于在石油开采业缓慢下降

时，抓住时机由单一的石油、石化产业转向发展多元化产业，从而使石油城逐渐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城市，保持了经济与城市发展的持续繁荣。

大庆油田自1976年登上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高峰以后，已持续稳产了很长时间。在为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大庆油田自身的储采失衡的矛盾也在加剧，油气资源接替不足，持续稳产、高产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油田密集储量的主力油层、好油层动用程度很高，剩下的储量大都比较分散，油层浅薄，特别是那些低渗透和稠油油田，开采难度很大。为了保持稳产、高产，还必须找到新的可采储量。为此，大庆油田的石油勘探每年都要向沙漠、戈壁、沼泽、黄土塬和滩海扩展，向更加复杂隐蔽的油气矿藏进军。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开采，油田含水率升高，特别是高含水和特高含水油田，产水量很高，加大了污水处理、供电等地面系统工程建设的工作量，增加了生产难度。由于油田作业难度加大，设备维修量也随之增大，增加了挖潜改造和增产措施的工作量，致使原油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自然递减幅度较大。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增大了石油生产的风险性。而且，考虑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大庆油田应该逐年减少产量，以休养生息。

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石油城市如果单纯依靠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加工业，是不能够持久繁荣的。于是，可持续发展就成为摆在大庆人面前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其实这也不单单是大庆自己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来考察这个问题的话，就不难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减少和环境污染的加剧，世界上所有资源型城市乃至整个世界都将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考验。

对于大庆的发展前景，还在1987年10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就适时提出，大庆要改变“三个单一”状况，大力发展替代产业。1990年2月，江泽民视察大庆时又意味深长地指出：作为一个城市来讲，总还是有一个长远的将来，大庆要“未雨绸缪，考虑长远发展问题”。1994年4月，朱镕基视察大庆时指出，要把大庆建设成为北国江南。1996年7月，李鹏视察大庆时要求，把大庆建设成为中国北方高科技的现代化城市。

为了落实中央领导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大庆人从实际出发，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了以油为主、多元开发、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1991年，他们提出“发展规模经济、实施名牌战略、技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和经营思路。

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庆人抓住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浪潮，抓住东北亚经济的开发和崛起的历史性机遇，制定了战略转变的总体方案。在指导思想上，通过大开放、大市场、大协作促进产业向高级化、多元化发展，逐步把大庆建设成为以石油和石油化工为基础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都比较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在内容上提出四个调整，这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由单一产业逐步转为多元产业；运行机制调整，由高度的计划经济逐步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战略调整，由半封闭的内向型经济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调整，由传统产业逐步转变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为了做好多元发展这篇大文章，大庆油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了以三次产油助剂为龙头的石化工业，带动了下游产品的开发，形成了发挥油田优势的工业群。他们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建材、机械、电子等规模型企业，不断增加开发起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增强油田的综合经济实力；积极开发对外石油技术和劳务输出，拓展国际石油市场。

1994年，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期间，江泽民在与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等人谈话时又一次谈到了大庆，他说：大庆给我的印象最深，大庆过去给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仍然给国家做贡献。可以说，大庆支撑了半个中国的石油工业。他还请岳岐峰代表他向铁人的子女和油田的职工表示问候。

在90年代，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前往大庆视察或听取大庆的工作汇报，对于发扬大庆精神，搞好大庆的二次创业作出了重要指示。李鹏在视察大庆时曾说过："大庆油田是祖国最大的油田，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希望大庆油田永葆青春，出更多的油，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为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题词："铁人精神代代相传"。朱镕基视察大庆时充分肯定了大庆的三个历史功绩。一是大庆以实际行动真正改变了中国贫油历史，树立了中国人民的信心；二是大庆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精神；三是大庆也体现了改革开放、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

1995年，大庆人迎来了油田开发建设35周年、年产5000万吨原油持续稳产20周年的日子。为鼓励大庆搞好二次创业，江泽民亲笔为大庆题词："发扬大庆精神，搞好二次创业。"也是在这一年，大庆人正式提出"二次创业"的战略构想，提出要"发扬大庆精神，搞好二次创业，实现长久繁荣，把大庆建设成为高科技现代化城市"的奋斗目标，制定了确定一个首要任务，抓好三个战场，发展六大支柱产业，实现三个重点突破，实施三项保证的"13633"发展战略。确保一个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石油、石化企业稳步发展。这是事关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也是大庆继续发展前进的基础和前提。抓好三个战场，就是要抓好开发区、区街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六大支柱产业，就是要发展石油产品深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乳品及畜产品深加工，建筑及建材加工，电子信息业，机械及仪器仪表业。实现三个重点突破，就是要使地方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有新突破，外向型经济发展有新突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新突破。实施三项保证，就是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维护社会稳定。

1998年，中国石油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改造，对原油、成品油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当年4月，世界欧佩克10个成员国和墨西哥等国达成协议，从4月1日开始，每天减少210万桶原油产量。与此相适应，大庆也制定了自己的减产计划：原油年产量指标由1998年的5570万吨，下调为5450万吨。当时，大庆油田已经实现高产稳产23年，但下调产量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国石油企业与国际石油市场接轨的具体表现，它标志着我国石油企业的观念和机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这一年开始，大庆油田的开发指导方针也由"特续高产稳产"向"高水平、高效益、可持续发展"转变。实践证明，这一转变是及时、有效而且是成功的。1999年，

大庆原油产量下调120万吨，经济效益却由86.3亿元上升为115亿元。

新兴的大庆市既体现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又具备了一般中等城市应有的诸多功能。这种城市格局，顺应了当今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卫星城市、田园城市理念，避免了人口过于集中的城市通病。由于坚持走多元化产业发展道路，注意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在原油产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大庆市连续5年GDP年均增长8%以上。2002年，大庆还成为我国内陆地区首家环保模范城。

第二节　今日“铁人”钻井队

1205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生前工作过的钻井队，他曾长期担任这个钻井队的队长。这个队自1953年在玉门组建以来，在王进喜的带领下，1958年钻井打出了“月上五千，年上双万”的当时全国最高纪录；大庆石油会战期间，1205钻井队又以“不上十万非好汉，不夺冠军心不甘”的精神，创造了15小时38分钟打成一口小“三一井”，22小时钻一口1221米中深井，班进尺721.64米的新纪录。后来王进喜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他“当了干部，还是个工人”，仍在关心着1205钻井队。1966年，1205钻井队在铁人精神鼓舞下，年进尺突破10万米大关，超过了当时美国的“王牌”钻井队和前苏联的格林尼亚“功勋”钻井队，成为世界顶尖级的钻井队。70年代，为完成老队长未竟的事业，这个队全体职工继承发扬铁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于1971年底，实现了老队长生前提出的“日上千、月上万，一年打它12万”的奋斗目标，并首创月进尺16201米、年进尺12.7万米的当时全国最高纪录。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历史时期，1205钻井队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1982年，他们成为全国第一个累计钻井进尺逾百万米的井队；1989年，他们的钻井总数在全国率先突破1000口大关。自1990年起，1205钻井队已连续13年实现年人均交一口井的奋斗目标。截至2003年，这个队已累计为国家交井1530多口、钻井进尺195万余米。

对于1205钻井队所取得的成绩，各级领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先后被石油工业部授予“铁人钻井队”、“钢铁钻井队”、“卫星钻井队”等荣誉称号；1995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003年被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授予青年文明号、“百面红旗”单位称号。

从大庆石油会战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1205钻井队的队长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每任抓学技术和岗位练兵都一样认真。大庆钻井二公司近几年举办了两次岗位技能大赛，总共设9个单项，1205钻井队一次拿了9个第一，一次拿了7个第一。

1205钻井队不仅技术过硬，更重要的是作风过硬。大庆人常说，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能看出1205钻井队的那种铁人精神，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英雄气概。

大庆采油六厂所辖喇嘛甸区块，人称“气老虎”。这个区块开发过多次，每一次，

再有经验的钻井队也会遭遇井喷。2002 年 8 月，1205 钻井队所在的钻井二公司，把在这个区块打一口定向井的任务交给了 1205 钻井队。

1205 钻井队接受任务后，组织全体干部职工研究防止井喷的办法。泥浆是钻井的血液，要防止井喷，就要把住泥浆关。为此，他们充实泥浆管理小组住井督岗，泥浆大班实行 24 小时住井，对容易出问题的开钻前的基浆处理和打开油层前、完钻电测后、固井前的泥浆处理四大关口勤观察、勤测量、勤维护。结果，不仅没有发生井喷，还创出了井身合格率和固井优质率两个 100%的好成绩。

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1205 钻井队以“面向市场争一流，跨出国门站排头”的发展战略目标和“与时俱进敢为先，永葆队旗更鲜艳”的开拓进取精神，大力实施“建设集调整井、定向井、水平井等多种井型于一身的多功能钻井队”的总体工作部署，不断创出新的业绩。为掌握当今国内外领先钻井技术，加快向海外市场的挺进步伐，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这个队常年组织职工学习外语、涉外工程承包知识和特殊工艺井技术，增强了职工队伍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近年来，全队职工以要上就上高水平，要创就要创一流的干劲，先后完成了丛式定向井、取芯井、小井眼井和阶梯式水平井等特殊工艺井型的施工，实现了向多功能钻井队的重大转变。如今的 1205 钻井队，人人都能用计算机操作，人人能用英语记录报表，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走出去和国际先进钻井队一比高低。

其实，1205 钻井队如今已经走出了大庆，走遍国内各油区，并走出了国门。在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的油田，都有过 1205 钻井的轰鸣。

今天的 1205 钻井队只是今日大庆的一个缩影。大庆钻井技术服务公司，按照“标准化施工、文明化言行、军事化作风、规范化操作”的要求，固井工程施工打入国内外油田，工程产品打入苏丹、哈萨克斯坦，赢得了“最信得过的固井队伍”的赞誉。基建施工队伍干一项工程，树一块丰碑，在陕京管线、西气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中，赢得了信誉，树立了形象。油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占市场，2002 年外拓市场总产值达 1.02 亿元，被称为“善战之师，扬威江南，铁人后代，名不虚传”的铁军。由大庆制造的不少产品已成为国内外市场的名牌。其中大庆生产的电泵除牢固占领国内市场以外，还打入苏丹、美国、印度尼西亚、秘鲁等国外市场。

第三节　新时代的“铁人”王启民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庆还狠抓了队伍建设，形成了以王启民为代表的新一代“铁人”队伍。

王启民于 1937 年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1961 年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大庆油田。1964 年，大庆油田出现了“注水三年，水淹一半”的严重局面，王启民奉命到油田中区西部搞注水开发试验。他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所得，结合大庆油田油层多、厚

层薄层的渗透率差异较大、呈典型非均质分布的特点，向国际上肯定的“温和注水”理论发起了挑战。他大胆实践，反复摸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大庆创造了一批日产百吨以上的高产井，从而闯出一条我国自己的注水开发油田的新路子。

70年代，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大庆油田中区西部试验区的油井平均含水上升到54%，地下形势恶化。王启民带领试验组奔赴一线，用10年时间，进行“分层开采、接替稳产”的试验。他们收集整理了8种、近10000个数据，绘制出油田第一张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从而揭示出油田不同含水期开发的基本规律和稳产办法，有力地指导了油田开发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庆油田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6年，王启民领命承担大庆油田1986至1995年第二个年产5000万吨稳产10年的规划编制任务。此时，油田综合含水已超过85%，要使油田保持10个年产5000万吨的目标，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王启民把目光投向了被同业人士称为禁区的表外储层。他们通过对1500多口油井的地质剖析、研究，对四个实验区45口井试油、试采，终于打开禁区的大门，实现了世界油田史上一个新的突破。

进入90年代，大庆油田全面进入高含水开发阶段，如果继续采用世界上惯用的提液稳油的老办法，油田的经济效益将会大为降低。此时，年过半百的王启民再挑重担，率领科技人员投入到稳油控水的系统工程研究与开发中。他们经过多次试验，组织科研攻关，终于以“三分一优”的结构调整方法拿下这个工程，从而使大庆油田实现了三年含水上升不超过1%，有力地保证了油田的稳产高产。

与铁人王进喜一样，王启民在取得一个个辉煌成就的背后，也伴随着巨大的自我牺牲。他有一句名言：“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他顽强地与疾病搏斗了30多个春秋，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坚持搞科研。妻子临产，他没能护送，以致他的女儿在路途中降生；母亲病危，他没能赶回去最后看亲人一眼，老人是拿着儿子的照片离开人世的。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追求享受、追求待遇的倾向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所抬头。对此，王启民说，尽管时代不同，岗位不同，但做事情都要靠艰苦奋斗和顽强拼搏，铁人精神不能丢，现在提出的“突破瓶颈，挑战极限”就是铁人精神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大庆石油会战时期，“铁人”王进喜是一面旗帜，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下，会战大军奋勇拼搏、克服困难，夺取了石油会战的辉煌成就。今天，新时代的“铁人”王启民也是一面旗帜，他同样鼓舞和带动了今天的大庆人在二次创业中顽强拼搏，去夺取更加辉煌的成就。

大庆炼化分公司100万吨/年ARGG装置安装过程时，由于工期紧、任务重，很多人昼夜奋战在工地上。高峰时期23台吊车、5个施工单位、1200多人在1万余平方米的工地上协同施工。正常需要两年才能安装成功的设备，他们只用200多天就安装完成了。该公司党委副书记张振在投产前夜连续24小时没合过眼，投产成功了，他也累倒了。有的焊工连续多日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采油二厂二矿48队资料员王玉薄，患

有严重的颈椎病，右手发麻，她就用左手操作鼠标。她从事资料分析 15 年，整理资料数据达千万个，无一差错。井下作业分公司作业一大队 102 队队长王宏志，在采油六厂施工时，被高速喷出的压裂液和油气冲下操作台，撞到油管接箍上，当场昏迷过去。待醒来后又强忍剧痛，冲上井口，和大家一道制止井喷，避免了一场更大的事故。

1997 年 1 月 17 日，正是北京的隆冬时节，但人民大会堂里却春意盎然。下午 3 点，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

江泽民微笑着同王启民握手，当他得知王启民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等多种疾病时，亲切地告诫他："要注意身体。"

四天之后，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1997 年工作会议上，总经理周永康将"铁人科技成就奖"的惟一金奖连同 10 万元奖金奖给王启民。王启民激动地接过奖牌，他表示要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科研工作，以报答各级领导的关怀与厚望。对于那 10 万元奖金，他全数上交给了组织，决定作为勘探开发研究院的科研奖励基金，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多出成果，为大庆二次创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9 年 6 月 9 日，大庆石油管理局举行科技工作总结表彰暨三项配套技术攻关动员大会，王启民在会上被任命为进行油田三次加密调整、三元复合驱油和外围"三低"油藏有效开发三项配套技术攻关队总指挥。从此，他更加忘我地投身到大庆油田的科技攻关和开发建设中去。

王启民的先进事迹不仅在大庆，在全国石油系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全国各大油田普遍开展了学习新一代铁人王启民的活动。

胜利油田在学习、宣传王启民先进事迹时，把学习的内容作为油田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在全油田开展以学习、宣传新"铁人"为主线的"四个教育"活动：学习王启民的新"铁人"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艰苦奋斗教育，引导职工在二次创业中迎难而上，埋头苦干；深入进行现代科技教育，引导职工刻苦钻研技术，全面提高技术素质；深入进行主人翁意识、责任感、使命感教育，引导职工立足岗位，兢兢业业，勤奋工作。

辽河油田把学习王启民的活动确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局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提出以学习新'铁人'精神为核心，加强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并要求各级干部自觉对照王启民找差距，公开述职，增强学习新"铁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局党委专门组织职工收看王启民事迹报告会，全局共有 6 万人收看了报告会实况。局党委和下属各二级单位都专门召开了学习王启民事迹的知识分子、管理干部、劳动模范座谈会。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在全局选树了一百多个先进典型，提出"远学新'铁人'，近学身边典型"的口号。

江苏油田结合实际开展学习王启民的活动，全油田的科技工作者表示，要向王启民那样，解放思想，注重实践，力争在三大勘探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局党委提出，利用二至三年的时间，全油田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实现"四个走在前面"，即上级走在下级前面，党员走在群众前面，领导机关走在基层前面，油田走在地方前面。

塔里木石油探区在学习王启民先进事迹的活动中，通过举行座谈会、讨论会，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大家纷纷表示，王启民精神就是“铁人”精神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在塔里木石油会战面临许多世界级难题的情况下，更要发扬新时期的“铁人”精神，要像王启民那样艰苦奋斗，顽强拼搏，锲而不舍，勇于探索，不断向未知领域进军，不断攻克勘探技术难关，创造出第一流的工作业绩，为在塔里木寻找大油田，建设大油田做出新的贡献。

玉门油田广大干部职工通过学习一致认为，“铁人”王进喜是老一代石油工人的代表，王启民是我国陆上石油工业的新时期涌现出的先进典型。玉门油田在二次创业的艰难时期，尤其需要新时期“铁人”精神。

长庆油田把学习王启民与学习身边先进人物结合起来，以王启民的先进事迹为教材，教育干部职工发展油田的大好形势，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科研攻关的激情。

第四节　大庆精神不能丢

大庆精神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场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在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曾一度放松了对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放松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宣传，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邓小平所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于是，社会上有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时代变了，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已经过时了。还有人开始批判“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观念”。因此，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大庆精神也少有人提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似乎大庆精神已经过时了。

大庆精神真的过时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实现民族复兴任重道远，各方面的工作千头万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形势越复杂、越严峻，越是需要振奋民族精神，越是需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越是需要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同心同德，共同奋斗。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江泽民来到大庆。他带来了党中央对大庆在过去几十年所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也带来了党中央继承发扬大庆精神，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决心。

2月25日上午，江泽民乘坐的列车停在大庆车站。他下车后顾不上休息，即驱车前往离市中心30多公里的八百垧，去看望铁人王进喜的家属。在途中，江泽民向随行人员详细询问了王进喜逝世后家人的情况。他满怀深情地说：王进喜同志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吃水不能忘记掘井人啊！

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家中看望，王进喜的老伴王兰英和儿子、儿媳都很兴奋。他们像

过年一样，将地板拖了又拖，桌椅擦了又擦，全家人都换上了最好的衣服，兴奋地等待江总书记的到来。大庆的一些职工和家属听到这个喜讯，也纷纷来到王兰英住的4—3号楼前。尽管大庆的2月正是天寒地冻，但人们心中却充满了暖意。

上午10点30分，江泽民乘坐的汽车停在了4—3号楼前，在场的群众自发地站在道路两侧，向江泽民鼓掌欢迎。江泽民面带笑容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此时，王兰英及家人已在门外迎接。有人向江泽民介绍说："这是铁人的老伴王兰英。"江泽民拉着王兰英的手，询问了她的身体和子女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他深情地说道："王进喜同志为我们中国石油工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永远忘不了他。"他把右手按在心口上说："我们都很怀念他。"

江泽民对王进喜的子女说："你爸爸那时实在是苦啊！我看了电视连续剧《铁人》，这部剧拍得好，很成功，充分体现了中国石油工人的精神风貌。"在场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插话说："这部剧放映后，在我们石油系统反应也很强烈。"江泽民接着说："哪个时候，要把一台钻机搬进来，没有相当的毅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看现在还要发扬这种精神。"

人们谈话间，王进喜的孙女王文静走过来，施了礼，把崭新的笔记本打开，对江泽民说："想请江爷爷给我题个词，这是我的笔。"江泽民爽快地说："好，题一个。"于是，他提笔写道："继承发扬铁人精神，做铁人的好后代。"

从王进喜家出来，江泽民又视察了大庆的22个基层单位。在座谈中，他希望同志们要继承大庆创业精神，向铁人王进喜学习，保持大庆的光荣传统，为油田稳产5000万吨原油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视察过基层单位以后，江泽民又认真听取了大庆领导的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将大庆精神总结归纳为四种精神。这就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讲究科学、尊重科学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他指出：这几个精神正是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不仅工业部门，各行各业也还是要学习这种大庆精神，因为它展示了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色。

江泽民在讲话中还高度概括了大庆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他指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建设，打破了中国贫油论之说；在三年最困难时期，大庆在能源上支援了各地，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支撑濒临崩溃的经济做出了贡献……

最后，江泽民又总结说：大庆在给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工人阶级创造了一个很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就是中央再三肯定的那四个精神，我们应该珍惜它。而且在今后实现四化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

江泽民还挥笔为大庆题词："发扬大庆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1997年1月，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时，又一次讲到大庆精神。他说：今天，我要特别给你们坦率地亮一个思想，就是中央认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单单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就是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大庆精神、艰苦奋斗、“三老四严”等传统作风，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大庆是我国工业战线的一个好榜样，大庆职工和石油队伍是我国工人阶级的英雄队伍。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征程中，高度重视教育和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20世纪90年代，胡锦涛在一次听取有关大庆工作的汇报后指示：“要珍惜大庆的光荣历史，再创大庆新的辉煌。”他说：“石油能否保持稳定增长，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关国家大局。”党的十六大闭幕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来到革命圣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他在西柏坡回顾了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胡锦涛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2003年是王进喜80周年诞辰。10月8日，中国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大庆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石油工人的光辉楷模铁人王进喜同志。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务院国资委、黑龙江省委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负责同志，大庆石油石化企业和社会各界近3000人参加了大会。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托，正在黑龙江省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专程到王进喜曾经工作过的大庆1205钻井队，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慰问奋战在采油一线的石油工人。他高度赞扬大庆石油工人为共和国建设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鼓励他们继续发扬“铁人精神”，赋予“铁人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再立新功。

当然，我们要继续弘扬大庆精神，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同时肯定以往工业学大庆运动中的一整套做法。历史已经证明，依靠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来推动经济建设的办法并不成功。我们要坚持依靠市场配置生产要素，依靠法制维护经济秩序，同时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经济建设中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庆精神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与前人相比较，我们应当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野更加开阔，胸襟更加豁朗。要赋予大庆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意志，使我们的路线、纲领、政策、行动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艰苦奋斗，万众一心，全力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小康社会。

第九篇

改革开放时期到来

第一章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一、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于是他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南巡

1970年九届一中全会以后，随着批陈整风运动的进展，毛泽东看到一些人的检查交待和揭发材料，觉察到林彪一伙人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三项办法观察他们的动向，削弱他们的权势。他还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他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要学他的办法，到南方去游说各路诸侯。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南巡。

是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由汪东兴、张耀祠陪同乘专列离开北京。16日到达武汉，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了话。17日又将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召到武汉谈话。25日将前不久由湖南调到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从北京找到武汉谈话。27日下午两点离开武汉前，在火车上同刘丰谈了一次。

27日晚毛泽东到达长沙，晚9时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以及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28日晚9时，将广州军区和广东、广西负责人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召到长沙谈话。30日上午又谈了一次。

8月31日晚毛泽东到达南昌，江西负责人程世清和奉命上午到达的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去车站迎接，毛泽东同他们在火车上谈了两个小时左右。9月1日上午，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奉命到达南昌。当天下午和9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程、韩、许共谈了两次。

毛泽东于9月3日零点左右到达杭州后，同浙江省及当地驻军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9月10日下午2时半至3时40分，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又同南、熊、陈及白宗善谈了一次。

10日晚专列到达上海后，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专线上，毛泽东在车上同上海市负责人王洪文、王维国谈了话。11日上午，许世友奉命从南京飞来上海。毛泽东10时半同许世友、王洪文在火车上谈了话。下午2点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上海北返。

毛泽东离开上海后，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在火车站等候。11日晚6时左右，专列在南京站停留十几分钟后，继续北返。9月12日中午到达丰台火车站，毛泽东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负责人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找来，在火车上同他们谈了话。晚5时左右，专列到达北京站，毛泽东回到中南海。

毛泽东在各地的谈话内容，中共中央根据在各地的谈话纪要综合整理出一份《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于1972年3月17日转发全党，要求立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根据九届二中全会和其后开展的批陈（伯达）整风情况，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首行强调“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历数建党50年来发生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党没有分裂，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其次，他批评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和林彪的错误言行。最后，他要求军队、地方都要谨慎；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一切行动听指挥；要读马、列的书。他还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

此外，毛泽东还在谈话中对党内一些重要人物作了评述，他说：遵义会议是张闻天、王稼祥支持的；陈独秀不讲民主，怕农民，他有个长处，不爱财；五十年不容易，党的历史叫大家知道好；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在关键时刻叶剑英立了一大功，你们应当尊重他；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有个前委，主要是邓小平起作用。毛泽东还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光是老将不行；对子女管教一定要严格，对缺点不要怂恿；对农民永远不要搞任何形式的反瞒产；资本家定息还搞不搞，要讨论一下；民主党派问题要拖一拖，等斗批改搞得差不多了，把民主党派的牌子再挂出来；现在生产情况还好，就是日用品不够用；雅尔塔会议是瓜分世界的会议。毛泽东还针对称颂他为“天才”等三个副词问题说：现在要降温，把我的像到处挂，日晒雨淋，可怜噢！在南巡过程中，毛泽东还协调了福建和江西、上海和江苏的关系，要浙江一些人解决和南京的关系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这些很重要的思想并未整理到中央下发的文件中。

自毛泽东开始南巡后，林彪一伙因心中有鬼，急切想知道毛泽东到了哪里，找哪些人谈话，谈了些什么。吴法宪只能根据空军的报告，知道何时何地有飞机飞往何处，猜测毛泽东到了哪里。后来，他们通过刘丰、顾同舟、王维国三条渠道得知了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

1971年9月5日，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6日晨，刘丰违背毛泽东不许把他谈话内容往北京传的规定，在东湖宾馆向李作鹏详细讲了毛泽东与他谈话的内容。李听后十分紧张，并形成三个印象；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还没有完（他原以为4月份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检讨就算了结）；上纲比过去高了；矛头似乎指向林彪。因此，李回京后立即告诉了黄永胜，黄听后也很紧张，连夜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叶群。1980年11月25日，黄永胜在法庭上供认：他给叶群通情报，促成林彪下决心谋害毛泽东主席，后果是很严重的。

刘兴元、丁盛从长沙回到广州后，按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5日向军以上干部传达

了毛泽东同他们的谈话的主要内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置会议宣布的纪律于不顾，当晚便将毛泽东谈话要点告诉于新野、周宇驰。于新野连夜整理出电话记录稿，周宇驰于6日飞往北戴河，将记录稿交给林立果、叶群、林彪。顾同舟还按周宇驰的旨意，将毛泽东谈话内容整理出长达50页的详细文字材料，9月9日派人乘飞机密送到北京交给周宇驰、林立果。

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于9月11日晚，在上海打电话给周定，密报了毛泽东与其谈话内容和离开上海的情况。12日，又派专人乘飞机到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谈话的详细内容。

二、毛泽东南巡谈话震动了林彪一伙，反革命武装政变一触即发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吴法宪、叶李作鹏、邱会作等人。1971年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明确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黄等心中没底，不知此事是否就此了结，担心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

毛泽东在南巡路途中的多次谈话，把1970年的庐山会议说成是党内第十次大的路线斗争，说“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党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这里，已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件上升到“夺权”、“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等“大将”的名，还批评林彪说：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说过头了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林彪当然要对庐山这一次的斗争“负一些责任”。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对一些人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毛泽东还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指林立果在空军的一个讲用报告，被吴法宪等吹为“超天才”。林彪一家有四口人，毛泽东指名不指名的批评了三个人。

毛泽东历来很重视军队。针对当时一个很流行的提法，毛泽东批评说：“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毛泽东还在一些场合中说：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军队要统一，要整顿。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

当9月5日、6日，林彪、叶群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惊恐不安，决心采取行动谋杀毛泽东。

9月6日，周宇驰飞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据林立果讲，林彪当时抱着头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9月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次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这就是发动武装政变的命令。9月11日，林立果又将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王飞，原文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法庭宣读了总政保卫部226号鉴定书结论是：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两页检验材料上的字迹是林彪所写。”

那么林立果、周宇驰“传达的命令”内容又是什么呢？据当晚至9日凌晨看过“手令”和听传达的胡萍、江腾蛟、王飞等人交待说：就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指谋害毛主席），“北京由王飞负责指挥攻打钓鱼台”。其他十几名见过林彪“九八手令”和听到林立果、周宇驰所传达的命令的人都证实：尽管说法比较含蓄，但实际内容就是搞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林立果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就是“武装起义”。这个已经报告过首长（指林彪），他同意。胜败在此一举，有叛变的毙了他。

林立暴在具体策划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时多次讲：这次是首长（批林彪）下决心要搞，亲自在抓。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指毛泽东）搞掉。9月11日晚，当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已离开上海后，痛哭流涕地说：“全完了，首长（指林彪）把生命都交给了我，我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待呢?”

三、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处置林彪出逃事件

林立果9月7日至11日，曾与江腾蛟、王飞、周宇驰、李伟信、鲁珉等先后6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行动方案，因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施。11日晚10点多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林立果、周宇驰即开始实施其“中策”，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下午4时半，周宇驰在西效机场，布置胡萍调6架飞机，准备飞广州，此前已布置胡萍为林彪准备三叉戟和伊尔十八两架飞机，准备于13日7时半和周一起乘伊尔十八飞机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三叉戟256号专机同林彪一起飞往广州。胡萍一一作了布置和安排。

12日晚7点40分，林立果、刘沛丰等乘三叉戟256号去北戴河，8点15分到达山海关机场。胡萍谎称专机256为客机252。当晚，周宇驰、于新野等在北京策划次日（13日）南逃广州的起飞时间、降落地点、随行人员名单和分工，并准备了枪枝弹药。

晚9点左右，林立果、刘沛丰来到北戴河林彪住处96号楼。当时大厅正为林立衡订婚放电影。林立果对林立衡说：祝贺你们！我马上到首长那里去。说着便到叶群卧室谈话，然后一起到林彪的客厅。据林立衡说：9月7日，林立果在北戴河曾向她透露过9月6日叶群逼林彪乘机逃往苏联的一些情节。因此，她便派身边人员偷听林立果与林彪、叶群等的谈话，得知他们说要坐飞机逃跑。晚10点多，林立衡在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陪同下离开96号楼到58号楼，向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的负责人姜作寿、张宏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要往广州、香港跑，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他们

还要谋害毛主席，警卫部队要注意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张宏当即电话向张耀祠汇报，张立即报告汪东兴，汪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讨论准备在四届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周恩来接到电话报告后，命令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同时打电话找吴法宪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确实刁；知情，便问胡萍，胡谎称是改装好的三叉戟飞机，试飞山海关。吴按胡萍的说法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吴又电话告知胡萍，胡口头答应，而又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诉林立果早拿主意，同时又同山海关机场的驾驶员潘景寅合谋，谎称发动机油泵坏了，飞不回来。周恩来重申：修好后，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来京。

因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周恩来在找吴法宪了解飞机情况之后，又打电话向李作鹏查问。

周恩来追查飞机的情况，通过胡萍、周宇驰、林立果这条电话线，不断传到北戴河林彪住处。叶群为了试探和证实此事，便在晚 11 点 22 分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彪要动一动。周恩来问坐火车还是乘飞机？叶群说：乘飞机。周恩来追问是否调了飞机，叶群欺骗周恩来说：还没调。

此时，周恩来已查清 256 专机就在山海关机场，而叶群却谎称没调飞机。周恩来后来对身边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为防止发生意外，周恩来进一步下达命令；这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把这架飞机封锁起来。

李作鹏两次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时，将周恩来的命令篡改为：周、黄、吴、李“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据李作鹏说：周恩来还指示他：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周恩来）去电话。

周恩来封锁 256 号专机消息传到林彪住处后，引起他们一片惊恐，认为一定是内部出“叛徒”，有人向中央作了报告，他们的阴谋已为中央察觉，再不跑就来不及了。林彪、叶群、林立果本来安排 13 日晨携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作会飞往广州。但为掩盖真相，林彪却故意说：明早 6 点去大连，并让人打电话问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就在叶群与周恩来通电话之后，周恩来下令封锁飞机不久，晚 11 点 40 分，叶群拉着警卫秘书李文普急忙到林彪那里，叶先进去同林说了几句话后，再让李进去。林对李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等吴法宪的飞机到了就走。叶群说：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叶群出来催李快点调车，越快越好。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林立果也对李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李打电话通知部队，林立果将电话按住说：哪里也不要告诉，部队也不要告诉。李还听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晚 11 点 50 分左右，林彪对公务员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司机杨振刚随即将车开来。刘沛丰先上车，要林立果随后坐在第二排。叶群上车后，林彪连帽子、大衣都没带，最后上车，他俩坐在第三排。李文普在车上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

远？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了。这时，李才醒悟：他们不是去大连而是要去苏联。

汽车下山经过58楼时，路边有警卫部队战士拦车。叶群说：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司机就按喇叭加速冲过58楼。过了挡车线约100米，李文普突然喊停车，随即跳下车。车里有人向他开枪，击伤其左臂，李也向汽车前门还击一枪。挡车的警卫部队战士见车停了便追过去，也对汽车打了两枪，只见车门未关好就继续向山海关机场急驶。

13日零点2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没等客梯开来，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个爬了上去。机组人员还没上齐，舱门未关好，飞机就急促起动、滑行，于零时32分起飞。

林彪等是11点50分离开北戴河住地的。11点45分，八三四一部队一名副大队长带7个人乘吉普车先一点出发去山海关机场准备控制飞机，但在途中，被林彪的高速轿车超了过去。他们到机场后见林彪、叶群正在上飞机，便找到机场调度室，要求制止这架飞机起飞。机场采取关闭灯光和鸣枪办法阻止起飞，而飞机还是在黑暗中强行起飞了。

林彪的汽车从北戴河开出后，八三四一部队按周恩来劝阻林彪不要上飞机的指示，先后组织了8辆车70多人，由张宏副团长带领追林的车。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他们将未来得及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和程洪珍等人交机场看管。将林彪、叶群未带上飞机的东西带回北戴河，听候中央处理。

9月13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陆续接到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阻拦乘车强行去机场，并开枪打伤警卫秘书；零点32分飞机已强行起飞。周恩来在电话中要汪东兴即刻到毛泽东住处；要李德生马上去空军司令部；又将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中找来，嘱咐他以甲央政治局秘书名义带人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指挥，并告诉吴法宪，杨德中到后立即让杨亲自向他回电话。吴法宪明白杨是来监视他的。

杨德中当即与警卫处副处长王福中一起去西郊机场。吴法宪即已明了杨的来意，因此接电话、传达命令都大声复诵，使杨能听清楚。

周恩来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张耀祠也几乎同时到达。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但256号飞机不回答。地面雷达不断报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飞机耍了个花招。开始时航向290度即向北京、大同方向飞，但十几分钟以后，在零点46分改航为311度，向蒙古的西部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一线飞行。

1点12分吴法宪来电话请示是否对飞机进行拦截，汪东兴接电话后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汪给吴回电话说，不要派飞机阻拦。

1点55分，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逐步在我方雷达屏幕上消失。

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下达禁航令：从现在起所有飞机一律不得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1点52分到59分禁航令下达完毕。但在3点15分接到报告

说：从沙河机场飞走了一架直升飞机。这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用林彪“九八手令”骗走的。周宇驰要驾驶员飞向乌兰巴托。毛泽东、周恩来命令空军进行拦截、迫降，绝对不允许飞出国境。几经周折，这架直升机13日6点47分降落在怀柔县境内。降落过程中驾驶员陈修文与周宇驰搏斗被周杀害，由副驾驶员操纵降落。落地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

直升飞机起飞后，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坚持要他去人民大会堂暂住。毛泽东住到了大会堂的北京厅，要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通报情况，研究处理方法。直到14日中午接到我驻蒙使馆报告，才知道256号飞机已于13日2点30分坠毁，林彪等9人全部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

第二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始末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两国人民在这悠久的历史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军国主义者却把对外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爆发于1937年4全面侵华战争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大灾难，在中国人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都是两国人民永远不应忘记的经验和教训。毕竟友好交往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消极因素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冷静地将日本广大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加以区分，大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关系的发展，积极努力重建中日友好关系。1972年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所走过的23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风云突变、波澜曲折，是一段两国人民冲破一切反华势力的重重阻挠，艰难奋进的历史。

吉田阴霾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独霸日本。日本在麦克阿瑟的掌管下，按照美国人的意愿，对旧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整治，其对外政策就更是唯美国的马首是瞻。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美国在亚洲称霸的迷梦，它对新中国采取极其敌视的政策，同时改变对日策略，大力扶植保守的日本亲美势力，重建日本的防卫力量，以使日本成为美国反华战线的前沿。日本的吉田茂内阁紧紧追随美国，为美国的反华政策摇旗呐喊。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除积极介入朝鲜战争外，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违背“不使用武力干预台湾现有局势”的诺言，公然派出第七舰队、第十三航空部队占领台湾，中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为了进一步把日本纳入其亚洲军事战略体系，急急策划召开将新中国排斥在外的对日媾和会议。1950年12月4日，周恩来就对日和约问题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但是美国政府并未停止这一反华举措。1951年9月8日，四十八个国家的代表与吉田茂政府的“全权代表”在旧金山签订了片面的对日“和约”。当晚，吉田茂又与美国国务卿艾奇孙、外交顾问杜勒斯在旧金山下级军官会议厅，私下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完全充当了美国反

华的仆从。

旧金山会议之后，吉田茂政府向美国保证，日本将与台湾缔结和约，这无疑是对新中国最直接的挑衅。1952 年 4 月，吉田茂内阁与台湾签订了“日台条约”。吉田茂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强烈的愤慨。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阴霾之中。

第一批民间使者赴日

吉田茂等人只能代表少数亲美反华分子，与他们对亲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曾深受帝国主义之苦的日本人民却十分渴望与中国人民恢复传统的友谊。早在 1949 年 10 月 10 日，日本民间便成立了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筹备会。日本各界的有识之士也希望与新中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政府也并没因为吉田茂等人的反华政策而放弃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1952 年，中国采取主动，首先打通了中日两国经贸往来的道路。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重振面临着一系列困难。1952 年日本经济再度陷入严重的危机，许多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数日益增加。正在这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向日本财界的十位实力人物发出了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邀请信。日本财界积极响应中国的倡议，吉田茂政府却拒绝给参加会议的代表发放护照。应中国代表团邀请，作为战后首次访问中国的日本人进入北京。日本各界代表在东京集会，成立日中贸易促进会议，致电日本代表，希望他们缔结日中贸易协定。

1952 年 6 月 1 日，中日两国代表签订了第一个中、日贸易协定。美国苦心经营的对中国禁运的高墙终于被中日友好交往冲开了缺口。

继中日签订贸易协定后，中国政府再次采取主动，推进民间友好往来，这就是中国协助日侨归国。日本人民为了表示谢意，邀请中国红十字代表访日。1954 年，中国红十字代表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民间使者赴日，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1952 年 12 月 1 日，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提问时表示：“我国政府向来愿意协助自愿回国的日本侨民返回日本。……只要日本方面有办法解决船只问题，我国政府和人民极愿努力协助日侨回国。”中国政府的这一友好表示立即获得了广大日本人民的赞扬。日本日中友协会在听到北京电台的广播后，立即致电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将与日本各界各阶层合作，就解决这一问题立即派遣代表和进行其他准备工作。”吉田茂政府迫于国内压力，不得不签发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护照。1953 年 1 月 24 日，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协会及日中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在日本人民的热烈欢送下，登机经香港赴中国。3 月 7 日，双方发表公报，中国答应负担归国人员到达港口前的一切旅费，并为日侨提供携带物品、兑换外汇的方便。3 月 23 日，运载日本归国侨民的“兴安丸”顺利抵达京都府北部的舞鹤港。从此，日本侨民分期分批回到了故土，他们带回了关于新的最具体、最直接的信息。日本民间掀起了不大不小的“中国热”。

为了感谢中国人民，1953年7月日本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会发出了访日邀请，中国方面欣然接受。但是，要让中国代表最终踏上日本领土，这还需一番艰难的争取。日中友好协会以争取中国代表团访日为目标，倡议以1953年10月为“日中友好月”。这年10月，日本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日中友协还发起了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签名活动。

此时，亚洲的局势出现了暂时的缓和。1953年7月27日朝中代表与美国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日本国内的形势也因此有所变化。正是在7月底，日本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在日中之间缓和对人员往来的限制，促进贸易的发展。次年5月，日本众参两院又表决通过了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决议。

中国红十字会迅速组成了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大型代表团。周恩来总理极为关心代表团的情况，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954年11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达日本，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赴日的民间使者。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细水长流的原则，向日本各界朋友明确表示，中国人民不记前嫌，希望与一衣带水的邻邦尽快恢复传统友谊，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当代表团乘车从京都去大阪时，沿途五十公里的公路两侧挤满了欢迎的人群，盛况空前。日本掀起了一个被称为“李德全热”的中国热。

遣返日本战犯

1954年12月10日吉田茂内阁倒台，民主党鸠山一郎组阁。鸠山对发展中日关系较为热心，中国政府及时作出友好表示。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社论，表示中国政府准备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并解决中日间的渔业问题。1955年4月中日签订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在此之前，雷任民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于3月29日到达日本，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促进日本贸易评论员联盟进行缔结新的中日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方指出：要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民间努力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就双边贸易进行谈判，在未达到此点之前，民间协定应取得政府支持。5月4日，中日签订第三次贸易协定，日本贸易促进会会长村田省藏致信雷任民，通报中方，鸠山一郎向评论员联盟的代表表示对协定予以支持和协助。同月，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应郭沫若的邀请访问北京，从此打开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同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率领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议代表团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举行了亲切会谈，双方签订了第一次民间文化交流协定。

随着中日间人员往来的增多，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展，中国政府再度采取主动步骤，推进友好关系的发展。1950年4月，中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中国政府决定对他们予以宽大处理，并遣送被释战犯归国。6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335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之后，又有682名战犯被免予起诉。这些战犯先后分批回国。战犯们离开中国时一再表示：“一同携起手来，为和平，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和团结而奋斗。”许多人在归国后积极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民间交流进一步发展，鸠山一郎本人也确实对双方经贸往来予以支持。但是日本的外交政策仍然未脱旧有的框架。虽然中国政府曾有举行中日政府间会谈的意向，日本政府却没有作出响应，中日交往仍然限于民间交流的范围之内。

岸信介，故意为难

鸠山内阁之后，石桥内阁在首次会议上表示在北京和东京互派民间贸易人员。但是两月之后，石桥因病不得不辞去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1957 年 2 月岸信介上台组阁，由于岸信介的倒行逆施，中日关系再度发生逆转，中日间的友好往来和联系几乎完全中断。

岸信介上台伊始便向中国提出调查所谓“下落不明”的 35767 名在华日本人的问题，并扬言“不可能考虑与‘中共’建交”。6 月他作为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台湾，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极为赞同，表示：“非常同意，太好了。”同时岸信介访美，他对新中国大肆污蔑攻击，叫嚷“中国共产党要向整个亚洲渗透。”对于岸信介这一连串反华举措，周恩来总理严正指出：中国不能不怀疑岸首相是故意同中国为难，以骂中国来讨好美国。

岸信介却并未因此回头，而是一意孤行，对中日经贸往来亦不予支持。中日签订的第四次贸易协定规定：相互设立常驻民间商务代表机构，备忘录中还规定：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岸信介对这一规定不予承认。1958 年 5 月 2 日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当日下午四时，两名暴徒闯入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举办的中国物品展览会会场，突然扯下悬挂的中国国旗。暴徒被扭送警察局，展览会主持人要求对其以“侮辱国旗”论处。但日本当局却释放暴徒，岸信介公开表示：“中国国旗不是代表国家的旗帜，只不过是一般私人物品。”中国外长陈毅对此愤然表示：“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断绝了同日本的一切进出口贸易；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歌舞团和其他代表团均提前回国；中国停止延长渔业协定。除了应邀来华的日本人外，中日人员交往中断。

1958 年 7 月 7 日，中国政府在当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提出了恢复中日交往的“政治三原则”，即：停止敌视中国的政策；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不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8 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评论员佐多忠隆访华团时，再度重申了此三原则，并提出了恢复往来的具体条件。岸信介顽固坚持旧有立场，拒绝了中国的要求，

岸信介的倒行逆施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不断的批评和抗议。1959 年，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曾召开了有 3 万人参加的“粉碎安保体制，恢复日中邦交”国民大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日本各界的上层人士努力寻求再度打开中日交往大门的途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前首相石桥湛山以及政界名流松村廉三等相继应邀来华访问，与中国领导人坦率交换各自的意见。

岸信介内阁的对外政策非但没有朝着有利中日恢复邦交的方向转变，而是更为忠实地执行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岸信介不顾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1960 年初还亲赴华盛顿，签订了“新日美安全条约”。中日两国间关系的发展在岸信介时期一直处于阴沉沉的低谷。1960 年 6 月池田勇人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才出现新的转机。

“廖——高埼贸易”出台

池田勇人执政后表示：“对中国的政策，我认为没有必要和美国采取完全雷同的立场”，并赞成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1958 年 8 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第六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这是长崎国旗事件后第一批访日的中国人。同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共同发表了《关于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联合声明》，打开了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大门。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中日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继政治三原则后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争取政府协定、“条件成熟时”可签订民间合同、个别照顾。贸易三原则受到了日本经济界的欢迎，不少日本中小企业开始与中国进行商贸洽谈。

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是在 1962 年展开的池田内阁时期，日本经济面临着美国经济的强大冲击，经济危机不断加重，那些深受其苦的日本大垄断企业也把中日贸易作为摆脱困境的一条道路。日本的化学品部向政府明确提出：“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应谋求对华贸易早日正常化”。池田很快接受了日本企业的建议。在他的同意下，1962 年 9 月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偕池田派评论员小川平二等人访问北京，并取得初步成果。10 月 28 日，高埼达之助率领日本实业界的代表访问中国。高埼与周恩来、陈毅进行了会晤，他表示日本经济界强烈要求恢复中日商贸往来。经过商谈，11 月 9 日由廖承志代表中方，高埼代表日方，签订了关于中日贸易的《备忘录》，随访的日本实业界代表据此确定了各行业与中国的对口贸易计划。由于这次会晤是在池田勇人同意下进行的，所以在“廖——高埼贸易”中成套设备的交易，一开始就包括定期付款方式，也包括需政府承认事项。“廖——高埼贸易”顺利进行与否也就成了中日邦交是否向正常化迈进的试金石。1964 年中日双方再度达成协议，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在中国设立“高埼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

就在日本政府最终批准以定期付款办法向中国出口维尼轮成套设备后不久，1963 年 10 月 4 日中日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成为中日友好的又一里程碑。中断了五年的渔业协定也于次日恢复。

中日关系发展到半民半官阶段自然引起了美国、台湾以及日本右翼势力的恐慌与不满，他们极力破坏中日间的贸易关系，1964 年 5 月，吉田茂致信台湾当局，公然声称日本 1964 年度不考虑用输出人银行的资金向中国出口维尼轮成套设备。中日关系面临一场严竣的考验。1964 年 11 月池田勇人下台，佐藤荣作上台，中日关系再度逆转。进入七十年代，日本外交受到强大的外部冲击，中日关系迅速解冻。

来自大洋彼岸的"旋风"

接替池田勇人的佐藤荣作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行动，他宣布继续接受"吉田书简"的约束，使刚刚有所发展的中日经贸关系遭到严重挫折。佐藤荣作还接过吉田茂、岸信介等人的论调，重提"台湾归属未定"论，积极配合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当日本的佐藤内阁还在热衷于破坏中日友好交往时，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悄悄解冻，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正迅速上升。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中美两国在长期对抗后终于开始接触。1970 年 10 月下旬，尼克松再度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希望与中国和解，并愿派使节秘密访华。12 月 18 日，毛泽东通过斯诺，向美国提议发出了积极回应。1971 年 4 月，中国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小球转动了大球"。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7 月 15 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美国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公告。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股"尼克松旋风"强烈振撼了日本各界，佐藤荣作的外交政策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冲击。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除蒋帮"决议案。这无疑又给制造"两个中国"的佐藤当头一棒。

1972 年 6 月，佐藤荣作被迫下台。从此，中日关系大步向前迈进。

田中角荣北京之行

中日帮交长期不能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执政党一贯奉行从属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外交时时受制于美国人的意志，缺乏独立。尼克松访华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对日本旧有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巨大冲击，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破产。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要求中日邦交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恢复中日邦交国民运动，各友好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极力敦促日本政府改弦易辙，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尽快恢复邦交正常。1972 年初，"中日复交问题"成为日本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日本国会也因此问题而动荡不宁。

1972 年 4 月 14 日，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与日本民社党访华代表团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双方确认了中日恢复邦交的三条原则，即：(1)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中日复交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6 月 17 日佐藤荣作在一片斥责声中下台。7 月 5 日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当晚，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7 月 7 日田中又在第一

次内阁会议上表示："关于外交，要尽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檄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下，要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7月10日，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孙平化率领上海舞剧团赴日访问演出。随着这一舞剧团的出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帷幕也徐徐拉开。7月14日日本政府两位现任内阁大臣三木和中曾根观看了中国剧团的演出，并与孙平化和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处首席代表肖向前进行了会谈。两天后，日本国会参议长河野谦三同孙平化举行了会谈。7月1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前来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说：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日本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7月21日，佐佐木更三从北京归来，他立即向田中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

8月11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大仓饭店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向他们转达了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决定。消息很快传回北京。次日，中国外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田中角荣作为战后第一位到新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在北京机场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中国党政军要人的热烈欢迎。陪同田中角荣出访的有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等。

9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

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中日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日两国人民终走完了23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夙愿，是两国人民携手努力的结果，它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对缓和亚洲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1978年8月，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虽然，中日交往中也出现了日方有损于友好关系的行为，如"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光华寮事件"等，但是和平友好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中日两国人民应当共同珍惜传统的友谊，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共同努力，开创一个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新局面。

第三章　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70年代是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成就的时期。在复杂激烈的国际斗争中，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超级大国的压力，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实行正确的外交政策调整，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屹立于东方，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

一、着眼全球，抓住美苏争霸世界的主要矛盾，促进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构成

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春天，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这两件事引起了中国和世界极大震动，也使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推行敌视中国政策的美国赖在中国领土台湾不走，还不断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对中国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在中国北面，苏联为了推行其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苏联增派重兵驻扎在中苏边境和蒙古，直至挑起珍宝岛事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局面，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苏边界的流血冲突进一步表明，中苏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它就不会侵犯别的国家吗？美国和苏联会联合反对中国，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吗？这个问题尖锐而紧迫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面前。当时党中央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在此之前，中国虽然一直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进行着斗争，但是在对外政策上还是把苏联与美国加以区别，把中苏两党的分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美国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在苏联出现了一桩又一桩侵略行径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战争威胁重新加以思考。如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这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思考的中心。

60年代末的世界格局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为争霸世界而在一些地区挑起战争，其它的一些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如英、法、日、意、西德等正力图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并不想卷人战争。从美国和苏联的情况看，美国在全世界到处伸手，是用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兵力散，只能打些小仗，已经深陷于侵越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苏联则在迅速地扩充军事实力，并以此为凭进行扩张。现实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一定的基础上可以和平共处；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以因利益冲突而发生战争。与中国接壤的苏联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施加战争威胁的危险性相对说来在增大。这个事实使人们感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没有过时，但是在解释当代出现的新问题时还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60年代末，在美苏争霸引起的世界动荡中，政治格局进一步加剧变化。按照毛泽东1964年关于美苏之间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提法，“第一中间地带”，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继续风起云涌，有力地打击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增强。美国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进一步削弱了对其盟国的控制，这不仅有利西欧国家独立自主倾向的加快发展，而且为中国冲破美国设置的障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美苏争霸世界造成的新的战争威胁，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对，更加深化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西欧发达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如何使所有反对战争的力量汇合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而共同努力，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思考的重要问题。

60年代末的世界政治格局是复杂而微妙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刘比发生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了美苏双方都在注意的一支力量。美国在调整全球战略时，想利用中苏分歧对抗苏联；苏联担心中美联合打破苏美战略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命运，而且牵动着美苏态势的变化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面对错误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共既不屈从于超级大国的压力，也不为国内一时的政治气候所左右；既不受原有思想框框的束缚，也不轻率从事，而是综观风云，着眼全球，权衡利弊。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走出了改善中国处境的重要一步。1969年3月下旬，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苏联，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这样，在中苏两国箭拔弩的形势下，周恩来总理于9月11日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使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促成了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

在相当严峻的形势下，一方面动员全国做好打仗的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和平协商做缓和中苏关系的努力，这是党的“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的历史经验的又一次运用。这一次中苏谈判不同于历史上的特点在于，谈判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中苏双方，而且具有对美关系的意义。中苏政府首脑的会谈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使美国急起直追，加快了走向中国的步伐。1969年12月，在中美会谈中断近两年后，中美双方的代表又开始了接触，商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样，如四位老帅所预言，通过谈判“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一个新的战略格局在1969年底初步显现出了轮廓。

在世界上，中国开始摆脱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局面，以不依附于任何大国的独立姿态，成为美苏并列的一支重要力量，初步构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初步构成，减少了中国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造成的压力，使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捍卫民族利益的斗争中增加了主动性和灵活性。

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相对和缓，中央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5月20日，他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声明中又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应该看到，从号召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要准备打仗，到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世界上制止战争的因素大于发动战争的因素；从准备核大国打核战争，到看到核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这里，毛泽东除再次肯定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的重要作用之外，还看到了几个大国对于维持世界平衡的相互制约作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时所说的革命，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有所不同。它并不是指武装夺取政权，变革社会制度的内容，而是把革命作为与战争对立的一个因素，指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制止世界大战的努力。1970年7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讲道，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这里，革命内涵的变化显然与世界大战可以延续的认识有关。既然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不会发生，那么原来由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推演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将会引起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在当前也就不存在了。当然，此时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仍然是立足于把战争与革命当作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来展开的。这或许与他不自觉地沿用习惯用语有关。但是此时"革命"内涵的变化以及他在外交上的行动都表明，他晚年的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反对战争和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目标上了。

1970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各国驻华使节，传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有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要老是这么吵下去嘛！"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的变化预示着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既然可以把延缓战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么，今后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更长的和平时期，使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将成为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国内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外交工作中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推行的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一步得到了纠正。从1969年春天开始在全国掀起的战备高潮逐渐由临战型向常备型转化。原先作为各项工作中心的"备战"、"备荒"的战略方针，在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的方针所取代，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

二、抓住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苏边界谈判恢复后，中国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为缓和中苏关系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苏联却在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等问题上一再向后倒退，甚至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中苏谈判一直不能取得进展。苏联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军事政治高压政策。事实表明，1969年底在国际上初步显现出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在制约并平衡国际力量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不稳定的。

同一时间，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于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仍在表现出积极态度。

为了着重对付苏联在我国北方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为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进一步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毛泽东毅然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明确地表达了新中国20多年来第一次欢迎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信息，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作出了积极反应。1971年4月，他又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结束时，不失时机地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乒乓外交”这一出乎世界各方意料之外的举动神速地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使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这称得上是毛泽东抓住时机，大胆决策的一个创造。

在中美两国相互敌对了20多年后，中央决定打开中美关系，与素有“资本主义头子”之称的美国进行接触，这不能不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外交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是中美关系能否深入发展的关键。在打开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从社会发展的前途看，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但是要解决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问题，中派和左派是不行的，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因为尼克松代表垄断资本家。1971年2月他又在旅游局关于接待外国来华旅行的报告上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为了打消党内的思想顾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底召开会议，作出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决定。党中央在这一决定中指出：“中国对美关系的方针是先当权派，后反对派；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将有助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又于1971年6月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转发了毛泽东从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关于纠正极左思潮的重要批示，引导全党反对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加深理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党中央的这些认识，端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在世界范围内爆发革命还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从而有力地纠正了党在一个时期内存在的“世界革命进人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认识。此外，这些认识引导人们把外交与革命区分开来，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固然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各国的革命是各国内部的事情，要由本国人民自己进行。

外交工作方向的端正，不仅为打开对美关系扫除了思想障碍，也为正确处理中国与其它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政府和共产党组织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同时，“文革”初期一度受到极左思潮损害的中国与缅甸、肯尼亚等国政府的关系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我国的宣传工作中，诸如“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努力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等内容逐渐增多。无疑，外交工作方向的端正，是“文革”时期中国外交消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迅速打开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美接触的过程中，不放弃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批评，但是又不因为这种批评就不同美国改善关系，仍然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也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与外交问题上的坚定性和灵活性。1970 年 5 月，针对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人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在 5 月 20 日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一庄严声明表明了中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决不会因为考虑对美关系的改善而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行为姑息迁就。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激烈批评，中美两国间的接触暂时中断了。但是几个月后，在美国继续发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后，毛泽东仍以积极方式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解和尊敬。

在打开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中美之间长期严重敌对的分歧点，是中国领导人直接面临的问题。在这些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促进中美两国的接触；又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毫不动摇地进行斗争，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驾驭局势的非凡才能。其中，台湾问题便是一个典型。为了有利于中美高级接触，党中央从大局着眼，不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高级接触的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在 1973 年 11 月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所表示的，国际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应与整个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一政策调整奠定了中美两国在存在着重大分歧的情况下逐步接近的基础。但是，在中美建交的问题上，中国却始终坚持美国必须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一直贯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中，为此，中国对美国试甲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进行了一次次坚决的斗争。

1971 年 10 月，在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又一次达到高潮。在中国和许多伸张正义的友好国家坚持不懈的斗争下，联合国终于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这个中国外交的巨大胜利中，最高决策者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功绩是不言而喻的。

1972 年 2 月 28 日，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的《联合公报》为标志，中美关系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扫清了道路。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世界上出现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我国外交从此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此之前，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官方来往不多。世界

上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使中国的对外关系进人了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互访接触不断增多，进一步加深了沟通和理解，开始在各个领域发展交流与合作。中国更加全面、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活动中去。

中国同美国、日本、西欧关系的改善，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国家为首划分世界的战略格局。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确立在世界局势下增加了新的稳定因素，使国际政治格局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在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方面中国同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基于共同的考虑，实际上联合起来，加强了抵御苏联扩张的力量。

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不仅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发展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1972 年，我国中断了 4 年的对外引进工作又得以恢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下，我国开始从国外进口 43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次引进，打破了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来帝国主义一直在经济上封锁中国的局面，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关系，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也为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准备了一定条件。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并非仅仅具有外交史发展的一般意义。实际上，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紧紧联系着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由狂热转向务实，由困惑转向突破的过程，因此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别开生面，继往开来的一个领域。

三、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反对霸权主义，完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已不复存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四分五裂；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过去的许多概念和大致界定已经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中国领导人需要从理论上回答出现的新问题。

70 年代初，随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强，活动范围日益广阔。中国外交成就的取得，证明了中国在新形势下实行外交政策调整的正确性，也为新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国际形势不断发展，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在他进人肋高龄后，仍孜孜不倦地在国际问题上进行着新的理论探索。

1974 年 2 月，毛泽东在反复思考的基础上，经过归纳和概括，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在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首次向世界阐明了毛泽东这一新的战略思想。以后，邓小平向外宾介绍说，我在联合国讲了一篇话，实际上都是毛主席的观点，是一些新的语言。邓小平在又一次会见外宾时还讲道，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经过好几年的考虑才提出的。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标志着中共对世界战略格局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从60年代后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分化、改组的新变化出发，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抓住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矛盾，以三个世界的划分大致勾划出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点。这种划分，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同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指出苏联和美国一样已经成为霸权主义超级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斗争是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在苏美两霸中，苏联“尤为恶劣”。

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反霸斗争的主要力量；强调了第二世界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及联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重要意义。

这种划分还强调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势力，永远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一边，永不称霸。中国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反对战争和侵略，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

在这一新的理论中，中共中央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发展了他在60年代前期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和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首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应该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重要问题。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正确处理各种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制定国际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在新的形势下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

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以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实力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准。这种标准实际上涉及到了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两大问题：一是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一是由各国经济发展所决定的国力强弱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本国经济权益，打破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寄予了深切期望。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的发言中，表达了这种期望——“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这段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70年代后正在向经济领域深入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作出了新的总结。这一总结表明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国际经济事务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按照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世界格局的大环境中，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

于明确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及有关政策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认识突破。与此相联系，从1974年下半年起，他不断地在国内工作中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重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重要变化，与毛泽东此时对第三世界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愿望是一致的。同样，这一思想的明确，也为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1975年坚持的种种主张，如要抓生产，加快经济发展；抓紧科技、教育建设；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等，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坚实而有力的理论支柱——“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联系到7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不难看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既反映了中共对于变化了的世界格局的总体认识，也反映了中共在中国外交中始终坚持的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控制，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坚定立场。

不应否认，作为一种理论，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在提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上还存在不足之处；此外，这种划分在对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的认识上也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是，瑕不掩玉的是，在毛泽东对于世界格局的大致划分中毕竟提供了前人未能、或未能如此明确地提出的认识，从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勇于突破、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活力。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完善了70年代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指导我国外交工作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准备。

今天，每当我们放眼世界，在一个相对稳定并基本上打开了外部联系的国际环境中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时，仍然可以感到70年代打开中国对外新局面英明决策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可以肯定，今后无论历史跨过多少个年头，世界和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在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不朽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

第四章　邓小平与1975年的整顿

一、历史的呼唤

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圈阅，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很快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邓小平被委以重任，使1975年这一年刚刚开头便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不过，这仅仅是中国政坛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征候，相隔几天，又有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接踵而来。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当讲到今后的任务时，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的嗓音逐渐响亮了。他向全国人民重新展示了他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初步设想，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身体衰弱的周恩来用不断增强的声音展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蓝图时，他瘦削、憔悴的面庞泛起了红晕。台下，许多人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人们的心，随着这声震屋瓦的宣读加快了跳动……

中国现代化，这是凝聚着多少仁人志士、炎黄子孙毕生理想的辉煌目标啊！自甲午战败，国运衰落，民生艰困，正是这国富民强的目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捐躯洒血，忘我奋战……

如今，当中国走过一段风雨交加的历程之后，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又一次高矗在中国人民面前！它带着不可遏止的力量，穿透了历史积淀的厚厚尘埃，从周恩来那深陷的、却目光炯炯的眼睛里流溢出来，从正直的人民代表漾溢着兴奋表情的脸上流溢出来，从人民大会堂的每一个角落向上空汇集，渐渐形成一股暖流向全国扩散……

这个重要的信息，连同邓小平重新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任命，像是1975年中国政坛上迎接春天到来的雨声脆炮，先后在神州大地爆响。从此，中国社会便在那个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导引下，拉开了新一幕。

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第一副总理紧张地

工作起来。

四届人大闭幕后一个星期，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军队需要整顿的话。

他满怀深情地从井岗山讲起，讲党的领导，讲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讲组织纪律性。他高亢激昂地说："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然后，他严肃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军队的整顿，一个是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会场里一次次迸发出热烈的掌声。

1975 年 3 月初，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独具特色的见面方式和撼动人心的讲话，给到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议开始那天，国务院主管工业的领导干部和各省、市、区的工业书记聚集在会议厅里。听说邓小平要参加会议并讲话，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对这位老首长重新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感到由衷的喜悦。一些人禁不住喜上眉梢，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一些人不时地看手表，左顾右盼地环视着，希望能快一点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领导。

离开会的时间还差几分钟，忽然一个边门打开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议厅。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和热烈的问候，他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

一会儿，几个省、市领导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想与邓小平握手。邓小平却迅速地举起了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

"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这句话，使全场刹时鸦雀无声。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僵僵地怔住了，两眼平平地望着邓小平。

邓小平走近大家，站住脚，目光从会场扫过。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这种对 1975 年初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在场的大多数工业书记心中共有的认识，但是用来代替见面的礼节，却是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

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烟，开口说道：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磕磕烟灰，吸了口烟，接着讲："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

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

他审视着在场的人，提高嗓门说：“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他从农业谈到工业，然后说：“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接着，他讲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需要采取的措施。他一条一条地讲，声音由低渐高：“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

他停顿了一下，稍顷，接着讲：“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错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

他越讲，神情越严肃：“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

他疾言厉色地继续说：“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

最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他以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

他的出现和他的讲话，使到会者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及至散会时，许多人的表情还是严肃的。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召开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决定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据说，同时邓小平曾令徐州驻军同闹派性的头头“谈判”，结果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很快结束了徐州的混乱局面，一共只抓了三个坏头头。

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很快在全国引起的反响。

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在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路部部长万里在铁路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九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响亮地提出：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九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万里一边讲，一路跑，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换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很快地、严重堵塞的几个路局全部疏通，实现了万里一个月前提出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口号。

铁路整顿见成效之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上来。军队、军工、教育、文艺、科技

等领域的整顿也厉兵秣马，酝酿展开。

正在外地治疗伤腿的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应召回京。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找他谈话：整顿国防科工系统非你莫属。好样的就站出来和他们斗！张爱萍腾地站起，拖着未治愈的伤腿出征了。他拄着手杖，上飞机，下基层，奔走在混乱不堪的国防科工战线。在有名的“老大难”单位七机部，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正言厉色地说：在问题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

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在省委会议上表示：要拼着老命干，不要怕打倒！浙江省委规定：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参加任何派性活动。此外，还明确提出，要把被坏人“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杭州市连续三次召开批判派性的大会。每场参加者逾万。

福州、武汉、郑州……

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为社会安定而围歼派性的战斗打响了！

到处在批派性，讲团结，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到处在讲大局，抓生产，恢复健全规章制度。

二、捅“马蜂窝”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全国再次出现了严重混乱的局面。对此，毛泽东深感不安。他不断地对江青等人“放火烧荒、搞乱全国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1974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郑重地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1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先念等汇报1974年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时又指出：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支持由周恩来“组阁”，一再对“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提出了严肃批评。

更重要的是，在周恩来的病情日益严重，而王洪文又使他明显地感到失望的情况下，他对邓小平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他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当着众人的面，明确地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比王洪文强。

从这一桩桩的举动中，显而易见，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并使这种“左”倾错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年迈多病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九年之后，现在，“大治”天下的愿望愈发强烈。他把这种愿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把邓小平推到了治国安邦的第一线。

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这是邓小平。他对干部讲过：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

横下一条心，不怕再一次被打倒，这是邓小平。他曾幽默在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最多，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起来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了。他镇静、坚定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这次“请教”，很快有了积极的反响。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还写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批示一传达，立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批还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

那些正在老干部面前言辞凌厉、咄咄逼人的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态度收敛，声细如蝇了。

为邓小平的“请教”捏着一把汗的老一辈领导同志，会心地笑了。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在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时间不久，“四人帮”就大批“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干部，这与毛泽东此时“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是完全相悖的。毛泽东的批示，从根本上扭转了“四人帮”提出的以“反经验主义为纲”在全国造成的混乱。

然而，毛泽东并不止于此。

他从“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中，对“四人帮”、尤其是对江青断章取义、另搞一套的作法，又一次产生了警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他说：“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

接下来，他检讨自己也犯了错误，因患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张春桥那篇反经验主义的讲话，自己只听了一遍，没有听出问题。

他又一次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他严肃地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他再次提到批林批孔批走后门这件“三箭齐发”的事情，接着，他责备在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他语气恳切，再三再四地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要求“四人帮”对这次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

他的目光冷冷地扫过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一大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中央委员更要谨慎。”

这些话说得平心静气，却鞭辟入里，戳到了江青的痛处。毛泽东的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不过，这次不是使正在发展的整顿形势发生逆转，

而是为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开了通路。

自此以后，在一个时期里，“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移花接木，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了。可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要让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承认错误，实在不易。

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上，“四人帮”几年来搞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进一步的批评。

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四下放“风”。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向人诉说，政治局会上大家的“讲话过了头”。

然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四人帮”继续受批评。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

他又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太浅。”

他紧紧抓住所谓“第十一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声色俱厉地质问：“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默然不语地坐着，会场出现了长久的沉默。

终于，王洪文发言了，多少做了点自我批评。

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已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她没有忘记强调客观：“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他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三、全方位的整顿

邓小平领导的反对派性，反对批判所谓“经验主义”的斗争作为整顿工作的前哨战，首战告捷，把“四人帮”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

政治局会议刚结束，他就连续作战，在5月29日召开的全国钢铁会议上“开炮”了。

他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赖，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几个月后，9月27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他还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讲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这些话，既是对前段斗争的总结，也是新的战斗部署。

显然，前段虽是锋芒初露，颇见成效，但是，有待整顿的方面还是大量的，存在的问题仍是尖锐的，没有英勇顽强，敢斗敢干的“作战”精神，全国的局面还是“扭转不过来”。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整顿工作迅速地在各条战线开展起来。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他气愤地脱稿讲话；严厉说道：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下，他亲自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把部队掌握好，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为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巩固的组织基础。

在中国科学院的院部及所属单位，胡耀邦主持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科研机关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这个风要吹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上十二级台风”。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会骂……”。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

在“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回响着教育部长周荣鑫响亮的声音：“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政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光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一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在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后，这块被“四人帮”把持的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气象，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人们奔走相告，为“四人帮”的禁令被打破而欢欣鼓舞。在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重新公演，“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老家伙”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在文艺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全面整顿的深人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深人到宣传理论阵地。为了打破这一块“四人帮”控制的一统天下，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在宣传理论领域也展开了。6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以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老的理论工作者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研究室，为了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许多重要的文件开始起草，一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战斗极强的重要思想渐渐形成了……

1975年的夏季是火热的，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更是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1975年全面整顿的发展趋势很清楚，邓小平和他的战友组成的“作战指挥部”，“横下一条心”，竭尽全力所要“扭转”的，不仅是严重混乱的社会和生产秩序，也不仅是“四人帮”趁机夺权的嚣张气焰，而且是力图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全国正在开始好转的经济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1975年，偏离了正确航向的人民共和国的航船正在逐渐地调转船体，逐渐地驶人正确航道……

整顿工作的深人发展，已使新一轮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迫近。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此时的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他一生中所做的、可与新中国建立并列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迫切地想扭转“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社会出现的混乱现象，希望实现社会安定，希望加快经济发展，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却与安定团结、经济发展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矛盾。

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四人帮”深知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们又一次开始了活动。

这一次，打头阵的是“四人帮”的亲信毛远新。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

毛泽东在不断听到，并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的态度变了。他在听取汇报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1975年11月起，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先后靠边站了。

然而，邓公“钢铁公司”的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驳斥：

“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

一层新的阴云重新向人们心头压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不久，邓小平下台了。这是在他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不过在他这一次身处逆境时，毛泽东仍然对他采取了保护态度，指示“保留他的党籍”，派出专人、专门部队保卫他的安全。

邓小平再次下台带来的厄运，决不仅限于他个人，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的国家又一次陷人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邓小平下台了。但是，他和他的战友所进行的九个月的整顿，不仅给“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以沉重打击，而且强烈地冲击着“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使全国笼罩着的“左”倾空气进一步淡薄了，也使在“左”倾错误的迷雾中困惑、痛苦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邓小平下台了。但是，他和他的战友在整顿中提出的重要思想，仍在深入人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印发的、作为“批邓”的靶子用的所谓“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三篇文章）在散发过程中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思想共鸣。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使数以万计的人们在比较，在思考，在选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批邓”；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四化”。……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展，恰恰与发动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广大群众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矛盾迅速地激化了！爆发了！

1976年春天，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及“左”倾错误的强大的人民抗议运动发生了！

在这一震动全国、震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中，“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成了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沟通思想、互相鼓舞的力量源泉。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旗帜下，广大群众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斗争最终汇合成强大的历史潮流；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进程。

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1975年邓小平和他的战友，在整顿中力图使全国“扭转”过来的发展方向。

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又一次重返政坛……

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第二次新的伟大革命。

第五章 “四人帮”集团的覆灭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在日历上这是极其普通的一天。

然而历史选择了这普通的一天。

白天，一切如常，晚上，夜色迷人，中南海的秋夜和往常一样，肃穆安谧。就在这美丽的秋夜，在中外闻名的怀仁堂，一场对中国当代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特殊战斗，静悄悄地进行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集团就在这一天走向了覆灭。

“文革”兴起，无名小卒一举扬名

“四人帮”集团是在1965年批《海瑞罢官》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依靠江青的力量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形成江青集团的核心力量。以后，他们又凭借权势，趁着“文革”的混乱局势，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帮派体系。1972年9月，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也成了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视为登上“女皇”宝座的“军师”和“干将”，张、姚、王等则把江青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靠山和保障。这伙人，“文革”前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文革”使他们一举扬名，成为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的风云人物。

江青，又名李云鹤，生于1914年，山东诸城县人，15岁开始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还在青岛大学当过旁听生。1932年入党，因介绍人被捕，失去党的关系。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者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被捕，在狱中自首，被保释出狱。1935年到上海当上了影剧演员，改名蓝苹，演过《玩偶之家》、《狼山喋血记》、《王老五》等影片，为争演《赛金花》，闹得天翻地覆。1937年8月，她经西安到了延安，改名江青隐瞒了自首的历史混入党内。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江青的目的很清楚，获得这一身份是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当时政治局给她规定任务，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参加政治活动，这当然是江青不能满足的，她的政治野心很强，只是当时条件限制，没办法实现，只得暂时隐藏起来，扮演一个贤妻角色。解放以后，江青长期养病，一直没干什么大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直被“锁在云雾中”。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提出批评。江青认为时机到了，于是给自己戴上“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到处活动。“文革”兴起，江青更是如同吃了兴奋剂，仿佛什么病都没了，她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得到了指挥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对此她仍不满足，九大时，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1972

年，接见美国客人维特克时，干脆地表露出她要成为中国当代的“女皇”的远大“理想”。

江青的活动，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将”，张春桥首选为“军师”。张春桥也是山东人，比江青小三岁，也曾混进于上海文艺界，以“狄克”的笔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8 年 1 月到延安，后来到石家庄工作，以后又随柯庆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江青门下，他算是有点知名度的，还在 1958 年，为迎合毛泽东同志的“左”倾思想，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并因此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赏。1963 年，他又百般逢迎江青，帮助江青组织批判《李慧娘》等的文章，由此得到了江青的信任。在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江青看中了张春桥的诡计多端，将其收为“军师”。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为一无名小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专门爱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称。1965 年，按江青的意图，姚文元写下了那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因此立功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在江青跟前效力。

王洪文、吉林长春市人，16 岁参军，复员后在上海国棉 17 厂当保全工，“文革”前不过是该厂的保卫科副科长。“文革”兴起，王洪文找到机会，靠造反起了家，成了“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上窜下跳，先后制造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又闹出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当了上海市第三书记。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挑中了王洪文作新的接班人，认为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特别是对“文革”有重要贡献，1972 年把王调到中央。王洪文一到中央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成了“四人帮”。

江青一伙人，既无战功，又无政绩，缺少政治资本，“文革”中却能显赫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个人崇拜极其狂热的年代，这个身份对江青来说太重要了。她总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张口闭口都是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等等，这对江青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文革”中老一代领导人多被打倒，成了走资派，江青一伙就成了毛泽东的依靠力量。江青等人还善于制造极左理论，舞文弄墨，为“文革”的发动和深入制造各种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化”、“党内资产阶级”论等，蒙蔽群众，抬高自己的身价。在一片动荡不安中，他们收罗起一批野心分子，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形成了一个体系，造成一股势力。就象一群暴发户，利用“文革”的时机“发”了起来。

作乱全国，极左集团显赫一时

“文革”期间，“四人帮”干尽了坏事，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给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

“文革”初起，他们推波助澜，只怕形势不乱。为了乱中夺权，他们和林彪集团勾结起来，狼狈为奸，煽动红卫兵及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造反、“革命”。“打倒一切”、文

攻武卫、“破旧立新”，数不清的名堂，一时间，搞得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人们睁着迷惘的双眼，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怎么又要“革命”？而且革命就是打倒一切，被打倒的又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立下过赫赫功勋的各级领导干部，同时，一批投机分子则借机跳了出来，夺取各级权力。黑白颠倒，人妖颠倒，武斗、抄家、大批判，只有大乱才算是革命。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集团被粉碎，周恩来同志于危难之际出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他主持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提出了批极左和反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江青等人此时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坚决反对批极左、攻击批极左就是“右倾回潮”是修正主义。周恩来的努力，使国民经济的恢复有了起色，1973 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形势趋向稳定，“四人帮”的破坏捣乱，又使形势急转直下，国家再次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周恩来同志积劳成疾，不幸身染癌症，江青一伙则跳出来大肆攻击周总理，说什么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频繁地制造出什么“蜗牛事件”、“白卷英雄张铁生”、“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批“师道尊严”、批《三上桃峰》、批《园丁之歌》、批《海霞》等等。闹得乌烟瘴气，人们每天打开报纸，都在猜测是不是又会出个什么“事件”。至于经济是否发展，生产是否在进行，“四人帮”是不管的，他们只管所谓的“革命”。1974 年，“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同志要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和深入批判林彪反动思想的极右实质的想法，组织一些人编写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说毛泽东批准以中央 1 号文件下发，搞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批林批孔的旗号，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为其出来组阁掌权扫清障碍。他们大搞阴谋活动，极力搅乱局势。这段时间，“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十分繁忙，今天是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判现代大儒，明天又评法批儒、吹捧法家人物、吹捧吕后、武则天，“梁效”、“罗思鼎”的名字频频见报。

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对他们提出了严厉批评，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还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要注意呢，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可“四人帮”根本不听。筹备四届人大时，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出来组阁，夺权，为此还从上海弄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准备让他们到各部委任职。江青还公开伸手向毛泽东要官、要权，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不支持她，坚决拒绝了她的要求，而支持周恩来继续组阁，还同意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邓小平复出，1975 年进行了全面整顿，和“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他整顿交通、整治工业、农业、军队、科技工作、全国形势明显好转，人们看到了各行各业的新气象，看到了希望，江青一伙则看到危机。这一次，他们不用写作班子的名义，姚文元、张春桥亲自出马发表文章，借口学习理论，又一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毛泽东觉得江青等人走得太远，又一次批评了这伙人，说他们“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但江青当然不会放弃她夺权的阴谋，稍加收敛不久，又开始反扑。这次他们利用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在全国掀起评

《水浒》运动。批宋江、批投降派，仍然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毛泽东开始时还批评"四人帮"，但到了1975年11月，形势开始逆转，江青等人的诬告得了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被发动了起来，"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来打倒邓小平，而且不只邓小平一个人，是要打倒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同时，他们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他们的亲信拉入党内，塞进各级领导班子，为其全面夺权作准备。

至此，"文革"已进行了将近10年，多次的反复，无数的破坏，使国民经济几乎停滞不前，思想意识领域一片混乱，是非不明，数不清的家庭受到冲击，人们渴望安居乐业，厌恶这没完没了的运动。"四人帮"倒行逆施，人民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尽管他们身居高位，不可一世，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罪行终将受到人民的惩罚。

巨星殒落，野心家策划登基

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实在是难忘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这个消息播出后，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自己耳朵，渐渐地，整个中国沉浸在哀乐声中，人民在悲痛中震颤，而"四人帮"却下达了一大堆禁令，不准戴黑纱和白花，不准开追悼会，向遗体告别的时间被减少了，人数被压缩了。总理尸骨未寒，"四人帮"控制了上海《文汇报》，竟然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了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接着又在一篇文章中诬蔑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两起事件，激起了人民对"四人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为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4月4日，清明节，人们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人们把悼念总理的活动，同时变成了一场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示威。"四人帮"丧心病狂地下令镇压，说广场上是反革命的破坏捣乱，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后台就是邓小平。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人民遭到了骇人听闻的镇压，但是，人民的力量是压不下去的。四五运动，为同年金秋季节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运动本身，也在1978年被中央正式肯定，宣布是革命行动。

之后，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大地震，一连串的灾难压向中国人民，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忧心重重的人民，更加心情悲痛，忧虑万分，举国上下，万众悲哀忧愁凄凄，人们为祖国的命运担心，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在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抓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1976年8月，毛泽东同志病重，"四人帮"认为他们的"第二武装"就要发挥历史作用了，从8月5日开始，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下发各种枪支74000多支，大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作武装叛乱的准备。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当天，他们就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向他们请示汇报，妄图切断党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们来发号施令。姚文元和"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爪牙，一次又一次地布置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张春桥写了

篡党夺权的提纲，准备镇压和杀害一批反对“四人帮”的干部和群众。9月16日，“四人帮”精心策划，推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第一次抛出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叫嚣“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

到了10月，更是剑拔弩张，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反革命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姚文元说，“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100条狗困难，捉1万个、10万个反革命容易。”“四人帮”已准备好了告人民书，准备政变后就立刻向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争夺战的丑恶表演。10月1日，江青跑到清华大学，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他一下子让摄影师为他照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像、办公像114张，又从27张8英寸样片中亲自选定了他满意的标准像。恬不知耻地指令按周总理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修版。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煽风点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还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影射、攻击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是修正主义。也在这一天，毫无哀伤之色的江青跑到景山公园摘苹果，平常一向穿戴妖里妖气，又怕光又怕风的江青，这次摘掉帽子，也没围围巾，又没挎小皮包，而是换上中山服，在苹果树前搔首弄姿，让摄影师一下子照了17张标准像。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到北海仿膳用餐，边吃边骂，“阶级敌人造我的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深夜，“四人帮”的干将迟群，催促“梁效”写作班子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他的秘书得意扬扬地说：“主席、委员长、总理要定下来了，要提升一批，罢免一批。”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气势汹汹地声称，“任何修正主义分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四人帮”所以把毛主席生前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称之为“临终嘱咐”，是想利用这一“尚方宝剑”来扫除他们的障碍，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最终目的，为此，姚文元多次打电话或口头指示新华社，强调要反复宣传这一所谓“临终嘱咐”，不要怕重复，于是各种报刊都连珠炮似地发表文章，大吹大擂，截至9月80日，只6种主要报刊不完全统计就登载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种专文236篇，占全部发表追悼毛主席的报道和文章的59%，许多报纸把“按既定方针办”用作通栏大标题，有的为此登大幅宣传画，大肆宣扬，反复说明“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与走资派斗争”，就是“坚持学习，深入批邓”，也就是按“四人帮”的方针办。华国锋很快察觉这一阴谋，在10月2日的一个指示中指出，毛主席亲笔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避免错传，删去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可激怒了“四人帮”，张春桥出面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

示，江青则亲自出马找经典，找根据，于是才有了10月9日的文章，这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它象--股罪恶的龙卷风，刮遍华夏大地，饱受十年浩劫之苦的人民，又一次遭到恐怖的袭击。素有政治头脑的千百万干部、群众，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恶贯满盈的“四人帮”早已天怒人怒，如今，他们已在霍霍磨刀准备夺权：江青到处抛头露面，大讲“女皇帝”；姚文元关起门来和他手下的文痞子们炮制各种“诏文”；张春桥、王洪文则忙着打电话、发号施令，调兵遣将；“民兵指挥部”在昼夜值班。“四人帮”还到处放风，10月8、9、10日将有“特大喜讯”，上海的一些商店中，鞭炮、红纸被抢购一空。

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凭着多年工作经验，凭着对党和祖国的忠诚和关心，敏锐地观察着“四人帮”的举动，关注着国家的前途，他们多次碰头，商量对策。

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就多次到叶剑英处密谈。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说，“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帅则说，主席在世，不可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并要王震和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主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保持联系。王震表示，我来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

毛泽东治丧期间，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人都与人商议过“四人帮”的问题，并直接找过叶剑英。北京的西山，成了铲除“四人帮”的“联络站”和“指挥部”。西山本是块避暑胜地，金、元、明、清历代帝王在此营建离宫别院，此地亭台楼阁，共成28景。解放后经修整重建的香山公园、八大处，以及玉泉山清明园、曹雪芹故居，樱桃沟等处，都是西山的名胜，“西山晴雪”是燕京八景之一，香山红叶更是诱人。这里还有中央军委的一块“禁区”，是一些军事设施和几栋供临时来住的首长工作和休息的院落。叶帅就住在这里，利用这个隐蔽所，同能够接触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个别交谈，或约进来，或走出去，向靠得住的同志们交换看法，除了前面提到的老一辈老革命家们，还有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如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春长、熊向晖等同志，军队的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肖劲光、苏振华、吕正操，曹立金，傅崇碧等，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做出的，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叶剑英起了重要的作用。逆境中的叶帅，每当和人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在杂音的干扰下谈，为的是防止窍听，如同搞地下斗争。

长时间的酝酿，叶帅心中有了底，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也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叶帅想到，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首先要得到华国锋的大力支持，这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帅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为此，叶帅亲自到他的住

处，向他分析形势，陈述利害，揭露“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希望他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华国锋也为“四人帮”的困扰而苦恼，听了叶帅的话，他很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叶帅回答：“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华国锋的情绪高了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叶帅还多次到中南海做汪东兴的工作，汪东兴明确表态，支持叶帅和华国锋的主张。

形势越来越紧张。自从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就紧锣密鼓地为夺权做准备，江青为了掌握毛泽东的文件，和华国锋大闹，气焰十分嚣张，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深深感到，反击的时候到了，他考虑了叶剑英的意见，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换意见。因为自己的处境比较困难，华国锋到李先念处委托他代表去见叶帅，赶快想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以逛西山植物园为名，冒着风险来见叶剑英。与此同时，聂帅也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剑英：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无济于事。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9月29日，江青等人再次大闹政治局会议，公开要求为江青安排工作，就是想让她当党中央主席，接着又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又哭又吵，反对华国锋让其回辽宁的意见，从头一天午夜折腾到第二凌晨，激烈的争吵，无理的纠缠，围攻华国锋。华国锋忍无可忍，坚决不再退让，坚持让毛远新回辽宁，并说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集体议论决定，然后宣布散会。这次会后，华国锋感到政治局无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于是和叶帅商定，以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名义，议论毛选五卷，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汪东兴熟悉情况，又掌管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由他负责有关事宜。时间是初步定在国庆节后10天。

《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社论发表后，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解决他们的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他找到华国锋，决定将时间提前到10月6日晚8时，以前面商定的召开常委会的方式进行。

这是一场在非常形势下以特殊方式进行的斗争，为了确保胜利，叶帅等人反复磋商，周密布置，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同时，还和军队的领导取得联系，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沿海边防。

10月6日晚7时，叶帅的车子驶进了中南海怀仁党，华国锋、汪东兴已守候在此。正厅内由一扇屏风一分为二，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则在屏风背后。时针指向了8点，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最先到的竟是号称神机妙算的张春桥。可惜这次没算出自己的命运由此发生变化。他夹着文件包，兴冲冲地进来了，一进门，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这才觉得有点不对，不停地问：“怎么回事？”进得屋来，叶帅正襟落坐，目光严峻，华国锋立起身来，严肃地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平时盛气凌人的狗头军，此时双腿打颤了，

只用手摸了摸眼镜，没作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带走了。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走下高级轿车，趾高气扬地跨进门来，行动组的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走进来，王洪文一看势头不对，立刻端出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就使出造反司令的浑身解数，拳打脚踢，可他的武斗本领毕竟有限，很快就被扭住双手带到正厅。他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预感到末日来临，两眼射出凶光，象野兽一样扑了过去，警卫人员将他推倒在地，等他爬起来时，终于从青云直上的梦境中清醒了，威风全无，乖乖地听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被带走时，无奈地发出叹息：“没想到这样快!”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倒证明一条真理，对付他采取“先发制人，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及时，何等正确。

姚文元姗姗来迟，8时15分才到。其实，姚文元早就想开政治局常委会了，“四人帮”这位笔杆子已手痒多时，他接到通知，嘴里还中唠咕着：“搞什么鬼！这么长时间不开会，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心里急着来参加会，竟忘了带帽子遮上秃头，也忘了叫警卫，只顾夹上皮包就来到了中南海。不知是因他迟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对他的处置降了格，没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华国锋也没有亲自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科长宣布。等姚文元弄清楚怎么回事后，这个昔日的“金棍子”，“四人帮”的吹鼓手，平时一贯善于用“软刀子”杀人的凶手，此刻双腿发软，瘫倒在地，被几名卫士拉起来，踉踉跄跄地被带走了。

就在怀仁堂的“会议”紧张进行时，另一个小组来到了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个小组里有两名女警卫。居住在这里的“女皇”这几天为筹备“登基”真是又忙碌，又兴奋，也太疲倦了，此刻刚吃完晚饭，正在沙发上休息，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据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央警卫团长张耀祠回忆，他当时带人进去后，因为是熟人，平时常见面，江青只是点了点头，仍在沙发上端坐。但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江青（没往日的“同志”二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除了“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的，其余全是在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并未发生传说中的“大吵大闹”，“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大致是后来审判江青时她在法庭上大吵大闹，人们由此推理，以为拘捕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江青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她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从腰间摘下钥匙，密封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交给了张耀祠。之后，押上了她平时乘坐的专用轿车，并没象传闻那样带手铐。这一天，把她带到了中南海的一间地下室。

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投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打垮了“四人帮”。当晚，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处的会议室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晚10点一直开到

第二天早晨5点。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与会者听了华、叶的报告，无不欢欣鼓舞。完全赞同这一行动。

第二天开始，“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也相继被隔离审查。4年后，林彪、江青集团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1991年5月14日，保外就医的江青死在她的住所，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因病死在医院。

“四人帮”的罪行有目共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就达34000多人，受迫害的70多万人，受株连的有1亿多人。“文革”期间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真正是元气大伤。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人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终无好下场。粉碎“四人帮”，人民欣喜若狂，多灾多难的1976年，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第六章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至12月，由《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波及全国，惊动政坛，博得政治界、理论界、文化界广泛参与。这场讨论，澄清了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怎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它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审视、评价历史，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辟未来前进的道路，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钥匙和指南。它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先声。

“四人帮”的覆灭并没有使人们完全卸下历史包袱。两年徘徊在于精神枷锁禁锢。解放思想势属必然。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声音，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标志着动乱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至结束。全党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积极揭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并以极大热情投身到生产和建设中。“揭批查”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党和政府组织整顿及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科文工作开始走上正常，“历尽劫波”的中华大地开始出现生机。

随着形势的好转，全党内外，干部和群众，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错误，正本清源，澄清是非。然而这种要求却遇到了来自中央领导层的阻挠。华国锋同志不能正确处理否定“文革”与维护毛泽东声誉的关系，认识不到中国发展必须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因而扮演了置人民群众的要求于不顾、不能顺应社会思潮发展的角色。

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上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左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正式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社论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最早是在同年1月按照华国锋的意见为他准备的一份讲话划稿中提出来的。同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又重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两个凡是”的提出，标志着华国锋等人拒绝系统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拒绝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1977 年 3 月 14 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了邓小平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他还说，对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 年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对邓小平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华国锋还对与会同志说，邓小平的问题正在解决，但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适当时候才能让邓出来工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说，在“四人帮”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接着又说，确实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他告诫大家，应当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什么了。

华国锋的讲话，虽然认为邓小平有功有过，适当时候要出来工作，虽然认为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仍然认定批邓是必要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在这次讲话中，他肯定“文化大革命”是 7 分成绩，3 分错误。他强调指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1977 年 5 月 1 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所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文章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说成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

1977 年 7 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华国锋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

1977 年 8 月，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同时又指出这“决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华国锋的报告虽然对“四人帮”的谬论和倒行逆施进行了较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但仍坚持并阐发“文革”中的许多“左”的观点，仍然全面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报告甚至还提出“‘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的十一大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继续受到“左”的错误的阻挠。比如，对“四人帮”曾把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中“百花齐放”删去的作法不许进行批判，说什么“大治之年，强调放的方针，不适当”。当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时，主持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却认为“文艺黑线确实有”，这个案不能翻。1977 年 12 月 19 日，中央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提出的的意见转发各地研究执行，继续肯定大寨、昔阳的一套“左”的做法，强调农村要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教育，“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1978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分别报道安徽、四川两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但中央政治局中的分管农业的领导人却认为这是“右

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历史冤假错案，都以毛泽东或康生批准为由不予平反，许多受过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迟迟恢复不了工作。

种种情况表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两年间，虽然各项工作都有所进展，但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相本改变，“左”倾错误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历史遗留下的精神包袱仍然很沉重，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阻挠，调到很大障碍，出现徘徊不进的局面。

面对这种形势，人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结束十年浩劫后，必须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入批判“左”倾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才能走上正轨，才能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解决“两个凡是”的方针究竟对不对的问题。这时候，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打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旗帜。随着邓小平的复职和一批老干部的陆续解放，与“凡是”派相抗衡的力量逐渐壮大，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讨论运动的形成已在所难免了。

陈云、王震力主邓小平“出山”。邓小平说，搞“两个凡是”不行，实事求是最重要

最早向“两个凡是”提出质疑的是陈云和王震。他们以老革命家的无畏胆略，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要求解决重大历史问题人手，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开火”。在1977年3月4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突破华国锋的议题限制，发言提出两件事情：一、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出来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二、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搞的诡计。王震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更为尖锐，他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是革命的，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认为它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还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是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凡是”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

在这里，邓小平开始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认识和评价“两个凡是”，并为批评和纠正“两个凡是”找到了理论根据。只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克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才能够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才能够解决党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1977 年 7 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实事求是，要完整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指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撰文，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聂荣臻在第 9 期《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文章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徐向前在 9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

陈云在 9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文章说："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使理论界也逐步热心起针对"两个凡是"错误的论争和批评。1978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首都理论工作者张德成（署名张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更理的准"，"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这篇文章的体裁是思想评论，字数只有 1 千多字，放在报纸的第三版，尽管如此，文章发表后一个月内就陆续有 20 多封读者来信、来稿寄到报社编辑部，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可见，这篇文章已经点到了人们心目中存在问题的关键之处。思想理论界舆论宣传的侧重点已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转而集中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一场大规模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在酝酿之中。

"一文激起千浪"。汪东兴说，此文是针对毛主席的，不要砍旗、丢刀子。邓小平说，文章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

从 1977 年讲起。这年冬天，1 千多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在探讨《文革》教训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当时被视为"难题"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提出研讨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在胡耀邦的指导推动下，中央党校出现气氛活跃、思想解放的气象，并创办《理论动态》作为探讨问

题、交流体会的园地。

几乎与此同时，《光明日报》收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的两篇稿件，其中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报社对这篇文章做了修改加工，准备在该报《哲学》专刊发表。

1978年4月初，这篇文章的大样送到总编辑杨西光手中，这位刚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的主编，敏锐地感觉到手中文章的份量，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撤下组织力量再进行修改，然后放在第一版发表。稿子经报社编辑两次加工后，又送到中央党校研究室再加修改、润色。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几易其稿，历时7个月后，始成定稿。经过胡耀邦亲自审定，该文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目发表于5月10日《理论动态》上。5月11日的《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载，5月12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不少省市党报随之也予以转载。

这篇7千字数的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正由于它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针对性，因而它一发表便在党内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这样开始了。

文章首先引来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和在思想理论战线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少数人的反对或质疑。这些人认为文章不妥当、不正确：一、文章只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而没有说出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二、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认为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难道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也不是真理吗？三、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又讲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和理论都可以修改，这会不会引起思想混乱？

5月17日，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光明日报》社。他说，这篇文章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刊登文章的报社负责同志没有党性，党报这样干是根据“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中宣部要“把好关”。汪东兴后来针对全党要求拨乱反正的思潮，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的转变。

5月18日，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一位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那篇文章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他还说，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再次指责，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汪东兴特别提出，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被敌人利用是了不得的事。

当坚持实践标准观点、反对“两个凡是”的人受到压制和责难时，邓小平等老一辈

革命家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5月30日，邓小平在同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形势再次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观点。他说："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还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的讲话实质上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肯定，是对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的支持。

其后，邓小平在同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文章）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邓小平还在7月份的讲话中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讲话中，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毛主席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一些人思想多么僵化。这僵化的实质是违反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李先念、谭震林、胡耀邦、罗瑞卿等或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或指示写文章，直接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捍卫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把社会舆论推向热潮。首都理论界、科学界纷纷召开大型研讨会，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舆论阵地也积极投入到这场讨论之中，使讨论渐成全国规模。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科学界等领域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达650多篇，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大规模的讨论正不断深入，真理越来越明地显现在人们面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果将刻入党和国家的史册上。

中央工作会议为真理标准讨论作总结。邓小平高度评价“大讨论”，称它解决了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的讲话。会前，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首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会议的中心思想。

会议开始后，与会代表提出了一些议题范围之外的问题，特别是11月12日陈云在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中央要考虑和决定的6个问题后，会场气氛逐渐活跃起来。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是：一、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不能成立，他们出反省院是经中央和党组织决定的，不是叛徒；二、“七七决定”和1941年决定中涉及到的同志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也不是叛徒，应实事求是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三、陶铸、王鹤寿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叛徒，应复查作出新的结论；四、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应当给予批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否定和批判“文革”及其以前的二十年“左”倾错误，也涉及到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

11月27日，党内一位同志在发言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讨论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又担心是否有利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说，现在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如果把这些作为思想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就要十分慎重。他还说：“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篇发言登上会议简报后，立即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讨论中，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对实践标准的观点及真理标准的讨论表示肯定和支持态度，对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提出了尖锐批评。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这标志着针对“两个凡是”错误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正确的观点和力量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形成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历史条件及其危害，充分估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重大意义。邓小平在报告中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对于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它对于我们国家彻底甩掉历史包袱，抛弃沉重的精神负担，大步地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和根本作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第七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建设新中国积极探索，艰苦奋斗，并在“一五”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初步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英明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然而从 1958 年以后，党内滋长的“左”倾错误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常发展。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肆虐全国，中华民族蒙受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中国走向何方？中国未来怎样？志士仁人无不忧心忡忡。十年浩劫结束后，由于“左”的阴霾尚未从神州驱散，旧的枷锁仍束缚人的头脑，这些问题仍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础上，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的决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提出要把过去颠倒了的一切东西颠倒过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出现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这艘巨轮开始走上光辉航程。

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试图把建设现代化与坚持“两个凡是”统一起来，然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了他迎头一击

华国锋是毛泽东为自己选定的最后一位接班人，就在毛泽东去世前的几个月，1976 年 1 月下旬，由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 4 月，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与此同时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毛泽东生前曾对华国锋表示“你办事，我放心”。

10 月 6 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0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1977 年 7 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至此，华国锋一人统揽了全国的党政军大权，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袖、统帅和舵手。

经受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历经磨难的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在此情形下，华国锋继承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提出的关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口号，再次把现代化的任务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7 年 8 月，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1978 年 2 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建设现代化的口号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十多年来，“左”倾错误流弊全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难以促进生产，推动经济发展，现代化只能是美好的空洞的难以实现的幻想。华国锋意识不到或不愿解决经济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左”倾错误的对立关系，他在继承现代化口号的同时，还拾起了业经历史检验是错误的一系列“左”的思想理论。

华国锋矢志维护或者说不愿意纠正“左”倾错误，主要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口号上。1977年2月，两报一刊根据华国锋的指示，在发表的《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观念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违背毛泽东本人一贯倡导的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照这种观点办事，中国就很难正确认识历史，深刻总结教训，就很难觅得一条新的生路。

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他是1977年4月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5月，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7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指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最重要”。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引导和指导下，理论界开始探讨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重大理论问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套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被完全打碎，对“四人帮”设置的各种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由于这篇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故而引起理论界、政治界的广泛注意，并逐渐形成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热潮。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历时半年有余。它波及全国范围，影响深刻。它开始打破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它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确定正确的指导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它是1978年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实现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思想基础。

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发言突破议题，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之必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会前，即11月10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我们通常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包括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

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会议期间共开了3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是分组讨论。

华国锋在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宣布了此次会议的三个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还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华国锋的讲话和部署，正透露出他两年来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不能动历史“左”倾错误，搞现代化建设。而要讨论转移工作重点于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就不能不涉及讨论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问题，不能不涉及到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从根本上纠正过去所犯“左”倾错误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和保证。因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希望这次会议开成一个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会议，并为此作出了努力。

11月12日，陈云在会议东北组发言，果敢突破会议议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为保证安定团结，中央必须考虑和决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他列举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所谓叛徒集团案问题；二、在“文革”中错划为叛徒的一批干部的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的冤案问题；四、彭德怀的问题；五、天安门事件问题；六、康生罪行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文革”期间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根本问题。它的提出，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拥护和响应，引发了各会议小组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而讨论的焦点是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问题。

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时认真地研究了与会代表的意见，对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究。

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和处理，冲破华国锋提出的“讨论经济工作”的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也为三中全会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奠定了基础。根据工作会议精神，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成绩，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亿万人民痛悼周恩来、怒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们对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纠正“左”倾错误的突破口。它对于深入总结“文革”及其

以前的历史教训、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于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起到积极作用。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入会议中心议题，邓小平称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存亡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曾有代表发言提到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并对《红旗》杂志和中央宣传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提出了批评，但这还未引起与会人员的充分注意。11 月 29 日以后，会议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并最终达成了共识，使会议取得重大成果。

27 日，一位与会代表发言，谈了他对目前正在社会上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看法。他表示担心这样讨论下去会引起思想混乱，会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如果把这些说法当作思想宣传工作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得十分慎重。他还说：“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位代表的发言立刻引起代表们的热烈争论。有代表针对上述发言中的观点，提出驳斥意见，说真理标准问题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明确，思想就不能够解放，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受压抑，因而不利于安定团结。

胡乔木在发言中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它是党进行各项工作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来判断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么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教训，怎么落实党的政策？

徐向前在发言时指出，真理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极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他还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

习仲勋发言指出，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还有人发言说，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关系到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的争论。

万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邓颖超在发言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

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过程中，由于老一辈革命家与及会多数代表旗帜鲜明的对目前社会上进行的这场讨论表示支持，充分肯定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些抱有疑虑态度的人提高了认识，少数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结局，是对在社会上持续半年多时间的这一问题讨论的总结和结论，是党内尤其是高层领导开始达成共识的标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凝结了工作会议的成果，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有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才能正确地进行改革。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思想上有了根本转变和提高，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标志着党解决了与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休戚相关的最为根本和关键的问题。

抛弃毛泽东晚年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早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曾对我国斗争形势作过正确分析，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八大提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之后，毛泽东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八大作出的正确决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正式改变了八大的提法，确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从此，阶级斗争成为全党工作的纲领，成为全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中心工作。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观点，造成一次又一次错误的政治运动，制造一起又一起政治冤案，并把推向内乱的漩涡，使之蒙受长期的劫难。

十年浩劫结束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时首先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要准备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因而在年底召开的这次中

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让与会人员讨论。

与会人员普遍拥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这一决策。认为，工作重点转移，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是针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提出来的。一致同意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搞好现代化建设。

有代表发言说，从1964年底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屡遭挫折，现在在人大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口号，已是党史上第三次了，这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就强盛不起来，社会主义优越性也不能体现。

还有人发言指出，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它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还有人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个旧提法值得研究，如果这样“一起抓”，实际上“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主次，没有重点。

另有人说，现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决不能离开这个中心。

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讨论，为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奠定了基础。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着党在实质上放弃了坚持有20年之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实现了政治路线上的重大转折，中国社会发展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

为农业难题找出路，打开国门看世界，现代化不能指望旧体制、旧政策。改革开放先声已响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业和农村伺题的两个文件时，与会代表指出了农业发展落后状况和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的局面。代表发言说，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

有人发言提到，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30—50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69个县。

王震在发言中说，他今年略略看了贵州省，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他说“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贫穷落后状兑呢？会议代表也作了讨论。有人认为，农业发展慢主要是由于错误路线干扰，也由于经济工作中有缺点。有人认为，过去对农民卡得过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问题影响了发展。有人认为，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主要是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一是农轻重的方针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其二是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有人认为，农业发展慢，根本原因在于

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应当反“左”。

怎样解决存在的问题呢？会议代表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都体现着对旧政策、旧制度、旧体制的改革精神。基于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口号，制定出一系列新政策和经济措施，比如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成为后来更为深刻广泛的农村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会议曾专门印发了几份参考资料，有《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与会代表认真研究了这些资料，从中受到了启发，并提出了许多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措施。有的同志指出，中国要搞建设，可以向外国借款。外国人也可以到中国来合办工厂。我们赚外国资本家的钱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行？要借鉴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做到洋为中用。

还有人提出，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我们要采取各种方式，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聘请专家就请专家。

有人发言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闭关自守等于慢性自杀；但我们也不能有依赖思想，什么都引进。

还有人提出建议，从福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地区特点和有利条件，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放手大搞出口贸易。

根据与会代表的讨论精神，三中全会指出，为使国民经济高速、稳步地发展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标志着中国行将结束几十年来实际上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以新的态姿投入到世界大舞台上。

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还讨论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讨论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及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问题都得到一次大清理，大更新，大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为我们国家开辟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新时代。

第八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党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努力调整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和扰乱的社会关系，把拨乱反自工作不断推向深入。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社会政治生活形成思想活跃、生动活泼、民主和谐的新景象。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有的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感到不理解，认为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而另有少数人利用拨乱反正之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实质，歪曲党的历史，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这些“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都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认为，有必要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有必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分清功过是非，阐明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统一，以此来澄清各种湖涂和错误认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健康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背景和认识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定原则，数千人参与讨论，胡乔木劳累病倒，《决议》一朝通过

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给予了初步的基本估价。讲话中还透露：“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同年11月，中央指定成立以胡乔木为组长、由邓力群等20多人参加的《决议》起草小组，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主持下，开始草拟《决议》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起草小组拿出了提纲初稿。但这个初稿写得太细，概括不够，论证不足，而且在一些观点上也过于照顾各种不同意见。

1980年3月，提纲初稿送到邓小平处阅示。邓小平看后，于3月19日约请有关负责同志，发表谈话。小平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小平还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对有些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的是，起草《决议》总的要求、总的原则、总的指

导思想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所以，《决议》中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写出来。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会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邓小平还说，三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

邓小平提出的这三项要求、原则，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都一致同意，从而成为党中央制定《决议》的指导思想。起草小组虽然对三项要求的理解和文笔表达经历了一个过程，但他们自始至终在《决议》的整个结构上、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在每个重要提法乃至字句的斟酌上都努力坚持和体现这三项要求。

1980年7月，起草小组草拟的《决议》讨论稿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在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的主持下，书记处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参加了对《决议》讨论稿的讨论。根据书记处提出的许多意见，起草小组对《决议》讨论进行了很大修改。

同年10月，《决议》征求意见稿被散发到全党四千名党员、干部中，展开讨论，征求意见。这次讨沦，党的高级干部多数都参加了，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也有一些值得商确、不能接受的意见。在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上，党内还存在一定的分歧。邓小平看到了讨论活动简报，了解了讨论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于25日再次约请有关负责同志，指示《决议》起草事宜。

邓小平同志说：“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他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摸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邓小平还说：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党的历史总的来说还是光辉的历史。邓小平还指示起草小组要压缩决议篇幅，可以不说的去掉，应该说的突出重点。

1981年3月，起草小组根据小平指示和四千人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又对原稿修改后提交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和部分老同志共五十多人，再次征求意见。老同志熟悉党史，经验丰富，有远见卓识，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5月，决议修改稿提交到由75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利用10个半天的时间，进行了反复讨论。6月13日，把集中了讨论意见的修改稿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至此，前后较大的修改已有六次之多，至于起草小组的行文、润色、措词方面的修改就更多了。

当年曾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胡乔木同志，此次在新《决议》的起草中肩负重任，立了大功。他不顾年老体

衰，抱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决议》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每次修改的设计方案都是他提出来的。稿子拿出去讨论之前，他都要认真地修改一遍。《决议》不少段落，从头到尾是他亲自动笔写的。《决议》形成过程中，由于劳累过度几次病倒，一度住院，在住院中仍关心《决议》的修改和写作。邓小平同志曾动情地说："写这个《决议》确实不容易。起草这个《决议》的同志，乔木同志，确实是煞费苦心。"

1981年6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全会第一段为预备会议，用了8天时间，讨论《决议》。第二段为正式会议，于27日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叶剑英因年老患病未参加全会讨论，特向中央告假。他在致全会的信中，盛赞《决议》之重要。他说："《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于29日通过的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影响。"

建国以来历史问题决议为什么要回顾建国前的历史？陈云说：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令人信服地评价毛泽东

现在《决议》的第一部分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洋洋洒洒五千字，含盖面广，内容丰富。而最初的几次《决议》稿子中并没有这个部分。是怎么加上去的呢？

建国以后共32年，毛泽东在世是27年。27年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给国家造成深重灾难。"文革"前也有"大跃进"、"反右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估计等"左"倾错误。除了前7年，容易使人产生建国以来毛泽东"一错再错"的错觉。而实际上，27年间的成绩和正确的东西也是占主体地位的。尽管如此，《决议》在没写"回顾"这部分的时候，这样写，那样改，总是显得调子低沉。

1981年3月，陈云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3月24日，陈云又向邓小平同志谈了同样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让起草小组采纳，在《决议》稿中体现陈云建议的精神。

六中全会前的稿子，这部分是当作"前言"处理的，只有两千多字。全会讨论后，普遍要求再增加点份量，结果字数增加了近一倍，并改成了现在的题目。

有了"回顾"这一部分内容，就可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功绩，就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加上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贡献，同他在"文革"及其以前的错误相比，就可以得出他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的必然结论。

同时，通过回顾建国前28年的历史，还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历史公认的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前进和胜利的旗帜，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的32年，还是今后，要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夺取胜利，必须坚持并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

32年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功过面前，不要给人如此印象：别的人都正确，一个人有错误

建国32年来，虽然由于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足，党对形势的分析和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在"文革"前尤其在"文革"中犯有错误，但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因而《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一节中首先论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针对一些低估或诬蔑建国以来历史成就的观点，《决议》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10个方面，论述了我们在各行各业的主要成就。《决议》指出："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认识，以为如今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说明当初搞"三大改造"搞早了，社会主义搞早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或推迟搞社会主义，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就会得到根本改观。对此，《决议》在分析历史背景、阐述宏观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决议》强调，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的历史进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有不少曲折、反复。人们在讨论《决议》稿时，意见很多，争论很大，稿子多次修改仍不能如人意。直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几次修改稿，邓小平同志都不满意。后来小平同志约请有关人员谈话，提出这一段应当如何分析和估价，应当怎么改，为起草小组人员打开了思路。胡乔木亲自动手，首先从题目改起，改成现在的题目，得到了中央和绝大多数的同志的认同。

邓小平同志这一部分的修改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后再写成就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的。原来起草小组撰写时，头脑被一段历史的"大跃进"、"反右倾"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所缠绕，看不到全局，看不清十年中有正确和错误两个发展趋向，因而从题目到段落都没有搞好。比如曾用过"曲折中前进的十年"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十年"这样的题目。对前者，有人认为，谈何"前进"，简直是"曲折中后退"。对后者，人们也认为，不能用它专指前十年。根据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重新布局谋篇。在列举成绩、指出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之后，描写了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

邓小平对这一部分稿子最不满意的还有一点就是，写来写去仿佛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错误，此人便是毛泽东。邓小平指出，这样描写不符合实际的。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按照邓小平上述指示精神，《决议》产生出这样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论断："这十年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接着，《决议》又写了这么一段话作为前面论断的补充和下一部分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铺垫："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怎样解决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胡乔木如此评论"文革"，可谓匠心独运

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采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郑重论证毛泽东的错误，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全面评价"文革"时期，是《决议》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决议》起草过程中，最初这一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看稿子的同志也不满意，因为稿子起点太低，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后来胡乔木执笔修改，面目一新。

《决议》首先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写上这些论点时，起草者用的都是毛泽东自己的文字，并经过反复核对。这些论点列举出来之后，就很容易给一个印象，即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从性质上和程度上已同"文革"前大不一样。《决议》接着论断道："文革"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起草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所坚持的正确的东西，他所坚持的实质是脱离了他以往思想认识正确轨道的东西。解开这个难题，得益于邓小平的多次指点。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又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根据小平同志这一观点，胡乔木煞费苦心，深思苦虑，反复推敲，精心斟酌，终于形成了这样一段堪称"绝唱"的文字："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样，就更加证明毛泽东思

想确实是科学原理，谁违背它就要犯错误，毛泽东本人也不例外。这也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批评毛泽东错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六中全会，曾请党外人士对《决议》草案提意见。有的党外人士说：《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决议》按历史顺序如实描写了“文革”的全过程，在指出毛泽东在此期间的严重错误之后，也没有抹杀毛泽东做过一些好事，认定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样论述，其意旨在于，虽然“文革”本身是完全错误、应当全盘否定的，但“文革”中的毛泽东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同“文革”时期党组织和群众抵制“左倾错误、坚持生产、取得一些成绩的事实不能跟着全盘否定一样。《决议》在这一部分的最后还分析了“文革”之所以发生并延续十年之久的原因，这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总结和认识历史教训，避免“文革”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在《决议》原来的稿子中，这一部分还有一段文字专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六中全会讨论过程中，郝建秀说，起草出于好意，想把毛泽东同林彪、江青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泽东比低了，革命家怎么能跟林彪、江青这些阴谋家相提并论呢？她主张把这段文字删掉。中央和起草小组采纳了她的意见。这样修改更突出了主线，强调了重点。

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决议稿中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如果不写或写不好，整个决议不如不做

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面光辉旗帜，是《决议》必须论及、不可回避的。在《决议》稿的讨论过程中，曾有人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说写也很难写出什么东西来。对于讨论稿中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有的人不予赞同。说实事求是在汉朝就有这样的语言，谈不上什么创见；群众路线是我党的创造，但马克思主义论唯物史观就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过用另外几个字表述罢了，谈不上是新东西；至于独立自主，无非是一个对外关系的原则，几乎所有国家都坚持独立自主，这不算毛泽东思想的贡献。针对这些意见，邓小平反复讲，毛泽东思想丢不得，这个旗帜必须举，《决议》必须全面地、概括地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指出：“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理沦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理论贡献。这

些贡献都有哪些内容呢？最初的《决议》稿中只写了四条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期间，赵紫阳提出，只讲四条不完备，起码没有包括关于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的理论，而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是很高明的，有不少独到的东西，为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央和邓小平都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好，要求起草小组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起草小组在原四条贡献之后，又加写了一条，包括战略战术、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外交工作，搞得很杂，也没有集中表述出在战略、策略上的突出贡献。六中全会上，大家对此感到不满意。经过讨论，决定把政策和策略专列为一个方面。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列为第五点。第六点是党的建设。这样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些方面，毛泽东思想以独特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点，绝大多数人在《决议》稿的讨论中认为提得好，值得提，但对写在这三个方面之前的几句导语不满意。这导语的写法是说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样写的本意是想说明这三点比上述六个方面的理论更带有普遍性，需要今后长期贯彻执行。但在讨论中，人们反映，这种写法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把这些贡献看得比理论低些，这些东西好像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理论贡献，因而要求这段话重写。胡乔木亲自执笔，作了很大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文献，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举了毛泽东的几篇哲学著作之后说，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表现在这些哲学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这样一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重要内容便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观点，《决议》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又强调了以下几点内容；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二、或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或照抄照搬毛泽东说过的话，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都是错误的；三、要在新的实践中运用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的名字需要点。《决议》的最终目的在于团结一致向前看

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 1976 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此后也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许多问题上也犯有错误。《决议》怎样写“华国锋问题”呢？开始讨论《决议》稿时，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提华国锋的名字。邓小平得知这种意见后，便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斟酌，认为不提名字不行。

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中解释了为什么“不提名字不行”。邓小平说：“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指《决议》）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邓小平还说，我们的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因而，《决议》列举了华国锋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拖延和阻挠平反冤假错案、搞个人崇拜等错误，并指出：“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多次强调，《决议》一定要起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起到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作用。为此，《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也作了总结，并指明今后的一切工作就是要集中全力实现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所包含的十项方针，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十项方针是对32年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总结了过去，又面对现实，规定以后应该怎么办。按照这十项方针武装人们的头脑，就能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同心同德建设现代化的目的。

《决议》起草过程中，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急于搞。邓小平在1981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样不行。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从国际来说，外国人看中国，怀疑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邓小平指出：“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还说，《决议》定下来以后，提到六中全会通过。设想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

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设想的那样，1981年7月1日前夕，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庆祝党的60岁生日到来的时候，一部伟大的历史性文献发表了，人们感到惊喜，充满希望。

第九章　改革方针的形成与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改革开放方针，是我们党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加深认识，长期进行探索的结果，它反映了国内外客观形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奋斗精神。这一方针形成，大体经历了飞口下发展阶段。

一、最初的设想和尝试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比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现成经验，建立了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基本适应建国初期生产力发展情况的。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特别是到了“一五”计划末期，由于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中央集权过多和国家对企业管得太死，给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从1955年底起陆续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和初步方案。

1955年11月，陈云指出：统一财经工作，实行计划经济，都要求集中，但是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这个事实。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1956年5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草案确定：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业和事业，应尽可能交给地方管理；企业和事业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初步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

同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陈云就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生产和流通问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观点。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

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创见性的主张为正在酝酿中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57年，党和政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等方案。这些方案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基本通过，并于11月经国务院通过后正式公布。这些方案已开始触及到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方法为主的经济体制的一些通病，提出了体制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是一次探索性的尝试。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错误的干扰，上述改革尝试还未来得及展开便被打断了。

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中央又开始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1963年3月，中央决定试办托拉斯，逐步改进企业管理体制。当时首先成立了烟草公司，统管全国卷烟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托拉斯问题的汇报时，表示赞同刘少奇关于建立托拉斯企业的设想。指出：目前这样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那么多的人干什么？人是要吃饭的，要消耗的，用那么多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

1964年8月，中央决定再试办11个托拉斯性质的公司。这些托拉斯的试办，不但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进一步改善了企业的经济管理，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1966年3月，毛泽东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的设想，主张进一步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但是，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上述改革探索不得不再度中断了。

在进行改革探索的同时，党中央面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也曾努力创造条件，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起并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这是最初的对外开放。

在建国初期和50年代，我国主要是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1953年5月，经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决定由苏联政府帮助我国新建、改造141项重要企业（包括1950年签订的50项)。1954年10月，又商定增加15项。这就是后来通常说的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也帮助我国建设了58个工程项目。与此同时，我国还先后派出大批留学生、实习生到苏联、民主德国、捷克等国家进行学习，培养中国的经济建设人才。

这时期党中央还提出了一些对外开放应遵循的原则。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

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并且宣告："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开放政策的积极姿态。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不仅停止了对我国的援助，而且还用逼债、撕毁合同等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也利用我国的经济困难加紧对我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原有的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援助已不可能，而且对其它方面的开放和合作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尽管如此，我们党仍未放弃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的努力。

在国际环境显然不利于我们的形势下，能够作出上述努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所具有的开放和探索精神。

总而言之，在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党已经多次提出过改革和开放的主张，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改革的探索屡次被"左"的错误所打断，开放的努力又被国际上的条件所制约，因而改革开放的方针还不具备形成的条件。

二、曲折中的探索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陷入了一场持续10年的大动乱。这场动乱不仅导致了我国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而且也使正在进行的各行改革和开放尝试因失去必要的安定环境而不得不中断。但尽管如此，我们党仍未停止对改革开放问题的探索，而且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尽力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这些探索主要有：

1、以企业下放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

1969年，动乱的局势稍见稳定后，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被重新提到日程。在1969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讨论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根据这个设想，凡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级"革命委员会"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向全国的关键性企业、事业单位，暂仍由各部直接管理；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设到厂矿去。1970年6月中央指示：在落实国家计划的工作中，国务院各部、委要正确处理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各部、委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外，一般都应下放；大多数完全下放给地方，少数实行双重领导，其中多数地方为主，少数中央为主；下放工作在1970年，应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完毕。截止1970年9月，中央共计9个部已下放企业2237个，占总数的73%。

此外，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中央还要求从1971年起实行以下改革措施：（1）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2）物资分配大包干。（3）财政收支大包干。（4）扩大地方权

限，实行“块块为主，各块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

实施上述改革措施的目是想通过扩大地方权力，探索一种能够较好地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经济管理体制。但是，在当时那种混乱局面和“左”的思想的干扰下，这一目的是难以实现的。对企业下放，周恩来虽曾多次指示，要有步骤地进行，不可撒手不管。但实际上是一哄而下，带来了不少问题。如：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分工不清，造成各关心各的，两个积极性拧不到一起；由于仓促下放，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影响了一些老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央对经济全面的指导没有相应跟上，使各地方自成体系，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相当严重，造成很大浪费，等等。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的体制改革措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2、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实行对外开放的努力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国的变化。世界战略格局由美国称霸逐渐演变为苏美争霸，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兴起，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破产。美国已没有力量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得不修改其早已行不通的孤立中国的政策。

面对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坚决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方针。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

根据这种形势，我国政府从1972年起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1973年，经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用43亿美元从日本和西欧引进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些项目的引进，不仅增强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工作给予了肯定和支持。1975年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计划工作务虚会上，有的同志建议建立石油和煤炭出口基地，换进外国的成套设备。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对此建议表示肯定。8月18日，他在《关于发展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谈话中专门指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一个大政策。”同月，国家计委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专门提到：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用我国生产的石油、煤炭来偿还。这实际就是后来实行的“补偿贸易”。

由于当时整个工作处于动乱的环境中，因此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工作也不能不受到动乱局面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1974年以后，“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为了打击坚持同他们斗争的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别有用心地制造了所谓“蜗牛事件”和“风庆轮事件”，把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当作“崇洋眉外”来批判，攻击国务院的领导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爬行主义”等等，使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很难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交往。这不仅干扰

了正在进行的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的工作，而且也为继续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设置了严重障碍，使得我国在日趋活跃的国际经济活动中闭关自守，缩手缩脚，陷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错过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时机，极大地延误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新时期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和提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得“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10年的动乱终于结束，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进行拨乱反正的进程中，1977年党的十一大又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与这相应的正确政策。1977年到1978年，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有了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对改革开放方针进行了充分的酝酿。

1、改革方针的酝酿

新时期对改革方针的酝酿于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这次会议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影响，表现了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它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讲话中。

关于改革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李先念指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

关于改革的任务。李先念指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别、行政便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特别是坚决实现专业化，发展合同制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关于改革的突破口。李先念提出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自主权，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企业的主张，从而为历史新时期的企业改革把扩大自主权作为突破口提供了指导思想。他说：无论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注意发挥工农业企业的积极性。企业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在企业中劳动的全体职工和社员是直接的生产者，只有充分尊重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生产才能高速度发展，把各企业当作任何行政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推动的算盘珠，这种管

理思想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机器都要自动化，何况是人，何况是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和由他们组成的社会主义企业？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他们能够根据经济本身的需要，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实行经济核算，降低经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提高经济效果。这就需要在经济管理中充分注意企业的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充分实行按劳分配，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不要用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的框架去束缚经济的发展。

李先念还总结了以往改革的经验教训，指出：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往往从行政权力转移着眼，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改革结果也往往不能符合经济发展的最大利益。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次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使我们的管理水平尽可能适应高速度发展工农业的需要。

这篇讲话是我们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改革问题，是党正式确定改革总方针并开始历史新时期改革的一次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这篇讲话在党内立即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中央决定，把它提交到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并作为会议的三项议程之一。

同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进行了改革的思想动员。他指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

上述情况说明，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改革方针和决策已经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酝酿成熟。

2、对外开放的有利时机与决策

70年代末期，国际上出现了对我国更加有利的形势。资本主义各国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打击下，相继陷入了经济危机，此时正处在危机后的萧条状态，工厂设备开工不足，资金和技术找不到出路，产业结构急需调整。据我国冶金部1978年派人到西欧考察了解，当时欧洲共同体国家的钢铁设备开工率只有63%，而且预测在1985年前不会有什么好转。为摆脱这种停滞状态，美国、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看中了中国这个拥有10亿人口的市场，争着同我国做买卖。与此同时，国内已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具备了同国外开展正常经济交往的条件。党中央利用国际国内这种有利的形势，积极恢复并扩大了同国外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1977年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状况，提出了“十个要不要”。其中第九点就是：“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同年7月7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规划，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原则批准。这个规划提出，在今后8年中，再引进65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

同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形成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指出：在发展我国自己科学技术的同时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作好新技术的引进工作。特别是在今后5年到8年内，我们要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时机，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5月和7月，他在两次会见外宾时谈到：现在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条件作为根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同年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总结讲话中也指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现在世界上的极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对于引进的东西，要努力去消化它，发展它，创造新东西。如果只引进不创造，那就永远落在别人后面，永远不能赶上和超过，那我们就是笨蛋。那种什么都想买，一直买不下去的懒汉思想，是一辈子也实现不了四个现代化的。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1978年内，我国先后向国外签订了22个引进成套设备或机组的合同项目。其中包括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上海宝山钢铁厂，5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4套30万吨合成氨装置及彩色电视机生产线等项目。

同过去相比，这一时期的引进工作具有3个显著特点。一是通过活跃的外交活动为引进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二是引进工作的规模大、气魄大，确实显示了前所未有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气魄。三是引进的方式比过去灵活多样。不但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而且还包括引进国外资金，进行补偿贸易等内容。

3、改革开放方针的正式形式

在经过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党中央于1978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及其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围绕关于实行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为推动讨论的深入开展，开阔大家的思路和眼界，党中央还专门向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如何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材料，作为会议的参阅文件。这对于与会同志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方针，起了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

与会同志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下，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改革经济体制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意见。

华北组在讨论中提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于集中，把什么统得死死的，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二是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吃大锅饭。因此，计划体制、上层建筑必须作重大改革。否则，章法不变，经济改革也搞不好。

东北组在讨论中提出：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我们要采取各种方式，用齐头并进的办法，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

在讨论中，大家比较多的意见是：当前应着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尊重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应该改变，实行政社分开；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

谭震林在发言中提出：要打破过去那种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框框。现在国际上情况和过去不一样了，各国都看到中国市场大，争着借款给我们，我们应该欢迎。

王震也在发言中提出：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加快四化建设是极为有利的。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过剩，新技术、成套设备和资金急于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我们在平等互惠、互通有无的政策下，搞补偿贸易、合营企业。也可以设想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对于我国的大江、大河流域进行疏浚、建设梯汲水电站，开采有色金属和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业。打开了这个大门，经济科技都会上得快一些。

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中从指导思想上支持了大家的上述意见。同时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讲到体制问题时，他还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全会公报提出：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要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在经过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的《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还确定了在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和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方面来。

上述文件标志着，在党中央的决策上，已正式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而且，随着

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指导思想的逐步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还将会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

四、改革开放方针的发展和完善

从1979年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步伐。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得到巩固，使得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同以往相比，不仅没有因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干扰而中断，而且还能够一次次地克服阻力，使过去没有条件实行的一些设想付诸实践，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要求，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从而使改革开放的方针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了突破。1979年1月，安徽省风阳县和肥西县农村，率先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验，揭开了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党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由安徽向全国农村扩展。到1982年，全国农村已普遍建立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这一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又进一步向其它方面扩展。1985年，开始了以改变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中心内容的第二改革。1986年，又完成了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改变人民公社领导体制的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建立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使我国的农村经济获得了迅速振兴。并为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农村改革的影响和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逐步地开展起来。1979年1月，四川省在6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的基础上，决定把扩权试点扩大到100个企业。7月，国务院决定把试点扩大到上海、四川的1600个企业。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大中型企业。在此基础上，改革进一步扩展到商业体制、财政体制、计划体制、劳动就业体制等领域。1984年10月，党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全面展开。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在计划体制方面逐步改变了国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在企业管理方面，逐步实行了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等不合理的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上述改革给我国的经济不断注入活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1991年3月提供的资料；我国国民总产值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平均996的速度持续增长，在高于世界3—4%的平均速度，10年共增长了1.36倍。

在对外开放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继续积极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且还不断地为开放政策增添新的内容。1979年7月，党中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改称“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央决定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央又决定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布

局。1987年，中央又决定把海南岛建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特区，从而显示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扩大的势头。在开放地带不断扩大的同时，采用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方式，兴建了新企业、改造了老企业。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到1991年，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累计已逾26000户。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在理论上也逐步地明确和完善起来。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了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实施指明了方向。

1979年4月4中央工作会议，在确定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的同时，继续强调了要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在这次会议期间，邓小平还向当时的广东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了试办特区的设想。他说：就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6月6日和9日写出了关于在对外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特区的报告。在广东省委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的文字表述。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是把改革和开放作为我们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途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1980年8月，邓小平又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从而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是党自建国以来首次提出的新任务，它为改革方针增加了新内容，反映了党在改革问题上认识的深化。

1980年12月，在决定进一步实行调整方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同时，"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推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这是在党中央的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使用"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为使改革开放的工作顺利进行，邓小平，反对崇拜资本主义和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1981年11月3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将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和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作为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

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这里使用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概念，是对当时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总概括。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又把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的思想进一步作为整个历史新时期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只注意后一手而怀疑前一手是错误的，只

强调前一手而忽视后一手是危险的。对这样的方针，全党同志必须十分明确，不应当有丝毫含糊。从而使改革开放的方针更加全面。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勾画出了在我国进行全面改革的蓝图。对改革的必要性、目的，任务等作了全面阐述，指出：改革不仅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面对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和挑战的迫切需要。改革是为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应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同时还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这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关于改革的理论已经系统化。

1986年1月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是对"两手抓"方针的进一步发展。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这一提法标志着我们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此后，党中央开始用"改革开放"的提法代替"开放、搞活"的文字表述来概括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1987年10月，以加快和演化改革为主题的党的十三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义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样，改革和开放就被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方针总政策而确定下来。这是改革开放方针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上述事实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在实践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方针政策上也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完善。

第十章　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

目前，中国人中恐怕已少有不知“乡镇企业”这一名词的了，诞生于八十年代中期的这个新词也正被各种传媒以异乎寻常的高频使用着。这一切均缘于，“乡镇企业”这个词它标志着一个奇迹，标志着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民族在新时代创下的又一奇迹。如果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成就辉煌，是一大奇迹。那么，谁又能否认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是这奇迹中的奇迹呢？在改革开放前夜，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不点儿”就是在农村经济中，它也只是一支次要的补充力量。从 1979 年始，乡镇企业便踏上了创造奇迹的历程。它从小变大，从点到面，从星星之火燃为燎原之势，蓬勃发展，声誉鹊起，成为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中一支实力强大的生力军。

明珠　从夹缝脱颖而出

乡镇企业的勃兴是和改革开放同步的。1978 年，乡镇企业还只是国民经济中的小字辈。这一年，全国的乡镇企业一共才 152.42 万个；企业的职工人数 2826.56 万人，只占农村劳动力的 9.2%，在整个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才 7%；乡镇企业总产值 493.13 亿元，在农村社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24.3% 和 7.2%；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才 385.3 亿元。

十四年后，乡镇企业所创下的宏大家业不能不让人对它刮目相看。简单对比一下 1978 年和 1992 年的一系列数据，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实实在在的奇迹。据 1992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1992 年，乡镇企业个数已达 2091.6 万个，是 1978 年的 13.5 倍；企业职工人数 10624.6 万人，增长 2.75 倍，平均递增 9.9%，是同期全国社会劳动力年增率的 3.5 倍，乡镇企业总产值 17659.69 亿元，较 1978 年增长了 34.7 倍，年均递增 29%，是同期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的 2.6 倍；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13193.37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33.24 倍，平均年增长 28.7%，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 13.2% 的速度。同期，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也以 21.5% 的年增长率不断积累，1992 年已达 3490.79 亿元。乡镇企业的国民经济中已占据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就职工人数来说，乡镇企业在 1992 年已吸收了全社会 17.8% 的劳动力，即有 1/4 的农村劳动力走进了乡镇企业。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大约 1/3 是乡镇企业创下的；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早已把“老大哥”——农业抛在身后，坐上了头把交椅，独占 2/3 的产值。乡镇企业已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经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当我们在感叹乡镇企业今日的辉煌时，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乡镇企业这颗今日的明珠是凭着它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从夹缝中挤出道路，迸放异彩的。它曾历尽艰难与曲折，曾备受责难与冷落。当然，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但是，回顾历史，会更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一奇迹的伟大，更显那些曾为乡镇企业的今天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弄潮儿的伟大。

一般说来，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在此，我们不妨把历史的镜头再向前伸展一点。乡镇企业的前身叫“社队企业”。社队企业这个降生于1958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浪潮中的早生儿，出世之时便发育不良，体弱多病。其后的成长道路更是坎坷不平。三年困难时期，社队企业被大幅度收缩调整；1962年中央正式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社队企业跌入了低谷，到了1964年情况才稍有好转。十年“文革”之中，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而社队企业却因城市工业生产不足，农村的生产生活物质极度匮乏，有了一定的发展。1970年后，各地又在大办农业机械化、建立地方“五小”工业的号召下，陆续建起了机修厂、小化肥、小水泥厂等一些企业，同时一些非农机产品的加工业也零星地建立起来。社队企业的家底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创下的，这便有1978年时那些规模和水平参差不齐的社队厂矿，有了两千八百多万从业人员。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同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乡镇企业也步入了第二次创业的初步成长阶段。1970—1983年四年间，乡镇企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对自身进行了两次较大的调整。增加了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在整个乡镇企业经济中的比重，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适当降低，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在各产业内部也有相应调整，重工业的比重下降，轻纺工业比重有较大提高。通过对自身发展方向、内部结构的一系列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与1978年相比，虽然企业总数减少了17.78万个，从业人员却增加了408万人，增长14.4%；企业总产值达到1007.87亿元，增长了1.04倍，年递增15.3%。企业的产品质量也提高，1983年，有两个产品获国家银奖，有197年产品获部优产品称号。但是总的说来。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还处于自身的内部调整充实阶段，整个产业规模还没有较大发展，而且整个国民经济也正处于恢复发展，初步改革时期，各种促使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尚未发育成熟，乡镇企业更大规模的发展还有待下一阶段。

1984—1988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它的第一次起飞阶段。198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即中央4号文件），文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正式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并规定乡镇企业应是乡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同时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发展多种经营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战略方针，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这样就基本消除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内部障碍，激发出其内在的活力。也就是在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更明确，更系统地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依据这一决定，整个国民经济进行了较大幅度的

调整改革。这便为乡镇企业的起飞造就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从1984年起，乡镇企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规模不断扩大，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往昔的新特点。

一是乡镇企业个数急剧增加，尤其是联户企业和户办企业蓬勃发展。1988年，全国已有1888.16万个乡镇企业，短短5年之中，增加了13倍。企业职工人数增至9545.46万人，增加了6310万人。乡镇企业中，户办企业占85.2%，联办占6.4%，乡办，村办一共占8.4%。户办，联办企业的从业人数也占了乡镇企业总从业人数的一半以上。同时，在全国近一半的省市中，户办、联办企业的产值超过了乡办、村办企业。

二是内部行业结构大幅度调整，第三产业迅速崛起。1983年，80%以上的乡镇企业还属于农业、工业两大产业，第三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到了1988年，农业、工业两大产业在乡镇企业中的比重已下降到47.3%，特别是农业企业的比重从20%下降到了1.2%。而属于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企业数已占52.7%。与1983年相比，1988年乡镇企业第三产业的总产值达到1052.19亿元，是1983年的12.8倍，在整个乡镇企业总产值中占14.99%，明显高于1983年占8.1%的水平。

三是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经营规模不断扩大。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7017，76亿元，比1983年增长了5.96倍，年均增长47.4%，相当于每年增创产值1201.98亿元。其中，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增长5.7倍，达到4992.9亿元，是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的2.65倍。这一时期，乡镇企业还进一步拓宽了横向联合的道路，在城乡农工商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了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同时，还涌现了一批中外联营企业。1988年，年产值中500万元以上的乡镇企业已达8860家，其产值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14.3%。同年，年创产值1亿元以上的县（市）有1312个，这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所创产值占总产值的94%。

正是在这一段黄金时期，乡镇企业开始走向世界，出口创汇逐渐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典型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

1989—1991年是乡镇企业的调整时期。1984年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从1989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为时3年的治理整顿。就乡镇企业而言，虽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但是它所受到的各方面阻力也日益增大，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都需要一番大刀阔斧的调整。确实，在一部分乡镇企业中存在着产品质量差，污染严重，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这部分企业将面临关、停、并、转的命运。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就更为显著。乡镇企业面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它的巨大阻碍。乡镇企业从一开始便处于计划体制的夹缝当中，企业生产必需的能源、原材料、运输等没有列入国家计划，人才、技术也不在计划之列，就更谈不上享受国有企业独有的优惠条件、平价供应以及商品包销计划。维持企业运转的大部分物质要素均需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去自筹自谋。乡镇企业在这样的困境中顽强地生存五来，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正是在这种从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创业，乡镇企业形成了自身运作轨道——依赖市场获取生产要素，让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乡镇企业的运行模式与计划经济下国

有企业的经营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二者间不时发生摩擦和冲突。

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获得社会对其运行模式的承认。而实际上，乡镇企业却不断蒙受来自社会的责难。在其运行模式形成时期，它便被指责为“与国有企业争资金、争原料、争市场”，“不正之风之源”，一再成为经济整顿的重点目标。在治理整顿中，乡镇企业又因“与农业争劳动力”，假冒伪劣、粗制滥造现象严重，再次列为首要的整顿对象。乡镇企业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治理整顿期间，消费收缩，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停业倒闭，从业人员流失，乡镇企业经济增长速度相对降低。但是，乡镇企业却并未失去活力，其顽强的生命意志再次展示在世人面前。人们所目睹的是当国营企业陷入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的不景气之中时，乡镇企业仍一枝独秀，以显著高于国民经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继续向上发展。1991 年，乡镇企业数经连续两年下降后，回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达到 1907.9 万个，企业创下 1621.69 亿元的总产值，是 1988 年的 1.65 倍，平均每年递增 18.3%。这一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是 1988 年的 1.65 倍，平均每年递增 18.3%。这一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是 8708.61 亿元，比 1988 年增加了 74.4%，年递增率 20.4%，是同期全国工业部产值增长速度的 1 倍多。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乡镇企业已从困境中再度崛起，它按照自己的运行轨迹生机勃勃地迅猛发展着，它期待着整个社会在事实的基础上对它的地位以及运行模式予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这也正预示着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大变动即将来临。

以 1992 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乡镇企业迈入了第二次起飞期。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途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建设的精僻论断。中共十四大在南巡讲话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的战略方针。我国国民经济再度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所依据的运行模式得到了全社会广泛的认同。一时间，横加在乡镇企业身上的众多束缚被一一清除，乡镇企业展示出惊人的发展势头。1992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 17659.69 亿元，比 1991 年增加 6038 亿元，增长率 52%，其中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 13193.37 亿元，比上年增加 51.5%。1992 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出口交货额 1192.8 亿元，比 1991 年增加 68.1%。至 1992 年，全国已有 6 万多家乡镇企业向外出口，其中“三资”企业 1.5 万家。乡镇企业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各省，均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第二次起飞的核心任务，力图实现第二次战略目标大转移。同的，乡镇企业加，速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大力进行产业合理化调整。企业经营规模普遍扩大，不同层次的企业集团如雨后春笋在各地纷纷涌现。1992 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比上一年增加 1015.5 万人，增长率 10.56%达到了 10624.6 万人。

当然，乡镇企业的发展仍有不足之处，仍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其发展中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西差距日益扩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比较雄厚，乡镇企业起步早，发展速度快。而中西部地区一直面临着一些限制乡镇企业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因此，不论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规模来看，中西部一直逊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经济的不发达直接影响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相对落后，这就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中西部乡镇企业经济的不发达也制约了东部乡镇

企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实行产品升级、产业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与循环，就必然要把那些技术含量不高的资源加工型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应快速发展这些产业，及时填充东部地区留下的市场空白。这样形成一个从东到西有机结合的产业梯度。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优势互补，经济互利，东部的地区的乡镇企业也有了广阔的市场，其经济发展将更加迅猛。

异军突起的第二重含义

当邓小平同志用“异军突起”这四个字来称赞乡镇企业时，这位改革总设计师，这位奇迹主创者的喜悦之情不禁溢于言表，这其中深深倾注着他对乡镇企业这一奇迹的关注与厚爱。的确，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并不仅仅在于其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而更在于它对传统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观念意识的猛烈冲击，更在于这些冲击所激发的规模空前的社会反响和由此导引的深刻的社会变动。我们回溯往夕、透视历史时，也许正是后者更能诱发我们的兴趣，更值得我们去探究和深思。

乡镇企业被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这首先是指乡镇企业在创业历程中自身发展起来的那一套以市场需求和导向的生产机制，即由市场来决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企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也均来自市场。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所论述。此处从略。先导作用的另一方面表现在乡镇企业所创建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机制。乡镇企业大都是自筹资金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企业必须把盈利视为生命。只有盈利企业才能壮大；亏损只有自己承担，就得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这使乡镇企业的职工和经营者随时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他们把企业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所以在企业面临难关时，职工宁愿少发工资，加班加点工作，千方百计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自负盈亏的体制使企业在决策上、在用人制度上、在分配上都创立了一套新的机制。乡镇企业的管理机构十分精干，少了许多“婆婆”，他们自主经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国营企业的审批报告还未盖完公章，镇企业的产品已走上了市场。乡镇企业在分配上真正坚持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还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使企业一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乡镇企业的用人机制是干部能上能下，在企业的内能合理流动。所以有人又把乡镇企业经济誉为“能人经济”。

乡镇企业的企业机制是和市场经济体制紧密联系的，是乡镇企业的生机活力的直接来源。这样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无疑会对传统的计划经营模式产生强烈的冲击，后者必须更多地借鉴前者。乡镇企业的发展催动了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变革。它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旧有的农村经济结构。在我国的农村经济中长期存在着主、副业之分，农业曾一直作为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到 1980 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 68.1%，非农产业占 31.9%。1992 年，农业产值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 35%，相对增减 33.1 个百分点，它只好屈居第二了。而同年非农产业所占的比重达到 64.296 上升 32.3 个百分点。

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导致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而且还引发了整个国民

经济结构的变革、冲击了传统的城乡分工体系，开创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现代化道路。

在变革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农村集中了3/4的劳动力，而所创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不及1/3。乡镇企业的发展已使这种格局有了较大改变。与1978年相比较，1992年农村劳动力占全国社会劳动力的73.796，下降了2.6个百分点，农村社会总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则从29.85上升到46.3%，增加了16.5个百分点。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打破了传统的城乡分工体系，使工业集中于城市的布局让位于城、乡工业的均衡互补的新格局。1978年，全国的乡镇工业产值才385.3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还占不到1/10；1992年乡镇工业的产值已达13193.3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8%。乡镇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引起城乡工业间的冲突，而造就了一种城乡互补，协同发展的新结构。

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在促使旧的体制，旧的经济结构变革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是不同地区，依据各自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条件，探索出的一条条成功道路。

在乡镇企业发展中，首先引起人们关注并得到社会公认的是“苏南模式”。此处的“苏南”指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的广大农村地区。这里毗邻城市水陆交通都十分便利，而且农业发达，社队企业已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苏南乡镇企业所走的道路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依托城镇，与城市的企业和科研部门密切联系；大力发展非农副产品加工业。苏南模式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普遍性，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已在本地国民经济中起到骨干作用。

当人们刚接受苏南模式，在浙江沿海交通不便，农业经济并不发达的温州地区，乡镇企业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与苏南模式大不相同的发展道路。苏南人以集体经济的繁盛而骄傲，温州人却热衷于挂户经营，以家庭经济为乡企业的重头戏。苏南乡镇企业依托城市，发展非农加工业，温州人却就近培育专业市场，生产钮扣、松紧带之类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商品。而且一时间“温州生意郎，送货遍四方”，10万农民推销员踏遍了全国各地。这就难怪“温州模式”的出现曾伴随着那么多批评、指责，曾在全国上下引起无数的争论。温州模式对旧观念，旧体制的冲击远远大于苏南模式。

与苏南模式，并列的是“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所开创的道路。珠江三角洲的自然条件与苏南相似，而其最大的不同在于毗邻港澳，有为数众多的华侨。珠江人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确立了一条以集体经济为主，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已成为这一地区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除以上三大模式外，还有以发展加工工业，为城市服务的“城郊模式”，其典型实便是上海城郊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而在远离城市，农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以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为主的耿车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已走过了十五个年头。十五年的道路坎坷不平、风雨兼程，乡镇企业却以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为自己开拓了一条生存发展的广阔道路。它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为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为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的提高作出了重

大贡献。它在不断奋进中所开创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运作方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任人唯才唯德的企业机制，猛烈冲击了旧有的体制和观念，推动了一场深刻的体制革新。乡镇企业的运行方式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它代表着改革的方向。乡镇企业的勃兴还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推动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农村小城镇蓬勃兴起，开辟了一条农村现代化的成功道路。

第十一章 沿海经济特区的崛起

举办经济特区，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办经济特区的思想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特区建设成就卓著。

一、酝酿和筹办

一、决策的过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还提出要“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并大力加强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开始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分析国外经济发展情况，寻求他山之石。当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约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这一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设立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作法，似可在中国沿海某几个地方参照采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根据本省与香港、澳门相邻，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海外粤籍华侨众多的特点，专门就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和举办特区的可行性反复作了讨论，形成初步意见。

1979年4月中旬，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上听取了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汇报，肯定了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市举办特区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后报告中央审定。受中国委托分管此事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于5月份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十多位负责干部，前往广东调查，同当地的干部和经济专家深入研究。与此同时，福建省也进行了相应的工作。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

鉴于举办特区是一项新的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了指导。当年第四季度，谷牧前往这四个地方作了实地考察，1980年3月下旬又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中央指示贯彻情况，进一步研究特区建设问题，会议明确指出，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保障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主

要吸收侨资、外资进行建设；先搞好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措施，为外商投资创造条件；先上那些投资少、周转快、收效大的项目。根据半年多筹办工作实践，考虑到特区在其发展中不但要办工业，也个商业、旅游等行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将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种功能，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改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二、制定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条例》，划定特区的位置和区域。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章法，早在1979年8月，国务院就着手组织起草法规性文件。先是委托广东省有关方面起草并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后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建立经济特区进行了审议，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主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正式诞生。

以后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所以选定在四个地区举办经济特区，是由于这四个地方在地理、人文条件方面具有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优势。一是靠近国际市场。深圳和珠海与香港、澳门毗邻。汕头和厦门也与港、澳相近。厦门还面对台湾。二是历史上这些地方与海外有着密切交往。三是深圳是中国南方对外交通的重要陆路通道，汕头和厦门是中国南方的重要海运港口。四是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可为依托。五是海外华侨、外籍华人有许多人的祖籍就在这里。实践证明，经济特区的选址是正确的。

三、举办特区方针政策初步系统化。在国务院批准上四个特区的位置区域后，广东省成立了以省委书记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特区管理委员会，福建省成立以省委书记郭超为主任的福建省厦门特区管理委员会，着手制订建设规划、建立工作机构、宣传招商等项工作。

为了研究国外经济性特区的作法以为借鉴，1980年9、10月份，当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参加下，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公园”进行考察。还借途经日内瓦的机会，邀请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讨论。考察组对国外经济性特区的基本经验归纳了一条：立法比较健全，可操作性强；有开发总体规划，然后从小到大逐步建设；管理体制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的自主权；注重人才培训；有优惠政策。考察结束归国后，考察组向中央作了汇报。

1981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广东、福建两省的主要领导，有中共中央工作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特区的负责干部，还邀请了多位经济学家。会议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下，回顾了初步开展的工作，参考国外经济性特区的成功作法，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提出了较系统的意见。会议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其主要内容是：1.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它的“特”在于实行国家规定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2. 举办经

济特区是为了吸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拓展对外贸易，观察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习与提高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本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3. 特区的经济所有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结构。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可以大于内地。特区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4. 特区建设要制订全面规划，量力而和从小到大，逐步发展。5. 特区要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特E的行政管理机构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6. 加强经济特区法制建设。7. 在对特区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以优惠和方便。8. 授予特区较多的经济管理权限。9. 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政治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加强社会治安，打击走私活动。10. 国家大力支持特区建设，等等。这次会议对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构架作了初步集成的工作，对特区的建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开创新业建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从 1980 年下半年起相继投入开发建设。从这时到 1985 年底，四个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初潮的推动，进行艰苦开拓，为以后的发展初步打下了基础。

一、集中力量建设基础设施。集中力量进行以创造投资环境为目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基本建设，成为经济特区举办初期的工作主题。这四个特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多方筹措资金，分片开发，开创了新的路子。

起步最早的深圳特区，在全面规划、通盘安排基于项目的基础上，重点建设蛇口、罗湖、上步三片。蛇口工业区在 1979 年上半年就着手施工。在施工中引起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创造了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效益，以后被誉为“蛇口模式”。深圳特区对罗湖综合功能区和上步工业区的开发，除投人部分地方财力外，主要运用国家信贷政策倾斜，使用银行借款，负债经营、滚动发展，并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招标和承包的建筑管理改革，取得了高速优质的成果，被誉为“深圳速度”。深圳特区的这些经验和作法，为其他特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厦门特区于 1981 年 10 月在湖里工业区破土动工，组织进行“五通一平”，以及机场、码头等重点建设项目，改善了厦门全市的基础设施面貌。珠海特区开始从发展旅游业着眼进行开发，到 1984 年转人建设吉大、南山等工业区及外围配套工程的较大规模的施工。汕头特区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先以办出口加工业为建设重点。

到 1985 年底，四个特区基本建成了具有现代化综合设施的八个工业小区，以及与之配套的市政工程、商业楼宇和旅游设施。经济特区从蓝图变成了赫然在望的现实。

二、外引内联、兴办工业生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的举办，一开始就引起海外投资商的兴趣。港澳客商率先到来，投资举办企业。特区为了弥补自身资金短缺、人才不足和技术底子薄的弱点，内地一些部门和企业则为了通过特区获取经济技术信息，开拓国际市场，加强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联合。特区与内地的经济技术联合增强了对外资投

入的吸引接纳能力。中（特区）——中（内地）——外（境外客商）联合投资、共同经营成为良好办厂方式，外引内联促进了特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85年，四个特区当年农业总产值达到61.5亿元，比建立特区前一年的1979年增长3倍多。外贸当年出口额比1979年增长5倍以上。虽然当时的工业项目以简易加工装配的小型项目居多，出口的商品中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但是毕竟为特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三、兴办商业、旅游等服务行业，活跃市场。按照举办综合性经济特区的要求，在重点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四个特区尤其是深圳、珠海、积极举办商业、房地产、饮食、旅游、金融等第三产业。1985年，这两个特区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79年增长了13倍。

四、适应开发建设的需要，进行初步的改革和改革步子迈得较大的首属深圳。除建筑设计施工实行招标承包以外，还推行劳动用工合同制浮动工资制，放开大部分生活资料价格，各专业银行交叉经营搞活信贷发放，房地产商品化等等。这些改革，促进了特区建设，引起了内地的重视。基于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遵照立法程序，制订公布一批特区单行法规，使特区工作初步作到有法可依。

中共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特区的开发建设，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导。1982年初，中央在解决广东、福建两省沿海一度走私活动猖獗的问题时，强调要正确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10月底，陈云在广东的一份报告上指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委员谷牧受中央委托，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的负责干部就特区建设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讨论纪要。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转发执行，并指出：试办经济特区，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1984年春节前后，举办特区的倡导人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他说，经济特区是我倡议举办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他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回京后，他又同中央几位领导人进一步谈了特区的开放政策和怎样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其中蛇口更快。"他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关于经济特区的作用，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但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他提出："除现在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丰富和发展了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对外开放工作。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指出，特区还处于开创阶段，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扎实工作，勇于前进。会后，国务院批准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在此前后，还批准于珠海特区、汕头特区扩大范围。

在经济特区进入它诞生后第六个年头的春天，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三角地区的59个市、县开辟为经济开放区。中国的对外开放，从举办四个经济特区起步，至此初步铺开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有重点、多层次的梯级推进格局。经济特区在这个格局中，按照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要求，又迈开新的前进步伐。

三、致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四个特区，经过五年多的开发建设，到1985年已初步奠立基础。同时，在前进中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失衡，投资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统筹规划不够，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高，产品外销竞争能力不强。从1986年起，四个特区按照中央的指示，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外向型经济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经济特区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非这时才提出的新任务。特区在筹办之初，曾命名为“出口特区”。限于主客观条件，在开创阶段经济外向度还不高，同时在认识上也有个随着实际发展逐步演化的过程。到1985年2月，在深圳举行的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更明确地提了出来。主持这次座谈会的谷牧在讲话中强调：在新形势下，特区应在继续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把重点转向增加工业生产，积极扩大出口创汇方面来。新上的外引内联企业都要按此精神审批，要重点建设一批技术水平较高，能够出口创汇的项目，培育一批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的骨干产品；尽快建成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渔和旅游业同时发展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他要求各特区要朝着这一目标，下大力量“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

1986年元旦期间，谷牧受国务院委托，在深圳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四个特区，广东和福建两省、国务院参事室9个部门的负责干部。会议总结了特区举办以来的工作，集中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和重要的政策性措施。会议提出，经济特区经过五年多的搞建设、打基础，在“七五”应当把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方面，努力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具体要求：特区产业结构应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工业建设以吸收外商提交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智力开发和文化建设，培养和引进人才，大力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培养一大批中高级技术工人。要扎扎实实通过发展生产、改善管理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会议还强调，越是对外开放，越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腐败现象。要把特区的“两个文明”同时抓上去，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了支持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会议就国家需要采取的政策性措施，提出了建议。2月7日，国务院审定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对特区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推动作用。

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基本框架的确立，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在此后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部署，四个特区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坚决调整投资结构，压缩非急需的建设工程。首先停建一批可以缓建的工程项目，从而使资金、物资紧张的状况得以缓解，造成比较宽松的经济运行环境。与此同时，重点安排确保生产力增长的项目和使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项目。(二)着重发展工业生产、提高产品水平。加强对外引内联项目的筛选，引导投资方向。在所有洽谈的项目中，重点接纳工业生产项目，在工业项目中优先安排出口创汇项目和先进技术项目。在组织生产上强调改善企业管理，抓紧技术和技术开发，着力上水平、求效益。(三)大力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外贸出口。这四个特区都把扩大外贸出口，当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中心环节，按照"立足特区，依托内地，走向世界"的方针，从产品更新和市场开拓这两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四)清理整顿商贸公司，克服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得到了保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健康的经营环境。1986 年到 1989 年 4 月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都从自身实际出发，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各具特色的进展。

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在四个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1988 年 4 月 1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决定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

建立海南经济物持区，是中国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要部署中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其他沿海地区的大部分省辖市和县划人沿海经济开发区。要求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组成的包括 293 个市、县，面积约 42 万平方公里，2 亿多人口的沿海对外开放地带，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也是总结海南岛开发建设实践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1980 年 7 月上旬，国务院曾专门召开会议，确定对海南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逐步建立适应当地特点的农业结构，推动经济全面发展。1983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根据中央几位领导人先后去海南调查研究提出的建议，作出专项决定，赋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对外经济合作自主权，在海南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包括外商提交企业的所得税按 15%征收，以对外开放促进内部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指出，开发建设好这个宝岛，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巩固海南国防，意义重大，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从人、财、物上积极给以支持。这项方针和有关政策的实施，使海南开发建设获得了新的活力，迈开了较大步伐。1987 年 4 月，中央、国务院开始研究在海南岛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建立经济管理新体制，把海南岛办成全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就是在做了一年准备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的。

在筹备海南经济特区的过程，对其有关的政策措施反复进行过研究。国务委员谷牧、张劲夫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组织国务院等有关部门会同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政机关和一些专家，对举办海南经济特区的可行性和有关政策，三上三下作了研究论证。1987年10月上旬，谷牧在海口市主持召开有国务院16个部门和广东、海南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深入讨论并系统集纳了各个方面的意见，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审查修改后，于1988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这个法规性文件，明确规定了海南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其中大部分是深圳等四个特区行之有效的经验，一部分是按照海南实际作出的新规定。

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开辟了开发建设海南岛的新里程。在1988年到1990年3年中，海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的条件下扎实地前进。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上升到56亿元，比1987年增长18%；外贸出口则比1987年增长3倍，1988年到1990年3年实际吸收外商提交额，超过1980年到1987年8年总和的2.7倍。海南经济特区建设起步实践说明，发展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经济特区带着自身经济迅速增长，对全国改革开放起了重要借鉴和推动作用的实绩，跨进了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中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到新水平的重要发展阶段，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常关键的十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特区，寄予殷切期望。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夫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办好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要求“理会有效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扩大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合作，积极支援边远地区与内地经济的发展”。展望九十年代，经济特区在它诞生的第二十年里将与日俱进，臻于成熟。

第十二章　邓小平与‘一国两制’的提出

北京，人民大会堂。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

沿着中国地图的东南方向看去，有一座与大陆一水相连的岛屿——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有着悠久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45年前，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占据台湾一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的大陆长期隔绝，造成了祖国分裂的局面。

海峡两岸人民渴望祖国统一。

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生前写下了这样动人心弦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的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实现祖国统--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考虑和平方式统一祖国。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表明和平统一的意向。1974年10月2日，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时也说道：解放台湾有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即使台湾解放，我们也不会把大陆的政策搬过去。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先后实现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开拓了对外关系的新格局，这就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了国际、国内的必要条件。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他在会上说，今天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行了正常化；三是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问题已经提到了具体的日程上来。也就是在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与此同时，长达几十年

之久的炮击金门等岛屿的行动划上了句号。随后不久，正当中国人民欢度新春佳节时，邓小平出访美国，1月30日，他向美国参、众两院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张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表明，邓小平在确定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已经有了"一国两制"的初步设想。

两年后，即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两天后，邓小平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约蒂时说：叶剑委员长所阐明的九条，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次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又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从此，"一国两制"的概念，开始正式使用。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又就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天他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指出："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系统，都由台湾自己珲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二、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的发表

邓小平在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还说到：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我们正在逐渐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澳门也属类似的问题。当然，台湾问题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事情，是内政；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中国和葡萄牙之间的事情，是恢复行使领土主权的问题。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点。

香港和澳门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近一个多世纪来为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强占和强行租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严正声明，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1997年6月30日，英国在香港的租借期满，中国届时将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随着这个日期的日益临近，从70年代末英国就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逐步成熟。

顺利解决香港问题，不仅是中国政府的意愿，也是香港各方面人士的意愿，英国政府对此也比较着急。因为英国在香港有它自己的利益，只有香港保持稳定，外国投资者才会在那里投资。香港问题若没有一个明确的、妥善的解决办法，会给香港的经济和建设带来种种不利的影响。为此，英国方面首先决定派人到中国试探。

1975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希思访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会见了希思。当时希思曾问毛泽东将来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毛泽东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年轻人去管吧。

1979年3月下旬，英国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香港问题。3

月29日，邓小平接见了麦理浩爵士，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方针：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请所有外国投资者放心，怎么变都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利益。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明确表示我们将以“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

1982年4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时又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他说，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担心呢？邓小平明确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到时要收回主权。同时指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的中国人管理香港。

这样，英方经过多次试探，决定就香港问题同中方进行正式谈判。这就是不久后开始的国际社会所说的“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两国政府高层决策者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接触。

这位被称为“铁女人”的英国首相，带着大批智囊谋士、新闻记者前来，是为举世瞩目的香港问题寻求答案的。因而，她的到来，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9月24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就解决香港问题向撒切尔夫人摊牌。

邓小平坦诚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并说：“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撒切尔夫人对比并不意外，但试图反击，她认为，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平静地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接着，邓小平严肃指出：我担心今后十一年过渡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制造这些混乱的主要是英国人。希望英方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十多年来事情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英方在香港问题上不断设置障碍，违背中英达成的联合声明，违背香港基本法。但尽管如此，丝毫不能阻挡中国人民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的进程。

最后，双方商定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进一步磋商。

外电评论这次会谈：撒切尔夫人锋芒毕露，邓小平是棉里藏针。

政治家毕竟是政治家。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见后的第二天，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电台记者戈登·马丁说：“我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是我们共同的目的大于分歧。”同时，她还向全世界表示，中英双方本着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高层会晤后通过外交途径继续进行商谈。

此后，中英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谈判。谈判共进行了22轮，直到1984年9月结束。历时两年之久。

而在这期间，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趋于成熟。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同访问中国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谈话时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不同，香港是自由港。

1984年5月18日，"一国两制"的提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方针的概括性语言。

同年6月22日至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说，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他进而说道：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还多次重申，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

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完善和中国方面对香港问题解决的诚意为越来越多的英国和香港各方面的人士所了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也取得了成果。

1984年9月26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举行了草签仪式。

协议草签后，中英两国依照法律程序进行了审议，同年12月19日下午5时半，还是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订议式。

入冬的北京寒气袭人。然而，人民大会堂内却春意盎然，一派热烈气氛，觥筹交错，贺音频频。这是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等中英有关人士参加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的一个场面。

当天，邓小平又同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会谈。他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并强调："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行使主权。

互换批文生效后，开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作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指示。

经过5年的努力，1990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邓小平十分关注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多次满怀深情地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他表示到那时候，就是坐着轮椅也要到香港去站一站，看一看。

随着解决香港问题的进展，澳门问题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中葡双方经过几轮会议

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文本)。

1987年4月13日，人民大会堂内。

一张铺有墨绿色绒布的长桌上，插着中葡两国的国旗。中葡两国代表在这里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声明，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出席了这次签字仪式。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已制定和通过。在1999年中国收回澳门的问题上，葡萄牙共和国采取了合作的良好态度。

至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

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来的。这一构想有着重要的国际意义。他说：“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既能向人民交代，又可以保持局势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会伤害哪一方。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与国家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当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在紧张和对抗不幸地笼罩着世界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次极为突出的首例。”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政嗣也曾这样说道：中英香港协议是“一国两制”的伟大实验，这不仅对台湾回归中国和南北朝鲜实现统一产生良好影响，而且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会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一切人的高度评价。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的同时，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可以先不谈主权，进行同共开发。1978年他在谈到钓鱼岛问题时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得利，也可以全资经营。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问题，邓小平也指出，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

第十三章　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一、建国以来党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与实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之后，面临的最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尽快使我们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认真思考行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建设蓝图。1949 年 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虽然进行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大规模的运动，党中央并没有放松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而是实行“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仅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即着手确定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1953 年，党中央确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 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说：“如果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目的就不能达到。”在此期间，毛泽东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打个基础，然后再用七个五年计划，也就是 2000 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的设想虽然不无急于求成的因素，但他不仅肯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且初步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从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到 1957 年底，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往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日益陷入“左”的错误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建设上不顾客观条件，忽视经济规律，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1958 年开始盲目发动的“大跃进”，结果是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国民经济的正

常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挫折，耽搁了十年时间。但是，即使在曲折发展的艰难岁月里，虽然理论和实践上一再偏离，我们党和政府仍然反复重申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1964 年 12 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 1975 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虽然这与前述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的设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对于第二步目标实现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但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这样两步走的总体设想，是十分可贵的。

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按照上述党中央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容抹煞的成就。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而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中能够维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一些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较快，有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在经济建设中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如，长期以来，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使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片面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益，造成资源的浪费；不断扩张建设规模，忽视技术进步，形成工业部门在低水平上不断扩大和重复建设；另外，由于在注重建设和生产的同时，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造成长时间社会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水平较低，等等。几十年间，我国经济经历了大的折腾，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在“文革”时期竟濒临崩溃。其原因，除了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党的工作重心没有能够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等原因外，在经济建设上就是长期以来适应政治“穷过渡”的需要，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缺乏一个符合国情、切合实际、坚持不懈、逐步推进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与政治上固守“两个凡是”的同时，在经济建设的指导上一度却又出现了新的冒进，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中央在考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时，吸取历史的教训，首先明确这样一个思想：认真研究国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陈云当时曾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陈述了他的意见。其中讲道：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快三十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邓小平也针对当时的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指出：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是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业林牧副渔并举。在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许多会议上，

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深刻指出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因此经济发展目标不可能订得过高。

基于这样的冷静而清醒地对中国国情的再认识，党中央充分意识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1979 年 3 月，陈云指出：一方面我们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 20 年，即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个矛盾。1979 年 9 月，叶剑英在庆祝建国 3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时，党中央实际上已经看到，在本世纪末还不能完成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这个任务的时间必须拉长，中间要分为几个阶段。在当时，尽管仍然使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但含义已有所变化，不再从完成的意义而是从阶段的意义上来使用了。

此外，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也为党中央重新考虑和制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与步骤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世界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时代主题转换的时期，从而也在世界各国面前提出了一个谁都不能不予以估计和考虑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大课题。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揭示出时代的基本要求和特征，而且把它作为我们确立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点之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以此作为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国际关系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较长时间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同时，这种国际条件也加剧了各国经济发展上的竞争，向我国提出了挑战。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加拉大了，而且与在 60 年代、70 年代先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也有了相当的差距。现实是严峻的，它要求中国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国际经济发展的竞争中争取有利的地位。

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和现实国情的客观分析，对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发展动向的正确估量，使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大大深化，制定一个既积极稳妥，又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与步骤的条件逐步成熟了。

二、“小康”目标的提出、确立与“温饱”目标的实现

正是在充分认识现时国情，认真分析国际形势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党中央首先逐步确立了从八十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到 1990 年为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1990 年到 2000 年为第二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第二个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和关键的作用。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就开始考虑制定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战略步骤问题。他特别针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指出“四小龙”的发展，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间的事，“四小龙”能搞上去，我

们就不能搞上去？不知你们服气不服气，反正我不服气。“小康”目标就是邓小平在与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一次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

日本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是后来者，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为赶超英美而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用不到30年的时间，从一个遭到沉重打击的战败国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成功的主客观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战后日本制订了一个切合本国实际的国民经济现代化及其分阶段实施的发展规划。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背景，1979年12月6日，当大平正芳访华期间会见邓小平时，就自然而然地问到一个问题，即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略加思索后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使到了本世纪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已经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达到一千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二百几十元美金，邓小平据此推算说：“如果达到一千元，就要增加三倍”。在这次会晤中，邓小平第一次用统计指标量化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虽然没有使用“翻两番”的概念，但增加三倍的实际含义与翻两番是相同的。

与大平正芳谈话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转述了他与大平正芳会谈时讲到的关于“小康”目标的设想。1980年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正式提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小康目标的提出，是审慎的，经过多方深思熟虑的结果，而绝非随机性地脱口而出。事实上，这个目标的确定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进程的探索，一个更加成熟的新阶段。这一目标，在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确认：“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进而，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又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〇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过到小康水平。”十二大报告还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到1990年为第一步，是打基础的阶段，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剩下的10年为起飞阶段，在新的基础上使工农业年总产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部署和安排，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实现“小康”目标的要求。

改革开放是发展我国经济的必由之路。“两步走”目标的实现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致的，而小康目标的实现则无疑是与我国经济的全面改革的推进同步的。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农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长期困扰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宣布，十二大提出

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逐步全面展开，并很快取得了成效，1984年至1988年五年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使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额增长，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亿元，7年时间完成了预定10年完成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1979—1986年的8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12800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达8755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的26年的投资总和还多1110亿元。这些投资中间，能源、原材料、运输、邮电等基础性的投资占近1/3，兴建了1600多个大中型项目，使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为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定的物质技术基础。1980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7027亿元，预计本世纪末可达到29500亿元左右，超过翻两番的要求；乡镇以上工业总产值可能达到美国80年代初的水平；人均占有农产品的数量，可达到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国民生产总值预计可达到11800亿美元左右，是1980年的4.4倍，人均950美元左右。据世界银行估算，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位次，可能由1980年的第8位，上升到第6位，甚至第5位。十三大报告中总结说：我们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九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和城乡居民平均收都大体上翻了一番。并预言，现在看来，到本世纪末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最终确立

在确立了本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以后，党中央又开始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进行跨世纪的思考。1980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小康”目标实现以后，还要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他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未来，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放到世界环境中，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只是现代化的“最低目标”，真正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和奋斗。那么，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目标应该是怎样的呢？这绝不能凭借主观想象，而是要依赖于经济发展实践对第一步和第二步发展目标可行性的检验。只有实践证明前两步发展目标确定的速度是正确的，才有可能科学地预见更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

邓小平密切关注着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按照“六五”计划规定的指标，1981年到1985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到5%。但实际年增长率1982年为8.7%，1983年为10.2%，1984年为14.296，大大突破了预定的指标。这些统计数字使邓小平对实现本世纪既定的发展目标的信心更加坚定。1983年12月，他在会见杨振宁时说，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希望实现的。1984年9月会见吴健雄、袁家骝时，他肯定地说，实现“小康”目标是有把握的。同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他说得更清楚：“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过四年的时间，‘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

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这时，邓小平认为提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984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以后，我们还要在下世纪三十年到五十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同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说，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新设想作了进一步的表述；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20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到七十。这样，邓小平就把我国经济发展规划的时间由本世纪末延伸到下世纪中叶，并把目标定在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上。

在后来的谈话和讲话中，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从而使下个世纪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逐渐清晰、具体和完整。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人均四千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六万亿美元”的量化目标，发达程度定为“中等发达的国家”。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十二大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的更为完整的“三步”的战略构想。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同时还指出，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效率，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

这标志着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的我国现代化建设70年间宏伟构想的形成。

事实已经证明，并在继续证明，这是一个积极而切实的目标体系。实现第一步发展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必须达到7.2%，这样的速度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从世界范围看，1961年到1980年的20年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增超过7.2%

的只有日本（达到增长8%），其余国家都远远低于7.2%。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美元上下增加到4000美元左右，美、英、法、德等国家都用了200多年时间。日本发展比较快，也用了一百几十年时间。我国50年代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70美元，到下个世纪中叶，要提高到4000美元左右，就是说要用100年左右的的伺，走完人家200多年或一百几十年所走过的路程。应该说，做到这一点有相当的难度，但是设想正在变为现实。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正在向第二步目标胜利前进。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6%—7%也就可以了。这个速度不仅远低于近几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的速度，就是比过去30多年平均每年增长8%多一点的速度也还要低一些。可以肯定地说，依据我国现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依靠亿万人民的齐心努力奋斗，实现这样的速度是完全有把握的。至于第三步发展目标，即用21世纪前50年时间，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要求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仅为3%－4%。尽管由于基数的不断增大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会使相同百分点所留包含的绝对数目大大增加，尽管一个国家要在长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不容易，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越来越趋于成熟，加上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潜力，应当说第三步发展目标的确定是留有余地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经过艰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此外，我们有必要强调：这是一个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尺度，体现了速度和效益的统一综合性目标。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存在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的倾向，甚至主要是以某几种工农业产品的来规定发展目标，结果往往只求高速度，忽视了效益，只注意某些经济门类，忽视了综合平衡，走了一条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路子。尽管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人民得到的实惠比较少。“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避免了以往经济发展中的严重缺陷，以生产发展水平和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为发展目标，更好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它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把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它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从发展战略上明确要求把经济的增长置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得到相应的实惠。由于以国民生产总值代替工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尤其特别注重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它所反映的内容更为广泛和准确。因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范围不仅包括工业、农业，也不仅包括整个物质生产部门，还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由于不计算中间产品的价值，所以重复计算的部分少。另外，使用国民生产总值作综合指标，使我国在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中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尺度。这个宏伟目标的依次实现，无疑对中国的发展、对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具有伟大的意义，同时对世界的发展也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积极影响。

第一，它可以使中国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落后的国家，温饱问题在旧中国从历代王朝到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办法解决。第一步目标的提前实现，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已经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如果第二步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全国人民的生活就可以进入小康水平。而第三步目

标实现后，全国人民就可以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而且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和贫富过于悬殊，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病。

第二，可以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邓小平讲过："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就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一百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如果实现了第三步目标，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就将达到六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大超过美国现在的数字，那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就成了经济强国。由于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进一步提高，就能够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了较大的贡献。

第三，将最终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但是，由于我们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加上自身的失误，这种优越性还没能充分显示出来，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如果实现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就像邓小平说的："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进入 90 年代以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产。从国际来，原有的东西方对峙的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这对我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更加有利。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加之政治稳定，社会安定，这些都是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有利因素。同时，目前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我国的一些周边国家，都在努力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我国是一种挑战。在这样一种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 1992 年春的南巡谈话中，及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力争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一谈话完全表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内心的渴求，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迅速进入了新一轮加速发展的时期。1992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规划了 90 年代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重申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展望未来，我们坚信，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国的国民经济一定能够不断迈上新台阶，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一定能如期或提前实现，并为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十四章　邓小平南巡与党的十四大

我们生活在一个改革的时代。十几年的改革已使中国获得了世人共睹的成就，中国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但我们所从事的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前进中不免出现困惑和问题，1992年，中国来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人低潮，国内尽管治理整顿取得显著成绩，但仍存在严重问题，深层次的矛盾尚未解决。中国的强国之路该如何走下去？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有明晰的回答。邓小平——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运用他的全部经验和智慧，又一次为我们吹响了进军号。从此，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潮在中国大地涌动起来！

邓小平要说话了

在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在反"左"的斗争中，邓小平曾先后四次发表重要讲话，中心都是把住生产力不放，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时刻，为了拯救民众，拯救国家，邓小平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是生产力中心论的先声。70年代中期，邓小平重新工作之时，阶级斗争为纲人人皆知，他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力图把发展经济置于指导纲领的位置上去。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原则。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又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国际形势重大动荡后出现新格局，国内改革又面临新的困难，有人居然主张走老路，在这个重要时刻，邓小平又说话了，讲到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抓住生产力不放，把现代化建设搞上去。对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从根本上原则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邓小平，我们的总设计师，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说出最需要的话！

1991年最为轰动世界的大事之一是苏联的解体，另一件大事是海湾战争，这两件大事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的扩张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没落。世界原有的两极格局被打破，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

苏联的解体，原因可以找出千条万条，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政治动荡，民族危机，长期军备竞赛的重负，等等，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自身功能衰竭的体制，几十年不变，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邓小平南巡时深刻总结了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苏联东欧从1986年6月至1991年12月，顷刻瓦解，更证明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只有经济发展

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了，社会主义才能站得住脚。

也是在这几年，中国的周边国家也起了变化，不但“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而且泰国，马来西来等东南亚国家发展速度也在加快，我国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和他们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要继续拉大。周边的掘起和挑战，对中国经济发展客观上起到良性作用，同时也促使我们看到深演化改革和加速发展的紧迫性。

当今世界的又一特点，是世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几个经济强国为中心的共同竞争的多极时代在到来，而围绕各极正形成巨大的区域集团。主要有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五个经济圈等，这对中国来说，形势严峻，中国处在这些集团之外，商品将很难打人集团内市场。面对投资、外贸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出路仍然是推进改革开放、自强自立、走向世界。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内部的情况又如何呢？1991 年春节，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谈到要开发浦东，振兴浦西，实事求是，稳步前进，但不能光稳步，还要前进，稳得多了，不动不行。《解放日报》则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即很有名气的“羊年小论”，谈到了市场经济，谈到了深化改革，等等。“小论”引起很大反响，有的报刊发表文章，批判“羊年小论”，认为此事要先问问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只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计划经济，等等。这正是新的思想僵化。另外，从更广阔的视界来透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深化改革面临一系列难关，还有不少矛盾等待解决。如，工业生产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矛盾，冶金投人增多与资金效益下降的矛盾，改革理论莫衷一是，市场发育迟缓，高科技发展不力等问题的存在。这些矛盾迟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如何摆脱困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深化改革，攻克改革中的难关。

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面临“左”的阻碍，又一次期待新的突破，期待新的思想动力。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要说话了。

东方风来　春满华厦

1992 年的中国，春意盎然，生机勃勃。邓小平从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视察了中国的南方，并沿途发表关系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方向的一系列讲话，通过新闻媒介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再次震动了中国和世界。

深圳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一直得到邓小平的关注和支持，这次又是他南巡的必到之地。1 月 19 日上午，一列长长的列车开进深圳车站，车停稳后，在一节车厢门口，服务员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地上，以这样的礼节迎接邓小平，这也许不符合任何礼仪规范，但表达了深圳人民的火热心情。这是邓小平时隔 8 年后第二次来深圳，当邓小平下车后，人们迎了上去，用感情真挚而丰富的语言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殷切盼望和热情欢迎。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们非常相信您”，深圳市

委书记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深圳市长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

邓小平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倡导者和总设计理师。1979年4月，他就向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于是，中国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一个特区。深圳人民奋力拼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新事物的出现总会有阻力和困难，有人怀疑、责难甚至反对。1984年金24日，在杨尚昆等同志陪同下，邓小平亲临深圳视察，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建设成就，并挥笔题词，鼓励深圳党政军民坚持大办特区的方向、继续努力。8年后，邓小平同志再次来到深圳，刚刚走进下榻处——市迎宾馆桂园，他不顾旅途劳顿，急不可待地要去实地观察："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随行人员也说，小平同志身体健康，车上也休息得很好。于是仅仅小憩十分钟，就来到外面散步，其间，邓楠问到父亲1984年给深圳题词的事，邓小平不加思索地答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散步后，邓小平等人乘车观光深圳市容。以后的几天，1月19日至23日，小平同志又参观了国贸大厦，走访了先科激光公司，视察了华侨城，游览了仙湖植物园，给深圳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当汽车在深圳街道缓缓行驶时，小平同志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热闹繁荣的经济市场，熙熙攘攘的密集人群，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代替了昔日的低矮宿舍、静僻里市、羊肠小道、水田鱼塘，非常高兴地和陪同人员侃侃而谈。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作出了响亮的回答：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讲到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说，广东要力争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一翻话说得语重心长。

1989年12月29日开通的皇岗口岸，虽然只有一平方公里，却拥有180条通道，每天约通过7000辆车次和2000人次，最高流量可达5万辆车次和5万人次。谁能想到这

个通商口岸只用了短短的四年就成为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邓小平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眺望香港，他大概是在想香港的回归吧。

能够标志深圳建设速度的，当然不只一个皇岗口岸，高耸人云的国贸大厦：曾经创造过“三天一层楼”的惊人纪录。深圳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一个特区发展的明证。1984年人均仅600元，现在达到了人均收入2000元。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却又不满足于此。他想得更深：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100年不动摇。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指着眼前的高楼大厦：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也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在国贸中心的一楼到三楼，层层挤满了想能亲眼目睹小平同志风采的群众，虽然人山人海，却是秩序井然。小平同志来到了人民中间！大家终于看到了小平同志，顿时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是人民爱戴小平同志的由衷之情，是人民拥护改革开放的激情流露。离开国贸大厦，邓小平一行来到深圳先科激光公司，这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中国目前唯一的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它充分而有力地注释了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公司董事长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华明，他握住小平同志的手，格外激动。小平同志则亲切地询问他和他弟弟的情况。叶华明告诉小平同志，公司的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标准，产量也非常可观，而且使我国跻身于世界上能生产此项产品的少数国家的行列。年产激光唱片500万张，视盘150万张，激光机、唱盘放送机5万台，畅销国内和国际市场。邓小平同志兴致勃勃看着视盘，问是什么材料作的，公司同志说：“塑料上面镀一层银”并且为小平同志等人作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还找来一位四川籍的业余歌手，为大家演唱了一首卡拉OK《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平同志带头鼓掌，称赞道：“很好，我听得很清楚，不走调，音响效果不错。”这家公司更可贵的地方是拥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科技职工，邓小平问他们的年纪，叶华明答：“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邓小平满意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他们还谈了版权、产量和利润等问题，小平同志听了介绍感到很高兴。

1月21日，邓小平游览了华侨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在这些地方，领略了内容丰富的民族风情，欣赏了优秀朴素的民间舞蹈。游览后邓小平同志谈到了共同富裕的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总之，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红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月22日，邓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游览。在市迎宾宾馆接见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时，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干什么事都要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小平同志谦逊而认真地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是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小平同志乐观而坚定地认为，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1月23日，邓小平在谢非陪同下，离开深圳去珠海特区。临别时李灏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并殷切地希望深圳人民：“你们要搞快一点。”把握时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邓小平同志来到珠海特区，先后视察了珠海生化制药厂，亚洲纺真公司，红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听取了三个企业的工作汇报，参观了车间、研究室，对三个企业的发展予以了充分肯定。

小平同志看到珠海生化制药厂的凝血酶产品已成为我国第一个进入国际市场的生化药品制剂时，非常高兴地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摆脱受人欺负的日子。要不务虚名，讲求实干。在亚洲纺真公司，听取了情况介绍，参观计算机房时，小平同志连连称赞：好东西，好东西啊！你们干得出色。全国各行各业要共同努力，同行之间要通力合作，调动和集中人力、物力搞科研攻关，打歼灭战，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中国穷了几千年，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在红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参观时，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他们打破铁饭碗，对优秀职工实行奖励，并通过股份制把职工的切身利益和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使公司职工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公司劳动生产率达到全国同行业最高水平的做法。他说：“你们的做法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很好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感谢你们！希望你们不要满足现有的成绩，做到日日新，年年新，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创新，增强竞争力量。”

在珠海，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他握着亚洲仿真公司一位青年科技人员的手风趣地说，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于年轻人。你们现在的条件比

50年代分多了，那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一批老科学家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搞起来了，那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科学家是很幸福的，所以要求你们的更多了，更高了。要发展，就需要人才，没有人才不行。他还反复强调吸引留学生回国的问题：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是怎么样，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中国是相信他们的。小平同志还称赞了珠海制定的对发展高科技产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重奖的政策。

1月19日至1月29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和珠海，看后他甚感欣慰："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强了。"之后，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并一直在上海停留至2月21日，他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重要谈话，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开诚布公地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局面，都会不一样。上海的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邓小平视察南方、深圳、珠海、上海并发表重要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和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

一、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100年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建设，更快地改善人民生活。二、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些，要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总结经验，对的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特区性"社"不姓"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发展，但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不能掉以轻心。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经济能否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反对形式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搞改革要靠实事求是。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以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消息和他的重要谈话，犹如强劲的东风，吹遍神州。2月28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尤其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全面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结合实际，贯彻落实。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全体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一致同意讲话的观点，决定用讲话统一全党认识。

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传达后，举国震动，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热潮在全国兴起。

万众瞩目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这次大会，举国关注，这是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承前启后，并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大会。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从理论上为大会作了直接的准备。谈话中的三个突破性的论点，对于大会确定政治路线和具体的方针政策，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第二，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邓小平指出这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第三，关于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要赢得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社会主义就要大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认识突破了以往的那种社会主义只有对立没有借鉴、利用的观念。邓小平同志这些看法，对十四大有重大影响，有利于代表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在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作了政治报告，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全文共26000多字，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89名，特邀代表46名，来宾307名，人大、政协等列席197名。

十四大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次地位非常重要的大会。大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国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更大的胜利。十四大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形势下召开的，国际环境有利，国内条件具备，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全国上下改革和建设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十四大制定了走向21世纪的宏伟纲领，并确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十四大最大的功绩。十四大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

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写入党章，同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都是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头等大事。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十四大作了新概括，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的

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十四大把这一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作出了我国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这个基本国情为根本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政治保证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战略步骤上，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在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强调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强调民族团结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十四大报告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成就，指出十四年中我国在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方面上了三个大台阶。下一步的任务，十四大重申了三步走的战略布置，并提出了 90 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达到百分之八到九；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科技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这是我国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问题认识上有了发展，突破了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观念束缚。

十四大报告是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走向 21 世纪的宏伟纲领，报告内容丰富，得到了全体代表及全体党员的一致拥护，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实现十四在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10 月 19 日下午，邓小平同志会见了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他沿着宽阔的宴会大厅绕场一周，向代表们频频致意。邓小平同志高兴地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江泽民代表新当选的中央领导表示，现在大政方针已经确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把大会精神落到实处。代表们则对小平同志的到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小平同志您好！"的问候，这问候道出了全国人民对这位总计划师的深厚情意。

邓小平同志南巡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是 1992 年的重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中国正迈开更加矫健的步伐，昂首走向 21 世纪。中国的改改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我们有正确的路线，有坚强的党，有充满信心的 11 亿人民，炎黄子孙跃居世界富强民族之林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一探索始终伴随着改革的实际进程，并不断在实践中得到补充和发展。

1. 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模式的提出

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看，核心问题是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和再处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应予恢复坚持；同时指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经验，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指出：过去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计划又时常脱节，并且只能搞大路货，不能使生产丰富多彩。计划该严的不严，该宽的不宽，市场调节作用得不到发挥，导致各部门比例失调。人们忽视价值规律，没有“利润”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等人时，从社会制度性质的角度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是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把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升到经济模式的高度，指出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模式。我们党的上述主张，继承了50年代有关探索成果，并结合新的经济条件，为把市场引进社会主义经济开通了道路。

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简政放权起步的，国家在地方实行财政“分灶吃饭”、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同时，还向基层生产单位放权。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城市进行各种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这些改革措施，使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市场调节机制开始逐步形成。在微观经济领域中，物质利益原则和价值规律受到重视，调动了农户和企业的生产热情，尤其使农业这一短线部门，很快出现了粮食丰收、五业兴旺的景象。在宏观领域中，也加速了经济增长。不过，由于放松了中央对地方投资和企业工资基金的统一控制，也造成宏观经济领域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消费需求膨胀现象。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以及对不同类型企业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改革模式。十二大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只有通过计划经济的综合平稳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今后要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尤其是骨干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而对其他一些产品和企业则实行运用经济扛杆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无论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遵守价值规律。对各种产值小、品种多、不可能用计划管起来的小商品，则继续实行市场调节。

十二大提出的上述改革原则和改革模式，强调计划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主要是指令性计划，但它把指导性计划也看作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为我们转换计划经济观念提供了概念前提；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几种不同类型企业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地分类安排上，着眼的范围较窄，但它明确认为市场调节也包括对国有经济的调节，从而把市场调节扩展到各种所有制中；它带有适应当时近期宏观经济调整的色彩，但却未因此否定市场调节的必要。它是我国渐进性改革过程中必经的一环。

2. 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诊断的确立和改革模式的扩展。

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调整和整顿，1983年—1984年第四季度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稳定，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改革方面，农村迅速完成由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过渡，乡镇企业有了较大发展。这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与之相比，城市国有经济改革显得慢了些。实践本身提出丁全面改革的要求。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全面改革的指导性文件，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并对之作了深入的阐述。第一，阐明了“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第二，在商品经济的运行含义上，指明了国有经济与商品经济相溶合的依据：“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第三，不仅指出计划经济包含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方面，还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从而在资源配置的意义上对计划经济概念作出新的阐释。《决定》还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容作了描述，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改革模式。认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之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要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活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今后各级政府

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这个《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超越了建国以来我们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模式，确立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在总体上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和模式。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陈云指出它“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作法，很多现在已不适用。”其实践意义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十二大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分类安排的设想上，而把眼光扩展到在企业、价格、政府等有关社会经济行动主体和运行机制的范围内寻找一个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适宜的结合点上。1985 年党的代表会议以此为据对改革模式作了新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三个方面，即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系。

从 1984 年起，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基本上围绕企业、价格、宏观管理三个方面展开。在企业改革方面，力求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的原则搞活企业，试行承包制、租赁制、“工资与效益挂钩”等办法；在价格改革方面，逐步增加自由价和议价交易比例，对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在宏观管理方面，规定对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的投资实行“指导性计划”，放宽投资审批权限，尝试取消贷款的指令性计划。这三个方面的措施使改革重心迅速由农村移到城市，由局部走向全面，并在整个经济运行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

3. 面对“新旧体制并存状态”的改革设想：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及改革模式的细化

随着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推进，到 1987 年，原有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经济活动的覆盖面明显缩小，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我国经济体制明显呈现出“新旧体制并存状态”，造成了严重的体制摩擦，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长处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从市场方面看，放权等改革措施虽然使市场机制的作用扩大了，但却随即发生了国家对企业监督不严和企业预算约束不足的问题，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加之“分灶吃饭”的同财政体制促使一些地方各行其是，造成区域分割，统一市场更是难以形成。从计划方面看，指令性计划的直接管理范围缩小了，而企业对指导性计划的间接调控反应很弱，导致一些指导性计划起不到计划的制约作用，有时出现中央计划管不住速度，定不了结构的局面。这种状态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快改革的步子，因为只有尽快消除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状态”，强化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对企业和地方的约束力，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引导经济资源投入合理方面的经济体制。

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并对改革原则和改革模式作了新的概括。十三大提出的改革原则和模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市场内在统一酌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

业'的机制。与1984年的《决定》相比，这些新的提法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同一层次的范畴，在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广泛性，从而带来改革模式的进一步细化。第一，在企业组织方式上，十三大充分肯定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国有企业，不会改变民所有制所的性质。并进而指出，要依产业种类，企业规模、技术特点确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具体形式，承包制和租赁制是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股份制也是社会主义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第二，十三大把价格改革问题上升到"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高度。1984年的《决定》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而十三大则指出，要"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要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制度。"第三，在宏观管理方式上，十三大进一步论述了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内容，指出要把计划管理的重点转向制定产业政策；要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发展多种金融机构；要按照公平税赋。促进竞争和体现产业政策的要求设置税种、确定税率；要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等等。

十三大所提改革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出发，对我国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目标作了初步说明。与十二大相比，十三大所提出的改革目标基本摆脱了经济环境问题的影响，没有因当时经济"过热"反弹的压力而强调以经济为主，而是对经济环境问题作了符合改革目标的解释，表现出鲜明的坚定的大胆的改革精神。

十三大提出的改革原则和改革模式以"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为航标，升起了加快改革的风帆。然而，"新旧体制产并存状态"下所面临的问题却很复杂。为此，邓小平一方面鼓励全党加快步子。大胆改革；另一方面也告诫全党：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这时我们要解决的不单纯是改革初期放权对象和范围的扩展等问题，而是放权以后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约束力不足问题，即"放话"而不"放乱"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问题。因此，如果改革措施客观上过于偏重放权以扩大市场范围的作用，而起不到及时建立有效的宏观管理体系的作用，就难免在市场约束形不成、计划约束跟不上的情况下，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引起微观市场形成与宏观计划控制之间的矛盾。事情正是这样。宏观控制放松了，却出现了一个很不规范的市场；市场空间扩大了，却又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状况。因此，当1988年夏季宏观经济环境严重不利之时，我们只能通过加强中央计划控制的办法，对经济环境和流通秩序进行治理整顿。

4. 对"新旧体制并存状态"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及结合问题的探讨

1989年9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1989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提出了治理整顿时期的一个规范性提法，即"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合，这个不能改。"9月19日，江泽民

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含义作了明确阐发。指出这既不是“过去那种集中过多，统得过多的坟墓体制，”又不是“全面否定计划经济”，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创造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动机制。”

治理整顿意味着要在经济工作中，加强宏观管理的作用。1988 年 9 月 22 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经济问题的汇报时，针对前一时期在建立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的失误，指出“中央要有权威。”以后他还强调说：“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他还指出：“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在这个思想指导下，1989 年 1 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向地方、企业放权让利，以利于搞活经济，是改革；合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健全调控体系，也是改革，而且是更艰巨的改革。”并再次强调经济改革模式中的宏观调控，即不是否定地方和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的过度集中，也不是一味消弱必要集中的完全的间接调控，而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是一种“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既然治理整顿时期的宏观调控不是片面集中，那么在指导思想上，它就与深化改革并行不悖。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下，按照江泽民的指示，我们党特别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的积蓄、方式和范围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1990 年 3 月七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体说来，属于总量控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的调整、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一般技术改造和小型建设等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1990 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八五”计划的建议也指出：应根据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企业、不同社会生产环节和不同领域、不同产业和不同产品对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界也对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问题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数十种乃至上百种结合模式的建议。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内含着两大目标。一是在经济环境上缓解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整顿生产、建设、流通和分配中的混乱现象；二是在体制改革上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1989 年到 1991 年间，中央政府从加强直接计划控制入手，通过信贷收缩和利润浮动等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相结合的货币政策，缓解了总供给的紧张形势。因此，治理整顿的前一个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搞活国有企业的目标的实现却需要以更深入的改革为条件。这样，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探索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结合起来的改革途径，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5. 由“新旧体制并存状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概念的重新界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

长期以来，我们一般都把市场经济当作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从而赋予“市场经济”以社会基本制度的含义。因此，要在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对市场经济概念加以重新界定。邓小平最早提出并一贯认为，计划经济和市

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经济方法。1990年底和1991年初，他又几次重申这个观点。尤其在1992年春视察我国南方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他再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就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看作是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从而对市场经济概念作了重新界定。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讲话，第一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指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更加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着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深刻的阐述了这一改革目标的理论原则。

第一，十四大从理论范畴上再次阐明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根本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在内涵上具有资源配置手段的属性，尽管它们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功能不同，但这并不代表社会基本制度的特征。

第二，十四大从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即有计划、又有市场的经济体制，它要"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关于市场的长处，十四在认为，它主要有利于提高微观经济的运行效率。即它可以"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扛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活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并非万能。十四大指出："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一般地说，市场的弱点在于它无法处理宏观经济领域的各类问题，如经济总量上的平衡问题，如果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就会造成频繁的经济波动、剧烈的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再如较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如果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就会花费很长时间并经过反复，不利于迅速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就必须动用计划的方法来处理。十四大指出，通过计划可以"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第三，十四大从社会基本制度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即"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体制。首先，"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那"国有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但把公有制经济推向市场并不意味着要改变公有制本身。在传统的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市场经济只适用于私有制。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

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将是使市场经济适用于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经济的一种办法。这时所改变的只是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经营机制，而不是实行私有化。

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些理论阐述，集中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状态"后，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问题探索的科学成果，在理论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

理论的突破为新一轮改革提供了方向。标志着我国经济改革进入由"新旧体制并存状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时，制定一个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的改革规划，就成为迫在眉捷的事情。

1993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综合配套改革方案。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看，这个《决定》要解决"新旧体制并存状态"下国家对企业约束不严格、市场体系和规则不健全，宏观管理体系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等问题，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转换国有企业经济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与承包制的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只是要求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而且要求国家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从而使消除承包制企业"负盈不亏"的现象成为可能，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使企业受到来自产权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严格约束，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为规范的微观基础。第二，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要在全国统一开放，并与国外市场相互衔接。与十三大关于市场体系的论述相比，这个《决定》对改善与加强市场管理和监督问题以高度重视，提出要发展会计师、审讲师、律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组织，建立正常的市场进人、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第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与 1984 年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相比，这个《决定》不但继承了更新计划观念、转变计划职能的思想，提出国家计划总体上应当是指导性计划，而且更加强调国家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与十三大关于宏观调控体系的实施的设想相比，这个《决定》不但继承了宏观体系建设上迈出更大步伐，以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调控。并且进一步指出，要在近期内把十三大以来实行的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产权基础上的分税制。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要给予地方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但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第四，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个人保障制度，重点完善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以促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为深化企业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提出的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它们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基本框架。另外，这个《决定》还从改革战略的高度指出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在理论上为我们选择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以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要求为前提的，这必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成果和展望

第一篇

中国经济布局

第一章　经济布局概论

第一节　我国经济发展与布局的展开

一、经济发展及世界地缘经济新格局

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在内地建设新城市与新工业基地是使经济布局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初步展开的话，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增长，则使经济布局在较高的层次和更广的地域空间内进一步展开。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放慢，甚至陷入低谷。我国经济因有植根于内需的较大潜力，又因制造业低成本优势而得到继续发展。2001年加入WTO，稍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启动；加之中日、中韩贸易均已达空前规模，东北亚经济区的出现势在必然，这些将使世界贸易格局与经济格局呈现新的态势。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与综合国力仍不算很强，在总值33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中，中国只占4%；但三十年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如图表1－1所示：

图表1－1　　中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地位变化预测

项目 / 年份	经济总量（GDP中国内地）		人均GDP（美元）	
	万亿美元	占世界（%）	中国内地	世界
1980	0.17	2.1	172	1560
2003	1.41	4.2	1090	5200
2010	2.16	5.1	1592	5887
2020	4.32	7.6	3027	6789
2050	17.28	12.6	11069	11578

自从单一货币“欧元”出现后，“欧元区”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大经济区。随后，在21世纪50年代，中国、印度的GDP可能占世界20%、10%，并由此而形成美、中、

欧、印四大经济区的世界地缘经济新格局。如再出现"亚元"或类似亚元的货币地理圈，则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化会更明显。

另据专家对BRIC人口、资源、投资市场的考察，随着国际资本向BRIC的部分转移，全球经济布局形成新态势。至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出现三个大国（美、中、印）及一系列中等规模国家（日、德、英、法、意、巴西、俄国等）。其中中、印经济规模分别达到35万亿、27万亿美元，人均收入与富国的差距也将缩小。当然，中、印经济各有所长，也各有弱点，不会对强大的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以高技术、低耗能而著称的日本经济，也将会保持自己的地位。

二、大区域布局失衡与"西部大开发"，经济重心沿海化与经济地域多元化

多年以来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域布局等方面的调整，并未完全达到目的。至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由于追求高速增长而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受损的代价；还有一些产业布局不合理以及大区域（如东、中、西部地区等）经济发展与布局失衡，使地区差距继续拉大。贫富过于悬殊增加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难度，而社会问题丛生又影响到经济发展。

从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角度考虑，我国"经济重心沿海化"趋势，即国家经济重心及近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几乎全盘聚集于东南沿海一隅，有不利的一面。分析表明，其所以未能有效地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推进和产业转移，固然有体制、成本等因素起阻碍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经济重心的沿海化趋势，它是阻碍梯度推进和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如果再从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考虑，21世纪全球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就更有必要使生产力战略布局合理化。因此，应及时将我国经济重心和战略重心逐渐内移，并由此而带动全国范围内经济布局合理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实现经济地域多元化。

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在1999~2000年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颁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并相应地在生产力战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势产业等方面，部署和实施西部开发。"十五"期间（2001~2005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

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

20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直接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是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的主要场所，因为市场需要以城市作为载体和依托，市场经济向高层次的发展和完善，只有在城市化进程中才能实现。至2003年，我国内地有设市城市660座、建制镇20226座；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0.5%。

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内地的城市化已进入一个活跃的发展时期。如果按近年城市化

发展的平均速度推算，至 2010 年，我国内地将出现 900 个以上不同等级、类型、规模的设市城市和 25000 多个建制镇，并形成庞大的城镇体系。其时，全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将提高到 45%，2020 年达到 54%，2050 年达到 70%以上。

四、经济发展的区域化趋势及问题

由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必然会在具体的地域范围内体现出来，有关经济地理学的各种专题研究便应运而生。目前，地域经济综合开发已成为经济学、地理学、城市科学以及生态学、环境保护、规划学等诸多学科竞相研究或联合探讨的领域。在中国经济发展地域分布以及生产力布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当前，我国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区域：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地区（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村等，其中省一级区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跨省区的"经济区域"（或"经济带"）的作用亦越来越显得重要，使人们刮目相视。与此同时，由于乡（镇）村企业异军突起，使乡、村两级的经济说力明显增长，其经济结构和地域布局亦发生了明显变化。

以省级区域为例，我国现有 34 个省区在全国经济运行中的功能近十多年来都有相当大的加强。但因资源、区位等条件不同，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和时间上的先后、历史文化传统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异，使各省区之间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支柱产业的选择和培育，经济布局的合理展开等方面，渐渐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拉越大，未能实现协调发展，全国性的经济地域多元化难以实现。在此情况下，西部大开发与加速区域城镇体系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二节　影响经济布局的主要因素分析

总结我国历史上（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布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布局问题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布局合理可以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亦有利于社会发展；布局失误，则将造成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如果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项目布局失误，还将损害国民经济全局，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甚至严重污染环境，危及生态平衡，遗祸于子孙后代。

经济布局，作为经济发展的空间形式，其发展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国、一地区经济布局特征的形成，通常同该国、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知识与智力资源、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包括历史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策略、政策变化，生产关系等）诸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一、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发展和布局的影响增大

“资源”一词涵盖广泛。自然资源是指人类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并用于生产、生活的物质和能量，是自然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物资源、海洋资源、能源资源和旅游资源等。它们对于经济的发展及其布局，产生经常的和重要的影响。

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和有偿使用，不仅可以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也能促进自然资源本身的可持续利用；反之，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只会给经济发展及其布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作为我国某些地区资源开发政策的“有水快流”式的开发，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短时期获利而已，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原则是不符的。联系到目前我国已进入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时期，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我国对自然资源的评估和开发利用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失误和教训较多。如20世纪50～80年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是通过开发自然资源而取得的。当时，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有盲目的“地大物博”观念，即便是在多数自然资源未经详勘、家底不明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地认为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还正式肯定并鼓励所谓“有水快流”的开发模式，在经济布局上则是遍地开花，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资源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程度等指标同先进国家相比差异很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述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面对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现实，长期以来盲目乐观的“地大物博”的提法才被“人口大国，资源贫国”，“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等理智的提法所代替。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增大，始现石油匮乏，全国主要能源和初级产品供求格局变化。预计2010年在全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保需求的仅21种，2020年仅为9种。特别是石油、铁矿等缺口很大，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全局。加之以前不被重视的水资源也凸显短缺，至2003年，出现21个省区拉闸限电（2004年增至24个省区），华东、华中、华南三大跨省电网严重缺电，使我国经济发展精华所在地区损失严重。目前我国已成为煤、钢铁、铜等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由于国内资源供应不足，进口大增，价格上涨。

以上这些，都使资源约束对经济发展和布局的影响更为明显。对此，有关部门提出对全国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战略及具体方案，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档次。在加强对各种资源勘探的基础上，形成合理规模的适度开发，同时，通过对有限自然资源的深加工与精加工，获取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经济布局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尽管采取了上述对策，自然资源约束仍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布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约束力越来越大。

二、人力资源能力，知识与智力因素对经济布局的影响力更趋明显，高素质劳动者已成为资本的载体，并直接影响科技含量高的一些部门的配置

近年来，中外经验证明，在解决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布局的同时，还必须解决好人力资源的培养、引进与使用，才会出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即使是原来经济非常落后、自然资源贫乏、地理环境非常不利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适用这个规律。为此，应引导人力资源跨国、跨地区配置。

除自然资源以外，人力资源能力高低，特别是其发展趋势与提升状况，现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布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提法是：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源，是一国一地区进行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即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制定生产布局方案时，对员工的素质要求逐渐提高。到 90 年代，知识经济发展起来，上述提法也发生了变化。

人力资源能力分为人的体能、技能、智能三个层次。社会对上述三方面的投入比为 1∶3∶9，但它们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却是 1∶10∶100。我国内地的“人力资源”能力得分现为 7 分上下，且地域差异悬殊，北京 2001 年的得分已增至 18 分。在过去的十年内，中国人均“人力资源能力”提升了 1 分，北京人的得分在过去三年间提升了 5 分。上海、深圳等地人力资源能力的提升状况，与北京大体相当，有些方面略高于北京。

知识是一种可以增加附加价值的智慧。由于知识经济在近十年的悄然兴起，使知识与智力资源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布局的重要因素，它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说农业经济发展是以土地与劳动力为基础，工业经济是以大量耗用矿物、能源等进行加工制造为特征的话，知识经济的发展则以不断创新且层次较高的知识为动力，它是一种富于智慧而又变化迅速的新经济形态。

在战后的 20 世纪 50～70 年代世界大发展时期，只要拥有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即可以生产组合创造的能力追逐利润，日本以严谨的社会结构、地域文化（含城市文化）和产业文化为推动力，在经济上奋力追赶美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即有“日本名列第一”的说法。未曾料到，至 20 世纪 90 年代，知识经济悄然介入，美国的 5000 家软件公司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到 1998 年，在全球排名位居前列的大公司中，一向以制造业、重化工而位居前列的许多日本公司名次倒退，而像美国微软公司等的名次则直线飙升。即便是像印度这样的农业经济和人口大国，因其拥有一个完备的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和软件服务业，使知识经济成为近十余年（1991～2003 年）引领印度快速发展的动力。

上述情况表明，知识已发展成为生产要素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知识经济迅速崛起的情况下，产品制造模式开始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伴随而来的是柔性制造系统时代的到来，它使制造业竞争中劳动力成本的作用降低。在知识经济的模式中，投资方向正在发生巨变：由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随着产品中所蕴含的知

识量成为竞争的基础，无形资产的地位逐年提高；知识、科技先导型企业成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组织形式；高新技术园区崛起，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便是美国西海岸湾区的硅谷。在中国，则有新竹科学园区和后起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相对于近年来一些国家以软件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崛起，我国知识经济发展还刚刚起步，但在某些地方或城市已列入经济发展战略方案之中。如北京在1998年提出了发展知识经济的设想；而上海的知识经济则已成为全市经济新增长点中的第一热点。

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已具备条件。迄今为止，以经济总量、人均产值等指标名列前茅的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其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结构演变及其布局态势的形成，除政策、区位因素以外，还同其自身的知识和智力资源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北京的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在近年快速发展，并最终获准定位为“首都特色经济”；上海高新技术从1996年开始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撑点之一；深圳则以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工业为主导，对外经济贸易发达为其特色。上述三大城市又几乎都是移民城市：上海是最早的移民城市，其经济发展和结构最接近市场经济，是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工商业、金融及管理人才集中地；深圳为最新的移民城市，并从一开始就形成外向型经济结构，是京、沪、穗等地高、中档人才来此集聚并共同运作的产物；北京在作为共和国首都之后，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沪、苏、浙、辽、粤、湘等地）的人才，逐渐形成高密度的智力集聚。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之所以能够提出大力发展首都经济、知识经济的构想，主要仰赖于人才集聚这一优势。

在现代经济中，技术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凝结在企业物质资本（如生产设备）中，而是更多地储存在企业技术人员的头脑中。这时的技术人员已不仅仅是企业雇佣的高素质劳动者，更是一个资本的载体。这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已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人才集聚地被称为“头脑地区”、“头脑城市”；人才资源已成为第一资源。

由核心技术人员、企业家构成的人力资本，不仅成为企业的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而对企业的产出增长也起明显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高素质人才比例增加与流动性加大，知识与智力资源因素对经济布局的影响力更趋明显；反之，经济发展和布局也受到人才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资源）流失和不足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更明显。

当然，推动知识经济发展，优化经济布局，除人才以外，还需要改变产业文化，包括产业或企业内互信的文化，而这一点就当前而言是很欠缺的。

三、生产技术与工艺流程的变化

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布局改变的三大源泉（常规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之一，新技术可以为减少贫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在对经济布局产生经常和重要影响的因素中，生产技术与工艺流程的变化有时也很

重要。例如在近几个世纪，钢铁工业的自然资源条件虽有所变化，但变化不是很大。然而，钢铁工业的采矿、冶金技术和运输技术却发生了巨变，使钢铁工业布局随之出现根本性变化，由原来主要靠近煤产地变为趋向铁矿、交通枢纽（如港口附近）、钢材消费地。

历史悠久的造纸工业，在近几十年中相继在各地建立起一批现代化大中型企业，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造纸工业的原料工艺路线。传统造纸工业耗用大量植物纤维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污染，一直是造纸工业生产与布局中难以克服的缺陷。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90年代才投入工业化生产的合成纸工业问世后，成为继蔡伦发明造纸术二千八百年以来最彻底的一次革新。21世纪，传统造纸工业可能被合成纸生产逐渐取代，整个造纸工业的布局也将发生划时代变化。

石油加工工业布局的变化也是如此。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炼油和石化工业布局原则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生产技术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前，我国内地的多数炼油厂建在原油产地附近，而80～90年代建设的炼油厂则多数布置在石油加工产品消费地附近。因为在现代运输技术条件下，向消费地运送原油比分别运送各种成品油以及各种化工原料要经济合理得多，且运输原油比较安全、方便。另外，炼油工业的中间和下游产品日益增多，其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生产装置与辅助装置格外多样、复杂，在消费地附近建设与布局，可以从当地得到科研、中试与工业技术方面的充分协作，并可就近招收具有较高技术素质的员工，有利于其庞大复杂设备的综合调试和安全运营。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述情况又有所变化。由于大量进口原油，且运距长、运费较高，遂倾向于建设特大型（1000万吨级以上）炼油厂。在此情况下，拥有深水岸线且距稳定货源地较近的港湾附近，才是炼油厂选址建厂的首要候选地。

大型火电（含坑口电站）项目效益明显，但因污染总量较大，加之耗水高，在建设与布局及具体选址中常遇到很大困难。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为尽快实现西电东送，对主要电源点工程，大多采用空冷技术，大幅度降低水耗，节水率达78%；又针对电厂所在地区环境污染原已较重，对新建电源点项目同步上降尘及脱硫装置，确保环保达标。这也能说明生产技术与工艺流程的变化对工业布局的影响。

四、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

应充分估计历史发展对经济布局的影响，也要估计到地区经济布局的历史遗产，利用其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和合理布局。特别要看到某一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往往促使生产布局发生跳跃式变化，从而产生种种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

技术固然可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甚至可以对某一地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最终决定技术是否成为各地发展动力的却是政策。高瞻远瞩的政策可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良好效益，误导性政策则遗祸无穷。

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最为有力，累计完成6200多个重

点建设工程和 130 多万个基建项目。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的半个世纪内，也常常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因而在生产布局和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上也会打上深深的“政策烙印”。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 年），我国工业建设及其布局，就注意做到边发展、边改造沿海老工业基地，同时在内地积极建设新工业基地。结果，对全国经济发展和合理布局有利。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以后，改变了这一正确做法，消极地限制沿海地带经济发展的规模，盲目地在内地建设过多项目，结果欲速则不达。此后，不仅未接受教训，反而在大规模展开的“大三线”建设中走得更远，使布局上的失误更大。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从 1964 年初即开始拟定，原本的指导思想是在大跃进的政策错误之后，休养生息，重点解决百姓的吃、穿、用问题，发展农业及相关工业，并作均衡布局考虑。但随后 1964 年 8 月国际形势与周边局势发生较大变化。在此情况下，对形势发展作了错误判断，认为战争会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因此，1965 年制定的“三五计划安排”，大幅修改 1964 年拟定的“初步设想”，其中特别强调“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二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由此，“三五”生产力发展的均衡布局改变为“山、散、洞”布局，即设想在全方位同时受到入侵情况下，将重要工业部门布局同时向中国内，地的腹心部位压缩，并且尽量地“靠山、分散、进洞”配置。

从 1964、1965 年相继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在我国内陆的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心地域（包含 13 个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即“大三线地区”之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且旷日持久（历时十七年）的建设，同时对全国经济发展格局进行重大的调整。结果，总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052 亿元。其中建成大中型骨干项目 1100 个，涉及冶金、航天、航空、汽车制造、造船、电子、化工、军工、机械、核能、水电等部门，并建成 10 条铁路干线。

然而，因过于急促地将生产力布局的重心西移，打乱了经济发展的阶段与规律，使巨额投资难以获得回报，或回报率很低。在此情况下，从 1983 年开始，又被迫进行大幅度调整和搬迁改造，累计二十年完成投资数百亿元，对数百个项目通过关、停、并、转、迁等方式实施布局调整。预计至 2005 年，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才可完成。

上述失误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那个年代未能客观、冷静地估量国际国内局势。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若干重要产业的许多项目（包括主要新发展项目和多数由沿海地带内迁项目）的发展及其布局进入误区。总的来说，存在布局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三大问题，更有相当多的企事业单位建在地质构造复杂、水质不佳、山体滑坡、地下溶洞等生态环境恶化的基础上，使生产和生活面临威胁。以至于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 90 年代后期，还在为消除三线建设在布局上的失误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当然，经过调整、搬迁改造以后并在新的布局思想指导下重新配置的一些企业，现已发展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基地，并已形成效益，但许多三线建设项目在布局上的失误却只

能作为惨痛的教训而成为历史。

生产布局与社会经济因素、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密切关系，在近二十多年来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我国经济发展及其布局的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以及机电、轻纺、军工、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很多大中型项目，在布局上有一部分做到了反复论证、遵循客观规律，故而能够获益。

但是，我国在此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布局，重视经济效益有余，而重视生态环境效益不足，不少项目选址与布局方案，未作严格的环保评估，或者只考虑地方的、近期的获利而使评估草率通过。以致项目建成、布局到位后，即对当地生态系统构成损害。这在某些产业（造纸业等）和某些领域（如乡镇企业）尤为严重。实践证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以牺牲生态效益来换取经济利益的一些措施与政策（如“有水快流”等），都是不可取的。

又如，在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方面，较长时期内存在外商投资结构（含部门结构和地域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外商投资总额中，有50%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30%投向旅游宾馆和房地产业；只有10%投向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1.8%投向交通运输，1.5%投向农业；即使是在吸引外资最多的加工工业中，外商投资也仍以劳动密集、加工型为主，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小。

为此，在“九五”（1996～2000年）期间，通过有关政策，引导外商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大型骨干项目等。在投资结构方面引导外资投向农业新技术和土地资源综合开发、水利、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机械、电子、矿业等国家急需发展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对现有企业的技改，提高企业的技术经济效益；房地产业则鼓励外资投向住宅建设。

与此同时，引导和调整外商投资的地域结构。199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产业政策向西倾斜战略即包含上述内容。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等方面实行同等优先、重点支持的原则，并适当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凡能发挥中西部地区人力和资源优势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均属鼓励外商投资领域。

此外，国际局势是否有利，以及国内经济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是否得当，也会对经济发展和布局产生一定影响，包含正面、负面的影响。后者对某个地区和某一部门来说，在短期内还可能是带有全局性和结构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尽快发现，及时采取新的调控措施加以弥补。

1997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政策信息，确定16个重点建设地区，意在引导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布局。这16个重点建设地区分别是：辽宁中南部地区、京津唐地区、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海南和北部湾沿海、红水河地带、哈尔滨—长春地区、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长江干流中上游沿岸、陕西关中、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干流沿岸、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地区、攀西—六盘水地区、乌江和黔中。

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相继制定了一些促进西部开发的政策

与措施。鉴于西部基础设施落后，投资软环境差，市场比东部小，故引资政策尤为重要。如进一步扩大西部利用外资的审批权，西部投资可享受比东部更优惠的所得税待遇等。

五、地域文化及商帮影响

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布局，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文化特色及其传统渊源的影响，有的甚至还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迹。

地域文化与地域经济关系密切。通常说来，渗透于地域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地域文化，对地域经济发展能够起到良好的润滑和促进作用；而地域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又可借地域文化背景及其历史渊源而打造自身特色，形成地域品牌效应，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十分有利。

在强盛的经济区域中，通常作为其经济发展主流力量的商帮，对地区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进步都能发挥出重要的影响。

至21世纪初，浙江商帮的影响遍及全国和海外各地。它在近十多年来，不仅主导了浙江经济的发展，还向海内外渗透。据不完全统计，从浙江全省来看，仅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即达70%；从全国来看，多达300万名浙商在各地创业，已建立企业3.3万家，投资总额3000亿元，获营业收益每年6200亿元。他们在各地创办商品市场近1000家，市场摊位30多万个，成交额2000多亿元；从世界来看，已有100多万名浙商在全球各地创业。

浙江是一个资源、能源小省，加之地处政治、军事敏感地段，长期以来国家在此投资极少，但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很多乡里重教育、出人才。因此，民间投资十分活跃。浙人善于拾遗补缺，捕捉商机，开拓各种小商品市场。制造业主产品一时难与国企竞争，浙人就以生产小商品及耗能、耗原材料少的产品为特色，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很高。由于消耗少、分工细、专业化，在国内外市场上很灵活，应变能力强，故有“小狗经济”之称，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老虎经济”来说，并非弱小，而且特色鲜明。

在近三十年中，浙商的崛起晚于粤商。前二十年粤商受惠于三大优势（政策优势、地缘优势、先发优势），占尽天时地利，以珠三角为大本营席卷全国。此时，很多草根出身的浙商正处于艰苦创业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崛起，促进了浙商的大发展。目前数以千计的浙企将总部迁出浙江，进驻上海等地，谋求在更大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与布局的展开。近年在粤商、浙商的对峙与竞争中，已明显表露出浙商的某些优势。

综观中国近代、现代经济发展史，晋商、徽商、粤商、浙商各具特色，且各有其地域文化背景和兴衰历程，也都在各自不同历史时期中对所在区域及周边地带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与布局变化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经济布局合理化：理想与现实

一、布局问题涵盖

经济布局合理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经济区网络，长期以来就是一种被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的地域经济形态。可是，现实与理想常常有很大差距。这就促使更多的人对它重视，从各自不同角度（经济、地理、城建、技术等）进行探讨和研究。

通常说来，布局问题涵盖面广泛，大而至于整个国家生产力战略部署；海洋综合开发规划；小而至于高科技产业园区开发、核电站选址、航天器发射窗口排列，乃至于居所空间安排，从宏观到中观、微观，都有微妙的“布局”思路。

经济布局合理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发展结构优化和合理布局，还包括大农业发展的地域组合、城镇体系的规划和建设，以及城乡建设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与实施等。

二、重要教训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经济发展和布局中诸多的经验教训，其中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钢铁工业发展的片面认识与过分倚重，及其在布局上遍地开花等做法，教训尤为深刻。

1958年7月底，当时全国大小钢铁企业产钢累计仅完成380万吨，距年底只有153天，全年产钢1100万吨的指令性计划根本无法完成。于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著名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遂由此而展开，几乎在一夜间各地建起无数小炼钢炉，以后数年虽然在布局上经历了“小土群”→“小洋群”→中小钢铁基地的改进，但因原料杂、工艺流程落后，造成收益小、损失大。直至20世纪90年代，产业布局分散化的后遗症依然存在。

在我国工业发展和布局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种为实现某个工业部门的超常发展和布局上的迅速展开而举国动员、全民投入的现象，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仅钢铁工业本身正常发展难以为继，还连带使各地资源受损，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加剧。当时，“全民炼钢”的失误，还造成以后长期在发展和布局上的后遗症，以致迄今经过四十多年不断调整，钢铁业产业集中度仍很低，布局仍不够合理。

此外，还有“三五”计划生产力发展由最初的均衡布局构想急剧改变为“山、散、洞”布局原则，并影响到20世纪60～70年代“大三线”建设中许多布局问题的失误而付出的巨大代价；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付出的大面积地

域生态环境受损的代价；一味追求本地区全面发展而付出的大量重复建设、结构雷同、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损失浪费严重的代价；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许多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一味追求单个城市的建设进度，铺摊子，摊大饼，忽视区域规划、城镇体系、城市设计、城市文化，造成城市之间经济同构、建筑趋同，彼此都有一副相同的经济躯壳和相似的建筑躯壳，特色城市、品牌城市罕见，并使不少城市成为“失忆”的城市。

上述教训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布局合理化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要解决它，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

三、基本思路

关于经济布局合理化的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

（一）因地制宜确定（调整）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不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及布局的改善，实现经济地域多元化

当代中国的经济布局，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由于历史发展等原因，原有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生产力布局畸形集中于少数地点。经过20世纪50～70年代在区域均衡发展指导思想下的规划和建设，上述情况有所改观，但随之出现很多问题。80～90年代实行非均衡发展的战略和市场经济原则，各区域发展因区位因素差异，地区比较优势不同，比较优势是否发挥，相对劣势是否抑制，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和时间先后、历史文化传统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不同，又使区域发展拉开距离，而且越拉越大，至90年代末，出现大区域生产力布局失衡，并影响到可持续发展。

近五十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布局的战略，经历了前三十年均衡发展和后二十多年非均衡发展的转变过程。然而，无论是哪种发展战略，虽然在各自的实行过程中均有所建树，但均未能很好地实现促使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这充分说明，不同时期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远非人们（包括领导层和主管机关在内）的主观意愿所能随意驾驭的。

因此，正视上述事实，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使我国区域发展跳出原先所设定的模式，重视科学研究，包括必要而适当的超前研究在内，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发展道路，如实行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同时，及时加以总结和修正，进行动态调整，以求达到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布局改善有利的目的。

在我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和后进地区的关系，主要是处理东部沿海经济地带和地处内地的中部、西部经济地带的关系。一方面，在东部沿海地带，继续发挥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开拓国内市场，推进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另一方面，中部地带应发挥其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以水陆交通干线地区为重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西部开发则应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特别是交通、水利、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同时，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改善西部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优势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深加工。

这就是说，在承认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差异客观存在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发挥不同区域各自的比较优势，同时抑制相对劣势，地区间互补互利，从不同层次共同参与地域分工甚至国际分工与竞争，以期实现经济地域多元化。

（二）经济布局应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应注意防止因条件有利投资过度，从而使布局过度密集化

合理的布局方案，通常都是以较少的投人获取较多的产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因此，应当优先保证那些投资效益高、见效快的地区经济更快地发展。具体地说，应尽可能布置在具有自然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地方。如农业布局特别要注意因地制宜，以便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收获量多质佳的农产品；工业布局则要注意尽可能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产品消费地区，同时注意采用新技术，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运输，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然，上述要求（尤其是工业布局的要求），并非都能同时做到。因此，工业布局时，应充分考虑到各工业部门不同的生产特点。凡在生产中耗用原料和燃料较多的部门，一般宜布置在靠近原料和燃料产地的地方，而耗电多的部门，宜布置在电力中心或输电网附近；凡不宜长途运输、产品容易腐烂变质而消费者要求保鲜的生产部门，则应该尽可能布置在消费地区。应当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工艺流程的改变，上述原则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某些资源优势或区位优势具备的地方，经济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往往受到经济效益大的诱惑而迅速密集化，并出现对资源与环境“透支”现象，而且经济发展及布局集中倾向还会由于惯性力作用难以做到适可而止，甚至失控，造成透支现象加剧。

现实生活中常会出现这样的事例：一旦某些地方成为“投资高地”或某些行业回报率高，就会随之出现滚雪球效应，各种投资（含直接投人及相关投人）接踵而至，甚至于出现“投资过度”，资金消化不良。在此情况下，吸引经济布局的有利条件便会弱化。因此，在对各种布局方案进行技术经济论证时，必须扩大与延伸视野，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进行核算，将资源与环境的成本计人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并对市场需求、投资回报充分论证。

（三）经济布局应有利于发挥地域优势，发展特色经济，生产专业化和综合发展相结合，避免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结构趋同

地区生产专业化，是指在劳动地域分工发达的基础上，一个地区充分发挥本地区的优势，集中生产一个或多个产品，主要销往区外。它是随着社会生产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其有利之处是，可以充分利用各地自然优势或经济优势，集中发展一个或几个生产部门，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但是，也要防止片面追求专业化的倾向。只有地区生产专业化和必要的综合发展互相结合，才能形成合理的地域经济结构。我国地区差异颇大，各

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也不一样，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即各地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比较优势；反之，也存在相对劣势。因此，必须注意扬长避短，实行地域分工，逐渐建立并形成以本地区专门化部门为主导、多种部门互相协调的地域经济结构，尽量避免各地因区域发展战略不明而盲目仿效邻近区域或先进区域进行发展，或因旧体制运行惯性所产生的地方政府对重复建设的积极性，特别是多发性或阵发性的“投资冲动”而形成的地方经济发展的“结构趋同”、“产业趋同”现象。

在我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地区自成体系，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严重，影响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致使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趋同现象相当严重。例如，在1997年，我国中、西部地带工业结构的相似率竟达97%，某些中小城镇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至于特色经济则属于凤毛麟角。以上这些所造成的危害，远不只是缺少特色，还导致相邻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只能在低水平基础上的恶性竞争，最终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发展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经济布局应做到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避免出现“两个极端”（即布局过度集中与过度分散）的不合理局面

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布局（首先是工业布局）的适当集中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如在有利的地点或区域，集中力量建设规模宏大的石油化工企业和钢铁联合企业，比分散建设总生产能力相等的一批中小型石化和钢铁厂，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高额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在同一地点或特定区域内，工业布局过于集中，城市规模过大，则会使原来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逐渐趋于消失，并且反过来出现用地用水紧张、交通阻塞、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迫使工业发展向外疏散。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规划经济布局时，必须注意贯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以尽可能避免出现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的不合理局面。

然而，在我国发展及布局的实践中，过度集中与过度分散这两种倾向都存在。前者在某些工业基地、大城市或重要工矿区常出现，不同层次和档次的产业高度集中分布，造成彼此干扰，经济运转不良，社会问题频发。为保持经济、社会健全发展，于是只好花大力气重新规划，明确（有的是重申）区域经济发展定位和城市定位及其发展战略，并具体操作土地置换，“退二进三”和升级换代等；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小城镇建设和乡镇企业布局等方面。有许多乡镇企业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大发展和“天女散花”式的布点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布局太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甚至无法再竞争生存，遂重新规划，适度集中，保持一定的效益。

（五）经济布局应有利于实现区域性联合与协作，逐渐形成客观合理（而非主观拼凑）的经济协作区网络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一些地方的横向经济联系发展较快，开始突破旧的经济体系的格局和行政区划的束缚，使区域性联合和协作得到加强。在全国范围内，已建立起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经济技术协作区网络。至1999年，全国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经济协作区域已达100多个。它们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是省际的经济协作区（如环渤海经济区）；第二个层次是省毗邻地区的经济协作区（如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协作区）；第三个层次是省内的经济协作区（如辽宁中部城市群）。上述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的出现，对于地区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最终形成生产布局的合理格局，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在生产布局时，必须认真考虑这一新的因素。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的十多年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一些地方的区域性联合与协作曾几度出现小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经济协作区域网络，直接推动了地域经济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并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的重要措施。

但是，也应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如地区本位主义，联合与协作中的“同床异梦”现象，还有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割据治理”的影响等，都使区域性联合与协作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近十多年，虽然有几个小的高潮出现，但也数度出现停滞不前的景象。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各种层次的经济区即已达到104个，而到1999年初还只是100多个。其原因是有不少经济区名存实亡或自行解体。因此，虽有新的经济区组建，但全国经济区总数并未增加甚至略有减少。至于有些公认条件优越的经济区（如环渤海地区等），在实行区域性联合与协作方面，也并没有走多远。为此，有些学者呼吁尽快启动环渤海经济圈（即作为国家一级经济区的环渤海地区），并以此带动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忽略这一点，北方与南方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继续拉大，甚至有可能如同东、西部地带拉大一样，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不利。

（六）经济布局应与其主要载体——城镇相互协调，即同区域规划、城乡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相互协调、同步进行

目前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所有类型的市场经济一样，都是以城市为主要场所而发展壮大的，因为市场需要以城市作为其主要载体与依托，而市场经济向高层次的发展和完善，也只有在城市化进程中方可实现。不可设想，在不重视城市化的氛围中，市场经济能得到健康而持久的发展，经济布局合理化这一理想能够得以实现；也不可能设想，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进程滞后的情况下，能够持久地承载并支撑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为经济布局合理化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良好的载体。这一点在经济发展和布局中一段时间内是不够重视的。在所谓“先生产、后生活”等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明显地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布局的进程；城市化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我国城市化速度比工业化速度落后约10个百分点）。这些对我国经济布局的展开，对经济布局合理化这一理想的实现，无疑产生了不利影响。

除上述城市化进程滞后对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布局的合理化产生消极影响以外，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雷同与缺少个性，也对经济布局合理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相继发现，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许多城市正变成格式雷同，城市个性逐渐消失。尤其是中小城市（镇）的建设和发展近乎千篇一律，缺少地域文化特点。不仅产业趋同，连城市形象也神似，彼此都有一副相似的“经济躯壳”、

"建筑躯壳"，特色经济和特色城建犹如凤毛麟角。

以上这些所造成的危害，远不只是缺少个性本身，还在于造成经济的过重投入，同时连带产生新设城市（镇）建设和发展的单一化，也必然影响到地区乡土经济、乡土文化的传统。

一件简单的工业产品尚需重视特色，何况一座城市！作为经济发展和布局主要载体的城市（镇），其建设和发展必须因地制宜，有个性和特色地规划和发展城市，拒绝"克隆城市"。不然，城市发展和布局难以实现合理化，它所承载的经济发展和布局当然好也难以实现合理化。

（七）经济发展和布局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地理环境，保障生态安全

人类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布局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使自然生态和生物圈受损害的历史。据统计，人类对地球生物圈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在1961年时虽已急增至70%，但尚未达到透支的程度。到1997年，这个比例又提高到120%；另据2000年的统计显示，近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0.3%，但由于资源浪费、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GDP增长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而获得的。以上说明：人类正在超负荷利用（透支）地球资源来发展经济。其结果是：当人类将自然界推向难以支撑的极限时，常遭受大自然的报复。还有，某些资源（如森林、草原、矿产、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代表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总是看上去胜了，或当时胜了，日后却不断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如20世纪末的大洪水，21世纪初的沙尘暴，SARS等疫症蔓延。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社会行为而提出的新思路和发展观，是要在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在发展中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

生态安全，是指地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表明，生态破坏将使人们丧失大量适于生存的空间，并使经济发展和布局进入困境。因此，保护环境，保障生态安全，是经济布局中必须遵循的准则。

在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布局实践中，前三十年环境与生态问题不突出，后二十年则非常突出。年复一年的快速增长中，人们所关注的是更多地向自然界索取，以至于不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布局不适宜于当地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环境，或者说超出了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承受的程度，在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面前，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经济至上"。

因此，伴随而至的是生态环境的退化、恶化甚至是毁灭性破坏。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环境与生态问题经过积累已上升至整体恶化。有些地区因环境恶化而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最大的环境压力。此后，各地才开始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并着手治理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但直至21世纪初，我国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态势。

鉴于上述教训，我国经济布局合理化必须特别考虑使产业结构及其布局有利于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

一般说来，投资者在各地寻找回报率高的地方，已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和外企选址的首要目标，自然也成为生产布局的主要依据。然而，如果单纯追求这种回报率，投资者常常会被吸引到资源较丰富而环保意识薄弱的地方，而这两者的结合恰恰是一种危险的隐患，无论从近期或长远利益来看，都会使环境问题迅速积累并导致恶化，最终危及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

保护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依法防止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科学地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因此，在生产布局时必须逐项加以考虑。否则，一个从多方面看来似乎是合理的生产布局方案，却会因环境和生态的恶化而降低效益甚至毫无价值。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地带内的某些城市，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已经率先采取对外资和内联引进项目布局方案实行“一票（环保）否决”制度，以便切实保护当地的环境与生态。而对本地经济发展项目（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经济发展项目）布局方案审定，则已先行一步采取严厉态度。

这种以环境生态决定布局的原则，在21世纪初已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影响生产布局的环境与生态原则，由以前的普遍被忽视到开始受重视，有些城市和地区在审批生产布局方案时，相继将环境生态原则提高到具有一票否决地位的高度，以极力避免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而已受严重污染的城市和地区，包括昔日著名的老工业基地，都已相继投入巨额治理资金，并开始对影响生产力布局的环境生态原则另眼相看，格外重视，避免重蹈以牺牲环境和破坏生态来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覆辙。总之，中国环境负荷已达极限，承受能力变得十分脆弱。

在国外，一些著名老工业基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比我国要早。如德国推行生态经济的观念使GDP在增长两倍的情况下，污染减少70%，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布局中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章　农业布局

第一节　农业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变化

一、农业内涵的变化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仅以资源为国民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局面得到改变，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型转变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农业经营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农业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农业外部的资本和技术投入。

为适应上述变化，我国农业从体制和产业结构进行大调整。但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要承担自然、市场两大风险，农业发展和布局随时受到这两大风险（自然的、市场的）经常或周期性冲击。

二、农业经济发展及其结构演变

我国农业历史悠久，然而近代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却很落后。自1979年以来逐步推行农村改革，加之融人农业技术，才使国内多数地区的农业经济获较大发展。到1997年，世界8种主要农产品中，我国有6种农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粮食、棉花、肉类、禽蛋、水产品、油料，其中前5种农产品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只有糖料和奶类的人均水平仍较低。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1957年为40.3%，1978年为28.1%，2002年为15.4%，预计2020年下降到10%上下；农业劳动力在总就业的比重：1978年为70%，2002年为50%，预计2020年降至33%。

目前我国农业的成长空间大致是：农业经济约占整个经济15%，年均增幅约3%。

农业部门结构也发生大的变化。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林、牧、渔业的比重，已由1949年占17.5%上升到1978年的20.1%、2002年的45.5%；而农作物种植业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占82.5%下降到1978年的79.9%、2002年的54.5%。

以上变化说明，我国农业结构已由单一的、以种植业占绝对优势的简单农业，发展为农、林、牧、渔均有发展的庞大的农业生产系统，正在向着以提高农业产出率、农业商品率以及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为中心的现代农业转变。

三、入世促使我国加快农业改革及结构调整

由于受资源、规模、科技因素等的长期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成本普遍偏高。具体表现在：农业资源短缺，农户经营规模偏小，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高。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农业改革速度加快。因为入世后必须减少关税，价廉物美的外国农产品更容易与我国农产品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农产品存在质量较差、劳动生产率低以及农产品深加工和就地转化不够等劣势，但依靠离市场近、劳动力价格低廉等为数不多的优势加上一定的关税壁垒继续生存。入世后必须将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拓展。

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农产品基本上可分为土地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等几种类型。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尚有竞争力，故入世后此类产品可扩大出口规模。为此，需大力进行种植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即从以种植低附加值的粮食作物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种植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等）。另外，肉类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也有机会。

与此相适应，另一项调整则是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就业结构调整，其中农业方面多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工业方面则应多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四、农业生产的地域性

地域性是农业生产的鲜明特征。它是由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错在一起、对土地等要素有特殊依赖性的特征所派生的。一般来说，各种动物、植物都有自己特定的“适生环境”。它们同某种自然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依存关系。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具有不同的特征，各自然区域往往具有明显差异，使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因此需要科学地认识和发挥本地区的自然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合理的农业劳动地域分工。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摆脱传统农业的狭小圈子和“小而全”的生产格局，向区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批农、林、牧、渔商品生产基地。黑龙江、吉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等省成为商品粮产区；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江苏、新疆和安徽成为棉产区。此外，黑龙江、吉林的大豆，山东、广东的花生，四川、安徽的油菜籽，湖北、河南、安徽的芝麻，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的甘蔗，黑龙江、内蒙古的甜菜，四川、浙江、江苏的桑蚕茧，辽宁的柞蚕茧，浙江、湖南的茶叶，河南许昌地区、云贵高原上某些低丘地带的烤烟，山东、辽宁的苹果，河北

的梨，新疆的葡萄，都已在本省区范围内，选择了一些自然地理基础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较好的县、市，建设一批商品生产基地。

上述商品农业基地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得到发展，但发展进度木一。如新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云南省则成为第一大烤烟生产基地。

20世纪90年代农业发展和地域分布变化特点主要表现在：随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30%～70%农业劳力向外转移。在沿海引入外资较多的农村，已将农业综合开发优势与对外开放优势结合，实现农业投资多元化、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农产品特色化、农业企业化，推动了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换，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外向度。

五、问题与忧虑

尽管有上述变化，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其布局，在整个产业链条中依然是薄弱环节。至21世纪初，距离现代市场化农业还有差距，许多地方的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仍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农产品的区域结构调整也尚未达到立足于各地的比较优势拟定的目标。

农业基础仍然落后，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方式仍较落后，大量陡坡耕地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并未完全克服，大面积地域土壤肥力和生产力下降，农业的品种结构和地域布局不尽合理，农产品加工程度低。发达国家农产品的产后加工能力均在70%以上，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的90%，而我国仅为30%左右。因此，尽管我国生产的谷物、水果、豆类、肉、蛋、水产品等均居世界首位，但其加工利用的效益远未得到发挥。另外，在当前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如何使处于产业链条最初端的亿万农户也获取整个产业的平均利润，仍是一个现实的难题。在许多地方，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合理转移，也阻碍了农业效益增长。由于农村城市化进程滞后，使现代农业发展受阻。只有通过城市化，使农村人口降至只占全国人口25%以下时，我国农村的土地才有可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经营。

第二节 区域比较优势，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区域特色及区域比较优势

农业的合理布局，因其具有鲜明的地缘、区域色彩，历来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目前来说，则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合理利用资源，防止结构趋同。对于新的一轮农业结构调整，需要在优化区域布局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区域特色。具体而言，可以从各自的区位优势、自然条件和传统习惯出发，使缺少比较优势的农作物生产逐渐从

原有的地位退出，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之需，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区域布局态势。

二、向区域化、优质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调整，我国农业生产加快向区域化、优质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深度调整，高效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优质专用农产品快速发展。如优质早稻占到早稻总面积的六成，优质专用小麦占小麦总面积三成多，专用玉米从无到有，也占到二成五。另外，主要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从北至南已形成东北地区玉米带、黄淮海平原小麦带、长江沿域水稻带，并正在形成东北内蒙古油用大豆产业带、沿黄沙壤花生产业带等，为我国跻身国际农产品市场奠定了基础。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空间扩展。从2002年起，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呈现出新态势，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已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步骤，也是农业增长方式重要变革。

三、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2003年公布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确定11种农产品35个优势区域的布局规划，并对每一种优势农产品在分析其比较优势和薄弱环节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其目标市场及需求变化趋势，提出发展目标及优势区域，实施非均衡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与专业分工，并按产业化思路进行建设。

具体地说，选择资源与生产条件较好、商品量大、市场前景广阔的加工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苹果、牛羊肉、牛奶、水产品等11种优势农产品，从资源、市场这两个基点出发，按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布局，规划了35个自然条件好、生产规模大、产业化基础强、区位优势明显的主产区，作为进一步开发的优势区域，提出了各自的主攻方向、发展目标和建设重点，重点扶持，尽快提高上述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应对加入WTO以后进口农产品对市场的冲击，并扩大出口目标。

第三节　世界主要谷物生产国

一、谷物生产国际比较

1980年以前，中国内地谷物产量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至今一直居世界首位。2002年谷物产量3.98亿吨，虽然同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仍分别超过美国（3亿吨）、印度（2.2亿吨）、俄罗斯（0.8亿吨）、法国、印尼、巴西等世界主要谷物生产国。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社会技术、经济条件和地域开发历史差异较大，为形成多种谷物种植的不同地域组合提供了可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地域综合开发的不断深入，谷物传统地域组合出现许多新变化。如过去水稻一向集中于南方诸省，北方种植水稻罕见。由于兴修水利，培育抗寒早熟稻种，使北方部分有水源的地方，水稻种植及地理分布也有较大的发展。

二、水稻育种技术突破与稻作地理，长江流域水稻带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相继育成一批适合不同地区、不同生态与生产条件、不同成熟期的半矮秆高产水稻良种，在全国推广。到70年代，以杂种优势理论为指导，以发掘不育细胞质源为突破口，使籼型杂交稻率先在我国获成功并大面积推广；至90年代种植面积达1500万公顷，占全国稻作51%，总产58%。这样，使我国水稻单产水平实现两次提高。我国稻谷生产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如图表2－1所示：

图表2－1　　稻谷生产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

项目＼年份	播种面积		产　量		单位面积产量（千克/公顷）	主要稻谷产区（2002年该地区稻谷产量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万公顷	占全国粮食播面（%）	万　吨	占全国粮食产量（%）		
1952	2838	22.9	6843	41.7	2408	①湖南②江苏③四川
1978	3442	28.5	13693	44.9	3975	④湖北⑤江西⑥安徽
1997	3177	28.1	20074	40.6	6319	⑦广西⑧广东
2002	2820	27.1	17454	38.2	6189	⑨黑龙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水稻是全球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种植面积达1.54亿公顷，占世界耕地11%，分布于12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占种植面积和生产总量的90%。全球以大米为基本食粮的人口已增至25亿人，预计2025年进一步增加到35亿人。然而，水稻产业的大发展也加剧了全球水危机问题出现。鉴于水稻重要性激增，联合国宣布2004年为“国际水稻年”。

在世界各主要稻谷生产国中，我国水稻播种面积（1996～2000年平均）占世界20%，次于印度；稻谷年均产量19619万吨，占世界35%，远远超过印度、印尼、孟加拉、越南、泰国、缅甸、日本等国。但我国优质稻米短缺。而泰国盛产香米，印度北部也出产世界一流的香米。这些优质米的国际市场价高一倍多。至2002年，我国优质水稻面积已扩大到387万公顷。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也是国际大米市场上的主要输出国之一。至90年代，大米输出减少，世界大米输出国的前三名已由美国、巴基斯坦、中国变为泰国、印度、美国。

水稻是我国稻谷生产的主体（旱稻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很小）。它是一种喜温、喜湿作物，我国有广阔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东部和南部属于湿润半湿润地带，又受季风气候影响，夏季全国从南到北水、热条件形成有利结合，适宜水稻生长、发育。因此，目前我国除高寒地带和水源缺乏的干旱区之外，南起北纬18.5度的海南省，北至北纬52度的黑龙江省呼玛县，东起台湾，西至新疆喀什，均可种植水稻。

水稻种植的分布特点是：南方多而集中，北方较分散。具体可划分为四个水稻分布区（排序按稻谷产量）：长江中、下游单双季稻区；华南双季籼稻区；北方稻区；云贵高原稻区。如图表2－2所示。

（一）长江中、下游单双季稻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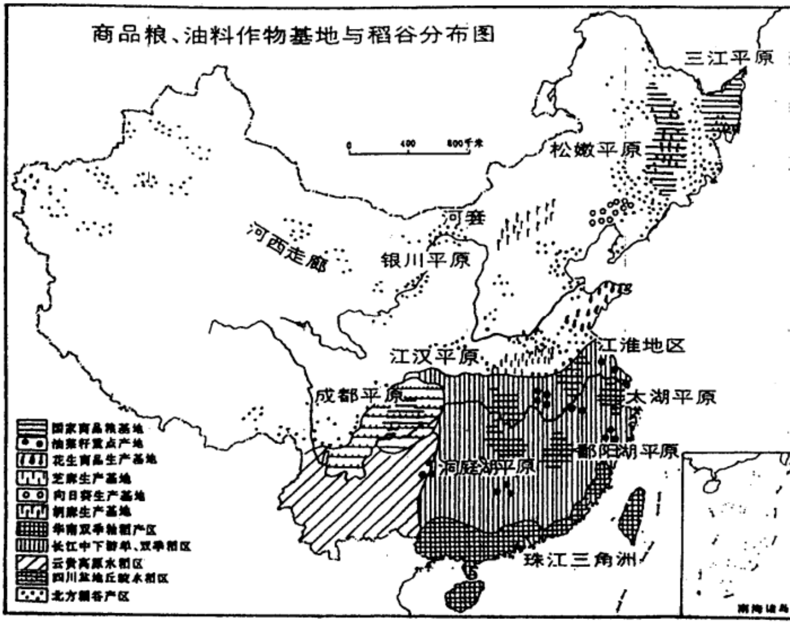
它包括秦岭淮河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四省以及四川、江苏、安徽等省的水稻集中产地，形成世界著名的长江流域水稻产业地带。还有上海市、河南和陕西两省南部、福建西部、两广北部。这些地区单季稻和双季连作稻并重，是我国水稻种植最集中、稻谷产量最大的地区。全区稻谷产量约占全国65%，以两湖平原（包括其南部的洞庭湖平原和北部的江汉平原）、江淮地区、太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成都平原等地的水稻种植最集中，提供商品稻米最多。

（二）华南双季籼稻区

它包括地处南岭以南的广东、广西两省区大部，福建东半部和海南、台湾两省。全区稻谷总产量（未包括台湾省）约占全国17%，为我国第二大稻谷集中产区。其中，广东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广西东南部沿江平原和盆地，福建东部闽江、九龙江下游，台湾省西部平原，水稻分布较为集中，且多为双季连作稻，个别地区还有三季连作稻（如海南省）。

（三）北方稻区

它包括秦岭、淮河以北除青藏高原以外的广大地区。水稻种植具有“大分散，小集



图表 2－2

中”的特点，尤其在拥有水源和排灌设施的平原、丘陵、盆地较集中。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境内。如辽河中下游平原、吉林省东部山间盆地、黑龙江省北大荒以及牡丹江一带的半山区谷地平原，河北省海河下游低地、宁夏银川平原等。全部为单季稻，以粳稻为主，由于生长期长，日照充足，灌溉水质一般也较好，故米质较优，产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大幅增长，全区稻谷总产量约占全国的 12%，已超过云贵高原稻区居全国第 3 位。

（四）云贵高原稻区

它包括云南全省、贵州省大部，还有川西南和桂西北部分地区。水稻种植较普遍，但因地势较高，水热条件相对较差，故稻谷产量较前述三个区为低。全区稻谷产量只占全国 6%。水稻种植主要分布于河谷平坝地区，在纬度较南、地势较低的河谷平坝有少量双季连作稻。

三、小麦生产地理分布，专用小麦带建设、布局

小麦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播种面积仅次于水稻，而产量则在稻谷、玉米以后，是全国第三大粮食作物。2002年全国小麦总产9029万吨，超过美、俄和欧盟小麦产量，居世界首位。我国小麦生产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如图表2-3所示：

图表2-3　　小麦生产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

项目 / 年份	播种面积		产量		单位面积产量（千克/公顷）	主要小麦产区（2002年该地区小麦产量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万公顷	占全国粮食播面（%）	万吨	占全国粮食产量（%）		
1952	2478	20.0	1813	11.1	735	①河南②山东③河北
1978	2918	24.2	5384	17.7	1845	④安徽⑤江苏⑥四川
1997	3006	29.2	12329	24.9	4101	⑦陕西⑧新疆⑨甘肃
2002	2391	23.0	9029	19.7	377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一）地理分布特征，世界与中国的小麦产销

2002年全球小麦产量5.65亿吨，主要分布于东亚、北美、欧洲和澳洲。全球小麦贸易量2003年度2.03亿吨，预计2004年度降至0.97亿吨，同产量起伏度大相比，小麦贸易量起伏度更大。

在我国，最重要的是冬小麦。因它可与水稻、玉米、甘薯、棉花等秋收作物接茬种植，能充分利用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因此获得广泛种植。主要分布于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而长城以北主要是春小麦区。同水稻相比，小麦的地理分布更广泛，遍布于全国各地，具体可划分为三个分布区：

1. 北方冬小麦区。

它包括长城以南、六盘山以东、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山东省全部，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省大部，以及皖北和苏北的部分县市。小麦总产量约占全国一半以上。

2. 南方冬小麦区。

它包括秦岭、淮河以南，折多山以东地区，地域范围比北方冬小麦区要辽阔得多，但小麦种植的集中程度却远不如北方冬小麦区。其中，以四川、湖北、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中部等地分布最集中。全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

3. 春小麦区。

它包括长城以北、岷山大雪山以西十分辽阔的地区。区内多为高寒或干冷地带，如种冬小麦，难以安全越冬，故以种植春小麦为主。其中，以黑龙江、甘肃、新疆和内蒙古4省区种植较多。全区小麦总产量约占全国五分之一，由于实行大规模机械化作业，

能向市场提供较多商品麦。

(二) 专用小麦带建设及其布局

我国小麦总量大，但优质专用小麦却不足。如适宜加工面包用的强筋小麦、加工饼干、糕点用的弱筋小麦品种较少。

鉴于专用小麦的市场需求潜力很大，近期我国重点发展优质强筋小麦、弱筋小麦，稳定发展中筋小麦。到2007年，专用小麦面积将占全国小麦40%，比2001年提高20个百分点。正在建设三个专用小麦带：(1) 黄淮海优质强筋小麦带，主要分布于冀鲁等7省39个地市82个县市；(2) 长江下游优质弱筋小麦带，主要分布于苏皖等4省10个地市20个县市；(3) 大兴安岭地区优质强筋小麦带，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内蒙古的3个地市11个旗县（农场）及黑龙江垦区。

四、玉米生产地理分布，专用玉米优势区建设、布局

玉米是世所公认的“高产之王”、“饲料之王”、“综合利用之王”。经过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玉米已成为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和第一大杂粮作物。

(一) 地理分布特征

玉米喜温、喜湿，降水少的地方需有灌溉方可大面积种植。随着水利条件改善，玉米地理分布大为扩展，以东北三省集中程度最高，吉、黑、辽3省玉米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合占全国玉米总产量四分之一强，提供商品玉米占全国近二分之一；此外，鲁、豫、冀、川等省及内蒙古也是玉米集中产区。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玉米商品率上升，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玉米出口升至第4位（次于美国、阿根廷、南非），但从21世纪初开始，因取消出口补贴，我国玉米出口下降。

(二) 专用玉米优势区建设及其布局

作为世界玉米的产销大国，与其他玉米主产国相比，我国专用玉米品种少，专用性能不强，玉米加工业滞后，生产与消费市场区域不平衡。随着牧业发展和玉米深加工技术广泛应用，国内玉米需求大增；同时，东亚地区是世界玉米主销区，年销量达3500万吨，占全球玉米贸易50%，该市场现主要被美国转基因玉米占领。我国有临近国际玉米消费市场的区位优势，又有非转基因品种优势。发展专用玉米有利因素明显。

近期我国以发展饲用玉米、加工专用玉米为主，并使产销衔接，增强产区玉米转化加工能力，延长产业链。地域布局上重点建设两大专用玉米优势区：(1) 东北－内蒙古专用玉米优势区，涵盖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4省区26个地市102个县市（旗）；(2) 黄淮海专用玉米优势区，涵盖河北、山东、河南3省33个地市98个县市。到2007年，上述优势产区的玉米单产、总产分别提高20%，专用玉米占玉米总面积的60%以上，并在增强优势产区转化能力基础上形成有利的内、外贸易格局。

我国玉米生产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如图表2－4所示

图表 2-4 玉米生产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

项目/年份	播种面积		产量		单位面积产量（千克/公顷）	主要玉米产区（2002 年该地区玉米产量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万公顷	占全国粮食播面（%）	万吨	占全国粮食产量（%）		
1952	1257	10.1	1685	10.0	1343	①吉林②山东③河南
1978	1996	16.6	5595	18.4	2805	④黑龙江⑤河北⑥辽宁
1998	2524	22.2	13295	26.0	5267	⑦内蒙古⑧四川
2002	2463	23.7	12131	26.5	492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3》。

五、大豆生产长期萎缩，大豆振兴计划与优势区域布局

我国是大豆的故乡。1936 年大豆产量 1330 万吨，占世界 90%以上，并独占世界大豆市场。后因战乱和粮食紧缺，使大豆产量锐减，1949 年全国只产 509 万吨。

20 世纪 50 年代恢复大豆生产，但 1958 年后强调“以粮为纲”，使传统大豆产地被挤占。80～90 年代，大豆生产发展较快，1993 年产量首次超过 1936 年的生产规模。

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我国是世界大豆的最大生产国，但到 60 年代被美国取代，1974 年被巴西超过，1998 年又被阿根廷赶上。1993～2001 年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徘徊于 670 万～950 万公顷之间，总产量 1300 万～1540 万吨。

近年由于需求激增，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1998 年净出口大豆 100 余万吨，以后转变为净进口。2001 年进口 1394 万吨，接近全国大豆总产量。虽然通过政策扶持增产大豆，但预计大豆需求的巨大缺口将延续至 2006 年以后。

国产大豆较北美产大豆口感好，风味纯正，且都不是转基因大豆。如能降低其杂质、土沙含量，出口竞争力将会提高。2002 年中国大豆在日本售价每吨 280 美元，美国转基因大豆仅 190 美元。

大豆生产与自然地理状况关系密切，随着纬度提高，大豆含油量逐增，而蛋白质含量渐减。因此，东北和内蒙古的纬度位置对扩大高油大豆生产有利。

2002 年开始实施的“大豆振兴计划”，将我国东北、内蒙古、黄淮海地区视为大豆产业振兴的黄金地带。因该地带自然环境适宜种植、增产大豆。

近期以提高高油大豆单产、含油率为主，并降低生产成本，推行深耕深松技术和玉米、大豆轮作。预计到 2007 年，东北地区成为世界最大的非转基因高油大豆产区。地域布局上重点建设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吉林中部、辽河平原、内蒙古东四盟市等 5 个优势产区，涵盖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4 省区的 30 个地市（盟）127 个县市（旗）。

第四节　建设商品粮基地，粮食增长中心北移

一、人均耕地递减，耕地总体质量不高

中国内地耕地面积1996年为1.301亿公顷，到2003年减少至1.23亿公顷，平均每年减少近100万公顷。递减的原因，在1999年以前主要是非农建设占用，以后则是由于生态退耕面积以及开发区圈地等大幅增加所致。

全国人均土地0.73公顷，相当于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0.094公顷，为世界的五分之二。耕地的总体质量不高：优质耕地仅占三分之一；中低产田所占比例高达79%；还有约600万公顷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其经济效益通常很低，生态效益更是得不偿失。

二、二十年建成商品粮基地

“商品粮”在我国的含义，长时期内曾远远超出其本身的价值，能吃上商品粮，甚至成为人们拥有社会地位的象征。

由于人口基数很大，而且经历过大饥饿时代，故选择最佳地理区位建设商品粮基地，稳定大量地提供商品粮，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布局中的大局。

随着人民生活改善，虽然人均用粮有所下降，但饲料用粮却大幅度增长，工业用粮等也在增加。粮食增产主要途径只能提高单产。特别是在7000多万公顷粮田中，选择自然条件较好、增产潜力大、交通运输便利的地区，建设起大面积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在“六五”期间采用国家和地方联合投资形式建设60个商品粮基地县（市）。1983年，由国家计委、农牧渔业部、商业部、水利电力部和黑龙江、吉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江西8省协议联合建设50个商品粮基地县（市）。同年国家又与辽宁、内蒙古、广东的10个县（旗）签订联合建设合同，以确保收购更多商品粮。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13个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包括243个县，约占全国县级行政单位总数十分之一，生产的粮食占全国五分之一。上述商品粮基地，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地域类型：(1)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吉林省中部地区，辽宁省中部地区，共计59个县；(2)湖南省洞庭湖平原，湖北省江汉平原，江西省鄱阳湖平原，共计57个县；(3)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共计48个县；(4)苏北地区和皖北地区，共计46个县；(5)河西走廊、银川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共计33个县。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商品粮基地县（市）增至523个。从1994年起，国家连续

五年扶持 523 个商品粮大县继续发展。至 2000 年，国家级的商品粮基地县进一步增至约 900 个。

从 1996 年开始，又在作为重点粮食生产省的吉林、黑龙江、山东、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四川、陕西选择 20 个商品粮食集中产区，以地区（市）为单位，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到 2000 年，建成 20 个大型商品粮基地。

三、粮食减产与粮食安全

上述商品粮基地建设，对缓解国家粮食供应长期短缺甚至于社会稳定都大有裨益。但未曾料到，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900 个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和 20 个大型商品粮基地全面建成，许多地方相继出现粮食高产滞销、储备过多、粮食供应由卖方市场迅速向买方市场转变等现象。

1998～2003 年，中国粮食总产由 5.12 亿吨减至 4.31 亿吨，但仍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世界粮食产量已有八年没有增长。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全球气候变暖，加上地下水枯竭，是全球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粮食减产，除受上述因素影响以外，还因为居民消费结构改变和优质粮食比重相对较少，国外优质廉价农产品大量输入。2003 年以后，中国已变为“纯粮食进口国”。

考虑到 2050 年前世界人口增加 30 亿（其中中国增加约 4 亿），为保证粮食安全之需，选择地理区位有利、水源条件较好地区建设商品粮基地，对促使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四、全国粮食增长中心北移，“南粮北调”悄然结束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粮食增长中心北移。

这一引人注目的变化，同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南粮北调”现象恰成对照。业已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南粮北调”格局于 20 世纪 80 年代悄然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则是“北粮南运”。

在 1978～1984 年时，南方地区虽仍占全国粮食生产主导地位，但其地位逐渐下降，而东北地区粮食生产的地位提高；1984～1994 年期间，全国粮食增产中心继续北移，黄淮地区和东北地区共同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在此期间，全国粮食增产总量中，黄淮地区、东北地区各占一半。1993 年上述两地区粮食产量合计占全国总产量的 46.3%，相比之下，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粮食生产却在 1989 年下降的基础上继续下滑，1993 年在全国粮食总产中的比重跌至 46.1%，分别比 1978、1984 年下降 10%、8.7%。据统计，1983～1995 年，全国粮食共增产 7934 万吨，其中北方增产量占 70%，南方只占 30%，因此，长三角、珠三角率先由粮食调出区变为调入区。

造成上述粮食增长中心北移的主要原因：(1) 作为原有粮食主产区的南方地区对外

开放早，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镇二、三产业（包括众多乡镇企业）转移，与此同时，大量耕地被占用。黄淮、东北地区的粮食生产受上述影响的程度要小得多；(2) 黄淮、东北、西北地区的粮食生产应用新技术以及改进耕作制度和粮食作物结构，使稻谷、玉米、小麦的增产幅度提高，商品率上升；(3) 黄淮、东北、西北地区耕地较多，人口相对较少，缺点是水资源缺乏。但这不妨碍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一批商品粮基地。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黑龙江省粮食商品量、专储量均居全国第一，吉林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商品粮保有量、外销量居全国第一。我国水土资源分布与商品粮增产，如图表 2－5 所示：

图表 2－5　　　　水土资源分布与商品粮增产

比较项目 ＼ 占全国比例（%）＼ 地区	长江中下游及以南	黄淮流域及以北
水资源总量	81	19
人口	54	46
耕地	36	64
1983～1995 年粮食增产	30	70
2000～2040 年粮食增产（预测）	25	75

五、北粮南运与南水北调，水资源配置

据预测，在 21 世纪 10～40 年代，我国粮食增产中心北移现象会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内地在其著名的地理界线——秦岭淮河线以北的广阔区域内，在现代科技扶植下，粮食增产潜力会进一步发挥。

但是，水资源短缺对北方粮食增产的限制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中国人均水资源 216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数的四分之一，当 2030 年人口达到 16 亿高峰值时，人均水资源还将减至 1700 立方米，水资源不足是制约中国（尤其是北方）经济发展的“瓶颈”。如华北平原由于农业、工业和城市用水短缺而造成的长期过量开采地下水，出现大面积地下水漏斗，直接威胁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北方、南方水资源差异，如图表 2－6 所示：

图表 2－6　　　　北方、南方水资源差异

地　域 ＼ 指　标		降　水　量　（毫米）
南方	台湾中部山区	≥4000
	华南沿海	1600～2000
	长江流域	1000～1500

地域 / 指标		降水量（毫米）
北方	华北、东北	400～800
	西北内陆	100～200
	塔里木、吐鲁番、柴达木	≤25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2003》摘编。

为此，迫切需要研究、解决水资源配置问题，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其中包括规划论证已有数十年之久的“南水北调”，即从我国内地南部水量丰沛、水流较稳定的长江干流及汉水、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等调集巨额水量供应华北、西北城乡，兼顾解决农业、工业、能源、交通与生活用水，还可直接推动“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不仅是涉及未来数十年的粮食生产布局，也是涉及大半个中国可持续发展、优化生产力战略布局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大举措。

经多年规划、选线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格局已确定为东、中、西三条线路、总投资5000亿元，建成后它们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江河构成“四横三纵”的布局。

（一）东线

从长江下游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提水北送，出东平湖后一路向北，一路向东至胶东地区。

（二）中线

从汉水丹江口水库引水，沿唐白河流域西侧过江淮分水岭，再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基本上自流到京、津。

（三）西线

从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上游筑坝建库，调长江水人黄河上游，解决黄河上中游及渭河关中平原缺水问题。

三条线路到2050年调水448亿立方米，其中：东线148亿立方米，中线130亿立方米，西线170亿立方米。东、中线2003年开始同步建设，预计2007年、2010年通水。近期供水目标是以解决城市缺水为主，兼顾生态和农业用水。这对解决我国水资源的跨流域、跨地区分配有重要价值，并由此而朝着有利于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南水北调仍不能完全解决北方的缺水问题。

第五节　经济作物生产与布局

经济作物指收获物主要供作工业原料的作物。按用途可分为：纤维作物、油料作物、糖料作物、淀粉作物、嗜好作物、饮料作物、橡胶作物、染料作物、药用作物、鞣

料作物、芳香油料作物等。

一、我国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和布局特征

（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提高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小，在农作物中只占8%左右，收获的经济作物加工利用也不充分，经济效益不大。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各地相继推广种植经济作物，并相应地发展加工工业，使经济作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增长，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面积之比，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已提高到16%以上。

（二）对生长环境和经济技术条件要求较高

从生长环境来说，许多经济作物都需要满足其各自的生态条件，才可正常生长，获良好收成。因此，经济作物种植业有很强的地域性。从经济技术条件来说，种植经济作物，通常比种植其他农作物需要更多资金，并在种植、管理、收获、初加工到出售过程中，付出技术性较强的劳动。故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业（特别是建立规模化种植园和生产基地），需对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进行充分调查、比较和选择，确定最佳布局方案，以求良好效益。

（三）受价值规律影响，对市场依赖程度大，与轻纺工业关系密切

经济作物自产自销比例很小，绝大部分通过商业渠道或预签合同出售，商品率很高，价值规律对生产的作用大，市场价格浮动常使种植面积相应扩大或缩小。同时运输费用在生产成本中占较大比例，加以部分作物在收获后需要及时运往加工地，又不宜长途运输。因此，经济作物的生产布局应考虑运输因素，或是新建运输线路，或是尽可能靠近原有运输通道。为了兼顾生产、运输、加工，通常将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与相应的加工业结合，并通过方便的运输线路联系起来。

二、棉区布局大调整

我国经济作物中，棉花的播种面积、经济价值均居首位。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纺织原料绝大部分依赖产棉区供应。后来大力发展化纤，毛、麻、丝原料也得到相应发展，使纺织工业原料结构有较大改变，但棉花仍然是纺织业发展和人民衣着的主要原料来源。

（一）世界最大的产棉国

长期以来，我国棉花生产发展受自然灾害和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1949年全国棉花产量仅44万吨。以后，恢复老棉区，开辟新棉区。棉花播种面积1957年增至578万公顷，产量164万吨。但到60年代因饥馑缺粮而使许多棉田改种粮食，棉花面积急剧减少到350万公顷以下，产量也减至75万吨的低水平。后来，棉花生产又开始增长，

但受到“以粮为纲”政策的影响而不稳定。1979年起棉花生产稳定发展，并于1984年达到高峰：播种面积692万公顷，产量626万吨，占世界棉花总产量三分之一以上。从1985年开始，棉花生产受市场需求影响波动。

2002年我国棉花产量在世界主要产棉国中，超过美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居首要地位。棉花种植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分别如图表2-7所示：

图表2-7　　棉花种植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

年份	播种面积		产量		单产（千克/公顷）	棉花集中产区（2002年该地区棉花产量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万公顷）	占全国经济作物播面（%）	（万吨）	增长速度（以1952年为100）		
1952	558	44.6	130	100.0	233	①新疆②河南③山东
1978	487	33.7	217	166.9	443	④河北⑤江苏⑥安徽
1984	692	35.9	626	481.5	904	⑦湖北⑧湖南
2002	418	18.1	492	378.5	117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二）国际棉花生产比较及其基本格局

2001年，印度植棉面积达862万公顷，远高于美国（639万公顷）、中国（478万公顷），但棉产量不足中国的二分之一，也次于美国，居世界第3位。为此，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棉进口国。从2002年起，印度逐渐改种转基因品种的抗虫棉，此举在多年后可能使世界三大产棉国重新排序。世界三大植棉、产棉国排序，如图表2-8所示：

图表2-8　　世界三大植棉、产棉国（2001年）

按植棉（万人顷）排序		按产棉（万吨）排序	
印度	861.9	中国	532.4
美国	639.4	美国	369.0
中国	477.5	印度	207.0

与世界主要产棉国相比，我国产棉的单产水平较高，是世界平均单产1.8倍。目前，我国棉花已经形成良好的生产基础，但种植规模差距甚大。美国棉农家庭农场平均种植规模180公顷，我国仍以小农型生产为主，全国约有1亿棉农，人均植棉仅0.07公顷，生产规模小，品种单一，流通环节多，对参与国际竞争不利。另外，我国棉花品种结构不合理，适纺高支纱和低支纱的原棉较缺少，品质一致性较差，“三丝”（异性、异形、异色纤维）含量高。

（三）中国棉花生产布局调整，建成三大优势棉区

棉花原产于亚热带，在生长过程中具有喜温、喜光、生长期长的特点。我国植棉历

史悠久，适宜植棉的地区广泛。在20世纪80～90年代，棉花生产布局在发展中有较大的调整。到2002年，我国植棉5万公顷以上的省区已调整到11个，近年还在继续调整棉花生产布局，使一些分散的棉区向主产区集中，尤其是向重点产棉区集中。

近期将使棉花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发展陆地长绒棉和中短绒棉生产。长绒、中长绒、中短绒棉花的比例，将由21世纪初的1：95：4调整到2007年的7：83：10，长江流域棉区将建设成适纺50支纱以上、20支纱以下为主的原料生产基地；黄河流域棉区建设成为适纺40支纱为主的原料生产基地；西北内陆棉区建成以适纺32支纱为主的原料生产基地。

（四）彩棉生产区域已成规模

彩棉原产于中美洲印第安人住地，1982年引进美国，并培育出长纤维品种，1994年扩大种植4000公顷。由于彩棉纺织成衣过程中无须使用有毒化学染料，故很受欢迎。2002年全球彩棉产量急增至20万吨。据国际农业委员会预测，至2030年全球彩棉总产可达400万吨，占世界棉花总产30%。

我国已成世界彩棉生产国之一。1999年始种7000亩，2002年增至25万亩。目前，彩棉种植基地主要分布于新疆、江苏、山西、甘肃等省区。从种植到加工，业已形成专门化规模。

（五）主要产棉区

考虑到不同地区生态条件对棉花的适宜程度，以及棉花生产发展和技术管理特点等，可将全国划分为三大棉区，如图表2－9所示。

1. 西北内陆棉区。

包括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这里热量资源甚优，温差大，日照充足，为全国日照条件最好地区。区内棉田集中分布于北疆玛纳斯河流域、吐鲁番盆地；南疆叶尔羌河流域、塔里木盆地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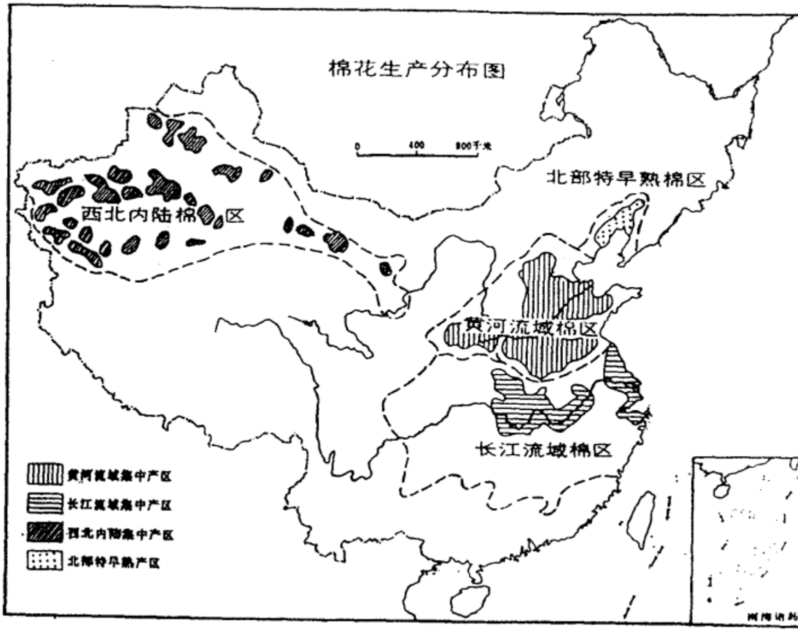
近年来，在有灌溉条件的地方，植棉面积有很大扩展。1992～2002年，新疆已连续10年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棉基地。所产原棉纤维长，是高档棉制品原料，质优价高，已成为我国长绒棉生产基地。但在有些地方，因棉田扩展太多或布局不当，已危及生态环境。为此，从2000年起，新疆适当缩小棉田面积，低产风险棉区全部退出，以防止土地沙漠化趋势，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2002年本区棉田面积调减至94万公顷，棉产量150万吨，占全国三分之一。

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市场竞争，我国棉花生产规模化经营必须进一步提高，建立稳定的优质棉生产基地。在国内三大产棉区中，以自然条件看，本区比较优势较多，在2007年以前建设成以适纺32支纱为主的原料生产基地，布局上主要建设新疆自治区、新疆兵团和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30个县、团场。

2. 黄河流域棉区。

包括山东全省，京、津两市，河北、河南、山西三省的绝大部分，以及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和陕西的中央腰部地带等。棉田集中于黄淮平原、海河平原以及山西汾



图表 2－9

河、陕西渭河这两条河流的谷地。自然环境对棉花生长有利：水热条件适中，春秋光照充足，无霜期较长，能满足早、中熟棉的需要。但在气候变化不稳定的年份，春季的低温和秋天的早霜，均影响棉花的产量、质量。

该棉区在原有老棉区基础上发展起来，棉田技术管理水平较高。20 世纪 80 年代棉田面积近占全国半数；棉产量在全国所占比重，少时为三分之一，多时接近半数。此后因西北内陆棉区崛起，使本区棉产量占全国比重下降。

近期本区主要建设冀鲁豫苏皖 5 省的 50 个产棉县。到 2007 年，黄河流域棉区将建成为以适纺 40 支纱为主的原料生产基地。

3. 长江流域棉区。

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上海 4 省市，江苏、安徽 2 省淮河以南地区，以及川东、豫南等。棉田分布东起长江三角洲、苏北里下河平原，经皖中平原、鄱阳湖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至四川盆地，以江汉平原棉田集中程度高，棉花产量多。

长江流域水热资源丰富，无霜期比黄河流域要长，有利于棉花增产，但不时发生春雨、伏旱和秋霖等自然灾害，又影响棉花生产。全区棉田面积和产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

近期本区主要建设江汉平原、洞庭湖、鄱阳湖、南襄盆地等地的40个产棉县。到2007年，长江流域棉区将建成为以适纺50支纱以上、20支纱以下为主的原料生产基地。

三、油料作物种植及其地理分布

油料作物指可食用草本油料作物，在中国广泛种植的有花生、油菜籽、芝麻、向日葵以及油用大麻、胡麻和蓖麻等。

近五十多年中，我国油料产量以1962年为最低，仅200万吨。此后缓慢恢复，至1978年才超过1952年水平。从1979～2002年，油料种植面积一再扩大，产量急剧增大，2002年油料总产达2897万吨，居世界前列。

（一）花生

系半干旱作物，在沙质土壤种植的效益远高于其他作物。有些沙岗坡地或沿河冲积沙土以及南方丘陵地红、黄壤等，种别的作物减产，而种花生却能丰收。

20世纪90年代起，受内、外市场需求刺激，花生产量急增，2002年达1482万吨，超过印度、尼日利亚、美国而居世界首位。2002～2003年度世界花生出口148万吨，中国占40%，远高于美国、越南等主要花生出口国。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利，我国鲁豫等地花生品质、外观俱佳，成为出口贸易增长的主因。

花生种植主要分布于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广东、湖北、四川等省（区）境内。从苏北经山东、河南、河北到辽宁的大片沙土地和丘陵地区，是全国最大的花生生产和出口基地。从开发潜力来看，在沿黄8省区直至新疆一线的碱性沙质土壤建立起一个花生种植带（“沿黄花生产业带”），兼有重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二）油菜籽

油菜生性喜凉，对热量、土壤以及其他技术、经济条件的要求不高，决定其地理分布的广泛性。且既为油料作物，又为养地作物，目前我国油菜籽产量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但因内在品质差异，尚需进口。

近期油菜生产以提高含油率和单产水平、降低芥酸、硫甙含量为重点，预计到2007年，长江流域油菜基本实现“双低”化，满足国内植物油需求增量的60%；地域布局上重点建设三个优势产区：（1）长江上游优势区，涵盖川黔渝滇4省市的36个县市。（2）长江中游优势区，涵盖鄂湘赣皖豫5省92个县市区。（3）长江下游优势区，涵盖苏浙2省22个县市区。

长江流域其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冬油菜集中产区，主要因为油菜可作为水田的越冬作物，不与水稻争地，又可起养地作用，故长期以来获稳定发展。从长江向北，冬油菜的地理分布区可延伸至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再往北只能种春油菜。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油菜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以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收获油菜籽较多。

（三）芝麻

芝麻含油率高，油质香雅优异，唯对生长环境要求较严，喜温怕涝，不耐旱，单产较低，故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远不及花生和油菜籽，但仍不失为我国主要油料作物之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芝麻和麻油的消费量加大，因此，许多地方扩大了芝麻的种植。2002年全国芝麻产量89万多吨，集中分布于豫鄂皖3省。

（四）胡麻籽

在我国西北和华北北部一带，一向有种植胡麻的习惯，甘肃、内蒙古、山西的胡麻籽产量居全国前列。胡麻是当地人民的食用油料作物，耐寒耐旱，但需要充足的光照条件。在华北北部海拔较高的河北坝上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山西的雁北地区、宁夏南部山区，这些条件均可得到满足，故种植胡麻较集中。雁北和宁夏胡麻籽质地优良。

（五）向日葵籽

含油率高，有营养价值，生长过程中耐旱耐寒，还可利用盐碱地种植，稍加经营管理即可丰收。过去只是零星种植，现已发展成为我国百丈油料作物之一，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多人少地区，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山西向日葵籽产量居全国前列。

四、糖料作物地理分布，蔗区布局大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糖料作物种植发展缓慢，生产不稳定，食糖消费水平低，近年情况有好转，糖料总产量仅低于巴西和印度，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消费食糖7千克，只及世界人均消费食糖量三分之一。因此糖料作物种植扩大的潜力可观。我国糖料作物生产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如图表2－10所示：

图表2－10　　我国糖料作物生产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

年份／作物	产量（万吨）					集中产区（2002年该区糖料作物产量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1949	1962	1978	1990	2002	
甘蔗	264	344	2112	5762	9011	①广西②云南③广东④海南⑤台湾
甜菜	19	34	270	1453	1282	①新疆②黑龙江③内蒙古④吉林⑤辽宁⑥甘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一）蔗区布局大调整，桂中南、滇西南、粤西三大优势产区

甘蔗只有在华南水热条件结合良好、且无霜冻威胁的地区种植最适宜。为此，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重点建设桂中南、滇西南、粤西三个“双高”甘蔗优势产区。预计到2007年，上述产区平均亩产提高到5吨，含糖率达到14.5%，相当于甘蔗生产发

达国家平均水平；植蔗面积、总产、糖产量分别占全国54%、60%、65%。

近五十年中，蔗区布局屡有变化，与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关系密切。

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是老蔗区，种蔗历史长，产量高。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粤西雷州半岛开辟新蔗区。从90年代前期开始，广东老蔗区萎缩，蔗田大减，主要原因是植蔗成本高，且居高不下；加之许多蔗田被工业发展与城镇建设占用所致。目前，粤西仍是我国重要甘蔗产区。

20世纪90年代前期，广西蔗区迅速扩大并超过广东，成为我国第一大蔗区，但蔗田布局太分散，至90年代后期广西调整蔗田布局，减少植蔗成本较高的桂东、桂东南及沿海蔗田面积，增加桂中、桂西蔗田面积。目前，桂中南地区是全国最大的甘蔗优势产区。

云南植蔗业发展也超过广东，仅次于广西，居全国第2位。滇西南地区已成长为全国第二大甘蔗优势产区。台湾一向是我国重要的蔗区，蔗田主要分布于肥沃的台南平原。但近十多年来蔗田面积缩小，产蔗量一再下降，已次于广西、云南、广东等省区。

（二）甜菜种植基地

甜菜生态习性同甘蔗差异很大，是一种喜温凉的作物，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特性，唯需日照充足，适宜于在长城以北种植。

全国有10多个省、自治区种植甜菜，其中播种面积超5万公顷、年产量超过100万吨的只有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3个省（区），以新疆种植最集中，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西部到吉林省西部，甜菜种植连成一片，亦为我国最主要的甜菜生产基地。从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土地资料来看，还有进一步扩大种植的潜力。

五、烟草、茶叶种植和蚕茧生产及其地理分布的变化

（一）烟草种植西移

烟草原产于美洲，约四百年前传入中国。烟草按其叶的用途和调制方法，可分为烤烟、晒烟、晾烟、香料烟等类。我国烟叶生产以烤烟为主，2002年产量214万吨，在世界各主要烟草生产国中居第1位。

烟草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性喜温暖，怕涝，适宜排水良好、有机质含量适中的土壤。全国栽培烟草的省（市、迁）有27个。种烟农户570万，烟农2200万人。主产商品烟叶的有14个省（市、区）。其中出产烤烟有云南、贵州、河南、湖南等省。

河南烤烟生产曾长期居全国首位，主要分布于省境中部的许昌、平顶山等地区。这一带年均气温14°~5℃，降水量700~900毫米，无霜期长，日照充足，加上土壤也适于烟草栽培，故烟田面积大，产量高。云南烤烟产量近年超过各省，以质量优异著称，主要分布于玉溪、曲靖等地。所产“云烟”具有香味适中、色泽鲜亮、燃烧性好等优点，是加工制作高级香烟的主要原料。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曲靖和玉溪2市同为全国著名的优质烟叶生产基地。

曲靖市包括9个县（市、区），素称“云烟之乡”，烤烟的常年收购量450万担，70%销往省外或出口，为全国近100家卷烟生产企业提供生产高档卷烟的优质原料；玉溪市包括8个县（区）在1985~1996年期间建成50多万亩优质高产烟叶生产基地，所产烟叶的内在品质已达到美国、巴西等烟草大国水平。

（二）茶园面积略减，仍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

茶树性喜湿润气候和微酸性土壤，耐阴性强，在我国中部至东南部普遍种植。

种茶、饮茶在我国已有几千年历史。19世纪80年代，我国茶叶出口量曾达10万吨以上，在世界茶叶市场占重要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衰败，50年代又开始广植茶树，开辟茶园，1976年全国产茶23.3万吨，超过历史上1886年22.5万吨水平。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茶园面积居世界第1位、茶叶产量居世界第2位、出口居世界第3位。但近年茶叶销路不畅，使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均有所下降。2003年，我国内地茶园面积减至121万公顷，茶叶产量77万吨，在世界各主要产茶国中，高于斯里兰卡、印尼、土耳其，次于印度，居世界第2位。

目前，全球约有20亿人以不同方式喝茶，为适应此需要，世界茶叶增产迅速。平均年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为110万吨，70年代155万吨，80年代220万吨，2002年306万吨。

印度茶业仅二百二十年历史，却已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产茶国。2002年产茶86万吨，占世界28%，但其茶园面积仅占世界18%，茶叶生产加工集约化程度高、技术含量高，是印度茶业发展不同于中国的主要特点。相比之下，中国的茶园70%仍由农户分散经营为主。

茶叶产品结构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经常调整。中国内地所产茶叶中，绿毛茶约占73%，其余依次为：乌龙毛茶、红毛茶、压缩茶原料等。世界绿茶市场中有80%为中国生产。

我国出产茶叶的省（区）有18个，但实际上拥有5万公顷以上茶园的省只有7个：云南、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其中，年产茶5万吨以上的有福建、浙江、云南、湖北、湖南、四川。根据植茶条件和茶叶品种的差异，可划分出几个跨省的茶区：(1) 浙皖赣茶区，茶园主要分布于3省相邻的丘陵地区，产茶量居全国之首，以绿毛茶为主，红毛茶次之；(2) 滇川茶区，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的山地丘陵，绿、红茶兼有，云南是红毛茶的主产地；(3) 湘鄂茶区，湖北以产绿毛茶占绝对优势，湖南绿红茶兼有，红毛茶产量2002年全国首位；(4) 闽台茶区，福建是乌龙毛茶的最大产地。闽南安溪有“中国茶都”之称，乌龙茶产量占全国二分之一。

（三）桑园萎缩

栽桑养蚕的历史远早于植棉业。春秋战国时，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一带即已广植桑树，养蚕业兴旺发达。后来，蚕桑又进一步向南发展。历史上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就是从当时黄河中游出发。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的。这些都足以证明当时我国北方和南方的蚕桑业曾经十分发达，只是近代才衰落。到

20世纪40年代末，全国仅剩20万公顷桑园，桑蚕茧产量3万多吨。50年代开始恢复栽桑养蚕，1980年桑蚕茧产量25万吨，超出历史最高（1931年22万吨）。1994年78万吨，居世界第1位。现有桑园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四川、广西、山东、广东等6省境内。其中，以太湖流域、四川盆地一带最为集中，产茧量也高。四川的桑蚕茧产量曾占全国四分之一，居首要地位。江苏、浙江两省产茧量现分居全国第1位和第2位。从1995年开始，因茧价下跌幅度大，影响到桑园萎缩，桑蚕茧减产。1999年曾减至44万吨，2002年恢复到64万吨。

（四）柞蚕开发规模尚小

柞树叶也可养蚕，我国拥有天然柞林约670万公顷，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南、湖北、吉林等省（区）。目前，仅辽宁省境内的柞林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开发利用，河南、黑龙江等省（区）柞蚕业规模尚小。

六、水果生产及其地理分布

从1993年开始，我国内地的水果产量居世界第1位。同时，水果生产在大农业中的地位呈上升态势。1996年，水果业已成为仅次于粮食和蔬菜的第三大产业。

主要品种有苹果、柑橘、梨、葡萄、香蕉、龙眼、荔枝和菠萝等，并已基本上形成了以这八大水果为主的果品生产体系。

（一）苹果优势产区：环渤海、西北黄土高原

苹果是高营养果类，亦便于储藏与运输，故而发展很快。2002年全国苹果产量达1924万吨，比1952年增长100多倍。苹果适生于温带气候条件下，20世纪80～90年代，苹果生产基地由东部沿海地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中尤以陕西、河南2省发展迅速。苹果出口1998～2001年呈增势，加工制品出口增长快，苹果汁已占世界贸易量40%，陕西苹果出口创汇连续五年占全省农产品创汇总额二分之一。

目前，我国正重点扶持和发展两个苹果优势产区：（1）渤海沿岸区。主要包括山东、辽宁、河北3省12个地市28个县市；（2）西北黄土高原区。主要包括陕西、山西、河南、甘肃4省11个地市27个县市。上述两个苹果优势产区至2007年优果率增至50%，单产提高到15吨/公顷，形成全国85%以上苹果生产能力。高档苹果出口由2002年的30万吨提高到2007年的90万吨，占世界出口量的比重由6%提高到15%。

（二）梨

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辽宁、河南等省产梨较多。其中，河北产量近占全国三分之一，河北鸭梨，山东莱阳梨等闻名。

（三）柑橘三大优势产区

作为一种典型的亚热带水果，柑橘分布有鲜明的地域性，主要集中于闽、川、浙、湘、桂、粤等地。近年柑橘、柑橘罐头出口增长，但优质柑橘进口增幅也很大。目前，我国正在重点建设三大柑橘优势产区：（1）长江中上游产区。主要在四川、重庆、湖北

境内，将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橙汁生产基地；（2）赣南湘南桂北产区。将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优质脐橙生产基地；（3）浙南闽西粤东产区。将建设成为有较强竞争力的宽皮柑橘出口基地。预计到2012年，上述柑橘优势产区优果率提高到50%，早晚熟品种比重提高到35%，鲜果上市期延长至8个月。

（四）葡萄

葡萄是一种优质浆果，果实供生食、制干、制汁、酿酒用，以滋味甜美和富于营养而著称。葡萄适宜在雨量少、温差大、日照充足的条件下栽培，主要分布于新疆、河北、山东、辽宁等省区。在我国西部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四大葡萄种植区：新疆种植区，陕西渭北地区，甘肃河西走廊东部，宁夏贺兰山南麓。其中，新疆葡萄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吐鲁番的无核葡萄著名。

（五）香蕉、菠萝、荔枝、龙眼

香蕉、菠萝、荔枝、龙眼均为我国南方出产的热带、亚热带水果，以滋味鲜美而闻名，号称“南国四大佳果”。其种植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集中产于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和云南。上述5省（区）的香蕉产量占我国内地的99%。此外，台湾香蕉、菠萝产量也比较大，香蕉产量仅次于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在我国的进口水果中，香蕉占首位，2001年进口41万吨，主要来自菲律宾、越南、厄瓜多尔。

第六节　林业定位变化，分区域林业建设与布局

一、林业定位重大转变

随着国家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引发了对林业主导需求的改变，从而使作为传统产业的我国林业的定位随之发生重大的转变：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是从事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向社会提供森林生态服务的行业。

我国林业发展处于转折时期，正在实现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新的定位体现出生态优先的原则。其对经济发展及其布局所产生的影响，不只局限于林业经济，也会延伸至许多其他相关的产业。

二、森林的非采伐性贡献开始受到重视

长期以来，我国林业及其森林资源的价值主要只体现于森林工业，即只有砍伐树木

以及后续加工时才计算产值，而对于生长中的树木则不计算产值。事实上，森林的非采伐性贡献也是产出，而且价值可观。

上述不合理的经济核算方式，促使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并不富裕的森林资源的高强度采伐及对主要林区初级产品的过度开发。

森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生态功能，通过林冠层、林下灌草层、落叶层、土壤层等多层次复杂空间结构截持与调节大气降水，产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净化空气等作用；其次是森林的木质、非木质林产品众多；还有森林的历史、文化、美学、休闲等社会价值巨大，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森林已成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上述森林功能的认识直接决定了对森林的经营（包括保护、培育、利用）。

因此，在考量和论证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及林业发展策略时，应将具有多种功能的森林资源作为资产，将森林的非采伐性贡献算作产出，并具体到对其所在地区（城、镇）的环境改善等多方面都算作正产出，而将环境的恶化算作负产出，并具体体现到国家和地区对森林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相关政策与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中。

至21世纪初，生态优先、三大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兼顾的林业经营思想正为全社会所共识。

2001年起，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我国林业正在实现从产业为主向以公益事业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三、森林资源及其配置状况是林业发展基础

当前，世界森林资源日趋减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世界森林资源评估报告，尚有森林面积34.36亿公顷，分布很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亚洲、拉丁美洲、北美和欧洲，非洲和大洋洲森林面积很小；从国家来看，则集中分布于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印尼和我国境内。其中，俄、巴、加、美的森林面积约占全球森林面积一半，拥有大片原始林，树木生长高大茂密，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高，森林开发利用价值大。上述4国林木蓄积量占世界的58.3%。

我国森林面积15894万公顷，占世界的4%，次于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高于印尼、扎伊尔，居第5位。活立木蓄积量124.9亿立方米，次于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和印尼等国，居世界第7位。

然而，如果以我国现有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同国土面积相比是不相称的。在占地球陆地7.2%的辽阔大地上只有占地球4%的森林，全国森林覆盖率16.6%，人均占有森林面积排名世界第119位。

正确认识和估计我国森林资源的现状，有利于严格保护我国现存宝贵的少量森林资源，确定合理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措施，合理地发展林业。

四、森林资源的地理分布及林业布局

(一) 森林资源的地理分布

我国森林资源总量不足，人均森林面积0.128公顷，只及世界五分之一；人均森林蓄积量9.05立方米，只及世界的八分之一；且地理分布很不平衡。天然林多分布偏远，如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因地处边疆，山势较高，气候寒冷，这里的森林生长茂密，林木蓄积量占全国30%左右；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等高山地带，森林资源也较丰富，林木蓄积量约占全国20%，

从各省（区）来看，以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西南的四川、云南、西藏（东部），华东的福建、江西，中南的湖南等省（区）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较大，而森林覆盖率的高低则依次为：福建、浙江、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吉林、云南、湖北等，森林覆盖率20%～40%。

(二) 四大林区及其重点保护措施

1. 东北、内蒙古林区。

曾长期作为全国最大的天然林区。区内森林面积3100多万公顷，林木蓄积量30多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四分之一。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和林木种类的差异，划分为：(1) 大兴安岭林区，跨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沿着大兴安岭呈东北—西南走向，形成一道宽200～400公里、长1000公里的巨大林带，主要树种有落叶松、獐子松、鱼鳞松、东北云杉和西伯利亚冷杉等；(2) 小兴安岭林区，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由西北向东南蜿蜒400余公里，山岭平缓，气候寒冷潮湿，红松、云杉、冷杉、落叶松、枫树、桦树等生长茂密；(3) 长白山林区，包括吉林省东部和辽宁省东北部。由于气候较温暖，除有针叶树以外，还有阔叶树生长，成为混交林，以红松、落叶松、杉松、赤松（以上为针叶树）、胡桃、楸、水曲柳（以上为阔叶树）等为主要树种。

东北内蒙古林区不仅是重要的林业基地，而且是天然的绿色屏障，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经过近百年来三次大的采伐期之后，已使林木资源骤减，原始林所剩无几，林区外缘平均退缩140公里，减少林地600万公顷，林区内水土流失面积急增至253万公顷，在资源、经济、生态效益等方面均出现危机。

据统计，1999年以前四十年中，国家在大兴安岭砍伐木材2.4亿立方米，财政收入很有限。然而，生态等方面的损失却很大，每年仅碳氧循环和水循环的损失就达157亿元，是木材生产的16倍，如加上其他生态损失，可能是成百上千倍。因大兴安岭自然地理条件差，一株落叶松长大要八十至一百年，长期繁衍的森林群落阻滞寒风，拱卫松嫩平原，连呼伦贝尔草原也受益。但连续四十年的超强度采伐已使大兴安岭森林的调节和屏障功能大为弱化，周边地区自然灾害随之增多。

为此，近年来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对森林工业实行结构调整。1998年末，国家宣

布对东北内蒙古林区最后一片未开发的原始林——乌玛、奇乾、永安山原始林区封闭管理，实为一项生态抢救措施。

从1997～2003年，东北、内蒙古林区木材年产量已由1853万立方米减至1102万立方米，但采伐量仍然过大。据估算，如不进一步减少，十六年以后可能无林可采。

2. 西南林区。

它包括横断山脉、藏东南的山地和滇南的林地。该林区纬度较低，但因山高谷深（相对高差可达2000～3000米），地势崎岖，使气候具有明显的垂直变化。从树种来看，从寒温带到热带树种皆有，因此，西南林区不仅是我国第二大天然林区，也是我国树种资源最丰富的林区。主要树种有杉、松、竹、樟等。

西藏森林面积达717万公顷（国土实际控制线内439万公顷），居全国第5位，而林木蓄积量却达20多亿立方米（实际控制线内14亿立方米）居各省区首位。仅林芝地区即有8亿立方米。西藏局部地区森林资源丰富，主要得益于印度洋暖湿气流沿河谷上溯，带来大量的热和水汽，生长出茂密且种属多样的原始林。

以前，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采运困难，西南林区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但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又开发过快，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有些地方的珍稀野生动植物（如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滇金丝猴）已濒临灭绝，危及这一地区生态平衡。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发生后采取一系列禁伐措施，以保护森林资源，减少水土流失。

3. 南方林区。

本区范围较大，包括秦岭淮河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的林地，主要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9个省区。区内开发历史悠久，人口和经济活动稠密，天然林资源受到破坏，除个别地区保留有成片的天然林（如湖北神农架林区）以外，主要是人工繁育的次生林。除用材林以外，还有各种经济林。

目前，这一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林区。其中，南岭、武夷山一带为杉木生产中心；湘、鄂、黔3省丘陵山地则为油桐产地；湘、赣、浙中部丘陵是油茶集中分布区；赣、闽、粤邻近地区是松脂产区；粤、桂、闽、台诸省区则是天然橡胶、八角、柚木、油棕、椰树等热带经济林木产区。

4. 防护林区。

本区主要包括横亘于我国北方、从东北西部到华北西北部和大西北一带的“三北”防护林带（目前是中国最大的防护林区），豫东、冀北沙荒林带（中国重要的果树和泡桐林区），东部、东南沿海海防林区。林区范围辽阔，然而森林覆盖率很低。

（三）林业结构变化及主要林产品地理分布

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原有地位轻微。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49年只占0.6%，2002年上升至3.8%。

近年来林业结构变化很大，虽木材产量减少，但其他产业、延伸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很快，2003年林业总产值达5860亿元，比1998年增加约1.5倍。目前我国林产业已形成包含林木种植、经济林、花卉业、木材采运、木材加工、木浆造纸、林副产品采集、森林旅游等在内的较完整产业链。

在林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木材生产，1949年仅为567万立方米，1995年达到6767万立方米。以后呈下降趋势，2002年为4436万立方米。主要出产于东北、华东和中南等地。

作为世界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国现有竹林面积约为420万公顷，胸径5～10厘米的大径竹约有220亿株，主要分布于南方林区的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江西、云南等省，湖北、广西境内也有大面积竹林。竹子生长快、成材早、产量高、用途广泛，故发展较快。竹业年产值和年加工产值及生态旅游价值渐增，市场前景广阔。浙北安吉有“中国竹乡”之称。

至20世纪末，因木材生产减少并受到严格限制，使竹业发展备受重视。国家林业部门规划在十五年内改造和新建竹林基地120万公顷，使全国竹林种植面积达到541万公顷。预计到2010年，毛竹产量将由4亿株增至8亿株。

除以上木材、竹材以外，我国主要林产品还有天然橡胶、松脂、生漆、油桐籽、油茶籽和核桃等。它们产自占森林面积7%的经济林，我国的经济林包括生产木本粮油、工业原料、药材、香料等林木，经济价值较大。但这些林木对自然环境和管理技术的要求较严格，因此生产的地域性十分明显。

天然橡胶是国际公认的“稀缺资源”。我国天然橡胶产量1957年仅200吨，且地理分布范围极小，只局限于当时广东省境内个别地方，后突破北纬18度种植禁区，在云南、海南、广东大面积种植。2002年全国天然胶产量52.7万吨，成为世界第5产胶国(次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印度)。近年越南橡胶产量增长快，预计到2010年达59万吨，仅次于泰国（220万吨）、印尼（205万吨）、印度（72万吨），位居世界第4位。

虽然产量大有增长，我国工业所需60%的天然橡胶原料仍要进口。目前，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橡胶消费第一大国。为推进橡胶产业化经营，正在调整产业布局。广东、海南和云南农垦逐步关闭农场小型加工厂，整合资源，组建大型加工厂和橡胶集团，并用需求量大、效益较好的子午胎胶和浓缩乳胶逐渐取代目前的大路品种。此外，改变经营管理体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提升产量水平，目前云南的产胶量已达先进水平。

松脂是指从松树树干上采割而得到的树脂。2002年产量56.4万吨。松脂加工后可得松香和松节油。目前我国松香的年产量已达40多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出口量为20多万吨，占世界松香贸易量的一半以上。松香产地主要在南方，以广西、广东、福建、云南、江西、湖南等地出产居多。

油茶树的种植，主要分布于南方林区的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省区。油茶籽的产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时高时低。从全国来看，1957、1981、1985、1989、1997、2002年为高产年，产量为：50万～85万吨。

油桐籽的产地，主要分布于西南、华中一带的丘陵、山区，在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4省（区）有大面积连片油桐林。全国油桐籽产量很不稳定，2002年为38.9万吨，尚未达到20世纪50年代的生产水平（1957年曾达51.8万吨）。

五、中止数十年超强度采伐，保护天然林，营造人工林

历史上，中国曾是林木茂密、森林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汉初全国森林覆盖率达64%，后因不合理开垦、饥荒、战乱，林地一再缩小。到清初，森林覆盖率减至21%，1949年再减至不足9%。

近半个多世纪大力开展造林，林地有所扩大，全国森林覆盖率由9%上升至17%，但同时由于对天然林资源开发过度，保护不力，尤其东北林区连续数十年不间断采伐，超强度索取，致使天然林资源大为衰退，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全国性的森林资源危机。

中国森林覆盖率变迁，如图表2－11所示：

图表2－11　　中国森林覆盖率变迁

项目＼时期	汉初	清初	1949	2000	林业规划		
					2010	2020	2050
森林覆盖率（%）	64	21	9	17	19	23	26

针对国有林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从1998年起我国实行国有天然林保护工程（“天保工程”），停止生态公益林的采伐。国有林区主要分布于江河源头及重点山脉地带，集中了全国60%的天然林资源。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维系着民族生存与发展，并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庇护所覆盖区域乃至全国生态环境发挥着极重要作用。

“天保工程”期限十三年（1998～2010年），投资1196亿元，目标是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对国内尚存的天然林重新分类、区划；调整森林资源经营方向，促进天然林资源保护、培育；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对划人重点生态公益林的森林实行严格管护，停止采伐；对划人一般生态公益林的森林，大幅调减森林采伐量；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大力开展营林、造林；加强资源综合开发，调整和优化林区经济结构。

至2003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初见成效，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的13省已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同时，林业经营方向实行战略调整，生态建设上升至突出地位。

由于我国森林资源相对贫乏，而禁伐天然林的决策生效后，使林产品需求加大和供应不足矛盾凸显。为此，有必要开发海外森林资源，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自主开发海外林业基地。另外，发展人工林，建设防护林体系和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至2002年，全国人工林面积达到6607万公顷，居世界首位。同时建立了一系列经济林开发基地，全国经济林面积已达到2733万公顷。

六、总体布局设想与分区域林业建设

我国林业发展总体布局设想是：西部（三北、西南、青藏）在保护的基础上加速绿化；东部（华北、中原）发展种植林业及向农区、城区和林业下游产业延伸；北部（东北地区）休养生息以恢复森林资源；南部（南方、东南沿海热带区）大规模发展商品林（用材林、经济林）。

在上述基础上，形成"西治、东扩、北休、南用"的林业发展新格局。这是在重新认识森林与人类的关系、森林功能重要性以后，林业专家于2003年提出的。

七、荒漠化危害及对策

我们已成为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199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267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27%；另据国家林业局2002年公布的监测结果，全国土地荒漠化、沙化呈局部好转、整体恶化之势。

荒漠化潜在发生区域，在我国主要是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占国土35%，其中，荒漠化土地已占到这一区域的79%。

荒漠化的地理分布涉及新疆、内蒙古、西藏等18省区，集中于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西部、西藏北部。荒漠化类型有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冻融荒漠化、盐渍荒漠化等。从荒漠化程度来看，我国重度荒漠化比重达39%，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经济建设活动频繁，经济布局不当（如草原过牧，城乡建设与布局违背"生态至上"原则等），加之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也加快了荒漠化。1994～1999年，我国荒漠化土地年均增加1.04万平方公里，每年因荒漠化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间接损失难以估量。

荒漠化在我国的扩展，除导致土地资源锐减、土地生产力下降以外，还导致自然灾害（如沙尘暴等）频发，造成贫困加剧。

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防治荒漠化。为此，我国已制定防治荒漠化的目标，即：力争到2010年基本遏制荒漠化扩展的趋势；到2050年使能治理的荒漠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

第七节　牧业发展中的过牧危害及生态灾难，牧业基地建设

一、牧业经济发展和布局现状

2002年，牧业产值8455亿元，比1949年的34亿元增长200倍；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亦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2002年的30.9%。但是，同经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还是较低的。目前，我国牧业正依托规模化养殖和产业经营来加快发展，牧业布局也由传统分散型向现代化集约型转变。

从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头数的情况来看，2002年全国猪、牛、羊肉产量达到5228万吨，居世界第1位。其中，猪肉产量由以前占80%以上下降至65%，禽肉上升至20%，牛、羊肉仍相对较少。同国外肉类生产构成相比，差异甚大。这主要是受国内绝大多数居民传统习惯的影响。近几年来，随着居民饮食结构与消费习惯改变，对鲜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量大增。因此，牛奶和羊奶的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乳品消费量升至22千克，但仍远低于世界水平（100千克）。

全国大牲畜的头数，据2002年末统计为15189万头。在大牲畜中，以牛的饲养量最多，常年保持在1.3亿头左右，远远超过其他大牲畜（马、驴、骡、骆驼）之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获取牛肉、皮张和牛奶为目的的菜牛和乳牛饲养发展迅速。此外，驴在大牲畜的构成中居第2位，以下依次是马、骡、骆驼。90年代中期以来，马、驴、骡和骆驼的饲养则呈下降趋势。目前，我国仍是世界上出产马、驴最多的国家。

猪的饲养在我国很普遍，在农区畜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猪的存栏数近年保持在5亿头左右，数量居各种牲畜之首，而且经济价值也大。我国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分别占世界的44%、46%。近十年来，由于规模饲养发展快，肉猪饲养业成为买方市场，增长速度放慢。

羊的饲养增幅过高，2002年末全国有3.2亿只羊，比1949年增长6倍。近年许多草原因载畜量过大而不堪重负，造成草场退化，甚至土地沙化。因此，养羊业发展规模必须考虑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

二、牧业结构变化，新的产业链及产业化模式

畜产品中的肉、蛋、奶发展均衡，且增幅较大；草食家畜和禽肉生产等节粮型牧业发展较快，其畜产品所占比例有较明显增长。以上发展变化使牧业结构渐趋优化。

因城乡居民对猪肉以外多种肉类（牛、羊肉等）需求快速增长，对其他畜产品（鲜奶、奶制品、羊毛、皮张等）的需求量也大增，故形成新的朝阳产业及产业链。其中，产奶牲畜饲养、奶源基地建设以及奶制品加工业和市场终端网络，至21世纪初，已形成新的产业链并成为跨牧业、食品加工业、商业的朝阳产业。

近年，跨国公司挟资本、品牌、技术优势进入中国市场，但国内乳业企业以“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将中国乳业产业链拉起、延伸。这种很长的产业链，将第一产业的奶源基地、第二产业乳品加工、第三产业的终端销售网络串连，而跨国公司却受制于奶源，特别是在有着运距、保鲜所限制的鲜奶市场。

三、牧业地理分布，过牧危害与草原生态灾难

区域化、规模化是我国牧业发展在地域分布和生产上的主要特点。如四川、湖南的养猪数和猪肉产量多年来均居全国前2名；山东、四川、河北不仅肉类总产量居全国前列，且禽蛋占全国五分之二；区域化、规模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原来一些发展条件较好但却长期落后的地区终于改变了面貌。如东北各省禽蛋肉类生产均获长足发展。

从农、牧区的分布情况来看，差异很明显。如猪的饲养差不多完全集中于农区，以南方各省（自治区）饲养最普遍。2002年全国有18个省区猪的存栏头数在1000万头以上，其中有13个在南方。集中分布的省区有：四川、湖南、河南、广西、山东、河北、云南。

羊的地域分布则大体相反。2002年末全国有11个自治区（省）羊的存栏头数在1000万头以上，其中有8个省区在北方。羊的种类在牧区以绵羊为主；山羊的饲养主要分布于农区各省，且南北并重，北方和南方的一些省均有较多饲养。养羊（尤为山羊）过多，特别是放养，对植被往往造成严重的破坏。

大牲畜的地理分布，总的来看也是南北并重。如图表2－12所示：

图表2－12　　我国主要牲畜、畜产品地域分布（2002年）

产地、名次 项　目	出产最多的省、自治区（前6名）					
	1	2	3	4	5	6
大牲畜（牛、马、驴、骡、骆驼等）	河南	山东	四川	云南	河北	广西
猪（年末数）	四川	湖南	河南	广西	山东	云南
羊	内蒙古	新疆	河南	山东	河北	西藏
猪、牛、羊肉	四川	河南	山东	湖南	河北	江苏
牛奶	黑龙江	内蒙古	河北	新疆	山东	北京
绵羊毛	新疆	内蒙古	河北	吉林	山东	黑龙江
禽蛋	山东	河北	河南	江苏	辽宁	四川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摘编。

2002年末全国有21个省（自治区）大牲畜的存栏头数在300万头以上，其中：有12个省（区）位于北方，9个省（区）在南方。如果以农区、牧区来分，则有16个省（区）大体上位于农区，5个省（区）大体上地处牧区。我国大牲畜的构成是以牛、马、驴、骡、牦牛、骆驼为主。其中，牛多分布于河南、四川、山东、云南；20世纪90年代以来，奶牛饲养量稳步增长。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河北等省区；马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古、云南、吉林等省区；驴主要分布于河北、新疆、甘肃等省区；牦牛是藏民聚居区所特有的大牲畜，主要分布于青海、西藏；骆驼有“沙漠之舟”之称，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区。其中，地处内蒙古西北部的阿拉善盟，有“骆驼之乡”的称号。因生态环境恶化，骆驼数量锐减。

根据我国畜牧业发展的自然资源、历史和经济条件等地区差异以及各地畜牧业生产的特点，在全国范围内大致可分为四种畜牧业生产类型区：

（一）牧区畜牧业区，牧业布局因过牧与草原生态灾难而改变

包括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下游—阴山—鄂尔多斯东缘—祁连山—青藏高原东缘—线以西的广大地区（个别平原灌区和绿洲除外），土地面积占全国52%，我国辽阔的天然草场大多分布于此。区内畜牧业生产规模及其布局曾较为合理，但后来既发展粮食生产，又使牲畜超载过牧，草畜矛盾加剧，造成草原退化、沙化。

从地理特征来看，我国草原几乎都是干旱草原，产草量较低，不宜放牧采食量大的牲畜或采食中破坏草原的牲畜（如山羊），对细毛羊产业的发展也不宜过量。同时，冬季长且寒冷，易发黑灾、白灾。

20世纪50～90年代，90%的可利用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在增加，使我国成为世界草原退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草原生态“局部治理、总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大面积退化、减少的原因，除气候因素外，主要是不合理开发利用：（1）超载过牧。牧区草原平均超载36%，使牧草生产力和覆盖度下降；（2）滥垦。累计开垦草原1930万公顷，二分之一已经沙化；（3）滥采乱挖药用与经济植物。仅内蒙古草原就破坏草原1267万公顷，其中200万公顷完全沙化；（4）水利设施建设滞后，也使草原退化。

在西部有些草场，经历长期过牧之后，丰茂的牧草雕零时，还会生长出一种花开妖艳却有毒的植物，警示草场已退化，预示生态衰变，并表示自然界对人类掠夺式开发的报复。

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牧业生产地域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牧业布局向农区特别是城郊地带转移，而传统的牧区成为休养生息、生态建设与保护以及适度发展特色牧业的重点区域。

（二）农区牧业区

地处牧区东南。农区牧业在农业经济中一般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全国畜牧业生产中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牲畜总头数约占全国80%，提供肉食占全国90%以上，是全国以生猪、家禽为主要特色的畜牧业生产区，是大批提供肉猪、家禽肉、禽蛋以及猪鬃、

肠衣、禽类、绒毛等的生产基地。

（三）农、牧交错的畜牧业区

地处农业区和纯牧区的接壤地带。这一地区的畜禽品种多，一般以畜栏饲养为主，兼有放牧。畜种构成甚为复杂，马、牛、羊、家禽等均有分布。

（四）城郊畜牧业生产类型区

主要位于各城镇郊区和工矿区周围，在20世纪80~90年代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因城市、工矿区居民的肉、蛋、奶消费量不断增加，使城郊畜牧业形成规模经济，其中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建成现代化的肉、蛋、奶生产基地。从生产布局与经营管理上均体现出现代牧业发展态势。

城郊牧业生产类型区占地小，对生态环境损害减少，劳动生产率高，但对局部地区环境仍有污染。

四、牧业发展前瞻，重点建设的牧业基地

至20世纪末，我国牧业发展已形成生猪、蛋鸡两个相对成熟的产业，肉鸡、牛羊肉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只有奶业仍属弱势产业。在21世纪，我国牧业加快发展牛羊肉、禽肉生产，突出发展奶业、羊毛，并加强各自的基地建设。

预计至2005年中国内地乳品产量达1395万吨，超过阿根廷，次于欧盟、印度、美国、俄罗斯，居世界第5位。但人均乳品消费量11.3千克/年，仍然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欧盟243千克、印度73千克、日本72千克），仍需大量进口乳制品。

（一）重点发展三大牛奶优势产区

目前我国奶业正处于加快发展阶段。制约奶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良种奶牛数量不足，单产水平低，饲养规模小，奶业布局分散，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滞后。对此，加强奶牛繁殖，扩大奶牛饲养规模，发展小区养殖，主攻奶牛单产和牛奶质量安全水平。经规划正在建立三个牛奶优势产区：（1）东北优势产区。含黑龙江、内蒙古2省区12个地市（盟）37个县市（旗）；（2）华北优势产区。含河北、山西2省10地市29个县区；（3）京津沪优势产区。含3市的13个郊区县和25个农场。.

近年来在我国北纬45度及附近地带（松嫩平原、完达山麓、三江平原等）乳业经济发展较快，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乳业经济带，包含奶牛养殖、乳品加工、冷藏、流通等企业。对世界乳业来说，北纬45度线是国际著名的优质奶牛带，乳业发达国家的许多乳制品工业区多集中布置于这条纬度地带上，黑龙江乳业地带亦包括在其中。

（二）建设6个肉牛、肉羊优势产区

至2002年，我国是仅次于美国、巴西的第三大牛肉生产国和第一大羊肉生产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肉牛、肉羊饲养水平不高。为此，正在重点建设6个肉牛、肉羊优势产区：（1）中原肉牛优势产区。含豫鲁冀皖4省7地市38个县市；（2）东北肉牛优势产区。含辽吉黑内蒙4省区7地市24个县市（旗）；（3）中原肉羊优势产区。含豫鲁

冀苏皖5省6地市20个县市；（4）内蒙古中东部及河北北部肉羊优势区。含2个地市10个县市；（5）西北肉羊优势区。含宁甘青新4省区5个地市（州）15个县市；（6）西南肉羊优势区。含川渝滇黔桂5省区市的5个地市16个县市。

预计到2007年，上述优势产区将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肉牛、肉羊产业带，牛羊肉产量提高30%以上，优质肉比重由2002年不足5%提高至20%以上，结合无规定疫病区建设，使中原、东北等地成为我国牛羊肉主要出口基地。

（三）综合性牧业基地

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利弊、发展畜牧业的历史基础，建设综合性牧业基地：（1）大兴安岭两侧草甸草原地区肉牛、奶牛、细毛羊生产基地；（2）新疆细毛羊、肉用牛羊、役用马生产基地。其中在伊犁州、博尔塔拉州、昌吉州、巴音郭楞州、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将建成全国最大的细毛羊生产基地；（3）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牛羊肉、乳、毛生产基地；（4）华北、西北农牧交错地区牛羊肉、毛生产基地；（5）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及鲁、豫地区猪、禽为主的肉蛋生产基地。

（四）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

针对长期以来的过牧、草原退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在蒙甘宁西部荒漠草原、内蒙东部退化草原、新疆北部退化草原、青藏高原东部江河草原等严重退化的草原，安排近千万公顷退牧还草，并实行重点集中治理。此外，在1999～2003年全国退耕还林的1500万公顷中，也有一些涉及牧业地区。

第八节　渔业：由捕捞转向养殖

渔业包括水生动物和海藻类植物的养殖和捕捞。一般分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广义的渔业还包括水产品加工业。因为渔业既能为人类提供副食品和工业原料，还可为畜牧业提供饲料，因此兼有农、工、商业的性质。目前我国渔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由养殖、捕捞、加工、流通、渔用工业等组成的产业体系。

一、渔产居世界之首，但加工差距大

我国水产品的产量在1936年曾达到150万吨，至1949年下降到45万吨。此后，渔业发展较稳定，但从60年代到80年代，由于政策失误，水产品总量增长缓慢，少数年份甚至倒退，出现“负增长”。1982年起调整渔业政策取得成效，出现增长稳定、增产幅度较大的局面。水产品总量继1988年逾1000万吨、1994年逾2000万吨之后，2003年达4690万吨。占世界水产品总量三分之一，超过日本、俄罗斯，连续十六年居世界首位。同时，水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渔业产量虽大，但加工量低，高附加值产品少，废弃物利用率低，传统技术落后；而且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恶化，渔业结构调整滞后等问题日益凸显，也影响到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

根据国际渔业贸易一体化、自由化的新趋势，21世纪初起，我国将按照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原则，建设一批从种苗培育到养殖、加工等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生产基地。重点发展对虾、罗非鱼、鳗鱼等品种的种苗、养殖、加工一体化的出口基地。至2002年，中国已取代泰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鱼类出口国。

二、渔业产业结构变化

在渔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我国渔业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养殖渔业的产量在渔业总产量中的比重，由1985年时的44%提高到2002年的64%；沿海捕捞渔业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外海和远洋渔业从无到有，产量增长快。另外，渔业总产值在大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由1979年的1.4%、1985年的3.5%提高到2002年的10.9%以上。在我国许多地方，渔业已发展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全国从事渔业的劳力增加了1000万人。

在渔业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时，渔业的资源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如在我国第一大渔场——舟山渔场及邻近海域的捕捞渔业中，传统的大宗鱼类资源衰退，从过去以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大经济鱼类为主体的渔业，转变为以上层鱼类、虾类和小型鱼类为主体的次生类型。在20世纪60年代，四大鱼类产量占舟山渔业总产量的80%，到90年代只占20%了。

三、发展渔业的资源条件

我国濒临太平洋的西北岸，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岸线总长3.2万多公里；海域总面积473万平方公里；其中：拥有12海里领海权海域面积37万平方公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管辖海域300万平方公里。这是发展海水养殖和海洋捕捞的有利场所。在海域总面积中，大陆架渔场面积280万平方公里，海水可养殖面积260万公顷，浅海滩涂可养殖面积242万公顷。

从全国的大农业发展目标看，海洋水产业应是发展的重点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沿海各地正在大力发展“耕海牧渔”，实现海洋农牧化。21世纪以水产业为重点的海洋产业将得到大发展。我国沿海海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利的场所。

上述海域从南至北跨越地理纬度约44度，包括热带、亚热带、温带，故适生鱼类多；又由于沿海暖流、寒流、外海高盐水和沿岸低盐水在此交汇；再加上有几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及众多中小河流注入其中，带来丰富有机物，浮游生物生长快。以上这些，对于吸引鱼类回游、索饵产卵和繁殖生长有利。我国渔业生产的发展，如图表2－13所示：

图表 2－13　　我国渔业生产的发展

年 份	水产品总产量（万吨）	年 份	水产品总产量（万吨）
1936	150	1975	441
1949	45	1985	705
1952	167	1990	1237
1957	312	1995	2517
1962	228	2003	469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1986》、中国 2003 年《统计公报》。

从生物生产力的角度看，我国近海是太平洋生物生产力的高值区域。这里所拥有的海洋生物，有数千种，鱼类即有 1500 多种，以暖水性鱼类居多。其中主要经济鱼类约 200 种。此外，经济虾类有 100 多种，海藻类则有 2000 种左右。按其水域、水温，可以分为渤海、黄海的温水性鱼类（大黄鱼、带鱼、鲐鱼、鳕鱼、鳓鱼等），东海、南海的暖水性鱼类（带鱼、鲹鱼、墨鱼、马面纯、鲳鱼、鲷鱼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亦称为中国海洋的四大经济鱼种。

在淡水渔业方面，淡水水域包括河流、湖泊水面，水库和塘堰。在上述水域中，相当一部分适合发展淡水养殖。养殖面积约 500 万公顷，尚有发展潜力。

我国淡水鱼类约有 700 多种。其中，经济鱼类有 50 多种，鱼种以青、草、鲢、鳙、鳊、鳝、鲤、鲫、鲟等为主。青、草、鲢、鳙是我国特有的经济鱼类。

四、过度捕捞，海洋污染、海底生态荒漠化趋势，休渔与轮渔

从 1960 年以来，大、小黄鱼资源由于过度捕捞而出现了严重衰退。至 80 年代，仅有带鱼尚能形成鱼汛；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在东海等海域，由于滥捕等原因，带鱼也难以形成渔汛了。而在南海海域，捕捞能力大大超过资源的再生力。海洋的底部原本是凹凸不平的，但由于捕捞船拖网在海底长期拖拉，许多礁石遭破坏。没有了礁体，海洋微生物无法生存，海底生态环境因此出现荒漠化趋势。另外，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人海洋，造成海水水质恶化，赤潮灾害等频繁出现。珠江口水域原有 200 多种海洋鱼类繁衍生长，现已锐减至 50 余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仅存 400 头左右。因环境恶化也使渔业资源出现衰退现象，渔业资源的平均密度只有 80 年代的八分之一，传统的八大渔汛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一些海域甚至无鱼可捕。

另外，海洋污染趋于严重，主要是营养盐、有机物、石油类和重金属泛滥，赤潮增加，使我国每年减少 50 万吨捕捞量，经济损失 30 亿元。在我国四大海区中，以东海污染情况最严重，有一半以上海水水质属于超四类。据 2002 年调查，浙沪等华东 5 省市濒临海域，受到严重污染。

鉴于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现象严重，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出发，从 1990 年开始

执行“零增长”计划和“伏季休渔”，并消化过剩的捕捞力，同时加强海洋资源环境监测、管理等措施。2003年起又实施“海洋渔船控制制度，预计至2010年，我国海洋捕捞渔船从2002年的22万艘再减至19万艘，功率数从1270万千瓦减至1143万千瓦。

2000～2010年，广东治理海洋生态环境，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在沿海投放大量人工鱼礁，为各种鱼类寻找食物、繁衍生长及躲避天敌，提供良好场所。并规划使传统的八大渔汛复兴。

五、长江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长江流域水域面积约占全国淡水面积50%，渔业产量占全国淡水渔业总产量60%，是我国淡水渔业资源集中度最高地区。但这里同时又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区域。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已给长江渔业地位带来多方面威胁。水环境污染、水利工程建设、围湖造田、过度捕捞等因素，使长江流域原本丰富的渔业资源及水生哺乳类资源处于严重衰退状态，直接影响长江渔业经济发展。

据统计，长江流域自然资源捕捞量1954年为54万吨，近年减至10万吨以下，优质鱼比例更是大减。著名的长江鲥鱼，1975年捕捞1570吨，现已难见。长江四大家鱼鱼苗年产量从300亿尾减至10亿尾，许多经济鱼类已形不成鱼汛，或者濒临灭绝。

2002年，国家决定在长江流域实行春季禁渔。长江干流从云南德钦以下至长江口(南汇嘴与启东嘴连线以内)，加上汉江、岷江、嘉陵江、乌江、赤水河等一级通江支流以及鄱阳湖、洞庭湖区为禁渔范围。2003年，长江流域10省市同步禁渔。

六、从资源条件变化到发展战略调整，建立三个优势区

随着世界渔业资源日益匮乏，曾长期作为渔业主业的捕捞业发展前景堪忧，传统渔业优势迅速弱化。这一点不仅在世界也在东亚和中国日益凸显。

为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须从战略上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如实行“捕捞—精深加工”、“养殖—精深加工”等发展战略，通过精深加工，延长渔业经济产业链，提高渔业附加值，逐渐在国内外市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更是水产养殖大国，养殖产量占世界76%，水产品出口也已占到农产品出口的首位。但我国水产品出口竞争力不稳定，质量安全问题突出，加工流通和产业化滞后。对此，近期重点做好水产品质量安全、种苗繁殖、精深加工，改善水质生态环境，推广健康养殖方式，巩固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在地域布局方面，优先发展三大水产品优势区：(1) 东南沿海养殖带。主要布置于浙、闽、粤、桂、琼5省区28个地市43个县市，重点发展鳗鱼、对虾、罗非鱼、大黄鱼；(2) 黄渤海养殖带。主要布置于鲁、冀、辽3省9个地市23个县市，重点发展对虾、贝类；(3) 长江中下游养殖区。主要布置于苏、皖、赣3省11个地市12个县市，重点发展河蟹。

预计到2007年，上述三大优势区（带）按国际标准组织生产，良种覆盖率由2002

年的70%提高到80%，水产品加工率由2002年的40%提高到50%，养殖产品出口比重明显提高。

七、专属经济区制度对海洋捕捞业的重要影响

多年来，随着中日、中韩、中越双边渔业协定的签署、生效，海洋渔业由领海外自由捕捞向专属经济区制度过渡，我国海洋捕捞渔船的作业渔场明显缩小。这也是导致21世纪头两年外海渔场国际纠纷不断的重要原因。

为此，到2005年前后，将有3万艘渔船陆续从部分外海传统渔场撤出，并有30多万沿海捕捞渔民和100多万渔业人口转产转业至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及非渔产业。

上述改变将直接影响到海洋捕捞及其关联产业，但却有利于推进我国海洋渔业长期累积矛盾的解决，使海洋渔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对实现海洋渔业以及沿海渔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八、渔业地理分布的变化

（一）海洋渔业

我国水产品中，海水产品约占58%，在海水产品中，各种海水鱼类近占五分之二，其他海水产品合占五分之三。海洋渔业生产区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沿岸渔业生产区。

通常指海岸线以外水深40米以内的狭长水域，包括渤海大部以及黄海、东海、南海的沿岸地带，海域面积约3300万公顷。这一海域由于承受大陆众多江河注人，故海水盐度较低，且富含有机物，成为多种鱼类繁殖场所。区内海域南北狭长，因气候情况不同，渔业资源差别较大，可分：(1) 北部渤海区；(2) 黄海沿岸区；(3) 中部东海沿岸区；(4) 南部南海沿岸区。它们在历史上一向是沿海渔民的重点捕捞区。

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捕捞过度、工业排污，使本区部分海域（特别是渤海）渔业资源严重破坏。如渤海湾沿岸有217个排污口，1995年排污量达98万吨，海底重金属含量超标2000倍；加之渤海海域过量捕捞，20世纪90年代中期渤海作业的船网为80年代初的5倍。因此，使渤海湾一带继同乐鱼、绘鱼绝迹，螃蟹、平鱼、黄花鱼、毛蚶、对虾形不成渔汛之后，特有鱼种棘头鱼也濒临绝迹。

现在，本区是我国渔业资源的重点保护区，也是实行捕捞和养殖相结合、大力发展海水养殖的渔业区。在本区范围内，目前主要有如下海水养殖基地：辽宁、山东的扇贝、海参、鲍鱼养殖基地；山东、江苏的对虾、文蛤、海带养殖基地；浙江、福建、广东的对虾、牡蛎养殖基地。

2. 近海渔业生产区。

指沿岸渔业区外侧、水深40～100米海域，面积5300万公顷，超过沿岸渔业生产区。这一海域由于有沿岸水和外海水交汇，水质肥沃，饵料丰富，是多种经济鱼虾的索

饵场和越冬场。因此，我国一些主要的渔场都集中于此。因海域内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的差异，大体以北纬34度线为界，此线以北的黄海海域，重要渔场有石岛渔场、连青石渔场，主产冷水性鱼类；此线以南的南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一带，有大沙、沙外、长江口，江外、舟山、鱼山等重要渔场，是海洋水产品主产区，舟山渔场为中国第一大渔场，地处舟山渔场中心的沈家门渔港是全国第一大天然渔港，与挪威的卑尔斯港和秘鲁的卡亚俄港并称世界三大渔港。鉴于捕捞船只增长过快，本区已对海洋捕捞强度严格控制。

3. 外海和远洋渔业生产区。

指近海渔业区外侧、水深100~200米海域，包括东海、南海的外海和台湾岛以东的太平洋洋面。主要渔场有东海外海的五岛、海礁、对马、济州岛渔场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外海渔业生产区的范围迅速扩展，我国内地远洋渔船向西越过印度洋进入西非大西洋水域，向东已越过太平洋进入白令海和阿拉斯加湾一带，进行远洋捕捞作业。至1995年，我国内地的外海和远洋渔业产量已占海洋捕捞总量的10%，2000年再增至34%；而台湾渔船的远洋作业区域也已发展到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等海域。至90年代，台湾远洋渔业产量约占海洋捕捞总量的一半。

（二）淡水渔业

淡水渔业在我国渔业生产中的地位，近二十年来大有提高。淡水水产品占全国水产品的比例，1978年为22.7%，2002年达到42.1%，使淡水渔业由原来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变成与海洋渔业并驾齐驱了。我国淡水渔业地位的变化，如图表2－14所示：

图表2－14　　我国淡水渔业地位的变化

年　份	水产品合计（万吨）	比　例（%）	
		海水产品	淡水产品
1952	167	63.5	36.5
1957	312	62.2	37.8
1965	298	67.5	32.5
1978	466	77.3	22.7
1985	705	59.6	40.4
1990	1237	57.7	42.3
1995	2517	57.2	42.8
2002	4564	57.9	42.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3》。

根据我国各地淡水渔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状况的差异，全国淡水渔业可划分为以下5个区域：

1. 长江、淮河流域淡水渔业区。

本区江河湖沼塘库密布，淡水水面约占全国50%，且鱼类饵料来源丰富，盛产鲤、

鲫、鳊、青、草、鲢、鳙、鳜、鲥、鲚等鱼类。淡水鱼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近60%，区内已形成以下淡水鱼商品生产基地：(1) 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区；(2) 洞庭湖区；(3) 洪湖梁子湖区；(4) 鄱阳湖区；(5) 巢湖和泊湖区；(6) 微山湖东平湖区。

2. 珠江流域淡水渔业区。

淡水面积约占全国17%，气候条件十分有利，鱼类可四季生长。盛产青、鲢、鳙、草等鱼类。区内的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为全国淡水鱼单产最高地区，也是最主要的淡水鱼商品生产基地之一。

3. 黄河、海河流域淡水渔业区。

淡水面积约占全国18%，但养鱼不普遍，养鱼水域单位面积产量也较低。鱼类产量只占全国7%，主要鱼种有鲫、鲤、白、鳜鱼等。

4. 辽河、黑龙江流域淡水渔业区。

淡水面积约占全国12%，产鱼量占5%，有鲫、鲤、白、鲟、鲑等。

5. 青海、新疆、西藏内陆渔区。

淡水面积分散，利用率低，产量甚微。

九、主要渔港、渔场、渔获物产地

(一) 渔港

我国的海洋渔港，从北至南主要有：獐子岛、皮口、辽滨（以上位于辽宁省沿海）、南堡、天津港、南排河（以上位于河北省、天津市沿海）、岔尖、海防、羊角沟、三山岛、蓬莱、隍城、烟台、威海、龙须岛、石岛、青岛、石臼所（以上位于山东省沿海）、连云港、大洋港、浏河（以上位于江苏省沿海）、嵊泗、沈家门、宁波、澶门、石浦、松门、温州（以上位于浙江省沿海）、沙埕、三沙、马尾、东澳、三江口、崇武、沙坡尾、大澳（以上位于福建省沿海）、基隆、苏澳、新港、东港、高雄、台南、马公（以上位于台湾省沿海）、汕头、汕尾、澳头、新湾、香洲、东平、闸坡、博贺、湛江、乌石、草潭（以上位于广东省沿海）、清澜、白马井（以上位于海南省沿海）、北海、企沙（以上位于广西沿海）。

在上述海洋渔港中，又以烟台、石岛、青岛、沈家门、宁波、马尾、高雄、汕头、湛江等生产规模较大。地处舟山群岛上的沈家门渔港，为我国目前最大的天然渔港。这里接近我国第一大渔场，港内水域宽阔，避风条件良好，可同时容纳1000艘渔船停靠。沈家门渔港所在的舟山市是我国目前唯一的渔港城市。

淡水渔港同海洋渔港相比，淡水渔业的生产较分散，因而淡水渔港的生产规模和集中程度不及海洋渔港。目前，我国较大的淡水渔港有：武汉、九江、浏河、广州等。

(二) 渔场

海洋渔场从北至南主要有：海洋岛、辽东湾、滦河口、渤海湾、莱州湾、烟威、石

岛、青岛、海州湾、大沙、吕四、长江口、舟山、鱼山、温台、闽东、闽中、闽南、粤东、珠江口、沙堤口、电白、洲头、铜鼓、三亚、莺歌海、昌化、白马井—西口、涠洲、青兰山渔场等。

（三）渔获物产地

我国主要渔获物产地（按渔获量多少排列）依次为：山东、广东、福建、浙江、辽宁、江苏、广西、湖北等省，渔获量均在200万吨以上。但各省的渔业结构差异较大，有的以海洋渔业为主，有的则以淡水渔业为主。我国主要海洋渔获物产地为山东、福建、浙江、广东、辽宁、广西、台湾等，渔获量年均在100万吨以上。浙江舟山市年产水产品130万吨，出口10万吨，有“中国渔都”之称。

全国淡水渔获物产地主要是湖北、广东、江苏、安徽、湖南、江西等省。主要渔港及渔获物产地，如图表2－15所示：

图表2－15　　我国主要渔港及渔获物产地

主　要　渔　港	海洋渔港：沈家门、高雄、石岛、烟台、青岛、马尾、宁波、汕头、湛江
	淡水渔港：武汉、九江、浏河、广州
主要渔获物产地（数字为2002年鱼类和其他水产品的总量，万吨）	海洋渔获物主产地：山东（598）、福建（495）、浙江（409）、广东（374）、辽宁（327）、广西（166）
	淡水渔获物主产地：湖北（272）、广东（254）、江苏（237）、安徽（163）、湖南（150）、江西（138）

第三章　能源布局

能源，是指可以提供大量能量的物质和自然过程。它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前提。近三十多年来屡屡出现的能源危机，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因此，能源的开发、布局和运输格外引人注目。

能源工业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电力、核工业等。其发展速度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并直接影响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曾九次改变能源机构设置，能源开发及其结构和布局有很大变化。

第一节　能源资源与能源结构

一、能源资源总量大，但油气资源相对不足

能源资源，指经过加工或利用后能够产生动力的煤、石油、天然气、地热、水力、风力、太阳能等。对能源资源进行加工、利用的生产部门，称为能源工业。能源工业发展和布局，需要有能源资源作保证，资源状况往往影响到能源工业生产规模、能源结构及其地理分布。

我国能源资源中，水力资源蕴藏量居世界首位，煤炭资源已探明的保有储量居世界第2位，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不足。此外，光能资源丰富，分布从东向西增多；在铀资源方面，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南方发现大型铀矿，可为自主开发利用核电提供核燃料。应该看到，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数量较少，同世界许多国家相比不具有优势。因此，必须节能，对已发现的能源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

二、能源结构矛盾突出

能源结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源工业的内部构成。选择和形成合理的能源结构，应根据本国或本地区能源资源的具体情况以及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并参照能源供给的国

际化趋势加以确定。目前，世界能源结构总趋势是煤炭比重下降，核电、水力电和石油、天然气的比重上升。

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我国能源结构矛盾突出。优质天然气和水能所占比例仍较低，煤层气、风能、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的规模开发还刚起步；仍以煤为主要能源的生产、消费结构产生大量污染物。这些污染物的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同时，也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从能源生产结构来看，煤仍占主导地位（70.7%），以下依次为石油（21.1%）、水电（8.9%）、天然气（3.2%）；从消费结构来看，1990~2002年，煤的比重从76.2%下降到65.6%，石油的比重由16.6%上升到24.6%，水电核能由5.1%升至7.8%，但在一次能源向二次能源转换方面，电力用煤占国内煤消费比重由1990年的25%提高到2002年的53.5%。大量耗煤带来严重污染，我国SO_2、CO_2排放量已居世界前列。为此，减排SO_2、CO_2十分紧迫，国际压力也在加大。这些均迫切需要尽快改善我国的能源结构。

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及其构成，如图表3-1所示：

图表3-1　　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及其构成

年　份	能源生产总量（折标准燃料，万吨）	能源生产构成（占能源生产总量的%）			
		煤	石油	水力发电	天然气
1949	2371	96.3	0.7	3.0	
1957	9861	94.9	2.1	2.9	0.1
1965	18824	88.0	8.6	2.6	0.8
1980	63721	69.4	23.8	3.8	3.0
1990	103922	74.2	19.0	4.8	2.0
2002	139000	70.7	17.2	8.9	3.2
2005（预计）		67.1	21.1	7.4	4.4

三、能源结构正在改善，但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

虽然作出以上一系列调整，但我国能源结构的矛盾仍难以很快解决。预计至2010年，能源结构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仍以煤为主，只是煤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水力发电、核能发电的比重有较大上升，其他如风能等的利用，虽然也会形成较大规模，但在能源结构中处于影响不大的地位；石油的比重因资源不足预料不会上升（消费结构比重仍会上升），天然气的比重则会随着国际的利用趋势而有较大的上升，由目前的3%升至约10%。预测到2020年煤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约65%。

第二节　煤业布局由北向西延伸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煤炭在我国能源生产结构中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迄今仍占68%，为我国第一大能源。从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所占比重也达到60%以上。

煤炭工业包括煤炭的勘探、开采和洗选等生产过程。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发煤炭资源的国家，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有采煤业，唯现代化煤矿建设较晚。自19世纪70年代在开滦煤矿建成第一对机械化矿井后，到20世纪40年代形成年产3000多万吨的采煤能力。

一、保有储量大，分布相对集中，但优质资源渐少，必须考虑煤炭资源安全

我国煤炭的保有储量为10077亿吨（2000年），资源探明率19.9%；经济剩余可采储量1145亿吨，占世界11.6%；从煤炭储量的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华北、西北。

如果以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一线为界，此线以北，煤的储量占全国的94%，此线以南仅占6%；如再以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为界，则此线以西煤的储量占89%，此线以东只占11%。

尽管煤炭资源丰富，但优质资源少，后备工业储量不足，而且煤是一种可以转化为油、气的能源，因此，国家能源安全储备战略，包含煤、石油、天然气等的储备都必须考虑，就煤炭工业而言，节煤、减少出口（2003年中国焦炭供应占全球50%），保护资源，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与开采，势在必行。而且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也必须考虑煤炭能源安全，对稀缺煤种、重要煤种实施战略性保护。

二、北煤南运、西煤东运格局长期存在

在20世纪80～90年代，为适应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和外贸出口的需要，以山西能源基地为主的我国北方地区的煤炭工业，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开发。到2003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了17.4亿吨，约占世界煤炭总产量四分之一，超过美国、印度、俄罗斯，居第1位。

目前，我国产煤较多的地区主要有华北（占全国五分之二）、华中和华东。从各省（自治区）产煤量的多少来看，则主要是：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安徽、河北、黑龙江、陕西、辽宁、贵州。上述各主要产煤省（区），煤炭资源探明储量丰富，煤田地质情况良好，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也较为有利。其中，尤以山西省的地位最为突出，产煤量占全国六分之一。上述各产煤省（区）大多分布于我国内地上述两条地理界线的北侧和西侧，这是形成我国煤炭工业布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预示着“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将会长期存在。我国主要产煤省（区）和缺煤省（市、区），

如图表 3－2 所示：

图表 3－2　　　我国主要产煤省（区）和缺煤省（市、区）

省（自治区）		2002 年产煤量占全国（%）	省（市、自治区）		2002 年产煤量占全国（%）
主要产煤省区（前十名）	山西	17.6	产煤少的省、市、自治区（前十名）	上海	0
	山东	9.5		天津	0
	河南	7.2		海南	0.00001
	内蒙古	6.4		西藏	0.00001
	安徽	4.5		浙江	0.0005
	河北	4.4		广东	0.001
	黑龙江	4.3		青海	0.002
	陕西	4.3		湖北	0.003
	辽宁	3.8		广西	0.003
	贵州	3.6		福建	0.00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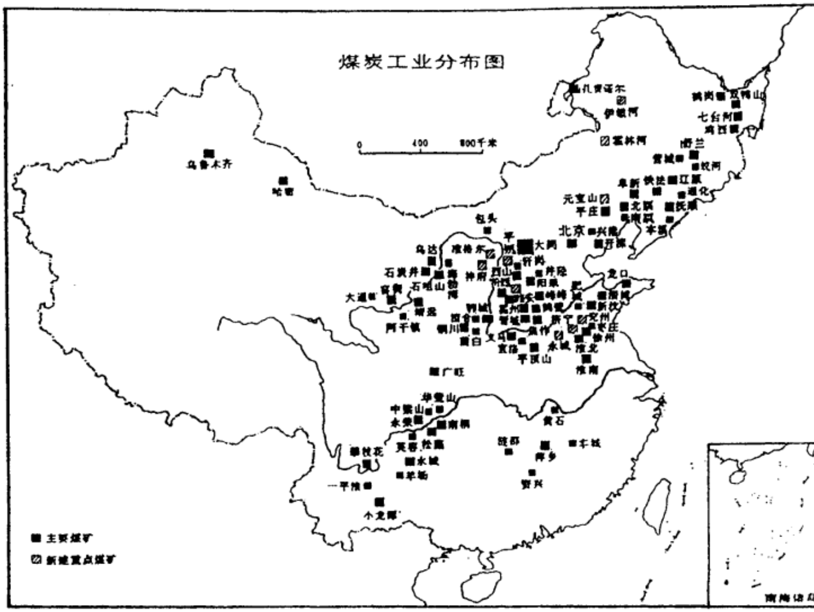
三、主要产煤基地

在全国各主要产煤省区中，除山西以外，煤炭工业的布局也不是很均匀的，集中于一些生产规模大的煤矿。下列煤矿是我国现代化煤炭工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山西大同、西山、阳泉、平朔、晋城、潞安、汾西、霍州；河南平顶山、义马、鹤壁、焦作；山东兖州、邹城、新汶、枣庄、肥城；黑龙江鹤岗、鸡西、七台河、双鸭山；河北开滦、井陉、峰峰；四川攀枝花、松藻；内蒙古霍林河、伊敏、准格尔、东胜、乌海；宁夏石炭井、汝箕沟、呼鲁斯太；陕西神府、铜川、韩城；甘肃华亭；贵州水城；安徽淮北、淮南；江苏徐州等。如图表 3－3 所示：

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型露天煤矿主要有：内蒙古的准格尔、霍林河、元宝山、伊敏河、山西平朔等；大型井工矿有：山西古交矿区、山东济宁煤矿和兖州矿业、河南永城煤矿、淮南新集一矿、二矿、陕西神木大柳塔和黄陵煤矿、河北开滦的钱家营和东欢坨煤矿等。与此同时，还重视对原煤的洗选加工，兴建了一批大型洗煤厂。

四、体制调整与布局变化

为改变现行煤炭工业体制，我国最大煤炭工业基地山西组建焦煤、动力煤、无烟煤三大集团公司：（1）山西焦煤集团公司——以煤炭工业中的稀缺煤种——焦煤的生产、精加工、销售为主要特色，以全国最大的焦煤生产基地“西山煤电”为核心，沿石太、侯月铁路，联合“阳泉煤业”、汾西矿务局、霍州矿务局、太原煤炭气化公司、“华晋焦煤”离柳矿区，辐射太原市、吕梁地区、临汾地区的地方煤矿，其中年产焦炭 4000 万



图表 3－3

吨，占全国 38%；年出口焦炭 1000 万吨，占国际焦炭贸易量的 50%。(2) 动力煤集团公司——以全国最大动力煤生产基地大同矿务．局为核心，沿着大秦铁路，辐射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地区地方煤矿，年产规模很大。2003 年新组建的“大同煤矿集团”产销量预计 2006 年逾 1 亿吨。(3) 无烟煤集团公司——以晋城矿务局为核心，沿太焦铁路，联合潞安矿务局，辐射长治市、晋城市地方煤矿，年产约 5000 万吨。

上述布局的调整，使山西煤炭基地的资源配置、产销格局呈现出新的态势。此外，在内蒙古西部和陕西，新组建的神华集团利用矿、路、电、港、航一体化优势，大力开发西部煤田，2003 年产煤 1.02 亿吨，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吨企业，在世界最大煤炭企业中名列第 5 位。煤炭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

我国煤炭工业地域布局调整的原则是：矿井开发尽量接近煤炭消费地，优先建设东部缺煤地区经济效益好的矿井；强化煤炭产运需综合平衡，重点加强晋陕蒙（西）、贵州煤炭调出基地的建设；有条件的矿区实行煤电同步建设，变输煤为输电，缓解运输压力；新开发的褐煤矿区实行煤电或煤电路同步开发，同步建设。

由于小煤矿对资源的回收利用率仅为 10%～15%，严重浪费资源，从 1999 年起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的各类小煤矿，其中，特别是对布局不合理和影响国有矿安全生产

的小煤矿以及位于国有矿井田范围内的小煤矿。至 2001 年，全国已关闭各类小煤矿 6 万多处。这对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优化煤炭工业结构与保护环境均有利。但各地受利益驱动，至 2004 年小煤矿仍屡禁不绝。

五、生产集中度仍较低

非法经营的煤矿在近年虽已大量关闭，但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煤炭工业的合理布局问题。中国内地煤炭企业仍多达 2 万多家，年均产煤 6 万吨。国家 94 处重点煤矿的生产集中度不到 40%；2002 年中国最大煤炭企业的前 5 家，市场占有率仅为 16%；多数企业仍是单一产业、单一产品。而国外主要煤炭企业多为大型化、集团化，生产技术向遥控发展。

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和第二出口大国，我国仍需进口部分煤炭。如 2002 年产煤近 14 亿吨，出口 8384 万吨，进口 1181 万吨，来源地为澳大利亚、越南、南非、俄罗斯，进口地为粤、浙沿海，主要是动力煤。重要原因是运费，北煤南运比国外进口还要贵。2002 年广东口岸进口煤均价跌破 30 美元，加上运费、3%关税、13%增值税，进口煤仍比北煤南运便宜。因此，我国煤炭企业如何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经营，十分紧迫。

目前世界年产煤超亿吨的大企业已有数家。十大跨国公司出口煤占全球煤炭贸易量 40%以上。我国煤产业应将产业链向下游行业延伸，走国际化发展之路。

六、煤业发展与布局前瞻

如以 2002 年的煤产量（13.8 亿吨）为起点预测，至 2020 年我国原煤产量将达 21.5 亿吨。在煤炭生产结构方面，近年来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国有煤矿生产比重上升，乡镇煤矿生产比重下降，今后将以组建大型煤炭公司为发展方向。重点建设大同、神府、太原、晋东南、陕北、平顶山、兖州、两淮、贵州、黑龙江等 13 个大型煤炭基地。煤炭生产地域分布仍以华北为主，但西北的上升速度快。华北、西北产煤比重将从 37%、8%上升到 2020 年的 44%、19%，它们占全国比重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地处华北、西北地区接壤地带的鄂尔多斯煤炭基地大规模开发。消费比重上升的地区是华北、华东、西南、西北，其中华东是因经济持续发展，洁净煤利用多；西南、西北则是因西电东送而配套建设一批燃煤电站。消费比重下降地区是中南、东北，前者主因能源结构变化，优质能源消费比上升；后者则因引进俄罗斯油气缘故。

第三节　石油：探明资源不足，布局几经转移

石油是矿物能源中发热量高的燃料，也是重要化工原料。石油工业以采油为主体，包含炼油和石油产品的储运等生产过程。由于石油及石油产品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普遍利用，使石油工业在现代工业体系中占凸显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工业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已取代煤而跃居首要地位，只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以煤为主。我国属于后者，石油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的比重，1949年仅有0.7%，1976年曾上升到24.7%。由于石油增产幅度不及煤炭，故其比重有所下降，到2000年降至21.0%；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1953年只占3.8%，1976年曾上升到23%，后来由于一部分烧油设备改为烧煤，使石油消费下降，到1999年，石油消费的比重又升至23.4%。

一、油气资源探明不足，东部油藏减少

我国沉积岩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分布广泛，生油地质条件尚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陆相沉积的构造里先后找到了大庆、胜利、辽河等大、中型油田；在松辽盆地南部根据岩性油藏新理论找到新的油田，但规模不大。目前，我国的石油资源总量约1000亿吨，居全球第11位。其中陆上775亿吨，海域225亿吨。至2002年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230亿吨；石油的剩余可采储量仅24.3亿吨。全国天然气资源总量38.14万亿立方米，剩余可采储量2.02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1.7%、1.3%，按现有生产规模，仅供开采约15年、60年。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占世界1.8%，且多是开发条件难度大的资源，优质蕴藏量少。

因后备资源不足，我国东部地区已探明石油逐渐枯竭，加之全国石油资源总量不丰，不得不大量进口原油。

二、石油工业发展及地位变化，勘探开发布局转移

近代石油工业在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1877年于台湾省苗栗首次打成机械化油井，1907年又在陕西延长钻探成功，建成大陆第一口油井——延一井。但半个世纪后，1949年全国石油产量仅12万吨。50年代末，我国石油生产布局实行战略性转移，从西北、西南转向东北，1959年建成大庆油田，1963年首次实现我国石油自给。70年代以来，石油勘探在华北、西北等陆上地区获得重要成果，并开始向海洋进发，在渤海、珠江口、北部湾、莺歌海、东海找到了油气层。至90年代中期，海上油气产量分别达到生产规模。上述变化使石油工业在勘探开发中的战略布局再度出现大的转移。

石油产量1978年首次突破1亿吨，并开始有一定数量出口。石油出口始于1970年，当年出口48万吨，1975年增至1210万吨，到80年代达到高峰（1985年出口3630万吨，出口额67亿美元）。此后国内需求迅速增长，石油出口急剧下降。至90年代初，由于原有油田的探明储量减少，使我国石油生产增长缓慢。2003年原油产量1.7亿吨，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5%，在世界主要产油国中，次于沙特、美国、俄罗斯、伊朗，居第5位。

三、石油安全与经济安全

因石油资源后备储量不足，1993年起我国已由石油净出口国成为净进口国。目前，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并完全依赖油轮运输，源头主要是屡经战乱的中东，次为非洲、东南亚，承运的多数油轮必须穿越印度洋，在印尼群岛周围狭窄、易于封锁的海峡中航行，最终才能进入东南亚的航道。2003年进口的9112万吨原油中有60%走此路线，在不拥有远洋海军的情况下，难以与可能截断我能源供应的举动相抗衡。

2004~2010年间预计中国内地石油消费从2.6亿吨提高到4.5亿吨，除国内生产1.6亿~2亿吨以外，需进口原油1亿~2.5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这种供需格局易被中断或受到区域性经济政治纷争所干扰。

在国际上，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国民经济运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1亿吨时，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

鉴于我国石油安全有受制于人的潜在危险，而石油安全同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均有密切的联系。加之世界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高度依赖性，资源与生产布局又偏集于某些地域，既使石油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又深深介入国际间经济和军事争斗。因此，世界石油生产布局及外运航线格外令人关注。我国人均石油资源缺乏，而且目前我国已处于经济发展对石油依存度很高的阶段。为此，必须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建立海外油、气供应基地，并实行石油进口多元化，在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库的同时也拥有一定的商业储备。另外，采取石油进口替代战略，以便从多方面提高规避石油危机的能力。

至2003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的商业性石油储备仅为15天，远低于主要石油进口国。我国石油战略储备的一期工程已经启动，初期建立相当于20~30天国内消费量的石油储备，预计至2006~2008年，四大石油储备基地（黄岛、镇海、大连、舟山）竣工。

四、石油工业地区分布概况

石油工业布局，不仅包括油、气田的开采，还包括炼油厂的布局，原油、天然气、石油产品的运输和地区产销平衡等。就石油开采业的合理布局来说，主要是考虑油田可

采储量大小、原油质量高低，以及油层埋藏深浅；在决定油田开发规模时，也要适当考虑油田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条件。

现已相继建成松辽石油基地、华北石油基地、新疆石油基地、南海海上石油基地、渤海海上石油基地、陕甘石油基地和四川盆地天然气生产基地、新疆天然气生产基地、陕甘宁天然气生产基地等。

从各省区来看，原油开采分布于2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黑龙江、山东、新疆、辽宁、天津、广东、陕西7省区占全国85%。

原油老产区黑龙江、山东、辽宁在全国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新疆、天津、陕西则呈上升趋势。广东的产量不稳定，1999~2002年间原油产量起伏较大。我国主要产油地及重要油田，如图表3-4所示：

图表3-4　　主要产油地及重要油田

地区＼项目		2002年占全国石油产量比重（%）	重要油田和石油生产基地
全国合计		1.7亿吨 100.0	
主要产油省（市、自治区）	黑龙江	30.1	大庆油田
	山东	16.0	胜利油田、蓬莱19-3海上油田
	新疆	12.1	克拉玛依油田、塔里木油田、吐哈油田
	辽宁	8.1	辽河油田、绥中36-1海上油田
	广东	7.6	南海东部油田
	天津	7.3	大港油田、渤海埕北油田
	陕西	6.4	长庆油田、延长油矿
	河南	3.4	中原油田、南阳油田
	河北	3.0	华北油田、冀东油田、秦皇岛32-6海上油田
	吉林	2.9	扶余油田
	其他省（区）	3.1	青海油田、江苏油田、江汉油田、南海北部湾油田、东海油田

五、陆上主力油田

在上述石油产区，迄今已建成一批重要的油田。主要有大庆油田（黑龙江）、胜利油田（山东）、辽河油田（辽宁）、克拉玛依油田、塔里木油田（新疆）、中原油田（河南）、华北油田（河北）、大港油田（天津）、长庆油田（陕西、甘肃、宁夏）、延长油矿（陕北）、扶余油田（吉林）、江汉油田（湖北）等。

地处黑龙江省安达县大同街（现属大庆市大同区）附近的松基三井在1959年首喷原油，标志着大庆油田发现，随后成为中国第一大石油基地，至2002年已连续二十七年年产油5000万吨，总产量近17亿吨。但大庆油田开采高峰期早已过去，2003年起减产幅度较大。

胜利油田是我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20世纪80年代扩大采油区范围，90年代初原油产量达到高峰，以后产量下降，1995年为3006万吨，2002年2671万吨；辽河油田的原油产量1995年逾1500万吨，居全国第3位。华北油田自1970年全面开发以来，原油年产量最高曾达1700万吨，近年产量下降，1997年生产原油不足400万吨，但仍不失为一处重要油田。中原油田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规模大，1990年产油826万吨，但近年以来因后备储量不足而使产量下降。

新疆三大盆地石油资源约210亿吨，探明地质储量27亿吨，产原油2002年合计达到2040万吨，是我国内地新崛起的油田群。在21世纪前十年，新疆石油产量可望继续提高，并成为我国陆上石油资源的战略接替区之一。长庆油田是以低渗、低压、低产为主要特征的油田，开采年限逾半个世纪，包含陕北、陇东、宁夏油区，是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开发的主体，年产能力到2003年升至730万吨，预计2005年900万吨。

陕北延长油矿是我国目前具有合法石油开采资质的四家企业之一，迄今已开采一个世纪，至2003年产能约500万吨，油井主要分布于延安市所属的安塞、吴旗、志丹、子长、延长5县。近年因民间乱开滥采，使陕北石油资源遭受损失。2002年起国家有偿收回油井权益，石油开采布局也开始得到规范。

六、海上油田

海上采油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程度很高的产业，采油设施布局必须紧靠海床油气富集区。近二十年来，有多家外国石油公司与我国合作从事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已在24个海上油气田获取探明储量，海上原油产量增至2300万吨。

1985年是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发展的转折点，国内第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渤海埕北油田建成，到1996年渤海海域的商业油田增至7个，2001年底，渤海海域年产油能力560万吨，2005年将增至2100万吨。渤海海域是华北含神气盆地组成部分之一，可供油气勘探的面积5.3万平方公里，预测资源量96亿吨。但渤海油气开发在地质构造、生态环境条件方面有不少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南海的第一个海上油田位于北部湾涠洲岛西南，已于1986年投产。至2001年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涠西南油一田群。以蛇口为总基地的南海东部油田已有9个油田投产，2000年生产原油1393万吨，成为我国第一大海上油田。南海东部油田可供勘探油气面积13.1万平方公里，石油资源约50亿吨，开发前景甚佳。

我国石油工业分布图，如图表3－5所示。

七、主要石油企业市场份额及经营格局

1999年，在原油市场份额方面，“中石油”占67%（2002年上半年64%），“中石化”占22%（2002年上半年仍为22%），“中海油”占10%（2002年上半年11%）；在成品油方面，中石化占31%，中石油12%。中石油主要经营北方市场；中石化则以南方市场为主。至21世纪初，中石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北部和西部；而中石化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南部和东部。为适应加入WTO以后市场的需要，中石化、中石油从21世纪初起开始打破南北分治的垄断格局。

图表3－5

“中石油”集石油天然气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体化，跨地区、行业、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现为中国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生产商，拥有雄厚的油气资源及其开采权，生产加工多种石油化工产品及庞大分销网络；“中石化”则是中国第二大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商、第一大成品油及石化产品生产商和经销商。其主要业务区域（中国内地东部、中部及南部）经济发达；“中海油”是第三大石油集团，主要从事海上油气开发。

八、新的石油发展格局：国内增产，国际合作开发

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已形成“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格局，这种布局态势，不仅在有效利用资源、减少长途运输等方面有利，而且从国家战略利益上考虑亦很必要。

21世纪前十年的石油工业布局，是在上述基础上再开发建设一批油气田，使中国油气产量达到3亿油当量。这些油气田将分布于松辽盆地、渤海地区、西部地区。在国外通过国际合作开发获得5000万吨份额油。

中国涉足海外油气市场始于1993年，至2003年，海外合作项目有：(1) 中石油所属20个油气项目，海外原油作业量2123万吨，份额油1018万吨，海外合作油田产量将达3500万吨。在地缘上已形成北非、中亚、南美、亚澳的四个海外油气生产基地。(2) 中海油的海外战略主要依靠跨国并购实现，如收购西班牙在印尼的五个油田部分权益，带来4000万桶净权益原油产量，随后又与印尼东固气田结成上游产品分成伙伴。2002年收购澳西北礁层天然气。(3) 中石化预计到2005年可获200万～300万吨份额油。

但是，国际大油田掌握在垄断资本手中，我国开发利用的国外资源，或为“边际油田”或属敏感地区，开发难度大、成本高，而且变数大。如中海油、中石化的北里海项目位于石油富集地带，期望值很高，但最终得而复失。

九、在周边国家寻求稳定油源，石油输入选择与战略

当本国石油无法自给时，在周边国家寻找稳定供应的油源便是最佳选择。

鉴于我国在近年成为世界石油进口大国之后，原油的运输距离太长，运费高，且安全系数小。为此，应在周边国家就近寻求稳定的油源。根据俄罗斯能源发展计划，至2020年石油产量可达5亿吨，而内需仅2亿吨，可供大量出口。2000年初，俄能源部建议同我国共同开发一系列油田，特别是开发东西伯利亚油田，包括伊尔库茨克州和雅库特的油田。这些油气田地处高纬，接近酷寒地区，且交通困难，开发不易。

俄石油储量占世界12%，地理分布区域为西西伯利亚、伏尔加—乌拉尔、东西伯利亚和远东。

基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利益，截至2003年止，俄已允诺向德国、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扩大石油输出。近年俄加大石油生产与出口，相继开通黑海、波罗的海两个新的石油出海口，并计划开辟巴伦支海摩尔曼斯克、太平洋石油出海口。

然而，油源不够开始显现。按照俄能源发展战略，东西伯利亚的几个地质区块均被列入未来石油勘探开发计划（其中东西伯利亚和雅库特计划在2020年前年产1亿多吨），这些现今尚不产油的“油田”也同时被确定为向中国等亚太国家就近出口油的产地。

实际上，俄目前大力输出石油只能主要依赖于西西伯利亚。因勘探开发新油田需大量资金，且涉及许多政府部门审批，故进展不快。至2003年，俄以日产原油850万桶超过沙特（847万桶），居世界产油国之首，但按目前的开采速度与勘探进度，石油储量到2040年将耗尽。

因油源不足等一系列原因，原已达成协议的，通过国际输油管同时向中国与亚太国家大量供应原油的承诺（每年向中国出口3000万吨、向日韩出口5000万吨）难以兑现。目前仅向中国出口，每年数百万吨，火车运输，运输成本高，且难以做到不受气候条件影响大量而安全地输送。大口径长输管道虽说没有上述不利因素，但建设成本高，又深涉国际、地区经济政治，有时十分复杂，长期争议，或议而不行。

单就技术经济论证而言，跨国输油管线建设因其运力大、建设成本高，至少需满足下列三项基本条件：(1) 充足、稳定的油源；(2) 资金到位，并按期回收成本；(3) 终点需求稳定，且用现金支付。目前，油源仅够铺设至大庆的管道，如果几年后能提供更多油源，再铺设至纳霍德卡管道，对日、韩等国皆有利，中国也会乐于接受。

可供中国选择的油源，除俄罗斯以外，还有中亚。哈萨克斯坦石油资源主要分布于该国西部的里海沿岸低地，已探明石油储量100亿吨，天然气11700亿立方米。“中石油”已收购“尼玛石油”并控股北布扎奇油田。根据中、哈两国协议，两国能源合作的重点是共同铺设一条西起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阿特劳，东至中国新疆阿拉山口的国际输油管（可延接独山子）。近年来哈萨克斯坦产油增长快，2002年达5000万吨，出口3500万吨，预计2015年1亿吨。中、哈输油管年输油扩大到5000万吨。

以庞大的国内市场为背景的我国能源输入选择与战略，及其运输方案的确定，不仅对本国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亚洲和世界能源市场产生影响。为此，需要进行反复的政策分析和技术经济论证，并对运输布局方案进行择优比较。

第四节 天然气：气源偏西，用户居东，西气东输布局态势分析

一、天然气工业发展滞后，“油气产量比”失调

因长期忽视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利用，致使我国天然气工业起步晚，发展滞后。到1997年，我国油气产量比仅为1∶0.1，远低于1∶0.7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到2003年，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还不到3%，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平均水平（8.8%）。

这种状况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对洁净能源的迫切需求相比很不适应，而且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布局也偏于少数几处地方，通常距消费地遥远，如西气东输的主

干线长逾4000公里。

近二十年，我国已开始认识到油气产量比严重失调问题，将天然气工业置于同石油工业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发展。预计到2020年天然气产量可达1100亿立方米，再引进国外天然气800亿～1000亿立方米，将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10%，并形成以京沪津穗蓉渝秦汉等为中心的区域消费市场。

二、资源总量仍然不足，运输距离过长

虽经近年来的大力勘探，增加天然气探明储量，但后备资源总量仍然不足，剩余可采储量2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15位，而且地理分布局限性很大，运输距离过长。从主要气田资源来看，只能确保西气东输主干管道稳定供气二十至三十年，但从我国西气东输干线布局需要来看，应有稳定供气四十年的储量才算是经济合理的。

另外，管道运距长达4000公里，且沿途地质地貌条件极为复杂，使工程建设及维护管理成本上升。上述因素对于最终消费价格均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亦有类似问题存在。如1999年发现的蓬莱19－3油气构造，当时被称为“海上大庆”，但经核实后可采储量减少。

三、已发现的天然气富集地

天然气开发利用的关键，在于资源勘探、后备储量增长以及下游产品开发。天然气利用主要体现在能源利用、化工利用两方面。化工利用已有较大发展，能源利用则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从世界全局来看，天然气开发利用程度在能源结构所占比例稳中有升，21世纪在一次能源利用中将占重要地位。

勘探方面，我国陆地和海域发现的天然气田有139个，其中储量50亿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田20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国家确定将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作为能源发展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促使我国天然气工业发展战略作述重大变化的背景，主要是这一时期国际油价下跌，国外原油普遍限产；以后油价又急剧攀升，使大量进口原油的我国成为最大受害者，并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加之，天然气是洁净能源，污染少，不受或少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之故。

为了增加天然气资源后备储量，1998～2003年间的勘探开发新增近2万亿立方米，新增天然气产能180亿立方米，累计达350亿立方米。到2005年可进一步增至400亿立方米。

通过进一步勘探开发，川渝、塔里木、柴达木、陕甘宁、鄂尔多斯等地以及南海、东海、渤海、北部湾、珠江口等海上油气田的天然气储量与生产能力均有提高，共同组成我国天然气工业布局的基本格局。

四、陆上主力气田

（一）塔里木气田

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总资源量8.39万亿立方米（占全国22%），至2003年底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6579亿立方米，主要分布于库车—塔北、塔西南—巴楚、塔东三大气区。其中，作为西气东输主供气源的塔里木盆地库车—塔北气区天然气地质储量5000亿立方米。

在库车—塔北气区，已探明六处气田：克拉2、牙哈、英买7、羊塔克、玉东2、吉拉克。近期又发现迪那2、阿克莫木等气田。其中"克拉2"气田探明地质储量2840亿立方米，是供气初期的主力气田。

西气东输的源头工程包括克拉、牙哈、桑南、吉拉克4个气田，已形成120亿立方米产能，通过轮南—靖边—上海输气管道，主要输往长三角用气市场。

（二）长庆气田

位于陕甘宁接壤地带，在近十多年相继发现靖边、榆林等大型气田，至2003年底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11143亿立方米，探明储量5126亿立方米，预测储量7550亿立方米，三级储量合计23819亿立方米。

其中，陕北定边、靖边、横山3县天然气探明储量2410亿立方米，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建成每年30亿立方米产能的净化厂及860公里的陕京天然气管道（靖边—北京），1998年后分别向北京、西安、银川供气，2002年向天津供气。至2004年建成靖边—上海段管道，靖边已形成年供气100亿立方米的能力。优质的长庆天然气已成为我国一些特大城市首选的清洁燃料。

（三）苏里格气田

地处内蒙西部鄂尔多斯盆地的苏里格气田近年才发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6025亿立方米，预计2008年苏里格气田年产气65亿立方米，为西气东输提供另一气源，并扩大长庆气田对京、津及华北和东部地区的天然气供应量。

（四）柴达木气田

柴达木盆地拥有天然气资源量2.5万亿立方米，探明加控制地质储量5000亿立方米。这里的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早，但直至20世纪末才形成规模经济。处于柴达木腹地的涩北地区，是盆地中已发现的最大天然气富集区域，在500平方公里范围内3000～4079米深的地层均含有丰富的天然气。涩北1号、2号气田已获开发，年供气量已具备65亿立方米规模。涩北—西宁—兰州输气管道2001年建成，优质洁净的柴达木天然气东输，已改善地区能源结构，带动甘、青两省经济发展及产业布局调整。

（五）川渝气田

四川盆地天然气总资源7.2万亿立方米，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4755亿立方米，建

成配套产能100亿立方米。主要有重庆、蜀南、川西北、川东北四大气区和川中油气区。预计2007年天然气产量130亿立方米，2010年150亿立方米。从21世纪初起，川渝气田也成为我国“西气东输”的主要源头之一，已建成忠县—武汉输气主管（738公里）及三条输气支线，供应鄂、湘2省用气市场。

（六）其他陆上气田

准噶尔盆地天然气资源总量2.1万亿立方米，年产天然气20亿立方米，2005年增至30亿立方米。其他天然气产地还有华北油田、苏北射阳等。

以上陆地天然气产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几乎都偏于西部，而周边国家可供商业开发的天然气资源偏向于距离更远的西北部，国内用户则大多在沿海一带。为此，除在沿海寻找新气源以外，还必须大力兴建长距离、大管径的输气管网，以便经济合理地运输和消费。

五、海底天然气田

海上天然气开发，通过海底管道运输等方式上岸，用于发电、化工或民用，对沿海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其中用于发电的热效率可达50%以上，成本只及煤电的一半；而且天然气作为一种洁净能源，有利于环境保护。近二十多年我国在南海、渤海、北部湾及珠江口附近海域，相继对外开放海底油气勘探，发现一批油气田并投入商业开发。后又将东海海域对外开放。迄今上述海域均已进行商业开发。

（一）东海海域

“中国东海西湖凹陷”油气田，是东海盆地内富含油气区之一，地处上海东南方450公里的东海大陆架上。东海大陆架是我国海上天然气资源富集区，其中西湖凹陷先后发现了平湖、春晓、残雪、断桥等7个油气田和一批含油气构造，探明油气储量为1000亿立方米，可年产25亿立方米天然气。2003年，中海油、中石化、英荷壳牌、优尼科等国内外四大石油公司决定联手开发西湖凹陷的油气资源。预计至2007年，设计年产25亿立方米，上述四家公司分别拥有30%、30%、20%、20%的权益。

东海天然气与西气东输将以互补之势，共同保障长三角经济区能源供给。2005年，东海的春晓气田、平湖油气和西气东输合计供气可达100亿立方米，2010年增至180亿立方米。由于开发成本的原因，东气价格会低于西气。

位于上海东南方450公里（距宁波350公里）处的春晓气田群开发，预计2004年天然气上岸。但因国际争议可能推迟开发。

（二）南海、北部湾海域

南海、北部湾海域是20世纪90年代发现并确认的天然气产区。现有崖城13-1、东方1-1、乐东15-1等商业气田。其中1996年投产的崖城13-1气田（海南岛西南100公里处海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海上气田，所产天然气除部分供海南省以外，主要输往香港。

地处南海北部湾莺歌海海域的东方 1－1 气田（距东方市 110 公里），1992 年发现，2003 年建成投产。气田面积 288 平方公里，天然气地质储量 967 亿立方米，其中纯烃储量 612 亿立方米。已建 22 口生产井，所产天然气通过 110 公里长的海底管道输往陆上终端——东方市，一期年产气 16 亿立方米，二期增至 24 亿立方米。其中 8 亿立方米供终端附近的化工企业作原料；16 亿立方米通过东方—洋浦—海口输气管供洋浦电厂及海口市民用。供气周期约二十年。

（三）渤海海域

渤西气田已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投入商业开发，并开始就近向天津市塘沽区供气。

六、周边气源，俄气南下与澳气北上

鉴于我国油气资源总量不足，寻找周边气源作为一种补充势在必行。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内地每年将进口 800 亿～1000 亿立方米，除 160 亿～200 亿立方米可能来自俄罗斯、中亚国家经管道输入以外，其余 640 亿～800 亿立方米将来自液化天然气进口，西澳大利亚州将是主要进口来源地。

俄罗斯天然气储量达 46.9 万亿立方米，独占世界 30.8%，已成为最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地区。相对于我国国内“西气东输”的格局而言，“俄气南下”同样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且对改变我国能源结构与能源布局有利。首先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天然气资源占俄罗斯的三分之一，其中仅“科维克金”气田的天然气地质储量即达 14000 亿～19000 亿立方米，中心气田面积 5000 平方公里，为当今世界已探明却多年未开发的大气田之一。因产地经济规模小，能源需求有限，且距俄天然气传统出口市场又相当遥远，故俄早在十年前就将此气田开发前景定位于亚洲市场，大规模开发并就近输往中国及东亚，是其经济布局最佳选择。

据 2003 年俄罗斯露西亚石油股份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韩国天然气公司在莫斯科审议并通过的《从俄罗斯科维克金气田向中国和韩国供气项目国际可行性研究报告》，将建设巨型跨国输气管，西起伊尔库茨克州贝加尔湖西侧的科维克金气田，经贝加尔湖南侧至赤塔、满洲里、沈阳，再由沈阳分出两支：一支至北京，一支至大连并由黄海海床铺管至韩国的平泽，总投资 180 亿美元，管线全长 4887 公里，预计 2005 年动工，2008 年供气，年供气量 340 亿立方米。其中：40 亿立方米供应伊尔库茨克州、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200 亿立方米供中国东北及环渤海地区；100 亿立方米供韩国，累计三十年内向中国供气 6000 亿立方米、韩国 3000 亿立方米。

管线地理走向、气价两大因素，曾是长时间议而不决的主要原因之一。

21 世纪初，俄经济发展开始稳定增长，同时推行“稳定弧”地缘策略，上述两方面因素为我国利用周边气源提供可能。至 2003 年，俄中韩终于在管线的地理走向、气价等方面达成共识，估算俄天然气运至东北价格为人民币 1 元/立方米，用户终端价人民币 2 元/立方米。

澳大利亚近年来天然气探明储量增长快，内需有限，可供大量输出。根据“中海

油”与 GORGON 于 2003 年签署的协议，未来二十五年购买 1 亿吨液化天然气。为接受与销售澳气，“中海油”已确定架构中国东南沿海天然气管网。这一管网长达 2100 公里，包含在粤、闽布局 2 大 LNG 接收站，再将这两大海外气源以及南海气田、东海气田等国内气源同众多用户联通，并与“西气东输”管道在上海对接。预计到 2020 年，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将累计形成逾 600 亿美元市场份额。

第五节　炼厂布局

一、炼厂布局原则变迁

炼油厂的选址和合理布局，在整个石油工业布局中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内地众多的炼油厂，其布局原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有相当大的变化：70 年代以前建的炼油厂多数建在原油产地附近；70 年代以后至 90 年代建的炼油厂，则多数建在石油产品消费地附近。主要因向消费地运送原油比运送各种成品油经济合理，且原油运输比较安全、方便。另外，在消费地附近建厂，既能从当地得到工业技术方面的协作，又可使炼油厂的产品和副产品都得到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

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鉴于原油进口激增，而我国原有炼油厂规模偏小，生产成本偏高，经济效益偏低，遂注意首选距原油供应地相对较近的深水港湾且有成片土地资源的地方（如湄州湾、茂名、湛江等），以利于大量输入原油，降低运输成本，也降低建厂成本。

二、主要炼油基地的形成

由于石油加工工业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大发展，全国炼油工业布局态势大体形成。至 2000 年底，我国内地有炼油厂 90 多家，炼油年加工能力 2.24 亿多吨，居世界第 4 位。但我国炼油企业生产成本高，桶油炼制成本与国际相比差距大，故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

炼油企业布局，五分之四的原油加工能力集中在 20 多个重要的炼油厂点，它们主要是：大庆、抚顺、大连、锦州、辽阳、吉林（以上在东北地区）、北京、天津、大港、石家庄、沧州（以上在华北地区）、淄博、南京、上海、镇海、肖厝、安庆、九江（以上在华东地区）、茂名、广州、洛阳、武汉、岳阳、荆门（以上在中南地区）、兰州、玉门、长庆、独山子、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以上在西北地区）。其中，抚顺、茂名都曾是开采油页岩提炼石油，后来改变原料工艺路线发展成为炼油基地。

从地区供需平衡的角度来看，东北炼油能力大，而西南地区则没有大型炼油厂，炼

油工业布局几乎是空白。目前，我国内地业已形成的石油加工基地（分别由一些彼此邻近、不同规模的炼油厂点组成）主要有：辽宁中南部炼油基地，广东炼油基地，苏浙沪炼油基地，长江中游炼油基地，京津炼油基地，黑（龙江）吉（林）炼油基地，山东炼油基地，新疆炼油基地，甘陕炼油基地，福建炼油基地。

三、炼厂沿江、沿海布局比较分析

在长江中游沿江布局的四个炼油企业（九江、武汉、岳阳长岭、荆门），加上在下游西段的安庆炼化，都遇到两大不利因素：原油进厂运费高；原油进厂途耗大。上述两项均直接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加之近年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使沿江炼厂相继亏损。而因为亏损又导致减产，只是市场有需求而维持运转。

为此，业内人士曾主张将原油都安排在沿海大型炼油基地加工，再将油品运至长江中游的消费地，以提高经济效益。但这样调整原油加工企业布局在全局上并非都有利，主要是油品运输成本比原油运输（船运）成本高，难度大，要求复杂。如修建油管输送原油，则沿江炼厂布局仍有某些优势。

四、新厂择深水岸线而建

近十多年以来，炼油工业发展和布局的重点是：对沿海一些条件好、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进行改造和扩建，尤其是对拥有深水码头的沿海炼油厂进行改造扩建，成为加工进口原油的基地。由于国内原油生产有限，进口原油大增，而加工进口原油企业布局的决定性因素是拥有深水岸线（海岸、江岸），加上运距相对较近的区位因素，这已成近期我国炼油企业布局的趋向。

广东茂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成为我国第一个千万吨级以上（1350 万吨/年，正提高到 1800 万吨/年）的炼油基地，其主要诱因便是拥有良好的深水岸线条件，且距离中东原油相对较近；福建湄州湾肖厝港一带正建设成为 1200 万吨/年加工能力的大型炼化基地，原因大体相似。

21 世纪初开始，经济发展力度使炼油能力无法满足需求，为此决定下列六大炼油基地分别形成千万吨级以上规模，包括：大连西太平洋石化于 2004 年完成 1000 万吨炼油厂改造；大连石化年加工 2000 万吨含硫原油改造（预计 2006 年完成）；对兰州石化、抚顺石化年加工 1000 万吨设施全面配套；独山子石化、长庆石化两个年炼油 1000 万吨项目正在加快启动。

第六节　电力：优化区域结构与电源结构

一、二次能源及其布局特征

电力属“二次能源”，是由一次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水力、核能等）转化而来的。它是一种大量生产的最佳动力。电力工业是指生产、运输和分配电能的工业部门，其特征是电能的生产、消费过程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不能储存。

电力工业布局较为分散。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使多数电源点距离负荷中心偏远。要加快发展电力工业，须解决大量电力能源从我国西部、中部送往东部的高压输变电技术及大电网构成问题，因地制宜地建设一系列水、火电站（火电站还包括一般电站、热电站、坑口电站、配套电站），形成布局合理的电力工业体系。中国内地电力工业发展及国际地位变化，如图表 3－6 所示：

图表 3－6　　中国内地电力工业发展及国际地位变化

项目＼年份	1949	1965	1986	1995	2003	预计	
						2010	2020
发电装机容量（亿千瓦）	0.018	0.121	0.94	2.17	3.8	6.7	9.5
发电量（亿千瓦时）	43	572	4495	10070	19108	30500	45000
国际地位排序	25	9	5	2	2	2	2

二、电力瓶颈—相对富余—区域缺电

长期以来，我国电力严重短缺，电力工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加快电力工业发展，采取下列措施：（1）采用大机组，建设大电厂，加速发展火电；（2）选择地理上和经济效益上均有利的河段，建设一系列水电站；（3）同步建设几个核电站；（4）大力开发超高压输变电线路，形成大电网，发挥联网的经济效益；（5）开发其他发电能源（风电等）。至 20 世纪末，由电力“瓶颈”到相对富余。当时，不少地方出台对高耗能产业的优惠政策。至 2002 年，钢铁、有色、化工等高耗能工业出现盲目发展迹象，造成电力再度趋紧，2003 年缺电区域进一步扩展，全国各地有 21 个省级区域（南方居多）相继拉闸限电，2004 年再增至 24 个省级区域。

至 2003 年，中国内地已建成 100 万千瓦以上水、火、核电站 107 座，并形成以大型

发电厂和高效大容量发电机组为骨干的电力生产体系，共有独立核算电力企业1万家，总装机约4亿千瓦，发电量19108亿千瓦时，均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有电厂6000家，发电量32122亿千瓦时）。

近年电力工业发展很快，预计2005年总装机逾4.5亿千瓦，发电量2.1万亿千瓦时，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总体电气化水平仍有待提高。

多年来电力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证明，它的发展及其合理布局，大地域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不仅对于能源工业，而且对于整个工业乃至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各地可用于发展电力工业的资源种类多，计有煤、水力、石油、天然气、核能、地热能、风能以及海洋潮汐能和海水温差能等。其中：煤炭、石油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力资源主要分布于西南、中南；风能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南沿海，地热能主要分布于西南；海洋潮汐能则集中于华东（尤其浙、闽两省）沿海。

目前,我国电力生产的资源,主要是煤,其次是水力,再次是石油、天然气、风力,至于地热能、潮汐能的开发利用,虽然起步较早,但迄今规模不大,所发出的电力甚微,而核能发电则正在加速,成为投资开发重点之一,并成为化石能源的一种替代能源。

三、水火电之比几经起伏

从电力工业的内部结构来看，当前我国电力工业仍以火电为主。火力发电量由1949年的36亿千瓦时增至2002年的13420亿千瓦时；水力发电量由1949年的7亿千瓦时增至2002年的2710亿千瓦时。在此期间，水火电的比例几经起伏。其中，水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之比，1949年不足20%，到1975年增至30.9%，1985年30.3%，水电比均接近三分之一，此后，由于经济发展急需，各地相继建成一批大功率火电站，而水电因建设周期太长而发展趋缓，水电比骤降，到1990年为26.1%，1995年再降至24.0%；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虽有三峡、二滩、小浪底等超级或大型水电站建设，但只有二滩、小浪底等电站发电，故水电比仍在较低水平上徘徊，这对于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的我国来说，不能不说是水力资源开发滞后和能源结构上的一大问题。预计至2010年水电比为28%。

“水电比”并非是越高越好，湖南、福建2省电网水电比分别达55%、48%，在2003年高温少雨季节（即“特枯年”）同时遭遇严重缺电，并延续到翌年，造成空前的“电荒”，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四、优化区域结构与电源结构

前者主要是因地因网制宜，确定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电力发展速度，加快西部电厂及输电线路建设，推动西电东送；后者则主要是坚持优化发展火电、优先发展水

电、适当发展核电、积极利用新能源发电的方针。其中特别是加大水电投资与建设力度；在沿海缺能地区重视发展核电和燃气蒸汽循环机组；在边远地区则充分利用当地的水电、风力等资源。

到20世纪末，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出现新的转折，许多地区调整结构，并从经济效益与环保要求出发，关停一大批小火电，促使电力企业趋向现代化，促进电力资源在省区、地区间有序流动，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使电力工业布局趋于合理。

由于电力结构调整力度加大，30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已成为主力机组，单机容量为66万千瓦的机组已投人运行，70万、80万千瓦机组新近投人运行。同时，单机容量5万千瓦以下的纯凝汽发电机组陆续关闭。

目前，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和布局正在进行新一轮“南水北火”电源建设，同时跨区域电网互联、形成全国统一联合电网、实现全国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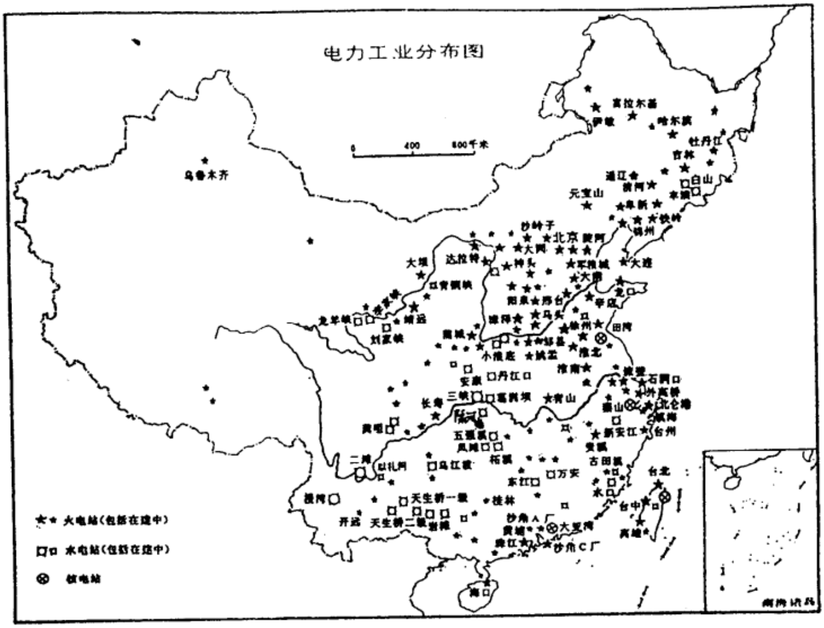
五、火电布局及环境选择，燃煤电厂选址

火力发电通常指以煤、石油、天然气作燃料发电，经过输电系统送给用户。各用户耗电量的多少和发电燃料的选择、供应以及工业用水的稳定来源和供水保证率，加上电厂附近地区产业发展和社会对环保的要求等，是火电厂选址建厂的决定性因素。其布局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是靠近用户集中的电力负荷中心（尤其是为大、中城市服务的热电厂)；二是接近燃料供应基地；三是处在离负荷中心和燃料供应地都不太远的地方；四是靠近水源地，在我国北方和其他缺水地区，充足而稳定的水源往往是大型火电站布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五是选择对地区环境污染损失较小的指定区域内。目前，火电对环境的污染又以燃煤电厂最甚，一个30万千瓦燃煤电厂每年产生$SO_2$4万吨、烟尘22万吨。我国SO_2排放量大大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已使三分之一国土被酸雨严重污染。故火电厂（尤其是燃煤电厂）选址要求十分严格，应通过专门的环境论证。我国电力工业分布图，如图表3-7所示：

从2003年开始，国家严格规定燃煤电厂布局必须做到：(1) 大中城市建成区内，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燃煤电厂；(2) 东、中部地区及西部“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SO_2控制区）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燃煤电厂，要严格按基建程序审批，并同步配套建设脱硫设施；(3) 西部“两控区”以外的燃煤电厂，不符环保要求的要同步配套建脱硫设施，符合环保要求的可预留脱硫场地。西部燃用特低硫煤的坑口电站，有环境容量的可暂不建脱硫设施亏但必须预留脱硫设施建设场地。

与“十五”计划相关，为尽快疏通“西电东送”主通道，选择适宜的电源点，通常经过煤源保障、运输条件、灰场选址、降尘脱硫、水土保持等多方论证比较，同时决定“十五”新建电源点多采用空冷技术，大幅减少水耗。如漳泽三期采用节水显著的30万千瓦级国产机组，年耗水由1200万吨降至216万吨，节水率78%；并针对山西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电源建设中同步上降尘、脱硫装置，确保环保达标。

鉴于燃煤发电的环境选择问题甚为复杂，而燃油发电又受阻于国际油价。从21世



图表 3－7

纪初开始，我国注重采用天然气发电。因天然气价廉、清洁，是难得的火电燃料。我国天然气后备资源有限，故近期在粤、闽 2 省建设的天然气电厂主要依赖从澳大利亚、印尼输入，进口天然气接收站的布局主要考虑深水岸线、专业港湾设施、土地、安全等因素，选择在大鹏湾东岸等地，通过输气管输往消费地，电厂则布置于惠州、深圳等缺电城市。惠州天然气电厂装机 200 万千瓦，2006 年建成。参与天然气发电项目者主要有中海油、广东省、英国石油公司（B_P）、几家香港公司以及澳大利亚 ALNG 集团。

六、水电布局与主要水电基地，有利地段过密，开发亦有隐忧

水电是清洁能源，利用江河水流的位能发电，如果江河流量大，落差也大，又有良好的坝址可供筑坝建设电站，则可发出量大而又廉价的电力。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发展水电也是十分紧迫的。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居世界第 2 位（仅次于美国），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为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应继续开发这种可再生能源。

但是，水电（尤其是大型水电）对当前和未来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总量上很大，且很难精确计算，有些项目的评估对此的估算通常偏小。因此，虽然我国把大型水电作为可

再生资源利用而大力推广，但国外却只将小型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因其对当前与未来生态环境影响总量很小。

另外，水电还有十分明显的时段性、季节性，有“不可调节”这个固有缺陷。这也证明水电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近十余年气候变数大，有时大旱延续时间长，在水电比例高的地区季节性缺电极为突出，危及宏观经济和社会生活。如2003年，“水电比”高的南方数省（湖南55%）因久旱不雨而严重缺电（外省援电有限）造成罕见的“电荒”，蒙受重大损失。

我国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6.76亿千瓦，可开发量3.78亿千瓦，年发电1.92万亿千瓦时，占世界可开发总量17%，以上指标均居世界首位。但我国已开发水力资源比例尚低。至2003年，水力发电总装机9217万千瓦，约占全国可开发水力资源的24%，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50%）。

水力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从大区域来看，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占68%），其次是中南（15.5%）、西北（9.9%），华东、华北、东北很少，合计仅占6.8%；从河流水系来看，以长江水系的水力资源最富（又集中于上、中游），达2.68亿千瓦，占全国的39.6%，其中可开发水力资源1.97亿千瓦，占全国52%；次为雅鲁藏布江水系，水力资源（包括西藏的其他河流）达1.60亿千瓦，占全国23.6%，其中可开发0.50亿千瓦，占全国13.2%；再次为怒江、澜沧江等水系，共有水力资源0.97亿千瓦，占全国14.3%，其中可开发0.38亿千瓦，占全国10%；此后依次为黄河、珠江以及东南沿海诸水系。珠江水系的南盘江—红水河以水力富集且接近电力消费市场而著名。

我国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方面有利因素很多（如：落差集中，经济效益显著；多数坝址地处人烟稀少的峡谷，水库淹没损失小等）；另一方面也有不利之处（坝址所在地地势崎岖，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远离负荷中心，交通困难）。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水力资源开发的重点：第一阶段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地带若干比较容易开发的河段上；第二阶段推进到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游的某些支流上，现在才推进到黄河上游、长江上中游的干支流和西江上游（南盘江红水河）以及澜沧江一带。

按水电发展规划，在全国水力资源分布相对富集的12个流域区建成12个水电基地。在长江上游干流、雅砻江、黄河上游、南盘江红水河、澜沧江建设一批大型水电站，其中资源集中度很高、区位条件亦有利的西南三江（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从2000年起进入“流域、梯级、滚动的系列大开发”，并以此为基础兴建我国最大的水能基地。此外，还在东北、华北、闽浙赣等地建设一批大中型水电站。

全国12大水电基地，总装机2.1亿千瓦，年发电9945亿千瓦时。其中，西部有7个完整的和2个各占一半的水电基地，总装机1.67亿千瓦，年发电8544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国的80%、86%。我国主要水电基地排序，如图表3－8所示。

在长时间内，我国仍将是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市场。预计水电装机容量2010年达1.25亿千瓦，2020年达2.1亿千瓦。

未来二十年我国水力发电建设的重点是：具有调节能力的大型水电站、流域梯级开发的龙头电站及抽水蓄能电站；在地域布局上，除了后一种类型的水电站集中于东部地

区以外，其余均集中布置于中、西部地区。

图表 3－8　　主要水电基地（按区位排序）

水电基地	区位	开发规模（装机容量，万千瓦）	
		总规模	其中已建和在建
金沙江	西南	7174	1260
澜沧江	西南	2560	680
雅砻江	西南	2856	660
大渡河	西南	2340	460
乌江	西南	1100	660
嘉陵江、岷江等	西南	2889	
长江上游干流、清江	西南、中南	2890	2237
南盘江—红水河	西南、中南	1239	1038
湘西	中南	778	337
黄河上游	西北	1786	559
闽浙赣	华东	1487	699
东北	东北	1198	513

现有水力发电量的地区分布，最多的省（自治区）是：四川、湖北、湖南、福建、贵州、云南。它们的水力发电量均超过 200 亿千瓦时。其中四川在 400 亿千瓦时以上，居全国首位，而湖北在近年内将超过四川。我国火电、水电的地域分布，如图表 3－9 所示。

由于在一些有利河段相继建设了一大批水电站，在全国已形成或正形成多条布局集中度高的水电走廊：（1）鄂西沿江（长江、清江）水电走廊，含三峡水电厂以及葛洲坝、隔河岩、高坝洲等，密集地分布 400 余座水电站，总装机逾 3000 万千瓦，是世界最大的水电走廊；（2）桂滇黔南盘江—红水河水电走廊；（3）黄河上游水电走廊；（4）滇西澜沧江水电走廊；（5）川西雅砻江水电走廊；（6）贵州乌江水电走廊；（7）四川大渡河水电走廊；（8）川滇金沙江水电走廊（即将形成）。

图表 3-9　　我国火电、水电的地域分布（2002 年）

居全国第几位	火力发电最多的省、区（前 10 位）	水力发电最多的省、区（前 10 位）	居全国第几位	火力发电最多的省、区（前 10 名）	水力发电最多的省、区（前 10 名）
1	广东	四川	6	山西	云南
2	山东	湖北	7	辽宁	广西
3	江苏	湖南	8	浙江	广东
4	河北	福建	9	上海	甘肃
5	河南	贵州	10	内蒙古	浙江

上述水电布局高密度趋势，固然会带来巨大效益（经济的、社会的），对推动西部大开发有利。然而，高强度、高密度的水电开发已成"跑马圈水"的过热之势，而且又多是在地势很崎岖、建设用地很稀少、生态很脆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加之近二十年植被破坏，气候变数大，山洪泥石流大增，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为此，应防止出现水电经济过热，防止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总量过大。

我国水、火电的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火力发电多的省、市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经济地带的杭州湾以北地段，余下则分布于长江以北产煤较多的地区；水力发电多的省、自治区主要分布于西部经济地带，中部、东部经济地带的南段。上述情况的出现，同我国"一次能源"的地理分布状况有密切关系。

七、三大核电基地，核电站选址

核电是一种干净清洁的能源。属于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20 世纪 60～80 年代核电在世界多数发达国家获高速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起则从整体上进入徘徊甚至停滞阶段，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核电发展计划受阻。

到 2003 年，全球有 446 座核电机组运行，占总发电的 18%，总装机 3.5 亿千瓦，分布于 32 个国家（地区）；另有 24 座核电机组正在建设，33 座已列入发展计划。

世界核电发展五十年来，成熟运用的技术主要有两大类：重水堆；轻水堆（又分压水堆、沸水堆）。在全球 440 座核反应堆中，压水堆约占 70%；中国内地除秦山三期是重水堆以外，其余是压水堆。从技术指标看，中国内地已运行和在建的 11 个反应堆中，除秦山一期外，均属第二代。

美国是全球拥有核电机组最多的国家，至 2001 年底有 104 个反应堆，发电总量 7780 亿千瓦时，占美国发电总量约 20%；除美国以外，核电较多的国家还有法国、日本、德国、俄国、加拿大、乌克兰、英国，上述 8 国占世界核电容量的 80%；从对核电的依赖程度来看，首推法国（85%）、其次是立陶宛（82%），以下依次为比利时、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瑞典、韩国。

中国内地核电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酝酿筹建，当时并非是对电的需要，而是同核大国地位不相称，想改变有核无电的尴尬。但由于对核电究竟是“核”还是“电”，是“自主建设”还是“全盘引进”而争论不休，耽误了核电发展，直至1985年才起步。

核电布局，1991年在浙江省杭州湾畔海盐县的秦山建成第一座核电站（“秦山一核”，30万千瓦），1994年在广东大亚湾畔建成“广一核”（180万千瓦），即大亚湾核电站，向香港、深圳供电。随后，“秦山二核”1号机组（60万千瓦）以及“广二核”岭澳核电站（198万千瓦）分别于2002年建成，我国首座商用重水堆核电站—“秦山三核”（146万千瓦）2003年建成，秦山二核2号（60万千瓦）和地处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4台100万千瓦级压水堆型机组中的两台随后建成。从上可见，我国核电布局的主体思路是靠近沿海经济发达而又缺少常规能源的地区。

目前，我国核电发展主要建设100万千瓦级核电站，以缓解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急需，至2005年，中国内地三大核电基地：秦山（1、2、3期）、大亚湾（广1核、广2核）、田湾均可形成规模效益，核电容量合计913万千瓦，核电比例逾2%，其中浙、粤2省核电比例均为13%左右。

东部沿海缺电省区粤浙苏辽鲁闽等均在发展核电，以此作为解决能源短缺的一条重要途径，并重视选址与方案论证。其中“广东核电”已建、在建、规划四大核电站，分别布置于珠三角东、西两翼的大亚湾、岭澳、岭东、阳江。岭东核电站（“广三核”）在建，阳江核电站（“广四核”）靠近珠三角西翼，拟建6台100万千瓦级机组，年发电450亿千瓦时，将成为中国最大核电站。

在拥有经济实力省区纷纷择地发展核电的同时，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制订核电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对核电发展规模、布局、反应堆类型等，亦缺乏具体部署，核电发展各自为政，分散建设与布局。21世纪初开始将核电纳入国家能源整体规划，并拟定核电规划。至2020年，将新建27个百万千瓦级机组，中国核电达3600万千瓦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4%，布局主要集中于华东、华南，在建造方式上，由以前单个建造改为小批量建造，以获取规模效益，预计2020年前后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鉴于目前我国已拥有5000多名核电建设设计专家，建设成本控制也较好，而缺电地区又相当普遍，故在21世纪前十年将出现核电发展与布局扩展的态势。

在我国内地核电发展以前，台湾核电已形成一定规模。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台湾岛上三个地点建成6座核电机组，在全部电力供应中，核电比例曾达20%，现降至9%，是世界中等发达的核电地区。现正在第四个地点建设2座核电机组。核电站布局集中分布于岛上的南、北两端。其中：核1、核2厂位于台北县北部的金山乡；核3厂位于屏东县南端的恒春镇；核4厂地处台北县东北角的贡寮乡。总的布局特征是靠近负荷中心，但又同大中城市保持安全距离，且有山岭阻隔。但后来发现选址仍有考虑不周之处。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发生后，核电设施虽因距震中较远而基本安全，但台湾学者指出，上述核电厂布局多接近断层甚至活断层，使周边居民易产生恐慌。他们认为，核电站选址应重视地质状况的调查，查清附近地区有无断层，并对断层活动随时进

行监测。同时，提高对核电设施及其建筑的抗震系数，以确保安全运营。

在2000~2001年间，台湾核4厂曾经历数月停建并引发社会争端，后又复工续建，损失颇大；其核废料处理也遇到麻烦，最初选定朝鲜核废处置场，并已预支8000万美元，后因多种原因未实行协议。从2001年起倾向于运往西伯利亚处置，总量8000吨，再支付7200万美元。造成上述问题原因主要是台岛面积小，地质地貌复杂，经济布局饱和，用地缺少，且人口密度很大，核电选址回旋余地太小。

比较而言，大陆核电站建设中选址的回旋余地较大。秦山、大亚湾、田湾三地都直接濒海洋（便于建设独立的港口码头设施），并且分别拥有较为孤立的小半岛（便于统一规划生产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与外界有山岭相隔（便于安全防卫），同最近的城市主要市区保持有数十公里距离（必要的安全距离）。另外，地质、地理条件良好，三大核电基地布局均远离地震带，再从承压条件来看，地基情况良好，使核电站一系列重型设备及相关建筑所要求的地基承压条件有保证。

八、绿色电力——风电：资源、政策、布局

对核电发展的最大挑战是安全问题，在俄罗斯的车里雅宾斯克、美国三里岛、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等事故使核电发展过快的危险显露之后，世界一些地方（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脱离核电发展的潮流。与此相对应，对风力发电等其他能源的利用步伐大为加快。

据欧洲风能协会与绿色和平组织签署的《风力12》认定，风电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能源，而是已成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风能是一种无污染、可再生的新能源，且发展潜力巨大。风能的开发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失，符合当今世界推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风能开发通常具有投资大、装机容量小等特点，并网又有一定难度。因其分布地域广，且便于民间开发利用，故发展前景仍然看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资源保护和环保双重考虑，世界风电发展迅猛，到2003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逾3500万千瓦，集中分布于欧美。欧洲风电在近五年中年均增长35%，德国拥有1461万千瓦，居世界首位，美国（647万千瓦）、西班牙（641万千瓦）、丹麦（311万千瓦）均为风电总量较多的国家，我国居世界第9位。丹麦“风电比”已达17%；因多国竞相发展风电，并将其作为“替代能源”，预计到2010年欧洲风电总量达6000万千瓦，2020年全球风电将占电力总量的12%，绿色电力已成为新兴产业，前景有以风代煤之势。

我国10米高风能资源总储量32.26亿千瓦，陆地可开发利用风能的装机容量约10亿千瓦（其中内蒙古1亿千瓦、新疆6500万千瓦），次于俄、美，居世界第3位，具有商业化、规模化发展潜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风电开始向商业化发展，但生产成本高，为大水电的2~8倍，亦高于火电价。预计未来风电生产成本会有所下降。

风电开发已形成规模的，主要分布于我国内地的西北及东南沿海一带。上述地方的

风能具有稳定性高、连续性好、无破坏性风速等有利条件，适宜建设大型商业风电场。至2003年，中国内地已建40个风电场，预计2010年风电装机400万千瓦，2020年2000万千瓦。目前我国最大的风电场（10万千瓦以上）分别在广东惠来、江苏如东等地兴建。内蒙古二连浩特将建规模更大的风电园区，投资12亿美元，装机100万千瓦。建成后，二连将成为亚洲“风电之都”。

为鼓励发展风电，并推动风电产业化。2002年起我国对风电实施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半的优惠政策，可使风电价每千瓦时平均降低0.05~0.06元，而新建风电场电价可望降至0.5元以下，下降幅度0.1~0.4元。

在电力紧缺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粤、苏、内蒙古等地相继大力发展风电，成为我国风电产业化和规模化布局的主要载体。目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问题促使风电超常发展。至2020年，中国风电有可能超过预定规模（2000万千瓦），占到全球风电14%。

九、潮汐、潮流、地热发电

潮汐能、潮流能、地热能、风能等都属于新能源，亦为可再生能源。它们在地理分布上与常规能源呈互补特征，而且它们的开发利用将成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重要措施之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这就使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更具现实意义。

（一）潮汐能资源

目前已探明可开发利用的潮汐能为2500万千瓦以上。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苏和山东沿海一带，浙江的杭州湾、乐清湾沿岸，具有建设大型潮汐电站的良好条件。目前，我国尚未建大型潮汐电站，地处浙江省温岭市的江厦潮汐电站，装机容量为3200千瓦，在世界上已经建成的潮汐电站中居第3位，除每年可发电1000多万千瓦时以外，还进行海涂围垦、海水养殖等综合开发利用。

（二）潮流能资源

用于发电，在我国有很大潜力。根据我国与欧盟签署的协议，将在浙江省舟山市岱海海域合作兴建第一座100~300千瓦的潮流发电站。电站所在水道的潮流流速达到每秒2米。该电站建成后，可为开发我国丰富的潮流能资源提供借鉴。

（三）地热资源

目前已利用的仅占十分之一，地热能发电主要分布于广东、西藏。已在广东丰顺建成国内第一座地热发电站，且已并网发电。随后建成的西藏羊八井地热电站，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是拉萨主要电源之一。

十、抽水蓄能电站开发

（一）必须发展及合理布局的理由

抽水蓄能电站既能发电，亦为电网管理工具。它可由电网企业投资管理；亦可实行水火互济，由火电企业投资兴建管理；还可由超远距离送电的企业在负荷中心投资兴建，形成常规水电与抽水蓄能组合。在电价改革后，实施峰谷电价、调频、调相、事故备用等动态效益付费后，抽水蓄能电站也可以独立存在。

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发与合理布局，取决于各电网具体需要。

1. 在缺少水电的地区。

如京津沪苏鲁皖冀辽蒙等省（市、区），“水电比”通常不足3%，将来可能降至1%以下；加之这些地区又是西电东送受电区。故无论从调峰、调频、调相和事故备用考虑，均需开发、合理布置抽水蓄能电站。

2. 有水电但调蓄性能差的地区。

如粤湘赣琼黑豫晋等省，夏季调峰水电均在6.2%以下，难以满足系统调峰需求，需建设并合理布置抽水蓄能电站。

3. 风电比高的地区。

如内蒙、新疆，在大规模开发风电及并网发电后，需建抽水蓄能电站将随机电力转换为调峰容量。

（二）布局现状，前瞻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内地始建抽水蓄能电站。至21世纪初，已在9个省（市、区）建成11座、总装机570万千瓦，主要分布于广州、浙江天荒坪、北京十三陵、河北潘家口等地；在建或将建的则主要分布于泰安、桐柏、宜兴等地。

十一、利用新能源发电，减少对石油依赖

近年，随着石油危机与油价攀升，不少国家（特别是石油进口国）格外重视开发新能源，其中欧美国家重视发展风电，而几乎100%依靠进口石油（80%来自中东）的日本，在2003年美伊战争爆发后，实施《特别措施法》，规定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能、中小规模水电，强制企业使用一些新能源，并规定日本电力企业如不能完成一定数量的新能源发电，将被课以罚款。

中国年进口原油逾1亿吨（56%来自中东），石油安全问题凸显，但对发展新能源重视不够，除对风电开发有政策扶持以外，法律尚未涉及。应根据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开发多种能源。

第七节　西电东送，全国联网

一、能源地理分布的局限性，大地域范围能源资源优化配置

由于受能源资源、水力资源分布和用电负荷中心、电力市场分布不一致的限制，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电力工业提出了“西电东送”的发展战略。

从水力发电来看，水电资源高度集中于西部地区，在全国可开发的3.78亿千瓦水电中，西部占70%以上，而用电量仅占全国17%左右，全国用电负荷集中于东南沿海，其中粤、苏、浙、鲁4省即占全国电力消费的27%，且潜在电力市场仍然很大，预计至2010年前，仅广东就需新增3000万千瓦，华东、华中需新增1亿千瓦以上。因此，必须大力开发西部电能，实现西电东送；从火力发电来看，因煤的分布集中于华北、西北，大量西煤东运，成本高，又造成全国运网不堪重负，如将一部分煤转换电力再向东送，则更有利。因此，华北西部和西北的一些大火电站，也应成为西电东送的源头。

由上可见，能源分布与消费地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实施西电东送的必要性。西电东送将促进在最大地域范围内实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跨省电网及其布局

在我国很多地方，过去供电范围小，后经大力发展联网供电，开始时是200千伏以上交流电压电网。从1981年起建设500千伏电压的超高压电网，使送电距离大为延长，供电效率相应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电力系统运行主要以省为实体进行，即以各省作为相对独立的电力电量平衡核算单位和电网运行实体的格局。至2003年底，大部分省网的装机容量规模在1000万～3000万千瓦之间，广东省网、山东省网均超过3000万千瓦。台湾电网逾2600万千瓦。

跨省区电网现有华东、南方、华中、华北、东北、川渝、西北等七大电网，各电网的容量在2000万～7000万千瓦之间。华北电网火电比高达98%，网内有一大批区域性的骨干火电站（如唐山发电总厂、神头一电厂、大同二电厂、张家口沙子岭电厂等），发电装机容量逾6000万千瓦。近年来，华北电网相继与东北电网、华中电网实现联网，加上华中、川渝两大电网也已实现互联，遂形成北起伊敏、南至二滩、跨14省区的超大型交直流互联电网。

华东电网包括沪苏皖浙的主要电厂，电网容量迅速扩大至6000万千瓦，年发电3700亿千瓦时以上，成为大容量和超高压运行的电网。网内除少数大型水电站以外，

以火电为主，核电增长较快。2003～2004年缺电较多，正在兴修一批大型火电站和坑口电站。

川渝电网作为承担“西电东送”的主力电网而发展迅速。其外送电力2005年为250万千瓦，2010年为600万千瓦，2020年为1800万千瓦。如加上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白鹤滩、乌东德四大电站在内，外送总规模5000多万千瓦。巨量电能通过“两交四直”的外送大通道向华东、华中、广东输送。

华中电网由湖北、河南、湖南、江西电网联结而成，其突出特点是电网容量大（超过5000万千瓦），水电比重大。该电网利用河南丰富的煤资源和湖北、湖南、江西的水能优势，形成电网内南水北火、水火互补、彼此调节能源开发格局。目前正进一步扩大容量。三峡水电厂建成后，华中电网容量逾7000万千瓦。其庞大的电力送出工程包括：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6519公里、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2965公里，主送方向为华中、华东、广东。预计2009年26台机组全部发电后，同时建成的三峡输变电工程向华中电网送电能力可达1200万千瓦，向华东电网送电能力可达600万千瓦，向川渝电网送电能力200万千瓦，向广东电网送电能力300万千瓦。2020年金沙江下游四个巨型梯级电站建成后，将形成以三峡为中心沿长江展开的供电网络。届时，华中电网与川渝、华东、福建电网实现互联，将形成全国最大的中部超级电网。

由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电网组成的南方电网，是以“西电东送”为最大特色的跨省商业化大电网，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发展迅速，后来居上。电网总装机容量逾4000万千瓦。其主要特征是电网所在地区水力资源极富，但分布很不均衡。其西翼资源集中度很高，云、贵电能资源储有量占全区90%，而其东翼的广东却是常规能源贫乏区。为使东、西两翼优势互补，从90年代起，区域内的水能大规模开发利用。因此，南方电网水电比重高，并已实现水电、火电、核电；抽水蓄能等多种电源互补、水电跨流域补偿调节，既提高供电可靠性，又能错开用电高峰，增加效益。

南方电网内，至2004年已先后建成500千伏“五直三交”八条西电东送大通道，成为中国第一个远距离、大容量、超高压、交直流并联运行的大电网。其中，西电送广东总的通道输电能力1088万千瓦，至2010年还将再增加1030万千瓦。

在目前南方电网的基础上，随着红水河、澜沧江、金沙江、乌江等流域的开发和贵州煤电基地的建设，将扩大范围形成我国的南部超级电网。

东北（含内蒙东部）电网原为全国最大电网，现地位下降，但仍不失为大电网之一。容量逾2000万千瓦，网内大型骨干电厂多，以火电为主（约占92%）。21世纪初，东北、华北两大电网互联。2003年起东北电网内建立区域电力市场。

由陕、甘、青、宁组成的西北电网，不仅拥有黄河上、中游的水力“富矿”，而且煤藏也大，近年来电网容量迅速增加，西北电网亦与华北电网互联，开始西电东送。

华北、东北、西北三大电网及山东电网实现互联后，将共同组成我国的北部超级电网。至2005年，网内的陕西、内蒙等地可向京津唐送电270万千瓦。

三、全国联网、西电东送主要涉及的地理区，效益与负面影响

按照“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方针，在近期将以三峡建设为核心，向东、西、南、北方向辐射，建设并形成电网互联的送电通道为主体、南北电网间多点互联、纵向通道联系较为紧密的全国互联电网格局。到2005年实现西电东送2000万千瓦，区域大电网间电力交换能力1500万千瓦；到2010年实现西电东送4000万千瓦，区域大电网间电力交换能力3000万千瓦；2020年将在全国联网形成的基础上，全国西电东送规模每年为8000万~1亿千瓦。

由于全国联网形成，使华中电网西翼、南方电网西翼以及川渝电网、西北电网内所发出的强大电力，通过联网送到国内的各主要负荷中心（主要位于东部电力市场），合理调剂东西部用电和南、北用电，调剂火、水电，获取经济效益‘且提高供电安全性。还可以改变长期以来电力资源局限于某一地域内配置的情况，并改变电力管理体制及电网结构的不合理方面，从而使电力资源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发挥水火互补、东西互补、南北互补的作用。据估测，仅南方电网内实现西电东送后，比各省单独运行在2020年可减少装机700万千瓦，总费用减700亿元。同时还减轻了污染，仅SO_2排放一项即可减少经济损失80亿元。另外，西电东送代替广东油电或煤电，在近期利用电价差可获益30多亿元，远期可达80亿元以上。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地区时差大，用电高峰相应有较大的时间差。利用这一特点，通过全国统一电网，可实现“移峰填谷”，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国发电机组的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一方面，通过全国电网的远距离调电，将东、西部不同时差的巨大效益充分调动起来；另一方面，则可调剂水、火电，将丰盈的南方水为北方所用，尤其是在丰水年，可充分开发丰水地区的水力，发电后调往需要电力的地方。如果全国不联网，上述大范围和远距离调电都不可能。

但是，跨地区甚至跨国电网，因其过于庞大与复杂的网络，也呈现出脆弱的特性，加上自然地理要素中某些难以预测的部分，有时会造成一处不慎，满盘皆溃。如2003年夏以纽约为主的美加电网大停电，曾使两国的很多城市陷人瘫痪。

在21世纪，随着长江三峡和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红水河、澜沧江梯级开发中一系列巨型水电站以及华北西部和西北陕西等一批大型火电站的建成，就构成了实现全国联网以及大规模西电东送的条件（小规模西电东送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

另外，还应看到大批电厂（水电及配套火电）的建设和运营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危害相当可观。如有的水电站建设造成泥石流危害加剧；又如配套火电密布于黔西滇东酸雨区，会进一步加剧污染。另外，西电东送距离遥远，主要电源点至广东、华东、京津唐输电距离2500~3000公里，如此远距离的输电费用连同线路管护费用都将摊人电价，使电价“水涨船高”。

四、西电东送主通道

在我国内地，已相继形成并继续扩大三条西电东送主通道，第四条通道也即将形成。

（一）南部主通道

主要由南盘江、红水河、澜沧江、乌江各干流河段上梯级电站的电力东输广东等地，并形成连接粤桂黔滇4省区和港、澳地区的南方电网。其中东输广东电力已达350万～400万千瓦，2005年增至1000万千瓦，包括黔电400万千瓦，滇电160万千瓦，三峡电300万千瓦。本通道西电东送主源头现为南盘江天生桥1、2级电站，随后增加长江三峡电厂、红水河龙滩电站、澜沧江小湾电站等，加上黔西滇东地区坑口火电或配套建设的火电，形成多源头西电东送。从柳州经贺州至佛山罗洞的二回500千伏输电线已于2004年开通。

（二）中部主通道

主要由长江干支流水电站的电力东输长江三角洲等地，并形成连接川渝、华中、华东三大区电网的超级电网。

长江水系为深谷型河道，可开发22座水电站，集中数千万千瓦电源。现有葛洲坝一上海500千伏超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雅砻江二滩一万州一上海输电线路；三峡500千伏电力送出线。2003年后形成长江三峡电力外输，加上长江干枝流其他电站相继建设与滚动开发，至2020年，本通道西电东送可达2000万千瓦以上巨大规模。

本通道的关键是三峡电力东输，故建有多达15回的500千伏送出干线，主送方向为华中、华东、广东。

（三）北部主通道

主要由山西、陕西、内蒙西部的煤电基地以及黄河上游公伯峡、拉西瓦等水电站的电力东输京津唐和山东，并形成连接西北、华北、山东电网的北方大电网。

本通道各大坑口电站密布于晋陕内蒙，仅"十五"期即装机580万千瓦（其中山西460万千瓦），新建项目多采用空冷节水的大机组，并有骨干大矿支撑，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就地消化原煤2000万吨，将进一步改善山西输煤输电比重，并可节水78%，提高综合效益。

本通道的关键是托克托经浑源至安定双回500千伏等三个输变电工程、神州二电厂二期等四个电源工程。2006年后送电容量500万千瓦，2015年增至800万～900万千瓦。

五、西电东送与宏观经济布局

鉴于西电东送是一项大的地理区域之间乃至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布局上需要反复比较论证，同时还必须防止重复建设、区域保护等不利于宏观经济布局合理化的情况出现。

因此，西电东送及其主通道布局，只有在下列情形下才是经济合理的：(1) 符合大地域范围资源综合利用与优化配置原则，打破省间壁垒，避免电源重复建设；(2) 满足西部地区本身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要，包括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而形成的对电力增长的需要，在上述基础上大力推动“西电东送”；(3) 东部地区电力市场为接纳西部电力留出相应的市场空间；(4) 在对区域、全国电力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关停小火电，并严格控制新建常规燃煤火电机组，以免在受端出现电力市场狭小的局面；(5) 西电东送项目（尤为火电）建设与布局涉及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故其主要电源点选址、输电线路选线等必须推行“环保至上”原则，从一开始就重视对环境的影响，以防各电力输出地域环境污染加剧；(6) 加强西部地区电网、东部受端电网和西电东送电网的全面性、整体性规划、建设，推进全国联网进程。重点是结合西部大型水电基地的有序开发，加强与完善西部区域主骨网架及负荷中心受端网架建设，进行高一级电压等级输电网络建设，逐步推进区域联网、全国联网和跨国联网。

第四章　制造业布局

制造业对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即便是处于“后工业化社会”或者是信息时代的发达国家，由于服务与信息的载体均为物质产品，制造业的发展也仍处于一种核心地位。美国制造业对 GNP 的直接贡献始终超过 26%，拉动其他产业 36%；中国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已有多年超过 40%，并占税收的 36%，它是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发动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正式采用制造业的行业分类。当时将制造业划分为 31 个大类，90 年代调整为 29 个大类。到 21 世纪初，标有 Made in China 的产品遍销世界。

制造业发展受原材料工业等各部门发展水平的制约，故应与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制造业布局主要研究其生产的分布规律，包括各工业部门的发展条件和特征，地域分布及其形成，结构特征和地区联系等。

第一节　世界制造业生产经营方式与布局的新变化

一、制造业全球生产经营的传统方式

制造业全球生产经营的传统方式主要是：(1) 在本国设立生产基地，向国外批量销售产品；(2) 在产品销售国或其他条件有利的地方设立制造企业，直接控制生产制造设施与技术，并掌控生产全过程，产品就近销售或经由制造企业所在国再出口。

二、制造业跨国公司的新变化

近二十多年来，制造业跨国公司开始改变上述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广泛利用别国生产设施与技术大量进行产品制造与销售，而跨国公司本身只掌握产品设计和关键技术，或者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环境有利、生产成本较低又有技术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东南亚等地），设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网络，而跨国公司本身只做产品的总装与营销。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结构重组及地位变化

一、制造业发展概况

（一）发展历程

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开办一家机器印刷厂，一般认为这是近代制造业在我国的开端。但此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我国制造业仍很薄弱，主要产品产量和产值在世界均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1949年全国制造业总产值尚不足100亿元。制造业布局也很不合理，只集中于东部沿海少数几个城市，沿海的其他地区以及广大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依旧停留在起步状态。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规模、结构，制造业布局，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业主要部门，从其职工人数来看依次为：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从总资产来看依次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等；从销售总额来看依次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等。

（二）现状概述

至2001年，中国内地制造业创造了GDP的42%。另外，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77.6%；纳税占全部税收36%；就业占全部从业人员11.3%；出口占外贸出口总额的89.9%。

中国内地制造业主体构成，如图表4－1所示：

图表4－1　　**中国内地制造业主体构成**

（2002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

项　目	排　　序
按职工人数多少（万人）	①纺织业（280）；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26）；③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17）；④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07）；⑤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89）；⑥普通机械制造业（187）；⑦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155）
按总资产大小（亿元）	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9879）；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9780）；③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9723）；④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9598）；⑤纺织业（6681）；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680）；⑦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6238）

项　目	排　　序
产品销售收入大小（亿元）	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10957）；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8030）；③化学原料及制品业（6975）；④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6472）；⑤纺织业（6039）；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5749）；⑦石油加工及炼焦业（4894）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摘编。

二、在世界制造业中地位变化

近二十多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大幅增长，已成为继美、日、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生产国。至21世纪初，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1位。预计2005年可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生产国。

三、制造业主要部门结构、地域结构概貌

现有100多种位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产品，涵盖家电制造业、通信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等10多个行业。在中国内地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个世界级的制造区域。上述三个区域在全国制造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66%，出口总额比重在85%以上。

四、制造业人工成本优势明显

从图表4－2可见，我国制造业同老牌制造业强国德国以及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相差悬殊，但时序变化较大。

图表4－2　　制造业人工成本时序变化及国际比较　（单位：美元/小时）

国家或地区 ＼ 年份	1990	1999
中国（内地）	0.244	0.756
德国	21.88	26.0
美国、日本	13.0	20.0
韩、台、港、新	3～4	7～9.5
墨西哥	1.5	2.12

另据国际劳工组织近年统计，按当年平均汇率，对中、日、德、美、英、印、泰16国（地区）近年制造业人工成本测算，中国相当于日本的2.1%、美国的2.2%、德国2.8%、英国2.9%、韩国5.2%、中国香港5.2%、新加坡5.9%、中国台湾6%、墨

西哥 11.3%、巴西 18%、马来西亚 22.7%、泰国 44.2%、菲律宾 48.3%、印度 95.6%。

连续二十年的人工成本优势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但是过低的工薪也使许多工人心寒，以致从 2004 年开始在珠江三角洲等地相继出现“民工荒”。这将影响制造业的后续发展。

五、尚未成为“世界工厂”

18 世纪中叶开始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广泛使用，纺织业等部门迅速发展。此后至今约两个半世纪，英、美、日相继成为世界工厂。近十余年，有些媒体认为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中国经济“收获的十年”，并指出“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与日本的产业空洞化问题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亚洲经济增长点是中国的上海或印度的班加罗尔，不再是日本的东京”。

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工厂”，但实际尚未达到这一步。日本仍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工厂，而且在总体上日本制造业技术水平仍居世界第一。如日本钢铁业产量远低于中国，也低于美国，但其产业集中度远高于中国，且高附加值钢材产量居世界第一，钢材出口亦居全球之首；作为衡量工业发展水平的机床工业，日本机床产量中的 87% 为数控机床，机床数控率超过率先开发数控机床的美国。另外，日本正处于由追赶型的经济增长向成熟型、开拓发展型的经济增长转变，增长速度下滑反映出结构调整有所滞后。而我国制造业的成长则多反映在低端产品的成本优势及市场价格优势，尚未从整体上构成对日本制造业的“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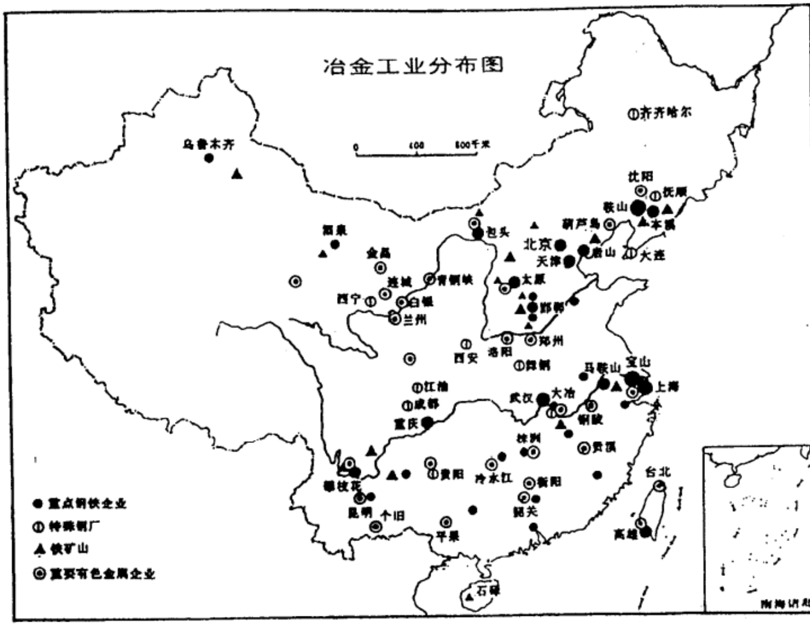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于加工业的大幅度增长，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领域，除某些部门以外，中国还处于开拓阶段。而进一步发展制造业的瓶颈则是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员工技术素养欠缺，“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中国创造”。

我们是在缺少自主核心技术的情况下，以廉价劳动力为依托进入全球产业链的，而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当我们在全球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时，就很容易受到发达国家大公司的专利围剿。

第三节　冶金：产业集中度仍较低

在现代工业体系中，冶金工业是重要的基础材料产业部门，被称为“资源型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包括冶金工业在内的资源型产业的上游可以扩展至能源开发领域，下游发展到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产业。

我国冶金工业布局，如图表 4－3 所示：



图表 4－3

一、钢铁业从“夕阳产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到 20 世纪末，全球年产钢的能力为 16 亿～17 亿吨，实际产量 7 亿～8 亿吨。由于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钢材售价低廉，使用范围广泛，并可回收利用，因此，现今任何一种基础材料都无法取代它。

（一）资源型产业地位变化

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使许多资源型产业被归入“夕阳产业”，失去了以往的显赫地位。这些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影响到不少国家钢铁业的衰退。但到 90 年代以后，由于钢铁业内部的更新改造，采用新技术，不断适应用户对新材料、新用途的要求，如薄板坯连轧机等。随着这些工艺的使用，成本进一步降低，应用范围更加扩大。此外，钢铁企业“三废”多、能耗大的传统观念也有所改变，三废能转变为可利用资源，能源可以自给，甚至实现“负能耗”炼钢。以上这些均使原已呈现夕阳化趋势的钢铁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在的钢铁业是资源、资本、技术、能源密集型的产业。

（二）经济安全因素的影响

钢铁的保证程度，通常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因此，尽管是以初级产品为主，但发达国家对此均给予足够重视，欧元区国家、韩国、日本、美国等多年来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保持对钢铁工业持续发展和合理布局的高度重视。

（三）资源条件利弊参半

我国发展钢铁业的资源条件有利有弊。铁矿石储量尚存 213.6 亿吨（2002 年），在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和巴西等国。但矿石含铁率普遍较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优质富矿。需大量进口富铁矿石，并重视发展矿石的采选和烧结技术，将贫矿转化为人造富矿人炉冶炼。同时，我国铁矿资源还多共生、伴生的综合矿。为此，需着重解决冶炼过程中的工艺技术难题，尽量提炼出多种金属物质，以综合利用现有资源，提高经济效益。

此外，炼焦煤资源丰富，且铁矿和煤炭资源的地域结合一般也较好，有利于钢铁厂就近获得焦炭供应。至于钢铁生产所需的各种辅助材料，蕴藏丰富，分布广泛，可满足需要。

二、钢铁工业的特殊敏感性，其发展的国际比较和布局变化

作为主要基础材料产业的钢铁工业，同制造业的许多部门（汽车、造船等）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吸纳力强。因此，一些经济大国均尽力保护本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美国更有保护甚至偏袒钢铁业的传统。

因此，钢铁工业的战略性调整，必须发挥政府的调控引导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

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开工率仅 50% 左右。在现代钢铁业发展史上曾长期位居前列的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钢铁生产萎缩，1998 年以来已有 10 多家钢铁制造商破产。但欧元区的钢铁业却出现转机，由于投入巨资开发新技术，并考虑到国际环保潮流影响，采用更清洁的生产线，还通过新的管理系统节约了成本，并超标减少污染，使一些历史悠久的钢铁厂商相继摆脱困境。至 2000 年底，欧元区钢铁业生产率居全球之冠，钢铁产量及主要生产商在世界的地位均呈上升趋势。

世界主要钢铁厂商及其地域分布，以及世界钢铁工业布局和洲际国际比较，如图表 4－4、4－5 所示：

图表 4－4　世界主要钢铁生产商及其地域分布

2000 年			2001 年		
生产商（公司、集团）	地域国别	规模（100 万吨）	生产商（公司、集团）	地域国别	规模（100 万吨）
浦项制铁	韩国	26.8	阿塞洛	跨国	43.1
新日铁	日本	26.1	浦项制铁	韩国	28.6
阿尔贝德	卢森堡	22.4	新日铁	日本	26.2
LNM	英国	21.0	伊斯帕特	英国	19.2
宝钢	中国	18.9	宝钢	中国	19.1
科鲁斯	英/荷	18.4	康力斯	英国	18.1
日本钢管	日本	18.0	蒂森·克鲁伯	德国	16.2
北方钢铁联合	法国	17.1	里瓦	意大利	15.0
蒂森·克鲁伯	德国	16.0	NKK	日本	14.8
里瓦	意大利	14.0	川崎制铁	日本	13.3

图表 4－5　世界钢铁工业布局，洲际国际比较

地域、国别＼年份、产量	钢产量比较（百万吨）	世界产钢国排序
世界	783.2	
亚洲	308.5	
东亚	248.6	
中国	115.6	1
日本	86.5	3
韩国	43.5	5
欧洲	281.4	
欧元区	155.4	
德国	40.8	6
俄罗斯	50.8	4
美洲	163.4	
北美	128.8	
美国	107.6	2
南美	34.6	

三、产业集中度仍较低，过度、无序投资扰乱合理布局

我国是世界上炼铁早的国家。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就有炼铁业，到春秋战国发明了铸铁和炼钢技术。但近代钢铁业起步甚晚，直到1890年才由张之洞建成第一座小型钢铁厂——汉阳铁厂。以后，在鞍山、本溪等地建立规模较大钢铁厂。1943年全国产生铁190万吨、钢92万吨。1949年居世界产钢国的第26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国民经济发展各时期，几乎都把发展钢铁摆在特殊重要地位，虽然取得成绩，但却走过曲折道路。进入90年代后，我国钢铁业由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时期，进入整体结构调整、提高竞争力为主的阶段。按国家产业政策，以市场为导向，优化结构，重点发展供铁路、汽车、造船、发电、机械、石油、煤炭等行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各种钢材，并逐步建立产需衔接的市场销售体系。

2002年，中国内地产钢1.8亿吨，2003年达2.2亿吨，占世界四分之一，超过美、日、俄、韩、德等国，居全球首位。但是，各地投资钢铁业的热潮不减，不仅新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而且一些地区年产100万吨甚至30万吨的小钢厂也层出不穷，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形成第二次大炼钢铁运动。①如果已经上马的投资全部达产，到2005年炼钢能力达3.7亿吨，2010年4.5亿吨，而实际需求则是：2005年2.5亿吨，2010年3.1亿吨，产能远超过需求；而且原料也难以供应，即使全球出口铁矿都卖给中国也不够。结果只能是过剩设备能力增大。由此可见，过度与无序投资已经扰乱了中国钢铁业的合理布局。

另外，还应看到在工艺结构方面，国产优质钢和一般钢的比例低，低水平产能过剩和高附加值产品短缺两者并存，其中以冷轧板为主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产能严重不足。近年钢材进口激增，1996年进口量1440万吨，2002年2450万吨，2003牛3717力吨。

企业规模效益问题亦很突出。钢铁企业规模小而散的现象各地普遍存在。2003年我国有300多家炼钢企业，平均规模仅70万吨。其中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企业13家，绝大多数企业，形成了小而分散企业组织结构和地域结构。同世界钢铁工业大国相比，我国钢铁工业布局的最大缺点就是“产业集中度”太差，因而影响到经济效益。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没有浦项制铁（韩）、新日铁（日）那样的超大型企业。

地处韩国东海岸的“浦项制铁”曾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钢2860万吨，控制韩国45%的钢材市场；日本五大钢铁公司产钢占全国77%，而且NKK、川崎、新日铁、住友正在酝酿联合；欧洲的22家钢铁企业联合兼并，目前是4家大集团。我国年产钢居前列的13家企业，集中度只占全国43%，不利于应对国际竞争。

四、结构调整，布局转移

钢铁工业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80～90年代则逐步走上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当前处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阶段，在产品结构、工艺技术装备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基本实现现代化配置。在产品结构方面，加快发展冷轧薄板、镀锌板、不锈板、冷轧硅钢、热轧薄板等；工艺技术装备结构调整方面，淘汰落后工艺，整体提高技术装备水平；逐步关停小钢铁厂，推动钢铁企业优化配置。

在布局方面，鉴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钢铁工业布局应逐步向钢材市场容量增多的地区转移。同时，鉴于进口铁矿石激增（2003年增至1.4亿吨，2004年达1.8亿吨），成为影响布局的主要因素，故此，钢铁工业布局应逐步向利用进口矿条件较好的沿江、沿海地区转移。又鉴于我国地域辽阔，运输费用在生产成本中占有较大份额，故普通钢材生产布局应尽可能面向本地市场，以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在缺水或严重缺水地区（如西北、华北）及环保达标难度大的地区，如首都、大城市及重要旅游中心、风景名胜地区的钢铁工业，应限制或缩小企业规模或迁移至条件适宜地区重新布局。

五、主要钢铁企业、生产基地特色

钢铁生产的地域分布，相对集中于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等地。

重要的钢铁生产企业有：2000万吨级的宝钢；1000万吨级的鞍钢；800万吨级首钢、武钢；600万吨级本钢；500万吨级马钢、唐钢、攀钢、华菱、包钢。我国主要钢铁企业地域分布，如图表4－6所示：

图表4－6　　中国主要钢铁企业地域分布

序　号	生　产　商 （集团、公司）	地　域 （省、市、自治区）	2002年产量 （100万吨）
1	宝钢	上海	19.48
2	鞍钢	辽宁	10.07
3	首钢	北京	8.17
4	武钢	湖北	7.55
5	本钢	辽宁	6.21
6	马钢	安徽	5.38
7	唐钢	河北	5.07
8	攀钢	四川	5.01
9	华菱	湖南	4.91
10	包钢	内蒙古	4.82

2002年，上述10家企业占全国产钢量42%，是生产高档次、高附加值钢铁产品的主要企业。其中鞍钢是有八十年历史的老企业，一向有“钢都”之称。而邻近的本溪则是冶炼优质铸造生铁的大本营，均为靠近资源布局型的钢铁基地。上海钢铁基地的布局则靠近消费中心，该基地包括宝钢公司和上海冶金以及江苏梅山钢铁联合企业等。上海既是一个老基地，又引进新技术，建立了宝钢，由于两者相结合，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均居全国首位，是精品钢材的最大生产基地；武汉钢铁基地的综合生产规模居全国第3位。地处四川的攀枝花钢铁公司，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也是我国最大的铁路用钢生产基地和独具特色的钒钛钢铁生产基地，其炼铁提钒工艺和生产规模居全国首位，重轨的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包头则是建立在内蒙古草原上并以回收稀土为最大特色的钢铁基地。太原是我国最大的不锈钢和不锈钢材生产基地。马鞍山原是我国江南最大的生铁冶炼基地，到21世纪初已扩建成为以生产H型钢等产品为特色的大型钢铁企业。京津唐钢铁基地的建设具有煤、铁资源条件，本身也是多种钢铁产品消费区，目前该基地拥有大型炼钢设备，在生产小型钢材和各种钢管方面也有特色。

国企在我国钢铁企业中一向占垄断地位，江苏张家港市（原沙洲县）的“沙钢”则是民企，1993年投资13亿元引进设备，1996年与韩国浦项制铁合资建设年产15万吨不锈钢薄板、15万吨热镀锌板，2001年收购德国霍斯钢铁公司全部设备，2003年开始与浦项制铁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预计至2007年沙钢年产可达1000万吨，成为大型民营钢铁企业。

随着制造业规模化，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不锈钢消费国（次于美国），预计2005年以后成为第一大不锈钢消费国。为此，已先后建成一批不锈钢、特殊钢生产企业，主要分布于太原、宁波、天津、齐齐哈尔、抚顺、大连、江阴、张家港、西安、西宁、大冶、江油、成都、舞钢、贵阳。

六、关联度高的有色金属工业

同黑色冶金工业相比，有色冶金工业体系庞杂，门类繁多。在大约70余种有色金属中，如以其本身的比重、价格来区别，则可分为以下5类：比重韶讨4.5的为“重有色金属”，包括铜、锌、铅、锡、镍、锑、汞、钴、镉、铋等；比重小于4.5的称“轻有色金属”，包括铝、镁、钠、钾、钙、锶、钡等；价格昂贵者称为“贵重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铂、铱、钯、锇、钌、铑等；此外，还有“半金属”（硅、硼、硒、磷、砷等）和“稀有金属”（钨、钼、钒、钛等）。

（一）关联度很高的产业及正在延伸的产业链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关联度达到0.95，并正在延伸为相当长的产业链，成为日益带动经济社会发展钧重要基础产业。

有色金属一向是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产业部门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建筑业和民用工业。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有色金属同钢铁生产之间总是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向前发展，有色金属的比重将逐渐增大。

（二）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国际比较

近年来，世界主要有色金属工业跨国公司对产品结构、资本结构等都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由此对世界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布局带来新的影响。中国已成为世界有色金属工业的主要生产国。2003年，中国内地10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1205万吨，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电解铝产能500万吨，钨、锡、锑、稀土、镁等有资源优势的金属占世界二分之一的市场份额，锌、铅产量占世界五分之一，铜产量占世界不到十分之一。

但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在发展和布局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1) 有色金属资源总体条件不好，至2003年，国内矿产资源已难以支撑有色金属工业快速发展，铜产量60%、铝产量48%、铅产量30%均靠进口原料生产；(2) 技术装备水平同跨国公司采用高效、低耗、低污染的新技术装备相比仍有差距；(3) 生产布局集中度低（同国外企业生产规模趋于大型化相比）。

（三）资源特征及地理分布

我国有色金属资源总的来说要比黑色金属资源丰富得多，而且品种也较齐全，不少品种的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其中钨、锡、锑、钛、锌、镁、钽和稀土的探明储量居世界之首，铅、铝、钼、镍、铌、汞等的探明储量居世界前列。拥有一批条件优越的大型矿床，如江西德兴铜矿、甘肃金川镍矿、山西孝义铝矿、广西大厂锡矿和平果铝矿等。特别是铝工业的地理分布，优势明显：全国铝资源的85%，集中分布于山西、河南、贵州、广西等煤炭资源、水电资源丰富的4个省区，是实行铝—电联营、大规模开发铝工业的理想之地。

七、有色金属工业布局变迁

近年重点发展氧化铝和建设新的铜基地，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煤、电、铝联产。鉴于部分矿产资源短缺的矛盾突出，特别是铜、铝资源不足，故把矿业开发作为重点，冶炼和一般加工能力不再扩大。

（一）铝土资源的丰富与不足

铝材是仅次于钢材的金属材料。在轻有色金属中，铝处于最重要地位。我国铝土矿石基础储量71557万吨（2002年），次于澳大利亚、几内亚、巴西等国，为铝土大国之一。但铝资源80%属贫矿，有先天不足之处。而且又以一水硬铝矿为主，并具有含硅高、铝硅比小、难溶解等弱点。

上述铝土资源结构特征曾长期制约着我国氧化铝工业发展与布局。20世纪90年代，随着选矿技术与氧化铝生产新工艺实现重大突破，特别是在选矿技术上找到了一整套一水硬铝矿选矿新工艺，并可使氧化铝生产能耗降低，进而降低铝工业生产成本，影响工业布局。

（二）铝工业布局，世界铝业产销中心正向中国转移

铝土矿地理分布特征是影响氧化铝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我国以一水硬铝矿为主的

铝土矿资源90%集中分布于山西、贵州、河南、广西境内。此外，在海南发现有三水铝石矿，但储量较少。

铝工业通常包括从铝土矿提炼氧化铝，以及再由氧化铝冶炼金属铝。氧化铝生产基地布局一般靠近矿山，而金属铝生产基地布局，则因耗用大量电力而靠近电能中心。

电解铝企业回报率通常较高，近年来在许多地方形成投资热，并助长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1995年中国内地电解铝企业53家，产量187万吨；2003年猛增至132家，546万吨（产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解铝生产国。但重复建设趋势仍然存在，扭曲了产业的合理布局；铝加工发展亦快，铝材产量1990年仅39万吨，2003年达363万吨。另外，上游产业氧化铝的在建、拟建项目2000万吨，促使资源消耗太快。

预计我国铝加工材消费高峰从2005年起至2022年达最高点，年需求逾1000万吨。国际铝业投资商正以高、精项目为切入点进入中国。

目前我国电解铝企业平均规模太小，且不具备合理的产业链，没有足够的氧化铝原料，也缺廉价电力，其盲目无序发展表现出“粗放型”特征，与世界电解铝工业生产大型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主流不符。故应优化配置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合理的产业链。

现有氧化铝基地主要分布于河南、山西、山东、贵州、广西；金属铝生产基地主要分布于河南、青海、宁夏、贵州、甘肃、内蒙、广西；铝加工业则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这里是中国内地铝加工材的最大生产基地，次为长江三角洲。

（三）铜资源不足与铜工业布局改善

铜的重要性居重有色金属之首。我国铜资源的基础储量2966万吨（2002年），资源总量不丰，但从长江中下游到黄河流域均有分布。长江中下游的赣、皖、鄂3省，是重要的铜矿资源分布带，20世纪80年代才获得大规模工业开发的赣东北铜带，包括德兴、永平、武山、城门山、东乡等5个大型铜硫共生矿，已探明铜的工业储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湖北大冶，安徽铜陵，山西中条山，云南东川和易门，甘肃金昌和白银亦有铜的蕴藏。另外，西藏冈底斯铜矿带蕴藏亦较丰富。

至21世纪初，重要铜矿的储量消耗已过半，三分之一铜矿山在21世纪头十年内将陆续关闭，面临资源危机。

铜矿的开采基地主要有德兴、永平、武山、东乡、银山、城门山、东川、易门、中条山、铜陵、大冶等，其中地处江西的德兴铜矿为亚洲最大铜矿。拥有新建的3000万吨级大型露天矿山。铜的冶炼中心有贵溪、铜陵、上海、沈阳、白银、昆明。“江西铜业”（有全国最大的炼铜厂）2003年产铜34万吨；历史上有“中国古铜都”之称的铜陵亦为大型炼铜基地，“铜陵有色”2003年产铜33.7万吨。铜加工工业则集中于上海、洛阳和沈阳等地。新兴的江西铜基地已成为中国铜工业的支柱，对缓解我国铜的产供需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铜市场供不应求，为此大量进口铜及铜产品。2003年全国生产粗铜131万吨、精铜177万吨，铜材330万吨。铜的消费量急剧增长。2002年全球铜的消费量为1520万吨，而我国的铜消费量增加到250万吨，占世界17%，并已取

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铜消费国。铜精矿进口量1990年24万吨，2001年增至226万吨，2003年铜产量的60%以上依赖进口原料生产。

(四) 钨资源消耗过多，钨品生产总量失控

作为稀有金属、战略资源，我国钨的储量大，有“钨的王国”之称。钨（WO_3）的储量至2002年尚有292万吨，钨精矿产量、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分别占全球80%、70%；钨矿主要分布于赣南，盘古山、浒坑、大吉山、漂塘、荡坪、下垅、铁山垅等地所产钨砂占全国60%，为世界著名的钨矿产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钨精矿年产保持在4万吨水平线上，出口价也较稳定。此后，受利益驱动，许多地方出现采钨热，钨精矿年产激增至6万吨，超额出口，导致国际市场钨价下跌，宝贵的战略资源大量消耗。

1998~2001年，通过政策调整限制钨矿开采，整顿矿业秩序，实行出口配额限制。2003年全国钨精矿折合量6.7万吨、APT（钨的中间产品）产能9万吨。目前，我国钨工业技术仍较落后，长期以来生产初、中级产品为主以及钨矿开采和钨品生产失控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为此，应对出口总量控制，并发展钨品深加工，改变出口产品结构。

(五) 其他有色金属工业布局

1. 铅锌工业。

铅、锌在自然界多以共生的形式出现。我国铅、锌储量分别为1251万吨、3756万吨（2002年），主要分布于云南、青海、甘肃、陕西、湖南。其中，云南兰坪铅锌矿储量居全国之冠。铅锌开采、冶炼工业基地主要有湖南常宁水口山、青海锡铁山、甘肃厂坝、湖南株洲、广东韶关、辽宁葫芦岛和沈阳等地。

水口山矿历史久远，有“中国有色第一矿”与“铅都”之称。因资源衰竭，现年产铅锌铜约8万吨。产量虽下降，但深加工有所发展，并冶炼国外原料。葫芦岛锌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年产锌40万吨，并可同时生产铅8万吨、铜20万吨、硫酸100万吨，加工铜材10万吨，还可回收金、银、铟、镉、铊、铋等金属。

2. 镍工业。

甘肃、四川集中了全国镍金属产量的90%以上。镍的储量全国有299万吨（2002年），分布集中，甘肃金昌市的金川镍矿为世界著名的大型多金属共生的硫化镍矿，镍的储量居我国第1位、世界第2位。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开发，目前，镍产量占全国的85%，因此，金昌市被称为“中国镍都”。预计2005年产镍5.5万吨，副产铜10万吨、钴2000吨、贵金属1500千克、无机化工品60万吨。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已成为采选冶配套大企业和国家级镍钴铂族金属技术中心。

3. 锡工业。

锡矿采冶业有一老一新两大基地，云南、广西集中了全国锡金属产量的88%以上。其中云南省东南部的个旧锡矿，锡的储量占全国近四分之一，这里是我国传统的锡矿开采、冶炼中心和出口基地，有“中国锡都”之称。而地处广西北部的河池市到南丹县一带，则是新发现的锡矿资源富集区，不仅锡的储量大，还有大量的铅、锌、铜、锑。南

丹锡矿矿石品位40%，年产锡3万吨，居全国前列。

4. 锑工业。

湘中冷水江市的锡矿山矿务局，是全国最大的锑业基地，锑矿储量居世界前列。该矿发现于明朝末年，当时误认为锡，故称锡矿山。冷水江市是在锑矿开采、转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工矿城市，号称"世界锑都"。锑价昂贵，土法冶炼成本低，获利大，有数十家小锑矿、上百家小炼厂长期蚕食国有矿山资源，并损害生态环境。

除锡矿山以外，广西大厂、甘肃崖湾、贵州晴隆亦为锑矿产地。

5. 稀土工业。

稀土元素被誉为属于21世纪的换代型工业原料，广泛应用于磁性材料、荧光材料、汽车、计算机、环保产品等领域。

我国稀土矿（氧化物）的基础储量2152万吨（2002年），居世界前列，主要分布于内蒙古、甘肃、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包头被认为"世界稀土之都"，已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科研生产基地，可生产80多个品种、200多个规格的稀土产品。

1980年以前，我国稀土工业尚处于试验和简易生产阶段，此后发展较快。至1996年，世界稀土市场总消费量的60%～70%由我国供应。至此，我国已由原来单纯的稀土资源大国发展成为稀土主要出口国和消费国。但我国稀土产业也同时存在着资源流失严重、单体规模较小、技术含量较低等问题，应重视集约化发展，提高资源利用和产业开发水平。

6. 黄金工业。

在20世纪80～90年代，国家重视发展黄金工业，先后建成一批大、中型金矿，产金万两以上的黄金矿山增至71个，全国基本上形成10个主要的黄金生产基地：(1) 胶东基地；(2) 小秦岭豫陕基地；(3) 千山长白山辽吉基地；(4) 燕山大青山华北基地；(5) 黑龙江砂金基地；(6) 承德赤峰朝阳基地；(7) 嘉陵江上游砂金基地；(8) 滇黔基地；(9) 天山阿勒泰新疆基地；(10) 鄂豫皖基地。地处胶东半岛上的招远有"中国金都"之称，2001年黄金产量逾80万两，是全国最大的黄金开采、冶炼、加工基地。

第四节　机械电子：组建企业集团，调整布局

作为国民经济的装备工业，机械制造业一般具有生产部门繁多，产品种类复杂，生产中使用多种原材料（以金属材料居多）。因此，需要较高科学技术水平，实行专业化协作，根据不同生产特点，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一、机械工业发展水平，布局变化

1865年，清政府在上海开办"江南机器制造局"，这是我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经过八十多年发展，到1949年，我国机械工业基础仍十分薄弱，主要表现在门类少，

工厂规模小，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地理分布过于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城市。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机械工业有所发展。但规模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低。至2002年底，我国已形成门类较齐全、具有较大规模的机械制造体系，产值、利税、企业数、员工数等占全部工业的20%～25%，经济总量仅次于美、日、德、法的机械工业规模，居世界第5位。普通机床、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等产品在质量、品种、性能、价格方面可与国外产品抗衡。机械工业在利用外资和外贸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一般机电产品、日用机械等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2002年中国内地机电产品出口1571亿美元，已拥有一批产量、出口量位于世界前列的机电产品，其中，电视机、DVD、移动电话、显示器、程控电话机、空调器、集装箱、光学元件、电动工具、小家电等产品出口额居全球首位。

机械工业内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产值已有很大增加，它们在整个机械制造业中的地位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

机械工业的地区分布，同20世纪50年代相比变化明显，由原集中于沿海少数城市扩展到东部沿海地带的多数省区和西部少数省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汽车、船舶制造业基地；珠江三角洲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基地；东北地区重大成套设备制造基地；西部（川渝陕等）军事装备制造基地等。

机械工业主要行业的地域分布，如图表4－7所示：

图表4－7　　　机械工业主要行业的地域分布（2002年）

主要行业（按经济规模排序）	经济规模大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前八位）							
	1	2	3	4	5	6	7	8
一、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广东	江苏	上海	北京	天津	福建	山东	浙江
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上海	吉林	江苏	湖北	广东	山东	浙江	重庆
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上海	天津	安徽	福建
四、普通机械制造业	江苏	浙江	山东	上海	辽宁	广东	河南	湖北
五、专用设备制造业	山东	江苏	浙江	上海	河南	广东	北京	辽宁
六、仪器仪表文化办公机械	广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北京	山东	天津	重庆

资料来源：据《2003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资料摘编。

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和软件业的结构、布局演变

（一）全国工业经济第一支柱产业

随着新技术发展浪潮的冲击和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换代等方面的迫切需要，以及居民消费热的出现，近十多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

展，并已成为全国的“领先产业”。1980年我国内地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和软件业的产值仅有100亿元，1996年增至2982亿元，2003年销售额1.9万亿元。超过纺织、化工、冶金、电力等，居我国制造业之首，形成全国工业经济第一支柱产业。

其中软件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近十年来实现的。1995年中国内地软件业销售收入仅68亿元，至2002年达1100亿元。从21世纪初起在10城市建设国家级软件基地，促使软件业发展。但目前我国软件企业仍然小而分散。

从产业规模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内地信息产业已进入世界前三位。经济总量接近占世界第2位的日本，成为全球的IT制造中心之一，世界信息产业大国。在电脑、显示器、手机、交换机等产品领域均居世界前列。但我国IT制造业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弱点：生产规模大，竞争力却不强；低附加值产品制造能力强，高附加值产品制造能力弱，而且核心技术几乎都为外企掌控。

（二）结构变化与布局

1. 投资类产品拉动力增强，但芯片产业仍处于劣势。

在内部结构方面，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微电子技术已成为现代通信与信息业的硬件基础，产品结构在调整中按国家产业政策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增量中，以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为主体的投资类产品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成为带动整个产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动力。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结构变化与布局，如图表4－8所示：

图表4－8　　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结构变化与布局

产品结构	产值结构变化（%）			布局集中地区
	1989年	1996年	2002年	
投资类	16	33	45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福建沿海、环渤海
消费类	53	34	28	
基础类	31	33	27	

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出口元件为主，1986年开始，消费类整机出口增长，并带动出口结构变化。1994年出口额124亿美元，2001年增至650亿美元。由于投资类产品出口增长，使出口结构继续改善。但电脑产品出口中多属加工贸易出口方式。

微电子产品虽增长快，但主要集中于芯片的加工生产。芯片是集成电路（IC）的简称，承担运算、存储功能，是电子设备主要组成部分。芯片产业包含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三个产业群，它可带动一个包括化工、材料、设备制造、电子在内的庞大产业链发展，故芯片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且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但发展芯片产业对技术设备、原材料、环境要求苛刻，投资一条12英寸的芯片生产线需15亿～20亿美元。因此，芯片产业的发展要有国家整体工业、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作后盾。

近四十年我国芯片产业发展滞后，21世纪初出现芯片投资热，2000~2003年投入100亿美元，初步形成沪、京、深三个芯片制造基地。但我国芯片业仍处于劣势：技术水平较低、产能不足。高端芯片生产严重短缺。与美、日、韩及我国台湾芯片业相比差距较大。2003年世界芯片市场逾1200亿美元，几乎为美、欧、日、韩及我国台湾所垄断，同年我国芯片产量134亿块，供应国内市场17%，仍需大量进口。

在“十五”期间，微电子、软件、计算机、通信、网络产品成为发展热点。2005年中国内地芯片市场将增至400亿美元。

2. 布局变化。

产业布局已由少数几个点扩展到11个省区：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天津、福建、浙江、山东、四川、辽宁、陕西。出现了一批电子信息产业较发达的城市：深圳、上海、北京、天津、东莞、惠州、昆山、珠海、杭州、无锡、苏州、福州、厦门（以上在东部沿海地带）、绵阳、成都、咸阳、西安（以上在西部地带）。

3. 软件产业发展、布局态势。

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具有战略性的先导产业。但我国软件业发展滞后，并已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此制定了2002~2005年振兴软件产业纲要，软件产业销售额从1100亿元增至2500亿元，形成几家超50亿元的软件骨干企业，出口增至50亿美元，到2005年软件产业总体规模与印度相当。

布局方面，从21世纪初起在11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大连、济南、长沙、珠海、杭州、西安）建设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以利于软件企业的资源整合，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促进软件出口，2004年初决定在上海、大连、深圳、天津、西安5城市建设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发挥聚集效应和规模优势，形成以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为龙头，辐射周边地区，带动全国软件出口的产业格局。但我国仍未形成像印度班加罗尔那样规模的电脑软件制作及出口基地，也未达到印度软件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三、汽车工业格局初步确立，跨国公司在华布局基本完成

（一）汽车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

汽车制造业通常具有十分之一的效益贡献率（财税、就业、出口占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和3倍上下产业关联带动效应，对提供原材料的产业和燃料、电子、橡胶、金融等行业有很大拉动作用，故一些有条件的国家（地区）均以此作为主导产业，力促其发展。

我国汽车制造业虽有五十多年历史，但直至1990年以后才初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只有1%，而美国为5.6%，日本8.9%，韩国8.7%，中国汽车制造业在本国经济中的地位，与世界主要汽车工业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日本几家汽车企业依靠自主知识品牌优势占领国内外两个市场；韩国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弥补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也使汽车企业形成自主开发能力。我国汽车市场很大，

却未能形成以自主开发能力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中国内地汽车工业主要生产轿车、载货车、客车三大类。生产规模由1971年的10万辆、1986年的37万辆（其中轿车1.2万辆）增加到2003年的444.3万辆（其中轿车201.9万辆），在世界汽车生产国中的地位也提高到第5位。预计2010年中国汽车总产量逾1000万辆，汽车制造业成为最主要支柱产业。

在资本结构上，投资主体较多，主要为国企、外资、民营资本；产品结构上，已改变从前“缺重少轻无轿车”的畸形结构。载货车产量比由1992年的59%降至2002年的33%，轿车比由15%升至34%。几乎所有的汽车跨国公司都来中国内地建立起合资企业。因此，在全球汽车整体生产能力富余30%的情况下，受跨国公司投资拉动，中国汽车工业仍然有大发展，并在2002～2004年出现高潮。目前，在华投资的跨国汽车公司主要有：大众、戴克、PSA、日产、通用、现代、丰田、本田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竞争加剧，直接推动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并形成新的布局态势；只是对本土企业自行开发产品的影响尚难预料。缺乏自主品牌已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中的缺陷。

另外，因市场需求高速增长，各地汽车工业盲目重复建设，如整车厂的新建与扩建已遍及全国27个省区，并有23个省市建成轿车生产线。

（二）主要汽车制造企业及生产基地“3+9”布局态势

目前，全球汽车产能7500万辆，实际年产销约5500万辆。其中18家年产100万辆以上大集团占全球汽车产量80%。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汽车厂家生产规模小，且布局分散，已成为发展汽车工业的主要障碍。通常汽车工业经济生产规模为年产30万辆，而我国多数整车企业远未达到这个指标。

目前，中国内地汽车工业有整车企业百余家，其中产量超过50万辆企业3家；超过10万辆企业7家；超过5万辆企业10家；1000～10000辆企业25家；1000辆以下企业70家。

汽车产业“3+9”的布局态势初步形成：一汽、东风、上汽三大集团，产销规模均为50万辆以上，占国内市场51%；还有九家骨干企业（北汽福田、北京现代、长安福特、南京菲亚特、广州本田等），占国内市场的40%。

汽车生产的主要厂家分布于上海、长春、天津、十堰、北京、武汉、广州、重庆、闽侯，其中轿车生产集中于上海、长春、天津；载货汽车生产主要集中于长春、十堰；轻型客车集中于闽侯等地。

伴随着上汽、通用、五菱的联合重组；一汽、丰田合资；东风、日产全面合作，中国汽车三大集团相继选择了两个合作伙伴，中国内地汽车工业的格局已初步确立，汽车跨国公司在华布局也基本完成。

至2004年，主要轿车生产企业按产销量排序依次为：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北京现代、天津一汽夏利、长安汽车、神龙汽车、奇瑞汽车、一汽丰田。上述企业轿车产、销量分别占全国72%以上，产业布局集中度仍然不高。

我国内地汽车制造业发展与布局，如图表4－9所示：

图表 4－9　　中国内地汽车制造业发展与布局

项目		1971	1986	2003	预计 2005	预计 2010	地域分布
产量（万辆）	汽车	10	37	444	600	1000	上海、长春、天津、十堰、重庆、北京
	轿车		1	202	350	650	上海、长春、天津、广州、北京、武汉、重庆

四、船舶制造业基地的分散与整合

（一）世界造船中心东移，中国造船基地兴起

现代化大型船舶号称“移动的城市”，故船舶制造不再是简单地用“焊接”等称谓的传统产业，而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相结合的产业。

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造船中心的东移，为中国内地造船业发展提供商机。我国目前的优势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加之因认真学习和自主开发，使造船技术提高较快。但是，船用设备（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主要载体）仍需大量进口，造船周期也较长，与世界造船大国日本、韩国相比有差距。

中国内地造船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年造船能力由1982年前的30万～40万吨提高到2004年的800万吨；船舶制造总量从世界第17位上升至第3位，成为仅次于日、韩的世界第三船舶生产国。预计2005年造船能力达1000万吨，在国际造船市场占有18%的份额。

建造巨型油轮（VLCC）、超级油轮（ULCC）的造船基地布局扩展迅速：1999年中国内地仅有30万吨级油轮修造能力的造船厂2家（大连、山海关），至2002年，拥有可建造30万吨级船的造船厂8家，2003年再增至12家，其中有7家专造新船，2家专门修船，2家修造兼营。

主要造船企业有：“中船重工”（军民用造船）、“中船集团”等，各自下属有一批大型船厂。

除少数几种高技术船舶制造尚未开发外，中国船厂能建造国际航运界所需船型的95%左右。能够建造的散货轮已由7万载重吨发展到17.5万载重吨，油轮由11.8万吨发展到30万吨，并可建造5668TEU集装箱船、12300载重吨的重型滚装船等。中国内地已经拥有9座30万吨级造船坞。

船舶工业已成为我国的出口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中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21世纪初，我国生产的船舶80%供出口。出口船最大载重吨位为33万吨级，出口品种从一般货轮、油轮发展到多用途集

装箱船、高速车客滚装船、大型冷藏船、采油平台等。

至2003年，我国向发达国家（地区）出口船舶的比重达70%以上，其产业布局已形成以东部沿海为中心的六个造船出口基地：上海、江苏、大连、广州、福建、山东。

（二）布局分散影响规模效益，主要造船基地的整合

我国造船企业太多，布局分散，无序竞争，而船用设备研制滞后，对进一步发展不利。至2000年初，中国内地有船厂1800余家，其中出口1亿美元以上大企业仅有5家。船舶工业布局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一带，上海、大连、南通、广州、天津、青岛、马尾是主要的海轮制造中心；重庆、武昌、芜湖、九江、南京、哈尔滨则是内河船舶修造中心。

至2004年，中船集团在上海地区的企业，通过整合、重组，优化布局。先是“江南造船（集团）”与求新船厂实现资产重组，增加造船能力；继而将隔江相望的沪东、中华两大船厂以新设合并方式重组为“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成为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造船企业；新近又将上海船厂与江阴澄西船厂联合重组为“上海澄西船舶”，成为修船全国第一并兼有造船的新的修造船基地。

随着中船集团对上海地区企业布局调整，在长江口一带形成了布局合理几个基地：(1) 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2003年通过验收，占地210万平方米，拥有我国目前最大的船舶总厂；(2) 长兴岛造船基地；(3) 崇明修造船基地。

此外，邻近上海、拥有充足岸线资源的南通也发展了造船业，在此建成的“中远川崎”是我国最大合资船厂，由“川崎重工”与“中远”合资建设，类似川崎坂出船厂，以管理先进、劳动生产率高著称。“中船重工”所属“大连新船重工”则是北方最大的造船基地。

岸线是船厂的生命线，岸线资源充足，大船厂的建设与布局才能合理。2003年，中船集团在上海长兴岛新开港下游获得8公里岸线，超出目前世界最长的造船海岸线（韩国现代造船厂，5公里多），这里位于长江主航道近旁，水深坡陡，适宜建造大船，目前全国最大的造船基地——“中船长兴造船基地”正在建设。预计到2015年上海造船能力达1200万吨，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基地。

在华南，中船集团选择广州番禺南沙龙穴岛北部，在此获取岸线4.5公里，并取得岸线以内1.3公里的土地，这里位于珠江口主航道近旁，水深充足，适宜建造大船。将在此建设华南最大的现代化造船基地。预计2008年南沙造船基地形成200万吨以上造船能力。

第五节　化工：结构调整对布局有重大影响

一、化工大发展及其结构、布局特征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化学工业发展比许多别的工业部门要快，至21世纪初已在世界上占据一定地位：合成氨、氮肥、电石产量均居世界第1位，硫酸、化学农药、染料、磷肥等产量居世界第2位。

但是，同世界化工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化学工业的结构也存在问题。如忽视了煤化工等部门发展；化肥结构不合理，单质氮肥、磷肥产能过剩，而钾肥、复合磷肥产能不足。在生产最多的氮肥中，低浓度单质的碳铵占45%，专用肥、高浓度无污染复合肥比例小。而发达国家化肥生产主要是复合肥。

化学工业布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1949年全国化工产值仅1.8亿元，只有8个较大的化工厂，分布于个别几个沿海、沿江城市；至2002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化工企业增至2.7万家，工业产值1.9万亿元，化工布局扩散到各地。

但我国化工生产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偏小。如我国合成氨企业平均生产规模不足3万吨（美国企业平均产能30万吨），工业布局也不尽合理。

二、主要化工行业地域分布

我国化学工业主要行业的地域分布，如图表4－10所示：

图表4－10　　化学工业主要行业的地域分布（2002年）

主要行业	产值大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前八位）							
	1	2	3	4	5	6	7	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江苏	广东	山东	浙江	上海	辽宁	河北	天津
医药制造业	江苏	广东	浙江	山东	河北	上海	湖北	四川
化学纤维制造业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福建	上海	河南	河北
橡胶制品业	山东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辽宁	河北	河南
塑料制品业	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安徽	福建	上海	河北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辽宁	山东	广东	上海	黑龙江	北京	浙江	江苏

资料来源：据《2003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摘编，橡胶、塑料为2000年资料。

三、基本化工产品生产基地

硫酸是用途最广的基本化工原料。我国制酸原料有黄铁矿、铜铅锌多种金属矿物尾砂，也利用有色冶金和石油炼制烟气。硫酸生产企业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云南、四川、湖北、安徽、广东、湖南，硫酸生产基地有南京、贵溪、大连、葫芦岛、株洲、白银、开封、抚顺、湛江、衢州、铜陵。

纯碱、烧碱的原料有食盐、天然碱、石灰石等，需耗用大量电力。纯碱企业多靠近盐产地设厂，山东、江苏、河北、辽宁、天津的纯碱产量合占全国二分之一以上；大连、塘沽、青岛、应城、自贡为重要的纯碱生产基地。20 世纪 80 年代在潍坊、连云港、唐山等地新建一批大型纯碱厂，其中潍坊纯碱厂与羊口盐厂于 1995 年开始实行盐碱联合，使纯碱产能达 80 万吨/年，居亚洲首位。烧碱企业一般设在消费地域或电力充足区域，以山东、江苏、天津、河南、浙江等省市较集中，生产中心主要有天津、上海、株洲、沈阳。

四、化肥生产发展快，但存在结构与布局问题

化肥生产与环境、饮食、健康关系密切，因此其工艺流程选择和产销布局不仅涉及经济发展，也涉及社会生活多方面。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化肥生产国，但我国化肥工业内部结构有待改善。市场对单质肥需求减少，对复合肥、专用肥、微量肥需求增加。

氮肥产量约占我国化肥总产 75%，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云南。氮肥生产基地主要有：乌鲁木齐、东方市、大庆、沧州、盘锦、安庆、镇海、岳阳、枝江、泸州、赤水等。

磷肥生产近年增幅大，2002 年产磷肥近达 800 万吨（磷复肥占 45%）。鉴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土壤缺磷，故磷肥工业仍需发展。现有磷肥企业多集中分布于南方的湖北、云南、四川、江苏、安徽；北方的山东、河南、河北也有一定规模。

钾肥主要原料是钾盐，钾盐是紧缺的矿物资源。受资源限制，我国钾肥生产发展缓慢。青海格尔木市建设 100 万吨级全国最大钾肥生产基地，利用察尔汗盐池的钾盐资源生产钾肥供销全国。新疆罗布泊已探明钾盐 1.74 亿吨，是迄今发现最大钾盐矿，潜在价值超 5000 亿元，具备成为中国最大钾盐生产基地的资源潜力，从 21 世纪初起进行规模开发。

化肥发展方向是复合化、专用化和缓效。我国高浓度复合肥生产长期短缺。化肥生产结构不合理以及布局问题的长期存在，影响到经济效益。

“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五大磷肥基地：湖北黄麦岭磷铵、广西鹿寨磷铵、贵州瓮福重钙、云南大黄磷重钙、湖北大峪口重钙，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布局思路是靠近资源或市场，按矿肥结合、酸肥结合和磷电结合即靠近原料产地的原则进行建设。其

中，湖北两大项目所依赖的磷矿品质低、难以开采；云南的电价当时仅0.02元，后涨至0.21元；贵州的重钙项目产品无销路；而广西则不缺磷，靠近市场的理由一开始便不成立。

除上述布局思路有误以外，还有其他失误，如建设周期过长，五大项目从立项到达到设计能力，平均长达十五年以上，建设周期平均延长九年；投资也严重失控，计划55亿元，实际投入182亿元。加上普遍使用国外贷款或基金，资产负债率高达92%。到2003年，上述五大磷肥基地，四个严重亏损，一个建成后即停产。

五、有机化工生产基地，石化基地形成规模效益

在我国化学工业中，有机化工的崛起是很明显的部门。它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有机矿物质为原料，生产一系列化工原料和产品。

国外有机化工最初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从19世纪末开始以煤代替农副产品，发展煤化学工业。到20世纪60年代，石油化工快速发展，随即取代了煤化工而居首位。

至21世纪初，跨国公司已控制33%的世界产量、70%的直接投资、80%的技术开发与转让。世界三大石油石化公司（埃克森美孚、壳牌、BP）的炼油能力占世界16%，乙烯占15%。

中国内地有机化工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较快，当时以煤化工为主，进入70年代后，石油化工逐渐得到发展。到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批大型现代化的石化企业相继建成投产，使有机化工产值迅速增加，并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化工部门。但与跨国公司相比差距甚大，主要是生产综合成本高、技术开发能力弱、企业规模及效益相差大。至21世纪初，中国内地原油加工能力达2.24亿吨，乙烯生产能力540万吨，合成纤维主要原料生产能力630万吨。石化工业长期存在的产业集中度低、规模不合理状况正在改变。

石油化工基地主要有：南京、上海、北京、大庆、抚顺、天津、辽阳、吉林、镇海、惠安、惠州、广州、茂名、兰州、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独山子。其中，兰州是内地建立的第一个石化基地；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燕山石化”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石化基地；大庆、南京、淄博则是1980～1990年分阶段建成的大型石化基地；上海化工区的产业集中度高，2002年始建的90万吨乙烯裂解及下游衍生物装置，2005年投产后可生产多种规格化工产品228万吨；地处南京的扬巴（巴斯夫—扬子石化）石化联合企业也将于2005年投产，拥有60万吨乙烯及其下游装置；埃克森美孚化学、沙特阿美、福建石化在惠安合资建设的60万吨乙烯联合装置，预计2006年建成；埃克森美孚化学在中国的第二套石脑油裂解装置是广州的100万吨乙烯项目，可望2008年建成；正在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建设的“中海壳牌南海石化”，占地4.3平方公里，投资43亿美元，将建成年产80万吨乙烯、230万吨高附加值产品的特大型石化基地，在大亚湾北岸将形成世界级规模的石化区，惠州将成为类似新加坡裕廊岛、荷兰鹿特丹、美国休斯敦的化工城。

天然气化工已成为世界热点，而且出现生产要素向资源和市场所在地优化配置的趋势。重庆市长寿区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天然气化工基地，海南东方市的天然气化肥工程于2003年建成，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天然气化肥企业。

煤化工基地主要为：太原、石家庄、平顶山、唐山、吉林，建有化肥、化工、制药、染料、电石等一系列企业。在建的枣庄煤化工基地2005年建成，年产醋酸20万吨；临沂在建大型二甲醚生产基地。

六、化工园区的建设与布局

化工园区的建设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化学工业进一步发展和布局变化的新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003年，经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化工园区约50个。布局特征：在长三角、珠三角主要选择在沿江、沿海有水资源及深水码头等有利条件的地点，以其自身优势吸引外资进入；或者依托大型石化企业，建立上中下游产品延伸加工，形成关联度高的产业集群，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或以老企业特色产品为核心建设；或结合城市规划及产业布局调整，使分散布置的化工企业搬迁集中于化工园区，既符合城市发展之需，也有利于环保达标。

但各地化工园区的建设与布局也存在过热现象，有些深水港都在建设或规划建设化工园区；有些在建园区圈地过多，-招商未实行“准人制度”，甚至饥不择食，使某些技术落后、污染重的项目进人园区。

化工园区建设形成规模效益需十至二十年，因此必须明确园区定位及产品特色，必须与生态环境相容。

七、周边石化产业集群对我国石化的影响

在我国周边，集结着庞大的、产能过剩的炼油、石化产业群体，尤其是其下游产业系统产能巨大。地理分布高度集中于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上述地域某些条件有利的地段形成了很高的产业聚集。过去长时间内我国炼油、石化业发展缓慢，乙烯等一些产品或原材料严重短缺，原因之一就是周边石化群体的竞争优势。近年国际油价上涨，我国虽也受到损失，但石化业发展更快，布局较合理，产业集中度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作支撑，即使油价上涨影响到下游市场，但需求量仍能支撑生产能力，使中国内地炼油石化业的发展与布局及规模效益有可能赶上周边地区。

第六节　“建筑时代”来临与建材业发展及布局变化

由于经济持续发展与城市化加速进行，各项建设事业兴起，大规模的建筑时代已经在中国来临。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物质生产部门。我国建筑业承担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60%工作量，建成大批重点工程，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1989～2003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提高到8.9%，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预料今后五年，中国将是全球容量最大的建筑市场，近期市场规模约5万亿元，远期市场规模逾7万亿元。

目前，我国建筑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住宅建设、城镇建设和农村建设。

为建筑业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各种材料的建筑材料工业，属于基础材料产业，亦为资源型产业部门。

一、建材资源分布

我国矿物建材资源有大理石、石灰石、石英砂、砂岩、花岗岩、高岭土、石棉、石膏等。作为水泥生产主要原料的石灰石，储量丰富，分布广，保有储量超过200亿吨，工业储量逾100亿吨。因此，发展水泥工业条件良好。

作为玻璃工业主要原料的石英砂和砂岩，在辽宁、广东、青海、河南、河北、山东、湖南、陕西等省有大量分布，工业储量逾3亿吨，可满足玻璃工业发展之需。此外，其他重要建材资源还有石棉（储量居世界第3位）、石膏（储量居世界首位）等。

二、主要建材部门的生产及地理分布

（一）水泥及制品工业

全球有12个国家的水泥产量在3000万吨至1亿吨以上，我国2002年生产水泥7.25亿吨，居各国之首。需求量7亿吨，供需基本平衡。

长期存在的技术落后和结构性问题已有改善。新型干法水泥产量比重从2000年的10%上升至2003年的24%，发展大规模新型干法水泥已成为近年水泥投资的主体和热点。水泥投资过热从2004年起开始得到遏制。

全国淘汰小水泥产能逾1亿吨，大中型企业“产量比”逾55%，市场份额扩大，但落后的立窑水泥生产在局部地区仍占较大比重。

水泥工业的地域布局，因水泥生产过程中需耗用大量原料和燃料（以石灰石为主，包括粘土、石膏和煤等），故一般在靠近石灰石产地和能源供应地附近建厂。同时，由于水泥本身重量较大，运输成本较高，又不宜长期储存，故其厂址选择也应尽可能接近消费地，以便就近销售。水泥产量最多的省区依次为：山东、广东、河北、江苏、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广西、辽宁。大型水泥厂主要分布于唐山、大同、邯郸、本溪、抚顺、大连、南京、徐州、宁国、洛阳、黄石、湘乡、英德、广州、柳州、江油、重庆、剑阁、昆明、开远、永登、耀县、铜川等地。

（二）玻璃工业

平板玻璃产量多的省区依次为：河南、河北、江苏、山东、辽宁、上海、浙江、湖南。大型玻璃生产企业主要分布于：洛阳、秦皇岛、成都、上海、沈阳、大连、凌源、兰州、昆明、太原、杭州、厦门、南宁、成都、通辽、齐齐哈尔、江门等地。

（三）新型建材工业

由于有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等优点，近年来新型建材在全球发展迅速，目前在发达国家中，新型建材的比例多已达到50%，我国也已占到20%以上，且继续发展的空间相当大，布局主要在上海、北京、哈尔滨、沈阳、武汉、苏州等地。

与节能、节地关系密切的新型墙体材料，已占到全国墙体材料总量30%以上，并有15个大城市的新型墙体材料比重超过50%，其中北京、上海已分别达到75%、80%。

第七节　纺织：生产力布局区域性转移

一、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及其结构、布局调整

纺织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家蚕和织丝绸的国家，曾以“丝国”闻名于世；麻的生产和利用也年代久远。在棉花的生产和利用方面，陆地棉在我国栽培很早。近代纺织工业起源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了较大发展，成为我国原有基础最好的一个工业部门，1949年纺织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36.9%，居首要地位。此后，由于别的工业部门以更快速度发展，纺织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至21世纪初下降至10%左右。

纺织工业作为最主要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内部结构失衡，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过剩，中低档产品产量过大，企业规模偏小，而高档产品生产能力又不足。因此，调整结构是重建纺织业优势的出路。

20世纪90年代的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压缩过剩的初加工能

力，以深加工、高附加值、市场前景广的产品取代初加工产品；(2)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压缩低水平加工能力；(3) 通过区域结构调整，使不同经济区域的纺织业合理分工，形成不同产业梯度。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逐步退出传统技术的初加工生产，重点发展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而将初加工等生产部门转移到原料产区和劳动力输出地区。

加入 WTO 为我国纺织工业带来新机遇，在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1位的基础上，2003 年中国内地纺织工业总产值达到 21500 亿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 804 亿美元，占全球五分之一，纺织业的国际依存度约 40%，服装业 50%；所产棉纱、棉布、蚕丝、丝绸、苎蔗布、丝织品、针织品、服装、化纤、呢绒等分别居世界第 1 位、第 2 位。

但从人均纤维消费量等指标来看，目前我国为 6.6 千克（世界平均 7.5 千克），预计 2005 年可达 7.4 千克，加之出口量大，预示着我国纺织业仍留有发展空间。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纺织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大，棉纺织业比重从 78%下降至 40%，而化纤纺织、毛纺织、丝绢纺织和麻纺织比重则有不同程度上升。

纺织工业布局的变化亦很明显，由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青（岛）天（津）”的地理格局，到 50～80 年代初沪苏鲁辽鄂的分布态势，再到 90 年代广东的快速发展和上海退出初加工的领域；21 世纪初期则以苏浙纺织业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块状布局为主要特征。

不同时期中国内地纺织工业地理分布态势如图表 4－11 所示：

图表 4－11　　纺织工业地域分布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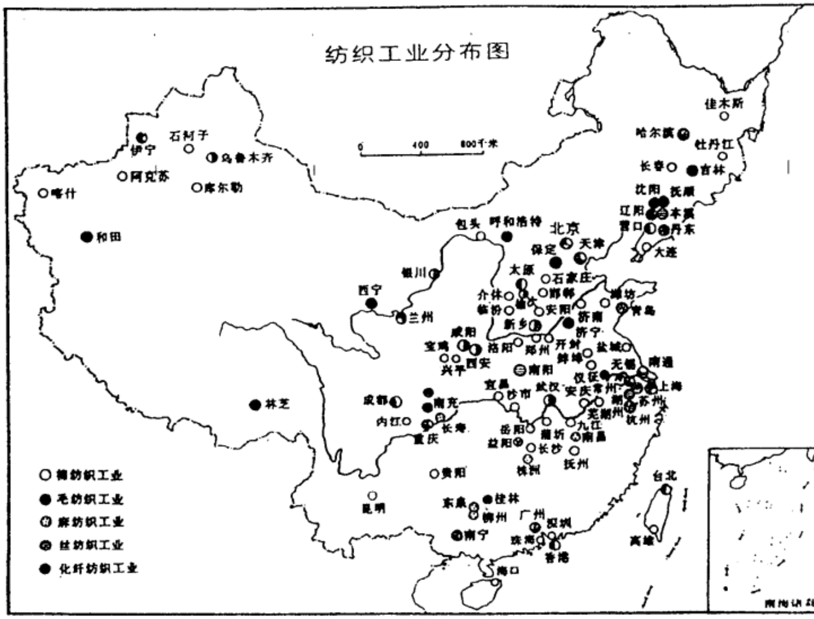
年　份	纺织工业地理分布主要地区
1949	上海、天津、山东、江苏
1981	上海、江苏、山东、辽宁、湖北、浙江、天津、河南
1997	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湖北、河北、河南
2002	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北、上海、湖北、河南

二、棉纺织业及其主要生产基地

我国近代棉纺织业起源于 1890 年李鸿章创建的“上海机器制布局”，此后，棉纺织业曾长期是我国纺织工业中投资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一个部门，也是地区分布变化明显的部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棉纺织业的发展、布局，一方面调整和改造上海、天津、青岛等老基地以中、小型为主的大批棉纺企业，提高其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则在华北平原、江汉平原、渭河谷地等集中产棉区建设新的棉纺织基地。1949 年，全国棉纺锭数为 499 万锭；到 1989 年增至 3154 万锭，1996 年达到 4171 万锭，产能居世界首位。

目前我国已形成下列棉纺织工业基地，如图表 4－12 所示：



图表 4－12

（一）长江三角洲棉纺织基地

包括上海、南通、无锡、苏州、常州、镇江、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拥有一批生产效率较高的棉纺织企业。

受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加之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已不能容纳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产业，故纱、布等产量逐渐减少。20 世纪 90 年代棉纺锭也大幅度减少。上海原有纱锭 250 万枚，至 1999 年减至 84 万锭，只及历史高峰三分之一。从 1995 年起，苏南地区及沿江城市的低附加值和高耗棉产品向苏北原料产区、低成本地区转移。至 1997 年，苏南纱锭占全省的比重，已由 1994 年的 54%下降到 43%。

（二）华北平原及黄河中下游棉纺织基地

包括天津、石家庄、郑州、北京、西安、咸阳、邯郸、太原、榆次、新乡、洛阳、开封、宝鸡等，其中，除天津原有棉纺织企业较多、基础较好以外，其他城市的棉纺织企业主要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新建的。目前，该基地纱和布的产量占全国 23%、21%左右。

（三）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及附近地区

包括武汉、荆州、广州、襄樊、宜昌、湘潭、长沙、南昌、九江等9个棉纺织工业较发达的大、中城市。

（四）山东棉纺织基地

包括青岛、济南等城市，其中青岛为全国纺织工业发达的城市之一。因山东境内棉产丰富，20世纪80年代棉纺锭大幅度增长，90年代略有减少，至今仍有近500万锭。

（五）新疆棉纺织基地

包括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库尔勒等。这里热量资源丰富，气温日差较大，光照特别充足，所产棉花纤维长，质地优异。

新疆棉纺织工业原本十分薄弱。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棉纺织工业在实行结构调整中，提出"东锭西移"战略，即全国在不增加棉纺锭规模总量的基础上，将中心城市、发达地区的棉纺初加工能力向原料产地转移。新疆成为实施这一转移的首选地区，至1995年已拥有120多万锭的棉纺初加工能力。1997年新疆纺织业在总量上已超过原来纺织工业较发达的陕西省，成为西北地区主要纺织基地，也是我国内陆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三、毛纺织业及其生产中心

1876年开办的"甘肃织呢总局"，是我国近代毛纺织工业的开端。到1997年末，全国已形成毛纺能力约400万锭，其中五分之四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目前，我国的毛纺织品产量居世界第2位。然而，作为毛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羊毛，却严重不足。全国羊毛产量只有33万多吨（2000年度），作为世界第一养羊大国，我国毛纺业所需羊毛四分之三需进口，国产羊毛特别是细羊毛自给率仅25%～30%。

主要毛纺织工业中心有上海、北京、天津、鄂尔多斯（东胜）。此外，南京、无锡、兰州、呼和浩特、哈尔滨、沈阳、西宁、咸阳、银川、乌鲁木齐、伊宁、林芝等地，也有毛纺织企业。

四、麻纺织业及其生产中心

1890年建立的"湖南官麻局"，为我国近代麻纺织工业的开端。目前，我国麻纺织工业可分为麻袋纺织、苎麻纺织和亚麻纺织三类。麻袋纺织工业以黄麻等为主要原料，工厂布局一般接近原料地。主要分布于山东、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区。

苎麻是我国特产，是纺织品的优质原料。苎麻纺织在我国有悠久历史，苎麻制品透气性好，夏季穿着凉爽舒适，多用于织夏布，也可作蚊帐以及抽绣、窗帘和台布等。湖南是我国主要的苎麻产地，地处洞庭湖滨的沅江市，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苎麻生产基地。苎麻纺织集中于苎麻主要产区附近的岳阳、益阳。

亚麻纺织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兴的纺织行业。亚麻纤维柔软光滑，既可作衣料，又可用于室内装饰，还可制作防水帆布和水龙带。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纺织用亚麻产区，也是最大的亚麻纺织工业基地所在，建有哈尔滨亚麻厂等大型企业。

五、茧丝绸产业格局

以桑蚕茧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丝绸纺织业，历史最为久远。早在四千年前，我国已发展了养蚕和手工缫丝织绸业。二千多年前丝绸产品开始销往国外，世界交通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当时我国同西亚和地中海各国进行大规模丝绸贸易的主通道。直到20世纪初，我国丝绸产量仍几乎独占世界市场。

我国使用机器的近代丝纺织工业，始于19世纪中叶，一度发展迅速，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了一批使用机器动力的缫丝和丝织业中心。但后来在国外丝绸产品的激烈竞争下逐渐衰落。到1949年，全国只生产1800吨丝和5000万米丝制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丝纺织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95年产丝11.34万吨、丝制品65.91亿米，以后有所下降。到2001年，我国丝绸生产和出口均居世界首位，生丝、坯绸分别占国际市场贸易量的六成至八成，真丝印染绸、丝绸服装、针织品产量亦居世界前列。

但是，目前我国丝绸产品在国际茧丝绸产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并不高，主要生产加工中、低档产品，出口附加值低，创汇率为韩国产品的40%、意大利产品的8%，对此，我国茧丝绸行业正进行大规模技改，并提高企管水平。

（一）桑蚕丝纺织工业布局

桑蚕丝纺织业主要分布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一带，以浙江、江苏、四川、重庆4省（市）集中程度较高，尤其是浙江，被称之为“丝绸之府”，年产丝占全国44%，丝制品占20%，如加上邻近的江苏、上海，合计年产丝制品占全国47%，杭州丝绸联合厂为著名企业。除杭州以外，主要丝纺织中心还有上海以及苏、浙两省的苏州、无锡、镇江、南京、嘉兴、湖州，广东的顺德、南海、中山，四川的成都、南充等。丝纺织品出口量也大幅度增长，涌现一批丝绸出口基地：苏州（包括吴江）、无锡、南京、杭州、嘉兴、湖州、上海、淄博、青岛、烟台、佛山、丹东、重庆、天津。

（二）柞蚕丝纺织工业布局

我国柞蚕茧、丝、绸产量均居世界之首。其主要产地为辽宁的丹东、凤城，山东的青岛、烟台等。

六、化学纤维纺织业及其生产基地

在我国纺织工业中，作为新兴部门的化纤纺织业，发展快速。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粘胶纤维，只有保定化纤厂稍具规模，年产粘胶纤维0.2万吨。后从国外引进锦纶、

维尼纶、腈纶技术，在北京、兰州等地建厂，至1976年，合成纤维产量超过粘胶纤维。70～80年代引进一批大型高效成套设备，分别在金山（上海）、辽阳、仪征、大港、佛山、平顶山等地建成现代化纤厂，促使我国化纤工业高速发展：从1957年的0.2万吨激增至2002年991万吨，居世界第1位。化纤在全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中的比重超过60%，取代棉花成为第一大纺织原料，但化纤的构成变化很大：粘胶纤维、合成纤维之比在1957年为100%：0，1976年为46.3%：53.7%；2002年为6.8%：93.2%。

七、区域性“纺织产业集群”及产业链延伸

近年来，纺织业经过结构调整和重组，形成了一批以开拓国际市场、科技创新等为主的纺织大企业集团；同时，纺织产业的资源要素向一些县市及城镇集中，形成一批专业化特色明显、集聚效应显著的区域性产业集群，获得高效益，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种纺织产业集群化趋势正在成为一种产业现象。这种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纺织大省尤为突出。至2002年，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5省的纺织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利润总额分别占全国73%、70%、87%，而这5省纺织集群效应也十分显著。另据统计，江苏省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浙江省绍兴县，杭州萧山区，广东省东莞市、开平市、中山市等纺织工业产值超100亿元的10个纺织基地市（县），纺织工业总产值达2442亿元，也表现出其集群效应显著，并延伸纺织业的上、下游产业链。

第八节　轻工：结构调整与布局调整

因轻工部门、行业繁多，且有些部门已在前面几节中提到，故本节主要介绍食品及造纸业的结构与布局调整。

一、我国轻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轻工业是我国工业的主体。1949年轻工业（未包括纺织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五分之二强，但产品档次低，品种少，布局偏集于少数沿海城市。

近二十年轻工业获较大发展，但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一般性的轻工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市场饱和；而中、高档轻工产品却生产不足，进口增加。

针对上述情况，1997年国家决定对轻工业的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深层次调整。

二、轻工业布局演变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轻工业布局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原有轻工业基础较好的大城市（上海、天津等），进一步发展多种轻工部门，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轻工基地；另一方面，在各主要的轻工原料集中产区（华东、华南等地），发展制糖、乳制品、罐头食品、香料、卷烟、造纸等多种轻工行业，并分别形成一批具有全国或地区专门化意义的轻工基地。

三、糖业布局的区域性转移

制糖业生产季节性强。糖料种植以提高单产和含糖量为主。故选择最适合于此的自然地理条件，就成为决定制糖工业布局的首要因素。

2001年，我国食糖产量次于印度、巴西，居世界第3位；食糖消费量次于印度、欧盟、巴西、美国。中国还是食糖的净进口国和最有潜力的糖消费国。

（一）大陆制糖业生产力布局区域性转移

20世纪90年代制糖业发展快。至1998年，中国内地制糖企业达539家，拥有生产能力1052万吨/榨季。经布局调整，淘汰一批弱势企业后，保留390家糖厂，生产能力788万吨。

在经历了一系列布局调整之后，形成以广西、云南、广东为主的蔗糖基地和以新疆、黑龙江、内蒙为主的甜菜糖基地，并以此形成全国糖业生产地域结构新的布局态势。

近十多年中，蔗糖业（含植蔗业、蔗糖业）生产布局经历了两次大的区域性调整。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至中期，广西逐步取代广东成为全国最大蔗糖生产基地；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广西境内的植蔗业和蔗糖业又进行新的区域性转移。

造成上述糖业布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生产成本问题以及长期以来因罕见而被忽略的霜冻问题。其中，生产成本问题是长时间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90年代后期主要表现于桂东、桂东南及沿海一带，因植蔗成本渐高，终于造成蔗田大面积萎缩，使糖业生产布局失去赖以形成的基础。另外，大霜冻则是偶而降临、临时影响的因素，但其影响力却很大。如1999年罕见的大霜冻袭击了整个华南地区，蔗区过冻面积高达50%，而在中国内地糖产量份额中占到41%的广西蔗区，过冻面积更是达到70%以上。这说明广西在近十年中扩大蔗区布局时，受利益驱动有盲目性，忽视了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的制约，因而使1999/2000榨季的蔗糖产量锐减，进而成为影响糖业布局再调整的重要因素。

2001～2002年，各产糖区再度出现盲目扩大植蔗面积，布局不合理，甚至向单产和含糖量不高的地域扩展趋势，还有些地方向25°坡度的山地扩展，危及自然生态。为此，国家再次强调宏观调控，要求各产糖区将糖业生产转移至单产高、含糖量高的地段，以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规定凡是25°坡度的山地植蔗者，必须退耕还林还草。

在对蔗田布局进行区域性调整的基础上，糖厂布局亦发生相应变化。广西、云南和广东湛江等地，相继有大批规模小、污染重的糖厂被淘汰。至2000年，中国内地有341家蔗糖企业保留下来，拥有生产能力703万吨/榨季。

蔗糖厂主要分布于广西的贵港、南宁、崇左、扶绥、柳城、桂平、合浦、上思、宁明、武宣、象州、宜州、大新、龙州；广东的湛江；云南的开远、耿马；海南的儋州(那大)；福建漳州等地。

广西“贵糖”集团以生态工业思路发展制糖工业，对促进制糖业结构性调整并解决行业结构性污染有利。在此基础上，2001年设立贵港生态工业（制糖）园区，利用制糖废弃物甘蔗渣生产高档生活用纸，2003年投产。预计至2010年拥有100万吨精炼糖能力，年产50万吨纸、10万吨生物工程产品，形成年销售100亿元的生态糖业基地。

（二）台湾蔗糖业萎缩，布局大调整

曾是台湾经济命脉的蔗糖产业，最盛时期岛内甘蔗种植面积达17万公顷，拥有42家糖厂，年产蔗糖140多万吨，是当时我国和世界著名的蔗糖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后因国际糖价低迷，制糖成本又受工资等因素影响而越来越高，致使糖厂接连倒闭。到2001年，全台仅剩10家糖厂，年产规模不足20万吨，在我国各省（区）中的地位由第1位降至第6位。从2002年起决定进一步缩减糖业规模，台湾糖厂进一步减至4家，年产12万吨。因上述改变，使台湾从蔗糖的大型出口基地变为进口地。

四、食品工业原料特征及其加工业布局

食品工业包括制盐、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烟草加工等，2002年全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工业企业近2万家，工业总产值1万多亿元，在轻工系统中占重要地位。

食品生产的特点，是以农、林、牧、渔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产品种类多，消费市场广。食品工业的发展和布局，很明显地受到各地自然条件的影响、制约，并且程度不同地具有季节性。

（一）粮油加工业布局

面粉工业多分布于产麦区和主要面粉消费区：北京、郑州、包头、西安、武汉、重庆、上海、无锡、兰州、太原；碾米工业多分布于水稻集中产区：长沙、九江、安庆、芜湖、上海、武汉、重庆、成都、广州、南京；榨油工业中的大豆油脂企业多分布于张家港、大连、霸州、防城港、哈尔滨，花生油脂工业分布于烟台、济南、天津、青岛、深圳，油菜籽油脂工业集中于武汉、长沙、成都、广州、南昌，芝麻油脂工业分布于郑州、开封、安阳、武汉等地。

近年来，中国内地油脂加工能力急剧扩大。如大豆加工至2002年底已有日榨能力1000吨以上的油脂加工厂49家，年加工能力2600万吨，中小企业1200万吨，加上在

建项目总规模5000万吨（而实际需求仅为2200万吨）；企业布局也由大豆主产区向豆粕的主消费区转移。

（二）制盐业布局主要受资源因素制约

制盐工业的产品既是食品，又是重要工业原料，其生产、布局明显地受到资源条件、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海岸线漫长，沿海一带有许多地方海滩平缓，蒸发条件有利，有些地段，海岸附近很少有淡水注入，海水含盐度高，适宜开辟大面积盐田。如渤海沿岸、山东半岛、苏北海岸以及闽、粤沿海，都有发展海盐生产的良好环境。此外，华中、西南岩盐、井盐资源，西北、华北池盐资源也丰富。尤以柴达木盆地中的盐湖，盐的储量极富（察尔汗盐湖储量达537亿吨），晶粒大，氯化钠含量高，且开采容易，生产成本低，可直接通过铁路运输等优点，开发潜力大。

资源赋存对开发我国多种制盐工业，平衡生产布局有利。1985年全国原盐产量1479万吨，2002年为3284万吨。地理分布集中于山东、河北、江苏、辽宁、天津、湖北、四川、内蒙古、青海等省区，地处渤海沿岸的山东、河北省和天津市，海岸条件得天独厚，盐产量多年分别保持在200万吨以上，著名的"长芦盐"即出产于此。西北内陆的青海省，近年来湖盐产量激增，"青盐"外销数量增加。

（三）酿酒业产业结构与发展格局改变，产能转移与地理因素

1. 水资源是影响啤酒业产能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近二十年来我国啤酒业快速发展。啤酒产量从1975年的27万吨增至2000年2231万吨，超过德国，居世界第2位。山东、北京、浙江、广东、辽宁、黑龙江、河北、福建、河南等省啤酒产量位居前列，主要啤酒企业分布于青岛、北京、沈阳、广州、杭州、重庆、哈尔滨等地，青岛啤酒已有一百年以上历史，2002年产量逾300万吨，产值高，出口量大。

啤酒生产工艺对水的消耗很大。至21世纪初，我国啤酒业吨耗水量为20吨。如燕啤在北京的产量逾100万吨，年耗水量达2000万吨。北京是严重缺水城市，水价一涨再涨。全国660座城市中约有400座城市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因此，水资源的紧缺正成为引发中国啤酒业产能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2. 白酒业布局扩散之势遏止，优质酒生产与布局中的地理因素。

从1987年起国家限制白酒生产，但其发展与布局的扩散仍呈蔓延态势。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点。随后白酒行业进入大调整时期。至2002年，白酒总产量从高峰期的年产817万吨下降至739万吨。

优质白酒主要厂家分布于四川宜宾、绵竹、泸州、成都，贵州仁怀、遵义，安徽亳州，江苏泗阳、泗洪，山西汾阳等地。以茅台酒（贵州）、五粮液（四川）、汾酒（山西）、西凤酒（陕西）等驰名中外。白酒产量多的省区分别是：山东、四川、安徽、江苏、湖北、河南、贵州等。

茅台酒已有2000多年历史，一向有"国酒"之称，其所以在贵州仁怀市茅台镇发展起来，主要是受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地质地貌方面，茅台镇一带

主要是七千多万年前形成的侏罗纪白垩系紫色砂页岩、砾岩，能溶解土壤中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并滤出甘美爽口的水；在自然地理方面，赤水河“集灵泉于一身”，有美酒河之誉，海拔约400米的河谷地带冬暖夏热的气候也有利于它的发展；在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积累的酿酒技术和千年传统工艺也是不可缺少的。

目前，我国酿酒业的发展以啤酒为主，白酒为辅，改变了长期以来白酒占主导地位的格局。近十年又兴起葡萄酒消费热，生产基地主要分布于葡萄产区附近。

五、烟草加工业布局西移和全球最大烟草市场

我国烟草加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受利益驱动而持续快速发展，产量高，产值大，经济效益显著；且布局转移快，很快就成为中、西部地区若干省和较多地市的支柱产业。从全球来看，我国占世界人口20%，但却在全球烟草市场份额中占30%；从社会效益来看，卷烟生产是应该受到限制的。我国“烟民”多达3.2亿，占全球烟民（11亿）总数29%，嗜烟者年龄向小发展，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目前，我国内地平均每年生产、收购烟叶约220万吨，卷烟产销量约3400万箱，均占世界三分之一；2002年，卷烟产量3467万箱，比1952、1978年分别增长12倍和2倍，烟草加工业布局以前高度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现在扩展至全国各地，尤其是地处内陆的西部、中部地带。烟草加工业产值和销售收入居前十二位的依次为：云南、湖南、湖北、贵州、上海、广东、河南、四川、山东。云南一个省占全国四分之一居首位；上海烟草加工业因受原料供应限制，从以前占全国首位而衰退，但上海仍然是我国高级香烟生产中心之一。

现有主要卷烟厂分布于云南玉溪、昆明、曲靖、昭通、楚雄、上海、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毕节、遵义、武汉市、广州市、河南新郑、郑州、许昌等地。

鉴于我国烟叶产地相对集中，而卷烟生产则相对分散的情况，近十多年来烟草加工业布局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经济地带逐渐转移的趋势。推动烟草加工业布局继续西移，使其在布局上进一步接近原料产地，并借以推动西部、中部经济地带特别是烟叶生产主产区（如滇黔）的资金积累与经济发展。

我国虽是烟草大国，却非烟草强国。在国际烟草出口市场上，中国内地烟草出口只占3.5%，卷烟出口仅占1.8%，无论从企业规模还是品牌而言，国内烟草企业还难同国外烟草大公司相抗衡。至2003年，作为国企的“中国烟草总公司”市值245亿美元，2003年营业额110亿美元，所产香烟占中国内地消费量92%，而这相当于全球消费量三分之一。

六、造纸业对环境的重污染促使其原料结构与生产布局发生变化

（一）发展与布局容易失控的行业

生产一吨纸要消耗比它本身重量和体积都要大得多的原料，故造纸厂的建设，一般

选择在原料产地或集运中心附近；又由于生产过程中耗水多，排污量大，故也应考虑尽可能接近水源，并需经处理方可排污。造纸工业布局必须考虑环境因素。

造纸工业是目前我国轻工业中为数不多的供不应求行业，这也是纸业发展和布局容易失控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原因之一。

20世纪80～90年代前期，淮河流域等地的小型造纸厂发展失控，到90年代中期，环境污染空前严重，1996～1998年，国家强制干预，在豫、皖、鲁、苏4省先后关闭1100多家5000吨以下的小造纸厂，以减轻污染。但目前造纸工业对我国许多地方环境的污染仍较严重。迄今仍是全国造成环境污染最严重的三大产业之一。

（二）机制纸及纸板生产地理分布

2002年，我国内地机制纸及纸板产量达到4667万吨，居世界第3位（次于美国、日本）。机制纸及纸板生产主要集中于：山东、浙江、广东、河南、河北、福建等省，在广州、中山、江门、湛江、营口、丹东、吉林、石岘、佳木斯、保定、济源、天津、北京、上海、寿光、宁波、杭州、南平、沙县、汉阳、岳阳、柳江、乐山等地，建有一批大中型造纸厂，并大体形成了我国造纸工业的布局。近年在日照、南宁、湛江等地新建大型木浆厂，使木浆造纸比重提高。以上变化，对调整造纸工业的原料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地区布局的改善起促进作用。

（三）原料结构、产品结构、地域布局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造纸业以非木材纤维为主要原料，木浆发展缓慢，且林业与纸业发展互有脱节。这严重限制了我国造纸业向规模大型化、产品高档化、生产清洁化方向发展。

造纸工业的地域布局，从合理配置资源考虑得到调整。在东北地区，以技改和扩建为主，作为重要生产基地继续发展；在长江以南则因原料来源有保证，可作为全国造纸工业的重要发展基地，特别是作为我国木浆造纸的重要基地。

在近期，造纸业的结构调整仍是发展林纸一体化，实现以木浆为主要原材料的“清洁造纸工业”。而由造纸企业自身建立原材料基地，定向培育造纸速生丰产林，则是实现林纸一体化的主要途径。

现有4600多家造纸、制浆企业中，年产20万吨以上的只有1家。规模效益仍较低。全国造纸业年产能力3800万吨。而消费量逾4000万吨，有400万～1000万吨缺口。近年大量进口纸及纸板和造纸用木浆，为此，有的企业考虑将造纸基地向外部延伸，在国外条件适合的地方建立造纸原料生产基地，加工纸浆，再运往国内造纸。这将使我国造纸工业发展及其布局形成一种新的模式。

（四）林浆纸一体化与造纸林基地建设

近年，投资林浆纸一体化和造纸林基地建设发展快。“十五”期间我国造纸林基地面积增至267万公顷，进入采伐期后每年提供造纸原料3200万立方米，生产木浆800万吨，使全国纸业木浆比重大幅提高，并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因市场需求以及桉树所具有的生长能力强、纤维质量好等特性，一些造纸企业和许

多农户造林面积很大，桉树正在成为中国南方人工林主要树种。在世界造纸业大公司推动下，目前我国桉树种植面积激增至150万公顷，仅次于巴西、印度，居世界第3位。但也有人担心桉树发展过快可能造成不良生态影响。

原产于澳洲的桉树引种到中国已有一百年，但如此大面积种植、推广的时间不长，目前主要分布于粤桂琼滇4省区，其中广西林地资源被国际纸业大公司所青睐，近年纷纷进入广西投资建设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但广西林地有限，如规划不当，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　交通运输布局

第一节　运输网布局改善

一、运输线路延长

我国古代交通运输业曾相当发达，只是到近代才落后于欧、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交通运输各部门都有较大发展，形成由多种运输方式构成的运输网络。到2002年底，全国运输网总长362.6万公里，比40年代末的18.9万公里增长18倍。民航里程增幅最大，其次是公路、铁路、内河的营业里程或航道里程，亦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另外，海运有很大发展；输油（气）管道则从无到有，形成长输管网。交通运输线路的延长，如图表5－1所示：

图表5－1　　交通运输线路的延长　　（单位：万公里）

运输方式＼年份	1949	1978	1990	2002
铁路营业里程	2.18	4.86	5.78	7.19
其中：电气化里程	0	0.10	0.69	1.74
公路里程	8.07	89.02	102.83	176.52
其中：高速公路	0	0	0.05	2.51
内河航道里程	7.36	13.60	10.92	12.16
民航航线里程	1.31	14.89	50.68	163.77
其中：国际航线	0.51	5.53	16.60	57.40
管道里程		0.83	1.59	2.98

①1952年数字。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2003》等资料摘编。

二、运网构成及布局变化

在各种运输线路增长同时，运网布局也发生较大变化。如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西北、西南地区新建了1万多公里铁路和30万多公里公路，并新建一批机场，开辟多条国际、国内航线，还整治了内河航道，对改变本地区落后、闭塞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东部和中部地带，也新建了一系列运输线路，并改进了原有线路的技术装备，加上海洋运输的迅速发展和管道运输网的初步形成，使综合运输能力大有提高。

对外运输口岸迅速增加。国家级一类口岸已由1978年底的51个增加到2001年的245个。在新开辟的194个一类口岸中，以水运口岸最多，其次是空运、公路和铁路运输口岸。此外，各省、市、自治区境内还开辟了大量的地方口岸。

但我国交通运输业原有基础薄弱，加上从20世纪50～70年代期间对发展交通运输认识片面，重铁路、轻水运和其他运输方式，致使整个运输业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不够适应，运输业的结构和运网布局也有不合理之处。

随着运输市场发展，各种运输方式开始发挥自身优势拓展空间，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运输方式围绕市场份额的竞争日趋明显。至21世纪初，我国运输结构在经历了持续多年演变之后，已促使全国性综合运输体系运作渐人佳境，即开始进人五种主要运输方式各展其长，优势互补，既有竞争又能在大体上协调发展的阶段。全国综合运输体系也已形成。

目前我国运输业存在的问题是交通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仍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技术与装备水平差距悬殊（如既有时速43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又有蒸汽机车）；运输设施的区域布局也不适应地区协调发展（如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第二节　铁路主通道和高速铁路

一、铁路运输地位有所下降

我国的资源与生产力布局错位分布，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人均GDP值较低。因此，需要依靠资源节约型的运输体系来满足高速增长的运输需求。铁路在交通运输中的骨干地位由此建立。近年来，铁路运输的地位，虽然面临公路、航空的激烈竞争，但在铁路提速和改进服务之后，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

据2003年统计，铁路运输完成的货物周转量17092亿吨公里，占货运总周转量的29.9%；旅客周转量4789亿人公里，占客运总周转量的34.7%，由此可见，铁路运输在全国运输业构成中，虽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运输业结构的变

化，如图表 5－2 所示：

图表 5－2　　　　　　　　**运输业结构的变化**

项　目 / 年份 / 运输方式		铁路	公路	水运（包括远洋运输）	民用航空	管道
货运量（以货运量总计为 100）	1949	34.7	49.5	15.8	－	0
	2002	13.7	75.1	9.5	0.01	1.6
客运量（以客运量总计为 100）	1949	75.2	13.2	11.4	0.2	
	2002	6.6	91.7	1.3	0.4	
货物周转量（以货物周转量总计为 100）	1949	72.2	3.1	24.7	0.01	0
	2002	30.5	13.3	54.1	0.1	2.0
旅客周转量（以旅客周转量总计为 100）	1949	83.9	5.2	9.8	1.2	
	2002	35.2	55.3	1.0	8.5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 2003》资料计算编制。

二、路网布局特点及前瞻

从 1876 年修建淞沪铁路开始，至 1949 年，共修筑 2.2 万公里铁路，路网密度每百平方公里 0.23 公里，分布偏于东部沿海、东北地区，铁路质量差，运能低，尚未形成有效的路网。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修筑了 160 多条铁路干支线，总长 5 万公里。同时还对旧线进行技术改造，并在一些运能紧张的线路和区段修建复线或实现电气化。至 2002 年底，中国内地既有铁路营业里程 71900 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 17400 公里，成为世界第三个电气化铁路最长的国家。全国铁路电气化率为 24%，促使我国铁路网结构和运营设施有了改善。

至 21 世纪初，中国内地已有 372 条铁路干线、支线以及 6000 多个车站，形成铁路交通网络。其中，重要铁路枢纽有：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聊城、阜阳、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郑州、武汉、株洲、广州、南宁、柳州、成都、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兰州等。

从铁路发展及其运输指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铁路虽已成网，且利用率很高，运输密度达 2778 万换算吨公里/公里，居世界首位，货运密度、客运密度分居世界第 1 位、第 2 位，但路网密度仍然较低，尚不足 1 公里/100 平方公里，在世界铁路国家中排名约第 60 位，仅高于巴西等国。如图表 5－3 所示：

图表 5－3　　铁路发展及运输指标国际比较

项目 / 国别	铁路里程（万公里）		路网密度公里（100/平方公里）	客运密度（万人公里/公里）	货运密度（万/吨公里/公里）
	总长	其中：电气化铁路			
美国	27.0	0.3	3	4	947
俄罗斯	14.8	3.6	0.8	175	1216
加拿大	9.6	-	1	-	-
中国	7.2	1.7	0.7	616	3026
印度	6.3	1.2	3	510	404
德国	4.7	1.9	13	15	167
法国	3.2	1.3	5	173	148
日本	2.7	0.8	7	1237	127
巴西	3.1	0.2	0.4	-	-

我国国土面积大于美国，但铁路仅及美国的四分之一，且路网布局不平衡。东北地区路网密度比全国平均数高出 2 倍；关内各地铁路有的基本成网（华北），有的已形成路网骨架（中南、华东），有的即将形成骨架（西南、西北），仍需大力进行建设。

根据地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预计至 2020 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将由现在的 21 亿吨增至 40 亿吨，客运量由 11 亿人次增至 40 亿人次，需要 10 万公里布局合理的高效率铁路网，主要干线实现客货分流，复线率、电气化率均达到 50%，这为铁路建设及完善路网布局留下发展空间。

另外，将在省会城市及大中城市之间修建 1.2 万公里客运专线，改变长期沿用的“客货共线”运输模式，这种模式既加大了运输能力的损失，又延长了货物运到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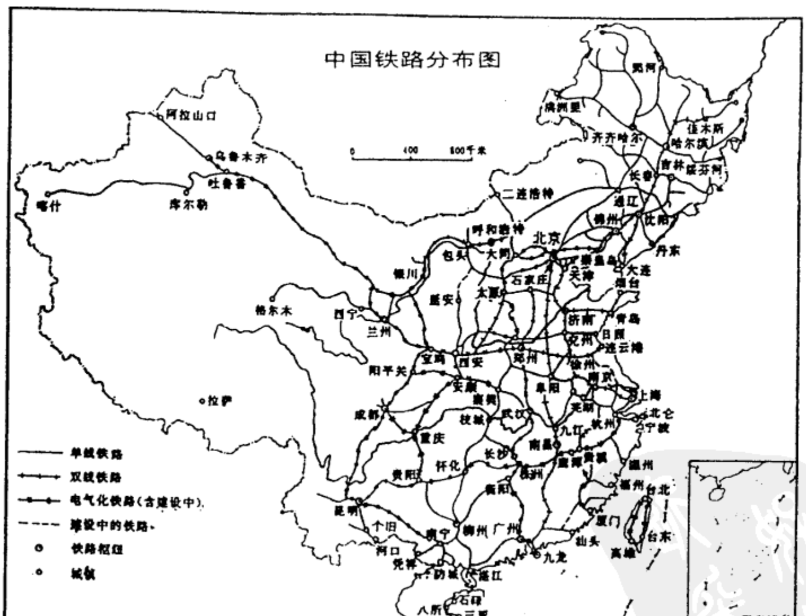
三、八纵八横主通道，近期路网建设及布局改善

“十五”（2001～2005 年）重点建设、改造起骨干作用的“八纵八横”铁路主通道，扩大西部铁路网，至 2005 年铁路营业里程增至 7.5 万公里；提高铁路运行速度，研究开发高速铁路技术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设青藏、渝怀、洛湛、赣龙、胶新、西安—南京等铁路干线；（2）建设京沪高速铁路；（3）建设西北、西南进出境铁路；（4）通过秦沈客运专线建设和京秦线技改，形成京沈快速客运通道；（5）形成覆盖我国主要城市的快速客运网；（6）建立快捷货运体系。

四、提速铁路网络

长期以来，我国铁路运行速度慢（平均时速仅 40 公里）的状况，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有了较大改变。1997～2001 年期间四次大面积提速，形成“四纵两横”提速网络，达 1.3 万公里，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城市。2003～2005 年要进行两次提速。提速后，全国初步建成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三个提速圈”，半径在 500 公里左右的城市实现“朝发夕至”，1200～1500 公里左右的城市实现“夕发朝至”，2000～2500 公里的城市实现“一日到达”。另外，2002～2003 年期间还对京九、西康、石德、汉丹、淮南、宁芜、皖赣、石太、京承等铁路进行技改，使其时速达 160 公里以上；三个提速圈及全国 28 条线路客运专线旅客列车最高时速 200 公里；广深、京津线建成第四线后实行客货分线运行。

中国铁路分布图，如图表 5－4 所示。



图表 5－4

由多次铁路提速而形成的提速网络，加快了人流、物流周转速度，增加了运力，对促进各地发展及经济布局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铁路提速并不等于高速铁路。

五、高速铁路发展与布局

1964年日本建成东海道新干线以来，到2000年，世界有日、法、德、意、西、比等国建成高速铁路6858公里，并有韩、荷、澳、英及我国台湾正在建设高速铁路。我国内地高速铁路规划及前期准备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

据我国五大铁路干线——京沈、哈大、津沪、京广、陇海（徐州—宝鸡段）的运量计算，它们所完成的换算周转量占全部铁路的42.8%，旅客周转量占全部铁路的50.7%，而上述五线的里程仅占全部铁路的11.8%。

上述五大干线是我国铁路网中与整体路网关联性最强的。铁路非常重视的运煤通道、南北通道、进出关通道、西南通道、西北通道的畅通，均离不开这五大干线。目前，五大干线已成为全国铁路运输的薄弱环节。而采用技术改造、提高通过能力，以及修建公路干线分流等一系列措施，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修建高速铁路势在必行。

高速铁路通常具有速度快（运营时速约300公里）、运量大（单向运能每小时1.5万人以上）、占地少、能耗低等优点，污染相对较小，故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从建设用地看，建一条高速铁路占地约为四车道高速公路的三分之一；而能耗亦可节省，高速列车、小汽车、飞机的平均人公里能耗为1∶5.3∶5.6；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比为：1∶3∶4.1。从节约总旅行时间看，高速铁路在距离100公里以上优于高速公路，1000公里以内则优于航空。另据美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修建高速铁路与扩建高速公路和机场相比，不仅可节省一半以上投资，而且更有利于环保。

由此可见，修建高速铁路，对于人多地少，建设用地奇缺，又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加上现有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的我国国情来说，还是较为适合的。

在五大干线中，按其需要程度首当其冲应解决京沪之间的铁路运输问题。京沪经济带土地面积仅占全国6.4%，而人口占26.5%，国民生产总值占34%。近年来，京沪运输通道上的公路、民航均有大发展，但铁路运力仍严重不足。京沪之间现有铁路里程1463公里，仅占全国铁路的2.03%，却承担占全国铁路8.8%的货物周转量、14.3%的旅客周转量。因此，修建京沪高速铁路成为当务之急。

京沪高速铁路的前期工作从1998年开始进行，但直到2003年仍未开工，主要是围绕采用德国的磁悬浮技术、法国的轮轨技术、日本新干线技术方案比较论证难以决断。2004年初决定弃用磁浮，采用轮轨技术，争论长达五年的京沪高铁方案才有初步结论。

京沪高速铁路起自北京，经天津、济南、徐州、蚌埠、南京至上海，为全封闭电气化复线，1304公里，时速300公里，建成后年运旅客逾1500万人次。

从现有运输情况来看，不仅是京沪、京广、京沈、哈大、陇海（徐州—宝鸡段）五大干线客运密度已大大超出国外修建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的标准，沪杭、浙赣等线路也已具备修建高速铁路的条件。因此，在条件具备时，应及时兴建高速铁路，以进一步缓解部分线路运输的紧张状况，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节　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国道主干线架构

一、公路运输地位呈上升态势

在经济发达国家运输业的结构中，公路运输往往居显要地位。公路运输在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虽然尚未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程度，但亦呈蒸蒸日上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发展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现代化短途运输方式，并在长途运输中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全国客运量的构成，公路运输所占比例，在1949年仅占13.2%，2002年上升到92%；全国旅客周转量的构成，公路运输所占比例，也由1949年的5.2%上升到2002年的55.3%；全国货运量的构成，公路运输所占比例也呈上升态势。

展望前景，公路运输在我国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不仅在铁路稀少的地区是如此，即便在铁路网较稠密的地区，公路运输也在凭借其自身的某些特有的优势同铁路运输展开竞争（如沪宁高速公路同沪宁准高速铁路之间的客运竞争）。

二、公路网建设及分布，亚洲公路网形成对我国公路网建设与布局的影响

如果从1913年在湘东修建长沙—湘潭公路算起，我国公路网的建设迄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其中，前三十七年（1913～1949年）只建成8.07万公里，且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中部地带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后五十多年建成162万公里，总计170万公里，居世界第4位。其中：高速公路占路网里程的1.2%；二级及其以上公路占13.4%；其余为各种类别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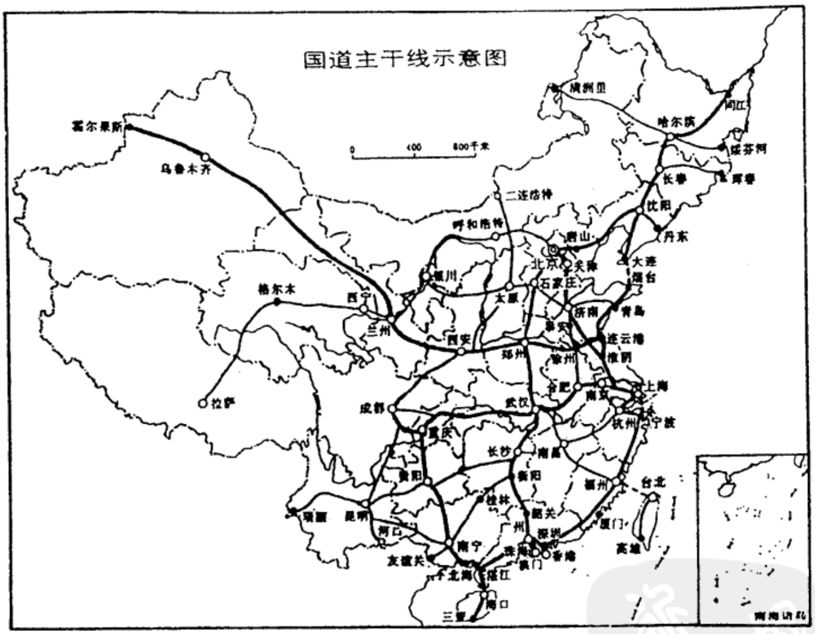
从总体来看，我国公路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路网密度低，通行能力差，服务水平不高。我国公路发展和路网密度的国际比较及国道主干线示意图，如图表5－5、5－6所示：

图表5－5　　公路发展及路网密度国际比较

项目 国别	公路总长 （万公里）	路网密度	
		（按国土密度公里/100平方公里）	（按人口密度公里/万人）
美国	628	67	238
巴西	165	19	103
日本	117	309	93
德国	64	179	83

项目 国别		公路总长（万公里）	路网密度	
			（按国土密度公里/100平方公里）	（按人口密度公里/万人）
印度		218	73	22
中国		170	18	14
其中	东部	55	42	10
	中部	58	20	13
	西部	57	11	19

资料来源：据报刊资料摘编。表列数中国为2001年，余为2011ks90年代后期统计。



图表5－6

随着公路网的形成和公路运输的发展，客、货运输量大幅度增长，在我国内地全部运输业货运周转量构成中，公路占13.3%，次于水运、铁路，居第3位；从客运量来看，在全国客运总量构成中占91.7%。当然，应该看到公路运输所承担的客运一般以短途为主，但长途客运发展快。

2004年，中、日、韩等23国签署《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这意味着蒙古、老挝、尼泊尔等诸多内陆国可通过亚洲公路网找到最近出海口；也意味着发自上海或天津

的货物，可一路西行直达圣彼得堡或伊斯坦布尔。这个标志着亚洲经济开始走向一体化的协定将促进我国公路网建设与布局的进一步完善。

在东部沿海地带和中部地带，公路主要是作为铁路和水运的辅助线路，担负短途运输，集散物资；在广阔的西部地带，公路则要担负相当一部分干线运输。

我国内地公路虽已基本成网，但却存在路网密度不够、道路技术标准低等问题。自1990年以来，进行了公路主枢纽规划布局，提出在全国建设45个公路主枢纽的布局方案。在“九五”期间（1996～2000年），建设公路主骨架，其中重点建设“两纵两横3条重要路段”，形成高等级公路运输大通道。“两纵两横”即：同江—三亚、北京—珠海、连云港—霍尔果斯、上海—成都4条国道主干线；3条重要路段即：北京—沈阳、北京—上海、重庆—北部湾的公路出海通道。

在“十五”期间（2001～2005年），加快以“五纵七横”为重点的国道主干网建设。至2010年，中国内地公路里程达210万～230万公里。在西部建8条连接东、中、西部的大通道，技术标准是二级以上的高等级路。

三、高速公路

在建设上述公路骨架同时，在一些经济中心城市之间以及经济中心城市与出海口和国际机场之间，正在按国际标准修建高速公路。

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波恩—科隆）建于1932年，迄今已在60多个国家（地区）建成21.9万公里。1984年，沈大高速公路正式开工，拉开了我国内地建设高速公路的序幕。至2003年，陆续建成数十条高速公路，总长2.98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如图表5－7所示。

高速公路主干线有：京津塘、沈大、京沪、沪杭甬、京珠、西南公路出海大通道等。高速公路布局已覆盖29个省区，其中山东超过2000公里，率先在全国实现“半日生活圈”，冀豫苏川粤辽晋等省均超过1000公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均在实现网络化，并成为人流、物流的主动脉。但在国道网中，年均交通量大于5000辆次的尚有907段，约2.3万公里，应修建高速公路。因此我国今后仍处于高速公路发展期。

图表5－7　　高速公路发展国际比较

项目 国别	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万公里）	占公路总里程（%）
美国	8.85	1.4
中国	2.98	1.7
加拿大	1.65	1.8

国别 \ 项目	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万公里）	占公路总里程（%）
德国	1.12	1.8
法国	1.01	1.1
意大利	0.64	2.0
日本	0.61	0.6

①中国为2003年，余为近期资料。

预计至2010年，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5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2.3%，连接全国90%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东部地带基本形成高速公路网；2020年高速公路总里程7万公里以上，占公路总里程2.5%。

第四节　水运主通道建设与布局

一、发展水运的条件

水运包括内河、海上运输两大部分。其运输线路受水道分布条件的影响较大，一般速度较慢，但具有载运量大的优点。尤其是大江大河和海运，单位货物运价低廉，通常比铁路和公路低。因此，在临近江河湖海的地方，应尽量利用水运的有利条件，为发展经济服务。

我国面临世界上最辽阔的大洋——太平洋的西缘，拥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为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又有太平洋流域第一大河长江和其他一系列江河，发展水运条件优越。但以前水运业的发展落后，内河通航里程很长，而利用却很不充分，内河运输船队主要是由落后的木帆船组成；沿海、沿江运输轮船很少，远洋运输更为薄弱。

二、水运业发展概况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水运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两个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河运发展较快，到1962年，全国内河航道由1949年的7.36万公里增至16.19万公里，以长江航运为重点，新建安徽裕溪口港；扩建上海和汉口港；初步整治川江航道，对珠江和京杭运河也进行了一些治理。但这个时期对海上运输缺少规划，发展不力，是造成后来我国海运设施奇缺、压船压货现象严重的原因之一。

70年代以后，内河航道里程下降，至1979年只剩10.78万公里，比1962年减少近6万公里。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在水利建设中缺少综合观点。在通航河流上所建的4000多座闸坝中，有60%妨碍船只航行。

80~90年代，内河航道建设又受重视。其中，对长江、汉江、西江、湘江以及京杭运河江苏段进行整治和建设，共改善航道4200公里，新建、改建内河港口码头泊位92个，其中1000吨以上泊位42个。新增吞吐能力2400万吨。另外，在90年代后期，地方自建中小型港口码头设施大为增长（其中有不少重复建设）。到1999年底，全国内河航道里程接近12万公里。在此期间，海运业（尤远洋运输业）也获长足发展，1999年底拥有万吨以上泊位490个（1980年仅144个）。

至2001年，在全国总的货物周转量中，水运承担一半以上，而在外贸运输中，水运承担比例达到87%。

三、从泊位不足到重复建设，但公用码头设施和大型专业化深水码头仍不足

约二十年前，我国内地水运（特别是海运）码头泊位严重不足，普遍造成压船压货，每年仅为此而向外轮付出的罚金相当可观。此后水运设施建设逐渐加快，布局迅速展开。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有些地方，由于不少水运设施（多为河运，个别为海运）重复建设，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水运资源，而且直接造成经济损失。如长江中下游，随着经济发展，地方保护悄然抬头，违背生产力合理布局原则，市市建港，县县建港，在水运条件有利的黄金地段，为抢占地段，甚至乡乡建港，村村建港。结果，使运力布局过于分散，许多新建港口利用率低下，经济效益差，还有些码头设施自剪彩之日起就未充分利用过，只能任凭岸线被占用，生产力闲置，设备锈蚀；另外，也不利于生态保护。由于自然岸线大为减少甚至消失，使江河沿岸许多城乡居民失去传统的亲水环境，有的甚至连眺望江河水面也难以做到。

在海运方面，重复建设主要表现在货主码头、开发区码头、商贸码头等方面，而公用码头不存在重复建设问题。至2002年，由于外贸运输的持续增长，我国沿海港口码头泊位又出现总体偏紧的状况，公用码头尤其是集装箱码头能力严重不足。

运输方式不协调，港口综合能力较弱，尤其是接卸大型专业化船舶，如第4代以上集装箱船、20万吨级以上矿石船、油船码头能力短缺，港口规模、结构、装备及管理等不适应运输市场迅速发展。除华南以外，我国内地沿海中、北部尚未形成规模化的集装箱运输中心，港口集装箱“门对门”运输比重在华南珠三角为85%，华东仅为35%，北方25%，为此不得不依赖周边港口中转。如2001年到韩国釜山港中转的集装箱达182万标箱，到台湾高雄港中转者也达100多万标箱。

四、主要水运企业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内地没有远洋船队。当时我国对外贸易运输由我方负责承运比重仅占20%，主要靠租用外国船只来运输。

1961年开始组建第一家国际海运企业——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其时商船队仅有150艘小型轮船，总载重只有76万吨；到1975年增至500多万载重吨；至2003年，"中远集团"拥有和控制的各类现代化远洋船舶总数已达600艘，载重吨超过3000万吨，经营500多条航线，航行世界1200多个港口。年货运量超2亿吨，总资产达180亿美元。中远商船队综合规模居世界第3位，散货船运力居世界第1位，集装箱船运力位列世界前十位。

此外，总部设在上海的"中海集团"，包含"中海油运"、"中海集运"等，拥有各种船舶400艘、1150万载重吨，承运中国沿海80%煤炭、90%石油等物资，年货运量约2.5亿吨，也参与远洋运输。旅客运输则以上海、广州、大连为中心，辟有10余条客运航线。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则是我国最大内河航运企业，所属企业分布于长江沿岸港口。

集装箱运输发展快，在近十年以年均30%速率增长，是我国水运业（尤海运）发展中的一大特征。其中，国际班轮运输始于1985年，已形成干支线相衔接的网络，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桥梁。集装箱运输以高效、便捷、安全的特点成为交通运输现代化的主要形式。

目前，由我国内地港口开出的国际集装箱班轮分别直达欧洲、北美、南美、澳大利亚、南非、地中海、波斯湾等地港口；近洋班轮分别直达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东南亚、新加坡等地港口。

国际集装箱运输，还通过海运与公路、铁路的联运将其向内陆延伸运输。我国内地已拥有147家从事国际集装箱运输的船公司，集装箱船队总规模已占世界第5位，集装箱运量占全球五分之一。2003年，各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800万标箱，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中远集运"船队规模列世界第6位；"中海集运"拥有30万标准箱位，在世界集装箱船运公司中名列第10名。

在散货运输方面，"中远散运"至2003年拥有灵便型、巴拿马型、好望角型等各类大型散货船舶70多艘、400多万载重吨，实际操作运力逾900万载重吨，为国内外市场客户提供矿砂、煤、化肥、钢材、木材、农产品等海运服务，航线通往100多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港口。

台湾、香港的远洋运输均很发达，澳门的远洋运输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在发展之中。其中，香港的干散货船队1993年末以970万载重吨而名列世界干散货船队的第8位；台湾的集装箱船队在1993年时以270万载重吨名列世界集装箱船队的第5位。

台湾的阳明、长荣等船公司是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型集装箱运输企业。其中，长荣海运公司1968年成立于台北，1979年开辟远东至欧洲的集装箱航线，1984年长荣集团又

开辟东西双向环球航线，其集装箱运输航线自此遍及全球。1994年以后，长荣开始涉足内地业务。2000年，长荣始将旗下货轮归并意大利等国籍，并准备将来大规模进军内地市场。“长荣海运”全盛时期拥有148艘集装箱船的庞大船队，服务网络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及地中海，集装箱承载量曾在世界十大班轮公司中列第3位。

五、港口、航线布局

港口是水上运输基地。衡量一个港口经济价值大小，主要看该港口经济地理位置优劣。如港口“腹地”有多大，以及在腹地范围内经济发达程度和商品生产规模。另外，港口自然条件（水深、底质、气候、冰冻、淤塞状况等）有利与否，对港口经济价值大小也有重要意义。如一个不冻不淤的深水良港，即使腹地小一点，也有开发价值；何况腹地范围并非一成不变，是可以通过改善交通条件来加以扩大的。

以前，我国只有少数港口，技术装备落后，吞吐量不大。近五十年港口数量增加，技术装备水平提高，港口职能也开始得到充分发挥。到21世纪初，在我国内地沿海已形成由20个主枢纽港为骨干、区域性重要港口为辅助、地方中小港口为补充的、层次分明的港口布局，更高层次的区域性航运中心已初见雏形。

（一）主枢纽港，集装箱港，专业大港

至20世纪40年代，我国仅有上海、青岛等港口初具规模。从1951年开始在渤海湾海河人海口的塘沽建设新港，并于翌年开港，成为北京、天津的海上门户。1954年又在雷州半岛东侧建湛江新港，成为我国华南的两大进出口港之一。但直到70年代初，我国海港建设的规模都不大，供远洋船舶停靠的深水泊位，全国只有89个，尚不及海运发达国家一个大型港口内的泊位数。

20世纪70～90年代大力发展海运，新建和扩建万吨级泊位400多个，新、扩建的海港在21世纪头五年吞吐量大增。

2003年，中国内地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26亿吨，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9亿吨。亿吨级大港增至8个：上海、宁波、广州、天津、青岛、秦皇岛、大连、深圳。以长江口为界，南方、北方沿海各占4个。上海港货物吞吐量逾3亿吨，居世界港口第2位。天津、青岛、上海、广州、深圳等20个主枢纽港有着较好的腹地资源优势，规模效应突出，货物流向枢纽港的趋势很明显。同时，因外贸集装箱化率急剧上升，使我国集装箱港口发展更快，在世界集装箱港大港中，上海港、深圳港2002年分列第4位、第6位，2003年升到第3位、第4位，香港则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如图表5－8所示：

图表 5－8　　中国内地沿海主要港口港湾设施布局、吞吐量

港口（吞吐量排序）	码头及港湾设施布局	货物吞吐量(万吨)		
		1952年	1978年	2002年
上海	黄浦江、长江口、杭州湾、洋山	656	7955	26384
宁波	北仑、金塘水道南岸、甬江口	—	326	15398
广州	黄埔、珠江口内、番禺南沙	47	1050	15324
天津	渤海湾西岸、海河口	74	1131	12906
青岛	前湾新港区、胶州湾口两岸	175	2002	12213
秦皇岛	渤海西北岸、秦市区东南	181	2219	11167
大连	大连湾西南岸、大窑湾、鲇鱼湾	151	2864	10851
深圳	盐田、蛇口、赤湾、妈湾、大铲湾	0	0	8767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 2003》等资料摘编。

在“十五”期间，重点建设集装箱码头、大型专业化原油、铁矿石接卸码头。主要建设上海、宁波、大连、天津、青岛、深圳等主要港口的第四代以上集装箱码头；在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分别布局建设大型专业化矿石码头。

预计到 2010 年，中国内地沿海港口总吞吐能力增至 30 亿吨，集装箱码头总吞吐能力达 1 亿标准箱，进口原油 20 万吨级以上大型接卸能力 1.6 亿吨，接卸比重 95%，采用大型泊位接卸矿石的比重 90%。

（二）亚洲主要港口对枢纽港地位的争夺

制造业大国通常都拥有国际枢纽港，如韩国釜山、日本神户与横滨、美国洛杉矶、德国汉堡等。目前，亚洲各主要港口（尤其是东亚港口）对枢纽港地位的争夺激烈：釜山港的定位是“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港湾”，并为此进行大规模扩容，2003 年宣布将在距现有港口约 10 公里的新港区注资 60 亿美元建设 17 个码头，预计 2020 年釜山港的集装箱年吞吐能力可达 3000 万标箱；神户港遭地震后已恢复，并提出建设 21 世纪亚洲母港；高雄港则提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它们的快速发展在中国内地港口周边形成竞争态势，吸引大量货流（特别是釜山港）。

针对国际枢纽港发展布局态势，“十五”期间我国重点建设集装箱码头、大型专业化原油、铁矿石接卸码头，以弥补上海、青岛、天津等主枢纽港港湾设施发展与布局中的缺陷。其中洋山深水港的建设将形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集装箱中转枢纽港的地位，并使釜山港货物处理量减少 30%。

中外主要集装箱港比较，如图表 5－9 所示：

图表 5－9　　中外主要集装箱港比较（2002 年）

世界			中国			
港名	排序	所在国	港名	排序		所在地区
				世界	中国	
中国香港	1	中国	中国香港	1	1	中国香港
新加坡	2	新加坡	上海	4	2	上海
釜山	3	韩国	高雄	5	3	中国台湾
上海	4	中国	深圳	6	4	广东
高雄	5	中国	青岛	18	5	山东
深圳	6	中国	天津	28	6	天津
鹿特丹	7	荷兰	基隆	30	7	中国台湾
洛杉矶	8	美国	广州	33	8	广东
汉堡	9	德国	宁波	46	9	浙江
安特卫普	10	比利时	厦门	49	10	福建
			大连	50	11	辽宁
			中山		12	广东
			福州		13	福建

资料来源：据 2003 年报刊资料摘编

（三）海运航线

我国海运航线可分为“沿海航线”和“远洋航线”两类。作为联系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南北交通主要水上运输干线的沿海航线，又可划分为“北方沿海”和“南方沿海”两个航区。

在北方沿海航区，以大连、秦皇岛、天津新港、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等为起点；

在南方沿海航区，以黄埔港为中心，开辟了一系列重要航线。

远洋航线以上海、黄埔、宁波、大连、天津新港、青岛、秦皇岛、盐田、湛江等港口为起点，与世界各国、各地区重要港口之间开辟了东、西、南、北四组主要远洋航线。其中，“东行航线”到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南美洲国家港口，是当前我国外贸运输最繁忙的一组远洋航线；“西行航线”经南海、印度洋西行，或经苏伊士运河人地中海、大西洋，或绕经好望角直接进入大西洋，沿途停靠南亚、中东、欧洲、非洲国家港口，也是我国外贸运输的繁华航线；“南行航线”经南海、西太平洋向南至东南亚和大洋洲国家港口，以前这组航线并不十分重要，近年来随着能源（石油）、工业原材料（铁矿石、畜产品）、粮食、杂货等外贸物资运量大增而格外繁忙；“北行航线”由我国沿海港口北上，到朝鲜、俄罗斯远东主要港口，其中到俄远东的海运航线，随着近

年中俄贸易及换货量大增而重趋活跃。

近二十年来，随着海运货物集装箱化率提高，集装箱运输航线在海运航线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国出口货物集装箱运输航线主要有：(1) 日本航线；(2) 欧洲航线；(3) 美西航线；(4) 美东航线；(5) 中国香港航线；(6) 韩国航线；(7) 东南亚航线；(8) 地中海航线；(9) 中国澳门新加坡航线；(10) 南非南美航线；(11) 东西非航线。

中国台湾航线：1998 年中国台湾货轮首航深圳盐田港，开辟盐田—中国香港—高雄—日本—美国西岸航线，主要从事集装箱运输；1999 年又开通经由第三地的沪台集装箱班轮航线：上海—青岛—中国香港—高雄—基隆—石垣；2002 年开通海口—中国香港—高雄—小仓—广岛—梅口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

(四) 内河港口

全国主要内河港口码头泊位约 7900 个。集中分布于长江、珠江等水系沿岸。20 世纪 50 年代初长江沿岸只有 17 个港口，到 90 年代中期，长江沿岸已拥有 200 多个港口。

南京港为我国第一大河港，武汉港为中西部最大河港。南京港内的新生圩港是我国内河规模最大、功能齐全的外贸港区，吞吐量居河港之首。

其余内河港口在长江干流沿岸从下游至上游主要有：南通、张家港、江阴、泰州(高港)、镇江、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九江、武穴、黄石、城陵矶、沙市、枝城、宜昌、巴东、万县、涪陵、重庆；在长江重要支流主要有南昌、襄樊、长沙、益阳、常德；在京杭运河沿岸主要有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邳州；在珠江水系沿岸主要有：东莞、江门、贵港、梧州；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沿岸主要有：哈尔滨、黑河、同江；在澜沧江沿岸有思茅港（橄榄坝)、景洪港以及勐罕、关累港等。

(五) 内河航线、国际河运通道

内河航线主要有长江水系航道、珠江水系航道、京杭运河航道以及黑龙江、松花江航道等。

长江干流自四川宜宾至人海口长 2813 公里，可全年通航，是我国全年昼夜通航最长的深水干线航道。其中，自长江口至南京可乘潮通航 2.5 万吨级海轮；南京至武汉可通航 5000 吨级江轮（洪水期可通航万吨级海轮)；武汉至宜昌可通航 3000 吨级江轮；宜昌至重庆至宜宾可通航 1500 吨级轮船。2003 年起三峡水库蓄水，改善干线航道 650 公里，昔日狭窄难行的三峡航道及川江的通航能力大为提高，已成为一条“黄金水道”。

流经陕甘川渝 4 省（市）的嘉陵江，在重庆汇入长江，干流全长 739 公里，是国家规划的水运主通道，也是我国内河主通道中第一条实施“全江渠化”开发的河流，投资 254 亿元，预计至 2010 年，嘉陵江全江渠化后水流平缓，通航拖载量大，运输成本低，可达到四级通航标准。

长江干流主要港口码头泊位数，如图表 5 – 10 所示：

图表 5－10　　长江干流主要港口码头泊位数（2002 年）

港口（由下游至上游排列）	码头长度（米）	泊位数（个）	港口（由下游至上游排列）	码头长度（米）	泊位数（个）
南通	3811	43	九江	1020	43
张家港	4752	41	黄石	1446	26
常州	4596	126	武汉	3543	46
泰州（高港）	1375	15	城陵矶	712	11
扬州	2216	45	枝城	1205	25
镇江	2783	24	宜昌	1140	21
南京	5897	65	万州	10350	63
芜湖	2261	37	涪陵	1166	23
安庆	1148	23	重庆	5005	73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 年版摘编。

珠江流域处于亚热带，降水丰沛，为华南最主要内河航道大动脉。其航运价值仅次于长江。珠江水系中又以西江航运价值最大，自广州上溯至梧州，可常年通航轮船；再上溯至百色，可通航小型轮驳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旅客时间观念变化需要，广州、梧州、肇庆、江门等相继组建高速客轮船队，开辟新航线，包括从广州、江门、肇庆、梧州至香港、澳门航线在内。已初步形成珠三角、西江水系高速客运网络。

京杭运河 1794 公里，也是重要的内河航道。经整修后，可通行 1000 吨级船只。运输繁忙的江南段，大运河过长江后至杭州，同另一条由湖州至上海的湖申古运河交叉于江苏吴江市平望镇，这两条呈“十”字交叉的古运河，连接着杭州、上海、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每年运送的货物超过 5000 万吨，故被称为“黄金水道”、“金十字架”，实为我国河运最繁忙区段。

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唐古拉山，长 4880 公里（中国内河长 2130 公里），连接中国云南以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诸国，故有“一江连六国”、“东方多瑙河”之称。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开发利用的有利因素多，据国际通航协议，我国云南省整治了中、老、缅段航道，已使从云南景洪港至老挝琅勃拉邦 880 多公里航道达到国家 6 级航道标准。目前，中老缅泰 4 国已开辟国际水运通道，并于 2001 年正式通航商船。预计至 2010 年，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的货运量可达 150 万吨以上，客运量 40 万人次，柬、越两国也将加入通航。

六、港口码头发展与布局中的问题

至 21 世纪初，我国内地港口的发展与布局仍存在结构不合理之处，即中小型码头泊位发展过快，数量偏多，而深水专用码头泊位，特别是大型散货码头泊位不足；公用

码头超负荷运转，而货主码头中的商贸码头等却在大量地重复建设。

上述问题除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无效投资以外，还使我国有限的水运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于国民经济全局不利。

我国沿海港口多属第一代港口，部分具有工业功能和简单商业功能的主枢纽港进入了第二代港口的行列，还没有港口完全具备第三代港口的功能、条件和特点。与在二十年前开始进入第三代港口发展阶段的世界先进港口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七、水运主通道建设与布局

水运主通道是水运网布局的骨架，其建设和发展对于改善我国运输结构以及交通网络的布局均有重要作用。

按地域经济发展需要及水运资源分布特点，在21世纪前二十年内，中国内地水运主通道建设、发展和布局，重点是建设贯通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海上运输大通道以及贯通主要通航河流的内河航道。

在2000～2020年期间，全国水运主通道建设总体布局方案是：设置“两纵三横”共5条水运主通道。“两纵”指沿海南北主通道、京杭运河主通道；“三横”指长江及其主要支流主通道、西江及其主要支流主通道、黑龙江松花江主通道。除沿海南北主通道外，内河主通道由通航1000吨级船队的四级航道组成，共20条河流，总长约1.5万公里。这些主通道连接17个省会和中心城市、24个开放城市、5个经济特区。

第五节　航线资源与机场布局

一、快速运输的优势

作为一种现代化快速运输方式，空运能适应人们在长距离旅行时，对时间与舒适性的要求，及对货物快速传递的需要，故而发展迅速。

二、周转量居世界前列

从1929年创办“中航”到1950年，全国民航仅有航线12条，载运旅客1万人次，货运周转量0.02亿吨公里；1978年发展到162条航线，载运旅客231万人次，货运周转量1亿吨公里，但在运输业构成中仍然微不足道。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航政企合一的准军事管理体制仍未改变。1987年实行政企分开，促进空运加速发展，增幅超过各种运输方式。

2002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班完成的总周转量162亿吨公里，在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23位上升至第5位（次于美、日、英、德），如包括港澳在内，则居世界第2位（次于美国）。

按客货运输分类：客运完成1239亿客公里，居世界第4位（次于美、日、英）；货运50亿吨公里，居世界第6位。

三、主要航空集团，航线资源及枢纽基地

2002年，中国内地众多航空公司经重组后形成六个航空集团，与民航总局脱钩，航线资源重新布局。六个航空集团是：（1）中国航空集团；（2）中国东方航空集团；（3）中国南方航空集团；（4）中国民航信息集团；（5）中国航空油料集团；（6）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以前三者为主。

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主体，联合中国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组建的中国航空集团（“国航”），以北京为枢纽，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经济带为依托，连接国内干线、支线并对国际航线形成全面支持的国际国内航空双向发展的运输网络；以东方航空公司为主体，兼并西北航空公司、联合云南航空公司组建的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东航”），围绕上海、北京、广州三大中心，以华东为腹地，以西安、昆明为两翼，拓展西北和西南市场，在国际、地区航线上竞争；以南方航空公司为主，联合北方航空公司、新疆航空公司组建的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南航”）航线最多，飞行基地最多。以上三大航空集团控制80%市场份额，并分别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建立三大枢纽基地。三大航空集团及其航线资源，如图表5－11所示：

图表5－11　　　三大航空集团及其航线资源

航空集团 / 运输方式	国航	东航	南航
资产总值（亿元）	561	473	501
运输飞机（架）	119	142	180
航线（条）	339	437	606
国内航线	286	383	512
国际、地区航线	53	54	94
枢纽基地布局	北京	上海	广州

据统计，在我国航空运输的20条黄金航线中，北京—上海航线每周有207次往返航班，频率最高。其余依次为：北京—广州、广州—海口、北京—深圳、北京—西安、深圳—海口、上海—深圳、昆明—景洪、香港—上海、北京—大连、北京—沈阳、北京—成都、北京—杭州、上海—广州、上海—厦门、广州—杭州、成都—昆明等。

民航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活力的一个增长领域。预计至2020年，中国民航

机队拥有的客机数量将相当于全球的 7%，成为世界第二大民航市场。

四、机场布局与空域资源优化配置

我国内地定期航班机场有 126 个，加上台港澳，共有 137 个。民航飞机总数 1112 架，其中运输机 602 架（大中型飞机 525 架、小型飞机 77 架）、通用飞机 335 架。

从机型来看，有数十种之多，波音、空客两大系列为主。以安全、经济、管理效率而言，机型较少为好。

我国内地定期航班机场布局之一，如图表 5－12 所示：

图表 5－12　　中国内地定期航班机场布局之一（2002 年）

项目 / 经济地带	定期航班机场	
	个	占总数（%）
东部	46	36.5
中部	37	29.4
西部	43	34.1

资料来源：据中国民航等资料编制

机场布局，全国 137 个定期航班机场中：东部 46 个，中部 37 个，西部 43 个，台港澳合计 11 个。

2002 年，中国内地最繁忙的 10 个机场依次如下：北京、广州、深圳、浦东、虹桥、昆明、成都、西安、杭州、厦门。若以离港航班数计算，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最大的单一机场，载客量近占全国 12%；上海两个机场载客量合占全国 9%；珠三角各机场载运能力占全国 17%，形成最大的航空枢纽。国内航空市场已形成珠三角、北京、上海“三分天下”的格局。

我国定期航班机场布局之二，如图表 5－13 所示：

图表 5－13　　中国定期航班机场布局之二（2002 年）

项目 / 地域	定期航班机场	
	个	占总数（%）
华东地区	31	22.6
中南地区	25	18.3
西南地区	23	16.8
西北地区	20	14.6
华北地区	14	10.2
东北地区	13	9.5
台港澳地区	11	8.0

资料来源：据中国民航等资料编制。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内地民航机场（尤其是枢纽机场、干线机场）建设与布局，主要集中于东、中部地区，在辽阔的西部以及与西部毗邻的东、中部一些省区，无论是枢纽机场、干线机场还是支线机场的布点均显不够。

为适应西部开发之需，从1999～2005年，在西部地区通过改建和扩建形成成都、西安、昆明、乌鲁木齐4个区域性枢纽机场；兰州、西宁、桂林、呼和浩特、贵阳、拉萨、银川9个干线机场，以及63个支线机场，使西部地区机场总数达到76个。预计到2015年，在西部形成成都、西安两个国家级枢纽机场；昆明、兰州、乌鲁木齐、桂林、重庆5个区域性枢纽机场；呼和浩特、南宁、贵阳、西宁、银川、拉萨6个干线机场，以及90个支线机场，西部地区机场总数增至100个。

但从2001年以来，西部干线机场多数要求升级为国际机场，支线机场建设也有相互攀比延长跑道、争取起降波音737机型的倾向，不利于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空运结构调整，也不利于发展支线航空及国产支线飞机制造业。

机场布局涉及多种资源配置及有效利用。因新（扩）建机场投资以亿元计，高者达数百亿（如首都机场2004年开始的第三次扩建投资167亿元），加之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同城效应"日益显现，故区域性枢纽机场和国际机场，特别是航线多、航班密度很大的国际机场，其合理布局所形成的有效覆盖范围在300公里半径圈内外。然而有些城市（特别是一些经济扩张力强的地级市）将机场看成自身的窗口和脸面，匆忙贷款兴建，有的建成之后即陷入亏损甚至停航。从地区来看，有些地区（主要是东部较发达地区）缺乏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空域利用规划，也是造成近年来机场密度急剧加大甚至出现"机场建设大战"的原因，造成土地、空域资源的浪费，以及巨额资金的重复投入。

在20世纪末，大珠三角地区国际机场密度即达每万平方公里1个，至2003年，长三角地区机场密度也升高到每万平方公里0.8个。两个三角洲地区的航线资源、航班密度分别低于美国，但机场密度却都超过了美国每万平方公里0.6个的水平。另外，在西部大开发中，由于互相攀比，从2001年开始也出现浪费空域资源的现象。

空域资源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还表现在对低空空域资源的开发方面。2004年以后，我国将充分开发空域资源（特别是低空空域资源）作为新的建设重点。

五、主要航空线

我国民航航线1985年有268条，至2002年增至1176条，通航世界34个国家的60个城市；国内136个重要城市，2个特别行政区。

除上述客、货、邮运输以外，通用航空在20世纪90年代也得到发展，主要是为工农业生产与科研提供服务。

全国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国际、国内空运网络。各省、自治区首府，各直辖市和其他主要城市，与北京均有直达或衔接航班联系。同时，上海、广州、武汉、杭州、厦门、桂林、昆明、成都、拉萨、兰州、乌鲁木齐、西安、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大、中

城市或旅游中心之间的航空联系也日益方便。地处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空运也得到了发展。

按民航客运量统计，在一千多条国内航线中，重要航线有360多条，而繁忙的“热线”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广州、广州—海口、广州—重庆、广州—成都、北京—西安、广州—杭州、北京—成都、广州—武汉等。

从1998年起京沪穗航线“空中高速路”正式贯通。上述三地每日均有400～500架次航班起降。从2001年开始在上海、北京、香港之间分别开辟航空快线，使上述三个大都市联系更趋密切。

六、支线航空

在大力发展干线航空运输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支线航空也获得迅速发展。

支线航空通常指航距较短、往来中小城市间的非主航线运行，所使用的支线飞机是指50～100座、飞行距离600～1200公里的中小型客机。在我国，支线航空一般指航距600公里以下、飞行时间1小时之内，来往于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或中小城市之间的航班。

鉴于我国幅员广，地形复杂，经济发展与布局地域差异大，发展支线航空对机场等级要求低，运输周期短，具有投入少、产出快、社会效益好的特点，适合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高原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人烟稀少地区发展现代交通之需。因上述地区通常具有人口密度小、可采资源不足、幅员又较大等特点，建设铁路、公路投入很大，一般铁路单线每公里投资为1000多万元，复线2000万元，而且年运量还必须达到500万～800万吨才不至于亏损；公路建设每公里投资也接近1000万元，高速公路逾2000万元，建成后如通行车辆较少，投资也很难收回。而如果建一个支线机场，投资平均为3亿～4亿元，比建设铁路、公路要节省得多，并且还具有建设时间短、见效快、节省在途时间等其他优点。

在此情况下，应优先考虑发展支线航空。例如新疆广达16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仅11人/每平方公里，在一些重要城市和工矿业基地之间，往往是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故支线航空在20世纪90年代获蓬勃发展，至2003年已相继建成、在建12个支线机场；云南的滇西、滇南地区，则因垂直高差过大，地势崎岖，铁路、公路建设受阻，已先后建成9个支线机场。除新疆、云南外，内蒙古、四川、贵州、陕西、西藏等地也在大力发展支线航空运输。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支线航空成为快捷有效的一种方式。据规划，21世纪前二十年，我国支线航空将出现高潮，并围绕沿海地区、西部交通不便地区和中部的旅游城市进行支线网络布局，形成覆盖全国的辐射式网络，需要约2000架飞机，其中100座以下支线飞机400架以上。从2000年起已规划在西部建设一批支线机场，西部各省（自治区）已开始制定发展支线航空的方案。

七、国际航线

在国内民航蓬勃发展的同时，国际航班业务获更快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我国只有3条国际航线。到60年代开始远洋飞行，陆续开辟西亚、北非和美洲的国际航线。80～90年代国际航班业务大发展，2002年国际航线增至161条、57万公里。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昆明、大连、厦门、深圳、天津、西安、沈阳、乌鲁木齐等国际机场可直飞亚、非、欧、大洋洲、北美洲34个国家的60多个城市。

主要国际航线有：北京—东京、北京—汉城、北京—新德里、北京—纽约、北京—洛杉矶、北京—旧金山、北京—苏黎世、北京—法兰克福、北京—伦敦、北京—巴黎、北京—卡拉奇、北京—莫斯科、上海—大阪、上海—名古屋、上海—法兰克福、上海—巴黎、上海—洛杉矶、广州—曼谷、广州—新加坡、广州—吉隆坡等。

第六节　管道运输快速发展及布局抉择

一、管道运输优势无可替代

管道运输指使用管道输送流体货物（石油、汽油、天然气等液体和气体货物）的一种运输方式，具有成本低、密闭性能好、可连续输送的特点，适用于货源稳定、量大且单向的远程输送。按输送物料状态，可分油品管道、天然气管道、固体浆料管道等。通常由大型钢管、泵站、加压设备以及供电、通讯系统等组成。这种现代化运输方式，具有运量大、走捷径、输送均衡连续、作业平稳等特点，货物在输送过程中损耗少，又可以避免运输设备的回空，有利于川流不息地进行同向大量货物输送，并易于实行自动化管理。另外，管道运输受气候和其他自然因素影响不大，全天候运行；占地少，对环境污染也少。是一种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单位货物运费低廉，经济效益明显。

二、战后世界管道运输蓬勃发展

世界第一条管道运输线始建于1872年，但管道运输的快速发展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1997年，全球建成166万公里管线网络，其中美国占47%；在世界管道总里程中，输气、输油管道分别占54%、40%，其他管道占6%。

三、中国管道运输发展与布局

自1958年建设克拉玛依—独山子输油管以来，至2003年已建成200多条输油（气）管道，总长近4万公里。其中原油输送干线1.7万公里、成品油干线0.3万公里、天然气干线1.7万公里，初步形成“北油南运”、“西油东运”、“西气东输”、“海气登陆”的运输格局。上述管网的布局与运营，减轻了铁路运输压力，实现了对大宗液态物料既安全又经济合理的运输，并对逐步改变我国运输业结构、布局有重要意义。

从地理分布来看，原油运输管道主要在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境内，大庆、辽河、华北、胜利等几个大油田和大连、秦皇岛、青岛、南京等几大输油港口以及在近二十年内相继建成的一些大炼油厂连接起来，主要有：大庆—铁岭—大连港、大庆—铁岭—秦皇岛港、大庆—抚顺、任丘—北京—秦皇岛港、东营—青岛黄岛油港、任丘—沧州—临邑、东营—临邑—济南—仪征、濮阳—临邑、塔中—轮南、轮南—库尔勒、库尔勒—鄯善。以上述管线为骨干，大体上形成原油输送网络。其中运量最多的大庆——铁岭—秦皇岛管线，长1300公里，管径720毫米，年运力4500万吨。

四、新建陆地输油管线、西油东送主管

库尔勒—鄯善输油管道是塔里木油田第一条原油输出管道，全长470公里，设计能力为500万吨/年，1997年建成后使塔里木原油直接输往兰新铁路鄯善火车站外运，改善新疆原油外运条件；轮南—库尔勒输油管线1990年建成；塔中—轮南输油管线（304公里）1996年建成。

成品油输送管线主要有1999年建成的天津—北京线和2002年建成的兰州—成都—重庆线以及在建的茂名—柳州—河池—贵阳—盘县—昆明线。其中，兰成渝输油管全长1250公里，目前是我国最长成品油输送管道。年输送能力580万吨，可解决四川无大型炼厂、原油或油品运输成本高、不安全等问题。2003年开工建设的“中石化西南成品油管道”，从茂名经广西、贵州至云南，全长1691公里，设计年输量1000万吨，投资35亿元，2005年建成后将成为成品油管道中输送量最大、运距最长的线路。

2004年起着手建设西部原油、成品油管道干线，并与中哈管道共同组成西油东送的大动脉，在布局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鄯善—兰州原油管道全长1500多公里，年输油能力1000万吨；乌鲁木齐—兰州成品油管道全长1800多公里，年输成品油800万～1000万吨。上述管线将于2006年贯通，主要供应东部石油市场。

五、国际输油管（安大线、安纳线、泰纳线）地理走向之争，中哈线战略意义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条交通线路的地理走向之争像安大线、安纳线那样如此难以抉择，方案选择论证时间长达十年，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在历经七年、多次谈判与论证之后，中俄两国于2001年就共同建设安加尔斯克—大庆原油管道项目可行性研究达成协议。安大线全长2400公里（俄境1600公里、中国800公里），投资28亿美元，原计划2005年供油，年运量2000万吨，2010年起增至3000万吨。预计25年内共向中国输送原油7亿吨，价值1500亿美元。可使中国石油进口的20%就近获得，还可使西伯利亚原油经转接向东亚国家（日、韩等）输出，开创亚洲原油产、运、销新格局。

此后，因日本的介入和俄罗斯国内分歧，原计划几被推翻。2002年底俄石油运输公司提出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安纳线）方案，该线全长4200公里，投资100亿美元，2008年建成，年输油5000万吨。

上述两方案在俄各大石油公司及专家、学者中引发激烈争论，俄能源部采纳折中方案，并由国家政府于2003年对外宣布。俄方认为折中方案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以及有利于自然资源综合开发。俄计划从2010年起通过安纳线主管每年向日本、韩国等国输油5000万吨；通过至大庆的分管道每年向中国输油3000万吨。届时，国际原油运输将出现新格局。

上述方案中，安纳线全部通过俄境，有掌控权，且管道运力大，投资回报高，可同时向中、日、韩、朝、美出口。对我国来说，虽然失去安大线的有利之处和“过境国”的地位，但安纳线对东北亚各国皆有利，也是可以接受的。跨国输油管地理走向之争，背后是国家利益的权衡与大企业、大财团的利益之争，在当今生产力战略布局中也并非罕见。不过，安纳线耗资巨大，途经高纬酷寒地带，加之外兴安岭山脉以及黑龙江流域的沼泽和冻土带也会给施工造成极大困难，工程艰巨，难以按期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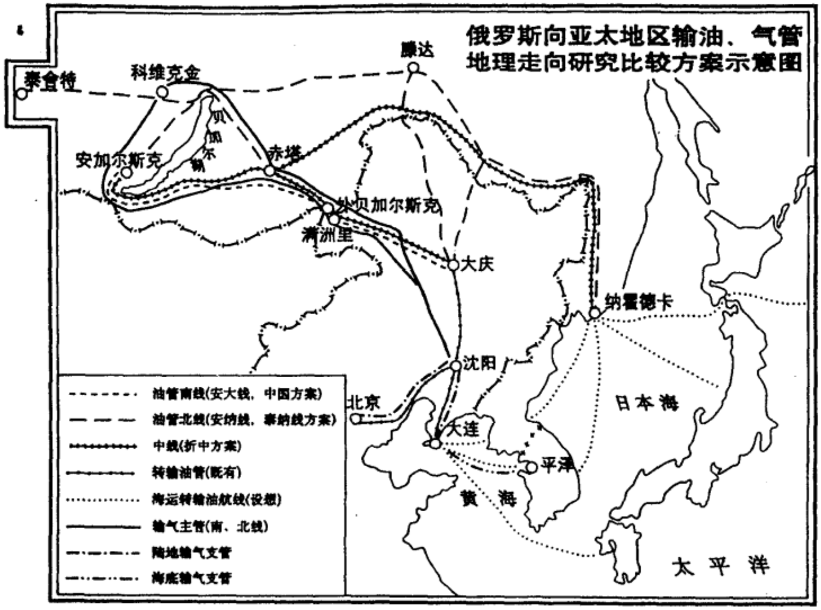
后续油源不足则是最大的隐忧，这将使在北部高纬地带建设的口径更大、运距更长的输油主管（安纳线）经济效益受损，也有可能保主管、弃支管，使向中国供油中断。如果建安大线，油源尚有保证。

另外，生态问题已经提到很重要的高度，无论油管走向南绕、北绕贝加尔湖，都有可能对这个世界淡水宝库造成污染。

俄罗斯向亚太地区输油管地理走向方案比较示意图，如图表5-14所示。

2004年，俄国又提出“泰纳线”新方案。该线起点是东西伯利亚的泰舍特，终点仍是纳霍德卡港（纳港附近佩列兹沃湾），输油距离更长，投资增至162亿美元。泰舍特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的枢纽，亦为现有输油管网必经之地，运输地位重要，这里靠近东西伯利亚和雅库特的油田，原油集运便利，且远离贝加尔湖。泰纳线主管由此出发，途经贝加尔湖北部，再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和中俄边境地区通往远东港口，并在中途建支管通往中国大庆。上述主、支管线年输油总量预计8000万吨。但油源多未落实。

中哈输油管道在战略意义上可能超过中俄安大线。1997年“中石油”获得哈萨克斯坦两处油田开采权，2004年中哈两国签署从哈萨克斯坦阿塔苏至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原油管道建设协议，预计2006年建成，年输油1000万~2000万吨。随后继续建设肯基亚克—阿塔苏油管，并与已建成的阿特劳—肯基亚克油管相连。这样，从里海港口城市



图表 5－14

阿特苏向东横贯哈全境至阿拉山口再到独山子，形成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运输线，全长 3088 公里，其中哈境内 2818 公里，中国境内 270 公里，总投资约 30 亿美元，年输油能力近期 2000 万吨，2015 年可望达到 5000 万吨。鉴于哈油藏较丰，将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稳定的陆路能源供应地，且沿途为亚洲内陆，同危机四伏的海路运输相比，安全系数大一些。这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战略意义不容忽视。

六、西气东输主干线

由于受陆上能源开发基地西移的影响，近十余年来我国陆地新建的管道运输干线多分布于西北、西南至华北、华东等地区，先后建成靖边—北京、涩北—兰州、轮南—上海、忠县—武汉等西气东输主管，特别是轮南—上海线为我国 21 世纪仅次于三峡的第二大基础设施工程，对实现能源多元化并减轻燃煤污染、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轮南—靖边—上海

1. 工程规模、投资额、地理走向。

此线为“西气东输”第一主管线，西部大开发战略项目。以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库车—塔北一带的天然气富集区作为主供气源，于轮南油气田集中外输，途经新、甘、宁、

陕、晋、豫、皖、苏、浙、沪10省（市、区），最终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其具体走向是：轮南—库尔勒—鄯善—哈密—柳园—武威—甘塘—中宁—靖边—柳林—郑州—尉氏—淮南—南京—上海白鹤，全长4000公里，管径1016毫米。2002年全线开工建设。至2003年已建成靖边一上海段（1516公里），并开始向郑州、合肥、南京、杭州、上海供气；2004年建成轮南—靖边段（2484公里），共同构成我国运距最长、管径最大的管运干线。

工程分上下游企业建设。上游企业修建从源头至终端主干管道；下游企业建设从干道至用户的管道，包括沿途各受益城市供气管网的改造等。总投资1560亿元，其中上游投资273亿元，管线投资435亿元，下游投资852亿元。

2．地区市场需求及供气量。

经市场调查，认为沿线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是全国天然气需求最大的地区。预测沿线地区意向用气量2004年为80亿立方米，2005年126亿立方米，2007年166亿立方米。其中沪浙苏3省市市场前景广阔，2005年用气83亿立方米，2010年用气量将增至145亿立方米；河南省用气量在2005年时为29亿立方米。供气量预计在2004、2005、2007年分别为28、80、120亿立方米，供小于求。

3．气价及热值比较。

据预测，（城市人口处）供气价平均1.29元/立方米，含上游出厂价0.45元/立方米，加上平均管道运费0.84元/立方米。具体价随用户距离不同而有差异，上海用户1.35元/立方米，略低于2002年上海使用的东海天然气上岸价1.45元/立方米和进口液化天然气交气点价格1.60元/立方米。与目前大量使用的煤气相比，煤气价低但热值不及天然气。按同等热值计算，塔里木天然气到东部长江三角洲的供气价只相当于煤气的三分之二。

4．经济社会效益。

轮南—上海输气管线的最大效益在于环保，改善华东、中原地区能源结构，亦可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在沿途10省（市、区）形成一条新的经济增长带。

1460亿元的投资中，西部省区可吸纳338亿元，可望营造出新的供需市场，并增加大量就业岗位。西气东输全线贯通后，塔里木天然气中每年可分离出57万吨轻烃、91万吨凝析油等，可作为优质原料发展天然气化工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东输长江三角洲等地的天然气达到每年200亿立方米时，相当于提供2000万吨原油，折标准煤2660万吨，或加工合成氨1500万吨，或发电1000亿千瓦时，还可保证8500万居民使用优质燃料，提高生活质量。

（二）靖边—北京、榆林—北京

由长庆气田的陕北靖边至北京的输气管道，跨越陕晋冀京4省（市），全长860公里，管径660毫米，1997年贯通。年输气量2000年约10亿立方米，2004~2005年建陕京二线（榆林—北京），输气量2008年增至50亿立方米，另外，由靖边至银川、西安、天津的输气管道中已分别建成。

（三）涩北—西宁—兰州

以柴达木盆地的涩北气田为源头，经青、甘2省，全长953公里，2001年建成。设计年输气量20亿立方米，2005年以后可达50亿立方米。沿线途经盐沼、沙漠、戈壁、山脉、冲沟、大河、黄土塬等复杂的地貌形态，且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部分地区缺氧，故管道运输是最适合的运输方式。

（四）忠县—武汉

以川渝气田东部重庆市忠县为源头，经湖北利川、长阳、荆州、潜江至武汉。另建荆（州）襄（樊）、潜（江）岳（阳）（湘）潭、武（汉）黄（石）等三条支管，全长1347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9亿立方米，其中12亿立方米直供武汉，余由主管及支管沿线城市分享。2003～2005年建成。

七、俄气、澳气输送管网路径意向

（一）亚洲最长的俄中韩输气管道（布局方案）

西起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金气田，绕经贝加尔湖至赤塔、满洲里、沈阳，由沈阳分出两支：一支至北京，一支至大连，再由大连经黄海海床铺管至韩国京畿道的平泽，全长4138公里，预计2005年动工建设，2008年供气。年供气量340亿立方米，其中向俄境内（伊尔库茨克州、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供气40亿立方米，向中国东北和环渤海地区供气200亿立方米，向韩国供气100亿立方米，累计三十年内向中国供气6000亿立方米，向韩国供气3000亿立方米。气价运至东北为1元/立方米，用户终端2元/立方米。

（二）澳气登陆后的运输管网

据2003年“中海油”与GORGON签署的协议，未来二十五年购1亿吨液化天然气。为接受与销售澳气，由“中海油”架构中国东南沿海天然气管网，长2100公里，包括在粤闽布局两大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将此两大海外气源以及南海气田、东海气田等国内气源同众多用户联通，并与“西气东输”管道在上海对接。

八、海底输油气管道、固体浆料管道

海底管道运输在我国也正在兴起。20世纪90年代，随着海洋油气资源商业开采的实现，海上油气成为沿海经济的动力源。因此，铺设海底管道，直接将油、气从海底油气田输往沿海城市，用于发电、化工或民用，成为经济效果显著的现代化运输方式。1996年建成南海崖城13－1气田，由此建有两条海底输气管线：一条通往香港，长778公里，管径711毫米，年供气30亿立方米，用于发电；另一条通往海南三亚，长99公里，年供气5亿立方米，用于发电和化工。

东方1－1海底气田至海南省东方市的输气管道，长110公里、管径22吋，于2003

年建成，初期年输气量 12 亿立方米，后期增至 24 亿立方米，一部分就近用作化工原料，大部分再经陆上管道输往洋浦、海口分别作燃料、民用。

还有东海平湖泊气田至浦东海底输气管道，长 370 公里，年输气 4 亿立方米；平湖油气田至舟山的输油管道，长 300 公里，年输油 70 万吨；渤海渤西气田到天津塘沽的输气管道，长 40 公里，年输气 4 亿立方米。

长距离管道输煤工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建设。由山西盂县经山东潍坊至青岛的“盂潍青输煤管道”跨越三省，长 720 公里，将在我国开创一种全新的大规模运输形式。建成后可使运输过程不受或少受气候变化影响，将气候对运输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第六章　乡镇企业发展和布局调整

第一节　乡镇企业发展及其特征

一、在城乡分割的体制环境下发展起来

乡镇企业，主要是指农民举办的集体、合作、个体企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有重大作用。它是在城乡分割的体制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与发展初期相比，现在无论是所有制关系、地理分布、产业结构等的变化均很大。

鉴于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加上其行业繁多，经济类型复杂，既包括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又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难以归入任何一章，故独立成章。

二、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乡镇企业实力甚微，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常被忽略。此后，由于政策调整，留下很大的发展空间，促使乡镇企业崛起。至90年代，乡镇企业不仅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而且也开始在全国大中型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1978年时，全国乡镇企业职工只有2826万人，企业总产值493亿元，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占8.7%；至2002年底，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有1.33亿人，是1978年的4.8倍，企业增加值增幅更高。

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1987年是转折点。这一年的非农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表明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潜力大，前景可观。

乡镇企业崛起，成为我国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其直接的结果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陆续转入工业或其他产业；另外则是一大批农村小城镇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而崛起，直接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当乡镇企业在某一有利地点的发展和聚集达到一定规模，经济效益比较显著时，农村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都能相应跟进，这对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城镇化有利。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概况，如图表6－1所示：

图表 6－1　　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概况

项目 年份	从业人员 （万人）	总产值（增加值） （亿元）	出口交货值 （亿元）	利税总额 （亿元）
1978	2826	493	－	－
1990	9265	9581	462	608
1996	13508	（17659）	6008	2798
2000	12819	（27156）	8669	6482
2002	13288	（32386）	11563	7558

①从 1996 年起改为增加值。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统计 2001》，《中国统计摘要》2003 年版

三、过度分散型的工业化与“农村病”蔓延

在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亦较明显。在许多地方，由于以地域狭小的乡镇，甚至村、居民组与农户为单位，盲目攀比建工厂、企业的风气兴盛，形成了过度分散型的工业化。其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一种以工业乡土化、分散化和大面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病”开始蔓延。上述情况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初期已明显表露出来，有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素质不高，经营粗放，效益低。突出表现在：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间发展差距大；一些企业破坏资源与污染环境，且占用土地过多，布局不合理。因此，多数乡镇企业难以和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融为一体。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地域组合

一、发展趋势

自然地理条件及其资源的比较优势，曾是影响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迄今这种重要性已大为下降。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导向和竞争压力，使乡镇企业发展进入由量的扩张为主向质的提高为主的转变，由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阶段。乡镇企业在产权与投资、增长方式、市场开拓、组织结构以及企业布局等方面都在变化。

至 2002 年底为止，乡镇企业发展呈现五个趋势：(1) 产权和投资主体多元化；(2) 企业规模出现显著变化；(3) 科技作用增强；(4) 对国际市场依存度上升；(5) 对农村城镇化促进明显。

二、结构分析

20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并非均衡实现而是呈区域集团式崛起的。从部门结构来看,在7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中农业企业所占比例相当大(32.5%);到80年代中期,农业企业数急剧减少;至90年代后期,所占比例下降至仅占0.7%(2000年)。

与此相反，商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中的乡镇企业数增长很多，分别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40.3%和19.8%；工业企业在乡镇企业中的构成比例下降，企业总产值（增加值）比例也有所下降，但它作为乡镇企业的主体地位未变。乡镇企业发展结构分析，如图表6-2所示。

乡镇工业的部门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同国企类似，重、轻工业约各占一半。从90年代开始，为适应出口需要，乡镇工业结构又作大的调整。至2002年，在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中，纺织服装、轻工、机械类分别占24.9%、23.4%、10.6%，分居第1位、第2位、第3位，其余依次为工艺品类、化工类、机械类等。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构成，如图表6-3所示：

图表6-2　　乡镇企业发展结构分析　　(单位:%)

部门/项目/年份	工业		建筑业		商、饮、服务业		交通运输业		农业	
	企业个数	企业总产值	企业个数	企业总产值	企业个数	企业总产值	企业个数	企业总产值	企业个数	企业总产值
1978	52.1	78.1	3.0	7.1	8.1	3.7	4.3	3.8	32.5	7.3
1984	79.3	72.8	1.3	12.7	13.1	8.6	2.4	2.8	4.1	3.1
2002	29.4	70.3	3.3	7.6	47.9	15.7	17.8	5.5	1.6	1.0

从1996年起，企业总产值改为增加值。

资料来源：据《全国乡镇企业统计摘要》、《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摘要计算编制。

图表6-3　　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构成（2002年）

项目/类别、部门	构成	
	亿元	%
合计	11563	100.0
纺织服装类	2888	24.9
轻工类	2687	23.4
机械类	1224	10.6
工艺品类	901	7.8
食品类	654	5.7
化工类	558	4.8
其他（矿产、畜产、土产、丝织等）	2651	22.9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版资料摘要计算编制。

从经济类型、所有制结构分析，在1986年以前，乡镇企业产值的80%以上为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私企仅占20%以下。因此，许多乡镇企业的发展受产权不明晰所拖累。

90年代私企迅速发展，加上各地相继改制，使私营、个体企业比例剧增。至2002年，乡镇企业增加值中，个私企业比例在鲁、苏、粤3省分别达到64%、63%、53%。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竞争需要，部分乡镇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外向度、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均有所提高，并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在乡镇企业起步早、效益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型乡镇企业和企业集团已成为当地乡镇企业的支撑力量。如江苏省到1996年已通过合并、兼并、重组等形式，形成大、中型乡镇企业约1300家，虽然企业个数仅占全省乡镇企业总数的0.13%，但其工业增加值、利税等分别占全省乡镇企业的30%、35%以上。

据调查，由于正在实现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并重的转变，使全国乡镇企业的外向度提高。至2002年有14万家乡镇企业从事外向型经济，出口产品交货值达11563亿元。

乡镇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其自身结构也在变化。具体表现在它的经济类型结构、轻重结构和行业结构，都在随时随地进行调整。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市场需求，包括国际国内、地区内外的市场需求，需求的不断变化，刺激乡镇工业不断地发生结构性变化。

国家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变化，也促使乡镇企业结构进一步改变。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保护国有资源不被蚕食，为减轻城乡环境污染恶化状况，决定大量关闭小造纸厂，同时对小煤矿、小化肥、小水泥、小五金等企业也实行严格限制，促使乡镇企业再度进行行业结构调整，并淘汰落后的原材料和工艺生产流程，改变在布局上过分分散状况，配合小城镇规划建设，使乡镇企业在新一轮发展中逐步形成合理布局。

三、地域组合：东、中、西部比较

当前中国乡镇企业的地域分布，如图表6－4、6－5所示：

图表6－4　　乡镇企业的地域分布之一（2000年）

指标 地带	企业增加值构成（%）	企业员工占农村劳力比重（%）	劳动生产率（元/人）	农村人口人均乡镇企业增加值（元/人）
东部	57.8	37.6	21430	4800
中部	36.2	22.6	15170	2160
西部	6.0	18.6	11260	950

资料来源：据报刊资料摘编。

图表 6－5　　乡镇企业的地域分布之二（2002 年）

项　　目	全国合计	地域分布（列全国前六名的省、市、自治区）					
		1	2	3	4	5	6
企业个数（万个）	2133	山东	湖南	四川	广东	河南	辽宁
从业人员（万人）	13288	山东	广东	浙江	江苏	河南	河北
企业增加值（亿元）	32386	山东	浙江	江苏	广东	河北	河南
营业总收入（亿元）	129760	浙江	山东	江苏	广东	河北	辽宁
出口交货值（亿元）	11563	广东	浙江	江苏	山东	福建	上海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3》资料摘编。

在东部沿海地带，除广西、海南以外，其余各省、市乡镇企业的密度都比较高，职工人数、企业增加值、企业总收入和利税也较多。尤以浙江、山东、江苏、广东、河北5省，合计企业增加值和利税占全国近一半，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河北平原、环渤海沿岸地区在内的沿海地带，绵延数千公里，业已成为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地带。由于沿海地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结果，已促使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东部乡镇企业发达省区，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已成为支撑大局和拉动全国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总量增长的重要力量。1999 年全国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中，东部地区占 91.5%，其中粤、苏、浙、闽、鲁 5 省又占大部分。

同东部沿海地带相比，中部地带乡镇企业的发展规模、水平，从整体上看要低一个档次，其地域分布主要集中于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省。西部地带乡镇企业的发展规模较小，水平尚低，加工工业比例小。只有个别省区（如四川）比较发达，分布也较为广泛。

四、高聚集地区：苏浙粤比较

在上述乡镇企业较发达、聚集度高的省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结构、经济类型及其布局又有较大差异。江苏省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步早的地方，浙江省也具有类似的特点。2000 年江苏省乡镇工业产值 10143 亿元，超过本省国有企业产值之和。由于这一变化，乡镇企业经济已由过去的补充性经济发展转化成为支柱性经济。乡镇工业布局已在苏南、苏中广泛展开。2000 年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百强县（市）中就有 14 个在江苏，2001 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有 17 个在江苏，2002 年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有 21 个在江苏，而且排序靠前，如江阴、常熟、张家港、昆山、吴江、宜兴、太仓等。它们均以乡镇工业发达而著称，出现了一大批乡镇工业发达的镇、乡。苏南、苏中乡镇工业的迅速崛起，同一大批乡镇工业发达的镇、乡的出现密不可分，如

洛社、前洲、支塘、角直、塘桥、横山桥、陆家、木椟等等。

在地跨苏、浙、沪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大批镇（含市属镇、县属镇）已从传统的农业社区逐步走向工业化、城市化，成为城市外围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实践证明，发展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又支撑和促进了工业化的扩展与提高。

浙江省一直被认为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地。经多年调整、改组之后，至2000年底，全省有乡镇企业108万家，从业人员880万人，吸纳农村劳力近五分之二，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经济的五分之四；在经历近二十年发展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已实现了初始资本积累。

长期以来，国家并未在浙江注入很多投资，大型国企也很有限，这也促成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里很多地方乡镇企业发展，也没有依托大城市，而是在一些不被看重的小地方迅速发展起来，主要依靠十分活跃的民间投资，加之浙人善于拾遗补缺，善于捕捉商机。近十年来屡屡成功地开发众多的小商品的国内、国际市场，部分小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甚至达到30%～90%。

兴办企业与创办市场相结合，以企业为依托，兴办专业市场，再带动乡企发展，是浙江乡企发展的特点，并由此而催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市场。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余姚“中国塑料城”、慈溪“中国食品城”、乐清柳市“中国电器之都”等。

在产业布局、地域组合方面，浙江乡镇企业发展和布局独具特色，形成了明显的“区域块状经济”。所谓块状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主要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的新兴产业群落快速崛起。上述两种布局模式的块状经济，已在浙江全省85个县市区中形成。至2002年，已出现年产值超1亿元的区块519块，10亿～50亿元的区块118块、50亿～100亿元的区块26块、100亿元以上区块3块。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

广东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区位优势和地缘因素，主要特色则是各部门较均衡发展，多种经济类型同时出现。因广东有利的地理、人文环境，使各种类型的乡镇企业均有发展机会。至2000年，全省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力，其中外向型乡镇企业达到2.96万家，有一千多个出口产品取得国际认证，销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全省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达2084亿元，近占全国四分之一；

五、温州模式、苏南模式

20世纪80年代，当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壮大时，曾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前者由农民创业，在农村发展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企业生产主要以外部市场为导向；后者以乡、镇政府为主体，在农村发展集体所有公有制的非农产业，企业生产多是适应内需（后来也陆续改为以外部市场为导向）。

上述两种发展模式在初始阶段各有利弊，并曾引发激烈争论，苏南模式一度占据上

风。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地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壮大，作为集体所有公有制的非农产业，因其产权不明晰而影响到进一步发展，90年代各地（包括苏南）纷纷改革产权制度，使非农产业的非公有制比重大为提高，企业生产以外部市场为导向，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者也是市场，而乡镇政府的职能则由以前负责领导甚至直接管理企业，转变为以改善地域的投资环境（软环境，硬件设施）为主，并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律运作。上述变化表明，温州模式在实际上已占据上风。

一向代表苏南模式的苏锡常三地的乡镇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失去领先地位，竞争力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规模经济、技术含量以及产权制度等方面。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开始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整。

当然，对温州模式也应进行分析，它的成效是建立于温州的地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其他地方理应结合本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以借鉴。

第三节　乡镇企业布局调整

一、布局分散化、乡土化及忽视环保的不良后果

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多。如有不少乡镇企业原材料消耗高；能耗高，工艺设备水平低，技术落后，创新乏力，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管理方式落后，产品质量不稳定；许多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淮河流域造成的空前严重污染事件，主要就是乡镇企业发展失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果。

据1995年调查，乡镇企业污染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有些地方，由于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庇护，加上经营管理者片面追求功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了一些乡镇企业，结果获利有限，但对环境和自然生态污染的后果却很严重，甚至遗祸无穷。

从产业格局与城乡关系以及土地利用和小城镇规划建设来看，乡镇企业二十多年的发展，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但对环保的忽视以及过度分散的布局形式，直接导致工业乡土化、分散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因此，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整体上未能形成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合理布局，存在着明显的滞后现象，表现在城乡分割因素依然在起作用，企业布局分散，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而合理规划、相对集中连片发展不够，工业用地配置比例严重失调。

据20世纪90年代后期调查，在土地利用方面，乡镇企业布局各种用地交错配置。在某些农村工业化素质不高地区，乡镇企业布局甚至达到高度不良状况：80%在村落，12%在集镇，7%在县以下的建制镇，1%在县以上城镇。上述极为分散布局的农村工业

和其他企业，享受不到布局相对集中所带来的利益，也享受不到城市聚集效应。为此，近年来调整或置换乡镇企业用地，集约利用存量土地，严格控制增量土地。

从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情况看，只有克服上述一系列问题，才能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二、与布局调整有关的变化

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1) 由以前主要靠增加投入的外延发展，转向依靠科学技术，实行内涵发展和外延发展并重；(2) 以前，大多数乡镇企业单纯依靠国内市场，目前有一部分经营者跻身国际市场；(3) 部分乡镇企业正由分散经营转向专业化、社会化协作生产，逐渐纳入国内外商品经济发展劳动地域分工的网络中去；(4)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短缺经济时代基本上结束，市场供应相对充裕，加上国企改革，使乡镇企业原有的优势大部分已不复存在，促使乡镇企业中的强者必须发展成为规范的现代企业。其管理机构则相继迁入有一定规模的城市。

三、新建乡镇企业布局原则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乡镇企业布局不提倡在村里再办工厂，原有村办工厂向小城镇集中，使企业布局由分散向集中连片发展，集中到建制镇和经过规划的工业园区、工业小区。到 2002 年，全国已有约 30%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集中于工业园区和小城镇。伴随着工业布局逐渐集中的趋势，近 4000 万人的农村劳动力连同其亲属陆续成为城镇居民，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四、工业园区、特色园区的规划、布局，专业镇“集群经济”

在江苏南部，近年来规划、建设乡镇工业园区已形成趋势，到 2000 年上半年，仅无锡市的乡镇工业园区就发展到 118 个，入园企业 1200 多家，投资 16 亿元，占地 1.1 万亩。比以往分散发展和布局节约了大量土地和资金。而且由于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以中心城镇为重点，以优势经济为依托，建立特色园区，而使以往乡镇企业布局所产生的空间位置与环境资源不对称、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对称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变。

全国乡镇企业的布局在 21 世纪继续发生变化，经过最新一轮区域规划、小城镇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后，有些具有区位优势和其他有利条件的地方会获得更大发展。如一直是乡镇企业摇篮的无锡市锡山区，从 2001 年以来外资引入形成趋势。经过重新规划后而开辟的锡山经济开发区，在 1997 年前规模尚小，至 2002 年，规划面积由原来的 29 平方公里扩展至 50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投入 21 亿元，累计引进各类企业 1000 家，其中外资企业 300 家。日、韩和中国台湾等地的许多中小企业正在进入我国内地的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如锡山、昆山等）。

广东省乡镇企业发展早、规模大的一些建制镇，近年来工业布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如中山市小榄镇以五金制造业为基础产业和特色产业，为进一步建设成为“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开辟占地2万亩的科技工业园区，营造专业化协作的产业群体。与此同时，制定全镇的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建成占地7平方公里的新城区，并对2平方公里老城区进行了全面改造。小榄镇成为“全国村镇建设示范镇”。

地处浙江省永嘉县境内楠溪江、瓯江交汇处的瓯北镇，由于乡镇企业多年来的持续发展，工业经济已形成规模。近年来又通过技术改造、建设园区等措施，促进了阀门、泵类、服装、鞋革等支柱产业和一批企业提高层次。到2002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企业有49家。1998年始建的“东瓯工业园区”规划面积11平方公里，已有270多家内、外资企业人园，开发利用土地6190亩，尚有350家企业正立项审批人驻园区。预计至2005年工业总产值300亿元，财政税收10亿元。按照“一区多园、一园多点”的思路，瓯北范围内新开辟的园区都将纳人东瓯工业园区管理和建设，由此使园区地域继续扩大、功能完善、环境优化、经济实力增强。

在浙江永康境内规划和建设的“五金科技工业园区”，其产业聚集度到2002年已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要求人园的企业需要等待园区择优录取。园区地价涨至相当于上海郊区的水平。近年来浙江省提倡合理规划、建设工业园区和特色园区，促使聚集效益提高，但有些园区并未达到预期效益，后来被撤销。

专业镇集群经济在广东乡镇企业发展和布局中具有重要意义。以服装为特色的东莞虎门镇，2003年服装业年销售额120亿元；东莞长安镇，本地居民3万多人，却容纳60多万流动人口，全镇经济规模逾百亿元；中山小榄镇，作为五金制品专业镇，经济规模150亿元。像以上这样围绕一个主要产业，突出产业强项，上下延伸产业链，凸显小镇个性，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相关产业聚集地，此类专业镇在广东约有300个，其中经济规模逾20亿元者有130个，形成特色鲜明的“集群经济”，促使广东成为著名的制造业基地。

第七章　城市发展与城市布局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是指非农产业、非农业人口以及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高度集中的地域空间，也应是人类最经济而舒适的生存空间。

现代社会合理的人口布局，通常会有70%～80%的人口聚居于城市。因此，城市发展与城市布局是很重要的经济地理课题，对于城市化滞后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GDP1万亿美元这道坎，美国、日本分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跨越的，当时它们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80%、75%，而中国在2000年超过1万亿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仅有36.1%，滞后约40个百分点。

21世纪是"新的城市化世纪"，但城市发展又要谨防二哄而上，在空间地域必须有序。城市化有量的要求，更有质的要求。城市化加速进行，要求城镇空间布局和城镇内部发展的合理化。

第一节　城市发展历程

一、城市的出现与城市发展阶段

在距今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在许多地区已发展成为主要生产部门，导致原始居民点形成。后随着手工业与商业发展，某些条件有利的居民点扩大成为所在地区的各种活动中心，萌芽时期的城市遂因此而产生。

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城市遗址，这表明早在五千五百年前就出现了城市。而在此之前，考古界公认我国最早发现的城市坐落在山东五莲的丹土村，距今有四千多年。凌家滩遗址位于江淮之间巢湖流域，这里在远古时期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发展已形成规模。城市里既有大的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具备了城市基本条件和功能。其表现的文化证明它具有城市内涵。

在龙山文化时期，标志着我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遗址，在山东龙山镇发现；到夏商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发展同时，城堡与宫殿营造技术提高，促使城市发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夯土建筑遗址多座，内有大型宫殿遗址，建于三千六百年前，应

为夏代建筑；建于三千五百年前商代早期的武汉盘龙城遗址，是我国南方区域性城市的先祖，城区内外布局很有规律：东北部夯土台基为宫殿区，城外北部是平民居所，南面分布着密集的手工作坊，东面系贵族茔域，西面及北面局部为中小奴隶主和一般平民墓地。整个城址保存较好，是研究我国早期城市和国家形态的标本。

此后，人们为了改进居住环境而自发或主动地进行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大致经历了古代城市和近代现代城市两大阶段，前者持续时间达数千年，在我国以隋唐长安城和元大都为代表；后者持续时间短，只是近代工业出现以后的事。

二、城市发展与区域的关系

城市发展通常都是在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即区域）内进行的。城市与区域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城市；而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区域。

任何一座城市，它的发展同所在地区之间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结构体系。城市与一定的区域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各个国家（地区）的各类城市以及它们与各自相对应的经济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经济网络。

在由城市与其相应的经济区域所组成的经济网络中，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城市一般发挥着“龙头”的作用。中心城市对区域的发展，既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合理布局，需要有它的中心城市及其城镇体系，并以此为载体。区域中心城市需要有足够的腹地，中心城市要依托腹地区域的整体发展，腹地区域的发展也需要依托中心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两者相辅相成。

近二十余年在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中心城市通常都是最主要的增长极，而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涌现或相继出现，也差不多都是以城市（城镇）作为载体与依托而出现的。因此，城市经济的发展格外引人瞩目。

但各城市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由不同性质与规模的城市彼此联系共同发挥作用的。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这种彼此间的联系构成了不同的城市体系。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在城市体系的经济辐射区域，又形成了不同范围的经济区域。

第二节　城市化

一、城市化内涵与误区

城市化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它包含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 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镇集聚，并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2) 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与强化；(3) 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发展。

但是，人们对城市化有种种误解，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误区。城市化并非普遍地建城造镇或简单地更改建制，也不等于城镇扩建，更不是一味地扩大城镇地域空间。城市化历史不等于城市发展史。人类迄今已有九千年城市发展史，但城市化历史却只有两百多年。城市化与日趋多见的城镇化一词，其内涵是相同的。并非是城镇化主要指重视小城镇建设，更非主要是发展县城以下城镇。

影响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工业化道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度和水准以及产业结构、政策等。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城市化的终极形态；工业化道路和政府政策决定了城市化的道路选择；而经济发展水准和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状况，则决定了在一定地理空间的城市化形态和进程。

二、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

就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应当说是工业化催生并带动了城市化，而城市化进程稍有成效之后，又反过来在集聚效应、需求带动等方面回报工业化，并带动现代化进程。三者之间的互动共同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般地说，工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城市经济属性；而在工业、城市发展之后兴起的第三产业，则表现出较为工业更加追求城市化的强烈特征，因为第三产业要求服务对象相对集中，只有在良好集聚效应的城市才有发展余地；近年获长足发展的信息业，又表现出较第三产业对高素质城市化的进一步追求。

因此，只有当城市化在数量、质量上均提高到较高水准，城市化进程达到较高层次时，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才能更加适应，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中外城市化进程比较

从图表 7－1、7－2 可见，我国城市化进程与世界比较，在 19 世纪中叶时的城市化水平十分接近，到 20 世纪初相差一倍，60 年代后期差距达到 2 倍，20 世纪末差距显著

缩小，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再次回复到十分接近。

图表7－1　　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发展预测

年份 指标	1800	1850	1900	1950	1980	2000	预测	
							2030	2050
城市化水平（%）	3.0	6.4	13.4	28.4	39.7	48.0	60.0	67.0

图表7－2　　中国城市化水平及发展预测

年份 指标	1843	1893	1949	1960	1969	1978	1990	2002	预测	
									2030	2050
城市化水平（%）	5.1	6.0	10.6	19.7	12.5	17.9	26.4	39.1	62.0	70.0

在近二十多年城市化的进程（1980～2002年）中，虽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与城市的确切含义，并非完全吻合。如县级市，几乎都是整县改市、或整县整市改区（市辖区），而且由于市区所辖地域过大，出现了某些设市城市（或市辖区）的非农业人口比重不高（甚至很低）的怪现象；在地级市中，则出现了某些新升格的地级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能力不强，市管县有些勉强，只能做些行署式的管理，主要发挥行政方面的职能，而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能较弱。严格地讲，建置城市化并非真正的城市化。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只能以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为准。因为只有它们才拥有城市建设和发展以及关于城市化的各种统计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有关城市化的研究与论述便无从谈起。

截至2002年底，中国内地的城市总数已达到21260个。其中：设市城市660个，比1980、1990年时的设市城市数量分别增加437个和193个；建制镇（包括市辖建制镇、县辖建制镇）总数20600个，比1980、1990年分别增加17730个和8867个。与此同时，城镇人口相应增长，至2002年年末，我国内地居住在市、镇辖区内的常住人口已达50212万人，城市化水平已上升到39.1%，比1980、1990年分别提高19.7个、12.7个百分点。

四、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已使我国从以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为主的时期进入到以城市经济社会形态为主的时期。

城市已成为国家或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城市自身的快速发展及其功能的日益完善，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高，其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城市以仅占18%的国土面积和42%的人口，却容纳了占全国45%以上

的就业人口，创造出占全国70%的GDP、76%的工业产值、70%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80%税收。

就城市建成区来看，到2002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2.6万平方公里，尚不及全国土地总面积0.3%，却聚集全国人口30%，产生出巨大的土地利用效益。

在城市发展数量增加的同时，城市发展的质量也有长足的进步。在1980～2001年期间，建设投产了一大批以供气、供水、道路、交通、污水处理为重点的市政公用设施；已将住宅建设列为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至2002年年底，中国内地城镇人均住宅提高到23平方米（1978年为7平方米）。

第三节　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已进入历史上最快的时期，但也应看到，与工业化进程相比，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相当低；基础设施滞后状况虽大有改善，但仍未从整体上改变。

另外，作为城市化进一步延伸的城市现代化，由于认识上及指标体系设置等原因，也存在很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比较注重经济、交通、道路等硬件设施改善，忽视生态环境、社会服务、产业结构、管理水平等"软件"建设。与此同时，一些城市的经济布局仍不够合理。

一、城市发展定位等认识上的偏差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对城市化、城市发展定位、经济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等认识上的偏差，致使城市建设和发展在不少方面走人误区。如把战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建设时期加以自然延伸，认为功能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太奢侈，不符国情；又如整个国家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采取以农补工的形式，逆城市化政策；在城市规划方面，重点城市几乎都是作为重点工业城市（甚至连作为千年古都和文化教育中心的北京也不能例外）来规划和建设的，且工业布局又大多集中于城市的城区和近郊区，并以"烟囱林立"的生产型城市为典范和骄傲。有些城市则干脆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延缓、欠账达数十年之久。而对于原有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达的城市（甚至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城市和商贸、金融中心也不例外），则以其是"消费城市"为由而加以彻底改造，致使许多著名城市在工业比重上升的同时，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大为下降，城市工业的发展也只是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远未实现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工业化。

由于上述原因，使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在一段相当长时期内步履蹒跚，城市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多采用低标准，且长期欠账，致使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明显地不

能适应城市发展之需；城市化水平指数提高缓慢，有的年份甚至大幅度倒退；城市经济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不够合理，市民生活质量不高。

二、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

1952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相比，滞后约5个百分点，到1978年滞后26个百分点，1990年减至11个百分点，目前是14个百分点；同人均GDP1000美元上下的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约15个百分点。

工业有着强烈的城市区位指向，工业发展与合理布局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务及一系列城市基础设施的支持，而且最终还需要紧靠城市这个大用户、大市场。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有一种分散而孤立地进行工业化的倾向，使工业发展和布局的形成，相当普遍地脱离商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社会劳动地域分工不够，专业化程度不高，特色产业缺少，市场发育跟不上，市气不旺。因此，不少地方的城市化，还只能算是有了市、镇建制的“建置城市化”而已，并非真实含义的城市化，更非城市化的真谛，离城市现代化则有更大的距离。

三、有些城市发展脱离区域，各自建设管理，城乡差距拉大

区域发展产生城市，而城市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区域。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与布局，同其所在的区域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城市经济与一定的区域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结构体系。城市与一定的区域，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但是，由于行政约束，使我国的城市多局限于行政管辖范围内发展，城乡只强调各自的建设管理，不同行政区域的城市，跨行政区的经济区的不同城市，其合理的发展与布局往往受到制约，甚至使经济区名存实亡。由于不重视或者从根本上缺乏有约束力的区域规划，致使许多城市所制定的近期、长远发展战略，城市性质和定位、城市发展布局方案乃至城市设计等都不够科学、合理，而且还导致攀比成风，不管自然、地理基础，也不管历史、文化积淀如何，你发展什么，我也照做，结果出现大量重复建设，经济发展同构，城市建筑趋同。

如果减少行政干预，不干预经济的社会地域分工与市场需求，重视发挥经济区作用，制定合理的区域规划或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和在科学定位基础上制定高水准城市规划，并将规划制定、决策和实施置于市民监督之下，就有可能改变上述状况。

另外，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在近半年多世纪以来，先是向重工业倾斜，以求尽快实现工业化；后来则是向城市倾斜，以求尽快改善投资环境，并实现城市现代化。但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到20世纪末，城乡差别不仅未能实现逐渐缩小，反而迅速拉大。1984年是我国城市与农村差距最小的年份，城乡收入比为1.74∶1，到2003年扩大到3.7∶1，如加上政府对城市的福利补助等，实际差距已达5∶1甚至6∶1，长期的“重城轻乡”正逐渐显现其后果。另据1998年以来的统计，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世界最高，从而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全面发展的差距与障碍。

四、许多城市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落后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城建速度快，新建筑多，但城市文化发展滞后，城市发展与布局的人文特征表现不明显。很多城市经过多年高强度开发建设，高楼林立，但却缺少文化底蕴。

从基础设施来看，作为城市发展的硬件基础设施日新月异，但其软件设施，包含市民的人文素质成长缓慢。我们在大力加强城市硬件建设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素质的基本建设。

从城市文化及城市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市民们曾世代生活于农村文化中或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缺乏城市意识，偏重于简单实用的商业利益，因此使城市文化及文化产业迄今落后。

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用 GDP 外，还用 HDR 这个人文发展指数作为衡量标准。它包括人均寿命、人均教育、人均收入，即生态质量、文化质量、生活质量，作为重要参数。可见，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单从城市人口规模等某些指标来看，我们已经拥有一些足够大的城市，甚至是超级城市。目前，中国内地已有 103 座大城市、218 座中等城市，但用 HDR、GDP 衡量，却缺少堪称典范的城市。而典范城市的形成则需要我们不仅重视城市化的数量指标，也重视城市化的质量指标，并在继承民间文化的基础上，重视城市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渗透于城市发展诸领域的城市文化，对城市经济发展通常起良好的润滑和推动作用，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又可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能提升经济的价值和品位，更进一步还可以形成行业特色。至于在教育和启迪市民、提高其素质与层次方面，城市文化更是不可或缺的。

文化产业并非只具有社会效益，其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WTO 将知识产权贸易视为其三大支柱之一，仅电影、音像、计算机、传媒等版权产业，其出口额之大，在美国年均达 4000 亿美元以上，占 GDP6% ~ 7%；有些欧洲城市，在其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时期，甚至还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的口号，以推动进一步发展城市、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档次，借以改善城市形象，提高竞争力，获取更多的经济社会效益。

因此，城市文化对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起明显拉动作用，而且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在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应像重视城市经济一样重视城市文化的发展，有条件的城市还可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世界城市发展史表明，发达国家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城市，在 19 世纪及以前多是生产型城市，以烟囱林立而自豪；20 世纪则是城市膨胀，以大都市甚至超级城市著称，城市建筑豪华气派，高楼大厦林立，但污染与城市病接踵而至；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则是生态型可持续发展城市，以城市文明程度、文化底蕴及拥有一系列文化积淀的建筑物来体现其城市形象与竞争力。

五、城市个性发展被忽视，“失忆症”与特色危机

城市的灵魂在于个性，有个性的城市才有魅力，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经历多年来的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布局也已展开，但却在突然之间发现了特色危机，即“千城一面”的现象相当普遍。其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城市规划只注重功能性，忽视地域文化特色与历史文脉承袭。许多城市建筑和房地产项目，过于重视其使用性，而忽视艺术性，更忽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及建筑的人性化；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相当长时间内普遍存在重开工、竣工面积数，忽视城市设计、空间管理与街区整体形象等倾向，加之城建也赶时髦，不管地理、生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不管南方、北方在气候上差异，竞相追逐时尚，相继出现高层建筑热、玻璃幕墙热、人造景观热，还有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等等。甚至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旧城区，也插建了不少新建筑，对老城区传统风貌造成很大破坏。

这些导致很多城市的建设和布局缺少特色，而一些原本颇具历史传统的城镇也被外观相似的新建筑所淹没，成为失去历史记忆的城市，这种现象被称为城市发展中的“失忆症”。

从城市特色同建筑物关系来看，特色城建主要体现在公共建筑上，而主要公共建筑物的趋同，使特色城建难觅。各地普遍缺乏与迅速发展的经济及城市相匹配的公共建筑。

还有些地方在“克隆”城市，出现了城镇发展与城建的“盗版”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不少城市争先恐后地建了一批平庸甚至粗俗的多层与高层楼房，布局又多靠近或直接临街；加之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数以千计的小城镇沿着国道、省道以及与其垂直相交的十字街道布置房地产项目，出现了大量的“一条街，两张皮，鸭舌帽子一般齐”的新城镇，更加重了人们对城市形象趋同化的感觉。

在城市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应当看到城市个性化的弘扬。然而不少城市却表现出趋同化：相同的经济躯壳与相似的建筑躯壳。这使它们的后续发展处于两难境地，不论是改建还是重建都有很大难度，且经济耗费很大。

六、城市病出现及原因分析

城市病是指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同时，也带来不少尖锐的城市问题，使市民受到影响和损害：

（一）城市发展在空间上无序进行

盲目扩大城市规模，且城建布局呈外溢式摊展（“摊大饼”），有些地方甚至是企盼城市化大跃进，狂热缔造无序的繁荣。

（二）土地无序开发，违章违法建设

城市新区开发随意性大，出现新区松散化。20世纪90年代前期房地产泡沫和开发

区热时，各级开发区多如牛毛，到21世纪初又出现新的圈地热；另外，在城市中心区和居住区，则普遍出现土地开发强度过大、建筑密度过大、容积率过高现象（也有的城市走向另一极端：旧城空心化）。

（三）住宅问题

一方面空置房大量增加，至2003年累计逾4亿平方米，空置率超出国际警戒线，沉淀资金数以千亿计；另一方面，多数市民住房水平仍然低下，特别是城镇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所需小户型、低价位住房严重短缺。

（四）烂尾楼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华南和各地，因房地产过热而形成泡沫经济，留下大批烂尾楼。如海南在短期内涌人2000亿元，留下烂尾楼605栋。全国从南至北许多城市中的烂尾楼，既有损城市形象，也妨碍市民生活。这些烂尾楼的特点是区位好，规模大，功能杂，成本高，产权不清。

（五）流动人口聚集地与城市烂边

从上海、北京等超级城市到一般中小城市，20世纪80年代至今分别涌人数百万至数万不等的流动人口，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融人城市经济与社会中，成为城市发展动力，但因素质良莠不齐以及户籍制约，迄今未能受到完全的国民、市民待遇。另外，他们多聚居城市边缘（即城市烂边地带），居住环境与卫生状况恶劣，犯罪率高。

（六）缺水

因水源减少与水质污染，全国有600座城市供水不足，400多座城市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每年造成2300亿元以上损失，水危机已连续多年困扰城市经济和居民生活。另外，各地的城市化进程中，几乎都出现了城市水环境问题，水面减少，水域生态被破坏。

（七）垃圾围城

城镇生活垃圾年产逾亿吨，历年垃圾堆存量60亿吨。虽然近十多年不断提高城市垃圾处置能力，处置率由1990年代初11%上升至目前的58%，但在中国内地的660座城市中仍有约200座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中。

（八）城市环境污染

有一部分中国城市已进人世界重污染城市前列。近年来工业污染有所控制，但机动车污染和生态破坏及不良卫生习惯等，造成环境问题突出。至2002年，仍有74%的城市人口在未达标的空气中生活；86%的城市噪音过高。

（九）建筑病

新建或改建、装修后的建筑空间内普遍发生下列症状：建筑物综合症，建筑物关联病，多元化学物质过敏症等，影响市民生活质量。

（十）名胜古迹和自然、人文遗产开发过度

随着旅游热兴起，受利益驱动，很多城市竞相对辖区内的景点过度开发，甚至滥加

索取，使其遭遇不应有的城市化困扰。在一些著名景区（如南岳衡山、张家界、庐山、北京香山）因过度开发而导致的城市化倾向一度很严重。

（十一）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长期滞后

防灾减灾措施不力，许多城市由于不设防或设防标准低，或缺少灾难预警和应急指挥协调机构，在突然爆发灾难（疫症、洪水等）时处于被动，损失巨大，如 2003 年春 SARS 的肆虐，1998 年的大洪水等，都曾使一些城市受损。

（十二）城市交通阻塞

长期以来忽视公交优先，特别是超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迟缓，难以形成城市“捷运”系统，加之道路交管不力，使许多城市交通拥堵。据 2002 年统计，仅塞车造成工时损失每年即有 200 亿元以上。

（十三）区域性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

形象工程或赚钱的基础设施（如机场、港口、车站）大量重复建设，布局不合理。相反，处理污水、垃圾，改造上下水等不赚钱的设施，能拖则拖。

（十四）城建管理、城市管理不力

建筑工程事故频发，制度缺失，工程分包及分包后的管理问题沿袭已久，行贿、受贿成为一些部门默认的“行规”，这也是形成高造价而工程质量反而低劣的重要原因。

（十五）规划及规划管理问题

长期以来，城乡规划水平普遍不高。城市总体规划过于重视规划技术而忽视经济社会人文等多方面因素。操作中少数人决定，秘而不宣，不受监督，加之规划管理失控，受制于权力，随意增减建设项目，加剧城市问题出现。

（十六）城市安全

它包括社会治安、生产经营安全问题。许多城市治安恶化，市民安全感下降。生产、经营中安全问题亦很突出，近年来工矿城镇安全事故频发，每年直接、间接损失高达 2000 亿元，并由此引发城市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城市病不只是大城市有，即便是中小城市，如投入不足，软、硬件建设跟不上，规划不科学或布局不合理，也会同样产生城市病。

七、明星城市、贫困城市同时出现

由于各城市之间内、外部发展条件差异，逐渐出现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现象。迄今我国内地已出现一批人均 GDP 超过 4000、5000 美元的城市和 6000 ~ 7000 美元的特区，但也出现了不少贫困城市。如同在市场经济中有企业破产一样，也有城市衰败现象。而城市衰败则往往与城市贫困同时出现或相继产生。

下列几种情况是造成贫困城市出现的主要原因：（1）重城轻市，过于注重扩大外延，增加人口，扩展市区面积，却忽视经济实力提升，致使财政收入有限，易造成有城

无市的"空壳城市"、"空壳财政"，并导致贫困城市出现。(2) 城市建成区面积狭小，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产业聚集规模小，经济吸引范围小，综合竞争力弱，而又担负起领导大片地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重任的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步履艰难。(3) 长期未能选择并培育发展适应本地特点的主导产业，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实力一直较弱小的城市。(4) 原有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已成为夕阳产业的城市，或弱势国企集中的城市，导致城市经济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而一个城市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聚集规模及其相应的经济总量支撑，就难以避免走向衰落。(5) 城市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太小的城市，或长期只能作为农矿产品集散地的城镇。(6)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枯竭（如采煤、采油）或国家资源利用政策变化（如停止采伐天然林）或原料工艺流程变化（如减少利用贫矿），若城市经济发展战略未及时调整转变，势必导致城市经济萎缩，甚至出现"矿竭城衰"、"城废"。目前，我国约有资源型城市440座，其中20%出现资源枯竭、次生灾害、环境污染和经济萎缩现象。

另外，我国资源型城市长期以来"重生产基地建设，轻城市建设"，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足，致使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这也是造成贫困城市出现的原因之一。

八、城市化政策研究滞后

顺应城市化规律、客观而理性的城市化政策，对推动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曾采取抑制城市化甚至逆城市化的政策。自从上述政策被摒弃之后，如何推进城市化又引起争论。诸如：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镇，何者限制，何者优先；还有"离土不离乡"等各式各样的政策措施，都曾对我国城市化政策的研究、制定以及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并且长时期极大地局限了我们的政策思维。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我国工业化的程度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城市化水平却仍停留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上，并由此而带来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影响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并影响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因城市化水平过低，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低，导致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发展所必须支付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成本过高，从而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上述一系列原因，城市化问题已经成为未来二十年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解决不好，可能对城市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为此，需加强政策研究，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推行客观而理性的城市化政策，对城市发展不再强调控制，并减少对规模的制度干预，淡化城市的行政级别，允许和鼓励新兴城市多样性成长。引导有经济潜质的城市快速成长，鼓励有扩张能力的城市吸纳更多农村人口。

与此同时，研讨城市在空间地域上无序发展的各种表现方式及成因，从机制、体制、法制等方面寻求治理城市病的良方。另外，考虑到城市圈将成为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我国经济需要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立足，放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也必须研究制定以大城市圈、大城市群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及其地域布局策略。

第四节 城市设置与分类

一、城市设置标准长期以来只考虑少数指标

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常有不同的城市设置标准。近五十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城市设置标准经历了多次调整变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此决定明确提出了具有量化指标的市、镇设置标准，从而对规范市、镇建设、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有重要的作用。但到1962年，因1958～1960年期间在工农业发展等方面出现严重失调而决定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城镇数量，并作出调整市、镇建制的决定。1963年又决定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由于严格控制设市条件，提高设镇标准，使我国城市化水平在1962～1969年期间急剧下降7.2个百分点，以后虽有所回升，但直至1978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仍然比1960年低1.8个百分点。

1978年以后，城市化逐步走上正轨，市、镇设置标准也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作了较大的修改。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的设镇标准是：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000人；或总人口在2万以上的乡，乡政府驻池非农业人口占全乡总人口1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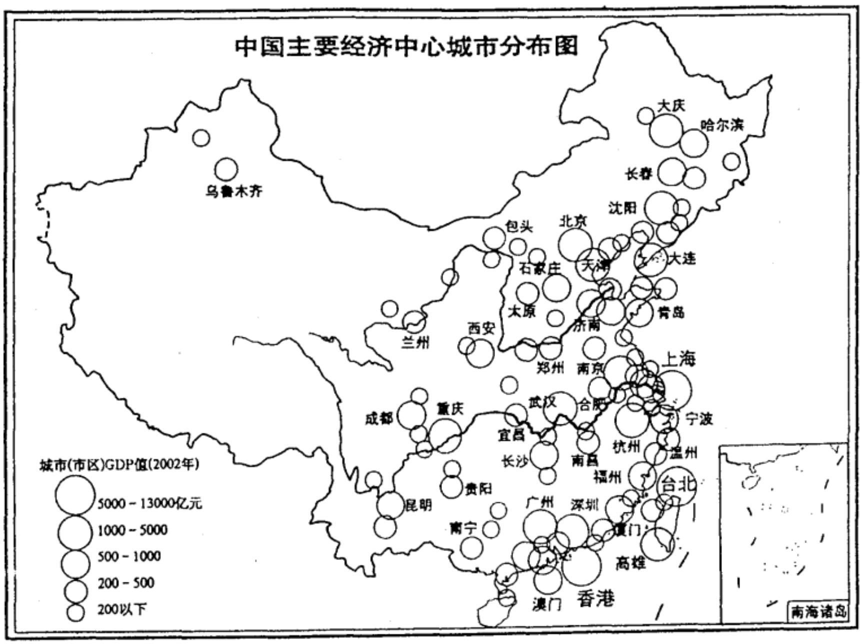
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试行的设市标准，地级市有？个指标，其中：市区非农业人口25万人；市政府驻地有非农业户口人口20万人；工农业总产值30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80%；国内生产总值25亿元；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5%以上并大于第一产业产值；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2亿元。县级市的设市标准及其指标体系较复杂，包括人口密度指标、县政府驻地镇指标、全县指标等三大方面共计14项。

从上可见，我国的城市设置标准基本上综合了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城市功能及非农产业发达程度等多方面因素，但也应看到，设市标准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考虑少数几个指标，对于城市本身自然的和人工的物质载体考虑不足，而且按行政级别设市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与观念仍然被沿用，并非按经济规模、产业发展及特色经济与文化等规划和设置城市。

这当然不利于按经济规模来安排城市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病的出现

与蔓延，并且由于部分城市是出于带动本地区大面积地域加速城市化的急切需要而拔高设置的，是城市化大跃进产物，它们的市辖区过大，建成区面积过小，致使城市本身的带动作用很有限。有些近年来新设立的市，其核心只不过是一个镇，辐射能力很小，通常只有3～20平方公里低标准的建成区，公共基础设施标准低，利用率低，人口与产业聚集程度低，却要担负起带动周围1000～9000平方公里（个别城市市区达到5万、8万甚至12万平方公里）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实现城市化的沉重负担，使第二、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均未得到理想的发展。

我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分布图，如图表7－3所示。



图表7－3

二、中外城市设置比较

世界各国城市设置标准差异颇大。有的以人口数量为标准，有的以城镇特征（公共和市镇服务设施）为标准，或者单纯以某级行政中心所在地为标准，或者是将上述各种标准及其政治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但不管是根据哪种标准设立的城市，通常所辖市区并不辽阔，甚至于同其人口规模相比显得很小，而市内分区（市辖区）又比较多，以

便于其开发利用，也利于进行有效的城市管理。如日本首都东京，人口 826 万，其所辖 23 个特别区之和也不过 591 平方公里；第二大经济中心大阪，人口 255 万，面积仅 212 平方公里；第二大城市横滨，人口 355 万，而全市面积仅 430 平方公里，下辖 16 个区。韩国首都汉城，人口 868 万，面积 627 平方公里，下辖 17 个区。法国首都巴黎，市区人口 218 万，面积仅 105 平方公里，市内划分为 20 个区。即便是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规划建设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口达 877 万，全市面积也只有 878 平方公里，市内划分为 32 个区。面积 641 平方公里、人口 310 万的新加坡，甚至划分出 55 个计划区，注重发展指导计划。世界著名大都会纽约，市区人口 735 万，面积除去水面仅 777 平方公里，虽然还存在一个纽约大市区，但并非政府划定的行政区，而是由纽约区域计划委员会根据社会经济特点而划定的"城市化地理区"。

通过中外城市市区与市辖区建置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城市市区偏大，而市辖区数偏少，且区内市政设施、公共设施不足，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如华北某市的两个城区，其面积分别为 426、471 平方公里，人口 224 万、229 万，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市辖区，且人口分布又高度集中于各自区内的某些地段，高层建筑（住宅、写字楼、公共设施建筑等）密集布局，加上建筑设计的某些缺陷，对城市防灾减灾不利（2003 年 SARS 肆虐时曾是主疫区）。

相比之下，国外城市市区偏小，而市辖区数偏多，且区内公共设施充足，便于进行城市开发建设和城市管理，能够较好地实现非农产业向城市集中，并实现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与强化。

应当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设置标准忽视了一些重要的财政指标和公共服务设施指标，如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仍有很多城市供水不足，供水普及率只有 70%甚至 60%以下。在 90 年代新设市中，东部地区少数城市低于 60%（最低者 44%），中部地区少数城市低于 50%（最低者 24%）；西部地区少数城市低于 50%（最低者 20%）。污水处理率也普遍较低。在 90 年代新设的一些市中，未建正规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至于城市道路铺装率指标，在新设市中有一部分道路铺装率低，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过小。还有的新设城市，其地质（含构造地质、工程地质）、自然地理（含地貌、气象、水文地理）环境条件和经济地理位置以及区位条件等有缺陷，致使城市建设受阻，发展前景不佳。在城市产业构成方面，在 90 年代以前，设市标准中普遍忽视第三产业应占比例，致使我国城市（尤其是新设市）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值普遍较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难以充分发挥。

为此，我国城市设置标准有必要作较大调整与补充，新设市标准除原有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城市功能及非农产业指标外，对城市本身自然的和人工的物质载体应予以充分考虑，以确保城市能顺利地发展到合理规模，符合地区经济振兴和地区城镇体系布局需要。在具体指标方面，还应增列财政指标和城区基础设施指标以及产业结构指标等。

三、设市城市划分，按行政级别分组

我国城市分类方法和分类标准现有如下三种：按城市的行政级别分；按市辖区总人口分；按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分。

按行政级别分组如下：

（一）直辖市

历史上直辖市设置多少不一，差别很大。1928 年，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特别市”有北平、天津、哈尔滨、上海、南京、青岛、汉口、广州等 8 个；1930 年，特别市改称（行政）院辖市，至 1947 年，全国设 12 个院辖市：南京、上海、北平、青岛、天津、重庆、大连、哈尔滨、汉口、广州、西安、沈阳。此后，院辖市又改称直辖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1953 年曾设置 12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同年，长春、哈尔滨升格为直辖市，使全国直辖市增至 14 个。

1954 年，直辖市大多改为省辖市，仅留北京、天津、上海 3 个，1958 年再减至 2 个：北京、上海。1967 年恢复到 3 个，此后三十年不变。1997 年设重庆直辖市，才使直辖市增至 4 个。

长期以来，其所以严控直辖市设置，主要是考虑加强行政控制，亦受逆城市化思维的影响，不重视利用直辖市资源。

直辖市是一项宝贵的资源。在 21 世纪头二十年，中国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挑战，应重视发挥特大城市的核心作用，可以设立较多的直辖市。随着改革深入，中央和地方关系将逐渐制度化，并将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因此，设立较多的直辖市会有利于发挥其在资源、产业、区位上的优势。

（二）副省级市

1997 年以前全国有 16 个副省级市，包含全部 14 个计划单列市在内。重庆市升格后现有 15 个副省级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均为在全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城市。它们中的多数因其在资源、产业、区位等方面的优势而有条件成为直辖市。

（三）地级市

一般为省辖市，直接由省管理。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广泛实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的新体制，使地级市大增。1986 ~ 2002 年，地级市数量由 150 个增至 275 个。有些地方还有“副地级市”，民间戏称为“地方粮票”。

（四）县级市

包括省直辖县级市和地区（自治州）辖县级市，许多县级市在实际上又受地级市领导，形成“市内有市”。还有少数县级市循特殊体制设立，如新疆的石河子、阿拉尔、图木舒克、五家渠 4 个县级市，是按“市、师合一”方式设立，是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

单位，实际上主要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理，是兵团由经营农业逐渐转向经营城市的地域载体。

近十余年我国县级市增加很快，且多是“整县改市”。1986～1999年，县级市数由171个增至427个，到2002年减至381个，仍是我国增长和发展快的城市类型。

四、按城市市辖区总人口分组

这种分类方法及其统计数据通常为国家有关部门及省、地两级政府较多采用，各地城市当局在研究并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时，通常以此作为主要数据之一，亦为规划、建设部门参考。媒体在涉及评价各城市的规模与地位时，也常以城市市辖区总人口或全市总人口等指标为主要依据。设市城市按市辖区人口分组，如图表7－4所示：

图表7－4　　设市城市按市辖区人口分组（2002年）

市辖区总人口（万人）	城市数（个）	占设市城市总数（%）
1000～2000	2	0.3
400～1000	10	1.5
200～400	22	3.3
100～200	137	20.8
50～100	279	42.3
20～50	171	25.9
20以下	39	5.9

（一）1000万～2000万人

2002年底上海、北京的市辖区人口分别为1270万、1007万，全市总人口分别为1334万、1136万。另据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数，沪京常住人口分别为1674万、1382万，还有约300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据此计算，沪、京实有总人口规模分别达1900万、1600万人上下，均为世界级城市。

据预测，世界1000万～2000万人的巨型城市至2005年底可达19个，其中中国有2个，排序处于前列。

（二）400万～1000万人

2002年底我国内地有400万～1000万人的城市10个，依次是：重庆、武汉、天津、广州、深圳、杭州、沈阳、南京、成都、西安。

以上两组12个城市，共同特征是城市发展历史久远（个别除外），城市经济结构多已调整到较好状态，各自在地理上的布局也已充分展开，并凭借自身地理区位价值、人文资源、行政地位等有利条件进行城市扩张。近15年无论是经济实力、城市人口均大幅增长。但也有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如重庆15个市辖区总人口999万，城市化

水平只有42%，如按全市总人口3114万计算则仅有23%，还需经历长期的城市化扩张过程。

（三）200万～400万人

2002年底有22个，依次是：济南、佛山、青岛、哈尔滨、长春、唐山、大连、淮安、淄博、潮阳、枣庄、太原、郑州、昆明、襄樊、无锡、苏州、常州、宁波、石家庄、莆田、普宁。

本组约三分之一为特色城市、品牌城市，近十余年扩张力强，经济实力大增。如无锡、苏州、宁波、青岛、大连、佛山等。但也有些城市主要依靠急速扩大市辖区范围，提升城市规模（人口规模、辖区规模），实际城市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相当低。如本组内有两个华东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仅分别为24%、28%；两个华南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仅分别为29%、30%。按别的指标衡量，上述四个城市也只有中等城市框架。

（四）100万～200万人

2002年底有邯郸等137个，地理分布以粤鲁苏鄂川等省居多。本组城市在20个前除个别知名度较高、接近大城市规模且经济发展有特色外，绝大多数只有中小城市框架，城市经济发展和布局亦无明显特色。

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本组内部分城市很有活力，如东莞、中山、江阴、常熟、江门、汕头、扬州、镇江、台州、温州、慈溪、温岭、福州、厦门、晋江、烟台、长沙、绵阳等，约占本组城市近四分之一；但本组也有相当多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城市现代化程度都不高，建成区也不大，故实际上不应视为大城市，多为中等城市。

（五）50万～100万

2002年底有279个，地理分布以鲁辽豫冀苏浙等省居多。本组城市有少数颇具活力，城市经济发展有特色。如张家港、昆山、吴江、南通、绍兴、义乌、余姚、上虞、威海、荣成、文登、东营、增城、惠阳等，加上另一些较具活力的城市共计占本组城市九分之一，但本组大多数城市应视为中、小城市，其城市化水平（数量的、质量的）较低，在东、中、西部都有一些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只有20%甚至15%上下，最低11%。

（六）20万～50万人

2002年底有171个城市，其中个别城市有活力，如太仓、石狮、珠海、平湖等，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小城市，建成区小，经济辐射力弱。

（七）20万人以下

2002年底有39座，地理分布多在西部的新疆、内蒙古、甘肃、广西等境内。城市规模小，功能不全，有相当多的城市实际上还是小城镇。

五、按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分组

这种分类法及其统计数据通常为规划、建设、设计、科研、教学等部门较多采用。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也是我国法定划分大中小城市的主要指标。设市城市按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分组，如图表 7－5 所示：

图表 7－5　　设市城市按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分组（2002 年）

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城市数（个）	占设市城市总数（%）
1000 以上	1	0.15
400～1000	7	1.06
200～400	9	1.36
100～200	31	4.7
50～100	65	9.8
20～50	222	33.6
20 以下	325	49.2

（一）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 50 万人以上）

现有 113 个，比 1949 年的 15 个、1980 年的 45 个分别增长 6 倍、2 倍。近十余年我国大城市量的扩张（尤其是特大、超大城市量的扩张）表现很明显，势头强劲，直至 2003 年以后，上述扩张势头才有所减弱。

为了科研、教学、规划、管理等方面的需要，通常又将大城市再分为以下三组：

1. 超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 200 万人以上）。

现有 17 个，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南京、济南、青岛、哈尔滨、西安、成都、长春、大连、杭州。包含全部直辖市，多数副省级市、中央计划单列市和一批省会城市。它们几乎都是地域辐射范围较大或很大的中心城市，城市经济发展迅速，量的扩张极为明显。各城市现有经济实力在全国 660 个设市城市中位居前列。

但是，从具体分析来看，上述城市的迅速发展，除开地理区位、历史与人文因素的有利影响，政治因素、行政管理和政策，对城市发展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2003 年以后，上述各城市量的扩张开始有所减弱，而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强烈。

2. 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 100 万～200 万人）。

现有 31 个，依次为：石家庄、太原、郑州、佛山、乌鲁木齐、昆明、兰州、长沙、淄博、唐山、南昌、福州、贵阳、无锡、鞍山、抚顺、吉林、苏州、徐州、汕头、合肥、包头、齐齐哈尔、邯郸、蚌埠、常州、洛阳、宁波、枣庄、南宁、大同。包含大批省会城市，个别副省级市（中央计划单列市）和一批地级市。

近十余年上述城市几乎都获较快发展，尤其是量的扩张很明显，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中五分之一城市获超常规发展，经济实力大增，辐射半径延长。但也有部分资源型城市因资源枯竭、生态环境受损，而经济重构或转型不及时或转型难度大等原因，面临困难。

3. 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 50 万 ~ 100 万人）。

现有 65 个，包含个别副省级市（中央计划单列市）、部分省会城市和一大批地级市。近十余年本组内约有六分之一的城市获超常规发展，经济实力大增，如东莞、中山、江门、南通、扬州、镇江、温州、厦门、烟台、海口、攀枝花等，其中有些城市还制定了实施新的城市扩张的发展战略及具体规划；但是，与此相对应，另有六分之一的城市（主要是资源衰落型城市）面临困难。

就整体而言，本组城市中约二分之一还只有中等城市框架，距大城市有差距。

（二）中等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 20 万 ~ 50 万人）

是一组发展很快的城市群体：1949 年全国中等城市仅 20 个，到 1980 年增至 70 个，2002 年激增至 222 个，比 1949、1980 年分别增长 10 倍、2 倍。近十余年本组城市中约有七分之一获超常规发展，GDP 大增，如江阴、常熟、张家港、昆山、吴江、绍兴、嘉兴、台州、晋江、荣成、文登、珠海、增城、惠阳等，成为一定地域（县域、地区）内的中心城市与强势城市。此外，还有约七分之二的中等城市在经历多年发展后已具有一定辐射力、吸纳力。

但是，就多数（约占七分之四）中等城市而言，城市化（数量的、质量的）水平普遍不高，城市硬、软件设施短缺，经济活力不足。

虽说已具有一定辐射力、吸纳力的中等城市不占多数，但仍是一组数量可观的城市群体，总数约 100 个，地理分布广泛，可发挥自身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特大城市量的扩张已开始减弱，吸纳高素质劳动力需求日趋强烈，并开始淘汰中等技术人才，出现了一些相对剩余的设备和资金，而小城市对这些人才、设备、资金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只有中等城市可以较容易地将农村与大城市这两端剩余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因此，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应利用此次有利机遇，加速城市扩容，进一步提高吸纳力与辐射力。

（三）小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 20 万人以下）

我国小城市群体发展也很快。1949 年全国小城市约 100 个，到 2002 年增至 325 个，增加 2 倍多，特别是 1980 ~ 1997 年间发展最快，1997 年以后全国小城市大为减少，原因是部分小城市发展扩容后成为中等城市，或者被大城市、中等城市兼并，整市改区，不再拥有市建制。

近十余年，本组城市中约九分之一获超常发展，城市经济基本竞争力加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优势。如浙江的慈溪、余姚、温岭、乐清、诸暨、义乌、瑞安、海宁、桐乡、上虞、富阳；江苏太仓、大丰、金坛；福建石狮、长乐、龙海；山东乳山、招远、蓬莱、莱西；广东高要、从化等，成为在一定地域（主要是县域）崛起的城市，经济活

力较强。

但是，迄今我国小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数量的、质量的）大多数都较低，许多小城市处于农村与大城市之间，却难以将两端剩余的要素加以吸纳和整合，对人才、设备与资金缺少足够的吸引力，故不宜片面强调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长期以来，出于对发展大城市的顾忌，曾强调发展小城镇，不少地区小城镇建设与布局遍地开花，效果不佳，聚集效益差。为此，应选择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

我国内地城市的建制与发展，如图表 7－6 所示：

图表 7－6　　　　我国内地城市的建制与发展

城市 \ 年份			1949	1980	1990	2002	增长率(%) 2002 为 1949 年	2002 为 1980 年
设市城市	合计		135	223	467	660	488.9	295.9
	其中	1. 大城市	15	45	59	113	753.3	251.1
		(1)超大城市	2	6	9	17	850.0	283.3
		(2)特大城市	4	12	22	31	775.0	258.3
		(3)大城市	9	27	28	65	722.2	240.7
		2. 中等城市	20	70	119	222	1110.0	317.1
		3. 小城市	100	108	289	325	325.0	300.9
	大中小城市结构比		1∶1.3∶6.7	1∶1.6∶2.4	1∶2.0∶4.9	1∶2.0∶2.9		

资料来源：多采用建设部、公安部资料。建制镇数公安部、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各不相同，本表采用民政部数据。

六、国外城市划分比对

国外关于城市分类未见统一的规定和划分标准。美国、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多将城市人口 10 万以上者视为大城市，但对中小城市却标准不同。其中美国将城市人口 2.5 万～10 万者视为中等城市，2.5 万人以下为小城市；俄罗斯则规定 5 万～10 万人规模为中等城市，5 万人以下为小城市；东欧国家视 2 万～10 万人口规模为中等城市，2 万人以下为小城市。

分类标准不同的原因，同各自具体国情以及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欧洲有些国家对城市的规模分类很细，分组多。如法国城市分为如下五组：20 万人以上；10 万～20 万人；5 万～10 万人；1 万～5 万人；1 万人以下。

第五节　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和布局

一、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曾制定并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实际上，城市规模在昔日计划经济体制下也难以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更难以控制了。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大中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表现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大中型城市多呈平面扩张态势，且城市功能多样化；二是小城市（含小城镇）数量激增。据156座城市情况的统计分析，大中型城市的规划面积扩展了86%，城市功能方面，工业城市不断补充商业、金融业和文化功能，文化城市增加产业功能，而特大城市国际功能的强化，则普遍推动了市政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通信和环保等事业的急剧发展。从小城市的情况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我国内地出现了近4万个小城镇。

二、大城市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脊梁，我国大城市仍有待于充分发育

在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大城市一向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脊梁。通常它们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城市功能相当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我国内地部分大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与竞争力，如图表7－7所示：

图表7－7　　我国内地主要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与竞争力排序

指标 城市	综合实力	基础设施	产业结构	科技创新	人力资源	影响力	国际化	经济发展环境优良水平
上海	1	1	1	1	1	1	1	1
北京	2	2	4	1	2	2	2	3
深圳	3	3	2	3	3	3	3	2
广州	4	4	3	4	4	4	4	4
大连	6	4	7	6	7	5	5	6
天津	5	7	6	8	8	7	8	5

城市＼指标	综合实力	基础设施	产业结构	科技创新	人力资源	影响力	国际化	经济发展环境优良水平
青岛	7	6	5	10	10	8	7	14
南京	8	9	9	5	5	10	9	8
武汉	9	10	8	6	6	6	9	9
厦门	10	7	9	9	9	9	6	24

从图表 7－7 可见，除科技创新一项沪京并列第一；产业结构以沪深穗位居前列；经济发展环境以沪深京居于三甲以外，其余各项指标均以沪京深穗为序。

但上述排序是以 20 世纪末的资料为基础而进行的，到 21 世纪初，情况又有所变化。

另据 2001～2002 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衡量中国城市发展的指标体系，以及评估城市“真实发展能力”的方法和检测手段。“真实发展能力”位居前列的中国内地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南京、武汉、杭州、沈阳、大连。

我国现有大城市，特别是其中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几乎都是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其地位和作用均很重要。

大城市只占全部城市土地面积的 8.8%、人口的 26.7%，却创造出 42.9%的 GDP、42.1%的工业总产值、51.8%的产品销售收入和 52.8%的邮电业务总量。在全部城市的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有 57.2%的国有经济、52.8%的股份制经济由大城市产出。此外，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所占比重，大城市分别占 55.3%、69.8%、50.1%，其地位与作用更为重要。据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人口健康、环境污染、交通状况、用地等指标综合比较，我国 100 万～400 万人口城市综合效益最好。

又据我国内地 324 个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利税和工业利润进行加权平均，求出各类城市的产出水平。结果是城市规模越大，产出水平越高；而从投入水平来看，我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较高产出水平是在较低投入水平下实现的。

另据计算，我国设市城市按非农人口聚集规模而区分的五级，其首、尾两级（即 200 万以上、20 万以下）比对，单位土地 GDP 产出率可以相差 40 倍。

在我国内地现有的 113 个大城市中，约有 30 多个超越常规发展速度，其在全国或大区域内的地位和重要性呈增长趋势，这一点从其经济发展指标和综合实力比较中可以看出。已形成的三大城市群，无一例外不是以大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如以沪、宁、杭、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连、沈、青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港、穗、深为中心的南海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都以区内的多个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城市功能上具有不同特色的大城市为中心或次中心，形成多层次的、功能互补的城市群。

全球1000万人以上的巨型城市现有19个，其中中国2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325个，其中中国内地48个。因大城市地域空间不断扩展，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城镇化地区的大城市地区；更有一些大城市已首尾相连，形成大城市连绵区，此种状况在我国也已出现。

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大城市发育仍然不够充分。如上海、北京、广州3市的GDP占全国比重分别只有4.6%、2.5%、1.8%；而同期伦敦、东京、汉城则达到17%、19%、26%。根据我国幅员辽阔的特点，沪京穗等虽无必要达到上述比重，但提高到适当高度是合理的。

中国幅员虽广，但生态环境脆弱，且平原比例小，地理分布又偏集于河、海沿岸，故很多城市适宜建设用地越来越短缺。面对如此国情，很难有条件选择欧美大城市发展与布局模式，倒是可以借鉴日本模式。美国70%城市人口生活于5万人口以下城镇，日本60%人口生活于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中国内地生活于5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目前只占城市总人口30%，因此发展大城市尚有相当大的空间。预计超1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将增至10座，300万人以上大城市达到50座，100万人以上大城市达到300座，总计有6亿多人在百万人以上的城市生活，占中国内地当时城市总人口近50%，这符合国土地理状况。

三、外溢式还是组团式结构

我国大城市一方面是还有待充分发育；另一方面，在城市发展布局与空间结构方面，需防止在某些局部或某一时期走人发展与布局上的误区。如有些大城市的发展因资本涌人过分密集而出现盲目膨胀，导致城区外溢扩展（摊大饼），结果是人们为通勤耗费大量时光，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发展大城市应更多地考虑城市经济的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改善，尽量采取组团式的城市结构。从另一方面来看，城市规模控制的关键是控制形态，理想模式是建设新的中心区。

很多大城市在近年来迅速膨胀，并且是从旧城区中心向郊外呈外溢式扩展，结果导致城市基础设施负荷加重，多种大城市病产生。如果严格规划并实施组团式结构与布局，合理选择用地、建设新区，使城市结构与布局形成数个分隔开的城区，从而使因城区面积过大、城市功能过分叠加，各功能争夺空间资源等无序发展状况得以避免或减缓。如深圳市明确提出，在城市布局上摒弃摊大饼式、同心圆式的布局，而是规划组团式的结构、无锡、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等城市在近年调整城市规划后，也都提出了建设新城区，改善城市空间结构的方案。

四、国际大都市应具有国际公认性

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我国大城市经济逐渐与国际接轨。近十余年，提出建成国际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目标的城市，由最初的 20 个增加到 182 个之多。而在建、拟建 CBD 的城市也多达 40 个以上。

然而，国际大都市是有公认标准的，通常是指在金融、商贸、文化、交通等方面具有强力辐射作用和重大国际影响、知名度很高的特大城市。具体说，对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就业人员结构、交通和信息产业发展程度、城市基础设施、跨国公司和财团总部数量等方面的指标经过评估，具有国际公认性者，才可称之为国际大都市。

1915 年，英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最初提出“国际大都市”这一概念时，是专指拥有较强经济实力、地理位置优越、服务功能良好、驻有一定数量跨国公司和金融总部的城市，它们对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区域经济有着较强的实力。到 20 世纪 60 年代，多国学者对上述概念加以补充，概括国际大都市的主要标志：全球区位金融中心；众多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机构集中地、三产高度发展；主要制造中心、世界交通枢纽；城市人口 600 万以上。

迄今公认的国际大都市有：纽约、伦敦、巴黎、京滨、汉城、墨西哥城、开罗、芝加哥、洛杉矶、法兰克福、莫斯科、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从我国来说，近期上海、京津、深穗均可能成为国际大都市，远期武汉、重庆、沈阳亦有可能。

五、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城市结构总体表现为：大城市不大，中等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

从纵向比较看，大中小城市具有各自的特点，不同时期发展速度各异；从横向比较看，在 1949 ~ 1997 年期间，以中等城市的增长速度最快；在 1980 ~ 1997 年期间则以小城市的发展居先。

由于它们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内地城市的结构体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中小城市的结构比例由 1949 年的 1∶1.3∶6.7，改变为 1980 年的 1∶1.6∶2.4、1990 年的 1∶2.0∶4.9、2001 年的 1∶2.1∶3.3。

处于大城市和广大乡村之间的许多中小城市难以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一方面是投入不足，软硬件建设跟不上；另一方面则是面临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调整等许多难题。

在我国 547 个中小城市中，拥有科技优势和投资优势者仍然很少。因此，整个中小城市群体必须着眼于使固有的传统产业升级，逐步提高科技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做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重视发展私营经济，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小城市在硬件建设方面欠账多，故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的

硬环境，同时也应改善软环境。

统计表明，小城镇的平均生产效率同大城市相比要低得多，土地、能源、水资源等的利用率都较低。还应当看到，小城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发展“五小工业”起步，资源配置不合理。因此，小城镇的建设和布局不可遍地开花，应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十五”（2001～2005年）计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

第六节　城市化地域差异和城市布局调整

一、城市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各种类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除受到其各自的自然地理因素、历史基础等影响外，还受到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使各地城市建设和发展、城镇人口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城镇布局与城镇体系形成，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据2001年统计，我国东部沿海地带仅占全国土地面积13.5%，却集中地分布着293个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4%，而且在十多年来呈继续增加的趋势，从1988～2001年间增加了8个百分点。在东部沿海地带的城市中，有大城市53个，中等城市103个，小城市137个，分别占全国同等规模城市的51%、47%、40%；广大的西部地带，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6.4%，城市数只有122个，仅占全国的18.4%，而且在十多年中呈减少趋势，从1988～2001年间减少3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带的城市中，又以中、小城市为主，大城市只有11个，仅占全国大城市总数的10.7%。我国内地城市发展的地域差异，如图表7－8所示。

从城市经济发展态势分析，至21世纪初，我国内地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在全部城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69.82%、20.86%、9.32%；城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57.58%、30.71%、11.58%。

图表 7－8　　　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的地域差异（2001 年）

城市＼指标＼地域		合计 数量(个) A	合计 比重(%) B	东部沿海地带 A	东部沿海地带 B	中部地带 A	中部地带 B	西部地带 A	西部地带 B
设市城市		662	100	293	44.3	247	37.3	122	18.4
按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分组	超大城市	15	100	9	60.0	3	20.0	3	20.0
	特大城市	26	100	13	50.0	9	34.6	4	15.4
	大城市	62	100	31	50.0	27	43.5	4	6.5
	中等城市	218	100	103	47.2	79	36.2	36	16.5
	小城市	341	100	137	40.2	129	37.8	75	22.0
按行政级别分组	直辖市	4	100	3	75.0	0	0	1	25.0
	副省级市	15	100	10	66.7	3	20.0	2	13.3
	地级市	250	100	97	38.8	104	41.6	49	19.6
	县级市	393	100	183	46.6	140	35.6	70	17.8
CDP100 亿元以上城市		181	100	130	71.8	33	18.2	18	10.0

①指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据建设部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地域分布明显地偏集于东部。城市（市区）GDP1000 亿～6000 亿元的 9 大城市，2001 年以前西部地区还没有。

我国内地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地域分布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密度比较，如图表 7－9、7－10 所示：

图表 7－9　　　中国内地经济实力强城市地域分布（2001 年）

城市（市区）GDP，亿元	东部沿海地带	中部地带	西部地带
1000～6000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沈阳	武汉、大庆	
500～1000	南京、大连、济南；无锡、青岛、苏州、宁波、淄博、东莞、厦门、福州	长春、哈尔滨	重庆、成都、西安、昆明
300～500	石家庄、东营、南海、顺德、温州、鞍山、珠海、江阴、中山、烟台、唐山、徐州、常熟、张家港、晋江	长沙、郑州、南昌、太原	乌鲁木齐、兰州

资料来源：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2》等资料摘编。

图表 7-10　　东、中、西部城市密度比较（2002 年）

地区 \ 项目		2002 年城市数		土地面积		城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城市（个）	占全国比重（%）	面积（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	
全国合计		660	100.00	960	100.00	0.7
其中	东部地带	266	40.30	106	11.04	2.5
	中部地带	227	34.39	168	17.50	1.4
	西部地带	167	25.31	686	71.46	0.2

资料来源：据建设部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造成了城市化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而且这种地域差异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前期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90 年代中期以后，上述发展态势已经开始有微小改变。

二、城市化水平的地域差异

由于区位条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现有水平以及人口分布和人均耕地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移民特征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域差异颇大。据 2000 年 11 月 1 日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省区是广东（原为辽宁），最低的省区是西藏，两者相比，城市化水平的差距 36 个百分点。各直辖市的城市化水平，除重庆较低以外，均在 70%以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可分为以下三组：

（一）城市化水平较高

约为 40%～8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50 个百分点。按高低顺序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黑龙江、吉林、浙江、内蒙古、福建、江苏。

（二）城市化水平较低

约为 30%～40%，低于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 5 个百分点左右，按高低顺序依次为：湖北、海南、山东、山西、青海、新疆、重庆、宁夏、陕西。

（三）城市化水平低

均为 30%以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17 个百分点，依次为：湖南、广西、安徽、江西、四川、河北、甘肃、贵州、云南、河南、西藏。

三、我国城市布局的调整，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目标

针对我国近期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趋势，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应对全国的城市化战略及城市布局进行调整。包括制定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目标，修订设市标准，制定新的设市规划，提高城市建设和城市化的质量，促进城市化的健全发展。

根据《中国设市规划》，重点调整城市布局将形成如下框架：到2010年，我国内地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8%以上，设市"城市占市县总数的比重，将由1994年的26.3%上升到42.6%，特大喊市和中等城市的比重将有所下降；西部城市极少的状况将有所改善；同时注重城市化质量，使城市的公共交通和水、电等基础设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城市的水平。"

在2010年规划期内，国家重要工矿业基地、大型港口、交通枢纽及重要旅游区，经济腹地较广、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有利于对外开放，区位条件优越、交通方便的城镇，都将是设市的重点。近期设市重点仍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中西部地带主要在交通方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大型工矿基地和重要边贸城镇；近期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将基本上实现城市化。

在设市模式上，主要采取"整县改市"模式。据民政部区划司区域规划处对全国17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通过28项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综合排序，再加上一些定性的分析方法，例如要考虑到其对外交通的便捷程度、燃料动力的保证程度、城市所可能遭受到的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以及是否有国家发展项目等因素。不同地域城市化发展目标预测，如图表7－11所示：

图表7－11　　不同地域城市化发展目标预测

项目 地区	城市密度(2000年，个/万平方公里)	各类城市在全国所占比例(2000年，%)			城市化水平预测(2010年)%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东部①	2.27	50.0	47.5	41.2	58.0
中部②	0.87	40.4	35.9	37.2	48.0
西部	0.23	9.6	16.6	21.6	43.0

①含广西；②含内蒙古。

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建设部资料计算编制。

在我国城市化的具体进程中，应根据三大地带不同的情况，分别拟定各自的城市化发展目标。

（一）东部沿海地带

至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不利之处是乡镇企业布局过于分散（虽经调整仍较分散），使城镇聚集能力有限，影响了城市功能

的发挥和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此，东部沿海地带在21世纪的城市发展应同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布局的变化相结合，从调整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人手，以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为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大城市群。

预计在2020～2030年期间，长三角和珠三角将形成总数达3亿人口规模的巨大城市群。

（二）中部地带

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外流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而城市的吸纳能力明显不足，加之境内的老工业基地衰退，也限制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对此，应加强规划和建设城镇基础设施，扩大各类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容量。在政策法规方面，则应鼓励和引导大、中城市的规模适当扩大，并大力发展小城镇。

（三）西部地带

长期以来，国家在此建立的以资源开采、重化工业及军工等为主的城镇，同农村的非农产业之间缺少密切联系，而且后者也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加之西部地带就其整体而言开发与开放滞后，故形成城乡产业双重落后的不利状况。

四、西部城市发展策略

（一）西部城市化现状已影响到生产力布局

在城市化现状方面，西部城市化进程缓慢主要表现在：大城市少，且经济活力不足、功能不全；中等城市亦较少，且地理分布集中于局部区域；小城市与小城镇也不多。以上问题已在长时间内影响到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调整，还影响到西部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二）西部需要具有经济活力、功能完善的大城市

我国的西部大开发迫切需要大城市的支撑，近期内至少应有若干个具有较强经济活力、功能完善的大城市，它们既能够有效联系东部、中部或来自境外的投资、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亦可广泛地接纳各种外来的商业机会，经过城市化的转化，向中小城市及乡镇腹地渗透。

整个西部地区可通过上述大城市带动一批中小城市，形成不同规模、层次、功能的城市群体，促进西部开发。

为此，应从政策上鼓励西部大城市的人口扩张，以利于城市功能的提升，同时也使中小城市在数量方面得到扩张，并通过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资源集约化和农产品专业化生产与经营，使更多剩余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聚集，共同推动西部城市化进程加快。

在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方面，鉴于短时间将很难形成空间结构完善的城镇体系，故应通过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调整，形成与西部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城镇布局，首先应依托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形成较大的聚集与辐射中心。

第八章　区域，区域经济联系

21世纪初开始，在我国一些地方相继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突破行政区划与体制障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标志着我国内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出现相当大的变化：从一向占主导地位的行政区经济逐步走向经济区经济。

第一节　区域内涵

区域是地区的泛指，指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它具有整体性、结构性等特征。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单个的区域，可以是自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一定范围（如自然区、生态区等），也可以是某个行政区或经济区，通常重视对于类型区域和区域演化的研究。自从1954年艾萨德（Walter Isard）创建区域科学以来，使其得到迅速发展，区域与空间遂成为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规划学、城建部门乃至工程师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形形色色的区域，包括自然区、自然保护区、流域区、生态区、行政区、经济区、农业区、工业区、商业区、金融区、金融管理区、风景名胜区、旅游区、军事区、城镇集聚区、城市化地区、城市辐射区、城市规划区、城市建成区、城市功能区、海洋功能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我国，行政区划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大多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和在一定的地理条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当今形形色色的经济区域网络，通常都是以行政区作为地域单元而组建起来。因此，有必要将行政区与经济区、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以及近十多年来才重视的经济地带的划分，分别加以阐述。至于区域经济联系及其变迁，也应当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行政区与经济区

一、行政区与行政区经济，行政区划调整创新势在必然

行政区是指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各级区域或地方；行政区划则是国家对各级行政区域的划分。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的区域经济现象就是行政区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基本上是行政区经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已开始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逐渐转变，正在从行政区划为界的竞争向以产业互动为基础的经济区域竞争转变。

我国行政区划萌芽最早约始于夏，当时的行政区划单位是在原始公社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国”，这些国与夏王朝之间，存在着某种松散的从属关系。至东周时期，由于生产力进步，各诸侯国互相兼并，国境扩大了。于是，主要的诸侯国下面设立郡、县。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实行郡统县的两级制。县以下再设乡、亭。在我国首次形成统一的行政区划体系。

唐代行政区划，大体上分为道、州、县三级；宋代基本上是实行路、府（州、监、军）、县三级制；元代行政区划变动较大，实行省、路、府、州、县五级行政区划制；全国曾分为11个行省，此为今日我国一级行政区划实行“省”制之始。明代全国曾划分为15个一级行政区（名称起初称“省”，后改称“京”和“布政使司”），以下再设府、州、县，为四级行政区划制。清朝末年，全国共设22个省，省以下设府、州、厅、县等。

1912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民国，基本上实行省、县二级制。1929年全国设28省、2地方；1946年设35省、1地方。据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全国共分为35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新疆）、1地方（西藏）和12直辖市（南京、上海、北平、青岛、天津、重庆、大连、哈尔滨、汉口、广州、西安、沈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变更频繁。1949年底，全国分为30省、1自治区、12直辖市、5行署区、1地方、1地区；1952年调整为29省、8行署、13直辖市、1地方、1自治区。1959年改为22省、4自治区、2直辖市、1筹备委员会。1967年改为22省、5自治区、3直辖市。

1988年设立海南省，是继1885年设台湾省后设立的第二个海岛省分。1997年设重庆直辖市，同年又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是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

区域，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1999年澳门回归，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至此，全国省级行政单位增至34个，包括23省、5自治区、4直辖市、2特别行政区。

中国现行区划制度大体沿袭元制。元朝时期，其行政区划重在统治与控制的有效性，改“山川形变”为“犬牙相入”，相邻政区彼此交错，互相牵制。此种区划理念，对中央集权国家管理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有利。

至21世纪初，在市场经济持续发展之后，我国传统的行政区划思想、制度都面临大的调整与创新。因为行政区划及其设置模式，必然要同当时的多种条件（生产力水平、交通、信息、地理、民族与人口分布、社会制度等）相适应，即便是这些条件中的一部分发生了大的变化，行政区划的调整、创新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经济区与经济区划的涵义

经济区是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地域组织形式，是既有内部结构（包含部门结构、区域结构、经济核心）也有外部联系的生产地域综合体。它只有在商品交换发展、劳动地域分工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现。因此，也可以说，经济区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

经济区划是人们对于客观存在的经济区的主观认识的结果。通常是根据劳动地域分工的规律，考虑到各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有基础、经济联系和建立不同等级的经济综合体的要求，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划分为若干个各具特色的综合经济区或其他类型的经济区。人们在逐渐认识经济区发展变化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划分和不断调整经济区，确定较为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明确各经济区生产发展的方向，以利于适度开发国土资源，合理布置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确定经济区划的原则

一般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经济原则

在确定区域经济中心的基础上，以其所影响和联系区域范围为划区依据。这就是说，经济区划应与经济中心所辐射和吸引范围相一致，经济中心所辐射和吸引的范围，通常是经济区的范围。如沈阳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经济中心，它与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一道，其辐射和吸引范围所至，除辽、吉、黑3省外，还包括内蒙古东部的4盟市（呼伦贝尔、兴安、通辽、赤峰），这是划分东北经济区主要依据。

但这一原则不宜绝对化。因为经济中心辐射和吸引范围，有时互相交错。在具体划分时，还需兼顾别的原则，加以综合考虑，最终确定其适宜的范围。如上海是我国最大经济中心，其辐射和吸引范围很广，而华东区或上海经济区的地域范围，则是在这个很广的地域内选择辐射、吸引作用最强地区并考虑别的因素而组成的。也有的地区同时受一个或几个经济中心辐射、吸引，划归哪一个经济区都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应优先

考虑主要经济部门的经济效益或者本地区长远利益，最终确定加盟哪一个经济区（如河南加盟中南区，江西加盟上海经济区）或者兼跨两个经济区（如广西既加盟中南区，又加盟西南6省区市7方经济协作区）。

（二）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在确立专业化生产部门的基础上，根据建立不同等级和各具特色区域经济综合体的要求划区。

每个经济区都是由多种生产部门所组成。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技术、经济、劳动力、历史条件的不同，因而分别拥有自己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或几个生产部门，往往成为具有区际意义的专门化生产部门，并可在全国的劳动地域分工中承担特定的任务。如上海经济区是全国最大的机械、电子、纺织、化工工业基地；东北经济区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中南经济技术协作区是能源和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和火电基地等。

（三）兼顾近期与长远经济发展的原则

经济区划通常从经济发展现状着手，兼顾本区经济发展的远景方向。这是因为经济区划的主要目的，不仅是认识经济区的现状，还应通过现状分析来确定本区域战略开发远景方向，通过对区内自然环境、社会经济诸条件综合考察和分析，为拟定本区经济开发适度规模、合理布局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如西南6省区市7方经济区，仅从发展现状来看，经济势力尚不够强大，专业化生产部门并不突出，经济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尚未形成，生产布局也未展开。但该地区拥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从经济发展远景分析，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产业优势。本着兼顾近期与长远发展结合原则，在“七五”期间即已将该地区正式列为全国一级经济区网络。又如云南“澜沧江流域经济区”，从现状看经济落后，难以划区，但该区水能资源奇富，加之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的有机结合，潜在的巨大经济效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漫湾、大朝山、小湾等大型水电站兴建和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开通，大规模经济开发揭开序幕。因此，兼顾近期与长期经济发展的原则是可行的。

（四）经济区划不应受行政区划界限束缚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保持一致的原则，各级综合经济区划通常要以相应的行政区划为基础。如国家一级经济区划以省区为单位；省内经济区划以县为单位。上述行政区均应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

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影响，经济区域划分思路有新的拓展，在制定经济发展和战略布局长远计划时，考虑到现实和未来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和地理特征，势必突破行政区划界线，在已有经济发展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新的经济区。例如全国七大经济区域，就是按市场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征，突破了行政区划界线，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划分的。至21世纪初，有的省内经济区划分也做到了这一点，如江苏的靖江、江阴两市联合成立沿江开发促进会，把长江岸线资源优势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更多的情况仍然是行政区划干扰了经济区划的正常进程，要素的空间布局受到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碰到的最大问题仍然是行政界限。即便是在东部沿海地带亦表现很明显，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长江为主轴的经济协作、产业整合规划迟迟难以出台，主要原因就是体制障碍。至于其他地方，类似情况更明显。

到21世纪初为止，行政区域分割仍然是区域经济整合的最大障碍。

第三节　经济区网络，七大经济区

一、经济区网络的涵义及其发展历程

经济区网络，是由一系列规模大小不等、层次不同、各具特色的经济区所组成的经济区域体系。这种经济区域体系通常是以一个或若干个中心城市为主体和依托，将有密切联系的生产、流通、金融、科学技术等部门融合在一起，形成网状经济区域结构。

经济区网络是在劳动地域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在长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受生产力的地域分布和影响经济区网络形成的诸因素所制约。

经济区网络有认识性和规划性的区别。认识性主要着眼于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业已形成的经济区；而规划性则主要着眼于在综合科学考察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规划出经济区网络的远景蓝图，是一项复杂的超前性工作，其目的主要是服务于各经济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

由于地区间客观存在的差异（自然环境、资源条件、人口分布、对外开放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为因地制宜加强各地区国土开发、经济建设的协调和组织，促进地区经济以适度规模和速度逐步发展，有必要将全国划分为一系列经济区。

在国外，有些国家对经济区划很重视，组织多学科的学者参与，详细考察和调研，将本国划分若干大经济区，大经济区之下又分若干亚区和小区，分别拟定发展目标，并按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合理部署生产力。

我国经济区划长期以来没得到正确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50～60年代，曾将全国划分为七个或六个大的经济协作区，大区经济协作机构称协作委员会，下设计划经济办公厅，作为办事机构，受国家计委、经委的指导。由于协作委员会仅是经济工作协商机构，工作范围与权力有限，因此，1960年决定成立大区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六个战略性地区建立区域性较完整经济体系的领导。还分别拟定经济发展的目标，有的还制定了长远规划。但由于对大区的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素质及其地域差异、各地的工业与技术状况、运输条件与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等，未能经过详尽、客观的综合考察和研究分析，因而在确定各区域发展方向及其专门化部门的选择上，有违背客观规律和不切实际之处，而所确定的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也偏大偏高，难以实现。

到1963年之后，有些大区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对区内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组织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和研究分析（如西南区计委曾组织国家各部门及区内的大批科技、管理人员联合进行考察；华北区计委组织了小型考察），对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有所认识，但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体制和指导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在考察经济发展条件时，常夸大地区优势，不切实际、不讲效益地追求大而全的地区工业体系，同时又幻想依靠国家干预，使工业布局迅速转移至内地。在具体进行工业区选址或大中型企业选址时，又片面强调"国防原则"，追求靠山、分散、进洞，导致很多严重问题出现，并普遍造成亏损，经济技术协作在不少地方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大区领导和协调机构的取消，六大经济协作区的作用降至最低点。但传统和自发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并未因此而消失。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又提出基本建成六个大区经济体系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起，在总结50～60年代划分经济协作区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根据协商一致、平等互利原则，发挥地域优势，协调和促进地区经济共同发展，又相继成立经济区（经济协作区、经济技术协作区等）。特别是国务院在1986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后，全国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跨地区、跨部门的不同规模、层次、形式、特征的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和协作网络。至2002年，区域性联合和协作关系紧密、半紧密、松散型的经济区（经济协作区、经济技术协作区等）有100多个。

二、经济技术协作区的几个层次，七大经济区

按照劳动地域分工的不同层次，上述经济技术协作区域大体上分成如下几个层次：

（一）省际间的经济地域联合（即全国一级经济区）

按成立年代顺序排列：华北三省区二市经济技术协作区（1981）；上海经济区（1982）；晋陕豫内蒙宁能源基地（即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1983）；东北经济区（1983）；西南5省区6方经济协作区（1984）；西北5省区经济技术协作联席会（1984）；中南5省区2市经济技术协作区（1985）；沿黄河经济协作带（1988）；京津唐地区（"七五"期间确定）。

到1992年，国家计划部门和经济科学、经济管理专家，研究并提出"七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战略布局方案。七大经济区域是：长江沿岸地带；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西南与华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东北地区。

上述七大区域的划分，可使处于内地的中、西部省区通过同沿海、沿边、沿江省区的联系，将内陆腹地的资源优势同沿海的区位优势结合。然后，各区域根据其自然和资源条件、经济技术基础和相互经济联系，按不同区域特征，在较大范围内规划地区经济布局，形成适合国情的多层次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以及合理布局的格局。

至1996年，七大经济区域划分思路又有新的拓展。考虑到未来十五年（1996～2010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和地理特征，势必突破行政区划界线，在已

有经济发展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如下七个跨省经济区域，并以此为格局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布局的渐次展开。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可利用该地区通江达海、交通便捷的良好区位因素，发挥工农业基础好、技术水平较高的优势，依托长江两岸数十个大中城市，以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和建设以及三峡工程等全面展开为契机，使经济发展和布局渐次展开，逐步形成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综合型经济区。

环渤海地区，可依托渤海沿岸的大、中城市，利用该地区城镇分布密集，科技人才多，煤、铁、石油、盐等资源丰富以及交通便捷等有利条件，以重点发展支柱产业以及建设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为动力，形成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综合经济圈。

东南沿海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和福建沿海等地区，可利用毗邻港澳台，对外开放早的优势，在现有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资金技术密集的外资企业和高附加值的创汇产业（包括创汇农业），形成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经济区。

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可利用该地区沿海、沿江、沿边等区位优势以及能源、金属矿藏、农林、旅游资源丰富等有利条件，通过建设出海和外运通道，大力开发能源和多种矿藏，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大能源基地、有色金属、磷硫生产基地以及热带亚热带农业基地和旅游基地。

东北地区，可利用区内现有重工业基础较强以及土地、能源资源丰富和交通网稠密等有利条件，通过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更新技术装备，改善管理，同时发展深加工，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化工基地和商品农业基地。

中部五省地区（豫鄂湘赣皖），可利用区内工农业基础较好、水陆交通便利等有利条件，加快沿京广、京九、陇海等交通干线地带的开发建设，形成重要的农业、原材料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基地。

西北地区，可利用区内能源、矿藏、农牧业和旅游资源较丰富的有利条件，以及通过由陇海—兰新铁路所形成的亚欧大陆桥可连接东亚和中亚的区位优势，可向东、西两面开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逐渐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优质棉、畜产品、石油和石化工业基地，能源和有色金属工业相结合的基地。

1997 年，有关部门提出九五计划期间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的方向和重点，认为关键在于七大经济区域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条件，确定在全国经济区域分工格局中所承担的任务和产业发展方向。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的重点是围绕重要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并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区域联合与协作促进产业布局有序转移。

（二）毗邻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经济地域联合（即全国二级经济区）

按成立的年代顺序排列如下：浙闽 4 地市协作联谊会（1982）；川黔毗邻地区经济协作区（1983）；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1985）；湘鄂川黔经济技术协作联席会（1985）；晋冀鲁豫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1985）；川滇黔毗邻 12 地州市经济技术协作会（1985）；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1985）；苏鲁豫皖淮海经济区（1986）；闽粤赣边区经济协作区（1986）；鄂豫川陕毗邻地区经济协作区（1986）；苏皖毗邻地区

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1986）；滇桂黔边区5地州经济协调会（1986）；陕甘宁蒙毗邻地区经济协作会（1986）；西江走廊经济开发协调会（1986）；晋陕豫黄河三角协作区（1986）；陕甘川宁毗邻地区16方经济区（1986）；闽浙赣皖边区经济协调会（1986）；牡丹江流域经济协作区（1986）；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地带市长专员联席会议（1986）；川滇青藏毗邻地区经济协作会（1987）；甘青藏滇川毗邻地区民族友好经济协作区（1987）；武汉经济协作区（鄂湘赣豫邻近部分地市，1987）；苏皖毗邻经济协作区；闽浙赣边区协作区；湘鄂毗邻4地市协作区；嫩江流域经济区；湘桂毗邻地区协作区；桂东粤西协作区；川滇黔赤水河流域协作区（1988）；环京经济协作区（1988）；攀西—六盘水开发协调会（1989）；重庆经济协作区（1988）；苏锡常通杭嘉湖经济区（1991）；湘桂黔毗邻协作区（1991）；大别山经济开发协作区（1991）；宝中铁路沿线经济协作区（1992）；长江三峡经济开发区（湖北宜昌、重庆万州、涪陵，1994）；大京九经济协作带（河北霸州、衡水，山东聊城，河南商丘，安徽阜阳，湖北麻城，江西赣州，广东惠州、河源等10地市，1997）。

（三）省内毗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地域联合（即三级经济区）

按所在省区分列如下：镇宁扬经济技术协作区（1985）、徐淮盐连经济协作区（1985）、靖江、江阴沿江开发促进会（2001）、杭嘉湖地区横向经济联谊会（1987）、皖南经济协作区（1986）、皖中经济区（1986）、皖北经济区（1986）、闽南厦漳泉三角经济开放区（1985）、闽东北5地市经济协作区（1986）、豫南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1986）、江汉平原经济协作区（1985）、鄂西北协作区（1987）、长株潭经济区（1985）、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1985）、钦州湾经济技术协调会（1985）、北部湾经济区、桂林经济旅游协作区（1986）、内蒙古东部5盟市经济协作区（1986）、内蒙古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1985）、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1984）、辽宁沿海5城市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体（1985）、长白山经济协作区（1987）、黑龙江西北部经济区（1985）、三江平原经济规划协作区（1986）、川南经济技术协调会（1985）、川西经济技术协调会（1985）、滇中8地州经济协作区（1986）、澜沧江流域经济区、关中经济带（1986）、甘肃中部经济区（1985）、丝路重镇经联会（1991）等。

上述经济技术协作区域，按性质和作用不同，又可分7种类型：综合经济协作区、资源开发协作区、经济开放地区、城市经济协作区、城市经济协作网络、经济不发达地域协作区、部门经济协作区。

经济协作区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大多数又都是开放性、松散或半松散型的区域性经济协调组织（区域性联合和协作关系紧密型的经济区只占少数），其主要任务是：（1）围绕开发本地区的任务，研究和探讨带有共同性的重大问题，如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地区经济体系论证等；（2）协商带有共同性的政策、措施，以振兴地区经济；（3）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的经济技术协作活动；（4）研究和探讨在流通、生产、科技领域内推行改组联合，实行专业化协作等。

第四节　三大经济地带

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表现

为了准确反映现阶段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客观地认识全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为生产力布局提供依据，有必要在客观分析、评价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参照其地理位置特征，在全国范围内划分出若干个经济地理带，以利于国家及政府有关部门对不同的经济地理带分别进行指导，有针对性地发展经济，改善生产力的布局。

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①，并且在发展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

上述关于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从客观上轮廓地表现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宏观布局状况，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地区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技术水平的宏观地域差异。

上述三大经济地带的形成，同我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处东亚，濒临太平洋）、近百余年来的历史和经济发展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展的结果。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布局，逐步由东向西推进。三大经济地带主要指标比较，如图表8－1所示：

图表8－1　　三大经济地带的主要指标比较（2002年）

指标	单位 \ 经济地带	东部沿海地带	中部地带	西部地带
土地面积	万平方公里	106	168	685
	占全国（%）	11.04	17.50	71.40
人口	亿人	4.94	4.26	3.64
	占全国（%）	38.47	33.18	28.34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466	254	53
	流动人口特征	粤浙沪苏京闽等省（市）大量流入	皖湘赣豫鄂5省大量流出	川渝黔等省（市）大量流出

指标 \ 单位 \ 经济地带		东部沿海地带	中部地带	西部地带
GDP	GDP 占全国（%）	57.7	25.2	17.2
	人均 GDP（元/人）	13747	6959	5507
对外经贸	进出口贸易额（亿美元）	5682	301	225
	占全国（%）	91.5	4.8	3.6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455	50	23
	占全国（%）	86.2	9.5	4.3
城市化	设市城市（个）	266	227	167
	城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2.5	1.4	0.2
	建制镇（个）	7474	6012	7120

①包括原属东部的广西、中部的内蒙古在内。

资料来源：据《中国行政区划手册》、《中国统计摘要 2003》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二、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拉大

以工业产值为例，在 1949～1985 年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近 60 倍。其中：东部沿海地带增长 44 倍，中部地带增长 73 倍，西部地带增长 65 倍；三大经济地带 1949～1986 年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东部沿海地带由 1949 年时占 70%下降至 1986 年的 60%，中部地带由 1949 年的 20%上升至 1986 年的 27%，西部地带由 1949 年的 10%上升至 1986 年的接近 13%。

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多种原因，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差距又拉大了。人均 GDP 值，在 1978 年时东部比中部、西部分别只高出 243 元、360 元，到 1994 年则分别高出 1482 元、1756 元，为原差额的 6 倍和 5 倍。2000 年则高出 5352 元、6647 元；2000～2002 年，中部 GDP 占全国的比重下降，西部略微上升，东部继续上升。2002 年人均 GDP 的增长也是东部高，西部次之，中部较低。

西部 GDP 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主要还是中央投资带动的结果，西部经济发展内再的机制尚未形成，自我发展能力不够。

三、流动人口特征

当前，全国流动人口超过 1.2 亿，其中跨省流动有 4242 万人，占 35%，省际流动主要是从经济欠发达而又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地区部分省流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中，中部地带的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 5 省均有大量流动人口进入东部；西

部的四川省外出流动人口规模最大，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6.7%，达700多万人；东部流入地区中，则以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等省市为主，占全部流入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广东省非当地户籍的流动人口2200多万（其中省外湘川赣桂等地流入1500万，省内流动700万），他们为广东GDP做出了25%的贡献，但他们只是有居住地（多为临时栖身之所）而没有社会地位的新移民，即在住地劳作、消费、纳税，却长期没有城市居民权，而且劳动、生活条件较差、工薪低下。从全国来看，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在各地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已延续了近20年。

四、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分析

从宏观来看，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可归纳为三大类：(1) 对生产效率产生明显影响的因素；(2) 对生产要素投入量（资本和劳动）产生明显影响的因素；(3) 历史文化因素。

一般认为，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影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区位因素，而历史文化因素主要是历史基础、区域文化等。

五、区域协调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的主要目标

从“九五”开始，国家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要点来抓。1996年制定并出台了有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强中西部地区资源勘查，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步增加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国家政策性贷款将对中西部地区作一定倾斜；调整加工业的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实行同等优先、重点支持的原则，并适当放宽外商投资的领域。

1999～2000年，国家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并配套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然而，中西部（尤为西部）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与布局很不均衡。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应注意布点不宜过于分散，不可忽视中心城市的依托作用，不必热衷于地区自成体系，不能为了实现所谓“理想”的经济发展与布局方案而有损于自然生态环境，而应采取有重点的发展战略，以向西部非均衡推进为主，并继续向中部梯度推进，促进全国性的区域协调发展。

也有学者提出，西部地区因生态环境脆弱，不必实行追赶东部并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应以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为重点，靠为东部有偿提供自然资源、人力和优美环境来赢得可持续发展。

西部大开发在目前主要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水利、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同时，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改善西部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优势资源的合理开发及深加工，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从发展和布局的重点来看，依托欧亚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开发。

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西部开发也是东、中、西部的共同机遇。中部地区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以水陆交通干线地区为重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东部地区的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要与中西部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开拓国内市场，推进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

第五节　区域经济联系变迁

一、世界区域经济联系变化与经济中心转移

区域之间在资金、信息、技术、劳务、商品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渗透，是形成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动因。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呈迅速发展态势。

世界经济联系主要是从工业化以后逐渐开展起来。此前，各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经济构成以自给经济为主，劳动地域分工不发达，区域间联系少，产业发展及布局处于分散状态，缺少聚集的动力。因此，规模较大的经济中心难以形成。

工业化社会形成后，由于近代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及其在某些有利地域空间的聚集，致使一批大的经济中心相继产生。当然，只有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产生聚集的效益才是良好的。因此，当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就会产生向外扩散，形成新的产业聚集。

由于不同地区间在发展生产与科技方面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基础与条件也可能发生变化。上述因素促使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各异：有的地区成为大区域乃至世界性的经济中心，而有的地区则仍处于落后状态。随着时间推移与外部条件改变，一些大区域乃至世界性经济中心又常发生转移的现象。

16世纪初以前，世界性经济中心主要还是分布于地中海沿岸；从16世纪开始向北海和大西洋东岸转移；到20世纪初又开始向北大西洋西岸转移；20世纪50年代之后，太平洋沿岸（尤其是亚太地区与太平洋西岸）经济发展开始加速，并延续至21世纪初。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发展，使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大为提高，一批具有大区域乃至世界性的经济中心也相继在太平洋沿岸涌现，使大西洋沿岸各大经济中心在

发展活力、经济效益以及经济增长率等方面显得逊色。

因太平洋地区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技术格局、贸易格局、文化格局等均在演变。其中，工业布局已经发生了巨变。横贯太平洋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及其所产生的凝聚力，已使太平洋沿岸产生一大批区域性乃至世界级的经济中心城市。

与此相对应，从不同历史时期世界主要大城市（通常是世界或大区域经济中心）的兴衰（亦可体现在世界重要城市排序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在地区转移上的概貌，如图表 8－2 所示：

图表 8－2　　　　不同历史时期世界重要城市及变化①

时期	世界重要城市
公元前	亚历山大、罗马、雅典、西安、瓦拉纳西、大马士革
1 世纪	罗马、亚历山大、西安、米兰、武汉、广州
7 世纪	西安、巴格达、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广州、开罗
10 世纪	巴格达、伊斯坦布尔、科尔多瓦、西安、杭州、大马士革
14 世纪	开罗、杭州、北京、广州、巴黎、伊斯坦布尔
15 世纪	威尼斯、那不勒斯、米兰、热那亚、巴黎、巴塞罗那
16 世纪	北京、伊斯坦布尔、杭州、那不勒斯、巴黎、开罗
1700 年	伊斯坦布尔、伦敦、巴黎、那不勒斯、里斯本、阿姆斯特丹
1750 年	北京、伊斯坦布尔、伦敦、巴黎、德里、开罗
1800 年	东京、北京、伦敦、马德拉斯、广州、巴黎
1850 年	伦敦、巴黎、维也纳、北京、加尔各答、费城
1900 年	伦敦、纽约、巴黎、柏林、曼彻斯特、芝加哥
1920 年	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芝加哥、曼彻斯特
1940 年	纽约、东京、伦敦、巴黎、莫斯科、芝加哥
1960 年	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
1970 年	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墨西哥城、上海
1981 年②	墨西哥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上海、东京、纽约
1991 年②	圣保罗、墨西哥城、上海、孟买、东京、汉城
2005 年（预计）	圣保罗、上海、墨西哥城、孟买、北京、达卡

①根据城市人口数等指标编制；②少数城市人口数前推或错后一年。

在 20 世纪中叶，世界重要城市还多分布于大西洋沿岸。1950 年，纽约是全球唯一人口超 1000 万的城市；1975 年，千万人口城市增至 5 个，其地理分布出现向亚太地区转移趋势，预计至 2005 年，千万人口城市激增至 19 个，大多集中分布于亚太地区，五大洲中亚洲名列第 1 位。

二、中国区域经济联系变化与经济中心转移，区域增长极

当前，在我国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省一级区域发挥的作用很明显，且近十多年来在全国经济运行中的功能有相当大的加强。但因资源、区位差异，以及对外开放时间上的先后、历史文化传统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异，使各省（区、市）之间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支柱产业的选择与培育，经济布局的展开等方面，渐渐拉开了距离，而且在20世纪80~90年代呈越拉越大之势。

据统计，1981年，工业地域分布的实力排序是：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四川、黑龙江、广东、湖北、河北、北京、浙江等省市。到200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长很多倍，而且在地域分布的格局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地域布局的顺序改变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辽宁、河南、河北、福建、湖北、天津等省市。

从上可见，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等省市已成为支撑中国内地工业发展的主要地域，并是中国内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从发展速度来看，以浙江、广东两省多年平均发展速度较快，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山东加速发展；从经济总量来看，80年代多数年份江苏均处于全国前列，到90年代，多数年份均不及广东，名列全国第二；从人均GDP和财政收入来看，则以上海最为突出，1997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2003年达到5500美元，率先进入国际中等收入地区行列。其余各省中则以浙江、广东、位居前列，江苏、山东次之；在总财力方面，广东、上海、山东排序靠前，江苏、浙江次之。

上述5省市在经济结构上总的特点是都呈现出向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转变的良性趋势，但表现各不相同。上海三产比重高，且增长迅速，近10年三产比重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至2000年已达到50%，在经济结构中首次充当主角。此外，广东在各省中位居前列，苏鲁浙略低一些。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首推上海，曾长期主导其经济发展的第二产业比重在1990~2000年期间持续下降，已退出经济结构中第一主角的地位。此外，上海、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至于所有制结构，由于个体和私营企业发展快，上述5省市总的特点是国有比重逐渐降低。

投资效果系数以山东、浙江、广东位居前列；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以上海遥遥领先，广东、江苏次之；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则以广东遥遥领先，上海、江苏次之。

三、经济热点地区及经济中心转移规律

经济热点地区系指区域经济发展处于活跃周期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常会出现热点地区青睐于不同区位的情况。即每当生产力发展出现重要突破时，都有某些处于有利区位的国家（地区）后来居上，实现经济的超常发展和布局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规律不仅在世界，也在中国区域经济联系变化与经济中心转移中充分表现出来。如图表8－

3、8－4所示。

图表8－3　　　亚洲经济发展地位及经济热点地区转移

年代＼指标	GDP占世界（%）	生产力布局及经济热点地区转移
1868[2]～1950	9	日本
1951～1980	–	日本、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
1981～2000	33	日本、中国、韩国、东盟
2001～2020（预测）	40	中国、日本、印度

①以表列最后一年的GDP为准；②明治维新开始年。

图表8－4　　　中国内地生产力布局及经济发展热点地区转移

年代	生产力布局及经济发展热点地区转移
1860[1]～1952	个别临海城市：上（海）青（岛）天（津）
1953～1963	内地（东北重工业基地，武汉、太原、包头等工业城市）
1964～1980	大三线（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线以西、乌鞘岭以东）
1981～1999	东部沿海地带（珠三角、长三角、闽东、环渤海）
2000～	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西南、西北、内蒙、广西）

①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

从世界生产力布局的变迁来看，亚洲国家GDP在1950年以前只占世界9%左右，到2000年已增至约33%，预计到2020年将进一步达到40%，包括中国、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在内的整个亚洲，正在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重组及其布局转移的地理重心。

近代史上有几次经济追赶、热点地区转移实例，其中：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美国追赶英国；20世纪60～80年代日本追赶美国；70～90年代韩国追赶西欧；还有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上述四次成功的经济追赶事例，就有三次发生在亚洲（东亚）。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被看成是真正的经济典范，但随后的10余年却陷入危机。在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亚洲经济的增长点是中国的上海或印度的班加罗尔，不再是日本的东京或其他城市。

再从中国生产力布局的变迁来看，在20世纪40年代末，全国工业的70%以上集中分布于被戏称为“上青天”（即上海、天津、青岛）的个别临海城市，而轻工业地理分布集中度更高。1949年全国500万棉纺锭中有80%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毛纺织业90%集中于上海、天津。

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布局的重心首次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重点建设东北重工业基地以及武汉、包头、太原等工业城市；60年代起又进行三线建设，在我国内陆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线铁路以西、乌鞘岭以东的“大三线”地区（包含13个省、自治区的全部或局部），历时十七年，建成2000多个企业，并配建了数十条铁路、公路

干线。

三线建设虽说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工业布局的客观规律，有许多教训，但也有若干成功事例。因此仍对我国工业布局向中西部转移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业布局的热点又回到了沿海，但在其前期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及南海沿岸，后期再推进到了浦东、环渤海等地。二十多年过去后，东部地带内部的转移循环日趋完成，又鉴于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日益拉大，新一轮区域性转移再度来临。

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在时隔二十多年之后，我国内地的中西部重新迎来开发热潮。不过此次的周期性开发从一开始就提倡在科学决策、区域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进行，不大可能重蹈当年大三线建设与布局在决策上过度匆忙、在指导思想和布局原则上又趋于极端的覆辙。另外，中西部的主要经济中心（如武汉、重庆、成都、长春、太原等）的辐射能力也已经是具备相当的规模、今非昔比了。

第九章 对外开放格局，国际产业转移

对外开放是针对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且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国情而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经历二十多年，迄今已在全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承受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开放型经济发展及其布局态势形成，并使我国经济发展加速与世界的融合，走上与经济全球化逐渐适应的地步。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主要是由国家投资的建设项目大小与多少所决定的话，那么开放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则反映出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和对内改革深度的差异。

第一节 沿海开放格局

一、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

1979～1980年，国家对地处沿海、区位有利的粤闽2省赋予特殊政策，包含在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经济管理上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相继建立起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

到1984年，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工业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对上述城市对外经贸活动的自主权、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老企业技术改造等给予政策倾斜，并在有条件的沿海开放城市开辟经济技术开发区。至此，我国内地沿海的开放从南至北形成主干线。

二、扩大沿海开放地区

1985年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上述地区工业加工能力较强，农产品商品率较高，城乡经济发展较协调。上述地区51个市、县的城区和经省（直辖市）批准的工业卫星镇基本上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以增强出口商品生产，并吸引外资，提高经济技术水平。到

1988年，再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至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其他沿海地区的一些市、县。随后，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

三、由点到面的开放格局

沿海地带实行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在内的沿海开放地带，计293个市、县，面积42.6万平方公里，人口2.8亿。

在此弧形带状区域内，利用其区位优势，并根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生产与投资转移的新情况，实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即以拓展出口贸易为导向，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积极参与国际商品交换。同时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加速经济发展。

至此，在我国内地沿海地区，已形成由点到面的开放格局。

第二节　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格局

一、沿江开放城市

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及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成为继沿海地带开放之后，又一个足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重要地带。

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包括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等6个重要的港口工业城市，同时批准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

二、沿边开放城镇

在我国长达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一带，有丰富的资源，而且由于多种民族聚居，与相邻15个周边国家的边民之间血缘相近，语言相通，历史上早已存在边境贸易与经济文化交往。上述条件，为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2年开放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塔城、博乐、凭祥、畹町、河口、瑞丽、东兴等13个陆地边境城镇，扩大发展边贸和对外经济合作权限；鼓励内地和外资企业到沿边开放城镇投资。同年，又批准举办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丹东、伊宁、博东、塔城、凭祥、东兴、瑞丽、畹町、河口等13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三、内陆开放城市

1992年，石家庄、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昆明、郑州、太原、西安、兰州、西宁、银川、贵阳、合肥、南昌、长沙、成都18个省会（自治区首府）成为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

第三节　开放地区经济发展及布局

一、开放地区经济发展与布局的基本态势

至21世纪初，在我国内地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和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由国家实行政策倾斜给以扶持的开放地区已增至1440个县级行政区域，广泛分布于“四沿”（沿海、沿江、沿边和内地沿交通干线）地带。

上述地区经济发展及其布局态势，在沿海开放地带范围内是以5个经济特区作为前沿，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主干，而包括260个市、县在内的沿海开放区则是其腹地。利用其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工农业发展基础，以及科研文教较发达、经济技术实力较强等有利因素，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发挥辐射作用，带动中西部经济振兴。

在沿江开放地带，则是利用长江黄金水道通江达海的有利条件和良好区位因素，发挥经济技术水平较高的优势，依托长江两岸数十个大、中城市，以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以及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扩展外商投资领域，使经济发展加快，布局渐次展开。

在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趋势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向纵深推进，以边境开放城镇为窗口，边境市、县为前沿，省会（自治区首府）及中心城市为依托，面向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多层次的沿边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由于初步形成了上述对外开放格局，促使我国经济正在与世界经济融会一体。据统计，我国内地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由开放前（1978年）的10%上升到目前的59.7%（2002年），经济活动全球化指数也相应上升。

到2004年3月，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逾47万家，合同利用外资977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155亿美元。外商投资的部门和领域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以IT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服务业和汽车等行业，成为当前外商投资热点，只是地域差异在1999～2002年间缩小甚微，仍然十分明显。如图表9－1所示：

图表 9－1　　对外开放程度区域差异（至 2001 年）

地域		气商投资总额（占全国%）	外方注册资金（占全国%）	三资及股份企业户数（占全国%）
较高省区	广东	25.3	26.8	23.3
	上海	12.9	12.5	8.9
	江苏	10.5	10.1	9.6
	辽宁	7.3	6.8	6.5
	福建	5.9	6.9	7.6
	北京	4.9	4.6	4.4
	山东	4.8	4.3	6.8
	天津	3.9	4.1	4.7
	浙江	3.9	3.4	5.5
较低省区	贵州	0.2	0.2	0.4
	宁夏	0.1	0.1	0.2
	新疆	0.1	0.1	0.2
	青海	0.1	0.1	0.1
	西藏	0.03	0.03	0.04

据《2001 年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摘编。

二、经济全球化及其区域影响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随着各种跨国公司投资力度增强及其产销活动涵盖面扩大，使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对很多国家和地区产生深刻影响。正是此时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由于区位和地理条件差异及开放时间早晚、开放程度不同，造成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影响在我国各地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从经济全球化及其区域影响情况来看，差异也大得惊人：粤沪津等地外贸占 GDP 比重分别为 1.5971、1.1128、0.9318，比黔青高出 10～30 倍；苏闽粤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 0.3632、0.3291、0.3101，比青黔高 15～50 倍；由多种指标综合计算的经济活动全球化水平指数，粤沪津苏闽分别为 0.9536、0.6461、0.5589、0.4713、0.4324，而黔青仅分别为 0.0374。经济活动全球化水平指数及区域差异，如图表 9：2 所示：

图表 9－2　经济活动全球化水平指数及其区域差异（2002 年）

地域＼项目			外贸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经济活动全球化水平指数
中国内地平均值			0.5075	0.1010	0.3043
比较省区	较高	广东	1.5971	0.3101	0.9536
		上海	1.1128	0.1793	0.6461
		天津	0.9318	0.1859	0.5589
		江苏	0.5793	0.3632	0.4713
		福建	0.5357	0.3291	0.4324
		北京	0.7063	0.0848	0.3956
	较低	贵州	0.0687	0.0060	0.0374
		青海	0.0558	0.0190	0.0374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 2003》资料计算编制。

三、国际产业转移及其部门结构与地域特征

世界发达国家产能的向外转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全球共享型生产的规模，到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业已达到相当于世界制造业贸易 30%的规模（约 8000 亿美元）。

国际产业地域转移，在部门结构上，由以前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服装、鞋、金属制品、初级电子组装等）为主向电子、化学、运输工具、机械等中间产品与零部件的生产活动转化；非股权参与的外包形式引人注目，跨国公司将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研发、设计分包给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以达到全球地域范围内利用最优资源的目的；生产能力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以国际生产的网络或体系为基础，形成以领导企业为核心、全球地域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企业组织框架；生产能力转移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提供了以现有的能力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的可能，还有利于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快速成长，并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但是，被动地接受这种产能转移，容易变成“出口飞地”，失去自身产业发展动力。而且生产能力转移的地理分布很不平衡，如 2000 年接受国家的前 5 国占 78%（中国占 28%）。另据分析，中国内地出口增长的 65%来自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伙伴的外包。因此，必须使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转移同自身的产业发展相结合。

四、国际资本流量及流动的地域趋势

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量，1980～2000 年期间逐年上升，从 549 亿美元猛增至 14919 亿美元，此后因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出现大幅下降趋势，2002 年跌至 5340 亿美元。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放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国际贸易增速减缓、跨国公司并购减少等。全球并购活动的衰退，使美国在2002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剧减，让位于中国而退居第2位。

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地域性特征来看，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的国际资本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越南等）。从洲际地域来看，流入亚洲增加，主要是那些市场容量和潜在需求较大的经济体。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因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来看，在21世纪初的前几年中，国际资本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和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2003年的国际调查显示，外国公司投资居前列的国家是：中国、美国、墨西哥、波兰、俄罗斯、印度、英国、德国、巴西。其中，中国连续两年超越美国名列第1位，墨西哥、波兰取代英、德分列第3位、第4位，印度从2002年居第15位升至第6位，泰国、韩国、越南的排位也都有攀升，而在发达国家中，继美、英从第1位、第3位退至第2位、第7位，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则已从前十名中退出，它们均为发达国家。跨境投资的上述变化趋势，表明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地域特征十分清晰。

五、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特征、投资方式、领域、地域变化

至2003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不同的特点：（1）投资定位升级，一些公司升格为亚太地区总部，并设地区研发中心、管理营运中心；（2）从新建投资转向并购投资，从合资转向独资；（3）由点状的地理分布转向系统的区域布局，并注重产业链的整体构建，即从单个项目投资转向产业链投资。有的还实现了纵向一体化，向企业的上、下游延伸，或横向一体化，向相关服务领域拓展。

据统计，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以前仅为5%，每年约20亿美元，从2002年起跨国公司收购兼并中国企业成为热点；另外，跨国公司以前多采用合作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现在随着中国外资政策松动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验积累，改而选择独资或合资控股方式。2002年新增外资企业中有65%以上为独资，而且有的跨国公司采取"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共同投资"的方式。

在投资领域方面，有较多的跨国公司重点投资生产服务业，逐步进入中国的服务业领域，并使中国成为其地区的管理营运中心。

投资地域方面，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重点地域逐渐从珠三角地区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并呈集中化布局态势。此外，以京津为主的环渤海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也开始受到重视。

技术使用方面，世界500强在华企业采用母公司先进技术比重，1995年约为14%，2001年增至43%，2002年接近80%。

上述变化趋势表明，新一轮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及产业布局调整对我国有利，应充分

利用这一机遇。

六、区域开放模式及其利弊

我国内地的区域开放模式有自己的特点，国际上一些工业化先行国家有的是国内区域间开放先于对外开放（如英国模式）；有的则是对外开放先于区际开放（如美国模式），而在我国内地则是两个层面的开放，即区际开放、国际开放同时进行，虽前者（区际开放）与国际通行模式相比有所不同，区际贸易额不大，但确有一定程度的区际分工；而后者严格受制于政府的开放战略与政策，国际贸易也几乎全由国家垄断，并在相当长时间内，许多地方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利用外资等，却相对忽视了对内开放、区际贸易和利用内资（上述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

尽管如此，我国内地的区域开放仍在较短时间内带来了明显的效益。由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以及外贸增长迅速，使全国经济在二十多年内基本保持快速增长，许多条件有利地区得以迅速脱贫，进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提高，进出口贸易激增，人均所得成倍增加，并带动整个国家实力上升。当然，也出现了国内区际开放进展迟缓，区际贸易未曾达到应有水平，没能导致应有的区域专业化分工。伴随而至的还有区域产业发展趋同，面向出口的低附加值工业区重复建设及不合理布局等问题。

七、大区域布局失衡，“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地域多元化

在对外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均衡发展战略，强调大区域（如全国分成6、7个大的经济协作区）各自建立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从而忽视了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近二十多年来，在一些条件有利的大区和省区，重视利用政策与区位优势、历史文化因素等，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并逐渐形成新的区域产业结构格局。

对境外投资商而言，他们对投资环境的要求通常都是较高的，对于投资地区的选择以及项目布点，首先考虑的是回报率的大小。为此，他们总是选择投资区位因素有利、而软环境又较理想之地，这些都是造成外向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内地沿海的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9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6.85%，辽阔的西部地区只占2.73%；到2002年，西部利用外资比重虽略有增长，也只占3.99%；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亦大致如此。

东西部差距过大，已经影响到经济发展全局失衡。如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人均GDP最少的4个省区是西藏、贵州、广西、云南、东、西部都有；但到90年代后期，人均GDP最少的4个省区改变为贵州、西藏、甘肃、陕西，全都分布于西部，而且原来经济已有较大发展的陕西也加入到相对落后的行列。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针对上述情况，国家已采取一些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199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产业政策向西倾斜的战略，重点在产业布局、财政信贷、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等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

"九五"计划利用外资安排中，已明确优先安排中西部地区的项目，国务院还决定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由1000万美元以下扩大到3000万美元以下。

到1999年，在实行上述措施但收效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国家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力求举国动员促进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以便从整体上缓解经济发展中因大区域布局失衡而对全局不利的状况，并遏制由于不当的开发和发展方式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有利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在1999～2000年，根据"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区相继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并相应地在生产力战略布局、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源、水利等）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以及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面向国内外市场，发展特色经济，培育优势产业等方面部署和实施西部开发。

从多年以来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成效来看，不仅对西部也对中部的加快发展有利。由此可见，经济地域多元化对全国经济发展和合理布局的重要性。这绝非重拾昔日低水平"均衡布局"的理论，而是各地在发展特色经济的基础上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四节　各类开发区建设和发展

一、以"产业集聚"为目的的特定地理区域，中、美开发区比较

开发区是由上级政府批准划出的特定区域，经资金投入和政策引导营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

产业集聚则是指特定领域内的关连企业、专业化供给企业、服务机构等经科学规划与论证而有序地集中布置于特定的地理区域。

经历二十年的发展，在中国内地有一部分开发区已成为吸纳国际产业资本、技术和企业的重要载体，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主要基地，促进了所在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美国一些城市设立的开发区通常有两种形式：工业开发区；科研开发区。前者多于20世纪80～90年代设立，通常占地不多，布局多沿城市间的高速公路。这些开发区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当地政府的经济部或地方经济发展公司甚至商会管理。开发区内产业布局较集中，企业间关联性较强或协作关系密切。科研开发区多为高校或围绕高校而设立。如2000年在伊利诺斯州东部尚佩恩、厄巴纳2市设立的科研开发区，依托附近的伊利诺斯大学，分为一区两园，州政府建设的孵化器设施先进，园区内产业结构以IT和机械产业为主。该园区发展迅速，已有30多家企业入园，在美国科研园区中有一定影响。地处密西西比河畔、一向是美国中西部水陆交通要冲的圣路易斯，利用其有利区位与城市发展条件，由区域商会出面，吸引有实力的科学研发机构投入巨资，通

过发展“簇群经济”的发展与布局模式，正在建设成为美国的植物和生命科学中心，还将促成更多外来风险投资注入，形成横跨密苏里、伊利诺斯两州的“生命科学产业带”。

二、各类开发区发展及地理分布

我国从1979年设经济特区、1984年设立第一个开发区，到2003年，各类国家级开发区先后设立139个。国家级以下各级开发区则有多次大量设置的热潮，尤其是1992～1993年和21世纪初年，相继出现“开发区热”、“园区热”等。经整顿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类开发区留存4210个，但到2004年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占地3.75万平方公里，已撤销4735个。

各地盲目圈地设立开发区、园区，占用大量土地，严重浪费资源，尤以东部缺少土地的省最明显，如山东设开发区947个，浙江758个，江苏702个，天津143个，一度形成“圈地”之风。2003年起上述各省市分别撤并整合各类开发区695个、624个、544个、100个，使违法圈地现象初步遏制。中西部亦有类似现象，如中部地区某省，在近年兴起的“园区热”中，仅县级以上的工业园区即有118个；有些省会城市或规模稍大一些的城市，通常有5～6个开发区。由此可见，开发区泛滥及盲目扩张，不仅在东部，中西部也有。

我国的各类开发区，在当初设立时同经济特区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是一种地域性、区位价值和政策观念极强的地域经济实体，在政策法律环境大体相当，或者只是略有差异的情况下，其对地域和区位因素的考虑与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仅就国家级开发区的情况来看，其地域布局如图表9－3、9－4所示：

图表9－3　　国家级开发区地域布局之一

特区、开发区 / 经济地带	经济特区①	国家级开发区					
		小计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保税区	旅游度假区	边境经济合作区
东部	6	85	28	29	15	10	3
中部	0	26	8	14	0	0	4
西部	0	28	11	10	0	1	6
全国合计	6	139	47	53	15	11	13

①包含带有经济特区性质的上海浦东新区。

国家级开发区地域布局之二

特区、开发区 / 经济地带	经济特区①	国家级开发区					
		小计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保税区	旅游度假区	边境经济合作区
华东	2	48	21	15	6	6	0
中南	4	34	7	15	7	3	2
东北	0	18	5	7	1	1	4
华北	0	12	4	6	1	0	1
西南	0	14	4	5	0	1	3
西北	0	13	6	5	0	0	3
全国合计	6	139	47	53	15	11	13

①包含带有经济特区性质的上海浦东新区。

由于多种内部、外部条件的差异，我国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发展和布局，有的已达到或超过预定规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有的已建立起一定的产业基础，形成集聚雏形；有的仍停滞于初始发展阶段或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开发区建设、发展和布局的主要特点

设置开发区的决定是在经济特区取得初步经验基础上，于 1984 年作出的。而特区是选择少数在地理位置或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条件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沿海城市或边境城镇，由国家决定划出一定地域范围，设置明显的、有形的界限，在此区域内，对外经济活动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以吸引主要来自国外、海外的投资者。

各类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投资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主要是指在我国沿海、沿江、内陆和沿边的开放城镇中，经国家批准划出一定地域范围，采取类似经济特区的某些优惠政策、措施，以便依托所在城市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智力资源，吸引来自国外、沿海的先进科技、新兴设备、新工艺流程以及先进管理经验，集中兴办三资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增加出口创汇能力，并向内地进行技术和管理上的辐射。同经济特区相比，所不同的是：开发区地域范围通常要小得多；而且开发区本身不是行政单位，不具有行政管理权限，只是一个地域经济实体，通常只负责土地开发，引进项目资金，为投资方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等。

具体地说，各类开发区建设、发展和布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建设与发展资金主要来自外部；（2）区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3）经济活动及其运行机制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4）产品以外销为主；（5）与内地保持密切联系，既依托内地又服务于内地。

四、开发区建设与布局的政策和措施

（一）区位因素、母城条件充分论证

开发区建设与布局迄今存在一系列问题，经验与教训并存。主要是各种开发区“散、多、小”，彼此过度竞争，为吸引外资，多偏重于降低地价、税费，忽视综合投资环境改善。

对于最重要的区位因素与母城条件，在开发区选址、规划中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论证。母城同开发区之间的相互依托关系至关重要，母城对开发区所能提供的依托受两大因素制约：(1) 服务半径；(2) 功能容量。开发区选址如离城区过远，母城的社会服务功能就难以受益；反之，如母城经济技术水平有限，财力弱，基础设施缺乏，社会服务功能容量小，即使是置身于开发区近旁，也难以提供开发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当然，这并非说开发区本身不需要一定的功能配套，而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开发区与母城相互依托的关系，不少开发区选址不当，发展迟缓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创造投资环境

1. 投资环境是开发区的竞争力所在。

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主要指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城市基础设施等。如果再细化，则包括：经济地理位置、影响经济发展的区位因素、地貌与气候条件、地质基础、海岸（河岸）特征、自然灾害强度及发生频率；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讯、排污、排洪、平整土地等问题配套解决。后者则主要是指对投资者的优惠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情况，经营管理水平，办事机构效能，职员与工人的素质等。

2. 投资商重视市场辐射力与制度环境。

一般说来，硬环境，即物质环境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是，软环境，即人际环境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可解决的。有不少开发区，甚至不少地方的领导认为，吸引外资关键在于优惠政策，因而在地价、税费、审批手续等方面竞相提供种种过头的优惠，以讨好外商。但有实力的投资商（尤为跨国公司）所关注的不是眼前小利，而是长远利益。据 1998 年调查，外商最关注的是市场辐射力大小和投资成功率、法律环境、员工素质等。有些地方实行过分的优惠政策，反而招致外商的疑惑。

至 21 世纪初，“配套环境”越来越被投资商所钟爱。“配套环境”指从购地、拆迁所需时间、吃住生活到人员素质再到国际信息流通等条件，还有投资地政府行政效率与规范化程度，投资地市场辐射力、国际机场远近、航班多寡、国际银行开业状况等。

（三）政策引导，不同时期确定重点投资地域

投资地域与投资环境有关，投资地域的形成，也是在一定政策条件下双向选择的结果。其中，投资环境（重点是软环境）优劣常起关键作用。改革开放后前十五年，重点投资地域过分集中东部沿海地带；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注意通过政策引导使主投资区域逐渐向中、西部分散与转移。

据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调查，以对“赴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为题，主要投资行业涉及各投资区域内6个大项：（1）自然环境；（2）基础设施建设；（3）公共设施；（4）社会环境；（5）法政环境；（6）经济环境。结果从1189份有效问卷中筛选出最满意的投资区域：A级，苏州、嘉定、余姚、萧山、杭州、奉化、扬州；B级，宁波、吴江、武汉、无锡、昆山、青岛、天津、北京、上海、大连。

从其地域归属可见，上述A级地域全集中于长江三角洲，B级地域多集中于东部沿海，仅武汉属中部地带。这在客观上加据了经济发展及其布局的地域分化。

另据2002年公布的台湾电子工业同业会对祖国大陆城市投资环境评估，采样的地域涵盖内地22省、5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范围内的88个城市（或市辖区），受到推荐的前十位的投资地是：昆山、苏州市区、珠海、中山、扬州、杭州、萧山、奉化、吴江、上海市郊、青岛。上述地域主要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从21世纪初开始，东部一些城市用地紧缺等原因，投资环境满意率下降。同时，中、西部某些地方却有一些有利条件可供利用，加之“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引导因素，促使中国内地主要投资区域有从东部开始逐渐西移的趋向。

（四）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体制法规和运作方式

据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1999年组织的“外国投资者看法调查”，在评价中国的投资和经营整体环境时，最满意的因素依次为：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生活质量和总体经营成本；最不满意的因素包括贪污腐败、环境质量、法规制度透明度和连续性等。

上述调查表明，我国内地投资硬环境经过连续多年的改善已变得较好，但软环境却仍有待改善。而软环境好坏，则常是跨国公司考虑是否在一个地区投资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资环境中的硬件设施，在资金雄厚的国际资本集团面前，可通过集约投资来改善；而体制法规则是东道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不是跨国公司集约投资所能解决的。因此，出于对资金风险的控制，跨国公司对软环境特别敏感。

加入WTO以后，我国各地相继废止一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但非制度性“梗阻”依然存在。

（五）选择适宜的土地开发与转让政策和方式

由于影响土地开发与转让效益因素甚多，且影响程度因时因地而异，故开发利用与转让政策及具体方式不易准确把握，应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制宜解决。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我国各级各类开发区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曾广泛出现“筑巢引凤”、“引凤筑巢”以及“借巢引凤”等方式，曾经都有一些成功之处。但是，一旦盲目推广便走向反面，教训很多。如盲目圈地，甚至挪用资金筑巢，而引来的凤却寥寥无几，得不偿失，而由此造成一些城市大量土地闲置和撂荒；引凤筑巢方式在不少地方也运用不当，造成批地过多。

有的地方则提出“以地生财”的口号，借招商之名，成片出让土地，预支土地。如某市在多年前将市政府前一块规划的绿地出让给外商搞工业，数年后又多花数倍价钱从

开发商手中把这块地买回来，这一出一进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还有一些城市在开发热衷盲目设立开发区后，未经规划即将城市辖区内的土地成片廉价出让，过多过早贱卖，后来在规划区范围内几乎已没有未出让的建设用地，甚至连建学校、教师住宅用地、公益建设用地等，也只能再从开发商手中用高价购回。

为吸引投资，竞相压价，亏本协议出让工业用地，人为造成用地的买方市场，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仅破坏了土地市场秩序，而且也使国有、集体土地资产严重流失。至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一些地方（尤其东部城市）相继发现：开发区土地过多过早贱卖，损失太大，有的城市已出现工业用地告急，土地资源紧缺加剧。有的城市2010年的建设用地指标，在2001年即已用完。

对此，有的城市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成为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创新，并迅即引发连锁反应，到2003年已推广到全国1000多个城市（镇）。另外，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推动了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落实。据统计，全国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面积占有偿用地的比例，往年仅为2%～5%，2002年增至15%，2003年增至31%。

（六）基础设施先行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种状况能否改善，是经济发展和布局改善的关键因素之一。为此，一些开发区很重视并适度超前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据统计，我国现有4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与规模在各自所在城市几乎都居领先的地位。由于有高额资金的持续投入，使这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得以吸引较多的外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七）注重人员素质与科教水平

多年以来，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已使地域之间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硬环境的差距大为缩小。在此情况下，人员素质、科教水平等软环境因素对吸引内外资的重要性增加。据2000年中国内地各省级行政区域有关投资环境的多项指标的分值：软环境水平最佳地区（上海）同最差地区的“综合分值”，差距为0.6422；硬环境水平最佳地区（北京）同最差地区的“综合分值”，差距0.4695。前者是后者的1.37倍，说明在近年来我国各地（包含东、中、西部）硬环境水平差距日益缩小，而软环境水平（如劳动力素质、人才结构、科教水平等）差距仍较明显，仍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中西部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更具体的政策引导。

第十章　华东地区经济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精华所在的华东地区，土地面积只占全国8.3%，在六大地区中居倒数第1位；人口占全国29%，经济总量占全国42%，均超过其他地区而居首位。

本区自然条件有利，近代工业发展较早，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农业集约化程度和外向度均较高；还有全国最稠密的现代综合运输网络；城市化进展快，城市竞争力指数较高。

从20世纪80年代起，本区经济总量、人均GDP等均已占全国之冠，在各地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数十年来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发展，以及布局的高密度集聚（如长三角、太湖流域等），已造成生态退化，陆地与海洋环境受损。为此，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并引导社会形态向高层次发展，促进高质量的城市化与面向全社会的生态环境系统建设。

第一节　受惠于自然

一、气候条件与地貌特征对经济发展有利，但洪涝灾害频繁

华东地域轮廓南北狭长，由鲁北至闽南，从北纬38度到北回归线，南北直线距离长达2000公里，跨越纬度14度，从暖温带到亚热带气候兼而有之，各地气候条件和水热资源差异颇大，形成了明显的地带性。这为不同农作物与经济林木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本区农业多样性发展，对轻纺工业发展亦有利。

从地貌特征来看，本区多数地方海拔低，地表起伏小，尤其是区内北部、中部，地处黄淮平原，地形平坦，对实现机耕有利，于现代工业布局及交通运输网络系统的布置亦很方便。

缺点是洪涝灾害频繁，有时出现大灾，使地域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尤以淮河、长江及太湖流域，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曾分别受大洪水袭击。

淮河流域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影响它的天气系统众多，降水年际变化大，地区分布不均，暴雨经常发生；淮河水系呈扇形羽状不对称分布，每降暴雨，广阔地域的地表水迅即汇集于主河道。加之淮河落差大，上游落差近占90%，洪水汇流至位于本区境

内的中下游一带，下泄缓慢，往往形成严重涝灾。

从历史因素来看，黄河夺淮数百年，淤塞中下游河道，并使淮河失去入海尾闾，加重淮河水患。同时，不当的经济活动，地域开发强度过高，有些地方已超出了环境的承受力。淮河流域人口密度大（615 人/平方公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近二十年内幅度大，工业布局、城市布局不够合理，未曾与治水防灾形成很好的结合，也是洪涝加剧的一个原因。

长江中下游平原由长江及两岸的支流冲积而成，跨中南、华东，包括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皖中平原、长江三角洲四个部分，其中后三个部分均在本区范围内，它们地势低平，海拔高度约为 50 米，河道弯曲，湖泊密布，港汊纵横，一向有“水乡泽国”之称，由于水、热、土壤条件都比较好，交通便利，开发历史悠久，为著名的农业生产基地。

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北，各有一些丘陵、盆地和山地分布，其高度多在海拔 500 米以下，对交通的阻碍作用小，已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如北面的山东丘陵，中部的淮阳丘陵，南部的赣东丘陵、江南丘陵、皖南丘陵、宁镇丘陵和浙闽丘陵，或富于农、矿资源，或有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富渔盐和海运之利，或有多种暖温带和亚热带经济林木以及便于开发的水利资源等，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

地下资源也较丰富。鲁西北的石油、天然气，山东丘陵、鲁南和皖西一带的黄金、煤、铁资源，苏北和皖北的煤田，江西、皖南、闽浙一带的有色金属，都具有开发价值，有的还具有全国或世界意义（如江西的钨）。

二、受惠于海洋，却污染海域

华东有漫长的海岸线，多种多样的海洋资源。从我国沿海四大地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来看，本区享有得天独厚之利，从北至南分别濒临渤海、黄海和东海，同南海也近在咫尺。其中，山东在渤海、黄海的大陆海岸线长 3024 公里，江苏在黄海之滨的大陆海岸线长 1000 多公里，上海、浙江、福建临东海之滨的大陆海岸线分别长 200、2254、3324 公里，合计全区大陆海岸线总长近万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一半以上。在浙江、福建和山东海岸以外，还有数千个岛屿和数百个天然港湾，仅福建即有 1400 多个岛屿和 125 个港湾，其中东山湾、漳州港、厦门港、湄州湾、兴化湾等 8 个深水港湾可建 5 万吨以上深水泊位，对发展海运，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

在上述漫长的海岸线上，除一小部分为沙质海岸以外，大部分皆为岩岸，岸线曲折，多天然港湾，且岸外通常有岛屿作天然屏障，对发展海上运输、捕捞、海水养殖、开发多种海洋资源（如晒盐、潮汐发电等）和发展海上旅游事业十分有利。此外，海洋气流对全区多数地方都有一种润泽作用，给陆地气候以良好调节，使自然环境更有利于人类。实际上，本区在较小的面积上，集中了全国最多的人口，与上述海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本区各地比较均匀地濒临海洋或靠近海洋，也带来一些自然灾害（如

台风等)，但毕竟是次要的。

从1984年开始，中国对沿海14个城市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这14个城市有8个在华东，加上原已对外开放的厦门经济特区，形成了一股加速开发本区沿海经济的优势。此后，本区濒临海洋的5省、市相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正是上述5省、市所濒临的海域受到了严重污染。据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浙沪近海已无一类海水（杭州湾海水已是劣四类水质)，海水富营养化逐年加剧，使赤潮进入全面发病期。2004年浙江海域发生特大赤潮灾害，面积广达1万平方公里，且含有毒素成分，其水产品对人有害。另外，长江、黄浦江、钱塘江、甬江、曹娥江等著名河流入海时均有大量污物；5省市的水产养殖也导致海水氮磷含量严重超标。

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大地受惠于海洋，却又严重地污染了海域。不仅使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干净海水浴场减少，而且也将影响到不少产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我国近代工业兴起后，华东临海靠江一带，是工业布局相对集中之地。到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南京、杭州以及青岛等地成为当时我国的轻纺工业中心，安徽、江西的矿产，也开始得到开发。50年代以来，国家利用原有基础，恢复、改造和新建，一方面使上海、江苏、山东的原有企业加强协作配套，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工业落后的安徽、江西、福建、浙江进行了必要的新建，使其工业得以发展。

据2002年统计，华东地区工业销售产值占全国的44.9%，远远超过其他各大区，居全国首位。这说明，虽然工业布局向内地移动，内地不断建设新工业基地，但华东沿海原有的老工业基础，仍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发展，并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在部门结构上，轻、重工业尚能协调发展；从轻、重工业部门产值比重来看，机械、纺织、化工、食品居前四位，以下为：冶金、建材、造纸、石油、电力、皮革等，有数十种主要工业产品占全国首位；在地域结构上，则以上海、苏南、浙北和山东半岛工业布局最集中。

一、具有全国专门化意义的机械电子工业

华东地区的机械电子工业具有全国专门化意义，布局主要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等地，所生产的机械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有轿车、机床、远洋散装货轮、全集装箱船、大型高炉和转炉、石油钻机、大型发电机组和核电站设备、合成氨设备、轻工机械、纺织机械、内燃机、通信设备等。IT产业已形成具有规模效益的上下游产业链。

机械电子工业中心首推上海，其次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浙江

的杭州、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济南、淄博、潍坊；安徽合肥、马鞍山；福建福州、厦门；江西南昌等。

从21世纪初起，江苏长江沿岸一带发展成为IT制造基地和IT产品集散地：以无锡为中心建立微电子产业基地，形成微电子走廊；以昆山、吴江为中心形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以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为主轴，形成软件产业带。

二、全国最大的化工生产区

本区化学工业主要是在近五十年发展起来，现在是我国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地区。在基本化工方面，硫酸占全国三分之一，烧碱占全国五分之二，基本化工企业主要分布于江苏、山东，其中南京是全国硫酸生产基地；鲁北莱州湾畔形成了亚洲最大的纯碱生产基地。

近三十年来，因东北大庆原油和本区胜利原油源源运到，加上进口原油，推动了炼油和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出现了南京、上海、镇海、淄博、仪征、安庆等石油化工和化纤工业中心。在南京长江两岸，有2座具有全国意义的石油化工企业：金陵石化（位于南京东北部，长江南岸）、扬子石化（位于长江北岸）。前者是炼油、有机化工原料、化肥、洗涤剂、特种油品、合成塑料等的全国性生产基地之，；后者则是全国最大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生产基地之一。此外，在南京与扬州之间的仪征——鲁宁输油管的终点，还建有我国内地最大的化学纤维和化纤原料生产基地——“仪征化纤”。

仪征化纤占地9.6平方公里，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至2003年已建成六个主体生产厂，形成年产45万吨PTA（聚酯生产主要原料）、111万吨聚酯聚合能力、65万吨涤纶纺丝能力，涤纶加工丝9万吨，列世界聚酯生产企业第5位。

南京化学工业园位于南京六合区，距南京市区30公里，南依长江，水源充沛，交通方便。园区西与“南化”相连，东与仪征化纤相接，南与金陵石化隔江相望，规划面积45平方公里，包括长芦、玉带2个片区。其中，长芦片区26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石油和天然气化工、有机化工原料、精细化工产品等；玉带片区19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石化上游产品与化工物流。园区周边地区化工科技实力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区内的西坝港还有10公里长江岸线，临近深水区，可建多座深水码头，为布置大运输、大用水的重化工提供良好载体。

除南京及隔江相望的仪征以外，上海已成为石化、乙烯、化纤、氯碱等生产基地。到2003年，上海原油加工量增至2500万吨，居全国之首。地处金山的上海化工区90万吨“乙烯裂解”是目前世界单线产能最大的乙烯装置之一；浙江“镇海炼化”是千万吨级炼厂、中东原油加工基地，以炼油为主业，原油综合加工能力1200万吨，并有60万吨/年以上的尿素生产能力；山东“齐鲁石化”完成改扩建后，原油综合加工能力为1000万吨，齐鲁乙烯二轮改造2004年竣工后，乙烯产能扩大至72万吨/年，合成树脂专用料产能扩大至46万吨/年。安庆则是炼油和化肥生产基地。

湄州湾沿岸一带，正在崛起为我国最大的石化基地之一。由福建炼化、埃克森美

孚、沙特阿美海外公司三大企业共同组成的福建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投资数十亿美元，使其年产能力从400万吨提高到1200万吨，并新建一座年产80万吨乙烯的工厂。最终使这里成为世界级的炼油化工基地，并拥有庞大的营销网络。

三、重点开发的石油、煤炭和电力工业

华东区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地区，曾长期面临能源短缺和原料供应不足等困难，阻碍本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二十年来，经过对本区石油、煤炭资源的重点开发，能源短缺状况有了一定的缓和。

地处渤海之滨、黄河三角洲上的胜利油田，规模仅次于大庆油田，居全国第2位。这里油田面积大，但原油含硫高，为高硫油。20世纪80年代起，该油田以年均增长500万吨扩大开采规模，1992年达3500万吨，后因资源不足产量下降1100万吨。近年探明“隐蔽油气藏”石油地质储量6.5亿吨，原油产量重又上升到年产3000万吨上下。

至2003年，胜利油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43亿吨，天然气230亿立方米，累计已生产原油8亿吨，各种利税（费）1307亿元。由于胜利油田的大规模开发，在昔日芦苇丛生的黄河三角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石油城——东营市。近年胜利油田采区向海上发展，成为陆海兼顾的油田。

华东经济对煤需求大，区内产煤供不应求。一方面将大量“北煤”南运，西煤东运；另一方面扩大本区采煤规模。较大的煤矿多集中于山东、安徽，2002年两省产煤分别为1.31亿吨、6100万吨，在本区各省中居第1位、第2位。

经营煤炭采选业的重要矿务局（或煤矿）有：淮北、淮南、皖北（以上在安徽）、兖州、新汶、枣庄、滕州、肥城、淄博、龙口、坊子（以上在山东）、徐州、长广（以上在江苏北部及苏浙边界）、萍乡（在江西）。

安徽的两淮煤田是华东规模大、开发速度快的煤炭基地，地质储量约200亿吨，蕴藏煤质较好的主焦煤和配焦煤，煤田地质情况适于机械化开采，加上邻近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而又能源短缺地区，交通运输方便，附近水源条件也比较好，能满足建洗煤厂和坑口电站用水的需要。这样，从两淮煤田向外送煤、送电均可。年产煤4000万吨。在建的淮南煤电基地至2020年火电规模达2000万千瓦，形成1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主供沪苏浙，成为“华东动力之乡”。

山东兖州煤矿，因靠近沿海煤炭消费集中区，且直通出口港，有较好的地缘优势，故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获迅速发展，形成5000万吨/年生产经营规模。2002年出口煤1450万吨，其中出口日本1258万吨，占日本从中国进口煤总量的40%；兖州以煤为主，带动煤化工、电、建材等综合发展。

在电力工业方面，2002年全区发电量为4972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30.1%，远远超过其他各区，居全国首位。电力结构火电占92%，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上海、安徽等省、市；水电占8%，集中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等省，这一地区建有一批大、中型水电站；浙江新安江水电站装机容量为66万千瓦，建成投产之初曾是全国

第一大水电站；福建水口电站（140万千瓦）是目前全区第一大水电站。20世纪90年代建设的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80万千瓦，是我国目前已投产容量最大、水头最高的纯抽水蓄能电站。

为缓解供电不足，先后兴建大批火电骨干企业，包括早年兴建的镇江谏壁电厂（162.5万千瓦）等。华能德州电厂装机252万千瓦，是已建成的全国大火电之一；上海宝山区石洞口电厂，总装机300万千瓦；在建的山东石横电厂总装机达322万千瓦；华能浙江玉环电厂一期（200万千瓦）采用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百万千瓦级）、运行参数最高的燃煤发电机组；华电国际邹县电厂再安装两台百万千瓦级机组后，总装机将达到454万千瓦，为全国最大火电厂。

华东电网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4省、市，拥有5000万千瓦以上的装机容量。电网北部的淮南、徐州一带，是火力发电站集中的地区。为适应煤电基地建设和长距离送电要求，20世纪80年代建成淮南——上海、徐州——上海两条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线路，为长江三角洲一带工业分布集中地区送去了大量电力，同时与南方的新安江、富春江等水电站互相调剂，又在湖北葛洲坝和上海之间建设中国第一条500千伏输电线路，至21世纪初又建成三峡至华东的输电线路。但预计至2010年，华东地区仍缺电2820万千瓦。为此，从2003年起由“华能”、“中电投”、“淮南矿业”联合开发建设淮南煤电基地。此举既可满足华东经济的电力需求，减轻煤炭运输中对环境的污染，亦可加快安徽经济发展，缩小与华东整体水平的差距。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要，本区在大力开发煤炭资源，并就地转换成电力的同时，又在开发新能源——核能、潮汐能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于1985年初动工兴建。该电站位于浙江省杭州湾北岸海盐县境内，一期装机容量30万千瓦，随后建设的秦山二、三期工程，核电装机容量分别达120万千瓦、140万千瓦。秦山核电基地的建设，对缓和沪宁杭地区电力紧张局面有利。此外，在浙江温岭市，已建成我国规模最大的江厦潮汐电站，虽然所发出的电力有限（每年1000万千瓦时），但它为大规模开发本区杭州湾和乐清湾等地丰富的潮汐能奠定了基础。

四、精品钢材生产基地，但近年出现投资过“热”

华东地区钢铁工业在1985年以前不占重要地位，过二十年发展快。上海生产的钢材规格居全国之冠，且多是我国发展能源、电子仪表、机电、汽车、造船等不可缺的材料。

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的宝山钢铁总厂，主要是为改善本区钢铁工业内部结构而建，位于上海市东北翼长江口南侧，这里靠近上海市区，有不少便利之处，但地基松软，下有很厚的淤泥、沙层，宝钢是建筑在经过特殊处理的地基上。与国内各大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宝钢具有如下特点：（1）拥有容积大（4063立方米）、技术先进的高炉，300吨纯氧顶吹转炉，年开坯300多万吨的大型初轧机等，具有高效率生产的特点；（2）采用进口富铁矿做原料，并为此而构筑了包括宁波北仑港在内的大型深水港，拥有20

万吨级和10万吨级的矿石中转码头及配套设施，承担宝钢每年数千万吨原料和数百万吨成品的装卸任务。从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地经海路运来的矿石，首先运抵建在杭州湾口的北仑港，然后驳运到长江口的宝钢原料码头进厂冶炼。

宝钢距上海市区26公里，厂区占地已扩大至18.9平方公里。一、二、三期工程相继建成后，形成年产1100万吨产能；1997年底，宝钢与上海冶金、南京梅山钢铁合并组成“宝钢集团”，2002年产钢1948万吨，为亚洲第3位、世界第5位。并首次拥有自己的矿山，梅山铁矿为我国最大的竖井提升铁矿。

预计至2010年，宝钢将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用钢、石油管、船用钢板、不锈钢、电工钢、高级建筑用钢等六大类产品的精品生产基地，产品结构如下：普通钢产量预计为2700万吨，不锈钢300万吨。企业规模可望进入世界前三名。

受局部利益驱动，本区钢铁工业在21世纪初出现投资过“热”。如江苏一家私企在常州市新北区及扬中市西来桥一带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设计年产840万吨，投资105亿元，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估，违规占地6541亩，多为长江沿岸农田，致使4000余名多已过上小康生活的农民失去家园。2004年被查处时已造成很大损失。

五、铜基地建设对我国铜工业布局的影响

在有色冶金方面，江西的钨、铜具有全国意义。以赣南的钨矿、赣北的铜矿为主。赣北德兴至贵溪一带，已建设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铜业生产基地。铜的金属储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工业储量占全国三分之一，除铜以外，还伴生铅、锌、钼、金、银等，且大都适宜于露天开采。近二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矿山开发，建成亚洲最大的铜矿——德兴铜矿和我国最大的铜冶炼厂——贵溪冶炼厂。与江西铜基地配套的交通、能源工程，如浙赣、皖赣铁路改造及贵溪电厂等，也已投入运行。目前，江西铜基地已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采、选、冶炼大型联合企业。1998年电解铜生产能力达到15万吨，2003年增至40万吨。江西铜基地的建成改变了我国铜工业的布局。

六、传统纺织工业对产品结构和布局进行了大调整

纺织工业曾是本区第一个具有全国专门化意义的工业部门。

区内纺织工业部门齐全、棉、丝、麻、毛和化纤纺织能力均大，技术力量强，产品花色品种多，在市场上竞争力强。

其中纺织品和丝绸还大量出口。目前，我国作为主要的棉纺织品出口国和最大的丝绸出口国，与华东（尤其是江苏、上海、浙江）纺织工业的开发有密切关系。

上海纺织工业产品产量原在全国占突出地位，20世纪80～90年代为适应市场需求，对产品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包括关并部分企业，减少数十万纱锭，裁员数十万技术工人，大幅减少初加工能力，重点经营高档和适于外销的纺织精品。因此，上海纺织业产量减少，而价值却提高了。

江苏纺织业发展快，2002年生产纱155万吨、化纤261万吨、布37亿米，均居全国前列。毛线、呢绒、丝和丝制品也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省内纺织工业布局集中于无锡、常州、南通、苏州、南京。1995~1997年，布局发生明显变化：苏北纱锭占全省比重由45%上升到57%，呈现出由苏南向苏北转移、销区向产区转移趋势。

浙江丝绸工业发达，素称“丝绸之府”，丝产量3.28万吨（2002年），居全国第1位；丝织物产量亦居全国首位。山东纺织业也较快，到1994年拥有棉纺锭562万锭，超过江苏，居全国第1位。青岛纺织业是该市的支柱产业，从1994年开始实施优化资本结构，优化劳动力配置。目前，山东纺织业中心主要有：青岛、济南、潍坊、淄博。

近年来，苏浙两省一些地段纺织业发展及其产业链延伸出现群聚效应，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如江苏省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浙江省绍兴县、杭州萧山区等纺织工业产值均已超100亿元，成为全国性的纺织业基地市（县）之一。

20世纪80~90年代，华东地区的化纤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上海石化总厂、江苏仪征化纤公司等相继建成投产，成为我国目前已建成投产的最大化纤企业之一。由于化纤产量激增，使本地两大工业部门（纺织、化工）之间联系密切，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纺织工业原料结构，还带来了巨额经济效益。

华东地区工业经济如图表10-1所示。

第三节　商品化、多样化的农业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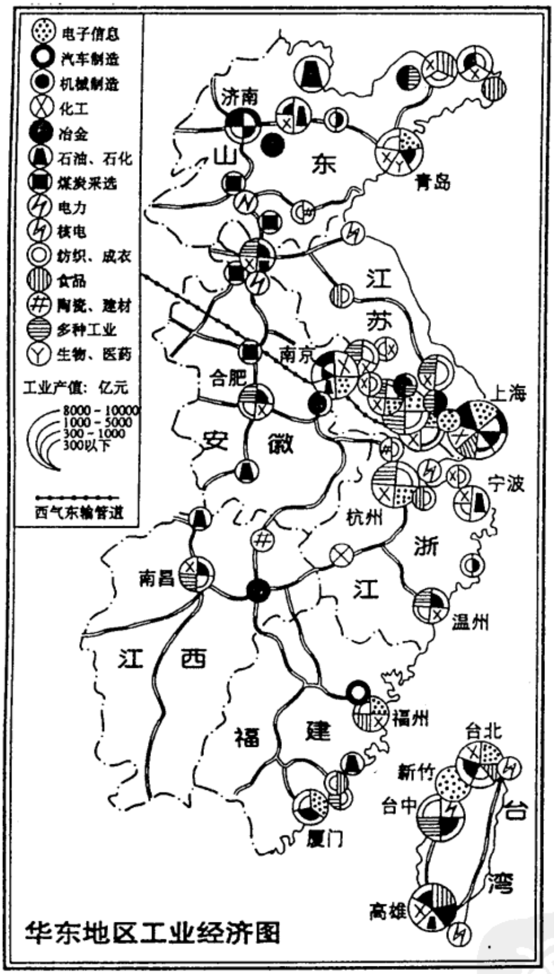
一、农业发展地位突出

本区人均土地少，但农业自然条件好，加以劳力充足，对土地和水面实行精耕细作，复种指数高，因此农业产值很可观。1985年全区农业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33.7%；2000年全区农林牧渔业产值占全国33.9%，居全国六大区之首。

粮食生产和分布的特点是：稻、麦产量大，而且交错分布。稻作集中于江苏、江西、浙江、安徽四省，小麦则以山东、江苏和安徽居多。全区稻谷产量仅次于中南，而小麦产量则超过中南，居全国首位。

水稻种类除江西大面积种植早、晚稻以外，其余各地均以中稻为主，2000年江苏中稻的种植面和产量均居全国各省之首（超过四川）；小麦种植广泛且多与稻谷种植接茬。2000年山东、江苏、安徽小麦产量在全国各省中分居第2位、第4位、第5位。

华东地区的棉花和油料，无论是产量和商品量，都曾长期占全国首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棉花产量、商品量被西北地区超过，而油料产量与中南地区持平。棉田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安徽；油料作物在山东、安徽和江苏三省普遍种植。其中山东的花生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安徽的油菜籽和芝麻产量大，为榨油和食品加工业发



图表 10－1

展提供了充足原料。此外，皖、赣的麻类产量亦丰。

居全国第一位的农林副产品还有桑蚕茧、茶叶、水果。桑蚕茧主产于浙江和江苏，以两省之间的太湖流域分布最集中；2000 年福建、浙江的茶叶年产量分别为 12.6 万吨和 11.6 万吨，加上安徽、江西等省所产，远远超过中南 6 省（区）之和；华东水果产量占全国近三分之一，以山东苹果产量最多；畜产品中肉猪出栏头数占全国近四分之一。

二、渔业经济专门化程度高

华东地区水产品的地位更为重要，沿海5省市中，鲁闽浙苏4省水产品总量分别居全国第1位、第3位、第4位、第6位；海水产品更是居全国第1位、第2位、第3位。

山东为全国第一水产大省。其水产品总量、沿海和近海捕捞、海水养殖等指标均居全国之首；浙江则以海洋捕捞占优势，舟山渔场为我国第一大渔场。20世纪90年代浙江省的外海及远洋捕捞渔业发展迅速，作业渔场远至西非、澳洲和南美。沈家门渔港已发展成为世界三大渔港之一。至2000年，浙江海洋捕捞达340万吨，居全国之首。其中外海和远洋捕捞量248万吨，相当于闽鲁粤辽琼苏6省外海及远洋捕捞之和，近占全国半数。此外，福建的海洋渔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适宜贝类、藻类和海水养殖面积2700平方公里。在90年代，福建渔业（尤以养殖渔业）发展快速，近年来包括海水养殖在内的海水产品产量已超过浙江，居全国第2位。

三、农业区划

根据华东各地农业生产及其分布特点，大体上可以淮河、江南丘陵为界，从北至南划分为三个农业区：北部（淮河以北）棉、麦、烤烟、油料作物区；中部（淮河以南至长江三角洲和鄱阳湖平原）稻、麦、油菜、桑蚕、棉、淡水渔业区；南部（包括江南丘陵和浙闽丘陵及其以南）稻、茶、蔗、水果、林业、海洋渔业区。

第四节　发育良好的综合运输网

由于华东经济发展居全国之首，内外贸易兴旺，故交通运输繁忙。从运输方式上来看，水上运输（内河、海运）条件优越，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发展快，形成颇具规模的综合运输网。

全区内河航道里程、货运量大约分别占全国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铁路营业里程、货运量分别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和六分之一；公路里程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而货运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

一、路网布局改善，平衡运力

20世纪90年代以前，路网布局有缺陷，沪宁线等区段运量过于集中，形成瓶颈，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此后，通过修建新线分流和对原有线路的改扩建以及提速等，改善路网布局。

津沪铁路（天津北——上海，1323公里）是纵贯华东区南北的交通干道，沿线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已铺设双线，以客、货流密度高而著称，为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运力不足的问题，已决定从21世纪初开始兴建京沪高速铁路。

胶济、蓝烟铁路为本区北部交通干线，沿线有三个煤矿、一个大油田，终点为两个重要海港（青岛、烟台），沿线农业发达，水果、油料产量亦多，运输量大；陇海铁路在本区境内只有东部一段，里程不长，然而它是大西北以及中原地区货物东出黄海的必经之道，近年运量迅速增长；浙赣、皖赣两条铁路对于沟通华东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杭州、南京、苏南各市）与内陆腹地及中、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重要，20世纪90年代浙赣铁路复线建成后，运能提高。

鹰厦铁路是福建与内地联系主通道，但通过能力有限。1994年全线电气化改造完成后，年输送能力由850万吨增加到1600万吨，对加强福建同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联系有利。但在路网布局上仍有缺陷，即运输地位重要的鹰厦铁路和南（平）福（州）铁路仅有一个通道与腹地联系，为此新建横（峰）南（平）铁路，改善路网布局。

金温铁路北起金华南至温州，长251公里，1992~1998年建成，对改善华东地区及浙江省内的路网布局有利。

新长铁路北起新沂，向南经淮安、盐城、靖江、江阴、无锡至浙江长兴，与宣（州）杭（州）铁路接轨，全长638公里，为国铁一级干线，至2001年全线贯通；胶（州）新（沂）铁路全长307公里，亦为国铁一级干线，它与新长铁路纵贯鲁苏浙三省经济发达或重点开发地区，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利，并已成为我国八纵八横铁路网主骨架之一，东北至长三角陆海通道主要组成部分。

这条陆海通道已成为我国沿海地区一条新的南北运输干线。通道北起哈尔滨，经哈大线、烟大铁路轮渡、蓝烟线、胶新线、新长线，并将胶济、兖石、东陇海线等连成路网，为东北与华北地区，胶东半岛与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交通提供一条便捷的通道，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原有铁路改造方面，沪宁铁路技改工程已完成，从1996年起成为我国内地第一条准高速铁路运营线，是华东地区目前运输最繁忙区段。

由于全面推广干线提速和快速客运技术，并通过建成“宁沪杭甬快速客运走廊”，华东地区实现了客运快速化、网络化，形成了快速、便捷的运输网络，使客、货运输均实现快速化。

2000年贯通的京沪高速公路（北京—天津—德州—济南—临沂—淮安—江阴—无锡—上海），全长1262公里。该线纵贯华东地区，北达京津，已成为京沪经济带的交通大动脉；1996年通车的沪宁高速公路，全长274公里，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紧密联系起来，被称为“华东黄金走廊”，对推动沿线地带由30多个城市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沪杭甬高速公路是华东地区另一条重要干线，由沪杭、杭甬两段组成，全长296公里。主要联系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一系列大、中城市以及上海港、乍浦港、北仑港，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纽带，也是依托上海进一

步发展浙江经济的黄金通道。

二、杭州湾公路大通道，烟大铁路轮渡

华东地区沿海陆路（公路、铁路）交通，在相当长时期内均受到阻隔：南有杭州湾，北有渤海海峡，均需绕道很长距离。

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准备，2003年开工建设，南起宁波慈溪，北至嘉兴乍浦，全长36公里，桥面设计为6车道高速公路，被称为世界第一大桥，建成后可使沪杭甬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压力缓解，突破杭州湾的交通瓶颈，上海至宁波陆路距离缩短120多公里，并带动杭州湾地区南、北两岸的城市化。同时，直接促进宁波、嘉兴等周边地区的发展，还对浙江全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南翼的整体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003年开工建设的烟大铁路轮渡，北起大连市旅顺口区羊头洼，南至烟台市四突堤，海上直线距离147公里，北部通过旅顺支线连接东北铁路网，南部通过蓝烟、胶新、新长等铁路进入长江三角洲，从而使东北至山东和长江三角洲的运输距离比绕道沈山、京山、京沪等缩短400~1000公里，大为节省运费和时间。

三、水运设施布局扩展快，但有重复建设

本区境内长江干流为"黄金水道"。其中长江在江苏有360余公里主航道，穿越经济发达的8个城市区域，沿江布置10个一类开放口岸、167座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江面船舶流量平均2500艘次，年通过船舶100万艘次，2003年总吞吐量3.1亿吨，与国内10多个省区及世界120多国有贸易往来，国际航行船舶年进出港2.7万艘次，年进出港海轮10万多艘次。这段长江干流的运力相当于10条沪宁高速公路和沪宁铁路运力的总和。

为提高航运效率，从2003年起在长江江苏段实施船舶定线制，大型船走500米宽的深水航道，小型船在其外侧200米宽的航道。改变传统的"江面有多宽航道有多宽"以及"上行走缓流、下行走主流"的传统航法。

华东地区主要河港有：南京、南通、张家港、镇江、芜湖、安庆等。其中，南京港货物年吞吐近1亿吨，为全国第一大河港，港内新生圩码头可停靠2.5万吨级货轮，是全国最大的内河码头。南通港货物吞吐量逾5000万吨；张家港年吞吐能力约3000万吨(外贸1500万吨)，是长江干流新出现的国际贸易商港。

海运方面，除上海外，本区原来的海港多不重要。近二十年外贸货运增长迅速，本区海运蓬勃发展。一方面是上海、青岛、连云港等老港扩建，吞吐量增长；另一方面则涌现出北仑（浙江宁波）、日照（山东）、东渡、海沧（福建厦门）、城澳（福建宁德）、秀屿（福建莆田）、肖厝（福建泉州）等新开辟的大型现代化专用港或新商港。

上海港迄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海运中心，港区位于长江航

线和沿海航线"T"字形交点、长江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两岸以及长江口和杭州湾北岸。拥有222个泊位，其中万吨级泊位74个，码头长度24公里，分别供集装箱、散粮、煤炭、木材等货物装卸使用，全港货物吞吐量2002年逾2.6亿吨，居全国各大港口之首，亦跻身于世界级大港之列。

近年来上海港的集装箱运输呈快速发展趋势，2002年集装箱吞吐量861万标准箱，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

为进一步开发上海港，近年来兴建了罗泾、外高桥、金山嘴等新港区，并正在建设洋山深水港，使上海港逐步从狭窄的黄浦江向长江口、杭州湾和东海深水区拓展，形成新的港口格局。

2001年上海港开辟第二条进出长江航道—宝山北水道。该水道上接长江白茆沙水道，下连黄浦江，长17公里，宽600米，水深10米，可满足第四、五代集装箱船全天候通航；10万吨级船舶减载通航。开辟上述水道后，上海港拥有两条进出长江的通道，可适应上海港及长江各港年吞吐4亿吨需要，亦可进一步保障航行安全和畅通。

预计在近年内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将进一步增长，集装箱年吞吐量达1600万标箱。

华东地区主要海港发展状况，如图表10－2所示：

图表10－2　　华东地区主要海港吞吐量　　（单位：万吨）

港名	港湾设施布局	1952年	1965年	1978年	2002年
上海港	黄浦江、长江口、杭州湾、洋山岛	656	3194	7955	26384
宁波港	金塘水道南岸、甬江口			326	15398
青岛港	前湾新港区、胶州湾口两岸	175	448	2002	12213
连云港	海州湾南岸	46	265	594	3316
日照港	日照市东海岸石臼所、岚山头	0	0	0	3136
烟台港	烟台市区北部、芝罘湾沿岸	26	98	458	2689
厦门港	厦门岛、海沧等地			200①	2000②
福州港	闽江口马尾、台江等地			353①	2000②
肖厝港	泉州市泉港区湄州湾沿岸	0	0	0	1000②
龙口港	莱州湾口东侧			100	500②
温州港	瓯江口、杨府山			307①	400②
威海港	威海市区东部、威海湾西岸			130①	300②

①20世纪80年代初；②吞吐能力。

青岛港原是华东第二大吞吐港，发展历史悠久，1892年建港。当时主要是利用胶州湾的有利条件，胶州湾为世界少有的天然海湾，口狭内阔，为伸入内陆的半封闭海湾，海域广达466平方公里，湾内有阴岛、冒岛、黄岛、大小赶岛和三条水下谷地，成为天然深水航道。1897年德国强租，辟为商港和军港；1914年为日军强占，1922年中国收回。1952年货物吞吐量175万吨，1978年2002万吨，2002年1.2亿吨，成为世界

级大港。因区位有利，港口辐射和吸引范围扩大，为与周边的国内外港口争夺亚洲枢纽港地位，其港湾设施仍在扩建，相继建成大型集装箱码头、30万吨原油码头、20万吨级矿石码头、10万吨级煤码头等，港湾设施布局重点也向胶州湾西岸扩展。前湾新港区已建筑靠泊能力最强的港湾设施。集装箱码头水深16.5米，2003年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423万标箱，仅次于上海、深圳，为中国内地第三大集装箱港。预计至2005年，青岛港将成为我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货物吞吐量可达1.4亿吨，成为以集装箱、煤、油、矿四大货物为依托的国际航运中心。

连云港是苏北大港。但其腹地范围远远大于苏北，通过陇海、兰新、北疆等铁路干线的联系，成为中原和西北等9省（区）便捷的出海通道，亦可连接中亚和欧洲国家铁路网。以连云港为起点，构成新亚欧大陆桥。故该港发展前景可观。港口设施建在海州湾的南岸，外有东、西连岛作天然屏障，港内风平浪静。20世纪70～90年代在此新建30个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港口综合吞吐能力3000万吨。自1992年首列国际集装箱专列从连云港发车以来，连通亚、欧两大洲的"新亚欧大陆桥"正式开通营运，有专列发往中亚、西亚和欧洲。至2020年，连云港将拥有70个泊位，总吞吐能力5000万吨以上。

宁波港为浙江第一大港，包括老港、镇海港和北仑港三个组成部分。其中老港建在甬江航道中，因靠近人海口，故为河海兼用港；北仑港则是新建的大型海港，具有水深、浪小、不淤、陆域宽阔等特征。港湾设施建于宁波市北仑区金塘水道南岸，水深20米，且因海水流速大，无泥沙淤积之患，可供10万吨级船只满载自由出人，25万吨级巨轮亦可半潮出人。宁波港内现有22个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包括25万吨级原油码头，20万、10万吨级铁矿石中转码头，5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3万～5万吨级集装箱码头等，2002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1.5亿吨，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港，并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进口矿石中转基地，华东最大国际集装箱远洋中转基地，煤、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产品的储存、中转基地。

福州港位于闽江口，港区分为台江、马尾等几个部分。其中，台江为内港，水深2米；马尾为外港，水深9米，是深水港区。已建成5个港区、45个泊位。厦门港虽历史悠久，但规模一直较小。其主体位于厦门岛西岸及其以西海域。这里水深、浪小、基本不淤，且港域宽阔，平均潮差约4米，大型船可乘潮出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一、二、三期建设，已成大港规模，年吞吐能力1500万吨，集装箱180万标箱；预计至2005年可达到3300万吨、250万标箱。

厦门港规划建10个港区，现有东渡、海沧、嵩屿、和平、高崎、排头、杏林、大屿、五通、刘五店等港区，以东渡港区为主。港内可泊1万～5万吨级货轮，大型集装箱船。东渡港重点经营集装箱运输和粮食、杂货运输，保税仓储业务，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海运贸易往来。东渡港区按规划将建20个万吨级以上泊位。

地处厦门港西翼的海沧港，具有港阔水深优势，有18公里长海岸线，其中水深10米以上深水岸线5公里，规划建36个万吨级泊位，并具备建筑大型集装箱码头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建成（含在建）3万吨级煤码头、10万吨油码头、3万吨级集

装箱码头和2万吨级杂货码头，已发展成为集装箱中、远洋运输和能源、化工运输基地。

肖厝港位于泉州市泉港区湄州湾沿岸，是一处长年不冻不淤的天然良港。湄州湾可供20万～30万吨级船舶出入，在50多公里海岸线中有5.5公里可建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近十余年来已建10万吨级原油、5万吨级集装箱、万吨级杂货、千吨级成品油码头7座。预计在2020年内可发展成为吞吐超2000万吨的大型港。

随着本区沿海城市对外开放，还有一些重要港口获得开发与发展。如地处长江口的南通港，杭州湾畔的乍浦港，福建宁德市的城澳港，福清市的江阴港、莆田市的秀屿港，山东半岛上的威海港、龙口港等。

华东地区的水运建设及其布局扩展迅速，但也出现了重复建设、无效投资等弊病，主要表现于内河水运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竞相建设水运设施。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地方保护主义悄然抬头，违背生产力合理布局原则，抢占资源，市市建港，县县建港；在水运条件特别有利地段甚至乡乡建港，村村建港，使运力布局过于分散，浪费资源，效益低下。

大型水运设施，甚至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亦有重复建设。如长江下游南京以下江段，已建、在建、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有160多座。各建港部门均以自己认定的腹地计算货源，其中有很多是重复计算，造成建后货源不足，浪费巨大。

四、洋山深水港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江水携带大量泥沙淤积，使长江口航道一直受到水深的制约，致使大型船舶无法靠、离港。经大力疏浚后，航道水深也只能达到12.5米，但近年来出现的第五代、第六代甚至装载8000标箱的特大型集装箱船，吃水深达14.5米。在此情况下，上海港湾设施布局面临新的难题，即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布置现代深水港湾设施，不仅黄浦江不行，长江口的罗泾、杭州湾畔的金山嘴也不行，必须进入东海深水区，在距离国际商业航线和上海市区都要近的海域寻觅适宜的港址。

深水港选址历经6年，最终选定小洋山岛。这里地处杭州湾长江口外的崎岖群岛，属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距国际航线仅45海里，距上海市南汇区的芦潮港约30公里，是距上海最近、且拥有15米深水岸线的天然深水港。

小洋山岛海域海床稳定，虽含沙量偏高，却因海潮强劲，泥沙不易淤落，故处于基本冲淤平衡状态；港址地质构造稳定，水深常年保持15米以上；岛峡效应明显、岛链天然屏障利于船舶靠、离、泊；周边有很多岩岛，也利于取石填海造地合理布置码头设施。

在建的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码头岸线长1600米，建5个集装箱泊位，可停靠第五代、第六代集装箱船，兼顾8000标箱的集装箱船靠泊，港区陆域面积1.7平方公里，2005年底投入运营；并在上海南汇芦潮港客运码头与浙江嵊泗县崎岖群岛的小城子山

之间架设东海大桥（全长31公里），在芦潮港建一座海港新城，占地80平方公里，人口20万～30万，作为洋山深水港后方的市政及辅助配套设施所在地。

按总体规划，依托大、小洋山岛链形成南、北港区，小洋山所在的北港区可形成10公里深水岸线，布置30多个泊位，集装箱吞吐能力1300万标箱。整个洋山港远景发展可形成深水岸线20公里，布置50多个大型集装箱泊位，年吞吐能力2500万标箱，陆域面积到2020年扩大至18平方公里。

洋山深水港的建设，将充分适应国际航运业的发展趋势，并发挥其周边地区一大批支线港、喂给港的作用，促进长江三角洲港口群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以深水港为核心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成后，还可进一步通过长江加强东西部联系，扩大上海经济中心城市的对外辐射力，优化沿江一带的产业布局。上海港的发展及货运结构变化，如图表10－3所示：

图表10－3　　上海港的发展及货运结构变化

年份 / 项目	1930①	1952	1965	1978	1992	2002	预测		
							2005	2010	2020
货物吞吐量(万吨)	1400	656	3194	7955	16297	26384			
集装箱吞吐量(万标箱)					90	861	1000	1500	2500

①20世纪30年代的最高年吞吐量。

五、沪浙关于深水港布局之争

洋山深水港项目是“十五”期间上海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国家重点工程，对建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进一步发展华东地区的海运均有重大价值。但它必须在浙江的地盘上做。对此，浙江有不同认识。浙江方面担心，因兴建洋山港而导致的沪浙深水港布局的重大调整，将对浙江、宁波的发展和北仑港的开发利用造成很大的冲击，并产生负面影响。浙江方面认为，洋山只是渔港，浙江有比它条件更优的深水港，其所以选中洋山，仅仅是它的位置距上海最近。1995年沪苏浙协调会上，浙江提出“以上海为中心，以浙、苏为两翼进行港口组合”的总体布局方案，认为国际远洋深水集装箱港区的建设应“充分发挥宁波北仑港的优势”。但上海方面不同意上述构想，主要理由是北仑港离上海远，不便操作。

六、航空网络形成，长三角机场密度过大

空运在华东地区原较落后，近年有快速发展。新建、扩建了福州、南京、厦门、宁波、青岛、烟台、杭州、温州、徐州等重要机场，开辟一系列新航线，形成以上海浦东、虹桥两个国际机场为枢纽的航空运输网络，并已初步确立浦东国际机场作为亚太地

区航空枢纽港的地位。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位于江宁县禄口镇西南4公里处，距南京市中心35公里，1997年建成，成为华东航空运输网络中的重要干线机场和主要货运机场，且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互为备降机场。对内可辐射全国各主要城市及台、港、澳地区；对外可开辟至日本、韩国、东南亚的专、包机业务，并与北美、欧洲通航。按设计规模，年客运能力4000万人次，货运能力100万吨。此外，福建第一空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已建成；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正在扩建。

作为上海第一大空港的浦东国际机场，占地20平方公里，是具有独特功能的航空港，在我国首创一座城市同时拥有两个大型国际机场的布局形式。目前正在建第二条跑道及相关配套设施。预计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时航空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超过机场四期工程设计能力。浦东机场总体规划突出了枢纽功能，世界公认的枢纽港三大特征（旅客吞吐量大、旅客中转率高、航空企业数量多）均得到体现。从2002年冬春航季开始，上海两大机场（浦东、虹桥）的航班经大幅度调整，形成“南北对飞、东西分降”的航线格局。

“十五”末期，华东运营机场增至36个，主要汇集于“长三角”，这里的机场密度已达每万平方公里0.8个，超过美国每万平方公里0.6个的水平，结果造成部分机场客源少、航班少、亏损大，2003年本区有3个机场停航。但部分地级市仍在准备新建、复建或扩建机场。2004年苏州市宣布退出长三角机场建设之争，退出原因是近期内尚可利用周边的机场（浦东、虹桥、禄口、萧山4个国际机场）资源，节省再新建国际机场投资数十亿元，避免至少二十年的亏损及财政赤字。

第五节　区内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

一、区内差异及其特征

华东内部差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作为内地的江西、安徽之间，由于历史发展、交通等方面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2) 各省区内部，由于经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不同，也存在传统差异，如苏北与苏南、皖北与皖南、浙东北和浙西南。另外，山东境内的半岛区域以及胶济铁路沿线与鲁西北、鲁西南，福建东部沿海与闽西山区之间的差异，亦为人所共知。

二、省域经济特征及发展前景

华东地区各省（市、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如图表10-4所示。

（一）江苏省

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省区之一。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经济实力激增，在占全国1%的土地上创造出占全国10%的经济总量。尤以近十余年来发展迅速，1991年全省GDP1601亿元，2002年增至10636亿元，居华东第1位、全国第2位。

图表10－4　华东地区各省（市、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表（2002年）

项目／区域	GDP		工业销售收入[1]（亿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经济全球化			新经济指数	城市化			
	总值（亿元）	人均（元/人）			外资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全球化水平指数		设市城市（个）	城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建制镇（个）	城市化水平（%）
华东地区	44966	12232	48585	9128	0.5950	0.2028	0.3989	-	188	2.4	5835	-
上海	5409	40627	7977	234	1.1128	0.1793	0.6461	73.3	1	-	132	88.3
江苏	10636	14397	13554	2012	0.5793	0.3632	0.4713	48.4	40	3.9	1194	41.5
浙江	7670	16570	9326	1136	0.4999	0.1108	0.3054	51.6	33	3.2	824	48.7
安徽	3569	5817	2127	1306	0.0976	0.0401	0.0689	40.0	22	1.6	1020	21.8
福建	4682	13510	3450	1089	0.5357	0.3291	0.4324	51.6	23	1.9	623	41.6
江西	2450	5827	1114	825	0.0675	0.1463	0.1069	41.3	21	1.3	789	27.7
山东	10550	11643	11037	2526	0.2929	0.1710	0.2320	47.0	48	3.1	1253	38.0

①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

②包括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活力与实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五类指标

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2003》、《经济日报》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产业布局主要集中于苏南，其次是苏中。这里有一批GDP值500亿～3000亿元的地级市（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扬州），并有一批GDP100亿～500亿元的县级市（江阴、张家港、常熟、武进、昆山、吴江、宜兴、太仓等）。县域经济发达，竞争力强，已成为江苏产业格局的重要特征。2001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江苏占17席，且大多位居前列。

近二十年来，这里曾利用两次较好的机遇发展经济：一次是发展乡镇企业；一次是发展外向型经济。至21世纪初，包括苏南、苏中多数市、县在内的“江苏沿江经济带”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为全省经济布局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从理论上说，地域空间发展通常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和增长极上，然后沿着多种渠道向外扩散。苏南经济已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的增长极，但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苏南的用地格局已呈现出饱和状态，这对经济进一步发展与合理布局均有不利影响。为此，江苏提出沿江开发、苏南、苏中“联动”的发展战略，并于2005年之前在长江下游（江苏段）先后架设“江阴”、“润扬”、“苏通”、“南京3”等一系列世界级水平的特大型桥梁，为苏南扩张、苏南苏中联动发展提供高效率的通道，也为苏北的加速发展准备条件。

与苏南相比，苏北经济发展水平、规模均有很大差距。对此，90年代江苏省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方针。至90年代后期，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为此，江苏省又制定“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实施苏南部分产业（主要是初级加工产业）向苏北有序转移，并采用南北挂钩办法，利用苏北地域广，矿产丰富，劳力充足，海岸线长的优势，为苏南产业升级开辟发展新空间；而苏北则可利用苏南经济发达，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加速自身发展。

2002～2003年，江苏制定并实施苏锡常、南京、徐州三大都市圈规划，紧接着又提出“沿江开发战略”。“沿江开发”的目标是要把江苏省境400公里长江两岸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制造业聚集带，带动江南、江北共同发展。目前，沿江产业带的开发强度达到15亿元/平方公里。

预计到2010年，江苏沿江地区GDP将达到12800亿元以上，人均GDP5万元。此外，对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等也做了具体规划。

近十年来，如何缩小南北差距，成为江苏发展中的一道难题。对此，曾先后实施南北挂钩、对口支援、产业转移、建设三大都市圈、沿江开发大战略等一系列规划，并曾对行政区划进行多次调整，还曾酝酿大的区划变更，分割江苏，以图更大发展。然而，上述这些都不足以解决省域经济发展与布局中的众多难题，从而使经济学、地理学和规划学都面临挑战。

（二）浙江省

人均产值高、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省区，产业布局以区域块状经济为最大特色；中国最大民间投资区和民间资本溢出地，“浙江商帮”广泛分布于海内外各地。

全省人均耕地仅0.036公顷，居全国之末；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3位，为“资源小省”，主要依靠体制优势和低成本、低价格优势发展经济，人均GDP、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经济发展的外向度等指标，均居国内各省区前列。县域经济发达，2002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浙江占据27席。全省经济总量从1978年124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9200亿元，居全国第4位。但应看到发展的总体层次并不高，经济成长更多地来源于粗放式的增长方式，能耗高，能源利用率低。

从产业结构来看，浙江现有产业以轻型为主，轻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经济的60%，原来基本上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变。这里是蜚声中外的“丝绸之府”和龙井茶的故乡，海水产品居全国之首，多种小商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占有率很高。

城市化水平近年提高很快。1999～2002年，全省城市化水平由36%上升至42%，现已形成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区，48个大、中、小城市形成体系，城市化已初具规模。通过加速推进城市化，加快了产业聚集与升级，促进了工业集约化和合理布局。21世纪初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使浙东乃至长三角交通格局出现新变化，促进环杭州湾都市群形成。

浙江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此阶段，改善经济结构、提高产业层次和

企业整体素质，是经济进一步成长的关键。

在产业布局方面，浙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至 2002 年，已有年产超亿元的区块 519 块，10 亿～50 亿元的区块 118 块，50 亿～100 亿元的区块 26 块，100 亿元以上区块 3 块。有 52 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30%以上。著名者如：乐清低压电器、海宁皮革、嵊州领带、诸暨袜子等。

块状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主要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者是城市边缘的新兴产业群落快速崛起。上述两种布局模式的块状经济，已在浙江 88 个县（市、区）中的 85 个形成，年产超亿元的 519 个区块经济总产值 6000 亿元，占全省二分之一。

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长期以来国家在此投资亦少，但这里民间投资十分活跃，浙人善于拾遗补缺，捕捉商机，开拓小商品市场，制造业以生产小商品或消耗较少的产品为特色，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均很高。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亦为改善工业布局，近年浙江提倡发展工业园区和特色园区，并已取得成效，形成特色区域块状经济。

经济发展消耗少，分工细，专业化，在国内外市场上很灵活，应变能力强，有“小狗经济”之称，相对于其他地方的“老虎经济”、“狮子经济”来说，并非弱小，而且特色鲜明。

陆地狭小，且多山地，今后经济发展加速对海洋的利用。全省有 2254 公里大陆海岸线、4068 公里岛屿海岸线，海域（含领海、内海）4.2 万平方公里，连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共 26 万平方公里，为陆地 2.6 倍，且海域位置在全国居中，海洋资源丰富，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大力开发海洋，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建成新的海洋经济大省。在产业选择上，继续发展海洋渔业，重视发展港口海运业、加工和转口贸易、滨海工业和海洋旅游等产业；不仅利用原有产业优势，而且培育新兴产业，重点扶植海洋化工、海洋医药、海洋功能食品等精细加工产业发展，促进海洋能源开发及海水综合利用。在区域布局上，不仅发挥沿海地区作用，也合理规划海岛的功能。至 21 世纪初，浙江省海洋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经济发展与布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明显。除太湖流域一带早已造成水质污染、生态退化、环境受损以外，在全省产业集中度最高、城市布局密度最大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温黄平原地带，因长期不合理开采地下水等原因而导致地面不断沉降。从 1964～2000 年，嘉兴沉降集中区域下降 827 毫米，温黄平原下降 500 毫米，宁绍平原下降 468 毫米，且下降势头在近年来呈加快趋势。如任其发展，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预计至 2020 年浙江实现全省现代化。人均 GDP3000～5000 美元（1997 年 1200 美元）；第一、二、三产业构成为 5：45：50（1995 年为 16：52：32）；城市化水平提高到 60%（2000 年为 48%）。为提升产业层次和国际竞争力，正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如加快规划、建设三大产业带：（1）环杭州湾产业带；（2）温台沿海产业带；（3）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

（三）福建省

区域经济发展新定位：海峡西岸经济区。

从历史上看，这里是充满着迁徙文化的地区；近代又受海峡两岸战事影响。故经济

发展乃至于城市建设均不很看重。从地理上看，此处居华东南翼，境内地形崎岖起伏，绝大部分为丘陵山区，但气候有利，地当亚热带，水、热条件良好，且为我国“黄金海岸”（闽粤海岸和台海）范围之内，拥有3324公里大陆海岸线、2120公里岛屿海岸线及众多岛屿，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超过全省陆地。故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山”、“海”优势。森林尚保留45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60.5%，居各省第1位；亚热带经济林木广为种植，水果产量大，龙眼、荔枝、香蕉、菠萝产量分别居全国第1位、第2位、第3位。此外，海水养殖多，紫菜产量占全国一半，缢蛏、花蛤、牡蛎产量亦为全国之冠。全省海水产品总产量居全国第2位。

作为侨乡，福建同海外经济、文化联系密切。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兴办厦门经济特区，开辟闽南厦漳泉三角经济开放区，开放福州港口城市，引进港资、台资、侨资、技术和管理。上述原因直接推动了省内基础设施建设和轻纺、电子、重化工业发展，并已形成规模效益。但从省内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来看，20世纪80~90年代发展的主要是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加工业，电子工业则局限于装配型企业。90年代后期开始，福建注重发展能源、石化、原材料工业以及机械和设备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向优化。

开发区政筞实施良好。1985~2002年，省境先后设立的开发区中，有10多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相继成为吸收外资的重要基地和对外开放主要窗口，同时也成为向内辐射扩散的阵地。上述开发区（含保税区、台商投资区）连同经济特区及海峡两岸直航口岸等，形成多层次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新格局，全省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分别由1978年位居全国第22位、第23位提高到2002年的第11位、第7位。

近年，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项目实施经济带动，通过项目的落地、转化、延伸，加快工业整体实力发展。在地域布局上大力开发包括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5市在内的闽东南地区，重点发展电子、机械、石化等主导产业，形成以闽南三角经济开放区、闽江口经济区、湄州湾开发区为依托，以福厦交通主干线为主轴，连接三大港口（湄州湾、福州、厦门）和沿海城市的“海峡西岸经济区。”

长期以来，福建经济发展滞后和交通不便，在长三角、珠三角之间形成为一处醒目的“低谷”，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不利。近年福建经济实力壮大以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定位，为构建一个整合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体提供可能，也为将来构建“环海峡经济区”奠定基础。但是，福建较为复杂的地质、地理基础及生态环境又难以承受重化工业及交通网络的过度发展。因此，必须拟定适度的地域经济开发力度与经济合理布局方案。

三、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协作区、都市圈

（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1. 内涵、地缘优势，两大三角洲比较。

长江三角洲在沉积学上涵盖扬州、镇江以东的狭长扇状平原；在自然地理学上则扩

大到太湖平原至杭州湾；在经济区概念上，再扩大到整个沪宁杭地区。

1985年开辟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之一。1992年成立长三角14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后发展到15个地级以上城市及所属53个县（市）。以上海为中心，跨苏浙沪3省市，土地面积占全国1.04%，人口占6.34%，却创造出占全国20.7%的GDP，比珠三角多11%；外贸出口占全国的28.4%，且呈上升趋势，虽仍比珠三角略低，但差距急剧缩小，2003年几乎相等。

长三角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这块略呈弧状的地区，以向东突出的上海为龙头，成为我国“T”形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轴，是对内对外辐射力最强的经济核心区。因其辐射力继续增强，2003年地处长三角南翼近旁的台州市获准加入，长三角经济区拥有16个地级以上城市及所属59个县（市），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随后，地处长三角西翼近旁的马（鞍山）芜（湖）铜（陵）地区，也在酝酿加入长三角经济区。

两大三角洲比较，如图表10－5所示；

图表10－5　　两大三角洲比较

经济区		主要指标占全国（%）				经济密度（GDP万元/平方公里）	城市化（%）
名称	等级	土地	人口	GDP	外贸出口		
长三角	二级	1.04	6.34	20.7	28.4	2174	50
珠三角	三级	0.43	3.21	9.8	34.5	2431	70

2. 城市化水平高，城市群体系与城市连绵带发育良好。

本区以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为依托，已形成一批经济实力强、社会发展水平高且投资环境甚佳的城市群体，拥有15个中心城市、55个中等城市、1446个小城镇，城市群体系发育良好。城市化水平逾50%，城市扩张日新月异。现有城市按经济总量、财政实力，可划分三个层次：(1) 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GDP1000亿～6000亿元，财政收入100亿～2500亿元；(2) 绍兴、南通、常州、嘉兴、扬州、镇江，GDP500亿～1000亿元；(3) 泰州、湖州、舟山，GDP500亿元以下。

至2002年，在由上海—昆山—苏州—无锡—常州组成的城市连绵带里，已形成清晰的IT产业链。沿沪宁、沪杭、苏嘉杭等高速公路布局的一些跨国公司及众多配套商，组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上下游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地理毗邻的众多城市（镇）在相当大的区域内组成产业联动整体，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3.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体制障碍。

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形成区域性挑战。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除地缘优势、环境资源优势、历史人文因素和投资环境（软环境和硬环境）改善以及民营经济非常发达并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以外，还表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冲破体制障碍，开始取得进展。

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仍然不够，尚未完全突破体制障碍，仍存在各种体制和机制问题，阻碍经济一体化进程。表现在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的排他性，区域割据，各自为

政；区内产业结构低层次重复，内在竞争激烈而外在竞争力不足；缺少跨行政区的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重复。以长江为主轴的经济协作、产业整合规划，虽酝酿已久却迟迟难以出台。

行政区对经济区运行影响过大，要素的空间布局受行政区划限制，各个城市产业结构趋同、缺少分工而导致城市功能不明确等问题依然严重存在。如长三角 14 个城市"十五"规划，排在前四位的支柱产业都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趋同率达 70%；其他问题还有：电力紧缺、水资源问题、土地资源紧缺，但仍有浪费；同时，开发区设置多，各开发区土地过多过早贱卖，致使进一步发展的用地告急。此外，工业（尤为乡镇工业）布局与村镇建设分散，生态保护与建设不够，环境（尤其是水环境）污染较重。1991 年太湖流域水灾直接损失 110 亿元，1996 年国家决定治理太湖，后因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而使治理不力，至 21 世纪初，太湖水质恶化，重新启动联合治理。

4.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体制创新；开发强度过大的负面影响。

为实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2002 年开始建设以上海为中心，300 公里半径的三小时交通圈，包括拓宽沪杭甬高速公路，筹建浙江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快速通道，新建连接宁波与上海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以及连接浦东、崇明、海门的沪崇苏大通道。以上将使沪苏浙互联互通达到新的水平。另外，长三角地区的县级市也制定了"接轨上海"的合作规划，上海则加大了结构调整、产业外移的力度；市场互相开放，资本双向流动的结果将是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长三角经济区布局图，如图表 10－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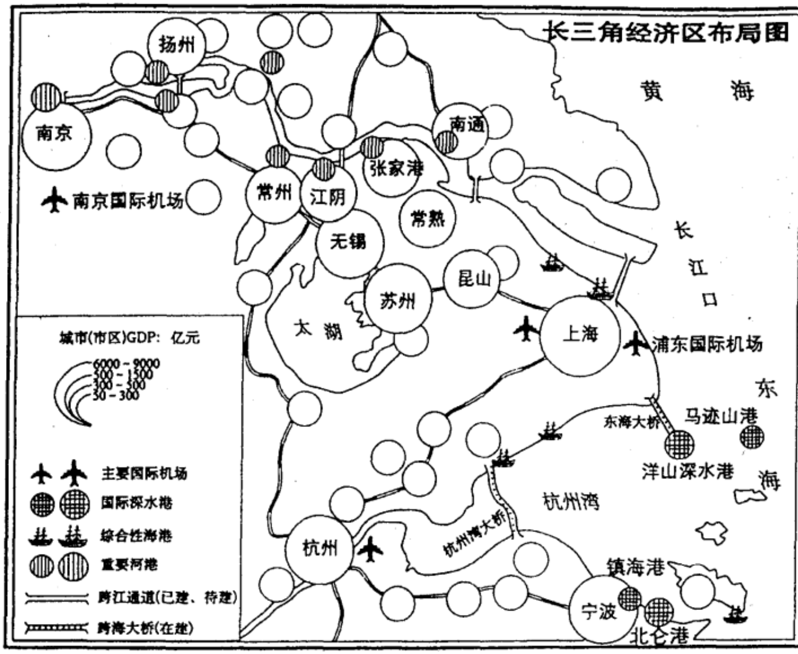
为适应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长三角拟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构，包括指导机构、协调机构和执行机构在内；同时，为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内实现自由流动，将联合组建区域产权交易中心、发展银行、人才交易中心等，并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北部及江苏南部开展民间资本融通。通过建设区域性要素市场促进区内资源优化配置。

长三角条件有利，但开发强度过大也渐显弊端。如近十五年 GDP 的高速增长带来巨额财富，但也改变了世代相传的自然化生态空间，并使传统的江南美景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和形．形色色的开发区。"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原本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有可能由于经济过热与布局的不当而成为历史的回忆。

（二）淮海经济区

成立于 1986 年，包括苏鲁皖豫 4 省接壤地区 16 个地区（市），至 2002 年，原有区域内政区变为 20 个地级市：江苏徐州、盐城、淮安；宿迁、连云港；山东济宁、泰安、枣庄、临沂、菏泽、日照、莱芜；安徽蚌埠、淮北、宿州、阜阳、亳州；河南开封、商丘、周口。土地总面积 17.81 万平方公里，人口 1.21 亿，是人口密度大，有一定经济实力，且区位特征鲜明的国家二级经济区。

作为地跨东、中部，四省相对欠发达地区的经合组织，本区生产力水平大致相近，发展需求有共性，且区位特别，在我国版图上处于独一无二的"脐部"地带，在东部支持中西部开发中可发挥"二传手"和"接力站"作用。因此，其经济发展成效关系中国经济东西并进、南北联系的通畅程度，对全国经济总体格局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图表 10－6

但因行政归属不同，地方保护，加之边界纠纷以及岛屿和海域争执，致使区域内经济合作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徐州系区内中心城市，淮海经济区设立时，联络协调地点选定于此。此后，济宁发展迅速，至20世纪末在全国城市实力排名中，徐州、济宁分列第35位、第36位。贯穿本区的“亚欧大陆桥”，其桥头堡原为连云港，后日照港崛起，又建成与后方腹地联系配套的运输体系，遂形成“双桥头堡”格局，并使苏北、鲁南区域经济发展之争加剧。

为进一步争夺资源与市场，进入21世纪后山东规划营造新的都市区，使济宁—兖州—邹城—曲阜发展为复合中心城市，而江苏则规划将徐州发展为涵盖徐、连、淮、盐、宿5市的新都市圈。

鉴于苏鲁两省经二十多年发展均已稳居全国前列，经济实力并驾齐驱，并以此为后盾全力支持各自的欠发达地区—苏北、鲁南，双方对各自利益的要求，已使涵盖四省、区位甚佳、前景看好的淮海经济区，在跨省合作方面难有大的起色。

（三）新南京都市圈

苏皖2省8市从21世纪初起联手建设“新南京都市圈”，以南京为中心，以长江为主轴，其地域范围包括南京、镇江、扬州市的全部和淮安市部分地区；马鞍山、滁州、芜湖市的全部和巢湖市部分地区。在历史上悠久的地域经济与地缘文化的背景下，跨越行政区划局限，联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体化环境治理格局；加快物流建设，形成大市场共享格局；联合发展旅游，开展科技合作，致力于促进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其发展总体目标是：（1）人均GDP从2000年的1.16万元提高到2005年的1.8万元、2020年的7.8万元；（2）平均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的46%提高到2020年的66%；（3）产业布局与生态建设，建成宁扬、宁镇、宁芜3条产业及交通发展的主轴。同时，跨区域合作建设自然保护区45个。

第六节　主要城市与经济中心，开发区与经济特区

一、城市化进程较快

华东地区的设市城市到2002年底已增至188个，建制镇5835个，市、镇数在全国务大地区中均居首位。城市化水平在部分地区（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等）已达50%以上，但在多数地区仍处于中等或低水平。全地区城市密度24市/10万平方公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倍。

按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分类，有大城市32个，其中超大城市5个：上海（1103万）、南京（323万）、济南（286万）、青岛（285万）、杭州（206万）；特大城市11个（淄博、南昌、福州、无锡、苏州、徐州、合肥、蚌埠、常州、宁波、枣庄）；大城市16个；中等城市82个；小城市74个。

二、城市内在扩张力强，竞争力居前列

在华东地区城市经济增长中，一级、二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很明显，其中二级中心城市发挥了更大作用，在全国各大区中最显著。从区域城市发展阶段论来看，无疑将促进全地区经济的继续增长。在本地区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为数不少的中小城市和“级别”不高的城市（县级市）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内在扩张力强（甚至很强），并已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环节。

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位来看，全地区188个市中，有中央直辖市1个（上海），副省级市6个（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地级市78个（合肥、

福州、南昌等)，县级市109个。区内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从整体上来说很明显，个别城市的影响具有全国意义。

从城市竞争力来看，华东有一批城市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在资本力方面有上海、南京；在劳动力指数方面有上海、杭州、南京；科技力方面有上海；区位力方面有上海、苏州、南京、南昌；环境力方面有厦门、青岛、南京、无锡、杭州；文化力方面有上海、福州；管理力方面有上海、杭州、综合竞争力方面有上海、厦门、无锡、杭州、南京等。上述竞争力强的城市多集中分布于长江三角洲。

近年来，华东地区很多城市政府竞争逐渐从产业转向环境。众多城市的政府生产和供给各自不流动的产品（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物品），或者营造市场竞争环境。

三、城镇空间布局引导，都市圈发展策略

随着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华东多数省市率先进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从21世纪初起，江苏、浙江、山东等竞相出台都市圈发展规划，以领跑于各地的城市化进程。江苏确定了“三圈五轴”城镇布局架构，提出以中心城市为节点，快速交通体系为依托，构建南京、徐州、苏锡常三个都市圈和徐连、宁通、沪宁、新宜、连通五条城镇聚合轴，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城镇聚合轴为骨架、都市圈为网络的城市空间组织结构。

2002年开始实施的《苏锡常都市圈规划》，是我国经政府批准实施的第一批都市圈区域规划。随后，《南京都市圈规划》、《徐州都市圈规划》相继出台。与此同时，浙江、山东也制定了类似的都市圈区域规划。

四、主要经济中心、增长中心

（一）上海市

1. 城市布局变化。

作为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综合经济实力和辐射力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首位，有“中国经济首都”之称。全市面积6341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由20世纪80年代的376平方公里扩大到2001年的5299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由1947年的92平方公里增至2002年的660平方公里。因经济发展迅速，促使城市布局发生很大变化。近十五年来上海建成区的迅速扩展，在浦西、浦东形成了不同的空间扩展模式：浦西属于“辐射填充”型，主要是沿交通干线向外扩展；浦东则是以功能开发区为核心发展，属于“跳跃型”扩展模式。

但是，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增长过快，至2003年，在外环线以内670平方公里区域，集中居住920万人，人口密度达13731人/平方公里，远远超出纽约、巴黎、伦敦。因中心城区房地产价飞涨，使城市布局如摊大饼之势向外扩展，而这正是城市发展与布局中的不良传统。为此，上海规划建设新城，并非传统的卫星城，而是依托重大产业项目

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型都市，大量分流人口，最终中心城区人口减至800万人。新城包括临港新城（南汇）、松江新城、嘉定一安亭新城；前者处于长江、杭州湾交汇处，靠近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面积293平方公里。

2. 大都市圈形成，人均GDP上升快。

上海人口现已增至1700万，另有大量流动人口。预计至2010年，上海的城市人口将达2000万。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居民逾5000万，是全球六大城市群之一。

上海市的面积仅占全国的0.06%，人口占全国1.3%，而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占全国的比重是：GDP值占全国的5.2%，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2.1%，进出口贸易总金额占全国的11.9%。1997年人均GDP值超过3000美元，2003年5500美元，成为我国内地最早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地区行列的城市之一。但是，上海的商务成本，特别是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近年来有较大幅度提高，也给上海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些约束。预计2007年人均GDP7500美元。

3. 全球化、国际化趋势。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更高（如工业产值占全国的8.5%），从1985年以后，由于国内部分省、市的经济发展幅度超过上海，使上海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在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上海迄今仍是全国最大工业城市，亦为最大港口，国际国内贸易中心，并是国际金融中心。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上海仍是计划经济的牢固阵地。进入90年代走向改革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沿，经济全球化指数也急剧上升，到21世纪初已成为日益全球化、国际化的新上海。

4. 产业结构升级，支柱产业更新。

由于近十余年来上海实行新的产业发展方针，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调整。第三产业占GDP值的比重由1991年的34.1%提高到2000年的50%，金融保险、商品流通、交通通信、房地产、旅游业、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上海经济增长已由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推动为主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城市发展的综合功能明显增强。在第三产业优先发展的同时，第二产业发展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由过去主要依靠传统工业支撑转向主要依靠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共同支撑。知识服务业也已成长为全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工业结构在近十多年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作为第一支柱产业的纺织业被汽车制造业所取代，后又被电子信息业取代。其他支柱产业还有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制造、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精品钢材、家用电器、生物工程与医药、环保、新型建材等。

在1948年以前，上海是远东最大的金融城市，当时的金融业营业额是香港的1倍、东京的3倍。20世纪50年代后，上海由国际金融中心转变为大工业城市；从90年代起再逆转，重视“大流通、大市场”，包括金融、保险、证券交易的发展，使上海逐渐成为大地域范围内的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人才流的汇集点和辐射地。

作为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城市，当前上海的竞争力主要还是来自制造业，虽然传统产

业多已移出上海，但上海仍然保持着制造业的中心地位。

5. 工业布局大幅度调整。

据2002年制定的《上海工业产业导向及布局指南》，上海鼓励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电站设备及大型机电产品制造、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精品钢材、生物医药等支柱产业，以及软件开发制造、服饰化妆吊制造等都市型工业，对资源消耗型、有一定污染和低附加值、市场正在萎缩的行业产品（冶金、纺织、电气等）将限制其发展，纸浆、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则因资源消耗过大而严格限制。

与此相适应，重点地区工业布局体现“三环分布”的总体格局：即以市中心为轴心，内环线、外环线为布局界限。内环线以内主要布置都市型工业；内、外环线之间主要布置高科技工业及配套产业；外环线以外主要布置装备工业和基础原材料工业。

6. 地域载体功能调整，城建布局与景观布局。

上海对自身产业结构大调整过程中，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三产比重在1948年以前曾为58%，至1978年降至18%，自90年代开始，上海逐渐恢复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到2000年，第三产业已上升到50%以上。2010年前后将建成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按照城市规划，地处黄浦江西岸的外滩及浦东陆家嘴，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是中央商务区，以金融、贸易、服务业及大公司办公地为主的核心地区。即浦西外滩地区和浦东陆家嘴地区即将共同构成上海中央商务区的地域载体。

公共活动空间既狭小又分散，缺乏景观环境整体规划，曾一直是上海城市发展和布局中的痼疾。为此，从2002年起进行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本着“规划国际化”原则，借鉴国际著名城市滨水区改造与功能重建经验，注资1000亿元对杨浦、南浦两座大桥之间的核心滨水区用地性质作重大调整，形成南北向的城市滨江景观主轴，并进而使南起卢浦大桥、北至复兴岛，浦江两岸岸线40公里长、25平方公里陆域改观，使黄浦江一带成为“海派”城市象征。此外，复兴岛到吴淞口、卢浦大桥到徐浦大桥为北、南延伸段，上述各段加起来，从徐浦大桥到吴淞口，浦江两岸岸线长约85公里、面积73平方公里都归入浦江开发范围。开发的核心是使原生产型功能转向服务型功能，如交通运输、仓储码头变为金融贸易、国际会展、旅游、文化、生态居住等，浦江两岸腾出的土地变为绿地系统。通过整体景观设计，使浦江一带蜿蜒开阔水域的形态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上海原有的风景线增添新内容。

以上述景观布局、城建布局调整为核心，上海正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城市。

在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进行的同时，生态环境已在某些方面受到损害。根据其环境受损情况，正在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调整和市政建设大举之机，增强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工业布局与城市建设布局，并将新的环保规划目标与任务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经济发展方案之中。与此同时，上海还在建筑保护地区、风貌保护地区、城市景观线路严格限制建筑物高度，鉴于市中心高层建筑，已逾3500幢，造成空间环境压抑感，故严格划定“禁高区”，并通过黄浦江、苏州河的开发创造“释放空间”，还可以减少由于大量高层建筑而引发的日照、热岛效应、光污染、消防救助困难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二）杭州市

1. 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其定位变化。

自古以风景秀丽著称，名胜古迹众多，有“天堂城市”之称，旅游业已形成规模经济。旅游收入占GNP的17%，成为全市支柱产业之一。电子信息、纺织、制茶业也较发达，为全国轻纺基地之一，现正发展成为轻纺制造城市。

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内跨区通道网络建设，改变原有区域交通格局、经济格局，使杭州、南京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强力影响腹地”收缩，而苏锡常、甬温等城市崛起。杭城周边因受沪苏甬围绕，加之沪杭关联度急剧上升，使未来的杭州必须定位于“长三角”整体协调发展，特别应注意与区域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并在产业选择、空间发展上主动适应、作好互补。从空间结构形态来看，杭州将成为长江三角洲的副中心城市。

2. 城市发展与布局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

据新的城市规划，21世纪杭州的发展走向是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二大区域中心城市（仅次于上海）。市区面积扩大5倍，其主要特点是：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市区向东、南延伸，形成沿钱塘江、跨钱塘江发展的新格局。并由此而制定了“保老城，建新城，美容西湖”的战略措施。即保持老城传统的“三面云山一面城”特殊风貌；同时在老杭城以东兴建新城。

以钱塘江为依托的钱江新城，是杭州发展由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重要体现。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在建的一期8平方公里，投资100亿元。未来以钱塘江为轴线的杭州全城，将包含一个主城（老城区）三个副城（江南、临平、下沙）双轴线（东西向即钱塘江城市生态轴、南北向即主城—江南城为轴线的城市发展轴）六大组团（临浦、瓜沥、义蓬、塘栖、余杭、良渚）六条生态带（西湖—灵龙、径山—西溪、超山—半山、皋亭山—彭埠、石牛山—湘湖、青化山—航埠山—新街）。杭州市市区面积到2003年已由原来的683平方公里扩大至3068平方公里，以适应城市布局变化之需，预计市区人口将由现在的186万增至400万。

3. 衰退萎缩的西湖恢复原有风貌。

作为杭州最重要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西湖的秀美风光今非昔比。由于长期以来保护不力，开发利用过度，使水域缩小，雷峰塔倒塌，杨公堤湮没，“十景”残缺不全。为此，新规划除对现有的西湖风景区和“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市景观予以特别保护之外，还实施“西湖西进”等一系列全面整合西湖资源的措施，扩大西湖水面，并恢复西湖原有的全景风貌，300年前的“一湖二塔三岛三堤”景观可望基本复原。距离西湖较近的主城也将搬出大批企业、迁移20万居民，降低人口密度、建筑密度，重点发展旅游服务、商贸、金融等第三产业，以便使城市发展与西湖全景风貌浑然一体。

（三）南京市

1. 历史文化名城，多功能中心城市。

始建于2480年前，为全国六大古都之一，并曾是民国首都。从1953年起为江苏省会，1985年起为“宁镇扬经济协作区”、“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的经济中心。2001年

GDP1150 亿元，出口额 58 亿美元。近 30 年工业发展快，以化学工业为最大特色，次为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石油加工等，部分工业产品（石化产品、化纤、合成氨、化肥、硫酸等）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但作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否应如此大规模发展化学工业，值得考量。有些化工企业（尤地处上风向者）及电厂的布局均有损于城市。

市区多名胜古迹，有中山陵、玄武湖、秦淮风景带、栖霞山等，旅游业发展快。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随着禄口国际机场、西安—南京铁路、长江二桥三桥、地铁南北线、宁杭高速公路、宁启铁路和“1 小时圈”高速公路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使城市发展总体水平提高，对外辐射力加强。现今南京已发展成为一座濒江近海、开放型的多功能中心城市，在华东地区宏观生产力布局中居重要地位。

2. 旧城改造突出文化建设，重现民国建筑特色。

南京民国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1927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复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先后两次掀起建筑热潮。据统计，市内现存民国建筑 1000 多处，其中 119 处被评为中国近代优秀建筑。上述沧桑遗存，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无可比拟。从 21 世纪初起，南京旧城改造突出文化建设，重现八十年前民国建筑特色。加之历史更悠久的文保单位尚有 500 多处，南京将把老城恢复与建设成为“文化之都”。

据总体规划，以主城为核心的都市圈为规划发展重点。主城系指长江以南、绕城公路以内，面积 210 平方公里。城市发展和城建布局以河流、铁路、古城墙为界，划分 5 个片区，以明城墙合围空间为主体的中片区不准再建高楼，并迁走部分居民，主要发展三产，重点强调环境品质提升及历史文化特点的体现；其他 4 个外围片区则加强设施配套与功能完善，形成居住、就业相对平衡、设施相对完善的综合性片区。

3. 河西新城区—南京城市布局的历史性跨越。

鉴于南京有 100 多万常住人口和数十万流动人口拥挤于古城墙内仅 50 平方公里狭小空间，造成用地奇缺、交通阻塞、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病。为此决定建设新城，并由此带动河西 32 平方公里的开发。2002 年确定“一城（河西新城）三区（栖霞、江宁东山、浦口—江新市区）”的城市布局扩张思路和“一疏散三集中”（老城人口向新区疏散，工业向开发区集中，学校向大学城集中，建设向新区集中）城市布局格式。从隔江到跨江，南京城市布局出现历史性跨越。预计至 2010 年以后，南京沿江一线建成具有滨江特色、现代城市功能齐全的新市区，成为向苏中、苏北、皖东南辐射的前进基地。

（四）苏州市

1. 园林之城，跨国公司加工制造业基地。

苏州位于太湖东北，市区内外依托空灵秀逸的吴中山水和锦绣江南田园，自古以精巧园林著称。如果说杭州之妙美在天然，苏州则贵在人工。此处集中江南园林精华，有代表宋元明清不同建筑风格和艺术特色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等，而“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城景色以及“吴侬软语”等社会风情，也易使人亲近，近年来每年吸引近 2000 万国内外游客，旅游业发展居全国城市前列。

有 2500 多年建城史，曾以中国的商贸重镇而列入世界名城之列，近百年来商贸衰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苏州以此为资源有选择地发展外向型经济，近十余年来相继建

立15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集中开发面积163平方公里，至2003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50亿美元，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制造业基地。2003年全市GDP2802亿元，居全国城市前列；出口额列全国第3位。

2. 城市空间拓展基本合理，形成"一体两翼"城市布局。

土地开发进度快，城建强度高，已对苏州老城及城市传统风貌造成损害，但未造成很大损害。因城市规划及时，城建布局基本合理。在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时，将是否有利于市民工作与生活置于首位，也作为衡量城市布局是否合理的准则。1992年"依托古城，开发新区（在西翼）"的决策和1994年在东翼辟建工业园区，使东"园"西"区"迅速崛起。这种以文化、环境资源吸引投资的做法实际上推动了苏州的快速发展。同时政府出资百亿元对城市"整容"，以灰、白、黑为主色调，对老城区街巷、运河水网、园林等进行保护与整治，力图展示一座集古典园林、古城墙、古河道、古街巷、古塔、古桥、古建筑、传统民居于一体的江南古城形象。

城建的快速推进与城市布局的改变主要在古城的东西两翼，至21世纪初形成"一体两翼"的城市发展格局，有"现在的古城是昨日的古城，西翼的高新区是今日的苏州，东翼的工业园则是明日的苏州"之说。空间拓展基本合理，历史文化积淀层理分明。近年新城区开发重点向西部太湖之滨丘陵地延伸，使苏州进而向湖滨城市发展。但也有人认为经济的诱惑已造成不少损害，苏州古城已不具备完整性，周边的现代建筑也使古城韵味受到影响。

苏州曾提出以"东方日内瓦"为目标，成为一座会议和休闲城市，近来则提出"绿色苏州、速度苏州、天堂苏州"的口号，今后城市发展将会继续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经济和历史文化之间谨慎前行。

（五）无锡市

1. 城市发展新策略—锡沪联动，错位发展。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无锡与上海地域相近，人缘相亲，两地相融源远流长，故此无锡有"小上海"之称。近二十多年无锡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迄今已形成制造业基地、物流中心和国际旅游胜地。鉴于与上海的密切联系，从21世纪初起，无锡在新一轮发展中，特别注重在城市功能上与上海衔接和互补，基础设施与上海对接，产业上则与上海错位发展，形成特色。2003年全市GDP1901亿元，人均4000多美元。预计到2010年可达8000美元。

2. 城市地理空间扩大，城市布局从"运河时代"走向"太湖时代"。

无锡地处太湖以北、大运河之滨，长期以来依托运河发展工商业，繁荣城市。市区及沿太湖一带又是我国著名风景区，有鼋头渚、蠡园、梅园、锡惠公园等胜景，享"太湖名珠"之誉。已形成环太湖、古运河、吴文化等旅游区，城市文化积淀丰富，文化产业占GDP10%。

鉴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规模增大，建成区面积从1997年的89平方公里增至2002年的164平方公里，预计2005年以后基本形成特大城市框架。与此相适应，无锡城区面积经规划调整，已从1989年的570平方公里扩展至2002年的1658平方公里。城

市地理空间的扩大为城市布局合理化创造了条件。经多次论证，认定无锡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布局应当走出运河时代，走向太湖时代。太湖时代的明显标志是：城市形态沿湖发展，同时构筑完善的生态系统，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和现代化建筑群。未来的无锡应当是内抱蠡湖，外倚太湖，背靠马山、惠山、融湖光山色于一体。为此，已确定对城市布局实施"南进北伸、东整西优"大调动方案，优先发展新城区，逐步改造老城区。最终成为有品位的特大型城市，生态型湖滨城市。

（六）青岛市

1. 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区域性贸易中心和旅游名城。

位于山东半岛南侧，原为渔村，宋、元以后渐为通商口岸，1897年辟为商港和军港，2001年商港货物吞吐量逾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约300万标箱，仅次于上海、深圳，居全国第3位，是我国内地第一个建成的国际集装箱中转港。2003年GDP1518亿元，城市经济规模已取代济南居山东省首位。在城市竞争力方面，青岛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国际化等方面均处于许多城市之前，近年来在信息产品制造、家用电器、海洋生物工程、医药领域出现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知名企业。

2. 重视城市设计，延续历史文脉。

1910年德国人制定的青岛城市规划，将城市布置于胶州湾东侧，以濒临海湾、环境优美的南部为主要市区，建设提督府和德国人居住区，其西部构筑港口。道路系统结合地形呈自由式，其走向也注意以教堂等建筑物为对景。20世纪70~80年代，在旧城区插建一些建筑，对老城区风貌造成很大破坏。90年代起通过立法、规划避免城建对老城区风貌的破坏，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还采用城市设计手法对历史街区制定保护性详规。八大关、汇泉角等8个区域划为历史风貌保护区。

与此同时，1992年开始进行东部新区开发，改变青岛原来南北狭长的城市布局态势，并在胶州湾口西侧的黄岛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保税区。2002年，青岛港也实现大规模西移，不仅有利于青岛港向国际集装箱枢纽大港转换，也有利于实现"以港兴市"战略和城市经济重心西移。2003年进而提出青岛、黄岛、红岛"品"字形城市布局的构想，城建环胶州湾布置。

多年以来，由于依托港口优势，拓展转口贸易，发展港口经济和海洋经济，扩大了陆向和海向腹地，且大力发展临港工业，开拓港口功能，形成港口经济与城市经济互相促进的新格局。跨海大桥建成后，胶州湾两侧新老城区建设布局将实现一体化，生产力布局也将呈现新貌。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国际投资热点地域，并确立了"一园三区三线"的开放格局。一园即高科技工业园，三区即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保税区；三线即胶济、烟青、青黄高速公路干线。至21世纪初，上述地域已成为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布局的主要区域。在外商投资结构中，韩资占57%，逾60亿美元。是中国吸引韩资最多的城市。

（七）宁波市

1. 港口工业城市与经济增长中心。

从20世纪80年代起市区扩大，利用良好区位、优越的深水海岸进行大规模港口建设，同时发展临海工业。迄今已建成包括北仑深水港、镇海深水港、宁波老港在内的大港区，年吞吐货物达1.5亿吨，急速成长为全国第二大港。全市工业产值1985年为89亿元，2002年增至2000亿元。近年来已超过杭州，上升为浙江第一大工业城市与经济增长中心，故有“浙江经济首府”之称。已形成初具特色的三大类工业：(1) 服装、电子元器件等传统行业组成的支柱工业；(2) 炼油、化工、电力、钢铁等临海型工业；(3) 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

20世纪90年代宁波对外开放、开发规模加大，形成以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大榭岛开发区、科技园区等为重点，国家、省、市级开发区梯度推进各具特色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累计引进“三资”企业5000余家。

在工业布局上，以北仑深水港为依托的北仑临海工业带于20世纪90年代崛起，现已形成规模经济。

宁波虽有天然良港，但在区域经济中却因其处于交通网络的末梢而受影响。21世纪初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使浙东、浙北和苏、沪交通格局出现新变化，包括宁波在内的环杭州湾城市群正在崛起。

由于甬沪之间的绕道交通即将变为捷径和坦途，对两市经济文化联系有利。加之历史上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源于宁波，80%的宁波人有上海亲戚，地缘与亲缘对宁波“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皆有利。

2.“老外滩”与历史文化积淀。

城市形象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相比，难以匹配。为此，21世纪初开始重视城市设计和特色城市建筑、布局及城市文化。地处余姚江、奉化江、甬江汇合处的“老外滩”，是闻名遐迩的“宁波商帮”最早发迹之地。这里比上海外滩还要早二十年，它代表了宁波的一段历史，见证了宁波的兴衰。利用此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从2002年起，在老外滩600米长的江岸上建筑未来宁波的时尚地标。通过保存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植入新都市文化，使厚重的历史与发展理念相结合，由文物与旧、渐旧、新建筑等构成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和载体。宁波将拥有“宁波帮”、“宁波装”、“宁波港”、“宁波景”、“老外滩”五张城市名片。

(八) 温州市

浙南经济中心。以传统重商文化、市场经济发展早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的经济结构而闻名全国，也以其地域发展的独特经验而备受国人所关注和争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工业，特别是在农村发展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并以区域性产业集中的地域结构为特色，被称之为“温州模式”。但不久因市场缺乏规范，粗制滥造，一度被称为“假货之都”。90年代至今，按市场规则运作，重建信用，经济发展由粗放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全市经济结构以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民营企业多。温州人善于发现商机，富于开拓，擅长经营管理。温州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从上世纪末起，一些温州知名企业迁往上海等地，易地经营，并带动“温资”进一步向外渗透。据统计，在国内外各地经商的温州人达200万，在外投资额1050

亿元，还有1500亿元民间资金在等待投资机会。

社会收入分配方面，温州的基尼系数较低，收入状况分布相对均衡，这一点也同我国很多城市有所不同。这里也有贫富之差，但相对较高收入和中间收入阶层人数较多，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有利。

应当看到，温州的发展和温州模式，是与其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分不开的，别的地方宜结合本地的地域、文化实情加以借鉴。

五、经济特区

（一）厦门经济特区

1. 全部土地纳入新市区建设。

厦门经济特区位于全国著名侨乡、福建省第二大城市厦门市区。自1981年在厦门岛西北部的湖里地区举办经济特区以来，吸引了海外投资，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层次；特区面积也由原来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整个厦门岛以及鼓浪屿，共计131平方公里。特区内新开辟的湖里工业区、筼筜新市区、鼓浪屿旅游区和厦门富山国际展览城等均已基本建成。其中位于老市区与湖里工业区之间的筼筜新市区，占地15平方公里，已开发成为厦门市的金融和贸易中心。

至2002年，特区实际利用外资130多亿美元，在我国5个经济特区中居第2位（次于深圳）。外资结构中台资占重要地位。特区内城市建成区面积已由38平方公里增至83平方公里。现在厦门岛全部土地131平方公里已纳入新市区建设。

特区的设立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目前，全市经济发展规模、城市经济水平已居福建省前列。已形成化工、电子、机械三大支柱产业，2002年工业总产值1106亿元，GDP648亿元，人均GDP5800美元，预计2005年增至7500美元。

2. 城市功能布局。

在城市功能布局方面，厦门实施"以港立市"的发展战略，按照"国际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总体目标的格局开展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工厂外迁，岛内重点发展商贸、旅游、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工业，同时通过建设海沧大桥，以本岛的第三产业和工业向海沧、杏林、集美三地辐射，加快海沧、杏林投资区、临海重化工基地和新兴港区开发；通过厦门大桥推进集美、同安两区的建设与布局。以上共同构成现代化国际港口风景城市格局，使厦门成为区域性航运中心、商务中心、旅游地和对台经贸交流基地。

3. 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

厦门城市空间布局过于集中于岛内，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优化。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应有更大的腹地为依托；要成为区域中心城市，还应与周边地区在功能和产业上进行新的分工。为此，必须将城市建设重心从岛内转向岛外海湾地区，促进厦门城市沿着海岛—海湾—海洋演化拓展，更有效利用厦门优良的港口、优美的滨海景观、丰富的海洋资源，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集聚辐射力。

4. 发展方向：自由贸易区。

厦门经济特区辟建二十年，已形成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软、硬件皆已具备。同时，已确定并部分建设了与内地的隔离线，逐步实施人员、货物、资金的进出自由。在我国入世后，有条件行使国际自由港功能，可望发展成为我国内地首批自由贸易区。

（二）浦东新区

1. 双重性质的开发区。

位于上海市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的三角形地域。1990 年经国家批准设立，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区域之一，以外向型、国际化为发展目标，实行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

浦东新区面积 533 平方公里（含填海地），其中实现城市化地域面积已扩展到 100 平方公里，人口也增至 253 万（2000 年）。这里靠近浦西老市区，又因直接临海临江（长江），不受黄浦江水面狭窄之限制，有良好的建港和水运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已在北部的外高桥新建港口区，并依托港区在其南面分片开发出口加工区和外商投资区，主要发展技术先进和产品档次较高的出口产品，并配合出口加工区的建设，设立保税区，形成转口、储运中心。另外，在浦东新区西侧紧靠浦西的陆家嘴一带，重点发展金融、贸易、商业、房地产、信息等现代服务产业，并使其成为浦东新区的黄金地段。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五年，浦东开发主要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建成南浦、杨浦、徐浦大桥及南北快速道路和一批万吨级海轮泊位，改善了投资环境；90 年代后五年，浦东开发进入了功能性开发阶段。为此，国家已赋予浦东新区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允许向国内省市开放外资市场，向外商逐步开放外贸市场，向外商适度开放金融市场，以及允许外高桥保税区全面启动除零售业务以外的商业经营活动。以上这些，已经给浦东新一轮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先进生产力聚集地。

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开发小区的发展均已形成规模，成为上海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一系列功能性措施的推出和实施，已使浦东开发向功能开发的深层次推进。其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首期 6.8 平方公里土地上，至 2002 年已有 123 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入驻；张江高科技园区至 2003 年完成 12 平方公里开发，累计引进项目 856 个，引资 100 多亿美元，中外企业在此设立的研发机构逾 150 家，初步形成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产业链，已发展成为我国内地三大高科技园区（中关村、张江、深圳）之一。

由于注重投资环境的改善，加之区位有利，对外资吸引力增强。到 2001 年，浦东新区累计引进独资、合资项目 7192 个，总投资 370 亿美元，占上海利用外资总额 46%；同时吸引内资项目 5000 多个。内外资相继注入，使浦东新区的外贸出口额已占到上海市的 40% 以上。

3. 对上海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及布局的影响。

浦东新区的开发，加快了上海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布局及城市建设的展开，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促进上海成为国际性的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进而带动

长江三角洲及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为使浦东新区得以持续发展，近年来兴建以航空港、信息港和深水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其中国际航空港（浦东国际机场）位于浦东新区的东南角，占地 20 平方公里，至 1999 年建成通航，已成为浦东新区的空运门户，并成为上海第一大国际航空枢纽。

浦东新区在近十余年内崛起，对上海、长江三角洲以及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

六、主要开发区

（一）对外开放、开发概况

华东地区对外开放较迟，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本区开放、开发程度及效益等方面均不及广东甚至华南沿海的一些城市。此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相继形成全方位与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态势，开发效益良好。到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有实力的投资商（特别是跨国集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后多首选上海和江浙，看中这里的市场辐射力和制度环境。另外，较多的国际航班、国际银行，完善的基础设施及众多高、中档人才，以及由中部地带流入到此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均为吸引投资的重要条件。

（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华东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增至 21 个，占全国同类开发区总数的 44%。其中：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闵行、虹桥、漕河泾、宁波、福州等 9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于 1984 ~ 1988 年批准设立；威海、昆山、杭州、萧山、温州、融侨、东山、芜湖等 8 个开发区分别于 1992、1993 年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则于 1995 年正式开园。

经济技术开发区同经济特区一样，也是吸收利用外资的重点地域。它同经济特区的区别在于：经济特区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而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是所在城市政府领导下实行某些特殊政策的外向型区域，且范围通常较前者要小；从其经济构成来看，特区通常是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综合性经济，而开发区则以发展先进的工业与科技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主要依托所在城市，必要时也可在区内设金融、商业、仓储、运输、生活设施等，但主要是为本区域的需要服务。

1. 苏州工业园。

设立时间晚、发展快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苏州古城以东、金鸡湖畔，北靠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南临娄江、吴淞江等内河航道，水陆交通便利。由中国、新加坡两国合作开发，是两国政府间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

园区占地 70 平方公里，其中已开发的 1 区紧靠苏州古城，占地 12 平方公里，正建成一个以工商业为主体、包括金融业和旅游业的中心区；2 区占地 24 平方公里，与 1 区共同环绕金鸡湖分布；3 区靠近昆山、上海、占地 27 平方公里，将建成一个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加工业基地。全部建成后，园区将成为一座拥有 60 万人口的新型工业城区。

20 世纪 90 年代设立园区时总资本 3 亿美元，双方共同承担园区规划区内的成片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引资。园区自主、选择性地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与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招商措施包括：(1) 低地价（2000 年以前每平方米 58 美元，2001 年起 30 美元以下）；(2) 在设立企业与税收方面提供特殊优惠措施等。

由于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高起点和环境保护高标准，首期开发面积每平方公里基础设施投资达 6 亿元人民币。

2001 年起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简化投资程序，同时设立直通式进出口货物分流中心，将口岸功能延伸至园区，并单独设置海关、保税仓库（海关监管），对园区的进出口货物实施快捷有效监管。另外，园区所依托的母城投资环境（尤软环境）良好，有足够吸引力。1994～2004 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160 亿美元，名列华东与全国前茅，主要投资商（除台商外）来自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地。

2.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5 年自费设立。东邻上海，西接苏州，京沪铁路、312 国道、沪宁高速路通过。以前是经济单一的农区，主要靠土地招商，引进项目；利用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主动接受经济辐射。开发面积约 20 平方公里，在资金、技术、人才、产业方面产生良好聚集效应。至 2002 年 6 月，累计人区外资企业 865 家，合同外资 70 亿美元，实际到位 32 亿美元，客商主要来自欧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IT 产业为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 IT 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区内有几个不同特色的专业园区：科技创业园、出口加工区、微电子工业园、国际商务区、日本工业园等。近年来，昆山开发区的一些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并成为拉动昆山经济发展的龙头。

3.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处青岛市黄岛区，与青岛老市区隔海相望，相距 4 公里。开发区建于 1985 年，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和发展，现已发挥集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于一体的优势，实际开发 20 平方公里，并形成新城市建成区。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其地域范围又扩展至黄岛区全境，在胶州湾西岸一带业已形成新市区。区内人口增至 20 万。至 2002 年，开发区累计批准利用外资项目 1300 多个，实际利用外资 20 多亿美元，形成家电、电子通讯、石化、物流等主导产业体系。

4. 漕河泾开发区率先完成开发，借地发展。

上海市内同期开辟的三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域狭小，规划面积闵行、虹桥、漕河泾分别为 3.5、0.65 和 5 平方公里，其中：漕河泾开发区人区企业多属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无污染型的，经过十多年开发建设，已形成微电子、光电子、计算机及其软件、新材料等四个支柱产业。在我国首批 1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漕河泾开发区到 1996 年已率先基本完成开发，2002 年以后借地发展，已选定闵行区浦江镇，建设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

闵行开发区至 2001 年底累计引进项目 154 个，吸引外资 21.74 亿美元。3.5 平方公里开发区内每平方公里销售收入逾 50 亿元，居全国各开发区前列。

（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苏州、无锡、常州等高新区，都是依托各自母城的环境资源与经济基础而发展壮大，成为其共同特点。

苏州高新区地处苏州市老城区以西，1990年启动建设，1992年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占地52平方公里。坚持引进高新技术，优化利用外资，并因良好投资环境而发展迅速。至2002年已有外资企业600余家人区，总投资65亿美元，进出口总额逾75亿美元，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位居前列。还是我国内地首家实施区域性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开发区，因环境质量改善，亦为首家“国家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园”。

由于高新技术开发与城市建设协调，实施“高新区、开放型经济聚集区、现代化新城区的三位一体”建设方针，现已建成的“真山真水园中城”（即苏州高新区）是苏州市城建现代化的象征，并与“假山假水城中园”的古城区互为对照。

无锡高新区位于市区东南，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经此，是上海—苏州—无锡城市连绵带一部分。已有300多家外资企业进人，投资额约30亿美元，开发面积由原来的10平立公里扩展到22平方公里。一些跨国公司已将生产基地和部分产品的研发基地迁此。现已形成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及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及医药、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等5个支柱产业。

常州高新区地处市区外环路以北，建区十年累计投入35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于本区可发挥其地理优势，在沪宁之间、长江南岸开发与布置理想的物流基础；另外，开发区自身的基础建设也很到位。至2002年累计引进外资企业545家，利用外资30亿美元。

（四）保税区

在华东地区境内现有厦门、青岛、张家港、上海外高桥、宁波和福州6个，分布于本区沿海的4个省市。

外高桥保税区于1990年设立，是我国内地创建的第一个保税区。位于浦东新区，濒临长江口，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由港口、仓储区、加工区、贸易区等功能小区组成。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对外辐射可利用上海港的新、老港区和浦东国际机场等航海、航空设施，与世界各地往来便利；对内辐射则可使用多种交通工具，直通全国各地。已建成并实行封关运营的地域超过5.5平方公里，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2672余家企业投资，投资总额达32.7亿美元。保税区进出口和转口贸易总额早在1996年即已超过10亿美元。保税区功能得到初步发挥。

第十一章　中南地区经济

依托地缘优势、对外开放先发优势而激活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南地区，土地占全国10.6%，人口占全国28%，经济发展快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总量超过华北、东北而居全国第2位（仅次于华东），制造业崛起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很大。

但是，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对本地区（尤南部）陆、海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不容忽视，需改进经济发展模式，以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外，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文化与科技滞后已日渐显现。应在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如珠三角）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形成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优化城乡空间结构。

第一节　区位因素有利

本区位于我国中部偏南一带，地处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以及号称“中州大地”的河南和“九省通衢”的武汉，都在这一地区。

全区轮廓南北狭长，南北跨越纬度32度，直线距离3500公里以上。其中在大陆上跨越的纬度也有16度，距离1800多公里。上述地域特征，使本区具有多种气候和水热资源条件，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兼而有之，它们对区内不同自然地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不同的自然地带里，可以建立起多种类型的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促进了农业多种经营发展。

地处本区最南部的海南省，由于气候与水热资源的特殊有利条件，一直作为内地一些省区的良种繁育基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农业部与海南省联合建设全国最大的“海南国家南繁种子基地”。

自然条件复杂，还表现在地表形态上：自北至南依次有黄淮平原、桐柏—大别由地、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江南丘陵、南岭山地和珠江三角洲，为本区农、林、牧、渔业的综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个别地区外，各平原一般土壤肥沃，河流和灌溉渠道纵横，是大面积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理想之地；丘陵低矮，坡度甚缓，适种经济林木。

中南地区南部濒临辽阔的海洋，海岸线长达9200多公里，占全国大陆、岛屿海岸线总长的27%。沿岸一带有众多的优良港湾，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还有其他一系列岛屿，星罗棋布地散布于南海海域。南海不仅在我国内地边缘的四大海中居首位，而

且也是世界第二大陆缘海，为欧洲—远东航线的必经之海，海中和海底资源丰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南海北部大陆架已发现有3个含油气盆地（珠江口、北部湾、莺歌海盆地），有的油井已投入商业开发。至90年代中期，南海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海上产油区。上述有利的临海条件和海洋资源，对本区工业以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发展水产业的条件亦有利，兼有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鱼类，近十多年来随着渔船冷藏技术的改进，加以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海洋水产品数量逐渐增长。其中广东省的海水、淡水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但是，多年来的捕捞强度过大，已造成传统渔场海底生态环境出现荒漠化趋势，使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从21世纪初开始在广东沿海已投放大量人工渔礁，为各种鱼类觅食和繁衍提供良好场所。

本区陆上江河纵横，湖沼塘堰很多，利用这些水面发展淡水渔业的潜力也很大。河、湖密布的湖北省，淡水鱼类产量已增至居全国首位。此外，拥有洞庭湖以及湘、资、沅、澧四水的湖南省北半部，为珠江水系所贯流的广西、广东东南部以及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均为发展淡水养殖的理想之地。

上述水网地带除可发展淡水养殖业以外，还可用于灌溉、蓄洪、工业用水、发展水上运输、开辟水上旅游点等，昔日“鱼米之乡”的概念，如今已扩大了。

在本区地下还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其中，有色金属储量大，锑具有世界意义，铝、钨、铋、铅、锌等具有全国意义。在此基础上，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得以发展，在全区工业结构中占有突出地位。湖南有色金属早已开发，广西红水河右江有色贵金属资源集中区则已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加强勘查与开发利用的矿产基地。另外，本区还有丰富的水力和能源矿物（石油、煤）以及较丰富的黑色金属（铁、锰），为发展钢铁、化学工业提供了原材料和动力。

第二节　粮、棉、油、糖、热带作物综合开发

作为我国农业发达的地区之一。中南地区人均耕地已减少到不足0.06公顷，总的来说是人多田少，管理精细，生产水平较高。在占全国五分之一弱的耕地上，获得占全国四分之一的农业产值。耕地复种指数高，广东复种指数平均高达233%，从南向北递减，全区平均19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另外，生猪饲养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

由于本区在纬度位置上的优越性，境内又有大面积的平原、盆地和低山丘陵，四大水系（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和众多湖泊塘堰分布其间，降水充沛。所以，水、热资源丰富，加上历史上开发较早，成为我国农业发达的地区之一。

本区农业的竞争力与外向度也有较大提高，尤其是华南沿海许多地方初步具有农业

投资多元化、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农产品特色化、农业企业化等现代农业的特征。

农业生产的构成较复杂，部门繁多，许多部门在全国也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地区是中国水稻、棉花、油料、茶叶、蚕丝、麻类和水产业的重要基地，蔗糖和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尤有得天独厚之利，居全国首要地位。主要农产品在全国所占地位，如图表11－1所示：

图表 11－1　　中南地区主要农产品在全国所占地位（2002 年）

产品名称	产量占全国（%）	第几位	同其他大区比较
稻谷	37.2	1	
芝麻	56.4	1	
黄红麻	59.1	1	
苎麻	62.6	1	
柑桔	42.3	1	
香蕉	83.6	1	
菠萝	92.6	1	
橡胶	62.3	1	
甘蔗	73.1	1	
淡水鱼类	44.3	1	
肉猪出栏头数	33.5	1	
花生	38.7	2	次于华东
烤烟	27.1	2	次于西南
茶叶	27.0	2	次于华东
小麦	26.8	2	次于华东

一、我国最大的水稻产区

中南地区粮食作物的构成以水稻为主，稻谷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播面积的一半，而产量占近三分之二。全区除河南北部和东部外，水田面积所占比重通常都较大。在各河流的冲积平原，大小山间盆地，以及水利灌溉条件较好的山坡地，差不多都已开辟成水田，全国水田的三分之一集中于此。而这些水田中，又有相当多一部分是种植双季稻的。双季稻作比例之高为我国其他各区所不及。湘、粤、桂3省（区）早稻产量在全国务省区中分别居第1位、第2位、第3位，而晚稻产量分别居第1位、第2位、第4位，成为我国最大稻谷产区。2002年，仅湖南一省的稻谷产量即达2119万吨，居全国首位。中南地区的小麦生产也占重要地位，仅河南一省的小麦产量即达2248万吨，居全国之冠。

目前，本区北部的黄淮平原是小麦的集中产区，间以杂粮、豆类；中部的长江中游地区盛行水稻连作和麦稻轮作；五岭以南则主要为双季稻、冬小麦或绿肥的一年三熟制，个别地方（如海南岛）有三季连作稻。按产量计算，洞庭湖平原、湘江和资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珠江流域、江汉平原为稻米主产区，而河南省则是小麦主产区。

二、甘蔗、棉花和油料的重要生产区域

本区南部两广一带是我国甘蔗生产基地。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对甘蔗生长十分有利，甘蔗含糖率（12%～15%）和单产都比较高。

广西现为植蔗业最发达的省区，2002 年甘蔗种植面积增至 67.1 万公顷，已远远超过广东（17.2 万公顷），居全国第 1 位。广西蔗田主要分布于自西向东贯流的河流两岸，如郁江、右江、柳江等流域一带。广东植蔗业在 1993 年以前一直居全国首位，后因蔗田面积减少而地位下降。

棉花的分布同甘蔗相反，主要集中于区内北部和中部偏北一带。这一地区历来是我国重要的产棉区之一，棉田面积超过 120 万公顷，棉花产量近占全国三分之一。棉田集中分布于河南省北部和东部，湖北省的江汉平原以及湖南省的洞庭湖沿岸一带。其中，河南棉区属于黄河中下游棉区的一部分，夏季气温高，有利于棉花的生长；秋季雨水少，晴天多，对于棉花的后期生长和收摘也甚为有利。

本区油料作物具有种类多、分布广、产量大的特点。其中芝麻集中分布于河南、湖北，产量分别居全国第 1 位、第 2 位；花生以河南、广东居多；油菜籽的种植则以湖北、湖南最为普遍。

三、全国热带经济作物基地

热带经济作物系生长于热带的工业原料作物或具有特殊用途的作物，包括橡胶、椰子、油棕、芒果、腰果、剑麻、香茅、咖啡豆、可可、胡椒、槟榔、金鸡纳、广藿香等。在本区南部即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湛江附近，广西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以及玉林市南部，地处低纬，具有终年湿热的热带季风气候特征，为大面积种植热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南地区的热作以橡胶、椰子、腰果、油棕、芒果、剑麻、香茅草和胡椒等较为重要。其中，海南省和广东省的胶园已扩大到 40 万公顷以上，胶园面积和干胶产量均占全国 60%以上。由于这一地区橡胶生产的迅速发展，使我国已成为世界主要产胶国之一，植胶面积和干胶产量分别居世界第四位和第五位。

第三节 能源与轻、重工业协调发展

一、世界最大的水电基地，“三峡”最优水位方案选择

中南地区能源工业发展迅速，能源结构比较合理（清洁能源水电比重较大），有力地支援了经济的发展。

水力资源丰富，水电建设规模大，是本区能源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湖北、湖南、广西水能蕴藏丰富，其中湖北西部山区，尤其是长江三峡、清江、汉江上游一带，湖南沅水、资水中上游，广西红水河流域，均为水力资源宝库。加上区位有利，在全国版图上处于基本适中位置，且接近主要负荷中心及电力市场，故成为国家优先投资开发的场所。

利用上述有利条件，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陆续在本区兴建葛洲坝、丹江口、隔河岩、高坝洲、水布垭、三峡（以上在湖北）、东江、凤滩、柘溪、五强溪、凌津滩、江垭、洪江（以上在湖南）、新丰江、枫树坝（以上在广东）、西津、大化、岩滩、天生桥二级、天生桥一级、龙滩、恶滩、平班、百色、长洲（以上在广西）、三门峡、小浪底（在河南）等一系列水电站：其中80年代建成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及二江、大江电厂的总装机容量272万千瓦，年发电157亿千瓦时。

三峡水电厂（湖北宜昌三斗坪）始建于1994年，2003年起发电，26台70万千瓦机组（左岸14台、右岸12台）相继投入运行，总装机1820万千瓦，当三峡水库蓄水位在2009年达到175米高程时，年均发电847亿千瓦时，为当今世界第一大电站。三峡电力市场主要为华中、华东、广东，通过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6519公里、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2965公里向上述电力市场供电。

三峡水库是在狭长的峡谷型河道建筑高坝，故水库仍保持天然河道形状，只是水位上升水面加宽。蓄水后，沿江居住的大量人口需迁移。因移民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蓄水位方案论证数十年之久。水位高，经济效益也高，但淹没损失大，移民问题复杂。通过150米、160米、170米、180米、200米等不同蓄水位方案比较，最终选择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为最优水位方案，兼顾防洪、航运、发电效益。三峡工程，从设想到现实，历时近九十年。

21世纪初，在广西天峨县境内开始建设的龙滩水电站，系红水河的龙头电站，也是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程。2007年以后9台机组相继投入运行。电站装机容量63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187亿千瓦时，电力主供广东。

上述一系列水电站建成后，在本区西翼形成世界最大的水电基地，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布局改善，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与布局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煤，也是本区的重要能源，而且地理分布与水电恰成互补态势，以河南省境内最集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该省水力资源之不足。2002年产煤9900万吨，占中南地区原煤总产量的五分之四，其在全国的地位，也由20世纪70年代的第4位，上升到现在的第3位。煤田主要分布于豫西，绵延三十余县，储量丰富，且煤种配套。素称“中原煤仓”的平顶山，是本区开发的第一个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田面积714平方公里，保有储量76亿吨，年产商品煤2200万吨，主产焦精煤、肥煤、筛混煤等，供销中南、华东11省市及武钢等1000多家企业，并出口韩、日等国。洗煤能力每年1200万吨，是中南地区最大炼焦煤基地。但平顶山矿浅层资源接近枯竭，需开发深层资源。此外，本区主要煤矿还有河南焦作（无烟煤）、鹤壁（焦煤）、义马、郑州、永城等。

在煤炭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先后建设了一批火电厂。厂址多选择在大、中城市或煤炭产地附近和靠近水源或为交通枢纽的地方。如东莞沙角发电厂A厂、C厂、黄浦发电厂、华能岳阳电厂、河南沁北电厂、南阳鸭河口电厂、平顶山姚孟电厂、焦作电厂、韶关电厂、襄樊电厂、武汉阳逻电厂、汉川电厂、广州发电厂、黄石火电厂、广西合山电厂、云浮市发电厂、茂名热电厂、湖南耒阳电厂、石门电厂、益阳电厂、海口电厂等。其中平顶山姚孟电厂为全国7大火电基地之一。从该电站至武汉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线路，是全国最早建设、电压等级最高的输变电线路，1981年投入运行。河南亦已成为全国重要火电基地，至2001年全省火电装机1600万千瓦，成为本区火电生产与消费第一大省区。

目前，在本区北部的华中电网内，已建成的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线路有：平顶山—武昌、葛洲坝—双河、葛洲坝—武昌、葛洲坝—上海、葛洲坝—常德—株洲等；在建的有三峡电站15回500千伏电力送出线路。华中电网已成为我国超高压输变电线路分布最密集、功率强大的电力网之一。另外，在中南区南部，原来没有建设跨省电网的广东、广西，也已与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联成“南方电网”。已建、在建多条500千伏输电线路将桂、黔、滇电力输送广东，至2005年可达1000万千瓦。鉴于广州到深圳一带缺电较多，还在深圳经济特区东侧大鹏半岛的大亚湾畔，新建两座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前者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亿千瓦时，已于1994年开始运行，除向广东供电外，还向香港提供电力；后者也已于2002年开始并网发电。

近十多年来，本区另一种重要能源——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发展迅速。中原油田前称东濮油田，位于河南东北，以濮阳为中心，称为“东濮凹陷”，地质复杂，开采难度较大，但油田经济地理位置有利，介于中南、华东、华北之间，地处中原大地，便于修建运输干线，故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得到开发，到90年代因后备储量减少而使产量下降。

南海北部（含北部湾）大陆架上的海底油田从1985年开始投入商业开发。此后，这一大片海床备受中外石油公司重视，探明油气储量增加，商业开采规模迅速扩大。至1997年，以蛇口为基地的南海东部油田年产1300万吨以上，成为本区也是全国最大的海上石油与天然气生产基地，并已成为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开发主要场所。

二、“有色金属之乡”

本区有色金属资源品种多，储量丰富，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是本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也是地区工业专门化的主要方向，被称为我国的“有色金属之乡”。随着一批大型水、火、原子能电站的兴建，电能供应充裕，加上冶炼技术改进，使有色金属采、选、冶能力继续提高。中南地区有色金属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如图表 11－2 所示：

图表 11－2　　中南地区有色金属工业在全国的地位（2000 年）

主要有色金属及有色金属材料	产量占全国第几位	备　注
锑	1	占全国 81%①
铅	1	占全国 61.2%
锌	1	占全国 46.8%
铝	1	占全国 26.4%
铝材	1	占全国 37%①
日用精铝制品	1	占全国 41%
钨	2	次于华东
锡	2	次于西南
镍	2	次于西北
铜材	2	次于华东
铜	3	次于华东、西南

①1997 年统计数。

资料来源；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1》资料计算编制。

在全区有色金属资源中，按其储量丰富程度、开采规模大小以及在国内和国际上的重要性来看，主要有锑、铅、锌、锰、钨、锡、铜、铝等。

锑的储量居世界首位，生产居全国首位，出口量占全国一半以上。主要集中于湖南冷水江市的锡矿山。这里自 1892 年正式开采以来，产量一直居世界前列，因而有“锑都”之称。该矿地处资水上游，矿体分布在矽化灰岩中。锑矿石开采后，冶炼成精锑经冷水江外运。冷水江市是在锑矿转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

铅锌开采以湖南常宁水口山规模较大，曾有“中国有色第一矿”与“铅都”之称。所产铅锌矿砂沿京广铁路北运至株洲冶炼，株洲冶炼厂现已形成铅锌铜电解 16 万吨的生产能力。

钨矿开采分布于粤北始兴石人嶂和湘南资兴、宜章交界处的瑶岗山等地，作为湘南经济中心城市的郴州，则是适宜发展冶炼之地，近年已建成现代精炼企业。

广西锰、锡储量分别居全国第 1 位。锰主要分布在桂东南的桂平、来宾和钦州一

带，这里也是中南区的三大锰矿区；锡矿开采集中于桂西北的南丹、桂东北的富川、钟山、贺州、恭城等地。

河南、广西平果是铝资源主要富集地。河南省氧化铝、电解铝产量均占全国第1位，2003年氧化铝产量约140万吨，近占全国24%，建有全国最大的铝氧厂，该厂正在进行扩建，预计2005年生产氧化铝逾200万吨，将成为世界级氧化铝生产基地。

广西平果铝基地（一期）于1995年建成，二期正在建设，平果成为中国第七个氧化铝基地。平果所在的百色地区铝土矿储量7亿吨，居全国第2位，远景储量逾10亿吨，占全国27%；且品位较高，埋藏浅，适宜露天开采，加之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丰富，铝土矿与廉价电能相结合，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上述有利条件已引起国际投资商重视。2004年美国铝业公司经实地考察后看好广西铝业发展前景，拟同“中国铝业”联手，注入12亿美元共同建设平果铝基地，再注入8亿美元开发配套水电。

平果铝基地按规划将发展成为年产250万吨铝精矿、120万吨氧化铝、30万吨电解铝、10万吨铝材的综合生产能力。

三、以武汉为中心的钢铁工业

武汉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附近黄石、大冶、鄂城一带的铁矿是武钢的矿石基地；大冶附近还有锰铁共生矿、石灰石和白云石，是钢铁冶炼中不可缺少的辅助材料；炼焦煤也可就近从邻近的河南平顶山取得。

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武昌青山区建设武钢，70年代起引进新技术，建成1700毫米热连轧机，近年完成“平改转”，在建2250毫米热连轧机、2800毫米中厚板轧机。生产板材为主，产品有热轧卷板、中厚板、大型型材、重轨、高速线材等200个品种，用于船舶、汽车、桥梁、机械制造、军工、管道、建筑等行业。已形成年产生铁约800万吨、钢800万吨、钢材600万吨。产能居全国第3位。

除武汉以外，在河南安阳、湖北大冶、鄂城、汉阳、湖南湘潭、娄底、广西柳州、广东韶关、河南舞钢、洛阳等地，还分布着一些钢铁联合企业或独立的钢厂。其中，由湘钢、衡钢、涟钢联合组建的华菱集团，钢的生产能力已增至700万吨。

四、以汽车制造为主的机械制造业

本区有色金属、钢铁业的发展，为机械制造业提供了原料，而区内所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又为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开辟了市场。

十堰市以生产运货汽车、乘用车闻名。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于1966年选址武当山北麓建设，后形成年产汽车25万辆产能。从1990年代起向外扩张，十堰—襄樊—武汉已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汽车工业带，是全国载重车、轿车生产基地之一。至21世纪初形成重、中、轻、轿等宽系列、多品种的产品格局。东风集团产能51万辆。

2003年，“东风”与“Nissan”在武汉组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7亿

元（2400 亿日元或 20 亿美元），各持 50%股份。预计 2006 年销售量 55 万辆，其中乘用车 22 万辆、商用车 33 万辆。另外，中法合资“神龙公司”也以武汉为基地，并将把产能由年产 30 万辆扩大至 40 万辆。

其他运输机械制造，株洲电力机车厂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电力机车生产基地，所产干线电力机车主供南方各省。

动力机械制造在全国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有武汉锅炉厂、柳州动力机械总厂、湖南省动力机厂等。此外，在广州、湘潭、开封和郑州也有动力机械制造企业。湘潭电机厂为著名的电机生产中心之一，从 2001 年起成为城市轻轨车生产基地。

为适应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和冶炼之需，本区还建设了一批制造矿山、冶金设备的企业。如衡阳有色冶金机械总厂可制造有色金属矿山所需的大型成套设备，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有色冶金机械厂。在农业机械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即在洛阳建成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拥有年产大型拖拉机 1.5 万台的生产能力，在全国同类企业居首位。

五、电子信息产业形成规模效益

以深圳、东莞、惠州、佛山、珠海为基地的广东省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家用电器、精密机械制造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发展迅速，并已在全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如微型电子计算机、电脑资讯产品、电子计算器、电脑零部件、打印机、光盘驱动器、电脑主机、电脑主板、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收音机、收录放机、照相机、钟、表、家用电冰箱、电风扇、程控交换机、电话单机、传真机等的生产量和销售额均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有些产品的产量竟占到全国总产量的半数以上。

至 2001 年，广东电子信息产品年产值达 3000 多亿元（其中深圳 1580 亿元，东莞 770 亿元），连续十年居全国第 1 位，成为全球最大的硬件生产基地。深莞产业走廊是目前全国 IT 产业布局集中度最高之地。

2001 年广东省各类电脑产品出口总值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增至 31%以上，已取代服装、玩具等传统产品，成为出口贸易的支柱产业。但广东电脑产品出口中绝大多数仍属于加工贸易出口方式，并非拥有自主版权的电脑产品。

目前，广东不仅已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基地，而且已成为其研究和发展中心。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区工业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十分重要。中南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制造业产品在全国的地位，如图表 11 – 3 所示：

图表 11－3 中南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制造业产品在全国的地位（2000 年）

主要产品	产量占全国第几位	备注	主要产品	产量占全国第几位	备注
表	1	93.9%	电脑资讯产品	1	
照相机	1	64.3%	彩色显像管	2	次于华东
传真机	1	56.1%	空调器	2	次于华东
程控交换机	1	50.8%	家用电冰箱	2	次于华东
电话单机	1	80.6%	家用洗衣机	2	次于华东
电风扇	1	88.7%	自行车	2	次于华东
原电池	1	52.4%	移动通信设备	3	次于华北、华东
数字程控交换机	1	50.7%	微型电子计算机	3	次于华北、华东
组合音响	1	80.4%			
彩色电视机	1	39.8%			

资料来源：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1》资料计算编制。

六、有机化工崛起

现代化学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在中南地区仅有二十年历史，但技术水平一般较先进。海南省东方市的天然气化工厂，拥有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52 万吨大颗粒尿素生产能力；此外，还相继在茂名、岳阳、广州、洛阳、荆门、武汉、深圳、长沙、宁乡等地建成一批大、中型炼油和石油化工企业。其中，“茂名石化”炼油能力达 1350 万吨，21 世纪初将提高到 1800 万吨、乙烯年产能力 80 万吨。正在创建的茂名石化工业区定位于石油、乙烯的后续加工和下游产品开发，形成石化产业群。随着茂名—贵阳—昆明输送成品油管道的建设，“茂名石化”对支援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作用也在显现。

而由岳阳石化总厂、长岭炼油化工总厂、洞庭氮肥厂等 4 家石化企业联合组成的巴陵石化公司，则已发展成为中南地区重要的油、化、纤、肥生产基地和湖南省最大的经济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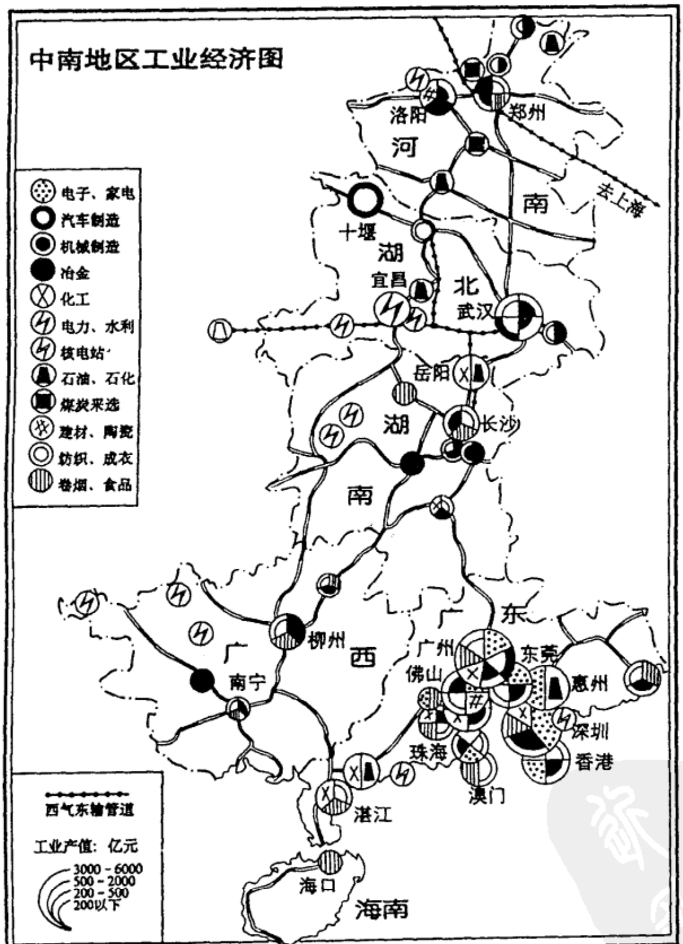
随着南海和北部湾海上油气田相继投入商业开发，进口原油也较近便，而需求旺盛，促使本区沿海的石化、天然气化工得以迅速发展，其布局大有变化。如地处海南省西缘的东方市，原来经济落后，化工布局更是空白，但附近海域油气资源开发后，已建设成为大型天然气化工基地。

21 世纪初，粤西湛江市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引来更多投资。这里处于华南三省区通衢之地，紧靠国际商业航线，坐拥国家深水良港（湛江港），无论是获取国内、外石油生产基地的原油还是进口油，均为最佳区位。加上附近辽阔的丘陵地，可满足石化企

业占用大片土地之需，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均拟投巨资或扩资在此建立石化基地，并成为华南发展临海重化工业的重点。

2002 年开始在惠州建设“中海壳牌南海石化”，系由英荷壳牌与中海油合资兴建，包括 80 万吨乙烯在内的 12 套生产装置，主产乙烯和乙烯衍生产品。

中南地区工业经济图，如图表 11－4 所示。



图表 11－4

七、布局大调整的制糖业

广西、广东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发展制糖工业具有得天独厚之利。目前，制糖工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工业部门。

糖业布局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转移：（1）90年代初由广东向广西转移，后者取代前者成为全国第一大蔗糖基地；（2）90年代后期在广西内部由桂东、桂东南向桂中、桂西地区转移。促使上述布局变化的原因，除偶发性的大霜冻（1999年）以外，关键是生产成本等市场因素在起作用。

广东糖厂布局原来集中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的番禺、顺德、中山、江门、斗门等地，现改为主要集中分布于粤西湛江地区。

在我国制糖工业发展史上，广东曾长时间占据第1位，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广西超过。广西1999年产糖374万吨，居全国第1位。制糖工业中心主要分布于郁江流域的贵港市和南宁、崇左、扶绥、柳城、桂平、合浦等地；海南省制糖业中心主要分布于儋州（那大）等地。

第四节　完善南北通道

一、陆经水纬

在中国版图上，本区居中而又南北狭长的区位特征，使之成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带。在这一地区，大体上呈南北走向的陆运（铁路、公路）干线和呈东西流向的内河航道，犹如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一般，组成了一幅布局奇特的综合运输网。

二、经向陆路构成我国南北交通主轴

在铁路交通方面，地域狭长的中南地区是国家南北向铁路干线的主要途径地，在全国四条最重要的南北干线中有三条（京广、京九、焦柳）纵贯本区，担负我国南北物资交流和长途客运业务。加上区内其他线路，全区铁路营业里程9639公里，京广、陇海两线于郑州相交，成为全国铁路交通的“十字路口”。已对郑州铁路枢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郑州北编组站担负着京广、陇海两大干线的货物列车集散改编，年通过货物量占全国铁路货物的8%，设计能力为每天2.4万辆，不仅是本区也是全国大型编组站之一。

按线路通过能力和货流密度衡量，本区铁路中以京广线（2298公里）最重要，它

是本区也是我国最早兴建的铁路之一，是目前我国最长的双线电气化铁路，亦为全国客、货流密度最高的铁路主干道之一。京广线纵贯全区，并以此构成全区经济技术协作的运输中轴。

作为京广线延伸的广深线，则以行车速度快、列车开行密度大而著称。全线行车速度已增至每小时200公里，且运行实现公交化，列车开行密度每9分钟一趟，是穗、深两座特大城市以及香港同内地之间客运交通的主干道。

20世纪70年代建成通车的焦枝、枝柳铁路，也合称焦柳铁路。它与太（原）焦（作）铁路联成一体，成为与津沪、京广线平行的纵贯我国南北的第三条铁路大干线，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北煤南运、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和内地建设有很大作用。

地处我国东、中部地带结合部的京九铁路，是近年建成的我国第四条南北大动脉，主要通过本区北部豫鄂2省东翼及南部的粤东；而新近建设的洛湛铁路（洛阳—石门——益阳—娄底—邵阳—永州—岑溪—湛江）则是我国又一条纵向铁路大干线，它处于我国中西部地带的结合部，主要通过本区北部豫鄂2省西翼、湘中、桂东，与焦柳、京广、京九等共同构成纵向铁路网骨架，也是我国中西部地带通向湛江、北海等华南深水港口群的重要出海通道。

2003年开通的粤海铁路通道，是为改善我国铁路建设与布局的重大项目。该线由湛海线、海南西环线、琼州海峡铁路轮渡三部分组成，全长543公里。年输送能力货运1100万吨，客车8对；跨越琼州海峡段因海宽水深，架桥或凿通隧道投资太大且技术难度高，故采用火车轮渡方式通过，长24公里。粤海铁路通道建成使海南铁路与全国铁路联网，对完善海南省及广东雷州半岛的综合运输体系，促进海南经济特区和粤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南海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南地区的东西向铁路干线，原本只有陇海线，沿黄河南岸通过，联系河南省洛阳、郑州、开封三大城市。后陆续修筑汉丹、襄渝及湘黔铁路，成为第二、三条东西向干线。其中，汉丹和襄渝线相连，将长江中、上游两大城市——武汉和重庆从陆上联成一体，使历史上“川汉铁路”的设想变成现实；而湘黔铁路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后，不仅成为中南地区中部同西南地区南部的交通捷径，而且也使湖南经济较发达的湘东和落后的湘西紧密联系起来，对开发资水和沅江流域资源起促进作用。

1998年建成的石长铁路亦为东西向干线，西起焦柳铁路的石门北站，经常德、益阳等至长沙，全长264公里，运力1900万吨。该线建成对加强湘、资、沅、澧四大流域区经济发展联系有利。

在建的广珠铁路，干线长140公里，并预留延伸至澳门的通道，建设标准为国家Ⅰ级。该线距离不长，但全线纵贯珠江三角洲西翼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繁荣地区，投入运营后将使珠三角西翼地区（包括澳门）与内陆广大腹地联系起来，并为之带来良好效益。

2001年初建成的梅坎铁路，西起广东梅州市，东至福建坎市，全长152公里，此线不长，但因跨粤闽2省接壤地区，连通铁路断头，对改善我国沿海铁路网布局有利。

三、水运：内河、海运并行发展，沿海货柜码头布局呈过密趋势

（一）河运居重要地位

本区现有内河航道3.5万公里，占全国31%，鄂、湘、粤、桂均有内河航运系统。长江横贯本区中央，有1000公里河段，不仅为鄂湘2省利用，也是沟通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地区的水运动脉。流量大，终年通航，重要河港有武汉、城陵矶、沙市、枝城、宜昌、秭归茅坪。其中，武汉港为中国内陆第一大港，港区包含汉口港、扬泗港、舵落口港、青山港、江岸港、阳逻港等，后者有长江中上游第一深水港之称。从武汉辟有通往各地的20多条班轮航线（武汉—重庆、武汉—上海等），影响所及全国四分之一国土；并辟有通往俄罗斯、日本、新加坡及港澳航线。武汉港年吞吐货物3800万吨、发送旅客600万人次。

2003年建成的秭归茅坪港，是三峡坝上第一港，成为长江航线上承东启西的中转枢纽港，旅客吞吐激增至200万人次，货物吞吐100万吨，为三峡库区新涌现的大港。

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在光化以下终年通航，襄樊为重要河港和水陆联运枢纽。在长江以南，湖南的内河航运相当发达，湘、资、沅、澧四水以及洞庭湖，共同组成河运网，主要河港有城陵矶、霞凝（长沙主枢纽港）、湘潭、益阳、常德、新安。除上述长江水系以外，珠江水系的航运价值也很大，其西江航线横穿两广腹地，江轮向西上溯可抵梧州。

（二）华南海运发展迅速

广州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广州港口分为两部分：内港为广州港，以内河运输为主；外港为黄埔港，以沿海和远洋运输为主。现在，两港合称为广州港。港内拥有135个码头泊位，其中万吨级深水泊位32个（最大可泊3.5万吨级远洋货轮）、2万吨级集装箱码头1个，1985年广州港货物总装卸量达1772万吨，2002年增至15324万吨，为中南区第1位，是全国第三个亿吨级大港（次于上海、宁波）。而广州口岸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2位。

为适应对外贸易运输需要，广州港近年进行扩建。港内的新沙一期工程已竣工，新增吞吐能力910万吨；广州港为期两年的浚深工程也已竣工，全长115公里的出海航道浚深至11.5米，3.5万吨级船可进港，5万吨级船乘潮进港。从21世纪初开始推进广州港南沙港区、珠江出海航道浚深2期工程。南沙港区位于广州市南沙镇附近，地处珠三角几何中心，扼虎门水道西岸咽喉，距港、澳仅38、41海里，发展现代水运的地理优势比黄埔港区更为有利，故成为广州港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

为开发粤西、桂东，亦为大西南地区寻找出海口，多年来在雷州半岛的湛江先后建设25个万吨以上泊位。2002年湛江港吞吐量2627万吨。港内岸线长241公里，拥有30万吨级油码头，20万吨级铁矿石码头在建。2003年开始进一步扩建，将成为连接大西南腹地的第一个亿吨级大港。

20世纪90年代在湛江以东的茂名市电白县沿海，又建成了另一个大型海港——水东港，港区包括原油接卸、成品油输出、杂货和集装箱等泊位设施，总吞吐能力每年可达1700多万吨。

深圳港的崛起引人注目。该港已形成东部盐田港区、西部蛇口赤湾港和妈湾港区、南部大铲湾码头三足鼎立的港口主体格局。港湾设施已建成127个泊位，其中万吨以上泊位38个，2003年货物吞吐量逾亿吨，仅次于广州港，居中南第2位、全国第8位。为适应外贸运输迅速扩大之需，该港集装箱运输实现超常发展，集装箱吞吐量从1988年的1万标箱增长到2002年的761万标箱、2003年1062万标箱，仅次于上海港，为全国第2位，是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盐田港区还将进行扩建，并分流香港货柜码头部分业务。

目前，深圳港已开辟71条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其中美洲航线占32条。从深圳港开往美国西海岸的集装箱国际班轮已成为最繁忙的国际航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的珠海港，拥有70公里长的海岸线，包括高栏深水港以及九州、洪湾、斗门等8个港区。另外，80年代对外开放的广西北海港，已经同6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地处北海市以西85公里处的防城港，已建设成为全国19个枢纽港之一，拥有26个码头泊位，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2个，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个港口有业务往来。该港是我国沿海最西部的深水良港，由此到西欧的海上距离最近。年吞吐能力为1600万吨。预计到2020年将增至4050万吨。地处防城港东北、钦州湾顶端的钦州港，2003年形成800万吨吞吐能力。上述三大海港呈“品”字形布局，组成深水港群，并通过南（宁）防（城）、钦（州）北（海）、黎（塘）钦（州）、南（宁）昆（明）等新建铁路干线互联并同我国大西南腹地进行联系，共同构成我国内陆西南大通道的终端。预计至2010年时，北海、防城、钦州3港的总吞吐量将提高到6000万吨。上述海陆联运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布局，不仅对促进广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将促进西南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其他已建成或在建的港口还有中山港、江门港、新会港、容奇港、太平港、澳头港等。

（三）货柜运能始现过剩迹象

本区南部（华南）海运设施原较落后，经过近二十年大力建设，到21世纪初已能适应外贸运输需要。其中货柜运输发展尤为迅速，深圳的盐田、蛇口以及广州、北海、防城等港口的货柜码头业务能力合计已增至1800万标箱，加上粤港澳经济一体化趋势，香港货柜码头1800万标箱的运能也以内地为重要箱源，使港深穗等港口的总运能高达3600万标箱。如再加上正在建设的广州南沙港区及其近邻、拟建的深圳大铲湾港区1000万标箱，将出现货柜运能过剩。

四、高速公路基本成网

公路干线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分布于铁路、内河交通所不及的地区，是将这

些地区同邻近火车站、河港或海港联系起来的纽带。90年代以来，随着对国道公路干线的全面整治以及在城镇密集地带修建多条高速公路，使公路运输在本区的作用呈上升趋势。

至2002年，中南地区已建或在建的高速公路主要有：北京—珠海、北京—开封、开封—郑州—洛阳、开封—商丘、焦作—郑州、漯河—周口、宜昌—武汉—黄石、襄阳—十堰、长沙—益阳—常德—张家界、深圳—广州、深圳—汕头、广州—佛山、佛山—开平、北海—柳州—桂林、海南环岛东线（琼山—安定—万宁—三亚）、海南环岛西线（海口—洋浦—九所—三亚）。

上述高速公路干线已成为中南地区现代公路交通骨架。目前，区内正在实现高速公路网络化。

五、空运由弱到强，南部国际机场布局过密

（一）区域航空网络形成

中南地区民航原较薄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长足发展。现有20多个重要机场，以广州、深圳、海口、武汉、长沙、桂林、南宁、郑州、洛阳、汕头、珠海、湛江、梅州、北海、三亚、宜昌、张家界等机场为中心而形成区域航空网络。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年吞吐旅客1300万人次，仅次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居全国第2位。但白云机场高峰日客流量和飞机起降架次多年来一直居全国首位。至2002年，从白云机场辟有100多条国际、国内航线飞往各地。

但白云机场的地理位置距市中心太近（直线距离11公里），既影响飞行安全，又无扩建余地。遂向广州东北方向外移28公里迁建新白云国际机场。

新白云国际机场地处原机场以北17公里，距广州市中心（海珠广场）28公里。新机场占地15平方公里，约为原机场5倍。2004年建成一期工程，可满足2010年旅客吞吐量2500万人次、货邮110万吨之需。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同期建设两条跑道的中枢机场，东跑道长3800米、西跑道长3600米。远期建第三条跑道，以满足2030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货邮250万吨需求。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珠海三灶国际机场均系20世纪90年代新建。其中宝安机场距白云机场约100公里，至21世纪初已开通国内国际航线100多条，飞机的起落架次和旅客吞吐量在我国内地居第4位；三灶机场距白云、宝安两机场分别为150公里左右。以上三大机场形成鼎立之势，加上香港赤鱲角新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共同构成珠江三角洲及华南航空主网络。

香港新机场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大航空中心，唯因用地所限而使其仓储物流场地等硬件设施难以扩展，航空货运能力已处于饱和状态，不得不靠深圳、广州机场分流。而广州白云机场多年来一直饱和。因此，为了抢占物流市场，就成为兴建新白云机场的主要诱因，期望“新白云”落成后依靠地缘优势和早已形成的服务网络获利；而深圳机场尽管有地理位置、用地和运输网络等限制性因素，也仍然大力从事物流开拓；珠海机场受

到客源不足、债务纠葛等诸多因素困扰，更是寄希望于利用自身某些优势开拓物流。其优势主要是周围有 50 平方公里土地可供大型货运枢纽及仓储、保税等设施的用地需求，且地价较低。

珠三角地区航空运输出口货物现有 70% 是先运至香港机场再出口，2004 年新白云国际机场启用后，很多空运货物会直接从广州走。为此，香港机场和深圳机场结盟并参股珠海机场，与新白云机场相抗衡。

中南地区还有一些重要机场。其中，海口大英山机场选址不当，原为建在市区的一个小机场，未曾考虑海南设特区后城建布局迅速扩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空运的巨大需求，到 1996 年即已成为全国繁忙机场之一。因该机场离市中心仅 3 公里，加之机场周边新建高楼林立，净空条件差。为此在海口市东南 18 公里处的琼山美兰镇新建大型“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999 年竣工通航后已成为中南地区重要的干线机场。

武汉因其“九省通衢”的区位因素而使航空运输发展迅速，遂于 20 世纪 90 年代建设天河国际机场，并从 2001 年起使武汉的空中门户由王家墩机场向天河国际机场转移。

此外，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宜昌三峡机场、郑州新郑机场、张家界荷花机场均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建成通航，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改扩建工程相继竣工。

至此，中南地区现代航空网络基本形成，并显示出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布局态势，只是在珠三角地区布局过密，于资源、运力等方面均有所浪费。

（二）南部国际机场布局过密

在中南地区综合运输体系发展过程中，空运地位由弱到强，但因缺乏宏观调控和有约束力的区域规划而发展过速，以致在珠三角的狭窄地域内，出现“机场大战”，特别是国际机场布局过密，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运力损失。

如地处该地区最南端的一座大型国际机场，从立项、建设到营运，一直颇多争议。建成多年后仍因客源不足而勉强维持，后又因拖欠债务而被法院清盘并查封部分资产。这座大型国际机场与母城相距遥远，且它所依托的母城经济实力有限，人口也不多。当初选址时主要出于战略考虑及长远需求。从区域经济发展和民航运力布局来看，这里的优势主要是土地因素有利，但作为是否盈利的旅客聚集因素并非有利，然而决策者对此并不在意，而且又将一些不确定因素也考虑进去。如当时澳门没有机场，设想澳门回归后可与其共用一个机场。实际上，澳门由于特殊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以及传统产业旅游博彩业发展需要，赶在回归之前即已建成国际机场；而企望得到珠三角西翼若干中小城市客源以及广州白云机场分流客源的愿望，也因该机场布局和选址过于偏南、有效覆盖范围一半空落海面而损失不少，加之白云机场一向有传统的客源网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宁肯再投巨资向北迁建新机场，也不愿主动向南分流客源。至于机场所在城市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因周边一批实力相当城市的竞争而受到抑制，不可能很快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客源膨胀自然也很有限。以至于到 21 世纪初，机场实际的客流量不到设计能力的 10%。

近十余年，其所以造成珠三角地区的机场大战、国际机场布局过密的状况，在珠江口两岸的狭窄地域内，先后形成五大机场集结（机场布局密度上升至每万平方公里 1

个，超过美国0.8个水平），虽然各有其具体的经济甚至政治原因，但从整体和宏观来看，却是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土地、运力以及资金等），还形成了新的债务纠葛。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区域规划与城镇体系规划；而在缺少区域规划情况下的城市规划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些又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造成城市规模预测失误，城市发展定位不准。至于深层次的原因，则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较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有潜力的城市强调自我，各自为政以及地区和城市领导者的投资冲动。

第五节　区内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

一、区内差异及其特征

中南地区各省区间的差异，按人均GDP等指标衡量，以广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湖北、海南则略低于全区的平均线，广西、河南、湖南远低于平均线。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排序曾是：广东、湖北、河南、湖南、海南、广西，近年发生较大变化：海南地位上升，河南地位下降。到1999年的排序改变为：广东、湖北、海南、湖南、河南、广西。中南地区各省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表，如图表11－5所示：

图表11－5　中南地区各省（市、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表（2002年）

项目 区域	GDP		工业销售收入①（亿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经济全球化			新经济指数②	城市化			
	总值（亿元）	人均（元/人）			外资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全球化水平指数		设市城市（个）	城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建制镇（个）	城市化水平③（%）
中南地区	30194	8454	26886	7760	0.7995	0.1763	0.4879	－	179	1.8	5093	－
河南	6163	6431	4150	2195	0.0501	0.0300	0.0401	41.8	38	2.3	869	23.2
湖北	4976	8319	3451	1203	0.0753	0.0937	0.0845	42.1	36	1.9	738	40.2
湖南	4341	6565	1980	1320	0.0623	0.0821	0.0722	43.5	29	1.4	1097	29.8
广东	11674	14908	15929	1765	1.5971	0.3101	0.9536	60.0	47	2.6	1458	55.0
广西	2437	5062	1153	917	0.0886	0.0636	0.0762	43.3	21	0.9	750	28.2
海南	603	8054	223	360	0.2456	0.2247	0.2352	42.2	8	2.4	181	40.1

①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

②包括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活力与实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五类指标

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2003》、《经济日报》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鉴于本区在地理上呈狭长形，经济实力较强的广东、湖北分居于南、北两侧，分别

拥有广州、武汉两大经济中心，因此自然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包括粤桂、湘南的经济协作联系；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鄂豫和湘北的经济协作联系。广州、武汉两大城市具有不同的职能，在发展上有不同的优势。

在各省区内部，也存在着差异，且差不多都表现为东、西部（如豫东与豫西、鄂东与鄂西，湘东与湘西）的差异。只有两广略有不同，广东是粤东南与粤西南、粤北的差异；广西则主要是桂中柳州—南宁地带与桂西山区的差异。

二、省域经济特征及发展前景

（一）广东省

经济对外依存度最大省区，由较落后的农业省发展为发达的经济大省。原有工业基础薄弱，依托地缘优势、对外开放先发优势迅速发展，带有明显的外源型经济特征。GDP1970 年仅 100 亿元，1988 年超 1000 亿元，2003 年 1.35 万亿元，占全国 11%，多年来均占我国内地各省区之首。

外源型经济虽说是广东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应继续发展，但外向依存度过高会使其发展受制于人，抗风险能力弱，故近年开始注重内外并进。

制造业发达，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多年来一直居全国第 1 位。外贸出口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增长快，出口额超越上海、辽宁之后已连续十六年居全国第 1 位，出口结构中科技产品比例上升；另外，通过大量吸纳国内外技术、管理人才以及邻近省区的廉价青壮年劳动力（约 2200 万人），也对建立并扩展外向型工业有利。

以轻工业起家的广东工业经济，从 21 世纪初年开始，其产业结构的重化倾向增长明显，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与此同时，广东的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现有城市化率逾 55%，居全国各省区前列。

本省气候条件有利，水热资源丰富，热带经济作物产业发达，一向居全国首位。但由于开发建设用地剧增，土地管理一度失控，目前，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仅有 0.03 公顷，居中南各省（区）之末位。近年来采取措施切实保护耕地。

省境于南海之滨有 4314 公里大陆海岸线（包括岛屿海岸线在内达 6867 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近四分之一。还有辽阔的浅海滩涂、大陆架以及淡水水域，对发展水产捕捞和养殖业十分有利，全省水产品总量已超过浙江，居全国各省（区）第 2 位。此外，南海海域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投入商业开发，提供了推动广东省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和整个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广东凭借其有利的区位优势而使经济率先发展，并达到相当的规模，促使其经济结构演变，对外辐射能力增强。其中：第一阶段通过香港等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省内（以珠三角为主）转移；第二阶段是省内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作为广东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是向内陆中、西部地区以初级产业转移为基础的经济辐射，从 21 世纪初起，配合西部大开发，广东输出资金和管理经验，加大了西部开发力度。以上不仅对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也可使广东产

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得以深化，促进粤港经济向结构性和整体性合作拓展，使粤港经济一体化。

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东省非当地户籍流动人口已超过2200万（邻近省区川湘桂赣等地流入1500万，省内流动700万），他们为全省GDP作出了25%的贡献，但他们只是有居住地（多为简陋的栖身之所）却没有“名分”的新移民，而且所获报酬普遍低下。

近年来，由于政策优势逐渐消退，先发优势与地缘优势明显弱化，加之代表广东经济特色的大量民营企业也面临产权关系和整合升级等难题，迫使广东寻求新的区域发展战略。

鉴于省内不同地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2001年人均GDP珠三角7市平均3750美元，粤北山区7市平均仅729美元，粤东粤西7市平均902美元。为改变省内经济发展与布局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等不利的局面，从2002年起，广东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规模构筑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网络，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在珠三角和经济特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东西两翼地区则是有选择地承接一部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和辐射，同时发展地方特色工业及海洋产业；粤北山区和贫困地区立足本地资源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和辐射。

（二）湖北省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规模较大的省。工业基础较雄厚，汽车、钢材、水电、纱、布、原盐等工业品产量均居中南地区首位，有些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但也存在着工业经济结构不够协调、工业布局不够合理等问题。

因全国经济发展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推进，湖北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高。这里处于我国内地东部技术、产业密集区和西部资源密集区的结合部，更兼有长江黄金航道流贯，因此，兼有东部地区的开放和技术优势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随着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三峡工程、京九铁路、京珠高速公路、南水北调等一批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湖北省逐渐成为投资热点。

从发展知识经济和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来看，湖北高新技术开发的三大主体即专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大型企业居中南地区前列，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奠定了基础。已建立2个国家级开发区和6个省级高新区，其中武汉东湖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已形成较大规模。

在此基础上，省内经济建设在2010年以前将主动适应国家地区布局和产业政策的总体要求，实施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按照点、线、面梯度开发原则，重点建设以武汉为中心，以两江（长江、汉江）、三线（京九、京广、汉渝铁路）为纽带，以黄石、宜昌、襄樊为三角，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三角地区，增强对周边地区辐射功能，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城市化水平在华中居前列，城镇的空间分布正形成“三区”、“三轴”的发展格局。三区系指武汉大都市连绵区、襄樊大都市区、宜昌大都市区；三轴分别是汉十高速公路及汉渝铁路复合轴，黄宜高速公路及长江湖北段复合轴，襄荆、荆宜高速公路及焦柳铁

路湖北段复合轴。预计湖北城市化水平2010年为44%，2020年为55%。

为适应西部大开发及本省经济布局展开的需要，构筑三条西进通道：(1) 高速公路通道，新建武汉—十堰高速路；(2) 铁路通道，新建枝城—重庆万州铁路干线；(3) 管运通道，新建重庆忠县—武汉的西气东输工程。

近几十年来，湖北经济发展较快，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是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特别是为建设商品粮棉基地而围湖造田，导致湖泊大量减少。20世纪50年代初，全省有大小湖泊1066个（历史上有“千湖省”之誉），至80年代时，因围垦而使900多个湖泊消失。湖泊消亡直接影响对江河洪水的调蓄，是形成90年代后期连年大洪水的主要原因之一。1999～2002年期间，在加固长江堤防的同时，大力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

三、区域经济技术协作、城市经济协作区、沿海经济开放区

（一）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珠三角经济区布局图，如图表11－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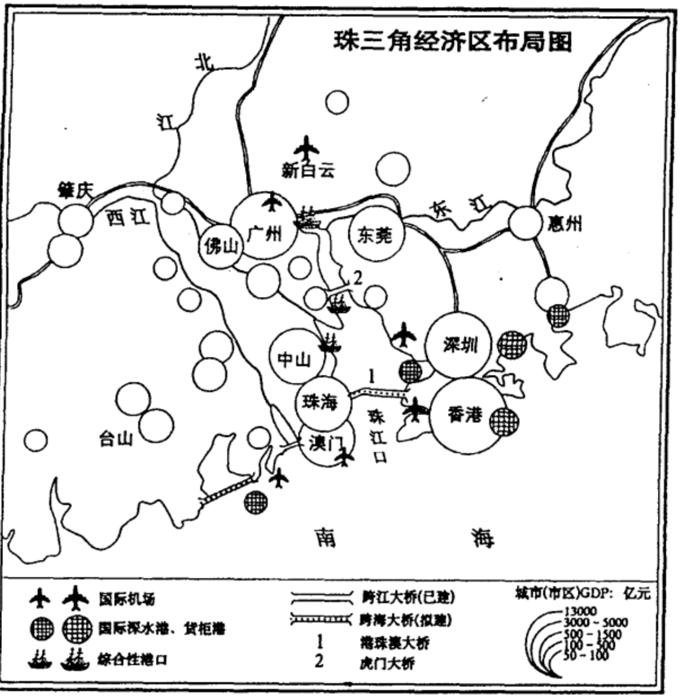
1. 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促进改革开放，“集群式”工业化与工业布局。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里一直处于我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沿。为利用多种有利条件，先开辟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区域范围始为佛山、江门2市及所辖14个县(市)，后扩大为包括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中山、东莞、惠州、肇庆等9个地级市及所辖40个县级市（区）。这一带的主体是富饶的三角洲平原，商品经济发达，又是交通枢纽，加以毗邻港澳，接近东南亚，与华侨、港澳同胞息息相关。此外，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作为前沿“窗口”。具有开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有利条件，对于经济发展全局来说，也已形成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使本区可以作为内联外引的桥梁、技术转移和信息传递的跳板。为此，这块经济区以广州为中心，以城镇星罗棋布、河网交叉纵横的冲积平原为腹地，利用廉价的外来劳力，采取“三来一补”等方式发展制造业，通过集群式工业化道路及其布局模式，促进本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实现，并正在实现城镇信息化。民营企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增强了本区产业界的活力；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使农民分享土地非农化以后巨额的增值收益，也加快了资本积累。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公共财政体制趋于完善，为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投资环境的软、硬两方面均较好。

本地区已发展成一个开放型、综合型的经济区，农业、工业、外贸、旅游四个支柱产业，其中工业主要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家用电器、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并已形成专门化制造业基地。

2. 率先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的区域。

在珠三角经济区6.2万平方公里（占广东省35%）的土地上，拥有4100多万常住人口，GDP占全省80%，外贸进出口额占86%，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88%。到21世纪初，本区已形成通信、IT产品和家用电器生产基地，其他高新技术产业也增长迅速，



图表 11－6

使本区高新科技产值和出口额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位。

21 世纪头十年，珠三角地区将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在 2010 年率先实现现代化。届时，珠三角将成为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具有较强辐射力的现代物流基地和国际化的制造业基地。预计 2010 年人均 GDP 超过 7000 美元。

城市化方面，随着最后一个县（斗门）在 2001 年改为市辖区，使珠三角地区全部转化为城市建制。因整个地区城市化进程快，2002 年城市化水平已达 72.7%，多年来居广东乃至全国前列，还吸引 1500 多万来自湘、川、赣和全国各地的移民（以青壮年为主），推动第二、三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已形成国内最密集的城市群。广州、深圳已发展成为多功能的中心城市，东莞、中山、佛山等城市成为工业布局的高密集区；而深圳、广州、东莞、珠海等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强者，顺德、南海、增城、新会、惠阳、台山、开平、三水、高要、从化等则成为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的强者。上述城市不仅在珠三角而且在华南乃至全国也位居前列。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改善投资环境，相继在本区兴建高速公路网、准高速铁路、深水港口群和一系列货柜码头以及多处国际机场等。

3. 规划滞后，区域协调不力。

珠三角依靠地理区位及“特殊政策”起家，政策只是在一个时期内发挥优势，至20世纪末，其政策优势逐渐消退，先发优势、地缘优势明显弱化。21世纪初，在投资、人才等方面出现向长三角等地转移现象。此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力，未能克服体制障碍，区内各市经济社会发展各自为政，多年以来出现重复建设、经济同构甚至城建趋同，以大区域的视角、跨行政区划的区域规划未受重视，发展特色经济、品牌城市不够。代表珠三角经济布局与企业结构特色的民营中小企业大量聚集，也面临着复杂的产权关系以及整合升级等难题。

为此，必须重视高水平、重协调的规划，各市、镇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及相互间的协调发展，强调大珠三角整体的区域整合，对生产要素包括土地、水资源，城镇之间交通、信息、排污、文体设施建设等，都要协调发展，加强地域分工，完善城镇体系，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形成大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

4. 以局部创新为突破，进行重整、融合，新区域调控机制。

至2003年，面对经济增速、外商直接投资等落后于长三角之势，珠三角在规划的基础上，正以局部创新为突破，进行重整与融合。其中，在街市相连的广佛两大城市地区，其分工协作的产业规划已开始付诸实现；深港合作借“CEPA”正式签署之机更进了一步。而相对后进一些、各自为政也明显一些的珠三角西翼，也因港珠澳大桥即将兴建而面临大地域范围协调发展的良机。

另外，针对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等顽症，珠三角将以法律强制力来保证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同时，通过行政监督管理制度的安排，使从上而下的行政管制功能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城市化力量平衡起来。还有，引入“水权概念”、“容积率奖励办法”、“土地集中调控优化的新体制”等，以形成基于利益机制的新区域调控机制。

5. 大珠三角；泛珠三角——最大规模的区域合作工程。

大珠三角包含港澳，泛珠三角则包含粤桂湘赣闽琼川云贵港澳，即所谓“9+2”，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来看，还可包含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泛珠三角的概念缘起珠江，与珠江流域的自然流向、最后流入南海而构成的“经济流向”和文化联系密切相关。以广州为中心的9省区面积199.5万平方公里，人口4.5亿，分别占全国20%、34%，2002年GDP34474亿元，占全国34%；鉴于珠三角土地少，开发已近饱和，区域经济发展除调整结构、产业升级以外，有必要实施大珠、泛珠战略，在十至二十年内，在联系密切的广阔地域内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布局重组，利用经济上的互补性展开经济合作，形成最大规模的区域合作经济体。

2003年CEPA签署有助于大珠三角的融合。同年，粤港共同提出十至二十年内把大珠三角建设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广东成为制造业基地，香港则成为现代物流业、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形成新的“前店后厂”关系，港澳还决定建设大珠三角现代交通网络。与此同时，2003年“泛珠”九省协作会议商讨建立政府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区域内资源利用和合理共享，营造区域经济发展“多赢”格局。2004年“9+2”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是中国迄今最大规模的区域合作工程正式启动的标志。这一范围最

广、在不同体制框架下的区域组合，已成为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新尝试。

（二）武汉经济协作区

本区在类型上属于城市经济协作区，从劳动地域分工的层次上看，则属于国家二级经济技术协作区网络。它以华中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武汉为首，包含武汉—长沙—南昌金三角区域及鄂豫湘赣4省相邻的有关地级市，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人口1.1亿。1987年联合组成武汉经济区，当时为17个地、市，现扩大为25个地级市。

区内水资源丰富，相对于各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普遍短缺而言，这里的条件良好：长江干流1000公里，加上汉水以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形成河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加之洞庭、鄱阳两湖经过整治，减少水患，恢复生态，已使本区成为中国内陆水资源条件最好的经济区。

交通方面，水运网早已形成，近年又建成以武汉为中心的高速公路网。此外，区内文教科技人员较多，是长江流域智力密集区之一。

随着经济地域多元化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九省通衢”的武汉在全国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提高，武汉经济圈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较具经济潜力的经济区之一。

第六节　主要城市与经济中心，经济特区与开发区

一、城市与城市化概况

中南地区的设市城市至2002年底为179个，建制镇5093个，市、镇数在全国各大地区中均居第2位。

近二十多年本区城市化进展迅速，但由于原有基础较差，全区现有城市化水平除珠江三角洲、广东省沿海、江汉平原和湖北省沿江一带较高以外，其余地区仍较低。地区城市密度为18个市/10万平方公里，低于华东地区，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倍。

在现有179个设市城市中，按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分类，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有3个：深圳（506万）、广州（465万）、武汉（459万）；100万~200万人的特大城市6个：郑州（177万）、佛山（175万）、长沙（156万）、汕头（120万）、洛阳（106万）、南宁（103万）；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24个；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61个；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85个。全地区大中小城市结构比例为1：1.9：2.6。

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位来看，全区179个市中，有副省级市3个（武汉、广州、深圳），地级市79个（郑州、长沙、南宁、海口等），县级市100个。区内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在沿海、沿江和沿交通干道地带表现很明显，少数城市的影响具有全国意义。

二、部分地域城市化进程快，城市竞争力强

在中南地区的部分区域城市化进程快，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已达70%，为数不少的中小城市和低“级别”城市（如县级市）所表现出的活力及内在扩张力强（甚至很强），并已成为推进地区城市化的重要环节。

从城市竞争力来看，中南地区已有一批城市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在设施力、管理力方面有深圳、广州；文化力、开放力方面有深圳、珠海；区位力方面有武汉、广州；制度力方面有东莞；结构力、聚集力方面有广州；资本力、科技力方面有深圳。而在综合竞争力方面则有深圳、广州等。上述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其地理分布大多数集中于珠三角地区。

三、主要经济中心、增长中心

（一）广州市

1. 区位因素刺激城市经济高速增长。

广州一向是华南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因其区位有利，受到对外开放等因素的强刺激，经济发展迅速，且产业结构变化快，三产比重居我国内地各城市之首；综合经济实力大增，在80年代中期即已超越武汉，成为中南地区第一大经济中心，到90年代后期，广州综合经济实力按GDP排序居中南第1位、全国第3位（次于上海、北京）。2002年GDP3002亿元，人均GDP逾5000美元，在中国内地城市中居第2位。

全市常住人口激增至1020万，城市建成区从原先的32平方公里扩展至2002年的553平方公里。以广州为中心之一的珠三角都市圈已成长为亚洲的大都市圈之一。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当珠江水系西、北、东三江汇合处，京广、广九、广茂铁路也在此交汇，工商业发达。2002年工业产值3786亿元，主要工业部门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近年来工业结构有所改善。对外贸易兴盛，为我国最大的外贸中心之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在此举行。从市区东行15公里，有著名的黄埔商港，大型远洋货轮、集装箱船频繁出入。包括黄埔港区在内的广州港，已开发建设成为华南海上门户。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开发强度过大，损害城市传统风貌与生态环境。

从城建发展、布局及城市形象来看，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还是一座充满岭南风情的特色城市。此后十多年对主城进行了超负荷、超强度的开发，而城市规划滞后，致使城市建设及其布局损害了原有的传统风貌乃至生态环境，也损害了城市形象。在“马路经济”、“围墙经济”的影响下，一度曾使广州成为“集市”和“停车场”的代名词。

3. 扩大、调整市区发展空间；城市功能结构主体——城市中心和三大组团。

2000年开始，广州扩大与调整市区发展空间，城市布局实施“东进、南拓、西联、北优”发展，即利用工业布局原本集中于东部的有利条件，将传统产业向黄埔—新塘地带迁移，依托港口优势，整合产业发展空间；在南部新开拓的市区，正建设南沙龙穴岛新的深水码头，形成集物流产业、临港产业、科技产业为一体的产业基地和滨海港口城区；西与已经调整城市布局的“大佛山”市街市相连，协调发展；北部的“新白云国际机场”已于2004年建成，优化其功能配置与空间布局，成为大型流通中心。

在上述城市布局大调整的基础上，以“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为目标进行新的规划。新广州的城市功能结构主体是城市中心和三大组团，前者由中央商务区（CDB）、中心商业区和旅游休闲带组成，突出广州的城市形象。在建的珠江新城中轴线、海心沙可望成为未来广州的中央商务区和新城市中心；后者则包括以花都附近的新国际机场、广州北站为依托的北部组团，以番禺（市桥）、大石、洛溪为发展重点的南部组团，以黄埔港、南沙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新塘、南沙开发区等为主的第三组团。

（二）武汉市

1. 一城三镇的经济地理格局。

全市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部分组成。城市依江而兴，亦因水而隔。近五十年相继兴建4座长江大桥、3座汉水大桥，使武汉三镇连成一体。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城三镇的地理格局，对经济布局有深远影响：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功能相对独立的区域，商业、文化、工业各为主导，各成体系。

武汉产业基础雄厚，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昔日“汉阳造”曾闻名全国），故有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50~70年代，武汉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六大工业基地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调整工业结构，产业升级，至2003年，初步形成光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环保等为主的现代制造业体系。

鉴于武汉科技教育优势明显，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加之水资源丰富，人均拥有地表水量、水域面积分别居全国各大城之首，也是华中最大的商贸中心。上述这些比较优势为进一步发展现代制造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武汉亦有较好的金融基础，历史上汉口是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为加快中西部开发，有必要利用中西部大城市的金融基础，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地处东南与西北两大经济地理扇面中心点的武汉，应是构建这一内陆金融中心较为理想的选址。

2. “九省通衢”和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布局调整。

武汉地当水陆交通要冲，一向有“九省通衢”之称。又处于全国经济地理中心，以此为圆心，半径400公里以内涵盖45个大中城市，运输半径小，成本低，辐射力强，综合区位优势明显。近十余年来则成为长江开发的重要支撑点。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建设长江二桥、三桥、四桥、天河国际机场，并呈“米”字形构筑通往省内外城市的高速公路通道，以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需。

2001年启动武汉外滩工程，将汉口滨江区江汉三桥至后湖船厂约10公里临江地带

建成临江风景区，成为市民观江休闲之地，规模接近上海外滩。作为我国加入 WTO 后第二批对外开放金融的五大城市之一，正在汉口沿江大道 12 幢老外资银行建筑原址一带构建新型“外资金融贸易区”。另外，在汉口王家墩一带还将建设中央商务区（CBD），成为集金融商贸、展览、高档住宅为一体的多功能国际化新城区。

以上一系列城建及布局的调整，对改善武汉投资环境有利。

按新的规划，武汉在生态绿地、水体湖泊、历史文物、道路交通方面用地布局落实到中心城区相应地块，建筑物密度、容积率、高度、形式等必须与自然环境融合；并按文保单位、近代优秀建筑、旧城风貌区、主城风景名胜区和重点地段分层保护文物。

3. 武汉城市圈战略。

以武汉为中心，100 公里半径圈内，包括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赤壁、仙桃、潜江、天门、汉川、应城、安陆、麻城、大冶等城市，由于日益紧密的联系而形成武汉城市圈，这里是湖北省人口、产业、城市布局最密集地区，正提升城市化水平，发挥城市产业集聚、要素流动等功能，形成增长带，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

武汉及周边城市间经济联动早已有之，但武汉城市圈战略系 2002 年才提出。实施方案包括共建工业园，资源共享；推进圈内金融一体化，引进外资与民间资本；建设武汉大市场，服务周边产业，使武汉市场服务业与周边主要产业共生共荣；促进圈内教育科技融合。近年来武汉的影响力已超出湖北省，其地理区位及人文特征都使它有条件成为继沪京港之后中国的第四大都会和国际城市。

（三）东莞市

1. 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新兴出口贸易城市。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东莞从一个农业县急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成为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新兴出口贸易城市。地理区位有利，位于珠江口东岸，穗深港经济走廊中段。近二十年来，因其地缘优势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及时、投资硬软环境改善而广泛吸纳外资，以港资、台资比重大。至 2001 年，全市外商投资企业 1.4 万家，累计利用外资 160 多亿美元，工业门类以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纺织服装等为主，其中电子信息及通讯设备制造企业 2800 余家，形成较完整的 IT 产业链，成为国际性的电脑产品制造业基地。在其鼎盛时期，“无论哪里下单，都在东莞制造”，享有“IT 新都”雅号。

出口贸易发展快，2001 年出口额 190 亿美元，出口规模仅次于深圳、上海，至 2002 年连续七年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 3 位，2003 年起列第 4 位（次于上海、深圳、苏州）。

在城市竞争力方面，一向以“东莞活力”著称。其实，东莞的许多条件并不占优，但利用其临近香港、土地资源丰富、低成本劳动力来源广泛等若干有利因素发展制造业，承接港、台部分产业转移，形成旺盛的产业群体；并适应港人内地置业需要而发展房地产业，亦为台商在珠三角的主要聚集地。台资企业的群聚性，也有利于东莞形成盯产业链及电脑产品零部件配套率高（至 2003 年达 95%）的优势。

2. 粗放式增长不利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东莞经济在近二十年中以年均 22% 高速增长，但主要是依靠大量消耗土地、大批

使用廉价外来劳力等方式获得。全市面积2456平方公里，人口645万，其中户籍人口155万，外来人口490多万。近十年来激增的数百万人口中，外来民工、装配工占绝大多数，故东莞又被称为“民工城市”。

在制造业的价值中，以研发、中介、服务获利多，而生产获利较少，主要靠获取廉价加工费的东莞，因其土地效益较低、生态环境受损、治安压力大而影响到可持续发展。

对此，在21世纪头十年，东莞将建设成为以“国际制造业名城”为特色的现代化中心城市。在城市布局方面，重点建设“两区”（城市新区、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两区的建成可从整体上提高东莞的聚集力、竞争力。同时，借CEPA签署、粤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形成之机，以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为载体，构建香港产业支援服务业的营运基地，以有利于8000余家港资企业进一步发展。

（四）惠州市

地处东江下游，市境区位因素有利，邻近香港、深圳，且土地、淡水、旅游资源丰富，并有深水港湾之利，是承接港、深两地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和港口城市。工业产值由1988年的18亿元激增至2002年的1216亿元，其中电子产品制造业近占一半，为广东第二大电子产品制造业基地。在惠阳淡水镇一带，至90年代末已开发建设成为华南最大的电脑产品生产基地之一。2002年在大亚湾畔开始建设的“中海壳牌南海石化”总投资43.5亿美元，建成后可年产80万吨乙烯、230万吨高附加值石化产品和130亿元年销售额，并可以带动50倍的下游产业，投产后，惠州将成为先进的石化产业基地。

（五）海口市

位于南渡江口，1926年设市。向为海南岛对外交通和进出口贸易门户。自1988年设立海南省、海南经济特区以来，海口已初具热带海滨城市规模。房地产业、旅游业发展迅速。对外交通运输在长时间内主要依赖航空。1996年海口机场即已成为全国的繁忙机场之一。因机场离市中心太近，净空条件不理想，后又择地新建美兰国际机场。20世纪90年代海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量大，房地产业年平均有120万平方米竣工，但同时亦因房地产开发过热，规模过大而形成“泡沫经济”，出现大批“烂尾楼”，以致到21世纪初仍在消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房地产泡沫的后遗症。迄今城市规模已相当可观，建成区面积由80年代末的18平方公里扩展到50多平方公里。

市境原有地域空间狭小，是土地面积最小的省会城市。经过十多年的跳跃式发展，海口在城市布局、产业带动等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如不及时扩展地域范围，势必影响到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性。2002年，琼山市并入海口市，土地面积由原来的236平方公里增至2365平方公里，扩大9倍；还改变了长期存在的“一城两市”、“同城分治”的格局。新编城市规划可将原琼山、海口三个组团与沿海、沿江、傍山发展通盘考虑。

（六）北海市

位于北部湾畔，扼我国内地西南出海大通道终端，原为小渔镇，20世纪90年代以

来，利用地理优势，使交通运输、房地产业、金融业和旅游业等迅速发展，是“以地兴市”的新兴城市，也曾是以泡沫经济著称之地。土地批租过多、过快，导致大量土地闲置、撂荒和城市布局失控。该市仅在1992～1994年就批租土地67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为开发区用地，相当于原城区面积5倍，75%没有开发。21世纪初，剑匕海开发再次增温。涌入资金不再用于炒地，而用于支持土地储备经营，加快闲置土地（尚有2173公顷）的处置，盘活土地这份最大的国有资产。交通设施建设成绩显著。已建成北海港1000多万吨的吞吐能力；北海机场经扩建可供大型客机起降。钦（州）北（海）铁路通车后，连接南（宁）防（城）、黔桂、南（宁）昆（明）、黎（塘）钦（州）等铁路干线，构成我国内陆进出口贸易新的运输网络。地处北海市东翼的铁山港也在建设中，该港被誉为“中国南方大港”。

北海银滩有“天下第一滩”之称，绵长24公里，系高品位石英砂，含量98%以上，为国内外罕见。1992年国务院批准在此设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但是，开发随即失控。经过多年来高强度、高密度开发建设，发现密集布局的人工建筑严重地干扰了海岸沙滩的自然发育过程，使大自然的珍品——北海银滩的沙质变灰变黑，原来平缓的潮间带沙滩变得起伏不平。为此决定在2003年拆除33幢建（构）筑物，恢复生态的银滩。

（七）十堰市

华中新兴工业城市，我国老牌汽车制造业基地。地处武当山北麓，原为鄂西北山区偏僻村镇，居民不足100户，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从国防因素考虑，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等一批三线建设项目在此选址兴建，80年代相继建成，90年代形成以汽车制造为主导产业的新工业城市，并一度成为全国最大汽车工业基地，有“中国汽车城”之称，城市经济实力在80年代一度在全国排名第22位，但到90年代因受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加之本身地理位置偏僻，对外交通通讯不便，24个专业厂分散布置在20多条山沟里，厂区之间一般相隔2～5公里，形成百里厂区，对生态保护、运输效益及生产成本均有不利影响；而其所依托的母城（十堰）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从经济结构看是一座“嵌入型”城市，城市经济构成又过于单一，遂使整座城市发展缺乏活力，工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疲软滑坡。至90年代中、后期处于城市衰落状态。近年来“盘活”国企资产，扩大开放，引进8个乘用车新品种，振兴支柱产业，汽车产量提高。另一方面，鉴于十堰作为新工业城市，环境尚未破坏，进一步维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并高标准改造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硬、软环境，提高引资力度，通过合资嫁接、购并联合、重组改造，使工业经济和城市发展走出困境。2003年“东风汽车公司”总部迁往武汉，虽对本市发展有所影响，但十堰汽车制造基地仍将继续发展成为全国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商用车基地之一。

十堰地处秦巴腹地，紧邻陕、渝、川、豫，位于武汉、重庆、西安三大经济区结合部，距三地均约为500公里。这使该市可以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圈，在参与三大经济区分工合作基础上，实现资源在大范围的优化配置和共享，有效利用东部产业优势和西部资源优势，在东西部经济互动中，可以发挥十堰在西部开发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十堰除可继续作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商用车生产基地之外，同

时发展医药、水电、旅游、绿色食品产业，还可利用世界文化遗产道教圣地武当山的人文资源，发展生态、人文旅游产业等。

四、经济特区

（一）深圳经济特区

1. 特殊移民城市，“一夜城”。

位于珠三角东翼，南以深圳河为界与香港新界毗邻。特区内划分为罗湖、福田、南山、盐田4个区，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人口400多万。包括特区及外围的宝安、龙岗2区在内，深圳市总面积202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57万，另有流动人口约200万；而原籍为本地的人口只占30多万，其余主要来自川、湘、赣、桂、黔、豫、皖、京、沪及省内各地。因此，深圳是一个典型而又特别的移民城市。即利用特区的围栏阻挡住大批低层次的盲流进入，又利用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农转非优惠政策、投资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大批智能、技能、体能较高甚至出类拔萃的人才聚集，并直接促成整个特区人力资源得分迅速提升。正是由于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的知识、智力与体能上的贡献，才促成了特区的发展与繁荣。这也应当是神速崛起的“一夜城”成因的合理解释。

2. 特区建设与布局概貌。

就城市建设与布局而言，深圳是我国少有的、从一开始就按总体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年轻大城市，主要体现在城市整体布局、城市设计、城市功能结构和城市建设策略等方面。自1980年开辟特区、1982年始建“二线关”以来，完成了罗湖、上步、南头、蛇口、沙河、沙头角、盐田等地域的综合开发。至2000年，建成区面积已由原来的3平方公里增加到330平方公里（其中特区内为137平方公里）。

在特区范围内，从西部的南头到东部的盐田，是由自然山体、河流及人工绿化带隔离开的城市组团。组团之间由多条城市干道联为一体。上述组团结构为特区城市功能和运行效率提供了有效的载体。

特区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带状组团式布局结构以及组团功能相对独立的用地结构；至90年代，城市建设与布局跨出特区界限，特区内城市格局基本形成，特区外城市化加快。与此相适应，结合深圳特定的自然条件，相继编制了覆盖全市的城市总体规划。

3. 经济结构与布局问题较多，自主知识产权缺乏。

鉴于城市范围已从特区扩展至全市，要求从全市范围配置生产及生活要素。此外，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地区迅速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且出现结构雷同、重复建设等弊端，也要求深圳建立与该区域相衔接的运行关系，处理区域资源配置、地域分工协作、城镇体系建立等诸多问题，以推动区域良性互动发展，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面对信息时代的产业结构，深圳需要从全市范围安排经济布局。包括特区工业外迁，加工工业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业迅速增长以及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第三产业

发展，在城市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上的需求，都应体现在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上。

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原来单一的自给型农业经济，已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商业贸易、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等综合开发的外向型经济，城市经济的外向度很高。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91年的8%提高到2003年的49%；全市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5100亿元，工业构成以电子信息占主导地位。

深圳电子工业发展又以投资类电子产品发展迅速，如计算机、通信设备等。此外，消费类电子产品由于具有稳步增长的特点，也成为深圳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如彩色电视机、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位居全国前列。到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不仅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生产中心，也成为其研究和开发中心。但是，自主知识产权缺乏、品牌产品少是深圳工业的一大弱点。

2003年深圳市GDP2860亿元，人均GDP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居首位，并仍是我国实力最强的经济特区。在经济总量增长同时，经济结构优化，已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三大支柱产业。产品外销比例大。2003年外贸出口总额631亿美元，仅次于上海，居全国各城市第2位。此外，旅游、金融、保险、信息、科研等产业也得到了发展。

深圳因地缘、政策因素而得以迅速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并面临从特区向大都会转型的紧迫任务。为此，已提出建设成为国际城市的目标，然而三产（尤金融）相对滞后，仅44%低于上海（51%），远低于香港（87%），尚需经济转型，促进经济服务化，同时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与布局重组。

4. 重视市中心规划设计，形成良好城市形象，但土地资源少，过度开发反而不利。

市中心的规划与设计对形成良好的城市形象十分必要。深圳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重视市中心的建设、发展与布局，并兼顾地上、地下，强调生态环境与综合效益的综合规划与城市设计。根据1999年拟定的市中心区综合规划方案，采用我国传统的九宫格局，争取建成全国一流中心区。

但是，目前深圳面临土地资源少，缺少更多发展空间的问题很突出。根据这里的自然地理特征，深圳适宜开发的地域面积约900平方公里，到2003年为止，经二十多年高强度、高密度的开发，在特区内未开发的土地只剩30平方公里，剩余土地仅供开发十年。因此，近年来，由于地少，房地产开发的密度越来越大，如任其发展，漂亮的深圳城市景观及人居环境有可能走向反面。

5. 在组团式布局基础上规划城市发展轴。

全市的建设和发展，是在早期提出的“带状组团式”布局基础上，进一步规划“东、中、西三条城市发展轴”。其中，西轴沿广深高速公路发展成为与广州及珠江沿岸城市带联系的产业密集区；中轴通过京九、京广九连接粤中乃至内地，成为深圳的物流走廊；东轴则在盐田港带动下发展成为粤东的工业基地。以上发展既可适应特区外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趋势，也为深圳与珠三角整体发展相互衔接奠定了基础。

包含特区在内的整个深圳市的建设和发展，在城市布局上摈弃摊大饼式、同心圆式的布局，而是规划组团式的结构，大力发展卫星城，以发达的市域公路网、轨道交通网、光纤通信网体系将市中心区和卫星城镇连为一体，形成一市多城的都市结构。上述做法与深圳的地理、地貌特征相符，亦可减少内地普遍存在的“大城市病”。

（二）珠海经济特区

毗邻澳门，位于珠海市拱北海关东、西两侧。1980年始办特区时面积15.16平方公里，后扩大为121平方公里。

特区依山傍海，在自然环境质量、气候舒适度、风光秀丽等方面竞争力强，建成一批风格各异的宾馆和度假别墅，旅游业已发展成为主导产业。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力开发珠海西区（地处市区西南，包括三灶、小林、南水等，现称金湾区），兴建高标准城市基础设施。珠海三灶国际机场于1996年建成通航，高栏深水港、万山港、京珠高速公路等于21世纪初相继建成。规模宏大的港珠澳大桥即将兴建。随着投资环境改善，珠海从1998年起兴办实业，办大学园区，建设专业园区、园镇等，珠海高新区、保税区、临港工业区已形成规模效益。实行功能区带动战略，增强了珠海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城建方面，重视环保规划与人居生态建设，珠海市是我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以适宜于居住为特色。

总体规划多次修改，城市定位屡有改变：（1）1979年第一个总体规划，城市定位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渔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风景游览区和新型边境城市”。（2）1985年第二次、1995年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3）2003年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定位原为“珠江口西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但在国务院批复中，珠海被定位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东南沿海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

（三）汕头经济特区

汕头在韩江三角洲南端，濒临南海，向为粤东经济中心和交通门户。这里又是著名的侨乡，发展出口加工业的条件较好。1981年始设汕头经济特区，1991年特区面积扩大到234平方公里，分为龙湖、广澳两个片区。其中，龙湖片区位于汕头市区东部，分为工业区、港口仓库区、商业区、旅游区、生活区、农业区，所生产的工农业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广澳片区位于汕头市区东南部。汕头经济特区将工业、农业开发和旅游贸易有机结合起来，由过去单纯搞出口加工转变为综合开发。此外，在附近还建成了供集装箱船和散货船停泊作业的新港，开通了至香港的航线。1995年广（州）梅（州）汕（头）铁路全线建成并投入运营，同时海湾大桥开通以后，对促进汕头经济特区发展有利。但汕头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1999~2001年期间因企业骗税、造假以及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效益等造成整个地区信誉下降，投资软环境条件变坏而使外资利用大减。后重振信誉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到2004年6月，汕头市累计吸纳外资合同金额110亿美元，有53家跨国公司、商社和财团在此投资153个项目，合同外资21亿美元。

（四）海南经济特区

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其地域范围包含海南全境，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区内经济开发主要利用外资、合资和鼓励内联等方式来实现。地处海南岛西北部的洋浦开发区，利用其自然水深充分、港湾开阔、避风条件好等有利条件，按照世界自由港模式，实行自由对外贸易政策，对整个海南经济特区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促进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区域经济发展试验区。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与布局，加上“中油东方化工城”、海口保税区、老城工业开发区等工业园区的开发，初步形成海南岛西岸现代工业走廊。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建设与布局体现地域文化和热带海岛文化特色。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相结合，建筑造型强调热带风情，突出滨海特色。公共建筑、旅游建筑、文化建筑不贪大求洋求古，而与自然环境和谐，且讲究自然通风、采光，创造大众共享的开放空间。

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特区政策逐渐失去吸引力。因此，海南在2002年确定生态环境开发利用方向，使特区由以前的政策吸引改变为环境吸引。然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海南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脆弱性，故其生态环境开发利用的具体产业政策又须谨慎而行。

五、主要开发区

中南地区南部（华南）沿海一带，得益于区位与政策，成为我国内地最早开放地区，各级开发区及口岸亦纷纷设立。以上这些对本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与促进作用。但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对外开放的地域范围一再扩大，国内各地相继形成全方位与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态势，且政策一再放宽，使本地在开放、开发方面的优势逐渐消失，华东地区（尤其是沪苏浙）从整体上已超越本区，成为外资新的聚集地。

（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南地区境内，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迄今已先后设立7个：广州、湛江2个开发区于1984～1988年设立；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武汉3个开发区于1992～1993年设立；郑州、长沙2个开发区于2000年设立。

1.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于广州黄埔区东南缘、珠江主干流与东江北干流交汇处，濒临黄埔港。规划面积9.6平方公里，现扩大到32平方公里。主要引进新技术与新兴产业部门。到2002年，本区与广州高新区、出口加工区、广州保税区实现四个国家级功能区一套管理机构，成为外商投资最密集区域。入区企业800多家，其中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259个，投资项目的族团化布局特征明显。全区工业产值880亿元（2003年）。

2.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于蔡甸区沌口，是我国中部最大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开发 18 平方公里，合同利用外资 34 亿美元。2003 年工业产值 308 亿元，居全国开发区前列。以发展汽车为特色，拥有自己的整车厂及汽车产业链。是我国汽车研发、制造、销售中心之一。区内还单独设置武汉出口加工区，是我国中部第一家国家级出口加工区，规划面积 2.7 平方公里。已于 2001 年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封关运行。

3.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处惠州市南部、大亚湾北岸的澳头一带，毗邻深圳、香港。紧邻惠阳区，有城市依托，生活配套便利。发展目标定位是：以石化产业为主导，电子、汽车零配件工业协调发展，并充分发挥惠州港的物流聚集效应。正在建设一批大项目，包括投资 43.5 亿美元的“中海壳牌南海石化”；装机 210 万千瓦的惠州天然气发电厂；广石化陆域储油库；并拟建巨型炼厂（1200 万吨/年）。预计至 2010 年，开发区将实现 1000 亿元工业产值。

4. 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于广州番禺区南沙镇，这里是珠江通向海洋的门户。1993 年设区，至 1998 年累计投入 30 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交通网络，生活设施配套，成为珠三角新的投资热点。21 世纪初起，广州在南沙注入 500 亿元进行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快城建步伐。这里地处珠三角几何中心，扼珠江虎门水道西岸咽喉，距香港 38 海里、澳门 41 海里，生态环境亦佳。故作为广州的一个新区、即城市布局向南拓展的新空间而编制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规划，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

（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科技产业开发方面，由于开放早，产业发展对科学技术需求迫切，加上区内文教科技事业较发达，故中南地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置多达 15 个，占全国同类开发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它们分别于 1991、1992 年批准设立，布局较均衡：广东 6 个（中山、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珠海），湖北 2 个（武汉、襄阳），湖南 2 个（长沙、株洲），河南 2 个（郑州、洛阳），广西 2 个（桂林、南宁），海南 1 个（海口）。

1.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

地处东莞市，穗深港经济走廊中段。占地 72 平方公里，园区内建筑均为园林式低层建筑，形成“科技共山水一色”的园区形象。经反复论证，产业结构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相关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促进高新产业及研发机构在园区的集聚，形成产业高级化的有力支撑，并创造新的经济和科技辐射源，推动现代化中心城市形成和发展。

鉴于其所依托的母城东莞是公认的制造业基地，并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发展成为制造业名城。为此，先期投入 60 亿元开发费，并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以招引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为主，吸引大企业研发机构为主。又因东莞经济发展已形成较大规模，而多年以来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使东莞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故松山湖科技产业园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之一。

2. 广州高新区。

由广州科学城、天河科技园、黄花岗科技园、南沙资讯科技园、广州生物岛等组成。其中，广州科学城位于广州东南部，距市中心10公里，规划面积23平方公里，已开发2平方公里。

3. 武汉东湖高新区。

这里区位有利，北邻华中理工大学等数十所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区内拥有10万余人的专业技术人员，智力密度仅次于北京中关村地区。本区开发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

（三）保税区

保税区在中南地区境内现有深圳福田、沙头角、盐田、广州、海口、汕头、珠海等7个，近占全国保税区总数的二分之一，它们均位于广东、海南沿海一带。其中位于深圳福田、沙头角保税区创建于1991年，均系我国最早设立的保税区之一。

保税区的主要功能：出口加工、国际转口贸易和仓储、商品展示。我国现有的保税区大多设置于运输条件良好的港口城市，这一明显的经济地理特征表明保税区经济发展所必备的地理优势。中南地区境内7个保税区的选址设置均符合上述条件，其中深圳各保税区加在一起仅2.4平方公里，但产值巨大，每平方公里土地创工业产值130亿元，进出口30亿美元。

广州保税区地处东江以西、横滘河以南，距黄埔新港2公里。规划面积1.4平方公里，主要依托毗邻港澳以及依托黄埔商港优势，开拓对外贸易、转口、金融、仓储、信息等业务。

沙头角保税区位于深圳市东翼，东北接华南最大的国际中转港——盐田港，以发展外向型工业为主，并具有进出口贸易、转口、保税仓储、信息咨询等多种功能。

福田保税区东邻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皇岗，南与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规划面积1.68平方公里。保税区对外交通主要依靠公路，以发展国际贸易为主，引进先进技术和工业，并带动金融、信息、仓储、房地产等发展。

（四）边境经济合作区

中南地区西南翼有一段陆地边界，迄今已开辟凭祥、东兴2个边境经济合作区，1992年设立，位于广西中越边境，对促进边贸发展起重要作用。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占地7.9平方公里，现有人口4万人。东兴边境经济合作区占地4.1平方公里，至2002年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亿元，城市、口岸、港口基础设施改善。全国已有26省市以及1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家客商到东兴投资，批准立项687个，投资额92亿元。另外，贸易、旅游也已成为支柱产业。

第十二章　华北地区经济

位于国家首都周边的华北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16.2%，次于西北、西南，在六大区中居第3位，人口占全国11.6%，次于华东、中南、西南而居第4位。

能源工业发达，是华北经济的一大特色。煤炭生产规模、外销量都远远超过其他大区，居全国第1位。这里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以北京为中心的陆、空交通网络和以天津港、秦皇岛港为中心的海运航线，将本区同国内外各地联系起来。

但是，多年来在发展中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已开始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利，对经济布局亦有不良影响，成为本地区后续发展的隐忧。

第一节　京畿之地

一、首都周边，地缘优势

华北地区的精华部分，主要位于国家首都周边一带，这里在历史上也一向作为京畿之地，具有多方面（政治的、地缘的等）优势，加之其主要部分地势平坦，土地资源与能源丰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

全地区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地貌特征大致可分为平原、山地和高原三大类型。其中，平原主要位于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是华北大平原的北部，因有海河及其众多的支流流贯其间，故称海河平原。又因平原的主体部分位于河北省境内，亦称河北平原。

该平原轮廓鲜明，北起燕山，南至黄河，西起太行山，东至渤海，由海河、黄河共同冲积而成，土地平坦、开阔，土层深厚，盛产棉麦和杂粮，为我国北方农业集约化较高的地区，也是工业布局集中的场所。此外，华北的两个特大城市（北京、天津）及一系列大、中、小城市（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衡水、泊头、沧州、唐山等）也都聚集于此。

由海河平原北行，地势迅速增高，进入了冀北山地。它介于海河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为过渡地带。南部有燕山和军都山，北部有大马群山和桦山，均呈东北西南走向，形成拱卫平原的天然屏障，海拔1000～1500米，多险要关隘，自古战略地位重要。

再向北，进入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上游，即大兴安岭南翼。巍峨的山脉由此向北蜿蜒伸展，直达黑龙江边，长1200公里，海拔1100~1400米。无霜期短，不宜多种农作物，但对树木生长有利，形成最大的原始林区，有“绿色宝库”之称，林地1400多万公顷，林木蓄积量11亿立方米，居全国第4位。在涵养水源、保护自然生态和旅游、科研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态屏障严重受损

华北西部和西北部大片地方，地貌形态基本上届于高原。处于太行山和黄河之间的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海拔600~1200米，境内黄土广布，有一系列大小河谷盆地分布其间，生悉环境脆弱。位于山西高原以北的内蒙古高原，范围宽广，西起马鬃山，东至大兴安岭，南界长城，北抵蒙古，海拔1000米左右，地势起伏甚微。由于阴山横贯中部，将整个高原一分为二：西南部有阿拉善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后者是一片肥沃的良田沃土，历史上所说的“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指的就是这里；东北部为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高原、乌珠穆沁盆地和呼伦贝尔高原，其上有大片水草丰美的牧场，分别有：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曾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之地，以盛产马、牛、羊毛、肉类和奶酪等著称全国。

但是，由于在20世纪50~90年代开发利用过度，过牧、滥垦，使土地不堪承受，造成大片草原退化，土地荒漠化，加之有些水利设施建设与布局不当，生态环境日益退化甚至恶化。如河北省平原地区长期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已出现大面积漏斗区，并仍在扩大；北京市地下水采补失衡，平原地区地下水位至2002年比1980年下降11.8米；内蒙古全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总面积60%以上，而且有些地方还在扩展。全区最大的内流河——黑河（古称弱水），因上游来水巨减，下游额济纳河早已断流，河水注人的居延海（咸水湖）、东居延海（淡水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干涸，危及生态。

内蒙西部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毛乌素5大沙漠和内蒙中东部的阴山北麓荒漠风蚀带、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等已构成了从西向东横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长达2600公里、总面积70多万平方公里的荒漠风沙带。上述地带恰巧是影响首都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态屏障带，如其生态状况继续恶化，将危及我国北方广阔地域的生态安全。

在地域辽阔的阿拉善地区（含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其生态环境原有三道天然防线，从西向东分别为：（1）额济纳河；（2）天然梭梭灌木林带；（3）贺兰山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气候变化以及水利设施布局不当等原因，造成额济纳河断流，使干旱进一步加剧。加之牧业发展过快，严重的超载、过牧，超越了环境的容纳限度；而且畜群结构不良，为了羊绒而大养山羊，结果山羊吃光青草甚至树根。还有牧民日常生活用薪材对于生态的破坏作用，天然梭梭也大量枯死。上述这些都促使生

态环境天然防线相继崩溃。

地处偏僻、经济规模很小的阿拉善，在生态上却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是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态上游"，其下游（东南方）的十多个省区以及渤海、黄海海域均在其影响范围之内。民谚有"风起西伯利亚，沙起阿拉善"之说，由于阿拉善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到20世纪末已是面貌全非，原来生长的130种植物现有110多种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沙尘暴频发，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多次暴发的沙尘暴掠过整个华北。2002年春的沙尘暴席卷蒙古国、中国18个省（市、区）、朝鲜、韩国及日本大部分地区。

另据卫星观测，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1988、2000年的卫星数据加以比较，发现浑善达克地区流动沙地和半流动沙地由5.9%增加到25.7%，而固定沙地则由67.9%减少到39.1%，林地和高盖度草地迅速减少，生物量下降，草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由于上述原因，已使该地区成为京津沙尘暴灾害的另一个源头。

从2001年开始，为改善植被状况，内蒙古河套地区已禁止放牧。禁牧区包括河套地区的全部灌区及部分牧区、林区。禁牧后牲畜实行圈养。而地处张家口、承德的坝上、坝下地区及永定河下游三大沙区（亦为京津风沙源之一）在2001～2010年期间投资225亿元治理，退耕还林还草，以改善京津地区的生态面貌。浑善达克沙地也在治理，期望恢复原先"黄马驹"草原风光。

然而，华北地区能源开发及工业（如炼焦、煤电等）污染总量很大，也危及地区生态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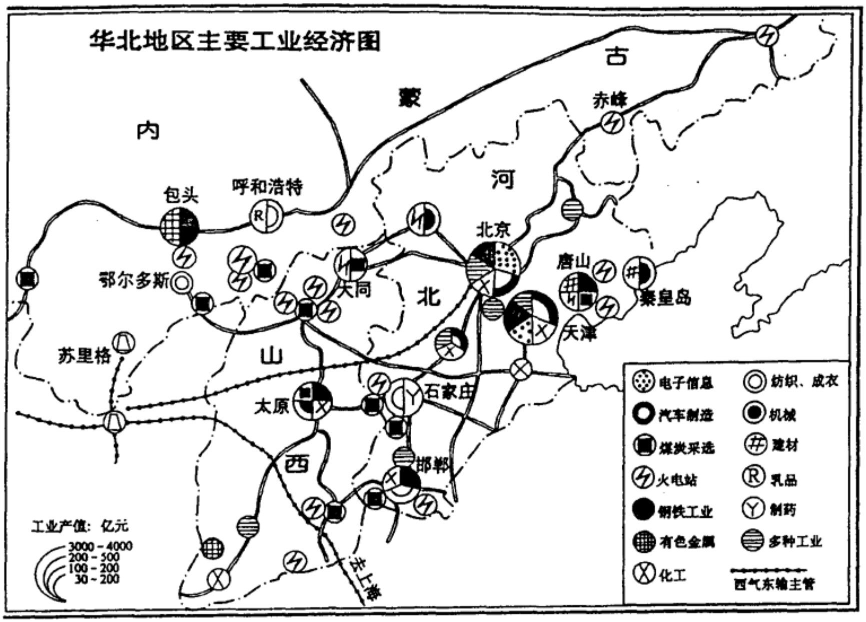
三、地下资源富饶

华北地下多矿产，以煤最富，有"煤海"之称，探明储量近占全国二分之一，山西有3000多亿吨，拥有大同、宁武、西山、汾西、沁水、河东等巨型煤田和阳泉、浑源等大中型煤田；内蒙古探明2232亿吨。

除煤以外，华北地区的稀土、铌矿资源亦居全国首位；铁、石油、天然气、海洋资源等也具有经济开发价值。

第二节　全国能源基地

华北煤炭工业产值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化工产值占全国近五分之一，地域工业结构的最大特色，是大力开发本地区的资源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如图表12－1所示。



图表 12－1

一、煤炭资源的开发及布局

华北煤炭工业，无论是资源、产品产量、产值在全国六大地区中均居首位。煤资源的开发，对推动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山西煤藏丰富，品种齐全。但在 1949 年时产煤仅 270 万吨，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大力开发，到 2003 年，全省原煤产量达 4.8 亿吨。在此期间，山西累计产煤 80 多亿吨，其中外销煤 25 亿吨，供应全国 26 省，并出口国际市场。山西煤炭工业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专门化部门。

山西煤炭工业布局遍及全省，有大同、平朔、阳泉、西山、汾西、潞安、晋城、轩岗、霍县等大矿。大同以出产优质动力煤而著称，是我国最大的动力用煤基地。1985 年产煤逾 3000 万吨，1997 年上升至 8000 多万吨。但长期以来单一产煤，效益低，且污染重，几乎把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毁掉。21 世纪初起有所改变，大同煤矿集团于 2003 年重组后成立，实施大公司发展战略，以大同、宁武煤田资源为基地综合发展，预计至 2006 年产销量逾 1 亿吨，同时大力发展煤炭延伸产业，建坑口电站，煤电联营。

平朔煤田开发于 1982 年，至 21 世纪初已成为我国出口煤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大型

露天矿和亚洲最大的洗煤厂。产品有洗精煤、洗混煤、平混煤三个系列十多个品种，出口量占全国动力煤出口的三分之一，预计至2010年，平朔年产煤4500万～5000万吨。

地处晋中的阳泉，为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供应基地。阳泉无烟煤含硫低，热量大，是优质民用煤和制造合成氨原料，除供华北消费外，还供应上海等地；太原西山是全国最大的焦煤生产基地，炼焦煤可采储量11.2亿吨。因煤种特殊，焦煤在世界和我国均属短缺性煤种。利用焦煤深加工，可获焦炭、炭油、焦炉气，并可提炼数十种化工产品。西山矿务局古交矿区年采能力为1650万吨。

山西所产的大量优质原煤外运，铁路运输承担总运量的五分之四；公路承担近五分之一。在铁路运输中，1984年开通的大同—北京丰台双线电气化铁路和20世纪90年代开通的大同—秦皇岛重载铁路，是通过量最大的2条干线。此外，还有5000多辆载重汽车沿公路起辅助运输作用。还规划建设管道输煤干线，增加新的输煤方式。

内蒙古煤田与山西一脉相承，也具有煤田面积大和储量丰富的特点。唯因地理位置较偏远，故对其开发利用较晚。

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勘探和开发，从西部的桌子山，经鄂尔多斯台地、大青山、锡林郭勒高原到大兴安岭山地，都有丰富煤藏。至2002年，内蒙煤炭探明储量2232亿吨，居全国第2位。其中，位于鄂尔多斯台地上的准格尔—东胜煤田，是目前国内已探明的最大煤田。其他主要煤田还有霍林河、伊敏河、元宝山、大青山以及乌达—桌子山煤田等。

霍林河煤田位于内蒙古东部，面积540平方公里，褐煤储量129亿吨；伊敏地区煤储量176亿吨，为低磷低硫优质褐煤，且附近水源充足，便于建设大型坑口电站，实现煤电联营。以上煤藏覆盖层浅，便于实现大规模露天开发，经济效益佳。1984年，2座现代化露天煤矿——霍林河南露天矿和伊敏河一号露天矿首采区，相继建成投产，揭开了大规模开发利用内蒙古境内煤炭资源的序幕。生产规模2000万吨。另外两大露天煤矿（准格尔、元宝山）也已建成。

内蒙古的煤产量1985年为3204万吨，2002年增至1.12亿吨，在全国各省区中的地位上升至第3位，在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区中名列第1位。鄂尔多斯市煤炭外销量每年逾7000万吨。

河北省煤田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地处交通要道，靠近大、中城市，产、供、销均很方便。炼焦煤比重大，为发展冶金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煤炭工业结构较合理，不仅开采能力可观，而且洗煤能力大，洗精煤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所产大量炼焦煤和动力煤，除就近供应本省和京、津两市需要外，还通过铁路和秦皇岛海港，运销华东和东北等地。

地处冀东的开滦煤矿是全国著名大矿，煤层厚，煤质良好，煤种主要为肥煤、气煤，分别可供冶金配焦和燃料动力使用。另外，矿区紧靠海港和铁路，便于将所产大量原煤、洗精煤外销国内各地或出口。

位于冀南的峰峰、井陉煤矿，则以出产高级炼焦煤著称。这里的煤具有较强的结焦性，发热量大，煤中所含的有害杂质少，除供本省和北京外，还南运武汉，北销鞍山，

是不可多得的优质炼焦煤产地。

华北煤炭工业发展与布局中，有一个新的因素：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用。20世纪90年代在晋东南发现大型煤层气富集区，面积1200平方公里，探明储量2000多亿立方米，是世界级煤层气基地之一。在我国煤炭工业的多种经营和综合发展中，将开发煤层气作为一项战略性工程。在晋城至长治建设我国第一个大型煤层气基地，建成后年产气10亿立方米，可基本满足晋东南城市的工业与居民用气需求。

此外，煤炭直接液化项目的开发建设从2004年开始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率先启动。此项技术是以煤为原料并将其直接液化为石油产品，一期工程2005年投产。二期建设完成后可年产成品油500万吨。上述建设与布局对华北与全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均有利。

二、电力工业布局及煤电联营

以火电占绝对优势的华北电力工业，以本区煤炭资源为基础而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兴建一批火电厂和热电站，如唐山陡河电厂装机容量155万千瓦；内蒙古东部元宝山电厂，单机容量60万千瓦，曾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机组。80年代以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自治区）在向外输出大量煤炭的同时，开始实行煤电转换战略，大量输出电力。为此，先后建成一批区域性的坑口电厂和火电站，向北京、天津、河北以及区外的辽宁等省市送电。尤其是山西电力已发展到“大机组、大电网、高参数、高压输电”阶段。使山西形成向京津输送能源的大功率“空中走廊”，对华北经济发展有利。80～90年代相继建成的山西神头第一、二电厂、大同二厂、阳泉电厂、漳泽电厂等大电厂，共同构成电力输出基地。此外，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已建成或在建阳城电厂、河曲电厂、王曲电厂、古交电厂，其中阳城电厂燃用无烟煤，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通过755公里的50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全部输往江苏省。在建的内蒙古托克托A厂，全部建成后总装机480万千瓦。

内蒙古亦为重要的外输电力基地。除了向北京等地输电以外，也向东北输电。伊敏煤电一期1998年建成，将伊敏褐煤就地转化为电力，输往黑龙江省。2001年，丰沙二回500千伏输电线路建成，内蒙西部向京津唐电网送电增加。此外，内蒙古还向蒙古国输出电力。

2010年前后，内蒙电力将以三条通道向北京方向输送，合计送电能力1000万千瓦。为减少“西电东送”通道拥挤，还将建设从内蒙中部向北京送电的南北通道。

现在，华北主要电力工业中心有北京、天津、军粮城、大港（以上属天津市）、大同、神头、太原、阳泉、娘子关、漳泽、霍县、阳城（以上位于山西）、唐山、陡河、邢台、马头、涉县、张家口（以上河北）、丰镇、达拉特、准格尔、托克托、包头、元宝山、通辽、霍林河、伊敏（以上内蒙古）。

三、陆、海油气资源开发初具规模

至21世纪初，陆、海油气资源开发形成较大规模。已开发华北、大港、二连、冀东和渤海油田。地处河北省中部的华北油田。靠近京、津两大城市和本省各工业中心，经济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从20世纪70年代投入开发后，产油量迅速超过大港，现为华北地区第一大油田；位于天津市东南郊、渤海湾西岸的北大港（今称大港），现已成为初具规模的石油城。以此为中心的大港油田，成为我国大油田之一。此外，在20世纪80~90年代，华北地区北部石油勘探也取得了成果，到1995年，内蒙古的二连油田得到开发。

海底油气资源开发后来居上，并促使华北地区石油工业布局出现东移趋势。至21世纪初，在渤海海域已相继建成埕北、绥中36-1、曹妃甸11-1、渤中29-4、渤中25-1、蓬莱19-3、秦皇岛32-6等一批商业油田，成为中国北方沿海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布局的集中区域，由此而形成整个渤海油田，成为继南海东部油田之后我国第二个年产1000万吨级的海上油田。

华北炼油工业主要分布于北京、天津、石家庄、沧州、大港，均建有大型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本区和东北所产原油，通过输油管道运至上述各地提炼。其中，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的工业产值和产品销售额在全国石油加工行业中均居第3位。

四、其他工业基地

（一）冶金工业基地

华北焦煤供应充足，加上河北省东部、南部以及内蒙古包头市北部一带铁矿资源甚丰，使冶金工业较快地发展起来。2002年，全区出产生铁5958万吨、钢5244万吨、成品钢材5132万吨。在全国重点钢铁企业中，位于本区境内的就有首钢、包钢、太钢、邯钢、唐山钢铁公司、天津钢管公司、宣化钢铁公司等。

首钢主要依靠冀东和国外提供矿石、冀南供应焦煤进行生产。冀东迁安铁矿是大型矿山之一，探明储量46亿吨，年产矿石1000万吨、铁矿粉400万吨。首钢通过技术改造，至1995年，已形成年产10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后因规模过大不符合首都经济特点而将综合产能调减至600万吨。

首钢的发展与布局曾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在20世纪70~90年代，随着市场需求，生产规模急剧扩大，获利不菲，却又造成污染空前严重，对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首都造成多方面危害。为此，当同类企业在增产扩能拼市场时，首钢却将主要精力用于环境治理，1995~2001年累计耗资13亿多元，完成269项治理项目。北京申奥，首钢又面临“是迁是留”的困扰。如整体搬迁，易地再建800万吨规模同类企业，需455亿元，难以解决；并影响10万市民生计。遂决定“以退为进”谋发展，在2008年以前再关停部分生产设施，压缩200万吨产能，在河北迁安新建高起点、高水平钢铁生产基地

（基于地理位置与资源条件限制，暂定 200 万吨规模）。在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后，腾出的大片土地将用于城市集中开发。

首钢发展受累于布局所付出的巨大消耗，通过更新发展策略、调整产业结构、大量增加非钢收入而得以弥补。

包钢利用附近大拐沟等地焦煤，冶炼白云鄂博的富含稀土和铌的铁矿石。此种有利条件不仅使包钢的钢铁产品更具延展性、抗拉性等良好加工性能，还使它在成为钢铁工业基地的同时，也是全国的稀土科研和生产基地。已形成年产钢 500 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生产重轨、大型工槽钢、带钢、方钢、无缝钢管、石油套管和线材等。1999 年建成重轨加工线，为华北乃至全国铁路提速、发展高速铁路服务；新近建成了热轧薄板生产线、薄板坯连铸连轧工程，并于 2003 年开工建设冷轧薄板项目，这些使包钢初步形成“板、管、线、材”四个精品生产线，装备水平、连铸比、板管比均有大幅提高。

太钢始建于 1934 年，是国内最早开发的生产不锈钢的企业之一，经技术改造，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已能批量生产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特征的不锈冷轧薄板等产品，至 2004 年已形成年产 100 万吨不锈钢、不锈钢材的系统，是全国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

邯郸钢铁集团近年发展快，至 2002 年已有薄板坯连铸连轧热卷板 CSP 和中厚板轧机 3 套，形成年产板材近 300 万吨能力。正在建设 130 万吨冷轧薄板工程，建成后年产冷轧板卷 90 万吨、镀锌板卷 30 万吨、彩涂板 10 万吨，对华北钢铁产品结构调整有利。

在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方面，包头的稀土和稀有金属冶炼，具有全国意义。这里已建成全国最大的稀土精矿选矿厂和稀土合金生产厂，形成了稀土精矿、稀土合金、氯化稀土、混合稀土化合物、单一稀土化合物等生产线，生产多种稀土产品。包头市稀土产品产量占全国 70%。此外，山西省铝土矿的探明储量达 5.8 亿吨，在河津市建设的山西铝厂，到 2003 年已形成年产氧化铝 80 万吨、电解铝 28 万吨的生产规模，成为华北地区主要的铝工业基地。

（二）化工基地

由于煤炭、石油、电力、冶金等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和能源，使化学工业获快速发展。山西化肥厂是我国第一个以煤为原料的大型化工企业，年产合成氨 30 万吨、硝酸 54 万吨、最终产品硝酸磷肥 90 万吨。对改变华北化肥生产中氮、磷比例失调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北省的化肥工业亦有较大规模，氮肥生产在我国北方居首位。地处秦皇岛的中国—阿拉伯化肥公司则是全国最大的复合肥生产基地之一。

华北化学工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酸、碱、盐等基本化学工业较发达。在渤海湾沿岸所产优质海盐的基础上，天津、河北的制碱工业早已发展，具有悠久的生产历史和良好的技术基础。

随着大港油田和华北油田相继得到开发，以原油、天然气为原料，在大港、天津、北京、石家庄和沧州等地发展了石油化学工业。其中，北京燕山石化、天津石化均为大企业。燕山石化拥有年加工原油 950 万吨和生产乙烯 71 万吨的产能，是目前北方最大的乙烯、塑料与树脂、合成橡胶、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生产基地之一。

（三）纺织工业基地

20世纪50年代以前只在天津有一些棉纺织厂。从50年代起扩大植棉，在产棉区附近的河北、北京、山西新建了一批棉纺织厂和印染厂，并使天津的棉纺织工业，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扩建，到80年代初期，全区各地所的棉纺纱锭，已达300万枚，至90年代初进一步增至600多万枚。此后，在90年代后期开始淘汰压缩落后的棉纺锭，使总锭数减少。

华北棉纺织工业的主要生产中心有天津、石家庄、北京、邯郸、太原和榆次。

在毛绒纺织工业方面，本区的设备能力较大，拥有毛纺锭40万锭，多利用内蒙古的原料或进口羊毛进行生产。内蒙古已成为我国毛纺工业重要基地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鄂尔多斯和临河等地的羊绒加工业发展快。此外，在京、津两地，还有规模较大的毛纺织厂。

（四）其他轻工业基地

食品工业有：呼和浩特、包头的乳品、肉类加工和甜菜制糖。河北、天津濒临渤海的岸边有大片盐田，是我国沿海食盐生产条件最好的地方，所产“长芦盐”为优质民用盐，除供本地消费外，还畅销内地各省（区），并为盐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原料。

华北地区主要工业品在全国的地位，如图表12－2所示：

图表12－2　　华北地区主要工业品在全国的地位（2002年）

主要产品	产量占全国第几位	备注	主要产品	产量占全国第几位	备注
原　煤	1	占全国29.2%	优质型钢材	2	次于华东
焦　炭	1	55.8%	无缝钢管	2	次于华东
生　铁	1	35.9%	化学原料药	2	次于华东
铁矿石	1	39.2%	塑料树脂	2	次于华东
焊接钢管	1	53.7%	合成橡胶	2	次于华东
钢　带	1	56.4%	纯　碱	2	次于华东
乳制品	1	33.1%	烧　碱	2	次于华东
移动电话机	1	43.6%	原　盐	2	次于华东
数字程控交换机	1	36.5%	呢　绒	2	次于华东
微型电子计算机	2	次于华东	火力发电	2	次于华东
成品钢材	2	次于华东			

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摘要计算编制。

第三节 农牧业发展布局及其教训

一、粮食、经济作物布局

华北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大宗。河北省小麦产量居全国各省第3位，集中分布于河北平原；谷子种植因消费增长之需而呈上升趋势，华北地区谷子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二，集中分布于河北、山西；马铃薯种植以内蒙古居多，产量居全国之首。

棉花为主要的经济作物。高产棉田集中分布于河北省京广铁路沿线及石德铁路以南的平原区，有“冀南棉海”之称。自然条件有利于棉花生长，且植棉历史悠久。河北省年产棉40万吨以上，常年居全国第3位、第4位。华北也是油料作物较多地区，以花生、葵花籽、胡麻籽为大宗，向日葵种植集中于内蒙、山西；胡麻是耐高寒、生长期短的作物，多种植于内蒙古大青山前和阴山丘陵区。内蒙的胡麻种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第2位。

果园面积河北居全国第一，水果种类以梨为主，苹果、葡萄次之。2002年河北产水果748万吨，其中梨占266万吨。作为糖料的甜菜以前较少，现种植多。2002年华北甜菜产量229万吨，集中分布于内蒙古后套和土默川平原，这里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利于甜菜糖分积累。

二、牧业布局变迁

华北牧业发展较快，地域布局变化也较大。牧业生产的地域构成以河北、内蒙古为主，河北主要是得益于“环京津”的区位价值，内蒙古则是利用区内有利的自然条件(原来牧场辽阔、水草丰美）而实现了牧业的大发展，是我国牧区畜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出产“三河牛”、“三河马”、“科尔沁马”、“敖汉细毛羊”等闻名，并向周边城市提供大量奶、乳制品。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仅有海拉尔一家简陋的乳品加工作坊，现在有数十家机械化乳品加工厂，布局主要集中于呼和浩特等地。

由于靠近京津唐城市群，近十年来华北乳业发展迅速，奶牛饲养量、牛奶产量、奶类总产量、乳制品产销量等指标均居全国六大经济区之首。

三、草原退化，土地沙化与荒漠化，经济结构与布局调整

据统计，内蒙古牧区原有草原8800多万公顷，因受人类经济活动（过牧、滥垦、城乡建设）急剧增加的影响，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现已减少到5100万公顷，而且

草原质量严重下降。此外，内蒙古荒漠化面积广达6600万公顷，在全国居第2位。在上述地区，从三十多年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肥美草原衰变为沙尘暴频发的生态灾区。

为此，在包括牧业在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布局调整时，除禁牧、轮牧、休牧、收缩转移、"退耕还林还草"以外，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尽量组织"人退"，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牧（农）民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生存与生产、交易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继续造成损害。如地处京津上风方向并作为华北风沙源之一的锡林郭勒草原，每迁走2000人，就可使约5000平方公里的草地自然恢复；又如荒漠化面积已占85%的阿拉善地区，在27万居民中，分散居住的牧（农）民仅占5万人，但他们为了生存，继续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如实行生态移民，更有利于生态的自然恢复。

到2003年，内蒙古已有44个旗县实现全面禁牧，13个旗县实现季节性禁牧，14个旗县划区禁牧。全区已腾出草场与坡梁地50万公顷以上，植被覆盖率有所提高。

第四节　新的陆、空、海交通网络

一、交通运输地位显要

近十多年中，华北地区交通网的结构与布局出现了很大变化。

华北是大量煤炭外运的主源头，我国"北煤南运"与"西煤东运"的必经之地。其他重、轻工业部门亦较发达，农、牧业产品商品率也较高，区内外物资交流和进出口贸易兴旺，更兼是首都所在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因而交通运输繁忙。北京为全国铁路枢纽、航空中心；天津新港为华北外贸门户，秦皇岛为超级能源输出港；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为华北公路网中的枢纽要站。

二、以运能干线为主的铁路网

国有铁路营业里程仅次于东北，居全国第2位。

担负能源运输干线作用的铁路，以大秦—京秦新线、京包复线和京原电气化铁路为主而构成的中国能源运输干线（北线）和以石太—石德—胶济复线电气化铁路为主而构成的中线几乎全部在华北境内。

从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华北铁路网中以纵贯南半部的京广线最重要，它将本区主要的棉、粮商品生产基地以及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大、中工业城市连通起来。

京山线，即京哈铁路北京至山海关段，长415公里，1880～1901年筑成。其中，从

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路"为我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现在，京山线是贯穿于京、津、唐地区以及天津新港和秦皇岛港的重要交通干线，也是华北、东北两个经济发达地区运输纽带。

20世纪70年代建成通车的京原铁路，由北京至山西原平，全长419公里，是华北区腹心地带的东西交通干道，亦为晋煤外运出口。此外，作为晋煤外运主干线的山西北同蒲复线电气化和南同蒲复线、太焦复线、电气化工程，已于80年代完成，使晋煤外运通道更为畅通。

20世纪80年代建设的丰沙大双线电气化铁路，东起北京丰台，西经河北沙城至山西大同枢纽口泉站，全长379公里，年运量9600万吨；北京—秦皇岛电气化双线铁路，全长341公里，1982～1985年建成。上述线路贯通后使山西煤炭可以源源东运出口。为了进一步提高晋煤外运能力，我国第一条电气化复线重载铁路——大（同）秦（皇岛）线（全长653公里）于1991年建成，年运煤量可达1亿吨。

津沪铁路，由天津北站至上海，全长1323公里，20世纪初始建，现已改造为通过能力高的铁路，是华北、华东以及京、津、沪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是我国目前运输繁忙、客货流密度大的主干铁路之一。由于客货流密度过大，不堪重负。从21世纪初起修建与其大体平行走向的京沪高速铁路。

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集通铁路，西起集宁市，向东经化德、阿鲁科尔沁旗、开鲁县至通辽市，全长943公里，是我国第一条草原铁路，亦为全国最长的地方铁路。也是连接"三北"（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陆路纽带。

1996年建成的京九铁路（北京—九龙），纵贯华北大平原中央，连接北京、天津、霸州、任丘、衡水等城市，是华北第三条纵贯铁路。运力大，年运量7000万吨。建成后对改善全国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从华北来看，对推动华北平原中央腹部地带经济开发有利。

朔黄铁路，西起山西朔州神池，往东经原平、行唐、沧州至黄骅港，是作为我国西煤东运第二条大通道神（木）黄（骅）铁路的第二期工程而兴建的，建筑标准高，运力大，是电气化复线铁路。2002年全线贯通后，具备每年6000万至1亿吨的外运能力，对华北地区扩展铁路网，改善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铁路干线在华北范围内相交，形成了北京、大同、太原、石家庄、天津、霸州、衡水、集宁、通辽等铁路枢纽，以北京铁路枢纽规模最大，有8条干线交汇，不仅是华北也是全国铁路网的中心。在经过多次铁路提速以后，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出现了快速运输的新格局，开行直通全国88个城市、4个国家的旅客列车。

三、以首都为中心的航空运输

随着"京津航空一体化"构想的实施，华北航空运输市场逐步形成以首都机场为中心，周边机场合理分工的航空运输网络。该网络的形成，对改善华北运输结构有利。

地处北京市东北郊外的"首都国际机场"始建于1955年，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国际

空港，辟有170多条国际、国内航线，其中跨越极地直飞纽约的航线是从我国飞往北美东海岸旅途时间最短的航线。2002年首都机场旅客、货邮吞吐量分别为2700万人次、67万吨，居世界第26位、第25位，亚太地区第6位、第9位。预计到2005年，首都机场客运量可进入世界前二十名。

因对运量预测不准和规划问题，首都机场进行的两次大的改扩建均很快达到饱和，如1999年完成的扩建，耗资30亿元，不仅比不上汉城以西的仁川机场，就是比20世纪90年代竣工的东京成田国际机场，规划设计、建筑质量均有差距。

首都机场现有东、西两条平行跑道和1、2号两座航站楼，年客运吞吐能力3500万人次，2005年达到饱和。2001～2003年，首都机场每年增加约300万人次。预计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月高峰客运达556万人次，为此从2004年起在2号航站楼东侧再建第3号航站楼，投资194亿元，征地2.2万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预计2007年底建成，设计客运吞吐量每年6000万人次，起降50万架次，货邮180万吨。实现规划中的枢纽机场功能，还将以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基本建成航空城，使首都机场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自由贸易港。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从1995年起在华北民航运输网络布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增强，由原来的国际定期航班备降机场升格为国际定期航班机场。占地680万平方米，跑道长3200米，可接纳包括波音747～400型大型宽体客机在内的各种飞机起降。

此外，华北还有石家庄正定机场、太原武宿机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等重要机场，以及包头、赤峰、通辽、乌兰浩特、海拉尔、锡林浩特、秦皇岛、长治等中小型机场。因内蒙古面积辽阔，东西绵长达数千公里，并要绕行其他省、市，因此民航运输发展早，辟有多条长距离航线，有7个民航机场，航线里程2万多公里。

四、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

以前，公路在本区交通运输网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突出。近十余年以来，由于公路运输的灵活性等原因，其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除改善现有公路网以外，重点加强高速公路建设。“京津塘高速公路”于1993年建成并投入营运，对改善京、津两市的运输联系，促进华北对外经济贸易、国际旅游以及沿线地带的经济开发均具有重要意义。

华北地区建成的高速公路干线还有：京珠（华北段）、京沪（华北段）、京沈（华北段）、京开（北京段）、京张、石太、石安、石黄、宣大、保津、唐津、唐港、大运、呼包等。其中作为京珠高速公路北段的京石高速公路于1995年建成；石太高速公路的山西段太旧高速公路于1996年建成通车，这是我国第一条山地高速公路，蜿蜒于太行山中，现已成为山西与华北各省市公路交通的新通道。此外，内蒙古第一条高速公路——呼（和浩特）包（头）线也已于2001年建成通车。

至2003年，华北高速公路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天津、石家庄、太原为枢纽，辐射主要大中城市和塘沽、秦皇岛、京唐、黄骅四大海港以及大同、阳泉等煤电基地。由于上述高速公路网络的形成，使重要运煤路线及各省区重要城市的主要出入口道路长期存

在的拥挤状况得以缓解，并使公路运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

五、海运量大，海港布局有过密倾向

华北地区的海岸线短，仅在渤海西翼有562公里海岸，且多为平直的沙岸，海岸外又缺少岛屿，故发展海运的条件不及其他几个大区有利。然而，也有几段自然条件良好的海岸，如秦皇岛有一段岩岸，岸外即为深水区，海面上适逢一股暖流通过，形成全年不冻天然良港。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皇岛港先后建成原油、煤、杂货码头等49个，其中万吨以上26个，可泊10万、5万、3.5万、2万吨级船舶，成为以能源输出为主的港口，货物吞吐量1.25亿吨（2003年），名列华北第2位、全国第6位。有数十条海运航线通往国内外，主要输出煤。在与腹地联系方面，它与大秦铁路共同构成1亿吨运力配套，加快了“三西”（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煤炭外运，2003年输煤1.1亿吨，占全国海运煤炭总量二分之一，成为我国“北煤南运”的枢纽和龙头，也是世界级的能源输出港。

一向作为“华北门户”和京、津出海口的天津新港，地处渤海湾西岸和海河口，是我国第一个人工商港，北方的进出口物资集散地。15公里长的南、北防波堤嵌人大海，堤内是120米宽的双航道，港内已建成76个泊位，其中万吨级泊位52个，有我国目前最大的突堤式码头和第六代集装箱码头以及国际客运码头、杂货码头、化肥码头、散粮码头、煤码头、铁矿石码头、石化码头。可通往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鉴于天津港地理位置有利，立足华北，辐射西北，面向东北亚，腹地广达450万平方公里，故扩建仍在进行。但建设与布局的特点从项目建设过渡到注重空间拓展与功能拓展。至2003年底已建成15万吨级深水航道，水深15米，10万吨级船全天候进出，15万吨级船乘潮出入。预计2010年建成与国际大港相适应的完备的集疏运体系，成为国际深水大港、东北亚国际集装箱枢纽、中国北方最大的散货主干港、国际物流和资源配置的枢纽港。

1952年天津港重新开港时，货物吞吐量仅74万吨。到2003年货物吞吐量逾1.6亿吨，预计2010年逾2亿吨，集装箱700万标箱。

此外，华北其他重要海港还有京唐港、黄骅港等。其中京唐港位于河北乐亭县王滩镇东侧，初系地方港口，后被定为北京的出海口，按规划由唐山、北京联合建设，产权共有。1993年部分建成并实现国际通航。在21世纪初还在渤海北部的曹妃甸建设25万吨级矿石、石油接卸码头。预计至2007年，京唐港东、西两翼的王滩港区、曹妃甸港区吞吐能力之和将达到5000万吨。

然而，京唐港的腹地与货源有限，一方面唐山市腹地较小，另一方面北京进出港货物舍近（天津新港）求远（京唐港），港口使用成本高，不如使用塘沽的港口设施合算。京唐港周边已有秦皇岛等20多个港口，其年吞吐规模从百万吨至1亿吨不等。上述限

制性因素使京唐港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黄骅港位于河北省黄骅市，是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转口港。其港口开发与陕西北部神府煤田开发以及神木至黄骅的重载铁路干线建设，三者同步规划、同步兴建。作为我国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的神黄铁路在21世纪初建成后，黄骅港形成年吞吐3500万吨的装卸能力，远期可达1亿吨。该港地处环渤海经济区前沿，周边原有港口较少（天津港至龙口港之间1000公里海岸线上无大、中型综合性港口），作为我国西煤东运第二通道的终端和转口港，其建设与布局还是合理的。

至21世纪初，在华北沿海已形成由天津新港、秦皇岛港等组成的海运网络。但在对海岸线的利用与开发过程中，地方保护和各自为政以及未经多方论证而匆忙另建新港等做法，对经济发展和合理布局反而不利。因此，应注意防止港口（含中小港）开发布局过密倾向。

第五节　区内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

一、区内差异，省域经济特征及发展前景

华北内部无论在自然条件、历史开发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地区内各省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如图表12－3所示。

（一）河北省

为华北第一省。历为京畿之地，中环京津，东环渤海，“两环”是河北独有的区位优势。

人口众多，占华北近一半，有较强工业基础，燃料动力和钢铁工业较发达；农业地位重要，是重要的棉、麦产地。

凭借良好区位和资源条件，河北省成为重要的原材料生产和供应基地。全省生产力布局形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功能的三个地带：（1）较发达的山前地带；（2）落后的山区坝上地带；（3）处于中间状态的沿海地带。

图表 12－3　华北地区各省（市、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表（2002 年）

区域＼项目	GDP 总值（亿元）	GDP 人均（元/人）	工业销售收入①（亿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经济全球化 外贸依存度	经济全球化 外资依存度	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水平指数	新经济指数②	城市化 设市城市（个）	城市化 城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城市化 建制镇（个）	城市化 城市化水平③（%）
华北地区	14957	10080	13498	3079	0.3460	0.0765	0.2113	—	77	0.5	2261	
北　京	3130	27746	3169	230	0.7063	0.0848	0.3956	97.0	1	—	141	77.5
天　津	2023	22068	3346	181	0.9318	0.1859	0.5589	59.1	1	—	120	72.0
河　北	6077	9047	4393	1729	0.0930	0.0557	0.0744	42.8	33	1.8	933	26.1
山　西	2002	6098	1617	352	0.1475	0.0259	0.0867	42.2	22	1.4	564	34.9
内蒙古	1725	7233	973	587	0.1275	0.0236	0.0756	40.8	20	0.2	503	42.7

①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

②包括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活力与实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五类指标；

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 2003》、《经济日报》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20 世纪 90 年代建设京唐港、黄骅港 2 大新港以及神（木）黄（骅）铁路、石家庄正定机场、邯郸马头机场等重点基础设施工程，使全省海、陆、空交通网络构成及其布局大有改善。加之本省区位因素有利，省内绝大部分地区（如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沧州、邯郸、邢台、承德、张家口地区）处于我国内地北方经济开发热点之一的环渤海地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上述地区又是京畿重地，发展商品农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条件甚佳。1996～1997 年，河北酝酿、制定、实施“环京津”、“环渤海”的“两环”开放带动战略，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使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相互促进，推动全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如能充分利用上述有利因素，有可能全面振兴河北经济，在京、津外围再现一个兴旺的“环京津经济地带”，共同构成中国的“首都圈”。

从河北省经济发展及其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来看，近年来由于充分利用上述有利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因素，加上重视引进外资与技术，开发资源和合理布局，已使全省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局面。预计 2007 年 GDP 可达 1 万亿元，成为经济大省。

（二）山西省

能源、冶金、化工基地，全国最大的产煤省份以及煤炭和电力输出地。1999 年产煤量达 2.5 亿吨，远远超出其他各省，居全国首位，有“煤海”之称。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山西外销煤 30 多亿吨，按每吨煤可创产值 2500 元计算，共创产值 75000 多亿元。到 20 世纪末，山西煤炭工业继续发展遇到困难。首先是低硫煤资源经数十年大规模开采后，面临资源匮乏，而高硫煤开发则因环保问题而难以销售。加以近邻陕西、内蒙的大型煤田相继开发，因其成本低，可低价销售，每吨煤坑口售价仅 29 元上下，与山西煤每吨 100 元相去甚远。

对此，山西煤炭能源开发向输煤与输电并重转化，使二次能源、低效能源、污染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化，重点发展市场看好的无烟煤、主焦煤、洗选煤，并依托能源优势发

展不锈钢、氧化铝等产业。

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导的重型产业结构，是山西经济发展及其布局以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它是由山西的资源特点所决定的，是历史演变和长期投资的结果，基本上符合全国的区域分工和国家战略发展重点以及产业政策导向。但也存在产业初级化，支柱产业单一，三产发展滞后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山西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并引发环境灾难。

为此，需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现已建成与在建的有原煤、洗精煤、型煤、焦煤水煤浆产业链；冶金业主要建设不锈钢、铝工业、镁工业三大基地；电力建设"十五"末期达到2500万千瓦时的生产规模；贯穿南北的高速公路（大同—运城）也已于2003年开通。

在区域发展方面，以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为依托，以吸引和辐射范围为区界，按实际经济联系，将全省划分为六大经济区：大同经济区、太原经济区、阳泉经济区、长治经济区、侯马经济区和晋西北特别开发整治区，走扩大开放，发展区域联合和国际合作的发展道路。

二、经济区、经济协作区

（一）环渤海地区

环渤海经济区布局图，如图表12－4所示。

1．经济区地域界定；东北亚中心区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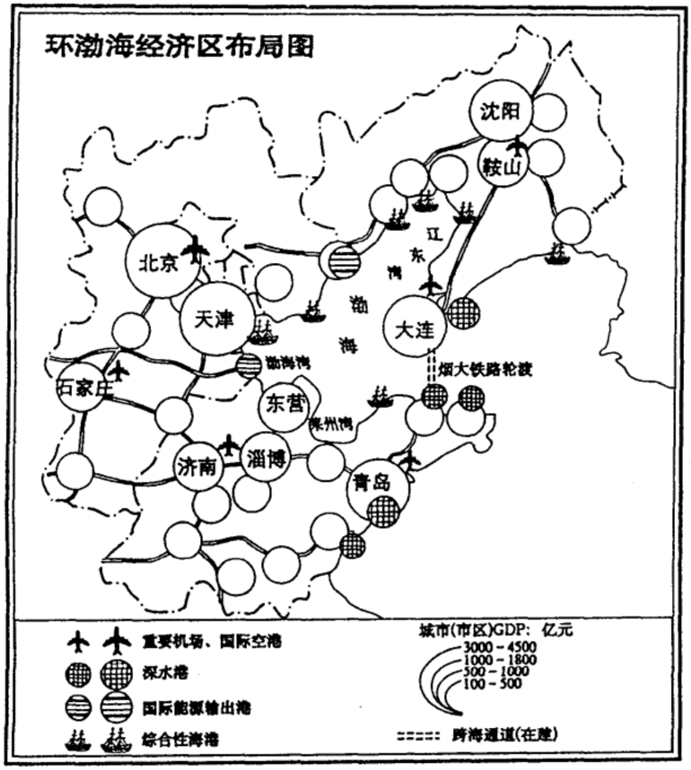
本区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中部、辽宁省和山东省组成，面积182.89万平方公里，有居民2.6亿人。这是广义的环渤海地区，也是对我国近年规划的七大经济区之一的环渤海经济区的地域界定。单从地理上看，其范围只包含京津冀辽鲁5省（直辖市）。狭义的环渤海地区仅指天津、大连、青岛等16个沿海城市及其辖区。

环渤海地区位于东北亚中心位置，是中国沿海最邻近日、韩、朝的地区，是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前进基地，对我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掌握主动，从边缘转化为核心区域，具有重大意义。

2．城市群、港口群、产业群密集布局，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滞后。

本区位于华北、东北、华东三大区的结合部，并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密集区域之一（见图表12－4），也是我国经济开放与开发由南向北推移以及经济发展与布局扩展由东向西进行的结合部。

在历史上，环渤海地带的工业和制造业多有老字号历史，是我国近代工业和制造业的发祥地之一，只是制造业以重为主、国企为主，存在体制、结构等问题，故在改革开放前期发展落后。近年来逐渐成为投资热点，GDP已占全国26%左右。正发展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我国第三个大规模区域制造中心。随着对老工业基地改造力度加大，在环渤海弧状地带，可伸缩的地域空间较广阔，但存在的问题亦不容忽视。



图表 12－4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滞后，已成为环渤海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区内经济布局集中的京津唐产业集聚区以及胶济、沈大两个产业带，实际上是三个相对独立的“港口——腹地”经济区域，或称三个核心区（京畿圈、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而在产业布局集中度最高的京畿圈地区，又因行政藩蓠壁垒而导致各自产业优势难以互补，长期以来形成两个直辖市、一群省辖市，却没有一个中心城市的局面。另外，本区城市首位度偏低（同长三角相比）也有影响。应逐渐建设成为统一的功能经济区，并成为中国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主导区域。

渤海海域面积达 7.7 万平方公里，海洋资源丰富，但海洋生态环境脆弱。由于海域封闭性强，工业布局集中，周边陆地工业污染严重，未达标排污问题突出，平均每年流入渤海的污水达 28 亿吨，随同进入的污染物 70 万吨，分别占全国人海污水、污染物总量的 32%、48%。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出现大面积海洋污染，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经常发生赤潮灾害。至 2002 年，渤海未达到清洁海域面积仍有 17.4 万平方公里，占渤海

总面积41%。

3. 以区域观点大面积规划、治理海洋。

为使我国最大的内海免遭“死海”之灾，正实施《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区域含冀、津、辽、鲁的13个沿海地区及渤海海域，合计23万平方公里。这是我国首次将海域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环保重点，同时将海域治理与上游流域治理相结合，并实现陆海、河海兼顾。也是我国首次对大海域环境污染实施总量控制，各省市、各部门共同从区域的观点为大面积海域编制海洋环保规划。要求至2005年陆源化学耗氧量比2000年降低10%以上，磷酸盐、无机氮和石油类的人海量分别削减20%；至2010年渤海海域环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生态破坏得到控制。

（二）京津唐地区

1. 北方经济核心区。

素称“华北金三角”的京津唐地区，是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的核心。包括北京、天津两个市及河北省的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市，是国家在“七五”期间确定建立的一级经济协作区。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占华北4.4%，人口3500多万，占华北24.7%，工业总产值占华北近一半。这一地区是我国北方的经济核心区，全国三大工业、城镇、人口集聚地区之一；又是首都所在地；地下资源丰富，海洋资源和旅游资源也获初步开发。

2. 城市间联系薄弱，经济协作不够；城市职能及布局调整。

京津唐地区开发历史较早，有利的地理位置及交通线路布局，使建立全国一级经济协作区既有需求又有基础。但实际上城市之间的联系薄弱，经济协作开展不充分。其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行政区划，这里分别归属于三个并行的行政区：两个中央直辖市、一个省区，它们各自为政，长期以来发展建立行政区经济。

近半个世纪以来，区内良好的经济协作条件未曾得到充分利用，致使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形成了工业规模相当、产业结构趋同的局面。对此，可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机制，协调处理重大基础设施、大型产业项目等的空间布局，在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及生产要素的重组。例如，可考虑沿京津塘、京秦、津唐等高速公路发展和布置特色产业及优势产业，发挥京津唐地区的产业互补效应。中关村—亦庄开发区—廊坊—逸仙园小区—微电子小区—天津开发区组成城市连绵带，形成新型产业链。

目前，京津唐地区内，北京工业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但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将继续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加强；天津着重在海洋产业、商业和港口外贸方面发挥经济中心城市职能；唐山成为能源、冶金、原材料供应基地，并为京津唐地区生产力布局的调整提供新的地理空间，在唐山外围东北的迁安和东南的京唐港一带，分别接纳首钢炼钢能力东迁与扩建，北京焦化厂整体搬迁以及在建的全国最大火电厂——大唐王滩电厂等一批重大项目。此外，秦皇岛已成为年吞吐1亿吨的超级能源输出港和旅游度假胜地；廊坊则成为北京城市功能与布局的延伸。

3. “京津冀北”地区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地域载体。

从区域规划的观点来看，整个京津唐地区从21世纪初开始正在成为“京津冀北”地区（即“大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地域载体。

第六节　主要城市与经济中心，开发区

一、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化水平的地域差异很大

华北地区设市城市77个（2002年），建制镇2261个。区内部分地区（如华北平原）城市发展条件较好，现已形成一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如冀北山地、雁北、内蒙古高原）城市发展条件较差，现有城市中也多是历史不长，发育不充分，功能较单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全区现有城市化水平除京、津2市较高以外，在全国仍处于中等程度或者较低水平。全地区城市密度为5个市/10万平方公里，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现有77个城市中，按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分类，200万人以上超大城市有2个：北京（770万）、天津（501万）；100万～200万人的特大城市6个：石家庄（197万）、太原（197万）、唐山（150万）、包头（117万）、邯郸（110万）、大同（103万）；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4个；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18个；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47个。全区大、中、小城市结构比例为1:1.5:3.9。

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位来看，全区的77个市中，包括中央直辖市2个（北京、天津）、地级市28个（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等）、县级市47个。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在部分地区（如京津唐地区、环渤海区域等）较为明显，部分城市的影响具有全国意义。

从城市竞争力来看，京、津2市综合竞争力强，并在全国位居前列，但其他数十座城市的竞争力普遍较差。

二、城市发展缺乏大区域意识及涵盖整个区域的总体规划、区域城镇体系规划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缺乏大区域意识，更缺少可供协调的区域规划，而是受到行政区域的严格约束，遂使城市发展各自为政，结构雷同甚至重复建设。

这二点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平原地区）表现较明显。如京、津均系超大城市，又近在咫尺，经济发展理应分工协作，扬长避短。然而在长时间内彼此都搞“大而全”，北京忽视其根本立足点文化与历史，天津则忽视其临海优势，两者长期竞相发展低水平的大工业生产，结果均导致高成本、低效益。且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布局无序进行，呈外溢式扩展，相继步人外延扩张误区，并导致“大城市病”丛生。这种状况直至20

世纪90年代才有所认识和改变。但因各自的城市规模业已形成，外延扩张已成惯性。为此，需要有大区域发展意识，最好是制定涵盖整个区域的总体规划，并制定区域城镇体系规划，明确各自发展方向，协调各方面在空间布局上的冲突与用地、用水等方面的矛盾。

三、中心城市、资源型城市

（一）北京

1. 城市扩张及地域涵盖变迁与人口扩散趋势。

（1）北京城区：通常指四个核心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广义的城区还包含近郊区，即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区的一部或大部，上述地域简称“城八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城区人口呈向外扩散趋势，10年内核心城区总人口减少22万，而近郊区人口增加240万，增幅达60.2%，成为人口分布最集中区域。1949年北京城区面积62平方公里，人口130万；2002年大城区约500平方公里，人口800万。

（2）北京政区：北京市全部18个区（县），总面积1.68万平方公里，2003年底常住人口1456万，预计2008年常住人口逾1600万人。1950年北京市面积707平方公里，人口203万。

（3）大北京，亦称京津组合城市。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区域内的各大中小城市，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

以上北京城区、政区、大北京的地域涵盖大体相当于东京区部（23个区）、东京都、东京圈；后者（大北京）亦相当于大伦敦、大纽约。

2. 文化是北京的灵魂。

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年的建都史，文化遗存极富。但因20世纪50～8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失误，老城改造不当，加之“大工业基地”的定位，使古都风貌严重受损，致使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在数十年的建设中或者损失或者只是孤立地保存下来，迄今尚存7000余处。还有135所高校，506所科研机构，100多家博物馆，仍不失为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有利条件。作为国际、国内旅游热点城市，北京2002年接待国际旅游者31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31亿美元。

3. 城市发展定位、规划与工业布局不当，空间结构失误。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不适当的工业大发展（搞大而全）和工业布局失误（在市区布置一系列工厂，甚至在价值连城的古建筑内布置街道小厂），导致后二十多年（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头几年）工业关、停、并、转，企业大搬迁和布局大调整。

从北京作为首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其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城市性质、发展定位、城市规划等，皆有不当之处。早在50年代，先是拒绝了梁思成建议，错过了“保留旧城、另建新城”的发展契机；后来又采纳了苏联专家以莫斯科为蓝本的北京规划思路，尽管当时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

心向外辐射的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但从政治出发，还是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50年代开始，老城改造过早过急，破字当头，见缝插针，使现代化城建与古都风貌很难协调。渐渐地，"半城宫墙半城树"的景象就难以见到了。同时，工业发展过多，且结构偏重。从1957年规划时提出建设成为"大工业化城市"到1985年城区工业开始外迁的二十八年中，北京拥有全国539个工业行业中的406个。1996年全市重工业产值比例高达60%，具有典型的资源能源消耗型的特点。其中，冶金工业发展规模过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年产钢1000万吨），某些重化工业、机械和建材部门也不适合首都特点；加上对流动人口管理失控，使全市流动人口达410万，严重超饱和状态，并在短时间内形成大批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包围市中心区。因此，造成城市规模过于庞大，交通拥挤，供水不足，严重影响到环境质量。在1983年，北京烟雾日数40多天，1997年增至256天。北京城、近郊区空气质量等级经常是三级、四级，个别日子甚至达到五级（从2000年开始，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交通拥堵加剧）。

4. 调整工业结构，改变工业布局；疏解市区，开拓外围。

在此情况下，北京作出了从根本上调整工业结构、改变工业布局的规划，在1985~2005年内完成市区工业搬迁，土地置换总面积达1400万平方米。同时调整工业结构，至2008年，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都市型工业比重分别占40%、40%、20%；工业布局达到合理有序，层次分明：(1) 四环路以内为工业营销、研发机构及无污染的都市型工业和对外交往的窗口；(2) 四环沿线为高新技术产业带；(3) 郊区、县为产业定位分明的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和原材料工业基地。

按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为"疏解市区，开拓外围"，城建重点从市区向远郊转移，并扩大周围卫星城镇的规模。在布局上提出"两个转移"：外部形态从市区向远郊转移；内部形态（结构）从外延摊展向本身更新改造转移。市区仍采用"分散集团式"布局，防止城市中心地区与外围组团连成一片（后来发现很难做到）。外围组团划分为北苑、望京、东坝、定福庄、垡头、南苑、丰台、石景山、西苑、清河等10个。另外，远郊加强东南方向的轴向发展，如亦庄、黄村、通州等定为重点发展的卫星城。

5. 首都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仍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方向大调整，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三产发达、产业结构合理和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体系。其中，在"十五"期间，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将成为高新技术的支柱产业，重点发展基因工程、生物芯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纳米技术等前沿技术，并形成产业规模。人均GDP将从2002年的3355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约6000美元。

6. 城市布局与功能区划分。

长期以来，北京城市布局是在城建历史久远的中轴线基础上展开的。

作为北京中心区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十五"期间重视对城市布局和功能区的划分。现已基本建成的金融街（地处西城），形成金融管理和服务密集的金融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加快建设，正在形成北京的经济支柱和高新技术产业区；地处城东的

CBD；以王府井、西单为重点的商业区；以前门、大栅栏为重点的传统文化特色商业区以及若干文化保护区；还有正在形成的琉璃厂文化产业园区以及地处城北的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建设与布局，共同支撑北京城市品位的提升，构建起国际大都市框架。

7．必须考虑建设新城，不应固守"单中心加环线"的布局模式。

北京长期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俗称摊大饼），至今越摊越大，处于不改不行、想改也难的两难境地。

近十余年，虽以空前大的投资进行一系列功能调整，但北京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问题仍未能很好解决，城市空间无论是平面上还是纵向上均一再突破。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功能，"边缘集团"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远郊又规划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也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近郊的望京、远郊的回龙观，人口均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功能只以居住为主。这样的住宅郊区化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疏解不利，使市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

从2002年起新一轮城建浪潮开始，新一轮圈地运动出现，而市中心区土地的有效供给极少。在此情况下，是固守"单中心加环线"的发展布局模式，再花费高昂的资金投入，继续改造备受争议的老城，抑或继续与居民争地，任凭地价一路飙升，或继续在外围作外延式扩展，还是选择与主城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另建新城，转移部分城市功能（如行政功能等），并通过土地置换，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空间结构的调整，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大局。从长远发展考虑，北京应及早规划、建设新城。

（二）天津市

1．国际港口大都市，中国北方经济中心。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天津，人力资源丰富，资本存量大，产业发展、科技基础较好。投资成本低，利润回报率通常较高，是跨国公司投资和进行产业转移的重要据点。然而，作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水资源严重短缺，本土水资源人均拥有量居全国各省市末位。

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在华北地区居第2位（次于北京），在全国居第5位。

主要工业部门（四个支柱产业）有以汽车及机械装备为重点的机械工业；以通信和计算机为重点的电子工业；以石油化工、海洋化工、精细化工为重点的化学工业；以优质钢管、高档金属制品和优质钢材为重点的冶金工业。工业产品居全国前六位的有：原油、原盐、纯碱、烧碱、自行车、表、移动通信设备、手机、录像机、轿车、无缝钢管、拖拉机、电梯等。

人均GDP2003年约3000美元，预计2010年为6000美元。

2．布局东移，滨海新区开发与海河经济拓展。

近十年来，天津经济布局发生重要变化：布局东移，滨海新区开发建设和海河经济拓展。

被称为天津新经济区域的滨海新区，地处市区东部，濒临渤海，包含天津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以及塘沽、汉沽、大港城区、海河下游工业区，地域面积2270平方公里。滨海新区建设于1994年启动，至2002年形成以新型产业、外向型经济

为主导，以自由港为发展方向，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齐全的经济新区，是天津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极。预计至2005年，滨海新区GDP将达到1300亿元以上，占全市45%，外贸出口占全市60%。将成为国际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物流中心。除为天津服务以外，还为北京、环渤海和中西部地区服务。

目前，滨海新区内，冶金、微电子、纺织等几个工业区初步成型，新型工业基地初步建立。

天津在调整工业布局时，使占据市中心良好区位的工业、仓储等企业外迁，发挥市中心区的优势，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用地结构的优化。20世纪90年代，市内通过土地出让，腾出大批地块，重点发展金融、商贸等。通过这种空间置换，使市内原有的大批污染扰民或陈旧衰败企业渐趋消失，代之以金融、商贸建筑，不仅于产业结构上有利，而且于市容上亦有大的改观。

通过实施城市工业布局东移，也带动了天津城市建设和发展向滨海地区延伸扩展。天津滨海的250平方公里非宜农的滩涂荒地，现已成为新型工业化基地。同时利用工业废渣和疏浚港池、河道的淤泥填海造地，已造地20多平方公里。在此建起5.5平方公里的保税区和油、煤码头等。

3. 城市发展布局走出外延扩张误区。

通过调整布局，经济重心东移，在滨海新区构筑新型工业化基地等一系列措施，已使作为中国第三位超大城市的天津，其城市发展布局走出外延扩张误区，这对于目前仍在进行外延扩张的一些城市来说，具有借鉴意义。

至2003年，新天津在地理上的特色是略呈哑铃状，西翼是经改造的老市区，东翼是基本建成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滨海新区。

天津城市建筑，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损毁60%，1985年恢复到震前水平，至1996年再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20世纪90年代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调整城建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同时促使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对资本、市场、企业实行重组，大量引入外资，疏解资金难题。

预计至2010年，天津的发展定位是：中国北方的商贸和金融中心、技术先进的综合工业基地、全方位开放的国际贸易港。

4. 综合开发海河两岸。

海河是天津城市发展布局的摇篮。但海河为典型扇状水系，尾闾不畅，天津亦曾深受其害。海河两岸长期未曾高水准规划与综合治理和建设，影响城市发展总体布局。2002年，天津市规划在治理海河基础上将海河两岸划分四段：传统历史文化区；都市消费娱乐区；中央金融商务区；智慧城。建成后海河两岸形成有特色的服务型经济地带、景观地带、文化地带。

（三）秦皇岛市

我国最大的能源输出港，亦为旅游胜地。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市内有耀华玻璃厂、山海关桥梁厂、山海关船厂和秦皇岛港等著名企业。1984年开始成为全国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并辟建国家级的“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秦皇岛港经多次扩建，港口吞吐能力至20世纪90年代末已达到1亿吨，2002年货物吞吐量11167万吨，主要是能源输出港。

市内名胜古迹众多，著名的有北戴河、山海关等，北戴河是夏季避暑胜地，有“中国夏都”之称，亦为国际旅游胜地，旅游服务业发展快。

（四）大同市

煤炭能源生产与输出基地，亦为历史文化名城。市内动力煤蕴藏量大，年产原煤最高曾达860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8%；发电100多亿千瓦时，占全国的1%，巨量能源通过陆路、水路、电网等形式输往全国27个省（直辖市）和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市第一、二、三产业比7:65：28，其中仅煤和电就占54%，是全国最大的输出动力煤、煤制品与电力的城市。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煤炭采选、加工和外销为主的产业结构，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也付出沉重代价，由于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产业结构附加值低；加之国家长期控制煤炭等上游产品价格，使大同在华北乃至全国产业布局中一直处于不平等交换的地位。经历半个世纪“有水快流”式的大开采，被严重透支的大同不仅经济增长乏力，且自身生态环境也已脆弱。造成了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并严重地损坏了其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制约着城市经济的扩大与发展。另外，在近年来因其侏罗纪优质煤炭资源减少，内蒙古、陕西廉价煤炭资源的加速开发，使市内的煤等支柱产业逐步衰落。

鉴于“矿竭城衰”的威胁，大同市在1995年提出“建设现代化综合工商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战略构想。利用该市地处我国中、西部地带交汇处，本身又是华北北部交通枢纽，拥有多种矿产资源及云岗石窟、北岳恒山等著名旅游景点，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多元化（发展非煤产业、旅游业、农业），可望开发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向中、西部地带经济技术辐射过程中的一个区域性经济中心和重点产业区。同时对已形成主导产业的煤炭工业，运用新技术嫁接改造，延伸产业链，如发展水煤浆等。

然而，支撑了半个多世纪的单一资源城市，往往转型不易，如果其产业核心被损坏，则结构调整更为艰难。

四、京津冀北地区城市空间发展

城市发展与城建布局中的“摊大饼”现象在华北地区很明显。从地理上来看，这里许多城市的城区缺少大江大河以及山岭的天然阻隔，加之地势平坦，再加上数十年中城建布局沿城市周边向外延伸已成惯性；从规划及管理上来看，城市规划屡屡有误。如北京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错过了“保留古城，另建新城”的发展契机，50~80年代又大规模发展不适宜首都的重、化工业。同时，规划管理失控或受制于权力，这些都加剧了城市的盲目扩展与膨胀。北京在近年来每年净增40万人口（其中常住人口净增20万），城区面积扩大10平方公里以上，且基本上呈平面摊展之势向外延伸；另外，本地区京、津两座超大城市和其余一系列大中小城市之间各自为政，长期缺乏协作，也使城市空间

发展难以有序进行。

从21世纪初开始对京津冀北地区（即“大北京”）城乡空间所进行的规划研究，是一次大规模的区域规划活动，并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目标。大北京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区以及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居民4000多万。在此区域内，将以京津“双核”为主轴，唐、保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通过合理布局形成城镇网络，构建组合城市，采取“交通轴加葡萄串式的城市走廊”模式，即各城市沿区域交通轴呈葡萄串式发展与布局，彼此间以生态绿地连接；在城市经济结构方面则应重点发展北京的知识经济、总部经济；天津的临港经济（含工业、运输）；河北的加工制造业等，形成特色经济的结合。

在此基础上可以缓解京、津等过度集中的核心城市的空间压力，使区域发展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形态转化，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在开拓城市发展空间的同时，促进区域整体均衡发展，以尽快改变“单中心加环线”模式。

五、主要开发区

（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我国迄今开发规模最大、产值最高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位于天津市塘沽区，天津新港西北部，距市中心50公里。这里原为滨海盐碱低地与滩涂，东临渤海湾，西有京山铁路干线通过，南有海港铁路，并有京津塘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条件甚佳。开发区规划占地面积33平方公里，实行分片开发。起步区仅2平方公里，迄今实际完成开发面积20平方公里，包括工业用地15.5平方公里，商住用地4.5平方公里。以引进外资为主，发展现代工业，扩大出口，现已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外向型的工业经济区域，并已形成新市区。进入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以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等企业居多。

至2002年，已有3470家外资企业人区，投资总额17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约100亿美元。开发区工业总产值103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60%；出口57亿美元，多年居各开发区之首。预计至2005年以后将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的高科技产业制造中心、研发基地。

2.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始建于1992年，位于大兴区亦庄附近。北靠南五环，京津塘高速公路从区内通过。与北京市区、首都机场、天津港交通便捷。开发区一期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至2002年，人区企业近1000家，总投资40亿美元，主导产业有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新材料产业等。因人区企业基本上是无污染产业，功能区布局合理，整个开发区已于2001年通过国际环境认证。

2002年获准扩区，向京津塘高速公路以东扩展14平方公里，向凉水河以西扩展10

平方公里，使开发区面积达到39平方公里。另外，规划面积192平方公里的亦庄卫星城总体规划已获批准。卫星城以开发区为核心，向凉水河以南和京津塘高速公路以东发展，由开发区、亦庄镇区、凉水河南部新区、马驹桥镇区等6个分区组成，到2020年将有49万人口居住。

（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 中关村科技园区。

（1）园区发展概况。早先为荒地、坟场和菜园，仅数户人家，后因有太监坟场而称“中官”村。此地及周边一带地处京城西北通衢大道近旁，交通地位和土地条件均有利。近百年来相继有清华、燕大（后北大迁入燕园）等环其周边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有中科院直属单位迁此，并有一批科研人员由南京等地迁人。同时，中科院（京区）择地规划、筹建一批国家级研究所，始称中关村，随即实现低水平的城市化，建有科研区、生活区和简易道路系统及上下水管线。

1988年，以中关村为核心的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设立，是中国内地最早创建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此基础上，1999年国务院又批准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这是继深圳、上海张江之后中国内地设立的规模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园区下辖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亦庄科技园，覆盖北京科技、智力、人才、信息资源密集区域，在布局上形成了一条环京科技产业带。

至2003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已有高新技术企业1.5万家，从业人员46万，2003年技工贸总收入2840亿元，预计2004年为3350亿元。成为北京乃至北方地区高科技研发基地。

（2）区位特征。中关村科技园区主体部分位于北京西北部，居上风上水之利；从全年主导风向及水系径流走向来看，这一带是受污染相对较少、环境质量相对较好之地。多年以来亦为北京城建布局及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带（见图表12－4）。

从政区分布来看，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下属园区及其他组成部分多分布于海淀区境内，其余部分则分布于朝阳、昌平、丰台、大兴等区。

上述地域是科研、教育、文化机构密集分布区，科技人才约30万，且境内及周边多自然风景区、历史文化遗址及旅游胜地。这些人文与自然环境的优势，为开发高科技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用地功能规划。中关村科技园区按用地等功能规划分为三部分：中心区、发展区、辐射区。

中心区南起西外大街，北至五环路，西起京密引水渠，东至八达岭高速公路以东的大屯地区，占地约75平方公里。包括一个核心区和两条主要轴线。核心区包括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关村西区，用地约10平方公里；主要轴线有中关村大街、学院路。

发展区在五环路以北，包括海淀区山后地区、清河地区、西三旗地区及昌平区的回龙观地区等280平方公里。规划建设的主要特征是以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为起点，沿八达岭高速公路向北呈组团式发展：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北大生物城为第一组团；西三旗新

材料基地为第二组团；回龙观地区为第三组团；永丰科技园和航天城为第四组团。四个组团的规划建设用地合计 26 平方公里。

辐射区包括一环两线。一环指环市区的电子城、亦庄科技园、丰台科技园区、昌平科技园区等；两线指沿八达岭高速公路向沙河、昌平、南口方向辐射和沿京密路向顺义、怀柔、密云方向辐射。

(4) 生态环境规划。在中心区内，已有颐和园、圆明园、紫竹院、动物园等公园，并紧邻香山、卧佛寺等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万柳公园、双清绿地、小月河楔形绿带，形成围绕中心区的“绿环”；发展区西、南被小西山自然风景区环抱，北有南沙河横贯，可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发展区四个组团周边均保持一定宽度的绿带，并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整治大气、水环境及市容，以符合科技园区布局的环境需要。

(5) 发展目标。按规划，中关村科技园区将加快发展科技产业，积极推进以软件产业、信息服务和信息制造业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电子信息、光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新材料和环保等支柱产业发展；带动中介服务、文体、教育培训及商业、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争取十年左右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位置、构成与周边环境示意图，如图表 12 –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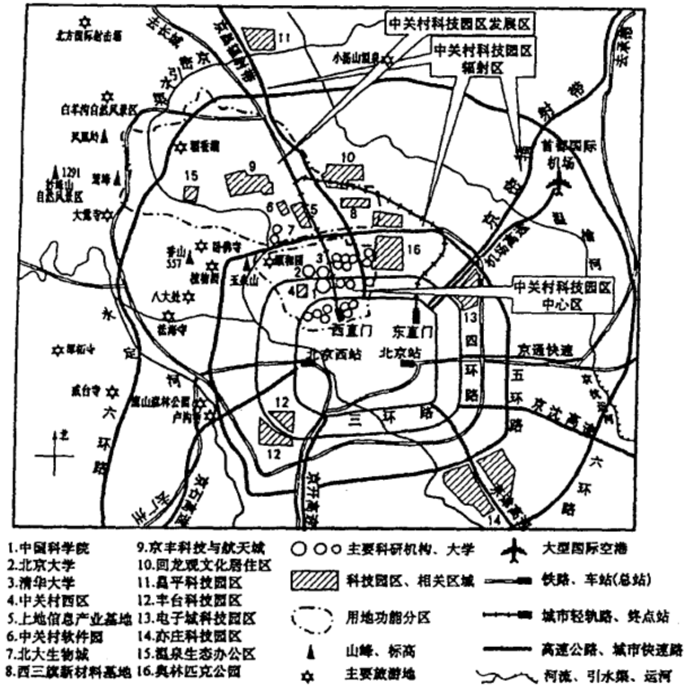
2. 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天津、石家庄、太原、包头、保定 5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于 1991、1992 年经国家批准设立。其中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总面积 21.85 平方公里，由华苑产业区、政策区和辐射区组成。政策区位于天津市智力密集区，是园区的基础和起步区，已建成科研基地、外贸街、南开工业园和天津大学科学园。政策区现已发展成为天津市高新技术成果、信息产业、技术交流的集散地。华苑产业区位于市区西南部，主导风向上风口，为发展高新技术提供了环境条件。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包头市区南侧，是全国 53 个国家级高新区中唯一冠有专业名称的高新区，至 2002 年已有内、外资高新企业 86 家，占包头市的 90%、内蒙古的 70%。

(三) 保税区

保税区在华北地区境内迄今只有 1 个，即“天津港保税区”。1991 年批准设立，是一个以国际贸易为主导，国际金融、保税仓储、出口加工多业并举的综合性、多功能自由贸易区，亦为我国内地第一个单独设立（不在其他开发区内）的保税区，位于塘沽新港内易于封闭的东北部地段，是在港口疏浚填筑地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规划面积 7.1 平方公里，封关运作面积已达 4 平方公里，整个保税区的周围根据国际惯例加以封闭，由海关监管，实施比我国现有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更简便的管理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境内关外”性质的特定经济区。区内主要从事国际转口贸易和为之配套的货物运输、储存、挑选、混合、包装、改装、分类、分级、清理、处理等加工服务业务，以及金融保险业务。已成为面向国际、辐射京津和中国西部的国际贸易窗口及国际物流进出通道。



图表 12－5 中关村科技园区位置、构成与周边环境示意图

（四）边境经济合作区

华北地区西北部有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已开辟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北邻俄罗斯，占地 6.4 平方公里。满洲里一后贝加尔斯克建有大型陆运口岸，过货能力 2003 年为 900 万吨，预计 2008 年增至 1800 万吨，分别为全国过货量最大的陆运口岸。

第十三章　东北地区经济

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面积占全国 8，3%，略大于华东，居倒数第 2 位；人口亦占全国 8.3%，略多于西北地区，居倒数第 2 位。然而，本区自然环境、工业基础均较好，交通网稠密，城市化水平高，人均 GDP 在 1994 年以前居全国六大地区之首，后被华东超出，居全国第 2 位。

这里有四个优势：自然资源、固定资产、运输网络、科技，并且仍继续发挥“五大基地”——钢铁基地、能源基地、机械制造基地、林业基地、商品粮基地的作用。但是，这些都难以掩盖东北地区在某些方面的衰退。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东北地区靠资源开发形成的老工业基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因体制不顺、效益不好、下岗失业等引发“老东北现象”；随后，靠土地带来辉煌的农业，又因某些主打农产品过剩、农民收入低而产生“新东北现象”。另外，经过半个多世纪高速发展经济与高强度的城市开发，已使资源枯竭，生态环境受损，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2003 年起，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始扭转东北的全面衰退。这是继 1979 年东部开放开发、1999 年西部大开发之后而提出的战略部署，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自然资源优势迅速弱化

东北地区的北、东、南三面，山环水绕，而中部则内孕辽阔的平原，沃野千里，气候温和湿润，大部分地方属温带气候。全区土地、水分和热量资源对发展农牧业十分有利。

地处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之间的东北平原（松辽平原），北起嫩江中游，南至辽东湾，南北长约 1000 公里，东西最宽处 400 公里，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一大平原。该平原绝大部分位于本区境内，包括黑龙江省西南、吉林省西部和辽宁省中部，连成一片。除中央鞍部稍高以外，总的地势低平（平均海拔 200 米以下），为发展机械化大农业，广泛种植小麦、豆类等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由东北平原沿松花江而下，还有著名的三江平原，海拔 50 米上下，亦称三江低地，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冲积而成，为“北大荒”重要组成部分，已开垦耕地 321

万公顷，成为重要的粮食和豆类生产基地。但也使天然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只有相当于原有湿地的五分之一被保留下来。为保护湿地，保护生态平衡，从1999年起已停止开荒，并采取措施逐渐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

作为世界仅存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黑土区，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2省，总面积11.78万平方公里，且土层深、肥力高，地貌多为较平坦的漫川、漫岗及台地低丘，适宜大规模机械耕作，多年来平均每年交售商品粮1000万吨。但由于数十年来的过度开垦与掠夺式经营，已使肥力下降，同时造成水土流失。目前，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面积4.5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流失0.3～1厘米厚黑土层。20世纪50年代60～70厘米的黑土层，现今大都只有20～30厘米厚。按此速度，曾作为东北资源优势之一的广袤黑土层，可能在四十至五十年后被剥蚀掉。

环绕在东北平原外围的山地，如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等，有茂密的森林，总蓄积量曾占全国三分之一，历经数十年超强度采伐后，已大为减少，遂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

区内河网系统发达，水量较稳定，而起伏的山峦又给河流形成了落差，水能蕴藏处一般距城市不远，坝址地形不复杂，施工方便，电站建成后向外输电半径短，因此投资较省，便于得到开发。至21世纪初已接近于完成开发。

石油资源曾是主要优势，北有大庆、南有辽河、中有扶余3个油田。但前两者开发利用的高峰期已过，面临后续资源不足；其他资源（如煤等）赋存状况亦有类似问题。

第二节　老工业基地的衰退与改革

一、曾是中国最发达地区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本区现代工业即已初具规模。及至50年代，国家采取中央计划经济政策，将财力、物力着重于进一步发展工业，东北三省的大中城市工业产业因此得以长足发展，国有资产实力雄厚，后来形成15000亿元的庞大工业固定资产。在鼎盛时期，仅辽宁生产的钢、生铁、纯碱、烧碱、变压器等即占全国二分之一；原煤、原油、电力、水泥、平板玻璃产量亦占全国重要地位。

直至20世纪70年代，东北仍是中国内地最发达的地区。80～90年代，改革开放偏重于地处关内的华南、华东沿海，因此东北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急剧萎缩。在为数众多的国企中，除一部分垄断性强或管理较好者以外，多数已处于劣势，面对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生死两难。

东北最早进入计划经济，最晚退出计划经济，受其影响之深表现于各方面。与此相关，体制问题、经济结构也拖累地域发展。直至2002年，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依次为：黑龙江89%，吉林78%，辽宁63%，远

高于其他各省。

东北地区主要工业产品在全国的地位，如图表 13－1 所示。

二、冶金工业基地地位下降

钢铁冶炼是建立在本区丰富的煤铁等资源基础上。“一五”期间国家在此大力发展钢铁工业。故本区曾长期作为全国第一大钢铁基地。后因资源面临枯竭，加上设备老化，使本区钢铁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呈下降趋势。

图表 13－1 东北地区主要工业产品在全国的地位（2002 年）

主要产品	产品占全国第几位	备注	主要产品	产品占全国第几位	备注
原油	1	占全国 41.1%	薄钢板	2	次于华东
汽油	1	占全国 30.5%	普通中型钢材	3	次于华东
柴油	2	次于华东	内燃机	2	次于华东
燃料油	2	次于华东	金属切削机床	2	次于华东
木材	2	次于中南	汽车	2	次于华东
乳制品	2	次于华北	轿车	2	次于华东
铁矿石	2	次于华北	发电设备	3	次于华东、西南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3》。

地理分布主要集中于鞍山、本溪，1919 年投产的鞍钢，历史悠久。利用大孤山、齐大山、弓长岭等地铁矿石进行生产，现有 6 座大型铁矿、5 座选矿厂配套。已形成包括采矿、选矿、炼焦、炼铁、炼钢、初轧、精轧等一系列厂矿在内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拥有年产钢 1000 万吨的产能，为全国第二大钢铁企业；鞍钢原有职工 50 万人，为典型的计划经济型企业，加之原有设备陈旧，故效益低下，运转艰难。在 1998～2003 年已使主体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连铸比由 30%提高到 100%，职工削减至 3 万人，主要生产铁路钢轨、汽车轿车钢板等，已成为具有一流水平的高速、高强钢轨生产基地。

本钢以大量冶炼优质生铁为特色，同时生产钢和钢材。尤其是热轧薄板、冷轧薄板的生产具有重要地位，是全国薄板生产基地之一。此外，本区还有一批独立的钢厂或钢铁厂，分布于抚顺、通化、齐齐哈尔、大连等地，生产特殊钢、优质钢材。

三、曾长期是国家的装备工业基地

本区有我国最早建设的机械制造工业体系，许多产品行销全国，在我国机械工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从布局来看，国家或大区一级的机械制造中心，由北至南主要有：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其中，沈阳机械工业部门多，综合性强，曾长期作为国家的装备工业之都；大连以远洋船舶制造、船用柴油机、机车车辆制造为主，大连造船新厂拥有可制造30万吨级船舶的能力。长春以生产汽车、铁路客车、拖拉机居多，一汽集团、一汽一大众公司主产载货汽车和轿车，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哈尔滨则生产发电机、汽轮机、锅炉、精密机械、内河船舶，著名的哈尔滨三大动力机械厂：汽轮机厂、锅炉厂、电机厂，拥有制造70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整机和年产发电设备1000万千瓦的能力，是我国最大发电设备、舰船设备制造基地和成套设备出口基地；齐齐哈尔生产大型冶炼和轧钢设备、大型铸锻件、机车车辆、机床，其中重型机械年产能力居全国首位。

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对市场经济与全球优趋势，东北机械制造业及生产基地急剧衰落，一大批国企或破产或兼并、重组，但也有的老工业基地（如沈阳市铁西区）正在复兴。

四、石油开采地位和重要性下降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石油工业作为一个新兴工业部门得到迅速发展，1985年全区石油、天然气开采以及石油加工业产值占全国39%以上，以后随着我国石油工业布局在关内各地展开，东北石油工业的地位和重要性下降。

石油工业布局主要是一北一南：大庆油田含油面积5000平方公里，有20多个油气区，探明地质储量50亿吨。从1959年开发以来，迄今已开采四十余年。1976年主力油田投入开发，形成大型油田的布局态势，原油产量在1976～2002年每年均超过5000万吨，开发四十二年来累计产油17亿吨，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二分之一。

大庆油田开发的高峰期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过去，至21世纪初，油田可采储量仅剩30%，预计到2010年原油产量降至3000万吨，2020年产量将下降至2000万吨，开采成本也将在目前已经很高（桶油15～17美元，比中东原油开采成本每桶5～7美元高一倍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为避免出现前苏联巴库油田“油竭城衰”局面，大庆油田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石油生产单一结构，开发非油产业，发展多元经济。

辽河油田位居辽河下游冲积平原，从1970年开发建设，原油产量1986年逾1000万吨，成为东北第二大油田。

扶余油田（吉林油田）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是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内地东部唯一的上升油田，年产规模已上升至500万吨。

东北地区石油加工业较发达。大庆原油除在本地提炼、加工一部分外，另一部分通过输油管运至海港（大连、秦皇岛），然后转运各地；还有一部分经输油管南运至吉林、辽宁等地提炼加工，为当地提供燃料和石化原料。

辽宁石油加工能力居东北3省之冠，原油加工量占全国第1位，“抚顺石化”年加工原油1000万吨，生产柴油350万吨、乙烯近100万吨、化工产品约150万吨，列中国

石油炼化企业前列。辽宁石油炼制与加工业的发展，为化工、轻纺等一系列部门提供原料，推动经济发展。

五、化工基地

在基本化学工业方面，本区有良好的原料条件。2002年全区生产纯碱83万吨、烧碱70万吨、硫酸123万吨，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企业分布于辽宁省境内，大连化工公司拥有以煤、硫铁矿为原料，生产硫酸、硫铵、染料，以盐和海水为原料，制碱和氯化钾等一系列化工厂。近四十年中，该公司新建了年产30万吨硫酸和50万吨纯碱的生产设备，使之成为全国基本化工基地。

地处本区中部吉林市的吉化公司亦为著名的化工生产基地。坐落于第二松花江畔，在充分利用附近水源、水力发电的基础上，以石油、煤和石灰石作原料进行生产，它在20世纪60年代以煤化工为主，80年代开始进入煤化工与石油化工并举发展的时期。

自从20世纪60～70年代东北石油工业发展以来，化学工业的发展规模及其部门结构，都受到直接影响而发生了新的变化，由原来主要以煤、硫化物、盐、油页岩作原料，发展到大量采用石油、天然气作原料，并出现一批新兴石化中心，如大庆、大连、吉林、辽阳、抚顺等。其中，辽阳石油化纤公司是我国北方最大石油化纤生产基地；大庆石化则是一家以大庆原油、轻烃和油田气为主要原料，从事炼油、化工、化肥、化纤生产的特大型石化联合企业，预计2005年乙烯产能提高到100万吨水平。

六、煤炭工业衰落

东北煤炭工业，因受区内能耗巨大而资源赋存急剧衰竭等影响，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迅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煤炭主要产地过去是南多北少，后改变为北多南少。

在北部，黑龙江省的四大煤炭基地（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已经面临资源枯竭和大量关井的局面；在南部产量大、开采成本低的抚顺、阜新等煤炭基地相继进入萎缩期，产量大幅度减少。阜新矿区有百余年开采史，近五十多年累计产煤5.3亿吨，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海州矿曾长期是亚洲第一大露天矿，现即将关闭。

主要建立在煤炭资源的基础上的电力工业。全区发电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在电力工业的结构上，火电和水电约为20与1之比。

区内大型火电站的布局，靠近煤炭产地或电力负荷中心，主要有清河、抚顺、阜新、吉林、大连、朝阳、锦州、哈尔滨、大庆、鸡西等。其中以地处辽宁省北部的清河火电厂规模最大。水电站的分布集中于区东部山地的鸭绿江流域和第二松花江上游以及牡丹江一带。第二松花江全长901公里，两岸山峦重叠，河谷狭窄，大量河水从长白山奔腾而泻，于峡谷之中穿流跌宕，故水力资源甚丰；牡丹江亦有类似特征。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白山水电站（150万千瓦）为东北第一大水电站。此外，还有莲花水电站

(55万千瓦)、水丰水电站（76.5万千瓦)、云丰水电站（44万千瓦）和扩建后的丰满水电站（100.4万千瓦）等，沿江组成梯级发电网。

七、全国最大森林工业基地衰变

东北森林工业产值和木材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完达山、长白山等各大林区，每年都要采伐大量松、杨、桦、椴等树木，供应本区和全国各地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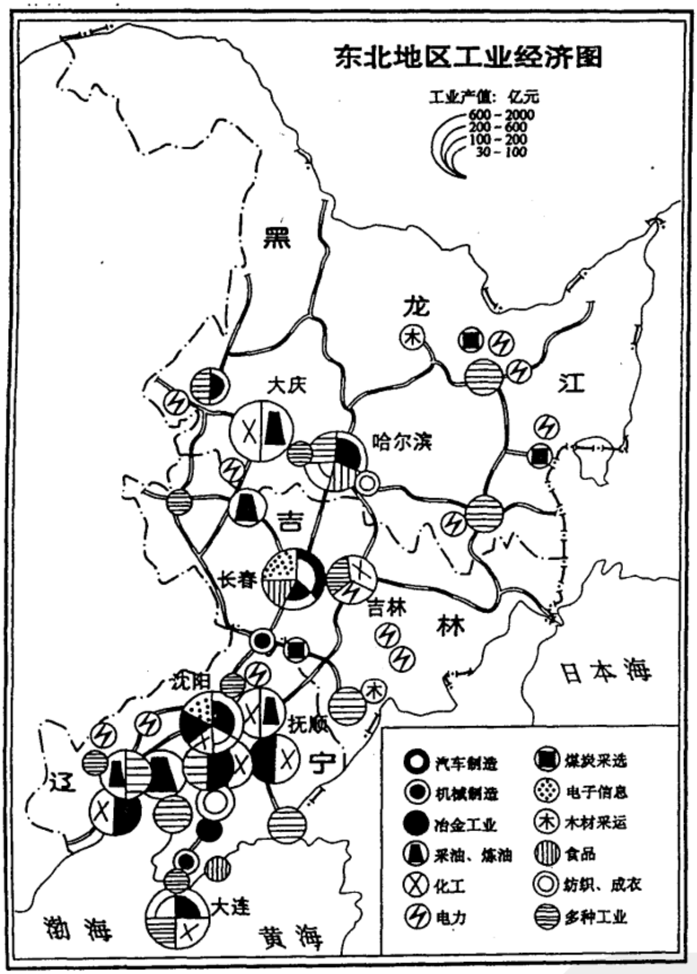
其中，地处小兴安岭的伊春林区，面积4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72%，树种以珍贵的红松、落叶松为主，一向有“红松的故乡”之誉，也是全国最大的国有林区（有“共和国第一林区”之称)。在20世纪后五十年共采伐木材3亿立方米，亦为全国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但也由于连续五十年的不间断采伐、超强度索取，违背林业生产规律，到90年代后期终于出现林木资源危机，表现于下列方面：(1）活立木总蓄积量由开发初期的4.3亿立方米减至2.2亿立方米；(2）每公顷蓄积由194立方米减至85立方米；(3）单株材积由1.21立方米减至0.35立方米；(4）以名贵红松为代表的针叶树比重由68%减至47%；(5）成、过熟林蓄积由3.19亿立方米减至0.34亿立方米。上述五项指标锐减幅度最高达89%。

按当时伊春林区年产400万立方米采伐强度延续，如再开发六至八年，就无林可伐，并将进一步衰变为水土流失重灾区。

从1998年起，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伊春林区木材产量也大幅度减少，从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450万立方米下降数倍。同时大力造林、营林，调整森林资源经营方向，发展木材深加工、森林生态旅游、绿色食品和北药等产业开发。至2002年，木材产量下降至137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提高到82%，实现消涨平衡，明显地改善了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表现在以下方面：(1）森林调节热平衡能力增强，对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均有利；(2）涵养水源能力增强，对周边水系有利；(3）改善大气质量。仅伊春林区的森林每日可释放氧气1600万吨，吸收$CO_2$2700万吨；(4）改善野生动植物生长环境，并对保护物种资源与生物多样性有利。

大兴安岭一带是十分重要的原生态林区，近一百年经历三次大采伐而元气大伤。特别是近五十年连续不断超强度采伐，使原始林所剩无几，1999年开始实施重点保护。这里是北方立地条件较差但生态作用非常重要的林区，林木生长缓慢，靠造林生产木材效益甚微，同时地理位置特殊，不可替代。为此应明确其巨大的生态价值及无与伦比的生态地位，改变林业企业单纯依靠木材获取经济效益的方式，将森林的间接效益转变为直接效益，创造条件，使这片对东北乃至全国不可或缺的林区停止衰变。

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图，如图表13－2所示。


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图
工业产值：亿元
600－2000
200－600
100－200
30－100
黑
龙
江
吉
林
辽
宁
大庆
哈尔滨
长春
吉林
沈阳
抚顺
大连
日本海
渤海
黄海
汽车制造
机械制造
冶金工业
采油、炼油
化工
电力
煤炭采选
电子信息
木材采运
食品
纺织、成衣
多种工业

图表 13－2

第三节　全国商品粮、豆主产区

一、粮、豆生产商品率高

“沃野千里”的东北大地，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8.7%，人均占地比全国平均数高80%，人均粮食占有量占全国之首。

1999年，东北3省粮食总产量达7030万吨，以后因粮食滞销而压产，2002年减至6667万吨。但本区人口较少，人均产粮黑、吉2省分别居全国第1位、第2位。在人口构成中，农业人口比例又相对较低，如果按全区3500多万农村人口数平均，每人有粮2吨，远远高出于其他各大区之上。

另外，在本区的北大荒和三江平原等地，还分布着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有农场群，人均占有粮豆更多。

因此，全区粮食商品率达50%，每年都有上千万吨粮食销往市场，拥有较多的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构成按产量多少依次是：玉米、稻谷、小麦。以玉米产量最多，稻谷种植发展最快。黑龙江已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稻谷产地。黑、吉、辽三省均为一季中稻，因生长期长，土壤与水质较好，故米质较好，稻米商品率高，每年大量进入关内各地市场。

东北大豆质地较优，在历史上，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商品大豆产地。美国于19世纪引进大豆后，从20世纪40年代起迅速扩大播种面积，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巴西从20世纪70年代起也超过中国，居世界第2位。

20世纪80～90年代，东北地区扩大了大豆种植，在“大豆之乡”黑龙江省，2000年大豆播种面积达到287万公顷，总产450万吨，两项指标均居全国第1位。从全区来说，大豆产量占全国总产量40%以上，每年可提供大量商品大豆。

二、主要农作物地理分布

东北地区粮食和豆类作物的分布，在不同品种作物之间有着较大差别，同一品种作物在不同地域范围内也有较大差别。黑龙江省以种植玉米、稻谷、大豆、小麦为主；辽宁省以玉米、稻谷、高粱居多；吉林省的玉米产量在东北三省中居首位。从商品粮豆生产的地域来看，主要集中于黑龙江、吉林2省。

由于东北面积较大，南、北之间的纬度不同，同一纬度带上，地势高低不同，都影响着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土壤、水分和热量条件。总的来说，高粱集中于南部辽河平原；小麦集中于北部黑龙江省的北大荒一带；水稻以黑龙江、辽宁省境内种植最多，吉林东

部河谷、丘陵山区也较多；谷子则偏于吉林、黑龙江省西部一带；玉米种植遍及吉、黑、辽3省，以吉林省种植面积最大，黑龙江、辽宁次之；而大豆则在北部黑龙江省境内普遍种植，吉林次之。

三、不同的作物类型组合区

上述各种农作物在地区上的组合各异。一般来说，由北至南可划分为6种不同的作物类型组合区：

（一）小麦、大豆类型区

地处黑龙江省北部。

（二）小麦、大豆、玉米、谷子类型区

横贯黑龙江省中部。

（三）玉米、高粱、谷子类型区

黑龙江省西南和吉林省中西部。

（四）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类型区

北起黑龙江省呼兰河畔的绥化，经哈尔滨—长春—线直至辽宁省北部一隅。

（五）水稻、大豆、玉米、谷子类型区

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哈尔滨东南方的第二松花江、拉林河、图们江三个流域。

（六）高粱、水稻、玉米类型区

辽宁省境内，北起开原，南抵辽东湾畔。包括辽河以及浑河、太子河、饶阳河、大凌河两岸。

从20世纪80～90年代，上述6种不同的作物类型组合区有些变化，其总的变化趋势是玉米、水稻、大豆的种植区域扩大，而小麦、杂粮的种植区域则相对缩小。

四、新的“大豆、玉米轮作计划”

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东北大豆、玉米轮作计划”。其中，黑龙江省将用大豆置换400万亩玉米，吉林省增加大豆种植面积300万亩，辽宁也将适当增加大豆种植。实施上述大豆、玉米轮作，对保持和提高地力，实现东北地区农业持续发展有利。

第四节　铁路主导型交通网络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交通运输发达，有一个稠密的交通运输网。这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地区内部以及区际乃至国际（中俄、中韩、中朝、中日）间的经济联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一、铁路五横七纵布局

在稠密的东北交通网中，铁路居于主导地位。全区现有铁路干、支线70多条，路网密度每100公里为1.51公里，在全国六大区居第1位。

全区铁路，大体可分为五横七纵干线，再加上很多联络线、连通线，组成格状路网。在区际联系方面，形成以京沈、京通和集通为主干的三条出人关（山海关）通道。

“T”字形滨洲、滨绥线和哈大线，是东北铁路网的脊骨。以哈大线运量最大。该线从哈尔滨往南经长春、四平、沈阳至大连，铺设双轨，为纵贯本区南北的主轴，并于2001年实现电气化运营，成为东北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营业里程945公里。

同哈大线走向几乎成垂直相交的滨州、滨绥线总长1495公里，东西横贯东北全区和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其东、西两端均与中俄边境贸易口岸连接，既是东北经济北部经济联系大动脉，又是中俄外贸运输的主通道。

京沈铁路也是运量很大的干线，营业里程853公里。北段沈山线几乎完全在本区境内，过去是东北同关内经济联系的唯一通道，现在仍是首要的陆运干线。全线客货流量均大。

在上述铁路干线相交处形成了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白城、锦州等铁路枢纽。其中，沈阳铁路枢纽的客、货运量均名列全国前茅。

二、为完善路网功能而构筑快速入关通道、南部跨海通道、东部边境通道

同其他大区相比，东北地区铁路网基本完善，只是在本区东部国际海陆联运和出海通道以及本区西南一隅客运出关通道上尚有缺陷。为此，在“十五”（2001～2005年）期间，除通过建设秦沈客运专线和京秦线技改，形成京沈快速客运通道以及东北至长江三角洲（哈尔滨—大连—烟台—胶州—新沂—长兴，其中大连—烟台段为铁路轮渡）的陆海通道以外，还从2001年开工建设绥阳—东宁—珲春干线，以弥补黑、吉2省东部路网布局的缺失。该线长310公里，建成后可使黑、吉2省东部路网与俄罗斯铁路对接。据中俄海陆联运协议，黑、吉2省商品可通过俄罗斯港口直接出海，运距大为缩短。2003年，珲春—卡梅绍夫铁路（20.3公里）建成通车，是本地区第三条中俄边境铁路线。

秦沈客运专线是我国第一条快速客运专线，西起秦皇岛站，东至沈阳北站，全长405公里，为双线电气化铁路，1999～2003年建成，日通行能力为100对列车以上，设计时速200公里（可提高到250公里），是我国铁路建设中技术层次高、创新内容多的标志性工程。

三、北方最便利的水运系统

(一) 海运

本区南部拥有大陆海岸线 2178 公里。巍巍千山连同巨大的辽东半岛插入黄海和渤海之中，使得海岸线大进大退，曲折异常，形成了一系列大小海湾（如大连湾、旅顺口、金州湾、普兰店湾、复州湾、辽东湾、锦州湾等），为发展海运提供了良好条件。

大连港是首屈一指的天然良港，水深港阔，不淤不冻，其腹地深远，港湾条件优良。港口建筑在大连湾内的西南一隅，主要码头有：东区、西区码头，鲇鱼湾油港，甘井子煤码头，大窑湾港。后者是以集装箱运输为主要特色的深水港，港内 3、4、5、6、7 号集装箱泊位是大连港务局与新加坡港务局合资经营。从 1996 年起，包括大窑湾港在内的大连港全面介入国际航运网络，跻身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行列。

2002 年大连港货物吞吐量达 10851 万吨，集装箱 135 万标箱。正在建设一批专业化深水码头，包括 25 万吨级矿石码头、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大窑湾二期 6 个集装箱泊位等。其中地处鲇鱼湾港区的大连港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已于 2004 年建成，可接卸目前世界先进的 30 万吨级超大型油轮，年设计通过能力 2300 万吨。预计至 2010 年大连港吞吐量逾 2 亿吨，集装箱 500 万标箱。

本区沿海还有营口、丹东、锦州、葫芦岛等港口。营口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辟为对外贸易港，靠近辽南重工业基地和沈阳、辽阳、鞍山等工业城市，经济地理位置有利，但有冰冻期，每年 4 月后才能通航。位于营口老港区以南的鲅鱼圈新港于 1986 年建成，至 1999 年，营口港拥有 1945 万吨吞吐能力，在东北仅次于大连港，居第 2 位。营口港的崛起，对缓解煤炭运输紧张状况、促进辽东湾沿岸地带经济发展有利，也可起到为大连港分流的作用。

地处辽西的锦州港也已成为新崛起的港口，为东北第三大港。具备原油输入、成品油输出、多品种杂货装卸以及集装箱装卸等运输功能，已成为我国内地沿海八大油港之一、六大化工港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再建 6 个深水泊位，成为千万吨级大港。2003 年吞吐量 1700 万吨。

葫芦岛港于 2000 年对外开放。该港系天然不冻深水港，建于 1908 年，曾长期作军港使用。港内现有 4 个万吨级泊位，水深 6 ~ 10 米。开发该港对辽西、吉、黑乃至内蒙东部的外贸有利，也使我国海港布局由南向北的格局改善。

(二) 北方最便利的内河运输

东北地区有内河航道里程 6021 公里。在我国“三北”（华北、西北、东北）地区中，以东北的内河运输条件较好。区内可航水道有黑龙江、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等。然而，上述河流除松花江、辽河外，均为国界河道，距离经济活动中心地区一般较远，但对发展国际及边贸运输有利。

20 世纪 80 年代，航运较繁忙的河段集中于松花江。其中哈尔滨以下的松花江干流

可通行1500吨的大型江轮。内河港口主要有哈尔滨、佳木斯两个枢纽港。自80年代末以后，随着中俄边境贸易和运输增长，以及我国同东北亚国家新的水运通道的开辟，黑龙江干流航运同松花江航运一样进入繁忙时期，可由黑河、同江、抚远、富锦、佳木斯、哈尔滨等港口，驶往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列宁斯科耶、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共青城、玛戈港，以及韩国的釜山、朝鲜的清津、日本的酒田等港口。

四、公路运输

全区公路通车里程12.9万公里（1999年），在我国六大区中居末位。这是因为区内有比较稠密的铁路网，长途运输主要由铁路担负，公路一般以短途运输为主，担负铁路客、货的集散任务，只有在边远地方和铁路运输过于繁忙地区才是例外。如哈沈（哈尔滨—沈阳）、沈大（沈阳—大连）公路干线，就担负为铁路运输分流的任务。

公路运输的重要性近年来开始受到重视。1990年，沈大高速公路建成，2004年完成改扩建，全长348公里，双向8连道，时速120公里，昼夜通行能力13万～15万辆次，比原来的沈大公路通过量提高14倍以上。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沈阳—哈尔滨、沈阳—北京、沈阳—本溪、本溪—丹东、沈阳—抚顺等一系列高速公路相继建成，东北地区形成以沈阳为枢纽的高速公路网络，对经济发展、城建布局和城镇体系形成有利。

五、国际陆海联运

我国东北地区处于东北亚国际陆海联运的有利区位，由于地缘优势、政策优势形成合力，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俄、日、韩4国陆海联运的开通，使一批边境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与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其中，地处中俄边境的绥芬河口岸已成为众多国际运输线的枢纽，每天有万吨左右货物经过这里运往第三国。绥芬河距俄罗斯，纳霍德卡东方港300公里，距日本、韩国、朝鲜的直线距离也不超过600公里。1998年，日本新淘—中国绥芬河—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国际运输线开通，朝鲜惠宁—中国绥芬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际联运开通。上述国际陆海联运使本区获得直达日本海的进出口通道，具有重要交通运输价值。

绥芬河已成为中俄边境自由度最高的口岸，很多货物在此口岸的滞留时间不超过3小时。为此，一些国家都把绥芬河口岸作为向第三国出口货物的桥头堡。

珲春—玛哈林诺铁路口岸于2000年开通，实现批量过货，已形成每年80万吨换装能力，2010年可达250万吨换装能力。这使我国出口日、韩及南北美洲的各类货物通过此口岸可直接到达俄远东各港口：珲春到波谢特港62公里，到扎鲁比诺港80公里，到海参崴322公里，到纳霍特卡482公里，开辟了一条国际陆海联运新通道。如2000年，中国珲春—俄罗斯扎鲁比诺港—韩国束草港之间的陆、海运输线开通。

至21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同东北亚国家的进出口业务已形成下列三条通道：（1）

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通道；(2) 哈尔滨、绥芬河、格罗捷科沃、海参崴（或纳霍德卡）通道；(3) 长春、珲春、卡梅绍夫、扎鲁比诺、波谢特通道。其中：第二条通道运量增长最快，2002 年格罗捷科沃运往中国货物 560 万吨，2003 年逾 600 万吨；新开辟的第三条通道同前两条相比，运距大为缩短。如经由俄罗斯扎鲁比诺港至日本港口（函馆、新潟、舞鹤、北九州）的平均距离为 880 公里，而由大连至上述港口的距离平均为 1790 公里，相差 910 公里，每吨货可省运费 16 美元，并节省运输时间。

六、民航和早已发展的管道网

东北地区民航原较落后，1986 年以来发展迅速。已开辟 200 多条航线，将全区主要大中城市与国内外城市联系起来，形成稠密的航空运输网络。区内现有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佳木斯、齐齐哈尔、吉林、牡丹江、延吉、锦州、丹东、黑河等民航机场，其中前六个为重要机场，前三个为国际机场。地处北纬·50 度的黑河机场则是本地区也是全国纬度最高的机场。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在 1993 年完成扩建，成为东北区具备国际标准的大型航空口岸，至 2004 年辟有 60 条国内外班机航线。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完成扩建后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航空枢纽，有过港航线 67 条，始发航线 55 条。2004 年开通沈阳经北京至法兰克福、洛杉矶、悉尼三条远程跨洋国际航线，加强了沈阳作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的枢纽空港地位。

管道运输在东北综合运输网中早就占有重要地位。1970 ~ 1975 年相继建成大庆—抚顺、铁岭—秦皇岛、大庆—铁岭（复线）、铁岭—大连、抚顺—鞍山等输油管道 8 条，全长 2471 公里。铁岭为枢纽站。中国最早的两条长输管线（庆铁线、铁秦线）因设施老化，1997 ~ 2000 年完成技术改造后，两线共长 1300 公里，管径 720 毫米，年输油能力 4500 万吨。技改完成后，高新技术设施节能高效，每年仅节电一项即达 1710 万元。

第五节　区内差异与经济联系

一、东北三省差异，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及存在问题

东北 3 省，尽管在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经济结构上有不少共同点，但由于地域辽阔，气候差异以及临海情况和地下资源的区别，地域开发的早晚等原因，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东北地区各省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如图表 13 – 3 所示。

（一）辽宁省

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其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大中城市数、铁路网和高速公路密

度、经济总量、人均 GDP、工业产值等，均居全区前列，其中有些还在全国居前列。主要工、农业产品和交通设施有 20 多种在全国占突出重要的地位。

本省自然条件有诸多有利之处（如临海、海陆交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加上近代工业发展较早等原因，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后，国家又以此为重点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如"一五"期间（1953～1957 年），全国重点建设的 150 多个项目中，辽宁就占了 24 个。因此，工业基础雄厚。至 20 世纪末，辽宁省企业的资产存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居各省区首位。

图表 13－3　东北地区各省（市、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表（2002 年）

项目 区域	GDP		工业销售收入①（亿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经济全球化			新经济指数②	城市化			
	总值（亿元）	人均（元/人）			外贸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全球化水平指数		设市城市（个）	城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建制镇（个）	城市化水平③（%）
东北地区	11603	10829	9567	2589	0.2294	0.1138	0.1716	—	90	1.1	1550	—
辽　宁	5458	12986	4925	1133	0.3550	0.2144	0.2847	47.9	31	2.1	615	54.2
吉　林	2243	8322	2141	679	0.1504	0.0291	0.0898	44.8	28	1.5	460	49.7
黑龙江	3902	10235	2501	777	0.0992	0.0324	0.0658	39.4	31	0.7	475	51.5

①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

②包括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活力与实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五类指标；

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 2003》、《经济日报》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但本省工业和经济发展仍存在严重不足：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锐减，有的矿（如阜新煤炭基地等）已枯竭；多数工业企业的机械设备严重老化；许多国有大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从经济结构来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开发薄弱，20 世纪 50～60 年代发展工业时，曾经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

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社会总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已从周期性震荡转为持续下降，主要表现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连年下降。1980 年时辽宁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 9%，居首位，比广东省高出 1 倍以上。到 2000 年，辽宁仅及广东的三分之一，在全国各省中的地位也降至第 10 位以下。

工业布局集中分布于辽宁中部城市群和沈大、沿海 2 大产业带。辽宁中部集聚着沈阳的机械、电子，抚顺的炼油、石化、煤电、特钢，辽阳的化纤，鞍山、本溪的钢铁等工业；以沈大高速公路和沈大铁路为主轴线的产业带，面积只占全省四分之一，工业产值却占四分之三以上；以大连为中心，丹东、营口、锦州、葫芦岛为两翼的沿海产业带，则集中分布着石油、化工、造船、机车、纺织、轻工、电子等工业。

（二）黑龙江省

农产品商品基地；国内先进水平的重大装备工业基地；石化、煤化工基地、边疆文化与边贸大省。曾长期是东北资源大省，但近年来煤炭、森林、石油等产业的资源状况日益严峻。

省内一些重要农作物和林产品的商品率高、外销数量大，不仅在东北区而且在全国亦居首要地位，主要农、工业产品居全国前列的有：商品粮、大豆、甜菜、甜菜糖、亚麻、亚麻布、奶牛存栏数、鲜奶收购量、乳制品、木材、原油、天然气、铁路货车、发电设备。

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由过去的产量型目标转向质量效益，从20世纪末开始不再开荒，并创造条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发展畜牧业。

在林业方面，由于对大、小兴安岭等主要林区长期过量采伐，采育比例失调，致使森林面积缩小，生态环境衰退，已经影响到本省林业优势的发挥。目前建设以营林为基础的林业基地；在农业布局方面，则强调优化区域布局，着力发展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新格局。

近十多年来，本省已发展成边贸大省。省内中俄边界线长3045公里，拥有国家一类口岸25个，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2位，具有水、陆、空俱全和客货运兼存的口岸群体优势，有利于吸引东南沿海各省市与黑龙江省开展边贸合作。正建立面向俄罗斯市场的加工产业体系。根据省内各地资源、地缘条件、产业布局，以黑河为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以绥芬河为边境商贸中心和出口商品集散转运中心，以同江为江海联运的港口城市，集中发展进出口货物中转及仓储业务。

现有城市化水平较高（52%），据2001～2020年《城镇体系规划》，全省城市化水平将增至65%，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化质量为重点，加强区域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哈、齐、大、牡、佳等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调整优化资源型城市的结构与空间布局，有重点地扶持绥芬河、黑河等边境口岸城市和小城镇建设。

二、经济区、城市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体

（一）东北经济区

是我国经济区域中形成最早、联系最为紧密的全国一级经济区。1985年在沈阳成立（前身是1983年成立的东北能源交通规划办公室）。地域范围包括辽、吉、黑3省和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兴安、通辽、赤峰），主要指标占全国的比例：土地面积12.9%；人口占9.6%；GNP11%。

东北经济区发展具有如下优势：（1）地处东北亚中心，既沿海又沿边，区位有利；（2）稠密的综合运输网络，多种现代运输手段均较发达；（3）拥有占全国20%耕地、40%林地及能源、金属、非金属矿藏。

此外，工业基础好，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城市密度大，城市群体辐射力强。全区20万人以上中等城市30个，50万人以上大城市20个，100万人以上特大城市8个。昔日有“辽老大、黑老二、吉小三”之说，城市经济实力亦如此。近年长春等城市发展快速，并带动四大经济中心排序发生变化：城市（市区）GDP排序改变为大连、长春、沈阳、哈尔滨。

但是，东北地区是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严重地区，传统产业比重大，企业技改滞后，开发能力弱，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难以适应市场竞争。加以区内资源型产业比重大，面临资源枯竭、接替产业发展滞后等隐患。

东北经济区的持续发展，需要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结构调整，加快重化工业技改，发展具有某些优势的支柱产业，加快资源型产业转轨，积极发展接续性产业。

东北经济区已选定大连作为全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并加快以珲春市为中心的图们江地区开发开放；同时有效利用满洲里、黑河、绥芬河、丹东等沿边口岸对外贸易的优势，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沿海、沿边开放政策，扩大开放领域。

（二）辽中城市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体

本联合体属于城市经济协作区这一类型，从劳动地域分工的层次上看，则属于国家的三级经济协作区网络。包含辽宁中部 7 个省辖市（沈阳、鞍山、抚顺、丹东、本溪、辽阳、铁岭），是以沈阳为中心自然形成的城市群体。主要指标占全省的比重：土地面积 51%；人口 52%；工业总产值 50%；长期以来是以重型经济结构为主要特色的经济区，也是东北工业布局的核心地带。

辽中一带工业发展的历史较悠久，工业技术基础雄厚，交通运输发达，以沈阳为中心，陆运网络呈辐射状通往各城市，同外部地区的联系亦便利。全区有一百余所高校和中专，并有数十所科研机构，科技力量雄厚。城镇稠密，城市人口比例大。在沈阳周围 100 公里左右范围内，集中了十多个大、中城市和数百个小城镇，构成稠密的城镇群。上述这些对经济技术协作的开展有利，但也应看到本区是受传统计划经济束缚严重的地区，工业结构雷同，经济基本上届于内向型，迫切需要技术改造。另外，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市民健康和生态平衡。

第六节　主要城市与经济中心、开发区

一、城市化进程开始较早，城市化水平较高

东北地区的设市城市至 2002 年底有 90 个，建制镇 1550 个。城市密度 11 个/10 万平方公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 倍。

城市化进程开始较早，现有城市化水平达 53%以上，在全国六大地区中居首位。且发展较均衡。

在现有 90 个城市中，按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数分类，200 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有 4 个：沈阳（401 万）、哈尔滨（274 万）、长春（228 万）、大连（218 万）；100 万 ~200 万人的特大城市 4 个：鞍山（129 万）、抚顺（124 万）、吉林（124 万）、齐齐哈尔

(113万)；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13个；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29个；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40个。大、中、小城市结构比例为1:1.4:1.9，同大城市的发展相比，东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

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位来看，全区90个市中，有副省级市4个（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地级市34个、县级市56个，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在多数地方表现得很明显。在辽宁，沈阳、大连和鞍山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本区的大城市发育较充分，地位重要，城市经济集中度高，四个副省级中心城市（沈、大、哈、长）的经济总量近占全区经济总量二分之一，从2004年开始，哈、长、沈、大一线将联手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装备工业走廊，预计十至二十年建成新型产业基地城市。

二、四大经济中心城市

（一）沈阳市

1.“共和国工业长子”。

沈阳是东北第一大城市，交通枢纽，亦为全国主要装备制造业基地之一。市区人口482万，以沈阳为中心150公里范围内8个重要城市所形成的“大沈阳都市圈”有人口2000多万。

工业是沈阳城市经济的最大特色。市内工业现有1000多亿元存量资产。以装备制造业为主，有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456户，其中有一批是国家的重点骨干企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一五”、“二五”期间国家曾将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于此。有“共和国工业长子”之称，亦称“共和国装备部”。当时，装备工业齐全，配套能力强。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沈阳仍是东北地区第一大工业城市。但随后因设备老化、国企集中、老工业基地衰退等原因，其综合经济实力从80年代居全国各城市的第4位下滑至90年代的第10位以下。

2. 重振装备制造业及布局选择，城市重心南移。

为振兴沈阳经济，挽救老工业基地的衰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调整产业结构与布局，21世纪初起以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推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因沈阳在装备制造业方面尚有比较优势可供利用。遂以此为基础，积极承接国际制造业的梯度转移，使传统的装备制造业通过嫁接提升新技术含量。

在工业布局、城市空间拓展方面，沈阳筑城2300年，历历在沈水（浑河）之阳，浑河以南坡澜不兴。2001年开始，城市发展重心南移，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基础上，全面开发建设浑南120平方公里区域。到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比重由3%增至13%，利用外资由7%增至20%，出口由27%增至45%；国务院已正式批准沈阳浑南新区规划建设3.3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与此同时，新加坡在浑南规划建设“新加坡工业园”和“新加坡城”，占地分别为10平方公里、2平方公里，以发展科技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为主。东亚国家也对沈阳的发展予以重视，至2002年，韩国公司在此投资兴建2156家合资或独资企业；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还辟有"中国沈阳日本工业园地"。

在城市形象方面，昔日"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工业城市形象已大为改观。投资环境的改善，为沈阳面向东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奠定了基础。2002年全市GDP逾1400亿元，在全国城市经济排序的地位略有上升。

（二）大连市

1. 中国北方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国际旅游城。

作为东北经济区最大港口和海上门户。大连市区三面环海，海岸曲折绵长达1906公里，并有沿海岛屿226个，形成天然屏障，军事、航运、经济地位重要。大连港一身兼商港、油港、军港、渔港职能，水深港阔，自然条件优越，为我国最具发展前途的良港之一。至2002年，货物吞吐量达1.1亿吨，以外贸货物多、金额高、集装箱运输发展快为特色。

2002年大连市GDP1406亿元，居东北地区前列。工业主要生产远洋、近海客货轮，大型油轮，船用大马力柴油机、内燃机车、纯碱、石油加工制品、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服装。

20世纪80年代开辟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内地最早开辟的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位于金州区大孤山，并在连通黄海的大窑湾构筑新港，与开发区同步建成。

20世纪90年代在大连市内相继建成一批增强城市功能、发展城市经济和改善市民生活的工程，遂使其城市发展水平有较大提高；而众多旅游设施的完善，又推动旅游进一步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2. 重视城市规划、空间拓展、功能提升。

大连是中国最早编制城市规划的城市之一，在早期具有城建特色的基础上，以后历有维护与改进。通过提出独特的规划思路，充分整合环境资源，创建品牌城市。

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曾先后被日、俄、苏占领或"租借"。城市规划和建设始于日、俄分别占领时期，早期城市发展和城建布局具有一定的日、俄文化特色。1900年俄国人制定的大连规划，采用古典主义的规划手法，由圆形广场和放射形路组成道路骨架。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占大连重新制定城市规划。

近十多年来，大连城市规划多次改进，规划管理与城市管理到位。市内有一批特色鲜明的建筑，加上个性化的广场和舒适的气候，使大连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它的优势是三面环海，腹地深远，弱势则是淡水资源严重不足，而且，用地稀缺，故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这也成为城市发展信条。相对于一些城市不顾地理基础，放弃自身特色，城建贪大求洋而言，大连的特色发展值得借鉴。

但从2002年开始实施"大大连"战略，编制超大城市的规划，回归重工业城市。为此，有些人认为大连并不具备建成超大城市的地理条件与优势，而且还担心近十余年来一直作为大连宝贵财富的环境资源会在"大大连"的规划、建设中受到损失。

新规划在城市空间拓展方面，按“西拓北进”思路，大连城区西拓至旅顺，北扩至金州，构筑一个由主城区、新市区和北部三个县级市（卫星城）组成的“两城三星”组团式城市空间布局。预计到2020年城市规划用地1000平方公里。人均GDP 2007年达到5000美元，2020年增至1万美元。

（三）哈尔滨市

1. 中国装备制造业基地之一，东北亚经贸城市，寒地国际城市。

由百余年前的一个晾网场发展成为一座超大城市。附近地区发展重工业的资源并不丰富，但它利用自身铁路枢纽和内河良港的有利因素，使城市经济联系的腹地范围扩大到东北的北部及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带，促进了经济发展，并成为我国北方工业重镇。工业以机电设备制造为主，飞机制造业亦为支柱产业之一，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为全国著名的三大动力厂，生产的电站成套设备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哈尔滨市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38%上升到52%。从21世纪初开始，按照建设东北亚国际经贸城市的长远战略目标，实行多元复合型城市化战略。在城建方面则以建设国家园林城市为目标。为深入挖掘自然、人文资源潜力，实施建筑特色、冰雪特色、自然景观特色发展战略，对中外闻名的“松花江畔”、“太阳岛景飞”按滨水城市的一流水平重新规划建设；并以世界冰雪旅游名城为目标，深度开发全市冰雪资源。

2. 城市布局优化调整。

在城建布局上，开发建设松北新城区，形成“开发松北、繁荣（松花江）两岸”的城市布局态势；在老城区改造方面，通过成区域的改造危房棚户区，实现了城市布局优化调整，提高了城市中心区的土地价值和开发效益。

以太阳岛为中心的松北新区在近年加快了建设步伐。松北新区面积276平方公里，是哈市现有城区的1.5倍。目前，松北新区内已建成5个功能区：太阳岛名胜风景区；松浦交通枢纽商贸区；利民新兴工业区；前进教育行政区；江湾分区。

在21世纪前十年，哈尔滨将在1886平方公里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区在继续保持“分散组团式”布局的情况下，控制市中心区的开发强度，适当引导城市经济与城建布局向南、向西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哈尔滨市周边地区草原面积锐减，其中城边草原减少幅度最大，已开始影响到城市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出现衰变。与此同时，由于对黑土地的过度开发，已使土地肥力大减；而对于湿地的开垦，也已对湿地生态造成不良后果。从21世纪初起，哈市陆续出台保护自然生态措施。

（四）长春市

1. 中国最早建成的汽车制造基地，“行走机械”之都。

长春处于东北地区中心部位，经济联系范围超出吉林省之外。从“一五”时期开始成为我国内地工业建设首选之地。市内工业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和行走机械工业产品为最大特色。我国第一个现代汽车制造企业——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于20世纪50年代在

此建成。现有第一汽车制造集团、长春大众等著名国企及中外合资企业。以生产载重汽车、轿车、铁路客车、拖拉机等行走机械而闻名。除汽车以外，光电子信息、食品、生物医药亦为主导产业。

2. 文化积淀及其特色。

近百年来的城市发展，使长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积淀与经济基础。它是东北地区一个以文化、科研著称的城市。市内有大专院校15所、科研机构80多个，光学精密机器、材料试验机、气象仪器、汽车等方面的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是全国光学仪器科研基地和生产中心。另外，地处本市朝阳区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长春也是东北地区探寻近代历史与人文、自然景观的胜地。19世纪以前，市境归蒙古族郭尔罗斯王公所有，为“春猎之地”。1895~1931年，俄、日势力先后在此开商埠，修铁路，办工厂，长春成为东北地区输出农产品与轻工业品的中心。1932年设市，城区面积扩大到20平方公里，初具城市规模。“9.18”事变后成立的伪“满洲国”定都长春，改称“新京特别市”，成为当时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规划规模在东北地区为最大，并按规划建设了一部分市区。迄今留存伪满洲国皇宫、八大部等建筑和遗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春重视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长春—吉林、长春—营城子以及长春绕城线等高速公路于1997年建成，标志着以高速公路为主骨架的公路网络初步形成，对促进本市经济发展有利。

三、资源型城市

东北地区众多资源型城市，在20世纪80~90年代因资源衰竭或资源利用政策变化而相继遭遇发展难题。如阜新、伊春、大庆、抚顺、鸡西、双鸭山等。

（一）大庆市

1. 城市因油而兴。

我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位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中部，市境多为草原与沼泽地。城市因油而兴，1979年设市，2001年GDP1032亿元，居东北地区第2位、全国第9位。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75%以上，有大庆油田、大庆石化等著名大企业。

2. 资源衰减后城市的持续发展。

四十多年来，市内已产油17亿多吨，但早已面临资源型城市所遇到的难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油气资源衰减，加之油气大量开采带来植被破坏问题，使经济继续发展遇到困难。近年来重视发展非油产业，并使石油产品加工延伸，实施“石化立市”战略，建设乙烯、裂解丙烯衍生物和油田化学品三大生产基地。又实施“农转牧”战略，并进行“治水、还林、还草、净气”等生态建设，使大庆开始由单一的矿区型城市走上综合型城市发展之路。

产业布局特征直接影响城市发展方式，油田的矿区割裂了城市布局，主导产业骨干企业的变迁影响城建格局与聚集效益，市区原来很分散，现已有所改变。预计2010年形成石油、石化、地方经济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至2020年完成由矿区型城市向综合型、区域中心型城市过渡。在东北地区一批资源型城市衰落中，大庆市的转型是较为成功的。

（二）抚顺市

1.城市因煤而兴又因煤而衰。

抚顺素称“煤都”，采煤历史100多年，有亚洲最大的露天矿，煤炭产业从业40万人，矿区人口占全市城市人口30%，但近年来因资源渐趋枯竭，煤炭可采储量仅剩1亿吨，4座大型煤矿关闭2座，年产煤由1400万吨锐减至600万吨以下，“煤都”之称已名不副实。不仅如此，还导致相关产业萎缩，并在城市中留下大面积采煤沉陷区，区内近10万居民需搬迁安置。

2.发展重新定位。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调整产业结构，以石化取代煤业。“抚顺石化”现为中国石油骨干企业，加上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抚顺石化研究院等，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格局。2002年，经多方论证，抚顺市发展重新定位为：“中国北方石化城”。“十五”期间抚顺石油加工能力提高到1500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140万吨/年，精细化工新开发产品100种以上。在发展壮大石化业成为本市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页岩油、煤层气等接续产业。另外，根据国家调整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以及加快采煤沉陷区治理的具体部署，优化城市布局，并恢复被破坏的生态。

四、主要开发区

（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于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我国最早举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大连市金州区东南部的大孤山半岛，距市中心33公里，大连港7海里，毗邻大窑湾。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水源较充足，气候温和，地质状况良好，具备一个兼有大型港口、外贸加工区、旅游地等在内的开放经济区的潜在优势。

在开发布局上，采取组团式结构进行总体布局。规划开发面积开始为20平方公里，后扩大至90平方公里。至21世纪初期实际开发近50平方公里。已建成大窑湾港深水码头、开发区道路网以及水、电和通信设施，并已形成新市区，形成大连的“副都心”，被称为“第二大连”，现有人口20多万，最终规模100万人。开发区产业结构以轻型、低耗能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至2002年底，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8家企业入区，实际利用外资38亿美元。从投资产业结构来看，现代产业群体初步形成，包括：现代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生物制药等。近年来利用外资项目趋

向大型化，并因此而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区工业产值逾500亿元，出口逾30亿美元，预计2010年GDP1000亿元。

就城市布局而言，这里已成为大连市新型产业拓展和城市发展空间延伸的核心标志区，它南承主城区，北促三个卫星城的联动发展，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中最具城市化、现代化、国际性的区域。

2.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3年创建，位于市区东南，距火车站8公里、国际机场15公里，长吉、长大两条高速公路从开发区过境。规划面积51平方公里，先期开发10平方公里。至2001年底，吸引内外资企业2577家，合同外资14亿美元，实际利用6亿美元，已形成汽车零部件、光电子、生物制药等主导产业。在城建布局方面，本区已发展成为长春市新城区。

3.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西新区。

沈阳开发区创建于1988年，1993年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位于城区西南部，与铁西工业区毗邻，2002年与铁西区合署办公并成立铁西新区，整合后面积54平方公里，为区内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空间。铁西是全国著名的国企布局及产业工人分布密集区，20世纪50～70年代曾是中国工业设备制造的摇篮，到90年代因设备老化、人员及债务包袱重等原因走向衰落。从21世纪初开始，对区内尚存的176户装备制造企业分别实施合资优化、改造提升、搬迁改组、破产退出等措施。这里将开辟5个工业园，承接世界装备制造业布局转移之需。同时通过土地置换、资本运营筹措改造成本。因铁西城区土地比开发区土地差价每平方米高1000元，故铁西以搬迁求活，仅级差地租即可集资100亿元，同时吸引国际制造业投资10亿美元以上。另一方面，盘活国有资产，运营土地存量，并推动原有贫民聚居地和棚户区改造。至2003年，铁西老工业基地初现复兴。区内还辟有“中国沈阳日本工业园地”，占地2平方公里，投资5亿美元。

（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科技产业开发方面，东北地区工业技术和科研、教育水平一向较高，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创建7个国家级高新区。其中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4个开发区于1991年设立；大庆、吉林、鞍山3个开发区于1992年设立。

（三）保税区

大连保税区于1992年设立，位于大连东北27公里处，地处建设中的大连新市区中心，西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大窑湾国际深水港，东临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北接地域辽阔的东北经济区腹地，西南距周水子国际机场21公里。保税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实际围网区1.92平方公里，按用地功能可分为金融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库3个功能小区。至2002年底，已吸引41个国家和地区客商来此投资，其中日本、中国香港、韩国、美国、中国台湾资本合计占40%以上。由大连保税区、大连港合建的“大连国际物流园”，是保税区的延伸区，享受保税优惠政策（投资政策、海关政策），依托港口资源，已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国际物流中心。大连出口加工区则已成为中国运作最

成功的出口加工区之一，重点发展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出口加工业，每年完成 GDP 约 50 亿元。以上“两区一园”（保税、出口加工、物流）发展规划纳入“大大连”城市布局总体框架，并逐步实现向自由贸易区转型。

（四）边境经济合作区

鉴于东北地区的东、北两面有漫长的边境线，且边境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故其所开辟的边境经济合作区数量较多。其中，黑河、绥芬河、珲春、丹东 4 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均于 1992 年经国家批准设立。

黑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已开发成为黑河新市区，改善了城市面貌，并利用中俄边贸和扩大对俄开放的契机发展国际贸易和旅游业；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规划 5 平方公里，按产业布局划分为出口加工区、商贸中心区、保税仓库等功能区，1992～2002 年完成开发 3.8 平方公里。

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规划面积 24 平方公里，起步区 2.28 平方公里，区内开发建设对一向地处偏僻的珲春市经济有拉动作用，珲春成为图们江下游国际合作重镇。另外，位于区内的珲春出口加工区于 2001 年通过国家验收，现为全国出口加工区之一。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沿鸭绿江 8 公里长荒滩建成工业加工区、商贸旅游区、口岸贸易区、科技园区，并带动了丹东城市发展与布局。

第十四章　西南地区经济

深居内陆腹地的西南地区，面积占全国24%以上，仅小于西北，在中国6大区中居第2位，人口占全国15.7%，次于华东、中南，居第3位。

本区现代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由于注重利用这里的一些有利条件，开发能源与矿藏，发展交通，建设出海和外运通道，使本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布局渐次展开。

但在经济发展与布局展开的同时，有些地方已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了某些破坏。

第一节　"西部大开发"主要地域载体

在西部大开发中，西南地区经济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从GDP地域分布来看，西南占三分之二左右；就西部最大的中心城市（重庆、成都、西安）和次一级中心城市（昆明、兰州、贵阳、乌鲁木齐、绵阳）来说，西南也占有较大优势。

从我国版图上看，本区地理位置似乎偏于西南一隅，但因有世界著名的长江水系贯流其间，这里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辽阔腹地。加之区内东部的重庆、四川、贵州及云南东北部地处我国内地腹心部位，且资源丰富，劳力充足，开发条件有利，实为国家的战略后方。

一、盆地精华

西南地区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其海拔最高主体部分位于本区西部西藏境内。在本区中部和东南部还有横断山区、云贵高原。以上三大地形区，占全区绝大部分。它们的地面垂直高差很大，交通运输困难，人口密度低，经济开发难度大，只有在一些河谷地带例外。如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南盘江和元江等流域，散布着许多串珠状的河谷平坝，坝子上通常淤积较厚的冲积土，气候条件相对有利，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纬度位置偏南的河谷地带还可种植亚热带或热带经济作物。

横跨川渝的四川盆地，是本区农业生产的精华所在。周边有邛崃山、龙门山、大巴

山、巫山、大娄山环绕，盆边海拔高1000~3000米。盆地内北高南低，底部海拔200~700米，为西南平均海拔最低地区。盆地范围西起雅安，北至广元，东至奉节，南止叙永，略呈菱形，面积20万平方公里。因境内岩石主要由紫红色砂页岩组成，而这些岩石又易受风化发育成紫色土，故有"紫色盆地"或"红色盆地"之称。

根据地形特征，盆地内又可分为川西成都平原、川中方山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三大部分。总的说自然条件适于农、林、牧、渔综合发展，物产丰富，向有"天府之国"称号，是我国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首要盆地区。

物产富饶的"成都平原"，亦称川西平原，由沱江和岷江七个冲积扇组成，为山麓冲积平原。西北起自神仙桥山，南至新津县城，东到金堂，平均海拔600米，面积8000平方公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著名的都江堰，即利用这种微斜地势，在近二千年以来一直进行着自流灌溉。现灌溉面积已扩展到1000万亩，成为我国最大的灌区。土壤肥沃，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稻、麦、油菜籽、烟叶高产稳产。古代记载中的"沃野千里，不知涝旱，号称天府"，最初指的就是这里。后来，整个四川盆地也被泛称为"天府之国"。

二、三江并流遗产

地处滇川藏结合部，在98°~100°30′E、25°30′~29°15′N之间，山高，林密，地表径流奔腾湍急，有一些神秘的大峡谷，多条世界级大河相邻相伴，携手同向奔流，蔚为壮观，这便是著名的"三江并流区"。由于地球上两大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的剧烈碰撞，产生出一系列自然奇迹。

深藏于横断山脉纵谷之中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前二者最短直线距离仅66公里，而后二者不仅并流直泻的路途特长，而且彼此间的最短直线距离不足19公里。这种情况堪称世界地质学、地理学上的奇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由于上述三条大江在世界屋脊的边缘上，形成江水奔腾并流却互不相汇的奇特景观，对国际旅游探险考察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三江并流区域资源富集与生态脆弱并存，从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重点开发兼重点保护的主要地区之一。另外，怒江在我国1500多条较长江河中，还是唯一未建大坝、自然生态特征保存较完整的。

三江并流地区还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区内具有极为明显的垂直分带性。从海拔760米的怒江干热河谷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汇集高山峡谷、雪峰冰川、高原湿地、森林草甸、淡水湖泊、稀有动物、珍贵植物等奇观异景。这里生活着14个少数民族，其中，独龙、傈僳等6个少数民族为当地独有。

这一区域的矿产、水力与水资源丰富，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重要价值；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更是具有世界意义，并流区内集中了北半球南亚热带、中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的多种气候与生物群落，并有小熊猫、滇金丝猴、桫椤等一批国家级保护的动植物，被称为"地球最直观的体温表"和中国"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避难

所”，不少地方属于尚未有人类涉足的原始生态区域。2003年起正式列入《世界遗产（自然景观）名录》。

另外，有“人间仙境”之称的“香格里拉”美景也分布于此附近。在川滇藏接壤地带，有一大片云蒸霞蔚、风光旖旎的景区，历来是中外旅游者心中的圣地。从2002年起，川滇藏三省（区）联手开发这一世界著名的景区。

“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初步界定在川西南、滇西北、藏东南9个地州10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将投资800亿元，开发建设成为全球性的休闲旅游后花园。但是，对三江并流区的旅游开发规模以及建坝密度等问题均有待综合论证。

三、资源集中度高

西南地区的资源集中度很高。在矿物资源方面，区内已发现的矿产达100余种，其中有90多种具有经济开采价值。钒、钛、锡、铅、铜、锌、铝、铬、汞、镍、铂、锂、铍、锰、铁等金属矿藏，天然气、井盐、芒硝、硫、磷、石棉、云母和煤炭等非金属矿藏，都分别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四川的铁矿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2位。贵州的煤炭储量在南方各省中居首位。四川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储量大，其中，攀枝花市拥有的钒、钛资源，分别占全国的69%、91%，均居第1位。红格钒钛磁铁矿是我国少有的特大型综合性矿床，已探明的铁矿储量达十多亿吨，占全国同类型矿床的一半以上；钛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的28.9%，整个矿床的潜在经济价值高达数千亿美元。云南兰坪铅锌矿则是我国储量最大的铅锌矿之一，而西藏冈底斯铜矿带则有望开发成为一个新的铜矿基地。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四川的铁、有色金属和贵州的煤均已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对西南区冶金、能源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云南的铅、锌、锗，云、贵、川3省的硫、磷，贵州的汞，四川的锂、铍、石棉、云母，西藏的铬，也已或即将得到开发利用。

在水资源方面，本区更是得天独厚，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50%；由于降水丰富，河流众多，更兼山峦起伏，地势高低悬殊，境内很多著名河流（如长江上游主干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都是从世界屋脊的边缘飞泻而下，故水能蕴藏极富。据初步计算，高达4亿多千瓦，占全国水力资源总蕴藏量68%；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是开发价值最佳的水电富集区，每平方公里产电量可达286万千瓦时，为世界水平的40倍，比世界水能密度最高的瑞士还大3.7倍。

西南地区地貌类型复杂，且垂直高差通常都很大。有一些坝址交通不便，而且不少坝址又恰巧位于我国内地多发性地震区范围内，给开发利用带来某些不便，但也有不少有利之处：它们通常具有落差大、水流稳定、建坝回水成库淹没耕地少、移民少、开发和运行成本低等一系列优点，权衡利弊，仍然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是大西南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

如地处本区中央地带的金沙江，天然落差达5100米，水能蕴藏量1.124亿千瓦，

占全国16.7%，是能源高度富集区，仅金沙江下游即可建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四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3850万千瓦，建成后均可跻身世界大水电站之列；而地处偏西的澜沧江因其以能源为主的资源集中度高，且便于跨国输送，故已建成和正在建一批大型水电站，也已成为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环节。

在此基础上，完全有条件构筑规模宏大的西南能源产业平台，并成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

四、已有初步开发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除四川盆地因靠近国土中部，又有长江贯通东西，自二千多年前有大量移民进入，开发利用较早以外，其他地方经济发展迟缓。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国家在西南有重点地建设工业、交通线路。先后开发了云南个1日的锡矿、东川的铜矿、四川攀枝花的铁矿、贵州六盘水的煤矿。与此同时，四川盆地的天然气、盐的开采，也从小到大，由过去沿袭旧式手工开采而逐步改用机械化作业，开采规模大为扩展。在上述资源的基础上，发展了钢铁和有色冶金、机械制造、军工、化工等主要工业部门。

但是，也应看到有较大差距。加上20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项目上得太多，在工业布局上又片面推行“靠山、分散、隐蔽”的“山、散、洞”方针，造成工业布局不合理，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不足，运输不便，难以形成综合生产能力，供、产、销脱节，产品成本高，竞争性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总结“三线”建设教训的基础上，对本区工业结构和布局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至90年代，根据西南地区的区位特征以及能源、金属矿藏、农林、旅游资源丰富等有利条件，确定通过修筑出海和外运通道，大力开发能源和多种矿藏，建设具有全国意义的大能源基地、有色金属、磷硫生产基地及热带、亚热带农业基地和旅游基地的长远目标。

上述开发目标的确定，基本上符合西南地区的实情，并且已使西南经济发展逐渐活跃起来。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开发滇黔川3省毗邻地区。该地区因资源高度富集而被称为西南的资源金三角地带，正开发成为21世纪滇黔川3省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战略布局的主要地区。

五、重点加强勘查与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集中区

根据“十五”西部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实行“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西南地区重点加强下列矿产资源集中区的矿产勘查与开发利用：(1) 西南“三江”(金沙、澜沧、怒江) 中南段有色金属资源集中区；(2) 攀西黔中矿产资源集中区；

(3) 四川盆地天然气资源集中区；(4) 西藏“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拉萨河）有色金属资源集中区。

六、荒漠化、地质灾害、生态恶化等对经济发展布局的约束作用

西藏北部地区集中连片的荒漠化趋势比较严重，荒漠化总面积广达44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居第3位。此外，西藏邦达草原、四川的川西草原等地沙化危害趋势亦较明显；云南梅里雪山冰川不断后退；滇黔川三省许多地区，因地质和地貌条件复杂，致使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经常发生。以上生态与自然灾害，成为约束本地区经济发展与布局的重要因素。

引发生态问题的还有另外一种因素，即由对旅游资源开发的过高期望值和过量开发引起。西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之丰富是罕见的，如由中甸、丽江、大理所构成的“香格里拉走廊”，由九寨沟、黄龙所构成的钙华五彩池（梯湖）和瀑布群，由泸沽湖所构成的母系社会遗迹等，它们以梦幻般的山水风光、绝版的人文景观等吸引国际国内游客。然而，这里也是地势崎岖险阻、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之地，20世纪末期的过量开发已造成诸多问题。对此，应通过对旅游景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计算与论证，确定适宜的开发规模。

第二节　新兴能源、金属、化工基地

西南地区是我国新兴的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以硫、磷为特色的化学工业基地；还由于能源资源富集，经过初步开发，已成为我国“西电东送”的主要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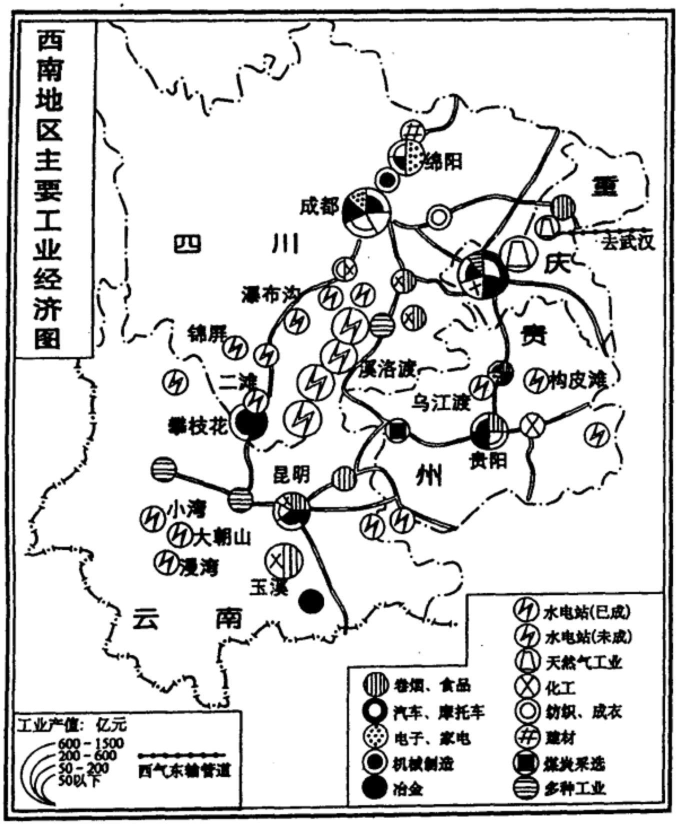
西南地区主要工业经济图，如图表14－1所示。

一、构筑宏大的能源产业平台，“西电东送”与跨国输电主要源头

（一）三江系列开发，西电东送主力电源

西南水力资源极富，占全国水力资源总量的68%，藏、川、滇、黔诸省区位居全国各省区前列，仅川、滇两省可开发装机容量即达1.6亿千瓦，占全国的43%，其中，从21世纪初启动的三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系列大开发令人瞩目。

早在八十多年前就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水电站——昆明螳螂川石龙坝电站，但直至20世纪50年代水电开发还停留在落后状态。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利用西南的水能优势（水力蕴藏集中，大坝址多，淹没损失少，单位千瓦造价低），先后开发建设



图表 14－1

一系列大、中型水力发电站，主要有地处大渡河中游的龚嘴低坝水电站（装机 70 万千瓦）、贵州乌江上游的乌江渡水电站（装机 122 万千瓦）、大渡河铜街子水电站（60 万千瓦）、岷江紫坪铺水电站（76 万千瓦）、白龙江宝珠寺水电站（70 万千瓦）、滇黔交界黄泥河鲁布革水电站（60 万千瓦）、黔桂交界南盘江天生桥一级、二级水电站（合计 252 万千瓦）、云南澜沧江的漫湾水电站（125 万千瓦）、大朝山水电站（135 万千瓦）、小湾水电站（420 万千瓦）、四川雅砻江二滩水电站（330 万千瓦）、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330 万千瓦）、贵州乌江构皮滩水电站（300 万千瓦）等。

已进入前期建设和规划建设的有：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1260 万千瓦）、向家坝水电站（600 万千瓦）、白鹤滩水电站（1250 万千瓦）、乌东德水电站（740 万千瓦）；澜沧江景洪水电站（150 万千瓦）；沙沱水电站（100 万千瓦）、清水江三板溪水电站（100 万

千瓦）、独松水电站（136万千瓦）、大岗山水电站（150万千瓦）、长河水电站（124万千瓦）、猴子岩水电站（140万千瓦）；雅砻江锦屏一级水电站（360万千瓦）、锦屏二级水电站（440万千瓦）、两河口水电站（300万千瓦）、官地水电站（180万千瓦）等。

在上述水电站中，乌江渡水电站是我国在喀斯特（岩溶）地区建成的最大水电站，从2000年起正扩建成为122万千瓦，加上洪家渡、索风营两个新建水电站、共同作为贵州西电东送主力电站。乌江水系电站以单位造价低（仅为国内同类项目投资的五分之三）、经济效益大而著称。

二滩电站则是我国已全部建成的第一大水电站，装机330万千瓦，年发电170亿千瓦时。至1999年底有六台55万千瓦级的水轮发电机组并网发电。从2001年开始，四川的巨大电力，通过二滩—昭觉—洪沟—陈家桥—长寿—万州再经龙泉至荆门，形成川渝、华中两大电网互联，再经湖北双河、葛南至华东。二滩水电站的建成，除可大规模启动西电东送，还使滚动开发雅砻江、金沙江、大渡河水能资源的系统工程渐入佳境。

2002年开工建设的小湾水电站，位于澜沧江中游，因坝址条件优良，是澜沧江水电基地的龙头电站，装机420万千瓦，年均发电190亿千瓦时，建成后补偿效益显著，可使下游的漫湾、大朝山、景洪3电站出力增加110万千瓦，并可使“汛期弃水、枯水期电力紧张”的结构性矛盾也得以缓解。

（二）金沙江“水电高地”，开发强度大，密度高

山高谷深、水流激越的金沙江，现正成为投资高地，并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水电能源高地。金沙江是长江上游宜宾以上河段，属于典型的峡谷河流，从巴塘河口至宜宾的2360公里河段，落差达3280米，规划开发18个梯级，它们落差集中，动能指标优越，淹没损失小，而且梯级规模大，具有单独远区送电能力。其中，石鼓至宜宾的中、下游优先开发，布置12个梯级：（1）上虎跳峡；（2）两家人；（3）梨园；（4）阿海；（5）金安桥；（6）龙开口；（7）鲁地拉；（8）观音岩；（9）乌东德；（10）白鹤滩；（11）溪洛渡；（12）向家坝。以上总装机7502万千瓦，年均发电量3477亿千瓦时。

溪洛渡是金沙江第一座巨型水利枢纽，地处金沙江产沙区末端，调节库容65亿立方米，可利用巨大的死库容拦截74%泥沙进入下游，使进入三峡水库泥沙大减。溪洛渡电站地处川滇交界的雷波、永善2县，规划安装18台70万千瓦机组，总装机1260万千瓦，年均发电577亿千瓦时；向家坝水电站位于四川宜宾，将安装8台75万千瓦机组，总装机600万千瓦，年发电293亿千瓦时。以上两大电站2006年开工，移民数分别为5万、10万人。此外，同处金沙江下游的乌东德（740万千瓦，339亿千瓦时）、白鹤滩（1250万千瓦，550亿千瓦时）两个巨型水利水电工程也将建设，并在2020年基本建成。

上述4座特大型水电站地处西南地区川渝滇黔的核心部位，不仅有巨量的发电效益（丰水期共有3850万千瓦容量的电力，相当于两个三峡），并足以改变中国电力格局；而且它们作为三峡工程后续项目可改善金沙江下游、长江中上游的防洪和航运条件，更好地发挥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并带动四川凉山、云南昭通等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可进一步满足川渝滇及华东、华中用电需求，成为西电东送主力电源。但其开发利弊亦

有争议。如溪洛渡电站正好位于马边—永善—大关地震带，建坝安全问题；向家坝水电站正好建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另外，拦截泥沙也仅是权宜之计。还有虎跳峡建坝遭遇一些学者与民间人士反对。

（三）雅砻江落差集中度很高，但生态很脆弱

雅砻江流域梯级滚动开发正在大规模进行。这里已成为继三峡之后能源建设水电开发价值最大、最集中的地区，是中国典型的“流域、梯级、系列开发”的河流。雅砻江年径流量596亿立方米，是黄河1.1倍，可开发3462万千瓦水能，其中干流可建21个梯级电站，总装2856万千瓦。

开发优势是天然落差非常集中，如锦屏大河湾，直线距离17公里，落差310米。雅砻江沿岸有些地方的森林资源已遭砍伐，原生的森林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逐年加剧；另一些地方因很难进入，人迹罕至，原始生态系统侥幸保留，生物多样性依然珍贵。上述各种情况在流域梯级开发中均应充分论证，以使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得以维护。此外，随着开发推进，泥石流危害还有可能增加，地震、地质灾害亦不容忽视。

（四）怒江开发有争议

据《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规划以松塔、马吉为龙头水库，丙中洛、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光坡等梯级组成的两库13级开发方案，总装机2132万千瓦，每年创产值300多亿元。上述报告于2003年通过评审，然而，围绕怒江水电开发对陆生生物多样性、对水生生物、对“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对水文和地质环境影响等引起很大争议。

怒江是我国仅存的两条原始生态江河之一，有些人认为应作为生态江河予以保留，不予开发。另外，怒江峡谷以其连续深切的峡谷形态、谷地湍流的水流形态而著称于世，为世界级峡谷旅游资源，加之怒江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有机组成部分，对其进行13级水电开发将改变自然河流的水文、地貌、生态的完整性。但力主开发者则认为怒江开发河段沿岸地带是生态脆弱、贫困落后之地，怒江州更是兼有资源的富集和极度的贫困双重特色，现为云南和全国最贫困最落后地区，原有森林采伐业因环保在近年退出经济领域，替代产业只能是水电、有色金属、旅游，但旅游承受力较低，有色金属开发则必须要有电力，而且开发水电还可改变传统能源结构（改薪柴为用电），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环保部门则认为既要看到水电开发的负面影响，也要看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因为当地居民在温饱尚且不保时也是要破坏生态环境的。总体而言，水电开发对怒江的生态保护利大于弊。但在具体开发中应降低大坝密度，优先建设六库电站等，通过实验性开发实现怒江的可持续发展。

（五）西南水力大开发的巨大利益与隐忧

在建的中国十二大水电基地中，全局或部分位于西南地区的有7个：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乌江、长江上游干流、南盘江—红水河，规划总装机1.35亿千

瓦，占全国67%。

西南水力大开发，不仅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与生产力布局的展开，而且在全国能源平衡的大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已成为我国“西电东送”主源头，还将为日见短缺的东南亚电力市场提供跨国输送。

从2000年起加快开发西南水电，构筑规模宏大的“西南能源产业平台”，并以此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其中区位有利、资源集中度很高的西南三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正在进行“流域、梯级、滚动的系列大开发”，形成我国最大的水电群落；与此同时，在三江的东西两翼，乌江、澜沧江开发也进入高峰期。预计至2015年，我国西南山谷中将隆起硕大无朋的水电高地。

但是，西南水力大开发中的某些特殊有利河段，已建、在建和规划建设大坝密度太高，开发强度过大，未曾周密地顾及区域电力结构的合理性、生态失衡与环境承受力。如只考虑技术可行性因素，并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导致水电经济过热，则有可能遭受自然界报复，出现山洪泥石流增多，垮塌、地质灾害等也会呈增长趋势，生态上的损失会更大。

（六）坑口火电、配套火电

随着水电大力开发，西南电力工业结构中“火电比”急剧下降。出于电网安全运行需要，需配套建设与合理布局一批骨干火电站。现有火电主要分布于江油、重庆、成都、攀枝花、昆明、开远、曲靖、宣威、水城、安顺、遵义等大、中城市或工业中心附近；而一批在建、待建的火电站（坑口火电、配套火电共计1500万千瓦）则集中布置于“西电东送”南通道一带的黔西滇东地区。粤黔共建的六盘水市盘南电厂（360万千瓦）是贵州省最大的坑口火电站。

（七）天然气产量长期居全国首位

因地质地理条件有利，西南地区天然气资源丰富，四川盆地现有天然气田100多个。天然气产量长期以来居全国首位。2002年天然气产量102亿立方米，占全国三分之一；天然气产地主要有江油、自贡、泸州、隆昌、长寿、开县、宣汉等。

西南地区煤炭资源亦较丰富，但过去因主要煤田位于贵州、云南、四川3省接壤地区的崇山峻岭中，交通不便，没有得到大规模开发。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为配合内地工业建设，逐步开发丰富的煤炭资源。21世纪初全区煤炭生产能力达1亿吨，贵州煤炭工业发展迅速。

贵州煤的探明储量500亿吨，为我国南方煤藏最富的省区。全省产煤量已达5000万吨，比1949年增长100多倍，地处黔西的六盘水市，已开发成为大型煤炭基地，也是贵州最大的煤电输出地，有两座240万千瓦和一座360万千瓦巨型火电站；四川已开发煤田主要分布于川西南，攀枝花煤矿年产规模600万吨，居西南地区首位，以出产优质无烟煤为主。

二、攀西大裂谷以及新兴的冶金工业基地

西南冶金工业原有基础薄弱，只有一个小型的重庆钢铁厂，年产钢不到1万吨；而钒钛冶炼则是空白，任其丰富的矿物资源长期埋没地下，未曾得到开发利用。

大自然的杰作——攀西大裂谷，以资源丰富著称，探明矿产50种，钒钛磁铁矿储量100亿吨，伴生钒钛镓钪钴等20余种稀贵金属元素。其中钒资源占全国62.6%、世界11.6%以上。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金沙江畔建设攀枝花钢铁公司。至21世纪初，利用本地盛产的钒钛磁铁矿作原料，已形成年产500万吨钢和各种钢材的综合生产能力，跻身于全国主要钢铁企业行列。

在昔日封闭的川西南，出现了一座新的以资源为依托的工业城市——攀枝花市，它是地处我国内陆深处的新工业基地，并已成为我国开发攀西大裂谷地区资源的战略据点。

从远景发展来看，攀枝花市和攀西大裂谷及邻近的川滇黔接壤地区，有丰富的铁矿、炼焦煤和有色金属矿藏，而在距市区45公里比较半径范围内，又有可建大中型水电站的优良坝址4处，总装机容量可达700万千瓦，可以提供稳定而廉价的电力。因此，具有进一步发展冶金工业的良好条件。

1972年，攀钢雾化提钒成功，建立起我国的钒工业。至1980年，我国由钒的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由于自行建设攀钢，并采用独特的设计工艺，迄今已使攀枝花市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钒制品生产基地，它的钒制品占全国钒市场74%、世界钒市场18%，故此攀枝花市有“中国钒都”之称。因在炼钢中加钒可显著改善钢的性能，含钒钢产量1990年为53万吨，2000年增至120万吨。目前，攀钢主要产品除钒产品系列以外，还有以重轨为主的大型钢材系列以及板材、管材系列等。

西南的有色冶金工业，除前面提到的钒钛冶炼以外，还生产多种有色金属。其中，云南个旧锡矿有四百多年开发史，已发展成为生产锡、铜、铅、锌的大型采选、冶炼联合企业，锡的产量居全国前列，是我国最大的产锡基地之一。因此，个旧有“中国锡都”之称。云南铜的生产历史，可追溯到元代以前。以东川铜矿生产规模最大。

贵阳市及其附近地区（包括修文、清镇），铝土资源有4亿吨，居全国第2位，现已成为我国主要铝矿产区和炼铝工业基地。建在贵阳市白云区的贵州铝厂，拥有从采矿到冶炼的全套生产系统，生产铝锭、氧化铝、碳素制品三大系列34种产品，至2003年拥有年产氧化铝80万吨、电解铝25万吨的生产能力，已成为我国新兴的铝工业基地，正发展成为对铝资源进行深加工与综合利用的基地。此外，西南地区还有云南铝厂、遵义铝厂、重庆铝厂、西南铝加工厂等。地处重庆的西南铝加工厂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铝材生产基地。

三、以磷、硫为特色的化学工业

本区的化学工业，建立在区内多种化工原料（天然气、井盐、磷矿，天然气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川渝气田曾长期是全国最大天然气田，井盐产量居全国首位）的基础上，是全区工业中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

四川曾长期是全国生产农用化肥最多的省，1997年川渝分设后，四川化肥产量仍居全国前列。其中氮、磷肥的产量均居全国第2位。化肥生产布局主要集中于四川盆地内。从全区来看，具有全国意义的大型化肥企业有：四川化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赤水天然气化肥厂、"云南石化"、"云天化"等。

四川以生产氮肥为主，云南以磷化工为最大特色，所产磷复肥、黄磷、磷矿石等均居全国首位。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地处黔中的开阳县优质富矿占全国78%，储量3.9亿吨，矿源分布集中，易于开采，故有"高原磷都"之称。20世纪90年代，黔中的开阳、瓮安至福泉一带已建设成为矿肥结合的磷化工生产基地。其中，开阳磷矿已开发成为磷精细化工基地；瓮福磷矿、瓮福磷肥厂是国家在1991～2000年建设的全国最大磷矿肥基地。

四、"军转民"机械、电子工业，装备制造业基地

本区机械电子工业内部构成有动力设备制造、军工机械、飞机制造、汽车、摩托车、彩色电视机、电子仪表、冶金机械等部门。地理分布主要集中重庆、成都、德阳、绵阳。

德阳早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就定为我国的"母机工业基地"，先后建成中国第二重机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形成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以生产大型电站（水、火、核电）成套设备、冶金成套设备、工程施工成套设备为主，能够单独制造70万千瓦级的长江三峡水轮发电机组。四十多年来，德阳累计生产水轮发电机组、汽轮发电机组、大型连铸连轧设备分别占全国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到2002年，有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99家，资产159亿元。

重庆主要生产汽车、摩托车、动力设备、矿山机械、机床、仪器仪表等。至2002年拥有年产汽车30万辆、摩托车200多万辆产能，后者占全国七分之一；绵阳在1990年期间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到1995年建成17条彩电生产线，2002年生产800万台，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

除上述三大中心以外，西南地区机械工业的布局还有一些次要中心。如昆明、贵阳、遵义、资阳、绵竹等。

1980年以来，本区一些军工骨干企业，实行"军民结合"、"军转民"，开拓发展新路。如"重庆长安汽车集团"，其前身是创办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中国最早的兵工

厂。军转民二十年来，成为全国产销量最大的小型车及发动机制造企业，形成年产汽车30万辆、发动机36万台生产能力。2005年增至年产销汽车50万辆、发动机35万台产能；重庆的“嘉陵”、“建设”等企业集团，以前产品单一，军工产品优势难以发挥，实行“军民结合”后，生产摩托车等民用产品，形成规模效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重庆成为我国内地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1997年组建的“中国嘉陵建设摩托车集团”，拥有年产摩托车400万辆、发动机500万台的产能。

资阳机车厂则是我国大功率干线客货运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的专业生产厂，中国西部唯一可同时生产内燃、电力机车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制基地。

五、建设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高新技术产业在西南地区发展滞后，从2000年起，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具体步骤，成都—德阳—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带正式启建，这也是西南地区第一条高新技术产业带。

成、绵、德三地交通、通讯发达，成绵高速公路和信息高速通道缩短了三地时空距离。鉴于上述三地在经济、科技、生产力布局等方面具备了相对优势，成都、绵阳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德阳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已使其成为四川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涉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机电一体化等。

成都—德阳—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立，带动成都平原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预计至2005年产业带初步建成，年产值约1000亿元。

六、少数轻纺部门优势及地缘因素

同重、化工业相比，西南区的轻、纺工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投资比重过低，发展甚为缓慢，难以满足全区1亿多居民的消费需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注意调整农、轻、重比例，使轻、纺工业获得较快的发展，并使少数部门的传统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

（一）国家名酒及其特殊的地质、地理基础

西南地区酿酒业历史久远，优质白酒生产在全国占突出地位。酒类中的国家名酒多产于本区，主要有茅台酒（贵州）、五粮液（四川）剑南春（四川）、董酒（贵州）、泸州老窖（四川）、全兴大曲（四川）等。

“国酒”茅台历经两千年发展不衰，主要在于其地缘因素，拥有特殊的自然条件。在地质地貌方面，仁怀市茅台镇一带是7000多万年前形成的侏罗白垩系紫色砂页岩、砾岩；土壤受海拔高度和岩石风化后成土母质影响，土壤分布与地貌关系紧密，广泛发育的紫色土层，酸碱适度。土体中砂质、砾石含量高，渗水性良好。地面水、地下水通过两岸红层进入赤水河，溶解红层中多种有益于人体的微量元素，又经层层过滤，滤出

纯净香甜爽口的泉水。此外，茅台镇海拔400米的河谷地带的气候类型也有利酿酒业发展，这里冬暖夏热，风微雨少，形成相对封闭、有利于酿酒微生物生长的小环境。在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积累的酿酒技术和二千年传统工艺亦为重要因素。加之酿酒活动在此千百年传承不息，空气中有大批微生物群，并在茅台酒开放式发酵中被充分网罗到曲醅里，有利于酒的质地提升。

20世纪7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投资，在遵义市郊选定风水宝地，就近嫁接，以全套工艺"克隆"茅台酒，历经十年，收效甚微。这个教训也充分证明，茅台镇一带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是很难复制的，即便是离得很近。

（二）我国烟草种植、加工业布局重心逐渐西移至本区及其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联

西南地区卷烟工业在近十多年中发展迅速，2002年全区卷烟产量达991万箱，占全国的28.6%，其中，云南的卷烟产量即占全国五分之一；贵州卷烟工业发展亦快。我国烟草种植、加工业布局重心逐渐西移至本区，与滇黔2省部分地域（曲靖、玉溪地区；黔南等）的自然地理条件能够满足烟草生产中对生态环境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而烟草加工业布局西移，则是其接近原料地发展的结果。

第三节　种植业、养畜业和桑蚕、柑橘产区

西南地区农产品种类繁多，是中国主要农业区域。

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布有明显差异。四川盆地自然条件有利，开发利用较充分，物产富饶，是西南农业的精华所在。除此而外，在大面积的山地和高原区，基本上仍然是粗放经营，水土流失严重，对自然生态构成威胁。

一、经济作物地位上升，烟草、橡胶产业布局扩展

经济作物以烟草、油料、棉花、甘蔗和桑蚕茧等较重要。2002年全区烟叶产量达127万吨（其中烤烟占五分之四），已超过中南，居全国第1位。烟田主要分布于云、贵2省。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利于烟草生长，是我国烤烟主产区；油料作物中，以油菜籽为大宗，四川油菜籽产量高达145万吨（2002年），在全国各省（区）中居第3位。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和绵阳、乐山、南充、达县、内江等地区。

甘蔗种植主要分布于云南境内海拔14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那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甘蔗的生长和糖分积累，故产量较高。2002年云南甘蔗产量达1733万吨，仅次于广西，居全国第2位。

桑蚕茧是西南重要特产，全区产茧量为14.1万吨（2002年）。其中，70%出自四川，为全国桑蚕茧产量多的省（区）之一。在茶叶生产和加工方面，云南、四川2省每

年都出产数万吨茶叶。四川盆地边缘以及滇西、滇南地区均分布着大面积的茶园；水果产量也很大，四川是我国主要柑橘产区，2002 年产量达 166 万吨，占全国第 2 位。

滇南地处南回归线附近，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气温高，雨量丰沛，空气湿润，与同纬度的广东、广西热作地区相比，还有不受台风影响、寒潮不易侵入等优点，对橡胶种植甚为有利，现在橡胶林已成片分布，并扩大到北部一带地区，使云南橡胶生产的地理分布，打破了国际上公认的“植胶禁区”，已成功地将橡胶树北移至北纬 25 度、海拔 r200 米的地方种植，在橡胶种植上创纬度和海拔高度两项记录。此外，云南还出产紫胶、咖啡豆、胡椒、椰子、油棕、剑麻、香茅草和依兰香等。其中紫胶、咖啡豆、香茅草均为全国第 1 位，咖啡豆产量占我国内地 96%，香茅草占 66%。

二、中稻为主，薯类占先

粮食作物种植，在西南农业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2002 年全区粮食总产量 6772 万吨，其中四川省产粮 3132 万吨，在全国各省（区）中位居前列。

从粮食生产的部门结构看，以稻谷、薯类、小麦、玉米为大宗。

稻米为全区居民的主粮。川、滇、渝、黔的稻谷产量较大，占各自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在全国的地位则分别居第 3 位、第 11 位、第 13 位。由于生长季的差别，本区稻作农业不仅与华南差异大，也与华中、华东（杭州湾以南）有别，几乎全是中稻，只在低纬的滇南有少量早、晚稻种植。

薯类种植面积、总产均居全国之冠。红薯种植集中于川、渝；马铃薯种植则以黔、滇居多，因云贵高原气候和地理环境适宜，是我国南方最大的马铃薯生产基地。

从地域分布看，稻谷主要集中于四川盆地以及云贵两省的河谷坝子和山间小盆地。在四川盆地内，又以成都平原和岷江、嘉陵江、渠江的中、下游以及长江沿岸一带分布最集中；小麦种植，在四川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和沱江、涪江、渠江和嘉陵江流域，在云、贵则分布于滇中、滇东河谷和遵义、贵阳、安顺地区。

三、林业发展曾走入破坏生态的误区

西南地区林业资源丰富，但因开发利用方式不当而使资源受损，并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主要采用沿河漂流集材方式开发大渡河等流域的木材，造成资源浪费和水土流失；80 ~ 90 年代在修建一批铁路、公路后，国家和地方对本区森林资源开发强度过大，加之一些贫困地区又将砍伐木材外卖作为主要生计（即所谓“木头财政”），造成大面积资源破坏和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到华中、华东和华南。我国第一大河长江逐渐“黄河化”，泥沙主要来自西南地区。90 年代后期，当长江流域等地接连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后，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川、滇等省相继采取禁伐措施，并改变林业结构，以保护森林资源，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

西双版纳是地球北回归线近旁少有的热带雨林，物种资源极为丰富，但也受到毁林开荒等一系列不当开发的威胁。从20世纪末开始成为我国优先保护对象，并已设立保护区。

滇西北山区的野生红豆杉，是世界珍贵树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有上百万株野生红豆杉，因树皮被剥去提取制药原料而死亡，使生态系统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

四、牧业发展和布局特色

牧业产值大，是西南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其中四川牧业产值在全国各省（区）位居前列。

西南牧业生产同西北相比有自己的特色。西北草原辽阔，拥有大面积天然草场和纯牧区，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广阔场所，历来以游牧为主要特色，舍饲居次要地位；而西南虽然也有广阔草原（如西藏境内），但全区牧业生产以农区养畜业为主；牧区牧畜业居次要地位。

牲畜构成，西北地区以羊（大部分为绵羊）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为主；而西南地区则以猪为主。据2002年统计，四川省无论是肉猪出栏数（6203万头），还是年底猪的存栏头数（5376万头），均超过其他各省（区），居全国首位，民间曾有“川豬安天下”之说，说明四川豬业地位重要。此外，西南地区的牛和山羊饲养也很普遍。在藏北和川西北等牧区，还放养着大批绵羊、牦牛、犏牛、马等。

五、草原过牧与沙化危害

西南的部分地区(如川西草原、西藏邦达草原等)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已出现沙化危害或生态严重退化的趋势,已严重影响到部分地区的生态平衡,影响到附近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究其原因,主要是草原过牧、鼠害、病虫害和降水减少。上述生态环境的损害对本地区农牧业及整个经济发展与布局的影响值得引起足够的注意。

第四节　构筑出海和外运通道

一、从“茶马古道”到外运、出海通道

西南地区因其地形起伏大，高差悬殊，区内外交通受阻，以至于不少地区昔日只能依赖于马帮交通、牦牛交通，艰难地运送茶叶和其他物资。在滇藏川以及缅、印等国从

林中绵延盘旋的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也最遥远的物资交流和文化传播古道之一。自古以来，茶马古道作为大西南连接不同地域文化、打通中国对外途径的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由茶马古道维系的地域经济联系延续到近代，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大西南仍以交通闭塞而闻名。当时，西南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四川还没有一条铁路，只有云南、贵州各有一段里程短、轨距不一、通过能力低的铁路，更未形成现代交通网络。

50～70年代建成9条铁路干线，组成总长6000公里的铁道网；80～90年代同时修建铁路、高等级公路，大力发展民航、水运，为西南腹地发展市场经济构筑起至关重要的出海和外运通道。

至20世纪末，已初步形成由铁路干线组成的宝成、襄渝为主的“北通道”和贵昆、南昆、川黔、黔桂为主的“南通道”，主要承担外运、出海运输；21世纪初则是重点打通重庆与四川的“东通道”，新建遂宁—重庆—怀化、达县—万州、万州—枝城铁路，建设株洲—六盘水复线；同时开始修筑青藏铁路。此外，加大现有线路改造力度，主要是成昆线电气化改造以及使西部铁路电气化连片成网的扩能项目。

在高等级公路建设方面，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间，除以大城市为中心建设一系列高速公路以外，还建设了四川经贵州至广西北部湾之间的出海公路大通道，规划建设国际公路大通道。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西南地区还与境外各国加强了经贸与文化交往，并通过民航、公路、铁路和国际水运，开辟新的出海和外运通道。

二、铁路主通道

西南地区迄今已形成两条对外主通道，即以宝成、襄渝线为主的北通道；以湘黔、贵昆、南昆为主的南通道。此外，即将形成以渝怀、达万、万枝线为主的东通道。

由上述三条通道共同组成的铁路主通道，对加强西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及中部地区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加快对外开放和开发，促进经济发展与布局的展开十分有利。

（一）宝成线

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由宝鸡至成都，长671公里，20世纪50年代建成，70年代全线实现电气化，运量增大。到90年代，为适应运量增长之需增建“宝成复线”，客、货运能力增长1.4倍。宝成复线开通，使原本狭窄的西南地区北上铁路通道拓宽，为西南腹心地带通向西北、华北和中南的交通大动脉。

（二）成渝、川黔线

西南铁路网中最繁忙干线，地处全区腹心部位，分别由成都至重庆、綦江至贵阳，共长929公里，是区内成都、重庆2市以及川、黔2省之间经济联系主通道，并以此为轴线构成成渝经济走廊。它与成渝高速公路平行走向，还可与川江联运，对西南经济布局产生重要影响。成渝线年客运量达1800万人次，货运量600万吨。20世纪80年代中

期全线实现电气化后，货运量增至1300万吨以上。为适应客货运输增长需要，从21世纪初开始建设成渝铁路快速通道。

（三）襄渝线

西南路网东北翼主干线。由襄阳经安康至重庆，长840公里，1978年通车。是本区第一大城重庆以及川东地区同外界联系的主干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现电气化以后，运量有较大增长。

（四）黔桂、湘黔线；株六复线

西南路网东翼主干线，贵州与中南地区交通干道。分别由贵阳至柳州（长607公里）、贵定至株洲田心（长820公里），黔桂线还是西南通往出海口（广东湛江港、广西防城港）的重要通道。湘黔线完成电气化改造后运力有较大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支援开发西南，又将湘黔线向西延伸，经贵定至贵阳、六盘水市，均修筑复线，亦称株（洲）六（盘水）复线，并实现电气化。21世纪初贯通后成为支援“西部大开发”的主干线之一。

（五）贵昆线

西南路网中部东西向电气化干线。从贵阳至昆明，长635公里，是六盘水煤炭基地外运干道，也是六盘水同攀枝花实行“煤钢联营”的纽带。亦为滇、黔2省经济联系唯一铁路干线；它还同湘黔、浙赣、沪杭3条铁路几乎呈直道连通，共同组成我国南方最长的东西向横贯铁路，为上海和华东支援西南经济建设主要运输通道。电气化改造已完成，使全线通过能力增加。

（六）成昆、昆河线

西南路网西翼南北向干线。从成都至昆明，再到边贸重镇河口，共长1554公里。其中，成昆线是川滇两省间运输干道，对开发攀枝花市钢铁工业有重要意义；昆河线则对活跃滇南经济、促进边贸作用甚大。20世纪90年代，成昆铁路完成电气化改造，提高了运力。

（七）达成、达万、万宜线

西南北部新建东西向干线。其中，达成铁路长353公里，1996年建成，横贯四川盆地北部。从20世纪末开始，达成铁路的延长线——达万铁路（长162公里）于21世纪初建成，是连接三峡库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也是我国“十五”规划八纵八横主干线中重庆至上海沿江铁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万州至湖北宜昌的铁路（378公里）2003年开始兴建。万宜铁路也是沿（长）江铁路通道的重要路段，可转接长江航运或与长江并行的铁路，构成西南地区及川渝两地连接华中、华东及出海交通大动脉，也是支援三峡工程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对开发沿线资源，推动移民开发和三峡库区经营发展有利。

（八）南昆线

为支援老区建设和延伸产业布局而新建的国家一级干线。由南宁经贵州兴义云南曲

靖至昆明，并从兴义附近向北延伸至红果。全长858公里，是20世纪90年代作为国家重点工程而建，电气化线路，1997年通车，直通作为大西南主要出海口的广西三大深水港（防城、钦州、北海），共同构成当今西南地区最主要的出海通道和外运通道，年运能近期为1000万吨，远期3000万吨。南昆线建成后，已使西南地区陆路出海口运距大为缩短，市场半径延伸，运力增强，对推动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也是国家调整经济布局的重要步骤。

（九）内昆线

西南地区南北向的中央通道，运输地位重要。该线北起四川内江，向南经自贡、宜宾至云南的水富、贵州的梅花山至昆明，线路走势从四川盆地直上云贵高原，工程艰巨。全长872公里。南、北两段早已建成，新建中段（水富—梅花山）358公里，2002年全线开通运营。新建线路一次实现电气化，设计最大区段货流密度为每年1400万吨。内昆线全线开通弥补了金沙江以东的川黔滇接壤地区没有铁路干线的缺陷，对扩展和改善西南和全国铁路网布局、促进四川盆地及沿线中小城市外贸物资输出等均有重要价值。

（十）广大线、滇缅国际铁路（规划线）

西南地区铁路网向西延伸的新建干线。东起成昆铁路的广通站，西至大理市，全长206公里。1998年建成。从广大线向西延伸可至缅甸的铁路枢纽密支那，是历史上备受重视的滇缅铁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力图兴建而未果）。建成后可使西南地区路网与东南亚地区的路网相连，并成为我国进入印度洋的捷径。

（十一）遂渝线、渝怀线

西南与中南、华东地区之间的新通道。遂宁至重庆，经涪陵、黔江至湖南怀化，跨3省市，线路全长754公里，为一级干线，预留复线，一次建成电气化铁路。沿线是中国内陆目前铁路的空白区，建成后成为我国铁路网“八横”的组成部分。其中，遂渝线设计时速200公里，成为西部最快铁路；渝怀线则可使两地运距缩短300公里，并使川渝2省市至沿海的运输压力缓解，东接株六复线、浙赣线，西连成渝铁路快速通道，形成横贯东、中、西部的大能力通道，对促进“西部大开发”有利；也是川渝黔湘地区与中部和东部交流的又一条重要通道。

（十二）昆明—新加坡国际铁路（泛亚铁路）

由昆明经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至新加坡，全长5500公里，投资25亿美元，预计十年建成。是连接东南亚中南半岛与中国的国际铁路干线，2001年东盟正式批准建设，旨在帮助中南半岛相对落后国家，改善老、柬、越、缅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并对东亚经济区（含东亚、东南亚）以及相应的自由贸易区形成有利。

三、进藏铁路布局及选线方案比较

西藏面积占全国八分之一，且地处“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交通历来不便，进出西藏的大量客货运输主要依赖路途遥远而又艰险异常的公路，少量通过空

运，故有“出国容易进藏难”之说。长期不通铁路成为影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进藏铁路的勘测与选线及工程技术的前期准备已持续数十年，先后形成四个方案：

（一）青藏线

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一期西宁至格尔木早已建成。二期工程从青海格尔木市南山口起，越昆仑山，跨楚玛尔河五道梁，经二道沟、雁石坪，进入西藏后经安多、错那、桑雄、当雄宁中、德庆至拉萨，全长1110公里，唐古拉山垭口高5072米。投资194亿元。

（二）滇藏线

从云南大理经点苍山东麓、洱海西岸北行，跨澜沧江，穿梅里雪山入藏，再跨怒江，经久拉垭口，至林芝附近的中沙坝，再经米林、朗县、加查、桑日、扎囊、贡嘎至拉萨，全长1594公里。投资636亿元，

（三）川藏线

从川西都江堰站起，穿起邛崃山，经马尔康，甘孜人藏，再经昌都、波密、中沙坝接滇藏线。全长1927公里，投资768亿元。

（四）甘藏线

从甘肃永靖经广和、和政、临夏、合作、碌曲至青海久治，再经达日、四川石渠、青海玉树、杂多、西藏索县、那曲至拉萨。全长2126公里，投资638亿元。

以上各线比较，从距离、投资两大要素来看，以青藏、滇藏线两方案较短、较低，滇藏线方案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尤为有利，但前期准备不充分；而青藏线方案不仅距离最短、投资最省，且前期准备充分，但工程艰巨程度也最高，全线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段达960公里，而且有多年冻土地段600公里，是全世界目前穿越高原与高寒、缺氧及永久冻土带和多发性地震带的最长铁路。考虑到前期的科研、技术准备充分，我国现已基本掌握青藏高原多年生冻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解决了工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因此，最终选择是青藏线方案。

从2001年起，青藏线开工建设，预计至2006年通车。鉴于沿线地带自然条件险峻，生态环境脆弱，除采用高新技术以外，还兼有生态价值，沿线辟建野生动物通道33处，以有利于藏羚羊等多种野生动物正常生活迁徙，是国内第一条生态铁路。此外，对地震环境的充分了解和抗震技术的应用，也使铁路穿越多发性地震带成为可能。

四、公路“西南出海大通道”及国际通道

（一）高等级公路建设与布局概况

近十余年来，西南地区重视高等级公路建设，相继建成成（都）渝（重庆）、成（都）乐（山）、成（都）绵（阳）、成（都）灌（都江堰）、成（都）雅（安）、成都—

贵阳—南宁—北海、成（都）南（充）、渝合（川）、渝长（寿）、长涪（陵）、渝黔、内（江）宜（宾）、昆（明）曲（靖）、昆（明）玉（溪）、大（理）保（山）等高速公路以及贵阳—黄果树、贵阳—遵义、贵阳—新寨等高等级公路。其中，成渝高速公路全长340公里，1995年贯通，现已成为推动川渝经贸发展的“黄金通道”，沿线逐渐形成“川渝经济走廊”，对西南经济布局已产生重要影响。

（二）“西南公路出海大通道”

为适应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构筑公路“西南公路出海大通道”，即成都经隆昌、纳溪、贵州大方、贵阳、广西河池、南宁、北海。全长1709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015公里，一级路67公里，二级路627公里。2001年建成。它是国道主干线“两纵两横三个重要路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内地继京沈、京沪线之后建成的第三条具有区域经济通道意义的主干线。它的建成标志着西部高等级公路建设进人连接成网和发挥规模效益的新阶段。

（三）“国际大通道”公路

滇缅公路在抗战期间曾是中国与外界联系主通道，是当时运输战略物资的“最后一条陆路输血线”，1938年通车，1942年被日军切断以前是当时世界最繁忙的国际物流通道。

为适应与东南亚经贸联系以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需，从2002年起建设昆明至曼谷的国际大通道公路干线。

昆曼公路由云南经老挝至泰国首都，全长1748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由昆明经元江至磨憨口岸（688公里）以高速公路为主，2005年建成；在泰国境内曼谷至泰老边境（813公里）已建成高速公路；在老挝境内的247公里路段路况较差，分别由中泰两国及亚洲开发银行各自承接三分之一。该线建成后，还可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陆上通道连成一体。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陆运至曼谷通常只需三至五天（如绕道沿海港口运输则需一个月），经济效益明显。

大（理）保（山）高速公路2002年建成，这是我国在横断山脉区域建成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也是我国内陆地区通往东南亚国际大通道（上海—昆明—瑞丽）的重要路段。

（四）进藏公路

进入西藏的交通，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四条长途公路干线。其共同特点是地势崎岖，自然条件严酷，地质灾害频发，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经常破坏路基和桥梁，造成停运。

青藏公路（西宁—拉萨）长1943公里，海拔平均高4500米以上，是世界里程最长的高原公路。经多次整治、改建，实现路面全程沥青化，是唯一四季通车的进藏公路，担负80%以上进出藏物资货运量和90%的进出藏客运量。

滇藏公路路况较差，穿越高山峡谷，因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影响，降雨多，泥石流、塌方等常阻断交通；新藏公路则以自然条件严酷著称，路面最高处6700米，被称为

"生命禁区"。

川藏公路则因沿线地质、地貌状况过于复杂和特别险峻而使其通过能力有限，且路况差、事故多，经常需绕道运输，早已失去作为运输干道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期投资20亿元改建，至2000年完工后全线达到三级路标准，再度恢复其作为运输干道的地位。

此外，还建成了拉萨—日喀则、日喀则—江孜—亚东、那曲—狮泉河、拉萨—泽当、日喀则—定日、曲水—江孜、拉孜—普兰、那曲—昌都公路，中尼国际公路中国境内定日—友谊桥路段也已建成通车。

20世纪50~90年代西藏上述公路干线的建设，直接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型城镇，如青藏公路上的那曲；川藏公路上的昌都、八一镇；拉泽公路上的泽当；中尼公路上的樟木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以穿越西藏的5条国道干线为骨架，形成"三纵二横"、"六个通道"的公路主骨架。同时建设察隅、错那、亚东、聂拉木、普兰、什布奇六个向外通道。"三纵二横"覆盖西藏各主要经济区，既连通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新疆，又通过6个口岸构成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国际通道，这既是西藏也是西南地区乃至我国西部对南亚、中亚开发贸易流通的捷径。

五、从"驼峰航线"到现代航空运输

历史上西南地区航空运输长期落后，但在抗战期间曾发展迅速。1942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中美两国开辟著名的"驼峰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至云南的十多个机场，1942~1945年中美双方投入各种飞机2000架，飞行8万多架次。因航线沿途多高山，最高7600米，而当时飞机能飞3500米，只能在峡谷中穿行，故名驼峰航线；又因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空难频发，先后有600多架飞机失事，1500多名飞行员遇难，故称"死亡航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经贸和旅游业的发展，西南航空运输异军突起，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拉萨、攀枝花、松潘等地均建有重要机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始建于1938年，当时称"双桂寺机场"。1956年由空军专用改民航使用，1987年改称双流机场。20世纪80~90年代三度扩建，1995年更名为双流国际机场。2001年建成新航站楼，成为西南第一大空港，辟有90条国际国内航线，2002年开通的"成渝空中大巴"，旺季航班密度为每小时一班。2002年旅客吞吐754万人次，货邮20万吨，运输业务量居全国第6位，为中、西部地区第一大机场。预计2010年吞吐旅客1800万人次，货邮50万吨。

重庆因地势崎岖，原有机场较小，又无扩建余地，空运曾长期受限制。1990年择地建成并启用的江北机场（现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位于市区以北21公里处，至2002年辟有60条国际、国内航线。为适应直辖市空运增长之需，正在建设新航站区，2004年竣工后，年吞吐旅客700万人次，货邮18万吨，成为西部地区一流空港。

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是我国“门户机场”之一。昆明—曼谷、昆明—新加坡、昆明—吉隆坡、昆明—仰光、昆明—万象等国际航线均以此为起点。还辟有59条国内航线。

拉萨贡嘎机场建在雅鲁藏布江谷地，主跑道长达4公里，为世界海拔最高的现代化机场。辟有十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其中拉萨贡嘎机场至昌都邦达机场的航线，由于全程航行在海拔4400～5800米以上，是全球最难飞行的航线，使用专门设计建造的波音757飞行。以上航线的开辟和运营，使地处遥远的西藏同国内外的联系较为便利。

贵阳新机场建设年代新，为贵州民航枢纽。位于贵阳市郊龙镇堡镇，可供波音767、757等客机起降，年吞吐500万人次。该机场启用后不仅对贵州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也使西南航空网络布局大有改善。

西南地区干线航空网络已大体形成，正规划、建设支线机场，增辟支线航空线路，配备支线飞机，使包括西南、西北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逐步形成支线航空网络，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六、内河运输、出海通道及国际水运

西南地区内河航道里程1.4万公里，包含川江、乌江、嘉陵江、沱江、岷江以及金沙江和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

（一）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

地处偏僻的澜沧江—湄公河，过去未受重视，近年得到开发。这条一江连六国的著名河流，有“东方多瑙河”之誉。源于青海省扎曲，经中、老、缅、泰、柬、越，注入南海，长4880公里，在中国境内2161公里，主要航道从云南经缅、老至泰国金三角这一段。其中由云南省景洪港至老挝琅勃拉邦880公里航道一段自然与水文状况复杂，但经整治已达到6级航道标准。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进出口贸易及边贸的扩大，对水运需求增加，1998年我国西南水运开发集团的浅水船队在澜沧江一湄公河进行昼夜试航成功。

2001年，中老缅柬4国建立国际水运通道，并正式通航商船，沿岸有对外开放码头14个，即中国思茅、景洪、勐罕、关累，老挝班赛、班相果、孟莫、万巴伦、会晒、琅勃拉邦，缅甸万景、万崩，泰国清盛、清孔。其中，思茅港位于澜沧江中段的橄榄坝附近，是以货运为主、客运为辅的综合性国际港；景洪港是以客运为主、货运为辅的国际航运港口；关累是景洪港的一处重要码头，地处勐腊县关累镇中老缅三国交界附近。从关累港出发到金三角只需20小时，下游国家的热带水果、海鲜、矿产、橡胶、干胶片、木材和我国的温带水果、日用百货、小家电、机械等，多在关累港集散。我国内地出口到台湾的一些蔬菜也经转关累码头。预计至2010年，澜沧江—湄公河航道货运量可达150万吨，客运量40万人次。柬、越也将加入通航。

2001年中、老、缅、泰四国通航后，国际旅游航线也将开通。与此相适应，云南省国际水运客、货运量将大增。为此，将扩建思茅、景洪、关累等对外开放港口；还将扩建水富港，开通中越红河航运、中缅伊洛瓦底江水陆联运通道。上述航线开通后，不

仅有利于西南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如在云南择址建设出口加工基地），也将对我国在21世纪大量进口石油的安全运输有利。

（二）川江、嘉陵江航道

长江干流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段（俗称川江），是西南、中南、华东地区之间水运交通主动脉。从2003年起，当三峡水库蓄水至135米高程、回水达重庆涪陵以后，使昔日狭窄险急的川江航段形成“高峡出乎湖”景象，改善650公里航道。由于江面加宽，险滩消失，川江通航能力由以前1000吨级、每年1975万吨提高到3000吨级、每年5000万吨，相当于5条重庆至上海的铁路运力。因长江水运重载直达、航速提高等有利因素，水运成本可降低35%；为此，长江水运企业投入的客、货轮增至8000余艘。

鉴于地处三峡库区的老港口、老码头沉入水底，现已复建、新建一批港口码头，并使长江中上游的港口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长江上游最大中心城市和首要港口的重庆，新建3000吨级集装箱深水码头7个、滚装码头2个，水运业已具备竞争优势。位于重庆江北区的寸滩港，新建运能已超过九龙坡港而成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集装箱货运港口。

流经陕、甘、川、渝的嘉陵江，于重庆汇入长江，干流全长739公里，是国家规划的水运主通道，是我国内河主通道中第一条实施“全江渠化”开发的河流，投资254亿元，预计至2010年，嘉陵江渠化后，水流平缓，通航拖载量大，安全系数高，运输成本低，通讯及其他配置完善，达到4级通航标准的高等级航道。

（三）北盘江出海通道

贵州省北盘江主航道经过整治于2004年试航成功，标志着贯穿滇黔桂的航线全线贯通，由此出海，直通港澳等地。

第五节　区内差异与经济联系

一、区内差异，省域经济特征及发展前景

西南5个省、市、自治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原因主要是各自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开发、原有基础不同。西南地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如图表14－2所示。

（一）四川省

西部人口大省、经济强省。在西南5省（市、自治区）和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中，以四川省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该省地处西南腹地、长江上游，自然资源丰富，四川盆地自然条件优越，历史上开发早，经济发展有基础，劳动力充足，劳动技

能较高。

1997年川渝分治后，新的四川省面积、人口减少，经济总量下降，但仍是人口、资源、经济、科技大省。作为农业大省，有多种农产品位居全国前列，水能资源丰富，46种矿物资源保有储量较大。在工业方面，四川是我国西部工业较发达的省份，电子信息、机械、冶金、化工、建材、食品、丝绸等均有一定规模。旅游业发展快，现有国家、省级风景名胜区62个，九寨沟、黄龙寺、峨眉山—乐山大佛以及大足石刻、青城山、都江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全国旅游业发展的热点地区。

2003年全省GDP 5456亿元，居西部第1位、全国第10位。

图表14－2　西南地区各省（市、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表（2002年）

项目 区域	GDP		工业销售收入①（亿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经济全球化			新经济指数②	城市化			
	总值（亿元）	人均（元/人）			外贸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全球化水平指数		设市城市（个）	城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建制镇（个）	城市化水平③（%）
西南地区	10418	5153	5871	3287	0.0788	0.0219	0.0504	—	68	0.3	4054	—
重　庆	1971	6353	1236	461	0.0848	0.0220	0.0534	45.4	5	0.6	683	33.1
四　川	4875	5766	2662	1601	0.0757	0.0327	0.0542	43.7	32	0.7	1937	26.7
贵　州	1180	3140	708	431	0.0687	0.0060	0.0374	40.0	13	0.7	697	23.9
云　南	2232	5178	1253	738	0.0863	0.0151	0.0507	41.4	16	0.4	597	23.4
西　藏	160	5983	12	56	0.0672	—	0.0336	35.9	2	0.02	140	18.9

①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

②包括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活力与实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五类指标；

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2003》、《经济日报》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在交通方面，建筑出川铁路通道，8条出川公路通道；在支柱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方面，发展5个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机械制造业、建筑建材业、饮料食品业、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培育3个新的经济增长点：(1)以成都为中心，推动德阳、绵阳、内江、乐山等城市快速发展，逐步形成成都经济圈；(2)攀枝花至西昌沿线地带，加快资源开发，把攀西开发成为水电基地、钒钛钢铁基地和有色金属基地。并利用此地水、热资源丰富且地域结合良好，开发为高效农业基地；(3)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培植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全省一级中心城市发育较好，但二级中心城市发展滞后，并已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为此，应加快二级中心城市发展，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层面扩大和布局展开。

全省城市化进程滞后，2002年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预计至2010年基本形成如下格局：以成都为核心，发展成都平原城镇连绵区、攀西城镇发展区和川南城镇密集区，形成宝成、成昆、成达、成渝四条交通干线为轴线的城镇群体。全省城市化水平2005年达32%，2010年达38%以上。

本省发展的不利条件仍是人口包袱大，加之不少地方生态条件衰退，水土流失面积19万平方公里，岁人长江泥沙6亿吨。为此，从1998年起在全省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二）西藏自治区

西藏以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战略地位重要而著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只及四川的1%；经济规模小，地处边疆，地势高耸，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气候，生活条件差，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生态价值。

据最新调查，西藏江河水量位居全国第1位，水力资源全国第2位（仅次于四川）。地热、太阳能、风能有开发前景。其中，水力蕴藏量超过2亿千瓦，目前开发利用尚不足1‰；已发现的地热显示点有600处，拉萨以北的羊八井地热田，是我国内地上最早开发的湿蒸汽田，羊八井地热实验电站，是我国最大的地热电站；西藏高原上日照强，太阳辐射强，太阳能资源丰富，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日照时数可达3000～3200小时，每平方厘米土地受热量达190千卡以上，居世界前列。此外，铬铁矿、硼砂和铜矿在全国占重要地位。

由于印度洋暖湿气流沿河谷上溯等原因，生成了丰富的森林资源。有森林717万公顷，活立木蓄积20.8亿立方米，分别居全国务省区的第5位、第1位，是保存完好的天然植物宝库。

此外，西藏还有特殊的农牧业资源和诱人的旅游资源。这里历史久远，地形特别，被称为“世界第三极”，是开发国际探险、科考、旅游不可多得之地。

为改变西藏经济落后面貌，从1983年起，由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西藏建设，促进了西藏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藏加快能源、交通、通信发展。其中，能源建设仍以水电为主；火电、地热、太阳能、风能等多能互补；交通以进藏铁路和公路建设为主，重点是“三纵两横”、“六个通道”的公路主骨架，形成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网。准备已久的青藏铁路建设于21世纪初启动。

但是，高原生态环境脆弱，而且一旦遭受破坏很难恢复。为此，经济发展和布局必须格外注意这一特点，使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结合起来。

“十五”期间西藏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大力发展旅游业、藏医药业、高原特色生物（含林下资源）产业和绿色食（饮）品业、农牧产品加工业和民族手工业、矿业、建材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城镇建设与布局，“九五”确立了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城镇建设联合发展的思路，“十五”提出加快小城镇发展策略。已制定西藏城镇体系规划（2000～2020年），寻找适合西藏实际的城镇化道路，立足特殊的区域发展背景，合理调控区域城镇体系及其空间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和地方特色，结合地处高寒、藏传佛教的影响等，保护地域文化特色。以“一江三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流域中部地区为发展重点，实现西藏城镇合理的职能分工、规模扩展及空间布局。

在开放和开发策略方面，西藏开放的重点是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利用政策优势与资源优势，吸引我国内地经济实体与个人进藏办企业；对外开放则应大力开展边境贸易与边民互市贸易，扩大同邻国贸易额，并积极发展国际旅游。

鉴于西藏地域辽阔，差异大，根据区内自然、经济条件差异可划分4个经济区，明

确各自发展方向：(1) 中部经济区以发展农业为主，建立商品粮和副食品基地；(2) 西部经济区以边境口岸为窗口，开展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贸与旅游业，并逐步开发资源，发展盐化学工业；(3) 东部经济区重点对尼洋河流域和三江流域进行综合开发；(4) 北部经济区以发展牧业为主，建成山羊绒基地，发展畜产品加工等。

二、经济协作区

(一) 西南6省区市7方经济协作区

本区起初由川、云、贵3省和重庆市以及近邻广西组成，1984年称"西南4省区5方经济协调会"，所属地域称西南4省区5方经济协作区。1986年接纳西藏，1997年后改为"川滇黔桂藏渝蓉6省区市7方"，面积2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26.9%；人口2.42亿，占全国20%。区内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上有一定实力，为全国一级经济区网络。

本区作为开放的、松散型的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开展区域经济协作主要目标是：用十至二十年将大西南建成为既能独立存在，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能源基地、重工业基地、轻工业基地和林牧业基地。

本区拥有资源优势，区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业已形成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今后联合开发大西南提供了较好的协作环境。在资源方面，特别适宜发展热带作物；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丰富。滇黔2省的煤，探明储量201亿吨；云南磷矿探明22亿吨；广西右江沿岸的铝土矿已探明2.8亿吨；攀西地区已探明60多亿吨钒钛磁铁矿，加上六盘水地区丰富的炼焦煤资源，对发展冶金工业有利。广西、贵州锰的储量分别居全国第1位和第2位；广西平果铝土矿矿床集中，开采条件好，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大；铅、锌、锑、锡、铜等有色金属资源亦富；水力资源的丰富和集中程度更是世所罕见，总蕴藏量高达4.88亿千瓦，可开发的有2.48亿千瓦。

在此基础上，本区将联合开发和建设以贵州六盘水煤矿为中心的煤炭基地；新建一批重点水电站和火电厂（如已建成的四川二滩水电站、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一、二级高坝，在建广西的红水河龙滩水电站等），实现西电东送；联合发展橡胶生产，开发磷矿资源和发展磷化工；联合开发建设有色金属基地；整治长江上游、赤水河、澜沧江等省际、国际河流。

2002年在南宁举行的西南6省区市7方经济协调会第18次会议上，针对我国与东盟正在加快合作步伐的有利态势，呼吁"中国西南各省区市联合起来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二) 重庆经济协作区

本区在类型上属于城市经济协作区，从劳动地域分工的层次上看属于国家二级经济技术协作区网络。最初成立于1987年，至1996年发展到由川滇黔3省21个地市组成。重庆经济协作区主要以长江为纽带，依托各成员地市的区位或资源优势，推动经济联合

与协作。运用横向联合的手段，共同开发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联合改善交通、通讯条件，共同建立能源、原材料基地，培育市场体系，开展科技协作、行业专题协作和多种形式的企业联合。

第六节　主要城市与经济中心、开发区

一、城市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滞后

西南地区的设市城市至2002年底已增至68个，建制镇4054个。从全区来看，除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盆地）以外，城市数量较少，城市化进程较缓慢。

现有城市化水平很低，是西部也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区。省区城市化水平排序：重庆（33.1%）、四川（26.7%）、贵州（23.8%）、云南（23.4%）、西藏（18.9%）。全地区城市密度为3个/10万平方公里，仅高于西北地区，在全国6大地区中居第5位。

在现有68个设市城市中，按其城市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数分类，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有2个：重庆（424万）、成都（266万）；100万～200万人的特大城市2个：昆明（160万）、贵阳（137万）；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5个；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17个；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42个。全地区大、中、小城市结构比例为11.9∶4.7。

在西南地区城市发展中，一级中心城市发育较好，但二级中心城市发展普遍滞后，并且已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川、滇、黔三省表现均较明显。如四川省特大城市工业产值比重大，中小城市工业产值比重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边缘地区中小城市经济发展。

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位来看，西南地区68个市中，有中央直辖市1个（重庆）、副省级市1个（成都）、地级市29个（昆明、贵阳、拉萨等），县级市38个，部分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所增强，城市（包括建制镇）发展的活力也比以前有所增强，但仍很不够。

二、经济中心、增长中心、资源型城市

（一）重庆市

1. 曾是“陪都”，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作为中央直辖市，西部第一大城市和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是全国辖地面积最大、管辖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城市化水平不高，在全市3090万总人口中，主城6个区

的城镇人口223万人，而全市农村人口比重高达80%，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是仅有的。这意味着其广袤的地理空间与城市概念难于统一，也意味着它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城市化扩张过程。

重庆是我国历史名城，春秋战国时即为巴蜀名邑，抗日时期又成为中国的“陪都”和西南大后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此具备国际影响。20世纪40、50年代均为直辖市，后改省辖市，80年代为计划单列市。1997年设直辖市。

2. 地形崎岖，用地稀缺，城建布局过于密集。

重庆因长江而兴。主城挟两江（川江、嘉陵江）之利，三面环水，形似半岛，海拔160～1030米，层峦叠嶂，是一座高山河谷中的特大型城市。街道依山而建，层层分布，参差错落。故此，既是“山城”，又是“江城”。因地形崎岖，用地奇缺，城建布局过于密集，且形成单中心模式。受地形等诸因素制约，商务中心区（CBD）无法在地域上连续扩展，只能选择多中心扩散模式。除现有老中心解放碑地区以外，上清寺、北部新城将建成CBD的两个新中心。20世纪末始建的“北部新城”位于嘉陵江以北，包括商务区中心、行政区中心、中央金融区、领事馆区等功能分区。北部新城成为吸收国内外投资、拓展城市布局的热点区域。

重庆与三峡地区一水相连，山峦相接。三峡水利工程的兴建，在重庆至三峡大坝之间形成巨大库区，并由此而分出100多万移民。国家对这一带状地区投放数百亿资金，形成新的产业群，实现开发性移民。重庆的经济基础及其带动能力在三峡库区开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三峡库区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特大城市的有力支撑，这也是国家设立重庆直辖市的主要动因之一。

目前，重庆已成为我国西部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和外贸口岸，科技、文化、教育也有较强实力。2002年GDPI 971亿元。作为中国西部第一大工业基地，全市工业资产存量700多亿元。汽车摩托制造业为第一大产业，冶金、化工亦为支柱产业。

3. 开辟外运、出海新通道。

为改善重庆投资环境，增强对外辐射能力，近年新建全天候“江北国际机场”，建成珞璜等4个电厂，新建多条高速公路（成渝、渝长、渝黔、渝遂、渝合、长涪、上界等），并建设长江二桥、渝澳大桥和全国第一条城市高架轻轨道路。在对外交通方面，则致力于从铁路干线和高等级公路两方面开辟外运和出海“南通道”（55北部湾深水港），同时建造“东通道”（新建渝怀铁路至怀化，接株六复线、浙赣线；新建达万、万枝铁路至枝城转接各运输线）。此外，充分发挥重庆作为内陆口岸和沿江开放城市作用，把三峡库区至成渝高速公路一线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对内对外开发开放的走廊。

4. 城市布局难题，规划朝令夕改；立法根治规划黑洞。

重庆在发展与布局中遇到很多难题：（1）城市化指数低，大城市带大农村（含大面积贫困山区），负担过重；（2）作为老工业基地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国企比重高，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不合理，工业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3）规划滞后，管理不力，甚至朝令夕改，使城市建设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保护与发

展的矛盾突出，屡屡出现“建设性破坏”，有损于“山城”、“江城”形象。

2003年，斥巨资进行大手笔规划，指引重庆在主城区9.5平方公里土地上建设新的渝中半岛，并制定《关于渝中半岛城市形象设计方案》，对市区一个区域性的城市规划动用立法保护，在中国规划史上尚属首次。这里是重庆的主城核心区和都市风貌区，在如此大的区域内做城市设计，亦属罕见。

鉴于以往的教训，在土地奇缺的渝中半岛上，因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开发与人口聚集，形成“人库”（相对三峡“水库”而言），“钢筋混凝土森林”，“举目无青”，“危楼高百尺”。半岛高楼密度居全国第一，在建拟建还在增加，西部第一高楼也落户于此。高楼过密已引发一系列城市病，并使“热岛效应”极为明显。继续发展，这里的长江两岸将变成钢筋水泥铸造的大峡谷，城市魅力将不复存在。根据新的规划与城市设计，这里将改造、建设成为一个“两江交汇、楼阁错落”的高度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半岛，规划实施二十年。

重庆在建设具有山城、江城特色的现代城市中，要求城建布局依山就势，讲究层次，滨水而建者则讲究通透明快。“显山露水”，注重保护和美化城市天际线、水际线、主干线等景观。作为都市核心、山城形象集中体现的渝中区半岛部分，则对其整体形象规划设计，使之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与商业中心，其余主城各区按“多中心、组团式”规划布局，发挥各自特色。

根据推进城市发展的十年规划，重庆将建设以主城区为核心的五个层次城市群：(1）主城区建成500万人口以上的国际级大都市；(2）涪陵、万州、江津、合川，分别建成70万～100万人口的国内大城市；(3）永川、开县、长寿、南川、黔江，发展为20万～30万人的区域中心城市；(4）建设与合理布局20多个10万～15万人的县城和城关镇；(5）上百个1万～3万人的中心镇。

（二）成都市

西南地区第二大城市，我国内地重要的工业基地。地处成都平原中部，曾以农产富庶和蜀锦等手工业而闻名，并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工业经济总量占四川省的三分之一，GDP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4位。电子信息、机械、汽车、生物医药、食品、烟草被确定为主导产业。工业布局近年来有较大变化，东郊老工业基地实行搬迁改造，利用级差地租理论，对老基地企业分别予以搬迁改造、关闭破产或就地发展，腾出土地主要发展三产。

本市还是西南陆、空交通枢纽，有成渝、宝成、成昆等铁路及5条高速公路交汇于此；还可通过近年建成的西南出海大通道等公路干线直达出海口。在市区西南郊外的双流，建有西南地区运量最大的国际机场，客货运输繁忙。由于以上一系列交通设施的建设，使成都的区位竞争力增强。

1997年川渝分治以后，成都作为新四川省唯一特大城市，战略地位更为突出。其人口占全省的比重，由8.6%提高到11.8%，GNP比重由19.8%提高到27.2%，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从21.8%上升到30%；以成都为辐射中心的成都经济区，已成为四川实力最雄厚的经济区，经济总量占四川“半壁江山”。上述构成变化，将为成都开拓新的辐

射范围和发展空间。

在城市发展布局方面，按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在21世纪前20年，将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以中心城建设为重点，推动城建布局向东南方向发展与展开，加快城市化进程，将3260平方公里规划区建成结构合理的都市圈，并使之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撑点。

（三）昆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区重要的旅游、商贸中心城市。云南省省会。

地处云南中部滇池盆地之北，是一座风光明媚、气候宜人的高原城市。海拔1894米，气温常年平均为15℃，最冷月（1月）平均温7.8℃，最热月平均温20℃，四季常春，花开不断，故有"春城"之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业发展快，已成为国际旅游中心。至2010年昆明的国际旅游率可望达到20%。

作为西南第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业结构以卷烟、冶金、机械、纺织、化工为主，生产精密大型机床、仪表、钢铁、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和卷烟等；又是铁路交通枢纽和国际民航基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昆交会"）定期在此举行，已成为外贸基地。

根据《昆明市2010年总体规划》，其主城总体布局为"依山傍水、单核心一轴线组团型"；城市结构为"南北主轴，东西两翼，一主四副"，即城市东北西三面环山，南临滇池，二环路以内为单个主中心区，以东风路、北京路为两条轴线，金马寺、关上、马街、金刀营为四个副中心。在城市中心与副中心之间，以绿化、山林、河流等生态分割。

至2002年，进一步明确在二环路以内建筑物只拆不建，结合规划中新国际机场布局，规划设计40平方公里的新市区，形成主城新的发展空间。在昆明主城区以外，还将建成安宁、宜良、嵩明三个次级城市，使昆明的发展和城市布局形成主城—次级城市—卫星城镇的网络体系。

近年来，关于新昆明城市布局，是远离滇池还是环绕滇池来发展，引起争议。

（四）绵阳市

西部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彩色电视机专业化生产基地。位于川西北，城市早期开发得益于一批电子、轻工企业集中建设于此，20世纪60年代末初步形成大三线的军工基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成为四川第二大城市。

科技资源丰富，建有绵阳科技城，而绵阳又有"四川科技城"之称。20世纪80～90年代大力开发民用电子工业及家电生产，至1995年彩色电视机年产能力达到300万台，并形成以彩电为主导产业的现代经济结构。2001年GDP330亿元，仅次于重庆、成都，居西南地区第3位。

城市化地域面积约80平方公里，呈组团式布局。从2000年起，由于成都、绵阳、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使上述三地可望连成城市带。

（五）攀枝花市

西部的资源型城市和移民城市，地处川滇结合部。1964年前仅为金沙江畔一个小村，后因“三线”建设而兴起，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发初期称攀枝花特区，因保密缘故对外泛称“渡口”，曾制定《渡口城市总体规划》，后正式定名为四川省渡口市，并公开其地理位置及坐标体系。它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罕见的因受生产力布局中国防因素影响而长期没有专用名称的重要城市。现已发展成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大型冶金工业基地，铁路用钢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钒工业基地（有“中国钒都”之称）和钛原料生产基地。

市区及附近一带铁、煤、水力及亚热带林果资源丰富，钒、钛资源储量居全国之冠。已建成攀枝花钢铁公司、成昆铁路等。装机容量达330万千瓦的二滩水电站是我国已完全建成的第一大水电站。金沙江、安宁河流域的水热和土地资源开发潜力大。攀枝花市已建设成为国家开发攀西资源的战略据点和川西南及川滇接壤地带的经济中心城市。

因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加之金沙江河谷深切，垂直高差大，故工业用地城建用地均极为稀缺，主要企业（如攀钢）和街市建筑多浓缩分成很小的组团零星分布于金沙江北、南两岸及若干小支流的河谷阶地，且多采用竖向布局。市内最大企业攀钢有“象牙微雕钢城”之称，以形容其节省用地的程度及结构布局之精巧。

攀枝花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第一代工业城市格局，面临重新定位和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挑战。今后城市发展的核心在于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从企业化城市向社会化城市转变，从追求城市规模向注重城市品质的转变。

三、主要开发区

由于地处内陆深处，距海遥远，开放时间晚，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关于开放的观念有所扩大，对外开放的地域范围也由沿海到沿江、沿边、内陆城市，西南地区才开始举办各类开发区。

（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长江南岸，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已开发4平方公里。有127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入区内，投资额4.3亿美元。

为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2000年国家批准成都、贵阳、昆明3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

（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科技产业方面，由于西南地区的教育与科技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较大发展，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设立5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重庆2区于1991年经国家批准设立；昆明、贵阳、绵阳3区于1992年经国家批准设立。其中，成都高新区采用“一区多园”发展模式，除位于成都南部的集中新建区以外，还有成都高

新西区、出口加工区等，是四川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中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绵阳高新区则是西部最大的彩色电视机生产基地；贵阳新天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建设成为西部最大的新型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

（三）边境经济合作区

鉴于西南地区有漫长的边境线，且周边国家多，自制定沿边开放政策以来，相继开辟了3个国家级的边境经济合作区：畹町、瑞丽、河口，均系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其布局集中于云南省西南部和南部边境一带，与缅甸、越南交界处的中方一侧，主要原因是交通运输条件好，历史上边境贸易与边民互市贸易发展规模较大。

畹町边境经济合作区位于滇西，系中缅交通咽喉，区内经济发展贸、工、旅、农并重。

第十五章 西北地区经济

曾经孕育过灿烂古代文明的大西北，现在是人口稀疏、经济密度低的欠发达地区，但却具有很大开发潜力。该地区面积占全国32%，在六大地区中居首位；人口却只占全国7%，居末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31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外，本地区气候干旱，严重缺水，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然而，尽管有以上不利因素，西北地区仍是我国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从生态建设与保护来看，也只能在开发中结合进行。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与战略的调整，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才得以同步进行、加速进行。

第一节 “西部大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亦为生态环境脆弱之地

西北地区是我国土地最辽阔，生态环境脆弱，资源丰富，而开发利用程度迄今仍然较低的地区。

一、价值34万亿元的矿物财富

西北地区是我国矿物资源的巨大宝库。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西北地区范围内，其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高达33.7万亿元人民币，与其他地区相比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根据整个西北地区的资源赋存状况，并考虑到该地区现有产业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及其在布局等方面的特征，在西北地区可规划建设七大主要矿产资源开发区。

新疆的石油、煤、钾盐、铬铁矿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塔里木盆地经过十多年来面积广达56万平方公里地域的勘探，在盆地北部和腹地相继探明轮南、桑塔木、解放渠东、吉拉克、东河塘、牙哈、英买力、羊塔克、塔中、田河等11个大中型油气田；新近又探明克拉、迪耶、牙哈等大型天然气气田。据新一轮资源评估，塔里木盆地的石油蕴藏量为108亿吨，天然气蕴藏量83900亿立方米，油气资源总量达192亿吨，与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一起并列为中国油气资源大于100亿吨的三大盆地之一。

新疆罗布泊湖床，蕴藏着丰富的钾盐资源，探明储量1.74亿吨。据测算，罗布泊钾盐的潜在价值逾5000亿元，具备成为中国最大钾盐生产基地的资源潜力。钾盐在我国是极为紧缺的矿产资源，从21世纪初起，对罗布泊的大规模开发已经启动。

青海省已探明盐化工、石油与天然气、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共60种，有37种矿物名列全国前十位，其中居第一位的就有氯化钾、氯化镁、氯化锂、氯化钠、溴、化工灰岩、硅石、石棉等。察尔汗盐湖为我国最大的盐湖，面积1500平方公里，积存426亿吨氯化钠。还有大量的氯化镁、氯化钾，形成我国最大的可溶性钾镁矿床。一向有“聚宝盆”之称的柴达木盆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地处偏远而未得到大规模开发。90年代末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正建设成为天然气开采和外输源头以及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盐化工基地。

甘肃有10种矿藏探明储量居全国第1位：镍、铂、钯、锇、铱、钌、铑、硒、铸型粘土和重晶石；陕西和宁夏的煤、天然气、铼、制碱灰岩、黄金和石膏也具有重要开采价值。其中，地处陕北和内蒙接壤地区的神府东胜煤田、陕甘宁蒙接壤地区的长庆气田，分别是我国已探明的主要煤田和气田。上述丰富的矿物资源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得到开发，使大西北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提高。

二、水是开发利用大西北的关键

西北的气候是干旱少雨，多数地方水资源奇缺，土地面积占全国32%，而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5.8%。因此，水是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有水则有绿洲，无水则荒漠。而有些地方却又拥有相对丰富的水资源。在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阿尔泰山、祁连山、积石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地区，由于海拔高、气温低，降水多以降雪形式出现，日积月累，遂形成丰富的冰雪资源。据普查，我国冰川居亚洲之首，占亚洲冰川总量一半多，是世界中、低纬度地带冰川资源丰富的国家。全国共有冰川4.3万条，面积5.9万平方公里，储冰量5.2万亿立方米。冰川分布集中于西部地区，新疆、青海、甘肃合占一半以上。每年春暖以后，高山冰雪逐渐融化，汇成江河，为长江、黄河以及澜沧江提供源头之水，也为散布于西北各地的绿洲农业，提供了宝贵的灌溉用水，还为许多牧区牲畜提供饮水。

鉴于水是大西北生态环境的主导因素，对经济发展与布局以及城乡居民生活都关系重大。因此，有关水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应作为最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并特别注意节水，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建立“节水型经济体系”，进而构建节水型社会和符合市场规律的水价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及其结构调整、布局调整，均应“量水而行”。

三、黄河上的“水力富矿”

西北水力蕴藏较富。黄河干流蜿蜒流经青、甘、宁、陕4个省区，流程4000公里以上。沿途多峡谷，河床比降大，水流湍急，有许多适于建大、中型水电站的优良坝

址。从上到下依次有龙羊峡、李家峡、公伯峡、积石峡（以上属青海）、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小峡、大峡、乌金峡、小观音（以上届甘肃）、大柳树、青铜峡（以上属宁夏）、壶口、龙门（以上届陕西）等。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其中，黄河上游仅从龙羊峡到青铜峡之间的918公里河段，落差1324米，规划可建24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576万千瓦，年发电564亿千瓦时，还具有淹没土地少等有利因素，缺点是电源点多不在负荷中心。但因上述各峡大多位于我国几何中心地区，无论是距本区（西北）经济重心，还是距邻近省区都不很遥远，可采用高压输电技术将电力东送。

因此，这一带是对黄河流域进行梯级开发的理想地段，亦可发挥其他水利作用。对根治黄河、利用黄河，开发大西北，意义重大。

四、生态环境恶化，农牧业资源有待保护和适度利用

在历史上，至少是唐代以前，关中一带曾是森林茂密，水资源丰富，物产富饶之地。在汉唐兴盛时期，长安城人口近100万，为当时世界最大都会之一。后因人为因素，唐以后关中生态环境恶化，清以后更甚。

西北地域辽阔，可供利用的天然草场到近代仍有1.1亿公顷，在祁连山、天山、昆仑山麓还有不少湖?白，水草丰茂，既是牧场，又是珍禽异兽栖息之地，成为不可多得的自然财富。但在20世纪的后40年，在发展农牧业、工矿业、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建设和布局中，忽视了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致使整个西北地区相继出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有些地方达到极其脆弱的程度。

如新疆4800万公顷可利用的天然草场中，退化面积高达85%，且每年还以28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广袤的伊犁草原，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农业开发热，开垦草场种农作物，建设加工厂，开辟旅游景点。加之天然草场超载放牧，上述原因均造成草原严重退化，并导致毒草蔓延，乌头草盘踞之地已达30万公顷。

又如，主体部分位于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其生态环境原本脆弱，近几十年更呈加剧之势，“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牧越荒，越荒越牧”，形成恶性循环，并进而将其生态灾难扩展、蔓延至本地区东南部以及华北、东北等区域。

长江、黄河源头地区则是全国生态系统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因受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影响，致使江河源头地区雪线上移，冰川退缩，降水和径流量急剧减少，导致土地沙化、水土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全国第一大湖青海湖水位下降，湖面缩小，沼泽湿地萎缩退化；天山天池湖水下降，湖面萎缩；全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流域，则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开荒、堵坝取水等造成多年断流，下游320公里河道干涸，尾闾台特玛湖变成一片沙漠，成为罗布泊第二，并使塔克拉玛干、库姆塔格2大沙漠有合拢之势，亟待进行生态抢救；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干流821公里，中下游生态恶化，土地沙化，生态失衡，已危及西北、华北的生态安全。

西北冰雪资源最多的新疆，从 1964 年以来因气候变暖、人为活动加剧等而使冰川面积减少 20%，储冰量减 18%，山区雪线高度上升 60 米。

五、荒漠化危害严重

西北荒漠化面积很大，新疆即有 105 万平方公里，居各省区之首。每年因荒漠化危害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远超出西北五省区财政总收入。另外，青海湖环湖地区近三十年沙化面积一再扩大，已影响到该地区生态平衡，并给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已成为制约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应特别注意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除有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及保护残存的林地，治理内陆河以外，还应在一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尽量组织“人退”，以便最大限度减轻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继续造成损害，为生态环境的自然恢复创造条件。

六、经济布局应相对集中

对西北地区开发起限制作用的因素，除自然生态脆弱以外，还在于这里的大多数地方人口稀疏、经济密度低，且商品完成对外交易距离太长，无论是往东到太平洋沿岸，还是往西至地中海、大西洋沿岸，运输距离均在数千公里以上。此外，地区内各经济中心之间的交易的距离也很长，通常达数百公里，最长 1000 公里左右。上述情况造成本地区对内对外交易的成本都很高。

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主要组成区域的西北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布局中，应实行企业大规模的生产经营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相对集中，以提高产业集中度，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发展。目前西北地区规模经济发展方面比西南地区更为短缺。

另外，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地域的集中，也可减少对本已十分脆弱的一些生态敏感地区的继续破坏，对生态系统自然恢复有利。

七、重点加强勘探与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集中区

根据“十五”西部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实施“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西北地区重点加强下列矿产资源集中区的勘查与开发利用：(1) 塔里木能源资源集中区；(2) 黄河中游能源资源集中区；(3) 东天山北祁连有色贵金属及能源资源集中区；(4) 柴达木能源化工矿产资源集中区；(5) 秦岭中西段地区有色金属资源集中区。

第二节　特色农牧业经济

从现状来看，西北地区经济具有一定的农牧业特色，畜牧业、耕作业中的某些产品具有全国意义，如羊的头数、细羊毛产量、棉花产量、商品棉比例等。今后可在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利用区内自然条件中的有利因素而加以开发。

西北农、牧业生产，在地理分布上处于一种交错状态。东南部，包括黄土高原、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地在内，基本上是农业区；此外的辽阔地域，则大体是畜牧区。在牧区范围内，也有像银川平原、河西走廊以及兰州、西宁、乌鲁木齐、伊宁、阿克苏和喀什等农区或绿洲农业。同时，在农区和牧区之间，还分布着具有过渡性质的半农半牧区。

一、优质长绒棉商品基地

南疆的叶尔羌河、塔里木河流域，塔里木盆地边缘；北疆玛纳斯河流域，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适宜种植棉花（特别是长绒棉），是我国主要的长绒棉产区，地处塔里木河畔的阿拉尔市是全国最大的长绒棉繁育生产基地。1992 年，新疆棉田扩大到 64 万公顷，产棉 67 万吨，到 2001 年增至 113 万公顷、146 万吨，分别占全国 24%、27%，连续多年居全国第 1 位，成为全国最大的棉产区和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

以新疆为主，包括甘肃河西走廊在内的西北内陆棉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扩展和崛起，是我国植棉业利用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调整植棉布局，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布局重组，从而使棉花生产走向优质、高产、低成本以及商业化和基地化的缩影。

但是，新疆棉田扩展过快，棉区布局也有不合理之处，出现不少生态环境问题，从 2002 年开始适量缩小棉田面积，并对棉区布局进行调整，建立稳定高效优质棉区，退出低产风险棉区。

二、“面包小麦”

西北地区粮食作物中以小麦种植较普遍。冬小麦主要分布于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和陇东一带，春小麦则分布于河西走廊和新疆。从近期耕作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本区东部的关中、银川两块平原，中部的河西走廊，西部的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由于可耕地面积大，且平坦连片，易于机耕，一旦水源问题解决以后，即可适量种植小麦、稻米、棉花等粮食和经济作物，逐步开发成为全区的商品粮棉基地，为西部大开发出力。

在本区的新疆等地，气候和其他自然地理条件适宜种优质、专用小麦，其所处纬度与目前世界上优质小麦种植区域（美国北部、加拿大）相似。这种小麦的蛋白质含量高，加工出的面粉可专用于制作高档面包和蛋糕，故又称“面包小麦”。在 21 世纪前十

年内，新疆将成为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基地。

三、采用滴灌技术，开发节水农业

鉴于严重缺水、生态环境脆弱，西北地区农业发展开始改变传统灌溉模式。如采用滴溉技术，开发节水型农业等。

地处北疆玛拉斯河流域的石河子垦区，借鉴以色列节水农业模式，从1999年起大面积推行节水灌溉，采用在大田膜下滴灌的方式，并有效解决了降低滴灌器材价格、设备国产化、农作物种植过程机械化等问题。至2002年，已使农田大面积应用滴灌技术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鉴于我国水资源不足，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近十余年来，全国农业年均受旱面积达4亿亩，并有400个城市常年缺水。因此，石河子垦区发展节水灌溉并引发农业生产的变革，对改变我国传统农业用水方式、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改变传统农业结构，促进大西北以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利。

四、细毛羊基地和牧业生产条件衰退

西北牧业产值只占全国牧业总产值的4.7%，但区内拥有的大牲畜（牛、马、骡、驴、骆驼等）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人均大牲畜头数和羊只数均居全国第1位。绵羊存栏数、绵羊毛产量均居全国第1位。牲畜的良种化和牧业生产的机械化也得到相应发展。如青海湖牧区改良半细毛羊及羊毛产量所占比例均较高，新疆石河子建有全国最大的美利奴细毛羊繁育基地，伊犁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最适宜细毛羊饲养，新疆是我国细毛羊的故乡、全国细毛羊生产基地。

新疆细毛羊主要分布南、北疆6个地州的23个基地县，2003年末，细毛羊及其改良羊1210万只，细羊毛产量2.83万吨。

近几十年，新疆累计为本地和全国毛纺业提供优质细羊毛80多万吨，在细羊毛主产区，细羊毛收入占牧业收入二分之一，但近十年来细毛羊产业滑坡（产量减少、品质退化），使优势产业陷于困境。其原因主要是原始的生产管理方式等。

由于人口增长、过度放牧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如滥垦、棉粮种植扩展过度、盗伐林木、偷猎野生动物、挖药材、搂发菜等）的影响，造成草原退化，载畜能力降低。与此同时，沙化与荒漠化面积扩大，进而对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威胁。

牧业生产条件衰退，迫使牧业发展必须调整规模、结构与布局。农业（如植棉）的规模也不宜过大，现有棉、粮种植区域及布局也应适当缩小或调整。

五、水源涵养，三江源生态保护，塔里木河生态治理

地处青藏高原的“三江源”是我国及东南亚主要江河的共同源头，江河支流很多，湿地资源最富。但因地势高、气候寒冷，生态系统脆弱。这里曾经是水草丰美、湖泊众多、野生动植物种群繁多的高原草甸区。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和人为破坏，使江河湖泊和湿地迅速萎缩，风沙危害加剧，水质也在下降。为保护生态，从2001年起，“三江源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分布于黄河、长江、澜沧江源头地区的天然林资源正在得到保护，以使该地区继续作为我国主要江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另外，青海三江源地区及六州牧区实施包括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牧草种子基地建设、天然草原围栏保护建设等在内的草原生态建设工程。

此外，2002年启动的“长江黄河源头地区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工程”，用五年完成，实施范围包括位于江河源头的26.4万平方公里地域，使其水土流失面积中的60%以上得到有效治理，控制人为水土流失面积增加。

为拯救塔里木河，从2001年起投资107亿元对这条新疆的“母亲河”进行全面的生态治理，以确保其下游有足够水源，挽救残存的胡杨林，并栽种新的防沙林带，在快要合拢的塔、库两大沙漠之间形成绿色的隔离带。

第三节　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开发初具规模

西北地区境内拥有发展工业的雄厚资源条件，但却未能实现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从2001年起，西北工业结构正在作重大调整，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

一、“西气东输”最大源头，陆地石油战略接替区

西北地区境内有丰富的天然气、煤，较多的石油、水能资源。

天然气开发因长期未受重视而规模很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较大规模。陕甘宁蒙接壤地区的长庆气田是我国陆地最大的整装气田之一，远景储量4.2万亿立方米，至2003年底，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11143亿立方米。首期开发在1998年建成陕京、靖西输气管线及年产能力3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净化厂，分别向北京、西安、银川供气，2002年开始向天津供气，2004年开始向上海供气。

新疆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总量8.3万亿立方米，至2003年探明地质储量6579亿立方米，轮南至上海的输气管线，到2003年已建成靖边—上海段，2004年建成轮南—靖边段。供气量2004年28亿立方米，2007年增至120亿立方米。成为全国性的天然气

生产、外输基地。

青海柴达木盆地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3500亿立方米，至2005年可形成年产气50亿立方米生产能力。亦为西北地区天然气生产、外输基地。主要通过2002年建成的涩宁兰输气管道外输。

在石油工业方面，本地区境内的主要油田有新疆的克拉玛依油田、塔里木油田、吐哈油田、陕甘宁长庆油田、陕北延长油矿、甘肃玉门油田、青海油田等。新疆三大盆地石油资源约210亿吨，探明地质储量27亿吨，占全国12%，2002年产原油2030万吨，石油工业已占新疆工业增加值60%，目前新疆已成为我国陆上石油的战略接替区，预计至2010年成为中国陆地第一大原油产区。包括陕北、陇东在内的鄂尔多斯盆地，是全国重要的综合性矿物能源基地，原油储量13亿吨，天然气逾1万亿立方米。陕北位于盆地中心地带，面积8万平方公里，占盆地32%，石油产量占85%，天然气产量占92%。近年发现的陇东西峰油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部，区位条件良好，但以上油气田地质构造复杂，开发难度大，普遍呈现“低渗、低压、低产”特征。

近年陕西产油迅速增多，2002年1064万吨，上升至全国第7位。因油气资源地理分布主要集中于鄂尔多斯盆地陕北斜坡，故采油作业主要分布于长庆油田与延长油矿。地处延长县西门外的“延一井”于1907年开钻成功，是中国内地第一口油井。长庆油田2004年产原油800万吨、天然气70亿立方米，已向京、津、沪、西安、石家庄、银川等大中城市输气。

1970年以前，延长油矿独家对陕北地区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并统一管理油气资源；1971年陕甘宁石油会战开始，长庆石油勘探局进人陕北。至2003年，在陕北8万平方公里“资源面积”中拥有“登记面积”6.6万平方公里，延长油矿拥有“登记面积”1.1万平方公里。20世纪90年代资源登记中曾出现纠纷。1994年长庆油田划出500平方公里交安塞等6县开发，并在志丹、永宁之间划出一块作为延长油矿的风险勘探区。但上述划分因四界不清而引发资源纠纷。加之，近年因民间采油和土法炼油发展过快，布局混乱，而且低层次、掠夺式开发，造成资源极大浪费，2002～2003年实施整顿，有偿收回油井权益，陕北石油开采布局有所改变。

西北石油加工业已形成较大规模，有兰州、克拉玛依、独山子、乌鲁木齐、庆阳、玉门、格尔木等大小炼油厂，除向区内外供应成品油以外，正加快发展石油、天然气下游产品加工业。

二、“西煤东运”、“西电东送”重要基地

西北地区的地理、地质条件，使得多种资源（煤、水力、天然气、风等）均较丰富，且均可转化为电力。

已开发的煤田主要位于陕西、宁夏和甘肃境内。位于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的神府东胜煤田已探明含煤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储量2236亿吨（其中三分之二在陕北神木府谷，多为优质动力煤，地表以下1500米以内探明储量1339亿吨），占全国五分之一，

且地质构造简单，煤层倾角小，赋存稳定，属低灰分低磷硫，中高发热量，高挥发性煤。

神华集团的神府东胜矿区在1985～2003年先后建矿十多处，其中4对矿井年产煤均超过1000万吨，3对矿井年产煤均超过850万吨；人均产煤是全国煤炭企业平均水平的33倍。神华集团2003年产煤1.02亿吨，销售1.01亿吨，成为我国第一家煤炭亿吨企业，在世界最大煤炭企业中列第5位。

地处神东煤田的大柳塔矿，年产能力1500万吨，是当前我国采掘技术和全员工效最高的煤矿。由于实施矿井大型化和高度集中生产，对矿区和井田跨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建成世界一流煤炭基地。

为配合煤炭外运，由神木至包头、神木至河北黄骅港的铁路已建成，为西煤东运开辟新的出海通道。

宁夏贺兰山煤田以煤质好著称，素有“贺兰山宝疙瘩”之称。已探明地质储量308亿吨，居全国第5位。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在贺兰山麓先后开发了石炭井、汝箕沟、呼鲁斯太3个矿区，现有6对矿井，年产能力600万吨。以出产优质“太西无烟煤”和主焦煤为特色。还建有焦煤、无烟煤两个中心洗煤厂，总洗选能力每年560万吨。无烟煤主供首钢、鞍钢、武钢、宝钢高炉喷吹及烧结，并出口西欧、日本；焦原煤包括气、肥、焦、瘦4个煤种，主供酒钢、八一钢厂、包钢等用户。

地处陇东的甘肃华亭矿区，由华亭、安新、赤诚3块煤田组成，煤田总面积134平方公里，地质储量34亿吨，煤质优良，低硫低磷发热量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发成为我国重点新建煤矿，2003年“华亭煤业”年产能力达1200万吨。

电力工业水、火并重，发展迅速。至2002年，西北地区发电量1189亿千瓦时，成为我国重要的电能基地。在水电方面，地处甘肃永靖的刘家峡水电站，装机容量116万千瓦，年发电57亿千瓦时，是西北最大水电站之一。此外，甘肃还有盐锅峡、八盘峡等水电站，合计全省水电在我国北方各省区中居第2位。以上水电站和西固火电厂等共同构成兰州电网。

西北黄河干流上的梯级开发仍在进行。青海黄河河段，西起龙羊峡，东至寺沟峡，长276公里，落差达到865米，每年过境水流量230亿立方米，可建13座大中型水电站。其中，龙羊峡水电站已建成发电，电站装机容量128万千瓦，年均发电60亿千瓦时；而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李家峡水电站，装机容量为160万千瓦，是黄河上游目前规模最大、装备最现代化的水电站，也已于1999年建成。至2000年，青海水电在我国北方各省中上升至首位。2001年开工建设的公伯峡水电站（150万千瓦），是“西电东送”北通道的主要电源点之一，2004年并网发电。

随着“西部大开发”进行，黄河龙羊峡至寺沟峡段水电资源开发步伐加快，预计至2015年黄河上游规划中的多数大中型水电站建成，构成西北地区最大的水电走廊，成为西电东送重要源头。

火力发电方面，区域性火电站主要有陕西坝桥电厂、户县电厂、韩城二电（240万千瓦）、蒲城电厂（126万千瓦）、宝鸡二电（凤翔，120万千瓦）、府谷电厂；甘肃兰州

热电、玉门热电、平凉电厂（120万千瓦）、靖远电厂（80万千瓦）；宁夏大坝电厂、石嘴山电厂以及新疆的苇湖梁火电厂等。

地处宁夏青铜峡市黄河西岸的大坝电厂，设计规模360万千瓦；陕西府谷电厂装机300万千瓦，均为西北地区最大火电项目之一。韩城二电厂一期安装2台60万千瓦燃煤机组，是西北地区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站。

上述水、火电厂建成后，西北电网输变电线路形成330千伏东西贯通，110千伏南北展开的网络格局，实现西电东送。对推动西北地区内外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

三、以镍、铜、铝、铅、锌为主的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基地

甘肃是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产地，在探明有色金属、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基础上，对国家急需的铜、镍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冶炼。

地处河西走廊东翼的金川，拥有世界著名的特大型多金属共生硫化镍矿床，有镍、铜、钴、金、银、铂、钯、锇、铑、钌、硫等18种矿物。其中镍储量仅次于加拿大的萨德伯里矿，居世界第2位，铜储量居全国第2位。20世纪60年代投入开发，1978年被列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3大基地之一。近十多年来，解决了生产技术难题，有色金属产量大增。公司所在地金昌已建设成为一个新工业城市，并有“中国镍城”之称，亦称“东方镍都”。镍、钴产量分别占全国88%、9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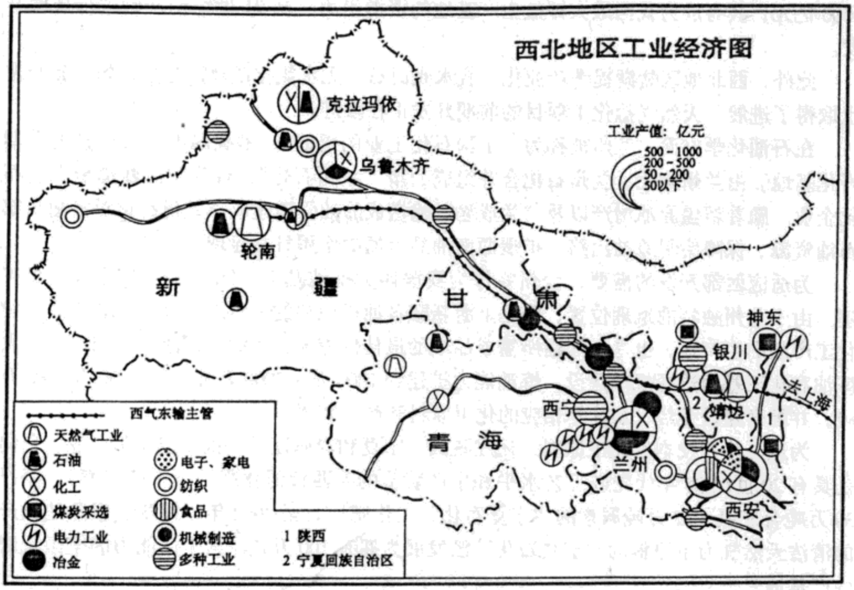
“十五”期间，以扩大铜的生产能力为主，调整产品结构，金川公司正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色金属及无机化工特大型联合企业和国家级镍钴铂族金属技术中心。预计至2005年，镍、铜、钴、贵金属、无机化工产品年产分别达到5.5万吨、10万吨、2000吨、1500千克、60万吨。

地处兰州东北70公里处的白银市，是西北地区典型的矿业城市，依矿设企，因企立市。20世纪50年代在此建设大铜矿，后又建铜加工厂，成为全国铜基地，曾经号称“中国铜城”。90年代开始，铜等资源枯竭，调整产业结构，至1996年完成由单一的铜硫生产向铜、铝、铅、锌、金、银、硫综合发展的转变，2003年白银公司的有色金属综合加工能力达30多万吨，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

西北地区工业经济图，如图表15－1所示。

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中的锡铁山，是铅锌矿的主要产地。这一地区的铅锌矿还伴生有金、银、锡、锑、钼等13种元素。部分矿石品位较高可直接冶炼。锡铁山铅锌矿已于1988年全部建成。设计年采选矿石100万吨，是我国第二大铅锌矿。由于它的建成，使全国铅锌工业布局发生重要变化。另外，金属镁生产基地在青海省民和县境内建成。

西北铝厂建设较普遍，已建成宁夏青铜峡铝厂、甘肃兰州铝厂、连城铝厂和青海铝厂等。其中，兰州铝厂的综合生产能力至2002年达30万吨，2005年可增至50万吨电解铝；青铜峡铝厂建于1964年，20世纪90年代三期扩建工程完成后，电解铝规模增加到10万吨。现正扩建为年产22万吨电解铝的大型铝冶炼企业。青海铝厂一期、二期均已建成，该厂位于西宁市大通县境内，年产铝锭20万吨。2000年西北地区产铝77万



图表 15－1

吨，占全国26%，居第2位。西北铝的产量大，但铝加工不发达，尤其是深加工需要发展。

西北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经过20世纪50～80年代的开发建设，已初具规模，布局上也有特色。从青海龙羊峡经甘肃到宁夏青铜峡的黄河上游近1000公里河段，已建设成为电解铝、铜、铅锌、金属硅、稀土金属的生产和出口基地，被称为“中国有色金属长廊”。此长廊地带山峦重叠、金属矿床和水能资源形成有利结合。自20世纪50年代末刘家峡电站建设拉开序幕，至80年代已建成四个梯级电站，并相继建成兰州铝厂、青海铝厂、青铜峡铝厂、民和镁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西北铜冶炼厂、甘肃稀土公司等30多家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和矿山。至21世纪初，在黄河上游有色金属走廊地带出现了更多梯级电站，同时有色金属采选冶炼业亦有长足发展。

四、盐湖化工与石油化学

在丰富的盐湖资源基础上，青海、新疆的盐化学工业正在迅速发展。利用青海察尔汗盐池钾盐资源为原料生产的钾肥，产量居全国第1位，作为“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的青海100万吨钾肥生产基地已经建成。

新疆罗布泊钾盐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1.74亿吨，罗布泊钾盐的潜在价值超过

5000亿元，具有成为我国最大钾盐生产基地的资源潜力，从21世纪初开始进行规模开发。

此外，西北地区盐湖提锂产业化、脱水光卤石、无水氯化镁及镁合金系列产品开发也取得了进展。天然气盐化工项目的前期开发正在推进。

在石油化学方面，兰州被称为“中国石化工业的摇篮”，是我国第一批建设的大型石化基地。由兰州炼化、兰州石化合并组成的新“兰州石化”，现为我国西部最大的石化企业。随着新疆原油增产以及“兰成渝”输送成品油管道建成，兰州石化对平衡西部石油资源、保障新疆原油出路、扩展西南油品市场的作用日益显现。

为适应西部开发的需要，兰州将作为我国四大炼油基地、四大化工基地进一步扩建。由于兰州独特的地理位置，既是上游新疆各油田原油的消费地，又是西北成品油和化工产品的生产地，也是大西南所需成品油的最佳供应地。为此，国家对兰州作为四大炼油和化工基地进行规模建设，炼油能力扩建到1000万~2000万吨、乙烯60万~80万吨，并配套建设芳烃、ABS等相应的化工原料和产品装置。

为进一步开发本区化工原料，还在陕西、宁夏和青海建设一批大型化工企业。它们是具有20世纪90年代先进工艺水平和生产装备的陕西渭河化肥厂（主产尿素），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宁夏石化”二化肥厂。至2002年，以陕甘宁盆地出产的清洁天然气为主原料的“宁夏石化”已发展为拥有100万吨尿素生产能力的全国化肥生产基地之一。

在新疆已形成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独山子、库尔勒、泽普、哈密等石化基地。独山子石化以其技术基础及区位特征，还将改造为加工哈萨克斯坦含硫原油的1000万吨级炼油基地和100万吨级乙烯基地；乌鲁木齐石化建设成为化肥基地和100万吨级芳烃及化纤原料基地；克拉玛依石化建成西部最大的高等级沥青、高档环烷基润滑油生产基地，主要加工新疆稠油，年加工能力500万吨的扩建工程正在进行；塔里木石化建设成年产合成氨45万吨、尿素80万吨的大型化肥基地，充分发挥其天然气资源优势。

此外，还将在新疆鄯善、准噶尔盆地漠北油田、塔里木油田建设天然气液化厂，至2008年日处理能力达1200万立方米，成为全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南疆库尔勒市发展天然气精细化工产业，以天然气制乙炔和甲醇为基础，形成以精细化工为主的产品链。

五、其他工业基地

纺织工业是最大的轻工部门，其发展建立在本地区自产较多的棉花、羊毛的基础上。其中，陕西关中平原是传统的棉花产区；新疆出产的长绒棉纤维长，拉力强，光泽好，是我国生产高档纺织品的重要原料，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新疆成为我国最大的商品棉基地。新疆、青海、甘肃的羊毛资源也较丰富。青海牧区藏系羊所产“西宁毛”是编织地毯上佳原料。而新疆细毛羊的饲养规模、羊毛综合品质均居全国首位。

20世纪50年代在关中棉区的西安、咸阳建设了一批大型棉纺织厂和印染厂。以

后，宝鸡、兰州、银川、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也相继发展成为地区性的棉纺工业中心。80～90年代新疆棉纺织发展快，至2000年棉纺锭增至300万锭，成为西北最大棉纺织工业基地，取代陕西在西北地区纺织业中的“龙头”地位。以新疆、陕西为主的西北棉纺织在整体上超过了西南、东北地区。另外，毛纺织业在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石河子、伊宁、银川、天水、咸阳迅速发展起来。

机械制造和装备工业在西安等地有较大发展。西安已发展成为高中压输变电成套设备、飞机及航空发动机、重型货车、彩色显像管、工业缝纫机、大型工业风机等的制造装备基地。其他机械工业中心还有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勘探机械等）、咸阳（彩色显像管）、阎良（飞机设计制造）等。

六、主要产业群体及其地理分布

西北地区有着辽阔的荒漠地带，加之经济发展落后，故有“中国经济的荒原”之称。近年来，由于国家发展战略和重点逐渐西移，加上西北各省区对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新思考与调整，使西北经济发展与布局也开始形成一些颇具规模的组合。

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源、冶金、石化、机械、军工、轻纺等部门的发展，到21世纪初已形成六个初具规模的产业群体，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1）以兰州、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为中心的石油化工产业带；（2）以兰州为中心，西宁、银川为两翼的黄河上游资源开发带和有色冶金工业群；（3）以阎良、宝鸡、兰州、咸阳为联结点的飞机制造、机械、军工、电子产业群；（4）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为核心的棉纺、毛纺、化纤产业群；（5）以塔里木、准噶尔、吐哈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为主的油气勘探、开采工业，以神东、靖边、轮南等为主的大型现代化煤炭、天然气开采工业及集、输设施；（6）以黄河上游河段为轴线的水力发电走廊，以府谷、大坝、石嘴山等为主的火力发电工业群，以龙羊峡至青铜峡带状地域的电力和铝、铜等产业互相结合而成的有色金属长廊。

第四节　延伸西北通道

一、从古代“丝绸之路”到现在的西北大通道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延伸西北通道已成为国家交通网建设和布局的重要任务之一。

西北地域辽阔，国土占全国三分之一，同国内7省（直辖市）和国外8个国家相邻，有漫长边界线。古代即已开通的“丝绸之路”（长安一君士但丁堡）曾是中国最著

名的对外贸易通道。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因战乱、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西北地区交通运输落后。20世纪50年代初以前，全区范围内只有一段不长的铁路，公路和航空线也少，而且所有运输设施都十分陈旧，运输线路时通时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交通已有较大发展，以兰州、西安、乌鲁木齐为中心的陆、空交通网正在形成。但从整体看，西北交通网络密度低、质量差的状况并未完全改变。

近年随着我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和交流不断加强，古“丝路”焕发新生。继陇海、兰新铁路干线技改并提速之后，另一条大体平行的高等级公路国道主干线（连云港—霍尔果斯）也已贯通，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业已形成，并经中亚、欧洲直通大西洋，构成对亚欧大陆经贸活动发挥巨大作用的“新亚欧大陆桥”。总计新丝路新建3500公里，扩建5500公里，投资约150亿美元。

二、铁路网骨架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同时又是资源丰富之地，加快铁路建设对开发资源，带动经济发展和布局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西北区铁路营业里程已达9857公里，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0多倍。但铁路密度仍然很小，在每1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仅有0.33公里，尚不及东北区铁路密度的六分之一，在全国各大区中居末位。

本区现有兰新、包兰、宝中、西陇海4条主干线，其他铁路干线有：兰青、宝成、阳安铁路，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和近二十年来建成的包神（包头—神木）、神黄（神木—黄骅）以及南疆、北疆铁路，还有在建的神（木）延（安）、青藏（格尔木—拉萨段）铁路。

（一）陇海线

由连云港经西安至兰州，长1754公里，近一半里程在本区。宝鸡以东一段早就筑成，宝鸡至天水段于1945年筑成，工程标准低，经整修，于1950～1952年再建成天（水）兰（州）段。至此，前后建了半个世纪的陇海铁路全线贯通。为适应西部大开发需要，从2000年开始，在宝鸡至兰州段增建二线。为国家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2004年竣工后输送能力由日发客车16对、年运量1300万吨提高至日发客车45对、年运量4500万吨，成为大西北与内地铁路干线中运量最大的通道之一。

（二）兰新线

由兰州经武威、嘉峪关、哈密至乌鲁木齐，长1904公里，是我国第二条长距离铁路干线。由于跨黄河，穿越乌鞘岭、天山和戈壁沙漠，工程艰巨，故历时十年（1952～1962年）才通车。

以上2条干线相连，横贯华东、中南和大西北，并同津沪、京广、焦枝、同蒲、宝成、包兰、兰青和北疆、南疆铁路连接，是本区向东至出海口、向西直通中亚和欧洲市场的交通捷径，也是同国内主要城市经济联系的主干道，货运量大，主要有新疆石油、

石油制品及经由大陆桥进入国内的哈萨克原油等；其他货物有金属矿物、棉花、牲畜、皮毛、粮食、机器设备等。兰新铁路设计年通过能力最初仅为500万吨，20世纪80年代末提高到1200万吨。90年代从连云港至新疆阿拉山口的“亚欧大陆桥”开通以后，重要性进一步增强，2003～2005年兰州至武威增建二线，年运量增至2800万吨。

（三）包兰线

从包头沿黄河经银川至兰州，长990公里，20世纪50年代筑成。它的中段和南段贯穿于本区境内，途经银川平原及宁夏、甘肃两省区的能源开发（水电、采煤）和主要工矿区（石嘴山、白银、兰州），故运量大，主要运输货物有煤、有色金属矿物、钢铁、机器设备和皮毛。电气化工程于90年代完成后，提高运力。

（四）兰青线

从兰州至西宁，长216公里，1960年筑成。东与陇海、兰新、包兰铁路相连，西同青藏铁路相接，是甘青2省经济联系大动脉。全线技改与提速工程已于2003年完成，在西北路网中起重要作用。

（五）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东段从西宁至格尔木，全长815公里。全线在青藏高原上，为世界上海拔较高的铁路。1984年运营。

青藏铁路西段因沿线地形极为崎岖，筑路技术难度过大，投资过多而长期未建，至20世纪末开始进行勘测设计。

在基本掌握青藏高原多年生冻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成功解决了工程中关键技术问题后，2001年起修建青藏铁路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18公里，途经唐古拉山垭高5072米，投资194亿元，是全世界目前穿越高原和高寒、缺氧及连续性永久冻土地带的最长铁路。预计2007年竣工通车。

（六）南疆铁路、中吉乌国际铁路

南疆铁路东起吐鲁番，西至喀什，横贯整个南疆，长1446公里。1999年全线建成通车。设计运输能力为1000万吨。对开发塔里木油、气资源，促进南疆发展有重要意义。从路网布局看，则对我国延伸西北通道，促进西部大开发有利。

由南疆铁路向西进一步延伸至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吉乌国际铁路，可行性研究于1999年完成，该铁路地处我国西部边陲至中亚，东起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全长577公里（中国段166公里），预计2010年建成，年货运量达2000万吨。

（七）北疆铁路

从乌鲁木齐经昌吉、石河子、乌苏到阿拉山口，全长470公里，20世纪90年代初通车。与陇海、兰新两大干线连通，横贯中国，并同哈萨克斯坦铁路相连，成为第三条亚欧大陆桥。连接中国连云港与荷兰鹿特丹港，1994年起运行国际列车。运输货物除经由大陆桥的过境集装箱货物以外，则以哈萨克原油和日用百货为大宗。

(八) 阳安电气化铁路

由阳平关经汉中至安康，长 357 公里，1969 ~ 1972 年建成，为电气化铁路，贯通陕南交通的主干道，通车后促进了对汉中盆地和整个陕南的开发。

(九) 宝中电气化铁路

由宝鸡经千阳、陇县及甘肃华亭、平凉、宁夏固原、同心至中卫。为陕西至宁夏铁路运输捷径。长 172 公里，是煤炭外运线。

(十) 神朔铁路

西起陕西神木县大柳塔，东至山西朔州市境，长 270 公里，是我国西煤东运第二条铁路大通道（神木一黄骅铁路）的西段，为神府煤田的煤炭外运主干线，是我国继大(同)秦（皇岛）铁路建成之后而修建的第二条重载铁路，开行重载单元列车。1989 年开工建设，1996 年建成单线，年运量 3000 万吨；2002 年建成复线，年运量 1 亿吨，与朔黄铁路连通后已成为我国西煤东运又一条大通道。

(十一) 西包铁路、西康铁路

西包铁路南起西安，北至包头。其中西安至延安段（亦称西延铁路，长 334 公里）和包头至神木（亦称包神铁路，长 173 公里）已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分别建成通车。从 1998 年开始修筑延安至神木的铁路（亦称神延铁路，长 386 公里）；西康铁路北起西安新丰镇编组站，穿越秦岭，南至安康，长 268 公里。2000 年建成，为一级电气化铁路，预留双线，年输送货物 2000 万吨。是我国西北、华北地区人川和连接大西南的新通道。

西包、西康铁路形成纵贯陕西全省和西北地区东翼的铁路通道，使富饶的关中平原以及作为能源宝库的陕北高原和水热资源结合良好的陕南秦巴山地连成一体，成为维系陕西经济发展的纽带。同时也使北起包头，中经西安、重庆，南达湛江的我国西部地区，最终形成平行于京广、京九线的又一条南北大通道，对改善全国路网布局，加速西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 西安—南京铁路

全长 1027 公里，1999 年开始建设西安至合肥段 955 公里。是我国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地区至大西北的捷径，运输距离大为缩短，对支援西部大开发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全国铁路八纵八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我国路网布局有重要意义。

西北地区在上述各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形成了兰州、西安、宝鸡、乌鲁木齐、安康等铁路枢纽，其中以兰州枢纽规模最大。

三、大区域公路枢纽建设

由于本区铁路密度小，因此在离铁路干线较远的地方（如陕北、青海、新疆大部分地区），经济联系主要依靠公路进行。

从长远来看，由于区内地域十分辽阔，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高，运量有限，修

建铁路投资大，经济效益小，而建筑公路较为经济合理，故公路通车里程增长较快。全区公路已达13万公里，比20世纪50年代初增长10倍多。

区内主要公路干线有青藏、新藏和星霍公路等。青藏公路从西宁经茶卡、香日德、格尔木至拉萨，长2100公里，20世纪50年代前期建成，运输繁忙，是内地进藏物资的主要运输线路；星霍公路东起新甘边界的星星峡，经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乌苏至中国、哈萨克斯坦边界的霍城，长1463公里，是横贯北疆重要交通线，对北疆各地的经济交流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高等级公路建设在西北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陕甘新等省（区）建设高等级公路干线，如西（安）铜（川）一级公路，渭（南）潼（关）、西（安）蓝（田）、西（安）阎（良）、铜（川）黄（陵）高速公路、兰州—白银、兰州—定西、兰州—临洮、兰州—海石湾、大通—西宁、乌鲁木齐—奎屯、小草湖—托克逊高速公路、吐鲁番—乌鲁木齐—大黄山高等级公路等。

从2002年起建设的黄延高速公路（黄陵—延安）是西北地区首次按BTO方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投资建设的高速公路；榆林—靖边高速公路则是中国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

“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提出后，西北公路建设加快进行。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正建设成为全国性或大区域公路交通枢纽。至21世纪初，西安即拥有8条国道主干线辐射全国，并由此确立在全国公路网中的“中心枢纽”地位。

四、国家与地方共同进行机场布局规划建设

幅员广大的西北，物流主要靠公路、铁路，但客运和部分货物运输则较多地依赖航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本区同各地经济、文化联系加强及旅游业发展，开辟了很多民航线路。

2000年开始，为适应西部大开发需要，国家与地方共同进行机场布局的规划建设，积极发展支线运输。规划建设支线机场，尽快建立起西部支线机场网络，根据市场需求增辟航空线路，配备支线飞机。

西北各省（区）以新疆民航发展最快。这与新疆幅员辽阔和运距长有重要关系。在当前我国公路、铁路、航空之间为争取客户而展开的“运输大战”中，通常运距在1500公里以上时，民航才具有竞争优势，而涉及新疆航空线的平均运距在3000公里以上，全国最长的10条航线中有6条涉及新疆。

目前，覆盖新疆的国际、国内航线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几条增至21世纪初的53条，形成“向东辐射，向西、北和西南开窗”的空运网络。相继建成（扩建、复建）1个国际机场、12个支线机场，民航线总长11万公里，飞行范围拓展至国内6大经济区的40多个城市以及6个国家的10个城市；自治区内支线航空的规模居全国首位。

西北地区现有西安、乌鲁木齐、兰州、银川、西宁、敦煌、安康、格尔木、汉中、嘉峪关、延安、榆林、阿克苏、阿勒泰、和田、喀什、库尔勒、且末、塔城、伊宁、克

拉玛依等民航机场，基本上形成了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为中心，以乌市、兰州、银川、西宁等省会城市为干线，以旅游城市（敦煌等）和其他支线为补充的地区机场格局。

随着西部大开发推进，“十五”期间西北地区航空运输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增长。其中新建6个机场。全地区全天候通航能力也由50%提高到80%。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是西北地区航空枢纽，1991年投入运营以来开辟70多条航线通往国内外70多个城市。该机场二期扩建2003年完成后，年吞吐旅客900万人次、货物13万吨；乌鲁木齐地窝铺机场则是我国5大门户机场之一，已开通国际、国内航线50多条；1997年建成通航的银川河东机场和西宁曹家堡机场，结束了宁夏、青海两省区缺少现代化民航机场的状况。2002年启用的新敦煌机场，已开通了至北京、上海等地的直飞航线。

五、新建大口径长输管道

西北管道运输发展较早，始建于1958年的克拉玛依—独山子输油管为全国第一线，但以后西北管道运输发展迟缓。至20世纪90年代又获迅速发展，主要管道运输干线有：克拉玛依—独山子、塔中—轮南、轮南—库尔勒、鄯善—乌鲁木齐、库尔勒—鄯善、陕西靖边—北京陕西靖边—宁夏银川、青海南八仙—甘肃敦煌、格尔木—拉萨等。其中陕京（靖边—北京）输气管道全长860公里，年输气量50亿立方米。2001年建成的青海涩北—西宁—兰州输气管道，全长930公里，年输天然气20亿立方米，主要担负向西宁、兰州及附近地区的工业、居民用户供应清洁能源。

从2002年开始建设的轮南—上海输气管道，跨越新、甘、宁、陕、晋、豫、皖、苏、沪9省（区）市，全长4000公里，其中在西北地区境内约占三分之二，2003年建成靖边—上海段，2004年建成轮南—靖边段，实现全线贯通，是我国运距最长、管径最大的管运干线。至2007年输气120亿立方米。

第五节　区内差异与经济联系

一、区内差异及其特征

西北5省区之间，在许多方面（土地面积、人口、人口密度、工业发展水平、外贸、利用外资、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但在某些方面（如人均GDP值）则差别较小。造成差异大的原因，主要是各自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历史发展等因素不同。如新疆、青海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加上许多地方海拔高，气候寒冷，或者虽海拔较低，却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经济开发条件相对较差。至于人均产值差别较小，主要是

一些产值小的省区（如青海、宁夏）因人口较少的缘故。

20世纪80～90年代，西北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后，国家从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实施产业政策向西倾斜战略，加之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西北地区发挥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加快，如新疆通过实施“东联西出”战略而受益，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不少经济指标在西北地区已位居前列。

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如图表15－2所示：

图表15－2　西北地区各省（市、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差异情况表（2002年）

项目 \ 区域	GDP 总值（亿元）	GDP 人均（元/人）	工业销售收入①（亿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经济全球化 外贸依存度	经济全球化 外资依存度	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水平指数	新经济指数②	城市化 设市城市（个）	城市化 城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城市化 建制镇（个）	城市化 城市化水平③（%）
西北地区	5466	5895	3780	1552	0.1152	0.0184	0.0668	—	58	0.2	1813	—
陕　西	2036	5523	1442	509	0.1129	0.0403	0.0766	48.2	13	0.6	930	32.3
甘　肃	1161	4493	914	359	0.0741	0.0113	0.0427	39.8	14	0.3	460	24.0
青　海	341	6424	221	66	0.0558	0.0190	0.0374	42.9	3	0.04	115	34.8
宁　夏	330	5764	297	93	0.1229	0.0105	0.0667	44.5	6	1.2	78	32.4
新　疆	1598	8390	906	525	0.1594	0.0143	0.0869	39.7	22	0.1	230	33.8

①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②包括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活动与实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五类指标；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2003》、《经济日报》等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二、省域经济特征及其比较优势

（一）陕西省

中国文化资源大省，大型能源接续基地，西部新兴工业基地，科研教育中心。

在西北5省区中，以陕西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主要因为该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心地带，具有承东启西、连贯南北的区位条件，而且在历史上开发最早，先后有14个王朝在此建都，曾在长时期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内地重点建设地区，形成以机械、军工、纺织、电子为主的区域工业体系，科研与教育也有较大发展。但在80～90年代，由于地处内陆深处等因素的限制，使陕西经济在向开放型和市场化转变中落后，同沿海省的差距拉大。

在资源方面，陕西的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并重。省境（尤其是北部、中部）煤炭、天然气、石油蕴藏丰富，煤的储量居全国第3位，其中渭北、黄龙、神府三大煤田储量即达3765亿吨，有利于建设商品煤外运基地和电力外输基地。陕北油气资源亦很可观，榆林市被称为“天然气之都”，拥有大型天然气田、世界级煤田。其中天然气探明储量逾7000亿立方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陕北成为投资热点区域，至21世纪初，榆林能源重化工

基地已初具规模。从2003年起，加快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围绕“三个转化”（煤向电力转化，煤向载能工业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形成新的产业链。

陕西的文物与名胜古迹众多，有“天然历史博物馆”之称，对发展访古旅游十分有利，并可与国际经贸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智力资源也较为雄厚，高等院校多，科研机构多，军工企业与大中型企业也较多，加工能力强，是国家航天、航空、兵器、机械、电子、仪器仪表、农业等方面科研生产基地；在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高效节能等高新技术领域具有一定实力。

从20世纪末开始，在高新技术领域重点推进信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和新医药等。信息产业已成为优势产业之一，对全省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20%；全省有科研机构107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1个。是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

鉴于陕西在地理位置上的特点：省境南北纵贯874公里，东西宽约500公里，东连江淮河海大平原，西接蒙新青藏大高原，居间过渡的区位特征，使之东西并收、南北兼容，我国水热条件的多种类型，在本省几乎都有显著表现，造成浓缩而又复杂的生态环境，大部分地区生态脆弱，呈恶化趋势，并且是经济发展落后的主因。

为此，陕西应在维护生态、调整农林牧业结构、着力建设区域生态农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发挥其在能源、科技、加工业和旅游诸方面的优势。

在西部大开发中，陕西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围绕依托科技教育、机电工业、能源矿产和旅游资源的存量优势，从振兴装备工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扩大旅游业，开发建设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等四个方面展开。

在地域布局上，重点是“一线两带”建设。即以西安为中心，以陇海铁路陕西段和宝潼高速公路为轴线，将关中地区4个国家级开发区、3个省级开发区和几十个产业园与科技园串起来，使之成为具有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星火产业开发带。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北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区，亦为全国幅员最辽阔省区。土地面积为宁夏的24倍多。这里地处偏远，但在整个亚洲来说，却处于中央部位，与东、南、西、北、中亚的8个国家相邻，陆、空交通地位重要，是西部对外开放的前沿；加上资源丰富，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和能源供应基地；并是47个民族聚居地，人文资源丰硕。由于上述因素起作用，近年来经济实力增强，人均GDP、农牧业产值、城市化水平、设市城市数量等指标居西北第一位，而GDP总值、工业产值、外贸金额等指标居西北第2位。新疆棉花在总产、人均占有量、外销商品棉等方面均已上升到占全国首位。近年牧业发展快，并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石油与天然气蕴藏量分别占全国陆上油、气资源蕴藏总量的28%、33%，石油、化工现已成为新疆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和主导产业。至2002年，新疆石油、石化工业的增加值已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60%；因其纬度位置、气候和地理环境适宜种植优质、专用小麦，正在发展成为我国“面包小麦”的生产基地。羊、马、驴、奶牛的存栏数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3位、第4位、第2位，绵羊数居第1位。新疆的细毛羊、良种马、哈密瓜和吐鲁番葡萄，在国内外市场闻名遐迩。

但新疆资源与区位优势尚待进一步发挥。而且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在某些方面更显

严峻，如冰川退缩，雪线上升。1964年以来，由于气候变暖、人为活动加剧等因素影响，使冰川面积减少20%，冰储量减18%，山区永久性雪线高度上升60米；同时，新疆的荒漠化每年以35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塔、库2大沙漠以合围之势威胁剩余的绿洲。以上这些成为影响新疆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为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从2000年起，新疆全面启动六项生态工程：(1)塔里木河中下游治理；(2)塔里木盆地南缘、准噶尔盆地南缘沙漠化治理；(3)艾比湖生态保护；(4)全区天然林保护；(5)退耕还林还草300万亩以上；(6)乌鲁木齐城市环境综合治理。

在地域协作方面，鉴于新疆地域辽阔，而且呈纬向横亘于中部、高耸险峻的天山山脉，把新疆分为南疆、北疆两大区域，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条件差异大，故本身就有地域协作需要；区外协作方面，1995年后新疆加速与内地省区联系协作，进一步开放一大批优势资源市场，通过实施"东联西出"战略，借陇海、兰新和北疆铁路开通国际列车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之便，实现以开发促开放的贸易兴边战略。"九五"以来又抓住国家赋予西部倾斜政策的机遇，依托新亚欧大陆桥优势，吸引各省区投资，集中应用于陆桥经济区域，全面构筑投资重心沿陆桥分布的新的产业布局。其中"中国新疆北坡经济带"是新疆工业化的先导区，包括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为轴心的准噶尔盆地南缘，天山北坡中段，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的通达中亚的流通大通道和产业经济带。土地占新疆的5%，工业产值65%以上。

第六节　主要城市与经济中心、开发区

一、城市化进展缓慢，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滞后

至2002年底，西北地区设市城市增至58个，建制镇1813个。市镇数在全国各大区中居末位，城市化进程较缓慢。现有城市化水平在全国仍是较低的。全区城市密度（2市/10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六大区中居末位。

在现有58个市中，按市区非农业人口数分类，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有1个：西安（266万）；100万～200万人的特大城市有2个：乌鲁木齐（171万）、兰州（158万）；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3个：西宁、银川、咸阳、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15个；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37个。全地区大中小城市的结构比为1:2.5:6.2，尚未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

在西北地区城市经济增长中，除部分省会城市（或自治区首府）发育较好以外，其他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滞后。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位来看，全区58个市中，有1

个副省级市（西安）、27个地级市（兰州、乌鲁木齐、西宁、银川等），31个县级市。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之内。

西北地区城市化进展缓慢，主要表现在：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不多，且功能不全；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过少，且地理分布过疏；数万人口的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数量也较少。以上问题已影响到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调整，还影响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

二、生态脆弱地区的城市化

鉴于地理与生态特征，应优先在自然和交通条件较好地方发展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人口扩张，以有利于城市功能提升；避免在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地方建设城镇，更不宜遍地开花发展小城镇。还可考虑对沙化和生态脆弱地区农牧民实行逐渐迁移与城镇建设、城市人口扩张相结合的政策，既有利于生态自然恢复，又可推动农（牧）村城镇化进程。

但是，在生态脆弱地区推动城市化进程应格外谨慎。目前，西北地区有些绿洲已被迅速膨胀的城市所覆盖，这些地方的城市发展和布局必须注意不能阻隔水系，不能有损于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平衡。在实现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自始至终将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置于首位。

三、主要中心城市

（一）西安市

世界历史文化古都，中国西北地区最大中心城市，旅游、商贸和高新技术发展基地。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前进基地。

1.3100年历史、文化积淀。

西安有3100年建城史、1200年建都史，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这里曾创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辉煌，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拥有秦兵马俑、明城墙、周秦汉唐四大遗址等文物古迹和秦岭北麓、渭河平原等独特的自然风貌，旅游资源具有密度大、保存好、级别高的特点。从国际比较而言，西安与雅典、开罗、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是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城市。

为有效保护人类的共同财富，已出台《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对明城、唐城、周秦汉唐遗址保护均作出明确规定。包括古城墙以内区域的建筑高度实行分区控制，整体建筑控制高度不超过36米；钟楼至东、西、南、北城楼划定文物古迹通视走廊，并对位于通视走廊内的建筑高度严格限定。2002年又提出近期在西安南郊建设行政中心新城区，将行政机关从旧明城墙内迁出，并将旧城内人口向外疏散，实现“重心”南移；远期向西发展。

2. 三次城市总体规划及其发展态势与空间格局。

1953～1972年《规划》确定东、西郊工业区，南郊文化区等的发展方向；1980～2000年《规划》突出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1995～2010年的第三次总体规划提出建成外向型城市、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在上述规划期间，西安已建成一定工业基础，是我国航空航天、输变电设备、电子、仪器仪表、飞机制造、纺织、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基地，形成科技人才优势，市内有大学37所、国家级科研院所133个、重点实验测试中心75个，专业技术人员40万人，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各大城市第3位，而国防科技则居首位。近年来西安开始发挥作为西北最大中心城市的作用，东联西出，加快了发展步伐。外资投入亦有增长，已有2200多家外企进入西安。

3．问题与教训。

中心城区出现功能叠加，“外溢发展”，各功能争夺城市空间资源，发展无序；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受到威胁，城市特色消减；城市综合竞争力低，空间结构复杂，不利于产业升级；重大基础设施未起新增长点的作用；历史上的东、西两市繁荣景象不复存在，“关中八景”、“八水绕长安”等景象也难觅踪影；缺水、大气污染重。

4．西咸一体化，“大西安”空间格局。

西安、咸阳两个重要城市的中心相距仅25公里，两市的相似性与关联度甚高，且长期彼此隶属或对等而设，在城市布局上则常常是背靠背反向推进。尽管如此，由于两市距离太近而不可避免地发展到街市相连。但受阻于行政藩篱，很多可以联合发展双赢的事都只能各自为政，事倍功半。新近对关中经济区的规划将实现西咸一体化。一体化主要指经济、城建、环保、文教、旅游等，并非一定要两市合并。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在中国经济区域网络中是二级增长极，是陇海兰新经济带上的最大经济增长点，按新规划将形成东到临潼、西到咸阳、南止长安、北抵三原的“大西安”空间格局。近期拉大城市骨架，优化布局结构，发展外围新区，降低中心密度，保护古城风貌，建立新城，形成“一城五轴八条生态带”的中心城市布局。具体布局是西接咸阳，东连临潼，南拓长安，行政外移。城市发展方向主要向南，在韦曲至秦岭北麓范围内形成四个城镇轴发展；远期考虑将西安与咸阳形成一体化大都市。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加快关中“一线两带”及周边城镇群发展。

在西部大开发中，西安正依托其区位优势，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处于“米”字形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立体交通之中心点，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中枢。因此有利之区位，使西安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带生产要素的聚集点，有利于资源的大范围整合及资本的大范围流动。

（二）兰州市

我国西部工业基地，西北第二大城市，甘肃省省会。位居中国陆地地理中心（东乡）的近旁，地理位置显要。自古以来，这里为中原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要冲。兰州火车站现为西北区最大的铁路枢纽，横贯西北的陇海、兰新铁路在此相接。此外，兰青、包兰铁路亦交汇于此。

近半个世纪以来，工业发展和布局已形成较大规模，是西北最大的炼油和石油化工基地，亦为冶金工业中心，并是全国著名的石油机械、石油化工机械生产基地。市内沿

黄河河谷建有一系列大、中型企业，“十五”期间（2001～2005年）实施12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等项目，促进石化、有色金属、机械装备、建材等传统产业升级，并实施50多个高新项目，加强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新材料和绿色食品等新的主导产业。

城建布局受自然地理条件约束，是我国唯一跨黄河而建街市的大城市。市区东西长40多公里，南北狭窄处仅2公里。环境质量亦受此影响，加之常受沙尘暴袭击，大气污染较重。近年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继2万公顷南、北两山造林工程之后，又在建设40万公顷生态防护林工程，并建设全长40公里的黄河风情旅游线。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兰州市重视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调整全市经济结构，发挥“丝绸之路”等因素优势，促使兰州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交通通信枢纽和经济、科教、商贸中心。

（三）乌鲁木齐市

中国西部国际大通道中心城市，西北地区新兴的综合性工业与边贸城市，新疆自治区首府。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边缘。居民包括维吾尔、回、哈萨克、汉等38个民族155万人。市内工业发展迅速，主要工业部门有：石化、纺织等。交通地位重要，处于亚欧大陆桥国际大通道中枢地位；乌鲁木齐地窝铺国际机场是中国西部的门户机场。

从乌市往西，沿铁路、高速公路贯连的昌吉、石河子、独山子、奎屯、乌苏、克拉玛依等一系列新兴城镇，初步形成城镇体系，构成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经济核心区）的主轴。

因受地貌、工业结构与布局等因素影响，乌鲁木齐成为重污染城市。近年重视发展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乌鲁木齐已被国家确定为清洁能源示范城市。拟实施“导风洁乌”工程，根据乌市自然地形，配合工程措施，使东南风局部改变方向吹向正北，稀释污染空气，改善城市大气环境。

四、主要开发区

由于距海遥远，开放时间较晚，故西北地区境内带有经济特区性质的各类开发区迟迟没有设立。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观念的拓展，开放的地域范围也由沿海到沿江、沿边到内陆城市，西北地区方才得到较多的开放与开发之惠。

（一）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1997年设立。由国务院19个部委和陕西省联合主办。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域范围包括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咸阳市西翼、渭河北岸，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由科学园区、产业园区、国际合作园区、现代农业综合园区、试验推广基地等5个功能区组成。至2002年，已有人区企业459家，注册资金30多亿元，初步形成了以生物技术、节水灌溉、农业环保、农产品深加工、生物制药等为特色的产业格局，并已开发成为中国主要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和农业科技研究开发的聚集与

福射源。

（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北地区范围内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有4个。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已有2.5平方公里土地得到开发。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3年成立，2000年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总规划面积23.5平方公里，至2002年已引进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项目279项，外资12.6亿美元，已形成机械、电子、轻工食品、生物制药、新材料为支柱的产业结构。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

（三）边境经济合作区

鉴于西北地区有漫长的边境线，且周边国家较多，自从制定沿边开放的政策以后，相继在本区范围内开辟了3个国家级的边境经济合作区：伊宁、博乐、塔城，均系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但其布局集中于新疆的西北部边境一带，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中方一侧，主要原因是交通运输条件较好，这一带边境有多条铁路、公路干线联系两国边境地区，中、哈两国边境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多年来一直很活跃，贸易金额也相当可观。与之相对照，西北地区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的边境一带，迄今尚未设立国家级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其主要原因也是交通运输不便，或者是虽有交通运输干道穿越，但地处高寒、自然条件较差。

第十六章　特别行政区域经济

由于历史原因，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差异，从 1997 年起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域。

目前中国所拥有的多元文化，是不同民族的、区域的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和生活习俗等在长期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香港、澳门、台湾的多元文化又为中国文化增色不少，并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各具特色。民间有“经济香港，文化澳门”之说，从一个角度凸显其富于个性的方面。现在的香港则是具有服务优势，特别是金融优势；至于台湾经济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则以具有高科技优势，产品技术集密和升级换代较快而著称。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性是，香港、澳门、台湾都已经完成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进入以知识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

第一节　香港经济：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

一、香港经济发展结构及其地理基础

香港地域狭窄，人口过密，天然资源匮乏，但区位有利。其海岸十分曲折，有优良深水港湾，又处于国际时区有利位置，是连接亚欧之间时间差距的桥梁；毗邻我国内地，并与东南亚各国联系密切；低税率的税制环境、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健全的法律及金融架构、完全自由兑换而又可靠的货币、高效率交通及通讯网络，为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香港成为自由港已有一百五十多年。自由港是指经济上对外实行完全开放和自由进出的区域，包括自由开办企业，自由贸易、通航，货币自由兑换，资金和人员自由进出等。

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1）开埠至 1949 年，由一个偏僻渔村发展成为一个转口港；（2）1949～1978 年，转口贸易发展停滞，转而发展成为工业城市，同时金融业亦开始发展；（3）1979～2004 年，内地开放，香港转口贸易再度大幅增长，金融业更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商业服务、旅游等发展亦很迅速。

以上这些使香港成为一个多元化经济中心。2002 年香港人均 GDP18.73 万港元（钓 2.4 万美元），虽连续多年下降，仍居世界前列。同三十年以前人均 GDP0.65 万港元相比增长 28 倍。香港居民储蓄额 3 万多亿港元，人均储蓄居世界前列。

香港经济的构成，农业及渔业所占比例极小，仅 0.08%；工业（含制造业、电力煤气供水、建筑业等）所占比例逐渐缩小，2002 年占 GDP12.75%；服务业（含批发零售、饮食及酒店业、运输业、仓储、金融保险地产业等）占很大比例，2002 年占 GDP 的 87.16%。

近七年来，由于受两次衰退的影响，经济不景气几乎影响到各方面。从另一个层面上看，随着内地对外开放全方位进行，香港所赖以获利的地理因素逐渐失去其比较优势，然而香港的管理优势和专业优势依然是明显的，依然是可以继续获利的重要因素。但香港经济萎缩延续时间过长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直至 2003 年才逐渐复苏。

二、全球名列前茅的自由经济区域

据《世界经济自由度：2003 年周年报告》，中国香港第七次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美国、新西兰、英国、加拿大、瑞士、爱尔兰、澳大利亚、荷兰。

除整体排名第一以外，香港在“政府规模”、“与外地人士交易的自由度”以及“信贷”、“劳工和商业规管”方面排名也均居首位。该项报告是在对世界 123 个国家和地区就其经济自由诸方面的情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评选产生的，香港连续获评说明回归后经济自由度并未下降。

三、国际金融中心

近一百年来，香港屡经变故：从 1925 年的大罢工、1967 年的文革、1972 年的港股崩盘等。当时许多不看好香港后市的有钱人纷纷大举脱手香港资产，但事后接手的人却都因此而大赚了一笔，涌现不少新富。由此可见香港具备不受短期事件影响的金融实力与经济实力。

作为香港城市经济发展领导行业，香港金融业具有两方面优势：法律系统完备；居住外在环境良好。这是因为金融业需要非常繁琐但是确定的法律，而香港的法律系统相当健全，无论是企业或私人借贷、发行各式债券等，均有完整而务实的法律系统领先亚洲许多城市。

在全球 100 家最大的银行中，有 87 家在香港开设分行。到 2001 年底，香港已有持牌银行 251 家，其中外资银行 114 家，持有的海外资产总值 4195 亿美元。

此外，香港另有 6300 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香港外汇市场在 1995 年 4 月时的平均每日成交额 910 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五大外汇市场。

2002/2003 年度终结时，香港联交所共有 985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 3.43 万亿港元，

是全球第11大股票市场（2001年底总市值3.8万亿港元，全球证券市场中居第9位）。

金融业发展对香港的经济繁荣贡献颇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创造了就业机会。20世纪90年代香港金融业在本地生产总值的总附加值中所占比重约为8.5%，目前，香港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产业已经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

四、国际贸易中心

香港由于其特殊的海岛型外向经济，加上地理位置有利，位于亚太区国际商业航运要冲，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已高达237%，与全球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关系。有11万家贸易公司，雇员50万人以上，还有1165家境外跨国公司以香港为亚太地区的总部或办事处。

从1947~2002年，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不足20亿港元增加到31799亿港元，增长千余倍。另据统计，香港在世界贸易体系排名逐年提高，从第23名上升到第8名。

2002年，香港进口额15682亿港元。出口15605亿港元，出口构成以转口贸易为主，占91%以上；港产品出口已低于9%，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1990年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35%，1995年占17%，2002年仅占8.4%。

中国香港的贸易格局大体上是从我国内地及中国台湾、日本进口原料、半制成品，从日本、美国、英国进口机器设备，由中国香港制造业加工，再向美国、我国内地、西欧及其他地方输出。与此同时，从我国内地、日本、美国进口食品、消费品。另一方面，还大量转口各种商品。转口商品主要来自我国内地及中国台湾、日本、美国、韩国；转口的主要去向是我国内地、美国、日本、德国、英国。

至2003年7月，中国香港的外汇储备达1126亿美元，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中仅次于日本、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韩国，排名第5位。

在港设地区总部的外资公司到2002年6月有948家，在港设办事处的外资公司有2171家。据2002年调查，香港铜锣湾商铺每平方米的年租金4.33万港元，居世界第3位（仅次于纽约第5大街、东57街和巴黎香榭丽舍大道）。

五、制造业兴衰与工业再配置构想

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重点发展纺织、成衣等制造业，至1959年，香港产品出口开始超过转口。70年代初，制造业进一步发展成为香港最大的产业部门。

20世纪90年代前期香港制造业的主要产品按产值大小依次是：电子产品、成衣、纺织品、钟表、印刷品、塑胶制品、金属制品、饮食品、工业机器、珠宝首饰。制造业总产值在1996年达到2820亿港元。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地价和劳工成本激增，劳动密集型工业大批迁往内地及东南亚低成本地区。为此，香港社会提出了工业重新配置的问题，即将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至珠江三角洲等地进行外发加工，香港则集中发展高科技工业，以挽救制造业的

衰落。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经历第二次转型。这主要是近十多年来已有数以千计的企业进入内地发展，工业布局北移。至1995年，已在内地雇佣数百万员工，开阔了香港工业与经济发展路向，同时也催生香港经济转型。在此情况下，香港制造业原有大量员工有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刺激了房地产、商贸、金融及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但香港经济结构又太过于依赖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1997年这两项合在一起占香港总产值的42%）。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恢复和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有利于振兴香港经济。

六、香港与内地，“自由贸易区”与“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

香港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外向性的特点。近四十年来，香港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同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其中特别是与英国、荷兰、美国、日本、我国内地及中国台湾的经济，在不同时期分别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1979~1994年，港商在内地投资设立的企业为13.9万家，实际投资600亿美元，至2002年底增至2042亿美元，占内地实际利用外资（4600亿美元）44.3%；港资投向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以珠三角地区和华南沿海一带为主，投资行业多数集中于加工业。到90年代，投资区域向珠三角以外地区（包括华东、华北、东北、西北、西南）扩展，投资行业也由一般加工业扩大到基础设施、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酒店和餐饮服务业等。

与此同时，内地对香港的投资也有较大增长。在20世纪30~40年代，内地对香港的大量投资成为后来香港本地华人资本蓬勃发展的基础。此后，在50~70年代，中资在香港的投入只有12项，80~90年代，中资在香港的投入大增。至2001年底，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存量为32697亿港元，其中，中国内地已经占到最大部分（29.3%），内地在港投资涉及各种经济活动，包括投资控股、地产、银行、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等。从2003年起内地企业赴港投资增加，并欲利用香港作跳板走向世界。

因受累于全球经济放缓，使香港经济继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之后再度出现疲软态势，五年两陷衰退，影响所及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为摆脱此不利局面，2001年，香港提出与内地建立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后改名为“更紧密经贸关系”），期望在内地与港澳之间，形成比WTO一般成员之间更紧密的贸易互惠关系，并有助于发挥三个关税区各自的优势：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澳门的旅游服务业和大陆的劳动力市场互惠互利。

2003年正式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包含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内容，将进一步提高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为香港服务业、制造业带来众多商机，并有利于香港经济转型。

中国内地加入 WTO 以后，香港的城市职能与经济地位受到一些发展迅速的内地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的有力挑战，但由于香港经济发展的现有优势与潜在优势仍较明显，故近期内任何一个内地城市都难以超越或取代香港的地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在服务业（尤金融）方面的优势，同台湾的高科技优势，上海、广东的制造、整合与腹地优势，彼此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大中华”经济圈各有作为。

预计十至二十年内，涵盖粤港的大珠三角地区将发展成为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其中广东将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则将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之一。

七、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业成为优势产业

香港航运、航空地位重要，自由港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转口港功能亦很突出，主要为华南和东南亚的转口贸易服务。多种运输方式得到协调发展，物流成为优势产业。

目前，香港拥有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在海运方面，有 80 家国际集装航运公司，每周提供 400 条航线，开往全球 500 多个港口；空运方面，66 家国际航空公司每周提供约 3800 班定期航机由香港飞往全球 130 多个机场。

香港的船东拥有 1294 艘远洋船舶，6050 万载重吨，其中，香港船王包玉刚家族旗下的“环球航运”，2003 年通过国际收购增加 108 艘，总载重量达到 2230 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船运公司，并介人中国内地海运市场。

据 2002 年统计，全年有 40 多万艘船只抵港，货物吞吐量 1.42 亿吨，国际旅客 2000 多万人次。在海运中，集装箱运输发展很快，货运集装箱化率逾 60%，1995 年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 1250 万个标准箱（TEU），2002 年增至 1914 万个标准箱，已连续八年居世界第 1 位。地处九龙半岛西翼的葵涌集装箱码头有 19 个泊位，年吞吐集装箱 980 万 TEU。

地处九龙半岛的启德机场兴建于 1924 年，1927 年后几经扩建，1936 年开始经营客运，至 20 世纪 90 年代货运量居世界第 2 位（次于东京成田机场），客运量居世界第 4 位（次于伦敦希斯罗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年吞吐旅客 2500 万人次。

鉴于启德机场距离九龙和港岛商业区太近，加上机场周围已被城市道路、住宅和出入维多利亚港的航路包围，噪声和扰民问题严重，夜航受限制，没有任何发展余地。为适应 21 世纪国际空运发展需要，兴建赤鱲角新国际机场。新机场位于香港西南部的赤鱲角岛及其邻近的填海地域，地处香港商业中心区以西 25 公里，占地 1248 公顷（含填海造地），投资 1500 亿港元，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基建工程，已于 1998 年启用。近期每年可运载旅客 3500 万人次，空运货物 300 多万吨；远期增至 8700 万人次、900 万吨，居世界大机场之前列。

香港新国际机场的建成，不仅提高了空运的现代化程度，也为进一步发展留有空间，而且可使原机场附近数十万居民长期以来所受的噪声及环境污染之苦得以解决，还

直接促进了香港最大岛屿大屿山的经济开发，对生产力布局均衡发展有利。

在铁路建设方面，原有铁路集中于东部，故称之为“东部铁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兴建“香港西部铁路”，它是连接西九龙与新界西北部的双轨客运铁路，南起九龙，北至落马洲、罗湖，西至屯门，东至上水，全长31公里，2003年通车，并与东部铁路衔接，共同构成以客运为主的路网，对促进香港西北部经济特别是房地产、旅游业等发展有利，也有利于香港经济布局向合理的方向展开。

另外，通至落马洲的香港铁路，还可以通过皇岗口岸同中国内地深圳的地铁接驳（车程仅需16分钟），使港、深两大城市联系十分便捷。

八、旅游购物中心

旅游业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赚取外汇的第二大行业。1995年到港游客1020万人，旅游收入720亿港元，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6%，“九七”香港回归，加之内地旅游业兴起，也是促进香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内地从1993年起成为香港旅游业第1位客源市场，其余游客主要来自中国台湾、日本、西欧、东南亚、北美、澳大利亚。2002年访港旅客激增至1657万人次。

九、城市用地开拓

集中在新界东北、西北、原启德国际机场旧址及港岛南区开拓土地，使其到2006年后每年有条件兴建成9500个房屋单位，同时并致力于发展新的商业与高科技工业。

预计至2011年时，全港人口将达810万。届时，香港的后备土地资源仍能满足房屋及城市基本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土地需求。同时，也能提供高容量及有效率的运输系统，以便使香港继续作为国际城市和区域商业金融中心、转口贸易基地、制造业基地、资讯中心及旅游中心等能得到切实保证。

十、创意中心，数码港

经历了金融风暴之后，香港昔日以房地产、金融等行业为主的辉煌已有些失色，不可能再完全依靠传统的经济结构来振兴经济，于是改而希望发展创意工业，并用科技创新来谋求发展。一方面继续利用香港不可多得的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则可借助于此地多数居民普遍掌握“二文三语”的有利因素。.

为实现经济转型，香港重视发展创意行业，并力争成为亚洲的创意中心。据截至2002年统计，香港创意工业已聘用9万多人，占总就业人口的3.7%；创意工业产值占香港本地产值的2%，出口值占香港服务出口总额3.1%；比较英国、澳大利亚创意工业的经济贡献，英国的创意工业占本地产值7.9%，雇员为就业者的4.1%；澳大利亚则分别为3.3%、3.7%。

1998年香港设立“创新科技委员会”，并策划使香港经济的内涵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即通过技术的创新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此情况下，1999年香港提出了以“数码港”为代表的许多科技项目和设想，以求为香港在全球资讯科技、资讯服务领域争得一席之地。数码港的目标是吸纳约30家大公司及100~150家较小规模的公司。

香港经济未来将是以知识经济和服务业为主，并突出金融和物流业特色。

十一、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

近年，香港经济经历两次衰退，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并且是长期积累所致。因此，结构调整、优化投资，势在必然。

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香港经济增长点已成过去，而以科技创新、创意工业、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点又未能实现预期的辉煌。内地已是香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内地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率未能帮助香港避免五年之内的两次衰退，主要问题是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不顺。

香港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目标是：拓展知识经济与提升传统经济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强化已有优势（即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运输中心），并顺势拓展新的经济中心（即物流中心）；香港继续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桥梁，并发展成为以“大华南”为主要依托具有亚洲国际大都会地位的“大香港”。

第二节　澳门经济：独具特色的旅游博彩业

地处珠江三角洲南翼偏西的澳门，地域狭小。全境由一个半岛（澳门半岛）、两个离岛（毡仔岛、路环岛）及路氹填海区组成，面积分别为8.5、6.2、7.6、4.5平方公里，总面积26.8平方公里。

澳门虽小，却是在不断“长大”。13世纪时，澳门仅有三组小岛，16世纪开始澳门岛自然演变成半岛，1863年开始填海造地。19世纪时总面积仅10.28平方公里，1912年增至12.69平方公里，1980年15.52平方公里，1990年17.4平方公里，2002年达到26.8平方公里。

到2002年，澳门人口43.9万。获准居留的外籍人口2.4万，外籍劳工3.2万。人口分布高度集中于澳门半岛上，占总人口的96.3%，并由此而构成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每平方公里6万多人），而土地面积占一半以上的两个离岛人口仅占2.9%，另有0.8%是水上居民。

澳门人口构成中96%以上是华人，外籍人以葡人居多，而葡人中又有1.1万多是“土生葡人”，通常他们已将澳门视为“永久的归属地”和“故土家园”。

澳门拥有四百多年的开埠历史，是久负盛名的旅游城市。甚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宜

人的亚热带气候，独具特色的博彩（赌博）业，丰富的中西交融的人文景观，人员与货币自由进出的国际自由港制度，使澳门在亚洲及远东都闻名遐迩。

一、"缩微经济"及其演变

澳门面积小，其经济发展有"超小型经济"、"缩微经济"的特色。但它同时又具有经济起点较高、产业相对多元化、国际联系广泛、区位优势突出、经济运行相对独立等特点。澳门以其具有特色的旅游博彩业、低税制、享受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税及配额优惠，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综合服务、信息中心，使其投资环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已被世界银行组织列为上中等收入的国家（地区）之列。

曾有"东方蒙特卡罗"、"东方拉斯维加斯"之称的澳门，过去"以赌维生"，靠经营赌场和旅游收入支撑经济。近十几年来，澳门的出口加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逐渐形成出口加工业、旅游博彩业、建筑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共同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但在近年来，特别是澳门国际机场建成通航以后，澳门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并取代出口加工业，成为澳门经济发展的第一大支柱。

如今，整个澳门的经济发展已由"缩微经济"走向稍具规模。其经济门类从早期的只有鞭炮、火柴、神香等小行当开始，迄今已形成旅游博彩、出口制造、金融业和地产建筑业为主体的多元化结构。

2002年澳门 GDP 541 亿澳门元（67 亿美元），人均 12.3 万澳门元（1.53 万美元）。近十余年澳门外贸发展较快，但不稳定，且总量不大，进口常年大于出口，有部分转口贸易。

2003年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有助于澳门贸易与经济结构向合理方向发展。

澳门特区政府关于"以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政策，是根据澳门地域小、资源弱和博彩业具有特殊地位等因素来决定的。

二、以客流兴旺为特色的航空运输

澳门实行人员、货币自由进出的国际自由港制度，作为中国南部仅有的两个自由港之一，从16世纪中叶便与欧洲国家开始了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成为"欧风东渐"的突破口。

但是，由于地域过于狭小和"超小型经济"的因素，澳门的对外交通运输以前多依赖香港的海运与航空设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加工业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旅游业的兴旺以及游客来源地的变化，澳门对外交通运输设施开始迅速发展。至1995年，建成澳门国际机场，并在澳门南端建设新港。从1998年起，又在氹仔岛和路环岛之间的路氹连贯公路右侧填海区内建设第二个口岸。

澳门国际机场地处澳门东南部，是选择在逃仔岛以东、路环岛东北方浅海地带填海

造地，形成南北狭长的人工岛，面积 1.15 平方公里。这是世界第二个完全布置于海面的国际商用机场，其规模仅次于建筑于大阪湾中的日本关西国际机场。近期年客运量 450 万人次，留有扩展空间。

澳门国际机场开通定期航班飞往北京、上海、厦门、青岛、武汉、福州、南京、桂林、重庆、昆明、西安、中国台北、高雄、曼谷、马尼拉等 20 多个国内外城市。其中以台北—澳门、高雄—澳门 2 条航线飞行密度最高，每周飞行航班在 40 次以上，已成为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及商务旅行热线。1998 年开通宁波—澳门—台北、高雄包机航线，2002 年开通深圳—澳门—台北航线，使澳门国际机场担当起海峡两岸“三通”正式实现之前两岸人员与货物往来的重任。

从此，澳门机场因其拥有“一机到底，沟通两岸”的独特功能而使其的重要性大增。到 2002 年，澳门国际机场每周在台北—澳门航线上有 81 个往返航班；高雄—澳门航线上有 23 个往返航班；上海—澳门航线有 21 个往返航班；北京—澳门、厦门—澳门航线各有 7 个往返航班。

澳门的港口包括内港、外港和九澳港。因澳门水域地处珠江口淤泥带，故难以建成深水港。内港地处半岛西侧，与珠海湾仔隔河相望，全长 3500 米，水深 3～3.5 米，是澳门连接内地 30 多个口岸的唯一港口，共有 30 多个泊位，承担港澳货运和内地往来的客、货运；外港亦称“港澳码头”，地处半岛东岸的“新口岸”一带，水深 4～5 米，主要承担港澳之间的客运；九澳港地处澳门南端的路环岛东翼，是为改善澳门海运设施而新建的，包括货柜码头、燃油码头和油库，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建成。目前，澳门与 100 多个国家（地区）有商贸往来，其中 80%的货运吞吐在九澳港货柜码头完成。

三、旅游博彩业，赌业经济发展演变

作为闻名遐迩的赌城，澳门的赌博业发展由来已久，在清朝时已初具规模。1847 年，澳门已有博彩合法化的法令，开澳门博彩业发展之先河。1872 年，港英当局严格禁赌，清政府也在广东禁赌，致使赌徒流聚澳门，澳门赌业得以进一步兴旺。

赌博专营制度于 1937 年开始实行，并正式推出专营赌场，赌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1961 年，澳葡政府颁布法令，公开竞投赌博业专营权，并发放唯一博彩执照。随后由“澳门赌王”何鸿荣独家控制四十年，2001 年到期，重新竞投赌权。2002 年起赌业经营从一家垄断改呈三足鼎立之势，博彩牌照一分为三。

澳门赌场的建筑及设施虽不及美国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豪华气派，但却以豪赌著称。据统计表明，每年全世界最大赌注的投入都有华人参与，而全球最大的赌注都是投在澳门赌场。

因此，澳门博彩业收入十分可观。博彩方式多，其中仅幸运博彩一项年收入现已超过 170 亿澳门元。博彩税也是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近年来其比重已达 50%，1996 年为 50.6 亿澳门元。除赌博外，娱乐业也很兴旺，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众多，而博彩和娱乐业又带动了旅游业兴旺，加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特殊历史背景，如中、葡等多民

族混居，中式屋宇与欧陆式建筑并存等，形成澳门独特的赌博—观光模式，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外来游客在1965年突破100万人次，1985年为420万人次，1996年达到815万人次。以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旅游业一度衰退。1999年澳门回归至今，治安改善，游人赌客重又增多，2002年达到1153万人次。客源主要来自我国内地及中国香港、日本、英国、美国、泰国、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法国等地。

四、特有产业链及地缘关系

在澳门，旅游与赌，呈相互渗透与包容之势。这也是其产业链特有的存在方式之一。游客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专门或兼为博彩而至。

20世纪80年代，在外界赴澳门游客总量中，港人占80%以上，90年代这个比例逐年下降。尽管如此，人均GDP达2万多美元、并拥有一支庞大而富有的中产阶级的香港，仍是到澳门休闲、度假兼赌博扔钱最多的群体。此外，其他香港居民的短期游览与娱乐需求，亦不可忽视。上述这些，都构成了对澳门发展的很大支持力，也在港澳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缘关系。

港澳间相距仅42海里（78公里），乘穿梭往来的喷射船、水翼船横渡珠江口水域，费时仅1小时，如乘私人游艇或轻型飞机，则速度更快。如此便捷的交通条件，使不少港人每年数度甚至数十度赴澳门短暂停留，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为赌而来。有趣的是，港澳之间的海上联系，上下船的专用码头，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连码头名称都相同（港澳码头），且都建筑于各自的寸土寸金之地。大约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赌客和游人，好让他们即便是在通宵博弈之后，头昏脑胀之时，也不至于忘记应该踏上归途的地方。

五、"文化澳门"及其地缘关系

民间有"经济香港，文化澳门"之说，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富于个性的一面。

从港岛乘船横渡珠江口进入澳门，第一印象仿佛是从大城市来到乡镇。香港堪称国际级大都会，澳门则不过是一座中等城市而已。然而，澳门也让人感受其不同凡响之处，首先是城市文化的魅力。

穿行于澳门街市，可以见到除闻名于世的赌业（赌场、跑马场等）影响以外，娱乐业也很兴旺，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众多，而博彩和娱乐业又带动了旅游业发展。加之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特殊历史背景，中葡等多民族混居，中式屋宇与欧陆式建筑并存等，形成了澳门独特的产业结构和城市文化、建筑文化模式。

如果说香港文化的某些方面侧重于英语系国家，澳门文化则是侧重于拉丁语系区域。就整个亚洲来说，澳门是唯一可使用拉丁语系的地方，且有某种独特的语言以及文

化优势。

发展城市文化，同发展城市经济相比，前者远不如后者那样见效快，因此也难以受到重视。通常说来，渗透于城市发展诸领域的城市文化，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良好的润滑和促进作用；而城市经济发展，又可形成自身的特色，进而形成“城市品牌”效应，有的还可进一步形成著名的“品牌城市”。澳门可以说是一座人口不算多、规模不算大却是影响较深远、特色鲜明的品牌城市。

六、城市建设与城市布局变迁

近百年来，澳门城市建设、城市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城市化区域，仅局限于澳门半岛上几个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域内，以后，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布局的需要，通过数十年填海造地，使陆地面积由 10 平方公里增至现今的 24 平方公里，又通过建造澳氹、友谊两座跨海大桥和路氹填海公路，使澳门全境由过去互不相连的三小部分连成一个整体。1999 年建成的莲花大桥，又使澳门与珠海横琴岛连接，腹地范围扩大，进出口通道也由一条增至两条。

上述变化有利于澳门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局，也有利于城市布局展开。北部的半岛区域主要布置赌场、酒店、博物馆、商业街道、服务业，并保护、维修中西各式建筑及众多古迹。原有的浅水湾港湾码头设施继续维持港澳交通等功能；中部的氹仔岛主要布置占地较大的跑马场、公园、加工业，安排新的房地产项目；南端的路环岛因接近深水区，主要布置深水港及各类公园、绿化区域等。

第三节　台湾经济：技术密集产品输出基地

一、深受海洋之惠

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海面上，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台湾岛面积 35788 平方公里，以它为主体，包括周围一系列小岛在内，共有陆地面积 3.6 万余平方公里，居民 2252 万人（2002 年底）。

考古学者在台湾左镇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被称为“左镇人”，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三万年前古人类。近年在台东有不少石器、陶片和玉器出土，经鉴定为二三千年前台湾先住民遗物，并发现他们来自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至元朝时，台湾和澎湖已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一部分。明代从 1638 年起向台湾移民，1885 年清政府设台湾省。

在自然环境方面，山地占全岛三分之二，平原主要分布于西部沿海。北回归线横穿全岛，属热带、亚热带气候，为我国降雨最多之地。山区森林茂密，为我国森林覆盖率

最高（52%）的省区。地热资源也较丰富。另外，岛的四周还有辽阔海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又因地处寒暖流交汇，故渔业资源丰富。

二、经济发展历程，产业升级；资金外流、产业外移

从20世纪50～9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

（一）进口替代阶段（1949～1959年）

从恢复和发展农业着手，全面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和地方原料工业，电力、化肥、纺织等发展较快。到1959年第二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①结束时，GNP比1952年增长1.6倍。

（二）出口扩张阶段（1960～1973年）

当时适逢资本主义经济处于战后迅速发展中的转型期，发达国家竞相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将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某些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台湾利用这一机遇，实行开放政策，一方面将岛内已发展的进口替代工业导向出口；另一方面则引进大量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的资本和技术，招收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加工和装配，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遂形成长时间出口热和“经济起飞”。

（三）发展基础设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阶段（1974～1986年）

鉴于前十年工资大幅上升等原因，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优势逐渐消失。于是，转而大力发展交通、港口、核电、钢铁、造船等社会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同时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借以促进经济升级。到80年代中期，台湾重工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以及海、陆、空交通运输业均有了较大发展。

（四）新的产业升级和资金外流、产业外移时期（1987～2003年）

该时期的特点是在有针对性的经济调整之后，又进入新的产业升级，建立高科技产业基地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在多数年份表现为适中，少数年份较低。1986年，台湾正式确定“三化”（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方针，用以指导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不同工业部门优先发展的选择方面，扶植和优先发展电子、信息（IT）产业和能源、新材料、高附加值机械制造业、生物技术产业及其他技术密集产业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进一步调整战略，进入新的产业升级。

以1995～2002年工业结构变化为例，在此期间，集成电路产业强劲增长，电脑、软件应用、通讯产业、光电产业、精密机械、生物技术产业也呈增长态势。主要工业品产量：电脑由704万台增至1493万台，主机板由1595万片增至4636万片，电子电容器由424亿只增至1456亿只，印刷电路板由798亿元新台币增至1703亿元新台币；大幅度下降的产品主要有：各种成衣由3775万打降至1785万打，监视器由1775万台降至551万台，显像管由1552万只降至436万只。

其他工业品的年产量基本保持稳定、变化幅度不大的有：人造纤维320万吨、发电量1581亿千瓦时、钢1826万吨、数控机床3940台、小汽车33万辆，液晶显示元件

34913亿只。

总体看中国台湾经济发展，在近数十年中呈上升趋势。除个别年份呈负增长以外，少见大的震荡，即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各国和日、韩等国遭受重创情况下，中国台湾经济受创程度较为轻微。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高科技产业崛起以及信息产业作为第一大产业的结构，并直接推动了中国台湾产业升级转型。但近年就连科技产业也有些不景气。

20世纪90年代末期，因生产成本提高等原因，使台湾工业外移速度加快。至1999年，某些重要产业的外移比率已超过二分之一。到2002年，从传统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出现了整体外移现象。

在1988～2000年的十三年中，台湾外流资金总量约3700亿美元，外流形式主要是投资、岛外花用等。据认为这是造成台股近乎腰斩的最起始原因之一。积极因素则是造就了台湾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维持多年的巨额贸易顺差。目前，台湾经济虽从2000年以来遭遇挫折，经济发展在某些层面呈下滑趋势，但台湾的资金、技术及掌控部分世界市场的能力，仍是其优势之一。

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3～2004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前九名依次为：芬兰、美国、瑞典、丹麦、中国台湾、瑞士、冰岛、挪威，中国台湾居第5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是亚洲竞争力最强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台湾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域运行出色；新加坡则是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共机构的质量。

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结构演变

从国民生产总值（GNP）及人均水准来看，台湾1986年人均GNP3748美元，1990年增至8111美元，2002年12900美元。虽然比1997年（13592美元）、2000年（14188美元）均有所下降，但同大陆各省相比高出甚多，相当于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上的水准。

多年以来，台湾一直是向国际市场提供信息技术产品的中心，拥有一大批外向型电子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技术产业的不景气影响到台湾技术密集产业，因受成本等因素影响，台湾电子企业一部分转移至祖国大陆，而产品继续面向国际市场。

台湾电子产品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反应很灵敏，1996年以后，及时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台湾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大增，1997年在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上的占有率已达到34%，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52%，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和出口基地。此外，全球25%的台式电脑、53%的监视器、70%的主板、92%的显示器都出自台商的公司。

数十种工农业产品中，生产多处于缓慢下降状态。这是因为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曾大量出口的一些工农业产品，至90年代中期因市场竞争等原因，均有程度不同的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加工工业的转型，转向发展资本

技术密集型工业的结果。

农业经济60年代中期以前在经济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以后随着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而使农业经济比重下降，台湾“四宝”（茶、糖、米、樟脑）的时代早已过去。构成农业经济的4种产业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种植业由以前居首位下降到第3位；畜牧业实行专业化、企业化饲养，发展最快，在农业经济中居第2位；渔业发展亦较快，并由沿海渔业逐渐向近海、远洋渔业发展，地位亦由以前在农业中只占第3位而上升至第1位；林业生产地位未变，仍居第4位。

糖业萎缩和布局改变，也是台湾农业和农产加工业一系列变化中的重要内容。曾是台湾经济命脉之一的植蔗业和制糖业，全盛时期拥有17万公顷蔗田、42座榨糖厂，年产蔗糖140多万吨，除内销外，还大量输出国际市场。后因国际糖价低迷，而制糖成本升高，使糖厂接连倒闭。至2001年，仅剩10座糖厂，年产20万吨。预计2004年进一步减少至4座，年产12万吨。

工业经济发展早已远远超过农业，其后服务业又远远超过工业。到2002年，台湾GDP 97344亿元新台币，部门构成如下：农业占1.9%，呈下降趋势；工业占31.0%，呈下降趋势，其中制造业占25.7%，下降趋势；服务业占67.11%，上升趋势，其中金融保险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占20.82%，比1992年增加2个百分点，但比1999年下降2个多百分点。

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产业崛起，并形成以信息产品制造和信息服务业作为第一大产业的结构，是台湾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一个特点。但台湾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就整体而言仍有单一结构的弱点，即便是效益良好的高科技产业，也因为对关键技术部分有求于人而使整个经济结构呈现出“浅碟子经济”的某些特色。

大陆与台湾在经济发展层面上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但直至2002年，仍有十至十五年的差距。

四、未来产业发展目标

为巩固产业升级转型成果，从1998年起，台湾围绕全球最具竞争力的5大产业，即信息产业、精密机械工业、生物技术与制药工业、航空工业、多媒体工业，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即到2010年，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50%，这5大产业涉及10个新兴工业部门，即通讯工业、信息工业、消费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精密机械自动化工业、航空工业、高级材料工业、特用化学品与制药工业、医药保健工业和污染防治工业。为此提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植这10个新兴产业。如提供研究发展所需人力、经费以及风险性事业创业的风险性投资；通过基础教育、高教以及在职培训，提供产业发展人才；加强研究机构的预期性及整合型技术开发，协助企业共同开发关键技术，并带动民间企业的创新活动。通过官方、企业和研究机构三方合作推动产业发展。同时利用合约采购中的项目合作计划，引进技术及掌握先进管理经验，推动产品创新进程。

另外，在环境方面，加强各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区、科学工业园区建设统一规划，并给予相应优惠政策。

至2002年，鉴于岛内制造业、科技产业向大陆转移逐渐形成趋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未来产业空洞化的担心，一些有实力的厂商相继决定在岛内扩大设立先进研发中心，并促使形成"台湾研发，大陆生产"的分工协作体系及互补关系，使台湾未来产业发展继续借助与得利于科技因素。

2000年起还斥资数千亿新台币，启动"数码台湾"计划。该计划涵盖"宽频到家、e化生活、e化商务、e化政府、e化交通"五大领域，计划用6年时间，耗资4020亿元新台币（含民间投资3644亿元）。

五、经济布局特征及"群聚效应"

台湾工业布局偏于一北一南，分别组成以台北、高雄为中心的两大工业区。

台北工业区包括台北市、台北县、基隆市和桃园县在内，集中分布着全省工业企业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工业产值约占全省一半；高雄工业区包括高雄市、高雄县、台南市、台南县和屏东县，多大型企业。

台湾产业界已形成产业分工相当细的生产体制，加之长期以来走的是中小企业型专精分工的产业组织形态，这些都影响到生产布局，并且在一个行业中常产生"群聚效应"。即如果一个行业的主打厂家进入某一地区，其下游的配套企业就会跟过去，而配套企业又带来更多的下游企业。上述趋势在台湾工业布局集中台北、高雄时期是如此，后来向外转移时亦如此。在大陆置业时，先期在闽粤时是如此，后来向长三角转移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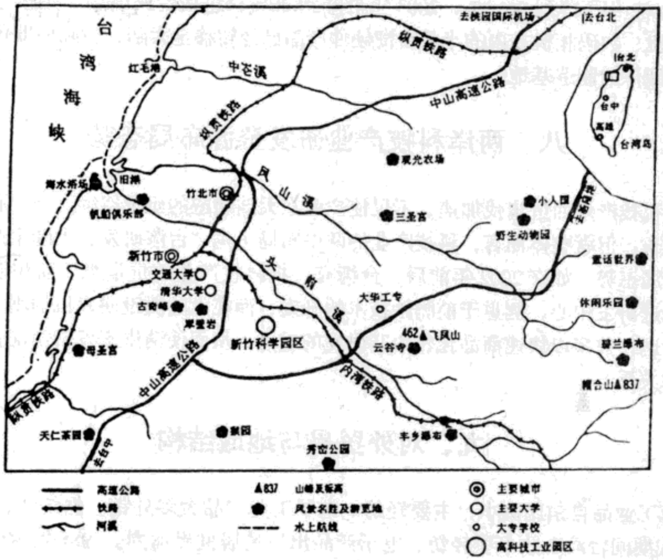
六、新竹科学园区崛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工业布局向新竹、台中以及东海岸一带转移，随着新竹科学园区、台中加工出口区、台中国际贸易商港等的开辟和发展以及环岛铁路的贯通营运，台湾工业布局高度集中于一北一南的现象已有所改变。

新竹科学园区位于台湾西北新竹市东南角，地处新竹市和新竹县的竹东镇、宝山乡交界处，距台北约70公里。此地多丘陵，山水相间，自然风光秀丽，适宜布置与发展科技产业，附近还有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教机构，为发展科技产业奠定了基础。区内文教、科技机构分布集中，最多时曾有8万名科技人员聚集于此，成为投资环境中的最有利因素。

建于1980年的新竹科学园区，到90年代后期已跻身于世界知名的科学园区行列，甚至被认为是世界两大成功的科学园区（硅谷、新竹）之一。主要是电脑硬件产地，笔记本电脑等产量居世界前列。但因其受限于土地以及水、电供应的短缺，加之本土工资上涨过快等原因，投资环境受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人才与产业外移。

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位置与周边环境，如图表 16－1 所示：



图表 16－1　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位置与周边环境示意图

至 2000 年底，新竹科学园区有运营企业 287 家，当年科技产品销售额 300 亿美元，产品主要有：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和外部设备、无线通信产品、光电子产品、精密仪器、生物技术，其中集成电路销售所占比率达 61%；园区职工 102840 人，平均年龄 31 岁，62%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16%拥有学士学位，“海归” 4108 人，多来自美国。

园区包含生产、居住、娱乐三部分，另有服务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园区管理署在台湾“科委”保护下工作，后者行使政府职能。

七、工业布局向境外延伸

近年，台湾工业布局向境外延伸引人注目。主要延伸方向为东亚、东南亚、中北美洲。其中在祖国大陆，台资企业发展和布局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如珠三角东莞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成为电脑产品生产基地。

21 世纪初台湾芯片业在大陆的投资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尽管受到限制阻挠，但仍采取“绕道”登陆等方式到上海、昆山、苏州等地建厂。对遭遇低谷、开工不足的 IT 产业来说，向大陆转移是一种选择，因为这个投资较大的产业必须寻找成本更低、市场更大的地域。另据统计，台湾信息硬件产品制造业移至大陆生产硬件产品比例 2001 年

为36.9%，2002年增至46.9%，2003年达60%；而在台湾制造的比例2001年为47.1%，2002年下降到36.3%，2003年再降到26%；包括台式电脑、主板、CDT显示器、光碟机、数码相机在内的半数台湾硬件产品已经转移至大陆，大陆已取代台湾成为全球信息硬件的制造基地。

八、两岸科技产业研发资源布局态势

随着科技产业西进步伐加速，不仅使产业在大陆制造的比重持续上升，研发资金也有较大增长。但就整体而言，科技产业的两岸布局仍是“台湾研发，大陆生产”的分工体系与布局态势。如在2002年前后，台湾有一批科技产业的重量级厂商相继决定在台岛设立先进研发中心，侧重于前瞻性技术的开发，而在大陆所设研发机构则主要是出于本地化考虑，并多以快速商品化作为其研发的重点，从而使两岸研发资源配置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九、对外贸易与地域结构

台湾工业品自销比例小，主要轻纺、电子工业产品大多外销。据统计，20世纪80～90年代期间台湾有数十项轻纺、电子产品出口量居世界前列。1985年台湾外贸出口额307亿美元，进口额201亿美元，外贸顺差106亿美元；2002年外贸出口额1306亿美元，进口额1126亿美元，顺差180亿美元。由于从1980～2002年连续多年顺差，使中国台湾的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我国内地，居世界各国（地区）的第3位。

中国台湾出口商品去向在1994年以前主要是美国、香港（其中大部分转口至我国内地）、日本、新加坡、西欧、韩国等。1995年以后，我国大陆上升至第1位。进口商品来源地则主要是日本、美国、我国内地、韩国、新加坡、中东、西欧等。至2003年，台湾进出口前3位的排位——出口：我国内地、美国、日本；进口：日本、美国、我国内地。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台湾对外贸易的地域结构过于集中化，外贸发展受少数国家市场形势变化影响太大。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台湾致力于“分散贸易地区”，并取得一定成效。

十、海峡两岸经济贸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与大陆的经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87年以前，两岸经贸关系长期处于冻结状态，只有个别特需物资，由官方授权的“物资局”负责，从第三地区通过转口间接贸易的方式输入，数量也极为有限。1987年，台湾有关主管部门开放29种大陆农工原料转口输入，到1990年增加到155种。与此同时，台湾转口向大陆输出的工业品急剧增长。

1976年时两岸转口贸易总额不到1万美元，1980年增至320万美元，1990年激增至40亿美元，2001年323亿美元。从2001年起，祖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目前，台湾输往大陆货品总额已占台整体出口额的23%，超过出口美国21%的比重，并成为台湾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台湾对大陆的巨额出口及高额顺差（2001年223亿美元），已成为台湾经济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1978～2001年间，两岸间接贸易额累计已达2233亿美元。

2001年底海峡两岸相继加入WTO之后，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更为密切。

海峡两岸经贸情况，如图表16－2所示：

图表16－2　　海峡两岸经贸情况

（单位：亿美元）

项目＼年份	1976	1980	1990	1995	2001
两岸转口贸易额	0.0001	0.032	40.4	210.0	323.0
台商在大陆累计合同投资额	0	0	7.6①	380.0②	547.0

①1989年统计数；②1997年统计数。

十一、台资登陆

大陆也是台商对外投资最多之地。至2001年底，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项目累计为50820个，累计合同台资金额547亿美元，实际投资293亿美元。2002年又有台资38亿美元登陆，投向江苏、广东、福建等地。

迄今为止，台商投资内地已形成四波热潮：第一波投资因应台岛产业转型，劳力密集型传统产业转移至内地；第二波投资是因台岛电子工业吸收美国代工产能，为建立大规模生产基地而投资内地。前两波投资的主要特点均以曲线登陆（通过香港或其他第三方转投）和试探性投资为主，且投资者多为小公司；第三波则是在PC产业成熟后，组装厂为追求“全球运筹”的成本效益而投资内地；第四波从2000年开始出现，以2001年海峡两岸相继加入WTO为契机而有不少大公司和技术含量高的公司参与，投资领域从加工业扩大到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业。

十二、交通运输网络

台湾在发展经济和外贸的同时，建成发达的对内对外交通运输网络。对外运输主要依赖远洋航运（货运）、国际航空（客运、部分货运），岛内运输主要依赖陆运（公路、铁路客货运）、沿海航运（货运为主）；离岛运输则主要依赖支线航空（客、货运）和海运（货运为主）。

主要运输线路，陆运有南北高速（中山高速）公路和环岛公路；纵贯铁路、环岛铁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建筑南北高速铁路。

这条高速铁路北起台北，南至高雄，全长343公里，纵贯台岛西侧的14个县市，设计行车速度最高为300公里川、时，预计在2003年以后建成营运。鉴于高速铁路建筑标准高，沿线地带业已实现城市化，城镇分布和工业布局均很密集，加上各种运输线路纵横交错，征地拆迁费用十分昂贵，故主要采取从地面以上通过方式。全线343公里中约有75%为高架桥，13%为隧道，创铁路建设与布局之奇观。

中国台湾的海运线主要有环岛航线和通往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定期航线。

高雄港为台湾第一大港、南台湾海上门户，兼有商港、军港和渔港的职能。主航道宽440米，商港港区面积26.8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14.4平方公里，内港水域面积12.4平方公里，水深16米，平均潮位0.75米，可通行10万吨级以下船舶。至2002年，建有118座码头泊位，码头线总长26.6公里，其中集装箱泊位26个，长7791米，6000TEU集装箱船可自由出入。此外，尚有散货泊位32个、杂货泊位30个、粮食泊位3个。

2002年高雄港吞吐集装箱849万TEU，居世界第5位。原为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近年因箱源减少而使其在世界排名下降。高雄港定位是具有国际转运中心功能的枢纽港，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再出口的基地。

基隆港位于台岛北端，在1960年以前是台湾第一大港，现在仅次于高雄居第2位，为台北的出海口，集装箱吞吐量曾居世界前列，现下降至第30位，但仍为国际集装箱港之一；西海岸中段的梧栖新港，亦称台中新港，是70年代才建成启用的，面临台湾海峡，10万吨级船可自由出入，20万吨级船需候潮通行；西海岸的另一个港口一布袋港，是台湾本岛距广州、厦门航程最短的港口，已于1995年上升为台湾的第四大商港，近期分担高雄、台中等国际商港的一部分运量，远期则将成为海峡两岸的直航港口。东海岸的花莲港正在进行扩建，在巨型防波堤内建有9个深水泊位，不仅是台湾也是中国唯一直接濒临太平洋的优良深水港。

台湾航空运输辟有国际航线103条（客运48条、货运55条），地区航线22条。重要机场有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台北国际机场、高雄国际机场。其中建成于1979年的桃园中正国际机场为台湾第一大机场，2001年旅客、货物吞吐量分别为1097万人次、100万吨，预计2021年可达4926万人次、354万吨；高雄机场2001年旅客、货物吞吐量分别为300万人次、12万吨，预计2001年分别达到566万人次、54万吨。此外，在马公、花莲、台东、台南、台中、嘉义等地建有中、小型机场。台湾地区经营民航业务的航空公司有6家，以中华航空公司规模最大。

十三、城镇体系，城市化水平，城市布局

台湾在19世纪末期时，超过5000人的都市聚落只有14个，分别是：台南、嘉义、新竹、彰化、宜兰、风山、大稻埕、艋甲、鹿港、朴子、北港、盐子、北斗、东港。经过近一百年来的发展，至1995年，台湾已有92个城镇的人口在5万以上，城市化率高达80%，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城市布局呈现出连绵化的态势。目前，台湾地区的设市城市有28个。其中，"行政院直辖市"2个（台北、高雄）、台湾省辖市5个（基隆、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各县辖市21个。另辖建制镇61个。

台北市位于台北盆地内，是台岛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亦为文教科技中心，陆、空交通枢纽。面积272平方公里。1920年设市，人口16万，1944年增至40万人，1960年逾90万人，20世纪末达到280万人，其中从事商业、服务业者占70%；20世纪50~80年代人口高速增长（主要因为工业经济起飞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但分布极不均匀，人口密度西部高于东部。在土地开发方面，西部开发强度大于东部。后因富裕阶层向郊外迁移，使台北的东、北部发展迅速。

自然地理条件已成为台北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全市适宜城建用地约102平方公里，业已开发殆尽。又因地处盆地，周边山丘环立，过度开发易引发生态灾害，且城市用水短缺，21世纪初曾出现断水局面。由于长期过量抽取地下水，还出现地面沉降现象。2003年的缺水更是波及整个北台湾，并阻碍产业复苏。

由于土地开发处于饱和状态，城市发展和建筑布局只能拆旧布新，或者孤立地向高空伸展，难以顾及与周边建筑的和谐协调。如地处台北信义计划区闹市的101大楼，高达508米（101层），为目前世界第一高楼，楼内有161家商店，开业后成为台北新的购物及娱乐中心，但也有一些附近居民基于安全考虑而宁愿选择别的购物去向。

高雄是南台湾经济中心，工业、港湾城市，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再出口基地。面积152平方公里，人口146万。高雄港为台湾第一大港、世界第五大集装箱港，因实行"市、港合一"而促进了高雄市的进一步发展。

近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市场发育程度完善，台湾80多个城镇之间经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多种联系得到发展。其联系的密切与否，同城市的区位情况、经济发展特色、产业构成、城市主导产业和中心功能的形成与辐射扩散、交通运输线的走向与布局以及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等，均有直接关联。台湾有建制的城市及管理体系，如图表16-3所示：

图表16-3　　台湾地区有建制的城市及其管理系统

城市隶属关系	城市数（个）	人口规模（万人）	城市名称
"行政院"直辖市	2	150~300	台北、高雄
台湾省辖市	5	20~80	基隆、新竹、台中、嘉义、台南

城市隶属关系	城市数（个）	人口规模（万人）	城市名称
县辖市	21	20以下	板桥、三重、中和、永和、新庄、新店（以上属台北县）、宜兰（属宜兰县）、桃园、中坜（以上届桃园县）、竹北（屑新竹县）、苗栗（属苗栗县）、丰原（属台中县）、彰化（属彰化县）、南投（属南投县）、斗六（屑云林县）、新营（属台南县）、风山（属高雄县）、屏东（属屏东县）、台东（属台东县）、花莲（属花莲县）、马公（属澎湖县）

资料来源：池田哲夫、胡欣：《台湾经济结构重组及其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由于以上一系列原因，使台湾的各城镇之间，在行政隶属关系及其管理系统以外，又形成了以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为主要形式与脉络的复杂的城镇体系。这种城镇体系的发展与建设，在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结构重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特别的意义。

十四、六大都会区

由于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加之城市之间经济文化与社会联系充分发育，使众多10万人口上下的小城市集中分布于大中城市周围，至20世纪90年代已形成或大体形成下列6大都会区：(1) 台北都会区；(2) 高雄都会区；(3) 台中都会区；(4) 台南都会区；(5) 桃园—中坜都会区；(6) 新竹都会区。其中，台北都会区形成最早（20世纪60~70年代形成）、规模也最大（台北50公里以内地区聚集了台湾20个主要城市中的11个）。

六个都会区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现有城市规模、发展潜力、近期与远期发展前景等因素加以综合衡量的，并非只考虑现有城市规模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因为单纯从现有城市规模来看，基隆市、嘉义市在台湾分别居第5位、第7位，但它们的发展潜力有限，或者只是一般生活圈中心城市（如嘉义），或者只是具有某一方面特殊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如基隆）。故均未选择作为建设都会区的对象。

相反，桃园市和中坜市现有城市规模甚小，但因其地位重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干线建成和规模最大的桃园国际机场开放以后，这两个原来的小镇，皆因其区位因素显要、发展潜力大，一跃而为最具发展前途的城市之一，故合在一起作为台湾第五大都会区进行规划建设。

十五、主要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比较分析

台湾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市区面积小，人口密度高；除个别城市（如新竹）以外，人口老化指数普遍较高；此外，城市化程度、居民生活水准也较高。在岛内七个主要城市中，按人口密度以台北居首位（9718人/平方公里），以下依次为：高雄、台中、嘉义、

台南、基隆；人口老化指数也以台北居首席，65岁以上人口与0～14岁人口比率高达47.43%，而新竹则因新竹科学园区中多为中青年科技人员，故全市老化指数仅27.76%，是台湾最年轻的城市；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台湾城市通常都是地狭人众，居住拥挤，但嘉义市相对宽裕，人均住房40.4平方米，在七个主要城市中居首位，台北、基隆人均住房分别为28.2、29.1平方米，居倒第1位、第2位，是台湾较拥挤的城市；在所得消费方面，台北市1999年度平均每人可支配的所得为33.7万新台币，在七城市中居首位，台南市22.4万元，位居末席。

第四节 不同体制框架下的区域（以“泛珠”为例）经济合作

一、“泛珠”概念缘起及地域涵盖

泛珠三角的概念缘起珠江，它同珠江流域的“自然流向”以及最终注入南中国海而构成的“经济流向”和文化联系密切相关。

“泛珠”概念形成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动态过程，从最初十分狭小的2市14县扩展到后来的9市40个县级市，再急剧膨胀至现今9省（区）2个特别行政区，其意义远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延伸，更在于对不同体制框架下区域合作理念的认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制度创新、地域创新和发展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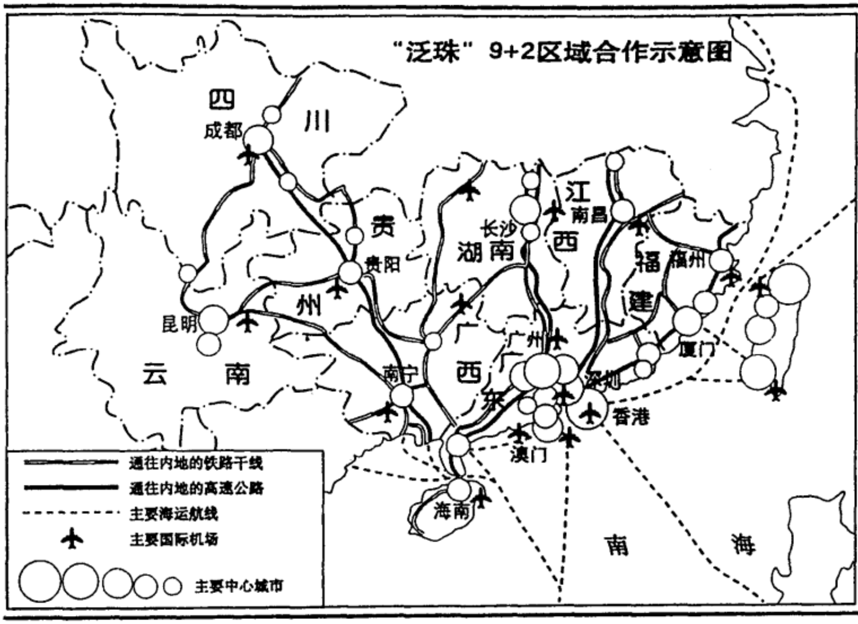
二、中国最大规模的区域合作工程

泛珠三角区域包括内地9省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和香港、澳门，简称9+2。内地9省区有土地面积199.5万平方公里，人口4.5亿，分别占内地20%、34%，2002年GDP3.5万亿元，占内地34%，加上港澳，泛珠在全国地位十分突出。

泛珠区域合作由广东省政府发起，得到周边省区和港澳响应，这一规模大、地域范围广、不同体制框架下的区域组合，已成为我国区域合作发展中的一个新尝试，也是东中西部经济互动协调发展的突破。

泛珠9+2区域合作示意图，如图表16－4所示。

鉴于狭义的珠三角土地资源少，开发已近饱和，而且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故很必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十至二十年内，在联系密切的广阔地域内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布局重组，利用互补性展开合作，形成最大规模的区域合作经济体。在“十一五”规划中，国家将重点支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包括重点支援



图表 16－4

"泛珠"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确保口岸安全畅通，加强跨省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优化港口、公路、铁路物流交通网络，加强电力、能源及矿产原材料等方面的统筹协调。

2003 年，泛珠 9 省协作会议商讨建立政府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区域内资源利用和合理共享，营造区域经济发展多赢格局。2004 年相继在香港、澳门、广州举行的"9＋2"区域合作发展论坛，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区域合作工程正式启动的标志，并留有台湾参与其中的发展空间。

第二篇

光辉的成就

第一章 从贫穷走向小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年来，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们的国家，已经从落后走向昌盛，从贫穷走向小康。

第一节 经济发展成果巨大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如果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座宏伟的大厦，那么，经济的发展则是这座宏伟大厦的根基。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施，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以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的20年，又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增长速度占世界首位

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建国初期的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有679亿元人民币，1978年增加到3624.1亿元，到1998年进一步增加到79396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1998年GDP为902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位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之后，世界排名第七位。1980年到1989年和1990年到1998年两个时期内，GDP年均增长率世界发达国家分别为3.1%和2.3%，发展中国家分别为2.5%和4.2%，而我国1979—1998年GDP年均增长率则高达9.7%，保持了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1995年，中国提前实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令世界各国叹为观止。（参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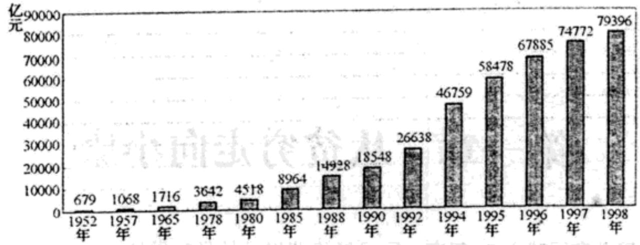


图1－1　1952—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数字绘制。1998年数参见《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二、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国内市场繁荣

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到1949年止，主要工业品最高年产量分别为：纱44.5万吨，布27.9万吨，钢92.3万吨，原煤6188万吨，原油32万吨，发电量60亿千瓦小时。主要农产品的最高年产量，粮食1.5亿吨，棉花为84.9万吨。这样落后的生产能力，还不断地遭到战乱的破坏，整个经济处于瘫痪状态。1949年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都仅相当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一半左右"。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50年的努力，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新中国建立以来的50年，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虽然受到过"大跃进"等急于求成的冒进运动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建国开始到1952年，在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和全面恢复、重点建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很快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并开始了部分重点建设。一些煤矿、电厂以及原材料工业项目的建设开始进行。自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建成了一批为建设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基础工业项目，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3—1965年进行的经济调整，对于纠正"左"的经济指导思想，保持合理的投资比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合理安排建设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改革投资管理体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固定资产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发挥，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仅1980年至199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就达169571.1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65306.59亿元，更新改造投资30912.1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32120.71亿元。建成投产

基本建设项目 788043 个，其中大中型项目 2704 个。1998 年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8406.17 亿元，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33430 亿元。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 42.2%。

其次，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不仅在建国初期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引导农民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走上集体化道路，而且，最终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干扰，通过反复探索，找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新路子。建国 5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亿万农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生产热情，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整个农村欣欣向荣。我国用占世界 10% 的耕地，养活了占全世界 22% 以上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总量上看，1998 年我国的农业增加值 14600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 1952 年增长 3.5 倍，平均每年增长 3.3%。1998 年我国的粮食、棉花、油料、糖料、水果、水产和猪牛羊肉产量分别是 49000 万吨、450.1 万吨、2313.9 万吨、9790 万吨、5452.9 万吨、3906 万吨和 4090 万吨，分别是 1978 年同类产品产量的 1.6 倍、2 倍、4.4 倍、4.1 倍、8.3 倍、8.4 倍和 4.8 倍，是 1949 年的 4.3 倍、10 倍、9 倍、34.6 倍、45 倍、87 倍和 18 倍。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由 1978 年的 2523 公斤/公顷迅速增加到 1998 年的 5800 公斤公顷，在粮食总产量连续跃上 35000 万吨、40000 万吨、45000 万吨和 50000 万吨四个台阶后，主要农副产品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得到改变，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由 1949 年的 209 公斤增加到 1998 年的 400 公斤以上，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都跃居世界前列。其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和水果等的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参见表 1－1)

表 1－1　　我国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项目	1949	1957	1965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谷物		3	2	2	1	2	1	1	1	1	1
肉类	3	2	3	3	3	2	1	1	1	1	1
棉花	4	2	2	3	2	1	1	1	1	1	1
大豆	2	2	2	3	3	3	3	3	3	3	4
花生	2	2	3	2	2	2	2	1	1	1	1
油菜籽	2	2	2	2	2	1	1	1	1	1	1
甘蔗		3		9	9	4	4	3	3	3	3
茶叶	3	3	3	2	2	2	2	2	2	2	2
水果					10	8	4	1	1	1	1

注：肉类 1993 年以前为猪、牛、羊肉产量的位次。

资料来源：1949—1997 年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30 页；1998 年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

在农业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一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或兴办乡镇工业，或从事商品流通，从而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到1998年，我国的乡镇企业已有2004万家，从业人员达1.3亿，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税收的1/5、出口交货的1/3，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6.3%，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0.8%，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同时，全国19216座由农民自己投资兴建的功能多样的小城镇（建制镇，不含县城），吸纳了73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为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城乡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保障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稳定大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良好环境。

再次，工业生产增长迅速，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旧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部门残缺不全，技术水平极其落后，严重依附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建立后，经过50年的建设，特别是近20年的改革开放，建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工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到199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35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49年的159倍。1978年到1998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5.9%。按现价计算，在1997年比1978年新增的71148.3亿元GDP增加值中，工业的贡献占42.36%；在1979年到1998年CDP年均增长的9.7%中，有4.7个百分点来自工业的贡献。我国现阶段的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约占88%以上，比改革开放前提高30多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199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12.4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了52.2倍。其中，原煤产量为12.5亿吨，比1949年增长38.1倍；原油产量1.61亿吨，比1949年增长1340.7倍；发电量为11670亿千瓦小时，比1949年增长270.4倍；钢产量1.16亿吨，比1949年增长721.4倍；纱产量为542万吨，比1949年增长15.6倍。到1997年，我国的煤炭、钢材、服装、水泥、化肥和电视机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发电量、化学纤维、棉布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其它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也居世界前列。(参见表1－2)

表1－2　　我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项目	1949	1957	1965	1978	1980	1985	1990	1992	1994	1995	1996③	1997
钢	26	9	8	5	5	4	4	3	2	2	1	1
煤	9	5	5	3	3	2	1	1	1	1	1	1
原油	27①	23	12	8	6	6	5	5	5	5	5	5
发电量	25	13	9	7	6	5	4	4	2	2	2	2
水泥		8	8	4	4	1	1	1	1	1	1	1
化肥		33	8	3	3	3	3	3	2	2	1	1
化学纤维		26②		7	5	4	2	2	2	2	2	2

项目	1949	1957	1965	1978	1980	1985	1990	1992	1994	1995	1996[3]	1997
棉布			3	1	1	1	1	1	1	1	1	2
糖			8	8	10	6	6	3	4	4	4	4
电视机			8	5	3	1	1	1	1	1	1	

注：①为 1950 年数字，②为 1960 年数字，③为估计数。

资料来源：1949—1996 年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33 页；1997 年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提供。

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也有了显著改善，已经能够独立研制和生产一大批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技术装备。

三、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繁荣

工农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推动了国内贸易发展迅速，国内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建国初期，我国商品市场网点稀少，行业不全，市场不景气，国内贸易发展落后。五十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内市场在多数时间里都呈现出稳定和均衡运行态势，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总体逐步呈现出供给充裕状态，各类商品品种丰富，质量、档次大大提高。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后，市场规模扩大更为迅速，市场淡旺逐渐不甚分明，月度之间、年度之间没有大的波动，表明我国国内贸易与国内市场已初步进入成熟状态。

分城乡市场看，建国以来，农村市场在多数时间里大于城市市场，特别是 80 年代，由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展开，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市场快速发展起来，到 1989 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540 亿元，比 1952 年的 137 亿元增长了 24.8 倍。1990 年以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市场增速开始加快，在规模上迅速扩大并超过农村市场。1998 年农村市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327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81.6 倍；城市市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825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40.9 倍；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1952 年 262.7 亿元，增加到 1978 年的 1264.9 亿元，到 1998 年又进一步增加到 29152.5 亿元，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5.4%，1979—1998 年平均每年增长 9.6%。市场交易量的迅速增加，推动了各类商品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国市场繁荣，各类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商品质量不断提高；物价稳定，长期困扰我国的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基本改变，买方市场初步形成。

四、交通运输发展迅速，邮电通讯业蒸蒸日上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铁路营运里程 1949 年仅有 2.2 万公里，1998 年发展到 5.76 万公里，增长了 1.6 倍，其中 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2.9%，1979—1998 年平均每年增长 0.9%。公路里程 1949 年为 8.1 万公里，1998 年发展到 127.9 万公里，增长了 14.8 倍，其中 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7.8%，1979—1998 年平均每年增长 1.8%。内河航运里程由建国初期的 7.36 万公里增加到 1998 年的 11 万公里，增长了 40.3%。民用航线里程 1952 年为 1.31 万公里，1978 年发展到 14.89 万公里，1998 年进一步发展到 150.58 万公里，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9.8%，1979—1998 年平均每年增长 12.3%。在营运里程迅速增加的同时，各类运输线路的建设质量与营运质量也大大提高。例如在公路方面，等级公路所占比重逐年上升，1998 年达到 83%；无路面公路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仅占 7%；近几年，我国高速公路发展迅速，达到 8733 公里，已跻身世界前列。

邮电通讯业的发展更为迅速。邮电业务总量由 1952 年的 1.64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2431.21 亿元，其中，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7.8%，1979—1998 年平均每年增长 24.4%。交换机容量由 1952 年的 47.1 万门，增加到 1998 年的 13823.70 万门，其中，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8.6%，1979—1998 年平均每年增长 19.3%。电话机由 1952 年的 39 万部，增加到 1998 年的 13123.4 万部，其中，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9%，1979—1998 年平均每年增长 19.6%。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建国 50 年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且也为 21 世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国家财力逐步增强，金融事业蓬勃发展

新中国建立之初，社会经济落后，国家财力枯竭。1950 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 65 亿元。建国 50 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1998 年，全国财政收入达 9853 亿元，比 1950 年增加了 132 倍。同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曲折性相关，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差别较大。“一五”时期，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确指引下，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1%。“大跃进”时期，在“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下，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平均每年仅增长 0.2%。1963—1965 年三年调整时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对“大跃进”造成的失误进行了纠正，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也以平均每年 14.7% 的速度增长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也就比较缓慢。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1979—1997 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1.3%。国家财政实力的增强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事业不断发展，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已经成为聚集和分配资金的重要渠道，其重要意义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1998年金融机构吸收的各项存款达95697.9亿元，是1952年92.3亿元的1036.8倍；同年发放的各项贷款达86524.1亿元，是1952年108亿元的801.1倍。金融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各项其它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居民收入大幅增长　生活显著改善

建国5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已使我国人民逐步摆脱了贫穷走向小康。

一、居民收入大幅增长

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人民收入水平很低，到1949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过100元。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1952年仅有156元，1978年为343元，到1998年则已提高到5425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3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49年仅有44元，1978年为134元，到1998年则已提高到2162元，扣除价格因素，1978—1998年，平均每年增长7.9%。（参见表1－3）

表1－3　　部分年份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单位：元

年份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人均年总收入	748.92	1522.79	4288.09	4844.78	5188.54	5458.34
人均可支配收入	739.08	1510.16	4283.00	4838.90	5160.32	5425.05
财产性收入	3.74	15.60	90.43	111.98	124.39	132.87
转移性收入	65.88	250.01	587.61	660.42	756.86	878.99
特别收入	35.95	69.46	152.14	171.68	198.06	210.50
其它劳动收入	12.36	22.61	96.91	116.37	142.93	174.00

资料来源：1985—1997年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1998年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

随着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在消费之余，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也迅速增加。1952年，城乡居民储蓄极少，仅有8.6亿元，1978年增加到210.6亿元，到1998年又迅速增加到53407.5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也由1952年的1.5元、1978年的22元增加到1998年的4299元。

改革开放后，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的收入来源也

大大拓宽。城镇居民收入由原来单纯依靠工资收入，转变为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个体经营收入、从事第二职业收入和股票债券收入比重提高的多元化格局。1998年，国有、集体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全部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92.6%下降到66.9%，下降了25.7个百分点；从事个体及其它劳动收入的比重为7%；财产和转移性收入比重达22.3%。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呈现由以集体统一经营收入为主到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以粮食收入为主到农业、工商业等多种经营收入并重的新变化。1978年，集体收入占农村全年纯收入的比重为66%，1985年以后，这一比重便迅速下降到不足10%；1978年，农民从事第一产业所得收入占全部生产性纯收入的比重为91.5%，到1998年便下降到60.7%，下降了30.8个百分点；而从事第二、三产业所得收入比重也由不足10%提高到39.3%。(参见表1-4)

表1-4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年份农民收入增长　单位：元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人均总收入	151.79	216.22	547.31	990.38	2337.87	2806.73	2999.20	3018.48
人均纯收入	133.57	191.33	397.60	686.31	1577.74	1926.07	2090.13	2161.89
转移和财产性收入	9.52	22.40	29.91	35.79	106.75	122.17	115.96	122.40

资料来源：1978—1997年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1998年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收入的增加，我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1978—1993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8000万，到1996年，又减少了3200万。1998年底，全国贫困人口进一步下降到4200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1998年的4.6%。

二、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经济收入的迅速增加，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生活质量大大改善。

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建立前，绝大部分人生活艰难，食不果腹。经过近30年的努力，1978年绝大部分地区已实现温饱型消费；1978年以后20年的改革开放，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在温饱问题得到全面解决后，人民消费性支出基本上都用于吃饭穿衣的状况明显改观，由以吃、穿等基本生存资料为主较快地向以用、住、行等发展和享受资料为主的转变。195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仅为80元，1978年提高到184元，到1998年则猛增到2973元。其中，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1952年为154元，1978年提高到405元，到1998年进一步增加到6201元。农业居民人均消费1952年为65元，1978年提高到138元，到1998年进一步增加到1892元。197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物性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7.5%，到1998年，则降低到44.48%。1978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由67.7%降低到1998年的53.4%。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分别达到或接近联合国粮

农组织提出的小康标准（40%—50%）。

同时，我国居民的食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历了由吃饱到吃好、由追求数量品种增加到讲究营养质量提高的过程。首先是居民饮食结构中粮食直接消费量下降，突出地表现在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建国初的1957年的167.2公斤下降到1998年的86.7公斤，开始摆脱以粮食为主的粗放方式，逐渐向讲究营养、风味、保健及方便等方面转变。其次是粮食消费的内部结构中玉米、高粱、红薯等粗粮的消费明显下降，而大米、小麦等细粮的消费则明显上升。在农村居民的主食结构中，建国初期，粗粮占绝对比重，到1978年粗细粮比例各占50%，1998年细粮比重进一步提高到83.9%。再次是副食特别是动物性食品消费的比重明显提高，居民传统的以粮食、蔬菜为主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肉类、家禽、鲜蛋、水产品、植物油、奶品等的消费量全面增加。与1957年相比，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副食消费量中，植物油增长81%；猪肉增长1.4倍；牛羊肉增长1.8倍；家禽增长2.9倍；鲜蛋增长2.3倍。1998年，农村居民饮食结构中人均主食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65.3%下降到35.5%，人均副食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31.4%上升到42.9%。（参见表1－5）

表1－5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主要食品数量　　单位：千克

项目	解放前	1957	1985	1988	199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粮食	108.4	167.16	134.76	137.17	130.72	101.67	97.00	94.68	88.59	86.7
鲜菜	76.8	109.14	144.36	147.02	138.70	120.74	116.47	118.51	113.34	113.8
食用植物油	6.0	4.20	5.76	6.96	6.40	7.53	7.11	7.13	7.20	7.6
猪肉	3.1	6.72	16.68	16.94	18.46	17.12	17.24	17.07	15.34	15.9
牛羊肉	1.2	1.20	2.04	2.81	3.28	3.10	2.44	3.29	3.70	3.4
家禽	1.0	1.20	3.24	4.00	3.42	4.13	3.97	3.97	4.94	4.7
鲜蛋	1.4	3.29	6.84	6.87	7.25	9.68	9.74	9.64	11.13	10.8
水产品	5.6	7.62	7.08	7.07	7.69	8.53	9.20	9.25	9.30	9.8
食糖		1.44	2.52	2.58	2.14	1.91	1.68	1.71	1.63	1.76

资料来源：1957年数据见《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1985—1997年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1998年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

居民穿着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在经历了由穿暖到穿好，由单调、低档到多样、中高档的发展过程之后，我国居民衣着消费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明显提高：一是衣着原料提高，粗棉布的消费相对下降，对高档纯棉制品、化纤布、绸缎、呢绒、毛料等的消费上升；二是成衣率提高，购买布料自制衣着的数量减少，成衣消费大大增加，特别是花色、款式明快新颖的中高档服装消费增长较快。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服装5.8件，比1957年增长7.3倍；农村居民人均购买各种布料1.97米，比1957年增长7.3倍，人均购买成衣1件，比1983年增长1.2倍。

耐用消费品数量迅速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建国初期，居民用品消费主要以日常生

活用品等生存资料为主，耐用消费品数量很少。经过50年的发展，耐用消费品已成为居民用品消费的主流，而且耐用消费品还不断升级换代。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消费经历了由60、70年代的“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向70、80年代的“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音响、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的转换过程。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新六件”迅速扩张，目前在多数城镇居民家庭中已接近饱和。近几年，消费热点又开始转向电话、空调、家用电脑、商品房以及汽车等新的科技含量高、功能齐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万元级、十万元级耐用消费品开始进人普通居民家庭。199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105.4台、洗衣机90.8台、电冰箱76.1台、空调器20台、家用电脑3.8台和轿车0.3辆。改革开放20年来，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目前，农村居民对“老四件”的拥有量已经饱和，正处于加速普及“新六件”的阶段。199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96台（其中彩电33台）、收录机32台、洗衣机23台和电风扇112台，录像机、照相机、电冰箱甚至空调、电脑等也已进入部分富裕农户家庭。

三、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建国前，我国居民住房条件极差，城镇居民居住拥挤不堪，一间房住3—5人的家庭占到总户数的70%以上，农村住房则以土坏草顶房为主。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居民住房条件得到逐步改善。在城镇，随着住宅建设的加快，住房条件改善很快。199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1956年的4.26平方米增加到12.4平方米，增长了1.9倍，68.3%的城镇居民家庭住上了单元配套住房；人均居住面积8平方米以上的家庭，在1982年仅占总户数的10.2%，到1998年便提高到76.8%。农村居民平均每户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8.1平方米，增加到1998年的23.7平方米，增长了1.9倍，人均住房面积中，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占75.4%，比1981年的48.6%提高了26.8个百分点。

四、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旧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瘟疫、霍乱、结核、疟疾、麻疹、乙脑等多种流行性恶性疾病猖獗，缺医少药甚至无医无药的现象比较普遍，人民的生活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解放前夕，全国平均每千人仅有病床0.15张，卫生技术人员0.93人，医生0.67人。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卫生机构数由1949年的3670个增加到1998年的31.4万个，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从8.5万张增加到291.4万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由50.5万人增加到442.4万人。截止1998年，每千人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2.33张，每千人有医生数1.6人。1998年，全国73万个行政村中设置医疗点72.9万个，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达到132.8万人，基本形成了遍布城乡、比较健全的医疗网络，许多疾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有的已基本灭绝。目前我国已经消灭或基本消灭了

鼠疫、霍乱、天花、回归热、黑热病等传染病，有效地控制了白喉、麻疹、脊髓灰炎、流行性斑疹、伤寒、吸血虫病和布鲁氏菌病等多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流行，一些目前尚未消灭和控制的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都显著下降。人民的平均寿命已从解放前的约35岁提高到目前的71岁左右，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的33‰以上下降到目前的6.5‰，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约200‰下降到目前的33.1‰。居民的身体素质大大增强。8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0—7岁儿童各年龄组身高平均提高了1.1厘米，体重增加了0.26公斤。1995年与1979年相比，7—18岁各年龄组城市男性身高增加了1—4厘米，体重增加了2—5公斤；农村男性身高增加了3—7厘米，体重增加了2—7公斤。人民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同时，享受健康快乐的人生。

第三节　科技蓬勃发展　教育成就显著

建国50年来，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教育事业成就巨大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在一个经济落后、教育极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只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学校布局也不合理，农村、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很少。高等教育更为落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12—1948年的36年中，高等学校毕业生仅有21.08万人，而且科类结构也极不合理。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得到了确立，在各个方面的大力推动下，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享受教育的范围大大扩展。到1998年，全国已有65%以上的人口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6%以下，基本改变了我国文盲、半文盲大国的状况，国民素质和社会文化程度明显提高。

高等教育在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的发展格局，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由1949年的11.7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85.6万人，又进一步增加到1998年的340.9万人。仅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高等院校就培养本、专科大学生和研究生1801.15万人，其中博士生3.6万人，硕士生39.46万人。（参见图1－2）

中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其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56%，1978—1998年中等职业教育为经济建设培养了2770.22万中等实用型技术人才。我国原有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得到了补充和充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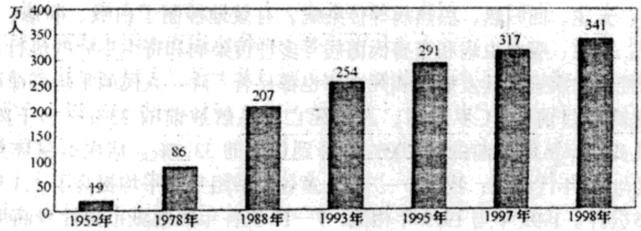


图 1－2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及《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数字绘制。

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的成人教育成绩显著。全国已经有 80%以上的乡镇和 40.5%以上的行政村建立了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农村成人教育培训网络。数以亿计的职工和农民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岗位培训和文化技术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以来，报考人数累计已达到 2000 多万。

妇女和儿童教育、少数民族教育、贫困地区教育和特殊教育得到空前发展。普通高校、普通中学和小学女学生占大中小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从 1978 年的 24.2%、41.5%、44.9%，提高到 1998 年的 38.3%、45.7%、47.6%。1997 年，少数民族学生占大、中、小学总数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4.2%、3.8%、5.3%，分别提高到 6.8%、6.7%、8.9%，已接近或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内蒙古等 8 个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省（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8.9%。全国有 1 万多所各类学校进行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涉及少数民族语言 60 多种；多种形式的特殊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校生从 1978 年的 3.1 万人增长到 1998 年的 35.8 万人。

在教育规模得到迅速扩展、教育水平得到巨大提高的同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教育体系方面，经过多次调整和改革，初步确立了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以普通高等教育为龙头、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共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办学体制方面，打破了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起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新体制，民办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到 1998 年，社会力量兴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已达 5 万多所，在校学生人数达到 1600 万人左右。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初步形成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把义务教育的责任放到地方，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性。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政府统筹管理下，发挥自己的特色，面向社会办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等多种形式，初步打破了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已有 648 所普通高校进行了管理体制的调整，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新体制框架正在形成，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得到提高。在招生和毕业生分配方面，实现了高校招生收费并轨改革，大中

专毕业生实行了“双向选择”、逐步走向自主择业的新体制。

与此同时，我国教育的对外交流不断扩大，形成了广泛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格局。至1998年，我国已与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交流和合作关系，对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先进经验的吸引和借鉴，对国外的先进教材和教学方法的合理引进，推动了我国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仅在改革开放的20年间，我国务类出国留学人员就达到近30万人，遍布世界上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公派约4.7万人，单位公派9.2万人，自费留学生约15.4万人。目前已有9.6万人学成回国，成为促进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接受外国留学生来我国学习，也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78年的29年中，我国有30多所学校接受了来华留学生共1.2万人，改革开放后来华留学生人数更是大幅度增加，20年中共有330所高校接受来华留学生总数达25.8万人。

我国高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力度也明显加强。1978年到1998年，全国600所高校先后聘请数万名外国专家、教师来华任教和进行合作研究。1997年，仅教育部直属的高校聘请外国专家和教师就达3658人。

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

新中国建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事业的地位大大提高，科技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科学技术研究形成了新的格局，科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科学技术水平在许多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1. 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促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新中国建立伊始，科学技术事业即受到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科技发展被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文化大革命”等一类错误的政治运动给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科技人员发奋努力，我国科技事业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已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提出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科技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结合。我国实施了各种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工作计划，如攻关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成果推广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等等。科学技术更加广泛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加快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强了竞争力。至199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达到10%，主要工业制造设备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占30%，现有工业生产设备具有90年代技

术水平的已近40%。由于科学技术进一步渗透到生产领域，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在20年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8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53.5%，工业制成品占46。5%，1998年工业制成品已上升到88.8%。在农业方面，由于大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如推广水稻旱育稀植和节水技术、紧凑型玉米、塑料暖棚畜禽饲养、ABT植物调节剂和小麦旱地全生育期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等，几年来增产粮食150亿千克，增加经济效益200多亿元。星火计划的实施，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既起到传播技术的作用，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 基础科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高科技研究取得可喜的进展。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国家和地方设立了多种基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同时国家还通过实施重大科学工程、攀登计划、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措施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并取得了明显成绩。“八五”以来，我国高温超导研究、证明定理的数学机械化方法、水稻基因组物理图谱、澄江动物化石群发现等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一批新兴学科如生命科学、表面科学、纳米科学、非线性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地球系统科学等得到了迅速发展，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高技术研究方面，我国从无到有，60年代就研制成功原子弹、导弹，70年代初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改革开放以来，又成功地实施了“863计划”，跟踪世界高科技前沿，十余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我国自主研制了12英寸直拉单晶硅，成功推广两系法杂交水稻，从而比三系法增产10%—15%，并继续保持国际领先水平。高技术研究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加强。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到1996年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到40%，使我国数字程控机从国外公司绝对垄断下夺回了1/3以上的市场份额；国产微机已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网络光纤传输设备已占20%的国内市场。

“863”计划

1986年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组织下，200多位专家参与制定了《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863”计划纲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17个主题，作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新技术的重点，其目标在于：(1) 积极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情况，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力争在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项目上有所突破；(2) 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创造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3) 尽快实现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为形成中国的新兴高技太产业奠定基础，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国民经济基础发展和国家安全服务；(4) 为全国范围内的高技术发展起到先行和推动的作用，为国民经济向更高水平的持续快速发展准备后劲。

3. 科技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科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针对高科技体制存在的科技与经济分离、科研企业活力与效率不高等弊端，1978年以后，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形势，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深入地展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

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1988年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1996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引下，科技体制改革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这一基本问题，从科技系统内部改革起步，以运行机制改革为重点，带动组织结构的调整和管理制度的改革，从解决与经济相关的科技问题逐步向推动农村、企业及全社会科技进步的广泛领域推进。进入90年代以后，科技体制改革又向着“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形成科研、开发、生产、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和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以及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工作实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到1997年我国与1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95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加入了75个国际学术组织，283家研究开发机构被授予外贸经营权。在国际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1997年达到294亿元。在对外开放中，我国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了我们的发展起点，在国民经济若干领域如通讯、电子、汽车、航空、钢铁、化工等行业，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在家电行业，我们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吸收、消化、创新，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家电生产大国，若干家电产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攻关，我国掌握了大型火力发电机组等一大批成套技术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技术，5000吨级货物重载列车已经在京沪、京广线上开通，增加年运输能力1300万吨。

4. 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1998年末，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091.3万人，是建国初期1952年的49.2倍，每万名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2374.2人。

第四节　经济结构趋向合理
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建国5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还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经济结构大大改善，渐趋合理；二是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一、经济结构明显改善

旧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2年，国民经济依然相当落后，产业结构也很不合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占56.9%，轻工业产值占27.8%，重工业产值占15.3%。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通过不断改革与调整，纠正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农业基础薄弱，农轻重

比例严重失调”的格局，使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

1. 产业结构的比例日趋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扩大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口，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措施，使产业结构明显改善。1979—1998 年，我国在 GDP 迅速增长的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 5%，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增长 11.7% 和 10.5%，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 1978 年的 28.1:48.2:23.7，变为 1998 年的 18.4:48.7:32.9。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基本符合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即第一产业比重逐步正常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更快一些。自 1985 年后，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一产业比重，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开始从主要由第一、二产业带动转向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带动。在此期间，我国工业化进程有所加快，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产业。（参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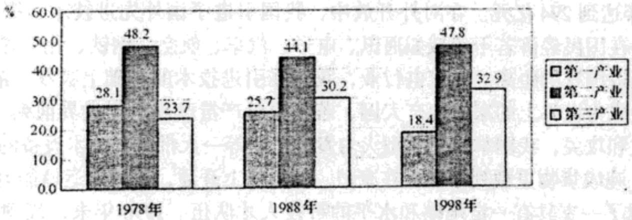


图 1－3　产业结构变动图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绘制。

2. 产业内部结构关系明显改善。在农业内部，突破了种植业一统天下的局面，纯农业产值比重下降，林、牧、渔业比重上升。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1978 年农业占 80%，林、牧、渔业分别占 3.4%、15% 和 1.6%；而到 1998 年；农业下降到 56.2%，林、牧、渔业分别上升到 3.4%、30.8% 和 9.6%。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结构正逐步由偏重消费补偿的“轻型结构”向投资导向的“重型结构”升级。在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产值的比例，1978 年为 43.1：56.9，到 1998 年则变为 49.3：50.7。在第三产业内部，交通运输业、商业等传统第三产业的比重下降，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等新兴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并逐步发展为贸易、餐饮、金融、保险、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房地产等行业并举的格局。这些变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无论是产业之间还是产业内部，都在向着合理化、高级化的方向前进。

3. 初步形成了与目前生产力水平较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建国初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导的国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

成的偏差，特别是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所有制改造走入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结构的误区，到改革开放前夕，形成了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被消灭，公有制一统天下、国有经济占居主体地位的不合理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经济质量不断提高、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并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就业结构优化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就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就业结构也明显改善。建国初期的1952年，我国从业人员为20729万人，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为：83.5:7.4:9.1；1978年从业人员上升为40152万人，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变化为：70.5:17.3:12.2；1998年从业人员达到69957万人，在三次产业就业的构成为：49.8:23.5:26.7。可以看出，新中国50年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迅速提高。（参见表1－6）

表1－6　　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员

年份	从业人员（万人）				构成（合计＝100）		
	总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2	20729	17316	1528	1885	83.5	7.4	9.1
1978	40152	28318	6945	4890	70.5	17.3	12.2
1997	69600	34730	16495	18375	49.9	23.7	26.4
1998	69957	34838	16440	18679	49.8	23.5	26.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28页；《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三、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

城市化水平是反映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旧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很低，城市的数量少、人口少、经济发展水平低。到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我国城镇总人口（包括城市人口和镇的人口）只有5765万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到1978年，我国城市的数量已达到193个。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到1998年我国城市的数量已增加到668个。从城市规模看，小城市增长最快。从地区分布看，城市化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和明显的地区优势，以北京、天津、青岛、沈阳、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上海、南京、杭

州、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功能互补的城市群。

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多，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8%—10%左右徘徊，而到1998年末，这一比重已经提高到18%，城镇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30.4%。(参见表1－7)

表1－7　　1978—199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变动趋势　　单位:%

年份	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1978	8.3	17.9
1992	14.0	27.6
1994	16.0	28.6
1996	17.0	29.4
1998	18.0	30.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提供。

在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的同时，城市的综合实力也大大增强。一是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以1997年为例，我国22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市区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就有34个，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万元以上的就有109个。二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1988—1996年间，我国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3%。在非农业人口2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1996年第三产业占整个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达到49.3%。

城市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民经济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城市群的形成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从计划转向市场

从1978年底开始，我国对50年代初逐渐形成、曾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从计划转向市场，这一重大改革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经过20年的努力，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

第一节　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50年来，为建立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关系，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改革。这一过程充满曲折反复，最终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下来。

一、公有制经济质量提高控制力增强

随着所有制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的深入展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效率。

首先，国有资产保持高速增长，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改善。

新中国建立后，国有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国有资产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后，国有资产的增长进一步加速。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1996年，国有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50428.2亿元和34995.9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了10.2倍和近10倍。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达到82211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为62405亿元，占75.9%；非经营性资产19806亿元，占24.1%。

1978年国有工业的总产值为3289.2亿元，1998年达到34109.6亿元。国有资产总量年平均增长15.5%。到1998年底，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只占39.2%，但资产总额占68.84%，销售收入占52.33%，工业增加值占57.03%，实现利润占36.01%。不仅如此，国有企业还承担了相当大的改革

成本。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国有经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应地也有所下降，但仍高达60%，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企业；在全国城镇社会就业人员中，有近70%是国有企业和其它国有单位接受的；同时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承担了大量投资大、周期长、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低的建设项目；全国1/3的学校和医院1/3的病床是由国有企业开办的。可以说没有国有企业为改革承担巨大的成本，我国经济建设就很难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它所有制经济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

在国有资产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有经济的布局也得到改善，从遍布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向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在铁路、民航、邮电通讯、城市水电煤气等基础产业部门，在科研、教育、国防、金融、保险等重要领域，国有经济仍具有绝对优势，保持着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其次，集体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比重大大提高。

城镇集体企业的恢复、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集体经济改革开放后基本保持了每年20%—30%的增长速度，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无论是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工业生产总值方面，集体经济所占的比重都已超过国有经济。从有代表意义的工业来看，1998年，集体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2.4%上升到38.3%。80年代，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它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的比例为1:1.2:2.2.90年代则为1:2:3。公有制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集体经济遍及各个行业、部门，逐渐在公有制经济中占居主体地位。

随着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集体经济企业在增税创汇、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1978年，集体经济在全国工业产值结构所占的比重仅为22.4%，1998年则提高到38.4%。

二、非公有经济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经济的比重，1978年仅占0.9%，1996年上升到24%。同时，非公有经济已经扩展到贸易、餐饮、农林牧渔、工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许多领域。在工业领域（以产值计算），国有经济的产值已由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8年的28.2%，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8.4%，非公有制经济由0.2%上升到33.4%。在商业领域（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算），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4.6%下降为1998年的20.7%，集体商业的比重由43.3%下降到16.5%，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由2.1%上升为62.8%。（参见图2－1）

从城镇就业人数上看，1998年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达3231.9万人。在改革开放20年间全社会累计创造的非农就业岗位2.5亿个中，非公有制经济就占8500万个，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比重还要大一些。它们在发展生产、满足人们多样化需要及增加就业等方面都已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表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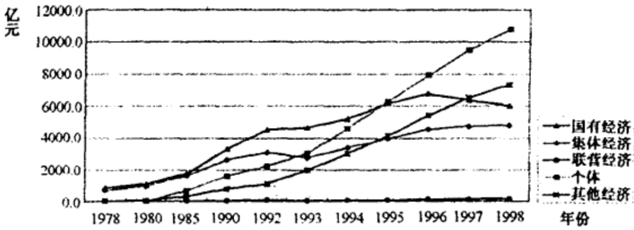


图 2－1　1978—1997 年不同所有制经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5 页数字绘制。

表 2－1　　1993—1998 年城镇非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变化表　　单位：万人

经济类型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联营经济	65.80	51.27	51.71	48.51	42.61	46.17
股份制经济	163.61	287.49	311.65	357.28	460.15	401.35
外商投资经济	132.82	191.32	235.47	267.94	290.39	279.94
港澳台经济	155.34	208.35	267.34	259.10	274.85	284.29
其它经济	18.16	8.97	10.78	8.84	17.53	615.88
合计	535.73	747.4	876.95	941.67	1085.53	1627.6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在非公有制经济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迅速。80 年代是中国个体经济大发展时期，而 90 年代则是私营经济崛起的时期。据统计，1998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3120.2 万家，从业人员 2259 万人；私营企业 120.1 万家，从业人员 937 万人。在工业总产值中，个体和私营经济的份额已由 1978 年的 0.2%上升到 1998 年底的 17.1%左右。个体与私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是非公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980 年 5 月 1 日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在北京注册成立以来，外商投资经济在我国迅速发展。1985 年，我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 3145 个，新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 4912 家，相当于前 6 年外商投资的总和，外商协议投资额 98.67 亿美元，直接投资 59.32 亿美元。到 1998 年，批准外商投资项目达 19850 个，年末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 22.78 万家，外商协议投资额 632.01 亿美元，直接投资 521.02 亿美元。1979—1998 年，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 32.57 万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2700 多亿美元。

外商投资补充了我国投资资金的不足，引进了新技术和新的管理经验，丰富了商品品种，活跃了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

三、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形式的股份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股份合作制成为我国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选择。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相当一部分大中型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至1997年，我国已有股份制企业3.6万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9200多家（上市公司800多家）、有限责任公司2.7万家；经过公司制改造，建立起较完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司制企业有4328家。1997年股份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比1996年增长34.1%，是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的近4倍。

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股份公司，它是把确定的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由一定人数的有限责任股东组成的公司。其主要特征是：(1) 股东对公司只负有限责任，即以其投入的股金为限对公司的债务负责。其全部资本划分为若干等额的股份，以股票的形式在社会上公开发行出售；(2) 是典型的财产或资本的组合公司，股东只在持有股票时，才是公司财产的所有者之一；(3) 股票可以在市场上随意转让买卖，公司对此不加限制，股票的价格随行就市；(4) 股东有法定最低人数的限制；(5) 公司财务必须公开；(6) 多数股份公司的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的所有者与经营者通常是相分离的；(7) 股份公司的股东人数众多，资本筹集较容易，竞争能力较强。

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有限公司，它是以资本的结合作为基础，公司的全体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责任以自己的投资额为限，包括已交和应交但尚未交清的股金。其主要特征是：(1) 不公开发行股票；(2) 股权凭证（称股单）一般不能任意转让；(3) 财务不公开；(4) 股东人数有最高限额的规定；(5) 所有权和管理权可以合二为一。

中小企业的改制以股份合作制为主体。到1997年，全国已有股份合作制企业400多万家。其中农村300多万家，城镇100多万家。实行改制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效益普遍好于未改制的企业。已改

股份合作制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以各自的资金、实物、技术等生产要素为股份，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遵循自愿互利、民主管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建立起来，即：入股财产仍归入股者所有，新增资产由入股

各方共有，经营所得利润可以按劳分配，也可以按股分配，经营风险由入股者共同承担。这是一种由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既具有股份制某些特点，又具有合作制某些特点，它避免了在合作中容易产生的合并财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同时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生产经营规模。由于其组织形式与产权结构适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为发展初期的乡镇企业以及后来一些国有中小企业所借鉴，表现出了相当的发展活力。

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国有小企业的亏损面已由原来的60%下降到20%，其竞争力明显增强。

第二节 农村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农村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年的改革，旧的经济模式已被突破，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形成。

一、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农业生产基本经营制度开始的。中央充分肯定了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从1983年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8.6%，其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97.7%。相应地，国家在农村实行政社分设，分别建立乡镇政府和自主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此基础上，1984年初，中央又将联产承包制的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1984年底又郑重宣布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随着中央关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的施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断完善。1993年底，国家做出了在原定的耕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的决定。1998年，全国一半以上的村组完成了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的工作。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作为新型的农村经济体制的基础，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经营体制。它由过去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演变而来。该体制下，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农户只有使用权，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将原来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职能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分散经营的农户家庭承担，一部分由统一经营的集体承担。这种以社区合作组织为载体，公有土地为依托，联产承包为纽带，家庭经营为基础，统一经营为补充，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称为双层经营体制。其特点是：能由家庭来完成的事情尽量由家庭来承担，那些农户办不了或办了效果不佳的事情，由集体来经营，因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一般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集体经营的内容、项目多一些，反之，则家庭经营的内容、项目多一些。双层经营体制能被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所容纳，既发挥了家庭分散经营的积极性，又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二者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废除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长期以来实行的农村单一集体公有的格局也得到了改革。在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找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又使广大农民能够积累属于个人的经营性资产，推动了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使以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经过 20 年的努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农村所有制结构基本形成。一些原有的集体经济形式在改革中得到了完善，新的经济形式和经营形式如合作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联合经济、承包经济等纷纷涌现，与此同时，个体、私营经济也有较快的发展。

三、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理顺农产品流通体制，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改革自 80 年代中期起力度明显增大并不断走向深入。1985 年开始取消统购统销，价格由市场自行调节。1978 年，国家实行统一价格管理的农产品多达 113 种，占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总额的 94.4%，而到 1998 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79%的农副产品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决定；至 1999 年 6 月止，主要农产品中，除蚕茧、烟叶、油菜籽、糖料等的价格仍由国家管理、粮食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外，包括棉花在内的其它农副产品的价格已

全部由市场决定。适应农产品市场化发展的进程，农产品的经营体制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农产品不再受过去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流通；非国有或非公有经济主体被允许进入农产品经营领域，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独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与放开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和经营相适应，各类农产品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到 1998 年底，全国集贸市场又达 95379 个，其中城市批发市场达 27698 个；成交额达 11043 亿元。在农副产品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技术、劳动力、资金、信息、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总体上看，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面貌已基本改变，较为完整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

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适应农村经营体制转变、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提高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发展起来。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技术部门和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等农民联合组织相结合的服务网络。到 1998 年底，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专业协会达到 140 多万个，遍及全国各地农村、分布于农村经济和各个领域。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传统农业的科技改造，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及出口创汇农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和作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1998 年，全国农、林、牧、渔总产值由 1978 年的 0.14 万亿元增加到 2.45 万亿元，增长了 16.5 倍。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产；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到 1978 年底，全国乡镇企业仅有 152.4 万家，职工人数为 2827 万人。到 1998 年底，全国乡镇企业总数已达 2003.9 万家，实现增加值 22186.5 亿元，职工人数也猛增到 12536.5 万人。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参见表 2-2）

表 2-2　　1978—1998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增长情况　　单位：万吨

年份	粮食	棉花	油料	糖料	麻类	茶叶	烟叶	水果
1978	30477	216.7	521.8	2382	135.0	26.8	124.2	657.0
1980	32056	270.7	769.1	2911	144.0	30.4	84.5	679.3
1985	37911	414.7	1578.4	6047	445.0	43.2	242.5	1163.9
1986	39151	354.0	1473.8	5853	193.0	46.1	170.7	1347.7
1987	40298	424.5	1527.8	5550	208.0	50.8	194.3	1667.9
1988	39408	414.9	1320.3	6188	181.0	54.5	273.4	1666.1
1989	40755	378.8	1295.2	5804	112.0	53.5	283.0	1831.9
1990	44624	450.8	1613.2	7215	110.0	54.0	262.7	1874.4
1991	43529	567.5	1638.3	8419	88.0	54.2	303.1	2176.1

年份	粮食	棉花	油料	糖料	麻类	茶叶	烟叶	水果
1992	44266	450.8	1641.2	8808	94.0	56.0	349.9	2440.1
1993	45649	373.9	1803.9	7624	96.0	60.0	345.1	3011.2
1994	44510	434.1	1989.6	7345	75.0	58.8	223.8	3499.8
1995	46662	476.5	2250.3	7940	89.7	58.9	231.4	4214.6
1996	50454	420.3	2210.6	8360	79.5	59.3	323.4	4652.8
1997	49417	460.3	2157.4	9387	74.9	61.3	425.1	5089.3
1998	51230	450.1	2313.9	9790.4	49.5	66.5	236.4	5452.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三节 能动性市场主体的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形成富有活力和效率的能动性市场主体，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20 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紧扣这一中心环节展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企业逐步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首先，经过 20 年的改革，特别是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以国有企业为骨干的我国企业逐渐成为适应市场要求、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 1979 年起，以旨在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改革逐渐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从依靠政策手段扩权发展到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能动性的企业运行机制。国有企业体制创新是企业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后，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力度显著增强。相当一部分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推进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到 1998 年底，已有 575367 户企业改造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绝大部分企业已具备面向市场、创造性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与条件。一部分企业的经营机制已发生实质性转换。制度创新大大激发了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调查表明，全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75%，而股份制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则为 64%，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只有 49%，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为 40%，而股份制企业的亏损面则为 20%，上市公司的亏损面只有 7.5%。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同时也使它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实施，不仅使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必然，而且使不同性质的企业的竞争激烈展开。从总体上说，经过二十年改革，我国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结构已基本形成，曾被严重束缚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已日益充分地层现出来。

二、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并不断强化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逐渐解除旧的体制对社会的主体——人的不合理束缚。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的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以在改革中确立并不断得到强化。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大大提高；二是消费者的需求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导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农村劳动者从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赋予了农民充分的自主权和极高的自由度，农民可以自主地从事一切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村改革 20 年的实践证明，正是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我们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并且把保持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作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核心，才有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巨大发展。

改革也使城镇居民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和行为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事制度、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牢牢地束缚了城镇居民的手脚，因而也严重压抑了城镇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的深入展开打破了旧体制的束缚，随着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劳动者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等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的建立，城镇劳动者能够自主地支配包括劳动力在内属于自己的全部要素，并有效地利用市场给予的机会，创造性地开展投资、消费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此确立了城镇劳动者的市场主体地位。

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生产与消费脱节的生产经营格局被打破，以消费者偏好为准则，唯市场需求是瞻，成为政府和企业经济工作或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而使消费者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渐形成。消费者主体地位的确立，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改善与提升，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提供了保障。

第四节　开放、完整的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因此，市场体系的发育与完善程度，实际上反映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与完善的程度。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开放、完整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

一、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市场体系的发育从商品市场伸展到要素市场，从着眼于推出一般扩大市场调节的措施深入到构建市场化的经济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消费品市场繁荣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消费品市场品种丰富，繁荣兴旺。消费品市场销售规模迅速扩大，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264.9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29153亿元。消费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我国消费品主要以一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型消费品为主、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改革开放后，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品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目前，耐用消费品支出逐渐成为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日用消费品支出仅占很小比重。同时，随着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化，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已经由原来主要由国家定价的计划价格机制转变为主要由市场供求定价的市场价格机制。目前，除极少数耐用消费品和少数公共消费品的价格仍由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定价外，其它消费品的价格已全部由市场决定。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所占的比重为92%。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使我国消费品市场出现空前繁荣，长期以来消费品短缺、必须通过计划或票证等限量供应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基本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我国居民作为消费选择主体的地位得到真正确立。1998年，消费品中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占98.3%，供不应求的消费品只有1种。

（二）生产资料市场迅速扩张

自1978年以来，我国生产资料市场建设也随着传统的物资流通体制、价格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获得长足的进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交易活跃流畅，市场调节的程度迅速提高。到1998年底，我国已建成各类生产资料批发市场5500多个，市场交易总量达到37831亿元，由国家计划分配的生产资料已从1978年的791种下降到1998年的5种，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已进入市场流通。生产资料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国家定价部份仅占10%左右。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市场的组

织形式也日趋完善，形成了一批规则较为健全、运作较为规范的生产资料批发市场、期货市场以及物流中心、配送中心。总起来看，经过20年的努力，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国内国际资源相融通，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生产资料市场已基本建立起来，多元化的生产资料流通格局已经形成。（参见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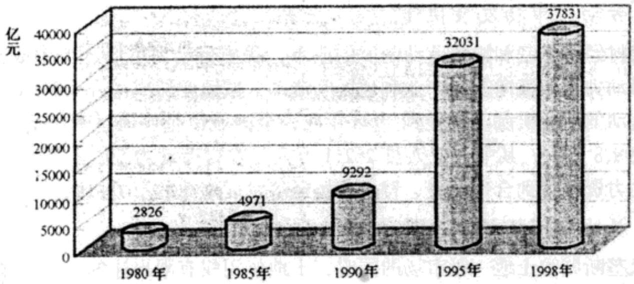


图2－2　1980—1998年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增长示意图

资料来源：1998年10月1日《经济日报》。1998年数据来自《中国市场发展报告1999》，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三）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并日趋规范

1985年以后，在经过试点，我国各类金融市场从无到有逐渐建立起来，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解决了企业和金融机构资金融通的需要，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也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信贷市场由"统一计划、多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逐步走向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取消贷款规模管理。

股票市场的建立和扩展，成为企业筹集资金和转制的重要途径。截止到1999年8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920家，另有45家企业分别在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上市。股票市场市价总值达29655亿元，相当于GDP的35%左右，开户数达4298万户。

债券市场有了较快发展，成为金融市场中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子市场。到目前，已形成以国债和企业债券为主、短、中、长期券种并存的债券市场结构。尤其是国债市场发展很快。1981年财政部恢复国债发行。1998年，国债收入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1年的4.3%上升到30.7%。国债交易市场从1988年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在不断地规范中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在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管理体制后，中国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开始发展起来。中央银行放开了对同业拆借资金利率的上限管制，拆借资金利率日益市场化。

票据市场日趋活跃。1986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实行办法》推广实施以来，票据市场发展稳定，再贴现业务成为中央银行调整储备和货币供应量的重要的间接

调控的货币政策工具。商业票据年度发生额逐年大幅增长，1995年、1996年和1997年1998年，商业票据年度发生额分别为2424亿元、3890亿元和4600亿元；同期，商业银行办理贴现分别为1412亿元、2265亿元和2740亿元；中央银行办理再贴现分别为844亿元、1350亿元和1332亿元。

（四）劳动力市场发展快速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和城镇劳动制度的改革，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并不断扩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向非农产业和地区间流动，城镇亦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截止到1998年底，全国城镇企业通过劳务部门职业介绍成功人数达798.8万人，其中失业人员262.1万人，农村劳动力393.3万人。初步形成了能够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市场机制。

（五）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

在国家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的同时，土地使用权有限出让的二级市场在改革中不断发展。随着福利性住房体制向商品化货币化住房体制的转变，房地产市场也在较快的发展。1998年商品住宅销售额为2006.87亿元，比上年增长36%；销售面积为10827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7.7%；个人商品住宅779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了48%；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710亿元，其中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的委托贷款余额为220亿元，自营性贷款余额为490亿元。

（六）科技市场、信息市场逐渐形成

改革前，我国基本上不存在技术与信息方面的市场。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技术、信息市场也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技术、信息成果有偿转让面不断扩大，技术产品和经济技术信息商品化、产业化的程度逐渐提高。1990年，全国签订国内各类技术合同7.5万次，技术交易额达75亿元。到1998年，全国签订国内各类技术合同28.17万次，技术交易额达435.82亿元，平均每项合同额为15.47万元。

二、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加强

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完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加强，从而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价格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价格体系、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不仅基本理顺了价格体系，而且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管理体制。

在价格体系方面，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基础产品价格偏低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价格结构逐步趋于合理。

1997年与1978年相比，采掘工业品价格、原材料工业产品和加工业产品价格分别

上涨7.2、4.2和2.3倍，三者综合比价分别为1.71:1:0.55，这意味着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中，加工工业超前、基础工业滞后的格局得到了较大改善。199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比1978年上涨3.8倍，农村工业品价格上涨1.97倍，工农业产品综合比价为59.7；主要农产品内部比价逐步趋于合理。

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过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市场机制在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形成中已起主导作用。按全社会各类商品价格总额计算，直接生产者与经营者过去基本上没有定价权，现在已经掌握着约占全社会80%—90%的产品定价权。

在价格管理体制方面，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价格的传统办法有了重大改变，一个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并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新的价格调控体系开始形成。

在价格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发挥，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者。

三、市场规则进一步健全，市场竞争秩序不断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和政府各部门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对于维护和规范市场秩序，对于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促进流通和多种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适应市场机制调节作用不断增强的新形势，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也不断得到改善和加强，一批有权威的市场执法和监督机制陆续建立起来，行业组织和社会舆论对市场的监督作用也越来越大。总体上说，经过二十年的改革，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监督与管理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

第五节　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初步建立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时期内，我国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以直接管理、实物管理为主，排斥和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入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实现了从直接调控方式向间接调控方式的转变。

一、宏观经济调控内容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改革前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政企不分、宏微不分、政府管理即是宏观管理，而宏观管理即是政府包揽一切。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这

种状况逐渐改变，政企关系逐步得到理顺，国家宏观管理职责也发生重大转变，逐渐集中到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上。与此同时，宏观调控的方式也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经济逐步转向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通过市场途径调节经济。在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等经济杠杆作用的同时，作为计划经济支柱的传统计划体制也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行政指令性计划被逐步取消，最终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指导性计划为主的新的管理模式。而且指导性计划也由原来的年度计划为主转变为以中长期计划为主，突出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运用。

二、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财政的实质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财政管理体制，是规范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及个人与国家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因而它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78 年以后，我们着手对原有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经过 20 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框架基本确立。在实行“分灶吃饭”、“财政大包干”等改革探索的基础上，从 1994 年起，我们着手建设依事权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到目前，这一管理体制已基本建立并不断走向完善。这一体制的建立，大大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增强了中央调控经济的能力。对合理调节地区间的财力分配、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制度初步形成。1979 年底以来，我国税收制度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革：1994 年以前，针对传统税制过于简化，既难以发挥组织收入的作用，又无法调节经济活动的弊病，通过“利改税”、完善流转税、开征所得税和建立涉外税收制度等改革举措，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产品税制向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的转变；1994 年以来，针对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不规范，名义税率高、实际税负低，企业所得税种、税率不统一，涉及个人或个体工商户的税法不统一、不规范等弊病，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收、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思路全面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初步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税收体制的改革，大大增强了税收杠杆对经济的调节功能。税收体制改革，也逐渐规范了分配关系，保障了财政收入。1979—1998 年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 11.3%。1998 年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为 98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财政实力的增强，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为宏观调控的科学有效奠定了基础。(参见图 2 – 3)

3. 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体制改革是构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20 年来，结合理顺财政体制关系，这方面的改革稳步展开，实现政府的资产所有者职能与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分开、政府所有者职能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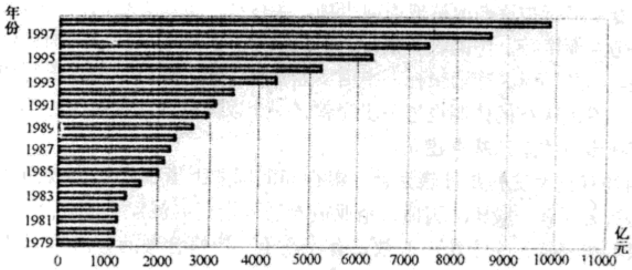


图 2－3　1979—1998 年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企业经营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经营中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分开，在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部分地区已初步形成三个层次管理与运营体系：在政府两种职能分开的基础上，将政府的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职能集中统一起来，实行一元化和专业化管理；在所有者职能与产权经营职能分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众多专司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的公司组成的中介经营体系；在企业出资者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基础上，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已有了初步的基础和明确的目标。

三、金融体制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金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1978 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我国金融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实现了金融机构的多样化。1978 年以前，中国实际上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和基于集体所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 20 年的改革与发展，现已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到 1998 年，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基层网点）有 11.77 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达 200 万人。

2. 初步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既办理个人、企事业单位存款和发放工商业贷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又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办理发行货币、结算、经管国库等中央银行业务，同时也是代表政府管理金融业的行政机关。几经改革，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已成为履行稳定货币和加强金融监管，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等金融杠杆，对金融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央银行。

3. 商业银行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成立政策性银行分离政策性金融业务的

基础上，国有专业银行被逐渐改造成面向市场、实行资产负债管理的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和广东、深圳、上海浦东的发展银行的体制也进一步完善，一个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商业银行体系已基本建立。

4. 金融市场有较大发展并日趋完善。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已形成网络，交易活跃，资本市场从无到有，股票、国债、企业债券进人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组织不断完善，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正在形成。

5. 外汇管理体制初步理顺。实现了汇率并轨，建立了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并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制度。

四、投资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

投资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活动直接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1978 年以来，通过不断深化的改革，逐渐改变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整个投资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 投资主体由过去主要是中央政府一个，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集体、个体、外商等多元化的主体。特别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财政、金融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正在成为基本的投资主体；(2) 投资资金由过去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投资单位自筹资金、银行贷款、财政拨款和利用外资等多种渠道，相当一部分投资资金通过市场途径募集；(3) 投资方式由过去主要是政府投资，转变为联合投资、中外合资、合作建设等多种形式，并根据投资对象的性质与市场需求状况，分别确定投资主体和投融资形式；(4) 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由行政指令分配任务，向尽可能引进竞争机制，实行招标投标办法转变，市场机制已在投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5) 投资行为由过去无人负责向建立强有力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转变；(6) 投资管理由过去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计划手段和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主要采用间接调控的办法。投资体制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其它环节的改革，对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六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初具规模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关系法制化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

和完善。新中国建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间，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但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法制建设的进程较慢，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尤其缺少。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我国法制化建设进程显著加快，经济法制建设更是走在前面。从1979年至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了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或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批准了大约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多件。在这些法律法规中，2/3以上是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它们的制定与实施，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了社会安定和社会经济秩序，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框架已初具规模。

一、规范市场主体的立法

我国市场主体立法在改革开放中进展较快。20年来，我们逐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有关企业的法律制度，将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其中包括《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这些法规确立了各类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地位、组织体系、管理体制构架及行为规则，不仅为处于大改革大变动中的我国务类企业规范化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有力地约束了企业的不良经济行为，从而推动着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这些法规的制定，也标志着我国关于经济主体的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规范市场行为和秩序的立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秩序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等。这些法律保护了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成了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对创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立法

随着我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逐渐由直接的行政手段转变为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强宏观调控的立法进展很快。这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确定了调控范围和控制力度，为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社会保障资金从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负担为主逐步转向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从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也逐步完善起来。这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这些立法从法律上规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目标、原则以及具体实施步骤等方面的内容，为切实贯彻社会保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保证。

五、促进对外开放的立法

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加快了对外开放的立法步伐，一些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陆续制定、出台，使我国对外开放方面的立法逐步走向规范化，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发布施行，对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走向国际市场，发展外贸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

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也迅速地得以健全和完善，使现行知识产权的主要规范已与多数国家采纳并实践的国际标准接轨。这方面的主要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法》及其相关的实施细则或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此外，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也对保护知识产权作了重要规定。关于知识产权的一系列立法，不仅对我国知识产权给予了有力的规范和保护，而且对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规范市场中介组织的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相继产生。为了充分发挥市场中介组织自身的职能，我国制定发布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相关立法。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这些立法为市场中介组织沟通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联系，监督企业行为，监督市场活动，保证公平交易、公平竞争，降低交易成本，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提供了法律准绳，同时也促使市场中介组织在法律法规的引导、规范和保障下发展壮大。

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同时，各项法律法规也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和运用。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其执法职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运用司法手段调节经济关系，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保障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法制建设也发展很快，各级国家政府部门及其授权部门的行政执法水平大大提高。同时执法监督力度也不断加强。

另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以及普法宣传的不断深入，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也得到不断加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制环境基本形成。

第七节　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所有制的变革相适应，我国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

一、分配制度的改革取得突破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极不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我国不断改革了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合理体制，探索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了以劳动为主要依据、以经营效益为基础的符合不同职业特点、体现各种能力效果的灵活多样的收入分配格局。

改革开放20年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显著变化：

1. 城乡居民的收入机会增多，收入种类增加，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农村居民以务农收入为主，城镇居民以工资收入为主，几乎没有额外的收入渠道。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00多亿元，平均每人每年存款不到22元。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除了务农之外，还有机会进入乡镇企业和城市务工，非农收入所占比重增大。1998年，乡镇企业职工达1.25亿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25.4%，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部分的1/3来自乡镇企业。城镇居民除了获得工资收入之外，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收入和财产收入比重明显增加，要素分配收入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随着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机制在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初次分配是排斥市场的。由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不能进入市场，要素所得的份额和数量只能以行政的方式分配或配给。近年来，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兴起、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以及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通过市场配置的比重逐年提高。相应地，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目前股

息、红利以及债券利息等个人收入分配，主要是以市场方式进行的；国有企业的职工的工资水平主要依企业经济效益由企业自主决定，而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供求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协商、约定的。

3. 初步建立起分配调节机制。随着个人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我国收入差距出现了扩大趋势。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调节收入差距，积极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调节机制。近年来，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不仅加强了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大了农村扶贫投入，而且改革了城市社会救济制度，初步建立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规范了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逐步趋向合理，有效地防止了两极分化。

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成效显著

1978 年以来，国家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单一国家保障模式的弊端，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探索并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层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经过 20 年的探索，我们打破了过去的“企业自保”模式，实行退休费社会统筹的办法，使新老企业在职工养老方面互助共济。1998 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的企业职工达到 8475.8 万人、企业离退休人员 2727.3 万人参加离退休费社会统筹，分别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80.5%和企业离退休人员总数的 98%以上。同时，也改变了过去退休费用由国家、企业包揽的做法，实行国家、企业、职工三方合理分担，并明确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这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较好地界定了国家对职工养老所应负的有限责任和职工个人应负担的养老保险责任。它既体现了社会互济，也突出了自我保障；既讲求公平，又注重了效率，通过个人账户把职工养老待遇水平和在职时的贡献大小紧密联系起来。除此之外，还统一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制度从无到有。1986 年，国务院制定丁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的有关规定，开我国失业保险之先河。进入 90 年代后，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城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职工和三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部分职工。1998 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为 7927.9 万人，全年共有 158.1 万人享受了失业救济。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的设计与建设，充分考虑到了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形势，将失业保险与分流国有企业冗员和促进就业结合起来。1986—1996 年我国共有 500 万人实现再就业，其中享受失业救济人员的再就业率为 54%，从而有效保障了国企用人制度的改革。1998 年，通过各种途径共分流国企职工 639.8 万人。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展较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费医疗、劳保医疗费用由国家或单位包揽。1988 年开始了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10 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创新主要是将医疗费用与个人工资适当挂钩、职工大病医疗实行社会统

筹、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和公费医疗费用由医院包干等。1993 年，医疗费与职工个人工资适当挂钩的办法在公费医疗单位普遍得到推广，80%以上的国有企业劳保医疗也实行了这一办法。1998 年底，全国已有 401.7 万职工参加了统账结合方式的医疗保险制度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改革，1108 万企业职工参加了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

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效果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进展速度很快。到 1997 年末，全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已有 206 个，占全国建制市的 1/3，共使用保障资金 11.5 亿元，有 200 多万贫困居民受益。1998 年上半年，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已经有 400 多个，比 1997 年底增长近一倍。

随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层次、社会化保障体系的推进，在日益提高的生产力基础上，人民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1978—1998 年，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增长 42 倍，其中国有单位增长 39 倍，城镇集体单位增长 35 倍，非公有制企业在 1986—1998 年的 12 年内增长了 110 倍；此外，国家财政用于抚恤、退休福利、救济和救灾等支出在 1978—1998 年间增长了 8 倍。(参见表 2 - 3)

表 2 - 3　　1978—1998 年部分年份全国保险福利费用　　单位：亿元

年份	保险福利费用					用于抚恤、退休、救济和救灾的财政支出
	总额	国有单位	城镇单位	其它单位	占工资总额比例%	
1978	78.1	69.1	9.0		13.7	18.91
1980	136.4	119.3	17.1		17.7	20.31
1982	180.5	157.0	23.5		20.5	21.43
1984	257.7	213.4	43.4	0.9	22.7	25.16
1986	420.1	343.9	74.1	2.1	25.3	35.58
1988	653.1	537.6	110.8	4.7	28.2	41.77
1990	937.9	777.3	152.9	7.7	31.8	55.04
1992	1309.5	1095.8	198.8	14.9	33.2	66.45
1994	1958.1	1646.2	248.1	63.8	29.4	95.14
1995	2361.3	1980.4	294.5	86.4	29.2	115.46
1996	2725.3	2296.6	317.8	110.9	30.0	128.03
1997	3043.5	2578.8	336.2	128.5	30.4	142.14
1998	3360.7	2797.4	324.4	234.7	36.2	171.2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

作为我国传统保障与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住房体制，1978 年以后也被推向改革进程。改革沿着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住房新体制的方向不断深化，已取得了积极进展：相当一部分福利性住房已通过提租、出售的方式纳入市场化轨道；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

供应体系已初步建立并进一步走向完善；住房交易市场已有一定程度的发育；住房公积金制度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到1998年底，我国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量已达1200亿元左右，占目前城镇住房建设资金总量的40%左右；住房金融稳步发展，一些商业银行已开始实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总起来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城镇住房体制的建设已有一定的基础。

第三章　从封闭走向开放

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走向世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建国后前30年积极地开展对外工作的基础上，1978年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认真实施。20年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了开放。

第一节　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新中国建立以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曾与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并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开展了一些领域的合作。但由于当时国内外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封锁，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仍极为有限。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我国对外开放领域和规模逐步扩大，效益不断提高，经过20年的探索和努力，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一、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取得重大成就

经济特区的开放是我国全方位开放的起点。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国家在1979年7月决定给予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1980年5月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3月又创建海南经济特区。国家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方面以特殊的经济政策，允许其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近20年来，经济特区的建设成绩斐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我国的经济特区是兼有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功能的综合性特区。近10年来，经济特区运用国家给予的特殊经济政策，发挥毗邻国际市场的优势，大力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在吸引外资，拓展出口等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与此同时，经济特区发挥其在对外经济联系中的优势，向内地传递国际经济信息、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成为内地联系国际经济的舞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桥梁和纽带，有效地发挥了“技术的窗口、管

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的作用。1998 年 5 个经济特区的对外贸易额达 390 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2%，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达 235.4 亿美元，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 14.9%，占 5 个经济特区对外贸易总额的 60.4%。

经济特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形成。作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特区先于非经济特区进行了一系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这些探索，不仅有利于特区本身的对外开放，而且为内地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

经济特区的兴办及其不断完善，带来了经济特区本身的巨大发展。它依靠中央给予的多方面特殊政策和“先行一步”形成的体制优势，经济特区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外向型经济成分较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以设置经济特区率先对外开放为起点，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我国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经济正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逐步与世界经济活动融为一体。

对外开放的地域从沿海、沿江、沿边城市扩展到广阔的内陆地区。1984 年，国务院决定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使其加快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步伐，尽快成为经济繁荣、技术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沟通国内、面向世界的现代化港口城市。1998 年，这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进出口总额达到 885 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7.3%。1985 年 2 月，国务院又决定分两步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以及环渤海湾地区（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区）开辟为经济开放区，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地带。

进入 90 年代后，在继续推进沿海开放的基础上，对外开放进一步向沿边和内陆地区扩展。1990 年 4 月，国家宣布开发上海浦东新区，接着沿长江开放了武汉、重庆等 6 个城市和合肥、南昌、长沙、成都 4 个沿江省会城市，形成了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的长江流域经济开放带。1990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外高桥建立我国第一个保税区。之后，又相继建立天津港、大连、深圳沙头角和福田、宁波、广州、张家港、海口、厦门象屿、福州、青岛、汕头、珠海、海南洋浦等 14 个保税区。1998 年，除新建的海南洋浦外的其它 13 个保税区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81.8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20.1%。1991 年开放绥芬河、满洲里、丹东、珲春 4 个北部口岸。1991 年 3 月 6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决定继 1988 年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再批准 21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后又批准建设了苏州工业园。1998 年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特殊开发区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251 亿美元。1992 年，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为契机，我国的对外

开放开始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中央先后决定以浦东为龙头，开放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5个长江沿岸城市（后扩展为9个沿江开放城市和17个沿江开放县市），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沿边、沿海省区的省会（首府）和太原、合肥等11个内陆省区城市，在其后的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市县。迄今为止，我国的"四沿"（沿海、沿边、沿江、沿交通干线）开放地区共包括359个市、县，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人口3.2亿。这片广大的开放地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骨干阵地，对全国的对外开放起到了强有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对外开放的领域从一般的工贸行业扩展到基础设施和重要服务行业。近2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向纵深扩展。外商的投资经营已从一般性工贸领域走向金融、保险、商业、外贸、会计等重要服务领域；从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扩展到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领域。与此同时，外商进入的形式也从一般的资金、发展和新体制的建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见表3－1）

表3－1　　　1996—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	企业数（户）			投资总额（百万美元）			注册资本（百万美元）					
										外方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合计	240447	235681	227807	715322	753470	774229	441485	459814	467287	2119796	3029117	313712
农、林、牧、渔业	5748	7289	5538	8629	12451	918	6280	8811	6528	4292	5197	4645
采掘业	1604	2115	1506	3102	8586	3208	2361	4647	2407	1601	2844	1661
制造业	172180	165636	161293	389249	398009	410308	264329	268428	273821	167781	176749	179483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36	1314	1349	36271	44565	47459	13954	17873	19489	8169	10330	11314
建筑业	7444	7112	6696	17859	22192	23716	10774	12633	13131	7046	8204	8755
地质勘查和水利管理业	109	152	129	337	484	568	225	325	364	150	220	235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3158	3359	3474	22147	25956	3069	11053	12789	14178	6961	7937	9424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14271	14649	14315	25650	27130	25917	17469	18380	17502	11957	12476	11262
金融、保险业	98	81	77	1907	1357	1777	1658	1283	1665	1250	885	1183
房地产业	14470	13872	13911	151171	150784	156569	76448	75912	77913	56377	54319	57730
社会服务业	16284	16369	16023	47801	48994	5034	29486	29986	30928	19121	18945	20330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572	569	532	2834	2903	2859	1742	1813	1721	1307	1259	1266

行业	企业数（户）			投资总额（百万美元）			注册资本（百万美元）			外方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1084	892	802	2310	1835	1672	1549	1314	1198	1043	844	794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198	1136	1042	1414	1565	1702	1064	1178	1244	713	794	851
其它	991	1136	1120	4641	6659	8264	3093	4442	5198	2028	1984	37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除开放沿海沿边的城市外，中国还陆续开放了旅游城市，吸引了众多的国际游客来华访问。目前全国大陆所有地区都有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甚至西藏的拉萨这个内陆高原上的城市也对外国记者和普通游客开放。此外，中国各地许多省市，包括地、市级城市，已与国外许多相对应的地区、城市结对，建立友好省市或友好城市，不仅交流，而且扩大了相互间的经贸往来。

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地域已从经济特区通过沿海开放城市，进而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带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地区，从而初步形成由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三、有利于推进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需要，1978 年以后，以外贸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对外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进展明显。总起来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有利于推进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

外贸企业制度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各类企业对外经营机制大大改善。国有对外经贸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积极推行公司制改造，财产组织形式与内部经营管理制度逐渐理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外贸企业组织结构和资产重组的力度不断加大，一批国际化、实业化、集团化的综合贸易公司得以建立。外贸经营格局显著改善，非公有经济企业经营外贸的比重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各类企业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转换对外经营机制的改革也加速展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统一对外的外贸经营体制和多层次、多渠道经营的“大经贸”格局初步形成。1997 年初，外经贸部制定《经济特区生产企业进出口权自动登记暂行办法》，这为最终实现外贸经营权的自动登记制创造了条件，外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外贸代理制不断完善，享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不断增多。除 32 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就享有自营进出口权外，截至到 1999 年 6 月，全国有外经贸经营权的企业共有 2.5 万多家，其中流通型公司 9000 多家，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 1.2 万多家，主营对外承包劳力的公司 900 多家，边贸公司 3200 多家，私营生产企业 142 家，中外合资外贸公司 5

家。与此同时，外贸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998年底，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达到48.4%，集体企业占2.4%，外商投资企业占48.7%，其它经济占0.5%。经过20年的改革，国家对对外经济活动的调节由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转向主要运用汇率、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

外贸出口管理和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开，统一联合经营和指定公司经营的商品数目已经大大减少，建立了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制度，目前实行出口配额招标的商品已达20多种。在进口管理体制上，也为适应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取消176个税目商品的进口控制措施，目前国家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只剩下36种；降低关税税率，使关税总水平由原来的35%降低到17%；取消和规范大部分进口减免税政策，对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等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进口调节税；实行加工贸易台账保证金制度；等等。与此同时，外贸市场组织体系日益健全，进出口商会协调指导签约服务的作用不断增强。

第二节　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包括外贸体制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成就显著。

一、对外贸易发展迅猛，成就巨大

我国进出口总额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0年，仅有11.35亿美元，到1978年，发展到206.4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采取了多项开放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50年里，我国对外贸易增长了285倍，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增长了16倍以上。1998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对外经济贸易仍取得可喜成绩，进出口总额猛增到3239.3亿美元。而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的7年，则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快的时期。1992—199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值累计达18177亿美元，比1949—1991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期间我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高达15.1%，不仅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速高出近8个百分点。

出口方面，出口总额由1952年的8.2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5亿美元，1952—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口增长更加迅速，到1998年出口总额达到1837.6亿美元，使1979—199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4.5%；

进口方面，进口总额由1952年的11.2亿美元加到1978年的108.9亿美元，1952—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1998年，出口总额达到1401.7亿美元，使1979—

199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6.7%。(参见表3-2)

表3-2　　1952—1998年进出口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差额
1952	19.4	8.2	11.2	-3.0
1957	31.0	16.0	15.0	1.0
1962	26.6	14.9	11.7	3.2
1965	42.5	22.3	20.2	2.1
1970	45.9	22.6	23.3	-0.7
1975	147.5	72.6	74.9	-2.3
1978	206.4	97.5	108.9	-11.4
1980	381.4	181.4	200.2	-18.8
1985	696.0	273.5	422.5	-149.0
1986	738.5	309.4	429.1	-119.7
1987	826.5	394.4	432.1	-37.7
1988	1027.9	475.2	552.7	-77.5
1989	1116.8	525.4	591.4	-66.0
1990	1154.4	620.9	533.5	87.4
1991	1356.3	718.4	637.9	80.5
1992	1655.3	849.4	805.9	43.5
1993	1957.0	917.4	1039.6	-122.2
1994	2366.2	1210.1	1156.1	54.0
1995	2808.6	1487.8	1320.8	167.0
1996	2898.8	1510.5	1388.3	122.2
1997	3251.6	1827.9	1423.6	403.4
1998	3239.3	1837.6	1401.7	435.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在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断改进。新中国建立之初，农副产品、原油等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高达70%左右。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提高到45.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并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和优先发展机电产品的战略，在保持传统大宗商品出口贸易的同时，积极扶持、培育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的出口。从1995年起，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服装、

纺织品，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类别。到199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2.2%，高出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幅11.7个百分点，占当年出口额的36.2%，并实现机电产品贸易顺差26.7亿美元。这一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88.7%。这表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制成品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外贸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近年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多元化战略，在维持以发达国家和亚洲市场为主的传统重点出口商品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以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市场，使我国的贸易伙伴从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现在的227个国家和地区。1998年，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动荡使我国对亚洲地区、俄罗斯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对巴西的出口增幅降到不足4%，但我国对非洲、欧盟、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出口均比上年增长了10%以上，带动当年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0.5%，并实现了对美国、日本、欧盟的贸易顺差。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说明我国外贸市场的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对市场波动的承受力和贸易风险的抵御能力大大增强。

在发展一般贸易的同时，我国积极学习国际惯例，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对外贸易。其中作为利用外资重要方式的“三来一补”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我国来料（包括来图、来样）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进出口总额已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5.7%，从事加工贸易的就业人员已经达到3000万左右。与此同时，其它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也发展起来。随着与周边国家边境局势的不断缓和，我国政府增开了众多的边境口岸，推动了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其中，中苏、中蒙、中尼、中缅、中越边境的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发展最为迅速。1998年，我国边境的小额贸易额达到20.2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2%。此外，我国还采用了寄售代销、租赁贸易、易货贸易、来料加工贸易等多种对外贸易形式。1998年，这些外贸方式的进出口额达到1.2亿美元，表现出了一定的发展潜力。

二、利用外资规模不断壮大，水平逐步提高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以后，曾于50年代有效地利用外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了156个大型项目，六七十年代也曾利用外资进口了国家一些急需的精密机械和技术设备。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外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真正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则是在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而且吸纳外资的领域也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水平也大大提高。（参见图3－1）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979—1982年只有124.57亿美元。1992年为192.02亿美元，而到1993年便增加了一倍，达到389.60亿美元。其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644.08亿美元，1998年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仍达到585.57亿美元。

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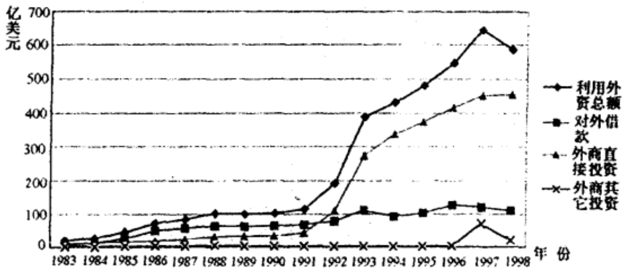


图 3－1　1983—1998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概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5 页。

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1980 年第一批 3 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成立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一直呈迅速的上升趋势。1979—1986 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尚处起步阶段，1979—1984 年的 5 年间，我国每年外商直接投资都还未超过 10 亿美元。在经过了 1987—1991 年的持续发展阶段后，1992 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着对外商投资企业批准权限的下放，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增加。1992 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超过 100 亿美元，1993 年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达到 275.15 亿美元，到 1998 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又比 1993 年翻了一番，达到 454.63 亿美元。1979—1998 年，我国实际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不含其它投资）共计 2526 亿美元，其中自 1992 年以来的 7 年内，就引进 2423.7 亿美元，占 20 年累计额的 91.7%。截止到 1998 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共 32.47 万家，其中已经开业的有近 15 万家，就业人数为 1750 万人，到我国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 180 多个。1993 年以来，我国连续 6 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家。

我国在利用其它外资方面也达到了一定规模。1979—1998 年的 20 年间，我国通过对外发行股票、开展国际租赁业务、进行补偿贸易和加工贸易等多种形式，累计利用外商其它投资 147 亿美元。

我国对外借款也呈逐步的上升趋势。我国利用加入国际性经济组织和发展与友好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大力借助外来的优惠低息贷款来发展本国经济。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贷款、因中日长期贸易逆差而安排的日本政府的黑字贷款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政府的贷款。我国还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发行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成功地利用了国际商业贷款。1979—1998 年，我国借用国外资金累计达 1271.3 亿美元。在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金融动荡的 1998 年，我国的对外借款仍达到 110 亿美元。（参见图 3－1）

伴随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的利用外资质量也不断提高，结构也不断改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项目开始明显增加，国家鼓励投资的项目增加，而限制投资的项目则不断减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正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

比重有所提高；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多，全世界前5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来华投资，其它大型跨国公司也正积极筹备来华投资；大型投资项目逐渐增加，平均单项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提高。

对外资的大量和有效的利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促进了经济国际化进程，也促进了投资环境的改善，对加快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快速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前，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坚持“不做国际承包商”，对外基本上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经济合作。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迅速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已成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还只有少数几家企业从事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目前，已发展为一支由近700家企业组成的门类比较齐全、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队伍，业务范围向技术较强领域不断扩展，项目越作越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客户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美国《工程新闻杂志》（ENR）评选出来的世界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中，我国企业有27家。1978—1982年，我国对外签订劳务承包合同755项，总金额11.96亿美元；1983—1989年签订对外劳务承包合同金额138.96亿美元；1998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仍然保持增长势头，全年签约117.7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完成营业额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01.34亿美元，增长20.9%，占1979—1998年20年累计完成营业额683.7亿美元的14.8%。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77.7亿美元，占20年累计完成营业额457.6亿美元的17%。1998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出口的货物达2.7亿美元，占全国当年出口总额的1.5%，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2.5%。1998年末，我国在外劳务人员达32.5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

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形式日趋丰富多样，从普通劳工到医务工作人员，从运动员教练员到艺术家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不断走出国门。中国的乒乓球教练员和运动员几乎遍及全世界，中国劳工的吃苦耐劳和敬业合作精神为各国人民所称道。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传统艺术、医术等陆续走向国际，商业性文化交流既宣传了广博的中国文化，又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

四、国际旅游及其它形式的国际经济交流成效显著

建国50年来，我国的国际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有了长足的发展。1998年全年海外旅客入境人数达6348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10.2%。其中港、澳、台胞5625万人次，外国游客711万人次。当年创国际旅游收入12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

居世界第七位，其中旅游带动的商品销售收入达25亿美元左右，约占20%。

对外投资保持发展势头。我国对外投资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呈现出逐步发展势头。对外投资的市场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领域除制造业和贸易外，还包括资源开发、加工装配、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旅游及餐饮业等。我国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等国的投资不仅取得了经营权，而且向国内输入了大量的产品，从而既弥补了国内资源的不足，又降低了国内的使用成本。我国与非洲、南美洲沿海的一些国家进行了渔业合作开发，开展远洋捕捞，向国际和国内市场提供了短缺的海洋产品。我国还对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工业进行投资，包括对整个企业的购买。在发展商品贸易的基础上，我国还对俄罗斯、东欧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合资开办生产性企业或贸易公司，促进了双边贸易往来。截止1998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在外经贸部备案的境外企业共5666家，协议中方投资总额达63.3亿美元。对外投资在开拓国际市场、开发国外资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做出了贡献。

多双边贸易合作成效瞩目。50年来，我国遵循平等互利原则，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密切了我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关系。目前，我国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贸易伙伴的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稳步推进，与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关系不断增强，为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在多边贸易方面，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历时13年。在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和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国参与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并签署了最后文件；我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亚欧会议，为推进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亚太、亚欧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援外工作稳步开展。建国以后的前30年，我国曾不断地对一些国家给予了援助。改革开放后的1995年，我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包括已建成项目逐步改为以合资、合作方式经营，从而既帮助受援国的人民获得了技术和经营经验，也为中国企业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改革后，新的援外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受援国的理解和拥护，使援外工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95—1998年，我国已同43个国家签订了56笔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截止1998年年底，我国对外援助的国家累计达136个，援建成套项目1554个。

多种形式的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加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加大了引进国外人才的步伐。除了继续在对外宣传工作中邀请外国语言专家和少数医疗卫生专家来华执教外，我国还在各行各业中广泛聘请国际人士参与管理和提供技术援助。目前，每年外国专业技术人员来华入境的人次数已占外国人来华入境总人次数的6%以上。改革开放也推动了大量的外籍人员来华留学，到1998年底，我国已累计接受了152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25万人。与此同时，我国也派出大批的人员到国外学习，或鼓励本国公民自费出国留学。从最初的少量公费选派，到现在的大量自费考录，从起初的主要派出高中生、低年级大学生，到后来的主要是学士、硕士、博士出国，从开始仅以学习外国语言

及普通自然科学为主，到后来各门高深科学领域都有访问学者研修，我国借助国外智力资源为本国培养的各类专业人才越来越多，大量的留学归来人员成为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目前，我国已与1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文化交流和合作关系，签订了95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加入了75个国际性学术组织，累计向103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近30万名留学人员。

第三节 对外经济贸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它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显著加强。

一、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加快了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8%，1997年提高到36.4%，1998年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仍达到79395.7亿元，比1997年增长了7.8%，对外贸易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3.71%，其中出口占18.9%，进口占14.9%。可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带来的强势拉动分不开。而同时，大量地引进和利用外资，也有效地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对综合国力的提高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5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存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1.6%，到1997年，这一比重便上升到了24.4%；1990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占中国工业产品的销售总收入的比重仅有2%，到1997年，这一比重便上升到了20.5%；1997年中国的外债余额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达125%，与国家外汇储备的比例达94%。(参见表3-3)

对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增强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能力，我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199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7位，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第11位，出口排名第9位，进口排名第11位。多年连续的外贸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98年底达到1450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后盾，我国抵御外部金融与经济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也保证了我国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回旋余地。

表 3－3　改革开放前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

指标	1952	1978	1998	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3—1978	1978—1998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679.0	3624.1	79395.7	6.1	9.7
第一产业（亿元）	342.9	1018.4	14599.6	2.1	5.0
第二产业（亿元）	141.8	1745.2	38691.8	11.0	11.7
第三产业（亿元）	194.3	806.5	26104.3	5.5	10.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119	379	6392	4.0	8.3
国家财政收入（亿元）	183.70	1132.26	9853.0	7.2	11.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461	1397	24516.7	2.4	6.0
工业总产值（亿元）	349	4237	119048	11.4	15.0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9.4	206.4	3239.3	9.5	14.8
进口额（亿美元）	11.2	108.9	1401.7	9.1	13.6
出口额（亿美元）	8.2	97.5	1837.6	10.0	15.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和《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资料整理。

二、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使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势必要进行调整与优化，而这种调整与优化，不仅要立足国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也要依托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以使我国的经济结构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对外经济贸易作为连接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纽带和桥梁，通过及时获取国际商品市场的最新信息，对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为国内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机械、电子、汽车、化工、轻工、纺织、医药等许多行业，通过吸收外商投资使产品得到更新换代，技术工艺和生产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大规模集成电路、程控交换机等一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引进，填补了国内空白，缩短了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推动了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外商投资也使我国各类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大大丰富了我国居民的生活内容，提高了他们的总体生活水平。

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提高了我国国际竞争力。1997 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各国国际竞争力水平作出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国际竞争实力。

1. 在生产总水平方面，1997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 7 位。从增长速度看，我国人均 GDP 实际增长率排世界第 1 位。可见，无论从生产总规模，还是发展总水平，我国都表现出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实力水平。

2. 在经济运行方面，1997 年我国通货膨胀率仍然较高，但已从两位数字下降到 6% 的低水平，因而世界排名第 30 位，比 1996 年下降了 11 个位次，说明经济运行的环境条件已具备稳定的国际竞争实力。政府政策有效性方面，中国 1997 年世界排名第 13 位。

3. 国际交换方面，1990—1995 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16.96%，列世界第 1 位，1996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为 2.4%，具有较强的外贸竞争力。在资本流动方面，1996 年我国利用外资数量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实力。

三、加强了我国在世界各类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以及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世界各类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我国不仅参加了许多世界经济组织，而且在各类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行动，而且勇作中流砥柱，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从而对缓解东亚金融危机压力，稳定亚洲经济、甚至是整个世界经济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受到世界各国的好评。

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国对外贸易的 74% 是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进行的，引进外资的 90% 也是来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因此，中国不断地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合作，同时也努力建立与全球各国的合作关系，包括：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加强与东北亚的区域合作，特别是中韩的合作；加强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双边合作；加强与欧盟的洲际合作：加强与南亚次大陆、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世界、非洲、拉美等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地区及经济组织的合作。

随着对外开放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在世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中国作为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在两极化的世界秩序已告结束，世界新的格局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我国正以新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主要形式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进了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益贡献。

第四章　五十年曲折、辉煌的探索历程

新中国建立5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懈探索、长期建设的结果。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呈现的特点来看，50年的建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20年两个阶段，包括四个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的20年。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有计划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一、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

新中国是在一个十分落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建立的。建国之初，生产萎缩，交通梗阻，物价飞涨，市场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曾掀起四次全国性的涨价风潮。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

（一）打击投机，稳定物价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恶性通货膨胀已持续12年之久。针对市场秩序混乱、投机盛行、物价飞涨的状况，新中国确立了建立人民币市场，巩固扩大人民币阵地的金融方针。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金条、银元、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严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

同时，人民政府紧缩财政开支，减少货币发行，并从1949年11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重要物资，经过周密的布署，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增大供给，适时地集中抛售粮、棉等产品。这些措施，使投机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

国营经济开始掌握市场的主动权，全国市场物价趋于稳定。

（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

建国初期，由于以往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是分散进行的，中央财政只统一支出，却无统一收入，因而出现了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的被动局面。针对这一状况，中央决定统一财经工作。这是中央政府平衡财政收支的重要前提，也是最终稳定市场物价的重要举措。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把公粮、税收、仓库物资以及部分国营企业利润和折旧金按规定限时统归国库，由政府统一调用；各地国营贸易机构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国家开始集中控制了大部分重要物资，包括粮食、纱布、工业原料等。中央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实行统一的转账制度，统一了全国的现金管理和外汇管理。通过一系列政策的施行，中央实际上集中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掌握了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从而为保持物价长期稳定、集中财力物力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可靠的财政保障。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迅速改变了建国初期资金和物资管理上的混乱状况，在全国建立起统一集中管理的财政经济体制，取得了新中国经济战线的第一个巨大胜利。

二、土地制度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为了在经济领域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解放生产力，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的广大新解放区开展并基本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一）土地制度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在总结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土地改革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展开。这一次土地改革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统一的人民政府已经建立的条件下，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进行的。它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各个新解放区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基础上，依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令、方针和政策，在土地改革委员会和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下，分期分批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对于城市郊区、沿海、山陵和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一般农村的特殊土地政策。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至此被彻底废除，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空前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

农村经济的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二）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经济。由于旧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新中国面临严重的困难，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

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对于建国初期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的恢复是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恢复的基础。土地制度改革的胜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交通特别是铁路的恢复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并很快收到成效。对于工业、商业的恢复，一方面，政府在接管官僚资本的过程中贯彻“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使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调整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流通，并从 1950 年 6 月开始，通过各行业制定产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销售任务，以给私营工商业留下一定的经营空间。同时，国家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从而使它们能够继续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并保证它们获得正常利润。对于私营商业，国家鼓励其扩大经营范围，并委托它们进行代购代销，使它们的经营境况因此好转。1950 年冬，政府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农产品收购，并以此为突破口来振兴市场。通过成立农村供销合作社、经常召开土产交流会议和鼓励农民进行短距离的商品贩卖，农产品销售变得较为顺畅，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反过来又形成了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城乡交流日趋活跃，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初步发展，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52 年比 1949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7.5%，平均每年增长 21.1%。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45.1%，平均每年增长 34.8%；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53.5%，平均每年增长 15.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并大大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主要农产品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全面恢复，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这三年的经济恢复，为后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经过充分的酝酿，中共中央于 1952 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开

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从1953年开始。"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制定的过程中经过了反复调研与充分论证，基本符合我国当时建设的急需与国力的可能，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在苏联人民帮助下，我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新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这些项目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当时称为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一五"期间，全国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亿元，全国同时开展了10000多个工矿建设单位的施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68个全部或部分建成投产。从而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为以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参见表4-1)

表4-1　　"一五"计划成就（1957年与1952年比较）

项目	工农业总产值	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钢产量	煤产量	发电量	农业总产量	粮食产量	棉花产量
1957年比1952年增长（%）	67.8	210.0	83.0	296.0	96.0	166.0	24.8	19.0	26.0
年均增长（%）	10.9	25.4	12.9	59.2	19.2	33.2	4.5	3.7	4.7

资料来源：根据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和《中国统计年鉴1989》（第52、53页）数字编制。

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而缺少其它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抗御自然灾害，为了采用农业机械和其它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愿望。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日益尖锐，也形成了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因。

在1953年以前，合作的主要形式是临时性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以后逐渐发展到

以常年互助组为主。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此为标志，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转入到以初级合作社为中心的阶段，1953年末全国仅有初级社1.5万个，次年3月就有9.5万个，年底为49.7万个。到1955年6月，全国初级社已发展到63.4万个。同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错误地批判了运动中的所谓"右倾思想"。以此为转折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浪潮，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87.8%加入了高级社。至此，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1953年以前，国家主要是通过收购、加工、定货、包销等初级形式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953年夏季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开展以及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扩展与深化势在必行。国家着手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范围，在原有私营企业中加入国家公股，由国家派出干部参与企业管理。公私合营首先在私营大企业开展，然后扩展到中小企业，再进一步推广到主要行业和一般行业。1955年10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背景下，毛泽东邀请工商业代表座谈，随后又专门召开会议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当年末和次年初，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掀起高潮。到1956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核定私股股金，对这部分资本由分配利润改为定期付息，生产资料从此失去了作为职能资本的作用，而由国家统一支配，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农产品统购统销

1953—1985年我国在农村实行的有计划地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粮食、植物油和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政策，即国家向有剩余农产品的国营农场、集体生产单位和农户实行统购，在国家下达的统购数量指标范围内的农产品，都必须按国家规定统购价格收购；对非农业人口和缺粮油的农场以及从事渔盐林牧业的生产单位和农户所需的农产品实行统销政策。农产品统购统销由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工负责管理，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具体执行。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获得迅速增长，1985年，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制度进行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废除。

与此同时，国家还对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即开始限制私营批发商的活动并逐步加以取代。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对于零售业采取批购、经销、代销的方式进行改造。到1956年，私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三）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历史上，我国曾经是手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新中国初期，手工业总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5%—20%。1953年，中央决定从实际出发，从供销人手，将个体手工业组织起来，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直到1955年以前，手工业合作化发展得还是比

较稳妥的。1955年底，全国共有手工业合作社20928个，从业人员97.6万人，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11.9%，其产值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12.9%。农业合作化步入高潮之后，个体手工业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1956年3月，毛泽东作出加快手工业改造的指示，手工业合作化迅速推进。到1956年底，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达到603万多人，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1.7%；产值为108多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2.9%。

（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三大改造”的完成，使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有制经济开始占据绝对优势。（参见表4－2）

表4－2　“三大改造”前后所有制结构对比　单位：%

年份	全民所有制经济	集体所有制经济	公私合营经济	前三项合计	私营经济	个体经济
1952年	19.1	1.5	0.7	21.3	6.9	71.8
1956年	32.2	53.4	7.3	92.9	0.1	7.0

资料来源：根据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数字编制。

1955年夏季以后，由于对农业合作化、对手工业与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出现了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现象；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处理和使用也不很适当；由于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确定为建立苏联式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遗留下了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后来长期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副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一直到1978年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这些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但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在改造进程中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仍得到迅速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巨大勇气、伟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经验。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后，在工业建设和计划管理方面，基本

是学习苏联的做法。到1955年底，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不适合我国国情，便开始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种探索的最初成果体现在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的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联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报告阐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与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指出传统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改革的根本措施在于向下级政府和企业下放权力。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探索。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会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可以集中精力，着眼于现今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就如何贯彻综合平衡、如何对待各种经济成分、如何利用经济规律、如何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计划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认识。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与党和国家的其它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卓越探索，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一些领导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不顾客观实际可能，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错误地批评反对冒进的同志，最后终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使我国经济发展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一)“大跃进”运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地估计了粮食产量，提出把工作重心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并确定了以钢产量为中心的一系列高指标。会议要求：钢产量1958年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再翻一番。达到2700—3000万吨，粮食产量在1959年达到8000—10000亿斤，提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了

实现这些指标，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指标层层抬高。同时，随着管理体制盲目下放地方，基建规模急剧膨胀。从1958年9月开始，全国范围内“大炼钢铁”，大办“大洋群”、“小土群”，不断追加投资，不顾其它，“全面保钢”，能源生产、交通运输均要服从炼钢的需要；农村动用大量劳力砍伐树木，土法炼钢炼铁；商业系统无条件收购钢铁，银行系统五条件提供信贷，更是推波助澜。结果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国家职工人数增加过快，农副产品供应紧张。1958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高达267亿元，比上年增加97%，相当于“一五”时期投资总额的一半。

“大跃进”运动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1958年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和次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开始采取行动纠正错误。连续两次调低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并开始收回一些盲目下放的权利。这些努力虽然没有清算“左”的错误，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59年7—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中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加深。在次年的上海会议上，中央估计1960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并且再次规定了以钢产量为中心的高指标，并提出所有制过渡的措施。以此为标志，全国再一次掀起了“大跃进”高潮，继续追求高指标，又大搞劳民伤财的“小土群”，“大炼钢铁”，同时盲目要求各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使得“大跃进”运动在1960年上半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损失。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高级合作社成为农业生产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为了大搞水利建设，毛泽东在1958年3月要求各地并小社为大社。同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此后便出现了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8月下旬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到9月底，全国农村除西藏地区外全部实现公社化，全国共建立人民公社26425个，参加公社的农户达12194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8%。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大二公”是其最突出的特点。所谓“大”，一是指规模大，绝大多数人民公社都有三四千户农民；二是经营范围大，农林牧副渔全面经营。所谓“公”，一是指人民公社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二为一，国家把一些全民所有制单位下放给公社管理，增加它们的公有制色彩；二是指公社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等收归公有，消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残余”；三是实行工资制、粮食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化运动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分配制度上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果必然导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成了政府集中调度资源的工具，当时的“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等运动，都依靠人民公社无偿地调用农村资源，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影响农副业生产，加之于非农人员增多使得农副产品需求增加，导致农副产品严重供不应求。

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前中央便有所察觉，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提出整社工作，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中央重新肯定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以及价值规律和货币的作用，重新肯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企图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的错误思想，并规定人民公社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农村工作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否定了这些调整，"左"的错误再次升级。1960年3月，重新推广农村公社食堂，农村社会关系再度紧张。

1959年庐山会议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会议的原定议题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与会同志根据这一宗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意见。7月14日，彭德怀就"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陈述和分析。毛泽东把信转发与会同志讨论，以作为批判的准备。7月23日，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彭德怀的言行，并认为党内存在着大批的反对派和怀疑派，阶级斗争还会扩大。因此，会议由本来的"纠左"转向了反"右"。随后，在全国各地区党政机关和基层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

庐山会议掀起的这场"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严重危害了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独行的不正之风和工作中宁"左"勿"右"的歪风，为"左"的错误更加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上，由本应该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转向了继续跃进，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后来不得不在1960年开始经济调整。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低谷和复苏时期。

三、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年，我国在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经济困难突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全面失调，国家和人民都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 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对高速度的追求导致了高积累率。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积累率分别为33.9%、43.8%、39.6%，新增积累额占新增国民收入的比重，1957年为33%，1958年增至80%，1959年则超过100%。高积累率不仅使得资金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且严重挤占了人民消费，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无法得到满足，人均消费为建国来的最低水平，甚至出现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2. 工农业比例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农业总产值反而下降22.7%，工农业产值比由5.7:4.3变为8：2。由此带来的首要问题便是粮食供应

严重不足，三年间人口增加1600万，粮食却减少1031亿斤，结果是“国家挤农民、口粮挤饲料粮、粮食挤经济作物”，整个农业生产都急剧下滑，农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调。

3. 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采掘工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三年间，尽管煤炭产量增长两倍，但仍不能满足“大炼钢铁”的需要，煤矿掘进度落后于开采，煤矿设备损坏严重，元气大伤。轻重工业比例也失调。在“一五”期间，轻重工业总产值之比大体上为3:2，比例关系基本上正常，在1958年到1960年，这一比例变为1:2，市场上轻工产品供应严重困难。除此之外，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比例失调，运输业的发展滞后，导致货物积压。

4. 财政信贷失衡。为扩大基本建设，不得不多招职工，再加上企业亏损，使得财政开支和银行贷款剧增、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至1960年，财政赤字达到81.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2.5%；1961年的货币流通量虽然较1957年增加了1倍，但仍不能满足对资金的需求。

导致困难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经济工作的严重失误。在1958年到1960年，由于贯彻“以钢为纲”，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顾效益地把全国资源集中于发展钢铁工业。导致轻工业、农业发展连年负增长；工业内部结构明显不合理、基础工业发展滞后。在生产关系方面，一方面由于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盲目集权；另一方面对工业管理权限盲目下放地方，导致既严重地窒息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使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在经济发展中，不尊重客观规律，急于求成，高指标、“浮夸风”盛行，人为地破坏了生产力。此外，1959年到1961年我国部分地区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在1960年7月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停止了一切合作，使得一些建设项目一时无法进行，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

四、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调整国民经济势在必行。1960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调整工作。特别是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开始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故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一)"八字方针"和1961年的经济调整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把"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确定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指导方针，简称为"八字方针"。1961年的经济调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恢复农业。重申"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恢复自留地和集市贸易，允许家庭从事副业生产和组织作业小组，同时减少粮食征购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废除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二是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逐步把经济管理权限收归中央，统一财政工作和货币发行。三是努力稳定和调剂市场供应。一方面通过采取暂时冻结存款和从预算拨款中预扣经费的办法压缩集团购买力；另一方面对部分消费品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供应，计划外价格较高，但可满足一部分需求，有助于货币回笼和增加财政收入。上述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二) 全面进行经济调整

1961年的经济调整由于没有把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靠的程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进展缓慢，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于1961年9月召开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当机立断，切实进行调整工作，"该退的必须坚决退，而且要退够"。会议精神在次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切实得到贯彻。"八字方针"开始得到全面执行。

1962年，中央先后采取了若干果断措施：(1) 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通过收回基本建设审批权和把基本建设资金改由中央财政拨款，使得1961年和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上年削减207.89亿元和33.62亿元，预算外投资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结果，1961年和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减少67.2%和44%，这为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腾出了较大的空间。(2) 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1961年和1962年的1—10月，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共减少4.4万个，相当于总数的45%，多数地区的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削减到了1957年的水平。通过这次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有所改善，劣质资源淘汰出局，产业组织结构得到改善。(3) 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961年国家开始动员城市职工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经过艰苦的努力，从1961年开始的两年半时间内共精减职工1940多万人，城镇人口总共减少2600万人左右，因而明显减轻了商品粮供应和工资开支的压力。(4) 把生产小队作为农业的基本核算单位，并鼓励农村副业发展。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原材料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增加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的生产量和供应量，增加农用煤和燃料油的供应，促进农业发展。(5)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财政支出，稳定财政金融，以抑制通货膨胀。(6) 在农村恢复集市贸易，在城市恢复合作商业，以活跃商品流通、繁荣市场。

(三) 继续调整的三年

经过1962年强有力的调整，国民经济在1963年开始全面好转。农业生产初步恢复，各种比例关系开始趋于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货币流通量相应减少。但

是，这种好转的势头还相当脆弱。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顶住“左”倾思想重新抬头的压力，决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这次调整的重点转向“八字方针”中的“巩固、充实、提高”，主要是加强短线产品、薄弱部门和薄弱环节，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技术改造工作。三年中继续减少职工600万人，减少基本建设资金7.9亿元，同时试办“托拉斯”，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探索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当时还推行了固定工人和“亦工亦农”两种劳动制度以及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以利于缓解失业压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些措施都取得了较好效果。

（四）调整的成绩

调整期间，由于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作风，上下一心，在国际环境恶化的不利条件下，再一次创造了恢复发展的奇迹，使国民经济仅用约3年的时间就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重新恢复正常（参见表4-3），经济运转情况良好，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外经济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到1964年，中国已经按期偿还了苏联13.89亿新卢布的贷款，剩下的1700万，中国又用1964年对苏贸易顺差的一部分提前还清。另外，中国还提前一年还清了1960年的贸易欠账；1965年又提前两年还清了1961年借的50万吨糖。1962年至1963年间，我国从国外引进了14个成套项目和最新的石油化工设备。1963年至1964年，国家又批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100多个项目向国外考察、询价和相机签约。1964年至1965年，机械工业从日本、法国等国家引进了液压件、电动气动量仪、重型汽车三个项目，并引进玻璃电极、微电机等7项技术和设备。在这期间，我们还给予了许多国家人民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大力的支持。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后来影响颇大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任务。

表4-3　　国民经济调整前后经济状况

年份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	75:25	78:22	66:34	61:39	61:39	62:38	63:37
轻工业产值与重工业产值之比（%）	42:58	33:67	42:58	47:53	45:55	44:56	52:48
积累率（%）	43.8	39.6	19.2	10.4	17.5	22.2	27.1
国家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65.8	-81.8	-10.9	8.3	2.7	0.5	7.0
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元）	97	103	114	117	116	120	12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

但是，与产业结构同时进行的经济体制调整，在1962年却遇到了阻碍。对“包产到户”的否定和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使得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探索被局限于集体共同生产经营的范围内。在企业改革方面，尽管试办了政企相对分离的“托拉斯”，但是由于严厉限制市场调节，仍然没有解开“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在企业内部，也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这一切都使国民经济在完成调整恢复任

务后，依然面临着如何改革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问题。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工作重心错误地转向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成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严重混乱，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对经济的冲击

1962年，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此后“左”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到1966年，毛泽东认为，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同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从8月份掀起的全国师生大串连，导致交通运输紧张，货运任务无法完成。到年底仅铁路就有1000万吨物资运不出去。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鼓动“造反”，批斗所谓的“走资派”，各级党政机关难以正常工作，原有生产秩序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工业生产滑坡。

1967年1月开始，“文化大革命”由“大批判”发展到“全面夺权”，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由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动乱的冲击也由上层建筑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全国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大量厂房设备遭到破坏，大多数企业停工停产，交通中断、生产停滞，整个经济生活处于极端无序状态，无政府主义猖獗。

二、“三线”建设和“五小工业”的发展

针对全国的混乱状态，中央委派人民解放军实施“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各地各部门以及基层政权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使政治局势一度走向稳定。周恩来利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召开了中断两年的计划工作会议，扭转了经济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经济形势在1969年有所好转。

早在1964年，针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经济建设方针，集中力量进行三线建设，形成全国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有大、小三线之分。大三线

是就全国而言，当时确定范围有云、贵、川、陕、甘、青、宁、豫、鄂、湘、晋11省。小三线指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的小后方。1969年，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中苏部队发生流血冲突。三线建设进一步加紧进行。自1966年至1980年，三线共安排建设项目1100多个，大部分项目形成了生产能力。建成了以成昆、湘黔等铁路和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葛洲坝、龙羊峡和神头等大型水火电站，第二汽车制造厂等铁路、冶金、能源、机械和国防工业。改变了我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对战争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估计过急，过于片面强调“山、散、洞”的方针等原因，部分项目投资效益较差。同时，为了建设“小三线”，实现各地区经济与军事工业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国家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强调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造成了一些重复建设，但“三线”建设和“五小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1970年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使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较上年增长25.7%；其它主要经济指标也有较大增幅，并大体上完成了“三五”计划。

1970年拟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立足于“备战”，不切实际地制定高指标，要求钢铁产量五年内实现翻番，三年内扭转南煤北运等。为此，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拉得过长，预算内基建投资由1969年的181.60亿元增加到272.73亿元，积累率也由1969年的23.2%陡升到1970年的32.9%；在物质供应方面，计划安排留有较大缺口。这就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了以“三个突破”为标志的比例失调，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是加强基本建设管理，削减基本建设规模；二是收回劳动工资管理权限，控制职工人数与工资总额；三是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四是调低“四五”计划中的过高指标，并努力克服“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的影响。经过1972年、特别是1973年的努力，经济形势再次好转，工农业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三、第二次生育高峰和人口政策的转变

中国人口众多，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建国以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1953年至1957年，人口高速增加，其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34.8‰和24.1‰，形成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参与群众性“大炼钢铁”、“大办水利”等活动，从而掩盖了前几年刚出现的就业难的苗头；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高强度使用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人口死亡率骤然升高，人口增加速度放慢，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甚至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和人口负增长。之后，第一次高峰期新增人口逐渐步入生育期，政府却还没有将人口控制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政府基本上陷于瘫痪，生育无政府

状态和人口盲目增加更为严重，1962 年到 1973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达 30‰以上，净增人口 1 个亿以上，人口增加出现了第二个高峰。

1970 年在拟定“四五”计划纲要时，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有了初步的认识，周恩来强调要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国家计划，并从这一年起采取大力控制出生率的措施。1973 年恢复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四五”期间，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大，新增人口还是高达 9428 万。在 1975 年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越来越大，人口增加逐渐得到控制。但是，无论从近期还是远期来看，过大的人口基数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我国的第三产业相对滞后，“文化大革命”中又把许多正当的商业、服务业砍掉，导致劳动者就业出路更为狭窄，大批城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况。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方面国家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组织城镇居民下乡从事农业生产（1966 年至 1976 年约有 1600 万人“上山下乡”和 2000 万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另一方面，城镇却不得不向农村招工，大量农村人口（估计为 2000 万人）流入城市和工矿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城乡人口大对流，从表面上掩盖了就业矛盾，但是，几年后随着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给当时和以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四、“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经济形势

1973 年，江青一伙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并于 1974 年 1 月别有用心地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煽动并鼓励各地大搞“二次夺权”。一时间，全国社会经济秩序再度混乱，政府机关无法运转，工人不上班、不生产，全国出现了搞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的混乱局面，刚刚稳定的经济形势再度陷入动荡，国民经济无法正常运转，突出表现为煤炭欠产、铁路运输堵塞、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财政也因此出现赤字。为此，毛泽东作出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于 1975 年 1 月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工作。邓小平克服重重阻力，开始了艰难的经济整顿工作。他以问题最大的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作为突破口，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整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全国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975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1.9%，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147.5 亿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基本建设进度加快，投资效益有所提高，市场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状况都有所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 1975 年 11 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抓住此次机会兴风作浪。各级经济管理机构再度受到冲击，大批领导干部被批斗或打倒，许多法令规章制度被废除，正常的经济秩序再度遭到严重破坏。

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辞世，唐山大地震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特别是“四人帮”的冲击破坏，使得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 1.5%，绝大多数产品产量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 58.9%，经济效益是建国以来最差年份之一。年底，全国国营企业亏损额达 177 亿元，为 1965 年的 3 倍。财政赤

字增加，达到29.6亿元，国库亏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再次严重失调。10月，中共中央粉粹了“四人帮”，结束了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遭到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挫折和损失。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被破坏，经济指导思想的许多是非被混淆，一些“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由于党和人民艰难曲折的斗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这一期间，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宝成铁路等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武钢引进的一米七轧机等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设备陆续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尽管如此，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进一步拉大了。

第四节　历史的伟大转折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国家。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特征、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一、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的经济状况

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工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技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其它一些“左”的政策仍在继续。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针对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国务院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首先解决铁路堵塞问题。接着从1976年12月起开始整顿企业，强调按劳分配，恢复奖金制度，给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并且大量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的农业总产值较1976年增长10.8%，工业总产值则连续两年增长13%以上，有52种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财政收入也有较大增长，结束了1974年到1976年连续三年的财政赤字；对外贸易额显著增长，市场供应情况也明显好转；人民

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

（二）经济工作中的失误

经济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并没有得到清理和纠正。在指导思想上，“左”的指导思想依然占支配地位，表现为继续盲目追求高速度，盲目提出高指标，认为“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张，积累率攀高。

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原已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加剧：（1）1977 年、1978 年两年的积累率分别为 32.3%和 36.5%，两年间新增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只占 38%，投资规模大，效益差，人民生活没有什么改善。(2) 继续实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工业内部结构畸型，农副产品缺乏。(3) 引进项目缺乏必要的论证，外贸逆差高达 11.4 亿美元。(4) 就业问题突出，全国约有 2000 万人需要安排就业。（5）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仍未恢复正常。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会议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邓小平在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会议同意上述意见，并进一步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等。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策指导思想：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它地区、其它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强调说，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这样，这次全会就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全会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

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是全党摆脱长期"左"的错误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走向新的振兴的起点。但是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需要一个过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更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历史任务。三中全会以后经过理论上的反复探讨、对历史的实事求是反思和经济调整改革的具体实践，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才逐步纠正脱离国情、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左"的错误，初步找到了一条从中国国情出发，速度适当，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段时间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基本总结，宣告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已经得到根本性转变。

三、20年经济发展的轨迹

（一）1979—1985年的经济发展

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现状的调查，对我国经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而长期存在的比例失调问题的认识日益明确。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1979年和1980年经济调整工作的主要内容：

1. 改善农轻重之间的关系。国家对农村政策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并且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两年中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30.8%，农民从中得到277亿元的好处，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大力发展农村社队企业的精神，国家为社队企业制定了税收优惠、奖售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了社队企业（此后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同时，政府采取了优先安排轻纺生产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建设投资、银行贷款、进口用汇、交通运输等特殊措施，加速发展轻工业。对于重工业，则通过调整冶金、机械、化工等行业的产品结构和服务方向，使它们更好地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

2.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两年内，国家安排了1800万城镇劳动力就业，提高40%以上职工的工资，并通过实行奖金制度，发给职工副食品补贴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使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1980年同1978年相比，积累率

由36.5%下降到31.6%，而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相应地由63.5%上升到68.4%。

上述调整使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长期形成的各种失调的比例关系还使国民经济潜伏着危险，突出表现为财政连年出现赤字，靠向银行透支过日子。因此，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

1981年，国家坚决压缩投资，当年减少基本建设投资116亿元，并且关停并转了一些小型加工企业，取得了明显效果。1982年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承包制的推广，农业增长迅速，1983年、1984年的国民经济发展也比较平稳，一些重要的比例关系逐步恢复正常。

经过上述努力，国民经济"六五"计划所规定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提前或超额完成，使1981—1985年成为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这5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7%，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繁荣，对外经济活跃，财政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这5年中，农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10.1%，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5.6%。"六五"期间重点建设成绩显著，其中葛洲坝二江水电站96.5万千瓦的7台发电机组投入运行；全国最大的建设项目——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生铁300万吨、钢300万吨、无缝钢管50万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已经建成，并于1985年底进入试生产阶段。

（二）1985—1991年的经济发展

1984年开始，经济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在经济发展取得重要成绩的同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一些政策的负面效应，社会总需求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膨胀，1985年经济开始趋热，使社会经济出现供求严重失衡。中央于1985年提出并实施了以压缩财政开支和紧缩银根的"双紧"方针为核心的一系列紧缩措施，期望使国民经济实现从过热膨胀状态到稳步健康发展。然而此次"双紧"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当年工业总产值仍达到18%的高速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8.7%，全社会零售物价上涨8.8%。1985年到1987年，全年全国零售物价分别比上年上升了8.8%、6.0%、7.3%。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比1987年又上涨了18.5%，是建国以来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1989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由于物价涨势的惯性作用仍比上年增长17.8%。这时候企业和地方开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投资需求旺盛。中央政府在不断地"放权让利"后调控能力削弱，中央为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承担风险，投资需求缺乏约束，个人收入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流通领域内的混乱使得矛盾更加激化并已经出现比较普遍的抢购风潮，仅1988年8月就被抢购了60亿元商品，因抢购商品而挤兑银行存款26亿多元。政府不得不开始治理整顿。

198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同时调整经济结构，控制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和减少重复建设，大力加强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

建设，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经过1989年到1991年三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治理整顿预定的主要任务。通过大力压缩投资和集团消费等措施，物价从1990年开始回落，整体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好转，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安定。三年治理整顿取得了成效，经济过热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也出现了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经济效益不高、财政困难较大、市场疲软、产品销售困难、"三角债"增多等问题。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大起大落。但由于遵循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1986--1990年的"七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仍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超过计划的要求。同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我国单一的经济形式和所有制结构被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多种经济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所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加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七五"计划的完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跃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1992—1997年的经济发展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决议，彻底摆脱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作不同社会制度基本特征的观念的束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有了根本性的突破，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使全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1992年到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37.6%、50.6%和27.8%，货币投放也高幅度增长，物价水平居高不下。中央从1993年下半年起再次实行以紧缩为取向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着手治理通货膨胀。通过三年的努力，压缩需求（特别是压缩投资需求），扩大供给（尤其是扩大粮食供给），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1991—1995年的"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圆满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迅速；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金融形势基本平衡；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全方位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1995年就已提前完成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任务。从各项指标来看，"八五"计划是建国以来执行效果最好的五年计划之一。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此后的物价涨幅逐年降低，国民经济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为抵御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四）199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消费需求不振、固定资产投资放缓、价格总水平不断下降、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新情况。针对这些问题，从1998年初起，国家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对策，各类调控手

段与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推出，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国内特大洪涝灾害面前，1998年国民经济仍实现了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8%。

20年间，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市场供给充足；科技、卫生、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比较优势得到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增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间也翻了两番多，人民生活水平正在由温饱阶段向小康阶段迈进，居民消费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

经济“软着陆”

经济“软着陆”指的是国家针对某时期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实行以紧缩为取向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国民经济平稳地逐步走向有序发展的状态，达到既不过于膨胀、也不过于萧条的平稳运行状态，从而避免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给经济带来的破坏。现实中，要实现经济“软着陆”存在相当的难度，它要求政府既要解决好经济过热带来的投资盲目扩大、物价上涨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又要注意避免操作不当出现经济“急刹车”，造成经济发展停顿。

四、二十年的改革开放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改革的启动和局部试验（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

我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1978年秋，安徽、四川部分地区因遭受自然灾害，农民自发恢复了60年代初期经济调整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得到保障，各地农村干部和群众纷纷恢复和创造了多种形式以“包”字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此，党中央采取了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的方针，在实践中因势利导，使农业生产责任制很快发展起来。各地出现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开始主要是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两类。1979年底，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1/4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1980年9月，中央肯定了这些做法，1982年进一步在文件中予以确认。到年底已有92%的生产队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79年到1984年的六年间，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其中粮食，棉花产量分别增长1.9倍和1.3倍；农民年均消费水平在六年间增长一倍多。农业承包制改革，造就了千千万万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农村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其它方面改革的试验。在国有企业，先是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后来在1983年和1984年推行了两步“利改税”。1981年还开始推行城

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行市管县的体制；在财政体制方面，从1979年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

这个时期还开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种经济形式随着城镇劳动力就业的需要逐步恢复和发展。197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广泛宣传了北京市广开就业门路，大力组织集体所有制和各种生产服务事业，解决青年劳动就业问题的经验。1970年8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明确宣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权宜之计。并对如何扶持和保护个体经济作出了规定。在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下，我国城镇自1957年以后不断减少的集体经济和几乎绝迹的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到1982年，全国城镇集体和个体劳动者人数比1978年增长了35.6%，占城镇劳动者总数的比重由1978年的21.7%增长到24.5%。1978到1982年新增的就业人员中，35.8%从事集体和个体经营，而且主要是充实到原来比较薄弱的商业、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通过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1984年10月到1992年1月）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解放了长期以来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1984年，农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好收成，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仅仅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也显著地增强了试点企业的活力，提高了试点企业及其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增强了政府进一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的触角伸入各个领域。这次会议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认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根据改革和发展实践的要求，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经济体制改革原则与方向作了更进一步的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的深化。总之，从1984年10月至1992年初的这一时期的改革，是围绕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目标进行的，即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体制，统一开放、运转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和以经济手段调节为主的宏观间接管理体制。相应进行的主要改革：

1.在实行“经济责任制”、“利改税”等措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承包、租赁等形式实现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与此同时，配套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并且，通过企业间的承包、租赁、兼并及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企业集

团，推动生产要素，促进企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2. 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比价关系，改善价格形成机制。在1983年放开小商品价格的基础上，1985年起又陆续放开了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并对部分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实行了计划内和计划外“双轨制”价格。同时改革商业经营管理体制，在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改、转、租、包、卖”等形式，改善国营流通企业的经营机制，发展非国营流通企业，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高效畅通的流通经营网络和管理体制。并在价格与流通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撤关除卡措施，开拓各类市场，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与完善。

3. 通过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实现计划工作重点由定指标、立项目、分钱物向宏观总量控制和长期的结构调整的转变以及对部分城市实行计划单列，改善宏观经济管理，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与此相应，改财政的统收统支体制为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变单一税制为复合税制；并在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分离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职能的基础上，探索通过运用综合信贷计划、存款准备金、利率等经济杠杆调节金融、经济活动，通过专业银行的企业化管理与经营活跃金融行为，加快资金流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路子。

除上述三个主要方面外，还大胆进行了股份制、破产制方面的试点，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出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舞台上。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改革也相继登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是我国改革涉及面宽广、改革步伐最快的时期之一。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对外开放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继1980年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后，又相继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中国经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这一阶段的探索中，我们经受住了1989年的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和1988—1991年经济发展波动的考验，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这一阶段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积累了经验，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三）以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阶段（1992年至今）

1992年是中国改革史上又一个关键年度。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10月，中共“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明确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作出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与部署，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方面的改革呈现全面突破的新景象。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新的突破，从而推动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总之，从1992年至今的这一时期，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

革取得了重大突破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改革进展包括：

1. 大踏步地进行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在1993年整顿以金融秩序为主的经济秩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从1994年起，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深入展开。在财政体制方面，实现了由各式各样的财政包干制向在划分事权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分税制的转变；在税收体制方面，重点改变了按产品分设税目、分税目制定差别税率的传统做法，确立了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制度；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围绕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建设有效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和把国家专业银行转变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展开；在外汇管理体制方面实现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实现了自由可兑换；在计划体制方面，国家计划管理职能进一步转变，总体上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为总体上的指导性计划所代替；在价格管理体制方面，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取消了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进程也大大加快；在投融资体制方面，重点是推行项目法人制、资本金制度和招标制度，加强投资风险约束。这些改革的顺利推进和不断完善，不仅使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起来，而且为其它方面改革的深化创造了条件。

2. 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改革的重点从主要是“放权让利”转向着力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的精神，中央和地方普遍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被改造成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被改组为控股公司。同时，发展了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产权联结为主要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众多的小型国有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进行了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各地积极开展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作，推动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形成。在着力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的同时，通过资产重组和企业并购等途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使国有资本逐渐集中到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1997年，中央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按照这一要求，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全面深化。

3. 市场流通领域的改革继续向深层推进。除继续深化价格改革外，这一时期在健全市场规则、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一定的行政手段，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分垄断，打击走私贩私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行为。与此同时，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和各类要素市场，并积极推进代理制，鼓励大型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联合，内外资企业联合，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这些改革，有力地推进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大大增强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

4.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三条保障线”制度。

“三条保障线”

这是适应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改革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用由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三分之一的办法。依据此办法，领取基本生活费用三年后还没有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要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转入社会保险机构领取失业保险金；如果享受失业保险两年后仍未就业，便再转到民政部门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

5. 所有制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在这一时期，随着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深入展开，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日趋多样化。国有控股的经济包括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党的十五大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农村经济、对外贸易、城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在这一时期也都有新的进展。

第五章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迅速发展生产力，必须从两个方面开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是根据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二是制定适宜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战略重点和步骤，解决经济建设中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5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我国逐渐形成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

第一节 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和“三步走”战略的提出

采取适宜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指导我国经济的建设，是建国5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重视的一个大课题。在这方面，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

一、改革开放以前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

1978年以前，我国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事实上从建国一开始就进行着。

194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国设想，将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写入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接着，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项战略任务：（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从而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52年底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要有步骤地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

公有制。同时，从1950—1955年历时6年，4易其稿，制定了比较适合国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1956年1月，中共中央拟定了《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后经修改于1960年由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和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长期规划。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试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主张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认为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并且使之更快、更多地发展。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提出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础，以便支持内地工业大力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指出要适当压缩军政费用的支出，多搞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建设要建立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不允许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等。《论十大关系》对如何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10个重大关系问题提出了科学的原则，但随后进行的“大三线”建设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都不同程度地违背了这些原则。1957年7月，毛泽东同志提出用10年至15年时间建立现代化的工农业基础；此后，准备以8个至10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并准备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同年11月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时，又提出争取15年超过英国。由于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急剧膨胀，导致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左”的色彩。总路线的严重缺陷，助长了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为“大跃进”的发动奠定了基础，使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在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工作基本方针。同时还提出了：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等经济工作方针。围绕这些方针，调整工作有效进行，为国民经济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1966—1975年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均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那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不仅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原有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实施也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与冲击，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事实上也被打断。

纵观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除个别时期外，我国采取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并占主导地位的赶超战略。这种战略概括地说就是：基本上或完全依靠国内积累的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随着重工业的建立

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它产业部门，使这些部门逐步转移到机器大生产的轨道上来，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替代进口；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种战略最重要的特点有二：一是以经济高速度发展为主要目标，二是把重工业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同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直接相关的。从国内情况看，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百废待兴。从国际环境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我国，在经济上对我实行封锁、禁运、冻结，以图搞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我国最初确立的积极同国外发展经济交往的政策受到极大阻碍。在这种条件下，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关系国家和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在经济建设中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在当时是大致适应我国国情的，因而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1）我国经济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通过实施这种战略，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集中起来用于发展重工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52—1978 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7.9%、8.2%和 6.0%（参见表 5-1）。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不仅同解放前相比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远高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参见表 5-2)

表 5-1　　改革开放前我国务主要时期经济发展速度　　单位:%

时期	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	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一五”时期	11.3	10.9	9.1	8.9
“二五”时期	-0.4	0.6	-2.2	-3.1
1963—1965 年	15.5	15.7	14.9	14.7
“三五”时期	9.3	9.6	6.9	8.3
“四五”时期	7.3	7.8	5.5	5.5
1976—1978 年	8.1	8.0	5.8	5.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经济平衡统计司：《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5、46 页。

表 5-2　　1950—1977 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增长速度比较　　单位:%

国家名称	中国	日本	苏联	联邦德国	印度	法国	美国	英国
工业年平均增长率	15.5	12.4	9.7	6.9	6.0	5.2	4.5	2.3

资料来源：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25 页。

(2) 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一批为国家工业化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甚至完全空白的基础工业建设起来了。以后又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进一步健全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各部门内部结构也有了很大改善，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在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也从无到有建设起来。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看，这种战略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3) 维护了国家政权及经济的独立。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民经济体系和民族工业、国防工业的建立和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国顶住了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维护了人民民主政权及经济上的独立。

综上所述，当时我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来进行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但这一战略也存在着内在的一些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进行，这些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并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1) 这种战略的实施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模式之间客观上要求相互适应、配套。选择了一种发展战略，就要求一定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配合。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面临的资金、原材料、技术等短缺的制约，就需要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为了集中财力物力进行重工业建设，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就需要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必然导致企业缺乏活力，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等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2) 这种战略的实施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基础地位被忽视，而且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大量资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来自农业。为了从农业中取得更多的积累资金，不得不压低了农产品价格，产生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影响了农民向国家出售农产品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农业生产。此外，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3) 这种战略导致积累率过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更快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大提高。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总的来说，积累率过高，挫伤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经济的更快发展。实践证明，凡是积累率较高的时期，经济增长率反而是各个时期中较低的，而积累率较低时期，经济增长率反而是较高的。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处理不当，也妨碍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前30年间，我国积累额的增长速度，除“一五”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外，其它时期都超过国民收入总额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30年间，除1957年以前职工实际收入有所增长外，从1957—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实际下降5.7%，职工的实际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1963年以来，城乡居民年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参见表5－3)

表 5－3 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时期积累率及经济增长速度、人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 单位：%

时期	积累率	全国职工和农民个人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速度	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
"一五"时期	24.2	6.1	8.9
"二五"时期	30.8	3.0	－3.1
1963—1965 年	22.7	2.2	14.5
"三五"时期	26.3	2.3	8.4
"四五"时期	33.0	2.2	5.6
1976—1978 年	33.3	3.1	6.0

资料来源：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73 页、588 页。

这就是说，我国在经济起步阶段曾取得重大成功的经发展战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已经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适应新的形势调整发展战略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本来，"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前后是我国进行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适当时机。经过"一五"期间的建设，我国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是基本协调的，并且，毛泽东同志也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事实上，党和政府已着手了这方面的努力，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提出了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按这个方向走下去，经济建设就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点。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八大"的正确决策没有实行，原有经济发展战略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向极端方向发展，致使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

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1978 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国开始从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思考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从探索到成熟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主要是确立了"翻两番"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一）"翻两番"目标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年动乱"及其以前的历史问题得到拨乱反正。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 年 12 月，邓

小平会见当时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根据这一思想，我国在"六五"计划中，不仅对国民经济中期发展做出了部署，而且首次提出年工农业总产值到2000年"翻两番"的长期战略规划。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继续把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到2000年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其中战略目标是：从1981年到200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这个目标的实现将使我国国民收人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城乡人民收入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战略发展的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战略步骤是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一步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翻两番"的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分阶段实施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综合平衡的指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把经济、科学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十分重视发挥科技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指导思想上改变了过去盲目求快的"左"倾思想。在这个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建设走出了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邓小平同志评价说："这条道路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

（二）"三步走"战略的提出

本世纪达到小康水平后，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代表时，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他说，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2月，邓小平切合实际地把"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提法改为"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又一次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指出："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翻两番"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明确地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从此，"三步走"战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相比具有显著的特点：（1）这一战略从中国实际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

盾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纠正了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的偏向，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2) 它体现了当前目标和长远发展目标相结合，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3) 它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4) 这一战略注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参见表5－4）。关于"三步走"战略的伟大意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表5－4　　传统发展战略与"三步走"战略比较

	传统发展战略	"三步走"战略
时期	1949—1978年	1978年以来
战略目标	追求经济增长，尽快赶上经济发达国家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部门发展优先次序	重工业优先发展	注重综合平衡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过渡
技术选择	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结合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
对外关系	封闭、半封闭状态	全方位开放
经济体制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三步走"战略的伟大实践

科学完整、目标明确的"三步走"战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自实施以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1988年，我国就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4922.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4517.8亿元增长102%，基本上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57494.9亿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用7年时间又翻了一番，原定于2000年实现的战略目标提前实现。据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原来第二步战略目标修改为：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20年来，在"翻两番"和"三步走"战略的正确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我国当前所处的战略阶段及发展目标

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为争取早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

济建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我国“九五”和2010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第三步战略目标，成为“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以上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在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改革开放以前，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指导下，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期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及客观条件的变化，经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与优化。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

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十分薄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产业结构。在当时的产业构成中，农业比重很高，但基础很差；现代工业基础薄弱，工业结构残缺不全，并带有严重的倚外性质；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还没有建立起来，已有的工业基础都集中于沿海一带，工业布局极不合理。面对落后的经济和极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加之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我国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党中央提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建立大体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与此相适应，在产业结构的演变上也出现了一种向重工业倾斜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

1. 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1949年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0%，其中约半数为手工业，近现代工业仅占17%左右；1978年上升为75.2%。（参见表5-5）

2. 工业内部构成中的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1952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35.5%，到60年代，重工业产值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经超过轻工业，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到1978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高达56.9%。（参见表5-6）

表 5－5　　1949—1978 年我国的产业结构　　单位：%

年份	1949	1950	1952	1956	1963	1965	1976	1978
农业	70.0	66.8	56.9	48.7	39.3	37.3	27.3	24.8
轻工业	22.1	23.5	27.8	29.6	27.2	32.3	31.9	32.4
重工业	7.9	9.3	15.3	21.7	33.5	30.4	42.8	42.8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 1990》第 8 卷，第 26 页。

表 5－6　　1952—1978 年轻、重工业总产值结构　　单位：%

年份	1952	1957	1962	1965	1970	1975	1978
轻工业	64.5	55.0	47.2	51.6	46.1	44.1	43.1
重工业	35.5	45.0	52.8	48.4	53.9	55.9	56.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9 页。

3. 积累率居高不下。为了支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国家利用对资源集中支配的体制，提高积累率。改革开放前各个时期我国的积累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76—1978 年间竟高达 33.3%。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而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我国经济基础很薄弱，经济要想得到较快发展，不能只依靠资源总量投入的增长，必须通过推动产业结构的转换，向结构变化要效益。同时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能源、原材料和基本的生产装备，促进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经过 30 年的建设，我国产业结构同解放初期相比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参见表 5－7)

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变动，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工业生产增长迅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一定提高。

表 5－7 改革开放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及从业人员构成情况　单位：%

时间	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			从业人员构成（社会劳动者人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2	50.5	20.9	28.6	83.5	7.4	9.1
1957	40.3	29.7	30.0	81.2	8.9	9.9
1965	37.9	35.1	27.0	81.5	8.3	10.2
1970	35.2	40.5	24.3	80.7	10.1	9.2
1975	32.4	45.7	21.9	77.1	13.3	9.6
1978	28.1	48.2	23.7	70.5	17.3	12.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6 页、第 128 页。

但是由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造成第一产业发展停滞、第三产业发展萎缩、第二产业发展畸形的问题。例如，当时虽然理论上强调"农业是基础"，方针上强调"农、轻、重"次序，但实际上却长期忽视对农业的投入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内部由于多年来强调以"以粮为纲"，片面重视种植业而忽视甚至强行限制农村副业的发展，在种植业内部则重视粮食而忽视经济作物的发展；工业内部过分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因此形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局面；在重工业内部，强调"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忽视能源与其它原材料工业，造成加工能力的大量闲置，影响了重工业内部的协调发展。此外，对外贸易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产业结构内向性提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难以协调地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调整和改革，我国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 三次产业均有较大发展，比例关系进一步协调。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各次产业的增长速度为：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018.4亿元上升到1998年的14298.7亿元，增长14.04倍；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745.2亿元上升到1998年的39149.8亿元，增长22.43倍；第三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860.5亿元上升到1998年的26104.3亿元，增长30.34倍。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28.1:48.2:21.4变为1998年的18.0:49.2:32.8（参见图5-1）。从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中的配置来看，就业结构日趋合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1998年的49.8%；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有所增加，由1978年的18.3%上升到1998年的23.5%；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增加，1978年为13%，1997年上升到26.7%。这一变化基本符合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化规律。（参见表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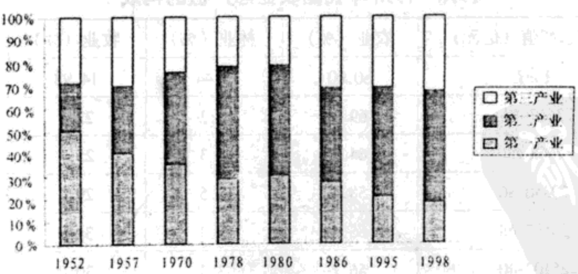


图5-1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三次产业GDP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表 5－8　　改革开放以采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及劳动力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CDP 比重	劳动力比重	GDP 比重	劳动力比重	GDP 比重	劳动力比重
1978	28.1	70.5	48.2	18.3	21.4	13.0
1980	30.1	68.7	48.5	18.3	21.4	13.0
1982	33.3	68.1	45.0	18.5	21.7	13.4
1984	32.0	64.0	43.3	20.0	24.7	16.0
1986	27.1	60.9	44.0	21.9	28.9	17.2
1988	25.7	59.3	44.1	22.4	30.2	18.3
1990	27.1	60.0	41.6	21.4	31.3	18.6
1992	21.8	58.5	43.9	21.7	34.3	19.8
1994	21.0	54.3	47.3	22.7	31.8	23.0
1995	20.6	52.2	48.4	23.0	31.1	24.8
1996	20.2	50.5	49.0	23.5	30.8	26.0
1997	18.7	49.9	49.2	23.7	32.1	26.4
1998	18.0	49.8	49.2	23.5	32.8	2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数据整理。

2. 各产业内部结构也有了较大变化。

（1）在农业内部构成中，农林牧渔业的比例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1978 年农业占 80.0%，林业占 3.4%，牧业占 15.0%，渔业占 1.8%；而到 1998 年，农业占 56.2%，林业占 3.4%，牧业占 30.8%，渔业占 9.6%。（参见表 5－9）

表 5－9　　1978－1998 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构成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1978	1397	80.00	3.44	14.98	1.58
1985	3619.49	69.3	5.2	22.1	3.5
1990	7662.09	64.7	4.3	25.7	5.4
1995	20340.86	58.4	3.5	29.7	8.4
1997	24587.68	56.4	3.3	31.0	9.3
1998	25103.40	56.2	3.4	30.8	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

在种植业中，劳动利用量少，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相对较少的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降；而劳动利用量大，因而单位土地产出相对较大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迅速增长。（参

见表5－10）

表5－10　　1978—1990年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基本构成

年份	总播种面积（千公顷）	粮食作物比重（%）	经济作物比重（%）
1978	150104	80.3	9.6
1980	146379	80.1	10.9
1982	144755	78.4	13.0
1984	144221	78.3	13.4
1986	144204	76.9	14.1
1988	144869	76.0	14.8
1990	148362	76.5	14.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表9－26；

《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表12－165。

总的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日益摆脱了过去单一发展的局面，而向着各业均衡发展的方向转变。

（2）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经历了一个重工业比值先下降后上升又稍降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一定时期内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轻工业得到不断恢复和发展。轻工业增长速度也高于重工业，1952—1978年间，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增长2779.5%和905.2%，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是轻工业增长速度的3倍；而1978—1992年间，重工业与轻工业分别增长371.2%和591.7%，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不到轻工业的2/3。（参见表5－11）

表5－11　　改革开放以采我国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　　单位：%

年份	1978	1980	1982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轻工业	43.1	47.2	50.2	47.1	49.4	48.9	47.2	44.0	47.1
重工业	56.9	52.8	49.8	52.9	50.6	51.1	52.8	56.0	52.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3.制约中国经济的“瓶颈产业”有了较大发展。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落后的状况大为缓解。在80年代中期，我国能源工业落后的状况还较严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能源短缺，每年有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8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始终把能源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使它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原煤产量1978年为6.18亿吨，1990年达到10.8亿吨，居世界第一位，1998年增加到12.5亿吨；原油产量1978年为1.04亿吨，1998年增加到1.6亿吨。

基本原材料严重短缺的局面也得到改变。1998年我国钢产量达到1.16亿吨，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水泥产量1978年为6524万吨，1998年达53600万吨，年平均增长11%以上。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铁路营运里程由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8年的5.76万公里；公路里程由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8年的127.80万公里，其中作为公路交通现代化标志的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已达到8733公里。民用航空里程增长了近9倍，1978年时为14.89万公里，1998年达150.58万公里。（参见表5－12）

表5－12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运输线路长度表　　单位：万公里

年份	铁路营运里程	公路里程	民用航空里程	内河航道里程
1952	2.29	12.67	1.31	9.50
1978	4.86	89.02	14.89	13.60
1998	5.76	127.80	150.58	11.0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4.高新技术产业初具规模。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奠定了门类齐全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出现了一批效益较好的高技术企业，建立了一批高技术开发区和科技产业园区，并培养了一支300多万人的高技术产业队伍，这为今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对外贸易发展较快，出口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是，我国产业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基础薄弱，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现在我国农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它收入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但在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中，农业对增长的贡献均在10%以下，这说明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结构升级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和农产品技术含量过低。

第二，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虽然很高，但自身素质不高。（1）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低水平的一般加工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基础产业的发展，造成一般加工业的产品供过于求，出现相当普遍的产品积压和能力闲置。工业发展向初级产品加工部门过于倾斜，也形成了高级化需求与低度化供给之间’的矛盾。（2）主导产业不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我国在1994年发布的产业政策中，把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工、汽车工业、建筑业与建材工业规定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主导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的主导地位还没有真正形成，不能充分带动经济的发展。（3）高新技术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第三，第三产业发展虽然很快，但仍相对滞后。目前，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达60%—80%，而我国1998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8%，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四，从产业的地区分布看，结构趋同问题十分突出。由于信息不灵、投资分散，各地都发展相同的产业，搞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闲置和浪费，并加剧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困难，导致某些产业发展中的分散化、小型化和低效益。

第五，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造成出口增长乏力。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我国出口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带动的。现在，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在国际上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进一步增长将十分困难，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给我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压力，这些都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

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研究制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总体规划，明确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制定产业政策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 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2) 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3) 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4) 具有可操作性，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产业政策的实施，支持短线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对长线产业与产品采取抑制政策。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重点与主要措施是：

1. 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坚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要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粮棉购销体制，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此外；还要调整支农工业的投资结构，增加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等。

2. 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扶植与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努力缓解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严重滞后的矛盾，使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本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效益"的方针，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及其产业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今后要把高新技术产业培育为新的主导产业。在一段时间内，既要加快整体发展，又要有所选择，扶持重点。除电子信息产业外，还应加强生物技术产业以及空间和

海洋产业的发展。

3. 大力扶植支柱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加快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这些支柱产业的发展，并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机械工业要以关键的基础设施、基础零部件和重大技术成套设备为重点；电子工业要以微电子为基础，以通信、计算机等新兴产业为主体；石化工业要积极促进生产规模的大型化，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深度；汽车工业要尽快形成少厂点、大批量的生产体制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结构；建筑业要以城乡居民住宅、国家重点工程、城镇建设为重点，积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建筑市场，提高建筑产品质量。

4. 鼓励和引导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将逐渐上升，交通、通讯、旅游以及金融、保险、教育、咨询等直接为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人们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今后将继续发展。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要逐步提高，使之与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要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范和管理，重点发展为社会生产和广大群众基本生活服务的行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5. 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联合和合作，从多方面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发展各具特色的经济，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形成跨地区的经济区域和重点产业带。加快改革融资体制，完善国家产业政策，切实解决“大而全”、“小而全”和重复建设等问题。

6. 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继续扩大对外贸易，积极调整贸易结构，发挥比较优势，大力提高出口效益，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增强国际竞争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第三节　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既涉及到产业结构的问题，也涉及到地区结构即生产力的区域布局问题。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是否合理，区域间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关系到国民经济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城乡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与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也有密切联系。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人文条件差异极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银行曾在一份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就象一个世界。因此，制定适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显得非常重

一、改革开放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初步探索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长期探索过程。从建国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实行的基本上是以地区间平衡发展为目标的内陆地区重点发展战略。

解放以前，我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很不合理，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占国土12%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重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北，轻工业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解放以后，针对这种情况，国家采取了促进内地经济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缩小地区差别，实现地区间平衡为目标的内陆地区重点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内陆地区重点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0年代开始，以平衡沿海和内地关系为宗旨，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国家经济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尤其是中部地区。为此，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局面，国家的建设资金开始侧重于内地。“一五”（1953—1957年）、“二五”（1958—1962年）和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以上用于内地（表5—14）。“一五”期间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大多安排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基本布置在北京至武汉铁路一线以西。国家安排的649个大中型工业项目之中的472个也在内地。国家对内地的重点投资建设，使内地经济的发展速度快于沿海，中原和东北地区建立的一批综合性和专业性工业基地，为改变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设想建设不同水平、各具特点、大力协同、农轻重关系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参见表5－13）

表5－13　　中国经济区划的历史演变

时期	区域名称	区域构成
50年代	经济协作区	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含华中和华南）、西南
60、70年代	一二三线地区	一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三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湖北、湖南、山西 二线：其余为二线

时期	区域名称	区域构成
80年代	三大经济地带	东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含海南）、广西11省区 中部：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省区 西部：宁夏、西藏、新疆、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青海9省区
90年代	1. 东部与中西部（同80年代）2. 七大经济区域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

第二个阶段从50年代末开始，我国与前苏联的关系恶化，加之西方国家继续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国际环境处于"冷战"时期。基于战备和国防的考虑，我国确定了建设大三线的战略目标。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改变了三年调整时期的建设重点，转到了以备战为中心。"三五"、"四五"计划期间都继续贯彻了这个指导思想。一方面是资金投向三线地区（参见表5－14），使内地的投资继续高于东部沿海；另一方面是内迁沿海的企业和高等学校，并加以改建和扩建。通过这一时期的建设，中国战略后方的建设得到初步发展，西南、西北和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已建成的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的1/3以上，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建成了很多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对促进内陆地区的商业、文化、卫生、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表5－14　　1953—1965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内地所占的比重

年份	内地所占的比例（%）
1953—1957年	53.3
1958—1962年	55.9
1963—1965年	58.0

资料来源：根据马洪、房维中所编《中国经济开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资料整理。

从总体上看，重点发展内陆地区战略的实施，拓展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区域经济严重不平衡的格局，对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由于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从1950年到1979年国家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建设资金达634亿元，如在内蒙古建立了包头钢铁公司，在新疆建设了克拉玛依油田，在宁夏建设了贺兰山煤田，在广西建立了制糖、麻纺和食品工业基地等一批国家重点项目。昔日近代工业的空白地区西藏高原也有了自己的发电、建材、毛纺和皮革等工业。

但是，改革开放以前实施的内陆地区重点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很

大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许多问题。总的来看，国家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还不成熟，实际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1）在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方面，对于如何搞好工业布局，缺乏一个长期稳定的战略。对沿海的地区工业投资重视不够，没有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好的优势，通过加快沿海地区发展带动内地发展。（2）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为缩小地区差距，片面强调建立地方工业体系，没有从发挥地区优势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合理布局。1958 年提出建立地方独立的工业体系后，各地区工业建设遍地开花，星罗棋布；1970 年又提出要建立工业省，要求各省粮食、油料、轻纺工业、钢铁、民用机械等都自给，而且层层仿照实施，从省到县都建立了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反映出缺乏经济发展的区域观念和区域发展的经济观念。（3）加强“三线”和内地建设虽然符合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的需要，但是建设规模过大，进度要求过急，项目面向备战，重工、军工畸重，实施中又严重违反基本建设的科学施工程序，加之贯彻“山、散、洞”方针，工厂钻沟进洞，布点分散，投产后留下很多后遗症，影响了经济效益的发挥。

二、东部沿海地区重点发展战略的形成与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东部地区经济重点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在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使中西部地区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称为以提高效益为目标的东部沿海地区重点发展战略。

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在总结过去“轻效益，重速度”、“轻沿海，重内地”的经验教训和借鉴世界各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战略的思路是：中国经济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为顺序的梯度态势，即发达的东部、欠发达的中部、不发达的西部三个地带。这三个梯度的形成是由我国区域发展的历史、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多种因素决定的，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体现，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梯度差的经济功能，首先发展东部地带，再带动西部地带的开发。我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提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基础，“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要“努力发展内地经济”，“继续积极支持和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提出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概念，划分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战略地域，明确了按照东部—中部—西部的顺序进行建设：沿海要“加速发展”，中部要“有重点地发展”，西部要“做好进一步开发的准备”。从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经济发展明显呈现出东部优先的特点：

1.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沿海地区倾斜。从 1980 年起，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投资的比重逐步增大。“六五”时期，国家纠正了过去偏重三线建设、忽视东部地区的倾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及其中的基本建设投资均分别占全国的 48%、29%和 17%左右（其余 6%为不分地区的投资所占份额）。在工业建设布局方面，从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前提出发，增加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重点进行了工业

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改造。“六五”时期沿海地带的11个省（区、市）的工业基本建设及更新改造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均比“五五”时期提高了2个百分点。“七五”国家投资重点明确放在东部，投资东倾幅度五年中基本上呈扩大趋势。“七五”期间完成的近2万亿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占56.5%，中部占28.8%，西部占14.7%。与1985年相比，东部投资比重上升了3.9个百分点，中部下降了2.3个百分点，西部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东部建设中又以部分经济发达省市为主。东部12个省（区、市）中，浙江省五年投资比重逐年上升，其它几个经济发达省、市如上海、江苏、浙江、北京、辽宁、广东等，投资占全国比重也大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

2. 通过对外开放，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1978年以后，我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模式是以区域性开放为主，即主要以沿海地区为先行，分阶段、分层次逐步向内陆地区推进。

我国首先在东南沿海城市建立特区，此后，又陆续开放了东部沿海城市，设置经济开发区，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这使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而且使它们获得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和先行一步的体制改革优势。它们最早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 大量预算外资金通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进入东部建设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布局已由以前主要由国家财政通过预算实施，变为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和外资共同构造布局轮廓。沿海地带的发展战略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大量利用预算外资金并对我国“七五”生产力布局轮廓影响较大的两个重要因素。沿海地带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依靠各种优惠政策，充分利用国内与国际资源发展本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国民经济重心东倾的幅度。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在此期间取得了高速发展。沿海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78年的52.5%提高到1998年的58.1%；80年代，四个经济特区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2%；吸引和利用外资成效显著，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广东省达到了23.6%，福建省达到27.7%。利用外资，兴建了大亚湾核电站、深广高速公路、上海大众汽车厂等，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建立了一批新兴产业如轿车、彩电、程控交换机、集成电路、精密机床、核电等，提高了国家整体技术水平。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经济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实行东部沿海地区重点战略的同时，继续坚持对中西部地区的建设，重点扶持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六五”、“七五”期间，国家有计划地在内陆省、区建设了一批能源、原材料工业和农业、林业、水利项目，改造了一批机械电子企业，建设了若干条交通干线。并且倡导在地区之间打破封锁，在生产、流通、物质领域，开展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中央也采取了一定的政策措施，扶持和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我国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践

（一）90年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东部沿海地区重点发展战略，不仅使沿海地区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且使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得到明显增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区域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有：

1. 东部、西部、中部发展的差距加大。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看，沿海地区占全国的比重1978—1998年间上升了5.6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都下降了2.8个百分点。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1984年东部为中部和西部的14.5和9.7倍，1994年上升为18.7和22.7倍。（参见表5-15）

2.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类型、产业结构与东部也有很大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别较大。从经济类型看，中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的比重较高，而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和“三资”工业的比重较高（参见表5-16）。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加工工业比重较高，中西部地区基础工业比重较高。1995年，基础工业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东部地区为25.2%，中西部地区为36.4%。1994年，全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实际收入之比为2.86，中部的大部分省、区和西部的全部省、区均高于这个比例。

表5-15　1978、1998年中国地区间GDP份额及人均GDP变化对比

地区	GDP占全国份额（%）			人均GDP（元）		
	1978年	1998年	增减百分点	1978年	1998年	增长量
东部	52.5	58.1	5.6	462	9483	9021
中部	30.7	27.9	-2.8	335	5667	5332
西部	16.8	14.0	-2.8	152	2232	207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提供。

表5-16　1996年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经济类型对比　　单位：%

	国有	集体	私营	个体	股份制	其它	乡镇企业	三资企业
东部	27.3	39.5	2.7	11.7	3.6	15.2	45.1	19.6
中西部	46.9	30.9	2.2	15.0	3.2	1.8	37.1	4.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关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新华月报》1997年第3期。

3.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地方权益的扩大，中西部地区竞相开发加工项目，东部地区也不得不上一些经济效益不高的资源项目，结果加工工业有优势的省、区的资源项目比重上升，内地有资源优势的省、区的加工项目比重上升，东部和中西部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化现象，严重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

总之，这一时期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继续扩大，东部沿海地区重点发

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挑战。

（二）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我们利用东部沿海地区较好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地理位势，并通过特殊的政策推动其优先发展，从而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强烈的示范作用和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必要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需要更多地关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原有的国家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要调整，调整的方向应着眼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并通过中央的区域经济政策，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

自 1993 年中国开始的宏观调控以及 1996 年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已开始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战略。在战略部署上，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战略方针，指出：从战略上看，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多做一些贡献支持内地发展，这也是大局，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从“八五”开始，国家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993 年以来，国家陆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扶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如中国人民银行从 1993 年起每年为中西部的乡镇企业提供 50 亿元的专项贷款；1994 年国务院实施《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决定》、《中国 21 世纪议程》（1994 年）的第一批优先计划，开始实行在资金和技术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1991 年开始设立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其享有与沿海开放城市相似的优惠待遇，以促进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1994 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从 1994 年到 2000 年，力争用 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主要在中西部地区），为此国家相应增加了扶贫贷款。

同时，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仅在 1994 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就落实了 62 个援藏建设项目，包括能源、交通、邮电、农、牧；林、水、粮油加工和社会发展项目，投资总额 23.8 亿元；其中中央及有关部门承担 30 个项目，占总资金的 75.7%，地方对口支援 32 个项目，占总资金的 24.3%，全国各省区和计划单列市都承担了援藏建设任务。国家还设立民族经济实验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发挥地区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取得了成绩。

（三）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走向

实施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战略已取得初步成效，这一战略将被继续坚持下去。1996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与方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是：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各地区要在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选择适合本地条件的发展重点和优势产业，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化，促进各地经济在更高的起点上向前发展。积极推动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合理交换和经济联合。各个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进一步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分别建成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综合经济带、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经济区、全国的能源基地、有色金属和磷硫生产基地、热带亚热带农作物基地、旅游基地、农业基地、棉花和畜产品基地、重化工基地等。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其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是一个关键环节。下一步宜采取如下政策取向：

1. 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全国性基地的中西部资源开发项目，国家实行投资倾斜。跨地区的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国家投资为主进行建设。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2. 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大中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力度。

3. 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比重。

4. 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60%以上要用于中西部地区。

5.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继续组织中央各部门、社会各界和东部沿海地区，以多种形式支援西藏等民族地区、三峡库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建设。

6. 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组织好中西部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务输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采取多种形式与中西部地区联合开发资源，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人才培训和交流。

第四节　科教兴国战略

发展科学教育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保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把发展科技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并最终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一、改革开放前科学教育的发展（1949—1978）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立即将大力发展科学教育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新中国成立时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家建设，鼓励科学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1949 年 10 月成立了专门从事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的中国科学院。新中国的建立吸引了一大批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如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赵忠尧等。1950 年到 1953 年，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家和留学生就有 2000 余人，成为我国科技事业以及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五"期间（1953—1957），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科技和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发展教育方面，为了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满足经济建设需要，我国决定以苏联的教育体制为蓝本，对高等学校进行改革。1951 年开始进行了第一次院校调整，主要扩大了工科专业招生能力，使全国招生人数提高了 8.9%。1955—1957 年进行了第二次院校调整，一方面解决了东部沿海和内地之间高校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再次扩大了高校规模，全国高校增加到 229 所，学生数量也相应增加。与此同时，积极输送学生出国深造，截止到 1960 年，我国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留学生 10678 人。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1950 年 10 月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签定了引进技术设备的协定。之后，苏联对我国援建工业建设项目 156 个，我国从苏联聘请技术专家 10800 人。在实施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逐步掌握了现代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法。我国还组织了对西藏、热带亚热带地区、黄河中游和黑龙江流域的资源考察，发现了大量的矿床，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工业技术和建设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自行建造了当时亚洲第一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基本上控制了霍乱、天花、鼠疫等疾病的传播，80% 的医用药品可以自行制造出来。

在"一五"建设任务圆满完成的条件下，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的要求，党和政府提出了尽快改变落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状况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就不够了，要学真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1963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听取关于新十年科学规划的汇报时再次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建立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为适应这一转变，我党首次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 年），确立了发展科学和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7 年），开始制定《1956—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运动。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 10 年期间，我国取得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成就，填补了许多技术空白，解决了大量的国民经济建设的关键技术问题。《1956—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并于 1963 年开始制定新的十年科学规划。1957 年，我国自行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 250 万伏特高能质子静电加速器，结束了不能制造核仪器的历史；1958 年，歼教 1 喷气式歼击教练机试飞成功，国内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下水，国产“红旗”轿车诞生；1959 年 9 月 26 日大庆油田实现喷油，到 1963 年大庆油田建成，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1965 年 10 月 16 日，成功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1965 年，我国首先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等。这些成就表明，我国在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1957 年到 1966 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 140 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 211 万人。

在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科学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机关受到冲击，人员下放劳动，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中国科学院的 106 个研究所撤并为 13 个直属所和 43 个双重领导的研究所。高等学校数目减少，高校的用地被侵占，一些高校迁往农村，人员散失，设备毁坏，高校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多种学术期刊停办，学术骨干受到批判和迫害。1968 年国家科委撤销，全国的科技发展年度计划也随之取消。科学和教育领域成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的 30 年间，我国取得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一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整体上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中发展的，科学和教育屡遭挫折。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尚未形成一个如何依靠教育和科学发展国民经济的整体构想。

二、确立和落实科学与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1978 - 1995）

（一）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我国也开始了对科学与教育在经济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新中国建立之初的 17 年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经过“十年动乱”，这个差距又显著拉大

了，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和教育的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70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深刻、显著。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不对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的问题作出回答。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科学和教育工作，发表了关于科学教育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对于确立科学与教育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制定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的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科学与教育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历史上的劳动力也是同二定的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因此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实践表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和技术的力量。1977年，邓小平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主持工作就亲自抓科教，提出了"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重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确立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春天。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科学技术是由人来发明和创造的。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树立教育是基础的思想，将推动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关系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创造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正是教育的责任，也是教育基础作用的体现。

2. 必须强调科学与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文革"期间，发展生产力本身曾一度被当作"唯生产力论"进行批判，科技人员钻研业务被视为"白专道路"，学生学习文化被看作"脱离政治"，科技教育事业没有受到一贯的和应有的重视。1978年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和科技也就必然相应地提到了重要的战略位置。1977年4月，邓小平指出，"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关于科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为将科学和教育摆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位置奠定了基础。

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只有在经济建设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学教育必须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因此，必须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改变过去那种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体制，促进科技长入经济，确立"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对党的教育方针作出了新的阐述，指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明确了学校在将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同时，学生应该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

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1983 年 10 月 1 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新时期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4.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展科学教育的根本是人才。邓小平指出，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学科学，用科学，树立科技意识，学会依靠科学解决问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是因为我们缺乏科技人才，要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发展教育与科学的社会基础。

（二）促进教育与科学发展

在邓小平关于科学教育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科技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部署。

1. 确定教育和科学在经济建设中的战略重点地位。198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确定了教育与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根据这一决策，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科学教育的投资力度。“七五”（1981—1985）期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支出为 1969.37 亿元，比“六五”（1975—1980）增加了 118%。虽然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并没有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下降所致），但是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则有明显提高。（参见表 5－17）

表 5－17　　国家财政中对教育经费支出的情况

（1970—1995）

年份	财政性教育经费（亿元）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1970	27.56	4.2	1.2
1975	53.18	6.5	1.8
1978	75.05	6.7	2.1
1979	93.16	7.3	2.3
1980	114.15	9.3	2.5
1981	122.79	10.8	2.5
1982	137.61	11.2	2.6
1983	155.24	11.0	2.6
1984	180.88	12.8	2.5
1985	226.83	11.3	2.5

年份	财政性教育经费（亿元）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1986	274.72	12.5	2.7
1987	293.93	13.0	2.5
1988	356.66	14.3	2.4
1989	412.39	14.9	2.4
1990	462.45	15.0	2.5
1991	532.39	15.7	2.5
1992	621.71	16.6	2.3
1993	754.90	16.3	2.2
1994	1018.78	17.6	2.2
1995	1193.84	17.5	2.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6》、《中国统计年鉴 1998》数据计算，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和财政支出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6》，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8》。

进入 90 年代以来，科技活动的经费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科技活动支出总额由 1990 年的 369.1 亿元上升至 1998 年的 1128.5 亿元；其中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由 1990 年的 125.4 亿元上升至 1998 年的 551.1 亿元。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与 1990 年持平，均为 0.7%。

2. 加快体制改革，解放科技生产力，促进教育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是参照前苏联的计划体制建立起来的，经济单位与科技单位分别依附于不同的行政权力机构，导致了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相分离的状态。为改变这种状况，1985 年我国开始科技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解放科技生产力，推动农村、企业和全社会的科技进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 年）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将科学技术工作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落实到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中去。1986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和实施奠定了基础。

3. 国家制定和实施科技计划，促进经济发展。80 年代以来，国家通过实施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863 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和科技成果推广计划（参见表 5－18）等，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4.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保证教育。发展的优先地位，加速科技进步。1986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该法规定“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

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体现了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

表 5－18　1978 年以来国家制定和实施的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

计划名称	开始时间	目标	主要内容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六五”时期（1981—1985）	由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重点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产业、关联度比较大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工程技术和生产技术，为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国家技术储备服务。	“六五”期间，国家投入 15 亿元，支持 38 个国家急需解决的项目，取得 3500 项成果；“七五”期间，国家投入 32.5 亿元，安排 76 个项目，取得 1 万多项成果；“八五”期间，投入 45.2 亿元，安排项目 180 个，取得 6 万多项成果。
星火计划	1985 年 5 月	把现代科学技术引向农村和乡镇企业，以点带面，如星火燎原。	“七五”时期：（1）每年为乡镇培训 20 万知识人才和基层干部，每人学会 1—2 种技术；（2）开发 100 种适用于农村的成套技术；（3）帮助建立 500 个技术示范乡镇企业。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1986 年 3 月	选择若干技术领域，跟踪国际前沿技术的发展。	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进行跟踪和攻关
火炬计划	1988 年 7 月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建立国家级新技术产业实验区，其中国家级新技术产业园区 53 个。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211 工程”建设目标，国家投资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院校，使之在 21 世纪成为具有国际影响以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1995 年 3 月我国第一部《教育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国家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并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实现依靠提高全民素质发展经济的长期目标奠定了基础。在科技方面，我国先后颁布了《科技进步法》（1993 年）、《科技成果转化法》（1995 年）等法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国家优先发展科学技术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取得丰硕成果，公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基础上，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了明显提高。

三、科教兴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即：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相对落后。经济尚未摆脱传统的外延型、粗放型发展格局，依然是靠扩大投资和大量消耗资源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当整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质量和效益不高、商品竞争力不强等深层次问题日益暴露出来，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要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必须重视科技和教育，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依靠于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我国的科技整体实力虽然有了明显增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处于劣势，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15—20年。国民教育还处于初级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为1%，也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还没有达到4%的目标，也低于世界5%的平均水平。这不仅说明中国的科学教育水平需要提高，也说明全党和全社会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从而提高国家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投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面向未来的选择。本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前沿阵地孕育着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群体迅速崛起，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变化。科学技术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同时，种种迹象表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不仅成为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焦点，而且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根本保障。"落后就要挨打"的论断仍然是真理。

从当前看，加快教育发展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目前我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城乡居民受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加快发展教育，既可以减缓升学压力，为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环境，满足广大学生受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减缓目前的就业压力。

综上所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决

策，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二）世纪之交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随着科教兴国成为全国的共识，我国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的步伐也明显加快，目前正在以下一些关键方面展开努力：

1. 通过加快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挖掘现有教育资源潜力，增强学校的活力与效率，充分发挥公办学校的主渠道作用。1999 年高等学校已经增加招生名额，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正在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根据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都可以大胆试验的原则，民办教育的发展正在迈出更大的步伐。鼓励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举办高中阶段和高等职业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已开始兴办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发展民间办学，吸引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办教育，开始形成风气。这正如朱镕基同志 1999 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

2. 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加速科技进步。几年来，正在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40%以上。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先进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使我国机械、制造、电子、服装等传统产业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推动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各种形式进入企业，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提高产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建立激励企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机制，正在为使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作出贡献。

3. 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科技进步的源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既要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也必须注意加强基础性研究和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建立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雄厚基础。国家正在加强对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的支持，努力在若干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 鼓励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形成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引进和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同时，努力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近年来，0.8 微米集成电路芯片、12 英寸直拉单晶硅、6000 米水下机器人、两系法杂交水稻等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创新、发展和提高。面对下个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我国要进一步大力提高国家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加快培育新的科技力量，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5. 加大对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投入。近几年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社会科技意识进一步增强，科技投入普遍增加，知识分子地位得到提高。与世界各国比较，我国还需要继续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经费投入。在这个问题上正在从长期战略发展的角度形成共识。中央从 1998 年到 2002

年的五年中，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逐步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为此，还在建立规范有效的多渠道投人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

6. 在提高教育质量上下更大功夫。我国正努力全面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特别是中小学阶段的教育质量；重视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使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提高一代新人的全面素质。并且，正努力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建立一套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使用的有效机制，形成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创造有利于知识和人才发挥作用的社会舆论。在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意识，掌握和使用科学方法，鼓励发明创造，用科学战胜迷信和落后，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995年，科教兴国的战略刚刚作出，江泽民同志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在于创新。1997年，朱镕基同志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便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并决定在1999年召开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大会，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科教兴国战略的高度重视与认真实施的决心。

可以预言，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的部署，中国在21世纪将会拥有更大的高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第五节　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和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张，我国日益重视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间关系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

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不仅当代人类面临的某些尖锐矛盾在中国有所体现，而且由于特殊的国情，我们在发展中还产生着一些新的问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必然的和迫切的选择。

1. 人口膨胀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缺乏对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认识，付出了较大的代价。1992年底全国人口达到11.15亿人，比1949年的5.42亿人增加了106%。由于人口长期处于盲目高速增长的状态，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比例失调，积累资金和生产资料的增长难以适应快速增长的就业人口的需要，人口的文化素质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消费资料的增长也不能满足人

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1982 年中国将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人口增长得到控制，但是 1998 年人口总数仍达 12.48 亿，1996 年文盲半文盲比例高达 16.36%，构成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

2. 资源短缺的状况日益严重。我国是世界上疆域辽阔的大国之一。国土面积 1260 余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约为 960 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 6.5%。我国又是海洋大国，海域自然面积 427.7 万平方公里，拥有海岛 6500 多个，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域（包括大陆架和经济区）面积约 300 万平方公里（约为陆地面积的 1/3)。我国资源总量也很大，多种资源总量居于世界前列。同时中国又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均资源拥有量很小，居于世界后列。关系到人类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类资源，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28.1%、32.3%、14.3%和 32.3%，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更加剧了资源短缺。

3. 生态变化态势令人担忧。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减少、淡水资源枯竭等是目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我国还是世界上荒漠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缩小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27.3%，相当于 14 个广东省的幅员。50 年来，全国已有 1000 万亩耕地、3525 万亩草地和 9585 万亩林地变成流沙。风沙的步步紧逼，使成千上万的农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成为“生态难民”。

4. 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目前，在全国 600 多座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 1%。全国每年排放污水 360 亿吨，除 70%的工业废水和不到 10%的生活污水外，其余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人江河湖海，致使水质严重恶化。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物日增，大部分未经妥善处理。

纵观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几乎都是靠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持经济增长的。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选择上，基本都是“先发展、后治理”、“先污染、后保护”。现在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是解决环境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但是，中国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先污染后保护”的老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只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二、积极推行计划生育、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政策

从建国初期到 90 年代初期，我国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建设相协调的总量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方面的工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受过挫折，但总的看成绩是巨大的。概括地说，在这方面，我们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 积极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这方面曾有过一些曲折。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人口理论”，对中国人口的高速盲目增长提出质疑，并引出了我国领导人实行计划生育的设想。但是在50年代后期，“新人口理论”受到错误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多次受到干扰。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其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严重，从70年代初开始，计划生育的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且力度不断增强。1982年，国家正式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作为基本国策，并多次重申。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认真实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3年到1982年的19‰下降到1991年到1996年的11‰。同时，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参见图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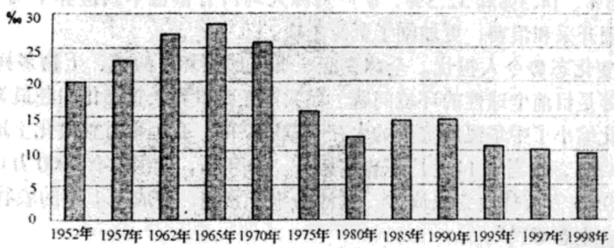


图5－2　1952—1998我国人口增长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二) 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的方针

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就提出与实施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自50年代以来多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力求降低成本，节约能耗，提高效益，并取得一定成效。如在国土资源开发方面，国土整治与国土开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生产力布局已经基本展开，大江大河得到初步治理，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在土地资源的利用上，建国之初即完成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此后在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治理水土流失、改良土壤、改革耕作制度、植树造林及规划、利用工业、交通、城镇用地等方面，均作了大量工作，使我国土地利用的深度与广度均有较大的拓展。在水资源的利用方面，建国后大江大河的治理，各项水利建设以及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有了迅速发展。如黄河、淮河、海河的整治，长江防洪泄洪工程建设、京杭运河的疏浚与扩建、南水北调工程等；同时还修建了大、中、小各类型的水库数万座，建设了大型引水灌区数十处；大中小型水电站容量从1949年的36万千瓦增加到1988年的3270万千瓦，等等。但是在较长时期内，由于认识的局限和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我们在重视资源开发的同时对资源的节约与保护注意不足；与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资源合理利用与降低消耗的差距还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放到经济建设的重要位置，倡导

节约，反对浪费。节能和降低消耗是国家考核企业的重要经济效益指标。1980—1995年间，我国每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从13.3吨标准煤下降为2.2吨标准煤，年节能率为5.6%。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节能降耗工作正在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效。

（三）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曾经走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比较协调。在工业建设中，注意了合理布局，有污染危害的工业建设项目摆在工业区内，在工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建立绿化隔离林带，有些工业企业还采取了一定的防治污染的措施。在城市建设方面，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建立城市规划工作，包括城市绿化、功能分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消灭了一批大中城市的“龙须沟”，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在城市中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治理“脏、乱、差”，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在这段时期中虽然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立法，但却颁布了一些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如1956年卫生部、国家建委联合颁发的《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和1957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等。这些法规的实施，推动了植树造林、防治水土流失、开展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控制工业污染等保护环境、进行环境建设的工作。在“大跃进”期间，工业企业布局几乎冲破一切规章制度，不顾环境保护的要求，又不采取控制污染的工程措施，加之管理混乱，工业“三废”排放放任自流，环境污染迅速蔓延。在“大办小土群”的冲击中，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惊人。破坏了许多地方的地貌、景观和矿产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在60年代的调整时期，国务院于1963年接连发布了《森林保护条例》和《矿产资源保护条例》；1962年7月24日，国家计委和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在调整期间，减缓了工业对环境污染的压力。但生态破坏却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恢复的，“大跃进”时期造成的某些生态破坏的不良影响，直到进入90年代也没有完全消除。在工业、农业、城市等领域已经建立起来的极为有限的保护环境的法规、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被否定和破坏了，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无遏止地迅速蔓延开来。

改革开放以来，认真总结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沉痛教训，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和思想，使全民族的环境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国家的环境保护战备思想逐步成熟。中国在工业污染防治上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大环境保护政策，推行防治环境污染与生产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对控制新的污染起到了显著作用。在积极采取改革措施保护环境的同时，国家还注重依靠法规保护环境。近年来，环保的立法工作显著增强，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法律体系。除积极进行国内立法外，还加快了纳入国际相关法规体系的步伐。自1979年起，中国先后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管制条约》、《关于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生物多样性条约》、《防治荒漠化公

约》等一系列的国际环境公约和议定书，并一直严肃认真地履行所承担的责任。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世界和中国的确认，自90年代初特别是90年代中期起，我国政府加大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

根据1992年6月世界环发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同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指导环境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即《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其中第一条就是“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7月中国政府开始着手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3月25日获得国务院批准。该《议程》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联系出发，提出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议程》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毫不动摇地将发展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同时，中国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才能实现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发展需要和必然选择。这是全球第一部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它把可持续发展原则贯穿到各个领域。

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闭幕式时的讲话《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199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继续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体现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确定：“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治理、生态条件的改善，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等等。

中国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对未来数代人的责任。如何结合国情有效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还需要进行深入而艰苦的探索。当前我们正着手这样几方面的工作：

1. 继续扎实推行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提高人口质量。强化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继续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加强对重点城市、区域、流域、海域的污染治理。加强对资源的规划和管理，合理利用和保护

资源，切实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2. 努力构造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适合国情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实行全面节约的战略，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局面。选择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的发展方式，把经济建设、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3. 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和强有力的执法监督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和协调管理，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项具体措施得到贯彻落实。

4. 加强相关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世界经济正在日益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格局，全球性环境问题将整个人类的命运连在一起。从环境保护正在促进产业技术和工艺发生根本性变革这一点出发，加强国际环境合作有可能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有利于深入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六章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探索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水平。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建国50年来，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五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轨迹

新中国5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虽然我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轨迹并不顺畅。

一、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我国长期战争、停滞与落后的局面，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3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具体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建国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的经济增长

这一时期，我国经过3年艰苦努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完成了土地改革，确立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毒瘤迅速得到治理，经济很快得到恢复。1952年，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3.8%，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短短的3年中，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便已达到或超过了解放前历史最高水平。与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的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可谓卓有成效。这一时期经济恢复与增长的主要特点包括：充分调动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大力推进城乡交流；财政拨款与多渠道融资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基础设施与工农业的投入；注重农业的品种改良与工业的技术革新，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的经济增长

这一时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我们一方面效仿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另一

方面在苏联帮助下，开展了以156个重点项目及其配套工程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49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704亿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8.0%。基础工业和关键性的机器制造业迅速建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4.5%。由1952年的46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37亿元（参见表6-1）。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实际工资平均每年增长5.4%。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包括：经济成分由多种所有制成分向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经济运行机制由市场调节为主向计划经济过渡，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慎重地制定了适合国情的国民经济计划，集中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建设以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为核心的重点建设项目，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表6-1　　1949—1978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　　单位：亿元

项目	1949	1950	1952	1957	1958	1965	1966	1976	1977	1978
社会总产值	557	683	1015	1606	2138	2695	3063	5433	6003	6846
国民收入	358	426	589	908	1118	1387	1586	2427	2644	3010
人均国民收入	66	77	104	142	171	19今	216	261	280	315
工农业总产值	466	575	810	1241	1649	2235	2534	4536	4978	5634
工业总产值	140	191	349	704	1083	1402	1624	3158	3578	4067
轻工业总产值	103	135	225	387	503	723	796	1395	1573	1753
重工业总产值	37	56	124	317	580	679	828	1763	2005	2314
农业总产值	326	384	461	537	566	833	910	1378	1400	156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

（三）"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的经济增长

"大跃进"时期，由于忽视经济发展与运行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现状的热切愿望和积极性的能动作用，提出不切实际的"赶超"任务，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以期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结果欲速而不达，导致产品质量大幅度下降，原材料消耗大幅度增加，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损失。1958—1963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0.06%，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则为-4.4%。1961年，中共中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3年起，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并逐步实现了较快增长。1963—1965年，工业生产年均递增17.9%，农业生产年均递增11.1%。钢和原油产量分别由1963年的762万吨和648万吨增加到1965年1223万吨和1131万吨，都增长了近1倍。城市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恢复和提高，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年均增长7.2%。

大跃进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大跃进"期间，工业管理权限盲目下放，农村管理体制盲目高度集中；产业政策突出"以钢为纲"，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同时，又造成极

大浪费，导致国民经济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对工业经济的管理权力重新集中，以便于调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下放农村经济管理权力，同时注意运用价格与市场的部分调节作用，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注意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农业内部结构也有较大改善。工业体系建设和技术创新在调整中都取得较大进步，长期依靠进口的石油经过油田开发建设基本实现了自给，电子、原子能、航天工业也都在这个时期成长为国民经济重要工业部门，通过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立了石油化学工业。总的说，这个时期经济大起大落，波动严重。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的经济增长

这一时期包括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改善的正常进程，1967年、1968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产业结构愈加失调。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由1965年的37.3∶32.3∶30.4，变为1975年的30.1∶30.8∶39.1，重工业比重提高了8.7个百分点，而农业、轻工业比重下降；在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业的比例由1965年的11∶39.7∶49.2，变为1970年的8.5∶38∶53.5，能源、原材料工业的"瓶颈"问题越来越突出。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额由1965年的20.9元降低到1976年的12.1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利税额由39.8元降低到29.0元；每百元流动资金实现利税额由29.8元降低到19.3元；每百元工业产值实现利润额由21.3元降低到12.6元。只是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在抵制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坚守生产岗位，使"文革"前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开始发挥作用，加之以大庆油田为代表的石油工业的崛起，才使我国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了增长。其中，工业总产值实现了年均9.9%的增长（参见表6-2）。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挠与影响，经济增长依赖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大，经济发展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迭宕起伏。

表6-2　1953—1980年我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年均增长速度　单位：%

项目	1953—1957年	1958—1962年	1963—1965年	1966—1970年	1971—1975年	1975—1980年
社会总产值	11.3	-0.4	15.5	9.3	7.3	8.3
国民收入	8.9	-5.9	14.7	8.3	5.5	6.1
工业总产值	18.0	3.8	17.9	12.0	9.3	9.6
轻工业总产值	12.9	1.1	21.2	8.7	7.9	11.5
重工业总产值	25.4	6.6	14.9	15.0	10.3	8.2
农业总产值	4.5	-4.4	11.1	2.9	3.4	3.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

（五）1976—1978年的经济增长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我国经济分别以7.6%和

11.7%的速度获得了较快增长。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76年的315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4067亿元；农业总产值由1976年的137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567亿元，农业开始恢复活力。1977年起，城市人民生活开始有了较大改善。这一时期，虽然生产增长很快，但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不讲效益的问题仍然很突出。

总之，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我国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较快。社会总产值由1950年的683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6846亿元，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7.9%；国民收入由1950年的42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10亿元，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0%；工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191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5790亿元，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1.4%。其中，轻工业由1950年的103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753亿元，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9.3%。重工业由1950年的37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2317亿元，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3.8%（参见表6-1)。但是经济增长过程波动很大，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效益起伏也很大。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

为了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增长和发展的统一，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这方面的努力在改革开放后明显加强并取得积极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大体包括四个阶段：

（一）改革初期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增长1979—1985年）

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六五”时期，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绝大部分任务指标提前或超额完成，使1981—1985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5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7%，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7%，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改善。5年中，农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10.1%，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5.6%。“六五”计划的编制经历了近3年的详细调查和反复研究的过程，它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首次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的计划，因而这也就使它们成为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显著特点。除此以外，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还同改革开放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农村，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大大发挥；在城市，“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得以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得到积极推行。但这一时期，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然存在。

（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增长（1986—1990年）

“七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全国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改革与发展相互推动齐头并进的繁荣局面的形成，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

个新的水平。总的看，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很快，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均超过计划的要求。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历史积累的因素在内），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困难，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明显加剧、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鉴于此，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重点进行经济环境的治理和经济秩序的整顿工作。1989年11月起，治理整顿力度进一步加大。治理整顿时期，投资与消费增长受到较大影响，出现市场疲软状况，国民经济增长波动较大，1989年和1990年两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4.1%和3.8%，与"七五"时期前三年分别增长8.8%、11.6%和11.3%的形势形成鲜明对照。

（三）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增长（1991—1995年）

1991年4月由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1991—199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这个规划是与1991—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一同制定的，而且是建国以来执行效果最好的五年计划之一。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国民经济呈加速增长趋势。5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2%，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7.4%，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0.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任务。但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突出的是某些领域过热，出现了比较强的通货膨胀，5年中零售物价年均上涨11.4%。因此，这一时期，在保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的总趋势的同时，中共中央从1993年6月起，着手实施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重点的宏观调控举措。

（四）制定跨世纪发展战略与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增长（1996—2000年）

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纲领。《纲要》提出的"九五"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实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开局良好，经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在上个五年计划实施中一度出现的某些领域过热，物价涨幅过高的问题得到克服，既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

"九五"计划前3年即1996—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9.6%、8.8%和7.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4%、7.6%和6.7%。199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

同期增长7.6%。其中1998年的高速增长是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战胜国内特大洪捞灾害的情况下实现的，实属不易。但这一时期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7年下半年以来，消费需求不振，固定资产投资放慢，物价持续下滑，外贸出口增长大幅度回落。针对这些情况，1998年和1999年两年里，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措施，通过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

三、建国以来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5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其速度不仅远远高于旧中国，而且也快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有很多的年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民经济实现了协调健康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有的年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效益不理想。有的年份国民经济增长波动剧烈，甚至出现负增长，由此也使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总起来看，处于由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变过程中的我国经济，在成长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高速度与低效益并存

1. 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50年间，那些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阶段往往同时又是投资增长幅度较大的时期，也就是说，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增加要素投入特别是增加资金投入来实现的。建国以后的前30年里，几次大的经济增长波动都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增减直接相关。经济增长较高的1956年、1958年、1964年和1969年，GDP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5.0%、21.3%、18.3%和16.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增长52.8%、84.5%、42.2%和62.9%，分别高出GDP增长37.8、63.2、23.9和46.0个百分点。而在1962年，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一年减少了62.5%，GDP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为-27.3%；196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了26.3%，GDP负增长为-5.7%。对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使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断遭受频繁波动的困扰。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虽然经济大起大落的状况有所改观，但经济快速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六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10.7%，而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则高达19.4%。其中，1985年，GDP增长13.5%，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增长38.8%，比GDP增长高出25.3个百分点。“八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2%，而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则为17.7%。其中，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增长61.8%，仍比GDP13.5%的增长率高出48.3个百分点。（参见图6-1）

从企业的效益状况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我国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率，50年来总体上基本呈下降趋势。其中，固定资产利税率从1957年的34.2%下降为1978年的24.8%，1990年又下降到12.9%，到1997年又进一步下降到7.6%；资金利税率从1957年的34.6%下降为1978年的24.2%，1990年又下降到12.4%，到1997.年又进一步下降到6.3%；产值利税率从1965年的30.3%下降为1978年的24.9%，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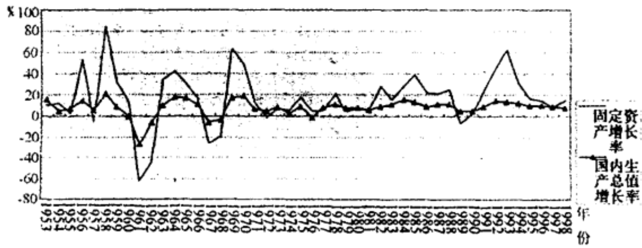


图 6-1　1953—1998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 GDP 增长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 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年又下降到 12.0%，到 1997 年又进一步下降到 10.4%。(参见表 6-3)

表 6-3　　1952—1998 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效益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

指标	1953	1957	1962	1965	1970	1975	1978	1980	1983	1985	1988	1990	1995	1996	1997
固定资产利税率	30.8	34.2	15.8	29.7	32.3	24.0	24.8	24.3	21.7	22.4	20.2	12.9	9, 3	9.9	7.6
资金利税率	30.4	34.6	15.1	29.8	30.3	22.7	24.2	24.8	23.2	23.8	20.6	12.4	8.0	7.1	6.3
产值利税率	20.9	24.5	22.2	30.3	27.6	22.8	24.9	24.1	22.8	21.8	17.8	12.0	11.1	8.2	10.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6、1997、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2. 高消耗、低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增长要求资源利用的高效率，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缺乏强有力技术进步的支持，因此，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加重经济对资源投入的依赖，导致产出物耗比的递升，使我国成为第三大能源消耗国。据统计，工业消耗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1978 年的 64.9%上升到 1985 年的 67.4%，1989 年进一步上升到 71.7%。技术落后，又决定了我国能源利用率不高。建国后的前 30 年，落后设备水平导致了能源的低效率利用是可想而知的；改革开放后，虽然随着设备的改进、能源利用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已经有所提高，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也仅有 30%，与发达国家的 40%—50%的利用率的差距还很大，其中，火电、水泥、合成氨和钢等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外国先进水平高出 30%—80%。我国每 1 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约为美国的 3 倍、日本的 9 倍。能源的大规模消耗与低效利用使我国面临能源缺乏与浪费并存的局面。能源低水平利用的同时，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提高缓慢，产品质量一直不高。虽然改革开放后以来，我国工业品的合格率已大有提高，但仍保持在 70%左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产品质量差是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3. 高积累、低消费。高速度需要高积累来支持，建国 50 年来，我国一直保持了很高的积累率。1952—1990 年，我国年均积累率为 26.2%，其中，最高的 1959 年竟高达 43.8%；而自 70 年代以来这一比率则一直高达 30%以上。如此高的积累在世界上是较

为罕见的。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本来很低，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的因素，更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得到快速提高。1952—1978 年我国国民收入增加了 353.3%，而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却提高十分缓慢，1978 年仅比 1952 年的消费水平提高了 77.2%，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 26 年时间里，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未能翻一番。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提高，但提高幅度仍远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幅度。1978—1998 年的 20 年里，我国经济增长 5 倍多，城乡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则分别为 3.5 倍和 2.2 倍。

（二）技术进步缓慢

由于偏重于铺新摊子，忽视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的投入，造成我国主要行业技术水平落后。例如，机电行业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 15—20 年，主要机械产品仅达到世界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水平的只占 1/3，达到目前世界水平的只占 5%，所需先进机电设备主要靠进口。冶金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 25—30 年以上。纺织工业中，全国约有 1/4 是需要淘汰的落后设备，达到 80 年代先进水平的不到 40%。据统计，在所有工业企业设备中，近 1/5 已经老化，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已达 25%，超期服役率为 39%。我国技术水平总体比发达国家落后 15—20 年。正因为如此，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较低。据测算，我国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只有 30%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 60%—80%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的 35%左右的平均水平。

（三）经济超常波动，经济运行难以步入良性循环

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曾有三次大的超常波动。第一次发生于 1958—1962 年。“大跃进”的 1958 年，GDP 增长率为 21.3%，但接着 1960 年、1961 年和 1962 年连续三年出现 GDP 负增长：分别为 - 0.3%、 - 27.3%、 - 5.6%，波动幅度为 49.6%。第二次发生于 1965—1968 年，1965 年 GDP 增长率为 17.0%，而 1967 年、1968 年又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分别为 - 5.7%和 - 4.1%，波动幅度为 22.7%。第三次发生于 1970—1976 年，1970 年 GDP 增长率为 19.4%，1974 年又下降到 2.3%，1976 年出现负增长，为 - 1.6%，波动幅度为 21%（参见图 6 - 2）。脱离国力和国情、盲目追求高速度，超常地耗费社会财力和物力，必然为社会所无法承受，更难以长期支撑，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可一度升得很高，但却难以持续保持下去，而往往是在经济出现超高速增长后不久，又会出现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超常规经济波动造成经济总量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从而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使我国经济无法实现长期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四）经济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我们往往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而要保证重工业的发展，又不得不靠抑制消费、挤压轻工业和农业发展来实现，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积累和消费、农、轻、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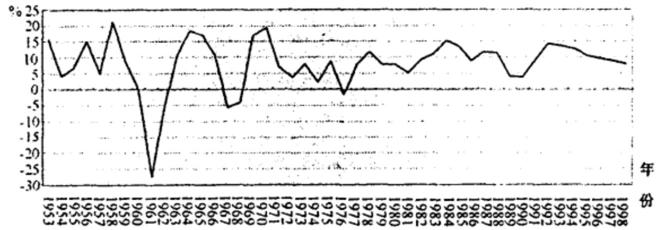


图 6-2 1953—1998 年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重大经济结构间的关系，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1958 年我们为了实施不切实际、违背规律的“赶超”计划，实行“以钢为纲”的方针，大办钢铁，使钢铁等重工业超高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其它产业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农轻重比例为 21.8:26.1:52.1。1960 年，重工业比重更是高达 66.6%，达到历史颠峰，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调。进入 70 年代后，重工业连续几年超高速增长，农、轻、重之间比例关系由 1965 年的 37.3:32.3:30.4，变成 1975 年的 30.1:30.8:39.1，重工业上升 8.7 个百分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等得到较大调整。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情形仍不时出现，经济生活中盲目铺摊子、上项目、重复建设的状况仍然严重存在，结构雷同、比例失调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五）经济总量频频失衡，通货膨胀不断发生

效益不佳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往往引起高通货膨胀：追求速度，必然导致基建投资规模速度扩张，而基建投资规模过度扩张，又必然引起货币超常发行，从而导致货币（包括信贷）急剧膨胀，通货膨胀必然推动物价水平上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被管死，通货膨胀往往呈隐蔽状态。改革开放后，物价上涨显性化，由过热的经济带动，我国发生了三次高通货膨胀。第一次发生于 1984—1985 年，1985 年通货膨胀率为 8.8%；第二次发生于 1988—1989 年，1988 年通货膨胀率为 18.5%；第三次发生于 1993—1994 年，通货膨胀率 1993 年为 13.2%，1994 年为 21.7%。超高速度增长也多次引发投资需求膨胀、经济总量失衡。如 1958 年至 1960 年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扩张，1958 年到 1960 年部门基建投资 611.5 亿元，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总和近一倍半；1978 年、1985 年、1988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 22%、38.8%、22.7%；而 1992 年和 1993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又分别比上年增长 44.4% 和 61.8%。所有这些时期，都带来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严重失衡，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和产品质量的下降，最终迫使政府进行经济整顿和结构调整。

上述这些问题表明，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成效显著，但总的看经济

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也就是说，速度是经济发展的中心，而速度主要是靠增加投人、铺新摊子来支撑的。

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可以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经济增长方式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三高”和“三低”，即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费、低质量、低产出和低效益。具体表现为：从宏观上，重实物量平衡，轻价值量平衡；从生产上，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益；从投资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深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经济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反，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有机构成和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即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扩大再生产方式，它具有消耗低、质量高，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等特点。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注重经济增长中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协调。它不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有利于显著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

第二节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因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

要解决上述问题，实现高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必须更新发展的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因

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相比，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但为什么我国会形成粗放型增长方式，并且长期束缚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呢？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基础差

一个国家实行何种经济增长方式，与其基本国情密切相关。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基础。

1. 经济底子薄弱，资产存量少，资金短缺。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

基础极为薄弱，在农业、手工业占绝对比重，少量存在的工业亦十分陈旧的基础上、在建设资源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没有较高的速度，没有较高的积累，不优先发展重工业，难以缩小和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

2. 科教文化落后。对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国民之科学文化水平。旧中国教育落后，建国初期，人才缺乏，科技和文教事业也不发达。因此对推进集约型增长方式，增加科技投入，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巨大障碍。

3. 人口众多。中国是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农村人口比重很大。生产力水平的极端落后和人口众多的事实，及其带来的沉重的就业压力，反映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必然是粗放型经营。

此外，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备受列强凌辱的历史教训，也要求我们必须以较高的速度才能尽快建立工业化基础，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从而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建国初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难免实行也难以摆脱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方式。

（二）经济发展战略失之片面

建国初期开始形成的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本应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改善而逐渐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事实上，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观上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始终把速度放在第一位，导致实践中片面地追求产品产量与产值，忽视品种与质量；片面强调总量增长与速度，忽视技术进步与效益提高。不少地方和部门热衷于脱离实际的盲目赶超，铺摊子、上项目，粗放型增长方式直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未能得到有效的改变。

（三）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一方面造成政府部门本身无约束的盲目行为，使在高速度增长目标下的投资膨胀，重复建设与数量扩张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又使企业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无法产生追求科技进步、强化企业管理、推动质量效益提高的内在竞争动力。这样计划体制下的微观经济组织，实际上就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计划经济体制是我国长期以来不能摆脱粗放型高速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

二、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可能性

1995 年 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

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1. 我们已具备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产业体系。经过50年的努力，我国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多年调整，我国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第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已经相对协调。我国产业门类比较健全并富含着较强的升级潜力，我国不仅有传统的支柱产业，而且有正在成长壮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的骨干产业。

2. 我国已具备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较好的技术基础。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能够以先进技术来开发新产品，提供新设备；我国基础性科学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技术的开发利用，已建立一套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系统，对经济运行质量的改善、经济结构的升级，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起越来越直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3. 我们已具备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较好的人才基础。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增强，随着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引进，一支优秀的经营者队伍已初步形成，一些企业的管理水平已接近国际水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造就了大批具备经济、管理等知识的专业人才，形成了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规模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成为各个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骨干。与此同时，从农民到职工，文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专业素质日益增强。

4. 我们具有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较好的外部环境。经过50年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的改革，封闭的经济运行系统已被打破，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这不仅使我们能够有利地利用国外的技术、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也有利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按照国际规则理顺体制关系，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5. 最重要的是，我们已初步形成有利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20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企业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竞争性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宏观经济间接管理体制的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通过经济杠杆为主的调控手段，调控经济活动的能力大大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条件将更进一步改善。

第三节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高新技术产业是提升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带动力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是指随着高新技术的应用而出现的新的产业部门。它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现在我们说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产业部门。建国50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贯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目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其重点转向高科技领域。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而且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仅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要加快高科技产业化进程。要解决我国经济中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等重大问题，也必须依靠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大部分高新技术项目的开发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初的领域包括核能、航空、火箭、电子、激光和自动化等项目，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现在已建立起了包括航空、航天、核能、微电子和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电子及通讯工程、海洋资源开发、新材料、自动化等工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初步奠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并取得了一批出色的科技成果，其中有些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有的已处于世界前列。但总体上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与世界发达国家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到1978年的30年间，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从无到有，主要限于军事领域，很少用于民用产品，并且只有单个的高技术项目。高技术的发展没有从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中独立出来。以航空、航天、核电等为主体的高技术产业尚未形成独立产业，一直处于准军事化的发展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中国科学院及各部门、各地方的一批科研

和实验机构，通过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初步改造了科技教育体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即《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规划确定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八字方针："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规划中特别强调了对核技术、喷气技术（即后来发展起来的宇航技术）、无线电技术、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等6个方面的高新技术发展采取紧急措施。根据这个规划，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高新技术领域和工业部门。1962年，面临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国际上科学技术有重要发展，苏联专家撤退等新问题，国家科委重新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重视和强调尖端技术、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分子生物学等重点项目和前沿项目。我国的科技事业获得了新的发展。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导弹核试验，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等等，均凝结了我国高新技术的成就。这一时期，尽管高技术重点项目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尚未制定独立的总体的高新技术发展规划，高新技术尚未产业化。因而，这一时期仍属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奠基阶段。

第二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阶段。在"依靠科技振兴经济"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83年10月以后，我国出现了"新技术革命"。1985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强调"对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以支持"并决定选择若干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这一决定，有力地推动了高新技术的发展。1982年以来，我国实施了"国家科技重点攻关计划"、"863计划"和"火炬计划"，创办了具有不同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推动了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

"国家科技重点攻关计划"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带有方向性、关键性和综合性问题的十分重要的科技推动计划。其宗旨在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经济竞争力、集中力量攻克一批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加强已有单项技术集成配套和工程化研究，强调实现科技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市场导向与技术推动相结合，加快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该计划于1982年开始实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批关键技术和装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863"计划是我国在世界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期实施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其宗旨是追踪赶超世界高新技术领先水平，推动我国高新技术研究发展，建立我国新兴高技术产业基础。"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和海洋技术等8个高新技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点。"863"计划于1986年开始实施，13年来，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98年底，民用高新技术的六个领域共资助项目近3000项，取得研究成果1670多项，其中50%以上达到国际水平，使我国在所选高新技术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共发表论文32163篇。有700项成果获得国家或部委级奖励，成果获奖率达45%以上，获国内外专利近500项，一批重大关键技术获得突破。专家对其中36项关键技术的评估分析表明，60%以上技术在水平很低或几乎完全空白的基础上起步，目前已进入或接近国际水平，11%达到或保持国际领先水平。“863”计划的科技成果40%以上在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等领域得到应用，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极大地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火炬计划”是一项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于198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原国家科委组织实施。其宗旨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挥我国科技力量的优势和潜力，以市场为导向，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火炬计划”的实施，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的增长点，并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到1998年，“火炬计划”已累计立项14749项，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445亿元，产品销售收入1284亿元，利税总额266亿元，出口创汇24亿美元。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火炬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智力密集和开放环境条件为依托，主要依靠我国自己的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同时借用一切可能的国外先进科技资源、资金和管理手段，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创造局部优化环境，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集中区域。自1985年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建立到1998年底，国务院共批准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与此相应，各地区也相应建立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些特色鲜明的开发区，通过整体规划、强化管理、系统引导和配套服务建设，经过14年的不断完善和规范，其服务功能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功能越来越突出出来，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和向传统产业扩散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辐射源，成为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加速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的示范区，为建立我国比较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

（一）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显著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通信产业、航天技术产业、核技术产业等发展迅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电子信息产业和通信产业的发展。这两个高新产业依靠高新技术作先导，规模迅速扩张，产值增长十分迅速，走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列。

1. 电子信息产业。我国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在90年代取得显著成就。1998年，电子信息业产业总值由1990年的698亿元，增加到3100亿元，增长了3倍多；利税总额也

由42.2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230亿元，增长了4倍多。其中，计算机产业发展最为迅速，1998年，我国微机年销量达到288万台。(参见表6－4)

表6－4　　1990—1995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及利税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8
产业总值	698	886	1087	1396	18612	2471	3100
实现利税	42.2	48.5	58.8	83.4	119.2	155.8	230.0

资料来源：乌家培：《中国信息产业的现状展望与对策建议》，《中国软科学（京）》1997年第7期；1998年数据来自《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2. 通信产业。过去由于发展滞后，通信业曾是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来，通信产业已发展成我国工业经济向信息过渡的先导产业，完成了从人工网向自动网、从模拟通信向数字通信的转变，通信能力有很大提高。数据通信网的建设和应用的发展迅速，推动了信息服务业的迅猛发展。1998年，我国通信业实现业务收入2295亿元，比1997年增长25.5%，通信新增增加值占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7年的2.4%提高到1998年的4.9%。

(二) 高新技术产业产品进出口增长迅速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在80年代末已有迅速增长，进入90年代后，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更加迅速，大大高于我国商品进出口的总体增长水平。到199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年进出口额由1987年的63.1亿美元增加到34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其中，出口总额由9.2亿美元增加到113.7亿美元，增长了11倍多；进口总额由53.2亿美元增加到228.8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1998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进出口增长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仍实现了强劲增长，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6.3%、17.8%和15.6%，进出口额占全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0.6%，出口额占全国商品出口贸易总额的6.2%，进口额占全国商品进口贸易总额的16.3%。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体现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也展现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具备的国际竞争力。(参见表6－5)

表6－5　　1987—199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额	出口额	占商品出口额%	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	进口额	占商品进口额%	占工业制成品进口额%	差额
1987	63.1	9.2	2.3	3.5	53.2	12.5	14.9	－50.0
1989	87.0	18.5	3.5	4.9	68.5	11.6	14.5	
1991	123.2	28.8	4.0	5.2	94.4	14.8	17.8	－65.6
1993	205.8	46.8	5.1	6.2	159.1	15.3	17.7	－112.3
1994	269.4	63.4	5.2	6.3	206.0	17.8	20.8	－142.6

年份	进出口额	出口额	占商品出口额%	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	进口额	占商品进口额%	占工业制成品进口额%	差额
1995	319.2	100.9	6.8	7.9	218.3	16.5	20.3	-117.4
1996	265.5	76.8	5.1	5.9	188.7	13.6	16.6	-111.9
1997	294.4	96.5	5.3	6.1	197.9	13.9	17.4	-101.3
1998	342.4	113.7	6.2	7.0	228.8	16.3	19.5	-115.1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技指标课题组：《1997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状况简析》。1998年数据来自《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值增长远远超过其它产业

自从1985年7月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政府联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科技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经济呈现出持续迅速增长的良好形势。到199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工贸总收入由1991年的87亿元增加到4840亿元，增长了55.4倍，年均增长77.5%；工业总产值由72.1亿元增加到4333.6亿元，增长了60.9倍，年均增长79.8%；利税总额也由12亿元增加到477亿元，增长了40倍，年均增长69.4%。出口额由0.86亿美元增加到65.2亿美元，增长了60多倍，年均增长73.5%。工贸收入、工业产值、利税和出口额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增长平均水平，充分反映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参见表6-6）

表6-6　　1991—199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状况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收入（亿元）	87	231	564	943	1530	2380	3380	4840
利税（亿元）	12	34	75	110	176	240	350	477
出口（亿美元）	0.9	2.0	3.8	13.0	29.0	42.0	64.8	65.2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火炬计划统计资料》（1991—1998）。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尚有很大差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还很低，只有3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很小，仅为8%左右。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组织和体制存在弊端：管理机构过多过大，科研机构条块分割严重，难以形成联合攻关共同完成重大科研课题合力，而且企业和科研机构、高等教育严重脱节，合作程度很低。人才短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难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求。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经费也面临短缺问题。高新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小，不仅大大低于全部发达国家，大大低于新兴国家和地区，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一比重又一直呈递减趋势。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我国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途径

1. 充分发挥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以促进科技与经济一体化为核心，围绕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了改变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力量分散、条块分割的局面，我国应强化对高新技术发展的组织领导，制订统一的高新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实施和制定优惠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加快制定、完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并严格实行。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产业趋同现象。国家应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组织协调和统一管理，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高、新、特”的原则，提高产业的技术集中度，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约化发展。

2. 拓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加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步伐。拓宽资金来源必须充分发挥多元投资主体的作用。一是政府应加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投资力度，特别应该注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领域和关键性技术领域。使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长的力度起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同步。二是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加快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现代股份制公司改造，优先安排高新技术企业股票的上市额度，运用资本市场直接筹资。四是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3. 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要把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作为重要内容。所有企业都要开展研究和开发活动，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要建立技术中心。要大力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要区别不同情况，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逐步转变成科技型企业、整体进入或部分进入企业，或者转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要注意分类指导，做好细致工作，积极而稳步地推进。要积极发展和扶持多种所有制、多种组织形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我国民营科技企业 80 年代初出现，进入 90 年代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是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新生力量。要加强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支持和引导，进一步明确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政策，包括融资渠道、税收优惠、工商登记、人才引进等，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他们健康发展。

4. 推进产学研结合，鼓励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进入企业和企业集团，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一是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挂钩，长期稳定地在科研开发、成果产业化、人才培训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二是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研究开发，例如设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流动站等，开展项目合作。三是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股份制的形式组建科研生产联合体，允许技术入股和创业入股，调动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的积极

性。四是通过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密切合作，制定具有前瞻性、实用性的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能充分推动产业升级的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计划。

5.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商品化、产业化，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因此，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开发高新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和产业。在高新技术的供给者和最终需求者之间，还必须培育各种中介性组织。培育高新技术交易市场，如定期召开科技成果交易大会，成立专门的高新技术交易中心等等。

第七章　农村改革与发展

农村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前进，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崛起。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体制和农业的发展状况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中，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走过了曲折的历程。这一历程与农村经济体制，特别是土地制度的变化密切相伴。土地是农业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的基本保障。农业经营制度的变化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总体上都围绕着土地归谁所有和如何经营进行。土地制度变革及其带来的经营体制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

新中国诞生50年来，我国土地制度与农业经营制度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其中前两次发生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之间由于政策的变化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

一、土地改革运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1.19亿农业人口（总人口1.34亿）的老解放区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尚有约2.9亿农业人口（总人口约3.36亿）的新解放区未进行土地改革。新解放区主要分布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地区，那里的广大农村，仍然保留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封建地主凭着占有大量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权，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必须在这些地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以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新解放地区的农村领导广大农民掀起了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民土地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修改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后，于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通过，

并在全国新解放区贯彻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工业化开辟广阔道路。

与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政策相比，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和财产，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保留不动；对地主只没收其“五大财产”（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及其在农村中的多余的房屋），其它财产不没收；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和其它财产不受侵犯；规定小土地出租者如每人平均所有土地不超过当地人均占有土地的1倍，不予没收；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侨乡采取有所区别的政策；对于城市郊区、沿海、丘陵土地，也采取了有别于一般农村的特殊土地政策。从1950年冬季开始，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有步骤有区别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约4600多万公顷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土地改革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而推动了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

土地改革使农民人人有了耕地，但土地的所有制性质仍然是私有制。由于农户间劳动能力强弱差别的存在，加之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单个农户要经常面对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因而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农户间的土地兼并随时都可能发生，从而会逐步形成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土地私有基础上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往往会导致广大个体农民的迅速破产，大批破产农民往往被迫流入城市，又必然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这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初衷相违背。因此，党和政府早在土地改革期间便开始了对农业合作化的酝酿。土地改革以后，刚刚分到土地的贫农下中农普遍存在着缺乏牲畜、农具及其它生产资料的困难，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押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它新技术，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农户间的互助合作来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

根据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在发展生产上的两种积极性，即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结合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各地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推动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决议提出了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三种形式：即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2年底以前，主要是大量发展临时互助组，逐步推广常年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人民政府在经济上和农业生产技术上对互助合作组织实行扶持和优惠的政策，如发放低息农业贷款，供给新式农具、良种耕畜及优良农作物品种等等，促进了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发展。这种多种互助合作形式并存、互助合作组织与个体农民经济并存的体制，是同我国当时不同地区、不同生产条件的差异性相适应的，对于吸引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到 1952 年底，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 40%。据统计，当时互助组的产量一般要比“单干”农户高出 10%—30%。

中共中央于 1952 年 2 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3 年 12 月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了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即首先组织和发展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接着发展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进一步建立土地和其它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迅速。1954 年互助组总数增加到 1000 多万个，参加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上升到 60.3%。农业社（初级社）总数由 1953 年的 1.4 万个增加到 50 万个。与此同时，初级社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追求速度、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于是，中共中央于 1955 年 1 月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合作化运动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整顿工作包括确定并稳定土地报酬的数量，新办农业社不急于将牲畜折价归社，健全合作社的劳动管理，实行包工包产等。经过 1955 年上半年的整顿、缩减了 2 万个农业社（初级社）。这一年上半年，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户数的 14.2%，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 50.7%，个体户农户占 35%，仅不足千分之一的农产参加了高级社。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中共中央于 1955 年 10 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到 1956 年 5 月，全国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的比重已经迅速提高到了 91.2%。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 61.9%，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占 29.3%，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此后，高级社继续增加，发展很快。到 1956 年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比重进一步提高到了 87.8%。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成就，是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对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具有深远而巨大的历史意义。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在实施改造的步骤与方法上，我国汲取了历史上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具有中国特色。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化历程比较，中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在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中，农业生产发展没有中断，农业生产水平仍在提高。1953—1957 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4.5%，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19%，棉花产量年均增长 4.7%，猪、牛、羊肉产量年均增长 3.31%，其它农产品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5.39%，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但改造工作也存在缺点，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要求过急，步子过快，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多数农民没有经过初级社，有些农户甚至没有经过互助组就进入了高级社。有些地方给予的土地报酬过低，甚至取消土地报酬，有些地方把大牲畜入社时作价过低。有些地方甚至违反自愿原则，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来强制农户入社。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脱离了农村的实际，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震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出卖或宰杀耕畜、甚至要求退社的风潮。

三、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了土地报酬，将社员私有土地无代价地转归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水利等设施也随土地归集体所有；耕畜、大型农具等则按照自愿互利原则折价归社；从而实现了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经营管理上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按劳分配。其规模一般相当于后期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产大队。公有化程度高、规模较大的高级社已与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由此引发的许多问题很快就有所暴露。但是这些问题没有得到纠正，由于"左"倾思想处于支配地位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制度基础，更加激进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以狂飚之势迅速掀起。农村经济进入长达20多年之久的曲折发展时期。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重提要把小型农业社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各地开始了并社工作。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进入高潮。10月，人民公社在全国基本建立。这样一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据1958年11月初的统计，当时全国已有99.1%的农民、12690多万农户，由原来75万个农业合作社组成26500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不仅继续实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中劳动、按劳分配的经营体制；而且以"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为特征，进一步把基层政权和集体经济组织合为一体，公有化程度更高。它既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又是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单位，同时还是劳动农民联合的集体经济组织。这一体制明显地不适合现阶段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其弊端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一大二公"。"一大"即规模大，初期的人民公社，多是几乡一社，平均规模为每社4797户，规模最大的公社则有2万多户。"二公"就是与合作社相比，人民公社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公有化：土地、牲畜等基本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集体所有，农户的全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转为公社所有。公社财产经常在内部无偿平调。公社规模越大，财产公有的范围越大，无偿平调的财产范围也就越大。公社把合作社和社员个人的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以及无偿平调财产的做法，违反了自愿原则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严重

损害了农民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向中央的报告，几年中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

2.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制度下，公社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社员统一行动，集中劳动，实行军事化管理，就连生活也由公社统一安排。这就为像战争时期支援前线那样大规模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可能性，也为无偿平调部分生活物资的做法找到了依据。

3. 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公社是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又是基本的分配单位，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制度。通过实行有限的工资制和不同程度的供给制，如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基本生活消费品供给制，大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由1958年10月底的265万个增加到391万多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左右，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0%以上。在公共食堂吃饭，名义上是“按需分配”，实际上仅能勉强达到维持生命的最低伙食标准。而且由于收入低，绝大多数人民公社除了保障社员按低标准吃粮以外，几乎发不出工资。这种不切实际的分配制度造成很大浪费。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普遍下降。

4.“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将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与农民基本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二为一，把国家管理社会的行政功能渗透到农业经济组织内部，为单凭行政命令管理经济创造了条件，使“命令风”与“共产风”结合，不讲经济效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按照主观意愿搞“一刀切”的做法普遍盛行，也使县以上国家机关参与平调公社财产的错误做法变得顺理成章。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级领导机关都到农村去大搞副食品供应基地，无偿平调公社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仅河北一省就被部队和中央机关312个单位要去公社土地107万亩。

人民公社体制的迅速建立，体现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增长，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经济成效，产生了过高的预期；同时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胜利后，其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制度变革的热情也很高。因此，在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又被迅速发动起来。正是受这种急于求成思想的支配，《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导致包括“共产风”在内的“五风”在农村以强劲的势头迅速蔓延开来。虽然1958年底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错误已经有所觉察，并且试图予以纠正，但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纠正工作有很大局限性。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同志之后，党内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政治形势的变化不仅不可能再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相反，在某些方面“左”倾错误反而得到不断扩大。对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同志进行错误的打击，客观上支持了浮夸作风，以致发生了某些地区谎报成绩、虚报产量、多交公粮，甚至造成饥饿导致农民死亡的惨痛事件。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1958—1962年，我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减少3.9%。其它农产品的产量也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农民生活相当艰苦，农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共产风”与“五风”

“共产风”即毛泽东同志首先在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的：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四、“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党和政府开始逐渐纠正“左”的错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调整，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

早在1958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认识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开始进行纠正。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建立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机构。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基本社有制改为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体制，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一级。1960年11月，党中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应该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确定以生产队为基础，同时还规定生产队下属的生产小队有小部分所有制，以调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1961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以解决人民公社普遍存在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公社规模偏大，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管得太多太死，公社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一步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进一步解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管理上的过分集中，纠正无偿平调农民财产的错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提出：人民公社要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取消供给制，实行评工记分；建立社员代表大会、监督委员会等民主管理制度；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相当于初级合作社的规模），实行“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这一条例所确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的原则一直实行到1980年前后。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这个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大二公”的弊端，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政社合一”体制作为既定的前提并未被改变。经过了几年的经济大调整，我国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并有

所发展，1962年我国农业生产开始实现正增长，并在此后4年，都连续实现了较快增长。其中1964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到了13.5%。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经济困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左”倾思想再次泛滥，不仅不可能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再作进一步纠正，而且60年代初期对农村政策的调整也被当做“右倾”受到批判。1967年夏以后，全国农村又开展了对“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租地自由）的错误批判，给它们扣上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帽子。60年代初开始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走形变样，“左”的错误做法被奉为典范，得到推广。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1967—1976年间，农村曾两度掀起合队并社、向大队核算过渡的风潮。第一次合并风潮发生在1968—1969年。1968年庆祝人民公社成立10周年前后，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一些地区否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轻率地过渡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匆匆忙忙地并社，扩大人民公社规模。到1970年底，实行大队核算的单位占全国生产大队总数的比例由1962年的5%上升到了14%，人民公社的总数从1966年的7.03万个降到5.15万个，减少1.88万个（即减少26.74%）。其中，仅1968年、1969年两年就减少1.63万个。全国每个公社平均农户数，也从1966年的1944户增加到近3000户。后经中共中央制止，一部分已经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又重新退回到生产队核算。到1975年9月以前，实行大队核算的单位占全国生产大队总数的比例又降至9.2%。第二次合并风潮发生在1975—1976年。1975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推动农村再次掀起了过渡和并社的风潮。据1977年对11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大队核算单位占大队总数的比例又上升至11.2%，其中，比例最高的山西省达39.9%。两次合并风潮给农村集体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一些生产队为了避免公社或大队平调其财产，纷纷杀猪砍树，吃光分尽储备粮和公积金，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60年代初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国农村发起的向大寨学习的运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山村，七沟八梁一面坡，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实行农业合作化后，全村农民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农业生产取得了良好收成。1964年，中共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要求全国农村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这一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却变成了推行“左”的错误的工具。扭曲后的所谓“大寨经验”在农村各地被机械地照抄照搬，多种经营、家庭副业、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禁止，“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多劳多得，按劳分配”、“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等遭到批判，代之以扩社并队的“穷过渡”风、“自报公议工分”的平均主义分配、组织管理军事化等“左”的错误做法，

使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变得更加僵化而脱离实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寨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总体上看，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的经营体制不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不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其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越来越突出，成为阻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桎梏。尽管如此，在实施人民公社体制时期，曾经将原先独立分散的农业生产者组织在一起，使我国能够在十分落后的农业基础和生产条件下，集中力量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完成了大量由单个农户所无法进行的大型农田水利基础工程。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的 20 多年里，广大农民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兴修水利，治理荒山，开展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有效地改善了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所取得的业绩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人民公社在相对封闭孤立、视野狭窄的农民群体中培育了集体主义观念，公社社员在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互助协作，帮困济贫。人民公社体制对于我国集中全国特别是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工业化建设，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也起了一定作用。

五、1978 年以前农业的发展状况

1978 年前我国农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一方面，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全国兴修了大量的大中小水利工程，建设了一大批高产稳产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1957 年的 24.5%上升到 1978 年的 45.2%，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与 1949 年前相比，1978 年，我国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农业用电量增加到相当于建国初全国发电量的 7 倍多，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长 1.7 倍，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以及社队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里，我国农业发展起伏较大。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 3.6%。在 1950—1978 年的 29 年间，我国农业有 5 年出现负增长，3 年持平，9 年实现 2%—5%的增长，7 年增长 6%—10%，5 年实现了 10%以上的较快增长(参见图 7－1)。1958 年以后，伴随着制约因素不断增多，农业发展的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农业发展缓慢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现出来。1952—1978 年，全国人口由 57482 万人增长到 96259 万人，增长 3.8 亿，年均增长 20‰，其中非农业人口增加 1 亿；同时全国耕地面积由于基本建设用地增加等原因有所减少。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粮食的总产量年均增长 2.4%，单产也有较大提高，农牧渔业的总产值由 1952 年的 461 亿元增长至 1978 年的 1397 亿元，年均增长 2.7%，但农村居民的生活却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到 1978 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还停留在 1957 年的水平，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 70 元左右，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 50 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

足1万元，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农业发展缓慢和落后的状况同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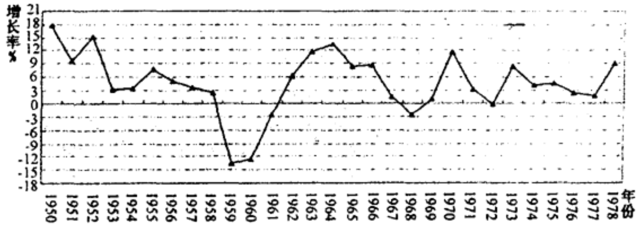


图7－1　1950—1978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

以上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政策方面失误对农业发展带来的损失更大，而更深层原因则是当时僵化的农村经济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方面还缺乏经验，对经济运行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过分强调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在组织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瞎指挥现象严重，浮夸风、“共产风”泛滥起来，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农业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的推行，频繁的政治运动，不时地干扰着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极大地挫伤了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畸重工业发展政策，加重了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对人口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在人口政策方面的失误使我国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也给农业发展造成沉重压力；缺少生态保护的科学观念，盲目地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造如破山开荒、围湖造田等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的平衡与改善，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第二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发展与农村组织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率先从农村展开。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生产与核算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使用权直接交给农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适应了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的原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产生并迅速得到推广，是由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决定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公有化，它严重脱离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在：

1. 不符合农业生产的规律。农业生产具有与工业生产不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农业生产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劳动对象，是一种按照自然生命周期规律、直接利用自然资源且工作空间极其广大的再生产。二是农业的生产时间是分散性的，使劳动时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活动需要一种更为灵活、适应性更强的经营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具有大型经营无法取代的优点，是农业生产最理想的经营方式。

2. 剥夺了农民独立地使用土地和改造劳动对象的权利。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不能独立使用土地进行生产、不能根据自己的劳动投入和实现的产量获得相应劳动回报，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抑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大降低。

实际上，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 20 多年里，尽管“左”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类似家庭联产承包的经营形式，如包工到户、包产到户等，却也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体现出，农民对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不满，始终希望能够按照农业生产的规律改革不合理的经营管理体制。早在 1956 年合作化的高潮中，浙江永嘉县、四川江津县、广东中山和顺德县就敢于领风气之先，首创包产到户。1959 年春夏之时，更大范围的包产到户发生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部分农村。据估计，1960—1962 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约有 20% 的地区自发试行过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生产形式往往能立即带来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而邓子恢、曾希圣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干部也都曾具体地支持或倡导过包产到户。可见，家庭经营方式适合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但这些合理的要求，当时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受到错误批判和强行压制。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强调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提出计算农民劳动报酬时，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建立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这个决定拉开了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1. 初步发展阶段：1978—1980 年初。安徽、四川等省的一些农业发展较落后的农村，为了解决穷困面貌，实行了包产到组，有少数地区实行了包产到户。这期间中央先

后肯定了“包产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和允许因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这种政策上的放宽，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发展。到1980年初，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核算单位已达到近30%。

2. 推广阶段：1980年初到1982年底。这期间，中央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也给予了相应的肯定。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对“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允许其“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此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获得迅速发展。到1980年底，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核算单位已达到80%以上。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已达到50%以上。

3. 普遍实行阶段：1983年初到1984年底。1983年初中央肯定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初中央又将联产承包制的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1984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郑重宣布，“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这标志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联产，即以劳动者的最终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主要依据；承包，就是确定劳动者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责权利关系的经营形式，即将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或经营项目，通过承包合同，规定某种分配办法，交给农户去经营。这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了农户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这一阶段的改革，是从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即经营方式人手的，这使农民有了较大的生产自主权、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和收入分配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国家还提高了农产品价格、调整了生产结构，多种经济成分也得到了发展。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已占到总农户的98%。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这一时期农村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6.4%，扣除物价因素后，农民收入每年仍平均递增15.1%。

4. 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从1985年至今。这一阶段，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有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出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创新模式，使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增长更为迅速。1997年，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对于承包土地掠夺式经营等短期行为问题。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少数确实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和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以新的形式呈现出的更加旺盛的活力。

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示出的巨大制度优势已经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它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打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使我国农产品供应的短缺状况大大缓解，城乡人民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目前，广大农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发展较快的地区开始过上小康生活。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为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打下了基础，也为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

三、农村组织创新

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人民公社体制的种种弊端，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推广，农户已经实际上成为生产经营和效益核算的基本单位，这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产生了矛盾，人民公社体制已经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改革陈旧僵化的人民公社组织体系，以便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协调的制度环境。

1979年8月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四川省在广汉县进行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的试点工作。按照党、政、企分工的要求，将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成立乡政府；取消生产大队，改设行政村。随后，吉林、河北、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等省也进行改革试点。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政社分设。”这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进入普遍展开阶段。

实行政社分设，就是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实现政权机构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分离，国家政权管理经济的职能同合作经济的经营职能之间的明确划分和明确分工。把人民公社中属于政权的那部分职权分出去，建立乡政府。乡政府对各级经济组织进行行政领导，包括制定本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各级经济组织、农户执行与国家签定的经济合同等。

对于公社原有的经济职能，各地改革形式不一。有些地区是建立乡农工商联合公司，下面分设各专业公司和一个信用社。有些地区是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机构，在当时仍保留人民公社作为经济实体，保留三级所有。有的地区还建立跨社跨县的联合经济组织。这样就使农村各级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

农村基层组织的改革主要是设立村民委员会行使原来生产大队的行政职能，村民委员会是中国农民的合法的自治组织，其功能为管理农村基层，在协调各方面关系中起到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在村民委员会下还建立了基层群众性合作组织村民小组。取消原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经济职能，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社区集体合作经济组织。

政社分设遵循有利于推动农业经济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原则，将不同层次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改变为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关系，把逐级过渡关系改成各种联合与合作关系，打破划地为牢的资金、劳力、技术流动的框框，改为资金、劳力、技术自由流动，建立新的合作经济，实现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形式与规模的多样化，而不再是以往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单一的僵化模式。

经过两年的改革实践，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已建立乡（镇）政府91171个，取代了以前的56000多个公社。1985年5月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完成。同年年底，全国共建乡、镇政府91138多个，成立村民委员会940617个。

通过政社分设，我国建立起了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新型组织体系，使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济经营管理体制得以真正确立。此后，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的不断深入，打破社区地域界限的各种各类专业经济联合体，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社区经济合作与专业经济合作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而以原生产队（组）为基础设置的社区合作组织由于其范围较小，难以获得规模效益，或因实力较弱，无力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使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在设置范围上逐渐向村级合作组织转移。1988 年，村级与生产队（组）级两级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共有 165.3 万个，二者的比例为 23:77；1992 年两级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增加到 205 万个，二者比例则变为：32:68。这些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力地推动着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回顾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农业要发展，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农业科技的开发和全社会对农业的投入三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扶持力度，通过逐步减少农产品定购任务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与此同时，国家又不断加大对农业的直接投入，并积极推动农业科技的开发，培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后劲。所有这些政策与措施，对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些积极的政策措施之所以能够产生比较理想的效应，与我们不断推进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分不开，也就是说，理顺了农村经济的体制的关系，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前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推广之所以推动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发展，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节　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建立和完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进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与扶持的措施，推动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急剧改变。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又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推动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一、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沉积下的大量经济资源则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资源条件，在国家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后，乡镇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蓬勃发展。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领有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一）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乡镇企业，产生于50年代。70年代在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曾一度发展较快。但是真正普遍发展、壮大和提高，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50年间，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49—1978年：曲折的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我国农村工业开始兴起。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了农村大办工业的热潮，仅一年的时间，几乎每个人民公社都办起了以钢铁冶炼、农机具修理和制造及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企业。1959年底，全国农村有70多万个小工厂，从业人员达到500万人，总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同年，中共中央对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的做法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人民公社办工业的“三就”（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和“四为”（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社员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和为市场、出口服务）的原则，作为发展农村工业的基本政策，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人民公社体制下，大多数乡村企业是由人民公社或生产队创办经营的集体企业，称为社队企业或社队工业。社队企业只不过是一些工场作坊式的小摊子，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设备落后，经济上一般依附于社队集体经济，经营范围也仅仅是承接简单的加工业务和生产一些低档次的产品，对社会的供求起着补缺拾遗的作用。

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对农村经济造成极大冲击，使农村失去了发展企业的基础，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遭到了极大破坏。1961年，农村社队企业减少到4.5万个，产值下降到19.8亿元。1962年，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提出：“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农村社队企业数量和产值在曲折的波动中逐步下降。到1965年，社队企业仅有1.2万个，产值为5.3亿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治的动荡给我国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连续三年经济增长下滑。中央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农村可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以扭转经济面临的困难状况。到1970年，全国社队工业企业增加到4.5万个，产值增加到26.6亿元。同年，国家提出了在农村利用本地资源，兴办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小工厂。在人口增长过快、相对人多地少的东部沿海地区，社队企业率先发展起来。1974年，社队工业产值由1971年的77.9亿元增加到129亿元，同比增长了66%。到7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社队企业又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1978年，社队企业数量增加到152万个，总产值达到390亿元，比1974年增长了2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1.8%。

2.1979—1983年：初步发展阶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切入点的农业改革，在推动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为了让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了充分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沉淀压抑下来大量的经济资源来发展农村经济，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社队企业。同时指出：凡是符合经济合理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社队企业加工；城市工厂要把一部分宜于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

经营，并给予技术、设备支援；国家对社队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根据这一精神，国务院于1979年3月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社队企业发展方针、原则、政策措施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国家还为社队企业制定了包括税收优惠、奖售补贴、资金扶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为社队企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十分有利的政策基础。

在正确政策的指导和扶持下，社队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83年，社队企业发展到135万个，安置剩余劳动力3235万人，比1978年增长14.4%；占全社会劳动力的6.97%，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30%；总产值增加到1019亿元，年均增长21%，分别占全国国内总产值和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9%和17.2%（参见表7－1）。社队企业的发展，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实力；增加了社员收入，成为安置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繁荣了农村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这一时期，社队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企业滥采滥伐，对环境资源造成破坏；有些企业技术过分落后，经营粗放，质量低劣，造成了人财物的浪费；社队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海等少数发达地区，规模与数量不大。显然，仅仅依靠发展社队企业远远不能满足发展农村经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

表7－1　　1978—1998年乡镇企业发展情况

年份	企业数（万个）	职工数（万人）	总产值（亿元）	增加值（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出口交货值（亿元）	固定资产原值（亿元）
1978	152	2827	515	209	431	95	-	230
1979	148	2909	561	228	491	112	-	280
1980	142	3000	678	285	596	126	0.1	326
1981	134	2970	767	321	670	123	0.1	375
1982	136	3113	892	374	772	129	0.4	429
1983	135	3235	1019	408	929	137	0.5	476
1984	607	5028	1710	633	1537	188	27	575
1985	1222	6979	2728	772	2566	275	39	823
1986	1515	7937	3583	873	3364	379	99	1212
1987	1750	8805	4946	1416	4598	381	162	1604
1988	1888	9545	7018	1742	6120	526	269	2098
1989	1869	9366	8403	2083	6983	570	371	2500
1990	1873	9262	9581	2504	7284	608	462	2857
1991	1909	9614	11622	2972	9027	727	789	3118
1992	2092	10581	18051	4485	13434	1079	1193	4084
1993	2453	12345	29022	8007	26433	1966	2193	6439

年份	企业数（万个）	职工数（万人）	总产值（亿元）	增加值（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出口交货值（亿元）	固定资产原值（亿元）
1994	2495	12017	45378	10928	39274	2572	3398	8868
1995	2203	12861	68915	14595	57299	3697	5395	12841
1996	2336	13508	76778	17659	68342	4351	6008	16051
1997	2099	13050	82363	18914	75850	4662	6686	19427
1998	2004	12537	96694	22186	89351	5112	6854	21567

资料来源：农业部。

3.1984—1988 年：全面高速发展阶段。针对农民个体、联户办企业的悄然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情况，1984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将社队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它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等，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此后，国家对乡镇企业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引导和扶持政策，企业在组织生产、产品销售等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权，推动乡镇企业实现了全面高速发展。1984 年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一改过去不足 1 亿元缓慢发展状况，迅猛增长到 27 亿元。仅 1986 年、1987 年两年就超额完成了“七五”计划的产值目标。1987 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达到 50.4%，为 4946 亿元。到 1988 年末，企业个数达 1888 万个，年均增长 52.8%；从业人数达 9545 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 17.6% 和 23.8%，年均增长 20.8%；总产值达 7018 亿元，年均增长 58.4%。出口交货值增加到 162 亿元。

4.1989—1991 年：整顿提高阶段。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从 1988 年下半年开始，国家进行了“治理整顿”工作，国民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全国经济收缩，特别是银根抽紧，对乡镇企业影响很大。国家控制了乡镇企业贷款，压缩了基建规模，关、停、并、转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能源原材料、污染严重的企业。1989 年起，乡镇企业投资减少，增长速度放慢。同时，经过市场竞争，一部分企业关门停产，生命力强的企业则继续获得较大发展。1989 年增长速度为 13%，1990 年为 14%，1991 年为 37%，三年平均增长速度比 1984—1988 年减少 42 个百分点。但这一阶段，乡镇企业的出口仍保持大幅度增长，1991 年出口交货值比 1988 年增长了近 2 倍，达到 789 亿元。治理整顿，使乡镇企业经受了磨炼，许多企业以此为契机进行了自身结构调整，为下一步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5.1992—1994 年：第二次全面发展阶段。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以后，国务院连续下发文件，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外部环境。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开始恢复提高，总量迅速增长，乡镇企业进入了第二轮的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开始加快，1994 年底其吸纳农村劳动力达到 2867 万人，比 1991 年增加了 65.5%。1992 年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 18051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50% 以上；从业人员首次超过 1 亿人。1994 年，乡镇企业个数为 2495 万个，比 1992 年增加 403 万个；从业人员达到 1.2 亿人，比 1992 年增长 19.3%；

总产值比 1992 年增长 1.4 倍；纯利润增长 1.3 倍；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润提高了 48.6%；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提高了 25%；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降低了 16.8%；人均创利税提高了 1 倍；出口能力跃上了新台阶，出口交货值达到 3398 亿元，比 1992 年增长了近 2 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普遍强化了企业管理，注重科技与人才开发，使企业总体质量大大提高，涌现了一批大中型企业和现代化企业集团。

6.1995 年至今：稳步发展阶段。1996 年我国历史上首部保护和规范乡镇企业行为的法律《乡镇企业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乡镇企业的规划和管理进入了法制的轨道，乡镇企业逐步走上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个体、私营企业获得较大发展，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其就业吸纳能力一直呈上升趋势，1998 年底，个体、私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达到 4592 万人，比 1994 年增加了 60.2%，与同期乡镇集体企业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的状况形成明显反差。1998 年，全部乡镇企业个数为 2004 万个，比 1995 年虽减少 199 万个，减少了 5.4%；从业人员也比 1995 年的 1.28 亿减少到 1.25 亿人；但效益却保持了增长趋势，实现营业收入 89351 亿元，利润总额 5112 亿元，税金总额 1583 亿元，出口交货值 6854 亿元，分别比 1995 年增长 56%、43%、10%和 27%。

（二）乡镇企业的历史作用

作为改革的前锋，乡镇企业率先进入市场，实行“多轮驱动、多轨运行”，推动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农村所有制结构的形成，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导力量，其经济总量迅速增长，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为农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1. 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了社会有效供给，其生产经营活动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乡镇企业产品不仅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大部分需要，而且为城市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还为城市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原材料和能源。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成为一支引人瞩目、充满活力的经济力量，推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 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 22186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27.9%；乡镇工业企业增加值达到 15530 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46.3%；上交国家税收总额，占全国税收总额的 20.4%。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产量年年增加，已占全国相当大的比重。1998 年乡镇企业原煤产量 64218 万吨，占全国原煤产量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16%上升到 51.4%；水泥产量 23025 万吨，占全国的比重由 5%上升到 43%；机制纸产量 1232 万吨，占全国的比重由 10%上升到 58%。

2. 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促进力量。

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推动了农村各产业的发展，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20 年前，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还高达 74%，社队企业仅占 26%。到 1987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 52.4%，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此后，乡镇企业持续增长，所占比重逐年提高。1998 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 22186 亿元，占农村社会增加

值的比重高达60.8%。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集体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资产，目前，乡镇企业积累的集体资产已近10000亿元，占整个农村集体资产的比重超过了80%。集体经济的实力的增强，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和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加强自身发展潜力的同时，乡镇企业还大力支援了农业生产，为发展农业生产积累了大量资金。20年来，乡镇企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已经超过1000亿元，仅1998年一年，集体工业企业上交的支农资金就达60多亿元。这些支农资金成为农业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增加了农业技术装备，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对增加农业发展的后劲，保持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乡镇企业日益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促进力量。

3. 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

乡镇企业的发展，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注入广大农村，打破了几千年来农村、农业、农民三位一体的传统农业经济，极大地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乡镇企业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发展加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改变了农村过去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结构。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产生了显著的积聚效应，带动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工业小区和工商业聚集的小城镇。大批农民亦工亦农、亦农亦商，增强了城镇建设的基础。同时，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为小城镇提供了大量资金，使小城镇基础设施得到建设和改造。小城镇的建设，又促进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推动了农村二、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全国有近6万个小城镇，约容纳了1.5亿农村居民定居。这些小城镇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辐射和带动作用，展示了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广阔前景。

4. 拓宽了就业门路，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收入。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1998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了3.4倍，达到1.25亿人。在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的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1978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工资仅为300元，到1998年达到4000多元，比1978年翻了4番。1978年，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仅有10.7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八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部分的50%来自乡镇企业。1998年，全国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达686.78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8%。

5. 外向型经济已初具规模，成为国家创汇的重要来源。

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起步于80年代初，且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局面迅速打开。到1990年乡镇企业出口创汇的企业已达到5.6万家，出口交货值达462亿元，比1985年增长10倍多，占全国出口产品收购总额的四分之一。到1995年，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企业发展到12万家，出口交货值增加到5395亿元，比1990年增长10.7倍，平均每年增长43.5%。进入“九五”以后，外向型经济开始平衡发展。1998年我国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为6854亿元，比1995年增长27%，占全国出口的34.8%。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乡镇企业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与包装，已在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布局分散、产权模糊、人才缺

乏、管理不规范，社会负担过重，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逐步得到解决。

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随着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从种植业内部结构、农业内部结构到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乃至收入分配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经济结构日趋合理的调整已经而且正在推动着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一）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广义的农业包括农业（即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农业内部结构指的是广义农业内部农林牧渔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民生疲敝，百业待兴。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使备受长期战乱蹂躏的农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 年，农业总产值中，农、林、牧、渔比例是 74.5:1.6:11.4:12.5（参见图 7－2），主要由于历史原因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此时的农业结构中，种植业比重已经很高。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主观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农业发展政策连续出现失误，没有对农业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一方面，面对落后农业的基础，我们不得不以尽快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出发点，来设计农业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又没有解决好人口控制问题，导致国家面对越来越大的吃饭问题的压力；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服从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农村被当作粮食供应基地和重要工业原料产地，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造成种植业畸重，林业、牧业、渔业畸轻的更为不合理的农业结构。1978 年，我国农业结构内部各业比例已经变为 80.0:3.4:15.0:1.6。其中，渔业比重较 1952 年降低了 10 多个百分点，所占比重不足 2%，种植业所占比重又有所上升，达到建国 50 年历史中的最高水平，农业几乎成了种植业的同义词。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确立了大农业的新观念，不断加大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力度，终于打破了原先种植业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各业并重、协调发展的新型农业结构。自 80 年代初起，通过颁布或制订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规，国家开始有针对性地推动农村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非种植业的发展。如 1980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和批转的《关于加速发展畜牧业的报告》、1981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982 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加速发展淡水渔业的报告》、1984 年和 198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并公布实施的《森林法》和《渔业法》等等。这些政策；法律和法规为农村多业并举的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政策环境和法制保障。国家通过将不宜耕种的土地还林还牧还渔，有计划地开发广阔的山区、丘陵、草原和水面、海域、滩涂，增加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食品和工业原料；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特别是价格杠杆促进农林牧渔业的合理比例形成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林、牧、渔各业的迅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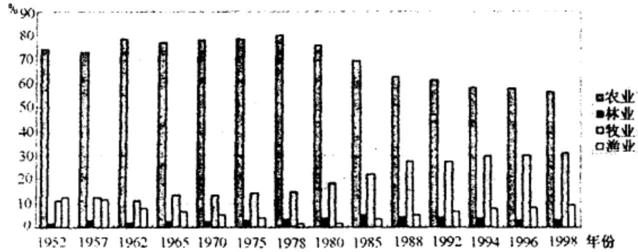


图 7-2　1952—1998 年我国农林牧渔各业比例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1952—1975 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7 页数据计算而得；1978—1998 年数据见《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 10 年后的 1988 年，农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种植业的比重下降了近 20 个百分点，降低到 62.5%；牧业的比重有了实质性的增加，达到近 30%；渔业比重增加到超过 5%。到 1998 年，种植业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 56.2%，牧业比重超过了 30%，渔业比重已接近 10%，农业结构更趋合理。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消费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对林、牧、渔业产品的需求仍将大幅度提高，使这些产业面临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农业结构也必然会得到更进一步的调整。

应当看到，5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是在农业内部各业产值不断提高的过程实现的。也就是说，农业内部结构中各业比重上升或下降并不是通过单纯降低某一产业的产量来实现的，而是在各业普遍增长的同时实现的。1978—1998 年，我国种植业产值增长了 1.67 倍，林业增长了 1.97 倍，牧业增长了 5.22 倍，渔业增加了近 8.9 倍。

（二）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同时，种植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原来以粮食作物为核心的畸形结构，转向粮食作物与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的比例合理、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特别是"一五"计划后的若干年，在"以粮为纲"方针的指导下，我国重视粮食生产而忽视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形成了不合理的种植业结构。1978 年粮食产量在主要种植作物总产量中的比重竟高达 88.2%。为解决征购粮和农副产品的合理比价问题，从而为发展多种经营、改善种植业内部结构打下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 1971 年到 1975 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并且从 1979 年起减少征购 25 亿公斤。1981 年 3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在保证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的前提下，使棉、油、麻、丝、茶、糖、烟、菜、果、药、杂各项经济作物和其它农副产品得到普遍增长，并

决定今后若干年要继续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保证粮食供求平衡。粮食征购指标的稳定，减轻了农民的粮食生产负担，使农民能腾出手来发展经济作物或其它多种经营。

为发挥价格杠杆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从 1979 年至 1981 年，国家以减少财政收入 520 亿元的代价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轻部分地区的农村税收负担。1985 年 1 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规定从 1985 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水产品、副食品、木材、中药材等，除个别品种外，一律退出派购，代之以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这是在建立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已成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后，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为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做的大胆尝试。国家还根据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经济效益为原则，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调整种植业区域生产布局。例如，在南方已证明不适合种双季稻的地区缩小双季稻种植，在华北、东北改单一粮食连作制为多种作物轮作制等。

在国家一系列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政策的指导和作用下，种植业结构逐渐改善，打破了长期以来粮食占绝对比重的种植结构，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茶叶等作物产量全面增长，在种植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从播种面积结构上看，1979 年开始，粮食作物面积逐年调减，由 1978 年的 120587 千公顷减少到 1998 年的 113787 千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降低到 73.1%，但粮食总产量却逐年增加。与此同时，油料播种面积有大幅度增加。由 1978 年的 6222 千公顷增加到 1998 年的 12919 千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 4.1%提高到 8.3%。棉花播种面积虽然由 1978 年的 4867 千公顷占 3.2%下降到 1998 年的 4459 千公顷占 2.8%，但产量却提高了一倍多。其它经济作物如糖料、茶叶、水果等种植面积也大大增加。

从产量结构上看，改革开放 20 年后，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近 2 亿吨，增长了 61%，但粮食产量在主要种植作物总产量中的比重却由 1978 年的 88.2%，下降到 1998 年的 72.7%，降低了 15.5 个百分点。油料、糖料和水果的产量分别增长了 3.4 倍、3.1 倍和 7.3 倍，所占比重也分别由 1978 年的 1.5%、6.9%和 1.9%，增却未发生变化，分别保持了 20 年前的 0.6%、0.1%和 0.4%。只有麻类作物的产量降低了 63%，占主要种植作物产量的比重由 0.4%下降到 0.1%。(参见表 7－2)

表 7－2　　1978 年、1998 年我国种植业结构对比

年份	项目	粮食	棉花	油料	糖料	麻类	茶叶	烟叶	水果
1978	占比（%）	88.2	0.6	1.5	6.9	0.4	0.1	0.4	1.9
	产量（万吨）	30477	217	522	2382	135	27	124	657
1998	占比（%）	72.7	0.6	3.4	14.5	0.1	0.1	0.4	8.1
	产量（万吨）	49000	450	2314	9790	50	67	236	5452

年份	项目	粮食	棉花	油料	糖料	麻类	茶叶	烟叶	水果
1998 年产量比 1978 年增长（万吨）		18523	233	1792	7408	－85.5	40	112	4795
1998 年产量比 1979 年增长（%）		61	107	343	311	－63	148	90	730
1998 年占比比 1978 年变动（百分点）		－15.5	0.0	1.9	7.6	－0.3	0.0	0.0	6.2

注：表中各类作物占比为该种作物当年产量占所列作物产量总和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1—93 页。

（三）产业结构的变化

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变。我国农村一改过去服从于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的单纯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和工业品消费市场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发展成为一、二、三产业齐备、功能健全、并日趋合理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变促进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农村与城市分界鲜明的二元结构大大改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二、三产业所占份额微乎其微，只有一些手工业和商业零售业。到 1978 年的 30 年里，仍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虽有较大的发展，但比重很低，质量也不高。农村改革以来，三次产业都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超过第一产业，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迅速发生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而第三产业则呈缓慢的上升趋势（参见图 7－3）。1978 年我国农村三次产业的比例是 68.6:26.1:5.3，第一产业占据明显优势，第三产业据点比重很小；到 1990 年，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使第一、二产业的比重达到基本相等的水平，分别占 46.1%和 46.3%。1998 年三次产业的比例变成 22.3:63.6:14.1，与 1978 年相比，第一、二产业的比重正好颠倒过来，第二产业已经占据绝对优势，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第三产业的比重比 20 年前增加了近 10 个百分点，有了很大提高。不过，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三产业的比重仍然偏低。第三产业未得到应有的充分发展，已经和正在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需要加大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有重点地推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总体上看，20 年间，产业结构的优化使非农经济成分超过农业经济，彻底摆脱了旧体制下单一的传统农业经济模式；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使得各产业的质量都得到明显提高。1998 年，全国农村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的产值为 25103.4 亿元。而非农产业产值则达到 87467.9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产值达 71595.3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达 15872.6 亿元。非农产业的产值超过第一产业的部分已高达 62364.5 亿元。

（四）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长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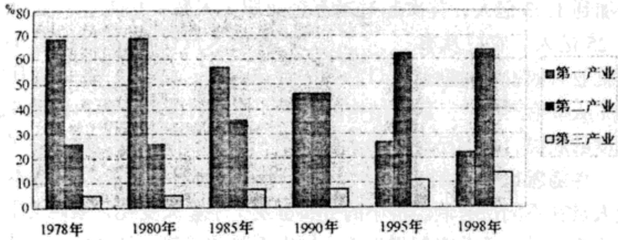


图 7－3　1978—1998 年农村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1978—1995 年数据见《光明日报》1998 年 12 月 13 日；1998 年数据见段应碧：《伟大的历史性巨变》，学习出版社 1999 年版。

来实行的农村单一集体公有的所有制结构被打破，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 30 年里，我国农村逐步形成的单一公有的所有制结构，不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严重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推进的过程，也正是这一僵化的所有制格局逐步被打破的过程。80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确立，使广大农民能够积累属于个人的经营性资产，以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为前提的"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实现了家庭经济分散经营和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合理结合，从而使农民的劳动联合和农民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也使农村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90 年代，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继续推进农村所有制改革。这些政策包括：允许农产继承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进行有偿转让；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采取转包、入股等多种形式办家庭农场、合作农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荒山、荒地、荒滩、荒水的使用权可以进行拍卖；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可以改组为股份制企业和转制为合伙和私营企业。这些措施不仅标志着农村所有制改革的深化，而且也标志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农村所有制结构基本形成。新的所有制结构使农村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增强了活力，也使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还涌现了合作经济、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经济、承包经济及中外和港澳台合作、合资经济等多种新的经济形式和经营形式。新型所有制结构更加适应我国农村的不同地区差异较大的生产力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就业结构的变化

同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相适应，我国农村就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被完全禁锢在土地上不能流动，基本上都是从事第一产业劳动，而且主要是从事种植业的劳动。1978 年，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 90%左右。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1993 年，乡镇集

体企业职工增加到1.23亿人，首次超过国有企业职工人数。1998年，全部乡镇企业职工已增加到1.25亿人。农村从事一、二、三产业的人员比例演变为70.1∶18.1∶11.9，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近30%，已达到1.38亿，其中60%从事第二产业，40%从事第三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使农村劳动者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他们已经成为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等多种行业的劳动者的综合性劳动群体。伴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农村就业人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的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上升，而公有制经济就业比重下降的趋势。从乡镇企业内部就业结构看，1990年，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占乡镇企业中个体、私营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总和的比重为14.8%，而集体企业比重则为85.2%。到1998年，前者上升为38.1%，后者下降为61.9%。

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低生产效率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向较高生产效率的产业部门的自由流动，是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但改革开放前的长时期内，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我国农村长期积存的剩余劳动力，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而实现相应的转移。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使生产要素在行业与区域间的流动成为大势所趋，农村劳动力转移才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给我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

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较长时期内，为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国家实行以城市为中心、以重工业为发展重点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借助行政命令，禁止城乡人口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了种种限制，千千万万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几乎没有择业自由，农村劳动力长期过剩。而同期的农村人口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有效控制。1949—1978年农村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07%。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在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阻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自70年代末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开始向非农部门转移。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不断增加，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归纳为“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种形式。

所谓“离土不离乡”是指农民不离开自己的家乡而就地完成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这种形式的劳动力转移，绝大部分是通过就业于本地的乡镇企业实现的，是改革开放前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乡镇企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1978年，乡镇集体企业从业人数仅有2827万人。10年后的1988年，便增加到了9545万人，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17.6%；1996年，是乡镇企业发展历史上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一年，从业人数高达1.35亿人，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28.8%。由于结构调整等原因，1997年、1998年两年乡镇企业，特别是乡

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数出现大幅度下降，但仍保持超过 1.25 亿人的水平，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 27%，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参见图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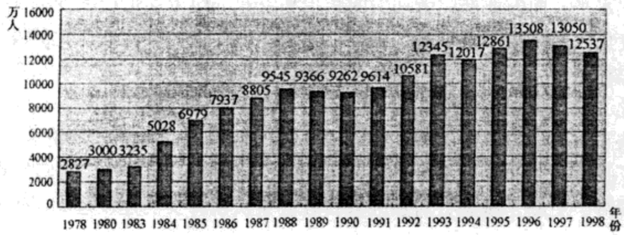


图 7－4　1978—1998 年我国农村乡镇从业人员变动情况

注：1978—1989 年数据为乡镇集体企业从业人员数；1990—1998 年数据为乡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与个体企业从业人员总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所谓“离土又离乡”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自己的家乡，跨区间完成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70 年代起，农村已经出现农民陆续外出打工的现象，但当时人数很少，且比较分散。由于国家政策不允许，这部分人经常被冠之以“盲流”强行逐回原籍。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基本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形成大量就业机会，农民外出人数骤增。1984 年，国家推出有关政策，准许自筹资金、自理口粮、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服务的农民及其家属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此举使我国自 1958 年以来长达 26 年严禁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第一次出现了松动，农民外出打工发展势头越来越迅猛，流动的区间跨度也越来越大，由最初的多在本县或邻县，发展到跨出县界、省界的更大范围。

进入 90 年代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间流动集中地发展成为以大城市为进军目标的“民工潮”，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二次高潮。“民工潮”最初出现在经济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此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进城农民凭借自己体力或一技之长，服务于大城市中比较苦累的行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的必要补充，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缺乏规划管理、盲目涌人的“民工潮”也给大城市的环境、住房、治安等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何加强管理和引导这支外来就业大军，成为当前各城市亟待探索解决的课题。据有关部门估算，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数量约在 1 亿人左右，其中县内流动的占 30.7%，省内流动的占 33.1%，跨省流动的占 36.2%。从地区流向上看，东部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部分被当地乡镇企业吸纳，只有一小部分有技能和资金的劳动力则到大城市或中西部地区寻求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则是小部分被当地乡镇企业吸收外，大部分流向大城市和东部地区。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从劳

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部门转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二、三产业部门，为二、三产业增加了劳动力补给，推动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提高了农村的工业化水平；而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为农业生产实现适度集中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部门，使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占农村就业总数的比重下降，优化了我国农村的就业结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集中，促进了中小城镇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广大农民通过从事新的工作，经济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而且，在东奔西走之中，他们逐渐适应了市场，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对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四节　科教兴农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根据我国国情的实际，要实现农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在继续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的基础上，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最根本的环节。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农业科技的创新与应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过程中，发展农业科技，倡导科教兴农，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科教兴农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学科齐全的农业教育体系、完整的农业化学工业和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已经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全国形成了包括基础研究、开发研究、技术推广在内的农业科技体系和省、市、县、乡四级农技推广网络。农科教相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科技进步正在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里，我国曾在不同时期有重点地进行了农业技术改造，并取得了很大成就：(1) 农用机械和化肥施用量的显著增加。1952 年我国拥有的农用大中型拖拉机的数量仅有 1307 台，到 1980 年已发展到 745000 台，机耕面积也由 1952 年的 204 万亩增加到 61485.7 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40%多。排灌动力机械，1952 年只有 12.8 万马力，1980 年发展到 7464.5 万马力。 (2) 灌溉面积增加。由 1952 年的 29938.5 万亩增加到 1980 年的 67332 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45%。(3) 带有新技术的农业物质投入水平提高。化肥施用量大幅度上升，1952 年只有 7.8 万吨，平均每亩耕地施用不到 1 斤，1980 年增加到 1269 万吨，平均每亩耕地施用 17 斤，同时化肥施用结构也由以前的以氮为主转向氮、磷、钾并重的格局。微量元素在农业中的推广和应用提高了作物的产出水平。农药、除草剂、农膜等投入品的运用也提高很快。(4) 良种的培育

和推广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以占中国粮食作物面积和产量40%左右的水稻为例，50年代主要是推广地方良种，平均亩产提高到130—180公斤；60年代开始推广矮杆良种并进行一代更新，亩产平均跃至200—280公斤。同时，建立了国家和地方两级管理的多学科的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各种民办专业技术协会在试验、示范、培训、推广科技成果和适用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经济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后，要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的开发、推广和应用，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年中，国家坚持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相结合、高新技术同常规技术相结合、自主研究同技术引进相结合、科学研究同成果推广相结合的原则，在动植物品种选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和农产品储运加工技术等方面不断推出大型科技开发与推广工程，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

首先，以良种选育和推广以及栽培养殖技术为中心的农业科技取得巨大进步。1986年开始，由农业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了“丰收计划”。“丰收计划”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为目标，通过将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组装配套，在全国大范围大面积推广应用，靠科技开发潜力，提高单产，促进农牧渔业全面增产增收。截止1996年，“丰收计划”实施第一个十年里，中央财政支持丰收计划专项资金3.35亿元，各地配套资金40多亿元，配套专项化肥2200万吨、农膜28万吨、农药30万吨，参与工程的科技人员达90万人次，推广科技项目257项，其中粮棉油良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面积达13亿多亩次，科学养殖畜禽4亿多头（只）、水产养殖面积560万亩。“丰收计划”，大幅度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累计增产粮食310亿公斤，皮棉8亿公斤，油料37亿公斤，肉蛋及水产品14.6亿公斤，新增产值400多亿元，投入产出比达到1：8以上。1997年，国家又提出“丰收计划”下一个10年目标：组织推广2000项农牧渔业先进技术，主要作物和栽培技术推广面积20亿亩次以上；主要农牧渔品种及技术更新1至2次；培训农民3.5亿人次；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通过实施“丰收计划”获得的主要农产品增产量，要力争达到全国增产总量的20%以上。目前，新一轮的“丰收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1996年国家又启动了推广优质良种的“种子工程”，当年，全国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统一耕种面积达5600万公顷，使全国主要农作物统一耕种率较上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全国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种子包衣面积达1233.3万公顷，比上年扩大1.57倍；全国粮食增产中，“种子工程”增产了35亿公斤以上，贡献份额在26%以上。“种子工程”的实施使优良品种得到大规模的统一供应，对农业增产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以集约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为核心、多产业综合发展的科技开发有了很大突破。实施“丰收计划”的同时，1986年开始，国家又在全国组织实施了“星火计划”。星火计划以培育支柱产业和区域综合开发为重点，引导发展规模经济，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科技保障。内容包括了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农用化工、农用新型装备、轻工纺织、农村建材、为大工业配套、环保、矿产资源开发等十几个领域的综合开

发利用技术。到1996年，在实施的第一个十年里，星火计划培育了上百个产值超亿元、利税超千万的星火企业、企业集团和区域性支柱产业；共建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127个和星火区域性支柱产业217个，使乡镇企业相对集中连片发展；在全国建立了40个国家级星火培训基地，4000多个星火培训网点，10年累计培训各类农村适用技术、管理人员3600多万人次，上百万科技人员献身星火计划，送科技到农村。1996年9月国家科委发布《星火计划"九五"发展纲要》，确定了"九五"期间"星火计划"主要任务是：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中心，以现有区域产业、星火技术密集区为基础，进一步强化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资源集中配置，发挥综合效益，重点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星火区域性支柱产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拓宽实施地域范围和产业领域，加大组织和实施"星火计划西进示范工程"的力度，引导和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推进东西结合，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保护并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星火计划"正以更为迅猛的气势推进着。星火计划发展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主导产业，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小城镇建设，使一大批先进适用的星火技术和产品在中西部地区安家落户，有力地推动了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星火计划带来的科技贡献率和综合效益明显高于同类地区和同类行业，对周围及同类地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示范、引导和辐射作用，其对农村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

再次，农村科技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取得重大成就。国家大力倡导科技下乡、教育下乡，广大农业科技人员面向农业、面向农村、面向农民、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1988年，国家教委正式部署实施"燎原计划"。这是一项旨在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计划，主要任务是通过建设示范乡、示范县，扫除文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所有学校配备劳动基地；建立劳动技术教育的制度和措施；所在县办好一所能起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技术学校；乡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村发展农民夜校；普遍对在乡初、高中毕业乃至小学毕业生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当地生产技术、人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燎原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在充分发挥了农村各级各类学校智力、技术的相对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了与当地建设密切结合的实用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教育，培养大批新型的农村建设者。1996年底，全国燎原计划的示范乡有近万个，推广各种实用技术11000项，新增产值13.78亿元。截止1995年，普通高等农村院校已达90所，其中农业类48所，林业类10所，水产类4所，农垦类5所，水利类20所，气象类3所；中等农村专业学校达525所，涵盖林业、水利电力、农垦、农机、气象等专业。"八五"期间，全国高等农村院校共为国家输送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20.2万人，研究生6991人，通过函授和夜大，输送毕业生10万余人。涌现了一批"科教兴农"的典型，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科技、教育和文化的发展。目前在农村工作的专业科技人员达21.5万人，并涌现出80万人的农民科技人员和712万个科技示范户。科教兴农正在造就一代新型农民。

另外，我国在水利、林业、气象、信息技术等方面也都实施了很多重大科技工程。

农村科技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科技进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1998年，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42%。其中，科技进步在玉米、水稻、小麦增产中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51.6%、73%、40.6%，仅良种更新和推广一项技术的贡献率达到31.8%、20%。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我国农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它的确立，实现了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制的农业生产潜力充分得到了发挥，推动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数量多、规模小且分散孤立的农户家庭经营体制本身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无力进行设备投资和技术更新、难以进入市场、对市场波动的承受力很差等等。在当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要克服家庭经营的缺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业，就必须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农业经营方式不断进步，以提高综合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运动正日渐盛行，方兴未艾。

农业产业化经营

又称“农业一体化”或“农业综合经营”，是“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农业经营方式的简称。它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龙头”组织（公司企业、专业市场、合作经济组织、“产学研”联合体等）为依托，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按照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内外贸、经科教一体化经营的原则，对农业的主导产业、主导产品，实行多层次、多元化的优化组织，发展特色鲜明、具有竞争优势的带动型产业实体，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经营的有机结合，从而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引导相对封闭的农户进入开放的市场体系的有效组织形式，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是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立发展的基本运转机制，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质就是通过市场中介组织的联结作用，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与从事农产品加工、运销、服务等的企业或组织结成多元参与、自愿连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联合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农产品的生产、储存、加工、销售联为一体，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和高度商品化。这种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的农业经营方式，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发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势，又可弥补农户经营的先天性缺陷，实现了农业的专业化与市场化经营，从而

可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80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逐步扩大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极大地缩小了政府计划调节的份额，绝大多数产品的市场价格和购销都已经放开，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条件。进入90年代后，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我国农村开始出现。一些地区相继进行了农业经营创新的大胆探索，创造了形式多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199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九五"时期和今年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中指出：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把农户生产与国内外市场连接起来，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紧密结合，是我国农业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向商品化、专业化和现代化转变的重要途径。在中央精神的推动下，我国各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差异较大，主导产业或产品也各有不同，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多种多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按组织类型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1. 龙头企业带动型（即公司加农户型）。这一类型是指以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龙头，用合同契约或产权联结等形式，带动生产基地和农民从事专业生产的产业化组织类型。龙头企业一头连接国内外市场，一头连接千家万户，形成农工贸一体化、产加（工）销一条龙。其运作过程是：龙头企业按照市场需求，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建立生产基地，提供产前、产中、产后配套服务（配套服务不由龙头企业全包）；农民按合同生产、交售，企业按合同收购、加工，把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利润在各个环节合理分配，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经济共同体。龙头企业主要是指那些规模较大，与农业联系紧密，辐射带动面大、经营机制上较为灵活的企业。龙头企业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合作经济组织，或市场中介组织，比如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等。龙头企业是此种类型产业化的关键部位，因而它一般出现在主导产业的关键环节和关键产品上，以便带动整个产业链。如粮食、畜牧业产业组织，以大型食品加工企业为龙头，而果品、蔬菜、水产品等活鲜产品，在分类包装、防腐、保鲜初级加工环节建龙头企业。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创造条件吸引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这些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大型工商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和市场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与农业嫁接，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在高起点、高水平上运行。

在沿海地区和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山东、江苏、福建、广东等省，龙头企业带动型成为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类型。这些地区经济水平发展较高，企业规模也较大，在所有制方面，国有企业、集体（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并存，具有形成一体化的坚实基础。特别是沿海地区，多年来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多形式地推进农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扩大出口创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引进急需资金，先进的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扩大农副产品交换空间，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形成了以外向型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90年代中期内地省区也建立了以外向型企业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1997年，农业部对全国11824个有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调查显示，龙头企业带动型占调查总数的比重为45%。

2. 中介组织带动型。这是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含农民专业协会）等，通过联结带动作用，推动农副产品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的产业化组织类型。中介组织大都具有民办性质，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中介组织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等途径形成经济实体，向农民提供生产、经营、物质、技术、信息等服务，在自愿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加快产业化经营的步伐。中介组织带动型约占29%。

3. 专业市场带动型。这是指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带动主导产业，连接千家万户，实施产销一条龙经营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大型专业市场具有物资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产品信息中心等功能，是供需双方见面的纽带和窗口，并为农民生产、企业加工和经营决策提供依据。专业市场带动型约占13%。

除上述三种主要类型外，还有一部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科研教育单位，通过合同契约关系为农户专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些类型约占13%左右。

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农户与各参与方的利益关系，使产加销各环节、农工贸各方面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共同发展。特别是要使农户能够平等分享加工、销售环节的合理利润。这方面，各地创造了多样化的利益分配机制。有的采取把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按一定比例和数额返还给农户的办法；有的采取价格优惠、预付定金、提供贴息贷款或赊销贷款等办法；有的企业设立了风险保障基金；有的地方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财产为纽带把企业与农户真正联结起来。一些地区各种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协会按照互助合作原则运作，实行“民办、民管、民受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种类型的利益分配机制，有效地协调了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关系，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真正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巨大的发展活力。

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和帮助小农户进入大市场，克服了家庭经营规模不经济的缺陷，以市场为纽带产生适当集中，形成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形成农业产业系统内部利益补偿机制，促进农业经营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和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提高，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延长了农业产业链，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现了市场化原则，培育了健康的市场交易关系，是农业经营方式、产销制度和利益分享机制的整体创新。它不受行政区域、行业部门、所有制和旧体制关系的限制，是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第八章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它表明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在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5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第一节　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我国是世界上城市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城镇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3000—2000年期间，中国就有了城市的雏形。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就产生了有繁荣市场的大型城市；目前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在公元100年左右就已建立或者有了雏形。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近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束缚，近代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到1949年除了东部沿海若干帝国主义势力盘踞的大城市和内地个别的经济中心得到畸形发展以外，绝大多数城镇都相当破败，经济衰微。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才开始了真正的城市化进程。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从1949年至1978年；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现在。在这两个阶段，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一、改革开放前城市发展的进程

（一）1949—1957年城市化正常发展时期

1949年以前，中国设市城市69个（其中9个在台湾），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只有16个。在这些城市中，工业很少，除了商业和饮食等服务业外，大部分只有少量轻工业，甚至只有一些手工业。城市内部，较为近代化的公用设施，都集中在少数“富贵之区”，广大劳动人民被挤在低洼、狭窄、不卫生的地区，房屋矮小破烂，没有供水排污设施，更没有像学校、医院、剧院和公园等教育、卫生与娱乐设施。从区域分布上看，大多数城市偏集于沿海地区，内地城市很少，规模也小。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城市工作方针。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2年，各城市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整

顿工作，迅速取缔赌场、妓院、烟馆，收容改造乞丐、流氓、小偷、妓女，城市社会秩序大为好转。与此同时，国家努力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建设，改善城市劳动人民的居住环境。人民政府通过以工代赈和组织居民义务劳动等方式，修建排水管沟，清除垃圾，初步改变了全国城市的环境面貌。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城市也获得了较快发展，市的建制相应增加。到 1952 年底，全国大陆设市城市已由 1949 年的 134 个上升至 160 个。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财力、物力和技术人员的严重不足，城市建设只能围绕着工业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为此，在 1954 年 6 月召开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上，确定除首都北京特殊重要外，对全国其它城市重新进行分类排队，对不同城市采取不同的建设方针。第一类城市是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安排较多的新工业城市。它们包括太原、包头、兰州、西安、武汉、大同、成都和洛阳。第二类城市是扩建城市。这些城市包括鞍山、沈阳、吉林、长春、哈尔滨、抚顺、富拉尔基、石家庄、上海、重庆、广州、郑州、株洲、青岛、本溪、邯郸、湛江、天津、佳木斯、大连和鹤岗等。第三类城市是可以局部扩建的城市。这些城市包括南京、济南、杭州、昆明、唐山、长沙、南昌、贵阳、南宁、呼和浩特、张家口、西宁、银川、宝鸡等，这些城市新建了工厂，但项目不多，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开展，局部进行改建或扩建，城市设施着重进行维修养护，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第四类是一般中小城市。这些城市没有安排限额以上的工业项目，城市建设基本上是进行维护工作，加强城市卫生管理，并根据可能对道路等加以调整。随着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这个时期在中国大陆辽阔的国土上，特别是在大规模建设工业企业的京广路沿线及京广路以西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工业城市、新的工业区和工人镇。许多过去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已逐步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如哈尔滨、长春、包头、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武汉、湘潭、重庆、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共新建了 6 个城市，大规模扩建了 20 个城市，一般扩建了 74 个城市。

1949—1957 年，城镇人口从 5765 万增加到 9949 万，增加了 4184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523 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为 7%，城市化水平由 10.6%上升到 15.4%，上升了 4.8 个百分点，年均增长 0.53 个百分点。这个时期的城镇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约占 60.6%，自然增长为辅，约占 39.4%，是建国以来城镇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957 年，城市的数量增加到 176 个，每年平均新增 5 个城市。（参见表 8－1）

表 8－1　　1949—1957 年城市化水平　　单位：万人

年份	全国总人口	城镇人口	城市化水平%
1949	54167	5765	10.6
1950	55196	6169	11.2
1951	56300	6632	11.8
1952	57482	7163	12.5
1953	58796	7826	13.3

年份	全国总人口	城镇人口	城市化水平%
1954	60266	8249	13.7
1955	61465	8285	13.5
1956	62828	9185	14.6
1957	64653	9949	15.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1958—1965年城市化发展波动时期

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发展波动起伏最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起大落的时期。1958年，在“用城市建设的大跃进来适应工业建设的大跃进”的号召下，全国2195个城镇中，普遍安排了工业建设项目，使城镇人口骤增。1958—1960年底，城镇人口增加13073万人。全国设市城市数，也由1957年底的177个增加到1961年的208个，1961年成为1949年以来12。年中设市城市增加最多的一年。一些大城市规划和建设了卫星城，北京建设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工程。城市住房和市政公用设施增长速度也加快了。但是在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城市和城镇人口过分膨胀，均远远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此后城市建设投资的比例被迫大幅度降低了。导致市政公用设施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城市供排水出现问题，公共交通困难，防洪设施标准低，居民住房紧张。从1961年6月至1963年6月，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全国减少职工1887万人，共减少城镇人口1061万人；到1964年底，建制市由1961年底的208个减少到169个。全国撤销了39个市的市建制。它们是：通化、汉沽、宣化、榆次、侯马、朝阳、青铜峡、吴忠、哈密、临沂、聊城、荷泽、临清、泰安、屯溪、湖州、嘉兴、绍兴、金华、新余、岳阳、冷水滩、郴州、洪江、津市、娄底、安顺、六枝、都匀、大理、巴彦高勒、安达、白银、冷湖、乌兰浩特、大柴旦、东江、冷江、安江。此间全国城市建设与全国经济形势同步出现大的起伏。从1963年起，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加强了城市建设的管理工作，并且开辟了城市建设和维修资金的来源渠道：将城市的工商业附加税，公用事业附加税和房地产税，统一划为市财政，用于城市的公用事业、公共设施以及房屋的维修和保养；城市房屋的租金也实行专款专用。城市建设投资方逐步回升。1965年全国城市数比1957年减少8个，建制镇减少近一半。这一时期城镇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2.5%，城市化水平提高很缓慢。（参见表8－2）

表8－2　　1958—1965年城市化水平　　单位：万人

年份	全国总人口	城镇人口	城市化水平%
1958	65994	10721	16.2
1959	67207	12371	18.4
1960	66207	13073	19.7

年份	全国总人口	城镇人口	城市化水平%
1961	65859	12707	19.3
1962	67295	11659	17.3
1963	69172	11646	16.8
1964	70499	12950	18.4
1965	72538	13045	18.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1966—1978年城市化发展停滞时期

"文化大革命"严重地阻滞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进程。1966年—1971年，城市建设工作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国家主管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工业机构停止了工作，各城市相继撤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机构，下放工作人员。由此造成乱拆乱建，破坏园林文物，挤占私人住房。由于工厂避开城市进山进洞，城市建设投资的比例从1963—1965年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9%猛减为1.8%。典型者如陕西省1967—1969年间不列城市建设投资，以为降低城市设施标准，就可以消灭城乡差别。这种落后、倒退的错误指导思想，给城市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危害。虽然国家从1971年起开始恢复城市建设机构和复苏城市规划工作，从1973年起重新规定了城市维护费用的来源，但是由于长期投资过少，欠账太多，城市仍积累了大量问题。一方面大批知青、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城镇人口大量迁出，另一方面通过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转变身份，城市化进程基本停滞。70年代以后城镇人口略有增长，但主要是自然增长。1966—1978年，全国城镇人口由13313万人增加到17245万人，年均增长327万人，城市化水平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又有所上升的波动过程，但基本上保持在17%以上，最后仍达到17.9%。在多数年份中，城镇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人口增长率，有几年城镇人口甚至是负增长。在城市新增人口中，自然增长所占比重达77.3%，机械增长仅占22.7%。（参见表8－3）

二、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城市建设与发展

（一）城市发展的基本成就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新的发展道路，也给我国城市带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城市建设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表 8－3　　1966—1978 年城市化水平　　单位：万人

年份	全国人口	城镇人口	城市化水平％
1966	74542	13313	17.9
1967	76368	13548	17.7
1968	78534	13838	17.6
1969	80671	14117	17.5
1970	82992	14424	17.4
1971	85229	14711	17.3
1972	87177	14935	17.1
1973	89211	15345	17.2
1974	90859	15595	17.2
1975	92420	16030	17.3
1976	93717	16341	17.4
1977	94974	16669	17.6
1978	96259	17245	17.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 城市数量不断增长。

20 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展开和我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进程，在原有城市得到进一步扩展，其作为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不断加强的同时，主要以原有县、镇所在地为基础，集中了众多的企业、生产要素与经营设施，经济实力较强，并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地区与地带。适应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额要求，国务院分别于 1984 年 10 月和 1986 年 4 月颁布了新的设镇规定和设市标准，使小城镇迅速增加，一大批县、镇进入了可以设市的范围，从而形成了地级市数量稳步上升，县级市数量快速增长的格局。在这期间，城市数量由 1978 年的 193 个发展到 1998 年的 668 个。其中，1979—1988 年，增加了 241 个，相当于前 30 年城市增加量的 4 倍。1989—1998 年又增加了 234 个。城市数量迅速增加的趋势，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参见图 8－1)

从城市规模上看，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增加最快，由 93 个增加到 378 个，增加了 3 倍多；20—5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组的增加次之，由 60 个增加到 205 个，增加了近 2.5 倍；50—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组增加相对较慢，特大城市增加了 24 个，大城市增加了 21 个。这说明，改革开放 20 年来农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后，广大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极大地推进，也表明我国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已经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原来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改革开放先行的优势，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比中部、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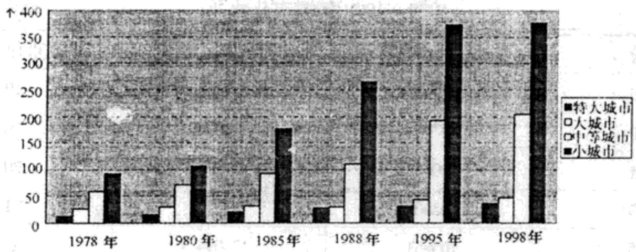


图 8－1　1978—1998 年各类城市数量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地区为快。东部地区城市由 69 个增加到 300 个，增加了 231 个，增加了 3.35 倍，其城市数量占全国城市数量的比重由 38.5%提高到 44.9%，提高了 6.4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城市由 84 个增加到 247 个，增加了 163 个，增加了 1.94 倍，其城市数量占全国城市数量的比重由 43.5%下降到 37%，下降了 6.4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市由 40 个增加到 121 个，增加了 81 个，增加了 2.03 倍，其城市数量占全国城市数量的比重由 20.7%下降到 18.1%，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这使东部在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作为中心城市的影响和辐射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整个地区的城市化速度也大大加快。因此，城市化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速度与效益的区域优势。（参见表 8－4）

表 8－4　　1978—1998 年各地区城市变动情况　　单位：个

年份	城市总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市数	占比%	城市数	占比%	城市数	占比%
1978	193	69	38.5	84	43.5	40	20.7
1980	223	78	35.0	100	44.8	45	20.2
1985	324	113	34.9	133	41.0	78	24.1
1988	434	162	37.3	181	41.7	91	21.0
1995	640	234	36.6	290	45.3	116	18.1
1998	668	300	44.9	247	37.0	121	18.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 城镇人口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迅速。1979—1998 年，我国城镇人口从 1.84 亿人增加到 3.79 亿人，增长了 1.05 倍，城市化水平由 19%提高到 30.4%，提高了 11.4 个百分点。（参见表 8－5）

表 8－5　　1979—1998 年城市化水平　　单位：万人

年份	全国总人口	城镇人口	城市化水平%
1979	97542	18495	19.0
1980	98705	19140	19.4
1981	100072	20171	20.2
1983	103008	22274	21.6
1985	105851	25094	23.0
1987	109300	27674	25.3
1989	112704	29540	26.2
1990	114333	30191	26.4
1992	117171	32372	27.6
1993	118517	33351	28.1
1994	119850	34301	28.6
1995	121121	35174	29.0
1996	122389	35950	29.4
1997	123646	36989	29.9
1998	124810	37942	30.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城市的人口规模来看，中等城市增长最快，基本上体现了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政策。但这一时期，虽然国家加强了对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由于经济相对发达、政治与文化比较集中的原因，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仍表现出较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较快。从区域分布上看，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城镇人口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造成的。

3. 城市非农业人口比重迅速提高。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 8%—10% 之间徘徊。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到 1998 年，这一比重便提高到了 18%，提高近 10 个百分点。

由于我国对不同规模的城市所采取的人口政策有差别，不同规模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表现出较大的差异。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及 1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在 80 年代下降趋势十分明显，但到 90 年代以来又出现回升。20—5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则一直呈平稳的上升趋势。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所占比重在 80 年代迅速上升，进入 90 年代后又进入稳

步发展状态。

4. 城市区域不断扩张。

改革开放后，城市市区区域扩张十分迅速。1984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重仅为7.6%，到1996年这一比重便提高到18%。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广州和哈尔滨等特大城市周围的许多县区，都已建成城市新区。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加快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5. 城市综合实力大大增强。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城市产业结构、城镇体系、空间布局、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朝着协调、合理、健全的方向发展。

首先，城市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高速增长。1988—1996年，我国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为18%。其中，1992—1994年的3年间，年均增幅超过28%。1997年，我国226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市区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有34个，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万元以上的城市有109个。与此同时，城市人均GDP也保持了平稳的增长。1988—1996年，我国城市市区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8.5%。

其次，城市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育，城市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信息、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各种中介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的新的特征。1988—1996年，我国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9.3%，其占城市GDP的比重从1988年的28.6%上升到37.2%，在非农业人口2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这一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9.3%。目前，第三产业已成为城市产业结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心作用的发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1998年末，我国城市道路长度已达14.52万公里，面积163993万平方米，人均拥有8.3平方米；运营公共汽（电）车18.90万辆，平均每万城市人口拥有8.6辆，出租车已经普及到每一个城市。城市供电、供水、供气、供热增长很快。1998年末，居民年人均生活用电101.8千瓦时，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0%，燃气普及率达到78.8%，集中供热面积86540万平方米。城市电话机总数达7963万部，无线寻呼用户达3908万户，公用电话259.5万部。

第二节　新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政策

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与国家的城市化政策紧密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多有变动。与此相适应，国家的城市化政策在不同时期也有相当大的差别。

一、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政策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次中央委员会对城市工作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工作方针。新中国建立以后，城市建设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宗旨。这一方针对于迅速恢复城市经济，进行工业化建设，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城市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了城市建设座谈会，提出了“有重点地进行城市建设”的方针。要求根据国家的长期计划，分别不同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新建和改建，加强规划设计工作，加强统一领导，克服盲目性，以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以后，为了配合工业建设，中央加强了城市建设的统一领导，从上到下建立、健全了管理机构，制订了城市建设的工作方针，调整了市、镇建制。1955年颁布了市镇设置标准，城镇设置必须遵照标准，经上级机关审批。其后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修订了市镇设置标准，但市镇设置要经过层层批准的规定没有变。建国初期，通过发展工业生产，重点开发内地中、小城市，并不同程度地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特别是与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差距。

1958—1961年的“大跃进”时期，城镇的发展盲目加快，短短几年新设置了33个市，新设建制镇175个。但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造成资源巨大浪费，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其后国家为减轻城镇人口负担，不得不提高了市镇设置标准。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1964年国家规定建制镇最低常住人口规模从2000人提高到3000人（或250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最低比重从50%提高到70%（或85%）。按照这个标准，对全国新建的市镇进行了大幅度压缩。

城镇的发展与劳动就业政策、人口迁移政策紧密相关。在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对劳动力的就业和需求，进行有计划的调配。建国初，中国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安置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400万失业大军。自1951年起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及大中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安排就业。1955年后国家明文规定由劳动部门对城镇劳动力进行有计划的统一分配和调配，这是当时城镇发展和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

在城乡人口迁移方面，“一五”计划期间城镇人口增长量中，56%是迁移增长，2700万人口中约有1500万来自农村。尽管当时城市发展较快，城镇人口增长率较高，但由于工农业发展较快，城市发展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基本上与国民经济相适应，因此，对乡村—城市的人口流动没有采取限制措施。5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了城市户籍管理制度，1958年初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农村人口只有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户口管理机构准予迁入的证明，方能迁入城市。1964年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的规定》，再次强调严格控制城镇人口。这些政策在一定时期有利于稳定城乡社会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却又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

生产力布局政策是与城市化政策联系紧密的一项重要政策。我国在建国头三年的生产力布局重点是恢复和发挥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作用。"一五"计划期间，在继续合理利用东北和上海等工业基地的同时，通过重点发展内地工业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力图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国家对新工业区的建设强调依托老城镇，或靠近资源开发地，尽量利用方便的交通条件。国家对城市建设采取重点发展政策，强调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项目的新兴城市，使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配套、协调发展。1965—1978年，"三线"建设完全采取了非城市化的发展方针。工厂选址，原则上不接近城镇，尽可能地"靠山、分散、隐蔽"；企业所需原料、燃料和机器设备零、部件等生产资料绝大部分靠相距较远的原有工业城市供应，所以这些企业的建设与生产成本都很高。这些企业职工的生活供应和服务，也只能全部由企业负责，从而加重了企业负担，既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也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的城市疏散了大批企业和人员，综合实力受到削弱。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1976年以后，城市建设出现新的局面。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整顿城市的任务；就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认真抓好城市规划工作等任务作了规定。决定从1979年起，在47个大中城市及旧城改造任务大的城市试行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成5%，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此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住宅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政策

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建成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有相当技术水平和规模的现代工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这一基础之上，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原有城市化政策作了调整，颁布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促进我国城市的发展和推进城市化进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城市化趋势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成为解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同时为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 市镇建制政策。

1978年底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崛起，小城镇发展呈现出新格局。与此同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以城市为重点，城市的中心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于1984年10月和1986年4月，分别批准实施新的设镇规定和设市标准，开始实施新的市镇建制政策。

新的标准较之以前的老标准有了很大的改革和创新。国务院批转的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的报告》除恢复县级政府所在地都设镇的规定外，还规定总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或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区、过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

2000人，确有必要，都可建镇。

关于设市，1986年国务院批转的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中作出了如下规定：(1) 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包括常住的务工、经商人员和常驻的机关与部队的人员），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亿元，已成为地方经济中心的镇都可设市建制，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工矿或科研基地，交通枢纽和边境口岸等城镇可放宽条件。(2) 总人口50万人以下，县驻地非农业人口10万人以上，常驻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过40%，年国民生产总值3亿元以上的县，可设市撤县。在大县（总人口超过55万），非农业人口要过12万，年国民生产总值超4亿元，才可设市撤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区、盟、自治州的驻地还可放宽设市标准。(3) 准予辖县的城市是：市区非农业人口超25万，年国民生产总值超10亿元，已成为地区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中心，并对周围各县有较强辐射力和吸引力的城市。

新的标准使小城镇迅速增加，使一大批县、镇进入了可以设市的范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发展的进程。全国建制镇从1978年的2796个增加到1986年底的9755个，增幅为248.9%；全国设市的城市由1978年的193个发展到1986年底的353个，增幅为82.9%。小城镇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小城镇的建设积累了资金。很多小城镇加强了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过去破旧的城镇面貌逐步得到改变。如湖北省仅在1981—1982年两年中，用于小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和住宅建设的投资达33300万元，共修建住宅227万平方米，新建或扩建自来水厂73个，新修道路506条、625公里。

90年代以后，适应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的要求，同时针对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市镇建制政策又有进一步的改善。1993年5月，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对1986年国务院批准试行的设市标准作了调整。报告分别对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400人以上的县、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00—400人以上的县、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00人以下的县撤县设市（县级）、对自治州人民政府或地区（盟）行政公署驻地等特殊条件下的撤县设市（县级）的指标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报告还首次设置了建立地级市的标准：市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25万人以上，其中市政府驻地具有非农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20万人以上；工农总产值30亿元以上，其中工业产值占8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在25亿元以上；第三产业发达，产值超过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35%以上；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2亿元以上，已成为若干市县范围内中心城市的县级市。从总体上说，90年代以来的市镇建制标准与政策重在提高城镇建设的层次，促进城镇的发展从单纯追求数量扩展转向质量提高和实现规模经济。

2. 人口管理与迁移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对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旧的人口管理与迁移政策陆续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从80年代初起，国家有关部门先后解决了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干部家属、“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技工业职工家属和煤矿井下职工家属以及其它职工家属的“农转非”户口问题。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那些长期在

城镇务工、经商、有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在自理口粮的情况下迁入城镇落户。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要求，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各地分别制定了农民进镇落户的具体政策。1985年9月，我国首次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在户籍管理的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985年7月，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公民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的合法性。90年代初，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先后废除粮票，不再对人口流动有硬性限制，使曾经具有等级、身份意义的户籍开始模糊起来。从1993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终止粮票的流通，全面放开粮油市场价格。1996年7月1日，全国开始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户口管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渐走向规范化。1998年7月底，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放宽解决夫妻分居户口”等4个方面的政策内容。同年9月份，公安部就此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提出贯彻文件的实施意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于年内组织实施。此后，各地相继提出了实施措施，广州等市已开始试行。人口管理与迁移政策的调整，有力地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3. 市辖县的政策。

早在1958年，我国就开始实行市辖县的行政管理体制。但在当时，包括城市在内的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城市难以有效地带动农村，因此，在60年代中期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时，除了北京和上海市以及辽宁省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以外，这种行政体制基本上被撤销。1983年在城乡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市辖县”的管理体制重新得到推广。取消专区，市直辖县体制，密切了市与周围各县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城市有了更丰富的资源基础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则有了充分运用城市资金、技术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的便利。市县间优势互补，相互支援，有机联动的结果是形成城乡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升级的新格局。

市辖县体制下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但总的看来，它在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乡经济的联动与差别的缩小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收效也是明显的。

1986年，国家对设市标准作了新的规定，我国建制市的数量开始加快，一般每年增加20余个，其中1988年增加最多，达53个。至1998年底，县级市的数量已达437个。

4. 城市发展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大力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十分重视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与结构协调。1980年10月，国家建设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这一方针被国务院确立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情况，国家对这一方针作了适当的修正。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规划法》将城市化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建议，制订的国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又明确指出：“城市发展要坚持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有计划地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并使之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中央关于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的指导下，20年来我国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以空前的速度迅猛发展的同时，在总体布局上也逐步走向合理。改革开放前发展薄弱的小城镇与小城市建设发展很快。

与此同时，大中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展，且功能进一步向多样化增进。原有工业城市不断补充商业、金融业及文化等方面的功能；消费性城市则强化了产业功能。而特大城市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国际化功能明显增强。

5. 城市建设方针。

调整城市内部结构，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提高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服务工具的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所遵循的基本方针。根据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安排，20年来城市建设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二是积极推进城市住宅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作为城市建设核心环节的城市建设管理运营体制发生了重要转变，建设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即由主要由政府部门、由国有经济单位从事城市建设转向按照国家统一规划下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国有经济单位和非国有经济单位多方从事城市建设；建设资金也从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拨款与行政性贷款转向多渠道投融资，形成了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集资、利用外资等并存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格局。这种转变大大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扩大了城市建设的规模，从而使一些过去难以兴办的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得到迅速的建设。与此同时，城市建设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在建设资金筹措机制上还做了两方面的探索，一是把城市建设资金的筹措纳入法制轨道。1984年以后，随着利改税的实施，国家将从工商利润中提取5%的城市维护费的做法改变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以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为依据，设市城市的税率为7%，县城和镇的税率为5%。二是将市政设施的无偿使用变成有偿使用。从1984年起，各大中城市陆续实行排水设施的有偿使用政策，收到了筹资与节水的双重效果。一些城市还对部分桥梁和道路收取费用。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土地无偿使用，浪费土地资源的状况，实行城市土地资源有偿使用。依法收取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对市政设施的有偿使用，使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建设有了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城市建设和维护资金不足。相应地，也使各地区设市建市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第三节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态势

城市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兴起。随着各级城市的连片发展和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出现了城市带动周围城镇和乡村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格局，以特大城市和

大城市为中心、按“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市镇”的序列逐级带动发展、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基本形成。适应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城市体系的形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中心城市稳步发展，辐射力迅速提高

中心城市指的是人口在50万人以上、具有区域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发展国民经济和推进全国城市化方面，中心城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心城市实现了稳步发展，经济辐射能力迅速增强。

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间，尽管国家曾采取措施控制大城市的规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城市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1949年我国的大城市数量仅有12个，至1998年，我国大城市数量已达到85个，其中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有37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48个。50年间我国大城市增长了近6倍，成为世界上大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上海、北京已进入全世界十大城市行列。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市作用也逐步增强。从1983年起，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城市的地区经济合作，先后把大连、厦门、青岛等14个城市列为“计划单列城市”，拥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从而扩大了这些城市的经济自主权，提高了它们的经济地位和作为中心城市的作用。1986年，国家又进一步鼓励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以冲破部门和地区的分割与封锁，遵循“扬长避短，共同发展”的原则发展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促进了城市开放型体制的形成和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使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从城市的区域分布上看，位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明显多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且更加集中。目前，我国东部地区有大城市、特大城市42个，占全国大城市、特大城市总数的49%。而中部则有34个、西部有9个，分别占40%和11%。反过来，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看，大城市、特大城市所在地区，其经济发展状况往往明显好于其它地区。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现象，既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展示了大城市、特大城市对全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带动作用，这说明，我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已经成为各地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核心，成为这些地区的中心城市。

不断发展的中心城市，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正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心城市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基本的支撑作用。中心城市集中了社会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与经营设施，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具实力、结构最先进和合理的地区，代表着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中心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城市化推进的骨干力量。

其次，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中心城市积聚了大量的丰富的经济资源，这里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先进，信息充分，人才集中，市场容量

大，投资效益高，成为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主要聚集地，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都纷纷将总部等重要机构设在中心城市，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也都将其首脑机关设在中心城市。在81个中心城市中，省会或自治区首府占据了29个（省会城市只有海口和拉萨没有进入中心城市行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频繁与人口的集中，使中心城市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推动着全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中心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发展具有强劲的带动作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了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和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众多中小城市组成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心城市以其较强的凝聚力将区域内部的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强化了区域内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分工协作功能，使区域经济的有机性和协调性大大提高，从而带动了广大中小城市的发展。

第四，中心城市对全国其它地区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中心城市拥有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社会进步最快、城市化水平最高，在文教、卫生等方面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远远领先于全国，中心城市的居民享有全国最高水准的生活，成为其它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的理想，成为激励人们提高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的巨大动力。中心城市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示范效应，引导着全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总体上看，我国的中心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和广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带动力量，为全国的城市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最关键的最坚实的基础。

二、中小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分布密度不断提高

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在50万以下，是连结中心城市与农村的桥梁。中心城市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中小城市来传递其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辐射力，而广大农村地区与城市经济联系的建立也主要是通过中小城市实现的。因而发展中小城市是城市建设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城市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使全国的城市空间分布密度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存在人为地抑制发展的问题，许多已经够设市条件而又需要设市的城镇没有及时设市，中小城市增长缓慢，中小城市的数量明显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重新认识到了中小城市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采取各方面措施，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我国中小城市发展十分迅猛。“八五”期间，我国中小城市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等城市由117个发展到192个，增长52%；小城市由291个发展到373个，增长34%；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由59个发展到75个，增长29%。1998年中等城市又增加到205个；小城市则增加到378个。

与此同时，中小城镇人口增加的绝对量和增长幅度不断提高，使城市规模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大城市、大城镇人口比重开始下降，中小城市比重开始上升，在某

种程度上纠正了过去那种大城市发展过快，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偏差。从区域分布上看，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区。

中小城市的迅猛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中小城市是中心城市辐射力的载体，中心城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正是通过中小城市，有效传输给周边地区，带动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使中小城市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其次，中小城市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中小城市往往是所在区域的经济中心，直接与众多的小城镇和乡村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小城市的发展，推动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再次，中小城市推动了我国城市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小城市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口的增长，许多小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中等城市，而中等城市又逐渐发展成为大城市，从而形成系列化的逐级递进的良性城市增长机制。

总之，中小城市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丰富了我国的城市结构，为城市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小城镇大量涌现，城乡一体化纽带建立和加强

小城镇是我国城市体系的末端，是联结我国城乡社会的最基础、最直接的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为我国小城镇兴起创造了条件，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则是我国小城镇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加强了城市与乡村连结的纽带，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发展状态，有力地推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乡镇企业的崛起对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乡镇企业的集中连片发展，产生巨大的聚集带动效应，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乡镇企业在其产生之初，往往是出于搞活地方经济的目的，根据本地的生产条件，选择某一产业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国家开始注重引导乡镇企业逐步实现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区的集中，使乡镇企业的聚集度（在建制镇和工业小区相对集中连片发展的乡镇企业占全部乡镇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多数地区的乡镇企业的聚集度达到 20%左右，发展较快的部分省份、县市已经达到 40%左右。乡镇企业的连片发展，产生巨大的产业带动效应，既节约了建设成本，又提高了投资效率，使所在村镇上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得到较快的发展，逐步演变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城镇。同时，一批乡镇企业工业区和专业化市场也迅速变成了新型小城镇。如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村开辟了许多乡镇工业区，后来，这些工业区便逐步走向了城镇化；而在中西部地区，一些相对成型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专业产销市场，也逐步发展为新型小城镇。

2. 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使小城镇的人口迅速增加。大规模农业人口迁入小城镇，进一步促进了其它生产要素向小城镇的集中。

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脱离出来，向小城镇集中，在那里从事第二、三产业，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1984 年，国家推出有关政策，准许自筹资金、自理口粮、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服务的农民及其家属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此举改变了过去严禁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大批农民亦工亦农、亦农亦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到小城镇上定居。后来，随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集中趋势日趋增强。人口的集中又带动资金、技术等其它生产要素向小城镇进一步集中，增强了小城镇的发展潜力。

3.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小城镇提供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推动了小城镇的综合开发建设。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小城市镇的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不断发展的乡镇企业又陆续地为小城镇建设提供着资金支持。近年来，各地政府注重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加强政策引导，形成了城镇建设多元参与的投资机制。如通过“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政策，调动小城镇内部和四周的乡镇企业对小城镇建设投资的积极性。投资环境的改善，推动乡镇企业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生产和公用设施、居民住宅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促进了小城镇综合配套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城镇在地区的凝聚力。

80 年代，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我国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进入 90 年代后，乡镇企业开始了新一轮全面发展，小城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一座座面貌一新的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星罗棋布，生气勃勃。1985—1997 年，我国建制镇的数量由 7956 个增加到 18316 个，增加了 1.3 倍。（参见图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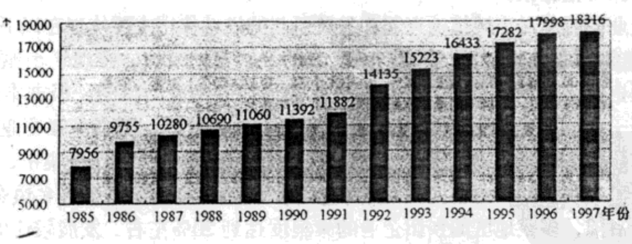


图 8－2 1985—1997 年我国建制镇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加强了城市与农村的经济联系，对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建立起了城市与乡村联结的桥梁。小城镇是农村之

首，城市之尾，它接受大中小城市的经济辐射，又是将这种辐射传递到广大乡村，是农村城市化的直接推动者。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加强了城乡连结的纽带，使各级城市的辐射能力能够迅速传递到乡村，推进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其次，小城镇的发展，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了自身发展的基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集聚，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小城镇的兴起则又反过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有重点地推动乡镇企业的集中和加强小城镇的建设，使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优化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目前，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为乡镇企业提供的新的发展机遇正日益显现出来。

再次，小城镇的发展，调整了农村内部的经济结构，农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基础。布局合理的大量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培育和发展了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进入小城镇，被吸纳到第二、三产业中，进一步推动了这些产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大大改善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同时，小城镇的发展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区域经济带动效应，在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又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条件，从而培育了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推动着农村经济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四、城市带、城市群的兴起和城市体系的形成

进入 90 年代后，伴随着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和城市素质的不断提高，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便捷的交通网络和畅通的现代通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使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和社会交流日益频繁，相互促进、协作发展的有机联结关系日益加强，形成连片发展的城市带。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城市对农村的辐射能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间连片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目前，我国已形成的城市带主要有：

1. 沿海城市带。

在我国 1.8 万公里长、50 公里左右宽的沿海范围内，集中了包括香港在内的 16 个特大城市和 102 个大中城市，加上小城市总数已达 278 个。这些城市中，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城市和一大批 80 年代初期就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地处沿海的地理优势和发展外向经济的良好基础，使沿海城市带成为我国经济实力最雄厚、产业最为密集和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带。

2. 长江城市带。

上海至宜宾的 1751 公里的长江沿岸地区，是我国又一条产业密集的城市带。沿岸有上海、南京、武汉、重庆 4 个特大城市，42 个大中城市，加上小城市，共有城市 60 多座，并初步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为中心的四大城市密集区。将来，三峡工程的建成投产，将进一步加快长江城市带的发展速度，使之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3. 京广城市带。

沟通我国南北的重要交通通道、长达2300多公里的京广铁路，将铁路沿线的京津冀地区、以郑州为中心的豫中豫北地区、武汉地区、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东湘中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核心地区连结在一起，形成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5座特大城市为中心、20多座大中城市聚拢其中、贯通南北城市带。

4. 新亚欧大陆桥城市带。

全长4131公里的新亚欧大陆桥陇海——兰新铁路沿线，横穿东、中、西部，将沿线有郑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16座大城市和众多的中小城市连结起来，逐步形成了贯通淮海、中原、晋中南、关中、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若干个经济区域、等级规模有序、布局合理、横跨东西的城市带。这一城市带中的许多大城市又是多条重要铁路干线的交汇点，徐州、商丘、郑州、洛阳、宝鸡、兰州分别与京沪、京九、京广、焦柳、宝成、包兰等铁路干线相交或相连，正在分段建设的沿桥高速公路和由34个干、支线机场构成了沿桥的主体通道，使新亚欧大陆桥城市带的交通纽带进一步加强。

在全国性城市带迅速发展的同时，省域内城市带，如济南—青岛城市带、沈阳—大连城市带、大同—太原城市带等已成为比较重要的经济发展轴线。

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间合作的推进，引起城市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张，对周围地区辐射作用越来越大，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经济联系密切的不同层次的众多城市组成的逐级传递、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开始形成。城市群集中了大规模的经济资源，并在城市群内部实现了合理配置，产生巨大的集聚效益，为这些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已形成的城市群主要有：

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有15座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上海、南京、杭州三个特大城市呈三足鼎立之势，构成长江三角洲城镇体系的三大核心，几十座大中城市沿沪宁、沪杭以及杭甬铁路干线密集分布。仅310公里的沪宁线上分布着五座大城市，彼此平均间隔距离为60公里左右。该地区已形成我国最发达的主体式交通网络，作为我国南北大动脉之一的京沪线和东西大动脉的长江贯穿其中，浙赣线将其与中国南大门相连，沪宁、沪杭甬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联系距离。上海港、北仑港已开通国际航运；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大国际机场与世界五大洲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2.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共有25座城市，城镇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100个，城镇平均间距不到10公里。以香港、广州、深圳为核心，包括东莞、佛山、中山、江门、肇庆、珠海等大中城市。该区域是我国机场密度最高，国际机场最多的区域，4万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建有7座机场，公路、铁路、水运、海运四通八达，广深高速公路已建成投入使用，分布着大亚湾、大鹏湾、香港、妈湾—赤湾、高拦、盐田港等天然深水良港。中心城市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广州已发展成为我国南方最大的中心城市。这两大中心

城市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和经济发展起到主导作用，再加上深圳、珠海两大特区的辅佐作用，进一步带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3. 京津冀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核心，逐步形成京津、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沧州等城市组成的城镇密集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中国的政治、科学和文化中心，经济实力仅次于上海，天津是华北最大的港口工商业城市，是华北的经济中心。该地区共有城市30多座，是中国交通最发达的地区，铁路干线四通八达，京津塘高速公路早已建成，京深、京唐高速公路即将贯通，有天津港、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四个港口，这些都为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4. 辽中南城市群。

辽中南城市群以沈阳、大连为中心，已形成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鞍山、营口、盘锦、瓦房店、大连等城镇组成的城镇密集区。该地区城市高度密集、大城市所占比例最高。沈阳是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经济中心、交通和信息中心，全国最大的综合性重工业基地。大连也是辽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东北地区最大的港口工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口岸。近年来，沈阳、大连充分发挥了大城市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带动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中心，以长大、沈丹、沈山、沈吉和沈承五条交通干道为发展轴线的城镇分布体系，提高了地区城市化水平。

除了上述四大城市群之外，在山东半岛、闽南沿海、豫中、成渝、湘中、关中、武汉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分别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城市密集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间的不断融洽，这些城市密集区又将发展成为新的规模较大的城市群。

在大城市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的不断增强、城市带与城市群的兴起和小城镇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这种按“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的序列逐级带动发展的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适应了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城市体系（未包括台湾、澳门地区）大致可分为六级：

第一级，国际性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不仅具有影响全国的城市功能，而且也是我国的国际交往活动中心。

第二级，跨省区中心城市。如天津、广州、重庆、沈阳、大连、武汉、成都、西安、兰州等城市，不仅在本省市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而且辐射面已扩散到周边的广大地区。

第三级，省域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约有40多个，多是本省区的首府，有的省有两个以上。

第四级，省内经济区中心城市。每个省都有若干个经济区，每个经济区有一个甚至几个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多数是中等城市，也有大城市。全国这类中心城市有200多个。

第五级，县域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或为县级市的人民政府驻地，或为县人民政府所

在地的建制镇，它们是县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全国约有 2000 多个。

第六级，县域内的中心镇。在县城以外，比较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小城镇，它们是该区域内的经济贸易中心，是城市与农村的纽带，起着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样的城镇全国将近 2 万个。

城市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1. 从特大城市、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小城镇，最后是广大的乡间村落，这种按城市规模由大到小等级分布、按城市化水平由高级向低级依次排列的结构体系，使各层级城市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格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层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必将得到联动性的提高。

2. 城市体系的形成，将广大的农村地区纳入到一个全面带动的城市化发展体系之中，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受到各级城市发展的直接牵动，从而改变了过去城乡分割、各自独立发展的二元社会格局。我国的 668 座城市和 18000 多个建制镇，形成了一张结点密集的巨大的网，将每一个区域单位都涵盖在其中，将有力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各级城市和城镇的转移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发展现代化农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方向展示出良好前景。

五、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挑战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 20 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进程成就是显著的。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展开与深入，一些矛盾与问题也明显地显露出来，城市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1.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长与大量转移，同城镇有限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耕地则因建设占用等原因而逐渐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突出，加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的发展，城镇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场所。但进入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的减缓和有机构成的提高，吸纳劳动力成本增加，吸纳数量呈减少的趋势。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断深化，企业中富余职工显性化，下岗职工不断增加，城市中失业人员和待业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任务十分严竣。除此之外，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增长幅度将会相对减缓，从而使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与水平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特别是城镇人口的大量增加，城市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需要大大增强。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

施和公用事业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同社会需要间差距较大。特别是交通、通讯、环境保护、供水排污及与社区相配套的教育和医疗设施，文化和体育场所建设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首都北京已经位于世界上污染严重的大城市的前列。供水紧张问题越来越迫切：在我国668个城市中，供水紧张的有340个，其中120个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1600万立方米。这种状况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密切相关。反过来看，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将会成为下一步城市化进程的“瓶颈”与障碍。

3．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拉大，导致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别悬殊。

同旧中国比，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尤其是改革开放的20年来的发展速度更快。但同世界许多国家比，我国城市化的进展则仍显缓慢。国际上通行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目前发达国家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0%。据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我国的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30.4%。世界银行通常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30%为低水平城市化，达到30%一70%为中等水平城市化，高于70%为高度城市化。据此衡量，我国的城市化处于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的过渡时期，总体上说还比较低。而在全国城市化水平偏低的总体趋势下，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也较大。从城镇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状况看，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从城市数量看，东部地区城市数量增长快。1998年全国共有668个城市，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数分别为300个、247个和121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4.91%、36.98%和18.11%。从城市分布看，东部地区城市密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其增长率也高于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每百万平方公里范围的城市数。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反映了地区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异。而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加大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从而不利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实现。

从现状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首先，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将有力地推动城市化进程。我们正在向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目标迈进，随着经济体制关系的理顺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转变，我国国民经济将步入快速且平稳发展的阶段，这无疑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改革的深入为城市化加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将会改变，现行的户籍制度将逐步改革，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陆续消除，过去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的城市化潜能将得到释放。城市化同工业化、城市化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渐趋协调，在内涵发展完善的同时，外延上的扩张将形成城市化的主要趋势，特别是多数中等城市和小城市，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经济实力和素质的增强和提高，对城市化将形成明显的扩张性推动。第三，城市化发展规律表明我国将进入新的城市化阶段。根据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分析，城市化的发展从起步开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10%至30%以下为早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

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为成熟期阶段。城市化中期阶段所耗用的时间，一般比早期阶段所耗用的时间少，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将是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过30%，可以预料，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只要措施得当，操作到位，我们能在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处理好、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从而促进城市本身、城市间、地区间和各社会经济要素之间协调发展与良性循环。

第九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

建立科学合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了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所有制结构，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建国初起，我们就开始了不懈的探索。经过5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与改革

自50年代初没收官僚资本、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建国50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历经多次调整与改革，走过了极不平凡的探索历程。

一、前三十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和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经济命脉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外国资本、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的代表手中。受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和长期战乱的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百年以上。新中国诞生之后，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早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这一纲领的指引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级人民政府没收和接管了属于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金融和工商企业，从而构成了新中国最初的国有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向建立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型经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

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1949 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工业占 34.7%，公私合营工业占 2%，私营工业占 63.3%。

在 1949—1952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国家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积极扶持合作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营经济，政府在接管官僚资本的过程中贯彻“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使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对于私营经济，一方面，实行以“节制资本”、统制贸易和加强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政策，通过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诸方面对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调整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流通；并且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从而使得私营经济获得正常利润，能够继续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这些政策措施调动了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1952 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与公私合营企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已达 50% 以上，与其它经济成分相比已占优势。

（二）单一公有制格局的形成及其历史教训

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主义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经过充分的酝酿，中共中央于 1952 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 1953 年开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级，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到 1956 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极富创造性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变革，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和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这项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在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1957 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产比重达 97.5%，私营工业已全部公私合营，批发与零售商业中，私营成分分别仅占 0.1% 和 2.7%。（参见表 9 – 1）

表 9－1　　1950—1957 经济成分变化情况表　　单位：%

年份	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		工业总产值中各种经济类型比重的变化（不包括手工业）				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中各经济类型比重的变化						
	总数	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	国营工业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私营工业	批发商业				零售商业		
				总数	其中公私合营		国营	供销合作	公私合营	私营	国营供销合作	公私合营	私营
1949	－	－	34.7	9.5	2.0	55.8	－	－	－	－	－	－	－
1950	10.7	－	45.3	17.8	2.9	28.7	23.2	0.6	0.1	55.8	14.9	0.1	85.0
1951	19.2	－	45.9	25.4	4.0	28.7	33.4	1.0	0.2	65.4	24.4	0.1	75.5
1952	40.0	0.1	56.0	28.5	5.0	17.1	60.5	2.7	0.5	36.3	42.6	0.2	57.2
1953	39.5	0.2	57.5	28.5	5.7	14.0	66.3	2.9	0.5	30.3	49.7	0.4	49.9
1954	60.3	2.0	62.8	31.9	12.3	5.3	83.8	5.5	0.5	10.2	69.0	5.4	25.6
1955	64.9	14.2	67.7	29.3	16.1	3.0	82.2	12.6	0.8	4.4	67.6	14.6	17.8
1956	96.3	96.3	67.5	32.5	32.5	－	82.0	15.2	2.7	0.1	68.3	27.5	4.2
1957	97.5	97.5	68.2	31.7	31.7	－	71.5	23.8	4.6	0.1	65.7	31.6	2.7

资料来源：根据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数据编制。

党和政府于 1956 年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并且于 1957 年制定了有关政策设法纠正，试图“以苏为鉴”，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管理制度。但是这一探索很快就被中断了。相反 1958 年又对个体工商业者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一是组织入社，对个体手工业户，除极个别的特种工艺手工业户外，都要组织加入手工业合作社；二是把集体工商业并入或转为国营企业。1958 年和 1959 年两年中，绝大部分的集体工商业都已经转为国营，留下的少量合作店、合作组也基本上只保留了形式，实际上也都归口国营企业统一核算，或按照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统付盈亏。在农业方面，到 1956 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 96%，其中高级社占 88%。1957 年，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 97.5%，其中高级社占 96.2%，个体农户不足 3%。到 1959 年，农业合作化后保留下来的近 3%的个体农户也都被强令加入农村人民公社。经过“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非公有制经济已所剩无几。1961 年，全国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大约只有 100 万人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加盲目和片面地追求纯之又纯的公有制形式，一方面，片面强调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低估集体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排斥其它经济成分，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另一方面，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搞所有制的“升级”、“穷过渡”和“合并”运动，将“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形式先进与否的标准，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范围越大越好，公有

化的程度越高越好。至 1978 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 77.6%，集体经济占 2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我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只剩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成分，而相当一部分集体经济实际上是按国有经济的规则管理和运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已成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单一的公有制。

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脱离了中国国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否定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压抑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1978 年以来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与改革

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成为 1978 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20 年来，随着所有制观念的不断更新和突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一）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问题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共识：在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选择标准上，突破了唯生产关系论和唯意志论，重新确立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在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突破了单一的公有观念，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在所有制性质的判断上，突破了公“是”私“非”的观念，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在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上，突破了唯有传统的国有或集体经济形式才是公有制的观念，确立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同一性质的公有制有多种不同存在形式的观念；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上，突破了只看比重大小的观念，确立了重控制能力与实际效果的思想；在对公有资产的权利上，突破了权力越集中越好的观念，确立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思想等等。从总体上说，我们已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所有制理论或所有制关系学说。

这些新的思想认识是在改革开放 20 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这个决议概括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所有制形式上的新认识，正式提出了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论点。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重申了这个提法。1982 年 4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通过并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在肯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的同时，提出“在法律规

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适应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后就业的迫切需要，在党的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支持下，我国城乡个体经济逐步产生和壮大，出现了一批个体工商业者，缓解了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劳动就业问题，也使城市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诸如吃饭难、修理难等许多社会问题有了解决的出路。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曾经被邓小平誉为"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指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在分析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后，提出"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还进一步提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基本确立。

1985 年 8 月邓小平在谈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时指出："我们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整个经济的 90%以上。与此同时，我们发展一点个体，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他还说，合资经营，外国资本占一半，另一半是我们社会主义公有的，至少发展了一半社会主义经济，一个企业办起来，企业的一半收入归社会主义所有，国家还可以从企业中得到税收。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合资的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欢迎外国独资经营，我们从中得到税收，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什么损害。邓小平阐述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好处，认为只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发展些其它经济成分只有好处，是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利的。

在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城乡多种经济成分逐步发展。私营经济也在个体经济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1987 年党的十三大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又有所发展。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它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公有制经济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企业。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有所不同。"此外，还要求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

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十三大以后，我国的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到 1988 年第一季度，已有 25 万户，雇工约 400 万人，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以上。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中，资本拥有 10 万元以上的占 45%。

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40 周年时，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谈及各种所有制的比重与地位问题："我们要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作用。"讲话认为，坚持这个方针，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快发展，绝不是要削弱或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不是要实行经济"私有化"。

党的十四大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基础上，阐明了所有制结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它企业都进人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十四大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更准确地反映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十四大以后，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经济类型划分的暂行规定》，将我国经济划分为以下九种类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其它经济。这九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以其中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针对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进一步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应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判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

1997 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在科学总结建国 50 年来尤其是近 20 年所有制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成就的基础上，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所有制结构问题，实现了认识上的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下来。这意味着，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这种所有制结构就不只是一般的方针政策，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十五大报告关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论述主要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1. 进一步论述了坚持公有制的重要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能走私有化道路，这是坚定不移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致富，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所以，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符合生产力标准的。

2. 全面论述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

"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近20年来，不仅国有和集体经济有了明显的壮大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同样有了明显的壮大和发展，这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

3. 科学地界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不仅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量的优势究竟以多少为宜，要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具体情况，其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质的提高是指公有制的素质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兼顾质和量两个方面，必须在增强公有制的素质和竞争力上下功夫。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体现在国有经济的整体布局上。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而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也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性质。

4. 进一步阐述了集体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强调"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集体经济可以体现共同致富的原则，可以广泛吸收社会分散资金，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公共积累和国家税收。要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这对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5. 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并科学阐明了股份制的属性。指出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求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私有还是公有，关键要看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些论述将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科学区分，为实践中大胆探索各种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确立了政策依据。

6. 科学地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意味着，长期以来把非公有制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异己和附属物的观点和做法成为历史陈迹。

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些重大理论突破，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肯定。根据十五大精神，1998年9月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关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

将我国经济成分划分为两大类别，共五种成分类型。第一大类为公有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成分类型；第二大类为非公有经济，包括私有经济、港澳台经济、外商经济三种成分类型。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所有制认识上的提高与理论上的突破，我国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和发展公有经济，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所有制结构从1978年以前的单一公有制，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上升；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集体经济的比重上升。但在经济总量中，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通过20年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它经济成分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以清楚地反映上述发展趋势。

在工业总产值中，四者的比例关系1978年为77.6:22.4:0:0，1998年为28.5:38.3:18.9:19.9。所有制结构的具体变化趋势参见表9－2。

表9－2　　1978—98年工业总产值中各种经济成分比重变化表

（工业总产值＝100）　　单位：%

年份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	集体工业	城乡个体工业	其它经济类型工业
1978	77.6	22.4	–	–
1980	76.0	23.5	–	0.5
1985	64.9	32.1	1.8	1.2
1986	62.3	33.5	2.7	1.5
1987	59.7	34.6	3.7	2.0
1988	56.8	36.2	4.3	2.7
1989	56.1	35.7	4.8	3.4
1990	54.6	35.6	5.4	4.4
1991	56.2	33.0	4.8	6.0
1992	51.5	35.1	5.8	7.6
1993	47.0	34.0	8.0	10.8
1994	37.3	37.7	10.1	14.9
1995	34.0	36.6	12.9	16.5
1996	28.5	39.4	15.5	16.6
1997	25.5	38.1	17.9	18.5
1998	28.5	38.3	18.9	19.9

注：（1）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2）1998年起，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反映国有经济状况。由于国有控股工业产值与相关的其它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存在重复计算，所以各种经济类型比重相加大于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从1981年的69.5:12.0:18.5，变为1998年的55.0:13.1:12.8。具体变化参见表9－3。

表9－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

（投资总额＝100）　　单位：%

时期	国有经济投资	集体经济投资	个体经济投资
“六五”期间	66.7	11.7	10.7
“七五”期间	64.8	13.4	21.9
“八五”期间	59.0	16.3	13.2
1996年	52.5	15.9	14.0
1997年	52.5	15.4	13.8
1998年	55.0	13.1	12.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注：因全社会投资总额中还包括其它经济投资，所以从“八五”以后，国有、集体和个体三类经济投资比重相加小于100%。

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放开搞活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较小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和港、澳、台及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比重，既包括它们的独资企业，又包括它们在合资企业中各自所占的份额）由1978年的1%上升到1996年的24%（参见表9－4）；非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上升到1998年的38.8%（见表9－2）。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增加就业等方面逐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界限也开始被打破，出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交融、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联合经营和企业集团等混合所有制形式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9－4　　1978—1996年各类经济成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单位：%

年份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1978	56	43	1
1993	42.9	44.8	12.3
1996	40.8	35.2	24

资料来源：王洛林主编：《面向21世纪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64页。

第二节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要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在所有制结构不断得到调整改善的同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也相应展开。这种探索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后更进一步加强。20年来，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国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和发展状况

国有经济是生产资料由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社会劳动人民占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又称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国有独资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国有民营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等等，都是国有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

国有经济是我国资产总额相对集中、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经济成分。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以来，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很快，作用巨大。整体实力雄厚。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98年，我国国有资产大幅度增长。1998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达82211亿元，比上年增长13.8%，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为62405亿元，占75.9%，比上年增长15.4%；非经营性国有资产19806亿元，占24.1%，比上年增长9.3%。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总产值由3289.2亿元迅速增长到34109.6亿元，增长了9倍多，国有资产总量年平均增长15.5%，高于建国以来年平均增长12.9%的水平。到1998年底在全部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数量只占17%，但资产总额占59.9%，销售收入占46.2%，工业增加值占49.6%，实现利税占46.9%。近20年来，国有企业承担了相当大的改革成本。随着改革的不断取得成功，虽然国有经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高达60%，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企业；在全国城镇社会就业人员中，有近70%是国有企业和其它国有单位接受的；同时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承担了大量投资大、周期长、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低的建设项目；全国1/3的学校和医院1/3的病床是由国有企业开办的。可以说没有国有企业为改革承担巨大的成本，我国经济建设就很难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它所有制经济也很难能有如此快的发展。此外，到目前，在铁路、民航、邮电通讯、城市水电煤气等基础产业部门，在科研、教育、国防、金融、保险等重要领域，国有经济仍具有绝对优势和较强的控制力。这说明，国有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

股份制经济的性质是由居控股地位的经济成分决定的。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有经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按照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的要求，通过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形式改造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中型企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一经改造，效益即明显提高。目前，多元投资主体的国有控股企业与单一投资主体的国有独资企业之间经营差距进一步拉大。对国有小型企业，则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有的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有的实行兼并、联合；也有的通过合法公开的形式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过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国有经济运行基本上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国有企业户数有所减少，但资本实力稳步增长。1998年我国国有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为23.8万户，比1997年26.2万户净减少2.4万户。1998年底，23.8万户国有企业拥有资产总额1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8%；占用国有资本48051.6亿元，比上年增长8.3%。在23.8万户国有企业中，大型企业9357户，比上年增长2.0%；中型企业3.3万户，比上年减少12.6%；小型企业19.5万户，比上年减少8.9%。

第二，国有大型企业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随着"抓大放小"战略措施的贯彻实施，1998年底国有大型企业拥有资产总额为76015.9亿元，占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的56.4%，比上年增长9.8%。我国9357户国有大型企业，户均拥有资产总额9.1亿元，比上年增长8.3%；户均占用国有资产3.2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国有企业中，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超过50亿元的为113户，户数比上年增长37.8%；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超过5亿元的1288户，户数比上年增长45.2%。

第三，多元投资主体的国有控股企业逐年增加。1998年底，国有控股企业吸纳非国有经济成分的资本为3930.3亿元，较上年增长21%。1998年23.8万户国有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为21.4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的89.9%，比重较上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以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合作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多元投资主体企业为2.4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的10.1%，较上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

第四，国有企业布局正在逐步得到合理调整。1998年一般生产加工、商贸和服务等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78057.6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比重为57.9%，比上年减少1.1%，比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平均增速低8.9个百分点；而国民经济基础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占用资产总额为56722.4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比重为42.1%，比上年增长13.7%，比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平均增速高出5.9个百分点，使我国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状况有所缓解。

当然，在国有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随着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差距进一步拉大。1998年国有企业赢利面为50%，赢利企业赢利额为3280.2亿元，比上年增长4.3%，赢利企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7.3%。而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66.5亿元，比上年增亏30.9%，亏损企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55.4%。在减员增效过程中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增多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建国初期以来国有企业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自身的经济包袱和社会负担却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彻底改变还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内部经

营机制，仍然没有得以脱胎换骨的改革，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三是国有企业设备陈旧老化、更新乏力的矛盾十分突出，没有大的技术革新与改造，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四是长期重复建设，导致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销路不畅，企业开工不足等等。显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振兴国有经济，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重大历史任务。

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探索国有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作了部署。

《决定》指出，“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下，国有经济的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一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迈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步伐。”“我们要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不断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坚定不移地贯彻十五大精神，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决定》强调，“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国有企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敏锐地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发展空间，尽快形成国有企业的新优势。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努力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在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上迈出新步伐。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决定》重申了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的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同时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而实际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目标所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求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同时强调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决定》进一步对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及其作用领域做出了界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和质的提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其布局要相应调整。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它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在坚持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量将会继续增加，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有所减少。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这种减少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决定》进一步要求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指出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可以相信，在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将更加多样化，并使国有经济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二、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和发展状况

集体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都归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的一种经济成分，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广泛分布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以及中小型工业企业之中，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与实现形式，集体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集体经济的主要部分。农村集体经济是从50年代初在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经过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到

1956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在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

80年代初以来，农村集体经济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合作经济的特征，形成了农户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经营形式。集体经济围绕着为农户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服务去实现，与社区合作经济和村民自治相结合。这种既有集体经济特征，又有社区合作经济色彩的新型合作经济，是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集体经济的新经营形式。在实践中，从各地．实际出发，我国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新型合作经济，把农村集体经济推向一个新阶段。到1997年止，全国已经形成各种利益结合关系的一体化组织共有11824个。从组织形式来看，通过互惠合同实现"公司+农户"、"企业+农户"、"协会+农户"和"合作社+农户"等合作经济形式的有8377个，占到总数的70.5%。

乡镇企业是在农业集体经济基础上发展成长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改革以后，在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广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在多数地区成为集体经济的代表并承担以工补农、建农的重任。它还有力地壮大、发展和巩固了集体经济。

城镇集体经济从其来源上看，一部分是在50年代初由城市个体（包括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化而来；而大部分则是在随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国家和国有经济的支持下由城镇劳动群众自力更生兴办的。在前30年发展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集体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并不断跃上新的台阶。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而带动起来的。1978年以后，面对"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1700多万名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党和政府为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提出了广开就业门路、发展集体经济、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思路。于是，在80年代初期全国兴起了大办集体企业的热潮，集体企业迅速发展，其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扶持兴办的集体企业，街道办事处扶持兴办的集体企业和待业人员自发组织起来的集体企业等类型。到1990年城镇集体职工人数从1978年的2048万增加到3549万，增长73%；城镇集体职工在全部城镇从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21.2%上升到24.1%。这些年来，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1995年底，全国城镇集体企业已达到100万户，从业人员占城镇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至1998年，城镇集体从业人数仍有1963.2万人。（参见图9-1）

改革开放20年来，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从工业总产值看，1978年集体工业总产值为947.8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22.4%；1990年达到8522.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5.6%；1994年达到2647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7.7%，首次超过国有经济的比重；到1998年集体工业产值达到45842.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8.3%，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比重9.8个百分点。从财政收入看，1978年集体经济的财政收入为142.4亿，占财政总收入的12.6%，至1990年达到545.15亿，占财政总收入的18.6%，到1995年达到1075.48亿，占财政总收入17.3%。从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来看，1980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为46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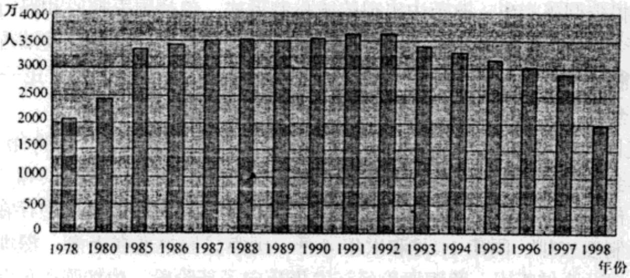


图 9－1　1978—1998 年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从业人数变动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 190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 页数据绘制。

占总投资的 5.1%，1990 年达到 529.5 亿元，占 11.7%，至 1998 年达到 3717.3 亿元，占 13.1%。(参见表 9－5)

表 9－5　　1980—1998 年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工业总产值	1213	3117	8523	8783	12235	16464	26472	33623	39232	43347	45842
财政收入	146.27	395.12	545.15	548.[illegible]	595.01	750.76	900.91	1075.48	–	–	
固定资产投资	46	327.5	529.5	679.8	1359.4	2317.3	2758.9	3289.4	3660.6	3850.9	3717.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9、41 页；《中国统计年鉴 1998》第 272 页。

三、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我国股份制经济是在 1978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渐发展起来的。

1979—1984 年是我国股份制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股份经济主要是以集资的方式兴办乡镇企业和城镇小型合作企业，以及一些由国有企业兴办的服务公司等。这个期间的股份制企业数目少、规模小、布局分散，而且极不规范、很不成熟，还只是股份企业的雏形，尚未形成一股经济力量。

1984—1988 年是我国股份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开始打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界限，开始组建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企业逐步从单一的生产技术协作发展到相互以资金、技术、设备等投资入股，有些地方也开始将国有老企业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组建新的股份公司。1984 年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等相继成立，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股份公司。此后，武汉、重庆、沈阳等地区也相继出现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1987 年 10 月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试行。此后，全国各地股份制试点企业迅速发展。1988 年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当时全国约有 6000 家股份制企业，遍布各地和各行业。

90 年代以来，我国股份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规范化。1990 年 12 月，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再次对股份制企业发展作出充分肯定，并对股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权交易问题作出了制度安排。同年 11 月和次年 4 月，国家先后批准在上海、深圳两市开办证券交易所。以此为转折点，我国股份经济发展迈向了新阶段。为加强股份制企业的宏观管理，统一协调有关政策和建立健全监管制度，从而促进了股份制经济健康有序发展。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回答了长期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同年 10 月，协调股票、债券、国债政策，从事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1993 年 12 月，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通过我国第一部《公司法》。至此，我国股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初步形成，进入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1992 年以后，股份制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行业和地区分布不断扩大，也日益规范化。1998 年全国上市公司已由 1997 年的 700 多家增加到近 900 家。股份公司不仅数量和规模增长迅速，经济实力大大加强，而且经济效益成就显著，规范的股份制经济日益显现出强大生命力。

四、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展

股份合作制是介乎于合作制与股份制之间又兼具两者特点的企业组织形式。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本质特征。自 80 年代初起在一些乡镇企业（其时仍称社队企业）基础较好的地方以农民对集体企业入股的方式出现。

1984 年 1 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九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肯定了农民向企业投资的做法，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农村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热情。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产生，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后一项根本的制度变革，是中国农民新时期的又一伟大创造。在我国农村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股份合作制的出现与推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85 年后，城镇中小型集体企业也引入了以资本、劳动联合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形式。进入 90 年代，股份合作制逐渐成为城市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如广东顺德、山东诸城、四川宜宾、江苏盐城、山西朔州、上海等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并取得了良好的绩效。

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受到了中央的肯定与支持。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现有的城镇集

体企业也应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企业集团。"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肯定了股份合作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在中央有关决定提出的关于适用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政策思路中，股份合作制被放置在重要位置。中央对股份合作制的肯定促使了股份合作制更快的发展，1993年之后，特别是1995—1996年城镇集体企业的股份制改组大面积展开，成为集体所有制的首选形式。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1996年底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近20万户，注册资金逾1000亿元。据对综合改革试点市、县不完全统计，在国有小企业改制的种种形式中，股份合作制占35.13%，是比重最高的。全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提出，"九五"期间本地区小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合作制。1997年末，全国乡村集体企业约有300万家企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

对股份合作制的规范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得到加强。农业部继1990年颁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之后，又相继发布了《关于推行和完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通知》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要求积极且规范地发展股份合作制。轻工业部于1993年发布了《关于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1994年劳动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税务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1997年，国家体改委以发布了《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全国各地也都出台了大量的本地区股份合作制规范发展对策，并组织验收。据统计，全国2/3以上省一级政府或政府的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股份合作制方面的办法或规定。

在目前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产权、股权管理不规范，股权流动性差，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有待于在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加以解决。

第三节　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在建国初期曾经存在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步萎缩，几近消亡。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重新得以确立，政策上得到扶持，其经营领域与经济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背景

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理论上，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在

实践上扼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曾经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损失。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幅度发展生产力必须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1982 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论断。这两次重要会议，奠定了我国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

1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明确的政策，指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为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会议还提出，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1992 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进一步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指出，外国的资金以及作为有效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在 1993 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提出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但允许有的地方、有的产业有所差别，允许个人财产与资本可以作为市场要素参与收益的分配。在以往政策发展的基础上，1997 年党的十五大实现了关于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新的突破，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和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1999 年 8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出台。这是我国继制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之后，制定的第三部涉及规范私营企业市场主体的法律，至此，我国关于私营经济三种主要形式——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主体法律已经基本齐备。个人独资企业法打破了按雇工人数划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做法，实现了对私营经济科学管理、依法保障、鼓励发展的新跨越。我国多年来将雇工 7 人以下的个人经济组织划称为个体工商户，将雇工 8 人以上的私人经济组织划定为私营企业。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新的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八条明确规定，有必要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出资、有合法的企业名称、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等，就可以申请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在这里，从业人员（即雇工）已经没有了 7 个或者 8 个的划分界限。全国现有 3120 万户“个体工商户”，将有相当多一部分依照本法逐步“升格”为“个人独资企业”。今后新创办的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经济主体，也可以“一步到位”依法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上述调整有助于依照宪法鼓励个人独资企业这种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积极、快速发展。

二、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作用逐渐加大，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在较有活力和效率基础上的强有力竞争，也给国有企业以压力，促使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向更高、更新的目标迈进。

（一）个体、私营经济

个体、私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生产资料归城乡个体劳动者所有、由它们进行独立生产和经营的一种所有制形式。个体经济通常以手工劳动为主，生产设备较为落后，规模较小，力量单薄，是一种小私有经济。但是，它有经营方式和布点方便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可以在较小的规模里充分利用零星资源，灵活发展生产，扩大社会服务，促进城乡商品流通，方便群众，较好地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还可以充分利用闲散的劳动力，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私营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生产和经营的所有制形式。与个体经济相比，它在资金、技术、规模、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它能够吸收部分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并且在组织出口创汇，完成国家税收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建国之初，我国城乡的个体私营经济曾占很大比重。1956 年对资改造和合作化运动高潮以后，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比重就很小了。60 年代后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而加以限制甚至消灭，到 1978 年，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微乎其微。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1979 年我国城镇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 31 万人，比 1978 年增长一倍多。

1984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要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形式。1984—1991 年，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不仅农村个体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城镇非公有经济也迅速恢复和发展壮大起来。全国城乡个体工商业从业户数突破千万大关，零售额由 1985 年的 661.0 亿元增加到 1991 年的 1844.4 亿元，并持续增长。1986—1990 年的“七五”计划期间，中国个体工商户的总户数年平均增长 59.1%，从业人员年均增长 66.9%，营业额年均增长 188.1%。在个体经济发展基础上，私营经济开始发展起来。1988 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 4 万多户，雇工总数 70 多万人，户均雇工 18 人。当时私营企业 80%在农村，80%从事工业。

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是在 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这一点，从个体经济的营业额和私营经济的雇工人数及注册资本金的变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1996 年与 1993 年相比，个体经济的户数增长 1.53 倍，营业额增长 2.49 倍；私营经济户数增长 2.44 倍，注册资金增长 5.51 倍。（参见表 9-6）

表 9－6　　　　1993—1997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统计表

年份	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			
	户数（万户）	人数（万人）	营业额（亿元）	户数（万户）	投资者数（万人）	雇工人数（万人）	注册资本金（亿元）
1993	1766.99	2939.3	3309.2	23.8	51.4	321.2	680.5
1994	2186.60	3775.9	4211.4	43.2	从业人员总共 559.0		1447.8
1995	2528.5	4613.9	8972.5	65.45	133.96	822.01	2621.71
1996	2703.7	5017.1	11554.2	81.93	170.45	1000.68	3752.37
1997	2850.86	5441	注册资金 2573.98	96.07	从业人员总共 1349.26		5140.12
1998	3120.2	6114.4	17486.3	120.1	263.8	1445.[illegible]	7198.1
1999 年 6 月底	3120.0	约 10000.0	–	128.0	从业人员总共 1784.0		8177.0

资料来源：张卓元等主编：《20 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第 36，37 页；1998 年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提供；1999 年数据见 1999 年 9 月 2 日《经济日报》。

1996 年，个体经济中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户数分别为 74 万户、333 万户、2297 万户，从事第三产业的户数占绝对的优势。个体工商户户均注册资金 8000 元，比上年增长 12%。私营经济 1992、1993 年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到 1996 年，私营经济从事第三产业的已超过第二产业。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的户数分别为 1.2 万户、39.2 万户、41.5 万户。

党的十五大作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后，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和引导。此后，个体、私营经济有了更快的发展。到 1998 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为 3120.2 万户，从业人员 6114.4 万人，注册资金 3120.3 亿元；私营企业 120.1 万户，从业人员 1709.1 万人，注册资金 7198.1 亿元。1997 年一年内，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吸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94 万人，另有 197 万下岗职工申办成为个体工商户或开办私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成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安置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至 1999 年 6 月底，全国私营企业 128 万户，从业人员 1784 万人，注册资金 8177 亿元。

1999 年 9 月，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使成千上万的个人经济主体摘掉"个体户"的帽子成为"独资企业"。此时我国城乡个体工商户按户数计算有 3120 万户，是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的 22.9 倍，工商户业主及雇工人数多达 1 亿多。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确立的新的制度，将大大有利于提升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保障它们依法进入市场公平竞争、获取发展的同等权利。目前我国下岗失业职工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这一举措将使这部分社会成员更乐于投

资创办个人企业或到这些企业就业。同时，我国现行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税收政策是有区别的。对前者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后者征收企业所得税。新的办法将兴利除弊，实现合理税负，保障国家利益和个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国家合理的收入不流失。针对独资和其它私营企业当前存在的问题，该法强调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个人独资企业招用职工的，应当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从而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与健康。

（二）外资经济

外资经济是指外国投资者（企业、组织或个人）根据我国法律并经我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的企业组织，通常称为“三资”企业。外资经济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所有制结构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

外资经济的发展不仅扩大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经济联系，而且可以学习、借鉴和利用国外的技术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对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增加就业、税收和发展出口创汇等都有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我国主要与苏联、东欧和其它友好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利用外资局限于苏联、东欧国家的贷款与少量合资企业。1960 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利用外资基本被中断，只有中波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等个别合资企业存留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资经济起步于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颁布。在此后的 20 年中，我国利用外资从而外资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试验起步阶段（1979—1983 年）：我国先后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吸收外资，举办“三资企业”实行一些特殊政策，采取措施扩大地方外商投资的审批权限，并逐步完善立法。初步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1980 年我国批准了第一批三家外商投资企业。这一时期，由于中方处于试验阶段，外方处于试探阶段，所以中国吸引的投资项目较少，但项目平均投资额较大，反映了一些具有承担风险能力的外商率先投资。这一阶段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1392 个，协议投资总额 77.42 亿美元，年均批准项目和投资额 278 个和 15.48 亿美元，项目平均投资额为 556.17 万美元。吸收的外商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地区，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项目和宾馆、服务设施等第三产业项目居多，并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其它沿海省市。

持续发展阶段（1984—1991 年）：1983 年 5 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外资工作会议，总结了试验阶段的经验教训，决定进一步加快利用外资的步伐。1984 年、1985 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上海、天津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为加速利用外资创造了条件。1986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利用外资在持续发展阶段前进一大步。这个时期对外商投资举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1987 年 12 月国务院有关部委制定了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的有关规定。1988 年中央决定将沿海经济开放区

扩展到北方沿海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其它沿海地区，形成了整个沿海地带迎接外商投资的新格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吸收外资的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发展较快。1984—1991年，中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0635个，协议投资金额445.96亿美元，年均批准项目和金额分别为5079个和55.74亿美元，项目平均规模较前一时期小，只有109.74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的产业重点由服务业转向了劳动密集型工业项目，到1990年底，投资的工业项目占到84.4%。台湾厂商于这一时期开始进入，并迅速增加。

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5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打消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顾虑起了很大作用。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投资环境得到更大改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连续数年超过10%，使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这一时期，国务院又决定进一步开放6个沿江港口城市、13个内陆边境城市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再向全国扩展的新时期。这些均促使外商投资的广度和深度有大的发展。1992—1995年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16761个，协议投资总额3435.22亿美元，分别为前13年总和42027个和523.38亿美元的5.15倍和6.56倍。外商投资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世界前500家大企业中已有200多家来中国投资。资金、技术密集的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加较多，平均单项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提高。这个阶段中国批准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为158.48万美元，比第二阶段的109.74万美元高出44.41%。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有了较快发展。

调整阶段（1996年至今）：对外开放以来，为了鼓励外商投资，我国制定了大量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面发展和大力出口。但是也带来了内外资不平等、假合资等等问题。因此，我国作了政策调整。一是从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过渡。1995年6月2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4类。1996年中国有关部门对外资减免税政策进行了调整，决定从1996年4月1日起，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性货物进口的优惠政策。1996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4592个，比上年下降33.73%，协议投资金额723.1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2.87%。但是，项目平均投资金额为294万美元，比第三阶段的158.48万美元高出85.51%。实际利用外资423.50亿美元，比上年的375.21亿美元高出12.87%。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设施产业的项目，如电子通讯设备、仪器仪表、医药工业、化学工业、电气设备制造业等项目增多。1997年中国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1046个，比上年下降14.4%，协议投资金额517.7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8.4%，实际利用外资452.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91%。截止1998年底，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2.47万家，合同外资金额5725.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2674.5亿美元；到我国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180多个，外商投资企业已开业近15万家，就业人数1750万人。

经过20年的对外开放，外资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工业总产值中，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等其它经济类型工业1980年占0.5%，1998年提高到19.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78年为31.1亿元，1998年增加到7334.8亿元。自1993年至1998年，我国连续6年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要"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加强引导和监管。"根据这一精神，我国将进一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加强引导和监管。

三、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深刻含义在于，凡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经济成分都应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得到发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必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创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是重要一环。在这方面，需要把握这样两点：

其一，按照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各种所有制的产业布局和企业投资结构。从产业布局看，除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需要保持国有经济的控股地位之外，其它一般性领域，应允许和鼓励其它经济成分进入，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优势。让集体经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公有制经济形式以及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一起共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从企业投资结构上看，除少数需要国家独资或控股的企业之外，大多数竞争性企业，应提倡多种经济成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充分发挥各种资产组合方式的优点，特别是应鼓励非国有和非公有股权进入国有企业，以改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从而改善其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竞争的微观经济主体。

其二，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平等竞争和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鼓励、扶持和保护各种非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按照十五大精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种相关政策和法律规范，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在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偏见与歧视，营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积极鼓励集体经济的发展，正确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成分的健康发展。使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政策法规的统一指导下，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第十章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体制建设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作为经济体制的关键组成部分，企业体制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因此，企业体制特别是国有企业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一直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经过 5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的努力，以理顺国有企业关系为重点的微观经济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体制正在形成。

第一节　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体制的探索历程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体制的调整

新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继承解放区的军工企业、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各个时期国家财政投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控制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主导，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52 年，国有工业实现产值 145 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41.5%。到 1957 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比重提高到的 53.8%。国有企业控制了主要的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大批发流通企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及领域，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与此相应的高度集中统一、直接管理的企业管理体制也初步形成。

建国初期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生产和流通的主要部分实行直接计划，对其它成分的生产和流通则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1953 年以前，我国国有企业除了华北地区由中央直接管理以外，其它各地基本由各大行政区直接管理。1954 年撤销了大行政区，多数大中型企业划归中央各工业部门管理，一部分划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国家投资兴建的工业和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由中央有关工业部门管理。这些企业由归口部统一编制长远发展规划，安排年度生产计划，统一组织物资供应，统一分配和销售产品，财务收支、人员工

资和企业职工数量、干部配备也由各部直接管理。至此，由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统一、直接管理的企业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到 1957 年，中央直属企业由 1953 年的 2800 户增加到 9300 户，各类企业的统配物资由 1953 年的 50 种，增加到 231 种。这些企业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接受指令性计划指导，生产和物资供应大量地使用实物指标，产品和物资实行统分统配制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企业管理体制和组织制度，对于医治战争创伤，保证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高速度发展，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巩固新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下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自主权，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各项业务管得太多、太死的弊端，很快就显露出来。

党和政府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从 50 年代中期起，陆续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1957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经同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84 次会议批准，于 1958 年开始实施。这些规定，从下放管理权限、扩大地方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权利等方面着手改进，是探索建立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初步尝试。与此相应，开始逐步下放中央直属企业。1958 年 4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该《规定》提出："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提早实现工业化，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决定作如下改变：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同年 6 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提出了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 17 条具体办法，要求尽快、更多地下放企事业单位。1958 年底，中央企业数由 9300 个减少到 1200 个，下放了 87%；中央直属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39.7%下降到 13.8%；中央统配物资由 231 种减少到 67 种（1959 年)。这次下放企业，由于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突击完成，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很多企业原有的协作关系受到严重破坏。

1961 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重新要求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同年 9 月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工业七十条》)，对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调整、改进了国家、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促进了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的恢复和建立。针对企业过于分散和经济协作混乱的状况，还作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又开始上收企业，并于 1964 年试办了 12 个工业、交通托拉斯。到 1965 年，中央直属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又上升到 42.2%，其中属于生产资料的部分占 55.1%。这些措施力图改善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但由于着眼点主要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管理企业的权限，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本身没有多大改进，使得这些调整和上收企业的措施没能在增强企业活力方面收到多大效果。1970 年 5 月，根据《"四五"计划纲要（草案)》的精神，国务院拟定了《关于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又一次开始下放企业。要求除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为主之外，把国务

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多数下放给地方管理。至“文革”结束，1977年又着手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局部性的调整，把在“文革”中下放的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型骨干企业陆续收回，实行以中央主管工业部门为主的双重领导；对仍然归由地方管理的未收回的大中型企业则规定应服从国家统一计划，保证产品配套和调出任务的完成，国有企业又陆续收归中央管理。

总体上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尽管国家在理顺国有企业关系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国有企业在条条块块之间曾几收几放，但这些调整都是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总框架下进行的，因而并没有取得多少积极的效果。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些调整始终没有触及到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改革，加之宏观管理体制排斥市场机制，因而否定了国有企业做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基本属性。截止到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对企业实行统分统配、统收统支、统一计划、直接管理的体制格局不仅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在力度上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完全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权力和利益，企业经营机制呆滞、僵化，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二、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企业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时指出：“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并强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此，国有企业改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积极性为出发点，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逐步展开，并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和扩大，一步步向纵深发展。

（一）由浅人深的放权让利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最初尝试。

针对传统企业管理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严重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弊端，政府以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为重点，开始通过政策调整的途径，有限地扩大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劳动管理、内部分配等方面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是对传统计划管理体制下统分统配、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的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初尝试。

这一改革尝试采取了局部先行的办法。从1978年第四季度起，部分省市从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限人手，开始在国有工业、商业企业进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1978年10月，四川省首先在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开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4月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四川省的试点工业企业扩大到100家，并在40

家商业企业中进行了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与此同时，云南、北京等地也在国有企业中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试点企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在这个基础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全面推行。1979年7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五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文件，肯定了各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方向，并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主要内容作了规定。重点是把国营工业企业由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改为实行利润留成办法，赋予企业自主安排使用留成资金的权力。1980年和1981年，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又先后发布了《批转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的通知》、《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完善了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相应扩大了企业其它方面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内容更加明确和具体。这一时期，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点时期，国家赋予扩权试点企业的权力主要是：制定补充生产计划权，部分产品自销权，利润留成资金使用权，出口产品分成外汇使用权，职工奖励处分权，定员编制范围内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权，中层以下干部任免权等。

此间，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进行了企业扩权试点。到1980年底，全国扩权试点企业已达6000多个，占国家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约占60%，利润约占70%。此外，在四川、上海、广西等地的200多个企业还进行了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企业改革试点。从试点情况看，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可以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按照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自主安排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自销部分产品，改变了国家统分统配、统收统支的企业管理方式，促进了企业的转轨变型。同时，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分配的财力和经济利益，逐步使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鉴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取得的积极效果，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相应扩大了企业十个方面的自主权，即：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定价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资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人事劳动权，工资奖金使用权，联合经营权等。这就是著名的“扩权十条”。以“扩权十条”的颁布为标志，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企业改革的起步措施得以完整体现，但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方面，伴随着整个改革的进程，扩大企业自主权不断有新的发展。

第二阶段，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

工业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它用法令和规章来确定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更加明确

了企业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在此基础上，把企业、职工的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力求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和逐渐得到落实，是通过契约关系促使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成功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工作的逐步深入，使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责任问题日益突出。1981 年初，山东省等地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对部分企业实行了利润（亏损）包干，随后，全国各地也相继实行了一些类似的包干办法。这些包干办法连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一起，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的主要内容。1981 年 10 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和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正式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政策在全国实行。

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强调要抓好两个环节：一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要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做到责任和利益相统一，解决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和职工的关系，做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解决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两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构成了经济责任制的核心内容。

实践中，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形式来处理两个环节的责、权、利关系。关于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主要采取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办法来处理；关于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主要通过经济责任指标分解，计分计奖，计件工资，超产奖，定包奖和浮动工资来解决。

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后，国家要求企业用留存的利润相应建立三项基金：生产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有条件的也可以用于企业扩建；职工福利基金，主要用于兴建职工宿舍等集体福利设施和用于医疗费补助，解决职工生活困难等其它福利事业；奖励基金，用于奖励职工劳动。

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强调企业责、权、利相统一，促进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完善和发展，对推动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以后各种形式的企业经济责任制和经营责任制就是由工业经济责任制逐渐发展和完善形成的。

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各项措施，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企业改革起步阶段采取的措施，它们具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其实施给几乎所有企业和所有职工带来利益，因此，容易为人们接受并受到欢迎，激励作用十分明显。尽管让利幅度不大，下放给企业的权利有限，但扩权让利政策的实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生产也受到严重束缚的状况，使广大企业和职工在利益刺激下，迸发出了巨大的生产热情。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

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法人。”提出要探索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的途径，实行政企职责分开，逐步确立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正确关系。由此，企业改革被确定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开始了全面探索，主要是通过政策调整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也开始深入到通过较为规范的契约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层面。

第三阶段，实行两步“利改税”。

“利改税”是对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改革，旨在通过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第一步利改税是对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实行税利并存的收缴制度。对企业实现的利润，国家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然后对税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第二步利改税把国有企业全部上交利润改为税收形式，是在第一步利改税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进行改革，旨在通过合理确定税目、税率，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在此基础上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逐步增强企业活力。

1980 年开始，国家在 400 多个工业企业中进行“自主经营，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试点，作为明确国家和企业之间关系的一项改革收到了积极效果。以此为基础，1983 年 4 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第一步利改税。即国有企业保持原有的工商税（按销售收入计征），把相当于基数利润的部分改为所得税，所得税后的利润再区别情况在国家与企业间进行分配。规定凡有盈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的利润先按 55% 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上交国家的部分，分别采取递增包干上交、固定比例上缴调节税、定额包干上缴等办法，一定三年不变。凡有盈利的国有小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由企业自负盈亏。企业的税后留利，要建立新产品试制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前三项基金不得低于留利总额的 60%，后两项基金不得高于 40%。

第一步利改税是对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的一个突破，改变了国有企业只上交利润不能征收所得税的传统模式，是处理国家与国营企业分配关系的一种新型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实行经济责任制过程中企业与国家在利益分配中讨价还价带来的弊病，对规范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由于其它改革不配套和第一步利改税自身存在缺陷与不足，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加剧了国营企业税赋苦乐不均现象，又由于过分强调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对企业发展后劲考虑不足，削弱了企业的投资能力。

针对这些问题，1984 年 9 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决定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办法。主要内容是：将工商税按纳税对象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盐税和营业税，改变企业利润上交形式，国家对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分别征收所得税和调节税，调节税后的剩余利润为企业留利；增加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规定调节税采取一户一率的办法分别

核定，即：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期利润扣除按55%计算的所得税和1983年合理留利后的部分，占基期利润的比例，为调节税税率。企业当年利润比核定的基期利润增长部分，减征70%调节税，并由“环比”改为“定比”，一定七年不变。核定的基期利润扣除55%所得税后，余额达不到1983年合理留利水平的大中型企业，不再征收调节税，经批准，还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征一定数额的所得税。企业税后留用的利润要相应建立新产品试制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企业从增长利润中留用的利润，一般应将50%用于发展生产，2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职工奖励。国营小型盈利企业，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后，一般由企业自负盈亏，国家不再拨款。

与一步利改税比较，二步利改税有较大进步。首先，把统一的工商税改为产品税、增值税，按不同产品的销售利润情况分别定率计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价格扭曲造成企业苦乐不均的矛盾；二是把一部分企业利润转化为流转税，有利于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三是考虑到企业折旧率低、留利，不多的实际情况，规定采取税前还贷的办法，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还贷任务，减轻了国家拨款投资的负担，许多企业得以用贷款进行技术改造，增强了企业技术改造的能力。

“两步利改税”试图通过理顺并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在企业改革以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外部体制改革不配套和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利改税未能脱离旧体制的束缚，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没能从划分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有企业资产所有者两种身份出发来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国有企业税利不分，国家与企业的权责无法界定，难以从根本上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第二，在没有建立企业约束机制的情况下，采取税前还贷办法，因缺乏对企业投资贷款的有效约束，实质上形成了企业投资的“大锅饭”，造成国有企业投资膨胀，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第三，在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产品税、增值税虽然可以缓解价格矛盾，但却限制了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一户一率的调节税，难以做到平等税赋，无法消除“鞭打快牛”现象。利改税本身存在的这些不足，加之这项改革出台的时机正值经济过热后的宏观经济整顿和紧缩，在两步利改税推行后，出现了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连续22个月滑坡的局面。事实上，利改税在没能得到实质性推行的情况下就被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取代了。

第四阶段，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我国广大企业和职工在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企业经营形式。“两步利改税”后，国有企业整体效益下滑，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下降。而与此同时，一些从1981年后坚持实行承包经营试点企业的经验表明，要调动广大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活力，仅靠对企业放权让利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国家与企业利益关系和权力机制的深刻调整；对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承包经营以“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为基本内容，使企业的责权利紧密结合并落到实处，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和利益约束机制，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责权利关系的一种有

效形式，有利于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基于承包经营在试点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全面总结承包经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从1987年4月开始，在全国逐步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制迅速在全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实行和发展起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推动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改革目标，成为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手段。此后，党的十三大报告充分肯定了承包制的积极意义，指出："无论实行哪种经营责任制，都要运用法律手段，以契约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前实行的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写进了《企业法》，把承包制纳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据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7个计划单列市的统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80%以上，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90%以上，从1987年开始陆续实行了第一轮承包，其中实行承包经营的大中型企业达95%以上。到1990年，有90%左右的企业第一轮承包到期，逐渐开始第二轮承包。截止到1991年底，95%以上的到期企业转入第二轮承包。承包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

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政企职责分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思路探索形成的一种经营形式。它以契约（承包合同）形式确定政府（发包方）和企业（承包方）的责权利关系，明确了各自的权力、责任和利益，改变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使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相应的权力，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因承包合同受到限制，为企业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创造了条件，是把国有企业塑造为独立的商品经济实体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因此，相对于前一时期的探索，承包经营责任制表现出明显的效果，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扭转了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二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落实，推动了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化和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建立，提高了企业效率。此外，承包考核指标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严格兑现承包合同，加强了对企业行为的约束。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使企业改革从单纯的放权让利深入到对企业经营方式的改革，促进了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整体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承包制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既有承包制本身的问题，也有承包制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外部条件不具备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1）承包基数的确定不科学，难以做到完全合理；（2）受"死基数与活环境"的矛盾困扰，基数很难真正包死；（3）包盈不包亏，短期行为严重，约束机制不健全；（4）企业利润分配向消费倾斜，发展后劲不足；（5）企业和政府责任不对等，企业难以真正做到自主经营，合同也无法严格兑现；（6）随着宏观经济运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指标管理为特征的承包经营的适应性减弱，尤其是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企业机

制，企业还不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经济实体，难以完全走向市场。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在以后几年中；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断完善并得到新的发展。一方面，各地通过规范发、承包方主体及行为，健全承包指标体系和指标测定办法，加强对企业的正常监督和管理，改进工效挂钩办法等措施，使原有利润承包方式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根据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探索了一些新途径，进行了新的承包经营试点，创造出不少新的承包形式。主要有资产经营承包、净产值承包、剩余收益分配制、投入产出总承包、双保合同制等。这些新的承包形式，在进一步发挥原有承包方式激励作用的同时，对于克服承包企业原有的包盈不包亏、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部分企业以包代管、短期行为等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取得显著效果。

在普遍推行承包制的同时，针对小型国有企业的特点，国家对国有小型企业实行了租赁经营。即：在不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依照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国家将企业资产有期限、有条件、有偿地出租给承租者，并将经营权完全让渡给经营者。与承包制相比，租赁经营对企业放权更加彻底，利益分配关系也更加清晰。从 1984 年开始，这种经营方式逐步从商业、饮食服务业引入工业企业，取得明显成效。1988 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规范了国营企业的租赁经营，并开始在小型企业实行。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均有一些小型工业企业实行了租赁经营，有些地方对部分微利或亏损的中型企业也实行了租赁经营。

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是对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形式的又一探索，租赁经营的出现和发展，在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方面显示出重要意义，给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其自身也随着改革的深化不断完善，成为搞好中小企业的重要方式。

第五阶段，贯彻落实《企业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和竞争要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加上传统的承包经营和租赁经营与市场本身的千变万化难以协调的问题加剧，对企业扩权让利的改革逐步深入到全面落实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贯彻落实《企业法》，以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和改革试点。

1988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企业法》。它是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第一部基本大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企业改革成功经验的结晶。《企业法》从法律上确定了这一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内涵，将改革以来国家搞活企业的有关法规、政策概括为赋予企业 13 项权力，即生产计划权、要求调整不必要指令性计划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选购权、产品定价权、对外经济活动权、留用资金使用权、资产处置权、内部分配权、用工权、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联合经营权等，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企业法》规定的企业应享有的这些权力，实际上是把企业构造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必要条件。落实《企业法》的过程，也就是使企业转换机制，适应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形成既有内在动力

又有竞争压力的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革过程。贯彻落实《企业法》，把扩权让利改革推向了顶点。

《企业法》的颁布实施，使扩大和落实企业自主权又有了很大进步，在指导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企业改革实践中，凡是搞得比较好的企业，多是能够充分运用《企业法》赋予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主动面向市场的企业。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难以落实，《企业法》的全面贯彻落实难度很大。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法》对企业各项权力的规定较为原则和概括，而又缺乏一个实施细则使其明确化、具体化。针对这种情况，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有关部委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并于 1992 年 7 月 23 日发布实施。这一条例一方面把《企业法》的原则规定明确化、具体化，另一方面又根据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需要，对《企业法》的某些具体规定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主要表现为：(1) 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2) 对企业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作出界定，规定了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职责，把企业的经营权具体细化并延伸为 14 项具体权力，即：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等。(3) 在明确赋予企业经营决策自主权的同时，强化了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以保障所有者的权益。(4) 对企业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作出了明确规定。把企业结构调整明确为转产、停产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内容，对各种形式的调整及有关权、责、利的处理作了规定。(5) 依据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需要，对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作了原则规定，指出了政府转变职能和机构改革应坚持的方向，等等。尽管其中的一些具体规定有着过程性的特征，内容也有局限性，但它的出台，是对《企业法》具体内容的发展和完善，对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一些重要环节作出了明确规定，有着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贯彻落实《企业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大举措。

第六阶段，深化配套改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1991 年 9 月，中央专门召开工作会议，专题研究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前所未有的，进一步说明了中央对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视和决心。围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进一步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对企业改革开始进行全面探索。

这一时期，国家关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政策，集中反映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李鹏同志的讲话中提出的 20 条措施。主要内容是：增加企业技术改造投入；逐步缩小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指令性计划；适当提高折旧，逐步免征折旧上缴的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增加新产品开发基金，新提部分免缴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对银行利率进行调整；抓紧落实给予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继续对 234 户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实行“双保”，即保证资金支持和国家物资供应的分配；抓紧清理“三角

债”；进一步做好组建国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坚决治理“三乱”；降低国有工业企业的所得税，从55%降为33%，结合扩大税利分流、税后还贷试点，分三年完成；坚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继续贯彻《企业法》，健全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积极推进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搞好优化劳动组合，逐步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逐步实行聘任制；提倡实行以岗位技能工资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改善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方式，缩小指令性计划，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使企业按市场需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多渠道筹措技术改造资金，吸收外资，支持办技术先进企业；坚持从严治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切实加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把整个“八五”计划时期列为集中力量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效益的时期。

根据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这一时期，各级政府把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体改工作的重中之重，纷纷出台了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对策和措施。全国各省、市均以不同形式制定了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办法。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本地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颁布具体的政策措施，加强了对搞活企业工作的领导。

各地把搞活企业的着眼点放在转换企业机制上，加大了企业内部改革的力度，特别是通过深化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在打破“铁交椅”、“铁饭碗”和“大锅饭”上下工夫。努力克服平均主义，建立企业内部竞争机制，增强企业面向市场、参与商品经济竞争的能力。强调搞活企业要从全面贯彻落实《企业法》着手，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清理“三角债”等措施，积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明确要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坚持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积极发展企业集团。

这一时期，适应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要求，企业改革试点探索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在不断完善承包制的同时，新的承包经营试点、“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试点、组建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股份制试点等企业改革试点迅速扩大，各类改革试点在改革的不同方面进行了重点探索，积累了重要的改革经验，为改革的全面深化做了实践上的准备。

（二）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企业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是，着力进行企业制度创新，解决深层次矛盾，逐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奠定微观体制基础；着眼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存量结构，在结构调整中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探索解决历史遗留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债务包袱重、富余人员多和企业办社会等问题。

从此，企业改革从靠政策调整解决表象问题转向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深层次矛盾，从

偏重于进行企业内部单项改革进入到内外部结合整体推进宏观和微观体制改革，从偏重于搞活单个企业进入到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从偏重于统一形式和办法转向针对不同企业强调分类指导、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来看，都远远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生了质的飞跃。

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4 年，我国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外贸和外汇体制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

1995 年和 1996 年，江泽民同志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就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两次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八条基本方针和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指出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难点、重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明确要以“三个有利于”来判断国有企业改革的是非得失，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要狠抓落实，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路子，加快步伐。

1997 年 9 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明确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报告指出：要继续调整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一切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要按照“产权清晰，叔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并明确提出“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十五届一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1999 年 9 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 20 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阐明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针，确定了到 2010 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坚定不移地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目标，努力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至此，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针已经确定，战略思想更加明确，总体思路也逐渐清晰，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为核心、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攻坚阶段，企业改革以点、面结合的方式从多层面展开，不断向深层次推进。

第二节　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开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为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积累经验

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不断深化的改革，为企业的制度创新打下了基础，也把企业制度创新自然而然地推到了改革的前台。在1994年3月召开的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家提出组织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工作要求。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有关部门选择了一批企业作为国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预选企业，拟定了试点方案及配套文件。1994年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100户试点企业名单，并对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根据国务院原则通过的试点方案，试点主要从解决国有企业制度创新面临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入手，通过完善企业法人制度，确定试点企业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内部组织管理机构，改革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制度，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等推动企业制度创新；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探索解除企业债务重、冗员多、社会负担重等历史包袱，为企业制度创新创造条件，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同时，国务院还决定选择中国石化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有色工业总公司进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探索国家控股公司建立和运行的有效途径及方式。

这一时期，在国务院选择百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也分别选择了一批企业，参照国务院试点办法，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达2000多家。

经过三年多的艰难探索，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到1997年底，国务院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改制工作基本完成。除一家解体，两家被兼并外，其它企业分别

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改制，近 80 家企业已完成改制工作并进行了重新登记，其中 69 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试点企业普遍开展了清产核资、清理债权债务、界定产权、核定国有资本金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投资主体，初步落实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80 多家企业依照《公司法》建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公司章程，在形成公司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企业法人财产权逐步落实，百户试点企业充分运用法人财产权，对下属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共设立全资子公司 721 个，控股子公司 411 个，参股公司 570 个，促进了下属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很多试点企业还在降低资产负债率、分流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负担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探索企业制度创新的具体形式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财产组织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制度的重要形式。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通过企业产权关系的明确化和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改变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一国家所有的组织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权责明确、分工负责、相互制衡的组织领导结构，使企业的资本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企业行为逐步合理化、市场化。

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试点是从 1984 年开始进行的。1984 年 7 月，北京天桥百货商场进行股份制试点，开创了我国商业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先河；同年 11 月，上海电声总厂发起组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在工业企业中率先实行股份制。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试行。”报告肯定了股份制的实践探索。此后，许多地方着手组建了一些股份制企业，但截止到 1990 年以前，股份制试点只是在少数企业进行，也没有统一的政策。

从 1991 年开始，股份制试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试点规模明显扩大，股票市场逐步形成，法规不断完善。尤其是 1992 年，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指引下，股份制试点迅速扩大，各类法规不断出台，股份制试点进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

第一，股份制试点的法规和配套规章不断完备。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有关部委制定并陆续发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及股份制企业财会制度、人事管理等 15 个引导股份制试点健康发展的配套文件，加强了对试点工作的领导，使试点逐步迈向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第二，在对原有股份制企业进行规范化改造的基础上，仅 1992 年一年，就新批准成立了 400 多家股份制企业。截止到 1992 年底，全国股份制试点企业已达 3700 多家，有 69 只股票（包括 18 只 B 股）分别在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有关部门选择上海石化总厂等 9 家大型工业企业开始进行企业在境内外公开发行股票，并到海外上

市交易的试点。在以内部职工持股和法人持股为主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基础上，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逐渐增加，并开始了股票异地上市交易试点，试点企业的选择也逐渐转向大型工业企业。

第三，证券市场初步形成。1990 年 12 月和 1991 年 4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开张营业，1992 年国务院成立了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

这一时期，股份制试点的迅速扩大，是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国有企业转换机制进程的需要分不开的。股份制试点的效果表明，股份制对开辟企业新的融资渠道，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优化组合，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1993 年，在总结股份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国家要控股并吸收非国有资金入股，以扩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影响范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并提出："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这些论断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指明了股份制改革的正确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化。

1993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了《股票交易与管理暂行规定》，同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颁布，并于 1994 年 7 月 1 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等一系列《公司法》的配套法规也相继出台并实施，标志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逐步步入依法设立和规范发展的轨道。

1995 年 7 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决定对《公司法》颁布前设立的股份制企业依法进行规范。根据这一精神，国家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体改部门，在继续抓好股份制企业新设工作的同时，集中力量积极开展对原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工作。全国 5400 家原有股份有限公司中，经规范符合《公司法》规定、依法进行重新登记的约

3600家，转为有限责任公司约50家，因不符合条件依法撤销或变更为其它企业的约1600家。

几年来，围绕寻找适应市场经济要的国有经济更加有效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经历了艰难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股份制改革已经显示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一是进一步理顺了产权关系，通过确定国有股持股单位，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初步做到了产权清晰和权责明确；二是通过改组、改制，对原企业的资产结构、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了重组和调整，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企业的历史包袱；三是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企业组织管理机构，初步形成了分工明确、相互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企业实现科学管理提供了制度基础；四是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散化，既有效促进了政企分开，也通过形成来自投资者和市场的外部压力，强化了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二，开拓了国有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筹集了大量社会资金，促进了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1998年底，全国依照《公司法》设立或进行规范重新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7266家，注册资本达4733.63亿元。实行股份制改革以来，仅上市公司境内外筹资总额就达4072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投资和经济发展。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补充了资本金，促进了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资本扩张，增强和扩大了国有资本的增值力和影响力。

第三，为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截止到1999年8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920家，另有45家企业分别在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上市。我国股票市场市价总值达29655亿元，相当于1998年的37%左右，投资者开户数达4298万户。同时，已批准设立10家基金管理公司，发行15只证券投资基金，发行总规模350亿元。经过对证券经营机构的整顿和分类管理，一批规模较大、实力较强、运作规范的证券公司正在形成。

三、积极推进配套改革，为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条件

在积极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和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同时，面上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不断深化，为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创造了条件。

一是对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2年11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规范企业财务行为，统一会计核算标准，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并于1993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两个准则统一规范了我国境内各类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使我国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逐渐统一和衔接起来，是我国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企业基本制度的重要改革，对企业制度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在全国进行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从1994年开始用两

年多的时间，国家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核查工作。通过清产核资，全面清理了国有企业、单位的基本户数，基本查清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摸清了国有企业结构和分布状况。还采取政策措施如允许企业固定资产重估后增提折旧、清理出的损失挂账等历史包袱允许核销资本金、主动暴露问题可不追究违纪责任、企业贷款损失可适当冲销银行呆账准备金等，对企业清理出的部分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进行了核销，基本核实了企业资产，核清了国有企业家底。

三是《劳动法》的颁布和贯彻实施，推进了国有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国有企业职工就业方式的变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保险等各项改革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是通过贯彻实施《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加强了对国有企业财产的监管，促进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初步明确了国有企业财产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管理、分工监督和企业自主经营的相互关系，推动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一些地方开始启动国有资产营运体制改革，探索国有资产市场化经营的方式和办法。

五是国有企业存量资产流动和重组的步伐加快，特别是一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发挥城市优势，紧密结合城市发展规划，采取兼并、联合、破产、租赁、划转、出售、转让、合资改造和搬迁改造等多种方式，推动了国有企业存量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重组，促进了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

六是对化解国有企业历史包袱进行了探索。各地针对解决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富余人员过多、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从1996年开始，国家还选择了西安、宁波、长春和唐山四个城市进行城市国有经济债务重组试点，采取多种办法，探索解除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和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途径，积累了宝贵经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普遍加强，职工下岗程序和申报备案制度进一步规范，为全面推进企业制度创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截止到1998年底，全国有下岗职工的企业都建立了再就业中心或类似机构，大多数下岗职工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并且领到了基本生活费，企业离退休职工养老金基本做到按时足额发放。再就业工作力度加大，通过多种办法，1998年当年就有600多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第三节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企业重组和结构调整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十五

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条指导方针就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根据这些精神，中央、国务院确定了"抓大放小"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积极实施职工再就业工程"的方针，努力探索推进国有资产流动和重组的路子，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优化资本结构，实行优胜劣汰

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在一些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探索通过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调整国有企业存量结构的有效途径。首批选择了18个城市进行试点，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途径；通过多种方式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企业富余人员，促进企业增资减债，探索解决国有企业历史包袱、减轻企业负担的办法。把国有企业改革与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综合配套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试点的主要内容和政策措施是：

1. 多渠道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针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不良债务数额较大的情况，多方面共同努力增补企业资本金，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1994—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或批转，有关部委先后出台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增加国有工业企业自有生产经营资金办法的通知》、《关于"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有工业企业补充流动资本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将部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意见的通知》和《关于将部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允许试点城市财政部门将企业实际上缴所得税的15%拨给企业，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本，企业在提取盈余公积金之前，要将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补充流动资本；允许将试点城市企业的中央和地方"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以补充企业资本金的不足。同时，地方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如：上海市共提出了29项增资减债的具体办法，被概括为著名的"六个一块"，即"主体多元吸一块，存量盘活调一块，债权转股权换一块，兼并破产活一块，企业发展增一块，政府扶持补一块"。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

2. 加大优势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在试点城市组织实施"双加"工程（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加强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发展支柱产业、拳头产品和名牌产品，从整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

3. 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企业富余人员。针对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重、富余人员多的矛盾，采取措施进行分离、分流。按照国务院有关部委颁发的文件精神，并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各试点城市大多采取"先分后离"的办法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先将企业办社会职能独立出来，实行自收自支，逐步减少费用支出，待条件成熟再脱离企业

生产经营母体，并逐步由政府负担。分流富余人员的主要渠道是：开发新的生产项目，兴办各类三产；通过企业间劳务输出，调剂余缺；新建企业优先招收老企业富余人员；出资鼓励职工自谋职业，实行离厂离职、厂管养老或组织起来重新就业；对年老体弱职工实行提前退休或厂内提前退养；将富余人员分流到社会，进人劳动力市场或职工再就业中心，实施再就业。企业社会职能与富余人员的分流及相关社会保障工作的进行，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优化结构乃至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展开。

4. 实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针对国有企业能生不能死、破产难的矛盾，实施兼并、破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试点城市逐步铺开。为此，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先后发布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鼓励和支持18个试点城市优势国有企业兼并困难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后有关银行贷款及利息处理问题的通知》、《关于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中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允许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和破产财产转让所得优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职工，剩余部分再列入破产财产进行分配，银行因企业破产受到的贷款本金、利息损失，在国家核定的呆、坏账准备金额度内冲销，对被兼并企业原欠缴银行贷款利息豁免，贷款本金由兼并企业分期偿还，还款期内给予免息优惠，银行利息损失也在国家下达的呆、坏账准备金额度内冲销。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试点城市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促进了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

鉴于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取得的成效，国务院逐步扩大了“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范围，由1995年的18个城市增加到1996年的58个城市，1997年又扩大为111个试点城市，并逐年增加了试点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可冲销的银行呆、坏账准备金额度。

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在建立企业优胜劣汰机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兼并破产力度逐渐加大，国有企业长期“只能生，不能死”的状况开始改变，一些长期严重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关门破产，一些效益好的企业通过实施兼并，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同时盘活了被兼并企业的存量资产。

特别是职工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在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职工失业保障体系和实现再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障逐步形成制度，为进一步推进存量资产流动重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创造了条件。

二、实施“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

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提出，要“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从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到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是企业改革工作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国有企业数量众多，千差万别，大企业与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其经营管理的特点、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不能采取一种模式、一个办法，需要对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分类指导。“抓大放小”是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重要措施。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其在稳定经济、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和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骨干作用；另一方面，要放开放活量大面广的国有小企业，使之寻找更为适合自身特点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一）关于“抓大”

根据“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针，从1995年起，国务院决定抓好1000户重点国有企业。首批确定了300家优势工业企业。这300家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46.4%，销售收入占52%，利税总额占67%。对这些企业，国家采取了一些扶持措施，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第一，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制订改制方案，按《公司法》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按母子公司体制确定和规范企业集团的内部关系。对其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公司和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由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授权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其派出监事会，并允许组建财务公司，赋予自营进出口权，并选择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第二，建立资本金注入和补充机制。坚持自补为主，认真贯彻执行“两则”，落实企业的理财权。逐步把企业“拨改贷”资金和基本建设经营基金贷款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允许企业合理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加速折旧。结合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和资产保值增值双挂钩，鼓励企业走自我积累、增值的新路。国内债券和股票的发行优先考虑300户重点企业，不断增强他们的筹融资能力，鼓励和引导他们用有限的国有资本控制和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加速自身的发展和扩张。鼓励他们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实行跨地区、跨行业经营，重点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第三，在300户企业中实行主办银行制度，由企业与主办银行签订银企合作协议。企业和有关银行间实行计算机联网，银行在监控企业资金运行的基础上，对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评价，核定企业的合理流动资金占用量，并在核定的范围内按信用等级优先供给信贷资金。

第四，对300户企业优先选择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在符合条

件的企业建立技术中心，增强企业自主开发产品的能力。

1997年，国务院确定了新增的212户重点企业，把享受政策的重点企业扩大为512户。同时，为促进大型企业集团的组建和发展，国务院转发了国家计委、经贸委、体改委《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把国家企业集团试点由原来的57家扩大到120家，并调整和完善了集团试点的有关政策。逐步减少对试点企业集团的计划管理，把试点工作重点放在：明确母子公司国有资本出资人，逐步建立出资人制度，建立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增强集团公司的投融资功能，鼓励集团公司兼并收购其它企业，发挥集团在结构调整中的的主导作用；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加强监督考核，强化和落实资产经营责任；扶持若干特大型企业集团母公司成为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赋予其更大的营运资本的权利，使其加快规模扩张，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逐步成为以资本为纽带，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

1998年，“抓大”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120家试点企业集团基本享有了自营进出口权、对外担保权、外事审批权、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权。多渠道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取得新的进展，继企业“拨改贷”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后，企业基本建设经营基金贷款转为国家资本金的工作也逐步落实，企业可转换债券试点工作继续进行，还对部分国有重点企业和大型企业实行了授信额度等办法，促进了大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二）关于“放小”

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家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推动国有小企业改革与发展，形成了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重要决策。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又明确提出：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特别是县属企业，可以放得更开一些。放活小的有利于集中精力搞好大的，也有利于搞活整个国民经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将小企业改革逐步引向深入，成为国有小企业进入市场，在竞争中快速发展的原动力。这一决策，也是中央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不断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按照中央“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精神，1994年开始，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加大了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力度，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加快了改革步伐，国有小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各具特色、多层次探索的局面。小企业改革起步较早的一些地方，勇于探索，大胆实践，通过多种方式、多种办法放开、放活小企业，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对全国小企业改革的深化起到了示范

作用。

各地对小企业改革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涉及产权变动的改制形式，包括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出售、拍卖、兼并、破产、分立重组等；另一类是不涉及产权变动的改革形式，如：联合、承包、租赁、委托经营、托管等。不同的改革形式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国有小企业中推行，取得了显著成效。到 1997 年底，许多省市有 50%以上的小企业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改制、改组，进展比较快的山东省，小企业改制面已达 80%。

股份合作制成为各地小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据有关部门对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安徽等省市的调查，这些地方已进行改制的小企业中，有半数以上改为股份合作制，安徽省为 77.6%，江苏省达 80%。从各地的实践看，股份合作制是运用股份制原理组织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以劳动合作为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决策体现多数职工的意愿；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的出资人。这种形式；是劳动群众在我国改革实践中产生的，首先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种新形式，后来在城市国有小企业改革中被广泛采用，并不断创新和完善，成为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实践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截止到 1996 年，全国股份合作制企业已达 200 多万户，其中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已发展到 20 多万户。

值得一提的是，在“放小”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片面理解“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改革精神，用“一股就灵、一卖就灵”代替多种形式的改革，把“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卖”字，采取行政办法和搞运动的方式强制出售和变相出售国有小企业，搞“一卖了之”，甚至搞半卖半送、名卖实送，刮起“卖”企业之风，不仅误导了国有企业改革，而且造成了不良后果。

中央及时发现和指出了这种错误倾向，并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出售国有企业成风的问题。1998 年 7 月，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指出：“放小”是要“放活”，也是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小企业的重要作用，而不是“放弃”，不是撒手不管。放活国有小企业，有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实现形式，不能变成只有出售一种形式，统统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1999 年 3 月，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继续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小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需要出售的要按照国家规范的办法进行，坚决制止名卖实送、半卖半送和逃废银行债务及国家税款、规避安置职工的错误做法。”这些措施和精神，有力地制止了“放小”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引导国有小企业改革沿着健康轨道不断规范并逐步深化。

在规范“放小”的同时，国家加强了扶持小企业发展的工作力度。根据国务院精神，从 1998 年起，各商业银行分别成立了专门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机构，一些地方

和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从资金融通、技术创新、信息服务、人才培训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推动资产流动和重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国有企业生产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的资产结构和组织结构不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的矛盾变得愈加突出，不少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针对这些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加大了存量结构调整的力度。江泽民同志于 1995 年和 1996 年两次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讲话中分别指出：要推动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引导国有资产向高效益的领域转移，以利于更有效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要把经济增长的着眼点转移到国有存量资产的调整、改组和优化配置上来，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一些城市推动存量资产流动和重组，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有了突破。

北京一轻集团利用级差地租收益，对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实施“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退三进四”（生产厂退出北京三环线搬迁到四环线以外）的调整战略，不仅盘活了大量闲置和低效运转的存量资产，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集团产业结构和职工就业结构的优化，使一批困难企业获得新生，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北京一轻效应的带动下，上海、广州、武汉、青岛等城市，利用原国有企业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增值，通过土地置换和产业转移，不仅使国有企业存量资产价值得以实现，还有力地促进了国有经济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上海、武汉等城市，通过授权集团公司和组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作为国有资本营运主体，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营运，通过存量资产的重组和流动，大力推进原有企业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在调整国有经济存量布局结构、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益。

还有不少地方通过引进外地、外国资金改造国有老企业，在国有经济内部通过跨地区、跨部门的资产无偿划转等方式，以存量引增量，有力地促进了国有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盘活了大量资产。

1997 年开始，国务院决定以纺织行业结构调整为突破口，推进纺织、煤炭、石油和石化、冶金等重点行业的调整和改组，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新的进展。1998 年，国务院确定的纺织行业当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 480 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 50 万人，减少亏损 30 亿元的任务基本完成；煤炭行业“下放、关井、压产”工作顺利推进，94 户国有重点煤矿以及原随煤矿上收的 206 个事业单位已全部下放地方管理，有关取缔、关闭非法开采和布局不合理小煤矿的范围和政策已经明确，“关井、压产”工作正式启动。国务院还对石油、石化行业进行了重大改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顺利组建，实现了上下游、内外贸和产供销一体化，初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增强了石油、石化行业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逐步摆脱了被动和亏损局面。冶金行业联合改组的力度加大，唐钢兼并宣钢工作全面展开，邯钢兼并舞钢已初见成效。上海地区以宝山钢铁公司为主体组建了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为制止重复建设，发挥规模效益和技术优势探索了新路子。

但是，总体上看，资产流动和重组进展缓慢，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很多人对资产流动和重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观念上还存在一些误区，例如认为“流动必然流失”、“出售国有企业就是搞私有化”等的观念仍然禁锢着改革的探索，国有存量资产滞死状况仍很严重；国有资产投资营运主体不明确，难以形成有效的流动和重组机制，存量结构调整困难重重；一些地方用行政计划的方式搞破产、兼并，支付了大量成本，促进存量结构调整的效果不显著；不少地方大量采取行政捏合的办法组建企业集团，利用行政命令搞“拉郎配”式的企业兼并，还有的地方把国有企业“一卖了之”、刮风“卖企业”等等。这些问题表明，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战略不明确，缺乏总体部署，中央和地方在资产处置上的权责不明，导致各取所需，各行其是，阻碍了资产流动和重组的步伐，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改革实践证明，中央确定的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改革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和改组国有企业，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是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措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进一步推进资产流动和重组，需要在确定布局调整方向，明确各方面权力和责任，形成有效的国有资产流动机制上下工夫。

第四节　努力实现政企分开，探索建立新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既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和十五大提出的积极推进机构改革的精神，近几年，国家逐步加大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在推进政企分开、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探索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机制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随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展开，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系的要求愈加迫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对国有资产要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

自主经营的体制，提出要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按照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原则，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系；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原则，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法人财产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和机制，建立与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度。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国有资产，授权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经营国有资产。要确保出资人到位。允许和鼓励地方试点，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这些论断和要求，初步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原则和目标，推动了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系的改革实践逐步展开，并走向深入。

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实施了《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以理顺国有企业财产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分工监督和企业经营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对企业国有资产（当时称国有企业财产）的监督、管理体制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或者有关机构，对指定的或者其所属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根据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有关部门或者有关机构，对指定的或其所属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提出了分级管理和分工监督的基本框架，明确监督机构通过向企业派出监事会的形式落实监督责任，主要履行监督评价企业经营效益和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向派出监事会的监督机构提出对厂长（经理）任免（聘任、解聘）及奖惩的建议，以及根据厂长（经理）的要求提供咨询意见等职责。同时规定，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依法独立支配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政府和监督机构不得直接支配企业法人财产，监事会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权。

为保证实施效果，国务院授权部门和机构陆续向部分重点企业派出了监事会，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办法，加强了对国有企业财产的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建设、信息整理和统计报告、对国有资产总体经营状况的考核等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在完善原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国有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暂行办法》和《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加强了对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产权界定、资产评估、产权变动、清产核资和资产经营工作的管理，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的制度基础初步形成。

根据中央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有效形式的精神，一些地方开始了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制的改革实践。上海、深圳、武汉等地先后进行大胆试验，尽管具体设计有所区别，实质上都是通过成立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机构、国有资产营运机构，并授权营运机构行使其授权范围内的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所有权，形成由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机构、授权投资营运主体和营运主体投资、持股的企业三个层次构成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系，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积极探索构建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和国有资产营运机制的具体途径。

率先试点的上海市，1993 年成立了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依法代表国务院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研究制定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大决策，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作为国资委的办事机构，行使国有资产管理的日常工作。国资委和国资办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法规、规章，并负责组织实施和检查、监督；负责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产权纠纷处理以及信息、统计报告等基础管理工作；决定市国有资产营运机构的设立、授权营运资产范围和数量、营运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及其收入、待遇；决定上海市国有资产的投资方向和调整战略，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决定国有资产收益收缴和分配，制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考核国有资产营运效果并决定对有关人员的奖惩等。通过对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授权、组建和将原企业主管局改制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等方式，成立了由集团公司、控股公司、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等几十家独资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构成的国有资产营运机构，依法行使被授权和其投资企业的国有资产出资人所有权，投资和营运其持有的国有资本，并通过合资、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等手段，实施国有资产布局调整，不断提高国有资产营运效益和质量。由资产营运机构对原有国有企业分别进行多种形式的改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通过配套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几年的试点，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系初步形成，特别是通过营运机构的资本运作，大大提高了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推进了国有资产产业布局结构、企业劳动力结构、企业产品和组织结构等的调整，大大加速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力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深圳、武汉、青岛等地的试点，也取得明显进展。这些试点地区对国有资本营运体系的构建途径、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具体组织形式、资本营运机构的职能以及配套体制改革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要求，在强化国有资本营运上下工夫，要以建立国有资产营运体系为重点，构建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大力推进国有资产存量布局调整，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现从整体上搞活城市国有经济的目的。这些改革试点，都从不同方面、不同重点地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实行稽查特派员制度，努力推进政企分开

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与脱困目标，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决定专业经济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并相应试行稽查特派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其目的是在政府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放手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同时，强化政府对企业的监管。

根据十五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关于推进机构改革的决定，199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并实施。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精神明确提出：专业经济管理部门都要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职能，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把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明确为：政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负责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国有资本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不能损害所有者权益。按照这些规定，伴随国务院机构改革，专业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政企分开的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工作已于 1998 年基本完成。适应政企分开的新探索，为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国家决定试行国有企业稽查特派员制度。1998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务院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方案的通知》下发执行，初步明确了建立稽查特派员制度的基本内容和要求，7 月，《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条例》发布实施，进一步就建立稽查特派员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

稽查特派员制度的核心在于解决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后，建立所有者对企业财产运营的有效监督问题。根据规定，稽查特派员是“国务院派出的国有企业稽查特派员”的简称，稽查特派员由国务院任免，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行使监督权力。稽查特派员的主要职责是以财务监督为核心，对企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情况、资产经营状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主要负责人员的经营业绩进行检查、监督和评价，对被稽查企业主要负责人员的奖惩、任免提出建议。稽查特派员与企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主要任务是查账，不参与、不干预被稽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特派员办事处，一般通过听取汇报、提出质询、查阅企业会计及其它资料、听取职工意见、向其它有关机构了解情况、调查核实等，开展稽查工作。稽查特派员签署的稽查结论报告，经由人事部分别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再报送国务院审定。有关部门和机构根据国务院审定的稽查报告中有关对被稽查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奖惩、任免建议，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奖惩、任免事宜。《条例》还对稽查特派员及其助理的任职条件、工作纪律、奖惩办法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试行稽查特派员制度，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的重大举措，是国家对管理国有企业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积极探索。

实践证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不断扩大，由于国有企业监督、约束机

制不健全，国家对国有企业监督不力的问题日益突出，加上其它原因，企业做假账、财务管理混乱已不是个别现象，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些问题触目惊心。稽查特派员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适应政企分开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对国有企业资产经营状况监督不力的漏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第十一章 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发展

活跃与丰富市场，建立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经过50年，特别是近20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市场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市场体系日趋健全，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关系逐渐合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第一节 价格形成机制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

价格是市场交换关系的核心。实现由计划分配关系向市场交换关系的转变，确保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关键在于建立新的、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调控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对价格的形成机制和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调整和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建国初期稳定物价的斗争与计划价格管理体制的形成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面临的是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局面。从1949年10月15日至11月25日这42天里，上海批发物价指数同10月上旬相比上升了326.2%，最高时达到每天上升20%—30%。其它大城市的物价也在飞涨。这是抗日战争以来12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延续，也是投机资本操纵市场、政府财政赤字庞大的后果。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1949年7月成立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8月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提出了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对策：抓紧征粮征税；发行公债；成立全国性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集中掌握几种重要物资。从此，拉开了抑制通胀，与投机资本较量的序幕。接着，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和老解放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与投机资本作斗争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初步取得了稳定物价的主动权。之后，政务院又于1950年3月3日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使用实行统一管理。从1950年3月开始，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到1952年12月，物价已基本稳定。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中，新中国结束了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局面，为安定人民

生活、恢复发展生产、巩固新生政权创造了基本条件。这一成就至今仍为国内外经济学界称道。其主要经验在于：加强金融管理，实行“紧”的货币政策，惩办金融投机首要分子；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和市场规则，调运足够的物资集中抛售，用经济办法战胜投机资本；发行折实公债，适度增加税收，实行“紧”的财政政策；统一财经、紧缩编制，从体制上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深层隐患。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部分消费品批发价格由中央贸易部管理。当时政府管理的主要为粮食、棉花、棉纱、棉布、食盐、煤炭等少数主要产品的收购价、批发价、地区价和批零差价，至于零售价则由各大区按照规定的地区差价、批零差价作价，其余商品定价由市场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价格管理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商业部管理的价格品种范围有所扩大；重工业产品的价格由国家计委成本物价计划局管理。“一五”计划的后期，对价格管理体制作了调整，并成为以后价格管理分工的准则：在农副产品中，凡是属于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由各商业部门规定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小土产和由地方政府确定为本地统一收购的物资，价格由地方政府管理，但是应当参照中央各商业部门掌握的价格水平，每年由中央规定统一升降的幅度。工业品方面，国家经委统一调拨的，或者各工业部所管的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收购价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调拨价格办理；其它所有工业品的收购价，按照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原则，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主要市场和主要商品由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次要商品和次要市场由省、市、自治区根据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定价原则自行定价，并且注意协商毗邻地区的价格调整。至此，形成了政府统一管理价格的基本格局，此后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各个时期的差别仅在于政府对于物价的具体调整状况。

“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新中国建立之初，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限期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 年 6 月 10 日，上海解放才半个月，军管会断然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 200 余人逮捕法办，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面）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又进行了“米棉之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陈云指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看我们掌握市场主要物资有多少。他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和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当 11 月 25 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自此，新中国初步取得了稳定物价的主动权。

1958 年 5、6 月间召开的全国市场物价会议确定今后的物价方针是：在继续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合理的价格，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调整。1962 年，为加强对物价的统一管理，成立全国物价委员会。商业部门对物价的管理要接受同级物价委员会的领导。1963 年初召开的全国物价会议研究了调整物价问题。决定在物价总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不合理的部分商品价格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1963 年先后调整的物价主要有：把农村的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到同收购价格持平；把城乡销售的工业用粮提高到不亏本的水平；对各地棉花收购价格平均提高 10%。同时，适当提高蚕茧、畜产品、木材和绸缎的价格，调低家禽、蛋品、海带、金笔、收音机、塑料制品等价格。重工业产品价格有升有降，降价的有农业机械和中小农具等。其后，又对少数消费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作了有升有降的调整。1964 年，陆续大幅度降低了医药商品的销售价格，多次降低了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的销售价格，调整了农村粮食销价。1965 年又调整了城镇粮食销价。提高煤炭出厂价和销售价，平均每吨提价 1.9 元。1966 年粮食收购价格平均又提高了 17.1%，并相应调整了销价。1965 年和 1966 年，全国物价委员会提出调整物价的五年规划，因为爆发“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直到 1971 年，才又开始对某些极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调整。

总的来看，1957 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价格管理体制也越来越集中，排斥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偏低，内部比价不合理；工业产品价格高低悬殊，企业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起跑线；有些商品价格购销倒挂严重，如改革之前实行价格补贴的粮食、絮棉、食用植物油、边销茶、农用柴油、农业用电等近 10 个品种，补贴金额 1978 年达 93.86 亿元；各种差价管理偏紧，有些商品取消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实行全国一个价，品种差价也难以体现；部分服务行业的收费标准偏低，致使服务行业发展缓慢；等等。各种价格及服务收费标准严重扭曲，致使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难以反映供求关系。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关系难以理顺，经济结构严重扭曲，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二、价格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价格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20 年的价格改革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的准备阶段（1979—1994 年）。

这个阶段，国家采取有计划地调整价格结构为主的办法，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先后进行了 6 次较大规模的价格调整。具体来讲，一是从 1979 年开始提高了粮食、棉花等 18 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高达 24.8%；并对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了超购加价政策，扩大了议价收购范围。二是提高猪、牛、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牛奶等八类副产品及有关制品的销售价格，平均提价幅度约

30%，同时相应给每个职工和城镇居民每月5元的（牧区为8元）副食补贴。三是提高了煤炭、铁矿石、生铁、钢锭、钢坯、部分钢材和有色金属、水泥等产品的出厂价格，并从1983年开始在辽宁、山东等6个省区的生产统配煤的矿务局试行超产加价。四是1981年11月提高了烟、酒、竹木制品、铁制品、陶瓷制品、皮革制品的价格。五是有升有降地调整工业消费品价格。一方面降低了涤棉布、锦纶弹力袜、电视机、手表等产品的价格；一方面适当提高棉纺织品的价格。其中涤棉布与棉纺织品降提价金额均为24亿元，手表、电视机等降价金额为3亿元。六是1983年12月提高了铁路货运价格和水运的客货运价，其中铁路运价提高幅度达21.6%。

通过一系列调整措施，1984年与1978年相比较，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近50%，工农业产品比价缩小了30%。同时对燃料、原材料与加工工业产品比价不合理的状况也做了初步调整，1984年与1978年比较，煤炭价格提高38%，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的矿产品、原材料价格平均提高了50%左右，轻工、纺织、医药等工业消费品价格有升有降，升降金额大体持平，电子产品价格有所降低，降幅达20%左右。

与此同时，这个阶段还对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主要是下放了部分价格管理权限，逐步放开了小商品和部分农产品价格，对部分机电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改革价格管理形式，即由单一的国家定价形式变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自由价格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比较灵活的价格管理形式。主要是：(1) 实行计划指导下的自由价格。规定钢铁企业从1979年起，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销一部分钢材；1982年9月和1983年9月先后放开了160种和350种小商品价格；到1984年10月6日，国家物价局发出通知，“除了各级政府必要管理的小商品外，其余全部放开”，实行工商协商定价；逐步提高农副产品议价收购的比重。(2) 对生产资料类的电子产品实行国家指导价格。二是逐步扩大企业的定价权限。具体包括：(1) 在部分企业进行企业定价的试点。试点企业可以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制定浮动价格和新产品试销价格。(2) 在部分（钢材、煤炭、石油等）生产资料中实行“双轨制”价格，即同一种生产资料中，一部分实行国家定价，另一部分实行企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定价。(3) 进一步扩大了工商企业的定价权限。1982年7月7日，国务院公布了《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将企业定价权由试点企业扩大为一般工商企业，并扩大了定价的权限。三是调整了中央和地方的价格管理权限，初步改变中央对价格管理高度集中统一的格局。主要包括：调整中央机关之间的价格管理权限，将一些直接有国务院管理的价格下放给国家物价局或各业务部门管理；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价格管理权限，将一些原来由国家物价局和各业务部门管理的价格下放给省、市、自治区和企业管理；各省、市、自治区内部的价格管理权限也相应进行了一些调整；逐步扩大企业的价格自主权。

这一阶段的改革调整，由于重点突出，措施稳妥，力度适当，初步调整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改变了原来不合理的价格结构，改善了一些重要行业的生产和经营条件，支持了一些重要产品的生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为进入实质性的改革阶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阶段：价格改革的初始阶段（1984—1992年）。

这个阶段，价格改革从“调放结合，似调为主”转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开价格为主要内容，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为重点，出台了3次较大的改革方案：一是放开了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改革农产品购销价格体制，实行合同定价制度，同时取消粮油统购价格。从1985年起，除粮食、食用植物油的合同定购部分及棉花、烤烟、糖料等少数几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由国家制定外，绝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二是先在1985年放开了缝纫机、国产手表、收音机、电风扇等5种工业消费品价格，接着在1986年又放开电冰箱、自行车等7种工业消费品价格；1988年再放开了13种名烟名酒的价格。三是工业生产资料继续实行价格“双轨制”。首先于1984年对生产资料计划外部分实行加价20%的办法，1985年初改为计划外部分实行议价。

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初步形成了中央、地方、企业分级管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多种形式并存的价格形成和价格管理的新格局。到1988年，在全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中，国家定价的比重已下降到大体占50%，其余50%的商品和劳务实行国家指导家和市场调节价。其中，农民出售的农产品总额中，属于国家定价部分降至24%，实行国家指导价格部分（生猪、大路菜等）占19%，其余57%由市场调节；在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部分占29%，国家指导价部分22%，市场调节价部分49%；重工业产品国家定价部分60%，浮动价格、议价销售部分40%。此外，还通过价格调整，使不合理的价格结构有所改善，农产品和基础工业品价格偏低的状况有所好转。1978—198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144.5%，比同期农村零售物价上涨率高83.1个百分点，比销往农村的工业品价格上涨率高106个百分点，同样数量的农产品可以多换76.5%的工业品；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上升了64.5%，其中采掘工业产品上升近1倍，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上升72%，制造业产品上升33%。

由于1985年后宏观经济环境日趋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加上前几年价格改革与其它方面的改革不配套，导致价格改革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的有差距，1988年4、5月一度提出的价格改革“闯关”又因抢购风潮的出现而未能实施，价格改革面临的宏观环境问题重重。所以，在治理整顿初期，主要任务是要把高幅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较多地运用行政手段，加强对物价进行控制，如冻结或半冻结部分重要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对原来已经放开的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关闭了一些产品市场；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国家专营等。从1989年起则对突出不合理的价格进行适当的调整。主要包括：1989年夏提高粮棉油收购价格，9月份大幅度提高铁路、水路和航空客运票价，11月份提高食盐和盐制品销售价格，年底调整了人民币汇率。

经过治理整顿，物价上涨得到抑制，一些耐用消费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从而为价格改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宏观经济条件和时机。价格改革又重新定位，进入90年代后价格改革的力度逐渐加大，如重新开始下放治理整顿初期被收回的价格管理权限，放开了许多商品的价格，取消了部分商品实行的提价申报制度、差率、利润率等控制办法，并对价格放开后政府如何进行调控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同时，调整了原油、成品油、统配煤、钢材、铁路运价等一系列重要商品的价格和邮电资费，尤其是1991年5

月提高粮油统销价格，是向计划经济体制最坚固的堡垒发起的有力冲击，打破了几十年没有触动的敏感禁区，为更广泛地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还调低了人民币与外汇比价。

第三阶段：价格改革的深化阶段（1992年以来）。

1992年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后，价格改革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新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继续放开具有竞争性的商品价格。1992年下半年，原国家物价局通过修订和颁布新的《价格管理目录》，大范围地取消了价格管制，使中央直接管理价格的商品由737种减为89种。市场价格在价格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实现。具体内容包括：先调后放，彻底解决粮食购销价格倒挂问题；放开原来尚未放开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工业生产资料大部分并轨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绝大部分进口产品实行代理制；大幅度地调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能源、原材料价格。从而确立了市场价格在价格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二是建立健全价格宏观调控体制，提高价格管理水平。在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市场调节份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价格调控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充实了价格调控的经济手段，为实现调控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建立了全面、准确、及时反映价格总水平变动的价格指数体系，从宏观上监测市场价格的变化。

三是加强价格法制建设，探索价格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1997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颁布和199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及与其配套法规的逐步制定和完善，标志着我国价格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它对于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起到重要的作用。

20年的价格改革，虽然几经曲折，但总的来说，成就是显著的。

——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市场机制在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形成中已起基础作用。1978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分别为97%、100%和92%。经过20年价格改革后的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93%的零售商品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决定；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中，81%的重工业品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决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79%的农副产品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决定。1998年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管理的价格（包括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已由1978年的1336种（类）减少为58种（类）。

——在价格体系方面，严重扭曲的差价和比价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农产品内部种植业特别是粮价偏低的状况有所改善；工业品内部基础产品价格偏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偏高的比价从总体上在改变；从工农业产品比价看，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品价格偏高的“剪刀差”关系从总体上有较大的改善。1998年同1978年比较，农产品收购价格大约提高4.2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已接近国际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虽然也有所

提高，但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此外，商品的差价关系已基本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地区差价、质量差价、季节差价都趋于合理。

——在价格宏观管理方面，初步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价格向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并以经济手段为主，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相结合并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新的价格调控体系的转变。

当前，我国价格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定价主体行为还有失规范，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明显滞后，少量政府管制的商品及服务价格尚未形成可操作性的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定价方法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以“企业自主定价、市场形成价格、政府间接调控、社会全面监督”为基本内容的，能够使价格结构经常趋向和保持相对合理，从而有效优化资源配置的，具有高度灵活性和自动调节特点的价格形成、运行和调控机制的新体制。我们要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价格管理经验，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价格法律体系，规范定价主体行为，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步伐，使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与商品和劳务价格改革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价格形成的市场化。

第二节　流通体制改革与商品市场建设

流通体制的改革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市场的建设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对传统的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内的流通体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实现了由以统购包销、统购统销、统负盈亏为特征的单一所有制经济形式、单一商品流通渠道、单一企业经营方式、多个流通环节、封闭式计划流通体制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少环节、开放式流通体制的转变。国有流通企业逐步由政府的附属物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转变。政府管理也由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宏观调控转变。与此同时，商品市场发育日趋成熟，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市场体系正在形成。

一、改革开放前单一流通体制的形成与变动

从建国之初至50年代中期，为了统一物价、稳定经济形势，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我国逐步形成了以统购统销为基本特点的商品流通体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国家集中过多的弊端。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我国开始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1957年11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的要求。可是随后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这一规定难以正

常推行。“大跃进”时期，又将参加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小商贩，以及个体零售商业网点过渡到国营商业，关闭了集市，逐步形成了主要用行政管理商业和由国营商业一家独办、计划分配的格局。这使已经进行的探索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国家从1960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在商业方面，自1961年起，政府逐步改进了商品购销形式，对农产品试行了奖售、超产超购超奖、换购以及议价购销，对工业品在继续采用统购统销的同时，允许某些日用工业品分别实行订购、选购和厂家自销等经营方式；拓宽了流通渠道，在坚持国营商业是商业主体和领导力量的同时，强调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承认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推行了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对商业流通体制的上述调整和改进，促进了与国营商业并存的其它经济成份的商业、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和商业经营方式发展。1962年底，全国基层供销社全面恢复，一度销声匿迹的集市贸易也有所发展。物资流通系统建立了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和服务队，开展代购、代销、代加工、代托运和物资调剂，促进了生产资料流通的顺利进行。这次调整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所谓“流通中心论”、“利润挂帅论”等的批判甚嚣尘上，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使得商品流通领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产品统一调拨分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凭票定量的品种不断增加。省以上国营商业计划管理的工业品种，从1957年的98种增加到1979年的131种，几乎形成了无所不包的局面。与这种分配型管理方式相适应，还按行政区划设置批发机构，实行固定供应区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作价率的办法，形成了单一渠道、封闭式、分配式、多环节的批发体系。供销合作社被重新并入国营商业，违背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走上了“官商化”的道路，经营机制日益僵化；合作商店一部分被并入国营商业，一部分被赶到农村，一部分被砍掉；个体商贩全面萎缩，1975年全国个体商贩仅存8万人，只有1964年的15%；集市贸易一振萧条，到1976年底，农村集市仅存29227个，比1965年锐减7770多个。对商品经济与商业流通的限制和打击，导致了市场的萎缩和货源的紧缺。

市场呆滞，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商业网点奇缺，商业经营机制失灵，买难卖难日益严重。至1976年，商业流通领域同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一样，陷于严重的困难。严峻的现实呼唤结束这种局面，实行彻底的改革。

二、流通体制的改革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流通体制改革自70年代末开始启动，经过20年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一）改革开放初期流通体制的改革（1978—1984年）

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1. 调整和改革商业所有制结构，拓宽流通渠道。

（1）鼓励发展集体合作商业和恢复供销社的本来面目。1980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提出了发展新集体商业的政策和措施。1983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发展城乡零售商业、服务业的指示》和《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肯定了城乡集体商业、饮食服务业、修理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要求尊重集体商业的企业自主权和财产所有权，其资金和财产任何单位不得挪用和抽调。此后，集体商业如雨后春笋，自1978年到1984年，城乡集体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由62.3万个猛增到159.4万个，增长150%；人员由不到200万发展到815.9万，增长3倍多；经营总额达1337.2亿元，是1978年的11.6倍。与此同时，供销合作社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批转的《1981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恢复基层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1983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肯定了供销社改革的方向和试点经验。1984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供销合作社要在农民入股、经营范围、劳动制度、按劳分配、价格管理等五个方面有所突破。同年底全国社员股金发展到9亿元，比1981年增长1.5倍，比1983年增长3.21亿元。供销合作总社还于1981年6月印发了《供销社贸易货栈管理试行办法》，使货栈贸易得以迅速恢复。这对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发挥了作用。

（2）恢复和发展个体商业。1979年10月，国务院在批转的一份报告中已指出，要在发展集体商业服务业的同时组织城乡待业人员走街串巷，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修理和服务性劳动。1981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对个体商业的性质、对象、原材料来源、资金、税收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1983年和1984年，国务院又先后发布了有关农村和城镇个体经济问题的补充规定，为个体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个体商业的兴起很快成燎原之势，为改善城乡人民生活起了拾遗补缺作用。

（3）集市贸易迅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此后，农村集贸市场和城市农贸市场在各地相继重新开放，并呈迅速发展之势。城乡集市由1976年底不到3万个增长到1984年底的56500个；成交额直线上升，1984年已达457亿元。这一时期长短途贩运日渐活跃，有力地推动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1984年全国已达1000个，比前一年翻了两番。一些综合性市场和新型专业市场也不断涌现，出售的商品逐步由小商品、低档商品向大商品、中高档商品转变。

（4）开展工业品自销。改革之前，长期实行的商业部门包销工业品的政策使工厂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与市场严重脱节，缺乏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和压力。1978年下半年，商业部门尝试改革工业品购销方式，开始拥有了部分自由选购权利，工业部门在启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之后，也开始拥有部分产品自销权。几年间，全国县以上工业自销机构相继建立，自销商品的零售额逐年上升。商品流通增添了新的通道，减少了中间环节，加速了商品流通，扩大了产品销售。同时企业能够及时获得市场反馈的信息，有利于改进产品质量，完善产品性能，提高企业效益。

2. 进行批发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环节。

为了提高流通效率，我国自70年代末便开始探索改革国营三级批发站的体制。1980年，允许三级站在本省范围或毗邻省区直接向产地二级站进货，不再经销地二级站中转。1981年，允许本地零售商店和外地批发商店直接从二级站进货。1983年2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进一步打破了批发商业中长期实行的按照行政区划、行政层次、固定供应区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扣率的批发限制，开始实行按批量作价、开放式经营，各要货单位可以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就近直接向生产者或商业批发机构进货。批发企业开始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相互之间变成平等的经济业务关系。1984年全国各地还逐渐建立了一大批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贸易中心。这些贸易中心，按经营范围分，有综合的、专业的。按经营形式分，有经营型、服务型和综合服务型。按组织形式分，有独立体，也有联合体。一些城市（如重庆）的贸易中心做到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采取自营、联营、联购联销、代购代销、代储代运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对发展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横向经济联系，打破封闭式、分配式的旧批发体制，建立开放的、多渠道、少环节的新型批发体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实行多种经营方式。

中央于1979年开始进行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提出在国家统一政策、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范围涉及自有资金处理权、定价权、购销权和人事权等。1982年5月，商业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国家物资局联合颁发了《国营工业品零售企业管理条例》、《国营饮食服务企业管理条例》、《国营三级批发企业管理条例》，对企业的权限和责任作了进一步规定。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也被“嫁接”到商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最先从饮食、服务和副食品行业及小型零售企业开始起步。1982年10月，商业部在召开经营责任制座谈会上提出了《商业部关于实行商业经营责任制的意见》的报告，对商业经营责任制的内容形式，合理确定利润基数和超额分成比例等作了阐述。当年，商业系统（包括粮食、供销社）实行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已达47400多个，占全部独立核算单位的35%。对于大中型国营企业，经营责任制以承包利润指标为主要内容，具体形式有：利润包干、利润基数包干、利润递增包干、全额利润分成、亏损包干等，主要是解决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分配问题，通过确定企业的利益机制调动企业的积极性。1983年全国推行利改税之后，又开始着手企业内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把企业的经营成果同职工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做到全面考核、按劳分配、奖勤罚懒。经营承包制对增强企业活力和内部动力，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增进效益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外，大中型商业企业还在股份制试点方面进行了探索。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并公开发行300万元股票，成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试点单位。

在商业经营管理改革方面，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搞活流通，企业开始实行多种经营方式。在购销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统购统销、统购包销、派购、议购的旧格局，出现了订购、选购、联购联销、代购代销、特约经销、预先付货分期付款等多种形式，还建立

了工商联营、商业联营、农商联营、农工商联合体。

第四，突破生产资料不能作为商品流通的束缚，试办物资贸易中心。

在这一时期，物资流通部门冲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做为商品流通”的框框，开始打破旧的调拨体制，按市场办法组织一些生产资料的流通。1981年6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物资总局《关于全国物资局长会议汇报提纲》中指出：“一般的生产资料实行自由购销”，“要试办物资贸易中心”。1984年底，各地物资部门在60多个城市和10多个县先后建立起110个物资贸易中心，其中综合性的有77个，专业性的33个。这些中心为供需双方直接洽谈业务提供了场所，打破了地区、行业界限，疏通了供销渠道，尤其为集体、个体企业获取生产资料提供了必要的采买场所。进入贸易中心购销的物资一般都实行浮动价，有利于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物资企业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包括物资企业之间、物资企业与工业企业之间的联营，这对于精简层次，减少环节，广开资源渠道，加强经济的横向联系，形成开放式的物资流通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二）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1984—1991年）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把农村改革推向全面，也把流通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1984年至1991年的这一时期，流通体制改革主要围绕这样一些方面展开：

1. 深化物资流通体制改革，扩大市场调节范围。

与大幅度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改革相适应，我国对物资流通体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根据1984年10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从1985年起，物资管理系统大幅度缩减了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目录，由1980年的256种缩减至1987年的27种。各工业主管部门管理的产品由1980年的581种缩减为496种。由国家计委和商业部实行计划管理的工业品也由1980年的131种减至1985年的14种。与此同时，计划外商品的价格也陆续放开，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至1992年，沿海地区生产企业所需物资的90%以上，大型企业所需物资的75%以上均是通过市场采购解决的。

2. 深化商业批发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批发体制改革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推进。1985年，商业部将上海、天津等19个工业品一级站放给所在城市。到1986年底，各省区所属的二级站，下放517个。有些省还把农副产品的批发环节也下放到了市、县。批发权的下放，再加上按行政层次逐级批发的方式被打破，为组建不分层次的多头批发网络提供了条件。工业品以城市为中心，农副产品以集散地为中心，不受行政区划和行政层次限制，使开放的、多渠道、少环节的新型批发体制得以逐步建立。

在打破原有僵化的三级批发体制之后，需要按照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探索新的商业批发形式。1986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单位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广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是改革商品流通体制的关键，应作为重点工作，大力推进。自此，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相继出现。这种结合程度不同的联

合体大致有几种形式：一是商品购销联合，有商商联合、工商联合、农商联合，根据各方意愿分别实行联购分销、分购联销、联合购销、经销和代销。二是生产销售一条龙式的联合，即商业部门同工农业生产者之间的联合，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利润分成。三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城乡之间、城城之间、区域之间的联合。横向经济联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联合方式不断翻新，以工商骨干企业为依托的大型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勃然兴起，产销一条龙式的联合成为主导潮流。联合程度有紧密型、半紧密型和松散型等。横向联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工商、农商、商商之间互相争利、扯皮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分割、城乡分割、部门分割的桎梏，摆脱了过多的行政干预，从而促进了生产，加速了流通，为形成科学合理的流通体制，减少流通环节，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

此外，横向经济联合还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商业企业集团，逐步形成了一批跨行业、跨地区和跨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集团和综合商社。到 1990 年，全国各类商业企业集团已达 110 多个。

3. 深化商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在大中型企业推行承包制，对小企业“改、转、租”。

伴随 80 年代中后期全国大规模推行国有大中型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大范围展开。1987 年，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的已占总数的 61.2%，供销合作社中实行承包的企业已超总数的 90%。商业企业的承包以“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为原则，硬化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加强了对企业的利益诱导和经济责任。同时，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区、行业、企业制宜，创造了“两保一挂”、“两保两挂”、“利润递增包干”、“减亏分成”等十多种适应商业特点的承包形式。80 年代末的“治理整顿”时期，针对承包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在完善企业激励机制的同时，强化了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实行了先审计效益、后兑现合同的制度。有的地方还试行了“共保合同制”，“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全员资产承包制”等新的承包办法。到 1990 年，大中型商业企业普遍实现了承包制。与此同时，承包企业还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采用先进管理方式方面做了很大努力。

国有小型商业企业实行了以“改、转、租”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仅 1985 年，进行上述改革的小企业就达 64671 家，占同类商业小企业总数的 75%。1986 年，北京市公开出售 30 多家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开创了买卖国有企业的先河，为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增添了一条新的途径。

对国有小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

所谓“改”，即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并按国家对待集体企业的政策和办法进行管理；“转”，即将国有小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的固定资产连同国拨流动资金实行有偿转让，分期归还，还清后归集体所有；“租”，即租赁给集体经营或个人经营，经营者在缴纳租金、税金和规定的其它费用后，利润归经营者

自主支配。

此外，以1988年再次修改宪法为标志，我国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私营商业自此又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流通领域的经济形式。

随着商业企业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政府还进一步推进了商业系统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改革。1988年，再次没立物资部，开始探索由“部门管理”向“全行业管理”的转变。自80年代中后期，商业企业自主权进一步扩大。1991年重庆市对企业的“四放开”（即经营权放开、价格决定权放开、用工权放开、分配权放开）的改革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半数以上商业企业。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流通体制（1992—1999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揭开了中国改革全新的一页，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流通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1. 推进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流通领域对外开放。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的改革开始转向全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到1995年，各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已达500多家，其中股票上市公司近40家。9家内贸企业进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1998年，各种形式的商业股份制企业和股票上市公司有了大幅度增加。通过联合、兼并、股权置换等多种产权重组形式组建企业集团，一批年销售额100亿元以上的大型流通集团脱颖而出。国有小型商业企业则因地制宜，从本地本行业本企业的实际出发，采取股份合作制、承包、租赁、出售、兼并等多种形式，有效地增强了企业活力。

自1993年起，我国商业流通领域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该年年底，5个地区、6个城市的中外合资零售企业有12家正式运营。随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步伐的加快，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潜力越来越大。粮食、棉花、食油、食糖、化肥等重要商品的进出口，起到了调丰补歉、稳定市场和物价的作用。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内贸企业，坚持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增强了活力，为自身开拓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了流通的产业化进程。随着中外合资零售商业的建立，既引来了资金，更引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现代化的流通方式，为我国流通企业经营业务向跨国化延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截止1998年底，我国共有317家内贸企业拥有了进出口经营权，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20家。

2. 全面引进现代化的流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

（1）重组商品批发体系，使现有的各种批发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商品流通的特点，建立起社会化、现代化、多元化的批发经营网络，一批起点高、规模大、辐射面广、功能齐全的全国性市场兴起。如上海金属交易所、上海粮油交易所、上海汽车交易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中国北方木材批发市场、成都肉类批发市场等中心批发市场和区域性批发市场作为商品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商情信息中心在稳定供求、满

足市场需要和平抑物价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在经营方式方面，大力推行连锁经营和代理配送制。连锁经营于 1994 年初试办便势头强劲。当年年底全国的连锁经营公司就达 150 多家，拥有各类店铺 2500 多个。到 1998 年底，全国连锁公司数目已上升到 1150 个，连锁店 21000 个，实现销售额 1000 亿元。连锁店经营范围已由消费品发展到机电、农机等生产资料，业态形式发展为超市便利店、仓储式商场、综合商场等多种形式并存。1997 年有 14 个连锁企业被授予进出口经营权。连锁经营实行大量集中采购、配送，与生产企业、副食品基地直接挂钩，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进货成本，增强了竞争力；实行规范化科学化经营管理，从而提高了企业效益；实行采购和销售分离，有利于防止假冒伪劣商品，净化流通秩序；统一标价，规模经营，有利于降低费用从而降低物价；直接向生产企业反馈大量的市场和消费信息，可以促进生产者调整产品结构，改进产品质量。

1995 年，由国家经贸委牵头的代理制试点工作启动，1996 年初见成效，106 家试点企业代理钢材 455 万吨，占试点企业经营总量的 22%，代理汽车协议 19 万辆，占试点企业经营总量的 25%。到 1998 年，参加钢材和汽车代理试点的企业又进一步扩大。代理业务正向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佣金代理的实施范围正逐步扩大。一些地方还在煤炭、纯碱、轮胎、塑料、玻璃、机电产品经营尝试代理销售。物资配送工作也进展顺利，富有成效。1996 年在全国 40 多个城市发展，就形成了年配送能力达 200 多亿元的规模，在钢材剪切、动力配煤、散装水泥、商品混凝土的功能配送项目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流通费用。

（3）改革和完善少数重要商品的流通体制。90 年代初中期，我国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均已实现了由市场形成价格和自由流通。但是少数重要商品如粮食、棉花、化肥等由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特殊地位仍实行较多的政府管理。为此，国家仍需根据不同时期情况不断探索这些商品的流通体制改革。其中粮食、棉花的流通体制改革最具代表性。

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早在 1985 年，国务院就决定取消粮食统购制度，改为合同订购制度。粮食企业在保证粮食计划供应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1990 年，为了增强国家对粮食的调控能力，国务院决定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为了克服议价粮食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状况，规范企业交易行为，国家试办了郑州粮食批发市场。1993 年 2 月，国务院提出“统一政策、分散决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放开粮食价格”。当年底，全国就已有 95% 以上的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这标志着粮食流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关键一步。并开始试办粮食连锁店和配送中心。1994 年开始实行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经营两条线运行。

随着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粮食流通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富余人员过多，管理不善，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国有粮食企业财务亏损挂账使得财政和银行不堪重负，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为此，1998 年 4 月，

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推出了“四分开一完善”的改革方案，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相配套，政府制定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切实管好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粮食市场监管。一个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粮食流通体制将在实践中形成和完善。

关于棉花流通体制改革。

棉花是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我国传统棉花流通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计划配置、纵向管理、行政分配。这种体制在棉花资源长期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促进棉花生产、保证工业原料供应和纺织品出口创汇以及保障消费者需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其弊端和深层次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建国以来，我国棉花流通体制的沿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 1949 年度至 1953 年度，政府对旧中国棉花自由贸易体制进行改造，可称之为“棉花自由购销阶段”。二是 1954 年度至 1978 年度以前，国家对棉花实行计划购销，可称之为“棉花统购统销阶段”。三是从 1978 年度至今，特别是 1983 年度以后，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对棉花流通体制及其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可称之为“改革探索阶段”。

从 1978 年起，国家连续三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1982 年全国棉花供求平衡并略有结余，开始出口。1983 年国务院决定暂停纺织品、絮棉定量供应政策，实行敞开销售，同时放开等外棉购销。1984 年全国棉花产量 12517 万担，创造了迄今为止棉花产量最高纪录。面对一时的供过于求，国务院确定大量出口棉花，以进养出的棉花改由国内供应，扩大絮棉销售。1985 年中央决定取消粮、棉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的棉花按国家规定的价格由供销社收购，定购外的棉花允许农民上市销售。但由于粮棉比价不合理，棉农增产不增收，1986 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产量、收购量大幅度下降，出现 80 年代以来第一个低谷。1987 年度，国务院决定提高收购价格，恢复收购一担棉花奖售化肥 35 公斤，奖肥计划单列。同时规定在全国棉花合同定购任务完成以前，不开放棉花市场，除供销社外，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插手收购、贩卖棉花。

1988 年度，国家为进一步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发展棉花生产的积极性，决定对实行棉花超定购分成办法，即超过国家定购任务部分，上交国家 30%，地方留 70%，同时对省际调拨实行吨棉吨粮的奖励办法。1989 年国务院决定在提高棉花收购价格的同时，在棉花销售环节实行调出调入包干制度，一定三年不变，并进一步强调统一收购、统一经营、不搞棉花市场，不搞价格双轨制。1991 年度，棉花生产达到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峰，产量 11350 万担。1992 年，《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改革棉花流通体制意见的通知》，提出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内外贸相互联结、高效畅通的棉花流通体制。并决定在山东、河南两省进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试点。1994 年国务院在明确棉花流通体制改革长远目标的同时，强调了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放开棉花经营、不放开棉花市场、不放开棉花价格，实行国家统一定价、供销社统一经营。1996 年，国务院决定稳步改进棉花供应

体制，主要是试行棉花交易会制度，即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供需直接见面，双向选择的棉花供应方式。

1998年10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强调要稳定棉花购销政策，促进棉花销售；搞好棉花总量平衡，加强棉花市场的宏观调控，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棉花生产布局。并指出："1999年度起将进一步改革棉花流通体制，主要是：国家不再制定统一的棉花收购价格，具体购销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拓宽棉花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除供销社外，允许具备条件的大型纺织企业直接参与棉花收购和经营，纺织企业收购资格认定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发展棉花交易市场和交易网络，规范交易行为，促进公平竞争。健全棉花质量监督体系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要在国家管好储备、进出口和质量的前提下，从1999年棉花年度起，放开购销价格，拓宽流通渠道，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机制。"这预示着，我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棉花最终走上市场。

三、商品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随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包括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在内的商品市场建设，无论在规模、档次、结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商品市场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国商品市场建设正向形成以若干中心城市为依托，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同步发展，城乡贸易贯通，内外贸一体，批发市场与零售网点、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互促进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市场体系的目标迈进。

（一）批发市场体系

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借鉴国外发展批发市场的经验，开办了大量的包括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生产资料以及某些重要商品的各式各样的批发市场。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市场体系的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主要表现在：

1. 有利于衔接产需，合理配置资源，指导生产，引导消费。我国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生产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衔接主要是通过国家计划来实现，产品的购销调存都严格按商品流转计划进行。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原有三十多年逐步完善并稳定下来的商品流转体制、流通渠道、供需关系、批发体系被打乱了，新的流通体制、供需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国的批发市场正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如最初发展起来的蔬菜批发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钢材批发市场等，对于刚刚步人市场的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确实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2. 有利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形成合理的商品价格。批发市场为买卖双方提供了谈判议价的场所，规定了交易规则和交易方式，为平等充分竞争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批发市场形成的价格基本上能够反映此类商品的市场行情。如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山

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等的价格行情，对全国同类商品定价都有影响。

3. 有利于维护流通秩序，规范交易行为。批发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商品市场体系的中心环节。为适应和推动批发市场发展，国家制定了《批发市场管理办法》，对批发市场的设立、监管机构、交易、代理、结算等作了详细规定。各批发市场对交易地点和规模、交易品种、组织机构、交易方式和结算方法、交易时间、代理规则和手续费标准都作了具体规定。保证了市场准入和交易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批发市场近 20 年的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盲目发展、重复建设，不少地方出现了有场无市、“空壳市场”现象；一些地方的工商部门既建市场又管市场，管办脱钩不力；不少批发市场只注重硬件建设、忽视市场功能的完善，等等。进一步培育批发市场的思路，是在全面总结国内外批发市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由规模扩张、以建为主转向功能健全、建管结合，重点是建设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要在搞好现有市场的基础上向配送中心发展，生产资料批发市场要以无形市场建设为主，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向电子订货直达供应方向发展，并与代理配送制、连锁经营相结合，力争到 2010 年建成比较发达的商品批发市场体系。

（二）城市零售市场网络

我国城市零售市场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流通规模急剧扩大，流通效率大大提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已经初步形成了零售业三级网络体系，并形成了为民、便民、利民的特色。一级是全市性商业中心，一般以大型商场或购物中心为龙头，大店名店密集，各种商品和各类服务齐全，服务功能完备，如北京的西单商业街、上海的南京路商业街等；二级商业网络是城市区域性商业中心，以中型商店为主，商品以中低档为主，商业饮食服务业齐全，一般都能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三级商业网络是居民区的连锁店、便民店、杂货店。

进入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大型零售商场的现象。许多大型零售商场营业额明显下降，效益下滑。这一现象表明，加强统筹规划，严格市场准入，促进零售业健康发展，仍然是今后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

（三）期货市场

新中国成立不久，从当时的特殊环境出发，我国政府即取缔了期货市场，在长达 30 多年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期货市场已逐渐被人们遗忘。1988 年，我国经济理论界开始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设想借鉴期货交易的办法，有助于解决我国农副产品价格波动问题。1988 年 3 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从而推动了对期货市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继 1990 年 10 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之后，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苏州物资交易所以及煤炭、化工、橡胶等交易所也先后成立。这些交易所都是引入期货的组织管理形式和交易规则，从现货批发起步，推行远期合约的场内买卖转让，逐渐向期货市场过渡。同时，一些专门从事期货交易的中介组织——期货经纪公司也相继成立。1992 年 10 月，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首家推出了铝的标准化合约，向真

正意义上的期货市场迈出了一步。与此同时，国家有关期货市场的监管机构、监管法律与规章也相继成立、出台。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还处于试点阶段。根据我国现货市场不够发达的特点，期货市场试点的基本方针是“从现货交易起步，引进期货交易机制，逐步推出标准合约”。1998 年，在进一步规范整顿期货市场的工作方针指导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调整期货市场的措施，使期货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调整期货市场结构。国务院于 1998 年 8 月 1 日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对期货市场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一是按照“继续试点、加强管理、依法规范、防范风险”的原则，对现有 14 家期货交易所进行调整和撤并。只在上海、郑州和大连保留 3 家期货交易所。

2. 取消部分商品期货品种，提高部分商品品种的期货交易保证金。决定将商品期货品种由原来的 35 个压缩到 12 个，取消 23 个期货品种。保留铜、铝、大豆、豆粕、小麦、绿豆、天然橡胶、胶合板、籼米、啤酒大麦、红小豆、花生仁等商品品种。对发挥套期保值功能较好、不易炒作的铜、铝、大豆等 3 个品种的最低交易保证金比率仍维持现行的 5%不变；将其余 9 个品种的最低交易保证金比率提高到 10%。

3. 取缔非法期货经纪活动，清理调整期货经纪机构。严格控制境外期货交易。加强对境外期货交易的管理，对确需利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少数进出口企业，颁布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不得进行投机。未经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进行境外期货交易。其次是规范期货咨询机构。中国证监会于 1998 年 1 月颁布了《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和《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对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进行清理、审核。第三是理顺期货监管体制。确立了证券期货市场垂直统一管理的基本框架。

期货市场的再次规范与整顿，虽然为中国期货市场重塑了较为合理的市场框架，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期货交易品种过少，期货市场控制风险的水平不高，期货经纪公司仍存在风险隐患等，需要进一步解决。

（四）拍卖市场

拍卖市场是一种古老的交易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流通方式，具有竞争性强、透明度高等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拍卖业在我国发展很快，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已有各类拍卖企业 800 多家，拍卖市场初具规模。拍卖企业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展，已涉及物资、文化、房地产等十几个领域。拍卖标的范围逐步拓宽，从初期主要拍卖执法机关罚没物资，扩大到动产、不动产以及无形财产。拍卖市场的恢复和发展，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完善市场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拍卖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一些地方出现了拍卖企业盲目发展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拍卖市场混乱；由于没有统一规范，各地拍卖活动存在自行其是的状态，影响了拍卖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甚至有一些执法机关擅自处理罚没物品，损害了国家利益，不利于廉政建设。

199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施行，标志着我国拍卖市场由试点阶段转向正常运作。这部法律为拍卖市场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统一的拍卖市场审批和监督管理机构和公物拍卖制度等的建立与完善，拍卖市场必将进一步走向规范和繁荣。

（五）旧货市场

旧货市场是商品的二次流通场所，其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不被人认识。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消费层次的提高，旧货市场成为打破消费与供给相持僵局，衔接城乡市场的纽带，在商品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近年来，在国务院领导和国家商品流通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推动下，旧货市场开始在一些大城市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到1998年底，全国各种形式的旧货市场和交易摊位已有2000多个，旧货调剂试点单位120家，分布在30个省区市的92个城市，年交易额超过70亿元。

发展旧货市场，疏通旧货流通渠道，旨在挖掘城乡潜在购买力，引导和刺激消费，推动新货流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建立以国有商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组织形式多样化，服务功能完善的旧货流通体制，在全国形成纵横交错的旧货流通网络，初步实现旧货调剂行业的产业化，是我国旧货市场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目前我国旧货市场正按照方便群众、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引导消费、规范管理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

（六）租赁市场

租赁是一种古老的商品流通方式。历史上经历了古代租赁、传统租赁和现代租赁阶段，在古代租赁和传统租赁阶段，租赁活动是出租租借物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收取租金和抵押金的实物租赁，不转移租借物所有权。60年代以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金融界广泛参与了租赁业，把单纯的融物推上了融资与融物于一体的新阶段，形成了以融资租赁为特征的现代租赁。其特征是出租方将租借物所有权以收取分期付款方式，转移给承租方，这种现代租赁方式在国外十分发达，大到成套设备、生产线，小到家用汽车、电脑、冰箱、彩电等，只需花少许租金和适量押金，就可以租到所需商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租赁业的发展首先是从外贸领域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各个商品领域。目前正处于改革的试点阶段。租赁市场，无论从规模上、结构上、管理上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我国发展租赁市场，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第三节　要素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市场资源配置，归根到底，是通过市场机制把生产要素配置到最合适的环节上去。因此，市场体系建设的重点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商品市场的迅速发展，我国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

市场和技术市场发展很快，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金融市场

改革开放前，我国金融系统由国家严格控制，除了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外，几乎没有其它形式的金融资产，也就几乎不存在金融市场。随着改革的展开和深化，国债重新发行，商业票据、企业债券等金融资产出现，我国金融市场开始进入发展的新阶段。

（一）同业拆借市场

1985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新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新的管理制度，允许专业银行间可以相互拆借资金，以发挥资金的横向调剂作用。这项改革措施，促进了货币市场的兴起。

1986年1月7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相互拆借”，“专业银行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议定”等。1986年5月3日，中国改革以来第一家城市信用社之间的资金拆借市场在湖北武汉正式挂牌营业。自此，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起来。到1987年底，除个别地区外，全国主要城市都开放和建立了无形或有形的同业拆借市场，并逐步形成了以武汉、沈阳、上海三地为中心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三大区域市场。1986年，全国同业拆借市场成交量为300多亿元，1987年猛增到2300亿元，1988年高达5200亿元。，

1992年下半年之后，同业拆借市场进入了第二次快速发展时期，但这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违规现象。根据这一情况，1993年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同业资金拆借秩序的通知》，对拆借市场进行治理整顿，提出了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资金拆借市场体系的要求，决定成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省市级分行牵头的资金融通中心。随后，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对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期限、资金用途、中介机构等进行了整顿和规范；对金融机构拆出和拆入的规模也作出了严格的数量限制。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我国的同业拆借市场进人了较为规范的管理阶段，形成了以人民银行融资中心为主导地位的松散式的、无形的拆借市场。1996年，人民银行在对48家融资中心改造以及撤销各商业银行组建的资本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

1998年，同业拆借市场经过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机制渐趋成熟，市场运行平稳。同业拆借市场已成为金融机构调节流动性和中央银行实施金融调控的重要工具。一是市场参与成员增加，市场规模扩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共批准了33家城市商业银行、9家外资银行、70家商业银行授权分行、10家保险公司（仅限于现券交易）加入同业拆借市场。至年末，市场交易成员达到177家，比年初的61家增加了近2倍，市场交易的广泛性大大提高。二是市场规则进一步完善。年内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银行间债券交易规则》、《银行间债券交易结算规则》、《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市场发行管理规定》等一系列重要法规。三是积极推进政策性金融债券市场化发行，增加了货币市场

交易工具。批准1998年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债券、财政部发行的450亿元专项国债和700亿元建设国债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交易。市场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四是同业拆借交易量有所下降。1998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989.48亿元，比上年减少3159亿元。拆借量收缩的主要原因是市场交易主体风险意识增强，注重交易的安全性，为回避风险转而采用债券回购方式。此外，由于商业银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分支机构的授权交易转为系统内调剂，融资中心改制后停止自营业务，重点转向清收逾期拆借资金等原因，也相应减少了市场交易量。五是银行间债券回购交易量增加。1998年银行间债券回购累计成交1021.5亿元，月均成交85.12亿元，比上午增加92.23%。全年交易量基本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债券回购交易量增加说明债券回购正逐步成为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主要工具，市场优势逐渐显现。六是市场短期交易品种比例提高。从拆借交易7个品种的交易量结构变化看，一个月以内的拆借交易量占市场总交易量的比重为65.5%，比上年提高8.5个百分点。从债券回购10个交易品种的交易量结构看，7天以内的交易量占比达到37.04%，比上年提高28.64个百分点，是交易量最大的品种。这表明银行间拆借市场交易正逐渐转向以短期资金融通为主的交易，银行间拆借市场已成为各金融机构调节短期流动性的主要场所。

（二）票据市场

银行承兑和贴现商业票据的试验起始于80年代初。1984年12月，人民银行发布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暂行办法》，决定从1985年4月起在全国开展商业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1986年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试行办法》，正式开办了对专业银行的再贴现业务，以推动商业票据的推广和贴现业务的发展。1993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商业汇票办法》，以促进商业信用票据化、票据运行法规化。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并于199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票据市场在规范的基础上获得了稳步的发展。

1995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商业汇票年度发生额分别为2424亿元、3890亿元、4600亿元和3810亿元；同期，商业银行办理贴现分别为1412亿元、2265亿元、2740亿元和2400亿元，中央银行办理再贴现分别为844亿元、1350亿元、1332亿元和1001亿元。票据市场的规范、稳步发展，为企业扩大票据融资、商业银行调整信贷资产结构及中央银行进行间接调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一是票据市场价格生成机制逐步完善。中央银行改革了再贴现率和贴现率的确定方式：确定再贴现率为一种基准利率，与同期再贷款利率脱钩；贴现率由再贴现率加点生成，与同期贷款利率脱钩，浮动幅度扩大，由在再贴现率基础上最高加0.9个百分点扩大为最高加2个百分点。改革后，中央银行可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来影响商业银行贴现率及市场利率水平；商业银行可根据票据风险度和企业的资信情况，合理确定票据贴现的利率水平，适当增加高流动性的票据资产。贴现率改革还将推动利率改革和票据市场发展。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三次下调再贴现率，累计下调约4.46个百分点，以鼓励商业银行扩展票据业务，加大信贷投入。

二是票据市场功能增强。1998年的商业汇票业务总量较上年虽有所下降，但票据

背书转让增多，抵用率提高，流通支付功能进一步增强，其衔接企业产销关系、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水平的作用明显。为节约交易费用、降低资金占用水平，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在商品交易中发挥票据的融资功能，将收受的商业汇票尽可能多地转让用于采购支出。一些大型企业已使用商业汇票作为主导性结算工具。一些商业银行积极尝试通过系统内集中、转让商业汇票和发展同业间的转贴现业务融通短期资金，加强和改善流动性管理，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表明，推广使用商业汇票，积极稳妥地发展票据融资的重要性，已逐渐被各市场主体所认识。

三是区域性票据市场初步形成。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采取政策措施，推动一部分金融机构集中、金融业务发达、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加快票据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中心城市的商业汇票业务不仅在全国的占比高、增长平稳，而且操作规范，票据的背书转让比例高，信用支付和融资功能高。中心城市票据市场的稳步发展，有助于市场参与者防范票据业务风险，也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票据市场实施间接调控。

（三）外汇市场

中国外汇市场经历了一个由外汇调剂市场向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国家对外汇实行严格控制。1979 年，国家改革了外汇分配制度，实行外汇留成办法，客观上促成了外汇调剂市场的出现。1980 年 10 月，中国银行开办外汇调剂业务。但在 1986 年以前，外汇调剂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办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人为规定外汇调剂价格，调剂对象仅限于现汇，基本上不能进行外汇额度的买卖。

1985 年 12 月，深圳特区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正式开办外汇调剂业务。1986 年，国务院批准企业可以通过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外汇额度余缺的调剂，同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外汇调剂。与此同时，外汇调剂业务由中国银行移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外汇调剂价格有所提高。1988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都设立了外汇调剂中心，外汇市场参与者进一步放宽。同时，放开了外汇调剂价格，取消了调剂最高价限制，允许外汇调剂价格随供求状况而浮动。1988 年以后，上海等 18 个城市先后开办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实行会员制和竞价买卖的办法。中国的外汇调剂市场逐步形成。

1988 年 9 月，上海市在原有外汇调剂市场的基础上试行外汇调剂公开交易；1989 年 7 月，厦门市正式宣布成立外汇调剂公开市场；1990 年 3 月，福州市外汇调剂公开市场首次举办竞价交易。此后，深圳也挂牌成立了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外汇交易的价格决定已由原来的人为控制转变为市场供求决定，它标志着我国已形成了有限度的、初级的外汇市场。

1994 年 4 月 4 日，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启用，并在上海设立了交易总中心。1996 年 6 月 20 日，外商投资企业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后，各地的调剂中心改造成为外汇市场的分中心。外汇调剂市场便为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取代。1997 年 1 月，经国务院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颁布；4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联合制定的《关于对携带外汇进出境管理的规定》公布；12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和《境内机构分行外币债券管理办法》。到1997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达1399亿美元，较上年底增加了349亿美元。

1998年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运行平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自1998年10月26日起非银行金融机构会员（共36家）暂停外汇交易；自1998年12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统一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1998年底，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各类会员达441家，比1997年增加26家。外汇储备1998年底达到1450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

（四）国债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定物价和加快经济建设，政府先后发行了几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这些公债都没有上市流通，到1968年初全部偿清。从1959年到1980年，我国没有发行国债。1968—1980年，我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财政收支出现逆差。为了克服国家财政困难和筹集重点建设资金，1981年财政部恢复国债发行，当年发行国债48.7亿元。1994年后，财政不能再向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后，财政赤字完全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国债发行规模日趋庞大，国债收入占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1年的4.3%上升到1998年的30.74%，1998年国债收入占中央财政支出的60.43%。

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到1988年，国债没有交易市场。从1988年开始，国家首先允许7个城市进行国债流通转让的试点工作。1991年初，财政部又决定扩大国债市场的开放范围，允许国债在全国400个地市一级以上的城市进行流通转让。同年我国还开始了国债回购业务的试点。1991年下半年后，我国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趋旺，国债回购业务应运而生。1993年下半年，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和整顿资金拆借市场的政策出台后，国债回购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5年下半年，仅仅两年时间，国债回购业务迅猛发展，1994年和1995年，其交易总量分别为3000多亿元和4000多亿元。目前，银行、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办理国债流通转让业务的网点已遍布全国。

随着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业及一些城市的证券交易中心的建立，我国集中性的国债交易市场也已出现，一个以证券交易所为点、以大量的柜台交易和场外电话交易为面的国债二级市场格局基本形成。国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1997年，仅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国债现货成交金额达3572亿元、国债回购成交金额达12876亿元。1998年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恢复了与商业银行间的债券回购业务，交易对象为包括主要商业银行在内的25家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国债回购是我国目前成交量最大、交易最活跃的货币市场，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节银行资产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操作工具。

我国1998年共发行9次国债，发行量超过6508.7亿元（不含外债），几乎是上年2412.03亿元国债发行量的3倍，除去补充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000亿元特别国债，还剩2808.7亿元，比1998年预算的2642亿元还高出166.7亿元，国债发行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成为国债发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年。从这9次发债来看，凭证式国债为2200亿元，占2808.7亿元中的78.33%，尽管其它698亿

元皆为附息国债，但都是面向银行与保险机构发行的。由于大量国债面向银行和保险机构发行，银行间拆借市场中可流通的债券因此大大增加。1998年银行间拆借市场共增加了4308亿元流通量，占当年国债发行量的66.19%。交易所债券流通市场相对萎缩。

（五）企业债券市场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企业债券开始出现。1987年3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从此，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纳入计划，债券发行市场开始走上规范化的道路。企业债券由内部发行为主转为向公众发行为主，发行者从小企业、乡镇企业扩大到大中型企业为主。

1992年是我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最大的一年，全年发行企业债券680多亿元。1993年，国务院对《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进行了修改，颁布了新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1997年，几家企业债券开始在深沪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1998年发行债券的企业明显增加，金额有加大的趋势，新品种试点正式开始。全年共发行27次企业债券，发债金额121.86亿元，其中包括南宁化工股份公司转债和吴江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转债筹集3.5亿元。

（六）股票市场

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没有股票市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行，股票市场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

我国股票市场最早应该从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业务部正式挂牌买卖股票算起，但是比较规范的股票市场则应该从1990、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运行为标志。在沪、深交易所成立之初，沪、深股票市场基本上只能算是地方性的股票市场。1992年中央允许全国各地经批准的上市公司股票在深、沪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这就使得深、沪两市很快突破了地域限制，由地方性股票市场转变为全国性的股票市场。同年，中央批准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研究证券监督、管理问题，制定全国性的证券监管法规，执行证券市场监管职能。这两项重大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从1992年至今短短的6年内，沪、深交易所上市股票达到800多家，市价总值逾1.75万亿元，流通市值近8000亿元。在股票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规范化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证监会的监管能力逐步加强，监管力度逐步加大，监管职能逐步向地方延伸，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能不断加强。以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颁布为起点，我国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七）投资基金市场

中国投资基金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而兴起和发展的，1987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国外一些机构组建了面向海外投资者的投资基金，但规模较小，影响不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证券、股票市场的迅猛发展，我国国内投资基金

到1991年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发展速度也较为迅速。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武汉证券投资基金于1991年10月由武汉证券公司对外开办。此后，我国相继设立了许多基金，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武汉、深圳、天津等地。到1994年底，全国各地共创立75家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近60亿元，全国共有上市的投资基金55个。同时，在境内外设立的涉外中国基金有20多个，基金总额10多亿美元。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准则出台。

1998年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第一批试点证券投资基金顺利推出，监管部门建立了较为有效的监管体系，逐步培育了一批基金管理队伍。更为重要的是，投资者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识趋于理性，为证券投资基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8年共有6只试点证券投资基金发行，每只规模20亿元，存续期15年，总规模120亿元。因为在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以及基金的投资管理方面都没有经验，6只基金全部是封闭式基金。从一年的试点工作中可以看出，管理部门将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基金运作放在了首要位置，形成了基金运作和监管的基本框架。另外，政府为了扶持基金的发展，采取了向证券投资基金配售新股的优惠政策，保证基金能有部分相对稳定的收益，促进基金业的发展。从试点证券投资基金的二级市场表现来看，基金价格较迅速地从初期过度投机向内在价值理性回归，这一过程同样体现了广大投资者对证券投资基金认识的深化。

二、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的发育与我国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同步。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是以社会福利形式由国家或单位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分配；而土地使用与土地开发方面则是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开发、统一安排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制度与土地使用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如租不养房、住房短缺、分配不公、土地浪费严重、国有土地收益流失等，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1978年后，我国从理论上就住房的商品属性、住房商品化、社会主义地租理论、土地产权等问题作了大量的探索，并逐步启动住房与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改革试点工作。

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1982年，国务院选择在常州、郑州、四平、沙市四城市进行“三三制”售房试点，即售房款政府、企业、个人各拿三分之一；1984年10月，国务院批准扩大城市公房补贴出售的试点范围；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0个城市和300个县镇实行了补贴出售公房。从此，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起步、发展。

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方面，1980年10月，国务院同意征收城镇土地使用费；1983年在抚顺市开始试点，土地分为四个等级征收使用费；1984年广州市对开发区、新建项目、涉外项目用地开征土地使用费；1987年重庆市也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这样，土地有偿使用试点改革开始在城市铺展开来。1988年，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土地税暂行条例》，以土地使用税代替了土地使用费。

在房地产开发方面，1980年9月北京市住宅统建办公室率先挂牌，从而拉开了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序幕。1984年国家计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暂行办法》。1985年起，各地开发企业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大量带有政府职能的开发公司开始向企业转轨，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也开始出现多元化。在此阶段，房地产交易日趋活跃，各种房地产交易形式也不断涌现。

伴随住房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及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也应运而生。为适应房地产交易发展的需要，从1988年开始，各市县开始建立房地产交易机构与常设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从1991年开始，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先后批复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改总体方案，从此，房改在全国范围内顺利推进，房产交易量也日益扩大。

1987年下半年以来，国家批准上海、天津、深圳、广州和海南正式进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试点。1987年11月26日深圳市政府首次公开招标出让一幅住宅用地；12月10日又首次以拍卖方式出让一幅土地，这是中国土地使用市场化的真正开端。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此确认了城市土地有偿流转的法律依据。一系列关于土地出让转让的法律、法规、条例先后颁布，以政府垄断出让为特征的一级市场与以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交易形式为特征的次级市场，构成了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基本框架。

1992年开始，我国房改全面启动，房改机构也不断得到健全。企业房改率先推进，主要方案是以优惠价出售公房，大步提租，房地产经营管理向企业化、社会化、专业化方向转变；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推行。1993年的房改主要是建立三级住房基金和发行住房债券筹集住房建设资金；1993年底，政府提出了“安居工程”计划，并开始实施，从此，面向中低收入居民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迅速发展。为了整顿市场秩序，规范交易行为，保证房地产市场的有序运行，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从不规范的混乱局面向比较规范、比较理性的方向转变。随着房改向纵深发展，关于房改部分产权、公房出售价格衔接等问题的政策规定陆续出台，城镇住房市场化的新制度基本确立。

90年代后期，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房地产市场经过了低迷、消化吸纳期后又开始复苏升温。普通住宅开始迅速发展，房地产市场体系开始健全，如物业管理市场、中介服务市场等。同时，房地产金融业务也不断发展，购房抵押贷款目前正在普遍推行。房地产价格构成正在逐步理顺，职工工资中的住房消费含量也逐步增加，住房的市场化正稳步推进。其中占整个房地产业半壁江山的住宅业发展更快，现在全国城镇拥有住宅约30亿平方米，折合资产总额约3万亿元，约为全国工业资产实值总额的2倍。

1998年是中国住宅与房地产业发展十分重要的一年。7月3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宅建设的通知》，确立了取消住房实物分配、实行货币分配的政策框架；接着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第一个配套法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规范了房地产开发主体及开发行为；还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的政策，加大了经济适用住房的投资力度。

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进而拉动整个经济增长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三、劳动力市场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社会就业是由政府与劳动人事部门统包统配的，而农村人口则基本上被禁锢在土地上不能流动，所以不存在劳动力市场。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萌发。1986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改革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的通知》和 1987 年国务院批转的劳动人事部关于劳务市场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对企业的用工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得人才交流初步发展。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明确提出“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后，我国就业制度改革开始步入市场就业的新阶段。

199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并于 1995 年起在全国实施，这给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完善提供了法律保证。1996 年 5 月，劳动部在《劳动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必须改变主要依靠国家安排就业的局面，实行国家政策引导扶持，社会提供帮助服务，鼓励和推动劳动者靠自己努力实现就业。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社会就业结构的调整也将大量的待业或再就业人员推人了劳动力市场。1997 年城市各类富余人员上千万，农村有近 2 亿剩余劳动力正寻机向城镇转移，这些都将有力地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1998 年，全国已有 3.1 万个由各种渠道、各个部门主办的各类型和各层次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正在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技术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技术不具备交易的条件，无技术市场可言。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技术市场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初步形成，并实现了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为技术商品化、开放技术市场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此之后，我国技术市场有了初生的萌芽，科研单位开始向企业有偿转让技术成果。1981 年，武汉、沈阳创办了科技交易会，仅武汉地区就展出科技成果 500 多项，企业提出招标难题 100 多项。据不完全统计，到 1984 年 8 月止，全国地、市以上的科技开发交流机构已有 100 多个，技术服务咨询机构已有 3000 多个，并形成了协作网络；全国共举办大规模技术交易会 240 多次，每次成交额都在几百万元至上千万元。

1985 年以前，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虽然实现了有偿或部分有偿，但着眼点仍仅在于给技术持有者以适当的补偿，技术还未真正成为商品。

以 1985 年我国颁布第一部专利法为标志我国技术市场开始步入规范化、法律化、正规化。1985 年 5 月 15 日全国首届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来自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49 个部委，加上军工共 78 个技术交易团（包括 3000 多个单位），提供可供转让的技术 15000 多项。这次交易会历时 25 天，参展人数 31 万多人次，共签订各种协议 15182 项，洽谈贸易额达到 80 亿元。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技术贸易蓬勃开展。据不完全统计，1985 年技术市场实际完成的交易额为 23 亿元，为 1984 年的三倍多。

1987 年 6 月 23 日，我国颁布实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技术合同方面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我国技术市场向着强化市场机制、健全市场组织、完善市场结构、规范市场秩序、建立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统一开放的社会主义技术市场体系方向发展。

进入 90 年代后，我国技术市场更加成熟，规模不断扩大。1998 年，全国共签订国内技术合同 28.17 万项，成交技术合同总金额 435.82 亿元，与 1997 年相比，技术合同项次增加了 12.48%，成交金额增长了 24.03%，平均单项合同成交额也从 14.04 万元提高到 15.47 万元，继 1994 年以来成交额增长幅度首次超过 20%。

目前，我国技术市场体系建设已初具规模，技术市场进一步向农村拓展，技术市场的中介组织不断发展，覆盖全国的技术市场管理监督体系已经形成，技术商品流通渠道得到进一步疏通，技术市场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科研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

第四节　市场中介组织培育与市场秩序建设

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中介组织，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需要逐步健全市场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政府监管职能与服务职能逐步分离等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并已初步形成具有多种机构类别、多种组织形式和多种服务方式的中介组织体系。同时，随着改革的展开，我国逐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系，市场秩序逐步好转。

一、仲裁机构发展迅速并不断走向成熟

中国目前的仲裁机构包括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协会，根据 1994 年 8 月 31 日八届人大第九次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它设立市的地区设立，不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管理机关之外，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中国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依据章程对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进行监督管理。为搞好仲

裁机构的组建工作，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由国务院法制局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的《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仲裁委员会登记暂行办法》、《仲裁委员会收费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第一届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政府法制、经济贸易、体改、司法、工商、科技、建设等部门和贸促会、工商联等组织协商推荐，由市人民政府聘任。在此情况下，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各项仲裁服务也广泛开展起来。国内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经济组织在使用仲裁手段解决经济纠纷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仲裁制度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备受重视。

我国的仲裁服务大致分为涉外仲裁、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和劳动争议仲裁等。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工商联、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执行涉外仲裁的主要机关。此类仲裁案件逐年增加，1996 年、1997 年的平均受案数量达到 800 余件，案件当事人涉及 40 个国家和地区，受理案件中争议金额最大的超过 57 亿日元。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1996 年受理的大要案 22 件，北京、上海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商务仲裁中心之一。

中国有 80%以上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是由农业承包合同仲裁机构通过调节或仲裁解决的。全国共有 2.2 亿多份农业承包合同，每年发生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大约 100 万件。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有关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有 85 万起左右。仲裁制度的推行对于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农村经济政策、稳定和促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证和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于 1993 年 6 月正式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明确规定了企业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制度。在 1994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又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形式将劳动争议仲裁制度规范化、程序化。特别是 1997 年以来，中国企业劳动争议仲裁服务十分普遍，企业劳动争议仲裁基本走上法制化轨道，为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注册会计师机构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迫切要求，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客观需要，从 1980 年开始，中国会计师制度、审计师制度逐步恢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1980 年底，财政部公布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1981 年 1 月 1 日，上海会计师事务所成立，这是中国恢复会计师制度后成立的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1982 年 8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建立审计机关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审计机关，1983 年 9 月 15 日，国家审计署成立。从 1984 年开始，审计师事务所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来。1986 年 7 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就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性质、考试和注册、业务范围、工作规则及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作了原则规定。1988 年 11 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该协会是受财政部领导的事业单位，它的成立，对引导注册会计师在工作中正确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注册会计师队伍自身建设，维护注册会

计师的合法职业权益，交流工作经验，沟通业务信息，增强国内外交流，促进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国务院颁布了《审计条例》，规定了社会审计组织的法律地位和业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经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于 1994 年 1 月 1 日施行。

《注册会计师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根据《注册会计师法》，目前该行业已经建立起职业规范法规体系，从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审批到会计师行业标准、业务监督管理、后续教育、涉外管理及财务管理等，均已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 1994 年开始，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明显加快。《注册会计师法》改变了原《注册会计师条例》中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是经国家批准的事业单位的规定，将会计师事务所分为两种类型：负有限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负连带无限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提出了按照企业性质来建立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1994 年还制定了合伙事务所的管理办法。批准了两家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提出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单位脱钩的具体办法。同时，提出改进执行证券业务资格的审查方式。

1995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审计工作走上法制化发展轨道。到 1997 年底，中国共有注册会计师 13.3 万人（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 5.5 万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超过 6900 家。其服务范围已经从外商投资企业扩大到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服务领域已从单纯查账验资逐步发展到企业会计师报表、审计、企业制度建设、企业清算审计、资产评估和申报纳税等全方位。1997 年 12 月 26 日，由国内比较知名的 12 家会计师事务所组建的中华会计集团正式成立，该集团共有从业人员 1000 多人，注册会计师 480 多人，注册会计师业务收入超过亿元，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集团。

为促进中国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加强对注册会计师队伍的自身建设，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从 1997 年 8 月到 1998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使会计师行业标准、从业人员资格管理、业务监督管理、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一是会计师队伍得到初步改善。全国有将近 6000 名考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年轻专业人员调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使行业执业队伍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得到改善。全国有 400 余家事务所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了联合。经过调整，行业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二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越来越受到关注，其客观性也有较大提高。三是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标准进一步严格。四是会计师事务所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及有关部委的安排，现存 6683 家事务所的脱钩改制工作最迟将在 2000 年上半年完成。

三、律师事务所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我国律师工作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 1980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到 1998 年底，我国共举

行律师资格考试9次，有11.4万人考试获得通过。共有律师事务所8300多家，各种类型的从业律师10多万人。形成了国有律师事务所、合作所、合伙所和个人所并存的格局。律师的工作已经进入金融、证券、企业兼并、房地产、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反倾销、高科技等法律服务领域。律师队伍以及律师事务所朝着专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近20年来，中国律师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第一，改革律师资格的授予制度。从1986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开始举办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已通过全国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的方式取代了单纯由司法行政机关考核授予律师资格的做法。为加快律师队伍发展，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从1993年起改为每年举行一次。1994年首次允许港澳台居民报考律师资格考试。第二，改变律师事务所完全由国家核发编制、核发经费设立的体制。从1988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开始进行设立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1998年初，第一家不受国家编制和经费限制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在河北保定成立。第三，改革律师事务所的经费管理办法。从1986年起，对律师机构逐步推广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自收自支，结余留用”的经费管理办法，大大增强了律师机构的自我发展能力。此外，司法部门还进行了其它一些改革，如律师工资从固定工资制，到实行工资与综合目标责任制挂钩，并逐步过渡到采用效益浮动工资制；律师由国家干部身份逐步转为非公职身份，律师的国家行政干部待遇改为律师专业职务待遇，律师事务所实行招聘师制度；改进和强化管理，建立了律师惩戒制度，制定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等等。这一系列律师体制的改革，为中国律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国律师事务所内部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新进展，一些律师事务所采取了股份制组织形式。

律师的对外交流合作工作进一步加强。我国先后接待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5000多名律师的来访，已经有50多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中国律师开展的涉外律师业务也取得良好成效。自1995年以来，经国家司法部陆续批准，13家中国国内律师事务所到美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到1997年底已有7家开业。这些在国外执业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通过办理涉外民事诉讼案件、涉外经济案件等，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公司、企业的合法权益。它们还通过开拓非诉讼业务领域，为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提供法律帮助，促进了中外经济技术合作。

四、公证业发展步伐加快

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中介组织，公证具有“服务、沟通、证明、监督”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证业发展迅速，截止1998年初，全国已经设立公证处3600多个，公证人员18000多人，公证服务网络在全国已基本形成。公证业务涉及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年办证量900多万件，公证项目100多项，公证书发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近年来，广大公证人员充分认识到公证工作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职能作

用，紧紧围绕服务市场经济这个中心，使公证在预防纠纷、保护公民、法人以及其它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82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以来，公证在为改革开放服务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由单纯办理涉外民事公证向涉外、国内公证并举方向转变；二是由以民事公证为主向以经济公证为主转变；三是由简单的证明向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法律服务转变。此外，公证法律体系基本成形。近年来，国家司法部配合《公证暂行条例》的实施，先后发布了《公证收费暂行规定》、《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提存公证规则》以及《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等法规政策。

五、资产评估机构发展势头良好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中国一直没有资产评估机构。即使在改革初期，在企业兼并、承包、租赁经营、中外合资等涉及资产的交易中，也没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范性资产评估机构，没有相对统一的评估标准，更没有法定的公允的资产评估程序。

1989年，大连市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开始对资产产权变动中的资产，尤其是中外合资中的中方资产进行了评估。这就有效地堵住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大连市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颁布了《在国有资产产权变动时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的若干规定》。1990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了资产评估中心，专门负责对国有资产评估工作的管理。随后，一系列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相继推出。

1991年11月，国务院第91号令发布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确立了国有资产评估工作的基本依据、方针和政策。该《办法》规定，凡涉及产权变动（拍卖、转让、企业兼并、出售、联营、股份经营与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者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企业清算等）都应当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机构是指："持有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国有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的资产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财务咨询公司，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国有资产评估证书的资产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财务咨询公司，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临时评估机构……"。目前，以91号令为主干，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有关细则，初步形成了一套可以指导评估操作的基本政策和方法。截止1998年8月底（从1998年9月开始清理整顿），中国已取得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3800多家，具有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的人员14000多人，实际从业人员62000多人。近十年来，累计确认国有资产评估项目20多万项，评估资产账面净值29100多亿元，评估累计增加值11000多亿元。

1993年12月，为加强对资产评估的行业管理，全国性的资产评估行业组织——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成立，并开始承担行业管理的职能。这标志着中国资产评估行业管理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资产评估协会是自律性行业组织，它接受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并协助政府贯彻执行有关法规政策，既反映评估机构和人员的愿望和要求，又协助政府对评估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在政府和评估机构、评估人员之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1995年3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代表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加入了国际评估标准委员会。

六、广告中介机构不断发育与完善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很早就有了广告。作为商家“广而告之”的方式，原始的陈列、叫卖广告在“日中为市”的殷周之际就已产生，但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及文化的特点，广告的发展十分缓慢。建国之初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国广告业始终未能形成一个行业。“十年动乱”期间，广告被彻底否定。1979年以前，全国经营广告业务的专业公司不到10家，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基本不经营广告业务。

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从过去全部依靠计划组织生产经营，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市场组织生产经营，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从以温饱型为主向以求新、求美、求知、求乐的小康型转变，为广告业的生存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81年至1999年的近20年里，广告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广告市场也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概括起来，自1979年1月上海电视台首播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解放日报》在全国率先恢复刊出报纸广告以来，中国广告市场发育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1年，是广告业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国内厂商开始效仿来华外商，小量投入广告费用，介绍自己的产品及“三包”服务；主要媒体开始经营广告业务；广告公司相继成立。1980年，国务院决定由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管理广告业。这一时期广告行业管理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对广告经营单位一律采取扶持政策，对广告市场并无专门法规进行约束。到1981年底，全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照的广告专营和兼营单位已达到2000多家，广告从业人员16000多人，广告营业额达11800万元。

第二阶段：1982—1991年，是广告业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广告业的广告收入以每年40%的速度递增，企业广告意识逐渐增强。在各类商品的广告费投入上，1983—1987年，生产资料的广告费投入占有很大比重，消费品的广告很少，因为消费品广告在当时被认为是追求“高消费”。1988年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资料广告费投资逐年大幅度增加。在广告经营上，国家实行“利用广告行业自身的力量，有计划逐步发展的方针，着重提高并加强现有广告经营单位的业务力量和手段”的政策，一方面，控制发展新的广告经营单位，扶持现有广告经营单位的发展。另一方面，允许各类媒介直接承揽设计、制作、发布本媒介广告和代理国内同行业广告业务。1982年5月，国家开始对广告经营实行登记管理。广告经营单位仍以每年20%的递增速度发展起来。到1991年底，全国广告经营单位已达11769户，广告从业人员达到134506

人，广告费占国民生产总值0.173%。这一时期，针对广告市场发展中出现的广告经营单位未经批准擅自经营广告业务；单纯为赚钱任意定价等乱收费现象；利用广告弄虚作假，欺骗用户和消费者；药品、食品广告违背科学，恣意夸张；盲目热衷于吹嘘国外商品等问题，国务院于1982年颁布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1987年又颁布了《广告管理条例》，使广告市场步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1983年，中国广告协会成立，使中国广告市场开始出现全国性行业自律组织。

第三阶段：1992—1999年，是广告业高速发展与完善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改革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广告业也加大了改革力度，取消控制，放开经营，在广告市场上引入了竞争机制。1992年底，全国广告经营单位达16683户，比1991年增加了41.7%；广告从业人员185428人，比1991年增加37.8%；广告经营额678675.4万元，比1991年增长了93.4%。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广告业的发展和广告市场的繁荣。1994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部《广告法》正式出台，1995年2月1日正式实施。《广告法》与其它20多项配套性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共同形成了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定组成的广告法制体系。1997年广告营业额462亿元，比上年增加26.02%；广告经营单位57024户，比上年增长7.85%；广告从业人员545788人，比上年增加6.58%。中国广告业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七、自律性中介组织的作用不断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地方性行业协会迅速发展起来，继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包装技术协会率先成立后，一大批行业协会随之而起。1987年中国已有全国性社团组织71个。同时，一批地方性的行业协会也相继成立。1988年机构改革，是中国行业协会广泛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纺织总会和轻工总会是中国最早弱化政府职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行业管理上来的部门。原轻工业部撤销了大部分专业局，改建和成立了家电协会、皮革协会、自行车协会、陶瓷协会等几十个协会。到1994年为止，全国正式登记的工业行业协会有160多家，其中，由中国轻工总会直接负责业务指导的全国性轻工业商品协会已达38个。到1997年底，全国工业系统共有国家一级行业协会、管理会、研究会436家，除去各类学会、基金会、研究会、管理性质的协会外，具有行业性质的协会208家。这些行业协会在行业统计、行知行约、行检行评、价格协调、行业标准修订、技术改造项目的咨询论证及培训、国际交流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是半官方外贸协会，中国国际商会对外为民间性商会，这两个组织1997年共有行业分会17家，地方分会47家，支会和县级商会600余家，企业会员超过60000个。中国贸促会在海外1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其数据库与30多个分支会联网，已经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用户开通了联网。中国工商联是中国工商业界组成的民间商会，1997年11月7日，中国工商联第八次会员大会全体会

议原则通过了新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1998年3月1日经中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会议审议通过。

在行业协会组织中，消费者协会的发展以及所开展的工作也非常引人瞩目。到1998年底，中国已经建立的县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3000多个，在农村乡镇、城市街道共建立消费者协会基层分会20000多个，在各工商企业中建立的各类消费者协会监督站、联络站25000多个，发展义务监督员50000余人。1993年至1998年间，消费者投诉达到25万件，仅1998年消费者投诉商品以及服务的种类就超过40种，当年受理服务投诉70303件，是1993年的4倍多。

当前，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发展中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与问题。一是市场中介组织的独立地位有待于进一步确立和提高，部门垄断、条块分割等现象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大部分验资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税务代理机构等都是由主管部门开办起来的，办管不分。二是市场中介组织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亟待强化。三是市场中介组织自身行为不规范，主体资格不合法。无照经营和未经登记核准擅自从事中介业务的现象比较常见。四是对市场中介组织的管理和宏观调控还较薄弱。总体上看，国家对市场中介组织发展还缺乏统一的规划部署，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约束差，致使市场中介组织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五是一些市场中介组织人员素质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违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六是规模小、数量多、竞争力弱。为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市场中介组织。要进一步健全制度、统一规划，严格审批登记和中介行为管理，加快建立健全市场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加强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以促进市场中介组织的有序发展。

八、流通秩序的整顿与市场管理

改革之初，为了规范比较短缺的商品市场，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改革环境，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注意维护市场秩序，先后发布《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1984年）、《关于坚决制止就地倒卖的通知》（1985年）、《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1987年）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然而，由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难免存在着市场机制和法制不健全、政府管理不完善等矛盾，80年代中后期，流通秩序混乱的情况较为严重。一些公司凭借行政权力，利用价格双轨制层层加价倒卖紧俏商品；一些企业掺杂使假、投机诈骗、乱"搭车"涨价，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市场秩序不健全，流通环节因企业多次转手倒卖而增多。

针对这种状况，党中央于1988年9月果断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一是坚决清理各类公司，至1988年，全国各类从事销售活动的公司高达47万多个，其中不乏从事非法经营却又披着合法外衣的行政性公司。国务院于1988年10月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198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进一步搞好清理整顿公司的四条措施》。由于措施得力，行动坚决，清理整顿工作进展很快，到1990年末全国已撤并的各类公司占清理整顿前全国公司总数的25%，

其中，流通领域的占已撤并公司总数的57%左右，规范了流通秩序的参与主体。二是加强市场物价的管理和监督。1988年5月，国家物价局发布《关于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199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商品和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的规定》，坚决打击不法分子哄抬物价、“搭车”涨价、乱收费和竞相涨价等行为，有助于恶性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三是加强对重要商品市场流通的管理，对部分紧俏商品实行专营。四是加强市场立法，逐步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过去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往往收效很快，反弹也很快，不少扰乱市场的非法行为不断复发，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市场经营活动未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为此，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在治理整顿的同时，加快了行政法规建设的步伐，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8年)、《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1990年)、《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规定》(1990年)、《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年)等一系列法规，对上述各类市场主体的设立、变更、终止、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这对于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其交易行为，推动市场秩序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九、宏观调控和市场秩序法制化

1993年，我国加强了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力度。针对流通领域存在的问题，国家采取了许多改革和管理措施。一是建立健全重要商品的储备体制。如增加储备品种，补充储备数量，调整储备商品结构；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体系；完善储备管理办法，轮换更新制度和吞吐调节机制等。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新建了食油国家专项储备。由于银行适时安排资金，财政部及时增加储备费用补贴，使储备粮，储备肉，储备糖显著增加。二是建立市场风险基金。1995年中央和29个省（区，市）共筹集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近百亿元。三是加强重要商品的进出口调控。四是实施“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确保有效供给；开辟“绿色通道”，进行异地调运；恢复国有菜店经营，开展配送、直供直销和连锁经营。上述一系列措施增强了流通领域的宏观调控能力。

与加强宏观调控紧密相联，市场秩序的建设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决策要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立法要体现改革精神，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抓紧制订关于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我国的经济立法进程明显加快，仅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制订了四十多个法律或者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推动了市场运行朝着有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这其中，有规范市场主体组织和行为的法律等。

第五节　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

随着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供求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下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变，卖方市场逐渐转向买方市场。

一、计划经济体制和商品短缺

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形成的短缺以及长期的卖方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产品的供销与销售都靠计划安排，相当一部分产品处于短缺状况，排队购商品和凭票买商品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状况不仅制约着人民生活需要的满足、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正常发展，而且导致产品和服务质量低下。

短缺和卖方市场在我国存在和延续了几十年，固然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有直接关系，但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病无疑也是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限的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缺乏活力的微观体制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影响了市场供给的最大增加。同时由于市场经常不能有效地调节供给和需求，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及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必然带来投资饥渴与消费饥渴。无约束的需求增长使供给无论怎么增加也难以满足需求，短缺经济难以消除。此外，以单一经济成分、流通渠道和经营方式为特征的商业系统缺少竞争压力和活力，也使卖方市场难以改变。

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短缺和卖方市场的长期存在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人们呼唤尽快摆脱贫穷与短缺，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更要求解决卖方市场的体制弊病。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的改革拉开了解决矛盾的序幕。

卖方市场

指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由于买方之间的竞争、抢购而出现的对卖方有利的市场现象。卖方市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 商品供不应求，出现商品“短缺”。(2) 消费者持币抢购。(3) 市场以“生产者为中心”，以产定销。(4) 卖方在商品交易中居于支配地位，主导价格变化趋势。(5) 伴随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在卖方经营中往往会出现商品质量差、品种少、忽视服务质量以及经营管理不完善等问题，买方极少有挑选商品的余地。

买方市场

指现行的价格在可以弥补具有代表性的生产者的平均成本的水平以下商品仍供过于求的一种市场现象。买方市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 商品供过于求，出现商品“过剩”。(2) 消费者持币待购，且挑选性强。(3) 市场以“消费者为中心”，以销定产。(4) 卖方之间的剧烈竞争，买方在商品交易中居于支配地位，并对商品价格起主导作用。

二、发展经济与拓宽市场

摆脱卖方市场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和城镇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粮棉油等农产品连年丰收，总产量直线攀高，屡创历史最高纪录。1984年，粮食产品超过4亿吨，比1978年增加了1亿吨以上；油料、肉类的产量分别为1185.2万吨和1525万吨，均是1978年同类产品的两倍。城乡集市贸易的迅猛发展又为农副产品的顺畅流通提供了宽阔、方便、快捷的通道。80年代初，城镇集体经济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商业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这些都使城乡人民生活一般用品，特别是一般农副产品的市场出现繁荣景象，并且打破了国营经济的独家垄断局面，推动了国有商业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我国共有73种主要商品在全国范围内凭证限量供应。到1982年末，已有64种先后敞开供应，仍需限量供应的9种商品，在限定供应数量之外，还有议价部分可供自由选购。1984年废除布票，敞开供应各种棉织物。多种票证由过去须臾难离的“必备品”，逐渐成为某些人的收藏品。与此同时，一些花色品种单调陈旧、质量较差的日用生活工业品开始积压，一些农副产品也出现了销售难的局面。这些都标志着至80年代中期，我国在告别短缺和卖方市场方面已迈出了关键步伐，初见成效。

随着改革推进和经济发展，人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城镇居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又开始追求生活水平的高层次。彩色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的“新三件”代替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老三件”成为消费热点。由于生产一时满足不了需要，耐用消费品的卖方市场在8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出现，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1988年的大抢购，国家被迫对彩电实行专营。

从生产资料市场看，80年代初期之后，在一般加工工业产品供应呈好转趋势的同时，原材料工业、燃料动力工业产品和交通通讯的供应紧张有所加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最终产品的短缺通过产业链条的传递容易引发中间产品以及上游基础产品的供求失衡；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张规模提高生产能力，导致了物质消耗巨大和对供给的压力过大；更重要的是，各地区为了追求一时高速度，纷纷投资发展“短、平、快”的加工工业，而对投资较大、周期长的基础产业项目投入不足，从而带来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

80年代中期，理论界已清醒认识到卖方市场的弊端，明确提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和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为了克服“瓶颈”约束，政府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基础工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发展登上了新台阶，为市场供给的明显增加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流通领域改革进一步活跃了市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加快发展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促进了竞争，增强了企业的自我约束力和活力。

90年代中期，我国工农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各类商品的供给缺口日益缩小。主要农副产品产需已平衡有余，生产资料市场呈现供求平衡、价格平稳、交易平淡的“三平”格局，而且生产资料全年的价格总水平下降。国内贸易局对601种主要消费品供求统计，1998年上半年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比例为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比例为25.8%；无一商品供不应求。1998年下半年供求平衡的商品比例为66.12%，供过于求的商品比例为33.81%。其中工业品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对于农副土特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类商品更加突出。1998年下半年，国内贸易局统计的439种工业品中，供过于求的比重为37%。至此，买方市场已步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成为国民经济供求状况的基本态势。

对于曾经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的我国来说，买方市场的出现，无疑是好事。

首先，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出现全面持续的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同时，瓶颈制约已大为缓解。能源方面，工厂因电力供应不足而“停三开四”的情况消失；原煤由过去煤炭用户的采购员“东奔西跑”转变为现在煤炭厂矿的推销员“四面出击”。交通方面，过去车的拥挤、路的颠簸被宽敞的高速公路、舒适的空调车所替代。通讯方面，昔日打电话常需到邮局排队，被“占线”所困扰，现在街头随处可见磁卡（或智能卡）电话亭，城市的家用电话普及率迅速提高。

其次，买方居于主动地位，消费者权益受到尊重和保护。

再次，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达到饱和，产品结构调整能够较为灵活、迅速地弥补市场的供给缺口。

最后，商品价格连续下降，低价竞争策略开始让位于质量、品牌、信誉、科技含量以及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综合性竞争。如彩电市场9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大战”杀得难解难分，现在各厂家则不停地打“技术牌”、“质量牌”和“信誉牌”，超薄彩电、等离子技术彩电、全平面彩电等推陈出新。

显然，渴求已久的买方市场不仅标志着告别短缺，使人们在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方面直接受益，而且为我国向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的集约型经济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定的基础，为实现改革“攻坚”提供了机遇。可以说，买方市场的出现，将使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与思维方式发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当然，目前我国出现的买方市场还只能是一种低水平、浅层次的买方市场，是一种相对过剩的现象。因为这种买方市场是与低购买力相伴而行的，其基础条件依然脆弱，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都还存在，此外，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不能低估。总之，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使社会获益良多，同时也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长期看，买方市场定将向更高层次和更成熟的方向发展。

第十二章　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物价稳定，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我国在五十年经济建设历程中，经过反复地探索，特别是经过最近20年的改革，逐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调控理论，并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与机制。

第一节　计划投资体制的探索和改革

计划投资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制，首先必须改革计划体制。从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到计划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我们经历了艰苦的探索过程。

一、计划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改革

（一）高度集中统一计划体制的建立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时间的艰苦努力，迅速制止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为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奠定了基础。从1953年开始到1957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适应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建立了各级计划机构，对国民经济实行了全面的计划管理，并逐步确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计划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说，是比较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的。这种体制能够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发展重工业，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政治环境相契合。此外，这种体制本身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首先，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客观实际，计划方式体现为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对国营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农业、手工业、私人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低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实行间接计划，主要通过政策措施和经济办法进行管理，使之

按照国家计划指引的方向发展。其次，从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制度，给地方以一定的计划管理自主权。另外，注意根据具体情况变化，及时调整计划，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正因为如此，这一体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平均每年增长 18%（计划增长 14.7%），农业平均每年增长 4.5%（计划增长 4.3%）。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五年增加 42.8%（计划为 33%），农民收入五年增加 27.9%。

尽管如此，这一体制下的权力仍然是高度集中的，特别是在“一五”后期，国家实行直接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而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减少。1957 年同 1953 年比较，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的工业企业由 2800 多个增加到 9300 多个；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由 115 种增加到 290 种；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由 227 种增加到 532 种；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建设任务，包括地方工业和城市建设，绝大部分由国务院各部门直接安排；国家财政收入的 75%由中央支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计划体制集中过多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从 1958 年开始，党和政府有针对性地对这一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1958 年，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目的出发，进行了以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体制改革。其内容：一是把大部分中央所属的企业交给了地方管理；二是下放计划管理权限，计划编制程序改为自下而上地逐级编制；三是建立协作区，实行三级管理体制，让地方自成体系。经过这样的变动，国务院各部门只保留了 1200 多个重要企业，其余 8000 多个工业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1959 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减少到 215 种；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减少到 132 种，减少了 75%；地方兴办限额以上项目，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批准外，其它设计和预算文件都交由地方审查批准。限额以下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由中央支配部分下降到 50%。这一变革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但由于过分追求脱离客观实际的高速度，加上权限下放得过多、过急，结果使国家计划失去控制，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为了扭转比例失调和“大跃进”后经济困难局面，从 1960 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管理的集中统一，以克服经济困难。提出：经济管理的大权应当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最近两三年内，更多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并将 1958 年以来下放的不适当的企业管理权、基本建设审批权、物资分配权、财权、货币发行权、劳动工资计划权、物价管理权等上收。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到 1966 年，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的工业企业增加到近 11000 个；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增加到 579 种；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全部由中央审批。这次体制变革，对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集中过多的弊端又暴露出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工作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和破坏。1966 年下半年至 1968

年，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市区经济部门一度陷入瘫痪，1968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1969年2月，全国计划座谈会提出，企业要以地方管理为主，中央直属的企业可以分为地方、中央和双重管理三种形式。此后在备战的要求下，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又提出，把全国划分为10个大协作区，各自建立工业体系，使下放企业管理权限更加紧迫。1970年3月5日，国务院拟定《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同日，中共中央决定，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等2600多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在政治动乱的背景下，企业急速下放，又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国务院直属部委机构由80多个精简到27个；财政收支实行地方包干，基本折旧资金相应下放，大力促进地方"五小"工业。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小工业的发展；但缺乏整体规划，也带来了损失和浪费。基本建设存在战线长、浪费大、制度松等问题。1972年国务院批准试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点意见》，要求把所有基本建设都纳入计划，积极进行基本建设大包干的试点等；国家计委还提出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十条原则。但是这些意见大部分没有实施。国民经济整体呈现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该集中的没有集中，该分散的没有分散，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计划投资体制有过多种变动，尽管一度收到了某些局部的成效，但从总体上说，这些变动都局限于调整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行政管理权限，在下放或上收方面兜圈子，没有从根本上克服传统计划投资经济体制的弊端。在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我国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造成资源配置频频失误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难以实现。在这样的体制下，计划的制定往往以政府的偏好为基础，计划信息十分有限，长官意志不可避免，而产品的价格只是核算的工具，并不反映供求关系。其结果必然造成计划制定的供求关系与实际的供求关系经常脱节，各种产品的比价关系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大大下降，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衡等。我国改革前出现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失调、基础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价不合理等，均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其次，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生产单位，只需完成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也得不到满足，整个经济缺乏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这必然造成生产上缺乏积极性，分配上"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存在，损失、浪费和短缺现象严重，经济运行效率低下。

最后，经济波动频繁、剧烈。改革前，我国经济波动是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政策变动的直接结果，这种行政的干预和政策的变动是具有体制上的根源和发展的背景，从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从1958年到1978年的三个经济周期性波动可以看出，1958年国民经济增长了22%，1961年国民经济下降了30%，1966年国民经济增长了17%，1968年国民经济下降了6.5%，1970年国民经济增长23%，1976年国民经济下降了2.7%，到1978年国民经济又增长了12.3%。

（二）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针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同时，也对计划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计划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如下方面展开：

1. 紧紧围绕搞活企业这一中心，调整计划决策的权力结构，中央计划决策的范围明显减小，企业的计划决策权相应扩大。计划决策权和利益支配权过分集中，对企业统得过死，是原有计划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摆脱过去只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的做法，以搞活企业为中心，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决策权。过去，企业的计划决策权相当小，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以及利益分配等生产经营活动，几乎都由国家计划安排。改革开始后，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生产经营活动计划决策的主体。

2. 指令性计划投资的范围大大缩小，市场调节范围加大。指令性计划范围过宽，比重过大，市场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是原有计划体制的又一弊端。通过20年的改革，经济运行中计划和市场的作用程度和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逐步缩小，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农业生产中，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1997的4.5%；1997年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市场的调节范围加大。在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4.4%下降为1997年的15%以下，除粮、棉以外，其它农产品价格已全部放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7%降为5%以下；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按市场价格销售的生产资料比重已占96%以上；取消了外贸指令性计划，对进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实行指导性计划。

3. 改革计划指标体系，改进计划方法。适应计划管理形式的转变，计划指标体系也得到逐步改革。从1995年起，按照计划指标的性质和功能，将计划指标大体划分为"宏观调控目标"、"预期指标"和"国家公共资金和资源配置指标"三类，并进行了系统改革。根据深化改革的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推进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新的年度计划的宏观调控指标主要有：经济增长率、国家银行信贷总规模、货币发行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通货膨胀率、有价证券发行总规模、财政收支差额、进出口总额、国家外汇结存、城镇失业率、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增长率和农民纯收入等。这些指标在今后的几年里，又有一定的改进，逐步形成了宏观调控指标体系。

在改进计划方法方面，逐步加强了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工作，提高了科学性、透明度、开放度和社会参与度。一是改进综合平衡的方法。各级计划部门改变了过去以实物量平衡为主的做法，在经济总量平衡方面注重价值量的平衡，从动态平衡、内

外平衡的角度出发，加强对社会资金的总量平衡和调节。二是改进计划制定的程序和方法。1991年7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试编两年滚动计划暂行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9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试编两年滚动计划。这是计划方法制度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有利于计划工作更好地前后兼顾，在年度计划安排上多看一步，用以保持计划的连续性，提高经济工作的预见性，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使年度计划与中长期计划更好地衔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三是完善年度计划报告。从1993年开始，国家计委试编了年度计划报告，体现了计划职能的转变和增强计划工作的指导作用。1995年，进一步规范了计划报告的性质、种类、内容、形式及编写、发布、实施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年度计划报告系列，并从1995年开始，建立了计划报告公开发布制度。四是加强了对国民经济形势的跟踪、监测和分析，对经济发展出现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及时研究，提出对策。

滚动式计划

滚动计划，亦称滑动式计划、连续计划，是衔接长期和中期计划或衔接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而连续编制的一种计划方式，以使计划工作更好地瞻前顾后，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其基本作法是：采取近细远粗、不断延续的办法，在一个计划期终了时，根据本期计划的结果、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对原定计划进行修订，并续编一期计划，将计划期按顺序向前推进一期，使计划不断滚动、不断延续，形成一个连续过程。

4. 改变计划职能，实行总体上的指导性计划制度。传统计划职能集中表现为“分指标、分物资、分资金”。这是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调、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之一，故此，转变计划职能就成为计划体制改革的关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主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财力、物力的可能，合理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目标，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根据这一目标，国家计划改变了传统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逐步加强和发挥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1995年国家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标志着我国计划体制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以往的计划特别是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不同，这一纲要中的计划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的、指导性的，着重规划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和整体的发展战略、指导方针、重大比例关系、全国生产力布局等，提出了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总量指标，以及若干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项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方面，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指标体系，提出了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政府各部门制定国家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的基础，从而使计划对国民经济运行起到总体指导作用。

二、投资体制的改革

（一）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投资体制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体制是计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征。政府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一手包办投资活动的全过程，通过计划直接分配和管理投资资金和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都要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安排，政府既要对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进行决策，又要对项目和资金进行管理。1950 年到 1978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7722 亿元，其中财政投资高达 5534 亿元，占 71.7%。在基本建设投资中财政投资所占的比重高达 83.9%。

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投资体制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中央集权制，实行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和 60 年代经济调整时期；二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制，实行于“大跃进”和“文革”两个时期。两者在用计划手段控制投资方面无根本不同，只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和管理权限存在差异。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制扩大了地方的项目审批权限，中央只负责对全国生产力布局有重大影响的骨干项目的决策，其余项目由地方审批，实行以地方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

在 50 年代，这种体制加上政治热情，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在 50 年代末之后，这种体制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了。主要表现在：

第一，投资主体及融资渠道单一。政府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并且又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不具备投资能力，不能成为投资主体。投资渠道基本上是单一的财政拨款。

第二，投资决策和管理权高度集中。投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投资管理基本上是一个部委管一个口，块块分割严重。

第三，投资要素流动性差，市场化程度低。投资资金严格通过计划集中分配，通过市场分配资金的程度极低。

第四，投资缺乏风险约束。由于投资项目和资金来源基本上是由政府统一分配，企业在资金使用上没有风险约束，争项目、争贷款的现象十分严重，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所有投资风险最终都由政府承担。

（二）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体制的变化

1978 年以来，我国对投资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投资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1. 明确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范围，企业逐步成为市场投资的主体。根据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性质和特点，将投资大体分为竞争性项目投资、基础项目投资和公益性项目投资，合理划分不同类型投资主体的投资领域、投资责任和不同建设项目融资方式。基础性项目投资鼓励和吸引各方参与投资，地方政府负责地区性基础设施投资，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由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通过财政投融资和金融债券等渠道筹集，采取

控股、参股和政策性优惠贷款等多种形式进行；竞争性项目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所需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自负盈亏；公益性项目广泛吸收社会各界资金，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由政府通过财政统筹安排。在经营性投资领域，企业作为市场投资主体，政府主要投资于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并逐步建立政府投资的监管和制约机制。

2. 改革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管理办法，投资管理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方式转变。政府主要运用财政、金融等间接性手段以及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结构进行调控；逐步缩小项目的审批范围，除重大项目继续实行审批制度以外，一般项目逐步过渡到项目申报登记和备案制度，通过发布投资信息加以引导。重点是进一步扩大企业和地方投资决策权，并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国家计委只对中央参与投资和统借国外贷款及需要国家综合平衡外部配套条件的基础建设项目，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其余项目只审批项目建议书，限额以上的新开工项目，纳入国家年度投资规模计划，不再审批开工报告。

3. 扩大项目融资渠道，强化投资风险责任。在资本金注入方面，项目投资由过去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投资单位自筹资金、财政预算内拨款、利用外资和通过发行股票等多种渠道筹集。针对过去“拨改贷”后国家对一些资本金投入不足，当前结合国有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仅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将银行债权转为股权，增加企业资本金，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在融资方面，企业除银行贷款之外，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和采用 BOT 方式融资。在强化投资风险责任方面，一是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1996 年国家计委颁布了《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要求国有单位经营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法人，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法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充分的自主权，项目法人对建设项目的筹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二是实行建设项目资本金制度，1996 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对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所有项目必须按总投资的一定比例落实资本金后才能进行建设。三是强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的风险责任，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投资项目资金的决策权，从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逐步转向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强化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风险责任。

4. 改进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调整投资结构。1992 年 6 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对发展第三产业的重大战略意义、目标和重点、主要政策和措施等作了全面论述。1993 年 3 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1994 年，国务院批准并颁布实施了《90 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其它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和法规。1997 年，国家发布《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引导投资方向。

产业政策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作为行政性计划的一部分，没有独立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防止“市场失效”、改善资源配置而制定的供给性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优化和升级为主要目的的产业结构政策；以鼓励有效竞争和规模经济、防止垄断、完善市场秩序为宗旨的产业组织政策；发挥比较优势、合理调整进出口结构的产业贸易政策；以产业技术进步为基本目的的产业技术政策等。

产业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计划手段。其中经济和法律手段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经济手段主要有：价格、税收、信贷、利率、税率等。这些手段也是总需求政策所采取的手段，区别在于产业政策实行的是差别性政策，如：差别利率和差别税率等。

此外，投资体制改革还在建立和规范为法人单位服务的各类工程咨询机构、发展为建设项目服务的社会审计机构、加快培育投资市场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进展。

通过一系列改革，整个投资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投资规模逐年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80年910.9亿元上升到1998年的28457.5亿元，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1.1%；投资主体由过去主要是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集体、个体、外商等多元化的主体。按经济类型结构来划分，国有单位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80年的82%下降到1998年的55%，集体、个体和其它投资主体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上升；投资资金由过去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投资单位自筹资金、银行贷款、财政拨款和利用外资等多种渠道。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国家预算、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它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1978年的62.2%、1.7%、4.2%和31.9%分别变化为1997年的2.8%、18.9%、10.6%和67.7%；投资效益比过去有所提高。

经过20年来的改革，我国原有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投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计划投资体制正在形成。

第二节 财政体制的探索与改革

财政体制是宏观调控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体系中，财政政策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经过五十年的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改革开放前财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变化过程。

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经济落后的严重局面，为了平衡财政，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我国针对当时财经工作管理分散的局面，采取了统一财政经济管理的重大决策，初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实行“统收统支”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的权限集中在中央；财力集中在中央；各项财政支出，除地方附加外，全部纳入统一的国家预算；适应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大量存在的情况，全国统一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这种特征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要求，集中收入，节约支出，统一管理，从而在短期内平衡了财政收支，稳定了物价，保证了经济恢复对资金的需要。但是，当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时，这种体制便显得很不适应，主要表现是：给地方和企业的机动性太小，不能因地制宜地灵活地运用资金，同时，中央集中了过多的繁杂的财政事务，不利于集中力量考虑国家财政的重大问题和方针政策。

1953 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我国财政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进：适当降低了集中程度，实行既集中统一，同时又在许多方面有一定的分散和灵活性的办法。主要措施有：中央财政下放了权限，实行中央、省（市）和县（市）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在支出方面大体上是按照企、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来划分各级的财政支出范围。在收入方面实行收入分类、分成的办法。当时把地方收入划分为三类：第一，地方固定收入，主要是地方企业事业收入，地方税收和其它收入；第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主要是农业税、工商营业税和工商所得税；第三，调剂收入，主要是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审定。建立企业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分成的制度。成立了管理基本建设资金的专业银行。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等。

“一五”时期的财政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但与建国初期相比，地方与企业又有了一定的可自行支配的财力，如地方可支配的财力约占全国的25%。预算执行结果，地方也有相当的结余。在国家同企业的关系上，尽管企业留用资金比较少，但企业在这期间共提取企业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分成 21.4 亿元。所以总的看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对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作用。国家一方面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一方面通过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进行灵活调节，有力地保证了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1957 年，根据毛泽东同志 1956 年《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讲话精神，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对经济管理体制作了较大的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也相应作了重大的调整。即随着中央企业下放给地方，来自这些企业的收入也划归地方，支出也相应下放，中央财政对地方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办法。在税收制度上，采取了简化合并

税种的方针。但是，由于在“大跃进”中经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要求各地方自成体系，冲击了新体制，使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新体制的许多办法到1960年就停止执行了。

在196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了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克服经济困难，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但这种集中统一并不是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集中体制的简单恢复。调整开始时主要是纠正“大跃进”时期一些“左”的错误，把下放过头的权力收回，以保证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包括将财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收回一部分重点企事业单位作为中央固定收入来源。支出方面则将基本建设拨款权限从地方收回，改由中央专案拨款，以利于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不准搞赤字预算；缩小预算外资金的范围，取消了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留成制度，恢复企业基金制度等；同时，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划清银行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准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支出；重申了加强财政管理的十项禁令等。以后随着经济的好转，注意了集中当中有分散，注意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市场调节，发挥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这不仅对于增加收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也是运用经济方法调节经济的有益尝试。三年调整时期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的这些举措，取得了很大的成效，1963—1965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7%，各项经济指标都恢复到“一五”期间的最好水平。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整个左倾错误的思想并未得到根本的纠正，仍然潜伏着危险和隐患。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财政体制变动频繁。1968年，生产停滞，收入下降，有的省和自治区连正常经费也不能解决。为了保证地方必要的支出，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暂时实行过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即收入全部上缴，支出全由中央分配。1971—1973年，财政实行收支包干的体制，1974—1975年实行过“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体制。1976年又实行过“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体制。在税收制度上，又一次进行了简化合并税制，全国仅留下了少数几个税种。这个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动乱和生产秩序的不正常，财政体制上实行的多种办法，基本上是临时过渡的办法，因此弊端甚多，特别是当时过多地下放了财权，使中央掌握的财力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几，出现了资金分散、盲目建设的现象。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我国的财政体制几经调整，经历了由集中到分散，又由分散到集中的往复循环。这些调整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总的说，它们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也正因为如此，循环往复的调整带来的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后果。对这种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变成为必需。

二、改革开放后财政体制的改革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相适应，财政体制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针对原有财政体制统得过死、集中过多、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上吃"大锅饭"的弊端，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彻底清算"左"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改革。这一改革进程在总体上可以划分两个大的阶段，即 1978—1993 年的以放权为特点的财政体制有限改革阶段和 1994 年后以实行分税制为特点的财政体制全面创新阶段。

（一）1978—1993 年的财政体制改革

1978—1993 年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围绕搞活企业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而展开的。

1. 围绕搞活企业这一中心，改革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

在传统的财政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管理办法，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捆住了企业的手脚、捆死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与国家改革开放整体进程相适应，财政体制的改革首先从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从 1978 年底开始，对国有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1979 年，为了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财权，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财政部、国家经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有关的具体规定。根据规定，试点企业可以按国家规定的比例留用一部分利润，用于建立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1981 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财政部和国家经委又下发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对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办法和盈亏包干办法。通过各种形式的放权让利，初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这一时期，国有工业企业留利占实现利润的比重为 22.3%。

从 1983 年到 1986 年，对国有企业实行两步利改税，进一步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也有了新的认识。国有企业不再仅仅是政府的附属物，而应是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经营实体。因此，需要通过一种形式来确定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利改税便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改革的议事日程。为了积累经验、顺利推进改革，自 1980 年起国家先后在 600 多户国有企业进行了利改税改革试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务院决定在 1983 年 1 月和 1984 年 10 月，分两步对国有企业全面进行利改税改革。

第一步利改税的主要内容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上缴利润改为先征收 55% 的所得税，税后利润再在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进行多种形式的分配。对国有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一般留给企业，但对少数利润较多的企业，国家要收取一定数量的承包费。对微利和亏损企业实行盈亏包干。第二步利改税的主要内容是，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征收所得税和调节税，税后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按 55% 的比例税率征收所得税，对税后利润超过原来留利的企业再征收调节税，调节税一户一率；对国有小型企业实行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对少数税后利润较多的

企业再收取一定的承包费；允许企业从所得税前利润中归还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并按还款利润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通过两步利改税的实施，使国有企业留利占其实现利润的比重上升为33.4%。同时，国家税收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五五”时期的45.6%上升到了95%左右。

两步利改税第一次在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中引入所得税的形式，结束了国有企业不缴纳所得税的历史。其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在改革初期对于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新税制的建立。但存在的问题，一是在价格不合理且未放开的情况下，税率的设计无法统一，因此在不规范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不规范。二是税利不分，以税代利，模糊了利与税各自的功能。没有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和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和所具有的双重职能。三是税前还贷政策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没有形成约束机制。四是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明显偏高等。由于此次财政体制改革是在其它方面的改革没有配套的基础上率先进行的，因此无法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更多的新问题，这使得利改税在实践中无法坚持下去，企业承包取而代之变成了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

早在实行一步利改税的同时，就有少量企业采取了具有承包性质的利润分配体制。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从1987年开始，对国有企业全面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制度的特点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通过包干机制，将权责利结合起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随着承包制的推进，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普遍的包盈不包亏、以包代管等。同时，承包制也助长了企业忽视技术改造、放松管理、虚盈实亏等短期行为，既影响了企业健康发展，也影响了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因此，承包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措施，不是正确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制度性办法。

在承包制全面铺开的同时，一部分企业进行了税利分流的试点。其主要内容是在适当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基础上，统一所得税制，适当降低所得税税率。取消税前还贷和按还款额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办法，企业固定资产借款用企业留用资金归还。税后利润需要上缴国家的部分，实行税后多种形式的承包办法，其余留归企业。实践证明税利分流的试点是成功的，其不仅发挥了所得税所具有的弹性调节功能，而且在当时有效地抑制了企业的盲目扩张冲动，有利于企业建立良性循环的投资机制。

1993年，中央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标志我国国家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改革从“放权让利”、“减税让利”转向建立“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相分离”的产权制度改革。国家在税收制度上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对国有企业依法纳税后的利润国家采取多种形式收取国有资产投资收益。

2．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建立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财政体制改革围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0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开始进行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改革。"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习惯上称为"分灶吃饭"的体制。该体制的基本内容是：(1) 根据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在收入方面，除固定收入外实行分类分成的办法。即将财政收入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在支出方面，一是经常性支出，按企业和事业隶属关系划分；二是专项支出，由中央财政以专款的形式下拨，不列入地方财政支出范围。(2) 地方上交比例，调节收入分成比例和对地方的定额补助经中央核定后，原则上五年不变。地方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自求平衡，多收多支，少收少支。地方的各项支出都由地方根据自己的财力自行安排，中央不再下达支出指标。(3) 要保持全国统一的财政制度。凡涉及到全国性的政策制度，由中央统一制定，不经中央财政批准，不能变动。(4) 几种具体的体制形式。对大部分省实行固定比例分成体制、调剂分成体制；对个别省实行定额补助体制；对京、津、沪三市仍沿用"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对广东、福建两省则采取"划分收支、定额上交（定额补助）、五年不变"的办法，给这两个省更多的自主权。同时，改进了民族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从 1983 年起，除广东、福建两省外，对其它省、市、自治区一律改为实行"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办法。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打破了统收统支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理财的积极性。但存在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不够明确，中央财政收不敷支，差额较大，同时也存在某些"包而不干"的现象。

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第二步利改税的改革，国务院决定，从 1985 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其基本特征仍然是"分灶吃饭"，具体内容是：(1) 按照"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以后的税种设置划分各级财政收入，把全部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类，共享收入按不同比例分成。(2) 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范围，分级包干。与原体制相比，1985 年的体制有以下两个优点：第一，以划分税种作为划分各级财政收入的依据，基本上改变了过去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做法。第二，较好地体现了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新体制既合理地确定地方财政的基数，也保证中央财政得到稳定的收入。这个体制实行到 1987 年，因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受到冲击。

实行"财政包干"的管理体制。继企业承包、外贸承包、银行承包之后，国务院决定用承包经营的方式改革原定财政管理体制，对全国 37 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广州、西安除外）分别实行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缴额递增包干、定额上缴和定额补助等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称作"财政包干"。

包干体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对调动地方理财的积极性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包干制本身存在着诸多弊端，如体制形式不统一所带来的分配关系的不规范、对既得利益的承认与维护、对产业结构和布局的逆向调整、对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加剧、对税制的侵蚀以及对中央财力的削弱等等。这些弊端及其与企业

承包相匹配的特点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体制。因此，1993 年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改革新方向。

（二）1994 年以来建立和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分税制的改革。此次改革与以往的改革措施相比，不仅注重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更注重新型财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和运行机制的转换。在 1991—1992 年部分地区试点的基础上，1993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并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实施。

分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是按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二是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种，增加地方收入。属于中央的固定收入有：关税，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交纳的收入（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企业上交利润等。外贸企业出口退税，除 1993 年地方已经承担的 20%部分外，以后发生的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属于地方的固定收入有：营业税（不含银行总行、铁道、保险总公司的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上述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银行总行、铁道、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和赠与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有：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为 75:25；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其它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证券交易税中央地方各分享 50%。在总的财政收入中，中央占 60%以上；在总的财政支出中，地方占 60%以上。

在划分税种的同时，分设中央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机构，实行分别征税。中央税务机构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方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地方税。

三是按统一比例确定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的数额。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额以 1993 年为基年，1993 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1994 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 1993 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 1:0.3 系数确

定，即上述两税全国平均每增加 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加 0.3%。如若 1994 年以后中央净上划收入达不到 1993 年的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数额。从 1995 年开始，在考虑各地客观因素的基础上，中央的部分收入增量对地方实行了比较规范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代表了今后财政转移支付体制规范的方向。

为顺利推进分税制改革，中央还决定 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原体制的分配格局暂时不变，过渡一段时间再逐步规范化，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

分税制的实行是我国对财政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它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这项改革尽量与国际上通行的作法靠拢，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打破了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所辖区域内所有的税收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都同地方政府经济利益挂钩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地方政府保护当地企业的财政诱因，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通过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加大对纵向和横向不均衡的调节力度，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深化改革的要求看，1994 年的改革所遗留的问题是：过多地保留了地方的即得利益，加大了财政横向平衡的调节难度；财政的收与支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此次分税制改革重点是分税分收，在支出方面没有做根本性的改革，制约了财政职能的转变；未能建立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致使中央对地区间分配关系的调整缺乏应有的力度，等等。因此，1994 年以后，又针对上述诸方面问题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改进。我国的财政体制正朝着即符合国际规范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制的方向稳步迈进。

三、税收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税收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财政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建国 50 年来，我国税收体制也经历了多次调整与改革。

（一）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的建立与调整

建国伊始，我国就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以后，随着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税收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

1. 建立新中国的统一税制。从建国初期至 1956 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税收制度是处于建立和发展的时期，税收的功能得到较好的发挥。从 1958—1978 年的 20 年间，我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一再简化、合并的变革过程。

统一税政，建立新税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全国各地区实行的税收制度很不一致，仅税种就有 50 多种，不能适应当时政治上统一、经济上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1950 年 1 月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同时还制定并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

程》。从而统一了税政，为建立新型的税收制度提供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障。新的税收制度由14个税种组成：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所得税、摊贩牌照税、临时营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等。1951年还开征了棉纱统销税。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又适时地调减了一些税收负担。确定暂不开征薪给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确定减并税目，如货物税税目由原来的1138个减少为358个；确定调低税负，如货物税部分应税品目的税率调低20%—50%；降低工商所得税的负担，提高所得税的征税起点等。

修正税制。1952年，针对生产有所发展，而税收却有所下降的局面，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研究了修正税制的方案，经政务院批准公布，从1953起开始执行。修正税制的主要内容是：（1）选择国家能够控制的掌握的22种商品试行商品流通税，采取从工业生产到商业零售一次课征制。（2）把在工业环节缴纳的货物税和营业税合并统一征收。货物税的税目由300多个进一步减并为100多个，这类产品在出厂环节纳税后，到零售环节再征一道零售营业税。（3）把在工业生产中除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的应税产品外的其它产品，应缴纳的营业税，按工业再加一道商业批发营业税合并征收，以后对商业批发不再征税，只对零售征税等。新的税收制度对当时经济的恢复和财政状况的好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第一次简并税制和第二次简并税制。1956年我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和集体经济占了绝对优势，生产力获得进一步解放。1958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我国税收制度第一次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改革原则是简化合并税种。基本内容是：将原来对商品销售实行一次课征的商品流通税、对一部分工业品征收的货物税、对工商企业按销售额征收的营业税以及印花税合并为一种税，即工商统一税。国务院于1958年颁布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试行。以后又根据各方面的不同情况停征了个别税种。经过这次简并，全国除关税、农业税外，只留下了8个税种：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车船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和盐税。

"十年动乱"期间，再一次简化合并了税制。主要是，将原对工商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和对企业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和盐税等合并为一个税种：工商税。1972年国务院批发了《工商税条例（草案）》，1973年1月全面试行。工商税仍然实行在工业环节和商业环节的两次课征制。这次改革后，对国营企业只征收一种税，即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只征收两种税，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其余的税种征收范围都比较小。

（二）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的改革探索

1978年以前，受"非税"理论和"左"的错误的影响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财政体制相适应，我国税收体制经过一再简并，形成了一套过于简化的税制。主要税种基本上只剩下了工商税和集体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只占约50%的比例。这套税种过少、覆盖面较窄、结构也不合理的税制无法正常发挥筹集财政收入和

调节经济杠杆的作用。因而税制显然已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伴随全面改革开放的步伐，1979 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税制改革的轮廓设想，指出：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与改革，一方面要求税收积极地发挥组织收入的职能作用，保证国家财政的稳定和平衡；另一方面要求税收进一步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

1981 年 9 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总体设想，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的原则。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合理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税收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的原则是：(1) 适应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和经济性质、经济形式的多样性，逐步恢复一些税种，使每个税种在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2) 加强经济责任制，逐步把国营企业的利润改为征税，以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3) 根据国家经济政策的要求，按不同产品和不同行业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从经济利益上来调节生产和消费。根据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税制要鼓励扩大出口，保护国内生产，要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4) 在目前价格不能大动的情况下，用税收杠杆来调节一部分企业的利润，适当解决企业之间由于价格和资源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利润水平悬殊的问题。(5) 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兼顾地方、部门、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6) 将各项工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管理权。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和原则，我国的税制进行了如下的改革：

1.“利改税”改革。经过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 500 多户企业将近四年的试点，1983 年 4 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改革，改变了以往国有企业只上缴利润的分配办法，在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中第一次引进了所得税的形式，为创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2. 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在实行第二步“利改税”的同时，对原有的工商税制也开始进行改革和完善。主要内容有：

改革并完善流转税制度。改革开放前，经过简并的流转税只剩下“工商税”一种，其重复征税的弊端阻碍了专业化协作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国务院决定将工商税按纳税对象一分为四：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体现了不同税种在不同经济领域里发挥特定调节作用的原则。上述条例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1984 年以后，又进一步对流转税进行了调整，中心内容是缩小产品税的征税范围、不断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并规范了增值税的征收制度。与此同时，对营业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调整，增设了新的营业税税目。

流转课税

流转课税，亦称流通税。以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销售额或数量以及非商品的营业收入为对象所课征的一类税。流转税是世界各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税收种类繁多，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 以商品生产、交换和商业性劳务为课税前提，征税范围较为广泛，既包括生产销售的工农业产品，也包括商业、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它既对国内商品课税，也对进出国境或关境的商品课征，税源充裕。(2) 以商品销售额和营业收入作为计税依据，一般不受生产经营成本、费用变化的影响，可以保证国家及时、稳定、可靠地取得财政收入。(3) 一般具有间接税性质，不论这类税收是采取价内税或价外税形式，税收与价格关系较为密切，便于国家通过征税体现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4) 同有些税类相比，流转课税在计算征收上较简便，易于为纳税人所接受。

建立健全所得税制度。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理顺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按照国际上的通行作法，1984 年通过两步利改税我国对国有企业开征了所得税，先后还陆续开征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1985 年又对集体企业所得税进行了调整。

建立涉外税收制度。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为更好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维护国家主权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1980 年和 1981 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形成了我国的涉外税收体系。以后随着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变化，1991 年将两个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度合并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开征新税种，有选择地恢复老税种，扩大税收的调节范围。除增值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是新开征的税种外，还针对不同的调节对象开征了一些新税种。如为了促进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开征了资源税；为了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开征了建筑税，后改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还开征了特别消费税，烧油特别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筵席税，以及奖金税，等等。在改进的基础上恢复的老税种，除产品税、营业税、盐税外，还有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

此外，通过恢复征收契税、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和耕地占用税及改革农业税的征收方式，完善了农业税制度。

恢复改进了关税制度。在制定《海关法》和两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基础上，采用《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重新制定和完善了《海关进出口税则》，部分地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加强税收征管的法制建设。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税收征管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制度，涉及征管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各个单项税收法规，不仅给公平执法造成困难，也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随着税收体制的改革进程，制定统一的税收征管法提到了议事日程，国务院于 1986 年 4 月发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经过一段实践的检验，作

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七届全国人大于1992年9月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从此税收征管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经过1978—1993年市场化取向的一系列改革，我国的税制已由改革开放前的单一税制转变为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制，税种由改革前的17种增加到37种，初步适应了当时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但是，与经济发展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税收环境的需要相比，其仍存在着不少弊端，主要有：税种结构不合理，且税种过多、税目税率繁杂；重复征税的产品税还继续存在，增值税不规范；税基过于狭窄，过份倚重加工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所得税制度，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制并行；中央税收完全依靠地方税局征收，缺乏宏观调控的有效财力保证等。这些问题都有待税制的深化改革来解决。

1993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同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等，并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全面施行。自此，我国的税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次改革遵循着这样的原则：统一税政。即属于国家统一开征并需要实行全国统一政策的税收，必须在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做到税制统一、税政统一，克服同一课税对象多税种并立和内外两套税制并存所带来的税政不统一的矛盾；增强效能。即税收规定必须有利于发挥税收筹集资金的作用，必须有利于国家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贯彻；公平税赋、促进竞争。即在合理负担的基础上，税赋确定以后，在同等条件下税赋要平等，鼓励进步、淘汰落后、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简化税制。即调整税种，优化税制结构，增强税法的透明度，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收效率；合理分权。即根据有利于税收管理和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实行税权集中于中央、征收管理由中央和地方分别管理的办法。根据这些原则，改革主要围绕如下一些方面展开：

1. 改革流转税制度。

改革增值税制度，确立增值税为新税制的主体税种。若按税收种类划分，税制改革大体可分为流转税、所得税以及地方税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验看，现阶段我国的税种结构仍应以流转税作为主体税种。在流转税中，增值税具有税基广泛、避免重复征收、相互交叉稽核、有利于出口等优点。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取消产品税。对增值税进行改进，将原来的12个档次的多税率结构改为基本税率为主，辅以低税率。基本税率为17%，对基本生活必须品和政策上要照顾的产品实行13%的低税率，对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政策。对小规模纳税人适用6%的征收率。此外，在增值税的征收办法上进行了若干改进，建立了凭专用发票注明税款的扣税制度。调整了纳税人的范围，将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和个人也纳入增值税的纳税人范围。严格了增值税的减免税制度。改

革后的增值税体现了公平、中性、透明、普遍的原则，其总体税负保持了原有水平。在新的税收体制中，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70%以上，其中增值税占47%（1994年决算数），对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建立消费税制度。消费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中新设立的税种。它是在原产品税、特别消费税、工商统一税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它保留了对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产品有选择征税的特征，但征税的范围主要限于消费品。它与产品税和工商统一税的区别在于：它不具有普遍征收的特点，而是根据产业政策和消费导向的要求，有选择地对部分消费品征收。因此，它发挥的是特殊的调节作用。将增值税与消费税结合起来运用，形成增值税普遍调节、消费税特殊调节的双层调节机制，更有利于发挥流转税的整体调节作用。消费税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有选择性地确定征税范围，仅限于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的应税消费品。这些应税消费品分为5个大类，设11个税目、13个子目，共25个征税项目；设15档税率，分为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形式。比例税率最高为45%，最低为3%。消费税仅对出口产品实行免税政策，其余一律不予减免。

改革营业税制度。营业税是改革后流转税制中的三个主要税种之一。新的营业税制是在原营业税、工商统一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因此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有所缩小。营业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在征税范围上，因增值税除不动产外对所有销售货物行为都征税、对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应税劳务也征税，所以新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原则上可以说，是原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剔除改征增值税后的余项，即销售应税劳务和销售不动产两类。新的营业税有9个税目。原营业税不适用于外资企业，这次改革将外资企业也纳入了营业税的征收范围。新的营业税实行有差别的比例税率，分别为3%、5%、8%，娱乐业适用5%—20%的幅度比例税率。清理了减免税政策，只保留了少部分的减免项目。

2. 调整与改革所得税制度。

所得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一种直接税。虽然所得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规模还不够大，但却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税种，在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上有着其它税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所得税制的改革，分为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和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两个序列。

我国原有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可分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套税制。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外，内资企业所得税有四种，即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私营企业所得税。这种按所有制性质分设不同税种的做法，即不利于税制结构的完善，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为了调整、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实现公平竞争，从1994年1月1日起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下一步再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对部分盈利水平低的企业，采用两档低税率给予过渡性照顾，对金融和保险业的所得税仍按原规定税率执行。用税法规范企业所得税列支项目和标准，稳定和拓宽税基，硬化企业所得税山。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这次改革后，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适用范围，包括按税法规定有纳税义务的中国公民和从中国境内取得收入的外籍人员。改革后的个人应纳税所得在原税法规定的六项基础上新增加了五项，即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个人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税率采用国际通行的超额累进制，即工资、薪金所得采用5%至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采用5%至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同时根据对纳税人基本生活费不征税的国际惯例，合理确定了税收负担水平。在计税方法上，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了分项征收的方法，并在对原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项目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形成了规范的减免税规定。

3. 其它税种的改革和调整。

除上述流转税和所得税之外，对工商税制中的其它税种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革。一是开征土地增值税。明确规定了土地增值税纳税人的范围，凡有偿转让地产都属于征税范围。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30%，最高税率为60%；二是改革资源税；三是开征证券交易税；四是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烧油税、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等。四是将特别消费税和烧油特别税并入消费税。与此同时，对农业税制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新税制共有17个税种，各项税收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85%左右。

1994年在推进新税制的过程中又出台了一些调整措施。主要有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生产率和纳税环节，调低农产品、资源性产品税负等；1995年又进一步解决了新税制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对增值税已征税款抵扣制度进行了调整，改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防伪识伪功能，进一步健全了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法律法规。一些地区试行了以纳税人自核自缴为基础的申报制度，同时推广计算机等先进征管手段的应用，强化税收稽查，在提高税收征管水平，杜绝税源流失，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税效率方面，取得了有益经验。另外，还针对出口退税中少征多退等问题，适当下调了出口退税率，1996年进一步调低了出口退税率。从1997年开始，有选择地陆续调高了出口产品的退税率，至1999年我国的出口产品退税率总体上已提高到15%，有利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

4. 改革关税制度。

为促进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完善和深化，同时配合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的谈判及多边关税减让谈判，1992年对我国的关税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使关税政策和职能由实施保护为主，向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方向转化，由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并重向主要运用关税手段转化，使我国的关税制度既体现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惯例。

20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得到了较好地处理，初步建立起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制度，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体制已经初步形成，有力地支持了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财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持续、健康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金融体制的探索与改革

金融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最重要的调控手段之一，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五十年来我国对金融体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改革。

一、改革开放前“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形成

我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可以远溯到70多年前，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就成立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就建立了自己的银行，独立发行货币，发放农业贷款。1948年冬，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于12月1日发出第四号公告，决定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当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即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逐渐取代了原来分散的各解放区银行，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成为全国集中统一的大银行。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没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金融机构，其资产和工作人员直接用来充实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外国在华银行特权，参与领导了对私营银行、钱庄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农村信用合作组织。通过对金融极端混乱局面的一系列整顿，建立了新中国的金融制度和秩序。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从1953年起，参照苏联模式，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集货币发行、工商信贷、储蓄结算、现金出纳等业务于一身，统一管理全国的信贷活动，逐步向大一统的银行体制转变。其后尽管这一体系内部也进行过一些小的调整，但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此间，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是当时我国唯一的金融机构，其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域从中央遍设至全国各地，尽管曾经有其它金融机构存在，但均非独立的经济实体，无从改变人民银行“大一统”的地位。

中国农业银行曾分别于1955年和1963年两度建立，主要办理短期农业贷款和财政农业拨款，业务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由于基层机构与人民银行职能划分不清，矛盾很多，仅分别存在两年左右，即于1957年和1965年两度重新并入了中国人民银行。

1953年以后的中国银行一直是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外汇专业银行，它保持着独立存在的形式，但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只从事外汇结算业务。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于1954年，归财政部领导，主要办理基建拨款，对建筑企业的贷款和基建的结算业务。1958年改为财政部基建财务司，对外仍称为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1962年恢复建制，仍归财政部领导。1970年并入人民银行，1972年再次独立出来。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在没收了官僚资本保险公司和改造了私营保险公司的基础上于1949年10月成立的，最初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1952年转归财政部领导，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受"公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的影响，国内保险业务停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转归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领导，仅经办少量国际业务。对外虽然仍挂保险公司的牌子，事实上却很难算作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办于1952年，在改革前始终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而且许多地方信用合作社与国家银行在当地的营业所合二为一。

改革开放前的这种"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银行附属于财政。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生产、销售都是由国家负责统一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也由国家统一确定，银行主要负责为此组织和安排资金，处于从属地位，实际上起着会计出纳的作用；第二，"大一统"的银行经营模式。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作用于一身，既负责货币发行和金融管理，又具体从事各种业务经营；第三，银行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全国银行各分支机构的人财物由总行集中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吸收的存款交总行统一调配，贷款按照总行信贷计划和指令进行发放；第四，信用的单一化。整个社会的信用方式集中于银行信用，不存在商业信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二、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的全方位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按照"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的目标不断向前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健全

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环节。经过近20年的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央银行为调控和监管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组织、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并存及分工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

1983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确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的经济实体，在国家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1983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做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保持货币稳定。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作为中央银行。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进行了重大改革，改变了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置若干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在不设分行的省会城市设立金融监管办事处，作为分行的派出机构，负责对辖区内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省会城市中心支行承担原省分行的部分金融服务职能。从此，人民银行的分行不再隶属于某个省份，有利于人民银行摆脱行政干预，充分履行监管责任；此外，组建跨行政区划的人民银行分行，也为建立货币政策的区域性研究制度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设立和恢复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其中，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工商银行主要承办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是在1979年得到恢复，其业务重点分别为农村金融、外汇业务和基本建设贷款业务。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应运而生，并得到蓬勃的发展。《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12月25日)。

1994年，我国分别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初步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的分离。198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运营，1988年以后，我国保险市场多元化步伐不断加快。“八五”(1991—1995）末期，对保险业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设为财险、寿险和再保险三个子公司。1998年底，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正式形成。此外，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得到较快发展。至90年代初，我国基本形成了中央银行为调控和监管下，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各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目前我国已有金融机构（含基层营业网点）20多万个，金融从业人员240多万人。

（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

社会主义金融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金融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起步发展阶段(1985年以前)。1981年国债发行重新启动，一些城市出现商业票据的承兑、贴现业务，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开始出现，但发展很不规范。二是快速发展阶段（1986—1993年)。在此期间，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迅速，一些城市出现一定规模的融资中心，银行普遍开办票据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证券市场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有价证券的转让市场。三是规范发展阶段（1994年至今)。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扩大全国同业拆借市场的规模，票据市场稳步发展，包括股票、国债、企业债券在内的证券市场在规范的基础上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了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外汇调剂市场、国债及企业债市场、股票市场在内的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业拆借市场。1985起，我国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

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新体制，促成了同业拆借市场的兴起。1986年国家体改委和人民银行总行把开放同业拆借市场列为金融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到1987年底，全国除西藏外，都建立了同业拆借市场。经过几年的整顿，1996年，人民银行在对融资中心改造和撤销各商业银行建立的金融市场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该市场的形成，为利率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有利于金融机构进行资产负债比率管理和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

票据市场。1981年开始进行票据贴现试点，1985年起开展商业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1986年起开办对专业银行的再贴现业务。1995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此后，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商业汇票业务的宏观管理和制度建设。

外汇市场。1988年，上海创办了第一个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到1993年底，全国已经有18个类似的市场。1994年4月，为了建立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化的外汇市场，成立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运行。

国债市场。1981年财政部恢复国债发行，国债市场开始启动。1994年后，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国债发行规模日趋增大。国债收入占同期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4.3%上升到1997年的26.9%。1991—1995年，开始采用承购包销的方式发行部分国债，1993年引入一级自营商制度，1996年国债发行采用招标方式，降低了国债的发行成本。与此同时，国债交易渐趋活跃，一个以证券交易所为点、以大量的柜台交易和场外电话交易为面的国债二级市场交易格局基本形成。

股票市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发展，股票发行数量逐渐增加。1990年和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分别成立，标志着股票市场步入规范发展阶段。1993年，股票公开发行试点扩大到全国，股票发行方式不断完善，发行规模急剧扩大。与此同时，市场监管体系逐渐形成。1992年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7年，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由证监会直接管理，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

（三）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从1953—1980年，我国长期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管理体制。其特征，一是信贷业务高度集中在人民银行；二是各级银行吸收的存款全部上交总行，各级银行发放的贷款由总行统一核定计划指标、严格按照计划发放。这种信贷管理模式是由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决定并为其服务的。鉴于传统“统存统贷”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从1980年开始实行“存贷差额”控制的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为适应新的银行体制，从1985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对信贷资金实行“实贷实存”的管理制度，即“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1988年，针对经济过热的局面，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采取了贷款限额管理的办法。总之，尽管在不同时期，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具体做法虽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即贷款的规模管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直接管理型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从90年代初，金融部门开始进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试点，1994年对各专业银行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人民银行下达给各专业银行总贷款限额为最高限额，各专业银行必须认

真遵守，各专业银行总行对全行的信贷总规模以及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支付能力负全部责任。专业银行总行对本系统各分支机构实行总量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8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管理，在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管理体制。这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放弃了长期实行的直接规模管理办法，自此，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在金融机构全面推行。

（四）不断加强金融规范化管理，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从90年代开始，金融规范化管理得到全面加强。一是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分离金融机构及其业务，严格整顿金融秩序。从90年代初开始，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与其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陆续脱钩。完善有关非银行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的界定，进一步整顿和规范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整顿和规范保险市场，严格界定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范围。对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各类基金会、互助会、结算中心等也进行了清理整顿。二是构筑金融法律体系基本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善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实施，从法律制度上堵塞漏洞，防范风险。三是中央银行强化金融监管，由原来例行的单一金融检查，逐步发展为合规性监管、合规性监管与资产风险监管并重，加强了对金融企业整体风险的监管。人民银行健全了金融监管责任制，总行和分行分工明确，各司其责。四是商业银行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信贷资产分类方法。1998年以后，各银行开始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按照实际风险程度，推行信贷资产五级分类法，改变过去“一逾两呆”的静态分类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明确法人负责制，健全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五是注重提高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及时防范和化解支付风险。近年来，人民银行加强了对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的监控，要求各金融机构制定资产流动性警戒指标，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人民银行对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金融机构，采取有条件的贷款支持、接管、购并、直至实行关闭、破产的办法加以处理。

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我国专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具体方法之一。其宗旨是通过控制资产负债相互间的比例以及各自的内部比例，实现资产负债的总量平衡和银行经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统一。上述目标一般是通过如下几项比例指标调控来实现的：(1) 存贷款比例控制。其要点在于首先对负债做必要扣除，并留有充分余地，使贷款加购买债券的总量小于或等于做出各项扣除后的可用资金来源总量。(2) 固定资产贷款比例控制。(3) 备付金比例控制。其原则为既要确保支付，又要减少占用。(4) 同业拆借资金比例控制。(5) 抵押担保贷款比例控制。(6) 对单个企业和单个项目的贷款也应实行比例控制。确定单个企业和单个项目的贷款余额与贷款总规模的比例，以分散贷

款风险，保证贷款安全。(7) 风险、呆账贷款率。

（五）外汇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1979 年至 1993 年间，在外汇分配制度、外汇市场建设、人民币汇率调整、外资金融机构的引进、外资利用和外债管理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和创新。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1993 年 11 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随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决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进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和外汇额度，实行结售汇制；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取消外汇券；加强资本项目的管理等。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外资流人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1996 年 12 月 1 日，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

三、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提高金融调控水平

改革金融体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金融调控体系的完善和金融调控水平的提高。

（一）日益健全的金融调控体系

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 30 年间，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金融调控手段表现为单一的货币、信贷计划。间接调控手段由于不具备其作用的经济基础，在货币信贷宏观调控中没有相应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逐步建立起以间接调控为特征的金融调控体系。

1.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我国的准备金制度是在 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建立起来的，在 1998 年 3 月以前，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两部分。

1984 年，为了加强结构调整力度，平衡信贷收支，中央银行按存款种类核定了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985 年，针对当时存款准备金率偏高，超过了国有商业银行承受能力的情况，为促进商业银行自求平衡、减少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过度投放，人民银行改变按存款种类核定缴存比例的做法，一律调整为 10%。1987～1988 年，为了抑制当时的经济过热、物价上涨过快和货币投放过多，同时，为了使中央银行能够适当集中资金支持国家重点产业和项目，又对存款准备金率作了两次调整。1988 年以后，考虑到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很大，同时，中央银行大量发放再贷款与存款准备金的作用相互抵消，因此，直到 1998 年初，近十年对存款准备金未做调整。

由于准备金存款不能用于支付与清算，因此从 1985 年起，各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

机构，为保证存款支付和资金清算，按规定在中央银行设立了一般存款账户，即备付金账户，一切资金收付和清算均通过此账户进行。

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集中存款准备金，不是用于金融机构保证支付和日常清算的需要，而是将其用于发放再贷款，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和某些重点产业、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商业银行为了保证存款支付和进行清算，不得不在中央银行开立了备付金账户，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另外，中央银行对存款准备金支付较高的利息，既加重了央行的利息负担，又弱化了准备金的内在功能。

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中央银行进行金融间接调控，加上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和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换，政策性贷款大多已由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担，因而改革准备金制度势在必行。1998 年 3 月，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改革：(1) 调整金融机构一般存款范围，将金融机构代理人民银行财政性存款中的机关团体存款、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的一般存款。(2) 将各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合并，称为“准备金存款”账户。(3) 存款准备金率从 13%下调至 8%，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按法人统一考核。(4) 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在人民银行分支行开设的用于结算的准备金账户按准备金存款计息，但不计入考核之列。准备金存款的超额部分由金融机构自行确定。(5) 下调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同业存款利率不得高于准备金存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对完善货币政策工具、深化金融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

我国的公开市场业务是从外汇市场的操作起步的。1994 年实行了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并轨。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开始进行日常性的公开市场操作。1994 年到 1996 年，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累计净买入外汇 923 亿美元，净投放人民币 7775 亿元，从而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1996 年 4 月，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进入国债领域，但刚开始交易量较小，起不到调控作用。1997 年 6 月，人民银行决定，各商业银行的国债业务从深沪两交易所撤出，转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银行间国债交易回购市场。这一市场的建立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初步建立起规范的操作机制。1998 年上半年，为了适应经济增长趋缓，贷款有效需求下降的变化，中央银行增加了交易对象，加大操作力度，并将公开市场业务的主渠道从外汇市场转到债券市场。

3. 再贴现业务的开展。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取消了商业信用，实行集中的银行信用，因此，不存在票据贴现。改革之后，随着经济的不断搞活，我国的商业信用逐步开放，许多企业由于资金紧张采取了开具汇票赊销的办法购买商品，商业票据的贴现和承兑业务应运而生，票据市场逐步发展，再贴现也逐渐成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近年来，中央银行票据再贴现业务获得了稳步发展。商业汇票年度发生额及商业银行办理贴现、中央银行办理再贴现数额大幅度上升。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的发展，不仅成

为企业和商业银行重要的资金融通渠道，而且成为中央银行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

4. 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业务。

我国中央银行从1984年开始发放再贷款。长期以来，再贷款业务是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1994年以前，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参见表12－1)。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成功后，外汇占款迅速增加，为避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中央银行通过收回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来实施“对冲”操作，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长较为缓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1997年，该比重为49%。

长远来看，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将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和发行金融债来解决；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系统内资金自求平衡，对中央银行贷款的依赖将越来越弱，再贷款这一工具的数量和份额将逐渐收缩。加上最近两年由于买方市场的出现、贷款需求减少、商业银行严格风险管理等因素，商业银行对贷款更加谨慎，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再贷款作为中央银行调控手段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可以预料，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将主要发挥救助功能而非调控商业银行资金头寸的功能。(参见表12－1)

表12－1　　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及占基础货币比例　　单位：亿元

年　　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	9860	10721	11628	14636	14992
其中：对国有独资银行	9562	9626	6927	8318	5761
所占比重（%）	97	90	60	57	38
基础货币	13147	17218	20760	26729	30642
再贷款/基础货币（%）	75	62	56	55	49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有关各期。

5. 利率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国注意发挥利率的经济作用，实行了差别利率政策。这对当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对私有制经济的改造，鼓励国营企业的生产经营，都发挥了较好作用。但1956年以后，我国实行了低利率和简化利率档次的作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利息当作“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提倡无息存款，削弱了利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改革以来，特别是金融市场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界对利率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利率的灵活性不断增加，其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参见表12－2)

表 12-2　　改革开放以来利率调整情况一览表　　单位：一年期%

时　　间	储蓄存款利率	储蓄存款实际利率	流动资金贷款利率
1978	3.24	2.54	5.04
1979.4.1	3.96	1.96	5.04
1980.4.1	5.4	-0.6	5.04
1982.4.10	5.76	3.86	5.76
1985.4.10	6.84	-1.96	7.2
1985.8.1	7.2	-1.6	7.92
1988.9.1	8.64	-9.86	9
1989.2.1	11.34	-6.46	11.34
1990.4.15	10.08	7.98	10.08
1990.8.21	8.64	6.54	9.36
1991.4.21	7.56	4.66	8.64
1993.5.15	9.18	-4.02	9.36
1993.7.11	10.98	-2.22	10.98
1995.1.1	10.98	-3.82	10.98
1995.7.1	10.98	-3.82	12.06
1996.5.1	9.18	3.08	10.98
1996.8.23	7.47	1.37	10.08
1997.10.23	5.67	4.87	8.64
1998.3.25	5.22	6.34	7.92
1998.7.1	4.77	6.69	6.93
1998.12.7	3.78		6.39
1999.6.10	2.25		5.85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有关各期。

（1）利率体系趋于完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利率的种类少、差别小。改革之后，利率的种类、档次不断增多，差别增大。根据期限长短实行不同的利率，并通过优惠利

率发挥利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1998年，中央银行为促进经济增长，在下调利率的同时，理顺利率关系，推进利率体制改革，确定再贴现率为一种基准利率。

（2）下放部分利率管理权，提高贷款经营机构的积极性。第一，各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的某些贷款，如国家没有统一规定利率，有关银行可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相近利率水平，提出具体利率，报人民银行批准后执行。第二，信托投资公司的利率，可以在银行利率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具体利率由信托公司提出，报人民银行一级分行核定。委托投资贷款利率，由委托银行同委托单位在国家规定的利率范围内商定。第三，向金融机构下放部分利率管理权，尤其是合作金融组织的存贷款利率，其浮动范围较大。1998年，人民银行抓住通胀率较低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有效地发挥了支持企业发展的作用。

（3）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作用。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人民银行同国有银行的资金往来由原来的统一分配改变为借贷关系。相应地，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了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这些利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起引导作用，是银行利率体系的核心，因而被称为基准利率。由于银行对企业的利率也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制定，因而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利率对整个金融机构利率水平的影响还不是很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央银行直接制定的利率将逐步减少，各金融机构在利率方面的权限将不断加大，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影响将逐步加大。

法定利率

法定利率是中央银行规定的利率。为了使利率水平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中央银行必须直接控制一部分利率水平，形成法定利率与市场利率并存的局面。我国《利率管理暂行规定》确认，“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变动。法定利率的公布、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

法定利率对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利率起导向作用。法定利率的升降直接影响贷款人刘未来市场利率的预期，并影响他们提供信贷的松紧程度，从而使市场利率随之升降。法定利率的高低还制约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对中央银行货币的需求。法定利率通常分为三类：（1）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融资利率，包括再贴现利率和再贷款利率。（2）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卖出证券的价格。以上两种利率对金融市场利率起着核心领导作用。（3）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管制和对金融市场上股息债息的直接控制。

基准利率

基准利率是在整个利率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利率。我国《利率管理暂行规定）确认，“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基准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

在金融市场上，由于利率的多样性与利率体系的复杂性，投资者和参与者不可能对每种利率都给予高度关注。同时，在多种利率并存的条件下，总有某一种利率起决定作用，当它变动时，其它利率也相应发生变动，这种起决定作用的利率即为基准利率。基准利率在初期，由市场活动的结果自发形成；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条件下，则由国家政府或金融管理当局决定。在我国，1984 年以前国家银行制定的利率起着基准利率的作用，市场利率的形成、变动及其管理都要以国家银行利率水平为依据；在国家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中，又以 1 年期的存款利率和 1 年期的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1984 年我国中央银行体制建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和各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基准利率变动时，其它利率也要相应跟着变动。

（4）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1996 年 1 月 3 日，全国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启动试运行，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同年 4 月，中央银行以国债回购方式启动了公开市场业务，其回购利率实行市场招标，进一步深化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二）金融调控水平逐步提高

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调控的有效性提供了制度保障，而金融调控体系的完善又为其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调控水平逐步提高。

1. 确定合理的货币政策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双重目标到单一目标的实践过程。1983 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强调双重目标，即经济发展和币值稳定。这是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把经济搞上去是经济社会中的头等大事，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必然要服从这一战略目标。

但由于有双重目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一直在平衡妥协之中艰难地运作。改革开放之后，各级政府直接肩负着推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容易产生缺乏约束的投资冲动。在财政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的份额越来越小、信贷资金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种冲动就必然通过行政关系导致银行信贷扩张，倒逼中央银行投放过多的货币，引发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得不进行调整，此时治理通胀、平抑物价又成了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目标。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调节性货币政策与非调节性货币政策

调节性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经常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对准备金和货币存量的需求变动进行调节的货币政策。非调节性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不是根据收入目标的要求利用调节

变量来调节货币存量，而是把准备金和货币存量固定在预定水平上的货币政策。调节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当准备金和货币需求增长时，中央银行就增加准备金供给，反之就减少准备金供给。非调节性货币政策则认为，在较短时期内，准备金和货币存量需求的增减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收入稳定目标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调节性政策和非调节性政策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中央银行有优先稳定利率的实际偏向。

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有了较大变化。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的手段将这一目标予以确定，币值稳定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首要目标。

2. 选择科学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与最终目标相关联的金融调控指标。由于时滞等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在短时间内的相关关系并不很明显，中央银行为了及时掌握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必须利用一些能够迅速反映经济形势变化的金融变量，作为观察从货币政策工具到最终目标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的信号，这些金融变量就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中央银行一直沿用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多种因素决定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有效的：一是居民的储蓄存款很少，金融资产单一；二是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国际收支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较小；三是财政长期以来实行"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预算管理政策，赤字较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也较小；四是贷款管理上一直实行"统存统贷"的政策，贷款几乎成为银行资产的唯一形式。除了银行贷款之外，很少有其它渠道供应货币，因此，只要控制贷款，基本上就可以控制社会信用总量。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一是居民储蓄存款迅猛增加，而且居民金融意识日益增强，其资产形式已不仅限于银行存款，对债券、股票等资产的持有量逐渐增多；二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已被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体系替代，国家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比重不断升高，1980 年接近 9.4%，1990 年则为 18%，而 1995 年进一步上升到 30%，而且到 1994 年，由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转化为存款后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只占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的一半左右；三是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比重不断升高，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筹集的资金越来越多，1997 年直接融资新增额达到 6700 多亿元，占企业总融资新增额的 19%；四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向型企业的结售汇数额持续增加，因此，外汇资产的变动对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另外，一些银行的"绕规模"放款，也使贷款规模的直接控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负效应。

上述情况说明，仅仅监控银行贷款和现金发行已经不能全面客观反映全社会的货币支付能力，据此也很难全面科学地判断银根的松紧，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强化了对货币

供应量的统计分析与研究工作，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1995年开始尝试将其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并从1996年开始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目前，中央银行中介目标的监测重点已由M_0向M_1和M_2转变。M_0的重要性已淡化；M_1与现期价格水平关系较为直接，是中央银行的短期重点监测目标；M_2对社会物价总水平有着重大影响，是中长期监测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已从1996年起在每年初提出当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监控范围，作为全年监测的目标和依据。

货币层次

货币层次是根据流通中货币的流动性即变现能力或其它特征对各种形态的货币所进行的分类或划分。货币层次主要有三个：

M_0＝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库存现金以外的通货＋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称为狭义的货币。

M_1＝M_0＋居民和单位定期存款十自筹基建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它存款（不含财政存款），是较广义的货币。

M_2＝M_1＋除M_1中各项银行存款以外的其它所有银行存款＋居城乡信用社存款（剔除转存于银行部分），是广义的货币。

不同层次的货币都具有特定性质和运动规律，在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影响，产生不同的作用。

3. 综合、协调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

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调控的唯一政策工具是货币、信贷计划。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应运而生，从8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调控逐步转向结合宏观经济形势，综合、协调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有效的间接调控。

由于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科学性的提高，我国比较成功地治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经济超常波动和通货膨胀，1997年开始又比较成功地抵御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效地防御了金融风险，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进入1999年后，在预防通货紧缩、刺激市场需求等方面，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一起，正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第四节　宏观调控模式和方式的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我国宏观管理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下指标、定项目、分钱物是这一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

别是随着1994年以来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宏观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宏观调控的模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模式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模式正在形成。

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必须运用必要的社会经济管理手段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职能。从狭义上来讲，宏观调控是对经济总量进行管理，其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是指：经济的稳定增长、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从广义来讲，宏观调控除实现总量平衡之外，还要实现重大经济结构的优化，弥补市场的失灵和公平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内容。

一、1978—1993年期间的宏观经济管理

从1978到1993年期间，与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相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具有“双轨制”的特征。一方面，指令性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仍具有重要作用，指令性计划手段偏重于实物性指标管理，强调定指标、分投资、分项目，国家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规模计划的直接管理和控制来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也开始逐步运用一些财政和金融手段对经济总量进行间接调节。根据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和特点，1993年前的宏观经济管理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总量紧缩阶段（1981—1982年）。

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管理还是以直接调控为主。1979、1980年财政发生赤字，银行货币发行过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从1981年实行总量紧缩的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82年。其基本要求是“两平一稳”，即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把物价、特别是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稳定下来。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停建缓建一批建设项目，减少基本建设拨款；大力节减事业费用和行政经费，并适当压缩了国防经费、减少了财政开支；重申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分口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等。执行结果是比较理想的。从财政方面看，赤字大幅度降低，由1980年的129亿元减少到1981年的25.5亿元和1982年的29亿元；从货币方面看，信贷收支也趋于平衡。流通中货币量的增长幅度下降，由1980年的29.3%减少到1981年的14.5%和1982年的10.8%；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缩小，积累率从1978年的36.5%，下降到1983年的30%；从物价方面看，从1981到1983年，价格上涨相当平稳，保持了1%—2%的水平。

2. 紧缩信贷阶段（1984—1985年）。

1984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于此同时，信贷失控，需求膨胀，到1985年下半年，物价上涨的态势更趋明显，第3季度物价涨幅在10%以上。1995年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达12.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8%，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27.5%，银行各项贷款增长23.9%，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了8.8%。对此，国家决定从1985年第4季度开始实行以行政性手段为主的紧缩政策，主要内容有：重新审查国有企业投资项目，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规模；紧缩信贷，并在4月和8月调高了银行存贷款利率。这些措施，到1986年初收到了明显效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减弱，物价明显回落，但经济增长速度也跌落较快，1986年2月份工业出现负增长。政府受到地方和国有企业的压力，放松了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的控制，经济出现回升，并继续在偏热状态下运行。

这次紧缩方向正确，取得了一定效果，如货币发行量明显减少，过快的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由于力度过大，操之过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猛。为了保速度，紧缩政策在实行九个月后即为总量扩张的政策所代替。后者大大增强了企业和地方活力，推动了生产、投资和流通全面繁荣；但由于宏观管理和经济监督准备不足，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投资失控和经济过热，以及“双轨”冲撞，市场秩序和分配关系出现严重的消极变化。在本阶段后期经济持续过热，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

3. 治理整顿阶段（1989—1991年）。

到1988年2、3季度，总需求迅速膨胀，经济运行重新呈现高潮。价格改革出台的时机正在总需求松弛的关头。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加大，开始提取存款，大量抢购，经济形势出现极其严重的局面。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上涨23.5%，社会零售额上涨27.8%，货币流通量增长了46.7%，物价从8月份猛涨，12月末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同期比上涨了26.7%，全年平均达18.5%。面对1988年以来涨价、抢购、挤兑、以及经济秩序混乱的严重形势，中央于同年9月果断决定，对经济全面进行治理整顿，把稳定通货、物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适当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遏制投资膨胀的态势；提高利率，实行保值贴补，稳定存款；冻结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并相应增加了国家的物价补贴；对涨价过猛的商品（如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对部分商品实现控购（如控制社会集团的商品购买）乃至清理公司、整顿流通秩序、控制职工货币收入增长等措施。此外还出台了一些集中财力的措施，如开征特别消费税、征收预算外调节基金、延期归还企事业单位的国库券本息等等。

通过一年的努力，总量紧缩和政策调整取得很大进展，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初步得到抑制，到了1990年，政策调整的效果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供需总量失衡的矛盾大大缓解，1989年末以来出现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货币供应量大为减少；物价上涨受到遏制。物价涨幅由1989年的17.8%降至1991年的2.9%。但伴随着通货膨胀的抑制，经济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1989至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及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为5.5%，10.3%和7.8%，处于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出现疲软，财政赤字扩大，经济效益下滑。这次紧缩主要采取行政性手段和增加物价补贴，给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1993年之后的宏观调控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决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1994年起，中央以财政、税收改革、会计、外汇体制等为重点，对严重滞后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全面改革。经过改革，计划、金融、财政等主要调控部门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初步建立起来，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逐渐集中到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上来，宏观调控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是：

(1) 宏观调控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条件下进行的；(2) 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间接管理方式，而不是通过对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进行的；(3) 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性手段。

得益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和不断改善，我国在1993年以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发展过热和市场需求不足的两个阶段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取得巨大的成效。

第一阶段：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1993—1997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我国经济一改上一阶段攀升乏力的局面，跃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国民经济超高速发展。1992年GNP增长13%，固定资产增长42.6%，进出口总额增长22.1%，货币发行增长高达1.17倍，零售物价指数为5.4%，呈现高速度、低通胀的局面。但是经济中积蓄的强大需求压力和求大于供的差额，为通货膨胀的出现埋下了伏笔。1993年经济发展的势头，比1992更为旺盛。伴随着经济的加速增长，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投资结构不合理；二是金融秩序极度混乱，全国普遍出现了乱集资、乱拆借现象，使货币供应量急剧扩大；三是结构矛盾再次突显，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特别是铁路运输的瓶颈制约变强；四是物价攀升速度加快，通货膨胀已开始威胁经济的正常运行。

针对上述问题，根据“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总方针，中央于当年6月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这些措施，着眼于加快改革的步伐，强化间接调控，并有利于继续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主要是经济办法，同时，也包括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

这些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金融秩序明显好转，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适度降温，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货币供应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币汇率并轨后稳中有升。到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国民经济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通货膨

胀得到有效抑制，消费市场活跃，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财政金融形势基本平稳。

第二阶段：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增长（1998—1999）

从1997年起我国市场物价涨幅持续回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大幅度回落，国内需求对经济拉动的力度明显下降，经济增长出现减缓趋势。针对新的情况，中央果断实施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改革和发展的各项目标。1999年三、四月份以来，国内国际形势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内经济中一些矛盾更加明显暴露出来，主要的一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三是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四是物价连续下降的趋势继续发展。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又果断采取了综合性宏观调控对策，主要有，增加发行长期国债，适当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促进居民扩大消费；采取措施，力争使农民收入稳定增加；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等等。这些措施的出台有利于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有助于加快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改革、确保社会稳定、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其积极效果已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来。

第十三章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自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党和政府就着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5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探索，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第一节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的这段时间里，国家相继制定了关于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家对已经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和整顿，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

关于社会保障，国际上尚无统一定义。根据国情，我国通常将社会保障理解为：社会（国家）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基本生活保障，以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在五六十年代，我国通常将社会保障的几个组成部分分别称为劳动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开始使用“社会保障”一词。

社会保障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 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首先是国家。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通常是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家和政府不是社会保障唯一的责任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社会保障中所起的作用和应担负的责任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现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社会本身具有寻求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保障制度必须通过社会组织这一“社会载体”去贯彻、落实，同时社会组织也应主动发挥自我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真正有活力的社会保障制度。(2)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配套工程。社会化生产使整个社会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保障就是以社会化的保障手段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它通常使用的方法是以再分配方式转移支付，但是这不是唯一办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社会化保障手段将会采用，譬如，自愿保险、储蓄账户、有偿服务、纯粹市场手段等。(3) 社会

保障作为经济福利制度，其目标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保障是面向一个社会成员的，而且是按“需”分配的。但这里所说的“需”，仅仅是也只能是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等较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国家和社会仅仅保证满足人们这些最低层次的需求，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实际供给能力相一致的。因此，社会保障的作用只能是“保底”，要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4) 社会保障的出发点和初衷是为了补偿现代社会中被消弱的家庭保障功能，但决不是取而代之。社会保障必须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本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更全面地帮助社会成员对付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经济风险。

一、城市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演变

(一) 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1. 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我国的劳动保险事业是从东北地区搞起来的。1948 年东北全部解放后，东北行政委员会于 1948 年 12 月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并于 1949 年 4 月在国营的铁路、矿山、军工、军需、邮电、电气、纺织等行业实行，这是我国劳动保险工作的开始。随后，华北各省市和铁路、邮电两行业以及西北、西南、中南个别地区及企业都纷纷仿照东北条例的规定，实行了劳动保险。截止 1951 年 2 月，全国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共计 1213 个，职工人数 1427519 人。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 32 条“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规定，参照东北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和各地实行劳动保险的经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1951 年 2 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决定从 1951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它对企业职工在遇到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时所获得的补助、抚恤和救济，都做出了相应规定，为全面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主要内容

这是我国政府于 1951 年颁布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条例。

其主要内容是：(1) 实施范围：雇佣员工 100 人以上的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矿场及附属单位；铁路、航运、邮电的各企业单位与附属单位。(2) 实施对象：凡在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内的工人与职员（包括学徒），不分民族、年龄、性别和国籍，均适用本条例，但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除外。(3) 劳动保险金规定，劳动保险的各项费用均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以直接支付与缴纳劳动保险金的方式负担。劳动保险金须将相当于各该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工资总额的 3% 按月缴纳，而且不得在工人与职员工资内扣除，并不得向工人与职员另行征收。(4) 规定的主要险种有：工伤、残废、疾病、死亡、养老与生育保险。条例中同时还对劳动模范和转入企业工作的战斗英

雄享受优异劳动保险待遇作了规定，对转入企业工作的残疾军人的劳动保险待遇也作了规定。(5) 关于组织管理，各工会基层委员会为执行劳动保险业务的基层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劳动保险事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为全国劳动保险业务的最高监督机关。

《劳动保险条例》是在国家财政经济没有全面恢复的情况下制定的，有些保险待遇规定得较低，在实施范围上先采取了重点试行的办法。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的开展，政务院于 1953 年 1 月对劳动保险条例作了若干修改，并决定自 195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政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正的决定》主要在两个方面对《劳动保险条例》进行了完善：一是扩大了实施范围，除了原已施行劳动保险的铁路、邮电、航运及有职工 100 人以上的工厂、矿场外，将实施范围扩大到工矿交通企业的基本建设单位和国营建筑公司；二是提高了劳动保险待遇，即废止“停工医疗以 6 个月为限”的规定，适当提高职工疾病医疗期间待遇标准，规定贵重药费的酌情补助，增加养老补助费，放宽养老条件，其它如生育待遇，丧葬费、丧葬补助费，非因工死亡家属救济费也酌量增加。

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体现了人民政府对工人与职员的疾苦和困难的关心，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对于暂不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企业，其职工的劳动保险待遇，采取由行政或资方与工会组织双方，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的原则与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协商，通过签订集体劳动保险合同的办法解决。

1956 年，根据国家财政经济的可能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范围又扩大到商业、外贸、粮食、供销合作、金融、民航、石油、地质、水产、国营农牧场、造林等产业和部门。这样，全国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实行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达到了 1600 万人，比 1953 年增加了近 4 倍；通过签订集体劳动保险合同实行劳动保险的职工有 700 万人，比 1953 年增加了 10 倍。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职工人数，相当于当年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 94%。

2.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按照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凡是以工资收入为生活的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工人与职员，都有享受劳动保险的权利。但是，除了业务管理机关以外，当时一般的行政机关的公教人员并没有实行劳动保险。原因是一般的行政机关的经费都由各级财政机关直接拨付，即由国库负担，公教人员的数量很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国库难以负担公教人员的劳动保险费用。因此，对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国家采取以单项法规的形式进行了规定。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医疗、生育、养老保险规定

根据《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措施的指示》和《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子女医疗问题》这两个文件，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工

作人员和残废军人，都享受公费医疗。而且门诊费、住院费、手术费、诊疗费、药费，均从医疗费中拨付。至于子女的医疗问题，可在两种办法中任选一种来解决。一种是参加医疗费统筹，每人每月按规定缴纳医疗费，由机关统一掌握，使用时从统筹费内开支；另一种由本人自理，对确有困难的，从机关福利费内给以补助。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育待遇是根据《关于女工作人员生育假期的通知》确定的。其中的生育假期，生育假期工资及怀孕、分娩时的检查费、接生费等与《保险条例》的规定相同。

养老待遇是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实行的。它所规定的退休条件，与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大体相同，待遇标准略有不同。《暂行办法》将因工残废退休的待遇规定为本人工资的70%—80%，符合其它条件的则为50%—70%；而对那些有重大功绩或贡献的退休人员，只规定可酌量提高，没有规定具体数额。

政务院于1950年12月批准的《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伤残和死亡待遇作了规定。这个条例经过1952年、1953年和1955年的三次修改，待遇标准逐步提高；1952年6月颁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措施的指示》，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的医疗待遇作了规定；1952年9月12日颁布的《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患病期间待遇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于1955年12月29日颁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对国家工作人员患病期间的待遇也作了规定。国务院于1955年4月26日颁发的《关于女工作人员生产假期的通知》，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育待遇作了规定；于1955年12月29日颁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养老待遇和退职待遇作了规定；于1956年7月26日颁布的《关于处理牺牲、病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补助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牺牲或病故后所供养的家属享受补助待遇作了规定。此外，财政部、卫生部和国务院人事局于1955年9月17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子女医疗问题》，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子女医疗待遇作了规定。

截止1956年底，国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遇到生、老、病、死、伤、残等时所享受的保险待遇作出了相应规定，这标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它同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一起构成了新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

（二）社会保险制度的调整

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基本是正确的，但由于某些保险待遇不切合实际和不合理，国家决定对其进行调整和整顿。

1. 统一退休和退职规定。由于企业和机关分别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办理退休养老手续，这两项法规对企业工人与职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待遇规定不统一，因而使一部分年老体衰人员不能够或不愿意退休，直接影响了就业。为了把企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制度统一起来，并适当放宽退休条件，

适当调整退休待遇，劳动部草拟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国务院全体会议修改通过，于1958年2月公布施行。该项规定对退休条件和待遇标准作了调整，对企业和机关实行了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相应建立了因工因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办法。

关于退职制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也是分别按两项规定执行，前者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的暂行办法》执行，后者是按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2年1月发布的《国营企业工人、职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草案）》执行。由于企业和机关实行两种不同的办法，加上有些规定不尽恰当，职工对此有意见，不利于退职工作的开展。为此，劳动部在起草企业和国家机关统一的退休办法的同时，还草拟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1958年3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由国务院公布施行。这个规定统一了企业和国家机关的退职办法，并适当放宽了退职条件，提高了退职待遇标准，因而解决了原来企业和国家机关退职办法中的矛盾。

2. 改进医疗制度。由于制度不合理，管理不善，公费医疗中浪费是极其严重的。不仅经费上浪费很大，而且在医疗力量、设备和药品上浪费更大。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和克服浪费现象，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门诊、住院和药品），取消一切陋规（如转地治疗由医院开支路费，住院病人外出由医院开支车费等）”等措施。这个报告虽然在全会上通过，但由于批判反冒进及随后的“大跃进”，这些措施并没有推行下去。

1965年9月，中央在批转卫生部《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公费医疗制度应做适当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当适当整顿。”根据中央的批示，卫生部和财政部发出了《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作了适当改进。其主要内容，一是看病要收挂号费，二是营养滋补药品除医院领导批准使用的以外，一律实行自理。1966年4月，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了《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本着逐步对劳保医疗制度进行整顿的精神，提出了具体措施：企业职工患病和非因工负伤，在指定医院或企业附设医院医疗时，其所需的挂号费、出诊费均由职工本人负担；职工患病所需贵重药品的费用，改由行政方面负担；职工服用营养滋补药品的费用，改由本人自理；职工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住院期间的膳费，改由本人负担1/3，行政负担2/3。

3. 规定被精简职工的保险待遇。60年代初，由于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困难，国家不得不从1960年秋季开始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从1961年至1963年的3年中，全国共压缩全民所有制职工1751万，精简比例高达34.7%。

本着对精简职工负责到底、妥善安置的精神，国务院于1962年6月发布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规定凡精简下来的老弱残职工，符合退休条件的，作退休安置；不符合退休条件的，作退职处理。其中家庭生活有依靠的，发给退职补助费；家庭生活无依靠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相当于本人原标准工资40%的救济

费；他们的家属生活有困难的，另按社会救济标准给予救济。《规定》还对下列特殊人群做出了特殊规定：对于1945年8月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和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因年老、体弱不能工作，又不宜作退休退职处理的，列为编外，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的规定发给待遇。对于精简下来回乡、下乡的职工，凡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发给退职补助费；对于安置到外乡的职工，原来生活在城市自愿下乡落户的职工，以及因工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原来享受因工残废补助费的回乡回家职工，除发给生产补助费或退职补助费外，另酌情一次加发1~3个月的个人标准工资的安家补助费；职工本人及其随行供养家属回乡下乡时所需的车旅费和途中伙食补助费，由原工作单位按照规定标准发给。这些规定对当时顺利完成精简任务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保险事业的停滞

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社会保险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工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社会保障机构被撤销，劳动保险金统筹调剂被取消，基金积累制被废除，劳动保险变成了"企业自保"。

1. 管理机构被撤销。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劳动保险管理机构，并配备了经过专业培训的专职人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当时管理企业劳动保险业务的工会组织被停止活动，国家机关管理工作被削弱，使整个社会保险工作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的局面，社会保险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2. 劳动保险变成企业保险。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生产遭到破坏，有些企业资金不足，缴不起劳动保险金，有些企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缴纳劳动保险金，加上劳动保险管理机构被撤销，劳动保险金统一征集、管理、开支的制度难以继续执行。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

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保健制度，它通过互助共济，共同抵御疾病的风险。早在40年代，陕甘宁边区群众为解决看病难，采取了"凑份子"的办法建立了"医药合作社"。1950年前后，合作社性质的农村卫生组织，在东北地区得到发展。到了50年代，群众为了同贫困和疾病作斗争，迫切要求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农民在集体的扶持下，自愿组织起来实行集体医疗保健制度，这种制度形式被称为"合作医疗"，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支持。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后，这一制度在广大农村逐步推广。到1965年，全国已有山西、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部分县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合作医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左"的影响，出现了平均主

义、一刀切、超越客观可能性等弊端。

（二）农村“五保”制度的形成

“五保”制度是农村集体福利的重要形式。所谓“五保”，就是对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和无法定或义务抚养人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生活无人照顾的老复员退伍军人等，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人保教），享受这项集体福利的对象，称为“五保户”。

“五保”政策

我国对农村无儿无女、无经济来源、孤寡无靠的老人由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社会保障政策。“五保”指的是保吃、保穿、保住、保医和保葬，享受“五保”待遇的老人家庭称为五保户。

五保户的供养经费，在公社、生产队统一经营时期，主要从公益金中开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供养五保户的款物，一般都列入各户的承包合同，有些地方还从乡镇村办企业中提取一定的经费用于“五保”开支。

五保户的实物供给以及日常生活的照料，是通过集体组织实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些地方兴办了农村敬老院，对五保老人实行集中供养，使孤寡老人们在衣食、医疗和娱乐等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

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能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幼、孤、寡、残疾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住他们的吃、穿和柴禾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根据这一规定，随着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实行，“五保”制度逐步在农村普遍实行，成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一项重要内容。到1958年，农村敬老院发展到15万所，收养老人300余万人，更多的“五保”老人则采取集体供给，分散或专户赡养的形式，保障其基本生活。

（三）农村救灾救济制度的形成

为了解决由于旧社会造成的破产农民和被遣返回农村安置的城市流民及失业人员，从1950年至1953年，国家发放了近10亿农村救济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民生活严重困难，从1960年到1963年，国家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共下拨4.8亿元，用于保障贫困对象的生活。对精减回农村的城市职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解决他们因年老体弱、丧失劳动力或无依无靠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

救灾工作形成了“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救济”的救灾工作的方针，在实践中积累了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互助互济的救灾工作经验。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共下拨救灾款94.5亿多元，有效地保障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三、城镇住房福利制度的形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拿出一定的财力和物力兴建工人住宅，这对于尽快解决当时工人群众关注的问题，安定人心，促进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公房的房租政策和管理制度很不合理，公房房租偏低，国家出资为工人建住宅这样一件得民心的好事，却渐渐演变为国家的沉重包袱。

根据国家统计局 1956 年职工家庭收支调查，住公房的职工平均每户每月负担房租 2.1 元，占家庭收入的 2.4%，占本人工资的 3.2%。国家收回的租金，一般只达应收租金的 1/3 到 1/2 左右。由于公房房租低，加上公房条件好，水电费有补贴，导致职工都向公房挤。有的职工说，“给我一间房，等于提一级”；职工中产生了“谁不带家属谁吃亏”的思想；还有部分职工把自己的私房卖掉，要公家给他房子。同时，由于私房房租一般要比机关宿舍高 2 倍左右，为了平衡职工的房租负担，有些单位对住民房的职工发放房租补贴。

党和政府对城镇住房问题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1957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重点谈到了城镇住房问题。报告指出：必须适当地提高职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应当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此外，对住民房的职工的房租补贴，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取消。必须制定严格的房屋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并且运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依靠群众力量来监督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但是，由于后来的批判反冒进，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大跃进”中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和扩大社会福利被看成是共产主义，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收取公房房租的主张化为泡影。

1965 年 4 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制止降低公有住宅租金标准的报告》时规定，公有住宅租金标准应当贯彻执行“以租养房”的原则。现行公有住宅租金标准符合“以租养房”原则的，不能降低；不能做到“以租养房”的，更不能降低。遗憾的是，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时，不少城市或单位以减轻职工负担或调整租金标准为由，任意降低公有住宅租金。城镇住房福利制度就这样延续下来，成为造成分配不公的因素之一。

第二节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险改革政策，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都经过了几轮，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一、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按照城乡有别、企业先行的原则分层次展开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起步较早，基本养老保险推出了全国统一制度，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正处于试点探索阶段；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行了改革，其余事业单位以及机关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探索，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案，从全国来说，基本上沿用过去的办法。

（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从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起步的。进入90年代，国务院在6年之内先后3次颁布了旨在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即1991年6月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5年3月发布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和1997年7月发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这些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使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从“企业自保”逐步转向社会共济，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二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从现收现付、代际转移转向预筹积累，为平稳渡过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提供了物质保障；三是企业职工退休费用从国家和企业包揽转向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并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原则；四是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实施办法从两种并存转向制度统一，即统一了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比例，统一了个人账户规模，统一了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

1. 实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80年代初，随着企业退休人员逐年增加，退休金支出增大，新老企业之间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退休费用由企业单位直接支付的办法，已经难以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特别是一些严重亏损的企业，因无力支付退休费用，不得不减发、停发养老金，经常引起退休人员上访，影响社会安定。此外，80年代推行企业经营承包制和租赁制，但一些老企业因退休人员多，退休费用背不起，因而没有人愿意去承包或租赁经营。还有一些企业，为了照顾在职职工的利益，采取了降低甚至取消退休待遇的错误做法，引起退休人员及其家属对改革政策的不满。

从1984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范围内，进行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首先在广东省江门、东莞、四川省自贡、江苏省泰州、无锡以及辽宁黑山等市（县）进行，初步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86年又扩大了试点范围。

全民企业职工退休费用实行以市县为单位统筹，缓解了企业之间退休费用负担不均衡的矛盾，基本保障了退休职工的生活。但是，以市县为单位进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社会化程度不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分散，调剂功能不强，抵御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1991年6月，国务院在总结部分省市实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提高退休费用的社会统筹层次，即从市县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到1995年底，全国实行省一级社会统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3个；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的社会统筹，集体企业参加社会统筹的市县达到了2219个；全国共有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统筹。

2. 探索"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过去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如果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例不发生急剧的变化，实行现收现付制是完全可行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老龄化迅速到来，城镇退休人员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将达到高峰，实行现收现付制将给企业和在职职工带来极大的负担。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国家决定把现收现付制转为部分积累制，探索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一些省市如上海市、深圳市、海南省等，开始探索"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实行"统账结合"的改革方向；199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推荐"统账结合"的两个实施办法供各地选择。

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发布之后，"统账结合"的原则逐渐深入人心，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有所增强，职工督促企业按时足额缴费的机制开始形成，企业瞒报少缴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现象减少，同时促进了职工养老保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3. 建立城镇职工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各地在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各地在设计"统账结合"的方案时，出现了多种个人账户比例。有的地方统筹基金的比例大一些，希望多体现社会保险的共济性原则；有的地方则强调个人账户的激励机制，个人账户在养老保险基金中占的比例大一些。总的看，全国出现了由3%到16%不等比例的个人账户。由于各地的个人账户比例不同，职工在地区之间调动时，个人账户转移困难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制造了障碍，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此外，各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实施不同的方案，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相差过大，造成不同地区职工之间相互攀比，也给未来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带来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在三个方面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

第一，统一规范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比例。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具体比例由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确定，确需提高缴费比例的，应报劳动部和财政部审批；个人缴费比例1997年不低于本人工资的4%，以后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最终达到8%。

第二，统一个人账户规模。各地都应按职工本人工资的11%为每个职工建立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人个人账户；不足部分由企业缴费中划人，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人部分应降到3%。

第三，统一养老金计发办法。养老金支付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当地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0%；第二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月发放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

4. 养老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的条块分割问题也很突出。养老保险的行业统筹，不仅影响了这项保险在更大范围的风险共担，而且影响了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为了改变养老保险的条块分割局面，1998年8月初，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把实行行业统筹的11个部门所属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全部移交地方管理，并在8月底前全部完成。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后，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在1998年内不变；从1999年起开始调整，纳入属地管理的原行业统筹企业缴费比例不低于13%，职工个人缴费按各地确定的统一比例执行；经过3~5年的过渡，逐步调整到与地方企业缴费比例统一。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移交接受准备工作，11个行业统筹部门所属的2263个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如期整体移交给了各省市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共涉及原行业统筹的1375万在职职工和415万离退休人员。从1998年9月份起，由各地负责收缴这些企业的养老保险费和支付其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本养老保险属地管理的实施，标志着养老保险制度在统一规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建国初期，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是分开管理的，1958年把两者合并起来，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又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的分开了。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相比，目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滞后，还处在初期探索阶段。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100多个地（市）、400多个县（市）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山东、福建、江苏、上海、广东、海南、辽宁、山西、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已经出台了地方性改革办法。湖北、河南、黑龙江、浙江、江西、陕西、新疆、河北、天津、广西等省市区，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试点工作。大部分地区是先从机关、事业单位合同制工人和部分不需要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而后再逐步开展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上海、海南等个别省和江苏省镇江市、四川省阆中市等一些地、市、县进行了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各地区在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中，借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做法和经验，针对机关事业单位的特点，大都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逐步实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二是基金筹集以支定收，略有结余，逐步积累。三是为职工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或手册，探索基本养老保

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四是养老金由离退休人员原所在单位支付逐步改为由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发放或委托银行代为发放。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本作法：一是确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大多数地区是按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提取，少数地区是按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和离退休费总额为基数提取。二是确定单位和个人缴费比例。单位缴费比例一般在20%左右。只开展合同制工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人员改革试点的，缴费比例低一些。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全员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地区，由于离退休人员所占比例大，赡养率高，缴费比例也高一些。少数实行个人缴费的地区，缴纳比例起步一般为1%或3%，最高限定在8%。三是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目前全国有北京、天津、上海等15个省、区、市在不同范围内进行了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记入个人账户的比例不尽相同，高的为16%；低的只记人了个人缴费部分。四是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大多数省、区、市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管理，并逐步建立起了各项规章制度。五是探索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费的来源。大多数地区从养老保险基金中提取，有的地区提取比例要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提取比例一般在3%左右，最低的地区为1%，高的地区为7%。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开展时间比较短，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国家尚未出台总体改革办法，各地工作还不够规范；工作发展不平衡，山东、上海、江苏等省市已在较大范围开展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全员保险，而西北的一些省区还基本没有起步；目前的改革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衔接不够、人员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比较困难。

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从80年代开始进行试点探索，试点工作主要由部门、地方或行业以及企业组织，试点内容包括职工个人少量负担医疗费、医疗费用随工资发给职工个人包干以及大病医疗费统筹和离退休职工医疗费统筹等。进人90年代，国务院出面组织改革试点工作。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先后在江西省九江市、江苏省镇江市等40多个城市组织进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试点。海南、深圳、上海、青岛等地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了不同方式的医疗保险办法。各地的改革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积累了经验。为了进一步推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这项改革从1999年初开始启动，1999年底基本完成。这标志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探索

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在一些地方和企业进行了初步改革探索，全国普遍实行了公费、劳保医疗费用和个人挂钩，挂钩面已达到享受对象的80%以上，普遍实行了职工看病自负一定比例的医疗费；部分省市对企业在职职工进行了大

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和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社会统筹；改革公费医疗办法，由过去公费医疗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公费医疗经费发展到多种管理形式并存；部分省市进行了社会医疗保险改革试点等。这些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1993年起，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其特点是探索建立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1994年初，国务院决定选择江苏省的镇江市和江西省的九江市两个中等城市（简称一“两江”）进行试点。1996年，在总结“两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又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50多个城市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同时，海南、深圳、上海、青岛等地按照“统账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不同的医疗保险方式。

“两江”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用人单位缴费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10%，职工个人缴费先从本人工资的1%起步；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职工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用人单位的缴费的大部分（不低于50%）和职工个人的缴费，记入个人医疗账户，用人单位缴费的其余部分进人社会统筹医疗基金，集中调剂使用；建立对职工个人的医疗费用制约机制，减少浪费。职工就医先由个人医疗账户支付医疗费，个人医疗账户用完后，仍不足支付医疗费用时，在个人年工资5%以内的由职工现金支付，全年医疗费超过个人账户结余基金加上个人年工资5%的部分，由社会统筹基金与本人现金共同支付；加强对医疗单位的有效制约，改善医疗服务。

“两江”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果，一是职工的基本医疗得到保障，二是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势头有所遏制，三是促进了医疗机构内部的改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社会统筹基金普遍超支，透支个人账户基金，影响了整个基金的收支平衡等。

“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体现了社会统筹的共济作用和个人账户的自我保障作用的有机地结合。经过“两江”两年多的试点探索，1996年5月，国务院决定再挑选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城市，把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到50多个试点城市。“两江”和其它扩大试点城市在探索“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改革的目标和原则都是正确的，通过试点暴露出新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也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阶段，除了“两江”和扩大试点城市以外，一些城市也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确定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对“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了探索。如海南省、深圳市探索了“板块结合”模式，青岛、塘沽等地探索了“三金管理”模式。此外，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在“大病统筹”模式方面也有新的改进。这些经验丰富了探索“统账结合”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践，对1998年底国务院出台全国适用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铺开

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职工基本医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在认真总结各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12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建立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明确，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管理。

经过 10 多年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特别是近 5 年的“统账结合”医疗保险模式试点探索，中国基本形成了新的适用于全国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但要解决传统医疗保障制度的根本性缺陷，还需要在改革上作出极大的努力。

三、建立和完善城镇失业保险制度

同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既“破”又“立”相比，失业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是“立”，即如何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在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方面共发布了 3 个文件，即 1986 年 7 月发布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1993 年 4 月发布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和 1999 年 1 月发布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正在逐步趋于成熟。

（一）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探索

1986 年 7 月，为适应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中国开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当时由于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失业问题争议很大，因而用“待业”一词来表述失业问题。按照暂行规定，待业保险适用于四种人，即宣告破产的企业的职工；濒临破产的企业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工；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企业辞退的职工。尽管暂行规定只适用于职工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它事实上开了中国失业保险的先河，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 1986 年到 1993 年，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失业保险的相关规定近 10 个，积极探索失业保险制度。1993 年 4 月，国务院颁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把失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的人员共有七种九类，即依法宣告破产企业的职工；濒临破产的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简的职工；按照国家规定被撤销、解散企业的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停产整顿企业被精简的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企业辞退、除名或开除的职工；依照法律、法规或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的其它职工。

按照 1993 年待业保险规定，企业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再以标准工资为基数，而以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失业救济金不再按职工本人原标准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而按民政部门的社会救济标准的一定比例计算；转业训练费和生产自救费不再按失业保险基金结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而按上年度筹集的失业保险基金的一定比例提取。但是，关于失

业保险的统筹层次，1993年的规定比1986年的暂行规定“后退”了一步。按照1986年的暂行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统筹使用待业保险基金，由于受“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制约，除直辖市外，几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真正落实。为此，1993年的规定明确：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市、县统筹，省、自治区可以集中部分失业保险基金调剂使用，直辖市根据需要可以统筹使用全部或者部分失业保险基金。

（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自1993年发布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待业保险规定建立的失业保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国务院总结10多年来实施失业保险的经验，于1999年1月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该条例在法规上第一次明确将过去的“待业保险”正名为“失业保险”，并把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在许多方面对1993年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加以完善。

一是提高了失业保险的缴费率和统筹层次，即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缴纳失业保险费，每位职工按照本人工资的1%缴纳失业保险费。失业保险基金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其它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

二是允许省、自治区建立失业保险调剂金。失业保险调剂金以统筹地区依法应当征收的失业保险费为基数，按照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筹集。统筹地区的失业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由失业保险调剂金调剂、地方财政补贴。

三是调整了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失业人员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按照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患病就医的，可以按照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领取医疗补助金，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参照当地对在职职工的规定，对其家属一次性发给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三）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的衔接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中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基本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确保国有企业这一改革和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努力解决企业富余人员过多的问题。由于目前的失业保险还无力承担全部接纳企业富余人员的责任，其它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条件也不能承受国有企业立即把冗员全部推向社会。因此，国有企业冗员分公开失业与下岗两条主要途径分别安置。

199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自下而上地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组织体系，切实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是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和促进再就业的有效措施，是当前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规定，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3年期满仍未再就业的，应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享受失业救济或社会救济。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的基本生活费，原则上可按略高于失业救济的标准安排并按适当比例逐年递减，但最低不得低于失业救济水平。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资金来源总的说是“三三制”，即原则上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1/3、企业负担1/3、社会筹集（包括从失业保险基金中调剂）1/3。

1998年，全国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总数已达12.4万个，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99.1%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心，98.1%的下岗职工领到了基本生活费；609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比例为50%。

采取以政府支持为依托，以企业集团或大企业举办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主要形式，企业与社会共同承担下岗分流负担的办法，目前是可行的。这种过渡办法，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又没有直接给社会造成大的压力。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失业保险基金不能用于仍同企业保持劳动关系的职工。但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状况和社会经济环境，可以用一部分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安置下岗人员，尽量减缓失业对社会的压力。

在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时，要注意这项工作与失业保险制度的有机衔接。一是应明确下岗是中国经济转轨，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特殊现象，而失业是市场经济的常规现象；二是目前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标准略高于失业救济标准，但应经过3—5年降低到与失业救济标准持平，以便逐步将下岗人员纳入失业这一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轨道；三是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应当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但应注意这些优惠条件不应与失业人员再就业有过大的差别，现在一些地方规定企业聘用下岗职工可以得到再就业基金的补贴，造成一些私营企业主解雇已经聘用的失业人员，改用下岗职工，造成就业机制上的不平等竞争；四是对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员的转业、职业培训帮助应大致相当。总之，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取消下岗人员基本生活保障这一特殊保障形式，同时逐步加大力度，发挥失业保险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应有作用。

四、建立城镇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

我国城镇职工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都是在50年代初形成的，这对保障在遇到工伤、生育能够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原有的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对其进行改革。

（一）工伤保险制度改革

工伤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50年代初建立的工伤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96年8月，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这是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旨在建立覆盖所有企业、各类职业的工伤补偿、工伤预防、职业病康复相结合的社会化工伤保险制度初步形成。

按照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职工因工负伤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并根据伤残程

度，分别发给残废抚恤金、伤残补助金、工伤津贴等；职工因工死亡，按规定发给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工伤医疗费、护理费、伤残抚恤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基金按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统一筹集。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根据各行业的伤亡事故风险和职业危害程度的类别实行差别费率。行业工伤风险分类和差别费率标准，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根据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的统计及统筹费用进行测算，征求企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提出办法，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工伤保险行业差别费率每5年调整一次。工伤保险实行属地管理，以中心城市或者地级市为主实行工伤保险费用社会统筹。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的工伤保险，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本办法另行制定。

按照要求，全国所有的市县都要按照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工伤保险费用社会统筹，并提取适当比例用于预防事故和职业病防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

（二）生育保险制度改革

为配合《劳动法》的贯彻实施，更好地保障企业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均衡企业间生育保险费用的负担，1994年12月，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把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生育保险按属地原则组织，生育保险费用实行社会统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筹集资金，由企业按照其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生育保险费，建立生育保险基金。生育保险费的提取比例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计划内生育人数和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等项费用确定，并可根据费用支出情况适时调整，但最高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1%。企业缴纳的生育保险费作为期间费用处理，列入企业管理费用。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女职工生育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享受产假，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按照本企业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女职工生育的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费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超出规定的医疗服务费和药费（含自费药品和营养药品的药费）由职工个人负担。女职工生育出院后，因生育引起疾病的医疗费，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其它疾病的医疗费，按照医疗保险待遇的规定办理。女职工产假期满后，因病需要休息治疗的，按照有关病假待遇和医疗保险待遇规定办理。女职工生育或流产后，由本人或所在企业持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签发的计划生育证明，婴儿出生、死亡或流产证明，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手续，领取生育津贴和报销生育医疗费。

生育保险基金由劳动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收缴、支付和管理。生育保险基金应存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银行开设的生育保险基金专户。银行应按照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同期存款利率计息，所得利息转入生育保险基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提取管理费，用于本机构经办生育保险工作所需的人员经费、办公费及其它

业务经费。管理费标准，各地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人员设置情况，由劳动部门提出，经财政部门核定后，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管理费提取比例最高不得超过生育保险基金的2%。生育保险基金及管理费不征税、费。

五、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

农村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保险工作主要从恢复和发展合作医疗以及进行农村养老保险试点两方面展开。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还不够发达，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不可能由国家和集体全包下来，也不能完全靠农村个人自费医疗，只能走互助共济的合作医疗道路。实践证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一些坚持实行农村合作医疗的地区，不仅使农民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有了保障，减轻了医药费用负担，减少了因病致贫，而且促进了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设和农村基层卫生队伍的巩固与发展，有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集体经济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合作医疗未能适应新的形势而一度处于低谷，但仍有大约5%的行政村坚持了这种医疗保健制度。1979年12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合作医疗破坏后存在的问题，联合发布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各地又根据这个章程，对基层卫生组织和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坚持农民群众自愿参加的原则，做到参加自愿，退出自由，同时改进了资金筹集方法，使合作医疗重新走上发展道路。

在全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后，一些地区对合作医疗如何适应农村新形势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上海、苏南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已达80%，保障程度和抗风险能力也比较高；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江西宜黄县等比较贫困的地区，合作医疗再度兴起；在河南开封县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仅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合作医疗已经覆盖农村人口的90%以上。

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因地制宜地发展和完善不同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合作医疗对于保证农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落实预防保健任务、防止因病致贫具有重要作用”，“力争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民通过互助共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制度。但在农村合作医疗恢复与发展过程中，有人把合作医疗看成“左”的路线的产物予以否定。1993年，在清理取消农民不合理负担时，一些地方曾一度把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也当成不合理负担

而取消了，对合作医疗的冲击很大。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农民自愿缴纳的合作医疗费属于农民个人消费性支出，不计入乡村统筹，并要求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同年3月，卫生部等5部委联合提出了《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后于5月下发执行。

按照5部委提出的意见，举办农村合作医疗，要坚持民办公助、自愿量力、因地制宜的原则。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农民个人缴纳的费用是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主要来源，应积极引导农民自愿缴纳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村提留公益金中应有一定数额用于农村合作医疗；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各自财力，以不同方式引导、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适当资助农村优抚对象和特困户缴纳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确定合作方式、筹资标准和报销比例，是完善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关键，应因地制宜地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确定。在经济发达地区，筹资数额和报销比例可以高一些，使农村合作医疗具有较高的保障水平并可逐步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筹资数额和报销比例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从低点起步，随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提高。

开展农村合作医疗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涉及农村工作的全局，各地把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当成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并力争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探索

在农民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基层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保障农民利益、解除农民后顾之忧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深远意义。1991年1月，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民政部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在山东等地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

各地根据民政部制定的的方案，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展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试点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思想认识不统一，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推行的难度反而比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还要大；有些地方没有制定有关法规，管理还不够规范；少数地方出现了挪用保险基金的问题。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加强保险基金的管理，避免出现混乱，以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1995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具备条件的地区积极发展农村（含乡镇企业）的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要积极引导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制定地方法规，完善各项管理，初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欠发达地区可选择条件较好的县（市、区）和乡（镇）进行试点，逐步积累经验。

经过几年的试点和稳步发展，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00多个

县（市、区）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约有8200多万农村人口参加，积累养老保险基金上百亿元。

第三节　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制度改革

一、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改革和完善传统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举措。它的建立和实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国十分重视对城市低收入者的生活救济，不仅有民政部门专门负责对无业人员的生活救济，还有工会组织负责所在单位生活困难职工的生活救济。传统社会救济制度对保障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救济范围偏窄、标准偏低、制度不够规范，这项制度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3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厦门、青岛、大连、福州、广州、无锡等城市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4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逐步对城市救济对象实行按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进行救济的思路。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各地根据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和市场价格等因素，计算出月人均最低消费金额，结合财政承受能力、物价变动和资金来源情况划定，并由政府授权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布。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1997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决定从1997年起到1999年底以前，在全国建立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这标志着我国社会救济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主要包括三类人员：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二是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三是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成了城市居民的最后一道生存防线。到1998年底，全国所有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以及81%的县级市都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在17个省（区、市）普及。1998年全国共支出最低生活保障金12亿元，保障了233.7万人的基本生活。

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而提供的物质帮助和生活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福利工作，逐步形成了以集体福利、特殊社会福利和社区社会福利服务为主的社会福利制度。由于社会力量对社会福利的投人不多，社会福利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国家和单位包办的倾向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一）改革城市集体福利事业

我国的集体福利事业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系统。在农村，集体福利主要指对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和无法定或义务抚养人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生活无人照顾的老复员退伍军人等社会成员提供的物质保障和服务保障，即实行“五保”制度。在城市，集体福利主要由企业、事业以及机关团体举办，内容包括三类：一是为职工提供生活方便或减轻家务劳动而兴建的集体福利设施，如职工食堂、幼儿园等；二是为减少职工生活费用开支而实行的福利补贴，如上下班交通补贴、房租补贴、水电费补贴、冬季宿舍取暖补贴等；三是为活跃职工文化生活、提高职工生活素质而建立的各种文化体育设施和组织的活动，如俱乐部、文化宫、体育场，以及开展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等。

城市集体福利是伴随着实行低工资制而产生和发展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由于国家对企业、事业和机关团体的职工集体福利，从基本项目、实施范围到经费来源等，都作出了统一规定，而且控制着资金渠道，所以，单位之间的集体福利水平差异不大，集体福利同低工资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市集体福利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对城市集体福利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已经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削减或取消一些福利补贴，变“暗补”为“明补”，逐步将其理人职工工资；二是认真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

为了切实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1995年5月，有关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确定在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和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进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改革试点，要求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分离企业自办中小学校、医院、后勤服务等单位的途径，企业先将自办中小学校、医院、后勤服务等单位在内部分离，独立核算，待条件具备后再逐步推向社会交由政府管理；同时要把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劳动力市场、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和改革住房制度等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二）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

“社区服务”这个概念是在1987年初提出的，用以代替“街道社会服务网络”概念，目的是在社区这一特定的区域内，通过政府的倡导和扶持，运用社区的资源，向社区全体居民提供福利性和商品化的服务。

为了积极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发展城市社区服务，1993年8月，民政部等14个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社区服务作为一个产业纳人第三产业发展规划，按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发展、城镇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相适应的社会化、产业化、法制化的社区服务的方向，积极支持和推动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服务门类齐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网络。社区服务业产值每年要以13.6%的速度增长；每千人口拥有的服务网点要有很大增长，各类社区服务设施达到26万个；85%以上街道兴办1所社区服务中心，1所老年公寓（托老所）、1所残疾人收托所和1所以上托幼机构。

三、优抚安置保障制度的完善

优抚是一种具有补偿和褒扬性质的特殊的社会保障，是我国军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障项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把优抚安置明确界定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之

国家对优抚安置工作十分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规。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1987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这标志着优抚安置工作步人了法制化的轨道。

（一）设立较为完备的优抚保障项目

优抚对象是为革命事业和保卫国家安全作出牺牲和贡献的特殊社会群体，是国家和社会的有功之臣，目前全国共11类4000多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按照优抚对象及其贡献大小，参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了优抚保障层次和标准，设立了优抚保障项目。优抚保障项目主要包括：

抚恤补助：国家对4类优抚对象实行定期定量抚恤，对5类优抚对象实行定期定量生活补助。全国共有447万人享受抚恤补助，抚恤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确定全国性的基本标准，各地在全国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再适当提高。

社会优待：对义务兵家属实行普遍优待，按标准享受抚恤补助，但家庭生活仍有困难的优抚对象也得到了优待。优待经费由社会统筹，优待标准一般不低于当地上年人均收入的70%，优待方式一般为现金支付。

医疗减免：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人员、在乡退

伍红军老战士、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享受公费医疗；对“三属”、三等革命伤残人员、红军失散人员、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实行医疗补助，补助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经费由政府财政承担。

孤残养护：无法定赡养人的孤老优抚对象由政府供养，供养标准在社会孤老供养标准基础上，再加上抚恤补助金，供养方式采取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相结合。光荣院以及敬老院、福利院集中供养孤老优抚对象，特一等伤残人员以及其它病发的优抚对象集中在优抚医院疗养护理。

扶持生产：主要通过对优抚对象家庭实行减免负担和优先提供资金信贷、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等优惠政策，以及广泛开展“一帮一、手拉手”社会对口帮扶活动，大力扶持优抚对象家庭发展生产。

褒扬宣教：对革命烈士和优抚对象的英雄业绩和献身精神大力弘扬，是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褒扬宣教的方式主要有兴建烈士纪念建筑物、命名表彰优抚对象英雄个人、颁发荣誉资格证书证章、编纂出版革命烈士和优抚对象英雄事迹书刊音像、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二）完善安置保障措施

安置保障是以退役军人为对象，包括退伍义务兵、转业志愿兵、复员干部、军队离退休干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退役士兵和退休军官安置的原则、方针和办法，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进一步完善了安置保障措施。

1. 保证城镇退伍军人第一次就业。1994 年 10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1994 年度退伍安置工作通知》，对城镇退伍军人安置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除继续坚持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安置主渠道外，采取多渠道、多种形式安置，明确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都有接收安置退伍士兵的义务。在安置形式上，有条件的地区可试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保底安置”的办法；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安置难度大的地区，可采取按职工比例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办法。同时鼓励退伍军人自谋职业，当地政府在税收、办理执照、租赁场地、贷款等方面给予优先优惠。

2. 开展技能培训。为了提高退伍士兵的综合素质，增强其择业上岗的竞争能力，各地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管理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1996 年，国务院军队安置领导小组、民政部和总政治部制定了《培养和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工作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这项工作的目标、措施和实施办法。

3. 加快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志愿兵住房建设。主要是改进现行建房办法，从军队、地方分别集中承建住房，改为国家投资集中承建与购买商品房、集资建房、发放建房费、个人自行解决等相结合的多种形式。

4. 改进移交安置办法。对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志愿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办法，从原来的成批审定计划、分散零星移交，改为成批审定计划，按年度下达计划，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移交，以加快移交安置进度。

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一）完善“五保”制度

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于集体经济被削弱以至瓦解，“五保”供养工作出现了新问题，有些地方的五保老人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的五保工作非常重视，多次要求各地切实保障五保老人的生活。为了落实“五保”政策，各地积极探索“五保”工作的新路子。在实践中出现了村提留、乡镇统筹和亲属供养等方式。从1985年乡镇统筹方式在全国逐步推开，成为较为普遍的一种形式，“五保”供养率和供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各地还加强了敬老院硬件建设，强化了服务，建立了“五保”服务网络。

1994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五保”工作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按照条例规定，“五保”供养的内容包括，供给粮油和燃料；供给服装、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钱；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房；及时治疗疾病，对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妥善办理丧葬事宜。“五保”对象是未成年人的，还应当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同时要求，“五保”供养的实际标准，不应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五保”供养所需经费和实物，应当从村提留或者乡统筹费中列支，不得重复列支；在有集体经营项目的地方，可以从集体经营的收入、集体企业上交的利润中列支。

（二）改革救灾制度

根据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确立的救灾工作改革原则，各地在保障灾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改革救灾款使用管理办法，实现有偿和无偿相结合，突破了传统救灾格局，增强了救灾工作的活力和群众的防灾抗灾能力。与此同时，把救灾同扶贫紧密结合起来，用多种方法扶持贫困户和优抚对象发展生产，改变过去单纯的生活救济方式，变“输血”为“造血”。

1993年全国救灾救济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提出了深化救灾工作改革，建立救灾工作分级管理、救灾款分级负担的救灾管理体制的新思路。国务院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救灾体制改革的思路。中央特大自然灾害救济款用于特大自然灾害的救助，大、中、小灾分别由省市县区财政列支217科目分担。经过实践探索，各地结合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推行救灾工作分级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

第四节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提出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总体设想。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历了五个阶段，城镇住房新制度的雏形已经显现。

一、鼓励城镇私人建房和合作建房

“住公家房子”的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产生了。有些人把国家改善工人居住条件、解决工人住宅问题，误认为是让每个职工都住公家的房子，以为只有政府出钱盖房子，才能解决住房问题。这种思想在低工资以及公房低租金的年代得以强化和蔓延，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解决住房由国家包下来的问题。

（一）推动城镇私人建房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绝大多数城镇，包括一些新建工矿区，职工住房很紧张；在人口集中、工业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住房紧张问题更为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住房由公家包下来的做法没有得到解决。1978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到 1985 年，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要达到 5 平方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地方积极鼓励城镇私人建房，所采用形式主要包括“个人自建”、“私建公助”、“集资联建”、开发公司建房向个人出售等。1984 年至 1986 年，全国城镇个人投资 68.51 亿元，新建住宅 7286 万平方米，占 1979 年至 1986 年 8 年中个人新建住宅总面积的 59.2%。

（二）发展城镇住宅合作社

住房合作社是在个人建房各种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有一个精干的常设机构，常年操办建房事务，代表社员利益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建房中的问题，并可以向银行贷款，帮助解决建房周转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地方组织住宅合作社，实行合作建房，充分体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解决住房问题的原则。北京、上海、沈阳、武汉、昆明等城市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 1988 年起，国务院有关房改政策的几个决定或通知中，都对住宅合作社这种形式予以肯定。199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提出：鼓励集资合作建房，继续发展住房合作社；1998 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强调：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坚持节约用地的前提下，可以继续发展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

为了规范城镇住宅合作社，加快城镇住房建设，1992 年 2 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建设部、国家税务局联合发布了《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住宅合作社是经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城市居民、职工为改善自身住房条件而自愿参加，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合作经济组织，具有法人资格。住宅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员，组织本社社员合作建造住宅；负责社内房屋的管理、维修和服务；培育社员互助合作意识；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社员的意见和要求；兴办社员居住生活服务的其它事业。凡具有城镇正式户口、家庭为中低收入并愿意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户，均可以自愿申请加入住宅合作社。

二、提高公房租金

公房租金标准长期偏低，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它使城镇职工对公房需求得不到有效抑制，并造成城镇住房供求失衡。如果说鼓励城镇私人建房和合作建房是从供给方面改革城镇住房制度，那么，提高公房租金则是从需求方面对城镇住房制度进行改革。

（一）提高公房租金的目标

早在1957年9月，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要适当提高公房租金水平，公房租金一般应包括折旧、维护和管理三项费用。但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城市公有住宅的租金标准都较低，难以维持房屋养护修缮的最低需要，致使房屋失修失养严重，自然淘汰率提高，加剧了住房紧张状况。为此，1979年6月，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发出了《关于重申制止降低公有住宅租金标准的通知》，要求各城市制定统一的房屋租金标准，租金标准原则上包括折旧费、修缮费、管理费、房地产税和一定的利润。1980年7月，国家城市建设总局提出按照“以租养房”的原则确定公房租金标准。所谓“以租养房”，是指租金收入除去其它必要的开支外，不仅能够保证房屋的正常保养修缮，而且在房屋使用年限终了时，能够收回投资、重建房屋。这实际上就是成本租金。1988年2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提出，1988年之后三五年内，房改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调整公房租金，按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投资利息、房产税五项因素的成本租金计租，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促进职工个人买房。从此以后，国家在制定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时，都把成本租金作为提高公房租金的目标。

（二）提高公房租金步履艰难

低租金是城镇住房福利的表现形式，也是城镇住房制度存在弊端的根源。烟台、唐山、蚌埠、常州和江门5个城市，作为国家首次确定的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都把改革低租金制度作为突破口。其中，烟台、蚌埠和唐山分别把租金提高到1.28元、1.18元和1.08元，相当于当时成本租金的70%—80%，公房租金提高了13—18倍。但是，从全国范围内看，提租的步伐始终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1997年，全国公房平均租金为1.29元/平方米，租金支出占双职工家庭收入的4%。同期，成本租金为6.52元/平方米，商品租金为11.09元/平方米。据对全国36个大中城市初步统计，截止1998年9月份，调整公有住房租金的有9个城市，即南京、杭州、宁波、广州、合肥、青岛、贵阳、昆明和南昌，平均调价幅度为42%。其中，调价幅度最大的是昆明市，租金标准由每月每使用面积平方米0.65元调整为1.20元，调价幅度为84.6%。上述城市租金调整后，全国36个大中城市平均租金水平由1997年底的1.26元提高到1.35元。

三、推动公房出售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投入巨额资金为城镇职工兴建住宅，公有住宅的规模越来越大。目前，约有一半城市居民家庭居住单位的公房。有计划地出售公有成套住房，对于推动住房商品化，回收国家巨额的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公房出售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补贴出售试点到大面积推开，从出售新建公房到出售旧有公房，都进行了探索。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全国曾掀起数次公房出售热潮，但几乎每次都出现了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的倾向，国家不得不下令制止。

（一）补贴出售新建公房的试点

补贴出售公房的试点工作从1982年开始，1984年增加了试点城市。到1985年底，已有90多个城市和40多个县镇先后参加了试点，共计出售新建住宅146.95万平方米，收回资金24522.9万元。其中补贴出售的占44.9%，全价出售的占55.1%。另外，还出售旧住宅264.2万平方米。通过试点和扩大试点，冲击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住房由公家分配”的传统观念，为住房制度改革造了舆论，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试点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是补贴偏多，售价较低，算总账国家负担不比原来实行低租金减轻多少；二是个人付出低于市场价格的购房款，即可取得同等面积住房的所有权，而企业单位因为不能再提取折旧基金，感觉吃亏而没有卖房的积极性；三是由于大部分住房仍然实行低租分配的办法，已经有房住的和将要分到房子的职工不愿意买，要求买房的实际上多是一些没有希望分到房子的职工；四是这一试点也解决不了那些没有能力建房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住房问题。鉴于存在这些问题，1986年3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宣布对补贴出售公房的办法需要“另作考虑”，提出“城市出售公有住宅原则上按全价出售”。

（二）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

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始于1988年初，这是推动公房出售的第二阶段。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随后印发了《关于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要求在三五年内把住房改革在全国普遍推开。其中，向个人出售公有住宅是整个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年2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的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各地贯彻执行。这个意见明确提出：从1988年起的3年内，努力做到有20%旧房出售。

由于旧房出售价格一般比新房便宜，加上发给住房券以及采取出售旧房给优惠的政策和措施，职工购房踊跃。出售公有旧住房的工作在相当一部分城镇开展起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公有住房出售价格价差较大，甚至出现互相攀比降低出售价格；还有少数地区和单位的领导人，乘住房改革之机，以筹集房改资金为名，贱价出售公有旧住房，损公肥私。为此，建设部于1988年6月发出

了《关于制止贱价出售公有住房的紧急通知》，明确所有公有住房一律实行全价出售，立即停止各种补贴出售和有限产权出售公有住宅的做法，制止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的行为。同年12月，建设部和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又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出售公有住房价格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公有住房的出售价格，同时要求建立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制度，各产权单位不得自行定价出售。

尽管公房出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国家并没有因此堵住售房这条房改的路。1991年6月，国务院在《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中仍然坚持出售公有住房，并明确提出实行"新房新制度"，对新竣工的公有住房，实行新房新租、先卖后租、优先出售或出租给无房产和住房困难户等办法。凡腾空的公有旧住房，视同新建公有住房，实行新制度。1994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再次把稳步出售公有住房，作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规定：向高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市场价，向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成本价。成本价包括住房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安工程费、住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费（小区级非营业性配套公建费是否列人成本由各地自行确定）、管理费、贷款利息和税金等7项因素。对以成本价售房确有困难的市（县），可以实行标准价作为过渡。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规定，从1998年下半年起，出售现有公有住房，原则上实行成本价，并与经济适用住房房价相衔接。

有资料表明，截止1997年底，全国城镇拥有有效住宅总量为36.54亿平方米，其中私房11.83亿平方米，全国可以出售公房的50%以上（约9亿平方米）已出售给个人。

四、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

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国家就开始探索住房分配货币化的途径。烟台等城市在80年代末进行的发放住房券的试点，就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最初形式。进入90年代，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成为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主要形式。1998年国家宣布停止福利分房后，进一步明确：在一些房价收入比较低的城镇，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主要靠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房价收入比在4倍以上、且财政和单位原有住房资金可以转化为住房补贴的大中城市，住房分配货币化主要是发放住房补贴。

（一）发放住房券试点

"提租发券"是烟台、蚌埠、唐山、沈阳等城市在80年代末期实施的房改办法，也是改革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最初形式。

所谓"提租发券"，就是在大幅度提高公房租金以后，向职工相应地发放住房券进行补贴。住房券采用比例法确定，就是以全市职工平均使用面积、每平方米平均新增租金和职工平均工资基数，计算出住房券占工资的比例，即发券系数。发券系数乘以职工本人工资，就是职工应得的住房券金额。为了对住房券进行控制，住房券采取转账结算

的办法，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住房券只能用于缴纳新增租金，不得抵交老租金，如有结余可存入银行，作为个人购、建房基金，不得冲击其它消费品市场。

按照“提租发券”的思路，烟台等城市采取三种形式启动住房制度改革，其中，烟台和蚌埠实行“提租发券、新房实转、旧房空转”，唐山实行“提租发券、新房实转一步到位、旧房实转分步到位”，沈阳实行“提租发券、新旧房同时实转”。“空转”与“实转”的区别在于，住房券资金是否落实到位，住房券能否兑现，房产单位能不能得到新增租金。从试点情况看；选择“提租发券”改革方案的城市，一般都愿意从实转起步，但实际采取了空转或部分实转的方式，主要是想在最大限度减轻财政和企业资金压力的前提下推动住房制度改革。

总结烟台等城市“提租发券”模拟运转的经验，并根据对一些城市的典型调查和测算，1988年年初，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对发放住房券的资金来源作出了规定，明确城市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住房基金是发放住房券的主要资金来源。不足部分，在改革起步时，可以少量进入企业成本（机关、事业单位列入财政经费预算）。改革由实转起步或由空转过渡到实转时，全市企业住房券进入成本要控制在20%以内（包括12%的房产税）。由空转起步时，全市企业住房券进入成本控制在发券额的5%以内，用于减、免、补助的统筹资金。无力建立住房基金的亏损、微利企业，住房券资金可以从集体福利、奖金中挤一点，在成本中进一点，市住房基金贷一点（经济好转后偿还）。机关、事业单位发放的住房券，列入财政经费预算的部分一般以控制在50%以内为宜。新房实转的住房券资金来源，企业可进入成本，机关、事业单位可列入财政经费预算。

由于住房券资金不能落实到位，“空转”未能顺利地向“实转”过渡，“提租发券”的改革思路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也没有在全国推开。

（二）建立住房公积金

建立住房公积金，是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一种新形式。1991年，上海市借鉴新加坡经验率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由于这项改革在筹集住房资金方面的作用明显，全国各地纷纷学习仿效。从1992年起，绝大部分省市都把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1994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把住房公积金作为构筑城镇住房新制度的基础和近期房改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都要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1998年7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到1999年底，职工个人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交率应不低于5%，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1999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标志着住房公积金这种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形式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住房公积金是一种长期性住房储金，在职工工作期间，职工个人和所在单位均应按职工个人工资和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逐月缴纳，归职工个人所有，作为职工个人住房基金，专户储存、统一管理、专项使用。住房公积金只能用于家庭购买、建造自住住房及家庭自住住房大修理支出，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我国建立住房公积金的时间还很短，但它在筹集住房资金方面的作用很快显示出来。到1998年底，我国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量已达1200亿元左右，占目前城镇住房建设资金总量的40%左右，发放住房贷款830多亿元，其中个人贷款122亿元。

（三）发放住房补贴

住房福利是同低工资粘合在一起的，停止福利分房，相应地要在收入方面进行必要的补偿。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房价收入比（即本地区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平均工资之比）在4倍以上，且财政、单位原有住房建设资金可转化为住房补贴的地区，可以对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实行住房补贴。

截止1999年4月底，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实施方案。江苏省全省78个市、县和山东、河北、广东省2/3的市、县已于1999年第一季度出台实施方案。这些省（区、市）发放住房补贴，主要采取“老人”一次性补贴、“新人”按月补贴的办法。

在发放住房补贴方面，贵阳市实行存量补贴和增量补贴相结合，因而很有特色。具体办法是，在核定全市现有公有住房资产总量的基础上，按照职工的贡献（工龄、职级）建立职工“存量补贴账户”，在职工购房或租房时以折扣或现金的方式给予兑现；单位原有住房资金转化为对职工的增量补贴，按照职工工资水平建立职工“增量补贴账户”，在职工购房时发放。同时，贵阳市还把现有住房的租金调整到成本租金、售价调整到微利价。职工已经购买的住房，在按微利价重新核定房款后，可以直接进入住房交易市场。

五、建立住房保障制度

住房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是国家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策思路。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一）开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我国目前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占城镇居民家庭的主体，需要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范围比较大，包括最低收入居民在内，需要政府住房保障政策支持的城镇居民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数的85%左右。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建设，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国家从1995年开始实施安居工程试点，要求安居工程每平方米的售价，原则上大城市控制在1500元左右，中小城市控制在1000元以下。到1997年6月底，安居工程试

点城市已扩大到200多个，一大批售价不高、质量较好的安居工程小区相继竣工，许多困难户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从1998年起，安居工程的范围从以建设成本价格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普通住房建设，扩大到以满足广大中等经济水平以下家庭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实施国家安居工程的城市，不再受城市规模和数量的限制，不限于原来少数大中城市，可以扩大到县镇。国家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采取政策扶持，包括提供部分基础设施配套、实行税费减免和以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同时以出售方式提供给城市中低收入居民家庭，要求住房的出售应收回投资并包含一定的利润。

（二）提供廉租住房

向最低收入家庭提供廉租住房，在我国是一个新课题。国家对廉租住房的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提供廉租住房建设资金和实行低房租制度。廉租住房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租金确定的主要原则是考虑最低收入居民家庭实际支付能力，一般不能收回成本，住户享受了补贴。

考虑到我国还有一定存量公有住房的现实情况，以及当前各级政府的财力状况，我国廉租住房主要通过从腾空的旧公房中筹集解决。对于那些已经拥有住房的最低收入居民家庭，可以视同廉租住房，通过租金减免政策，实行与其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租金制度，解决这部分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同时，也可以利用公有住房出售资金和住房公积金增值资金建设一批廉租住房，但要把握好政策：一是以满足基本需求为目标，在保证住房建设质量的前提下，确定合适的设计、建设标准；二是以承租廉租住房家庭的实际支付能力为基础，确定合理的租金水平，目前原则上以维修、管理费两项因素确定租金水平；三是以保障最低收入居民居住需求为原则，建立承租人收入提高后的迁出机制，或者随承租人收入水于提高实行新的租金标准的调租机制。

六、开放住房二级市场

全面开放住房：二级市场，促进已出售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流通，这是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1991年6月，国务院在《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职工购买的公房，5年后允许出售；1994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再次重申：职工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住房，一般住用5年后可以依法进人市场。但是，由于开放已购公房交易市场涉及许多敏感问题，如过去住房分配和公房出售中超标准的处理问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地划拨问题，已购公房上市出售所得收益的分配问题，故一直到1999年上半年，国家有关部门才出台了开放住房二级市场的政策。

（一）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确定：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实行准入制度。1999年4月，建设部发布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就开放住房二级市场的条件、

职工已购公房上市的准入问题和交易程序提出了原则意见。

职工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和按成本价购买的公有住房，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即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地产权证，可依法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已领取房屋所有权，尚未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书，在2000年底以前需要上市出售的，产权人可以凭房屋所有权证书上市出售。暂行办法同时规定了不得上市的几种情况：以低于房改政策规定的价格购买且没有按照规定补足房价款的；住房面积超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控制标准，或者违反规定利用公款高标准装修，且超标部分未按照规定退回或者补足房价款及装修费用的；处于户籍冻结地区并已列入拆迁公告范围的；产权共有的房屋，其它共有人不同意出售的；已抵押且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转让的；上市出售后形成新的住房困难的；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

按照个人申报、单位审核、登记立档的方式，对城镇职工家庭住房状况进行普查，这是开放住房二级市场的关键环节。如果对职工住房状况不清，就无法控制多占住房家庭通过二级市场，使非法所得合法化。1999年上半年，秦皇岛、厦门以及广西的大部分城市已经全面开展了职工住房普查工作；一些暂不具备普查条件的城市，如郑州、南京，首先从职工已购公房入手，建立了职工已购公房查询系统。这为开放住房二级市场创造了条件。

（二）确定土地出让金及收益分配办法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对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的缴纳和收益分配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1. 缴纳土地出让金。由于房改成本价及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中均不含土地使用权价款，因此，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时，均需由购买人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缴纳标准为不低于该住房座落位置的标定地价的10%。

对于经济适用住房，由于其土地使用权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个人购买时价格中不含土地出让金，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时，由购买人向国家补交土地出让金。

对于已购公有住房，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原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应当按规定由购买人向国家补交土地出让金。另一种是原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如原单位购买了商品住房（价格中包含了开发商已向国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再根据房改政策按房改成本价出售给职工，上市出售时，不需要再向国家补交土地出让金，但新的购买人应缴纳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并按照原投资渠道分别上交财政或返还原产权单位。

2. 收益分配。鉴于经济适用住房的出售价格是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的政府指导价，因此，居民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时，除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外，出售收益全部归出售人所有。

职工个人上市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取得的收益，除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外，自己应得的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基本收益和净收益分成。其中，基本收益相当于其住房面积标准部分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款，即该家庭中职务较高一方应享受的住房面积标准与上市出

售时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之乘积。如果因上市出售价格高于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等原因，出售收入高于出售人应得基本收益的，净收益部分应按超额累进比例或一定比例缴纳所得收益，剩余部分归出售人。房屋成交价格差异较大的，适宜采用超额累进方式；房屋成交价格差异相对较小的，一般适用于按一定比例缴纳。

第十四章　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

理顺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是建国后党和政府所致力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此，50年中，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多次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这一探索之路是曲折的，但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调整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服从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政府职能宽泛繁杂，无所不包。相应的，政府机构臃肿庞大，重叠交叉，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进程。在这30年间，我们曾对政府机构做过一些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说进展不大，效果不好。

一、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的形成与政府机构设置

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及与其相应的庞大的政府机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逐步形成的。这种格局的形成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更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其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由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给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运行了30余年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学习的范例。从客观上说，在遭受长期战争创伤之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生产萎缩、通货膨胀、市场紊乱、财政金融崩溃的“烂摊子”。这种局面加上原本就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基础，大大增加了恢复经

济和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难度。在人民贫困、财力物力匮乏、百废待兴，且国际上反动力量又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早日实现工业化，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必须高度集中财力、物力、人力等各方面资源，统揽一切权力来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创立前夕，为了取得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地和有计划地稳定、恢复和发展经济等艰巨任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本着精干的原则，政务院下设 35 个工作部门。其中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在政务院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指导海关总署、人民银行、劳动部、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等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1950 年，政务院设立人事部，主要管理全国的各类干部，撤销了食品工业部。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适应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准备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1952 年—1953 年，中央政府以加强中央集权为重点，加强了对全国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相应增加了经济管理部门：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被称为“经济内阁”，与政务院平行。从重工业部中分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和地质部，财政部中分出了粮食部，贸易部一分为二，分成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1953 年，海关总署并入对外贸易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由原来的 17 个增加到 23 个，政务院的部门由 35 个增加到 42 个。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选举出国家主席，成立了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调整和健全了政府管理机构，国务院设置机构 64 个，其中经济管理部门增加到 35 个，并适应计划管理的需要按专业化和行业设置，实行委员会制，进行综合管理。1955 年—1956 年，适应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均衡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又先后增置了 17 个工作部门，国务院机构总数达到 81 个。这次机构调整主要针对财经工作，增设机构的大多数是经济管理部门。至此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职能和政府机构设置基本成型。其主要特点就是对社会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中央高度集权、对社会资源分配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政企不分，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和企业没有多少自主权。

总体上看，新中国诞生以后，为适应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的需要，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框架，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正是这种比较精干、高效的体制安排，在建国初期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管理经济的成效是比较显著的。从新中国建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新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了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海关，实行了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独立、主权和经济利益；治理和稳定了物价，统一了全国的财经管理，实现了财政经济

状况的根本好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地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二、计划经济框架内的政府职能调整与机构变动

1956年的政府机构设置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建设要求，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其潜在的矛盾就逐渐暴露了出来。一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束缚了地方的手脚，不利于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二是政府机构臃肿庞大，部门林立，分工过细，办事效率越来越低。三是企业无权、无利，政府职能无所不包，政府部门权力集中，滋生出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提出了扩大地方自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不能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956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会议对于当时存在着的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对改进国家行政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从1957年起，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一是对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各级政府机构和人员进行精简。中央国家机关撤销合并了10多个单位，养活了8个部委、5个直属机构，使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81个减少到1959年底的60个，经济管理部门由50个减少到36个，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精简工作人员约30万左右，其中有10万人回到生产岗位，20万干部下放到基层工作。二是对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进行了重新划分，主要是下放中央的一部分管理权限和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如1958年，中央下放地方的管理权限包括计划、固定资产投资、物资分配、信贷、财政、税收等，扩大了地方权限，并将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权限也下放给地方。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型和军工企业只保留子1200多个。与此同时，还扩大了企业内部的人事安排权和机构设置权，大量减少了指令性计划等。至此，建国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调整结束。

50年代末的政府机构调整，由于受到"大跃进"等"左"的干扰，机构精简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还带来了中央宏观管理失控问题。从1960年起，中央重新强调集中统一，要求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1961年—1965年，为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调整。一方面中央相继收回了1958年以来下放给地方的计划、财政、基建、信贷、物资等管理权限，并同时将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也收回中央管理；另一方面，国务院也相继恢复和增设了许多部门，如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手工业管理局等。这种势头一直持续1965年底，国务院设部委机构49个，直属机构22个，办公室7个，还有1个秘书厅，一共79个工作部门。大体恢复到1956年的水下。从1960年—1964年，中央曾先后两次在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精简干部运动。第一次是1960年—1961年，主要在中央一级进行。精简幅度达33%，共

8万人，使中央各部门在京的24万人，减少到16万人。第二次是1962年—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共精简82万人，其中中央机关1万人，地方共81万人，使全国国家机关职工由268万多人减少为186万多人，精简幅度约1/3，精简下来的人员大多数充实到了基层和生产第一线。

1968年—1970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家机关已经受到严重和普遍的冲击，工作陷入停顿和半停顿状态。这时又对国家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撤并和人员精简。裁并后国务院只设了32个工作部门，其中的13个机构分别归当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管辖，国务院直接管理的机构实际上不到20个，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了2/3以上。这次调整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极不正常的变动，政治因素的影响起了决定作用，对经济管理体制造成了严重损害，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陷入混乱，甚至停滞状态。

1971年，周恩来同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了整顿经济工作的计划，国务院逐渐恢复了一些经济管理部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要在我国初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根据四届人大决议，国务院恢复建立了有关的政府管理机构，特别是经济管理机构，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开始对工业、交通、文化、教育、科技等系统进行全面整顿。到1975年底，国务院机构数达到52个。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之后，从1977年开始，国务院逐渐上收了一部分“文革”中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并相应增设了有关政府管理机构。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国务院设置76个部门机构，政府机构又一次开始膨胀。

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我国先后进行的几次以权力下放和机构精简为重点的政府职能调整，除“文革”期间的非正常状态外，都是在当时的历史实践需求下进行的，起到了相应的历史作用。但由于这些调整都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进行的，每一次调整仅限于解决当时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因此，总的说进展不大，效果不佳。在经济管理方面出现了两种交互存在的怪圈：一是经济管理体制上的集权——放权——再集权——再放权的往复循环；二是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往复循环。建国初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并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变化。由于这些调整主要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个部门与那个部门之间转移和重新分配管理权力，没有深入到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权和政府直接控制经济活动的管理体制，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体一亡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中央又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发展方针，并初步明确了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原则和方向。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基础与环境的变化，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并在实施中不断深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正在形成。

一、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会议，纠正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确定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明确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为加快经济建设和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中濒于瘫痪的国务院机构陆续得到恢复。从1977年至1981年的5年中，国务院工作部门先后恢复和增设了48个，从76个增加到100个，其中部委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机构工作人员达49000人，国务院设置的机构大大膨胀，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机构如此庞杂，人员如此之多，弊端也愈发明显。正如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中央逐步把精简机构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所以，这件事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并强调：“总之，这是一场革命……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这些论断，发聋振聩，使人警醒，指明了精简机构的重点和意义。

1982年3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

革问题的报告》，决定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主要内容是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解决领导干部老化和领导机构副职过多问题，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报告》重申了国务院机构的改革，首先必须改进国务院本身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为此，提出这次机构改革要减少副总理职数，增设国务委员，把国务院副总理由现有的 13 人减为 2 人。同时，国务院各部、委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办公机构的设置，也必须做到分工合理，职责分明，机构精干，提高工作效率。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要求将现有的 98 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裁减、合并为 52 个左右。

根据《报告》精神，这次机构改革要重点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首先明确各部门及其所属机构的任务和职责范围。通过机构改革，一定要坚决改变那种分工不合理、职责不分明的状况。只能因事用人，决不能因人设事。一个机构可以办的，就不要设许多机构；一级机构可以办的，就不要设几级机构；一个人可以办的，就不要配备几个人。每个机构、每个人，负什么责，办什么事，都要有个章程。二是选贤任能，配备和建设好领导班子。在国务院各部委，关键是配备好部委和司局两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精干，要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部的正副职配备 3 至 5 人，司局的正副职配备 2 至 3 人。部长的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岁；副部长和正副司局长的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岁。要注意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三是认真安排好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工作。从这次机构改革开始，要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使干部退休离休和退居二线制度化。四是切实加强干部的轮训工作，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这次精简，各部门编制只定额不定人，不定谁是编内、谁是编外。只要有条件学习的，都要为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轮流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本领。学习一段再工作，工作一段又去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中分别进行考核，从中陆续选拔优秀干部到更需要更适合的重要岗位上去。

同年 9 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正式向全党提出要改革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根据这些决定，1982 年—1983 年，从国务院开始，到省、地、县各级政府分别进行了机构改革。国务院撤委并部，大大减少了直属机构。经过撤并，国务院的部委机构减为 43 个，直属机构减为 15 个，办事机构减为 2 个，设办公厅 1 个，共设置 52 个工作部门。工作人员减少到 32000 人，国务院部委领导人数由改革前的 540 多人减少到 180 多人。中央直属机关部级领导干部平均年龄由 64 岁降到 60 岁，司局级干部平均年龄由 58 岁降到 54 岁，干部的文化层次也有较大提高。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历时 3 年之久，范围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建设和完善各级机关的改革。这次改革不仅以精兵简政为原则，而且注意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可能对政府机构设置提出的要求，力求使机构调整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有利条件，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并将其中一些条件成熟的单位改革成了经济组织。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作为群众经济组织，只保留名称；第六机械工业部改建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改建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等。但是，由于这次改革并没

有从根本上消除以往机构调整中的弊端，仍然只是在机构、人员的增减和权力的摆布上作文章，因此，尽管取得了一时的成效，但很快又步入了精简－膨胀的循环之中。到1984年底，国务院工作部门增加到65个；到1986年底，国务院工作部门再度膨胀到72个。（参见表14－1）

表14－1　　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前后机构变化对照表

精简后的机构共61个	精简前的机构共100个	备　注
外交部	外交部	
国防部	国防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济委员会	国家经济委员会	
	国家农业委员会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国家机械工作委员会	
	国家能源委员会	
	国务院财贸小组	
	国家标准总局	改为国家经委直属局
	国家计量总局	改为国家经委直属局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	改为国家经委直属局
	专利局	改为国家经委直属局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	改为国家经委直属局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新设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公安部	公安部	
民政部	民政部	
司法部	司法部	
财政部	财政部	

精简后的机构共61个	精简前的机构共100个	备　　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划出另设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改为经济实体，不再作为政府工作部门
商业部	商业部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粮食部	供销合作总社作为群众经济组织，保留名称
对外经济贸易部	对外贸易部 对外经济联络部 对外投资管理委员会 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	
农牧渔业部	农业部 农垦部 国家水产总局	
林业部	林业部	
水利电力部	水利部 电力工业部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国家建筑工程总局 国家城市建设总局 国家测绘总局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建委的一部分工作并入该部
地质矿产部	地质部	增加了矿产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的任务
冶金工业部	冶金工业部	
机械工业部	第一机械工业部 农业机械工业部 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 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	
核工业部	第二机械工业部	
航空工业部	第三机械工业部	
电子工业部	第四机械工业部 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	

精简后的机构共61个	精简前的机构共100个	备　注
	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	
兵器工业部	第五机械工业部	
第六机械工业部	改建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航天工业部	第七机械工业部	
煤炭工业部	煤炭工业部	
石油工业部	石油工业部	
化学工业部	化学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	
轻工业部	轻工业部	
铁道部	铁道部	
交通部	交通部	
邮电部	邮电部	
劳动人事部	国家劳动总局 国家人事部 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	
	国家编制委员会	
文化部	文化部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 外文出版发行管理局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	由直属机构升格为部级机构
广播电视部	中央广播事业局	
教育部	教育部	
卫生部	卫生部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精简后的机构共 61 个	精简前的机构共 100 个	备　注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物价局	国家物价总局	
国家物资局	国家物资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	
国家气象局	中央气象局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	改建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地震局	国家地震局	
国家旅游局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家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	移交中央办公厅领导

资料来源：联合国项目评审资料：《行政体制与机构改革》，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1995 年 10 月，第 69—72 页。

二、198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1982 年机构改革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1984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矛盾，又突出地表现出来。邓小平同志 1986 年 9 月 3 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和精简机构。

1987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必须在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年12月30日，李鹏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这个精神，国务院1988年2月批准了《国家体改委关于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其中指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进行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宋平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阐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现有机构的弊端愈益突出起来，主要表现在：机构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工作效率不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的、法律的间接管理方式，等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要求相应地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机构设置的总体格局及其职责权限。机构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难以巩固。所以，必须下决心对政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

1988年主要是按照转变职能，下放权力，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的方针，调整和精简中央一级的专业管理部门和一些综合部门的内部专业机构。1988年4月9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政府机构改革要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长远目标，以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这次改革确立的目标是：理顺关系，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增强机构活力。

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要求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减少政府机构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职能，初步改变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要求从机构配置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出发，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同时，贯彻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清理整顿所有行政性公司和一些升格的机构，撤销因人设事的机构，裁减人浮于事部门的人员。

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86年9月开始，中央机构改革专题组就机构改革问题专门进行调查研究和探讨，于1987年4月提出改革思路，经中央讨论，原则同意了机构改革专题组研讨报告。第二阶段，从1987年5月开始，按中央肯定的改革思路，经过近半年的调查研究，对原有的各部门机构逐个进行了职能分析，提出可供选择的3种方案，在反复比较和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改革的初步方案。同年9月，中央审议并原则同意了党政机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在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明确提出机构改革的任务。第三阶段，成立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从1987年10月开始，按照各部门实行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要求，在多方座谈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制定了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原则上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第四阶段，从1988年4月开

始，按人大批准的方案，先进行新组建的9个部委的“三定”工作，然后制定其它部门的“三定”方案。到1988年底，按预定计划，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的“三定”方案，经总理办公会议和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讨论，全部审定完毕，各部门相继按“三定”方案转入正常运转。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调整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调整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

与1982年的精简机构相比，1988年机构改革改变了以往就机构论机构的做法，而是按照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要求，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以经济管理部门为重点，与政府内部的制度化建设相配套，并结合着手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来进行。这次改革，制定了包括长远目标、五年目标、近期目标的改革目标体系，确立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但这次机构改革开始不久，我国经济即转入了治理整顿时期，不仅暂停了省以下的地方机构改革，而且为迅速治理基本建设失控和通货膨胀，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集中手段。由于多数政府部门在思想观念和管理办法上仍习惯沿用行政命令和直接管理的手段，热衷于批钱、批物，强调部门利益，因此，政府职能转变进展缓慢，管理方式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涉及转变职能的几个主要问题，如政企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加强宏观调控、减少部门直接管理以及与政治体制相关问题都远未解决。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再度复发。（参见表14－2）

表14－2　　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前后机构变化对照表

改革后设68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72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归口管理外国专家局
外交部	外交部	
国防部	国防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济委员会	经委部分业务并入国家体改委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语委改为由国家教委归口管理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归口管理国家核安全局，中国专利局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公安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	归口管理国家保密局
监察部	监察部	

改革后设68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72个工作部门	备　注
民政部	民政部	
财政部	财政部	归口管理国家税务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人事部	劳动人事部	原科委科技干部局并人人事部
劳动部		
地质矿产部	地质矿产部	归口管理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
建设部 国家环境保护局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归口管理国家测绘局
能源部	煤炭工业部 石油工业部 核工业部	原水利电力部中的电力部分划归该部。“煤”、“油”、“核”三部分别组建总公司
机械电子工业部	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 电子工业部	
航空航天工业部 航天工业部	航空工业部	
冶金工业部	冶金工业部	归口管理国家黄金管理局
化学工业部	化学工业部	
轻工业部	轻工业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	烟草专卖局改由轻工业部归口管理
纺织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	
铁道部	铁道部	
交通部	交通部	
邮电部	邮电部	
水利部	水利电力部	电力部分划归能源部
农业部	农牧渔业部	
林业部	林业部	
商业部	商业部	
对外经济贸易部	对外经济贸易部	归口管理国家商检局
物资部	国家物资局	
文化部	文化部	归口管理国家文物局
	新华通讯社	改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改革后设68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72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广播电影电视部	广播电影电视部	
卫生部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归口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归口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
审计署	审计署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物价局	国家物价局	
国家技术监督局		由原国家计量局、国家标准局和原经委质量管理局合并组建而成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版权局）	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版权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	
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	
国家医药管理局		原为国家经委领导的“国家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气象局	国家气象局	
	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	撤销
国家地震局	国家地震局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家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法制局	国务院法制局	由直属机构改为办事机构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委员会	国务院侨务委员会	

改革后设68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72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	撤销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研究室		

资料来源：联合国项目评审资料：《行政体制与机构改革》，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1995年10月，第73—76页。

三、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自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实行精兵简政，改革政府机构。1988年的改革余音未落，到90年代初，国务院工作部门又膨胀至86个之多，地方党政部门平均省级达70多个、地区达50多个、城市达65个、县级达45个。1990年全国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人数，比1980年增长70%。1991年末，全国党政群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已达3140万人，其中党政群机关906万人，事业单位2234万人。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超编约60万人，乡镇一级超编214万人。这么庞大的机构，大大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1980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66.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5%；到1990年已达333.5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9.7%，加上事业费，1990年共支出1255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6%；1991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达370多亿元，加上事业费共支出14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各级财政已不堪重负。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时提出要下决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计划从1993年开始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机构改革。

1993年3月，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部门，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要理顺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划分职责权限，避免交叉重复，调整机构设置，精简各部门的内设机构和人员。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

根据这个方案，国务院部委和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由86个减为59个，其中国务院

部委设置41个（含国务院办公厅），直属机构13个，办事机构5个。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的精简幅度较大，其中部分并入部委，或成为部委内设的职能局，或改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共15个），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非常设机构也进行了大幅度精简，由原来的85个减为26个，并改称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原有机关行政编制36700人，改革后核定为29200人，精简达20%。撤销了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物资部等7个部，新组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内贸易部，更名1个（对外经济贸易部），保留34个部、委、行、署。改革后的综合经济部门保留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分为三类，改为经济实体的有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后，分别组建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改为行业总会的有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这两部撤销后，分别组建中国纺织总会、中国轻工总会；保留或新设置的行政部门包括：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撤销能源部，分别组建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撤销机械电子工业部，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撤销商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

1994年，在继续推进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机构改革，参照中央的改革方案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省级政府各部门要认真转变职能，弱化微观管理职能，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加强对本地区生产、交通、流通领域以及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综合协调，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与协调。专业经济部门多数可转为经济实体、服务实体或行业协会；一时不能转为实体的，可保留精干的行政机构作为过渡，但人员要作较大幅度精简。现有的各类公司，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办成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直辖市政府的职能转变应体现城市的功能和特点，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改革方案还要求合理划分省、自治区与市、县，直辖市与区、县的职责权限，理顺上下关系。除重庆、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仍保留计划单列市外，其余省会城市不再实行计划单列，但要继续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

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面积等实际情况，省、自治区党政机关的机构平均控制在55个左右，经济不太发达、人口较少的省、自治区适当少设；直辖市党政机构限额控制在75个左右。这样，省、自治区党政机构平均减少13个左右，直辖市平均减少24个左右。省级机构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设机构，由中央编制委员会确定；一类为因地制宜的机构，由各地自行确定，具体方案由中央编制委员会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中央编制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情况，审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人员编制总数。全国省、自治区机关人员编制总数控制在16万人左右，精简20%。直辖市机关人员编制总数控制在11万人左右，精简15%。根据当时的状况，确定省级各类机关人员编制比例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机关人员占12%左右；政府机关占80%左右；人大、政协机关占4%左右；民主党派和工、青、妇等社团机关占4%左右。党委、政府的领导职数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做好1993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

届工作的通知》的规定执行，即党委常委职数为9—11人，政府领导班子职数为6—7人；直辖市、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比较多的省以及边疆民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职数可以各增加1—2人。

1995年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在抓好地方各级机构改革的同时，制定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方案和改革措施。改革的原则是政事分开和社会化运营，目标是建立符合事业单位自身发展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事业单位改革的重点是分类管理。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实施的关键则在于搞好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

随着1997年1月国家电力公司的组建，政府机构改革得到进一步推进。其它专业经济部门也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或改为协会性质的行业管理组织，原有的政府管理职能则转移给政府综合部门。

从总体上看，1992年以来机构改革的背景与以往不同，是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目标就是使机构设置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的重点依然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这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这次改革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构筑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思想体现得不够明显，对转变职能也只是作了原则性要求，实际动作不大，国务院部委的数量只比原来减少了一个，致使这次机构改革并未彻底解决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问题。由此可见，尽管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次机构改革方案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改革措施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参见表14－3)

表14－3　　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前后机构变化对照表

改革后设59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70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外交部	外交部	
国防部	国防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经济贸易办公室	管理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教育委员会	管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管理国家海洋局、国家地震局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改革后设59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70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公安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	国家保密局归属中直机关
监察部	监察部	
民政部	民政部	
司法部	司法部	
财政部	财政部	管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人事部	人事部	管理国家外国专家局
劳动部		
地质矿产部	地质矿产部	
建设部	建设部	管理国家测绘局
电力工业部 煤炭工业部	能源部	
机械工业部 电子工业部	机械电子工业部	撤销中国电子总公司
	航空航天工业部	分别组建航空工业总公司和航天工业总公司
冶金工业部	冶金工业部	
化学工业部	化学工业部	
	轻工业部	组建为中国轻工总会
	纺织工业部	组建为中国纺织总会
铁道部	铁道部	
交通部	交通部	
邮电部	邮电部	
水利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农业部	
林业部	林业部	
国内贸易部	商业部	管理国家粮食储备局
国内贸易部	物资部	管理国家粮食储备局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对外经济贸易部	管理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文化部	文化部	管理国家文物局

改革后设59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70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广播电影电视部	广播电影电视部	
卫生部	卫生部	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
审计署	审计署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税务总局		原为财政部归口管理国家局，升格为正部级
	国家物价局	并入国家计委
	国家技术监督局	改由国家经贸委管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环境保护局	国家环境保护局	
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家土地管理局	
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	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	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版权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	
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升格为正部级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	改由国家经贸委管理
	国家医药管理局	改由国家科委管理
	国家气象局	改称中国气象局，为事业单位
	国家海洋局	改由国家科委管理
国务院法制局	国务院法制局	由办事机构改为直属机构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家档案局	归属中直机关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改革后设59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70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国务院研究室	国务院研究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列入中央直属机构序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列入中央直属机构序列

资料来源：本表是根据国务院1993年第25号文件《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通知》和第2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整理而成。

四、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第六部分“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中批评了政府机构庞大、官僚主义严重的现象，发出了机构改革的强烈信号，并提出了改革的目标要求。他明确指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必须通盘考虑，组织专门力量，抓紧制定方案，积极推进。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随后，1998年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李鹏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机构庞大、政企不分、官僚主义，提出机构改革的建议。并指出：“政府机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密切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客观要求。”“现有政府机构设置的基本框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过去虽然进行多次调整和改革，取得一些进展，积累了经验，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和宏观环境制约，很多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机构设置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机构庞大，政企不分，滋生官僚主义，助长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

在十五大和十五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经过周密部署，国务院制定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机构变化较大、人员调整较多、因而力度和难度都较大的新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并经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顺利通过。3月6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受国务院委托，向九届全国人大作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这一说明分析了现有政府机构的弊端：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许多本来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现有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这不仅滋生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助长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中央和地方财政几乎都成了“吃饭财政”。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还指出，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国际经济技术文化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下岗和失业人员增多，社会矛盾不容忽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工农差别依然很大；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大量不良贷款，潜伏着一定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遍及全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快政府机构改革，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创造有利条件。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不可能没有阻力和风险，但是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没有出路。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现有组成部门40个，经过改革，减少为29个。其中包括：

——宏观调控部门。主要职责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经济、法律手段，改善宏观调控机制。调整内容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加强国务院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任主任，有关部长任成员，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

——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本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维护行业平等竞争秩序。专业经济管理部门都要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职能，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是：政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负责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国有资本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不能损害所有者权益。调整内容是：保留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农业部、水利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

组建信息产业部。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逐步将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企业集团。将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国内贸易部、轻工总会和纺织总会，分别改组为国家煤炭工业局、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冶金工业局、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轻工业局和国家纺织工业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电力行业已组建国家电力公司，不再保留电力工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改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将化学工业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化工部和两个总公司下属的油气田、炼油、石油化工、化肥、化纤等石油与化工企业以及石油公司和加油站，按照上下游结合原则，分别组建两个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公司和若干大型化肥、化工产品公司。将林业部改组为国家林业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

——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调整内容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在劳动部基础上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人事部职能作适当调整，在综合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公务员的基础上，承办国务院监管的大型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承办国务院向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的管理工作。不再保留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体委的职能委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列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主要职能是：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保留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作为国土资源部的部管国家局。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电视网络政府管理职能划出后，改组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

——国家政务部门。保留外交部、国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民政部、监察部和审计署。

经过一年的精心部署，细致工作，政府机构改革进展顺利，实现了预定目标。国务院组成部门从 40 个减少到 29 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 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 200 多项，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建设和工作作风出现了新的气象。中央党政军及公检法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决策业已基本落实。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心声。

1998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突出特点，概括地说，一是力度大，二是行动快，三是运行平稳。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这一次机构改革方案的制定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机构改革的多年经验教训，既考虑了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又考虑了社会的承受能力；既有突破性的进展，又照顾了现实状况，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既有难度和风险，又比较稳妥可靠。所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审议、通过这个方案时，赞成票占出席总数 2877 人的 97.8%。这也充分说明，方案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同时，这次机构改革之所以首战告捷，取得阶段性成果，是因为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坚持了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方针；在重点做好人员分流工作，提高公务员队伍和基层工作人员素质的同时，注重了切实转变职能，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强行政组织体系的法制建设。目前，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的人员分流工作尚未全部结束，

以省市为重点的地方机构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可以相信，只要我们一如既往，精心部署，细致操作，不动摇，不走样，这次机构改革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参见表 14－4）

表 14－4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前后机构变化对照表

改革后设 53 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 59 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外交部	外交部	
国防部	国防部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更名。管理国家粮食储备局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管理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煤炭工业局、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冶金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国家轻工业局、国家纺织工业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改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
教育部	国家教育委员会	更名
科学技术部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更名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新组建，将原国防科工委管理的国防工业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合并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公安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	
监察部	监察部	
民政部	民政部	
司法部	司法部	
财政部	财政部	
人事部	人事部	管理国家外国专家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劳动部	将原劳动部、人事部、民政部、卫生部及各行业部门的社会保障职能合并
国土资源部	地质矿产部 国家土地管理局	管理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
建设部	建设部	

改革后设53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59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国内贸易部	撤销并改组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
	煤炭工业部	撤销并改组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
	机械工业部	撤销并改组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
	冶金工业部	撤销并改组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
	化学工业部	撤销并改组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
	电力工业部	撤销并改组为国家电力公司
铁道部	铁道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信息产业部	邮电部 电子工业部	管理国家邮政局
水利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农业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文化部	文化部	管理国家文物局
卫生部	卫生部	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	升格为正部级。管理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	正部级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局	升格为正部级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正部级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	保留正部级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保留正部级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	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	
国家林业局	林业部	

改革后设53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设59个工作部门	备　注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原由国家经贸委管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原由国家经贸委管理
国家知识产权局		原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参事室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国务院法制局	由直属机构改为办事机构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国务院研究室	国务院研究室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撤销

注：本表根据1998年国务院第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和第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整理而成。

第三节　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我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与探索，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不乏沉痛的教训。通过改革，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要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而明确中央、地方权责，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则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机构改革的重要条件；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还有赖于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干部队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仍然是今后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

建国50年来，虽然我们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进行了大量曲折而有益的探索，但真正把握住机构改革的灵魂，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为核心，配套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当前，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的改革还将继续深入下去。

如前所述，“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是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当时，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1988年的机构改革与1982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再是就机构论机构，单纯进行机构增减与撤合，而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和契机进行相应的机构调整。转变政府职能的中心内容是政企分开、下放权力。具体包括：一是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二是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三是由部门管理转向全行业管理；四是由管字当头转向服务监督；五是由机关办社会转向机关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由于此时尚未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改革只能是过渡性的。

1988年以后的历次机构改革虽然是重申转变政府职能，但其内涵却在发生质的变化。

1993年的机构改革，是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展开的，与前几次机构改革相比，这次机构改革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做到宏观管好，微观放开。把属于企业的权力放给企业，把应该由企业自己解决的问题，交由企业自己解决。由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刚刚起步，计划体制的思维惯性一时难以消除，这次机构改革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政府职能转变并没有完全到位，甚至发生扭曲。如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政府将部分专业经济部门改组为公司，但改组后的公司并没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相反，仍然承担原有部门的职能，政府部门仍然热衷于掌握“批钱”、“批物”、“批项目”等审批权限，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

真正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为中心，全面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是1998年。1998年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按照这次改革的要求，将原有的综合经济部门如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主要目的就在于形成独立面向市场、面向社会的宏观调控体制和实行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综合部门与专业部门并存，共同参与分投资、批项目，不仅造成政府部门职能的交叉重复和相互扯皮，而且在追求速度、追求政绩的动机下，还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建设。

政企不分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弊端。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既阻碍了企业成为独立法人实体，也使政府陷入了对企业要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政企职能错位，造成企业的低效率；产权管理责任不清，既提供了政企不分的物质基础，也使企业难以进入市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政企不分，还阻碍了政府行使社会经济管理职能，难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0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客观要求；是创造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机制，加强宏观调控职能的需要；是政府简政、廉政的重大举措。

政企分开，就是政企脱钩，企业不再在行政上隶属于专业部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一是政府只对投入企业的资产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负债承担相应的有限责任；二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经济效益；三是企业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政府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使那些主要管理企业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向“制订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本行业产品结构调整；维护行业平等竞争秩序”，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可以说，1998年的机构改革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专业经济部门转成国家局后，其职能主要是行业管理和本行业企事业单位的改革，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将不复存在。此外，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还有赖于确立国家行使所有者职能的方式，形成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和监督机制；确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政企分开的投融资体制；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逐步加以探索和解决。

二、明确中央、地方权责，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配置是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的需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关系，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吃了不少的苦头，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分权模式和宏观调控办法，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奠定了基础。

其实，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否定地方分权，相反这是计划体制得以运行的重要条件。因为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只能以地方为中介才能实现。由于这种分权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不能解决微观主体的活力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因而往往与中央的计划产生矛盾。中央集权过多，势必影响地方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导致计划的僵化；地方分权过多，则又会造成严重的分散性和盲目性，破坏中央计划的完成，结果只能是集权与分权的不断循环。因此，改革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行政权力分割上的不稳定导致的所谓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一五”计划后期开始向地方分权，1961年中央又恢复向中央的集权，1966年又开始地方分权。

1979年之后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前的中央、地方权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做法，即中央政府从计划、投资、财政、物资、外贸等各个方面，层层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分解指标，特别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使地方政府的财力与财权大大增加，中央政府的财力急剧下降。放权让利后的各级地方为了自己的地方利益，偏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行为时有发生。地方主义的盛行，影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1992年确立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及金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改革，使中央地方权力的调整逐步向着有助于推动政企分开，扩大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完善中央政府调控职能以及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方向迈进。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确立的一种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是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种财政分配体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一种较为规范的方式。分税制的运行实现了新体制的平稳过渡，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的主要问题，一是事权和支出范围划分还不够科学、规范，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还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二是有的税种以企业隶属关系划分财政收入的做法不尽合理；三是地方税收体系不够规范，税种结构不尽合理，税收管理权过分集中；四是省以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作为一级政府的专享税种较少，有的地方财政还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五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不规范、科学。必须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要结合机构改革和政府部门职能调整，进一步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事权的划分要以市场基础原则、效率原则、分级管理和法治为导向。

此外，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采取多种有效途径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创造坚实的基础。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当前应抓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做到权力和责任相统一，并力求规范化、法制化。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要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三、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管理干部队伍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离不开科学的国家公务员制度。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是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我国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我国人事分类管理体制建立的开始，是中国特色的人事行政的开端，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郑重提出："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8月，时任总理李鹏正式签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拉开了在全国各级政府机关推

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帷幕。

在公务员条例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条例从总则、公务员的权利义务，到各个管理环节的每个章节，都突出了这个根本指导思想。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条例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性质、内容、范围、职位分类到具体管理环节的规定，都突出了中国特色，坚持从实际出发。如范围问题，许多国家把"吃财政"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都划入公务员的范围，我国没有采取这种划分方法，而是把公务员的范围界定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在职位分类、职务升降、培训、工资等方面，也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规定。三是坚持配套改革。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要在机构改革、精简人员的基础上进行，要与工资制度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 年 9 月。改革相结合，同时要搞好内部和外部的配套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退休制度的改革、人才市场的形成、民主政治或公民参政意识的发展等等。

6 年来，公务员制度从法规的研究制定到颁布实施，从典型试点到全面铺开，从中央政府推行到省、地（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推行的步子不断加快。目前，国家公务员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起来。具体表现在：

一是积极平稳地推行公务员制度"入轨"工作。"入轨"是指从原来的人事管理制度进入到公务员制度的管理轨道，从原来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过渡为国家公务员。推行公务员制度入轨工作是同机构改革结合进行的，首先在"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科学的职位设置，然后根据职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进行人员过渡，并同时完成机构改革的人员精简和分流工作。

二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及实行公务员竞争上岗等做法，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建立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人事部确定的公务员制度实施工作的第一个重要突破点。其成效在于最大范围地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公开竞争的机会，广揽有志于从事国家行政管理事业的贤才，有效遏制人事录用方面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竞争上岗则开辟了选贤任能的新途径。

三是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员管理机制已经启动。通过实施考核、轮岗、回避、辞职辞退等制度，我国在建立公务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管理制度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四是较为完备的公务员法规体系初步建立。从 1993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 1997 年 3 月 26 日人事部出台《关于建立国家公务员申诉案件备案制度的通知》，已形成一套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龙头，以 36 个单项法规、规章和实施细则相配套的公务员管理法规体系。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的步伐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大，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标已初步实现，但继续深化改革，使公务员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十五章 在对外开放中走向世界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努力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国际上通行的规则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鉴于历史条件，这方面的努力收效受到限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切实付诸实施。中国也因此摆脱封闭半封闭状态而全面走向世界。50 年的历史实践表明：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国之路。

第一节 对外开放的不懈探索与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我国是一个有着对外开放传统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除了清王朝出于防御和维护自身统治，一度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外，对外开放的思想和主张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于 1949 年 6 月 15 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郑重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内外交流”的经济发展方针。从此，新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的努力。50 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对外经济贸易，结束了旧中国受歧视、遭掠夺的不平等对外经济贸易历史；二是 1978 年以后，不断改革和完善涉外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一、1978 年以前的对外经济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克服重重障碍，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在十分严峻的环境下取得了对外经济关系的不凡成就。

对外贸易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我国对外贸易在曲折中向前发展。50 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采取敌视、封锁政策，我国积极开展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其它友好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不断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对医治我国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外汇短缺，中国与朝鲜、越南等

12个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以记账方式进行贸易。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与西方的密切经济联系，与其发展贸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并为后来实行的“一国两制”积累了经验。此外，我国从1957年起每年举办两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大起了很大作用。到5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3.8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了2.9倍。

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我国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急剧下降，我国的对外贸易遭遇了第一次较大的曲折。60年代初，中国经济遇到极大困难，出现了萎缩。面对这一形势，外贸的主要对象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往来。通过中国银行在香港、澳门吸收存款并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延期付款。196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6.1亿美元，比1959年增长5.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打乱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对外贸易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大的曲折。1967年以后进出口额连续三年停滞和下降。到196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降为40.3亿美元，比1966年下降了12.6%。

70年代前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明显改善，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197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74.2%；到1978年，又突破200亿美元，达206.4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2.3倍。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由建国初期的80%以上下降到70年代的50%。尽管如此，前30年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对外贸易虽然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发展速度总的说不够快。对外贸易也被看作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框架内。

利用外资方面。1978年以前，我国按照“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在利用外国资金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实践。50年代，我国从前苏联、东欧国家引进资金26亿美元（其中前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74亿卢布，约合19亿美元），建成了冶金、机械、汽车、石油、煤炭、电力等156个重点基础项目，创办了一些合资企业，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60年代，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适时提出，把引进对象转移到西方对我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利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方式，于1963年，我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技术封锁的缺口。接着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引进了2.8亿美元的20多项成套设备，其中包括我国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7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有所扩大。1975年，邓小平同志接替病重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明确提出要把扩大进出口贸易、引进先进技术装备作为一项“大政策”。先后两次贷款30亿美元和73亿美元引进大型设备。从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引进了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1套1.7米大型轧机在内的22项技术及成套设备和43套综合采煤机。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确立和实施积累了经验，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辅助作用。但是当时引用资金主要是借用利率高、还款期短的国外商业贷款来发展重工业，引进成本过高，加之我国科技落后，国内配套资金严重不足，特别是“文革”的破坏和影

响，一些利用外资项目被迫下马调整，利用外资的总体效益不高，引进的资金设备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

对外援助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我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个成套项目。1964年初，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了“独树一帜”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我国在对外援助中创立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真诚合作的典范，增进了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和信任。伴随着对外援助事业的发展，我国在建国后也开展了一些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以贷款和赠送方式，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共建成各类建设项目945个。70年代中期，又在一些与我国关系友好的石油输出国参与过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但是，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外承包工程一度被指责为“卖国主义”，劳务合作被贬斥为“廉价出卖劳力”，使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发展非常有限，失去了70年代进入中东承包劳力市场的机遇。此外，在接受国外援助方面，由于中国尚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甚至在唐山大地震后，中国还拒绝接受各种国际援助。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酝酿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进行着扩大对外开放的准备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5月，国务院曾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在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士五国进行了考察。同年7月，中央又召开关于经济工作的务虚会，发展对外经济合作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很大变化，科技水平日新月异，而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因此，建设速度是个尖锐问题；二是，许多发达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想和我国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可以办很多事；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投资等，我们都可以考虑采用，以缓解外汇支付能力不足的困难，付出必要的代价换取时间争得速度。9月，邓小平在一次工作谈话时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1978年12月末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随后，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这两种资源；要打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两种市场；要学会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两种本领。对外开放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是我国经济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

二、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

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粉碎“四人帮”后，在研究外国经济建设成功经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置

经济特区的做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些经济性特区，一般都是从本国、本地区内划出一定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用减免关税等优惠办法吸引外商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和投资，以发挥特定的经济功能，达到发展本国、本地区经济的目的。这些经济特区，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设在本国、本地区境内、关境之外的允许外国物资自由进出的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有设在本国、本地区港口或交通枢纽附近，以发展出口产品为目的的出口加工区；有设在本国、本地区边境地带，吸引外资办厂，方便邻国货物过境的边境自由区；有设在本国、本地区划出专门区域，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科技工业园区（或称工业科学园、科学城）。在亚洲搞得比较成功的有新加坡的裕廊出口加工区，菲律宾的马里蒂莱斯自由贸易区，韩国的马山出口加工区，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出口加工区和新竹科学工业园等。这些经济性特区，尽管其区域范围大小不等，发展模式不同，但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在其区域范围内实行一套优惠办法，以吸引外来投资，有效地开展对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活动，促进了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经过对国外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根据本省与香港、澳门相邻，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海外华侨众多的特点，提出了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和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并于1979年4月向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赞同和肯定。汇报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广东、福建两省领导机关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中央审定。6月，广东、福建两省根据中央对外开放的方针，分别向中央提出报告，要求在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便发挥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资源丰富、对外交往比较便利的优势，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行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的具体设想——在特区内，允许华侨和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商人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随后，确定由新建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此项工作。

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扩大两省的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其经济发展活力，基本办法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即在财政方面，1980年、1981年，广东每年上缴数确定为12亿元，福建每年补助数确定为1亿元，以后年份到时另议。其它有关包干的基数、指标和具体实施办法，由各主管部门同两省商量确定。二是在拓展外贸、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对外经贸业务上，允许两省有一定机动余地，在国家的总盘子中单划一块；三是国家在财力上给予照顾支持，5年内（后又延长5年）两省新增的收益，国家不要或少要，留给省安排建设。这项举措的若干作法，后来也在沿海其它省、区、市实行，开创了促进地方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河。

根据半年多筹办特区工作实践，考虑到在特区发展不但要办出口加工区，也要办商业、旅游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将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1980年3月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更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章法，在1979年8月国务院就着手组织起草法规文件。先是委托广东省起草，以后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我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

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后来，国务院又批准对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的区域范围作了调整。到1990年底，上述四个特区的面积总共为632.1平方公里。

1983年4月，中央、国务院决定比照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实施于海南岛，并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并正式设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有关决定。

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一种经济特区。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区与自由港的区别仅仅在于自由港是指整个港口或城市，包括停泊船只的水域、码头设施和陆上地区等，而自由贸易区则仅指港口或城市中的某一特定地区。由于自由港通常建立在交通要道上，把整个港口或城市辟为自由港，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对自由港所在国来说冒有风险，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些因素制约着自由港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港并不多，如新加坡、香港特区等。因此，各国建立的多为自由贸易区。有时候，人们仍把建立在港口城市的自由贸易区称为自由港。各国对自由贸易区的管理办法与自由港类似，建立和发展自由贸易区主要也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商业利益，即发展转口贸易、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等，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经济特区多为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是指由几个国家或地区组成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地区，也就是指由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成的贸易集团。集团内实行自由贸易，相互减免关税，对外则实行关税壁垒，征收统一的关税。

出口加工区

在一国或一个地区中划出一定范围，实行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以吸引外资，进行出口加工业务的地区。对出口加工区，一般实行减免关税，放宽海关管理的限制的优惠，并要求其产品全部或大部销往国外，以增加外汇收入。出口加工区是由17、18世纪的自由贸易区发展而来的。但出口加工区是以出口加工为主，自由贸易区则以实业贸

易为主。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出口加工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并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1978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马尼拉召开世界出口区会议，讨论了出口加工区的发展问题，并成立了世界出口加工区协会。中国设立的经济特区是类似出口加工区的经济地区。

我国举办经济特区，从国情出发，参照了国外举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党和国家规定，经济特区是我国完全行使主权管辖的行政区域，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文化上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在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在经济管理上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主要有：(1)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经济比重（特别在工业方面）可以大于内地；(2) 在国家宏观经济指导下主要采取市场调节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3) 对到特区投资的外商提供较多的优惠待遇，企业的所得税率减按15%征收，对进出特区的境外客商、外籍人员简化手续，给以方便；(4) 对特区政府授予较大经济管理权限。属于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边防、公安、海关、金融、外汇、港口、铁路、邮电等方面的业务，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结合特区实际情况，制订专项管理办法；(5) 国家对特区建设实行特殊政策倾斜，给以支持。如增加银行信贷资金，新增财政收入、外汇收入全部留用，特区进口基本建设所需的物资免征关税等。

社会主义国家举办利用资本主义世界资金、技术的经济特区，历史上没有先例，是一项创造性的实践。我国经济特区经过近20年的发展，整体经济实力颇具规模，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已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经济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经济特区的建立，直接为我国改革开放探索经验，起到排头兵、试验场的作用。

第一，特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给全国以鼓舞和启示。1980年举办特区时，深圳是个边境小镇，珠海是个海滨渔村，厦门、汕头虽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古老港口城市，但由于多种历史因素，本世纪30年代以后日渐衰落。这四个地方在举办特区的15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累计开发了12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建造房屋4000多万平方米，修筑道路673公里，建起20多个工业区和一大批商贸、文教、住宅和旅游设施，新增港口吞吐能力2000多万吨，25万多门程控电话直拨国内外数百个大中城市。工农业持续迅速增长，社会生产力大发展。1992年，这四个特区工业产值达785.7亿元，农业产值59.2亿元，社会零售商品总额255亿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60多倍、10多倍和30多倍。海南1992年与1987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倍，达到人均2000元，基本上实现了建立特区时提出的争取三五年赶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目标。经济特区引起全国的注目，增强了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它在开展外引内联、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以及拓展出口为导向牵动经济的提高，追踪市场需求推动科技进步以更新产品，采用现代农艺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相应发展第三产业以支持第一、二产业等方面，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第二，特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成为全国排头兵。特区是全国吸收利用外资的热

点。早在1992年，五个经济特区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万个，协议利用外商投资额200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90亿美元，约占全国外商实际投资的29%，外贸出口达到124亿美元，约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7，涌现出了一百多个技术和管理先进、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创汇大户，成为全国出口的新基地。出口的不断增长，提高着经济的外向度。除海南外，深圳等四个特区的工业品出口比重，均在50%以上，其中深圳为59%。在传递国际经济技术信息、转让先进技术、介绍外商投资项目、协助扩大出口、培训人才等方面，发挥着为内地服务的作用，并且与内地发展着优势互补、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经济技术联合。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对沿海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具有先行探索和示范的作用。

第三，特区的改革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我国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没有可以参照的现成经验，只能通过试验逐步实施。实行特殊政策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区，是在改革方面进行综合性试验的适宜场所。同时，特区的发展也强烈呼唤改革。它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建筑工程实行招投标承包制，劳动用工实行合同制，干部实行聘用制，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建立劳动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等等，都在内地推广。有些只适宜在特区进行的改革，在思路上也为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四，特区是我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我国的“窗口”。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从国内走向国际，必须刻苦观察研究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发展变化规律，学习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本领。特区所处的毗邻国际市场的区位和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特殊经济体制造就的社会环境，为这种观察、研究和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十多年来，特区的发展对我国如何利用国际条件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以发展经济，如何借鉴国外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和方法来完善经济管理，如何在对外交往频繁的情况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要课题，以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作出了初步回答，锻炼培养了一批人才。我国通过特区观察外部世界，外部也通过特区观察社会主义中国。特区已成为国际社会观察当代中国的“窗口”和海外各界人士来华参观考察的热点。从1980年到1990年，仅到深圳参观访问的外宾，就有120多个国家地区的政府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工商人士约3500批　3万多人。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展示了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作的努力，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对于保持香港、澳门的稳定和繁荣，促进大陆与台湾省的交往，逐步实现“一国两制”下的祖国统一大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以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为突破口，我国对外开放全面展开，先后设立和创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浦东新区和保税区等开放区域，并逐步从沿海向沿边和内地扩展，取得了惊人成绩，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与建设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参照经济特区的一些做法而设立的。国务院批准设立的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和建设，取得了卓著成效，已成为其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技术与管理的创新点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开发区大有希望”的论断正在成为现实。

在经济特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后，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到北京后他又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同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从经济特区走向重点延伸，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线。这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又一个重大步骤。

对进一步开放的港口城市，国家扩大其经济技术对外自主权，并给前去投资的外商以仅次于经济特区的优惠待遇。同时，考虑到这些城市长期欠账的基础设施还难以完全适应当代发展国际经贸业务的要求，刚刚着手改革的经济体制也不利于更好地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因而规定有条件的“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先形成投资环境较好的“小气候”，比较集中地为外商提供投资场所，举办工业项目，引进先进技术和科技项目，开发新产品，兴办新产业，同时，作为对所在城市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补充，促进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优化经济结构，带动各自腹地的经济发展。对十四个港口城市的政策扶持措施主要包括：(1) 扩大这些城市对外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包括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2) 对外商投资的生产性企业所得税减按24%的税率征收。(3) 支持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实行税前还贷；为此进口的关键设备5年内（后延长至1993年）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工商统一税；国家还为这些城市先后拨出28.2亿美元的外汇额度，用于技术改造。(4) 除北海和温州两市外，其它12个市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并给以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支持。

1985年2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的6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规定这些市、县的城区和经批准的工业卫星镇可以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在农业上为发展出口引进的优良种苗　、生产机

具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选择一些海岛和江心沙地开辟农业隔离试验区，引进良种、良畜进行试种试养项目，从获利年度起5年内豁免一切税收。

1986年初，国务院进一步提出，特区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要求特区从搞建设、以工业为主、打基础转向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根据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在此之前已扩大珠海、汕头特区的面积，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包括鼓浪屿）。

1986年5月，国务院成立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作为统筹协调外商直接投资事务的机构；于当年10月公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共22条，简称“二十二条”）。随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制定下达了22个有关“二十二条”的实施细则。“二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的基本内容是：（1）保护和发挥我国税率低、劳务费用低、土地使用费低的优势，使外商感到在我国投资办厂把产品销到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2）优惠与引导外资投向相结合，重点优惠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以及把投资获得的利润在我国再投资的外商；（3）在资金周转、外汇收支、进出口管理、原材料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提供上，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必要的条件；（4）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这就使我国吸收外资进一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推动了投资环境的改善，把吸引外商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1986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商贸服务业为主)。1988年6月，又批准了上海市举办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持续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位于实施这一战略目标前列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继续建设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以建设生产性项目为生命线，大力招商引资，拓展出口贸易，抓管理，上水平，努力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到90年代初期，就整体而言，开发区走上了以发展现代工业为主、吸引利用外资为主、拓展外贸出口为主（简称“三为主”）的发展轨道。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展现出勃勃生机。

1992年初，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各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紧抓住机遇，加大工作力度，发展登上新的台阶。先期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出现发展飞跃，新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迅速起步。1992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昆山、营口、威海、福清融侨开发区。1993年，国务院又批准东山、武汉、长春、哈尔滨、沈阳、杭州、芜湖、重庆、萧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成立开发区。1994年8月国务院又批准成立北京、乌鲁木齐两个开发区。至此，国务院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数达到32个。

经济技术开发区蓬勃发展，成效卓著，为所在城市利用外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充分肯定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应当看到，各地在自办开发区方面也出现偏差。许多地方不顾自身条件和可能，群起“仿效”经济技术开发区，兴起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特别是1992年，许多地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举办各种名目的开发区，以致在1993年初使各地自行设立的开发区总数达2000多个，规划土地面积

达1.48万平方公里。造成了资金和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加剧了全国基本建设规模的膨胀和能源、交通、原材料的紧张，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对外开放的健康发展也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对此，国务院于1993年下发了《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并在1994年的《国务院批转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中要求对开发区实行规范化管理。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各地对自办开发区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清理，加强了对开发区的引导和管理。对那些不具备条件，又没有发展前景的开发区坚决予以取消。共撤销各类开发区1300多个，占原有数量的六成以上；压减规划占用的土地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大体减少了一半；大量耕地还耕于农。经过清理整顿，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转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共有638个。其中，经济开发区53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8个，旅游开发区57个。规划面积5100平方公里，起步面积844平方公里。从分布情况看，沿海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含北京）的省级开发区约占总数的55%。

1994年初，配合实行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和计划管理职能等一系列改革，按照规范统一的改革精神，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调整了优惠政策，包括对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有：取消进口汽车免关税优惠；取消外汇现汇留成优惠政策；取消“三资”企业通过外汇市场平衡企业用汇的政策；取消工商统一税减免的优惠；取消外商直接出口退税；废止外企办公用品等免税；开发区新增财政收入全留政策到期不延长，优惠的开发性贷款也早已停止。政策环境的变化，内外形势的变化，迫使开发区必须将继续发展的着眼点放在“调整、提高、创新”上，依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体制创新和环境优化，实现在逐步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世纪之末的1999年，为了加快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步伐，促进中西部地区大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准许内陆省会或首府城市可以设立一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使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各地兴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对外开放特别是招商引资上作了大量的探索，也取得了可喜成绩，极大地促进了高新科技的开发和科技产业化发展。

（二）浦东新区的崛起

开发浦东的设想酝酿已久。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曾想到和讨论过开发建设浦东，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设资金基本上要依赖国家，而国家经济落后又没有足够的财力，致使开发浦东的设想未能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开发浦东提上议事日程。198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的报告《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首次正式提出了开发浦东的问题。国务院在1985年2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1986年10月，国务院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新区，使浦东成为现代化的新区。”

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同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的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并提出“抓上海”的战

略构想。他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决定在浦东地区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开发开放浦东，主要是利用国外资金发展外向型经济"。

1992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

浦东新区按照不同功能定位设立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四个功能小区，经过奋力开拓、艰苦创业已开始全面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其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中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功能命名的开发区，与上海浦西市中心一江之隔，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目前已初现"百鸟争栖"的可喜局面，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和国内各地的投资迅猛，各类金融商贸机构云集，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金桥出口加工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唯一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开发区域。主要发展出口加工业的第三产业，是集出口加工、贸易经营、商业服务和生活居住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开发区域，其发展目标是要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出口加工基地。外高桥保税区，作为我国第一个保税区，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标准设立并定位的，其依据是经国家海关总署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货物、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管理办法》、上海市颁布的《上海市额定高桥保税区管理办法》。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保税区主要发展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港口、仓储、出口加工以及金融服务等业务。"这突破了保税仓库区与保税加工区的范畴。外高桥保税区是中国大陆面积最大的保税区。目前，外高桥保税区内具有保税性质的产业规模逐步积聚与增大，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功能效应日趋突现。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上海面向21世纪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浦东新区的四个重点开发区之一。作为以雄厚的科研、工业基础作后盾的高科技开发区，以周围及浦西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依托，利用上海技术优势的重新组合和对地区局部优势的开发，强化科学、技术、智力条件，来促进浦东新区的发展，并对浦东"龙头"地位的确立具有战略意义。

经过9年的开发开放，浦东已成为上海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中新的高速增长点和上海、长江流域同世界经济的新的联结点。

（三）保税区的设立

设立保税区，是我国借鉴国际上自由贸易区成功经验和通行做法所进行的有益探索。我国的保税区是1990年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外高桥首先设立的。1990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向中央递交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中提出："在新区内划出五到十平方公里的地域，辟为保税区，并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6月，中央以中发［1990］100号文批复原则同意。至此，我国的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式成立。

1991年，继上海举办外高桥保税区之后，国务院又批准设立深圳福田和沙头角、

天津天津港、大连、宁波、张家港、广州、福州、厦门象裕、青岛、汕头、海口、深圳盐田港和珠海保税区。规定保税区作为关内境外的外贸基地，对国外的商品进入实行保税，免领许可证，允许外商或中外合资、合作在保税区内发展转口贸易，区内周转外汇可保留现汇，最大限度简化境外人员进出保税区的手续。目前，我国已有保税区15个，批准的总面积为38.62平方公里。保税区的设立与运营，在总体上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和拓展功能运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储备显示出经济活力，正在成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增长点。

保　税　区

又称保税仓库区，是指一国海关设置的或经过海关批准设置的特定地区和仓库。外国商品进入该地区不办理进口手续，不缴纳进口税，如再出口也不缴纳出口税。进入区内的商品可以进行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展览、加工和制造等。保税区形式多样，主要有保税仓库和保税工厂等，它们的职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佅税仓库是指经海关批准而设立的特定仓库，在这里，外国货物可以不办理进口手续而连续长时间存放。存放在保税仓库的商品可以随时用于再出口而无须缴纳出口税。进入保税仓库的商品通常不允许加工制造，如要进行改装、分类等也须在海关监督下进行。在保税仓库储存货物的期限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1个月到3年不等，我国一般为1年。储存期满后仍未运出保税仓库的商品，将由海关作出处理。

保税工厂是指经海关批准成立的、可以对外国货物进行加工、制造等保税业务活动的场所。同保税仓库相比，保税工厂不仅可以储存外国商品，而且还可以对外国商品进行加工制造。经过保税工厂加工制造的外国商品一般用于再出口。保税工厂的设立将有助于一国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推动该国外贸的发展。

佅税区起到了类似自由贸易区甚至出口加工区的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发展一国的转口贸易，而且还对该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外贸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区域开放格局的形成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强调指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随后中央发布《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对外开放。

1.开放长江中下游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6个沿江港口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

2.开放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绥芬河、黑河，内蒙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新疆的伊宁、塔城、博乐，云南的瑞丽、畹町、河口，广西的凭祥、东兴共13个陆地边境城市。国务院赋予沿边开放城市的主要政策有：（1）扩大边境开放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权限；（2）鼓励内地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到沿边开放城市投资；（3）批准举办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包括丹东）。合作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进口机

器、设备及其它基建物资等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税，国家“八五”期间每年专项给每个合作区10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用于建设。

3. 批准合肥、南昌、长沙、郑州、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哈尔滨、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自治区首府）为开放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4. 批准大连、广州、青岛、张家港、宁波、福州、厦门、汕头、海口市举办保税区；批准营口、威海、温州、昆山、融桥、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武汉、重庆、芜湖、杭州、番禺、南沙、萧山市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63家外资（或中外合资）银行（或金融机构）在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天津、大连、广州、宁波、青岛、南京七个城市开业经营外币业务；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包括零售商业、交通运输、房地产、旅游业等。

5. 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取消补贴，适当增加收汇留成，改变地区差别外汇留成办法，实行全国统一的按不同大类商品的外汇留成比例，发挥外贸和工贸专业进出口公司的主渠道的骨干作用。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布局。即：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区、沿江开放港口城市、沿边开放城镇，内地其它省会开放城市的开放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标志我国区域开放格局的最终确立。党中央、国务院依据开放工作的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实际，坚定不移地走开放之路，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

第二节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成绩的取得，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系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对外开放的扩大，对外开放的扩大又促进了改革的深化和改革成果的扩大。对外贸易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进程是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在1979年以前的30年间，与新中国建立之后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实行了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外贸国家垄断制。从1979年开始，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总体改革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外贸体制亦经历了若干次重大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外贸体制改革促使我国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加快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程，促进了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外贸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乃至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一、传统外贸体制的弊端

新中国一建立，我国政府立即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那一部分对外贸易企业，建立了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外贸企业则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并宣布实行对外贸易国家统制，改革海关制度，逐步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统制的、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对外贸易经营管理体制。其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对外贸易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局部的变化，但直到 1978 年，基本上是保持了国家统进统出的体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以国家统一经营、统负盈亏为主要特征的对外贸易体制，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建国初期，它对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保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曾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使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证了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维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使国内经济得以免受国际市场波动和外来竞争的冲击。然而，随着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扩大，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浪潮的兴起，旧有外贸体制的弊端愈益显露出来，主要是：对外贸易的经营管理权过于集中，统得过死，渠道单一，由各专业总公司经营的出口商品额占出口总额的 60%左右，各地方的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外贸企业财务吃大锅饭，不利于经济核算和提高经济效益；外贸业务产销脱节，生产供货部门同出口交货和收汇任务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负直接责任，影响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品种的开拓，使商品适销对路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外贸经营层次多，手续繁，效率低，官商作风严重；税收和进出口商品作价政策不合理，抑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等等。因此，这一体制严重障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亟待进行改革。

二、外贸体制改革的展开与不断深入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作为整个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贸体制，也随之被推上改革的道路。

从 1979 年至 1998 年，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79 年至 1987 年的探索阶段，1987 年至 1990 年的整体推进阶段，1991 年至 1993 年的攻坚阶段，1994 年至今的继续深化阶段。

（一）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下放外贸经营权，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具体内容包括：

1. 调整中央对外经济贸易的行政机构。根据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定，国务院于1982年3月撤销原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统一领导和管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此外，在广东、福建两省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成立外贸总公司，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省、市生产的出口商品的外销事宜，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

2. 由单一的经营渠道改为多渠道经营。为了适应外贸事业发展的需要，扩大地方经营权，确定对出口商品实行分级管理，分类经营。中央管理的一类出口商品由经贸部所属各专业总公司经营。二类出口商品是国外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商品，以及国外对我商品进口有配额限制的商品。这类商品在外贸专业进出口总公司组织协调下分别由有该类商品出口经营权的省、市、自治区自行对外成交出口。地方管理的三类出口商品，凡是有条件的地区，由省、市、自治区经营出口。

3. 外贸专业进出口公司开展代理业务和建立海外贸易机构。外贸专业公司对部分产品由收购制改为代理制。在国外主要市场设立贸易公司或常驻代表机构。

这些改革，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持续了5年之久。通过这些改革，原有的集权过高、统得过死的外贸经营格局有所改善，地方和外贸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但是外贸体制中的主要弊病仍未完全解决，与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全面相适应，1984年9月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确定进一步深化对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是：政企职责分开，经贸部专司管理；外贸经营实行代理制；工贸结合，技贸结合，进出结合。据此，1985年开始的外贸体制改革重点在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政企分开，加强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外贸实行政企分开以后，经贸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厅（委）专司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外贸易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既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的原则。经贸部要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领导管理全国外贸工作和各类外贸企业。

第二，简政放权，充分调动外贸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外贸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简政放权。经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和地方的外贸公司，都要逐步从原来所属的行政部门独立出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这是搞活外贸的基础。

第三，实行进出口代理制，改进外贸经营管理。实行进出口代理制有利于促进工贸结合，技贸结合，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可以成为外贸经营的基本形式。进口经营原则上全部实行代理制，由用户自负盈亏。进口实行代理制，价格同国际市场挂钩。出口经营基本上实行代理制，工矿产品基本上采用代理制，农副产品和一些手工艺品等仍由外贸公司收购。

第四，改革外贸计划体制，简化计划内容。过去外贸计划体制的主要问题是集中过多，管得过死，指令性计划比重过大，忽视市场调节，不善于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为此，外贸计划体制改革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今后国家只下达出口总额指标，作为指导性计划，属于国家管理的主要商品的出口数量计划，作为指令性计划。经贸部

不再编制和下达出口商品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在进口方面，国家下达进口总额指标，作为指导性计划；用中央外汇进口的少数几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引进项目以及同协定国家的贸易，由经贸部根据国家计划按商品、项目下达指令性计划，并指定专业公司经营。其余进口均不再下达商品的进口计划，只将进口用汇指标分给用货或订货部门，安排进口。

第五，改革外贸财务体制，加强经济调节手段。各类外贸企业实行利改税，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外贸易开始由单一渠道改为多渠道、多层次的经营体制；由集权型改变为分权型的管理体制；由指令性改变为指令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计划体制。但是，由于外贸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与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外贸体制中的主要问题，如政企依然没有适当分离，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财务上仍是统收统付，大锅饭问题未获解决；工业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没有从根本上结合；经营还未放开，经营权仍较集中；宏观控制仍以直接控制为主，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经济调节体系，等等，仍未得以有效解决。

（二）整体推进阶段

针对上述问题，从1979年起，外贸体制改革抓住构建良好的微观基础，立足于增强企业活力这个根本全面深化，步入整体推进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改革任务是在全外贸行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外贸体制的改革方向："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循着这一方向，经过充分酝酿，自1988年起、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全面推行，主要内容包括：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直接承担进出口任务的对外贸易总公司及工贸总公司，分别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财务盈亏三项指标，3年不变。完成承包指标内的外汇按留成比例分成；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分得的外汇，允许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自主使用。各外贸进出口总公司的地方分支机构，除保留少数经营国家统一经营商品的分支机构外，均下放地方按照国家的统一政策管理。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外贸、工贸总公司将逐步朝着综合型、集团型、多功能、国际化的商社式企业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配合全行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其它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其中包括：在全国建立若干外汇调剂市场，允许企业自有外汇随时进入市场自由调剂；转变外贸管理部门职能，运用价格、汇率、利率、退税、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逐渐形成外贸间接调控体系。这一时期，还在轻工、工艺、服装行业进行了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实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了地方、部门和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对于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受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阶段性的制约，不仅包括外贸经营承包制本身在内的许多改革举措具有较强的过渡性，而且这些具有过渡性的措施也因为配套改革跟不上而未能贯彻到位，所以，在经过承包制改革后，旧体制留存的问题和改革后产生的新矛盾

交织在一起，政企不分、工贸脱节、条块分割、进出口体制分离等矛盾进一步显现。

（三）攻坚阶段

从1991年起外贸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首先从取消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机制入手，推动外贸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联合统一对外的轨道。

1990年12月，在总结3年实行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自1991年起，我国外贸体制实行一系列改革，主要有：一是建立自负盈亏机制。自1991年起，国家全部取消对外贸易企业的出口补贴；同时合理调整汇率，人民币的官方汇率由4.72元兑1美元调至5.22元兑1美元；并且适当增加外贸企业的外汇留成。这样，使外贸企业能够初步实现在对外贸易经营中自负盈亏。二是统一外汇留成比例。各类外贸企业的出口商品收汇，按出口核销单、报关单进行核销，跟踪结汇。出口收汇实行全额分成。一般商品出口收汇按外汇牌价上缴国家20%，地方留成10%，生产企业留成10%，其余60%留成给外贸企业。机电产品出口收汇由地方、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实行全额留成。为保证国家用汇，生产企业的留成外汇和外贸企业全部出口收汇的20%，必须以全国外汇调剂市场平均价卖给国家。外贸企业其余的留成外汇，可以用于自营进口，或在外汇调剂市场上按调剂价格卖出，以便以盈补亏。三是实行三项指标承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直接承担出口任务的各外贸总公司、工贸总公司，必须承包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上缴给国家外汇额度三项指标。国家根据“八五”计划对外贸发展的要求和全国外贸出口的实际情况，逐年核定地方、部门和各外贸企业向国家承包的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上缴外汇额度任务。四是地方外贸与中央财政脱钩。对外经济贸易部所属的各外贸总公司在各地方的分支公司、地县一级外贸公司以及外贸生产企业，除了少数保留外，全部下放地方管理，财务关系隶属于地方。各外贸总公司的财务关系，隶属于经贸部。国务院其它部委所属的贸易公司的财务隶属关系，隶属于其主管部委。五是进一步发挥外汇调剂市场的作用。允许外贸企业在完成上缴国家外汇额度任务后，其留成外汇额度进入外汇调剂市场，在全国范围调剂。各地方和部门不得用行政手段干预外汇资金的横向流通和调剂。

1992年12月，国务院批转了对外经济贸易部制定的《出口商品管理暂行办法》，决定对出口商品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这是我国出口商品管理体制向国际贸易规范靠拢迈出的重要一步。办法规定，从1993年1月起，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品种共138种，比以前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其中被动配额商品24种；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中实行数量配额的，其分配原则、办法及分配数量等，只要不涉及商业秘密的，都要对外公开公布；取消原来出口商品分一、二、三类经营的办法。同时，自1992年起，我国还对进口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1992年初，中国实施了新的海关税则，采用了世界上多数国家普遍使用的《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并在税目和税率转换中主动调减了225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同年4月1日，我国取消了原有的进口调节税制度；从12月31日起，我国再次决定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降税涉及税目为3371个，

关税总水平下降了7.3%。这一年，我国还全部取消了进口替代清单。这一系列改革表明，我国将逐步向以关税为主要调节手段的进口管理体制过渡。

在清理整顿各地方和各部门一部分不符合条件的外贸公司初步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机制的基础上，自1992年起，国家进一步放开了外贸经营权，扩大了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的市场准人范围。1990年底，我国有自营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一共有430家，到1993年1月，全国共有891家生产企业或企业集团获得了进出口权。这一时期也是外商投资企业增加较快的时期。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打破了进出口贸易中国有外贸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到1993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占我国外贸出口总值的比重，已经提高到27.5%。

以取消外贸出口补贴、统一外汇留成和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它带来了国有外贸企业的诸多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变化。在经营指导思想上，开始从为出口而出口转向与效益并重；在体制建设上，通过完善经营责任制，推行“美元工资含量包干”制度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逐渐向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制度靠拢。各专业外贸总公司职能和角色的转变，使各外贸企业间以市场导向的平等竞争关系初步确立，并在市场竞争中，一部分外贸企业向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方向迅速发展。它还使外贸体制开始适应国际贸易规范，从而有利于我国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但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适应国际贸易规范的要求，我国外贸体制依然存在诸多不相适应的方面。首先，由于保留了出口创汇的指令性计划，使外贸企业在完成出口创汇任务与追求自身效益之间面临矛盾，企业往往为完成出口计划不得不牺牲经济效益。所以，改革以后并没有消除外贸企业靠压低价格争夺市场和客户的粗放经营现象。其次，由于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还不到位，国有外贸企业与其行政主管上级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经营活动仍然受到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第三，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使人民币汇率仍然发生着一定的扭曲，难以充分发挥作为调节进出口的主要经济杠杆的作用。同时也使进出口企业的经营核算显得十分繁琐。这些问题表明，外贸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繁重。

（四）继续深化阶段

从1994年起，作为全面理顺宏观体制系统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我国进行了以外汇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外贸全面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外贸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贸易规范所要求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1994年1月，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我国外贸体制按照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运行机制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汇率制度是其中的重点，从1994年1月1日起，双轨汇率制度被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所取代，人民币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并最终在几年后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这一时期的其它方面的改革还

包括：建立与完善外贸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调整与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和有利于出口发展的信贷政策，建立进出口银行，设立出口商品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取消国有外贸企业普遍实行的承包制，代之以赋税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有外贸企业，积极推行股份制试点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试点，推动企业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多元化的路子。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同时取消部分进口商品的减免税。赋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商业物资企业、科研院所和私营企业等外贸经营权，加快推进外贸自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的步伐。充实与强化进出口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职能，健全与完善外贸协调服务体系。在金融和商业零售、外贸等服务性行业扩大利用外资试点。

这一时期，对进出口管理体制主要是配额、许可证等管理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进口管理方面，1995 年，实行进口配额管理的一般商品由 26 种减少为 16 种，实行进口配额管理的机电产品由 18 种减少为 15 种。1996 年，我国实行进口配额管理的大宗原材料商品已由 16 种减少为 13 种。同时，我国对实行特定登记进口商品目录进行了多次调整，1996 年调整后的特定登记商品由原来的 20 种商品共 570 多个税号减少为 14 种商品共 470 多个税号　1995 年，我国进一步减少了进口商品配额许可证管理。调整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由 53 种减少为 36 种，税目由 742 个减少为 354 个。1996 年进出口许可证商品完成全部按海关编码管理。1997 年调整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共计 35 种，税目为 374 个。出口管理方面，1996 年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 114 种，其中计划配额管理商品 40 种，主动配额管理商品 55 种，另有 19 种商品实行一般许可证管理。1994 年开始的配额有偿招标工作是外贸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之一。1994 年初，首先对原木等 13 种出口商品试行配额招标，1995 年扩大到 24 种，1996 年扩大到 27 种。

加快自主降税步伐，降低关税总水平。1993 年底，调整了 2989 个税目商品的进口税率，占全部税目商品的 45.6%，降税幅度为 8.8%。1994 年初降低小汽车进口关税，降税幅度 35.9%。1995 年调低烟酒等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降为 35.5%。1996 年 4 月 1 日又降低 4997 个税号商品进口关税，关税税率总水平为 23%。1997 年 10 月 1 日起关税税率总水平进一步降到 17%。

出口退税制度改革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新税制的需要，强化退税管理，简化退税手续，及时足额退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科学、严密、稳定的出口退税管理机制。1994 年国家税务局制定实施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1995 年 5 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管理的通知》，决定自 1995 年 7 月 1 日起适当调低部分出口退税率。同年 10 月 6 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调低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决定从 1996 年 1 月 1 日起再次降低出口货物退税率。1997 年 2 月国务院决定，对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货物实行“免、抵、退”税的办法，并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1998 年初对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又适当提高了纺织品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1999 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出口，国务院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再次提

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加工贸易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由于我国对加工贸易给予政策优惠，进口料件给予免税，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假借加工贸易名义，进口料件加工后并不出口，而是转销到国内市场的不法行为增多。为打击这种变相走私行为，自1995年底对加工贸易试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从1996年7月1日起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对加工贸易的银行保证金台账监管制度。1996年加工贸易总值达到创纪录的1446.1亿美元，占总值的51%，比上年增长11%。1998年加工贸易份额进一步上升，已达60%以上。

从1994年以来，以放开外贸经营权为重要特征的外贸经营体制改革取得长足进展。1996年底颁布的《经济特区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自动登记暂行办法》，开始了我国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依法登记制的过渡。1996年9月30日，外经贸部发布《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在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试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标志着外贸领域对外开放迈出了重要的步伐。1998年底中国已有专业外贸企业9000多家，获得外贸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近万家，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已接近全国外贸出口的1/4；此外，还有已开业的15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均拥有自营进出口权。1999年，中国又下放外贸经营权到私营经济，从1999年1月1日起，凡符合《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进出口经营权的暂行规定》的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可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享有与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同等待遇。年初已批准61家私营生产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外贸公司对外开放合资经营的试点工作也已经展开。到1998年底，在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达48.4%，集体企业占2.4%，外商投资企业占48.7%，其它经济占0.5%。

在外贸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战略与贸易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为扩大出口贸易，中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和优先发展机电产品战略，实施了以进带出策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的贸易伙伴已从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现在的227个，遍及世界各地。从1995年起，机电产品出口额已超过服装、纺织品，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类别。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2.2%，高出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速11.7个百分点，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6.2%，并实现机电产品贸易顺差26.7亿美元。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改革，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行政性直接干预大大弱化，外贸宏观管理逐步走上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的轨道。二是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国有外贸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的执行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者。三是外贸政策的统一性进一步增强，透明度进一步提高，涉外法规日益健全。四是外贸中介服务体系开始形成。五是外贸经营的领域和渠道进一步拓宽，总体效益和竞争能力大大提高。当然，外贸体制改革还远没有结束，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舞台参与经济活动程度不断提升，我国外贸体制必须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以迎接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

第三节　对外经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利用外资

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以来，中国开始主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经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成效显著，成就斐然。

（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结构趋向合理，区域不断扩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1. 投资呈阶段性上升，总量已具相当规模。自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我国吸引外商投资大致经历了起步、持续发展和高速发展三个不断递进的阶段。

1979年至1986年为起步阶段。为了吸引外资，我国首先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对建立的“三资企业”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继而扩大地方审批外商投资的权限，并逐步完善立法。这些政策和措施，初步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发挥了各地利用外资的积极性，吸引外资的规模不断增加。这一阶段，我国吸引外商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地区，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项目和宾馆、服务设施等第三产业项目居多，并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其它沿海省市。

1987年至1991年为持续发展阶段。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商投资举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有效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吸引外资的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一阶段，在外商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结构有较大改善，生产性项目及产品出口企业大幅增加，宾馆、旅游服务项目的比重大大降低，外商投资的区域和行业有所扩大，台湾地区厂商的投资开始进入，并迅速增加。

1992年以来外商投资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我国的投资环境更进一步改善，吸引外资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大发展。1995年6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指明了外商投资的方向和领域。从1996年7月1日起，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提前在年内实现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

经营环境。与此同时，继续扩大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区领域。我国扩大了内地省份（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审批限额由总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下提高到3000万美元以下。1998年，党中央又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对外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保持了较大的规模，外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大跨国公司进入我国，资金、技术密集的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加较多，平均单项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提高，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有了较快发展；招商引资方式不断改进，从1997年每年在厦门举办一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外商增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寻求发展对华投资合作提供了良好机会。

此外，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国际证券投资等也获得很大发展。

2. 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区域不断扩大。80年代初，我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0多个，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形成。从洲别看，1998年亚洲地区投资额为313.3亿美元，占实际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额的68.9%；欧洲地区投资额为43.1亿美元，占9.5%；拉丁美洲地区为45.6亿美元，占10%；北美洲投资额为43.3亿美元，占9.5%；其它国家和地区为9.3亿美元，占2.1%。以香港、维尔京群岛、美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澳门、马来西亚、凯曼群岛、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为最多，合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89.8%。外资投向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1998年外商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实际投资比重分别为87.3%（包括中央部门）、9.7%和3%。

3. 投资项目规模扩大，跨国公司投资增多。外商投资平均规模由90年代初期的不足100万美元，增至1998年的263万美元。目前，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企业已有400余家在华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其投资的规模大、领域宽、覆盖面广，对扩大我国外商投资的整体规模和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4. 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领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经过20年的发展，在继续保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前提下，外资已经覆盖了农业、石油勘探开发、工业、交通邮电业、商业贸易、饮食娱乐业、金融保险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部门和领域。随着投资领域的拓宽，产业结构也有所改善，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投资领域已从初期的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扩展到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此外，金融、保险、商业、连锁、零售、外贸等行业试点引资的数量和地域也在不断扩大。

（二）借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健康发展，被世界投资、金融界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目前，我国借用外资方式主要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五个部分。从1979年到1998年，我国共签订对

外借款项目1579个，协议金额1301.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217.3亿美元。优惠贷款在对外借款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1998年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优惠贷款约占一半以上。我国的金融、财政部门从80年代起陆续在新加坡、日本、德国、英国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累计筹措资金约80亿美元。这些贷款和债券支持了大批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对外开放还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改革，繁荣了国内金融市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营业性机构达178家，其中外国银行驻国内分行146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外资独资银行7家，外资保险公司11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家。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贷款用于境内，贷款项目多为中长期项目。

利用外资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利用外资缓解和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国家税收和外汇收入；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进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引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吸引外商投资加快了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二、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一直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无息、低息贷款或无偿援助的主要方式有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少量现汇援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我国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与改革，继续向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方式更为灵活，援建的项目更加实用。

从1979年至1990年，我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调整：通过统筹安排，扩大了援助面，使受援国由1978年底的66个增加到1990年的93个；将我国援助同联合国多边援助、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相结合，推动互利经贸业务，促进援外与互利合作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对不同项目采取技术合作、管理合作、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合资经营等方式，改善和提高援助效益；进行援外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在援外项目实施阶段，由试行投资包干逐步试行承包责任制。

在援外结构的调整与探索时期，围绕着主要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并与发展多双边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我国共同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工作：调整援外结构，成套项目占60%，重点建设生产性项目、适当援建人员培训和社会公益性项目，也援建受援国有特殊需要、规模适当的个别社会公共建筑；大力推动我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合作经营生产性援助项目；设立多种形式援助专项资金；增加形式多样、灵活、及时的小额赠送；将一部分援外资金与联合国发展机构的资金相结合，开展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进一步调整、改革援外项目的管理体制。

1995年以来，我国援外工作在全面改革中稳步推进。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精神，为使有限的援外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我国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外援助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是积极推行优惠贷款。由我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以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双方企业的投资合作，带动我国设备、材料和技术出口；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以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此间，我国先后同31个国家签订了38笔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新的援外方式得到越来越多受援国的理解和拥护。

三、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是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它国家之间发展政治、经济友好关系的一条有效途径。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事业始于70年代末，起步较晚，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创业初始，我国仅有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国家开展业务。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我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大体经历了起步、逐步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

1978—1982年的起步阶段，我国共批准了29家企业从事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业务，我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首次走向国际舞台，主要市场集中在西亚、北非。经过创业之初的艰难开拓，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取得了初步发展，4年中共与45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承包劳务合同755项，总金额11.96亿美元。

1983—1989年的逐步发展阶段，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在国际承包劳务市场萎缩、条件苛刻的困难条件下，经过奋力开拓，取得了持续发展。在此期间，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队伍不断壮大，1990年底达到113家，初步形成了一支活跃在国际承包劳务市场上的骨干队伍；业务量不断增加，8年间共签订承包劳务合同138.64亿美元，在国际承包劳务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市场逐步扩大，为90年代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0年以来的稳步发展阶段，我国对外经济合作进入了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经营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企业由流通领域的窗口型公司为主逐步转向生产领域的实体公司为主，企业的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在外承揽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高，市场多元化战略初见成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止1998年底，我国累计签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份数16.1万份，合同额83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83.7亿美元，外派劳务超过177万人次。

我国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发展的突出特点：一是业务规模不断扩大。70年代末，初登国际承包市场的我国专业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仅签订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

36份，合同金额仅0.5亿美元。经过20年的发展，1998年我国签订对外承包劳务合同已达2.6万份，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均已突破100亿美元，分别达到117.7亿美元和101.3亿美元。全年有26家公司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逾亿美元。从国别、地区看，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21个，新签合同额共计75.7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4.3%。二是合作区域不断增加。我国在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创业初期，仅在中东地区和少数国家开展业务，截止1998年末，已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我国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技术合作区域所占比重分别是：亚洲59.98%，非洲16.6%，欧洲3.3%，拉丁美洲0.9%，北美洲3%，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国境内工程及其它14.3%。三是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对外承包工程公司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仅争取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同时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正在向成建制的总承包发展。劳务合作的内容也由单纯提供劳务发展为与外派技术、管理人员相结合的服务型、管理型的多层次、高技术劳务输出。海外企业已从单一的合资发展到参股、合作、合资、独资相结合。合作领域则从森林采伐、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公路建设、渔业合作逐步向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等技术密集行业发展。四是企业素质和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止1998年底，我国具有对外经济合作经营权的企业达900多家。1998年，位居前50位的企业的合同额合计占合同总额的68.8%；专业性实体企业的合同额约占合同额的70%。

四、对外投资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非常有限，主要是在境外开设一些窗口型贸易公司，为开展进出口业务服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海外投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业务开始起步。1978年12月，为了加强在国外的营销力量，做好技术、设备引进工作，我国政府同意国内企业到国外设立代表机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明确提出了要鼓励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对外投资业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展加工贸易，以现有设备、成熟技术、零部件和原材料等实物投入方式到境外投资建厂，开拓海外市场。一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了国门，成功地实现了跨国经营。

截止1998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共5666家，中方总投资额为63.3亿美元。其中，贸易性投资企业3288家，中方投资37.8亿美元；非贸易性投资企业2378家，中方投资25.5亿美元。在这些境外投资企业中，驻港澳地区的贸易性企业1821家，中方投资33.8亿美元；非贸易性企业246家，中方投资2.1亿美元。从投资规模分布看，我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其中，在澳大利亚投资所办企业的规模最大。从资金来源看，我国在海外投资的资本金多为国外贷款，或以中国现有设备、技术、专利等折价投资，真正从国内调出资金很少。90年代以来，我国在海外企

业的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总额的一半左右。

目前，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已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投资企业主要有两类：一是主营进出口贸易的贸易型企业；二是非贸易型企业。后者投资涉及的领域包括：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及加工、装配企业、工程承包、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医疗卫生、咨询服务、旅馆旅游及中餐馆等。就总体而言，我国海外投资正在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大型外贸企业、企业集团在国际化经营的转化中，通过到国外办企业、设工厂，利用当地资源、市场扩大营销，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外投资正在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第十六章　始终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应当始终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经过五十年的艰辛探索并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稳步提高；也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才能昌盛，民族才能团结，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

第一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需要。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质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作出明确判断后指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高度发达程度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再也无法容纳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并且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性质。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人民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就在于他们相信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带来生产力的更快发展，相信社会主义能更

好够满足他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社会主义不是产生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行进的尽头，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其生产力甚至低于资本主义一般水平。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格局，使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处于与资本主义竞争的位置。因此，社会主义只有以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生产力，才能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对比中展现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质，展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该紧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较快的速度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社会主义的实力才会不断壮大，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享受到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才会更加坚定，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才能不断巩固。

五十年的实践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各项事业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个中心，我们的各项事业就往往遭受挫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基础。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

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出发点和依据。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我们一定时期工作的主要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工作重心的确立，是由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们曾经一度走人将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误区。改革开放后，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提出我国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五大又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一矛盾作了更进一步的深刻阐述，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正确地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解决矛盾就必须从抓主要矛盾入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落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希望能够满足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国是一

个多民族的农业大国，自然资源总量虽然不小，但人口也很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很少，加上战乱频仍的旧中国留下了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很薄的底子。从社会发展程度看，我国属发展中国家之列，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现代化程度低，虽然新中国建立五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相比，我们的经济仍不很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仍需要更大的提高。特别是作为一个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先进的发达国家优裕的物质生活比照之下，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将不断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就使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的生活要求之间的矛盾在长时期内始终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就必须集中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都必须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心环节来展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尽快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具有先进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只有坚持经济建设中心，我们才能解决好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背离了这一原则，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应有的针对性，社会主要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停滞不前，甚至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危机。

社会主要矛盾规定和制约着其它社会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是解决其它次要矛盾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都同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顺利解决都依赖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只有抓住和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抓住和解决了社会其它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其它各种矛盾的重要基础，是推动社会全面改革的前提，因此，我们在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的工作都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发展，其中心内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

第二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五十年实践所作出的历史结论

新中国5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是在起伏跌宕的艰辛探索之中走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重要历史结论。

一、游离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惨痛教训

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的前30年里我们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全党工作的出发点，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留下了十分惨痛的教训。

1956年，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党的八大对我国的基本形势和党的根本任务已作出了正确判断，此后的十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期间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66年开始，基于对当时国内阶级形势、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完全脱离实际的估计，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

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59年的党内"反右倾"斗争，再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越来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最后终于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断。这一错误论断又为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使之不断得到强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了中国实际，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从而全面否定了党的八大所作出的正确判断及所确定的工作中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论断被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党内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时，阶级斗争被确定为一切工作的重心，阶级斗争被当作推动经济的手段，因而要不断地"抓革命，促生产"，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后走人了以为依靠频繁地发动政治运动就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误区，从而否定了生产力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最终决定作用。而将生产力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正确观点，则被视为"唯生产力论"，而受到批判，合理的物质奖励的做法被说成是"搞物质刺激"、"工资挂帅"、"工分挂帅"，农村经济中的多种经营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割除。60年代初开始的旨在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此时也变成了突出阶级斗争、推行"左"的错误做法的手段。这种以政治推动经济的错误做法曾一度走向极端，甚至提出"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论调。

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片面强调和频繁发动政治运动，将处于次要地位的其它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甚至把它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自然造成工作上的盲目和混乱，严重干扰与影响我国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挫折。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动荡的岁月里，在阶级斗争搞得最红火的年份里，甚至造成政府机关无法运转，工人不上班、不生产，全国出现了搞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的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财政也因此出现赤字，全国社会经济秩序陷入混乱，我国经济遭受了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挫折和损失。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依赖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资源浪费大，经济效益严重下

降。经济发展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迭宕起伏，总体上在低水平上徘徊。1967、1968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产业结构愈加失调，能源、原材料工业的“瓶颈”问题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的起伏迭宕，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自然条件较差的一部分地区，广大群众长期戴着贫困帽子，生活十分困难，生活质量长期得不到改善，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政治动荡与经济波动，使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饱尝了游离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惨痛教训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提出了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从此启动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

20年间，我们紧扣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来设计总体的改革方案，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切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在不同领域改革之间的关系上，党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放在改革的首位来抓，其它领域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的每一步，都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为基础。抓住了经济这个对改革起决定作用的中心环节，并不断取得的重大突破，也就为其它领域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创造了机遇。20年间，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其它领域的改革也有条不稳地推进着。在这样一场涉及面宽、力度大的全面改革运动中，不仅没有造成大的社会震荡，而且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属不易。这除了高度的策略技巧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党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经济20年年均增速高达9.7%，保持了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2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七，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1995年，全国提前实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国家财政收入以超过10%的速度大幅度增加。教育迅速发展，许多领域的科技成果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产业比例日趋协调，产业结构明显改善。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国内市场繁荣，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品短缺局面，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所有制结构日益丰富合理，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开放、完整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形成。人民生活有了巨大改善，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分别达到或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小康标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其夺目的光彩为世人所瞩目。

2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表明，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才能具备坚实的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真正符合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的要求，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才能使我国的

社会主义始终呈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节　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新中国五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宝贵经验之一，今后仍必须始终不移地坚持经济建设中心，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当前矛盾和实现长远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社会经济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问题。我们只有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能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才能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深入。

当前，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机制作用日益强化，我们面临着大量职工上岗下岗造成的就业压力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问题、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和不同行业阶层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等。这些问题与大量国有资产需要盘活、沉重的债务负担需要解决等问题纠结在一起，加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法规等制度性建设尚不完备，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推进面临严重的挑战。实际上，要改革必然就要不断面对新的矛盾和问题，正是因为有大量问题的存在，才有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存在矛盾和问题并不可怕，重要的在于要理清思路，找出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因素，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对策。

我们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是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结果。只是在原有体制下，这些矛盾和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和显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才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关系没有理顺，经济体系内部资源能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是发展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必须紧紧扣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才能使这些矛盾和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是由于各地区自然资源、人才、市场等条件的差异而带来的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但实际上根源还在于经济发展不充分。经济发展不充分造成的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得到解决。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的关键，仍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由于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政策，在目前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时，我们发现急待建立

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成为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归根到底也要靠经济发展来完成。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基础的支持，而社会保障体系也正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没有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完善起来。可见，多数矛盾和问题都是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因而也只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得到解决。江泽民同志指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毛主席讲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邓小平同志讲，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越是贫困的地方，越容易积累矛盾。因为群众生活过得不好，心中有怨气，心情不舒畅"，"如果干部作风再有问题，一些矛盾处理不妥当，就可能引发事端。"

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也是缓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解决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重要基础。改革与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是手段，推进改革的目的在于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会为改革创造条件和机遇，从而促进改革的深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后，我们就具备了更好解决改革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与条件。当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较多，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传统体制的长期影响、历史形成的诸多问题、多年以来的重复建设以及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和深化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是关键，但体制改革的推进只有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才会取得显著的成效。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就难以顺利完成。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在解决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时才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将这个思路扩展开来，认识和分析我们面临的其它所有问题，我们得到的启发更大。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和复杂化，一个国家国际地位高低最终要看它的综合国力。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始终不移地坚持加快发展本国经济的原则，不断强化自己的经济实力，这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坚实基础和最丰厚的资本。实际上，正是由于改革开放20年经济发展使我国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我们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重大冲击，并在亚洲国家一片货币贬值的连动反应中勇做中流砥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所以，不论是解决当前矛盾，还是实现长远发展我们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必须更加重视和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会丧失最根本的经济源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遵循的思路

确立明确的思路是实现未来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前提。坚持以一经济建设为中心，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继往开来地走向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必须理顺未来经济发展的思路，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规划，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立方向。

（一）明确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分几步走的发展战略，确定了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在这些目标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分步走的发展战略，切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早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就开始了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1987 年，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并完全采纳了他关于分几步走的经济发展构想，明确地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战略构想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目前，我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水平迈进。原定到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也提前 5 年于 1995 年实现了。在总结经济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九五”时期，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 年在人口将比 1980 年增长 3 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 20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党和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奋斗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高度统一，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有机结合，为下一世纪我国经济的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

（二）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速度与效益是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衡量指标。速度是经济发展的数量表现，而效益则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关键在于走出一条既有速度又有质量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首先，提高经济效益必须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伴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家对产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这标志着我国从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向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新的产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传统的计划型产业政策开始丧失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市场协调型产业政策应运而生。新的产业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也从整体上带动了经济效益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中国的产业发展目标也日益明确。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的角度看，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分化和重组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另一方面要加快主导产业的发展，瞄准市场需求变化，走一条基础产业、主导产业、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其次，提高经济效益要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相结合。国有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步骤。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赖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改组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的需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国家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发展一批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国有中小企业在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要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鼓励它们采取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加快发展。

再次，经济效益的提高还要与增长方式的转换结合起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贵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非片面追求社会生产总量、突出产值和速度的倾向；贵在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而非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扩张和增加人、财、物的投入；贵在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通过分化重组，着重于更新、改造、挖潜和技术创新，而非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投资规模；贵在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非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技和教育发展经济

当前，知识经济在国际社会中已初见端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经济发展为重点，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时代，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是智力竞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挑战首先来自世界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来自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分享世界科技、经济国际化的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抓住机遇，及时有效地加入这一轮新的竞争，我国就有希望在知识经济时代完全到来时，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和科技发展强国之列。因此，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作出有力的回应，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发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重视最新科技成果的运用，振兴中国经济。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要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首要位置，努力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首先，要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知识经济中，无论是知识、技术、信息的生产、传播以及应用，都离不开高素质的具有创造才能的劳动者和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将是国

民素质和人才的竞争。因此，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要改革传统的教育体制，重视提高国民素质和人才的开发培养，把人力资源的开发这一任务摆在优先地位，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真正得到发挥。

其次，要加快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努力提高我国自身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必须加速发展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我国现在经济总量不小，但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消耗高、效益低，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技术落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战略性调整，必须使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有显著提高。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生活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完成现代化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需要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切实加速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应该是：一方面要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加速发展有市场需求和前景的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必须把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同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跨越发展道路。这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经济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选择。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加速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与机制。特别要积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逐步建立一个产、学、研相结合，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开发和创新体系。二是要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办世界一流的大学，为国家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人才，使高等学府成为国家级的知识创新基地，推进产学研结合，鼓励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进入企业和企业集团，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要加强知识传播和应用系统的建设，为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扩散以及应用提供有利的条件。四是从多方面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鼓励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特别要大胆启用青年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在技术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

（四）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化建设的体制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抉择。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加快经济发展，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改革又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改革，不是基本制度的改变，但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它是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造。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目前进行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这项伟大的工程是宏伟的、艰巨的、也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以“三个有利于标准”做为准则，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勇于创新，敢于探索新问题、新方法、新路子。当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坚持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它改革相结合，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使之相互推动，相得益彰。”

（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走开放强国之路

对外开放是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时深刻地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希望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和技术交流。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没有实现。后来在“文革”中僵化的、“左”倾教条阻碍了我们对外开放，导致我们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和经济发达水平的距离拉大了。因此，邓小平同志于 1984 年明确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不断扩展、深化，加速了世界市场的扩展和国际联合体的形成，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信息、技术、资金、人才、文化的循环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起来。要大胆学习国外的经验，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经济规律的先进经济方式和管理方法。学习国外经验决不意味着我们要盲目照搬，必须坚持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要吸收各国之长，又要走自己的道路，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使中国真正迈上发展现代开放型经济的快车道的保证。

第十七章　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新中国建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基本经验之一。三者关系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

第一节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稳定和改革的目的都是发展，发展在三者关系中具有特殊的位置，是被历史所反复验证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50年的实践证明，加快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旧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烂摊子，面对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面对着极为严峻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国人民依靠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人间奇迹。证明了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性的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使中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根基也是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都要靠自己的发展。

第一，从根本上摆脱我国经济落后状况要靠发展。建国5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但是，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有的甚至较为突出。解决这些问题，进而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最终还是要靠发展。不发展就没有出路，加快发展是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和克服前进中困难的唯一选择。

第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靠发展。没有生产的发展就不可能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根本原

因在于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较快。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虽有大幅度提高，但离富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城市要建设、住房要增加、待遇要提高、生活要改善，没有经济发展，没有物资不断丰富，没有财富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就难以逐步提高。

第三，缩小各个地区的经济差距要靠发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各区域间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而要缩小直至最终消灭这种差别，归根结底还要靠发展。首先是中西部自身的发展。中西部地区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没有这种发展，中西部就难以形成摆脱落后局面，实现经济优势的产业基础；东部地区也需要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通过多种形式给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提供更大的帮助；整个国家更需要发展，有了这种发展，对中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就有了财力基础。

第四，实现社会稳定要靠发展。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解决一切同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有了经济基础；经济发展了，实现不断增长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就有了条件。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幸福，稳定就有了保证，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

第五，增强综合国力要靠发展。历史证明，国际间各种较量，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实力。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综合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主要因素。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要使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提高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能依赖经济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加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

这就是说，只有发展，才能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只有发展，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只有发展，才能有效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发展，才能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和平统一祖国目标的实现；只有发展，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也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真正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判断我们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一句话，应该以是否实现了发展为标准。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加快发展。

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赖于“两个转变”

谋求发展，不能不重视速度。但我们要的发展速度，是同好的效益相统一的，不是片面的数量扩张；是同低通胀相统一的，不是大起大落的折腾；是同可持续发展相统一

的，不是一阵子的大干快上。我们的发展是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是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证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赖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根本性转变。

合理的经济体制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基础。5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什么时期经济体制调整得较好，经济关系梳理得较顺，什么时候经济发展就快、就好。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期间，我们适应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的需要，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由于这一体制契合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又从具体实际出发，没有统得很死，保持了相当的弹性，因而它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一五”时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但随后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没有得到相应调整反而进一步加强，逐渐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1978年以来，我们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大大解放了被压抑的生产力，国民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因此，没有合理的经济体制，就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最终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从而也是最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提高产量、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体制效应，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使国民经济的每一个细胞充满活力，才能合理配置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效益。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往往片面追求社会生产总量的增长，片面突出产值增长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种重速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高投入低产出的结果是，速度一时地上去了，效益下降了，数量多了，质量下降了，最终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很大损失。在这样的增长方式下，产量和产值的增长主要靠增加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来实现。其表现是重视物质要素投入数量，忽视质量和效率；重视资金投入数量，忽视其使用效率和投资结构的优化；注重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忽视其科技文化素质，忽视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管理。这样的增长方式，是难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从我国国情出发，一定的投入和新建项目是必要的，但更要重视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注意实现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特别重视科技和教育的发展，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科技、教育和经济的紧密结合。加快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要实现科技进步

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关键则是发展科技和教育。要把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这些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高国民素质，为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在两个转变中，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条件。从根源上说，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旧体制作用的结果，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只能依托新的体制方能完成。经济体制不实现根本性转变，就不能真正地、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方式不实现根本性转变，就不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真正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并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节　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的实践表明，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未来，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必然要求

从根本上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完善与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一部人类发展史，实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基于人类历史的解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生产力是决定历史或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般地说，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会自我开辟道路，但这种自然的突破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因此，从历史上看，各个社会形态在它的基本制度建立以后，都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的具体环节或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它也必须通过改革，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环节和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以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始终处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就明确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需要，改革也是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的需要。唯有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日臻完善；也唯有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永葆生机和活力。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在旧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关系所束缚的生产力，并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终止，在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的社会主义中国，面对的是仍然落后的生产力基础。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我国集中体现为落后的生产力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间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而经济体制是其中的一个根本因素。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格局是否适应包括现有生产力基础在内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条件的要求，取决于经济体制是否能依经济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建国5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多次调整乃至最终被推上改革的道路，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我国的改革是实现生产力发展，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基本手段，正因为如此，它带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是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多的涌现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改革将是不断深入的、永续不断的。

二、把握历史经验，扎实推进改革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使我们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无论是解决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还是实现中华民族永远的繁荣昌盛，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经过20年的改革，我们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改革的任务还很繁重。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谨慎操作，切实打好改革的攻坚战。

20年来，面对着前无古人的极为复杂的改革开放事业，我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大胆试验，勇于创新，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子，积累了许多重要的改革经验，要打好改革的攻坚战，必须科学地运用和把握好这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历史经验。最主要的，是把握住这样一些方面：

（一）不断完善改革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改革实践

改革首先是对传统理论与思想观念的革命。面对着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还很浓厚的“左”的思想氛围，改革的启动选择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发端，从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统一了人们的认识，为改革开放的实践铺平了最初的道路。以后，从确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思路，又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一次次的重要的改革实践行动，都以思想理论的这种一次次的发展和革新为先导。而思想理论的每一次革新，都带来了改革实践的突破性进展。没有正确的改革理论，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改革实践。在2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跨世纪的改革新征途上，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工作。

（二）紧紧扣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在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改革实践中改革与发展的结合。最主要的是，一是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上新台阶，作为选择改革措施的最根本的依据；二是在制定改革的规划和方案及推出某些措施时，既考虑有利于解决经济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又考虑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提供的环境与基础；三是用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检验改革的总体战略与具体方针的成败得失，并根据这种标准不断对改革措施与政策进行调整。

（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始终维护人民利益

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要求集思广益，大胆探索。在2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千方百计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齐心协力地推进改革。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考虑国情特点，在总结、比较并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积极地将一些人民群众创造的改革措施、办法与形式及时推向全国。不仅如此，改革的推进始终注重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愿不愿意、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作为改革措施选择与调整的基准与标尺。

（四）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实行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有机结合

改革的复杂性及在中国改革的特殊困难性，使中国采取了“一切重要改革的全面施行都必须先在局部试验”的主要操作方式和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人深，循序渐进的渐进式总体改革战略。但同时，为了尽可能缩短新经济体制的建设进程，也为了使一些改革措施能顺利推出，中央政府力求将某些实践证明具有成效的局部改革措施及时地推向全局，并抓住一些关键的环节进行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改革战略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方式，既使改革保持了必要的力度、速度和连续性，又使改革逐步适应社会承受能力，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的发生。

（五）把握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灵活调整改革措施

在处理复杂的改革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某项改革措施能否产生预期效应，与其推出时机与推进过程中的灵活调整密切相关。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改革的社会经济环境或条件。在环境较好时，抓紧出台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例如，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社会经济环境较好的1990—1991年，大力度地出台了一些价格改革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则对已出台的措施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完善。反过来，政府在考虑推出一定的改革措施时，也尽量采取有效的措施，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

（六）科学对待原体制基础，大力增进新体制的优势

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用虚无主义的态度

对待原有体制，而是科学地吸取传统体制中一些有价值做法，以增进新体制的优势。以经济手段调控为主以行政手段调控为辅的调控体制、股份合作制的财产组织形式等都是这种科学吸取的结晶。此外，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十分注重把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与优良的民族文化、习俗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诚实信用、政府对企业的主动性服务，企业间的相互合作，不同级别管理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企业内部劳动者的集体主义精神，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等，这些反映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已广泛地体现在或蕴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之中。

（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努力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

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体制，是一种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国政府和人民始终把握这一方面，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科学有效地处理好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变化，体现竞争原则，又努力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克服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优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这一做法既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出不同于其它市场经济模式的特殊优势，也保证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顺利进行。

（八）科学吸收和利用世界资源条件和先进文明成果，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

党和政府在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就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方针。除了吸引和利用国外资金与技术，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外，还特别注意借鉴和吸取那些有利于我国新经济体制建设的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通行的先进文明成果。这样，对外开放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活动同世界市场及高效率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作规则的对接，也使建设中的新体制有效地摆脱旧体制落后、封闭的特性而容纳了世界一些先进管理体制的优点。反过来，改革中逐渐采取的新政策、新制度又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地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九）边改革、边规范，通过经济立法，推进改革措施的制度化建设

通过经济立法，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成形、走向成功的重要一环。在改革探索中，我们逐渐加强了改革初期有所忽视的这个薄弱环节，注意到把一些经过实践证明收效良好，比较成熟的改革措施，尽可能及时以规范的制度或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防止良好的改革措施变形，同时为新的改革措施的推出，新体制的进一步发育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些重要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开始就以法规的形式来颁布，如为了使企业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政府颁布了《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等。在着手建立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时又颁布了《公司法》。除此以外，政府在改革中，还根据需要与实际可能，制定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法规，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初步的法制环境。

除此之外，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还积累了一些其它经验。如从中国是一个有9亿农业人口的大国的实际出发，特别重视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以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提供宽松的环境和稳固的基础；注意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以创造适应新经济体制的上层建筑，同时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在着力抓好某些新的单项改革时，注意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配套与协调性等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也是极有价值的。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现在起到下一世纪的前十年里，是否实现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我们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的紧迫感，抓住机遇，把握重点，扎扎实实地把改革推向前进。从主要方面看，下一步要继续做好如下一些方面的改革：

1.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一方面，继续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加快解决国有经济领域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问题。使国有资本向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集中，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发展股份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改革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大国有企业存量资产的调整，特别要利用证券市场，通过国有股权上市，搞活国有资本，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另一方面，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与规范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目前特别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拓展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投资的领域与形式；二是引导和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在体制、机制上实现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转换。

2.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下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国有企业改革应按照这一部署扎实向前推进。主要是：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依据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继续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形成名符其实，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技术不断创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形成技术创新机制，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做好减员增效、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制度，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3. 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建设。要在健全劳动用工法规、发展就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改革各种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规章制度（包括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全面形成用人单位和经营者、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环境

和市场决定劳动力价格的机制；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将营业性用地依法全部纳人有偿使用的轨道。与此同时，理顺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间的关系，实现土地管理与经营的分离，构建为国有土地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主体。要素市场的枢纽是资本市场，应着眼于搞活资本，积极推动资本市场的发育。这方面的当务之急有二：一是强化国有资本的市场流动性；二是扩大社会直接融资的范围、手段与渠道。

4. 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继续深化金融、财政、计划、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要适应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的要求，建立灵敏有效的政策反映、应对系统和风险防范、抑制系统。

5. 继续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要抓住理顺管理和运营体制两个重要环节，抓建立多方出资、满足多层次需要的社会保障与人民生活支持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立较为完善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在加快基本社会保障建设的同时，要积极发展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商业性投保、个人积累等多形式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为有利于改革的快速推进，目前应把重点放在水平低一点但覆盖范围广、具有很强的安抚功能的应急保障与支持体制的建设上。

6.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要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维护市场秩序、实施宏观调控、规范市场主体、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和改善司法、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严格遵循市场经济的要求，科学定法、合理立法、严格执法、依法行事。

第三节　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

改革和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政治不稳，社会秩序紊乱，那么，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无从谈起。同时，社会矛盾的缓解，不稳定因素的消除，长期稳定基础的奠定，只能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体制转轨时期，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化很大，各种矛盾会比较突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维护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一、没有稳定的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中反复阐述的道理，它突出强调了稳定对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里所说的稳定，是指整个社会的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稳定，是指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变，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国家政局稳定。政治稳定是稳定的核心内容。经济稳定，是指经济稳定发展，不出现大起大落、大的波动。经济稳定是稳定的基

础。社会秩序稳定，是指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是稳定的综合反映，是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的重要条件。政策稳定，是指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政策稳定是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

实现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兴盛。

首先，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发展生产力成为我们的根本任务。为此，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前一个是外部条件，后一个是内部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讲，如果社会不稳定，经常处于动乱之中，势必“干扰”、“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影响人们“横下心来”搞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摆脱不了贫困，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掉，更谈不上沿着我们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了。只有保持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健康的发展下去，中华民族建立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才能实现。所以，稳定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其次，稳定是避免外部冲击的客观要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要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安下心来搞建设。但是，国际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分化、西化的战略，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就是先例。邓小平曾尖锐指出：“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一针见血指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一再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告诫中国自己不要乱，要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稳定，我们就难以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打击，也就维护不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外国势力的欺凌与压榨。这一点，我们已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三，稳定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稳定和动荡交替的历史，其中，稳定伴随着国家繁荣、民族昌盛，动荡意味着经济倒退、民众苦难。“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带来的苦难多数中国人至今记忆犹新。不稳定的最大受害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在稳定的环境条件下，才能有步骤地发展经济，有秩序地开展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

总之，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需要稳定，深化改革需要稳定，扩大开放需要稳定，完善民主，健全法制需要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求需要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尊严需要稳定。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二、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长期稳定

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统观全局，精心谋划，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坚持正确路线，妥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轨和观念更新，也必然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带来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问题。保持稳定，要善于审视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不发达经济走向发达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进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坚持正确路线，准确把握和科学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1.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持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不仅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而且也是其它一切稳定的前提。建国 5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政治稳定的前提则是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和稳定。在 20 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20 年来，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里程中，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基本路线；在处理改革与发展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时，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

实践表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又从新的实践中不断吸取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的。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近 20 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全面理解和正确贯彻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能保持我国政治稳定，才能保障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也才能妥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意味着坚持在这条路线

指导下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2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也同时证明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导下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政策稳定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条件。要保持政治稳定，要妥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正确和科学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整套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方针。其中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实行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方针；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实行“科教兴国”的方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大胆吸收与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方针，等等。

2. 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辩证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相互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关系，在改革实践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先富与后富的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和自然条件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很不平衡；同一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之间，在经济发展和效益方面也存在不平衡。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每个人都整齐划一地走向富裕。因此，改革一开始，我们就实行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实践表明，这样作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有利于发挥地区优势，有利于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经过 20 年来的努力，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全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贫困人口急剧减少，已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 1998 年的 4200 万。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方针，必须注意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整体有了空前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由于资源禀赋、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东南沿海，尤其是特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西北内陆地区相对发展迟缓，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了。二是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在个人收入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完全正确的。但也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和手段加大对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救济，调节和节制由于财产持有不同等原因造成的收入上的过分悬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收入差距过分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政策已经确定并逐步付诸实施。对于农村与城市的发展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国家已推出许多切实有

效的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和加强农业，努力发展乡镇企业，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和合理有序地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等地流动，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能够协调发展。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党和政府决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进一步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加大中西部地区资源勘探的力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国外优惠贷款的使用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同时，国家要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对于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党和政府区别不同情况，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一是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二是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三是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四是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五是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政府努力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实行社会救济，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积极扶持，对经济还很落后的一部分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给以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援。六是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加强了对某些公司人员、某些从事“第二职业”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和部分个体工商户收入的监督与调控，防止两极分化。这些政策和措施尽管还需不断完善，不断健全，加大力度，但是它符合民意，深得人心。

毫无疑问，象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由于各地在自然条件、生产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能力等方面必然有差别，不可能同步富裕，共同富裕必然要经历一个长过程。但是，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各种调节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定能够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缩小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保证人们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我们应当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从而保障我国广大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3. 解决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

从经济的角度看，要保持社会稳定，需要解决经济生活中容易出现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给人民利益带来较大的损害。通货膨胀，它会使人民口袋里的积蓄变少，使日常的支出增大，使正常的经济关系走入混乱，并形成新的收入分配不公；通货紧缩，它会使失业率提高，使收入差别的解决面临障碍，给常规性的经营活动带来困难。并且，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背后往往还存在着其它间接损害人民利益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它往往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时候，民意调查显示通货膨胀是与腐败并列的广大群众最有意见，反映最为强烈的两个问题之一。其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问题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经济生活曾几次出现通货膨胀，今天，我们又面临着通货

紧缩的压力。在困难面前，党和政府审时度势，灵活应对，通过深化改革和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成功地化解了通货膨胀的困扰，并且有效地顶住了我们未曾遇到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但是，作为发展中的国家，诸如通货膨胀等问题再度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不仅要从经济发展的高度，并且要从社会稳定的高度来看待认识它们，并采取得力措施，标本兼治，构筑起克服经济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体制基础与政策体系。

4. 大力惩治腐败现象。

惩治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政治稳定国家安定的大事。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党内和社会腐败问题的严重存在，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有意见，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稳定就始终面临着威胁，任其发展下去，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这些年，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存在。惩治腐败，既是社会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列入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与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要使反腐败大见成效并最终消除腐败现象，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抓起，在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上做文章。解决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改革。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减少和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条件和土壤。要深入研究在体制、政策、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努力消除导致腐败发生的因素；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制，强化对腐败现象的监督制约机制。

5.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鲜明地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只有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民主总是同法制结合在一起的，什么样的民主就由什么样的法制来体现和保障。我们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法律，并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的统一，保证党始

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与法制，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其目的是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经过建国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并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二）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局面同推进改革、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害怕变革，消极求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正是由于改革，较好地理顺了各方面关系，从而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是由于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在强调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稳定的同时，必须明确，单纯讲稳定是稳不住的，真正的稳定，长久的稳定只能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

1.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以改革求稳定。

改革是对旧体制的革命，必然要调整旧的利益关系格局，打破旧的经济体制框架，使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秩序失去平衡或稳定。但这样做的目标恰恰是为了消除旧体制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化解延续旧体制所必然造成的灾难或危机。因此，必须以改革求稳定。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过程，同时是新旧思维观念、行为方式、动作程序等发生猛烈撞击的过程，大量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将随之出现。对此，一味考虑眼前利益，简单采取安抚性的权宜之计加以处理，不仅会因弊端瘀积而终致大患，而且会给旧体制改头换面和新体制的游移变性留下空间。因此，必须树立治本意识，在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应急措施，并实施最为必要的治标办法的同时把握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通过体制的深层改革，从根本上消除矛盾与问题发生的源头。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但却有利于迅速而健康地实现新体制对旧体制的取代，防止大的社会震动。

为了尽量减少改革攻坚可能引起的风险，从而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也为了改革达到最大的效应，必须正确把握改革的策略，科学地运用改革技巧。一是合理把握改革的时机，在改革环境与条件较好时，抓紧出台一些重要的、攻坚性改革措施，在环境与条件相对较差时，则在配套改革和改革条件准备上多做文章；二是灵活调整改革的力度。在改革环境和条件朝好的方面发展时，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反之，则及时中止可能带来较大风险的改革措施的施行；三是正确使用改革的方法。在这方面，一要立足于疏导。改革就是理顺关系，重新调整已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从本质上说，是要与旧的格局“对着干”。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方式上必须无一例外地采取“剥夺”的办法。事实上，适当照顾已经形成的某些合理的既得利益，旁敲侧击，因势利导地推出一些实质性的调整利益关系的措施，不仅能够有效地达到深化改革的目标，而且能够较大限度地减

少改革的成本与风险，防止因改革方式上的唐突而导致社会的巨大震动。二要立足于法规推动。各项新出台的符合市场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应尽可能以法令、法规的形式推出。这样做既可以减少阻力从而尽可能减少风险，而且可以防止改革措施的走形变样。

2. 努力加快经济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

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赖于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但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正因为如此，他强调，不能为求稳定而放弃发展。"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他告诫："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有了发展，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占居了主动地位。有了发展，圆满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就有了条件。我们要采取一切有力措施，特别是通过改革建立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经济管理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通过发展科技和教育，促进经济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第十八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回顾新中国50年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运用这一原则去分析和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就顺利；而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一原则，我们的事业就往往遭受挫折。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新中国50年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

第一节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等这些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近代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强大兴盛的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为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此后，中华民族一步步沦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主权不独立，领土被分割，人民遭奴役，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为所欲为，就连当时并不很强大的一些西方小国也在中国占有自己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救亡图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从洋务运动的实业救国到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都是试图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找到一条富国强民的发展之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悟出了不推翻封建君主制度便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强盛的道理，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

制度，启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车轮。

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却未能真正推翻封建主义。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封建主义仍根深蒂固。在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封闭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买办势力与官僚势力勾结，官僚资本主义迅速膨胀。在官僚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双重挤压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十分缓慢。从国际环境看，主宰世界的西方列强绝对不允许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崛起，他们更愿意中国作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存在，因此，一个贫弱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要求。显而易见，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再搭上资本主义的末班车。

辛亥革命后，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军阀混战，国疲民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象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劳苦大众的生存境地仍然十分悲惨。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没有实现人们所期望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通过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在广大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来救国救民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十月革命”的炮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痛苦彷徨的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那就是通过暴力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的革命形势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正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清除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洗清了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横遭外族蹂躏的民族屈辱，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了起来，不再仰视他人鼻息，受制于西方列强，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彻底推翻了封建主义，荡涤了一切落后腐朽的污泥浊水，民主、文明、科学的精神得到倡导，并深入人心，为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彻底切除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毒瘤，为构筑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体系与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创造了条件。正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了强国富民的振兴之路。近代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二、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既不能机械套用经典作家的书本，也不能盲目照搬他国模式。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而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事物包含不同的矛盾，同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其性质也各不相同。各国的社会

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具有相同的性质，有其普遍的规律可循。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历史背景千差万别，因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也就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这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应当也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符合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事物特殊与普遍，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种种矛盾进行系统剖析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理论上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基本设想。但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对其身后发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做出更为细致具体的设计。而且，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粗略设想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主观理想的成分。正因为如此，他们告诫，他们提出的设想不是一劳永逸的教条，恰恰相反，在运用它们时，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事实上，要解决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不可能从经典作家的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建立的经济体制深深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虽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已经觉察到了当时经济体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作了大量工作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旧体制的弊端的暴露和人们对这些弊端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此，建国后几十年，基本上还是在原有体制内进行调整，而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僵化模式的框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注重了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灵活地用于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打破了原先僵化的传统模式，大胆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运行模式。由于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紧紧切合中国国情来完成的，所以改革开放 20 年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运行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活力与效率

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否具有活力和效率，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最终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和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在适合了本国生产力具体发展状况时，它们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会使国家经济体系富有活力和效率；因此，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富有活力与效率的社会主义。

50 年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我们在正反两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建国后的前 30 年里，限于历史条件，我国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在吸取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按照理想的社会主义概念设计的。这一体制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

用，过分突出了“一大二公”的成分，生产上要求一切活动都完全服从庞大的国家计划，分配上则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做法，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缺乏效率，使社会主义严重缺少活力。邓小平同志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

1978年以来，我们对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不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及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每一改革步骤都紧紧围绕中国的具体实际，注意联系中国国情进行一切制度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由于这一模式适应了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要求，使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运行的活力迅速增强。20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中国的社会主义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20年改革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建成高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因而只有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才可能创造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创造出的经济奇迹，才能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第二节　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就是要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基本出发点。

（一）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迅速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基本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但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变革没有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改变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

经过5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国民经济总规模进入世界前列。然而，总的来说，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

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这种状况说明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特定阶段。从我国的情况看，这个阶段大致从 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一是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这两层含义是不可分割的，必须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否定中国已经走上并且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否定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错误的。

中共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九个方面作出了科学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一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二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三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四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五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六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七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八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九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其中第一条和第九条是这一阶段基本特点和历史任务的总概括，其它七条则是对基本特点和历史任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展开。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 100 年的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途径与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成为我们立论行事的根本依据或出发点。

（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

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思想、观点、方法的具体体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领，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南。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

为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济建设，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四项基本原则，则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政治保证。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失去动力。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统一，是改革开放 20 年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前进的可靠保证。

2.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必须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出发，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做到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富裕幸福。

3.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注意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存在着右和"左"两方面的干扰。所谓右，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动乱。所谓"左"，主要表现为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和"左"的错误倾向都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在实践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既要反右，又要反"左"。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左"是主要的危险。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的重要思想和科学论断。

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市场经济，从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逐步消除了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最终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确认下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为了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为了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种优势既有量的优势，更注重质的提高。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保证，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成败。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企业可以有差别。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公有制实现形式指公有财产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从改革实践中认识到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利用，同一种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不同的所有制也可以有同样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80 年代后，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我国股份制企业的试点逐步扩大，在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同时，我国城乡创建的大量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开始成为城乡小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经济为吸收社会分散资金、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公共积累及国家税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只要找到合适的实现形式，就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够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真正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然，在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过程中，要保持头脑清醒，处理慎重，注意防止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的情况发生，避免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经济基础。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所有制改革突破单一公有制的过程，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要、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国家积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国家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积极鼓励它们健康地发展，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引导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使它们与占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紧密联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将会有力提高我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增强整个经济的活力。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处理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要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要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要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优点，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平衡。同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应该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的。因为市场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及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要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社会总供给量和社会总需求量的平衡是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前提。只有当经济总量平衡时，形成总供给的全部产品和劳务都能实现其价值，体现总需求的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购买力都能实现，国民经济才能顺畅运行。社会总供给中产品和劳务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经济结构平衡，是经济总量平衡的基础。任何总量平衡都是以一定的结构平衡为内容的，只有在经济结构平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避免在某些短线产品供不应求时，又存在着某些长线产品的供过于求。国民经济不可能在经济结构不平衡的情况下健康地发展。国家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在了解和掌握经济发展全局的情况下，依据国民经济变化的趋势和发展的规律性，运用各种调节手段，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协调各方面经济关系，以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地增长。

第三，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必要的行政手段实现宏观调控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由过去的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国家调控的对象是市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运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计划指导来调节国民经济。为了保证宏观调控政策的相互协调和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要在财政、金融、计划之间建立起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同时要建立有权威的调控组织系统和相关制度，以使宏观调控各部门能在统一目标下各司其职、协同运作，增强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可以使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尽可能地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法律手段包括运用规范经济管理、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使各项经济活动能够有序地进行。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行政调控手段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仍有必要，但它的使用范围将随着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完善而日趋缩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经济手段为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体系的总体功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三）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分配上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使按劳分配在所有分配方式中所占比重居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的劳动者按劳分配的收入量是其它所有制形式中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参照标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不限制和否定其它分配方式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发展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创造价值，就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商品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就要求允许各种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有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要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深化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完善代理制，扩大企业外贸经营权，形成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加强引导和监管。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和实施涉外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三、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必然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一）政治建设是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同人民的要求是相符合的，同整个国家的发展要求是相适应的。虽然建国以来，我们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重要历史经验，但目前，党和国家现行的具体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还存在一些弊端，如

政企不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还存在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因此，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就成为极为必要和十分迫切的任务。

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才会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是国家实现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是改革开放 20 年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只注重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会失去政治保证，而且会偏离方向，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也很难进一步深入推进。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的前提。

2. 必须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地包含着实行依法治国，是民主与法制的紧密结合。

3. 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些制度。

4. 必须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5. 必须维护社会稳定，保持政府廉洁高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五个基本原则，是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准绳，也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的重要保证。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任务

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要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这五方面的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切合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要求，也切合解决当前在前进道路上存在的新问题新矛盾的要求。

1. 切实健全民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和要求。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成败。邓小平同志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

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健全民主制度的具体任务，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决策结合起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人民智慧的决策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巩固我们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继续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党团结各界的重要渠道；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加强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此外，还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

2. 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只有形成健全和完备的法制，同时严格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才能有秩序地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教育协调发展。必须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这个原则下，一切政府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一切司法机关都必须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一定社会的法制水平，不仅同立法、执法、司法有密切关系，而且同全体人民法律意识的高低有密切关系。不断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加强法制建设和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

3. 抓紧推进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任务。长期以来，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政企不分，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沉重负担，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问题不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就难以顺利完成，现代化建设也不能更好地进行。因此，必须抓紧进行机构改革，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保证政府机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机构改革是改革的方向，主要任务是：坚决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减少和改组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机构改革，应注重通过法制手段，实现国家机构的组织、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能随意地扩大编制，随意地增设机构。同时还要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4. 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社会主义的民主要求政府尊重广大人民的意愿、按照人民

的利益要求行使人民赋予的一切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完善民主监督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就是要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和规范建设，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有：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

四、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过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同时，我们还要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其根本任务是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加强理想教育，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民族素质，而民族素质的提高要通过个人素质的提高来实现。因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在“四有”当中，有理想最重要。而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有 12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有了共同的理想，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指的也正是理想和信念。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现阶段，我们的阶段性理想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为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任务而共同奋斗，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现阶段的共同理想。这一阶段理想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和每个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结合了起来，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既是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也是各族人民为实现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奋斗。

（二）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全社会形成

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与其它思想道德体系的本质区别所在。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多做实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体现。它既是正确调节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提倡这种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是我们民族和国家具有凝聚力的原因。我们提倡和遵循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既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没有个性、扼杀个性的封建整体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只强调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是有着科学理论指导的、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汲取了世界优秀文明而形成的优良道德的基本原则。

（三）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

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要从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入手，这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既适合各阶层人们思想道德不同层次的需求，又是一个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集中体现和主要内容。

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最强力，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是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指针和最高层次的要求，它渗透于我们提倡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中，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的民族性格。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我们各条战线都涌现了许多为国争光的英雄人物，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焕发出新的光彩。

我们现在提倡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又要消除对祖国妄自菲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欣赏甚至崇拜的现象。要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全社会进一步发扬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良好风尚。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基本原则，它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社会主义为灵魂的。作为一种道德要求，集体主义要求人们在行动中，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标

准，处理好个人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当前尤其要对一些不顾大局，不讲团结，处处以地方小团体利益为重，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谋取地方小团体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同时要教育干部与群众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摆正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讲团结、讲大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分忧解难。

（四）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离不开科学技术；我国要在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必须改革科技体制，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加强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科技成果更快更好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世界范围看，科学技术进步愈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定要正确把握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的趋势，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对社会经济结构、现代化进程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第三篇

21 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第一章　金　融　业

面对越来越开放的金融环境，中国金融业正经历一次革命性的金融改革。一方面，以国有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革，伴随着民间金融机构的发育，境外金融机构的进入以及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化改革，一个竞争性、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趋向成熟；另一方面，在中国加入WTO后，金融的国际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国际金融对中国金融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同时中国金融也努力开拓创新，积极融入国际金融。本章试图从全球视角，从经济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出发，分析当前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基本特点，展望中国金融业未来中长期发展的趋势。

一、金融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上是单一的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大一统”的金融结构，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金融体制。改革开放以后的20余年中，我国金融业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增量到存量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其路径大致可描述为：恢复和分设国家专业银行——建立多元化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市场——专业银行商业化——各种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建立和规范分业制度——强化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业务多样化——国际化发展。2001年后，在加入WTO因素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1. 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我国金融业从此进入全面国际化发展的新时期。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政府承诺：在加入WTO的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办理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办理城乡居民的人民币业务。对外国非寿险公司，4年内允许其向外国和中国客户提供所有企业和个人非寿险服务；成立的中外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限定在50%以内；5年内允许向外国人和中国居民提供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外资可持有基金管理公司部分股权。3年内，允许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外资股权不超过三分之一；5年内外资股权不超过49%，可从事A股承销、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等。

加入WTO后，我国加大了规范国内外金融机构行为的力度。2001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条例》的修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取消设立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域限制和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外汇服务的服务对象限制，取消人民币业务市场准入对外资金融机构设定的业务规模数量指

标，放宽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的中方合作伙伴的限制，增加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有关规定，并统一了本外币的业务范围。二是调整外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外汇存款不得超过其境内外汇总资产的比率，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资金来源与其外汇资金来源挂钩的限定。同时增加规定，外资金融机构调整业务范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10%以上的股东变更、修改章程等重大事宜需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三是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审慎监管的需要，提高注册资本或营运资金的最低限额，并规定其中人民币所占的份额；也可以改变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形式。增加对外资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外资独资财务公司和合资财务公司中的外国出资者，受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和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审批其申请的规定。增加申请设立外资金融机构须满足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审慎性条件的要求。改变外资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外资独资财务公司和合资财务公司对一个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信用集中度的衡量标准，从单独对贷款的要求扩大到授信余额的控制，并明确流动性比例要求。四是规定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资独资财务公司和合资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为实缴资本，统一中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审批程序，要求外资金融机构增开新的业务品种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取消外资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外资独资财务公司和合资财务公司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加储备金之和30%的限制。

新《条例》已于2002年2月1日正式实施。配合新《条例》的实施，人民银行还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细则》是一部具体操作的法规，除了按照《条例》的章节顺序对其进行解释外，还包含了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在华注册的法人金融机构设立分行、外资金融机构解散和清算等内容。2002年6月25日，央行发布了《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进一步对外资金融机构行为加以规范。2002年6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标志着我国证券业的中外合资、合作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2002年11月5日，央行、证监会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QFII），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这一时期，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战略也有很大进展。其中主要是银行业海外业务的拓展。目前，部分银行通过拓展海外业务，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其中以中国银行为首。中国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在亚、欧、澳、非、南美、北美六大洲均设有机构的银行。中国银行是我国唯一一家以国际金融业务为特色的银行，目前共设有559个海外机构，建立了全球布局的金融服务网络。但是除中国银行外，其他商业银行目前在国外建立的分支机构还比较少，海外业务的展开还十分有限，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2.“分业监管制度”得到强化，混业经营出现松动

（1）“分业监管制度”不断强化与完善

2003年3月11日，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重组而成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正

部级事业单位独立设置。新设立的银监会整合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统一监督管理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拟订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法规，负责市场准入和运行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等。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分拆对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发展规范有很多有利之处。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它有利于中央银行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开阔视野，更多地着眼产业部门和实体经济，避免在调整利率和进行货币供应决策时，偏重于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从而有助于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有助于应对中国金融体制格局的变化趋势，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商业银行改革发展，防范金融风险。

这样，加上1992年和1998年分别成立的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形成了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监管架构。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在同一层次上分别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这标志着我国已基本形成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金融分工监管体制，而中国人民银行建国50多年来的集货币政策银行监管于一身的“大一统”时代也告结束。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3年1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于2004年2月1日起实施。该法与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使我国金融“分业制度”得以强化与完善。

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央行相继颁布实施了法律法规，以明确职能，加强监管。如2002年5月28日，央行发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2002年6月1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央行制定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自2002年7月18日起施行。

(2) 在“大分业监管”基本格局下，监管层对部分金融业务的混业经营也开始有所松动

如2002年4月22日，央行就金融机构加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有关事宜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商业银行及其授权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管理的各类基金、保险公司、外资金融机构，以及经金融监管当局批准可投资于债券资产的其他金融机构可加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实行准入备案制，自4月15日起施行；2002年10月29日，央行发布了《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等39家商业银行开办债券结算代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转》，将债券结算代理的对象由中小金融机构扩大到非金融机构法人，此举意味着企业能直接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资金的融通。

但修改过的新银行法为混业留了一定空间。例如，原《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本法施行前，商业银行已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实施办法。”而在新的银行法中，该条款修改为“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

规定的除外”。这就为以后国家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进行调整留下了空间。另外，目前《证券法》修改的准备工作也已做好。《证券法》将来的修改，将参照《商业银行法》有关做法和经验，给混业经营预留空间。

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建立在分工与专业化基础上的金融产业体系，这为金融企业进行业务拓展、实施多元化战略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截至2001年底，我国共有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09家城市商业银行、1049家城市信用社、38057家农村信用社、71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12家融资租赁公司、136家信托投资公司、109家证券公司、13家保险公司和191家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截至2002年6月底，全部金融机构总资产达23.2万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14倍，比1997年增长66%。

3. 金融机构体系呈现多元化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业已经形成了轮廓清晰的多元化机构体系。整体上看，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可分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中央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在内的金融监管层。

第二部分包括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国有独资政策性银行。这一层次金融机构目前看来仍是中国金融主体，资产及交易额均占到总量的60%以上。

第三部分为其他商业银行。这一层面在我国金融领域具有最广泛的覆盖性，其中包括10家全国性商业银行、2家住房储蓄银行、108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2367家农村信用联社、41755户农村信用杜。

第四部分为外资金融机构。至2002年底，已有191家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其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外资独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外国银行分行。

第五部分为现存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这两种机构和商业银行构成了我国商业金融体系的主体。

第六部分为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在央行监管下的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

在这个金融体系中，突出特点是银行业相对发达，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相对落后。我国金融资产的这一构成表明，银行业、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垄断金融市场的格局尚未打破，非银行金融机构有待加快发展速度。

4. 产业融合取得发展

2001年以来，中国金融业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对我国银行业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提供了法律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中国商业银行可以开办的中间业务种类，共列出了25项业务品种，基本上涵盖了目前银行业已经开办的所有中间业务种类，涉及银行与保险、银行与证券、银行与信托、银行与基金等各种交叉金融业务。《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商业银行在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审查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代理证券业务以及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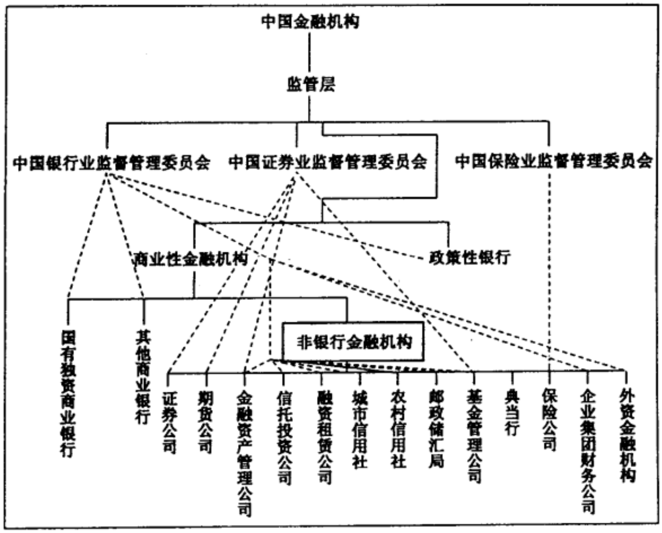


图1－1　我国金融机构总览

注　图中的实线表示自上而下或分类的关系；虚线表示监管的对应关系。

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业务，这是央行在审慎监管条件下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有力支持。

根据有关统计，至2002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中银集团凭借强大的海外业务，总收益约20%来自中间业务；建行实现中间收入43.7亿元，占总收入的12.5%；工行中间业务增长27.75%，实现收入50亿元，约占总收入的5%左右；农行的中间业务提高到了4%。

由于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发展时间不长，而且由于体制、技术、宏观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也存在不少问题：①品种少。以传统服务型中间业务为主。②规模小。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大约占总收入的“半壁江山”，有的高达60%以上。我国2001年四大国有银行最高的才占17%，最低的尚不足4%。中间业务的比重亟待进一步发展提高。③收益低。由于缺乏统一的市场规范与相应的制度约束，各银行在业务营销之初大都低价促销，让利于客户。如部分代收付类、创新类业务的服务实行无偿服务。无序的竞争不仅导致市场混乱，也使商业银行的新业务收益难以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新业务的健康发展。

(2) 银证合作

近几年，随着金融竞争的加剧，金融监管当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放松了对银证合作的限制，促进了我国银证合作的大发展。具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银证转账业务。银证转账业务，一是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股票保证金转账业务。二

是针对券商法人的资金清算业务。

②银证在货币市场领域的合作。一是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拆借市场，二是证券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正式出台《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借款。这开辟了证券公司融资的新渠道。政策施行后，许多银行、证券机构纷纷合作办理该项业务。

③“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业务合作。“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由国外引入的新业务。通过有关业务，不仅改善了金融机构资产状况，也加强了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目前，债权转股权等资产证券化方式已经开展。

④投资基金业务合作。主要是商业银行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2000年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规定，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接受基金管理人的委托，办理开放式基金单位的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这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目前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已成为开放式基金业务的代理人。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目前有75%左右的投资基金是通过商业银行网点销售的，银行网络是投资基金销售的主渠道。在国家采取超常规、创造性推进开放式基金的思路下，我国开放式投资基金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并最终成为证券市场增量资金的主渠道，而商业银行该项业务的空间还很大。

⑤顾问咨询类业务。银行与证券公司在开展业务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掌握大量信息资源，两者在信息交流的基础之上共同发展顾问咨询类业务具有广阔的前景。目前，不少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投资、理财和项目咨询等顾问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在未来金融“分业”格局有所突破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以以财务顾问的身份进一步发展这类业务，包括：协助企业境内外上市；企业的资产重组、并购；项目融资的投资安排与策划等。通过以上业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配合客户战略，带动银行相关业务的发展。

⑥法人结算划拨款与新股发行验资。银行为新股上网发行提供验资服务是指在新股上网发行时，由交易所指定一家银行将所有认购资金集中进行资金到位检验。1998年，按照中国证监会的部署，上海、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全面推行了法人结算制度，多家银行取得法人结算划款银行资格。

整体上看，目前的银证合作业务基本上属于中间业务的范围，大都具有风险低、收益高的特点。规范开展银证合作业务有利于银行减少经营风险、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减轻对存款的过度依赖，逐步突破以往传统业务收入占绝对地位的格局。另外，也有利于商业银行开拓和丰富个人金融服务业务。对于证券机构来说，则增加了融资渠道，并可利用银行的网络来扩大客户范围、提高交易效率。

（3）银保合作

“银行保险”（Bank－assurance）或“保险银行”（Assurance－Bank）等交叉业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多元化经营的业务创新。我国银保合作起步较晚，早期主要业务也只是体现在协议存款、代收代付等传统业务方面。在近几年金融业多元化发展过程中，银行业和保险业在保单质押贷款、信用卡、保险产品销售代理等许多方面建立起

了业务合作关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双方承诺，将在融资和保险代理、证券投资、实业投资等各方面紧密配合，加强支持，积极构建新型、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强各自的市场竞争能力。

(4) 证保合作

由于目前金融资产专用性不断降低，证券业与保险业之间合作机会也越来越多。例如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可以在风险的管理和风险管理系统的设计上进行合作。在美国，为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提供金融安排是投资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实际上，几乎所有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都建立了大型的风险管理部门，这些部门通过集中利用资本市场工具为大型企业的风险管理开发新的产品。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保险业务与证券业务的交叉较为频繁。具体来看，证保合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①"投资连接保险"和"分红险"。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尝到了这种产品创新的"甜头"，2002年寿险分红产品保费收入1121.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49.3%，在新型寿险保费收入中份额更超过90%，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②保险公司资金直接用于证券投资。从国外保险业的发展经验来看，作为组织、分散风险和提供风险保障的信用中介，保险公司必须具备多样化运用保险资金的手段和能力，以保障保险资金这种"救命钱"的安全和收益。相比较而言，证券投资，特别是股票投资，由于其具有较高的长期收益，已经成为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最重要的选择。1999年，为了提高中国保险业的整体偿付能力，监管部门已准许保险资金进入证券投资基金，为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开启了一个窗口，也进一步促进了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

从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保险资金的进入也是不可或缺的，保险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成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这对于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投资机构的多样化具有积极作用。

整体上看，证保合作与其他金融多元化业务相比，目前的"可融合性"不高。首先，就兼业代理和客户资源共享而言，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客户群有很大差别。如证券公司没有商业银行的网点及客户资源优势。另外，客户群体差别很大，银行业务涉及所有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企业的经营活动，而沪、深交易所的全部证券开户数只有8000万左右；其次，银行客户追求稳定收益，资产的安全性及增值性极为重要，这与保险的销售目标相符。而证券公司客户追求高额利润，投机性强，对稳健型的保险产品兴趣不高。同样，保险公司客户亦对风险甚大的证券投资持谨慎态度。

(5) 金融控股集团

金融机构除了业务上进行多元化合作，还可以通过组织层次上的合作实现"双赢"或"多赢"。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禁止金融业混业经营，但是并未明确金融控股集团的法律地位，这就给金融多元化在组织层次上的进行留下了空间。一些金融控股集团模式已初具雏形。著名的有：中国中信控股集团公司、中国光大集团等。中国中信控股集团公司股权关系构架如图1-2所示。

另外，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战略也在实施，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模式、平安模式也搞得有声有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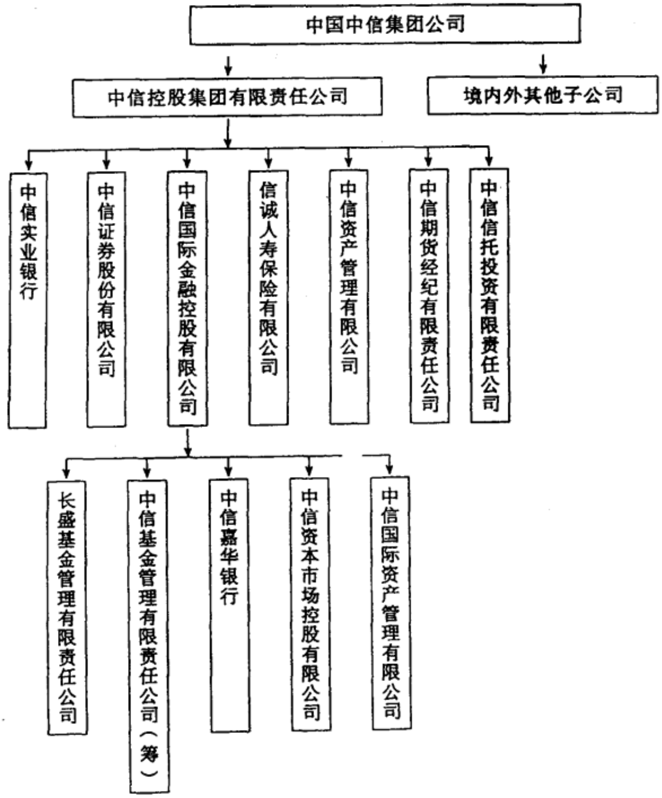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中信控股集团公司股权关系构架

二、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变化

我们选取各项存款（中国人民银行信贷收支统计口径）、国债余额、境内股票市值作为金融资产的代表进行分析。

1. 总量情况

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市值超过 GDP，金融资产扩张速度大于 GDP 增长速度，金融资产总体增长平稳，波动不明显。(见表 1－1 和图 1－3)

表 1-1 境内金融资产情况表

项 目	1997	占比	1998	占比	1999	占比
各项存款	82390	0.78	95698	0.78	108779	0.75
国债余额	5509	0.05	7766	0.06	10542	0.07
股票市价总值	17529	0.17	19506	0.16	26471	0.18
合 计	10542	1	122969	1	145792	1
项 目	2000	占比	2001	占比	2002	占比
各项存款	123804	0.67	143617	0.71	170917	0.75
国债余额	13020	0.07	15618	0.08	19336	0.08
股票市价总量	48091	0.26	43522	0.21	38329	0.17
合 计	184915	1	202757	1	228583	1

说明：各项存款采用中国人民银行信贷收支统计表口径，不含外币。

数据来源：2003年金融年鉴和国研网数据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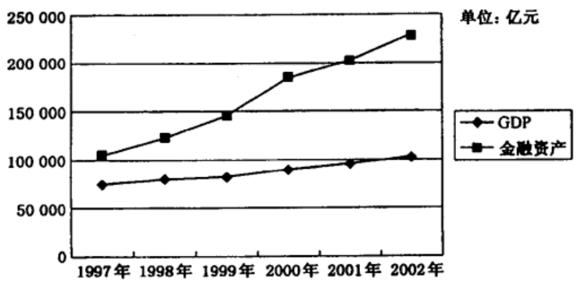


图 1-3 金融资产增加与GDP增加的比较

2. 结构情况

各项存款仍然占70%左右，股价市值在20%上下波动，债券所占比例较小且比较稳定。各项存款与股价市值之间有明显的消长关系。这是由于我们选取的时段在1997—2002年之间，1998—2000年中国股市火爆，入市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存款。2001年以来股市走熊，资金从股市回流到银行，而债市影响不大。（见表1-1、图1-4和图1-5）

3.2000年以来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背离

1992—2000年，市价总值增长与代表宏观经济走向的GDP增长走向基本一致，2000年以来向上势头良好，而市价总值却呈向下俯冲状（见图1-6）。这一方面说明1999年的股市市值过快膨胀透支了未来增长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尚不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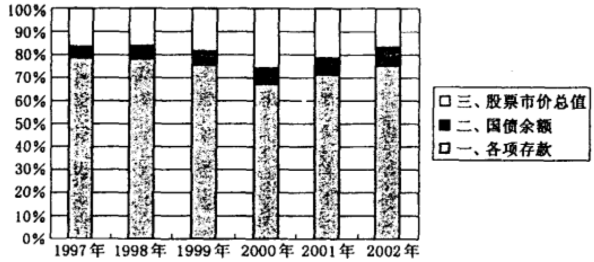


图 1－4　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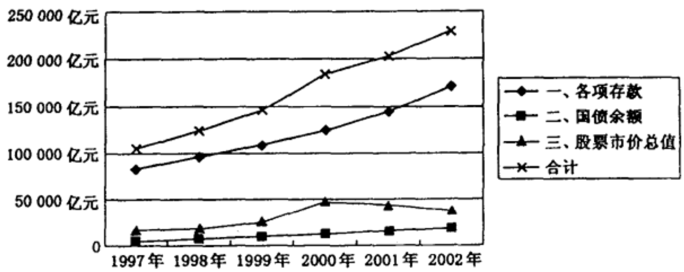


图 1－5　三种金融资产的增加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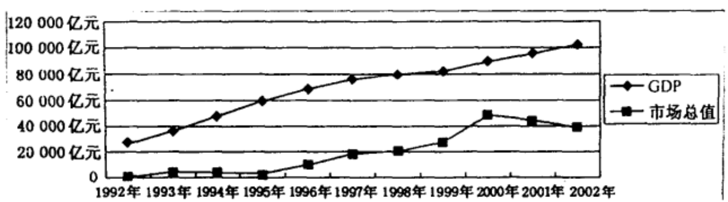


图 1－6　股市总值与 GDP 走势的比较

三、金融业发展前景展望

1. 制度与经济环境

(1) 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立于 1995 年 1 月 1 日，是致力于监督世界贸易和使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其核心是《WTO 协定》，基本职能是实施《WTO 协定》，组织多边贸易谈判以及解决成员国间可能产生的贸易争端和审议各成

员的贸易政策。其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根据加入WTO的承诺，我们必须置身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安排金融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取向。

（2）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逆转

回顾这几年市场物价变动情况，199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2.8%，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0.8%、1.4%，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上涨0.4%、0.7%，2002年下降0.8%，2003年上涨1.2%，2004年一季度的涨幅与1997年水平基本相当，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但第二季度超过了5%的警戒线，达到5.3%，引起高度关注。由于受2003年“非典”影响，基数较低，加之2004年上半年CPI上涨主要由粮食、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2004年第三、第四季度CPI回落，全年消费价格上涨比较温和，继续处于可控范围。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供应紧张，通胀压力加大。金融业要把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脉搏，适时进退，维护自身的稳定健康发展，防范风险积聚。

（3）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发展与调整并举

能源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严重滞后的缺陷。未来一二十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有实质性推进,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受到高负债经济的巨大制约,必须以流动的资本经济结构替代呆滞的负债经济结构,通过资本流动重组,建立企业现代治理结构和创新机制,进而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高负债经济结构向流动性资本经济结构的转变,必然要求纠正债务融资与资本融资的不平衡性,提高资本融资比重。

（4）间接金融资源剩余和外汇储备急剧增多

1996—1999年连续7次降息，间接金融资源相对剩余大量出现，既反映出直接金融短缺，也表明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激励机制缺损与外在约束强化的不对称性。必须调整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配置格局，重建金融企业治理结构。2003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多，2004年超过5000亿美元。为降低外汇占款成本，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外贸、外汇政策必将作出调整。

（5）非公有经济成分上升

新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必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未来几十年是非国有经济成分进一步提升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国有金融、股份制金融、合作金融及政策性金融配置格局需要作出调整。

2. 金融信息化

所谓金融信息化是指在金融领域全面发展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创新智能技术工具更新改造和装备金融业，使金融活动的结构框架重心从物理性空间向信息性空间转变的过程。在产业信息化以至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基础上，金融信息化将对金融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力地推进金融发展的历史进程。

（1）金融信息化对货币形态及其职能的影响

数字化形态的网络货币与黄金和纸币以其称量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尺度不同，它是作为一种更为抽象的货币形态来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因此，网络货币具有可以计量商品

价格的价格标准功能，用以实现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数字化货币发挥价值尺度功能使得货币的本质得以更清晰的体现。网络货币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货币形态，因此其储藏也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所有者依赖密码掌握其支配权，实际的网络货币传输过程通常经过公匙或私匙加密系统以保证只有真正的所有者才可以使用。由于网络货币只是电脑数据库中的一种记载，因此，其储藏费用很低。但与黄金等硬通货可以通过“窖藏”来独立实现储藏职能不同，网络货币的储藏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依赖中介机构才能完成，并且容易受到计算机、网络薄弱环节以及计算机犯罪等问题的影响。

(2) 金融信息化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一是带来金融机构形态的虚拟化。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是通过遍布各地的众多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开展业务的，而金融信息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得金融机构日益虚拟化。所谓虚拟化是指金融机构日益通过网络化的虚拟方式在线开展业务，其客户直接在办公室、家里甚至旅行途中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类服务，因此金融机构不再需要大量的有形营业场所和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在银行业，一方面，传统银行等正在通过“上网工程”等努力实现在线式服务，并逐步压缩传统有形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全新的网络银行正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及其终端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而根本不需设立有形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1995 年 10 月 18 日，世界上第一家没有传统银行经营网点的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在美国诞生，它创立的全部费用仅为 100 万美元，只相当于传统银行开办一个小分支机构的费用，其经营成本也远远低于传统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的诞生与发展标志着随信息化发展起来的没有传统有形银行与之相对应的虚拟化银行的开端，预示了金融机构形态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是促进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的转变。金融信息化导致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支付与结算、资金融通与转移、风险管理、信息查询等银行基本功能的实现方式。金融机构将传统的专用信息网络拓展到公共网络、电子货币、网络货币等数字化货币的应用使得传统以支票和现金为主的支付结算、资金转移方式正在向无纸化、无现金的方式转化，诸如各种信用卡、数字钱包的广泛应用；实时在线网络金融服务系统能为客户提供全时空、个性化、安全而快捷的金融服务；基于信息技术的各种金融风险管理决策系统如自动授信系统、风险集成测量系统等正在取代传统落后的风险管理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也在加快。

适应经营方式的变化，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在银行业，建立在传统银行经营模式基础上的组织形式——基于分支行的组织结构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经营方式，围绕客户的金融消费行为和需求，传统银行正进行新的结构设计，借助于信息技术重构其组织形式。结构设计的核心在于方便客户与银行的全面接触，不仅包括对自己账户信息的接触，也包括对银行提供的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接触。而新兴的网络银行则几乎完全摆脱了传统银行的组织结构，几乎找不到传统银行的结构特征。总之，金融信息化将金融机构从最初简单提高金融业务的自动化程度，发展到对金融业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改变。

(3) 金融信息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是促进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信息网络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日益联结成一个统一整体，金融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为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它大大提高了金融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和发布的能力，成为金融市场交易物质和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互联网络已经日益成为世界金融市场运作的中枢神经系统，低成本的网络交易将逐步替代传统的交易方式，与世界各地分别进行的交易所传统交易相比，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交易所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行非场地联网交易，使投资者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上网同步进行金融交易，完全打破了时间、空间限制，全球金融市场被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金融信息化正在打破长达200余年的传统证券交易所格局，未来的证券交易所将通过信息通讯网络、金融网站、网上经纪商等机构结成联盟，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信息及交易网站，以支援不同市场参与者的投资业务。因此，金融信息化的发展使整个世界正在形成一个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联系在一起的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

二是加速国际资本流动。由于信息网络技术促进了全球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国际资本流动的空间屏障被打开，信息化交易技术使得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也扩大了资金流动的总量，全球金融网络上跨国银行业务、国际证券交易、外汇交易急剧增长。目前，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额在1.5万亿美元左右，债务性融资规模也超过了1.5万亿美元，透过国际金融网络游弋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期游资达到7.2万亿美元。金融信息化促进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4) 金融信息化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影响

信息网络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电子货币、网络货币的出现使得货币的流通速度较之传统货币大大加快。根据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的需求量为：$M = PT/V$。数字货币的使用以及网络结算方式的普及使得人们往返于银行的费用降低，于是人们会选择增加存款和换取现金的次数，这必然带来现金需求余额的下降。

金融信息化推动的金融创新直接影响着对货币的定义，金融创新产品使得货币组成发生着变化。从中央银行传统上调节基础货币的三大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率、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看，信息科技使得金融机构对三大政策工具的反应也将发生变化。

3. 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在以交易主体为代表的活动因素、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因素、以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为代表的制度因素、以贸易和投资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因素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下，资本为追求最大回报在全球范围的流动、配置过程。其特征有金融活动的全球化、金融机构的全球设置、国际金融规则的统一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多元化和更有效率的资本流动对于提高资源在全球配置的效率，对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各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伴随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金融的动荡已经成为常态，使得世界各国都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之中。金融全球化既包含国内

金融业的走出国门，也包含国内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由于后者对国内经济影响更大，我们在下面作重点分析。

(1) 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业的正面效应

主要有：一是外向型发展效应。加入 WTO 使中国获得平等的对外经济规则，必然推动中国外向型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加入 WTO 还将直接推动服装和纺织品出口以及农业贸易量的增加。两项综合考虑，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出口量占全球比重将由 2000 年的 3.7%提高到 2005 年的 7.3%，进口量将由 2000 年的 3.4%增加到 2005 年的 7.2%。对外贸易量的扩大，必然对与外贸有关的金融服务提出新的需求。中国银行已经在全球各主要金融中心建立了分行和代表处。到 2004 年 4 月，中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已达 550 个，分布在全球 27 个国家和地区。其他商业银行也积极申请拓展海外业务，尽管步履维艰，海外分支机构数量还是不断增加。

二是金融制度创新效应。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国内金融机构的走出，总体上将促进一国金融素质的提高。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也会因对外开放而加快，中国金融业将更快地获得一个自主的良好发展环境。2001 年以来中国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除了因为扩大内需，任务紧迫之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加入 WTO。最近几年，为履行加入 WTO 的承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继续加快，尤其是商业银行业，将在 2006 年全面放开业务和地区限制，实现国民待遇。国内金融机构也在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内控与风险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加快向现代金融制度转轨。

三是金融技术转移效应。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我国可以根据 GATS 第 4 条“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要求发达国家在银行服务的商业性技术、信息网络上给予更多的帮助获得益处。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也会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专业技术、营销方式、优质产品及售后服务，通过示范效应、人才流动、业务交流等方式促进国内金融企业学习跟进，主动走出国门，直接融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环境中，迫使自己去适应，除了学会一些用标准信息传递的技术、经验外，还会学习到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四是国际化经营效应。对外开放从来都是两面的，不仅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加入 WTO 之后，按照对等的原则，中资银行可以较容易地得到签约国的市场准入资格；另一方面，国内监管当局也会放宽对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置机构和开展开外业务的限制。这样，目前阻碍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两大制度，障碍均将被突破，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将迅速增加，这将给中国银行业推行海外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业务机会。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步伐也在加快。同时国外的企业和国内的外资企业也能进入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这些为国内的证券业提供丰富的业务来源。

(2) 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业的负面效应

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全球化使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足不可避免的。

二是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

三是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在巨量资金的支撑下，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飙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目前的中国与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时的日本处境有相似之处，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国际游资通过种种渠道进入中国赌人民币升值，房市、期市等已有过热苗头。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避免出现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过热和90年代以来的过冷。

四是金融全球化给中国金融监管和调控带来严峻挑战。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出于获利的需要，国际上许多金融资源被无序、过度开发，金融投机性凸显。加之现代金融交易工具发展迅速，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其去向不确定性很大。这既给中国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将削弱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五是由于金融全球化规则多由发达国家制定，在金融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

4. 金融集团全能化

金融集团全能化，是指在一个金融集团内部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等多个具有法人地位的子公司，每个子公司是专门化经营，整个集团全能化经营。

(1) 混业经营的动因

一是范围经济。混业经营条件下，银行可以利用在提供一种服务时获得的信用向客户推荐它的其他服务，将与某一客户关系的固定成本（物力与人力）分摊到更加广泛的产品上，降低业务开发和推广成本。例如银行的一个网点，可以同时销售证券、基金、保险等不同金融服务产品，这就大大地降低了成本，比分别设立网点要节省许多人力和设立网点的费用。同时也节省购买者的研究和监督成本。

二是分散风险。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实现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可有效地分散风险，使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趋于稳定。就整个金融体系而言，要求分业经营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商业银行进入证券承销领域，危及商业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但美国White研究报告表明，证券附属机构的盈利要高于银行的盈利，并且证券附属机构债券对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影响。

三是协同效应。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收购、兼并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具有巨大的协同效应的优势。比如花旗银行在商业银行业务领域拥有广大客户群，有3000个分支机构。而旅行者集团可以利用这些分支机构推销各种基金、人寿保险、物业保险等金融服务产品；反过来花旗银行也可以利用旅行者集团的客户推销消费贷款、信托、外汇买卖、债券等金融产品。这种协同效益是非常明显而巨大的。

四是业务多元化。企业与个人资产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伴随民众资产的多元化，迫切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利率水平的不断降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多种投资工具的增加，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取储蓄资产的银行利息。客户对金融商品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且大多是综合性需求：客户需要存贷款、结算等金融商品，也需要买保险、基金、债券和炒股票及使用信用卡。客户希望的是获得“一站式”全金融服务，即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能得到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就如同在“金融超市”选购金融商品。而这一切，在分业经营下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五是金融创新向资本市场为主转变。从金融的发展轨迹来看，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新金融商品的开发和需求的创造，将使证券市场的功能日趋凸现，而银行的作用则趋于萎缩。我国银行业同样面临金融脱媒这一问题，银行业已进入一个充满竞争的买方市场环境，利润率下降，现实迫使银行进行金融创新以进军资本市场。这表明制度上的冲突已经出现。改革开放后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尤其是近年来资本市场呈加速发展态势，资本市场规模和品种不断扩大，证券资产比例在提高，银行储蓄比例则相对下降，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市场格局将会形成，对以经营货币为主的银行将带来严重挑战，如果银行不能及时调整战略，无疑将陷入被动。

六是金融全球化竞争需要。加入WTO是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外在动力。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应服从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六项基本原则和金融服务协议，中国金融将进一步嵌入国际金融体系，按照WTO制订的规则进行经济和金融活动。外资金融机构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模式，而且我国现行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亦允许外资银行从事外币投资业务。全能型外资银行或金融集团将同时向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申请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牌照，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使中资银行效益状况更趋恶化。因此，国内许多现有的管制或规定将被强行突破，而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将首当其冲。

(2) 金融集团全能化是我国金融业的未来趋势

我们认为“混业经营是金融业的大势所趋”指的是混业的第二层含义，即金融控股权的混业。第一种混业在我国风险太大，且银行经营管理者素质太差，无法进行有效的自律性监管。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才刚刚确立，预计5至10年内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既要满足上面我们分析的混业经营的动因要求，又要符合现行监管体制；集团式全能化便成为我国金融业混业发展的现实选择。一方面，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实现金融控股公司不同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可以增强我国加入WTO后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控股公司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它

通过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非金融子公司的股权控制和对各子公司进行资本调度，并通过制定各种长期发展规划来实现各子公司间在资金、业务和技术上的合作，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获得混业经营的正面效应。

另一方面，发展金融控股公司不会对我国现有的金融有效监管产生冲击，是与我国现阶段金融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框架下，各子公司所从事的金融业务是单一的，如银行子公司经营存贷业务，证券子公司经营证券业务，保险子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各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有各自的财务报表，和完全的混业经营相比，各监管部门可以更清楚、更明确地对各个子公司进行监管，不会对我国金融业的有效监管产生冲击，这就是说，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框架下，原来的分业监管仍然有效，这更有利于监管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市场的完善。

(3) 金融集团全能化的实现途径

新设进入战略。采用这种模式的金融机构，需要建立独立的子公司。例如，保险公司建立新的银行和储蓄机构开展存贷款业务；银行通过建立保险经纪公司或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业务。采用这种进入战略可以直接设计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不会受到现有公司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品牌价值的影响。但是，这种战略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由于公司没有合作伙伴，开展新的金融服务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诀窍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培育才能获得，因此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

并购进入模式。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与现有一家或多家金融机构合并，开展非核心金融业务。兼并收购的市场进入模式的优势在于：购并双方能够沿着确定的综合银行发展轨迹，进一步开拓市场。如果是收购性合并，那么母公司有权制定经营政策。

当需要快速进入目标金融领域时,这种进入模式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一是从一开始就可以获得开展新的金融业务所必须的金融技术和知识技巧。为实施这一战略,要求潜在的联盟伙伴必须具有本金融机构从事多元化经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二是如果子公司在市场上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品牌形象,合并后的母公司就可以获得这笔无形资产。

这种市场进入方式很受金融机构青睐，许多大型金融多元化集团都是通过一系列跨行业、跨科技、跨国界的兼并收购活动逐渐形成的。这种兼并收购活动结果就是：金融资本进一步向大型多元化金融集团集中，并形成了许多在全球金融体系具有重要影响的“金融巨无霸”。在这些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已经不再是集团收入的主要来源，代之而起的是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部门、基金管理部门、咨询服务支付和经纪业务等。

这一进入模式的缺点是，在市场上难以寻找完全满足条件的合作伙伴，而且这种购并往往需要支付巨额的成本，同时，合并双方在合并后的金融机构中的管理权力划分、企业文化的整合等方面的关联与互动较第一种模式更为复杂。例如，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后采用“双巨头”管理方式，从合并后的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到各主要部门的经理都是由原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共同担任的，由于双方为争夺领导权进行的斗争导致合并后集团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影响了金融产品的交叉销售，也影响了公司互联网战略的实施。

第二章　物　流　业

21世纪，物流产业正成为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动力、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新兴产业。近年来，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已经产生巨大的货物流量，同时也带来一个巨大的潜在物流市场。据统计，我国70%的物流服务提供商在过去的3年中，年均业务增幅都高达30%。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现代物流的涵义和范围有了极大的拓展和延伸，成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中国物流产业作为近几年新兴发展起来的产业，越来越显示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巨大效能。2004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与物流相关的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增长，GDP增幅超过9%，全社会物流总额达38万亿元，增幅在30%左右，社会物流增加值增长8.4%左右，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左右。物流企业和企业物流都有较大发展，为物流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技术与装备、物流信息与咨询、物流地产等相关的产业和企业也取得了较快的增长。区域物流发展迅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物流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带动和促进了我国物流的发展。虽然我国目前物流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比较低，但在加入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兴起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视等积极因素推动下，我国物流业将进入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物流业发展现状

1. 物流业的增长明显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

国内外物流发展的经验表明，物流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约10%，2003年GDP增幅达到8.5%，从而构成了强大的物流需求。统计测算表明，自1991年至2002年，反映物流需求规模的全社会物流总值从3万亿元上升到23.3万亿元，增长了6.7倍，年均以20.4%的速度递增，大大高于同期GDP（按现价计算15.4%）的年均增速。2003年，全国社会物流总值达295437亿元，同比增长27.5%（按现价计算），明显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见表2-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值为249570亿元，同比增长26.8%；农产品物流总值为11261亿元，同比增长2.5%；进口货物物流总值为34193亿元，同比增长40%；再生资源物流总值为278亿元，同比增长18.3%；邮政物流总值为136亿元，同比增长3.2%（见图2-1）。2004年，我国GDP增幅超过9%，全社会物流总额达38万亿元，增幅在30%左右。1991年至2002年，我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从5182亿元扩张到2.2万亿元，增长了3.2倍，年均递增14%，

高于经济年均增速4个百分点左右。

表2－1　　入世以来我国物流业与GLP增长比较

年　份	GDP增长	社会物流货物总值增长	社会物流增加值增长	每单位GDP的物流需求系数
2001年	7.5	14	3.9	1:2.03
2002年	8.3	19.6	7.5	1:2.27
2003年	9.1	27.5	10.5	1:2.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3，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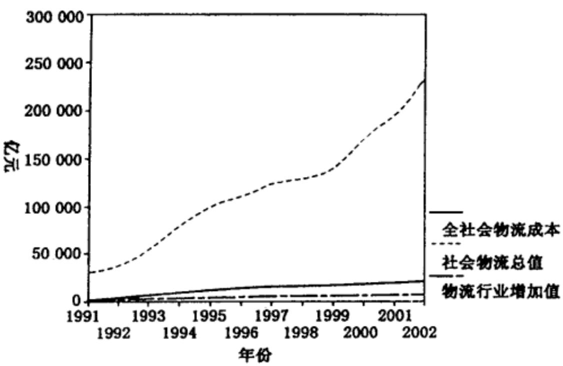


图2－1　1991年—2002年全社会物流成本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2003年中国物流发展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从统计测算的结果看，自1991年至2002年，我国物流产业增加值从2257亿元上升到7133亿元，增长了2倍多，年均递增11%，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约1个百分点左右。物流增加值的增幅高于国民经济增长水平，说明我国物流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专业化物流正在加快发展。2003年，国内物流业实现增加值为7880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交通运输物流业增加值为2953亿元，同比增长12.6%；仓储物流业增加值为90亿元，同比增长9.1%；批发物流业增加值为4530亿元，同比增长9.1%；配送、流通加工、包装物流业的增加值为243亿元，同比增长16.3%；邮政物流业增加值为63亿元，同比下降3.1%。其中发展最快的是配送、加工、包装物流业，12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17.6%，其次是仓储物流业，平均增速为16%，批发物流业为13.4%，邮政物流业为12.7%，交通运输物流业为8.6%（见图2－2）。从物流业增加值与GDP

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等的发展关系看，2003年物流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比同期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分别快出1.4和3.8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物流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专业化物流正在加快发展。物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物流业增加值占同期GDP比重为6.8%，比2002年的比例下降0.2个百分点，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0.9%，比2002年的比例上升0.2个百分点。近几年来，物流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基本维持在20%以上水平，已经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稳定因素。从物流业增加值的细分类情况看，配送、流通加工、包装物流业的服务业务量虽然规模还不大，但发展十分迅速，代表了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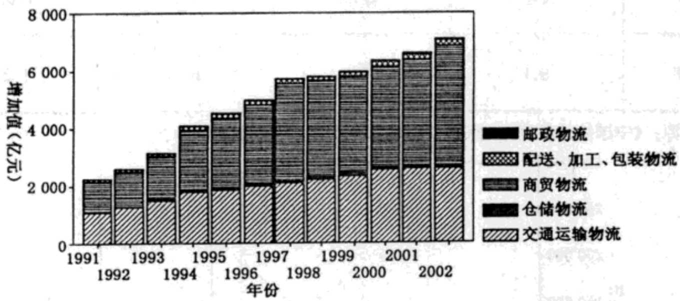


图2－2 1991年—2002年物流行业增加值堆栈图

资料来源：同图2－1。

2. 物流需求弹性逐年增高，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上升从经济发展与物流需求的关系看，1991年—2002年每亿元GDP带动的物流需求平均为1.73亿元。“八五”期间平均为1.57亿元；“九五”期间上升到1.71亿元；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2.03亿元和2.27亿元，2003年升至2.6亿元。物流需求弹性系数12年间的平均值为1.4，“八五”时期平：均为1.26，“九五”时期平均为1.35，当前约在2左右，这说明我国国民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物流总值增长2个百分点（见图2－3）。这些数据均呈上升趋势，反映出我国的物流需求伴随经济增长是同步发展的。也说明经济发展对物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据估计，“八五”时期以来，物流产业对GDP总量的平均贡献为8.1%，拉动GDP年均增长率约0.8个百分点。2003年中国内地社会物流总值近3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高于同期GDP增速约2倍；每一单位GDP的物流需求系数扩大到1:2.5（1991年该系数为1:1.4）。

3. 物流成本占GDP比重逐渐下降，但总体水平依然偏高

物流业越发展，物流效能越高，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例就越低，物流业水平的高低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由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信息平台和比较发达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组成的社会化物流服务体系，现代物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据专家统计；美国20年前物流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4.4%，2000年降为10.1%，物流产业的规模已达到1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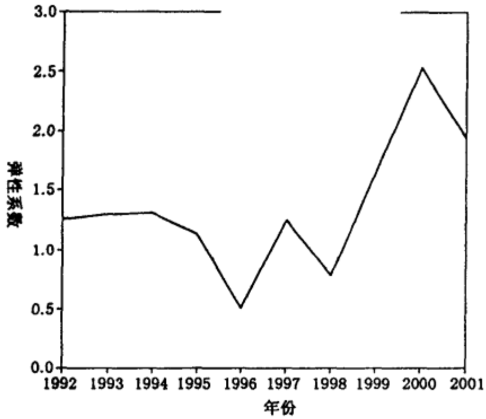


图2-3 1991年—2002年物流需求弹性系数

资料来源：同图2-1。

亿美元。2000年美国，物流产业总规模为9500亿美元，几乎为高新技术产业的2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日本物流产业总规模约为35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1.4%。在中国香港地区，物流产业总规模24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7%（见表2-2）。

当前我国物流成本占GDP比例较高，下降也较为缓慢，反映出我国物流效益整体水平仍然较低。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0%左右水平。与世界上有关国家物流成本比较，大约相差8至1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运行的物流成本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物流领域的管理水平和效率还比较低，但同时也说明我国物流成本的节约空间还非常大，降低我国物流成本的空间很大。根据计算，如果我国物流成本降低1个百分点，就可以节约894亿元人民币；如果我国物流成本与世界上的平均成本基本持平，即降低约9个百分点，则可节约物流成本8046亿元。这一数字约是当年新增GDP的八成，相当可观。从1991年至2002年，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缓慢下降，从24%下降到21.5%，2003年缩小到21.4%。特别是占社会物流总值的比例下降趋势明显，目前已经由1991年的17.1%下降到2002年的9.5%，平均每年下降约0.7个百分点（见图2-4）。但物流成本总体水平仍然偏高，与美国、日本、欧盟国家比要高出8至10个百分点。

表 2－2　　东亚物流成本占其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重

国家和地区	GDP（十亿美金）	物流成本（十亿美金）	占 GDP 比重
中国台湾	308	40	13.1
中国大陆	4250	718	16.9
新加坡	85	12	13.9
中国香港	175	24	13.7
日　本	3080	351	11.4
美　国	8083	849	10.5
英　国	1242	125	10.1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Washington D.C. IMF，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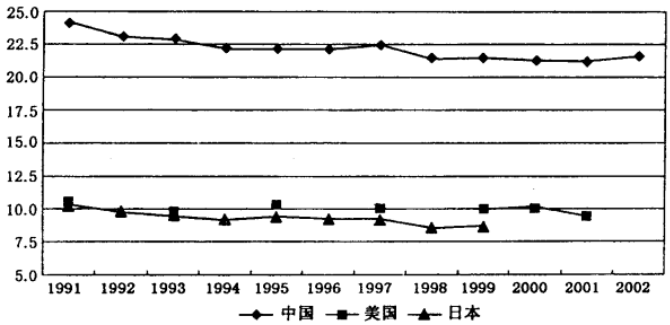


图 2－4　全社会物流成本占 GDP 的比例

资料来源：同图 2－1。

4. 物流成本中运输、保管成本比重较高，管理成本增长最快

首先，从我国物流成本的构成上看，运输、保管成本所占比例较高，20 世纪 90 年代平均比例分别达到 52.6%和 31.8%，管理成本占 15.6%。2003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成本为 24974 亿元，同比增长 13.6%，较同期物流总值 27.5%的增长速度低 13.9 个百分点。其中：运输成本为 14028 亿元，同比增长 15.1%；保管成本为 7376 亿元，同比增长 15.1%；管理成本为 3570 亿元，同比增长 7.3%。2003 年物流成本构成比重为：运输、保管成本占 49.3%和 18.4%，管理成本占 3.41%。而 2000 年美国和日本的物流构成比重的平均水平分别是：37.5%、25%、8%和 42.3%、13.2%、9%。其次，从增长趋势来看，管理成本增长最快，2002 年比 1991 年增长了 5 倍，年均递增 17.7%；保管成本增长了 3.5 倍，年均递增 14.6%；运输成本增长 2.7 倍，年均递增 12.6%（见图 2－5）。由此可见，运输成本、保管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较高，是我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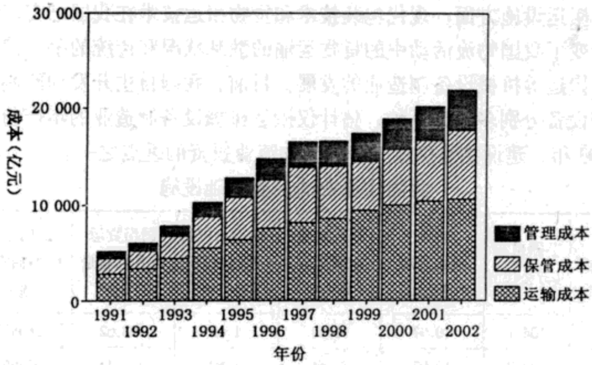


图 2-5　1991 年—2002 年全社会物流成本堆栈图

资料来源：同图 2-10

5. 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物流条件获得明显改善

统计数据表明，自 1991 年至 2002 年，国有物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从 325.8 亿元上升到 3568.3 亿元，增长了 10 倍，年均递增速度达到 24.3%，快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4 个百分点。2003 年，国内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5594 亿元，同比增长 11.3%，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3.1%，占同期全社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1.1%。其中：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4861，亿元，同比增长 9.5%；仓储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161 亿元。同比增长 31.7%；批发业；物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510 亿元，同比增长 25.1%；配送、加工、包装物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23 亿元，同比增长 46.3%；邮政业物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38 亿元，同比下降 4.6%。与全社会投，资增，长情况比较，物流业投资增长速度比同期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低 17.1 个百分点，比同期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低了近 13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物流业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这是我国物流效率相对较低、物流成本依然偏大的重要原因。货运总量略有增加，货物周转量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03 年，不包括管道运输业务在内的全国货运总量为 150 亿吨，同比增长 3.8%。此外，由于物流产业发展迅速，物流用设备需求旺盛，国内生产量急剧增加。2004 年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左右。

目前，我国已经在交通运输、仓储设施、信息通讯、货物包装与搬运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见表 2-3）。在储运设施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由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 5 个部分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运输线路和场站肄设方面以及运输车辆及装备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除运输部门的货运枢纽和场站等仓储设施外，我国商业、物资、外贸、粮食、军队等行业中的仓储设施相对集中，近年来发展比较迅速，年投资规模出现了快速增长趋势。

在包装与搬运设施方面，现代包装技术和货物搬运技术在我国已有广泛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物流活动中的货物运输的散乱状况和传统的手工搬运方式，并且带动了包装、搬运等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自主开发和研制的各种包装设备和搬运机械设备分别多达数百种，估计仅搬运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年产值约为400亿—500亿元。2003年，建设物流信息平台成为物流业投资的重点之一。

表2-3　　我国物流业的主要基础设施

年度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公路里程（万公里）	内河航道里程（万公里）	民用航空航线里程（万公里）	输油（气）管道里程（万公里）	民用货运汽车拥有量（万辆）	民用运输船舶拥有量（艘）	铁路货车拥有量（辆）
1991	5.78	104.1	10.97	55.91	1.62	398.62	385537	370054
1992	5.81	105.7	10.97	83.66	1.59	441.45	373568	373233
1993	5.86	108.4	11.02	96.08	1.64	501	372481	390097
1994	5.9	111.8	11.1	104.56	1.68	560.33	353385	415919
1995	6.26	115.7	11.1	112.9	1.72	585.43	364968	432731
1996	6.49	118.6	11.08	116.65	1.93	575.03	326007	443893
1997	6.6	122.6	10.98	142.5	2.04	601.23	265797	437686
1998	6.64	127.9	11.03	150.58	2.31	627.89	260208	439326
1999	6.74	135.2	11.65	152.22	2.49	676.95	242043	436236
2000	6.87	140.3	11.93	150.29	2.47	716.32	229676	443902
2001	7.01	169.8	12.15	155.36	2.76	765.24	210786	453620
2002	7.19	176.5	12.16	163.77	2.98	812.22	202977	459017
年均增长率%	2	5	1	10.3	5.7	6.7	—	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信息通讯方面，目前我国已拥有电信网络干线光缆超过30万公里，并已基本形成以光缆为主体，以数字微波和卫星通讯为辅助手段的大容量数字干线传输网络，其覆盖范围包括全国地市以上城市和90%的县级市及大部分乡镇，并与世界主要国际信息网络连通。此外EDI、ERP、MRP、GPS等一些围绕物流信息交流、管理和控制方面的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物流信息管理的水平，促进了物流效率的提高。

6. 物流业呈现企业多元化、服务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我国物流企业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国际物流企业，这些国际物流公司一方面为其原有的客户如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延伸物流服务，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市场正在生成和发展的专业化物流服务需求提供服务；二是由传统运输、储运及批发贸易企业转变形成的物流企业，它们依托原有的物流业务基础和在客户、设施、经营网络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不断拓展和延伸其物流服务，逐步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化；三是新兴的专业

化物流企业，这些企业依靠灵活的竞争策略和对专业化物流的认识，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较快，成为我国物流产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

表2-4给出了我国已经上市的26户物流企业的行业分布，26家上市物流企业中可以区分为9个子行业，平均每个子行业中拥有的上市公司不到3家，而且只有3家能够提供物流综合性服务业务，多数上市物流公司服务内容单一，仍然属于“类物流”企业的范畴，缺乏综合的现代物流社会化能力。目前，进军物流业的上市公司主要来自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和制造行业。从各上市公司从事物流活动的内容来看，几乎涵盖了仓储、运输、配送、包装加工、代理、信息服务等物流全过程。有分析指出，由于各行业上市公司的优势领域不同，其物流活动的侧重点又呈现出明显的行业特点：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主要是应外部客户要求而提供的第三方物流，提供服务侧重于仓储、城市间配送和实时信息；商贸行业上市公司经营活动多局限于城市内，发展物流主要是满足企业自身实行连锁经营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需要，因此物流活动的内容主要以城市内或城市间短途配送为主；制造业上市公司市场范围遍及全国甚至全球，其物流活动的目的更多是健全企业营销网络、降低库存。

表2-4　　　　我国上市的现代物流社会化公司行业分布

公司种类	仓储类	管道运输类	物流关联企业	铁路运输类	空运类	汽车运输类	综合类	水运类	港口类
个数	1	1	2	2	2	3	3	5	7

资料来源：根据2004年上市公司数据整理而成。

当前我国物流的执行主体依然是以企业自身和供应商为主（见表2-5）。但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企业对物流领域中存在的“第三利润源泉”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降低物流成本成为目前多数国内企业最为强烈的愿望和要求。据中国仓储协会对全国450家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45%的企业将在未来一两年内选择新的物流商，其中75%的企业将选择新型的物流企业，而不是原来的仓储运输企业，并且60%的企业将把所有的综合物流业务外包给新型的物流企业，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市场需求相当可观。

表2-5　　　　我国各类物溏执行主体分布（%）

物流形态＼执行主体	供货方	企业自理	第三方	混　合
生产企业原材料物流	71	8	21	
生产企业成品物流		43	21	36
商业企业物流	74	13	13	

资料来源：广州市社科院：《物流业研究文摘汇编》，2002年6月。

从全国来看，输送服务（包括干线运输和配送）是企业首要的物流需求，其次是仓储服务，包括租用仓库和仓储管理（见图2-6）。同时，专业化的物流服务需求已经出

现且发展势头极为迅速。其中在中国从事生产、销售及采购活动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优势企业对专业化物流服务的需求发展迅速，成为带动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市场基础。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形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方面围绕货运代理、商业配送、多式联运、社会化储运服务。流通加工等物流职能和环节的专业化物流服务发展比较迅速；另一方面是系缔化物梳服务或全程物流服务，即由物流企业为生产、流通企业提供从物流方案设计到全程流程的组织与实施的物流服务正在起步。二些新兴的经济领域，如私营企业、快速服务行业以及电子商务领域等；也产生和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物流服务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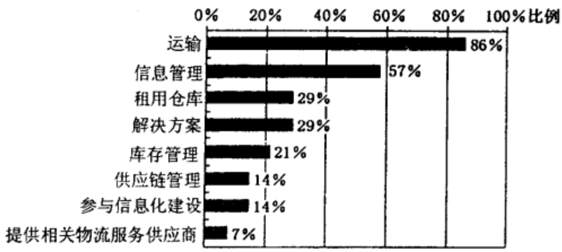


图 2－6　客户需求的物流服务

数据来源：中国仓储协会：《第三次物流市场调查》2001 年。

7. 全国已形成三大区域性物流网格局

世界上所有物流都以城市为中心，但并不是所有城市的物流是一样的，一个城市物流的地位与其经济地位和交通地位相适应。从南到北，台湾、香港、广州、深圳、上海、宁波、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兰州、青岛、天津、北京、沈阳、大连等地都是中国物流重镇。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呈区域型发展态势，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都已形成城市集群、产业集群、港口集群，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但中国中西部是资源基地，以武汉、郑州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部地区都在．崛起，物流业将与此相适应。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沿海大城市群为中心的三大区域性物流圈格局：（1）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和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物流圈；（2）以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物流圈；（3）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物流圈。这三大物流圈占据了中国大陆物流系统的主要市场，目前中国物流市场的近 80% 的收益都来自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1）长江三角洲物流

20 世纪末长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最密集的物流运输管道和物流交易平台。2002 年末上海通往江苏、浙江两省的快速通道增至 7 条；上海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开工；长江口深水航道工程一期验收、二期开工；上海外高桥四期集装箱运营；南京港和苏州港配套设施和一关三检等物流服务逐步改善；上海“大通关”工程

的正式实施；上海陆上货物交易中心的成立；江苏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建设项目通过专家评审等等。从 2001 年上海市完成《上海“十五”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划》以来，长江三角洲各地区在 2002 年也陆续完成了自己的物流规划，并开始进人实质性操作阶段。而其中上海作为国际物流中心的框架已初步显现。在航空方面，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成亚太航空枢纽的战略开始实施；在海上航运方面，2002 年上海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861.3 万标准箱，增速超过 35%，洋山深水港的建设将促进上海向国际航运中心的迈进；在陆上交通方面，上海市市内及辐射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高速公路网已基本建成；在物流信息方面，随着“大通关”工程的推广应用和公路地理信息系统的规划开发，上海市城市物流信息系统的主框架初步达成。此外，WTO 带来增长的对外贸易量和外商投资额将产生巨大的贸易物流需求。

（2）珠江三角洲物流

珠江三角洲 2001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 8364 亿元，如果按物流成本占 GDP 的 20%计算，珠江三角洲的总体物流需求为 1673 亿元；如果物流需求的外包比例为 20%，则珠江三角洲的物流产业将达到 335 亿元的规模。首先；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群，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群和钢铁、乙烯、汽车等重工业产业群构成了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物流需求的主要部分。其次，由于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该区域港口吞吐量增长的主要动力，珠江三角洲物流多表现为以进出口国际集装箱运输，为主体的国际物流。再者，该区域的众多人口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物流集散地之一。珠江三角洲商业物流需求主要表现为连锁商业业态在零售商业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2001 年广东零售业连锁销售总额达 215.07 亿元，占整个零售额的 6%，而广州、深圳等城市连锁商业所占的比重在 2002 年分别为 13%和 27%。

根据广东省物流产业发展规划：到“十五”期末将建成 30 家重点大型物流企业集团、30 个重点物流园区、30 个重点物流配送中心和 30 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深圳市政府将现代物流产业作为三个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到“十五”期末物流产业产值将从占 GDP 的 8 至 10%提高到 15 至 20%，政府规划的大型“平湖物流基地”占地 16 平方公里，计划吸引投资 1600 亿元。此外，其他城市也在积极进行物流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如常平地区物流基地和广东龙骏大型物流中心。

（3）京津环渤海区物流

近年来，京津环渤海区各省市先后制定了物流发展规划，特别是 2002 年北京、天津、大连、青岛、沈阳等中心城市的物流园区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为优化本区域的物流系统结构、搭建物流设施平台奠定了基础。北京市在物流发展规划中提出，2005 年初步建成以 3 个大型物流基地为核心，4 个综合性配套区域和 13 个专业性配送区为结点的覆盖全市的物流网络，2010 年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城市。在列为重中之重的“一港三区”建设中，北京通州物流产业区 2001 年已启动，投资超过 110 亿元的北京物流港项目 2002 年已启动。“十五”期间，天津市投入 50 多亿元建设物流园区、物流中心以及各类配送中心。2002 年以来，开发区工业物流园、保税区国际物流运作区、南疆散货物流中心、空港国际物流区、交通局物流货运中心五大物流工程进

展迅速。此外，以济南、青岛、烟台3个公路枢纽和潍坊、临沂、德州等6个集疏运中心为基础，逐步建成一批现代物流基地。

二、物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已有较大的发展和改善，但与我国经济以及物流产业的发展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物流效率的提高，不利于物流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总体来看，中国物流业的总体规模目前还比较小，发展水平也比较低，这一方面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中还存在着许多影响和制约物流业健康发展的因素。

1. 低水平的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严重影响着物流效率的提高

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物流周转速度、服务水平和效率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目前每万元GDP产生的运输量为4972吨公里，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指标分别为870吨公里和700吨公里。物流系统各环节的衔接较差，运转效率不高。仅以货运汽车的生产率水平为例，美国营运汽车的单车吨年产量约为66万吨公里，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万吨公里左右。目前我国铁路货车的运营速度仅46.4公里左右，公路货车的运营速度也不足50公里，内河航运速度更低。原材料、半成品及产成品的在库周转时间平均在3至6个月左右。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计算的运输网络密度，仅为1344.48公里/万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万人，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星巨（见表2－6）。

表2－6　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物流效率以及物流基础设施规模上的对比

国　　家	每万元GDP产生运输量吨公里	营运货车的单车吨产量万吨公里	运输网络密度	
			按国土面积计算公里/万平方公里	按人口数量计算公里/万人
中国	4972	3	1344.48	10.43
美国	870	66	6869.3	253.59
德国	—	—	14680.4	65.94
印度	—	—	5403.9	21.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物流年鉴》2002年数据整理而成。

现代化物流集散和储运设施较少，设施和装备的标准化程度较低。我国经济系统中能够有效连接不同运输方式的大型综合货运枢纽、服务于区域经济或城市内部的各种物流基地、物流中心还比较缺乏，这严重影响着物流集散乃至运输效率的提高。目前，交通部的公路主枢纽规划虽已经形成，但是仅有上海、深圳等地的一级主枢纽开始投人建设，航空货运基地尚在规划之中。我国物流设施和装备方面的标准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一是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标准不统一。例如，海运与铁路集装箱标准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海铁联运规模的扩展，我国海铁联运的集装箱运输在集装箱运输总量及铁路运输总量中的比例都比较低。二是物流器具标准不配套。例如现有托盘标准与各种运输装备、装卸设备标准之间缺乏有效衔接，降低了托盘在整个物流过程中的通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货物运输、储存、搬运等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三是物流包装标准与物流设施标准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虽然目前我国对商品包装已有初步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但在与各种运输装备、装卸设施、仓储设施相衔接的物流单元化包装标准方面还比较欠缺。

各种物流设施及装备的技术水平较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低。以货物运输设施和装备为例，铁路的货运重载、高速、自动化管理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还比较少，汽车专用公路仅占公路总里程的1%，等外公路仍高达20%以上；公路货运中各种专用运输车辆的比例仅占全部货运车辆的3%；沿海港口装备水平参差不齐，近年来建设的北仑港、盐田港、秦皇岛港及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港口的集装箱码头的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他大部分港口或港区的装备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60年代—70年代的水平，发达国家已极少采用的件杂散货运输方式在我国港口仍普遍存在；民航货运业还很不发达，全国航空货运飞机仅有14架，以客运飞机搭载货运仍然是主要的航，空货运方式。以信息系统建设滞后为例，一是工商企业内部物流信息管理和技术手段都还比较落后，如条形码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物资采购管理（MRP）和企业资源管理（ERP）等物流管理软件在物流领域中的应用水平较低；二是缺乏必要的公共物流信息交流平台，以EDI、互联网等为基础的物流信息系统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表2—7是关于我国物流服务企业在物流服务软件开发方面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物流服务企业所开发和使用的物流服务软件的比例和应用水平还不到生产制造企业的一半，明显可以看出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甚至还不如自己的顾客企业。这是我国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在物流服务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进展不快、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第三方物流服务业作业速度慢、物流信息不及时和准确率低的重要原因。

表2-7　　我国各种企业物流软件的开发与使用情况

软件种类	物流运作管理	仓库选址软件	运输决策软件	库存分析软件	条码扫描系统	配送资源系统
生产企业	53	8	20	39	28	16
商业企业	6	3	4	6	4	5
物流企业	19	4	9	7	6	13
总　计	78	15	33	52	38	34
比　例	50.6%	9.7%	21.4%	33.8%	24.7%	22.1%

资料来源：中国仓储．协会：《第三次物流市场调查》2001年。

2. 物流产业发展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市场需求约束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相当多企业仍然保留着“大而全”、“小而全”的

经营组织方式，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销售过程中的一系列物流活动主要依靠企业内部组织的自我服务完成。据调查，在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物流中由企业自理、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共同承担比例分别是24.1%和59.8%，而由第三方物流企业承担的仅为16.1%；在商业企业中，由企业自理和供货方承担的物流活动分别为76.5%和17.6%。与此同时，多数企业内部各种物流设施的保有率都比较高（见表2-8），并成为企业经营资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自我服务为主的物流活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延迟了工商企业对高效率的专业化、社会化物流服务需求的产生和发展，这也是当前制约中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表2-8　　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物流设施保有情况

	汽车车队	仓库	机械化装卸设施	铁路专用线	其他设施
生产企业	53%	59%	34%	3%	0%
商业企业	39%	44%	14%	3%	0%

资料来源：中国仓储协会：《第三次物流市场调查》2001年。

在工商企业优化内部物流管理、提高物流效率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企业内部物流活动逐步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化物流的潜在需求。但由于市场发育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完善，一方面企业内部运输和仓储等设施、各种物流装备、各类物流从业人员等资源还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合理的交流和流动；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提高物流效率、降低成本的内在动力和手段，企业无法将其内部低效率的物流设施、人员和组织实施有效的剥离。这就使得企业不得不继续沿用以往的物流方式，社会化、专业化物流需求仍难以转化为现实。

工业与商贸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商业运作模式开始被打破，非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外包特别是物流业务外包已成为一大趋势。根据2004年中国仓储协会等单位的调查，我国生产企业成品销售物流中，全部外包给第三方的占18%，部分外包的占55%，选择部分外包的企业比2003年高出11个百分点，比2002年高出19个百分点。商贸企业选择全部或部分物流外包的占27%。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制造业中，选择全部或部分外包的占57%，在商贸企业中选择全部与部分外包的占38%。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工业与商贸流通企业物流外包发展极不均衡，东部地区第三方物流需求的释放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连锁超市、家电、汽车、石化、电力、日化、医药、烟草等行业的物流需求释放快于其他行业。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与股份制企业的物流需求大于国有独资企业与民营企业。

3. 专业化物流服务还很有限，物流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尽管中国已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物流企业，但物流服务水平和效率还比较低，主要表现在现代物流服务内容；能力方面的欠缺。表2-9给出了我国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现有的主要服务内容，多数仍停留在货物代理、仓储、库存管理、搬运和干线运输等方面，很少几家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能够提供综合性、全过程、集成化的现代物流服务。

表2-9　　我国生产流通企业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的内容

	包　装	单纯仓储	干线运输	市内配送
生产企业	4%	20%	48%	28%
商业企业	14%	28%	29%	29%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年鉴》2001，2002。

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在企业的服务理念、服务设计、服务规范、服务内容、服务营销、服务质量控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差距，尤其在综合物流服务设计、社会化物流服务与顾客企业供应链的衔接、全社会物流服务质量标准和绩效考核标准方法等方面的差距更大。这些问题使得我国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缺乏与现有物流服务模式竞争的能力。我国的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在单据处理准确率、配送及时率和货损率这三项主要的物流服务指标上几乎都比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的高（见表2-10），这当然会严重限制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

表2-10　　我国顾客企业和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的作业质量

内容 企业	单据准确率在98%以上的比例	配送及时率在90%以上的比例	货损率在2%以下的比例
生产企业	64.4%	72.9%	9.1%
商业企业	72.2%	716.5%	82.4%
第三方物流企业	3.6%	2.7%	84.8%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年鉴》2001，2002。

物流服务层次低下是制约我国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的物流业从总体讲仍处于传统物流阶段，但已开始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型。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美国美智顾问管理公司的联合调查，2001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物流营业额大约为400亿元，占整个物流市场不到5%。

4. 物流产业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制度约束

物流产业的发展不仅仅要有充分的市场需求基础、活跃的市场主体以及完善的物流设施，更为重要的是要有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以保证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并使各种物流活动规范有序地进行，促进物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对物流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例如，在运输管理体制上，我国实行的是按照不同运输方式划分的分部门管理体制；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也有相应的管理部门和层次。这种条块分割的体制，不仅无法适应和满足物流产业发展的要求，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物流产业的发展。

首先，影响各种物流服务方式的协调发展。例如，由于各种运输方式的多头管理和相互分割，各种运输方式长期以来呈现分立发展的局面，不同运输方式在运输组织方式、服务规范、技术及装备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使得物流企业很难根据市场需要选择合理的运输服务方式，许多企业只能利用单一的运输方式来开展物流服务，而以多

式联运为基础的许多现代化物流服务方式还难以开展。其次，造成物流资源的浪费。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模式下，各种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缺乏必要的协调，一是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例如公路主干网络与铁路网络的平行发展，各地争相建设港口、机场等；二是涉及到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国家运输系统与地方运输系统之间、不同地区运输系统之间相互衔接的枢纽设施和有关服务设施建设方面缺乏投入，对物流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各种综合性货运枢纽、物流基地、物流中心建设发展十分缓慢。这种“重线路、轻结点”式的发展，即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影响着整个物流系统的协调发展。第三，存在部门、行业和地方保护现象。各管理部门、各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法规多从本部门、行业和地方利益出发，致使许多从事物流服务的企业想方设法寻求部门或地方政府的保护，在有保护的情况下开展物流服务活动，造成一种不正常的、不公平的竞争格局，不利于形成社会化的物流系统和跨区域、跨行业的物流网络。

5. 物流研究相对落后和物流专业人才短缺，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相比较而言，我国在物流研究和教育方面还非常落后，从事物流研究的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还很少，企业层面的研究和投入更微乎其微。物流教育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缺乏规范的物流人才培育途径。在高等院校中开设物流专业课程的大学仅有 10 所左右，仅占中国全部高等院校的百分之一；与物流相关的大学本科教育虽有开展，但尚来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研究生教育刚刚开始起步；物流职业教育则更加贫乏，企业的短期培训仍然是目前物流培训的主要方式。从先进国家物流发展的经验看，第三方物流服务业的职工和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一定的现代物流知识和现代物流管理水平与实践经验。在开展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调查和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除了极少数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的物流服务企业以外，多数这类企业的职工和管理人员在素质与水平上都很难满足我国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和整个行业发展的需要。

三、国际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出现所导致的本土化生产、全球采购、全球消费趋势的加强，现代物流的发展呈现出新特点：

1. 电子物流大规模兴起

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推动电子物流（E - Logistics）的兴起。网上的“直通方式”使企业能迅速、准确、全面地了解需求信息，实现基于顾客订货的生产模式（Build To Order - BTO）和物流服务。此外，电子物流可以在线追踪发出的货物，在线规划投递路线，在线进行物流调度，在线进行货运检查，电子物流将是 21 世纪物流发展的大趋势。

2. 物流规模和物流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物流企业将向集约化和协同化发展

21 世纪是一个物流全球化的时代，要满足全球化或区域化的物流服务，企业规模必须扩大形成规模效益。规模的扩大可以是企业合并，也可以是企业间的合作与联盟，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流园区的建设。物流园区的建设，有利于实现物流企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挥它们的整体优势和互补优势。二是物流企业的兼并与合作。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型物流企业跨越国境，展开连横合纵式并购，大力拓展国际物流市场，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此外，另一种集约化方式是物流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建立战略联盟。

3. 物流服务追求优质化和全球化

随着消费多样化、生产柔性化、流通高效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和客户对物流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物流服务的优质化是物流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5 个亮点“Right”的服务，将成为物流企业优质服务的共同标准。物流成本已不再是客户选择物流服务的唯一标准，人们更多的是注重物流服务的质量。物流服务的全球化是今后发展的又一重要趋势。据荷兰国际售销委员会（HIDC）发表的题为《全球物流业——供应连锁服务业的前景》的报告中指出，目前许多大型制造部门正在朝着“扩展企业”的方向发展。这种所谓的“扩展企业”基本上包括了把全球供应链条上所有的服务商统一起来，并利用最新的计算机体系加以控制。同时，报告认为，制造业已经实行“定做”服务理论，并不断加速其活动的全球化，对全球供应连锁服务业提出了一次性销售（即“一票到底”直销）的需求。这种服务要求极其灵活机动的供应链，这也迫使物流服务商几乎采取了一种“一切为客户服务”解决办法。

4. 第三方物流快速发展

欧洲 24% 和美国 33% 的非第三方物流服务用户正积极考虑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欧洲 62% 和美国 72% 的第三方物流服务用户认为他们有可能在 3 年内更多地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全世界的第三方物流市场具有潜力大、渐进性和高增长率的特征，这种状况将使第三方物流企业拥有大量的服务客户。国际上大多数第三方物流服务公司大多是以传统的“类物流”业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如仓储业、运输业、空运、海运、货运代理和企业内的物流部等，他们根据顾客的不同需要，通过提供各具特色的服务取得成功。

5. 绿色物流成为新趋势之一

物流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物流发展的同时也会给城市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21 世纪对物流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绿色物流。绿色物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物流系统污染进行控制，即在物流系统和物流活动的规划与决策中尽量采用对环境污染小的方案，如采用排污量小的货车车型，近距离配送，夜间运货（减小交通阻塞，节省燃料和减小排放）等。发达国家政府倡导绿色物流的对策是在污染发生源、交通量、交通流三个方面制定了相关政策。二是建立工业和生活废料处理的物流系统。

6. 不断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改造物流装备和提高管理水平

国外物流企业的技术装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系统技术为核心，以信息技术、运输技术、配送技术、装卸搬运技术、自动化仓储技术、库存控制技术、包装技术等专业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物流装备技术格局。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信息化——采用无线互联网技术、卫星定位技术（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射

频标识技术（RF）等。自动化——自动导引小车（AGV）技术、搬运机器人（RobotSystem）技术等。智能化——电子识别和电子跟踪技术、智能运输系统（ITS）。集成化——集信息化、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于一体。

四、物流业发展前景展望

1. 前景展望

根据专家分析，1999年我国物流总成本的比例约为16.9%，如按每5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下降2%（根据第十个五年计划）计算，即2005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为约14.9%，2010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约为12.9%；我国第三方物流在物流市场上的比例前6年（2000年—2005年）按照国际平均数仍左右计算，后5年按照此计算（根据第十个五年计划），则未来10年第三方物流在物流市场上比例的算术平均值为42%（GDP增长率按8%计算）。根据测算结果，到2010年，我国物流总成本将达到28505亿元，分别是1997年的4.8倍、1999年的2.08倍，第三方物流市场总规模将达到1972亿元。而目前我国第三方物流业才刚刚起步，实际总规模非常小，因此发展空间非常巨大（见表2-11），第三方物流业必将成为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一体化的物流服务正成为发展最迅速的一个行业，整个中国第三方物流市场2000—2005年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5%。

表2-11　　中国与国际发达地区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使用比例

指标 国别	现有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企业	无第三方物流服务但已提出第三方物流需求的企业	在三年内会使用第三方物流的企业
欧洲	76%	24%	
美国	58%	33%	72%
中国	15%	18.8%	62.5%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年鉴) 2002年。

当前是我国传统国有交通运输与仓储企业实行资产重组和流程再造，加速向第三方物流企业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时期。整体改造，提升为物流企业；整合内部资源，组建物流公司；寻求资本合作，组建股份制公司；已经成为我国传统交通运输与仓储企业组织再造的重要措施。目前，中远物流、中外运物流、中储物流等企业都在依托原有业务基础和客户、设施、经营网络等优势的同时，加速资产重组的进程，通过不断地拓展和延伸其服务领域，积极扩展经营范围，组建发展第三方物流。与此同时，一些著名工业与流通企业也开始关注企业采购系统与物流系统的流程再造。青岛海尔、上海大众、联想、华联等大型企业纷纷针对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大规模的企业物流的改造，将原有仓储运输部门独立出来，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提高整体效益。信息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已进一步得到重视，物流信息化也日益普及。2002年国内的物流软件商就达500家之多，其中既有IBM、ORACLE这样的著名跨国公司，也有用友、金蝶这样的本土企

业，他们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物流流程的设计和改造，以及企业供应链的形成、管理等方面开展业务。2002年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选出16个物流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典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建设物流信息平台已成为物流业投资的重点之一。

2. 若干建议

结合中国物流发展的现状特点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趋势，在未来5至10年内，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通过建立健全适应物流产业发展需要的相关制度规范，发展和完善包括各种基础设施在内的物流系统，建立起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

（1）制定前瞻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引导物流产业的发展

物流产业发展的合理布局，是发达国家早已高度重视的问题。日本1966年制定了《流通业务城市街道整备法》，把集中在大城市中心部位的流通设施向距离市中心20公里左右的郊区集中搬迁，以提高大城市的流通机能，保证道路通畅，增强城市的整体功能。根据这一法律，25年来日本在全国22个城市中建设了24个流通园区，将运输、集散、中转、储存、配送、租赁、定货、销售、售后服务等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物流设施的利用效率。通产省、运输省、农林水产省、建设省和经济企划厅等5省主务大臣，制定全国统一的总体构想，决定建设物流基地的具体城市。这些城市按照城市的整体规划确定物流基地的地点、数量、位置、规模及功能，并报中央政府审批。德国联邦政府在统筹考虑交通干线、主枢纽规划建设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生产力布局、物流现状，根据各种运输方式衔接的可能，在全国范围规划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用地规模与未来发展。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物流园区。

政府应该综合、统筹、全面地规划、制定前瞻性的产业发展规划，打破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格局，为从事现代物流服务的企业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本地区的物流体系，但在各地政府规划物流业的同时，国家也需建立一个全国物流协调中心，以统一协调各城市的物流中心，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可有选择地、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物流设施的资金投入，并制定一些鼓励多元化市场主体投资物流设施的政策，以加快物流设施系统的形成和完善。统筹考虑新型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物流发展规划。

（2）支持企业间的合并重组，形成物流企业规模经济

目前，我国的仓储、运输等物流设施数量已经较多，但功能单一，多由区域性的小企业分散经营，形不成规模。因此，政府应对现有的各种资源要素进行重组和结构的调整，推动物流业界的整合与重组，走综合化、规模化道路，形成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以及外经贸部《关于开展试点设立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跨国物流公司将加快在中国实施扩展与布点战略。一部分工业与流通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与中外合资企业、家电行业、服装行业、汽车行业、日化行业、连锁超市行业、饮料行业、医药行业、烟草行业等将首先释放物流需求，据《国际商报社》主持的《来华跨国公司物流服务需求调查报告》，来华跨国公司

物流外包的比例高达90%左右。因此，有必要加快传统运输与仓储企业的资产重组，全部或一部分转为第三方物流，并利用自己的优势，扩大自己的客户群，与外国物流公司或合作或处于竞争的地位。物流市场竞争加剧，包括中外物流企业之间、多种所有制物流企业之间的竞争；物流企业与生产、流通企业之间的竞争；多种运营方式与服务模式的竞争等等。全方位竞争的结果是市场集中度提高和细分化深入。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大板块的物流企业都出现了市场反应灵敏、规模扩张较快的“领头企业”。而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专业分工加快，需求的专业化带来市场的细分化，出现了诸如汽车物流、医药物流等更加专业的物流企业。

(3) 规范市场，完善服务体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首先要对现行政策中影响物流产业发展的相关活动的规章制度进行必要的清理，特别是对妨碍公平竞争、限制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政策进行清理，为物流产业发展创造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一是要坚决制止行业保护，打破各地政府对本地物流业发展的保护作用，使物流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合理运用；二是要排除有碍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使各物流企业按市场规律竞争。其次是要研究和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物流管理制度和有关政策，以保障中国物流产业在规范管理制度环境中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政府当前的政策取向，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装备更新的融资政策上，在物流基地的土地使用政策上，在物流服务和运输价格政策以及工商登记管理政策上，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物流产业发展的支持性措施。有关部门要从规划速度、技术改造、查验通关、交通管理、财政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搞好协调服务，从而为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还要加快网络建设，建立企业之间跨地区、跨专业的业务协作关系，实现由传统的分散经营向统一流程一体化运作的网络经营转变。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各网点根据区域优势和专业特点，按标准化运作流程建立起分工协作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加强政府部门的协调，制定规范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措施，为物流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4) 研究构建发展现代物流的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物流产业的整体水平

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物流经济活动从横向构成了物流产业，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特点非常突出。要把所有涉及物流产业的部门组合在一起，成立一个独立的部门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合理确立现代物流的产业结构，使整个产业合理配置、协调发展。

一是构建物流基础产业。这个产业由各种不同的运输线路、运输线路的交汇中心与节点以及理货终端构成，主要有铁路、公路、水运、空运、仓储等部门。这些部门的运力如何合理布局，如何有效连接，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建议在这几个部门体制改革方案设计中，把如何整合物流运力资源、合理设置物流设施，发挥整体合力，避免存量资源闲置、增量资源浪费作为重要的设计原则。从长远看，应考虑建立运输委或大运输部，对这些运输方式实行统一管理。

二是构建物流装备制造产业。这个产业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整个物流系统装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产业。大体可以划分为集装设备、货运汽车、铁道货车、货船、货运航空器、仓库设备、装卸机具、输送设备、分检与理货设备、物流工具生产等

行业。目前我国对各种物流装备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开发能力不均衡。集装箱生产能力和国际市场份额都已居世界首位，而其他行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没有规模优势。很多物流装备还要靠进口。建议把物流装备制造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加大改造和提升的力度，创造物流产业的新生产力要素。

三是构建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产业。第三方物流是社会化分工和现代物流发展的方向。在国外，第三方物流已经是现代物流产业的主体。今后推动物流产业的发展，要重点发展第三方物流，用信息化、智能化、服务综合化及个性化塑造先进的物流服务形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今后新建的大规模物流企业，应以第三方物流服务为主。应考虑把一批传统物流企业改造成为第三方物流企业，力争在“十一五”期间使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所占比例提高到30%左右。

四是构建物流信息系统产业。这个产业由生产提供物流系统的软件和硬件、提供系统管理等部门组成，是计算机系统技术和通信技术在物流过程的组合。信息网络技术是现代物流的生命线，通过信息传输与客户、制造商、供应商，实现资源共享，对物流各环节进行实时跟踪、有效控制与全程管理。建议组织强有力的科研队伍进行技术攻关，加强物流信息商品化、数据库化、代码化的研究，加强物流信息处理电子化和计算机化的研究，加强物流信息传递标准化、实时化的研究，加强物流信息存储系列化、规范化的研究，并尽快形成操作程序和管理文本。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物流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加快研究制定我国相应的标准。政府应首先促进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如ERP、MRP等在物流企业和广大工商企业内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全面提高企业的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为物流信息交流的畅通和高效创造条件。针对当前物流标准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国际物流标准化的发展方向，政府要高度重视物流标准化工作。

(5) 加强物流理论的研究和人才培养，适应我国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来说，物流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它不仅吸纳和使用许多代表当今科技发展水平的现代化技术，其自身也在不断创新和开发许多独特的物流技术。目前我国物流领域的研究工作还相当薄弱，因此，政府应积极支持和引导物流科研工作，特别是要充分调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并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加强应用性物流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还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物流理念和物流技术，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重视现代物流领域的研究和创新工作，加快物流人才的培养，从整体上提高中国物流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教育水平。建议国家尽快研究我国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设置专门研究流通理论的学科。建立完整的现代流通理论、商业经济及物流科学学科体系。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加速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养，把学校培养和在职培训结合起来，把长期培养和短期培训结合起来，抓紧培养具有跨学科综合能力的专业人才。大型物流企业必须加速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经理型人才队伍，以配合自己的竞争发展战略。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物流师国家职业标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面启动物流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工作。2004年物流师国家职业资格首开考试、年内获证超万人。

根据加入 WTO 的承诺，2004 年 12 月 11 日以后，涉及物流的大部分领域已经全面放开，中国物流业将会更加开放，物流发展的环境将更加宽松。2005 年是贯彻落实九部委《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第一年，这为中国物流业的加快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第三章 房地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猛。2003年，全国房地产业投资超过1万亿元，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8.3%。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历史较短，但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时间脉络来看，1993年、1998年可以视为产业发展的两条“分水岭”。在1993年前后，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步入低潮，开发热逐渐降温。在1998年前后，伴随经济增长“软着陆”的成功，我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呈现上升态势，到2001年，以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二线城市辐射，房地产业步入全面增长阶段。当前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下，房地产业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其价格的变化、供求的变动，不仅对各地的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房地产业发展现状

1. 房地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快速同步成长

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1989年全国城市化水平才20%左右，到2000年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36%—40%之间，如上海浦东新区城市化水平在2003年达到32%，上升近10个百分点。种种情况表明我国现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飞跃时期。

如图3－1所示，综观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史，几乎都呈现出一个临界飞跃的共同规律，即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整个国家的城市发展及其空间布局结构形态都会出现一次大的飞跃，其变动快速剧烈，直至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后才趋于平衡增长状态，城市空间结构也才趋于平稳。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整体保持增长，而上海、北京、深圳等特大城市则进入了明显的城市化飞跃阶段。城市化不仅带来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用地使用量增加，而且也使城市住宅建设量和供应量呈现上升趋势，房地产业逐渐占据产业主导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以上海为例，2001年以来，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年增长率大约20%，随着新一轮桥隧工程、世博等重点项目的推进，为城市房地产发展带来了新的助推力，2001年上海房地产业投资增速14%，2004年的增长速度则高达30%以上。可以说，2000年以来，新一轮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础建设的加速，推进了上海乃至中国房地产的快速同步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由于城市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都与房地产的商品结构和

产品类型密切相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功能发生变化，产业能级逐步提升，从而使城市房产市场结构也产生了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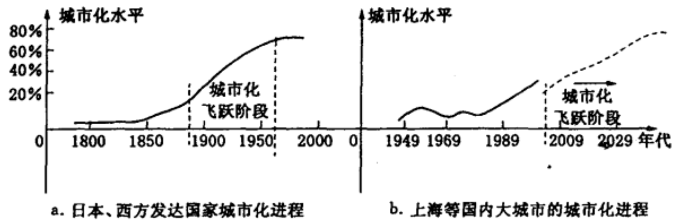


图 3－1　中外城市化发展阶段对比

2. 城市房地产业多元化，产业化发展更加明显

近几年来住宅投资和住宅建设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初步完成了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基础任务。在此基础上，国内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业形态也开始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第一，在物业形态上，住宅、商业、办公、旅游多种物业类型日渐增多，为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物业的多样形式既有利于企业组合投资、分散风险，同时对于整个房地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多样选择。第二，在房产开发主体形态上，随着投资渠道日渐增多，国有房地产企业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比重明显增加。2004 年全国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近 3 万家企业中，其中民营和外商投资性质的比重占了近三分之一。第三，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上也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目前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内贷款、自筹资金、预收购房款等。以上海为例，2003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1294.77 亿元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拨款为零，国内贷款 282.7 亿元，占 24.2%；利用外资 34.14 亿元，占 5.1%，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17.18 亿元；自筹资金 313.91 亿元，占 17%；其他资金来源 664.01 亿元，占 38.4%，其中定金及预收款 580.39 亿元。2004 年以来，通过依靠市场化运作，上海房地产建设资金筹集能力继续保持较强能力，其来源主要是定金预付款及银行贷款。

随着多元化的趋势显现，房地产产业化体系也渐渐得到完善，在住宅业方面尤为明显。一是加快建立和完善了住宅产业化体系。组织编制了住宅产业技术标准、规程及指导性原则；在住宅建设中积极推广新型住宅材料；住宅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逐步提高，住宅菜单式装修等新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以康居示范小区为载体，带动新技术全面推广。二是探索和完善了中国住宅产业化推进机制。住宅产业的企业群体逐步形成，40 个省市区相继建立了住宅产业化工作机构，制定了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积极引导和扶持，建立了相应技术核心体系的国家住宅产业基地。

3. 房地产业呈现出类似于成本推动型的增长

(1) 金融新政增加了融资成本

财税、金融政策往往是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为了控制经济发展过热，

2004年中央银行连续3次出台政策，调控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增长势头。通过调整资本金比例，加大授信额度，对开发商的资金要求大大提高。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收紧，使资金原本短缺、依靠小作坊式经营的本土开发企业更加捉襟见肘，部分企业不得不通过调高房价来避免承担过高成本。

(2) 土地资源日益成为市场焦点

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带来最直接效应是政府与发展商之间在土地上的不断博弈。2001年以来，国家土地政策经过了几轮调整，从经营性土地实行公开招拍挂到禁止农用地转用，再到“8·31”大限，开发商手上土地资源储备开始捉襟见肘，房地产开发逐渐显现出压力。一方面，国家土地政策的收紧，加速了土地资源的开放式竞争，扩大了开发商的选择范围，变被动地拿地为市场主动争取，充分体现出开发商的综合实力和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围绕银行信贷紧缩、资本金率提高等配套金融措施而进行土地改革，使开发商持有土地换手率提高，部分实力不够的企业纷纷下马，形成了房产市场开发主体新一轮的洗牌。土地资源获取成本的上升，使土地日益成为行业瞩目的焦点。

(3) 上游产业链成本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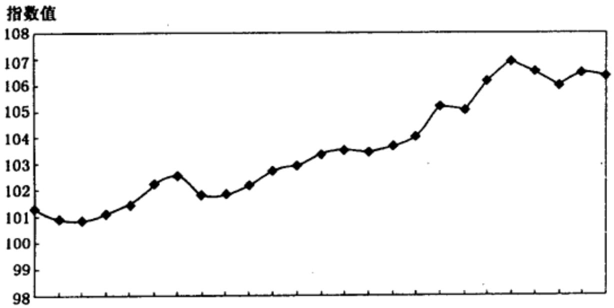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升温，带动了原材料价格在内的物价指数CPI的全面上涨。此轮价格上涨还有着众多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世界能源紧张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国际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上涨——主要是钢铁和原油等的上涨。其次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贸易量不断扩大，以及国内需求扩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拉动了价格上涨。其三是美国连续多年的低利率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由于我国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情况下必然有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随着房地产业上游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一定程度的上涨是必然的。由于房产市场存在大量需求，因而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普遍出现了价升量增的局面。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持续快速的成长。

二、房地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 房地产业投资过热，供应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观察近两三年的中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趋势图可知，景气指数在2000年一路攀升，到2001年4月抵达高点，随后一路调整到2002年2月出现阶段性底点，3至4月反弹，继而走稳，4至8月间指数上下波动幅度极小。全国房地产开发市场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进入2003年，部分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热度不减，呈现出投资消费双向持续高涨。这里回顾一下2001年—2003年来商品房新开工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变化情况：200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30.6%；200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新开工面积为3.5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2%；2002年全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基本保持平稳；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新开工面积增长28.5%，增幅比上年增加10.9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逐渐对市场预期看好。2000年全国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9.5%；2001年全国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6245亿元，

同比增长25.3%，增幅为前高后低，1至8月数字为32.1%；2002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超过8千亿元，到2003年，全国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幅；房地产到位资金增长37.6%，增幅比上年增加7.4个百分点，也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与此同时，供求关系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增长强劲，销售面积达到3.2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9.1%，增速超过商品房竣工面积，其中，销售给个人比重达到94.2%。全年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8亿平方米，增长2.2%，比上年回落8.7个百分点，其中，空置一年以上的面积为5425万平方米，增长14.4%，占全部空置面积的比重与上年相比增加4.5个百分点。2004年空置一年以上的面积增长了近5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资已开始呈现过热态势。



中国房地产业景气指数趋势图

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过分集中于中高档商品房的建造，导致市场上较难觅到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从而无形中抬升了平均房价，造成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失衡。以上海为例，首先，从单价上看，单价在每平方米6000元以下、适合城镇居民动迁安置和工薪阶层改善居住条件需求的中低价商品住房供应量偏少，占总量的比例不足60%。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2004年上半年，全市预售登记面积1459万平方米，其中3500元以下的占22.6%，3500元—6000元的占31.7%，6000元—9000元的占32.1%，9000元以上的占13.6%；前两项合计，每平方米6000元以下的占54.3%（2003年为36.9%）。其次，从总价来看，由于开发商建造的房型普遍较大，适合工薪阶层需求的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总价在50万一60万元左右的商品住房较少。2003年100平方米以下住宅预售登记套数占预售登记总套数的比例为27.8%，2004年为34.5%。另外，从区位分布来看，价格较低的房屋一般都处于环线之外、交通不便之地。据统计，每平方米单价6000元以下的商品住房主要分布在中环线以外，其中，3500元以下的大部分集中在外环线以外。

2. 宏观经济调控与行业持续发展的平衡问题

(1) 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调控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中国房地产业的持续增长形成了一定影响，特点是手段多样而且影响面广。此轮调控的背景是在国家紧缩银根、地方政府采取财税政策无效的情况下实施的，主要从适度控制源头的角度对于土地、金融、项目三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通过挤压市场水分，以达到抑制市场投机、改善市场结构和平衡市场供求的目的。宏观调控政策充分显现出了其必要性：调整市场结构；平抑过高房价；缓解资源短缺；为经济过热降温。2004年3月，国家相关部委调控土地出让制度，建立土地垂直管理体系。4月份起，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放宽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重点是钢铁、电解铝、水泥、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城市建设等重点项目。仅上海地区就取消了4000多亿元的建设项目，如上海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环球金融中心、崇明岛赛马场、崇明越江隧道工程等。全国受影响的项目估计在上万亿元。与建筑业关联度最高的房地产行业受到影响。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落，建筑业投资增幅比上月下降了28个百分点。7月份，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主要表现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消费市场稳中趋旺；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动；由消费升级带动的高成长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的同时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重要进展；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这种由市场主导的、以消费升级和企业自主投资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这次宏观调控在客观上对房地产业还产生了有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商品房价格上涨的幅度受到了抑制，避免了泡沫的继续产生。2004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广州三地房价上升幅度得到了有效控制，商品房价格上升幅度同比减小8%、14%和3%，市场高档房与中低价房的供应结构矛盾得到明显缓解。

(2) 宏观调控后所产生的效应与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问题

当然，持续近一年的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行业也形成了一定冲击，如部分地方和区域的市场需求明显下降，重点工程和项目受到土地控制的影响等等。但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而在效果上会有一些差别，总体上看，这些措施产生的效应可以划分为3个层次：一是短期效应——供求矛盾趋缓、价格趋稳。2002年至2003年，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供不应求现象，尤其是住宅，中央和地方调控措施的合力，会促使供求的平衡，并带来价格的稳定，这是必然的结果。短期内这些效应会慢慢地显现出来，并将持续一两年，或许更长。二是中期效应——供给有不确定性，市场仍然会有震荡。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主要集中在财政、金融政策，特点是持续性长、覆盖面广，而地方的调控措施则是控需促供双管齐下，应该不会对中期的供应产生困难。但是，中央调控的重点在控制供给，控制供给的效应在两三年以后才会表现出来。如果地方措施能够在稳定中期供给的问题上进一步与中央的措

施互为补充的话，那么中期的供给才不会有问题。总之，中期供给有不确定性。这是地方政府必须要特别留意的，因而也是市场存在震荡的主要诱因之一。三是长期效应——应该讲这次宏观调控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对中央乃至地方的房地产市场不会有长期效应（一般是指5年以上）。

考虑到以上因素的存在，目前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存在一些难以预测的问题：一是房价是涨是跌的问题。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房价仍有上升空间，目前我国已有住宅建筑面积约为60多亿平方米，以现有的4亿城市居民人口计算，如果人均住宅面积达到20平方米，那么我国的城市面积还需要增加20亿平方米，如果人均住宅面积达到30平方米，那么我国的城市住宅面积还需要增加60亿平方米。以每年新增建筑面积4亿平方米计算，新增60亿平方米就需要15年的时间。如果考虑到这15年内，我国的城市人口还要新增加1至2亿人，那么，城市所需要的建筑面积还要多。总之，在我国的城镇住宅面积还未达到120亿—150亿平方米之前，我国的房地产业的需求增长仍将持续下去，这也是我国房价稳步上涨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产业政策的变动，以及区域发展概念和优势的提前透支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也从另一个方面左右着房价的涨跌。二是建设用地保障问题。土地是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家政策对土地市场的“松”和“紧”对房地产投资和开发影响深远，当前，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面临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旧城改造、居民动迁和新区投资开发等问题，因而对于建设用地的需求缺口也越来越大。在这种“粥少僧多”的土地市场需求状况下，未来城市建设用地供求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房地产业发展的成败。

三、房地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1．“十一五”期间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推动下，“九五”期间出台的继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和规范、搞活房地产市场一系列政策举措积聚的能量和效应继续不断释放，中国房地产业始终保持着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走势，呈现出以市场机制为指导，以有效需求为依托的健康向上的繁荣局面，房地产市场更趋成熟，房地产市场运行机制已基本形成。以住宅为核心的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逐步提高。目前，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波动将对整个宏观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减轻波动幅度，避免不正常波动，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房地产业本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未来“十一五”期间，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走向究竟如何？这是目前房地产市场各级参与主体最为关心和重视的问题，也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能否健康、稳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从国内经济形势分析，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走向与当前经济形势息息相关。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各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当良好。然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特

别是某些资源型行业发展过快，引起了全国物价消费指数的上涨，导致了经济发展过热。然而，我国居民平均收入近年来稳定增长，城镇储蓄水平持续提高，收入和支出预期趋好，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逐步完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从而形成了相当强的内部需求。"十一五"期间，对于房地产市场持续性的需求量仍然较大，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政府也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小康社会初期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使住宅建设具备了持续发展的基础，房地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城市化与住宅建设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住宅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要素之一，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住宅需求和住宅消费必将随之扩大。根据有关部门预测，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左右，每年增加0.8到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达到6.3亿，比2000年净增1.7亿。按照60%的新增人口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或者改建住房，按届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5平方米计算，需新建住宅25.5亿平方米建筑面积。为改善现有居民居住条件，按现有居民（4.6亿）人均住房面积增加4.5平方米，需增加住宅面积20.7亿平方米。每年有1亿平方米的旧房拆建，还要增加10亿平方米的新住宅。总体上看，住宅建设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特征，房地产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逆转。

其次，从国际经济形势分析，近年以来，美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均超过了预期，各方均肯定了今后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世界银行预测，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提高到3%以上，其中发达国家将升到2.5%，美国、日本、欧元区将分别达到3.4%、1.3%和1.7%；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升为4.9%。IMF预测5至10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4%，其中美国为4%左右，日本为2%。总体来看，世界经济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仍将保持温和复苏的态势。受此影响，外资对于中国房地产业的投资仍将稳步增长，如2004年境外进入上海房地产业领域的资金已达30亿元。目前，摩根斯丹利、高盛、第一麦格理等房产基金对国内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触手，已开始从间接投资逐步转向实质性投资开发阶段。

从长期来看，中国房地产业无疑是前景光明的，但就目前和今后"十一五"期间的形势来讲，房地产市场由"高位放量"的"上升至顶"阶段转入到价格缓慢下跌阶段。近年房价上升速率过快、商品房供应结构不合理、银行房贷高速增长等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控，必将成为新一轮住宅开发的风险积聚过程。楼价的上升应该是盘整式或呈波浪式、螺旋式缓慢上升，不经过小幅盘整而直线上升是不扎实的，否则楼价的大起必然隐含巨大的风险，况且房价的对比要考虑通货膨胀、科技含量、装修成本（全装修）、公建市政文化教育配套、生态环境改善及利息（贷款）等因素，不能简单论之。因此，笔者判断，"十一五"期间我国房地产住宅产业的发展将步入一个高位盘整到缓慢回落的阶段，随着旧区改造节奏的适度调节，轨道交通网络的健全和延伸，中低价住宅供应的增加和住宅结构的日趋合理以及房地产贷款政策的调整等，房地产住宅将逐步步入一个理性发展期。

进入2008年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将可能出现分化，不管市场怎样运行，房地产市场普遍上涨的格局也将一去不复返。随着市场行情的退潮，将会出现阶段性价格调整。

各地房地产市场会逐步出现分化，不同产品面临市场考验，极有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市场礼遇。房地产销售不畅、房价下跌现象的出现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就总体房地产住宅的价格而言，随着其内在品质的提高将稳中微升，但其内在结构必定是有升有降。除部分价格和价值相符的物有所值的高档商品房及大量中低价位住宅因存在广泛需求而价格坚挺外，相当一部分中高价楼盘将面临市场竞争的洗礼。以上海为例，在进入“十一五”以后，其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面临着众多的外在有利因素：上海经济仍将保持两位数增长，市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住房市场需求继续趋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城市定位，正在吸引更多的海内外资金、技术、企业和人才进入上海、投资上海；上海世博会场馆的开发建设，城市发展面临新一轮建设，浦江两岸综合开发、旧区改造、小城镇建设和轨道交通建设等将会扩张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

2. 我国房地产业的长期发展展望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房地产业发展的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房地产业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总体来看是机遇大于挑战：

一是中国房地产业仍将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存在上升空间。即便当前中国房地产面临很多问题，在很多城市和地方存在很大的泡沫。但房地产发展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可能需要10年，也许需要20年。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发展仍然处于一个相当快速增长的环境。如果我们假定每年城市化的速度是40%，到2020年城市化的水平达到55%。如果以人口14亿计算，城市人口大概就是7.7亿，城市人口净增加是2.6亿。如果按照人均居住面积20平方米来计算，每年要增长住房面积是2亿平方米。随着环境的改善，对于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也会稳步增长。以2020年7.7亿人口来计算，每人增加4—5平方米，在20年内就会增长30亿平方米，城市的拆迁、住房改造每年至少有5.8亿平方米。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大概就是90亿，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每年住房建设投资大概是3亿平方米左右，这需要30年才可能满足。所以房地产业建设肯定会在现在的基础上，以更高的速度发展。

二是多层次、梯度化住房供应体系加速完善。从去年开始，国家地方两级住房建设重心逐渐向中低收入、社会保障群体倾斜，一方面扩大了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中低价位商品住房的用地安排和建设，如上海市就提出了建设1000万平方米中低价房和1000万平方米配套商品房的“两个一千万”目标。另一方面，扩大了廉租房屋的对象范围，并增加了大量的可供配租的廉租房源。通过以上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我国房地产市场正逐步朝多层次、梯度化的健康方向发展。

当然，展望未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还有两点需要引起重视：一是稳步控制房地产业发展节奏，科学掌握产业发展政策导向。通过前面关于房地产周期的叙述，不难看出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步入关键时期，房地产市场不仅需求旺盛，而且供给充足。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发展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机制尚未完全成熟，产业发展还存在着众多制约因素，如资源环境因素、产业结构因素、政策因素等。怎样规避这些不利因

素，提高抗外部风险的能力？笔者认为，不仅是需要政策的宏观调控，也不仅是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需要市场参与者共同努力，在投资、开发和市场流通等各环节进行适时调整，以稳步控制房地产业的发展节奏。通过分析中国近几次城市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可以看出政策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谓“成也政策，败也政策”，着眼于产业长远的发展考虑，政府应该运用积极性的政策加以充分引导，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切忌下猛药，应该充分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经验，通过科学分析来掌握房地产行业正确的发展政策导向。二是关注房地产业的低能耗、低成本、集约化发展，使我国住宅产业化发展跃升新的台阶。除了在发展节奏上和策略上要谨慎之外，我国的房地产业也存在着客观的约束因素，即像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原材料供给的约束。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资源约束与环境承载力已经成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今天，中国所有的资源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没有一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更没有一个在世界水平线之上的。比如我国人均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天然气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石油8%，铝9.7%，水25%，铜26%，耕地40%，铁45%，煤炭86%。在这种缺少能源资源的情况下，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发展要特别避免奢侈和粗放经营，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从国情出发考虑房地产业良性发展，还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节约土地、建筑材料的成本上下功夫。如在住房建设上不能一味追求大而全，在房型设计上要考虑人口结构以及实际需求，在开发模式上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验等等。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研究和探索房地产业低能耗、低成本、集约化发展道路，避免房地产业出现资源过多浪费现象。

总之，中国房地产业要实现未来既定发展目标，要保持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还必须要有三条思路：一是坚持服从经济全局的思路。房地产是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必须了解国家和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全局，服务全局，服从全局。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思路。房地产业之所以是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因为满足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需求，如同其他社会商品一样，房地产业发展要顺应消费者的市场需求。三是坚持创新思路。这种创新不仅仅体现在房地产的规划建设理念上，而且体现在管理模式和个性化需求等方面。

第四章　旅　游　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领改革开放之先，享改革开放之惠，发挥了巨大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充分显示了优势产业的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成为活跃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一支新生力量。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旅游业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旅游大国的地位从各个方面、不同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提高。未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性快速增长和小康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我国旅游业将迎来一个更快发展的黄金时期。本章将在梳理我国旅游业发展成就，尤其是近几年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未来的中长期发展予以展望。

一、旅游业的发展成就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成就，可简要地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明确旅游业的产业性质为发展切入点，实现了产业定位的重大突破。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旅游业在明确产业性质、产业定位方面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间，旅游工作一直是外交工作的补充形式，对于宣传中国的建设成就、加强国际友好往来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范畴。1979年，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指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按照这一重要指示，我国旅游业很快实现了从"外事接待型"向"经汇型"转变的重大突破。1986年，国务院将旅游业第一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92年，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旅游业列为第三产业积极发展序列第一位；1998年和1999年，中央将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进一步明确和提高了旅游业的产业地位。

第二，旅游市场格局不断深化升级，"三大市场"在不同背景，不同起点上逐步向互促互补的方向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旅游市场已经进入成熟期，世界排名位次不断向前跃进。国际旅游业作为我国旅游业的一支先头力量、始终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对满足国际市场需求、扩大产业规模以及提高产业素质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也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开展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1979年—1998年20余年间，我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次年均增长

率为14.54%，不仅高于同期全球旅游国际旅游接待4.29%的增长水平，也远高于60年代以来全球旅游业5.93%的年均增长率。进入21世纪后，入境旅游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增长。2004年接待入境过夜旅游者首次突破1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8.96%，是1978年的60倍。接待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次及创汇的世界排名分别由1980年的第18位和34位跃升至第4位和第5位。

二是国内旅游市场进入成长期，成为推动我国旅游业向前发展的又一支主力军。国内旅游经过长期积蓄与发育，90年代以来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市场规模宏大、出游主体众多、消费层次丰富的特征十分鲜明地显现出来，越来越强有力地说明我国旅游业正在向成熟而完善的更高阶段迈进。2004年，国内旅游者达11.0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26.61%；国内旅游收入达到4711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36.86%。

三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控制的中国公民自费出国（境）旅游正处在有序发展阶段，实现了港澳游、边境游和出国游的全面发展。三个市场互促互补，不仅有效防范、抵御和化解了市场风险，维持了市场稳定性，而且是我国旅游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旅游大国”形象不可或缺的促成因素；不仅是我国旅游业大发展的直接结果和体现，也是推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我国旅游业已形成产业规模，旅游生产力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素质明显提高。旅游业“吃、住、行、游、娱、购”六大门类建设成就辉煌，旅游住宿、旅游交通等“瓶颈”部门相继有了较快发展，旅游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旅游住宿设施28.38万个（包括：星级饭店0.98万个，社会旅馆8.01万个，个体旅馆19.40万个）。在1997年顺利实现了由一、二、三类旅行社向国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的转变工作后，2004年全国共有旅行社15339家，比1988年的1573家增长近9倍。旅游交通条件有了根本性好转，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大大提高，旅游者“进得去、出得来、转得开”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旅游餐饮、旅游娱乐、旅游购物环境改善，质量进一步提高。

第四，我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是在国民经济中持久地发挥着创收外汇、回笼货币、吸纳就业、扩大内需等方面的综合作用。1978—1999年的20余年间，国际旅游累计创汇924亿美元，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作出了重大贡献，旅游外汇收入已成为国家非贸易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攀升，2004年旅游业总收入达6840亿元，相当于全国GDP的5.01%；二是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对于更新观念、平衡地区差异、脱贫致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三是在促进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复兴方面也发挥了催化和推动的作用。旅游业发展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等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1. 我国旅游业的现状综述

近些年来，中国旅游业一直保持了高速发展，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地位已经确立，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1）入境旅游市场

在改革开放20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入境旅游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我国入境旅游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2年）为启动超速增长阶段，第二阶段（1982—1989年）为稳步高速增长阶段，第三阶段（1989—1993年）为恢复快速增长阶段，第四阶段（1993—2002年）为持续平缓增长阶段。总体上看，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态势显得十分强劲，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2.1%和22.6%，远远高于同期GDP的9.76%。入境游客除港澳台同胞外，外国游客约80%来自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等10余个主要客源国。

（2）国内旅游市场

国内旅游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90年代后，国内旅游迅速增长。中国国内旅游现状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发展快、规模大。1990—2002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由2.8亿人次增至8.78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也由1990年的170亿元升至2002年的3878.36亿元。二是覆盖范围广。东西南北齐开花，形成了一个覆盖范围空前广大的局面。三是形式多样化。国内旅游不再是单一的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活动，探亲访友、商务活动、学习考察、宗教朝拜、探险探奇、保健养身等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已广泛开展起来。

（3）出境旅游市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公民出境旅游发展迅猛，出境旅游人数越来越多。1992—2001年10年间，年出境总人数由292.8万人次增至1212万人次。1997—2002年的5年间，出境旅游人数翻了一番。近年来，中国出境旅游一直有计划、有组织地稳步发展。2002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为166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6.84%。截至2003年底，中国政府批准开放的中国公民自费组团可以前去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达到28个，中国已成为亚洲地区快速增长的新兴客源输出国。

2. 我国旅游业的产业组织分析

20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旅游业飞速发展，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组织。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许多省份、地区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下面，我们就中国旅游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市场效益作一分析。

（1）旅游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旅游市场结构反映了市场的竞争和垄断的关系，而影响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是市场集中度和产品差别化程度。

第一，产业集中度较低，但近几年这种状况有所缓解。

旅游产业市场集中度是指产业的供需集中程度，包括买方集中度和卖方集中度两个方面。从需求层面看，我国旅游产业的买方集中度在地域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以国内旅游为例，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西部与东部等不同地区显然是不同的，这不仅与各地区旅游资源的差异性相关，更多地还取决于各地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及闲暇时间的差异。

这里着重分析卖方集中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业一直呈现出市场集中度低、布局与结构松散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随着旅游需求激增，旅游市场不断扩大，旅游业一度呈现出的高利润率促使众多行业或部门转向旅游业，加上旅游业的市场壁垒较低，经济规模有限，技术含量也不高，其他行业和部门很容易进入，由此造成了整个旅游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业的重要作用凸现，许多地区将旅游业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的企业进入旅游业的某一领域，因而导致了整个旅游产业的布局与结构比较松散。

以2001年旅行社业为例。每家旅行社资产平均394.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平均560万元，利润平均12.2万元。在整个行业中缺乏具有较强实力的龙头企业，目前国内最大的国旅、中旅、中青旅三家旅行社所占市场份额不足20%，因此我国旅行社行业属典型的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而世界旅行社发展趋势是大的旅行社在行业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比如英国旅行社业已形成航空2000、航空旅行社及托马斯三个旅行社经营商垄断80%市场份额的局面。

再以饭店业为例。我国旅游饭店业多年来一直高速增长，进入90年代以后，新建饭店的数量得到了遏制，但大批房地产项目和商住楼转入饭店业，导致我国旅游饭店业在总量上一直供大于求，在结构上则是大规模的高档饭店较多，小规模的中低档饭店较少。为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停止审批新建饭店、严格控制饭店扩建、鼓励饭店开展多元化经营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旅游饭店的供求矛盾。但由于旅游饭店的专用性较强，一时难以转入其他行业部门，加之供求缺口较大，总量和结构上供过于求的问题短期内还无法根本解决。

旅游产业不仅产业集中度偏低，而且近10年来整个产业增长速度太快，企业数量每年的增长幅度都超过旅游人数的增长幅度从而造成供求失衡。由表4-1可见，旅游产业供给能力远远超过了客源市场的开发速度和增长速度，整个产业表现出供求失衡、供给过剩的特征。

表4-1　1996—2001年旅游企业数增长与旅游人数增长情况的对比

年　份	旅游企业数（个）	增长率（%）	旅游人数（万人）	增长率（%）
1996	10913	13.8	69012.8	2.1
1997	12894	18.1	70158.8	1.7
1993	17397	34.9	75747.8	8

年　份	旅游企业数（个）	增长率（%）	旅游人数（万人）	增长率（%）
1999	20341	16.9	79179.6	4.5
2000	24574	20.8	82744.4	4.5
2001	27860	13.4	87301.3	5.5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年鉴》1997年—2002年。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企业总量得到极大扩张，使供需进一步失衡，市场集中度进一步下降，无序竞争过度，企业整体竞争力低下。但近几年，旅游过热得到了一定控制，企业集团化发展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产业自然集中度有所提高，部分企业获得了市场竞争力的较大提升。

首先，针对旅行社几度膨胀、结构极不合理的状况，国家旅游局及其有关部门下大力气进行了治理整顿，将一、二类旅行社合并为国际旅行社，对一些经营不善、效益很差的旅行社坚决予以关停，提高了旅行社的保证金数额，并实行了年检、旅行社经理与导游员资格考试等一系列措施，基本上改变了旅行社总量多、规模小、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制止了客源市场竞争中的混乱局面。而国、中、青旅及民营的春秋、康辉等旅行社的集团化步伐加快，在事实上成为影响旅行社市场竞争态势的主导力量。

此外，伴随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大型旅游企业集团方兴未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各个地区都新建了许多旅游饭店和旅游景区，大批旅行社也纷纷成立，这些旅游企业没有历史包袱，一开始就力争与国际接轨，在第三产业部门最早实行了岗位责任制、劳动合同制、员工聘任制和星级评定制度（饭店星级、景区A级和旅行社类别等），许多旅游企业推广了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并先后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些旅游企业还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实践证明，现代企业制度在旅游企业建立以后，原有的行政壁垒被部分打破，政府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极大减少，有利于旅游企业按照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要求，以资本为纽带，组建现代旅游企业集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旅游企业的集团化进程显著加快，除那些以行政手段组建的旅游集团公司外，以资本为纽带组建的旅游企业集团也开始涌现，例如上海的锦江、华亭、衡山三大旅游集团公司和山东的新立克集团公司等；集团企业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力进一步得到加强，比如锦江酒店集团、建国国际酒店公司等近两年在国际酒店集团的排名扶摇直上，2004年，锦江集团由2003年的35位升至29位，建国集团则由2003年的118位升至91位。大型旅游企业集团的出现，有利于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有利于旅游景区的整体建设，有利于旅游业资产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整个旅游业组织结构的优化。

第二，旅游产品多样，但多停留于表层开发。

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步加剧与深化，我国旅游企业已越来越注重产品差别化这一非价格竞争手段。目前，传统旅游产品逐步成熟。观光旅游、度假旅游、探亲访友等一大批传统旅游项目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能够满足不同的旅游消费者的需求。此外，现代

旅游者尤其是重复旅游者的增长，表明人们已不满足大众化的旅游消费，更加追求特殊性、趣味性和有益于健康的个性化旅游消费。受此需求变化的促动，我国旅游产品类型逐步丰富，品种多样，已从过去传统单一的观光旅游向集观光旅游、度假休闲旅游、特种旅游于一体的局面转变，旅游产品类型得到极大丰富，旅游产品与其他产业（如工业、农业等）的产品也表现出明显的渗透、延伸、融合的趋势，新兴旅游产品不断涌现。我国自1992年起已经成功推出一系列的主题旅游年，由此各种专项旅游产品也层出不穷，如会务旅游、商务旅游、体育旅游、教育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产品，以适应于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收入结构、不同文化结构的旅游消费者。

然而，大多数旅游产品仍停留于旅游资源的表层开发，属于初级旅游产品，尤其是同类旅游产品的异质性小，可替代性强，跟风、模仿现象严重，产品缺乏主题、内涵和文化。因此，为争夺客源和市场份额，价格竞争仍是主要的竞争手段。

(2) 市场行为分析

由于受旧体制的影响，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管理不善的状况仍然存在，我国不少旅游企业的自主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成为市场主体。又由于目前我国旅游业整体有效的市场环境仍未真正形成，表现在市场运作规则、市场管理手段不完善，市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缺乏强有力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手段等方面，进而对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带来不利影响。

第一，削价恶性竞争行为突出。

我国旅游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定价行为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企业对价格的影响力较小，削价竞争在多数行业、多数地区仍是主要的。这是因为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的情况同时存在。由于企业的部门分割和地域分割，使部分企业获得一定的市场垄断条件，其定价行为与市场需求相背离：如一些景观业企业，由于其所经营的资源具有自然垄断性，其定价便具有垄断性，但随着大量新的同类旅游资源出现，旅游业重复建设遽增，产品可替代性变大，景观业企业的垄断定价力大幅削弱，削价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

而在饭店业、旅行社业，由于小企业过多，造成过度竞争。这些小企业大多缺乏开发新市场的实力和能力，只好对原有市场争来抢去，不惜搞削价竞争。此外，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垄断，搞市场自我保护的封闭体系，从而引发不正当的市场竞争，并以高额回扣、虚假广告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

第二，企业兼并行为大量发生，企业集团化、集约化程度提高。

出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提升市场竞争力和降低资产风险的诱因，我国旅游业近10年的企业兼并行为频繁发生，企业集团化、集约化发展程度得以空前提高。

但由于市场主、客观环境的一些不利因素，我国旅游企业的市场重组行为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企业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受到非市场力量的制约。政府行为或长官意志仍起支配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将一些旅游企业捏合在一起，组成了所谓的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仍然隶属或挂靠于某--地区、某一行业的政府部门，企业集团和成员企业的负责人由政府部门委派，企业集团和成员企业运行的

动力不是市场规律和利润法则，而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命令或某个领导人的长官意志，个人功利动机往往引发一些非理性的决策和短期行为，从而造成极大的损失或浪费；二是旅游企业集团的发展不规范，协作联姻仍是主要形式。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许多旅游企业以契约的方式组成了企业集团，这种类型的旅游企业集团缺少血缘关系，核心企业的影响力缺乏相应的产权基础，成员企业根据各自的比较利益进行协作，集团的规模庞大但结构松散，整体优势不明显。

(3) 市场效益分析

从旅游行业的整体经济效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两个明显特征。在宏观层面，产业体系和市场规模增长迅速；但微观层面，在企业数量和总收入增加的同时，全行业利润和利润率却在一个较低水平徘徊，甚至出现负利润率的情况（见表4-2）。

表4-2　1996年—2002年旅游产业规模和企业利润及利润率变化的情况

年份	统计企业数（家）	营业总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利润率（%）
1996	10111	1106.85	46.7	4.2
1997	11938	1307.76	31.7	2.4
1998	16266	1441.39	-18.9	-1.32
1999	19243	1626.65	-20.9	-1.3
2000	24574	1992.38	22.97	0.6
2001	23760	1946.77	29.11	1.4
2002	26617	2260.66	81.05	3.6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年鉴》1996年—2003年。

3. 我国旅游业的产业结构分析

旅游产业结构（Stucture of Tourism Industry）是指旅游产业各部门、各地区以及各种经济成分和经济活动环节的构成及其相互比例关系。分析旅游产业的产业结构，在于保证旅游产业的总体发展规模和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相协调，从而有利于旅游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产业供给角度看，旅游产业是一个主要由旅游餐饮业、旅游宾馆业、旅游交通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商品业、旅游娱乐业等六大要素所组成的整合产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我国旅游产业的结构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产业结构未能合理化；二是产业高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1) 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只要有旅游行为的存在，吃、住、行、游四大要素缺一不可，因而这四类需求弹性较低的要素通常被称为基础要素，而购物、娱乐这两大需求弹性高的要素是旅游业的提高要素。在旅游业的起步阶段，旅游者的消费能力较低，对购物和娱乐的需求十分有限。在旅游业的初级阶段，基础要素的消费构成在旅游业中所占的比例远大于提高要素的消费比率。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游客消费能力的提高，特别是旅游业从观光旅游为主转化为观光、度假、专项旅游齐头并进发展之后，提高要素在旅游业收入中所占比

重会越来越大。

一是从入境旅游看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相对于旅游业发达国家来说，从我国入境旅游六大要素的构成来看，产业结构未能合理化，主要表现在购物所占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还有相当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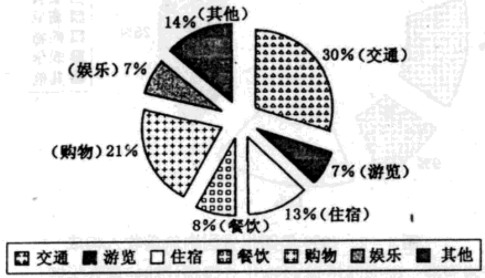


图 4-1 2002 年国际旅游收入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旅游年鉴》2003 年数据绘制。

如上图的消费构成中，吃、住、行、游需求弹性低的四大要素占消费总量的 58%，其中长途交通（主要是机票）的支出占去了 25.8%，明显偏高，表明中国的航空机票价格太昂贵，旅游门槛太高，这已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障碍。而娱乐仅占 7%，购物仅占 21%，其他服务（如电信、金融、保险等）仅占 14%，这些需求弹性高的部门在游客消费构成中所占比例太小，明显反映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在旅游业发达国家，游客在购物一项的消费支出一般占旅游总消费量的 30%以上，如美国等已超过 60%，游客的娱乐支出则往往超过 20%。

很显然，入境游客在购物、娱乐等部门的消费较少，并非是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是我国产业结构各要素比例配置不够合理、产业要素的有效供给不足所致。

二是从国内旅游看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省是西部国内旅游业发达省份之一，1999 年其国内游客的消费构成如图 4-2 所示：

其中，吃、住、行、游四大要素占游客总支出的 66.26%，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反映了四川省旅游业的基本情况：一是观光游客占绝大多数；二是旅游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特别是游客在娱乐消费和购物消费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不是游客的消费能力问题，它反映出四川在旅游产业结构上娱乐业和旅游商品业发展水平低下，没有让游客满意的产品供应市场。

我国不同地域的产业要素结构也是不平衡的。如将东部旅游业发达地区与西部旅游业欠发达地区加以比较，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西部地区旅游业六大要素的消费结构中，游客仍然将主要的花费用于餐饮、住宿、交通、游览，而购物、娱乐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与东部相比有较大差距。这一方面反映了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外地游客去后难以购买到如意的旅游商品和娱乐产品；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地区的主要客源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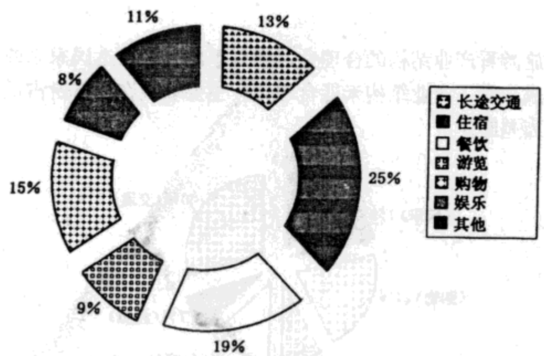


图 4－2 1999 年四川省国内旅游收入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省 1999 年旅游统计抽样调查绘制。

（一级市场）的消费能力有限。

由以上入境和国内旅游的要素构成来看，我国旅游业产业结构离合理化要求还有相当差距，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的大背景，同时也是我国旅游业产业结构现状的反映。目前，无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国内旅游，游客的消费主要停留在六大要素的基础要素层面上。国内旅游是游客消费能力的现实反映，而入境旅游则体现了我国旅游业体制、制度上的不合理。

(2) 旅游产业各要素的现状

从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角度看，我国旅游各要素行业的自身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产业内部诸如饭店业、交通运输业、娱乐业等的水准较低，结构不太合理，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旅游景观业未形成体系，旅游产品及产品组合单一。

旅游地仍以观光类型为主，度假型旅游地的开发不能完全满足游客的需求，专项型旅游地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老旅游地产品结构不合理，单一而不成体系，产品组合的深度、广度、长度都较为欠缺。

第二，旅游交通运力不足，制约了产业规模经济的形成。

突出表现在：民航机型小，机场建设严重滞后，国际航线和航班增长缓慢；火车客运超负荷运行。旅游集散城市火车起点车次不足；区域内公路特别是通往旅游区的公路等级低、路况差、不安全．因素多；水上旅游航线还停留在设施陈旧、航速缓慢的较低水平。

第三，旅游接待设施与旅游业发展速度不相适应。

一是酒店主要分布在大都市，竞争激烈。相反在客流量大的旅游胜地，特别是著名风景区所依托的中心城镇，星级酒店明显不够，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稀少。酒店业还缺乏基于细分目标市场定位的合理布局。目前，酒店业供给的产品多为观光型酒店，缺乏

商务宾馆、行政宾馆、会议宾馆、度假饭店、度假公寓、青年旅馆、汽车旅馆等一系列的产品体系。二是餐饮业量大、面广、质低，缺乏有特色和文化品味的产品，导致餐饮业竞争力不强。三是娱乐设施不完善，娱乐项目单一。在景区，适宜家庭、儿童娱乐的康乐产品太少，地方特色的娱乐游戏活动没得到很好的挖掘。

第四，旅游商品适应性欠佳，在游客消费构成中所占比重偏低。

旅游商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研发能力不强、缺乏吸引力；商品的主题性、差异性、系列性都很低，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摆脱外贸附庸的地位。

第五，先导行业不够突出，经济效益不佳。

目前，旅行社业在布局上“小、散、弱、差”的状况特别突出，缺乏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从组织体系上看，将旅行社划分为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是按经营范围来划分的，而按市场法则和国际惯例，应将旅行社按旅游批发商和零售商来划分，这就导致中国旅行社开拓旅游市场特别是国际旅游市场的能力很低，无法在国际国内形成庞大的分销网络系统。

三、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得以迅猛发展，但仍面临着诸多发展障碍。旅游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其发展必然要在与其他产业的互动关联中实现。因此，构成旅游产业发展的障碍不仅来自旅游产业内，也来自旅游产业外。但这里只讨论阻碍旅游产业的产业内因素，并将其归纳为观念障碍、结构性障碍、制度障碍。

1. 观念障碍

产业观决定产业发展模式。对旅游业的产业地位、特征、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认识，仍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水平上，从而导致许多旅游资源宏观配置和微观经营失误。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误区：

(1) 对“旅游业是无烟工业”的绝对认识

从理论意义上讲，“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和类似的“旅游是非耗竭性消费”并不符合旅游的产业发展实际。我国近20余年的旅游开发中出现的大量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被破坏性使用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一些决策者仍以上述观念为支配，以“一次性投入，持续性耗用”为模式，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很少考虑生态负荷和文物负荷问题，更不用说对旅游环境和资源保护进行持续投资了。我们认为，越具垄断性、稀缺性的旅游资源越具有吸引力，同时往往越具易损性。因此，越是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旅游资源，就越应加强保护工作。所以，对旅游产品生产者而言，保护环境和资源应当视为一种再生产行为。

(2) 旅游业是低投入、高产出的产业

这种论点在我国旅游业的理论界和实业界曾十分普遍，直到现在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但我国旅游业短短2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说法的片面性。从旅游开发角度来讲，旅游业的投入不仅包括资本、劳务和其他可再生资源，还包括大量不

可再生资源（如文物古迹、珍稀物种等），其价值甚至是难以量化的，许多旅游资源实际上是被无偿使用的公共物品。所以所谓的“低投入”和“高产出”仅仅是片面地考虑了旅游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内部成本”和“内部收益”，而忽视了其“外部性”，表现在重产值、轻效益，重开发、轻保护的粗放型旅游开发决策定势上。如果将旅游看作是一个必须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那么旅游产业就是一个“高投入就高产出、低投入就低产出、不投入就不产出”的产业。

（3）对“大旅游”的片面认识

旅游产业是以旅游活动为中心而形成的配置型行业，由旅行社业、饭店业、交通运输业、娱乐业、零售业和景观业等构成。同时，旅游业又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交叉产业，与其相关的行业和部门包括行政管理、海关、邮电、文教、卫生、园林、艺术等。根据产业联系效应理论，旅游产业是一个后向联系（Backward – Linkage）较强的产业，其发展会对相关产业产生较强的刺激作用。从上述角度认识旅游产业的高度产业关联性，提出“大旅游”的概念是十分正确的。然而，旅游业的联动作用是有其条件限制的，它取决于资源的比较优势及其他相关因素。目前，有许多决策者片面地理解“大旅游”，不顾自身条件，将旅游业置于不恰当的产业发展序列上，在旅游发展中搞“跑步经济”，过分强调旅游产业的“爆炸效应”，盲目上项目，机会成本很高，投资回报则很低。

（4）对旅游产业集中方式的陈旧认识

我国旅游产业中普遍存在的“散、小、低、差”诸问题，需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得以部分解决，即通过提高旅游产业的集中度来提高旅游产业的规范程度、集约程度和经济效益。但多年来我国许多企业集团的形成，基本上是基于行政命令。政府对旅游集团公司的经营活动享有很大的支配权，并据此对旅游资源和旅游生产要素的配置与使用施加过多影响，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以违反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产业集中方式而形成的旅游生产要素聚集体是无法克服旧有矛盾的，反倒有扩大旧矛盾、产生新矛盾的极大可能。这种倾向的产生与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认识定式有直接关系。此外，我国旅游产业的集中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突破地域、部门、所有制界限，因此难以催生出真正的富有效率的市场主体。这是传统计划体制下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传统思维在旅游产业集中方式上的具体表现。

（5）对旅游开发市场导向的狭隘认识

旅游资源开发是旅游资源商品化的过程。对开发主体而言，其导向必然是市场需求，但这里所指的需求既包括高层次旅游者的需求，也包括其他层次旅游者的需求；既包括现实旅游需求，也包括潜在旅游需求。但某些旅游产品经营者和旅游产品开发者则单纯以低层次旅游消费需求和现实旅游需求为开发导向，不重文化内涵的深层次开发，迎合较低需求层次的旅游者，结果造成旅游景区景点建设的低俗化趋势。旅游资源的开发应是一种不完全市场导向的开发行为，旅游开发时必须兼顾旅游经济效益、人文效益、环保效益，单纯以市场为导向，势必造成景区景点过度商业化的后果，最终使景点的市场号召力也丧失殆尽。

2. 结构性障碍

我国旅游业发展所积存下来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对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客观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结构不合理的巨大资产存量

我国目前的旅游业资产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激烈竞争使得行业利润率不断下降，造成大量资金沉淀，许多小企业的资金无法向大企业转移，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

(2) 产业结构性失衡突出

伴随着我国旅游业开发的持续升温，旅游投资与建设的随意性、盲目性和重复性造成旅游业发展的地域发展失衡、要素结构失衡和产品结构失衡，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加了难度。

3. 制度障碍

旅游产业发展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特点相符的旅游管理体制，这就必须对原有的旅游管理体制进行突破。现行旅游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计划体制下建立的，具有很强的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特点。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条件下，这种旧的旅游部门管理体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旅游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归纳起来，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旅游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产生负面影响：

(1) 旅游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主办”

中国多年来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基本走向还是局限于政府系统内部，未能完全走出政府配置资源的框架，所不同的是由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中央计划导向的中央政府直接配置方式变为如今以市场为导向的各级政府的直接配置方式，由一元主体变为多元主体，但多元主体的核心仍是政府，旅游管理体制仍有很强的计划色彩。各级政府只顾“内在经济”发展，不顾“外在经济”发展，外在不经济相互转化，外在不经济费用趋高趋多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和本位利益争相扩大旅游规模，由此形成了旅游经济微观方面的规模不经济，宏观方面的结构不经济。

(2) 旅游资源管理体制的“多头领导”

许多旅游资源仍处于条块分割的分散管理、交叉经营之下，一旦出现问题难免推诿扯皮，其直接后果是风景区资源遭到破坏。特别是在自然与人文复合型景区内，多头管理、交叉经营、划地为牢的现象更为普遍。因此，要使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就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协调组织机构。

(3) 旅游法制建设的滞后

依法治旅是旅游产业管理活动的最高层次。只有先用法律界定出制度，管理主体才能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而公平的调控。目前，我国旅游法制体系仍有许多方面未能与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使用的要求相适应。首先，立法有待进一步明细化。笼统的立法会给法律执行的主客体都造成许多困难，会给执法不严和有法不依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其次，进一步规定旅游者的法律责任。我国旅游法律体系中对于旅游者破坏旅游资源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较少且较为笼统，较多地侧重

于对资源开发、经营行为的约束。但事实上，对资源的破坏因素中，旅游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长江三峡漂浮的垃圾、黄山山谷中的垃圾都是游客造成的。低层次的、缺乏资源保护意识的游客对我国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构成了威胁。

四、旅游业发展前景展望

1.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

在未来15年，中国旅游业将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前景令人乐观。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三个市场协调、快速发展

在今后5到10年，中国旅游业仍将以高于GDP的增速发展，产业整体效益继续提高，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三个市场得到协调发展。在国内旅游方面，旅游人数将继续快速增长；入境旅游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而在出境旅游方面，随着向我国公民开放的境外旅游国家和地区的增加，出境旅游需求将极大得到释放，出境人次预计将飞速增长。

二是市插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大幅提高

随着我国企业产权改革的继续深入，企业重组并购行为会更加频繁，这些都将为中国旅游业催生出一大批真正具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同时，各级政府对旅游业的微观经营活动的干预会极大减少，加快向产业宏观调控主体的角色转变，意味着旅游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地方保护势力将随着行政干预力的减弱而削弱，企业进出壁垒将得以降低。因此，今后的旅游企业所面临的是一个比现在更为完善、有效的市场环境，市场所发挥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也将获得更大提高。

三是西部旅游业的崛起，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有望得到改善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十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推进，为西部旅游业消除了关键性的外部瓶颈，西部地区丰富而优质的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潜力巨大，这不仅为我国旅游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将缓解我国东西部旅游发展不平衡这一突出矛盾。

四是与其他产业的横向联系加强

在21世纪开始的前几年，我国旅游业萌生了一个新的特征，即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渗透、融合，比如与工业、农业的双向融合，催生出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等新兴旅游业态。这一特征将在今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成熟。这不仅体现在新兴旅游方式的涌现上，也能使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实现优势互补、共利多赢的良性互动的局面。譬如，旅游业借助互联网、信息业的技术，能提升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等等。

2.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及我国旅游专家的预测，在未来10～20年间，我国旅游产业将呈现出如下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第一，旅游产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各地区旅游产业定位将更加准确。

我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将进一步提高，综合发挥多方面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旅游业总产值对全国 GDP 总值的贡献将继续扩大。一些地区的旅游业的主导性地位将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随着旅游开发稳定、有序的逐步推进，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旅游开发建设的指导性进一步加强，一些地区将对旅游业的产业地位与定位重新认识，并加以调整。部分地区可能将旅游业作为新兴的增长点，而不是盲目地将其列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定位将更加准确，在整体国民经济中找到自身最适宜的位置与发展序列。

第二，中国将成为全球旅游产业发展的热点国家。

据预测，到 2020 年，欧洲虽然将继续保持世界最大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但其旅游业的年均 3.1%的增长率将低于世界旅游业平均增长率，占世界市场份额也将从 59%降为 45%。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旅游业将以年均 7.0%的速度增长，超过年均增长率为 3.8%的美洲，成为世界第二大目的地市场，占世界市场份额也将从目前的 18%上升为 2020 年的 27%；非洲、中东、南亚的市场份额则分别为 5%、4%和 1%。最近 10 年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缓慢增长的趋势，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则将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旅游业发展带来良好的前景，各种商贸旅游、会议旅游将在这一地区兴盛起来。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者也会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有人预测，本世纪前 20 年，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游客数目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中国是这一地区最令人振奋的国家，本世纪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客源国和最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第三，旅游目的地的竞争趋向于整个环境的竞争。

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竞争这一趋势已渐露峥嵘，今后会更加明显。旅游业发达的欧美以及成为后起之秀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地区），在竞争中取胜的很大一个筹码就是有一个优良的大环境。换言之，就是其政府重视，社会各界支持，全民参与。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以简捷的出入境手续、良好的治安环境、美丽洁净的游览点、方便的交通和通讯、称心如意的购物场所、优质的服务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让游客宾至如归。旅游不仅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游山玩水，更主要的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旅游业发达与否，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形象，代表的是一个更广阔的活动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

第四，旅游业区域竞合化程度加深，旅游形式呈多元化态势，向多层次发展。

这一趋势指将某一特定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根据区域内和周边地区的旅游资源、交通条件、地理位置，按照旅游经济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全面安排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景点、设施的建设和旅游商品的生产与供应，其目的是为了优势互补，共谋发展。相对于以往的相互争夺客源的恶性竞争，这种既竞争又通过合作而使各方均能得益的区域联合，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观光旅游，继之而起的休闲度假旅游、文化旅游、学习旅

游、探险旅游、商务和会议旅游等方兴未艾。随着专项旅游的发展，个性化的散客旅游将进一步得到强化。近年来，散客已占70%，这就要求旅游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创造更方便的环境和条件，促进散客游、家庭式旅游、背包旅游等多形式更大的发展。

第五，旅游的宣传促销走向信息化时代。

这一趋势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电脑技术的进步。目前，在西欧、北美发达国家，产业的分化已成为一大趋势，这一趋势导致了在原有三大产业结构中，分化出第四产业——科技信息产业，多媒体时代已向我们走来。未来的旅游产品推销、旅游市场推广将在国际互联网上一较高低。我国正在积极推出“金旅工程”，一旦条件成熟，也将加入国际网络，使中国旅游真正走向世界。

第六，人性化、个性化旅游成为主要发展方向，分时度假和产权酒店业将成为新亮点。

经过市场化的发展，消费者将会相应成熟，消费者权益至上的观念将深入人心，也将成为旅游经营者立足市场的根本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是旅游产品、旅游活动必须考虑人本身的需求，以人为本，走向人本关怀。“以游客为中心”将成为贯穿中国旅游发展各方面的主流观念。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个性化将达到最大程度的弘扬。在性别、年龄、职业等传统细分标准的基础上，旅游者被进一步分化为若干以兴趣、爱好、背景相区分的“族”。个性化旅游需求推动中国旅游走向主题化。主题旅游线路、主题旅行社、主题旅游宾馆度假村、主题性旅游项目将蓬勃发展。

分时度假和产权酒店将成为旅游消费的新亮点。所谓的分时度假（Timeshare 或 Vacation ownership 或 Holiday ownership），最初是指人们在度假地购买房产时，只购买部分时段产权，几户人家共同拥有一处房产，共同维护。分时使用的度假形式，后来逐渐演变成每户人家在每年拥有某一时间段的度假地房产使用权，并且可以通过交换系统对不同房产的使用权进行交换。产权酒店是分时度假产品的一种特殊模式，是指投资者买到酒店设施的所有权，除部分时间自己使用外，统一将其他时间的住宿权委托酒店经营，自己获取红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消费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它将成为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新增长点。

第七，旅游市场将呈现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新格局。

加入WTO后，中国的旅游企业分化将大大加剧，大规模、集团化和小型化、特色化同时成为两个发展极。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实行股份制改造将成为旅游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连锁化、品牌经营成为发展方向，质量价格比将继续提高。

第五章　信息产业

电子信息技术（IT）产业不是一种完全新生的产业，它是在以往微电子产业、通信产业、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软件产业的基础上，随着人们日趋重视信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尤其是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形成的。而计算机网络的空前普及和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推动了 IT 产业的迅猛发展，它具有技术含量高、能耗低、自身技术更新快速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强等特点。

一、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1. 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支柱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信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产业规模总量迅速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近 10 多年来，信息产业一直保持 2 至 3 倍于 GDP 的速度增长，从 1989 年到 2001 年，全行业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和出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 29%、27%、24%和 30%。主要电子产品的产皇大幅度增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上缴国家税金、实现利润等指标均位居各工业部门前列，其中通信、电子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989 年的 1.4%提高到 2001 年的 4.2%。2001 年电子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89 年的不到 5%上升到近 10%；规模总量的快速扩张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信息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20%，出口增速长期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增速 16 个百分点（1989 年至 2001 年），2001 年对外需的贡献率达到 58%。2003 年全行业完成产品销售收入 18800 亿元，比 2000 年翻了一番。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的产业增长速度分别为 20.1%、17.9%和 34.3%（见图 5－1），信息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三。2003 年，信息产业的经济效益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全年实现利税总额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同比增长达 16%，其中上缴国家税金总额超过 300 亿元，同比增长为 10%（见图 5－2）。与国内其他产业相比，2003 年信息产业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高出全国工业发展速度 10 个百分点；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全行业完成产品销售收入继续领先全国工业各行业（见图 5－3）。近年来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增加。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信息产业全行业从业人员分别为 301.7 万人、326 万人和 408 万人，增长速度分别为 2.3%、8.3%和 11%。其中 2003 年电子制造业从业人员 349.5 万人，比 2002 年增长了 7.2%；软件业 59 万人，比 2002 年增长了 18%（见图 5－4）。

电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跨越式的快速增长。全国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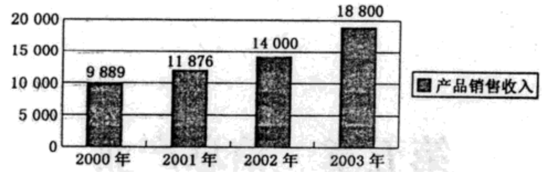


图 5-1 信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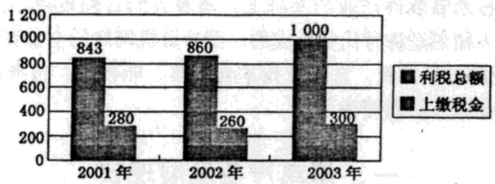


图 5-2 信息产业实现利税总额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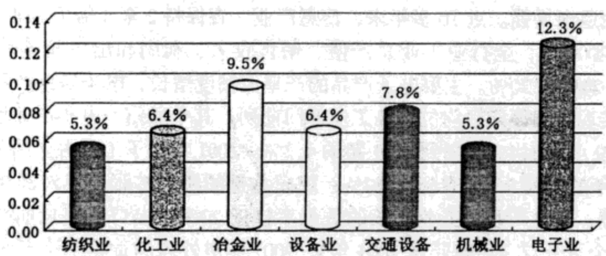


图 5-3 各行业规模占全国工业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

了“八纵八横”格状型国家光缆骨干网，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据通信用户增长迅速。我国固定电话用户已达到 2.18 亿户。我国手机用户已达 2.12 亿户。目前我国稳居全球电话用户数第一的宝座。同时我国的网络用户发展势头强劲。1995 年以前，我国的上网用户数几乎为零。从 1997 年开始，上网用户数以每年近 2 倍的速度递增，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全面高速增长时代。2003 年 1 月 30 日，国内网民已达 6000 万户，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国家。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域名数为 1187380 个，全国网站数为 595550 个。截至 2004 年 2 月，全国在线数据库的总量为 169867 个，其中企业网站拥有的在线数据库数量最多，占全部在线数据库的 54.3%；其次是商业网站拥有的在线数据库，占全部在线数据库的 14.1%；其他非赢利机构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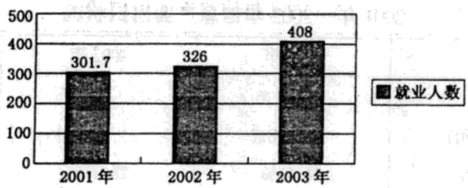


图5-4 2001年—2003年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情况

资料来源：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

站拥有的在线数据库排第三位，占全部在线数据库的9.3%。

信息产业不仅自身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作为新的技术基础推动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等。同时，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这些相关产业可以同社会生产的各行业和各个领域相结合，使得电子信息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极强的渗透性。而其创新活动会迅速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扩散和渗透，贯穿于所有经济领域，应用于整个经济过程，成为改造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基础。这种作用又会促进各产业的不断创新，使得信息产业不断地自我发展和革新，然后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一种良性循环的效应，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2. 信息产业出口额迅速增长，已经成为出口主力

2002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成绩喜人，全年进口、出口及贸易额分别达到851.3亿、920.4亿和1771.7亿美元，三者均创历史新水平。其中电子信息产品出口更是一路攀升、亮点频现，2003年，信息产业的进出口继续增加，继续保持全国出口行业的首位，对我国外贸出口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年电子产品出口1420.9亿美元，增长54.38%，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增幅19.8个百分点。1991年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在全国外贸出口中的比重仅为6%，1998年为14.7%，1999年为20%，2000年为22.1%，2001年为24.4%，2002年为28.27%，2003年该比重已升至32.41%，几乎占全国外贸出口的三分之一，对全国出口增长贡献率为44.4%，继续成为拉动全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力量（见表5-1）。据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统计，近年来高新技术出口增长的90%来自电子信息产品。从电子信息产品本身看，以组合收录机、黑白电视机、电话为代表的传统电子产品出口比重不断下降，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如手机、基站、程控交换机、激光打印机、不间断电源、路由器等出口快速增长，比重不断加大。2003年各大类电子产品出口累计情况见图5-5。

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也逐渐加强。我国各电子企业不断加大开拓国际市场力度，不断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使我国信息产业的海外研发中心规模以及产品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2003年全行业电子家电类产品前5家、通信类产品前10家以及软件业前15家等生产企业均在国外建有研发中心或生产线，其海外市场的收入占本企业的总收入大部分都超过20%以上，为全行业出口增长做出了新的贡献。

表 5－1　　2001 年—2003 年信息产业出口状况

项　目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全国出口（亿美元）	2661.6	3255.7	4383.7
信息产业出口（亿美元）	650.2	920.4	1420.9
信息产业出口比重（%）	24.43%	28.27%	32.41%
全国出口增速（%）	6.61%	22.32%	34.65%
信息产业出口增速（%）	17.79%	41.56%	54.38%

数据来源：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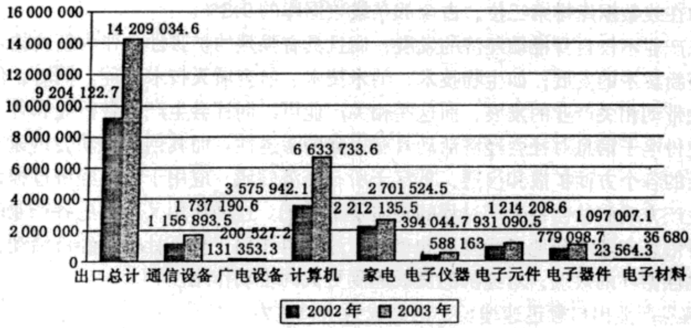


图 5－5　2003 年各大类电子产品出口累计与去年同期比（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CCID。

3. 国际信息产业向中国迅速转移

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通信、计算机及软件产业为主体的世界信息产业在激烈竞争和产业结构升级中高速发展，其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 8%—10%，平均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IT 产业的发展历程经历过生产据点从美国迁徙到日本、日本转移到韩国、韩国又转移到中国台湾若干个阶段，现在呈现出由中国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的趋势。事实上，半导体产业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从全球竞争观点来看，业者自然会寻求更具优势的地方作为发展地。目前美国新经济发展减速，全球 IT 跨国公司利润大幅度下降，而中国、印度等 IT 市场潜力巨大且劳动力成本低，促使 IT 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由于跨国公司内部经营模式和战略不同，转移的方式做法也各有千秋。随着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积极为产业转移作准备，向这些地区的转移速度进一步加快。比如说信息技术产业 100 强企业中的 90%已在华建立企业，摩托罗拉、诺基亚、宏基电脑等公司已将我国作为其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并带动相关配套企业来华投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目前形成了以整机生产为主体、电子元器件为基础、配套

齐全、规模庞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体系，如东莞的台式微型计算机产业链，北京、天津的手机产业链，苏州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链等。爱立信的英国、马来西亚、巴西工厂都宣布关闭，而在中国扩大手机生产能力。诺基亚重点扩大的两个生产基地是韩国和中国。因为这里的投资环境更好，劳工更便宜，距离消费市场更近，因此成本更低。创新、利益、价值、需求这些调整的根本动因使转移的高技术含量越来越多，产业迁移到新的栖息地使全球IT产业分工正经历着历史性调整。

4. 信息产业集群现象凸现

电子信息企业集群通过地理集中和产业组织优化，可以获得生产成本优势、以质量为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产品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提高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要素流动、共享服务和基础设施等，从而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向周边辐射，进而带动全国发展。美国的硅谷、英国的苏格兰科技区、印度的班加罗尔、中国台北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区、法国的昂蒂布、芬兰的赫尔辛基、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等都是信息产业集群的成功典范。

伴随我国信息产业规模的扩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部分中西部地区四大信息产业基地已经初步形成（见表5－2），这些产业基地的产业链比较完整，具有相当的规模和配套能力。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最高的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密集地区。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主要优势领域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家用电器、视听产品和基础元器件；产值占全国3成多，其中新型陶瓷电子元器件基片产量占全国一半，智能化、节能环保型家电占全国产量的6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一个重点投资地区，囊括了从芯片到外壳的所有计算机零部件生产，2002年长江三角洲信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532亿元，占全国的25.5%。环渤海湾地区则逐步形成了北京、辽宁和山东的软件产业集群，天津的移动通信产业集群，胶东半岛的家电产业集群。部分中西部地区信息产业军工电子比重大，具有自主研发、自成体系的特点，产业结构中加工装配的成分相对较低，但附加值较高。

表5－2　　目前我国信息产业集群

区域名称	重点城市	具体行业及重点产品
珠江三角洲	广州、深圳、东莞、中山、顺德、珠海	通信、计算机、家用电器，视听产品
长江三角洲	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	集成电路制造、封装等，通信、计算机装配、电子元器件类产品
环渤海湾地区	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大连、青岛	通信、计算机、集成电路设计，微电子、软件、家用电子电器类产品等
闽东南沿海	福州、厦门地区	计算机等

区域名称	重点城市	具体行业及重点产品
成渝绵地区	成都、重庆、绵阳地区	彩电、软件、光电子、通信设备
西安—宝鸡—咸阳地区	西安、宝鸡、咸阳地区	彩管、彩电、冰箱，程控交换机、偏转线圈
中南地区	武汉、长沙等	光电子、彩管等显示器件

资料来源：赛迪 IT 经济研究所，http://www.iteconomy.cn/3redian/3-5zonghe/3-5-6.htm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主导企业和多级零部件供应企业分工高度细化的产业分工方式，能够实现即时供应，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正逐步发展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重要的世界生产制造基地。

二、信息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 研发投入低，导致核心技术和产品不足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更加注重企业的研发能力，产品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一些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取得了长足进步。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提升逐渐明显，不仅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向我国的进入和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自主原创技术的局部突破（如 TD-CDMA 标准）和一些创新型高技术公司的活跃与成长。但是我国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仍然过低。信息产业是高研发投入的产业，而且研发的投入有越来越高的趋势。目前，我国信息产业在研发上的投入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世界上一般软件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其销售额的 10%~20%，而我国软件行业的研发经费平均占销售额的 3%~4%。过低的研发投入不利于企业开发有自主版权的新产品。根据世界经济论坛、Insead 和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2003 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显示，2002 年全球 83 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的信息技术综合排名列世界第 1 位，美国、新加坡、瑞典、冰岛 4 国分列第 2 到第 5 位，我国的信息技术综合竞争力在世界上的排名列第 43 位。

2. 电子信息企业综合实力不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信息产业一直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但仍然缺少一批主业突出、创新能力强、有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尚未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以众多中小企业为其配套协作的企业群体。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差距仍很明显。从营业总额来看，2003 年国际 IT 百强中规模最大的 10 家公司总营业收入为 3429.16 亿美元，我国 IT 百强的总营业收入为 647.3 亿美元，仅相当于前者的 19%，不及规模名列第 3 的 VERIZON COMM 公司（675.29 亿美元）的营业总额。

3. 信息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

在全球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信息产业以组装和来料加工性质为主，仍然处于价值链

的低端。例如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形成了两个全球性的电脑采购中心，电脑的几乎所有组配件都可以在此寻找到供应商，但两个地区基本上都是以组装和加工为主，很少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个人计算机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优势只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但这种发展模式受到全球经济影响波动很大，在2001年全球信息产业波动加剧后，广东的发展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地区，以这种方式发展信息产业对于地区经济来说应该是一种可选的发展道路，但从国家战略来讲，这种发展方式同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主线并不相符，仅仅依靠这些数字上的成绩企图来证明发展的成功是危险的。

三、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产业分工继续深化，产业价值继续转移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信息产业已经形成明显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已经占据研究开发等高端领域，而落后国家或地区则只能选择技术要求较低的领域介入。这种分工趋势使各国在行业利润分配中处于不同位置。由于控制行业多数标准和掌握行业绝大多数专利，发达国家在行业利润分配中占较高比例，而其他国家则在行业利润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分行业来看，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基本上被美国垄断；真空显示器行业基本上被韩国和日本垄断；通讯行业则被欧洲和美国垄断。

价值转移（Value Migration）是指收益率和市场价值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公司之间乃至公司内部等层面转移运动的过程。Slywotzky（1996）首先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价值转移现象，认为价值转移现象是由于顾客需求转变或交易方式改变而导致现存企业如果要在市场上继续保持或提高其产品或公司的价值时，必须因外部环境改变而重新设计适当的经营模式或战略定位，避开竞争对手的威胁与挑战，以争取继续成长的机会。Slywotzky（1997）又提出了利润区（Profit Zones）的概念。利润区是一个可为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的经营活动范围。Slywotzky认为利润区是一种在经过核心能力培育与经营战略选择之后，一个可持续为企业带来巨大价值的商业经营方法或市场、产品区域。而无利润区（No－profitZones）是企业的“黑洞”，资金投入之后，不会产生利润。当外部因素如科技进步、潜在竞争对手涌入、需求等因素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产业价值转移现象，进而导致产业的利润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昨天的利润区变成今天的无利润区。因此企业家必须前瞻性地把握这种变化，迅速地调整企业战略，让企业运作保持与利润区的变动同步。基于价值转移和利润区理论，Slywotzky等（2000）进一步从各产业演进型态归纳出30种不同经营模式的变化轨迹。

Slywotzky（1997）从由外向内的现代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探讨了产业价值转移和战略性的企业设计，承立平、洪文隆（2002）在Slywotzky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IC）产业的剖面，研究了IC产业1993年到2001年间设计、制造、封装测试3个子产业间的版图消长现象与研发活动投入水准的相关变化，发掘并归纳整理了台湾地区IC业界近10年发展的价值转移类型。

把IC产业价值链进行分解，可以粗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3个主要阶段。IC

设计是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上游部分，投入资金成本最低但行业利润率最高，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IC制造是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中游部分，投入成本最高具有中等的行业利润率，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封装测试是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下游部分，属于资本投资大且偏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Slywotzky等（2000）认为全球IC产业过去完全整合的经营模式已经由价值链的分解而趋向专业分工的模式，产业运作方式也由上下游整合的IDM（Integrated DeviceManufacturer）模式逐渐蜕变为将制造、封装业务外包，再专心将企业资源投注于设计业务的模式。

承立平、洪文隆（2002）的实证分析认为台湾地区IC产业的发展轨迹不同于Slywotzky（2000）提出的价值链"解构模式（Deintegration Pattern）"，而是由技术层次较低的下游IC封装测试业务延伸到制造端，再发展至IC设计领域，产业价值创造重心呈现出逐渐向上游IC设计转移的现象。承立平、洪文隆认为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台湾IC制造技术在逐渐成熟后，逐渐退居为次要的价值创造来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由于市场变化快速，IC设计公司若能充分利用研发设计实力突显其产品规格与功能，快速抢占市场，将取得更大的获利潜力。台湾地区的IC设计业者为了与美日等强大的IDM竞争，大多数以低价的策略切入逐渐成熟的缝隙市场（Niche Market）。缝隙市场规模较小，专业化程度较高，因此适合于擅长发挥"成本、技术、速度"特性的台湾业者并提高学习效果，这些地区IC设计产业公司并不直接涉及需要庞大资金投入的制造设备投资，而是运用累积的产品与电路设计的特有技术诀窍，通过产品的形式在市场中获取利润。

随着产业分工的逐步深化，信息产业的价值再转移。在"摩尔法则"这一"行路图"的指引和强迫下，集成电路技术迅速发展，系统设计者不断寻求产品更短的上市时间、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成本，IC产业在21世纪已进入系统级芯片（SOC，system－on－a－chip）时代。SOC的出现，导致IC产业进一步分工，出现了系统设计、IC设计、IP模块、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和加工等各种专业。这些分化已经明显地带有模块分解的特征，随着IC产业分工深化和模块的分解，IC产业的价值也在进一步转移。同时，随着SOC芯片的整合趋势的凸现，IC产业的制造加工、封装、测试等子产业的复杂性也持续增加，从而带动了整个产业体系的提升。

2. 模块的虚拟再整合的产业组织模式将成为主流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产业价值链和价值模块不断地分解，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演进。伴随着价值链和价值模块不断分解的过程，信息产业的组织结构模式先后经历了一体化（Integration）、价值链整合（Value chain integration）与虚拟再整合（Virtual re－integration）三个阶段（见表5－3、图5－6、图5－7）。下面以IC产业为例探讨信息产业的组织结构的变化。

表 5-3 信息产业整合模式的演进

时　期	20世纪70年代之前	20世纪70—8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	21世纪
硅片尺寸	1~4英寸	5~6英寸	8英寸	12英寸
产业整合模式	一体化（系统公司）	一体化（IDM）	价值链整合	模块化的虚拟再整合
新兴地区	美国	日本	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	中国（?）
分包战略	部门间的协作	OEM	ODM、DMS	EMS

资料来源：根据蔡南雄（2003）的表改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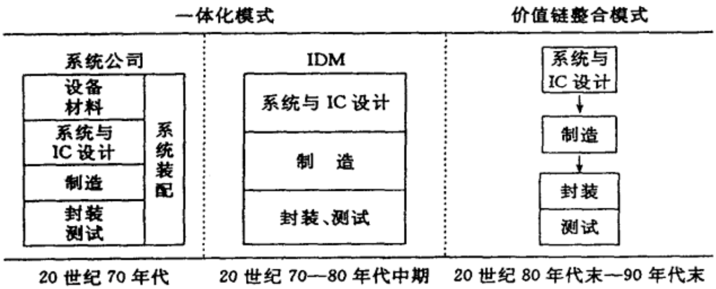


图 5-6　IC产业的一体化模式和价值链整合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蔡南雄（2003）的图改制。

（1）一体化整合模式

自1958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I，Texas Instrument）发明第一块半导体集成电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IC产业属于一体化的整合模式。一体化的整合模式又可以划分为系统公司时代和整合组件制造公司（IDM）时代两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IC产业还没有从电子、计算机产业中真正独立出来，但是已经有了集成电路的雏形。在这一阶段，系统整合公司要自己设定系统的规格，生产所需要的各种部件，并完成系统的最终组装。例如，IBM和其他电脑主机制造商的机型都是互相独立的，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操作系统、处理器、辅助设备、应用软件等，IC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等都包含在这些零部件的制造过程中。只有到1964年IBM推出了提高电脑零部件之间的兼容性的模块型电脑（360系统）后，集成电路才逐渐从电子、计算机产业中分化出来。

20世纪70—80年代中期，整合组件制造公司（IDM）开始兴起并逐渐占主导地位，使IC产业真正从系统公司中独立起来。这一阶段的企业以Inter、TI为代表，其业务过程涵盖系统设计、IC设计、IC制造和封装测试，主流产品是微处理器、存储器以及标准通用逻辑电路。IC设计往往只作为附属部门而存在。IC产业仅处在以制造为导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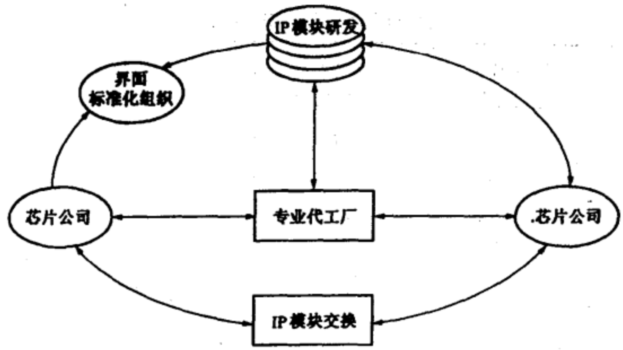


图5-7　21世纪IC产业的虚拟再整合

资料来源：根据王迎春、吉利久（2002）的图改制。

初级阶段。

（2）价值链整合模式

20世纪80年代末，原来一体化的IC产业结构逐渐解构（Dis-integration），逐渐形成了设计业、制造业、封装业、测试业独立成行的局面，向高度专业化方向发展。1987年台湾集成电路公司（TSMC）的创立，是价值链整合模式开始的标志。90年代晶圆代工（Foundry）企业和不再拥有生产线的IC设计公司（Fabless）迅速发展，使IC产业价值链发生了显著的裂变和解构。Fabless灵活应对市场的设计能力与Foundry优质的代工服务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价值链整合的产业模式实现了迅速的成长。

（3）价值模块的虚拟再整合模式

在世纪转变之交，IC产业的分工继续发展，价值链继续裂变，出现了由第三方提供的、经过验证的、可重复使用的各种IP（Intellectual Property）模块。IP模块的出现为IC设计公司、制造公司及系统设计公司缩短IC产品上市周期做出了重大贡献（朱瑞博，2003）。IP模块的重复使用和SOC芯片技术的发展使IC产业逐渐形成了以代工厂为核心，将EDA工具、库、IP模块、加工、封装、测试等公司构成的一个紧密的相互联系的网络，为用户提供完整统一的解决方案，构成一种“虚拟”的整体，即虚拟再整合的产业模式（见图5-7）。王迎春、吉利久（2002）认为这种虚拟的集成模式比价值链整合的分层关系具有更高的生产率。IP模块已经成为虚拟再整合和IC产业发展的催化剂。

标准化是模块重用的关键问题（朱瑞博，2003），社会联系和交叉投资则是IC产业虚拟再整合的主要机制。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同时使虚拟再整合模式中的每一组成部分都获益匪浅。徐进钰（Hsu，2003）把台湾地区IC产业的这种虚拟再整合的生产方式称为小商品生产（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她认为紧密的社会联系通过公司衍生（Spin-off）过程便利了新公司的创立。通过密切的技术社群（Technicai communities）联系、交叉投资与小商品生产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台湾地区IC产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

能力和创新能力。

(4) 三种组织结构的比较

一体化模式和价值链整合的分工体系各有优缺点。价值链整合模式在取得专业化分工利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两个缺点：一是设计技术、商业机密外泄的概率大大增加，因为设计公司向制造公司下单或把部分设计步骤外包给其他公司时，往往必须将设计的规则与集成电路的布局完全交出；二是制造与设计制造厂商间的信息沟通成本较大，制造与设计公司在生产初期必须经常频繁地由相关的工程师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相对而言，一体化模式在同一公司内部通过垂直整合的方式来进行设计与制造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两个缺点。但单个的公司往往难以达到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

20世纪90年代日本IC产业的整体衰落，就是一体化模式缺陷的典型佐证。日本的IC产业一直沿用一体化的整合模式，几个主要的电子集团同时也作为主要的IC厂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60—70年代长时期的产业发展和积累后，日本IC产业开始实现腾飞，产品在全球市场上一度占领半壁江山，1988年更是高达67%。然而在90年代价值链分解整合的模式下，美国的芯片设计公司纷纷兴起，中国台湾地区的代工厂商茁壮成长，IC产业的竞争日益加剧，这种模式的缺点也日益突出，并逐渐步入困境。目前，日本半导体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减少到了24%。尽管.B本规模庞大的IC企业在不断地进行产业重组，以裁减员工、关闭工厂和分拆业务等方式，使公司转变成为规模小、机制健全、灵活的企业，但成效甚微。一体化模式的缺陷使全球的IDM厂商反思自己的行动，在2002年IDM厂商争先恐后地与代工厂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合作关系，以分担研发先进工艺所需的费用及所面临的风险。

具有模块化本质的虚拟再整合则能够避免一体化和价值链整合模式各自的缺点，并发挥两者的优点。通过模块的"黑箱"处理，实现了对产品系统信息和个别信息之间的协调。这样虚拟再整合的产业模式就不容易发生设计技术、商业机密的外泄，还可以降低信息沟通成本，同时还可以获得社会分工的好处。

3. 信息产业向其他产业的融合渗透作用将越来越强

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经济管制的放松是产业融合的外在动力。经济管制的放松为产业融合创造了制度环境；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内在要求促使管制理论与政策的不断改善，以适应变化了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但是技术创新和放松管制都没有真正地实现产业融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拓性的观念创新（合作竞争理念）与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结合起来，才最终使融合发生在电信、广播、电视诸产业的边界处成为现实，张磊认为其标志是互联网（张磊，2001）。

但是张磊等仅仅关注电信、广播、电视、出版等产业的融合，只是分析了产业融合的个别现象，没有真正把握产业融合的本质。固然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经济管制的放松是产业融合的外在动力，合作竞争理念的观念创新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没有包含知识产权的具有通用界面标准的模块载体，还不能真正地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产业融合。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的数码化是模块化发展的前提基础。安藤晴彦(2003)认为数码化（即"信息序列"、"数字序列"）是最简单明了的共同界面。功能各

异的模块，通过重用、改进、整合，如同“搭积木”一样，能够迅捷地制造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协调生产的规模化与需求的个性化之间的矛盾，真正实现生产上的“弹性专精（Flexible specialization）”。以这些模块为载体与核心，形成了一系列充满活力、具有强劲创新能力的融合化了的产业体系，塑造了能够有效利用信息处理能力的产业结构。

SIP（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可翻译为硅智产模块）模，块是系统级芯片（SOC）的关键组成部分。系统级芯片通过将具备重复使用和产品功能特性的SIP（如CPU、Memory、Interface等）整合在一个单芯片上，使其具有信息采集、转换、存储、处理和信息输入/输出等系统功能，具有速度快、集成度高、功耗低的特征。由于SOC集成了多个功能，使整机成本和体积都大大降低，加快了整机系统更新换代的速度。SOC的这些优点正好顺应了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与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产品（简称3C产品）向轻、薄、短和低功耗的发展方向，对于移动通信、掌上电脑和多媒体产品的生产厂商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此市场对SOC产品有强烈的需求。SOC本身也是一个模块，它是由一系列具有知识产权的SIP模块集成起来的复杂模块。SOC技术方法被誉为信息产业的第二次革命。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个人式计算机逐渐转变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由于互联网的通用化，带动个人式计算转为网络集中式计算；而无线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性电信自由化，也加速网络通讯的发展以及网际网络的普通化，使信息、通讯及网络迅速进入消费者个人、家庭及办公室。在互联网、数字融合（Digital convergence）和系统级芯片（SOC）三大推动力之下，形成了后PC时代科技与产业的革命，使信息、通讯及消费电子融合成一体的21世纪后PC的3C产业。逐渐融合为一体的3C产业，将对社会各方面，如教育、企业、娱乐、金融、医疗、图书馆、管理、法律、媒体等产生重大冲击和广泛影响（台湾3C整合策划推进小组，2000，2003）。在3C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下，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都积极推动科技与产业基础架构的调整与发展，许多大企业纷纷调整战略定位和组织重构，以应对3C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大力推动3C产业的融合。例如，日本邮政省在2000年起将电视、移动电话、游乐器等信息家电连上互联网，结合产官学等方面的力量，设立推进组织，希望以信息家电为主导，来刺激日本商务市场，试图挽回信息产业落后于美国的劣势，并使日本在后PC时代成为全球3C产业融合的主导者。

未来3C产品将向个人定制（Custom - made）的方向发展，即将各项应用（应用程序、人机界面、操作系统、通讯技术等）予以IP模块化，并依靠SOC技术，将这些模块依据消费者的需求加以整合，而这些模块可以随不同客户需求，重新组合产生个性化产品（台湾3C整合策划推进小组，2003）。

针对3C产业融合的趋势，英特尔公司已经制订了全方位抢滩中国市场新商机的战略，即通过SIP集成推动计算机和通讯产业的融合。英特尔正在与业界紧密合作，并通过在标准化、制造工艺、技术规范和创新等领域内的不懈努力来推动更高程度的芯片集成和业界合作。2003年3月，英特尔公司正式推出了新一代处理器“迅驰”（Centrino）。

“迅驰”中融人了无线芯片，从而第一次将PC的计算和通信融为一体。英特尔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CTO）基辛格博士认为，加速的计算和通信的融合，正在改变着整个行业的发展，因此应推出真正富有创意并能使客户受益的产品和服务。随着硅技术的进步，集成电路的线宽越来越细，已经深入到纳米级的层次，这不但为进一步提高计算速度和性能（主频）、降低功耗提供了可能，更把通讯、射频、激光等非计算、非数字技术集成到一个小小的芯片中，打开了前所未有的空间。Intel认为这些技术，特别是计算和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微观融合，将引发新的使用模式、商业模式、使用习惯，从而促动继互联网之后新一轮大范围的宏观融合。不仅如此，芯片与生物工程、健康服务等方面也有更大范围融合的可能。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各行业信息化建设已进入全面启动阶段，业务应用需求已取代IT厂商的新概念推广而成为推动各个行业信息化建设的真正动力。(1) 制造业信息化是企业信息化的重点，在科技部实施的中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百亿工程）中，目前全国近2000家企业全面启动了信息化试点示范工作。结合企业用户的需求和现有的制造产业基础，中国将重点支持以三维CAD系统、ERP系统等7大产品为代表的关键技术产品研发与应用。(2) 电子政务成为行业信息化的新亮点。2003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议指导意见》对电子政务建设和软件产业发展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电子政务工程开始广泛地启动。目前，中国已建成3000多个政府网站，70%以上的地市政府在网上设立了办事窗口。电子政务建设开始从网络基础建设向功能应用层面和社会服务层面转变，注重应用已成为电子政务的主题。随着“12金工程”的进一步推进，预计未来3至5年内，中国电子政务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3) 银行业信息化建设向深化和细化方面迈进。随着银行业大型网络系统建设和改造工程的基本完成，以及各主要商业银行数据集中工程的接近尾声，2003年中国银行业IT建设开始减速，应用市场规模较前几年出现缓慢减小趋势，但其应用正在向精细化方向发展。(4) 传统行业的信息化建设逐渐加速。近年来，电力、石油、冶金、机械、采矿、建材等传统行业信息技术应用进展迅速，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逐渐提高，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效益逐步显现。

4. 合作竞争和标准竞争将成为IT产业竞争的突出特征

(1) 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

合作竞争又可称为协同竞争，是企业之间在“双赢”基础上建立的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关系，通过企业间有意识的相互合作去得到由原来的单独竞争所得不到的经营效果。在合作竞争理念的指引下，实业界逐渐突破了产业分立的限制，呈现出产业融合的特征。

融合后的大多数企业从跨领域生产经营，转变为围绕核心能力的开放式专业化生产经营，着重发挥他们的核心能力，致力于成为某一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借助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同外部企业建立开放合作的生产体系，从外部企业获取所有其他资源。这就是所谓的“新水桶原理”。企业不再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个“水桶”，不再仅仅着眼于修补自己的矮木板，而是将自己水桶中最长的那一块或几块木板拿去和别人合作，共同去做一

个更大的水桶，然后从新的大水桶中分得自己的一部分。按照模块的观点，企业可以用自己的强势部分与其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这种基于合作构建的新水桶的每一块木板都可能是最长的，从而使水桶的容积得到最大。任何企业都只能在某些价值增值环节上拥有优势，在其他环节上，其他企业可能拥有优势。为达到“双赢”或“多赢”的协同效应，彼此在各自的关键成功因素——模块化的优势环节上展开合作，可以取得整体收益的最大化，这是企业采取合作竞争战略的原动力。例如英特尔公司为培育“商业生态系统”，制定了以个人电脑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发展规划，建立了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销生态系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特尔成为电脑生态系统的核心和微处理器生态核心，而那些经销英特尔个人电脑的流通商及产品使用得益者同样在系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通信、计算、传媒、娱乐都整合到同一种媒介之中，突破了“死尸的融合”，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产业融合”。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外产品的进入将使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但同时也将使它们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因为电子信息产品的“系统”特征使得一个企业或国家不可能囊括，种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其中的某些环节上有所作为。

(2) 设计规则的标准竞争

产业融合过程中的企业从标新立异、生产互不兼容的产品转变为生产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零部件或通用性的软件产品。前文所提到的各种 IP/SOC 标准化联盟，目标都是通过标准化提高芯片的适用性，使半导体芯片转为线路组件，以适合在各种芯片系统上使用，从而实现批量化生产，降低芯片制造成本。适应这一趋势，率先采取积极行动的企业将迅速成长；与此相反，逆新技术潮流而行，不管他们付出的努力多么巨大，都将面临失败或遭受重创。

标准竞争逐渐成为产业融合后的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新的融合产业中，标准竞争将成为产业融合过程的一个主要竞争手段，产业的主导者将是那些控制了产业标准的厂商。随着融合技术的发展，竞争日益演变为围绕网络和通信标准进行。如果存在多重标准，则网络之间无法进行连接或者通信。而且，缺少共同界面将使产品难以为市场所接受。

网络的外部性效应是标准竞争的主要动力。网络的外部性主要是指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就是需求的规模经济。一种产品的消费者给其他消费者带来外部效应，或者一种产品的供求对其他产品的供求产生连带影响。在网络效应明显的融合市场上，存在着市场偏向问题，即只要某一技术或者产品标准在生产和销售规模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产品或者技术就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消费者往往只注重网络外部效益而较少关心网络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网络效应最终会使融合产业的市场成为一种技术标准主导的市场。以微软为例，微软公司自从其“视窗”操作系统成为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标准”以来，在市场竞争中无往而不胜。由于技术标准的选择，能够决定不同企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和利润来源（专利费、市场占有率），在信息产业各个领域，从高清晰度电视、移动通信到各种计算机软件、硬件，技术标准竞争一直非常激烈。

四、信息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信息产业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支柱产业，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核心产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信息产业部初步构想要用10年到15年左右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信息产业强国，即信息制造强国和技术强国。如果达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信息产业的特征将会发生一系列的质变。

1．"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趋势

（1）"十一五"期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市场

从市场趋势和发展环境来看，中国信息产业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发展优势，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投资动力。中国信息产业部政法司副司长郭福华2005年5月24日在"国际资本中国战略高层论坛"上从5个方面采分析和判断中国在未来5年内将会成为未来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市场：一是未来5年世界最大的电脑市场和配套市场在中国。中国目前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电脑生产基地，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今后5年中，中国电脑将进入普及阶段；二是未来5年世界最大的家电市场在中国。中国目前是世界家电最大的生产制造国之一，家电的普及率也已经很高。但目前中国的家电，特别是家用电子产品已进入到更新换代时期，新一代数字电子产品将大批进入中国的家庭和个人。特别是数字电视、数字音响、DVD、数码相机等产品以及新一代智能化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将是中国今后家电市场的主流产品，将会推动中国进入新的消费高潮；三是今后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市场。中国目前已是电话用户规模和网络规模最大的国家，互联网用户居世界第2位。但从中国电信市场潜力来看，还远未达到市场的最大化；四是今后5年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在中国，而汽车产业与信息技术是紧密相关的。目前在中国汽车的成本中，电子产品平均成本已占25%。今后，由于信息技术在汽车领域的深度应用，将推动汽车的燃油系统、控制系统；底座系统、车载系统、汽车媒体及汽车行驶的调度系统等都由信息技术来实现其智能化。可以断定，今后的汽车就是机械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产物。中国既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也会是最大的汽车电子市场；五是未来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应用市场可能也会在中国。信息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并以此来带动经济的增长是全球未来关注的重点。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化建设，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行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城市信息化、社区信息化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多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为信息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空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技术的巨大需求，有可能在今后若干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应用市场。

（2）中国将成为全球信息产业制造基地

21世纪伊始，以日本为首，东亚以及欧美各国不断把视线聚焦在持续增长的中国

经济，特别是迅速崛起的制造业上，认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正在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日本通产省2001年5月份发表贸易白皮书，首次承认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雁行结构”崩溃，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随后，《日本经济新闻》、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新闻周刊》、韩国《经济先驱报》等海外媒体接连刊登文章对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进行报道评论。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甚至在2001年9月份由美国《福布斯》杂志主办的企业高层会议上表示，正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工厂”一样，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世界工厂”。从“世界大市场”到“世界工厂”，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信息产业是制造业中的重要部分，电话机、彩电、视盘机、扬声器、收录放机、微波炉、磁头、磁性材料、软磁盘、铝电解电容器、压电石英晶体器件等产品，中国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其中，收录放机、电话机、扬声器、磁头等占世界总产量的40%以上，出口量为世界之最；计算机主板、光盘驱动器、硬盘驱动器、显示器、打印机、程控交换机、印刷电路板、高频同轴电缆、圆柱式镉镍蓄电池、电冰箱、洗衣机、家用空调机和彩管等也名列前茅。在未来5年内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信息产业制造基地。

(3) 信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将发生改变

在20世纪末，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跨国公司大规模长期的投入，外资是推进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产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往往是外资引进比较成功的地区。但是近年来，民营资本正在逐渐成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尤其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民营资本对信息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民营经济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主体，这显示出中国民营经济在未来信息产业发展方面的潜力。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1世纪中国民营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成长最快、潜力最大的产业，将会成为民营资本投资的重点，民营经济也必将成为我国信息产业新的生力军。信息产业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国有资本从信息产业逐渐退出将是一个基本趋势，随着信息产业领域内的一大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资本的逐渐退出，国有资本在信息产业领域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

2. 我国信息产业的长期展望

(1) 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角色将由目前的OEM，逐渐转向ODM、DMS和EMS

从加工技术含量的角度分析，信息产业中的国际代工可以分为OEM（委托制造）、ODM（委托设计制造）、DMS（设计、制造、售后服务）和EMS（工程、制造、服务）层层递进的4种模式或层面。

OEM（委托制造）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按照品牌厂商的设计为其做代工，一切知识产权都属于品牌厂商，代工者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以日本为主的IDM时代，分包商就主要采取这一模式。在全球化经营与竞争中，全球跨国公司纷纷采用OEM的经营战略，寻求最佳的生产制造配套企业，而处于全球价值增值体系中的中国企业目前主要以OEM方式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制造成本，抢占国际市场。

ODM（委托设计制造）比OEM的技术含量高。除了制造加工外，增加了设计环节，即接受品牌厂商的委托，按其技术要求承担部分设计任务。DMS（设计、制造、售后服务）又进了一步，它集设计、制造、服务于一体，相当于品牌厂商把基本系统要求给代工厂商，由代工厂设计、制造、维护，这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台湾IT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代工厂商采取的主要经营模式。

EMS（工程、制造、服务）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模式，是业务外包的一种特殊类型。品牌厂商专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主要是定义产品规格和界面标准）和市场营销，将其他非核心环节外包，而EMS生产商按照品牌厂商的要求，提供制造加服务的整体服务方案，开展产品制造以及与制造相关的应用技术开发、维修、物流等业务。在这种模式下，品牌厂商只需有个“想法”，代工厂商就能把这个“想法”变为产品，包括交出产品制造的工程书与工艺文件（即产品工程化）。Solectron、SCI、Celestica是全球三大EMS，都没有打造自己的品牌，专心致志发展EMS业务，甘当品牌厂商的“代工”。这些EMS公司在IBM、惠普、苹果等品牌厂商那里知名度极高，信誉很好，品牌厂商甚至免除了对它们提供模块化零部件的测试。这些EMS的业务连续多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被美国高盛与摩根·斯坦利的产业分析师誉为“旭日东升的黄金宠儿”。与初级水平的OEM相比，EMS已经掌握了知识诀窍（Know－how）。

中国台湾从OEM做到EMS用了20年，台湾的IT产品和集成电路占全球的份额大大增加，原来台湾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占全球的10%—30%，后来到了60%。同时台湾的产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品牌厂商、代工厂商、OEM、ODM、DMS、EMS分层次推进。用这个标准衡量，全球制造中心在中国内地刚刚开始，真正达到“世界工厂”的水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经过10到15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将转向以DMS和EMS为主。

(2) 从一般技术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

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从经济全球化的全局来看，从硬件的核心芯片到软件的主要平台等关键技术和新技术的创新，基本都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手中。在未来，发达国家仍然会进一步巩固其在核心技术和高增值领域的垄断地位，但是中国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将会突破信息产业的发展瓶颈，以市场为导向，掌握软件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关键技术。软件和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产业和信息社会的基础，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核心技术。2000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为贯彻落实18号文件，信息产业部已经发布了《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及产品认定暂行管理办法》，并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集成电路制造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同时，集成电路产业相对集中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配套的优惠政策，如上海市已经提出》上海市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也制定了《北京市政府关于鼓励投资集成电路产业优惠政策》。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信息产业将会逐渐从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真正实现电子信息强国。

(3) 信息产业的发展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软化

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产业结构将趋于软化。一方面信息技术服务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也会因信息化而软化，传统产业内部的硬功能比重下降，而信息、研究、服务等软功能比重不断增长，制造业的改造实现以较少的原料、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就业结构方面来看，从事管理、研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所谓“软职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也逐渐改变了人们利用信息资源的方式，如电子商务、各种娱乐、文化、旅游更加丰富多彩，正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第六章 汽车产业

汽车，被称为“改变世界的机器”，汽车产业广泛的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侧向关联效应，使它荣登制造业皇冠的地位。这种集零件数以万计、年产量以千万计、保有量以万万计为一身，百年不衰的产品，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我国从发达地区开始正在步人居民汽车消费时代。居民汽车消费一旦形成气候，就会创造广个年销售额几千亿直到上万亿的持续增长的市场，从而构成我国以内需为主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石。在居民享受汽车文明的同时，汽车产业将成为我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领头羊。汽车可带动的行业和产业面之宽，能包容和吸收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之广，可形成的生产规模、市场规模之大，可创造的产值、税收和就业岗位之多，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之大、之持久，对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作用之显要，是其他产业所难以相比的。在经济起飞和工业化阶段，汽车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结构升级的载体，这一结论已被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正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

几十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地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经过一代又一代不懈的努力，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汽车工业体系，奠定了产业发展基础。在中国，人们习惯于将目光过多集中于“汽车工业”，试图在制造领域内解决中国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然而，近年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影响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已经大大超出制造业的范畴。面对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传统城市规划遇到了挑战，城市基础设施满足不了需求，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了，交通安全事故率上升，节能和能源战略的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如此等等，这些并不是汽车企业和消费者个人所能解决的，需要政府统筹规划，制定政策和措施逐步改善汽车消费环境，降低社会成本。为顺利实现居民汽车消费，还必须大力发展汽车贸易和服务业。汽车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使汽车产业的盈利向贸易与服务业转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的全球化进程加快，汽车金融、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广泛应用，国际竞争迅速由制造业向贸易和服务领域延伸。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全球汽车业的竞争格局。

一、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加入WTO以后，我国汽车产业不但没有受到进口汽车的严重冲击，反而出现爆发性增长。2004年以来，汽车生产继续大幅提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

1. 汽车产业进入加速增长期

回顾中国汽车工业50年，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71年汽车产量突破10万

辆；1980年汽车产量突破20万辆；1992年汽车产量突破100万辆；2000年汽车产量突破200万辆；2002年汽车产量突破300万辆。预计2005年将突破400万辆，每上一个台阶所需时间明显缩短。1970—1980年，汽车产量增长1.5倍；1980—1990年，汽车产量增长1.3倍；1990—2000年，汽车产量增长3倍（图6－1）。预计2000—2010年汽车产量将增长4倍以上，2010年我国汽车总产量将超过1000万辆。汽车工业发展在近两个10年呈明显加快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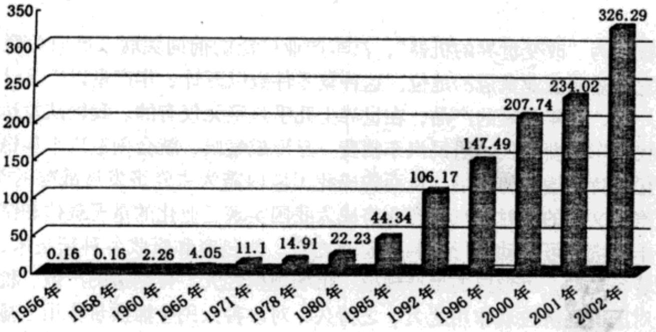


图6－1　我国汽车产量增长情况（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2003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从近30年我国汽车增长轨迹看，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国汽车工业经历了几个短暂的较高增长期，比较主要的有1983年—1985年、1987年—1988年和1991年—1993年，但都是以大起大落为共同特征。据统计，1971年—1993年，我国汽车工业超过30%增长的有6年，但负增长的年份却多达8年，大起大落给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91年以来，我国汽车工业出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增长期，虽然1994年—1998年汽车工业增速较低（1.5%—7.3%），但随着我国加入WTO形势的明朗化，汽车工业增速重新回到10%以上（1999年—2001年为12.4%—13.2%）。我国加入WTO后，汽车产量达到325.1万辆，比上年增长38.8%，是近10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见图6－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

2. 汽车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

从1999年开始，汽车工业就再，次以高于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增长。2002年，汽车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1%。按单一产品计算，汽车已成为当前工业增长中最突出的“亮点”。从行业效益看，汽车工业2002年对整个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19.3%，位居各行业之首（见图6－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

3. 汽车产业已尽为我国工业第5大支柱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汽车工业已由过去机械工业中的一个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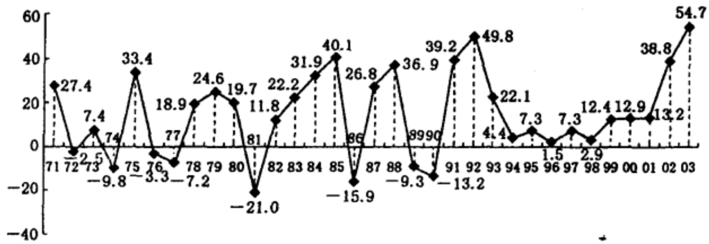


图6-2　1971年—2003年汽车产量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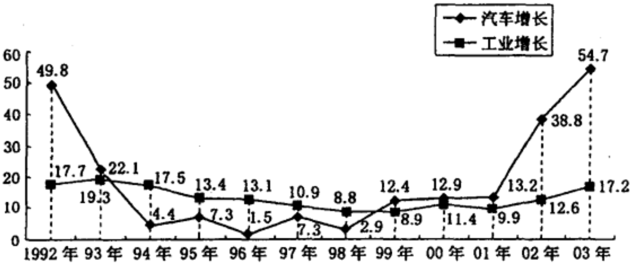


图6-3　汽车与工业增长比较（%）

业发展壮大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行业之一，汽车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90年汽车工业销售收入占工业的

比重为2.2%；1995年为3.3%；2000年为3.9%；2001年和2002年，这一比重提高到4.4%和5.2%。从行业位次看，按销售收入排名。汽车工业.1990.年列第15位；1995年列第11位；2000年列第10位；2001年超过食品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列第8位；2002年超过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列第7位。2003年汽车工业销售收入超过纺织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工业，位居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工业、电力工业、黑色冶金工业和化工行业之后，首次成为我国工业第5大支柱行业（见表6-1）。

表6-1　汽车制造业位次

位　次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1	通信电子	通信电子	通信电子	通信电子
2	电力	电力	电力	电力
3	化工	化工	化工	冶金
4	冶金	冶金	冶金	化工
5	纺织	纺织	纺织	汽车

位 次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6	石油加工	电气机械	电气机械	
7	电气机械	石油加工	汽车	
8	食品加工	汽车		
9	建材			
10	汽车			

4. 汽车产业国际化特征日益明显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呈现日益明显的国际化特征。一是国内汽车市场的国际化，进口汽车的关税壁垒日趋弱化，国内汽车市场更加开放；二是汽车产业的国际化，表现在我国加入WTO以后，世界上以“6+3”为主要格局的汽车跨国集团或公司都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进入我国汽车产业，我国主要的汽车企业也都与国外汽车公司合资或合作。截至2002年末，以实收资本计算，汽车工业中外资所占比重为24.4%，高于全部工业22.1%的比重。特别是在轿车制造业中，外资所占比重高达33.7%。据测算，通过利用外资，我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一下跨入90年代初期的水平。三是我国汽车产业在世界上的位次迅速提高。2001年我国汽车产量超过意大利、巴西和墨西哥等国，位居世界第8位，2002年超过韩国、西班牙和加拿大，跃居世界第5位（见表6－2）。

表6－2　　我国汽车产量在世界上位次

位 次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5年（预计）
1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2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3	德国	德国	德国	中国
4	法国	法国	中国	
5	韩国	中国		
6	西班牙			
7	加拿大			
8	中国			

二、汽车产业产业组织问题分析

汽车产业产业组织是汽车制造企业市场关系的集合体，其结构是指汽车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及其关联性以及汽车产业内大中小企业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格局。根据产业

组织学的理论，产业组织结构一经确定，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先进、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对企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不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则阻碍企业的发展。因此，产业组织结构要根据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要求适时加以调整，以适应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入WTO后，我国汽车产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我国汽车产业产业组织结构也必将进行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和优化。

1. 我国汽车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市场结构可通过市场集中度、进入与退出壁垒和规模经济等指标来反映。本文从这3个方面来考察当前我国汽车产业产业组织状况。

(1)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指一个行业规模列于前几位的企业的生产、销售或资产的累计数量占整个市场相应指标总量的比重，用CRn来表示（n为企业数）。

汽车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工业发达国家汽车生产企业市场集中度很高，日本为80%，美国为90%，法国和意大利基本是100%。而从我国汽车大企业集团的市场集中度来看，2002年我国汽车产业中最大的3家企业集团的市场占有份额分别为：一汽集团20.37%、上汽集团15.48%、东风公司13.29%，3家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总共为49.14%。从我国汽车市场看，大部分市场份额由一汽、上汽、东风、长安等10家大企业集团占有，说明了我国汽车工业大企业集团整体市场集中度较低，与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不同车型的市场集中度。2002年从载货汽车品种看，集中度最高的是重型载货汽车和中型载货汽车。重型汽车是典型的寡头型市场结构，一汽、东风和川汽3家企业集团占据总市场份额的93.1%；中型载货汽车是两大寡头型市场结构，即一汽和东风；轻型汽车呈散乱的市场格局，最高市场占有率权为35.38%，说明了轻型车市场处于过度竞争态势；微型车是五菱和长安两家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客车产品中，中型客车是绝对寡头型市场结构，一汽占有37.2%的市场份额；其余客车产品均属于较为分散型的市场结构。轿车市场也显示出绝对寡头型市场结构，上海大众保持着36.1%的较高市场占有率，一汽和天汽两者合计占有37.8%的市场份额。

(2) 进入与退出壁垒

进入与退出壁垒是从企业进入与退出的角度来考察产业内已有企业与潜在进入退出企业的竞争关系，由此来反映市场潜在的竞争强度。从历年我国汽车工业整车生产企业的增减数目看，从1956年的1家发展到1993年的124家，该阶段呈现出过度进入状态。而1994年后汽车企业数目略有减少，到2002年我国整车生产企业为106家。这主要是因为1994年国家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对新建汽车企业的生产规模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对潜在进入者构筑了一道壁垒。

按照产业组织理论观点，进入壁垒可分为政策性壁垒、资源性壁垒、技术性壁垒和成本性壁垒。政策性壁垒：我国地方政府自身保护意识严重，没有起到用政策导向来构筑进入壁垒的作用；资源性壁垒：我国各种资源要素供应相对充足；技术性壁垒：一些企业缺乏技术屏障，导致新进入者可采取合资等手段来获得技术；成本性壁垒：地方保

护导致市场分割、价格扭曲。这些因素导致我国汽车产业进入壁垒过低。相反，由于我国体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就业问题等，导致我国汽车产业退出壁垒过高。但是总的来讲，我国汽车产业仍是进入壁垒“软约束”和退出壁垒“硬约束”共存的产业。

(3) 规模经济性

汽车产业是受规模经济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我国 2002 年汽车总产量只有 325.12 万辆，不及国外 1 家大汽车集团的年产量，整体规模很小。按照汽车产业的一般规律，一个基本车型应有上百万，少则也要三四十万辆的市场支撑才能有竞争力。从企业最低经济规模（MES）即最小最优经济规模看，载货汽车为年产 15 万辆，轿车为年产 50 万辆。2002 年我国汽车行业只有一汽、东风公司的中型载货汽车产量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的要求，而轿车没有一家企业达到经济规模；因此，我国汽车产业总体上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

2. 我国汽车产业企业市场行为特征及市场绩效

市场行为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扩大市场占有率等目标而采取的为适应市场环境要求的不断调整战略和策略的行动。企业的市场行为受市场结构的状况和特点制约。我国汽车产业产业组织的市场行为具有以下 4 个特点：

(1) 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

随着汽车产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零部件通用率越来越高，世界先进汽车厂家零部件自制率只有 30%左右。而我国汽车产业受集团及地方利益因素的影响，各大汽车集团都有自己的零部件配套体系，小而全、散乱差、重复建设等现象严重，专业化集团仅为三分之一，而综合性集团多达三分之二，自制率高达 70%—80%，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很低。

(2) 自主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弱

我国汽车厂家大多不具备独立的开发能力，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相当多的车型特别是轿车，都是引进产品，自主开发能力及开发水平低、开发周期长，在高、新、尖技术领域尚存在许多空白。另外，我国汽车公司研发投入低，与国外汽车公司有很大差距。国外汽车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约占年销售额的 3%—5%，数额高达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而我国一些重点汽车企业每年的研发费用只占销售额的 1%—2%，数额仅有 1 亿—2 亿元人民币。

(3) 劳动生产率低，产品价格奇高

国外大的轿车公司人均年生产轿车一般都在 20 辆左右，而我国轿车企业人均年生产轿车只有 3 辆左右，不及国外的六分之一，致使轿车成本高和轿车价格奇高，与国外同级产品差价很大。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汽车产业发达国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

(4) 并购、重组力度加大

从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历程来看，合并重组是一个趋势。2000 年后全球汽车工业正形成“6+3”的格局，即六大集团和三大独立汽车公司。近年来，我国汽车企业合并重组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安徽奇瑞与柳州五菱进入上汽，厦门汽车与福建东南汽车工业

集团进行整合，江苏悦达起亚进入东风，特别是2002年6月天汽与一汽的重组被誉为中国汽车产业“标志性事件”。汽车企业的合并重组促使我国汽车工业正在形成以一汽、东风、上汽三大汽车集团为主的竞争格局。从发展态势看，未来我国汽车产业的重组活动仍将围绕三大汽车集团进行，实行强强联合。

3. 我国汽车产业市场绩效

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价格、产量、费用、利润、质量和品种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所达到的现实的状态。我国汽车产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50年的发展，尤其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引进外资，无论在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产品结构还是在研究开发能力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2002年汽车产量跃人世界前10位，产量达325.12万辆。轿车产量达到109.1万辆。轿车的迅速发展，不仅表现在产量的高速增长，而且技术进步的步伐也大大加快。2002年有近50款各具特色的新车面市，相当于过去5年之和的3倍。汽车产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也在稳步推进，特别是2002年6月天汽与一汽的联合重组，更是凸现了我国汽车工业正在形成三大汽车集团“三分天下”的格局。但总体来看，中国汽车工业综合竞争能力仍较弱，突出表现在：产业组织的整合程度较低；产业组织结构高度分散，集中度低；产品档次低，质量差，品种单一；企业利润低，总体经济效益不理想；汽车产业效率低下，尚未实现规模经济等。

4. 我国汽车产业产业组织优化的路径

世界发达国家的汽车产业走的是一条集团化、专业化、批量化、全球化的道路。为适应世界汽车产业发展趋势，促进我国汽车产业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提升我国汽车产业产业的竞争力，必须对我国汽车产业组织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和优化。

(1) 政府制定鼓励企业进行兼并、联合的政策

政府制定汽车产业兼并政策的重点，是要促进汽车企业间的兼并活动，从税收、金融上支持汽车产业中的优势企业去兼并劣势企业，统筹解决兼并企业的债务，安排职工就业。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还在受条条块块的限制，经营分散、竞争过度。政府要实施汽车企业联合的政策，通过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减少汽车企业间的摩擦和矛盾，以实现规模经济和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

(2) 构筑适度的进人壁垒和合理的退出机制

为遏止过度竞争，改变我国汽车产业进人壁垒过低的状况，政府应提高进人汽车市场的行业标准，根据行业的性质来设置不同的壁垒标准。政府构筑壁垒的主要手段是政策性壁垒，按照汽车企业数目适度、规模适度、布局合理和结构合理的原则，作出相应的中长期规划。同时，政府也要制定合理的企业退出机制，降低退出壁垒，让在市场竞争中濒临破产的企业能够顺利退出，减少资源浪费。

(3) 加速汽车企业的重组整合，走分工专业化道路

要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参股等形式进行强强联合，强弱兼并，加快组建一批有规模、有影响的汽车企业集团和联合体。对一些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汽车零部件工业企业，应结合实际，按照优势互补、优化组合的原则，尽快与全国整车和

零部件集团寻求联合或收购。小企业要走“专、精、特、优”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加快完成汽车产业中整车行业与零部件行业之间的相互独立和分离，实现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与经营，提高核心竞争能力。

(4) 参与国际分工，走国际化经营道路

我国汽车产业与先进国家汽车产业的差距是明显的。扩大吸引外资，加强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仍是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加快发展、缩小差距的重要途径。在合作方式上要灵活多样，不要一味追求合资，关键是要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提高自身开发能力和形成自己的品牌；要避免受制于人，做到在鼓励合资的同时，对对方进行监督和限制。外资要有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中资要有汽车生产经验和基础，能够接受和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合作要符合我国汽车产业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5) 提升我国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的竞争力

目前，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正在形成“6+3”的格局，而我国大型汽车集团多达16家。入世后，我国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竞争力培育的目标是：近期在国内市场有实力迎接国际汽车集团的挑战，远期达到具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国内竞争的环境，减轻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的社会负担，扶持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的发展，促进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大型汽车企业集团要制定好发展战略，苦练内功，强化资本运营，调整经营方向，增强研发，打造品牌，从多方面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6) 大力发展汽车零部件工业，扶优扶强，提升零部件企业的竞争力

零部件工业是汽车产业的基础。目前，我国已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较好、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零部件生产企业。发展汽车零部件工业，要以这些零部件生产企业为重点，从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使这些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为汽车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汽车零部件工业要走“专、精、特、优”的发展道路，生产要专业化，要加强技术引进与吸收，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汽车产业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汽车产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强，其基本原因在于中间投入比重很大，同时产业链条延伸很宽很长。汽车产业对；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就业都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而且间接带动作用远大于直接带动作用。在21世纪初期，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减轻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稳定增长的制约，有利于加强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1. 汽车产业对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中间投入比重大是汽车产业带动作用强的基本原因。汽车产业不仅投资量大和规模经济要求高，与国民经济的很多部门联系密切，而且更重要的是中间投入和价值转移的比重很大，因此汽车产业的发展既依赖于很多产业部门，也对整个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大

的带动作用。作为主要汽车生产国的若干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表明，汽车产业的增加值率远远低于整个制造业的增加值率。美国和日本汽车产业的增加值率不足30%，德国和法国汽车产业的增加值率也只有30%左右，而这些国家中其他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率一般为40%—50%。也就是说，即使在工业技术水平和增加值率高的发达国家，汽车产业中也有70%左右的产值是在消耗其他部门产品的过程中转移过来的；这就是汽车产业对其他产业尤其是工业带动作用强的基本原因。中国汽车产业的增加值率相对更低，1995年为21.5%，1997年为22.3%。中间投入的比重更高，使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对相关工业部门具有更大的带动作用。

发达国家汽车产业的投入对主要相关工业投入的总体拉动作用约为1倍。汽车产业需求较大的工业部门主要有钢铁、非电子机械、电子机械、金属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有色金属、纺织、服装、制革、玻璃制品、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等，其中需求比重最大的是前6类工业。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发展对以上工业部门产生了很大的需求拉动作用。根据有关资料计算，在美、德、日、法等发达国家中，汽车产业预投入与主要相关工业全部预投入之比大概为1:1（只有日本在某些年份有例外），法国主要相关工业全部预投入与汽车产业预投入之比达到1.5倍左右。也就是说，由于汽车产业发展对主要相关工业的拉动作用，整个工业的投入要比汽车产业本身的投入增加一倍。或者说，汽车产业的投入产出，将对整个工业发展产生双倍的带动作用。

中国汽车产业对主要上游产业的完全需求带来的增加值，达到汽车产业自身增加值的2倍多。根据有关方面利用模型进行的投入产出分析，中国汽车产业对上游产业产生很大的直接需求和完全需求。在中国的统计口径中，这些上游产业主要是林业、黑色金属采选业、有色金属采选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等。其中汽车产业直接需求最大的主要是机械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和橡胶制品业三个行业，完全需求最大的，除了这几个行业之外，还有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纺织业等。1997年汽车产业对以上主要上游产业的直接需求为7856亿元，完全需求达29531亿元（均为1992年不变价格）。1990—1997年，中国汽车产业对主要上游产业所产生的完全需求大概占汽车产业总产值的92%—94%，而完全需求所带来的增加值与汽车产业增加值之比，1997年高达2.26倍。也就是说，汽车产业仅仅对主要上游产业产生的完全需求，就接近于汽车产业的总产值，而这些完全需求所带来的增加值，则达到汽车产业自身增加值的2倍多。

2. 汽车产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根据有关资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购买一辆汽车的价格中，大概有40%左右要支付给金融、保险、法律咨询、产业服务、科研设计、广告公司等各种服务业。这也许就是汽车产业发展对服务业的基本带动作用。汽车产业对服务业的带动效应很大，基本原因在于其产业链条的延伸范围很宽、延伸半径很长。相关数据表明，在几个汽车业发达的发达国家中，汽车产业的预投入对主要相关服务业的预投入有较大的带动作用，

后者占前者的比重约为30%—80%。也就是说，汽车产业的一定投入，可以导致主要相关服务业增加30%—80%的投入。这里的主要相关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储运、实业和商业服务、社会和个人服务等。应当指出，这些服务业主要涉及与汽车产业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如果将间接相关的很多服务业部门包括进来，那么汽车产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要大得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也对公路建设、运输业、汽车维修、加油站、汽车保险业等服务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体制、法律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影响，汽车产业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在中国还远没有充分表现出来。

3. 汽车产业对扩大就业的带动作用

汽车产业不仅解决了大量的直接就业，而且带动了很高比例的间接就业。广义的汽车产业，包括了汽车制造业和与汽车直接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由于生产规模大，涉及范围宽，汽车产业既提供了很多直接的就业机会，又带动了很大比例的间接就业。在作为主要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几个发达国家中，与汽车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拥有较大的就业人数，尤其是汽车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自80年代以来大幅度增长，就业比重明显提高。汽车产业间接就业和直接就业之比，1994年美国达到101:100，日本为71:100，德国为66:100，法国较低，也有43:100。这表明汽车产业对于扩大就业有较大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对服务业就业的带动作用呈上升趋势。

作为汽车生产国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韩国汽车产业直接和间接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1980年为6.3%，到1992年上升到14.6%，其中与汽车相关的间接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由2.5%上升到4.9%。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国家汽车产业的间接就业数据，由于是从投入产出角度计算的，可能只涉及到与汽车业密切相关的部门，而没有包括全部的间接就业数据。比如，道路建设、政府机关以及非汽车产业中与汽车使用有关的就业，就可能多数没有统计进来。根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计算，如果将那些工作岗位与汽车使用有关的就业人员也算在内，那么汽车产业带动就业的效果要大得多。按这个口径计算，1997年德国汽车产业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达到500万人，其中汽车工业的直接就业为67万人，配套工业行业的间接就业为98万人，与汽车销售和使用有关的间接就业为335万人，汽车产业间接就业为直接就业的6.5倍。

中国汽车产业对于扩大就业特别是带动间接就业具有更大的作用。中国由于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矛盾突出，加上劳动生产率低，第三产业不发达，汽车产业对于多方面扩大就业途径，带动间接就业特别是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作用。根据有关投入产出分析提供的资料，1997年，与汽车工业相关的主要上游产业的完全就业人数为273万人，是汽车工业直接就业人数的1.5倍；与汽车产业相关的主要服务业的间接就业人数达到1726万人，是汽车工业直接就业人数的9.5倍；因此，汽车产业间接就业高达1999万人，与直接就业之比达到11倍之多。显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汽车产业具有明显更大的就业带动功能。以上与汽车有关的服务业包括汽车修理业、运输业、金融保险、销售、管理部门、研究咨询以及其他汽车使用部门，其中汽车修理业、运输业和其他使用部门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分别高达219.9万人、422.4万

人和1047.5万人。可以说，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对于扩大服务业的就业具有巨大的潜力。

4. 汽车产业发展对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1) 汽车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减轻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稳定增长的制约

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的较高速稳定增长将继续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这种需求不足仍主要来自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下个10年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较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两个基本的拉动力量：一是住房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二是私人汽车拥有率的迅速上升。这两个方面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任何一方的较快发展都会拓宽另一方的市场空间。中国是否大力发展汽车产业显然关系到政府对于汽车消费的政策取向，而汽车消费政策又对居民的汽车需求具有重大影响。由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不论中国以何种方式发展汽车产业，只要本土汽车在加入WTO之后以至关税减让过渡期之后能够有力地抵挡进口汽车的冲击，中国市场的汽车需求就会迅速扩大，从而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起较大的拉动作用。这里有两个暗含的基本前提：一是既然私人汽车消费有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推动这种消费需求；另一是任何一国的政府都只会鼓励对本国汽车的消费而不会鼓励对进口汽车的消费。因此，政府应当支持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不论选择哪种发展方式和途径。

(2) 汽车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加强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未来10年，社会投资需求仍将是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投资需求的扩大既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变动，也取决于民间投资的增长。目前中国民间资本的规模已经很大，在全社会投资中也占有较高比例，但由于长期集中于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部门，在消费品市场趋于饱和、同时有些投资领域尚未开放的条件下，民间资本难以找到有利的投资场所，这制约着民间投资的扩张。如果中国的汽车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对相关工业和服务业产生多方面的带动效应，将能够为民间资本提供很多有利的投资机会，拉动民间投资的扩张，从而促进社会投资需求的扩大，支持国民经济的较高速持续增长。

(3) 汽车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从现在到2010年，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方面的进展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后劲。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三大产业的结构关系，尤其是工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关系；二是工业结构的升级，主要是加快技术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汽车产业具有连接工业和服务业的特点，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相关工业，而且对相关服务业具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这就有利于实现工业稳定增长而服务业加快发展的结构调整目标。同时，汽车产业属于技术密集的加工工业，由于其具有巨大的产业关联带动效应，带动幅度最大的就是技术密集的机械电子产业，并且经济规模大，使很多高新技术成果能够很快得到应用，因此，汽车产业的较快发展也有利于带动工业结构的升级。

四、国际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

1. 汽车产业的全球性联合重组步伐加快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安全、排放、节能法规日趋严格，产品开发成本、销售成本大幅度提高，促使汽车工业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汽车跨国联盟已成为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潮流。戴姆勒与克莱斯勒合并，雷诺和日产联手，福特收购沃尔沃轿车，通用控股日本五十铃、铃木和富士重工等，基本形成了年产400万辆以上6大汽车集团，其产量已占世界汽车产量80%以上。强强联合使汽车技术、产品和企业国际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汽车大企业更具实力和竞争力。

2. 技术创新能力成为竞争取胜的关键

汽车市场竞争实质上是现代科技的较量，是技术创新的竞争。世界各大汽车公司已把主攻方向从实施精益生产、提高规模效益转向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对汽车工业的开发、生产、销售、服务和回收的全过程进行提升。围绕安全、环保、节能等重点领域，采用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开发研制新车型，占领技术制高点。以美国政府发起的"新一代汽车伙伴计划"（PNGV）为代表，用高新技术提升汽车产业已全面展开，并取得重大突破。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汽车电子产品占整车价值的比例从现在的12%~15%提高到2005年的25%~30%。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在走向实用阶段。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将更加广泛，跨国汽车集团正将自己雄厚的技术实力、丰富的人力及财力资源与互联网相结合，同客户、经销商、供应商等建立一种新的业务模式。

3. 平台战略、全球采购、模块化供货方式已成趋势

为提高产品竞争力，国际汽车产业广泛采用平台战略、零部件全球采购、系统开发、模块化供货等方式，使新产品开发费用和工作量部分地转嫁到零部件供应商，风险共担，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提高产品通用化程度，有效地控制产品质量，大幅度降低成本。不少汽车跨国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减少平台数量，增加零部件供货商产品开发的工作量。

4. 汽车产销地理分布变化

从汽车产销量的地理分布看，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市场疲软，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形势看好。在亚洲，韩国、泰国和中国等以其良好的成长性和巨大的潜力，继续成为世界汽车市场的亮点。据预测，从2002年到2010年，全球汽车产量将增加1100万辆，亚太地区将新增700万辆以上，占到65%，而其中将有一半来自中国。

五、汽车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我国《汽车工业十五规划》中，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对明确的总量和调整目标。其中，总量目标为：到2005年，汽车产量为320万辆左右，其中轿车产量为110万辆左右，汽车工业增加值为13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1%左右，汽车产品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汽车产品出口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8%左右。2005年摩托车产量约为1300万辆。摩托车出口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15%—20%。另外，也制订了相应的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目标。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有关方面预测（见6－3表），到2020年，中国轿车保有量和需求量将增长29%和32%，汽车保有量和需求量分别增长17%和15%。

表6－3　　预测结果表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家用轿车保有量（万辆）	251	813	2112	4736	9153
每年家用轿车需求量（万辆）		188	453	904	1570
家用轿车保有量增长率（%）		22.3	19.6	16.2	12.6
家用轿车需求增长率（%）		23.7	17	13.5	11.6
轿车总保有量（万辆）	540	1300	2960	5788	10401
轿车总需求量（万辆）		294	589	1030	1727
轿车保有量增长率（%）		19.9	16.2	13.4	11.9
轿车需求增长率（%）		20.6	12.7	11.4	10.4
汽车总保有量（万辆）	1609	3554	6351	10315	15692
汽车总需求（万辆）		593	994	1457	2081
汽车保有量增长率（%）		12.8	11.4	9.5	8.4
汽车需求量年增长率（%）		16.7	8.8	7.6	7.3

资料来源：陈泰清、刘世锦、冯飞：《迎接中国汽车社会——前景、问题、政策》，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

当然，就汽车产业而言，还应有更高层次、更长远的目标：

首先，中国已经确定新世纪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生活，那么，发展目标的调整对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目标的影响是什么？是否需要改变？20世纪80年代制定汽车产业政策时，更多注重产量和质量，注重建立独立的汽车产业。汽车产业政策是国家级的大政方针，必须服从并满足国家发展目标的要求。我们在为汽车产业发展势头高兴的同时，也必须注意汽车增多在一些城市的副作用问题。今天的汽车产业政策不仅仅是支持、促进，也有引导和协调，还应包括对汽车产业发展的约束与限制。就是说，制定汽车产业政策要跳出汽车产业，要关注汽车产业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影

响，包括中国未来居民理性消费模式、未来城市化交通体系、能源供应和消费、环境和公共设施使用的公平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发展目标，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底线。美国通用总裁预测，到2013年中国的汽车年销售量将达到1700万辆，即一年的销量就接近目前全国汽车的保有量2000万辆，届时全国保有量将达到1亿辆以上。在缺乏发达公共交通支撑的中国，能源供应、城市道路设施和环境能否承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今天中国汽车生产和消费已到了必须从整个社会发展出发系统考虑这些大问题的时候。如果今天讨论汽车产业政策，还囿于汽车产业内部，还停留在规划多少企业生产多少车，已经远远不够了。

其次，要全面理解汽车产业，也就是要准确界定什么是汽车产业？人们对汽车产业范围的理解偏窄，大多局限于汽车制造业，甚至局限于轿车制造业。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以及汽车制造业健康发展两个角度考虑，在制定汽车产业政策时，考虑汽车产业应该扩展到上游相关的钢铁、橡胶、塑料、玻璃等原材料和电子、通讯、化学等基础行业，汽车制造业中的零部件制造和研发环节，下游的销售、物流、售后服务、汽车金融、汽车信息、租赁、回收等完整的产业链，而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汽车制造。因为，汽车产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是整个相关产业水平发展的结果。世界汽车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整个国家工业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汽车生产大国都是工业大国的原因。不抓好上、下游两头，不可能培育出一个强大的汽车制造业。

第三，实现的方式和手段有时比目标本身还重要。实现同一目标的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成本和产生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事实是，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在发展，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入，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都要求政府职能必须作出调整，政府管理汽车产业方式必须要改变。汽车产业说到底是不具备自然垄断特性的竞争性行业，政府管理汽车产业的基本理论模式，是按照竞争性行业的要求进行管理。包括承认汽车企业同样服从诞生——成长——壮大——衰退——死亡的一般企业生命规律，同样应该服从市场经济条件下适者生存、强者壮大的法则。政府首要职能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公平的竞争作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极言之，如果在25%的关税保护下，还不能积聚竞争力，这样的企业退出舞台是必然的。

第四，要注意价值取向的深层次影响。在汽车产业政策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一些分歧不是来自具体的政策内容，往往隐藏着价值取向的差别。例如，对于合资股份比例的争议，背后反映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有没有必要和有没有可能坚持建立中国独立的汽车工业体系的目标取向问题，即民族汽车工业问题。是否坚持审批制度，建立以行政审批为手段的进入门槛，涉及的是汽车工业定位，即如何估价外资企业和民营资本问题。政府行政干预保留多少，保留什么，放弃什么，实际取决于对市场作用的认识和效率评价。对汽车产业的支持是倾向特定企业，还是提供普惠性支持，例如国家投资支持新能源开发、新节能技术、洁净生产技术、降低污染技术，鼓励购买节能车、废旧汽车回收利用技术等，反映的是如何看待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地位作用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取得一致，这也是讨论汽车产业政策最难解决的问题。

汽车是典型的国际化产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离开国际背景独立发展汽车业的可能性逐渐消失。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关注的不应是中国汽车产业是否应该参与世界汽车产业“重新洗牌”的过程，而是中国汽车产业以什么目标、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世界汽车产业全球化浪潮，才更能发挥优势，分享更多的利益。中国汽车产业正面临重大的战略选择。为此，政府必须调整有关政策，企业必须制定中长期战略，以入世为契机，以实现在中国的大规模生产和实现净出口为目标，积极投身国际重组、参与国际分工。这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一种可选择的出路。

中国汽车产业确实取得了很大发展，产值已经超过中国工业总产值的10%以上，进入第5大产业，中国汽车产业正在成为世界汽车产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21世纪世界汽车产业的大格局当中，中国汽车产业的位置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与努力。

第七章　钢铁工业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组成部分，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形成了包括采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耐火材料、铁合金等，以及勘探、设计、施工、科研等门类齐全、结构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

一、钢铁工业发展现状

1. 生产量的消费量不断增加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也跃上了新台阶。随着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产品消费的迅猛增长，钢铁作为重化工业最基础的原材料，中国钢铁工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1978 年我国钢产量只有 3178 万吨，居世界第 5 位；1996 年突破 1 亿吨，钢产量为 1.01 亿吨，列世界第 1 位；2004 年我国生产粗钢 2.72 亿吨，同比增长 23.2%，占世界钢产量的 25.9%，生产钢材 2.97 亿吨，同比增长 23.5%。

从全球范围看，全球钢铁生产的重心逐步向亚洲国家转移。2004 年，亚洲国家钢产量 4.99 亿吨，几乎占世界钢铁产量的一半，而在 1986 年时却不到 30%。其中，中国钢铁产量的高速增长则起了至关重要的原因，亚洲其他国家的产量增长相对比较平稳（参见表 7－1）。

表 7－1　　2000 年—2004 年全球粗钢产量统计　　单位：百万吨

国家及地区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欧盟 25 国	186.6	180.6	181.2	184.0	193.5
欧盟 15 国	163.4	158.6	158.7	160.3	168.3
其他欧洲国家	23.8	24.6	26.5	28.5	28.2
独联体	98.6	99.8	101.6	107.5	111.8
北美自由贸易区	135.1	119.9	123.9	122.8	133.0
南美洲	39.2	37.4	40.7	43.0	46.0
非　洲	13.8	15.1	15.8	16.3	16.5

国家及地区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中　东	10.8	11.7	12.4	13.4	13.6
中　国	127.2	150.9	181.6	220.1	272.5
日　本	106.4	102.9	107.8	110.5	112.7
大洋洲	7.8	7.8	8.3	8.3	8.3
亚洲其他国家	98.2	99.9	104.0	110.0	99.4
世界总计	847.5	850.6	903.8	964.4	1035.495

表7-2　　2000年—2004年我国粗钢产量的增长情况分析　　单位：百万吨

指　标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占世界产量的比重	15%	17.7%	20.1%	22.8%	26.3%
绝对增长量	/	23.7	30.7	38.5	52.4
年均增长率	/	18.6%	20.3%	21.2%	23.8%

从表7-2来看，我国钢铁产量呈现快速增长，2000年—2004年的平均增速接近21%，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由于受政府换届、基础投入增加和经济周期等影响，钢铁工业在需求的拉动下迅猛增长，导致国家不得不对过热的钢铁业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拉动钢铁生产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近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是达到了70073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额比上年增加1.5万亿元，投资大量增长带动了社会钢铁消费的快速增长；二是重工业发展的高增长。2003年重工业全年增幅达到18.6%，比上年加快5.5个百分点。其中大幅度增长的主要是耗钢强度大的制造业，如发电设备制造业、汽车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三是外贸出口总额的高速增长。2004年外贸出口总额达到59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35.25%，其中耗钢较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外贸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我国钢铁工业产销量占世界的比重日益提高。

表7-3　　2003年—2004年世界钢材寝观消费量　　单位：千吨

地　区	2003年第1季度	2003年第2季度	2003年第3季度	2003年第4季度	2004年第1季度	2004年第2季度	2004年第3季度	2004年第4季度
美　国	25682	24802	25865	26169	28557	29740	31047	29576
加拿大	4049	4074	3718	4285	4247	4108	3837	4758
北美洲	29731	28877	29584	304S4	32804	33848	34884	34334

地　区	2003年第1季度	2003年第2季度	2003年第3季度	2003年第4季度	2004年第1季度	2004年第2季度	2004年第3季度	2004年第4季度
德　国	8398	7734	6950	7653	7250	6784	6797	7619
法　国	3885	3930	2788	3545	4079	4045	3310	3550
意大利	7824	8429	8843	8036	7876	8389	9742	8506
西班牙	4871	4810	4266	4601	4903	5672	4873	5004
英　国	2958	3034	2864	2896	3170	3305	2978	2966
欧盟其他	8778	9617	6443	8431	10423	11180	7469	8648
欧盟15国	36714	37554	32153	35162	37703	39376	35167	36292
日　本	17355	17498	16995	17226	17243	17731	18132	18104
中国大陆	49621	54471	59865	64182	63576	60408	61573	65894
韩　国	10509	11471	11186	11026	10894	12123	11464	11439
中国台湾	4953	5570	4821	4953	5322	6198	6017	5676
亚　洲	82438	89011	92867	97386	97035	96461	97186	101112
独联体*	9220	9084	9118	10227	10480	9480	9926	10494
巴　西	3846	4131	4094	3863	4710	4748	4638	5305
其他地区	43513	46614	47508	47776	46540	44883	43649	45351
世界合计	205462	215271	215324	224868	229272	228797	225451	232888

备注：*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

以2003年和2004年的世界钢材表观消费量为例(见表7－3)，我国的钢材消费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2004年第4季度比2003年第1季度增加了32.79%。除了2004年前3季度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特别是2004年4月份，国家加强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个行业的“降热”，这三个季度的消费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但由于受需求的影响，2004年我国钢材的消费量仍出现较快的增长，达到2.51亿吨，占全球总消费量的27.44%；而美国与欧洲总的消费量也不过是3.05亿吨。

2. 对海外铁矿石资源依赖性日益提升

近年来，我国钢铁产量持续高增长，对世界铁矿石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3年我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04年我国铁矿石进口更是高达2.08亿吨，同比上升了40%，创造了新世界记录。2005年这个数字还将继续上升。

从图7－2的数据可以看出，1998年至2003年期间，我国铁矿石消费量年均增长为8%，基本与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一致性；但铁矿石的净进口量年增长率相对较高，达到28%，而国内铁矿石的产量基本维持不变，年增长仅2%；这说明我国对于境外铁矿石需求量不断提升。根据申万研究所的研究和预测，由于房地产、汽车、机电等行业的快速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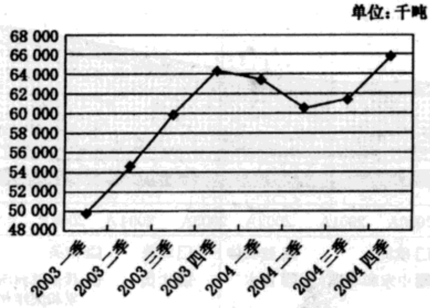


图 7-1 我国 2003—2004 年的钢材季度表观消费量

展的刺激，2003—2006 年，我国钢铁工业对于铁矿石的需求，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净进口量上以及国内产量方面都会有一个快速增长，特别是受境外铁矿石的大幅涨价的影响，境内的铁矿石开采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增幅。但这种增幅到 2005 年后基本达到最高位，不可能再有太大的潜力可挖，因此，我国钢铁业的增长最终还将依赖于境外铁矿石的供给。从国际铁矿石需求市场看，欧洲和北美洲市场已经比较成熟，进口需求比较稳定。在亚洲，韩国、日本近几年铁矿石进口量会有小幅增长，而中国的消费需求则是突飞猛进，世界铁矿石贸易格局由此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全球铁矿石的主要进口国开始由日本、西欧逐步转向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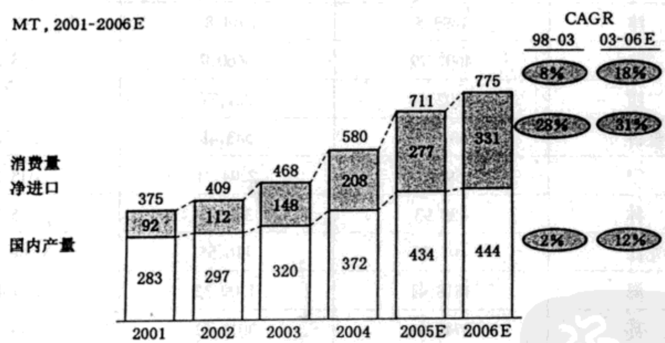


图 7-2 近年我国铁矿石消费量、产量及进口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钢铁协会，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从图 7-3 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几年世界铁矿石的增长主要是由中国的需求所致，到 2005 年以后我国对于铁矿石的需求也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而其他地区和国家增幅相当有限。

3. 省市分割明显，强弱差异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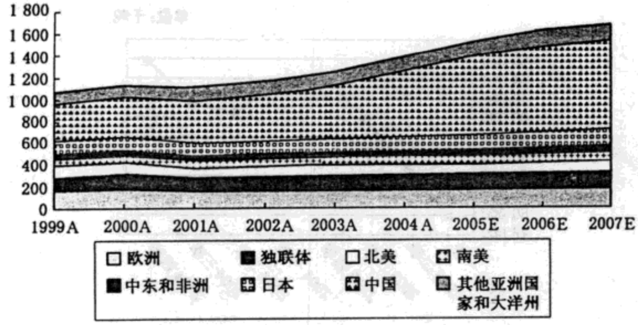


图 7-3　世界铁矿石近 6 年的需求和未来几年的预测　单位:万吨

建国初期,我国钢铁工业是按靠近铁矿原料产地和利用国内资源为主的原则布局的。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新建了主要利用进口铁矿的宝钢。目前,全国除西藏外,几乎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钢铁企业,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不仅数量多,而且效率低下,并伴有地区供求不平衡的问题。

表 7-4　　2003 年—2004 年我国各省市的钢材产量　　单位:万吨

地区名称	2004 年	2003 年	同比增长(%)
北　京	851.04	783.5	8.6
天　津	1493.5	1014.86	47.2
河　北	4697.79	3660.9	28.3
山　西	1102.64	821.71	34.2
内蒙古	601.36	543.48	10.6
辽　宁	2598.07	2294.31	13.2
吉　林	430.93	373.64	15.3
黑龙江	197.76	116.55	69.7
上　海	1818.41	1709.32	6.4
江　苏	3749.91	3012.63	24.5
浙　江	626.38	551.37	13.6
安　徽	945.71	722.13	31
福　建	568.4	468.91	21.2
江　西	774.9	661.46	17.1
山　东	2011.69	1444.77	39.2
河　南	966.02	819.15	17.9

地区名称	2004年	2003年	同比增长(%)
湖　北	1334.33	1127.45	18.3
湖　南	802.11	587.29	36.6
广　东	1141.68	955.96	19.4
广　西	376.12	243.79	54.3
海　南	17.55	14.01	25.3
重　庆	275.01	216.23	27.2
四　川	1011.97	832.86	21.5
贵　州	203.22	192.97	5.3
云　南	345.5	280	23.4
西　藏	0	0	0
陕　西	201.28	132.56	51.8
甘　肃	310.89	244.93	26.9
青　海	37.38	40.36	-7.4
宁　夏	14.09	12.75	10.5
新　疆	233.06	202.46	15.1
总　计	29738.7	24082.31	23.5

从表7-4的数据来看,河北的排名第一,达到4697.79万吨,江苏的产量为3749.91万吨,排名第二,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湖北、广东、山西、四川紧随其后,产量均超过了1000万吨。除了西藏没有钢铁厂以外,宁夏、海南、南海3省的产量不足40万吨,远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产量。虽然河北的钢铁产量排名第一,但该省的钢铁厂数量也是全国第一,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近200家),而大量的钢铁企业年产量不足50万吨;而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米塔尔集团年产量超过了6000万吨,远远超过整个河北省的产量。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钢铁工业的资源整合将不可避免。

4. 钢材消费和生产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

2004年我国实现GDP 1.53万亿美元,钢材消费量为2.51亿吨;而美国11万亿美元的GDP却只消耗1.3亿吨钢材;日本4.3万亿美元的GDP也只消耗了1亿吨钢材。如以单位GDP消耗钢材(钢材的GDP消费强度)为计,1998年我国是1.22吨/万美元;2002年为上升1.54吨/万美元;2004年这个数字稳定在1.64吨/万美元。而2004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世界主要钢铁生产国消费强度均低于0.2吨/万美元。尽管我国与发达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不同,但我国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因此,随着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增长方式的转变,钢材的节约、资源消耗降低的潜力非常大。

另外，我国钢铁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多、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也十分突出。目前，钢铁工业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10%左右，钢铁工业水耗占全国工业水耗的9%左右，其中电力消耗占全国工业耗电的11%左右；平均吨钢耗新水量约14吨，高出世界先进水平8吨—10吨；吨钢粉尘排放量约2.7公斤，是世界先进水平的5倍；粉尘年排放量约60万吨，占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的13%左右；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

二、钢铁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 铁矿石等配套资源相当贫乏

铁矿石是钢铁生产的主要原料。建国以来，我国累计生产铁矿石58.26亿吨，累计消耗铁矿资源140多亿吨。虽然我国铁矿资源储量很大(2002年末统计，已探明的铁矿资源总量约579亿吨，其中基础储量214亿吨)，但同时存在很多不利的因素：(1)品位低，贫矿多。矿石含铁品位平均只有33%；贫矿占全部矿石储量的98%。(2)矿床类型多，矿石类型复杂，难选铁矿占较大比例。

经过半个世纪的开采，我国铁矿石可采资源不足的矛盾逐渐显现，产量增幅有限。多数重点及地方骨干矿山的圈定矿量逐渐减少，许多已经开始进入生产中后期。由于资源枯竭，2005年现有国有重点矿山的生产能力将比2002年减少77万吨；新建矿山可补充能力为980万吨，预计2005年重点矿山实有生产能力可达到12777万吨；同时地方铁矿通过老矿山的挖潜改造和新矿山的建设，2005年产量可达到22623万吨；加上地方未报的铁矿产量，2005年国内原矿产量估计为43400万吨，可支撑生铁产量13454万吨。到2010年国内原矿产量47.000万吨，可支撑生铁产量14570万吨。但总的来讲，国内原矿产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钢铁企业发展的需要，我国铁矿现有经济可采储量只有80多亿吨，按目前的开采规模，保障程度只有25年左右。

同时，与钢铁业密切相关的锰矿、铬矿等资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锰矿和铬矿储量少，50%的锰矿、几乎100%的铬矿长期依赖进口；焦煤、电力、码头、铁路运输等瓶颈性制约因素逐渐显现，水资源日益匮乏，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钢铁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2. 议价能力以及战略前瞻性仍相当薄弱

2004年我国进口铁矿石达2.08亿吨，是世界铁矿石第一大进口国。从量上看，我国理应在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上拥有话语权，也就是说我国钢铁业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铁矿石的定价。但事实却不如人意，2005年2月下旬，日本新日铁公司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了2005年度铁矿石71.5%涨幅的协议，随后阿塞洛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以及韩国浦项制铁也相继与三大矿业巨头签订了同样涨幅的铁矿石贸易协议。在寡头垄断的强压之下，中国钢铁业的领军企业一宝钢集团在2月底无奈接受这个涨幅，这意味着国内其他企业也不得不接受同样的涨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铁矿石厂集中度高于钢铁企业，议价能力相对更强

当前,国际铁矿石产量增长有限,并且行业集中度高于钢铁工业。2003年世界前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36%,而2003年世界前三大钢铁企业的产量只占全球钢产量的11%,因而矿石企业对矿石价格的谈判能力比钢铁企业更强。同时,世界前三大铁矿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CVRD)矿业公司、英国力拓(Rio Tinto)公司和澳大利亚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公司的铁矿石供应量占全球海运量的70%左右,主导着全球铁矿石出口贸易(见图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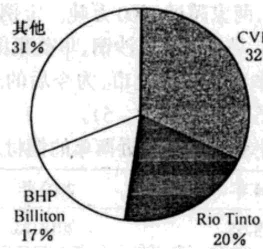


图7-4 2003年世界前三大铁矿石出口厂商所占全球贸易份额

(2)人为过度炒作,囤积居奇

近几年来,我国铁矿石进出口企业的数量成倍增长,2001年为173家,2003年达到了268家,2004年更是达到523家,其中有不少是中小规模的经销商和贸易企业。铁矿进口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有效管理的缺失,必然导致这些进口商之间的过度竞争。为了争夺矿源,这些经销商和贸易企业趁机在全球抢购铁矿石,之后囤积居奇,助长了国内铁矿石市场价格的虚涨,给国际矿业巨头坚持大幅涨价提供了很好的借口。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统一协调和自律,才使中国丧失了作为铁矿石大买家的优势地位。

(3)日本钢铁业的战略前瞻性高于我国

尽管需求猛增,我国钢铁业还未获得上游议价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目前铁矿石的国际定价惯例延续了当初日本处于世界钢铁业重心时期的做法。长期以来,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本钢铁公司都会在每年4月1日与三大铁矿石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达成的价格成为亚洲基准定价。作为资源的弱国,日本钢铁业对于资源的战略投资非常重视。如新日铁、三井财团、川崎制铁(川铁)、日本钢管(NKK)等企业,早在很久以前就对国际铁矿石三巨头的英国力拓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以及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进行了战略持股,甚至很多中小型矿厂都有它们的股份。

近几年,随着中国钢铁业的快速发展,日本钢铁业的地位受到极大的威胁,为了维持日本的世界地位,这次大幅提高铁矿石的价格(上涨71.5%)。一方面,价格的提升是受中国市场旺盛需求的强力拉升;另一方面,较高的定价有助于日本在资源领域里向中国发起挑战,企图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挤压中国钢铁企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巩固其在亚洲价格谈判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境外开矿规模大,矿价上涨能使其从中得到售价利润,而我国钢厂铁矿现货贸易比重和数量远远超过日本,矿价上涨受到的损失远远超过日本。

在高度依赖进口和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情况下，我国钢铁企业成本大幅攀升。在铁矿石价格创下20年来历史新高的同时，也同样标志着年进口量铁矿石2亿吨以上的中国2005年将多支出300亿美元以上的采购成本。

3. 钢铁企业数量过多，规模偏小

2004年中国的钢铁生产商数量超过800家，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合资企业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实力，但绝大多数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地步。其中大部分的年产能力低于50万吨，超过600万吨只有10家，两家超过1000万吨。宝钢集团的世界排名为第3，而鞍钢的世界排名为第8。武钢、首钢、马钢、唐钢、沙钢、华菱集团等的国际排名也相当靠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基本都实现了上市，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中国钢铁业的整合提供了可能(见表7－5)。

表7－5　　2004年全国前十强钢铁企业近两年的钢材产量及排名　　单位：万吨

企业名称	2004年	2003年	2003年排名
宝钢集团	2198.55	2018.23	1
鞍　钢	1082.79	957.45	2
武　钢	871.98	691.77	4
首　钢	819.18	771.96	3
马　钢	747.86	556.4	6
唐　钢	709.17	553.89	8
沙　钢	702.46	564.49	7
华菱集团	687.48	509.26	9
邯　钢	653.13	577.81	5
莱　钢	616.55	436.04	12

资料来源：《海外钢铁》2005年1月刊。

从总体上讲，我国钢铁工业仍处于低效率、高耗能、对铁矿石等原材料过度消耗的状况，其中的很大原因是小规模生产商的大量存在。如果按照人均产钢量来衡量，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力明显低于其他钢铁大国，但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其他国家，钢铁生产商来必会因此而处于劣势的竞争地位。

但在原材料、燃料、运费等价格快速上升的情况下，我国钢铁工业的成本压力大大提升。目前，国内钢铁需求特别是高端板材需求仍相当旺盛，且国内钢铁价格与国际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少数一些实力雄厚、生产工艺先进的大型钢铁企业，可以多生产高端产品，并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铁矿石上涨的成本因素转移到下游企业，从而避免损失。但对大多数资金比较薄弱、承受风险能力较弱，以生产建筑用钢或低端产品为主的中小钢铁企业来说，由于中低端产品的严重过剩，价格不升反降，因此很难转嫁其成本，只能被动承担成本损失，不得不面临着被淘汰或被吞并的命运。

三、国际钢铁工业的发展趋势

1. 钢铁大国排名变化不会很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钢产量在波动中呈缓慢增长趋势。1990年全世界实现GDP 21.8万亿美元，当年钢产量7.7亿吨，2003年全世界实现GDP 36万亿美元，当年钢产量9.6亿吨，钢材消费强度明显下降。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钢铁需求晕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钢铁产能增长较快，加剧了全世界钢铁产能过剩的矛盾。

除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产量和排名的变化相对比较稳定，就2004年和2003年相比，世界钢铁产量前十强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变化，只有印度从2003年第9位上升至2004年的第8位，这与印度钢铁巨头米塔尔一系列的重组计划有关(合并其现有的米塔尔公司与伊斯帕特公司两家钢铁企业资产，然后把美国国际钢铁集团收归名下)。同时，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钢铁企业钓整合；其世界排名将不断提升，估计不用到2020年其将超过日本和美国，最终排在中国的后面；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趋于平稳，排名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不排除个别位置上的微调(见表7－6)。

表7－6　2004年全球排名前十位的粗钢生产国和产量　单位：百万吨

名次		国家	总产量	同比增长	占世界的比重
2004年	2003年				
1	1	中国	272.5	23.2%	25.9%
2	2	日本	112.7	2.0%	10.7%
3	3	美国	98.5	5.2%	9.38%
4	4	俄罗斯	64.3	2.5%	6.12%
5	5	韩国	47.5	2.6%	4.52%
6	6	德国	46.4	3.6%	4.42%
7	7	乌克兰	38.7	4.9%	3.69%
8	9	巴西	32.9	5.7%	3.13%
9	8	印度	32.6	2.7%	3.1%
10	10	意大利	28.3	5.6%	2.7%
合计			774.4	/	73.7%

资料来源：《海外钢铁》2005年1月刊(总第39期)。

2. 国际钢铁巨头将加速进入中国和印度

世界钢铁巨头正通过合资办厂和产品出口等途径，加快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一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未完成，钢铁市场还有较大空间，而欧美日等国钢产量在达到历史顶峰后，市场需求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故而转向在中国市场寻找新的利润空间；其

次是作为钢铁产业重要用户的汽车行业，近年来快速进入中国市场，跨国汽车生产企业与重要钢铁企业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供销关系，进入中国市场的汽车企业要求原料本地化供应，使得世界钢铁企业也把投资重点转向中国。

到2004年底，外资控股的钢材生产能力占我国总生产能力已经超过10%。由于2008年之前是中国国内钢铁界最后的整合时机，即中国钢铁业的布局基本已经完成，产能和需求不会出现较大的增长，所以境外钢铁厂一方面加快与内地钢企的项目合作，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加大资本运作的力度。例如，韩国浦项制铁在2002年前就与中方合资建有3座板材生产厂；2003年新日铁与上海宝钢签署协议，合作投资65亿元人民币建设1800毫米冷轧工程，设计规模为年产170万吨；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与鞍钢集团共同投资1.8亿美元建设年产40万吨的热镀锌板项目，已于2004年6月正式开业；2005年1月世界第一大钢铁集团米塔尔与中国湖南华菱钢铁公司达成协议，以3.14亿美元收购华菱37.17%的股份，从而正式参股华菱管线；同时，米塔尔还实质性接触昆钢，希望参股或控股昆明钢铁厂；世界第二大钢铁集团阿塞洛也正在与青岛钢铁控股集团就股份收购问题展开初步谈判，力求入主青钢；日本JFE公司于2005年初正式公布了计划金额1000亿日元(计划持有50%以上的股份)与广州钢铁企业合资建立高炉炼钢厂，将于2008年投入生产，等等。

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印度目前的人均钢材消费量为26.7公斤，与世界人均钢材消费量120多公斤相距甚远，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印度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已探明的铁矿砂储量达到120亿吨，成为世界上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第三大铁矿砂出口国；另一方面，自1991年印度政府实施经济改革以后，印度政府相继取消了钢铁企业的一些政策障碍，极大地调动本国钢铁生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近年来，印度钢铁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重组，如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收购美国国际钢铁集团公司、印度塔塔钢铁公司收购新加坡NatSteel钢铁公司、印度金达尔钢铁集团公司收购印尼不锈钢冷轧钢厂等，这些购并大大加快了印度钢铁业的振兴。

同时，世界钢铁界也纷纷计划在印度投资建厂，并展开激烈竞争。如韩国浦项制铁与澳大利亚的资源开发企业准备投资120亿澳元在印度建设年产1000万吨的炼钢厂；中国的宝钢也积极考虑与印度企业的合作，寻求一席之地。

3. 世界钢铁工业将加快兼并重组

当前的世界钢铁巨头基本都是通过重组获得产能的优势，并提升自己的发展空间。全球钢铁巨头米塔尔集团在2004年10月收购美国第三大钢铁集团ISG后，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钢铁集团，超过了前世界第一钢铁企业阿赛洛公司，它是由法国、卢森堡、西班牙三国的三家大型钢铁企业合并而成。

未来几年，从全球范围来看，钢铁业的兼并重组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全球钢铁产能较上游产业链仍然比较分散，目前全球最大的10家钢铁生产商占有了世界市场30%的份额，而最大的10家铁矿砂和焦炭供应商则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从产业集中度的角度来说，世界钢铁业的兼并重组是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二是全球增长最快、也是最大的钢铁市场中国的钢铁产能在不断扩大，中低端钢铁产品已经面临饱和，必然要通过出口来缓解库存，这将给世界钢铁市场造成重大的冲击。三是近

年来良好的市场环境也是钢铁工业并购步伐加快的重要因素。在经历了多年的价格低迷后,世界钢铁市场从2003年底开始反弹,全行业的收益率也因此大幅上涨,2004年净利润增长了8倍,达到30.4亿美元。在如此大的财力支持下,特别是中国产能迅速提高和集中度提高的要求,将更加刺激世界钢铁业的重组。

目前全球钢铁业并购大战已经拉开序幕。据美国的研究报告称,全球有11家大型钢铁集团正在"伺机捕食",除了米塔尔集团和阿赛洛集团之外,亚洲有日本的新日铁、JFE和韩国浦项,中国宝钢也在其中,而俄罗斯的北方钢铁、美国的NUCOR和美国钢铁同样不可忽视。特别是美国钢铁企业几年前就已完成内部整合,现在正是眼光向外的时候。到2010年,世界钢铁巨头的数量可能会达到20家(即产钢量超过2000万吨),而到了2020年,未来全球很有可能只剩下4至6家钢铁巨头,而每家都拥有8000万至1亿吨的年生产能力。

4. 钢铁业的横向和纵向战略联盟将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随着世界钢铁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钢铁业的横向和纵向的战略联盟发展势头迅猛,已经从同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向跨国、跨大区延伸,从而将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在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优化、生产规模巨大、产品竞争力更强的钢铁巨头。

例如,2001年3月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分别与首钢总公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以共同应对国际竞争,避免彼此间的恶性竞争和部分重复建设,优化中国钢铁结构。2004年日本三家大型钢铁生产商(新日本制铁、住友金属工业和神户制钢所)宣布结成生产联盟,将联合使用住友金属工业位于日本西部和歌山地区的一座钢铁厂。这个由日本四大钢铁生产商中的三家所组成的联盟将有助于这些公司增加钢铁产量,提高住友金属工业这座钢铁厂的开工率,全力满足强劲的市场需求,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需求。

同时,世界钢铁业巨头之间的战略合作也正在积极地发展,如2004年9月中国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和阿赛洛公司鉴定协议,共同投资65亿元,在上海建设1座1800毫米冷轧带钢厂。

除了钢铁业内部加快战略联盟的同时,世界钢铁业为稳定市场,规避风险,也在不断加强与铁矿石、煤炭等上游原料生产企业的合作与联系,通过共同开发资源,获得了稳定的原料来源;同时,通过与汽车、造船等下游行业建立共同开发产品体系,缩短产品开发时间,满足了下游产业对新产品不断提高的质量要求,形成长期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

例如韩国的浦项、新日铁公司等均与其国内的造船厂有战略合作关系,在海外均有稳定的铁矿供应基地。2002年起,宝钢已实现向数十家国内汽车制造厂定向批量供货;2003年起宝钢还先后与上汽集团、一汽集团、东风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三大汽车集团在钢材供应、技术开发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还与国内许多家电、造船集团等下游大客户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5. 铁矿石供给和需求将逐步趋于平衡,价格稳中有降

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我国钢铁产量的大幅增长,对铁矿石需求持续增加,导致世界铁矿石供应偏紧,拉动了价格上涨。2004年世界铁矿石的主流市场价格上涨了

18.6%,2005年更是大涨了71.5%。面对世界钢铁业需求的拉动和利润的驱动,世界主要铁矿石供应商纷纷扩大投资、增加产能。

近年来,世界第一大铁矿石企业淡水河谷公司(CVRD)计划投入25亿美元,将铁矿石产量从2004年的年产2亿吨扩大至2008年的年产3亿吨;而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也计划投入28亿美元,将其年产能分别从目前的1亿吨和9300万吨扩大至1.7亿吨和13亿吨;扩产后3家公司铁矿石年总产量将达到6亿吨。从短期来看,世界铁矿石的扩产速度远不及需求的增长,而且大多数矿石扩建项目均在2005年以后开工。据专家预测,2005年全球的铁矿石新增产能仅有约5500万吨,而2005年我国铁矿石估计需要进口2.77亿吨,即比2004年增加6900万吨以上,2006年进口量超过3亿吨。虽然这是国际铁矿石市场和主要供应国供应商可以接受的量,但由于全球的供货量难以迅速扩大,所以未来两年,国际市场上铁矿石供应紧张状况仍将持续,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

随着中国需求量的逐步趋稳,到2008年以后,世界铁矿石的供给和需求将达到一个动态平稳,价格也将从高位回落至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

6. 钢铁生产重心将逐步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加快,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正成为重要的钢铁生产国。发展中国家钢产量占世界钢产量的比重由1950年的2%增加到2004年的40%,这一趋势还在不断上升。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国内对于钢铁需求非常旺盛,极大地刺激了本国钢铁工业的增长,同时也带动了世界钢铁工业格局的变化。从未来10年的发展来看,发达国家对于钢铁产品的需求基本比较平稳,不可能再有多少发展潜力,而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的钢铁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然导致世界钢铁业产生巨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必然逐渐成为世界钢铁生产和消费的中心。

7. 板带材等高附加值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

由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日益增长,供给已经超过了需求。发达国家的钢铁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扩大市场份额,加大了产品结构调整力度,主动放弃不具国际竞争力的中低端产品,充分发挥技术和资金优势,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扩大其市场份额,以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钢铁巨头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率,也开始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增加高端产品的比重。目前世界钢材贸易产品结构中,板带材产品的贸易总量已经占到钢铁产品的70%左右,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其将逐步成为竞争的焦点。

8. 新材料替代部分钢材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从世界结构材料的发展,趋势看,尽管钢材仍是应用最广泛的结构材料,但铝合金、工程塑料等均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消费的塑钢比(塑料类产品与钢材的比)是3:7,世界平均水平是5:5,而美国高达7:3,随着新型材料行业的不断发展,替代部分钢材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增加。

四、钢铁工业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1. 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优势分析

(1)我国已进入重化工时代,市场需求前景广阔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时代,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城市化、市场化、重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必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

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发展阶段不同其钢材消费强度也不同。处于不发达阶段时钢材消费强度较低;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钢材消费强度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并维持在一定高水平上;进入工业化后期及成熟阶段后,钢材消费强度缓慢下降。从目前钢材消费强度来看(2002年为1.54吨/万美元,2004年为1.64吨/万美元),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因此钢材高消费在较长时间仍将维持不变。

一是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还很低,城市化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房地产市场潜在需求仍然较大,未来10年左右时间房地产投资仍将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2%—18%),房地产市场持续向好的趋势不会逆转,因而我国钢铁产业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是我国正在向"世界制造中心"的目标迈进,一些大量消费钢材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包括汽车、造船、电力设备、重型机械、精密机械等行业都会增加出口量,这将进一步刺激国内的钢材需求量。

三是近年来上马的一大批重点工程、奥运场馆和相关配套建设为中国钢铁产业强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预计未来几年,经济全球化,投资多元化,在国内外两个市场融为一体的带动下,中国钢铁工业的产量将稳步上升。

(2)我国钢铁工业的人才、管理、技术开发等体系已经逐步完善

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我国钢铁工业无论在人才培养、职业教育、研发、设计还是在工程总承包、生产经营等方面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许多领域已经处在世界领先水平或向世界领先水平冲击,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做大做强奠定了良好的技术、人才和管理基础。

2002年起,国内钢材市场开始回暖,钢材价格的上涨诱导国内众多资本向钢铁工业的巨额资金,包括一批重点板材工程项目上马和技术改造,大大改善了钢材品种结构和产品质量,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率,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钢铁工业逐步摆脱了大而不强的被动局面。特别是通过高效化、大型化和精炼比提高的炼钢技术、转炉的溅渣护炉技术、连铸技术、以高炉提高喷煤比和长寿为重点的系统炼铁技术、棒线材连轧化和国产化技术、综合节能技术等共性技术的应用,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潜能。另外,大量外资企业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进入我国钢铁工业,它们的进入为我国钢铁工业带来了全新的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方式以及经营理念,推动了我国钢铁工业的管理软件建设和应用。

(3)钢铁工业布局已经展开,骨干企业集团基本形成

1998年宝钢吸收合并上海冶金公司和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司两大地方钢厂,一跃

成为国内钢铁业一哥，产量也由1200万吨提升到2000万吨，继上海宝钢组建中国最大钢铁联合企业以来，钢铁工业的重新布局趋势在中国如火如荼。

在2001年制定的中国冶金工业“十五”规划中，国家就希望形成5大钢铁集团，即东北地区的鞍钢、华北地区的首钢、华东地区的宝钢、中南地区的武钢和西部地区的攀钢，鼓励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来做大企业。通过多年的建设，中国钢铁产业聚集区已经形成，其中区域钢铁业已建成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模。以特大型企业为主的骨干企业主力军团部分已经基本形成或正在形成，同时也拥有了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

例如2004年6月攀枝花钢铁集团成功地重组了四川长钢集团、成都无缝钢管厂和长城特钢公司，加上对川投长钢、新钢钒和渝钛白三家上市公司的控股，完成了在钢钒、钛白粉、特殊钢的品字型布局，攀钢至此基本完成了在西部地区的初步战略布局。

武钢集团在2004年成功地实现了整体上市的同时，也加快了对地区性钢铁企业的战略重组。同年，其通过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政策支持成功地收购鄂钢，从而使整个湖北钢材市场牢牢控制在武钢手中；又积极地试图收购杭钢，借此优化集团资源配置，并强势进军华东市场，以此实现自己的战略布局。

2005年起，北京首钢正式搬迁至河北的曹妃甸，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布局，并与唐钢实现联合，而唐钢集团也正在酝酿与唐山国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唐山恒通精密薄板有限公司联手，建立一家年产120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首钢的搬迁将使其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并逐步完成对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的钢铁企业群进行战略重组。

近年来，辽宁省也开始着力推进鞍山钢铁集团、本溪钢铁集团的联合组建工作，组成年产钢3000万吨级的中国钢铁“航母”，从而实现对东三省的战略布局。

除了五大“航母”基本实现自己的战略布局以外，一些地方性钢铁企业也正在积极地进行战略布局。如2003年1月大连特钢和抚顺特钢重组成立了辽宁特钢集团；2004年辽宁特钢集团又与黑龙江省北满特钢集团重组为东北特钢集团，通过整合区域资源，实现了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了整个东北特钢生产经营专业化分工、市场资源统一配置的格局。经过多年的建设，一些重点地区的骨干钢铁集团正在逐步形成，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分散经营造成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无序竞争等情况的发生。

(4)我国有充足的煤焦资源和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

作为钢铁工业的重要配套资源，中国煤炭资源分布广泛，总量丰富。根据第三次煤炭资源预测与评价，全国煤炭资源总量为5.57万亿吨，排名世界第一；保有资源量为10202亿吨，可采储量为2040亿吨，位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现有煤矿年生产能力约为13亿—14亿吨左右，煤矿剩余可采储量约为1038亿吨，其中国有煤矿年生产能力约8亿吨，剩余可采储量约700亿吨，并且开采成本相对比较低廉。

同时，我国人力资源相当丰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保证钢铁工业的员工工资成本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报告的数据，一直到2050年，中国人能够提供18岁到60岁的劳动力人口达8亿人。而《世界发展指标2001》显示，1995—1999年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中国仅为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日本

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在国际以成本竞争的大环境下,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具有无法抵挡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中国钢铁工业持续较快发展的基础,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成本领先做了重要的保障。

2. 我国钢铁业发展的劣势分析

(1)企业布局和组织结构制约行业的健康发展

建国初期,我国钢铁工业是按靠近铁矿原料产地和利用国内资源为主的原则布局的。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新建了主要利用进口铁矿的宝钢。目前,全国除西藏外,几乎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钢铁企业。

由于我国现有钢铁布局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大中小并举,基本上每个省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钢铁生产基地,因此重复建设十分严重。在规模经济时代,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钢铁企业发展的趋势,同时我国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基本上都是"万能型"工厂,其产品几乎包括了所有钢材品种,专业化程度低,缺乏必要的分工与协作,产品出现严重趋同化。

随着资源和市场条件的变化,钢铁工业对进口矿石依赖程度不断上升,环保要求日益严格,钢铁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矛盾日渐突出。大量进口铁矿石均需通过沿海码头中转,2004年铁矿石进口量达到了2.08亿吨,给海运和铁路运输带采了巨大压力。2004年,全国74家重点钢铁企业中,有18家建在省会城市,有34家建在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生产规模已达800万吨钢的首钢,因环境和水资源的压力,已不得不进行搬迁。2000年以来,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华北地区、缺少能源和钢铁企业数量过多的华东等地区又盲目建设了一大批新的钢铁企业,致使钢铁工业总体布局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2)产业集中度低,兼并重组还没形成规模

以钢材的集中度为计,2003年中国前十大钢铁生产商的钢材产量占全国钢材产量的34.81%,2004年尽管前10大钢铁生产商的产量增长了18.05%,但集中度却反而降到33.36%。

表7-7　　近两年全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钢材产量情况统计

	2004年		2003年	
	企业数*	占全国的比重	企业数*	占全国的比重
1000万吨以上	2	12.02	2	13.59
500—1000万吨	13	33.04	10	27.42
300—500万吨	11	13.98	7	11.89
200—300万吨	17	14.71	17	17.91
100—200万吨	19	9.92	22	14.19
100万吨以下	8	1.51	12	2.71
合　计	70	85.18	70	87.72

注:集团整体计为一家。

2003年,全球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有47家,其中日本4家,其钢产量占日本钢产量的74.29%;美国4家,占美国钢产量的54.50%;俄罗斯4家,占俄钢产量的69.02%;韩国2家,占韩钢产量79.80%;欧盟(15国)7家,占欧盟钢产量的87.46%;而中国的前4家,占中国钢铁产量的27.09%,2004年,这个指标下降到了18.54%,C4集中度不增反减。

我国钢铁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专业化生产水平低、产业组织过度分散,从而造成钢铁工业重复建设、资源配置不合理和企业竞争力低下。产业集中度低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作为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2004年宝钢集团年产钢尚不足全国总产量的8%。现在,国内的钢铁产能还在增加,与此同时,我国钢铁业的兼并重组虽然在各地已经有所行动,但却还没有形成规模,主要原因是钢铁企业通常都是各地方政府的利税大户和解决当地就业的重要场所,因此跨越行政区域进行兼并的难度非常大。

近几年,一些钢铁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发行债券等方法,对我国钢铁工业进行了一定的整合,许多小型钢铁企业被一些优质企业所吞并,并且钢铁工业还出现了许多强强联手的现象,但我国钢铁工业的集中度还需进一步提高,专业分工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产品结构不合理,档次不高

其他产钢大国在钢产量超过1亿吨后都相继缩减,继而以优质钢材占领市场,而我国仍只重产量而忽略质量,从而造成钢铁产品结构层次低,现有钢铁产品中,60%以上的是低附加值、低档次产品。

2003年,我国钢铁生产的板带比为32.1%,消费的板带比为42%,两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而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板带比一般都超过60%。近几年我国进口钢材中,板带材等关键钢材品种的进口比重在80%~90%左右。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但无论是钢材出口量还是钢铁出口结构,与其他几个钢铁大国相距甚远,而且其他几个钢铁强国都在加快调整本国产品结构,减少了初级产品的生产,以优质高档次钢材拼抢市场。同时,市场需求量大的高附加值产品一般都占出口钢铁产品的40%~60%左右,在我国,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仅占13.4%,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初级产品比重却高达64.2%。如部分高附加值的关键钢材品种,比如厚度小于1mm的冷轧薄板、厚度小于3mm的热轧薄板、不锈钢薄板、镀锌板、冷轧硅钢片等品种满足不了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些产品只能通过大规模的进口来解决缺口。同时,属于限期淘汰范围的叠轧薄板、落后的热轧窄带钢,2000—2004年产量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仍呈增长趋势。

随着“十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现有大型钢铁企业发展板带材的支持力度,批准了一批板带生产线建设和改造,一些新建板带轧机在近两年相继投产。2004年,全国热连轧板卷生产增长30.5%,冷轧板卷增长27.6%,首次超过棒线材增长速度,板带比为33.7%,与2003年相比虽略有增加,但与消费相比仍有不足,相差4.6个百分点,净进口板带仍近2000万吨,而且大部分是高端产品。同期,我国钢铁出口虽大幅增加,但主要还是以普通中板、热轧薄板、棒线材为主的中低端产品;其中进口钢材平均吨钢709美元,而出口仅为585美元,相差124美元,可见我国钢铁产品结构仍相当不合理,发展高档次产品非常紧迫。

(4)总体工艺和信息化水平仍相当落后

国内冶金行业的生产技术除宝钢、鞍钢、马钢等少数重点大企业以外，基本属于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的生产水平，与国外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很多企业精炼基础还未建立，一些大企业仍采用热烧结矿工艺；铁水预处理、炉外精炼处理技术普及程度远远不能满足品种质量提高的要求。

同时，我国钢铁工业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吨钢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20%—30%。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钢铁工业的铁钢比过高，高炉余压发电、干熄焦等大型有效的节能环保装置配备率低，高炉、转炉煤气等余能余热回收利用率偏低所造成的。工艺及技术装备落后导致我国钢铁工业竞争力明显低于国际大型钢铁企业，尽管许多钢铁企业通过一系列的设备和工艺引进，在短时间内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但由于中国钢铁企业高端产品研发能力的受限，影响了技术进步的持续发展。

另外，从整体上来看，作为传统行业的钢铁企业在信息化基础方面仍然比较薄弱：基础数据电子化的不充分，使整个企业的销售、生产、财务等部门缺乏统一的数据交流；生产、销售计划编制缺乏信息支持，影响了准确的市场分析预测，使生产计划、采购计划和采购部门不能统一协调；质量工作较为被动，缺乏主动计划；固定资产管理落后，突发故障难以控制；所有这些薄弱环节都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决策的时效性，有可能导致了管理漏洞，无法有效地控制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5)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滞后

我国钢铁业由于长期实行粗放式经营，只重视产量扩张而忽视产品质量提高，使得企业RSLD投入严重不足。多数企业R&D的投入占当年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为0.6%—0.7%，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3%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1.5%—2%，甚至低于印度和巴西的0.9%—1%。在人力资源方面，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大中专以上学历人员仅为职工的1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数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0%—16%。低水平的R&D投入使得大多数企业不仅缺乏吸收、应用技术成果的动力与活力，而且缺乏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根据国际经验，用于科研、应用开发、技术转换三个环节的资金比例一般为1:10:100，而我国钢铁业该比例只有1:1.3:26。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和人才进行技术创新，企业技术水平也就无法得到长足的进步。R&D投入不足直接导致我国钢铁业创新能力差生产技术落后，使得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被效率上的差距所削弱甚至逆转。

随着汽车、家电、船舶、铁路等下游加工和装备工业的产业升级以及环保生态的压力，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钢铁企业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优质新型钢材。

但由于目前我国钢铁业还缺乏全面、有效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和机制，科技成果系统集成与技术改造脱节，致使我国钢铁工业在关键品种、生产技术与重大装备制造等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轿车面板、高牌号取向及无取向硅钢、不锈钢板等高附加值品种生产能力不足，产品实物质量标准不高；②炉外精炼装置、热连轧机、冷连轧机、镀锌机组、不锈钢冷轧机组和冷轧硅钢片机组等重大装备的关键设备和技术还依赖从国外引进。

五、钢铁工业发展前景展望

1."十一五"期间我国钢铁业的发展趋势

(1)钢铁业并购速度将加快

从钢铁产业的生命周期分析,我国钢铁业正处于高成长阶段,产业集中度还比较低;但从世界的角度看,国际钢铁业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已经基本完成了并购重组,产业集中度非常高。而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钢材市场正加速融入世界钢材市场,我国钢铁业的高速成长吸引国际钢铁巨头加速进入,2004年中期的宏观调控使钢铁业投资增速放缓的同时,国外钢铁巨头并未放慢进入中国投资的步伐。

1998年以前,我国钢铁企业的扩张主要还是依靠自我积累和新建,随着宝钢集团兼并重组成为我国第一钢铁企业后,各地的大型钢铁企业都加快了购并步伐,如武钢、攀钢等相继进行了购并,但由于受地方政府及一些钢铁企业的婉拒,这些钢铁大企业的并购之路走得并不平坦,特别是近两年钢铁工业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企业盈利状况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大小钢厂都不希望被别人购并。

2004年年中,国家从经济和钢铁工业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加强了对钢铁企业的宏观调控,在环境保护、土地管理控制和资金供应控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众多的中小型钢铁企业来说,政策风险开始凸现,市场风险大增,"傻子也能挣钱"的时代基本结束。2005年进口铁矿石更是大涨了71.5%,使得众多的中小钢铁企业的成本大幅增加,而其产品价格的加价能力又相对薄弱,导致往昔比较丰厚的利润变得非常微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部分企业甚至生存处境趋向艰难。相比之下,大型钢铁企业凭借产品品种高端、生产规模庞大,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大型钢铁企业来说,政府宏观调控对其短期利润影响相对较小,但采用"新建"方式成长壮大的成本却大大提高,因此,大型钢铁企业的扩张不得不更多依靠并购重组来完成。同时,国家也有强烈意愿,支持发展条件好的重点大型企业搞好结构调整,通过推进现有企业的联合重组,建立大型企业集团,提高钢铁工业整体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型钢铁企业有钱也有意愿通过并购重组迅速扩张,而中小钢铁企业也开始认真考虑联合重组的可能性,顺理成章,我国钢铁工业的更多的并购重组将会出现。另外,我国钢铁企业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为了与世界钢铁巨头们竞争,我国钢铁企业也不得不加快并购重组步伐,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更快地做大做强。

预计到2007年,随着我国钢铁业逐步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钢铁工业一类公司如宝钢、武钢、鞍钢等必然会对二类公司和三类中小规模的钢铁厂进行大规模并购,并以此成为世界钢铁巨鳄,届时钢铁工业集中度也会随之上升。

(2)我国将逐步成为钢铁净出口国

我国钢铁工业虽然早已成为世界第一,但是钢材出口贸易还没有形成规模。2003年我国钢材出口量仅占世界第10位,同时,我国还是世界最大的钢材进口国。2004年这种

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变,进口钢材6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钢材出口在2004年首次超过1000万吨,而且净出口钢坯220万吨,结束了多年来我国钢坯净进口的历史;我国钢消费量的自给率由2003年的85.88%,上升到95.17%,提高9.29个百分点。但进出口钢材的品种结构差异仍然较大,进口钢材中板材比例仍高达85.6%,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进口比例仍然较高(见表7-8)。

表7-8　　1999年—2004年我国钢材进出口情况统计表①　　单位:美元/吨

年度	进出口	累计(万吨)	同比%	累计(亿美元)	同比%	均价	同比%
2000	进口	1596.14	12.22	85.36	28.76	534.78	14.74
	出口	620.60	69.13	22.29	58.57	359.22	-6.25
2001	进口	1721.73	7.87	89.64	5.01	520.61	-2.65
	出口	473.95	-23.63	18.66	-16.3	393.72	9.6
2002	进口	2448.81	42.23	123.66	37.96	504.97	-3
	出口	545.50	15.09	21.83	17	400.23	1.65
2003	进口	3716.85	51.78	199.16	61.05	535.82	6.11
	出口	695.57	27.51	31.05	42.22	446.39	11.54
2004	进口	2930.27	-21.16	207.87	4.38	709.4	32.39
	出口	1423.10	104.6	83.36	168.48	585.79	31.23

中国2004年钢铁出口同比增长104.6%,达1423万吨,创历史纪录;进口2930万吨,同比减少21.2%,时隔6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4年9月中国钢铁业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逆转,即出口首次大于进口。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宏观调控措施初见成效,国内需求开始减少;另一方面,同期国外特别是美国、日本经济回升引起的钢铁需求劲增,美国钢铁进口量同比增长了1倍,再加上钢铁国际市场价格和中国国内市场价格的差异,从而推动中国钢铁出口增长。由于中国国内需求增长缓慢和质量水平提高,以及钢铁产量的大幅增长,从而进一步增加供应过度的可能性,中国钢铁企业必然会加大出口力度,因此"十一五"期间,中国钢铁出口基本上会出现超过进口的局面。

目前,中国钢铁企业生产的主要品种为棒钢和线材,而出口的多数为中低端产品,像冷轧板、镀锌板等高级钢材的生产还较少,仍多依赖进口。当然,2005年4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对钢坯、钢锭等粗钢产品的出口退税措施(因为生产这些钢铁初级产品的用户都是高耗能、高污染和面临淘汰的小企业,这些企业利用政府以前为鼓励出口而制定的出口退税政策进口铁矿砂来生产粗钢,以获取微薄利润),这会使一些中小钢铁企业停止生产并出口钢铁初级产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减缓中国成为钢铁产品净出口国,但未来的几年,供大于求的局面必然会推动中国成为钢铁净出口大国。

(3)中国钢铁业将面临结构调整

200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70%以上,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

难度很高，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已成为迫切的内在要求，而与固定资产投资高相关的钢材消费不可避免地也将受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而调整。

到2003年底我国已形成3.1亿吨钢生产能力，但落后的30吨以下的小转炉占总能力的25%，约有8000万吨将要被淘汰。2004年全国在建炼钢能力1.5亿吨，其中落后的小转炉和小电炉能力有3600万吨，随着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部分能力将无法形成有效供给。

从总量来看，我国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和在建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2010年的市场需求，但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受资金短缺、价格下滑等因素影响，相当部分在建项目难以继续，估计只有三分之二能力可投入生产。在已建成的生产能力中，大于1000立方米的炼铁高炉能力不到总能力的30%，大于100吨的炼钢转炉和大于60吨的电炉不到总能力的34%；在建生产能力中，大于1000立方米的炼铁高炉能力只有总能力的44%，大于100吨的转炉和60吨的电炉也只有炼钢总能力的52%。且在建生产能力中50%以上为长线材等产品，产品档次低、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偏差。另外，在已建和在建能力中，相当一部分项目属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技术装备落后，资源和能源消耗高，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相当一批能力是注定要被淘汰的。符合国办发[2003]103号文件准入标准有竞争力的现有和在建综合能力约1.75亿吨，距我国市场需求预计还有很大缺口，装备升级的任务还很艰巨，结构调整还有很大空间。

从钢材品种结构看，我国现有2.7亿吨热轧钢材能力中，只有32.1%属板带材产品，在建的1.48亿吨钢材能力中，只有52%属板材产品(含重复材，不计重复材则为49.4%)，我国钢铁工业近年的低水平能力扩张过快，但有效供给不足。

另外，近年来，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也将刺激中国钢铁业的结构调整。由于利润空间大幅缩小，以前那种炉子一出钢就大把赚钞票的粗放经营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企业必须靠扩大规模、提高产品档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获取利润的时代。进口铁矿石涨价会拉动国内铁矿石价格，从而使钢铁企业成本大幅提高，整个钢铁工业利润空间缩小，尤其会直接影响到三类钢铁企业生产经营，甚至将会导致其退出市场：一是高精尖产品比较少的企业；二是没有自有矿山的企业；三是规模偏小的企业。

可以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钢铁业将出现较大的结构调整，大批的中小钢铁企业将面临淘汰或兼并。

(4)我国钢铁业将逐步加大对境外资源的战略投资

目前，我国炼钢生产中有80%的原料来自铁矿石冶炼的生铁，其余的为废钢和少量合金料。我国每年的原矿开采规模为3亿吨左右，只能满足约9000万吨生铁生产需求。2005年受利润的驱动，会有一些新的项目上马，但从长远看，我国铁矿开采规模不可能出现较大的增长。其中的缺口只有通过进口加以弥补，2003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48亿吨，其对应的生铁产量约占全国的50%左右，2004年则达到了2.08亿吨，我国已经从以自有资源为主转变为以进口资源为主的钢铁生产大国。预计2005年、2010年和2020年，国内铁矿资源只能满足钢铁生产需要的41%、35%和32%左右，其余部分依赖进口。

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矿石需求，我国许多钢铁企业开始选择投资境外矿厂，实行合作

开采。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境外办矿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对稳定国内大型企业的进口铁矿石数量和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我国境外矿山可控资源量约3000万吨左右，占铁矿石进口总量20%，其中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占股40%)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矿有限公司(占股60%)合资的恰那铁矿1000万吨，首钢秘鲁铁矿1000万吨(原矿)，最近宝钢分别与巴西CVRD公司和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矿有限公司签约，分别合资开发600万吨和1000万吨铁矿山。武钢、马钢；唐钢、沙钢4家公司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合资(外方占51%，中方4家各占10%，日本三井和伊藤忠铁矿公司各占4.8%和4.2%)开发威拉拉铁矿，每年可获得1200万吨成品矿(其中武钢、唐钢各350万吨，马钢、沙钢各250万吨)。以上项目全部完成后，我国境外可控矿石规模将达到4800万吨。

表7-9　　日本三井财团在世界上矿山控股情况

国外矿山企业	100%股份基础产量/万 t·a⁻¹	Mitsui 控股比例和应分得的产品数量		国外矿山企业	100%股份基础产量/万 t·a⁻¹	Mitsui 控股比例和应分得的产品数量	
		(%)	产品数量/万 t·a⁻¹			(%)	产品数量/万 t·a⁻¹
澳大利亚				印度			
纽曼山合资企业				希萨果阿	350		178.5
戈兹沃斯公司	6000	7	420	巴西		51	
扬迪铁矿				巴西联合矿业公司	3600		1800
C区	1500	7	105	MBR		50	
罗布河公司				加拿大	1500		375
				魁北克矿业公司			
罗布河区	3000	33	990	QCM		25	
西安吉拉斯区	2000	33	660	总计	17950		4528.5

资料来源：BLOOMBERG，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总的看来，我国对于境外矿山的投资数量还是偏低，而且除了宝钢、武钢、马钢等企业相对重视以外，我国其他钢铁企业对于海外矿业投资刚刚起步。特别是日本新日铁与巴西CVRD首先确定2005年历史上铁矿石71.5%的历史最大的涨幅，给中国钢铁企业的境外矿山投资敲起了警钟。日本钢铁企业则通过多年与澳大利亚、巴西的合资开矿，因而此次矿石涨价受到的冲击明显小于中国。

同时，日本企业选择的合资开矿对象，都是储量大、铁矿品位高、开采条件好、交通方便的矿点，现在澳大利亚、巴西两个生产铁矿石的国家铁矿企业，几乎都有日本企业的股份。我们从日本三井集团公司在世界上控股的情况，就能看到惊人的结果。日本三井集团一家就控股占有4528.5万吨的铁矿石份额，远远超过我国宝钢的控制量，几乎占世界总贸易量的7.87%，占日本进口量的35%。

从日本三井境外投资的特点以及我国钢铁工业今后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看，"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境外矿山的投资力度，保证可控矿石源在进口矿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从而更好地解决原材料瓶颈、涨价问题。

2．到2020年我国钢铁业的发展展望

(1)产业布局基本完成，并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钢铁工业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

进入世界前列和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布局的调整将成为"十一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而随着中国《钢铁工业2020年发展规划》和《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必然也会对我国钢铁工业的结构和布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2005年年产800万吨的首钢公司，因北京的环境、运输、水资源等压力，不得不决定搬迁到河北唐山曹妃甸。以首钢搬迁作为我国钢铁工业重新布局的开始，2010年左右，大多数建在省会城市的大中型钢铁企业（包括杭州、广州、成都等地）都将逐步完成搬迁工作。根据目前的政策指导和发展趋势，未来的10年左右，我国钢铁工业将以区域为界形成5大钢铁集团，有可能形成以东北的鞍钢、华北的首钢、西部的攀钢、华中的武钢以及华东的宝钢为核心的5大钢铁集团；在此基础上，还将形成一些专业化的钢铁生产企业。

随着国际钢铁业战略布局的逐步完成，我国钢铁业重组风暴正在逐渐积蓄。在今后的十多年中，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钢铁企业都将被大企业所吞并，或者自行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数个超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合理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企业集团。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钢铁工业的综合产钢能力3.4亿吨，国内钢材市场占有率达到95%以上，其中关键钢材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而前10名的钢铁企业集团产能占全国产能的比例超过50%；2020年我国钢铁工业已经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前10名的钢铁企业集团产能达到70%以上，而前4家的集中度将超过50%。

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的要求，在不远的将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将不仅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开发、生产管理及市场服务体系），而且还将实现钢铁工业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基本完成钢铁工业产业布局与产品结构调整，形成以依托自有资源与利用国外资源相结合的钢铁工业生产体系。

(2)民营钢铁企业将异军突起

作为世界钢铁业的核心力量，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是世界钢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最为著名的民营钢铁企业为印度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其中老板米塔尔在1971年建造了自己的钢铁小作坊，1975年在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小工厂，规模不大但经营成功的小钢铁厂（年产几十万吨），在过去20年时间里，当竞争对手对那些旧钢铁工厂嗤之以鼻时，拉克希米·米塔尔却一步一步地在这些工厂废墟上，建立了强大的世界钢铁王国。从这个小工厂发端，米塔尔逐渐建造了一个跨越14个国家的钢铁帝国。2004年下半年，米塔尔以45亿美元巨资收购了美国国际钢铁集团，开始组建市值达210亿美元、粗钢年产能7000万吨的世界头号钢铁公司"米塔尔钢铁公司"。

从米塔尔起家到成为钢铁之王也就历时20多年，因此对于拥有数额庞大、形式多样的民营资本来讲，我国民营钢铁业的崛起也仅仅是时间问题。目前，中国民营钢铁企业最有名的要算江苏的铁本钢铁，其前身是有着20多年的东安钢铁厂，主要生产棒材、中板等建筑钢材，设备不是很先进，却拥有炼铁150万吨、炼钢180万吨、轧钢200万吨的产能。2002年初，其筹划在常州市建设新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及地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审批项目，而铁本公司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法占用土地6541亩。2004年国务院对中国钢铁

业过热行为进行了宏观调控，铁本钢铁被严肃查处，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申请破产保护的企业。

铁本钢铁的倒下并不意味着民营钢铁业发展的终结，作为对市场反应最迅速的实体，高效率、快决策是民营企业的优势，对于铁本事件的反思，其应该可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经历2004年的宏观调控和未来几年的供大于求的市场，相当一批民营钢铁企业将被市场无情的淘汰出局，但必然会有一些强者顽强的生存下来，这些企业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米塔尔”。

如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是1975年靠45万元自筹资金创办起来的，经过20多年来的努力，沙钢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年产铁900万吨、钢1300万吨、材1250万吨、不锈钢板35万吨、镀锌钢板15万吨的生产能力，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和优特钢材生产基地。2004年在全国500强中名列第86位，钢铁工业排名第7位，是全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

河北的唐山建龙钢铁厂在1999年还只是租用遵化市钢铁厂，产能只有20万吨，2000年买断了这家企业。2004年唐山建龙已经先后在承德、吉林、宁波、黑龙江和唐山等地设厂，经过了急剧扩张，唐山建龙产能已经达到200万吨，利润10亿元；在宏观调控风暴面前，其宁波建龙公司（规模为300万—400万吨，并且采用了进口的先进设备）由于杭州钢铁集团伸出援手，使这个在2004年同样遭遇铁本类似命运的钢铁企业免遭灭顶之灾。

1992年创办唐山长城轧钢公司也是一家发展极为迅速的民营企业，2000年购并邢台新牟钢铁公司，更名为德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2005年，其对新加坡上市公司“群宇”的反向收购，已经得到新加坡交易所原则批准。通过此项收购，德龙钢铁将筹集1700万新元，其不仅实现了国内民营钢铁企业首次在海外借壳上市，而且也为其他民营钢铁提供了解困样板，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将为民营钢铁企业打开广阔的天空。

严格的管理制度、较低的经营成本、快速的市场反映，使得这些民营钢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极具竞争优势，同时民营企业正在补救自身弱点（即技术相对薄弱），因此很可能成为这场市场整合的执行者。到2020年，民营钢铁企业肯定会在中国钢铁工业前十强中占有更多的席位。

(3)我国钢铁工业的综合竞争力将大大提升

由于我国钢铁工业发展面对铁矿石、焦炭和焦煤、电力、运力、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制约条件，从长远来看，其必然要走节约化、科技化之路，并且在钢材消费量增加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将保持多层次、多样性，并逐步向高层次演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汽车、轿车、家电、造船、机械等制造业的发展，将带动我国钢材产品结构从建筑业为主向制造业为主转变，从而提升我国钢铁业的整体竞争力。以汽车或轿车为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钢材的消费量仍超过1亿吨，主要消费业是汽车，美国每年汽车生产量近1000万辆，钢材消费占总消费量的30%，日本汽车用钢占钢材产量的约20%，而目前我国汽车年生产量约400万辆，其中轿车约200万辆，用钢量不足总消费量的10%，按中国汽车行业的规划，2020年至少要达到1000万辆的规模，这是汽车钢材消费将达到总消费量的25%，这将带动中国钢铁工业产品结构的提升。

同时，对我国钢铁工业来说，加大技术开发的投入，不断满足市场的需求，最大限度地

提高能源、水资源和原料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是钢铁工业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想象，经过“十一五”期间的购并，大量的中小钢铁企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剩余的钢铁企业不得不在专业化、科技化、节约化、特色化等方面苦练内功，从而有助于提升中小钢铁企业的产品结构和质量；而大型钢铁企业经过购并后，其在技术创新方面更有实力与世界钢铁巨头一争高低。因此，未来的市场选择将使中国钢铁企业的综合竞争力逐步实现质的飞跃。

(4)贸易壁垒将是永恒的主题

贸易壁垒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十几年中，其将一直伴随着中国钢铁业，尤其近几年对于钢铁工业的大量投资，将会给今后的国际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

近两年，随着我国钢铁产品的出口的增多，已经遭到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如 2003 年，墨西哥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钢铁钉征收每公斤 0.5 美元的最终反倾销税；2004 年澳大利亚决定对来自中国、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钢铁制品重新开展反倾销调查等等。

因此，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供大于求的局面的逐步到来，大量的库存需要加以处理，对于国际市场的冲击，必然会引发大量贸易壁垒的产生；同时，我国钢铁业实力的不断强大，出口量的不断提升，也会引起一些国家采取贸易壁垒对本国钢铁企业进行一定的保护。所以，到 2020 年，针对我国钢铁企业和产品的贸易壁垒将不断增多，所涉及的国家范围也将不断增加，其将成为我国钢铁企业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主题。

第八章　电力工业

电力工业目前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国家办电到企业办电,形成了多家竞争办电的格局;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从计划到市场转轨,引入多种经济成分;从地域性分散供电向大电网发展;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这些变化,使中国的电力行业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方面,2003年国内的发电企业重新改组,划分为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5家发电公司。重组后的若干发电集团,如何进行集团化管理,如何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发、输、配、送系统有效地进行整合,统一地调配资源,加强全面监管,提高综合竞争力,成为发电企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国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对电能源呈现出了"雪崩"式的需求。近几年国内各行业对电能源的需求量都在不断上升。全国范围内的缺电现象给发电和输电系统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同时也对电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此,认真分析电力行业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对比和借鉴国际电力行业发展的特征和电力改革的经验,对我国电力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章将在全面分析国内电力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外电力行业的情况,对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趋势做出全面的研究。

一、电力工业发展现状

1. 我国电力工业的基本特点

要概括我国电力行业的基本特点,需要与其他垄断性行业进行比较。有三个特点是比较显著的。一是电力行业与其他垄断行业服务对象不同。其他垄断行业服务对象都是部分群体,如民航、铁路它们的服务对象只是人群中的一部分,不像电力行业与所有人有关,不论城市或农村,不论生产或生活,不论信息传递或网络联系,家庭生活都离不开电,对社会是全方位的覆盖。一个国家电气化水平越高,电力在全社会作用越大。一旦发生问题,小则引起局部瘫痪,大则引起全社会瘫痪。因为它既是国民经济中的骨干行业,又是全社会的吃穿住行和人们生活需要的公用产品,这是其他垄断行业无法比拟的。

二是电力工业的产品不能储存,发电量超过需要量会形成浪费,发电量不足,会影响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社会对电量的需要是一个不定量,它会随着地区、时间、季节、气候、人们生活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能储备,需要量又是瞬息万变的行业,就要

求对供给和需求要有精确的掌握，以便及时进行调整和控制，才不至于出现像美国加州那样长期电力危机。

三是电力工业的垄断说到底是非经济型的行政性的垄断，情况非常复杂，这在国外也少见。在所有制上，有国家所有制、地方政府所有制、合资企业、集体所有制，国家担保贷款企业、股份制，等等。发电厂有火电、水电、核电。在电价上差别也相当大。从几分钱1度电到3—4角钱1度电。电网有国家投资，地方政府投资，企事业单位投资等等。在进行厂网分开竟价上网过程中，必须对电力企业的产权有所界定，对不同电价有所处理，以及今后电价的监督等问题，都需要政府介入。

2. 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情况

电力工业作为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者。电力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八五”以来，电力工业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自1993年开始发电量每年平均以6.2%的速度增长，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八五”以来，每年增加装机容量1500万千瓦以上，1996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和发电量均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总体来说，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有三个特点：

一是电力生产增长迅速。近10年来，电力生产增长迅速(见图8-1)，发电量与装机容量两项指标均居世界第2位。2002年电力工业加速增长，全国发电量累计达1640TW·h，年增长率约为10.5%，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2003年第1季度，全国电力生产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完成发电量408.88TW·h，比去年同期增长16.02%。资源国情决定了我国能源结构以火电为主。2002年我国的发电总量构成中，火电占81%，水电为17%，其他如核电、风电等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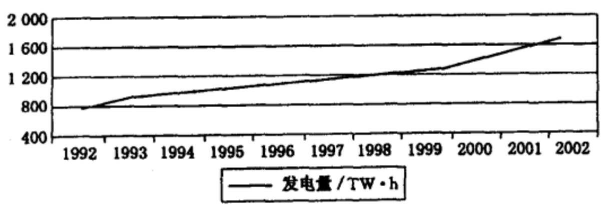


图8-1 全国总发电量增长情况

二是电力消费增长势头强劲。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保证了电力需求持续攀升，我国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已连续3年大于1(见图8-2)。2002年，全社会用电量1620TW·h，比上年同期增长10.3%。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增长了3.0%、11.2%和10.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增长率为7.7%。

三是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电力工业经过20多年的大规模建设，技术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大容量、高参数、高效率的大机组成倍增长。在大机组和大电厂已成为我国电力工业主力的同时，电网的覆盖面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有力地提升了我国电力行业的电气化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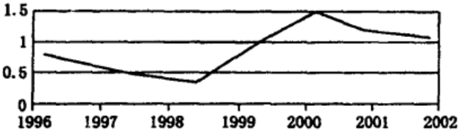


图8-2 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力供需由基本平衡略有富裕转为总体平衡趋于紧张,部分地区出现高峰拉闸限电、系统缺少备用的情况。2003年电力行业供应日趋紧张,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16.47%,机组均超负荷运转重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工业的需求,直接导致此类行业的需求猛增,全国用电量大幅增加。2004年全国电力紧张已成事实,电力生产总量增长高达15%,但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除东北、山东之外的所有地区悉数缺电,长江及珠江三角洲严重电能不足,特别到了夏季,民用电进入需求高峰,有些地区不得不对企业用电实行限电,甚至拉电。

3. 我国的电力资源

目前的发电方式有: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风力发电、地热发电、潮汐发电等。其中以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为主要方式,其他的为新能源发电,尚处于试验阶段。我国目前主要以火电为主,水电为辅,核电为补充。相应的电力资源主要有煤、石油、水能、铀,其中水能是唯一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首先,在我国电力资源总量中,水能资源最为丰富。我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676亿千瓦,可开发容量为378亿千瓦,相当于年发电量192亿千瓦时,技术可开发容量为37850万千瓦,居世界首位。煤炭资源也很丰富,现已探明储量为9667亿吨,居世界第二。石油资源贫乏,人均仅2.9吨,远低于25.1吨的全球平均。铀从总量上较丰富,人均29吨,约占全球总量的74%,但人均储量偏低。

其次,我国电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我国的地形特点决定了可供开发的水资源中,有92%集中于大西南、鄂西、湘西、黄河上游和东北三江流域。其中长江的水能蕴藏量为2.68亿千瓦,占我国总水能蕴藏量的40%,另外,四川省和重庆地区的水源可开发量为1亿千瓦,占全国开发量的26.4%,但目前开发程度较低。我国煤炭资源主要集中于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的煤炭基地(占全国已探明的695%)和大西南的贵州、云南等地。石油主要集中于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西部的塔里木盆地。根据电力资源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大力优先发展水电事业,努力优化火电,适当发展核电;从煤炭资源的分布来看,应努力建坑口电厂。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电力格局是西电东送,北电南送,北煤南运;西南、华中地区以水电开发为主,东北、华北、西北以火电为主,华东、华南沿海地区适当建设核电。

二、电力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 制度刚性束缚较强

我国电力工业垂直一体化的垄断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首先，这种垄断模式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垄断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在某些竞争性行业存在过度进入，造成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垄断行业又有投资不足，供给不足，服务不善，但又享受高额利润。据估算，我国电力工业的垄断租金为每年560亿—1120亿元。第二，垄断造成电力工业效率低下。由于垄断行业不存在竞争的压力，其自身没有提高效率的主动性。电力行业的电价是根据成本计算出来，再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确定的，这样的低效率反而会导致高电价，使电力部门收入增加，从而为其挥霍和截留资金创造条件。第三，电力行业垄断造成能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我国人均能源少，能源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由于电力垄断造成的能源利用率低和能源浪费的后果就更加严重。1995年我国的火电厂发电的标准煤耗为412克/千瓦时，而日本仅为330克/千瓦时。第四，我国电力垄断造成电价过高，影响我国其他行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电气化水平的提高。第五，垄断造成电力行业在创新能力、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和市场开发能力等方面都很欠缺。最后，也是很重要一点是，电力工业的垄断造成力电力工业缺乏自我制度演化能力，不能自发解决行业内部的问题，缺乏实现行业优化的发展能力。制度演化的重要条件是众多行为主体拥有按自身利益进行自由行动的权利，但垄断排斥了其他主体进入行业的权利，将符合垄断者利益的行为强加给其他利益相关者，而垄断者自身又缺乏变革的动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由于电力紧张各地政府建立了很多小电厂，在90年代中后期全国整体上出现了电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但在各地地方主义保护下，这些低效率的小电厂即使在国家下令关闭小火电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照样维持运行。由于地方保护的原因，很多小火电厂通过提高发电能力来达到国家要求的规模，这样又加大了供求的矛盾。

2. 入世影响程度不断加强

根据WTO框架，中国政府承诺在2010年以前将取消行业的进入壁垒。与此对应，电力行业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国企业的影响。入世后，中国电力行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市场份额的争夺。外国企业一旦进入中国电力市场，首先必将冲击国内发电市场。国内市场份额的让出不可避免。因此国家电力公司必须提前作好部署，制定远景规划，在保住现有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因此市场的争夺将日趋激烈，必须早做准备。

(2)技术的竞争。电力工业三大主营业务：发电——送电——配电，均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而当前我国电力行业在各项技术上，主要是依靠技术引进和改造，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入世后，外国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也会给我们带来冲击，我们必须在技术上创新，增强国内电力行业的竞争力。

(3)人才的争夺与竞争。外国企业在中国涉足电力行业,投资办厂,必须要同中国电力企业在人才方面展开竞争和争夺。外企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先进的管理机制、知人善用的经营理念等都是吸引人才的优势所在,这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

(4)制度方面的竞争。这是我国电力工业与外国企业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竞争中,调整电力企业制度,对于提高电力行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至关重要。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我国撤销电力部,成立国家电力公司,就是制度的优化。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化,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逐步完善。

3. 如何协调竞争与垄断的关系

电力行业改革必须打破垄断,已是大势所趋,因为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电力行业发展的要求。但问题在于,电力工业不可能彻底打破垄断,完全自由竞争,这是电力工业的特点决定的。即便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竞争也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只能是有限的竞争。何况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电力行业这么重要,政府不可能放手不管完全自由竞争。问题在于垄断和竞争的度如何掌握,两者如何结合,这是我们电力工业改革中面临的挑战。电力工业已经开始从生产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当今,我们需要用崭新的视角来透视市场状况,一些术语,如竞争能力、产品质量、收益率、效率及客户服务等都已被赋予了全新的理念。只有清楚地分析、理解当前的形势并及时、勇敢地采取行动,才能应对这些挑战。

三、国际电力工业发展现状及改革经验

1. 全球电力工业发展的状况及特点

1950年至1990年是全球电力快速发展的30年,期间,发电量增长了7.9倍,装机容量的增加超过了发电量的增长。2001年,OECD成员国的发电总量为9160.1TW·h,消费量为9169.1TW·h。

从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绿色电力已经成为发展的主流趋势。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促使电力公司更多地提供风电、太阳能等各种绿色电力产品。因此,一个竞争性的绿色电力市场正在形成。一些新技术的发明、应用也为绿色电力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

全球发电能力增长重心向亚洲转移,北美仍是电力最高消费区。亚洲电力的持续增长使其成为全球电力增长的中心,尤其是中国的电力增长潜力巨大。预测到2020年,全球发电能力将达到5915GW,在新增的发电能力3503GW中,中国将增加装机550GW,成为未来20年发电能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到2020年,全球人均电能消费将达到2.9至3.7MW·h,比1998年的2.3MW·h将有显著增长。北美的电能消费仍将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成为最高消费区。

此外,电力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世界各国纷纷进行电力改革以适应电力全球化的趋势。这样,国际上只有少数几家跨国能源公司的局面正在被打破,许多电力公司通过联合、兼并、购买和战略性联盟,逐步实现经营全球化。

2. 部分国家电力工业改革经验

(1)英国的电力行业及其体制改革

英国电力工业的改组晚于国内其他行业。英国政府起初是沿着电力行业的功能分割而加以进行重组。指导电力业实行重组的思想是:电力行业中发电与销售可以更多地引入竞争,而电力的传输与配电在无限期的未来被认定为是一种“自然垄断”。因此,对发电与销售的管制必须逐渐地予以取消,而对传输与配电的管制仍将继续。然而,即使在管制仍然保留的地方,一种新的管制形式(价格封顶)在引入新的管制机构——电力管制办公室的同时得以推出。

1989 年夏天,新的电力条令生效了。该条令最重要的内容是,在私有化出售之前,英国展开了行业的重组。首先,中央发电局被重组为四个独立的组织:两个发电厂、一个传输公司、一个拥有 12 个地区性供电公司的配电网。所有这些所有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归政府所有。私有化是在之后逐步展开的。这一步的重组可以用图 8－3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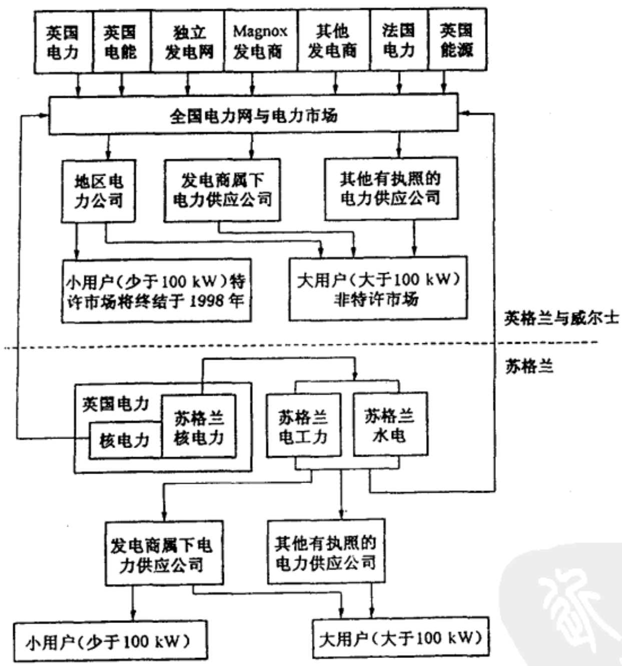


图 8－3　英国竞争性电力行业的结构

①发电　发电是属于竞争性业务,对其管制采取放松。英国电力公司和英国电能公司向电力批发市场供电,而新建立的私人电力公司则无此限制。1993 年,考虑到英国电力、电能公司的规模对电力价格影响很大,电力管制办公室将两个公司合计为 15%的发

电能力售出。1994年电力管制办公室又提出电力市场的最高限价。1995年,政府基于英国电力、电能公司试图兼并地区供电公司,而出手于预并获成功。

私有化后,政府在两个发电公司和12个地区供电公司维持了一个“金股权”,即它可以禁止任何一家私人主体公司在上述两个发电公司或12个地区供电公司中拥有超过15%的股份。1995年,政府在12家地区供电公司的这项“金股权”作废,但它在两家发电公司里的“金股权”将继续无限期地保留下去。

②输电　输电被视为自然垄断,私有化后,输电网保持完整统一。全国电网公司由12家地区供电公司拥有,但后者不参与前者的具体运行。发电能力超过100兆瓦的发电公司在进入电力网市场要求发送电时,必须向全国电网公司提出发送电量的申请。电力输送的费用管制公式如下:零售价格指数(RPI)——预期的生产率改进(X)。起初,全国电网公司拥有若干发电资产,1995被卖出。1996年,12个地区供电公司拥有全国电网公司的股份亦被要求尽数售出。1996年底,全国电网公司完全成为一个单纯的电网公司。

③供电　自私有化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供电是由12家地区公司负责。供电部分的功能是管制的,但销售则是逐步放开的。供电公司的价格管制也采取了RPI - X形式。在过去,X在0—2.5,允许供电公司购置自己的发电资产,但其在发电公司的持股不可超过15。供电公司中的供电业务与其销售业务必须在会计账面上分开。

④电力销售　电力销售是逐步开放的。首先是大的用户可以自己选择电力供应商。在1990年电力放开时,大用户约5000户,占电力需求量的30%。允许地区供电公司留住中等电力使用者(工商业用户),1990年占电力需求量20%。1998年4月起,地区供电公司必须自己争夺居民用户的市场。1996年,39家与原来地区供电公司无关的供电公司进入市场。新进人的供电公司占据市场的份额从1990年度43%上升至1995年度的69%。

⑤英格兰和威尔士电力市场的操作　电力市场的功能在于清理和平衡电力供应者与电力买者(通常为地区供电公司)间的供求。在电力市场上,每天被分成48个半小时单位。市场管理人员提前24小时将每半小时单位电力需求作出预测。发电商向市场管理人员提交下一天每半小时愿意供应的电量和价格。市场管理人员将发电商申请单按价格高低进行排队,便宜电力先上网发送,直至满足了所有需求。

⑥电力市场边际价格(SMP)　发电商得到的价格中还包括一个防止电力供应短缺的激励成份,即:LOLP = 短缺损失 × 短缺的概率。因此,发电商的价格是(PIP)SMP + LOLP。供电商支付的价格是(POP)PIP + 上网费。上网费的计算是考虑了电网储备、预测错误、传输线路紧张程度及最后一个电厂应变力调整等因素。在电网市场之外,还存在一个电力期货市场,允许客户与发电商直接谈判。

⑦电力行业私有化的业绩评估　自私有化展开后的7年里,英国电力行业的效率明显上升。从1989年至1996年间,电力行业员工被减少了50%。电力价格明显下降,大的电力用户在价格上受益最多。

(2)澳大利亚的电力行业及其改革

澳大利亚电力改革与私有化是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展开的。全国范围改革只是指导性的,各州自己掌握进程。维多利亚是澳大利亚改革与私有化进程最快的,而其他州则各异。

澳大利亚电力改革在全国电网运行、国家电力行业管制权限、以及电力地区性控制上显示了差异。大多数州的电力改革是沿着功能部门分开的模式，而维多利亚则学英国的模式。全国电网正在发展之中，管制是以价格封顶的办法。

1990年工业委员会受托审查电力业，并探讨建立全国电网的可能性。工业委员会建议：电力市场最终将私有化；发电、传输、供电要分开；对分开的部分要进行私有化或公司化；发电部分引入竞争；各州输电线应联成全国电网；输电和供电归入电力运输业务；私有化后，费率需反映实际的成本；交叉补贴需要取消。

6个月后，全国电力网管理委员会成立，其职责为起草全国电力条例。1994年10月，全国电力网管理委员会出台了条例第一稿，其所做的建议获各州政府同意。1995年9月，条例第二稿规划了电力市场的功能。提出了建立全国电力市场的建议，探讨了电力市场运行规则。1996年12月，报告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澳大利亚建立全国电力市场的构想分若干阶段来推进，直至2001年初，全国电力市场只包括维多利亚州、新南部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以及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目前，全国性电网已在维多利亚、新南部威尔士、澳大利亚首都地区运行，南澳大利亚州在1998年昆士兰州则计划在2001年澳大利亚电力市场结构为图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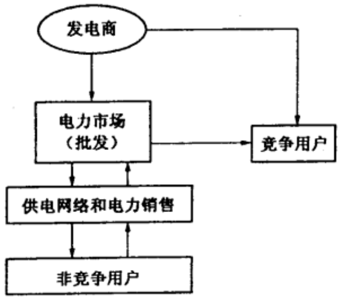


图8－4　澳大利亚电力市场结构

①电力批发市场　电力批发市场将允许四类团体介入。用电超过10W的用户；年发电超过20W的发电厂；电力市场管理公司；输电和供电公司；地区性系统运行者。它们必须成为全国电力条例行政有限公司的成员。全国电力市场允许大电量用户选择两种方案：在批发市场购电或者在零售市场购电。零售与批发市场是完全分开的，要么用户进零售市场，要么进批发市场。在电力批发市场里，共有三种交易方式：长期的双边合同；短期交易市场；现货市场。在批发市场中，买电者可以是终端使用者，也可以是未够资格的销售者，卖主可以是发电商，也可以是销售者。

②零售电力市场　零售市场参与者不像批发市场参与者那样受到各种限制。零售市场参与者可以相互谈判以实现理想合约。

③全国电力市场的构想　计划中的全国电力市场是围绕电力网或现货市场而设计的，这一市场保证了任何时候电力供求都能够平衡。每半小时为一单元，每一单元里均

会产生一个价格，买者与卖者的价格都是相同的。所有发电能力超过30MGW的发电商均须参与全国市场，年使用电力超过10MGW的消费者也必须参与全国市场。发电商和消费者必须于24小时之前提交第二天每半小时愿供或愿买的电量，以及愿意接受的价格。

目前，全国电力网运行还处于试验阶段。该网只是将新南部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合成一个统一的批发市场。有一个中央机构在受理TRANSGRID和维多利亚电力交易部提出的清单。这样，发电的需求量就确定了下来，同时，州际的电力调配数量也能够定下来。然后，电力调配的先后次序也定下来，并转发各州电力调配中心，由它们真正发送电力。电力价格是由被发送的最后一个发电商的价格决定，这一价格就是在特定单元时间内的电力市场价。

将来在全国电力条例被批准后，全国电力市场管理公司就会代替现在的中央机构行使州际的调配功能。新的电力条例允许电力现货市场的存在，以实现电力产品更高的价值。同时，为防止电价暴涨，电力条例规定了电力交易的最高价，即每千瓦小时5澳元。

(3) 阿根廷电力体制改革路径

阿根廷联邦管制的机构是ENRE，起着调节电力公司之间纠纷、强制联邦电力法令的执行作用。它的价格管制是采用了价格封顶的方法。

①发电　阿根廷私有化后的发电公司是独立的，并不受管制。大约有40家发电公司可以直接上国家的电力网，其价格也不受管制。为了防止发电商过于垄断，政府规定了单个电力商发电不得超过全国电力销量的10%。这些电力公司也被禁止在供电公司拥有大股东的位置。大约还有10家电厂仍然被联邦政府或省政府拥有，但最终还是要被私有化的。所有电力商在向电力传输网送电后将获得一个价格，它等于大发电商送电时的边际成本。如果发电商的生产成本太高，这些发电商将获得一笔电力储备费，这笔费用能促使发电商降低成本。

②电力批发市场　电力批发市场的供应方有：独立的电力供应商、私人发电商、联邦政府拥有的发电商、以及负责电力进口的外国进口商。电力批发市场是由一个非盈利又独立的机构来管理，该机构的出资来自政府和发电公司。它由一个政府、发电公司、输电公司、供电公司和电力用户组成的董事会加以管理。电力批发市场的需求方有：供电公司、电力出口商。批发市场的供求平衡决定了电力的批发价。另外，每个购电商需要支付一笔电力储备费用，以备电力短缺时补救。阿根廷电力市场有三种价格：合同价格、季节价格和现货价格。

③电力传输　电力传输网被认定为是自然垄断。分为高压传输网和地区性低压网。电力传输公司不允许直接买卖电力，它们的收入完全来自管制的价格。它的使用费率由联邦政府管制，有最高价格限定。高压电力网是由TRANSENER管理的，它向阿根廷24个省中的14个省供电，占总供电的90%。

④供电　供电公司也被认定为自然垄断。供电公司必须获得政府特许权方可经营。特许权长达95年，特许权的批准通过竞争叫价获得。政府规定了供电的最高费用。它

必须向第三者放开自己供电网络。

四、电力工业发展前景展望

1. 发展趋势

未来电力供需基本平衡，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3年我国发电量增长率为8.5%，全年发电量将达到1780TW·h，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为8%左右，总用电量将达到1750TW·h左右，电力供需基本平衡。我国总装机容量也呈上升趋势，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500GW左右（见图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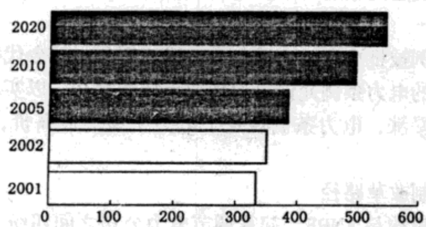


图8-5　我国装机容量的发展预测（GW）

但是，电力的结构性矛盾仍会比较突出。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差距，电力资源分布不均衡，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相对富裕，而部分地区由于电力结构不能适应用电负荷的变化，未来仍会存在着拉闸限电现象；随着三峡电站2003年开始发电，水电装机的比重将大大提高，但是，电力结构发展仍不平衡，将保持以火电为主的格局。

电力工业融资趋向多元化。电力属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十五"期间，电力工业投资总规模将达到9000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促使电力工业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将会出现银行贷款、集资办电、上市融资、发行电力债券及外资并购等多种融资方式并存的格局。到2005年，国内输变电设备需求量将达到148万台（组），一年的采购额近千亿元，电力装备将成为外资并购的热点。

我国电力工业从垄断逐步演变为竞争格局。提高电力行业效率的最好手段就是严格监管下的有效竞争，即在发电、售电领域引入竞争，同时对输电、配电等自然垄断性环节进行监管。在2002年底，我国电力工业的垄断被打破，新成立的五大发电集团资产占内地电力资产总额的33.8%，这样，发电领域的竞争主体基本形成。入世后，关税壁垒的逐步降低以至消除，为国外有实力的独立发电商和电力设备制造商进入我国电力市场，参与竞争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国电力企业也将直接参与国际电力市场的竞争。因此，打破垄断、竞价上网，将是大势所趋。

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电力一张网。2010年至2015年期间，以三峡电力系统为核心，将形成以北（华北电网与西北电网互联）、中川渝电网与华中电网互联）、南（在云南、贵州、广西至广东间建设六条输电线路向广东输电）电网互联的送电通道为主体，

南北电网间多点互联，纵向通道联系紧密的西电东送、南北互供的格局。西电东送将分三步实现阶段性目标，到2020年最终实现电力一张网（见图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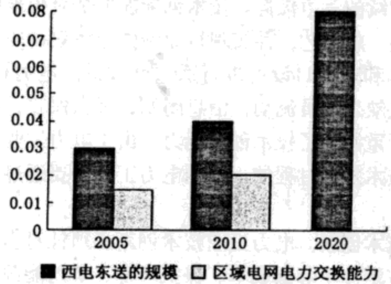


图8-6 2005年—2020年西电东送与区域电网交换的规模

发展高效、环保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成为一种趋势。在全球绿色电力的大潮下，我国将大力发展水电，适当发展核电，稳步发展火电及高效清洁能源。通过项目合作、引进燃气轮机制造技术，建设高效、洁净的联合循环发电厂。预测从2010到2020年，我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将从125GW增长到199GW，我国将成为这一时期水电开发最多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到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为60.4TW·h，装机容量将达到21GW（见图8-7），这将有利于电力行业的高效、环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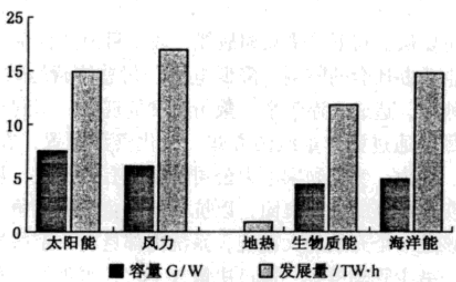


图8-7 2020年中国可能再生能源发电预测

2. 发展对策

(1) 构建电力工业的核心能力，重视技术创新。

电力工业的核心能力是指本行业独树一帜的、其他行业难以复制模仿的能力，可实现高于竞争对手的价值，可提供进入广阔多样市场的潜能，从而成为长期利润的源泉。具体是指电力工业在区域、国内、国际的竞争中快速实现知识的获取、积累、激活和运用的能力。主要表现为电力工业的学习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协作能力。学习能力是指行业从外界获取信息、知识、技术并结合行业内部的信息、知识、技术，将其消化吸

收，从而实现知识、技能的积累与储备的能力。协作能力是为实现知识的获取、积累、激活与运用提供适宜组织环境的能力。协作能力越强，就越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抢占制高点，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技术创新能力是对积累储备的知识进行创造性地再加工，开发出新产品、新工艺，并实现行业整体经济效益的能力。我国电力行业的核心技术是使用引进技术和对进口设备进行适应性改进。电力行业的职工多数来自技校，知识结构单一，而且缺乏人员流动，信息闭塞，观念保守，限制了电力行业的学习能力和协作能力，进而严重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由于电力工业核心能力的积累过程是伴随着电力产品、电力技术发展过程的，我国电力工业需要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才能建立较强的核心能力。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技术创新。电力工业技术创新必须针对当前生产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发电技术创新应定位于降低成本、保护环境、节约能源；送电技术创新在于全国电网联网工程中电力传输的安全性、可靠性；配电技术创新主要在于建立统一的竞价上网机制。

要加大技术开发经费投入的力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必须做好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工作，对企业职工进行技术培训，提升电力工业学习能力，要求职工熟悉现代技术和现代装备。市场上的竞争表现形式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其背后是技术竞争，而技术竞争的背后则是人才的竞争。进行智力投资是一件长期的、最终也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高报酬事业。因此技术创新应该以人为主体，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为主导，以网络为纽带。企业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

(2) 国家电力公司要从上到下尽快收缩战线，改变目前这种企业办社会的模式。

必须深刻认识到企业办社会的弊端：降低电力公司总体营运效率，增大管理成本，削弱主营业务的优势地位，造成人浮于事、敷衍塞责的现象，不利于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和责任感。因此要尽快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在调整中甩掉社会包袱，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实现国家电力公司规模的有效扩大，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组建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以抗衡外国企业的竞争。

国家电力公司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本着精干高效、扁平化的原则，减少管理链条，通过决策权上移，管理权下移，精干中间层，强化投资决策和资本运营功能。同时电力系统只有与外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和目标，才能适应环境，才能使电力系统达到最优的运行状态。这里的外界环境主要就是指市场，还包括和电力发展相关的行业。

到目前为止，我国电力工业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2 年底电力体制改革迈出重要的一步，国家电力公司开始进行资产重组和企业改组，组建 5 大发电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2 个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 4 个辅业公司，这将使电力市场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第九章 装备工业

装备工业的发展将主导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向型经济导向下，我国工业化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不仅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换，而且出口工业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产业分工体系中重要一环，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出口工业的竞争力，除了自身拥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外，还大大得益于外资的进入以及出口企业积极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在出口工业以及工业总体保持长期快速增长，体量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装备工业却因国内需求不足，发展相对滞后，与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进入新一轮对外开放阶段，装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也引起了政府与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框架下，中国的工业化要有新的突破和新的飞跃，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技术条件下装备工业的新一轮发展。装备工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具有需求弹性大、产业关联度高、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强、科技含量高等特点。装备工业是各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的主导产业之一，因其对其他产业提供技术手段，它的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其他产业的竞争力。所以大力发展装备工业，提高装备产品的质量、水平、性能，对降低工业综合能耗，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我国经济的硬实力，意义重大。

一、装备工业发展现状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装备制造业是机械电子制造业中去除消费类产品而生产的投资类产昂，约占机械电子工业增加值的80%，包括8大类，185个小类产品，是我国工业领域中最大的产业，也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的第一大产业。

按照装备的功能和重要性，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重大的先进的基础机械，即制造装备的装备——工作“母机”，主要包括数控机床（NC）、柔性制造单元（FMC）、柔性制造系统（F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工业机器人、大规模集成电路及电子制造设备等等；二是重要的机械、电子基础件，主要是先进的液压、气动、轴承、密封、模具、刀具、低压电器、微电子和电力电子器件、仪器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等等；三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科学技术、军工生产所需的重大成套技术装备。

1. 装备工业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主导性地位

“中国装备，装备中国”，是中国发展装备工业的最基本理念。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确实实现了这一愿望，但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制造技术的差距。改革开放后，面对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国装备制造业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了体制劣势、竞争力不足等挑战。我国装备工业的发展经历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装备工业初步基础。在“一边倒”的政策环境下，原苏联装备及技术启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奠定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但基本上处于按苏联图纸复制的模仿阶段。1949 年前，中国装备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主要只能为进口的机器搞维修及从事一些装配业务。“一五”时期，装备工业是以发展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矿设备、运输机械和农业机械的制造为重点，并适当地发展炼油和化工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和电器的制造。

第二阶段：建立较完整的装备工业体系。在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政策指导下，中国装备的确装备了中国，尤以 70 年代初的“二汽模式”，在动员了全国装备制造业力量的情况下，二汽近 98%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巅峰，但技术水平超乎不了传统的制造技术的樊篱，以组合机床组成的刚性生产线，凸轮轴控制的机械化自动机床，手动的焊装线等为代表的中国装备制造业远离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崛起的数字化、信息化和管理现代化的浪潮，闭关锁国的政策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制造技术的差距。

“二五”期间，发展所需要而又缺乏的各种重型设备、专用机床、精密机床和仪表制造业。“三五”期间，主要产品，如发电设备、机床产量分别年均增长 22.9%—30.3%和 12.9%—13.7%。“四五”期间，引进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三大透平（工业汽轮机、燃气轮机和透平压缩机）和轴承等。“五五”期间，调整生产结构，按专业化原则改组企业，发挥行业和中心城市的作用，发展经济联合体；改革管理体制，突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束缚，机械产品进入市场，扩大企业自主权。“六五”研制 2050mm 热轧机、60 万 kW 火力发电机组、超高压交流输变电、海上石油钻采等大型成套设备。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下，在面对充分的市场竞争后，中国装备制造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是一个痛苦的再造过程，体制劣势逐渐显露，除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外，大多数产品失去市场竞争能力，三分之二的国内市场失守，部分装备制造业企业举步维艰，曾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些脊梁企业惨淡经营，难以为继。

“七五”期间的重点企业和主要产品按国际标准组织生产，截至 1990 年，一半主要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达到工业发达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或 80 年代初水平；并形成年产 1000 万 kW 发电设备及相应的输变电设备生产能力；发展千万吨级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并配合宝钢二期工程生产重大成套冶金设备。“八五”重点加强联合改组和技术改造，优化结构，扩大专业化协作，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开发新产品，并扩大机电产品出口。重点研制 2000 万吨级露天矿、60 万 kW 核电机组，50 万伏直流输电重载列车和 30 万吨乙烯等成套设备。“九五”适应两个转变和迎接加入世贸组织，行业管理机构退出行政职能，把企业推向了市场。关键领域重大技术装备的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如第一

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号发射并回收，机械工业高技术工程达到新的高度；"新舟"新一代支线客机研制成功；20世纪内最大的能源项目二滩水电站550MW水轮发电机组投产；600MW火电机组质量提高；宝钢二期的250吨氧气转炉、1450mm板坯连铸机、1420mm和1550mm冷连轧板机等世界水平冶金设备；现代化大型乙烯成套装置的核心设备乙烯三机（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和乙烯压缩机）、乙烯裂解炉等相继试制成功，大大提高了石油化工设备的制造能力。

2. 我国装备工业的产业特点和发展水平

一是企业数量小幅增长。从1998年5.9万家增长到2002年6.7万家，其中2002年企业增长数最快，达到3948家。占全部工业企业的单位数从1998年35.7%上升为2002年36.9%。

二是职工人数持续下降。从1998年的1511万人降到2002年1182万人。每年减少100万人左右。但占全部工业企业的职工数每年基本稳定在31.7%。

三是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大幅增加。2002年比1998年分别增长了75%和85%，2002年为4.1万亿和1.1万亿，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37.7%和34.0%（见表9-1）。

表9-1　　1993年—2002年装备工业基本指标

年　份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企业单位数（个）	66978	63030	59674	58603	58858
占全部工业企业	36.9%	36.8%	36.6%	36.2%	35.7%
职工人数（万人）	1182	1212	1294	1405	1511
占全部工业企业人数	31.7%	31.6%	31.5%	31.7%	31.8%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亿元）	41797.81	34619.81	30089.19	25501.89	23282.13
占全部工业的比重	37.7%	36.3%	35.1%	35.1%	34.4%
工业增加值（亿元）	10692.53	8818.73	7751.68	6528.78	5845.05
占全部工业的比重	34.0%	31.1%	30.5%	30.3%	30.1%

注：统计口径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

四是装备工业效益提高。从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看，1998年到2002年装备工业效益提高。总资产贡献率快速提高，从6.07增加到8.60，资产负债率从65.2%下降为60.4%，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提高，从1.27增加到1.69，成本费用利润率上升1倍，产销率稳定在97%左右（见表9-2）。

表 9－2　　　1993 年—2002 年装备工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行　业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总资产贡献率	工业总计	11.1	9.45	8.91	9	7.45	7.12
	装备工业		8.60	8.13	7.50	6.57	6.07
资产负债率	工业总计	59.1	58.72	58.97	60.81	61.83	63.74
	装备工业		60.44	60.71	63.20	64.35	65.21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次/年）	工业总计	2	1.8	1.66	1.62	1.47	1.41
	装备工业		1.69	1.54	1.43	1.31	1.27
成本费用利润率（%）	工业总计	6.2	5.62	5.35	5.56	3.42	2.35
	装备工业		4.84	4.32	4.11	3.07	1.93
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工业总计	66943	59766	52062	45679	37148	31347
	装备工业		58439	48645	43821	36121	30477
产品销售率（%）	工业总计	98.1	98.02	97.63	97.67	97.15	96.52
	装备工业		97.34	97.00	97.32	96.65	96.29

注：统计口径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

五是主要产品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农业机械、电力设备、石油设备、石油化学工业设备、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及重型锻造设备、机床工具、汽车等。近年来，基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装备工业重点发展了电力设备、石化设备、煤炭设备、大型施工机械、农业机械、数控机床等，发展低污染、新型节能发动机和有竞争优势的汽车关键零部件。至 2002 年底，冶金、有色金属、石化等行业技术改造所需成套设备国产化率可达 80%。交流输变电设备可立足国内生产，直流输变电设备中的部分关键设备与国外合作在三峡工程中中标；60 万 kW 超临界机组已形成生产能力，10 万 kW 循环流化床锅炉已实现国产化；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达 10000 小时以上，国产数控机床国内市场占有率按价值计算达 33%以上（按台数计算达 67%以上）；数字化、智能化仪表产品占总量的比例达 50%以上，现场总线已投放市场；铁路准高速客车轴承基本满足国内需求；58.8～88.2kW（80—120 马力）轮式拖拉机、节水灌溉机械可基本满足国内需求，自走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已大批供应市场；新型路面施工机械基本满足国内需求；轿车新产品批量投产时国产化率达到 40%以上，相关发动机排放可达到欧Ⅱ标准。从总体上尚处于跟踪和模仿阶段，自我开发、自我配套的能力薄弱；装备工业产品多处于国外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水平，产品技术含量、附加价值都有差距。技术引进情况：20 世纪 50 年代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先进技术；60 年代从西欧和日本引进先进设备与制造技术；70 年代从整个西方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与制造技术；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多形式地引进、消化国外先进制造技术。

六是外贸增势强劲，但出口率偏低，贸易逆差扩大。出口交货值快速增长：机械行业 2002 年出口交货值 2138.84 亿元，同比增长 21.12%，2002 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同比增长，42.7%。从总体看，出口值高速增长，但出口率与工业发达国家（一般为30%，德国达70%）比，差距明显。2002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3255.7亿美元，其中机械产品出口额达441.50亿美元，同比增长26.83%，在全国外贸出口中的比重为1.3.56%，在机电产品出口外贸中的比重为28.11%。在出口额中，一般贸易增速高于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出口180.74亿美元，同比增长31.95%，占比重的40.94%；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246.5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6%，占比重的55.85%，机械产品出口主要销往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出口额224.09亿美元，占比重的50.26%。对美国出口96.43亿美元，占比重的21.84%；对中国香港地区出口62.25亿美元，占比重的14.79%；对日出口62.41亿美元，占比重的14.14%。2002年，全国外贸进口总额2952.2亿美元，其中，机械产品进口额696.68亿美元，同比增长29.28%，在全国外贸进口中比重为23.60%，在机电产品进口外贸中的比重为44.78%。在进口额中，一般贸易293.35亿美元，占比重的42.11%；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为166.50亿美元，占比重的，23.90%。机械产品进口主要来自日本、德国和中国台湾省，进口额382.06亿美元，占比重的54.84%。从日本进口190.86亿美元，占比重的27.40%；从德国进口104.46亿美元，占比重的14.99%；从中国台湾省进口86.74亿美元，占比重的12.45%。贸易逆差扩大：2002年，机械产品进出口逆差255.18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64.39亿美元，增长33.75%。逆差超过30亿美元的有仪表、工程机械、机床和石化通用机械等4个行业，逆差共163.51亿美元，占逆差总额的64.54%。仪器仪表行业53.20亿美元；占比重的20.85%，居第1位；其他依次为工程机械行业41.44亿美元，占比重的16.70%；机床行业36.16亿美元，占比重的14.17%；石化通用机械行业32.71亿美元，占比重的12.82%。

二、装备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国装备工业已拥有相当规模，是我国产业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等举措，我国装备工业的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批重要产品（如小型拖拉机、发电设备、通讯设备和PC机及其元器件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国装备工业的实力，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我国工业过去是计划经济的垂直管理，企业都是条块分割，而现代化的装备工业一大特征就是集成性，光机电一体化。除体制和机制问题外，企业组织结构不科学，技术、工艺、服务“瓶颈”都是制约装备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 体制转轨产生的各种矛盾制约装备工业发展

我国装备工业过去实行计划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变，在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其中既有国有经济的布局和战略性调整方面的问题，也有非国有经济的进入障

碍问题；既有企业机制不活导致结构调整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有现行财政、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的问题；既有国内竞争不充分的问题，也有国际竞争力偏弱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制约了装备工业的发展。

装备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分别进行了多次重大改制改组，供需双方开始尝试"以资产为纽带"等市场方法来组建企业集团，由于集团的组建基本上以同行业和相关单位组合为主，带来新的条块分割和新的计划摩擦。供需双方之间的行政分割与政府纽带弱化并存。当前推行业主负责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为了加大用户（业主）的国产化责任，根据用户的需要以及发挥用户了解使用工艺的特长，组织全国的优势资源进行科技攻关和装备制造。然而，这项工作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有的集团争装备的科研攻关任务，争资金，争科研经费以扶持本系统的企业。国家作为国产化工程的最终用户（业主）的利益受到损害，社会资源配置极其低效。用户（业主）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上一个项目，金额巨大，是不允许失败的。重大装备的国产化无论在质量、工期还是在费用上都可能与用户的最大利益相矛盾。因此在竞争领域，让用户（业主）为国产化承担一定的责任或风险，是违背商业价值的。用户与装备制造业国产化战略的利益冲突仍然非常尖锐。

"八五"以来，由于国家对技术引进的行业指导有所弱化，加之缺乏统一的技术引进战略，企业的微观行为与政府的宏观引导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对已引进的技术，管理上又缺乏对消化吸收工作的必要扶持和政策倾斜，企业在引进时又不受国家或行业政策的引导，致使行业、企业重复、盲目引进增加。

在市场准入资格认定上，对使用部门的装备制造企业没有对专业装备制造企业要求严格，对国外装备制造企业没有对国内装备企业严格。在执行合同方面国内企业的信用没有国外企业好，不按期交货的现象，致使成套装置无法投产使用，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经济效益。这些都是国内竞争秩序不规范，合同约束效力和信用度宽严不一的表现。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使用进口设备享受的优惠多于采购国内设备，例如国家对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相反，国内企业为工程国产化提供设备所需的原材料和配套件进口却受到较高的关税限制，使国产设备（如石化成套设备中的塔器、反应器、换热器）渐渐失去价格优势。

尽管十多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在推动科研机构面向市场方向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科研机构在本质上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并没有改变，大量应用型科研机构游离于企业之外，65%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近60%的研究开发活动都不在企业这个市场竞争主体之中，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体制症结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 技术发展模式还停留在引进型模仿创新阶段

我国装备工业几十年来的发展，始终没有摆脱技术引进型模仿创新的模式，装备工业一直在"引进—落后—引进"的怪圈中徘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大多数装备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还处于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在制造技术方面，我国装备工业整体制造水平仍处于机械化为主的阶段，设计手段落后，工艺装备水平低，而发达国家已进入以计算机控制为主的柔性化、智能

化、集成化为特征的自动化生产阶段。

我国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一般产品相对过剩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品短缺同时并存。我国产品结构层次低的根源在于技术水平落后。我国企业技术改造投入不足，企业的落后设备不能及时得到改造或更新，不少企业设备陈旧、老化，带病运转，甚至一些50年代的设备还在超期服役，造成多数产品单耗高、浪费大，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我国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7美元，而美国为3.4美元，德国为7美元，日本为10.5美元。主要工业产品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冶金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达0.9吨标煤，比发达国家高20%—40%。原煤入洗率仅为25%，而发达国家为50%—100%。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比重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不足2%，而世界500强企业一般为5%—10%以上。科技成果商品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低，分别只有20%和5%—7%左右。我国还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工艺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我国装备工业的整体素质和产业技术水平不高，集中体现于重大技术成套装备满足不了国民经济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我国许多重大技术装备，尚不具备研究开发与制造能力，不得不主要依靠进口。有数据表明：我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而且，越是重要、高档、技术附加值越高的装备，进口就越多，自给率就越低。

由于我国装备工业50年来一直采用了技术引进型模仿创新的发展模式，重要的产品和工艺技术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并长期陷入“恶性循环”。20世纪90年代，我国装备工业虽然能够提供经济建设所需的一些重大装备和产品，但技术仍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指以合法的手段、合理的方式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下同），机械制造业中57%的产品产业化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完成的。我国装备工业的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中心，即使有也水平低，行业自身的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很弱，发电设备、轿车、仪器仪表、数控系统等主要产品的更新换代离不开从国外引进技术。我国装备工业大中型企业在技术引进时，技术引进经费在技术开发经费支出总和中占很高比例，技术引进费用远高于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在引进国外技术经费中设计图纸、工艺专利的购入费所占比例高达60%以上。我国装备工业通过巨额资金购入的技术，只是使用权，而无知识产权，或者说是引进了“产权”，没有引来“知识”。许多企业引进技术后，对引进的技术往往停留在消化阶段，对于硬件设备往往只停留在使用上，不注意配套设施的建设，配套件、原材料协作不好，结果不能投入生产或产品质量不过关；对于软件技术往往消化吸收速度很慢，项目从签约到批量生产一般需要5年或更长的时间。由于长期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加之国内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弱，技术改造又往往强调技术装备的更新，而忽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片面追求技术的先进性和规模化，致使装备工业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以石油化工设备为例，通过利用外资或国有资金，采用引进工艺流程设计技术，成套进口全套装置。20年来，化肥生产企业先后进口31套合成氨装置、26套尿素装置、47套磷肥装置，总计耗资48亿美元；

乙烯生产企业先后进口18套乙烯装置，总计耗资200亿美元。当前国内高技术难度的大型化工装置仍是国外产品的天下。

3. 工程产业发展缓慢严重制约我国重大装备国产化进程

我国具有总承包能力的工程公司很少，工程公司是争取在大型项目中获得自主权的关键，只有获得了大项目的总承包权，我们才可能实现自主引进，自主选择合作伙伴，自主采购。总承包权是国产化的关键。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取决于设备购置的自主化，有了总承包权，才能有国产化的自主权。其中关键因素是具有工程设计、设备置办和施工管理能力的工程公司（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他们在大型项目的建设中对用户（业主）全权负责，对置办设备有选择权，在用户和设备制造商之间起着纽带作用。我国的大型项目建设的工程总承包就仍然依赖于外国公司，大部分装备制造企业在承接任务上就处于被动的局面。尽管通过技术改造，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加工设备与国外的差距已经不明显，但是承接大型设备制造的机会仍然很少。这种状况如果不扭转，装备制造业还将进一步失去市场，国产化将更加难以推动。目前我国的重大建设项目基本上依赖外国大型工程承包公司，装备制造企业要想切入，一般都是依赖主管部门安排国产化依托工程，或以合作生产的方式分包少量工程。在这方面，两大装备制造体系面临同样的问题。

装备产品的国产化研制与依托工程的结合，首先要求工艺国产化与依托工程的紧密结合，只有工艺与装备两者紧密结合的国产化依托工程，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国产化，只有在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的工艺与装备的国产化，才能实现装备制造业与用户真正意义上的结合。工程设计是新工艺技术形成生产能力的纽带，是技术软件工程化的关键。在大型项目的国际招标中，由于设备的参数及结构变化随着流程变化，一些利用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等贷款的项目，虽然采取国际招标的方式采购设备，但大都采取工艺和设备为一体同时招标的方式。装备制造企业在没有与用户的工艺研究开发结合为一体（国际上使两者结合为一体的通常是工程公司）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往往或因缺乏工艺设计，或因缺乏业绩而被排斥在外。由于国内用户对外国的工艺技术依赖程度很大，因此，往往在引进国外工艺技术的同时，依赖国外工程设计，在依赖国外工程设计的同时，又进而依赖进口国外设备。

三、国际装备工业的发展趋势

以装备工业为支柱的世界制造业，正朝着广义的“大制造业”的方向发展，其涉及的概念和领域正逐渐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和整合。

1. 新技术和新理念催生新的制造业全球化方式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管理思想与方法上的根本性变革。以机器等制成品出口和在海外投资建厂实现就近销售，这是两种传统的制造业全球化方式。新型的制造业全球化方式是：在自己可以不拥有生产设施与制造技术的所有权的情况下，广泛利用别国的生产设施与技术力量，制造出最终产品，并进行全球销售。主要形式：一是制造业公司掌握

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授权国外生产厂商按其要求生产产品，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二是制造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零部件的加工制造网络，自己负责产品的总装与营销。如波音747飞机，含有约450万个零部件，来自近10个国家，1000多家大企业，15000多家小企业。英国装配的汽车，发电机来自瑞典，控制设备来自德国，底盘、弹簧来自美国，车身来自意大利（见表9-3）。

表9-3　　全球装备产业主要行业及进入世界500强的公司

国家	主导行业	主要公司
美国	工农业设备	卡特彼勒、迪尔
	计算机半导体	IBM、惠普、康柏电脑、戴尔、SUN、英特尔、德州仪器
	航空航天	波音、联合技术、洛克希德马丁、霍尼韦尔国际、雷神、达信、通用动力
	电子电气	GE、朗讯科技、摩托罗拉、特科国际、思科系统、艾默生电气、Solectron
	汽　车	通用汽车、福特汽车
	汽车零件	德尔福汽车系统、汤姆森拉莫伍尔德里奇、约翰逊控制、里尔、达纳
日本	工农业设备	三菱重工
	计算机	富士通
	电子电气	松下电工、日立、松下电器、索尼、东芝、日本电气公司、三菱电机、三洋电机、夏普、京都陶瓷
	汽　车	丰田、本田、日产、三菱、现代、马自达、铃木、五十铃、富士重工
	汽车零件	电装
德国	工农业设备	蒂森克虏伯
	电子电气	西门子、罗伯特博世
	汽　车	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众、宝马、曼

资料来源：由“2001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整理得到。

2. 智能工厂替代传统的制造工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面临行业需求不断增加和变化，每年面临着利润缩减，而生产率又不断提高的严峻挑战。制造业厂商的生产系统必须更具适应性，他们的供应链必须更加灵活，因此出现了新型的自动化工厂——“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就是实时采集数据，分析监控工厂和设备的性能和优化生产力的能力以提高效率。使工厂管理人员不仅能够提高工厂效率，而且，使工厂的员工能够利用实时信息主动地对变化中的生产和设备状况做出快速反应，从而在改进设备利用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避免重大的损失。高效的工厂智能解决方案可解决运营、产品质量、工厂效率。避免停工和客户满意等方面的生产问题。它们能够帮助用户洞悉KPI、过程分析、停工期、操作、维护等各个方面。

3. 工业服务化的趋势催生了“虚拟企业”

近年来，制造业的网络化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充分显示了装备工业服务化的趋势。传统的装备企业正向服务型企业转变。例如：受到飞机制造业务利润的急剧下降以及IBM公司向服务业成功转型的鼓舞；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公司的CEO菲尔康迪特提出波音公司将不再仅生产飞机，而是学IBM向服务供应商转型，目标是“把人们联系起来并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大企业均在积极地开展与产品相关的全寿命周期内的服务，并积极推进网络销售、网络承揽订货、网络售后服务等。

当今企业竞争的焦点在于其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与全面服务的质量。但是企业的资源又是有限的，所以企业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了解市场和客户需求，并采用电子商务的手段去建立并高效地运作一个“虚拟企业”。在“虚拟企业”中，企业只保留自己最强大的核心业务，而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包。

“虚拟企业”实施的前提是现代网络技术所提供的在企业核心业务、非核心业务及外包业务之间，以及企业与原料供应商、业务合作伙伴之间，当然还包括企业与客户、市场之间良好的动态、实时、交互式的沟通。

四、装备工业发展前景展望

装备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工业部门，对加速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具有关键意义。目前，我国装备工业已具备雄厚的基础，初步建立门类齐全的装备工业体系，具备一定的综合配套和总集成能力，许多装备类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今后20年中国装备工业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为此，今后要大力提高装备工业产品开发和配套、集成能力，使装备工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出口的新一轮主导产业。

1. 未来20年我国装备工业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我国装备制造业仍将有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据测算，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与GDP的比例仍将保持在30%以上，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为此，我国装备工业要从建立、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提高加工制造整体水平的生产组织入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国际分工地位，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使装备工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出口的新一轮主导产业。在装备制造业高速增长中，首先要促进核心企业成长，完善专业化配套体系，为装备工业的提升和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政府部门要改变为单个企业和单个项目制定改造规划的做法，增强开发机电一体化设备的技术能力和提高整体加工制造水平。其次，装备制造企业应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完善生产组织体系。由于我国企业受到技术、资金和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因此，装备制造企业必须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装备制造业转移的机遇，加大技术引进力度，加强核心企业及专业化配套体系建设。目前我国一些设备产品智能化、自动化程度低，主要是由于缺乏在设备产品中应用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因此，应自主开发当今装备工业的前沿技术与核心技术，以提升装备工业。

2. 通过体制改革和战略性重组构筑装备工业基础

必须用改革的方式构筑装备工业的发展基础，强化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功能，弱化其生产加工功能，通过改革、搞活，形成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企业充分竞争的生动局面。要加快传统装备企业的兼并重组，形成一批具有规模效应的大型企业。装备工业是一个研发投入很高的产业，企业只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才能够保证生产和研发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应当转变观念，加强本地区内部的合作与协调，消除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出现的行政壁垒。只有这样，才能够加速资本的集中，民营资本和外资才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国有装备企业的改造和重组中去，才能够避免资本分散化带来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在产业基地建设的初期就避免重蹈彩电、手机等产业的覆辙。

3. 装备工业国产化能力将得到大幅度提高

国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项赶超战略。“十一五”期间，我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研制的任务很重，国家已把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作为提升制造业的战略重点，“十一五”国家继续加大对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的扶持。装备工业产品属于竞争产品，但同时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装备工业产品又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而且其中的一些技术含量高，研制费用大的产品，确实存在着市场缺陷。特别是民营企业干不了，外资不愿进入的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研究开发的投入占很大比例，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单靠市场机制是发展不起来的。对这样的领域，政府产业政策的介入是有理论根据的。装备工业的国产化需要依托工程，依托工程为国产化承担的风险，应当由国家通过优惠政策予以化解。为满足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需要，提高我国重大成套技术装备设计制造水平，增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继续对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实施专项规划。2004年5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专项工作的通知》，基本原则是：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专项以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和重点建设项目为依托，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急需，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水平为目的。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专项的组织与实施要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坚持重点突破与应用导向相结合；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专项内容包括：三峡工程配套装备研制；直流输电成套设备；超临界火力机组成套设备；大型空冷火电机组成套设备；大型抽水蓄能机组成套设备；重型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技术及成套装备；高新优船舶及配套设备；铁路现代化成套装备；年产600万吨综采成套装备；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成套设备。研制专项项目依托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整合装备制造优势力量，协作研制开发，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委托有资格的中介机构或组织专家组评审，择优支持。我国将以增强重大装备研发能力为重点，加快装备工业升级，加快发展装备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构建我国装备工业自主技术研发创新体系。

4. 我国装备工业将沿着信息化的道路前进

从大环境看，用信息技术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十一五”期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和软件业要大力发展汽车电子、机床电子、交通电子、电力电子

等应用电子产品；加快专用集成电路、嵌入式软件等关键产业的发展；积极支持电子专用设备、仪器的研发和产业化，形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所需的产业支撑能力。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核心在制造业上，而制造业的核心在生产工具的信息化上。信息化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生产工具的信息化，而生产工具这些硬件设施的信息化是高投入、高风险的。目前的设备企业有两方面构成，一部分是江浙的家族企业，创新不够，一部分是依靠进口，成本较高。中国要提高工业信息化的程度，就要在信息化的工具制造上有所突破，实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国家科技部将企业信息化的突破口选在了制造业。从国际上来看，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是针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这两大特点来进行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务之急。从国内来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传统制造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这是一条必由之路。我国的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推进以制造业信息化为代表的国民经济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通过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将用户、配套协作企业与装备制造企业三者的“信息流”、“物流”加以整合、集成管理是实现对用户连续性、全方位服务的理想模式。但是信息化的前提是以“用户满意度”为导向的经营理念，要求形成社会化的协作和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管理，信息流、物资流通畅无阻。目前国内装备制造企业落后的管理水平，是信息化的大碍。但是从目前企业对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国家的政策支持来看，信息化的推进有可能反过来促进装备制造企业引进新的管理思想，体现社会协作和规范化的管理模式。

5. 东北地区成为我国接受世界装备工业转移的新兴地区

装备制造业将成为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的“发动机”，世界装备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目标也开始聚焦东北。2003 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沈阳鼓风机厂在沈阳浑南新区合资建厂，投资 1370 万美元生产石油天然气设备部件，这是通用电气在东北投资的第一个装备制造业项目。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先进装备制造企业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东北。目前世界产业转移重点转向了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由于包括沈阳在内的中国东北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望成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中央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决策，目标是把东北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这个庞大的计划已经开始让人憧憬东北将成为继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之后中国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并将开创一个“新东北时代”。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确定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均把促进装备制造企业与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合资、合作，作为国企改革、振兴东北的突破口。

第十章 医药工业

医药产业是按国际标准划分的15类国际化产业之一，是一个集约化、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具有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辐射面广等特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广泛重视并大力发展、相互展开激烈角逐的一个焦点，也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从全球范围看，自1993年至2004年，世界药品销售额从2336亿美元增至5180亿美元，行业迅猛的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产业。医药产业可分为医药工业和医药流通两大子行业，利润增长主要来自于医药工业。医药工业又可以分为化学制药（原料药及制剂）、中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制药机械、药用包装材料等二级子行业。医药产业的下游产业除医疗卫生外，目前正在向保健食品，器材、卫生用品、化妆品，环保产业、绿色农业等方面渗透。医药行业对于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为计划生育、救灾防疫、军需战备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医药工业体系和医药流通网络，能够自主生产从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中成药及中药材的种植、提取加工，到生物技术药品、医疗器械、制药机械等的一系列产品；自主研发从无到有，开始步入快车道。我国医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发展成为世界制药大国，医药产业的生产能力居于世界前茅。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长，医药工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使得产业规模总量快速扩张，从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出持续性和规模性的特征。1978年至2004年产值年均递增18%，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GDP的增长速度，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同时也高于世界发达国家中主要制药国近30年来的平均发展速度年递增13.8%的水平，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医药市场之一。

一、医药工业发展现状

1. 总量增长迅速，产业规模明显扩大

医药产业是我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驶入快车道（见图10－1）。1999年中国医药产业总产值为1549亿元，2004达到3676亿

元。2004 年中国医药产业产值增幅为 17.4%，其中：原料药制造业增幅 16.9%，化学制剂制造业增幅 17.8%，中药饮片行业增幅 13.6%，中成药制造业增幅 16.1%，生物生化制造业增幅 22.1%，医疗器械制造业增幅 18.0%，均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势头，生物生化制造业更是以高于 20%的速度居各子行业增长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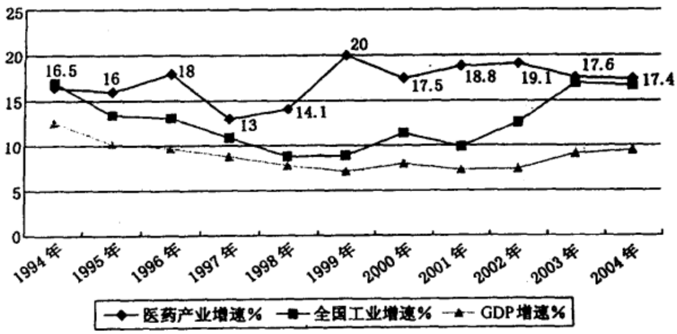


图 10－1　医药产业历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由于持续高速成长，医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01 年我国医药工业总值为 2164 亿元，占我国 GDP 的 2.3%；2004 年医药工业总值为 3676 亿元，占我国 GDP 的比重上升到 2.7%。医药行业整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图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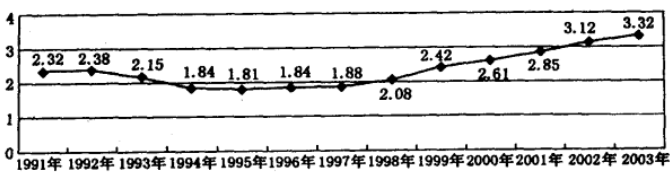


图 10－2　医药工业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 医药工业初具规模，产业体系比较完备

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医药工业体系和医药流通网络，成为世界医药生产国和原料药出口国之一。

我国现有医药工业企业 5014 家，可以生产化学原料药近 1500 种，总产量 76 万吨，位居世界第二。能生产化学药品制剂 60 个剂型 4500 余个品种。一些重要品种如维生素 C、青霉素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传统中药，已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能生产包括滴丸、气雾剂、注射剂在内的现代中药剂型 60 多种，中成药产量已达 60 万吨。我国能生产疫苗、抗血清、血液制品、体内外诊断试剂等各类生物制

品300余种，其中现代生物工程药品20种，生产预防制品约9亿人份。可以生产包括X射线断层扫描成像装置、磁共振装置等在内的47个大门类、3000多个品种医疗器械产品，还可以生产8大类1200多个规格的制药机械产品。

从各子行业构成来看，化学制药企业的产值仍然占据着医药制造业的大半江山，中药业次之，生物制药企业的规模目前较小（图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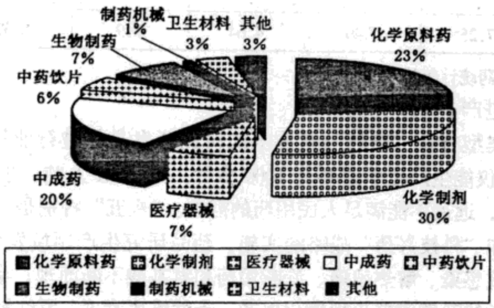


图10－3 2004年医药产业各子行业产值比重（%）

3. 多元化经济格局初步形成，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各领风骚

目前我国医药行业体制正呈多元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了以股份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和三资经济共同发展，民营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互动的多元化经济格局。按工业总产值计算，2003年股份制经济占全行业的比重已经从"九五"初期的11.9%上升到43.3%，三资经济从17.8%上升到23.4%，国有经济比重从53.2%下降到16.1%。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都对医药产业的高速增长做出了贡献；2004年1～8月份，国有医药企业完成销售收入303.17亿元，同比增长3.43%；集体经济140.2亿元，增长22.53%；股份制经济978.26亿元，增长18.66%；港澳台及外商投资477.3亿元，增长18.64%。分行业看，化学原料药利润的44.77%来自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为25.02%；化学药品制剂工业利润的43.93%来自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的利润贡献率达到34.85%；股份制企业对生物制剂工业利润的贡献达到58.9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贡献达到33.06%；医疗器械工业利润的45.51%来自股份制企业；中成药工业的利润71.37%出自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也达到13.52%；股份制经济对中药饮片行业的利润贡献则高达73.4%。（表10－1）

表10－1 2004年1—8月医药工业实现利润构成情况（占比%）

	化学原料药	化学药品制剂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中成药	中药饮片
国有经济	25.02	3.69	1.5	1.71	5.58	0.86
集体经济	6.18	10.04	1.89	2.22	1.01	3.96

	化学原料药	化学药品制剂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中成药	中药饮片
股份制经济	44.77	34.85	68.91	45.51	71.37	73.4
港澳台及外商投资经济	16.78	43.93	33.06	42.67	13.52	16.73
其他经济	7.25	7.49	4.64	7.9	8.52	5.05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统计年报。

4. 科技进步促进产业持续发展

医药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新药与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是促进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七五”末期，我国仅能生产化学原料药1000多种，产量21万吨，生产针剂不足2亿支，片剂40多亿片，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用药的需求。“八五”特别是“九五”期间，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和“科技兴药”战略的实施，药品研究生产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期间，一批新型抗感染、解热镇痛、诊断用药和氨基酸不断涌现；半合成青霉素、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抗菌素等趋于规模化生产；天然维生素E、罗红霉素、阿齐霉素等重要产品实现了产业化；控释、缓释、透皮等新剂型得到了较大发展；高效分离与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微囊及靶向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在医药生产中得到推广。

植物药和天然药物的发展成为“九五”期间化学药品工业发展的优势和重点。抗感染的黄连素，抗肿瘤的秋水仙碱、长春碱等，抗疟疾的青蒿素系列产品，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丹参注射液、银杏叶制品等已经在国内大量生产并广泛应用。

在新药研究方面，已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的有上海医科大学基因工程链激酶、江苏微生物研究所新半合抗依替米星、广州空军医院生化药欣络维等。还有一批获准临床的一类新药，例如抗肝炎药双环醇、抗癌新药氮烯菲林等。

中药作为祖国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比较有优势的产业，继承和发展中药也一直是我国制药界努力的方向。“八五”期间，还原青蒿素的研制和生产体现了我国自行研制创新药物的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九五”期间，中药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尤其在治疗与预防心脑血管、消化系统、肝炎等疾病方面有所突破。杏林颗粒、丹参滴丸已通过美国FDA的预审，并进入临床实验，迈出了中药进入国际市场坚实的一步。随着中药产品技术含量和科技含量的提升，中药出口已遍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总额6亿多美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医疗器械制造行业的规模和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能生产常规的中低档医疗器械，一些尖端的产品例如CT、核磁共振机、彩色B超等也实现了产业化。医疗器械产品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目前已经有100家企业通过了IS09000认证。

5. 企业组织结构改善，产业集中度提高

近几年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最明显的特征是企业的并购重组。国家政策调整和市场竞争需要，都促使中国医药企业的并购重组如火如荼。

目前我国医药工业已进入典型的过剩经济时代，恶性竞争严重，企业利润率逐年下滑。医药产业的重新整合是加入WTO的国际背景和医药制度改革的国内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医药制造业全面推行GMP、GSP、GAP认证，提高对医药企业的要求，进一步推动了并购重组的进程。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规定，2004年7月1日起，凡未取得GMP认证的企业一律停产。在这种情况下，未能按时达到这一要求的制药企业，只能主动向大型制药企业靠拢；而要进入制药领域的投资者，则采取并购重组业内企业的进入方式。这种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医药企业数量逐年减少，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随着并购重组的深入，我国医药行业出现一批大型的、有竞争力的集团公司，而大量规模小、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被迫出局，中国医药市场"版图"不断重新划分。目前前60家医药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国医药销售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1995年为19.7%，2004年为34.2%。少数优势大企业和企业集团越来越强有力地左右着全国市场，行业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对医药行业的快速增长起到了较好的拉动作用。

从地域角度看，医药工业地域集中度表现非常突出。华东是我国医药工业最为集中并且最具活力的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更是遥遥领先。不论按销售还是按利润排名，江苏和浙江都处于我国医药工业的前两名。在整体区域分布上，2004年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上海、河北6省市的产品销售收入已占全国的52%。江苏、浙江、北京、河北、广东、山东、上海7省市实现利润占全国60%的份额（表10-2）。

表10-2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生产前5个省市排行榜（2004）

排　序	总产量最大	产量增长最快	总产量最大	产量增长最快
1	广东	新疆	河北	河南
2	四川	四川	浙江	广西
3	广西	贵州	山东	湖北
4	湖北	广东	江苏	河北
5	河南	河南	河南	江苏

6. 医药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我国药品出口到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52年医药商品出口857万美元，1978年医药商品出口2.9亿美元，1998年达34亿美元，近10年医药商品出口保持了年均17.9%的增长速度。近两年国家实施鼓励出口的政策，对医药产品出口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2000年医药出口38亿美元，2004年1至12月，我国医药商品出口额为123.6亿美元，同比增长28.34%；进口额为101.30亿美元，同比增长23.84%，进口额和出口额双双突破百亿美元大关。我国医药产品正以较高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进入国际市场。

化学原料药和医疗器械是我国医药出口的增长点。我国是世界化学原料药第二大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主要出口大宗品种：抗菌素、维生素等。单个品种出口金额最大的

是维生素 C，2004 年出口总值达 3.14 亿美元，占化学原料药出口总额的 5.06%。医疗器械在出口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出口额每年均以 20%以上的速度增长，是仅次于西药原料药出口的第二大类商品。2004 年医疗器械和设备出口 27.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25%；中药出口则摆脱多年低增长的徘徊状态，2004 年中药出口总额达到了 7.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6%。中药材、提取物和中成药三个大类的出口均有增长。

二、医药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制药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和发达国家制药公司相比，我国制药业仍处于资源分散、研究和开发薄弱、竞争力低下的状况，产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1. 企业数目多规模小，市场集中度低下

我国的医药工业企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只有 1800 余家，尽管经历了 1998 年的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和近两年的兼并重组，2004 年我国医药工业企业仍然高达 5014 家，而世界最大的药品市场美国，其制药企业不到 2000 家；将医药产业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德国，其制药企业的数量也只有 1100 家。在任何一个时期，医药工业的市场容量总是有限的，它只能允许少数有效率的企业存在，更何况我国医药市场的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小，如此多的企业存在只能使产业利润下降，导致医药产业的过度竞争。

并且我国如此多的制药企业中，大型企业所占的比例不足 5%。2003 年我国有 4359 家医药企业，但 2003 年现值总产值超 10 亿元以上的企业仅占全部独立核算医药企业的 0.78%，尚不足 1%；2003 年利润超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数仅占全部独立核算医药企业的 1.22%。2003 年我国医药产业中销售收入排名第一的哈药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73 亿元人民币）不足美国辉瑞公司（472 亿美元）的 2%；2003 年我国医药工业全部独立核算企业销售收入的总额仅相当于辉瑞公司年销售收入的 74%。这也说明我国医药工业中实际上就没有强大的企业，据 2003 年的统计表明，医药企业共 4359 家，按固定资产原值来计算，平均每家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3950 万元人民币。这个规模虽然较 1995 年统计的平均每家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 1524 万元增加了两倍多，但是与国外的制药企业相比，其平均规模仍然偏小。

在产业集中度方面，我国医药工业的集中度一直不高。从表 10 - 3 可以看出，从 1991 年到 2004 年，销售收入排名首位的企业的集中度一直不到 5%，前 4 位企业的集中度（CR4）一直不足 10%，前 8 位企业的集中度（CR8）则一直不足 15%。而且，从 1998 年以来，我国医药工业的前四位和前/乙位企业的集中度虽有小幅的增加，但是集中度的增加幅度仍不是很明显。虽然我国医药工业销售额前 60 家企业的集中度由 1990 年的 18%提高到 2003 年的 45%，但这个集中度不仅在与我国各产业的横向比较中处于中下水平，而且与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医药产业集中度水平相比较更是显得非常低。1993 年世界药业排名前 10 名制药公司的销售收入总额占全世界的 25%，1995 年占 28%，到 2003 年已接近 50%。美国前 60 家企业的集中度 1992 年就已达到 97%。显然，

我国的医药产业的集中度很低，属分散竞争型市场结构。

表 10－3　　　　我国医药工业集中度的变化（%）

年　份	行业首位企业的集中度	行业中前四位企业的集中度	行业中前八位企业的集中度
1991	1.6	5.7	9.6
1992	2.9	6.4	10.0
1993	3.9	11.6	16.4
1994	2.2	7.5	11.5
1995	3.0	7.7	11.6
1996	3.5	9.1	13.9
1997	2.6	8.0	13.5
1998	2.5.	8.2	3.6
1999	2.5	8.6	14.2
2000	2.9	9.5	14.4
2001	2.9	9.7	15.3
2002	2.8	9.7	15.8
2003	2.5	8.9	13.0
2004	2.3	10.2	13.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医药统计年鉴》、《健康网》数据计算。

发达国家的制药产业多是寡占型的市场结构，至少也是低竞争性的，然而现代世界级的制药企业从组织结构上都是由若干个分公司组成的集约化集团，集团各公司的共同目标是发现、开发、生产和上市最高品质的安全有效的药品。这种集约化的集团公司有这样三个特征，一是将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有机地组合成一个整体；二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相关的优势产业；三是发展优势产品的规模生产，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市场。而我国国内的制药企业规模与发达国家制药企业无法相提并论，目前为止，我国医药产业中可以说没有一个被世界同业认可的大型企业。

尽管总体上讲我国医药工业的集中度近年来在逐步提高，但医药产业多年来形成的“小散乱”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企业规模效益差，已成为制约我国医药成长的一个“瓶颈”。整个行业呈粗放型发展的态势而不是集约化增长。医药市场结构分散，企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被扭曲了。依据贝恩等人的理论，集中度与行业的利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我国医药工业由于集中度低，其利润由于竞争过度的原因而消散了。从企业的利润总额来看，排序前 100 名企业的合计数是 120.67 亿元，占全行业 55.14% 的份额，前 500 名的企业共完成 204.50 亿元的利润，占全行业的 93.45%。以上数据是对 4341 家的企业统计得出的，也就是说，其余 3841 家占行业

88.48%的企业只贡献了行业利润的6.55%，额度是14.34亿元。

2. 新药研发投入不足，企业研发能力薄弱

发达国家制药公司的发展表明，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完全依靠企业对新药的研究开发。医药公司是新药研发的主力军。我国虽然94%的企业设有技术开发机构，但99%的企业无自主研究开发新药的能力。2000年全国年医药RSLD经费为23.46亿元，医药产品销售收入为1627.48亿元。R&D经费投入占当年销售收入的1.44%，距国外的10%～15%的投入相差甚远。

新药研制投入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新药的创新研制能力及制剂水平低下，使国内企业只能靠大量的仿制西药求得生存，严重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建国以来我国化学药，生产的3000多种西药中99%是仿制药。近几年生产的837种新药中，97.4%为仿制药，而且其中60%还处于专利保护期。即便是仿制药在技术水平、工艺、产品质量等方面均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甚远，目前我国的化学制剂行业不仅难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而且更面临来自国外的进口药品的竞争；中药产业虽然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但是我国中医药产品的技术含量偏低，缺少规范化标准体系。尤其是中药材产业结构不合理、种植格局单一、内在质量不稳定。由于缺少现代医药理论和技术的支持，开发的中成药因质量不佳而在国际市场中无法顺畅流通。目前，我国中草药在国际植物药市场上的份额仅占5%；医疗器械产业大多数产品仍处于中低档水平，自行研制、生产的高、精、尖医疗诊断和治疗设备较少。生物制药大多数品种尚未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生产。至2001年，我国自主投入的资金开发获得国际承认的创新药物只有2个：青蒿素和二巯基丁二酸钠。这种状况导致了市场竞争的进一步恶化，使企业无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从而限制了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

3. 产品结构不合理，行业亏损严重

由于新药研发能力薄弱和药品生产领域严重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投资主体的急功近利，使得我国医药产品差别化程度低下，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医药企业生产技术结构严重失调，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大量过剩，引发了同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严重不足，造成了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

目前医药工业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44%～60%，但是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差别化不足、档次不够高、附加值较低，每年还要花大量外汇进口国内短缺产品，因此进出口产品结构失调。我国化学原料年生产能力达38万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但化学原料出口，是把高能耗和高污染留在国内，而进口国则可以通过深加工赚钱。同时，我国化学制剂技术较差，出口的大部分也都是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国际中成药市场上每年高达100亿美元的销售额中，我国中成药的市场占有率仅为5%，而作为"徒弟"的韩国和日本则占到了25%，他们所用的原料大都来自中国。去年，我国药材产量达全世界90%以上，中药材净顺差达到2.38亿美元，但是中成药逆差达到了3.9亿美元。我国目前医疗器械产品主要有47大类，3000多个品种，11000多种规格的产品，但产品主要集中在常规设备等中低档医疗器械，高档产品

的生产较少，并且在技术方面落后。其中出口的主要是常规设备、手术器械等中低档产品，占整个医疗器械工业产值的30%。

产品重复，供大于求。许多医药企业仍然在一些老品种上做文章，医药市场产品品种雷同现象严重，价格战硝烟弥漫。如雷尼替丁片仅上海就有19家企业在同时生产，而1个氟派酸全国竟有1000多家企业在生产；其次，在我国新药开发中，低水平重复现象也很普遍，了解到一个新药的有效成分后，七八家甚至十几家企业蜂拥而上，在有效成分结构上加加减减，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结果搞出的却是同一种药，即使侥幸通过审批上市，也还是一种变相的重复竞争。如二类新药克拉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等，重复生产盲目扩大现象十分突出，生产企业都在50家以上，以致这些新产品供大于求，陷入低价竞销的"怪圈"。

企业竞相降价，扰乱了市场秩序。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不仅导致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而且还引发了医药行业内的一系列恶性价格竞争。由于生产起数目众多，产品差别化程度低，企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近年来大输液盲目扩产导致产能过剩，企业被迫陷入价格战。我国现有大输液生产企业240多家，而年生产能力已高达100亿瓶，远远大于市场需求量40亿瓶。其中全部产品的60%以上是葡萄糖氯化钠等普通输液产品，这部分竞争最为激烈。一瓶250ml规格的葡萄糖氯化钠输液产品，1998年的出厂价为1.8元，2001年降至1.3元，2004年只卖0.8元。在GMP标准下生产出来的输液产品还不如一瓶纯净水值钱。这是我国大输液市场价格严重扭曲的真实写照。残酷的价格战没有赢家。目前我国原料药价格一般是国际市场的20%左右，然而近两年，我国生产青霉素和维生素的厂家在对外出口上竞相压价，价格大战风起云涌，不仅损害了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国家利益，阻碍了产业的发展。自2000年5月至2001年12月底，我国维生素C出口价格由每千克5美元一路狂跌到2.8美元以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亿美元；2003年上半年青霉素的价格为每10亿单位90元以上，2004年6月已跌到60元左右，由于国内生产企业扩产后竞争加剧；而国际市场需求没有大的变化，出口平均单价大幅下挫，跌幅高达40%左右，使青霉素工业盐的出口价格低于成本价，这就意味着我国企业在赔本经营，也就是说企业出口越多，亏损就越多。

单个企业单一品种的销售规模很小。产品始终是医药企业的灵魂和生命线，市场竞争实质上是产品的竞争。当前，我国医药市场出现"破釜沉舟"式的恶性竞争，其核心就是产品结构性矛盾的综合反映。没有产品个性就形不成规模，没有特色就形不成效益。目前在中国，年销售过亿元的品牌约50个；过5亿元的也就10个左右，2003年我国销售排位第二的药品是复方丹参滴丸（天津天士力制药公司），销售额为11亿元人民币，也是我国唯一销售过10亿大关的单品种药品。我国医药产业严重缺乏大品牌。而在世界市场上，年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的"重磅炸弹"药品，1990年就有24个，1995年达到40个。2003年全球最畅销的10种药物的总销售额为428亿美元，占据全球药品销售额10.4%。

从图10－4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医药工业亏损率较低，一直保持在10%以下，但到1995年，我国的：医药企业的亏损面直线上升到了36.1%。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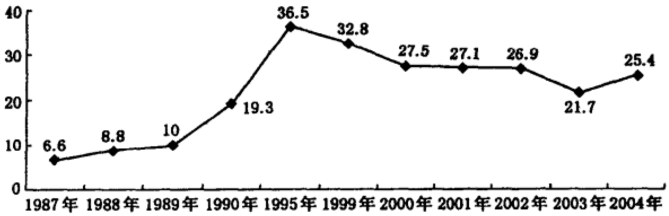


图 10－4　我国医药工业历年亏损情况（%）

是因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盲目的创办利润高的医药企业，这种状况造成了医药产业低水平重复生产变本加厉，医药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0年开始，我国医药企业数量突破3000家大关，2004年达到5014家。但是产业中的许多制药企业由于规模太小，竞争能力太弱，纷纷出现了亏损，市场上过度竞争的局面逐渐形成。1998年，国家鼓励医药企业之间的联合并购，对医药工业进行调整重组，产业中的亏损企业被效益好的企业兼并重组，逐步走出了亏损的境地，整个行业的亏损率逐步下降。2003年由于"非典"的刺激，我国医药企业亏损面创10年来的新低为21.7%。但是2004年，亏损率又有所增加，而且行业的亏损率仍然很高，回升至25.4%。这说明我国医药工业的市场总量仍不足以支撑这么多的医药企业，使医药产品供过于求仍然非常严重，简单的兼并重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药企业行业规模经济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生产，产品档次低以及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

4. 国际分工中位于产业价值链低端，国际市场占有率低

我国出口医药产品附加值较低，以中、低档原料药为主，制剂只占出口额的10%左右。相当的数量和品种原料药是作为饲料添加剂出口，且出口大部分通过中间商，多头出口，竞相压价，经济效益低。

从产品结构看，我国中药材出口大都为原药材或粗加工产品，化学药出口以污染较重的化学原料药为主，医疗器械产品主要集中在常规设备等中低档医疗器械，高档产品的生产较少，进口则主要为价格昂贵的制剂及大型、高档医疗设备等。目前我国化学制剂品种少，工艺水平低，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小，国际竞争力弱。我国能够生产4500多个制剂品种，而美国为15万个，日本为4.4万个，德国为6万多个。我国化学制剂业与国际上的差距还表现在原料药和制剂的比价上，按照国际惯例，原料药与制剂的比价差一般是1:10，而我国一般为1:3，说明我国制剂加工层次较低，开发深度不够。抗生素、解热镇痛类和维生素类是我国原料药出口的主导产品，原料药出口价格低廉、利润极薄。随着我国加入WTO及世界原料药生产中心逐步向亚洲转移，我国原料药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得以体现，出口数量因此上升，但因价格走低，出口金额反而下降。我国的化学原料药出口之所以价低利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产品并没有按照正常的渠道进入欧美原料药市场，而是以化工原料的形式出口。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除了是我国原料药企业对化学原料药出口的标准及程序不熟悉外，更多的是我们没有从根本

上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由于质量管理不规范，中国的药品中仅10%符合国际药品生产规范（GMP），主要药品中只有青霉素和链霉素等达到了国际水平，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药品出口能力。

尽管我国医药出口量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占全球市场份额比例很小。2004年，我国医药产业共完成出口交货值352亿元人民币，而全球制药业的年销售额高达5500亿美元。中国是中药的鼻祖，但目前国际中药市场年160亿美元的销售额中，日本产品占80%，韩国产品占10%，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占7%。而我国仅占5%左右，约5.8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还是原料初级品，中成药仅占1.26亿美元，且多以食品添加剂的形式出口。与此同时，从我国进口中药材的日本、韩国、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加工生产的“洋中药”却以每年30%的增速涌入我国，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吃起了“洋中药”。原来我们引以为豪的“国之瑰宝”——中药，已经逐渐失去了庞大的国际市场，这种现实与我国作为植物药的主要发源地及历史悠久的中药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5. 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不容乐观

当今世界，医药工业最大的特点是产业的高度专利依赖性和专利药品发达国家的高度垄断性。我国从1993年起开始对药品实施20年的专利保护。但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医药企业已习惯了仿制别国药品，创新缺乏动力，创制新药的能力不强。另一方面，我国制药企业存在着重成果轻专利的状况。如我国自行研制的国家一类新药青蒿素，在治疗疟疾病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当时科研人员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没有及时申请专利及取得专利保护。国外很快就掌握了此产品的制作方法，生产出与之相同的药品，国外仿制者还抢先进行了专利申请。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医药行业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在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里，知识产权保护尤为重要。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协定来激励、保护、发展我国医药产业已成为我国制药企业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6.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未达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医药工业的健康发展

自2001年国务院纠风办出台《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卫生部出台《医疗机构药品招标采购工作规范》以来，招标购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招标购药的目的一是降低药价，二是引入“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机制。而从实际上看，政府用有形之手规范药品购销市场，投入了大量成本强制推行，结果事与愿违，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主要的弊端首先是招标主体错位。医疗单位是招标主体，但实际操作中，各地招标主体混乱，有的是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直接组织招标，也有的成立了隶属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药品招标采购机构，还有的是交给与卫生行政部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司去组织招标，形成新的政企不分的格局，药品招标更强化了医疗单位在采购上的垄断地位；其次，招投标双方地位不平等。在中标企业和医疗单位签订的药品购销协议中，对中标方要求非常苛刻，而招标方却不承担任何风险；三是对医药产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招标主体以近期医疗单位采购的最低扣率或历次中标的最低价作为投标“门槛价”，导致医药企业持续发展能力每况愈下。

与此同时，招标采购还滋生了诸如招标代理费、手续费、保证金等费用，使销售成

本增加，加重了生产企业的负担，让投标企业不堪其累。尤其是由投标方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用标准过高，收费方式不合理。全国医药商业利润率 2002 年仅 0.59%，而招标代理费用每个品种中标金额 100 万以下的为 0.6%。随着不规范药品招标采购的不断扩大，脆弱的医药企业将更难以为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医药企业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加大对新产品研究开发的投入，花费大量资金实施 GMP、GSP 改造，另一方面，要承受利润空间的挤压，这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造成严重打击。此外，国家规定要把招标的让利部分大部分让给患者，但大多数地区医疗单位没有执行文件规定，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这与药品招标的初衷相背离。

三、国际医药工业发展趋势

医药工业是关系到人类健康的生命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以及每年保持 1% 的人口自然增长，老年人口每年保持 3% 的递增，医药产业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产业规模持续高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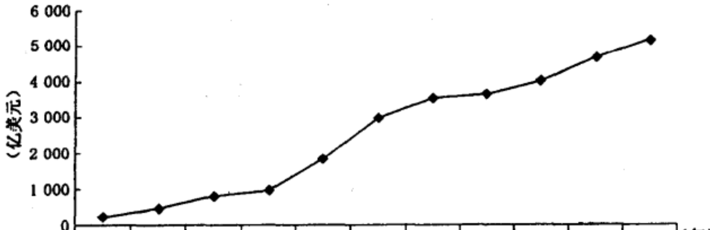
医药工业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多年来一直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现代医药工业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复兴时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加速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合成技术、新材料技术、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加之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医药产业得到迅速增长。从 1951 年—1980 年的 29 年间，世界药品产值由 29 亿美元增加至 773 亿美元，增长了 25.7 倍。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世界医药工业从传统依附的化学工业中迅速独立成为一个强劲的产业体系。90 年代以来，尽管受到全球整体经济增速减缓、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遏制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影响，医药市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是为数不多的逆势发展的行业之一，1990 年全球医药市场为 1821 亿美元，2004 年已增至 5180 亿美元，2000 年—2004 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0%，远高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按照全球著名的医药工业信息公司 IMS 公司的预测，2002 年—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6.7%。到 2010 年，全球药品的销售额将达到 6800 亿美元（见图 10－5）。

2. 旺盛需求促进医药产业发展

药品开发链的不断充实、老龄化人口的发展，及对创新疗法的不断需求是全球药品市场增长的强劲推动力。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饮食改善和人的寿命逐渐延长，许多疾病如高血脂、肥胖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等日益突出，药品消费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药品市场心血管药物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而抗感染药物有下降的趋势；老年疾病及妇女儿童用药的市场发展速度在增加；预防药物、保健食品（也称功能性食品）的发展持续升温；化学药品在药物市场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18	429	790	930	1 821	2 958	3 540	3 642	4 006	4 663	5 180

图 10－5　历年全球药品市场总销售额

数据来源：IMS World Review 2004。

中的统治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一些新兴的药物将在药品市场中崛起并占有较大份额。以生物高技术为特征的生物制药，近10年来发展迅速，尤其是基因工程，已成为医药产品更新换代的重要技术。目前，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的医药产品已达150多种，其中数10种具有生产可能性，有的已经生产，如乙肝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白介素－2、干扰素、人体生长激素及人表皮生长因子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天然药物、海洋生物、低等生物及鲜活动物也日益受到重视，成为药物研究的重点。

尽管各国政府均在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但世界药品市场的年均增长仍保持在7%。2004年全球有82个药品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比前年增加了17个，其中11个出自生物技术公司，12个用于治疗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分裂症和HIV。随着居世界经济前列的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医疗水平的提高，医药需求将持续旺盛，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医药工业快速发展。

3. 研发投入增加，新技术拓宽产业前景

医药工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创新推动的产业，其研发投入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高效的研发创新就是制药业的生命线，是制药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而日益复杂的新药开发难度迫使制药公司必须不断投入高额的研发费用才能不断开发出新产品，为此制药公司近年将大量的资金投向组合化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新技术的开发。

大型制药公司是研发创新的主要投入者和产业创新的主要推动者。以辉瑞、葛兰素史克等为代表的全球药业"10强"企业（见表10－4），2002年R&D投入达309亿美元，占当年全球研发总投入的一半以上，平均R&D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超过17%。2002年全球研发中的药物达6904个，比去年增长9%，创历史新高。2004年全球在新药研发上投入最大的10大制药公司的研发费用高达398.3亿美元，较2003年增长了27.3%，其中辉瑞以76.8亿美元估价高居榜首。但随着新药开发难度不断增大，即使R&D投入费用逐年增高，上市的新药数目却在不断下滑，代表新药研发水平的新化学实体（NCE）2004年上市仅有18个，较2003年减少14.3%，再写历史新低。

表 10－4　　2004 年全球新药研发投入医药企业 10 强

排名	公　司	R&D 费用（亿美元）	较 2003 年增长（%）	R&D 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
1	辉　瑞	76.8	3	15
2	葛兰素史克	52.0	8	14
3	赛诺菲—安万特	51.9	8	16
4	诺　华	42.1	12	15
5	罗　氏	41.0	7	16
6	阿斯利康	38.0	10	18
7	礼　来	26.9	15	19
8	百时美施贵宝	25.0	10	13
9	惠　氏	24.6	18	14
10	安　进	20.0	23	19
	合　计	398.3		

研发型制药企业仍然独占鳌头，美国药品研究和生产协会会员单位 2004 年的研究开发费达到 388 亿美元，比 2003 年增长 16.9%（而 2003 年较 2002 年增长 7.1%），较 1992 年的 115 亿美元更是增加了 2.37 倍（而 2003 年较 1992 年增加为 1.9 倍）。其中用在美国本土的达到 306 亿美元，82 亿美元用在美国之外，较 1990 年美国的药品研究开发费增加了 5 倍，同期，欧洲仅增加了 2.5 倍。所以排名前 10 位的药品中有 8 个是美国原创的。2003 年会员企业在研究开发的药品超过 1000 个，占销售的比例达到 15.6%，略低于 2002 年的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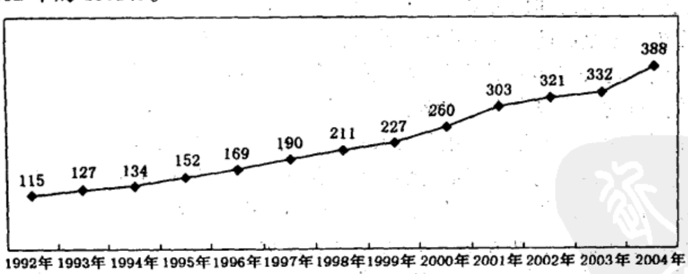


图 10－6　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会员企业新药研发投入（亿美元）

21 世纪世界制药业最重要的变化将是由普及基因技术而导致的药品开发的大变革。基因技术给 21 世纪人类带来的最大福音是增强体质，预防和减少疾病。基因技术在医

学领域的实用价值极大，因而巨大的市场潜力已被许多制药业看好，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治疗用生物药品、诊断试剂、疫苗迅速发展，并逐步扩大在世界医药市场的份额。在药物领域，纳米技术更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它使药物的生产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自动化、规模化，亦将给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曙光。纳米技术是在纳米（1×10^{-9}m）尺寸空间内对物质或者材料进行加工、制造的技术，其最终目标是按照人类意志直接用单个的原子、分子制造出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由于纳米材料在性质上的奇特性和优越性，医药产业又具有了新的更广阔的前景。

4. 大型并购波浪式增长，产业区域高度集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及医药市场的迅速膨胀，医药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为占据竞争优势地位，世界医药工业通过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和国际资本市场运作，提升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扩大生产与销售网络，提高竞争力，增加市场份额，集中资源，减小新药开发风险，提高医药产业的效益，成为当今医药产业发展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排名前列的跨国医药公司大多进行了不同规模的联合、重组、兼并，形成了葛兰素史克（葛兰素－史克必成）、辉瑞（辉瑞－华纳兰伯特－法玛西亚）、赫斯特—罗纳、阿斯利康（阿斯特拉－捷利康）等超大规模的制药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技术开发实力和覆盖世界主要市场的代理配送体系，占有明显优势。超大规模的跨国制药公司在重组中实现了优势互补，突出了主业，强化了其核心竞争力，在世界医药市场的分割中处于更加优势地位。1993年世界药业排名前10名制药公司的销售收入总额占全世界25%，1995年占28%，到2003年已接近50%（见表10－5）。

表10－5　　2003年世界医药企业前10强的市场份额

公　司	国　别	销售额（亿美元）	增长率%	2003年占全球市场份额%
辉　瑞	美国	472	8.5	10.1
葛兰素史克	英国	308	3.9	6.6
默　克	美国	226	6.1	4.8
强　生	美国	223	12.2	4.8
诺　华	法国	203	16.2	4.3
阿斯利康	英国	192	0.6	4.1
安万特	瑞士	171	8.7	3.6
百施美施贵宝	美国	157	4	3.4
罗　氏	美国	153	12	3.3
雅　培	美国	133	10.7	2.8
合　计		2238		47.8

国际医药企业并购案接连出现，各大公司在行业中的排名屡屡更迭。美国辉瑞（Pfizer）公司并购华纳兰伯特（Warner Lambert）公司之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制药公司，并购金额达850亿美元。2003年4月辉瑞公司又以600亿美元收购排名第九的法码西亚公司，进一步扩大规模，巩固了自己排行第一的位置。葛兰素威康（Glaxo Wellcom）与史克（Smith Kline）组成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 Smith Kline.Gsk）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制药公司，使得原市场领袖默克公司（Merck Z Co）排位下移至第3位。

5. 全球化趋势加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跨国公司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大规模的联合与兼并及国际资本市场运作，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与销售网络，扩大市场份额。一是表现在生产的全球化，各大制药企业通过兼并、合作以及世界各地开办全资及合资企业，将生产网点扩展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开发上，开办独资、合资公司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在对成熟市场的进入上，例如欧洲制药公司进入日本市场，则更多地采用对当地企业收购兼并、或与之合作的方式。生产全球化也表现在制药行业全球分工和地区日益变得专业化，例如中国和印度逐渐成为世界原料生产基地，而一大批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将新药开发承包作为己任。二是表现在销售上，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与销售网络，扩大市场份额，尤其表现在新药的全球推广上，各大制药企业为了能在专利期内最大限度谋取利润，无不在新药一上市即向全球推广。互连网技术的兴起也为全球销售提供了便利。世界经济研究公司预测，B To B商务正在以每年99%的速度增长，至2001年全球贸易额将近5000亿美元，而到2003年达到13300亿美元，其中医药行业的B To B的贸易额增长速度是最高的，保持着50%的增长势头。

四、医药工业发展前景展望

我国医药工业已经连续20多年以超过18%的增幅高速增长，虽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WTO的影响，未来几年的成长存在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市场的开发，未来5年中预计仍将达到12%—13%的增长速度。

1. 药品市场潜力无限，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是药品市场需求增加的基本因素。2000年，我国人口有12.95亿，到2005年我国人口将达13.3亿，人口净增长将对医药产品产生新的需求。而且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60岁以上）人口接近1.3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0%，中国已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未来老年人口将以每年3%左右的幅度增长，预计到2005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总数将达到1.6亿，占总人口数的11.52%。目前，老年人口的药品消费已占药品总消费的50%以上，人口的老龄化进一步促进药品消费。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进一步促进了药品需求：我国1990年~2001年每年的人均用药水平分别为13、15、18、20、31、38、43、50、62、74、85、99元。对照发达国家，我国人均年药品消费依然较低。2000年世界人均药品消费为50美元，美国人均药品消费300美元，日本400美元，中等发达国家人均药品

消费为40至50美元，而我国人均不到10美元。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均用药水平将在逐年上升，中国药品市场将呈现出更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到2005年，中国的药品市场年销售收人将达到140亿美元，到2010年将达到240亿美元，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之后的世界第5大医药市场。

2. 药品消费结构变化，非处方药将进人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饮食的改善和人寿命的延长，许多疾病如肥胖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日益突出。这些疾病使得药品消耗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是心血管药物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而抗感染药物有下降的趋势；二是老年疾病及妇女儿童用药的市场研究开发速度加快，精神分裂症、老年记忆衰退、老年性痴呆症、糖尿病、艾滋病以及各种癌症等治疗领域，市场前景广阔。随着妇女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各国对妇女儿童保健越来越重视，因而妇女儿童用药的市场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三是预防药物、保健食品（也称功能性食品）的发展持续升温；四是天然药物（主要指植物药）热潮涌起。随着回归自然潮流的涌起，国际市场对天然药物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天然药物（主要指植物药）发展潜力大。天然药物是指从植物、动物等天然物质中提取活性成分，经加工精制而成的药物。“非典”过后，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越来越认识到：天然动植物中蕴藏着巨大的药物开发潜力。目前世界植物制品销售额近300亿美元，其中天然药物销售额已达160亿美元，并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世界许多国家在新药开发方面寄托于天然植物，竞相采用现代技术研究开发传统医药，抢占国际天然药物市场。今后，医学模式将从治疗型向预防型转变，天然药物将成为人们防病治病优先选择的药物。近年来世界各国已经把天然药物作为创制新药的重要研究对象，国际上申请植物药专利数迅猛上升，欧共体已对草药立法和审批，美国FDA已接受草药复方药物进行临床研究。随着近年天然药物有效成分提取、分离、纯化及结构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诸如膜分离技术和药物制剂新技术等的应用，使得天然药物将获得更为快速的增长。天然药物作为自植物的“绿色药品”已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随着全球崇尚自然热潮的兴起，天然药物必将成为21世纪最受欢迎的药物之一。

此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高大乔木、海洋生物、低等生物及鲜活动物也日益受到重视，成为药物研究的重点。可以预见，天然药物的种类和数量将会大幅度增加，市场份额明显扩大，直至与化学药物平分秋色，形成生物药、天然药、化学药三足鼎立之势。同时，精神、心理疾病治疗药物需求有增长趋势；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药品消费观念的转变，购买力将有较快增长；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以及疾病谱的变化，一些医疗领域尚缺乏高效、特效药物，从而为新药创制提供了机遇。

非处方药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非处方药（OTC）是指无需凭处方，可以在柜台上买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WHO对OTC定义十分明确：对那些无需医疗咨询的症状提供快有效的缓解手段，缓和对医疗服务日益增长的压力，向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们提供更多的保健机会。我国OTC的遴选标准：“应用安全、疗效确切、质量稳定、使用方便”，是从5600余个医药3500个中成药中遴选。

OTC市场开发的特点是新产品开发的费用较处方药低，OTC新产品据测算它的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2%—3%，比新药开发（约8%—10%）小很多；OTC药的注册登记非常简便，不必像处方药那样经过严格的审批和检验；OTC的市场周期要比处方药长的多，如德国拜乐的阿司匹林为例，其一上市就是非处方药，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可仍然还有市场；非处方药的品牌作用十分明显。

我国的OTC（非处方药物）市场是个极具发展潜力的、需求巨大的新兴药品市场。在我国，OTC市场需求增长速度最近几年都保持在35%以上。1990年我国非处方药市场销售额为2.5亿美元，2000年达到30亿美元，已成为世界非处方药市场销售额增长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10年，OTC市场将占到整个药品市场的50%以上。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处方药销售市场之一。

3．化学原料药仍是我国医药行业的优势品种，中成药有望成为我国医药工业新的增长点

我国化学原料药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化学原料药市场，中国的地位仅次于美国。目前，我国原料药产量一半出口到国外，已经成为化学原料药主要出口国之一。据统计，2002年，我国化学原料药产量达56.18万吨，增长11%左右，占世界化学原料药市场份额的22%；化学原料药出口额达29.88亿美元，增长28.07%，占化学药及医疗器械类商品同期出口总额的51.88%。我国化学原料药产量规模大、工艺水平高、劳动力成本低、价格低。再加上近几年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制药公司调整生产结构，逐步退出原料药生产领域，我国原料药优势显得更加突出。

中成药将成为未来持续的投资热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疑难怪病、现代文明病等，素以疗效显著的化学药显得力不从心；化学药的毒副作用、耐药性等也困扰着人们；人类回归大自然、崇尚天然药物的潮流正在形成。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上植物药的需求量迅速上升，进入21世纪，美国、欧洲等市场对中药需求量大幅度增加，为中药走出国门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尤其“非典”过后，中药更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目前，世界中成药年销售额为100亿—150亿美元，是1990年的2倍—3倍，全球有40亿人口使用传统医药，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0%。在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以及我国两岸三地，中草药普遍受到重视和欢迎。欧美国家也开始重视和使用中成药，最近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对中成药报批也作了一些修改，使之作为药品更易进入美国市场。

中成药将成为我国医药产业新的增长点，中药现代化是大势所趋，用高新技术进行传统中药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成为热点。

标准化程度是中药产业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建立科学的生产质量控制标准，直接关系到我国中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根据近期出台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我国将全面推动中药标准化进程。要点有：加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和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研究，全面提高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加强符合中药特点的科学、量化的中药质量控制技术研究，提高中药质量控制水平；大力推行和实施中药材生产、药品生产、药品非

临床研究、药品临床试验和药品经营等方面的质量规范，提高全行业标准化水平等等。中药标准对于保证中药产品安全稳定、质量可控具有重要意义。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中药农残、重金属含量控制、安全性评价、临床研究规范化、中药饮片质量标准、传统中成药品种质量标准的提升等工作已成为当前中药研究的热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多种学科的相互交叉融合，尤其是现代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向中药研究开发领域的不断渗透，给中药的研究开发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血清药理学、基因表达、分子探针等正被用于中药药理学研究中，计算机自动控制、图像分析处理等技术，为建立更灵敏、规范的中药药理模型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基因芯片、高通量筛选技术也在逐渐应用于中药新药开发，中药新药研发的技术方法越来越先进。现代制剂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传统中药剂型的改进，中药制剂已由过去的“丸、散、膏、丹”向控释、缓释、靶向等现代制剂发展；各种先进的提取、分离技术在中药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中药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基因芯片等新的技术、方法也已广泛应用。如色谱法、DNA分子遗传标记技术、指纹图谱的研究等。这些都为实施中药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条件保障。日本已为数百个药方建立起“中药指纹图谱”，对一种中成药应含有哪些有效成分、每种有效成分含量范围做出严格规定，使不同企业所产的同种中成药的成分、药效相对稳定。由于成分稳定、药效稳定、质量可控，日本中药的竞争力得到了提高。

伴随着中药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各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将广泛应用于中药研究、开发、生产的各个环节。中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正越来越紧密，传统中药正在向现代中药转变。

为保持中医药科技的优势，实现传统中药产业向现代中药产业的跨越，国家决定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制订和完善现代中药标准和规范，开发一批疗效确切的中药创新产品，突破一批中药研究开发和产业关键技术，以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现代中药产业，这被称为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体系，该体系的四大建设目标是：

• 到2010年，形成中药现代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及支撑条件平台，重点支持2～3家重点实验室、10个中药研究开发中心、20个中药国家工程和技术研究中心以及10个中药产业基地的建设。

• 建立和完善500种常用中药材、500种常用中药饮片的现代质量标准；完成国家基本用药目录、传统中成药的工艺条件优选评价和质量控制手段的提高工作；完成200种中药化学药对照品研究。

• 开发出100个中药新产品，完成100个传统中成药的二次开发；完成现有国家中成药标准品种整理；提高工作效率，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中药产品的出口份额，争取有2～3个中药品种进人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 推动形成约5年销售额达50亿元人民币以上，10年销售额达30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大幅度提高中药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

此外，医药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对中药产业产生重大影响。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完善药品价格政策。改进药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决定再次放宽部分高科技药品利润率的限

制，对国家一二类新药明确其自正式生产之日起前3年销售利润率从宽掌握的政策，特别是明确对一二三四五类新药在保护期结束后五年内仍可按新药分类利润率的定价做出了规定，进一步提高了新药获利能力，拓展我国医药企业通过新药开发成功获取利润的空间。作为拥有新药品种最多的中药产业，可以说这次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必将促使中药产业获利能力再上台阶，中药企业新产品开发和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也将得到较大的发挥。

4. 医药工业趋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集中度提高

未来几年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最明显的特征将是企业的并购重组。我国医药企业要面对国外跨国公司的挑战，发展规模化、集体化经营，加快有效的兼并、联合、建立联盟，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无论从国家政策和市场竞争需要，我国医药企业的并购重组已经势在必行。医药产业已进入典型的过剩经济时代，恶性竞争严重，企业利润率逐年下滑。医药产业的重新整合是加入WTO的国际背景和医药制度改革的国内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医药制造业全面推行GMP、GSP、GAP认证，提高对医药企业的要求，进一步推动了并购重组的进程。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规定，2004年7月1日起，凡未取得GMP认证的企业一律停产。在这种情况下，未能按时达到这一要求的制药企业，只能主动向大型制药企业靠拢；而要进入制药领域的投资者，则采取并购重组业内企业的进入方式。

可以预料，未来几年中我国医药行业的兼并重组将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随着重组的深入，中国将出现一批大型的、有竞争力的集团公司，而大量规模小、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被迫出局，中国医药市场“版图”也将重新划分。目前在国内医药行业中的购并案例越来越多，如三九集团通过购并，已经将23—30家企业逐步纳入旗下，包括三家上市公司三九医药、三九生化和胶带股份等。而太极集团控股桐君阁、西南药业的举措也向大型医药企业集团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华源集团有志于向药业发展，先后控股靖江葡萄糖厂、本溪第三制药厂等。这种优胜劣汰的结果将是医药企业数量逐年减少，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2001年我国已淘汰占制药企业总数10%左右的小型制药厂，2002年又淘汰了10%左右的小型制药厂。预计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市场重组、淘汰将有超过2500家的医药生产企业消失，并会出现一些产值超过100亿元的大型医药集团。

药品经营企业的重组将更为频繁。由于流通领域成为目前国内医药企业争夺市场的最直接途径，以上市公司为主导的医药企业纷纷进军流通领域，收购零售企业和药店，许多地方小型商业企业、药品批发站、药品供应站、药店、药房，都成为收购的对象，而由于存在规模和经营上的限制，这些小型医药经营企业也迫切需要合并重整来降低成本，获得生路。“十一五”期间，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和行业结构的调整，一大批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大公司、大集团将脱颖而出，它们通过联合、兼并、重组实现超常规的资源汇聚、资产增值和资本扩张，形成强大的实力，他们将通过联合、购并、重组、实现超常规的资源汇聚、资产增值和资本扩张，形成足以与国外大公司同台竞争的实力，并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大显身手。

医药工业属于高增长行业，预期的发展前景和利润空间相对较大，对资本流入有较强的吸引力。目前我国大多数制造业的产能、产品相对过剩，大量的游离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正在寻找投资场所。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药品市场的需求将持续较快增长，医药行业将是高增长行业，具有相对较大的预期利润空间，这对社会资本尤其是工业资本形成很大的吸引力。为尽快占领医药市场，外部资本的进入将越来越多地采取并购重组的形式。预计2005—2010年，随着医药行业进一步开放，全行业重组将进一步升级，外资和民营资本对国有医药企业的并购重组比重将明显上升。

5. 现代医药物流业将迅猛发展

近年来，我国医药商业行业的毛利一直在下降。目前国内药品批发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为12.6%，而平均费用率却达到12.5%。美国医药批发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为5%，平均费用率只有3%～4%，平均商业纯利润率达到1%～2%。我国现在从事药品批发的企业多而小，近17000家批发企业中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只有10家，超过50亿元的只有3—6家。而我国12万家零售企业中，最大连锁店年营业额也只有5亿元。这种物流费用居高不下、纯利润率低、批发企业数量多而小的状况将难以应对外资冲击，大力发展现代医药物流业已成大势所趋。

作为医药产业中一个全新的领域，医药物流在2002年得到了飞速发展，一批具有一定规模、较为完善的网络结构和现代管理水平的现代医药物流企业脱颖而出，一大批医药商业企业正在向着医药物流企业转变。2003年“非典”爆发，在突然的疫情面前，国内药企在应急反应能力和企业成熟度上的不足暴露无遗，引发了医药企业对药品流通资产的并购。面临2004年12月药品分销对外资完全开放的最后期限，国内医药物流商做大做强的脚步在加快。目前，通过合作、并购等方式在中心城市和农村开办连锁药店、建立配送中心已经成为医药连锁企业规模化发展的主要方式，而制药企业为控制销售终端，也向医药商业进行渗透。要做大医药产业，特别是药品流通网络已是上市公司并购的重要目标。

趋利流动是资本的最原始属性，上亿、数亿、十余亿巨额资金不断投入医药物流业。相关数据显示：长春市医药物流中心总投资1.2亿元；桐君阁的西部医药有限公司一期投资1.5亿元；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总投资2.21亿元；湖南医药物流园总投资3.6亿元；成都五块石药品配送中心均为企业投资修建，总投资7亿元；内蒙古国家西部开发项目，占地1500亩的“北方药都”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海南知名企业集团三叶与海南银森实业、天津浩地集团和香港满京华投资公司兴建的包括GSP医药物流商城在内的“三叶数码城”已被列为海口市政府的重点建设工程，共同斥资13亿元人民币。2003年12月，我国首家中外合资的医药批发企业——中国永裕新兴医药有限公司在北京开业，标志着首个合资药品分销公司诞生，预示着我国医药物流市场竞争局面更加激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经将现代物流建设、连锁经营、电子商务作为国家技术改造项目的支持重点。原国家经贸委1999年下发的《深化医药流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国家将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扶持建立5—10个面向国内外市场年流通销售额

达到50亿元左右的特大型医药流通企业集团；建立40个左右面向国内市场或国内区域性市场，年流通销售额达到20亿元左右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集团。对连锁经营企业，发展改革委、食品药品监管局等政府有关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大力支持医药零售企业实现连锁化的规模经营，鼓励药品零售企业进行集中。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出台，无疑为医药物流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目前，国家已批准了11个由国债贴息的医药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医药物流业将迎来良好的发展前景。

第十一章　食品加工业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在农产品摆脱长期短缺局面，实现总量平衡的历史性跨越的同时，农业生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农产品销售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农产品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实现转化增值，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对于满足和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含量，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食品加工业发展现状

食品行业是典型的防御性行业之一，其经营活动状态不受经济周期影响，需求对行业收入的影响弹性较小。近期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年增速保持在10%左右，行业正处于成长期。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我国食品工业有一个全世界最大和最有潜力的市场，12.6亿的现有人口，每年1000万以上的新增人口，而且这种增长态势还将持续，这是食品消费增长的直接因素。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小城镇的发展，加大了对食品的需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虽然恩格尔系数下降，但近期食品消费的绝对值是在不断增加。可见，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坏境下，消费的拉动是食品工业发展的最大动力。第二，食品工业是一个完全竞争性行业，有市场就会有投资，外资、民间资本已经并将进一步关注这一领域。第三，从现状看，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0.3—0.4∶1，与发达国家2—3∶1的比例有较大差距，说明我国的食品工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1. 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成就

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国食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食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部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首次上升到第一位。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1) 食品工业快速发展，产量大幅度提高

1978年全国食品工业总产值只有471.7亿元，到1997年增加到5317.9亿元，年均增长10.1%，大大高于改革开放前26年年均6.3%的增长速度。

各类产品生产均取得显著成效。1997年，我国植物油产量893.75万吨，为1978年

的5倍，肉类产量达5200万吨，为1978年的6.1倍；食糖产量为702.6万吨，为1978年的3.1倍；乳制品产量为56.48万吨，为1978年的12.1倍；软饮料产量高达1050万吨，为1978年的40倍；饮料酒产量达2834万吨，为1978年的11.5倍，其中，啤酒达1889万吨，为1978年的47倍。同时，各行业还形成了一批驰名品牌，受到消费者的信任，食品工业的发展适应了居民消费逐渐向小康水平发展的需要。

1998年开始，国家统计口径作了调整，年销售额低于500万元的企业，不在统计之列，故1998年的经济指标，与此前的指标难以比较。尽管如此，1998年按新口径统计的食品工业总产值为5566.27亿元，利税总额1158.28亿元，均超过上年。1999年1—7月份食品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也比1998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其中软饮料711.20万吨，同比增长25.3%；啤酒1260.25万吨、白酒27.99万吨，分别同比增长5.3%、5.4%；罐头75.41万吨，同比增长17.4%；乳制品35.54万吨，同比增长11.5%；机制糖662.44万吨，同比增长14.1%；原盐1601.25万吨，同比增长27.2%。食品工业的发展继续保持着良好的态势。

(2) 新产品、新品种不断增加，满足了人民日益变化的需求

各种方便食品如方便面、冷冻食品、各种熟肉、肠类制品、方便菜肴、方便汤料、调味品等都有了迅速发展，儿童食品、营养保健食品等也发展迅猛，从而满足了不同消费层对食品品种、质量、档次的不同需求，逐渐适应了食品消费行为个性化、多样化、时尚化的趋势，使居民食品消费水平大为提高。

(3) 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食品工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10多年来，食品工业科技成果获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的近700项，其中达国际先进水平的109项。此外，还有食品标准化成果681项，食品专利成果253项。这些新技术包括——特技术、冷冻技术、微波能技术、膜分离技术、萃取技术、挤压膨化及计算机技术等。改革开放以来，食品工业共投资几十亿美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使食品行业出现一批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1995年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主持评选出的中国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最优500家企业中，食品工业企业有78家，占15.6%。综合评价满100分的12家企业中，食品工业企业有4家，占三分之一。

(4) 食品工业的发展为国家积累资金、扩大出口创汇作出了贡献

1997年全国食品工业创造的利税总额达1157亿元，占同期全国工业利税总额的20%，其中税额达800多亿元，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6.9%。

(5) 食品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1997年食品工业总产值的构成中，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57.5%上升为61%，饮料制造业的比重由17.5%上升到22%，烟草加工业则由23.3%下降到17%。尽管目前食品加工业和制造业的比例仍然偏低，烟草加工业和饮料酒制造业的比例明显过高，但结构性调整的总趋势是好的，饮食产品中制成品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

2. 我国食品加工业的特征

食品加工业既是与农业部门联系最为密切的工业部门，也是农业增加附加值过程中向工业的自然延伸。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食品加工业在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基本发展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食品工业发展迅速，其名义总产值由1981年的690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8368.88亿元，而食品加工业一直是食品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1985年占食品工业总产出的62.09%，2000年占44.48%，1985年—2000年期间，食品加工业总产出的实际平均增长速度，比同期农业总产出和食品工业增长速度都高（表11－1）。

表11－1　　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平均增长速度　　单位：%

类别 年度	农　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工业	
	总产出	增加值	总产出	增加值	总产出	增加值
1985—2000	12.27	7.58	13.0	22.94	11.22	18.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摘要》(2001)，《中国食品工业年鉴》（历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 整理计算。

目前，我国产业发展的目标主要是增加劳动就业、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对产业地位判断的基准就应该按照就业人数、工业增加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以食品加工业在轻工业中的地位为例，我国食品加工业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食品加工业各项指标在轻工业20个行业中排名几乎都为第一名。具体参见表11－2。

表11－2　　2002年全国食品加工业在轻工业各行业中的地位

	绝对值（亿元）	占轻工业比重（%）	在轻工业中排序
工业总产值	4766.38	19.30	1
工业增加值	1106.99	16.80	1
利税总额	204.89	10.46	2
利润总额	114.98	11.65	2
产品销售收入	4505.02	19.40	1
从业人员人数（万人）	172.29	12.95	1

资料来源：《中国轻工业年鉴》(2003年)。

从2004年和2005年上半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试从以下几个层面探讨中国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情况。

(1) 行业规模分析

2004年1—12月全行业12244家企业共实现工业总产值8052.36亿元（现价，下同)，比去年同期的6125.8亿元增长31.45%。2005年的前两个月，全行业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分别为6311.22亿元、7085.47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3.6%、32.07%。

2005年的前3个月，全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分别为1878.68千人、1887.37千人、1908.67千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7.71%、6.93%、6.47%。

2004年12月末，全行业资产总计4843.17亿元、负债合计3042.72亿元，分别比去

年同期增加17.24%，14.56%。10、11月末，全行业的资产总计分别为4582.39亿元、4688.7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8.61%、17.21%；全行业的负债合计分别为2893.19亿元、2943.76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3%、13.67%。

（2）经济效益分析

2004年1—12月全行业累计实现产品销售收入7810.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04%。2005年的前两个月，行业累计实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6125.54亿元和6870.73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6.62%、35.81%。

全行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33.95亿元，比上年同期的169.55亿元增长37.98%。全行业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47.51亿元，比上年同期亏损的37.33亿元再亏损10.18亿元。全行业税金总额为129.0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67%。2005年的前两个月，行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171.13亿元、193.83亿元。

2005年的前3个月，全行业产值利税率分别为4.25%、4.27%、4.48%；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3.14%、62.78%、62.83%；2005年末，行业资金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产成品资金占用率分别为8.99%、3.12%、18.34%。

（3）行业效率分析

2004年的10、11、12三个月，人均工业总产值分别为335939.13元、375415.76元、421882.77元；行业人均销售收入分别为391266.2元、397132.26元、409235.56元；人均利润分别为9108.79元、10270.11元、12257.03元。

本质上讲，中国的食品加工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虽然中国是谷物、油菜籽、生果、蛋及肉全球产量最高的国家，但只有大约30%的初级食品得到加工，这与发达国家80%的初级食品都得到加工相去甚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见图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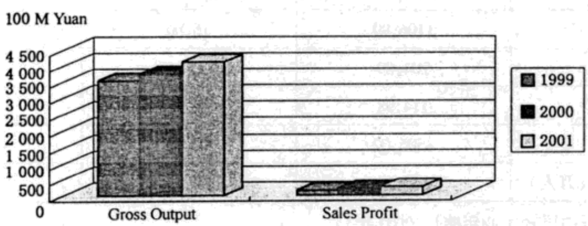


图11－1　中国食品加工业近3年的总产值与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

从原料食品供应看，中国在许多产品上存在价格优势。中国猪肉价格比国际市场低50%左右，牛肉低80%，羊肉低54%。而中国的果品产量占全球的13.4%，自1994年已跃居世界首位。苹果、梨、桃稳居世界第一；特产果树，如山楂、奇异果、枣等更是独占鳌头；核桃、板栗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二；柑橘排名第三。中国如此丰富的食品资源却疏于利用，例如苹果的加工能力不到产量的6%。据估计，单是果品加工市场就有几十亿港币。

消费者对加工食品的需求日趋旺盛。近年，食品安全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中国的食品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以致有机食品备受青睐。有机食品的生产加工按国际标准进行，劳动力的投入较多，对食品添加剂和能量投入的需求较少，因此有机食品加工在中国极有优势。虽然有机食品的价格普遍相对较高，但不论在内地还是在海外市场潜力都很巨大，尤其不可小觑内地市场。人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分重视食品的营养、卫生质量和加工工艺，越来越多消费者追捧有机食品。

除有机食品外，各类健康及具有预防、治疗疾病或有助于病后康复等调节身体功能的各种功能性食品，将得到较快发展并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此外，方便快捷性食品也日益走俏，目前，全世界方便食品的品种已超过了1.5万种，有向主流食品发展的趋势。冷冻食品向小包装、多品种、调理简单方便的家庭化方向发展。

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中国政府十分鼓励外商投资食品加工业。虽然还没有具体的针对该行业的优惠措施，但在一些农产品丰富的地区会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盛产多种水果的中国西部宁夏规定，投资兴办水果加工项目，实行“减7免3”的税收优惠。对触觉敏锐的投资者来说，中国食品加工业的不成熟正隐含无限的商机。

3. 我国食品加工业的结构分析

(1) 地区结构分析

为了揭示中国食品加工业在地区间的分布情况，我们将选取2004年的分地区数据来描述这种特征。

在全国31个省市中，行业工业总产值最高省市的山东省为2140.88亿元，为全行业的26.59%；五省市的另外四个省市及其情况分别为广东省640.2亿元，河南省638.89亿元，江苏省610.36亿元，河北省388.27亿元，五省市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4418.6亿元，为全行业的54.87%；其中，最高省市占五省市的比重为48.45%。

在全国31个省市中，行业资产总计最高省市是山东省，为1071.25亿元，为全行业的22.12%；五省市的另外四个省市及其情况分别为广东省423.39亿元，江苏省320.72亿元，河南省280.24亿元，广西地区276.35亿元，五省市累计实现资产总计2371.95亿元，为全行业的48.98%；其中，最高省市占五省市的比重为45.16%。

在全国31个省市中，行业产品销售收入最高省市的山东省为2057.52亿元，为全行业的26.34%；五省市的另外4个省市及其情况分别为河南省648.53亿元，广东省641.46亿元，江苏省585.82亿元，河北省382.65亿元，五省市累计实现产品销售收入4315.98亿元，为全行业的55.26%；其中，最高省市占五省市的比重为47.67%。

在全国31个省市中，行业利润总额最高省市的山东省为87.62亿元，为全行业的37.45%；五省市的另外4个省市及其情况分别为河南省26.41亿元，广西地区22.9亿元，河北省13.57亿元，吉林省10.46亿元，五省市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60.96亿元，为全行业的68.8%；其中，最高省市占五省市的比重为54.43%。

在全国31个省市中，行业人均销售收入最高省市的上海市为632931.8元，为全行业的154.66%；五省市的另外4个省市及其情况分别为江苏省578039元，广东省575405.35元，河北省572222.84元，天津市490646.13元，五省市平均人均销售收入为

569849.02元，为全行业的139.25%；其中，最高省市为五省市的111.07%。

(2) 所有制结构分析

全行业7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520.07亿元，占全行业的6.46%；股份制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587.64亿元，占全行业的7.3%。

全行业7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资产总计483.67亿元，占全行业的9.99%；股份制企业资产总计552.8亿元，占全行业的11.41%。

全行业7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483.74亿元，占全行业的6.19%；股份制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573.11亿元，占全行业的7.34%。

全行业7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1亿元，占全行业的1.97%；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04亿元，占全行业的7.71%。

全行业7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人均销售收入237050.46亿元，占全行业的57.93%；股份制企业人均销售收入424217.25亿元，占全行业的103.66%。

(3) 企业结构分析

全行业三种类型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分别为909.21亿元、2218.76亿元、4924.39亿元，占行业的百分比分别为11.29%、27.55%、61.15%。到12月末为止，三种类型的企业资产总计分别为766.05亿元、1543.76亿元、2533.36亿元，占行业的百分比分别为15.82%、31.87%、52.31%。

全行业三种类型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961.45亿元、2174.03亿元、4675.49亿元，占行业的百分比分别为12.31%、27.83%、59.86%。利润，总额分别为36.15亿元、86.03亿元、111.77亿元，占行业的百分比分别为15.45%、36.77%、47.78%。

全行业三种类型企业人均销售收入分别为418163.95元、434747.13元、396670.41元，分别为全行业人均销售收入的102.18%、106.23%、96.93%。

产品销售收入前10位的企业共实现产品销售收入680.41亿元，占全行业的8.71%；产品销售收入最高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40.02亿元，占全行业的1.79%，为前10位企业的20.58%。前10位企业中最高企业利润总额分别为27.5亿元、7.15亿元，分别为全行业的11.76%、3.05%。

产品销售收入前10位的企业，最高企业人均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1327870.85元、1019066.08元，分别为全行业的324.48%、249.02%。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53676.67元、52013.9元，分别为全行业的437.93%、424.36%。

二、食品加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食品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在0.3:1—0.4:1之间，其中西部省区仅为0.18:1，远低于发达国家2:1—3:1的水平。我国粮食、油料、水果、豆类、肉类、蛋类、水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加工程度很低。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后加工能力都在70%以上，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的90%，而我国仅为25%左右。中国食品加工业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原料与加工需求矛盾突出，制约着加工业的大发展。

一是农产品品质不能满足加工需要，缺乏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需要的专用、优质原料。二是原料生产分散，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使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规模受到影响。三是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履行合同的信用程度差，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缺乏稳定可靠的原料基地保障。

(2) 科技基础薄弱，企业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

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设备和技术，80%处于世界70年代—80年代的水平，约15%居90年代水平，只有5%左右达到目前国际先进水平。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有的甚至还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生产阶段，劳动生产率低下。多数企业缺乏产品自主开发能力，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程度低。在技术引进过程中重视硬件，忽视软件，配套性差，自我创新不够，影响了国产化程度的提高。企业技术人才缺乏，在全国食品加工企业职工中，大中专毕业生只占1.5%左右。

(3) 投资不足，影响着加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不足。“九五”期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1167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1%；食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571亿元，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2.8%，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另外，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不足，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影响了社会资本投入农产品加工业的热情。

(4) 宏观调控乏力，企业布局和规模结构不尽合理。

农产品加工企业缺乏必要的宏观指导和信息服务，一些产品结构滞后于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些行业在低水平上盲目扩张，高档产品生产能力不足，低档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在布局上，70%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原料和市场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企业很少；乡镇企业接近原料产地，与农业关系密切，但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只占其工业增加值的不到三分之一。

(5) 管理混乱，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从原料生产到加工过程管理分散，尚未形成完整有效的管理体系，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农兽药残留、土壤重金属污染、畜禽疫病、使用违法禁用药物、添加剂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产品质量和消费的安全，也是我国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主要障碍。

(6) 企业的整体素质不高。

加工水平和技术装备与国外先进水平比有较大差距，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管理水平较低。产业集中度不高，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不多，年销售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仅占4%左右。

(7) 产加销联结机制不完善。

多数企业和农户之间是买断关系。订单农业履约率较低，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四分之一，农民受益有限。

(8) 加工专用农产品原料不足。

目前在全国还没有形成专业化、标准化、优质化的大宗农产品原料基地体系。原料基地和加工企业、加工企业和销售市场之间还没有形成布局合理、畅通便捷的储藏运输网络。原料生产的品种品质结构不适应加工要求，分散生产与集中加工的矛盾突出。区域优势发挥不充分，发展水平低与结构趋同并存。原料保障能力差，成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9) 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目前农产品加工业税赋重、贷款难、财政支持少等问题较为普遍。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进项税抵扣率为13%，销项税率为17%，还有4个百分点不能抵扣。企业一次性收购原料，占用资金时间长，一般商业贷款难以满足。很多农产品加工企业为农户提供资金、技术和各种服务，但得不到财政等方面的扶持。

(10) 农产品加工制品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

一些产品的农药、兽药残留超标，个别地方畜牧业病疫突出，ISO9000、ISO14000等质量标准体系和GMP、HACCP的认证率较低，且没有建立有效的质量可追溯制度，难与国际接轨，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加工制品的出口。

(11) 农产品加工业管理体制尚需进一步理顺。

由于部门多头管理、认识不一，发展规划难以统一，资金和项目难以集中使用，保障体系难以建立，一些地区存在低水平重复和无序发展现象。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整体素质和竞争实力，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高度，认真加以研究，切实予以解决。

三、食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可分为竞争力来源（原因）指标和状态（结果）性指标两类。所谓竞争力来源类指标是指用来分析获得国际竞争力来源的相关指标，竞争力来源类指标又被称为分析性指标。所谓状态性指标则是指一个国家某个产业或全部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现状，它说明国际竞争力的结果的有关指标。由于本文试图对我国食品加工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因此状态性指标的界定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在随后的研究中，按照状态性指标类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资源利用效率、生产效率、劳动力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水平。

第一，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都与自身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有关。尤其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和信息技术不断普及的今天，以科技、信息为基础的高级资源更是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们认为，考量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在指标设计上将从现有的产业增加值状况和R&D情况两个角度展开研究。1. 研究开发（R&D）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高等要素的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其中包括企业投资和社会投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或产业，一般研究开发费用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重都相当高。有关R&D的指标主要有R&D人员比率，R&D经费比率，技术开发经费比率，消化吸收经费比率，这些指标对产业技术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决定了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2. 产业的增加值指标实际是利润指标或

市场占有指标的替代物，它可以比较准确地说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态。一般来讲在产业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将国内环节的增加值率指标与国外某一环节或其他环节的增殖率指标相比较，就可以体现某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并把握它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次。

第二，生产效率。与生产效率有关的指标主要有：总生产率变化率、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源耗量指标等。与资源利用效率不同的是，此处的生产效率主要考察的是劳动的生产效率状况，而不是资本的产出效率。为简化问题，本文将采用劳动生产率进行竞争力的定位。

第三，劳动力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人们通常都把劳动力看作是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并将其视为培育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突破点。但是，劳动力成本的绝对状况只是决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方面，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成本与生产效率高低的相对程度以及劳动力的素质状况。因此，为了能够准确界定出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程度，本文将采用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来进行研究，同时辅之于相关的劳动力教育构成情况说明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

最后，规模经济水平。对于工业产业而言，规模经济状况是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又一重要标准。它既是产业资源利用效率的综合性体现，也是产业技术利用能力的表现。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产业的规模经济程度尤其重要。食品加工业属于轻工业，相关产品在生产上是否具有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的程度与国际上的差异是反映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素质的关键因素。

1. 资源利用效率定位

在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方面，由于近年来农业资源条件日益恶化，食品工业的低效经营，食品加工业发展所需要金融、知识、技术等条件贫乏等，使得我国食品加工业的资源没有竞争优势。农业资源的约束，使食品加工业的价值链难以中断低水平的连续。在技术资源方面，食品加工业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投入不足，科技贡献率低，不超过40%，基本上呈现出粗放型增长的特点。与日本相比较，食品加工业的R&D经费投入比重不到0.1%，不及最低水平的八分之一。具体参见表11－3、11－4。

表11－3　　R&D经费投入强度的行业分布

≤0.1%	0.1%—0.5%	0.5%—1%	1%—2%
食品加工业	饮料制造业	纺织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食品制造业	烟草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
羽绒及其制品业	服装业	塑料制品业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木材加工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印刷业	金属制品业		
文教体育用品业	专业设备制造业		

资料来源：高建著：《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注：食品制造业包括糕点糖果、乳制品、罐头食品、发酵和调味品制造业。

表 11－4　　日本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 R&D 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年　份	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	0.841	1.043	1.136	1.286	1.261	1.317

资料来源：同上，第 50 页。

进一步分析，如果用食品加工业的增加值情况同先进国家同行业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我国食品加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一般来讲，工业增加值的情况是与生产技术水平相联系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要高于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增加值率是趋于上升的。但是，在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由于技术创新的缺乏，工业增加值率是十分低下的。在进行国际比较的国家中，我国食品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1995 年我国食品工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的比例为 0.09，同期巴西为 0.22，是我国的 2 倍多；美国、日本和法国该指标均大于 1，是我国的 12 倍以上。因此，我国的食品工业（包括食品加工业）仍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这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食品工业（包括食品加工业）发展潜力非常大。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食品工业技术含量以及由此决定的加工深度不够。这就决定了如果不能实现产业价值链技术环节的创新，我国食品加工业短期内很难进入资本推动或技术推动阶段，产业竞争力也就难以提高。具体见表 11－5。

表 11－5　　食品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比例的国际比较

	1980	1990	1995	1997	2000
巴　西	0.39	/	0.2	/	/
日　本	0.66	/	1.13	1.22	/
法　国	0.79	/	1.35	1.25	/
美　国	0.80	/	1.05	1.16	/
中　国	0.14	0.12	0.09	0.17	0.19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报告》（历年）、《食品工业年鉴》（历年）整理计算而得。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我国食品加工业在创出性资源方面却实现了较大的进展。由于食品加工业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食品加工业在资本化方面已开始重视利用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成果，截止到 2000 年底，我国食品行业共有 54 家上市公司，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4.9%；筹资额达到了 805.84 亿元，占上市公司筹资总额的 19.3%；这充分反映了我国食品行业在资本市场上已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

2. 生产效率定位

我国食品加工业的生产效率的总体水平，同国际水平有着一定的差距。为了简化比较的内容，这里利用劳动生产率指标进行国际比较。

为了能够较为清楚地揭示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从两个

方面加以比较，一是食品加工业本身的国别比较；二是不同制造和加工行业的国别比较。

可以肯定的说，我国食品加工业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一般来说，差距较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而差距较大的则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加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与资本密集程度直接相关的，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生产率会较高，而资本密集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就相对较低。我国食品加工业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相对稀缺，因而与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是显而易见的。从表11－6可以看到我国食品加工业2001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4.55万元人民币，即使按照1:8的汇率折算为美元，可折合为3.7万美元。但遗憾的是，即使与70年代末美国、日本、前德国、法国食品的劳力生产率数据比较，我国食品加工业依旧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些情况说明，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是很低的，甚至还无法赶上这些国家70年代末的水平，恐怕只能相当于这些国家50年代的水平。由此可见，我国食品加工业要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在时间上晚了近半个世纪。从表11－7，同样可以发现，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劳动力生产率较发达国家比处于很低的水平，与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有一定的差距。

表11－6　　食品加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国　别	年　份	从业（万人）	产值（亿本币）	劳动生产率（折合为美元）
美　国	1977	158.1	2021	127830
日　本	1978	120.6	216260	85173
前德国	1979	48.9	1331	148501
法　国	1979	57.6	2933	119685
中　国	2001	167	4098	3700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报告》（历年）、《食品工业年鉴》（历年）整理计算而得。

表 11－7　中国加工制造业务劳动生产率与若干先进国家的差距　单位：%

	中国 1998 年加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以下国家之比					
	美国（1995 年）	日本（1993 年）	德国（1994 年）	韩国（1994 年）	马来西亚（1995 年）	印尼（1996 年）
加工制造业	3.7	3.5	4.2	6.2	21.0	38.6
食　品	3.6	4.9	4.8	7.3	18.8	67.8
饮　料	2.7	3.1	3.5	3.3	15.5	38.1
烟　草	4.5	8.8	4.2	7.8	213.7	219.5
纺　织	4.5	3.8	3.9	6.0	14.0	33.2
服　装	4.0	8.2	4.8	9.9	42.7	78.7
皮革制品	6.9	5.4	5.4	6.4	38.4	76.8
木材制品	5.0	4.3	3.8	7.3	29.5	44.4
化学工业	1.7	1.4	3.3	3.7	6.5	20.2
石油加工	2.9	1.8	0.9	1.4	4.3	114.8
钢　铁	3.7	2.4	5.7	3.7	25.7	3.6
运输设备	3.5	3.0	4.9	6.0	16.3	13.0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8、1999）、《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工业年鉴》（1998）有关资料整理。

3. 劳动力优势定位

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在总量上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我国食品加工业劳动力同样具有这一优势。但是，一个产业劳动力在量上的优势，并不说明该产业在劳动力方面具有了竞争优势。一般说来，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产业劳动力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从理论上说，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与要素投入的密集度相联系，资本密集度高，劳动报酬的比重一般就低；劳动密集度高，劳动报酬比值也相应高。但从国际比较看，这一内在联系为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差别所取代。在单位劳动成本相同的条件下，这一指标与劳动生产率指标是相反的，以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高，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就低；反之也是。而在单位劳动成本不同的情况下，该指标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方向就发生变化，它反映了总劳动在价值形态上的投入产出率。与先进工业国家相比，我国加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而单位劳动成本也低。因此，总的劳动报酬在整个增加值中的比重如何，成为关系总体竞争力比较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相对较低，说明劳动成本低的作用大于劳动生产率低的作用，总体劳动的投入产出率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如果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相对较高，则说明劳动生产率低的影响超过了劳动成本低的影响，总体劳动的投入产出率也处于劣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食品工业主要行业的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普遍较低。从表 11－8 中可以看出，食品加工业的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为 27.4%，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为 34.1%、30.1%和 36.4%；我国饮料制造业的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为 25.1%，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为 41.3%、32.1%和 27.1%；与此相类似，中国食品制造业和烟草加工业的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总体上也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表明我国食品工业（包括食品加工业）的所有行业的劳动成本方面，相对发达国家具有竞争力优势。但是，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除了饮料制造业还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外，其他行业不具备竞争优势。

表 11－8　　中国食品工业中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重的国际比较　　单位：%

中国 1999 年	美国 1995 年	日本 1993 年	德国 1994 年	巴西 1997 年	印尼 1996 年	
制造业	34.4	31.9	36.0	44.2	26.9	20.3
食品加工业	27.4	34.1	30.1	36.3	20.5	21.6
食品制造业	31.0	35.8	32.6	42.3	22.3	19.9
饮料制造业	25.1	41.3	32.1	27.1	19.8	21.1
烟草加工业	41.5	40.9	39.0	44.1	30.1	23.4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报告》（历年）、《食品工业年鉴》（历年）整理计算而得。

从我国食品加工业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情况看，虽然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我国食品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这种比较优势也在逐步减弱，比如目前一些发达的沿海城市商务成本急速提高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在这种趋势下，如果要保持我国食品加工业对发达国家的比较竞争优势，就需要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的质量和效率。就我国食品加工业劳动力的素质来看，在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对组织的从属感和忠诚度、对工作的热情等方面，依然比较落后。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使得劳动力在量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从表 11－9 可以看出，从 1985 年到 1995 年工人和学生比重下降了 8.5 个百分点，工程技术人员比重上升了 4.9 个百分点，管理人员上升 1.5 个百分点，服务人员上升了 2.1 个百分点，技术水平和管理素质有所提高。从表 11－10 可知，食品加工业整体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都不高，中专以上文化者不到 10%，初级职称以上者不到 11%，可见食品加工业劳动力主要是由高中以下没有技术职称的非技术人员构成。

表 11－9　　我国食品加工业人员构成　　单位：%

年　份	工人和学生	工人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其他人员
1985 年	79.1	1.2	11.2	8.5
1995 年	70.6	6.1	12.7	10.6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 年工业普查资料》（第 3 册，全部工业企业）（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5 年工业普查资料》（综合行业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年）整理。注：1985 年为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

表 11－10　　1995 年我国食品加工人员的文化及职称情况构成　　单位：%

文化程度					职称		
大专以上	中专	技工	高中	初中以下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4.0	5.8	4.9	25.8	59.5	0.32	2.35	8.1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5 年工业普查资料》(综合行业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年）整理。

4. 生产规模定位

规模是国际同类产业之间竞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生产规模和产业内部组织的规模，它们既是参与竞争的条件，也是阻碍竞争对手参与竞争的屏障。从总体规模的角度分析，我国食品工业的平均生产规模普遍偏小。从表 11－11 可以看出，我国现有食品企业总体规模小，生产集中度尚不够高。如国内粮油加工企业合理的经济规模为面粉加工 400—600 吨/日、稻谷加工 200—400 吨/日，而我国 78.9% 的面粉企业为日处理小麦 50—100 吨的生产规模，80% 的稻谷加工设备为日处理 50 吨以下的小机组；啤酒生产企业合理经济规模为 20 万吨/年，而我国啤酒生产企业的平均规模不到 4 万吨/年；浓缩苹果汁企业国际先进水平为 5 万吨/年以上，而我国浓缩苹果汁厂平均规模不到 1 万吨/年；制糖行业平均日处理甘蔗约为 1500 吨左右，大大低于 6000 吨的国际平均日处理量。

表 11－11　　中国食品工业重要项目生产规模与合理规模的比较

	中　国	合理生产规模
面粉加工	50—100 吨/日	400—600 吨/日
稻谷加工	50 吨/日	200—400 吨/日
啤　酒	4 万吨/年	20 万吨/年
苹果汁	4 万吨/年	20 万吨/年
制糖（处理甘蔗）	1500 万吨/日	6000 吨/日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从国外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实践可以清楚地知道，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水平与农业产业化的程度直接相关。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还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不能满足我国 2 亿左右农户的要求。据农业部 1997 年 6 月—10 月的调查统计，全国有农业产业化组织 11824 个，共带动 1995 个农户，仅占全国 19419 个农户的 10.27%，而且大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偏小，达不到应有的经济规模。比如，全国 760 家乳品加工厂中，有半数以上日处理鲜奶能力低于 20 吨，加工能力超过 100 吨的仅占 3%，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档次质量，形成规模效益，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即使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如黑龙江省华润金玉实业公司是欧亚非三洲最大的酒精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达 22 万吨，年创产值 18 亿元，利税 4 亿元；河南莲花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味精生产基地和世界单厂生产能力最大的味精企业，1998 年销售收入 21 亿元，实现利税 2.6 亿元，但与国

外企业相比就相形见绌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 1997 年利润就达 412.9 亿美元，相当于 853 个金玉，1313 个莲花。

此外，在市场秩序方面，由于食品加工业市场化的滞后，目前尚未形成有利于工业食品市场化和推动食品加工业升级的市场秩序。在企业制度方面，多数食品企业包括食品加工企业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其战略水平和组织水平难以同世界同类企业相提并论；在相关产业方面，由于食品加工业自身制度性改造的缓慢，尽管金融、保险、信息、运输等相关产业的水平在改革中迅速提高，但食品加工业同这些相关产业的有机联系和协同效应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市场需求方面，我国的工业食品市场规模、消费者对产品质和量的要求水平和消费者素质等，正在迅速提高，这是我国食品加工业可能提高竞争力的少数优势之一。但是，我国食品加工业及工业食品的不规范和缺乏秩序性，使得来自市场的发展动力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又使产业的这一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在政府工作人员方面，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食品加工业部门的运作和管理机制，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正在发生着有利于提高食品加工业竞争力的变化。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政府运行机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官僚主义造成的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法制观念贫乏以及分配和监督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腐败现象仍很严重，又是阻碍食品加工产业提高竞争力的因素。在创业者方面，代表食品加工业发展方向的富于冒险和革新精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创业者的数量和素质同先进国家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这方面不具有竞争优势；在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方面，我国食品加工业总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知识、技能的管理者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具备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能力的技术专家的数量较少，在这方面也不具备竞争优势；在外部因素方面，我国已加入 WTO，这是全面提高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好机会，如果把握好这一机会，将会形成我国食品加工业在国际竞争优势方面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食品加工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是并不是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能性。例如，通过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食品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有效地参与世界食品工业资源配置战略的形成等，可以改变农产品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局面；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机构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企业的改革，促进现代食品加工业创业者、管理者和技术专家的成长等。当然，培育食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上述途径是相互联系的系统。从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实际出发，必须认识到，形成这样的系统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

四、食品加工业发展趋势

1. 世界食品加工的变化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食品加工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些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水产品和海产品的加工急剧增加

近20多年来，随着世界畜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世界肉类加工急剧增加。肉类的生产将受世界经济和饲料供求状况的影响，其发展速度不会太快。近几年，肉类产品供过于求，贸易停滞，预计今后也不会出现根本好转。蛋类的生产近年来增加也不显著，惟有水产品、海产品今后仍将是世界动物类食品中的畅销货。

（2）蔬菜和水果加工制品正成为重要食品

目前，国际市场需求量大、发展快的水果主要有柑橘、橙、苹果、香蕉、葡萄等原品和加工制品等；蔬菜主要有青刀豆、西红柿、洋葱、食用菌等原品和加工制品。主要的问题是加工、储藏、运输、保鲜、包装等跟不上。

（3）饮料趋向多样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三大饮料的贸易增长缓慢，1970年—1998年世界咖啡贸易量仅增加60万吨，年增长率为1.1%，茶叶增加30万吨，年增长率为2.1%，而1998年可可的贸易量几乎与1970年相同，基本上没有增加。但世界饮料的品种却向多样化发展，速溶咖啡、袋泡茶、冰茶、果味饮料茶、保健茶、特种茶等的出现，标志着世界三大饮料的传统消费习惯正逐渐被新的流行趋势替代。90年代以后，国际市场上果汁、保健型饮料畅销，需求量不断扩大，尤其是橙汁、苹果汁和具有保健功能的天然饮料将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4）酒类发展十分可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上以啤酒、威士忌、葡萄酒等酒精含量低的品种增长速度最为显著。世界酒类市场出现一种新情况，一方面传统的酒消费国（包括法国、意大利等），消费量有所下降，而另一方面某些非传统消费国酒的进口大幅增加。

（5）加工食品更加严格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加工食品发展很快。这里所指的加工食品不是广义的概念，而是特指粮食制品、肉制品、乳制品、各种罐头、干脆果品、速冻蔬菜和脱水蔬菜、糕点、糖果、调味品等。国外对加工食品的销售要求和习惯是：各种食品要求保证质量，合乎卫生规定，对食品中含铅、含锌以及农药残留物的限制，各国都有严格的要求。目前，国际市场上加工食品更趋于现成、方便、多样化、规格化、标准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对食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因食品卫生不合格而引发的贸易争端时有发生，如最近韩国、日本发生的牲畜口蹄疫，影响之大，损失之惨在世界食品贸易中也不多见。

2. 我国食品加工业发展趋势

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专家预测，今后食品工业发展的五大趋势将是方便化、工程化、功能化、专用化和国际化。

（1）方便化

发展方便食品是优化食品工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提高居民食品制成品消费水平的重要措施，将进一步使城乡居民从繁琐的炊事劳动中解放出来。

①主食方便食品。主要是米面制品如方便面、方便米饭、方便粥和馒头、面包、饼

干以及带馅米面食品。以方便面为例，1996年的产量为150.7万吨，增长率为12.4%；1997年产量为158.67万吨，仅比上年增长5.3%，增长速度趋缓。但就总体而言，方便面生产尚处于发展阶段。我国方便面总产量已列世界各国之最，但按人均计算仅列第9位。目前方便面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城镇居民。就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不及城市的三分之一。随着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方便面市场前景乐观。促进馒头等中国传统特色的米、面食品的方便化，开发适合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各种方便食品将大有可为。

②副食方便食品。主要是各种畜肉、禽肉、蛋、菜的熟食制品，或经过预处理的半成品。目前，全国的熟肉、禽肉制品产量只有300多万吨，仅占肉类总产量的6%，与发达国家熟肉制品占50%以上的水平相距甚远。如果我们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仅肉类制品一项就可增值2500亿元。

③速冻食品。速冻食品制造业是最近几年食品工业中发展最快的新兴行业。在大城市里，速冻食品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日三餐的组成部分。速冻食品发展的重点应放到方便消费的主食类、肉食等菜肴类产品上来。除现有的速冻饺子等产品外，速冻面条、速冻炒饭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经过膨化涂裹、油炸、速冻的牛排、炸鸡腿、酥肉、面拖虾、面拖鱼等产品及经过成形、涂裹、油炸、速冻的肉饼、土豆饼、米饭饼、面条饼等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微波系列套餐、速冻烘焙食品和冷冻面团以及速冻蔬菜都是速冻食品开发的重要领域。冷冻食品的发展要重视与食堂、餐馆和学生午餐紧密结合，扩大集团消费的份额。

④传统食品的方便化。中国传统食品是千百年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的积淀，每个产品都是几代人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有着独特的风味，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但是，它操作复杂、费工费时、生产量小、保鲜期短。要从原料的品种、品质抓起，采用科学、先进、合理的工艺技术，按一定的规模进行标准化生产，用现代的保鲜、包装技术，延长保存期，方便群众消费。

(2) 工程化

工程食品是20世纪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一类新型食品概念，工程食品的基本特点是：一是根据营养平衡的原则，对原料的成分进行合理配比，必要时强化某些营养素，使产品符合人体对营养的需求；二是应用现代技术，进行工业化生产，严格执行各项标准，保证产品规格一致，质量安全卫生可靠；三是通过综合利用原料和采用优良的代用品，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程食品除采用先进技术生产各种原配料，如从低值原料或植物性原料中提取优质蛋白质，从天然植物中提取色素，从天然资源或用化学方法制造食品添加剂等外，其涉及的主要领域还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营养强化食品。在食品加工中，补充某些原料中缺乏的营养素或特殊成分，使消费者获得营养比较完全的食品，减少营养缺乏症及其并发症。美国在1915年出现了商品化碘盐；1936年在牛奶和人造奶油中强化维生素A和维生素D，消灭了幼儿佝偻病；1941年立法必须在白面和面包中，强化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尼克酸和铁，消

灭了癞皮病。20世纪40年代以后，加拿大、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纷纷对食品进行营养强化。我国碘盐推广，牛奶中添加维生素A和维生素D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主食营养强化只是星星点点，远未达到产业化水平。

其次是模拟仿真食品。即采用性质相似，但价格低廉的原料，模拟某些价格昂贵食品的色香味形而仿制成的食品。如仿螃蟹腿和仿对虾等，口味与形态同真品十分相像，而价格却便宜得多。

另外，针对预防某些疾病开发的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也属工程食品，如加有膳食纤维，低热值甜味剂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功能因子制成的食品。

随着越来越成熟的生物技术、真空技术、挤压技术、膜分离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超微粉碎技术、微胶硝技术、微波技术、冷杀菌技术、无菌包装等高新技术在食品工业中的推广应用，必然会使工程食品推出更多新配料、新产品。

(3) 功能化

这里说的功能化，是指保健（功能）食品的生产将成为21世纪食品工业的重点。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饮食与健康的关系，拥有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人们花钱买健康成为可能；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和精神压力的加重，需要保健食品来提高工作的效率和生存质量；科技的进步使食品企业有能力生产各种保健食品，满足市场需要。

我国1996年制定的《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和1997年制定的《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的颁布实施，使我国保健食品生产与流通有法可依，管理力度大为加强。但实施3年来也存在一些问题：现有保健品档次不高，基本上都属第二代产品；评审制度不完善，3年中已批了2000多个产品；雷同现象比较严重，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产品集中在免疫调节、抗疲劳、调节血脂方面；形式单调、价格过高、包装过于豪华、夸大宣传、自败声誉等。

保健食品的开发要根据不同人群、不同生理条件的不同营养与健康需求，如婴幼儿、青少年、老年人、孕妇以及营养素失衡人群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配方设计，使其既具备人体生理调节功能，又有营养功能和感官功能，轻松享受美味与健康。

从目前市场销售的情况看，比较热销的保健品有不饱和脂肪酸、补钙、减肥、美容、补血类等产品。未来其他各类系列保健品，如肽系列、蜂王浆、蜂蜜系列、菌类多糖系列、有益菌系列、低聚糖系列、螺旋藻系列、海洋生物系列以及中草药系列等都将成为时尚。"药食同源"是我国保健食品的基本优势，但中成药方不能用来开发保健食品。要加强对保健食品功效成分的研究开发，这些功能成分主要有：多糖类，如膳食纤维、香茹多糖等；功能性甜味料（剂）类，如单糖、低聚糖、多元糖醇等；功能性油脂（脂肪酸）类，如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等；维生素类，如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C等；肽与蛋白质类，如谷胱甘肽、免疫球蛋白等；活性菌类，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微量元素类，如硒、锌等；其他还有二十八烷醇、植物甾醇、皂甙等。通过对功能因子的提取、合成、分析、检测、功能评价、分离重组等工作，加上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我国保健食品将从当今的第二代产品向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三代产品提升，

以满足国内外的需求。

(4) 专用化

是指食品工业生产用的各种基础原料要做到专用化，改变过去那种不管原料是否符合加工要求，有什么就用什么的落后状况。发展食品专用原料，对提高食品品质至关重要，也是衡量食品工业水平的一个标志。

一般来说，食品生产用基础原料的专用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由农业生产组织选育、栽培适合食品生产用的优良的谷类、果蔬、畜禽和水产品等专用品种。如生产不同类型的葡萄酒要有不同品种的酿酒专用葡萄；生产优质果汁饮料，首先要栽培适合加工的专用果树，那些用作鲜食的果品，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优质的果汁饮料。因此，未来农业为食品工业提供的原料要做到基地化、规格化、标准化，实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二是通过食品加工，为食品生产提供各种专用原料。国外专用面粉品种不断增加，日本有60多种，英国有70多种，美国有100多种投放市场。我国目前只有10多种，远不能满足需求。食品加工用的各种专用油脂，日本有400多种，中国台湾也有100多种，而我们只有几种，差距较大。生产各种奶糖、巧克力所需的专用牛奶几乎没有。凡此种种，既是差距，也是潜力所在。

(5) 国际化

世界食品工业以21800亿美元的营业额高居世界工业榜首。其中的20%被100家左右的跨国大公司所占有，它们以其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上的优势，向着经营规模化、产品标准化、管理规范化、集贸、科、工、农为一体的产业化和系列化的方向发展，并向世界各地扩张。改革开放的中国食品工业，无须回避食品工业国际化的大趋势，世界著名的食品生产跨国公司已经抢滩中国市场。无论从资金、技术、管理还是产品开发等方面看对我国都不无好处。90年代初，国际啤酒商大举拥入中国市场，签订了50个合资项目，价值5亿美元。12亿人口的啤酒消费，曾让外商们踌躇满怀，但是他们低估了在农村供应啤酒的难度，高价位的目标群，只是大城市高收入的居民，但这部分人是很有限的。中国的啤酒企业需要在与外资啤酒企业的竞争中不断加强和提高，以适应国际化的发展潮流。

经过数十年磨砺积累的中国食品工业的技术、管理和企业素质已有较大提高，一方面应奋起与进入中国市场的境外食品企业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像健力宝集团公司那样，把企业办到大洋彼岸去。中国食品尤其是一些传统食品和保健食品，有许多历来受到国际上的欢迎，扩大出口会有更大的作为。要走出国门，开展国际交流，在科技、经营、管理领域广泛开展友好合作活动，使中国食品工业置身于国际化的大循环中快速健康发展。

五、食品加工业发展前景

从2002年的现状来看，我国食品加工业景气指数一路攀升，在2002年6月达到113.4的历史最高点，迭创新高，年底以128的骄人成绩收尾，充分展示了我国食品加

工业的发展活力和潜力，也说明了我国食品加工业的投资热情高涨，从而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见图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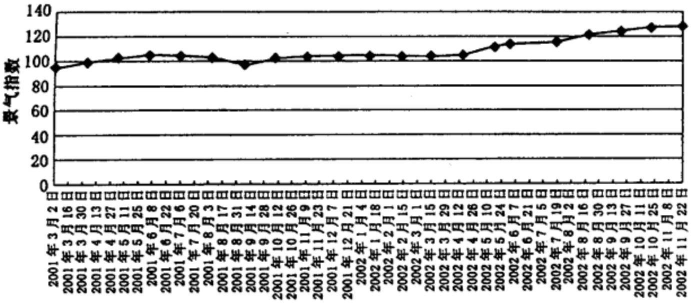


图 11－2　食品加工业景气指数

2002 年占食品加工业销售收入 32.05%的粮食及饲料加工业发展状况良好，景气指数一路走高，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食品加工业的良好发展。与此同时，制造业、植物油加工业、水产品加工业亦有不俗表现，推动食品加工业快速发展亦功不可没。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人们选择食品的时候更加注意了营养和口味方面，从而水产品成为市场上的宠儿，水产品加工业在整个食品加工业所占比例增加，景气指数随之走高。

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超市普及，人们由菜市场购买的习惯逐渐改变，超市保鲜蔬菜、无公害蔬菜因其干净成为主妇购买的另一个选择。微波炉的普及带动了微波食品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其他食品加工业的飞速发展。

总体来看，我国食品加工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为：

一是农业方面的潜力。作为食品加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业潜力的发挥，必将带动促进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众所周知，我国在 1978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农业生产，带动了农业的飞速发展，极大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然而，我们在看到农业发展的同时，却限制了农业高新技术的进一步实施。事实证明，我国改革开放 20 余年，受益最小的群体是农民，尤其是近年“三农问题”的提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渐渐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替代，实行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有利于高新技术进一步推广的生产模式，再次使农业生产呈现新的辉煌，“三农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而这一切，必将为食品加工业提供充分的原料供应保障；必将带动和促进食品加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食品加工业的主要潜力所在。

二是食物资源加工利用的潜力。食品加工业的主要原料是农畜产品在采购、屠宰以后，继续进行各种生物化学变化，往往导致腐烂变质，造成损失。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谷物损失占总产量的 10%以上，其他食物资源损失更大，而发展中国家因贮藏、加

工、运输条件落后，情况更为严重。我国食品资源的损失，十分惊人，例如：粮食方面，在收割、晾晒过程中的损失，几乎占总产量的0.5%，再加上有虫蛀、鼠食、霉烂等多种损耗因素，每年粮食损失十分惊人。

同时，我国地少人多。食品加工业原料仍相当紧张，以前实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法，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必须综合利用原料的各个组成部分，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如油料作物榨油后的饼粕可提取蛋白质20%—30%，是宝贵的植物蛋白来源；动物屠宰的血和骨大多没有得到应用，血液富含蛋白质，大部分却随污水排放，既污染环境又浪费。今后开发利用，可提取血清蛋白作为功能性食品的原料，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畜骨可做骨酱，骨胶；也可做饲料，应加以应用。食品企业工业废水含有大量营养物质，如啤酒废水排放的酵母泥，经过自溶也是味道鲜美的调味料。今后如能利用，也可增加食物资源。在食品资源的利用率上，我国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我国食品加工工业的经济技术指标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特别表现在原料消耗定额高，如植物油的生产，用浸出法提取植物油，每100吨油料可以比压榨法多生产植物油5吨，而我国目前使用压榨法的仍占40%左右。这说明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有效利用率所蕴藏的增收节支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三是营养互补方面的潜力。人体需要平衡膳食，各种营养素有一定的比例，而农产品的化学成分各有高低，必须适当搭配，取长补短，才能符合人体的需要。例如玉米的蛋白质中缺乏赖氨酸，配入富含赖氨酸的大豆，就能更好的发挥两者的营养作用。我国传统的玉米面，就是按照这一营养互补的原理进行生产的。我国食物资源有限，根据营养互补原理发展与膳食有关的健康食品，以提高食物的利用率并保证广大居民的营养需要是十分必要的。进一步发展多种功能食品，更好的发挥各种食物资源的作用，等于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农业生产，这一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四是新资源开发的潜力。近40年来，我国在野生果实的开发利用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猕猴桃、酸枣、刺梨、沙棘等，已经用做食品加工的原料，由于富含维生素C，被誉为"水果之王"。山楂本是山区的小食品，不受重视，近年来，因口味独特，又有医疗功效，华北几省大量栽培，开始结果，并已出口创汇。以上数例不过是新资源开发的开端，据调查，全国野生植物高达3000种，其中绝大部分可食，到目前为止，已被利用者还不到十分之一。工业加工者更是寥寥无几，这类野生植物，本生长在山区，人工栽培不占耕地，今后发展不受限制。有关动物性食物新资源，已用于宴会的有蛇、蝎子、蜗牛、牛蛙、蝉的幼虫等，也有用蚕蛹制造饮料的。科学界认为可供食用的昆虫有370多种，有待进一步挖掘。

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广阔的前途，但也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如资源普查，样品收集，化学成分的分析，毒理学试验，感官评定，加工适应性研究，优良加工品中的选育以及人工栽培和繁殖的研究等。这一项工作是长期的，潜力和效果是十分巨大的。

五是生物技术方面的潜力。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食品科学界寄予极大希望，认为生物技术是解决全世界食物不足的最主要潜力。以微生物蛋白

为例；酵母菌是一种单细胞微生物，其氨基酸组成的配比恰当，维生素含量很高，对人畜均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国的产量虽然很小，但发展潜力巨大，培养原料容易。如味精，酒精，淀粉，豆腐等工厂排放的污水，既可变废为宝，又可改善环境，其重量倍增时间最快，仅20—30分钟，而青草为1—2周，鸡为2—4周，猪为4—6周，牛为1—2个月，其生产不受气温影响，可以全年生产。不与粮食争地，一座年产10万吨的酵母厂，其蛋白质产量相当于150万亩土地生产的大豆蛋白或3亿亩牧草所获的牛肉蛋白。一方面选育动、植物原料、新的优良高产加工品种和新的微生物菌种；另一方面对发酵工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效率，并应用酶工程将不可食的资源变为可食资源。

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物工程是21世纪的主要特色，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生物技术，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将生物技术列在国家十大重点科技项目之中，而且我国动植物的资源丰富，为选育良种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十二章　农　　业

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稳定增长，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到2003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由1985年的29.8%下降到14.8%，就业份额由62.4%下降到49.1%。但是，农业农村发展仍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以1号文件形式，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扶农政策，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特别是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更成为宏观调控大背景下我国经济走势的最大亮点之一。

一、农业发展基本现状

近2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经历了由增产到减产的过程（表12－1）。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1978年—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实际年均增长率达5%，蔬菜水果分别达7.5%、7.2%，而棉花则高达19.3%。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从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人均食物占有量大幅增长，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1999年以来，由于农产品供需结构的变化，粮食生产出现减产趋势，1999年—2003年年均减产4.1%。

分析我国农业增长的因素，既包括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的巨大作用，也离不开技术进步的贡献。同时还包括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等。

表12－1　　主要农产品产量（1983年—2003年）　　单位：万吨

年　份	粮食作物总产量	油　料总产量	棉　花总产量	甘　蔗总产量	甜　菜总产量	水　果总产量
1983	38728	1055	464	3114	918	949
1984	40731	1191	626	3952	828	985
1985	37911	1578	415	5155	892	1164
1986	39151	1474	354	5022	831	1348
1987	40298	1528	425	4736	814	1668
1988	39408	1320	415	4906	1281	1666

年　份	粮食作物总产量	油　料总产量	棉　花总产量	甘　蔗总产量	甜　菜总产量	水　果总产量
1989	40755	1295	379	4880	924	1832
1990	44624	1613	451	5762	1453	1874
1991	43529	1638	568	6790	1629	2176
1992	44266	1641	451	7301	1507	2440
1993	45649	1804	374	6419	1205	3011
1994	44510	1990	434	6093	1253	3500
1995	46662	2250	477	6542	1398	4215
1996	50454	2210	420	6688	1673	4653
1997	49417	2157	460	7890	1497	5089
1998	51230	2314	450	8344	1447	5453
1999	50839	2601	383	7470	864	6238
2000	46218	2955	442	6828	807	6225
2001	45264	2865	532	7566	1089	6653
2002	45706	2897	492	9011	1282	14375
2003	43070	2811	486	9024	618	14517

注：自2002年水果总产量包括果用瓜。

数据来源：2004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农业信息网 http：//www.agri.gov.cn/sjzl/baipsh/2004.htm.

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肉类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的食品需求大幅度增加，农业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在农业总产值中，畜牧业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5%扩大到2003年的32.1%，水产品由1.6%上升到10.6%，而种植业则由80%下降到50.1%。农作物面积中，粮食面积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80.3%下降到2003年的65.2%，而高价值经济作物面积不断增加，由19.7%增加到34.8%。粮食作物中，水稻、小麦面积逐步下降，而玉米面积随着畜牧业增长对饲料需求的增加略有增加。经济作物中，蔬菜、水果面积增加比较显著。畜牧业也从过去单一结构逐步向多种畜禽产品结构转变。猪肉在肉类中的份额由1982年的83.6%下降2002到66%，禽肉由9.5%增加到20%，牛肉由2.1%增加到8.6%。

2004年我国农业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我国粮食种植面积10161万公顷，比上年增加220万公顷；粮食增产9.0%，粮食总产量扭转了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 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普遍大幅度增产。具体表现在：（1）夏粮、早稻、秋粮季季增产。（2）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作物样样增产。水稻产量3532亿斤，增长9.9%；小麦总产量1815亿斤，增长4.9%；大豆总产量358亿斤，增长16.2%。（3）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粮食处处增产。除西藏外，各省粮食产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主产区增产效果最为显著。主产区对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80%和90%。（4）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样样增长。其中单产比上年提高19公斤，历史最高水平。（5）棉花、油料、蔬菜、水果产量均有增长。其中，棉花增长30.1%；油料增长8.8%；蔬菜的种植面积虽有减少，但产量仍比上年增长1.7%；水果产量也增长了5.0%（见表12-2）。

表12-2　　2004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绝对数（万吨）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46947	9.0
夏　粮	10104	4.8
早　稻	3208	8.8
秋　粮	33635	10.3
油　料	3057	8.8
花　生	1431	6.6
油菜籽	1304	14.2
棉　花	632	30.1
糖　料	9528	-1.2
甘　蔗	8948	-0.8
甜　菜	580	-6.1
烤　烟	214	6.2
茶　叶	84	8.7
水　果	15243	5.0
蔬　菜	54927	1.7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

2004年粮食等农产品增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清理整顿了各类园区，严格查处了各种土地违法案件，暂停了农地转用审批程序，加强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了违法违规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为粮食播种面积的恢复性增长创造了条件，有力保护了粮食和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二是“三补贴”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2004年，“三补贴”政策共补给农民140多亿元：除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116亿元外，还对13个粮食主产省安排良种补贴资金28.5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7000万元。三是国家增加了对农村生产和生活基础设

施的财政投入。2004年，在国债资金规模有所缩小的情况下，仍安排专项资金285亿元用于农村“六小工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粮食生产条件。四是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和粮食生产信贷资金的支持。2004年，中央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不仅没有关紧农业贷款这个“闸门”，而且还大规模地增加了农业信贷规模。2004年上半年，央行在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期，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额度，重点用于支持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扶持西部贫困地区发展。与2004年1月相比，同年11月农业贷款余额增加1386多亿元。五是气候因素。2004年，全国除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外，没有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播种、生产和收获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

2. **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2004年，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其中以粮食、肉类、蛋类最为显著。全年粮食价格涨幅在30%左右，粮价在5月达到最高后开始回落。粮价上涨也带动以粮食为饲料的畜牧业和水产业产品价格以至于食品价格整体水平上涨。其中，肉类和水产品价格涨幅在20%左右，蛋类价格涨幅约30%，食品价格平均涨幅达到14%，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产量和需求量之间存在缺口。近年来，中国粮食需求量平均每年500万吨，2004年的需求量约为49000万吨，当年粮食产量仍然小于需求量。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当年粮食产量和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就一直存在，需要动用库存或通过进口来弥补。同样，由于糖料当年产量（9528万吨）不足，2004年国内食糖价格上涨幅度较大，11月的市场糖价比上年同期上涨42%。也有一些农产品价格下跌，其中以棉花最为突出。由于国内丰产、进口增加、供给充裕，2004年棉花的销售价格年末比年初下降了35%。

3. **农民收入增幅加大。**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比上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这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比前6年的平均增幅高近2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具体表现为农民纯收入的四项来源全面增长。一是农民人均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为1746元，比上年增加205元，增长13.3%。二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998元，比上年80元，增长8.6%。三是农民人均得到的转移性收入为116元，增加19元，增长19.3%。四是农民人均得到的财产性收入为77元，增加11元，增长16.5%。同时，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陈劲松，2005）。

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一是产量因素。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较大，由此带来的收入增加额约占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加额的20%。二是价格因素。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增加额约占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加额的80%，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因。三是政策因素。据农业部初步估算，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大中型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减免农业税、减免部分特产税的“两减免三补贴”政策，拉动农民收入增长2个百分点，使农民增收294亿元。四是宏观因素。2004年中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带动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而且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兑现情况较好，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后使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有所提高。

4.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农产品生产加速向优势

产区集中，优质专用粮食比重进一步提高。例如，水稻和玉米的优势区域种植面积分别占全国的86.1%和33.3%，比上年分别提高1.2%和1.3%；三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99%以上；优质专用小麦、早稻、玉米的播种面积分别占总播种面积的43.9%、70.5%和31%，分别比上年提高5.9%、8%和3%。二是畜牧业和水产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年肉类总产量达到7260万吨，增长4.7%。其中，生猪养殖效益为近年来最好，农民养猪积极性较高；牛羊肉产量分别增长7.9%和10.6%，效益稳定。奶业产量保持高速增长，牛奶产量达2190万吨，增长25%。养禽业克服了年初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不利影响，呈持续性增长的趋势，其中蛋类总产2700万吨。渔业生产继续稳步发展，水产品产量达到4855万吨，增长3.2%，淡、海水养殖水产品比重进一步提高，水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三是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都有较大提高。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41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实现利润9900亿元，增长15.5%；上交税金3650亿元，增长16.6%。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快、效益好，并进一步带动了农民就业和增收。总体上，2004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呈现出全面增长的态势。

5. **保障农民权益，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加强农民权益保障的主要做法是，在加强土（耕）地保护的同时，改进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征地补偿的标准。在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中，全国共偿还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160.45亿元，占拖欠总额的91.4%。同时，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就近、免（借读）费入学提出明确的要求。更为突出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专项行动，共清理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325亿元。

2004年，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新增部分，主要用于农村；西部地区部分农村困难家庭学生，得到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资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医疗救助工作取得进展；大力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农业部等部门启动了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培训的“阳光工程”。2004年中央财政共拨款2.5亿元对250万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前的非农技能培训给予补助。此外，2004年，财政安排120亿元扶贫资金，全年新脱贫人口300万人，是5年来减少贫困人口最多的一年。

6. **农村各项改革进一步稳定推进。**2004年，我国农村重点深化了5项改革。一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中央1号文件确定将一定比例的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出台了征地补偿标准，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二是推进市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增加了农民的种粮收益，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三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继续减轻农民负担。在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吉林、黑龙江免征农业税（西藏自治区一直免征农牧业税），11个粮食主产省降低3%，其他非粮食主产省降低1%。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共5个省市自主免征或基本免征农业税。四是改革和创新

农村金融体制，加强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2004年，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了29个省（区、市）。农村信用社支农投放继续快速增加，全年增加近2000亿元。五是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和推广。据卫生部资料，截至2004年10月底，全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333个县（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实际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8000多万，“参合”率为75.20%。为建立农村新型医疗保障体系，各级财政投入了300多亿元（程国强，2005）。

二、现阶段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一，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尽管2004年农民增收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的“喇叭口”越开越大（见图1）。1997年—2003年的7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一半左右。从收入增长的绝对数来看，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比1996年的1926元增加了696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4838元增加到8472元，增加了363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值1996年为2.51∶1，2003年扩大为3.23∶1。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是我国“三农”问题中最严重和矛盾最突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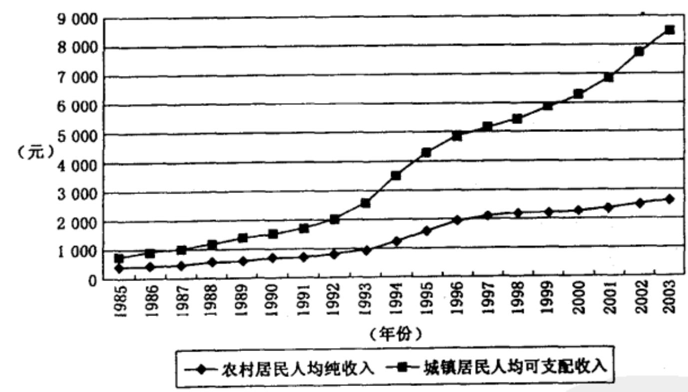


图1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比（1985年—2003年）

数据来源：《2004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农业信息网 http：//www.agri.gov.cn/sjzl/baipsh/2004.btm.

第二，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品种结构矛盾显露。从1996年—1999年，我国粮食连续4年丰收，但从2000年—2003年，粮食连续4年减产，后4年粮食平均产量与前4年相比，下降500亿公斤以上。尽管2004年粮食大幅增产，但由于粮食消费量逐年增加，粮食产需平衡的年度缺口逐年扩大。弥补粮食产需缺口主要靠挖库存和进口。因此

2004年中国农产品贸易自1984年以来首次出现逆差，农产品进出口差额由上年的顺差25亿美元转变为逆差46.4亿美元。在粮食总量关系趋紧的同时，品种结构矛盾也逐步暴露，特别是大米短缺的问题较为严重。粮食供求关系由供大于求向供求趋紧转变，主要标志是2003年10月份和2004年3月份粮食价格出现两次较大幅度上涨。2003年10月，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涨引发国内粮食价格上升，主要是大豆、小麦及面粉价格明显上涨，涨幅达20%左右。2004年3月中旬，与上年同期相比，3种主要粮食品种平均价格上涨50%左右，其中大米价格上涨60%～70%，小麦上涨40%以上，玉米上涨21%以上。粮食价格由长期持续低迷到连续出现上涨是粮食供求关系出现新变化的重要信号。

第三，土地资源流失，资金短缺严重。近几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要素大量流失，给农业发展带来严重的“硬伤”。生产要素流失突出表现在耕地和资金两个方面。从1996年—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00多万亩。2004年我国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了大量耕地，但由于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当年净减少耕地80万公顷。耕地减少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造成实质性的、不可逆的损害，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偏离“三农”的倾向十分严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体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农村资金大量通过金融机构流入城市。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为例，2004末，不仅其各项存款余额远远大于其贷款余额，而且与年初相比，其存款的增长幅度还略高于贷款的增长幅度，这是近年来首次出现的现象。这说明，农村资金依然外流，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第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过快，制约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2004年出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农村电力供应紧张等现象。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宏观经济局部过热带来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同时，在整个经济已经绷得很紧的情况下，农业特别是粮食供给和价格又发生大的问题，与煤电油运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交织在一起，出现“两碰头”，加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也偏高，部分抵消了农民的新增收入。200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3.9%，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4.8%；食品价格总水平上涨9.9%，其中城市上涨9.1%，而农村上涨11.5%。这种新的城乡不平等制约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五，农民权益受损，社会矛盾突出。侵犯农民合法利益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而且征地补偿款拖欠严重。以土地换取发展资金，随意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严重侵害农民利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屡禁不止，有些雇主采取变相方式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无保障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土地承包政策得不到落实，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承包地以种种名义被收回。这些侵犯农民权益的行为，引发了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农民因征地问题的上访增多，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要

工资的事例增多，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三、从国际看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是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农业，主要是指发达国家的农业，是逐步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的农业，农业生产的区域分工更加明显，农业产业供应链的运作和管理更加完善，农业产业布局更加符合区位优势。

1. 市场化程度日趋成熟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农业生产的产业链条将会延伸。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市场化运作，除了农业最终产品即各种农产品外，各种中间投入产品、劳务和消费品以及其他农业生产要素，包括各种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农用化学品、良种及兽医服务等，都进入农业交换领域，甚至农民的生活消费也普遍成为商品性消费，农产品商品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农业产业领域的准公共领域比如农业科研也将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农业打破了内部物质循环的局限性进而实现物质的开放式循环，从自给农业发展为市场化农业，农民农业的家计式经营转变为盈利性经营。

市场化程度的发展使得农业资源的出现集中的趋势，最典型的就是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从国外农地经营规模的变化来看，在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企业平均经营规模都呈现了随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而扩大的趋势。历史上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广泛存在小规模的小农经营，传统的土地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制约或阻碍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为了适应非农产业进一步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各国政府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或农业立法来鼓励和促进农业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主要的措施有直接的土地政策和间接的农业信贷政策、价格补贴政策、税收政策、劳动力转移政策、农业合作政策等等。比如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政府通过多种途径促使青年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产业。例如：对离农人口进行新的职业培训；对职业变动者提供补助、提供经营场所、财政信贷支持和减免税收等措施，来增加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使用权。法国政府规定，凡是愿意到政府指定地区新建或扩建工厂，并能安排一定数量离农劳动力者可以获得地区发展奖，企业在迁厂过程中受到的损失由国家赔偿。

市场化程度日趋成熟催生了许多专业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交易市场的发展，极大地减少了农民搜寻市场的交易费用，提高了农产品的交易效率。农产品期货市场作为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通过套期保值来转移商品价格风险。能发现合理的预期竞争价格，并能调节农产品的现货价格，从而稳定农产品的长期供求关系。

2. 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现代农业生产

先进的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首先引发了育种技术上的革命。常规育种技术主要是依靠育种专家的经验在田间对育种对象作表型性状的选择，只能利用有限的种内杂交优势，而基于分子生物学理论的生物技术，则可以对生

物的遗传信息作实验室操作，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即所有物种间作基因转移和重组，可以作遗传改良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生物技术，可以注入作物中某些新的特性，如耐旱、耐涝、耐低温、耐盐碱、耐瘠薄、耐储运和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抗逆性能；也可以使作物产出某些新的特性，如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油料、富含抗癌蛋白的大豆、可食性疫苗等等。通过遗传改良的猪，日增重和饲料利用效率等指标可较普通猪种提高一倍；动物的体外受精、胚胎分割、性别控制、核移植等胚胎工程技术和克隆技术已趋成熟，并实现商业化。生物反应器技术可以以动植物为载体，生产昂贵的蛋白质药物。微生物基因重组技术的出现，正在掀起农用生物制剂产业的革命，新一代生物农药、动物疫苗、生物肥料、生长调节剂等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信息技术正在对农业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改造。农业信息化将通过信息技术和智能工具的普遍应用，使农业生产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使生产过程的管理实现科学化、智能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智能化农业专家系统使农业由定性到量化，由经验到科学；网络技术使农业由分散封闭到信息灵通；PA技术（精准农业）使农业由粗放到精确；3S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使农业管理由微观到宏观。信息化将大大增强农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有效的沟通产销关系，使农产品发挥更大的效益。农业信息网络体系还将改善农作物生长情况以及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预警，增强农业的抗自然风险能力，减轻由于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

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不是常规农业技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在分子和信息化层次上的一次重大技术突破。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会改变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使农业成为现代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

3. 农产品的标准化建设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标准是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它是品质的保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农产品标准化程度成为一个国家农业生产水平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更是农产品冲破技术壁垒，建立自己的保护体系，获得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应得利益的基本手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食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食品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品提出了标准化要求。产业化生产的农产品，需要加工增值；食品工业的发展趋势，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标准化的初级农产品。作为食品工业的加工原料，待加工的初级农产品不再只是原来意义上的农产品，而是标准化意义上的农产品。比如，加工面包用的小麦，就必须是符合加工高筋粉要求的小麦品种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对农产品提出了标准化的要求，除国际化标准机构（ISO）外，1962年FAO和WHO还成立了FAO/WHO联合食品规格委员会，加强国际食品规格的制定、协调、推进工作。发达国家往往利用自身在标准化方面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设定门类繁多的贸易技术壁垒，来获取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为了提高农产品贸易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强农产品标准化建设的步伐。

4.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组织模式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都采取产业化经营的模式。

美国实行的农业一体化，使农业形成了一个由产前、产中到产后的各个环节系列服务的完整体系。不仅如此，美国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协会已经替代政府在农业生产以及开辟市场等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和保障。法国的农业联合体遍布全国各地，对整个农业生产经营过程提供系列化服务，成为法国高效农业的支撑点。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供销合作社、服务合作社及其联社、农业工会、农会、专业产品联欢会以及跨行业协会等，作为法国农业服务系统包括了生产资料的供应、产品加工、产品销售等农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使法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日本的农协组织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已经在组织机构、事业运营、管理机制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稳定的体系。就其社会化服务的内容来看，从农民生活到生产经营，以及农产品从农场到超级市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有序、高效的产业服务体系，从而推动了日本高效农业的发展。

完善的产业体系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与现代生产手段、生产技术相适应，农业发展突破了传统的产加销脱节、部门相互割裂、城乡界限明显等局限性，在我国，普遍通过“农业公司＋基地＋农业合作社带农户（家庭农场）”生产组织形式，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走向一体化，农业与工业、商业、金融、科技等不同领域相互融合，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农业产业链条大大延伸，农产品市场半径大为拓展，逐步形成了农业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格局。

农业产业化的深度发展就是出现农业关联产业群。农业关联产业群是一种与发展农业相关的社会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也就是为农业服务的一群产业。这一群产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有机的利益整体，具体体现出了农业经营产业化、农业服务社会化。农业产业化能够很好地解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的衔接问题，能够很好地解决农业生产的技术支撑问题，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小农户，大市场”的问题。一方面，农业产业化促进了农业专业化和规模经营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专业化和规模经营又促进了农业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和应用，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的服务为手段，通过实现农业产业的一体化经营，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形成一条有机联系的产业链。农业产业化经营被实践证明是现代农业经营的必然模式。

5. 注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注重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现代农业以化学物质的使用和能源（主要是石油）的大量消耗为开端，其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激增，导致食物需求已经超过了谷物增长的速度。农业能耗过多，加剧了能源危机；水资源紧缺，土地资源退化，导致植被破坏；农田化学品的过量使用，污染环境，危及人类健康与安全。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一，农药、化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指土壤、水体和空气所受到的污染。农药的大量长期

使用对环境生物安全和人体健康都将产生严重的危害。有些学者研究指出，在美国由于农药的施用，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损失达81.23亿美元。由于农药污染我国许多品种的农畜产品被迫退出欧美市场，给我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化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化肥的过量使用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土质变差。其二，灌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传统农业的大水漫灌的特性导致引水河流和湖泊的水位明显下降，流量减少，水面缩小，改变河床的冲淤情况，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灌溉不当不仅导致水、肥、土的流失，使土壤中出现化学反应，而且水还会破坏土壤结构，增加土壤容重，造成地面结块，使土壤水、肥、气、热严重失调。灌溉不当还会使土壤发生盐碱化、破坏土壤团粒结构等等负面影响。

现代常规农业对于社会和环境的压力迫使许多国家反思农业的常规发展，探索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和模式。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农业发展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重视土、肥、水、药和动力等生产资源投入的节约和使用的高效化，在应用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出“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等农业发展模式，其实质是一致的。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正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趋势。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荷兰登博司召开了农业与环境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登博司宣言和行动纲领”，宣言中提出了“持续农业与乡村发展”的概念，其含义是指“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基础的方式，并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可持续农业能够维护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友好、技术应用得当、经济上能够维持以及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

从农产品消费的角度来看，绿色农业很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农产品高质量的要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对于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消费者对于农产品消费观念从追求数量向数量、质量并重的方向发展，市场上出现了价格低、质量差的农产品滞销，优质安全农产品畅销的局面。因此，农业生产经营必须应时而变，生态农业实行从“田头到餐桌”的质量控制管理，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满足了人们对于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

6. 现代农业必然要求现代化的农民

任何现代化技术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人的使用才能够实现，而科学技术本身也凝结了人类劳动，它是人类智慧成果的最高物质体现。现代农业生产，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成分，如良种、肥料、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现代农民必须掌握现代化的技术，才能使现代化的技术转换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取决于土地生产率和土地规模的差异，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现代化学生物技术的使用，土地规模的扩大依赖于对现代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农业机械的使用，而这些技术的使用的主体都是掌握现代化技术的农民。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的农民的特点是文化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农业耕作的历史经验。现代农业发展意味着广泛地应用现代化的技术，这必然要求现代

化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必须依赖于农业劳动力资本的积累，而这主要依赖于教育和培训。农业教育发展落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下、农业科技人才紧缺等无疑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显而易见，没有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根本无法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教育是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的主要途径，而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要求政府必须改变现在轻视农村教育和财政投人的现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政府还应该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农民的技术培训和成人教育，向农民积极传输农业技术。

7. 现代农业的产业功能更加丰富

传统农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有 4 种形式，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这些具体的贡献强调了农业产业的产品功能和市场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农业所具有其他功能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农业的拓展功能具体有环境友好功能、旅游观光功能和保障功能。

农业的环境友好功能主要是指农业生产的绿化、净化和美化作用。特别是对于大都市而言，农业的环境友好功能更加突出。现代都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废气多、噪音大、污水垃圾等公害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大都市周边的农业不仅为人们提供鲜美的农副产品，而且还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质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成为大都市的一块绿洲。作为人工湿地的水稻田，对于空气的净化功能已为人所共识。

农业的旅游观光功能是指农业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接触自然、体验农作物生长以及观光、休闲与游乐的场所与机会，并有利于增强现代农业的文化内涵的功能，它主要定位于城郊农业区域。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日益严重，人们日益向往亲近大自然，回到大自然清新的环境中去，而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能满足人们的这一愿望。城郊农业区域通过发展园艺农业、花卉农业、蔬菜农业等方式，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回归自然的精神需求，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利于城市的绿化建设，优化城市坏境，防止城市污染，同时也可限制城市的过度扩张。

重视农业的旅游观光功能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的这个功能为城郊农业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发展模式。它把农业与城市中其他产业有机地联系到一起，有利于城区向农村的渗透和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原有的城郊界限将变得模糊，有利于消除城乡分割对立的状态，使城乡关系变得协调和融合。农业的旅游观光功能，一方面满足了城市居民对农业旅游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亮点，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收入。

农业生产在提供食物保障方面的功能被重新认识，并且加以重视。农业的食物保障功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功能，而是更高层次上的食物安全问题，它的战略意义将更加突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专业化分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各地区经济的依赖性增强，区域分工的某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引起全局范围内的经济震荡。农业产业的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在防范世界性的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过程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不仅有

着发达的工业、第三产业，而且有着发达的农业，即便是农业自然条件差的国家如以色列也有着相当发达的农业。其背后的动机正是在于农业的食物保障功能。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多发生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宁可牺牲大部分消费者的利益来维持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从侧面反应了农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保障功能。

四、农业发展前景展望

1. “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农业是一个极具市场潜力和市场前景的产业，关键是要采用现代化的理念加以经营。那么，农业现代化将可能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和就业空间。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加快了进入农业领域的步伐，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有300多家大中型企业不同程度地介入食品和农产品的开发，工业企业涉足农业，不仅可为企业多创收，而且有利于安排企业富余人员。日本工业企业在1995年—1999年间安排了12万名富余员工进入农业部门。发展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一个有利选择，大批劳动力从工业生产转向新兴的农业，1985年，美国仅有20多家重要企业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开发工业产品，1998年上述企业已增至420家，从业人员总数22万，其中60%是90年代以后加入的。这些企业中的三分之二分布在城镇周围。

对中国来说，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转变过去那种搞农业就是搞生产的传统观念，实现农业的产业转型，将农业作为综合产业经营的基础平台，在这个基础平台上，深度挖掘农业的潜在经济要素，实现农业的多功能化，并在多功能化中提升农业的经济价值。

第一，建设农产品产业链，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现代农产品生产的国际趋势是将“从田头到餐桌”的一系列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整合为“农产品供应链”，实行一体化集约经营。把从供应投入品，如种子、肥料及机械等，到食品加工者和零售商的一系列公司组成有序链条，实行现代化企业大生产。现代的农业产业早已超出我们一般意义上农业的概念，成为一个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产业体系。

在50年代，全球农业产业化（Agribusiness）的交易额为420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一以上，据预测，到2028年农业产业化交易额将提升至10万亿美元，其中农产品的份额将降到10%。这充分表明，在以“农产品供应链”为纽带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产品经营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产业和经营被整合到农产品供应链之中，形成一种以农产品生产为服务对象，将以此衍生的众多行业通过农产品供应链加以连接，成为一个系统化的大生产经营模式。这种大生产经营模式不仅将提高农产品的竞争能力，而且将会形成和推动农业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连锁营销业、物流业、信息技术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等的发展，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开拓一个崭新的天地和巨大的赢利空间。

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建立在现代化产业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以农

产品供应链为纽带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农产品供应链的建设，要求各个参与主体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产业链和利益共同体，其竞争优势就在于联盟企业与农户间的充分合作，形成长期稳定的资源、信息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互利合作关系。因此，要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农业产业经营的组织创新工作，以农产品供应链的理念和模式来构建新型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在时间上重新规划农产品和相关企业的供应流程；在空间上重新规划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的分布；在经营上对技术、服务、生产、加工、销售等资源统一集成为一个整体。重点扶持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基地"、"公司＋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市场＋企业＋农户"的龙头企业，并重点建设一个国际性农产品市场，使其形成比较完整的农产品产业链条。

第二，开发农业生态休闲旅游，深度挖掘农业外延经济潜力。

从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农业是多功能性的大农业。在欧美、日本的许多城市中，与食品相关的一系列产业以及与生态、观光、休闲相关的商业活动是现代都市农业经营的主体内容，且互相融合、相互促进，始终贯穿着一系列产业化、商业化的经营活动，使现代都市农业不仅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成为一个蕴涵了巨大赢利空间的产业。生态休闲农业不仅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事业，同时还肩负着传承农耕文明、促进生态提升、切实保护环境等社会责任，最终达成社会、经济及环境共进的多元化目标。

农业生态休闲旅游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就开始了农业旅游，意大利1865年就成立了"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专门介绍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体味农业野趣，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作。生态休闲观光农业以农业生态景观、特色产业、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为依托，来满足城市居民观光、品尝、休闲、猎奇、娱乐、参与、体验、购物、度假等需求。它既是对农业经济潜力的深度挖掘，也是一个系列旅游产品开发的过程，成为一种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新兴产业。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估计，1988年，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收入为12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收入更要高出几倍，美国约300亿美元、德国约80亿美元。

第三，建设环境友好型农业，发挥农业的社会效应。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开始高度重视农业生态以及农业与环境相互影响问题。举例来说，2001年度英国对农业的公共支出，包括共同农业政策以及英国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总量高达31.82亿英镑，其中环境是非常突出的领域。共同农业政策下的农业环境措施，用于"环境敏感区"的支出，从1997年度的1730万英镑迅速提高到2001年度的3070万英镑，平均每年增加的幅度高达10.9%。除共同农业政策外，英国政府也增加了对"环境敏感区"的支出，从1998年度的2100万英镑迅速提高到2001年度的4140万英镑，平均每年增加的幅度更是高达16.4%。

韩国在20世纪末提出了"亲环境农业"规划，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农业，来应对环境和自然生态界的危机，以及农村环境恶化等状况，将其作为一种可长期持续发展的农业操作方式来开发实现，在确保农业生产的经济性，保全环境的同时，追求农产物的安全性。

自从1992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以来，农业环境问题被越来越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1992年，法国的农业环境措施补助只有800万欧元，1993年（改革后的第一年）达1.5亿欧元，增长近20倍。而且这种增长势头还十分迅速。2001年补贴额达3.7亿欧元，比1993年增长1倍以上。巴黎为了保护和发展农业与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事实上，如果缺少了一个良好的、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就会变成一个缺乏生机和活力的城市。良好的农业自然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建设都市现代化环境友好农业，将可能是缓解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环境压力的最经济且最有效的途径。所以，在“十一五”期间，上海应该考虑如何通过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农业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和农业环境友好技术来实现21世纪大都市农业现代化的理念，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环境友好功能和生态屏障功能。

2.“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的政策走向

“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政策的走向可简单地归纳为“多予、少取、放活”。“多予”，就是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就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更加重视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流失，彻底放弃靠剥夺农民利益积累城市建设资金的做法；“放活”，就是要深化农村改革，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消除束缚农村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赋予农民全面发展的权利。具体来说，我国农业发展要采取如下政策框架：

第一，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耕地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必需要素，也是广大农民的“命根子”。近年来，耕地被乱占滥用的现象十分严重。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98年—2003年的5年间，我国耕地面积由19.45亿亩减少到18.51亿亩，净减少9363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872万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2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我国耕地中的中低产田比例大，在18.51亿亩耕地中，中低产田为12.20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4.58%。针对这些情况，2004年，国家果断暂停耕地占用审批，严肃清理各种开发区和园区，坚决制止和纠正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坚决守住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土地出让金使用、制止占用基本农田植树、尽快恢复撂荒地生产、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并严格土地管理等5项紧急通知，这构成了新阶段农村土地政策的核心内容。

第二，继续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核心是要做好减法。其一是加快现代化农业产业的建设，把推动“专业户有序进入、兼业户逐步脱离”作为主要抓手，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和产业链经营，在拉长农产品产业链条的过程中，为退出种植、养殖一线的劳动力创造就业就会；其二是加快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态休闲旅游的发展，以及从中延伸出来的农产品物流、农业服务和相关第三产业，从整体经营农业的角度来深度挖掘就业空间和就业潜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业内部实现由农民到农业产业经营者的转变。除了营造促进农民非农就业的政策环境，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外，还应该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农民市场就业的能力和自主创业的本领。

第三，积极制定并推行“三个反哺”的政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市民反哺农民，对于促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是非常必要的。发达的工业国家通常都给予农业大量的补贴，以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例如，农业补贴占农户收入的比重，澳大利亚为5%，美国为20%，欧盟为35%，日本、挪威和瑞士甚至高于60%。因此，加大工业和城市对农业的资助和支持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反哺”农业的核心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农业和其他产业、农村和城市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用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的视角看待农业和农村问题。不能把分配关系仅仅局限在农村、农业经济和农业产出、农民与地方政府这样一个层面上，应当以整个国民经济所能够提取的财力，在农民与市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城市政权和农村基层政权等层面上进行一个大的统筹分配。另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将反哺农业理解为补贴农民收入，简单补贴农民收入结果只能是“授之以鱼”，要在适当直接补贴农民收入的同时，把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放到更新农业生产手段、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形成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市场经营范围等项目的建设之上，协助农民获得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来源和产业经营空间，真正起到“授之以渔”的效果。

第四，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管理功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不能放松政府对农业的领导、指挥、宏观管理和协调，也不能用行政行为干预市场行为。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放手交给市场来处理，行政绝不参与。把政府行政推动的重点放到确定发展方向、规划发展蓝图、建立支持体系、落实保障措施、统筹推进步伐、协调区域关系等方面。这些工作包括：首先，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制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其次，要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建立地区政府间农业合作协商机制；三是设立农业发展统筹基金，统筹管理运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投资补助和日常生产费用补助，根据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统一协调好建设资金的筹集、调配和使用，以促进生产性资本积累的增长和现代化建设按规划的方向实现；四要将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督和质量安全体系的建设牢牢掌握在手中，以保证农产品的安全和提高农产品的国内、国际竞争能力；五是推进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推广、应用和组织农民的各种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五，建立良好的投入增长机制和农业财富积累机制。鼓励实行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的联合，建立新型的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明确参与现代农业产业各利益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财产权利，加快形成市场带动型、加工推动型以及服务引导型等多种形式的农产品产销新体系。积极探索市场化、多元化投资方式，通过引进工商企业、外资参与农业建设，走现代化的大农场、大企业经营模式，进一步延伸拓展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产品市场体系。大力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深度与广度，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对各类资源的配置作用，加快形成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切实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要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重点，加快完善所有制结构。

第六，发展新型的农业产业经营组织形式。以提高农业组织化为抓手，推进农业向

规模经营集中。重点做好农业产业化、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三项工作。一是创新产业化经营机制，做强、做大龙头企业。进一步完善“公司+基地”的生产组织模式，强化和完善产业化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民在产业链上得到实惠。推进同业农业企业整合，通过联合、兼并、收购等方式，组建资产结构多元化的农业企业集团，创造条件成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用现代工业手段改造和装备农业企业。二是引导农户组建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农业法人制度，鼓励农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等专业经济组织的发展，实行土地、资金、技术、劳动的联合。三是推进农业行业协会建设力度。依托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组建跨地区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发挥其营销、信息、技术服务等功能，实现分散农户与市场的有机对接。使企业、农民和农村在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真正得到实惠，达到增长与发展的“双赢”。

第七，调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2004年，化肥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农民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成本比上年增加约50元以上。同时，在种子、农药、肥料和禽流感疫苗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制售假劣农业生产资料的行为，这样势必影响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对此，政府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化肥生产和进口的税收、价格优惠政策，明确了化肥的进销差率、批零差率和零售的最高限价。政府通过大力整顿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严厉打击随意抬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制售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的行为，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力度，遏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势头，保护农民利益。

第八，实行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价格支持政策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限量使用的“黄箱”政策，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多年来均充分利用此项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对本国农产品实施价格支持，以保护农民利益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例如，美国有“无追索权贷款”和“反周期补贴”政策，欧盟实行了“目标价格”、“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政策，日本对10类农产品实行了5种形式的价格支持政策。从发展趋势看，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所支付的补贴资金逐渐从原来的收购环节向生产环节转移。因此，我国依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根据国内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公布了早籼稻、中稻、晚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并完善储备粮调节制度。

第五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 年

10　月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下午 3 时，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并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检阅各兵种部队，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全体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同日，《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表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0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布《关于新区土改决定》。华北全境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新区需要实行土地改革。决定指出：把减租减息政策作为过渡到平分土地政策的办法，在这些地区已无必要。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决定除绥远全省外，其他各省新区一律于今冬明春全部完成平分土地的任务。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

10 月 17 日　全国铁路工务会议开幕，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说："在员工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曾经支援了南下的解放大军，战胜了美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并实现了十二年所未有的京沪通车"。滕部长要求全体铁路员工必须努力完成国家所要求的运输任务，重视养路工作。

10 月 20 日　为了保障生产安全和劳动人民福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

10 月 21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告成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今天也举行成立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报告财政经济情况，并提出今后数月主要工作。

10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东北粮食公司大量收购农民余粮，缩小粮布比价，以哈尔滨为例，今年农民出卖一吨高粱可较去年多得解放布一匹零五十尺，因此使农民实际收入大大增加。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

11　月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充裕华北粮源，保证京津等地粮食供应，东北粮食大量入关。自 10 月 29 日起至本年年底，每日运进关内五百万斤粮食，分发京，津、保、沧各地。

11月4日　华北各省人民政府注意掌握棉价，保护棉农利益。保定，定县两专区二十多个县，每斤皮棉已能平均换小米九斤以上。

11月8日　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会议任务有三：第一，了解各地情况，提出一个最近期间水利建设的方针与任务，第二，根据各地区人民的需要与全国现在的经济力量，制订1950年度的水利工作计划；第三，关于统一全国水利工作的领导问题。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讲话："希望立即开始工作，把当前任务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和长远任务治水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希望在拟订治水计划时要估计到国家当前财政的困难，……这就是说水利计划的原则应该是必需与可能，既不是对紧急问题坐视不理，也不是百废俱举。"

11月9日　"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四千人通电起义，两公司在香港共有八十余架飞机，其中十二架飞机已飞回祖国，其余飞机资财留港待中央人民政府接收，

11月18日　政务院举行会议，听取陈云副总理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陈副总理在报告中详细地分析和说明了10月底以来各地物价波动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物价问题指出："一般地说，这是胜利过程中的困难，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无可挽救的毁灭性的经济危机有着根本的区别。具体地说，这次物价的暴涨，除去投机捣乱及各种客观原因外，领导上未能事先掌握得好，也应引为教训。"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小组，研究处理这个问题的详尽办法，并由陈云副总理召集。

11月24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劳资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

11月24日—12月10日　全国税务会议在北京召开，各地区与会代表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明年概算中所分配的税收数字，他们一致表示，争取超额完成任务。

（12月14日《人民日报》）

12　月

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陈云副总理指出，物价猛涨系由于财政收入不抵支出，发行公债可弥补部分财政赤字。会议一致通过了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又说，估计明年情况会比今年好，三五年内经济可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毛泽东主席还就各大行政区的设立作了说明，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这样一级的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新华社发表社论《战胜财政困难，争取物价稳定》。

12月5日　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

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2月8日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生产会议，根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指示，这次会议以解决粮食与棉花的增产和兴修水利为中心。李书城部长致开幕词指出，"中国目前农业经济占整个经济比重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在当前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李书城部长提出"1950年农业生产运动的方针是：以恢复为主，在可能条件下争取提高"。会议还拟具增产粮棉、兴修水利计划。关于增产粮棉，李书城部长说：希望老解放区明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一成，就是增产一百亿斤；棉花的产量，全国从1949年的八百三十万市担，提高到一千三百万市担。

12月16日　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抵达莫斯科。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车站发表演说时指出：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当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斯大林。

12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中国各地区都有异常严重的灾害。自春至秋，旱、冻、虫、风、雹、水、疫等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为最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一万万亩，减产粮食约一百二十亿市斤，灾民（包括轻重受灾人民在内）约四千万人"。新华社为此发表社论《生产自救，渡过灾荒》。

12月25日　全国农业生产会议闭幕，会议制定了明年增产计划：增产粮食百亿斤，植棉五千万亩，产皮棉十三亿斤。

12月27日　财政部召开粮食会议，讨论全国粮食征收与管理问题，经过反复核算，对完成占国家收入概算百分之四十一的农业税，有了信心。并定出1950年粮食调度计划，除保证军政需要外，尚可拨出相当大一部分作为调剂民食之用，

1950年

1　月

1月1日　新华社发表元旦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社论指出，1950年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第二，厉行生产节约；第三，准备进行或着手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第四，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继续加强中国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大团结。

1月2日　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答塔斯社记者问时说：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主席说：这次访苏将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我国贷款、中苏贸易和贸易协定等问题。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去年修复八千多公里，大陆铁道网基本恢复，前方和后方，城市和农村、工厂和矿山连成一个整体，对支援大军解放西藏、海南岛、台湾，对全国经济建设，均将起伟大作用。

1月5日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今天正式开始发行，全国各地正踊跃认购。

1月6日　内务部指示各级人民政府，加强组织领导生产救灾，不许饿死一个人。要清楚掌握灾情，详细研究救灾方法。正确分配粮食；发动人民互助，劝止盲目逃荒；及时发动春耕，播种早熟作物；强调节约，变生活资料为生产资本。

1月13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老解放区的市郊，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已成熟。但郊区的土地改革应与农村土地改革有若干区别：如没收地主土地、征收旧式富农出租的土地，为了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之需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并分配给无地与少地农民使用等等。

（1月29日《人民日报》）

1月20日　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抵达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邦交的会商。

1月3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了税收制度，平衡城乡负担。

2　月

2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会管理企业》。社论指出，“学会管理企业，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企业，就应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中心口号”。

2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2月27日　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与会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越是渡过春荒，因此，生产自救的方针，必须贯彻实现。

2月2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指出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还来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1950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土地改革。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

3　月

3月3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陈云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这一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缩小赤字，统一管理，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会议还通过《中央金库条例》。

中共中央通知各级党委，保证统一财经工作，加强税务干部，完成税收计划。

同日，政务院发布《公营企业缴纳工商业税暂行办法》。

3月4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国营公营工厂，认真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保证完成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任务。

3月10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决定规定："全国的国营贸易，合作社贸易与私营贸易的国家总领导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

（3月15日《人民日报》）

3月11日　政务院为了统一盐政，加强生产、运输、税收，保证民食与国家收入，召开了全国盐务会议。会上作了《关于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今天由政务院发布，命令各级人民政府贯彻执行。

3月12日　毛泽东主席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发出通知，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通知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页）

3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通盘调剂粮食的伟大计划正在逐步执行之中。这个艰巨的、在中国粮食史上空前的工作，将保证全国各大城市和灾区粮食供求的平衡，维持产棉区棉粮的合理比价；同时足以减少外国粮食的进口到最低限度，以还击敌人的封锁，并在对外贸易上造成对我更为有利的形势。

3月16日　为了合理使用国家资财，克服囤积浪费现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并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统一领导。

3月24日　为了克服国家收支不平衡与收支机关脱节的现象，为了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的管理，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

同日，为了保障军需民食，调节市场供求，实现本年财政收支概算，政务院作出《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

同日，为了减少浪费，增加口粮，政务院决定改变粮食加工标准，制用九二米八一面，并规定：一切粮食公司商店只许出售粗米粗面。如果人人都吃九二米八一面，全国一年可节粮八亿斤，而且营养成分对身体好处极大。

（4月2日《人民日报》）

3月27日　新华社报道，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华北各地不少农民和农村干部害怕发展生产，认为生产好了、富裕了，就是"冒了尖"，就会"招风"，就会被"斗争"。华北各领导机关正在采取各种办法，如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力宣传政策，并发布保护地权财权的具体规定，克服一部分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对于发展生产的各种思想顾虑，提倡劳动发家，生产致富，借以展开今年的农业生产运动。

同日，中苏签订民航公司协定，公司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经营北京至赤塔、北京至伊尔库茨克、北京至阿拉木图等民航线。

（4月2日《人民日报》）

3月28日 中苏两国签订协定创办两个联合股份公司，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开采新疆石油及有色金属。

3月31日 为了保护搬运工人生活，扫除货物流通障碍，政务院决定，设立统一搬运公司，废除封建把头制度。

（4月4日《人民日报》）

4　月

4月7日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联名发出命令，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并公布政务院决定，指定人民银行为执行机关。

4月8日 新华社报道，各地灾荒基本上已停止发展。在去年底今年初时，全国灾民曾达四千万，但其中真正亟待救济者，仅为因解放前国民党匪军的多年破坏摧残而遭受巨大水灾的七百万灾民。两三个月以来，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拨粮十二亿斤进行救灾，各级人民政府亦进行了艰巨的组织工作，全力领导灾区人民生产自救，并广泛发动社会互济，终使严重的灾荒停止发展。

4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执行不久，已获初步成效，京沪物价开始稳定。十多年来，中国人民饱受物价波动之苦而形成的“轻货币，重实物”的畸形心理，在许多新的事实面前开始扭转过来。

4月11日 中央水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批准中苏条约及协定。毛泽东主席说：中苏条约和协定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同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保证棉、麻与粮合理比价的通告》，指出：“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棉、麻生产剧减。兹为求得迅速恢复，除改良种子和栽培方法外，规定棉、麻与粮食合理的比价，使工业农业生产两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根据棉，麻与粮食作物收获的比较，粮食供需和调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及历年棉，粮价格的比例，1950年应保证如下的比价：每斤八分之七时中级皮棉折粮数，华北及山东主要产棉区为小米八斤，河南及陕西主要产棉区为小麦七斤，长江流域各主要产棉区为大米六点五斤；每斤中等麻（麻皮长七尺）折粮斤数，华北青麻为小米二斤，黄麻及其他麻类，各省区自行拟定。

4月1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听取和批准了陈云副总理《关于财政和粮食状况的报告》。关于财政方面的状况，报告指出：“财政收支已经接近平衡，这是与去年根本不同之点。”“今后数月的工作，……应将重心转到调整工商业方面去，并做出可能和必要的成绩。”关于去年的灾情及今年的全国粮食准备工作和救灾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各地所需粮食，政府已有充分准备，为了保证民食，正在调运粮食；各项

救济灾民的粮食共十五亿三千多万斤。报告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春荒，帝国主义者注定要失望。毛泽东主席就陈云的报告讲话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行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同日，新华社报道，据各地报告，全国 1949 年度征粮工作已接近完成。1949 年度的公粮征收了作虽因广大新区工作基础薄弱，许多地区又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破坏和轻重不等的灾害，遇到种种困难，但在农民的高度爱国热情和各级干部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其中，东北，内蒙、西北均超额完成任务。

同日，新华社报道，3 月份以来全国物价普遍稳定，这是人民政府 2 月全国财政会议之后，力求平衡收支的重大成就。3 月份各大城市物价平均跌落了百分之十二。北京各界人民欢呼物价稳定。

4 月 20 日　中苏签订贸易及换货协定，并签订 1950—1952 年由苏联供应我国各种工业装备及器材汉定书。

4 月 21 日　新华社报道，东北新区土地改革全部完成，为大生产运动打下有利基础。华北新区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热烈投人大生产运动。

4 月 25 日　实施中苏两国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公司成立，领导职位的分配及人选已由双方议定。

5　月

5 月 16 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指出“当前林业工作的方针，应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重视森林，保护森林》。

5 月 21 日　新华社报道，东北三千万农民土地改革后，购买力今年预计比去年提高将近百分之七十，给城市工商业提出了广阔发展远景。

5 月 25 日　《人民日报》报道，关内今年雨水充足，小麦可望丰收，产麦地区群众要求政府收购，中央人民政府亦为了帮助关内灾民渡过当前青黄不按的严重困难，由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决定，将东北巨额剩余粗粮交贸易部换关内小麦，并由贸易部以纱布及其它工业品偿付东北。

5 月 26 日　为了调整五种经济，实行统筹兼顾，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圆满闭幕。会议第一阶段由各地代表报告了各地工商业情况。第二阶段研究了目前全国工商业困难的原因和必要的与可能的解决办法；检讨了公私企业，即工业，商业、金融各方面的关系等问题。今后将陆续召开有私营工商业代表参加的一系列专业会汉，具体进行调整工作。

（6 月 4 日《人民日报》）

5月30日 据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计：3月份赤字比2月份减少百分之七十一点八，至4月份收支已接近平衡。这是3月以来全国物价普遍稳定的基本原因。

5月31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减轻人民负担，决定自6月1日起将现行食盐税额减半征收。

6 月

6月6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提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0页）

6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营企业采取委托加工、定货，收购和发放贷款等形式扶植私营企业，使部分私营行业产销情况日趋好转。

6月14日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指出土地改革为中心议题。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希望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一个土地改革法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付诸实施，首先使十余万正在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早日学习这个法案，以便在今年秋后大约有一万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一、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二、土地的没收和征用；三、保存富农经济；四、关于分配土地中的若干问题；五、在进行土地改革时若干应该注意的事项。

（6月15、30日《人民日报》）

6月15日 陈云副总理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问题。（一）关于目前经济战线上的一般形势，报告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为独立自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

点，由落后到进步的历史转折点，由坏情况到好情况的历史转折点”；（二）关于调整工商业，报告指出：调整工商业这个题目中，问题很多。它包括调整公营工商业与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公营与公营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工业与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城乡关系问题，调整国内各区域间关系问题，调整各企业内部关系问题和调整出入口关系问题等；（三）关于调整税收，报告指出：“我们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征收公粮的工作，在地区上和在负担面上有畸轻畸重的现象，负担面太窄，使得一部分人负担过重的现象是比较地多。城市税收方面，同样有畸轻畸重的情况，也有逃漏税的情况。税目太多，有的重复，有的不明确。计税方法和估价不统一，许多手续错误。”

（6月19日《人民日报》）

6月17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人民日报》于19日发表短评《认真救济失业工人》。

6月23日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闭幕，会议全体一致在原则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核通过后颁布施行。

6月28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共六章四十条，第一章总则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6月29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通知：全国开始调整税收，规定停征合征减税退超项目，自7月1日起全国一致执行。

6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自即日起施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为实现金中国土地改革而斗争》。

7　月

7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东北全部，华北大部及河南一部，约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凡是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农村面貌已是焕然一新，同时工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

7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入春以来，华北各地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的农业生产政策的教育，已深入广大农村。农民中怕“吃大锅饭”，怕再“平分”的顾虑已开始消除。农村生产呈现着新的活泼气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为华北农民生活的富裕而奋斗》。

7月14日　政务院第四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农民协会组织通则》。通则的总则第一条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第三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7月27日　全国合作社工作者首次代表会议闭幕，会议期间，刘少奇、朱德同志曾到会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合作社联合总社。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合作事业迅速发展，社员超过二千万人，资金达三千七百余亿元。会议确定：今后要整顿业务，走上正轨后，再稳步前进。

(8月11日《人民日报》)

8　月

8月4日　为了正确地实施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8月21日《人民日报》)

8月11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和《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

(8月17日《人民日报》)

9　月

9月4日　新华社报道，7月间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举行全国进出口贸易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对外贸易，并在这一前提下，调整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公私关系。会汉认为：进出口贸易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与扶助生产，调剂市场，平稳物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私合作，开展对外贸易》。

9月5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这一条例的重要性在于：关系着广大新解放区约二亿六千余万农村人口的负担和八亿余亩土地的农业生产；同时，新解放区农业税在全国农业税中占有极大的比重，而农业税则是目前国家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收入之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正确执行新解放区农业税制而奋斗》。

9月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新解放区征收农业税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关于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农业税的税率降低了，国家公粮加地方粮占农业总收入由去年的百分之二十降低至百分之十五。各阶层的负担都减轻了，各阶层的负担比例更趋于公平合理。

9月9日　新华社报道，8月份全国物价继续保持稳定，国营贸易公司正积极调整粮棉价格，因为各地粮阶基本上虽已停止下跌；但一般地区大米及粗粮价格牌价高于市价情况依然存在，新棉一般水杂较多，而其价格在有些地区竟与陈棉相等。

9月15日　新华社报道，物价稳定，城乡交通逐渐畅通，人民币流通地区日益扩大，几十年一直使用银元的地区，现在也已愿用人民币，

(9月19日《人民日报》)

9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

规定》。制定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土地面积和常年应产量的计算标准，保证新区老区农业税征收政策的正确执行。

同日，为了廉价供应工业，交通与民间用煤，中央燃料部减低各矿煤阶．其中，华北区煤价最低，平均每吨售价七点五元，减低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四（减低了二点四元）。

（10月16日《人民日报》）

9月25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今天在首都联合举行开幕典礼。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说："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10　月

10月8日　毛泽东主席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页）

10月9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发《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及《发明审查委员会规程》。

（10月17日《人民日报》）

10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了确保豫皖苏三省免受淮河水灾，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上中下游的不同情况，实施蓄泄兼筹作为治理淮河的方针，并拟定明年应办工程，设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

10月25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11月15日《人民日报》）

10月29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制定这一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雇佣劳动者的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与顾虑，特依据目前国民经济条件而制定的。

11　月

11月27—30日　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临时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确定发展计划和方针；在全国总社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交换各地物资；几种生活必需品应廉价定量配售，应采用赊购办法活跃城乡间贸易；应依社员需要进销，反对追逐高额利润。

（12月16日《人民日报》）

12　月

12月7日　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于11月23日至12月7日召开1950年全国水利会议，会议提供今年水利工程完成土方为四亿公方，对于减轻水灾危害，保证全国丰收起着重要作用，会议认为：由于美帝扩大侵略战争的结果，巩固国防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为此1951年水利建设，第一，要掌握重点，厉行节约；第二，要加强计划设计工作，改进计划审核制度；第三，加强施工中的组织领导，规定民工工资的统一的计算原则；第四，健全财务机构，加强财务工作。

(12月11日《人民日报》)

12月8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七条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的规定制定的。

12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生产竞赛运动，目前已在全国的二十四个省及十三个城市中迅速广泛展开。

12月19日　政务院发布命令，公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屠宰税暂行条例》、《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人民日报》在《拥护新税法、迎接新任务》的社论中指出："保证税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制订与执行全国统一的税法"。"这些税法的公布是国家财政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12月22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办法》。

12月25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及《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的指示。目的是为能主动地掌握与调剂货币流通以巩固金融，使属于国家的但分散在各单位的资金更能充分集中统一、有效使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中资金的巨大需要，并促进经济核算及计划的执行。

(12月30日《人民日报》)

12月26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陈云副总理作了《关于1951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的报告》，并一致通过《关于1951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

12月2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命令，管制清查美国在我国境内的财产，冻结美国在我国境内的公私存款。

同日，全国合作总社于12月17日至28日召开贸易采购会议，会议作出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社员实行定量配销，三百万社员因此将得到廉价配售物品。

(1951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12月29日　政务院通过《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共四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核准及整记；第三章企业对内对外关系；第四章附则。其宗旨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鼓励并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

同日，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招待记者，在谈话中指出：迄今年年底止，全国通车线路已达到二万二千余公里。表现今年铁道工作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

铁路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的完整的运输计划。

12月31日 3月份以来，全国物价基本稳定，据北京、天津，上海，西安、重庆、广州等六大城市三十二种商品加权指数（以1949年12月31日为基期100）统计：1950年12月26日为176.7，比一年前上升仅76，7%，根本扭转了1949年内物价4次波动，上涨19倍的趋势，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空前重要大事之一。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稳定物价，一年来曾制定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首先，从1950年3月份起，实施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基本上结束了多年来物价波动的局面。其次，5月份以后，人民政府又开始调整工商业，改善了物价稳定和虚假购买力消失后的商品暂时滞销现象，使全国物价更趋稳定。

1951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在1951年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阵地，认真地恢复和有重点地发展全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并为进一步的发展生产作有系统的准备工作。

1月4日 为了保证人民穿衣的需要和稳定物价，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统购棉纱命令。根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

1月5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该办法所称企业，系指公私合营企业，及有公股公产的私营企业。

（2月9日《人民日报》）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民协会组织日益壮大，目前正在领导广大解放区农民从事减租或土地改革运动。据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不完全的统计，现已拥有会员六千数百万人。

1月7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一年工会工作获得重大成就，全国工会会员四百九十多万人．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生产建设事业。

1月12日 政务院会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目前农业生产在我国建设的整个系统中，还占着最大的比重。进行水利工作，防止可能发生的水灾，又是目前农业增收的主要保证之一。虽然1951年在美帝继续侵略台湾，朝鲜的情况下，巩固国防成为国家当前的首要的任务，但是中央人民政府1951年的水利投资仍然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2月7日《人民日报》）

1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闻名的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为了使爱国主义竞赛经常地开展下去，已提出五项条件，向全国务厂矿工人挑战。

1月27日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具会议于今日闭幕。去年各地推广新式农具五万余件。

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经过去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解放军战士以及沿线农民的积极整修和新建，全国公路的通车里程已由解放初的一万六千多公里，增加到十万余公里。对全国物资交流起着极大作用。

1月30日　第二届全国水产会议于1月20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51年全国的水产生产方针仍以恢复为主。会议讨论并解决一百二十多万渔民的组织问题，鱼货产销问题。

(2月3日《人民日报》)

1月31日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办法》。

2　月

2月2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1951年农林生产的决定》指出，1950年农林增产计划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全国粮食较1949年增产百分之十点八，皮棉增产百分之五十八点九，为了保证1951年农林增产计划的胜利完成，各级人民政府须贯彻以下各项农林生产政策：一、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老解放区，切实保护人民已得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二、贯彻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三、劳动互助组，应受到人民政府的各种奖励和优待；四、执行奖励主要工业原料作物生产的价格政策，保证棉粮、烟粮和麻粮合理比价，保证收购和运销；五、实行山林管理；六、奖励兴修水利；七、保障牲畜喂养者的利益；八、鼓励农民投资扩大再生产；九、在某些闭塞地区，粮食产量较大而无法运出销售者，……还应提倡养猪养牛养马及经过政府批准进行烧酒生产；十、严禁地主、特务、反动会道门的一切破坏行为。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完成今年农林生产任务而奋斗》。

(2月15日《人民日报》)

2月4日　根据1951年1月6日政务院第六十六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第三条（3）的规定，周恩来总理发出《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

(2月9日《人民日报》)

2月10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的《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及《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已在各地实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实施货币管理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货币管理的基本意义，是中央人民政府规定以国家银行为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清算、信贷与现金管理的机关"。

同日，1950年2月14日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196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换文，规定特大连市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

之财产，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的财产清单，包括在北京，大连和东北的宅舍、仓库、工厂、水电站等六百余处及大连港港湾设备与装备等。

2月18日　中共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决议要点。其一、三点如下：

一、二十二个月的准备工作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三、土改

1、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

2、争取今年丰收。

3、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

4、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

5、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

6、同意华东分期退押的办法。

7、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

8、土改后，增划区乡，缩小区乡行政范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35页）

2月2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决定从3月1日起实行。这个劳动保险条例以国家法律作保障，切实解决广大工人、职员生活中从来最感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的困难和顾虑。这又是一个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伟大法令。27日《工人日报》发表社论《切实执行劳动保险条例》。

同日，2月26日闭幕的农业工作会议，决定开展爱国生产运动。争取今年全国丰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群众性的提高农业技术运动，争取1951年农业丰收》。

(3月2日《人民日报》)

3　月

3月6日　新华社报道，为了保证今年农作物丰收，山西省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所领导的劳动互助组向全国挑战。农业部号召各地奋起应战，形成爱国竞赛热潮，以便顺利完成今年全国农业增产的重大任务。

同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规定：“为巩固国家货币币值，稳定金融，保障人民财产，特制定本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凡携带或私运国家货币出入国境者，一律没收。”出入国境之邮件，查有夹带国家货币者，没收其货币。”

3月7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保证棉粮比价的指示》。为了顺利地

完成1951年增种棉花的要求，除仍由各级人民政府大力进行组织动员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各种困难，改良种子及栽培方法外，特对棉花价格作适当的提高，以奖励群众大力植棉。

1951年应保证棉粮比价，每斤八分之七时中级皮棉换粮数量：河北、平原，山东换小米八点五斤，山西换小米九斤；陕西、河南换小麦八斤；湖北等地换中熟米八点五斤。

3月14日 中苏签订铁路联运协定，从4月1日起建立两国间旅客、行李、货物的联运。

（3月30日《人民日报》）

3月20日 为统一币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至此，在已解放的国土上，除新疆外，全国币制已经完全统一了。这也是继1950年统一财政收支与管理后，进一步的统一措施。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一币制，进一步沟通关内外物资交流》。

（4月1日《人民日报》）

3月29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为巩固国家财政工作的统一管理与统一领导，并适应全国各区、省、市的经济状况与工作条件，做到因地制宜，决定将1951年度的财政收支管理划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及省（市）三级。

（4月5日《人民日报》）

3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共十章一百零五条，第一章通则；第二章独资；第三章合伙；第四章无限公司；第五章有限公司；第六章两合公司；第七章股份有限公司；第八章股份两合公司；第九章公司债；第十章附则。

3月3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和公布《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公布该决定的命令中指出：全国城市地方财政，经过一年的整理，基本上克服了乱收乱支的现象，但大多数城市的地方收支仍感入不敷出。为了保证某些地方事业的开支，各地会不断要求增加新的收入，或则请求中央补助。为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特召集第一次全国十二个大城市的财政工作会议加以讨论，并对平衡财政收支问题作出《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

（4月6日《人民日报》）

4　月

4月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1951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国营工业生产控制数字；（二）关于国营工业投资控制数字；（三）关于国营地方工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四）关于加强工

业的经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五）关于企业中的生产竞赛。

（4月30日《人民日报》）

4月1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并决定5月1日起施行，同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

（4月28、29日《人民日报》）

4月23日　《人民日报》转载2月19日《东北日报》社论《目前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提高一步的关键》，该社论认为目前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中农日渐成为农村中的多数，而地方党政应集中全力满足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新要求。

4月29日　原属前国营上海中国油轮公司的永灏轮，于1948年7月交托香港英商黄埔船厂修理。1950年4月1日该轮全体员工宣告起义，返回祖国怀抱。而香港英国当局无理劫夺我国永灏号油轮。

4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征用我国境内各地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5　月

5月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指出："在继续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计划和管理的原则下，把财政经济工作中一部分适宜于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中央与地方财经工作职权的划分》。

（5月26日《人民日报》）

5月9日　中央治淮视察团抵开封，代团长邵力子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授予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达成协议，并在北京隆重举行签字仪式。

5月24日　新华社报道，为了把黄河下游的水患变成水利，引黄灌溉和济卫工程动工。

6　月

6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在此新旧棉花青黄不接期间，各地棉农虽确有存棉在手，但不肯出售，因此国家购入棉花甚少，使全国纱厂的原料供应更加困难，纱厂因此已开始停工。……因此，必须在全国棉农中开展一个爱国主义的售棉，储棉运动。"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保证购棉，储棉任务胜利完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

6月2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

6月4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按定资金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东北外，各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均未正式核定，以致很多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仍保持着或多或少的供给制作风。"《决定》规定："全国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应一律重新清理登记，并按1951年8月底的人民币价格，重新估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第一步》。

6月19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严格检查基本建设工程设计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基本建设中，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即行盲目施工的现象是严重的。"

6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1951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这是根据卤家的税收政策，参照1950年农业税工作的经验和当前全国农村经济的不同情况制定的，指示确定"农业税税率仍采用全额累进制，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最低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全国各地区农业税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百分之二十，随同农业税附征之。"

6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作好1951年农业税工作》，社论指出："农业税在目前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国家的最主要收入之一，而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的贯彻，不仅对于国家财政收入是一个重要保证，而且是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的重要条件。"

6月22日　因各地法庭在没收反革命财产的裁判及处理上尚不一致，政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于第九十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7　月

7月20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预算决算暂行条例》，8月20日《人民日报》公布该条例，并发表社论《把国家预算决算工作提高一步》。

（8月20日《人民日报》）

7月21日　新华社报道，预定的购棉储棉任务，在6月份只完成了约百分之五十。这是远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的。因此，购棉储棉，仍是目前紧迫的重要任务之一。《人民日报》特此发表社论《为购棉储棉的更大成绩而斗争》。

7月31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国营企业资产清理及估阶暂行办法》、《国营企业资金核定暂行办法》。

8　月

8月8日　为了进一步推进爱国公约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党对爱国公约运动的领导》。社论指出，"爱国公约运动正在发展成为持久的经常的运动"，"它正在成为鼓舞全国人民保卫和建设伟大祖国的无比强大的力量"。

8月13日 我国目前木材的情形是需要日广，资源不足，而浪费严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此发布《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制止浪费国家木材资源的行为》，社论认为：木材问题，现在已成为全国的重要问题之一。

(8月17日《人民日报》)

8月17—19日 青岛市召开棉纱细纱职工代表会议，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方法。如果全国细纱工都象她少出皮辊花，全年可增产四万四千四百六十件纱。

(8月24日《人民日报》)

8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布指示，放手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包工问题十分严重》。文章指出：建设一个新工厂，建筑工程要占二分之一左右，而一般性的建设，则基本上是建筑工程。这就是说，国家对基本建设的全部投资，有半数以上是用在建筑方面的，而目前进行建筑工程还主要靠自由包工。文章指出目前包工中有相当严重的问题：1.包工者普遍地唯利是图，不顾工程质量；2.层层转包，投机倒把；3.封建把头，超经济地剥削建筑工人；4.不择手段，贿赂成风。

8月31日 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闭幕，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国营贸易公司的任务是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正确执行价格政策，团结私商，使得物资能够顺畅流通。

(9月4日《人民日报》)

9 月

9月14—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论厂矿企业中民主改革的补课问题》。文章认为，民主改革这一课，在国营企业方面，是把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在私营企业方面，是把旧民主主义的企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企业。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或步骤，是建立党团工会组织和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等工作的先决条件。

9月20日 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于9月11日至20日召开全国林业行政会议。指出当前我国森林情况的基本特征是：资源不足，需要日广，而林木的损失与浪费情况仍然严重存在。今后的林业工作方针，必须采取一切有效办法护林、护山，把严防山火列为林业工作中的头等任务。

9月22日 根治淮河的第一年工程已经在汛期以前胜利完成，中央水利部治淮通讯组发表文章《把淮河千年的水患变成永远的水利》。

9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物价一年来保持基本稳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计，9月上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大城市二十五种主要商品批发物价的平均总指数，为1950年12月31日的一百一十四点八，比去年年底微升百分之十四点八，一年全国物价的特点是四季始终稳定，其中工业品价格又稍高于农产品。全国物价保持基本稳定，是我国各项经济建设的伟大的综合成果，它反映了我国金

融，币值的稳定。

9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人民铁路建设成绩巨大，原有线路全部畅通，今年修新路六百七十公里，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城乡物资交流有很大贡献。

10　月

10月1日　新华社报道，创造全国棉田单位面积最高产量的曲耀离互助组决定要把自己的棉花尽早地全部售储给国家，并向全国产棉区互助组及棉农发起爱国售棉储棉挑战，全国各地产棉区农民向曲耀离互助组应战，保证把全部新棉卖给国家。由于国内各地收购的棉花陆续运到上海，同时又获得苏联棉花的支援，上海五十三京公私营棉纺织工厂开始加班生产。

（10月10日、20日《人民日报》）

10月23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京开幕，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为了继续坚持抗美援朝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同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报告分为七部分：一，目前形势；二，外交与国防；三，土地改革；四，镇压反革命；五，政权工作；六，民族关系；七，统一战线。

（10月24日、11月3日《人民日报》）

10月25日　陈云副总理在中国人民改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报告分为三部分：一，农业情况；二，工商业情况；三，财政情况。

（11月4日《人民日报》）

11　月

11月16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布《关于争取按期完成武器捐献缴款工作，并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自从本会6月1日发出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以后，截至11月15日止，全国人民认捐总数已达四亿一千一百二十四万余元，缴款数目占认捐总数百分之八十四点五。

11月20日　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并由拿议一致通过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

11月21日　全国织布工作会议以郝建秀工作法为基础，集中全国各先进操作经验

和理论知识，总结出“1951织布工作法”，会议号召全国纺织部门切实推广和执行这一工作法。这一工作法的推广，为全国织布厂解决熟练工人不足的困难，实行新的更合理的定额、改革工资，实行经济核算制准备了有利条件。

11月26日　青年团中央于20日至26日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号召青年团员向贪污浪费现象坚决斗争。

(1952年1月9日《人民日报》)

11月27—28日　《人民日报》报道，从今年2月至目前为止，全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举行的各种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已有三十一起。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其中二十一个展览会的观众达一千零七十万人，二十三个展览会中成交的货物价达五亿二千二百余万元，这些展览会都有很大的成就。27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工作总结》一文，28日发表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的成就报道，指出展览会的成就是：具体地表现了我国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大地增强了广大城乡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使工农联盟的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了。并且给广大农民群众指出了一个远大的前途。还给广大城乡人民指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改进工商业经营方向。展览会又是一个大市场，等等。

11月28日　增产节约运动已在广大农民中逐渐展开，各地农民热烈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纷纷集会讨论增产节约的办法，并修订了爱国公约或制订了冬季增产节约计划，积极为明年的爱国生产运动作好准备。

11月30日　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重要指示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3页)

12　月

12月1日　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揭发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会议还清算了人城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和影响。

(12月30日《人民日报》)

12月7日　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会议并通过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12月16日《人民日报》)

12月8日　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重要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

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4页）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主席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一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9页）

12月2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委员会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层开校定资金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虽在进行，但发展不平衡。"《指示》要求国营企业"在伟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结合编制1952年计划来展开校定资金工作，定可正确地核定资金，为实行经济核算制打下坚实的基础，"《指示》认为："资金的严格节约，首须按定企业资金，从而进行资金管理，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合理的运用。"

（1952年1月4日《人民日报》）

12月81日　《人民日报》报道，本月份各大行政区，各中央机关，各省市，先后召开为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大会，"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52年

1　月

1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元旦团拜，毛泽东主席致祝词，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1月5日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周恩来副主席作重要报告，指出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周副主席指出，对于这些必须给予打击和铲除。同时，周副主席号召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进行自我改造。

1月9日　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指示，继续发动群众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政治斗争。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

任薄一波作了《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

同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并附各种事业基本建设的限额。

《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共有八节三十六条，第一节，总则；第二节，组织机构；第三节，设计工作；第四节，施工工作；第五节，监督拨款与检查工作；第六节，验收交接与工程决算；第七节，计划的编制与批准；第八节，附则。

对于各种事业建设的限额的规定：燃料工业三百万一五百万元，重工业二百万一五百万元，轻工业五十万一一百五十万元，纺织工业一百万一三百万元，其他工矿业一百万元；铁路一百万一五百万元，航务公路一百万一二百万元，邮政电讯一百万一三百万元，农业五十万一一百万元；林业五十万一一百万元，水利二百万一五百万元，土木建筑三十万元，试验研究三十万元。

（1月12日《人民日报》）

1月11日 政务院政务会议扩大举行，周恩来总理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方向、政策、步骤和运动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明确指示。

1月21日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号召中央一级机关，除继续普遍清查贪污，浪费外，应即把主要精力，转入对大贪污犯的斗争。

1月26日 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重要指示："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页）

2 月

2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对大贪污犯薛昆山（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混入我国营贸遏机关，曾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查明非法所得财产达二十三万元以上），宋德贵（曾任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达九万元以上，个人从中贪污六万四千元）判处死刑。

在公审大会上，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讲话指出：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曾经而且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的进攻。

2月10日 河北省人民法院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对刘张两犯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2月15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决定中规定：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

（2月27日《人民日报》）

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以来，上海市工商界逃税偷税的行为极为严重。从1949年5月到1951年年底，上海市税务局已查出依法处理的案件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五十六件之多，逃漏税款总数在二千六百万元以上。

2月29日　重庆市破获"星四聚餐会"，"星四聚餐会"是重庆的一批著名的资本家所组成的向国家经济事业大举进攻的指挥机构。

3　月

3月5日　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运动的重要指示，指示指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在"五反"中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5页）

3月1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业经本院3月8日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兹特公布，望各地遵照试行"。并指出："在'三反'和'五反'运动结束以后，国家建设工作即将迅速地转入新阶段。"

3月12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了完成1952年的粮食增产计划，以提高棉田和粮田的单位面积产量，特此发布了《关于1952年棉粮比价及棉田的公粮负担的指示》。

同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决定结束机关生产。《人民日报》13日发表社论《把机关生产交归国家管理》。

3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谈话若干要点：

1. 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
2. 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
3. 很好地团绪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9月14日《人民日报》）

3月23日　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重要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目的，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废除后帐，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7、58页）

4　月

4 月 3 日　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四十二个国家的经济界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我国代表。

4 月 10 日　《人民日报》转载《学习》杂志 1952 年第 4 期冯定的文章《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学习》杂志编者按：《学习》杂志本年第一、二、三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4 月 16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降低商品牌价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最近全国各地国营贸易部门和合作社陆续降低了大批商品零售的牌价。这些商品主要的是日用百货。上海有一万多种商品降低了牌价，北京有近四千种商品降低了牌价，这些商品牌价降低的幅度，由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平均约在百分之八左右。"

4 月 18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已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财政节约方面获得了巨大成绩。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著名的钢都——鞍山，从今年 4 月份起，已跨过艰巨的恢复时期，转入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阶段。这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的先声。

(11 月 25 日《人民日报》)

5　月

5 月 1 日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等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决定》。

(5 月 7 日《人民日报》)

5 月 31 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市"五反"运动基本结束，私营工商户积极恢复发展生产和营业。

(6 月 3 日《人民日报》)

6　月

6 月 1 日　对于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间正常贸易有重要开端意义的中日贸易协议，今天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签字双方在以货易货的基础上，每方购人与售出各为价值三千万英镑的货物。

6 月 5 日　新华社报道，今春全国共造林五百零二万亩。

6 月 6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顺利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5 月 30 日至 6 月 6 日

召开了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确定西北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计划，步骤和方针。

(8月17日《人民日报》)

6月7日　《人民日报》经济工作述评指出，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据三十五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一百零二个国营农场向国营双桥实习农场等农场应战，有五千三百五十一个著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向李顺达、曲耀寓等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应战。同时，有些挑战应战单位，正在以连环竞赛方式，层层发动群众，把竞赛运动推向广大农村。

6月10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五反”运动取得预期的伟大胜利，到目前为止，除极少数一贯进行非法活动而又拒不坦白的不法商人的问题须继续解决外，全市十六万工商户中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交清问题，迅速转入生产。

6月13日　全国各地“五反”运动先后进入结束阶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主要是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退赃与定案工作相配合等。

6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1952年农业税收的总方针是：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切附加。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不仅可以使农民的负担更加公平合理，使国家的税收更有保证，而且将会进一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

6月17日　华北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华北地区的“三反”，“五反”运动，业已获得伟大成绩，今后应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之上，集中全力加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工作。

6月24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公布全国人民捐献武器款，共达人民币五亿五千六百五十万六千二百三十元。

6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

6月28日　中央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就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全国农业季节已进入紧张阶段，坚决贯彻爱国增产竞赛，已成为决定胜利的重要关键。

6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据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统计：全国共有互助组六百余万个、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千余个；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有三千五百余万户，约占全国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左右。

同日，新华社报道，据中央农业部召开新式农具推广座谈会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推广新式农具工作，只有东北完成全年计划一半以上，察哈尔省接近全年计划的半数，其他地区大部做得很差，有的仅完成全年计划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8月31日《人民日报》)

7　月

7月1日　四川的成渝铁路通车，毛泽东主席题词：“庆祝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

力修筑天成路。"

7月2日　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于6月30日闭幕，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团结全国工商业者，争取国家经济的更加繁荣》。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

7月6日　新华社报道，东北工业生产的恢复阶段今年将基本结束，有重点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现已开始，因此，基本建设已提到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英国政府枢密院司法委员会非法搏我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飞机四十架及其他资财"判给"美国骗子陈纳德后，香港英国政府在同日午夜就开始其劫夺暴行，我两航（中央、中国）留港员工，坚持护产斗争。

（8月8日《人民日报》）

8　月

8月1日　政务院第一百四十七次政务会议上，中央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作《〈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说明》，会议通过《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确定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该《通则》于8月16日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命令公布施行。

（8月18日《人民日报》）

8月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三年来，在就业问题上有显著成绩。首先，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时所有旧公教人员，人民政府在接管时采取了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由于三年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各项建设工作的展开，绝大部分已重新就业。截至1951年12月为止，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重新就业约二百二十万人。

8月6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财政部长薄一波《关于1951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1952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编成的报告》，并通过了1952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这个报告指出，1952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支已经达到完全平衡。而收支平衡，经济恢复与物价稳定，则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

（8月11日《人民日报》）

8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抵莫斯科。随同前往的有：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等。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机场上发表讲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到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

8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东北区有重点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经过充分的准备，现已普遍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

8月23日　天兰铁路完成了铺轨工程，第一列火车已抵达兰州车站。毛泽东主席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9月28日《人民日报》）

8月27日　为全面了解各种失业人员的情况，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别处理，实现劳动就业，必须进行失业人员的统一登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发布《关于失业人员统一登记办法》。

9　月

9月4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中央农业部发出了《关于开展秋季作物丰产评比运动的通知》，《关于开展1953年小麦爱国丰产竞赛的意见》，《1952年农业丰产奖励暂行办法》。这些文件的中心目的是鼓励农民群众总结、推广先进丰产经验和农业科学技术，以便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9月16日　新华社从莫斯科报道，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谈判的中苏公报指出："在谈判过程中，讨论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同意着手进行各种措施，以便苏联政府在1952年年底以前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9月2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古总结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约有三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在这三年之中完成了土地改革。加上三年以前即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土地改革取得胜利的原因是：第一，在土地改革中，坚决执行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规定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与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第二认真贯彻了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做到了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第三，建立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10　月

10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缔结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10月5日　我国与锡兰在京签订贸易协定，同时签订我国售给锡兰八万吨大米的合同，这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一般贸易协定。

10月6—21日　中央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确定了1958年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和计划，要求1953年大力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推广科学技术，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爱国丰产运动。

(10月31日《人民日报》)

10月17日　塘沽新港举行开港典礼，这是我国人民以自己力量修建起来的第一个规模宏大的商港，对发展海上运输和促进国内外贸易有很大意义。

10月22—23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讨论加强基本建设工作，陈云主任指出：今后几年，基本建设工作将在经济工作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并指示：迅速调集干部充

实工作机构。

(11月18日《人民日报》)

10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转载苏联《真理报》10月3日社论《对于马克思列宁理论的伟大贡献》。

11 月

11月6日 首都各界举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毫无疑问，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更好地学习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同日，中央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行政会议闭幕，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次会议决定今后要在重点地区展开大规模造林育林运动。

(11月16日《人民日报》)

11月15日 为了适应1953年即将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有必要加强国家工作的集中性，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我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

11月20日 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通车，大队汽车开进了昌都。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筑路部队和民工题词，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总司令的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12月1日《人民日报》)

12 月

12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高等教育部为了发展和改进全国高等工业教育，大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材，今年在全国高等工业学校中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调整前，全国共有高等工业学校三十三所，学生四万八千余人，调整后学校已增加为四十四所，学生增加为六万八千余人。

12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国营贸易的经营积极性，积累资金，改善商品流转，更好地增强计划性，组织性，团结各种经济成份为生产及人民生活服务，迎接就要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已遵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拿的指示，决定国营贸易企业在1953年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制。

12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秋季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召开了各种形式的物资交流会，这些物资交流会是在今年农业丰收，和工业品增加的基础上举行的，因此，会上的成交额一般比往年为多，有的超过了好几倍，充分显示广大农民的购买力日益提高。

12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锡兰政府为了买卖橡胶和大米而签订

五年橡胶和大米贸易协定。同时，签订 1953 年大米和橡胶两个合同。

12 月 23 日 新华社报道，11 月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调整商业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营商业的领导作用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商业的积极性，以便进一步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迎接就要开始的大规模经济边设。

12 月 25 日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的信用合作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信用合作社一千七百六十四个，信用互助组五千二百三十九个，供销社的信用部一千一百二十一个。各地信用合作组织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和扶植群众生产上，取得了很大成绩。

12 月 27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命令，规定财政部门设监察机构，并颁发了《省（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经机关与国营财经企业部门监察室暂行组织通则》。

（1953 年 1 月 6 日《人民日报》）

12 月 31 日 根据全国财政经济情况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现行工商各税的税法是 1950 年公布的，基本上采取了“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关于税制若干修正》的特点就是：保证税收，简化纳税手续。例如：原来厂商应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营业税附加，今后一律并入货物税内交纳。新税制自 1953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同日，在哈尔滨举行了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的签字仪式。

1953 年

1　月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 1953 年的伟大任务》。社论指出，1953 年向全国人民提出三项伟大的任务是，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第二，开始执行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3 年度建设计划；第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

1 月 5 日 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72 页）

1 月 6 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决定推行经济核算制，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会议上制订了《1953 年国家粮食企业流转计划草案》、《1953 年国家粮食企业商品流转费计划草案》及与之相适应的

若干具体计划草案。

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发布《奖励 1952 年农业爱国丰产模范》的命令，并公布了 1952 年度第一批丰产奖励名单。

1 月 9 日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六次政务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

2　月

2 月 4—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会。周恩来同志作了政治报告。肯定了几年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了今后的任务。在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同志作了三点重要指示：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第二，学习苏联。第三，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2 月 6 日、2 月 8 日《人民日报》)

2 月 12 日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关于 1953 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指出：1952 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收入超过原预算，也超过了支出，预计可以有三十亿元以上的余额。总收入一百八十九亿二千七百八十一万元。超过原预算百分之十九点一五。总支出一百六十三亿二千一百八十六万元，超过原预算百分之二十五点八五。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群众制订和讨论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社论指出，当前生产部门和厂矿的中心工作，在于正确地制订 1953 年的生产计划，并发动群众讨论，以便在正确的计划的基础上，妥善布置全年的工作，动员和组织全体人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所规定的任务而努力。

2 月 15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决议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

2 月 25 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 1952 年中，铁道部领导方面由于不调查了解货源、贷流情况，不研究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规律，盲目编制脱离实际的 1952 年运输计划，以致大部分管理局，运输分局与车站不顾运输的质量和国家运输的计划性，单纯追求数量，不择手段地招揽贷源、凑装车数，造成铁路运输中严重的混乱现象。这种盲目运输，打乱国家计划的情况必须改变。

2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发表两项规定：《关于在农村整党中处理党员雇工、放债、经营商业和出租土地等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在农村整党中处理党员和干部贪污、浪费与强迫命令等问题的规定》。

3　月

3月5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因病逝世。

3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在同志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

3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济工作述评《坚决纠正农业税征收工作中的偏向》。述评指出，1952年的农业税较1951年为轻。由于取消了附加和各种不合理的摊派，全国农民公粮负担总额比1951年减少二十五亿斤细粮。但是由于有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及一些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严重，致使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有的省发生若干农民自杀的事件。这些问题必须坚决纠正。

3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炼铁工业获得显著发展，目前有些炼铁高炉正向着机械化、自动化的道路前进。同时产量迅速增加，如果以1950年的生铁产量为百分之百，那么，1951年就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四，1952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五，达到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九。

3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各地人民踊跃报矿，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料。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从去年9月成立以来，到今年2月底为止，已接到各地人民报矿信件四百零七件，所报的矿共有三十九种。报告的矿藏分布在二十七个省份，共有八百零九处。

3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的文章《1953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特点》。文章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分析和论证了“这个预算不仅是生产的预算，建设的预算，而且是增进人民福利的预算。”

4　月

4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发布了《关于1953年棉粮比价的指示》。指示说，过去的棉粮比价出现了新的缺点：一是棉粮比价不尽合理，棉价偏高；二是没有合理的季节差价。所以，应调整棉粮比价。

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发出通知，全国粮食与纱布季节差价于4月1日同时调整。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讨论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计划管理》。社论指出，目前许多国营企业在生产上计划管理十分薄弱，必须建立和加强计划管理。

4月10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今日起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4月17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4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重视手工业》。社论指出，手工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各方面必须很好地扶持，使之发展。

同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工会组织迅速扩大，会员已达一千零二十万人，

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196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人民日报》为此于25日发表社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是全党干部的重要任务》。

4月27日　我国第一台巨型的、完全自动化的发电机已安装成功，并于今天正式送电。

(6月6日《人民日报》)

4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量力而行》。社论批评了一些部门和一些同志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计算自己的力量，不顾客观可能性的大小，因而在他们的基本建设计划和具体工作中，产生了贪多冒进的错误倾向。社论要求必须调查研究、深入钻研、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4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善国营商业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方法》。社论指出，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制，树立全面的经济核算思想，正确地贯彻经济核算制，更好地为生产和人民的需要服务。

5　月

5月8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国营厂矿企业管理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下列几点：第一，建立与加强计划管理；第二，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度；第三，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和推广先进经验；第四，逐步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第五，有计划地培训技术人材、熟练工人等。

5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增产粮食是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去冬以来，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主要产崖省份，先后遭寒流或晚霜、虫、雹等灾害。因而动员起来，必须搞好“救麦保秋”，同时对困难农户给以救济，为战胜灾荒、增产粮食、保证国家经济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而奋斗。

5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人宣传党对于互助合作运动的正确政策》的述评文章。文章指出，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当前，在保护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就成为现阶段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受灾地区减免税收办法》。

6　月

6月3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冒进偏向，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

6月5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坚决实行“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今后三年，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稳定在1962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以使农民休养生息，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

（8月30日《人民日报》）

6月8日　中央粮食部和全国合作总社发出联合指示，要求大力开展收购小麦的工作，要保证完成商品粮收购占上市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6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克服农村工作中的“五多”现象》。对于农村工作中的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表册多、组织多、干部兼职多等现象提出批评。要求各级领导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深入实际，搞好农村工作。

7　月

7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等在“七·一”前夕，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说：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保证胜利完成夏季生产，夺取今年秋季更大的丰收。

同日，新华社报道，经过两年多的建设，阜新海州露天矿正式生产。这是我国新建的第一座大型露天煤矿。

同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李富春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期内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地增长。在这一总的目标之下，相应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积极地有步骤地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作用，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7月2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的报告。报告说：今后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而为了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

7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劳动纪律是迫切的任务》，社论指出，所有企业的领导者都必须把巩固劳动纪律当成一项经常的工作，当成保证全面地均衡地完成生产计划的重要方法，以求根本改善我们企业的状况。

7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百八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

（9月2日《人民日报》）

同日，在同一次会议上，政务院还通过了《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

（10月4日《人民日报》）

7月26日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发表公报，朝鲜停战协定达成协议。敌我双方首席代表定于27日上午在板门店先行签字。

8　月

毛泽东同志在一次重要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9页）

8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石油工业日益壮大。1952年的原油产量比1951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点四九，汽油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四。预计今年的原油产量要比1951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点九，汽油产量增加还要大大超过原油。

8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的文章《巩固地发展我国与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

8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朝中人民部队联合发布战绩公报：三年来歼灭敌军一百余万，击落击伤敌机一万二千二百多架。

9　月

9月5日　新华社报道，有一百五十万民工和工人参加的今年上半年的治淮工程顺利完工。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的拦蓄洪水的工程，约可以控制淮河洪水达一百六十亿立方米。淮河沿岸人民初步解脱了洪水灾害。

9月1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9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陈云副总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

9月15日　毛泽东主席致马林科夫主席电，感谢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全面的伟大援助。

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李富春作《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

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竞赛，保证全面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9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1953年度全国水利建设工程现已基本完工。今年度水利建设的方针，是以防洪、防涝、扩大灌溉面积为重点，主要任务是继续进行淮河、永定河的根本治理，完成洞庭湖的局部修整，订出根治黄河的初步方案，并继续扩

大灌溉面积。

9月28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1952年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恢复与发展情况的公报》。公报指出，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绝大部分已经超过我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主要工业品完成计划划分比为：钢百分之一百一十八，钢材百分之一百四十二，发电量百分之九十九，原煤百分之一百零六。粮食产量一亿六千余万公吨，棉花产量为一百二十九万公吨。国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较1951年的平均工资增加百分之十一。

10　月

10月15日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7页，第119页）

10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地质工作要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社论说，地质工作是"工业化的侦察兵"、"经济建设的开路先锋。地质工作一定要赶上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努力勘测各种地下资源。"

10月26日—11月5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6页）

10月23日—11月12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

大会主席陈叔通作了题为《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的报告。

代表们一致拥护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0月24日、11月14日《人民日报》）

11　月

11月4日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另一次谈话中指出："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还指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

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

11月5日　政务院通过《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12月5日《人民日报》）

11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赂线》。社论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巩固工农联盟所必须的伟大政治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是做好一切农村工作的基本保证。

1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把私营工商业纳人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社论指出，这是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需要，在今天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也具有充分的可能性，但其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有步骤、有计划、有区别地进行。

11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社论指出，小农经济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我国小农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11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民们！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帮助国家建设》。社论说，工业化的事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事业，而且是全国人民的事业。工业是帮助农民的，但是工业又离不了农民的帮助。

11月23日　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周恩来，朝鲜的全权代表是金日成）。

1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总路线的保证》。社论指出，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是我国人民革命胜利和国家建设胜利的保证。只有沿着总路线前进，一时一刻也不离开总路线，才能有巩固的工农联盟；也只有巩固工农联盟，才能保证总路线的实现。

11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廖鲁言的文章《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纪念〈组织起来〉发表十周年》。

12　月

12月3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公布第二次全国人民慰问金捐款情况：自1952年1月22日至1953年8月31日，共计收到捐款二千一百三十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元。如从1950年11月起截止到1953年8月底共计捐款数为三千九百六十万一千零一十四元。

12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共发行公债六亿元，于1954年1月开始发行，10月1日起计息，利率为年息四厘，自1955年起每年9月30日付患一次，逐年按一定比例还本。到 ..62年全部还清，本患共计七亿三千二百万元，其中利息一亿三千二百万元。

12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到今年秋收前，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今年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生产，社员也普遍增加了收入。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鞍钢三大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第七号炼铁炉相继提前竣工，并开始生产。毛泽东主席复电祝贺，希望在生产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1954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社论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工业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好比是一只鸟的两个翅膀，必须使这两方面的任务有新的成就。

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社论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保证必要的工业增长速度，而不应该有任何的保守思想。

社论指出，1953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产，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互助组有一千万个左右，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约一万五千个。1954年要发展三万五千八百个，同时还要发屑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此外我们要改造私营工商业，继续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1月2日　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成立三周年庆祝大会，该公司在发展生产，基本建设和地质勘探工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培养了将近三千名包括七十个工种的技术工人。

(1月8日《人民日报》)

1月3日　政务院命令公布《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条例》。

1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待农民应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介绍向农民收购粮食时进行社会主义总路线教育的经验。社论说："我们发扬这次购粮工作中对待农民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反对强迫命令的作风，那么，这些工作都是能够作得很好的。"

1月7日　政务院举行第二百零一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关于目前燃料工业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

1月8日　中共中央发布1958年12月16日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义、条件、原则、方针、形式等都作了具体明确的指

示。决议共有十项：

（一）中共中央在1951年12月所作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经过两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实行，证明其中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个总路线是一致的。

（二）土改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两个积极性反映农民（主要是中农）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前一个积极性可引向社会主义，后一个积极性易自发趋向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在工人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工业领导下，加上牢固的工农联盟，并通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形式，可以把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目前，全国参加临时的和常年的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有四千七百九十余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万四千多个，参加的有二十七万三千多农户。

（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它的重要作用在试办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显示出来。

（四）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

（五）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以下三项主要工作：

第一，增加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从而使农民能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繁荣看成是不断增进自己物质与文化的幸福的主要源泉，这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志。

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应该根据本身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改进，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使社员觉得方便可行，而又能够符合于促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

第三，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起着促进生产的作用，并且是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条件。

（六）要注意加强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同时又必须加强对发展各种形式互助组的领导。

（七）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使它们有可能在将来逐步地加入互助合作组织，促使最终有可能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八）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之间是互相分工而又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从而把农村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联结起来，逐步地在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改造小农经济。

（九）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今后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心。从1953年冬季到1954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

（十）党对农业合作运动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1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社论指出，这个决议总结了各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决议的重点是以办好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带动互助组的大发展，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前进。各级党委，特别是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必须用心学习这个决议，把它当作自己工作的指南。

1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争取实现今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社论在论述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原则以后说，是不是积极领导，是不是稳步前进，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主要表现在建社的数目多少，速度的快慢，规模的大小，在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主要表现在积累公共财产的多少和快慢，生产投资的多少，劳动和土地分红比例的大小。

1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互助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基础》，社论说，我国有一点一亿户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约有四千七百九十万户，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二十七万三千户，这说明，在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中，大量地仍是互助组；在全体农民当中，还有一大半是单干户。社论指出，在许多地区，互助组将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应加强领导，把互助组办好，并应满腔热情地去帮助、照顾和教育单干农民。

1月2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指示，要求全国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协助政府做好公债宣传和推销工作。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列宁，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同日，政务院举行第二百零三次政务会议，会议在听了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所作的《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后，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港管理暂行办法》，于23日命令公布。

1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向农民深入宣传总路线》。社论说，我们在农村推行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宣传教育、思想发动的方针，而这种宣传教育的经常的基本的内容，就是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运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更加深入的宣传教育，把总路线真正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动力。

1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用总路线的精神教育广大农村妇女》。社论说：“向农村妇女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社论要求经过宣传，逐步清除某些农村妇女中正在滋生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普遍残存的封建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上升为主要思想。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男农民一起，积极拥护和执行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1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踊跃购买经济建设公债》。社论号召干部、工人、农民、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房地产收入者、利息收入者都来自觉自愿地认购公债，通过对六亿元公债的推销和认购，提高各阶层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鼓舞全国人民支持国家建设的热情。

同日，北京车站举行北京、莫斯科间直达客车通车典礼。

2 月

2 月 6—10 日 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会汉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绪的决议》，同时通过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和在 1954 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全会公报于 2 月 18 日由《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对四中全会公报精神作了阐述。

(2 月 18 日《人民日报》)

2 月 1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工人农民的经常联系》。社论说，今年春节前后，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加强工农联系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工人对于农民、农民对于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是更加了解了，联系进一步加强了，生产积极性是大大提高了。联系的目的，是使工农双方随时知道对方的意见和要求，经常从对方的创造性劳动中得到应有的鼓舞，及时解决各种涉及工农日常利益的关系问题，以推动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前进。

2 月 10 日一3 月 5 日 国家统计局召开第三后全国统计工作会议。薛暮桥在会上作《1953 年工作检讨和 1954 年工作要点》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先后到会作了指示。

(3 月 31 日《人民日报》)

3 月

3 月 1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该项命令和办法于 1953 年 11 月 19 日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除少数地区经过政务院批准不予实行外，全国各地已全面贯彻。命令规定粮食计划收购和供应的十项内容是：

一、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交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使用，可以继续出售给国家成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也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互通有无的交易。

二、实行计划供应时，开始时可规定一些简便品行的办法，逐步研究改进，使之趋于完善。

三、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控制数字，应根据国家及人民需要和农村粮食情况作适当的规定。

四、今年秋粮计划收购的价格，基本上按照现行的收购牌价；计划供应的价格，目前基本上按照现行的零售牌价。

五、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粮

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有关部门领导。

六、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但得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理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理销售粮食。

七、所有私营粮食加工厂及营业性的土碾、土磨，一律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只能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或在国家监督和管理下，代消费户按照国家规定的加工标准从事加工。

八、城市居民购得国家计划供应的粮食，如有剩余或不足，或由于消费习惯关系，须作粮种间的调换时，可到指定的国家商店卖出，或到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相互间的调剂。

九、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各级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经常的检查和监督。

十、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应根据以上各项规定，参照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论指出，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是根据目前粮食情配和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而制定的，它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实行以来，供销情况良好，制止了投机奸商囤粮抬价，城乡人民心情安定，这是经济政策的又一次胜利，也是实行总路线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胜利。

3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重工业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社论在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义后号召全国人民集中力量保证苏联援建的一百四十一项工程胜利完成。

3月3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1954年棉粮比价的指示》。

1954年各地区棉粮比价如下：

地区	粮食种类	每斤7/8时中级细绒皮棉换粮数量
河北、山东、晋中、豫北	小米	7.5斤—8.25斤
陕西、河南、晋南	小麦	6.75斤—8斤
湖北、江西、湖南	二级米	7.25斤—8.25斤
江苏、浙江、安徽	中秈米	7.25斤—8.25斤

东北　由东北财委参考以上标准自行规定

西南　由西南财委参考以上标准自行规定

3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其他经济事业》。社论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规定，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必须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这个规定也是我国整个过渡时期中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社论分析了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批判了重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相互不重视的错误思想，要求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其他各项经济事业。

3月6日　政务院举行第二百零七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所作的《关于纺织工业目前基本情况与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

政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和预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加强天灾的预防工作，保证生产建设的安全》。对加强天灾预报工作的意义作了说明。

（3月24日《人民日报》）

3月10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央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以及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最近分别向各省、市及内蒙古自治区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认真作好人口调查登记工作。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挥现有国营工业企业在建设期中的作用》。社论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除了依靠新建企业外，还必须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以供应材料和设备来说，苏联帮助我国与改建的一百四十一项巨大工程中，就需要我国现有企业担负制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设备，并且需要我国现石企业生产配套用的和辅助性的半制品、成品和材料，这一百由十一项以外的工程，也要依靠现有企业来供应设备和材料。至于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和训练人材，更是现有企业的主要任务了。"社论号召全体国营企业职工，充分挖掘潜力，完成出人、出钱、出机器和增加工业品生产的计划。

3月12日　内务部和劳动部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人城市》的指示。指示说，从去年4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以后，虽扭转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混乱现象，但并未制止住，现春节已过，正是习惯上"农民流入城市"的季节，应及早劝阻，以免影响春耕生产。对已流入城市的农民，可由民政部门，劳动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动员还乡，路费一般应由本人自理，有困难者可由当地政府酌予补助或发给乘车证。

3月22日—4月3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城市储蓄工作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展储蓄工作。

（5月30日《人民日报》）

3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共中央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和修正，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为草案批准公布。

3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增产棉花》。社论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对棉花需要量日益增加，保证足够的棉花生产是我国农业方面长期的不能忽视的重要任务之一，社论对如何增加棉花产量作了说明。

3月2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3月23日发出的《关于1954年农产品预购工作的指示》（摘要）今日发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做好农产品预购工作》。社论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决定委托各地合作社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等主要农产品实行预购，由合作社代表国家和农民订立合同，预付一部分定金，而后由农民按照规定的品

种、数量、质量和时间，在收购后把农产品卖给国家。这是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要求各地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同时社论还指出了预购工作的三项好处。(一）加强国家在农产品市场上的领导作用，使农民摆脱投机商人的剥削。(二）对农民增加投资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起重大作用．(三）实行预购后，国家可以事先掌握一部分农产品，也就便于对其它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计划、资金、组织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有计划的安排。

4　月

4月1日　根据中朝国境铁路协定，今日起朝鲜与中国之间开始货物联运。

4月7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发展毛猪生产的指示》。指示目的是为了解决肉食供求矛盾而要求增加毛猪生产的。指示说，它既可扩大肥料来源促进农业增产，又可增加农业副业收入。

4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活跃初级市场，加速城乡物资交流》。社论说，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农村市场规律发生变化。商业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变化，某些地区初级市场不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不通畅，是当前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努力活跃初级市场，加强城乡物资交流，是当前的迫切任务。社论对这一任务作了分析和说明。

4月15日　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为此于16日发表社论《为了国家工业化，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同日发表中共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文章《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4月20—2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作关于《劳动竞赛已经开始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技术革新》的报告。副主席刘宁一作《关于加强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批准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劳动保险金掌握使用办法的指示》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疗养事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5月27日《人民日报》)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供给农民更多的生产资料》。社论指出，农民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很迫切，比往年多，关系到今年农业能否增产问题，是各级供销社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国营商业、地方工业手工业的共同任务。

4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劳动部最近召开全国失业工人救济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四年来的失业救济工作，从1950年7月到1953年12月底，全国二百多万失业人员都有了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处理失业工作的方针应该是：除根据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失业人员的就业条件逐步介绍就业外，并要鼓励失业人员自找工作自谋生活出路；适当地缩小统一调配的范围，以扩大自行就业的门路，其次对确有前途的失业青年应根据生产需要，给以必要的技术训练。无法找到职业，生活确实困难的失业人员，应分别情况给以适当救济。这个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应在失业人员中

广泛宣传，既对国家生产有利，也对失业人员有好处。

5 月

5月6日 政务院举行第二百一十五次政务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向政务院提出了关于颁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和《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的两个建议，会议通过了上述纲要和条例，并通过了关于颁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的决定》。会议在听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民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内设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决定。

5月13日 官厅水库全部工程胜利竣工。水库可控制四万七千平方公里的流域，永远免除洪水对首都，天津及下游千百万人民的危害。每年至少可为国家增加一亿斤小麦收入。

5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组织国家领导的农村初级粮食市场》。社论说，这个市场是一种由国家管理的没有私商参加的调剂农村商品粮食流通的粮食市场，是乡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出卖者和需要者之间通过交换方式直接调剂供求，互通有无的交易场所。社论批评了对初级市场的不正确看法。

5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集中力量巩固现有的九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论说，这九万多个社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耕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对农业生产的直接贡献还很微小，但它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影响来说，却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办好这九万多个合作社，不仅代表党的愿望，也代表一百七十多万农户的愿望，也代表尚未入社的千百万农民的愿望。

6 月

6月3日 政务院举行第二百一十八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所作的订立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经过的报告。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6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严惩治贪污罪犯》。社论说："反对贪污盗窃的斗争是长期性的，不可能经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能根绝。"社论提出三条办法：第一，经常进行教育，提高政治品质、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热情，对个人主义思想和腐化堕落生活强烈憎厌；第二，对贪污盗窃分子实行严惩；第三，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和揭发官僚主义现象，消灭一切可供贪污盗窃分子利用的空隙。

6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建立国家领导的农村粮食市场》。社论说，农村粮食市场已不是应不应慎建立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建立的时间、步骤、方法等实际工作问题，社论提出三点注意：一、市场的建立要普遍、及时、迅速；二、必须加强国家的领导；三、要因地、因时制宜，建立与改进管理制度。

6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毛泽东主席还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严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129、130页）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决议于15日公布)。《人民日报》为宣传学习宪法草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

6月14日　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劳动保险业务移交工会统一管理的联合通知》。

6月16—17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了财政部部长邓小平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通过了1954年国家预算。预算规定1954年总收入为二百七十四亿七千零八十六万元，其中本年实际总收入二百三十一亿八千八百一十六万元，结转上年结余四十二亿八千二百七十万元。总支出为二百四十九亿四千五百七十八万元。《人民日报》于18日发表社论《全力保证实现1954年国家预算》。

6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听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定》。会议还听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邓小平所作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6月22日　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的报告（报告全文于7月13日在报上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希望各地根据当地手工业的具体情况布置实行。

（7月13日《人民日报》）

7　月

7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争取全面完成农业生产计划》。社论分析了工业和城市工矿区人口及农业人口增加后对农业需要的增加情况，提出，要依靠互助合作组织和农业技术力量，加强宣传教育来完成任务。

7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方针》。社论指出，当前农村中心任务是发展互助合作促进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是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整个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又是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有力工具。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去做好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宣传教育，计划收购和供应，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经济作物计划种植、农业新技术等工作。

7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爱国守法教育》。

7月9日一31日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技术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对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系作了重要指示。农业部首席顾问巴列金、顾问布尼亚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组织工作，农作物种子的繁殖工作等提供了宝贵意见。

(8月14日《人民日报》)

7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社论强调，向学生进行劳动光荣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克服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思想，为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工作作好准备。

7月14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颁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的决定。该纲要于5月6日政务院第二百一十五次政务会议上通过。

《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共分四章二十四条。

第一章　录用、调动和辞退

第二章　企业行政和职工的基本职责

第三章　工作时间

第四章　处分

7月20—25日　中华全国合作社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程子华向大会作了题为《1950年7月全国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以来四年的工作和今后应当采取的方针任务》的报告。邓子恢代表中共中央，林伯渠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向大会致祝词。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选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委员会委员、理事会理事及监事会监事。苏蒙等八个兄弟国家合作社代表团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

7月21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逐步推行煤炭分区产销平衡合理运输制度的决定》(该决定于1954年7月1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真推行煤炭分区产销平衡合理运输办法》。社论指出，这个决定是逐步克服不合理现象和提高国家经济计划性的极其重要的措施，一切生产、运输和使用煤炭的部

门，都应该为贯彻这个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办法而奋斗。

7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农村妇女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作用》。社论对最近全国妇联发出的《关于当前农村妇女工作的指示》精神作了说明，社论指出，当前农村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要进一步教育与组织妇女参加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进一步发挥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潜在力量，必须让妇女认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每前进一步，妇女也就将向自身的彻底解放前进一步。

8　月

8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帮助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生产工作》。社论说，现有合作社的生产分好的（占百分之三十），一般的（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可能减产的（占百分之十）三类。工作中的先进与落后是始终存在的，但都应该做到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社论对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生产和巩固提出三项工作。一、根据农业季节和生产条件，找窍门，使农业增产。二、合理组织劳力，使地尽其利，人尽共才。三、建立好财务制度和会计帐目。

8月8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合作社接受国家委托预购粮食、花生、棉花、麻（麻袋用）、茶叶和羊毛等产品的工作，已经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在预购中付给农民的订金总额达一点二亿元。同时并供给农民大批农具、肥料和种籽，大大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8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武汉关的水位再次上涨，到下午5时已涨到二十九点四一公尺，但堤防的标高仍保持着高出水面零点五至一公尺，全市十多万防汛大军为了战胜洪水，正在开展规模壮大的立功运动。

8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重点建设城市的方针》。社论说，旧城市改建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我们有些商业城市或工业很少的城市，随着新的巨大的工业企业的建设，也将逐步变成一座座拥有新的近代化大工业的城市，建设新城市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但在具体步骤上都必须坚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

8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武汉关水位于今日下午5时上涨到二十九点五七公尺。比1931年的最高水位二十八点二八公尺高出一点二九公尺。全市堤防又加高三至四公寸。海军部队和铁道兵派潜水员支援武汉防汛抢险。

8月20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已由全国各地人民银行及公私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给付完毕。仅据五百四十六个清偿点（安徽、河北、江西、广西、湖北等七个省的清偿点尚未统计在内）的统计，共有三十九万三予个储户得到偿还，偿还款共计三千七百七十七万多元，从1937年到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上涨一百二十六万多倍，存款等于废纸。人民政府为了照顾存户的切身利益解决了这笔旧债。

（8月27日《人民日报》）

8月23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扩大举行。会议讨

论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草案)》。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据粮食部截止7月底统计，全国初级粮食市场达二万四千个。许多地区健全了粮食市场的组织和制度。

8月30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政务院颁布的《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的通知。

8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工作》。社论指出，分配收益问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分配工作的好坏会影响合作社的巩固发展。

9 月

9月1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和广东省农林部门联合组成调查队，调查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热带植物资源。据初步调查，在海南岛按现有条件发展龙舌兰、椰子、菠萝、咖啡等四种作物，六、七年后海南岛的居民的收入就可增加一倍。海南岛除了可以种植其他热带经济作物外，还有大量森林可以开发。

9月2日 政务院举行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会议在听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所作的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后，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会议还听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所作的《关于当前水情与防汛工作情况的报告》。

(9月6日《人民日报》)

9月4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拨发了救济款五千五百四十万元、贷款九千四百万元，扶助灾民开展生产自救。

9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有步骤地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9月9日 政务院举行第二百二十四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曾山所作的《关于准备实施棉布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和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会议还听取和批准了财政部副部长吴波所作的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

(9月14日《人民日报》)

9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由刘少奇委员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会议还修正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等组织法草案》。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论说，农村信用合作是

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之一。社论还说明信用合作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必须积极发展信用合作组织。

同日，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1953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人民日报》为此于14日发表社论《在五年计划第一年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9月14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命令说，为了保证棉布能够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进一步取缔市场投机，巩固物价稳定，决定从9月15日开始实行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棉花从新棉上市时起计划收购。《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社论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棉花实行统购的经济意义作了论述。

9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代表共一千二百二十六人，其中妇女代表一百四十七人，占百分之十一点九，少数民族代表一百七十七人，占百分之十四点四四。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新阶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大会于28日胜利闭幕。

同日，政务院公布《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加强基本建设的财政监督》。说明在财政部系统内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作用是：负责集中办理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以及对建筑企业的短期放款，组织和执行基本建设拨款的结算业务，并对资金的使用和使用效果实施财政监督。社论说，这是健全国家基本建设拨款制度、保证建设资金及时供应和合理使用的一项重要措施。

9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的政策》。社论说，棉布的统购统销和棉花的统购，是我们国家当前的重要经济措施，也是重要的政治措施，它具体地贯彻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基本政治思想，这就是：第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完全一致；第二，城市和农村的亲密互助；第三，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进一步促进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论指出，这项措施牵涉面广，影响人民的生活习惯，必须深入动员，端正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和觉悟，才能顺利贯彻。

9月19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农民增加油料作物生产的指示》。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增加油料生产，改进食油供应》。社论说，食油供应不足是必须注意加以解决的问题，希望各地认真执行政务院19日发出的《关于发动农民增加油料作物生产的指示》，逐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社论对增加油料作物的生产和措施进行了分析，指出充分发动农民，贯彻增加油料作物生产的具体措施，困难就可以克服，食油供应不足的状况就逐步可以得到改善。

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并于次日公布。《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保证实现国家的棉花统购计划》。社论指出，棉花是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很重要的物资，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等项办法之后，决定实行棉花的计划收购是完全必要的。棉农的利益与国家和城乡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9月23日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9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棉布商人应该服从棉布统购统销政策》。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制飞机成功，举行了试飞典礼。飞机性能良好，完全合乎标准。

9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承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通过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的决定，另外通过了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人民日报》为此于次日发表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9月29日—10月12日　应邀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日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我国，并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与我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会谈后发表了公报，公布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联合公报、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公报、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此外，还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人民日报》为此于10月13日发表社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对苏联政府，共产党和人民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10　月

10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祝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10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前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4，000余吨钢材积压问题的检查报告》，并发表短评《克服积压和浪费国家物资的现象》。

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

10月14日　中国和印度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在新德里签字。中印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规定中国商品经印度运往中国西藏地方的手续及关于中印贸易的某些具体问题的两个照会。

10 月 15 日　国务院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和决定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同外国缔结条约的批准手续的决定》（草案）。这一决定（草案）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会议在听了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所作的关于中苏会谈的报告后，通过了中苏《关于将“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国民用航空公司”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售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会议在听了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说明后，通过了《中国阿尔巴尼亚文化合作协定》和《中阿技术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同日，我国第一个人工降雨溉灌工程在上海市大场区举行放水典礼并正式喷雨。

10 月 20 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关于加强棉花统购工作的紧急指示》。

（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

10 月 22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接受苏联人民赠送的机器和设备，决定在黑龙江佳木斯以东一集贤县三通冈组建一个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

10 月 25 日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并在莫斯科餐厅进餐。

10 月 29 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各地建立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到今年 9 月份已增加一百一十三处。约计共有拖拉机七百多标准台（每台 15 马力），这些拖拉机站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和互助组等进行机器耕作的面积，全年可达六十多万亩。

11　月

11 月 1 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其中城镇人口七千七百二十五万七千二百八十二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二六，乡村人口五亿零五百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三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六点七四；男子为二亿九千七百五十五万三千五百一十八人，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八二，女子为二亿七千六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一八。

11 月 2—29 日　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郑州召开水土保持会议。会议根据治理黄河的要求和已取得的经验，要求黄河中游高原地区领导农民进一步广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以发展高原地区的农、林、牧等经济。

（12 月 8 日《人民日报》）

11 月 11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造的新闻纸开始出口。从九月到现在，我国已向印度，越南民主共和国等输出新闻纸两千吨。

1 月 1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粮食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好处》。这些好处是：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粮食市场，支持国家工业化；可以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削弱农民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社论批评了一些人对统购统销的错误思想。

11月20日 农业部决定三年内在黑龙江北部开垦荒地三百万公顷，面积相当于黑龙江全省现有耕地面积二分之一，共分五个区。嫩江、北安地区；甘南、龙江地区；穆棱河流域密山、虎林地区；松江下游集贤、富锦、饶河地区；以及萝北、绥滨地区。

11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继续深入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社论指出，继续深入地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完成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任务的最强有力的保证，今后应着重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宣传国家的建设计划和服从国家计划；宣传农业合作化政策；宣传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社论指出，宣传要结合实例和农民切身经验进行，使群众自觉地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11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发展信用合作社》。社论指出，信用合作社在农村是薄弱环节，要求今冬明春由现在的五万个增加到十五万个，做到使全国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乡都有社，使人社农户由二千多万户扩大到七千多万户，借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11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结合》。社论指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都是社会主义性质，基本任务是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满足人民需要服务。社论对二者的关系和分工作了分析。

11月29日 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写信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霍查，代表中国人民赠给阿尔巴尼亚人民二万吨小麦，二千吨大米，二千吨糖，十万公尺丝织品，二百吨麻绳，一百吨瓷轴和四十吨锡，作为贺礼。

（12月7日《人民日报》）

11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已拨给湖北省水灾区一点零五亿元，帮助灾民迅速恢复生产和解决生活困难。

12 月

1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及时检查和改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社论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二十万个，要求今冬明春发展到六十万个左右。要求各地应及时进行检查，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偏向，社论提出检查的内容为：检查建社的准备工作，不要一轰而起，检查工作要细，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强迫命令；要做到实事求是。

1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努力完成棉花收购任务》。社论说，由于棉农积极，政府帮助，棉花收成较好，但统购任务完成的很差。社论要求特别注意几个问题。一、从农民自由出售到国家实行统购，是经济政策上一个重大转变。要向棉农讲清政策。二、统购棉花既要完成国家计划，又要照顾农民实际情况。三、讲清与农民的交换关系，尽量供应农民所需要的商品。四、要集中二十几天内完成。

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设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于今日公布，农场

设在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任命王操犁为场长。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农业部，一机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签订协议，计划在1955年推广、制造和供应双轮双铧犁、双轮一铧犁四十万部。

12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社论对该纲要执行不利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评述。

12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去年百分之三，预计总产量可达三千四百亿斤，达计划产量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粮食耕种面积为十九亿三千多万亩，超过计划面积百分之三，比去年扩大四千多万亩。

12月11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对目前生产资料供应工作的指示。社论指出，今冬明春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发展到六十万个左右，面对这一新的形势，要求各级供销合作社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分析农民对生产资料品种要求上的新变化，做到心中有数，以免工作盲目、被动，影响生产；第二，产销都可以而且应该纳入计划轨道；第三，小农具和其他家庭日用工具，也应尽量加以组织，不能忽视；第四，应积极支援灾区所需要的饲料和代食品，非灾区也应加强牲畜调剂工作。

12月15—27日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第四次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内务部部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谢觉哉和内务部副部长陈其媛在会上讲话，对城市救济工作作了指示，总会秘书长伍云甫在会上作《一年来城市救济工作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通过了《生产教养工作暂行办法》。

12月15日　青藏公路全线修通，第一批车辆于下午2时到达拉萨。

（12月19日《人民日报》）

12月16日　国务院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在听了财政部副部长金明的说明后，通过了《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草案）。

1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使经济核算成为群众性的工作》。社论说，鞍山钢铁公司部分厂矿实行班组节约核算和劳动竞赛相结合的办法以后，在节约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废品、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社论认为推广这个先进经验可使积累建设资金的任务，和千百万群众的日常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给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树立坚实可靠的基础；可以使劳动竞赛经常化；可以促进企业中各方面工作的改进，并不断开辟新的潜在力量的源泉。社论号召推广这个经验。

同日，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及《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12月21—25日　政协第二后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同志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同志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作用已经消失。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统战作用仍然存在。"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董必武等十六人为副主席。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写信给越南胡志明主席，赠送大米一

万吨，棉布五百万公尺，援助越南人民。胡志明主席复电表示感谢。

12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黄河流域的规划工作已胜利完成，对黄河综合利用的技术经济规划中提出解决防洪灌溉、流域内的电力供应、水土保持、航运等五个问题。黄河中游最大水力枢纽三门峡水库的地质探验和测量工作正积极进行。

1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庆祝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交通部和交通部政治部电贺康藏、青藏公路全体筑路人员。

12月28日　我国政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协定书，恢复邮政电信议定书，修复公路、航运、水利问题会谈记录，关于中、越两国民用航空通航和援助建立民用航空站、气象设备问题会谈记录，邮政协定，电信协定和邮政、电信两个协定的附加议定书，并发表会谈公报。

2月30日　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交接仪式庆祝大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从1955年1月1日起这个公司的名称改为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编者)

同日，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在北京举行庆祝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交接大会，总经理沈图、副总经理包尔菲洛夫、苏联政府中苏民用航空通航谈判代表团团长热洛隆科夫、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先后在会上讲话。

1955 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一九五五年的任务》。社论指出，1955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为了完成1955年的建设任务，必须要加强计划性，厉行节约，克服浪费，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增强技术力量。社论强调，要克服盲目性。要根据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发展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的供销计划，进行合理的安排，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社论还指出："随着国家建设的进展，农业生产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要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正确坚持和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

1月4一17日　水利部召开1955年全国水利会议。研究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新发展对水利工作的要求。会议认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

1月7日　财政部发出《关于委托中国人民银行发行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几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石油工业超额完成了1954年生产计划。其中汽油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五点九。

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1954年我国林业建设有较大发展。据初步统计，全年共营造了一百一十三万公顷的防沙林、防风林、海防林、用材林和水源林。

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1954年全国各地资本主义工业经政府批准为公私合营的共达七百多户。

2　月

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经过互助合作道路，改造农村小商小贩》。社论指出，到1954年年底，全国农村私商初步估计还有二百四十一万户，三百五十万人。在这批私商中，绝大多数都是小商小贩。改造这些小商小贩的方针是，根据自愿的原则，在供销合作社领导和计划下，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组织，使它们经过互助合作道路，分担农村商品流转的任务，并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

2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对外贸易在1954年又有新的发展。全年的进出口贸易计划全部完成，并超额百分之三。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家正陆续拨给湖北省去年因发生特大洪水欠收地区一亿零一百六十二万元，来扶助这些地区农民的春耕生产。

2月17日　国务院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该命令于21日公布。

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3月1日起在全国开始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工作》。社论指出，现在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五十多万个，目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发展数量，而应集中注意于提高质量，应当全面转向巩固工作了，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工作是迫不及待的，已建成的合作社必须从政治上经济上加以巩固，在发展社的时期出现过一轰而起的错误的地方，今天在巩固工作中必须特别注意强调深入工作，绝不要把发展工作中一轰而起转化为巩固时期的一轰而退，或简单粗糙地进行整顿工作，致使工作的弱点被工作作风的弱点掩盖起来，遗留下去，造成无穷后患。

3　月

3月1—17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全国农村金融会议。会议确定了1955年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工作任务。

3月3日　国务院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所作的《关于

1954年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和当前农业增产措施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1954年一年内，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是有成绩的，但也存在着缺点和问题。（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盾三年的农业增产任务是艰巨的，困难也很多，但任务必须完成，也可以完成。（三）怎样完成农业增产任务。第一，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依靠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第二，保证农业增产的各项具体措施，第三，健全县以下的农业机构。

3月18—19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3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迅速向全体农民宣传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社论指出：“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则是既要掌握必须的粮食，又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3月21—3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致开幕词。政治局委员陈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4　月

4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社论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子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经济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

4月21日—5月6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今后对农业合作社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面巩固”，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

4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农业部发出《关子1955年棉粮比价的指示》。指示共三条：（一）为了适应我国纺织工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年必须继续贯彻“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棉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针；（二）棉花统购价格一般按去年价格不变；（三）为促进优良棉花生产的发展，提高品级长度，决定增添优级棉等级，并合理加价。要贯彻“优级优价，低级低价”的政策，公平合理按级给阶，严禁压级压价。

4月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整顿统销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压缩不应供应的部分，保证合理的供应。

5　月

5月4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作《关于全国轻工业生产方面情况和问题的报告》。

5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统筹兼顾的方针，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社论指出，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在目前国家工业生产中还占有不小的比重。这几年，由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了贯彻国家工业生产统筹兼顾的方针，各有关部门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加强领导，使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顺利进行。

5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能忽视对互助组的领导》。社论指出："互助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基础，合作社是互助组的前进方向，由互助组到合作社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一般的发展规律。我国现有的合作社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都是由互助组发展起来的，绝不能轻视互助组，谁要轻视互助组，就不是真正重视合作社。认真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对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5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全面节约运动》。社论指出："到1954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已等于1949年的四倍多，工农业总产值等于1949年的二倍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预计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一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但是发展工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我们只能在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资金的积累和在保证重点建设的条件下厉行节约。"

5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办好公私合营企业》。社论指出，公私合营企业现在近两千家，这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公私合营比私营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提供了在企业内部加强计划性、改进生产、改进经营管理、办好企业的可能。如何把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公私双方和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

6　月

6月9日　国务院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了铁道部1954年铁路工作总结和进一步提高铁路运输工作的措施；交通部1954年工作基本总结和1955年工作部署；邮电部1954年工作基本总结和1955年工作要点；中国民用航空局1954年工作基本总结和1955年主要工作措施；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1956年国外进口订货编审工作的决定，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

6月11日　我国发行新人民币工作已胜利完成，旧人民币从今日起完全停止收兑。

6月18日　国务院举行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并决定将其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会议决定就国家机关全部工作人员从

今年7月份起一律实行工资制待遇问题发出通知。

6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农业银行从今年起，开始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帮助贫农（包括个别有困难的新由农）解决加人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筹借入社费用的困难，巩固贫下中农之间的团结，贯彻双方互利原则。今年这项贷款的总额为一亿三千八百多万元。

6月22日 国务院举行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在听取了财政部长李先念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1954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5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并决定将上述文件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会议还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成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撤销燃料工业部。

6月23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对将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1954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5年国家预算草案作了说明。

7 月

7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黄河上第一座大铁桥——兰新铁路黄河大桥，落成通车。

7月5—3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一）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审查和批准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

（三）通过关于治理黄河规划的决议。

（四）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五）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六）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作了《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全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7月18日 国务院举行第十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会议决定撤销热河省，将其所辖市、县、旗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撤销西康省，将其所辖市、县、自治州划归四川省。会议通过了《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草案）》，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7月30日—8月2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一届全国委用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

议。会上，全国总社理事会作了关于一年来主要工作和 195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及有关财务的报告，以及进一步开展对农村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关于在供销合作社系统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报告。监事会作了关于一年来监事会的工作和监事会 1955 年的经费预算报告，会议通过了上述报告和相应的决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决议。

7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召集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共分十二个部分。毛泽东同志在第一部分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还说："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同志在第三部分说："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同志在第六部分说："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哪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68—191 页）

8　月

8 月 1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接再厉，争取完成今年农业增产计划》。社论指出，今年全国粮食生产任务为三千六百零八亿斤，比去年实际产量增加二百一十八亿斤；棉花生产任务二千六百零六点六万担，比去年增加四百七十万担。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对于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发展计划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8 月 20 日—9 月 5 日　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棉产会议，讨论了关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棉花增产任务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的总要求是，必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计划地扩大棉田，并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机械耕作和机械灌溉。

8 月 25 日　国务院命令公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办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我国粮食工作的重大措施》。

8 月 2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办法》。

9　月

9月4日　新华社报道，到现在为止，全国已有一百三十多家私营轮船公司实行了公私合营。

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民们，用实际行动贯彻粮食“三定”政策》。社论指出，今年秋收前后，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数字就要普遍地规定到各个农户。这是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进一步的发展。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规定全部实行工资制，并规定废除工资分计算办法，改行货币工资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待遇制度的重大改革》。

8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关于1954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公报指出，1954年我国工业、农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国内外贸易、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195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3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其中：国营工业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合作社工业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公私合营工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私营工业下降约百分之五。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三百九十亿斤，比1953年略有增加。

10　月

10月4—11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陈伯达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10月12日　新华社报道，从11月1日起，全国普遍使用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

10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的决议，是党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纲领，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必须按照这个决议，积极地、有计划地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

10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质量》。社论说，为保证农业合作社具有较高的质量，在建社以前，要有充分准备。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要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向农民群众全面地宣传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作法；制定全面规划；训练办社干部；大量发展互助组。这五项准备工作必须全都作好。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就可以把党的领导和群众办

社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就可能基本上解决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在建成合作社以后，还要做好整顿工作。党的要求是既要办多，又要办好，既要数量，又要质量。

10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防止反革命分子对合作化运动的破坏》。社论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走向全国性的高潮。这个运动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大喜事，而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则是最可怕的事。因此他们一定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破坏。为使农业合作化运动能顺利开展，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防止和打击地富和各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证合作化运动顺利进行。

10月29日　毛泽东主席邀集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就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举行座谈会。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要求他们认清形势，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进一步按受社会主义改造。

11　月

11月1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举行座谈会，陈云副总理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

11月1—21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了主任委员陈叔通作的《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会议还通过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大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陈救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思想问题》的报告。

11月7日　国务院举行第二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会议还通过《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草案）》，并决定将这两个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11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村党组织的工作要以合作化为中心》。社论指出，在全国农村中，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搞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党的领导要赶上去，农村党组织的工作要明确以合作化为中心。要真正做到"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指示各地农业合作社，可以把这一草案作为自己的社章试用。

11月10日　全国人民代奉大会常芳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六亿元。

1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范》。社论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按其内容和意义说，是农村中建设新社会的最高法律、根本法

律。示范章程草案具体地表现了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总结了过去几年办社的宝贵经验。

11月15日—12月8日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从1956年到1967年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方案和1956年的工作要点；制定了国际技术合作中农业部门的工作方案。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陈毅、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副部长刘瑞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分别向到会代表作了有关农业科学工作、国家建设计划、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等问题的报告。

11月19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已有半数的私营商业分别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城市的商业零售总额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四分之三。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零售商业占百分之五十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占百分之二十三，私营商业只占百分之二十五。

11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从8月初到11月上旬的统计，全国已经新建立了五十九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上原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内，现在全国共有一百二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1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社论指出，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1949年建国之初就确定了的，采取这一方针的根据，从政治上说，是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中，曾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革命或采取了中立态度。从经济上说，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有必要同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经济上的联盟，以便发挥其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地执行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极大的重要性。

11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决新问题，巩固合作社》。社论指出，新问题有：许多地方建社准备工作赶不上运动的进展，训练干部和宣传政策都作得不够；有些地方还有排斥贫农和强拉中农的现象，甚至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混进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有的地方出现了“中农社”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把工作重心立即由发展农业合作社转到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上来。

11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有准备、有步骤地推动私营工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社论指出，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当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形式。这一形式更有利于贯彻实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的方针。各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分批分期地进行。

11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李凯，庆琛的文章《五亿农民的方向——记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经过》。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11月29日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

会，向各省市手工业管理局和手工业生产联社发出关于对手工业改造工作进行全面规划的通知。通知指出，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下加快进行。

11月间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代表，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62年2月，经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

12　月

12月1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三次农村私商改造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了对于农村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

目前全国农村私商共有二百六十七万人。到年底止，预计受到各种形式改造的农村私商将达到八十九万人，其中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由供销合作社和私商合营的商店、代销等主要改造形式的占百分之四十，采取经销和经销小组改造形式的占百分之六十。社会主义商业在农村市场已经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商业在农村建立了基层商业批发网，批发比重已经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12月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已有三千二百九十八个市镇先后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制度。

1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处理社员的生产资料必须经过充分协商》。社论提出，按照互利政策处理社员私有的土地和别的主要生产资料，是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中的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农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必须采取逐步过渡的形式。因此，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要用最大的注意力和最妥善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要严格执行互利政策，经过充分的协商，达到社内人人满意。社论引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现阶段一般地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因此，不论在建社和整社的时候，都必须根据互利的原则，合理地处理社员的私有财产。”

12月12—20日　中国店员工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了1951年8月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选出了商业部门新的工会领导机构，并通过了“关于在商业和对外贸易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建议”。大会还通过了把中国店员工会改名为中国商业工会的决定。

1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全国五百人以上的大型私营工厂已经基本上实行了公私合营。据统计，在1953年底全国还有五百人以上私营大型工厂一百七十六个，到今年10月底，它们之中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变成公私合营企业。

1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截至11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了新老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百三十九点七万多个，还有十八点八万多个社即将建成。全国入社农户已经达到四千九百四十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12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农业部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根据目前各地统计，认为今年全国农业增产成绩显著，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创造了我国历史上年产量的最高记录。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六百三十九亿斤，超过计划百分之零点八，比1954年增产二百四十八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二千八百五十万担，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九，比1954年增产七百二十万担。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造林面积达一百二十一万三千五百多公顷，超过了去年造林总面积百分之四点四，等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二十二年造林面积的两倍多。

12月27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按语"总结了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

1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纠正排斥贫农的现象》。社论指出，解决歧视和排斥贫农、下中农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整社进行整党。

同日，全国第五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闭幕。会议着重研究了今后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确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

12月底　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要求，从1955年算起，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1956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指出："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突破了原来计划的指标向前猛进，这就给予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使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召开有关的会议，规划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将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1月3日　集宁——乌兰巴托铁路中蒙边境铁路接轨仪式在中蒙边境二连和扎门乌德之间举行。4日，中蒙苏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建成和联运开始。

1月4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人民日报》

为此发表社论《超额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月10日 北京市宣布全市三十五个私营工业行业的三千九百九十家工厂和四十二个私营商业行业的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三户座商，共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户，全部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从此，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六万多职工和资本家举行庆祝游行和游园联欢大会。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伟大胜利》。

1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11日北京市又有三万多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至此，全市手工业已基本上实现合作化。北京市郊区出现了新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11日晚间止，近郊五个区的三百五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合并成二百二十多个，并全部转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月12日 毛泽东同志1955年12月27日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发表。

1月25日 毛泽东主席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讲话。他说，“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在毛泽东主席讲话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了说明。周恩来总理就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等问题，陈云副总理就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的问题，李富春副总理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和今后的规划远景的问题，作了重要发言。

1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后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周恩来总理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应当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慎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政治报告还讲了国内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知识分子问题和解放台湾的问题。

2 月

2月8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规定认为，为了适应私营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情况和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肘需要，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推行定息办法，是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定息，就是企业在公私合蕾时期，不论盈亏，依据息率，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二、对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实行定息的息率，规定年息为一厘到六厘。国

务院全体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应当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企业的实有财产进行清理估价，确定私方股额。

《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指出："因为在批准合营和合作化之后，时间太短，私营工商业企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数量又大，有关供产销的安排和企业改造等各项工作还来不及进行，因此在工商业和手工业某些方面，就出现了一些供、产、销脱节的现象。"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改变这些现象，为了使我们有充分时间逐行逐业地顺利地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人民日报》根据这一决定发表社论《不要轻易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经营制度》。

2月9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决议》。

2月22日　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挥工商界青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作用》。社论指出，工商界青年应在"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中起带头作用。

3　月

3月1日　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开幕，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大规模地植树造林，不但要依靠国家的规划和扶助，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我国一亿二千万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撮性。"《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青年们，努力绿化祖国》。

3月4日　国家建设委员会于2月22日至3月4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会议，讨论了设计、建筑、城市建设工作初步规划和基本措施。如增强设计力量和改善设计工作状况的办法；大力编制和推广标准设计，有计划地大量地重复使用比较经济合理的设计；加强建筑机械设备的管理和维修，充分发挥建筑机械设备的效能；在今后的建筑工程中大力节约各种贵重材料，特别是钢材和木材；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职工工资和改善职工福利。

3月6日　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毛泽东主席认为："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指示要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主席还提醒大家，"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4、265页）

3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通知认为："在目前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全国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主义竞赛正在以更加广泛的规模开展起来"。"必须加强对于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领导，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4　月

4月3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指示指出：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了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的现象。"因此要求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广泛深入地宣传勤俭办社的方针，使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和全体社员都能够切实了解和坚决执行这个方针。"

4月5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根据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7日　中苏签订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两项协定：一个是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某些工业部门的协定（规定建设五十五个新的工业企业，作为正在建设中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补充）；一个是关于修建从兰州到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阿克斗卡站的铁路和从1960年起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

同日，新华社报道，历时一个多月的全国工资会议于今日结束。会议讨论了有关工资制度中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初步拟订了全国务部门新的工资方案。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早就明确提出的方针，确定按照"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和"按劳付酬"的原则，来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

（4月15日《人民日报》）

4月25日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此之前几个月，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同志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4月29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6年3月底止，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发展。

4月30日　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人民日报》为祝贺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汉开幕，发表题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的社论。

5　月

5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立和改进奖励工费制度》。社论认为：应该"使每个职工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对于创造了优异成绩的人，"不仅应该给以精神上的鼓励，也应当从物质上给以奖励"。

5月6日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中，每年都没有完成烤烟生产计划，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完成今年烤烟增产任务》。社论分析没有完成烤烟生产计划的原因是，由于“农业部门指导错误的结果”；“某些农民对于价格政策有疑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了某些农村工作人员的限制和压抑”；“烟产区饼肥供应不足”等。

5月7日　邓子恢同志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汉上讲述了半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任务。邓子恢同志指出：“现在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端”。并认为，错误和缺点还不少，第一，一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贯彻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勤俭办社的方针；第二，一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单一化，只注意粮棉增产，而忽视其他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第三，由于运动进行的迅速，小部分社的建社工作很粗糙。

5月9日　几年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城乡人民、特别是乡村居民，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够充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生产更多的油料》。

5月10日　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闭幕，全体代表在给全国职工的一封信中，倡议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5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从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不少地区的农村副业生产大大衰落，某些地区的副业收入竟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我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某些山岳地区，副业比重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农村副业》。

6　月

6月15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主要议程有下列各项：

审查和批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

讨论和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讨论和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6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社论指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出的结论。社论又指出，在预算报告中向全国人民指出防止和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是切合时宜的。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告，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急躁冒进。

同日，国务院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会汉并对工资改革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6月18日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关

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发言。发言指出，政府不把全部小商贩都组成公私合营商店、组成合作商店，“大家知道，小商店、摊贩、挑贩中的广大部分散布在居民区中间。这些分散在居民区中的小商贩是我国商业中今后长期需要的一种经营服务形式。如果把它们统统收缩起来，合并组成集中的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那就不便于居民的消费”。“……那就不能保持他们经营的积极性”。

同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的发言，发言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原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约等于八比一，在今明两年内，要更多地增加一些轻工业方面的投资，投资比例改变为七比一。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指出，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收到重大的效果。但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便没有缺点了。缺点现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6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的协定和实施经济援助协定的汉定书。我国援助柬埔寨八亿柬元物资和商品。

6月3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今天闭幕。陈云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通过决议批准国家预算，通过高级农业社示范章程，陈云副总理在关于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的办法”，“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方法，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因此，陈副总理提出几条很重要的新的管理办法的设想：

第一条办法，不是由商业部门用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的办法来管理公私合营工业，而是由工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来管理合营工业的生产和销售问题。

第二条办法，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内部的上下之间、地区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货关系。

第三条办法，由于降低了商业部门的批发利润，增加了工厂的利润，因此，现在商业部门批发机构的一部分上缴利润指标，应该移交给工业部门的各个工厂来承担。

第四条办法，银行应该改变现金管理和放款，结算办法中那些繁杂的、机械的办法，应该采用我国银行中原有的那些灵活的支付办法。

第五条办法，商业部门虽然对工厂实行了选购，但是多数商品仍然是由商业部门买进的。

第六条办法，除国家统一调拨的原料以外，一切原采由采购部和供销合作社供应的原料，仍然由采购部和供销社统一采购和供应。

第七条办法，国境以内，任何地方都不得采取互相封锁的办法。

第八条办法，选购的办法带有督促落后工厂改进生产的作用，这是必要的，但是又应该规定，暂时不在计划以外增加先进工厂的产量，以使目前在生产上还落后的工厂在一定时期内有机会改进生产，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社论指出，在公私合营高潮中，许多干部产生了大规模合并工厂的思想。社论根据我国公私合营工业的实际情况和各地已经取得的工作经验，提出对公私合营工业进行经济改组，目前应该采取大部不动，小部调整的方针。

7　月

7月1日　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今天全文公布。示范章程分十一章六十四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社员；第三章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第四章资金；第五章生产经营；第六章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第七章财务管理和收入分配；第八章政治工作；第九章文化福利事业；第十章管理机构；第十一章附则。

同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指示指出，“大量养猪，对增产肥料，提高农作物产量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算大帐，多养猪》。

7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行工资改革》。社论指出：“许多职工的升级问题，是这次工资改革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社论提出，“凡是能计件的工作，都尽量争取在明年全部或大部实行计件工资制度”。

7月7日　国务院发出指示，纠正若干地区银行，信用合作社在吸收存款、扩大股金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现象。

7月9日　工商界人士和政府业务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交换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意见。陈云副总理着重就公私关系问题作了指示，他说，公私关系，即公私双方今后在企业中如何合作共事，是今后工商业者和政府关系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7月11日　克拉玛依油区已有十口探井喷出原油，再次被证明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油区。

7月13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在建厂三周年前夕试制成功了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产汽车。

7月23日　商业部召开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确定改造小商贩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合作小组，并提出帮助小商贩解决货源，资金，税收负担问题的办法。

7月26日　根据1955年发表的中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我国政府决定以人民币八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协助越南人民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和恢复经济。

7月2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

8　月

8月3日　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研究了目前各地公私合营工业的生产改组、生产经营、职工生活、公私共事和企业管理等问题。

8月28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职工生活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福利费用掌管使用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以及《关于取消劳动保险条例中关于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治时贵重药费由本人自理的规定的通知》。

8月29日　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我国决定在1956—1959年内无偿地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亿六千万卢布。

8月30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今天召开。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一、准备大会文件；二、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准备大会发言稿。毛泽东同志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示：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8月31日　新华社报道，长江流域水利资源查勘工作结束；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9　月

9月1日　全国手工业改进工作会议于今日结束。这次会议研究了手工业合作化以后的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改善经营管理、社员的收入和劳保福利，供销关系以及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等问题。

9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保证粮棉需要，增产其他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开展多种经营；（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三）积极地、稳步地、因地制宜地实行技术改革，推广先进经验；（四）加强劳动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五）做好合作社的分配工作；（六）贯彻执行互利政策；（七）加强合作社的组织建设；（八）调整某些农产品的价格，改善农村购销工作；（九）调整手工业合作社与农业合作社的关系；（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合作社的领导；（十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为此、《人民日报》于13日发表社论《全面地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问题》。

9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

中国而奋斗。”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9月16日　周恩来同志在“八大”作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报告谈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是：合理地积累和分配资金，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加强商业工作；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企业改组和人员安排；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培养建设人材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和继续厉行节约；争取国际支援，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

9月18日　薄一波同志在“八大”作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的发言。薄一波同志认为，合理地解决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意义，就是要将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和个人的，当前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薄一波同志提出合理地规定积累和消费的几个比例关系：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应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应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应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

9月20日　陈云同志在“八大”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发言中谈到，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可以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它的出现，是为了改变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措施，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局部的、暂时的错误而产生的结果。

9月22日　邓子恢同志在“八大”发言指出，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正确地处理以下问题：第一，必须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保持工农业发展相互适应；第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第三，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正确处理国家资金积累和农民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第四，在农业合作社中，必须正确处理合作社与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第五，必须继续加强党对农民的政治领导与思想教育工作。

9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同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建次要求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在第二个五年内比原定的1957年水平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

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工人和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10　月

10月6日　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的新情况，继续保证国家和人民对粮食的需要，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国务院作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农业社的粮食统购、统销数量，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1955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核定。"根据定产、定购数字自1955年起三年不变的原则，农业社在进行社内粮食分配的时候，必须保证不突破国家核定的粮食供应指标。

10月12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小麦、早稻登场以来，全国粮食销量很不正常，7、8、9三个月合计共比去年同期多销四十三亿斤。另外在粮食征收和统购方面，今年夏季征收结果，比去年同期少收粮食三十亿斤。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目前粮食销售和秋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指示》。

10月15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移交生产。北京电子管厂建成，开工生产。

10月24日　最近在一些省先后放宽了农村市场的管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已经扩大，很多地方都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为此，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提出各地应该采取的办法：一、凡属国家统购的农产品，都必须仍由国营商业公司或者委托供销社统一收购，二、农村市场中可以放宽管理的商品，只应该是小土产一类，三、凡属国家统购或者委托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社统一收购的产品；应该大体上保持全国平衡的收购价格。

10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许多城镇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蔬菜自由市场。在此以前，这些城镇的蔬菜经营都是由当地国营商业包揽的。由于商业部门统一经营，流转环节过多，对菜价规定得过死，因此，影响蔬菜生产者积极性，也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10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农业高级社合作化运动正在继续发展。原有的数十万个小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进行并社升级，转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西、青海等省已经实现农业的高级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

11　月

11月6日　周恩来总理电贺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成立，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以价值三千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无偿地、不附任何条件地赠送给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11月9日　毛泽东主席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作了批语："……这个

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11月10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这是我国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会，显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

11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议程是：（一）目前时局；

（二）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

（三）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

11月17日　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不得自动提高国家统购的农产品和委托国营商业公司，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的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11月24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农业社秋收分配的指示》。指示指出，“对增产不多或者减产的合作社，应帮助他们做好冬季生产工作，增加收入；又不能片面强调少扣多分，不能用不适当的方法增加收入；由于包工包产不适当，劳动报酬定额不准确，因而产生的不合理现象，必须加以调整；”“合作社干部的报酬偏高偏低都不好，应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合作社应该把分给社员的现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统一计算，保证粮食统购政策的实施，和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

11月30日　据统计，全国发放农业贷款的累计数（包括1956年发放的和以前几年发放尚未收回的部分）已经超过三十二亿元。这比1956年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公粮（包括地方附加）折钱，还多一亿元。

12　月

12月5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城市中猪肉副食品的供应情况比较紧张，中央各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12月10日　为了动员一切工商业者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二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上谈经济建设和赎买政策。薄副总理指出：继续执行定息政策，条件不成熟就不取消。部分中小资本家可称为小资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目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

12月15日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报告提出，定息时间从今年起可定为七年。有些小型工商业者愿意放弃定息，我们是欢迎的，但不要来一个运动，并且要考虑定息对他们还有补助作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有必要恢复和建立企业管理委员会，私方人员和职工关系的正常，是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关键，望私方人员采取积极正确的态度。工会应对职工广泛进行赎买政策的教育，提拔一部分工人干部到领导职位上来。

12月28—29日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文章指出，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我们要做好计划工作，必须首先掌

握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而后按此规律，使重点和全面相结合。只顾重点，忽视其它的孤立主义思想是错误的；强调若干方面、若干地区，忽视其它方面、其它地区也是错误的，是违反按比例发展规律的。

12月29日　《人民日报》编辑邮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通过明年经济建设公债条例。《人民日报》于31日发表社论《踊跃认购1957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2月31日　经过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我国农村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提前一年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要求。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从1月到3月底，运动处在高潮时期，运动的规模继续扩大，运动的主流转向高级合作化。这时，加入农业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由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基本完成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四点九，达到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农户加入高级社。4月到8月底是农村生产最忙的季节，各地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暂时停止，转入了整顿和巩固的工作。不过由于有的省区在运动大体稳定的情况下尚有新的发展，所以全国加入农业社的农户约增加百分之四，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九，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二，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9月以后，农村中扩社、并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等工作继续开展，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11月底，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高级社）七十六万四千多个，入社农户一亿一千六百七十四万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百分之九十六点一。目前，除了有些地区还在继续进行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工作以外，绝大多数省区正在开展冬季整顿农业社的工作。

1957年

1　月

1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过春节的副食品、够不够?》。社论指出，目前副食品供应的情况相当紧张，估计过春节用的副食品将更加供不应求。怎么办？“第一个办法是要向广大群众说明副食品供应的实际状况，希望群众共同努力来设法减轻而不要增加供应的困难”。“第二个办法是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要努力改进分配制度和工作方法，尽力把供应量较少的副食品分配得更合理些”。

同日，新华社报道，各城市开放自由市场后，鸡鸭鱼蛋等供应情况有了改善，只要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市场管理，缺点是可以克服的。

1月17日　莫斯科各界劳动人民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中两国人民友好群众大会，

欢迎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联结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各国又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必须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过去社会主义各国在相互关系方面并不是一切都是正常的。"

1月18日 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潮。"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34页）

1月21日 中国科学院颁发1956年度科学奖金，这是我国首次颁发科学奖金。得奖人将获得金质奖章、奖状和奖金，并对得奖论著简要介绍。

1月 陈云同志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是：第一，1956年的财政经济情况；第二，如何解决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三，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第四，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40页）

1月27日 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0页）

2 月

2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多方面积极支持农民开展大生产，中国农业银行今年的农业贷款总指标已经确定为三十九亿元。

2月18日 为了更好发挥骨干作用，带动全国农民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

2月20日 全国农业展览会在首都"苏联展览馆"开幕。农业部部长廖鲁宫致开幕词指出，全国农业展览会总结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林业、水利、水产和气象各方面的生产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了中国农民在长久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产经验，介绍了先进科学成就的推广和应用。

2月21日 邓子恢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和经营方针等四个问题，向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作了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问题，报告指出："首先，农业生产是全国人民的'衣食来源'，是关系五亿农民生活改善的根本问题；第二，农业发展又是工业发展的基

础；第三，农业生产也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第四，为了进口就必须组织出口来换取外汇，而这些出口，在目前条件下，还只能是主要地依靠农产品和土特产品。”关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方针问题，报告指出：“第一，就要以增产粮食为重点；第二，要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农副业结合也是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环节；第四，合作社的生产计划，是既要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而又要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2月26日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作出决议：想尽一切办法争取1957华农业大丰收。

2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议上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月28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决定指出，“近两年多以来，生猪生产下降的情况是严重的，生猪生产下降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决定要求领导农民大量养猪，切实保证饲料供应；提高生猪收购价格，克服压级压价现象，每购一头肥猪给养猪农民留肉八至十五斤；贯彻执行“私有、私养、公助”方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发展养猪业》。

同日，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的精神，将生猪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五至二十七，全国平均共提高百分之十三点八九。猪肉零售价格全国平均共提高百分之八点四二。

3　月

3月2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后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应邀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说明。

3月4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说，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继续保持和巩固粮食局势的稳定。

3月5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周总理作关于访问十一国的报告。

3月9日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就目前的市场状况和今年的增产节约问题发言指出，1956年有些物资供应发生紧张情况并不是因为这些物资产量下降，而是由于社会购买力增长的程度，超过了物资增长程度。陈云说，1957年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3月12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418页）

3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的三项措施的通知。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

（3月19日《人民日报》）

3月18日　毛泽东同志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9页）

3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我国有四百八十七项大厂矿工程同时进行建设，其中有一百三十七项是属于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中的项目。

3月30日　新华社报道，经过两年多勘探，四川省攀枝花铁矿已经肯定为我国的大铁矿之一，它可以为大型钢铁厂提供一百年以上的矿石原料。

4　月

4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争取今年棉花丰收》。社论指出，"1950年棉花受到较重的自然灾害，没有完成原定的增产计划，增加了棉花和棉织品供应上的紧张程度。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今年棉花的大丰收。"

4月3日　我国第二个规模巨大的钢铁基地，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主体厂房建设今天宣告正式开工。据报道，1981年建成第一期工程后，将使我国钢铁产量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武钢开始建厂》。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社论指出，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都要有很大的部分转入生产。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着重地照顾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小学毕业生特别是中学毕业生，下乡种地，参加农业生产。

4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湖南、安徽、浙江、江苏、河北等省开发小铁矿，大量增设小炼铁炉，仅安徽一省，已经有一百九十九座炼铁炉投人生产，这种做法，被认为是解决生铁供应不足的一个好办法。

4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少花钱多办事是可能的》，谈我国基本建设的初步经验。社论说："基本的经验就在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也就是说，我国的建设要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必须是实事求是的。"

4月12日　国务院会议在听了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说明后，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指示说，在有煤炭资源的地区，根据需要情况，有领导地、积极地恢复和开办一些小煤窑，以就地解决民用燃料的供应，是很必要的。过去某些不适当的限制地方和群众采煤的办法，则应取消。

同日，国务院决定：减少夏季棉布供应，保证人民冬衣需要。由1957年5月1日至8月31日通用的第二期购布证一律按票面数额对折使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家都来节约棉布！》。

4月13日　举国瞩目的治理和开发黄河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4月16—21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了乡党委书记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到会作了《论农业合作社内部矛盾与民主办社》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农业合作社的内部矛盾和解决办法，讲话着重分析了当前农村方面六种比较突出的矛盾：第一，国家和合作社的矛盾；第二，合作社与社员的矛盾，也就是社员集体利苹与个人利益的矛盾；第三，社与队的矛盾，这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种矛盾；第四，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中农与贫农的矛盾；第五，队与队，主要是穷村与富村（也就是穷队与富队）之间的矛盾；第六，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二、关于民主办社。讲话认为：培养干部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满足群众迫切的民主要求，这是实现民主办社的先决条件。但光这样够不够呢？不够，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合作社的民主制度。

4月25日　中共中央批转福建省委批转龙溪地委《关于区乡干部、社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和改进领导作风的报告》。中共中央号召所有农村工作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脱鞋下田，同农民共甘苦，才能取得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从而把合作社办好，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4月2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

(5月1日《人民日报》)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怎样缓和食品供应不足的矛盾》。文章主要从怎样争取、利用一切可以争取可以利用的原料来解决这一矛盾进行了论述。

4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认真执行《给农业社社员适当地增加自留地来种植养猪饲料的通知》。

4月29日　近几个月来，市场上有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国务院发言人谈了当前物价问题，主要内容如下：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大多数商品价格稳定。提高价格是为了促进增产和保持供求平衡。高级消费品提价不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手工业品涨价主要是由于原料不足。蔬菜涨价是因季节差价和供不应求。农民收入增加，城市中购买力较高的人支出增加．今年财政收支，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可以平衡。

5　月

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

5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

5月3日　《人民日报》在《教育群众认清真相，缓和物资供求矛盾》的专题报道中，报道经济学家马寅初谈物价问题，他说：只有采取极少数几种商品调价的办法，并缩小机关、团体等对商品的购买力，才能使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平衡，才能避免物价再波动。

5月4日 武汉长江大桥钢梁合龙，武汉三镇连成一体。

5月9日 薄一波副总理在四川成都谈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如何进行整风。薄一波说：几年来“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浪费了很多资金，如果我们学会了基本建设的本领，就可能节约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同日，副食品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是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积极发展城市和工矿区附近的副食品生产》。

5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

5月11—12日 《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一文，文章仍用团团转的方法，着重分析工业各个环节的平衡问题：(一）重工业和轻工业间的平衡；（二）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平衡；（三）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平衡；（四）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平衡；（五）工业企业和运输企业间的平衡；（六）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平衡；（七）大型和中小型工业的平衡；（八）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平衡。

5月16日 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在重庆谈勤俭建国方针和基本建设的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问题：第一，技术政策问题；第二，基本建设的规模问题；第三，建筑标准问题；第四，城市规划问题；第五，土地征用问题；第六，自力更生和力争外援问题；第七，专业化和协作问题；第八，轻工业建设问题；第九，建筑基地和职工住宅问题；第十，劳动工资政策问题。

5月20日 近半年来，京、津、沪、汉等城市和新工矿区，蔬菜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根本上解决蔬菜供应问题》。

5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国营企业中逐步推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办法》。社论认为，这是扩大企业内部民主，解决企业内部矛盾，推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也是帮助企业党政工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种好方式。

6 月

6月3日 国务院发布《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整风是贯彻增产节约的主要关键，基本建设应该是增产节约的重点”。

6月8日 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页）

6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同日，《人民日报》在“对反社会主义谬论无法沉默，觉悟的工人群众起而应战”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上海、北京、天津、沈阳、鞍山等各地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

6月14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夏收分配指示》。指示指出，要切实作到公平合理，分别照顾，统筹兼顾国家、合作社、社员的利益；适当厢顾收入可能减少的社员；合理分配粮食；充分发扬民主，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

6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多建中小型企业》。社论认为，“就目前我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农业比重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情况来说，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有许多优点。”

6月26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开幕，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1956年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

6月29日　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报告预决算。

7　月

7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追击和驳斥资产阶级右派。

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是我国社会制度大变革的一年，在全国组织起来了七十五点六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人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在全国组织起来了约10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五百多万人，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一卜二。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和占职工总数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百分之八十二点二和占从业人员总数百分之八十五点一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伞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报告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的推动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1956年比上午增长百分之三十一；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为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九。但是，1956年的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第一，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多了约十五至二十亿元；第二，对农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超过计划十五点六亿元；第三，新增加职工二百三十万人，超过计划一百四十六万人；第四，教育事业的招生指标定得过高，执行过程又超过了原定的指标。

7月3日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书面发言，题为《新人口论》。其主要内容是：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

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

7月5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马寅初在第一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书面发言——《新人口论》。

7月9日　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发表了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指出："这次反右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5、448页）

7月1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通过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和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人民日报》报道说：这次会议"体现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推动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由于动手早、规模大、质量好、行动快，全国春季造林一百九十七万公顷。五年来造林总面积比解放前三十五年大三十二倍。

7月21日　新华社报道，福建省认为，在农村中进行一次以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是调动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他们作好当前工作的重要动力。

7月间　毛泽东同志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文章说："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8页）

8　月

8月5日　去年国家征购所得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了三十九亿斤。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销售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亿多斤，其中农村多销六十八亿多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社论指出，"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各方面努力来增加征粮和购粮的数量，缩减粮食的销量"。

8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

8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8月9日　据粮食部统计，1956—1957粮食年度比上一年度市镇多销了五十九亿斤粮食。为了保证近一亿人民所需粮食，全国市镇粮食销量必须严格控制。今后几年居民

口粮定量不再提高，供应水平偏高的要适当压缩，提倡节约，杜绝浪费。

同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规定，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人自由市场。

8月15日　综合《人民日报》报道，在反右的剧烈斗争中，8月上半月，粮食问题成为全国城乡一个突出的问题。《人民日报》曾多次报道农村开展大辩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粮食问题，包括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除此之外，在半个月中，先后发表了三篇与粮食有关的社论，即8月5日的《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8月12日的《粮食销量是能够减少的》，8月15日的《分清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

8月16日　根据资源条件确定合理分配办法，国务院批准减少棉布供应。城市多减，农村少减；取消职工、干部、学生同市民的差别；节约工业用布和公用布。

8月19日　冶金工业部将大力协助发展地方性的冶金工业，目前已确定了先在十八个省，自治区和市建设十八个中小型钢铁厂的方案。

8月22日　7月25日至8月22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确定贯彻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并提前编制1958年经济建设计划。

9　月

9月7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本年度棉花统购工作的指示》。指示认为，本年度多购一些棉花仍然是可能的，但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必须适当地减少农业社和农民的棉花留用量；第二，加强对土纺土织和棉花、土布市场的管理；第三，必须适当压缩絮棉供应；第四，加强棉花采摘工作的领导，增加棉花的收购数量；第五，棉农每出售一百斤皮棉，可以在计划供应指标以外，优待供应棉布五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抓紧棉花统购工作》。

9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各地国家机关普遍进行了精简工作，回到生产岗位和下放充实基层的干部已达三十多万人。其中十万干部回到生产岗位，二十万干部下放到基层。

9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用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就是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积极克服缺点，造成团结的新气象，以便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并从而促进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

9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布改进农业社的三项指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

9月20日　去年全国有十五省市没有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今年夏季丰收的省份中，也有的没有完成夏征任务。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税秋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9月25日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已全部完工，今天正式举行试通车，并即将交付使用，从此天堑变通途。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央多次指示，农业合作社的干部，从主任副主任起，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中央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各地各级党委都必须检查各合作社执行中央指示的实际情况，……适当地拟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10　月

10月1日　国家计委负责人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成就，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成就之中，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国家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负责人又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方针：一方面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证人民生活得到适当的改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与此相联系的建设方针是：我国的经济建设一方面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10月4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邮电通估网建成，直达电报和长途电话把首都同主要城市紧紧连在一起，每一县城和区都可通达电报、电话，深山僻壤已能迅速传递邮件。

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藏新公路建成，全长一千一百七十九公里，这条公路有九百一十五公里在海拔四千公尺以上。

10月9日　在9月20日到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邓小平同志作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同志作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同志作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9日，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做革命促进派》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1956年下半年的反冒进。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6—479页）

10月11日　国务院发出《粮食统购统销补充规定》，指出当前的方针应该是：在坚持粮食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保证国家正常的粮食收入，严格控制粮食的销售。

10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问题，对于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会议同意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加以讨论、在联席会议讨论之后，提到全国人民中讨论，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

10月15日　武汉长江大桥今天正式通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理想实现了》。

10月16日　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

草案，谭震林同志说明：两年的实践证明了纲要的方向和基本内容完全正确；中共三中全会已根据一些新的经验，对纲要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10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社论指出，凡是（反右）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就应当经过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适时地转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

10月26日 《人民日报》公布《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修正草案）包括序言和纲要两部分，纲要部分共40条：（一）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二）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三）发展畜牧业；（四）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五）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六）大力增加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七）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八）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九）扩大复种面积；（十）多种高产作物；（十一）积极地因地制宜地改进耕作方法；（十二）改良土壤；（十三）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十四）保护和繁殖耕畜；（十五）防治和消灭病虫害；（十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十七）发展山区经济；（十八）发展林业，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十九）发展海洋和淡水的水产品生产和水产养殖业；（二十）办好国营农场；（二十一）改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二十二）加强气象水文工作；（二十三）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二十四）提高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多种经济；（二十五）储备粮食；（二十六）改善居住条件；（二十七）除四害；（二十八）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二十九）保护妇女儿童；（三十）实行"五保"，优待烈属和残废革命军人，供养和尊敬父母；（三十一）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三十二）发展农村广播网；（三十三）发展农村的电话网和邮政网；（三十四）发展农村交通运输；（三十五）调整农村商业网；（三十六）发展农村信贷合作事业；（三十七）发挥复员军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积极性；（三十八）提高农村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十九）改造地主、富农、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保护农村的社会主义秩序；（四十）城市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必须互相支援。

10月30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煤矿领导、发挥生产潜力、增产煤炭和大力节约用煤的指示》。虽然1—9月份增产原煤三百零四万吨，但是，煤炭生产仍然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今冬明春以及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煤炭的供应仍将是十分紧张的。只有使增加煤的生产和节约用煤同时并举，才能有所缓和。

11 月

11月2日 向苏联祝贺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毛泽东主席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11月13日 新华社记者报道，毛泽东主席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我国实际情况迫切要求这样做，五年实践充分证明必须这样做。

11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邓子恢同志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的一部分——《关于农业合作社扩大再生产及其他几个问题》。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断扩大再生产，邓子恢同志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扩大再生产，最基本的是扩大基本建设；第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第三，动员社员适当地多出基建劳动日，这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出路；第四，要做好生产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既能增加出勤率，提高劳动效能，又能把辅助劳力都使用上，这是做好当年生产和扩大基本建设的基本关键；第五，要扩大再生产，必须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第六，必须提倡自力更生政策，不要依赖国家；第七，基本建设要有长期规划。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适当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的权限。(一）把目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作为地方企业；(二）增加省、区、市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三）原来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现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所得，百分之八十归中央所得。(四）在人事管理方面，增加地方的管理权限。第二，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一）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汁划管理的职责；(二）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三）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地方（省、自治区、市、县商业机构的设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第二，中央各商业部门没在生产集中的城市或者口岸的采购供应站（一级批发站、大型冷藏库、仓库），实行以中央各商业部门领导为主、地方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第三，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除了某些大型企业，地方认为管理有困难的以外，其余全部移交给地方，由地方商业部门直接管理。第四，商业计划指标，国务院每年只颁发四项指标，即：(一）收购指标；(二）销售计划；(三）职工总数；(四）利润指标。第五，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实行与地方全额分成。第六，商品价格管理的分工。第七，实行外汇分成。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地方财政收入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地方固定收入，第二种是企业分成收入，第三种是调剂分成收入；(二）地方财政的支出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地方的正常支出，第二种是由中央专案拨款解决的支出。(三）按照正常支出的需要，划分收入的项目和分成的比例；(四）地方结合和地方附加。今后地方可以在划定的范围内，根据收入，安排支出；(五）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比一般省市有较多的照顾。

11月16日 人大常委八十五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关手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这是从六

亿人口出发，进一步解决某些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

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

1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社论说：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内，中国可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1月26日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下放干部的热潮已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内开始形成，下放干部已达八十一万多人。

2　月

12月2日　中国工会代表大会今天开幕，大会总结四年工作经验教训，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提出"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12月9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被认为是一次组织全国农业生产跃进发展的会议。

12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指出："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12月13日　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作了说明：全国国民经济部门招用的临时工，每年不下二百万人次，1956年达到三百余万人次。

《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时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企业、事业、机关、部队、团体、学校等单位需用的临时工，应该首先从本单位多余人员中调剂解决；二、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必须持有当地劳动部门的介绍信；三、各单位在招工的时候，必须讲明所需的临时工应该具备的条件、从事什么工作，工作地点、工作期限、生活环境和工资福利等情况。此外，还规定各单位从农业社招用临时工的时候，必须与农业社和外出做工的社员共同签订劳动合同，并规定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人城市的农民，等等。

12月16日　今天闭幕的全国农田排灌机械及农业机械化会议决定，明年我国将供应五十万匹马力的动力排灌机械，给农村排涝和灌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同日，我国手工业劳动者有史以来第一次盛大的集会——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16日下午在北京隆重开幕。朱德副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手工业要赶上工农业的增长速度。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人民

日报》19日发表社论《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12月19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农业部最近联合召开了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总结和交流了畜牧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了各类地区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和任务。朱德副主席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重视畜牧业的发展，邓子恢同志作题为《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发展畜牧业》的总结报告。

12月21日　国务院发布《加强对于个体农户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指出，除了部分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还有百分之三左右的个体农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个体农户》。

1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第二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最近结束，会议订出十年水土保持规划，控制水土流失，消灭水旱灾害。朱德副主席在会议上讲话指出：水土保持是全国性的巨大工作。邓子恢在会议上讲话指出：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12月24日　我国航空工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第一架多种用途民用飞机诞生。

12月28日　五年来国家发放农贷八十亿元，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克服农民生活困难，今后要保持农贷资金的合理周转。

1958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社论指出，整风运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在全民整风运动下，我国195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业总产值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指标的百分之十七点三，比1952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二点五。农业方面，粮食产量达三千七百亿斤，比1952年增加六百一十亿斤。

社论最后说："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我们要在十五年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社论号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同日，宝成铁路正式通车，铁路全长六百六十八点二公里，贯穿陕、甘、川三省十九个市、县。《人民日报》为此于2日发表社论《把西南西北和全国连接起来了》。

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农村整风先抓薄弱环节，运用阶级路线整顿

三类社，两千三百个三类社跃升为一，二类社。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孝感县联盟农业社创全国最高记录，一季晚稻亩产二千斤。

同日，《人民日报》转载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社论指出，在农业发展纲要能不能提早实现和农业生产大跃进问题上，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思想的斗争，有勇气敢做敢为的人，是我们事业的促进派，没有勇气怀着无穷忧虑的人，是促退派，共产党人都应当是促进派。

1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社抢指出，从1953年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的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证明，我国国民经济完全有可能以比较高的速度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使重工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使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水平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的水平，争取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以上，使农业有一个跃进的发展。

1月7日　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必须注意节约国家建设用地》。

1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梅林看全国》，论述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在整改中掀起反浪费专题鸣放的经验。

1月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通过《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决定提出，农业社所留公积金的比例可以超过百分之八，经营经济作物的合作社可以超过百分之八。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部部长廖鲁宫的文章《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问题的说明》，文章指出，1956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社和百分之七十五的社员增产增收。根据全国不完全的统计，有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农业社，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和收入水平。

1月9日　国务院发布命令，公布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根据鼓励城市居民和其它非农业人口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的精神，规定青年学生下乡入社参加农业生产可以免缴股份基金。

1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右倾思想》，评述国务院对“自由王国”管庄进行检查后得出的教训——忽视政治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社论指出，建筑材料工业部在管庄问题上的严重错误是只抓业务，不抓政治，因而发展了单纯重视技术，完全轻视政治的倾向。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建材部部长赖际发的文章《关于“自由王国”——管庄问题的检讨》。

1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人民日报》编者在所加的按语中说：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谈到了对1956年工作的评价，批判了那种认为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错误的说法，说明了多快好省勤俭建国方针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柯庆施的文章是1957年12月25日

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人民扫报》为此于27日发表社论《打掉官气》，称赞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是一篇充满革命精神、值得认真阅读的重要文件。

1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浙江日报》记者吕韶孙的通讯，题目是：《毛主席在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文章说，一月上旬，毛主席在杭州郊区参观了农业实验田，并亲自使用双轮双铧犁耕田。

1月28—30日　毛泽东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讲话，提出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后，要搞四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四千万瓩电力。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看来八年可完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干劲，要鼓起勇气，力争上游。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讲不断革命，解放后搞土改，土改后搞互助组、合作社，1956年是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接着1957年搞整风，再接着就要搞技术革命。

2　月

2月1—11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京举行。彭真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李先念作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讲话以及其它决议提案，会议通过《关于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补选程潜为副委员长。在大会讨论中，代表们热烈赞扬正在全国各地掀起的生产建设高潮。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国家预算报告中指出，1957年预算收入二百九十三亿元，执行结果收入三百零七亿元，是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五。预算支出二百九十三亿元，执行结果支出三百零五亿元，是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九。国家财政收支相抵，收入大于支出，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人民日报》于12日为大会闭幕发表社论《一次大跃进的大会》。

2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社论说：跃进和冒进有原则的不同。1956年我国各项事业大发展是一个基本健康的大跃进。

社论号召："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社论说，全国大部分应当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的面貌基本改变。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破常规过春节》，号召全国职工春节不回家，少休息，力求把一分一秒的时间都用到生产建设上去，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人大代表马寅初在人大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发言阐述了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的关系。

2月11日　国务院发布命令公布2月6日第七十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人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

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我国劳动工资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发表了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对以上四个文件的说明。

2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人大代表李顺达、申纪兰在第五次人大会议上的发言《今年过黄河，五年过长江，力争八年亩产千斤粮》。发言介绍了山西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业社社员的干劲，"提前实现水利化，起早搭黑大进军，两头见星星，黑夜打马灯，雪下三尺不嫌冷，地冻三尺不收兵。"

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在全国除尽四害》。

2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商业工作一定能跃进》，介绍北京天桥百货商场搞好商业工作的革命气概和这个商场提出的做商业战线上的促进派的倡议，商业部和商业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商业职工向天桥百货商场学习。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介绍北京铁路局先进生产者及职工代表会议上互相比学赶超的事迹，同时发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关于全国铁路工作大跃进的谈话。谈话要求，"乘风破浪，鼓起革命干劲，开展日产百万吨公里运动"。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报上公布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要求全党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通过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打掉官气，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作空头的政治家。《人民日报》为此于15日发表社论《种试验田——又红又专的道路》。

2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茶叶工作会议，提出茶叶生产要迅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大力发展茶叶生产》。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山西人大代表陶鲁笳的发言《山西农业生产面貌三年内将基本改观，力争山区水利化，低产变高产，今年亩产二千斤，三年翻一翻》。

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据初步统计，到二月上旬，全国下放劳动锻炼和下放到基层单位工作的干部已达一百三十万人。

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大干一春》。号召全国农村把水利建设高潮继续推向前进。

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社论认为，1956年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因此错误的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应当接受教训，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社论说，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社论号召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各方面工作。

3 月

3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水利建设的大跃进》。社论中说：甘肃省水利建设事业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已达百分之三，全省从1956年已由缺粮省变成为余粮省，粮食总产量每人平均已达七百三十五斤。

同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示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是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干劲的决定性的运动。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条纲，可以把整风和生产统一起来，可以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社论要求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在反右倾中间加紧“大跃进”的发动。

3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民大动员的号角响了》。社论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是全民大动员的伟大号角。它将动员全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一步发挥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扫除落后现象，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水平。

3月7日 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十八省市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上做重要指示，号召全国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教育部副部长、全国扫盲协会副会长董纯才在为题《扫除文盲，向文化大进军》的发言中，要求全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扫除壮年的文盲，在两三年内基本上扫除职工和干部中的文盲，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农民和市民中的青壮年文盲，《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

3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河北省委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报告《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并为此发表社论《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社论高度赞扬了徐水兴修水库的经验，认为徐水经验给平原治水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3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对河南省水利建设高潮的报道。报道中说，“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

3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介绍和评论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厂职工关于“为谁劳动，为谁服务”的讨论。

3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扫除国营农场中的保守思想》。社论中说，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大跃进。1958年的开荒指标，由原计划的七百万亩跃进到了一千五百万亩，粮食总产量由原计划的二十三亿斤跃进到了三十多亿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荒指标也由计划的六千万亩跃进到了八千二百万亩。社论认为，提高开荒建场和发展生产建设的关键是消除保守思想。

3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赞扬河南省济源县和孟县打破县界联合治理莽河的经验，认为这是治理中小河流的基本方针。

3月22日 《人民日报》以《农业技术革命的新芽遍地生长》为题，报道群众性

的工具改革运动在全国农村蓬勃开展的情况，并为此发表社论《农业技术革命的萌芽》。

3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业中建立试验田的新经验》，号召在工业中广泛运用“种试验田”的领导方法，使工矿企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转变。

3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社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问题，在这次打掉官气的运动中，对残留下采的不平等现象，要进行一次大扫除。

3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新技术才能更快大跃进》，号召全国广大职工向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铣工苏广铭学习。苏广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努力革新技术，干了九年的活，为全国职工指出了跃进的门路，

4　月

4月2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天桥百货商场改革商业工作的报告，指示各地应抓住天桥百货商场改革商业工作的经验，在商业部门中层开整改工作。

(4月19日《人民日报》)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说：“凡是1958年粮食成棉花的亩产量全县（市）平均达到和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指标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出席会议。”通知号召全国各地应该用这件事动员群众，推动农业生产高潮向前发展。

(4月9日《人民日报》)

4月5日　《人民日报》以《比措施、比实效开展生产竞赛》为题，报道江苏常熟县二十三个公社党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农业高额生产竞赛的倡议，并为此发表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

4月7日　《人民日报》社论《要注意调节生产的节奏》，强调在群众干劲十足、打破常规大跃进的形势下，要讲究苦战的方法，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

4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植树造林要有一个新高潮》。

4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千方百计实现增产指标》。社论指出，1956年以来，一直有许多人不大相信农业增产指标能够提高，但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使人们相信，改变了生产关系，能够使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好多倍。过去必须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能够在几年内，甚至一、二年内做到。合作化的生产使生产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产量可以迅速地达到人们难以想象的高峰。

4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朱德副主席和上海市科学家见面。他勉励大家要又红又专，并说：“各方面都在大跃进，科学也要大跃进”。

(4月28日《人民日报》)

4月16日　《人民氏报》发表社论《提高双轮双铧犁的效用》，评论我国农村推广双轮双铧犁的过程和问题。社论指出，双轮双铧犁早在1953年就先后在东北和华北地

区试验推广，1954年底共推广四万部，1955年1956年合作化高潮中，两年推广了一百五十万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刮起了一阵歪风，破坏了双轮双铧犁的名誉，结果1957年仅推广了七万多部，有的地区甚至毁犁，退犁，造成很大损失。社论指出，将木犁改为铁犁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很大革命，我们要以极大的热情爱护双铧犁，大力推广双铧犁。

4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一文。内称："徐水县三十三万人民，经过三个月苦战，改变了全县的自然面貌。"

4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社论指出，农业中学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形式之一，是职业中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都要大力发展农业中学，努力把农业中学办好。

4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黑龙江国营庆华工具厂委员会《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和业务改革经验的初步总结》一文。《人民日报》在所加按语中指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都应当推行。"《人民日报》并为此发表社论（见5月7日条）。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农、肖峰的文章《企业管理的重大改革》。文章内容有三部分：工人直接参加管理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业务改革问题。

4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深入地、细致地、踏实地干》。社论指出，"为了实现先进的计划和指标，需要既有革命干劲，又要有求实精神"。

5　月

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争取更大的劳动成果》。社论说，一年来的整风运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农村中出现了排山倒海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高潮，农田水利大跃进特别惊人，一冬一春全国共完成一百七十亿土方，安徽省已完成五十亿土方，河南更加突出，已完成了六十亿土方。

5月5—23日　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议一致通过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会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党的社会建设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决议和报告27日发表），邓小平同志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及各项决议。会前召开了八届四中全会，为大会作了准备。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正式制定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规定作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决议和谭震林同志《关于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改草案的说明》于28日发表）

会议提出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强调要认真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同树又正式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我国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会议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文，号召"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会议闭幕后，《人民日报》于29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论述八大二次会议精神。

5月6日　全国农具展览会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进一步开展农具改革运动》。

5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社论高度评价黑龙江庆华工具厂在整风运动基础上，由职工群众创造出来的大胆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社论指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各地都应当研究这一经验，并在选点试验后，逐步推广。

5月12日　《人民日报》社论《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提出力争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

5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小型水电站——农村的夜明珠》。社论指出，农村小水电站的出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加速农村电气化的道路。

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提出要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甚至更短一点的时间内，扫除青壮年文盲。

5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文章《农业大跃进促进了全面大跃进》。

5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的文章《解放思想，迎接技术革命》。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扩种水稻、改变北方低产面貌》。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的文章《配合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全国农村文化大跃进》。

5月25日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以及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的文章《生产更多更好的机器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的发展》。

6　月

6月1日　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这是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同志4月15日写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推荐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苦战两年改变面貌”的经验。文章在批驳了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太落后难于前进的观点”以后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奋勇前进。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开方便之门》。社论集中批判邮电部门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号召邮电部工作要做到“哪里有电话，哪里就有高潮”，以适应工农业生产跃进高潮的需求。

6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同时发表社论《一个促进农业生产的条例》。《条例》规定，农业税率，全国平均为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社论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6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条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看明年》。社论号召在苦战三年中，要推广毛主席“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的领导方法。社论指出：“上步看下步，今年看明年”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6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赞扬河南人民以“踢破地球冲破天”的革命气概苦战半年基本实现水利化。

6月8日　《人民日报》以《冲天干劲夺得了惊人丰收》为题，报道广东早稻丰产消息，一百万亩干部实验田，估计亩产达八百斤——千斤。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

6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化革命开始了》。社论预见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6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业也要今年看明年》。

同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改进税收管理条例的规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税收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的文章《在农业战线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6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合作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点九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三千五百三十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创造奇迹的

农民兄弟祝贺》。

6月14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廉。毛主席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猪肉一百斤，油二十斤，棉花二十斤，再过一个时期，每人每年有粮一千五百斤"。新华社记者为这次接见发表报道文章《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总路线变成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夏粮增产可达二百亿斤，五个月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五月份的巨大成绩》。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引洮工程开工，工程可与我国伟大的运河媲美，将把二千万亩旱地变成水田。

6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创惊人高产记录：小麦亩产达四千三百五十三斤。

6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一年》，纪念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安徽阜阳地区谈农业大跃进的意义时指出："苦战三年，今年明年绝大多数地区粮食产量平均每人可达一千斤，将使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的等待落空，使帝国主义发抖。"

6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社论指出，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总路线的灵魂。

6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创造亩产四千六百八十九斤的高产记录。

6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推动全民工业化，中央企业百分之八十下放地方管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措施》。

6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认为，农业生产大有希望，平均每人二千斤的粮食任务，三年五年内即可完成。这样的农业跃进速度古今中外俱无。这是马列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不能出粮食的论调被驳倒了。

6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两条县办小型铁路通车，并发表社论《县的建设力量究竟有多大》。

7　月

7月1日　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刊载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开始出现了"人民公社"的提法。文中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夏季粮食作物获得空前大丰收，总产量达九百五十亿斤，小麦总产量达六百四十亿斤，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民问题仍然是根本问题》。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在省委工业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全党动员加速工业建设》。

7月10日　冶金部和财政部在石景山钢铁厂召开的基本建设投资下放现场会结束，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讲话说："投资包干制是我国基本建设管理制度的一个方向，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将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日报》于15日为此发表社论《基本建设投资要实行包干制度》，指出这是革新基本建设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革命措施。

7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浙江等地发现一座世界罕见的大铜矿，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铜矿。

7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小麦层层加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两亩小麦创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的记录。这是河南省放出的第二十九颗"卫星"。

同日，刘少奇同志在列车上与江西都昌县参观团举行座谈会。记者以"幸福的夜晚，难忘的会见"为题报道这次接见情况。

（7月30日《人民日报》）

7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协作就是力量》，评述工农业大跃进形势下，组织运输协作的重要意义。

7月16日　《红旗》杂志第四期一篇题为《在毛泽东旗帜下》的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7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闽候县连坂农业社二点六亩早稻试验田平均亩产五千八百零六斤，中共福建省委和人民委员会为此奖给连坂社一部拖拉机。

湖北省西平县猛进农业社，一点七亩小麦平均亩产七千二百零一斤。

7月23日　《人民日报》以"东风压倒西风"为题，报道1958年夏季粮食作物生产空前丰收的情况：总产量达一千零一十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九，小麦总产量达六百八十九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超过美国四十多亿斤。《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社论指出，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新阶段。铁一般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自称为"小麦王国"的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了。现在我们已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7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波阳县和平农业社创最新高产记录，一点二亩早稻试验田平均亩产七千七百四十五斤。

7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江西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达九千一百九十五斤，接近万斤大关。

7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深耕农具和改良土壤现场会议，在河南省长葛县召开。会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深翻和改良土壤的运动，要求大干

一秋加上一冬一春，把全国十六亿亩耕地普遍深耕改良一遍。一般深度达一点五尺上下，丰产田二点三尺以上。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早稻获得空前大丰收，总产量达到八百亿斤，比去年增加四百亿斤。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要学会多种技术》，号召工人开展学习多种技术运动，做“多面手”，不要终身只通一艺，固守一职。

7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第二季度养猪数量已达一亿八千万头，比1957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四，每一农户平均有猪一点五头，基本上达到了农业纲要1962年的要求。

7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省淮北人民经过半年苦战，提前实现河网化，彻底消灭水旱灾害。“淮北将要变成江南”。《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淮北人民的雄心》。

7月31日　《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放出一颗早稻高产“卫星”，平均亩产达一万零五百九十七斤。

8　月

8月3日　新华社报道，1958年上半年工农业大跃进创造了惊人奇迹，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粮食比去年增产八百四十亿斤，新建三十多万个地方工业单位，有四百四十四个县基本上消灭文盲。

8月4日　毛泽东主席参观徐水。《人民日报》于11日发表特约记者康濯的报道文章《毛主席到了徐水》。毛泽东主席说：“你们这里粮食吃不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

8月6—8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农村，赞扬七里营人民公社棉花长得好，社长对毛泽东主席说：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二千斤。毛泽东主席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还说：“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

（8月12日《人民日报》）

8月9日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主席视察山东农村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0日　安徽省枞阳县石牙乡高丰农业社早稻试验田又创新记录，亩产达一万六千斤。

8月10—13日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主席在天津视察时提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都有条件，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8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海星农业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斤的高产记

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

8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晋江县英湖农业社花生亩产创造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一斤的全国最高记录。

8月17—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工农业生产、农村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和《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议还作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8月17日 交通部发出关于全民搞运输保证出钢铁的紧急指示。《人民日报》于9月18日为此发表社论《立即展开一个全民搞运输运动》。

8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信阳地区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共有十大优点，四项有利条件，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

8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调查组的一封信，题目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大跃进的形势”。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紧紧抓住钢铁生产》。

8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协作是完成计划的有力保证》。

9 月

9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

9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数千万农民坚定地向共产主义过渡，河南省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截止8月底，全省农村在原有三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农业社（平均每社二百六十户）的基础上，已经建成大型综合性人民公社一千三百七十八个，平均每社七千二百户。加入农业社的户数已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土地来个大翻身》，号召各地都要把深耕列为农业生产一系列措施的中心，展开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深翻地运动。

同日，《人民日报厅，发表中共辽宁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文章《辽宁省并大社经验》。文章提出在并大社过程中，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处理经济问题。

同日，新华社报道，朱德副主席视察北京石景山钢铁厂。

9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歌唱人民公社的诗词：“入了公社如上天，一夜赛过几千

年，利刀斩断私有制，开辟历史新纪元。"

9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同时发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

9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北部山区连县田北农业社一点七三亩中稻平均亩产六万零四百三十七斤。同日刊登了"田北社卫星田"的照片，介绍说，在金黄色地毯一样的中稻田上，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9月5—8日　毛泽东主席召集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分析，指出目前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明年农业还要继续大发展，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要热忱欢迎，积极领导。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声明；谭震林关于人民公社等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1959年国家建设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关于财政工作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

9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南三省，区加强工业战线，领导重心转向钢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

9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的决议今日公布。该决议于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

9月上旬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主席在湖北省作为时六天的视察，《人民日报》于29日发表记者曹葆铭的通讯《毛主席在武钢》。毛泽东主席说："象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又说"学生自觉地要求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

（9月29日《人民日报》）

9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8月29日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个文件：（1）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2）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3）关于改良土壤和深耕土地的指示；（4）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5）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二千万大军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日夜奋战，9月上旬钢铁日日猛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钢铁生产必须快马加鞭》。

9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鲁山县一千三百多座炼铁炉全部炼铁，8月28日达到日产铁一千零六十八吨的惊人记录。

《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向日产千吨铁的鲁山人民致敬》。

9月16日一20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毛主席在安徽》，报道毛泽东同志在安徽视察情况。毛泽东同志在视察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

社能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9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河南日产生铁一万八千多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

9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康濯写的通讯《刘少奇同志在徐水》。

9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指示还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社办学校。要求三年或五年基本上完成扫盲，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的工作。

9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一千三百万人经过一年苦战，战胜了干旱，在粮食战线上取得了前所来有的大丰收。今年，粮食总产量达二百亿斤，比去年增产一点四倍，全省每人平均可有粮食一千五百四十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已经富裕了。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鞍山市举行三万职工群众大会，动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钢的任务而奋斗。李富春同志在大会上说，谁有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谁就会创造奇迹。

9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规定全体干部每人每年必须至少参加体力劳动一个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投入体力劳动——共产主义的大熔炉》。

10 月

10月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工农业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普遍开花，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风气。《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农村基本公社化》。

同日，新华社报道，五亿农民高举粮食帅旗，一年实现十年增产指标，1958年总产量将达到七千亿斤以上，比1957年三千七百亿斤跃进增产一倍左右，棉花总产量压倒美国，预计皮棉可达七千万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丰收再跃进》。

10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的诗词《送瘟神二首》。

10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文章《依靠群众，保证农业生产不断跃进》。

10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村劳动力必须全面安排》，论述农村应正确解决在大跃进中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省无为县响山社三年来实行“供给制”的办法，培养了社员的共产主义精神，拔掉了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架起通向共产主义的阶梯。

10月12日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设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任命陈

云为主任。

10月14日　《人民日报》报道，亿万人民苦干一冬春，农田水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一年扩大灌溉面积四亿八千万亩，现有灌溉面积达十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二分之一以上，占世界灌溉面积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掀起更大的农田水利高潮》。

10月15一21日　全国各地开展"钢铁高产周"。一周共生产钢四十三点七万吨，铁一百七十六万吨，《人民日报》于20日、26日分别发表社论《群众威力无穷》和《钢铁高产周胜利以后》。

10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李先念同志的文章《人民公社所见》。

10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

10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徐州视察钢铁机械工业时，赞扬徐州人民大搞钢铁工业的干劲，说明了全民炼钢的十大好处.

11　月

11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据冶金部统计，从1月到10月底全国钢产量达到七百二十万吨，全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争夺战胜利在望。《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质量是钢铁战线的迫切任务》。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王任重的文章《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

11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工具改革运动抓到底》，指出工具改革运动正在开辟着我国农业经过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

11月5日　新华社报道，据全国棉花生产跃进现场会议材料统计，全国棉花总产量超过七千万担，平均亩产皮棉九十斤左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年棉花产量还要来一个飞跃》。

11月7日　新华社报道，最亲密的兄弟送来最宝贵的礼物——苏联又帮助我国建设四十七个新企业。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十月革命的光辉道路上高歌猛进》。

11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向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全国钢产量已突破八百万吨大关，占全年任务一千零七十万吨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三。

11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搞快速施工》，认为这是建筑工业在城乡劳动力紧张情况下，加快工程进展的有效办法。

11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文章《广东省领导晚稻生产的经验》。

11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晚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广东省获得特大丰收，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一千六百九十斤，提前九年超额一倍，实现农业纲要指标。

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大连边船厂建造的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交通部将这艘远洋货轮命名为"跃进号"。

11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爱钢铁大军，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社论指出："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的安全和健康。"

12　月

12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张仲实的文章《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按劳取酬"》。

12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认为，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

(12月23日《人民日报》)

12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人民生活问题》的文章，报道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搞好生活的目的，是促进生产更大的发展，而不是促退。

12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一年之间钢产加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章。"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千万英雄儿女斗志昂扬奔向明年生产一千八百万吨钢的新目标。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为明年更大的丰收而奋斗》。

12月26日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12月29日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工业与交通问题》的报告。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据11月初统计，全国各族农民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一亿两千六百九十多万户，组成了两万六千五百多个又大又公的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达四千七百五十六户。

1959 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社论指出了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大好形势，阐述了1958年在工业、人民公社、

文教方面的成就，并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规定了1959年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一些主要指标。

同日，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闭幕，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六千名代表。《人民日报》为此于次日发表社论《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方向》。社论对这次会议的精神和要求作了说明。在闭幕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说，“1958年已经找到了一条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我们必须争取在1959年实现比1958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先进单位代表为1959年实现更大跃进提出十条倡议。(一)保证完成1959年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的任务，并且力争超过；(二)保证完成1959年生产一亿担皮棉的任务，并且力争超过；(三)切实做好小麦、油菜和其他过冬作物的田间管理；(四)认真执行“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五)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六)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七)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八)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群众生活；(九)争取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事业更大的跃进；(十)抓紧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密切结合冬季生产，整顿巩固人民公社。

1月2—13日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讨论和安排了今年的粮、棉、油、麻的农业生产及发展牲畜、蔬菜等生产问题和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问题。会议认为，要使今年农业有更大的跃进，必须认真全面地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合理地安排使用劳动力。

(1月19日《人民日报》)

1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1958年我国建筑材料的生产大放异彩，无论砖瓦、砂石、水泥、玻璃、陶瓷及其它建筑用的非金属矿产品都比去年增产很多，有些产品的产量增长了一倍到几倍，全年仅试制和生产的新产品就有两百多种，还有大量的代用品。到1958年年底，砖的产量将达到四百亿块左右，比前年增加一倍多，瓦的产量也将比前年增加一倍半左右。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发动群众大办土铁路，已出现高潮。部分动工较早的地区已有十一条铁路正式通车，全省还有二百四十多公里土铁路全面动工修筑，六百多公里开始进行地形勘测。《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土铁路——地方运输的新生力量》。

同日，全国农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朱德副主席、谭震林等中央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朱德副主席并为开幕式剪彩。展览会共分农作物馆、农村工作馆、林业馆、畜牧业馆等十一个馆，预计展至今年5月底。

1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谈，据初步估算，1958年全国地方工业的产值比1957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是执行以中央工业为纲，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的结果，1958年各地自己动手兴办了许多重工业，各地区大都能生产生产资料了。各地大办工业后，全国工业布局开始走向均衡。地方工业的发展对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将起巨大的作用。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我国煤炭产量超过英国》。1958年煤炭产量达

到二亿七千零二十万吨，比英国多五千多万吨。

同日，新华社报道，煤炭工业部1958年年底在山东薛城召开了全国土法炼焦及副产品回收现场会议，着重解决了提高焦炭质量和煤炭综合利用问题。

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1959年第一季度内全国就将有七十万瓩左右的发电设备投入生产。这个数字相当于1958年全年新增发电设备容量的三分之一，比去年同期投入生产的发电设备多了三十多倍。到第一季度末，全国将有七十个左右的大型电站同时施工，这些电站全部建成后，最终发电能力都在十万瓩以上。《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电力必须赶上去》。

同日，新华社报道，冶金工业部最近召开全国轧钢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一个增产钢材的运动，1959年全国钢材生产任务是：产量将比1958年增产一倍多，品种增加近两千种。《人民日报》为此于七日发表社论《千方百计增产钢材》。

1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铁路管理局三十多个车站采取"线路搬家"的办法，在三个月内，不增加一根钢轨和枕木，开辟了四千多个货位，相当于这个局八十二年来开辟货位总数的一半。这一措施对加速车辆周转，缓和货运堵塞现象有很大作用，铁道部负责人认为，这项经验可在全国各车站推广和学习。

1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大面积高产而奋斗——从全国农业展览会看今年农业大跃进的关键》。社论指出，农业大跃进的关键是大面积增产，大面积增产的关键是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1月9日　新华社报道，邮电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邮电会议，布置1959年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邮电部门必须坚持在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和为工农业大跃进服务的前提下，继续贯彻电讯以长途通讯为纲，邮政以报刊发行为纲，抓住通讯组织建设和邮电工作建设，进一步加速我国邮电事业的发展。

1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汽车列车化运动正在迅速发展，到1958年底已经制造挂车三万多辆，对缓和运输紧张状况起了重要作用，按每辆挂车平均载重量三吨计算，相当于载重四吨的解放牌汽车二万七千多辆投入公路运输，增长现有汽车货物运输能力一半以上。

1月13—26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会议认为：在整社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抓思想、抓生产和抓生活相结合的原则，而当前更重要的是抓好生产。谭震林、邓子恢、陈正人等同志在会上对当前农村工作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2月3日《人民日报》）

1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1958年，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在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全军参加义务劳动日共达五千九百万个，比1957年增加近两倍，通过劳动，既支援了国家的工农业生产，还增强了官兵的劳动观念，进而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大跃进。

1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农村水利冬修运动已经逐步展开。据统计，到1月11日止，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水利冬修工程已完成的土石方达五十亿立方米。

1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其中敬老院全国就有十万多处，入院老人约二百万人，敬老院为无子女无依靠的老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同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负责人，在北京分别签订了1959年各地的农产品产销协议书。目的是把各地今年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收购计划用合同形式规定下来，便于指导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更有计划的生产，促进人民公社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并且进一步把人民公社的各项生产都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

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轻工业部为了适应今年工农业更大跃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深入开展的需要，确定今年造纸工业必须继续贯彻“大洋群”和“小土群”两条腿走路方针，即在现有大中型企业中大搞技术革命，充分挖掘潜力，在人民公社中大办小型造纸厂。《人民日报》于18日为此发表社论《造纸工业要有更大的跃进》。

1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第三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包钢，经过一年多的大规模施工，今年就要进入边生产边建设阶段，提前出铁、钢和大型钢材，参加今年国家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钢的序列。今年投资比1958年大一倍半以上，有二十个系统包括一百多个工程项目继续施工和开工。《人民日报》于19日发表社论《保证重点，支援包钢》。

1月19—24日　冶金工业部在南芬召开了全国黑色冶金地质矿山现场会议。会议提出，千方百计增产铁矿石及其他钢铁原料，给钢铁工业大跃进提供丰足的粮食，是全国黑色冶金矿山职工的一项重大而光荣的任务。会议要求大搞群众运动和技术革命，发挥潜力，同时加速矿山基本建设，以保证钢铁工业原料生产更大跃进。

（1月31日《人民日报》）

1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工具改革运动更好地开展起来》。社论说，大跃进使劳动力缺少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要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靠人和工具两个因素，当前人的因素——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热情很高，关键是工具的因素，社论号召，在1958年大力推广工具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大搞工具改革运动，使我国的工具改革运动提高一步。

1月27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时毛泽东主席说，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

1月27日—2月5日　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

1月28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积肥造肥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农村和城市，人人动手，掀起全民积肥造肥高潮。

2　月

2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社论说，1959年是苦战三年的第二年，也是决定性的一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速度。现在苦战，紧张，就能换得将来的幸福，轻松。我们有了1958年的丰富经验，实现1959年更大、更

好、更全面的跃进就更有把握了。社论最后要求祖国的英雄儿女们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

2月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百零四次会议，商业部部长程子华在会上作了《关于商业工作的报告》。

同日，国务院批准并转发了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补尤规定，要求各地贯彻执行。

（2月18日《人民日报》）

2月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百零五次会议，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作了《关于钢铁生产的报告》，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作了《关于化学工业生产的报告》。

2月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百零六次会议，听取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作的《关于煤炭工业生产的报告》。

2月6日　农业部召开河北，北京等十一个省市小麦田间管理电话会议，号召全国产小麦省份开展一个小麦亩产千斤运动，努力创造小麦千斤亩、千斤队、千斤社、千斤县、千斤专区，争取今年小麦生产比上年有更大的跃进。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冶金工业厅（局）长和重点冶金企业厂矿长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讨论1959年计划和措施。会议认为，为了确保夺得一千八百万吨钢，必须大力发展焦炭、铁矿石和其他冶金材料的生产，开展技术革命运动。还讨论了今年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问题和整顿、巩固、提高“小土群”的问题。

同日，新华社报道，轻工业部最近在上海召开了轻工业科学技术工作会汉。会议指出，今后轻工业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是，面向生产企业、人民公社，土法上马，根据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搞技术革命。

2月7日　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举行扩大两国间经济和技术合作谈判，今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关于双方进行合作在1959年到1967年间在中国建设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器制造，电机制造，无线电技术，建筑材料等七十八项大型工业企业和电站的协定。这项新的协定是对现有的关于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实行工业化协定的补充，

同日，全长六百零五公里的黔桂铁路今日正式通车。

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煤炭高额丰产的途径》。社论指出，要完成今年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的生产计划，除继续鼓干劲外，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每个采煤工作面的产量。

同日，新华社报道，最近轻工业部制定了今年轻工业跃进计划。规定今年准备扩建和新建的现代化大中型企业约有二百个项目，造纸工业和制盐工业列为今年轻工业发展中的重点。

2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一千八百万吨钢而奋斗》。

2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苏团结永远是牢不可破的》。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伟大人民的兄弟友谊》。

2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至目前为止，以陶瓷代钢铁试制轻工业设备，已

试制成功运转良好的陶瓷机械设备有六十三种。最近轻工业部又在宜兴召开了有十多个省市参加的以陶瓷代替钢铁制造机械设备的现场会议。会议成功地总结了配料、成型、干燥、烧成和装配等一系列完整的经验。

2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我国机械工业的产量将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电站设备等都将成倍或几倍地增长。第一机械工业部认为每个企业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必须把增加产品品种，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作为1959年机械工业更大跃进的全面奋斗目标。

2月16—21日　中国科学院和水利电力部联合召开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规划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动员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协作精神，统一布置，分工负责，进行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的考察、勘测、研究工作，为今后规划设计提供必要资料。会议还初步拟定了西部地区南水北调1959年的考察工作计划。

(3月1日《人民日报》)

2月16—22日　轻工业部召开全国轻工业厅局长会议，具体安排了今年各行业的生产计划。会议认为，保证原材料的供应是完成今年轻工业任务的重要关键。

(2月28日《人民日报》)

2月16—3月1日　新华社报道，商业部召开全国土产废品会议，决定大力做好土产、废品的收购，调拨和交流等工作。会议初步确定今年采购总值为五十二亿元，比1958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会上共签订了三类物资的协议和合同四百二十六份，金额达一亿一千万元。

(3月18日《人民日报》)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公社要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社论在指出生产责任制的意义、作用和做法后说，人民公社的生产责任制，必须建立在社员的高度的劳动自觉性的基础之上，才能充分发挥社员的积极性。

同日，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郎和交通部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交通工作部长会议和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一致强调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人民日报》于20日发表社论《做好开路先锋》。

同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最近在湖南省新化县召开现场会议，交流和推广新化县协助县、社工业企业建立财务制度、改善财务管理的经验。

2月19日　农业部等召开的全国提水工具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农业、机械工业和商业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迅速为春耕生产准备好排灌机械和各种提水工具。《人民日报》为此于21日发表社论《切切实实抓紧工具改革》。

同日，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工具改革办公室主任会议确定：要进一步地迅速地开展一个更广泛、更深入、更细致、更有成效的工具改革运动，为农业的机械化、电器化作好准备。

2月19—21日　农业部在郑州市举行十省、市小麦座谈会，号召继续开展千斤竞赛，强调麦田管理要一抓到底，《人民日报》为此于25日发表社论《为穗长、穗大、粒多粒饱而战》。社论指出，保证穗穗长大，粒粒饱满，是争取亩产千斤的关键。加强措

施，使小麦生长过好拔节、灌浆关。

(2月25日《人民日报》)

2月20日一3月19日　农业部在广东召开全国造林园林化会议，指出实现大地园林化首先要加快绿化荒山荒地的速度和提高植树造林的质量。

(3月27日《人民日报》)

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化工部将从生产和基建两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化工产品生产，以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化工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报》为此于次日发表社论《大大增加化工产品》。社论阐述了化工产品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要作用。

同日，冶金工业部举行电话会议，要求各地按质按量迅速调运生铁支援重点企业。《人民日报》于24日发表社论《全国一盘棋》。社论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对全国或者对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是有利的。

2月2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抓紧春季开展大家畜配种运动的通知。号召精心养护母畜和照管仔畜，保证大家畜净增百分之十。《人民日报》为此于23日发表社论《加速发展畜牧业》。

2月24—25日　地质部在包头举行第一届全国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工作会议，讨论地下水的长期观测对国民经济的意义。会议订出了工作规划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3月5日《人民日报》)

2月25日　1954—1958年五期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还本抽签大会在京举行，财政部于20日发布的1958年建设公债还本付息办法于27日在《人民日报》公布，同时公布在今后十年内分年还本抽签中签号码并发表公告。

2月26日一3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正式成立六省市（晋、冀、鲁、豫、陕、北京）消灭农作物病虫害联防区，联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制定了1959年联防方案，全面围剿病虫害。

(3月5日《人民日报》)

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委最近召开会议，向中央工业、财贸各部门介绍了粮食部门的“粮食分区产销平衡合理运输”的先进经验，要求认真推广。《人民日报》为此于3月2日发表社论《大力组织合理运输》。社论指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从整体利益出发，就能顺利地推行物资分区产销平衡的合理运输制度。

3　月

3月1日　陈云副总理在《红旗》（1959年第5期）发表文章《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人民日报》今日全文刊载。文章对工业布局、企业布点、大中小型企业并举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

3月2日　新华社报道，煤炭工业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全国煤炭职工

红旗竞赛”广播大会。参加全国煤炭工业干部会议的代表在会上提出红旗竞赛的条件、措施和决心，薄一波副总理对全国煤矿职工讲了话，全国有一百几十万煤矿职工收听了大会广播。

3月4日　新华社报道，据北京、天津等二十二个城市的初步统计，有五十三万街道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业生产，她们办起的各种小工厂约达四万多个。

3月5日　全国林业科学技术会议今日结束。这次会议确定1959年将在国内对九十一种用材和经济树种的新林和幼林进行速生丰产的培育试验，会议要求全国林业研究单位都把这一工作列为重点任务。这次会议是由林业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所召开的。

(3月11日《人民日报》)

3月6日　新华社报道，据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各地举办的托儿所，幼儿园有四百九十八万多处，受托儿童六千七百七十多万人。一般省、县入托儿童都达到学龄前儿童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有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各地建立的公共食堂，到去年12月底止，共有二百八十九万多处，参加食堂的农户一般都达到当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多的达到百分之百。

3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遵化县委书记曹寿山的文章《以人定量吃饭》，介绍西铺建明公社公共食堂执行饭票制的体会。全公社一百三十六个食堂，两个月节约粮食达三十七万五千斤。

3月8日　新华社报道，春季造林运动发展迅速，据湖北、福建、甘肃等十七个省，自治区的统计，到4日为止，已造林一亿二千二百多万亩，四旁植树九十三亿株。《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社论《加快绿化速度，提高造林质量》。

同日，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商业部最近在广东清远县联合召开了全国家禽生产现场会议。《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速度发展养禽业》。要求采取两条腿走路方针和解决饲料问题。

同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对虾、黄花鱼和其他水产品捕捞工作的通知。

(3月13日《人民日报》)

3月9日　新华社报道，冶金工业部最近在河南焦作市召开全国耐火材料厂矿会议。会议向从事耐火材料生产的职工提出倡议书。

同日，冶金部最近在南京召开全国中小型铁矿会议，提出当前任务是围绕高产优质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推行采矿石机械化，努力提高生产水平，保证为钢铁元帅提供更多更好的铁矿石。

3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了实现今年生产皮棉一亿担左右的任务，全国老棉区千方百计提高单位产量，新棉区保证扩大计划，并积极开展棉田备耕工作。《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一定要拿到皮棉一亿担》。社论说，为了达到生产一亿担的目标，必须扩大棉田面积到一亿亩，即比去年扩大新棉田一千五百多万亩，去年亩年百斤以上的棉田只占棉田总面积的五分之二，今年要棉田平均亩产百斤皮棉，总产量才能达到一亿担。这是一个繁重的任务。但是只要我们鼓足更大的干劲，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一亿担皮棉是一定能够拿到手的。

3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劳动工资计划会议今日在北京闭幕，会议建议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指出开展技术革命和劳动竞赛是根本办法。

(3月25日《人民日报》)

3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更高速度发展水产业》。社论在分析水产对人民生活的重要关系和我国存在的水产资源潜力后提出四条措施：一、大力推广1958年的高产经验；二、大搞人工孵化，争取苗种丰收；三、积极发展捕捞生产；四、大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3月14—28日　新华社报道，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确定今年财政部门必须大抓企业财务管趣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筹集资金。

(4月2日《人民日报》)

3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增产日用轻工业品》，社论指出，积极增加日用轻工业品的生产，以适应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需要，是当前轻工业部门的一个重要任务。

3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最近抽调六千九百多名干部，分别下放到二十六个省（区)，市的人民公社和厂矿进行劳动锻炼。其中绝大部分是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

3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油料大丰收》。社论指出，油料同全国人民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人民生活正在不断改善，对食油的需要不断增加，工业用油的需要量也不断增长，必须象关心粮食，棉花一样关心油料，今年我们一定要把一百二十亿斤食用植物油的原料拿到手。

同日，冶金工业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全国钢铁职工高产、优质竞赛广播大会”。会上，全国钢铁工业战线各单位互下战表，开展“高产，优质，多品种”的社会主义竞赛。他们先后宣读了倡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耀邦都在会上讲了话。

3月18日　国务院批准并转发了商业部《关于逐级召开物资交流会进一步做好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要求逐级召开物资交流会，以便有组织地促进商品流通。

(3月24日《人民日报》)

3月19日　《人民日报》社论《贯彻八字宪法，提高播种质量》。社论指出，八字宪法之间互相联系，贯彻不好，整个生产过程无法补救。播种是贯彻八字宪法的关键，为了增产，必须在播种时很好贯彻，才能为丰收打下基础。

3月20日　商业部召开的全国蔬菜果品工作会议今日结束。会议决定各地全力做好蔬菜、果品的经营管理工作，尽快解决某些地区蔬菜供应不足问题。李先念在会上讲了话。

3月20—29日　冶金部在上海召开全国转炉炼钢会议，决定大力推广先进经验，从六个方面着手保证转炉生产更大跃进，充分发挥转炉炼钢能力。《人民日报》为此于4月4日发表社论《要转炉炼出又多又好的钢》。

(4月4日《人民日报》)

3月21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今年第四季度在首都召开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总工会为此发表告全国职工书，动员全国职工响应党和国家这一伟大的生产大跃进的号召。《人民日报》为此于3月24日发表社论《创造新成绩，争取上北京，群英会上争光荣!》

3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林业部最近召开的全国林业基本建设会议确定，今年将新建和修建三十六个大采伐企业，扩大采伐范围，以保证木材需要，今年开始将大力开发西南地区原始森林。

同日，新华社报道，冶金工业部最近召开全国小高炉生产技术会议，交流经验并制定了一套小高炉操作要点和技术措施方案。来自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小高炉工作者互相挑战应战，相勉在全国开展一个为争取小高炉优质高产大面积丰收的社会主义竞赛。《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社沦《千方百计增产生铁》。

同日，新华社报道，南水北调线路之一的（北）京广（州）大运河沙河到郑州段的勘测工作和郑州到北京段的查勘工作，已在最近开始。这支勘测队伍是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交通部和河北，河南两省及北京市的有关部门组成。这条大运河开通之后，可供给沿线地区灌溉，成为沟通我国南北的航运大动脉，沿线还可利用落差建设水电站。

3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商业部最近召开全国储运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商业部部长程子华在会上分别就短途运输和直线运输讲了话，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向全国储运工作者提出八项倡议。《人民日报》于3月26日发表社论《抓紧商品流通的重要环节——运输和储存》。

3月27日 煤炭工业部向全国煤矿职工发出指明技术革命的主攻方向的通知，决定今年推广三十六项重大先进经验。

同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召开设备成套工作会议，要求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工业、交通各部、各地方党委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早抓大抓设备成套工作。

4 月

4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合理密植》。社论指出，虽然说“密”是农作物高产多收的中心环节，但不能说越密越好。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限度内，密是好事，缺少一定条件，超过一定的限度，“密”就会变成坏事。社论又指出，“密”的限度也是可变的，但必须同各种条件相配合。只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密植就一定能合理，也就一定能增产。

4月2—5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于4月8日发表。

4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猛攻巧打病虫害》。社论说，“八字宪法”是统

一的整体，必须综合运用，全面执行。在肥多、水足、密植的条件下，对于“保”字（植物保护）不能不更加注意。社论强调消除病虫害对增产的重要性，要掌握敌情，抓住关键，土洋结合，猛攻巧打，就能多、快、好、省的消灭病虫害。

同日，新华社报道，农垦部最近召开全国主要国营农牧场，代表会议。王震同志在会上作关于国营农收场的生产方针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应充分发挥农牧场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生产大批农畜产品。同时农垦部与商业部、外贸部、粮食部等签订了 1959 年向这几个部交售农畜产品的供货合同。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商业部最近联合召开会议，全面安排全国汽车、拖拉机、内燃机配件的生产和供应工作。1959 年这些配件的生产总值将比 1958 年翻一番，品种将增加六百五十多种。

4 月 6—12 日　铁道部，煤炭部和辽宁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召集的“全国煤炭运输路矿协作现场会议”在阜新市举行。会议要求在全国普遍推广阜新市大协作经验，保证运输任务完成。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

4 月 8 日　《人民日报》报道，轻工业部最近在自贡市召开全国盐业资源综合利用现场会议。确定要组织盐业工业大跃进，力争原盐化工产品双丰收。会上，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报告了今年盐业资源综合利用的方针和任务。

4 月 9 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最近在上海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部长会议。邓小平、李富春、柯庆施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总结了 1958 年现代化工业企业大搞群众生产运动的经验。研究了 1959 年现代化工业企业群众生产的任务、方针和做法。《人民日报》为此于次日发表社论《现代化工业企业要继续大搞群众运动》。

4 月 13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广泛地实行合同制度》。社论说，合同制度是国家对人民公社实行计划领导、促进生产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今后长时期中，将是国家同公社之间结合的一种重要形式。广泛地、全面地推行合同制度，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社论对合同的严肃性和灵活性作了阐述。

同日，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到 1957 年）执行结果的公报》。公报说，到 1957 年底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基建投资达五百五十亿元，新建扩建一万多个工矿企业单位；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农副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和手工业的比重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点五。

4 月 14 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 1958 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五；钢（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铁（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煤炭、粮食、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比上年增长一倍左右；基本建设投资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我国农村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已经胜利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民群众生活有了可靠保证。

4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里程》。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家计委、化工部、外贸部和商业部最近联合召开的化学工业产品平衡分配会议，号召化工部门职工大力挖掘现有生产潜力，大搞增产节约运动。加快基本建设速度。充分发挥小型土洋化工企业作用，以满足工业建设对化学工业产品的要求。在化工产品的分配方面，确定首先保证四大指标需要。

4月15—23日　冶金部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钢铁工业五级干部会议。其中来自车间主任以下干部和工人约占百分之八十。会议要求华北地区的钢铁职工，以大搞群众运动办法，利用现有"物"的条件，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在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大跃进，以保证一千八百万吨钢胜利完成。

4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提高邮电通讯能力?》，社论说：提高邮电通讯能力，一是靠抓紧邮电基本建设，一是推挖掘现有设备和人员的潜力。社论指出，挖掘潜力是一个最现实、最经济、收效也最快的提高邮电通信能力的方法，是邮电部门当前应该抓住的主要环节。

同日，新华社报道，煤炭工业部最近在开滦煤矿召开全国重点煤矿煤炭质量会议，号召全国煤矿职工苦干巧干三十天，使煤炭灰，石少一分（煤里含的灰分和含矸率降低百分之一），块煤加一番。

4月17日　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今日闭幕。会议确定今年商业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为实现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努力，把市场安排好，进一步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4月18—28日　全国二届人大首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席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作《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作《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团结的大会，跃进的大会》。

4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委、煤炭工业部、林业部在北京联合召开辽宁、山西、河南、陕西、山东、河南六省坑木生产座谈会，会议认为，为了满足今年采矿、煤炭生产大跃进需要，必须千方百计，多方面开辟生产门路，大力增产坑木。

5　月

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民动员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说，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是充分挖掘生产设备、原料、材料、资金和劳动力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去年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决不能认为生产潜力已经挖完了，没得可挖的了，让我们鼓足更大干劲展开增产节约运动。

5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最近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在北京召开了今年的防汛会议，要求各地积极行动起来，作好准备，战胜洪水。《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加强防汛准备，为战胜洪水而斗争》。

5月5—9日　化学工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小型土法硫酸生产会议。

（5月14日《人民日报》）

6月6一19日　商业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三类物资交流大会在上海开幕。程子华部长在会上讲话说，这次大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整个商品有计划分配的一种形式。他要求各地代表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使会议真正起到促进生产和有计划地组织商品流通的作用。《人民日报》23日发表社论，《逐级开好物资交流会》。

5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及时作好夏季粮食、油料征购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于13日发表社论《立即动手，做好征购夏季粮食、油料的准备》。

5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农业部最近在河南兰考召开全国果树现场会议，提坦六项措施：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统一规划全面安排；挖掘种苗潜力，大搞快速育苗；土洋结合，大搞技术革命；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建立专业组织和责任制。

5月12—25日　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今年的任务为，努力筹集资金，管好用好流动资金，为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6月1日《人民日报》）

5月13日　新华社报道，粮食部最近在湖南黔阳专区安江镇召开了油脂加工“双高产”现场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区油脂加工“双高产”的先进经验，并要求各地迅速加以推广。

5月14日　第一机械工业部最近发出迅速提高产品质量的指示，要求全国机械工业的每件出厂产品都符合国家的标准。《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每一台机器的质量都应是优等的》。

5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在优质的基础上高产》。社论说：“在生产和建设中，必须提出严格的质量要求，特别是那些关键性的重要产品，尤应如此，否则就将造成恶劣的后果。”

5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提高劳动生产率》。社论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全面体现多快好省方针的口号。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当作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对于有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现今年的大跃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养私养并重，繁殖家畜家禽》。社论说，今年增加一亿头猪的任务繁重，单靠集体饲养是不够的，还必须大力提倡和鼓励社员个人养猪。

5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最近在沈阳举行十省（区）深井水泵和风力发动机现场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各省（区）研究利用深井水泵和风力发动机的成就和经验。

5月24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财贸部最近在重庆召开了城市财贸工作现场会议。

5月20—25日　煤炭部在抚顺召开全国煤矿红旗竞赛第一次总结评比大会，贺秉章副部长在会上作报告，要求把大面积丰产缸旗推向新高潮。

5月25日一8月1日　全国大中型高炉经验交流会议在本溪举行。会议要求全国大中型高炉的炼铁企业贯彻执行提高冶炼强度和降低焦比双管齐下的操作方针，提高生铁

产量和质量。会议还向全国大中型高炉职工发出了倡议书。

5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增产蔬菜》。社论说，蔬菜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必需品，与人民生活十分密切。蔬菜的多少好坏，常常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标志之一。因此，努力增产蔬菜，进一步满足人民对蔬菜的需要，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同日，新华社报道，林业部最近在吉林省洮安县召开全国造林工具改革现场会议，要求各地根据"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全面改革、不断改革"的方针，立即掀起一个造林工具改革运动。

5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地质部最近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交流经验，提高理论水平，继续鼓足干劲，促使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工作进一步发展，以满足工农业大跃进的需要。

6　月

6月1日　新华社报道，交通部最近在长沙召开全国木帆船运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研究和制定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今后发展的方向、任务和措施。《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充分发挥水路运输的作用》。

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领导开展密植问题的讨论》。社论说，密植是农业增产措施的中心环节，密植合理与否对农业增产关系极大。在密植问题上争论得最多的是密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虽然总的原则是"合理密植，因地制宜"。具体执行起来，却需要因时因地不同。因此就需要讨论。通过讨论，就可以找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密植规格，并且作出与密植紧密相关的各项增产措施的全面规划。

6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作好准备，战胜自然灾害》。社论说，农业生产能不能获得丰收，主要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充分利用自然界有利于作物生长的因素，一是防止和战胜自然界不利于作物生长的因素。这即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没有发生的时候，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灾害，一旦发生，又能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战胜灾害，这是保证农业继续大跃进，争取农业大丰收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6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踊跃储蓄》。社论说明个人储蓄的作用和意义后指出，每一个有储蓄能力的人，本着勤俭持家的原则，在安排好生活的基础上，踊跃地参加储蓄，尽己所能的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这也是增产节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日，新华社报道，水利电力部最近在洛阳召开全国火力发电厂生产经验交流会议。会议号召全国火电厂职工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强调建立正常秩序，加强技术管理，发电供电安全第一。

6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清理物资，调剂有无》。社论说，挖掘物质资源的潜力，使有限的物资得到最合理的使用，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这是当前增产节约运动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根据部分省市的经验，有领导有计划地清查积压和呆滞物质、沟通有无、调剂余缺，是发挥物资潜力的一项有效措施。

同日，农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防、巧治杂粮作物病虫害。通知指出，加强杂粮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对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粮食增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

（6月9日《人民日报》）

6月6日 新华社报道，冶金工业部6月初在济南召开的全国小高炉提高生铁质量交流会议上提出要求，要求在两三个月内把一般小高炉的生铁合格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6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提高机械工业产品质量》。社论指出，质量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机械质量不合格，返工重做是一层浪费；减缓了基本建设工程进度，国家投资不能如期发挥作用，这又是一层浪费。因此对于部分机械产品质量不好的现象，必须赶快克服。必须全面做到产品产量高、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一机部和辽宁机械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全国铸钢及辽宁省铸锻评比经验交流会议最近在旅大举行。会议号召全国铸锻部门大搞群众运动，加强企业管理，推广先进经验，突破当前机械工业的薄弱环节——毛坯生产，为增产节约运动作出更大贡献。

6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苏州看日用品的增产》。社论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消费品的需要极其巨大，它关系到眼前成亿人民的生活，切不可以轻视，社论接着评述了苏州合理布局增产日用品的经验。

同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税务局长会议，确定当前税收工作任务是：正确贯彻税收政策，促进生产发展，大力组织收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同日，全国青年工人先进经验观摩团今日在武汉结束活动，该团从4月1日在北京开始活动，共访问大中小城市四十一个，深入工厂和工地四百七十七个，同二十三万九千三百多名青年工人交流了先进经验。

6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好粮食交售给国家》。社论说，大家知道，粮食油料质量不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方面的损失，还会影响收购数量任务的完成。因此，只有切实保证粮食油料干、净、饱的质量，才算是真正地保证完成了收购的数量。

6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多种多收》。社论说，我国目前还不能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耕作制度。必须广泛地实行多种多收，同时在一部分土地上争取高额丰产。这是当前夏种工作中的迫切要求。

6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在上海召开全国商标工作现场会议，介绍了上海市全面清理商标和通过商标管理监督产品质量的经验。

6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生产更多的蔬菜供应城市人民》。社论指出，随着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进一步发展蔬菜生产，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社论接着分析了蔬菜扩种后的技术管理和运销如何解决等问题。

6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安全生产》。社论说，道理是很明显的，生产不安全，对于职工的健康和企业的正常生产都是十分有害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最

宝贵的财富是人，是千千万万的进行着忘我劳动的职工。保证他们安全生产，使他们的健康不受事故的损害，是企业管理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

6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轻工业部和粮食部最近在四川省新都县召开了全国菜籽油加工生产会议，研究制定增产油脂措施，提高出油率，多开辟油源。

6月23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会议，历时六天，于今日闭幕。

（6月30日《人民日报》）

6月24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计委、经委和财政部最近在成都联合召开全国工业、交通企业成本工作经验交流会议。

6月26日　新华社报道，煤炭部最近召开电话会议，号召狠抓掘进、剥离、生产、质量、安全等工作。计委、经委等已联合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按时、按质、按量和成套地供应煤炭工业用于掘进等方面的设备。

6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煤炭工业要全面跃进》。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36页）

7　月

7月1日　我国铁路新的技术管理规程（草案）今日起在全国试行。它的特点是：既要求充分发挥运输效率，又保证运输的安全；既反映了群众的干劲，也规定了必需的科学条件和基础；既强调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又注意因事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7月7日《人民日报》）

同日，国务院6月25日发布的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今日公布。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最近在保定召开全国中小型水库防汛工作北方会议，会议要求目前必须认真做好北方九万多座水库的防汛准备工作，使它在防洪抗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7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利用废品，大有可为》。社论说，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废品”的品种和数量也相应增长，废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废品很分散，收则有，越收越多，不收则无，弃之于地。如果收集起来，可以“变无用为有用，变一用为多用，变废旧为崭新”，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社论分析了回收的废旧物资的用途和价值后，又叙述了如何开展废品回收工作。

7月7日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写信给香港中华总商会，决定拨运十六万斤大米救济香港、九龙和新界地区一万多名受灾同胞，表示慰问。

7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许多地区商业部门在组织物资交流同时，又展开了群众性的技术交流活动。既提高了小商品生产水平，又促进了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交流形式有四种，一、销地支援原料地技术，原料产地以产品支援销地。二、互相学习技

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三、有技术的地区派技术人员携带机器工具到有原料的地区传授技术。四、原料产地派人到有技术地区学习技术。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件好事——谈机关、部队、工厂、学校的养猪、种菜》。社论论述了近几个月来机关、部队、工厂和学校里养猪种菜收获成绩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肯定这是一件好事，要求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但也必须说清楚，实在没有条件的也不要勉强去养猪种菜，

同日，煤炭工业部负责人召开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做好当前五项工作，即抓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运动，抓设备材料供应和检修，抓工人生活，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抓具体措施和典型经验。

7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小麦大面积丰收》。社论说，小麦单产一般都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至三十，今年农业战线上的第一个战役——冬麦丰产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社论指出取得成绩的原因是实行了丰产方和认真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

7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社论说，我们所以能团结广大群众不断取得革命胜利，是由于我们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和工作。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在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也越来越广泛。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搞好服务性行业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社论批判了“侍候人”的错误思想，并提出改进服务工作的一些建议。

7月14日　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中写信给毛泽东同志。主要内容：一、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二、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同志将彭德怀同志的信批给参加会议的同志阅读，在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同志。

（参见《彭德怀自述》）

7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多种经营》。社论说，开展多种经营，合理地安排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渔业的发展是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的。但并不是不分主次，平均发展。一般说来，应当以农为主，以林、牧、副、渔为次。在农业中，又要以粮食为主。社论最后指出，搞好多种经营，关键在于领导。

7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林业部在江西、湖南召开的全国油茶生产现场会议7月上旬结束。会议总结十年来生产经验，认为今后三年应以巩固提高现有油茶林的生产为主，适当发展新的油茶林。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公社也要清理一下仓库物资》。社论说，人民公社也积压了不少物资，应该把这一部分积压和呆滞的物资清理出来，调济有无，让这些物资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以保证工业部门建设的需要，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7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轻工业增产更多的原料》。社论说，轻工业能给国家提供积累资金，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目前的矛盾是原料生产赶不上轻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矛盾的解决在于人民公社开展多种经营，既能解决原料不足矛盾，又能增加人民公社收入。

8　月

8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各地采取措施，提高钢铁产品质量，冶金部制定的小高炉技术措施正在全国各地推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把小高炉生铁和转炉钢的质量再提高一步》。

8月2—16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并于27日发表公报。公报说，全会满意地指出：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时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五，铁路货运量增长百分之四十九，小麦、早稻、油菜籽总产量比去年的特大丰收有所超过，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市场供应情况已经好转。全会认为，今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栋应作如下调整，钢（不包括土钢）由去年的八百万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五十；煤由去年的二点七亿吨增加到三点三五亿吨，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粮食和棉花在去年核实的产量五千亿斤和四千二百万担基础上多增产百分之十左右。全会指出，调整后的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完成将会提前实现原定在1962年完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全会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攻击已可耻地失败了。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人民日报》为此子8月27日发表社论《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社论说明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成就，阐述调整的意义和必要性，批驳了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8月3日　新华社报道，冶金工业部最近在无锡召开会议，交流提高生铁质量和节约焦炭降低成本的经验。《人民日报》于4月发表社论《抓紧洗煤这一关》。

8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社论指出，抓紧8、9两个月，进一步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在一部分干部中新近抬头的右倾情绪，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这是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当前的迫切任务。社论在分析主客观有利因素后号召要厉行增产节约措施。

同日，新华社报道，轻工业部最近在郑州召开全国陶瓷工业四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地贯彻日用陶瓷和工业陶瓷同时并举的方针。

8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战胜灾害，力争丰收》。社论指出8、9月份有部分地区遭受旱涝灾害，要求树立"人定胜天"信念，掀起一个巨大规模的抗旱、防洪、防涝的群众斗争，战胜灾害，保证秋季丰收。

8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抗灾斗争的紧急指示。

同日，新华社报道，水利电力部最近制定八项措施要求所属企业，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各工业部门崔生产新高潮中所需用的电力。

8月15日　新华社报道，轻工业部最近在青岛召开了全国火柴、胶鞋、油墨、电池和塑料制品五行业专业会议，号召迅速掀起增产节约运动。

8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节约流动资金》。社论指出，管好用好流动资金，是工商企业增产节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增加生产，扩大流通，加速国家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日，新华社报道，劳动部最近在天津召开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广泛交流了河北、山东、天津等地和一些企业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的用最少的人做最多的事的经验。《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社论《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论述这次会议的精神。

8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培养新人传宗接代》。社论沦述手工业服务行业培养接班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8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胜旱、涝、虫等灾害》。

8月19日　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最近在哈尔滨召开农村财贸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财贸部门如何与农业部门密切协作促进农村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商品生产等问题。同时，农商协作，发展国营生产基地，可以大量增加商品量。《人民日报》为此于20日发表社论《农商协作发展多种经营》。社论指出，在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同时，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是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其目的是发展商品生产，方针是集体和个人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形式的多样是由多种经营本身的生产特点决定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杂粮大丰收》。社论说，玉米、高粱、谷子、荞麦、蚕豆等等杂粮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全部粮食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从去年大跃进的经验说明，管理好的产量和管理得不好的产量，相差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社论要求鼓足干劲，大抓这两个月杂粮作物的生产，反对“种多少算多少，收多少算多少”的消极态度和松劲情绪。

8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和商业部最近在北京召开蔬菜种子座谈会，要求各地建立蔬菜种子繁殖基地。

8月21—25日　新华社报道，原受旱的十七个省、区的农田，由于抗旱抢救和不少地区下雨，已有一点五亿多亩解除旱象。

8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快裴快卸》。社论指出，货物装卸工作是整个运输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停留时间过长，会浪费大量运输力，快装快卸，缩短物资运送时间，使物资尽快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装卸工作是运输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应刻不容缓地加强这项工作。

8月24日　刘少奇同志召集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今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情况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就国内外形势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继续鼓足干劲的任务。

8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负责人谈，我国十年来兴修的水利工程在战胜干旱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估计，三亿二千万亩受旱作物大部分丰收有望，五千万亩将减产。

8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修订1958年农业统计数字的公报。

公报说，1958年农业生产获得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丰收。由于农业统计瞧缺乏经验，估得高了，劳动力安排不很好，秋收工作粗糙，抛撒了一些，使有几项农业产量数字偏高，因此修订公布如下：

粮食总产量五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棉花总产量四千二百万担，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其它农作物产量比1957年增长的百分比是：大豆百分之四，花生百分之九，烤烟百分之四十八，黄麻、洋麻百分之三。

1958年底，全国猪的头数为一点六亿头，比1957年底增长百分之十。

1958年春秋造林面积共为二点六亿亩，比1957年增长三倍。

由于以上几项农产品产量的修订，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修订为六百七十一亿元，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这样，195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修订为一千八百四十一亿元，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

同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措施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1959年的经济形势，关于大炼钢铁问题，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问题、市场问题。二、调整1959年的计划指标。三、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于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8月27—29日 新华社报道，苏、阿、保、匈、越、德、朝、波、捷、蒙、罗等兄弟国家连日积极刊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文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霞迪科8月28日说，苏联人民为中国人民的成就高兴。朝、越、捷、德等国报纸28—30日相继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民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将继续跃进。

8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一年来走上了巩固的健全的发展的道路。全国二万四千多个公社已经全部巩固，参加农户达一点二亿多农户，占全国农户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农业生产继续跃进，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全面发展，成百万个小型工厂（场）兴办起来，一部分公社已有拖拉机、载重汽车和其他农业机具，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事业将大大加快帮助穷队变富，富队更富，大办集体福利和文教卫生事业，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使广大劳动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

8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公社万岁》，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周年。社论回顾了北戴河决议的三大历史功绩：一、成立人民公社是历史的必然，对人民公社给予热烈支持和积极领导。二、对人民公社的经济性质和发展前途作了科学的规定。三、对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发展步骤作了比较稳妥的安排。社论在总结人民公社的成就和论述了它的优越性之后说，人民公社将永远不会垮台。我们有千百万条理由高呼："人民公社万岁！"

8月31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1—7月全国产钢六百二十五万吨（不包括土钢），比

去年同时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七。

9　月

9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社论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大炼钢铁的污蔑咒骂，还批驳了我们队伍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得不偿失”、“有失无得”等言论。社论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我国人民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发挥高度积极性、创造性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几千万人参加的一次宏伟的革命运动，是为了摆脱“一穷二白”的长期愿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污蔑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正表明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远远站在人民群众的外面，根本不理会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状况的热烈的愿望和奋发的热情。接着社论从长远利益算了一笔帐，认为对小高炉在一个时期内给予补贴是值得的。

9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8月我国共生产二亿二千多万吨煤，相当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八，《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要生产更多的煤》。

9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发表关于7、8月份的防汛公报，千百万座水库锁住蛟龙，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控制了北方洪水，减轻了涝灾，显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赫赫功勋。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前完成一千二百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9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暂时不用的钱储蓄起来》。

同日，新华社报道，商业部8月下旬在郑州召开棉、麻、烟、茶采购工作会议，交流促进生产和组织采购的经验。

同日，新华社报道，到8月底止，木材生产已胜利提前四年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目前各林区已运出的木材占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五。

9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商业部最近在上海召开商业广告，橱窗布置和商品陈列经验交流会议。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办水利好得很》。社论列举事实，批驳了水利办得太多了、太快了、把水利办乱了、办错了的观点，论述了大办水利的必要性。

9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增产节约双跃进》。社论说，厉行增产节约是我国进行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条方针的实行，多年来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一面增产，一面节约，勤俭建国，勤俭办人民公社，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勤俭持家，这是我们国家的富强之道，也是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计划的关键”。社论还从物资、劳力、时间、农业等几方面的潜力进行了分析。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发出关于秋收、秋耕、秋种工作的通知。《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社论 X 作好秋种，奠定明夏丰收的基础。

9月15日　毛泽东主席邀请各党派团体负责人等举行会议，在会上就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

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9月16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9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第十八期《红旗》杂志社论《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

9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纺织工业发展大大超过旧中国六十年的发展水平，1959年棉纱产量将比1949年增加三点五六倍，全国平均每人棉布消费量比1949年增加一倍多。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成就巨大，至1958年全国学生人数比旧中国最多一年增加的倍数为：小学生二点六倍，普通中学学生四点七倍，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二点八倍，高等学校学生三点三倍。

同日，新华社报道，交通部、铁道部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最近在秦皇岛召开全国路港协作现场会议，推广秦皇岛等地路港协作经验。

9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头七个月全国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七，六十种主要商品绝大多数增长百分之二十至一倍以上；商业部门的库存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市场形势的回顾与展望》。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民族工作十年来取得伟大成就。全国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已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仅一万多人，1958年增至四十八万多人。各民族自治地方，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公路运输先进经验交流会议最近在河南许昌举行，与会者提出深入开展“安全、节约、车吨月产万吨公里”运动的倡议。

9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一卜年来我国电力工业有巨大发展，今年每四十天生产的电力，相当于1949年全年的发电量。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由于贯彻执行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祖国戏剧艺术得到空前发展，呈现一片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现在全国有三百六十多种剧种，三千三百多个艺术表演团体，二千八百多座城市剧场，四十七万多个工农群众的业余剧团。

9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钢铁工业飞跃发展，十年来钢产量增长七十五倍；四百多项大、中、小型钢铁企业工程建成并投入生产，初步形成了钢铁工业体系，并迅速提高了技术水平。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三十多万个食堂越办越好，全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在食堂吃饭，报道称颂它为“幸福堂”、“如意灶”、“大家乐”。《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9月2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1959年度农产品收购工作的指示和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指示内容作了五项规定：一、参加集市贸易的商品范围；二、集市市场内的价格问题；三、农村集市贸易市场的形式；四、参加集市贸易的对

象；五、加强农村集市贸易市场的领导与管理。《人民日报》于9月25日发表社论《全面和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解放军在巩固国防、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积极参加祖国建设，为祖国修建了四千六百多公里铁路，一万三千九百多公里公路和数万项水利工程。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商业成就辉煌。从1950年到1958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二点二倍，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三。

9月24日　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轻工业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今年各种轻工业产品的预计产量，与1949年实际产量比较，机制纸将增长十三点八倍，糖四点七倍，食油二点一六倍，原盐三点二倍，自行车一百零七倍。十年来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生产部门。

同日，新华社报道，截止9月15日，全国十年来已造林四千五百零五点七万公顷，已接近原有森林面积的一半。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一亿三千万青年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共青团团员从建国前夕的九十万发展到二千五百万。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成就巨大，现在已经同世界上九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已作到对外收支平衡。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自然科学工作有了伟大成就。研究机构发展到八百个以上，并开辟了旧中国所没有的许多科学部门，获得研究成果。

同日，新华社报道，冶金工业部最近在武汉召开基本建设高速优质施工经验交流会议，确定贯彻执行“高速、优质、节约、协作”的施工指导方针，确保二百多个基本建设项目尽快投入生产。

同日，《人民日报》从1日至25日先后报道，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全国农业展览馆在北京建成。《人民日报》就此于25日发表社论《大跃进的产儿》。

同日，新华社报道，到9月上旬为止，冶金设备、水泥设备、动力机械的产量已超过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今年机械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49年跃增五十倍。

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群众短途运输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社论《开展短途运输的群众运动》。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全国的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追认的革命烈士共有六十二万九千多人，发放抚恤金一亿九千二百多万元，发给烈军属生活补助费四亿二千多万元，共发出残废抚恤金二亿五千多万元，妥善安置七百多万复员军人到各个生产岗位上。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解除了自然灾害对农民的致命威胁；在城市中消灭了失业现象，改变了社会的贫困面貌。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已扩建为四十万平方米，能容纳四十万

人集会。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农业总产值比解放初期翻一番。1958 年农业总产值相当于 1949 年的二点三倍，粮食产量相当于二点三倍，棉花产量相当于四点七倍。

同日，新华社报道，十年来，我国已奠定了一个现代化的水陆空交通运输网和邮电通讯网的基础，目前我国铁路通车里程已超过三万一千多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四十多万公里，水运航线达十五万公里，民用航空线路达三万六千多公里，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国内外七十二个城市的航空网。全国邮路和长途电信线路总长度分别比 1949 年增长三点五倍和一点五倍。

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爱国卫生运动，普遍调整和建立了医疗预防网。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无鼠、无雀、无蚊、无蝇"的地区，并基本消灭了危害人民健康的最严重的疾病。

9 月 27 日　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1949—1959）在北京开幕。

同日，新华社报道，1958 年原木年产量比 1949 年增加五倍多，截止今年 9 月 20 日，全国原木产量比去年同期又增长百分之二十五。

9 月 28—2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连续举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各族人民的代表和采自世界五大洲的八十三个国家的贵宾赫鲁晓夫、金日成、胡志明等出席了大会。刘少奇主席致开幕词，民革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联向毛主席致献词。还有四十多个兄弟党和国家的代表致贺词。刘少奇主席在 29 日大会上致闭幕词，对各国贵宾的热情祝贺表示感谢。

10　月

10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第二个十年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社论总结了 1949——1959 第一个十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成就和人民生活上的提高，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同时号召荃竞和全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要求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号召而奋斗！

10 月 3 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最近在乌鲁木齐召集陕西、甘肃等六省区有关部门举行第二次治沙会议，决定明年在一切能马上治理的沙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沙运动。

10 月 6 日　周恩来总理发表文章《伟大的十年》。

10 月 8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提前十天到十五天完成今年工业生产计划》。社论说，目前形势很好，很好，很好。只要继续搞好增产节约运动，完全有可能争取提前十天到十五天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

10 月 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兴多种经营，力争农业继续大跃进》。社论说，我国经济建设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工业和手工业原料以及出

口物资，都是农村多种经营的产品。除了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之外，还有许多野生的油料和酿酒原料，干果鲜果，山珍野味，药材，香料，皮毛，石料，木炭，石灰，草辫，绳索，筐篮，席箔等等，说不尽的“物华天宝”，都来自于农民的多种经营。社论号召各地各个人民公社在秋后合理安排劳动力，人人动手，处处取宝，让多种经营来一个空前的大发展。

10月1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人民日报》10月12日发表社论《大家都来“小秋收”》。说明搞好小秋收的经济意义，和应实行的方针政策。

同日，新华社报道，今年头九个月全国铁矿石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以上。冶金工业部最近在河北宜化庞家堡铁矿召开了全国黑色冶金矿山会议，交流经验，促进矿石增产。《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社论《矿石生产必须一马当先》。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社论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指出，对于粮食和其他供应还不算富裕的消费品一定要在居民中开展节约，克服浪费，同时指出，节约用粮不是降低人们必要的口粮，而是在保证人民基本需要的基础上，有计划的进行安排，作到合理使用。

10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深耕深翻》。社论说，根据18个省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0月8日止，全国已深耕深翻的面积达3.3亿多亩，深耕深度大部分在6—7寸以上，部分达到一尺以上，进度比去年同期快一倍还多。社论指出，土是农业八字宪法的基础，深耕深翻对增加产量具有的重大意义，不是所有人都充分了解。社论对怀疑和否定深翻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

10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猪皮制革值得提倡》。

10月15—16日　包钢一号高炉举行出铁剪彩典礼大会。周恩来总理剪彩，乌兰夫等领导同志致词。16日举行庆祝大会，周总理在会上讲了话。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制的第一种直升飞机——旋风25型直升飞机，已开始成批生产。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向各地发出指示，决定提高大豆、花生、甘蔗、甜菜、菜牛的收购价格和大豆、豆油、花生、花生油、牛肉的销售价格，降低青霉素和链霉素的销售价格。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级党委和各级财贸部门迅速完成和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李先念、谭震林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指出，把农产品收购工作做好，可以增加工业原料，增加市场货源，增加公共积累，增加社员收入，一举四得，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极大意义。

10月15—21日　全国煤炭工业大面积高产红旗竞赛第二次评比大会在北京举行。煤炭部张霖之部长就改革企业管理，确保煤炭大面积高产问题作了报告，三百多个单位获得红旗奖。薄一波副总理在最后一天的广播大会上讲话，号召更深、更广、更持久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0月16—29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会议，讨论了如何超

额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计划和为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作好准备工作的问题。中共中央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等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

（11月2日《人民日报》）

10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截止10月15日，今年全国煤炭累计产量已达2.745亿吨，超过去年全年产量。

10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农业八字宪法》。社论说，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农业“八字宪法”一齐出现在1958年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结果。农业“八字宪法”是毛泽东同志根据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总结出来的，为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和农业科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这八项措施是农业增产的根本大法，不能取消，如果取消“八字宪法”就等于取消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等于取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论对攻击和怀疑“八字宪法”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进行批驳。

10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9月份全国共生产发电设备一百四十五万四千瓩。提前三年零三个月达到1962年的指标。

10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改良土壤运动》。社论说，“土”字是农业“八字宪法”的第一条，改良土壤又是这一条的一项主要内容。肥沃土壤是获得高产的基础。因此，实行改良土壤以增加产量，对于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意义十分重大。虽然有困难，只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良土壤，都是能够改好的。

10月25日　周总理视察密云水库，途中，还看了怀柔水库。

10月26日—11月8日　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共六千五百多人的群英大会在北京举行。代表中有二千五百六十五名先进集体的代表，三千二百六十名先进生产者和七百五十名特邀代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接见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刘宁一致开幕词，朱德代表党中央致祝词，李富春作题为《高举党的总路线的红旗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人民日报》为大会开幕发表社论《群众运动万岁!》。11月8日闭幕后，《人民日报》于11月9日发表社论《让先进种子在全国开花结果》，祝贺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闭幕。

10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陕西渭南十二万一千五百亩“秋香”棉田丰收。平均亩产籽棉二百七十二斤左右。其中亩产千斤以上的二百八十多亩。

10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商业部最近在南京召开家禽收购，出口现场会议，要求各地商业职工支持生产，提前完成全年家禽收购，出口任务。

10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大干一冬春的农田水利冬修运动已在全国各地猛烈展开，成千上万的水利工程已经开工，目前全国有三千万人奋战在水利运动的前线上。《人民日报》11月1日发表社论《播起大兴水利的战鼓》。

11 月

11月1日 我国第二拖拉机制造厂落成典礼在洛阳举行，谭震林副总理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吴芝圃在会上宣读了国家验收委员会关于该厂交工验收开始动用的总结，苏联代表团团长符明和帮助建厂的苏联专家出席了大会。《人民日报》11月2日发表社论《为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11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文章批判"包产到户"、"土地下放"、"全部成大部农活包产到户"、"定田到户"等思想。指出这是资本主义阴魂未散，尽管很微小，对社会主义总是有害的。

11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增产节约运动和技术革新结合起来》，社论说，增产节约运动，是职工群众比革命干劲，比提高劳动生产的运动，因为人的体力再强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有劳而无逸是不能持久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源泉，它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

11月5日 周恩来总理欢宴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全体代表。周总理说："让我们大家一起举杯，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进一步贯彻，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胜利，为增产节约运动的成功，为在今年内提前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为提前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为加强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为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干杯！"

11月6日 中共中央财贸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行"全国农产品收购工作广播大会"，要求把农产品收购运动推向新高潮。李先念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1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养猪好处多得很》。社论指出，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的有机肥料工厂，大量养猪是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猪肉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副食品。养猪好处很多，要加强领导，解决饲料来源，贯彻公养私养并重方针。

同日，新华社报道，从年初到10月底，已有八百多座简易焦炉建成并投入生产。目前简易焦炉生产的焦炭已接近大中型焦炉所产焦炭的二分之一。

11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最近在郑州召开黄河故道地区果园生产会议，号召在两三年内把黄河故道建成果品生产基地。

1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1—10月份国家统计局资料累计，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九，完成今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点五，钢增长百分之七十，生铁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五点八，原煤增长百分之五十八点三；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全国货运量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点四。到10月底止，金属切削机床、发电机、电钻用锅炉、货车、化肥等十一种主要工业产品已完成或超额完成今年计划。

11月15—21日 中共中央在重庆市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

议，会议肯定了过去的成绩，要求各地在发展蔬菜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并因地制宜地发展油料、水产、果品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三十九个大中城市的负责同志共计二百一十二人。　（12月11日《人民日报》）

11月17日　铁道、交通、冶金、煤炭四个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举行大协作广播大会，号召四个系统的职工进一步加强协作，挖掘潜力，提前和超额完成煤、铁、钢的生产和运输计划。这四个系统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六十四个先进集体的代表在会上提出关于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联合倡议。薄一波副总理等在会上讲了话。

11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行政管理局最近在哈尔滨召开了市场和街道民办工业现场会议，讨论整顿和提高街道民办工业和服务事业的方针。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纺织工业部和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最近在青岛联合召开全国纺织运转操作经验交流会议，总结郝建秀工作法和1951织布工作法，并予以发展和补充。

1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小洋群”的强大生命力》。

11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高工效的红旗插遍水利工地》。社论指出，目前高工效运动发展不平衡，为了实现高工效，必须土洋结合，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展群众运动，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使全国水利工程的工效在平均先进的基础上提高、再提高。

12　月

12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铁道、交通、冶金、煤炭、石油、粮食、林业等七个部最近在北京联合举行“一条龙”运输协作会议，经过讨论组成了以铁路为中心的三百七十八条协作运输线。《人民日报》于当日发表社论《组织更多的“一条龙”运输线》。

12月4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最近摘掉一百四十二名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12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粮食的分配、节约和储备》。社论指出，做好全面的粮食分配工作，是一件大事。分配工作做好以后，还要把口粮管好，吃好，既要节约用粮，又要使社员吃好，吃饱的关键在于实行计划用粮，改进粮食加工，食用方法，提高出米（粉）率，和出饭率，还要留足储备粮。社论最后说，粮食是“宝中之宝”，做好粮食安排工作，关系十分重大，决不能等闲视之。

12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土洋并举，加快农业技术改造》。社论说：“农业技术改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个是改良农具，实现半机械化，在最近几年内，应当实行土洋并举，以土法，即简易为主的方针。这就是，洋处着眼，土处着手，由土到洋，土洋结合。”

1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基本建设必须坚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社论说，由于重点工程按时或提前投入生产，为非重点工程的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大批非重点的必要的工程项目也迅速建设起来了，集中优势力量分期分批建设，能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建设速度快了，工程成本也跟着降低了。由此可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是一个既能多快又能好省的正确方针。

同日，重庆举行庆祝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和川黔、成渝两铁路接轨通车典礼。大桥全长八百二十米，从1958年9月开始动工，原许划两年完工，现提前到十四个月完成。质量优良，显示出总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我国火车飞跨长江的第二座大桥。

1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已有二百多万少数民族牧民，结束了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基本上实现了定居。开垦农田扩大粮食饲料基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在辽阔的草原上不断建起新的集镇和村落，现在是人有屋，畜有圈，人畜两旺。

1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猪为六畜之首》。社论说，自古以来，猪位于六畜之末的排法很不公平，应把猪提为六畜之首，即猪牛羊马鸡犬，这样才天公地道。理由是，猪繁殖快，能提供的肥料多，提供肉食，提高人民生活，增加社员收入。正如群众所说，养猪、积肥、增粮，利国、利社和利己。

12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养猪事业能够高速度发展吗?》。社论根据河北省新乐县，江西省玉山县养猪事业迅速发展，实现每人两头猪的事例说明养猪事业可以高速度发展。关键是敢于克服困难，只要有共产主义风格，有马列主义雄心壮志，充分发动群众、迎着困难上，一个个困难都能解决。“天大的困难，只要眼睛向下，依靠群众，就能解决”。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受灾田面积达六亿亩，旱灾延及二十个省区，但是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威力，使得今年粮食比去年仍然增产，棉花的收成比粮食更好。

12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社队队都来大办养猪场》。社论根据浙江建立一百二十三个养猪场，江西建立七万个养猪场的经验指出，公社、生产队大办养猪场，是保证养猪业高速度发展的决定性的措施。

1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结合水利运动建设河运网》。社论说，我国是一个多河流国家，全国有总长达四十二万公里的天然河流五千多条，有大小湖泊九百多个，这是我国发展水运事业的极其有利的条件。解放后，内河通航里程到1958年底已达十五万公里，比解放前增加一倍，小、中轮船航道已达四万公里，比解放前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点四，结合水利运动建设河运网是去年木跃进的一项重要经验，要求今年继续进行，全面规划。

12月26日　汉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截断汉水的伟大任务于今日胜利完成并举行庆祝会，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丹江口枢纽工程是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水的关键工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从去年9月开工，由湖北，河南两省十七个县的十万建设大军近十六个月的努力胜利完成任务。丹江口工程明年即可滞洪二十六亿方

水，可削减汉水洪峰，减轻中下游两岸人民防汛负担，保障中下游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水库建成后，可灌溉一千二百万亩农田，预计每年可增产粮食七十多亿斤，棉花二百万担。

丹江口枢纽的发电装机容量为九十万瓩，年平均发电量为四十五点九亿度，与洛阳、宜昌、英石等地发电联系起来，可在我国中部构成一个巨大的电力网。

丹江口枢纽还提高了航运能力，发展水产养殖业，还可把汉水引到黄河和淮河去。

12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心水利工地民工的生活》。社论说，目前，全国有七千万左右水利大军，他们干劲冲天地向地球作战，领导上必须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使他们吃得好，睡得好，休息得好，身体健康，劳动愉快，只有这样，他们高涨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才能保持下来，水利运动才能发展得愈来愈快。

12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气象事业采取大中小和土洋结合的办法，一年来获得巨大成绩。现在全国已组成气象服务网，天气预报准确率也有很大提高，对农业生产，特别是对群众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起了巨大作用。

12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一次水利大检查》。社论说，截止12月27日的统计，全国投入水利运动的人数达七千万人左右，开工的大、中、小工程在一百五十万处以上，已完成土石工程量一百一十六亿立方米。为了保证全国水利工程质量，从现在起到春节，普遍开展一次大检查，重点在以下七个方面：即查计划、查工效、查设计、查质量、查效益、查安全、查生活，使明年水利建设能创造更大成就。

12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浙江、河北、安徽、江西、江苏、辽宁省已有一百二十四个县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量指标。

1960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六十年代》。社论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过去十年中，在顺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任务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社论指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日，《人民日报》转载李富春同志的文章《迎接1960年的新跃进》，文章分析了1959年国民经济情况，提出了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文章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已完成或超额完成。新的一年里的主要任务是，更好地贯彻总路线和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根本方针，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文章强调1960年国民经济的安排，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更全面跃进的条件。

1月23日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新闻公报今日发表。公报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三年胜利完成。195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一，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九十四点四，钢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煤三亿四千七百八十万吨，粮五千四百零一亿斤，棉四千八百二十万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社论强调要用更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

1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实现了高速度和按比例的高度统一，工业农业并举保证了全面大跃进。社论还说，工业以钢为纲，重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项项大发展。农业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五业样样增产丰收。

1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道路继续跃进》。

1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的人民公社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现有社办工业单位二十多万个，从业人员五百多万人，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公社为多种经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林、牧、副、渔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显著上升。公社制度保证农副产品收购得又多又快又好，收购总额比1958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

2　月

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现代化企业也必须革新技术》。社论说，在一切现代化企业中，必须把支持职工群众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创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2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小洋群”乘胜前进》。社论说，全国生铁总产量中，仅地方企业的中小高炉所生产的生铁就占二分之一以上；钢的总产量中，中小转炉生产的占三分之一以上；铁矿石中小型矿山生产的占全部产量的一半左右。煤，小型煤矿生产的占茎部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小水泥厂生产的水泥占全部产量的七分之一。

2月18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蔬菜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大量增产春莱》。

2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面安排社员生活》。社论说，全面安排群众生活的中心问题是计划用粮。提倡普遍地多种春莱也是改善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措施。

同日，历时两个多月的民建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工商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今日闭幕。

《人民日报》于3月1日发表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顾一头即顾国家利益，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

2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商业部门千方百计支援农业。并发表社论《更快更好地供应农业生产资料》。

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一个手工操作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全民运动》。

2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钢铁生产推向新高潮》。社论说，“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要求我们生产出更多的钢来。还说，这是我们指导工业生产高速度和按比例地不断跃进的方针。

3　月

3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综合利用是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社论说，实行综合利用，才能最合理、最节约、最充分地利用资源。这不仅可以克服某些原材料不足的矛盾，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的技术方针。

3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快把“三包”落实到队》。社论说，春耕春种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当前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落实到队。

3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三十多个城市推广哈尔滨电线厂实行简化、升压、环形供电的经验，彻底改变配电系统不合理状况，使城市用电迈向合作化，《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物》。社论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社会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生产方式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有一系列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管理方式，

3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加速穷队赶上富队》。社论说，1959年，全国的穷队中已有三分之一，即七万个穷队赶上了富队；又有三分之一的穷队，达到了一般队的水平；只有三分之二一还没有摆脱穷队地位。

3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地方铁路大有可为》。社论说，到1959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已经建成了二千四百多公里土铁路和小洋铁路。其中有省、市、自治区的，有专区和县办的，也有厂矿和人民公社办的。

3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百分之九十四的社员家庭都参加了公共食堂。农村公共食堂，已成为农村中坚实的社会主义阵地。

3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样样林产有基地，处处基地设林场，个个林场搞丰产》。社论说，林业生产基地化，林业经营林场化，林木培育速生丰产化——这是我国林业发展的方向。林业的“三化”，标志着我国林业建设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3月26日　《人民日报》刊载中尼两国经济援助协定。协定规定，中国给予尼泊尔政府以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的经济援助，援助金额为一亿印度卢比，项目包括设备，器材，技术和其它商品。

3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扩大轻工业原料来源，大搞农副产品加工》。社论说，1959年，轻工业总产值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棉纱、棉布、盐和机制纸等主要产品产量，都已经达到或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62年指标，为了轻工业的继续跃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轻工业急需的农副业原料来源。

3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财贸部在上海召开现场会议交流先进经验，号召全国城市财贸、银行和财务部门掀起一个协作各方，参与生产和大搞群众性经济核算运动的高潮，大力支援当前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生产建设的高速度发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财政金融部门促进生产的途径》。

3月30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分别作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以及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李富春在报告中说：1959年继续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一，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三，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七，国家预算内的基建投资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五，连续两年跃进的结果，已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李富春还提出：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将比1959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实现1960年全面的更好的跃进，为整个60年代连续跃进奠定基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

4　月

4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社论指出，1960年农业生产应当继续以粮为纲，在保证粮食增产的条件下，全面安排粮食、棉、油、麻、丝、茶、糖、莱、烟、果、药、杂各类农作物的生产，并且实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争取农业的全面大发展。

4月7日　谭震林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作《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报告，

4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城市人民公社好得很。全国各地根据自愿原则建立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它在发展生产、组织生活、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加强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等方面，都显示了巨大的作用。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三结合”是技术革命的利器》。社论指出，领导人员、工人群众、技术人员三者密切结合，是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引向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的一个重要方法。

4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1959年秋至1960年3月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二十个省和自治区新垦荒地五千万亩，相当于“一五”时期垦荒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同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闭幕。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阐述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问题。大会通过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

国家预算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号召全国人民为超额完成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为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4 月 11 日　刘少奇主席发布命令，公布《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4 月 16 日　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轻工业技术革命会议和农产品加工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要大搞农产品加工一条龙和各种资源综合利用。

同日，《人民日报》为我国插秧机的诞生发表社论《农业技术革命的一项伟大成就》。

4 月 20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村人民公社要大量培养技术人才》。社论指出，加速我国农业技术改造，争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大量地培养科学技术队伍。

4 月 22 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指出："中国人民当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这个任务，不但对于中国人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也有显著的巨大的意义。

4 月 23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最近在上海下水。

4 月 26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畜牧业必须高速度发展》。社论指出，目前，一个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高潮正赠卷全国。大发展全改良是多快好省地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总为向。

5　月

5 月 5 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发展快、成绩大，至今年 3 月底，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职工已达二千二百多万人。今年头三个月，全国职工扫盲达二百万人。

5 月 15 日　全国财贸部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会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社论，《把财贸部门的技术革命运动推向新高潮》。

5 月 1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商业部门的新任务》。社论说：商业部门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商业部门应该成为城市人民公社党委在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方面的有力助手。

5 月 23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技术革命和节约劳动力》。社论要求企业生产部门在技术革新的基础上要及时地调整劳动组织，从实际出发，把多余的劳动力从不需要的岗位上抽调出来，这一件事，直接关系到巩固企业革新成果的问题。对于节约出来

的劳动力，应该以用到最需要人，而又最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的场所为原则。

5月31日　中蒙两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同时签订中蒙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根据经济技术协定，中国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二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帮助蒙古建设一些工业企业、水利工程和公用事业。

6　月

6月1—11日　全国文教群英会在北京举行。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林枫在会上作了《大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报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新的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6月5日，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招待出席会议的代表。他在宴会上说："无产阶级知识分手已经开始形成并且正在扩大。"6月11日，张际春在闭幕词中说："党中央指示我们，我国的文化革命，还仅仅是开始，文化革命是无穷无尽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个革命就会不断地进行下去。而在共产主义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

6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跃进的高速度和有计划的按比例是辩证的统一》。

6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民航伊尔－18涡轮螺旋大型客机，已在北京——拉萨航线试航成功。

7　月

7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同自然灾害斗争到底》。社论说，一场抗拒自然灾害征服自然灾害的战斗，正在我国许多地区持续进行。在抗旱斗争中，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威力，特别显示出了大协作的威力。

7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业企业要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社论说，一个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群众运动，已在全国开展起来。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不只是发展农业的要求，也是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其它经济事业的要求。

7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人民公社再提高一步》。社论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过不断地整顿提高，已经走上了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但是人民公社的有些规章制度还不完善，不少干部在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工作方法某些方面还不适应"政社合一"的需要。为了提高领导水平，组织工作组深入下层总结经验，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7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族人民，十年来已经治理了六千多万亩沙漠，百分之十六左右的瀚海已经被征服。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发展厂社挂钩》。社论说：从去年以来，

许多省市都运用了“厂社挂钩”的方法，作为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厂社挂钩”在许多地方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厂社挂钩把国家工业与农村人民公社工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了，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土洋并举”的方针，可以更好地使工业企业了解农业技术改造中的问题。

7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抽调一部分技术工人支援农业》。社论说，重庆三万多名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到农业战线上去了。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从节约出的劳动力中，抽调一部分技术工人支援农业，是一个好办法，对加速农业技术改造会有很大的帮助。

1960年7月　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一千三百九十人，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订计划，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36页）

8　月

8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发展南方煤炭工业》。

8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开展一个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

8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9　月

9月13日　中国与几内亚发表联合公报和缔结友好条约，同时签订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在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规定，在1960年9月13日——1963年6月30日的时期内，中国给予几内亚政府以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的贷款，金额为一亿卢布。

9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节约出的劳动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社论要求把节约出来的劳动力，用采加强生产第一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要正确处理好生产第一线和第二线的关系。

9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社论说，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条件之一。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我们才能更快地增加农产品的总产量和农产品的商品率。社论指出，农业机械化运动是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工业武装农业的过程，加速农业机械化，是工业和其他各部门的责任。

9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从10月1日起，在全国各地发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旗帜》。

10　月

10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社论指出，今年以来，全国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普遍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持续跃进。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展开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在各个战线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10月7日　《人民日报》社论《深入开展以班组为基础的劳动竞赛》。社论说，随着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的新高潮，已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战线上掀起来了。这次竞赛的特点是企业十分重视基层生产组织之间的竞赛。这是经济工作越做越细致，领导作风越来越踏实的一个重要标志。

10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进工业管理部门的领导方法》。社论指出，天津市委在工业管理部门中，普遍推行“一、三、二制”的领导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三、二制”就是各级领导干部每周有两天时间深入生产第一线，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有三天时间对了解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有一天时间学习理论和政策。

11　月

11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建设农业机具修配网》。社论指出：为了加速农业技术改造，必须把农业机具修配网及时建立起来。

11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于4月份开始的西藏农业区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复查工作将逐步结束。西藏自治区筹委常委会决定颁发土地证给翻身农民，开始支付1960年度对来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多余生产资料的赎买金。

11月16日　《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1960年第二十二期社论《工农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提出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问题中的首要地位。这个意见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非常重要。”

11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总结公社经验，加强公社建设》。社论指出，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第一个决议，就明确指出目前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后又在六中、八中全会决议和其他一系列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中进一步确定人民公社目前阶段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规定公社的生产资料要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设有小部分的所有权”。社论还说，总结三年来办公社的经验要特别总结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的经验。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础，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是现阶段发展公社的整个生产和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

11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生产小队的战斗作用》。社论指出，

劳力、土地、耕畜、农具要坚决实行四团定，任何人不得随便调用；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额奖励的制度，小队对社员要作好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的工作。

12　月

12月1日　中共和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公报和声明。《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胜利的旗帜，团结的旗帜!》。

12月11日　《人民日报》刊登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告世界人民书。次日发表社论《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防止世界战争，争取持久和平》。

12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合理使用劳动力，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社论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应该把主要的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是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方针的中心关键。

12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三级所有制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社论指出，“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是当前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中心环节。”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生产今年遭受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九亿亩，占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其中有三亿亩到四亿亩遭到重灾，甚至有一部分农田灾害特别严重没有收成。受灾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自然灾害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2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我国工业生产虽因自然灾害受到严重影响，但由于全体职工的英勇努力，整个看来仍是继续跃进，钢产量预计将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万吨，轻工业因农业受灾原料减少，纺织等几种主要产品将不能完成计划，这一年各工业部门对支援农业技术改造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和不断完善“三定一奖”制度》。社论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坚持实行‘三定一奖’制度（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对于提高公社经营管理水平，调动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1961 年

1　月

1月　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要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也就是要进行调整。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比如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实行关、停、转，回笼货币等。特别是动员两千万城

镇居民回乡，加强农业第一线，这对于扭转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1年7月3日《人民日报》薄一波：《崇敬和怀念》）

1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陕西省长安县采取物资交流大会形式，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农村集市贸易，加强领导，先活后管，活而不乱，管而不死，进一步活跃了农村经济，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

1月14—18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同志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党为战胜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全会认为，鉴于农业生产连年遭灾，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

（1961年1月21日、198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1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办得更好》。社论说，这是近年来工业战线上的一项新事物，也是工业持续跃进中的一个新成就。

1月22日　中古签订合同履行两国贸易协定，中国今年将以每磅古巴币4分的价格购买古巴糖一百万吨。古巴向中国出口五千吨铜砂。

1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月31日　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1960年，各部队为国家经济建设做了四千六百多万个劳动日，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用于农业。

同日，新华社报道，从去年12月到现在全国已有二十多对新矿井移交生产，为全国煤炭生产增加五十多个采煤工作面。同时继去年建成一百一十条铁路专用线和二百二十条轻便铁道之后又修建一百三十多条专用线路。

同日，中越两国经济贸易会谈发表公报，双方于今日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提供长期贷款（一亿四千一百七十五万卢布）和成套设备（中国帮助越南新建和扩建二十八个工业、交通企业）的协定，同时签订中越两国1961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等文件。

2　月

2月2日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公布经济会谈成果，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和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贷款协定等文件，签字仪式于今日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参加了签字仪式。

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采掘后加工》。社论指出，加工和采掘的发展，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它们的发展应有先有后。我国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连续跃进的经验告诉我们，采掘工业必须优先发展，必须走在加工工业前面。

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配套后主机》社论指出：把配套放在优先地位，迅速发挥产品的使用价值，这对于巩固三年来工业生产持续跃进的成果，把我国

工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2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重庆鱼田堡煤矿发动群众管好现代化企业，健全责任制促使煤炭生产持续跃进。《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一切企业都要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度》。

2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中药材生产、收购、供应工作，在过去一年里获得了很大成绩，种植面积比1959年扩大百分之六十左右，收购和供应总额都有所增加，各省、市、自治区都积极发展了中药材的生产基地。

2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1960年，归侨人数等于过去十年总和，为了妥善安置归侨，国家新建扩建了二十五个华侨农场和十一所中等以上华侨学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安置归国华侨的巨大成就》。

3　月

3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种植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社论说，山东省莒县爱国人民公社爱国生产大队在制订种植计划时提出的原则是：既照顾社员需要，又照顾到国家和集体需要；既照顾到吃的，又照顾到烧的；既照顾到人的需要，又照顾到牲畜的需要；既照顾到当年增产，又照顾到来年的茬口安排。这些经验值得全国各生产队重视。

3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使农业机械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社论说，从1958年到1960年，全国的拖拉机增加了两倍左右，排灌机械增加了八倍左右。充分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3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提高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社论说，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最小的人力物力，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措施，又是贯彻八字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

4　月

4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吴桥县前郭公社，贯彻植棉奖励政策，纠正重粮轻棉思想，解决粮棉争地矛盾，既扩大棉田，又种足粮田。《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粮棉必须兼顾》。社论指出：我国发展农业的方针必须是以粮为纲、全面安排，才能保证多方面地供应生产建设和冬民生活的需要。

4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社论指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4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切经过试验》。社论指出："一切经过试验"，

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行之有效的重要的工作方法。

4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辟新原料，增产日用工业品》。社论指出，在轻工业生产中，逐步扩大使用来自工业方面的原料材料，是一个关系着轻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

4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号"机车坚持包乘制，十五年来连续安全行车一百二十多万公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包乘制是一项有效的责任制度》。

4月22日　国务院第一百一十次会议通过《工农业产品和工程技术标准暂行管理办法》和《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法》。

4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三个经济合作议定书。议定书规定给阿贷款，供应粮食及其它主要食品，以及提供二十五个建设项目的成套设备等。

5　月

5月31日　《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先立后破原则，经过生产实践验证，鞍钢建它和健全质量管理制度。

6　月

6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江西安狮子公社尊重生产队的权力，关键在于社员当家作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尊重生产队的权力》。

6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福州经济区召开物资交流大会，加强经济联系，扩大商品流通，三十多个县市的城市和农村，山区和沿海地区进一步沟通了传统供销关系，建立了许多新的供销关系；当场签订了一千八百多份购销合同，交流了一千三百多种商品，安排了第三季度农副产品的调拨计划。

6月30日　北京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四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一起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用二十八年的时间在中国进行了人民民主革命；第二件，是在建国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再加上连续两年的大灾荒，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他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运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改进工作作风。

7　月

7月　朱德同志在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发展农村的手工业和副业生产，"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生产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

（198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7月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上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由中央批准试行。它的基本内容是：规定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是提供科研成果培养研究人才，调整研究机构，实行“五定”即定方向、任务、人员、设备、制度，使研究工作基本稳定，正确贯彻科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98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7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过解放十年来辛勤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初步形成。这条林带南起辽东半岛，北至大兴安岭南麓，绵延一千二百多公里，东西宽约三百公里，抗御风沙干旱的作用日益显著。

7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西北五省，自治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最近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流会，各省、区间调剂一部分急需的大型农具配件，以便在夏收之后，各种大型农具配件进一步得到补给。

7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武汉建汉竹篾厂发扬传统经营方式便利顾客，前门开店，后边设厂，产销结合。

8　月

8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负其责各显其能》。社论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组织要严格实行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特别是田间生产责任制。

8月下旬至九月上旬　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过程中，为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条例除总则外，共十章七十条。条例草案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建立、健全各级的责任制。必须发扬民主，认真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强调每个企业都要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在正常情况下，不许亏本赔钱的现象发生。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等等。

（198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9　月

9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许多地区大兴水面养殖和种植业，并发表社论《利用水面，发展水产》。

同日，《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十章六十条）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试行。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研、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81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

9 月 30 日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轻工业增加工业原料比重。来自工业方面的原料已由 1957 年的不到百分之三十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来自农业方面的原料比重，则山百分之五十以上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以下，其余来自林业渔业方面。

10　月

10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总骼线的伟大旗帜，争取新的胜利》。社论指出，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1959 年到 1961 年，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减产，这就影响了轻工业、重工业的生产以及市场的供应和人民的生活。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国庆社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万岁》。社论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认真总结过去已有的经验，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复杂问题。

10 月 11 日　《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万粜县坚持把畜牧业放在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地位，使槽头兴旺，粮棉增产。《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万荣看发展大牲畜的途径》。

10 月 17 日　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

10 月 26 日　《人民日报》报道，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最近在上海举行物资交流会。出席这次会的共二千多人，签订购销合同二千五百多份，成交额达二亿四千万元。

10 月 29 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尼泊尔关于修建公路的协定。

11　月

11 月 1 日　《人民日报》报道，劳动模范马恒昌领导的小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11 月 3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作用》。

11 月 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优先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发展家庭副业》。社论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构成中，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

11 月 11 日　《人民日报》报道，新疆建设兵团开垦荒原戈壁，大型机械化农场遍布天山南北。垦荒造田一千一百万亩，今年粮食总产量约比 1957 年增加近一倍。

11 月 1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发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的作用》。社论指出，企业中技术人员队伍，尽管各人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不同，但从全体看，都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技术人员都已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11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塑料工业迅速发展，二十个省市建文了塑料工厂。据化工部统计，今年前十个月全国化工企业生产的聚氯乙烯塑料为1958年产量的十二倍。

11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光大热水瓶厂经营管理仔细，经济效果显著。天津生产热水瓶厂改进经营管理变亏损为盈利。并发表社论《两个热水瓶厂的经验》。社论指出，每个企业都要讲究经济效果，厉行经济核算，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

11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紧工程配套，扩大灌溉效益》。社论指出，在今冬明春水利建设中，凡是水利工程体系不完整的地方，都应该大力解决配套问题，这是发挥现有水利工程的灌溉效益的中心环节。

11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牧业和农业区的养羊事业都在稳步发展，全国存圈的羊只相当于1949年羊只头数的一倍以上。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绵羊和适应性强，繁殖快的山羊各占一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多多养羊》。

12　月

1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莫斯科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12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来自农村的好消息》。社论指出，当前农村形势是令人鼓舞的，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革命干劲，首先要靠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还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12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扬革命干劲，做好明年工业生产准备》。社论指出，1962年，必须继续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使农业生产进一步好转，必须加强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加强市场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必须加强采掘工业和采伐工业的生产能力。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物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

1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合理安排农作物布局》。社论要求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合理安排农作物的布局，要善于用地，又要善于养地，妥善解决好用地与养地之间的关系。

12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天津轻工业开拓广阔的发展道路，多采用工业原料增产日用品，并发表社论《充分利用非农产品原料，增加轻工业品》。

12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经济协作》。社论指出，进一步加强协作，是工业战线为了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必须努力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报道北京机电工业八十六个工厂建立技术协作网，互相利用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努力增加产品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的情况。

同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在西藏地区设立海关的决定，并且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海关征收进出口税暂行办法》。会议经过审

议，校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及《关于延长1960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拉克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的协议》。

1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群众，建立和健全严格的责任制》。社论指出，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会主义企业的责任制，是工人阶级革命纪律性和革命自觉性的统一。贯彻执行责任制，最重要的，是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个人的岗位责任制是各种责任制的基础。责任制也是义务和权力的统一。

12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农村出现一批电力灌溉区。电力灌溉面积在一百万亩以上的灌区已有十多个。1957年，全国农用电只有一亿度多一点，而今年仅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四个专区的农用电（主要是灌溉用电）就超过一亿度。

12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我国，一支以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教师队伍正在形成和日益壮大。这支队伍已拥有三百万人左右，比1949年的九十三万二千多人增长了两倍多，其中高校教师增长了九倍多，中等学校教师增长了三倍多。

1962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献词指出，1961年我国人民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战胜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粮食方面取得了较1960年为好的收成。在新的一年中，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进一步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在国民经济中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完成国家计划，使农轻重的关系进一步协调起来，使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

1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炼钢企业1961年试炼成功了四十多种新的钢种。目前我国冶金工业能够冶炼的钢种，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我国在1961年还试轧成功三十多种重要的新钢材，并已陆续投入生产。用途广泛的八大品种钢材，在全国钢材品种中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轧制钢材的出材率，比1960年有所提高。

1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六年来帮助蒙古建成三十四项工程。这些工程是应蒙古的请求，通过无偿援助、长期贷款和贸易出口等方式先后建成的。这些工程除了火柴、陶瓷、肥皂六个小厂只由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之外，其他所有项目，从勘察设计、土建施工到设备安装等工作，都全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管理干部进行。这些工程所有物资，大部分都由中国运去。

1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山西长治专区十个老社总结合作化公社化十年成就。集体经济和集体主义思想共同增长。《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集体主义的光辉》。社论指出，十个老社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正是全国农民所走的道路。集体经济的威力能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关键在于是不是认真地实行党的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基本政策。集体经济的成长，又同经常的集体主义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聂荣臻、陆定一副总理欢宴首都科学技术工作者，周恩来总现在宴会上致词，号召科学技术工作者为了祖国富强，树雄心壮志，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

1月11日—2月7日　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共七千余人，简称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主要是总结建国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1958年以来四年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同志作了重要讲话，陈云同志在陕西省大组会上讲了话。

会议缩一阶段着重对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草稿）提出修改意见，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同志作重要讲话，他系统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代表们热烈讨论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并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认识，提高思想，加强团结。

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党认识。会议分析了我们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进一步动员全党抓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问题上，会议统一了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明确了1962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反对分散主义，以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8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1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全局出发积极安排轻工业生产》。社论指出，一个行业一个行业、一项产品一项产品地具体安排，是使轻工业生产稳步上升的一个重要条件。在逐行逐项安排生产时，必须从全局出发。

2　月

2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的畜牧业，四年来连续取得稳定、全

面、迅速发展，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四年提供商品畜八百多万头。

2月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2年第三、四期发表的社论《加强党的战斗力》。社论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起革命事业来，甚至是一个更加艰巨复杂的任务。但是，有些人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战斗力，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了。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社论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社论还说：有些同志没有把工作做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他们往往以主观想象代替调查研究，以感情代替政策，以个人意见代替群众意见，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代替深入细致的作风，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必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

2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扬优良传统，争取农业好收成》。社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今年争取农业有一个较好的收成，是进一步活跃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不能凭"想当然"办事。

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发山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增产措施》。社论指出，我国山区面积约占国土的三分之二左右，全国半数以上县份都有山，那里尚来开发的宜农、宜林、宜牧的山地是很多的。开发山区，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只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确定荒山、林木的所有权，划清全民、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副业经营的范围，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和帮助，就能把各级组织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3　月

3月2日　周恩来同志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陈毅同志也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强调："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发展手工业生产》。社论指出，正确地积极地安排和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仅现在，而且在今后的长时期中，对于支援农业生产，适应人民生活需要，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为出口和工业建设服务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手工业生产，首先要进一步正确贯彻执行党对手工业的各项具体政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三者并存，而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手工业的组织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手工业企业的规模的大小，要从有利于生产、方便群众来灵活确定，一般不宜过大，行业不宜混杂，该集中的集中，需要分散的就分散。手工业的工资形式不应强求一

律。经营方式的多样化，是手工业的又一个特点，但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和管理。发展手工业生产，还必须统筹安排各种所有制的手工业的产供销的关系。

3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社论指出，大力加强农业战线，是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针的首要环节。加强农业战线主要依靠农村公社内部的力量，同时依靠城市和工业战线的支援。加强农业战线，最要紧的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要使各方面的支援产生切实的效果，必须认真执行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和其他有关政策，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

3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清查仓库，统一处理物资》。社论指出，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妥善地安排市场供应，切实地做好1962年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重要条件之一是要统一掌握和调用各方面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些物资主要来源靠增加生产。但目前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现存的物资。开展二次全面的彻底的物资清查工作，可以把大量的“死物”变成“活物”。

3月27日—4月17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明了近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和缺点，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进一步克服当前困难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十项任务，并指出，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关于三年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理指出：在这几年的建设工作中，一些方面发生了不符合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的情况，我们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注意了数量，对质量和品种注意不够，从需要考虑出发多，对可能的条件注意得少，对高速度注意得多，对按比例注意得少。三年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建规模过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在生产和建设中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措施，废除了一些不应废除的规章制度，不讲经济效果。同时使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农业生产和城市供应的困难。

4　月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效率，节约人力》。社论指出，劳动生产率高低，足考核企业实效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国家正在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工作。根据调整以后的任务和今后产品发展的方向，许多企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计划、技术、财务、劳动管理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调整工作是否收到实效，最终都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面。社论特别强调节约人力，这对于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来说，是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强支援农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人力的节约，应该建立在改进管理、改进工作、提高效率的基础上。

4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水利效益的中心环节》。社论指出，管好用好现有水利工程和排灌设备，充分发挥水利设施的潜力，进一步提高水利工作的效益，在一个很长的期间，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手段。

4月16日　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公报中讲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定息从1963年起延长三年。

4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政协全国委员会三届三次会议胜利闭幕，会议发扬高度民主团结精神，反映出了我国蓬勃兴旺的气象。

5　月

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社论指出，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在积极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为将采国民经济的新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5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社论指出，国营农场首先抓好农业，千方百计发展农业这个主业，在农业有了一定基础以后再适时地、相应地发展多种经营，这是一般国营农场发展生产的一条必由之路（不同专业的国营农业企业有不同的主业）。

5月7日　朱德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发言中指出，农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他呼吁，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他还强调发展家庭副业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意义。他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要很好地解决，如果个人没有住房，没有饭吃，没有家庭，集体经济如何巩固？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只有家庭副业发展了，生活改善了，集体经济才能巩固。"

（198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5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社论指出，充分发挥银行对各部门各企业的监督作用，对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都是有很大意义的。

5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两万农户重建山庄恢复耕地。至4月15日，全省已恢复山庄四千九百八十个，占应恢复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恢复耕地五十万亩，占弃耕地百分之五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视山庄建设工作》。社论指出，加强山庄建设，是开展和建设山区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有效办法。

5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进生产队的财务工作》。社论指出，加强生产队的财务工作，首先是选拔真正为社员所信任的人担任会计工作，尽早地配备全生产队的财务会计人员，并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水平。其次是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帐目财务制度，在此基础上，要广泛地吸收社员群众参加财务管理，把生产队的财务活动置于社员的监督之下。

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视中型农具的维修和制造》。社论指出，在现代农业机械还不可能普遍应用的情况下，中型农具可以说是农具中的骨干。恢复和发展中型农具，对于当前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较好的收成，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当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之一。从长远看，发展中型农具，对于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力，也是很有好处的。

5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社论指出，一切单位的领导人，都应该自觉地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为国家和人民节省下那怕是一元钱，而不要有一点点儿的浪费。

5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保护森林》。社论指出，森林是宝贵的自然财富，保护森林是林业工作的重要任务。护林工作，目前最主要的是防止森林火灾和制止乱砍乱伐林木。作好森林保护，最根本的措施是正确执行党的林业政策，加强党的领导。

6　月

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养猪之道》。社论指出，为了真正贯彻党的养猪的方针，大收养猪之利，就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放手发展和扶植农户养猪上面。

6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水土保持工作做好》。社论指出，水土保持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项基本建设，它是根治河流水害、开发河流水利的根本措施，也是合理利刚水土资源，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由区农业生产的根本措施。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一要有全局观点，二要有长远观点。

6月15日　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会计人员的光荣职责》，社论指出，会计工作者的职责是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按照国家的法令和制度，监督一切有关的财务活动。

6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沙石峪村党支部领导群众艰苦奋斗十年改造荒山的事迹，同时发表社论《一篇活材料》。社论指出，沙石峪支部领导群众改造荒山的斗争经历，是一篇关于基层干部如何正确领导群众的活教材，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支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7　月

7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建筑部门试建一批坚固适用的农村住宅，它的主要特点是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代替木结构，从而节省大量的木材，并且造价较低，坚固适用。

8　月

8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十七个省区的农业科学研究部门选育出二十六种作物四百八十多种优良品种，经过几年的鉴定和示范，证明比原有种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8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据冶金部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重点钢铁企业，今年头七个月为农业、轻工业、手工业和市场提供了七百多个品种、四十多万吨钢材。

8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响应阿民族阵线政治局的呼吁，我国赠送阿尔及利亚一批物资。

9　月

9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工业部门正在分批分期地建立企业之间生产上的固定协作关系。到7月底止，第一批重点厂矿已签订四千七百多对协议，实行定点供应。九百多个企业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备品配件和配套产品固定由四百多个企业供应。大部分企业订立了下半年定货合同。

9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三秋”工作，为争取明年全面增产打下基础》。社论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形势是好的，这证明了党中央规定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和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工作的方针的正确。

9月24—27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争议在北京举行。29日发表了全会公报。全会研究了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问题的决定，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改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还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委会的工作，增选了中央监委成员。全会还讨论了国内和国际形势，满意地指出，自九中全会以来贯彻了八字方针，加强了农业战线，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得好，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目前存在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会上还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会把当时经济上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同资本主义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和国际上敌对势力进行一系列反华活动联系起来，错误地开展了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以及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这次会议对发展国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明确提出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但并未纠正经济工作上“左”的指导思想，而且使“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有了发展。

（9月29日《人民日报》1981年8月13日《解放军报》）

9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1959年到1961年连

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完全经受住了这场考验，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收到显著成效。两年来，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 .

10　月

10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庆社论《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而奋斗》。社论说，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国庆前夕胜利结束的八届十中全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社论指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加强团结，同国内外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做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

10月9日　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我国野生动物资源，贯彻“护、养、猎并举”的方针。

10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社论指出，发展我国农业，首先靠正确的执行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充分运用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用现代科学技术把我国农业武装起来。这就是说，一方面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10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田家为从资金上帮助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发放长期无息贷款的新措施。自7月到9月底全国已发展无息贷款三亿元。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集中全党全国力量支援农业》。社论指出，我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就是把农业逐步改造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农业的改造是两方面，一是社会改革，实现农业集体化；一是技术改革，实现农业现代化。依靠什么力量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呢？要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也要依靠国家的支援。

11　月

11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集中全力，争取明年农业丰收》。社论指出，争取明年农业丰收，要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既要正确处理人民公社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既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做好经济工作。既要保证粮食生产稳步上升，又要发展多种经营，做到全面发展。既要解决当前迫切的问题，又要有长远的规划和措施。既要鼓足革命干劲，又要发扬实事求是精神。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农业机械科学工作者举行会议，探讨南方水田农业机械发展途径。会议队为，当前应该贯彻半机械化、改良农具和机械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农业机具的选用、改良和制造，要大中小结合，以中小型为主。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西藏全区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参加了互助组，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11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发展棉花等经济作物》。社论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争取农业全面增产。在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中，争取经济作物增产居于一个极共重要的地位。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就必须相应地正确处理农业内部各生产部门的关系，在农业生产内部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具有重要意义。

11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地有步骤地实现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社论指出，农业技术改革的逐步实现，对集体经济的巩固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农业中使用的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是团结农民、巩固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农业技术改革，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因地制宜，反对千第一律，是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重要原则。农业技术改革的目的，要从根本上提高劳动生产率。

11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超额完成今年工业生产计划》。社论指出，在增加生产中，一定要注意产品对路，生产的是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要在提高质量的同时降低成本。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开会庆祝办初级社十周年，用办社以来的巨大成绩证明集体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1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克勤克俭，储粮备荒》。社论说，我国大部分农村，今年的收成都比去年好一些。粮多一些，钱多了些，大部分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大注意计划用粮，不大注意长期打算的苗头。社论指出，农村形势虽有了好转，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仍然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艰巨任务。

11月29日　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子今日结束。会议分析了农村形势，讨论了当前任务，交流了增产经验。会议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当前的任务是搞好公社各级特别是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和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力量和科学研究工作。

11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做好明年工业生产的准备》。社论说，从1961年开始，我们对工业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整，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工业调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逐步把我国的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在完成农业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明年起，工业部门要加强那些直接和间接为农业服务的生产。

12　月

12月1日　国务院举行第一百二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12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手工业要更好地为农业服务》，社论指出，手工业生产的以铁、木、竹、皮革等为原料的中小农具，对一般农业地区来说，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还有普遍的重大的作用。就是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之后，仍然需要一部分手工业制作的中小农具作为新式技术设备的补充。

1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社论指出，有计划地推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这是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

12月14日　国务院颁发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将在全国国营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银行、部队、学校等单位试行。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开展农业生产中的植物保护工作》。社论指出，农业生产中的植物保护工作，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方法，控制和消灭农作物病虫害。这不仅是一项科学技术工作，同时还是一项广泛群众性的工作。开展这项工作必须有正确的方针作指导，这就是防重于治。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出现新气象，全区已有医疗机构一百五十七所，医务人员一千五百名左右，培养出藏族保健员和接生员六百多名，城乡广泛开展了卫生运动。

12月16日　国务院公布《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加强生产建设中标准管理工作》。

12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棉花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粮棉并举的方针和奖励种棉的政策等。

（12月29日《人民日报》）

12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产棉省、市、区和集中产棉县代表集会，保证明年按国家计划种足种好棉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千方百计争取明年棉花增产》。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到农村去》。社论指出，为了从组织领导方面和人才方面支援农村，支援农业，需要大批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工作人员到农村去，还需要大批优秀的热心于社会主义的农业建设的、熟悉农业科学知识的、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的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到农村去，在商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需要许多人到农村去。

12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全国化肥生产和增产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供应农村化肥比去年增加近四倍。

1962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一万二千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它是目前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

（1964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12月　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主要是：（一）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二千万人，全国吃商品粮人口，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二千八百万人。（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证石汕工业。国家对基建投资从1960年的

三百八十四亿元，减到1962年的五十六亿元，加上自筹资金六十七亿元，积累半从1960年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降到1962年的百分之十点四。对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钢产量从1960年的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吨降到1962年的六百六十七万吨。全国县以上国营企业，三年共减少四万四千五百个。充实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还发展了塑料，化纤、合成洗涤剂等新兴工业。（三）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压缩城镇人口和停建那些无益的水利工程，1962年农村劳力增加到二亿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人，超过了1957年。削减了粮食征购量，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对农民实行退赔，还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四）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由于领导正确，措施得力，1962年的调整工作成绩卓著，到8、9月间，经济状况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198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1963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巩固伟大的成绩，争取新的胜利》。社论说，“过去的一年，是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取得决定性成就的一年。”社论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逆流和风浪”，“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比较短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现代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能够办到的。”

1月2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委最近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坚决把工业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要求，分析了1962年工业的形势，讨论了工业战线上的新任务，布置了1963年的工作，

会议一致认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新任务，是要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要求，坚决完善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会议还决定今年继续进行各方面的调整，同时做好几项主要工作：一、增产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市场需要的轻工业品和重要的原料、材料；二、争取在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方面大进一步；三、加强经济管理，增加积累；四、全面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会议号召全体职工鼓足干劲，热情高涨地参加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而奋斗。

1月9日　国务院公布《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该条例于1962年11月29日国务院第一百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会计工作是管理经济的重

要工作》。

1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机车和东北电业系统去年煤耗降低，节约煤炭一百八十多万吨，约等于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两华的生活用煤。

1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商业部门合理减少商品流转环节，降低运转费用，及时供应市场。作到就厂就站就库直接调拨商品，组织产销直接挂钩，保持和恢复前店后厂办法。

1月29日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举行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讨论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方向问题。周恩来总理出席会议，并阐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号召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群策群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2　月

2月1日　华东召开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号召踏踏实实开展农业生产运动。柯庆施强调要抓住三个环节：民主办社好、干部思想作风好、党的支部好。

2月8日—3月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商讨我国农业科学技术重要问题，研究我由农业科学技术长远规划。聂荣臻副总理说，我们提倡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倾听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珍视群众创造的先进经验。谭震林副总理强调农业科学研究要为当前生产服务，并且提出了应该着重研究解决的有关农业增产的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会议制定了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要求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广泛调查研究我国自然资源及其利用情况，在农林牧副渔各方面开辟新的资源；应用我国丰富的精耕细作传统和现代化科学技术措施，大幅度提高现有耕地、畜群，森林、水域和副业生产水平；全面研究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利用问题；加强基础农学的理论研究，开辟缺门学科和发展薄弱学科；研究和发扬祖国农业遗产；加强农业技术经济的研究。

（4月6日《人民日报》）

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我国有一百多个机械工厂和电器工厂固定为氮肥工业制造成套设备。据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人说，这是我国建立完整的化肥设备制造工业的开始，也是机械工业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畜牧兽医站》。社论指出，发展畜牧业生产除了靠农牧民积极性外，同时也必须有科学技术的指导，要大力开展牲畜疫病的防治工作，充分调动民间兽医的积极性，办好畜牧兽医站。

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为农业服务的县乡短途运输工作》。社论强调指出，交通运输部门，特别是地方交通工作部门要加强为农业服务的县乡短途运输

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月24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十五个省的重点产烟区代表在京开会，李先念副总理号召扩大种烟面积，给卷烟业提供更多原料。

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组织和发展农业的多种经皆》。社论指出，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和传统习惯，合理利用各种土地、各种资源和各种劳动力，组织农业方面的多种经营，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一项很重要的措施。

3 月

3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林业部有关部门和专家提出各种办法，逐步解决造林苗木不足问题。当前办法是：合理栽植，节约用苗，提高成活率；充分利用萌芽性较强树种；及时调济余缺。根本途径是；有计划地建立和健全种子基地，发展苗圃；发动群众大量采集种子，培育苗木。

3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用电量五年增长十倍，千余县市在农村架起输电线路，安上发电设备。三十一个粮棉高产县抓紧改造农村电力网，提高设备利用率。

3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提高工业品质量和增加品种方面再大进一步》。社论指出，工矿企业在增产节约活动中，需要很好处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和增加产量之间的关系。要把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放在第一位。

3月17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接见参加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和全国财贸联系网联系人会议的全体人员。

3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切实改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社论指出，改善商业企业的具体要求和目标，概括起来就是：降低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商品损耗，增加合理盈利。

同日，《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八章四十条）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八章立十条）以中央文件下发试行。中央强调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两个条例对教育方针、任务，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生产劳动，体育卫生和生活管理，教师行政工作，党的工作和其他组织工作等，都作出了规定。

3月24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取得蔬菜供应成功经验。建立了集体化和初步现代化的蔬菜基地，执行联系城乡和工农互利的经济政策，采取一系列远销经营方面的组织措施。近一年来，平均每天上市蔬菜五百万斤，品种在淡季仍保持二十种左右，菜的质量显著提高，莱价平稳并有所下降，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报道北京几家工厂为了节省一厘钱，或者利用一分钟，或者为了减少一根火柴废支，而作的种种努力和体现出来的节约精神。《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一本大帐》。

3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更大的力量发展水产业》。社论说，水产业

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当大力发展水产业，使全国更多的地方变成富饶的“鱼米之乡”，使我国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和日益富足起来。社论论述了我国水产资源以及发展水产事业应当采取的措施。

3月30日　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接见了出席商业、化工、煤炭、石油、地质、建筑工程、纺织、交通、水利电力方面的全国性专业会议的全体人员。

同日，国务院举行第一百二十九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工商所得税负担和汐进征收办法的试行规定》,《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

4　月

4月1日　新华社报道，按照经济合理原则改善企业生产工艺和物质供应，全国数千厂矿固定协作关系。这些厂矿需要的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备品配件和配套产品，可以长期就近供应。因此节约了大量资金和动力，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发展产品品种、原料材料的生产对路，减少了浪费，促进了计划管理。

4月2日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接见出席农业机械工业和其它机械工业、冶金工业、木材工业等方面的全国性专业会议的全体人员。

4月7日　新华社报道，十七个省区的棉花科学研究工作者最近在郑州集会，总结棉花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经验。

4月10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一百三十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物价委员会和国家编制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两个直属机构，并提请人大常委会审仪批准。

4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各支野外考察队几年来考察的结果证明，我国边远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发展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广阔前途。

4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全国木材节约会议，讨论、制订了今年节约木材的措施，决定在全国推行。

4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医药工业已建成比较完整的生产体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制药厂，医治疾病的各种药物基本上已能自给。

(1963年第5期《新华月报》)

4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正在新建七个大型的氮肥厂。这七个厂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陆续开工建设的。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建设这么多规模大、技术复杂的氮肥厂，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些厂建成以后，可以进一步改善化肥工业的布局。

5　月

5月1日　我国第一艘行驶中日航线的万吨级货轮“跃进号”在赴日途中突然遇难沉没。我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正对沉没原因进行严密调查。船员经日本渔船救起，正由我派出的护卫舰接返祖国，

5月2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召开的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最近在京举行。谭震林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人民日报》为此于3日发表社论《及时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5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为便利国民经济各部门及时支援农业，我国邮电通信网路延伸广大农村。目前一般的县都有了十个左右的邮电局、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通电话，邮路总长达二百七十多万公里，长途电信线路总长度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点九。

5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农业部、轻工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在砀山果园场召开黄河故道地区果树座谈会，讨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该地区水果生产问题。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好管理和好好使用农业机械》。社论指出，使用农业机械，达到既增产又增收的目的关键是两条，一条是维护保养好机械，充分提高机械的利用率；一条是努力降低使用机械的成本。

5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先进集体荣誉，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六年来，每年按国家计划植棉一千亩左右，平均亩产皮棉百斤以上，比初级社时增产一倍多。六年共向国家交售皮棉八十九万多斤，社员收入也增加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热爱集体，更热爱国家》。

6 月

6月2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接见参加全国工资工作会议的同志。

同日，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跃进号”货轮因触礁沉没。

6月17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题目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6月23日 《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5月27日发布的《森林保护条例》，并发表社论《保护森林，人人有责》。

7 月

7月2日 国务院举行第一百三十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通过国务院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报告。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为发展采掘工业，全国加速建设一百六十多个大中型矿山。其中很大一部分已在今年上半年竣工投入生产。

7月6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委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勤俭办企业和推行企业经济核算的问题，并交流了经验。五个厂矿成为勤俭办企业的旗帜。襄樊棉织厂、石圪节煤矿、兰州炼油厂、湖南橡胶厂、嘉丰棉纺织厂的共同特点是：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方针；干部以身作则，艰苦朴素，长期坚

持参加生产劳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关心工人生活；加强企业管理，严格执行制度；年年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7月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和国家决算。周恩来总理作国内外形势报告，解答常委会在分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7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发展牧区的畜牧业生产》。社论在论述我国畜牧业生产形势后指出，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首要条件是，认真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特别要很好地贯彻执行"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

8　月

8月9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以来，全国以农副产品畜产品为原料的二十种主要轻工业产品，有十九种显著增加。其中乳制品、干湿蛋品、内类罐头、硬脂酸、精甘油、肥皂、卷烟等，上半年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到一倍多；其他象棉毛麻丝纺织品、机制纸和纸板、酒精、饮料酒、糖和皮革等，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以上。

8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田地区建成新绿洲。三年多来，维吾尔族农民开垦出近百万亩荒地，建起二十六个林场和几十万亩牧场。陆续修成了五座中小型水库，补修了数以万计的田间渠道，把近四十万亩荒地改造成良田。易受风沙侵袭的地区，已植树二百多万株。各种牲畜发展到二万四千多头。三十六个新村和居民点已建立起来。商业、交通、文教卫生等事业也得到了飞快的发展。这里已成为新疆南部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农业区。

8月18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今日闭幕。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加强组织领导，拿出足够的领导力量，结合专家和群众，专门抓，长期抓，抓到底。

(8月26日《人民日报》)

8月19日　新华社报道，宁夏地区建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骑骆驼长途跋涉和人力拉牵行舟的艰难情况根本改变。

8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经济上看干部参加劳动的重大意义》，社论说，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有助于减少非生产人员，减少非生产时间，减少干部的工分补贴，增加物质财富，增加社员收入，增加公共积累，更好地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

9　月

9月6日　《人民日报》编辑郎、《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

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9月23日　廖承志——高墙备忘录贸易会议达成协议。第二年度贸易协议事项在京签订。

9月26日　我国自己设计和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氮肥厂——上海吴泾化工厂首期工程投人生产，年产硫酸铵十万吨。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国民经济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迅速克服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开始全面好转。今年粮食棉花和其他许多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工业生产继续稳步上升。基本建设继续发展。市场供应状况明显改善。国家财政和对外贸易计划也都完成得很好。

10　月

10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庆社论《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社论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开始全面好转的新局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社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国内外新形势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把勤俭建国的方针贯彻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中去”，“奋发图强，尽快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0月3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高原连续第五年丰收。翻身农民同声感谢党领导成立互助组，使生产年年发展，人民生活天天向上。

10月5日　日本工业展览会在京开幕。周总理向展览会致书面贺词，彭真市长为展览会剪彩。石桥湛山、铃木一雄、南汉宸等讲话，共祝中日友好关系和贸易关系不断发展。

10月11日　新华社报道，为加强中间友好合作关系，支援阿政府和人民发展国民经济，我决定向阿尔及利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

10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新疆建起初步现代工业基础。目前已能生产机库等一千多种工业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达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发展到四万多人，其中几千人担任企业的领导干部和管理干部。

10月16—25日　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大会确定，面向农村，生产更多更好的手工业品。薄一波同志到会讲话，鼓励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10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政府赠送古巴政府一批救灾物资。

10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内蒙古日用品工业发展迅速。全区已经建成近二百座日用品工厂，包括纺织、食品、制鞋、日用橡胶、日用塑料、陶瓷、烟草、制糖、蛋品，乳制品、皮革等行业，产品上百种，有些产品除供应本区还远销外地。

10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新疆开荒造田耕地扩大一倍半。解放以来新垦的二千八百多万亩土地上已收获一百多亿斤粮食和大量棉花油料，今年又将丰收。

同日，新华社报道，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经验，在正常

年景下，他的试验田亩产可达千斤左右。苏州地区农民学习这一经验，取得丰硕成果。

11　月

11 月 9 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建成比较完整的纺织工业系统。解放初期只能生产几十种产品，现在能生产一千多种产品。

11 月 12 日　中国农业银行在北京成立。李先念，邓子恢副总理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11 月 13 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召集十五个主要产棉省市代表开会，交流高产技术经验，争取明年棉花丰产。

11 月 14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农村集体副业是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件大事》。社论在说明发展农村集体副业的重要意义后指出，发展集体副业生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社论还指出发展农村副业应以集体经营为主，同时也要支援农村家庭副业发展。

11 月 17 日—12 月 3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开幕式。会议批准 1963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1964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时初步安排和常委会工作报告，通过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议。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祖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于 12 月 4 日公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而继续奋斗》。

11 月 19 日　新华社报道，工业战线扎实开展“全国学上海，上海学全国”比学赶帮运动，缩短后进先进差距。二十五个省区派一万多人到上海学习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上海派大批职工去外地“取经”。

11 月 20 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召开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重点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会汉，初步提出一个较长时期的水土保持规划草案，安排了今冬明春水土保持工作。黄土高原重点治理即将开始。

11 月 25 日　新华社报道，各族人民十多年来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前缘造林获很大成果，三百里林带截住东侵流沙。紧挨林带出现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新的牧场，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11 月 27 日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全国化工协会、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学会工作会议等十个专业会汉的全体人员。

11 月 29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海洋运输业日益发展。沿海运输网初具规模，海港吞吐能力扩大，货轮吨位增加，运期缩短，远洋客货轮开辟通往东南亚、欧洲、非洲三条航线，到达过三十多个港口。

11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翻身农奴发展互助，兴家立业。农民的耕地比民主改革前增加百分之二十多，多数农户的农具已经配套，耕作技术普遍提高，全区平均单

位面积产量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许多缺粮户变成余粮户。

12 月

12月2日 《人民日报》公布国务院关于《发明奖励条例》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的通知和两个条例的全文。

12月9日 新华社报道，内蒙古开发无水草原，建立饲料基地，发展畜牧兽医，草原面积改观，牧业丰收。五年来打机井两万八千多眼，三万平方公里无水草原有了水；1963年畜牧业年度全区新添仔畜一千多万头，比上年度纯增四百多万头，是历史上最高纪录。

12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农牧业生产蓬勃发展，全州今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到今年9月止，牲畜头数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六。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原油、汽油、柴油、煤油和润滑油等主要产品全面超额完成计划；石油产品达几百种，比1957年增加两倍。今年新建的炼油装置总加工能力，比去年新建的增加四倍多，工程质量良好；我国自己设计和建设的大型炼油厂，比去年的建设时间短、投资省、技术新。

12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大寨大队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中共山西省委号召各级党组织学习他们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风格。

12月29日 刘少奇主席等领导人接见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汉、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会议等六个专业会议代表。

12月30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一百四十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和《外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核准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文化合作协定、中国和阿富汗换货和支付协定。

同日，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煤炭生产计划提前完成，每天平均超产两三万吨原煤。平均每个工人比去年多产十八吨煤，平均每万吨煤消耗坑木少二十五点五立米，煤质提高。

12月31日 新华社报道，1973年我国工业领域产生了巨大效果；产品质量是几年来提高得最快的一年；生产成本是开国以来下降幅度较大的一年。

1964 年

1　月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胜前进》。社论在回顾了去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后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在新的一年里，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继续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要更深入更广泛地分期分批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乘胜前进。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毛纺织工业 1963 年增加的新品种和新花色产品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1963 年，我国还新建和扩建了十个毛纺织厂。

1 月 2 日　新华社报道，新疆各族人民经济生活变化巨大。1962 年消费的布、茶和糖，分别比 1952 年增加六点七倍、七点三倍和八点七倍；1963 年 1 到 8 月购买的呢绒、绸缎比 1962 年同期多一百多万米；全区农牧民自用畜达到四百五十多万头；城乡人民储蓄总额比十年前增加二十三倍。

1 月 5 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农业机械站工作发展迅速，1963 年与 1957 年相比，全国农业机械站增加二点八七倍，拖拉机增加四点六七倍。全国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县建立了农业机械站。

1 月 7 日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总结去年工作，确定今年任务，争取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会议号召继续广泛开展比学赶帮活动，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

（2 月 2 日《人民日报》）

1 月 22 日　新华社报道，在 1963 年，我国千万个工商企业，节约木材三百万立方米，节约的电力，相当于 1949 年全国工业消耗的电量；节约的煤炭，可供炼六百多万吨生铁；工业交通企业比前一年增加的上缴利润，可供建设好几个年产百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商业部所属企业减少商品流通费用节约的资金，可供购买七百万吨化肥。

1 月 26 日　刘少奇等同志接见正在北京参加关于地质、水利、机械、农业机械、石油、冶金、轻工业、建筑工程、铁道、邮电、气象、科学技术、测绘、统计、银行、财政经营管理、教育、医务、农村读物出版等方面的全国性专业会议的代表。

2　月

2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

2 月 9 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汉闭幕。会议要求除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 1964 年的农业

生产计划外，着重抓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还交流了大寨大队等典型经验。

2月10日　《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莎荫、范银怀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2月11日　新华社报道，西北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经验交流座谈会，最近在西安举行。座谈会认为，稳产高产的经验有千条万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第一条。

2月20日—3月9日　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深入开展比学赶帮活动，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上交任务；逐步建设旱涝保牧稳产高产农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垦战线队伍，用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办好国营农场。

1963年全国国营农场耕地面积比1957年增长一倍多，粮食总产量增长两倍多，上交商品粮显著增加。

(3月14日《人民日报》)

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翻身农民喜爱常年互助组。去年全区常年互助组增加百分之十左右，总数已超过四千个。

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陶铸的文章《人民公社在前进》。文章总结了广东省农村人民公社五年的经验。

2月29日　国家经济委员会今天召开了第一次工业、交通系统各部政治部主任会议。会议要求各部的政治工作机构在三月份建立齐全；立即组织力量到基层去抓生产第一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大抓加强领导机关革命化的工作。

3　月

3月5—14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会议总结经验，安排计划，提出要求组织干部社员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力争超额完成今年棉花生产任务。

(3月23日《人民日报》)

3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依靠群众力量，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社论指出，在当前我国农业还没有普遍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的条件下，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最现实最有效的办法，是依靠集体和群众的力量，勤俭创业，艰苦创业，充分发扬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利用起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把群众中的一切好经验都总结起来，努力地加以推广。

3月16日—4月3日　全国工业、交通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汉决定坚决扎实地学习解放军，建立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产业大军。工业交通各部分别建立政治部，目前主要抓生产第一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各部分别抽调干部到解放军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周恩来总理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

3月17日　薄一波副总理接见电力工业先进企业代表。薄副总理说，要办好企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政治挂帅，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生活、工作等

各个方面去，要求工交部门领导机关改进作风，深入基层，加强生产第一线。勉励代表们永远不要骄傲自满，永远力争上游。

3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知识青年董加耕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迹(文章题目是《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并且为此发表社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社论说，"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的确是一场移风易俗的革命。是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个组成部分。"

3月23、25、26日　我国新开辟的京昆、京沪、京广三条直达航线先后正式通航。

4　月

4月18日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召开会议，确定在条件具备的地区推广新型提水工具——水轮泵。

4月20日　全国重点氮肥厂增产会议在太原举行。会议提供的材料表明，全国首季化肥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1964年第5期《新华月报》)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木、范荣康的通讯报道《大庆精神，大庆人》，并发表编后记《崇高的榜样》。

4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访问十四国的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说，在他访问十四国过程中，提出了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即：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任何特权。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允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4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不断改善工人劳保条件，五百多种劳保用品保护各行各业的职工安全生产。一千多处大小疗养院（所）免费接待职工治病和休养，几十万名年老退休的职工享受福利待遇欢度晚年。

4月29日　中国——巴基斯坦直达民用航线今天正式通航。

5　月

5月9日　农业部召开南方十省市治螟座谈会部署工作：以防为主，防治并举，力除螟害。

5月15日—6月6日　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作重要报告，周总理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会议要求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财贸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职工的社会主义教育。会议指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职工，使财贸队伍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革命化，更加战斗化，是财贸部门的一项最重大的任务。

全国财贸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工作要点，中央财贸部门建立政治部。

6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东北西部防护林带扩延十万亩。这条1952年开始营造的防风固沙林带，跨越三省一区，南北婉蜒八百多公里。近百条基干林带，部分已经郁闭成林，平均树高五米左右。上万条主林带和副林带也已基本成型。受保护的农田达二千二百多万亩。

同日，新华社报道，根据蒙古政府捉议，我援蒙员工陆续回国。

同日，新华社报道，上海小批生产手扶拖拉机。"工业七型"手扶拖拉机，体积小，操作轻便，灵活，特别适合南方农村使用。一台能抵三头牛、二三十个劳动力。

5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处理山、水、田的关系》。社论指出，浙江省是个"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省份。他们从这个特点出发，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再实践，逐步摸出一个客观规律：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治山与治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治山是最根本的。社论还论述了处理山、水、田的关系问题。

5月27日　《人民日报》就吴吉昌创棉花芽苗移栽法发表社论《热情扶植新事物的幼芽》。社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的生产技术一旦在实践中成功了，其中必有自己的科学根据。科学工作者应当重视，认真研究群众的新创造。

6　月

6月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六个重点省、自治区狩猎工作会议最近在西宁市举行。

（1964年第7期《新华月报》）

6月8日　全国农业区划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在无锡举行。《人民日报》于9日发表社论《用严格的科学态度来领导农业生产》。

6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工业新产品授奖大会在京举行。有一千四百多项工业新产品获奖。薄一波副总理讲话指出："工业新产品大幅度增长，是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品种、质量提到第一位'指示的结果，是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取得的重大成就，增加了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

6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二十一个省区的农业区，近几年来建立了一批大牲畜繁殖基地。这些基地和基点繁殖的牲畜比一般地区增长快，品质好，商品畜比例大。

7　月

7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最近在北京召开农业方面标准化工作会议。

7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活质量水平决定于思想政治工作》。社论指出，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统帅下，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经营管理工作、技术改革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这个三结合原则，在提高农活质量上，它的作用表现得特别突出。

同日，我国最后一批援蒙员工于今日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7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号”机车十八年来高举革命红旗，年年出色地完成运输任务。铁道部决定进一步在全国铁路部门推广这台机车包车组的先进经验。

同日，新华社报道，内蒙古好牛好马成倍增长。今年以来，牛犊、马驹和驼羔等已增殖近七十万头，比去年同期多六万多头；公社化后全区大牲畜净增一百四十多万头，已逐渐成为向国家提供乘马和耕畜的重要基地。

7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广西邕宁伶俐糖厂增加长期固定合同工人，减少原有固定生产工人，合理利用工农劳动力。在经济方面，降低了生产成本，发挥了劳动潜力；在政治方面，密切了城乡关系，巩固了工农联盟。《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一项办法，多项好处》。

7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炼油设备生产大幅度增长。今年上半年生产的炼油设备相当于去年全年产量，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国自行设计的新产品，目前，许多新建炼油厂的设备都已由我国自己生产。

同日，新华社报道，煤炭工业部和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最近批准八十二个掘进队为“五好等级队”，并授予京西煤矿西山平峒工地为“掘进旗手”称号。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给水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自来水设施相当解放前三倍。全国饮用自来水的人口比解放前增加一点五倍，每天供水量等于解放前的四倍。

7月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百二十四次会议，批准1963年国家决算和1964年国家预算。

同日，新华社报道，1962年春季以来，全国有二十多万名城市初、高中毕业生热情参加国营农场生产建设。

8　月

8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有十一个省市的农村最近使用了一种新的化学肥料——碳酸氢铵。这种碳酸氢铵是十四个年产二千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生产的。小

型氮肥厂建设费用较低，生产流程比较简单，设备容易制造，建设时间短，可以充分利用地方零星资源。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磷肥工业。已建起大中小型磷肥厂近百个，年生产能力达二百万吨以上。最近化工学会在广州举行首次磷肥学术会议，着重研究向多品种和高浓度发展。

8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水利建设和稳产高产田》，社论论述了水利建设与稳产高产田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

8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稳产高产离不开林业的发展》。社论强调指出农业高产稳产离不开植树造林的发展。

8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肥沃土壤》。社论指出，离开了土，就谈不到农业生产；没有肥沃的土壤，就谈不到农业稳产高产。

8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地质部门今年派出近万名地质人员勘探地下水，为几十个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产地提供水文地质资料，同时为二十一个水利建设工程进行地质勘察。

9　月

9月2日　新华社报道，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欢庆成立十年。各族代表愤怒谴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颠覆破坏活动。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依靠祖国的繁荣和强大，十年来自治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粮食平均年产量比1949年到1954年提高三分之一以上，各类牲畜从解放时的三百多万头增加到近一千万头，建设了一批现代化厂矿，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

同日，新华社报道，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同英国两家公司达成购买生产聚乙烯成套设备协议。

9月17日　新华社报道，陕西榆林地区广大群众发扬革命精神，坚持不懈造林固沙，大片荒漠变绿洲。十多年来在一千二百多华里的风沙区，造成防沙护田林二百多万亩。公社化六年来的造林面积，超过公社化以前七年间造林面积三倍。

9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国营农场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农场总数比1957年增加八倍，耕地面积扩大三倍多，生产机械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去年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食和豆类比1962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八。今年夏收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二成多，秋田作物长势也比去年好。

9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重庆水轮厂全面实行“三定一顶”干部劳动制度。“三定一顶”就是定时间、定岗位、定职责，并在能独立操作以后，顶替班组定员，象普通劳动者一样地劳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象普通劳动者那样真正劳动》。

9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日益强大。今年试制成功新钢种新钢材四百多种。制造载重汽车、拖拉机，万吨远洋轮、破冰船和二万五千吨氮肥设备的钢材，已能自给或大部自给；钢铁和钢材的合格率，在去年较高的水平上又显著提

高；各种原料、材料、燃料和电力的消耗普遍下降，有十六项主要消耗定额出现了十五年来最先进的水平。

9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化学工业突飞猛进，今年一百多种重点产品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质量进一步提高。化肥和农药增长最快。高效化肥高效农药增加很多。有机化工产品和药品的生产发展也很快。过去没有的一些生产部门已经建立起来。按总产值计算，化学工业在工业部门中，已从第八位上升到第四位。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需要相比，化学工业仍然比较落后。目前全国有五十多个大中型化工工程正在施工。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机电灌溉面积自公社化以来增长五倍。今年各地新建扩建了一批排灌站，共增加排灌设备四十多万马力，大都分布在主要粮棉产区。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林业生产获得重大进展。今年八个月植树造林面积比去年全年还多，成活率超过近年最高水平，经过历年来造林育林，历史上很多风沙严重危害地区建立起绿色长城。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成一万二千吨压力巨型水压机。这是自力更生发展现代工业的重大成果。它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主机有六，七层楼高，基础深入地下40米，能把两三百吨重的特大钢锭象揉面团似地锻压成各种形状的机器零件。经过两年多试生产的检验，质量很好。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国民经济已全面好转。今年，农业获得较大丰收，工业产品质量上升，品种增多，产量大大提高，市场上各种商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在形成和发展中。

10　月

10月1日　《人民日报》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大庆油田的先进事迹；在“大力支援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大寨的事迹，在“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重庆水轮机厂、山西应县藏寨大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先进事迹。

10月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力更生制成电子静电加速器。上海先锋电机厂同有关单位密切协作制成的这种加速器，能够产生几百万电子伏特，是进行原子能研究和作为辐射源应用的新型仪器。

10月11日　北京第一所自动化邮局正式营业。

10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在北京闭幕的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工作会议，决定在今后农业改革中，积极制造和推广半机械化农机具，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公社集体经济。《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农具改革运动要坚持自力更生精神》。

同日，新华社报道，由于人工繁殖鱼苗试验成功，我国淡水养鱼事业不断发展。今年头八个月淡水鱼产量超过去年同期百分之二十六，去年养殖面积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全国淡水鱼产量相当于解放初期产量的二十多倍。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天门县九个轧花厂长期使用季节工的经验充分证明，亦工亦农劳动制度有很大优越性，工厂减少了固定工人，节省了工资和非生产性开支，降低了生产成本，社队增加了生产资金，社员增加了收入，季节工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10月16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10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四川乐至县红旗丝厂改常年生产为季节生产，这样为充分利用亡本农村劳动力，增加工业生产、发展地方工业，提供了有效途径、同时密切城乡关系，缩小工农差别，《人民扫报》为此发表短评《有意义的第一步》。

10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多数县建立农业机械站。农用拖拉机已达十万多标准台。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每台完成的工作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平均每亩的作业成本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10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重点地区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最近在西安举行。会议以革命精神总结和交流了这个地区一年来水土保持工作的经验，讨论和研究了1965年的工作任务和远景规划。会议要求一百个重点县旗大兴大寨之风，以革命精神和科学方法完成十项任务。

11　月

11月14日　周恩来、贺龙同志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以后，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1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电梯厂只有三百多名职工，依靠生产专业化和广泛的协作，十年来生产的电梯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规格四十多种；向国家上缴的利润，可以建设十四，个半上海电梯厂。

11月20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农业发展迅速，六年超过几个世纪。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扩大，连年增产。粮食总产量比民主改革前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平均单产提高百分之三十。

11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援助蒙古建成一座现代化养鸡场。

11月24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现代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建成中小型工厂五十多座，生产大批农牧工具建筑材料，全区现有工人二万名，有些人已经成为工厂的领导干部。西藏第一代工人阶级成长起来。

12　月

12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国营农场管理局最近采取革命化措施，把机关从城内搬到郊区，机关干部实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的制度，《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

论员文章《领导农业必须面向基层》。

12月20日—1965年1月4日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几年来国民经济的情况，说“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1958年到1960年的大发展，从1961年起，进入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现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赫鲁晓夫在1960年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三年大发展时期的成就，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农林牧副渔业产品收购量全面增加，按货币计算，今年收购的各种农业产品比去年增加近百分之十，林业产品增加百分之七，畜牧产品增加百分之三十八，副业产品增加百分之七，渔业产品增加百分之十一。

同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齐齐哈尔车辆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等参加该厂实行企业管理革命化写的七篇文章，并在“编者的话”中指出：这个厂实行“集中到厂部厂服务到班组”新管理体制是企业管理上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胜利。

1965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保证》。社论在总结去年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中取得成绩及明确今年这三方面的任务后指出，应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二、在各项工作中，要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三、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反对骄傲自满，自以为是。

1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这次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大会认为，我

国人民在1965年的主要任务是，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为198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保证和促进其它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人民日报》为此于次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1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检验干部的试金石》。通过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对两位市长跟班掏粪劳动的赞扬，说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

1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平定县锁簧公社立壁大队第一生产队有四十亩谷子平均亩产六百九十多斤，打破谷子是低产作物的旧观念。《人民日报》评论员为此发表文章《谷子高产说明了什么?》，用事实批判谷子不能高产的旧思想。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套尿素设备在上海试车成功，整套设备共有主机辅机二百多台，年产尿素四万吨。

1月22日　《人民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江南造船厂委员会的文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并加编者按语，指出："这篇总结性的文章以生动有力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2　月

2月15日—3月1日　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会议号召全国棉区社员干部发插不断革命精神，力争1965年棉花更大增产。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2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论芙蓉大队改造穷山恶水顽强斗争的经验》。文章指出芙蓉大队的经验是：抓住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集中兵力打好第一仗；从实际出发，有多少力量办多少事；处理好各种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并善于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2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革命的精神做好1965年的商业工作》。社论指出，1965年的商业工作的原则是：及时收购，积极推销，生意做活，活而不乱。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先念同志的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该文是作者应《工人日报》要求而写。文章指出，商业工作人员必须坚持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商业的一切业务活动，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都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扬生产民主，落实生产计划》。社论说，要使（农业）生产计划制订得比较正确，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不能只是通过少数人的头脑，

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大自然作斗争要力争主动》。社论指出争取今年农业要再有一个好收成，决不能只靠风调雨顺，而要靠我们在向大自然作斗争中掌

握更多的主动权，要在农事季节方面争取主动，在自然灾害面前争取主动；就是在有利条件方面也要力争主动。

2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生产高潮和领导艺术》，评述上海染料厂生产高涨的经验：1. 领导者要深入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学习技术，善于做普通劳动者和领导者。2. 领导者要保持民主作风。3. 要点面结合，以点带面，不要以偏盖全。

同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会议确定今年工业交通部门的基本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推动比学赶帮运动，组织生产建设高潮，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薄一波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2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按照农事季节安排农村劳动力》。社论指出，劳动力如何安排，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处理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以及农业和副业的关系问题。必须正确处理这一关系，除了按照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来确定基本建设和副业生产的项目、规模之外、最要紧的是按照农业季节的变化，及时地，合理地安排劳动力。

2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猪多了还要养猪》，评述吉林省榆树县秀水公社腰围子大队的经验。指出腰围子大队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总结养猪成绩，找出薄弱环节，坚持贯彻党的"公养私养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使大队养猪业得到发展。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最近在天津举行。会议确定了今年财贸政治工作的任务，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财贸工作的首位，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3　月

3月3日　新华社报道，1964年我国棉花生产又获得大幅度增产，全国棉花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三，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

3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1965年棉花生产的方针》，指出提高棉花产量的途径是扩大棉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大有可为的。

3月11日　《人民日报》介绍了广东省电白县十二年来坚持绿化全县改造面貌的事例，并发表社论《学习电白，绿化家乡，绿化祖国》。

同日，新华社报道，华东七省市（江苏、山东、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上海）纺织部门认为，只要革新现有设备，提高操作技术，把目前每一小时的棉纱产量，与上海的差距缩小一至二公斤，华东纺织部门就可以多生产几十万件棉纱。

3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产棉区要力争粮棉双丰收》，同时刊登了江苏省启东县副县长秦素萍的文章《启东粮棉双高产的来历》。文章介绍了启东县粮棉增产的过程和经验。

3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专业化和协作道路上，天津市从去年四月以来，革掉一批"大而全"、"小而全"的工厂，组成一百三十九个"小而专"，"中而专"的工

厂。有三十个新厂从大厂分出来后，生产面貌改观，产品数量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品种增加，成本降低。《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一组（四篇）专题文章，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专业化的协作是工业生产发展的规律。

3月16日—4月4日　全国设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彭真，薄一波同志到会作了重要报告。

（4月10日《人民日报》）

3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宣惠河疏浚工程目前正在加紧施工，这项工程由于坚决依靠群众、设计、施工革命化，实现了多快好省。全部工程原计划三年完工、受益，结果大干一个冬春就能基本完工，国家投资将节约三分之二左右。

3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号召农业科学工作者上山下乡同群众一起大力发展样板田，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会议期间作了报告。

3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三结合的样板田，促进农业科学实验运动》。社论指出，农业领导干部、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农民群众的“三结合”的样板田既出粮食、又出科学，既出又红又专的农业科学人材，又出又红又专的农业领导骨干，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科学和造就人材的途径，是农业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阵地。

3月31日　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次会议，批准中国坦桑尼亚友好条约，决定建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决定将建筑工程部分为建筑工程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刘少奇主席任命谷牧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刘裕民为建筑工程部部长，赖际发为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

4　月

4月3日　《人民日报》开辟专栏，进行“用革命精神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讨论。目的是通过不同意见的启发和讨论，求得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以进一步推动商业工作，更好地促进工农业生产高潮。

4月9日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最近召开设计工作会议，对五个多月的设计工作革命化的讨论作了总结和研究。《人民日报》，为此于次日发表社论《为设计工作的革命化而牛争》。社论指出，设计工作革命化的关键是设计工作者和领导者的思想革命化。

4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自力更生精神无往不胜——论安徽兴建淠史杭水利工程的宝贵经验》。社论指出，在正确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要正确对待资金，材料和技术力量。

4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养猪和政策——再论猪多了还要多养猪》。介绍和论述四川平坝地区彭县三邑公社月亮湾大队的养猪经验和与生产生活的关系。

4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多养猪大有可能——三论猪多了还要养猪》。分析养猪多的思想顾虑：饲料那里来？是否耽误出工？卖不掉怎么办？社论进一

步从月亮湾大队的经验号召多养猪。

4月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支持越南国会呼吁书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并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要求，按照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斗争的需要，尽一切力量支援越南人民。”

4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电机厂成功制造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29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笨和聪明》，祝贺这一重大成就，指出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别人用较长时间才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做到。

5　月

5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纪念列宁诞生九十五周年社论《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5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自力更生最可靠》。从化工战线两项重大技术成就（自制成套维尼纶工厂设备和新的合成纤维——缜纶）来阐述自力更生是发展科学技术最可靠的道路。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社论论述了知识分子下乡对农村经济建设和知识分子劳动化对消灭三大差别的意义，同时提出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三方面关心他们。社论认为“这决不是一项临时的措施，而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要认真做好的工作；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同日，新华社报道，在短时间内我国试制成功大马力内燃机车，并已成批生产。《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要敢摸“老虎屁股”》。文章认为：“新设备总是用老设备制造出来的，第一台精密的设备总是用比较不精密的设备制造出来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文章把先进技术当作“老虎屁股”，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

5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孝感县五桂公社胜利大队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在生产上克服片面性单一化，做到多种作物合理安排，互相促进，不再只看生产增加，而且计算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短评《怎样才是真快》。短评最后说，“一时跑得快，来必能长期跑得快，长期跑得快，才是真正跑得快。”

5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文章分四方面：一、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二、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帝国主义和原子弹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一种武器。四、必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最近在天津召开全国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经验交流会。会上着重介绍了上海、天津、北京和沈阳的经验。

5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革命精神推行加工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社论说："为了促进工业生产的全面高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经济管理工作革命，加工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是经济管理工作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社论论述了专业化的优越性之后还批评了办"全能厂"的错误思想。

5月14日　上午10时，我国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了又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

5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银行今春向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投放的各项资金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资金总额共达二十亿元左右。

5月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公布。

5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再论"三定一顶"的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文章引用孟子的话："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从反面说明干部懂业务的必要性。同时引用毛泽东的话："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的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

6　月

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字当头——论怎样组织工业生产建设高潮》，强调重视质量。

6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需要更多的商业人员到农村去》。社论指出，商业部门应该把更大的力量放在农村第一线。应该有较多的商业人员下乡，应该有更多的商业战线的领导干部带头下乡。要密切结合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来做好商业工作。

6月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先进工具经验交流会和先进工具展览会最近在北京举行。

6月10—12日　农业部在山西省曲沃县召开北方棉区学习杨谈棉花生产经验现场会议。

(6月21日《人民日报》)

6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要供应，更要收购》。论述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进一步活跃农村市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6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劳逸结合——再论怎样组织工业生产建设高潮》，阐述劳逸之间的辩证关系。

6月24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为发展我国北方地区的蚕桑事业，最近在山西省沁水县端氏人民公社召开了北方八省市学习端氏公社蚕茧生产现场会议。

6月29日　在北京举行的历时十四天的全国畜牧工作会议今日闭幕，谭震林副总理在会议期间作了重要讲话。

7　月

7月1日　新华社报道，第一轻工业部最近在山东淄博市召开全国陶瓷生产技术经验交流会。会议把全国各地革新成果配套成龙，决定在全国范围推广。

7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进经验要推而广之》。社论指出先进经验是先进思想、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以及先进的领导核心，先进作用发挥的大小决定于是否去积极推广。

7月5日　《人民日报》就河北省根治海河首批工程做到多快好省发表记者述评《水利建设的革命》。文章说："河北省海河流域兴修除涝工程的第一个战役的胜利，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革命精神、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是坚持人的因素第一的胜利，是真正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胜利。"

同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视察新疆石河子垦区，亲切探望知识青年，勉励他们献身边疆建设，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做扩主义接班人。

7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巧干出潜力——三论怎样组织工业生产建设高潮》。社论在分析了技术革新的意义——完成生产任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应有的条件后说，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是巧干。巧干出潜力，潜力无穷。但是这种无穷潜力基础是苦干。没有高度的革命精神，没有冲天的革命干劲，没有艰苦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不可能有什么新成果的。没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就不会有无穷的潜力。同时还指出潜力无穷和有穷的关系。

7月10日　农业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畜牧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区及畜牧业重点专区，县领导畜牧业生产的负责干部和一部分劳动模范、先进社队代表及科学技术人员、畜牧专家共三百多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在会议结束后接见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农牧并举，以牧促农》。

7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江西二百多个国营垦殖场，积极学习荷塘垦殖场的自力更生革命精神，取得了成绩，粮食比前年增加四成，林牧副渔各业都有所发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发扬南泥湾的革命精神》，评述江西荷塘垦殖场自力更生，综合经营的成就。

7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适合农村需要的工业品要多生产多供应》。社论指出，工业品的生产和经营，要适合城乡人民的需要，特别要注意适合农民的需要，要看到农村，要面向农村，有计划地生产和供应许多更适合农村需要的、物美价廉的工业品，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方向性的问题。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农垦部最近召开农垦系统政治工作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会议期间做了重要讲话。会议号召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农场各项工作中去，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曾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与会代表。

7月19日　《人民日报》就发展多种经营问题发表社论《不仅是为了"找零花钱"》。社论指出，发展多种经营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要把"以粮为纲"四字

孤立起来，以为有了粮食就可以代替一切，必须相互促进。

7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技术改革。同时发表编者按语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依靠什么呢？依靠大寨精神。什么是大寨精神呢？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从山上取来大批财富，逐步改变农村落后的经济、文化面貌"。

同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于本月20日回国的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先生时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又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7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象战士爱护武器一样爱护机器设备——四论怎样组织工业生产建设高潮》。社论指出，对机器维修应当重视。

8 月

8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作物三级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已在各地逐步形成，目前已有一千七百八十多个县建立良种繁殖场。

8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发展水利建设的综合利用》。要求在水利建设中，应该根据客观条件和需要，尽量实行综合利用。

8月12日 《人民日报》就唐山地区按照经济区域组织粮油商品流通发表社论《粮食商业工作的重要改革》。社论指出，过去粮食部门提倡的合理运输，只是按照行政区划不是按经济区域组织的，象粮食、油料这样的重要物资，同样可以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这是粮食商业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

8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多种经营，争取农业副业全面高涨》，阐述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

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最近举行小麦生产会议，总结夏粮大幅度增产经验，进一步推动比学赶帮超运动。彭真同志在会上指出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在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中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为此于17日转载《北京日报》社论《赶先进，超先进》。

8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思想下乡，工作下乡，产品下乡，技术下乡》。社论认为，这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是一件有着深远意义的工作。

同日，新华社报道，解放前根本没有工业的西藏，现在有六十七个中小型工厂。这些中小型工厂包括电力、煤炭、机械修配、农具制造、水泥、以及许多轻工业企业。现在西藏有八十八个国营商业机构和近七百个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

8月19日 《人民日报》就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技术资料问题发表评论员文章《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批判崇洋媚外思想。

8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召开的全国农林系统政治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最重大最光荣的任务是：运用解放军经验对五亿农民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谭震林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8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机械经营管理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各地农机工作部门从五亿农民需要和人民公社特点出发，开创一条中国农业机械化的道路。谭震林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8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机械管理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社论说："在农业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农业机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农业机械的经营工作，管好用好现有的农业机具，加快农业技术改革进程，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是当前农业机械化工作中一个重要任务"。又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有关部门的干部思想革命化。"

9 月

9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市物资部门为了进一步做好供应工作，组织生产服务队送物资到工厂工地。《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物资工作必须深入实际为生产建设服务》，认为这是处理人和物的关系的好措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都有物资供应人员的一份。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水利会议最近举行。会议提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基本方针。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谭震林副总理在会上做了报告。

9月10日—10月10日 中共中央财贸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在农产品收购和工业品销售旺季期间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10月17日《人民日报》)

9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平山县宅北公社南滚龙沟大队，十年来治山治水，在高寒山区建成高产稳产梯田，成为全国又一面大寨式的先进旗帜。

9月19日 《人民日报》就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发表社论《更全面地为社员着想》。社论要求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使农民不仅分到粮食，也必须从集体分到必要的现金。

9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已设置亦工亦农代购代销点八万个，深受农民欢迎，促使农村经济更加活跃。

9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天文工作者已把测定标准时间的精确度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准时间的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二秒，对国民经济、国防和人民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同日，新华社报道，自1955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以来，到今年8月全国已有百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9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面向班组，面向群众，为生产服务——五论怎样组织工业生产建设高潮》。社论指出，这是一次企业管理革命，大体上是从去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喜爱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官僚主义者

们的号召”以后开始的，今年毛泽东同志又作出“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以后，许多企业的革命自觉性更高了。这个革命的任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庆的革命精神，革企业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的命，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一套科学的、适合我们自己情况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又说：“要办好企业，必须依靠群众，必须坚持政治挂帅。”

10 月

10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社论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把革命进行到底。”

10月3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农村涌现一批大寨式先进单位，南方北方，山区平原，县县有大寨。国营农林牧生产单位也有大寨，在学大寨高潮中，农村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治山治水和农田水利建设工作。

10月4日 日本工业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彭真市长为展览会剪彩，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发表文章《祝日本工业展览会开幕》。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主任、政治部主任会议，对组织农村副业生产，活跃农村市场等问题作了研究和布置。

10月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最大的农田防护林带——东北地区西部防护林带，经过了当地农民十五年的努力，已经营造了三百万亩的农田防护林带，使近两千万亩耕地和几十万亩草原受到保护。

10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治山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学习南滚龙沟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革命精神》。同时发表报道文章《一面大寨式的旗帜——南滚龙沟》。

10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社论说：“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革命时代。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革命国家，胸怀全国，放眼世界，树立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的思想——这是时代和祖国对我们各个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的要求。”又说：“不管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还是平凡琐碎的事物，都是革命工作，都是我们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而我国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每做出一分成绩，都是给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贡献了一分力量。”

10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宣惠河疏浚工程，由于紧密依靠群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原定三年的工程，一冬一春即完成，为国家节省投资二千七百多万元。《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依靠五亿农民办水利》。

10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制度改革会议最近在武汉举行。会议认为，必须把烦琐、难学、准懂的会计制度改革成简明适用，易学易懂的会计制度。《人民日报》于28日发表社论《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生产队会计制度》。

10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在大旱之年仍获高产。

10月24日　全国农具展览会最近在北京开幕。这次展出的产品，都是全国各地农具厂，社为适应当前农业高潮需要而新试制和推广的半机械此改良农具。

10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最近举办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展览会表明，回收利用废旧物资是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重要措施。从1955年到1964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回收了价值达八十八亿元的废旧物资。

10月28日　《人民日报》在"藏粮于民，储粮备荒"标题下，刊登了湖北蕲春县大桴公社，甘肃永登县缸子沟公社和贵州黎平县储备粮食的报道，并发表编者按语。按语指出，除了国家的粮食储备以外，公社，生产队和社员个人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是一项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

10月30日　《人民日报》介绍了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十年来坚持治山治水、整地造林，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编者按语，称赞它"为华东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1　月

11月1日　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曾参观预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农业靠大寨精神》。

11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大旱之年大丰收的经验，题目是《对天作战的领导艺术》，并加编者按指出，大旱之年大丰收，这是哲里木盟人民对干旱顽强斗争的胜利，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的胜利。又指出，自然界的干旱是不可怕的，人们的思想上的"干旱"，即不敢对干旱作斗争，才是真正可怕的。我们不作大自然的奴隶，幻想"风调雨顺"的恩赐，而必须确信人定胜天，实行靠人吃饭，积极对自然作斗争。

11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云南威县松林公社回、苗、彝、汉四个民族百折不挠建设原始山区，从刀耕火种飞跃到农业先进行列。同时发表编者按语指出，这件事又一次最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最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思想。

11月27日　新华社报道，第一轻工业部最近在上海举办全国面向农村轻工业产品展览会。据该部负责人说，今年轻工业部门认真贯彻面向农村的方针，为五亿农民生产价廉物美商品，是为农民服务得更好的一年。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基本建设经验，部署了明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工作。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会议期间向全体代表作了重要报告。《人民日报》为此于30日发表社论《为基本建设工作的进一步革命化而斗争》。

11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水利电力部最近总结和推广白塔渠水利管理的经验，决定开展"学白塔，赶白塔，超白塔，实现水利管理工作革命化"运动。

12　月

12月1日　新华社报道，大寨大队给自己提出新课题，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语指出：大寨人作出“大寨学全国”的决定，做得很对。同时发表陈永贵的文章《以更高的标准建设高产农田》。

12月3日　陈毅副总理接见了日本《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回答了他提出的重要问题。陈毅副总理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心内容，是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加强国防力量。

1965年我们已经偿清了外债，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我们在钢铁，煤炭，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方面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的年度计划。农业取得了很好的收成，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我国正在进人一个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新高潮。

（1966年1月5日《人民日报》）

12月12日　新华社报道，第二轻工业部最近召开支援农业经验交流会议，要求各地农具厂社在保证中小农具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做到修制并举，因地制宜。

同日，新华社报道，农业部最近召开改造利用涝洼、盐碱、风沙地现场会议。

（12月26日《人民日报》）

12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认识和组织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六论怎样组织工业生产建设高潮》，阐述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意义、内容和目的。

12月14日　《人民日报》开始“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专栏讨论。

12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商业部决定从明年起在全国商业单位实行“增减记帐法”。

同日，《人民日报》介绍河南林县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把一个缺水缺粮、吃糠咽菜的县，建成一个高产的余粮县的事迹，并发表社论《创造更多的大寨式的先进县》。

1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机械产品设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向代表们做了重要指示。

12月27日　《人民日报》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为题，介绍了安徽省运用毛泽东思想领导生产的经验，并发表社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同日，新华社报道，从去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积极试行了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使工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民公社增加了收入，培养了技术工人，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财贸工作当政治工作来做》。社论对开展三个月的“为革命做生意，为革命办财贸”的讨论予以评述。

1966 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66年元旦献词》。社论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是我国人民一个雄伟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深入地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我们要在农村和城市更加广泛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力争农业生产逐年有所增长，更加有效地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在不断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有工业企业生产潜力和交通运输业的运载能力，同时大力建设一批新企业，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基础工业，加强交通运输业，进一步改进全国工业的布局，并且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要努力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月2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介绍大庆油田取得伟大胜利原因的文章。文章指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庆的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为此发表社论《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1月10日　我国外贸部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中古贸易的事实真相。指出：卡斯特罗关于中古贸易的谈话是不符合事实的。

1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狠抓低产地区，促进水稻更大增产》。社论指出，水稻生产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62年以来，水稻生产连续四年获得丰收。每年增产的稻谷数量，约占全国每年粮食增产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但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稳定，必须努力克服。

1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迅速研究成功的十六项先进的化工技术，属于化肥、高级化工、合成橡胶、塑料、有机化工原料和医药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这些成果对促进我国工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1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大庆革命精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社论指出，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群众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之道。

1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干劲要大，步子要稳》。社论指出，在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我们的口号是："干劲要大，步子要稳。"在提出生产任务和生产指标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实际的可能，并且留有余地，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不

能硬性推广增产措施。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争取做到。目前做不到的，就不要勉强去做。

2 月

2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当好冷静的促进派》。社论指出，在工交战线普遍开展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的增产节约新高潮中，广大群众干劲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领导，特别要当好冷静的促进派，要热中有冷，冷热结合。当前应注意以下问题：一定要坚持好字当头，质量第一；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一定要保证安全生产。

2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生产高潮和群众路线》。社论指出，一切革命事业，都是群众自求解放的事业，都要群众自觉自愿地进行斗争。我们只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提出先进的合理的指标，制订可靠的措施，就能做一个真正的，冷静的促进派。

2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县委要把造林营林放在重要日程上》。社论指出：植树造林，绿化我们的国家，这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在我们的国土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所以，必须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抓好这件事情。

2月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召开第五次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全面地总结了棉花大幅度增产的经验，并号召棉区广大干部和社员，继续鼓足革命干劲，进一步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力争1966年粮，棉双丰收。

2月16日　全国农业展览馆的农林副业馆今天正式开馆展出。参加展出的三十五个发展农林副业的典型单位证明，不论是山区、平原、丘陵、滨湖、沿海等各种地区，副业生产的潜力都是很大的，这些经验将会帮助人们大开眼界，把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同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汉召开扩大会议，特请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作报告。王进喜同志说：“大庆油田的胜利，是党的总路线的胜利，是大学解放军的结果，是全国各兄弟单位支援的结果。”“站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是最聪明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我们一定拿下这个大油田，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为全国人民争口气。”

2月18日　薄一波副总理在听了上海德新冶炼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的报告后指出，“一个小工厂在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同志领导下，搞出了这么多新产品，又创造了全国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十二万元）。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带方向性的问题：我国工业发展应该走什么道路？我国工业建设是实行大中小并举，大工业可以而且有些已经搞出大名堂，而小工业特别是小厂情况怎样呢？它们并不落后，而且不断向大企业大工厂提出挑战。德新冶炼厂就是一个代表。它不论在创造发明方面或者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都做出了它同行业的大厂所没有做到的事情。”

（2月23日《人民日报》）

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朱则民在第五次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的报告《全国棉花生产科学技术经验总结》。

3 月

3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树立长期建设草原的革命观点——二论用革命的发展观点指导牧区生产》。社论指出，牧区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的思想革命化，把革命化落脚到生产上，依靠牧民，抓好草原建设，逐步把我国四、五十亿亩草原建设好，为祖国社会主义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打下可靠的物质基础。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薛宝鼎的文章《资源综合利用是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方面》。

3月2日 新华社报道，大庆职工家属有劳动能力者，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家属在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成为革命化的劳动者，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从事集体农副业生产和服务性行业的劳动；三分之一是亦工亦农的劳动者，在农闲或油田需要时，为矿区进行维修公路，缝补劳动用品等工作，农业季节就从事农业劳动。

3月5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先进人物代表王进喜等六位同志，勉励他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虹旗，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互相学习，互相帮肋严经常交流经验，不断前进。他说，只你一个单位红了还不算，而且要帮助其它单位一样红，让他们来超过你们，你们再超过他们，在比学赶帮超运动中，做出更大的成绩。

3月9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林业会议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自力更生，坚持艰苦奋斗，坚持继续革命，充分调动五亿农民办林业的积极性。掀起林业建设高潮，加速绿化祖国。

(3月12日《人民日报》)

同日，国务院举行第一百六十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关于农业情况的报告。

3月10日 中央慰问团分成五路，到达邢台地区的地震中心地带，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慰问灾区人民，各方面发扬革命集体主义精神热情支援地震灾区。灾区人民说："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有党和毛主席，有解放军，天塌下来也不怕。""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灾害和困难。"

3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年来艰苦创业。到目前为止，已把一千万亩原始荒漠开垦成为渠道纵横、林带密布的良田，建成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大型农场和牧场，建立了一整套工业企业。整个兵团，已经成为一支以农为主，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大军。

3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介绍上海郊区十年来争取农业稳产高产斗争的经验的文章。文章说：解放前，这里水稻平均亩产不过三百至四百斤，皮棉不过二十至三十斤。1965年，农作物的平均亩产是：粮食大大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

皮棉达百斤以上，油菜籽二百四十斤。猪的饲养量平均每户三头半。副业总收入占农副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1965 年，上海郊区平均每人从集体分配的收入比 1957 年增加将近一倍。

3 月 18 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总结经验作出决定：工农兵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开始了，各级党委要大力领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积极领导政治业务的关系问题的大辩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和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县委常委以上干部下到基层去，带头抓好党员和群众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

3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一文，并发表编者按指出，陈永贵这篇关于大寨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谈话，生动地说明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光辉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方向。

4　月

4 月 1 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垦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召开，会议号召各地农垦职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政治，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彻底打破经营管理上的洋框框和旧框框，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为实现今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4 月 2 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庆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矿区》，并加编者按指出，矿区的建设遵循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它是乡村型的城市，也是城市型的乡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

4 月 3 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突出政治的会议，是一次重新系统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办工业、办企业的指示的会议，是一次用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部署工作的会议。《人民日报》为此发表《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社论。

4 月 9 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湖北省委的文件中总结的金星大队的机械化的道路，是一条突出政治的道路。这就是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自力更生，勤俭创业，发挥地方工业潜力，利用本地生产的农业机械，因地制宜实现农业机械化。有了这个经验，就可能以公社或大队为单位，分期分批实现农业机械化。

4 月 1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农不能轻牧》。社论指出，我们要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和畜牧业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同时并举的思想，坚持突出政治，纠正重农轻牧的错误思想，真正做到重农又重牧，农牧结合，不断地促进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大发展。

同日，全国农业展览馆农业机械化馆正式展出。

4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引林县人民修成了红旗渠》。文章叙述了英雄的林县人民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修成红旗渠的英雄事迹。全县的十一个公社的四十多万人民，祖祖辈辈“吃远水”的苦日子从此结束。林县的生产面貌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目前红旗渠水已经灌溉三十三万亩土地，争取要实现灌溉六十万亩。

4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食糖又获大幅度增产。比历史上产糖最高的上一个制糖期（1964—1965年）增加了将近两成，供应市场的食糖已比较充足。

4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各界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说：我国的经济建设高潮，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发展。我国的工业，不仅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在品种上、质量上、技术上都有了新的跃进。基本建设的规模、速度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几年。我国的农业，连续三年获得了好收成。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全面高涨。

5　月

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突出政治，促进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9日　我国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

5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回顾了1965年大好形势。这一年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市场更加稳定和繁荣，财政收支平衡并有节余，货币流通情况良好，市场上社会主义阵地进一步巩固扩大，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会议要求今后必须进一步搞好财贸工作。

6　月

6月2日　新华社报道，韶山灌区总干渠和北干渠竣工通水，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专程参加了通水典礼，并讲了话。

十万劳动大军只经过十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宏伟工程。两条干渠共长一百七十四公里，纵横伸展在湘乡、湘潭、宁乡三县的三角丘陵地带，可以使这三个县的七十万亩农田受益。第二期工程南干渠建成后，受益面积可以增加到一百万亩以上。动工兴建中，共完成土石方一千五百万立方，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大约八万五千立方。

6月12日　新华社报道，邢台地震区广大社员和干部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夺取了夏季好收成。

预计灾区的二百多万斤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而且地震灾害越严重的地方，增产的幅度也越大，处于震中地区的一些县，亩产量预计将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6月16日《人民日报》）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必须彻底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办法。为了彻底搞好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充分准备实行新的招生办法，决定将今年高

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

6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北京郊区的农业生产十分关怀，已决定由国务院、中共北京新市委组织工作队到各县区帮助夏收工作。

7　月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鞍钢生产形势大好。今年头五个月内比去年同期超产的钢材，可供制造五万多辆解放牌汽车，为国家积累的资金，足够建设四十多座大型高炉。

7月6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秋后动工兴修一项大规模根治海河的工程——黑龙港流域排水工程，经过四十多万民工，四个月的艰苦奋斗，已经在最近基本完成。两千多万亩耕地基本上免除涝灾，为大面积增产创造了条件。

7月8日　新华社报道，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今年上半年解决了几百个生产薄弱环节，载重卡车产量超过百分之六完成计划，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一。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今年上半年，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很多。主要产品大幅度增产，成本下降，新产品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有些产品赶上了国内外先进水平。

同日，石油工业生产建设形势大好。上半年重要石油产品全部超额完成计划，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创历史最高水平。

7月14日　今年上半年，我国纺织工业在产品产量、质量、品种和劳动生产牢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更高的记录。

8　月

8月1—12日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会在北京召开，于8月12日通过的公报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全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8月14日《人民日报》)

8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贡文声的文章《驳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

9　月

9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9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大庆油田1202和1205钻井队，只用七个月二十一天的时间，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突破了钻井六万米，把我国钻深井的技术推向了一个新水平。

这项记录，远远超过了苏联1965年公布的波良可夫斯基钻井队创造的全年钻井四万零八百一十六米的最高记录。这两个钻井队平均月钻进速度达到七千八百五十米，创造了世界钻井的最先进水平。

9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好秋收》。社论指出，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们，在秋收大忙期间，应当有计划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9月26日　《人民日报》介绍了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的英雄事迹。

9月28日　新华社报道，1962年以来，我国农业年年获得好收成，今年又获得更大更全面的丰收。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强大。

9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工农业生产呈现全面跃进新局面，工业，头八个月，生产计划超额完成。农业，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同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指标预计可以超额完成。一个新的全国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

10　月

10月6日　各中央局分别发出通知或决定，号召学习32111钻井队光辉榜样，把冲天的干劲用到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中去。

10月8日　我国制成第一批十万瓩水轮发电机组。

10月15日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10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机械工业今年获得很大发展，是新中国成立来发展最快的一年。集体经济购买的农业机械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地方农机工业产值已占农机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以上；小型农业机械品种越来越多。

10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青年工人和科技人员仅用五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没有办到的事，创造了石油发酵脱蜡世界先进技术。

10月27日　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1　月

11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必须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把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

1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十周年。毛泽东主席曾为一百零四篇文章写了按语。

11月21日　我国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

11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成了新型的化学灌浆材料甲凝和化学浆泵，使化

学灌浆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甲凝比水还稀，把它灌入混凝土或石头上比头发丝还细的裂缝，能把裂缝牢牢粘合。这种产品对维修建筑物具有重大意义。

11 月 24 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号召全国财贸职工，械革命促生产，抓紧完成全年农村产品收购任务。

12　月

12 月 2 日　新华社报道，济南制成十吨双向行驶自卸汽车。这种汽车的外型、结构、和一般汽车不同，适用于隧洞、山区、高原和铁路建设等工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产品。

12 月 8 日　新华社报道，第一汽车制造厂到 11 月 25 日已经提前三十六天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汽车产量比去年全年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三，汽车质量稳定提高，成本和原材料消耗，都比去年显著降低。

12 月 23 日　新华社报道，经过六年零九个月的艰苦工作，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2 月 26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厂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今年，我国钢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是历年最好的一年。截止 11 月底为止，矿石、生铁、钢、钢材等几种主要产品，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同去年相比，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幅度增长，质量普遍显著提高。

12 月 27 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粮食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比收成很好的去年又有较大的上升，是解放十七年最大的丰收。

2 月 28 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这次横爆炸试验成功，把我国核武器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2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任务，已经全部提前超额完成了。农业夺得了全面大丰收。工业全面增产，全国工业产值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工业基本建设任务完成得很好。交通运输方面。总货运量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商品收购量和销售额都比去年大幅度增长。我国进出口贸易情况和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也很好，财政的收入大于支出。

1967 年

1　月

1 月 5 日　新华社报道，1966 年全国原油产量比计划提前三十五天完成。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比 1965 年有大幅度增长。1966 年全国新增加的原油和炼油的生产能力，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全部生产能力还多，已经实现

的技术革新项目，也达到了两万多个。

1月29日　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国务院向全国各地发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指出：职工探亲假在文化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2　月

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第一炮》。

2月12日　中央农林各部和北京郊区群众组织向农业战线上的革命战友发出紧急建议，在抓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立即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

2月20日　《从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指出：贫下中农是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泽东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2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3　月

3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鞍钢生产出我国第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二十五米长的钢轨。

3月10日　根据国务院规定，我国的粮食年度是从头一年的4月1日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底结束。据粮食部门统计，1966年—1967年粮食年度全国粮食征购计划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五六。自然条件较差，历年多灾的北方一些省区，去年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粮食征购计划也完成得很好。

3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耕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社论指出，要团结一致，抓好春耕生产。

3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馆》。信中指出，希望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党中央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作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

党中央相信，一切厂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

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援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合作。

3月19日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真正地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相信，今年农业生产一定会搞得更好，相信你们不仅有一个好的春耕生产，有一个好的夏收，还会有一个好的秋收。

3月22日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已经紧张地动员起来投入春耕生产热潮，我们工人弟兄们更应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抓革命，促生产，支援农业，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尽最大的努力。希望你们一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严守劳动纪律，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产品质量，和一切不顾产品质量，浪费国家财产的不良现象作斗争。

4　月

4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革命统帅生产》，介绍山西军区某部协同太原第一热电厂管理工业的基本经验。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贫下中农的文章，批判“三自一包”。

4月15日　1967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这次展出的商品达二万多种，新商品有四千多种。

4月20日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夺取工业生产进一步提高，要攀登科学研究的新的高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5　月

5月4日　新华社报道，昔阳县作出决定，要求全县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保劳动人民本色。

5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节约闹革命》。社论指出，勤俭节约是无产阶级的本色，铺张浪费是资产阶级的特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节约闹革命的。

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抓紧夏收》。社论指出，贫下中农，一切劳动群众和革命干部，紧急行动起采，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集中力量打好夏收这一仗，为全年的农业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6　月

6月13日　新华社报道，首都近二十万人奔赴郊区夏收第一线。

解放军全力以赴支援夏收，保卫夏收。各部队把支援地方夏收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6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三论节约闹革命》。社论指出，我们一定要懂得，勤俭建国，节约闹革命，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大事，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事，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加强战备的大事，是支援世界革命的大事。所以，掌权后一定要事事、处处贯彻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厉行节约”的指示。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同日，还发表了毛泽东主席1958年6月的指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8 月

8月26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的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8月26日 《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社论指出，要把制止使用汽车游行，作为贯彻节约闹革命方针的一项具体措施。

8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民航事业出现崭新面貌。今年上半年，各项主要生产指标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运输总周转量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的最高纪录。

9 月

9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在北京签字。

9月20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14期社论《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9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到农业六好》。这六好是：革命好，生产好，收割好，选种好，征购好，分配好。

10 月

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成最新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10月9日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革命群众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已经可以看到，今年农业将又是一个丰收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又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包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和一次氢弹试验。在这样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大

革命运动中，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生产上付出一定代价，这是早在预计之内的。特别是在有乱子的地方，生产当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旦化乱为治，生产很快就能恢复上升。

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多快好省完成国家计划创造新成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雄心壮志和光荣任务，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

10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成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立体摄影机可以逼真地表现出实体的立体形象。它在工业、医学、新闻、文教等方面都有广泛用途。

12　月

12月9日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于1968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议定书》以及《关于阿尔巴尼亚政府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的议定书》在地拉那签订。

（12月12日《人民日报》）

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是我国农业生产解放十七年来获得最大和最全面丰收的一年。而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又获得空前未有的全面大丰收。其主要标志是：作为农业基础的粮食作物的产量，同创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去年相比，又有较大的增长。重要经济作物棉花、油料、糖料、麻类、烟叶，以及果品、蚕、牲畜等，除个别的外，也都超过或者大大超过历史上的最高年产水平。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解放军全军扩大耕地面积八十多万亩。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1966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农副业生产是一个空前的大丰收。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本溪钢铁公司职工制出我国第一台电炉液压自动装置，为冶炼高质量合金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我国电炉炼钢自动控制达到国际水平。

1968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共同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968年的工农业生产准会有更大的发展。要求各级领导都要政治挂帅，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人手，抓好革命工作，把它当作夺取全面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

1月5—13日　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汉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代表们保证全国铁路的每一个环节都能畅通无阻，为工农

业的大发展做出新贡献。

1月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轮——“东风”轮胜利诞生。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我国造船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东风”轮总长一百六十一点四米，排水量一万八千八百吨，航速每小时十七浬。它能在海上连行四十昼夜，中途不停靠任何港口，可以直达欧洲、非洲或美洲。

“东风”轮的主机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8820马力的低速增压柴油机。这台主机有三至四层楼高，约有四千多吨重，由五万多个零件组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精度要求很高的产品。

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珠穆朗玛峰多学科科学考察取得辉煌胜利。近三十个学科的一百多名科学工作者，对珠峰最高达七千多米的地区进行了全局、系统的综合科学考察，获得了一系列较完整、重要的科学资料。

2　月

2月2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座谈会要求全区贫下中农和干部，迅速掀起兴修农田水利备耕新高潮。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任立新的文章《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2月23日　洛阳轴承厂职工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套直径四米一，重量八吨的特大型轴承。

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永贵同志的文章《狠抓革命，猛促春耕，再立新功》。文章指出，要不违农时，适时下种，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为1968年农林牧副全面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日，上海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落实毛泽东主席“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掀起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群众运动。

3　月

3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北京市供电局广大章命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岗位，不断提高供电水平的事迹。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争当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3月31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深入农村，大力支援春耕生产。

4　月

4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文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两条路线斗争》。

4月11日　新华社报道，煤炭部最近在山东枣庄矿务局召开华东、华北节约闹革命，修旧利废现场会议，号召全国煤炭职工落实毛泽东主席节约闹革命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打一场勤俭节约、修阻利废的“人民战争”，迎接煤炭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4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个大规模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活动。

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八省，截止3月中下旬，已造林一千四百多万亩。北方多数地区造林活动也进入了高潮。

4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普通低合金钢生产达到新水平。这类钢的品种比1966年初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产量提高二十倍，质量良好。

5　月

5月8日　新华社报道，本溪制成高效率离心震动脱水机，把我国洗煤脱水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5月15日　毛泽东主席批准召开的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结束。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到会代表，大家决心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5月22日　北京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厂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强调要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更好地节约闹革命，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夺取革命和生产新胜利。

6　月

6月15日　首都二十万师生和干部相继奔赴京郊农业生产第一线，投入三夏劳动。

7　月

7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家经委的文章，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

7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内蒙、青海牧业生产连获丰收。

据统计，在1967和1968两个畜牧业年度里，内蒙古接育成活各类仔畜共达两千一百万头，畜牧总头数每年都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在最近两年里，内蒙古各地牧区人民公社向国家交售耕牛、役马和食用牛羊近六百万头，各种绒毛一亿多斤，各种牛羊皮一千一百五十万张。

青海1966—1967两年牧业丰收，今年又获得好收成。

7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调查员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8　月

8月11日　杭州机床厂，最近试制成功了一种具有在各先进水平的十字工作台型精密平面磨床，它填补了我国机床品种中的一个空白点，提供了机械制造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所需的关键设备。

8月21日　新华社报道，阜新发电厂两年来月月出色完成发电任务。实现了二百五十多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项目，软化水处理的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1967年和今年上半年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个厂为国家节约了三百三十多万元资金。

8月26日　北京、上海产业工人大军开进大专院校。

9　月

9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成功第一批静压（即液压）传动内燃机车，共有80马力、120马力、160马力三种。

9月10日　我国第一座黑色金属重介质选矿厂建成。

10　月

10月1日　南京长江大桥的铁路桥，胜利建成，今日正式通车。大桥是双线双层的铁路和公路两用桥，全长六千七百多米，长度为武汉长江大桥的四倍。

10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以来，大庆油田原油生产、加工、外运月月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油田建设已提前两年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

10月18日　《人民日报》刊登出席全国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部分代表笔谈摘要"'鞍钢宪法'是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指路明灯"。

同日，新华社报道，湖南耒阳插秧机厂创制成功"东风—2型"机动水稻插秧机，每小时可以插水稻二十五亩左右。经过大面积试验，性能良好，已成批生产。

10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盐业战线在去年超额完成国家原盐生产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又提前三个半月超额完成了国家原盐生产计划。到目前为止，全国原盐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百分之四十，为盐化工业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10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在青岛召开了印刷机械工业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六十多个有关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12　月

12月4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共同发表社论《坚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社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把节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常抓，反复抓。

1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水利电力部最近在石家庄召开省煤节电现场会。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设计、自行施工安装的富春江水电站提前两年建成发电。这座水电站将为上海、南京和浙江杭嘉湖平原等城乡提供强大电力。

（1969年1月6日《人民日报》）

12月27日　我国又爆炸了一颗氢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1969 年

1　月

1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最大的一座水泥厂——邯郸现代化水泥厂建成投产。

1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选集》近三年出版一亿五千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一亿四千多万册，《毛主席语录》出版七亿四千多万册。毛主席著作汇编本、单行本出版近二十亿册。《毛主席诗词》出版九千六百多万册。

1月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安装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氮肥厂——河北化肥厂第三期工程已胜利完成，正式开工生产。

2　月

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化工郎最近在济南召开了有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的化工建设现场会议，总结和推广了济南向阳石油化工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经验。到会代表一致表示，要努力使我国急需的化工产品基本上做到自给。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社论指出，到1968年底，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前又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我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南京长江大桥已经提前全面通车。石油工业提前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1968年下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半年有大幅度的增长。社论要求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3　月

3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在株洲市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切实作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为实现农业生产的新飞跃贡献力量。

3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春耕，夺取农业新丰收》。社论引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

4　月

4月1—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4月9日　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和汽车运输六厂，设计和制造成功一辆重一百五十吨的重型挂车。这辆重型平板挂车车身下装着五十六只轮胎，转弯时可以自动成为弧形。因此，车辆行驶时，载重虽大，车身虽长，还是可以转小弯子，相当灵活。

4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红旗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一万五千吨"大庆27号"巨型油轮下水。

5　月

5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它填补了我国抗菌素工业的一个空白，把我国抗菌素工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5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蔡正的文章《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文章指出，遵照毛泽东主席的一贯教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来源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积累。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我国也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发行过国内公债，这是当时国家筹集资金的一种辅助办法。从1950年到1958年，我国先后发行过六次公债，发行总额为三十八亿四千万元，加上应付利息九亿八千万元，还本付息总数共计四十八亿二千万元。已在去年年底全部还完。在我国建国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向我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总共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此项外债，我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且已经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6　月

6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发展普通低合金钢取得巨大成就。已有一百五十多个钢种，比1965年增加了近三十倍。

6月22日　由我国自行设计的两台巨型水泵试制成功。它的叶轮直径达三米，重一百吨左右，仅一个叶片就有一吨多重。每台每秒出水十六至二十四立方米，扬程三米。水泵转子叶片的角度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节，整个水泵自动控制程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我国麦类粮食作物又获丰收。今年，我国主要产麦的黄淮流域，小麦收成普遍比去年有较大幅度增长。长江流域地区也获得了丰收或较好收成。此外，东北各地还涌现出一批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典型社队。

7　月

7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洪引航的文章《毛泽东思想在金融货币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欢呼我国人民币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最稳定的货币》。

7月8日　新华社报道，河南林县人民十年艰苦奋斗，红旗渠工程已全部建成。全县水浇地已由解放前的不到一万亩，扩大到六十万亩，把“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林县，改变成“渠道绕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

7月11日　《人民日报》引用毛泽东主席关于“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的教导，介绍黑龙江明水县、河南林县依靠群众，大搞储粮建仓的工作。

7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

8　月

8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张旗鼓，除四害，讲卫生》。

8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调查报告《储粮储草，备战备荒》。

9　月

9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首都钢铁公司向武钢、包钢、太钢、重钢提出开展革命竞赛建议。

9月14日　《人民日报》报道，武钢、包钢、太钢、重钢热烈响应首钢的革命竞赛建议。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竞赛》的短评。

9月23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9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全面的大幅度的药品降价。降价以后的药品价格水平，比今年8月1日降价以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比1950年下降约百分之八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品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9月26日　我国给予越南经济援助协定在北京签字。

9月29日　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

9月30日　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觅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胜利建成。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和安装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汽轮发电机组。它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招待会的讲话中说：二十年来，"我们的祖国，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坚持独立自主、取得初步繁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0　月

10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台五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最近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胜利诞生。

10月4日　我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10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大力发展电子工业。三年来制成一千多种新产品。搞成大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填补了我国这个工业部门的许多空白。

10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套全自动长途电话设备诞生，这套设备在北京、天津之间试用，效果与市内通电话一样良好。

10月13日　新华社讯，中国农业科学院培育出白单4号玉米优良品种。经过示范性推广，普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其他玉米品种增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

10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的文章《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文章分五个部分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二、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三、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四、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五、备战备荒为人民。

10月18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发行1960年版5元券和1元券的通告》。决定从1969年10月20日起发行，这两种人民币和现行人民币在市场上同时流通使用。

11　月

11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我国农业在多年丰收基础上又获丰收。

今年，我国粮食作物，夏秋两季，都是丰收年景，全年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去年又有新的增长，部分地区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今年，棉花生产也获得了丰收。此外，蚕茧、茶叶、烤烟等经济作物，也获得了丰收。

11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2　月

1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江建农写的思想评论《论干部插队落户》。

12月12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成功地培育和推广了一批水稻、小麦、大麦、玉米、谷子优良品种，为农业生产做出新贡献。

12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浙江省粮棉产量跨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标。今年全省粮食作物平均亩产八百五十斤，皮棉亩产连续四年稳定在一百斤以上。

1970年

1　月

1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务部队，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新的巨大成绩。1969年，全军粮食总产量和生猪饲养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大部分部队做到了肉、莱自给，部分部队还做到了粮、油、盐、煤、药品和军马全部或大部分自给。

1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江虹的思想评论《认真抓好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文章指出："当前，一场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进攻的斗争，正在开展之中"。文章说，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表现得如此尖锐复杂，一小撮阶级敌人贪污国家费财，搞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煽动无政府主义，制造事故，破坏生产，施放糖衣炮弹，腐蚀革命队伍，妄图夺取企业的领导权。对此，必须狠狠打击（编者注：这场斗争后来发展为"一打三反"运运）。

2　月

2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姐文章《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文章批判了孙冶方同志的经济理论，并批判了经济管理中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问题。文章说，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就是鼓吹经济计划应以利润为基础，以利润为月的，以利润为动力，以利润为中心，是把利润当成衡量企业好坏的唯一标志。文章说，孙冶方同志的经济学是要人们追逐利润，不要革命，为了钱，丢了权。

2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安徽省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思想评论《搞好农村经

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评论说：在少数社队和城镇，某些经济部门，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还很猖狂。一些地方已经和正在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有领导有重点地进行揭发和斗争。

2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各地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特点是：规模大，进展快，质量好。目前广大革命群众冒严寒、踏冰雪，加紧挖渠修田，建造水库，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3　月

3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赵丰年的思想评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抓紧春耕生产》。评论批判了“生产到顶”和“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说：“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

3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吴正文章《粉碎束缚电子工业发展的精神枷锁》。文章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电子技术是一套“买办洋奴的理论”，是一条“爬行主义的路线”，是一面“修正主义的黑旗”。

3月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会议总结和交流了经验，讨论和研究了1970年全国棉花生产计划和各项增产措施。”

3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同群众商量，夺取农业新丰收》。社论指出不要把革命同生产对立起来，在大忙季节，要少开会，开短会，保证把劳力集中使用到春耕生产上。

3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文章《认真搞好工业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文章指出有些人利用国营工厂之间的协作关系、加工关系、供销关系等，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混水摸鱼，大搞资本主义活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必须进行批判、斗争。

3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广大农村适时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到处是一派抓革命、促春耕的朝气蓬勃的景象，春耕进度比往年快，质量比往年好。

3月22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支援春耕，热情帮助各地农村群众和干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夺取今年农业的新丰收。

3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落实到每个基层》。社论提出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来完成今年工业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

4　月

4月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毛纺织工业的生产总值、产品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毛线、呢绒的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十。

4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文章《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夺取工业生产新胜利》。文章指出，当前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就是有人借口批判“生产第一”，反对“抓革命，促生产”；借口批判“利润挂帅”，反对企业经济核算；借口批判“管、卡、压、罚”，反对合理的规章制度；借口批判“奴隶主义”，反对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纪律。我们应当摆正政治和业务、革命和生产、增产和节约的关系，加强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使革命形势大好更大好，生产发展一浪高一浪。

4月24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重一百七十三公斤，能播送《东方红》乐曲。

5　月

5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玻璃纤维工业迅速发展，已初步建成独立的玻璃纤维工业体系，产品产量质量不断提高，规格品种日益增多，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玻璃纤维工业是从1958年开始发展起来的。1969年比1968年产量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以上，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一倍左右，目前已从单一品种发展到一百多个品种。

5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冶金工人充分发挥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潮，钢、铁、钢材、铁矿石、焦炭产量比去年有较大增长，技术革新成果大批涌现，企业面貌改观，地方中小型钢铁企业蓬勃发展。

6　月

6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化肥工业最近几年发展很快，各地新建扩建了大批大、中、小型化肥厂。大厂出现崭新面貌，“小化肥”在全国遍地开花，目前小氮肥厂产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已经由1965年的百分之十二，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三。

6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齐永红的思想评论《工业必须大力支援农业——驳“支农吃亏”论》。评论说，现在有些同志对工业支援农业缺乏足够的认识，错误地认为搞支农产品“价格贱、利润低”，产品“简单粗糙”，技术上没有奔头。一句话就是“支农吃亏”。评论指出，这是把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变成了“我吃亏你占便宜”的买卖关系，是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相容的。

6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夏粮作物获得丰收。除个别地区，全国夏粮收成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产麦区河南、河北、陕西、江苏等省，在去年夏粮作物获得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获得了更大的丰收。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上海、天津等省市，夏粮总产量分别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北京郊区夏粮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也超过夏季丰收的1969年。云南、贵州、四川，改变了过去去不重视小麦作物的旧习惯，积极扩大播种面积，使今年夏粮总产量增加两成以上。去年今春遭受长期干旱

的山东、山西，安徽等省，经过广大社员的艰苦奋战，夏粮作物也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今年各地都涌现了一批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先进典型单位，涌现了许多大面积丰产地区。

7　月

7 月 17 日　新华社报道，去冬今春以来，我国农村兴建的中小型水电站装机总容量相当于过去近二十年农村兴建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的两倍。

8　月

8 月 14 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色织染纱四厂广大工人创造成功中国式棉纱“一步法”染色机，攀登上世界染纱技术的高峰。

8 月 23 日—9 月 6 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1970 年 9 月 10 日《人民日报》，《中国百科年鉴（1980）》）

8 月 24 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家建委写作小组文章《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文章指出，大中小并举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的必由之路’只有大中小并举才能迅速实现工业合理布局，大中小并举有利于促进工业技术的不断革新。

8 月 26 日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大寨公社尽大寨》。文章讲大寨公社除了大寨大队以外，还有二十个生产大队。1969 年，二十个大队中，有一个队粮食亩产达到九百斤，四个队达到八百斤以上，过了“长江”，三个队达到七百斤以上，八个队达到六百斤以上，最低的四个队也达到五百斤，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早稻又获丰收。今年早稻增产的特点是：大面积平衡增产；一些著名粮食高产区持续高产；不少产量较低地区也获大幅度增产。”

9　月

9 月 15 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以来，全国煤炭工业许多老矿井不断增产，新矿井快马加鞭，促使煤炭生产高产稳产。1 至 8 月，原煤产量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四，成本比过去降低百分之七。

9 月 18 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以来，全国主要轻工业产品的生产连续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为城乡人民提供了数量和品种越来越多的生活日用品。1 到 8 月，棉纱、棉布，针织品，化学纤维等纺织品，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中棉布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九；食糖、卷烟，原煤、机制纸、缝纫机、自行车、手、洗衣粉、灯泡等日用品，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五十五。许多轻工业品质量更加提高了。花色品种更加增多了，原材料消耗进一步降低。

9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城乡市场商品丰富，购销两旺，物价稳定。全国从大中小城市到广大农村，市场供应情况越来越好。百货公司或商店棉布、衣服、针织品、毛巾、袜子、热水瓶，搪瓷制品等日用工业品应有尽有；各种合成纤维织品、合成塑料制品和合成洗涤剂比过去显著增加；农用化肥、农药、铁木农具不误农时地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人民生活的肉类、鲜蛋、蔬菜、水果等副食品的供应量都有增加。

9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渔业生产又获丰收。今年上半年鱼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三。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蚕茧生产又获丰收。1969年我国蚕茧产量达到了解放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又超过了去年。

9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社论指出，昔阳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短短三年时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平均亩产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社论说："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一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9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量提前两年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今年1到8月全国原油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以上。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林区生产今年1至8月已完成全年生产木材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二，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三。

9月27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是我国历史上农机发展最快的一年。在头三个月里，拖拉机产量比1966年全年总产量增长三倍，粮油加工机械和饲料粉碎机等也都成倍或几倍的增长。

10　月

10月1日　周恩来总理在庆祝国庆二十一周年的招待会上致祝酒词中号召"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为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基础而努力奋斗！"

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庆祝国庆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社论指出，过去的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广泛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社论提出，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要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新胜利，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10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商业部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方向》。文章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商业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国内市场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社会主义商业是为了工农兵服务的新型商业；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商业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

10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铁路运输系统在保证超额完成国家运输任务的同时，努力降低机车煤耗，今年头九个月为国家节省了一百二十多万吨煤。

12 月

12 月 18 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广大电业工人，通过技术革新大大提高原有设备的发电能力。到目前为止，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今年电力工业新增加的装机容量，投资仅占建设同样发电能力的新厂的三十四分之一，所用钢材、铜材只占新建厂的四十分之一。

12 月 24 日 新华社报道，近两年来，各省、市、自治区、地、县、公社都自力更生地办起了不少中小型工厂。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煤矿、小机械厂、小水泥厂、小水电站、小化工厂等，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

12 月 28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江南各省在很多地区新探明的煤田储量，分别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一到四倍。江南各省建设的矿井规模比 1965 年增长了八倍多。

12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在连续八年丰收基础上又获得全面丰收，粮食的单产和总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今年我国农业丰收的特点是：不论南方、北方或平原、山区，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出现大面积增产的形势。粮食产量连续几年超过《纲要》的上海、北京、浙江，今年又获得了新的丰收；广东全省的粮食产量今年第一次超过《纲要》；天津郊区跨过了“黄河”，长期依靠国家供应部分粮食的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已经实现了粮食自给或自给有余；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的辽宁省，粮食自给程度有所提高。农、林、牧、副、渔各业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的产量，今年都有较大增长；北方主要产棉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北京等省市，棉花产量比去年增长两成以上；南方主要产棉区战胜阴雨灾害，也获得丰收。油、糖、烟、茶、果、蛋等，今年样样增产，渔业也获得了丰收。

1971 年

1 月

1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社论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农业连续九年获得丰收，工业出现新的高涨，社论强调，在新的一年里，要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作为干部学习的重要课题，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的前进。

1 月 2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轻工机械工业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现在纺织厂、制糖厂、造纸厂、塑料厂等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都能成套生产供应。由于轻

工机械工业的发展，1970 年全国生产的主要轻工机器，比 1969 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

1 月 8 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纺织工业提前完成了棉纱、棉布、毛纺织品、针织品、丝绸等主要产品的全年国家生产计划，各种纺织品的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

1 月 7 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大力加强矿山建设。1970 年全国铁矿石的总产量比 1969 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选矿、烧绪和矿山运输的能力也有了相应的提高，这对多快好省地发展钢铁工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 月 14 日　新华社报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农副业生产获更大发展，1970 年全军粮食总产量比 1969 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多。全军约有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粮食亩产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2　月

2 月 8 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家计委写作小组的文章《深入开展工业战线的增产节约运动》。文章指出，今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条战线都需要更多的原料、材料，燃料和设备，要适应这种形势，就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2 月 11 日　《人民日报》发表蔡正的文章《树立财政工作要为发展生产服务的思想》。文章指出，我国财政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为发展生产服务，那种认为财政、银行的工作就是“收支存放，点钱记帐是‘正业’，促生产是‘副业’的观点是单纯财政的错误观点。”

2 月 14 日　《人民日报》发表地质局写作小组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多快好省办地质的道路》。文章指出，发挥两个积极性，加强党对地质工作的一元化领导；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一支革命化的地质队伍；坚持群众路线，发动群众找矿；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指导找矿、探矿；实行综合找矿，综合评价，大、中、小矿一起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走自己武装自己的道路。

2 月 18 日　《人民日报》发表沈纪文章《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文章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是农业发展的纲。但是，如果只抓粮食，搞单一经济，不抓多种经营，不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既不利于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也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

3　月

3 月 3 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4　月

4 月 13 日　《人民日报》发表农林部写作小组文章《沿着农业学大寨的光辉道路

乘胜前进》。文章指出，“农业学大寨”是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方向和道路，是长期的政治任务。现在还仅仅是开始，更伟大的斗争和胜利还在后头。开展“农业学大察”运动，要在建设革命化领导班子上狠下功夫；狠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正确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5　月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一定把淮河治好”的伟大号召，豫皖苏鲁等省淮河流域广大人民，经过二十年的治理，陆续建成一批中小型和大型水库工程，兴建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河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人海出路。各地还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兴建了一批水利排灌工程。这些工程的建成，使淮河流域抗御洪、涝、旱、灾能力大大增强，灌溉面积迅速扩大。使多灾低产的淮河流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5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冶金工业部写作小组文章《在毛泽尔思想指引下发展我国钢铁工业》。文章指出，发展工业“以钢为纲”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客观规律；坚持两条腿走路，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多搞中小；积极开发矿业，建立坚实可靠的原料基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6　月

6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伊继平的文章《机械工业要为开发矿业服务》。文章指出，没有矿石就没有钢铁，没有钢铁也就没有机械。要把矿挖掘出来，并把它加工成钢铁和其它金属材料，就需要大量现代化的采掘、洗选、烧结和冶炼、轧制等矿山冶金机械。因此，机械工业必须要为开发矿业服务，大力发展矿山机械。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业学大庆》。社论指出，大庆是毛泽东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大庆油田会战，是在1960年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迎着帝修反的反华恶浪，打上去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建起了我国第一流的大油田，甩掉了西方资产阶级加在我们头上的“贫油国家”的帽子。

6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铁矿石产量在1970年比1969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的基础上，今年头五个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选矿，烧结的生产能力，以及辅助原料和有色金属矿的生产水平，都相应地迅速提高。

6月27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1至5月，全国原煤生产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重点煤矿平均日产水平超过去年同期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三；矿井建设进度很快，掘进总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地质勘探超额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任务；坑木消耗也降低列国家规定的指标以下。

6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广大农村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认真

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下，今年夏熟作物又获得丰收。目前，全国夏收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不论南方、北方，今年小麦、油菜、蚕豆、豌豆，比去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山东、江苏、四川、云南、江西、北京、上海、浙江、贵州、广东等省、市，夏收作物的产量，都比去年增产一成左右；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湖北、天津等省、市，同干旱、病虫害作斗争，也夺得了好收成；许多地区油菜籽大幅度上升，其中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省，油菜籽产量都比去年增长二成以上。目前各地正在踊跃向国家交公粮、卖余粮，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8　月

8 月 2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社论指出，全国务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相继隆重地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9　月

9 月 13 日　林彪及其一些死党在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驾机叛国私逃，林彪、叶群、林立果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林彪反革命集团于 1971 年 3 月制定《“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9 月 8 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改变。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清查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1973 年 9 月 1 日、1981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中国百科年鉴（1980)》）

9 月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特别是在落实干部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方面，收到一定效果。在经济工作方面，强调按劳分配，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在农业中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在工业中要求重视产品质量，重视发挥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还强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要求大家为革命事业学文化和技术等。

（1981 年 7 月 17 日《人民日报》）

9 月 14—30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国民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在头八个月中，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全国钢、生铁、铁矿石产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六、百分之二十二、百分之三十一点四，焦炭和钢材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七、百分之十九点一。我国有些轻工业原来比较薄弱的省区，积极发展轻工业，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在农业方面，又夺得了早稻丰收。今年早稻生产的特点是：总产量省省超过历史水平，而且大面积均衡增产。棉花和其他秋收作物长势良好，各种经济作物普遍获得丰

收，茶叶上半年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畜牧业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生猪存栏数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五；我国邮政事业，农村有线广播事业也都蓬勃发展；全国城镇储蓄普遍大幅度增长。1至8月全国储蓄余额比去年初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二，同历年同期比较，今年增长幅度最大，而且月月上升。

10　月

10月5月　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战线取得丰收成果。今年1至8月，原油产量和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和百分之三十三点七，并且在有些地区又找到了新油田。

10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各地商业部门在支援工农业生产中做出新贡献。今年上半年，全国商业部门供应农村的化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一，化学农药增长百分之五点六，农业机械用油和各种农业机具、小农具，农机配件等的供应量都有增长，在支援工业生产方面也取得了新成绩。

10月25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祛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0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加快，1970年同1965年相比，全国拖拉机拥有量增长了一倍，排灌机械、收割机、脱粒机以及其它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增长的幅度也很大，现在全国主要农机产品的品种已达一千多种。

11　月

11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轻工业部写作小组的文章《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轻工业》。文章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0年，各种主要轻工业产品都有几倍、几十倍增长，花色品种不断增加。质量显著提高。我们还从无到有发展了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增加了许多原采缺门的产品。在沿海，特别是在内地，建设了一批轻工业企业，改变了原来不合理的生产布局。由于轻工业发展，逐步改善了我国人民生活，繁荣了市场，扩大了对外贸易，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资金。发展轻工业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展农业原料和发展工业原料同时并举，提高省或协作区轻工业品的自给水平。

11月18日　我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建成一千八百多个小水泥厂，分布在全国百分之六十的县；产量将占全国总产量百分之四十多，水泥的质量一般总定在400号以上。

12　月

12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社论强调要加强党的观念，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要加强党的团结，光明正大和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12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今年取得很大成绩。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的1971年水利建设年度中，全国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共完成土石方工程五十多亿立方米，增加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达三千多万亩，这是近十年来增加最多的一年。

1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公路建设取得很大成绩，1970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解放前增加了七点五倍，民用汽车增长了九倍。今年1至10月，新铺沥青，渣油路面的公路里程，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五，汽车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

12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机械工业战线欣欣向荣。今年全国机械工业生产总值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八，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不少农业机械和矿山机械的产量都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机械工业基本建设进度比较快，有不少新建和扩建工程投入了生产。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建筑材料工业有很大发展。1至11月我国水泥、平板玻璃、玻璃纤维的产量分别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二十二、百分之十二、百分之二十，砖、瓦、水泥制品、建筑陶瓷等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原料、燃料的消耗和产品的成本进一步下降，产品品种有所增加，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在综合利用方面，建筑工业部门也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同日，新华社报道，广大农村因地制宜治理盐碱地，我国盐碱地主要分布在淮河北部地区、华北平原、东北西部平原以以西北内陆平原和盆地。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分布在盛产粮棉的黄河、淮河、海河流域。解放后，这些地区的人民把治理盐碱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这些地区的面貌得到了改变。据盐碱地较严重的河北，山东，安徽等省的统计，目前已有一半左右的盐碱地得到了改造，有的省的次生盐碱地已全部得到治理。许多过去是白茫茫的不毛之地，如今粮棉连年获得丰收。

12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目前，一个普及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以及普及农民业余文化学习的活动，正在我国农村广泛开展。1971年我国中，小学在校学生的总人数，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煤炭生产提前完成今年计划。今年全国煤炭产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生产成本比去年有所降低，坑木消耗也降低到国家规定的指标之下，同时还建立了一批新矿井，为明年提供了新的生产能力。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钢铁工业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超额完成年计划。全国今年钢产量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八，钢材和生铁产量分别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三。质量也有所提高，钢材品种有所增加，国家建设急需的板材和管材有较大增长。由于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全国各地钢铁“小土群”得到迅速发展。今年中小钢铁企业的生产水平大幅度上升，铁矿石，生铁和钢产量都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

12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获得第十个丰收年。今伞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千九百二十忙斤，比丰收的1970年又有增长。棉花、油料、糖料、茶叶、烟叶和蚕茧等经济作物，也获得好收成；全国各地的生猪饲养量普遍比去年增加；植树造林面积比去年扩大；渔业生产获得了丰收。

1972年

1972年前后，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批准，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成套设备和装置。其中，有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四川维尼纶厂、辽阳化纤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唐山陡河电厂、内蒙元宝山电厂、天津大港电厂、北京化工二厂、四川化工厂、泸州化肥厂、大庆卧里屯化肥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第二化肥厂以及其他一些大型化肥厂等，并于1973年盾陆续动工建设。这些引进项目，有不少是建设得成功的，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社论指出，1971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战斗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农业连续十年丰收，粮食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工业生产持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钢产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八，达到二千一百万吨，标志着整个工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并且强调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

1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商业战线进一步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扩大商品流通，整个商业战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71年全国商品收购总额超过了1970年的水平。商业战线形势大好的标志是：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自觉执行党的政策；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整顿商业队伍，改革管理体制，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1月6日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政协全国

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在北京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主席参加，周恩来总理致悼词。

（1月11日《人民日报》）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工业战线取得革命生产新胜利。去年全国原油和天然气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量比1970年分别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五。石油勘探获得了新成果，石油基本建设进展很快。

1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力工业战线深入开展学大庆运动。1971年全国发电量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国家计划，比1970年增长百分之十八。发电量增长的绝对数超过了历年的最高水平。

同日，新华社消息，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1月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基本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1971年全国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总额比1970年有较大增长。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械、化工、轻工、纺织、交通运输和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进度都比较快，工程质量也较好，数以百计的重点基本建设项目，陆续建成投入生产或交付使用，使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快的增长，工业布局进一步得到改善。

1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工交财贸企业和其它企业、事业单位，在1971年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清仓查库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全国去年清查出的各种多余积压物资的价值，比1970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共清查出钢材六十六万吨、有色金属五万吨、机床和电机十四万台、轴承二百八十七万套。各地清出的多余积压物资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生产和建设。

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广大指战员，认真落实“五·七”指示；发展农副业生产。据初步统计，去年粮食产量和生猪存栏数，分别比1970年增产近一成和百分之十以上，许多部队继续做到肉食，蔬菜自给。

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工交战线节约原材料取得显著成绩。1971年工交企业共节约钢材近一百万吨，有色金属六万吨，煤炭一千五百万吨，石油七十万吨，主要化工材料近五十万吨，木材三百五十万立方米，节约电力相当于七十万赶发电机组一年的发电量。

2　月

2月21日—2月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中美双方2月27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指出：“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公报还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自力更生发展中小型工业。1971年，全国各地中小型钢铁企业的铁矿石、生铁和钢的产量都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小化肥、小

水泥厂生产的化肥和水泥，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四十。小机械厂生产的耕作机械、排灌机械和农副业产品加工机械等，也都有大幅度增长。

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五个大牧区草原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4　月

4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华庆源的文章《一定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文章批评了有的部门和企业只把完成产量看成是完成了国家计划，把产品质量看成是无关大局，因此，他们只追求产品数量，不问实际效果，对一些保证产品质量的规章制度执行不严，甚至随意废除，致使某些产品质量不稳定，个别产品质量甚至下降。

4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路阳的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文章说，政治与业务、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是对立的统一。在这些矛盾中，主要矛盾方面是政治，它决定着经济、业务、技术发展的路线和方向。

4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指出，这篇社论是经周恩来同志审阅并根据他的意见修改过的，是为落实干部政策而写的。）

5　月

5月13日　新华社报道，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我国收音机的生产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起来。解放初期，我国只能生产少量的元件，电子管还是在试制阶段。到“一五”时期，收音机生产所需的元件、器件已经完全立足于国内，产量逐年上升，最近六年来我国电子工业进一步发展，1971年收音机年产量就相当于1965年的四倍，今年第一季度收音机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十八，与此同时，收音机的销售价格也逐年有所降低。

5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积极开展群众性选育、推广农作物良种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良好成绩。据统计，去年，南方水稻良种面积已占水稻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杂交高粱约占高粱播种面积的五分之一；杂交玉米约占玉米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已在全国普遍推广。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取得显著成就。仅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近年来就新建机井四十多万眼，利用机井灌溉的农田面积已占总面积的一半，使这个全国有名的缺粮地区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

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宫效闻的文章《以路线为纲，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文章指出，要有必要的规章制度；制度要有利于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执行制度也要靠说服教育。

6　月

6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许多地区积极发展化学药剂除草，防除农田草害，取得良好成绩。优良除草剂——“除草醚”等已在十多个省大量生产，利用工业副产品生产出来的一些除草剂，如“杂草安”、“敌稗”、“青燕灵”等，正在推广使用。

7　月

7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又夺得夏粮丰收。全国夏粮总产量比解放以来产量最高的去年有所增加。今年各地还出现了一批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先进典型，出现了大面积的丰产地区。

8　月

8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安群的文章《把路线教育和搞好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文章指出，当前，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正在各条战线深入开展，工交战线上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把路线教育和搞好企业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8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茶区广大社员加强茶园基本建设，在改造老茶园的同时，因地制宜开辟新茶园。据统计，全国新开的茶园面积相当于原有茶园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这些新茶园经过几年的培育，有许多已陆续采摘，使我国茶叶产量大幅度上升。1971年，全国茶叶总产量比1965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六，收购量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七。今年春茶又喜丰收，到6月底止，收购置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四。

8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早稻获得丰收。不少地区还出现了一批早稻平均亩产八百斤以上的县、公社、大队。

9　月

9月10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以来，全国已有四十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工作已取得巨大成绩。现在，黄河下游两岸已建成引黄涵闸六十多座，虹吸（抽水灌溉）工程八十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百多万亩。1971年，黄河流域的粮、棉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和百分之一百三十七。

9月25—29日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与田中总理就中日

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会谈，并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工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在连续八年稳产高产后，今年的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又有增长，油田面积进一步扩大。自从1963年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以来，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的速度向前发展，今年1至8月，原油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天然气的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油田建设也取得了新成绩。今年头八个月钻井进尺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七十。

10　月

10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回顾一年来，我国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的伟大成就。社论强调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学好业务、文化和技术。

10月6日　《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指使其上海党羽派人秘密调查“出笼”背景，打听周培源文章是不是周恩来同志要他写的。张春桥给上海下达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随后报纸上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197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10月10日　新华社报道，辽宁、吉林两省解放后大规模地治理辽河，取得重大成就。辽河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二百二十座，修筑堤防四千五百公里。全辽河流域共有电力排灌站九百二十处，可灌溉农田一千一百多万亩。

10月14日　《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同志讲话精神（编者注：在批判林彪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在8、9月两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实际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的文章。文章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大为恼火，攻击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毛泽东同志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把周恩来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随后，《人民日报》内部还开展了批“右倾回潮”的运动，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这样就使党内“左”倾错误不但得不到纠正，而且继续发展了。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狩猎生产获得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收购野生动物皮张，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五。青海等四省，去冬以来收购的野禽、野味，分别比上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八和百分之二百八十二。

10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群众科学实验取得新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农、林、牧、副、渔等方面涌现出来比较重大的科技新成果达三百多项。

10月19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化肥生产稳定上升，成本降低。今年1至9月，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产品质量稳定，原材料、燃料和电力消耗比去年同期下降，成本降低。今年前九个月，又有上百个小型化肥厂和一批大中型化肥厂投入生产，进一步扩大了氮肥和磷肥的生产能力。

10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职工深入批修整风，加强企业管理和运输组织工作，超额完成今年前九个月货运任务。今年1至9月，全国铁路的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九。

11　月

11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小水泥工业有很大发展。全国有百分之七十的县有小水泥厂，厂子总数已由去年的一千八百多个增加到二千四百多个，生产的水泥占全国水泥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八。到11月上旬，小水泥工业已经完成今年全年的生产计划。

11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公路黑色路面提前两个月超额百分之十完成了铺筑任务，今年前十个月比1971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比1965年的总和还多一倍。质量比过去有显著提高。

12　月

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辆载重量三百吨的大平板车，由上海试制成功，交给上海汽车运输六场使用。

12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纺织工业胜利完成今年生产计划。今年我国纺织工业的主要产品棉纱、棉布、麻袋、印染布、帘子布、针棉织品、呢龙、毛线、丝、绸等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产品质量有显著提高，花色品种大大增加。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广大机械工业产品质量有了提高。据十七个省、市、自治区部分机械企业的统计，今年第三季度产品合格率比第二季度提高了百分之八，零件合格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十四。主要机械产品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发电设备、拖拉机和汽车等产品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全国粮食总产量可达四千八百亿斤，相当于丰收的1970年的水平。油菜籽、麻类、蚕茧、茶叶、糖料、烟叶、水果产量分别比去年增长一到四成。全国各地生猪的饲养量普遍比去年增加，植树造林面积比去年扩大，渔业生产也获得丰收。

1973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1972年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农业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好收成，工业生产上升，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提出在新的一年里，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是整风。献词不点名地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献词要求全党认真读书，弄通马克思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那些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

1月2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的钢铁产量达到二千三百万吨，比1971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钢材和生铁分别增长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二。

1月4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国家木材生产计划提前完成，产量比1971年增长百分之八。

1月7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全国铁路货物运输量比1971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二；沿海、长江干线和远洋运输的货物运输量增长百分之七点一；汽车货物运输量增长百分之三点四，沿海和长江港口吞吐量增长百分之八点二。

1月30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全国主要报纸的发行量比1971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五；邮寄信函和包裹分别增长百分之十点一和百分之十二点五；汇兑业务增加百分之十四点二。

2　月

2月4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我国城镇人民的储蓄存款比1971华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九，是最近几年存款增加最多的一年。

2月6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我国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内燃机、水泵、打井机等主要农机产品的产量比1971年都有增长，其中拖拉机增长百分之十，内燃机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全国已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

2月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总结和交流了棉花增产的经验，号召各产棉区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努力完成今年全国棉花生产和收购任务。会议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全体代表，表扬了粮、棉双高产，贡献大的先进地区和单位。

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力基本建设1972年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去年12月

底止，全国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力、火力发电站，新安装投产的发电设备容量比1971年投产容量增长百分之五十三，是解放以来装机最多的一年。

3　月

3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机械工业部努力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到1972年，全国组合机床的产量超过了1966年前十年总和的两倍。

3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江虹的文章《认真总结经验，加速农业发展》。文章引用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的指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4　月

4月10日　1966年，上海维纶毛纺厂响应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搬到了西藏高原。于1967年元旦，在拉萨展出了西藏第一次自产的呢绒、毛毯、氆氇等二十多种产品。1970年，第一次生产出高原牌的彩色毛线。

4月15日　新华社报道，1973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目前同我们发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有一百四十多个。

5　月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加强支援农业的工作，据统计今年1—4月和去年同期相比，农业机械、农机配件、化肥、农药等产品，都有大幅度增长，其中拖拉机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内燃机增长百分之四十，化肥和农药也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和百分之八点九。

6　月

6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为了在越南停战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1974年中国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军事援助的协定》。

6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林区广大社员积极采收松脂，使松香生产近几年采有了迅速发展。1972年全国松香产量比1965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比历史最高年产量的1971年增长百分之二十，松节油的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6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商业和工业部门广大职工，积极开展棉布、棉纱的节约、代用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72年全国共节约棉布七千一百万

米，棉纱一万二千多件。

6月28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一次氢弹试验。

7　月

7月4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在工业支援农业方面不断作出新贡献。1972年与1965年相比，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品种增加，质量提高，成本也逐年下降。其中，丰收36型拖拉机增长十倍，每台由7马力提高到11马力。化肥增长了一倍半，各种农药增长百分之六十以上，还试制成功多种高效低毒新农药。

8　月

8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同严重干旱和雨涝等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夺得了今年夏粮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相等于大丰收的1972年水平，是解放以来第二个大丰收年。今年平均亩产达三百五十斤。

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水田农业机械化获得新进展。南方水稻主要产区江苏、上海、浙江、贵州等省、市、自治区，在水田翻耕、整地、植物保护、排灌和水稻脱粒等方面，已大面积推广、使用相应的农业机械。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收音机，电视机生产发展迅速。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收音机产量增长百分之八十三，品种和型号从去年初的一百八十多个发展到二百六十多个。电视机产量增长百分之八十八。

8月20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布托总理，对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等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同日，中国红十字会致电巴基斯坦救灾委员会，决定捐赠现款人民币一百万元和价值人民币一百万元的物资。

8月24—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迅速发展。电子工业已经成为我囱国民经济中一个新兴的比较完整的工业部门。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子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同期增长两倍，电子元件、器件的生产能力增长了十倍。大部分电子设备采用了半导体器件。

8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已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有关单位共同设计试制成功。半年多来经过三千多小时的试算运转证明，性能稳定，质量良好，主机的解题能力，外部设备和管理，语言编译，符号汇编三套主要指标，均已达到设计要求。

9　月

9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用的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经

过将近两年的观测使用证明，它的性能良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9月19日《人民日报》）

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近几年来我国养蜂业有较大的发展。目前，全国蜂群总数比1965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1972年全国收购的蜂蜜比1965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各种石油产品的产量节节上升。8月份的原油平均日产水平比去年12月份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上半年全国钻井进尺和建成投产的油井生产能力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全国各炼油厂从1—7月共节约燃油十三万吨。

9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机械工业目前已能为农业、基础工业和其他部门提供成套装备。全国二千一百多个县，除西藏、新疆的少数县外，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县都有了农机修造厂。

9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上半年，列人国家计划的十三种主要化工产品，有十二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同1965年上半年相比，化肥产量增长了一点九倍，农药增长了一点五倍，医药增长了一点八倍，其他如硫酸、浓硝酸、烧碱、纯碱、电石等基本化工原料也分别增长了一倍到几倍。

9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水利电力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带电作业现场会。共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名电工，在这次会上表演了四十八项带电作业项目。

9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化肥工业出现了发展的新局面。去年，全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

同日，新华社报道，遍布全国各地的八百多个小氮肥厂，已经有三百五十多个完成了为解决原料问题所进行的技术改造，能因地制宜，有什么煤，就用什么煤生产氮肥。现在，各地小氮肥厂生产的合成氨已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

10　月

10月3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1—8月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的产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三，百分之十八点六和百分之十二。

1972年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的产量，比1965年已经分别增长了一点四倍、一点一倍和四点八倍。

10月4日、我国农药工业1972年与1965年相比，产量增长一亿多，其中高效、低毒、低残毒农药增长近五倍。

10月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邮电事业欣欣向荣，以1972年与1965年相比。办理电报、电话、函件、包裹和全国主要报刊的期发数等邮电业务量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五至两倍以上，长途明线、干线电缆总长度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和一倍，全国邮路总长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长途电话载波终端机和载波电报机总数分别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和一倍半，市内自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农村电话载波终端机增长了近三倍，邮运汽车增加了一倍，用于邮递的摩托车数增加了十倍。

10月15日　新华社报道，1973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目前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和我国发展贸易往来。

10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地质工作者最近两年里在西藏发现了铁、煤、铜、铝、锌、云母、盐、砷、玛瑙等几十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不少矿产已探明了一定的储量。今年铜矿的勘探工作已超额一倍半，煤的勘探超额一倍完成了计划任务。

11　月

11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有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建成投产，新建成的小型水电站有五万多座，遍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

11月8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队在海拔三千八百米高寒地区大面积种植冬小麦获得丰收。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据统计，西藏全区去年种了十四万克（一克相当一亩）冬小麦，平均单产超过四百斤，并出现了不少跨“黄河”，过“长江”以及单产千斤的高产田。

1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冀鲁京津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团结协作，奋战十年，取得了巨大胜利。十年来，海河流域的人民群众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对洪、涝、旱、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共修筑防洪大堤四千三百多公里，开挖、疏浚支流河道二百七十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使海河的排洪入海能力比解放前提高了十倍多。同时还扩建新建了一批水库，挖了一批机井，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12　月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国内已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八十多条民用航空线，连结着全国七十多个城市。国内航线里程比解放初增加近五倍，旅客和货运量分别增长四十五倍和三十倍。在国际民航方面，我国已经同一百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占全国水泥总产量一半的小水泥工业，已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县都有了小水泥厂。

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我国对外贸易有较大的发展，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个。其中有五十多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定或贸易议定书。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轻工业生产继续以较高速度全面发展。今年1—11月，全国轻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八以上。

12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棉花生产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两成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2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正加速建设海港。1972年同1965年相比，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多的增加近一倍

1974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献词》。社论指出，1973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2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十二午丰收。社论号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4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1月6日　新华社报道，1973年我国工业生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支援农业的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八种主要产品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二十三以上。

据统计，1973年头十一个月与1972年同期比较，增长速度超额百分之二十三的产品有：化肥、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内燃机、联合收割机、水泵、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手推胶轮车，其中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手推胶轮车、手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分别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三以上。农药的增长速度也在百分之十三以上。1973年工业部门提供给农业的化肥、钢材、水泥、电力、手扶拖拉机和手推胶轮车都是近几年来最多的一年。

1月23日　新华社报道，1973年我国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又有较大幅度增长，城镇储蓄比1972年底增加百分之十点五，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存款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

1月27日　“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不批林，假批孔，疯狂地大搞批“周公”，批“现代大儒”，在军队里大搞“放火烧荒”，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其他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红旗》杂志1977年第九期）

2　月

2月3日　新华社报道，1973年，全国回收的废钢铁有一千一百多万吨；回收的杂钢制成电线，可架设三十六万公里高压输电线路；回收的废润滑油，相当子四十万辆解放牌汽车一年的用油量；全国商业部门回收的废旧物资，总值达九亿六千万元，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七。

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3252钻井队去年创造年钻井进尺十五万零一百零五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记录，相等于旧中田四十二年钻井进尺总和的两倍多。

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现在已完成水库、

塘坝、渠道、涵闸、水井、排灌站等各种水利工程六十多万处，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两千万亩。各地都建成了一批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提供了条件。

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气象事业获得较大发展，现在，监视天气变化的全国气象网进一步巩固、壮大、观测天气的能力和预报天气的水平都有提高，在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2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胜利建成，这个工程是为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江而兴建的，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是解放以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

3 月

3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西南交通干线成昆铁路胜利建成。这条铁路自1970竿7月1日正式通车以来，线路质量良好。

3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电力工业部门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在河北省怀来县自行设计建成一座试验性的地热发电站。

4 月

4月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艘两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在上海胜利建成。

4月15日 1974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市开幕。这届交易会是从1957年举办以来的第三十五届交易会，规模比过去历届交易会都大。

4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试制成功，已于去年11月正式投入临床使用。经有关部门鉴定，认为这台加速器达到了设计标准，决定正式投产。

5 月

5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工人又在华北东部滨海地区建起了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自1967年到1973年，这个油田年年提前完成国家计划，原油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十九点九。

5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水稻插秧机的研制，推广使用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到1973年，各地已经推广使用插秧机二十七万七千多台，同1966年相比，增长了八倍多。

6　月

6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中药材生产同1965年相比。1973年中药材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七十五，国家收购量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二，供应量增加百分之九十三。

同日，新华社报道，我国淡水鱼总产量比1972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一。其中广西、湖南、四川、黑龙江、吉林、贵州等省、自治区增长百分之二十。

7　月

7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洛阳拖拉机厂今年上半年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生产的拖拉机占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点二，比1965年全年拖拉机产量还多两千多台。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冬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目前，已有八十多个丰产性能好、抗锈病、抗倒伏的小麦良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小麦良种播种面积已占全国小麦播种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8　月

8月9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无线电十五厂试制成功一批伞式太阳灶，对广泛利用太阳能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一定意义。

9　月

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五万吨级码头最近在湛江港建成并交付使用。这个码头是专供装卸石油用的。

9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并发挥显著效益，青铜峡水利枢纽是一个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防洪、防凌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9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煤气公司职工建成我国第一座水槽双壁沉井螺旋式升降的大型煤气储气柜，容量为十五万立方米。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座储气柜。

9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工人在渤海湾地区建起了又一个大油田——胜利油田。

10　月

10月3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制造成功了我国最大的竖井钻机，为矿山建设作出了新贡献。钻头的最大直径为七点四米，采用可控硅自动控制，液压装置等新技术。

10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西藏进行了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前，全自治区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建立了人民公社。

10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盐业生产到今年9月上旬已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原盐生产计划，产量比去年同期增产百分之四十点四，质量也有提高。

10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地方小煤矿去年的产煤量，比1965年增长两倍多，占这年全国煤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八。

11　月

11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万吨级远洋货轮“凤庆”号，出厂后首次远航地中海，历时一百五十天，航程三万二千浬。

11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西藏全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增了产。继1973年五个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跨人了这个先进行列。全区三十二万克（一克相等子一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达到四百斤以上。据统计，西藏今年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1973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同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相比，增长了近一倍半。

11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信用合作事业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基本上每个农村人民公社都有信用合作社，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建立了信用服务站，一个社会主义的农村金融网已在各地初步形成。

12　月

12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赵丰年的文章《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文章指出，今年是我国农业连续第十三年丰收。总产量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艾达到新的水平；棉、油、麻等经济作物收成很好，林、牧、副、渔各业都有新发展。黄河以北出现了一批亩产过“长江”的县；长江以南出现了亩产超千斤的省，以及亩产一千六百斤以上的县。北方历来缺粮的冀套、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有余，为扭转南粮北调作出新贡献。特别令人振奋的是，西藏高原今年也实现了全区粮食自给，粮食总产量量丰收的1973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还出现了小麦亩产千斤以上的高产记录。

12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大庆油田产量已经提前二十天完成了今年国家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今年比去年增产的原油接近这个油田1965年全年的产量。

1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现在发挥着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的综合效益，为我国开发利用多泥沙河流提供了经验。

12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大庆至寨皇岛输油管道胜利建成输油。大庆原油通过这条地下大动脉源源不断流进山海关，在秦皇岛装车装船，运往祖国各地。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今年农业又获得全面丰收，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四百五十多斤，皮棉亩产一百一十五斤，油菜籽亩产二百八十三斤。生猪饲养量在连续三

年实现“一亩一猪”以后，今年又有新的发展，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今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二千四百零五斤。

12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建造的海洋地质勘探浮船“勘探一号”，经试验，在黄海南部海区成功地打了一口石油地质普查井。

1975 年

1　月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新年献词》。社论在讲到经济建设时提出：“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1 月 8—10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

1 月 13—1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届人大召开前，“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搞突然袭击，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阴谋篡夺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毛泽东同志戳穿了他们的阴谋，确定周恩来同志负责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1975 年 1 月 19 日、1981 年 7 月 1 日、7 月 17 日《人民日报》)

1 月 14 日　新华社报道，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成绩。强大的天然气流通过纵横千里的输气管道输向城市和农村，有力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目前，全省有三分之二

的钢铁企业用天然气炼铁、炼钢；各化肥厂以天然气作原料，生产了全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氮肥；全省百分之八十三点九的原盐是用天然气作燃料熬制出来的。大量的天然气还用于发电、机械加工以及生产碳黑、硫磺、胶片原料、药品等产品。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红麻、黄麻生产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和1971年相比，总产量和收购量分别增长了一倍；1974年总产量又比1973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四，收购量增长了百分之七。我国已经实现用麻基本自给。

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取得新成绩，1974年，我国又有九条主要公路建成通车，新建县、公社公路一万多公里，铺筑黑色路面一万三千多公里；各地又有一千二百多个山区人民公社通了汽车，汽车客、货运量均比上一年有新的增长。为支援工农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

1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有近一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南方许多地区开发利用和改良土壤取得了很大成就。据十一个省、区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开发利用和改良的红壤面积达一亿两千多万亩，并初步建成一大批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涌现了一百多个粮食亩产跨《纲要》和超千斤的县。

1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商业郎门经国家批堆，今年1月再次降低半导体收音机的零售价格。近几年来已经两次降低，连同这次降低，三次共降近百分之六十。

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召开了全国棉、油、糖、麻、烟生产会议，总结了生产经验，讨论了发展生产的计划和措施。

2　月

2月3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最近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代替人工对一台十万千瓦的燃煤气轮发电机组进行运行控制，获得成功。这不仅为我国今后在电力工业中使用电子计算机积累了经验，并且培养了一批计算机技术人员。

2月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目前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胜利建成。它供应西北陕、甘、青三省的工农业生产建设用电，并调节黄河水量，发挥防洪、灌溉的作用。

同日，我国辽宁省南部地区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七点三极强烈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国务院迅速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救灾工作，同时派出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

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发表了毛泽东主席1974年12月26日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2月22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即理论问题三十三条)。(编者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引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

3　月

3月1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解决全军存在的问题。在这前后时间里，江青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多次指使发表文章重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要给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打击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姚文元在一份宣传计划中塞进批判经验主义的内容，妄想骗取毛泽东同志的批准。4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宣传计划上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

(1977年3月3日、8月23日《人民日报》)

3月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国所有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好"的方针，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生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决定推动了全国铁路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好转。

(1977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3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理论学习促进工业生产》。社论指出，"当前，要重视和抓好铁路运输和钢铁、煤炭、电力的生产，要继续搞好支援农业生产的各项工作。"要"对党员和群众加强党的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要依靠群众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

4　月

4月2日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因病逝世。

5　月

5月3日　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批

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还提出政治局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并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强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197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6　月

6月9日　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同志致悼词。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悼词以及举行仪式的消息均未公开发表。

（10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6月14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六期夏力之的文章《货币交换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交换……是滋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土壤。”

6月24日—7月15日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了“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部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同时，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提出了要解决部队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解决部队肿、散、骄、奢、惰问题，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等等问题。

（1079年1月20日《解放军报》）

7　月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建成。这条用电力机车牵引着客货列车的铁路，穿过秦岭，北上陕西秦川，南下成都平原，全长六百七十六公里。全线实现电气化通车后，货物通过能力将提高一倍以上，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标志着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向现代化跨进了一步。

7月8日　新华社报道，秦皇岛至北京的输油管已建成投产。至此，以大庆为起点的大口径输油管道直通首都，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到华北、全长一千五百霉七公里的“地下大动脉”，保证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扩大生产的需要，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7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大中小化肥企业生产逐步上升，产量比去年同期有显著提高。据计算，今年上半年全国仅是比去年同期增产的化肥，就可以增产粮食一百多亿斤或皮棉三千多万担。

7月26日　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7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全国东西南北铁路干线畅通无阻。全国二十个铁路局中，有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锦州、北京、太原、柳州、成都、西安和乌鲁木齐等十个局做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8　月

8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最大的公路平板车在成都制成。这台大型公路平板车由一辆装重四百五十吨的平板车和两辆400马力的柴油机牵引车组成。平板车自身长二十二点七米，宽三点八米，高一点六米，有一百一十二个轮胎。

8月14日　毛泽东同志发出关于评论《水浒》批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四人帮"把毛泽东同志说的《水浒》的要害是"投降"歪曲为"架空晁盖"，并污蔑说，"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毛主席"，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掀起了所谓评《水浒》运动。

(197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8月30日　新华社记者述评，作为国民经济"先行官"的电力工业，最近三、四年来，每年都有一天批电站建成投入生产。今年1—7月，一批新的电站和输电线路陆续建成投产；全国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四点三。自1966年以来，电力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仅是1966年到1974年的九年间，全国新增加的发电设备容量，就比1966年前十七年增加的总和还多一点四倍。目前，全国几天的发电量，就相当于1949年一年的发电量。

9　月

9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的早稻生产，在去年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又获得丰收，单产和总产都创造了历史新水平。

9月2日　为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工矿企业的混乱现象，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提出了整顿工业和整顿企业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到1976年初该文件被"四人帮"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进行了批判。

(197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9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中小型水电站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到1974年底，全国中小型水电站的发电量，已占水电站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仅小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就已超过解放前夕全国电力工业一年的总发电量。今年中小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又有增长。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有线电广播事业蓬勃发展，已经拥有一亿多只广播喇叭，形成了一个遍及广大农村，连结千村万户的有线广播网。目前，全国农村百

分之九十二点七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安上广播喇叭。

9月15日—10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在昔阳开幕，在北京又继续举行。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工交战线广大职工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国庆。截止本月20日，大庆油田各项生产任务都完成得很好，接近或超过本月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上钢二厂出现争分夺秒地为国家多炼多轧钢材的动人景象；抚顺矿务局团结战斗夺高产，清河毛纺织厂生产持续发展。

9月26日　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讨论了科技工作，提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提出了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关于力求弄通毛泽东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和整顿等问题。1976年初，这个汇报提纲被“四人帮”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进行了批判。

(1977年3月9日《人民日报》)

9月30日　邓小平同志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主持国庆招待会。邓小平同志说：当前，“全国人民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0　月

10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工作者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培育出水稻新品种。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天津市农业科研所协作培育出水稻新品种“花育一号”，“花育二号”，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黑龙江省农科院、松花江地区农科所水稻试验站协作育成“单丰一号”和牡丹江地区农科所育成的“牡丹一号”等水稻新品种，亩产可达千斤左右。

10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汉古区办事处理论小组的文章《正确认识货币交换》。文章提出：“货币交换方面资产阶级法权存在，是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条件，是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

10月27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10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煤矿生产的原煤和洗精煤，分别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五点六和百分之二点六；开拓进尺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二点九，准备煤量、开拓煤量和可采煤量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煤矿的基本建设也是近几年中完成的最好的一年。

10月30日—11月11日　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表扬了煤炭系统的三百个先进单位，树立了十面红旗，作为煤炭系统学习的榜样。会议通过了《学习“十面红旗”建设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倡议书，讨论了今后十年煤炭工业发展规划和具体指标。会议期间，代表们不断把会议精神传回单位，使广大煤炭职工受到鼓舞，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热潮。11月上旬，全国原煤平均日产量比10月同期增长百分之三点

五，并有十五个矿、处提前完成了今年全年的国家生产计划。

11　月

11 月 17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原盐获得丰收，全国原盐生产提前八十天完成全年的任务，产量超过了丰收的 1974 年，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

11 月 26 日　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2　月

12 月 4 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 12 期刊登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把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党中央指示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的讲话诬蔑为“奇谈怪论”，说“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由此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 年 12 月 5 日，1977 年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

12 月 16 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2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战线在连续十三年丰收基础上又夺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去年显著增长，创造了历史的新水平。油料、糖料、烟叶、麻类和茶叶普遍增产。棉花获得了好收成。林、牧、副，渔业的生产，也都有新的发展。

1976 年

1　月

1 月 8 日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1 月 19 日　新华社报道，1974 年，全国一百三十六个大中城市共有水面五百六十万亩，已建成高产稳产鱼塘十万亩，养鱼水面达三百三十五万亩，产鱼三千万斤。

1 月 24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一次新的核试验。

1 月 27 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去年城乡储蓄存款比 1965 年增长一点三倍。去年农村社员储蓄存款是建国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年，城镇储蓄存款的户数增加了三分之一。

2 月

2 月 12 日 新华社报道，1975 年全国电影胶片的产量比 1965 年增长七倍，其中彩色电影胶片从无到有，大量生产。

2 月 16 日 1976 年中国地毯交易会在天津开幕。这次交易会是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青岛和大连等六个畜产进出口分公司联合举办的。

3 月

3 月 6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妇女带电作业队伍，已成为电力工业战线上的一支新生力量。几年来，她们共改进工具一百零八件，制做工具三十五种，推动了带电自由作业的新发展。

3 月 22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收音机生产迅速发展。1975 年的产量比 1965 年增长了十倍多，品种型号由四十多种增加到三百七十多种。

4 月

4 月 15 日 1976 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4 月 21 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上海、杭州中同轴电缆 1800 路载波通信干线胜利建成投产。这条线路全长一千七百多公里，纵贯八个省市，穿过黄河、长江等二百多条大、小河流，它能使沿途主要城市之间数千人同时通电话。

4 月 22 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技人员和上海试剂一厂工人一起，试制成功十四种高速液体色谱填料，并已投入生产。这是近十年迅速发展的一种分离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到工业、农业、医药、国防、环境保护等化学研究的分析上。

5 月

5 月 1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新兴的海洋地质调查事业迅速发展。从事海洋地质调查的专业队伍人数比 1965 年增长四点五倍，海洋地质调查船增长七倍半。

5 月 11 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对城镇手工业和私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目前，全区私营商业已全部纳入了国营商业轨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手工业建立了生产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大道。

5 月 13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邮电部门职工自行研制、生产、设计、施工，用晶体管 960 路和电子管 600 路微波通信全套设备，建成以北京为中心连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微波通讯干线。现在，全国许多主要城市之间通过微波干线开通了传

送电视、各种传真、电报、电话等多种通信业务。

5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为了根治淮河，兴建了一批防洪、排涝、抗旱、治碱工程。现在淮河全流域的农田灌溉面积已达一亿亩。比1965年扩大--倍。1975年全流域粮食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

6　月

6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十万吨级的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已于最近建成投产。这座十万吨级深水油港的投产，对于扩大我国原油运输能力将起很大作用。

6月8日　新华社报道，贯穿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嫩林路胜利建成通车。

6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三十万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投产，这是我国目前最大容量的火力发电机组。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发电，表明机组的性能和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已做到安全稳定发电。

同日，新华社报道，去年，我国在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方面作出了贡献。1975年和1965年相比，各地工业部门为农业提供的拖拉机、排灌机械、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等主要农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了六倍至十一倍。

6月29日　海黄浦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钢铁大桥。公路桥全长一千八百六十米，铁路桥全长三千零四十八米。

7　月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1号”，最近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地进行了首次远洋科学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多学科的第一手资料，为发展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7月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西南边疆又一条公路干线——滇藏公路已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全长七百一十六公里，是继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之后，从内地到西藏的第四条公路干线。

同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7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二十四个生产夏粮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比去年增产。全国夏粮总产量创造了历史的新水平。其中，北京、上海、山东、河南、辽宁、江苏、湖南、浙江、贵州、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夏粮的总产量比去年增长幅度较大。北京市郊区三百六十多万亩以小麦为主的夏粮作物，平均亩产达到四百斤，上海市郊区的小麦、大麦、元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增长三成以上。

7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东部沿海主要铁路干线津（天津）—沪（上海）路全长一千三百公里，复线工程提前胜利接轨。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8　月

8月23日　我国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造船厂建成下水。

8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又夺得了今年早稻丰收，单产和总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新水平。今年，长江以南主产早稻的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大多数地区都比去年增产，其中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广西、上海等省、市、自治区，早稻总产量比去年增长较多。江苏省一千主百万亩早稻，总产比去年增长两成，这个省的苏州、扬州地区，早稻平均亩产达到六百四十斤以上，成为全国早稻大面积高产地区。

8月30日　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9　月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9月26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10　月

10月4日　新华社报道，由中央气象声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气象台、站、农村人民公社的气象哨（组）组成的庞大气象观测网，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气象服务提供了基本依据。在我国已经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气象雷达网，卫星云图接收站。

10月6日　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

（10月22日《人民日报》）

10月7日　新华社报道，河南、山东两省军民战胜特大洪水，取得黄河防汛重大胜利。这次黄河洪水水量大，水位高，持续时间长。从7月20日第一次洪峰出现到9月13日第七次洪峰入海，先后有一个多月时间。十七天的洪水总量，接近1958年黄河特大洪水的水量。

10月17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10月21日　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11　月

1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青海省农业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水平。出现了更多的小麦平均亩产千斤的大面积丰产田。连从前被认为不毛之地的柴达木盆地，也创造了小麦平均亩产一千六百多斤的高产纪录。

11月17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一次氢弹试验。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小水泥工业比1965年增长了四点一倍，已占全国水泥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八。今年1至10月，小水泥已完成全年国家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九。现在，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都建立了小水泥厂，总数达三千多个。

11月31日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2　月

12月8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西藏农业获得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小麦、青稞、油菜等各种作物全面增产，其中八十万亩冬播作物单产大都超过四百斤，油菜籽总产比1975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全区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1975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八。继去年十一个县上《纲要》、过“黄河”之后，今年又有五个县、三个农场加入了这个高产单位的行列，并涌现出一大批过“长江”的社队。

同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颗卫星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地面。

12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江南九省已探明的煤炭储量比1965年增长了两倍。1975年江南九省原煤产量比1965年增加了二点六倍。今年1至10月，原媒产量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百分之十点六八。煤炭自给率由百分之五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12月10—27日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举行。

12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社论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工农联盟才能进一步巩固起来。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有了机械化，农业才能不断扩大再生产，充分显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实现农业机械化，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现有深远意义。

1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论十大关系》。

12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连续夺得第十五个丰收年，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的新水平，糖、麻、烟、茶、蚕茧等经济作物比去年增产，林、牧、副、渔各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粮食产量大多超过或达到去年的水平。全国许多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的地区，今年粮食生产又上了一层楼，许多地区涌现一批高产更高产的先进单位。

1977年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乘胜前进》。社论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乘胜前进。

1月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目前最长的公路桥——洛阳黄河公路大桥已顺利通车。大桥全长三千四百二十八点九米，桥面行车道宽九米，可并驶三辆大卡车。

1月5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我国石油工业的原油、天然气和主要石油产品的生产都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原油和天然气分别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十一，上缴利润增长百分之八以上，石油勘探也取得重大成果，在新地区打成一批高产油井，建成了高产油田。

1月10—25日　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欧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为此于26日发表短评《让大庆红花开遍煤炭战线》。

1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又建成了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综合性的石油化工基地——山东胜利石汕化工总厂。

1月11—27日　全国轻工业学大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月29日《人民日报》)

1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设的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已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全部工程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并且是一次试车成功。

1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述评《工厂企业办农副业好得很》。述评说，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工矿企业种地达二百六十至二百七千万亩，生产粮食约五亿斤，收获蔬菜二十多亿斤，养猪七八十万头，就产业系统采说，农副业办得最好的是石油工人。述评指出，这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逐步走上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述评同时列举十条优点。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家计委在广州召开全国节约燃料电力经验交流会议，总结交流了节约工作的经验，表彰了六十六个节约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1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昔阳县委贯彻学大寨精神，制定三条措施，一是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二是深揭猛批“四人帮”，三是大搞农田基本水利建设。

1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湖南省开发和综合利用石煤资源取得显著成绩。1975年全省产石煤一百零五万吨，1976年已增加到二百零八万吨，不久前在宁乡县双凫铺发现一处石煤储藏，走向七公里，厚度为二百四十米，储量在五十亿吨以上。

(2月1日《人民日报》)

1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中央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的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1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公路交通部门去年在全国新建公路三万五千公里，又有一千五百多个公社通了公路，铺筑渣油路面一万五千公里，并在黄河、闽江、乌江、延河、金沙江等主要江河上建成了大桥。汽车客、货运量比分别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八和百分之四。

(2月1日《人民日报》)

1月30日 据联合国人口年鉴统计，截止1975年年中，世界总人口为三十九亿六千七百万。

2 月

2月10日 中共山西昔阳县委为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召开了四级干部整党整风会议。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动各级干部，带领群众建设高标准大寨县。《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短评《要想打胜仗，就要常整党》。

2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哈尔滨汽轮机厂青年工人顾凯，被称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他从1972年到1976年底，以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十三年的工作量。现在已开始做1985年的工作。《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短评《向大干社会主义的青年闯将致敬》。

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到1976年底，全国建造的水泥船（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品种有农船、渔船、航标船、驳船、客货轮以及万吨浮船坞等一百多种，载重总量达三百二十万吨。

2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搞好春耕》。社论说，今年春早，放眼农村，形势大好。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生产才能搞上去。社论要求学好文件，走群众路线，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并号召各行各业都要支援春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春耕生产，夺取今年农业的全面丰收，夺取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

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廿个铁路局和十六个铁路分局党委、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二百多人。

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已取得一定成绩。河北省、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5年的千分之二十五左右降到现在千分之十左右。上海市和北京市都已控制在千分之六以下。

2月26日　西藏自治区乃东县结巴公社去年的粮食单产一跃过了"长江"，达到八百二十五斤，成为西藏自治区目前粮食单产最高的一个公社。

3　月

3月2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以来，云南、陕西、湖南、广东、山东、江西、四川、青海、河北等省先后召开了工业学大庆会议。

3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述评《全党办铁路》。述评指出，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得很紧，行动很快，开始出现了一个"全党办铁路，党、政、军、民都支持铁路"的大好局面，取得成就的经验是：党委重视，认识一致；抓纲治国，治路要治本；亲临现场，身体力行；长远打算，具体入手。

3月9日　中国红十字会致电罗马尼亚红十字会对地震灾情表示慰问。并赠送药品二十吨和人民币五十万元，帮助灾区人民克服暂时困难。

3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列宁著作《怎样组织竞赛?》（节录），并发表编者按说，列宁早在1917年12月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开展竞赛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政府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为了揭批"四人帮"对劳动竞赛的攻击和否定，发表此文供大家学习。

3月12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安徽省委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大办农业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70年以来，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六，棉花百分之九点一，生猪年末存栏数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点七，其中1976年是步伐跨得较大的一年。农业促进工业，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点七，重工业百分之十五点四。这七年农、轻、重的平均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二十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

3月13—30日　全国林业、水产会议在北京开会。各地代表在会议上狠批"四人帮"，决心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李先念、陈永贡于28日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3月27日、4月4日《人民日报》）

3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化工企业广大职工，坚持加强企业设备管工作，积极改善设备状况。据全国二百零五个重点石油化工企业的统计，设备完好率平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1976年原油产量、原油加工量和化肥产量，分别比1965年增长六点七倍、四点三倍和二点二倍。

3月20日　国务院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抗旱夺丰收的通知，国务院19日召开了抗旱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紧急动员起来，学好文件抓住纲，投入抗旱斗争，在大治之年夺得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3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1960年3月22日《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并加了编者按语。

同日，鞍山钢铁公司举行高举鞍钢宪法红旗、学大庆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鞍钢宪法十七周年，热烈欢呼这个光辉批示的全文发表。

3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大寨大队在党支部领导下，进一步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决心抗旱抗到天低头，地丰收。《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城镇全面动员支援农村抗旱》。

3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3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最近在昔阳召开，总结推广用大寨精神办财政金融的经验。陈永贵副总理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3月26—31日　大庆油田举行1976年度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大会。余秋里副总理出席大会并讲话。

3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十八个重点炼油企业的代表，联合发出倡议书，在炼油企业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3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基本建设会议最近在北京召开，代表们批判了“四人帮”破坏基本建设的罪行，决心把基本建设促上去。

3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冶金工业会议最近在北京召开。代表们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冶金部的黑干将篡党夺权、破坏冶金工业的罪行，交流了贯彻鞍钢宪法和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经验。李先念、纪登奎、谷牧副总理等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代表。

4　月

4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大庆委员会关于领导班子革命化的文章，文章指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措施共十二条。一，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把思想政治路线拙端正。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资批修。三，坚持搞光明正大，实行“四个公开”。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完成建设任务。五，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积极开展科学实验。六，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集体领导。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八，发扬革命精神，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九，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十，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十一，全面关心群众生活，爱护群众积极性。十二，力戒骄傲，谦虚谨慎。

4月3日　新华社报道，大庆油田十七年累计上缴国家的积累，等于国家给大庆全部投资的十四点三倍。

4月4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财政金融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代表在大庆集会，学习大庆油田财务工作经验。余秋里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4月5日　新华社报道，煤炭战线三十个大庆式企业、十个红旗队组和部分劳动模范，最近联名向全国煤矿发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倡议书。

（4月12日《人民日报》）

4月8日　新华社报道，继云南、陕西、湖南、广东、山东、江西、四川、青海、河北等省之后，近一个月来，北京、广西、甘肃、西藏、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等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了工业学大庆会议。

4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昔阳县委整风的六条经验是：一，敢揭矛盾，不捂盖子。二，每次整风要集中解决一两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不是鸡毛蒜皮一把抓。三，领导要把自己摆进去，不把责任往下推。四，发动群众开门整风，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五，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把教训当成包袱，而把它当成继续前进的动力，六，从理论上分析提高，不就事论事。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代表表示，要深揭狠批"四人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把领导班子建设好，把队伍建设好，把企业整顿好，把本单位建设成大庆式企业。

4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社论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项任务。

4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4月7日作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第五卷于今日首批发行一千五百万册，全国准备印刷二亿多册。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和外文版不久将陆续出版发行。

4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社论说，打倒"四人帮"后，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其进展速度，出人们的意料，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但不平衡，有的地方速度还不够快，社论指出，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抓纲治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政治统帅经济，用革命统帅生产。安排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等等。

同日，新华社招道，全国务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最近在北京召开。

4月20日　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油田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工业战线的代表七千人。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的空前盛会——热烈祝贺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开幕》。会议27日在北京继续举行，到6月13日闭幕。

4月25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大庆油田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宋振明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4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首批发行二千八百万册。

5　月

5月4日、9日、13日、14日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4日、9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余秋里副总理受党中央委托，4日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的重要报告，报告全文7日发表。大会13日胜利闭幕。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有志气——欢呼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

5月7日　新华社报道，冶金部和北京市最近在首都钢铁公司召开现场会，推广首钢，石钢机械厂研制成功的新型蜗轮副。蜗轮副是机械，交通设备、科学仪器和军事设备上广泛需要的部件。

5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机修理技术革新展览会最近在北京通县举行。展览会用大量图表、实物和现场操作表演向人们表明修旧利废大有可为。

(5月29日《人民日报》)

5月旧日　“全国工业学大庆”展览在京开幕。

5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委书记、省委、省革委二十多名部、局级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在太原西山植树，有力地推动了省城的造林运动。《人民日报》在引用毛主席的有关绿化的教导和周总理的指示后指出，省委领导同志狠抓绿化，这种作法值得提倡。

5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工程已胜利完成。

5月27日　何英副外长应约会见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向他重申我国政府对“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的立场。

6　月

6月3日　新华社报道，为创建十来个大庆而奋斗，石化部领导带头奔赴第一线。

6月5日　《人民日报》以《工业生产的全局搞活了》为题发表该报记者对5月份工业生产形势的述评。

6月7日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悍然强使侵犯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权的“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自然生效。朝鲜外交部就此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行径。

6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大庆的回答是：向更高的目标进军，大庆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一个多月来，大庆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新高潮，全油田办起了两千六百多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

6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四川全省五千多万亩夏熟作物全面丰收，小麦、马铃薯、蚕豆、豌豆等粮食作物总产量，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油菜籽收成也超出原来的预料，比去年增产。

6月12日　我国外交部就日本政府最近强使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在日国会获得“自然批准”一事发表声明，对日政府这一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表示严重抗议，并再次指出，日政府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人民日报》为此于14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我国大陆架主权不容侵犯》。

同日，新华社报道，农林部最近在山东省召开了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开展抗旱、抗灾斗争，夺取今年夏季粮油作物丰收的经验；研究、落实了抓好大秋作物生产，以秋补夏，夺取今年农业生产丰收的措施，陈永贵、谷牧副总理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6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在今年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上，冀、鲁、豫三省约定在三省之间倡议开展夏粮生产竞赛。

6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广大农村近几年来利用有益生物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工作有了较快发展，去年全国生物防治面积达五千二百多万亩。

6月20日　新华社报道，1974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茶园面积扩大一百万亩，茶叶产量年增三十五万担。为了促进茶叶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最近农林部、外贸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安徽省休宁县召开了全国茶叶五万担县的经验交流会。

（7月11日《人民日报》）

6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基本完成了青藏高原的野外综合科学考察，为西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最近中国科学院召开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会议，讨论了有关西藏地层、古生物、地质构造、地壳深部结构、冰川、地热、农、林、牧、水资源等方面的科学报告。

6月24日　根据中日两国政府1976年8月25日签订的关于互设民间办事处的协议，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驻东京办事处和日中海运输送协议会驻北京办事处即日起分别在东京、北京开始工作。

6月26日　新华社报道，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北起鸭绿江口，南到西抄群岛，沿海主要港口码头和渔场，都已有了测海观天的海洋台、站，我国海洋站网的工作体系初步形成。

6月28日　《人民日报》驻大寨联合报导组报道，大寨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十几年来，大寨人自力更生、继续研究、改制、制造二十多种农具，逐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财富。

同日，新华社报道，农林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在湖北省召开了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交流了棉花增产经验，讨论了夺取今年棉花丰收的措施。

7　月

7月1—13日　全国地质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余秋里副总理在闭幕式上作了报告。在闭幕式上，国家地质总局负赞同志给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命名的地质战线十七个学大庆式企业授了锦旗，会议还命名地质战线十二个学大庆的先进基层单位为地质战线学大庆的十二面红旗，并分别授予光荣称号和锦旗。《人民日报》15日发表社论《地质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7月4日　新华社报道，黄河治理领导小组、水利电力部、农林部最近在陕西省延安市联合主持召开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研究把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尽快搞上去。

7月5—20日　1977年中国工艺品交易会在北京举行。

7月6日—8月5日　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先后在昔阳和北京举行。会议部署了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的任务，讨论了到1980年农田基本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人民日报》于8月8日发表社论《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

7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文章《不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不算好干部》。文章介绍了昔阳县大寨大队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文章分三部分：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心。

7月14—28日　全国外贸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等出席大会。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讲话，余秋里副总理作了报告。

7月16—2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公报于23日发表。这次全会内容主要有四项：追认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主度、中央军委主席；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开除“四人帮”反党集团出党；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23日发表社论《历史性的会议》。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农林部最近在湖南省湘潭地区召开南方水稻生产会议。陈永贵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同日，新华社报道，1958年7月7日周总理在广东省新会县视察时，对废旧物资回收工作题词的手迹于今日发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向各省、市、自治区供销社（商业局）发出认真贯彻落实周总理题词的通知。

7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驻大寨记者联合报道组的文章《苦干加巧干，年年夺高产》。文章介绍了昔阳县大寨大队为革命大摘科学种田的经验。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

7月29日　毛泽东主席1961年7月30日亲笔写的《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公开发表。

8　月

8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交战线初见成效的标志》。社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二十三年是由一分一秒组成的，没有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二十三年的宏伟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二十三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因此今年初见成效，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社论指出，初见成效的标志必须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大搞企业整顿，必须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全面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要达到本企业的历史最高水平。社论说，做到这几条，就是初见成效了。为此，社论要求各级领导要改变领导作风，讲求领导方法。第一，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第二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第三，要进一步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第四，要关心群众生活。

同日，新华社报道，邮电部最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邮电部门学大庆会议。谷牧副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日报》为此于8日发表社论《努力实现通信现代化》。

8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制定了《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表》，以便更好地贯彻国务院最近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

8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省委要用很大的劲头抓农业》。社论引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的论述。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驻大寨记者联合报道组的文章《高举大寨红旗，重新安排河山》。文章介绍了昔阳县多快好省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

同日，新华社报道，马克思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摘译）一书最近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1977年第4期上刊载。

8月12—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于18日发表新闻公报。公报说，这次大会通过了三项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8月21日《人民日报》）

8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述评《我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新高潮》。述评说，今年以来，一百七十万各级干部先后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蹲点劳动，调查研究，这是解放以来少见的。

8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最近举行工业学大庆会议，总结交流十个月来工业学大庆运动的经验。

8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质量必须第一》。社论指出，质量必须第一。数量是重要的，但必须以质量作前提。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必须把产品的使用价值放在首要地位，为此，必须要提高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

8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国营农场搞好》。社论在分析了搞好国营农场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性后指出，搞好国营农场的关键是农场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要端正，要彻底整顿那些"软、散、懒"的领导班子。

8月23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华国锋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8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教论在说明社会主义企业需要盈利，国家需要积累的意义后指出，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

8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毛主席纪念堂已经胜利建成。纪念堂的室内布置已经全部就绪，安放毛主席遗体的水品棺已经移人堂内。随着纪念堂的建设，天安门广场比过去扩大了近一倍。

9　月

9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社论指出，当前特别要注意合理分配和正确使用农村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压缩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用工，把人力集中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地把农业这个基础抓好，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

9月5日　《人民日报》转载《山西日报》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灾害》。社论指出，天灾不可怕，人灾不得了。因此，遇到灾害，既要战天灾，更要教育干部、群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灾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斗灾炼人，使物质、精神双丰收。

9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1963年12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并为此于13日发表社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指导革命竞赛》。社论指出，开展比学赶帮超的革命竞赛，首先是比，重点是学，必须讲求实效，关键是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

9月10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发动群众开展“小秋收”。通知内容有三：一、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二、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三、妥善安排“小秋收”劳力。通知最后说，各地组织“小秋收”产品，要注意教育社员群众保护资源，严禁乱砍滥挖。《人民日报》为此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抓好“小秋收”》。

9月11日　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12月1日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水电部和邮电部最近共同召开革命友谊竞赛大会，参加的有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两部结成对子的二十二个对口单位向大会递交了对口赛的决心书。

9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农机化队伍要走我国自己的道路》。怎样建设一支宏大的农机队伍？社论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走亦工亦农的道路，这就是我国自己的建设农机化队伍的道路。”

9月17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全党动员，大办科学》。

(9月23、24日《人民日报》)

9月21日—10月9日　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北京举行。谷牧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9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建筑材料工业学大庆会议最近在哈尔滨举行。《人民日报》22月发表社论《全国人民都希望建材工业大上快上》。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研究了整顿金融，加强金融管理，加强银行工作的问题。李先念副主席在会上作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银行是金融中心，是国民经济活动的寒暑表，为了保证国家有计划、有重点的建设，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重视银行工作，加强金融管理，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

9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埃及萨达特总统宣布延期十年偿还苏联军事债务，并指出苏联曾欠西方军事债务三十年才作象征性偿还，埃及的这一决定符合国际公认惯例，

10　月

10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共同发表社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社论说："我们的目标是宏伟的，但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不论从巩固无声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来看，还是从国际阶级斗争来看，我们都必须加快建设速度，把我们的国家搞好。"

10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据农林部的资料，现在全国已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公社和百分之七十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一百零九万个企业，在企业参加劳动的社员达一千七百多万人。去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已经占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一，有些省市已达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以上。

10月16日　新华社报道，石油化工部、农林部、煤炭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在长春市召开了全国腐植酸类肥料科研成果交流会。

10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教育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对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人民日报》为此于21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10月23—24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1978年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0月25日　《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余秋里在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11　月

1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11月7日—12月4日　第四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先念副主席出席了闭幕式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11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的第一个数字制卫星通信地面站胜利建成，顺利开通。

11月10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自治区江孜县农业试验场今年再创冬小麦亩产一千六百七十三斤的最高纪录，这个农场1975年创造亩产一千六百一十斤的全国最高纪录。

1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大寨大队今年每人生产粮食两千赛九十三斤，交售给国家四十七万斤，平均每人交售一千斤。

1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建委最近在长春召开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施工会议，交流经验，研究并提出了搞好工程质量和安全施工的办法和措施。

11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据有关部门截止10月底统计，全国铺开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共达三十九万多处，平整土地三千万亩，修建水平梯田近二百万亩。

11月20—22日　全国气象局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到会讲了话。

(12月10口《人民日报》)

11月26日—12月12日　水利电力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电力工业会议。李先念副主席和余秋里、谷牧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12月18日《人民日报》)

12　月

12月3日　参加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办公室的八个单位——国家计委、水利电力部、农林部、第一机始工业部、商业部、财政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国家物资总局，联合召开了电话会议。会议号召迅速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为农业的高速度发展作出贡献，为夺取明年农业丰收创造条件。

12月4日　第四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今日闭幕。《人民日报》为此于次日发表社论《电子水准是现代化的标志》。

12月5日　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出通知，决定明年在北京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用大庆大寨精神，办好城乡商业》。

(12月16日《人民日报》)

12月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为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1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是全党的战斗任务》。社论指出，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对农业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大庆式企业的检查评比和验收工作的通知》。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研究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拟定了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安排和"六五"计划的轮廓，展望了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远景。提出今后二十三年的初步设想，在经济上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使农业每年以百分之四至五、工业每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地前进。

12月19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北京农展馆视察农业机械化展览，并观看农业机械化表演。

(12月25日《人民日报》)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地震局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震战线学大庆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到会讲了话。《人民日报》21日发表社论《把地震科学技术提到新水平》。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城乡一千万商业职工，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已初见成效。今年1—11月，全国工业品收购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

同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原煤生产已提前二十八天完成了今年国家计划，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点二，重点煤矿提前十二天完成了国家计划，产量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八。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力工业于12月12日提前十九天完成了全年发电计划。11月下旬的日平均发电量，比历史最好水平的1975年11月下旬提高百分之十三以上。

我国地质部门于12月上旬提前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据不完全统计，1:20万区域地质调查超额百分之十一完成了年计划，区域水文地质调查超过年计划的百分之六。

1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开展大规模、多学科的荒地资源科学考察，取得重大成果，经过最近四年多的考察，已查明全省可供开垦的荒地共有一点二亿亩，相当全省现有耕地面积总和，为加快我国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创造了条件。另外还查明，可供利用的草原有一亿多亩。

1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1964年12月13日在审阅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增写的一段话“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

同日，发表毛泽东主席1966年3月12日写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纺织系统科学研究，技术革新经验交流大会最近在上海举行。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在全国大大提倡植树造林》。社论说明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后指出，绿化祖国，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全党全民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级党委对林业建设要做到思想上有位置，组织上有班子，计划上有盘子，物资供应上有路子，扎扎实实组织群众大打植树造林的人民战争，年华坚持抓下去，绿化祖国的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够实现。

1978 年

1 月

1 日 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

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与财政部分设，分开办公。

4 日 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

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坚持 1980 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具体目标是：全国农林牧渔机械化水平达到 70%左右；同 1977 年相比，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增长 70%；手扶拖拉机增长 36%；排灌动力机械增长 32%；化肥年产量增长 58%。要求农机企业要在统一计划下组织起来，逐步实行专业化协作生产，搞好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会上有同志提出，1980 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不可能达到。但会议坚持这个目标。

21 日 国务院提出整顿物价措施

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市场物价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整顿物价，刹住随意变动价格的歪风。要坚持计划价格，反对自由价格；加强物价的统一领导，物价大权归中央，地方和部门不得自行变动；认真安排好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严禁用擅自提价的办法扭亏增盈；各地区要有相应的物价机构，切实改变无人负责的状况。

25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

会议决定，首先重点武装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在北大荒打一场大会战，提高农场单位面积产量，扩大垦荒面积。同时支持其他垦区的生产建设，加快发展速度，在不长的时间内，把国营农场建设成商品粮基地、工业原料基地、城市副食品基地、外贸出口产品基地。

30 日 国家计委调整折旧基金留用上缴比例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改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报告》。《报告》提出改进国营企业折旧基金管理办法。将从 1967 年起国营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全留企业和主管部的规定，改为从 1978 年起，所有国营企业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50%留给企业，30%上交中央财政，20%由地方掌握安排。由国家集中的部分，国家计委和各部门各掌握 30%，用于解决全国性的生产薄弱环节。

2　月

3日　《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安徽省、四川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经验

中共安徽省委和四川省委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于1977年11月和1978年2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两份文件总结了安徽省和四川省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主要经验：恢复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坚持按劳分配，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开展多种经营；慎重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的问题；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

5日　中央批准国家计委经济计划汇报要点

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汇报要点》提出，今后在经济上，要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这两仗。农业每年增长4%—5%；工业每年增长10%以上，为“六五”大上做准备。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生产建设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到1985年，粮食产量8000亿斤；钢6000万吨；原油2.5亿吨。基本建设计划，工业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主要有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老干线。重点建设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浦等5个港口。第三阶段，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粮食总产量达到13000—15000亿斤；钢产量达到1.3—1.5亿吨。

17日　财政体制试行增收分成改革

财政部发出《关于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财政体制的通知》，决定1978年选择黑龙江、吉林、山东、福建、江西、甘肃、陕西、浙江、湖南、北京等10个省市试行。地方当年的实际收入比上年增加部分，按所确定的比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

国务院决定恢复和办好一批重点高校

1966年以前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有64所，1970年前后撤销4所。此次国务院决定再增加28所，总数为88所。为加强各部委对面向全国和面向地方的重点高校的领导，对院校的管理体制作了必要的调整：少数院校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直接领导；多数院校由有关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双重领导，以部委为主。

18日—23日　中共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通过了《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25日　国务院批准恢复华侨外汇留成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恢复华侨外汇留成办法的请示报告》。根据广东省委建

议，《报告》提出对解决侨汇留成的具体意见：属于赡家汇款部分，留给地方6%，用于解决商品供应问题；属于修建房屋的汇款，留给地方15%。自1978年1月1日起执行。

26日—3月5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六个部分：(一）三年来的斗争和新时期的总任务；(二）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三）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四）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五）加强政权建设，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六）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报告》指出，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意国务院提出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

《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规定，工农业生产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7%，其中，工业增长速度为10%，财政收入10年合计为128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10年合计为4580亿元；1985年工业生产指标：钢6000万吨，煤9亿吨，化学纤维150万吨。

3　月

3日　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明确了以下方针政策：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认真抓好城市规划工作；加速住宅和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从1979年起，在所有省会城市和城市人口在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不含京津沪）以及遵义、延安、桂林、洛阳、苏州、无锡共计47个城市，试行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成5%，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

11日　国家决定建设宝山钢铁厂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据冶金部计算，宝钢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生产420万吨钢材，填补一批国内不能生产的钢材品种。

4月30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1978年需要增加上海宝山钢铁厂及有关配套项目投资的报告》，《报告》提出，和宝山钢铁厂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配套项目，有一批工程要在1978年开工，需追加投资。国务院认为这笔投资应在国家财政超收部分解决。

18日　邓小平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分三部分：（一）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二）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三）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中央规定科研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领导，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会议讨论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20日　国家计委等下达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中共中央批准各部门的规划用汇总额为85.6亿美元，1978年成交额为59.2亿美元，当年用汇11.7亿美元。重点安排煤炭、电力、石油、化工、轻纺等6个行业。为做好引进新技术、成套设备的企业建设工作，《计划》要求各部门注意5个问题：项目选点要注意合理布局；要充分做好国内建设的准备工作；建设项目的资源、厂址、生产协作条件、配套产品、工艺技术、领导班子和引进国别的选择等问题要解决好；注意引进专利技术，严格控制用汇，不得随意突破；加强监督和检查。

1978年同国外签订了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和宝钢等共22个项目，需外汇1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建设资金200多亿，共需600多亿元。这样大的投资规模同时进入建设高峰，对国内经济形成很大的压力。

28日　邓小平谈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这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政策。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要逐步提高，各级工资数额要有所增加。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跳级，不合格的就不提。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稿费制度也要恢复，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订。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4　月

6日　国务院批复南水北调工程

国务院对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方案作出批复，同意对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方案组织现场

审查。南水北调工程是补充华北地区工农业用水，改善南北航运的一项战略性工程。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主持，会同水电部、交通部、农林部、一机部和有关省市共同指挥组织进行。《批复》要求在1978年底或更长点时间完成现场审查工作，1979年或更长点时间以前完成规划方案的修改工作，报国务院审研并报中央审批。

14日　财政部提出提高投资效果问题报告

财政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基本建设投资效果问题的报告》。财政部在《报告》中建议，为了提高投资效果，必须合理安排建设布局，整顿基本建设管理，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

19日　国家计委等提出对外贸易规划要点

中共中央原则同意国家计委、国务院财贸小组、对外贸易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草案)》的报告。《规划要点》提出，（一）要统一全党对外贸工作的认识。弄清楚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的关系；弄清楚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关系；弄清楚出口和进口的关系等对外贸易工作的具体路线和政策。（二）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增加出口货源。（三）积极办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四）大力改进出口商品包装。（五）解决出口货源的政策问题。（六）积极增加非贸易收入。做好旅游、侨汇、港口服务工作。

20日　中共中央印发试行工业三十条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是当时指导工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搞好企业整顿，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二）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各个企业都要恢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责任制，职工代表大会制或职工大会制，恢复和建立企业基金制度。（三）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首先组织同一地区的本行业的专业性公司，然后逐步发展跨省市、跨行业的联合公司；从上到下建立起强有力的各级工业指挥系统，以有序地组织生产和建设活动。

21日　财政部决定对新产品免征工商税

财政部发出《关于在税收上对新产品采取扶持政策的通知》，决定对新产品、新材料在税收政策上加以扶持。对纳入国家和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计委和科技局试制计划的新产品，在试制期间免征工商税。试制成功后，正式投产的初期，征税后发生亏损，可给予一年的免税照顾，免税期满，如恢复征税有困难，省、市、自治区财政局（税务局）还可以适当减税或延长免税期限，但不能超过一年。

22日　邓小平谈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的要求相适应。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发展技术的发展趋势。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计委等印发有关基本建设管理的五个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规定》、《关于加强自筹基本建设管理的规定》、《关于基本建设程序的若干规定》、《关于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划分标准的规定》、《关于基本建设投资和各项费用划分的规定》印发各地区、各部门试行。这五个规定的中心内容是，要求整顿基本建设混乱的现象，加强建设资金的管理和合理安排，提高管理水平，提高投资效果。

5　月

7 日　国务院批准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通知》提出，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有条件、有计划地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规定合理的奖励和计件工资办法；将附加工资改用于奖金和计件工资；严格控制奖金总额和计件超额工资。

11 日　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章发表以后，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26 日　国务院要求加快县办轻工业发展

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县办轻工业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国务院指出，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快县办轻工业的发展。发展轻工业要从原料抓起，建立原料基地。县办轻工业不能与大厂争原料，各县必须保证国家上调任务。要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财政和商业部门要积极扶持县办轻工业的发展。

6　月

1 日　襄渝铁路建成通车

这条铁路东起湖北省襄樊市，西抵四川省重庆市，全长 916 公里，是沟通我国西南和中南地区的铁路重要交通干线。铁路总共投资 36.19 亿元。

23 日　中共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

中共中央将湖南湘乡县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报告转发全国。中央指出，湘乡县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各地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认真加以解决。中央规定：凡在国家计划外乱盖楼堂馆所的，一律由国家没收；无偿平调社队劳力、财力、物力的，要坚决退赔；任何单位不准向社队乱行摊派；国家支农资金，任何单位不准扣留挪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社队企业，在组织协作时，必须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政策，不能“一平二调”。

7　月

3日　我国停止对越援助

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因越方不断加剧反华排华，中国政府被迫决定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并调回工程技术人员。

6日　国务院召开理论务虚会

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会议认为，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保障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他们的经济自主权。有关部门要尽快提出改革工资奖励制度、劳保福利制度的意见；制定推行合同制、成立专业公司的办法和改进更新改造资金、流动资金、固定资产管理方法的具体方案。

16日　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会议纪要

《纪要》总结了28年物价工作的成绩和主要经验，指出了当前物价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国务院要求，在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委的统一安排下，在今年下半年以几个月的时间，大搞调查研究，摸清种类产品的比价关系，为今后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产品价格做好准备。

9　月

5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

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1) 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2) 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3) 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上来。

会议拟定了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1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平均每年增加：粮食300亿斤，棉花500万担，钢300万吨，原煤4000万吨，原油600—1000万吨。1979年国家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457亿元，加上地方自筹等投资，实际为583亿元。据计算，由于生产任务建设任务安排过大，物资、财政、外汇都留有缺口。燃料缺1500万吨；钢材品种和到货时间不能保证；水泥缺100多万吨；木材缺75万立方米。财政收入指标有20多亿元没能分配下去。外汇支大于收100亿美元。该计划草案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10日　国家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报告，决定1978年再追加4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其中65%用于煤油电、冶金机械、化工、铁路交通等重工业部门。此时国家手中掌握的机动资金只有10亿元。国家计委建议国务院先批准追加投资方案，所需资金在计划执行中通过“增收节支”解决。这样，连同已经追加的35亿元，全年追加的基建投资总数为83亿元。1978年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由年初的332亿元，经几次追加投资，达到415亿元。1978年底，在建项目6.5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73个，投资总规模达3700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9年和1960年的又一次高积累。这一年财政收入增加200亿元。

13日　邓小平发表“北方谈话

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在东北地区和天津视察，期间发表了--系列重要谈话。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外国交流技术。

25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直属国务院，由国务院财贸小组代管。

10　月

9日　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纲要》提出，从现在起到1985年，科学技术工作的奋斗目标是：(1）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2）专业科学研究达到80万人；(3）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试验基地；(4）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纲要》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该《纲要》的正式文本于1979年11月17日由国家科委转发。

11日　我国首次出口万吨级远洋货轮

上海造船厂为中国波兰轮船股份公司建造的“绍兴”号万吨级远洋货轮，已交付给订货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口万吨级远洋货轮。

17日　国家建委等提出对外承包工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建委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拟开展对外承包建筑工程的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动作快，见成效”。

19日　国务院决定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

国务院决定在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

8000万亩防护林体系。“三北”防护林体系营造地区包括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中北部、陕北、晋西、冀北坝上地区和东北三省的西部。防护林体系是根据因害设防的原则，从新疆到黑龙江，沿着万里风沙线，营造绵亘不断的大型防风固沙林带14200多里，计1031万亩，形成“绿色万里长城”；以此为骨架，营造草原防护林252万亩，农田防护林922万亩，水土保持林4900多万亩。据测算，受益农田和草场约2亿亩，为在该地区建设58个商品粮基地县、33个牧业重点县和改造70多个多灾低产县创造有利条件。

25日　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报告，决定从1978年起，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具体实施办法包括：（一）凡是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8项年度计划指标以及供货合同的工业企业，可按职工全年工资总额的5%提取企业基金；完成产量、品种、质量、利润4项指标和供货合同，可按工资总额的3%提取。在此前提下，其他指标每多完成1项，可按工资总额提0.5%的企业基金。（二）各级企业主管部门，按其直属企业汇总计算，盈亏相抵以后，利润超过国家年度利润指标的部分，分别按照国家规定的不同比例提取企业基金。（三）企业基金主要用于兴办职工集体福利事业，50%用于奖励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企业，50%用于生产技术措施和本系统企业的集体福利设施。

28日　国务院批准及时引进成套合成氨装置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重油制合成氨装置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关于引进重油制合成氨成套设备和制造技术问题，考虑到目前美元继续贬值，日本、西德、英国厂商在出售合成氨装置方面竞争激烈，对成交有利。拟引进3套成套设备。在引进中，要认真吸取过去13套大化肥设备引进的教训，做到技贸结合，在外商合作下进行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只购买一时造不出的设备，逐步增加自制设备比重。以化工部为主，会同一机部组织专门小组，及早研究，提出设计、合作制造设备和建设进度的方案，争取早日成交。

12　月

2日　国家减免农村税赋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同意从1979年开始进一步减、免农村税赋。财政部在《报告》中提出，为加快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力扶持社队企业，对农村税收负担，除按现行规定给予照顾外，拟再采取四项措施：(1)农村社队新办企业在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由原减征、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1—2年改为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2—3年（生产烟、酒、棉纱等高税率产品除外）。(2)农村社队企业仍按2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征税起征点由原来的全年所得额600元改为3000元；少数省市试行四级超额累进税率继续进行，起征点由原2400元改为3000元。(3)从1979年起，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征工商所得税5年。经济困难的老革命根据地，可由省、自治区提出，报国务院审批后比照办理。(4)在粮食产区，每人平

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免征农业税。起征点由省、市、自治区规定，并报国务院审批。

6日　武钢1.7米轧机基本建成

我国引进的的重点建设项目武钢1.7米轧机工程基本建成。该项工程包括连铸车间、热轧薄板厂、冷轧薄板厂、硅钢片厂。每年可轧制薄钢板300万吨

10日　陈云同志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2000万吨。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三）要给各省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要同引进项目一样对待。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

10日　我国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

庆祝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大会在北京召开。1978年，我国钢产量计划为2800万吨，在执行过程中，冶金部门一再抓超产，到12月9日，已经完成3000万吨，到年底达到3178万吨，大大超过国家计划，比上年增产800万吨。钢材也比上年增加575万吨。

12日　安徽凤阳小岗村土地承包到户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定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中共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对大包干作总结，提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此前1978年5月，安徽省来安县县委书记王业美在十二里半公社十二里半生产大队搞大包干试点；与此同时，肥西县在肥西县山南区全区规模搞大包干改革。

13日　邓小平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1月12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18日—22日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会议。全会认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体系，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会议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原则同意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相应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

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8日—29日 全国部分省市财政、税务局长会议提出税制改革问题

财政部召开部分省、市财政、税务局长会议。财政部副部长忻元锡就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发表讲话。他指出，国际方面，对外贸易大发展，经济交往日繁，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形式，多种多样；国内方面，经济管理体制要改，财政管理体制也要改，形成中央一级财政，省市一级财政，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这些都要求税收制度拿出新办法，适应新变化。改革税制要本着有利于工业改组的原则，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不论对内对外，看准的，就可以出台。今后，税收的渠道要扩大，比重要增加。目前，出现级差收入，可以考虑开征所得税，资源优厚的可以开征资源税，固定资产要征固定资产税。这些都是战略措施，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要通过调研、试点、立法，逐项出台。

27日 枝柳铁路建成通车

枝柳铁路北起湖北枝城，南达广西柳州，全长885公里。是我国南北交通干线。工程投资20.91亿元。

28日 唐山开滦煤矿恢复生产

经过1年零5个月的艰苦努力，地震后的唐山开滦煤矿所属7个矿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煤炭日产量已达到震前水平。1978年我国煤炭产量突破6亿吨。

31日 197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国内生产总值362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工业总产值4231亿元，同比增长13.5%；农业总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9%；全年国有单位完成基建投资501亿元，

比上年增加119亿元，同比增长31%。全年财政总收入1121亿元，同比增长28.2%；财政总支出1111亿元，同比增长31.7%，收大于支10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64.9亿元，同比增长7.7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增长0.7%。外贸出口97.5亿美元，同比增长28.46%；外贸进口108.9亿美元，同比增长51.04%；逆差11.4亿元。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3.0477亿吨，同比增长7.8%；棉花216.7万吨，同比增长5.76%；钢材3178万吨，同比增长33.87%；原煤6.18亿吨，同比增长12。36%；原油1.0405亿吨，同比增长11.12%；发电量2566亿度，同比增长31.15%。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元。

1979年

1　月

1日—6日　陈云、邓小平提出压缩计划指标

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留有很大缺口的问题，阵云、邓小平同志相继指出要压缩计划指标。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1日、5日作了两次批示："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原来的规划要做一些调整，宁肯减少一些大项目。1985年钢产量不一定非搞到6000万吨不可。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调整了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1日　《人民日报》连续报道生产责任制

《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介绍四川、云南和广东省的部分社队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四川广汉县委决定从今年起，全县普遍推广"以产定工，超产奖励"的办法。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推广"包产到组"。广东省的社队普遍推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即在生产队统一支配生产资料和统一处理产品和收益分配的前提下，对作业组实行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励的责任制。

中美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访美国。

4日　邓小平谈旅游业要有大发展

邓小平与国务院负责同志谈话，专门讲到发展旅游业的问题。他指出，旅游业要有

大的发展。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

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

轻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轻工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从着重抓产量、产值转到抓质量、品种上来；努力扩大出口，换取更多的外汇，当年计划出口换汇 21 亿美元；搞好挖潜、革新、改造和新技术引进；按照轻工业特点搞好专业化生产与协作。

17 日　邓小平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

邓小平同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谈话。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 1958 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18 日—4 月 3 日　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京召开。1 月 18 日，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说明会议的由来、目的和方法。会议对“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一些理论方面的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3 月 30 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政治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　月

4 日—3 月 12 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

会议提出，工商行政管理要从全局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着眼于支持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要允许郊区农村社队和社员个人进城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工作，要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便利社员生活。

5 日—28 日　人民银行行长会议

会议确定：银行贷款工作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要逐步做到根据国家计划，按企业间的经济合同发放贷款，对没有经济合同的企业在贷款上要加以限制；对完成国家计划和执行合同好、经营管理好、信用好的企业应按优惠利率贷款；对积压物资多、资金周转慢的企业要从严掌握贷款；在贷款利率上也要有差别：占用贷款时间短，利率要

低；占用贷款时间长，利率要高。以促进企业精打细算，节约使用资金，盘活物资积压。

17日—3月5日　对越自卫反击战

我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被迫对越南侵略者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自广西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自卫反击战役，在越南同登、谅山地区，高平、七溪地区，老街、柑糖地区，给越军以歼灭性打击。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奉命自1979年3月5日起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23日　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国务院发出通知，为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管理，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务院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并对农业银行的任务和工作范围作了具体规定。中国农业银行于3月30日正式办公。

3　月

1日　国家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

国务院决定从当年3月份起，陆续提高18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其中粮食统购价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棉花平均提高15%，油料平均提高25%，生猪平均提高26%。牛肉、蛋、甜菜、甘蔗、大麻、苎麻、桑蚕茧、南方木材、牛奶、部分中药材、主要水产品等也适当提高。提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580.5亿元，比上年增长26.2%。其中，粮食征购1045.1亿斤，增加59.3亿斤；食用植物油21.9亿斤，增加5亿斤；肥猪1.29亿头，增加2000多万头；棉花按生产年度计算，增加22万担。

2日—22日　全国统计局长会议确定增加统计内容

会议确定建立和健全企业的原始记录和社队的台账制度；增加新的统计内容，主要有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旅游、科学技术和环境保护；建立92个重大建设项目的直接统计报告制度；恢复职工和农民的家计调查；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全国人口普查；系统整理建国30年的历史统计资料；加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和经济效果的分析研究；改进统计制度和方法。会议为国务院代拟《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机构》的文件。国务院于10月20日发布《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机构的决定》。

8日　陈云同志谈计划与市场问题

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市场调节部分。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忽视了市场调节的另一后果，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在今

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10日　国务院批准提高城乡居民和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款利率

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决定从1979年4月1日起提高城乡居民和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并增加储蓄种类和利率的档次，以及开办半年定期储蓄、5年长期储蓄存款。各种以月息计算的定期存款利率调整情况是：城乡居民零存整取储蓄定期一年从2.7厘提高到3厘；定期储蓄一年期从2.7厘提高到3.3厘；半年期3厘；三年期3.75厘；五年期4.2厘。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相应提高。提高存款利率后，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

13日　中国银行分设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为更好地发挥中国银行在新时期的作用，有必要适当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并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建议成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仍称中国银行，直属国务院领导。

辽宁元宝山电厂一号机组发电

我国东北地区电力建设的重点工程，辽宁赤峰市元宝山电厂一号机组并网发电。这台机组的发电能力为30万千瓦，主要设备从法国和瑞士引进，以附近的元宝山煤矿所产的低热值褐煤为主要燃料。

14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党中央。信中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并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定5—7年的计划，而且要制定直到2000年的计划；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

同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任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任秘书长。

21日—23日　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邓小平作重要讲话。陈云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9亿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单纯突出钢，不能持久；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3年。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1961年、1962年严重得多。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到2000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1985年搞6000万吨根本做不到。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到钢的质量、品种上。邓小平指出，

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

4月5日—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代表中央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去年财政增收200亿元，其中150亿元给了基本建设；引进工作搞急了，去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全部用现汇支付。1979年计划，基本建设规模、生产指标、利用外资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财力上留了不少的缺口。根据上述情况，从1979年起要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

5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下达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对原订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经调整后下达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由原定的5%—6%调整为4%；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由原定的10%—12%调整为8%，其中轻工业增长8.3%，重工业增长7.6%；粮食产量由原定的6395亿斤调整为6250亿斤，棉花由原定的4834万担调减为4800万担；煤炭由65800万吨调整为62000万吨；钢由3400万吨调整为3200万吨；财政收入由1260亿元调整为1120亿元；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由457亿元调减为360亿元，加上用外汇贷款安排的投资，基建总规模为400亿元。

25日　龚嘴水电站全部建成

我国西南地区目前最大的水电站龚嘴电站的最后一台机组并网发电，该电站的发电能力为75万千瓦。

4　月

3日　中共中央批转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7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3个县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会议集中讨论了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认为，各地实行的联系产量责任制，具体办法多种多样，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除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外，都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独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应当允许。

13日—5月6日　全国财政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确定，按照经济合理、择优供应的原则，坚决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大力支持花钱少、收效快、利润多、创汇高的轻纺工业的发展，从中央掌握分配的资金中拿出5.5亿元用于轻纺工业的挖潜改造；坚决维护应当上缴国家的收入，任何人不得以“试点”为名，自立政策挤占国家收入；超过补贴定额的亏损、超计划和计划外亏损，财政

一律不补贴；调整价格、工资和奖金，要按国家统一规定办；坚决把基建拨款控制在国家预算之内，今年基建拨款在计划调整时一次核定，统筹安排包干使用；坚决防止相互拖欠贷款，严格结算纪律；严格控制其他各项财政支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财政监督和财政纪律。

25 日　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决定重新设立保险机构，恢复国内保险业务。至 1980 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除西藏）各省市自治区都恢复了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

5　月

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农业委员会的任务和机构的通知》。《通知》明确，国家农委是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

5 日—26 日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

财政部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税务会议。税务总局局长刘志诚就适应新形势、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税制改革的原则、设想、步骤等问题发表讲话。会议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要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并逐步向自负盈亏的方向发展。这一改革，财政统收统支的办法就不适应了，主要用税收形式来调节企业收入，这是必然的趋势。改革税制的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根据轻重缓急和主观力量的可能，妥善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出台。

3 月份，财政部税务总局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税务局干部，在江苏省无锡市进行税制改革调研，提出了工商税制改革的意见，并对增值税、国营企业所得税作调查测算。此后又在湖北省光化县进行国营企业改上缴利润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实行 5 级超额累进税，1979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

14 日　中美草签两国贸易关系协定

中、美两国政府草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25 日　国家确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

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 3 个城市选择“首钢”、“上汽”等 8 家企业，按照《关于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纪要》提出的改革内容，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

4 月，国家经委在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会议提出，企业管理改革必须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要求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权、财权、物资权、外贸权、劳动招工权、职工奖罚、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等项权力。

6 月

16 日—29 日 国务院财经委讨论宝钢建设问题

国务院财经委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会议指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第一个特大型建设项目，本应用更多一点时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来考虑决定。现在看来决定得仓促了。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进度是好的。现在既已决定建设，就应当统一全党认识，协力同心，勇往直前，一干到底，建设规模可以按今年 5 月 9 日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中国银行《关于宝钢建设工程安排的报告》办。建设期限必要时可延长一两年，不要操之过急。对外应签未签的合同，可即着手签订。会议决定由谷牧，韩光、叶志强、陈锦华负责宝钢建设。

国家计委等 7 部门关于宝钢建设工作的安排意见是：1984 年全部建成，建设用汇由上年底预计的 57 亿美元调减为 48 亿美元，国内再投资 70 亿元。48 亿美元外汇中，宝钢本身用汇 43 亿美元，煤、电、运和机械制造用汇 5 亿美元；国内投资 70 亿元中，宝钢用 48 亿元，煤、电、运用 22 亿元。

18 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受国务院的委托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报告》提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它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必须努力打好。《报告》强调指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保证我国现代化事业真正能够脚踏实地地向前发展所必须采取的完全积极的方针。要求全国人民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第一年，一致动员起来，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和各行各业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个以高产、优质、低消耗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运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计划。

22 日 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和财政部长张劲夫受国务院委托，分别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1978 年国家决算和 1979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点是加快农业的发展，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加强煤、油、电、运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建设。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城乡人民的生活继续有所改善。1979 年计划安排：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 4%；工业生产比上年增长 8%，其中轻工业增长 8.3%，重工业增长 7.6%；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360 亿元，加上利用贷款安排的基本建设，总额为 400 亿元，保持上年的实际水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7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6%。进出口总额 4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

实现计划的主要措施：集中主要力量把农业发展搞得快一点；千方百计加快轻纺工

业的发展；从增产和节约两个方面采取措施，逐步缓和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切实提高投资效果；大力增加出口，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努力增加商品供应，安排好国内市场；积极发展科学事业和文教卫生事业。

1978年国家财政决算：全年财政总收入为1121.11亿元，财政总支出为1110.93亿元，收支相抵，结余10.18亿元。同上年相比，财政收入增长28.2%，财政支出增长31.7%。1979年国家预算草案，总收入和总支出各安排1120亿元。国家预算总收入相当于上年决算数的水平，这是因为今年提高农副产品价格、调整部分职工工资、减免一部分农村税收、扩大劳动就业和试行企业基金制度等因素影响了财政收入。如果按上年的可比口径计算，1979年的总收入应当是1286亿元，比上年决算数增长14.7%。

1979年国家财政的任务是：在大力整顿企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合理安排各项支出，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加强煤、电、油、运等薄弱环节，加强文教科学事业，加强国防战备，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通过财政工作的整顿，切实搞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管理，坚持量入为出，力争收支平衡。

7　月

1日　全国人大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8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布委员长令第7号公布实施。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合营者按照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协议、合同、章程在合营企业的投资、应分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合营企业职工的雇用、解雇，依法由合营各方的协议、合同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合营企业开始获利的头两年至三年可申请减免所得税；外国合营者将分得的净利润用于在中国境内再投资时，可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合营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应尽先在中国购买，也可由合营企业自筹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鼓励合营企业向中国境外销售产品，合营企业产品也可在中国市场销售。

3日　国务院印发社队企业发展若干问题规定

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提出，为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今后新办的小铁矿、小煤窑、小电站、小水泥厂从开办起免税3年；其他新办企业在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经省、市、自治区确定，可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2—3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5年，灾区社队从事自救性的生产，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征或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

说明 已被1996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1990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代替。

8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伯托投资公司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各部门、各地方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有关法令，主要是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国务院决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为荣毅仁、雷任民、吴志超。

11日 中国人民银行试行信贷差颤控制管理体制

人民银行下达《信贷差额控制试行办法》，将现行的"统收统支"信贷计划管理体制改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从1979年7月1日起，在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湖北省、天津市、陕西省分行试行。

13日 国务院印发国胃企业扩大自主权的五个文件

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五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可据此在工业、交通系统选择少数企业组织试点。五个文件是：《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

五项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经营有盈余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在增加盈利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对企业实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制度；为鼓励企业发展新产品，有关新产品的费用可以规定一定的比例，从企业实现的利润中留用。

文件还规定，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条件可以制定补充计划，产品可以自行销售，可以承担协作任务和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企业有权向主管部门申请出口自己的商品，按规定取得外汇分成；有权按国家劳动计划择优录取职工；有权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任免中层以下干部；对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可以实行有偿转让或出租。按国务院的部署，截至年底，全国已有3000多个企业进行了试点。

法规名称 《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说明** 主要内容与1988年4月13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等不相适应。

法规名称 《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说明** 主要内容与1995年5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不相适应。

国家改革财政管理办法

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财政管理办

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财政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拟定了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两种方案：一种是“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另一种是“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前一种办法是比较彻底的改革方案，但考虑到实行这种办法，必须以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前提，目前不具备条件。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办法，作为过渡。同时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四川省进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办法的试点。

《规定》明确：按照确定的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参照各省、市最近三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情况，确定收入上缴和留用的比例，由地方实行包干，一定三年不变。比例确定以后，应当上缴中央的收入，由中央统一安排；留给地方的收入，由地方统筹安排，用于解决本身的各项开支。凡收入小于支出，收入全部留给地方，中央确定固定补助数字，一定三年不变；对收入分成低于20%的地区，其收入比上年增长的部分，另给5%—10%的分成。今后，中央各主管部门对于应当由地方安排的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不再归口安排支出，也不再向地方分配财政支出指标。为帮助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老革命根据地和经济基础比较差的地区加快发展生产，中央财政设立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此项基金，按国家财政支出总额2%计算，由中央专案拨款，重点使用。各省、市收入上缴和留用的比例，以及受补助地区的固定补助数额，由财政部同有关省、市分别协商确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省，从1980年开始，外贸和外汇收入以1978年实绩为基数，财政和基建投资以1979年实绩为基数，五年内除外贸出口外汇增长部分上缴中央三成以外，财政和其他各项外汇收入的增长部分全部留给省，由省内综合平衡，包干安排；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的包干办法。福建省贸易外汇收入以1978年为基数，近两年外汇增长部分全部留省，1982年至1984年增长部分上缴三成、省留七成。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在财政管理体制上，对两省实行“划分收支，定额外负担上交（补助），五年不变”的包干办法。

广东省委于1979年1月首次提出要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在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向中央建议在广东创办出口加工区，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邓小平指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12月17日，广东省委建议，认为特区的名称还是以“经济特区”为好。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26日—8月9日　全国物价工资会议决定提高部分副食品销售价格和部分职工工资

国务院召开全国物价工资会议，主要研究调整农副产品销价和副食品价格补贴，以及增加职工工资等问题。会议确定，粮食、食油、棉布、食糖和市场用煤等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销售价格不作变动；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8种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适当提高。以1978年为基期，猪肉提高33%、鲜蛋提高32%、水产品提高33%、牛羊肉基本同当地猪肉销价提高幅度，蔬菜要尽量不提或少提；职工每月价格补贴5元，于11月1日开始实行，同时提升部分职工工资级别，并将国家机关、文教、科研、卫生、体育、财贸等部门实行的三、四类工资级别各提高一类。在进行调资和提高地区类别的同时，冲销一部分粮（煤）价补贴和一部分附加工资。1979年职工价格补贴和工资级别升级共支出10.2亿元。

8　月

13日　国务院对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作出规定

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要求实行出口商品分级管理，扩大地方经营范围；大力组织商品对外销售，认真完成国家出口收汇计划；加强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工作；成立专业公司；增加外贸口岸，调整口岸分工；广开出口门路，逐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实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留成；对以进养出的物资实行优惠税率；扩大生产企业办外贸的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改变出口贸易收汇结算办法和兑换牌价；出国开办企业；试办出口特区。

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着力解决城市知识青年就业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北京市《关于安排城市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批转全国。全国亟待安排就业的人员达800多万人，其中城市知识青年约占57%。北京市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批示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广开就业门路，大力组织集体所有制和各种生产服务事业，解决了多数青年就业问题。北京市的经验转发以后，全国各地大小城镇参照北京经验，广开就业门路。截至年底，全国共安置就业人员（含统一分配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共902.6万人，其中城镇新安排人员达800万人，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

28日　基本建设投资试行“拨改贷”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和《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并发给各地区、各部门试行。《办法》规定，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工业、交通运输、农垦、畜牧、水产、商业和旅游等各类企业进行基本建设所需资金都可以贷款，贷款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贷款业务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负责办理。贷款基金由国家财政从当年基本建设预算拨款中拨给；地方财政用机动财力安排的基本建设贷款基金，由省、市、自治区在地方自筹基本建设资金中解决，贷款规模应当控制在自筹基建指标之内。1979、1980年先在轻工、纺织、旅游等行业和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中选择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建设条件

好的项目以及交通、铁道、旅游等部门买车、买船等方面的投资进行试点。这是投资试行拨款改贷款试点的开始。

说明 主要内容与1995年5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不相适应。

9 月

1日—9日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国家旅游总局在北戴河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旅游管理体制要实行企业化，搞经济核算，按经济规律办事。发挥地方积极性，在财务上应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地方旅游外汇留成一般为40%，新开辟的旅游区头三年收汇留给地方用于旅游区建设。

2日—24日 国务院财经委讨论经济计划安排

国务院财经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1980、1981两年计划安排。国家计委在汇报中强调要兼顾国家建设项目和国外进口项目的需要；要兼顾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建议198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250亿元，把12个国外进口的成套设备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40亿元用外汇贷款解决，同国内财政脱钩。按国家计委提出的计划，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财政有几十亿元赤字，外汇收支差额高达89亿美元，物资也不平衡。

陈云于9月18日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我们现在借到44亿美元自由外汇，明年不可能借到50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作基建投资。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决不能这样做。这将无以为继。对所借外汇要加以区别，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实现四个现代化重点应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

9日 中国银行收回被冀冻结的资产

国务院发布命令，授权中国银行收回被美国政府冻结的中国资产。10日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发布公告，被美冻结的资产收回、提取后，属于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原属私营工商企业的，由中国银行同有关单位进行结算；属于中国公民的个人资产全部归持有人所有。资产登记期限由即日起至1979年12月31日。

28日 中共中央制定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提出当前加快农业发展的25项政策，主要内容：（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二）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三）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四）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

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五）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多数社员又不同意的时候，搞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六）今后三、五年内，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18%；农业事业费和支援社队的支出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8%。（七）对农业的贷款，从现在起到1985年，要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国家要有计划地发放专项长期低息或微息贷款，有的10年，有的15年，有的可以到本世纪末。（八）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的收购价格，也要根据不同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九）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并且从1979年起减少50亿斤。（十）继续坚决地、大力地、因地制宜地搞好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储运、加工所需要的农业基本建设。（十一）要在充分利用现有耕地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由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有计划地开垦荒地。社、队新造耕地，从收获之年起，5年不计征购。（十二）努力办好国营农场，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

（十三）迅速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和各种除草剂的生产，并保证产品质量。（十四）积极选育、引进和推广良种。（十五）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机械化，提高牧业机械的比重。（十六）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认真抓好棉花、油料、糖料等各项经济作物，抓好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实行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十七）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注意提高成活率。要集中力量营造西北、华北、东北一线防护林体系，华北、中原、东北等地的农田林网化和四旁绿化，长江以南十省的速生用材林，南方、北方的经济林基地，东北林区的迹地更新等重点建设。（十八）大力发展畜牧业，提高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十九）合理利用水产资源，加速渔业生产，增加水产品产量。（二十）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逐步提高社队企业的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凡是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社队企业加工。国家对社队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一十一）商业工作要认真贯彻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搞好城乡物资交流。（二十二）农业要努力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国家决定拨出一笔专项外汇，用于支援各省、市、自治区发展经济作物、土特产、畜牧业、副业、渔业以及相应的加工工业。具体办法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二十三）我国西北、西南一些地区以及其他一些革命老根据地、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长期低产缺粮，群众生活贫困。这些地方生产发展快慢，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国务院要设立一个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统筹规划和组织力量，从财政、物资和技术上给这些地区以重点扶持，帮助它们发展生产，摆脱贫困。（一十四）必须坚决地继续努力实行计划生育。（二十五）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10　月

2日　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建成

国家重点项目我国最大的现代化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及其配套工程竣工。该项工程于1975年开始建设，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总投资5320万元。

4日　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邓小平在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对经济工作发表意见。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应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政治问题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要用经济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邓小平指出，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外资有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邓小平指出，财政体制，总的来说，我们是比较集中的。有些需要下放的，需要给地方上一些，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总的方针应该是这样。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现在对财政、银行，有很多反映。有的好项目只花几十万元，就能立即见效，但是财政制度或者是银行制度不允许，一下子就卡死了。财政、银行应该支持，这样就活起来了。这不是个简单的财政集中分散的问题。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

4日—10日　中央政治局对1980年计划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确定1980年计划盘子。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讲了几点意见：明后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按200亿元左右定下来；大中型项目再减掉几百个；22个引进项目该减则减，不要犹豫；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按6%定下来，争取达到7%—8%。财政体制，江苏按原定办法再搞一年，广东、福建继续按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办；四川按划分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支两级计划、两级财政试点；其他省按四川的办法作准备。

10日　我国在南海打出第一口高产油井

地质部南海地质调查指挥部所属第四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在南海“珠江口盆地”打出第一口高产油井，原油从距海底2000多米的地层深处喷出。这块具有巨大含油气前景的盆地，是我国石油地质勘探的重大发现。

11　月

20日—12月21日　全国计划会议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80、1981两年的计划安排，讨论确定了财政体制改革。在拟定1980、1981两年计划中遇到以下问题：因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安排劳动就业、增加职工工资，以及工业增长速度下降，1980年国家财政收入将减少；因调整煤炭采掘、石油采储、木材采育比例，1980年、1981年煤炭产量增长不多，石油产量大体维持1979年水平，木材产量下降；由于财政收入下降，基本建设拨款要减少很多，加上钢材、木材、水泥供应不足，基本建设规模必须大大压缩；自由外汇不足，1978年签订合同的22个引进项目不能全部按原来设想进行建设；社会购买力增长幅度大，轻纺工业和其他消费品生产增长慢，市场供需之间有较大的差额。

根据上述情况，会议确定1980、1981两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对比价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进行必要的调整，大力安排城镇待业人员，基本解决就业问题。严格控制销售物价的提高；争取农业每年递增4%、轻工业每年递增8%，同城乡人民购买力大体相适应；通过挖潜、革新、改造措施，通过整顿和改组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品种，降低消耗，使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逐步有所缓和，增加财政收入；缩短基建战线，使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相适应。投资重点放在农业、轻工业和煤、油、电、运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大力增加出口。

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8%，工业总产值增长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80亿元；进出口总额181—191亿美元；国家财政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241亿元，比上年减少110亿元；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785个，比上年减少202个；国家财政收入982亿元，财政支出1022亿元，赤字40亿元。主要产品产量指标：粮食32225万吨，棉花240万吨，原煤60600万吨，原油10600万吨，发电量2900亿度，钢3300万吨。

全国财政体制，除京、津、沪外，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照顾办法，广西、内蒙古等8个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体制，江苏仍按原办法执行，其余15个省实行“四川式”体制，即：“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实行中央、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当年的财政赤字绝大部分由中央负担

26日　邓小平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邓小平在谈话时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30日 人民银行与农业银行划分业务范围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发出《关于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业务范围划分的通知》。《通知》规定，从1980年1月1日起，将各种农业贷款，国营农牧场、渔场、企业事业单位存贷款，国营农场办的工业、商业、供销企业存贷款，农工商联合企业存贷款，信用社存贷款，各种农业专项贷款，全部农产品预购金贷款，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存贷款等业务，划归为农业银行业务；县城的储蓄存款，县（市）以下大型工矿企业、林区和部队驻地，仍然由人民银行收储，作为城镇储蓄。

12 月

3日 国务院财经委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设想

国务院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提出《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设想的初步意见》。《意见》对经济改革提出三种设想，一是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二是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三是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此为前提，该放的放，该收的收。

6日 邓小平谈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谈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努力。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候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那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地，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

27日 我国人工合成桉糖核酸半分子

我国科学家用人工合成方法合成了有41个核苷酸组成的核糖核酸半分子，为天然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打开一条通路，它标志着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人工核糖核酸的合成对遗传工程、病毒、肿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31日 我国出现建国以来最大财政赤字

1979年财政总收入1103.3亿元，总支出1273.9亿元，支大于收170.6亿元（初步数字，后经调整有所减少），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一是物价补贴急剧增加，价格补贴由上年93.9亿元增加到180.7亿元；二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一部分农村税收，财政增支减收98亿元；三是扩大就业，增加职工工资，实行奖励制度，超过预算25亿元；四是扩大地方和企业财权超预算20亿元；农业各项支农费用超预算19.6亿元；增加轻纺工业技措费和专项贷款15亿元；国防战备费超预算20.4亿元；基建开支超预算53亿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支出十几亿元。为弥补赤字，国家动用历年财政结余80.4亿元，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2亿

元，银行增发货币56亿元。1979年的财政赤字对经济尚未发生明显的影响。主要因为：当年农业丰收，轻纺工业增产多，基本满足市场供应；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减轻市场压力；地方和企业的机动财力转为银行存款，对财政赤字起到缓冲作用。

197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国内生产总值4038.2亿元，比上年增长7.6%；工业总产值4591亿元，同比增长8.5%；农业总产值1584亿元，同比增长8.6%；全年国有单位完成基建投资500亿元，同比增长4.4%，有118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产；财政总收入1146.38亿元，同比增长1.2%；财政总支出1281.79亿元，同比增长14.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52.5亿元，同比增长1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增长2%。外贸出口136.6亿美元，同比增长40.1%；外贸进口156.7亿美元，同比增长43.9%，逆差20.1亿美元；借用国外资金18亿美元，对外负债30.6亿美元。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3.3212亿吨，同比增长8.97%；棉花220.7万吨，同比增长1.85%；钢3448万吨，同比增长8.5%；原煤6.35亿吨，同比增长2.75%；原油1.0601亿吨，同比增长2.02%；发电量2820亿度，同比增长9.9%。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60.2元，增长19.9%；城镇职工工资总额646亿元，比上年增加77亿元。

1980年

1　月

1日　邓小平谈要做好四件事

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80年代是实现四化的重要年代，我们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就是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他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4日—23日　全国物价会议提出千方百计保持物价稳定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总局召开全国物价会议。会议提出，1980年要千方百计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在农产品价格方面，1980年准备只把棉花、黄麻、松脂的收购价格适当提高，提价总额约9亿多元。东北、内蒙古木材出厂价格提高30%，下半年开始执行。全国木材价格提高以后，轻工市场用材供销价格不动，采取财政补贴的办法解决。在重工业品价格方面，提高焦炭、生铁的出厂价格，但轻工市场产品用铁的出厂

价格不作变动，其价差作为炼铁厂政策性亏损处理。其次，适当提高铁矿石、硼矿石、白银（保温瓶、镜子用银和少数民族特需用银）价格不动。钨、锑、结晶硅等的价格，水泥、硼砂、硼酸等出厂价格也适当提高。少数机械产品价格作有升有降的调整。以上重工业品的提价金额约计19亿多元。在轻纺工业品价格方面，1980年调价的面要尽可能缩小，特别是上半年要尽量少动。肥皂、保温瓶、小灯泡等三种商品，由于原料提价，工厂发生亏损，经过努力仍然解决不了的，可以适当提高出厂价格或采取商品补贴的办法解决，市场销价不动。市场销价变动的是西药、塑料制品等适当降价，陶瓷制品、糖制品等适当提价，升降金额各约2亿元。此外，电话月租费和一、二等船舱的票价偏低，拟适当提高，全年提价金额约1亿元。

5日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

会议指出，1980年的主要工作是：1. 增加货币回笼，控制货币投放，加强金融市场管理，努力实现信贷平衡。2. 继续把组织和筹集资金摆在银行业务工作首位，壮大支持生产建设的信贷资金力量。3. 继续改革和加强信贷工作，发挥信贷的杠杆作用，更有力地支持企业挖掘生产潜力，增加商品供应，促进经济调整。4. 全面开展银行内部管理制度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节约、合理使用信贷资金。5. 改进结算工作，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6.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抓紧干部培训教育工作。7. 加强金融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加强调查研究和综合反映。

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市场流通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维护人民币统一市场，禁止外币在国内市场流通的报告》。国务院要求，要把收取外币的单位压缩到最小限度，极少数单位有必要直接收取外币的，应由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并提出意见报国务院批准。本年内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后，应立即停止直接收取外币。

7日　国家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

国家决定1980年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确保轻工业、纺织工业、手工业加快发展步伐。六个优先是：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同月14日，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的报告，决定在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措施费以外，每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发放20亿元轻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贷款和3亿美元的买方外汇贷款。1980年实际累计发放轻纺专项贷款16.3亿元，加上一般设备贷款中用于轻纺工业的9.9亿元，共计26.2亿元。1980年安排“三大件”专项贷款2.2亿元，当年增产自行车69万辆，缝纫机44万架，手表73万只，全部建成后可使“三大件”生产能力提高50%—60%。据已经竣工投产和部分投产的5600多个项目统计，1980年共增加轻纺工业产值34亿元，相当于当年轻工部、纺织部系统新增产值的14%。轻纺专项贷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戴帽项目，贷款金额大，征地和施工力量有困难，进度缓慢，少数项目有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

9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海关管理体制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全国海关建制收归中

央统一管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各地海关受所在省、市、自治区政府监督指导；关税收入统一归中央。

15日—18日　中国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管理大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成立于1977年，其宗旨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项目，首先是为粮食生产提供资金。成员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发达国家，第二类是石油输出国，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类成员国。

16日　邓小平提出中国争取本世纪末成为小康社会

中共中央召开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归还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在今后十年中努力为在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做出决定性的成绩，这是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由于中国人多，耕地少，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到本世纪末，要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1000美金，成为一个小康社会。

22日　国务院下发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

这个试行办法，对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进行了修订：1. 把原定的全额利润留成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企业当年利润高于上年利润的，其中，相当于上年利润的部分，按核定比例提取基数利润留成资金；比上年增长的利润部分，另按国家规定比例提取增长利润留成资金。基数利润留成比例核定以后，原则上3年不变。2. 企业增长利润留成的比例，按照不同行业，分别规定为：石油、电力、石油化工和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等赢利水平较高的企业10%；冶金、机械、电子、化工、轻工、纺织、建材、森工、铁路、交通运输和其他企业20%；煤炭、邮电、民航、农机企业30%。3. 工业企业必须完成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才能按照核定和规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润留成资金。四项计划指标中，每少完成一项，扣减其应提利润留成资金的10%。4. 企业从基数利润中提取的利润留成资金，按照核定的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的留成比例分别提取、分别管理和使用。企业从增长利润额中提取的利润留成资金，用于发展生产的部分不得少于60%，用于职工福利设施和职工奖金的部分不得超过40%，发给职工的奖金，除国家规定的节约奖外，都在职工奖励基金中开支。

22日—2月6日　全国电力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决定，1980年要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争取多发电100亿度，多装机100万千瓦。

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反对浪费发出通知

《通知》提出了13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节约公用经费；精简各种会议；控制差旅

费；压缩购买费开支；节约办公费用；控制小汽车使用；勤俭办外事；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严禁私分产品和国家财物；整顿宾馆、招待所；对行政、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办法；整顿劳保福利开支和奖金、津贴；整顿人员编制。

25 日　全国冶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1980 年，冶金工业部门要坚持又让上，全面提高。让，就是服从全局，不争投资，坚决按国家计划压缩冶金工业投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上，就是要大力降低能源消耗和其他消耗，用节约下来的原料、材料、燃料努力增加生产。会议确定 1980 年冶金部门要做好 10 件事：1. 要比 1979 年增产 100 万吨短线钢材；2. 把用户复验合格率作为衡量冶金产品的质量标准；3. 主要冶金产品要达到进入国际市场的水平；4. 武钢一米七轧机要正常地生产，拿出合乎世界水平的钢材；5. 抓好宝钢及江西铜基地、贵州铝厂三个大型引进项目的建设；6. 搞好矿山调整；7. 解决一批军工所需金属材料的品种、质量问题；8. 钢材成材率再提高 1%；9. 重点钢铁企业节约 150 万吨标准煤；10. 利润超过 1979 年水平。

国务院拨专款为知识分子建住宅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专项拨款为高级知识分子建设住宅。197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批准专项拨款 1 亿元，为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卫生部系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建设住宅。198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准专项拨款 300 万元，为社会科学院、文化部、文联；作协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建设一批住宅。这两次批准建设的高级知识分子住宅共 83 万平方米，投资 1.3 亿元。

28 日　辽河油田建成

位于辽宁省沈阳、营口、锦州之间的辽河油田建成。该油田从 1970 年开发建设，目前年产原油的能力已达 500 万吨，天然气 17 亿立方米，成为全国主要油田之一。

2　月

1 日　我国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国务院下达了《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具体办法是：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地方财政收支的包干基数，以 1979 年财政收支预计执行数为基础计算确定。凡是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地区，多余部分按一定的比例上缴；支出大于收入的地区，不足部分从工商税中按一定的比例留给地方；有些地区，工商税全部留给地方，收入仍然小于支出的，不足部分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助。分成比例或补助数额确定以后，原则上 5 年不变，地方多收了可以多支出。对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老革命根据地和经济基础比较差的地区，中央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此项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当逐步达到 2%，并由财政部掌握分配。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管理体制，仍保留原来的特殊规定，但中央对民族自治地区的补助数额，由一年一定改为一定 5 年不变、实行包干的办法，5 年内收入增长的部分全部留给地方。同时，为了照顾民族自治

区发展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的补助数额每年递增10%。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以后，中央各企业、事业主管部门，对于应当由地方安排的各项事业，不再归口安排支出，也不再向地方分配财政支出指标。但是，中央各部门仍应提出指导方针和工作方向，制定政策措施，检查经济效果，帮助地方把事情办好。

4日　国务院明确国家计委职责范围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国家计委的工作任务是，在国务院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在各部门、各地方工作的基础上，集中全力搞好综合平衡，拟订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中期和年度的计划，包括工农业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商品流转计划、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平衡计划、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计划、综合财政计划、物资分配计划、人口计划、劳动工资和集体福利计划等。在长期（10年或10年以上）、中期（5年）和年度计划中，以拟订中期计划作为工作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任务，进行以下几项经常工作：1. 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相互间的比例关系和发展速度，以及有关的方针、政策。2. 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妥善地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3. 研究生产力的合理配置，搞好地区布局和大中小城市的布局。4. 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在国民经济中采用先进技术的问题。5. 审查由国家投资和利用国外贷款进行的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条件、建成后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合理性。6. 研究生产、建设、流通等领域中提高经济效果的重大措施。7. 研究国际经济，拟定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利用世界市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途径和重大措施。8. 指导地方和部门的计划工作，审查他们拟订的计划，组织块块之间、条条之间、条块之间的协调。9. 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计划的执行情况。10. 研究和采用科学的计划方法，改进计划体制，组织和指导计划工作干部的培训。

8日　“三废”利用产品减免税收

财政部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联合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凡属治理污染、开展“三废”综合利用所生产的产品利润，可在几年内不上交。通知重申，利用“三废”作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减免税收。

10日　李先念谈经济问题

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经济调整的方针任务，提出，要努力争取农、林、牧、副、渔五业有一个全面的增长，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左右。争取轻工业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轻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8%，或者更多一些，使轻工业继续以超过重工业增长的速度前进；努力增产和厉行节约，使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逐步有所缓和，使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经济效果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合理调整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重工业的生产，使之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从根本上改变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的状况，使投资的使用方向趋于合理等等。

12日　设立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

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和

归口管理机械工业（包括电子工业）。其管理范围是：一机部（包括一机部代管的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四机部（包括四机部代管的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六机部、农机部的工作；协同国防科技、工业管理机构安排国防工业企业的民品生产，组织民用机械工业企业优先保证完成合同规定的国防科研、试制、生产等任务；统一规划和协调国务院其他部门管理的民用机械制造工业和各省、市、自治区管理的民用机械工业。

13日 国务院决定编制1981—1990年十年规划

国务院发出《关于拟定长期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决定，从现在起着手制定1981—199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年内先搞出一个1981—199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内容包括：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比例关系，各行各业必须采取的技术政策，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各项事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设想。

14日 国家分批开办长江对外贸易运输港口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等六个部门《关于开办长江对外贸易运输港口的报告》，同意1980年3月开办江苏张家港、南通、南京三港；4月开办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湖北武汉、湖南城陵矶、四川重庆五港办理外贸运输，并同意先对国轮办理外贸运输业务，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对外轮开放张家港、南京港、南通港。

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

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在全会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三中全会主要解决的是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这次会议解决的是组织路线。当前最重要的是选好接班人，必须注意从比较年轻的和各方面表现较好的同志中选一批接班人。还有一个要改进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从中央书记处建立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能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

25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工业部门开展进出口业务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防工办《关于国防工业部门对外开展进出口工作的报告》，原则同意《关于国防工业部门进出口工作若干暂行规定》。国防工业各部门要组成"32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直接对外经营国防工业的进出口业务。各公司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防工办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

3 月

4日—5日 经援项目试行投资包干制

对外经济联络部召开全国对外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对外经济工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认真做好双边援助工作，逐步改革对外经济援助管理制度和办法，积极

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其他收费项目业务，逐步扩大生产技术合作，搞好多边合作。1980年初步计划援外支出9.2亿元。为了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管理，要试行投资包干制，国家把经援项目的全部工作包给一个单位（部门或地区），由它按照对外协议（合同）的规定，全面负起该项目的经济、技术责任，所需费用按对外商定的价格和有关规定包干使用，包干节余由承包单位按国家规定支配使用。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指示指出，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2.7%，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占第120位。由于森林少，而且不断遭到破坏，使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不能有效地减免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保障农业高产稳产，木材和林副产品也十分短缺。指示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力争使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0%，各地要尽快做出植树造林和提高森林覆盖率的规划，提出五年、十年和本世纪末分别达到的目标。到1985年，要基本实现平原地区的农田林网化和"四旁"绿化；林区的迹地更新要跟上采伐，并还清旧账；主要经济林产品要达到或者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要绿化居民点及附近的宜林荒山荒地。为完成上述任务，要坚持贯彻依靠社队集体造林为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并鼓励社员个人植树的方针。集体的荒山荒地，要在统一规划下，实行社造社有，队造队有，合造共有的政策。对完成任务好的社队实行奖励制度。要鼓励社员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植树造林。在荒山荒地多、群众缺柴的地方，还可以划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山或荒沙荒滩，植树种草，产品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并可在集市上出售。社队附近的国有荒山荒地，国家近期无力造林的，可由社队造林，地权不变，林木归社队所有。工厂、矿山、机关、学校等单位住地和部队营区以及农场、林场经营的地区，由各主管单位植树种草，自造自有。铁路、公路、河渠两侧，水库周围，由这些单位自造自有；也可以与社队合作造林，比例分成；或者由附近社队造林，林木归社队所有。

7日　全国电子工业领导干部会议提出调整地方电子企业

会议指出，近几年来，全国地方电子工业发展很快，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一定的生产能力，承担着一部分军用产品和大部分民用电子产品的生产任务，成为我国电子工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地方电子工业厂点分散，力量不集中，骨干企业少，管理体制多样，产品有长有短，存在着比例失调现象。因此，要充分发挥地方电子工业的作用，必须首先搞好企业的调整，对于那些产品重复、质量低、消耗大、成本高、生产条件差的工厂，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关、停、并、转。

10日—25日　全国商业局长座谈会提出改革商品购销形式

会议提出对工业品分别实行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四种形式，减少商品流转环节，筹建全国性的工业品贸易中心，改革商业企业经营机构，将商业企业分为三类公司管理，整顿商业企业，继续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积极发展集体商业，加强商业设施建设，其中重申城市新建居民住宅应坚持拨出7%左右面积作为商业用房等。

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

会议确定，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西藏的中心任务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

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会议提出西藏的建设方针是：以发展农、牧业为主，逐步地调整好农、牧、林、副、渔业生产的布局；充分发挥现有工业企业的作用；努力发展商业、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

5月，胡耀邦和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在和当地同志共同讨论后，提出了需要做好的六件大事：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力。二、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三、在所有的经济战线上实行特殊的、适合西藏的灵活政策。四、把国家支援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用到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上来。五、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争取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历史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要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

根据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精神，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广西、新疆等自治区、省都提出了各自发展经济的方针，并放宽了各项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7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家能源委员会成立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小组成员；撤销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时，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任主任。

21日—4月14日　全国基本建设会议提出继续清理在建项目

鉴于1979年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建设项目仍然过多，总规模仍然过大，基本建设调整的任务仍然很重。为此，会议提出：一、继续搞好在建项目清理。对于未列入1980年计划的120个计划外项目，应全部停下来进行清理。除极少数花钱不多、又能在年内投产、销号的项目外，一律不得恢复建设。对于已经建了10年以上还没有收摊子的项目，要采取果断措施，除极少数外，1981年不再安排基建投资。对于列入1980年计划的199个收尾项目，要力争在年内收尾销号，不得拖期。对22个引进项目，要认真审查。有的要集中力量尽快保上去，有的要适当缩小规模，有的要坚决推迟进度，有的暂不上马。对于其他在建的大中型项目，要按照调整国民经济的要求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严格审查。二、扩大基建投资由银行贷款的试点范围。1980年，要再选一批项目进行贷款试点。从1981年起，《基本建设贷款条例》中规定应该实行贷款的各类建设项目，如轻纺、化工、建材、油气田开发、火电站、民用机械、旅游等，应当按照有偿使用国家投资的原则，凡有条件的，一律改为贷款。三、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前提下，可以自行承揽部分施工任务。企业在不超过工资总额计划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当地劳动部门直接招用临时工。需要增加固定职工时，企业有权择优录取。凡有条件的施工单位，都要积极实行计件工资。自1980年起，法定利润按工程预算成本的2.5%计取，3年内不上交。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按规定提取的企业基金后，50%上交财政，50%留给企业；增

长部分，企业留成80%，上交20%。地方国营施工企业的技术装备费，自1981年起国家不再拨款，由施工单位按承包建筑安装工作量3%列人预算，单独计取，不足部分由企业向银行贷款。四、改进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工作。对中央各部直属供应的大中型项目，要逐步实行按设计概算和建设进度分配供应材料。对地方项目所需的钢材、木材、水泥，应由建委统一分配和调度。无论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实行由施工企业包工包料，所需材料直接供应施工单位。

22日　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加速发展畜牧业的报告

我国牧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3.3%，每人年平均猪、牛、羊肉18斤、奶2斤、蛋4斤，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报告提出，要充分利用我国自然资源，加快发展畜牧业。1981年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要达到205亿斤，平均每人21斤。1985年，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达到300亿斤左右，平均每人30斤；禽蛋达到100亿斤，平均每人10斤；鲜奶达到100亿斤，平均每人10斤，同时要积极发展细毛羊、半细毛羊，实现毛纺工业原料的基本自给。1985年畜牧业产值要达到400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为完成上述指标，要继续鼓励个人和集体饲养；确定牧业县和半牧业县，逐步调整牧业县、半牧业县现行粮食征购和供应指标，使牧业为主的方针真正得到落实。要开放牲畜市场，取消禁宰牛的政策，坚持收购畜产品的奖励政策。要建立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做好畜禽品种改良工作和畜禽疫病防治工作，抓好牧业机械化。

30日—4月24日　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

会议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主管计划的负责人和国家计委有关同志参加外，还吸收了40多名社会科学专家和自然科学专家参加。座谈会主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在座谈会召开前和座谈会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姚依林等对拟定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讲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主要有：降低积累占国民收人的比重，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工业生产每年增长7%、8%或者5%、6%；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这要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承认不平衡；要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等等。

4　月

1日　国务院决定再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利率

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再次提高城乡个人储蓄存款和华侨人民币存款利率。各种存款利率调整情况是：1年期的零存整取和半年定期存款的月息，由3厘提高到3.6厘；1年定期存款的月息由3.3厘提高到4.5厘；3年定期存款的月息由3.75厘提高到5.1厘；5年定期存款的月息由4.2厘提高到5.7厘。华侨人民币的定期存款月息，1年由3.9厘提高到4.8厘；3年的由4.2厘提高到5.4厘；5年的由4.5厘提高到6厘。活期

储蓄存款月息，将从7月1日起由1.8厘提高到2.4厘。

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

外汇兑换券是一种含有外汇价值的人民币凭证，同中国银行旅行支票和特种人民币支票一样，都属于同一性质的银行支付凭证，不是另一种货币。它只能在指定的商店内购买用人民币买不到的紧缺商品，或支付需用外汇支付的费用。外汇券的兑换，目前暂时集中在中国银行办理，受中国银行委托的少数人民银行机构也可代办。外汇券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共7种，没有分币，可用人民币的分币找零。

国营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劳动总局将《国营企业计件工资暂行办法（草案）》发给各地方、各部门试行。这个办法规定：企业生产任务饱满，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和产品销路比较正常，管理制度健全，有先进合理的劳动定额，严格的计量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可以实行计件工资制。实行计件工资的企业，必须保证达到产品质量标准，不超过物资消耗定额，并使单位产品成本和工资成本有明显的降低；必须加强劳动定额的管理工作，合理确定计件单价。企业可以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特点，分别实行集体计件或个人计件。在保持劳动定额先进合理的前提下，可不限制工人的计件超额工资。这个办法试行以后，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计件工资的人数和工资总额有了显著增加。据对全国重点市、县、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统计，1980年实行计件工资的达263.8万多人（不包括计划外用工），实行计件工资总额由1979年的11.7361亿元增加到18.798亿元。

2日　全国建材工作会议

会议确定，1980年建材工业要在调整中前进，要在调整中提高。会议强调，建材工业今年要抓好几方面工作：1. 抓好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2. 切实加强质量管理。3. 大力抓紧节约能源工作。会议指出：通过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能力，这是加快建材工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今年要继续下大力气抓好列入国家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变基本建设管理松弛、效率低、建设周期长、投资效果差的状况。

3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把集市贸易管好搞活。对转手贩卖农副产品要区别对待：集体商业和有证商贩，可以按其经营范围，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社队集体可以收集本社队、社员的产品进城出售，但不准搞转手贩卖活动；对从事掮客和欺行霸市活动的要坚决取缔；国营农场的三类产品，在履行收购合同后，可以在农村集市和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出售；对工业品上市也不要一律禁止，国家允许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以后的多余部分，持主管部门的证明，可以在集市上出售。

6日—21日　全国物资局长会议

会议在南京召开，确定进一步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把物资流通搞活。

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严令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些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违反物价政策和物价纪律，为了片面追

求增加利润、多发奖金，任意扩大调价商品的范围，随便提高调价的幅度；有的采取换牌子、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短斤缺两等不正当手段，变相提价；有的随便减少平价商品，扩大议价商品的范围，甚至平价购进、议价销出；有的随意增加公用事业、服务行业的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确保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是当前物价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方针。

9日—19日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

国家经委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落实了全年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任务，研究和讨论了有关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会议提出：1. 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今后扩权试点单位，除大中型企业、部直属企业和企业性公司须按原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外，其他地方企业在不突破国务院有关企业利润留成规定的前提下，可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审批。2. 要尽快搞个比较完善的奖励办法。对扩权试点企业可以从利润留成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奖励基金；对不搞扩权试点的企业，奖励基金的提取必须按国家规定执行，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半月的标准工资。3. 加强对市场调节的领导，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有15%左右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因此要进一步搞好市场调节。企业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和自己组织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可以由商业、物资部门收购，也可以由生产企业按国家政策自销，或委托商业、物资部门经销代销。外贸部门不收购的出口产品，允许工业企业按照国家统一的外贸价格政策到其他口岸商洽出口事宜。各地区、各部门既要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又要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实行互助互利、取长补短、密切协作、共同发展的方针，不搞“画地为牢”，互相封锁。4. 要抓好工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的工业改组工作和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工商合一、工贸合一等各种形式的企业性公司。5. 要扶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要尊重集体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严禁随意平调。对现有的街道工业要进行调整，有些要转为从事修理和服务行业。

17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恢复我国合法席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决定恢复我国代表权。该组织成立于1945年12月，1947年11月起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是国际上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中国是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5月15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俗称“世界银行”）亦通过决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随后我国开始参加该行的活动，并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和派任执行董事。1981年11月4日，世界银行首次向我国提供贷款。

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北京市工作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对北京市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四条建议：1. 在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方面，北京要成为全国的模范，在全世界也应是最好的；2. 改造北京市的环境，搞好绿化、卫生，利用有山有水有文物古迹的条件，把北京建设成为优美、清洁、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城市；3. 要使首都成为全国文化科学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4. 经济要不断繁荣，人民生活要安定方便。

5　月

4日　国务院划定西北森林保护区

国务院确定祁连山、贺兰山、罗山、六盘山、子午岭、乔山、黄龙山和天山等林区为水源涵养林区；内蒙古潮格旗的天然梭梭林、克什克腾旗的红皮云杉林、大青沟珍贵阔叶林、新疆塔里木河中游的胡杨林为自然保护区。要求有关省（区）人民政府制定管理办法，予以认真的保护，严禁毁林毁草的现象继续发生。

国家建委等决定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

国家建委、国家计委等单位作出《关于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如下：1.施工企业的生产计划要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逐步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企业在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前提下，有权根据本身条件和社会需要，自行承揽部分施工任务或发展为施工服务的多种经营。2.改革材料供应办法。基本建设工程需用的材料应逐步做到直接分配给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包工包料。3.恢复法定利润。凡实行独立核算的国营施工企业，自1980年起暂按工程预算成本的2.5%计取法定利润。法定利润3年内不上交，全部留给企业；3年过后，按下达的分成比例办理。4.实行降低成本留成。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额和其他收入，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按规定提取的企业基金后，50%上缴财政，50%留给企业，若当年利润超过上年的上缴数，超额部分上缴20%，企业留80%。5.地方国营施工企业的技术装备费由国家投资改为由施工单位按承包工程预算成本的3%计取，不足部分向建设银行贷款。6.扩大企业劳动工资管理权限。企业可以根据任务需要，通过当地劳动部门直接招用临时工，可以按计划择优录用固定工，可以实行计时加奖励或计件工资制。对于提前竣工，其工程质量、消耗、安全等均符合规定的，也可以适当发给提前竣工奖，奖金由建设单位收益中开支。对于节约材料的，也可以发给节约奖，奖金在节约价值中开支。

8日　国务院成立体制改革办公室

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和协调各方面的改革。办公室由杜星垣任主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拟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近期内的改革意见。这是我国第二个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

军工企业生产民品纳入计划管理

国家计委等单位印发《军工企业生产民品暂行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军工企业除在平时完成军品生产任务外，应充分利用富余能力，积极生产民用产品和出口产品。现有军工企业，都要通过调查研究，逐步作出生产民品的规划。国防军工企业承担的民品生产任务，应纳入各级计划，主管部门要帮助疏通产、供、销的渠道，解决人、财、物方面的问题。计划采取中央、地方和工厂分级管理的办法，根据任务来源、市场需要区别不同产品，采取多种灵活的办法，以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列人国家计划安排的军工企业生产的民品计划，按照国家计划的编制程序，由主管军工部门在年度计划中

一并编制、上报，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综合平衡后批准下达。同时将这部分计划纳入有关民用归口部门的计划中。

17日　民航管理体制改革

为便于对民航实行企业化的管理，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民航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民航总局不再由空军代管。民航的方针、政策、规定等重大问题，由民航总局拟定，报国务院审批。

国务院批准外经工作基本方针

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外经工作当前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确定在新形势下外经工作的基本方针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为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20日　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提出积极促进建筑产品商品化

会议认为，建筑产品特别是住宅，实行商品化，建成的房屋可以卖给机关企业，也可以卖给职工个人，这是发展建筑业的一项重大改革。实现这一改革，必须以确认建筑业是物质生产部门为前提，给企业以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改变目前人、财、物分家，产、供、销脱节的状况，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正确解决建筑产品的价格、利润等问题。

31日　邓小平谈农村政策问题

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农村政策问题。主要内容是：一、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二、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

6　月

3日　国家计委等组织检查基本建设项目浪费情况

国家计委等单位发出《关于检查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浪费情况的通知》，并转发了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编印的《一个浪费惊人的基建项目》和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一个浪费惊人的基建项目》反映，黑龙江省佳木斯电厂扩建工程（新增加两台10万千瓦机组），投资总概算10100万元，实际花了14310万元，严重超支。超支的原因，1/3是由于概算不准，2/3则纯属于浪费。《通知》指出，这种严重浪费的情况不是个别的，必须采取措施，认真进行检查，切实加强整顿，提出改进办法。对于严重违法乱纪，损失、浪费巨大的，必须严肃处理。

8日　全国税收工作会议

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在河南召开。1979年，农业税收实行起征点的办法，按照国家

确定的最低口粮标准及有关规定，确定农业税起征点，每人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免征农业税，全年共减免农业税47.4亿斤细粮，折合金额7.4697亿元。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农业税征收实行起征点的办法，会议提出，对那些确属自然条件差、长期低产缺粮、收入水平低、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最低生产有困难，而且改变这种情况需要较长时间的生产队，凡符合起征点以下免税条件的，从1980年开始，给予免税一定3年不变的照顾。去年国务院批准核减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税额，从今年开始，原则上一定5年不变。会议要求各地要把国家核减的农业税额保证用于减免贫困地区社队的负担。8月26日，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执行农业税起征点办法的情况报告。

12日　国务院明确我国与外商合作勘探开发石油工作

国务院同意石油部《关于与外商合作勘探开发石油工作统一归口的建议》，明确我国与外商合作勘探开发石油的工作，在国务院能源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由石油部统一归口，有关组织邀请外商、对外谈判、签定协议或合同等均由石油部负责办理。

21日　国务院批转工交企业"挖革改"工作办法

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强现有工业交通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工作的暂行办法》。《办法》指出，坚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方针，搞好现有工业交通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22日　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批示指出，基建战线过长、浪费大、效果不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必须认识一致，如果犹豫不决，拖延时日，势必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误国误民，受到历史的惩罚。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在基本建设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中，作出更好的成绩。

23日—7月2日　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座谈会

会议提出，东北商品粮基地，以增产粮豆为主，同时发展油料、糖料和亚麻等多种经济作物。会议确定到1985年应取得的效果是：黑龙江省，以1979年为基础，粮豆总产量由292亿斤提高到350亿斤（其中大豆由34亿斤提高到54亿斤）；调出粮豆由8亿斤提高到50亿斤（其中大豆10亿斤）。吉林省，以1979年为基础，粮豆总产量由180亿斤提高到230亿斤（其中大豆由12亿斤提高到18亿斤）；调出粮豆由3亿斤提高20亿斤（其中大豆2亿斤）。辽宁省，以1979年为基础，17个商品粮重点县、区粮豆总产量由114亿斤提高到137亿斤，粮食征购由45.8亿斤提高到58亿斤。这样，从1981年到1985年，黑龙江和吉林省五年累计将上调给中央粮豆214亿斤，其中大豆37亿斤。为完成上述任务，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争取实现田间作业基本机械化。同时，要有计划地进行开垦，扩大耕地面积。

30日—7月11日　国务院召开海南岛问题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省、海南行署、海南自治州的负责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确定：海南岛应以加速发展橡胶等热带作物为重点，大力营造热带林木，努力

提高粮食产量，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逐步建立适应海南岛特点的新的生态平衡和农业结构。会议提出：从1981年起，由中央和省每年给海南岛调进粮食45000万斤，一定5年不变；建议银行专拨扶持社队发展热带作物的长期低息贷款，到有产品收获时再逐年还清；在海南岛的中央和省属企业，其利润应适当留成一部分给海南岛地方使用；中央和省要多支援海南岛一些化肥。

7　月

1日　重庆长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

大桥全长1121米，桥面总宽21米。主航道跨径174米，是当时我国已建同类桥梁中最大的跨径。

2日　国务院批准设立财政监察机构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财政监察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要求，县以上的财政部门设财政监察机构。《规定》对财政监察机构的任务、领导关系以及监察人员的职权等作了具体规定。

4日　关于对外承包公司业务的规定

国务院批准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关于承包工程等收费项目几个具体业务问题的请示》，就对外承包公司的审批手续、经营方针、结汇办法、利润分配、承包劳务出国人员待遇、思想工作等作了统一规定。

8日　国务院对推动经济联合作出规定

为了推动经济联合体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提出：1. 组织联合，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不受行业、地区、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关系各方原有的收入解缴关系制约，同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得改变，需要改变时，应当征得有关部门同意。2. 要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的联合。原材料必须首先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调拨任务，超过部分，经过协商，有的可以由加工地区返还一部分利润或产品，有的可以由加工地区与原料产区联合经营，就地加工。联合企业内部自产自用原料的供应，不再经过商业、供销、物资等中间环节，实行直拨自供。3. 各种经济联合体都必须保证国家税收和利润上交任务的完成，不得挤占国家的财政收入。参加联合的各方，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应当按原来的规定执行。4. 联合企业应由有关各方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经济联合的各方，在履行协作合同的条件下可以与联合体外的其他企业发生业务关系。组织在专业化协作联合体内的企业，不能吃大锅饭，应当实行独立核算。这个规定下达后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各种经济联合体的发展。据28个省、市、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除外）的统计，1980年共组织各种经济联合体3400多个。

19日　我国出口实行许可制度暂行办法

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最近颁发《关于出口许可制度的暂行办法》。

《办法》指出，要加强商品出口管理，以利于统一对外。

国务院检查企业长期经营亏损问题

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检查企业长期经营性亏损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对过去长期亏损，近一年内扭亏为盈的企业，要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给予表扬。对那些经过努力已接近扭亏为盈的企业，要限期在今年内消灭亏损。逾期不能消灭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再采取停产整顿措施。对那些长期亏损、消耗高、产品质量又不好、至今仍然管理混乱的企业，要立即实行停产整顿。在停产整顿期间，国家不补贴，银行不贷款，不提取企业基金，职工不发奖金，还没有调资升级的暂缓调资升级。停产整顿的企业，必须制定整顿措施，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付诸实施。

26日　国务院对中外合资企业劳动管理作出规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明确指出，合营企业职工的雇用、解雇和辞职，生产和工作任务，工资和奖惩，工作时间和假期，劳动保险和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劳动纪律等事项，均需通过订立劳动合同加以规定。

说明　主要内容与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01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修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7月22日国务院修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等不相适应。

27日　全国煤炭工作会议

全国煤炭工作会议在辽宁省本溪市召开。余秋里副总理在会议讲话中明确，我国的能源方针是，实行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大力开展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结构改革。

8　月

2日—7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

会议指出，多年来，由于压制乃至取消个体经济，加上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了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造成了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预计1980—1985年，全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将达3700万人，而目前在职职工已经超过1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会议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要逐步推行公开招工、择优录用的办法；要使企业有可能根据生产的需要增加或减少劳动力，劳动者也有可能把国家需要和个人的专长、志向结合起来选择工作岗位。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要打破劳动力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解决今后几年劳动就业问题主要靠：1. 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和合作小组，支持待业青年办独立核算的合作社。2. 在城镇郊区发展以知识青年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场（厂）、队或农工商联合企业。新办的知青场（厂）队，自创办之日起，5年内不交税，不上缴利润，不负担农产品的统购派购任务。3. 鼓励和扶持个

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4. 某些行业或工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革用工制度和工时制度。5.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同时要广开学路，吸收待业青年参加各种职业技术学习。6. 建立劳动服务公司，担负介绍就业，输送临时工，组织生产、服务，进行职业教育等项任务，并使它逐步发展成为社会上调节劳动力的一种组织形式，起吞吐劳动力的作用。

6 日　援藏人员大批调回内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中央、国务院批示指出，西藏解放以来，中央从内地先后派去大批干部、工人和文教、卫生、科技人员，他们同西藏广大人民一道，艰苦奋斗，辛勤工作，对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建设边疆、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培养当地民族干部，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称赞。现在，进藏的同志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任务，除留一部分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继续在藏工作外，大部分同志将分期分批调回内地。

8 日　国防工办召开国防工业企业军转民现场会

国务院国防工办在沈阳召开现场会。国防工业在保证完成军品生产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挖掘潜力，发展民品生产，把单一军品生产的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到军民结合的轨道上来，形成新的军民结合的生产能力，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指出，目前从整个国防工业系统的情况看，大部分企业已经行动起来，认真按照军民结合的方针办事。东北机器制造厂等单位的经验证明，实行军民结合，不仅可以把军品生产技术运用于民品生产，而且随着民品生产的发展，又会促进军品生产技术的提高。会议要求从事国防工业建设的各级领导、广大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调查研究，从企业的实际和市场的需要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12 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经济研究中心

为了加强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织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各有关部、委 16 个综合性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情报所和国家统计局等 18 个单位参加的“经济研究中心”。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个研究单位对发展国民经济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远性的问题有计划地展开研究，深入讨论，提出研究报告，供财经领导小组参考。

国家计委等组织清理压缩基本建设在建工程量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等单位联合发出《关于抓紧清理、压缩全国基本建设在建工程量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抓好基本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交付生产和使用的工作，继续认真清理在建项目。到 1980 年底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由上年的 1187 个减少到 912 个，净减少了 275 个，在建大中型项目个数虽然减少了，但停缓建的大中型项目只能压缩投资 39 亿元，而新上马的大中型项目计划总投资共需 160 亿元。1980 年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还需投资 1300 多亿元。此外施工的小型项目增加很多。据北京、上海等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80 年施工的小型项目达 27000 多个，比上年增加 24%。这些新上马的小型项目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项目。因此，

1980年基本建设总规模仍然没有压下来。

19日　国营工业企业开始改革试点

国家经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今年选择一两个国营工业企业，试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办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21日　国家计委印发关于制定长远规划的基本设想

国家计委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汇报提纲）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委员会讨论并征求意见。基本设想初步总结了30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和主要经验教训，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现代化建设应当遵循的方针，提出了今后10年国力的预测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对综合平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意见。基本设想提出，1981—1990年10年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7%左右，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左右，工农业总产值加在一起，平均每年增长6%左右，其中“六五”为5.5%，“七五”为6.5%。“六五”期间，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由1980年预计的30%多，逐步降到1985年的26%左右；基本建设总规模，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每年550亿元左右；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1985年主要生产指标的设想是：粮食7500亿斤，棉花6200万担，原煤7.3亿吨，原油1.06亿吨，发电量4000亿度，钢4200万吨，棉纱1800万锭，糖400万吨。

21日—2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任命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免去余秋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万里副总理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免去王任重的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丙乾为财政部部长，免去吴波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会议决定解除宋振明的石油部部长职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以下简称客商），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征税或者减免进口税。企业所得税率为15%。对在本条例公布后两年内投资兴办的企业，或者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客商将所得利润用于在特区内进行再投资为期五年以上者，可申请减免用于再投资部分的所得税。设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对特区实行统一管理；设立广东省经济特区发展公司，承办资金筹集和信托投资业务，经营或者与客商合资经营特区的有关企业，代理特区客商与内地贸易往来的购销事宜。

30日—9月11日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姚依林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正在顺利执行，预计工农业总产值可以超额完成。1980年上半年，在能源增长较少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3.6%。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6%。轻工业总产值比上

年同期增长 24.2%，超过了重工业的增长速度。1980 年上半年，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23.6%。原煤、原油、发电量、钢、水泥、化肥、棉纱、化纤、纸、糖、自行车、电视机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预计都可以完成或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全年工业总产值计划比上年增长 6%，预计可以超过。

1980 年上半年，收购商品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17.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18.5%。商品购销两旺，市场活跃。长期供不应求的猪肉已经敞开供应。上半年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20.2%。在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1980 年上半年，完成了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党和政府继续努力改善广大群众生活。上半年职工住宅施工面积 7371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又有所增长。

1981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协调地前进。1981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具体任务是；(1) 努力加快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使消费品的供应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大体相适应，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2) 大力加强能源的开发和节约，加强交通和建筑业，加快机械工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合理调整冶金、化工等重工业生产，努力增产短缺的和新型的原材料，更好地为农业、人民生活、出口、国防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3) 继续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努力缩短建设周期，争取有更多的工程建成投产。(4) 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扩大国际经济交流。(5) 大力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6) 全面讲究经济效果，努力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7) 进一步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使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改善。

根据上述要求，1981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安排如下：工农业总产值，比 1980 年预计增长 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4%，工业总产值增长 6%。工业中，轻工业总产值比 1980 年预计增长 8%，继续高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粮食产量 34250 万吨，比 1980 年预计增加 1000 万吨；棉花产量 255 万吨，比 1980 年预计增加 25 万吨。棉纱产量 286.5 万吨，比 1980 年预计增加 9 万吨；煤炭产量 62000 万吨，比 1980 年预计增加 1000 万吨；石油产量 10600 万吨，保持近两年的水平；发电量 3120 亿度，比 1980 年预计增加 120 亿度；钢产量 3500 万吨。基本建设总的投资额控制在 550 亿元左右。对外贸易比 1980 年预计增加 42 亿美元。国内市场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 1980 年预计增加 150 亿元。科学技术，列入全国科技计划的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共 400 多项。高等学校招生数仍然安排 27 万人，保持近两年的水平。劳动就业，在城镇安排 600 万人。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人民生活，农村社队和农民收入将增加近 100 亿元。城镇居民收入将增加 40 多亿元，居住条件、集体福利和生活服务等方面，将继续有所改善。从 1980 年开始，要逐步解决没有奖金收入或者奖金很少的科研、教学、医务和机关工作人员适当增加收入的问题。

会议还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会议同意华国锋不再兼任总理，选举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财政预算报告

财政部长王丙乾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去年我国财政虽然出现赤字，但并未引起货币发行量的大量增加；没有给经济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这是由于：第一，去年全国农业、轻工业、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幅度之大，是多年来少有的。由于农业丰收，轻纺工业增产，市场上吃的、穿的、用的商品，除了某些商品以外，一般说来，供应比较充分，因而人心是安定的，市场基本上是稳定和繁荣的。第二，去年城乡人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了97亿元，增加数额之大，也是多年以来所没有的。它一方面说明人民群众勤俭持家，积极支援国家建设；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民币的信誉是高的。第三，体制改革以后，国家有一部分财力转为地方和企业的机动财力，但当年并没有花完，转化为银行的存款。去年年底，企业专项基金存款、地方预算外存款、基本建设单位和机关、团体、部队的存款比年初增加的数字，共有67亿多元。这部分资金对财政赤字起了缓冲作用。

为了弥补国家收支的差额，1980年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80.4亿元；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了90.2亿元。财政发生赤字，对经济生活终究是会有影响的。近年来某些商品的价格有所上涨，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反映。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31日　公司股票开先河

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受东西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委托，代理发行公司股票，以筹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农工商联合企业花木公司。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负责联系投资单位，具体办理发行股票的手续，保证持票人年终按股票面额取得红利，退股时可以领到股金。银行代理股票发行，按股票的票面总金额向发行单位一次收取1%的手续费。股票按年分红，不计利息。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市分行办事处与当地两个砖厂达成协议：由银行出面代这两个砖厂发行红砖股票．各有关单位可以自愿认购，用发行股票的资金在这两个砖厂各建一座隧道窑，扩大红砖的生产能力。这次发行股票280股，每股1万元，认购股票的对象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单位。企业购买股票的资金，既不能挤占银行贷款，也不能挪用流动资金。股票的偿还期限是两年．股票不得自由流通。认股者的经济利益是砖厂向认股单位优先优价供应红砖，两年内付清认购股金金额的红利。银行出面发行股票，承担了一定的责任，经协商，按股票实际发行金额的1%向发行股票单位收取手续费。

9　月

2日　国家经委提出改进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意见

1980年经财政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批准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试点的有一个市（柳州市）、一个公司（上海轻机公司）和80多个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对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明显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生产中有些产品的分配调拨计划完成得不好，有些工矿企业为了扩大自销压低生产

指标；建设中盲目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有所发展：分配中奖金的发放控制不严，有平均主义的缺点。为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1. 改进现行的利润留成办法。多数企业要继续执行国务院规定的利润留成办法。对少数经营好、赢利水平高、增长难度又大的企业，可采取利润留成基数一定几年不变，即“定比”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其他办法。确因客观原因造成利润大幅度下降的，可实行超计划利润分成办法，按下达的计划进行考核，超计划利润视同增长利润。对微利和亏损企业可采取利润包干或减亏分成的办法。对矿山企业可本着“以矿养矿”的原则，采取全额利润留成的办法。2. 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各省、市、自治区，在今年内要选择一两个企业进行这方面的试点，做好准备，以便明年在一批企业中进行试点。3. 试点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要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企业有权根据国家的价格政策，对一些利润过高和供过于求的产品，以及超储积压物资，实行浮动价格，向下浮动。企业可以申请出口自己的产品，有权参与外贸部门同外商的谈判并附签合同。有条件的企业，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也可以直接经营出口业务。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到 1980 年底，除西藏自治区以外，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试点企业总计为 6000 多个，这些试点企业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 16%左右，产值占 60%左右，利润占 70%左右。

8 日　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拟订《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

《意见》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是：把企业从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把分散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单位，改为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联合体；把受行政系统分割的封闭的产品调拨体系，改为统一领导的开放的商品市场；把按条条块块组织经济活动，改为通过经济中心来组织经济活动；把由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制度，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指导性和指令性的计划制度；把主要依靠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把忽视法治，改为严格法纪，加强经济立法、司法和监督；把中央经济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改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管理权限；把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把党政直接管理经济，改为主要通过经济机构管理经济。

10 日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共分 18 条，规定所得税率为 40%，合营期在 10 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一年免税，二年减半税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满 1 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都要按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或者居住不满 1 年的个人，只就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按每月收入减除费用 800 元，就超过 800 元的部分纳税。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满 4000 元的减除费用 800 元，4000 元以上的减除 20%的费用，然后就其余

额纳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其他所得，按每次收入额纳税。

14日—22日 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

这次会议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提出：（一）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当前，应当把改善经营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当作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下苦功夫，抓紧抓好。（二）两年来，各地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一类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特别是出现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些形式都得到农民的欢迎，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级领导应当帮助社队把生产责任制加以完善和提高。（三）农业生产的管理要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凡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四）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包各业；各业的包产，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分别到组、到劳力、到户；生产过程的各项作业，生产队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分别奖罚；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各地应当根据群众自愿，加以引导，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广以上多类形式。（五）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的地区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六）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可以经过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这次会议对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现行的商业体制一定要改革》社论

社论指出：现行商业管理体制的弊病主要是购销统得过死，渠道太少，机构重叠，并由此形成经营上的官商作风。要根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改革，逐步建立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社论提出了当前亟待改革的四个方面。

28日 全国首次自然保护区区划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

会议提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初步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全国自然保护区将由现有的72个增加到300个以上。

10 月

4日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议。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

经理。

5日—5日　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乡发展方针

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建委和城市规划、城市建设部门负责人，部分城市的副市长，城市规划专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院校，设计科研单位的代表，共290多人。会议提出的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今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原则上不要再安排新建大中型工业项目。要利用中等城市，有选择地发展一些工业项目，但一般不使其发展成为新的大城市。新建项目应优先在设市建制的小城市和资源、地理、交通、协作条件好的小城镇选厂定点。建设小城市和卫星城的规模要适当，人口一般以10万或20万为宜。会议强调，要搞好居住区规划，加快住宅建设，加强城市规划的编制审批和管理工作，制止乱占乱建现象，防治环境污染，尽快建立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制。

10日—20日　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今年的粮食生产情况，协商了1980年粮食购销调拨计划，讨论了有关政策和体制改革的问题。11月13日，国务院转发《全国粮食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按政策搞好粮食购销工作，以解决因灾多销和青黄不接的需要。至于调整粮食的基数问题，在调整方案未批准以前，各地不要自行调整。粮油管理体制改革试行办法，可由省提出意见，同粮食部门协商，报国务院批准。财政体制暂时不动。

16日—27日　全国商业计划会议

商业部召开全国商业计划会议。会议汇报交流了各地市场情况和商业计划执行情况以及对1981年市场形势的预测，初步衔接了1981年主要商品购销调拨计划，座谈讨论了改革商业体制和统计人员实行技术职称等。

20日　国务院批转解决婴幼儿食品问题报告

轻工业部、商业部、粮食部《关于解决婴幼儿食品问题的报告》，针对当前婴幼儿食品存在着生产数量少、质量差、品种单调、供应不足、婴幼儿“吃饭难”的情况，提出；加强婴幼儿食品生产的组织领导；增加婴幼儿食品的品种、数量，提高产品质量和营养成分；要解决一些有关经济政策问题，总的原则是：经济扶持，保证原料，薄利经营，搞好服务。

29日　国务院发布开展和保护竞争暂行规定

国务院公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社会主义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展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为保护竞争，特作10条暂行规定。主要内容是：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要增加商品流通渠道，为竞争开辟场所。一部分商品价格，允许在规定的幅度内上下浮动。生产资料的价格，企业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权在不影响财政上缴任务的条件下自行调低。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准封锁市场，不得禁止外地商品在本地区、本部门销

售。对重要技术成果要实行有偿转让。

29日—11月3日　全国节能经验交流会

国家经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节能经验交流会。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近期内要把节约能源放在优先地位，大力进行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结构改革，确保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节约标准煤2000万吨任务的实现。1981年要在1980年的基础上，节约和少用标准煤2400万吨，其中节约油450万吨，节约煤2000万吨，节约电70亿度。为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会议提出：（1）必须在搞好能源管理的基础上，根据"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要改革机电产品，加快高能耗设备的更新换代。对耗能设备的设计、制造，要尽快制定统一的能耗标准，高于标准的，不能定型生产，已经生产的要限期改型，改不过来的要坚决停产。明年机械行业要逐步淘汰高能耗、低效率的设备，消灭"煤老虎"、"电老虎"。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改革工艺、革新装备、推广节能新技术。今后新建工程项目，设计上就要符合节能要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否则不准建设。（2）能源分配也要实行相应的政策，总的原则是：优先保证轻纺工业的发展，保证上海、天津、北京和其他轻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的生产，优先保证耗能低、质量好、产品适销对路企业的生产；适当控制冶金、重化工、重型机械制造等调整限产行业的能源供应，压缩或停止能耗高、质量差、亏损大、产品积压企业的能源供应，对同大城市、大企业争原料和燃料动力的"五小"工业，要采取切实稳妥的办法，进行技术改造和关停并转。1980年在提高能源利用方面取得了新成绩。每亿元工业总产值的能源消耗为102300吨，比上年的110200吨降低7.2%，由于能源利用经济效益的提高，全年共少用标准煤约3500万吨，其中改变轻重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约少用2200万吨，降低产品单耗节能1300万吨。

11　月

1日　国家计委等规定建设项目要严格执行"三同时"

国家计委等单位发出《关于基建项目、技措项目要严格执行"三同时"的通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在《通知》中强调，安排基建计划，必须把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从1981年起，对新建、扩建的大中型项目，凡可能产生污染、影响环境者，必须提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并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确定厂址；同时，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治污染措施，否则，不得列入计划。凡列入国家计划的基建项目和技措项目，需建设的环境保护工程必须作为项目的内容明确列出，建设项目的概算、预算和决算，要列出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数额；基建工程的检查和监督，要把检查污染治理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凡污染治理工程没有建成的，不予验收，不准投产。强行投产的，要追究责任，并要限期建成污染治理工程，过期不建成的项目要停产。

1日—7日　十大城市商业局长座谈会

第一次十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广州、重庆、沈阳、哈尔滨、西安）商业局长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座谈会提出了发挥大城市商业经济中心作用的四项建议：(1) 尽快把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恢复起来；(2) 挖掘大城市商业潜力，增设网点，改善布局；(3) 打破行业、地区隶属关系的界限，组织工商、商商、农商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企业，把生意做好做活；(4) 新建城市贸易中心机构。

11日　核能工作座谈会提出建设核电站

国家科委、计委和国务院能源委在北京召开核能工作座谈会。一百多位科学家、工程师和科技领导干部，建议国家把积极发展核能作为长远政策，首先在华东、广东、辽宁等地建设核电站。

15日—30日　全国计划会议调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同时，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这两个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调整了1981年计划。赵紫阳总理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是大好的，但是有潜在的危险。一是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可供使用额，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货币投放量增加，如不采取措施，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二是基本建设很大地超出国家经济的可能，这两年没有压缩下来。这些问题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如不解决，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局不稳，改善人民生活也无从谈起。因此，要下决心进一步抓好调整，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关停并转，稳定经济。要稳定经济，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上加强计划调节，把计划调节同充分调动基层生产经营单位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会议期间，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对调整1981年计划作了重要指示。主要内容是：明年基本建设要退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宝钢、22个成套进口项目，不行就放下来。为克服困难，必须集中。历来解决困难，权是要集中的，不是分散的，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明年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把生产搞扎实一些，速度5%有困难，4%也可以。好事要做，但是要量力而行。

根据中央领导和国务院领导的讲话精神，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重新调整了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情况是：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加3.7%，其中农业总产值169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加5.6%；工业总产值511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3%。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由原来的2390亿元增加到2473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8%；重工业由原来的2860亿元减为2637亿元，比上年减少1.2%。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154.5亿元（包括国外借款收入80亿元）减为1056.6亿元（包括国外借款收入80亿元），比上年减少0.6%；财政支出由原来的1204.6亿元减为1056.6亿元，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年预计减少40%。国家预算内投资由原来的242亿元减为170亿元。国防战备费由原来的193亿元减为160亿元。粮食由原来的6850亿斤减为6650亿斤。棉花5100万担。原煤由6.2亿吨减为5.88亿吨。原油由1.06亿吨减为1亿吨。发电量由3120亿

度减为3050亿度。钢由3500万吨减为3300万吨。木材由4910万立方米减为4710万立方米。水泥由7800万吨减为7240万吨。化肥由1230万吨减为1145万吨。棉纱由1600万锭增加到1620万锭。铁路货运量由原来的11亿吨减为10亿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2200亿元增加为222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8.3%。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373亿美元减为356亿美元。全年新增职工由250万人增为343万人。

18日 企业基本建设资金实行“拨改贷”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报告。报告提出：（1）从1981年起，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企业，进行基本建设所需的投资，除尽量利用企业自有资金外，一律改为银行贷款。确实无法实行贷款的企业，应由部门和企业提出申请，经建设银行签证，计委、建委审查同意，才能给予财政拨款。对于继续实行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要迅速建立经济责任制，实行投资包干。(2）扩大贷款单位的自主权，保障其经济利益。贷款单位在不减少新增生产能力，不突破批准的总投资，不推迟交工日期，不降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有权调整建设内容，安排施工顺序，选择设计单位和施工企业，选购设备材料。对于上级确定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经济效果很差的建设方案，有权提出意见，以至拒绝执行。（3）必须建立明确的经济责任制。为了做到贷款资金借、用、还的统一，建设银行只能同将来负责生产的企业或筹建机构签订贷款合同（特殊项目除外）。如果负责生产的企业或筹建机构不负责建设，在签订经济合同时，还应当由负责建设的单位联合签署。（4）合理确定贷款利率。从1981年起，对煤矿、建材、邮电行业实行优惠，按照年利率2.4%计息；机械、轻工、纺织、原油加工、石油化工等行业，按年利率3.6%计息；其他行业仍按年利率3%计息。(5）发挥建设银行经济杠杆的作用，银行要加强对建设项目的审查，检查资金使用情况和及时收回贷款。要大力吸收存款，把固定资产再生产领域里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灵活调度，按照国家计划要求的投资方向，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和挖潜、革新、改造贷款。

30日 国务院紧缩基本建设支出

为坚决压缩基建规模、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国民经济，国务院发出《关于紧缩基本建设支出的紧急通知》，决定：（1）从12月1日起，1980年基建计划不再追加。各地区、各部门待分配的基建投资包括国家预算拨款，地方、部门、企业自筹资金，各个银行基建贷款，用于基本建设的更新、改造资金等，全部停止分配。(2）1980年计划内尚未开工的项目一律暂不开工。(3）所有办公大楼、机关礼堂、招待所、宾馆、旅游饭店等，一律停下来重新审查，各级银行不再拨款。（4）1980年所有基建项目，投资用不完的，不得调给其他项目。(5）凡是已经确定停建缓建的基建项目，除了引进设备的接运、保管、检验费用以及经过批准核实的工程维护费、人员工资以外，各级银行均不予拨款。(6）所有建设单位除了1980年计划投产收尾销号的项目以外，12月份不得再采购材料、设备，各级银行不再拨款。(7）所有建设单位一律不得增加职工（投产项目除外）。（8）凡是属于原材料、燃料动力不落实，工艺技术不过关，地质资源不可靠，三废污染严重或建成后产品无销路，需由国家补贴亏损的项目以及盲目建设、重复建设

的项目，立即停止拨款。(9) 1981年准备新建、扩建的项目，在计划未正式确定以前，一律不准在1980年预拨基建投资，也不得预订设备、材料。

12 月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普及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

《关于普及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主要内容是：(1) 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应根据各地区的条件，分期分批予以实现。经济较发达、教育基础较好的地区应在1985年前普及小学教育，其他地区一般应在1990年前基本普及，至于极少数经济特别困难、山高林深、人口稀少的地区，普及期限还可以延长一些。中央提出，中小学学制，准备逐步改为12年制。今后一段时期，小学学制可以5年制与6年制并存，城市小学可以先试行6年制，农村小学学制暂时不动。(2) 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体，充分调动社队集体、厂矿企业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还要鼓励群众自筹经费办学。(3)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改革中小学教师工资制度，适当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和适当增加民办教师的补助费。与此同时，中小学要开始实行教龄津贴制度，以鼓励教师终生从事教育事业。(4) 切实改革普通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大力加强对这一事业的领导。今后普通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事业经费、基建投资人员编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统筹安排，组织实施。普及教育经费由各省、市、自治区"戴帽"下达到县，专款专用，严禁挪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把普及小学教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7日 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继1979年11月在全国范围提高8种副食品及其相关商品零售牌价以后，1980年各地区又对许多商品零售牌价进行了调整，加上大量地开展议购议销，使零售市场物价总水平上升幅度较大，影响了群众生活。据统计，1980年全国零售市场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升6%。其中城市上升8.1%，农村上升4.4%。全国因物价上涨，城乡居民增加开支110亿元，其中城市居民增加开支64.8亿元。为制止物价继续上涨，《通知》规定：从通知公布之日起，凡是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在全国各地的零售价格一律不得提高；各种议价商品一律按1980年12月7日的价格出售，只能降低，不许提高。一、二类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前不许议价成交。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信贷管理和现金管理，控制货币投放，监督购销活动。这个通知下发后，市场上乱涨价的情况一时得到制止。12月7日—2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物价会议，贯彻国务院的通知精神，确保物价的基本稳定。

13日—22日 全国市镇粮食供应会议

粮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市镇粮食供应会议。会议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市镇供应工作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切实保证市镇粮食合理供应，稳定粮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保证四化建设顺利进行；同时，在坚持统购统销、统一调拨的前提下，把粮食工作

搞活一点，按照以上原则，对市镇定量人口，要从严控制，不开新口子；对于市镇粮食销量、市镇口粮定量水平、工商行业用粮，保持稳定，不作大的变动。为了方便群众，更好地安排市镇人民生活，适当缓和供应粮食品种矛盾，在南方市镇扩大面粉复制品、主食食品经营；在北方市镇扩大杂粮复制品、主食食品经营。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1981 年 1 月 29 日，粮食部印发这次会议讨论修订的两个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市镇粮食定量人口、口粮定量及供应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扩大粮食复制品和主食食品经营的意见》。1981 年 1 月 30 日，粮食部印发了这次会议讨论修订的《市镇粮店管理试行办法》。这个《试行办法》对市镇粮店的性质任务、定额管理、经济核算、劳动竞赛、工资福利、规章制度、售粮设备等方面作了规定。

16 日—25 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陈云、赵紫阳、李先念、邓小平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经济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他说：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目前对国营和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一切引进项目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定案时宁慢勿急。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不能因为扩大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必须看到这种困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赵紫阳在讲话中对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调整的要求和方案、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作了说明。他说，为搞好调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现在强调集中统一，指的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他还强调指出，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表面上看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但是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今后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而是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提高经济效果。

李先念在讲话中强调，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作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财政要做到收支平衡，产品要适销对路；要在保证粮食的稳步增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所谓某些方面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包括国防开支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的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子的步骤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国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绝不是对它的改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对于统一思想认识，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整，稳定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18日　国务院发布外汇管理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共7章34条，对国家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外国驻华机构及其人员、侨资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及其人员，以及对外汇、贵金属和外汇票证等方面的管理，作了详细的规定。

24日　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座谈会

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座谈会。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杨尚昆出席会议。198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现在是调整时期，中央拿不出很多钱来支援广东、福建，而且还要广东、福建对国家多做点贡献。因此，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点。以后在前进过程中，也可能因为出点什么问题而收缩一下，调整一下，但是，中央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方针不动摇。

25日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明确促进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

会议着重讨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问题，并对今后的科技工作作了安排。为适应经济调整的需要，使科学技术同经济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今后一个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1）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的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3）必须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4）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5）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

30日　国务院批准减免进出口商品工商税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进出口商品减免工商税收的规定》。《规定》指出，对国家准予出口的商品，按照扣除税金计算，换汇成本高于当年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的，免征工商税；低于当年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的，可以酌情减征工商税。对进口商品免征

工商税的有：经国家批准引进的先进技术和样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外国合作者，按照合同规定，作为资本投资进口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国家批准的建设经济特区所进口的设备、器材、运输装卸工具，以及经济特区的企业为生产出口商品而进口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外商、侨商和港澳工商业者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根据合同规定，生产上所需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方面的仪器和设备；经国家批准由财政补贴的政策性亏损商品，如粮食、原糖、农药、化肥等。

31日　198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80年继续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取得了新的成绩。工业在能源生产比上年下降1.3%的情况下，总产值达到4992亿元，比上年增长8.7%。其中轻工业产值为234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重工业产值为2648亿元，比上年增长1.4%。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上年的43.7%上升到47.2%。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原煤6.2亿吨，比上年减少1500万吨；原油1.595亿吨，比上年少20万吨；发电量3600亿度，比上年多186亿度；钢3712万吨，比上年多264万吨；木材5359万立方米，比上年少80万立方米；水泥7986万吨，比上年多596万吨；化肥1232万吨，比上年多167万吨；棉纱293万吨，比上年多29万吨。农业总产值1646亿元，比上年增长3.9%；粮食6411亿斤，比上年少231亿斤，棉花5413万担，比上年多998万担。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663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全国铁路货运量10.8亿吨，比上年少1000万吨。1980年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8.89亿元，比上年增长6.8%。在投资总额中，用于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由上年的30.2%上升到35.7%。其中住宅投资比重由上年的14.8%上升到20%；用于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由上年的5.8%上升到10.8%。全年竣工房屋建筑面积1.45亿平方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40亿元，比上年增长18.9%，扣除零售物价上升的因素，实际增长12.2%。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7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其中出口总额为272.4亿元（折合18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7%；进口总额为291.4亿元（折合19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进口大于出口19亿元（折合12.8亿美元）。1980年，城乡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经济基本核算单位分得的收入为85.9元，比上年增加2.5元，加上家庭副业的收入，农村社员的全部收入比上年有较多的增加，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762元，比上年增长14.1%，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后，实际工资增长6.1%。1980年末，城乡人民储蓄存款达399亿元，比上年增长41.9%，全国城镇安置待业青年和其他人员以及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共900万人。1980年国民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本建设规模没有压缩下来，财政赤字127.5亿元，发了76亿元票子，物价上涨，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1981 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修改年度计划、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的社论。社论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但是，近两年来从中央到基层的许多同志，包括一些经济战线的各级领导同志，对经济调整方针的认识既不充分，执行也不得力。一方面提高了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却没有使基本建设的总规模退下来。这样，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国民收入，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其他各项开支也超过了财政收入。为使整个国民经济从被动转入主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实行进一步的认真的调整。主要是基本建设要退够，行政费用要紧缩，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某些方面坚决退够，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摆脱潜在的危险。其他方面，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生产，能源、交通的建设，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因此，实行进一步调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方针，有退有进，暂时的局部的后退是为了将来更好的长期的稳定的前进。

我国研制成功氢原子钟

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研制的在 60 万年里时间误差不超过 1 秒的氢原子钟通过国家鉴定。氢原于钟是利用氢原子跃迁时辐射的电磁波控制的同步电钟，由于这种电磁波频率异常稳定，因而获得准确度极高的时间标准。它在射电天文、宇宙通讯、火箭导弹的发射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4 日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截淹成功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主要由拦河坝、发电站、船闸、泄洪闸、冲砂闸和鱼道等建筑物组成。大坝全长 2561 米，坝顶高 70 米，控制流域面积 100 万平方公里，总库容 15.8 亿立方米。水电站一座在大江，一座在二江，装机 21 台，容量为 271.5 万千瓦，每年平均发电 138 亿度。葛洲坝工程共设有三座船闸，其中一、二号船闸，闸室宽 34 米，长 280 米，可以通过万吨客轮、货轮和大型船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船闸之一。三号船闸，闸室宽 18 米，长 120 米，通过 3000 吨以下的客货轮和民用船队。三座船闸年单向通过能力，近期为 2000 万吨，远期为 5000 万吨，相当于现在宜昌港单向通过能力的 8 倍到 20 倍。葛洲坝工程是将来的“三峡工程”的配套建筑，对三峡高坝起反调节作用。葛洲坝工程建成后，三峡以内一百多公里长的峡江，水位可以抬高 20 米，夜航航道大大改善。

年底，二江电站的一号和二号17万千瓦水轮机组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产发电。两机组年平均发电量可达18亿度以上。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最大的低水头转架式发电机组，也是世界上最大型发电机组之一。

5日　全国统计局长会议提出要逐步建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桉算体系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安排了1981年工作，讨论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草案)》。会议指出，在新的形势下，统计部门要积极开展国民经济综合分析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如实提出统计报告，以便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情况的国民经济平衡统计核算体系。

同年9月1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的报告》。国务院指出，统计部门要认真改进工作，完善统计标准。在搞好全面报表的同时，大力开展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努力提高数字的准确性，搞好综合平衡统计，加强经济分析和统计监督，使统计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7日　国务院发出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

《指示》针对有些地区市场比较混乱的状况，提出明确要求：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要积极扩大商品流通渠道，按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购销工农业产品。对于违反购销政策和价格政策规定的，要严肃处理。在完成调拨任务后，省、市、自治区之间可以组织物资交换，有关部门要准予运输。工矿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和履行合同规定。在此前提下，可以自销产品。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有证商贩，可按规定经营日用小商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社员经过生产队同意，可以从事个人力所能及(肩挑、手提、人拉、自行车驮）的、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的贩运活动。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一切应纳税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照章纳税（包括关税)。偷税、漏税和抗税不交的要严加处理。农村社、队和社员在市场销售自产的应税产品，应按照适用的税率征收工商税。持有社员自产自销证明的，在一定数量内（按各省、市、自治区的规定）可给予免税照顾，对无证个体工商业户，按“临时经营”税率征税。获利超过限额的，按规定加成征税。要加强对走私活动特别是海上走私活动的查缉。沿海、沿边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广西、云南等，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黑市交易，打击走私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提出加强货币信贷管理

会议确定人民银行1981年的中心任务是：认真贯彻狠抓调整、稳定经济的方针，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市场物价，保证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会议要求各级人民银行要善于运用信贷、结算、现金管理、利率、储蓄等手段，大力组织各项存款，特别是要保证今年上半年货币回笼任务的完成。要严格执行国家的信贷计划，不得突破规定的贷款指标。会议强调要加强流动资金的管理，督促企业压缩不

合理物资库存和商品库存，减少流动资金占用。

中国民航开通中美航线班机

中国民航北京——纽约航线的首航班机于美国东部时间7日晚7时55分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这架波音747SP型宽体客机是北京时间7日上年离开首都机场，途经上海和旧金山后到达这里的。空中飞行了16个小时30分钟，全程为一万五千多公里。今年1月底，泛美航空公司也将开始在这条航线上飞行。

12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运输管理体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改革外贸运输管理体制问题的纪要》。《纪要》的主要内容有；大力加强外贸远洋运输工作。交通部已经建立起一支远洋船队，这是我国远洋运输的主力。今后要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进一步保护和扶持国轮的发展；外经贸部已买进一些船，同意这部分船参加远洋运输。在国轮运力不足时，再租用外轮。在统一规划下，经国家批准，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区对外贸易的需要，开办与交通部远洋运输公司合营或自营的近洋运输船队。各船公司或船队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加强经营管理。货主和外贸部门各专业公司可根据择优托运的原则向船公司托运进出口物资。搞好进出口船货平衡工作，交通、外贸两部要密切协作，继续开好出口船货平衡会，有事及时商量解决。国家经委、国家进出口委每季检查一次；同意交通部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同意交通部在沿海外贸港口实行政企分开的试点；关于中远、外运两总公司的联合问题，拟以国家经委为主，研究起草联合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14日　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机械设备进口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机械设备进口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严格控制机械设备进口：1. 凡各部门、各地区需要从国外进口的机械设备，都要按照《通知》的要求经过审查、批准。2. 下列机械设备，包括元器件，今后原则上不准再从国外进口：（1）国内可正常供应，技术性能满足工艺要求。（2）国内已经引进制造技术，保证可以供应合格产品。（3）进口某些关键件、配套件或关键材料，国内制造或组装，技术性能满足工艺要求。（4）通过技术引进或技术合作，可以和外国厂商合作制造。3. 国务院责成国家机械委牵头，吸收有关部门参加，负责机械设备进口的审查把关工作。4. 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特区需要的进口机械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的审查办法，由两省人民政府另行拟定，经国家机械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

16日　国务院决定自1981年起发售国库券

国务院发布《1981年国库券条例》。《条例》指出，国务院决定自1981年起，向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分配发行国库券。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和农村富裕的社队可适当认购。个人也可自愿认购。国库券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利率为年息4厘。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清，不计复利。1981年共发行国库券48.7亿元，主要用于弥补1980年财政赤字。

国务院要求奖金的增长速度要低于生产和利润的增长速度

国务院发布《关于正确实施奖励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的几项规定》。《规定》要求：企业实行奖励制度，必须反对平均主义，企业奖金的增长速度应当低于生产和利润的增长速度。企业必须在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质量、利润、供货合同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条件下，才能提取和发放奖金。要坚决制止滥发奖金。具备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企业，可根据有关规定实行计件工资制（含提成、分成工资制），不再实行经常性的生产奖。计件超额工资部分应在企业利润留成中开支。

农业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提出要着重支持商品生产

农业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加强信贷管理，积极组织资金，合理地满足农村的资金需要，促进农业生产。会议指出，今年农村社队发展生产的资金需要量增加，但是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资金有所减少。近几年来，农村生产发展较快，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社队和社员手中的闲散资金不少。多吸收些存款，把今年的工作做好，是完全有可能的。会议要求今年的农业贷款要着重支持商品生产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设备贷款要支持那些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收益大的生产项目。对投资大、当年不能见效的农业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

16 日—27 日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实现以税代利试点增值税

财政部在京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和企业财务座谈会。会议研究了税收的集中统一管理、调整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税收和企业财务方面自行作出的规定，凡与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规定有抵触的，都要纠正过来。有条件的地区，可在机械、农机两个行业试点增值税。准备先在石油行业试点征收资源税。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参加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用税来代替利润上缴，从长期来看，是我们改革的方向。过去对税收工作的多次削弱，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一种表现，认为经济简单化了，企图很快改变所有制，用单一的、简单的制度代替税收制度。想把税收和利润合并起来，想把税收上比较复杂的税制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状况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刘志诚要求税务机关做到：坚决维护税收制度，不得随意改变税种、税率；应征的各项税收必须及时、足额入库。

财政部发布《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以税代利的几项规定》。《规定》要求：1. 试点企业原来向国家交纳的利润，改为征收资源税、收入调节税、所得税、固定资产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所得税按课税所得额 50% 的税率计征；收入调节税按企业利润总额扣除资源税、所得税、企业留用利润和流动资金占用费、固定资金占用费后的余额，按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核定收入调节税税率；流动资金占用费，按国家拨给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总额计算，每月征收 2.1‰；固定资金占用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不同行业每月征收 2‰—8‰。上述税率、费率由财政机关核定，一定三年不变。2. 纳税后留给企业的利润，按国务院规定的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的办法执行。3. 企业按规定留用利润后，不足以交纳上述各项税、费的，首先不征收入调节税，仍不足的按下列顺序依以减免：(1) 所得税 (2) 固定资金占用费 (3) 流动资金占用费。4. 企业上交利

润改为纳税交费后，成本开支范围、费用开支标准和营业外收支等，仍按现行财务会计制度办理。企业原在成本中列支的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金、新产品试制费、科研经费都应在税后留用利润中开支，不再计入成本或冲减课税所得额。

17日　邓小平谈调整国民经济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众议院副议长冈田春夫时指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工人、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如果物价上涨，工人、农民所得的利益就会完全丧失掉。调整国民经济，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是一时的后退，实质上是前进。经过调整，我们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上迈出更加稳定的、扎实的前进步伐。从这个意义来说，调整经济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19日　全国电力工作会议提出提高送变电投资和水电投资的比重

会议决定，要调整好电力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使电力工业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1981年要调整发电与送变电投资结构，提高对送变电工程投资的比重，即由1980年的22.3%提高到28.1%。特别要加快50万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的设计、施工和投产运行。华中电网的平顶山至武昌，东北电网的锦州至辽阳段的50万伏超高压线路，今年要建成。同时还要加快建设葛洲坝、淮南、秦岭、黑龙江、乌江渡等电厂的送电工程；石家庄至保定、大庆至哈尔滨、乌江至重庆等联网工程也要尽快完工。改变过去那种由于送电、变电工程建设跟不上发电厂的建设，有些电厂建成后电送不出去的现象。

调整水电和火电建设投资结构，提高水电投资的比重，水电建设投资要由1980年的48%提高到50%。水力发电今年要重点建设华中电网的葛洲坝工程，在保证大坝安全渡汛的基础上，要求今年有两台各17万千瓦的机组建成发电；川贵电网的乌江渡、东北电网的白山、西北电网的龙羊峡、安康等水电站都要抓紧施工，争取有一部分机组投入发电。同时，还要做好碧口、龚嘴、富春江等三项水电工程的验收工作。

21日　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

国务院在颁发这个条例的《通知》中指出，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目的，是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成套设备的进口，着重引进适用而先进的技术。为了贯彻狠抓调整、稳定经济的方针，在近两三年内一般不搞成套设备的进口。请你们根据这个精神，把现在正在与外商洽谈、尚未签订合同的项目认真进行一次清理。不符合上述方针的，应该立即停下来。确实需要引进的，应当按照这个条例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进出口委在报请国务院批准《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的报告中提出，(1) 对引进工作的方针、政策要统一认识。引进外国适用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2) 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必须加强计划性。所有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项目，不论大小，也不论外汇资金来源与偿还方式的不同，都要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统一编人计划。(3) 引进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讲究经济效果。引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和进口我国需要的适用而又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进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讲究经济效果，根据需要和可能，事先做好可行性研究，才能确定该否引进和进口。

23 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国务院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一切社会集团都要采取领导负责、财务把关的做法，进一步控制和压缩购买力，节约非生产性开支，腾出商品来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为消灭财政赤字、平衡市场、稳定物价做出贡献。会议要求各地加强对控制集团购买力工作的领导。每个单位的领导都要认真负责，控制限额；财务管理方面要设置专账，编制商品购买计划，充分发挥财务监督作用。国家规定的小汽车、沙发、地毯等 32 种专项控制商品，除新建单位和某些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准购买。

24 日　所有制出现多元化现象

新华社报道，我国除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之外，出现 8 种新的经济形式：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合营；全民企业和私人合营；集体企业和私人合营；中外合营；华侨和港澳工商业者经营；外资经营；个体经营；私人集资经营。

26 日　国务院要求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确保 1981 年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必须对财力的分配和使用采取集中统一的原则，严格财政管理和财经纪律，力求迅速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经济的稳定。为此决定：(1) 努力增加收入，坚决压缩支出，保证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收支平衡。(2) 国家税种的开征与停征，税目的增加与减少，税率的提高与降低，税收的加征与减免，统一由财政部下达，或者由财政部报经国务院批准下达。少数企业和个别城市已经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试点的，可以总结经验，继续进行；需要新增试点单位的，必须报经财政部批准。试点单位确定税率时，留给企业的财力不能超过原来利润留成的水平，超过的要加以调整。国家应征的税收，必须及时、足额地交入国库，任何人不得截留、挪用和拖欠；企业回款，必须首先缴纳税款。(3) 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试点，着重放在巩固提高方面，不再扩大试点范围。发放奖金要照顾左邻右舍。企业归还技措贷款和基建性贷款必须从贷款项目后新增收益中归还，或者用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归还。(4) 坚决缩短基建战线。一切基本建设基金，必须纳入国家统一的基本建设计划，并由建设银行监督拨付。(5) 认真压缩超储积压物资，节约流动资金。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确实不适销的，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可以拒绝收购，财政银行可以拒绝拨款和贷款。(6) 大力节减事业费和行政经费，对人员编制进行严格控制。

全国邮电局长会议提出组织各种资金加快城市电话建设

会议提出，为进一步搞好调整，今年邮电部门必须把各种基建资金集中起来使用，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确保当前通信、生产所急需的项目能很快收尾投产。把地方投资、用户集资、更新改造资金、电话初装费和国家投资等各种资金组织起来，加快城市内电话的建设。要争取多开电话线路，要组织好国内的国际用户电报网，加强国际通信的网路组织，提高国际通信的效率和质量。在邮政和长途电信方面，要大力推动联合，充分组织和运用社会力量，促进通信能力的增长和服务工作的改善。

29 日　国务院决定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

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决定》要求：

(1) 严格信贷管理，坚持信贷收支平衡要切实保证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全国货币发行计划和信贷计划需要有所追加时，必须报国务院批准。(2) 重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的原则，严格禁止把银行信贷资金移作财政性支出。(3) 管紧用好贷款，促进企业调整。国家决定停建缓建的建设项目，银行要停止有关贷款。银行发放的中短期专项贷款，凡是属于基本建设性质的项目，必须纳入各级基建计划，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没有计划部门的批准文件，没有按基建程序办理手续，银行一律不予贷款。(4) 压缩物资库存和商品库存，减少流动资金占用。要切实贯彻以销定产，以销定购的原则，企业生产和收购没有销路的产品和物资，银行不予贷款。5、人民银行要认真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责，认真审核各专业银行的信贷计划。(6) 实行利率统一管理，区别对待的政策。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其他部门和单位不得自行规定存贷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在国家规定利率的基础上，在上下不超过20%的幅度内机动调整。(7) 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一切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必须认真执行现金管理规定。(8) 增加生产搞活流通，切实抓好货币回笼。

30日　国务院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1. 为扶植社、队企业的正常发展，对社、队企业生产的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产品，其收入免征工商税。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旗）的社、队企业，从1979起至1983年止，继续免征工商所得税。2. 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1) 社、队企业生产的烟、酒、糖、棉纱、手表等高税率产品，不予减免税。(2) 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其他新办企业，可区别情况给予一年至二年的免税照顾。3.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用提留饲料粮酿酒，并交由商业部门收购的，恢复按40%的税率征收工商税。不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按粮食酒的税率60%征收工商税。以上《规定》自1981年4月1日起执行，凡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中国正式加入联合曰跨国公司委员会

我国同跨国公司技术中心的技术合作关系始于70年代末期。1980年，跨国公司中心开始向我国提供技术援助。期间，我国有关部门同跨国公司中心联合举办了跨国公司问题、石油问题、煤炭矿业问题、国际承包工程、国际会计报告标准、经济特区等讲习班。迄今为止，跨国公司中心向我提供了几十个技术项目。这些活动为我国提高干部素质，了解当代跨国公司状况和特点，起草涉外经济法规，完善对外经济合同，积极稳妥地引进外资，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31日　国务院要求限期调回未经批准存放在境外外汇

国务院发出《关于限期调回未经批准存放在境外外汇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有不少单位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将外汇存放在国外和港澳地区。这是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的，分散了国家外汇，使外汇不能纳入国家计划集中调配使用。现在，国务院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必须

将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存放在国外和港澳地区的外汇，在1981年2月底以前，即《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实行前调回国内，并根据不同情况结算或存入中国银行。3月1日以后，如再发现有未经批准，擅自将外汇存放在国外和港澳地区者，按违犯外汇管理条例论处，没收全部外汇，并对有关负责人员给以纪律处分。

我国调整基建投资方向取得明显效果

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基本建设部门认真调整投资方向，切实加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非生产性建设。1980年全国用于住宅、文教卫生、生活福利设施等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170多亿元，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3%。这是自1955年以来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最大的一年。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材料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非生产性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8.3%，比例关系比较协调。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到1976年，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的比重平均下降到13.2%。生活设施的投资大大减少，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给人民生活造成了许多不便。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十分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逐年提高，1977年为16.7%，1978年为17.4%，1979年为27%，1980年为30%以上。其中住宅建设投资大幅度增长。1980年全国城镇和工矿区住宅建设投资104亿元，施工面积14200多万平方米，竣工面积达7800多万平方米。高等院校招生用房建设增多。教育部直属的38所有招生任务的高等院校，去年共建成新校舍870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60万平方米。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设施建设加快。北京、杭州、兰州等城市的三项大中型供水工程已经全部或部分建成投产，每天新增供水能力40.6万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主要城市居民使用煤气的普及率都比上年有了提高，许多城市的排水工程也有增加。

2　月

9日　我国第一座大型高通量原子反应堆建成

这座高通量原子反应堆是一座试验研究反应堆，具有较大的辐照能力，配备有比较完整的工艺实验研究手段和广泛开展反应堆工程试验研究设施。它具有一堆多用的显著特点，可以同时生产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和超钚元素，还可以进行微量元素的活化分析和单晶硅中子嬗变的技术研究和生产，有助于提高许多科学领域和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原子反应堆主体及其配套工程的设备全部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我国已具备独立自主地设计、制造和建设核电站的能力。我国这座高通量反应堆热功率设计定额为12.5万千瓦，最大热中子通量是每秒钟每平方厘米620万亿个中子。这样大规模的高通量反应堆，目前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工业发达国家才能建造。

12日　海关总署制定保税货物和保税仓库办法

海关总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货物和保税仓库监管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保税货物必须存放于保税仓库；在规定期限内，暂缓征收进口关税和工商税；经营单位按章缴纳规费；可以对保税货物在保税仓库改变包装，改装后货物经批准

进口时，应照章征收进口税和产品税；保税货物不得在保税仓库内加工。所谓保税货物，系指已经入境但经海关特许暂缓办理进口纳税手续或者存放后再复运出口的货物。所谓保税仓库，系指专门存放经海关核准的保税货物的仓库。由海关设立或经海关批准注册登记。该办法于同年3月1日起施行。

12日—3月18日　中日两国政府就停缓建项目的引进成套设备问题进行谈判

2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会见日本政府代表大来佐武郎。邓小平指出，我们在调整中，从日本和其他国家成套引进设备的某些建设项目有一部分要停建或缓建。这种调整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今后更好地前进打下牢固的基础。当然，这会使某些厂商经济上受到一些损失。我们希望能共同寻找一种更好的办法，如利用政府贷款或合资经营等方式，使停建的项目继续搞下去，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一时找不出好的办法，我们也愿意承担合理的经济责任。总之，我国同外国经济合作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今后还要继续发展下去。

3月18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表示，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除了要积极妥善地解决引进成套项目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外，从长期来看，还应该研究如何更好地合作开发中国的能源问题。土光敏夫说，日中两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期待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同中国合作，妥善处理中国原计划停建的从日本引进的成套项目的问题。

同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土光敏夫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使中国原计划停建的从日本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继续建设的办法和途径。谷牧说，由于目前我国进行经济调整，我们计划停建或缓建一批从国外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当我们把困难告诉日本有关朋友，并希望中日双方寻找一种好的解决办法，使这些项目能够继续搞下去的设想之后，得到了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友好人士的良好反应。因而，我国政府打算根据具体情况，在日本方面的协助和合作下，使原计划停建的一些项目继续下去。

土光敏夫说，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对今后长期发展日中双方的经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要从大局出发，把中国的设想带回去，向日本政府提出积极建议，争取在谷牧副总理访日时取得双方满意的成果。

13日　国务院同意给高等学校一定的毕业生分配调整权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执行分配计划时，学校对分配不当的应有一定的调整权，使部分用人单位有择优录用人才的机会，让毕业生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工作志愿的自由。要试行择优的办法。由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根据需要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毕业生，应按国家干部管理，工资待遇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大专毕业生工资标准，但可高于这个标准。拒不服从分配的毕业生，取消分配资格。

20日　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信贷差额包干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差额包干办法》。《办法》指出：进一步对传统的“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的信贷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

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把宏观管理和微观搞活结合起来，把各级银行的责、权、利结合起来，以调动各级银行筹集、运用信贷资金的积极性，破除“大锅饭”式的资金供给体制。《办法》规定，人民银行根据国家批准的综合信贷计划，统一给各省分行和各专业银行确定包干差额；明确包干信贷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责任及权限，实行多（少）存多（少）贷；对核定的借差计划不得突破，“存差计划”必须完成。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强职工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加强职工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当下最大决心，力争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职工普遍训练一次，有效地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业务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并通过今后的定期轮训使他们在各个方面继续得到提高。为了加强职工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 各级政府要把职工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国民教育计划的轨道，要使职工教育列入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且要把它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办好。(2) 近两三年内，要把职工教育的重点，放在对领导干部的训练和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人的青壮年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技术补课方面。五年内，力争青壮年工人的实际操作技术水平普遍提高一到二级，使高、中级技术工人的比重有较大增加。企业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在1985年前普遍轮训一次，使他们逐步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内行。(3) 在调整国民经济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开展职工教育。最近几年，有一批基建项目下马，有一些企业关停并转，还有一些企业生产任务不足。应当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些单位的干部、职工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进行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培训。(4) 要因地制宜，广开学路，提倡多种形式办学。(5) 各级各类职工教育都应明确培养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标准。要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合格的发给文凭，作为晋级和安排工作的根据之一。(6) 积极建立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教师队伍。(7) 职工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要妥善地予以解决。企业职工教育的经常费用，大体可按工资总额的1.5%掌握使用，在企业成本中开支。(8) 要充分发挥普通学校的作用。(9) 建立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指导全国职工教育工作的机关。(10) 组织有关部门着手起草《职工教育法》，为进一步开展职工教育提供法律依据。

24日　国务院强调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要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千方百计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决定》要求：(1) 严格防止新污染的发展。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过程中，属于布局不合理，资源、能源浪费大的，对环境污染严重、又无有效的治理措施的项目，应坚决停止建设。(2) 抓紧解决突出的污染问题。当前要重点解决一些位于生活居住区、水源保护区、风景游览区的工厂企业的严重污染问题。(3) 制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利用。加强对自然环境的规划和管理。当前，特别要制止住对水土资源和森林资源的破坏。(4) 搞好首都北京和杭州、苏州、桂林的环境保护。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要会同有

关部门，帮助和督促这四个城市特别是北京市制订规划，积极实施，切实做出成绩。（5）加强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计划指导。要组织开展环境经济学和国土经济学的研究。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强对本地区国土资源的综合考察。逐步为制订我国国土整治、开发、利用的规划和加强管理工作创造条件。（6）加强环境监测、科研和人才培养。（7）抓紧制定各项具体的环境管理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国务院各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的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

国家经委提出各行业都要为轻工市场服务

国家经委召开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主要靠轻工产品的增长。要采取措施确保轻工业和纺织工业增产更多的回笼货币和换汇率高的适销对路产品。其他生产部门，也要根据市场需要，有计划地生产轻工产品。各行各业都要为轻工市场服务。会议提出4条措施：（1）轻工生产必须努力提高质量，增加高中档产品的比重。要注意研究农村市场的需要，增加量大面广、结实耐用的商品。（2）围绕名牌、“短线”产品，组织联合协作，实行大批量生产。国家经委今年将协同有关部门和地区先把自行车、啤酒、卷烟的联合协作生产抓起来。继续组织缝纫机、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协作生产。（3）抓好轻工业生产所需原料的供应。计划内分配的原料和超计划收购的一、二类农副原料，要优先供应给生产条件好、经济效果好的地区和企业。国家拨给地方的外汇和地方留成的外汇，应多用于进口短缺的轻纺工业原料。（4）要充分发挥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灵活多样、适应性强、能够容纳更多劳动力的特点，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特别要注意安排好日用小商品的生产，及时供应市场。手工业生产所需一、二类物资，各级物资部门要给予保证。

25日　人大常委会审议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收支调整报告

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姚依林代表国务院作《关于调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收支的报告》。《报告》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但潜伏着危险。主要是：财政连续两年出现较大赤字，市场货币流通量偏高，不少商品价格上涨，必须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1981年首先要争取做到基本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此基础上，基本上实现信贷收支平衡，停止财政性货币发行。把市场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1981年财政收入原计划为1087亿元（包括国外借款，下同），由于石油、煤炭产量调减，工业企业和工商税收减少，加上外贸亏损和粮食购销补贴增加，财政收入调减为976亿元。财政支出原计划为1124亿元，也调减为976亿元，使支出和收入平衡。为实现上述目标和要求，1981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内容和重大政策措施是：（1）基建总规模由原计划的550亿元调减为300亿元。（2）各项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和国防开支共减少64亿元，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费共减少16.7亿元。（3）认真抓好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确保轻工业增长速度达到8%；钢产量由原计划的3500万吨调减为3300万吨。（4）原油产量由原计划1.06亿吨调减为1亿吨。统配煤矿产量由原计划的3.5亿吨调减为3.38亿吨。（5）整顿和改组现有企业。（6）保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要从商业、外贸和物资部门的库存中拿出一部分商品投放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要逐步地适当增加一些工资。

(7) 加强集中统一，在以下几个方面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要坚决执行；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财政税收制度和重大财政措施要集中统一，必须严格遵守；控制信用投放，非经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在计划外增加贷款；国家规定的物资调拨计划必须坚决完成；坚决制止随意提价、变相涨价；坚决制止滥发和变相滥发奖金；加强外贸、外汇的管理，统一对外和联合对外，禁止互相拆台。向外借款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8) 发行国库券和借用地方财政结余。国务院决定发行40—50亿元国库券；要求地方节余开支80亿元，借给中央使用。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经济全局的稳定。

会议于3月6日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授权国务院按照报告中提出的调整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措施，对各项工作进行切实的具体的部署。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解决调整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务必做到从国务院各部门到各基层单位，都能坚决贯彻执行。要经过这次清醒的、健康的调整，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并且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协调的稳定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国政府首次获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单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第一档信用贷款的备用安排，允许中国在今后的12个月内可以换取4.5亿个特别提款单位，以支持中国政府的1981年经济调整计划。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为18亿特别提款单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动用过。这是第一次提出动用特别提款单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宣布，中国还将从该组织的信托基金项下获得另一笔贷款。

3　月

3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

《规定》要求：(1) 凡属基本建设，不论其资金来源如何，要由各级计委综合平衡后，在核定的基本建设规模之内，纳入各级基本建设计划，并要严格遵守有关基本建设的规定，接受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财政监督和统计监督。一切新建的大中型项目，必须正式列入国家年度建设计划，并由国家建委批准开工报告，才能正式开工。(2) 在调整期间，要严格控制新项目，少铺或不铺新摊子，切切实实安排好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扩建。基建投资首先要安排好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住宅和城市公用设施的建设。(3) 银行发放基建贷款，必须在信贷平衡的基础上进行。(4) 利用外资安排的基本建设要严格控制。(5) 国防费安排的工程等要适当压缩。(6) 所有基本建设计划必须落实所需物资。(7) 所有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都必须先由上级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并应有国家计委批准的设计计划任务书和国家建委批准的设计文件。任何领导人都不能个人决定上项目。(8) 从基本建设工程造价中提取的各种费用，必须由国家建委会同国家计委、建设银行总行统一规定。

6日　人大常委会批准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决定，并经1979年3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批准后成立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保护林木，发展林业，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必须引起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重视。为了使林业建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决定》要求：(1) 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山林树木，或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以及其他部门、单位的林木，凡是权属清楚的，都应予以承认，由县或者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保障所有权不变。根据群众的需要，划给社员的自留山（或荒沙荒滩），由社员植树种草，长期使用。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山和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的树木，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允许继承。(2) 国营林场和社队都要结合林业生产的特点，认真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要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切实把责任和报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社队集体林业，应当推广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可以包到组、包到户、包到劳力。联系造林营林成果，实行合理计酬，超产奖励或收益比例分成。(3) 国营林业局生产的规格材，除自用的和地方按规定留成的部分外，全部由国家统购。林区社队集体生产的规格材，国家统购百分之七十至九十，具体比例由省、市、自治区确定。林区的非规格材和社员的木材，国家不实行统购。非林区社队和社员生产的木材，国家不实行统购。(4) 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集体林区和国有林区的木材价格。

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1982年7月1日进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前，我国进行过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一次是1953年，第二次是1964年。这次人口普查的调查项目，除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姓名、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等指标外，增加了行业、职业、婚姻状况、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等指标。

3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召开的全国各省区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

11日　粮食部提出积极开展粮油议购议销

粮食部召开全国议价粮油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如何做好粮油议购议销工作以利于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会议要求：在坚持粮油统购统销、统一调拨的前提下，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作为国家增加粮油收购，调节社会需求的一条渠道，发挥它对弥补余缺、调剂品种、活跃市场、平抑市价、打击投机倒把的积极作用。会议指出，议购和征购超购要有一定的比例，议购比重不能过大，不能影响征购超购。议价收购只能在完成征购和超购任务的前提下进行。没有完成征购超购任务的，集体粮油不准上市，不许搞议购。由于产量增加，完成征购超购计划以后余粮、余油较多的，要力争多超购一些。会议指出，在完成和超额完成粮油征购任务之后，要积极开展议购。只要符合政策，就应依质

论价收购。会议认为，议价粮的销售要量入为出，瞻前顾后，留有余地，根据力量和可能办事。目前我国粮食还很不宽裕，计划内销售要打紧，议价粮销售也要适当控制，不能放得太宽。

这次会议之后，经国务院批准，粮食部和国家物价总局于3月20日联合发出《关于经营议价粮油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粮油的议购价格，应当随行就市，略低于市价。有些品种可以掌握在相当于超购价的水平，有些品种可以略高于超购价。不能因为搞议购而抬高集市粮油价格。通知规定，可以根据情况，掌握合理的季节差价。

12日　国务院要求稳定生猪生产政策

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商业部、粮食部关于当前生猪生产情况的紧急报告》。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保护广大农民发展养猪的积极性，关系到市场供应、农业增产，关系到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要经常研究解决生猪生产以及商业购销、加工、储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促进生猪生产的稳步发展，保持猪肉供应的好形势。

农业部、商业部、粮食部在《紧急报告》中建议：(1) 稳定发展养猪的各项政策。国家的收购政策、价格政策、奖售政策和集体的饲料分配、奖励政策，以及集体养猪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政策等等，都不要随意变动。(2) 对于一些社队因粮食减产影响饲料粮兑现的，要多方设法调剂余缺，予以解决。(3) 保护和发展母猪。对集体所有的母猪，实行联产计酬的办法，包养到户、到人，效果一般都比较好。对社员家庭养母猪要给予鼓励和扶持。(4) 各地可根据产销情况，在保证完成猪肉外调和出口任务的前提下，妥善安排城乡市场销售，解决卖猪难和买肉难的问题。

13日　国务院批准中行办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贷款暂行办法

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办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贷款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经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领到营业执照的合营企业，都可以申请贷款。贷款种类有流动资金贷款、结算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上述贷款分为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两种。借什么货币还什么货币。外币贷款按外币计收利息。贷款利率：人民币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执行。外币贷款利率，由中国银行拟定，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后执行。

16日　国家计委提出“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初步意见

国家计委提出《拟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初步意见》。国家计委在《意见》中指出，在去年对十年规划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重新考虑今后十年的设想，并着手拟定第六个五年计划，使经济发展有一个长远打算，避免走一步看一步的弊病。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六五”计划要贯彻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在拟定“六五”计划的工作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 从调查研究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进一步弄清我国的国情和国力。(2) 从实际情况出发，恰当地确定需要和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而不是先定目标，然后围绕这个目标定指标、提方案。(3) 研究和安排计划的顺序，要首先考虑人民生活最必需的改善程度，科学教育文

化事业最必需的发展程度，还应考虑国防建设最必需的发展要求。据此考虑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考虑能源、交通的发展和其他重工业各部门的发展。经过反复综合平衡，最后确定各方面的发展计划。(4) 着重研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研究提高经济效果，求得在投资不多的情况下社会生产有一个稳定的增长速度。(5) 人民生活的改善，生产建设的规模，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要在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来考虑。

18日 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运用经济杠杆加强经济管理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在调整时期如何搞好改革，特别是怎样运用经济杠杆加强经济管理的问题。会议提出：要用经济杠杆、经济手段、经济利益关系来调节部门、地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微观经济活动符合宏观经济的要求。要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在经济调整时期，价格不能大改动的情况下，可更多地利用税收来调节。对一部分长线产品、重复生产严重的产品加税，促使企业截长补短，有利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用税收促进改组，对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厂加税，促使企业走专业化协作的道路。要使企业摆脱地区、部门的束缚，合理地组织起来，必须改上交利润为上交税收。要研究改组成公司和联合体的利改税。用税收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把一部分企业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多得的利润通过税收收上来，解决企业之间利润水平相差悬殊带来的苦乐不均问题。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逐步改变目前这种地方财政节余，中央财政赤字的状况。用税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通过税收调节，使经营水平比较好的企业得利，迫使经营水平差的企业改善管理，长期不改善的就被淘汰。用税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一部分产品需要减免税外，今后主要是加税。对一切有营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要征税。同时指出，要运用税收杠杆，必须改变目前“协商办税”的做法。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税务部门一定要加强，根据税收任务增加人员编制。银行贷款要实行“择优扶持”的原则，对适销对路的产品优先贷款；对长线产品控制贷款；对同大厂争原料、燃料、动力，消耗高、质量差的小厂要停止贷款；要实行差别利率、浮动利率和加息制度。制定经济法规，使多种经济活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要建立仲裁机构和经济法庭。发挥物价、税务、银行、统计、财政和工商行政等机构对企业的监督作用，把经济活动的各种信息及时收集起来，便于作出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

25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制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几项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制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几项规定》。规定要求：(1) 不得在资源不清的情况下盲目编制计划任务书和进行设计；更不得边勘探、边设计、边建设。正在建设的矿山，凡资源尚未查清的要立即停下来补充勘探，把资源落实后补办审批手续，再继续建设。(2) 不得在自然条件、工程条件尚未搞清的情况下盲目定点，开工建设。正在建设的项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问题较大的，应限期补做工作。采取措施后仍不能解决的，要停止建设。(3) 不准搞工艺不过关的项目。(4) 不准搞工艺技术十分落后、消耗过高的项目。(5) 不准搞协作配套条件不落实的项目。6、不准搞污染环境而无治理方案的项目。(7) 不准搞长线项目。(8) 不准搞

重复建设项目。(9) 不准搞“大而全”、“小而全”的项目。(10) 不准搞同现有生产企业争原料的项目。(11) 不准盲目引进项目。(12) 不准搞“楼堂馆所”。

28日　国务院紧急通知要求千方百计把工业交通生产迅速搞上去

《通知》指出，一、二月份的工业生产和经济效果，很不理想。三月份工业生产虽有些上升，预计一季度不会有多大好转。形成上述情况，主要是有些单位对生产抓得不紧，组织领导不力。对上述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要求加强领导，进行调查研究，召开专门会议，发动群众，拟定和落实增产节约措施。《通知》强调，今年工业交通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必须深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动广大职工，广泛开展以调整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效果为目标的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大力增产城乡人民和出口需要的轻工产品。狠抓能源生产和节约，特别是要把煤炭生产抓好。要保证完成国家的原材料调拨计划。重工业、机械行业要积极支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搞好调整、改组、联合中，努力生产适销对路产品。铁路、交通运输部门要努力提高主要区段的运输能力，促进生产发展，对行之有效的、能促进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政策、措施和做法要继续坚持。要广开生产门路，进一步做好市场调节，把生产搞活。对工商、工贸关系和资金、贷款等问题，有关部门要主动配合，加强协作，抓紧研究解决。

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积极开展农村多种经营方针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指出，(一) 我国农业就总体来说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每人平均耕地较少，但是山多，水面、草原大，自然资源丰富；一个是技术装备落后，但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只有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时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方针、政策，合理利用和开发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保证我国农业建设的正常进行。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务必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我国的农业不但不能实现现代化，就是摆脱困境也是不可能的。(二) 长期以来，我们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耕地上，而耕地又几乎只是集中于种粮食作物，致使农业内部比例失调，自然资源受到破坏，农民负担过重。这个教训是必须记取的。(三) 必须做好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分区的和全国的国土利用总体规划，作为指导农业布局的科学依据。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若干年继续保持一定数量的粮食进口。各级人民政府应在粮食供求平衡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把农业经济内部比例失调的状况调整过来。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四) 开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积极性。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生产队加以组织和扶助。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最高限度可达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15%。(五) 中央、国务院建议逐步推广经济合同制，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先行试点。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作物的收购任务，由国家同生产队订立合同，确定双方应承担的义务。生产队保证完成合同规定的交售任务，对作物种植面积有权自行

灵活安排，剩余的产品有权自行处理。

此前，3月2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国家农委党组的《关于多种经营问题的汇报提纲》。

我国政府首次派团参加欧共体“中国贸易周”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国贸易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派出重要的大型代表团参加国外的贸易活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国贸易周”于3月30日到4月1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目的是使双方有机会交换意见，探索新的贸易合作和中、长期投资的途径。谷牧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不变。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策不变。在主要依靠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促进同外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的政策也不会改变。中国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市场，因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比较低。但是，如果向前看，就不难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无疑会发展，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也将随着发展。”

陈云同志对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

《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建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4　月

1日　国务院批转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汇报提纲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汇报提纲》。国务院批转这个文件的《通知》指出，在当前调整中，一定要处理好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在调整时期，调整是中心，改革要服从调整，促进调整。有利于调整、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改革必须坚持进行。工业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牵涉到许多方面，各部门要大力协同，密切配合。保证调整、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生产更好的发展。

座谈会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国家经委于2月26日联合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在工业体制改革方面如何贯彻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会议提出，(1) 继续调整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重点是积极地、认真地把轻工业搞上去，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繁荣市场，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2) 加强工业内部的薄弱环节。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挖掘内部潜

力，使交通运输紧张和矿山采掘、油田采储比例失调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3) 围绕调整稳步地进行改革。搞好现有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的巩固提高工作。结合企业的关停并转，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推动工业的改组和联合。(4) 认真搞好企业整顿。稳定现行的企业领导制度，搞好领导班子的建设，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和全面经济核算，开展职工的正规培训，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国务院成立旅游工作领导小组

为加强对全国旅游工作的统一领导，国务院成立旅游工作领导小组。陈慕华任组长，吴庆彤、韩克华、沈图任副组长。成员有：国家计委、商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国务院侨办等单位。该小组的任务是：审定旅游工作的方针政策；审查全国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的建设规划；负责协调同旅游有关的各方面工作；审定旅游计划，检查执行情况。小组不另设办事机构。具体工作由旅游总局承担。

2日　中央书记处决定加强国土整治工作

中央书记处第97次会议决定，国家建委要同国家农委配合，搞好我国的国土整治。建委的任务应该管土地利用，土地开发、综合开发，地区开发，整治环境，大河流开发。要搞立法，搞规划。国土整治是个大问题，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的部管这件事，我们可不另设部，就在国家建委内部设一个专门机构负责这项工作。由国家建委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3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提出积极支持个体工商户经营

此次会议提出，要管活市场，决不要把市场管死。要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保护合法经营，搞活经济。要克服“左”的思想影响，继续办好城乡集市贸易。今后，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城乡集市贸易将进一步发展。凡国家规定准许上市的商品，不要乱加限制。要正确贯彻允许社队和社员贩运农副产品的政策。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在政治上、政策上积极支持个体工商户经营。要特别鼓励和支持个体工商户经营那些群众需要、而国营和集体没有经营或经营不足的行业，如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和有特殊工艺技术的行业。对这些行业可以放宽一些，准许带帮手，准许多带几个徒弟，以满足社会需要，扩大待业青年就业。

6日　国务院批准1981年节约能源的目标和要求

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能源委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针对节能潜力很大和1981年能源供需矛盾仍很尖锐的情况，提出1981年节约能源2400万吨标准煤的目标。其中，继续调整轻重工业比重和产品结构，节约1200万吨；加强管理减少浪费，节约600万吨；依靠1980年、1981年两年完成的措施项目，节约600万吨。具体任务是节约石油450万吨，节约煤炭2000万吨，节约电力70亿度。

15日—25日　全国工业交通会议提出要深化改革加快消费品工业发展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和讨论经济政策和增加消费生产问题。会议决定：(1) 进一步落实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政策。要把统负盈亏逐步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好的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可以好于或高于同行业同工种的国营企业。要切实保障企业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

实行“多留少缴”的原则，留成比例不应少于50%—70%。为解决职工收入偏低的问题，恢复年终劳动力分红的制度。生产所需的一、二类原材料，要逐步建立正常的供应渠道，纳入各级计划。(2) 抓好轻纺工业所需农业原料的生产和供应。纳入计划的农业原料要搞好计划衔接。计划外的农业原料，要签订长期的经济合同。(3) 在改组、联合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4) 坚持按劳分配，控制奖金总额。(5) 工业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应采取以下办法：已经实行扩权试点的企业，继续实行利润留成；亏损企业和微利企业实行减亏包干，超亏不补，减亏、盈利留用；小企业提前一步实行自负盈亏、以税代利；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大中城市按行业、按公司试行利润包干。

会议提出，轻纺工业系统今年要增加重点产品的生产。重工业行业也要围绕消费品生产的需要，调整各自的生产。机械工业和军工部门要大力生产日用机电产品，同时为轻纺工业的技术改造提供设备和零配件。冶金工业、化学工业要为生产消费品提供更多更好的原材料。建材工业要面向农村，面向8亿农民，为农村建房供应建筑材料。能源供应要优先保证消费品生产的需要。会议指出，要完成中央工作会议所要求的实现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价稳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要做大量的工作，决不能掉以轻心。千万不能因为一季度形势比较好，就忘记了我们在经济上还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要坚决地继续贯彻下去。

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第二，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的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第三，必须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第四，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第五，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必须抓好以下工作：(1) 确定科学技术要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解决的重大问题。(2) 研究和制订重大技术政策。(3) 加强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实行有偿转让，改革价格、税收等政策。(4) 组织好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工作。(5) 改革体制和整顿机构。(6) 搞好学术、技术交流和科学普及活动。

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严格控制建设规模

由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会议结束。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继续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的问题。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国家建委党组的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会讲了话。会议认为，要严格控制基建规模，关键在于全党思想认识的统一。只有对“左”的思想进行认真清理，真正做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能自觉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切实做好控制基建规模的工作。会议对严格控制今年的基建规模，提出了以下意见和措施：对于没有列入今年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从4月15日起停止拨款，立即停下来进行清理；凡是已经停建缓建的项目，包括前两年和今年停缓建的项目，一律不准擅自恢复建设，或明停暗不停，变相施工；所有计划内项目，都要按年度计划确定的建设规模施工，不得擅自增加建设内

容，扩大工作量；对于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项目，要按有关规定的精神进行清理。

17日　国务院紧急通知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

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国耕地很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果在用地上失去控制，不仅会影响当前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会带来长期的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农村建房用地，必须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农村社队要因地制宜，搞好建房规划，充分利用山坡、荒地和闲置宅基地，尽量不占用耕地。各级政府对农民建房和社队企业占地情况，要进行一次检查。对任意侵占耕地建房、不经批准强行占地以及建房占地过多的，要严肃处理。对社队企业占而不用的土地，要责令退出。

5　月

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

国务院发出《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社队企业必须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从宏观经济的要求出发，根据社队企业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整和整顿。既要坚决服从全局进行调整，又要尊重社队的自主权，必须采取慎重步骤，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限制消极因素，发展短线，压缩长线，使其健康地发展。调整中要发挥财政、信贷、税收、物价的监督和调节作用。《规定》要求：（1）凡不与大厂争原料，产品有销路，经营有盈利的企业，均不应强制关停。（2）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应给予照顾和扶持。（3）凡国营企业加工能力有剩余的，社队不再办同类企业和扩大加工能力。（4）凡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宜于农村加工的，国家一般也不再在城市建新厂和扩大加工能力，应着重扶持集体企业的加工厂。社队棉纺厂、卷烟厂应停止发展。机械加工业，要重点搞好中小农具生产和农机维修，或同大企业协作配套。

5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要求清查偷漏欠税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清查偷漏欠税的通告》。《通告》要求，各纳税单位和个人对在纳税中发生偷税、拖欠工商税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首先进行自查，并将结果报告当地税务机关。时间从1980年1月1日查起。纳税单位在自查中主动检查，并及时补交税款，可免交滞纳金和罚金。拒不自查或弄虚作假，经税务机关检查核实，必须限期补交税款，并从拖欠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金；偷税漏税，处以相当于偷漏税款5倍以下的罚金。最高人民检查院同时发出《关于配合税务机关清查偷漏、拖欠税款的通知》。

7月13日，财政部召开全国清查偷税、漏税和拖欠税款电话会议。会议指出，清查工作进展很快，成绩显著。经企业自查，查出偷漏欠税款5.8亿元，已补交入库3.4亿元。在清查中要合理把握政策界限：第一，以教育为主，根据不同情节和严重程度，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二，对清查偷漏税的时间界限，要严格按规定办。第三，检查

清理偷漏税的重点，一般应当是城镇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社队企业以自查为主。农民和个体户不宜搞大规模的查补工作。会议要求，这项工作争取在九月底基本结束。

6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关于建设调整问题的汇报提纲

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关于建设调整问题的汇报提纲》。《提纲》提出，经过调整，1981年列入计划的大中型施工项目592个，收尾项目131个，共723个，比1980年计划项目数减少28%。大中型在建项目的建设总规模（从1981年起到全部建成止所需投资）已从1980年的1133亿元减为700亿元，压缩38%。投资方向也得到了进一步调整。调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981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300亿元规模难以控制，有再度膨胀的可能。停缓建项目的善后工作量大面广。为此国家建委向国务院建议：（1）凡是没有列入1981年基建计划的项目要立即停止建设。（2）凡是用更新改造资金和银行贷款搞的基建性挖、革、改项目，应由各级计委综合平衡，纳入基本建设计划，按基建程序办事。（3）住宅建设投资由1980年的108亿元调减为66亿元。各地区、各部门纷纷要求增加住宅建设自筹资金指标。鉴于这一问题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和安定团结，建议逐步增加指标。国务院同意国家建委的汇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研究执行。

国家计委等部门要求加强国家统配物资资源管理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物资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国家统配物资资源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国家统配物资的生产和调拨计划，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必须坚决执行，不得随意改变。统配资源分配权属于国家，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运用。擅自动用的，国家要扣回相应的分配指标。情节严重的，要进行通报并对主要责任者追究责任。在保证国家分配计划或国家计划内重点生产、建设的需要的原则下，企业可以自销(国家不准自销的除外)。但生产企业要按订货合同安排生产，以销定产，避免造成积压。不按合同生产的，银行不予贷款，物资部门不分配原材料、燃料。

8日　国务院同意允许和保护农村正当借贷

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报告》指出：（1）对待农村的信用关系，在国家银行和信用社的信用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集体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正当借贷存在。对社队的合理资金需要，利率不能超过当地信用社放款的最高利率。个人之间互通有无的借贷，将会长期存在，应当予以保护。（2）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对于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利息偏高的，不能视为高利贷者。

10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的具体实施办法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财政部、商业部、外贸部、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国家物价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实施办法》规定：（1）企业计划，应根据国家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指导性指标和市场需要，本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可能编制。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和调拨计划，企业必须保证完成。（2）国务院有关利润留成的办法，要继续执行。对企业留利过高的要适当调整，扩权企业要实行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有偿占用。（3）在保证设备更新和大修理的前提下，企业可以把生产发

展基金同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等结合起来使用。(4) 工业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后，可以按规定的自销范围，自销一部分产品。(5) 新产品试制费，属于国家计划安排的重大试制项目，由下达任务的部门拨款。属企业自行安排的试制项目，由利润留成开支。财税部门对企业试制新产品应采取积极扶持政策，新产品在试销期间，成本高，利润过低或者亏损的，经过省、市、自治区财税部门审批，可以减税或者免税。(6) 扩权企业有权申请出口自己的产品。有出口任务的扩权企业，有权按国家规定取得外汇分成。(7) 企业自销产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没有规定价格的，按同类产品制定价格，并经物价部门核定。(8) 以税代利试点今年一般不再扩大。(9) 企业利用中短期设备贷款建设的项目，投产后的新增利润，应按核定的基数留成比例提取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10) 扩权企业有权任免中层及中层以下干部。在编制允许，不增加工资总额的前提下，招聘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根据国家下达的劳动计划择优录用职工。扩权企业有奖惩、直至开除职工的权力。

20日　全国物资局长会议提出对一般生产资料实行自由购销

会议提出，在搞好社会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对重要的、短缺的生产资料必须实行计划管理，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或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超计划生产的产品，确定一定比例或全部由企业自销。对一般的生产资料实行自由购销，国家只下达参考性指标。生产企业可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按照市场情况自行安排，而不受这种参考性指标的束缚。但对其中一些影响市场较大的通用生产资料，国家可下达一部分指令性指标，由物资部门优先订购经营。为满足某些重点单位、重点任务的需要，主管生产部门或物资企业可以指定单位直接生产供应。

29日　农业部等提出改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蔬菜供应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商业部关于加强领导改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蔬菜供应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通知中指出，为改善蔬菜供应，城市和工矿区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抓紧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政府都要确定一名领导同志经常抓这项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密切结合，共同努力，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蔬菜工作有明显好转。

农业部、商业部在报告中分析了近年多数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蔬菜供应存在的问题。认为供应数量少、质量差、销价高的情况比较严重。买菜难成了城市居民的一大负担。农业部和商业部建议，大中城市近郊区农业生产要坚决贯彻以菜为主的方针；要认真贯彻菜区的各项经济政策，帮助蔬菜社队处理好蔬菜生产与工业副业以及同粮食生产的关系；在劳动力安排和生产资料分配上，要优先保证蔬菜生产的需要。报告强调，各级供销部门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对蔬菜供应的购销形式、淡季旺季调剂、价格政策、网点设置、贮存设备以及经营环节等等方面，都要有计划地稳步进行改革，使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工作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30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办好中短期设备贷款

国务院发出《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短期设备贷款工作经验交流天津现场会的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发放这项贷款有利于发展人民急需的日用消费品生产和

增加货币回笼，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和出口换汇，有利于安排就业，是一举数得的好事情。人民银行应在国家确定的贷款计划范围内，与有关部门协作，把这项贷款办好。有关部门要给予积极支持，使贷款项目尽快见效，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中短期设备贷款工作经验交流天津现场会的情况报告》指出，人民银行自1979年开始办理中短期设备贷款。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安排中短期设备贷款指标50亿元，其中，轻纺工业专项贷款20亿元，一般设备贷款20亿元，铁道部、交通部和冶金部10亿元。全年实际投放45.4亿元，当年回收5.6亿元。截至1980年末，共有5600多个项目竣工投产或部分投产，占贷款项目总数的36.7%。新增产值46.4亿元，新增利税11.9亿元。《报告》认为，今后要办好中短期设备贷款，必须坚持以下几点：（1）必须坚持贷款条件，真正发挥拾遗补缺、填平补齐的作用。（2）必须按照国家确定的贷款总额，控制发放贷款，非经批准不得突破。（3）根据项目一般需跨年度建设的特点，中短期设备贷款未用完部分，应准予结转下午继续使用，以保证项目建设的连续性。

6　月

3日　国务院提出逐步改革外贸体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进出口委《关于当前对外经济贸易如何为国民经济调整服务的报告》。国务院指出，现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很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要在政策上扶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我国现行的价格、税收、信贷办法，凡不利于奖出限入的，要逐步加以改革。

袁隆平获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

国家科委、农委联合召开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发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10日　国家计委组织拟定“六五”专题规划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拟定“六五”专题规划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更好地指导我国今后经济、技术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在制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同时，除了各行各业都应制定出本行业的规划外，需要制定一批重大的专题规划，作为全国中长期计划的补充。经国务院同意，请有关部、委在各部门所提“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方针政策，分别研究制定以下12个专题规划：（1）农业规划，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垦、水利、气象等，请农委负责。（2）日用消费品规划，请轻工、纺织两部负责。（3）财政增收节支规划，请财政部负责。（4）能源的开发和节约规划（关于山西煤炭基地的开发也可考虑单独搞个规划），请能源委负责。（5）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规划，请机械委负责。（6）原材料工业规划，请冶金、化工、建材三部负责。（7）铁路、交通规划，请铁道、交通两部负责。（8）利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规划，请进出口委负责。（9）科技发展规划，请科委负责。（10）人才培养规划，请教育部负责。（11）人口规划，请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12）劳动就业和工资

福利规划，请劳动总局负责。这些专题规划，不限于5年、10年，可以设想得更远一点。但在5年和10年期间的要求，应当同“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相衔接。

19日 赵紫阳谈经济工作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经济工作发表以下意见：(1) 有些经济问题要重新考虑，不要完全为财政框死。假使拿出10亿、20亿、30亿的资金来搞些必要的建设，把闲着的施工队伍、机械制造能力和材料都用起来，财政就可以增加收入，流动资金也可以减少占用。但是，钱要用在必要的地方。(2) 要下决心把煤炭搞上去，特别要重视山西煤炭的开发。资金来源，一是国内挤一点资金；二是用煤顶出的油出口收汇；三是利用外资。(3) 利用外国资金要全面算账，不能只算一面。借用外资搞建设，将来要还债，要付利息，好象好处不大，但可以把闲着的人用起来，把企业搞活。现在花利息借外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买时间，等于输血。(4) 调整时期速度低一点可以，但“六五”期间速度不能低于4%，5%更好。“七五”不要低于6%。没有一定的速度，不可能保持经济的稳定。(5) 整顿企业是必要的，但是要有一套调动积极性的东西，还是包干好。但地方包干要改，基本建设不包，只搞经常费用包干。

22日 财政部颁发国营工交企业经济核算工作试行办法

《试行办法》指出，经济核算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重要原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首先要从宏观经济上开展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许多企业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甚至还没有恢复到历史较好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更大。增产节约、提高盈利水平的潜力很大。

《试行办法》规定：定期考核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和其他适当的利润分成办法，鼓励那些经营好、盈利多、贡献大的企业，为社会多创造财富。国家对政策性亏损企业实行计划补贴的办法，鼓励他们将亏损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发生亏损的企业，必须限期扭转。长期未能扭转的，应当停产整顿。整顿无效的，应当合并、转产或关闭。

《试行办法》要求实行全面的、严格的经济核算。(1) 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生产全过程进行经济核算。(2) 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家要求的水平。(3) 合理、节约地使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向国家缴纳固定资金占用费和自有流动资金占用费。（注解：目前实行利改税办法的企业，不缴纳流动资金占用费，其他企业仍缴纳。）(4) 按规定提取和使用企业基金或利润留成资金、基本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以及其他专项基金。(5) 建立以总会计师为首的经济核算体系，健全财会机构。(6) 严格执行国家的财经纪律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

27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8章38条，（一）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回顾。（二）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四）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五）“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六）历史的伟大转折。（七）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八）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并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总结了它的主要点：(1)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3)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4)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5) 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6) 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7) 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8) 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9) 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0) 根据“文化大革命”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7 月

3日　中央书记处对国土保护作出批示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重要意见：关于国土保护问题，我们不能光是停留在城市的环境保护、三废处理这些问题上。要考虑中国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保护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定期公布金融统计数字

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公告说，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开始定期发表全国金融统计数字。金融统计数字的发表，将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方面了解经济情况，监督经济工作，研究经济理论提供重要资料，有助于增进国际上对我国的了解，促进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发展。

7日　国务院要求保护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合法利益

国务院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规定》要求，保护个体经营户的正当经营、合法收益和资产。主要政策性规定：

国家鼓励和支持待业青年经营那些群众需要而国营和集体未经营或经营不足的行业，以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根据需要和可能，可以有计划地将一部分适合于分散经营的手工业、修理业、服务业和商业的网点，租给或包给个体经营者经营。

凡有城镇正式户口的待业青壮年，都可以申请从事个体经营。退休职工中，具有当前社会所急需的技术专长或经营经验、能够包教学徒传授技艺的，也可以申请从事个体经营。个体经营户，一般是一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请帮手、带学徒，都要订立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期限和报酬等。合同要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鉴证。

为了发挥个体经营户经营灵活、方便群众的特点，允许他们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如来料加工、自产自销、经销代销、摆摊设点、走街串巷、流动售货等。政策允许自由购销的一些鲜活商品、农副土特产品，个体经营户可以在规定经营范围内从事城乡运销，但不准从事批发活动。

个体经营户从国营工商企业和集体企业按批发价格购进的商品，按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格出售。自行采购的议价商品，允许随行就市出售。个体经营户所需资金，自筹不足的，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设法帮助筹措；资金周转有困难的，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为了鼓励个体经营户从事社会急需而又紧缺的修理、加工、饮食和服务业，国家在税收方面可酌情给予适当减免。广大群众需要但经营确有困难和盈利微薄的，可以申请免税。

国家保护个体经营户的正当经营、合法收益和资产。个体经营户的凡属国家政策法令允许的经营活动，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乱加干涉；凡属经过批准的经营网点和经营场所，任何单位不得侵占；凡属当地有关部门纳入计划供应的物资，不得随意中断。除按国家税法和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缴纳税款和费用以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乱收费用。

说明　已被1987年8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代替。

11日　财政部改进工商税征税办法促进专业协作发展

财政部发出《关于对工业公司试行增值税和改进工商税征税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国务院要试行增值税的指示，按照既有利于发展专业协作，又不减少国家税

收的原则，对工业公司的征税办法规定如下：1. 机器机械、农业机具、日用机械三个行业的工业公司，不论是否实行统一核算，都可将原缴纳的工商税改按《增值税暂行办法》纳税。2. 其他公司可根据企业的核算体制，对工商税征税办法作以下改进：（1）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纳税的公司，公司内部之间协作生产的销售额，可不纳工商税，只按公司对外的销售额计征工商税。（2）非统一核算的工业公司，仍按现行工商税的规定，由所属企业分别缴纳工商税。

12 日　赵紫阳提出重工业在调整中积蓄发展力量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说，解决五年计划中的财政困难的根本办法是把经济搞活，提高经济效益。在调整时期，重工业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为以后积蓄力量。增加消费品生产的路子是对的，但重工业不能成为包袱，应当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在能源许可的条件下活起来，为克服财政困难尽一份力量。冶金、化工、机械、建材等重工业的根本出路是调整服务方向。要研究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包括工厂的设备更新，这也是积蓄力量。农业靠政策、靠科学，工业也要靠政策、靠科学。靠政策就是经济责任制。靠科学就是靠技术。技术改造是把经济搞活的重要途径。通过技术改造，可以把机械工业搞活，把冶金工业搞活。此外，能源、交通要有一定的建设规模，除利用外资外，要想办法筹措国内资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各大工业部门和各大企业的积极性，广开生财之道。对企业要给一定的利益，又要实行严格的监督，既不能把企业卡得太死，又不能放手不管。

15 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制止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国务院在《通知》中指出，当前，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不正之风。一些企业为了推销产品或购买原料，或承包业务，乱拉关系，牵线搭桥，给以大量现金或实物，作为“酬劳”，使所谓中间人，以及业务人员、采购人员、推销人员，从中获得高达数百元，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利益。这种不正之风极为有害，严重地腐蚀一批人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使贿赂风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机体，干扰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正常进行；破坏社会主义竞争，使之走上邪路。对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决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坚决制止：

（一）禁止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发给购销人员进行请客、送礼、拉关系的费用。（二）禁止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物权和工作之便，里勾外联，私通买卖，从中牟利。禁止转借银行账号、倒卖经济合同、买空卖空以及投机倒把等活动，如有违犯者，根据不同情况，依法惩处。（三）一切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之间的购销活动，一律禁止提取“回扣”。过去实际上存在的提取“回扣”的作法，要立即废除。关于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回扣”问题，另行规定。（四）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不能借发奖金为名，支持购销人员搞不正之风。（五）各级财政、银行部门，要负起对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财务和会计活动的监督检查责任。凡不符合国家财务制度和上述规定的费用，财政部门和银行有权拒绝报销和支付。

20 日　国务院批准增加税务干部编制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增加税务干部编制的请示报告》。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报告

的《通知》中指出，增加税务部门的征收力量，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现财政平衡、加强经济监督的一项紧迫措施，需要引起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国务院批准增加税务干部8万人，要抓紧在明年上半年以前配齐。新增人员主要用于充实加强基层征管力量。

27日　赵紫阳要求进一步搞活外贸工作

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国家进出口委关于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汇报。会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指出：去年外贸部对外贸体制改革后发生的一些情况估计过重，今年又后退。还是要研究搞活，要发挥出口方面的优势。煤炭资源丰富，争取多出口或者用煤代油，多出口石油。要用出口石油、煤炭换回来的外汇，建设水电站。沿海城市要放手搞进出口结合。外贸体制改革，不要一刀切。对上海、天津等城市要放宽，权力应大一些。外贸的工作重点是到国外推销。

28日　国务院批准加强农副产品收购管理

国务院批转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当前农副产品收购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 坚持统购、派购、议购政策。一类产品棉花，是国务院集中管理的商品，由供销社统一收购，统一分配。各地应按国家计划完成调拨任务。二类产品实行派购。国家向生产队和社员规定一定数量的交售任务。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开展议购议销。三类产品继续实行议购议销。(2) 认真执行农副产品的价格政策。一、二类产品严格执行国家牌价，不得擅自提价、超购加价和价外补贴、议价的范围和幅度要控制，议价的比例要缩小，议价的数量要减少。(3) 推行合同制度。统购、派购、议购的产品，应由收购单位和生产单位协商签订合同。(4) 加强农副产品市场管理。二类产品除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品种以外，其他品种在完成上交售任务后，可以上市。(5) 组织好农副产品收购工作。

国务院决定设立煤代油专用资金

国务院煤代油办公室和国家计委发出《关于设立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暂行办法》。《办法》设想，今后十年通过以煤代油的办法，压缩国内烧油部分用于出口，所得净利作为发展能源、交通的专用资金。主要内容：（一）通过以煤代油办法压缩国内用油每年用于出口部分，由国务院批准，作为年度石油出口专项任务，纳入国家计划。（二）煤代油专项石油出口业务由外贸部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代理。外汇收入汇入中国银行总行的指定账户，人民币净利润汇入建设银行总行的指定账户。（三）石油出口的外汇收入作为国家统借统还外债的专项外汇资金。

8　月

8日　国务院批转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暂行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物资总局在《关于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了进入市场的工业品生产资料范围：(1) 生产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分配计划和供货合同的前提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企业可以自销的部分；(2) 属于物资主管部门优先订购的工业品生产资料中，生产企业在确保完成订购

合同（协议）前提下的多余部分；（3）计划分配和优先订购以外的其他工业品生产资料；（4）生产企业自己组织主要原材料、燃料生产的产品和试制的新产品；（5）物资主管部门的经营单位所经营的工业品生产资料，在保证完成分配调拨计划的前提下敞开供应的部分。金、银和国家禁止自由购销的工业品生产资料，不得进入市场。

10日　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价格管理

国家物价总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粮食部、对外贸易部、国家水产总局、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农副产品议购议销价格暂行管理办法（草案）》，印发各地试行。

一、议购议销商品的范围：限于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收购任务以后允许上市的一、二类农副产品。为了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二类农副产品中的重要工业原料、畜产品、大中城市及工矿区的大宗蔬菜、中药材（包括34种贵重药材）不搞议价；外贸商品基地的主要产品也不搞议价。

二、议购议销商品的作价原则：议购议销商品价格应兼顾国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既要有利于搞活市场，又要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一）议购价格。供求大体平衡或供不应求的商品，议购价应略低于当地当时的集市贸易价格。粮油议购价格应本着随行就市，略低于市价的原则确定。（二）议销价格。以议购价格为基础，按照商品合理流向，加上必要的费用和薄利（统算利润掌握在2%到3%）制定。粮油议销价格要有合理的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

三、议购议销价格的管理权限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国家物价总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议购议销商品的作价原则、作价办法，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规定主要商品议购价格的最高限价。省级物价综合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根据上级规定的作价原则和办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规定实施办法或细则；同时管理议购、议销价格。

11日—15日　国务院召开京津用水紧急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制定北京和天津用水的开源和节流的应急措施。近两年，持续干旱少雨，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出现严重供水不足的情况。担负向京津供水的北京密云、官厅两大水库，今年入汛以来，水库上游基本没有降雨。现在雨季即将结束，两个水库都已降到了死水位，情况非常严重。会议确定了四条措施：（1）两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至今仍大量存在的用水的严重浪费问题，大力压缩工业用水，以确保人民生活用水；（2）在密云、官厅两水库蓄水没有根本好转以前，两库现在的来水，只能供北京用水，不能向天津供水；（3）采取临时紧急措施，从黄河引水接济天津，由于引黄引起的泥沙淤积等问题，国家负责补偿；（4）为解决天津市的水源，要加快从滦河潘家口水库经大黑河水库引水到天津的工程建设，国家决定相应增加投资。

12日　国务院批转关于工业企业自销产品征收工商税和利润处理的规定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工业企业自销产品征收工商税和利润处理的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1）工业企业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在拨交门市部时征收工业环节工商税。销售后，按实际销售收入征收商业零售环节的工商税。（2）工业企业不设立门

市部自销的产品，除征收工业环节的工商税外，还应视同商业零售征收商业零售环节的工商税。(3) 工业企业自销按规定减征免征工业环节工商税的产品，按实际销售收入征收商业零售环节工商税。有的产品执行后出现亏损，经税务机关批准，可酌情减免。(4) 工业企业按规定自销产品所实现的利润，应如数并入企业利润总额，按规定提取企业基金或利润留成资金，其余全部上交财政。上述规定从1981年8月1日起执行。

22日—9月1日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推行经济责任制

国务院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指出，工交战线实行经济责任制，势在必行，这是适合我国当前生产水平、管理水平和广大群众觉悟程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对于克服长期以来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病，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起着积极作用。座谈会要求各地在经济责任制大面积推开的情况下，要注意可能出现的问题。当前要特别注意：(1) 防止利大大干，利小不干，生产与社会需要脱节。(2) 保证产品质量，要加强监督。(3) 职工多得的部分（包括奖金和多得的计件工资），要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要保证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个人多得。具体形式和做法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也不要一哄而起。

29日—9月4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谈“六五”计划的几个主要问题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六五”计划的汇报时，对“六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发表谈话，主要内容：(1) 同意工农业生产、国民收入“六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定为4%，执行结果会超过4%。还是留有余地好。“六五”计划要以调整为中心，是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5年。在这5年中，产业结构要基本解决，产品结构要有相当大的变化，能源交通要有适当的建设规模，为以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还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同时为全面改革作好准备。全面改革，一是价格体系的改革，二是彻底的官商分家、政企分开。借外债，只要真正用得恰当，就不要顾虑太多。借外债搞建设，实际上是买时间。(2) 现在工业增加的固定资产和增加的能源、原材料，由于吃大锅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生产责任制，工业、商业势在必行。但是，步子要稳。定额、质量、成本工作要加强。财政问题主要是两条：一是采取政策，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推进技术改造，搞好综合利用。二是通过银行，集中一部分资金。“六五”计划投资用在两个方向：一个是用在提高效益方面，哪个来得快，经济效益好，就用在哪里。一个是要为以后的发展作准备，即搞能源、交通等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建设和挖、革、改资金都要这样用。(3) 能源、交通搞好了，其他方面差一些，将来也好办。国家的投资首先搞铁路，其次是能源。在基本条件上国家要下功夫搞，全部包下来不行。山西煤炭的开发，国家和各省都要投资。(4) 发展消费品生产门路很广。只要政策不变，1985年棉花可以搞到8000万担。北方的甜菜要下决心放手让它发展。棉花、糖料主要靠北方。(5) 技术改造既是使这5年有一定发展速度所必需的，也是为今后作准备。重工业要有一定速度，不外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二是为技术改造服务。三是能源、交通一搞，也会给重工业提出任务。(6) 要充分利用开放以后的有利条件，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主要是如何充分利用，而不是利用过头或者出了乱子。不是什么都靠自己搞才叫自力更生。不能只

在国内平衡，要到国际市场上去转圈子。

9 月

3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工作

国务院批转《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关于加强经济立法工作的几点建议》。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文件的《通知》中指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重视经济立法工作，加强领导，健立和健全本部门的法律机构，学会运用经济法规来指导和管理经济工作。

《建议》的主要内容：（1）近几年经济立法工作有较大进展。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据国务院各经济部门中51个部门的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以来，共颁发各种经济法规200多个。其中，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颁布或批准的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等6项。国务院颁布或批准的有《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外汇管理条例》等70多项。国务院各部门颁发的有《工矿产品合同试行条例》、《关于制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几项规定》等160多项。(2) 经济立法工作从理论和实际工作中来看都比较薄弱，“以言代法”、“以土政策代法”的现象依然存在；经济立法工作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经济立法工作缺乏全面规划，缺乏对有关法规之间的协调、平衡；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相关机构不健全，力量薄弱，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缺乏专业人才。急需解决这些问题，以加强经济立法工作，更好为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服务。(3) 加强经济立法工作的建议。各级领导要重视经济立法工作，把它放到议事日程；经济立法的重点，应首先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制定一批急需的经济法规，以保障、巩固经济调整和改革的成果，防止可能产生的一些弊病；经济立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在总结、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建立和加强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法律机构，充实人员；加强经济立法的全面规划、协调平衡和组织指导；加强经济法规的执行监督和仲裁工作；加强人才培养和宣传、教育，开展经济法理论的研究。

5日 财政部提出关于工商税制改革设想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国务院在批转这个《设想》的《通知》中指出，国务院原则同意《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在具体办法没有正式颁布之前，由财政部选择一些地方、行业，有计划地组织试点，成熟一个，解决一个。

财政部《关于工商税制的改革设想》提出，工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合理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改革的原则是：（1）适应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和经济性质、经济形式的多样性，逐步恢复一些税种，使每个税种在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2) 加强经济责任制，逐步把国营企业上交的利润改为征税，以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

算，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增加财政收入。(3) 根据国家经济政策的要求，按不同产品和不同行业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从经济利益上来调节生产和消费。(4) 在目前价格不能大动的情况下，用税收杠杆来调节一部分企业的利润，适当解决企业之间的，由于价格和资源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利润水平悬殊的问题。(5) 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兼顾地方、部门、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6) 将各项工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相应的税收管理权。

根据上述原则，提出税制改革方案，(1) 将现行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四个税种。(2) 开征资源税和利润调节税。(3) 将国营企业交纳的固定资产占用费，改为固定资产税。分行业规定税率，按固定资产原值计征。(4) 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5) 健全涉外税种，还要陆续制定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等法规。(6) 恢复征收和开征一些地方税。对企业恢复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恢复征收印花税和特种行为消费税。恢复征收集市交易税。开征土地使用税。开征城市建设税。以上这些地方税，由中央确定税种，制定征税原则，规定税率的最高限额。开征、停征、减税、免税以及具体征税规定，均由省、市、自治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按照上述设想，改革以后全国共开征 20 种税，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利润调节税、固定资产税、工商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建设税、印花税、城市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屠宰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

改革工商税制的步骤，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试点，逐步实施，争取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改革任务。

国务院要求积极稳妥地开展伯托投资

国务院批转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关于国际信托投资工作座谈会纪要》。国务院在批转这个《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开展信托投资工作应当采取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前进的方针，首先把已经成立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信托投资公司办好。

9 日　邓小平谈生产责任制不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指出，实行生产责任制，不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所有制。这种责任制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15 日　国务院批转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的报告

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并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在今后 5 年内，业务建设要重点抓好 4 项工作：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建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体系；统一统计标准，改进统计方法；加强统计分析和监督，开展经济预测，提高计算技术水平。建立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积极草拟统计法规。

20日 我国首次用1枚运载火箭发射3颗卫星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这是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卫星准确入轨，各系统工作正常，正不断地向地面发送各种科学探测和试验数据。

24日 我国发现6个大型近海含油盆地

我国海洋地质工作者完成100万平方公里的近海石油地质调查，先后发现了6个大型含油盆地，展示了我国海上油气资源广阔前景。这6个大型含油盆地是渤海盆地、南黄海盆地、东海盆地、南海珠江口盆地、北部湾盆地和莺歌海盆地。

29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要求继续作好压缩烧油和节约用油工作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能源委和国家物资总局联合召开全国压缩烧油和节约用油会议。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继续做好压缩烧油和节约用油工作。凡烧油的工业锅炉、民用锅炉和原设计烧煤、后改为烧油的电站锅炉，都要改为烧煤，最迟在1985年以前完成；对原设计烧油的电站锅炉，尽可能就地改造为烧煤的锅炉或另外新建高效发电机组来代替。各种工业窑炉，也要根据各地区、各企业的条件，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改造。经国务院批准，今后压缩烧油的项目，都直接作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列入计划，改炉所需的设备、材料等都按基本建设定额计算安排，给以保证；对改炉企业所需煤炭，从分配到订货都要专项安排，签订合同，保证供应。

我国加入商品共同基金组织

我国正式批准商品共同基金协定。商品共同基金是个新型的国际组织。基金现有104个成员国，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决策机构是基金理事会，董事会负责基金的经营事项。商品共同基金有资金7.5亿美元，由各成员国直接分摊资本和自愿认捐组成。

发展中国家为争得其主要出口的初级产品和原料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和定价的主动权，曾在第六届特别联大提出一项商品综合方案。核心是建立一项共同基金，签订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重大的18种初级产品的国际商品协定。1976年第四届世界贸发大会达成商品综合方案，1977年举行商品共同基金谈判，1980年达成协议。我国于1980年11月签署协定，是最早签署和批准共同基金协定的国家之一。

10 月

4日 国家经委等部门要求加强节约用水管理

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城建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节约用水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1) 各城市要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的管理制度。按指标供水，节奖超罚。要取消生活用水“包费制”。对用地表水和地下水（包括自备地下水井），制定合理收费标准，超定额加价收费。(2) 制定节水新技术规划，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水的重复利用率在50%以下的城市，要求在二、三年内每年把水的重复利用率提高6%至10%；水

的重复利用率在50%以上的城市，要求在二、三年内提高2%至3%。(3) 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与水源开发、节约用水要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新建住宅，要按户装设水表。工矿企业，必须确定比较先进的用水定额。要把节约用水的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和投产，并作为工厂竣工投产验收条件之一。

5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农业要走综合发展道路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措施，特别是因地制宜普遍实行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中央关于调整农业布局，大力开展多种经营的决策，极大地调动了8亿农民的积极性，使全国农村和农业生产出现喜人的大好形势。会议强调指出，要加强对各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领导，思想要解放，步子要稳妥。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工作基础千差万别，应当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管理方法、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并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群众的意愿，按照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宜统则统，宜包则包，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能强求推行一种模式，搞一刀切。要坚持集体化方向，农业生产搞责任制长期不变，责任制的形式多样化不变，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长期不变。那种认为实行责任制就是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认为"双包"就是"分田单干"的观点是不对的。一些地方实行的"双包"责任制，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责任制形式。会议确定，今后我国农业要坚定不移地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牧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粮食和经济作物都要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注意品种和质量。明年要把大豆等豆类生产促上去。畜牧业生产坚持农区、牧区并重、养猪和发展食草牲畜并重，把国家、集体和社员家庭饲养结合起来，要大力扶持专业户的生产。发展社队企业生产，是农村致富的重要途径。要积极为社队企业和社员家庭副业产品打开销路。

7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关于国土整治工作的报告

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搞好国土整治，是一项很重大的任务。目前，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在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迫切需要加强国土整治工作。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密切协作，把这件大事办好。

国务院决定调整部分职工工资

为解决部分职工工资偏低的问题，根据国家财力可能，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10月起，给中、小学教职工、医疗卫生单位部分职工，体育系统优秀运动员、专职教练及部分从事体育事业的人员调整工资。这次调资，共有1000多万职工的工资上调1—2级。增加工资的经费和中、小学民办教师补助费，按照"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各部所属单位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单位由地方财政负担。

国家计委等要求加强农业区划和计划协调工作

国家计委和国家农秀发出《关于加强农业区划和计划协调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计委、农委、农业区划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搞好农业区划和规划、计划的衔接，使农业发展规划和农业计划建立在农业区划工作的基础上。各级

区划部门要主动为计划和农业部门提供有关资料。对编制和计划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要配合计划和农业部门组织专题调查，共同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各级计划和农业部门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区划部门提供的建议，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主动向区划部门提供有关情况和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课题。县级农业区划是规划的基础，规划是区划的继续。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区划的成果，注意发挥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地确定农业生产的方向和途径，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国家农委组织的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及农业区划工作是1979年恢复和全面铺开的。这项工作主要目的是摸清各地自然资源底数，找出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为合理地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服务。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全国已有22个省、市、自治区提出了省级综合农业区划（初稿）。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业务系统开展的土地、土壤、气候、水源、森林、草地和其他生物资源、名特产资源的调查，都已全面铺开，其中气象部门搞出了单项区划。

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提出抓紧各项收入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会议强调，各地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振奋精神，挖掘潜力，抓紧各项收入。凡是收入完成进度快的，要力争多超收一些；完成进度慢的，要努力工作，尽快补上去。继续抓紧偷税、漏税、欠税的清查工作，及时把税款补交入库。企业利润包干的基数，要适当，不能过低，更不能搞重复分成，拿双份钱，发现问题，要坚决纠正过来。对职工的奖金，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有关通知发放，不能突破国家规定的指标。在抓紧收入的同时，要严格把住减收增支的口子。收入的退库、归还各项贷款、企业提取利润留成和企业基金，大都集中在第四季度，财政部门一定要严格审查，按制度办事。企业的利润留成和企业基金，要按国家规定执行，不能自行改变基数，提高留成比例，扩大留成范围，要坚决防止年终突击花钱。对于各项支出都要严格控制，凡是今年可以不花的钱坚决不花，结余下来留待明年使用。

8日—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

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提纲》中建议，1981年到198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的基本设想是：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05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441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在国家计委汇报后，邓小平、赵紫阳等讲了话。主要内容是：（1）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5年、10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计划定为4%，争取5%。（2）国内建设资金，中央缺钱，但地方、企业、社队有钱。可以用集资的办法把这些钱用起来。有些工程还可以搞劳力投资，少给钱，管饭。另外，利用外资要大胆一些。利用外资要打破一些老框框，不能只搞大项目，要多搞中小项目。引进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十几万美元、几十万美元、几百万美元的中小项目可以成千上万地搞。沿海省市、各行各业都可以搞。这样做见效快，风险不大。现在的机构，是历史上层次最多、部门最多的时期，而且是分工最不清楚的时期。机构不改革，计划不能顺利执行。

1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措施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旅游事业在我国既是经济事业，又是外事工作的一部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旅游事业发展的方针是：积极开展，量力而行，稳步前进。旅游事业要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管理体制。非旅游部门不得经营对外旅游业务。不允许外商以任何形式在我国国内经营旅游业务，已经设办事机构的要取缔。

此前7月11—24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代表国务院作了《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事业而奋斗》的报告。9月，中央书记处听取并讨论了旅游总局关于旅游工作的汇报。中央书记处指示，旅游总局要同国旅总社实行政、企分开，总局要作为管理全国旅游事业的行政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旅游工作；总社统一经营外国来华旅游业务，逐步实行企业化管理。10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不再由外交部代管，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城镇就业问题作出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四化前途，应当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要不断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形成一套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劳动就业制度。要广开就业门路，应该结合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在发展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基础上来进行。

《规定》要求：(1) 努力办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大力提倡和指导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在集体经济单位就业。遵循自愿组合、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等项原则。所谓自愿组合，就是自愿参加或者联合，人员能进能出；自负盈亏，就是企业的盈亏由各个企业本身负责，不搞统负盈亏；按劳分配，就是使劳动者的报酬和企业生产经营好坏挂钩，分配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在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劳动报酬不受国营企业水平的限制。可以从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劳动分红；民主管理，就是在有关的政策法令范围内，对于企业经营和内部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全体人员有权经过民主讨论后作出决定。集体企业实行合同工、临时工、固定工等多种用工制度。(2) 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五个以内的学徒。对于个体劳动者的税收，要规定合理的税率。个体劳动者可以在所在城镇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或联合会，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指导。其中的先进分子，符合党员、团员条件的，同样可以按照党章、团章规定，吸收入党入团。在从事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人员中，要根据需要，逐步建立党、团组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劳动就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77年到1980年的4年中，全国已安排2900万城镇劳动力就业。截至1980年底，全国有10个省、市已经把1979年以前积累下来的待业人员安置完毕，1981年1—9月，我国安排城镇人口就业477万人。至1981年底，大约又将有14个省、市可以把1979年以前的待业人员安置完

毕。从此，这些地区的劳动就业工作可以纳入当年安置上一年待业人员的常规。

28 日 全国计划会议提出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中心任务，实现生产持续稳定增长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并制定了 198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2 年计划的指导思想是，进一步做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工作，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围绕发展消费品生产来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社会生产的两大部门类相互协调、互相促进，保证整个社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会议初步拟定的 1982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农业总产值预计增长 4%，工业总产值预计增长 4%。粮食 6670 亿斤，棉花 6000 万担，原煤 62500 万吨，发电量 3130 亿度，钢 3400 万吨，纱 1809 万件。铁路货运量 10.4 亿吨。财政收入 1086 亿元，财政支出 1127 亿元，财政赤字 4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630 亿元，其中基建投资 380 亿元，保持上年水平。更新改造投资 250 亿元，比上年预计增加 8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400 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 8%。计划安排城镇 580 万人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

在全国计划会议结束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讲话。他指出，第一，明年和今后几年，要继续巩固调整经济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稳步前进。现在不稳定的因素没有根本消除，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减少和消除不稳定因素。明年财政计划还有赤字，要努力增收节支，做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要防止信贷失去控制，不要出现信贷膨胀。今后工人的工资、奖金，农副产品提价、加价、议价，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大幅度增加。第二，要强调产品的适销对路，在此基础上求速度。明年“保四争五”必须是没有水分、质量好、产品适销对路，真正有经济效益。第三，要把整顿企业放到重要位置上。第四，要继续压缩基本建设，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和企业结构。第五，基本建设效益问题，应该引起全党的重视。今后主要靠提高投资效益，改变建设周期长的状况。第六，技术改造是今后我国走向经济振兴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从明年开始，把挖革改资金的 40%、50%真正用于技术改造。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搞节能，而不是用于扩大外延。

国务院批准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

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并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指出，整顿企业是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最现实的办法。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重视这一工作，全面规划，统一部署，狠抓落实，定期检查。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同志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抓一批重点企业，亲自下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对企业进行全面治理，切实抓出成效。《意见》提出了当前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整顿企业的标准和要着重抓的主要工作。

29 日 国务院批转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意见

《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意见》是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起草并上报国务院的。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实行

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对改善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使工业生产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方向对，效果好。当前在工业企业中实行的经济责任制主要是从利润留成包干和盈亏包干入手的。应当看到，由于价格、税率不尽合理等各种复杂原因，利润的多少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水平。因此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不仅要和利润挂钩，而且要和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挂钩。这就要求企业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要摸着石头过河。要走一步看一步，走错了收回来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这样才能使经济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

《意见》指出，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抓好两个环节。一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解决企业经营好坏一样的问题。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解决职工干好干坏一样的问题。经济责任制，可基本归纳为三个类型：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具体形式有以下几种：(1) 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2) 全额利润留成。(3) 超计划利润留成。(4) 利润包干。(5) 亏损包干。实行“定额补贴，超亏不补，减亏留用或分成”和“亏损递减包干减亏留用或分成”。(6) 以税代利、自负盈亏。(7) 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意见》指出，在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关键是确定合理的包干基数和利润留成比例。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逐年有所增长，也要保证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

11 月

6 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内第一个跨行业企业集团

上海高桥石化公司成立。这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内第一家跨行业类型的企业联合体。这个公司由 7 家工厂和 1 家研究所联合组成，是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

我国完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全合成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宣布：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所等单位经过 13 年努力，胜利完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合成产物显示了转移丙氨酸（即将丙氨酸掺入到蛋白质中去）的活性。这是继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之后的又一重要成就。标志着中国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行列。

11 日　国务院批转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在批转的《通知》中指出，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总局、人民银行、全国总工会召开的京、津、沪、辽、鲁五省市经济责任制座谈会上讨论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有：(1) 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它要求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使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2) 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按社会需要生产，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造成产需脱节。要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要进行全面考核，不仅要考核上交利润，同时还要考核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指标。企业全面完成考核指标，按规定提利润留成或超收分成。少完成一项，扣减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分成）额。(3) 所有企业都必须首先保证财政上交任务的完成，使国家财政收入能够逐年有所增长。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每年增长的利润，国家所得比例要高于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的单位，留成比例、包干基数和超收分成比例，要与国家下达给本地区、本部门的生产计划和财政任务相适应。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办法的企业，其留成基数由上年实际利润，改为按前三年平均利润计算。生产正常的盈利企业的利润包干基数，一般要高于上年，并根据增产增收潜力的大小，确定不同的递增速度；亏损企业的亏损包干基数一般要低于上年，并逐年递减。原来规定的包干基数偏低的，应由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进行适当调整。盈亏包干的超收或减亏分成比例，上交国家部分一般不能低于 60%，留给企业部分一般不超过 40%。有些生产日用品的微利企业，分成比例可以适当大一些。完不成包干基数的单位，要用自己留用的专项资金补足。对于生产市场短缺低利产品和小商品的企业，要采取鼓励和扶持的政策。(4) 实行利润留成的扩权企业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试点单位，原则上应当继续执行原定试点办法。原定留成办法到期的企业，由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商定，可以继续实行原定办法或另行制定办法，继续试点，以便取得经验。有些企业因经济调整，生产和利润大幅度下降，执行原办法所得留成资金不能保证其职工正常福利的，由主管部门商同财政部门采取适当办法予以照顾；有的企业由于调整产品结构，生产不减而利润大幅度下降的，除保证其职工正常福利外，还可以核定适当奖金。(5) 一个企业只能实行一种形式的利润留成或盈亏包干办法，不能兼用两种办法。实行利润留成的单位，不再提取包干超收分成；实行盈亏包干的单位，不再提取利润留成或企业基金。凡是重复提取的要改过来，多提的部分要退回。今后，有条件的应积极推行按行业实行全额利润留成。企业实行哪一种利润留成或盈亏包干办法，由财政部门同主管部门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商定。企业利润留成或包干办法确定后，要相对稳定，一般三年或四年不变。生产不正常，变化较大的，包干时间可一年一定。(6) 企业各项技术措施贷款，必须用本项目投产后新增加的利润归还。(7) 企业的奖金水平，应当随着生产和利润的增减、产品质量的提高或降低、生产成本的降低或提高，有升有降。(8) 奖励基金要严格按规定提取，不得重复提取。每月已按核定的限额发放了奖金的，到年终时不得再用超收分成资金和其他资金加发奖金。

13 日　赵紫阳谈经济改革问题

国务院总理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就经济改革问题发表意见，其要点是：(1) 我国企业是否分成四类，要有死有活。第一类，应当计划和可能计划的产品，实行国家直接计划。这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产品和大企业。决策权在中央，企业的自主权有限。第四类，可以不计划，也无法计划的大量的小商品、小企业。这一类企业的产品应由市场调节，决策权在企业。在一、四类之间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间偏上的产品，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决策权比较集中，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一类是中间偏下的产

品，以市场调节为主，也有一定的计划性。要根据以上设想，设计出一种模式，逐步实现。(2) 体制改革的问题都卡在物价上，能否在“六五”期间把物价问题基本解决。5年不行，可在7年之间把价格基本调整好。物价改革每年都要搞一点，幅度不能大太。(3) 明年企业要搞定员定额。

全国外贸计划会议提出把发展对外贸易提到战略高度认识

会议中心议题是认真学习和讨论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意见。各地代表们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工作有两种力量，两种资源。两种力量，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争取外部力量为辅。两种资源，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但不要忽视外部资源。同时要学会两套本领，既要提高国内工作的本领，又要善于同外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会议要求外贸职工把发展对外贸易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在新的形势下，学会同外国做生意，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作用，广开门路，加快发展对外交换，为国民经济调整和四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研究了1982年外贸收购、调拨和出口计划和完成各项计划的有关政策与措施。主要内容是：大力发展国际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出口商品生产，在沿海省、市发展一批生产出口商品的专厂、专车间和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大力开展“以进养出”业务，为发展出口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要加强推销工作，积极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做生意；要大力改善外贸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要提高出口合同的履约率，要继续改革外贸体制，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类经营、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方针，坚持统一对外，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23日—2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项经济法规

五届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紫阳总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以及财政部长王丙乾所作《关于1980年国家财政决算和1981年国家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议听取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就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

24日　国务院首次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

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发行日元私募债券100亿日元，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外发行债券。

3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这次会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将比上年增长3%以上，整个经济形势比预想的好。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报告》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1) 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2) 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3)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的建设。(4) 有重点有步骤地加快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5) 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改组。(6) 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要从财政、税收等方面采取适当办法，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要加强税收和海关工作，恢复一些税种，开征一些新税。实行烟酒专卖，堵塞"跑、冒、滴、漏"，把一切应收的钱都收上来。(7)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8) 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更好的发挥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控制长线产品，发展短线产品。促进工业改组，调节企业利润水平，鞭策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9) 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10) 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财政部长王丙乾代表国务院所作《关于 1980 年国家决算和 1981 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1980 年国家决算：总收入 1085.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1%；总支出 1212.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1%。1981 年财政总收入预计为 1058.6 亿元，完成概算的 100.2%。国内财政收入 978.6 亿元，其中税收 609 亿元，企业收入 347.2 亿元。国外借款收入 80 亿元。财政总支出预计为 1085.8 亿元，完成概算的 102.8%。

12　月

12 日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通过验收

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轧机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正式交付生产。这项工程的建成投产将增强我国钢铁工业轧制薄钢板的生产能力。按设计生产能力，每年可轧制优质薄钢板 300 多万吨。

13 日　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自 198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都按本法规定缴纳所得税。应纳所得税额的所得额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所得税税率定为 20%、25%、30%、35%、40%。外国企业在交纳所得税的同时，另按应纳税的所得额缴纳 10%的地方所得税。对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来源于中国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应缴纳 20%的所得税。对下列情况给予减税或免税：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等利润率低的外国企业，经营期在 10 年以上，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所得税，第二、第三年减半征收。期满后，经财政部批准，可在 10 年内继续减征 15%—30%的所得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给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以及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贷给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均免征所得税。

全国人大五后四次会议通过经济合同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自1982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规定，经济合同是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购销、建设工程承包、加工承揽、货物运输、供用电、仓储保管、财产租赁、借款、财产保险、科技协作以及其他经济合同，均适用本法的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扰乱经济秩序，破坏国家计划，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法收入；经济合同，除即时结清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协商同意的有关修改合同的文书、电报和图表，也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下列经济合同为无效：（一）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三）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权，归合同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经济合同法》于1982年7月1日起执行。后于1983年进行修改。

15日—22日 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会议提出，1982年全党工作的奋斗目标是：第一，两手抓，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都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第二，在经济上努力争取一个扎扎实实、没有“水分”的一定的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第三，努力争取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党风有一个好转。

陈云谈经济建设工作方针

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就经济建设方针问题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1）农业经济是全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似乎农业中可以不要计划了，事实并不是这样。搞了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郊区必须种莱、养猪，要规定任务，要派购。烟叶种植面积不能超过800万亩。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增产经济作物，只能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总之，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灵活。不这样做，8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跨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2）我们经济工作另一大方针：一要使10亿人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里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3）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为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4）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该调出的物

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按全国计划办事。(5) 全国有40亿美元的顺差，所有权属于中国银行，使用权属于地方和各部门。地方30亿，各部10亿。各地各部自己的都可以使用，但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实际上这些外汇属于周转外汇，而且中央已经在使用了。我希望1985年能达到120亿美元的周转外汇，增加2倍。我们这个国家，有120亿（美元）的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

21日　兴隆庄煤矿交付生产

我国首次自行设计、施工的现代化特大型矿井山东兖州矿区兴隆庄煤矿经国家验收正式移交生产。该矿于1975年2月动工，设计能力为年产300万吨原煤。投产后成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配焦煤的主要供应基地。

23日　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贷款利率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的报告》。国务院指出，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对于促进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报告》提出的具体意见如下：(1) 扩大存款计息的范围，设立对公单位的定期存款。定期存款1年期月息3厘，2年期月息3.6厘，3年期月息4.2厘。(2) 提高城乡居民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利率。定期1年月息由4.5厘提到4.8厘，3年期月息由5.1厘提到5.7厘，5年期月息由5.7厘提到6.6厘。新设8年期定期存款，月息7.5厘，(3) 贷款利率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月息6厘的水平。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月息由4.2厘提到6厘。中短期设备贷款和大修理贷款利率，1年以下月息4.2厘不变，1年以上至3年，月息由4.2厘提到4.8厘，3年以上至5年，月息由4.2厘提到5.4厘。(4) 对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在调整利率的基础上，按国务院规定加息或罚息20%和50%。(5) 国营农业生产费用贷款月息由3.6厘提到4.8厘，国营农业生产设备贷款月息由3.6厘提到4.2厘。社队农业生产费用贷款月息由3.6厘提到4.8厘，社队农业生产设备贷款月息由1.8厘提到3.6厘。(6) 对中外合资企业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原则上应高于国内的人民币资金贷款利率，(7) 农村信用社存款、贷款利率，可以高于银行存款贷款利率。这次调整存款、贷款利率方案于1982年第1季度开始执行，储蓄存款利率调整于4月1日起执行。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是作为世界银行的中间金融机构，主要转贷世界银行的贷款。以后将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政府指定向国外筹集建设资金、办理固定资产投资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总行设在北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以及部分大中城市设分行与支行，共59个。投资银行实行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经济核算，总行统一核算盈亏。

26日　财政部等制定对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规定

财政部、国家经委颁发《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

《规定》要求：(1) 国家对企业和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多种形式的利润

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即“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全额利润留成”，“上交利润包干，超收分成或留用”，“亏损补贴包干，减亏分成或留用”和“超计划利润留成”。凡是有条件按部门（包括公司）实行利润留成或盈亏包干办法的，由各级财政部门商得主管部门同意后，从上述五种形式中确定一种办法试行。不能兼用两种办法，重复提取留成。(2) 对于生产正常、利润比较稳定的部门和企业，应当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的办法或全额利润留成的办法。为了比较合理地确定基数，应当将原来规定按上年利润确定基数，改为按前三年平均利润滚动计算。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办法的部门和企业，其全额利润留成比例，按照前三年应得的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留成之和，占前三年利润总额的比例，予以核定。(3) 有些部门和企业，因情况特殊，实行上述两种利润留成办法确有困难的，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以下办法：(1) 对因调整期间生产任务不足，利润大幅度下降的部门和企业，可以实行超计划利润分成的办法。年度的利润计划，由财政部门根据国家分配的收入任务，结合生产计划和增产挖潜的要求，具体核定。(2) 对潜力比较大的微利的部门和企业，可以实行上交利润包干、超收分成或留用的办法。对个别增产增收潜力小的微利企业，也可以实行“基数包干，超收留用，短收自负”的办法。(3) 对于确因客观原因发生亏损的部门和企业，可以实行亏损定额补贴包干的办法。个别企业减亏难度较大或者减亏数额不大的，经过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减亏部分企业可以多留一些或全部留用。(4) 为了促进企业节约使用国家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 1982 年起，所有工交企业都要按照国家规定交纳固定资金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企业交纳占用费，可视同利润提取利润留成，暂不调整利润留成比例。

31 日　国务院批准审批个人外汇申请施行细则和对个人外汇管理施行细则

这两个《细则》规定：(1)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外国侨民，收到由外国和港澳地区汇入的外汇，必须结给中国银行；对每笔人民币 3000 元以上的大额汇款，允许留存 10% 的外汇。(2) 侨汇允许留存 30%。其余结汇后享受优待侨汇的各项待遇。(3) 国家派赴国外的工作人员公毕返回，凭驻外机构的证明，允许个人留存外汇。(4) 国家派赴外国或者港澳等地区学习的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学者、教师、教练和其他人员，在境外期间收入外汇的剩余部分，在返回时，必须及时汇回或者携回境内，不得存放境外；其中属于个人应得的外汇，凭我驻外机构证明，允许留存。(5) 个人所得的出版费、版权费、奖金、补助金和稿费等外汇，必须及时调入境内，不得存放境外；按照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批准的有关规定，或者经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同意，属于个人应得的部分，允许留存。(6) 允许个人申请外汇的项目：对境外的临时性汇款；出境旅杂费外汇；华侨投资、存款的调出等。自 1982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同期，中国银行按新章程办理个人外币存款业务。存款种类有：美元、英镑、西德马克、日元、港币，其他货币可按公布牌价折成上述五种货币。我国国内居民需凭个人外汇留存证明，到银行填写开户申请书，预留印鉴，银行即可开给记名式存单或存折。

198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81 年，我国国民经济贯彻执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工农

业生产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比例关系开始趋向协调。

(1) 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490亿元（1980年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5%。农业和轻工业有较快的增长，重工业因进行调整，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0.1%升至31.5%，轻工业产值比重由上年的33%升至35.2%，重工业产值比重由上年的36。9%降至33.3%。这样的比例关系大体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农业总产值2312亿元，增长5.7%。其中粮食产量32502万吨，比上年增产446万吨；棉花产量296.8万吨，增产26.1万吨；油料产量1020.5万吨，增产251.4万吨；猪牛羊肉1260.9万吨，增产55.4万吨。工业总值达到5178亿元，增长4.1%。其中轻工业增长14.1%，重工业下降4.7%。原煤产量6.22亿吨，比上年增产200万吨；发电量3093亿度，增加87亿度；钢3506万吨，增加152万吨；纱317万吨，增加24.4万吨，糖316.7万吨增加59.6万吨。

(2) 基本建设规模压缩，投资构成改善，投资效益有所提高。全年完成基建投资428亿元，比上年减少111亿元。年末在建大中型项目663个，比上年减少241个。投资方向得到改善。轻纺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9.1%升至10%。同改善人民生活有关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33.7%上升到41.1%。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上年的79.1%提高到86.7%，大中型项目投产率由上年的8.3%提高到10.6%。列入国家计划的27种主要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有24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积累率28.5%，下降3.1个百分点，达到调整要求。

(3) 财政收支状况有了好转，财政赤字大量减少。全年财政总收入1064.3亿元(包括国外借款收入)，总支出1089.7亿元。收支相抵，财政赤字25.4亿元，减少102.1亿元。

(4) 商品供应量增加，市场供应情况有所改善。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350亿元，增长9.8%。剔除零售物价上升因素，实际增长7.2%。当年社会购买力同可供商品的差额由上年的100亿元减少为34亿元。

(5) 对外经济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717.4亿元，增长27.2%。其中出口总额增长36.3%，进口总额增长25%。据推算，剔除价格和汇率变动因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9.5%。

(6)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全国取得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3100项，其中经国家批准的创造发明120项。工业部门试制的新产品和试验的新工艺有上万种，其中半数已投入生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27.5万人，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在校生128万人，增长12%。

(7) 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率的降低，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7.2%，农民提高10%，城镇居民提高1.5%。安排820万人就业。

1981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是在大幅度紧缩支出的条件下实现的，因而不够巩固。一部分消费品的增长还赶不上人民需要的增长。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效益低下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有的方面甚至还有

所下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下降1.8%，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上升1%。有些产品质量有所下降，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有所上升。有一部分企业盲目追求产值，不注意产品的适销对路，造成一些产品超储积压，使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中含有少量“水分”。这些情况说明，国民经济中潜在的危险虽然有所缓和，但还没有根本消除。

1982年

1　月

1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中央指出，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国农村经济近几年的变化、发展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农业的基础毕竟比较薄弱，工作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所以，一定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力争1982年农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1) 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已转入总结、完善、稳定阶段。目前，我国农村的主体经济形式，是组织规模不等、经营方式不同的集体经济。与它并存的还有国营农场和作为辅助的家庭经济。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2) 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留。它不同于合作化前的小私有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为更完善的集体经济。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变动，就不要变动。(3) 联产承包制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目前存在的不同地区名目众多而又各具特色的责任制形式，是群众根据当地不同生产条件，灵活运用承包形式的结果。(4) 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农副产品收购，要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前几年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对收购政策作必要的调整。要使政策保持稳定。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允许按市场供求情况实行一定范围的浮动。

国务院批准调整部分进口商品税率

自1982年1月1日起，现行《海关进出口税则》中部分进口商品，将实行调整后的新税率。调整部分进口税率，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当前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需要。按照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生产的要求，这次调低橡胶、木材、木材制品、皮革、纸浆、纸张、能源物资、部分轻纺工业机械设备和机械零配件的税率。这样调整有利于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原料性产品的进口，有利于轻纺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国民经济薄弱部门的加强。对国内已能生产的机械设备适当提高税率。这次调整的税率，共涉及149个税号，占现行税则939个税号的“%，是对《海关进出口税则》进行的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整。经过这次调整税率后，在关税方面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获解决。今后，一般不再批准关税减免。任何企业或单位都不得在对外签订的协议、合同或其他文件中；列入关税减免条款，以维护关税法制的严肃性。各地海关已于1981年12月31日公布了《海关进出口税则》的局部修改对照表。

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决定》指出，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充分发挥现有国营工业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从1982年起，用两三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点面结合、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整顿。企业全面整顿的内容有：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坚决克服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企业的全面整顿，是对企业工作进行综合治理。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当前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做好以下五项工作：第一，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承担经济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果联系起来。第二，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第三，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第四，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有计划进行全员培训，坚决克服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第五，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颁发《条例》的《通知》中指出，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工厂党委是对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实行领导。厂长行政指挥的原则，就是党委要把工厂的生产经营活动，交给厂长统一指挥，全面负责。工厂的副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是厂长的助手，受厂长领导，对厂长负责。厂长应自觉地维护党委的领导，接受群众监督。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这些原则是根据多年的经验对我国工业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所作出的新概括。无论是现在仍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大

多数企业，还是试行其他形式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少数试点单位，都要遵循这些根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整个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制定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

我国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取得新成就

据《人民日报》报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取得巨大的成就：继 1980 年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1981 年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卫星。自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起，已经发射了 11 颗人造地球卫星。一年来，在同步通信卫星的研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自 1966 年 10 月 27 日，进行核导弹试验以后，我国的战略导弹、战术导弹的研制不断取得进展，1981 年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有了新的技术突破。

依靠我们自己力量开展的大型测量设备研制、改进，以及为做好新技术储备开展的预先研究得到了加强，涌现出一批新的科研成果。研究性重水反应堆 1981 年改建成功，运行正常，性能与工作条件有了显著改进；高通量工程试验反应堆去年年初建成后，一年来运行情况良好，为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制由于缩短了战线，突出了重点，飞机、军舰、导弹、坦克、枪炮和各种通信装备的性能、质量有了提高，取得了可喜进展。为了加速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根据我国的国力、技术条件和我军的作战特点，拟订了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正在集中力量研制一批能够在近几年内提供部队的新型装备。

按照军民结合的原则，国防科技、国防工业进一步调整了服务方向，积极承担民用产品的生产，在为国民经济服务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同位素技术、射线辐照技术和其他核技术，在农业、工业、医疗卫生、科学研究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1981 年又增加了 20 多个同位素新品种，目前已有 200 多种同位素投放市场，供应全国 1100 多家用户使用，其中医疗用户达 700 多个。各军工工厂按照国家计划安排和市场需要，千方百计安排民用产品的生产，已经生产了一批自行车、缝纫机、木钟、洗衣机、照相机、摩托车、电镀表、录音磁带等投放市场。一些地区的军工厂和民用厂挂钩，设计、制造出适合轻纺、烟酒、陶瓷工业生产的某些专用设备，加快了这些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军工厂在同民用厂的交往中，也学到了民用厂的许多先进技术，加快了军工工业的发展。

8 日　国务院要求坚决稳定市场物价

为保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知》。《通知》规定：(1) 凡由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在全国各地的零售价格，一律执行国家规定，不许提高。(2) 各种议价商品，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工矿区、县城和县以下城镇的零售价格，只能降低，不许提高。(3) 一、二类日用工业品不准搞议价。三类工业品实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的品种范围，要严格控制。(4) 一、二类农副产品，非经国务院批准，不得自行提价或变相提价。在完成收购任务前，不许议价成交或上集市出售。(5) 凡规定有季节差价的商品，仍应根据不同季节调整价格。(6)

各级税务部门必须严格照章收税。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信贷管理，控制货币投放。(7)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商业的补充，要按照国家政策，加强管理，继续搞活。要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行为。

11日—13日 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的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情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的精简方案。军队正在考虑，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刚才说，有几百万人要出，应该注意解决好；但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选取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进去。

国务院决定粮食征购销售包干一定三年不变

国务院决定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管理办法。具体办法是：(1)参照近几年实绩，结合今后粮食生产发展和征购、销售变化等因素，协商确定各项包干数字。粮食征购包干数，包括征购基数和超购任务。销售包干数，包括非农业和农业销售，及原由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调入包干数，包括正常的调入和原由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调出包干数为专项用粮后的调出数，并确定主要粮食品种的调入、调出数量。数字确定后，从1982年度到1984年度一定三年。(2)为适应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新情况，国家实行粮食征超购任务包干，一定三年。生产队、组、户在完成征超购任务后，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粮食。(3)国家确定各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数字，一般不作调整。在包干期内，各省、市、自治区多购少销的粮食，归地方掌握，准备以丰补欠。调拨包干数，三年统算，调出总数必须如数完成，调入总数不得突破。(4)在完成国家征超购任务后，积极开展粮食议购议销。把议购作为国家掌握粮源的补充渠道。(5)粮食包干以后，实行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粮食的办法。(6)根据粮食包干办法和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粮食财务仍由粮食部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同时作适当的改进。

14日 胡耀邦谈对外经济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作《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一)当前我们要注意的是，很好的总结经验，经过系统的思考和继续努力，制订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二)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通过对外经济联系，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尽快地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使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我们所说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三）对外经济关系要统一领导，全面规划，灵活反应，严格纪律。（四）吸引国外资金。今天我们利用外资的方式，大体有三种：第一种，吸引直接投资，包括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第二种，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中长期、中低利率贷款；第三种，一般商业贷款。为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港澳台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至于一般商业贷款，我赞成陈云同志意见，一定要谨慎些。(五）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大致包括五大项：一是先进设备或部件；二是新型和优质的材料；三是新的原理、数据和配方；四是新工艺和科学操作规程；五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六）大力开展国际劳务合作。1981 年对外承包工程实际收汇一亿多美元。我们建筑业对外承包工程，同时又带动国内建筑材料出口。这件事大有可为。（七）大规模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主要应当向以下四方面努力：第一，积极扩大矿产品出口；第二，积极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第三，积极发展轻纺产品和特有的手工艺品出口；第四，土特产品出口。

1982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点

《要点》指出，1982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保持财政、信贷收支基本平衡，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在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所提高。1982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任务是：争取农业有一个更好的收成，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轻工业，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努力增收节支，使财政、信贷继续保持基本平衡；继续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合理安排投资；搞好市场供需平衡，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努力扩展对外贸易；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证人民生活稳定，并且继续有所改善。

15 日　国务院召开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座谈会

为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务院召开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沿海九省、市、自治区是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沿海地区交通方便，经济比较发达，技术水平较高，劳动力充足，历来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一步发挥这些地区的优势，争取对外经济贸易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沿海省市对外经济贸易要抓的几项工作：(1）在内外销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努力增加出口的比重。要瞄准国际水平，大力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增加花色品种，创造名牌产品，使我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接受检验，促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2）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胆利用外资，积极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关键设备，对现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改造，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凡是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需要，地方、部门、企业能够自借自还资金，具备生产建设条件的项目，都要积极去办，同时，要认真做好引进技术、设备的消化、创新等工

作，尽快向内地推广。(3)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沿海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要发挥本地的优势，采取以进养出、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租赁业务以及技术劳务出口、咨询服务等办法，促进对外经济合作的广泛开展。尤其要大力发展来料加工，成品出口，凡是有生产能力，原料有稳定来源，产品质量好，在国外有销路，对国家有利的商品，都应放手去搞。(4) 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经济贸易管理体制，为全国提供经验。要在统一领导下，扩大沿海省、市、自治区的对外贸易经营权，并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自负盈亏，相应承担国家下达的出口创汇任务。不具备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体制的，也要核定换汇成本，年终考核，增盈减亏部分实行分成奖励。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外贸搞活的同时，必须加强联合、协调和管理。(5) 积极开展同内地省、自治区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协作，更好地为发展内地经济服务。

18 日　国务院决定对现有企业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

国务院作出《关于对现有企业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的决定》。《决定》指出，国务院认为，改变过去以新建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主要手段的做法，实行以技术改造作为扩大再生产主要手段的方针，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促进现有企业现代化，把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发展我国经济的一项战略措施。当前技术改造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使产品升级换代，提高性能和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综合利用水平。有利于环境保护。设备是否需要更新，应认真进行经济技术评价。《决定》强调，技术改造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全面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要防止不作调查研究，不讲经济效果，一哄而起，盲目上马的倾向。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要和新建企业统一考虑，一并纳入国家计划。要集中力量抓好工业发达城市和一批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

国务院发布 1982 年国库券条例

1982 年国库券发行总额 40 亿元，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 20 亿元，城乡居民购买 20 亿元。国库券的利率，单位购买的，年息定为 4%。个人购买的，年息定为 8%。国库券的还本付息，自发行后的第 6 年起办理。1982 年，实际发行国库券 43.8 亿元。

25 日　陈云谈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

陈云同志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已经讲了一次。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要坚持上述原则，不能例外。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从全局看，第一要吃饭，第二要建设。吃了以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首钢的经验，我看说明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企业里头，应该是有计划的。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里来，都计算好了，才能经营好。就这点讲，资本主义企业有相当的计划。从工作来说，企业是一层，经委是一层，计委也是一层。计委管全国大的计划，经委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有些事情可以包给企业，哪些包，哪些不包，规定要具体恰当。上层机构要有人专门考虑

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可以年年搞一点国库券，中央财政要想办法向地方收点税。

国务院下达“六五”计划控制数据

国务院发出《关于下达“六五”计划控制数字的通知》，并转发国家计委《关于下达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要点》和《1981 年至 1985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控制数字》。《汇报要点》提出，今后 20 年我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有一个大转变：(1)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2) 要围绕发展消费品生产来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保证整个社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3) 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在战略部署上，今后 20 年可分为两个阶段，“六五”要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七五”要继续完成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全面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更广泛地进行技术改造，并逐步以较多的资金用于农业、能源、交通和智力开发的建设，用于环境保护的建设。“六五”期间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计划上都定为 4%，在执行中力争超过。这次下达的主要控制数字为：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4%，1985 年达到 8050 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4%，1985 年达到 6070 亿元。其中，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7%，1985 年达到 3280 亿元，重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1985 年达到 2790 亿元。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 4%，1985 年达到 4410 亿元。国务院在下达控制数字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各自的“六五”计划草案，并提出“七五”计划的设想。

此前 1981 年 10 月 8 日—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提纲》中建议，1981 年到 1985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的基本设想是：1985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8050 亿元，平均每年递增 4%；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 4410 亿元，平均每年递增 4%。在国家计委汇报后，邓小平、赵紫阳等讲了话。主要内容是：(1) 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 5 年、10 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计划定为 4%，争取 5%。(2) 国内建设资金，中央缺钱，但地方、企业、社队有钱。可以用集资的办法把这些钱用起来。有些工程还可以搞劳力投资，少给钱，管饭。另外，利用外资要大胆一些。利用外资要打破一些老框框，不能只搞大项目，要多搞中小项目。引进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十几万美元、几十万美元、几百万美元的中小项目可以成千上万地搞。沿海省市、各行各业都可以搞。这样做见效快，风险不大。现在的机构，是历史上层次最多、部门最多的时期，而且是分工最不清楚的时期。机构不改革，计划不能顺利执行。

30 日　国务院颁发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加快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对今后增加石油后备储量和增加产量，发展我国石油工业，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国务院制定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条例》明确规定：（1）为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企业参与合作开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资源。（2）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企业的投资、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外国合作者可将其依法回收的投资、利润和其他正当收益汇往国外。（3）参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中国企业、外国企业，都应当依法纳税。（4）为执行石油合同所进口的设备和材料，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减税、免税，或者给予税收方面的其他优惠。

2　月

1 日　更新改造投资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发出《1982 年更新改造措施计划安排意见》。《意见》指出：从 1982 年起，把更新改造措施纳入国家计划。“六五”计划期间，将继续实行由中央财政集中企业 30%折旧基金的办法。对企业掌握的折旧基金和生产发展基金，也要采取鼓励政策、行政干预和银行监督等措施，使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初步安排，1982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工业交通企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约 140 亿元。其中国家统筹安排 50 亿元，由企业、地方、部门和银行自行安排 90 亿元（国家指定方向、重点）。国家统一下达计划的 50 亿元资金，主要用于节约能源，有重点地改造现有轻纺工业企业，解决交通运输薄弱环节，改造重点原材料工业企业，机电工业技术改造，推广新技术以及专业化协作。

5 日　国务院批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布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的通知》。《暂行办法》规定：（1）对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征收排污费。（2）对缴纳排污费后仍未达到排放标准的排污单位，从开征第三年起，每年提高征收标准 5%。已经达到排放标准，或者显著降低排污数量和浓度，经监测属实，应当停止或减少收费。（3）征收的排污费，纳入预算内，作为环境保护补助资金，按专项资金管理，不参与体制分成。环境保护补助资金，由环境保护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使用。它应当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排污单位治理污染源，以及环境污染的综合性治理措施。环境保护补助资金，通过建设银行监督拨款。

南京烷基苯厂建成投产

我国最大的烷基苯厂在南京建成投产。该厂 1976 年动工，1980 年试生产。主要装置是从国外进口的成套设备，设计能力为年产烷基苯 5 万吨，可供生产洗衣粉 25 万吨，约占目前全国洗衣粉产量的 60%。该厂投产后，可使我国洗衣粉原料基本达到自给。同年 10 月 20 日通过国家验收，正式移交生产。

6日　国务院颁发广告管理暂行条例

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布广告管理暂行条例的通知》。《暂行条例》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为了推销商品或者提供收取费用的劳务、服务，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刊登、播放广告，或者在公共场所设置、张贴广告，均属本条例的管理范围。广告的管理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经营单位必须按照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承办外商广告的单位，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审查同意。私人不得经营广告业务。

广告内容必须清晰明白，实事求是。不得以任何形式弄虚作假，蒙蔽或者欺骗用户和消费者。有缺陷的处理商品、试制和试销商品，都应当在广告中注明，不得给人以误认。刊登、播放、设置、张贴下列广告时，应当出具证明：（一）医药、食品类商品广告，必须有卫生机关的证明；（二）度量衡器类商品广告，必须有计量机关的证明；（三）标明获奖荣誉的商品广告，必须有颁奖部门的证明；（四）商品广告，必须有注册商标的证明和质量监督检验机构的鉴定证明。

广告的内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刊登、播放、设置、张贴：（一）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的；（二）有损我国各民族尊严的；（三）有反动、淫秽、丑恶、迷信内容的；（四）有诽谤性宣传的；（五）违反国家保密规定的。

禁止广告的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本条例自1982年5月1日起施行。

11日　中国人民银行通报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

国务院发出《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的通知》。国务院在批转这一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开展保险业务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是国民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积极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于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安定人民生活，减少社会财富损失，都是有利的。同时，也是积聚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指出，自从1979年国务院批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截至1981年10月止，除西藏外，已在28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和少数县，建立保险专业机构477个，银行代理处803个，现有保险专业人员5700余人。恢复和办理了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和汽车保险等业务，共承保企业近10万个、家庭90余万户、汽车13万辆，获得经济保障的财产总值达2000亿元，其中国营企业财产为1935亿元。《报告》提出，今后国内保险的方针是：积极开展业务，积聚保险基金，组织经济补偿，防止灾害损失，增进社会福利，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在巩固和发展国营企业财产保险的同时，积极开展货物运输保险、汽车保险、船舶保险、渔船保险等业务。积极办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财产保险和面向广大群众的家庭财产保险，在条件具备的城市和矿区，有计划地重点办理简易人身保险和团体人身保险等业务。对属于社会保险性质的职工福利保险、养老年金保险等业务，要根据需要与可能，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稳步推广。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需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牲畜保险

等业务。

20日—3月4日　全国工业交通会议

全国工业交通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益。会议认为，必须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变，由单纯注重产值、速度转变到注重经济效益上，并在实际行动中加以贯彻。为此，会议确定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措施。会议确定1000多个大型骨干企业为首批全面调整企业单位，提出要把完善经济责任制作为调整企业的一项内容。会议决定打破地区、部门间的经济封锁，提倡各地区在产品质量、价格和花色品种等方面开展竞赛。今后凡是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产品，列入国家计划定点生产的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医药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各地不得封锁；凡是国家规定调出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保质保量及时调出。

24日　国务院要求在经济调整中加强环境保护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对环境问题缺乏认识，造成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比例失调。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积极的态度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决定》要求，抓紧解决突出的污染问题；严格防止新污染的发生；制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时，必须把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作为综合平衡的重要内容，把环境保护的目标、要求和措施，纳入计划和规划，加强计划管理。加强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计划指导，是对《环境保护法》的重要补充。

26日　国家计委等颁布缩短建设工期，提高投资效益的若干规定

国家计委和国家建秀发出《关于缩短建设工期，提高投资效益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为了尽快把全国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使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的绝大多数在“六五”期间建成投产，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作如下规定：(1) 基本建设项目上项目之前一定要认真负责、精心细致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2) 严格控制基建规模。凡是能够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扩大生产能力的，就不要扩建、新建。(3) 明确规定基本建设项目的合理建设工期，作为具体安排建设计划、工程进度的依据。(4) 按合理工期安排建设计划，分配投资、材料。年度计划投资不得留有缺口。(5) 严格执行开工报告制度。一切新建、扩建项目动工修建，都要有上级机关正式批准的开工报告。(6) 实行分期建设，分期收益的办法。对包含若干个能独立发挥效益的单项工程，在建设方案确定后，实行分期、分段建设，分期、分段投产受益的办法。

27日　国家制定促进邮电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国家鼓励邮电事业加速发展，制定优惠政策，尽快改变邮电通信的落后面貌。优惠政策主要内容：(1) 增加投资。今年对邮电事业的投资比重从占基建投资0.8%左右提高到1.2%，投资总额可达2.5亿多元。(2) 邮电部门的利润和外汇收入的自留比例，分别由原来的80%和60%，提高到90%。邮电部有更多的机动财力进行技术改造。(3)

由银行以低息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邮电部门在北京、上海等地使用程序控制电话交换机等新技术。（4）同意邮电部门租用国际通信卫星信道以组织国内通信，加强通信能力。此后在 1986 年，国务院批准邮电部门按 10% 的比例偿还预算内“拨改贷”贷款本息。

3　月

2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

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同意国务院设国务委员若干人。国务委员的职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级，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将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设立水利电力部，将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设立商业部，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设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主任。

此前 3 月 2 日，赵紫阳总理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报告》指出，自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根据大会决议的要求，有步骤地着手进行国务院和所属各部、委的机构改革。国务院机构的改革，首先必须改进国务院本身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国务院各部、委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办公机构的设置，必须做到分工合理，职责分明，机构精干。《报告》建议，减少副总理，设国务委员。现有的 98 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拟裁减、合并为 52 个。国务院和各部、委的机构精简之后，工作人员将比现在减少 1/3 左右。

从第一批的 12 个单位的改革方案来看，精简以后，部级单位由 12 个减到 6 个；部内的司、局级行政机构由 180 个减到 112 个，机关工作人员减少 33%。原有部长、副部长 117 人，现配备 27 人，减少 77%。正副司、局长减少 51%。部、司两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都将下降。

4 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清查偷漏欠税情况和加强税收工作报告

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切实加强对税收工作的领导，要强化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税务机构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税务部门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上级税务部门领导为主。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调动，要征得上一级税务部门的同意。各地区、各部门不得超越权限擅自减免税。财政部的《报告》指出，税务部门对 54 万户企业和单位进行了重点检查。据初步统计，共检查出偷漏欠税 13 亿多元，入库约 10 亿多元。

赵紫阳提出不要只追求产值不顾效益

国务院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的经济工作的危险是可能发生不注意经济效益的问题。中央提出今年“保四争五”，已经考虑到各省的增长速度。但是，有些地方和部门下达指标时，又不顾条件，层层加码。我们要努力实现效益又好，产值增长又快的目标。如果只追求产值，不顾效益，这样的“速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为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必须坚持大计

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摆正全国一盘棋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在对外贸易上一定要坚持统一对外、联合对外。国家计划调拨的产品，包括农副产品，必须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得扣留自用，或拿去搞协议，议价出售。坚决纠正地区之间搞经济封锁。物价和税收管理必须集中统一。关于改革问题，初步打算是：已经实行的经济政策今年总的不变，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通过总结经验，提出对已实行的政策、措施如何补充、完善和调整的意见。要尽快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搞出来，使改革有个长远的打算。

8日　国家农委提出整顿社队财务的意见

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意见》的通知中，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把整顿社队财务，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抓好。国家农委、财政部在《关于整顿社队财务的意见》中提出：(1) 财务整顿的主要任务是，健全制度，改善管理，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要着重清理当前实有的财产和建立健全今后的制度，对过去的账目不要追溯太远。(2) 整顿社队财务要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试点之后有计划有步骤分批进行，争取在一两年内全面整顿一次。(3) 对实行包干到户的队，要分别清理好集体统一管理的和分户负责管理的固定资产，以及粮食物资、现金存款和债权债务；解决好集体财产今后的管理和使用问题；结算好社员上交各项粮款的账目。

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决定》要求对经济罪犯量刑从重。对刑法相关条款作出修改："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前款所列罪行，情节特别严重，按前款规定从重处罚。

10日　全国石油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勘探工作争取原油在稳产基础上逐步增长

全国石油工作会议提出，石油工业要大力加强资源勘探，提高开发效果，争取使原油产量在稳产1亿吨的基础上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近年来，石油部门对我国陆上东部、西部地区和海洋石油资源的初步评价说明，我国的石油资源增加储量的潜力很大，这为我国原油产量在稳产1亿吨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当前的问题是必须大力加强勘探工作，尽快打开新的局面，以迅速增加石油储量。为此，会议要求各油田把勘探工作放到重要地位，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提高勘探效率和成果，并积极采用和发展勘探新技术，以解决地质条件复杂地区的勘探问题。

12日　近三年城市职工家庭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对北京、上海、天津等46个城市8715户职工家庭收支调查的结果表明，1981年职工家庭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中，职工家庭人均月可用作生活费的收入38.64元，剔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收入比1978年提高31.3%。平均每100户职工家庭拥有电视机58台（其中彩色电视机0.6台），比1978年增长3.2倍。

15日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的统一管理

财政部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会议中心是贯彻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税收工作的通知》精神，总结1981年税收工作，部署1982年工作，并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的集中统一管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大力组织收入，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

税收计划问题。26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听取汇报。姚依林指出，“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是最重要的支柱，要加强。一是从地位上适当提高；二是把人员赶快充实，要提高政策水平，要搞好干部培训。税收政策要统一，要强调执行税法。希望大家努力，今年的税收多超一点。”

16日　国务院对全国性专业公司管理体制作出规定

国务院颁布《关于全国性专业公司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全国性专业性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生产经营的经济实体，不同于行政管理机构。建立各种类型的全国性专业公司，应根据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经营范围确定其地位，不套用行政管理级别；所有全国性专业公司，均不列为国务院行政机构的序列，应分别由有关部领导。国务院和各部委对全国性专业公司，应重在方针政策和计划上领导。

18日　国务院进一步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补充规定》。《规定》指出，为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方针，社队企业工商税收办法必须进一步改进。为此规定：社队企业生产销售的烟、酒、糖、棉纱、手表、钟、鞭炮焰火、电子产品、自行车、缝纫机、塑料制品、焚化品、化妆品、丝绸、化纤纺织品、油漆、家用电器（包括电风扇、电烘箱、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钢木家具、皮革制品（不包括车马挽具）、橡胶制品，一律按统一的规定征收工商税，不给予减免税照顾。其他产品交纳工商税有困难的，可以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给予减免税照顾，减免时间以一年为限。城市郊区的社、队企业，以及开设在城市和县属镇的社、队企业，其所得利润一律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工商所得税，不再执行现行20%比例税率和起征点3000元的规定。

4　月

3日　全国工商局长会议提出继续办好集市贸易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指出，要继续办好城乡集市贸易。凡是国家规定准许上市的商品，要允许上市，不要乱加限制。要正确贯彻允许社队和社员贩运农副产品的政策。集市的设置应当从便利群众出发，合理安排。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的网点，应当纳入城市建设规划，搞好市场建设和市场服务工作。要办好大牲畜、日用小百货等专营市场。要鼓励和支持个体工商户，如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和有特殊技术的行业。对那些行业可以放宽一些，准许带帮工，准许多带几个徒弟，以满足社会需要。

4日　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提出1982年要切实提高贷款资金使用效益

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结束。会议提出，今年银行工作要努力集聚社会资金，提高信贷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继续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方针，保持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会议认为，当前银行信贷资金的经济效益不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占用多，周转慢。1981年，国营工业和商业流动资金贷款比上年末分别增长9.1%和14%，而工业总产值和商品零售额只分别增长2.2%和4.2%。少数中短

期设备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也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会议要求，各级银行要加强信贷工作的调查研究和监督管理，积极促进企业搞好产销计划的衔接，努力做到产品适销对路。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把今年降低流动资金占用水平2%、3%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会议提出，要坚持以销定产、以销定购、以销定贷的原则，对工业企业和商业部门都要按照国家计划和销售情况掌握贷款。对虽已纳入国家计划、但产大于销的产品，银行要从严掌握贷款。对不按国家计划和供货合同，不按限产规定超产而无销路的产品，坚决不予贷款。

10日　邓小平谈打击经济犯罪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惩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有4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国务院禁止工业品购销封锁

针对许多地区出现了对外地生产的工业品进行封锁的严重情况，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知》，主要内容：(1) 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企业、事业单位和供销部门，有权到外地区、外部门择优选购各种工业品，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不得加以限制和阻挠。(2) 凡按国家标准生产的合格工业产品在优先完成国家任务以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和接受订货，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加以干涉。(3) 设计部门应贯彻择优的原则，优先选用质量好、性能好、价格合理的设备，不受地区、部门的限制。(4) 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对机电产品、农机产品及耐用消费品的选购，同样必须贯彻择优的原则，不得搞封锁。对本地区能够生产自给的日用消费品及轻工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适当控制外购，但必须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做到价廉物美。(5) 各级银行应当支持用户和供销部门合理使用资金，择优选购产品。对妨碍择优选购产品和违反财务制度的错误做法，要坚决抵制。(6)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凡是搞了限制向外地和外部门采购工业产品的规定和其他类似规定的，应一律废止；所有审批外购工业产品的机构，应一律撤销。

11日　国家经委等部门决定定期公布工业生产主要经济效果指标

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最近联合制定《定期公布主要经济效果指标的实施细则》。《细则》规定，根据前不久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的精神，为了互通情报，促进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之间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从1982年4月开始，按月报送、按季公布各省、市、自治区主要经济效果指标完成情况。

《细则》确定按季公布的主要经济效果指标共十六项：工业总产值和增长率；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完成计划情况；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工业产品优质品率；主要工业产品的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降低率；每万元产值消耗能源和降低率；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和增长率；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和增长率；工业企业上交利润和增长率；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率；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和加速率；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额和降低率；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和降低率；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增长率；工业企业职工重伤、死亡人数和降低率。

为了从宏观上考察各地工业生产经济效果的动态情况，《细则》还规定以下十项指标要把今年成绩和去年同期进行对比，按照改善、持平、下降的不同情况分别计分，进行综合分析。这十项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主要工业产品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降低率；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率；工业企业上交利润增长率；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加速率；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每千名职工死亡人数降低率。

12 日　国务院决定由国家计委主管国土工作

国家计委与国家建委提出继续开展省市区国土工作的意见。并宣布，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以前由国家建委主管的国土工作业务及其机构划归国家计委主管。国土工作照常进行。

13 日　国家计委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六五”计划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关于拟定“六五”计划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汇报》。“六五”计划控制数字中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落实下来。为此国家计委提出：（1）“六五”计划后三年的财政收支水平打平，关键是要增加财政收入。这就要适当调整分配关系，使“六五”后三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保持在28%左右。如果以后生产增长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更好，这个比重还可以考虑提高到30%左右。（2）要采取措施，适当增加投资，增加能源生产，促进能源节约。加强能源和交通建设，严格控制能源出口。（3）“六五”基本建设规模，最后控制在2200亿元左右。（4）“六五”期间共借外资150—200亿美元。国家外汇库存总数大约保持在50亿美元左右。

国家计委汇报后，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讨论汇报中的有关问题。会议提出，（1）“六五”计划的财政收支要基本打平，实现经济的稳定。解决财政问题，主要考虑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着眼，一不要开口子给企业增加新的负担，二不要把企业刚有的生气压下去。总的来讲，在处理国家与农民和职工关系上要谨慎。（2）“六五”建设总规模最后控制在2200亿元左右。但必须增加重点建设的投资，保证“六五”生产和“七五”发展的需要。“六五”计划要狠抓两个环节：一是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提高经济效益。二是想方法挤出一些资金搞重点建设，主要是煤炭和交通运输。筹集重点建设的资金，一是国外借款，二是从预算外500亿元资金中抽出一部分来。三是从银行贷款200亿元中挤出一些来。还有一年几十亿元的外汇顺差资金也可以使用一部分。（3）此次制定五年计划，要好好研究国际市场情况，考虑国际经济变化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17日 国务院同意开展城市住宅出售试点

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建委、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城市出售住宅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提出的意见，望研究试行。要搞好试点，为在全国城市实行这项改革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国家建委、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城市出售住宅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提出，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城市房屋出售问题，要选择几个城市打开局面，摸出经验"的批示，国家建委、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初步选定先在常州、郑州、沙市、四平四个城市进行试点。本着态度积极、步子稳妥的精神，对上述四个城市试点工作提出了如下几点意见：

（一）对新建住宅积极试行补贴出售的办法。今后，新建住宅，要努力创造条件向个人出售，以便逐步过渡到以购买为主。个人购买住宅，要支付售价的1/3，其余2/3由建设单位给予补贴。一次付清价款者，可在应付的售价中酌情给予优待；分期付款者，首次要交应付款的30%，余额还清的时间最长不超过十五年，并要逐年交付一定的利息。小区住宅的售价应包括：（1）住宅本身建筑造价；（2）住宅小区内的给水、排水、道路、供暖、供气、配电的建设费用；（3）征地或拆迁补偿费（只包括旧房折价和拆一平米补还一平米的造价）。其他公共设施费用不得摊入。（二）对原有住宅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原有住宅根据具体情况，能折价出售的就按质论价出售，售价同样由住宅所有单位补贴2/3，个人只付售价的1/3。收回的资金，也应存入银行，用于以后新建住宅。（三）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试点工作。为了支持试点工作，已商得财政部同意，沙市、四平二市从今年起开始实行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成5%的办法，以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和住宅的建设。银行可举办购买住房储蓄业务，并拿出一定数量资金，以低息贷给群众，用于购买房屋。

20日 国务院批准恢复财政驻厂员制度

国务院发出《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恢复财政驻厂员制度的报告的通知》。国务院指出，恢复财政驻厂员制度，有利于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严肃财经纪律，实行增收节支。财政部在《报告》中提出，（1）财政驻厂员是国家财政机关派驻企业的监察人员，它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财政法规，帮助企业整顿和加强财务会计工作，加强经济核算，加强成本、资金和财产的管理；通过财务分析，促进企业增产节约，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督促企业按时上缴利润，监督企业遵守国家财经纪律。（2）财政驻厂员派驻对象。全国现有6000多户大中型工矿企业、商业一、二级批发站、铁路、交通重要港口；大型联合企业要派财政驻厂员小组。

22日—5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

会议通过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决议》。宣布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组建完毕，部委总数从原有52个减至43个。会议通过了《关于任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决议》、《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关于批准198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批准1982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会议还批准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

国务院批准征收烧油特别税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征收烧油特别税的报告》，同意该项报告和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征收烧油特别税的试行规定》。国务院指出，烧油改烧煤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决策。实践证明。压缩烧油出口，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用于发展能源和交通建设，经济效果显著。开征烧油特别税是以税收方式推动以煤代油的一种特别行政措施，望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贯彻执行。此后，6月1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征收烧油特别税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以上三个文件，明确烧油特别税的征收原则。主要内容是：凡用于锅炉以及工业窑炉燃烧用的原油、重油，一律征收烧油特别税。特别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每吨征收固定税额：原油40—70元，重油70元。实行价外计税征收。减免税：对烧油单位按国际市场价格购买的出口转供国内使用的原油、重油，可以免税。该规定自当年7月1日起试行。1982—1990年，烧油特别税累计征收132.21亿元。促使全国压缩烧油规模1000万吨，累计压缩烧油8770万吨，累计积累煤代油资金322亿元。出口石油创汇42亿多美元。利用这笔资金安排了多项重大的电力、煤炭项目。

23日　**国务院批准海关征收出口关税**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海关总署等部门报送的《关于若干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请示》，同意从1982年6月1日起，中国海关对34种出口商品征收出口关税。对少数商品征收出口关税，建国初期就有规定并实行过。1951年5月，前政务院批准公布的《海关进出口税则》规定：对花生油、花生、猪鬃、桐油、薄荷油、薄荷脑六种商品征收出口关税。后来，由于国际市场和国内情况的变化，先后予以停征。这次对若干商品征收出口关税，是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以贯彻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统一对外方针所采取的重要经济措施。出口关税税率，煤炭从量征税，每吨征收人民币40元，其余实行从价征税，税率自10%至60%，共分6级，品种和税率如下：栗子、锰铁、铬铁、钒铁、钛、其他铁合金6种，税率10%；大米、大豆、糖、桐油、松节油、兔毛、淡水鱼、海蜇、杏仁、山羊板皮、生铁、钨铁、钼铁13种，税率20%；对虾、生漆、松香、钨砂、锑、硅铁、珍珠7种，税率30%；鲱鱼子、枸杞子、锡3种，税率40%；桂皮、当归2种，税率50%；鳗鱼苗、黄芪2种，税率60%。

28日　**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报告1982年计划草案和财政预算草案**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提交《关于198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提出1982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安排：农业总产值预计增长4%。粮食产量33350万吨，增长2.6%。轻工业产值预计增长7%，重工业产值预计增长1%，工业总产值增长4%。固定资产投资630亿元，其中，基建投资380亿元，更新改造投资250亿元。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在建项目的续建工程，对新上项目严格控制。更新改造，主要靠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进行。社会商品购买力2440亿元，预计增长8%，当年社会商品货源2380亿元，差额60亿元。为平衡市场供需，要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尽可能增产一些适销对路的产品。劳动就业，计划安排560万人，主要通过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来安排就业。继续调整没有实行奖金制度

的国家机关、科学文教卫生等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在增加农业生产、降低成本的基础上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

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提交《关于1982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主要内容：(1) 1981年决算初步数字：总收入1064.3亿元，总支出1089.7亿元，赤字25.4亿元。收入和支出比原预计数字大一些，赤字小一些。(2) 1982年预算：总收入1104.5亿元，总支出1134.5亿元，赤字30亿元。各项财政收入：企业收入344.1亿元，税收646亿元，其他收入2.4亿元，中央财政集中的企业折旧基金22亿元，发行国库券40亿元，国外借款50亿元。各项财政支出：基建拨款297.3亿元，技改和新产品试制费54.2亿元，增拨企业流动资金24亿元，支持农村人民公社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76.1亿元，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180亿元，行政管理费78亿元，国防战备费178.7亿元，总预备费27亿元。还本付息35.5亿元。5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批准了这两份报告。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批准1981年国家决算。

5　月

1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决定进一步扩大"拨改贷"'的范围，完善管理办法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建设银行总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通知》。《通知》指出，1980年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后，调动了企业管好用好投资的积极性，在节约投资，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收到好的效果。现决定：(1) 进一步扩大贷款范围。1980年决定，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基本建设所需资金一律改为银行贷款，因各种原因没有全面实行。从1982年起，原则上应按上述要求实行基本建设贷款制度。(2) 改进贷款项目的计划安排。加强贷款和还款的预算计划管理。(3) 加强设计概算和贷款合同的工作。凡设计文件不全或有重大修改变动和实际支付已超过概算的，应补报补批。(4) 改进提前还清贷款本息的奖励办法。从1982年起，提前还清贷款本息的新增利润，由借款企业与财政实行各50%分成，时间最长不超过半年。(5) 进一步完善贷款办法。新投产企业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原规定全部用于归还贷款。为解决新投产企业初期的一些开支，从1982年起，在建成投产后的三年内，基本折旧基金20%留给企业，80%归还贷款。从国外引进的大型建设项目，在建成投产后3年内，基本折旧基金20%留给企业，80%归还贷款。从国外引进的大型建设项目，在建成投产后的3年内基本折旧基金的10%留给企业，90%归还贷款。3年以后，所有贷款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50%留给企业，50%归还贷款。

4日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和赵紫阳总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和三项议案的说明。会议决定如下：

(一) 将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标准总局、国家计量总局、专利局合并，设立国家经济委员

会。(二）将农业部、农垦部、国家水产总局合并，设立农牧渔业部。(三）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国家测绘总局合并，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四）将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五）将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合并，设立机械工业部。(六）将第二机械工业部改名为核工业部。(七）将第三机械工业部改名为航空工业部。(八）将第四机械工业部、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合并，设立电子工业部。(九）将第五机械工业部改名为兵器工业部。十、将第七机械工业部改名为航天工业部。(十一）将国家劳动总局、国家人事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国家编制委员会合并，设立劳动人事部。(十二）将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合并，设立文化部。(十三）设立广播电视部，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十四）撤销第六机械工业部。

国务院原有52个部、委，经过这次机构改革，裁减合并为39个，加上已经批准设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总共设置41个部、委。

会议同意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提议，万里、姚依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主任，薄一波（兼）、杜星垣（兼）、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为副主任。其任务主要是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加强对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和协调工作。此前2月8日，赵紫阳总理在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报告中，提出设立国家经济体改革委员会，以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5日　国务院明确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工作分工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分工的通知》。国家计委与国家经委的分工。(1）国家计委负责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年度计划的执行和协调。在编制计划、进行综合平衡时，国家经委参加。国家计委和经委共同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2）年度计划如果在执行中需要对地方和重要企业的计划进行调整时，由国家经委与计委共同研究解决；关系全国性指标的重大调整，由两委研究，报国务院决定。(3）国家物资局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编制物资平衡分配计划，对国家计委负责。物资的供应、调度，对国家经委负责；(4）科技发展计划及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国家计委为主，会同科委、经委编制。由国家经委、科委分别组织实施。科技成果推广计划以国家经委为主编制，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纳入国家经济计划。(5）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包括银行贷款）计划，以各级计委为主，会同各级经委制定。与基本建设统一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各地方、各部门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计划，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审批。基本建设方面，国家计委负责确定建设规模、投资的使用方向和大中型建设项目，负责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论证，有关项目之间的衔接平衡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设计任务书的审批。负责组织资源勘探规划、区域规划、流域规划、路网航道规划、农业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和审查项

目的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调配建设物资，组织生产准备、竣工验收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标准规范及立法等。(6) 国防工业、国防科技计划由国家计委会同国防科工委和国家经委编制。机械工业的调整、改组、改造工作，由国家经委负责。(7) 国际收支平衡计划由国家计委负责。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计划，以国家计委为主，会同国家经委和有关部门制定和审核。引进技术的消化推广由国家经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8) 对于重大的经济政策问题，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要共同研究协商解决，报请国务院备案或批准。(9) 两委在日常工作中要加强联系，紧密协作，互相配合，建立定期联合办公制度。

关于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的分工。科学技术计划（包括中、长期和年度计划）和重点攻关项目，以各级计委为主，会同各级科委、经委负责制定。分别纳入全国、部门、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科学技术计划和重点攻关项目时，同时确定各项目的经费、投资、物资，按经济体制和渠道，分别纳入国家、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财务、基本建设和物资计划。

6 日　国务院要求抓紧货币回笼和严格控制货币投放

国务院发出《关于抓紧做好货币回笼工作和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通知》。《通知》要求：(1) 积极扩大商品回笼。要根据城乡购买力增长和人民群众对消费品需求的变化情况，多增产一些社会需要的日用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增加商品供应。进一步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大力组织农村货币回笼。在商品分配上，要切实贯彻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的原则。特别是农村迫切需要的建房材料和日用工业品，要组织有关部门协同配合，采取多种形式，使更多的工业品投入农村市场。对一些紧俏商品，要克服惜售思想，抓紧销售。(2) 严格控制信贷投放。各级银行要根据国家确定的信贷计划，有控制地发放各项流动资金贷款和中短期设备贷款。要压缩和减少滞销商品的生产和收购，对生产无销路的产品不能给予贷款。(3) 加强对收购农副产品的信贷、结算监督。对按照国家计划实行统购、派购的，要根据实际需要供应资金。对于不按国家规定，随意扩大农副产品议价范围，或自行降低农副产品统购基数、减少派购任务而加价收购的，银行可不予贷款。(4) 进一步办好城乡储蓄。要充分运用调整存款利率的有利条件，积极组织存款工作。要搞好储蓄网点建设，以方便群众存取。(5) 切实加强奖金管理。今年各地发放的奖金总额，一定要稳定在去年的水平上。各有关部门要把应发的奖金数额逐级核定到企业，由银行监督支付。超过核定数额，银行可拒绝支付。(6) 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接到通知后，要认真贯彻执行，上半年要尽可能多回笼一些票子，下半年要严格控制投放，争取全年货币发行不超过计划。

12 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为国务院领导下的相当于部级的全国性专业公司，由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直属的 138 个企、事业单位和交通部直属的 15 个单位组成。全公司职工 30 万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柴树藩，总经理冯直。

国家计委要求开展农业产量抽样调查

国务院发出《批转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的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为适应农村普遍实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新情况，提高农产品产量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是十分必要的。望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充分重视，尽快把农村抽样调查队伍建立起来，以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国家计委、农牧渔业部、商业部、国家统计局在《关于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许多生产队只掌握包产的数字，不能确切地掌握超产的数字。层层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不反映实际情况，特别是预计产量数字差距较大，给编制计划、安排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国家统计局为此制定了《全国农产量抽样调查试行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一）抽样方法。全国抽样数目大致为四百七十二个县，三千三百个公社，九千九百个生产队，八万多个地块，八十万个小面积样本。（二）调查办法。夏收、早稻和秋收，都要在作物收割前进行产量预测，在收割期间实行产量实测，分别取得夏收、早稻和秋收的预测和实测产量资料。（三）组织领导。请各级政府认真加强领导。(1) 尽快把农村抽样调查队伍建立起来。(2) 统一组织调查力量。为完成调查任务，在农作物收获季节，凡抽选出的县、公社都应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统一组织农业、商业、银行、计划、统计等有关部门参加，成立农产量调查组。调查结果，分别上报，共同使用。

25 日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成立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成立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由水电部主管，成立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贯彻水土保持工作的方针、政策；督促各地执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关法规、条例；组织交流防治水土流失的经验；协调较大范围内的水土保持查勘、规划和科学研究；定期研究解决水土保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26 日　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提出沿海和内地的划分范围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关于沿海和内地划分问题的通知》。为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作用，加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合作，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沿海和内地的范围作明确的规定。过去在计划、统计上，对沿海和内地的划分没有统一的规定，划分的口径不尽一致。对此，今后称沿海地区的范围，即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11 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回归祖国后也应包括在内），其余 18 个省和自治区则称为内地。

6　月

10 日　国务院批准调整部分产品工商税税率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出《关于调整工商税若干产品税率和扩大征税项目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调整税率是为了更好地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节工业产品的利

润和企业收入，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此次工商税税率调整和扩大征税项目，主要是调节工业产品的利润和企业收入水平，只涉及税利之间的变动，不影响物价水平。(1) 有5个项目调低税率：肥皂，由12%降至5%。布面胶鞋，由18%降至5%。炼乳、奶粉，由10%降至5%。沙器、瓦器，由12%降至5%。洗衣粉，由12%降至5%。(2) 有2个项目调高税率：原油，由5%调高至12%。轮胎、轮带：汽车轮胎，由10%调高至15%；其他轮胎、轮带，由10%调高至12%。(3) 有1个项目扩大征税：银行按业务收入额减去存款利息支出额，依率计算纳税，税率为10%，信用社暂缓征收。

17日　国务院决定实行城乡统管的商品流通新体制

国务院发出《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决定主要内容：为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改善农村市场的供应状况，决定：(1) 按商品分工、城乡统管的原则，改变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由国营批发公司全面负责，统筹安排全国城乡市场，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商品流通。(2) 继续发挥基层供销社的作用。国营批发公司应当积极支持和辅助基层供销社经营，依靠他们做好农村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工作，满足广大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不断增长的需要。同时，要继续发挥各种集体、个体商业以及其他商业渠道的作用，帮助他们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形式，从事购销活动。(3) 继续贯彻执行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优先供应城市的原则。进一步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钢材、水泥、玻璃等建房材料，有关部门也要根据上述精神，切实搞好对农村的供应。(4) 基层供销社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建立的代购代销店，如代购代销员有要求，并经社队同意，可以改为向生产队承包的自营店。自营店可直接向联营的批发商店和就近的国营商业批发部进货，享受批发价待遇。(5) 把工业品流通由城乡分工改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是商业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要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责成一位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亲自主持，研究解决问题，真正抓出成效。

21日　国务院要求健全各部委责任制

国务院发出《关于健全各部委责任制的一些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贯彻集中统一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使之主动地认真做好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国务院作如下通知：今后各部委对于主管的业务问题，凡是应该由本部委自行解决，或可以由有关部委协商解决、由综合部门协调解决的，就不要请示国务院。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对于超出本部门职权范围的问题，应当区别情况，按照下列程序办理：(1) 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年度计划的编制、平衡和重大调整，投资和大中型项目的确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计划的制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的审核，国土整治，等等，要同国家计委研究办理；(2) 有关农业、工业、基本建设、铁路交通、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和物资年度计划的执行和当年经济技术活动中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以及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年度计划的调整，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综合调度，当年财政、物价工作中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农工商之间的关系，为当前国民经济建设服

务的科技攻关项目的组织协调，进口机械设备的审批，引进新技术的消化，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基建施工、设计力量的协调，企业的技术改造，机械工业的调整改组等，要同国家经委研究办理。(3) 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政策，优先发展的领域和重要科研课题，科研体制改革和机构的布局、调整、整顿，以及涉及科学技术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基础性、综合性工作，要同国家科委研究办理。(4) 有关财政和信贷方面的问题，要分别同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研究办理；(5) 有关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劳动保护、干部调配、行政事业单位的编制等方面的问题，要同劳动人事部研究办理；(6) 有关体制改革、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地质、物资、物价、商业、对外贸易、工商行政、民族事务、政法、文教、体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要同各主管部门研究办理。如有分歧意见，可以提交综合部门协调解决。(7) 属于部门性质的行政法规，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由各部委自行发布；涉及几个部门的行政法规，先送综合部门审查后，由综合部门发布，或者由有关部门联署发布。属于全国范围的重大问题，需要制定法律、法令、行政法规的，由主管部门拟定草案，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报国务院审定。

30日　国务院发布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布水土保持工作条例的通知》。《水土保持工作条例》的主要内容是：(1) 水土保持工作的方针是：防治并重，治管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除害兴利。(2)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由水电部主管。成立以水电部为主，有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农牧渔业部、林业部参加的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加强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定期研究解决水土保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3) 水土保持工作机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水土保持的方针、政策、法令；进行水土保持查勘，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并组织实施；督促检查有关部门的水土保持工作；组织开展有关水土保持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宣传工作；管好用好水土保持经费和物资。

赵紫阳总理对“六五”计划的主要意见

五、六月间，国家计委党组就《二十年设想和“六五”计划》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三次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关于今后二十年的设想。据测算，前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有可能达到5%—6%的速度；后10年有可能达到8%—9%的速度。其中，农业前10年平均每年增长5%，后10年平均每年增长5.5%。工业前10年平均每年增长5%—6%，后10年平均每年增长9%—10%。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8000亿元。比1980年的7000亿元翻两番。其中，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后10年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在听取汇报时多次讲话。主要内容：(一) 关于农业。粮食问题需要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宜种粮的种粮，不应改种别的作物。不宜种粮的，应改种别的作物。在处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关系上，首先要保证粮食作物稳步增产，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再减少。同时要因地制宜，分别在不同地区进行适当调整。(二) 关于能源、交通。解决能源问题，要考虑今后一二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我国在今后20年内，科学技术会有很大发展，只要把耗能定额大大降低，到

2000年可以不消耗原来计算的那么多的能源。要从各方面挤出资金投入重点项目的建设，主要是开发能源和进行交通运输的建设。重点建设搞不上去，就谈不上在80年代为以后发展做好准备。(三) 增加的能源、交通投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项目，使之缩短建设周期，提前完成。二是新项目的勘察设计，搞好建设的前期工作。今后必须改变基本建设不按程序办事的状况。再不要搞那种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事。安排基本建设项目，首先要搞好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关键是计划，在计划中要列勘察设计项目。以后凡是下一个5年要搞的项目，上一个5年就要把这些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可行性研究和勘察设计等工作都搞好。要下决心从计划上转过来，经常准备100来个大中型项目，把勘察、设计、可行性研究等工作都事先做得好好的。这样，整个基本建设工作就主动了，长远规划也有了基础。(四) 要考虑适当集中财力。但现行政策不变，财政分灶吃饭、扩大企业自主权继续搞，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中央集中的比例要提高，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基数，为下一个10年做准备。进行重点建设，中央没有一定的财力不行。要适当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同时从控制财政补贴方面打主意。(五) 利用外资要采取积极态度，尽可能多利用一些外资。“六五”期间借用的外资，主要用于能源、交通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使用外资要合理安排。与外资合营的局面必须打开，要研究吸引外资的具体办法。(六) 5年计划，10年规划，要加强教育。从“六五”开始，教育要加强。“六五”期间国家要挤出一部分钱来，增加中年知识分子的工资，从今年开始就行动起来。(七) 关于企业的调整和整顿。“六五”期间，企业的调整和整顿要下决心搞。调整、改组要与企业的整顿、技术改造结合起来进行。(八) 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大体上分为以下两类：一是计划管理，包括直接计划（即指令性计划)、间接计划（即指导性计划）两部分。二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直接计划，一部分为间接计划，一部分为市场调节。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除中央的计划之外，还有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协作。这些经济协作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应该加强对这一部分的计划指导，成为国家统一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合法化。各级计委把这项工作搞好了，计划工作就会闯出一条新路子。对于小商品，可以考虑实行市场调节，随行就市。国家不统一规定价格，也不补贴。(九) 关于制定十年计划和专题计划。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后10年，这是全国经济工作大的战略部署。“六五”计划搞好后，接着就要集中力量搞“七五”计划。也就是前10的计划。同时要搞几个专题计划。如：10年农业规划，10年能源交通规划，20年科技规划。

7　月

5日　我国种植橡胶树北移成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橡胶作为战略物资，被美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向我国出口的战略物资名单。1950年以来，我国在国外历来认为不能种植橡胶的北纬17度以北的地区，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辛勤经营，现在已建成了以海南岛、西双版纳

为主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这两个橡胶生产基地有胶园341万多亩，占全国胶园总面积的53%，年产胶8万多吨。另外在接近北纬25度的广西、福建一些经过选择的地区，也植胶成功。现在，全国国营胶园面积有531万多亩，并拥有一批天然橡胶加工厂。集体经营的橡胶树，也有100多万亩。去年全国橡胶总产量达12.8万吨，比上年增长13.3%。我国天然橡胶林面积已占世界第四位，产量占第六位。初步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橡胶科学技术体系。

10日　我国商品市场出现"储币选购"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市场供应充足，商品丰富，过去市场上常见的"持币抢购"情况已不多见。普遍的做法是"储币选购"。全国储蓄余额1982年5月底比年初增加65.4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1.35亿元。这充分说明长期以来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开始走向稳定。我国城乡市场的变化，集中体现了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的巨大威力。它反映出，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工业结构、产品结构正在向更合理的方向转变。说明我国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14日　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

国务院发出《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的关系问题的请示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的《请示》，请贯彻执行。

人民银行在《请示》中提出：（一）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和主要任务：负责拟定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定全国统一的金融规章制度，人民币存款、贷款利率，按规定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执行；印制发行人民币，调节市场货币流通；综合平衡信贷计划，统一调度信贷资金；审核金融机构的撤并；统一管理国家外汇储备。（二）人民银行与各专业银行的关系：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都是总局级经济单位。在上述5个方面接受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三）人民银行继续担负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的任务。

20日　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通信地面站试用成功

邮电部在国际卫星通信组织的支持下，利用印度洋上空的国际通信卫星空余转发器进行国内通信试验取得初步成功。从今年6月5日开始，我国在国内进行包括电话、电报、传真、电视等各种功能的传输试验。参加试验的有北京、上海、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10个卫星通信地面站，其中有7个地面站的设备是我国自己研制的。经过一个半月的试验，这7个地面站设备的技术性能指标均符合国际卫星通信组织的要求。7月11日，呼和浩特市部分干部、群众第一次看上由卫星转播的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实况节目。这次利用国际卫星进行国内通信试验获得初步成功，为建立我国国内卫星通信系统打下良好的技术基础。

21日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六五"计划草案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六五"计划草案。会议开幕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同志就"六五"计划草案作了说明。会议赞成"六五"期间要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并为"七五"发展作必要的准备。赞同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集中力量

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搞好现有企业的整顿和改造。赞同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原则，适当集中财力，加强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会议对“六五”计划草案中的农业、能源交通、财政、固定资产投资等问题，以及1983年计划控制数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具体落实意见。对国家计委原来提出的一些具体指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会议提出了后3年集中200亿元资金用于重点建设的问题，但对如何集中没有确定下来。此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对“六五”计划又进行了研究和部分调整。

29日　劳动人事部和国家计委要求逐步实行奖金计划管理

劳动人事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奖金管理，严格控制奖金发放的通知》。《通知》要求，从今年起，对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下达的奖金总额的控制数，逐步实行奖金的计划管理。今年的控制数，根据国发（1982）75号文的有关规定精神，暂按1981年各地区、各部门奖金总额的统计数下达。包括企业的经常性生产奖、特定原材料、燃料节约奖和其他节约奖、劳动竞赛奖，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增收节支奖等在内。各地区、各部门今年新增职工和某些企业由于生产增长幅度很大、经济效益很好而必须增加的奖金，原则上在本地区、本部门某些单位应核减的多发乱发的奖金，以及压缩计划外用工所节减的奖金中调剂解决。未经劳动人事部和国家计委同意，不得超过下达的奖金总额控制数。

8　月

1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产中短程客机投入小批量生产

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国产中短程客机——运七飞机设计定型，并命名为运输七型飞机，简称运七飞机。同意该机投入小批量生产。运七飞机是为了满足国内航空支线运输发展的需要，由我国航空工业部门首次研制成功的旅客运输机。这种飞机装有两台发动机，可载旅客48名。它的巡航速度为每小时478公里，最大航程为1900公里，最大商载4.7吨。运七飞机除客机型外，还可改装成货机或客货混合型飞机。运七飞机研制以来；做了大量试飞试验工作。迄今为止共试飞1600多小时，飞机的操纵性、安全性，高原、高温起动性能，单台发动机起降性能，都达到了设计要求。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将正式生产运七飞机。

5日　财政部提出加强国营企业财务工作意见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在《关于加强国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报告》，报告规定：

（一）所有企业必须对财务会计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并限期达到以下要求：(1) 有一套健全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和财务会计制度；(2) 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遵守财经纪律；(3) 及时足额地上缴税款和利润；(4) 有一套保护国家财产完整无损的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5) 建立依靠群众管家理财的制度，勤俭办企业；(6) 有健全的财会机构和同工作任务相适应的财会人员。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按照要求，对经过整顿的企业，逐项检查验收。没有达到要求，继续进行整顿。

（二）建立和健全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和财务会计制度。其中包括：反映生产经营

活动的各种原始记录；原材料和工时的消耗定额，物资储备定额；物资的检验、领发和盘点制度；财务开支的审批和领报制度；会计账簿、凭证和核算办法；成本计算规程；经济活动分析和考核办法；以总会计师为首的分级经济核算制；财务收支计划和会计报表。

（三）企业领导人员、财会主管人员和管理使用人员调动工作时，必须向接替人员当面办理财产交接手续，并要由上一级领导人监交签证。（注解：财会主管人员调动工作时办理交接手续，改按 1985 年 1 月 21 日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执行。）

（四）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和实际消耗数量，如实核算产品成本和流通费用。不准用计划成本、定额成本、估计成本代替实际成本。不准把应当列入基本建设、各项专用基金开支的费用挤入产品成本。不准打埋伏，造假账，谎报成本。

（五）一切自销、试销、展销产品的利润，进出口产品的利润，经销议价产品的利润，贸易公司（货栈）的利润，地方信托投资公司的利润，高级宾馆和旅游企业的利润，以及各种手续费和业务收入等，都不允许擅自留用，化大公为小公，化全民为集体。发现这类问题时，财政部门应当通知企业立即纠正，限期补交入库。逾期不交的，可通知当地银行扣交，并按欠交金额每天处以 1‰的滞纳金。

6 日　国务院颁布物价管理暂行条例

国务院常务会议 7 月 7 日通过《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在颁布条例的《通知》中指出，物价问题是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保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是我国一贯的方针。《物价管理暂行条例》是物价工作的重要法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根据《条例》的精神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健全物价管理机构，加强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

《暂行条例》规定：（1）按照商品对国计民生影响的大小不同，分别采取国家定价、国家规定范围内的企业定价和集市贸易价。国家定价是主要形式。（2）国家对物价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重要的工农业品价格、重要的交通运输价格、重要的非商品收费和物资管理费，由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管理。（3）比较重要的工农业品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和非商品收费，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物价部门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管理。其他工农业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工商企业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有定价权。（4）一、二类农副产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购销价格。超购加价和价外补贴的品种与幅度，必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擅自改变。农副产品议购议销的品种范围、作价原则和价格管理办法，按国务院批准的管理办法执行。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不得自行扩大议价品种范围和哄抬议价。城乡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价格，在国家政策、法令允许的范围内，由买卖双方议定。（5）凡国家定价的重工业品，不论计划内生产的、计划外生产的或超产的，一律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不准议价。工业品实行浮动价格，由物价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规定实行浮动价格的品种和幅度。新产品试销期间，由企业根据成本，参照同类产品价格，制定试销价格，报物价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备案。试销期一般为一年，最多不超过二年。（6）个体劳动者从国营

工商企业和集体企业购进的商品，按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格出售。使用物资部门供应的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可参照国营企业同类产品价格，按质论价出售。经营议价农副产品、三类轻纺工业品中的小商品和手工业品中的小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自行定价出售。

9日　国务院颁布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

《条例》规定：国营工商企业；合作经营和其他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企业；联营、合营的工商企业；铁道、民航、邮电通信部门及其他公用事业单位所属的工商企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办理登记的其他工商企业，都应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工商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在中央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地方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企业中除全国性公司外，一律在所在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登记的主要事项：企业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筹建或者开业日期、经济性质、生产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方式、资金总额、职工人数或者从业人数。

开办工商企业，需要进行基本建设的，应于建设项目批准后三十日内，向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筹建登记。不需要进行基本建设的，直接申请开业登记。

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工商企业筹建或者开业的申请登记，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核准登记，发给筹建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工商企业凭具筹建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到银行开立账户，进行筹建或者生产经营活动。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62年12月30国务院发布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2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直属机构改革方案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国务院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国务院直属机构调整情况的书面说明。根据这个方案，国务院直属机构原有的41个单位，经过调整后现在保留15个，其余26个并入有关部委。批准国务院保留的直属机构为：国家物资局、国家物价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气象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海洋局、国家地震局、国家旅游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家档案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并入有关部门，不再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会议决定将新华通讯社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决定设立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1983年3月1日起施行。《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为保护海洋环境及资源，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法。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和海滨风景游览区，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

施。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的确定，须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主管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国家海洋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开展科学研究，并主管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海洋倾废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负责船舶排污的监督和调查处理，以及港区水域的监视，并主管防止船舶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港船舶排污的监督和渔业港区水域的监视。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用船舶排污的监督和军港水域的监视。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并主管防止海岸工程和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1983年3月1日起施行。《商标法》明确，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的工作。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国家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必须申请商标注册，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在市场销售。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对等原则办理。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应当委托国家指定的组织代理。

24日　国务院要求确保财政赤字不突破30亿元

国务院发出《关于努力增收节支确保财政赤字不突破30亿元的通知》。《通知》要求税务部门大力开展税务登记和税收政策的检查工作，堵塞偷税、漏税，杜绝“漏管户”。对国家已经决定开征的税种、税目，要抓紧开征。同时，加强国营企业利润的监交工作。

31日　国务院明确中国银行地位

国务院发出《关于中国银行地位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国务院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现就涉及中国银行的地位问题，通知如下：中国银行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外汇专业银行。根据1980年9月22日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银行章程》，它的任务是：组织、运用、积累和管理外汇资金，经营一切外汇业务，从事国际金融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银行除经营本身业务外，还可以根据国家的授权和委托，代表国家办理信贷业务。机构改革后，中国银行行使的各项任务并无改变，仍然根据国家的授权和委托，代表国家办理信贷业务，过去代表国家对外签订的一切贷款协议，仍由国家负责，不受机构改革的影响。

9　月

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开幕。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定了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和重要原则。战略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战略重点：为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战略部署：为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几个原则问题是：(1) 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2) 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3) 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4) 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80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20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国家要求所有工商经营单位和个人办理税务登记

经国务院批准，为维护税收法纪，保障合法经营，加强工商税收的征收管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财政部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办理税务登记。所有工商业经营单位（包括国营、集体企业）和个人，都必须办理税务登记，接受税务机关的纳税管理和监督。凡从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建筑安装、商业经营、金融信托、进出口贸易、服务性业务，以及其他有经营收入、收益依法应该纳税的单位和个人（简称纳税单位和个人）应当分别在开业后或停业前30天内，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开业或停业的税务登记。

2日—9日　第一次全国经济法制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交流了近几年来经济法制工作的经验，讨论研究了经济立法的五年规划，探讨了经济法的有关理论问题。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到会讲了话。彭真同志指出：经济法是一系列法规中极为重要的法规，是直接反映经济基础的，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形势要求我们尽快地抓紧制定各种经济法规。要成熟一个搞一个，能制定一部分的先制定出一部分。不成熟的，先搞大纲、草案，逐步完备起来。会议充分讨论研究了《1982—1986年经济立法规划（草案)》。这次会议提出，下一步应搞好地方立法的规划工作。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法制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进展很快。从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11个法律和法令。国务院颁布和批准颁布的有《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等80多个经济法规。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还直接颁布了一大批经济法规。这些法规实施后，已收到了初步的成效。在加强经济立法的同时，经济司法工作也在逐步展开，经济司法机构逐步建立起来。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截至198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293个中级人民法院，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都建立了经济审判庭。各级经济检察机构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4日　国务院批准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

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轻工业部、商业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报告》提出，三类工业品中的小商品销售额，在全国来说，约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6%，或略多一些。改变把小商品价格按照大商品价格管理的状况，对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企业定价，同我国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总原则是一致的。大体上用两、三年时间，把应当放开的小商品价格，分几批陆续放开。三类工业品中小商品有小百货、小文化用品、小针织品、民用小五金、民用小交电、小日用杂品、小农具、小食品和民族用品等9类。现决定放开6类160种的价格。

9日　商业部关于部分工业品开展“提前付货、分期收款”业务的通知

为了扩大工业品销售，增加市场货币回笼，满足城乡人民需要，特别是一些收入较

低的消费者的需要，并促进轻工和电子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以及一些地区的经验，经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决定对一部分价格较高的日用工业品积极开展“提前付货，分期收款”的业务。《通知》的主要内容：实行“提前付货，分期收款”办法的品种：主要是一部分价格较高、库存较大、销售不快的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收录音机、高档收音机、高档乐器、高档照相机、洗衣机、电冰箱；收款办法：在付货时应首先一次收取相当于售价30%左右的货款，其余部分再采取按月平均、分月收款的办法。分期收款的期限，一般可定为半年或一年；销售对象：主要是机关、团体、厂矿、企业、事业、部队、学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职工。价格：均按现行零售价出售，在分期收款期间遇到统一调整商品零售价时，属于提价商品，仍应维持原价不变；属于降价商品，降价前按原价，降价后未交款部分按新价折算。

12日　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请示“六五”财政平衡问题

国家计委党组认为，“六五”财政平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后3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减收增支因素。另一个是增加200亿元重点建设投资，资金来源还没有落实。国家计委经同财政部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后3年财政赤字，最多只能打90亿元。第二，原来财政收支平衡方案中出现的一些不落实因素，通过调整收支的措施加以弥补。第三，新提出来的增加支出、减少收入的要求，现在不能考虑。第四，后3年重点建设增加的200亿元投资，其中有一半左右是保证“六五”增长速度的，其余一半左右是为“七五”作准备的，这些都是必需的。拟采取发行国库券、征收能源交通附加费和银行转过来的中短期贷款等办法解决。

在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后，9月14日，赵紫阳召集参加党的“十二大”的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座谈讨论“六五”后3年集中200亿元资金用于能源、交通重点建设问题。姚依林在会上提出集中200亿元资金的四条办法：(1)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所属大集体企业的全部预算外资金中提取10%，3年共120亿元。(2)从人民银行中短期贷款中，抽一部分转到能源交通建设上，3年共30亿元。(3)人民银行多上交利润，3年共计30亿元。(4)国家财政增拨基本建设投资，3年共计20亿元。原来实行的发行国库券、向地方借款的办法，继续实行。会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一致表示赞成赵紫阳和姚依林提出的原则和办法，认为集中一些资金搞能源和交通建设很有必要，提出的办法是好的、可行的。这样，“六五”计划编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有了解决的途径。至此，“六五”计划安排大体落实。

13日　邓小平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现在着手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顺当。这一次在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顺当地解

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将来准备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18日　邓小平谈一心一意搞建设

邓小平同志陪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访问四川。在途中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刚刚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1981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22日　国家计委发出正式编制建设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

国家计秀发出《关于编制建设前期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为加强建设项目的前工作，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事，使建设项目的确定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认真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努力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投资效益显著，国家计委决定在编制"六五"计划和1983年计划时，正式编制建设前期工作计划。(1) 建设前期工作是指从建设项目的酝酿提出到列入年度计划开工以前进行的工作，主要包括勘察、科研、试验和可行性研究，设计任务书，初步设计三个方面。(2) 凡已列入"六五"计划，但还没有进行建设前期工作的新开工项目，或前期工作各阶段没有全部完成的项目，要首先列入前期工作计划；其次再安排为"七五"计划和后10年建设需要做好前期工作的重大项目。(3) 勘测、科研、试验报告，由主管单位鉴定、审核。地质储量报告由各级储量委员会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大中型项目，由国家计委或国家计委委托有关部门审批；小型项目按隶属关系，分别由主管部门或省、市、自治区计委审批。(4) 各项前期工作所需经费，勘察设计单位和科研单位承担的任务，有事业费和科研经费来源的，从事业费和科研经费中开支，没有经费来源的，实行收费的单位，按规定收取费用。新建项目如没有固定资金渠道的，按照隶属关系，分别由主管部或省、市、自治区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内安排。

24日　邓小平谈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面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的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

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27日 国务院发布1983年国库券条例

1983年国库券总额仍为40亿元，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18亿元，城乡居民购买22亿元。国库券的利率、还本付息期限和办法，都与1982年相同。1983年，实际发行国库券41.58亿元。

10 月

7日—16日 我国核潜艇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成功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新闻公报：1982年10月7日至16日，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此前，新华社于10月1日发布受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向以北纬28度13分、东经123度53分为中心，半径35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为了过往船舶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知本国的船舶和飞机，在当地时间每日9时至17时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海域上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海上发射运载火箭巨大胜利。党中央指出，在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这是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又一胜利。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特向参加研制、发射试验以及各项保障工作的全体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努力奋斗，进一步提高各自的业务水平，为国防科技、国防工业攀登新的高峰，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12日 水电部计划工作会议提出今后电力发展方针

会议提出，为适应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需要，电力工业必须有很大的发展。今后18年，要尽可能多发展水电，将重点开发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上游及其支流的水力资源，加快建设青海的龙羊峡、四川的铜街子、湖北的葛洲坝、贵州的乌江渡和云南的鲁布格等大型骨干水电站，还将建设一批中型水电站。同时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内蒙古、陕西、豫西、两淮、鲁南、六盘水等山区，加速建设大型火电基地。在华东、广东等地区建设核电站，以解决常规能源短缺地区用电的需要。在城市发展热电站，在农村牧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小水电、小火电、风力发电、地热发电等，发电能源多样化。由于我国西电东输的基本格局，所以要大力发展大电网和高压交直流输变电工程。

14日　邓小平谈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邓小平在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到本世纪末20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六五”计划已经过去了两年，今后三年要有很好的安排。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准备有个抢时间的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哪些项目早上，哪些项目晚上，要有个安排，不能挤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资金、材料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你们提出一批重大的勘察设计项目，准备提前做好建设的前期工作，这件事要认真落实。要列出进度表，什么时间勘探清楚，什么时间拿出设计，由专人负责包干。煤、电、油这些能源项目，还有交通项目，前期工作要抓紧，晚了不行。能源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水电大项目上去了，能顶事。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20日—11月10日　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决定改革国营商业独家经营体制

会议提出，把“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城乡经济，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为新时期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决定采取三条政策措施搞活流通领域：一、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二、调整工业品的购销政策；三、放手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合理调整国营商业在社会商业中的经营比重。

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和切实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政策，把流通领域搞活。具体政策措施是：

——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重要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政策要坚持，但派购的品种要逐步缩小，一、二类农副产品的46种减为22种；至于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统派购任务后允许上市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则要把流通搞活，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议购议销的产品价格允许有涨有落。除粮食以外，其他农副产品要允许多渠道运销，允许基层供销社和货栈出县出省推销，允许生产者长途运销，允许个体行商、流动购销专业户和马帮长途运销。

——调整工业品的购销政策。适当扩大一些商品的批发和零售差价，先从小商品开始，鼓励基层零售单位扩大经营。对耐用消费品实行提前付货，分期收款的办法。

——放手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合理调整国营商业在社会商业中的经营比重。国营商业对工业品的批发量从现在占总批发量的73%，调整到70%左右。国

营商业和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的比重从现在的80%，调整到70%左右。国营商业和基层供销社零售额的经营比重逐步由80%调整到60%；饮食服务业，在城市，国营的保持30%，农村除供销社外，基本上由集体和个体经营。

24日　赵紫阳指出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经济振兴要靠科学技术进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点，应该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领导干部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可概括成四句话：一是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二是给科技战线出题目；三是为科技工作创造条件；四是为科研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开辟道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要做三件事：第一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确定科研任务和课题；第二要调整科研体制和科研任务；第三完善对科研人员的考核和奖励制度。组织科技人员参加规划，参加攻关。必须组织科技人员参加行业规划、区域规划和重点企业规划。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

为了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对科技成果实行有偿转让。重点建设的前期科研费用，应当从基建投资中解决。担负研究新装备任务的企业，可以按照产值或销售额提取技术开发费用；实行优质优价。计划体制方面，要解决计划指标体系的问题。以总产值为主要指标，弊病很大。不利于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不利于采用新技术。在国家下达的计划中，不仅要有生产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要求，而且要有淘汰陈旧产品、禁用落后技术的要求。必须解决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为技术进步开路。财政方面，要解决新产品试制经费的经常性来源问题。信贷方面，要更好的扶植新技术新产品。税收方面，要实行鼓励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价格方面，要研究如何切实贯彻按质论价的原则，不仅实行优质优价，而且实行低质低价，对劣质陈旧产品规定惩罚价格。

25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

国务院于10月25日至11月10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1) 提高经济效益。(2) 落实1983年计划指标。(3) 控制固定资投资规模。(4) 处理库存积压物资。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争取工农业生产持续稳步增长；压缩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筹基建投资，压缩一般性的加工工业的投资，加快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有重点地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制定科技长期规划，进行重大科技课题攻关，对重大建设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和可行性研究；继续保持财政、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1983年计划的具体安排是：农业和工业总产值分别比1982年预计增长4%。财政收入1232亿元，比1982年增加125亿元（其中，筹集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60亿元）。财政支出为1262亿元，比1982年增加125亿元。收支相抵，财政赤字30亿元。

27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字

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经普查，1982年7月1日全国人口1031882511人。大陆29个省市区人口和现役军人1008175288人，其中，男性占51.5%，

女性占48.5%；汉族占93.3%，各少数民族占6.7%；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15个。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599人，高中6622人，初中17758人，小学35377人。文盲和半文盲为235820002人。1981年人口出生率为20.91‰，死亡率为6.36‰，自然增长率为14.55‰。市镇总人口206588582人。台湾省人口和福建省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数，按台湾当局公布的数字计算。香港、澳门地区的人口数，按香港当局和澳门当局公布的数字推算。

国务院对解决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问题作出规定

《规定》指出，当前，许多单位加给企业的社会负担名目繁多，使企业负担过重，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核算和正常生产，侵蚀了企业应当上交的利润，许多地区和企业迫切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今后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安排年度和长远计划中，对城市、矿区、林区各项建设事业要进行综合平衡，统筹解决。根据当前实际情况，为了适当解决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问题，特作以下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

财产保险问题。财产保险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准搞变相强制保险。在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对保险基金的积累要注意控制，应适当降低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费率，以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排污收费问题。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国务院原环境保护办公室和财政部拟订的收费办法和标准，各地都要按新的统一办法逐步实行。收取的排污费应按规定将大部分返还给企业用于治理污染，小部分用于综合治理项目，不得挪作它用。公路养路费问题。各地要认真按照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交通部、财政部《关于整顿公路养路费征收标准的报告》（国发〔1987〕158号）以及国家计委、交通部、财政部、人民银行1979年、1981年的两次联合通知的规定征收。今后需要提高收费标准的，需报请国家计委、财政部、交通部从严审查批准。对不出厂区的汽车，免收养路费。人防工程费用问题。人防工程建设当前主要搞好已开挖工程的维护，原则上不开新工程。人防公用工程的维护，原则上动员城镇职工参加义务劳动，按城镇职工总数的1%—2%掌握。人防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企业收取代工费或摊派资金。人民银行手续费问题。鉴于人民银行实行企业经营，从1981年起办理结算业务收取手续费。为减轻企业负担，银行可适当降低结算贷款利率。教育经费问题。由于向企业摊派教育经费的问题比较复杂，由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迅速进行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在没有解决以前，学校不得采取各种形式拒收职工子弟入学。对城市维护和建设方面的开支，国家已安排了专项基金，包括国家预算拨款，工商税附加，公用事业附加和八十四个城市（截至1982年10月份已经批准的）试行的从工商利润中计提5%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的资金。属于不合理的摊派，都应整顿、取消。企业占用土地的作价，严格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执行。不得任意加价和索要财物。

11　月

5日—23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业书记会议

会议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农业发展目标和要求；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

发展食品生产和建设商品粮基地问题；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前途和方向；流通渠道问题；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问题。

1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发表讲话。他指出，在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农民在承包以外的生产和经营也显著扩大，全国各地先后涌现出大批有技术专长和经营能力的专业生产者。其中有不少甚至发展为专业户，不少重点户和专业户随着生产的扩大和经营水平的提高，开始提出协作或联合的要求，有的已初步建立起各种形式的联合。靠八亿人搞饭吃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大量的人逐步离开土地，从事各种专业生产，并使种植业也逐步成为专业化的生产，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在联合的问题上，必须因势利导，决不可从上而下勉强规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必须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可以保留个体经营。他们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解决了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流通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随着分业分工和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原来的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必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革。对公社体制的改革，应取慎重态度，不要采取自上而下层层改变、限期完成的办法。许多地方社队都有或大或小的集体资产，在研究和进行体制改革时，一定要保护和更好地使用这些资产，决不能受到损失。

11月11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当前农业的几个主要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农业生产责任制要稳定、完善和提高。我们认为，第一，不要硬性规定哪些地方不能搞承包制。第二，要善于寻找不同情况下的承包制形式，予以总结和推广。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推行，组织经济联合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和农民的要求。这种联合，应该是经济的联合，不是行政力量的联合；是计划指导下的联合，不是离开国家计划轨道下的联合。可以说是在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基础上，发展产前产后服务的经济联合。促进农村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要坚持“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

8日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文件的《通知》中指出，一年多来，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前完善经济责任制，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落实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上面。特别要注意抓好大型骨干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工作。现在企业的潜力还很大，通过完善经济责任制，可以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作出更大贡献。工业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其他各个环节之间，密切联系、互为条件。完善经济责任制是各有关部门的共同责任，各部门要面向企业，密切配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为企业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使工业经济责任制逐步完善起来。

《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主要提出：（一）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

责任制。要抓好下列工作：企业要制定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奋斗目标。按照责、权、利相结合，责字当头的原则，逐项分解，层层落实到科室、车间、班组直到个人。切实加强企业的各项基础工作和专业管理工作，坚持按照标准和用数据进行考核。克服奖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真正使奖金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二）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关系。在分配上，一定要做到国家多收，保证国家适当集中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企业和职工所得的增长，要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来实现。实行利润留成办法已经三年，明年大部分企业原定试点办法已经到期。为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83 年要继续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国发〔1981〕159 号文）和国务院批转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发〔1981〕166 号文）规定的利润留成原则和办法。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企业目前实行的利润留成办法、留成比例、包干基数进行一次整顿。凡是不符合国务院规定，违反财政纪律，采取不正当手段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必须加以纠正。利润留成形式，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但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一个单位只能实行一种办法，并且必须保证国家多收。

26 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问题。这次会议提出，(1) 固定资产投资，必须认真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总规模必须控制。另一个是使用方向要得当。(2) 对基本建设规模要严格控制，对更新改造资金的管理则应搞得活些。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更新改造所必需的资金和物资。不允许一般挤重点。但是更新改造必需的财力、物力一定要得到保证。更新改造项目的管理办法要放活一些。一是按行业制定规划。二是划分更新改造投资计划的审批权限，对大的项目，分别由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三是银行要根据国家的规定，负责拨款、监督和检查。(3) 要保证更新改造资金的合理使用。(4) 要研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有效办法。既要有“笼子”使资金使用有一个范围，又不致于搞得过死。

1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在“六五”计划的后 3 年，再增加 200 亿元的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投资。这笔投资，财政和银行分担 80 亿元，其余 120 亿元，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中以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方式解决。从 198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同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办法》规定，除地方财政的农牧业税附加、中小学校的学杂费收入、国营企业的大修理基金、油田维护费和育林基金免予征集外，其它各项预算外资金，一律按当年实际收入数征集 10%，

每年共40亿元，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安排使用。广东、福建两省和部队也要按规定征集。交纳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单位，必须按规定的期限交纳。拒不交纳，当地税务部门和银行有权在其存款户内扣交，该办法自1983年1月1日起执行。具体实施细则由财政部制定。

2日　陈云同志谈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

陈云同志与出席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谈话。在谈话中陈云同志就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提出一些意见。主要内容：为了给后10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是局部服从全局。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

"六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上海老企业多，应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现在一些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的产品。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去阻挡，上海要接受这个挑战。办法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就象"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要让它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也可以跨国跨洲。"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国务院批准调整部分工作人员工资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国家机关、科学文教卫生等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工资的决定》。国务院决定，从1982年10月1日起调整国家机关、科学文教卫生等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工资。这次调资的范围，限于下列单位和人员：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科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及其附属事业单位；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单位；农业、林业、水利、气象、水产、畜牧事业单位；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环境卫生事业单位；中小学和工业、体育系统中1981年未列入调整工资范围的事业单位和人员。列入调整工资范围的单位，对1981年底在册，属于1978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国家正式职工，按照下列办法调整工资。（一）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1960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工资级别相当行政20级及以下的；1966年底以前毕业并参加工作以及1966年毕业生，工

资级别相当行政21级及以下的可以升两级。同期毕业并参加工作的研究生和8年制毕业生，升两级工资，级别比本科生高一级。普通高校专科毕业生，升两级工资，级别比本科生低一级。（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干部，1960年底以前毕业并参加工作，工资级别相当行政22级及以下的；1966年底以前毕业并参加工作以及1966届毕业生，工资级别相当23级及以下的，可以升两级。（三）现任正副处长、正副县长，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工资级别在行政21级及以下的，现任公社正副主任，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工资级别在行政23级及以下，可以升两级。根据"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规定，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负担。1983年，国家用于支付这次调整工资的资金总额为14亿元。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纪要

中央指出，试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纪要》提出当前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 特区要有更多的自主权；(2) 各特区的总体发展规划，由国务院审批；(3) 各特区建设所需要的物资，人民生活必须品，国家尽量给予支持；(4) 各特区本身的进出口贸易，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自主经营；(5) 各特区建设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吸收利用港澳资金、侨资和外资；(6) 特区的各种税收应当实行优惠待遇"(7) 加速制订和完善经济立法。

陕西彩色显像管厂通过国家验收

陕西彩色显像管厂通过国家验收并投产。这是我国第一座生产彩色显像管的工厂。年产14英寸和22英寸彩色显像管96万只。该厂1979年动工，1981年10月建成试生产。主要设备由日本引进。

4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新《宪法》的主要内容有：总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机构。国旗、国徽和首都。

《宪法》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十条，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第十五条，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宪法》为我国收回香港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法律规定。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报告》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一) 宪法修改草案规定，土地所有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归农产长期使用。(二)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通过行政管理，对个体经济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三) 国营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四)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协调发展。

国务院决定改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为改变财权集中，统得过死的状况，1980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取得显著效果。同时也需要加以改进。《通知》提出 5 个方面的改进措施：(1) 从 1983 年起，除广东、福建两省外，对其他省、自治区一律实行收入按固定资产比例总额分成的包干办法。(2) 将中央向地方的借款改为调减地方支出包干基数。从 1983 年起中央不再向地方借款。(3) 从 1983 年起，将卷烟、酒两种产品的工商税划为中央财政收入。对每年烟酒税收增长部分，实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成。(4) 凡是中央投资兴建的大中型企业的收入，应归中央财政收入（可以按规定留给地方一定的比例分成，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中央与地方共同投资兴建的大中型企业的收入，按投资比例分成。(5) 改进县办工业企业亏损负担办法。从 1983 年起，将亏损企业的负担比例改为同盈利企业的留成比例一致，亦由县财政承担一半，以利于整顿县办企业。

10 日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第六个五年计划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代表国务院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认为，国务院制定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是实现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个宏大目标的重要步骤，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行动纲领，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计划。会议批准赵紫阳总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报告》，和根据这计划制定的 198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于计划执行中的具体问题，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调整解决。

“六五”计划是继“一五”计划之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计划。“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六五”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是；

一、社会总产品。1985 年，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 5 部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达到 10300 亿元（1980 年不变价），比 1980 年增加 1800 亿元，平均每年

增长4%。其中：农业总产值2660亿元，增长21.7%，平均每年增长4%。工业总产值6050亿元，增长21.7%，平均每年增长4%。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产值2980亿元，增长27.7%，平均每年增长5%。重工业产值3070亿元，增长16.3%，平均每年增长3%。

主要产品指标：全国粮食产量计划达到36000万吨，增长12.3%；棉花360万吨，增长33%；纱359万吨，增长22.8%；食糖430万吨，增长67.3%；原煤7亿吨，增长12.9%；发电量3620亿度，增长20；4%；钢3900万吨，增长5.1%。

二、国民收入。1985年，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4450亿元，比1980年增加78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1985年消费基金总额3250亿元，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71%。积累基金总额1340亿元，积累率为29%。

三、财政收支。198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1274亿元，比1980年增加18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3%。5年合计国家财政收入达到5836亿元。其中国内收入5691亿元，国外借款收入262亿元。国内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生产额的比重，5年平均为27.8%。5年合计，财政总支出6098亿元，其中国内支出5836亿元，国外借款安排的基建支出262亿元。

四、信贷。“六五”期间，信贷资金来源增加1925亿元，信贷资金运用增加2170亿元。根据实际需要，增发一部分货币。

五、固定资产投资。5年内，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600亿元，其中基建投资2300亿元，更新改造投资1300亿元。

六、科技攻关项目。国家主要抓8个方面、38个项目，100个课题。1985年，普通高校的招生数从1980年的28万人增加到40万人。在校生由1980年的114.4万人增加到130万人。5年内大学毕业生共150万人。参加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学习的学员，1985年达到150万人。5年内毕业研究生45000人。5年内派出留学生15000人，主要是研究生，届时学成回国11000人。

七、人口自然增长率。1985年控制在13%。以内。城镇新安排就业人数，5年内累计2900万人。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4.9%。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1%。全国城镇住宅5年建成3.1亿平米。农村新建住宅25亿平米。

赵紫阳总理在报告中提出实现“六五”计划的主要措施，核心是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7日　国务院批准制定“七五”计划和1991年到2000年设想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制订长远规划工作安排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为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确定的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在落实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同时，抓紧制订第七个五年计划和1991年至2000年设想。国家计委在《报告》中就制定长远规划工作的安排提出以下意见。（一）规划的指导思想：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积极改革计划体制；统筹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建设的

发展；切实保证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学三个重点更好的发展，以重点带动全局；努力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二）“七五”计划和后十年设想拟包括4个部分：（1）综合规划。“七五”计划细一点，包括科技进步、生产发展、建设规模、重大项目、财政信贷、人才培养、人民生活，以及人口、商业外贸、劳动工资、文教卫生等计划。后十年设想可粗一些，先由国家计委作初步预测，作为各部门、各地区制订规划的依据。（2）专项规划。主要有：农业规划、能源规划、交通运输规划、科技规划、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规划、机械工业技术改造规划、国防军工和战略动员规划。（3）行业规划。国务院工交、财贸、文教各部要制订本行业的发展规划。（4）区域规划。包括经济区域和省、市、自治区规划。（三）规划方法。在计划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几点：加强调查研究，对重大问题要分别组织科研和统计部门进行分析研究；组织重大骨干项目的建设前期工作；组织科学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出几种方案，分析利弊得失，选择最优方案；搞好综合平衡；努力利用经济杠杆。（四）工作安排。1983年国家计委提出“七五”计划和后十年的预测。有关部门和地区提出专项、行业规划、地区规划的初步意见。年底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七五”计划的控制数字和后十年的初步设想。1984年上半年，各部门、各地区正式编制提出“七五”计划草案。1984年底争取上报国务院，并经党中央审议后，提请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批准。

22日　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两个规划办公室

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搞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通过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把条条块块协调起来，形成合理的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两个规划办公室。规划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从经济的全局出发，制定经济区和基地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协调经济区和基地内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和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区、基地同全国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相结合。规划办公室应首先从规划做起。通过规划，打破部门和地区的框框，促进地区的联合、企业的联合，真正按经济规律办事。统一规划，分别列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以便同国家计划更好地衔接。

24日　国务院发布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补充规定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补充规定》。《规定》指出，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5项措施：（1）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包括国家预算拨款、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都必须由国家计委和省、市、自治区计委进行综合平衡，统一纳人国家计划。（2）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家计委审批；小型基本建设项目，一律由省、市、自治区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不经过国家计委和省、市、自治区计委综合平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确定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除国家规定企业有权自行安排的以外，由各级计委会同各级经委按照规定权限审批。在国家计划外追加大中型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必须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3）所有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4）所有确定的建设项目，一律实行“五定”，即定建设规模、定投资总额、定工期、定投资效果、定外部协作条件，并且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5）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

由建设银行统一管起来，按计划监督使用。

为切实贯彻执行上述规定，国务院又作出以下几项具体补充规定：(1) 坚持计划的严肃性，严格按照计划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 各地区、各部门自筹的投资的来源必须正当，超过批准自筹投资指标的，按照超过额加收30%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3) 各级银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及相应的财政拨款计划和信贷计划进行拨款和发放各种投资贷款。(4) 国家重点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和物资要切实保证，使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按计划建成。

27日　我国第一座10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建成投产

我国第一座10万吨级宁波港北仑矿石中转码头全部建成投产并通过验收。北仑码头位于浙江镇海县，是上海宝钢的配套工程，设计年吞吐能力为2000万吨。

29日　财政部修改增值税暂行办法

财政部发布经过修订的《增值税暂行办法》，同时发出《关于检发〈增值税暂行办法〉贯彻执行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进一步贯彻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有利于工业改组，有利于稳定国家税收收入，我部曾将机器机械、农业机具和几项日用机械产品在工业环节交纳的工商税，改征增值税，由各地试行。现根据试行经验，对原办法作适当修改，并自1983年1月1日起对生产机器机械、农业机具（以上包括零配件)、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的企业试行增值税。

《暂行办法》规定，凡从事生产机器机械、农业机具、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的企业和单位是增值税的纳税人。应纳增值税的产品的税率为：农业机具及其零配件6%；机器机械及其零配件10%；缝纫机12%；自行车16%；电风扇25%。兼产不同税率的产品应分别计算纳税。

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调整化学纤维织品和棉织品价格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提高棉纺织品价格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国现行化学纤维织品同棉纺织品的价格比例不合理。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偏高，同购买力水平很不适应。这个问题，随着化纤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尖锐。当前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市场供应明显好转。物价基本稳定，为有计划调整不合理的商品价格，提供了有利条件。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批准国家物价局《关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提高棉纺织品价格的报告》。

国家物价局在《报告》中提出调整价格方案，涤棉布价格平均每米降低1.2元；棉布价格平均每米提高0.3元。按1982年预计销售量计算，提价总金额与降价总金额基本相等，都是24亿元左右。调整后，棉布与涤棉布价格比较合理，有利于打开化纤产品销路，发展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减少财政补贴。在调整纺织品价格的同时，准备在全国统一降低手表、闹钟、彩色电视机、布胶鞋、照相胶卷、电风扇的零售价格，预计降价金额3亿元。属于地方管理的洗衣机、电冰箱、新牌自行车等的价格，有条件的也应适当降价。这样从全国来说，提价金额约24亿元，降价金额27亿元。

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调整和改革，取得很大成就。

（一）农业生产大丰收。农业总值达到2785亿元（当年价），比上年增长11.1%（计划规定增长4%），超出7.1个百分点。在播种面积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达到7090亿斤，比上年增产590亿斤，增长8.9%。棉花在连续两年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又比上年增产1262万担，增长21.3%，总产量达到7197万担。油料总产量达到23635万担，比上年增长15.8%。

（二）工业生产全面增长。工业总产值达到5506亿元，比上年增长7.7%，超过计划规定增长4%的要求。100种主要工业品，有91种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轻工业由于纺织品的限制和不适应市场的新变化，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4.1%，放慢为5.7%，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7%的要求。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等因素，改变了前几年停滞下降的局面，比上年增长9.9%，超过计划规定增长1%的要求。原煤产量达到6.66亿吨，比上年增长7.1%（其中统配矿产量达到3.5亿吨，增长4.4%）。发电量3277亿度，增长5.9%。机械工业增长较快，产值达到1225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在重工业产值增加的247亿元中，机械工业占58.7%。

（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了扩大，一批大中型建设项目和更新改造项目建成投产。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84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555亿元，更新改造投资及其它措施投资290亿元），比上年增加177.8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加112.6亿元。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116个，比上年增加37个，投产率提高到14.2%。建成投资额在5万元以上的更新改造及其它投资项目4.8万个，比上年增加1.3万个。

（四）市场商品供应比较丰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570亿元，比上年增加220亿元，增长9.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3%）。社会购买力同可供商品货源基本平衡。

（五）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全国进出口总额772亿元，比上年增长5%，剔除价格和汇率变动因素，实际增长3.4%。

（六）人民生活继续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5.1%，其中农民提高7.1%，城镇居民提高0.9%。

这一年，国民经济在前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猛，突破国家计划。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计划超出110亿元。其中，地方、部门和企业自筹基本建设投资超过计划52亿元，国内银行贷款超过计划37亿元。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偏大，投资使用分散，出现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一般建设项目挤重点建设项目的现象。特别是能源、交通建设，由于资金、材料和施工力量不足而受到影响。更新改造投资超过计划40亿元，有相当部分搞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建设。(2)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偏大，重工业生产回升较快，使稍微缓和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重又紧张起来，运输能力更显不足。(3)许多单位仍然存在着片面追求产值的现象，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经济效益差的状况还没有明显改善，许多经济效益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其中，国营工业企业成本，计划降低2%到3%，实际没有降下来。国营工业企业上缴利润，计划增长5.2%，实际维持上年水平。由于经济效益差，财力分散，虽然生产增长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还很脆弱。

1983 年

1　月

2 日　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草案）

《草案》提出：(1) 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拟定农业发展规划。(2) 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将不宜种粮的土地还林还牧还渔。允许农民对完成交售任务后的剩余农产品进行加工销售，增加农民收入。(3) 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凡是群众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地方，都应当积极支持。(4) 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合作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按劳分配方式及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保持各自的特点。(5) 人民公社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二是实行政社分设。(6) 不允许剥削制度存在。允许资金技术、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和运输，应当允许。大中型拖拉机和汽车，原则上也不必禁止私人购置。(7) 调整购销政策，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要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广辟流通渠道。第一，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农民完成统派任务后，允许多渠道经营。第二，对某些实行统派购商品，一般不要全额收购。凡是确定收购基数的，几年不变，给生产者留有一定的产品处理权。逐步推行购销合同制。第三，发展合作商业。时已有的合作商业组织，进行整顿，存利去弊，继续发展。第四，发展农村个体商业和服务业，给予必要扶持。允许农民进行长途贩运，依法纳税。第五，国营商业要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允许集体和个体商业从批发站进货。(8) 继续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建立与健全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体系和农村建设人才的教育体系。(9) 要广辟资金来源。除重大建设项目由国家投资外，小型农田基本建设和服务设施的投资，主要依靠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劳动积累。(10) 对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要放宽政策，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有效利用国家财政扶持，力争尽快改变贫困面貌。

5 日　国务院研究财经问题

国务院第六次常务会议在听取了关于召开全国工交会议和财政工作的汇报后提出：(1) 工业、商业要加快改革步伐。方针是，第一要坚决改；第二要经过试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国营工业企业，除极少数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办法外，1983 年要普遍推行利改税。税后利润节余很多的，再采取各式各样的承包办法。(2) 要拿出全面改革工资制度的方案。(3) 必须控制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4) 流动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供应和管理。人民银行的权力不能分散，必须在国家

统一计划和领导下，指导生产、引导建设。

7日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办法》规定：（1）外资金融机构如确有需要，可申请在中国北京和经济特区设立常驻代表机构，也可申请在中国其他指定城市设立派出机构。（2）常驻代表和派出机构的有效期为3年。如要延长，由其常驻代表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延长驻在期申请书。经审核批准后，可顺延3年。延期次数不限。（3）外资金融机构的常驻代表机构及其派出机构的工作范围是；进行工作洽谈、联络、咨询、服务等非直接盈利的工作。不得从事任何直接盈利的业务活动。设在经济特区的常驻代表机构，只能在该经济特区范围内进行上述允许从事的非盈利活动。

11日　国务院提出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时要处理好支援同互利的关系

国务院批转《关于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工作座谈会纪要》。国务院在批转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民委共同负责，并由国家经委牵头。

《纪要》的主要内容：（1）自1979年党中央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3年来这项工作已经逐步开展起来。据受援省、区的不完全统计，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项目有1178项，已完成381项，正在进行663项。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2）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处理好支援同互利的关系。（3）建议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给予松动，适当放宽某些经济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国家统配产品和部管产品，要适当放宽。羊毛和有色金属，在确定上调任务时给予适当照顾；平板玻璃，除继续留给企业3%外，再留2%给所在省、区支配。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联合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可使用一部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银行贷款。

12日　邓小平谈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约见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根据最近的统计，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左右，大大超过原定的增长4%的计划。前两年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1982年是头一次出现。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现在不是说要改变原定的“六五”计划。长期计划留的余地应该大一些，年度计划可以打得积极一点，当然也要留有余地，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总之，制定计划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

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

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每人平均每年总要吃四五百斤粮食，还要有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做到粮食基本过关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标。

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对部分统配煤矿试行超产煤炭加价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发出《关于部分统配煤矿试行超产煤炭加价的通知》。《通知》指出：(1) 超产加价煤的考核以矿务局为计算单位。其计算方法是1980年底及以前投产的矿井以1980年末核定的能力为基础，年度原煤产量超过核定能力部分为超产煤。“六五”期间投产的新井和扩建井，以新增生产能力为基础，年度原煤产量超过规定的利用率部分为超产煤。(2) 1982年实际产量超过核定能力的部分，可在现行价格基础上加价25%；比1982年实际产量增产部分，可在现行价格基础上加价50%。(3) 超产加价煤款由用户负担。(4) 收入全部留给企业，大部分用于矿山技术改造，小部分用于改善职工集体生活福利，但不得用于发放奖金。(5) 按规定缴纳工商税。税后收入与企业盈亏不挂钩。单设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17日　我国首台质子直线加速器建成

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质子直线加速器，最近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成，首次引出能量为10兆电子伏，脉冲流强达到14毫安。

18日　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试点

江苏省根据市管县的体制，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除南京市以外，全省共设立了苏州、镇江、南通、徐州、扬州、盐城、淮阴等7个市，管理辖区内的各县。

同年2月24日，广东省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珠江三角洲和粤北地区将按照经济合理原则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其它地区将先实行地市合并。8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浙江省又有三个地区行政公署撤销，实行市管县体制。三个地区行政公署是宁波、绍兴和嘉兴。

辽宁省大连市最早在1969年实行市管县体制。

22日　国家计委提出改进和加强计划管理的意见

国家计秀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计划管理的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1) 加强计划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国家计委成立计划经济研究中心，开展对国民经济战略、经济效益、技术经济政策、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主要比例关系、生产力布局、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管理体制和方法等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切

实可行的建议。(2) 完善计划体系，搞好长期规划。实行长、中、短期计划相结合，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全面规划和专项规划相结合。1983 年要把计划的重点转向编制“七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 2000 年的长远规划。(3) 把科技计划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更紧密的结合起来。要编制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计划，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计划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等计划。各部门、各地区制定经济增长指标，要计算依靠科技进步增长的比例（计算方法另行规定）。(4) 试编 1983 年综合财政信贷计划。(5) 试编 1983 年全国煤炭、钢材、木材、水泥等重要产品的综合物资计划。(6) 编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计划。(7) 试编国际收支计划。(8) 编制地区协作计划。从 1983 年起，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先编制煤炭的地区协作计划，以后再逐步编制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的地区协作计划。并编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协作计划。(9) 制定建设前期工作计划，准备一批重点建设的预备项目。(10) 逐步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11) 进一步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应积极利用价格、税收、信贷、工资、奖励、财政补贴等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12) 实行产品归口管理，搞好行业规划。(13) 建立和完善计划的综合指标体系。(14) 改进经济效益指标。

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农民完成征购任务后多渠道经营粮食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业部《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一位的重要物资，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坚持统购统销政策；坚持“三兼顾”和以丰补歉的原则。对农民完成征购、超购任务以后的余粮，允许多渠道经营。粮食部门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撤销原来关于粮食议购议销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的规定。以粮食为原料的工商行业，在国家计划供应之外，可以自行采购部分粮食加工出售。国营粮食商业是粮食多渠道经营中的主渠道，供销社经营议价粮，可以对外运销。粮食议购议销价格，应随行就市，依质论价。议购价不应低于收购价。

26 日　我国信用社将恢复集体所有制金融组织的性质

为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从 1983 年起将进行改革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广。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明确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金融组织的性质，逐步恢复它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要以支持农业生产为主，支持承包户、专业户、重点户为主，支持解决流动资金需要为主；信用社的信贷业务，在用途、利率和作法上，可以和银行不一样，信用社贷款的用途可以比银行广泛，办理方式可以比银行灵活，利率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试点单位对社员过去的股金要逐户清理核对，换发新的股金证，落实股权，补发历年拖欠的股金红利，根据入股自愿的原则，积极扩大股金，增加民办因素，改变“官办”现状。

27 日　国务院批准水电部实行以煤代油资金包干办法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对水电部实行以煤代油资金包干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从 1981 年起，建立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将压缩的油出口，换回的钱用于发

展能源及交通事业。"六五"期间计划压油940万吨，安排用于发展能源及交通基本建设的资金为65亿元。目前全国烧油的量仍很大，1982年烧油3700多万吨，其中发电烧油占40%以上。水电部是压油重点户，为调动压缩烧油的积极性，拟对水电部采取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包干使用办法，压油越多，用于电力建设的资金也越多。把利益和责任挂起钩来，争取多压油，早压油。

31日 国务院明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外经贸部在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的分工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外经贸部关于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分工的意见》。《意见》规定：

1. 关于进出口计划和国际收支计划的制定及其执行。(1) 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按国务院统一部署，编制进出口贸易计划和国际收支计划，报送国家计委、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和人民银行分别负责汇总，提出全国进出口贸易计划和国际收支计划建议草案，由国家计委商同国家经委综合平衡后，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报国务院批准下达。(2) 进出口贸易计划需要调整时，有关出口总额、收购总额和主要商品的调整，由经贸部商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进行。进口计划的调整，由国家计委分别同进口商品主管部及国家经委、经贸部、财政部商定。国际收支计划的调整和重大的外汇调度，由国家计委商同人民银行、经贸部、财政部并商中国银行后决定。

2. 关于利用外资计划的制定及其执行。(1) 国家计委提出利用外资的规模、使用方向和限额以上项目，做好方案论证。(2) 财政部应逐步建立健全利用外资的财务、会计和债务报告制度，加强管理和监督。(3) 利用外资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办法。由经贸部汇总，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综合平衡、统一审定后，分别纳入各级国民经济计划和各级财政预算。(4) 利用国外贷款或采取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方式进行建设的限额以上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均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经贸部、财政部、中国银行及有关部委审批。其中，投资总额在1亿元以上的项目，国家计委组织初审后报请国务院审批。(5) 利用外资的对外谈判、签约、审批协议和合同章程，采购设备器材及国际招标等工作，除国务院批准由别的部门归口管理外，均由经贸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地方进行，银行及财政部参加。(6) 一切利用外资的项目，在安排外资的同时必须相应落实人民币配套资金。经贸部负责汇总利用外资的统计报表，并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报送有关统计报表及执行情况，抄送中国银行。

3. 关于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计划。(1) 由外经贸部汇总，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外经贸部等有关部门审定。(2) 使用国家外汇、出口信贷和留存外汇的限额以上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以国家计委为主，会同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外经贸部、财政部进行审批。(3) 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技术设备的对外工作，包括询价、技术与商务的谈判、合同审批等，由经贸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和地方进行。谈判结果如与原批准方案有较大出入时，应商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复审后再确定可否对外签约。

4. 关于对我援助计划和接受外援计划。(1) 外经贸部归口管理，国家计委商同经

贸部和财政部确定中期和年度的援外总金额。(2) 关于对我国的无偿援助，由外经贸部统一归口管理。(3)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向国外投资，由外经贸部归口管理。

2 月

1日 国务院确定抓好97个大企业

为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要着重抓好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生产潜力大的大企业的要求，国家经委同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工交各部认真研究，反复协商后确定，将着重抓好包括鞍钢、大庆油田、上海自行车工业公司在内的97个大企业。它们中有工业企业88个，交通运输企业8个，建筑施工企业1个。

2日 国务院组织各部门编制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全国编制长远科技发展规划动员大会，动员组织各部门和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专家为编制国家长远科技发展规划献计献策。这次会议是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邀请了10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参加。

大会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方毅主持。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平和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东宛，分别在会上报告了编制规划工作的有关问题。宋平就制订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4点指导思想：(1) 要紧密围绕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加强生产技术研究，把重大建设项目、行业技术改造和地区发展规划中提出的科学技术任务，作为主要内容列入规划；(2)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技术发展方向、任务和重大技术政策；(3) 在行业和地区全面规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办成几件事；(4) 各部门和各有关方面的专家要大力协作。赵东宛就规划工作的具体部署问题作了说明。

9日 国务院批准建立50个商品粮基地县

国务院批准试行国家计委《关于对商品粮基地建设进行改革试点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目前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粮食包干的情况，实行以县为单位，联合投资、钱粮挂钩、承包建设的责任制办法，联合建设50个商品粮基地县。

5日 国务院发布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

国务院发布《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1) 城乡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它有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城乡经济，补充国营商业不足的积极作用。城乡集市贸易的管理，应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坚持“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城乡集市贸易的主管部门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2) 农副产品在完成交售任务和履行合同义务后，除中央或省、市、自治区规定不许上市的以外，都允许上市。国营工业企业的产品，凡国家允许上市自销的部分，可以在农村集市和城市指定的市场出售。(3) 国营商业、供销社和其他合作商业及个体有证商贩可按照批准的范围，在农村集市和城市指定的市场经营购销业务。机关、

团体、部队、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可到集市采购农副产品。价格可以有升有降。

6日　国家经委提出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政策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全国技术改造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报告》主要内容：(1) 初步确定了1983年技术改造计划的资金规模。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择优安排了第一批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项目。这次商定的项目有2个特点：一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的投入占一半以上，其中提高产品质量的占29.7%，增加品种的占23%；二是大部分项目采取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国家补助拨款相结合的方式。自有资金占20%，银行贷款占42.5%。(2) 讨论研究了鼓励企业技术进步的一些政策措施。第一，关于合理使用折旧基金搞好技术改造问题。为合理使用企业的折旧基金，必须有经过批准的技术改造规划，才能提取用于技术改造。银行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第二，关于银行贷款问题。要适当调整信贷政策：贷款要与企业、地方自筹资金或国家拨款结合使用；贷款利率，节能、交通买船等专项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其他中短期设备贷款实行浮动利率；还款期限，经批准可适当延长，不超过5年；1983年要从集中的折旧基金中拿出4亿元用于技术开发，同时增加4亿元低息贷款。第三，关于提高折旧率问题。先从上海市和国务院批准的机械工业首批试行企业做起。1983年开始平均每年提高折旧率1%。第四，建议国家物资局根据会议确定的分地区的国家拨款和轻纺、节能专项贷款的资金额度，给予“三材”补助，纳入国家分配计划。第五，加强技术改造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11日　国务院批准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规定》提出：(1) 凡属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和国家统购统销（包括统配）计划收购的工业品，一切国营商业企业和供销社都必须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国家计划。纳入国家计划的品种，应当逐步减少，扩大议购议销的范围。完成国家计划后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允许国营、集体、个体商业经营。(2) 合理设置批发机构。凡是城乡都需要的农副产品，优先供应城市。凡是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3) 加快农村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步伐。恢复基层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基层社要积极扩大农民入股。县联社和基层社分别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4) 建立商业企业承包责任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推行以承包为中心的经营责任制。(5) 逐步调整部分商品的价格政策。国家统购、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坚持国家牌价；超购部分，实行浮动价格；完成任务后的剩余部分，由购销双方协商定价。其余农副产品，随行就市。国营商业企业要实行“利改税”，基层社仍按现行税收办法不变。

22日　劳动人事部要求试行劳动合同制

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通知》指出，劳动合同制的基本特征是用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义务和权利。实行责任、权利相结合。当前要在新招工人中试行，一个时期以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制度作为过渡。最终达到所有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

23日　国务院要求对建设征用土地进行严格管理

国务院颁发《关于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的通知》。《通知》提出对不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规定，敲国家竹杠，影响国家建设项目进行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以法律制裁。

《通知》规定，所有征地和被征地单位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对于违犯《条例》，坚持过高要求的，要进行批评。对挪用或占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侵占招工、转户指标的，要责令退赔、退回，情节严重的，要给以必要的处分。对于那种借征用土地之机，煽动群众闹事，敲诈勒索，阻碍国家建设者，当地人民政府要给以法律制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社队的干部和群众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妨碍和阻挠。征用耕地（包括菜地）的补偿标准，为该耕地年产值的3至6倍，年产值按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量和国家规定的价格计算。

28日　国务院批准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报送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国务院认为，国营企业利改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改革的方向。利改税的基本原则：必须遵照中央关于改革的精神，既要有利于促进企业建立与健全经营责任制，进一步搞活经济，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又要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该《办法》规定：(1) 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包括金融保险机构）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2) 企业纳税后的利润，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一部分上缴国家。(3) 凡有盈利的国营小企业，比照集体企业，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4) 按规定缴纳固定资金占用费，不再缴纳流动资金占用费。缴税缴费后实行承包制。(5) 所得税由税务机关管理，税后利润由财政部门管理。(6) 实行利改税以后，企业留用的利润应建立新产品试制基金、发展生产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7)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仍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上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国务院讨论钢铁问题

会议提出：(1) 到本世纪末实行钢铁产量翻番的办法：一是进口部分钢铁，包括买旧船拆钢铁；二是从矿山搞起；三是靠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增加炼钢能力。(2) 冶金工业应根据机械工业发展的需求，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3) 矿山劳动制度应当改革。可以把小矿山包给农民去开，国家负责制定规划，派技术人员指导。大矿山也可以由农民包工，或者招收农民合同工。矿山工资、奖金不封顶。可以试行减人不减工资。(4) 原则同意钢铁企业实行能源包干、节约归己的办法。(5) 为加快买旧船拆钢铁的工作进展，成立全国拆船公司，并在上海、天津、广州设立分公司。(6) 除国务院批准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的冶金企业外，其他按利改税的办法办。

3 月

2日 邓小平谈地区经济协作

邓小平视察江苏等地回京后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这次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帮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落到实处。

现在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10年打不起来。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山西两个经济协区，也不要老是试点。老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试点，几年解决不了几个问题，这就太慢了。经济协区有许多思想问题要统一，但现在要开步走。总之，一是要心中有数，现在不是完全有数。一是现在议论得多，行动不快。

3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基本建设项目实行包干经济责任制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出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包干经济责任制试行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实行基建项目包干经济责任制，是基本建设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请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一部分项目进行试点，认真做好包干的管理工作。制定或修订各种技术标准、规范、经济定额，真正把包干经济责任制落到实处，提高投资效益，推动整个基本建设管理的改革。《试行办法》规定：(1) 包干单位有权在年度计划范围内对资金的使用和项目的进度进行统筹安排和必要的调剂。超过年度计划时，应提前按计划管理权限上报批准。(2) 包干形式。包投资、包工期、包质量、包主要材料用量、包形成综合生产能力。(3) 建设单位按上级批准的概算节余的资金实行“五五”分成，即，上交国家50%，企业留成50%。企业留成部分一般按6:2:2的比例分别用于企业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分成收入。(4) 包干单位要把包干的经济利益和职工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可采取不同形式把任务包干到班组、个人。职工工资实行多劳多得。职工个人超额劳动所得工资收入不封顶。但包干单位不得超过包干工程的人工费用总额。

8日 积极发展城乡集体和个体零售商业服务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发展城乡零售商业、服务业的指示》。《指示》要求：(一) 把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零售商业、服务业作为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服务业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开辟多种流通渠道和服务的渠道。(二) 发展集体和个体零售商业、服务业，当前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1) 要搞好网点建设。本着“经济适用、布局合理、行业配套、方便群众”的原则，重点放在网点不足的地方，缺什么补什么。(2) 疏通货源渠道。集体和个体零售商业的货源可以从

国营公司购进，可以从工业自销产品中选购，也可以从外地进货，自购自销。(3) 在价格管理上，要在国家物价政策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凡从国营商业进货的工业品，执行国家牌价；自行采购部分，按规定的作价办法自行订价出售。(4)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征税，不搞统负盈亏。(三) 调整和改革国营零售商业、服务业的管理体制。坚决有秩序地在零售商业、服务业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对大、中型店，当前可以实行征税和利润递增包干上缴相结合的办法，也可以参照有关规定，实行利改税。对于二三十人以下的小店，可以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国家征税、自负盈亏”。

国务院成立物价小组

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国务院物价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为加强对物价工作的统筹规划，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的改革物价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调整不利于发展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价格结构，决定成立国务院物价小组。由国务委员张劲夫任组长，宋邵文任副组长。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商业部、财政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物价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物价小组对国务院负责。物价小组的主要任务：(1) 研究物价改革的长期规划；(2) 提出生产和流通部门价格改革、调整的建议；(3) 组织协商价格调整方案的执行。

11 日　国家经委等六部门对定期公布主要经济效果指标作出规定

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建设部、商业部、粮食部六部门联合发出《定期公布主要经济效果指标的暂行规定》指出，自 1982 年对工交部门实行按季考察，公布主要经济效果指标以来，取得较好的效果。1983 年除继续公布工交部门的主要经济效果指标外，对国务院各部门直属企业和各省、市、自治区建工系统所属施工企业，商业部部企业和各省、市、自治区国营商业、粮食企业、供销社，也要进行主要经济效果指标完成情况的考察和公布。请各地区、各部门相应的逐步建立起计划目标管理和经济活动分析制度。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有：建筑安装工作量及增长率；竣工工程价值及增长率；竣工率及增长率；优良品率及增长率；实现利润和上缴利润及增长率；百元建筑安装工作量占用定额流动资金及降低率；资金利润率及增长率；工程成本降低额及降低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千名职工因工死亡率及降低率。

商业供销社主要有：农副产品、工业品收购额及增长率；商品纯销售额外负担及增长率；销售百元商品开支的费用及降低率；全部企业利润总额及增长率；企业流动资金利税率及增长率；全部企业亏损额及降低率。

粮食部门主要有：粮油总经营量及增长率；企业亏损额及降低率；经营万斤粮油开支的费用及降低率；销售百元商品开支的费用及降低率；国库拨补亏损额及降低率。

15 日　国家计委与国家经委明确在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工作方面的分工

国家计委、国家经秀发出《关于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工作的分工意见》。《意见》对技术发行的程序、方法作出具体规定。(一) 计划程序。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提出技术改造计划资金总规模、使用方向和重点。由国家经委组织各部门、各地区作出安

排，经国家经委汇总，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纳入国家计划。具体项目由国家经委下达。中长期规划由国家计委为主组织编制。近期计划和实施方案以国家经委为主组织各部门、各地区制订。（二）项目管理。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必须编制设计计划任务书，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审批。限额以下技术改造项目，编制不同要求的项目建议书（附可行性研究报告），按分级管理的权限审批，然后列入计划。500万元以上项目报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备案。凡全部或部分用国家拨款、集中的折旧基金安排的项目限额以下的项目，由国家经委负责下达。使用人民银行轻纺、机械、节能等专项贷款的技术发行项目，由各省、市、自治区在国家经委、人民银行分配的贷款额度内负责审定，其中轻工100万元、纺织200万元以上项目和机械、节能项目，由国家经委和国务院主管部门联合审批下达。（三）使用国家外汇的限额以上的技术引进项目（限额按技术改造项目的规定，即总投资为1000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对外经济贸易部等有关部门审批。（四）国家统一掌握的技术开发费用，由国家经委根据国家计委规定的使用方向和重点，负责具体组织和安排。（五）过去有关规定与本文件不一致的，按本规定办理。

16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办好合资企业

国务院同意并批转国家经委、外经贸部《关于进一步办好合资企业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制定规划，有重点地发展合营企业。适当放宽政策。抓紧对外经济立法工作。明确规定合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加强管理，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报告》认为，由于经济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困难不少，进展不快，局面还没有真正打开。要打开新局面，需解决几方面的问题：制定规划，有重点地发展合资企业；适当放宽政策；抓紧对外经济立法工作；明确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加强管理，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7日—29日 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提出可以税前还贷

根据国务院指示，财政部召开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同利改税有关的政策问题，以及有关征收所得税和企业财务处理的几个具体规定，并部署了利改税工作。会议提出：(1) 实行利改税后，全国应当基本维持目前企业的留利水平。对于某些留利过高或者不合理的应适当降低。对原来实行企业基金办法的企业，这次实行利改税核定留利时，可以适当增加一点新产品试制费。(2) 各级商业批发站一律不能搞利润包干或承包制。(3) 工业方面，凡经国务院批准或财政部、经贸委批准实行首钢包干办法的可以继续实行。其他大中型企业要按全国利改税统一办法核实换算后统一执行。其他包干办法一律不再搞。(4) 企业归还专项贷款，可以在征收所得税之前用贷款项目新增利润归还。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自留资金。企业还款时，财政、税务部门要参与审查，贷款没有经济效益，企业和银行要承担风险。

17日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提出要打破交通部门独家经营的局面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的交通运输存在着独家经营、一统天下的做法，影响了整个交通运输的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国营运输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运输形式的原

则。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交通运输搞通、搞活、搞上去，要继续支持各省市建立海洋运输船队，可以航行香港、东南亚和日本。鼓励支持各省、市、自治区多建港口，扩大码头、泊位。长江干线和支线要允许大家跑，各个港口，都要允许各种船舶停靠。扶植集体所有制运输企业。各地交通部门要坚决贯彻关于允许私人买拖拉机、机动船舶和汽车从事运输及其长途贩运的政策。任何通航河流和公路都不要人为割据、一家把持或受行政区限制。有河大家走船，有路大家走车，制止乱收手续费、管理费等作法，允许跨省运输。

21日—4月1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工交会议

为抓好全年生产，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一）在能源方面，要既抓生产，又抓节约。在保证安全生产和均衡生产的前提下，组织运输条件好的地区尽量多增产煤炭；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能源的生产和分配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地方集资兴建小水电、小煤矿，有条件的还可以办小火电；积极推广节能的新经验，加快高耗能设备的更新改造工作。（二）在轻工业方面，要继续坚持“六个优先”的方针，对轻纺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能源、运输和原材料，要按生产计划优先予以保证；对当前短缺的生铁、木材、烧碱、平板玻璃等物资，要想方设法满足轻工业生产的需要。全国要保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大城市的轻纺生产。各省、自治区也要保轻纺工业基础好的重点城市的生产。（三）在重工业方面，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不能盲目超产。改变重工业当前增长过快的情况，根本的还是要坚决控制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各地区要坚决采取措施，尽快抓出成效。（四）在流通方面，要发挥商业对生产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搞好工商衔接和协作，坚决按计划收购，应该保有合理的周转库存，不要不适当地压低；商业部门要通过积极收购、增加销售促进工业生产。

会议期间中央财经小组听取会议汇报，并提出以下意见：（1）严格控制基建规模。方针是，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要控制，重点建设必须加强，技术改造还要放宽。压缩一般的基本建设，压缩计划外自筹基本建设。（2）全国要支援重点建设。必须下大力建设一大批能源、交通以及其他必要的技术先进的大型骨干项目。主要办法是减少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筹基建投资，征收建筑税的办法可以研究。（3）改革的步伐要加快。当前城市的改革，工商业的改革，要像农村那样，首先解决吃“大锅饭”问题，但要有计划地进行。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今后主要是把上缴利润改为纳税，而不是利润包干。对税后利润的分配还要照顾到企业的积极性。

22日　我国吸收外资发展经济开端良好

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管理局局长李岚清指出，我国自197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正式批准的合资企业有78个，加上各种类型的合作经营、合作开发项目，总共有六百多个，吸收利用外资17亿美元。此外，我国还同日本、科威特、丹麦、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建立了信贷合作关系。目前，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建设的27个大、中型项目，进展情况都很好。以上这些项目主要有石油、煤炭、铁路、港口、轻工、纺织、食品、机械和电子等。

27日　国务院批准续建宝钢二期工程

国务院批准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第二期工程继续建设，并要求第一期工程在1985年9月建成投产。宝钢是1978年底破土动工的。1980年，因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有关部门适当修改了宝钢建设方案，推迟了第一期工程的投产日期，并决定第二期工程暂缓建设。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全面权衡利弊，为了宝钢建设成龙配套，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决定第二期工程继续建设。

宝钢第二期工程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大型烧结机、高炉、焦炉、连续铸锭机，及轧辊宽度为2050毫米的连续热轧带钢机和2030毫米的连续冷轧带钢机，还有相应的公用辅助配套工程等。目前，宝钢第一期工程已完成将近70%的建筑安装工作量，进口设备已有一半安装完毕。宝钢自备电厂第一台3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经并网发电，开始发挥经济效益，第二台机组正在并网调试。面积为450平方米烧结机的主厂房的框架结构已完成；两座50孔焦炉已砌完了耐火砖。高110多米、容积为4063立方米的一号高炉直指蓝天。炼钢厂两台300吨纯氧顶吹转炉的炉体、初轧厂的两架初轧机和6架连轧机机架，也全部安装就位。外围配套的长江引水工程及其他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28日　国家要求抓紧进行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抓紧进行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水利电力部关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的汇报。国务院认为，南水北调引水工程已酝酿多年，是一项效益大而又没有什么风险的工程。不仅能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且对航运有重要意义。要全面考虑工程的综合效益，特别要联系航运问题一起考虑。如果不需增加太多的投资，通航时间要提前，1985年到1986年要通航到济宁，与新乡到菏泽的铁路水陆联运。这为北煤南运、特别是晋煤直运华东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决定：批准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方案，第一步要通水、通航到济宁；抓紧准备争取今冬开工。同时着手进行第二期工程方案（调水至天津）进行论证，争取今明两年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要分段包干给受益省施工，节余资金归省，超支由省负担，以提高工程效率。将长江口北支（崇明岛北）封堵，不仅有利于解决长江口盐水侵入问题，还可以新淤出大片土地。这项工程由上海负责。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的设计任务书及各个建设项目的设计，水电部、交通部应即着手编报，由国家计委审批。

该项工程完成后，每年可引长江水21亿立方米，使2100万亩农田的灌溉面积供水保证率由50%—90%提高到75%（旱作）和90%—95%（水稻）。京杭大运河的扬州至济宁段可以长年通航。

4　月

1日　国务院用法规形式规范国营工业企业的权利

国务院颁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1）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从事生产经营的

基本单位。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的根本原则。(2) 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在完成计划任务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市场需要，编制自己的生产经营补充计划。(3) 在完成国家订货任务后，有权在国家规定范围内自销产品。有权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制定和议定产品的价格。有出口产品任务的企业，有权按国家规定参加外贸单位与外商的谈判、签订合同、提取外汇分成。有权按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企业基金和利润留成。(4) 企业有权根据国家政策确定本企业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和分配奖金、安排福利。(5) 企业有权在国家规定的招工范围内，择优录用新职工，拒绝接受不符合条件的人员。

说明　已被1988年4月13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代替。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

《纪要》提出，海南的开发建设，必须立足岛内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讲究经济效益，逐步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要给海南行政区以较多的自主权，放宽政策。主要有：某些重要的矿产资源，报经国家批准，可以由海南行政区同外商合作开发；利用外资项目，500万美元以下的，不需要全国、全省平衡生产建设条件，不涉及国家出口配额的授权海南行政区审批；中外合资、合营或外商独资企业的所得税，从获利年度起，第一、第二年免征，第三年起减征，按15%的税率征收。工商统一税在投产后3年内有困难的，授权海南行政区审批减免；利用外资进口建材、机械、原材料和种子种畜免征关税。

6日　**国务院批准编制综合财政信贷计划**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关于编制综合财政信贷计划的报告》。《报告》规定：(1) 综合财政信贷计划，包括国家预算收支计划、国家信贷收支计划和预算资金收支计划。编制综合财政信贷计划的作用：了解和掌握全社会的资金来源；指导各单位自有资金和银行中短期设备贷款的使用方向；统筹规划老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各种资金；检查建设资金是否同建设物资相适应。(2) 为了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金来源与资金使用的全貌，掌握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方向，做好财力和物力的全面平衡，必须把预算外资金纳入综合财政信贷计划，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是加强宏观经济预测和计划指导的重要手段和措施。(3) 加强对预算资金的管理。凡是按照政策、制度规定留给企业的资金，应当继续留给企业。凡是不按国家政策或非法从国家财政挖走的资金，要坚决纠正。今后增设预算资金项目，必须报国务院批准。(4) 在银行体制改革之前，建议指定各级人民银行汇总，编制地区的综合信贷计划。各级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要将本部门的信贷计划及时报送各级计委和人民银行。(5) 要求建立预算外资金统一报告制度。(6) 由国家计委牵头，计划、财政、银行和统计部门分工协作，切实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10日　全国农民购买的拖拉机超过百万台，五百多农户装上电话

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农村社员独户购买和联户购买的大中小型拖拉机已经超过100万台，占全国人民公社系统拖拉机拥有量的1/3左右，比1981年底增加60多万台。我国农村已有500多个农户自费安装了电话，这是近年来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要求安装电话的大多是专业户、重点户。邮电部电信总局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将改变农村电话用户的结构，促进整个农村邮电事业的大发展。

13日　国务院进一步放宽对城镇个体经济的限制

国务院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1) 个体工商业户的经营范围：手工业，可以使用机动工具加工、生产；运输业，可使用机动车船承揽客、货运输。经批准可从事长途贩运、批发销售，但限于完成国家计划后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以及工业品中的三类小商品。收费标准按1982年8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2) 凡有城镇正式户口、有经营能力的，都可以申请从事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请帮手、带学徒，应按《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办理，在城市不准招聘农村户口人员；在集镇可招聘农村户口人员，但不改变其农村户籍，国家不供应口粮。(3) 个体工商户可以在银行开立账户。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依法受到国家保护。

说明　已被1987年8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代替。

14日　国务院采取措施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

国务院颁布《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指出：国家保护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并根据政策和国家计划进行统筹安排，积极鼓励、扶持、帮助其发展。《规定》指出：(1) 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之一。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的重要政策，不是权宜之计。(2)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是由劳动群众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并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各有关部门对待集体所有制单位应同国营单位一样，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在经济上平等对待。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借口平调、挪用、侵吞或私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资财；不得无偿调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力。(3)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国家法律、政策和计划许可的范围内，享有如下各项自主权：灵活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自行支配和使用企业的生产资料和自有资金；采购原材料和销售产品；购置和租赁固定资产；出租或有偿转让闲置多余的固定资产；根据实际需要，经过考核，聘用或录用职工；决定对职工的奖惩、解聘或辞退。(4)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应当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的发展规划、生产经营、人员增减、收益分配、职工奖惩等重大问题，都要经过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不称职的可以撤换。(5)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应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采用适当的工资形式。(6) 在原材料、货源、场地、信贷、价格、税收等问题上，主管业务部门要积极提出有利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意见和政策、措施。对于歧

视、限制、打击、并吞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错误作法和违法行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主管部门应予严肃处理。

国务院批准国营企业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

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关于1983年企业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今年企业调整工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调整工资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同职工个人的劳动成果挂起钩来。这是工资制度的重要改革，是对多年以来调资升级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重大突破，符合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必将成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动力。

劳动人事部的《报告》提出，从1983年起，调整工资必须实行调改结合的方针，把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结合起来，把调整工资同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好坏、同职工个人劳动成果的大小挂起钩来。在国家计划安排的工资增长指标范围内，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使企业的多数职工能够在1983年、1984年增加工资。部分工资偏低、起骨干作用的中年知识分子较多地增加工资。

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一) 速度问题。前10年的工业速度不可能很快，但搞得好，可能达到6%—7%；后10年工业速度有条件搞到8%～9%，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是可以做到的。(二) 重点建设问题。必须在前10年把重点建设抓上去。首先是要把"六五"计划的重大项目安排落实。同时考虑在原定"六五"计划之外，搞一批专项重点工程。(三) 市场问题。一是要控制基建规模的膨胀；二是要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三是要坚决制止重工业挤轻工业的情况；四是要搞好城市各行各业的包干试点，切实保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防止个人收入不适当地过多增长。

国务院批转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国务院发出批转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务院认为，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是在充分酝酿和经过几年试点后确定的一项重大改革。在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利改税是改革的方向，较之其他办法具有更多优越性。实行利改税，对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促进企业完善经营管理责任制，加强财政务管理和财务监督，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目前已经实行的各种形式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如何改过来的问题，财政部提出的几条意见是可行的，请各地区、各部门研究执行。

《试行办法》规定，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均根据实现的利润，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有盈利的国营小企业，按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营业性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和饮食服务公司，缴纳15%的所得税。县以上供销社，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国营企业归还各种专项贷款，经财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可用缴纳所得税之前该贷款新增的利润归还。

此前4月16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出《关于切实抓好利改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加强对利改税工作的领导，建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建立健全报告制度，搞好培训工作，把利改税工作推向深入。

28日　国务院批准加速发展高等教育

国务院批准《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加速改革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增加专科和短线专业的比重；要分层次规定不同的质量要求，同时抓紧重点学校和重点专业的建设；要对今后四五年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使招生人数持续上升。根据上述原则初步测算，1983年到1987年，全日制高等学校年度招生人数由31.5万人，增加到55万人，比1982年增加60.6万人。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要在注重质量的原则下更快的发展。初步设想，在校学生数由1982年的64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237万人。为弥补、解决专科学生较少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现有高等学校，特别是老校的潜力。第二，积极提倡大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中等城市和大企业，举办高等专科学校。这类学校分别由主管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央各部委按规定的办学标准审批。第三，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加强国家急需的专业。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要逐步设立教育电视台，增加财经、政法和应用文科等类专业。

29日　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

财政部作出《关于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暂行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一）国营企业所得税税率，分为比例税和超额累进税率两种。大中型企业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55%；饮食服务行业、营业性宾馆、饭店、招待所，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15%。小型企业、县以下供销社，适用八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一级税率为7%，最高一级税率为55%。（二）军工、邮电、粮食企业、外贸企业、农牧企业和劳改企业，仍按原办法执行。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利改税办法。（三）国营企业归还各种专项贷款时，经财政部门审查同意，可用纳税前该贷款项目新增利润归还。（四）企业税后利润，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上交国家部分可根据企业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递增包干上交、固定比例上交、交纳调节税和定额包干上交办法。（四）实行利改税后，遇有价格调整，税率变动，影响企业利润时，除变化较大并经国务院专案批准，允许调整递增包干上缴基数和递增比例，或固定上缴比例，或调节税税率，或定额包干上缴数以外，一律不作调整。征税时间从1983年1月1日起计算，6月1日起实行。

5　月

5日　国家计委提出试编基建经济效益计划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试编基本建设经济效益计划的通知》。《通知》要求制定全面考核基本建设经济效益指标。（1）考核部门、地区的综合指标。指令性指标有：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新增生产能力交付使用率和大中型建设项目投产率；指导性指标有：平均

建设工期、单位生产能力平均投资、未完成工程资金占用率和达到设计能力的时间。(2) 考核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的专业性指标。工业、民用建筑项目有：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建筑工效和工程成本降低率；矿山建设项目有：井巷工作面平均月进度和单斗挖掘机效率；油田建设项目有：钻井队年平均进尺；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有：基础工程土石方开挖填筑工效和大坝混凝土浇筑工效；交通建设项目有：隧道月平均进度和大中桥梁单位长度造价。

9日　福州市万门程控市话交换系统交付使用

我国首次从日本引进的万门程控市话交换系统在福州市交付使用。这是我国第一个大容量程控电话局。

15日　国务院成立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领导小组

为加速我国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事业的发展，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作好全面规划和组织协调工作，国务院决定成立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副总理万里担任组长，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和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震寰任副组长。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电子工业部、机械工业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部委的领导同志兼任领导小组成员。

同日，国务院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部署、落实"六五"计划后三年电子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产业、集成电路等的发展规划。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会议提出，"六五"期间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技术攻关，进行技术改造，组织工业化大生产和改革体制。会议认为，我国计算机事业长期搞不上去的原因，是管理体制上的分散主义，制定和贯彻全国计算机发展规划的根本出发点是治"散"。今后要在国务院全国计算机和集成电路领导小组的集中领导下，贯彻全国统一的规划，突出重点，择优支持，力争在 90 年代使我国计算机事业达到国际上 80 年代初的水平。要治"散"就要改革现有的部门所有制、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不合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

16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上海外贸自主权

为发挥上海在现代化建设中更大的作用，国务院决定扩大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的管理权限，使上海市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对外贸易、劳务出口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1) 扩大上海利用外资的管理权限。扩权后，上海可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租赁贸易等形式利用外资。必要时，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上直接筹款。(2) 扩大上海引进技术的权限。国家给予上海在谈判、审批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时有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上海工业的技术改造进程。(3) 扩大上海对外贸易的权限。上海口岸出口总值约占全国的 1/5。扩权后，上海许多出口产品可以自行成交，并且根据行业、商品、市场的特点，可以采取工业企业自营出口、工贸联营出口等形式。这有利于与外商直接谈判，加快进出口交易，并且使出口商品更适合国际市场的需要。(4) 进一步发挥上海口岸对内、对外的经济交流枢纽的功能。上海可以运用对外成交、港口运输、掌握情报信息等有利条件，更好地为外地的进出口服务。

28日　世界粮食计划署无偿援助我国六大城市奶类发展项目

世界粮食计划署无偿援助我国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西安六大城市奶类发展项目，已由最近在罗马召开的粮食援助政策及计划委员会第15次会议批准。根据项目的要求，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1984年至1988年五年内，向我国六大城市提供4万吨脱脂奶粉、1.3万吨无水黄油的无偿援助，总价值约6000万美元。这些奶粉和黄油将在六大城市的乳品加工厂调制成液态再制奶在市场上销售。据估计，五年内可加工成再制奶40多万吨，获得销售收入1.9亿元；六个城市的鲜奶供应量，在1982年的基础上，五年内平均每年将增加50%。六大城市的鲜奶生产和供应状况将得到改善。这个项目是1982年1月中国政府为促进六大城市的奶业发展，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出申请的。

6　月

1日　我国尝试用租赁方式引进的十九套地膜专用设备投产

为了扩大地膜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中国租赁有限公司用代筹资金进行租赁的方式，为北京塑料制品厂从日本引进了19套农用地面覆盖薄膜生产专用设备。6月1日在北京塑料制品厂举行了投产剪彩仪式。这个项目从谈判到设备引进、试车投产，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

6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向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1)关于过去五年的回顾。国民经济扭转了重大比例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农业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实现了持续的全面高涨；消费品工业扭转了长期落后的局面，重工业逐步端正服务方向，整个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增长；城乡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和有益的经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2)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关于经济建设：首先要保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相互协调地向前发展。必须大力加强能源、交通等方面的重点建设，积极推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必须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坚决控制人口增长。(3)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国家财力不足，资金严重分散。1979年到1982年，社会总产值增长33.6%，国内财政收入下降了3.3%。国务院认为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第一，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积极扩大财源。国家计划规定的降低生产成本和各种费用的要求，必须落实，切实保证完成。凡是完不成的企业，应按比例扣减利润留成。国家规定的税利上交计划，一切单位必须如数上交。凡是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完不成税利上交任务的单位，原则上不得调整职工工资。第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我们必须兼顾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在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要逐步使人民富起来，企业增加收入，同时也要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在企业新增加的利润中，要通过税收和规定合理的税后利润留交比例的办法，保证国家得大

头。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必须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确保重点建设和其他中央开支的需要。第三，正确确定基本建设总规模，努力保证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大力提高投资效果。（4）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经济体制，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指导。第二，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第三，改革财政体制和工资制度、劳动制度。进一步完善利改税的制度。

198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作《关于 198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 198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指标。（1）主要任务：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稳定经济的成果，克服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各项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向前发展。（2）1983 年计划的基本轮廓：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 4%；工业生产比上年增长 4%，执行中争取增长 5%。其中，轻工业生产增长 4.1%，重工业生产增长 3.9%。固定资产投资 747 亿元，比上年减少 98 亿元。其中基建投资 507 亿元，更新改造投资 240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7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3）为全面完成 1983 年计划，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切实保证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按计划完成。第二，通过继续整顿和调整现有企业，改革经济体制，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第三，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加快轻工业生产的发展。

198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8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财政部长王丙乾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作《关于 1982 年国家决算的报告》。《报告》提出，（1）财政收支。1982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 1123.9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8%；国家财政总支出为 1153.3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7%；财政赤字为 29.34 亿元，比预算赤字略有减少，准备通过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来弥补。1983 年国家预算已经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财政总收入 1232 亿元，总支出 1262 亿元，赤字 30 亿元。目前正在执行中，截至 4 月底，收入完成 326.78 亿元，支出完成 309.81 亿元，收大于支 16.97 亿元。（2）关于 1983 年的财政工作。有关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目前正在抓紧落实。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经过两年试点后，国务院已经决定，从今年 6 月 1 日起全面试行利改税，试行办法及其细则已经下达。这是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上的重大改革，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按照国务院的部署，认真抓好这项改革工作。准备在全国试行一段时间之后，全面总结试行经验，制定正式的利改税条例，报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15 日　国家许可停薪留职

劳动人事部、国家经委联合发出《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企业的富余职工，在企业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停薪留职”。“停薪留职”的时间一般不超两年，在“停薪留职”期间不升级、不享受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企业对职工的“停薪留职”问题，要严格控制，区别对待。《规定》对“停薪留

职”从事有其他收入的劳动或从事个体经营也做了具体规定。

国家改革金银管理制度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条例》主要内容：规定了国家银行在管理金银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保护个人持有合法所得金银，鼓励携带金银入境，限制金银出境；严禁金银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等违法活动。并对金银的回收、加工利用作出具体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加快企业领导班子整顿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关于用改革的精神搞好企业全面整顿的意见》和中央组织部、国家经委《关于坚持标准，加快企业领导班子整顿步伐的意见》企业领导小组的《意见》提出：2000 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必须在 1984 年整顿完，到 1983 年底累计验收合格的要达到 70%。面上的中小企业，分 3 年搞完。

20 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规定更新改造与基本建设的划分标准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更新改造措施与基本建设划分的暂行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更新改造措施是指利用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国家更改措施预算拨款、企业自有资金、国内外技术改造贷款等资金，对现有企、事业单位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包括固定资产更新）以及相应配套的辅助性生产、生活福利设施等工程和有关工作。其目的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升级换代，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治理污染等。在确定更新改造措施时，要掌握两条标准：一是单项工程新增建筑面积不能超过原有面积的 30%；用于土建工程量的资金一般不得超过资金总额的 20%。二是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用于土建工程量的资金不得超过当年更新改造计划资金总规模的 15%—20%。

基本建设是指利用国家预算内基建拨款、自筹资金、国内外基本建设贷款以及其他专项资金进行的，以扩大生产能力（或新增工程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新建、扩建工程及有关工作。

更新改造措施投资与基本建设投资确有必要结合使用的项目，凡是在现有企、事业单位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的列入更新改造措施项目计划。但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或效益）相当同类产品中大中型基建项目的，应列入基本建设计划。

25 日　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并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保证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会议提出：(1) 坚决控制住基本建设总规模。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办事，决不能再突破国家批准的自筹投资计划。银行贷款要控制发放额。国家预算内投资的追加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六五”基建投资总规模不超过 2800 亿元。国家预算的投资两年增加 100 亿元，主要弥补在建的重大项目投资不足。适当新开若干个能源、交通骨干项目。保证“六五”结转到“七五”续建的煤炭在建井规模达到 1.4 亿吨，电站建设规模达到 2500 万千瓦。(2)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六五”期间，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保持在 30% 为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应提高到 28%—30%。在财政收入中还必须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基

本建设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应提高到28%—30%。（3）集中财力物力的具体措施和要求：①利改税要搞下去，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税种。预算外资金的正常渠道保持不变，国家从中征集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3年按10%的比例计征，1984年改按15%的比例计征。对自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改项目的土建部分，除用于能源交通建设的以外，一律征收10%的建筑税。②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基本不动，对极少数收购价格偏高，供过于求的产品，如大豆、中低档烤烟，适当调低收购价格；适当减少国家供应给农民的生产资料价格补贴，逐步实行不赔不赚的原则。③适当进口一些富铁矿，多进口一些废钢铁，尽可能拆一些旧船。④为集中物力保证重点建设，各部门、地方和企业，都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按需生产，接受订货。⑤基本建设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由国家计委负责综合平衡。年度之间基本建设投资必须稳定地增加，增长的幅度不应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重点建设工程要严格责任制度，实行投资包干。凡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由建设银行统一管理，按计划监督使用。

国务院决定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国营企业流动资金

国务院同意并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为了加强流动资金管理，国务院决定：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人民银行有权制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管理企业的国拨流动资金，核定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和计划，考核企业使用流动资金的效益。

人民银行在《报告》中提出，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问题，财政、银行已经酝酿多年。好处是：适应财政、信贷资金渠道变化的新情况，有利于加强资金管理，挖掘资金潜力，促进企业节约使用资金。在银行一家管理流动资金后，要更加注意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使扩大再生产中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安排保持合理的比例。

7　月

2日　国务院确定“六五”计划时期的重大建设项目

国务院确定的“六五”计划期间，投资额在亿元以上的重大建设项目有93个：1. 河北开滦矿区（扩建）；2. 山西古交矿区；3. 山西大同矿区（扩建）；4. 山西潞安矿区（扩建）；5. 山西阳泉矿区（扩建）；6. 山西晋城矿区（扩建）；7. 内蒙古霍林河矿区；8. 内蒙古平庄矿区（扩建）；9. 辽宁铁法矿区（扩建）；10. 山东兖州矿区；11. 河南平顶山矿区（扩建）；12. 安徽淮北矿区（扩建）；13. 安徽淮南矿区（扩建）；14. 黑龙江大庆油田（扩建，其中30万吨乙烯工程新建）；15. 辽宁辽河油田（改建）；16. 河南中原油田（扩建）；17. 华北油田（改建）；18. 山东胜利油田（改建）；19. 新疆油田（改建）；20. 青海油田（改建）；21. 四川油气田（改建）；22. 湖北葛洲坝水电站；23. 青海龙羊峡水电站；24. 陕西安康水电站；25. 贵州乌江渡水电站；26. 云南黄泥河梯级水电站；27. 吉林白山水电站；28. 四川铜街子水电站；29. 红水河天生桥坝索水电站；30. 江西万安水电站；31. 山西神头电厂（二、三期）；32. 河南姚孟电厂；33. 富拉尔

基第二电厂（一、二期）；34. 江苏谏壁电厂（四、五期）；35. 内蒙古元宝山电厂（扩建）；36. 山东肥城石横电厂；37. 安徽淮南平圩电厂；38. 兖石铁路；39. 京秦铁路复线及电气化；40. 京广铁路衡广段复线：41. 南同浦铁路复线；42. 胶济铁路复线；43. 石太铁路电气化；44. 邯长铁路；45. 沪宁铁路复线；46. 皖赣铁路；47. 京包铁路复线及电气化；48. 滨州铁路复线；49. 陇海铁路复线及电气化；50. 浙赣铁路复线；51. 枝柳铁路；52. 津浦铁路复线；53. 南疆铁路（新疆吐鲁番—库尔勒）；54. 青藏铁路（青海哈尔盖—格尔木）；55. 北京铁路枢纽（扩建）；56. 京山铁路部分改线工程；57. 河北秦皇岛港（扩建）；58. 天津港（扩建）；59. 上海港（扩建）；60. 连云港（扩建）；61. 宁波港；62. 石臼港；63. 黄浦港（扩建）；64. 青岛港（扩建）；65. 青藏公路（改建）；66.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67. 首都钢铁公司（扩建）；68. 本溪钢铁公司（扩建）；69.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扩建）；70. 江西铜业公司（扩建）；71. 贵阳贵州铝厂（扩建）；72. 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73. 潞城山西化肥厂；74. 新疆化肥厂；75.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扩建）；76. 辽宁辽阳石油化纤厂；77.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扩建）；78. 天津石油化纤厂；79. 江苏仪征化纤厂一、二分厂；80. 四川长寿维尼纶厂；81. 云南昆明三聚磷酸纳厂；82. 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扩建）；83. 咸阳彩电显象管厂；84. 河北潘家口水库；85. 河南、山东黄河下游治理（改建）；86. 河北黑龙港治理（扩建）；87. 湖南洞庭湖蓄洪、防洪工程（改建）；88. 内蒙古牙克石林区（扩建）；89. 四川雅龙江林区（扩建）；90. 吉林长白山林区（扩建）；91. 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扩建）；92. 云南金沙江林区（扩建）；93. 北京地下铁道工程（扩建）。

3日　国务院中纪委紧急通知制止乱涨价乱摊派

国务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涨生产资料价格和向建设单位乱摊派费用的紧急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1）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钢材、生铁、水泥、木材、煤炭等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不论是计划内生产的还是计划外生产的，或是超产的，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有关单位作出的擅自加价的规定和在这一基础上签订的合同，一律无效，改按国家定价执行。（2）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由负责同志亲自动手，组织所属企业，对今年1月1日以来钢材、生铁、水泥、木材、煤炭等原材料和燃料价格，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凡属超越物价管理权限，擅自提价或变相涨价和加收费用的，非法收入一律没收。其中，30%上缴地方财政，70%以“非法提价没收收入”上缴中央金库。

7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乱涨生产资料价格的若干规定》。

7日　建设银行决定严格控制基建贷款发放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出《关于严格控制贷款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的指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决定，各地建设银行发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一定要严格控制在国家计划之内，贷款突破国家计划的，要追查有关行长的责任。为此采取三项控制银行贷款的措施：（1）凡是由建设银行发放的贷款，不论资金来源如何，都要逐项清查。对不符合规定的，一律停止贷款，进行清理。（2）各级建设银行今年安排的供企业更新改造用的贷

款，凡是超过批准贷款指标的，一律不得发放。(3) 各级建设银行经办的信托投资公司立即停办，将资金并入银行，按正常信贷业务办理，以便加强对信贷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

8日　邓小平谈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

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几个钱。请来之后，应该很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合作，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9日　国务院要求严控基建规模，清理在建项目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清理在建项目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1) 抓紧检查、清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凡是已安排的建设规模超过国家下达的基本建设计划规模的，都必须迅速把超过部分压下来，特别是用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安排的建设规模，必须压缩到国家计划指标以内。(2) 认真清理在建项目。凡是计划外项目(大中型项目以国家下达的计划为准，小型项目以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下达的计划为准)，要一律停下来。1983年计划新开工的项目，凡是不符合基建程序，不具备开工条件的，一律不准开工。(3) 加强财经纪律，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办事。今后决不能再突破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地区突破国家计划的，要追究有关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的责任；部门突破国家计划的，要追究有关部长的责任。银行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控制发放额，超过的要追究主管行长的责任。(4) 更新改造投资规模也要严格控制，各地区、各部门不得突破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要严格执行《关于更新改造措施与基本建设划分的暂行规定》。

13日　国务院对促进科技人员国内流动作出规定

《关于科技人员国内流动的若干规定》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科技人员按照合理的方向流动，即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内地到边远地区；从科技人员富余的部门和单位。到科技力量薄弱而又急需加强的部门。要打破部门、地区界限，合理调配和使用全国的科技力量。有计划地从一些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中抽调一部分科技人员，加强能源、交通、轻工、农业等部门。

22日　国务院提出机械电子工业技术改造主要目标

国务院公布《机械电子工业技术改造试行条例》。《试行条例》提出我国机械、电子工业技术改造规定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1) 加强研究和开发工作，不断改进老产品，发展新产品。(2) 改进工艺，采用新的工艺方法和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3) 适应提高产品水平和采用新工艺的要求，有重点地改造和更新设备，补充关键的生产设备和试验、检测手段。(4) 按照工艺、环境保护和技术安全的要求，调整工作场地，改造必要的厂房设施。(5) 相应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培训技术力量。

《试行条例》要求技术改造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分批进行。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

先选择一批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和出口潜力大的关键性产品，把生产这些产品的一部分工厂、主要协作配套厂和有关研究、设计单位，作为机械、电子工业的首批技术改造单位，抓紧做好工作，以便取得经验，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再在更多的企业进一步铺开。

《试行条例》就选定首批技术改造单位的原则作了如下规定：（1）带基础性的、影响整个机械、电子工业技术水平的产品，如机械基础件、电子元器件、机床、工具、测试设备和关键毛坯件等。（2）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发展的重点产品，如发展农业和轻纺工业、节约和开发能源、加强交通运输、发展薄弱的原材料工业等所需的机械、电子产品。（3）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关系密切，有利于满足市场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日用机械、电子产品。（4）为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急需发展的机械、电子产品。

29日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一期工程建成

葛洲坝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建成，7台机组全部投入运行发电（二期工程安装12.5万千瓦发电机组14台）。一期工程投资24.71亿元，完成主要工程量9.915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626万立方米；金属结构安装3.84万吨；架设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385公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主要由拦河坝、发电站、船闸、泄洪闸、冲砂闸和鱼道等建筑物组成。大坝全长2561米，坝顶高70米，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总库容15.8亿立米。水电站一座在大江；一座在二江；装机21台，容量为271.5万千瓦，每年平均发电138亿度，相当于1949年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倍多。葛洲坝工程共设有三座船闸，其中一、二号船闸，闸室宽34米，长280米，可以通过万吨客轮、货轮和大型船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船闸之一。三号船闸，闸室宽18米，长120米，通过3000吨以下的客货轮和民用船队。三座船闸年单向通过能力，近期为2000万吨，远期为5000万吨，相当于现在宜昌港单向通过能力的8倍到20倍。葛洲坝工程是将来的“三峡工程”的配套建筑，对三峡高坝起反调节作用。葛洲坝工程建成后，三峡以内一百多公里长的峡江，水位可以抬高20米，昔日危及航行安全的暗礁险滩，尽没水底，夜航将得到自由，航道大大改善。27孔泄洪闸和12孔冲砂闸，可安全宣泄历史上最大洪水每秒11万立米流量（1954年特大洪水为每秒六万余立米）。为鱼类修建的过鱼设施，可以使长江回游性鱼类过坝产卵、繁殖和生长。坝顶有供运行管理和沟通南北交通的铁路和公路，无异于又一座长江大桥。

该工程于1970年12月30日开工，因工程出现重大技术问题需解决，1972年11月，国务院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197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主体工程复工。1981年1月，大江截流成功；6月水库蓄水；7月，二江电厂一号机组并网发电；12月，二江电厂二号、三号机组投入运行。一期工程建设周期达10.5年，实际总工期8.5年，比修改设计后的建设工期提前一年完工。

8　月

5日　国务院批准扩大机电产品出口

国务院批准《关于扩大机电产品出口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机电产品出口规划：到1985年，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25亿至30亿美元，占当年计划出口总额的9.3%—11.1%，5年平均递增7.1%—11%。到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45—55亿美元，占当年计划出口总额的11.3%—13.8%，年均递增12.5%—12.9%。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采取以下措施：(1) 建立一批机电产品的出口基地。选择一批骨干企业，重点面向国际市场。在计划供应、协作配套等方面都要适应出口需要。(2) 建立符合国际水平的技术标准。(3) 积极开展“以进养出”。对目前国内生产技术不过关、质量差，不符合国际标准，价格又高的一部分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液压件、密封件、电器件、原材料及买主指定的配套零件，可以从国外进口。(4) 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由国家拨款，在中国银行设立专项人民币信贷资金。1983—1985年拨款20亿元，贷款年限从10年改为15年，年利率从7.2%改为3.6%—5.5%。对机电产品出口实行免税和让利政策。对出口产品，5年内免征工商税，所需进口原材料，免征关税和工商税。实行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奖。

10日　国务院决定整顿和加强统配物资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统配物资管理的通知》。国务院指出，当前物资管理分散的情况十分严重，使国家物资分配计划很难安排和组织实施。为此必须切实整顿和加强统配物资的管理。(1) 各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按计划接受订货，按需要的品种规格生产。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今年钢材、有色金属、木材、水泥、煤炭、汽车、废钢铁等统配物资，凡是还没有按国家计划接受订货的，企业主管部门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必须在9月15日前向国家计委补报资源。不按国家计划接受订货的企业，要相应扣减利润留成。(2) 任何地方、部门都不准擅自运用国家统配物资资源，地方分成产品的范围和比例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3) 企业的产品自销，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自销数量超过国家规定、尚未发货的，应立即撤销合同；已经发货的，要扣减企业下年度的自销数量。(4) 企业超产的统配产品，应按规定上交国家统一分配。1983年的超产统配产品的分配，除煤炭、石油已有规定外，其他统配产品，凡由国家组织超产的，应全部上交国家统配；其他超产的，上交国家70%。

13日　方毅谈加快我国生产技术发展的两大政策

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为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在长远规划中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移植军工技术。我国军工系统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丰富的科研成果，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装备。抓好军用技术向民用的转移工作，无论对促进地方工业还是国防工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移植军工技术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军民互利，搞有偿转让。二是重视从国外引进技术。我们搞现代化，需要很多先进技术，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切都靠自己从头搞起。从

国外引进对我们适用的技术，或同国外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在人家的基础上前进，是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要在充分发挥国内各种人才作用的同时，积极考虑从国外引进人才的问题，这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热情欢迎侨胞中的科技专家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帮助解决一些生产技术的关键问题。

国家统计局组建城市、农村抽样调查队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农村统计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国家统计局在《报告》中提出，我国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以来，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必须认真改革和加强农村统计工作，才能及时取得准确可靠的统计资料。为解决这一问题，1982 年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农产量抽样调查的试点。农产量抽样调查，全国需抽查一万二千个生产队、十二万个地块。农民家庭收支调查和农村经济社会情况调查，需从一万八千户增加到三万六千户（占农户总数的万分之二）。同时，还要加强城市职工家庭收支和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抽样调查工作。需专设调查人员直接到商店和市场进行实地调查。以上农村和城市两支抽样调查队共需八千八百人。建议由国家统计局统一管理，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随着统计工作的加强和改革，特别是抽样调查的开展，统计数据将大量增加，需要加快实现计算技术的现代化。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电子计算站处理人口普查资料的任务不久即可完成，有的省、市、自治区已经完成，今后应当积极承担和完成各项统计资料的处理任务，并逐步建立统计数据库系统。

20 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强审计工作

国务院发出《批转审计署关于开展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的通知》。国务院指出，建立审计机关，实行审计监督，是加强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抓紧组建审计机关。要边组建，边工作，围绕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审计监督。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都应当接受审计监督。

审计署在《报告》中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请示。主要内容：(1) 审计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对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的执行结果，进行审计监督；对各级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对国营企业、基本建设单位、金融保险机构，进行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经法纪，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专案审计；制定审计规章制度，贯彻审计法规。(2) 审计机关的职权是，检查被审计部门和单位的各种账目；参加被审计部门和单位的有关会议；责成被审计部门和单位纠正一切不正当的收支；通知有关部门对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部门和单位，停止财政拨款。(3) 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负责领导全国的审计工作，向国务院报告工作。

22 日　国务院发布经济合同仲裁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仲裁条例》的主要内容：经济合同仲裁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仲裁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处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实行一次裁决制度。仲裁机关对受理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进行处理。当事人双方在适用法律上一律

平等，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权力。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调解、仲裁和制作调解书、仲裁决定书；应当为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提供翻译。本条例适用于法人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也适用于个体经营户、农村社员同法人之间参照经济合同法签订的经济合同的纠纷。

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一般由合同履行地或者合同签订地的仲裁机关管辖，执行中有困难的也可以由被诉方所在地的仲裁机关管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由建筑物所在地的仲裁机关管辖。铁路、公路、水路货物运输和联合货物运输中发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由负责查处该项纠纷的运输管理机关所在地的仲裁机关管辖。航空运输中发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由合同签订地、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事故发生地的仲裁机关管辖。

说明 已被199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代替。

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引进国外智力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指出，引进国外人才加快我国四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必须坚持不懈地长期贯彻下去；要广开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引进人才；引进国外人才的重点是华侨华裔人才；充分发挥应聘国外专家的作用，这是保证这个战略方针取得成效的关键；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引进人才的工作，迅速地切实地研究有关政策和措施。决定成立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

31日 我国建立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第三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制定《关于认真做好198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今后，人口变动情况的抽样调查工作，应每年进行一次，形成制度。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以统计部门为主，公安、计划生育部门配合，按照规定的办法，选定抽样调查点，逐户进行调查。各地人口普查办公室要与统计部门共同做好1983年人口抽样调查工作。

9 月

1日 国家计委等规定技改项目不允许变相扩大基建规模

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地区立即加强对技术改造项目的管理，不准变相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要严格控制更新改造的总规模。《通知》规定，各部门、各地区一定要在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内安排技术改造项目，无权擅自扩大规模。对那些已列人更新改造名下的基建项目，耗能高的项目，原料、能源、施工条件不落实的项目等，要认真清理，该停缓的要停缓。更新改造资金要真正用在设备更新、实现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上，严格防止用更新改造资金搞基本建设或扩大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各级财政和银行发现用更新改造资金搞基建，或把基建项目转为更新改造措施项目的，有权拒付资金。更新改造措施项目中新增加的建筑面积超过原有面积30%

和土建工程所用资金超过资金总额20%的，都应按规定审查批准，未经批准列入更新改造措施计划的项目，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

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轻工业部、商业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在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于9、10月间安排执行。《报告》主要内容：提出增加一批放开的品种。在第一批已放开的160种（类）基础上，第二批再放开350种（类），合计510种（类）。凡是放开的小商品，购销双方，可以实行协商定价。各省、市、自治区政府要加强领导，具体布置落实小商品价格政策。

2日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修改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作如下修改：（1）第五条第一款“对新办的合营企业，合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修改为：“合营企业的合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2）第八条“合营企业所得税，按年计征，分季预缴。每季在季度终了后15天内预缴，每年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其中“每年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修改为“每年在年度终了后5个月内”。（3）第九条“合营企业应当在每次预缴所得税的期限内，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预缴所得税申报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报送年度所得税申报表和会计决算报表。”其中“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修改为“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利用外资是发展经济的长期方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指示》主要内容：1. 要把利用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长期方针。当前应尽量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中低利息中长期贷款，加快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要尽可能多吸收一些直接投资。开办中外合资经营性企业，应以生产性项目为主，以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为出发点。2. 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有些政策要放宽，并抓紧完善立法工作。（1）放宽税收政策。合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头两年免征所得税，从第3年起减半征收所得税3年。（2）对带进技术，生产我国还需进口产品的企业，其产品内销比例可以扩大。（3）放宽对设备、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的限制。（4）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国内投资给予特殊优惠。（5）可到国外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重点是合作开发能源项目。3. 搞好综合平衡，安排好国内配套资金和物资。

5日　引滦入津工程全线竣工正式通水

人民日报报道：引滦入津工程已提前于今日全线正式通水，比国家原定1985年通水的要求提前2年3个月；比天津市要求1983年底通水提前3个月。为解决天津长期缺水的问题，国务院决定由天津负责建设引滦入津工程，把水量比较充沛的滦河水，从河北省宽城县和迁西县境内的潘家口水库经大黑汀水库、天津蓟县于桥水库引进天津。

引滦入津工程的勘测设计于 1981 年 9 月 18 日全面展开，1982 年 5 月 11 日正式开工，1983 年 9 月 5 日通水。全部工程投资 9.7 亿元，比投资概算减少近 2000 万元。

在工程建设中，奉命参加重点工程建设的解放军驻津部队，担负着施工的关键任务，凿通全长 11.41 公里的穿山引水隧洞。由于这项任务的胜利完成，使整个工程进展迅速。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高度赞扬参加引滦入津工程施工的解放军，完成任务又快又好又省，为全国重点工程建设作出了榜样。

17 日　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国务院发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决定》指出：近几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发展了，社会资金多了，银行的作用日益重要。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为此，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业务和储蓄业务，以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1) 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不对企业、个人办理信贷业务，集中力量研究和做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保持货币稳定。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和拟定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法令、基本制度，经批准后组织执行。掌管货币发行，调节市场货币流通。统一管理人民币信贷利率和汇价。编制国家信贷计划，集中管理信贷、黄金和国家外汇储备。代理国家财政金库。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和撤并，协调和稽核各金融机构的业务工作。(2)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理事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和少数顾问、专家，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各一位副主任，专业银行行长，保险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原则按经济区划设置。(3) 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进行管理。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或人民银行理事会作出的决定必须执行，否则人民银行有权给予行政或经济制裁。(4) 为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必须掌握 40%—50% 的信贷资金，用于调节平衡国家信贷收支。财政金库存款和机关团体等财政性存款，划为人民银行的信贷资金。专业银行吸收的存款，也要按一定比例归人民银行支配使用。(5) 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6)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统一管理国家外汇。

20 日　国务院决定征收建筑税

为了进一步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方向，国务院决定征收建筑税，并发布《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财政部于 10 月 18 日发布《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施行细则》。《办法》规定：一切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地方政府，以及所属的城镇集体企业，及下列资金安排的自筹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措施项目中的建筑工程投资，以及按规定不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建筑工程投资，都由使用投资的单位按照本规定缴纳建筑税。国家预算外资金、地方机动财力、企事业单位留用各种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其他自筹资金的建筑税按 10% 的税率计征。更新改造措施中的建筑工程，凡投资额超过该项目全部投资额 20%，或者新增建筑面积超过原有建筑面积

30%的，应当视同基本建设，按该项目的全部投资额计征建筑税。下列投资免征建筑税：能源、交通、学校教学设施和医院医疗设施、中外合资企业的投资、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进行的项目。经财政部专案批准免征建筑税的投资。建筑税收入全部为中央财政收入。《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和《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施行细则》均从1983年10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发布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1. 依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是中国的法人，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2.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营企业，应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允许设立合营企业的主要行业是：能源开发，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仪器仪表工业，海上石油开采设备的制造业，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通信设备的制造业，轻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和医疗器械工业，包装工业，农业，牧业，养殖业，旅游和服务业。3. 申请设立合营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批准：有损中国主权的；违反中国法律的；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造成环境污染的；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不公平，损害合营一方权益的。

21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发布加强利用外资计划管理试行办法

国家计委等部门发出《利用外资计划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试行办法》规定：1. 利用外资计划，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凡涉及方针、政策和重大计划的调整，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负责。各级经贸部门负责日常业务的协调管理。2. 计划管理范围，包括各种贷款的借用还和国外投资者投入、汇出，及我方对投资者的产品补偿。3. 根据国家计划的统一要求，利用外资计划需要编制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对外开展工作项目计划与对外偿付计划。4. 全国利用外资的总规模，由国家计委提出报国务院。利用外资限额以上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均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投资总额1亿元以上项目，国家计委初审后，报请国务院审批。5. 国家计委提出利用外资的规模、使用方向和限额以上项目，并组织有关单位做好重大建设项目的论证。国家计委会同经贸部组织各地区、部门编制利用外资的长远、年度计划。6. 外经贸部负责检查、监督、执行利用外资计划，负责汇总全国利用外资的统计报表。

23日　1984年国库券条例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八四年国库券条例》。《条例》主要内容：国库券的发行对象是：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和农村富裕社队；城乡人民个人。国库券发行的数额由国务院确定，并从当年1月1日开始发行。交款期限，单位交款6月30日结束，个人交款9月30日结束。国库券的利率，单位购买的，年息定为4%；个人购买的，年息定为8%。国库券计息，一律从当年7月1日算起，提前交款的不贴息。国库券利息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利。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1984年国库券实际发行42.53亿元。

29日　财政部等下达工业企业扭亏指标

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下达1983年工业企业扭转亏损指标的通知》。《通知》要求，此项扭亏指标是国家指令性指标。对那些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完不成扭亏指标的企业，不准提取减亏分成，并相应扣减企业基金。对计划外亏损，各级财政一律不予弥补。对连年发生严重亏损而产品是长线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并、转，并停发奖金。在限期内提前扭亏的企业，应给予适当奖励；对扭亏做出显著成绩的地区和部门，应及时总结经验，予以表扬。

10　月

6日　国务院批准开展财务大检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开展财务大检查的报告》。《报告》对检查的目的、范围和内容作出规定。检查范围：主要是国营企业（包括工业、交通、商业、粮食、外贸、供销社、物资、金融企业）。检查的重点：是否有偷漏税；企业的成本、费用和营业外支出是否符合国家规定；企业应上交国家的各项收入，包括税收、利润、基本折旧基金、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以及国库券等，是否按规定上交国库；有无把预算内收入划为预算外，将中央收入划为地方收入。检查的方法：凡是地方所属的单位，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检查，中央各部所属单位，可以采取自查、互查和派工作组重点检查相结合的办法。

9日　国务院批准加强国民收入计划和统计工作报告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加强国民收入计划统计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1. 从1984年起，我国将采用国民收入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情况的综合指标之一。国民收入是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等部门所创造的净产值之和。2. 工业净产值可以作为考核部门、企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指标之一。但采用这个指标需要作大量准备工作。根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工业采用净产值指标，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进行价格体系改革；二是需要加强财务、统计工作。3. 加强国民收入和工业净产值的计划、统计工作的具体意见：（1）从1984年起，除国家计委继续编制全国的国民收入计划外，各省、市、自治区开始编制本地区国民收入年度计划。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工业部门编制工业净产值计划。（2）准备在1984年，先选择12个企业，进行以工业净产值为主要考核指标的试点。把净产值完成好坏同职工的奖金挂钩。（3）各地区、各部门在企业整顿中，要切实加强工业企业的基础工作，包括统计和会计核算、各项定额管理、原始记录等。4.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成立一个国民经济核算小组，对计算口径和方法作出统一规定。

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通知》指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显得很不适应。宪法已明确规定在乡村建立乡政府，政社必须相应分开。《通知》要求，当前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

立乡政府。大体上在1984年底以前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乡的规模一般以原有公社为基础，如原公社范围过大，可适当划小。要重视集镇的建设，对具有一定条件的集镇，可以成立镇政府，以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乡的编制要力求精干，不得超过现在公社的人员编制。随着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明确收入来源和开支范围。有关具体事项由财政部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应按村民居住状况设立。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要由村民选举产生。

27日　中国银行首次开办出口买方信贷

中国银行在上海正式签订第一笔出口买方信贷。这笔贷款是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贷给香港快航船务公司的。金额为564万美元。中国银行为了支持我国机电产品和船舶扩大出口，决定由上海等地分行试办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为购买我国产品的外国和港澳地区进口商人提供优惠贷款。同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成功我国第一笔中长期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达成协议，对其出口船舶买方信贷提供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

29日　国务院批准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组织多渠道经营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调整农产品购销政策，搞活农副产品流通，进一步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希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领导，密切合作，共同把这项工作搞好。这个报告只对商业部管理的农副产品购销政策作了新的规定，不属于商业部管理的农副产品购销政策需要调整的，应由各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另行下达。商业部在《报告》中提出，在现行农副产品分类目录中，统购有3种，粮食、食用油脂油料、棉花。派购43种。调整后，统购、派购共有21种，其中，维持现状16种，另外5种在主产区仍为统、派购。改议购的有小杂粮（非主产区）、小油料（非主产区）、大麻、生漆、木炭、黑木耳等25种。

11　月

1日　国务院决定取消北方棉区价外补贴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变棉花加价办法和取消北方棉区价外补贴的通知》。《通知》决定：1984年新棉上市起，取消北方棉区（包括江苏、湖北、安徽三省享受北方价区的县、社）5%价外补贴。在全国棉区将棉花加价由基数法改为比例法。南方按“正四六”（即40%加价、60%牌价）、北方按“倒二八”（即80%加价、20%牌价）比例收购。

10日　全国计划会议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确定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计划（草案）提出，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坚持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特别是抓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按照保证重点、适当照顾一般的原则，集中必要的力量把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搞上去。进一步搞活经

济，改善人民生活。同时，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防止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保持财政、信贷收支基本平衡，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1984年计划（草案）的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9283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4.7%。其中，工业总值644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5%；农业总产值2843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4%。国民收入475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4.6%。财政收入1306亿元，预计增长8.2%，财政支出1336亿元，预计增长5%，支大于收3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940亿元，其中国家基本建设投资650亿元（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投资323亿元）。根据这次会议提出的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于1984年5月31日由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批准。

12日　农林特产征收农业税

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林特产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明确凡从事农林特产品生产，取得农林特产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及本规定缴纳农业税。下列各项农林特产收入均属征税范围：园艺收入，包括水果、茶、桑、花卉、苗木、药材等产品的收入；林木收入，包括竹、木、天然橡胶、柞树坡（养柞蚕）、木本油料、生漆及其他林产品的收入；水产收入，包括水生植物、淡水养殖、滩涂养殖产品的收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

农林特产农业税的税率一般定为5%—10%。在此范围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不同农林特产产品的获利情况，在不低于粮田实际负担水平的原则下，分别规定不同产品的税率。对少数获利大的产品，可以适当提高税率，但最高不得超过15%。在制定税率时，毗邻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行协商，使相同产品的税率在地区之间大体一致。对某些处于发展初期，或者比较零星分散以及恢复较慢的农林特产，征税暂时有困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给予适当减免照顾。

15日　我国引进的第一条电冰箱生产线试产成功

我国第一条从国外引进的电冰箱生产线，在广州冰箱厂建成并试产成功。广州电冰箱厂引进扩建工程的总投资为3000多万元，其中外汇535万美元，包括从日本日立制作所和新加坡兴马公司引进的2条电冰箱生产线及其配套工程。2条生产线先后于1982年和1983年开始引进，于1983年11月和1984年5月相继建成投产，形成年产电冰箱10万台的生产能力。

19日　国务院通知制止买卖、租赁土地

国务院《关于制止买卖、租赁土地的通知》指出，近年来，一些农村社队、国家企事业单位等，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买卖、租赁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土地的情况不断发生。在一些城市郊区，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一些农村社队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租赁，捞取大量钱款和物资。这是严重违犯宪法的行为。《通知》主要规定：认真宣传贯彻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土地管理的规定，宣传保护土地的重大意义，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同买卖、租赁土地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各地要对买卖、租赁土地等非法活动，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违法和指使违法的典型案件，要严肃处理，决不能迁就姑息。财政金融部门要发挥监督、管理的职能，有权拒绝

收付买卖、租赁土地的资金，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依法管理土地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土地管理机构和制度，切实把土地全面管理起来。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检查清理买卖、租赁土地问题的情况，于1984年3月底以前报告国务院。

22日　国务院决定临时取消棉花、絮棉票证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生活的需要，根据当前棉布、棉花的生产情况，国务院决定从1983年12月1日起对棉花、絮棉临时取消凭票定量销售办法，对棉花、棉布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和絮棉票。鉴于棉花收购价格多次提高，絮棉的价格一直未动，絮棉敞开供应后，在适当提高絮棉等级质量的同时，适当调整絮棉的零售价格。絮棉质量由6级半提为6级，零售价格由平均每斤0.8元提高至1.22元。

28日—12月15日　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1号文件）所提的目标、方针、政策，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议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工作的正式文件，继续贯彻执行。1984年的工作重点应当是进一步完善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以鼓励农民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生产效益。各地现行承包合同期限多是1至3年，农民要求延长承包期限，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应予满足。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持了在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分别就我国经济形势与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理顺农业内部关系与调整农用物资供求关系等问题，在会上讲了话。

万里在讲话中指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制已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这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我国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变为包括科技、流通等多方面的经济网络，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充满生机的前景。这几年的发展对部分地区来说，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恢复性质；全国农民的生活虽然普遍有明显改善，但发展很不平衡，有少数地方农民生活仍然相当困难。这是一个关键时刻。问题解决得好，农村形势就能继续发展，顺利前进。否则，大好形势难于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必须从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出发，必须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改进我们的领导工作。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树立一种大胆探索，知难而进的改革精神。1984年要切实抓好农村的几项工作：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制；大力发展各种专业户；用最大力量做好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各项服务工作；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作了题为《农村前进中几个问题》的讲话。他阐述了通过联产承包制形式，将小型分散的家庭经营引入合作经济的重大意义，以及家庭承包制将要长期存在的客观依据，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以家庭

经营为主，是不是今后完全放弃规模效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否助长掠夺式经营"和"土地长期委托农民经营是否会形成事实上的私人占有"等一系列问题，展望了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有统有分的双层经营结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广阔前景，并就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历史意义和农村技术改造政策作了说明。

国务院决定进行全国工业普查

国务院决定于1985年进行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此次工业普查包括全部工业企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自来水企业；城市工业、乡镇工业；独立核算企业、非独立核算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全民与集体合资经营企业、个体经营企业；华侨港澳工商业者独资、合资或合作经营的企业；外国资本经营的及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主要指标有：产品质量、产值、销售量、销售额、工资总额、利润、税金、生产设备拥有量、主要产品生产能力、产成品库存量、固定资产等指标。截止时间为1985年12月31日。

此次调查分为3个阶段：（1）准备阶段，1983年11月至1985年底。主要工作是建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计划，设计调查方案，组织调查试点。（2）调查阶段，1986年上半年进行，并对数据进行检查和核实。（3）数据处理和分析研究阶段，1986～1987年。主要进行数据处理和综合整理工作，利用工业普查资料开展分析研究和预测。

12　月

8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主要内容。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计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国家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

国务院设立国家统计局，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统计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置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国家有计划地加强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技术的现代化建设。

20日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科技进步小组。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组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任副组长。科技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1. 统一组织和管理全国科技队伍。2. 统一领导制定科学技术长期规划，包括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使各个规划能够相互渗透、互相衔接。3. 研究制定重大技术政策。4. 决定重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5. 协调各部门的科技工作。

21日　我国研制成功亿次巨型计算机

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以上的"银河"机，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

28日　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

国务院决定，中国工商银行于1984年1月1日正式成立。朱田顺任工商银行董事长；陈立任行长；张肖、田同五、尹志海为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是国务院直属局级的经济实体。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三同步"方针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的环境保护战略方针。简称"三同步"战略方针。其主要内容：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同时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同步制定、综合平衡。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把环境目标、污染控制目标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外经贸部要求在对外经济援助中施行项目承包制

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出《对外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承包责任制实行政企分开。将原规定（指1980年的《关于对外经援项目试行投资包干制的暂行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作为承包单位，改由其所属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或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作承包单位；贯彻责、权、利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承包单位的经济、技术责任；扩大承包单位的自主权，保证合理收益。

国务院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

为解决三线建设中发生和遗留的问题，国务院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要职责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本着合理配置生产力布局，促进专业化协作，促进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的相互联合，对"三线"现有企业进行调整和技术改造。

31日　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83年国民经济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取得新的成就，比较全面地完成了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趋向协调。

一、农业丰收，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农业总产值达到3123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其中粮食产量7746亿斤，比上年增长9.6%；棉花产量9274万担，比上年增长28.9%。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提前两年达到和超过"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指标。全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比上年增长15.9%，农业商品率达到45.6%，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二、轻重工业发展比较协调，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工业总产值达到6088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2954亿元，比上年增长8.7%；重工业总产值3134亿元，比上年增长12.4%。有30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提前两年达到和超过"六

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指标。其中原煤7.15亿吨，比上年增长7.4%；钢4002万吨，比上年增长7.7%；原油1.06亿吨，比上年增长3.9%；发电量3514亿度，比上年增长7.2%；木材5232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3.8%；糖377万吨，比上年增长11.5%。

三、财政状况继续改善。全年财政收入1249亿元，比上年增长11%，财政支出1292.5亿元，比上年增长12%，支大于收43.5亿元。农业丰收，国家用于收购粮食、棉花，支付超购加价款34.7亿元。工商企业未能完成和超额完成利润上交任务，也是造赤字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重点建设有所加强。这一年建立了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的责任制，改变了基建规模严重失控的现象。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54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594亿元（国家预算内投资346亿元），比上年增长6.9%。在投资总额中，能源投资占21.3%，上升了3个百分点；科技教育投资占7%，上升了0.7个百分点。生产性投资占58.3%，增加3.8个百分点。

五、国内市场继续繁荣兴旺，物价基本稳定。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2849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市场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全年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升1.5%。

六、外贸进出口达到860.1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利用外资19.6亿美元，其中国外直接投资达9.1亿美元。

七、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250.1元，比上年提高6.9%。其中农民提高9%，城镇居民提高2.5%。全年安置就业628万人。全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新建住宅竣工面积1.16亿平方米，农民建房约7亿平方米。

存在的主要问题：能源生产虽然增长较快，但仍不能适应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紧张的状况没有很大改变。铁路积压待运和港口压船现象仍很严重，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信贷平衡还存在一定困难，财政收支还有一定赤字，特别是货币增发较多。消费品生产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某些耐用消费品供不应求。农村商品流通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流通渠道不够畅通。生产、流通领域里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善。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利润的增长同生产增长不协调。基建造价高、工期长的状况还没有扭转。

1984年

1　月

1日　中共中央印发1984年农村工作意见

中共中央以1984年1号文件印发《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1. 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土地承包

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地等，承包期应当长一些。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2. 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或把资金集中起来，联合举办各种企业。3. 实行经理承包责任制的社队企业，有的虽然采取招雇工人的形式，但是只要按下列原则管理，就仍然是合作经济，不能看作私人雇工经营：（1）企业的所有权属于社队；（2）社队对企业的重大问题，如产品方向、公有固定资产的处理、基本分配原则等有决策权；（3）按规定向社队上交一定的利润；（4）经理只是在社队授权范围内全权处理企业业务；（5）实行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对个人投入的资金只按一定比例分红。4. 加强社会服务，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各部门、各行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尤其要重视向农业提供优质廉价的农用工业品，保证农业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供销社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下去。5. 继续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要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供应的改变，继续减少派购的品种和数量。鲜活产品要尽量放活，要有合理的季节差价、地区差价。为了保证出口和大城市供应，可以试行建立专门的生产基地或用平价生产资料换购。6. 改善农副产品收购办法。农副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必须落实到生产单位，一定几年不变。7. 进一步放宽政策，加速对山区、水域、草原的开发。集体林区在实行木材采伐一本账的计划中，要给社队留下适当数量的木材。牧区畜产品也宜确定收购基数，签订购销合同，任务以外允许议购议销。牧区在落实畜群责任制的同时，要确定草场使用权，实行草场使用管理责任制。

1月17日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精神。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是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基本任务是：在国务院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依照国家法令、政策，在人民银行宏观金融决策的指导下，在统一的信贷计划内，大力筹集社会资金，加强信贷资金管理，支持工业生产发展，支持商品流通扩大，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银行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原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储蓄、信贷等商业银行的业务划归中国工商银行办理。

国务院颁布城市规划条例

国务院颁发《城市规划条例》。这个《条例》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发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方面的法规性文件。《条例》指出，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镇体系，合理确定城市在规划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确定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的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公共事业及战备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秩序、协调地发展。城市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综合部署；必须合理科学地安排城市各项建设用地；必须切实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搞好城市绿化建设；应当切实保护古迹，保持与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城市规划应当考虑城市的长远发展，并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城市规划建设必须集中领导，统一管理。《条例》还对大中小城市的标准，城市规划的制定、审批，旧

城区的改造，城市土地的规划管理，各项建设规划阶管理以及违反条例的处罚作出了规定。

6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

《决定》指出，目前还有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人，没有真正懂得统计的重要作用，不认真抓统计工作，不善于运用统计数据来研究问题指导工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加强统计工作现代化建设，运用先进的统计科学和现代计算技术，逐步实现统计指标体系完整化，统计分类标准化，统计调查工作科学，保证数字的准确性。逐步建立健全现代化的统计信息计算体系。要建立健全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统计系统。提高统计干部素质，稳定统计队伍。国务院决定设立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

汽车生产企业纳入国家计划审批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转发中汽公司《关于增设汽车生产厂点必须报请国家批准的报告》。《报告》提出，1980年的73家汽车厂（点）经过调整纳入1983年国家计划的有37家。但是，在国家计划之外，一些原来不从事汽车生产的企业又盲目转向汽车制造，且有发展之势。为了制止这种倾向，建议：凡未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批准，任何部门、地方不得任意增设汽车（含底盘）生产厂（点）；凡须取名为“汽车制造厂”的企业必须征得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同意，报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批准；凡属已经调整，改变产品方向的原汽车制造厂，必须由主管部门更换厂名，做到名实相符。

10日　国家对进口货物实行许可证制度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凡属本条例规定凭证进口的货物，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都必须事先申请领取进口货物许可证，经由国家批准经营该项进口业务的公司办理进口订货。海关凭进口货物许可证和其他有关单证查验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代表国家统一签发进口货物许可证。《条例》对许可证签发的范围、程序、有效期限等，作出了规定。

同年5月15日，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总署根据这个《条例》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许可证制度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13日　国家计委建立基本建设经济效益考核制度

国家计委印发《关于降低基本建设工程造价的要求》、《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自筹投资管理的暂行规定》、《基本建设经济效益计划表格和基本建设经济效益计划指标目录及计算方法》等文件。这三个文件要求：1984年起正式建立基本建设经济效益计划指标考核制度。从1984年起，三年内降低造价20%，其中1984年要降低5%。文件还提出了降低工程造价的主要措施；自筹投资一律列入基本建设计划；坚持由国家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并按项目进行安排，不得层层切块、层层下放安排；必须专户存入建设银行，坚持先存后批，先批后用；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建筑税。

18日　国务院决定对电力实行统一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工业发展较快，但仍然不能适应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紧张的状况没有很大变化。针对这一情况，国务院颁布《关于电力统一分

配确保重点企业用电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电力分配必须统筹兼顾，择优安排，在确保国家重点生产、重点建设需要的同时，妥善安排其他方面的需要。电网当年新增加的可供电量（不含地方和企业自建、集资建设部分的新增电量），由国家统一分配，主要用于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试车、投产的新增用电，并适当增加各省、市、自治区用电。《规定》要求，所有地区和单位都必须严格按电网和省、市、自治区的季、月分电计划用电，实行节约归己，超用扣还。超用电地区或单位拒绝扣还时，电力部门经过事先通知后，可实行限电，强制扣还，或者实行超用罚款。这个《规定》从 1984 年起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四个电网试行。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

会议认为，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是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企分开、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试验。人民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作为国家领导和管理金融事业的职能部门，集中力量研究和做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对信贷资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保持货币的稳定，更好地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为四化建设服务。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在行政上不是隶属关系，但在业务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会议还就银行体制改革、银行机构设置、信贷资金管理、农村资金的使用和调度、发挥中国银行作用、发展保险事业以及人民银行理事会工作等几个有关问题作出决定。

23 日　国务院决定农副产品购销实行合同管理

国务院颁布《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这个《条例》是针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后，农产品购销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制定的。适用于各类法人之间签订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农民个人同法人之间签订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也参照这个条例执行。《条例》规定，订立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符合国家政策，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属于国家统购、派购范围的农副产品的购销，必须按照国家下达的统购、派购任务（牧区畜产品按国家确定的收购基数）签订合同。属于议购的农副产品和完成国家统购、派购后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的购销，可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签订合同。《条例》指出，农副产品购销合同依法订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必须恪守信用，严格履行。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由于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还应进行赔偿。这个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过去颁发的有关农副产品购销合同的规定与这个条例有抵触的，按这个条例执行。

说明　已被 1999 年 3 月 15 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代替。

国务院决定工矿产品购销实行合同管理

国务院颁布《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这个《条例》是针对工业管理体制和计划管理体制变化后的新情况制定的。《条例》规定，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的购销合同，按国家和国家授权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下达的计划指标和需方提出的花色、品种、规格、质量签订；属于国家指导性计划产品的购销合同，参照国家和国家授权的主管部门

下达的指标，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由供需双方协商签订；属于自由购销产品的购销合同，由供需双方协商签订。购销（供需）当事人必须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本着按需生产、质量第一、适销对路的原则，按照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签订和履行合同。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严格执行。这个《条例》从公布之日起执行。过去的有关规定与这个《条例》有抵触的，均按这个条例执行。

说明 已被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代替。

26日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28日 国务院发布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规定，一切进出口商品都必须经过检验。检验内容包括商品的质量、重量、数量和包装。对外贸易合同有规定的，按合同规定检验；合同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按有关标准和规定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是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的主管机关。中国境内不得设立外国检验机构。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54年1月3日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同年6月1日，国家商检局颁布了根据这个《条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实施细则》。

同年7月20日，国家商检局、卫生部颁布了根据这个《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试行）》。

29日 邓小平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珠海时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2 月

9日 邓小平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

邓小平在听取厦门经济特区负责人汇报后挥笔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10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部署1984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除提出了1984年工农业生产、社会商品零售额和国家财政收入等计划任务外，还要求国营企业可比产品产品成本降低2%，节约能源1800万吨标准煤，商业企业商品流通费用降低2.3%，并提出1984年要重点做好的工作：组织好生产和流通工作；扭亏增盈，力争生产、税利、财政收入同步增长；搞好企业全面整顿，努力提高企业素质；抓紧行业的调整、整顿工作；大力推进技术进步；积极做好进一步改革的准备工作。会议于23日结束。

11 日　棉花供需首次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

从 1983 年 9 月新棉上市到 1984 年 1 月 20 日止，全国棉花收购入库 8649 万担，比上年同期增加 2059 万担。按照 1984 年棉花分配计划，将供过于求 2000 万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棉花生产的特点和产需情况，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解决棉花供过于求问题的建议：(1) 今后几年棉花生产应采取稳定的方针，避免大起大落。1984 年棉花播种面积和产量计划，调整为 8500 万亩和 8000 万担。(2) 棉花出口要有长远打算，相对稳定。近二三年内，可争取多出口一些。(3) 1984 年国家储备的棉花，应是工业、商业留足合理库存的超储部分，所需贷款利息由国家财政按实际发生时间和数额结算。(4) 纺织部门要抓好产品结构调整，开发适销对路的新品种。特别要多产一些农村需要的物美价廉的纺织品。商业部门要积极做好棉纺织品的下乡工作。

16 日、20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经济发展问题

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发展问题。会议提出 5 点意见：(1) 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方面更放手一些，多吸收一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以增强我国的建设力量。(2) 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工作要破除一些框框，大胆采用国际上成熟的先进的设计标准和工艺技术，把各项保险系数定得合理一些，尽量降低造价，力争少花钱多办事。(3) 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国各地的各种能源。在能源比较紧张的地区，不要过分强调保护地下资源，搞细水长流。(4) 企业一定要建立经营管理的盈亏责任制，当前，可以考虑首先在企业的关键岗位上实行岗位津贴的办法，把文化水平较高、工作认真负责的人调到关键岗位上，把不合格的人撤换下来。(5) 按照价值规律，逐步解决多年来价格不合理的问题。

21 日　全国电子工业厅局长会议提出我国电子工业发展重点

全国电子工业厅（局）长会议指出，随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国四化建设的发展，电子工业部门将担当起军事电子装备部、国民经济电子装备部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电子产品供应部的重任。要加快我国电子工业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量力而行、有取有舍的方针。要集中力量抓最重要的产品、最关键的技术、通过重点突破来带动全局。根据这个方针，会议确定以军事电子装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作为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重点，围绕这个重点，有计划、按比例、成龙配套地抓好雷达、通讯导航、广播电视、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等产品和技术，实现综合协调发展。

3 月 3 日，应陈云同志的约请，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到陈云同志住地，向陈云同志汇报了我国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情况。陈云同志详细询问了集成电路的种类、用途和加工的技术特点，以及我国集成电路生产的现状同国外的差距。陈云同志观看了操作表演后指出，我国财经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任务，现在大多数的财经干部还没有看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其他领域新技术的发现，都对财经干部提出了新的任务。陈云同志还指出，一定要集中力量，把电子工业搞上去。

24 日　邓小平谈办好经济特区

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必须明

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一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25日 国家允许合作商业组织和个人贩运农副产品

国务院颁布《关于合作商业组织和个人贩运农副产品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国家允许合作商业组织和个人按照本规定贩运农副产品。允许贩运的农副产品限于三类农副产品和统购、派购任务以外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贩运农副产品不受行政区划和路途远近的限制，可以出县、出省。农村个人从事农副产品贩运，须持所在生产大队或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城镇从事农副产品贩运的合作商业组织和个人，经产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可以下乡采购、贩运农副产品，也可以在城市指定的市场向贩运者批量进货，就地销售。允许贩运的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国家政策法令允许的范围内，由购销双方协商，随行就市，有升有降。在经营方式上，可以零售，也可以批发销售。国家保护农副产品贩运者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向贩运者乱收费、乱摊派。严禁利用职权向贩运者敲诈勒索。

说明 主要内容与1983年2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城乡集贸市场管理条例》、1987年8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等不相适应。

国家允许发展农副产品就地加工

国务院颁布《关于组织和发展农副产品就地加工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发展农副产品就地加工，有利于安排农村剩余劳力和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生产，应当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根据当地的资源、劳力和技术条件，因地制宜，进行安排。凡是适合在农村就地加工的农副产品，应当尽量分散到农村加工。今后新增加的生产加工能力，适合在农村的，应当尽量放在农村。农副产品加工所需的原料中属于统购派购的必须保证完成任务，由国家统一调拨供应。农副产品加工，应当根据生产规模、加工技术和市场的不同需要，实行多种加工形式、多层次经济联合，以调动国营、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应当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公共提留和劳动积累三项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和按劳分配或者按股分红制度。应当以县为单位或者按照经济区域，统筹规划。《规定》还要求商业、外贸、轻工、供销、银行、机械制造、科技、运输等部门支持发展农副产品就地加工。

27日 国家鼓励发展农村个体工商业

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农村个体工商业是指农村居民从事的适合个体经营的工业、手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运输业、房屋修缮业以及国家允许个体经营的其他行业。国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营社会急需的行业。对于确有困难的，国家可以在贷款、价格、税收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并在技术上给予必要的帮助。经县、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可以请一二个帮工；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二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请帮手、带学徒，应当签订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期限和报酬等。农村个体工商户应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准破坏国家收购计划，不准破坏国家矿产资源，不准偷税漏税，不准欺行霸市，不准哄抬物价，不准缺斤少两，不准掺杂使假，不准出售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不准买卖票证或用票证换商品，不准伪造、出租、涂改、转让营业执照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说明　已被1987年8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代替。

国家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经营运输业

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国家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用购置的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各地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油料供应的可能，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发展。农民个人或联户从事营业性运输，须持生产大队或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审查核准，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运输向国家交售或到市场出售的农副产品，持乡政府证明即可运送。农民个人或联户经营运输业，可以从事货运，也可以从事客运。《规定》还对车船、拖拉机的检验、保险、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国实行统一法定计量单位

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命令》指出，195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1977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在确定米制为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以来，全国推广米制、改革市制、限制英制和废除旧杂制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了贯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适应我国国民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扩大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国务院决定在采取先进的国际单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我国计量单位。我国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包括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国际单位制的辅助单位；国际单位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国家选定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由以上单位构成的组合形式的单位；由词头和以上单位构成的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本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3　月

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

《指示》的主要内容：(一)进一步提高对绿化祖国重大意义的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把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转化为良性循环，根本出路在于大力种树种草，增加覆盖国土的绿色植被。这是一项长远建设，必须及早动手。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行动起来，人人动手，年年植树，种草种花，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长期坚持下去。到本世纪末，力争把全国

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12%提高到20%；种草面积达到五亿亩，使退化、沙化的草场逐步得到恢复和改良。（二）扩大视野，因地制宜，加速绿化。造林绿化要乔灌草相结合，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对绿化工作实行分类指导。（三）放宽政策，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集体的荒山荒滩，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和经营能力，全部或部分地划给社员作自留山、滩，由县级人民政府发给使用证，土地集体所有，所种林草归已，长期经营，允许继承，可以折价转让。集体林场和国营林场，都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各种有利于加快绿化的措施和作法，都应当允许试行；一切行之有效的经验，都应当总结推广；经营者的正当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四）积极支持林业专业户的发展。要尊重承包者的经营自主权，依法保障其权益，让他们放开手脚，发展林业，治山致富。（五）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年满十一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都要承担义务植树任务。全国凡能植树的地方都要把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认真地开展起来，坚持下去。（六）切实抓好种苗，保证绿化需要。（七）认真保护林草植被。我国林草植被稀少，必须十分珍惜。现有的森林、草原是我国的自然：生态屏障，如果任其减少和衰败，后果不堪设想。对破坏森林、草原的行为，必须严加制止。（八）讲究科学，注重实效。种一片活一片，种一个山头绿一个山头，防止绿化工作走过场。（九）自力更生为主，广辟绿化资金渠道。（十）切实加强对绿化工作的领导。从现在起，各级各届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都要带头种树种草，并且要按照国家规划，一年认真抓几次，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质保量完成或超额完成本地区、本单位的绿化任务。这要作为一项制度，成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国务院在批转《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发展多种经营，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只有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妥善安排不断出现的多余劳力，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时间，逐步改变八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使农村商品生产得到充分的发展，农村才能富裕起来，也才能逐步积累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乡镇企业发展，必将促进集镇的发展，加快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建设，有利于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避免农民涌进城市，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对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要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对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分散生产联合供销的家庭工业和个体企业，也应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

5日　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

《条例》规定，所有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都必须依照这个条例管理成本。厂长，包括经理、矿长、场长和其他企业领导人，对本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负完全责任。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副厂长，协助厂长组织领导本企业的成本管理，

正确执行成本计划，准确核算成本，并对企业的经济效果负责。总工程师协助厂长在生产技术方面采取有效的降低成本措施，并对其经济效果负责。企业违反条例，如擅自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的；随意摊提成本费用，挤占国家收入的；弄虚作假，成本严重不实的；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大量废品或其他严重损失浪费，以致成本升高的；损公肥私，挥霍国家资财，增加成本开支的，应按照税收、财务的有关规定处理。

财政部根据这个《条例》的要求，于4月26日颁发了《国营工业、交通运输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

说明　已被1992年11月16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代替。

国务院批转清理和整顿向建设项目乱收费的报告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清理向建设项目取费情况和整顿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向建设项目收取的费用政出多门，名目繁多，标准混乱。这是使工程造价升高的一个原因。对此提出了以下整顿意见：(1) 坚决取缔不合理的费用；(2) 整顿行政、事业、企业单位收取的各种服务性费用；(3) 整顿设计、施工费用；(4) 研究城市配套费用的收取方法；(5) 调整人防工程费、商业网点费、新菜田建设费；(6) 严格整顿征地拆迁补偿费用。

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国家计委于3月17日发出《关于取消向建设项目收取的110种费用的通知》。这110种费用涉及城市建设、设计、施工、征地拆迁、材料设备、交通、公安、质量检查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收费。

6日　国家尝试用经济手段控制棉田面积和搞活等外棉经营

国务院发出《关于控制棉田面积和搞活等外棉经营的通知》。《通知》提出，今后对棉花的政策应当是稳定和适当控制棉花种植面积，积极鼓励改良品种，提高单产，提高质量。具体措施是：(1) 冀、鲁、豫三省棉田面积控制在5000万亩。(2) 从1984年新棉上市起，北方棉区超基数收购棉花奖售粮食由2斤改为1斤半。(3) 对等外棉的经营要放开，允许上市买卖，多渠道经营。国家收购等外棉花不加价，不奖售粮食，不奖售化肥。

9日　成人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教育部、国家计委印发《关于加强成人高等、中等专业教育事业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指出，成人教育计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高等、中等教育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类高、中级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必须加强对成人高等、中等专业教育计划的管理。纳入国家成人高等教育事业计划的范围是：按国务院有关规定，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并报教育部审定备案的，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学制二年以上，培养目标相当于高等学校专科和本科毕业水平的人数。纳入成人中等专业教育事业计划的范围是：按国务院、教育部的有关规定，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招收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学制为二年以上，培养目标相当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水平的人数。成人高等、中等专业教育事业计划，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和由

下而上、上下结合的编制方法。要严格计划审批程序，要经过批准纳入国家计划并正式下达后方可安排招生，未经批准的不得安排招生。

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颁布

国家主席李先念签署主席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自1985年4月1日起施行。该法是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制定的。《专利法》把发明创造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并对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条件、专利的申请程序、专利权的期限、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等作出了规定。

1985年1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专利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21日　中国工商银行颁布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暂行规定》对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的计划管理、国拨流动资金的管理、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来源和补充、流动资金损失的处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的检查和考核等作出规定，并明确提出，中国工商银行管理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的职责是：制定管理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的规章制度；管理和调剂国拨流动资金，监督企业按规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检查企业流动资金是否完整无缺；核定企业流动资金计划占用额，审核企业、企业主管部门的流动资金计划和决算；会同企业主管部门落实流动资金周转指标；监督和检查企业流动资金的使用情况，考核资金使用效益。《规定》要求建立和健全流动资金管理制度，落实资金管理责任制，考核资金使用效益，加速资金周转。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和流通的需要，不准挪用搞基本建设和其他开支。

23日　国务院批转1984年基本建设工作要点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84年基本建设工作要点》。《要点》指出，1983年，我国基本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多年来存在的建设项目工期长、造价高、浪费大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敞口花钱、吃大锅饭的现象还很普遍。因此，提高经济效益是基本建设战线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的当务之急。1984年基本建设任务很重，各部门、各地区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强领导，严格控制建设规模，认真抓好各项建设，集中力量把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搞上去。要保证投产项目及时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并且力争在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使基本建设工作真正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点》提出，1984年要重点抓好10个方面的工作：（1）狠抓计划落实；（2）加强建设过程中的调度工作；（3）加强设计管理，把好设计审查关；（4）认真搞好基本建设的基础工作；（5）继续推行投资包干经济责任制，研究基本建设管理的改革；（6）大力推行科学管理；（7）继续抓好整顿工作，努力提高企业素质；（8）抓人才的培养和教育；（9）抓好优秀设计、全优工程和五好建设项目的评选、表彰工作；（10）提前做好下年度重点项目的建设准备工作。

26日　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

口城市，并要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以下政策和措施：(1) 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天津、上海两市对每个项目总投资的审批权限放宽到3000万美元以下，大连市放宽到1000万美元以下，其他开放的沿海城市的审批权限放宽到500万美元以下。(2) 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外汇使用额度，在今后几年内天津每年为2亿美元，上海为3亿美元，大连为1亿美元。其他几个城市也要增加一定的额度。(3) 积极支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4) 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给予若干优惠待遇。这类企业，凡属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项目，或者外商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回收时间长的项目，报经财政部批准，企业所得税也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进口的生产和管理设备、建筑器材，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包装物料等，均免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5) 这几个城市，有些可以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这些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对外商所得合法利润汇出时免征汇出税。(6) 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所需进口的机械、设备和其他基建物资，不分外汇来源，1990年以前一律免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7) 各级计划部门制定“七五”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应把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安排。(8) 在改革方面应当走在前头。可以参照和逐步推进特区的某些成功经验。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

27日　赵紫阳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发表讲话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发表讲话，主要内容是：(1) 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在产品的生产、销售、原材料采购、技术改造和人事管理等方面，都可以考虑适当给企业一部分权力。如在计划管理上，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的前提下，应允许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安排一些生产。所生产的产品，超计划部分，应允许有一部分自销权。(2) 能源交通建设要大中小结合，长短兼顾。要坚定不移地建设一批投资大、周期长、具有战略意义的骨干工程。与此同时，要继续搞一些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保证我国经济在今后几年内能够持续增长。除了中央财力集中保一些大型项目外，要引导、鼓励、支持地方和部门多搞一些中小型能源交通项目。交通运输也要从综合效益、从多种运输方式去考虑。在“七五”期间，大同至秦皇岛长大列车的铁路干线必须修通。(3) 建筑、矿山井下、林业甚至搬运行业，用工制度现在就要改革，即减少固定工，积极推广轮换工、民工包工等多种用工形式。(4) 城市贸易中心在大中小城市可推广，农产品集散地也可以搞。先从消费品搞起。除了国家统一掌握的重要生产资料以外，其余的或计划外的，都可以参加到贸易中心去交换。(5) 要注意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价格体系没有大动的情况下，应采取以下一些办法：进一步完善利改税，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某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调整走小步，如适当调整生铁、南方人工造林地区木材的价格，农副产品要进一

步放开，增加市场调节的部分，有计划地减少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进一步搞好同农民的商品交换；农村税制要改造，适当调整新区老区的征购基数，从1985年起陆续实行。

29日　国务院批准乡镇企业统一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

财政部发布《关于对乡镇企业进一步减、免工商所得税的通知》。《通知》指出，经国务院批准，从1984年1月1日起，对乡镇企业征收的工商所得税，一律改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对不与大工业争原料、缴纳工商所得税确有困难、需要给予减税照顾的，由县、市税务局审查核实，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给予定期减免税照顾。对边境县、民族自治县（旗）的乡镇企业，全年所得额不满3000元，免征工商所得税；利用废水、废气、废渣作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的乡镇企业，从投产之日起给予免征工商所得税5年的照顾。新建的、独立核算的农村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如冷库、仓库的所得收入给予免征工商所得税2至3年的照顾。

4　月

2日　国务院批准将10所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将十所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请示报告》。这10所院校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国务院认为，重点建设这10所大学是贯彻中央关于把教育列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一项重要措施。这10所院校的建设要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编好设计任务书，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报告》要求这10所院校要认真进行整顿改革，精简机构，紧缩编制，提高效率，积极创造现代化大学的科学管理经验，为其他高等院校作出示范，尽快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为国家培养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高级建设人才和向国家提供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报告》提出应结合国家财力的可能，在上述10所院校之外，选择一批国家急需的、担负重大任务、学术水平较高、师资力量较强、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科、专业，也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有步骤地支持其发展。

5日　国务院就稳定和发展生猪生产问题发出指示

《指示》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生猪生产增加，肉食供应比较充足。但是1983年年末生猪存栏数比上年减少，特别是母猪减少较多。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生猪生产有可能下降。全国粮食连年丰收，生猪生产反而出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许多情况发生变化，而发展养猪的有些工作没有跟上去。《指示》对稳定和发展生猪生产提出了5项措施：（1）加强对生猪生产的指导。（2）坚持派购政策和奖售政策。（3）积极扶持专业户养猪。（4）大力发展饲料工业。（5）切实安排好猪肉市场。

7日　国务院决定对部分工业产品生产试行许可证制度

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条例》规定：凡实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的产品，企业必须取得生产许可证才具有生产该产品的资格。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企业必须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产品必须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产品必须具有按规定程序批准的正确、完整的图纸或技术文件；企业必须具备保证该产品质量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和计量、检验与测试手段；企业必须有一支足以保证产品质量和进行正常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及计量、检验人员队伍，并能严格按照图纸、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进行生产、试验和检测；产品生产过程必须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

8日　我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通讯卫星

我国发射一颗试验通讯卫星，16日成功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通讯、广播和电视传输等试验正常。这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发射通讯卫星，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和卫星通讯技术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5日—19日　西南四省（区）五方召开经济协调会

由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和广西组成的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在贵阳召开第一次会议。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议是跨省区、开放型的横向经济协调组织，不是一级行政机构。经济协调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自力更生、多方联合、国家支持、共谋振兴”的方针，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促进四省（区）五方的经济繁荣。这次会议制定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若干原则》，决定每年召开一次省区领导的高层次例会，商讨经济联合协作事宜，还商讨了交通、电力、煤炭基地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流通领域协作的意见，开展了经济技术协作。西南地区的经济联合从此起步。后来，西藏自治区和成都市也参加了这个经济协调组织，使这个组织成为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用这种各方平等互利、轮流坐庄、都有否决权的经济协调会议协调相邻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事物。

16日　陈云同志祝贺中国计划学会成立

贺信的全文如下：“中国计划学会：我祝贺学会的成立。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计划工作很重要，又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难度很大的问题。我们搞计划经济已经三十多年，不能说没有经验。经验应该好好总结，肯定和发扬成功的方面，否定和改正失败的方面。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总的原则，要具体化，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体制，还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探索，扎实工作。希望学会的工作取得好成绩，不负众望。”

国务院决定开征企业奖金税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发放奖金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发放奖金要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税利增加的前提下，发放奖金可以不“封顶”。取消奖金“封顶”后，实行奖金征税。企业全年发放的奖金总额，按超额累进的办法征收奖金税。在奖金的使用上企业有自主权。今后，国家对企业主要是控制工资总额（包括奖金）。以上作法，可以先在矿山、搬运、建筑行业实行，其他行业可选择一部分企业进行试点。

30日　海关总署等部门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监管和征免税规定

海关总署、财政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公布《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和征免税规定》。《规定》提出，按照合同规定作为外国合营者出资的、合资经营企业以投资总额内的资金进口的、以及合资经营企业以增加资本所进口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合资经营企业专为加工外销产品而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也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但加工后的出口产品转由国内销售部分，以及按计划进口供加工内销产品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均应照章纳税。合资经营企业出口的属于应征出口税的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的品种外，都免征出口关税。对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华侨同国内的企业共同投资举办的合资经营企业进出口的货物，除另有规定外，都比照这个《规定》办理。《规定》自5月1日起实行。

5　月

3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等部门认真抓好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的报告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认真抓好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1983年国营工业企业扭亏34.6%，全国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1个工业部门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国家规定的扭亏任务。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扭亏增盈工作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企业的亏损额仍然很大，二是盈利水平下降的局面尚未根本好转，三是有的企业政策性亏损掩盖着经营性亏损，盈利企业隐藏着产品亏损。为了切实做好扭亏增盈工作，报告提出要做好5个方面的工作：（1）加强对扭亏增盈工作的领导，坚决实行扭亏增盈首长负责制。（2）抓紧落实扭亏增盈任务。（3）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促进企业扭亏增盈。（4）狠抓亏损大户和盈利企业的亏损产品。（5）严肃财经纪律。

7日　天津港实行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港作为港口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实行“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从6月1日起实行。这是我国第一个以地方为主进行管理的港口。

8日　国务院颁布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

《决定》明确，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受污染和自然环境被破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务院决定：（1）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审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提出规划要求，领导和组织、协调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2）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包括小型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一切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工程建设和自然开发项目，都必须严格执行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的规定。正在建设的或者已经投产的项目，没有采取防治污染措施的，一律要补上。（3）对于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老企业，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经济管理部门作出决定，坚决进行整治，必要时下决心关、停一批。（4）采取鼓励综合利用的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发展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问题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国家经委《关于发展食品工业和发展饲料工业的汇报》。会议提出如下意见：（一）食品工业的产品，除了少数几种必需品外，应尽可能实行市场调节，首先是小食品应逐步把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要从政策上解决食品工业用议价粮而增加的亏损，如酿酒业用议价粮加价粮作原料，可考虑减半征税。在资金安排上，除按计划给各部门的以外，还应给食品协会划一点贴息贷款和外汇额度。（二）要大力发展饲料工业。“七五”期间需要安排建设资金15亿元，其中中央投资7亿元。现在国家每年平价供应30亿斤饲料粮，可以作为基数确定下来，今后不再增加。在此基础上扩大饲料生产，均以加价粮为原料，国家可考虑免征工商税；配合饲料厂应一律由集体办，用加价粮作原料，国家免征工商税。

10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

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10个方面向企业进一步放权：(1) 在生产经营计划方面，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和国家供货合同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安排增产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2) 在生产销售方面，除国家特殊规定不准自销者外，企业分成的产品、国家计划外超产的产品、试制的新产品等都可以自销。(3) 在产品价格方面，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的产品，一般在不高于20%或低于20%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属于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品，要执行国家规定价格，但企业可用计划外自销产品与外单位进行协作。(4) 在物资选购方面，对于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在订货时企业有权选择供货单位，可以和供货单位签订合同，直达供应，直接结合。(5) 在资金使用方面，企业可将留成所得的资金，按主管部门规定的比例，分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并有权自行支配使用；企业折旧基金的分配，从1985年起，企业留用70%；企业有安排技术改造项目的权力。(6) 在资产管理方面，企业有权把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出租和有偿转让。(7) 在机构设置方面，企业在主管部门核定的定员编制范围内，有权按照生产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8) 在人事劳动方面，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分别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厂级行政副职由厂长提名，报主管部门批准；厂内中层行政干部由厂长任免；企业可以从外单位、外地区招聘技术、管理人员；厂长（经理）有权对在职职工进行奖惩；企业有权在劳动部门指导下公开招工，经过考试，择优录用。(9) 在工资奖金方面，企业在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标准、工资地区类别和一些必须全国统一的津贴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选工资形式，厂长有权给有特殊贡献的职工晋级，企业对提取的奖励基金有权自主分配。(10) 在联合经营方面，在不改变企业所有制形式、隶属关系和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企业有权参与或组织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经营，有权择优选点，组织生产协作或扩散产品。

国家体改委印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国家体改委印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是国家体改委于4月16日至25日在常州召开的。《纪要》提出，要加

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步伐。简政放权，搞活企业，把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是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基础，是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会议代表认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应享有不同的自主权。开放市场，搞活流通，是促进生产，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重要前提。当前宜从建立贸易中心人手，着重抓好商业批发体制的改革。要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发挥城市组织经济的作用，必须对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改革。除少数大型骨干企业仍归中央有关部门管理外，其他中央和省属企业都宜下放给城市统一管理，这是改革城市计划管理体制的前提。为了改革和加强城市经济计划管理，应赋予城市必要的运用经济调节手段的权力。完善市领导县的新体制。加强小城镇的建设，更好地发挥小城镇的纽带作用。增加一批改革试点城市。除国务院批准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外，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可以自行选择一、两个中等城市进行试点。

11 日　劳动人事部等决定改革供销合作社劳动工资计划体制

劳动人事部、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商业部联合发出《关于改革供销合作社劳动工资计划体制和统计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按通知的规定执行。《通知》明确，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的精神，供销社已恢复为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因此，其劳动工资计划和统计一律改按集体所有制计划和统计管理。供销合作社原有全民所有制职工，继续享受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福利和职工调动等项待遇，保留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统计上应把他们在集体职工总人数中单独列出。现有计划外用工，已成为生产业务骨干和生产工作需要的，通过考核，择优录用为集体所有制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聘任制，不转户口，不转粮食关系；生产、工作不需要的和本人不符合条件的，要予以清退。今后由于生产、业务的发展需要新增加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时，按集体所有制劳动工资计划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颁布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是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机关。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的职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因水污染危害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以维护单位和个人合法的环境利益。该法还对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水污染防治的监督与管理制度和综合措施、对违反规定的处罚等作出了规定。该法自 198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流通体制改革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商业部《关于当前商业流通体制若干改革的报告》。会议提出：（一）要实行政企分开，商业可以先行一步。政企分开后，商业部不经营具体业务，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整个社会商业流通领域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二）为了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各省的二级站改为批发公司后，必须同市公司合并，由所在城市领导。（三）建立贸易中心后，一些商品的常年生产、季节销售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办法解决：一是由财政贴息，建立合理的国家储备；二是由商业建立自己的季节性储备，利息由商业

和工业双方负担，可以通过调整淡旺季商品出厂价、签订合同等办法加以解决。（四）改革小型国营商业零售企业的经营方式，要采取多种形式。特别是以劳务为主的服务、修理等行业，可以实行招标办法，所有制不变，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五）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国营商业企业，可以实行职务津贴（从企业奖励基金中开支）。

12 日　国务院决定提高发明奖和自然科学成果奖的奖金额

为了更好地鼓励科技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的创造热情，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务院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中规定的获奖项目的奖金数额由一等奖 10000 元，二等奖 5000 元，三等奖 2000 元，四等奖 1000 元修改为：一等奖 20000 元，二等奖 10000 元，三等奖 5000 元，四等奖 2000 元。新规定从 1984 年起实行。

15 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 5 月 15 日开幕，31 日结束。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有步骤地改革城市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国务院决定，从今年第 4 季度开始，进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具体做法是：合理调整产品的税率，增设资源税、增值税和几种地方税。在征收所得税后，区别不同情况征收调节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国营小型企业，可以实行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租赁经营，也可以依照集体企业的办法向国家交纳税金。在向国家照章纳税以后，企业对工资奖金的发放有自主权。（二）建筑业的改革，要围绕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提高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来进行。今后，凡是有条件的建设项目，都要签订投资包干协议，由建设单位对国家全面负责。凡是有偿还能力的项目，都要按照资金有偿使用的原则，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要制订鼓励节约的政策，由于提前竣工而节约的资金，应归承包单位。由于延误工期而多贷的资金，由承包单位负担。要积极推行以招标承包为核心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城市住宅区、新建工矿区及其公共设施工程的建设，由开发公司承包，按照城镇总体规划，统一办理土地征用事宜，进行设计和配套建设。要改革建筑材料供应方式，实行包工包料。与此同时，要允许一部分材料和设备实行市场调节。改革用工制度，要逐步降低固定工的比例，提高临时工、季节工的比重，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三）农副产品要有计划地减少统购派购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扩大自由购销的范围。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副产品，在保证完成国家收购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多渠道经营，允许长途贩运；一般农副产品的购销，更要随着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放活，随行就市，灵活经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加强对购销活动的引导和调节。供销合作社要变“官办”为“民办”，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四）在开放的沿海城市，外商投资办厂，在税收方面可以按照规定享受更优惠的待遇；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和引进技术的审批权限，简化外商入境手续；允许外商兴办独资企业，适当延长合资企业的合营期限，对确实提供了先进技术的产品，允许在国内市场有部分销售。

16 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 1984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坚持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特别是抓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按照保证重点、适当照顾一般的原则，集中必要的力量把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搞上去。进一步搞活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同时，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防止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保持财政、信贷收支基本平衡，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1984年计划的安排，仍然贯彻稳步增长、留有余地的原则，使地方、部门和企业有产可超，保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并避免在计划上留下较大的缺口。计划的总轮廓是：农业总产值增长4%；工业总产值增长5%；国民收入增长4.6%；财政收入1287.5亿元（不包括国外借款收入）；固定资产投资94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650亿元，更新改造投资290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60亿元；进出口总额816亿元；高等学校招生44.8万人。

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具体任务：（一）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大力促进农村商品生产。要争取农业生产全面发展，进一步合理调整内部结构，改善产品的品种、质量，提高商品率。（二）努力增加煤炭、石油、电力的生产，争取整个工业生产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稳步增长。（三）继续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四）安排好市场供应，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五）进一步对外开放，积极扩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六）加强智力开发，抓好科学技术研究，加快人才培养。

在计划工作和计划的执行方面，要注意抓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把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国家计划在做好全社会的预测和综合平衡的前提下，主要是管好重点建设的骨干项目和重要产品的生产。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凡是不属于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企业可以参照国家计划提出的方向，按照市场的实际需要和可能，自己确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的采购。属于指令性计划的产品，除国家特殊规定不准自销者外，企业在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指标之后，超产的部分可以全部自销。切实扩大基层生产单位的计划权和生产经营权，把经济搞活。国家对各部门、各地方的生产建设任务，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包干办法。在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同时，要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并加强全国的和行业的信息工作，引导各种经济活动沿着国家计划的方向前进。基本建设计划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多年经验，国家必须控制基本建设的总规模，但管理体制也必须加以改革。今后中央主要负责安排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骨干项目的建设，其他项目逐步下放给地方安排。同时，放宽项目的审批权限，简化项目的审批程序。凡是有偿还能力的项目，要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改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要推行投资包干制和招标承包制。通过改革，明确划分中央、地方、部门在基本建设方面的职责范围，适当扩大地方、部门在基本建设方面的管理权限，明确各自承担的经济责任，以促进建设工期的缩短、工程造价的降低和投资效益的提高。第二，加强管理，严格财经纪律。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对于各项经济活动，都必须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加强财政、税务、银行、审计、统计、工商行政等方面的管理和监

督，不能放任自流。特别是对主要的经济活动，必须竭力避免发生失控的现象。第三，努力提高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水平。第四，做好增收节支、扭亏增盈工作，保持财政、信贷收支基本平衡。第五，继续搞好企业的整顿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提高企业的素质。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财政决算和预算报告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84年国家预算安排的原则是：支持生产发展，活跃商品流通，加速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适当集中资金，加强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和智力开发，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继续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加强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确保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根据上述原则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1984年财政总收入为1338.5亿元，财政总支出为1368.5亿元。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30亿元。1984年的具体措施是：（一）大力促进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国家财政要在支持和促进生产发展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改进各项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方法，支持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的发展。大力促进能源的增产，千方百计地支持和促进“短线”产品和市场紧缺的名牌商品的增产，并支持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要继续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来抓，认真落实扭亏增盈的指标和措施，努力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二）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搞好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要通过这次改革，完全采取税收的形式，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基本固定下来。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将通过调整产品税的税率，使目前价格不合理的矛盾得到某些缓解，同时，利用税率的升降来调节和指导生产。在这一步改革中，将通过开征资源税，把企业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收归国家。还将通过恢复征收几种地方税，使地方财政有一些固定的收入来源。小型企业交纳所得税和承包费以后，剩余的利润留归企业支配。大中型企业则在交纳所得税和调节税之后，剩余的利润留归企业支配。为了更有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要逐步改革奖金发放办法。对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税利比上年增长的企业，奖金可以不封顶；对完不成国家计划和税利比上年减少的，奖金要减发或停发。企业发放奖金超过一定限额时，国家要征收奖金税。（三）继续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和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四）切实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严肃财经纪律。继续健全财政立法，做到一切都有法可依，依法理财。

国务院决定开展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工作

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土地资源调查工作的报告》。《通知》指出，准确的人口和土地数据资料，是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制订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这次开展土地资源调查总的要求是：全面查清我国土地的类型、数量、质量、分布、利用状况并作出科学的评价。调查工作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到1985年底，全国汇总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土地利用状况面积数据。第二步，到1990年，各地都要完成土地利用现状详查，开展土地评价，汇总出准确的各类土地数据资料。

17 日　国务院批准增加沿海开放城市外汇使用额度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外汇使用额度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拟在 3 年内，从国家拨出一笔外汇，增强这些城市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活力。除上海（每年 3 亿美元），天津（每年 2 亿美元）、大连（每年 1 亿美元）已有规定外，对其他 11 个城市的外汇使用额度，拟根据各城市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活动和消化能力，划为两档：第一档，每个城市每年 5000 万美元，有广州、福州、秦皇岛、青岛等 4 个城市；第二档，每个城市每年 3000 万美元，有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湛江、北海等 7 个城市。外汇额度由国家直接拨给各城市，从 1984 年开始，连续 3 年，可结转使用。购买外汇时相应的人民币资金，由地方自筹，实在解决不了或不足的，可向中国人民银行贷款。贷款利率按月息 2.1‰计息。

18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进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试点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认真搞好国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及附件《国营工业企业法（草稿）》。《通知》指出，在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积极改革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实行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厂长（经理）负责制，是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定在大连市和常州市的全部国营工业企业及京、津、沪、沈（阳）4 市部分国营企业中进行这项试点。《国营工业企业法（草稿）》对厂长、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的职责、权限分别作了规定。

23 日　胡耀邦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2 月上旬视察深圳时，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26 日　赵紫阳谈食品工业要加强行业管理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食品工业发展问题发表谈话。谈话的主要精神是：食品工业要加强行业管理。要按照这个方向来考虑建立组织。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家来办食品工业，一个部门垄断起来不行。食品生产要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一个是搞高档食品，开发新产品。这方面的要求在不断增加，很有发展前途。另一方面，要发展城乡人民需要的大众食品。这个市场潜力很大。食品工业大量分布在县以下的小城镇。除了发展传统食品以外，要注意大力开发新产品。搞市场调节放活以后，有一点重复生产也不要紧。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加强管理，让它们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发展。食品工业遍布城乡，大量在中小城镇。除了专卖的产品以外，哪个厂生产什么，不要由国家来定点。要加强专业协会的工作。专业协会不能放在哪个部门，成为部门的协会。要使它成为食品工业各个行业的服务组织、技术咨询组织。

30 日　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各专业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分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各专业银行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分工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基本建设贷款、技术改造贷款是两种性质不同、用途不同的资金。前者要适当集中管理，后者要适当放权。为了管好用好技术改造资金，促进企业实行改革、改组、改造，使三者密切结合，要充分发挥银行的重要作用，各专业银行，特

别是工商银行，要认真作好这项工作。《报告》提出，基本建设项目贷款，由建设银行负责办理；技术改造项目贷款由工商银行负责办理；固定资产投资使用的外汇贷款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由中国银行办理。

31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

海南行政区设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是一级地方国家机关。海南行政区政府归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1984年10月1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在海口市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

国家主席李先念签署主席令，发布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必须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发展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事业，根据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经济发展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确定地方内草原和森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的规定，可以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开辟对外贸易口岸，开展边境贸易。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

第一次全国工业性试验计划工作会议召开

国家计委在沈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业性试验计划工作会议，正式建立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我国工业性试验工作从此步入正轨。1982年5月，国家计委等部门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就提出：许多科技攻关项目须经工业性试验方能达到生产应用的程度。1983年5月，宋平同志指示，要落实工业性试验资金，“这笔资金不落实，工试工作不能开展，许多科研成果转化不成生产力。”从而肯定了工业性试验的地位。

沈阳会议以后，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积极扶持这一新事物的成长。为了推动省市一级工业性试验计划工作的开展，国家计委于1988年批准北京、湖南、河南3省市进行工业性试验基金试点，安排了一批工业性试验项目。在试点的基础上，天津、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河北等省市也纷纷从预算内投资中每年拿出一定数量资金安排工业性试验项目。

到90年代初，通过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计划的实施，安排了80条工业性示范生产线和37个工业性试验基地，总投资达24亿元。工业性试验促进了一批技术难度较大、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成果的转化，完成了一批需要完整配套技术、发挥整体效益才能推广应用的项目。

6　月

2日　国务院决定在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武汉市人民政府制定改革试点的十条实施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在不改变省辖市的行政隶属关系下，国家给予武汉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二）开拓市场，搞活流通，把省属商业二级批发站下放给市，实行站司合一，建立各种贸易中心；（三）建立综合交通网络，开发长江航运；（四）将武汉市列为外经贸口岸，有权直接对外经营，促进内外经济交流；（五）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加速企业改组联合，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组织联合体，打破企业、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界限；（六）加强智力开发，组织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实行科技、生产、教育相结合等等。上述方案争取在1985年全面推行。

6日　国家决定对纺织品实行按质论价

国家从1984年起对棉布、混纺布、化纤布等各类纺织品实行按质论价政策，以推动优质产品和新品种、新花色的发展。这项政策是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贯彻工业品按质论价政策的有关规定制定的。它的具体内容是：获得国家金质奖、银质奖产品及纺织部或省、市、自治区评出的优质产品可以加价，加价幅度分别为15%、10%和5%；新产品和工艺复杂、花色新颖、市场适销的纺织品，在现行出厂价基础上，价格可以向上浮动，浮动幅度不超过10%；对于花色陈旧、市场滞销的纺织品，价格可以向下浮动10%；质量低劣、缺经短纬、粗制滥造的产品，实行惩罚价格，把出厂价降到工厂无利以至亏损的水平。

10日　建设部等部门颁布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计委颁发《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对环境保护资金渠道规定如下：(1) 一切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指治理“三废”工程需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规定，并把治理污染所需资金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在建项目需要补做环境影响评价时，其费用应包括在该建设项目的投资——不可预见费用中列支。(2) 各级经委、工交部门和地方有关部门及企业所掌握的更新改造资金中，每年应拿出7%用于污染治理；污染严重、治理任务重的，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比例可适当提高。企业留用的更新改造资金优先用于治理污染。(3) 大中城市按规定提取的城市维护费，要用于结合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的综合性环境污染防治工程。(4) 企业交纳的排污费要有80%用于企业或主管部门治理污染源的补助资金。(5) 工矿企业为防治污染、开展综合利用项目所产产品实现的利润，可在投产后5年内不上交，留给企业继续治理污染，开展综合利用。工矿企业为消除污染、治理“三废”、开展综合利用项目的资金，可向银行申请优惠贷款。(6) 防治水污染，应根据河流污染的程度和国家财力情况，提请列入国家长期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逐项进行治理。(7) 环境保护部门为建设监测系统、科研院（所）、学校以及治理污染的示范工程所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按计划管理体制，分别纳入中央和地方的

环境保护投资计划。

28 日　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

《规定》明确，凡国营企业使用奖励基金发放的各种奖金都应缴纳国营企业奖金税。奖金税以企业为纳税义务人，职工个人不缴纳奖金税。奖金税按超额累进的办法计征。分级税率如下：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不超过标准工资两个半月的，免税；超过标准工资两个半月至四个月的部分，税率为 30%；超过标准工资四个月至六个月的部分，税率为 100%；超过标准工资六个月的部分，税率为 300%。标准工资以企业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工资等级、工资标准进行计算。企业自己调整的工资不包括在内。企业职工每人月平均标准工资不足五十元的，按五十元计算。下列奖金免缴奖金税：发给矿山采掘工人、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的奖金；按国家规定颁发的创造发明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自然科学奖；经批准试行的十种特定的燃料、原材料（有色金属、优质钢材、汽油、柴油、重油、原油、焦炭、煤炭、电力、木材）节约奖；外轮速遣奖；其他经国务院批准免缴奖金税的单项奖金。奖金税按年计算缴纳。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义务人发放奖金的情况进行检查。纳税义务人在纳税问题上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时，应先按税务机关的规定缴税，然后再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纳税义务人当年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不够缴纳税款、罚款和滞纳金时，应从下年度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中缴纳。

30 日　邓小平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发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谈话，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要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

国家计委等部门转发铁道部发展地方铁路若干问题的报告

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转发了铁道部《关于发展地方铁路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随着地方资源的开发，农村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城乡交流范围必将进一步扩大，对运输的需要更加迫切。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修建一些标准较低的铁路，作为国家铁路网的补充和地方运输的骨干力量，对活跃地方经济，加速资源开发，方便群众生活具有重要作用，是加快铁路网的建设，改善运输布局，提高铁路建设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地方铁路主要由地方

自建自营。投资应当继续坚持以地方自筹为主，国家酌情给予适当补助的原则。为了加快地方铁路建设，在一段时期内将铁路的收入，除缴纳统一工商税外，其余留作地方铁路发展基金，专用于地方铁路建设。

国务院批准矿山企业实行农民轮换工制度

国务院发布《矿山企业实行农民轮换工制度试行条例》，规定矿山企业所需劳动力，除技术复杂的工种外，应逐步实行农民轮换工制度。企业招用农民轮换工，从农村社队招收，双方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农民转换工在矿山工作期间是职工队伍的一部分，但其社员身份不变，户、粮关系不转。根据生产需要和保护劳动力的要求，农民轮换工的使用期限，一般为 3～5 年，到期必须轮换，不得延长。农民轮换工必须安排在井下采掘一线或井上需要轮换的生产岗位，不准借调从事其他工作或转为固定工。《试行办法》还对农民轮换工的工资、劳动保护、福利待遇等作出规定。

7　月

7 日—10 日　赵紫阳谈发挥老工业基地作用和钢铁工业发展道路问题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辽宁考察期间，就如何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问题和钢铁工业发展道路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一个上海，一个辽宁，是我国两个最大的老工业基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这样的老基地，要帮助它们进一步发展，应创造条件，改造老基地，振兴老基地。要坚持改革，加速技术进步，运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改造传统工业，把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要改造好辽宁这个老基地，首先必须做好规划，立足全国，通盘考虑，注意保持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冶金系统这几年成绩很大，但成绩是逼出来的，就是宝钢这么一压没钱了，无路可走，就逼出一条路，就是改造、挖潜、上品种、上质量、降低消耗，等等。在这个问题上，钢铁工业是有潜力的，依靠原有企业，走技术改造的道路，花钱不多，见效很快，周期很短。我国发展钢铁工业有两条路：一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尽量避免自己的短处，主要是个矿石问题。全国搞钢铁的办法要改，不能完全从矿石一直搞到轧钢，有些就可以进口矿石，有些应该从后边搞起。二是钢铁工业要坚决依靠原有基础来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不是搞一个企业丢一个企业。当然也要搞必要的改建扩建，使老企业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这样搞的结果，数量也会搞上去。我们的钢铁企业大小摊子不少，要在这样的基础上研究大的怎么搞，小的怎么搞，搞技术革新，走技术改造的路，这是一条比较多快好省的路。

12 日　国家计委要求进一步搞好国土规划试点工作

国家计秀发出《关于进一步搞好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规划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要搞立法，搞规划的指示，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国土规划试点工作。为了进一步推动试点工作，《通知》要求这项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归口管理。国土规划属于

长远规划性质。地区的国土规划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对象，以资源综合开发的总体布局、环境的综合整治为内容的区域规划，它是国民经济中长期计划的重要前期工作和基础工作。规划的目的在于求得规划区内的经济发展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使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国民经济中长期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为地区的开发编制出建设蓝图，从根本上为协调地、持久地发展我国经济和四化建设服务。国土规划主要包括：（1）确定本地区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和经济发展方向；（2）统筹规划区域内水源、能源、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3）在综合地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安排好人口、生产和城镇的合理布局；（4）搞好环境保护和环境整治，包括对自然灾害的防治。国土规划试点要有自己的特色，不断总结并逐步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法。

全国物价统计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物价统计计算方法

全国物价统计工作会议决定，从 1985 年 1 月起对物价指数的计算方法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职工生活费用指数由季报改为月报；向国家统计局直接报送物价指数的重点地区由原来的 29 市、26 县扩大为 107 市、76 县；计算职工生活费价格指数的商品目录统一精简为 330 种；将过去仅由大城市计算职工生活费价格指数扩大为大、中、小城市和重点县都计算。县除编制农村零售物价指数外，还编制农民生活费价格指数。

13 日　国务院决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

国务院决定从 1984 年 10 月 1 日起，在全国普遍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今后各地区、各部门不再批准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一律搞利改税。对于过去已经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企业，应区别情况，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1）经国务院或国家经委、财政部批准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企业，凡是已经到期的，应改按利改税办法执行；尚未到期的，继续执行原办法，但到期后必须改过来。（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企业，要进行一次清理，已经到期的应改按利改税办法执行。尚未到期的，如搞得比较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比较合理，到期后再改过来，但要报国家经委、财政部批准；如分配不合理，各方面看法不一致的，应尽快改过来。（3）地、市、县人民政府自行批准搞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应当坚决改过来，实行利改税办法。（4）凡是经过批准继续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企业，从今年四季度起，应按照新的税收条例，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资源税。

14 日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改革城市商业体制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权力，加强行政管理。把商业的经营权力交给企业，并扩大企业的计划、财务、物价、人事、工资、奖惩等权力，改变政企不分的状况。把商业部和各级商业厅局直属的日用工业品批发企业下放到市，按照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要求，组织商品流通。部管计划商品范围适当缩小，工业品由现在的 39 种减为 26 种。（二）改革日用工业品一、二、三级批发层次，部、省属批发站与市批发公司合并，组成一套独立经营和管理的批发公司。城市国营商业的批发业务，归批发公司统一管理。（三）建立城市贸易中心，逐步形成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体制。贸易中心是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实行开放式经营，计划外、非计划商品，都可以进入贸易中

心，自由购销。国营商业批发公司既是贸易中心的主体，也是它的后盾。（四）把国营商业中的小型企业进一步放开。国营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小型国营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或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五）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同步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六）凡是由各级政府和物价主管部门规定的零售价格和收费标准，必须严格执行；凡是政策允许实行浮动价格和企业协商定价以及议价的商品，可按规定的计价原则自定价格。

19 日　国家体改委等部门提出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1）发展多渠道流通。要发展国营、集体、个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实行多渠道流通。要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吸引农民从事商品交换。对农民的经商活动，不能采取限制的办法。要因势利导，使之成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一支重要补充力量。（2）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继续减少统购、派购品种。将商业部系统管理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 21 种减为 12 种，派购由 18 种减为 9 种。中药材派购品种由 30 种减为 24 种。对林产品中的小材小料和竹木制品，全部放开，多渠道经营。同时，开放一部分木材市场，组织农民调剂余缺。派购的 8 种海水鱼，也要逐步放开。国家规定的统购、派购任务，必须落实到生产单位，一定几年不变，由有关收购部门同生产单位签订购销合同。（3）改进价格管理办法。凡是计划内的，都要执行计划收购价格。计划外的，实行议购议销，随行就市，有升有降。（4）改变农副产品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一收购和供应的批发体制，砍掉不合理的经营环节。要逐步建立农副产品贸易中心和批发交易市场，实行开放式经营。要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逐步建立储备基金。（5）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把立足点转到扶持农村商品生产上来，逐步建立起商品生产服务体系。（6）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全民、集体、个体一齐上。（7）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经营设施，合理组织现有的社会运输工具，以市、县为单位组织联营。

24 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汇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汇报时指出，计划体制改革主要改革两个问题：一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二是扩大市场调节以后，为了便于企业的活动，避免同宏观经济发展需要发生大的矛盾，必须采取经济手段进行宏观管理。

25 日　国家改革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办法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部发出《关于改革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办法的通知》。《通知》决定改革 1977 年以来国务院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管理办法；取消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指标，对各单位也不再实行限额控制。缩小专项控制商品的范围，由现行的 31 种缩小到 14 种，其余解除专项控制。下放审批权限，简化手续。除小汽车、大轿车等几种价值昂贵的商品审批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以外，将大部分专控商品下放给主管局和地、市、县人民政府审批。《通知》要求各部门、地区反对铺张浪费，继续加强管理。

26日　国家计委办公厅下发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的计算方法

国家计委办公厅印发《关于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计算方法》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次计算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通知》指出，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对实现2000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在制定计划时，比较客观地反映和科学地计算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制定了这个计算方法。这个计算方法自4月发出征求意见稿以来，陆续收到各地区、各部门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对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改。请各地参照修改后的方法进行试算。这个文件主要提供了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采用增长速度方程进行计算；另一种是采用资金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计算。

30日　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我国第一条高原铁路干线——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通过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决定自即日起交付兰州铁路局使用。这条铁路全长867公里，穿越柴达木盆地和察尔汗大盐湖。

8　月

3日　国务院批准大力发展商办工业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大力发展商办工业的报告》。商办工业在食品工业中占很大的比重，是农副产品加工的一支重要力量。针对目前商办工业的发展同人民生活需要不适应的状况，《报告》提出，要改革商办工业的管理体制。在保持商办工业自身特点的同时，按工业的办法进行管理。要根据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逐步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或转为集体所有，或者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在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基础上，实行企业内部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对商办工业在税收、固定资产折旧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加速商办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实行扶持政策后增加的利润，应主要用于企业技术改造。

4日　国务院讨论通过食品工业发展纲要

国务院讨论通过国家经委提出的《1981年～2000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这个《纲要》宣布：到2000年，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将达到3000亿元，比1980年翻2.3番，食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将从1980年的11%上升到15%；城乡居民食品工业制成品消费支出，将占食品消费总支出的50%以上。《纲要》规定：从1981年到2000年，消毒奶、奶制品、豆制品、蛋制品产量将增长20倍以上；婴幼儿食品、啤酒、饮料产量增长15倍以上；肉类制品、精制面粉、面包及其他面制品水果蔬菜制品产量增长10倍以上；淀粉、水产制品产量增长六倍以上；调味品、罐头、食糖增长3.5倍以上；糕点、茶叶、糖果、原盐、卷烟、植物油、屠宰及肉类加工量增长1倍以上。膳食构成中动物蛋白和豆类蛋白各占蛋白质总量的比重，要从1980年的不足10%分别增加到20%和25%。食品的贮藏、保鲜、运输和加工条件要大大改善，果蔬、水产品等鲜活原料的损失率降低到5%左右。

6日　国务院批准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

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国务院在《通知》中指出，要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合作金融组织。为此，《报告》提出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1) 恢复信用社合作金融的性质。(2) 加强信用社经营上的灵活性。(3) 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4) 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5) 建立信用合作社的县联社。(6) 农业银行要在正确贯彻执行农村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审核信用社的业务计划，核定信用社的基准利率和浮动幅度，做好信用社干部的考察和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信用社的政策领导和业务指导。

1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城镇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家物价局关于解决城镇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的汇报。会议确定，粮食收购价格可以实行"倒三七"比例计价（即30%按牌价，70%按超购价），比例可以下浮，但不能上浮，原则同意从1985年起取消棉花奖售粮，取消奖售粮减少的财政支出，可用于提高肉食品收购价格。

11日　国务院讨论汽车工业发展问题

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汇报，进一步讨论了发展汽车工业的有关问题。会议提出：(一) 汽车工业的规划和发展，起点要高，步子要大。一是组织专业化，大批量生产；二是进口一些散装件在国内组装，多提供一些优质价廉的运输车、农用车和出租车，以缓和供需矛盾，控制盲目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二) 发展汽车工业要立足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不仅要把产量搞上去，而且要把水平搞上去。(三) 要以大的骨干企业为主搞好联合，在全国自然形成几大汽车公司。(四) 以中汽公司为主，搞一个"中国汽车行业协会"。今后全国性的大公司不再搞。中汽公司要搞好行业规划、行业管理。(五) 要给"一汽"、"二汽"等骨干企业很大的自主权，让他们放手发展。"一汽"、"二汽"在国家计委单独立户。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种质库在北京建成

这座国家种质库设在中国农科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它可以贮藏15万份种子，至少能在30年内使其保持较高的发芽率，这将对我国种质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利用产生深远的影响。全国拥有作物品种资源30万份，进入世界前列。

14日　计划工作座谈会提出要转变计划思想和计划方法

国家计委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23日结束。会议提出，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在计划思想和计划方法上要实现以下转变：在计划体制上，从集中过多，管得过死，忽视市场调节作用，转到管住管好大的方面，放开放活小的方面，自觉利用价值规律，重视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上来。在建设方针上，从过去相当长时期里过多地追求新建，真正转到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改建扩建为主上来。在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关系上，从现在结合得还不紧密，进一步转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来。在财力物力的平衡上，从过去主要考虑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国家统配物资的

分配使用，逐步转到做好全社会资金和资源的分配使用和平衡上来。在计划体系和方法上，从编制年度计划过于繁琐，转到简化年度计划编制程序与方法，以主要力量用于编制中长期计划上来。

16日　国务院确定三线企业调整方案

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关于三线企业调整方案的汇报。会议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方案：(1) 三线军工企业要转为军民结合型的企业。民品生产和出口纳入各级计委的统一计划。(2) 要选择一些条件好、能够承担新的任务的三线企业，进行必要的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使他们在“七五”期间和以后发挥作用。要打破军工、民用和部门、行业的界限，搞好规划，组织他们生产当前市场急需的产品。(3) 三线企业调整所需的资金要采取多种办法解决。(4) 不再保留小三线军工生产体系，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要转产，转不了，办不下去的企业要停办。

18日　国家计委简化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手续

国家计委发布《关于简化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手续的通知》，将需要国家审批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审批程序，由五道手续简化为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两道手续。凡列入长期计划或建设前期工作计划的项目，应该有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凡列入五年计划的项目，应该有批准的设计任务书。《通知》对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的主要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30日　中国工商银行开办科研开发和新产品试制开发贷款

为了促进科研体制改革，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试制开发新产品，推进技术进步，中国工商银行决定开办科研开发和新产品试制开发贷款，并发出《关于科研开发和新产品试制开发贷款的暂行规定》。《规定》提出，凡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实行独立核算，拥有一定的自有流动资金的科研单位、企业和科研生产联合体，在研究、仿制、消化新技术，试制开发新产品，推广应用新技术成果的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均可分别不同情况，向当地工商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和信托贷款。申请科研开发和新产品试制开发贷款，必须具备下列条例：(1) 投资少、见效快、有经济效益和还款能力。(2) 工艺先进、技术实用、产品有发展前途。(3) 原料、设备和设计施工条件落实。科研开发和新产品试制开发贷款的各项贷款利率，分别按照相应的流动资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或信托贷款等所规定的利率办理。《暂行规定》还对这些贷款的用途、还款期限等作出规定。

31日　国务院批转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意见

国务院批转机械工业部《关于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报告》的《通知》中指出，改革后的机械工业部，是国务院统管全国机械行业的职能部门，主要是管好有关机械工业的方针政策、统筹规划、综合平衡、组织协调和监督服务。除军工部门外，国务院各部门的独立机械工厂，都要下放，在当地注册、纳税。随着机械工厂的下放，管理机械工厂的机构相应撤销。现有公司，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该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的改为企业，都要真正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要赋予机械工业部必要的经济调节手段，保证有效地进行行业管理。机械工业部的《报告》

提出，改革的目的主要是把全国机械工业统一组织起来，解决条块分割、分散重复的问题；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发展专业化生产，解决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实现上质量、上品种、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为四化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任务。改革的设想总的是：以政企分开和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实现“两个过渡”，发展“两种横向联系”，即；各级机械工业部门由主管企业过渡到管理好全行业，城市的政府由直接管企业过渡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发展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形成多种形式的联合，发展制造和使用单位的横向联系，促进设备和工艺的密切结合，更好地为使用单位服务。

9　月

12 日　国务院颁布科技进步奖励条例

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奖励条例》。《条例》规定奖励的范围包括：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广、采用已有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科学技术管理以及标准、计量、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等。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国家级和省（部委）级。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三等：一等奖，发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奖章和奖金 15000 元；二等奖，发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奖章和奖金 10000 元；三等奖，发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奖章和奖金 5000 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特殊贡献的科学技术进步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授予特等奖，其奖金数额高于一等奖。《条例》还对评审程序、奖金发放，以及其他有关事项作出了规定。

15 日　国务院批转外贸体制改革意见

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1) 政企分开，加强对外贸的行政管理。外贸实行政企分开以后，经贸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厅专司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外贸企业独立经营进出口业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外贸易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2) 简政放权，充分调动外贸企业的经营积极性。经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其他部门的外贸公司和地方的外贸公司，都要逐步从原来所属的行政部门独立出来，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3) 进口经营原则上全部实行代理制。(4) 改革外贸计划体制，简化计划内容。出口计划方面，今后国家只下达出口总额指标和属于国家管理的主要商品的出口数量计划，其余出口商品都由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自行决定。进口计划方面，用中央外汇进口的，少数几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引进项目，由经贸部根据国家计划按商品、项目下达计划，其余进口均不再下达分商品的进口计划。(5) 改革外贸财务体制，加强经济调节手段。各类外贸企业要实行利改税，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出口商品在出口时，除原油和成品油外，其余商品一律退还生产环节的生产税和增值税。对于进口盈利的商品，除国家批准免税的以外，一律照章征收关税、工商税；对少数盈利大的进口商品，要调高进口关税税率。

国务院成立电子振兴领导小组

国务院印发《关于成立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必须有重点地发展新兴产业。在现代新兴产业群中信息产业是最重要、最活跃、影响最广泛的核心因素。应当把电子工业摆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坚决地搞上去。为了加强对电子和信息事业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地推动这项工作，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改为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担任，吕东、宋健、赵东宛、聂力、江泽民任副组长。

18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和发布试行有关税收条例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国务院批准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批准颁布财政部制定的《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国务院在批转财政部《报告》时指出，第二步利改税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改革，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用税的形式固定下来，较好地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为落实企业自主权提供了必要条件，使企业逐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这件事切实办好。国务院同意财政部的这两个报告自 1984 年 10 月 1 日起试行。

《办法》的主要内容是：(1) 将现行的工商税按照纳税对象，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盐税和营业税；将第一步利改税设置的所得税和调节税加以改进。对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照 55%的固定比例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对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按照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后，应按照核定的调节税税率，计算缴纳调节税。增加资源税，先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征收资源税，其余的暂缓开征。(2) 核定调节税税率时，以企业 1983 年实现的利润为基数，经过调整之后，作为核定的基期利润。基期利润扣除 55%计算的所得税和 1983 年合理留利后的部分，占基期利润的比例为核定的调节税税率。(3) 国营小型盈利企业，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以后，一般由企业自负盈亏，国家不再拨款。但在核定基数时，对税后利润较多的企业，国家可以收取一定数额的承包费。(4) 营业性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和饮食服务企业，都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5) 军工企业、邮电企业、民航企业、外贸企业、农牧企业和劳改企业，暂不按本办法缴纳所得税和调节税，但应按有关规定缴纳其他各税。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国家平均每年对企业让利约 30 亿元，企业总的留利水平有所提高。

同日，国务院还发布了与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相配套的产品税、增值税、盐税、营业税、资源税、所得税条例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税办法。

说明　已被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代替。

国务院决定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

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1) 今后新建项目都要实行投资包干制。(2) 要改革单纯用行政手段分配建设任务的老办法，实行招标投标。由发包单位择优选定勘察设计单位、建筑安装企业。(3) 各部门、各地区都要组建若干个具有法人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工程承包公司，并使之逐步成为组织项目建设的主要形式。(4) 城市综合开发公司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开发区的建设规划。(5) 勘察设计要向企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全面推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6) 实行鼓励承包单位节约投资，提前投产的政策。(7) 建筑安装企业要普遍推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8) 国家投资的建设项目，都要按照资金有偿使用的原则，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贷款实行差别利率。(9) 改革建筑材料供应方式，逐步由物资部门将材料直接供应给工程承包单位，由工程承包单位实行包工包料。凡是计划分配不足部分，允许采购议价材料。(10) 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承包单位即可委托设备成套公司或直接向生产厂进行设备选型、询价等，设计文件批准以后，即签订正式设备承包供应合同。(11) 今后需要由国家审批的项目，国家计委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12) 国营建筑安装企业要逐步减少固定工的比例，除必需的技术骨干外，原则上不再招收固定工，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增加合同工的比重。(13) 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扩大商品化住宅的建设。(14) 实行征地由地方政府统一负责的办法。

说明　主要内容与1997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9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不相适应。

19日　国务院讨论“七五”计划建设方针问题

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七五”计划建设方针问题。(1) 整个“七五”期间以至“八五”前期，要坚决把投资的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现有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改建扩建上，凡是能在现有基础上改建、扩建增加生产能力的，就不要搞新建。但关系经济全局的重点项目，还是要上一些。(2)“七五”期间，必须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食品工业，家用电器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以及建筑建材工业，很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的支柱产业，要加强改造，保持我们的传统优势。发展消费品生产，要着重在质量、品种方面下功夫，要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对一些市场紧俏的商品，国内相当一个时期生产又跟不上，可以有计划地进口零部件组装。在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时，要重视机械制造工业，特别是纺织机械、轻工机械制造厂的改造。(3)“七五”期间，要继续搞好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的重点建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要突出电力的建设，围绕电的发展来通盘考虑能源、交通建设问题。

"七五"期间，保证新增装机3000万千瓦。电力工业的发展，要贯彻大中小结合、近期与长远兼顾的方针，千方百计多安装一些机组，多发一些电。交通运输结构应当是陆运、水运、空运、河运、海运、公路、铁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搞好联运。除了铁路运输外，内河航运和海运也应加强。"七五"期间，要提高公路货运量在整个运输中所占的比重。要因地制宜发展空运。(4) 面对世界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七五"期间，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必须相应采取对策，积极地、合理地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迎接新的形势。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应多发展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上海要在这方面多下力量。必须不失时机地运用新兴技术，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所有的城市和集镇，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搞基础设施，放在"第三产业"上。(5) 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的国策。我们应注意从国外引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积极加以消化吸收，不要急于在短期内什么都"国产化"。某些关键的、专业性的设备，可以进口。在国内，要加强横向联系。

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森林法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这个法是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制定的。《森林法》规定，除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森林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进行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开采矿藏，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占用、征用林地面积2000亩以上的，报国务院批准。本法自1985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批准改革骨干统配煤矿管理体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煤炭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请示》的主要内容：(1) 从1984年开始，将外调煤炭量大，对国民经济起重要作用的山西、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5省的29个骨干统配煤矿和相应的管理机构、煤矿设备制造厂及设计、科研、教育等单位和株洲洗煤厂划归煤炭部直属。煤炭部直属煤矿的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比重将由19%上升到45%，煤炭净调出量由13%上升到86%。(2) 对国家统配和重点煤矿由目前按吨煤提取维简费的办法改为按固定资产提取折旧的办法。对由折旧基金和维简费中征收的能源交通建设基金，从1984年起如数返回，以利于煤矿的技术改造。(3) 除了财政已经给予补给的12个煤矿城镇外，对划归直属的新汶、兖州、鹤壁、韩城，七台河、大雁、扎赉诺尔等城镇也给予补助。

29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决定基本建设项目实行投资包干责任制

国家计委、城乡建设部、劳动人事部、建设银行联合发布《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办法》。《办法》指出，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是指建设单位对国家计划确定的建设项目按建设规模、投资总额、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和材料消耗包干，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管理责任制，是基本建设管理的一项改革。实行投资包干的项目，必须有经过批准的设计文件，并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具体条

件，可采取不同的包干形式。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要实行招标，择优选择有关承包单位。包干指标确定后，一般不得变动。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在包干投资总额范围内，有权根据工程进度对单项工程的资金使用进行统筹安排，不受年度的限制。包干后节余的投资，全部作为企业收入，可用于职工个人的分成收入。提前投产期间实现的利润，由生产筹建单位和项目承包单位分成。没有履行承包协议，超过投资包干指标，其损失由责任方负责，要追究失职人员的法律责任。

10 月

4 日 国务院批准改进计划体制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提出了 12 条改革措施，主要包括：(1) 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范围。在生产计划方面，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收购和调拨，规定指令性指标，超过收购计划部分全部放开，其他农产品实行市场调节。主要工业品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只对国家统一分配调拨的重要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并由国家做好主要生产条件的衔接。对国家下达指导性计划的产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计划指引的方向，根据原材料、能源的可能和市场需要自行安排生产和销售。国家不下达计划的产品，实行市场调节。国家对全国铁路货运量、港口吞吐量、邮电业务总量等指标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重点物资的铁路运量、部直属水运货运量、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实行指令性计划。(2) 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方面，下放计划管理权限，扩大部门、地方和企业的计划自主权，放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权限。非生产性建设项目、3000 万元以下的生产性建设项目，由地方、部门自行审批。从 1985 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内拨款安排的建设项目，都改为银行贷款。技术改造项目，国家计委审批限额由 1000 万元提高到 3000 万元以上，经国家计委批准了总体改造规划的大型骨干企业，其单项工程可不再报批。放宽自筹投资的计划管理权限，当年使用的自筹投资，要做到提前半年存入建设银行，除用于能源、交通、学校教学设施、医院医护设施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外，要征收建筑税。简化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手续，由国家计委审批的大中型项目，今后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3) 在利用外资、外汇方面，地方、部门和一些城市利用外资建设的项目，审批权限分别放宽到 500 万至 3000 万美元以下。使用国家外汇和自有外汇的技术引进项目，500 万美元以下的由各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审批。(4) 在物资分配计划方面，国家只对部分煤炭、钢铁、木材、水泥等少数重要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制度。(5) 在商业、外贸计划方面，国家对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行指导性计划，对人民生活必需的重要商品的收购和调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进出口总额和主要进出口商品实行指令性计划。(6) 改革劳动工资计划。企业的工资总额，根据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和经济效益的好坏，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增加或减少。(7) 在文教卫生方面，各高等院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接受委托培养或联合办学。(8) 实行多种形式的计划承包

责任制。钢材、煤炭等物资和某些商品的调拨指标，分别对部门、地方或中心城市试行多种形式的包干责任制。对重点工业企业逐步试行产量递增包干办法。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重点建设，对部门和地方逐步实行投资大包干。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实行招标承包责任制。(9) 加强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下放计划管理权限以后，各级计委要着重抓好全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外汇的平衡，安排好经济发展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发展重点、地区布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和农轻重、积累消费等主要比例关系。简化年度计划，建立起长、中、短期计划与专项规划相结合的计划体系。(10) 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11) 加强经济信息管理，搞好国民经济预测。(12) 制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和管理条例。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赞同冶金系统实行投入产出包干

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冶金工业部汇报时指出，冶金部不宜改为全国性的总公司，可实行某种投入产出包干的办法，即国家拨给冶金部一定的投资，冶金部向国家负责增加多少生产能力、调出多少符合品种和质量要求的产品，上交多少利税等。这种办法是计划方法上的改革，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总承包。为实现 1990 年冶金工业要达到的目标，冶金工业要坚持依靠现有企业，走挖潜改造的路子。老企业要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搞改造，在品种和质量上瞄准世界的先进水平，不然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就没有出路。企业是真正的承包者，要把责任、担子压到企业身上，同时利益也要给企业，使企业真正享有和行使必要的自主权，把企业搞活。要打破条块分割，以矿山分布为中心，实行地区间和企业间的各种形式的联合。

国务院批准一些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关于对一些城市要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认为，少数经济地位特别重要的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对促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是有好处的。但计划单列的城市不宜太多，除原已批准的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四个城市之外，还可同意 60 年代曾实行过计划单列的哈尔滨、广州、西安三个省会城市恢复计划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今后，其他城市一律不再批准实行计划单列。

6日　邓小平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 800 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 30 到 50 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对内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 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 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

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

7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开工建设

标志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向新高峰发展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举行奠基典礼。邓小平等同志参加奠基典礼，为基石培土，祝工程如期完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之一。它是一台可以使正、负两束电子束在同一个储存环里沿着相反的方向加速，并在指定的地点发生对头碰撞的巨型机器。这台对撞机的开工建设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表示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基地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正在向着新的高峰发展。目前世界上已经运行和正在建造的对撞机和同步辐射装置共有40余台，我国计划在1988年建成的这台对撞机，出束能量各为22亿至28亿电子伏，由五大部分组成，即：注入器、储存环、探测器、同步辐射实验区和计算中心。它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一机两用，应用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充分吸收国外经验，反复进行探讨和论证的基础上独立设计的。它既可以用来进行探索微观世界的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也可以在许多领域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生产服务。建成后，将使我国进入世界高能实验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的先进行列。

8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

《办法》规定，信贷资金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原则。统一计划，就是各专业银行的人民币信贷资金，必须全部纳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综合平衡，并核定各专业银行信贷资金计划和向人民银行借款的计划。划分资金，就是各专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和其他各种信贷资金，经人民银行总行核定给各专业银行总行后，作为各行的营运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实存实贷，就是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改变计划指标层层下批的管理办法，实行上贷下存的实贷实存的办法。相互融通，就是允许资金的横向调剂，搞活资金。一个地区的资金融通，主要是依靠该地区各银行之间的相互拆借。这个办法自1985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计委等部门决定地方煤矿建设实行招标承包

国家计委、煤炭部颁发《实行招标承包建设地方煤矿的几项规定》。《规定》指出，为了加快地方煤矿的发展，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采取招标承包的办法，在资源条件好、办矿积极性高、运输较方便的地区建设一批中、小地方煤矿。这对增加国家煤炭分配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资金只限用于地方煤矿新井、改扩建井和相应的重点配套公用工程。主要用于建设地方国营煤矿，也可用于集体煤矿建设。中、小结合，以小为主。用于集体煤矿建设，以无息贷款方式投放，从新增能力得的利润中分年度收回。《规定》对地方煤矿建设中的投资效益、井型、煤种、运输条件、煤价、原材料供应、上调的煤量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11日　国务院批准扩大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

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扩大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的报告》。

国务院在批转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给个人，是逐步推行住宅商品化，全面改革我国现行住房制度的重要步骤，要不断总结经验，为在全国全面开展这项工作创造条件。建设部的《报告》中指出，经国务院批准，1982 年在常州、郑州、沙市、四平 4 个城市进行了新建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项改革涉及面广，难度较大，为了稳妥起见，建议先在一部分城市扩大试点，以便继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为将来在全国推广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报告》要求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计划地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住宅售价要考虑职工的支付能力。个人购买住宅，原则上支付售价的 1/3。个人购买住宅应免征房产税和契税。各单位建造住宅向个人出售，不计算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内。工商银行要举办建房储蓄、贷款业务。

13 日　国务院允许农民进入集镇落户

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粮食部门要做好加价粮油的供应工作，地方政府要为他们建房、买房、租房提供方便，工商管理部门要做好工商登记、发证和管理工作。对到集镇落户的农民，要事先办好承包土地的转让手续，不得撂荒；一旦返乡的应当准予迁回落户，不得拒绝。大城市郊区的集镇，如何解决农民到集镇落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19 日　国务院批准中国石化总公司改革方案

国务院批转中国石化总公司《关于进一步推行改革，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案》。《方案》中提出：在实行第二步利改税的基础上，由总公司对国家实行税后留利盈亏责任制，国家赋予总公司相应的经济管理自主权。在 1985 年至 1990 年 6 年内，税后留利盈亏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1）“四定”。定产出，6 年内累计实现利税总额为 900 亿元；定投入，6 年内累计完成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 300 亿元；定税种、定税率，总公司的调节税率为计征所得税利润的 20%，留利率为 25%。（2）总公司向国家实行“四包”。包财政上缴；包主要产品产量；包新增的技术开发、智力开发和新产品试制等开发基金；包产品质量。（3）国家要对总公司“四保”。保生产原料、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保生产建设必需的资金；保统配材料和设备；保生产发展所需的人力。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落实总公司自主权。计划管理方面，总公司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国家将年度计划的总指标和投资方向下达给总公司，由总公司具体安排各个项目的计划。财务管理方面，总公司一个口对财政部，所得税、调节税由总公司统一向国家结算；用高价原油生产的油品价格，由总公司管理。超产油品和高价油品出口所得外汇额度，全部留给总公司。人事劳动和工资管理方面，除国家统一进行的工资调整外，总公司有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税利增长情况，进行自费工资改革，自行确定工资形式和奖励办法。基本建设方面，基建项目实行投资包干承发包制。产品销售方面，总公司统一管理全公司的产品销售，统一经营石油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外贸管理方面，总公司统一经营全公司

的外贸业务，享有外贸自主权。物资供应方面，总公司在完成国家分配计划的前提下，可用超计划产品与有关部门调剂物资余缺，也可以向原材料生产企业投资，取得所需的原材料。

20日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使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同时，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根据历史的经验，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应作如下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现有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

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

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制订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的方案；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汇集和传布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订并监督执行经济法律，按规定的范围任免干部，管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等。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实行政企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

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只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

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改革的步骤要积极而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准一条改一条，看不准的先试点，不企图毕其功于一役。

22 日　邓小平谈我们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谁也改变不了

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改变不了。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翻两番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 万亿美元。这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 30 年到 50 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我们要翻两番，而且到翻两番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新的目标，这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在本世纪最后的 16 年，无论怎么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占主体。这次的文件好（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编者注），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决定》最重要的是第九条。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讲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成功不成功就看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

26 日　邓小平谈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

27 日　国家经委等部门提出发展沿海地区轻纺产品出口的意见

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发展沿海地区轻纺产品出口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使轻纺产品更加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计划对 1100 多个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除了传统的技艺外，要采取多种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轻纺产品的生产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上。为鼓励和扶持轻纺产品出口，在政策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对轻纺产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逐步改行增值税；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实行优惠贷款；增加流动资金；在资金、物资上扶持轻纺工业原料基地建设。

11　月

1日　邓小平谈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现在需要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设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3日　国务院要求加快发展保险业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实践证明，保险是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一个好办法。各级领导要关心和支持保险事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保险公司要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管理体制，扩大服务领域，提高经济效益，为“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6日　国家计委确定近三年以工代赈扶贫工作目标

根据中央关于动用一部分库存粮、棉、布帮助贫困地区修建道路和水利工程的指示，国家计委决定：自1984年冬季开始，在3年内，从商业库存中拿出粮食100亿斤、棉花200万担、棉布5亿米（以上3项折人民币大约27亿元），拨给贫困地区，重点是严重缺粮、缺衣被和交通十分闭塞的县、乡，主要用于修筑由县到乡（区或公社）以及乡到农副产品集散地的道路，整修可以通航的河道，以及修建一些中、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

8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提出加强外汇兑换券管理工作意见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财政部、对外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外汇兑换券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外汇券的管理，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结合新的情况，提出如下措施：(1) 严格控制外汇券的使用范围。除为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海员等供应商品和提供劳务，以及其他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的商品或费用外，其他场所和内销商品不得强收外汇券。(2) 严格控制外汇券的使用对象。(3) 调整、缩小两种价格商品的范围和差价。(4) 清理和调整现有收券网点。(5) 必须认真执行外汇券回笼制度。(6) 必须认真执行外汇券结汇制度。(7) 加强市场管理。(8) 国内居民如将持有的外汇券拿到银行兑换人民币，银行可不追究其来源。

10日　国务院批准改革工程设计管理体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工程设计改革的几点意见》。《意见》提出：(1) 国营、集体和个体设计并存，开展竞争。工程设计队伍应以国营设计单位为主体，允许集体设

计单位和个体设计并存。今后的工程建设，都要创造条件由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或者委托工程承包公司进行设计招标。(2) 促进设计技术进步，积极推进同国外合作设计。今后老厂改造、改建、扩建和新建的项目，都要结合国情，在设计中采用经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已经普及的技术。(3) 实行企业化，增强设计单位的活力。国营设计单位要根据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实行企业化，逐步脱离部门领导，政企职责分开，实行社会化。暂不实行的，可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的办法。(4) 逐步实行专业化和社会化。各设计单位都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自己的主专业，拥有自己“名牌”设计和技术“诀窍”。(5) 发扬技术民主，繁荣设计创作。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时，提倡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从中选择最佳方案。凡取得优秀设计称号的工程项目，可给予奖励。(6) 组建工程咨询公司和工程承包公司。工程咨询公司以工程建设前期工作的经济技术咨询、可行性研究、项目评价以及利用外资的有关工程咨询业务为主。工程承包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受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的委托，承包工程的建设。

14日　我国在沿海口岸城市设立海事法院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在沿海口岸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以适应我国海上运输和外贸事业发展的需要，有效地行使我国司法管辖权，及时地审理海事、海商案件，以维护我国和外国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5日　国务院批准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工商统一税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规定》提出：(1) 在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内开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客商独立经营企业（以下统称特区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 对特区企业征收的地方所得税，需要给予减征、免征优惠的，由特区人民政府决定。(3) 特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客商将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境外，免征所得税。(4) 客商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特区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除依法免征所得税的以外，都减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5) 特区企业进口的货物，应当征收工商统一税的，在特区管理线建成以前，属于生产必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配件、交通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征工商统一税；在特区管理线建成以后，进口各种矿物油、烟、酒，仍然按照税法规定的工商统一税税率减半征收；其余的进口货物，都免征工商统一税。(6) 特区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或者另有规定的少数产品以外，都免征工商统一税。(7) 特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本特区内销售的，各种矿物油、烟、酒等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8) 特区企业将减征、免征工商统一税的进口货物或者在特区生产的产品运往内地，应当在进入内地时，依照税法规定补征工商统一税。(9) 特区企业从事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性业务取得的收入，应当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工商统一税；从事银行、保险业取得的收入，按照3%的税率征收工商统一税。上述企业在开办初期需要给予定期减征、免征工商统一税照顾的，由特区人民政府决定。

对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十四个港口城

市的老市区和汕头、珠海、厦门市市区内开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客商独立经营企业减征、免征税收也作出了规定。

说明　已被1991年4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1991年6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7年2月19日《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代替。

20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规范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工作

国家计委、城乡建设部印发《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暂行规定》。《暂行规定》要求，列入国家、部门和地区计划的建设工程，除某些不适宜招标的特殊工程外，均按本规定进行招标。凡持有营业执照、资格证书的勘察设计单位、建筑安装公司、工程承包公司、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不论国营的还是集体的，均可参加投标。建设工程的招标和投标不受地区、部门限制。工程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对中标单位要一视同仁。《暂行规定》还对招标的形式、程序、评标和定标、管理与监督作出了规定。

27日　国务院采取措施促进轻工业集体企业发展

国务院批转《关于轻工业集体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轻工业集体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法令和国家计划指导下，集体企业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并受国家法律保护。集体企业要真正按照集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来办。集体企业可以按照自愿组合，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职工集资，适当分红，集体积累，自主支配的原则，自主经营管理。轻工业集体企业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并实行民主管理和厂长负责制。有权根据社会需求和市场变化调整生产方向，实行自主经营，允许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其产品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的前提下，企业有权自销。集体企业为开发新产品、扩大业务进行的广告宣传、信息交流、展销订货等所需业务经营费用以及企业在开展供销业务中所必需的交易费，可以列支。国家管理价格以外的产品，集体企业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有权自定价格；凡属用议价购进原材料、燃料生产的产品，允许随行就市，高进高出；季节性较强的产品，允许有季节差价。轻工业集体企业在缴纳国家税收和完成上级联社规定的上缴任务以后，留下的利润归企业自行支配，任何部门不得挤占。轻工业集体企业的收益分配，在国家多收、企业多留的前提下，允许个人适当多得。只要产品成本中工资含量不增加，利税增长幅度高于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就应当允许职工工资收入（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按实列支，计入成本。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集体企业有权确定人员的增减，企业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员，可以从本企业职工中选拔，也可以向社会公开招聘，待遇从优。轻工业集体企业实行入股、集资。职工应按规定缴纳股金。股金同企业盈亏挂钩，企业盈利或亏损，按股金分红或以股金弥补亏损。在实行经济改组、归口管理和联合经营中，应保持集体企业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收缴关系三不变。

国务院重新发布1985年国库券条例

国务院曾于10月27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1985年国库券条例》。一个月后，国务院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宏观管理的需要，重新发布《条例》，决定我国从1985年起改进国库券的发行办法。改进的办法主要有三条：一是缩短偿还期，由原来的十年还本付息缩短为五年，即从第六年起一次还本付息。二是提高国库券的利率，对机关、团体、企业等购买的部分，由原来年息4%提高到5%；对个人购买的部分，由原来的年息8%提高到9%。三是个人购买国库券允许在银行贴现、抵押，购买超过1000元者，开给收据，可以记名和挂失。

赵紫阳谈加快沿海地区建设和发挥沿海地区作用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加快沿海地区建设和发挥沿海地区作用发表讲话，主要内容是：(1) 沿海地区必须坚持外引内联的方针。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是要通过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带，把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把沿海的发展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应当是我们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要起跳板的作用。一个是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引进来，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向内地转移；另一个是要把沿海生产的“洋货”向内地销售，把内地的原材料、产品在这里加工增值后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取得更好的效益。(2) 沿海地区农业的发展，要进一步转到从对外贸易的需要来考虑生产，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应当如此。应当把珠江三角洲进而把长江三角洲改为出口农副产品的基地，食品工业的基地，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三角洲的方针，应当是贸—工—农。要面向世界市场，分析市场变化的趋势，作出预测，使产品的生产同市场的需要衔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重点是要缩小一部分粮食作物的面积，恢复传统的优质大米的生产，增加一部分出口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3)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将通过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滚动式地由外到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因此，特区、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开放和改革上，担负着为全国提供经验的探索者、先行者的重要任务。

12　月

1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1985年价格改革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国家物价局《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初步意见的汇报》。会议认为，现在我们粮食形势和财政经济状况都比较好，1985年又要进行工资改革，物价改革必须趁这个机会出台。1985年物价改革就抓住一个猪，一个煤，把蔬菜等鲜活商品逐步放开的政策定下来，其他产品的价格改革要看一看，不要把面搞得太宽。猪、菜的价格问题解决了，从1986年起就可以逐年解决其他产品的价格。

8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规范基本建设自筹资金管理

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联合发出《加强基本建设自筹资金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主要内容如下：(1) 各部门和各地区企、事业单位用于

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必须专户存入建设银行，并坚持先存后批、先批后用的原则。从1985年开始，当年上半年使用的自筹资金，必须在上年底存入建设银行，当年上半年存入的不准运用；下半年使用的自筹资金，必须在当年6月底以前存入建设银行，下半年存入的当年不准动用。地方机动财力、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用于基本建设的部分，也要遵循此规定。(2) 为便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有计划地运用信贷资金，及时地向建设银行划转企、事业单位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和地方机动财力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和各部门对下年度需安排的自筹基建项目，要主动采取各种办法提前通知开户银行。(3) 凡有自筹基本建设任务的各部门、各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在不影响归还贷款的前提下，应提前向开户银行提出申请，将其自有资金中按规定可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资金转存到建设银行。但已安排用于技术改造的更新改造资金、大修理基金和企业留用的新产品试制基金，不能搞基本建设。(4) 在每年9月底以前，由建设银行按基建自筹投资管理范围，向国家计委提供（同时送中国人民银行）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建设银行的自筹资金存款情况，再分别核定各地区、各部门的自筹基建投资计划规模。(5) 对于各部门、各地区企、事业单位专户存入建设银行的自筹资金，建设银行要严格按计划拨付，不能用于超计划扩大基建规模。(6) 建设单位的基本建设自筹投资计划超过了规定期限内在建设银行的存款余额时，开户银行有权向建设银行总行反映，经国家计委核定后，将超过资金能力的自筹投资指标从主管部或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指标中收回。

国务院批准国营企业厂长（经理）实行任期制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厂长（经理）实行任期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1) 凡是由上级任命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一律实行任期制。(2) 厂长的任职期限，应根据企业的规模和生产经营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任期，每届任期最多为四年，在规定的任职年龄内，可以连任，但不得超过三届。(3) 现任厂长的任期自何时计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自行确定。1985年1月1日以后任职的，按批准之日计算。(4) 厂长在任期内，可以辞职。辞职前，必须正式向上级任免机关提出报告，陈述理由，经批准后生效。(5) 上级任免机关有权免除任期内厂长的职务。

10日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通知停止试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经贸部国家物价局、中国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停止试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的通知》。《通知》指出，1981年1月1日起试行的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在奖出限入方面起了一定作用。现在由于贸易外汇结算价与公布的人民币汇价已经基本一致，经汇价小组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自1985年1月1日起，停止试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一律按公布的人民币外汇买卖价结汇。

13日　国务院要求开辟多种渠道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

国务院发出《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通知》规定，对农村学校在逐年增加国家对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和教育事业费的同时，要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开辟多种渠道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除国家拨给的

教育事业费外，乡人民政府可以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并鼓励社会各方面和个人自愿投资在农村办学。这些经费，要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挪用和平调。国家拨给的教育事业费，在原有基础上实行包干，由县下达到乡，不能减少，不能截留。今后国家和地方政府逐年增加的教育事业费，重点用于发展师范教育和补助贫困地区。富裕地区乡教育事业费的增加依靠自己解决。

14 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决定预算内基建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规定》明确，从 1985 年 1 月 1 日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简称“拨改贷”）。“拨改贷”基本建设投资由各级计划部门根据国家批准的计划进行安排。“拨改贷”投资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纳入国家五年和年度基建计划。按照建设项目隶属关系和计划安排权限，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区安排的项目，其“拨改贷”的资金，分别由中央财政预算和地方财政预算拨给。“拨改贷”实行差别利率。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产品供需情况，对其建设项目实行浮动利率，或者对行业内部不同产品的建设项目实施调节利率。设计任务书、初步设计和概（预）算已经批准并列入国家年度基本建设计划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即可向当地建设银行申请贷款。借款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15 年。借款单位应按照借款合同的规定按期还本付息，并向贷款银行按年提送还款计划。“拨改贷”项目竣工时，应将建设期的贷款利息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建设银行办理“拨改贷”的实际利息收入，不上交财政，由建设银行在扣除其业务支出后，分别转作中央和地方基建资金。由于产品价格不合理，投产后盈利太低，以及前期工作项目撤销，归还贷款确有困难的，按规定经过批准，可以部分豁免或全部豁免贷款本金和利息。“拨改贷”项目在借款合同规定期内提前建成投产，或者投产后因提高经济效益或用自有资金提前还清本息的，借款合同规定期内的利息节余，全部留给借款单位，从还款资金中提出，用于发展生产和职工奖励。贷款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尚未还清的，贷款银行有权限期追回贷款，并对逾期部分按原定利率加息 20%。借款单位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用款，贷款银行有权收回部分贷款，并对违约使用部分按原定利率罚息 50%。

19 日　国务院批准全国统配煤矿实行总承包

国务院原则批准煤炭部《关于请求批准全国统配煤矿总承包方案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统配煤矿以 1984 年分配计划 3.9 亿吨为包干基数，按国家批准的 1985 年和“七五”分年度、分地区、分品种产量计划，一包 6 年。1985 年为 4 亿吨，1990 年计划产量 5 亿吨，“七五”期间平均每年递增 2000 万吨资源供国家分配。6 年超包干基数递增的包干煤炭产量，统一纳入国家分配，按现行价格加价 50%。再增产的煤炭为超产煤，如国家需要，应首先提供国家使用并纳入指令性运输计划，其价格在国家调拨价格的基础上加价一倍。由矿务局议价自销的超产煤，其价格不受国家规定 20%浮动幅度的限制。(2)“七五”期间煤炭部直属、直供煤矿开工总规模 1.8 亿吨，结转到“八五”1.5 亿吨。国家提供建设总投资 302 亿元。关于煤炭部自行利用外资和国内集资建设的矿井，其规模和产量均不计人包干基数之内。为了搞好地区布局和产、

运、销的地区平衡，凡新开工项目设计能力在500万吨及以上矿区的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由国家计委审批。（3）从1985年开始，统配煤矿全行业每年亏损包干以3亿元为基数，一包6年不变，超亏不补，减亏全部留用。并从1985年开始，统配煤矿维简费由原来吨煤提取6元增加到7元，煤炭的产品税率由现在的8%调减为3%，同时，企业按国家规定缴纳资源税。

国家计委等部门对国内合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作出补充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关于国内合资建设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根据各项管理体制改革和生产、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对1982年10月14日颁布的《关于国内合资建设的暂行规定》作如下补充：（1）按国家规定能用于合资建设的资金都可进行合资建设。（2）合资建设项目的投资额和建设规模指标，应作为一个统一完整的项目，分别列入合资建设各方所属的地区或部门基建计划。在自筹基建指标的安排上，根据合资项目签订的合同和每年的工作量计划，国家在核定地区和部门指标时，给予照顾。（3）合资建设项目所需的主要建筑材料，属于国家投资部分由国家安排；属于地方、部门投资部分由地方、部门安排。（4）合资建设项目的原材料、燃料和产品运输，由运输部门统一纳入计划。（5）合资建设企业所产产品的价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执行统一定价或浮动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6）合资企业的收入按第二步利改税等规定向国家纳税和进行收入分配。（7）合资项目的审批权限：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凡资金、能源、材料、设备能自行解决的，原则上由各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审批，其投资纳入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生产性建设项目，按规模划分，属于大中型项目仍按原规定由国家计委审批，按资金限额划分，国家计委审批限额由1000万元以上提高到3000万元以上，总投资2亿元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

27日　国家统计局开始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

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和把村（队）办工业从农业划归工业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为全面地科学地表现农村各生产部门的综合发展水平和速度，从1984年开始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计算范围是：全部农业总产值，即全部全民、集体、个体所有制的农业产值；农村工业总产值，包括乡镇工业产值和农村个体工业产值；农村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的总产值。为了在统计中正确反映农村各业发展的真实状况，把村办工业即过去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的工业，从过去属于农业改划归农村工业。

28日　国务院决定放开内销纺织品价格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纺织工业发展问题。会议根据我国纺织业发展状况，决定：内销纯棉织物和涤棉织物的价格要放开，由工厂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产品的质量情况自主定价。今后，凡是供求已经缓和或供过于求的非必需的日用消费品，包括老的“五大件”，价格都可以放开。要把选购棉花原料的权力交给工厂，今后工厂用棉，不再搭配供应，改由各厂自己根据生产的需要，到原料产地的棉麻公司选购，也可以直接从农民手里选购。要允许毛纺企业直接到牧区选购羊毛，按质论价。

31日　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84年贯彻执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第一产业增长幅度高达12.9%，GDP增长幅度达15.3%。第一次出现卖粮难的现象。

(1) 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农业总产值达到3790亿元，比上年增长17.6%。粮食产量40731万吨，棉花产量625.8万吨。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第一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农村多种经营日益扩大，各种专业户、经济联合体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工业总产值达到7042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轻工业增长13.9%，重工业增长14.2%。列入“六五”计划的65种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已有43种分别提前2年或1年实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指标。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超过国家计划较多，增长较快。原煤产量7.89亿吨，原油产量1.15亿吨，发电量3770亿度，木材6385万立方米，水泥1.23亿吨，化肥1460.2万吨。大多数轻纺工业产品的产量比上年有较多增加，特别是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分别增长45%到近2倍。

(2) 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进一步协调。农轻重产值的比例已由1978年25.7:31.7:42.6变为1984年的34.0:31.7:34.3，农业、轻工业所占的比重显著提高；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积累率由1978年的36.5%降低为1984年的31.2%。

(3) 国家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进展较快。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完成743亿元，比上年增长25%，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113个。更新改造和其他措施投资完成442亿元，比上年增长23.5%。

(4) 城乡市场繁荣兴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3376亿元，比上年增长18.5%。全国已经放开的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企业有5.8万个，全国建立起城乡贸易中心2248个。

(5) 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成绩显著。突出的是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农副产品出口增加、进口减少。棉花由上年净进口15.5万吨变为净出口15.7万吨，粮食、食糖等的进口数量也大幅度减少。全年利用国外资金达26.6亿美元，其中使用各种贷款13.2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3.4亿美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发展很快。

(6) 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取得新的成绩，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全国有1万项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奖励。大批科技成果在生产建设中推广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企业的技术进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47.5万人，比上年增加8.4万人，提前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招生指标。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业余或脱产学习的在校学生达到129.2万人，比上年增加36.6万人。

(7)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国职工工资总额达到1133亿元，比上年增长21%；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355元，比上年增长14.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提高10.2%。

1984年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仍

十分紧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够合理，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财政赤字50亿元。特别是第4季度以后，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工业增长速度过快，货币发行量过多，进口控制不严，国家外汇结存急剧下降，导致社会总需求急剧膨胀，社会经济生活出现某些不稳定因素。

1985年

1　月

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在这个文件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市场调节，并具体制定了10项经济政策：(1) 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棉花可以自由上市。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逐步取消派购，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2) 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1985年国家以一定的财力物力支持粮棉集中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林业等产业。(3) 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山区25度以上坡耕地要退耕还林还牧。集体林区取消木材统购，开放木材市场，允许林农和集体的木材自由上市，实行议购议销。中药材也同时放开。(4) 积极兴办交通事业。提倡集资修建公路，对困难地区，国家发放一部分粮、棉、布，作为修路投资。各省级政府经国家批准可以发行公路、航道债券。(5) 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6) 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除党政机关的在职干部外，各类人员可以停薪留职到农村工作，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为农村提供服务，或组成"科研——生产联合体"。(7) 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适当发展民间信用。积极兴办农村保险事业。农业银行实行企业化经营。(8) 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济长期不变。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和林业、牧业、水产业、乡镇企业的责任制。提倡合股经营、股金分红（投入的劳力、生产资料可以作价入股）的合作经济形式。(9) 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10) 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靠近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农村，应当成为农业方，面的对外窗口和"外引内联"的基地。

5日　国务院批准改革国营企业工资管理办法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1) 从1985年

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2) 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3)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企业的全部工资总额，以 1984 年的工资总额为基数进行核定。(4) 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指标，国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一般以 1984 年的实际上缴税利作为工资总额的挂钩指标。(5) 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比例，一般是上缴税利总额增长 1%，工资总额增长 0.3%至 0.7%，最多不得超过 1%。挂钩比例，1985 年先试行 1 年，从 1986 年开始一定 3 年或 5 年不变。(6) 企业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脱钩，国家不再统一安排企业职工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7) 建立企业工资增长基金。年度工资总额增长超过一定限额时，国家征收工资调节税。(8) 实行新办法后，原则上实行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9) 大多数大中型国营企业在 1985 年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办法。(10) 要加强领导，做好准备工作，经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行。由于价格关系尚未理顺，这项改革当年只在占全国企业总数 15%的 1400 多个企业中进行了试点。

6 日　我国第一台场离子显微镜建成

我国第一台场离子显微镜——原子探针在沈阳建成，这一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把我国的金属材料微结构研究工作提高到原子级水平。

8 日　国务院对纺织品进出口问题作出规定

国务院《关于纺织品进出口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点是：出口纺织品要积极搞工贸结合，结合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纺织品的出口计划、收汇任务和出口配额、进出口许可证额度的分配必须贯彻既要考虑历史状况，又要考虑鼓励先进、有利竞争、择优和促进联合的原则。扩大纺织品出口，提高产品质量，关键在于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把权真正放给他们，使生产企业提高对国际市场的灵敏度和清晰度，提高竞争能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外贸分公司、口岸公司、工贸结合公司的作用。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主要应搞好信息、咨询等服务工作，也可以直接经营一部分进出口业务。在纺织品出口经营放开以后，经贸部要发挥归口管理部门的作用。

10 日　国务院批准实行技术有偿转让暂行规定

国务院发布《关于技术有偿转让的暂行规定》。《规定》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技术也是商品，单位、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区、部门、经济形式的限制转让技术。国家决定广泛开放技术市场，繁荣技术贸易，以促进生产发展。一切有助于开发新型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等的技术，出让方同受让方都可以按照自愿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转让。技术转让费即技术商品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由双方协商议定。可以一次总算，可以按照该项技术实施后新增销售额或利润的一定比例提成，也可以按照双方商定的其他方法计算。经技术转让有关各方协商议定，促成技术商品交易的中介人（包括单位、个人）可以取得合理的报酬。执行国家或上级计划研究、开发的技术，除按照计划规定推广应用外，完成单位还可以按照本规定进行转让，其转让收入归单位；对直接从事研究、开发该项技术的人员给予奖励。根据本单位计划研究、开发的技术，其转让收入归单位；对直接从事研究、开发

该项技术的人员给予奖励。对根据市场需求主动提出研究、开发项目建议并积极促其完成的有功人员，应当给予较为优厚的奖励。职工在做好本职工作、不侵犯本单位技术权益的前提下自行研究、开发的技术，其转让收入归职工本人或课题组；使用了本单位器材、设备的，应当按照事先同本单位达成的协议，支付使用费。

说明　已被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2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的《企业财务通则》、1999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的通知》代替。

12日　国务院批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

国务院批准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报告》提出，“七五”期间，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第一是服务重点转到为发展国民经济、四化建设和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第二是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报告》提出了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措施。

14日　中央办公厅转发赵紫阳和万里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讲话的要点是：农业要有一个协调的发展。卖粮难、卖棉难和猪肉、禽蛋、水产品等农副产品出现供过于求，归根到底是农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棉、粮丰收后出现了低消费水平下的相对过剩，其主要原因在体制上。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商品生产的新阶段，要求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形势，改变农业生产结构。要引导农民关心市场变化，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使生产和社会需求互相衔接。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势在必行。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就要逐步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现在已具备放开的条件。农副产品价格放开，会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价格放开后，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参加市场调节，加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克服盲目性，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万里委员长讲话的要点：粮食紧缺局面的全面缓解为我国农业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向现代农业转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要总揽整个农村经济，因地制宜地发挥地区优势，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保护和促进生态平衡，逐步使农村经济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在粮食问题上，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对乡镇企业，在领导体制上要坚持政企分开。要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主要得靠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工作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加快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并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发展民间信用。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城市生产力向农村扩散，是关系城乡经济发展全局的一项战略性措施。要努力消除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逐步建立新型的城乡之间的分工、多层次的产业结构。

18日　我国第一座大型核电站广东核电站合营合同签字

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的合营合同签字仪式。这标志着我国第一座大型核电站、目前国内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的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广东核电站建在深圳大亚湾大坑村，占地面积近

200公顷。其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准备7年建成。

20日　国家体改委介绍石家庄市搞活企业的经验

国家体改委在石家庄市召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等7个省、市、自治区座谈会，介绍石家庄市以搞活企业为中心，进行“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的经验。这种工作方法的主要思路是以搞活企业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改革要求去“撞击”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促使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及时地进行改革，“反射”到企业和有关部门付诸实施，增强企业活力。企业有了活力，经济得到发展后，又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再促进管理部门进一步改革。这样循环往复，使改革不断深化。改革中重点解决5个方面的问题：(1) 围绕引“包”进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分配关系。(2) 围绕增加企业自主权，解决指令性计划指标过多、价格管理过死、企业缺少干部任免权的问题。(3) 围绕为企业改革创造外部条件，配套开展改革。(4) 综合运用经济杠杆。(5) 推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

2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会计法》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法》规定，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军队办理会计事务，必须遵守本法。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按照本法规定办理会计事务，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行政领导人领导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本法，保障会计人员的职权不受侵犯。任何人不得对会计人员打击报复。国务院财政部门管理全国的会计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管理本地区的会计工作。

《会计法》规定，下列事项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1) 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2) 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3) 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4) 基金的增减和经费的收支；(5) 收入、费用、成本的计算；(6) 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7) 其他需要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事项。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会计记账以人民币元为单位。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并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会计法》自1985年5月1日起施行。

25日　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建议将这三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座谈会认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三角洲地区应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按贸——工——农为序来安排生产，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动，调整商品的生产销售，多出口、多创汇。

赵紫阳总理在1月31日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我们总的设想有了，总的构思有了，总的蓝图有了。我们的改革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第二，我们的改革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由专家们先行设计一整套方案。既要有勇气做出关于中国的改革方向、改革的蓝图的大胆的决定，又要在步骤上走一步看一步，避免大的失误，大的曲折。这个思想用三句话表达，叫做“坚定不移，谨慎从事，务求必胜”。开放要

由沿海到内地、由点到面逐步推进。从全国看，开放地带是由沿海到内地，由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的开放，也应该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开放要有“进”有“出”。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都要为国家多出口、多创汇。有进有出，开放才能继续下去。改革、开放、搞活以后必须有相应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这是一个新课题。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

29日 国务院决定对机电设备进口实行招标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物资局《关于开展机电设备招标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国务院在批转的《通知》中指出，采用国内招标逐步取代层层审批办法，是改进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也是当前流通领域中一项重要改革。它不仅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而且有助于促进机械工业的技术进步。国务院同意成立中国机电设备招标咨询服务中心，业务上由国家经委领导，负责统一组织、协调、监管全国机电设备的招标工作。国家经委、国家物资局在《请示》报告中就机电设备试行招标的范围作了规定。凡需要招标的机电设备，今后都由各中心城市组建招标公司，面向全国，组织招标。通过招标仍需安排进口的，由组织招标的公司签署意见，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海关、银行、外贸等有关单位即可据此办理手续，不再经层层审批。

31日 国务院批准改革旅游体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当前旅游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以下意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加快改革步伐。要从只抓国际旅游转变为国际、国内旅游一起抓，从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从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要按照“政企分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散经营，统一对外”的原则，建立以国营旅游企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旅游经营体制；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高经济效益、高服务质量的旅游企业管理体制，把旅游事业搞活。政企职责分开，加强行政管理，扩大企业权力。各级旅游经营单位都要逐步从所属的行政管理部门独立出来，成为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旅行社、旅游饭店、汽车公司和游船公司等，都应实行企业化。下放外联权和签证通知权，增加招徕渠道。加强旅游价格管理，对旅游价格管理要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一对外，按质论价，合理收费的原则。国家旅游局和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国内旅游的领导和管理，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2 月

5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国务院在天津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于2月14日闭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制定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以及有关国营小企业

的改革问题，并部署了1985年度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1985年要采取的十项政策措施：(1) 加快推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勇于开拓的领导班子。(2) 要增强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把经营领域扩展到从市场预测、资金筹集、产品研制到产品销售后的服务。(3) 企业有权实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多种经营，包括发展第三产业。(4) 要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把降低消耗指标层层分解，责任落实到人，节约有奖，超耗有罚，奖金计入成本。(5) 对那些指令性任务重、贡献很大、调节税率很高、人均留利过低的先进大型企业，要逐步把调节税减下来。(6) 开辟生产资料市场，建立物资贸易中心。企业在确保完成指令性计划任务、保有合理储备的前提下，超过计划生产的产品，以及长期积压和超储的长线产品，可以随行就市，把平价转为议价，产销直接见面，搞活物资流通。(7) 给部分有条件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直接对外经营自主权。(8) 实行指令性计划的产品，要使企业有产可超，即使是市场紧缺的短线产品，也要给企业让出一块，允许超产自销。(9) 要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经过整顿验收合格的大中型企业中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的工资制度。(10) 整顿现有公司，改革大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

7日 国务院紧急通知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1984年末到1985年初，社会集团购买力急剧上升，大量购买高档消费品不仅增加了财政开支，而且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为此，国务院规定，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数额要比1984年减少20%，重新确定专项控制商品的范围，控购商品增加到17种；集中审批专项控制商品的权限。

8日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下放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改进技术进步工作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技术进步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技术改造和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技术开发项目的审批权限。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的限额由10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和技术引进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审批。从1985年起，企业的折旧基金，由企业留用70%，其余30%，国家不再集中，按企业隶属关系返给部门和地方。国家经委掌握的技术开发资金，2/3下放给归口部门，安排国家重点技术开发项目，报国家经委下达计划；1/3下放给各地区，在行业规划指导下，自行安排本地区的重点项目，计划报国家经委备案。

国务院发布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1%。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保证用于城市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的维护建设，具体安排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后，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得再向纳税人摊派资金或物资。遇到摊派情况，纳税人有权拒绝执行。《条例》

自1985年度起施行。

国务院批转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

国务院在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的《通知》中指出，上海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科技中心和重要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解放以来，上海在许多方面为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使上海成为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上海市要充分利用对内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要在1991年以前尽快转上良性循环，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通知》指出，改造、振兴上海不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事，国家应该给予上海必要的支持，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也要积极给予支援和帮助。今后考核上海的经济工作，要把上海对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作为评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标准，因此应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首要指标。

12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设置或撤并管理的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要求，任何部门和单位开办金融业务，从事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金融活动，包括货币信贷、信用委托、各种保险以及国内外汇兑往来等业务，其机构的设置或撤并均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单位批准，并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对非经批准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采取经济和行政措施，责令其停办金融业务。《暂行规定》还确定了金融机构设置的必备条件：确属经济发展需要，并具有相当业务量；符合金融部门专业分工的原则；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业务章程，并确实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政企分开的经济实体；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13日　国务院批准“七五”期间行业技术政策和方针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七五”期间行业技术政策和技术改造问题的报告》，要求“七五”计划期间要把建设工作的重点真正放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国家计委在《报告》中提出，“七五”的技术改造方针是：(1) 积极地、有步骤地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特别是机械、电子工业的技术改造要先行一步。(2) 推广国内科技成果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要同时并进。(3) 对老企业改造和新企业建设要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凡是能够通过技术改造解决问题的，就不搞基本建设，凡是能通过改建扩建解决问题的，就不要搞新建。(4) 要加强平衡和协调工作。《报告》还提出了铁路、水运、邮电、煤炭、石油、钢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轻纺等主要行业技术改造的重点。

21日　我国南极长城站举行落成典礼

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成填补了我国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为我国将来对南极进行系统的考察、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和平利用南极造福于全人类奠定了基础。

28日　国务院发布借款合同条例

为了加强信贷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保护借款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信贷计划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借款合同条例》。《条例》规定，所有独立经济核算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等单位同银行、信用合作社之间借款时都要根据这个《条例》签订合同。双方要遵守国家法律，按照国家政策，依据国家计划和有关规定，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银行、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依法签订后，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说明　已被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代替。

国务院要求节约行政经费

国务院《关于节约行政经费的通知》指出，1983年行政经费比上年增长21%，1984年又比1983年增长28%。行政经费占国内财政支出的比例，1982年为7%，1984年提高到8%。针对这一情况，国务院要求，1985年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经费都削减10%。要严格控制行政编制，大力节减设备购置和办公费用，精简会议、文件和刊物，刹住不正之风，坚持勤俭办外事，整顿宾馆、招待所的收费标准，制止摊派和挤占行政经费，整顿预算外资金。

3　月

2日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7日结束。会议集中讨论了科技体制全面改革的问题。会议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要造成一种环境，使大部分研究机构产生面向经济的内在活力，大部分研究人员能自动地面向经济，重视经济利益。社会对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更多的尊敬和荣誉，科技人员的物质待遇和他们的贡献要相联系。通过改革，把技术流通的大门打开，使先进技术、知识，从研究单位流向生产、使用单位，流向全国，从而推动经济建设前进。

3月7日，邓小平在会议作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要点是：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他在这次会议上又即席着重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

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为了激励与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国务院决定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

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从1985年起，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律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管理体制。这项改革不仅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也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将来过渡到完全按税种划分收入的体制创造条件。这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 基本上按照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以后的税种设置划分各级财政收入。将各种税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种。(2) 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支出，将支出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中央财政专案支出三类。(3) 以1983年财政决算收入数为基础，按照划定的财政收支范围，核定地方的财政收支。(4) 地方财政收入的分成比例和上解、补助的数额确定以后，一定5年不变。地方多收可以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4日　国务院通知制止滥发各种奖券

为了制止不少工商企业、事业单位滥发各种彩票、奖券所形成的不正之风和造成的不良后果，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滥发各种奖券的通知》。通知要求：(1) 所有工商企业都要立即停止举办有奖销售活动。已经实行有奖销售的，要进行清理，做好善后工作。(2) 文艺、体育界举办文体活动搞有奖售票、有奖评选的，今后原则上不能再搞。(3) 为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而举办的有奖集资，经过当地政府批准可以试点，但不宜普遍推广。金融单位举办有奖储蓄，已经搞了的，可以继续试办，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管理，目前不再扩大试办范围。(4) 发售“礼品券”，只能在经过批准的少数大型国营商业企业进行试点。“礼品券”只能卖给个人，收取现金，不允许卖给单位，扩大集团购买力。

邓小平谈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访华团时指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6日　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

会议认为，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信贷、消费基金、建设规模、货币发行、物价等方面的问题，既要看到这是在大好形势下产生的，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会给1985年的价格、工资改革增

加难度。因此，1985年城市改革的方针是，在改革的方向、目标上坚定不移，积极进取；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谨慎从事，稳扎稳打，把继续搞活同加强宏观管理统一起来，确保改革初战的胜利。试点城市的任务是，进一步搞活企业，尤其是搞活大中型企业；进一步对外对内开放，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的调节与管理。会议认为，要把企业真正搞活，城市政府放权要更加开明，首先从自己做起，把市里掌握的权该放的尽快放给企业。强调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决不是将原来属于部门和地区的某些权力简单地移交给城市。城市政府必须改变过去主要依靠行政办法直接指挥、干预企业的做法。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必须真正打开城门，允许和鼓励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允许和鼓励外地企业和农民进城举办各项事业，允许和鼓励本地的工商企业进行跨行业、跨城乡、跨地区的协作联合。3月13日会议结束。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座谈会纪要》。

首次全国土地管理工作会议提出保护耕地是我国的长期国策

首次全国土地管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耕地减少已成为我国农村一大隐患。不依法办事、乱占滥用耕地、非法买卖土地和浪费耕地的现象严重存在。一些地区土地失控，荒芜农田，有的甚至靠出卖耕地“致富”。如不加强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会议指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和“保护耕地”是我国不可动摇的长期国策。会议要求，统筹兼顾工农业和城乡建设的需要，通盘规划、合理布局，既要及时提供必要的建设用地，又要严格控制占地规模，坚决制止乱占滥用和浪费耕地。

7日　国务院批准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

《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规定，国家标准局主管全国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本地区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产品质量监督的重点是：（1）有关人身安全和健康的产品；（2）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3）获得优质荣誉的产品；（4）同群众关系密切的市场商品。国务院主管产品生产的部门，应当督促企业贯彻执行产品技术标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企业必须贯彻执行产品技术标准，对产品质量负责。出厂和销售的产品，必须达到产品技术标准，有质量检验合格证。企业应当接受标准化管理部门对产品的质量监督，如实提供检验样品和有关资料，并在检验测试手段和工作条件方面提供方便。对不执行产品技术标准的，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严重违反产品技术标准的，不具备基本生产技术条件，产品质量低劣的，触犯刑律或违反国家其他法律的，依法惩处。

国务院发布进出口关税条例和海关进出口税则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准许进口和出口的货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都应当由海关按照《税则》征收进口税或出口税。进口税设普通税率和最低税率。对产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订有关税互惠条款的贸易条约或者协定的国家的进口货物，按照普通税率征税；对产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订有关税互惠条款的贸易条约或者协定的国家的进口货物，按照最低税率征税。《税则》中未订有出口税率的货物，不征出口税。为

国外厂商加工、装配成品和为制造外销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辅料、零件、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海关按实际加工出口的数量免征进口税。经济特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立经营企业进出口的货物以及其他依法给予关税减免优惠的进出口货物，按有关规定减税或者免税。这个《条例》和《税则》于1985年3月11日起实施。

8日　国务院批准上海市进一步对外开放

国务院作出《关于上海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务院在《批复》中提出，要逐步把上海建设成为对国外客商具有巨大吸引力、对先进技术具有强大消化力、对国际市场具有敏捷应变能力的对外经济联系枢纽，成为发展出口、增加创汇的基地。《批复》要求上海市在对外开放中充分发挥本身的优势，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对现有工业进行系统改造，广泛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发展新兴产业。进一步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合。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批复》同意上海市的有关区、重点卫星城镇和所辖农村中规定范围内的技术引进项目和利用外资项目，可享受沿海14个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

12日　国家缩小高校毕业生计划分配范围

国家计委、教育部提出1985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办法改革的主要原则是：宏观上加强指导，微观上逐步放开，缩小国家计划分配的范围，扩大办学部门的分配权限。具体做法是，在毕业生人数中，27%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其余73%在国家分配方针指导下，由学校与用人单位直接联系，以“供需见面”的形式提出分配建议计划，征得主管部委、省、市、自治区同意后，送国家计委、教育部综合平衡，作为正式计划下达进行分配。

13日　中共中央发布科技体制改革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变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在人事制度方面，要克服“左”的影响，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面，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国务院下达调整生猪和农村粮油价格方案

调整生猪购销政策和价格方案的主要内容是：（1）取消生猪派购，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2）国营食品公司要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挥市场主渠道的作用；（3）1985年生猪和猪肉的指导性价格水平定为平均价上浮30%左右；（4）慎重选择放开生猪价格的时机；（5）逐步放开其他鲜活商品的价格，严格控制连锁反应；（6）给城镇居民适当补贴。

调整农村粮油购销政策和价格方案的主要内容是：（1）国家对小麦、稻谷、玉米和主产区的大豆实行合同定购，其他粮食品种自由购销。1985年度国家合同定购粮食计划确定为1580亿斤贸易粮；（2）供应市镇人口的口粮仍按统销价不变；（3）1985年度食油收购计划确定为45亿斤，分别不同的情况，实行合同定购或执行原收购政策。

国务院规定严禁非法倒卖外汇严禁外币在市场流通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外汇管理的决定》。《决定》规定严禁非法倒卖外汇的活动和严禁外币流通。机关、团体、企业单位议价买卖外汇和用外汇倒卖进口物资的，外汇管理部门要没收其全部非法收入，上缴国库，并课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要对有关单位领导人给予纪律制裁。非法倒卖外汇单位使用银行贷款的，银行要停止贷款，并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如金融机构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要从严惩处。《决定》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除国家批准收取外币的地区和宾馆、商店外，禁止任何外币在市场流通。要取缔炒买炒卖外币、外汇券的黑市。对于社会上从事倒卖外币的单位和团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要按破坏金融秩序论处，坚决给以打击。

国务院通知严格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通知》指出，1984年下半年后，一些部门，企业和个人，不顾国家和群众利益，乘改革之机，乱涨价或变相涨价，倒卖紧俏物资和消费品，牟取暴利，扰乱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知》要求：（1）重大的价格改革和重要商品价格调整，必须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执行；（2）凡属国家定价的生活资料，都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3）凡属国家定价的工业生产资料，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4）重要生产资料的供应业务和紧缺日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应掌握在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物资供销部门和生产这种产品的单位手中；（5）对实行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要积极参与调节，平抑市价。采购单位和个人要服从产地物价，严禁抬价抢购；（6）服务行业和饮食行业不得乱涨价，乱收费用。严禁倒卖车、船票和其他票证。

国务院通知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

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通知》针对市场上出现的就地倒卖、牟取暴利的违法活动，作出以下规定：（1）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商业、物资供销部门、供销合作社和生产这种商品的企业经营，不准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营，不准经纪人牵线挂钩从中渔利。（2）不准从零售商店套购紧俏商品就地转手加价倒卖，不准倒卖计划供应票证。（3）凡国家规定价格（包括浮动价）的商品，在就地交易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不准任意提价，不准以

任何形式索取额外收入。(4) 对利用假合同、假发票、假凭证骗买骗卖，投机倒把的，要坚决制止，严厉打击。(5) 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立即对就地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活动，进行认真检查和严肃处理，坚决禁止这些违法活动。(6) 禁止就地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品种范围，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商业部、国家物资局研究制定，并根据市场供应情况进行调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国家规定，研究制定本地区禁止就地倒卖的品种范围，并公布执行。

14 日　国务院批准调整部分存贷款利率

为了配合 1985 年的物价改革，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从 4 月 1 日起，对银行存款、贷款利率进行部分调整。城乡定期储蓄存款的利率提高：一年期的储蓄利率由现行年息 5.76%调到 6.84%；三年期的调整为年息 7.92%；五年期调整为年息 8.28%；八年期的不动，仍为年息 9%。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相应提高。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利率也有所提高：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现行的年息 3.6%调整为 4.32%，二年期的利率调整为年息 5.04%，三年期的利率调整为年息 5.76%。为了使银行存款与贷款保持合理的利差，对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由现行的年息 7.2%调高为 7.92%；对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利率，由现行的年息 8.64%提高为 9.36%到 11.52%。

19 日　我国成为巴黎公约成员国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是 1883 年签订，1884 年 7 月 7 日生效。曾于 1900 年在布鲁塞尔、1911 年在华盛顿、1925 年在海牙、1934 年在伦敦、1958 年在里斯本、1967 年在斯德哥尔摩分别进行过修改，1979 年又作了修改。我国加入《公约》适用于斯德哥尔摩文本。《巴黎公约》的保护范围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或原产地名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巴黎公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国民待遇。在保护工业产权方面，每一个成员国必须把它给予本国国民的保护同等地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二是优先权。申请人在其首次向成员国之一提出正规申请的基础上，可以在一定期限（发明和实用新型为 12 个月，外观设计和商标为 6 个月）内，向所有其他成员国申请，而以第一次申请日期作为在后申请的日期。三是共同规则。《公约》规定在专利、商标厂商名称、不正当竞争等方面，所有成员国必须遵守的几项共同规则。同时还规定各成员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可以自由立法。

20 日　国务院各部门直属机械企业下放

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机械工业部发出《关于国务院各部门直属机械企业下放有关事项》，决定除军工部门外，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的机械工业企业都要下放。机械工业部直属企业在今年一季度下放完，其他各部门的直属机械工业企业争取三季度至迟在 1985 年内要下放给地方管理；铁道、煤炭、石油、邮电、地矿部门下放机械企业的工作可适当推迟，但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分期分批下放。凡在大中城市的，下放到大中城市；不在大中城市的，下放到哪里，由各部门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确定。各部直属机械企业下放后，原定主导产品方向不得随意改变；各种计划，1985 年仍由各部为主做好安排，1986 年起将要实行的改革办法，应在 1985 年内做好准

备。计划内分配的原材料要连同采购权都要落实到企业。此外，这个文件还对下放后有关基建、财务、干部任免等作出了规定。

2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涉外经济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订立的经济合同（国际运输合同除外）。这个法律规定，订立合同，应当依据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合同有关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26日　国务院批准编制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编制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的报告》。《报告》要求，在1985年内集中力量编制出《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要围绕我国四化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勾画出国土资源开发和建设布局的基本蓝图；提出我国国土整治的若干重大专题治理规划；明确各重点地区的发展方向和重大开发措施。《纲要》以2000年为规划期限，近期可以与“七五”、“八五”计划衔接，某些重大的治理任务，如大江大河和黄土高原的治理等，期限延长到2030年。这是我国第一次编制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

27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和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开始展现。经过调整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在走上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新路子。这几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一个是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国民经济的基本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一个是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两者互相促进、共同增长。这是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突破长期形成的僵化和封闭的模式，城乡经济越来越活跃，改革和开放健康发展。但是，我国经济在发展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除了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够合理，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以外，突出的问题是，1984年下半年，特别是第4季度对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货币发行量多了一些，再加上乱涨价等不正之风，致使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必须予以重视。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是，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1985年要继续把经济搞活，促进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迈出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同时要切实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还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展开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要着重解决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问题，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农产品、铁路

短途运价、产品质量差价、计划外的生产资料。为了保证改革，必须坚决控制货币的发行量。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为了保证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的现象。既要搞活经济、又要加强管理。加强全局观念，克服本位主义。必须继续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继续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排除对改革的干扰。

28日　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85年经济工作有三件大事要同时办好。一是价格改革要起步；二是工资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三是为了全面完成"六五"计划和为"七五"计划作必要准备，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要保持一定的规模。这三件事安排得好，有利于理顺关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如果安排得不好，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可能影响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稳定。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项有利条件，搞好宏观的平衡和调节，恰当地处理价格改革、工资改革与投资规模这三者的关系，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促使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积极而稳妥地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保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六五"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并为"七五"经济发展准备条件。要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认真搞好财政信贷平衡，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保证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1985年计划草案规定的各行各业的具体任务：（一）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求得生产的持续增长。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农业（包括村办工业）总产值增长6%。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建设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以及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的商品生产基地，决不能因粮食连年大幅度增产而放松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大力开发新产品，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使产品适销对路。二是进一步降低燃料动力的消耗，认真搞好原材料的节约、代用和利库、利废工作。（二）适度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认真贯彻执行以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为主的方针。（三）适应经济搞活的新形势，调整国家统配物资的分配办法。（四）活跃城乡市场，适应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五）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技术的合作和交流。（六）加强智力开发，进一步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

1985年计划体制改革必须迈开步子。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计划管理中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建立起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计划体制，促进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根据这个要求，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同时充分重视经济杠杆和市场的作用。改革计划体制，要做到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国

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工业产品，由123种减少为60多种；国家计委和国家物资局管理的统配物资，由256种减少为65种。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同时，努力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防止发生失控现象。第一，加强信贷管理，控制货币发行。第二，加强消费基金的管理。人民生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避免消费基金的增长失控，是稳定物价的重要保证。第三，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第四，加强外汇管理。第五，严肃财经纪律，纠正不正之风。

198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8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85年国家预算安排的主要原则是：在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努力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根据量力而行的原则，保证重点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继续支持文教科学事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通过加强综合平衡和财政管理，严格控制财政开支，继续确保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财政总收入为1535亿元，增长4.8%；财政总支出为1565亿元，增长3.3%。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30亿元。为完成1985年国家预算任务，《报告》提出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要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二）要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组织收入的作用。（三）要继续推进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为了适应利改税以后的新情况，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起，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按照税种的设置划分各级财政收入，即：把国家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与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并按照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支出范围，确定分成比例或者上解、补助数额，一定五年不变。有关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和步骤，国务院将另行作出规定。为了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国家还要继续提高一部分重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并对那些经营水平高、贡献大、而留利过少的少数大型企业，逐步降低调节税的税率。与此同时，国家财政还要积极配合和支持今年进行的工资制度、物价体系和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从财力和管理制度上作出必要的安排。（四）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和消费基金，节减行政经费支出。（五）要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努力搞好资金综合平衡工作。（六）要严肃财经纪律，坚决刹住各种不正之风。

国务院决定继续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

国务院批转《关于广东、福建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定期5年，至1984年底期满。为了使两省的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继续探索和总结改革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等方面的经验，有利于稳定香港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国务院决定，在1985—1989年的5年内，继续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邓小平谈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

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情，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情。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一直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

29日　国务院批准出口商品外汇留成办法

为了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新形势，鼓励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经贸部、国家计委修订了原《出口商品外汇留成试行办法》，制定了《出口商品外汇留成办法》，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从1985年起，国家实行按出口商品收汇全额比例留成，即除出口的军品、增产原油、增产成品油等项的出口商品外汇留成按现行办法不变外，对一般出口商品收汇留成，按25%留成给地方、部门、企业。

4　月

1日　国务院通知狠抓出口保证国家外汇收入

国务院《关于狠抓出口保证国家外汇收入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委要从全局出发，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有利因素，狠抓出口工作，坚决完成1985年出口商品收汇270亿美元的计划，同时要适当调整进口，节省外汇支出。为了鼓励出口，超计划出口换汇实行中央和地方倒“三七”分成；对进出口商品推行许可证制度；加强对经营进出口贸易公司的管理。

2日　国务院发布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外资银行是指总行设在外国或香港、澳门地区，依照当地法律注册的外国资本的银行在经济特区设立的分行，以及总行设在经济特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册的外国资本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是指外国资本的银行、金融机构同中国资本的银行、金融机构在经济特区合资经营的银行。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其正当业务活动和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在经济特区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审批，可批准其经营业务项目的部分或全部。《条例》规定，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颁发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由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特区分行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

国家集中管理统一经营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

国务院批转石油工业部《关于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请示》，并通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国务院的通知指出，对外合作开采我国石油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应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经营。陆上石油对外合作勘探开发，只限在中央、国务院已批准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10个省（区）进行。国务院确定由石油工业部作为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政府主管部门，由中国石油开发公司负责经营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的业务。在陆上石油对外合作中，石油工业部要注意发挥地方和地质部门的积极性，地方和各部门要支持这项工作。

石油工业部的请示报告提出：合作区域以生成油气的沉积盆地为单元，不受省区界限的限制，成立中国石油开发公司的分支机构，代表公司与外国企业合作；对于承包对外合作区的石油作业和各种服务，中国石油开发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要及时提供市场信息，组织协调，避免盲目性。

4日　人民银行对控制1985年贷款规模作出规定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控制1985年贷款规模的若干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有：(1) 严格控制贷款总规模。1985年增发150亿元货币的计划要严格控制，不得突破。必须严格将贷款规模控制在710亿元左右。(2) 1985年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3) 改变敞口供应流动资金贷款的办法。(4) 农业银行的农村存、贷款增加额，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到当年平衡。信用社在农业银行的存款比例不得低于30%。(5) 企业自筹基建，银行不予贷款。信托投资公司发放的基建贷款，要列入国家基建规划之内，银行不予贷款。(6) 加强金融工作的统一管理。

5日　国务院批准建立第三产业统计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报告的《通知》中指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有必要研究和采用一些新的核算方法，从不同角度反映和研究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水平，以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我们要抓紧建立国民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统计。为建立第三产业统计，计算第三产业产值，首先要明确三次产业的划分。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提出我国三次产业的划分意见是：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第三产业：除上述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鉴于第三产业内部各个行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国内进行观察和考核，拟采用上述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计算第三产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

8日　国务院发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通知》指出，1984年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1160亿元，比1983年增长了21.8%，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增长12%的速度，投资规模偏大。为了保证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严格控制计划外投资，决定：(1) 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原规定不列入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的部分，也必须上报备案、严加控制。(2) 用银行贷款安排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执行。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准发放计划外贷款，不准用银行贷款以自筹资金名义擅自扩大投资规模。(3) 利用外资安排的基建和技改项目，必须经过批准才能对外谈判。(4) 自筹基建要严格控制在计划规模（包括浮动10%）以内，超过浮动范围的要加收10%的建筑税。(5) 银行对乡镇、集体和个人贷款，重点在能源、节能、交通、出口、农副产品加工和第三产业方面。(6) 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每季度检查一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情况。

9日　葛洲坝二江、三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二江、三江工程，经过四个洪水期的考验后，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委员会的竣工验收。这次验收是在中央有关部委分阶段组织多次中间验收的基础上进行的。国家验收委员会认为，葛洲坝二江、三江工程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是我国工程建设史上的一大胜利。这是设计、科研、施工、设备制造、运行管理等部门通力协作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取得的重大成果。总的看，二江、三江工程的设计是合理的，工程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几年的运行实践也证明工程建设是成功的。国家验收委员会指出，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技术复杂，施工难度大，涉及面广，许多技术在我国是首次使用，许多设备是首次制造。因此在今后的运行过程中，有关方面要继续协作，加强科研，加强管理，使工程不断地完善，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

11日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继承法

第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该法并对法定继承顺序、遗嘱继承和遗赠、遗产的处理等作出了规定。本法自1985年11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颁布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凡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独立核算的集体企业，都是集体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依照本条例所附的《八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税率表》计算征收。对下列纳税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或者一定程度上给予减征、免征所得税的照顾：(1) 开办初期，纳税确有困难的；(2) 新办的进行饲料生产的；(3) 乡镇集体企业，生产经营直接服务于农业的化肥、农药、农机具修理修配的；(4) 积极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品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5) 在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兴办的乡镇集体企业，经营确有困难的；(6) 由于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特殊原因，纳税确有困难的；(7) 经财政部批准其他需要减税、免税的。本条例自1985年度起施行。

国务院批准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征收工商统一企业所得税

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局《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征收工商统一税、企业所得税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外国企业在我国的常驻代表机构有下列收入的，应当征收工商统一税、企业所得税：（1）常驻代表机构为其总机构在中国境外接受其他企业委托的代理业务，在中国境内从事联络洽谈、介绍成交，所收取的佣金、回扣、手续费；（2）常驻代表机构为其客户（包括其总机构客户）在中国境内负责了解市场情况、联络事务、收集商情资料、提供咨询服务，由客户按期定额付给的报酬或者按代办事项业务量付给的报酬；（3）常驻代表机构在中国境内为其他企业从事代理业务，为其他企业之间的经济贸易交往从事联络洽谈、居间介绍，所收取的佣金、回扣、手续费。《规定》自1985年度起施行。

15日　邓小平谈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标确定了，从何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20日　赵紫阳谈发挥城市多方面功能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武汉考察时说，过去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较狭窄。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基地，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的中心。城市不应该局限于为本城市服务，而应该为它所辐射的整个经济区服务。应当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考核城市的主要指标。把我们的城市，首先是大城市，改变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社会化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城市改革要抓住简政放权、敞开大门、搞活企业这几个要点。城市与市场是不可分的，要逐步开辟多种市场。应当开辟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各种市场配起套来，经济杠杆的威力才能显示出来。每个城市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改革和经济工作中，我们要牵牛鼻子，就是要抓价格体系的改革。

国务院批准改革城市公共交通

国务院批转建设部《关于改革城市公共交通工作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题，必须综合治理，对各种车辆严格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增加客运车辆。同时，要加快道路网的改造和建设，修通必要的环路，形成流畅的干道系统。从长远看，在一些大城市要考虑发展快速轨道交通和地下交通，以缓和地面交通的紧张状况。各地要结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贯彻多家经营、统一管理的方针，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必须的支持，搞好搞活城市客运交通，使群众"乘车难"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22日　国务院要求严格控制引进彩色电视机装配线和彩色显像管生产线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引进彩色电视机装配线和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通知》。根据有关部门反映，一些地区和部门大量引进彩电装配线。这些装配线主要依靠进口成套散件维持生产。据预测，已经引进和正在引进的装配线投产后，生产能力超出了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因此，决定：不再引进彩电装配线。在通知下达之前，凡对外尚未签约的项目，停止对外洽谈；已签约及已引进的，由电子工业部组织验收认定，合格的才能批量生产，否则一律不批准进口彩电散件。彩色显像管的技术引进项目，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进行，未列入定点规划的地区，不得自行上这类项目。《通知》明确特区、开放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城市也按上述规定办理。

26日　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

国务院在颁布《试行条例》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我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偏低，需要适当提高折旧率。但是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有重点、分期分批地实施。除1983年和1984年已经批准提高折旧率的部分重点企业和上海、天津市的工业企业外，1985年可再选择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和部分沿海开放城市的轻纺出口工业企业，适当调整折旧率，提高折旧额按5亿元掌握。从1986至1990年的5年内，头两年分批调整其他国有工交企业的折旧率，后3年再分批调整非工交企业的折旧率。每年调整折旧率的数额和行业，由财政部商国家经委另行下达。未经财政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条例》规定的提取折旧的范围为：(1) 房屋和建筑物；(2) 在用的机器设备、仪器仪表、运输车辆；(3) 季节性停用和大修理停用的设备；(4) 农业企业的经济林木。不得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为：(1) 土地；(2) 通过局部轮番大修实现整体更新的固定资产；(3) 未使用和不需用的设备等。《条例》对停产、半停产、应淘汰设备的折旧也作了规定。

说明　已被1992年11月16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代替。

29日　国务院决定集资兴建粮棉仓库

国务院决定采用中央和地方集资的办法，在1985年和1986年兴建仓容为300亿斤的粮库和仓容为2000万担的棉花库。新粮棉库的建设布局，将根据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进行安排，主要分布在铁路沿线，海、江、河港口以及公路干线枢纽地带。这些粮棉库是在粮棉生产区建设的为全国服务的中转储备库、为扩大粮棉出口服务的港口库和

为大中城市服务的粮食供应库。在棉花主产区的大型棉花加工厂，还将建设一批仓厂结合的中转储备库。

5　月

2日　赵紫阳谈化学工业要加快发展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听取化工部党组汇报时指出，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基础部门，要把包括化工材料在内的原材料工业摆到同能源、交通建设一样重要的位置上来。化学工业是一个多行业、多品种的工业，涉及到众多的经济部门。要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大、中、小企业一起上，大家办化工。对地方集资办化工的积极性要给予政策鼓励和技术指导。化学工业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细化工是当前发达国家中方兴未艾的产业，它包括农药、染料、涂料、化学试剂、感光材料、食品添加剂和饲料添加剂等，品种多，耗能少，产值高，许多产品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为了在化工方面缩短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化工部要把研究国际上化学工业的发展动态，了解国际科技最新信息，引进最新技术，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化工部门要加快体制改革。今后化工部的主要作用是对全行业实行宏观指导，搞好统筹、协调、服务、监督。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化工部党组确定发展化工的三个重点：一是复合化肥和化学矿山；二是基本化工原料，特别是纯碱和烧碱；三是精细化工。

4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作出规定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军队的生产经营活动，要严格遵守党和国家、军队的有关政策、法令和纪律，保证战备、训练、施工等各项任务的完成和军事机密的安全。严禁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偷税漏税和买空卖空、牟取高利；不准套购或倒卖国家的紧俏物资和变卖计划内分配的物资。严格执行军企职责分开，官商分离的原则，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现役军人不准私人经商，不准个人合资办企业或入股分红；不得兼任公司的各种职务；不准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所办企业谋取利益。部队生产的产品，在完成上级规定的补助调剂供应和上调任务后，多余部分可利用军人服务社销售，也可委托地方商业、供销部门供销。所有产品销售，执行当地规定的市场价格。军人服务社应以为军队服务为主，兼营消费品的代销业务，要按规定缴纳工商税。

17日　国务院批准农业税由公粮改为折代金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农业税改为按粮食"倒三七"比例价折征代金问题的请示》。过去我国农业税都是以征粮为主，通常称为"公粮"。这种征收实物税的办法是与自给半自给经济相适应的，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它越来越不相适应。农业税由征收实物为主改为折征代金，是我国农业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具体内容是：(1) 将现行的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改为折征代金。从1985年起，农业税一般不再征收粮食。如少数地区农业税仍需征收粮食，可暂不实行折征代金的办法。(2) 折征代金统一按粮

食“倒三七”比例收购价计算。

国务院批准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水利电力部、国家物价局《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为了加速电力建设，搞活电力工业，用经济办法管理发电供电工作，决定把国家统一建设电力和统一电价的办法，改为鼓励地方、部门和企业投资建设电厂，并对部分电力实行多种电价的办法，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规定》指出：（1）集资办电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集资扩建电厂；二是买用电权，把这部分资金转为电力建设资金。（2）对部分电力实行多种电价。（3）集资电厂实行“谁投资、谁用电、谁得利”的政策，集资电厂使用议价生产资料或引进外资的，其售电价格可相应浮动。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裁员100万

中央军委召开军委扩大会。会议确定两年中军队的中心任务是，搞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6月4日，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邓小平指出，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没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强调，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

24日　国务院发布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明确，本条例规定的技术引进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司、企业、团体或个人，通过贸易或经济技术合作的途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公司、企业、团体或个人获得的技术。引进技术必须先进适用。双方必须签订书面的技术引进合同。签订合同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供方不得强使受方接受不合理的限制性要求。《条例》对合同报批必须提交的文件也作了规定。

国家经委等7部门联合召开国营小企业转让试点工作座谈会

会议决定在邯郸、丹东、大连等10个城市中选择部分国营工业小企业进行转让试点。

25日　“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运八”飞机在陕西运输机制造厂投入批量生产。“运八”飞机装有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每台4250马力；最高时速为660多公里，飞行高度可达1万米以上，可载重20吨，具有空运、空降、空投等多种功能。装货时，两辆解放牌卡车可先后从机尾直接驶入。“运八”是届时中国最大的运输机。

26日　我国首座微型核反应堆安全运行一周年

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微型核反应堆在运行的一年里，共承接分析研究课题

1400个，研究成果已经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得到广泛应用。微型核反应堆一年来还完成了自身工艺系统和仪器设备的一系列考验。考验结果，反应堆建筑物内部核辐射程度远远低于允许限量，建筑物外部的环境则同天然的完全一样。这个反应堆已经实现完全由计算机控制。

2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的主要内容是：(1) 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2) 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3)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4) 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5) 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此前于5月15—19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决定》草案。邓小平在5月19日的大会上就教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100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可能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6 月

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普通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从1985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从7月1日起执行新的工资制度。这次工资制度改革，是为了逐步消除现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和其他不合理因素，初步建立起能够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便于管理和调节的新工资制度，为以后进一步理顺工资关系打下基础。实行新的工资制度，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原则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工作人员的工资同本人的工作职务、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使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工资有一定的增加，通过改革建立起正常的晋级增资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即按照工资的不同职能，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奖励工资四个组成部分。这次工资改革，按照预定方案，平均每人增加18元，全年共需40亿元。

7日 全国国防军工协作工作会议提出军用技术要加快向民用转移

全国国防军工协作会议提出，我国国防军工协作配套部门，行业门类较齐全，产品配套，尤其在设备条件，工艺技术和科研力量方面，大都在国内同类产品部门中保持着优势。把这些优势尽快地转为民用，能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军工技术加速向民用转移的三种主要做法：(1) 一种产品，多种开发。就是把一些原来单纯军需的产品，通过扩大开发，推广于民用。(2) 一套设备，多种用途。利用

生产军品的工艺和设备，生产工艺相近、技术相通的民用产品。(3) 一支队伍，多种功能。我国军工协作配套部门，在确保完成军品科研任务的同时，应提倡科研技术人员按照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开拓与本领域相近的民用科研课题，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尽快促成先进军工技术向民用的转移和推广。

14 日　国家计委调整 1985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5 月 31 日，国务院确定，1985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严格控制在 1400 亿元以内，责成国家计委按此分配下去，明确责任，安排落实。超过控制数的，应由省、市长和银行行长负责。6 月 11～12 日，国务院召开部分省长、市长会议，对此作了部署。

根据以上精神，国家计委对 1985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进行调整：(1)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在 1400 亿元以内。技术改造更新措施投资总规模维持原计划 360 亿元。车船、飞机购置投资维持原计划 20 亿元，其他专项资金搞的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在 1984 年实际完成的 132 亿元以内，剩下的 888 亿元为基本建设投资，比原计划增加了 88 亿元。(2) 在 888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包括列入计划规模的投资，经国务院批准追加的投资，以及按照国家规定不纳入计划规模的广东、福建四个经济特区和广东核电站的投资，经国务院批准用国家结存外汇安排的基建投资，以及经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批准不纳入计划规模的劳改煤矿、啤酒专项等贷款。(3) 原定的自筹基建投资允许在计划指标 10%的范围内浮动的规定 1985 年暂不执行。

15 日　国务院批准加强电冰箱行业管理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轻工业部《关于加强电冰箱行业管理、控制盲目引进的报告》。报告针对电冰箱生产布点过多，尤其是盲目引进的新问题确定，将现有的 116 个厂、点减少到 41 个；引进规模也将有较大压缩。同时认真把好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关”。凡属电冰箱的引进项目，统一由轻工业部负责组织协调，并由有关部门审批。没有批准的电冰箱引进项目，一律停止同外商接触和向外商询价，也不得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再引进。报告还提出电冰箱由轻工业部归口管理，并负责宏观指导；发展专业化协作，促进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

18 日　国家计委简化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审批程序

国家计委印发《关于简化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审批程序的规定》。《规定》提出，根据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总投资在 30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审批，总投资在 2 亿元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需要报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企业的技术改造应有总体改造规划。总体改造的设计任务书经国家计委批准后，其中的单项工程可不再报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由改造企业或其委托的咨询、设计单位负责编制。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应有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和初步设计。此外，还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的主要内容作出规定。

26 日　国务院决定对若干商品开征进口调节税

针对一些地区和单位耗用大量外汇，盲目进口某些国内外差价大的商品和成套散件，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国务院颁布《关于对若干商品开征

进口调节税的通知》，决定对若干商品由海关在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产品税（或增值税）的同时征收进口调节税，借以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商品进口。国务院决定征收进口调节税的商品品种为：小轿车、旅行车、工具车、越野车和其他机动小客车、8吨以下载重车、摩托车、录像机、复印机、彩色投影电视机、电视显像管、电子计算器、微型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涤纶加工丝、化纤织物，税率在20%—80%不等。各经济特区和海南行政区进口上述应税商品，也应按规定征收进口调节税。

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的决定，通知各地海关自7月16日零时起，对上述进口货物开征进口调节税。

27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银行金融信贷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银行金融信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加强金融信贷管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常务会议议定：（1）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导，切实把各项资金管好，把固定资产的投资管好。各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要统一纳人人民银行的国家信贷计划；各专业银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信贷，要按项目严格控制，不得突破国家下达的计划。（2）在信贷工作中，要坚决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金融制度。（3）各级银行和从事信贷工作的同志，要负起责任，忠于职守，模范地遵守有关法规制度。（4）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监督、检查和支持银行工作。（5）一切违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金融信贷制度的错误作法，银行部门有权拒绝执行。

29日　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合作合同签字

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我国煤炭工业最大的中外合作经营项目，由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拥有的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共同拥有的中国岛溪煤炭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双方采用契约式合作经营方式。这个露天煤矿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和朔县境内，那里的煤是优质的动力煤，煤炭储量约5亿吨，煤矿设计年产原煤1500万吨，1986年第四季度出煤，1987年全部建成投产。这个矿选用国际先进设备和工艺，全矿总定员高峰时期为1720人，每工效率为30吨，约为当时我国露天煤矿效率的15—20倍。7月1日安太堡露天煤矿举行开工典礼。

7　月

3日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

国务院发布修定后的《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原《规定》是1984年6月28日发布的。修改过的《暂行规定》要求，凡未实行工资总额随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国营企业应按规定缴纳国营企业奖金税。奖金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按年计征。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不超过4个月标准工资的，免税；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超过4个月至5个月标准工资的部分，税率为30%，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超过5个月至6个月标准工资的部分，税率为100%，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超过6个月标准工资的部分，税率为

300%。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要求凡按照国务院规定实行工资总额随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国营企业都应按照本规定缴纳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企业当年增发的工资超过国家核定的上年工资总额7%以上的部分，计征调节税。工资增长总额占核定工资总额12%—20%的，税率为100%；工资增长总额占核定工资总额20%以上的，税率为300%。这两项规定自1985年度起施行。

9日　国务院决定建立博士后研究制度

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决定在我国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并拨出专款用于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全国重点工程实行项目决策招标

计划于“六五”期间开工建设的年产60万吨纯碱的全国重点项目，通过招标投标确定在山东省寿光县动工兴建。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整个建设项目的决策，是我国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一个新突破。从1983年到1985年元月，国家相继批准了江苏连云港碱厂、山东寿光碱厂及河北南堡碱厂的设计任务书，设计能力都是年产60万吨纯碱。经过多次协商，国家计委决定委托化工部对江苏、山东、河北三省人民政府提出招标，并成立招标领导小组；三省人民政府明确各自的计委为投标责任单位，也分别建立了投标领导小组。根据三个纯碱项目招标评审结果，山东省计委代表的寿光碱厂建设条件最优，一举中标。中标项目的责任单位按中标条件同国家签订包建合同后，再用招标办法将各个单项工程包给施工企业，逐步建立起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经济责任制。

11日　邓小平谈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发表意见，要点是：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需要的时间更长。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12日　国务院要求控制重复引进和制止多头对外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控制重复引进和制止多头对外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解决不必要的重复引进和多头对外的问题，在技术引进工作方面，必须注意抓好三个方面：(1) 提高引进技术的起点和水平，特别是基础件、元器件、关键件和基础工艺技术，提高综合经济效益；(2) 限制高档消费品和某些明显超过需要的生产装配线的进口，从严格控制一部分国内外差价较大的商品及其生产线的进口人手，整顿协调对外谈判、考察工作；(3)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已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形成综合配套能力上来，组织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关键设备的试制与批量生产，提高国产化水平。《报告》列出了“暂停进口的生产装备线”、“统一归口、联合对外引进技术和设备项目”、“统一归口、联合对外引进软件技术项目”和“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等4个清单，并提出

了相应的措施。

公检法联合严打制造贩卖假药毒品和有毒食品等犯罪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抓紧从严打击制造、贩卖假药、毒品和有毒食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对于当前出现的这种制造、贩卖假药、毒品和有毒食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各级政法部门必须抓紧从严打击。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从严打击制造、贩卖假药、毒品和有毒食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作为当前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斗争的一项重点来抓。对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以经济制裁代替判处刑罚。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3 日　中纪委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公开信全文如下：福建省委并转晋江地委、行署党组：晋江地区的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用各种行贿手段销往全国各地。这种明目张胆地违犯党纪国法，严重违背社会道德，为万人所斥的恶劣行为，长时期里在你们那里存在和发展，作为党和政府领导机关的晋江地委、晋江行署，以及晋江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竟然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甚至把大量制造假药危害人民的乡镇加以表扬，因此，你们不能不深刻地检查在这一重要事件中，你们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晋江地区制、售假药，报纸上公开揭发批评已经一个月了，除应检讨领导上的责任外，必须按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有关人员，党员参与制造假药的，必须按情节给以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违犯法纪的由政法部门处理。对有关党组织和领导人亦必须追究责任。请你们将查处结果报告中央纪委。

22 日　国务院批准调整储蓄存款利率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储蓄存款利率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的报告》提出，为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效益，控制固定资产总规模，配合 1985 年物价和工资改革，组织货币回笼，从 8 月 1 日起再次调整储蓄存款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在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中，半年期的由现行的年息 5.4%调高到 6.1%，一年期的由现行年息 6.48%调高到 7.2%；三年期的由现行年息 7.92%调高到 8.28%；五年期的由现行年息 8.28%调高到 9.36%；八年期的由现行年息 9%调高到 10.44%；活期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和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等项存款利率也相应进行调整。在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中，一年期由现行年息 5.04%提高到 7.92%；三年期由现行年息 5.76%提高到 8.64%；五年期的由现行年息 6.48%提高到 9.36%；十年期的由现行年息 7.2%提高到 10.08%；十年以上的由现行年息 7.92%提高到 10.8%。“拨改贷”贷款利率暂不调整。

国务院发布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

《办法》规定，凡水利工程都应实行有偿供水。工业、农业和其他一切用水户，都应按规定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付水费。水费标准应在核算供水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国

家经济政策和当地水资源状况，对各类用水分别核定。供水成本包括工程的运行管理费、大修理费和折旧费以及其他按规定应计人成本的费用。农业水费中，粮食作物按供水成本核定水费标准；经济作物可略高于供水成本。农业水费所依据的供水成本内，不包括农民投劳折资部分的固定资产折旧。工业水费，按供水部分全部投资（包括农民投劳折资）计算的供水成本加供水投资4%—6%的盈余核定水费标准。水资源短缺地区的水费可略高于以上标准。城镇生活用水水费，由水利工程提供城镇自来水厂水源并用于居民生活的水费，一般按供水成本或略加盈余核定，其标准可低于工业水费。水力发电用水水费中，结合其他用水的，一般按水电站售电电价的12%或电网平均售电电价的8%计收水费；不结合其他用水的，其水费根据水资源的状况，按结合用水水费的二至三倍计收。为改善环境和公共卫生等用水水费，可参照农业水费标准确定。由水利设施专门供水进行养殖、种植，其水费标准可参照农业经济作物的水费标准确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月

1日　邓小平谈建立经济特区

邓小平在会见竹人义胜委员长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说，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我还是两句话：第一，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10日　第一次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召开

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及其他对西部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同志聚集一堂，共同探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我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11个省区。这些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这里的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西部地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64%；人均国民收入只及全国平均数的66%；目前全国约有8000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其中的65%即5600多万人居住在西部11省、区。党中央提出了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将要转移到西部地区的战略设想。这次讨论会就是根据这个战略设想召开的。

1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瞻前顾后，统筹安排”的社论

社论指出，从1984年第4季度以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1985年上半年比1984年同期又大幅度增长，导致建筑材料、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全面紧张，工程竣工率下降，并且间接地刺激了消费基金的增长。社论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同志较多地重视微观放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控制的指标。社论要求，加强宏观控制，要着重扭转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

度的现象；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从全局出发，不能再搞那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强银行对基本建设贷款和企业自筹资金的管理，防止再出现各银行争相发放基建贷款的情况，凡属基本建设投资，今后一律归建设银行管理；社会集资规模必须纳入国家计划。不论在建项目或新开工项目，都要逐个进行认真审查。既不搞“一刀切”，又要狠心“切一刀”，砍掉那些不合理的建设项目，腾出力量保证能源、交通、原材料等计划内重点项目的建设。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严格控制支出

会议指出，1985 年 1 月—7 月财政情况良好，财政收入 995.6 亿元，完成预算的 66.4%，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 20%。但收入中“跑、冒、滴、漏”不少，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偏高，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增加过多，行政经费没有压缩下来。另外，违犯财政纪律的现象相当普遍。会议根据国务院领导的要求，提出要把消除 1985 年原定的 30 亿元财政赤字，争取实现收支平衡作为下半年全国财政战线的中心任务，除了要继续大力组织收入外，关键在于严格控制支出。各级财政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支出的管理。会议提出以下增收节支措施：(1) 大力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各级财政部门要大力支持企业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确保产值、实现利润和上交税利同步增长。对到期不能扭亏的企业和因管理不善新发生亏损的企业，财政一律不予弥补照顾。(2) 加强税收工作。1985 年税收任务必须保证超收 120 亿元。要严格遵守税法规定的减免税权限，不得擅自减免税收。(3) 努力改善外贸和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4) 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基本建设支出。除个别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以外，一般不再追加基建投资。(5) 把行政管理费和社会集团购买力支出坚决压下来。凡未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批准设置的机构，一律不予拨款。1985 年的设备购置费和会议费用分别比上年实际支出数压缩 50% 和 30%。会议还决定开展全国税收、财务大检查，严肃财经纪律，狠刹不正之风。

16 日　国务院批准实施星火计划

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关于拟定促进地方经济的“星火计划”的请示》。国务院领导在批示中指出，这是一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长远利益的事业。农业结构调整，不发展乡镇企业不行。发展乡镇企业不依靠科技就不会有前途。两者结合将可能闯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因此，应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长期坚持下去。这样做，必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家科委的请示中提出，在着重抓好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中长期项目的同时，抓一批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有示范和推广意义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短平快”项目。选择原则为：必须瞄准国内外市场需求；确有资源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技术成果商品化周期短，经济效益显著，有可能在一二年内投产，五年左右回收投资；具有示范意义，能够为推广应用提供成套成熟技术或提供设备，并可以成为地区培训基地；优先选择可以创汇或能减少进口的节汇项目。拨款方式实行“匹配拨款”制度，即经过充分论证后的项目，还要由地方财政和承担项目的企业分别集资 1/3 以后，国家才给以“匹配支持” 1/3 的投资或贷款。对合同的执行由银行监督。成功的，国家投资分期收回；失败的，风险均摊。

19日 国务院批准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的报告》。《报告》规定：这次大检查的范围，主要是工业、交通、商业、粮食、外贸、供销、物资、金融等国营企业。对国家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税收也进行检查。主要是检查1984年和1985年发生的问题。对个别数额大、性质严重的案件，也可以追溯到1984年以前。主要检查纳税单位和纳税人是否按照税法规定，及时足额地上缴各种税款，有无偷税、漏税、欠税；企业应上交国家的利润、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等各项收入是否及时足额地上交了国库，有无截留、挪用、拖欠的情况；企业成本费用列支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有无自行提高留利比例和各项专用基金比例的情况；有无违反国家规定，化大公为小公，或者收入不入账，私立"小钱柜"的情况；有无违反国家规定，自行乱涨价，倒买倒卖国家重要的工业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情况；有无炒买炒卖外汇的情况；有无突击花钱和动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情况；有无贪污、投机倒把、行贿的行为。

20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

国务院发出《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通知》。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各地成立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公司。总的来看，不少公司办得是好的，对于促进生产，活跃流通，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管理工作没跟上，有些公司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政企不分和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地影响公司本身的健康发展，而且干扰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认真加以解决。为此《通知》对清理整顿公司作出如下规定：(1) 必须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对于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干部办的公司，要实行政企分开，并使公司在经济上与党政机关脱钩；党政机关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的，要辞去一头，即辞去兼任的公司职务或辞去党政机关的职务。对于行政管理机构改挂公司牌子、实际上不承担经济责任、仍然行使政府管理职能的单位，有的可以与其他机构合并，有的可以改为服务性公司，个别的经主管部门批准也可以恢复为行政管理机构。(2) 公司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开办公司一般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金、设施和从业人员，有健全的财务制度、组织管理机构和公司章程。(3) 成立公司必须经过批准，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公司要持正式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营业。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公司，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直接登记注册。(4) 公司必须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公司的经营范围，要同其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必要条件相适应，可以一业为主，兼营其他，但必须按照登记注册时所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改变或扩大经营范围。

21日 邓小平谈改革的目的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

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24日　国务院决定开征集体企业奖金税

国务院发布《集体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明确从1985年度起对集体企业开征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的征收和管理比照《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办理。集体企业计算奖金税的工资标准，凡执行国营同行业企业工资标准的，比照国营同行业企业工资标准计算；未按国营同行业企业工资标准执行的，每人每月工资统一按60元计算，超过部分，视同发放奖金。

25日　国务院批准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管理局公布《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所指的公司是指依本规定的程序设立，有独立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承担经济责任的从事生产经营或服务性业务的经济实体。公司是法人，董事长或经理是法人代表。开办公司必须向公司所在地的市、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全国性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个体经营者不得单独申请成立公司。开办公司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1) 公司章程；(2) 固定生产经营或服务场所；(3) 与生产经营或服务规模相适应的资金；(4) 与生产经营或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5) 健全的财务制度；(6) 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生产性公司自有流动资金不得少于10万元。以批发业务为主的商业性公司的自有流动资金不得少于20万元；以零售业务为主的商业性公司的自有流动资金，不得少于10万元；咨询、服务性公司的自有流动资金不得少于5万元。

26日　青藏公路改建柏油路面工程交付使用

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前夕，青藏公路改建柏油路面工程全线完成，正式交付使用。青藏公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全长1937公里，整条公路蜿蜒于青藏高原上，平均海拔高度近4000米，要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等8座大山，跨越黄河、长江、怒江、沱沱河水系等10条河流。沿途地质条件复杂，空气稀薄，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劣，在世界公路建设史上十分罕见。青藏公路是紧密联结内地与西藏的大动脉，每年通过的进藏物资要占进藏物资总运量的81%以上。公路改建后，车辆行驶速度提高；周转时间可缩短45%，减少燃油消耗11%，每年可节约燃油5000余吨，并可节约车辆保修、大修和轮胎费用1500万元。

28日　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1985年基本建设规模

国务院发出《关于不再扩大1985年基本建设规模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6月以来，仍有不少地区由于年初基建摊子铺得过大，虽经压缩，仍难以完全纳入国家下达的控制规模之内，要求增加投资指标。各地区提出的要求中有些是合理的，但从全局来看，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严格控制基本建

设投资规模。为此，国务院作出如下规定：（1）1985 年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下达的控制规模之内，国家不再追加计划指标。（2）银行要严格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发放基建贷款。计划外贷款要立即停止发放。已经发放的计划外贷款或超计划的贷款，必须从其存款中扣回。（3）对自筹资金，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规定，凡 6 月末日以后存入建设银行的存款今年不得动用。上半年存款额低于自筹基建控制指标的，由国家计委核减自筹指标；存款额高于控制指标的，必须按控制指标执行。除建设银行外，其他银行不得办理自筹基建存款和拨款。对过去规定的“五类不纳入”基本建设资金的建设项目要进行清理，并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资金渠道和用途进行建设。除中小学建设外，其余“四不纳入”（注：指用县级地方机动财力和预算外安排的县（包括县以下）医院、保健站、文化馆、体育馆、博物馆的建设；用公路养路费新建、扩建公路；用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安排的新建、扩建城市、城市道路和新增公共交通车辆购置；老企业用自有资金安排的职工宿舍。）也要进行控制。邓小平谈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29 日　国务院发布审计工作暂行规定

《规定》明确审计机关是代表国家执行审计监督的机关。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国务院设审计署，在总理领导下，负责组织领导全国的审计工作，对国务院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审计局，在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内的审计工作，对上一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政府各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按照审计机关的规定，报送财务收支计划、信贷计划、预算、决算、报表、有关的规章制度、资料等。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经济制裁、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提请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国家计委等部门要求加强重点建设中的城市规划和前期工作

国家计委、建设部发出《关于加强重点建设中城市规划和前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是保证城市各项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依据。凡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的选址都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凡与城镇有关的建设项目，应按照《城市规划条例》的有关规定，在当地城市规划部门参与下共同选址。各级计委在审批建设项目的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时，应征求同级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意见。各城市规划部门要积极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9　月

1日　我国首次公布国际收支统计情况

国际收支统计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对外经济、政治及文化往来的系统记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每年都要公布本国的国际收支统计情况。编制和公布我国国际收支统计，有利于从宏观上对我国对外开放的规模、速度进行规划预测和控制，也有利于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投资者了解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国务院批转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在批转《规定》的通知中指出，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既是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承担者，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骨干力量。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一方面要有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更主要的是企业应当眼睛向内，搞好内部的改革，发挥企业本身拥有的人才、技术、设备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综合利用等方面狠挖潜力。用好已经给予企业的权力，明确树立市场观念、投入产出观念、利息观念、资金周转观念、竞争观念和智力开发观念，尽快由单纯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同时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一支有理想、守纪律的职工队伍，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暂行规定》要求，进一步减少指令性计划，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要给企业留有一定的余地；对于经济效益好、调节税率高的先进企业，有计划地逐步减免调节税；允许以大企业为主体，或者以名牌产品为龙头，打破所有制界限，进行跨行业、跨地区、跨城乡的联合与协作；给部分大型企业直接对外经营权；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发展多种产品，进行多种经营，可以进行产品的延伸或服务的延伸。

国务院要求扭转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状况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扭转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状况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工业生产，包括出口产品的生产，必须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关系到四化建设成败和企业存亡的大问题。对生产和在市场上兜售假的和冒牌产品的不法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国家经委的《报告》指出，1984年第4季度以来，部分工业产品质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85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工业品质量稳定提高率比上年同期下降11.6%。在产品质量上弄虚作假、“假、冒、次、劣”产品在市场上也经常出现。为了尽快扭转这种状况，国家经委提出如下措施：（1）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坚决纠正片面追求产值、利润、忽视质量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倾向。（2）层层把好质量关，坚决实行“五不准”。（3）深入开展工业产品质量大检查。从1985年9月份开始，实行国家监督性质的产品抽查制度。暂停颁发国家金、银奖牌。（4）加强质量监督机构，形成全国统一的质量监督网。（5）严格按照质量标准组织生产。（6）加快推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步伐。（7）加强法制建设。（8）进一步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9) 加强对乡镇企业的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

2日　中外机构首次联合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会议于9月2日至7日在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轮船上举行，遂简称“巴山轮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是第一个中外机构共同在我国召开的重要的经济理论讨论会，在当时曾产生较大影响。

6日　国务院批准调整1986年棉花产购销政策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等部门《关于调整1986年棉花产购销政策的报告》。《报告》提出1986年对棉花产购销政策作以下调整：(1) 继续控制棉花种植面积，努力提高棉花质量，解决棉花生产超过需求、库存大量增长的问题。(2) 调整1986年的棉花购销政策。1986年全国棉花定购计划仍为8500万担。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种麦以前把定购任务落实到棉花生产者，按国家定购任务安排生产，不要搞定购以外的种植。从1986年新棉上市起，北方棉区加价比例由“倒三七”改为“倒四六”，即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加价。南方棉区继续实行“正四六”比例不变。对工业用棉实行有计划的选购。纺织企业用棉应纳人收购调拨计划，从1985年新棉上市起，纱厂需要的棉花，要按计划向棉花经营部门选购。工业部门不要直接向棉花生产者购进棉花。(3) 积极扩大棉花、棉布的利用和销售。纺织工业部门要尽量多安排一些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棉花经营部门要弹制各种品级、多种规格的棉被套，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1985年，国务院已批准拿出1000万担国家储备优质絮棉，以优惠价格供应城乡居民。要允许多渠道经营絮棉，允许农民直接销售絮棉。内贸、外贸和商检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扩大棉花出口。

18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建议》提出，“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是：(1) 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2) 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中心的问题是根据国力的可能，在妥善安排人民生活的同时，十分注意确定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做到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在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3) 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4) 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建议》提出“七五”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为：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使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每年平均增长4%—5%，使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

都有进一步的改善。

《建议》提出在“七五”期间以至更长的一些时间内，必须在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上认真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适应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适应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坚决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三是正确处理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布局的合理化。

《建议》提出“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为：(1) 坚持依靠政策和科学，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继续促进农业的全面稳定发展；(2) 努力扩大消费品工业的生产领域，积极发展民用建筑；(3) 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重点工程；(4) 加快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逐步改变第三产业同第一、第二产业比例不相协调的状况；(5) 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运用先进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6) 正确处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发展它们相互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有特色的经济区网络。

《建议》提出，“七五”期间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要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形成一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

国务院对口岸开放作出规定

国务院发布《关于口岸开放的若干规定》。《规定》将我国的口岸分为一类口岸和二类口岸。一类口岸是指国务院批准开放的口岸，二类口岸是指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口岸。凡是开放的口岸都应根据需要设立边防检查、海关、港务监督、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商品检验等检查检验机构，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口岸机构。《规定》还对开放口岸的报批程序、报批开放口岸应附具的资料、对外开放前的验收等事项作出了具体规定。

20日　国务院决定征收事业单位奖金税

国务院发布《事业单位奖金税暂行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1) 凡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国家不再核拨事业经费，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不超过3个月基本工资金额的，免税；超过免税限额的部分，比照国营企业奖金税适用税率征收奖金税。(2) 凡需要国家核拨一部分事业经费的事业单位，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不超过1个半月基本工资金额的，免税；超过免税限额的部分，比照国营企业奖金税适用税率征收奖金税。(3) 凡需国家核拨全部事业经费，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人均超过核定限额的，比照国营企业奖金税适用税率征收奖金税。(4) 事业单位超过国家规定工资标准，多发的工

资和发放的奖金，包括用取得的经济收入开支的各种奖金性质的工资、津贴、补贴和实物奖励等，均属于奖金税的计算范围。

23 日　陈云在党代会上谈经济工作

陈云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主要指出，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十亿人口穿衣吃饭，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

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速度，分别为 7% 和 6%。这个速度比较适宜，执行中可能超过，但主观上不必再提更高的指标。

24 日　国务院发布工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

国务院发布《工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这个《办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单位。《办法》规定：凡发给职工个人的劳动报酬和按国家规定发放的津贴、补贴等，不论其资金来源如何，属于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额组成范围的，均应纳入工资基金管理范围之内。凡属工资总额组成的支出，不论现金或转账，均应通过开户银行，从工资基金专用账户中列支。各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单位，只能在一个银行建立工资基金专户。各单位应根据国家下达的年度工资总额计划，编制分季度或分月的工资基金使用计划，送单位所在地开户银行监督支付，并抄报主管部门备案。需要增加工资指标的，应按照劳动工资计划的审批程序办理。企业的奖励基金，应按国家规定提取。经国家批准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国营企业，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国务院主管部门应按其隶属关系将国家核定的上缴税利、工资总额基数、挂钩比例和按挂钩比例计算的增加工资额，逐级下达到企业并抄送其开户银行，同时报劳动人事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30 日　国务院决定对中外合资建设港口码头给予优惠待遇

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外合资建设港口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外国公司、企业或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共同投资兴办合营企业建设港口码头，除适用有关合营企业的法律、法规、规章外，根据其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和资金利润率低的实际情况，给予优惠待遇。《规定》对合营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办法、进口建设码头必需的原材料、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和其他生产设施的关税、工商统一税、所得税等方面的优惠作出明确规定。

国务院批准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政策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的要

点：(1) 对综合利用资源的生产和建设，实行优惠政策。(2) 开展综合利用，必须打破部门、行业的界限，不搞一家独办。国家提倡和支持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3) 普查勘探矿产资源，新建或改造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的矿山（包括煤矿、金属矿、非金属矿山）、油气田，都必须按照国家矿产资源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综合勘探，综合评价，综合开采，综合利用"的方针。(4) 对企业开展综合利用，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5) 由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的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的产品，不列入国家分配计划，自用时不抵扣分配指标。(6) 企业对未经加工的煤矸石、粉煤灰、各种炉渣等，应当积极支持外单位使用，不得向使用单位收费或变相收费；对经过加工的，除国家有规定者外，应当按照综合利用单位利益大于原料供应单位利益的原则合理收费。(7) 企业在不增加国家分配燃料的情况下，利用余热、压差和低热值燃料所发的电力，不纳入国家分配计划，不抵扣分配指标，多余电量可以通过独立电网自销，也可以送人大电网委托电力部门代销。(8) 企业按照本规定第5条自销的产品，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价格可以由企业自定。(9) 由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的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的产品，在国家经委提出的《资源综合利用目录》范围内的，减免产品税。(10) 开展综合利用的资金，主要靠企业自筹；生产出口商品的，可以利用外资；对社会效益较大而企业不受益的项目，应当纳入国家计划，予以扶持；对微利和增产国家急需原料的综合利用项目，各专业银行应当积极给予贷款扶持，还贷期限可以适当延长。(11) 综合利用的技术引进项目和进口设备、配件，可以视同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减免税、优先安排外汇等优惠。企业综合利用生产的出口商品，实行外汇分成。(12) 开展综合利用所需要的技术，除重大课题由国务院各部门积极组织攻关外，部门和地方可以组织综合利用科技市场，实行技术有偿转让；企业也可以专题招标，委托科研机构或社会科技力量承担。(13) 国家设立综合利用奖，奖励对发展综合利用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14) 各部门应当大力支持企业开展综合利用工作，要相互主动协调行业间、地区间的关系。(15) 国家经委负责全国资源综合利用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工作。

说明　已被1996年8月3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的通知》代替。

国务院召开省长会议部署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在这次会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指出，必须下决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这是一个涉及经济全局，关系"七五"计划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关键问题。他指出：(1) 好的形势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关键在于能否坚决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逐步做到基本平衡。198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达到183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464亿元。1985年将达到2300亿元以上。从总规模来说，五年翻了一番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已经明显超出了我们的国力，而且还有不断膨胀之势。从投资的构成看，国家预算外投资增长幅度，大大的超过预算内投资的增长；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全国重点项目；非生产性投资和加工项目投资比重上升，超过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幅度。投资规模过大，投资构成又不合理，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2) 建设规模是否安排合理，是否

同国力相适应，是经济能否稳定的一个重要界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实践所证明的一条客观规律。过去几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大膨胀，是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发生的。虽然通货膨胀，但物价基本上是冻结的。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再发生那种问题，结果必然是物价全面上涨。如果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改革肯定搞不下去。(3)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害处极大，会引起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改革就无法进行，经济也不能稳定，甚至大起大落，被迫再次进行大的调整，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这次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猛的问题，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分散在两年半的时间解决，必须引起大家的重视，搞不好可能会控制不住。

10　月

10 日　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教委统一管理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要求，为了统筹安排国家计划招生和用人单位委托培养招生，使招生、培养和分配工作相结合，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经国家教委与国家计委共同商定，并报请国务院批准，从 1986 年起，原由国家计委主管的大学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分配计划编制工作移交国家教委统一主管。为此，国家教委、国家计秀发出《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统由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管》的通知。

国务院通知加强汽车进口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汽车进口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1984 年以来，大量盲目进口汽车，特别是进口高级小汽车的情况十分严重。据海关总署统计，1984 年至 1985 年 8 月进口汽车已达 34.1 万辆，其中小轿车 8.8 万辆。8 月以后，仍有不少汽车陆续到货。这既消耗了国家大量外汇，又冲击了国内的汽车工业，特别是大量进口高级小轿车，已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为了迅速扭转这种状况，国务院要求：(1) 除对外已有合同或长期协议以及国内不能生产供应的车型以外，1986 年原则上不再批准进口汽车。(2) 从 1986 年起，所有汽车进口一律纳入国家经委组织制订的集中报批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由国家经委下达给各地区、各部门执行。经贸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下达的集中报批方案发放进口许可证，海关凭进口许可证验放。(3) 华侨、港澳同胞捐赠汽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审批，批准数量全年累计不得超过 100 辆，并抄报国家经委备案。(4)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配备小轿车的标准，认真检查和清理配车情况，对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出妥善处理。(5) 军队系统进口汽车，也要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11 日　国务院物价小组要求慎重对待物价调整

国务院物价小组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家物价局提出的今冬明春稳定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价格的措施。这次会议的《纪要》指出：现在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说，对稳定物价是有利的。但是物价不稳定的因素还不少。由于原材料涨价影响，一部分消费品生产成本上升；主要副食品的生产供应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有些品种的价格仍在上涨。

今后几个月，市场进入购销旺季，要求提高消费品价格的压力还会继续增大。《纪要》要求各级政府对待物价调整要特别谨慎。要及早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局部地区某些品种大幅度涨价。尤其应当加强对副食品价格的控制，以保证整个物价水平的控制和群众情绪的稳定。为此应采取以下一些措施：(1) 对猪肉、蔬菜等主要副食品要搞好余缺调剂，防止抬价抢购。(2) 加强对农贸市场和商贩的价格管理。(3) 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日用工业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要基本稳定。(4) 少数产品企业生产确有困难的，可按税收管理权限，经税务机关批准，适当减免税收。

12 日　国务院批准全面开展信贷检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开展信贷检查的报告》。《报告》提出，这次信贷检查的内容有 5 个方面：(1) 贯彻执行国务院控制信贷规模决定的情况。要重点检查经济效益不好的贷款，银行用贷款支持或贷款被挪用（包括转异地）搞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地方、企业自筹基建的情况；用流动资金贷款购买汽车和倒买倒卖紧俏物资的情况。(2) 组织货币回笼的情况。(3) 外汇管理的情况。(4) 贯彻国务院关于暂停信托贷款决定的情况。各地、各部门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各专业银行办的信托投资公司、信托部，城市信用合作社，都要进行检查，查清资金来源、运用及财务收支情况。(5) 违反贷款原则，滥放贷款和以贷谋私、索贿、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等违法乱纪行为。

15 日　国务院批准建筑企业招用农民工

国务院批准劳动人事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的《国营建筑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和使用农村建筑队暂行办法》，规定国营建筑安装企业、房屋维修企业、园林和市政工程企业所需劳动力，除少数必需的专业技术工种和技术骨干外，应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国家对其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应同县乡有关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应根据生产任务的需要确定，一般为 3—5 年，合同期满后，劳动关系即行解除。如企业需要续订合同，必须经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劳动部门批准。农民合同制工人在企业工作期间，是企业职工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应与固定工一视同仁。但其农民身份不变，户、粮关系不转。《暂行办法》还对农民合同制工人在企业工作期间的工资待遇和劳动保护作出相应规定。

16 日　我国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发射卫星业务

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正式宣布，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长征三号”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内外用户发射卫星业务。“长征二号”火箭是七十年代中期研制成功的一种大型二级液体运载火箭，能将重约两吨的卫星按要求送入近地轨道。连续七次发射卫星的实践证明，这种火箭的可靠性和入轨精度较好，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可以承担国内外卫星的发射业务。“长征三号”火箭已成功地把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静止轨道，表明我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技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其提供经济保险。

19 日　国务院批准扩大机电产品出口

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转国家计委等 8 个部门《关于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报告》。《报

告》指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长期处于落后状态。1984年全国机电产品出口约22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9%，仅占世界机电产口总额的3.4%，只相当于我国当年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25%左右，逆差达61亿美元。1985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又出现大幅度下降，更应引起注意。《报告》分析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并提出机电产品出口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目标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报告》提出：（1）要提高对机电产品出口战略意义的认识，把机电产品作为重要出口商品之一，重点扶植；要把机电产品出口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迅速改变工作不力的状况。（2）"七五"时期要下大力量打基础，上水平，努力扩大出口，争取1990年以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能有较快的增长。国家计委应组织有关部门及地方制定扩大出口的目标以及实施方案，纳人国家中长期规划。（3）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要加强科研开发，引进技术，抓紧技术改造，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4）要下决心选择一批条件较好的重点企业，主要承担出口任务，作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面向国际市场。对一批兼营内外销任务的重点生产企业，要扩大其外贸自主权。（5）充分发挥军工部门的科研和机械制造能力，将其作为机电产品出口的基本力量之一。（6）通过多种渠道选调和培养人才，尽快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的机电产品外贸队伍。（7）必须改变目前严重存在的商情不灵，外销不力，服务不周，零备件供应不及时的问题，有计划地抓紧建立国际销售网、商情网、服务网。（8）要建立起同国内现行办法不同的有利于机电产品出口的管理体制，制定切实可行的、积极的扶植鼓励政策。（9）理顺机电产品出口体制。坚持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同时要坚持统一对外，组织联合对外，建立出口联营，充分发挥各部门许可制度的作用。（10）在国务院领导下，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同时责成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

23日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24日　国务院要求组织好小商品生产和经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组织好小商品生产和经营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在批转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小商品价值虽小，但对人民生活关系很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当前，特别要注意安排落实小商品的原材料，合理调节经济利益，把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组织好，使供应状况有一个明显改善。国家经委在《报告》中提出，为了切实解决小商品生产的原材料问题，有关部门对分配给小商品生产的原材料，任何部门、地区不得截留，现有供应渠道不得随意变更，并积极开辟新的供应渠道；要研究适当的经济指标与考核指标，使小商品的生产经营与大件商品一样，经过努力有产可超，有奖可得，同时，要辅之以必须的行政干预，保证小商品生产任务的落实。《报告》还要求有关部门要在信贷、税收和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给以支持和照顾。各工商企业也要端正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克服重大轻小、重利润轻服务的思想，努力把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搞好。

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指出，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大部分地方农民负担仍然不断增加。农民依法纳税和合理上交集体提留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除此以外，还要交纳各种摊派款项。有些地方摊派项目达几十种，人均负担十几元、几十元。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这已成为损害党群关系、工农关系和影响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落实的突出的消极因素。如不及时制止，势必带来更大的危害。产生上述情况，主要责任在各级领导，多数派款收费的决定，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出面主持，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并采取断然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11　月

1日　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这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主要从事特区内各金融机构、企业债券、股票的发行与管理。

5日　国务院提出抓好粮食工作的五项措施

由于部分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调整产业结构，粮田面积减少，加上有些地方放松了粮食生产和购销工作及其他方面原因的影响，1985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较多。为此，国务院发出《关于抓好粮食工作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1) 认真贯彻执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凡是适宜种粮食的地方，一定要把粮食种好；在商品经济、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实行“以工补农”；调人粮食的地区，要根据粮源情况和交通运输条件，统筹安排。(2) 国家确定的定购计划，各级人民政府要逐级下达，通过同农民签订合同的办法落实下去。粮食部门要积极开展收购。银行要保证购粮资金的供应。(3) 合理安排粮食统销，严格控制平价粮食销售。食品行业用粮，要逐步扩大议价供应范围。“以工代赈”的粮食，从严控制，节约使用。(4) 要稳定计划内的平价食油供应，积极扩大议价比重。菜籽油要逐步向议价过渡。(5) 为了解决多购多存、多调多赔的问题，从1986年开始，适当提高粮油调拨费用；财政对粮食企业实行定额补贴；核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周转库存定额。

14日　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七五”期间以煤代油计划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七五”期间以煤代油计划安排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自1981年国务院决定实行以煤代油政策以来，5年累计压油2360万吨，净得利润94亿元，创汇20亿美元，其中用于发展能源交通及配套工程77亿元。“七五”期间要继续实行这一政策。(1)“七五”期间累计压油6600万吨，净得利润中用于基本建设170亿元。(2) 在“七五”期间，国内石油价格调整后，调价增收部分，扣除补偿油田成本提

高部分外，全部上缴财政。财政在国家基建投资之外，如数作为追加煤代油专项基建投资款处理。(3)“七五”期间以煤代油投资继续实行拨款改贷款，收回的贷款仍作为煤代油专项资金继续用于能源交通建设。对这部分新增基建投资所需“三材”和代油煤仍采取自筹的办法，不占国家计划内的统配资源。(4) 从 1985 年开始，油改煤出口油所创外汇，国家提取 50%，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留成 50%，用于能源交通建设。

26 日　宝钢一期工程举行投产仪式

宝钢工程于 1978 年 12 月 23 日正式动工兴建。1985 年 9 月 15 日宝钢一号高炉点火投产。9 月 20 日炼钢厂炼出第一炉钢，9 月 21 日初轧厂轧出第一批钢坯。至此，宝钢一期工程中炼钢厂、初轧厂、焦化厂和自备电厂均已投人生产。宝钢一期工程设计能力为年产铁 650 万吨，钢 670 万吨，钢材 420 万吨，商品坯 122 万吨。总投资为 128.77 亿元，其中用外汇 27.81 亿美元。

28 日　厦门国际银行开业

这是我国第一家合资银行。这家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和香港泛印集团有限公司四方合资组成的，是我国在金融领域内的一大突破。厦门国际银行注册资本为 8 亿港元。

12　月

4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财政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分配 1986 年度财政收支指标，研究部署 1986 年的财政工作。财政部长王丙乾在讲话中指出，1986 年的财政部门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抓紧增收节支工作。在大力组织收入的同时，控制支出。第二，继续完善财税体制，并为“七五”期间全面改革经济体制做必要的准备。1986 年要对需要技术改造、出口任务重，对国家贡献大，而调节税率高的大中型骨干企业逐步减征调节税，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部分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第三，要把财政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狠抓经济效益上来。要采取拨付专款和财政贴息等办法，支持某些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会议于 12 月 13 日闭幕。

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和部署 1986 年农村工作。会议认为，我国农村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村产业结构经过调整，一向比较薄弱的林、牧、渔业和加工服务业得到加强，农村社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有较多的提高。会议认为 1985 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然灾害严重，二是合理调整作物布局，三是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农民种粮兴趣下降。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会议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根本方针。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必须统筹兼顾，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会议认为，农业和农村工作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工补农，以副养农，以工业副业支持种植业，以经济作物支持粮食作物，将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一个办法。会议认为，

今后要使农业转向持续稳定的发展，将取决于政策的稳定和不断的完善，农民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条件的不断加强。城乡改革汇合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节更为复杂。改革中发生的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决不能因为遇到问题就倒退到老路上去。会议明确1986年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农村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存利除弊，着重把改革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解决好，为下步改革做好准备。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会议提出，1986年要继续深入进行农村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会议于21日闭幕。

10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促进汽车工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机械工业部和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关于加强宏观管理促进汽车工业健康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自1984年11月召开全国汽车行业规划工作会议以来，汽车生产不断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1)生产厂点盲目增加。至1985年底，全国汽车制造厂已达百家，但列入国家计划的只有66家。(2)盲目扩大规模。据不完全统计，省(市)和部门上报的“七五”建设规模已达200多万辆，大大超过汽车行业规划会议拟定的90万辆的规模。(3)多头对外，盲目引进。1985年1至7月份进口汽车21万辆，用汇14.6亿美元。而1980年至1983年进口汽车仅12万辆。对此，《报告》提出：(1)必须坚持实行统一的行业规划。首先必须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已经确定的重点项目，再根据条件在待定项目中选择一批项目，经国家批准后补入“七五”计划。(2)严格控制乱上汽车建设项目和盲目扩大规模。对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经中汽公司审查后报国家计委批准；限额以下项目须报中汽公司会同地方、部门审批，并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备案。鼓励各地区、各部门把资金、物资投向列入“七五”计划内的重点改、扩建企业。(3)严格控制重复引进，制止多头对外，限制汽车进口。(4)发挥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的作用。

14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决定调整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拨改贷范围

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出《关于调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贷款范围等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决定，从1985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简称“拨改贷”〉。对科学研究、学校、行政单位等没有还款能力的建设项目，《暂行规定》作了豁免本息的规定。根据一年的实践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从1986年起，上述豁免本息的建设项目不再采用“拨改贷”方式进行管理，恢复拨款办法。并对恢复拨款方式的范围、管理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

京秦复线电气化铁路全线开通

京秦复线电气化铁路是国家“六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该线西起北京的丰台西站，东至山海关，全长341公里，西端与丰沙大电气化铁路相接，是晋煤外运的北路重要通道。京秦线年设计运量为8700万吨，对华东、华南、华北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京秦铁路于1982年3月正式开工，1984年下半年简易开通并开始运煤，1985年底电气化铁路建成投产，比国家计划提前一年。京秦电气化铁路是我国部

分利用国外贷款，引进外国成套牵引供电设备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28日　我国第一台单机容量60万千瓦发电机组投产

我国第一台6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在内蒙古元宝山电厂建成投产。这台发电机组是国家"六五"计划期间重点工程之一，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发电机组，于1981年5月破土动工。

31日　兖石铁路交付使用

兖石铁路位于山东省南部，西起煤炭基地兖州以南的津浦铁路程家庄站，东至黄海之滨我国最大的现代化深水煤炭港口石臼港，全长308公里，年输送能力为1800万吨。它与太（原）焦（作）、新（乡）焦（作）、新（乡）菏（泽）、兖（州）菏（泽）等铁路连在一起，沟通晋、豫、鲁三省，形成晋煤外运的南通道，对解决北煤南调、促进煤炭出口、开发沂蒙山区、振兴鲁南经济，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兖石干线是我国铁路建设中第一条按概算实行全项目投资包干的重点工程。自1982年7月动工以来，在跨越100条河流的线路上架桥333座，建筑涵洞807孔。

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成情况

1985年我国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扩大开放的方针，继续深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蓬勃发展，超额完成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全年社会总产值16242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其中工农业总产值13269亿元，比上年增长16.4%。国民收入6765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在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繁荣活跃，财政收支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增加。

农村经济继续全面发展。全年完成农村社会总产值6195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农业总产值4510亿元（含村办工业），比上年增长13%，超过计划规定增长6%的速度。扣除村办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为3575亿元，比上年增长3%。农作物种植结构有较大调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440多万公顷，加上自然灾害和部分地区放松粮食生产，粮食总产量37898万吨，比上年减产2833万吨。主要经济作物产量，除棉花由于压缩面积比上年减产外，都获得较大幅度的增产，猪牛羊肉产量、油料和甘蔗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3.9%、32.5%、30.2%。

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8759亿元，比上年增长18%，超过计划规定8%的速度。轻工业产品花色品种增加，中高档产品产量增长较快，但一些紧俏商品仍不能适应市场需求。重工业生产中，电力和原材料供应仍然紧张。钢、煤、汽车和家用电冰箱的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7.3%、7.7%、38.7%、154.0%。

全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75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652亿元，比上年增长42.8%。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1061亿元，比上年增长42.8%；更新改造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591亿元，比上年增长33.7%。国家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重点项目投资完成计划的101%。新增发电机组容量、原油开采能力、铁路电气化里程和港口吞吐能力都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

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305亿元，实际增长17.2%，其中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0.7%。物价改革起步比较顺利，但市场物价上升幅度较大。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上年平均上升8.6%。零售物价总指数全国平均上升8.8%，其中，城市平均上升12.2%，农村上升7%。全年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比上年平均上升11.9%。

交通运输部门货物周转量16668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4.9%。其中，铁路增长12.1%。交通邮电仍然紧张。

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实际收入增长10.6%，农村居民平均每人收入增长8.4%。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20.9%，平均实际工资提高4.7%。

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在改革中前进，科技队伍继续壮大，全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比上年增加63万人，社会科学人员比上年增加41万人。

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较好。全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866.4亿元，完成预算121.6%；总支出为1844.78亿元，完成预算的117.9%；财政结余额为21.62亿元。

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社会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进口增加过快，国家外汇下降过多，物价上涨幅度较大。

“六五”计划全面胜利完成

“六五”期间，我国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1) 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增长。“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7%，都大大超过了计划增长4%的速度。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7%。“六五”时期农业发展是建国以来最快的时期。农业的迅速发展，为整个经济的全面稳定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 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六五”期间，平均每年产粮食37064万吨、棉花432.2万吨，比“五五”期间平均年产量分别增长21.4%和93.2%。“六五”期间，我国的原煤产量由6.20亿吨增至8.72亿吨，原油由1.06亿吨增至1.25亿吨，发电量由3006亿度增至4107亿度，钢由3712万吨增至4679万吨。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提前1～2年实现“六五”计划规定的指标。

(3)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新成就。“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330亿元，比“五五”期间增长67.3%，接近前两个五年计划完成投资的总和。新增固定资产3629亿元，建成投产基建项目17.6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520个，完成更新改造项目20万个。这些建设项目为“七五”时期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4) 财政状况逐年好转。“五五”末期，我国财政赤字较大，1979年和1980年合计为297亿元，“六五”期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59亿元，年均递增12%，超过计划递增3.3%的速度。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预算外资金大幅度，增加，1985年达到1430亿元，预算外资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五五”期间的12.9%，上升到“六五”期间的19.6%。

(5) 科教文化事业繁荣兴旺。“六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这方面的经费共为1172亿元，比“五五”时期增长一倍。五年间共取得重大科研成果33000项，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圆满完成计划。教育事业日益兴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80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3万人，完成计划的131%。

(6) 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六五”期间，进出口贸易总额累计为2564亿美元，比“五五”期间增长1.2倍。我国进出口额在世界中的位次由1980年的第28位上升至1984年的第16位。1985年同1980年相比，国家外汇储备有了增加。“六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初见成效。各地建立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旅游业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7) 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每年增长8.8%，超过计划增长4.1%的要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收入增长71.3%，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水平上升因素，每年递增6.9%。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一倍，扣除物价因素后，平均每年提高13.7%。城乡人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

“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注意不够；对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在着重加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特别是“六五”后期，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对经济稳步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986年

1　月

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部署1986年农村工作

1985年我国农村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遭受较大自然灾害，国家有计划地调减了粮棉播种面积，粮棉产量下降。在农业现有的物质技术基础还十分脆弱的情况下，一部分地区农民种粮兴趣下降。根据这一情况，文件明确提出1986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文件包括六个方面共18条内容。文件强调，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不但反映经济规律，也反映着自然规律，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七五”计划要求粮食总产达到9000亿斤，保持人均800斤左右，这是生产水平的一个新阶梯。只有依靠科学，

增加投入，提高单产，并适当稳定面积，才能保证实现。农村建设资金，除国家增加农业投资外，主要靠农村自身的积累。科学技术必须为农村经济服务，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应当作为一条重要方针而突出起来。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在政策上既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又应承认发展的差别，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注意发展合作制度，实行税收调节，做好扶贫工作，完善法制，以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分级负责，分批治理。当前应把重点放在帮助那些至今尚未解决温饱的最困难地区。国家拨给各省自治区的支持贫困地区资金，都要进行清理，由省、自治区政府统一安排使用，做出规划，经过论证，落实到具体项目，组织资金、技术、人才配套支持。积极帮助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兴办企业。国务院和有关省、自治区都要建立贫困地区领导小组，同时从中央、省、地三级机关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并组织志愿服务者到贫困地区工作。

2日　国务院发布1986年国库券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6年国库券条例》确定1986年发行60亿元国库券，其中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居民购买40亿元。发行利率比1985年有所提高。对单位购买的国库券，利率从年息5%提高到6%，高于银行3年以上单位定期存款的利率；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年息从9%提高到10%，也高于银行同期储蓄存款的利息。

5日—15日　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会议认为，1985年我国的价格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基本理顺了农村粮食购销价格，调整了生猪购销政策和价格政策，逐步放开了肉、蔬菜等鲜活副食品的价格，调整了铁路短途运输价格，小商品价格也进一步放开。总的讲，进展是顺利的，效果是显著的，整个价格体系正在朝着逐步理顺的合理方向前进。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物价指数上升幅度过大，在具体工作上也有一些缺陷。会议认为，今年的物价工作重点是对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进行“巩固、消化、补充、改善”。要通过消化和改善，使整个物价基本保持稳定；同时要搞好物价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为明年的改革作好准备。

6日　上海航空公司成立

中国第一家自主经营的地方国营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正式成立。

6日—10日　第一次城市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座谈会召开

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广州召开第一次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座谈会。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是：沈阳、广州、重庆、武汉、常州五市。五城市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方面，实行条块结合、分层次管理，专业银行的信贷计划仍由各总行下达和调整。开展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资金拆借，拆借期限和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议定。试点城市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要办成内有动力、外有压力、充满活力，责、权、利相结合的相对独立的金融企业。会议认为，试点城市要逐步改变信用工具种类少、范围窄、限制多的状况。对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推行支票结算；开办保付支票；试办旅行支票；扩大票汇通汇面；保证现金汇票付现，允许转汇。要充分利用各金融机构的有利条件，开展各种金融服务，并创造相应的信用工具。现有信托投资机构和城市信用

社要进行整顿。

7日　国务院发布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作为我国税利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体工商业户在分配上的关系，并有利于各地城乡个体工商业户在统一的税收负担的条件下开展竞争而制定的一个统一的、比较完善的征税条例。这个条例的颁布和施行，对于进一步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促进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的健康发展，保护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的合法经营，将是一个有力的保障。《条例》规定，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依照十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税率征收，税率7%至60%。纳税人全年应纳所得税额超过50000元的，按超过部分的应纳所得税额，加征10%—40%的所得税。新的条例确定的所得税负担，与过去的征收办法相比，个体工商业户总的负担水平是下降的。

国务院发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包括总则，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货币发行管理，信贷资金管理，利率管理，存款、贷款、结算管理，违法处理，附则等。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的银行管理基本法规。建国以后，我国先后制订了不少金融法规，对稳定金融秩序，活跃金融事业，促进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活动的领域急剧扩大，出现了多家专业银行、多种金融组织、多种信用形式、多种融资工具的新情况，金融管理的任务明显加重，原有的金融法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专业银行争设分支机构，争办存、贷款业务等问题，以及擅自设立金融机构，非银行机构自行开办金融业务，滥放贷款，以贷谋私等违法事情，迫切需要依法解决。《条例》的公布施行，把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济关系和金融业务的准则用条例的形式明确地固定下来，使金融业务活动和金融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条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的中央银行；专业银行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独立行使职权，进行业务活动；货币发行必须集中统一管理；财政部门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中国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

说明　已被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5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代替。

8日　国务院发布通用航空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凡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为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生产和国家建设服务的作业飞行，以及从事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海洋及环境监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及游览等项飞行活动（统称通用航空），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归口管理。从事通用航空飞行的单位或个人，经营通用航空业务的企业，都应当按照规定履行申请审批手续：从事或经营省际通用航空飞行或业务的，由民航局审查、批准、发给通用航空许可证；从事或经营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内的通用航空飞行或业务的，由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发给通用航空许可

证，报民航局备案。经民航局批准，经营通用航空业务的企业，可以承担中国境外通用航空业务。

第二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并通过国家验收

国家验收委员会正式宣布第二汽车制造厂验收合格。二汽的20000多台设备、500多条生产线，有98%是由我国机械制造行业提供的。这些设备不仅具有我国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有的达到了世界比较先进的水平。二汽的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汽车工业无论在数量、质量、品种上，还是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上，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1日—20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提出，坚持改革，加强企业管理，是现阶段关系到经济工作全局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抓紧抓好。会议认为，“六五”期间我国组织经济工作的五点做法需要继续坚持，并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即：提高企业素质，打好基础；坚持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推动技术进步，改造现有企业；加强宏观管理，组织好协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职工培训。会议认为，四年来，我国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主要经验是：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是进行企业整顿、加强管理、搞好企业的前提；加强管理基础工作和完善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是推动改革，实现管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坚持整顿与改革相结合，是改善管理，搞好企业的有效途径；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是端正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的可靠保证。会议就“七五”期间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推进管理现代化，提高企业素质问题提出奋斗目标，要求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作为主攻方向，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向管理要质量、要效益、要后劲，在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增强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12日　国务院发布节约能源管理条例

《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包括总则、节能管理体系、节能管理基础工作、能源供应管理、工业用能管理、城乡生活用能管理、推进技术进步、奖惩、宣传教育、附则等内容，自1986年4月1日起施行。这个《条例》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节能管理法规。它的发布和实施，不仅对于促进社会合理使用能源，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节能工作的法制建设，使节能由突击形式转人经常化、科学化的轨道具有深远的影响。

说明　已被1997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代替。

15日　国务院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作出规定

为鼓励外国合营者在中国境内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促进其外汇收支平衡，以利于生产经营和外国合营者将所得合法利润汇往国外，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的规定》。《规定》的主要精神是：依法批准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外汇收支需要调剂的，按照审批权限，分级管理解决。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由国家主管机关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外汇收

入中调剂解决，也可由国家主管机关同地方人民政府按商定的比例调剂解决。经由国务院授权的或国家主管机关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由各该地方人民政府或部门负责在所批准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外汇收入中调剂解决。《规定》自2月1日起施行。

17日　**国务院下达1986年度粮食合同定购任务**

国务院在《关于1986年度粮食合同定购任务的通知》中说，为了保护和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1986年度将适当减少全国粮食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比重。调减的原则是：对于商品经济发达、多种经营门路多的地区，要稳定粮食合同定购任务，通过以工补粮的政策，保证粮食生产和定购任务的完成；对于发展粮食生产有潜力、多种经营门路不多的地区，包括新商品粮产区和一部分老商品粮产区，减少合同定购任务，扩大市场议价收购，使农民从超产中增加一些收入；对于土地较多、粮食商品率较高的地区，不减少合同定购任务；对于极少数贫困地区，可以不订或少订粮食定购合同，主要采取市场收购的办法。

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渔业法**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包括总则、养殖业、捕捞业、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法律责任及附则，自7月1日起施行。《渔业法》规定，国家对渔业生产实行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国家对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其中海洋渔业，除国务院划定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的海域和特定渔业资源渔场外，由毗邻海域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按照行政区划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该法在捕捞业方面，突出了凭证生产的原则，凡从事内水、近海捕捞的，必须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对无证擅自进行捕捞的要进行处罚。对外国人、外国渔业船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的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在养殖业中，突出了确权发证的原则，对从事水面、滩涂养殖生产者，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核发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无正当理由使水面、滩涂荒芜满一年的，由发放养殖使用证的机关责令限期开发利用。《渔业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渔业进入了以法治渔的新时期。这部渔业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生产指导方针，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发展渔业生产，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维护渔区生产秩序，保障生产者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南京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将长江南京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今后南京港至长江口沿岸再有其他港口需对外国籍船舶开放时，授权国务院审批。

23 日　国务院对科学技术拨款管理作出规定

为了加强科技经费的宏观管理，合理和有效地使用科技拨款，推动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搞好科学研究的纵深配置，保证国家科学技术规划的实施，国务院发布《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共有 12 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根据这一规定，从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由财政部会同国家计委，按照科技经费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速度的原则，安排中央财政支出的科技三项费用（中间试验、新产品试制、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和科研事业费的预算拨款额度。

29 日　我国利用外资取得较大进展

对外经济贸易部新闻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截至 1985 年底，我国已累计批准建立中外合资企业 2300 多家，合作经营企业 3700 多家，外商独资企业 120 家，批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项目 35 个。与此同时，我国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的事业都已初步打开局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85 年是我国吸收外资最多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共签订对外借款协议额 35.3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 58.5 亿美元，商品信贷合同额 3.6 亿美元，分别比 1984 年增长 84.4%、120.7%和 62.8%。从 1979 年至 1985 年的 7 年中，我国合计签订对外贷款协议额为 203 亿多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为 160 亿多美元，商品信贷合同额为 17 亿多美元，实际使用的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商品信贷额分别为 156 亿美元、46 亿美元和 13 亿多美元。

我国新兴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事业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树立了良好的信誉。从 1979 年至 1985 年，我国共对外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为 51 亿美元，营业额达 24.8 亿美元。到 1985 年底，我国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在国外的人数已达 5.9 万人，经营这些业务的公司已达 64 家。这些公司先后在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建房、修路、筑水坝等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达 2600 多个。

我国还积极在国外同各国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到 1985 年底，我国在国外举办的各类合营企业已达 181 家，总投资为 2.77 亿美元，其中我方投资为 1.63 亿美元。

国务院决定下放上海港管理权限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国最大的港口——上海港由原来的以交通部管理为主改为由交通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上海市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同时实行“以港养港”的财务管理制度。改革后，上海港务局作为上海市政府的直属机构，行使市政府港口管理职责。实行“以港养港”的财务管理制度后，“七五”期间，以 1985 年度利润总额为基数，一定 5 年不变，以后增加部分全部留给上海港。

2　月

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 10 项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198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

决定》下达以后，党政机关办的企业大部分已经停办或者同党政机关脱钩；参与经商、办企业的党政干部，大多数已经回到机关工作或辞去党政职务。但是，这股不正之风还没有完全刹住。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十项规定，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领导干部子女、配偶不准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和关系经商办企业；各地要做到令行禁止，对拒不执行的要严肃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

5日　国务院原则批准我国旅游业发展目标

我国旅游业发展目标是："七五"期间打好基础，下一个5年大见成效，到1990年，争取一年接待外国旅游者500万人次，创汇款30亿美元；到2000年，一年接待1000万人次，创汇100亿美元。过去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旅游业未列入行业规划，旅游投资被归人非生产性投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旅游业作为一个行业正式列入国家计划。

出口巴基斯坦的21万千瓦大型火力发电机组试运行成功

我国首次投标出口巴基斯坦的21万千瓦大型火力发电机组试运行成功。这标志着我国20万千瓦级发电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已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参加这个项目投标的有日本、苏联、联邦德国等六个国家的七个公司，我国以5609万美元中标。从1983年2月23日中标以来，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这套火力发电机组就全部制造、安装完毕，比合同规定期限提前22天并网发电。为此，巴方付给我国110万卢比提前发电奖。

6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用节能资金扶植了一批集中供热项目的建设。但总的来看，城市集中供热在我国仍然发展较慢，城市居民基本上仍用分散的小锅炉和小煤炉采暖。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工作，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以下意见：（1）明确发展城市集中供热的方针。（2）健全城市集中供热管理体制。城市供热设施，由建设部归口管理。凡生活用热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设立热力公司，负责城市热网、集中锅炉房的建设和管理工作。（3）以多种渠道解决城市集中供热的建设资金。（4）对城市集中供热采取优惠政策和合理的价格政策。（5）加强城市集中供热的立法和管理工作。

7日　国务院批转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国务院批转《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把我国的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在深圳举行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认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建设进展很快，成绩显著，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作用。会议分析了经济特区在前进道路上所存在的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认为今后应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在做好国际市场调查预测的基础上，同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紧密衔接，制定特区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包括行业规划）和"七五"期间的分年度安排。（二）根据扩大出口的要求，认真筛选工业项目。（三）继续搞好内联，推动经济特区外向型工业的发展。（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

心，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六）坚决反对和制止违法经营活动。（七）健全经济立法，提高办事效率，加强人才培养。（八）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深入探索微观放开搞活与宏观加强管理密切结合的经验。

14日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暂挂靠在中国科学院，任务是：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规划，有效地运用科学基金，指导、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发现和培养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委员25名，由科学家、管理专家担任，实行任期制。

20日　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召开

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指出，今年银行工作的方针是：既要加强金融宏观控制，又要注意改善金融宏观控制，真正做到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既要把膨胀了的需求继续加以控制，又要改善供给，合理发放贷款，支持把经济进一步搞活；既要促进把不适当的速度降下来，又要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支持适当的增长速度；努力实现信贷收支、外汇收支平衡，保持货币稳定，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24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包装工业发展纲要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委提出的《1986—2000年全国包装工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了包装工业到2000年的发展目标：包装工业产值较1980年翻两番；包装制品的产量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包装工业的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到1990年，重点包装企业要达到国际80年代初期的先进水平。到2000年，重点包装企业要达到国际90年代中期的先进水平或国际同期先进水平；经过综合治理，把包装不善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大降下来。在本世纪末结束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一等产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历史。

27日　我国石墨乳生产技术达到国际80年代先进水平

我国生产彩色显像管急需的五种石墨乳在山东南墅石墨矿通过部级鉴定，正式批准投入生产。这标志着我国石墨乳生产技术达到了国际80年代先进水平。电子工业部已决定，今后不再进口石墨乳。我国的石墨原料资源丰富，但由于技术不过关，长期以来国内不能生产合格的石墨乳制品，国家每年要花百万美元的外汇进口石墨乳。为此，国家建材局专为电子工业部显像管生产配套从日本引进了一条生产线，利用我国资源生产合格的国产石墨乳，投产后年产量可满足150万只彩色显像管的需要。

3　月

1日　京汉广中同轴电缆载波工程交付使用

我国“六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京汉广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正式交付使用。京汉广中同轴电缆载波工程是基本沿京广铁路埋设的一条大容

量地下电缆通信干线工程。北起北京长话大楼，途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连接18个城市，全长2700多公里，是我国通信建设中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项目。这条长途骨干通信线路的开通使用，可提供9600多条电路，最终容量可使京汉广沿线的长途通信能力较建成前提高80倍，并为保证长途通信质量、开辟用户电报、传真、数据通信等多种业务、实现长途通信自动化提供了条件，将大大缓和京汉广沿线通信紧张状况，经过转接后还可以沟通东北、西北、西南、华东等广大地区的通信网络，增加北京同港澳、东南亚地区的通信能力。这项工程的建成投产，是我国通信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对改善我国通信落后面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加强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3日 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提出“863计划”

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著名科学家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月5日，邓小平在倡议信上作了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3月8日，国务院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正式作出决定拨款100个亿。《纲要》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共选人了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这7个领域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1996年海洋高技术被正式列为“863计划的”的第八个研究领域。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进人了一个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实施的发展新阶段。由于四名杰出科学家的建议和邓小平对这个建议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作出的，因此，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被命名为“863”计划。

6日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完成

国务院第三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会议宣布：世界上规模空前巨大的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已经胜利完成。截至1982年7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为1031882511人。其中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现役军人共1008175288人。其中，男性占51.5%，女性占48.5%；汉族占93.3%，各少数民族占6.7%。通过普查取得的准确、丰富的国情资料，对于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制定和执行人口政策，安排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和长期有益的作用。这项普查对世界人口情况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贡献。

第三次人口普查是1982年在除台湾省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普查项目包括各地区的人口数量及其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就业状况、行业、职业、家庭、婚姻、生育、死亡等19项，全部以1982年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进行直接调查。全部调查结果已经分三批公之于世。这次10亿人口的普查工作动员了600多万名普查员、指导员、编码员、录入员和电子计算机工作人员。投人大中型电子计算机30台，处理数据信息多达400亿字符。现场抽样检查和科学验证表明，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质量

和电子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质量及周期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8日　国务院决定推进电子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批转电子工业部《关于推进电子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并为此发出通知，强调工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一定要坚持政企职责分工、简政放权的原则，紧紧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进行。《通知》明确电子工业部是统筹规划和管理全国电子行业的职能部门，国务院赋予其必要的权限和调节手段。电子工业部在直属企业下放后，要逐步面向全行业，认真搞好行业管理。各级电子工业管理部门也要转变职能，从企业的主管部门转变为政府管理本地区电子行业的职能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对电子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要给予支持和配合，并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把这一工作切实抓好。电子工业部在报告中提出了拟在今明两年初步实现的四个改革设想：（一）简政放权，搞活企业。（二）政企职责分开，下放企业。（三）推进联合改组，改变企业结构。（四）转变职能，搞好行业管理。

我国光纤通信研究获得重大进展

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的24芯市内通信光缆、12芯长途通信光缆及其接续装置，在邮电部第五研究所研制成功，通过部级鉴定。光纤通信是利用激光通过光纤传送各种信息的通信手段。这次鉴定的24芯市内光缆可开通上千个话路，12芯长途光缆可替代同轴电缆作为长途干线使用，可开通上万个话路。这一成果表明，我国现代通信技术将进入一个新领域。

10日　中国正式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成员

亚洲开发银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日起正式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后，这家银行所拥有成员的人口增加到25亿，从而扩大了营业范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亚洲开发银行的核定股本从148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59亿特别提款权。

10日—16日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会议回顾了几年来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部署了1986年城市改革的任务，着重讨论了发展和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就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和任务作报告。报告提出，1986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贯彻"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1986年的改革任务为：（一）消化、补充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巩固与发展改革成果。（二）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三）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四）认真做好1986年的经济工作，继续搞好改革的试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了重要讲话。强调从现在起，应该把横向经济联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抓联合可以出效益、促改革。横向经济联合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都比较明显。联合的领域很广，包括生产领域的联合，生产与科研之间的联合，生产与流通之间的联合，以及流通领域的联合等等。发展横向联合，将使我国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还可能在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上引起变化，从而有可能解决企业组

织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企业行为也比较容易端正。联合能否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维护企业的自主权，必须是企业之间自主的联合，平等的联合，互利的联合。

1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矿产资源法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包括总则、矿产资源勘查的登记和开采的审批、矿产资源的勘查、矿产资源的开采、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自10月1日起施行。《矿产资源法》用法律形式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做出规定，对于进一步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提高勘查、开发的速度和效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重申制止乱占耕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加强土地管理，节约用地，制止乱占耕地、滥用土地，有一些地方收到成效。但从全国来看，城乡非农业建设乱占滥用土地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猛增的势头。乡镇企业和农村建房乱占耕地、滥用土地的现象极为突出。许多地方耕地大量减少，有的省一年减少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有的城镇郊区农民几乎已无地可种。这种情况如继续发展下去，将会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恶果，贻害子孙后代。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检查清理非农业用地。凡违反规定的一律停止使用，坚决刹住乱占滥用土地的歪风；查出的违法占地，都要按国家规定严肃处理，该罚款的罚款，该没收的没收，该判刑的判刑，对那些以权谋私、带头或支持违法占地的领导干部，都必须从严处理；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凡有违反规定乱批乱占土地的，要主动检查，自觉纠正，否则从严处理；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对非农业用地进行登记、发证，建立健全地籍管理制度。采取综合措施，强化土地管理，包括运用经济手段和建立完善土地管理法规。

23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横向经济联合的原则和目标、维护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自主权、改进计划管理和统计方法、促进物资的横向流通、加强生产与科技的结合、发展资金的横向融通、调整征税办法、保障经济联合组织的合法权益等八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具体要求和阐述，作出了30条规定。《规定》指出，企业之间的联合，是横向经济联合的基本形式，是发展的重点。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不受地区、部门、行业界限的限制，不受所有制的限制。提倡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进行组织。各种经济联合，都要以合同、协议关系确定下来。发展经济联合应围绕以下目标和要求进行：(1)有利于充分挖掘现有企业潜力，做到投入少，产出多，产品质量好，技术进步快，经济效益高；(2)有利于促进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3)有利于形成和发展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和技术市场；(4)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规定》在政策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 在计划方面，在国家

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内，国家、部门、地区每年要预留一定额度，主要用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联合建设项目；企业和单位用原有厂房、设备和技术、专利、商标等折价投资的，均不计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指标。2. 联合组织内部生产、建设指标和物资分配指标可以互相划转。3. 在资金融通方面，在国家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贷款额度内，允许各专业银行跨地区、跨专业向经济联合组织发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经济联合组织从银行取得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可以用于内部互相投资；流动资金贷款，可以上贷下拨，也可以横向划拨。4. 在税收方面，对经济联合组织不重复征税；全民所有制企业从联合中新分得的利润，免缴调节税；企业和单位向能源、交通设施以及"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投资分得的利润，可减半征收所得税五年，所得利润再投资于上述行业和地区的，可免征所得税。

24 日　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成立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今后凡由建设银行贷款、筹措资金的投资项目，都要经过中国投资咨询公司评估审查，或对有关咨询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确认，才能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是在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支持下成立的全国性投资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为中外投资和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投资咨询服务。该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盈利性机构，为各种投资行为提供咨询服务，不进行投资和商业性活动。

25 日—4 月 12 日　六后人大四次会议原则批准"七五"计划草案

第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七五"计划草案提出的基本任务是：(1) 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 5 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2) 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 90 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3)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七五"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执行的重要原则和方针是：(1) 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促进。(2) 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3) 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4) 坚持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5) 坚持恰当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加快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6) 坚持把建设重点转到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路子。(7) 坚持把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8) 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把国内经济建设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9) 坚持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0) 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11) 坚持在各项事业上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七五"计划草案提出的经济指标是：5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4%。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7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3倍；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1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年为8960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近70%。进出口贸易总额1990年比1985年增长40%，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5年增长27%左右。

26日　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第六届人大全国四次会议上作《关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计划草案安排，1986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包括村办工业为6%)，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为1570亿元。

1986年农业要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工业生产要把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性能和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放到突出的位置上，在这个基础上保持工业的适当增长速度。要在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适当改善投资结构，加强能源、交能、通信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安排好市场供应，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以适应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进一步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6年要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在进一步搞好工农业生产、改善供应的同时，对过度膨胀的需求要加以有效的控制。为此，要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切实管好银行信贷；认真加强外汇管理；继续改进计划体制。

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草案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985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854.11亿元(其中国内财政收入为1829亿元)，完成预算的120.8%，国家财政总支出为1825.94亿元，完成预算的116.7%。收入和支出相抵，财政结余为28.17亿元。1986年国家预算安排的主要原则是：正确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在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按照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措施，并继续有计划有重点地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技术开发和技术进步；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总规模的前提下，合理调整投资结构，着重增加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适当增加农业的投资，进一步支持文教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并确保财政收支的平衡。

中国银行首次在日本发行日元美元双重货币公募债券

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双重货币方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这次发行的日元、美元双重货币债券额共200亿日元，票面利率为7.2%，期限为10年，调期成美元之

后，浮动利率比伦敦银行同业的利率低6.5‰。中国银行和日兴证券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等13家证券公司和银行的代表在签字仪式上为委托公募债券、办理支付本息事宜和登记事宜3个合同签字。

27日　中瑞签署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一个发射订座协议

中国航天工业部与瑞典空间公司签订了利用中国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搭载发射瑞典邮政卫星的“发射订座协议”。它标志着中国的运载火箭即将进入国际市场，为外国提供卫星发射服务。

31日　国务院批准铁道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

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铁道部《关于铁道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通知》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交通运输业的骨干。近年来，铁路运输工作有很大发展，但目前仍是薄弱环节，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改变这一状况，铁路要以经济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全面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充分发挥铁路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多创利，加快路建和技改的步伐。国家计委等五个部门的《方案》提出，铁道部经营体制实行投入产出、以路建路经济承包责任制，从1986年开始，一包五年不变。承包的内容包括：包运输任务、包机车车辆生产任务、包铁路建设规模和形成运输能力、包基建投资和机车车辆购置费、按规定缴纳税款、实行换算吨公里工资含量包干等。

4　月

5日　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

《条例》包括总则、产品生产企业的质量责任、产品储运企业的质量责任、产品经销企业的质量责任、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产品质量责任争议的处理、罚则、附则，自7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对于明确工业产品的质量责任，维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抚顺水煤浆厂投产

中国第一座水煤浆工厂——抚顺水煤浆厂投产。这座工厂年生产能力为5万吨，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大厂之一。

1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外资企业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届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外资企业法》规定外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外资企业应当在审查批准机关核准的期限内在中国境内投资；逾期不投资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外资企业的投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账簿，进行独立核算，按照规定报送会计报表，并接受财政税务机关的监督。外资企业拒绝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账簿或者制造假账的，财政税务机关可以处以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停止营业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义务教育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届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 198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义务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普及基础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对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分地区、有步骤地实施义务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制年限、入学年龄及学习期限、免收学费和实行助学金制度、学校的设置、布局和办学标准、教育经费和基建投资、师资、管理体制、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考核与监督、有关法律责任共 12 个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13 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生产事业的发展，预算外资金有了很大增长。1979 年至 1984 年，平均每年增长 22.8%，而预算内收入每年只增长 4%。1985 年预算外资金总额达到 1400 多亿元，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81%。但是，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财经纪律松弛，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膨胀。为了切实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搞好社会财力的综合平衡，更好地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通知》共 11 条，对预算外资金的收费标准、提留比例、开支范围和标准等均作了严格规定。

15 日　引黄济青工程破土动工

国务院批准的我国又一项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引黄济青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这项工程建成后，长期供水紧张的青岛市每天将注入 30 万吨净化的黄河水。引黄济青工程，从鲁西北博兴县境内的打渔张引黄闸起，横跨惠民、东营、潍坊、青岛 4 个地市、10 个县，穿过大小 36 条河流，到达青岛市的河东水厂，全长 290 公里。沿线需建泵站、水库、涵闸、倒虹吸管、桥梁等 330 多座，需挖填土石 6 千万立方米，砌石 90 万立方米，混凝土 80 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为 8 亿元。将于 1989 年建成通水。

16 日贵溪冶炼厂建成投产

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江西铜基地贵溪冶炼厂，经过六年多的艰苦努力，正式建成投产。江西是我国最大的铜生产基地，地处浙赣、皖赣铁路交汇处的贵溪冶炼厂，是我国目前生产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炼铜厂。它首次采用世界先进的闪速熔炼工艺技术炼铜。

19 日　邓小平谈改革不承担风险不行

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时，就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问题发表了谈话。其要点是：现在我们国家总的情况是好的，从去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只进行了三个多季度，现在看来很有希望。一个时期曾经波动的物价，已经稳定了下来。我们现在把步子放慢一点，就是为了巩固、消化改革的成果，以便在以后实行更大的改革。邓小平说，过去国家总背着两

个大包袱，一个是原有的物价补贴，一个是企业没有自主权和相应的义务，所以不改革不行。改革就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他说，改革会有一定的风险，也可能引起点波动，但是没有改革的决心不行。要改革，就要准备承担风险。我们这几年的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取得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所谓长期，就是六七十年，一直到下个世纪前五十年。

国务院决定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

为了增强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活力，使其成为自主的科学技术研究实体，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对科研机构的任务、行政领导体制、人事管理、经费和税收、资产处理、科技外事和外汇六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扩大了研究机构、所长的自主权：(1) 研究所在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向社会承接各种科学技术任务；(2) 科研机构的行政领导体制是所长负责制；(3) 国家拨给事业费的研究所，有权在国家核定的编制内，按照合理结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调入、调出和安排使用各类人员。事业费全自给的研究所，在遵守国家人事制度的前提下，可根据工作需要自主聘用各类人员。在所内，应扩大课题组长的权力，课题组长根据需要选配课题组成员。(4) 研究所取得的经费，按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安排使用，对研究所的技术性收入，暂免征所得税；对新产品和中试产品，按有关规定减税或免税。事业费完全自给的研究所，可比照企业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并有权处理除国家投资的大型、精密仪器设备以外的多余设备物资。

21 日　国务院发布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共 9 章 44 条，自 7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在总结 30 年经验的基础上，以法令条款对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税款征收、账务、票证管理、税务检查、违章处理等作了具体规定，并明确界定了偷税、抗税、漏税、欠税的界定和处罚办法。《条例》要求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有代征、代扣、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照税收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或者代征、代扣、代缴税款义务。各种税收的征收和减免，必须按照税收法规和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执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农业税的征收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22 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大连港管理体制

国务院原则同意大连港实行管理体制改革：(1) 组建大连港务局，实行交通部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大连市为主的管理体制。(2) 大连港原则上实行“以港养港”的财务管理制度。“七五”期间，大连港年度利润包干基数为 1.53 亿元，一包五年不变，五年内的年度利润总额为 7.67 亿元（扣除因提高折旧率而增加的折旧基金、应偿还贷款本息及企业留利后，约为 5.75 亿元）。超定额部分外汇收入，50%留给港口，50%上缴国家。

23 日　国务院重申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

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乱摊派造成企业社会负担过重的问题。1982 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解决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1983 年国务院、中纪委联合发

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涨生产资料价格和向建设单位乱摊派费用的紧急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指示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以"集资"为名向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乱摊派的通知》。但是，仍有不少地区和部门对中央、国务院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为此，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通知》，重申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各项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向企业摊派。同时责成国家经委会同审计署、财政部对各地区、各部门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情况和问题负责监督、查办，并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26日　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作出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包括总则、机构管理、经营范围、业务管理和附则。《规定》要求金融信托投资机构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业务活动必须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只在大中城市设立，并应具备下列条件：确属经济发展需要；具有合格的金融业务管理人员；符合经济核算原则；具有组织章程；具有法定的最低限额的实收货币资本金。《规定》明确，县及县以下地区不得设立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禁止个人经营信托投资业务。《规定》还对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经营范围和业务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

28日　国务院决定征收教育费附加

为扩大地方教育经费的资金来源，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从7月1日起征收1%的教育费附加。地方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主要归当地安排使用。

5　月

1日　青海钾肥厂动工建设

我国最大的钾肥厂——青海钾肥厂一期工程在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上动工建设。青海钾肥厂是我国"七五"计划期间重点工业项目之一，设计规模为年产钾肥100万吨，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括年产钾肥20万吨的加工厂，建筑面积为九平方公里的采矿盐田和37000多平方米的选矿厂，机修、动力车间以及铁路专用线、自备电厂等。全部工程将于1989年8月完工，总投资37亿元。

10日　邓小平谈总产值翻两番问题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时说，现在看来，到1988年可能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番，为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打下基础。第一个翻番的实现靠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靠农村改革的成功。第二个翻番要靠城市改革的成功。现在进行的城市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体制改革，还包括教育、科学等。"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体制改革，现在看来，势头不错。发展要有后劲，后劲要从改革中来。

我国建成第一台大型串列式静电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

我国第一台具有国际化先进水平的大型串列式静电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成，标志着我国核物理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实验室总投资为5000万元，建筑面积8300平方米。

14日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为加强贫困地区开发工作，尽快改变这类地区的贫困面貌，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兼任组长，林乎加担任顾问。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调查研究；拟定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开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督促、检查和总结交流经验。在田纪云副总理主持下，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指出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救济的扶贫办法，改变不适宜贫困地区发展的生产方针，实行新的经济开发方式。

国务院办公厅于6月10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发出《关于转发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的通知》，要求认真研究执行《纪要》提出的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意见，争取"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集中力量，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把这件事办好。《纪要》提出十点意见：（一）改变一般化的领导方式，实行特殊的政策和措施，集中力量，重点解决集中连片的最贫困地区的问题。（二）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确定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方针，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三）加强智力开发，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素质。（四）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兴办乡镇企业。（五）疏通流通渠道，改善交通条件，活跃商品经济。（六）积极发展和不断扩大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七）将"星火计划"引入贫困地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治穷致富的巨大作用。（八）改革国家用于贫困地区资金的使用方式。（九）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建立明确的目标责任制。（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和支持贫困地区改变面貌。

15日—20日　国务院确定全国第一批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

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广东省江门召开。经国务院同意，江门、丹东、潍坊、苏州、无锡、常州、马鞍山、厦门、绍兴、安阳、洛阳、黄石、衡阳、自贡、宝鸡、天水十六个中等城市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试点城市，为全国机构改革探索道路。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机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组织上促进和保证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但是这项改革十分艰巨复杂，政策性强、难度大，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全面进行机构改革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选择部分中等城市进行试点，摸索经验非常必要。

中等城市机构改革的指导原则是：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的要求，转变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理顺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合理确定党政分工；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设置机构，明确划分职权的范围。

改革的目标是：改革后的机构要达到职责分明、分工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

要求，逐步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现代化，建立起一套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包括决策、执行、经济调节、检查监督和信息咨询在内的一整套的行政管理体系，实现经济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化。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加强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和经济调节监督机构；精简合并专业管理部门；调整城区政府的管理权限；结合机构调整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探索党政合理分工的路子。改革的方法、步骤要积极稳妥。

20日　邓小平阐述中国21世纪发展目标

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时阐述了中国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发展目标。其要点是：我们在本世纪末的目标是翻两番，到下一个世纪，再花30年至50年，确切地说，是50年的时间，争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讲“超过”或“赶上”，而是实事求是，即设想到那时再来个翻两番，也就是说国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1980年的国民人均收入是250美元）。如果这个目标达到了，中国可以算是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加上中国的分配制度，那时人民的生活水平肯定会得到普遍提高。实现这两个发展目标的手段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改革任务的完成将不仅为90年代的发展打下基础，而且为下一个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准备条件。

国务院批准石日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

中国最近建成的现代化煤炭港口——石臼港正式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石臼港位于山东沿海，是一个港口设备先进并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的港口，将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大型综合性的港口。

26日—29日　环渤海经济区成立

被称为我国北方“金项链”的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惠民、东营、潍坊、烟台、青岛和滨州共15个环渤海的市（地区）在天津市举行市长联席会，确定建立环渤海经济区，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会议认为，环渤海的城市（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发达，有辽阔的内陆腹地，丰富的资源条件，雄厚的科技实力和比较强大的工业基础。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发展联合，成立一个以沿海城市为主体，以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为依托，以东北、西北、华北为腹地，以五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窗口”的环渤海经济区，必将开创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30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改革商业流通体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单位《关于1986年商业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并发出通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流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消了农副产品统派购和日用工业品的统购包销，大大减少了计划商品；商业批发开始打破“三固定”（固定供应区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的做法，兴办了一批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调整了商业所有制形式；国营商业的大中型企业和粮店推行了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制，75%的小型企业已经放开。《报告》提出要在对已出台的改革作好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同时，进一步解放思想，抓好商业的横向经济联合，探索新的

流通渠道、新的商业形式，把改革推向前进。《报告》提出的改革措施包括五个方面：(1) 广泛发展商业流通领域的横向经济联合。(2) 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3) 继续放开国营小型商业企业。(4) 加强对市场商品流通的宏观调节和管理。(5) 进一步简政放权。

国家建立定期监测宏观经济活动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系统发生深刻变化，整个国民经济日益呈现复杂性、多样性及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了正确观察和分析经济形势，及时发现和解决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有必要建立定期监测宏观经济活动制度。为此，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建立定期监测宏观经济活动制度的暂行办法》，提出了生产规模、建设规模、消费基金、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外贸和外汇、运输与物资、市场物价八个方面 21 项指标，作为定期监测宏观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指标。

6 月

4 日 李鹏谈机械行业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全国机械工业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机械工业部部属企业全部下放后，各省市、各部门所属的机械企业也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放。机械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是把企业下放到中心城市。这不是简单地换“婆婆”，中心城市对企业要多作协调、服务工作，促进横向联合，不能随意加指令性计划、压产值，不能对企业内部事务干涉过多，否则就失去了企业下放的意义。对机械工业部来讲，下放企业，摆脱了许多具体事务，要集中全力发挥国家职能部门的作用，搞好全行业的管理。加强全行业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发扬积极探索、勇于开拓的精神，把改革引向深入，创造行业管理的新经验。在谈到如何进一步搞好机械行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时，李鹏着重讲了三点：一是发展横向联合。二是注意发挥军工企业的作用。三是今后机械产品订货要实行招标投标制度。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

10 日 邓小平谈农业、外汇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就三个将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发表了谈话。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到 2000 年，以 12 亿人口每人 800 斤计算，粮食产量要达到 9600 亿斤。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搞宏观经济，应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 9600 亿斤的盘子。要避免出现大量出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二是外汇问题。外贸逆差必须每年减少，否则就会拖后腿，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产品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总有一天经济要萎缩下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

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机构多、人多，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必然会拖后腿，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总的进展比较顺利。现在我们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就是个大包袱，越背越重。这个问题要妥善解决。总之，改革要继续搞下去。

25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土地管理法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共 7 章 57 条，自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的利用和保护、国家建设用地、乡（镇）村建设用地以及违法行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我国在土地管理方面的第一部大法。

《土地管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是珍惜和合理利用一切土地，认真保护耕地，节约建设用地，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切实加强对土地的统一管理，维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从 1955 年以后，党和国家制定、发布了不少有关管地用地的条例、文件和通知，但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法律章程，因而对乱占滥用土地打击不力。土地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了法治轨道的新阶段，实施《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管理工作主要变化有两点：一是由以前的盲目批准占地改为严格的计划指标管理；二是公有土地由以前的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今后国家将依据土地资源的许可情况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非农业建设用地编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进行计划管理。逐级下达用地指标，由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严格控制使用。对占用耕地实行指令性控制；对占用其他土地可以实行指导性控制。这样做，是为了严加控制我国净减耕地的数量。全国计划一年占用耕地的数量将控制在 500 万亩，大大低于我国“六五”期间平均净减耕地 738 万亩的数字。

26 日　我国首次公布城市人口统计资料

首次公布的有关城市人口的统计资料，是按国务院批准的市的行政区划统计的，不包括市辖县的人口。城市数 324 个，总户数 5351 万，总人口 21187 万。如果按照非农业人口计算，324 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总数为 11826 万。上海高居全国各城市总人口第一位，有 698 万人。首都北京拥有 586 万人，名列全国城市总人口第二位。

28 日　我国首次利用通信卫星进行计算机通信试验

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与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合作，利用国产通信卫星和微型计算机，在北京与昆明、北京与乌鲁木齐之间成功地进行了计算机通信试验。这是我国的卫星通信在继广播、电视节目和电话传输试验成功之后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利用通信卫星进行计算机通信，是近年来国际上计算机通信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利用我国的通信卫星进行这样的研究、试验还是首次。

3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组织三峡工程论证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责成水电部负责重新组织三峡工程的全面论证工作，并重新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供中央决策。这次全

面重新论证工作从1986年11月开始，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集体领导下，由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等14个专家组分专题进行。

7　月

3日　国务院颁发注册会计师条例

《条例》对注册会计师的注册、业务范围、工作规则、会计师事务所等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次颁发的注册会计师条例，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形势发展，进一步发挥注册会计师作用的一项重要法规。《条例》自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

4日　国务院发布工业企业管理十七条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共17条。《决定》指出，“六五”期间，经过全面整顿和初步改革，我国工业企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企业素质差、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的问题仍然存在。质量上不去，消耗下不来，经济效益不提高，企业就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国家也难以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预期目标。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紧迫感。《决定》要求，“七五”期间要把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和增加经济效益作为考核工业企业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为此提出了国家特级、一级、二级、省级企业的主要标准。要求全国工业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素质”的规划，并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实现。《决定》还从积极推行和完善全面质量管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认真搞好节能降耗工作；加强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加快企业管理现代化步伐；大力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加速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加强财务管理，搞好经济核算；改进和加强企业的经营工作；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维护国家财产，保障职工人身安全；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体系；切实搞好职工培训，不断提高职工政治素质；加强纪律，从严治厂；有领导、有步骤地完成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健全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改进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工业企业管理的若干具体要求。

5日　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汇率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今天起人民币对各国货币的汇价下降15.8%，由过去的100美元合320元人民币调整为100美元合370.36元人民币。这次人民币汇率调整幅度和选择时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根据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而作出的调整，目的是鼓励出口，平衡国际收支。汇率调整有利于“促出抑入”，减少外贸逆差，进一步吸引外资。

8日　我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建成开业

国内卫星通信网从1984年开始建设。开通的国内卫星通信网的骨干网租用国际卫星组织的转发器，将北京、拉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广州五个地球站联结起来，可以覆盖我国全部版图。

9日　国务院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作出规定

国务院下达《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个体投资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中方投资和其他经济形式投资，均须纳入全国和各部门、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二）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基本建设，要坚持按基建程序办事，严格控制新上项目；要严格控制银行基本建设贷款；对自筹资金要按资金来源规定使用方向；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更新改造，必须按建设程序进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投资规模作为指导性计划；从1986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省辖市每年要对个体的基本建设投资提出估算指标；对所有在建项目要进行认真清理；要建立健全计划管理制度等。

11日　中国申请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钱嘉东大使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东克尔提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申请书》说，中国政府忆及中国是关贸总协定创始国之一，现决定申请恢复它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准备就此问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中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理事会会议上受到了与会发言者的普遍欢迎和支持。钱嘉东于当日就此发表声明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关贸总协定之间的正式关系长期中断，中国政府认为，现在是恢复中国缔约国地位的适当时候了。他还说，提出申请只是第一步。中国政府打算在1986年末或1987年初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和外贸体制情况的备忘录，还准备在适当时候同其他缔约国进行实质性谈判。

于1948年5月21日成为关贸总协定原始缔约国之一。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提出退出关贸总协定，并于1950年5月5日生效。中国政府认为，按国际法规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于退出还是继承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理应由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作出决定。台湾当局的退出是非法和无效的。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只能是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原始缔约国地位，而不是重新加入。

12日　国家对劳动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四个关于改革劳动制度的规定并将于10月1日起施行。这是建国以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这次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劳动制度改革的四个暂行规定，重点是用工、招工制度改革，即国营企业新招收的工人都要实行劳动合同制，取消退休工人“子女顶替”和内部招收职工子女的办法，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工。按照新的规定，在国营企业的新招工人中，可以突破劳动力的“单位所有制”，使劳动者的特长、志愿和劳动岗位的需要较好地结合起来，打破国家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实行的“统包统配”制度，这对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加强企业管理，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法规名称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说明　已被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失业保险条例》、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代替。

法规名称　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

说明　已被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代替。

法规名称　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

说明　已被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失业保险条例》代替。

25日　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建立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和香港五家银行的代表在广东深圳签订一项关于在中国建立一家国际银行的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有：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美国太平洋证券公司、日本住友银行和野村证券有限公司以及香港东亚银行。这是自国务院于1985年4月2日发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后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

我国出现首例正式宣告破产倒闭企业

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倒闭，这是我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是个只有70多人的街道小厂。由于干部不善管理，工人技术素质差，生产设备简陋，累计亏损49万元，欠债49.2万元。1985年8月3日，沈阳市工商部门根据《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对该厂提出《破产警戒通告》，限期一年扭转亏损局面。防爆器厂非但没有扭转局面，反而每况愈下。沈阳市决定，对经整顿和拯救无效的防爆器厂正式进行破产处理。

30日　人民银行制定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对城市信用合作社的管理，保障其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精神，制定并发布《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的性质是城市集体金融合作组织，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经济实体，不是银行或其他任何部门的附属机构。阐明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设置条件：确属经济发展需要，具有相当的业务量；最少具有10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有懂得金融业务的合格管理人员；符合经济核算原则；具有组织章程；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规定》界定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办理城市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存款、贷款、结算；代理保险及其他代收代付业务；代理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业务；办理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8　月

1日　人民银行决定调整专业银行存贷款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即日起调整对专业银行的存款、贷款利率。这个决定的内容包

括：（一）专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利率，由现行的月息3.6‰调整为月息，4.8‰。（二）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计划内的贷款利率，由现行的月息3.9‰调整为月息5.4‰；计划外的临时贷款利率，由现行的4.2‰改为按不同贷款期限实行差别利率，贷款期限在20天以内的月息5.4‰，20天以上至3个月的月息5.7‰，未经人民银行批准逾期不还的按月息9‰计收罚息。（三）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再贴现利率，按同档次临时贷款利率降低月息0.3‰执行。（四）专业银行向人民银行交存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暂维持原月息3.6‰不变。

2日　大庆三十万吨乙烯第一期工程建成

大庆三十万吨乙烯第一期工程建成并顺利试车。该工程于1979年动工建设，各套化工生产装置属于70年代后期世界先进水平。大庆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的投料试车，创造了我国大型石油化工装置试车的新水平。大庆30万吨乙烯是我国第一个直接以油田轻烃为原料的大型联合化工厂，工程总投资为42亿元。这项工程总共要建设十二套大型化工装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国家提供有机化工原料、塑料、腈纶等56万多吨。其中一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将使我国的乙烯总产量增加50%左右。这对于发展我国化学工业和轻纺工业，改变工业结构，加快四化建设步伐，将起到重大作用。大庆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的建成投产，使大庆地区的油田开发、原油炼制和石油化工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既充分利用了油田的油气资源，使它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又能促进油田的开发和建设，为我国发展石油化工工业走出了一条路子。

7日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太阳能示范基地建成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太阳能示范基地首期工程已在兰州郊区的宛川河畔完工。这个占地面积92046平方米的试验基地，被誉为我国第一座“太阳城”。它配备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测试仪器。四间模拟式试验房在年内建成后，这里的科研人员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类型太阳房的效果对比，热工机理和模拟试验，各种集热器的性能试验以及太阳灶热效率测试，为不同类型的太阳能系统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这个太阳能示范基地是在联合国援助下由甘肃省科学院自然能源研究所承建的。

19日—21日　邓小平为天津开发区题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84年底开始兴建。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指出：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他为开发区挥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20日　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清理在建项目

按照国家计划安排，1986年我国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以去年过度膨胀的投资规模为基数，都应有所减少。但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6年头七个月全国已完成基建投资423亿多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3%；更新改造投资上半年完成152亿多元，增长率高达45.1%；连同当年新开工项目，全国基建和更新改造在建项目已达十几万个。这些在建项目中，非生产性项目和一般加工工业项目投资比重过高的状况没有明显改观，分散了基础工业和设施等方面国家重点建设所需的财力与物力。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也有不少是现在不该建的。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的势头尚未

完全控制住，投资结构也还没有调整好。为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正在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各地清理1986年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的政策依据是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清理在建项目的具体办法》。《办法》有8条，主要内容是：清理在建项目的范围，包括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限额以上更新改造等项目。包括计划内外、大中小型项目。清理口径以统计局1986年6月底统计的项目为准。凡资金、材料不落实的，建设和生产条件不具备、不配套的，投资效益差、技术工艺落后的以及不必要的重复建设项目，都应停建或缓建。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监督检查，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当务之急是认真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坚决停建缓建一批项目，以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清理工作从8月下旬开始，到10月底结束。

24日　广州大中型企业试行合股经营制

人民日报报道，广州市率先在大中型企业中试行"合股经营，共负盈亏"股份制，第一批试点的广州绢麻纺织厂、侨光制药厂、明兴制药厂，有七成至九成职工投资参股，并建立了董事会或股东代表会。

25日　财政部决定对发票实行全国统一管理

财政部颁发《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从今年10月1日起。全国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各种发票，将由税务部门按全国统一的办法进行管理。

《办法》规定：税务机关负责对一切印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和管理；一切单位和个人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劳务服务（包括工业加工）以及从事其他业务（包括对内对外业务）活动取得收入时，所提供给付款方的各种票据，均属发票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税务机关批准，均不得印制、出售发票，也不得涂改、撕毁、转让（包括转让性代开）、销毁和拆本使用业务性发票。严禁伪造发票。

27日　我国首家民间金融企业成立

上海第一家民间金融企业——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正式开业。这家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批准经营金融和外汇业务的企业，是由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投资创办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工商企业，并逐步建立对外金融联系网络，加强国内外同业的合作。公司经营的业务主要有人民币和外币的信托存款、信托投资和信托贷款；在境外发行和代理发行外币有价证券，在国内代理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租赁，担保、咨询等。它将按照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筹集和融通资金，发挥民间企业特色，为上海金融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探索新路子。

9　月

3日　国务院发布十二个领域的技术政策要点

这十二个领域是：能源、交通运输、通信、农业、消费品工业、机械工业、材料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城乡住宅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些技术政策的

要点在国家科委 1986 年 8 月编写出版的《中国科技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第一号)》里公开发表。技术政策是国家对技术和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指导的政策性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技术发展目标，规定合理的技术结构、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选择技术发展方向，采用什么技术、限制和淘汰什么技术；提出促进技术的路线、途径和措施。目的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么大规模地同步制定政策，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制定的十二项技术政策，为“七五”计划中技术改造规划提供了政策依据。

4 日　国务院批准上海建闵行、虹桥开发区

经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建立闵行和虹桥两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政策规定。

5 日　邓小平谈利用外资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关西财界人士时表示他赞成大胆使用外资，但大胆以外还要加一个“会”字，即要会使用外资。邓小平说，要人家投资，不让人家赚钱是不行的，但是有些费用太高，人家就赚不了钱，这方面，我们要下决心解决。

国务院批准海南实行计划单列

经国务院批准，海南行政区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赋予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海南行政区从 1997 年度起，除财政以外，其他均由国家在广东省的名下单独列出，同时下达到海南行政区。

9 日　国家经委等部门提出加强统配物资管理措施

为了加强统配物资管理，维护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严肃性，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物资局《关于加强统配物资管理的意见》，并指出，加强统配物资管理是当前保证国家重点生产建设，稳定经济全局的重要手段。《意见》提出了八项措施，规定所有承担国家统配物资分配调拨任务的企业，都必须严格按计划接受订货，按需要的品种规格组织生产，全面完成供货合同。在确保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国家调拨计划的前提下，企业才能自销（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产品不能自销)。没有按计划完成供货合同而擅自自销的企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全部自销多得的收入，上缴国家财政。

1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条例进一步改革企业领导体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同时发出通知，要求正在进行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认真贯彻实行这些条例。《通知》指出，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企业实行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厂长负责制；明确企业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是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做好企业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干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

国务院发布房产税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共 11 条，从 10 月 1 日起施行，施行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抄送财政部备案。《条例》规定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纳。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10%至 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

17 日 国家统计局改革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办法

为加强宏观控制和监督检查，国家决定 1987 年改革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办法。新的统计办法规定，现行全民所有制单位更新改造统计由季报改为月报；对全民所有制单位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先建立季报，试行一段时间后争取改为月报；交通部门车船飞机购置投资，由交通部门和各地区随同基本建设月报按月报送；集体和个体固定资产投资建立半年报制度。投资统计实行投资额与投入资产双重指标。为利于分别不同资金渠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 1987 年起，在继续搞好投资额统计的同时，在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中，建立固定资产财务拨款和贷款额以及分资金来源的统计指标，由建设单位根据会计核算资料填报。

19 日 我国最大的辐射中试研究基地正式投产

上海辐射基地工程在剂量场均匀度、钴射利用率、辐照处理能力及年处理量等主要性能指标方面达到了国际同类装置的水平。“基地”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负责承建。主要任务是以蔬菜、水果等食品的辐照保鲜为主，同时兼顾医疗器械的消毒、各类商品的防霉杀虫及各种材料的试生产。

23 日 《大亚湾核电站贷款协议》等七个文件签署

有关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贷款协议和供货合同等七个文件在人民大会堂签字。这些文件是，中国银行与法国七家银行的贷款协议、中国银行与英国十家银行的贷款协议、中国银行与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的项目贷款协议、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法国法马通公司核岛设备供应合同、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法国法马通公司燃料组件供应合同、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常规设备供应合同、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法国电力公司工程服务合同。大亚湾核电站场地准备工程从 1984 年 4 月开始。核电站建成后将向广东和香港供电，这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东的经济建设将起积极作用。

25 日 国务院决定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

国务院发布《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自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对应当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收入、如何计算征收等均做了具体规定。工资、薪金收入；承包、转包收入；劳务报酬收入；财产租赁收入；专利权的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和非专利技术的提供、转让取得的收入；投稿、翻译取得的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收入应当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以上单位颁发的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等奖金；国库券利息、国家

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保险赔款；军队干部和战士的转业费、复员费；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金、离休工资、离休干部生活补助费；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收入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12月1日，财政部发布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

30日　中国股票市场开始形成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部持牌进行股票的柜台交易，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开始形成。

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我国届时最长的公路桥——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提前21个月建成，并正式交付使用。这座大桥的建成，将使国道京广公路大动脉跨越黄河天堑畅通无阻，从而结束了郑州黄河两岸车辆阻塞的局面。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是与京广铁路平行的107国道上的一项重要工程。大桥全长5549.86米，宽18.5米，可并行4辆55吨载重汽车。整个工程投资1.65多亿元。

10　月

7日　国务院决定城乡道路交通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通知》说，目前我国的城乡道路标准低，质量差，人车混杂，交通管理又分别由公安、交通、农业（农机）部门负责，机构重叠，政出多门，互相扯皮。这种多头管理的体制，在城乡机动车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已愈来愈不适应我国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亟待改革。为此，国务院决定，全国城乡道路交通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

11日　国务院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二十二条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共22条。1984年以来，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经过多次讨论，制定了这个《规定》，这是我国政府为了把吸收利用外资工作切实搞好并推向前进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规定》从保障企业自主权和实现税费优惠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强调给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以特别优惠：一是降低劳务费用；二是降低场地使用费；三是减免税收；四是鼓励外商投资者将其从企业内获得的利润在我国境内再投资；五是保证这两类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包括有关物资的进出口）。这种着重给予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以更加优惠的办法，改变了过去对外商投资企业一般对待的做法，拉开了档次，显示了区别。

15日　国务院批准青岛市实行计划单列

国务院批准青岛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至此，全国实行计划单列的城市和地区已有九个，它们是：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广州、哈尔滨、西安、青岛和海南行政区。

18日　邓小平谈中国要发展高科技

邓小平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夫妇时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19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

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提出稳定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充实粮食合同定购内容；国家对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外的粮食，实行随行就市，议价收购，让农民从多卖议价粮中增加收入。

11　月

4日　我国第一套自行设计制造的52万吨大型尿素装置通过鉴定

我国消化、吸收、引进技术而设计制造的第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尿素装置在浙江镇海石化总厂通过国家鉴定。从而标志着我国大型尿素装置成套进口时代已经过去。这套年产52万吨大型尿素装置的主要设备共83种151台，其中国内自行制造的有62种127台，分别占总数的74.7%和84.1%。它从1981年11月开始建设到1984年9月建成，至今已累计运行10000多小时，生产尿素60多万吨。

8日—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会议交流了各地农村改革取得的新成果、新经验；分析研究了当前农村改革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了突破各项难点、推进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新措施、新办法。会议提出明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继续坚持改革，搞好基层整党，争取粮食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全面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根据这一总要求，会议还部署了明年农村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的指示，十分重要。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提出保证实现以下两个不可动摇的战略目标：一是保证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均800斤粮食的供给，努力使粮食的年总产量跨上新的台阶；二是保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稳步上升，并努力使其向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步靠近，缩小城乡差别。

10日—20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分析了今年内的农牧渔业生产形势，农牧渔业部预测：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4%，高于上年增长3.4%的速度。与上年相比，粮食增产1000多万吨，总产可达3.9亿吨；肉类增长5.6%；水产增长11.9%；乡镇企业增长21%。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农民收入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会议提出明年农业生产的工作指导方针是：深入改革，增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念，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不断增强物质和智力投入，推进农业技术改造，加强宏观指导和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提高生产力水平，保持农业持续、全面发展。

13日　国务院批准集体所有制物资供销企业经营重要生产资料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国家物资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集体所有制物资供销企业经营重要生产资料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集体所有制物资供销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按有关规定经营重要生产资料。但应以经营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为主，也可担负一些计划内的供应业务。在此之前，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重要的生产资料的供应和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物资部门企业经营。

15日　劳动部对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工资问题作出规定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适当确定中方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费用，劳动人事部颁发《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和职工工资、保险福利费用的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和职工工资、保险福利费用做了具体规定。

16日—2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主题是积极改革计划体制，做好明年计划安排。会议认为，积极稳妥调整产品结构，调整投资结构，保证重点建设，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经济工作中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会议集中讨论和研究了以下四个问题：（一）大力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工业产品结构；（二）继续控制投资规模，大力调整投资结构，保证重点建设；（三）努力增加出口创汇，改革外汇体制；（四）缩小统配物资范围，扩大生产资料市场；（五）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点，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坚持改革、安排好1987年计划》的报告。宋平指出，1987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的任务应当是力争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工作重点要放在增加和改善社会供给上，进一步搞活大中型国营企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生产、建设、流通的经济效益要有较大改善，产品结构同社会需求结构的矛盾得到缓解，国内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出口收汇力争创出新的水平。同时，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在生产增长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努力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在抓好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0日　我国首次发行企业债券

上海市建设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接受上海石化总厂和吴泾工程指挥部委托，将为上海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代理发行企业债券51400万元。第一批企业债券9000万元今起在市建设银行所属支行（包括十个县支行）办理预约登记。债券分单位债券（面额1000元）、产品配额债券（面额分1000元和5000元）、个人债券（面额分100元和500元）三种，年限均为3年。个人债券年利率为12%；单位债券年利率8%；产品配额债券年利率4.2%，均高于居民定期储蓄和企业定期存款利率。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措建设资金，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是我国基建投资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27日　全国服装行业归口纺织部管理

为了增强纺织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扩大纺织品出口，国务院决定，原属轻工

业部的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划归纺织工业部领导。国家已经确定，把扩大纺织品出口作为我国一项重大出口战略，要使纺织品成为我国“七五”期间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国家通过资金、信贷、税收、外汇留成等方面的鼓励政策，振兴纺织行业，促使纺织行业从主要出口粗加工产品和初级产品，转向主要出口精加工产品和制成品，使我国纺织品（包括服装、丝绸）到1990年出口创汇额比1985年增长80%以上。实行面料、服装生产一条龙的管理体制，对提高我国纺织品的加工深度，扩大纺织品出口和满足人民需要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12　月

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企业破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由第六届全国人代会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3个月之日起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包括总则、破产申请的提出和受理、债权人会议、和解和整顿、破产宣告和破产清算、附则等内容。《破产法》只适用于国营企业，目的是为了解决国营企业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问题。

1984年12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成立了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1985年9月，起草小组拟出了企业破产法征求意见稿，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征求意见。起草小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企业破产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研究和修改，形成企业破产法草案。今年1月31日，国务院第九十九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草案，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邮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由第六届全国人代会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邮政法》共8章44条，包括总则、邮政企业的设置和邮政设施、邮政业务的种类和资费、邮件的寄递、邮件的运输、验关和检疫、损失赔偿、罚则、附则。

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结果公布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首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新闻公报。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结果表明，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普查范围内共有房屋建筑面积46.76亿平方米，其中323个市（不含市属县）有房屋28.33亿平方米，占60%，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略低于县镇。这次普查范围内的住户共有3977万户，住宅使用面积15.09亿平方米；居住面积9.56亿平方米，户均24.04平方米，人均6.36平方米。这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历时两年，自1984年7月开始以来，共对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暂缓普查，台湾省未普查）的223个市、1951个县（旗）、5270个城镇与工矿区的房屋和1.5亿人（城镇人口）的住房情况进行了逐幢、逐户的测绘、丈量和登记，取得各种原始数据15.5亿个，基本查清了我国城镇房屋状况和居民居住水平。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的结果反映了建国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在现有的各类房屋中，解放后新建的占91%，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成的房屋达32亿多平方米，占总数的68.61%。

3日—5日　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暨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同时正式成立，从而使2000万个体劳动者有了自己的组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个体经济在党的开放、搞活的政策指引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据截至今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已达1162万户，从业人员1766万人以上。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大会开幕时说：我国个体劳动者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后几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内，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这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条党的总方针所决定的，也是建国30多年来的经验所证明的。

5日　国务院发布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八项规定

按照"七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要求，1987年要在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为此，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共八条：（一）认真落实搞活企业的有关政策规定。（二）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企业之间互相投资，或联合投资新建企业，一般宜采取股份制形式。有些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服务业企业，可由当地财政、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共同核定资产，由企业主管部门进行拍卖或折股出售，允许购买者分期偿付资产价款。出售企业的收入全部上交国家财政，由中央和企业所在城市五五分成。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律改为自负盈亏，不再上交合作事业基金。（三）加快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同时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并切实保障经营者的利益。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的，经营者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贡献的，还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四）进一步增强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五）改进企业的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包括增资指标）和政策范围内，对于企业内部职工工资、奖金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办法，以及调资升级的时间、对象等，由企业自主决定，国家一般不再作统一规定。同时降低奖金税税率。国家经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要研究改进能源、原材料节约奖的提奖办法，解决"鞭打快牛"的问题。（六）继续缩减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七）限期清理、撤销行政性公司。（八）鼓励发展企业集团。

13日　国务院要求继续整顿建筑市场

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整顿建筑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对建筑市场的整顿工作，查出的主要问题有：无证设计、无证施工和越级承包工程的情况严重；发包工程要回扣，承包工程搞贿赂；非法转包，坐收渔利；高估

乱要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揭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大多浮在面上，整顿工作还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为此，建设部提出以后准备继续抓好以下工作：（一）把整顿建筑市场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结合起来进行。（二）整顿建筑市场不仅涉及设计、施工、建设单位，还涉及材料供应单位和市场管理等部门。因此，城市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搞好协调。（三）划清不正之风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对建筑市场活动中的各种不正之风，要认真纠正。（四）抓紧解决工程质量下降的问题。（五）抓紧处理违章违纪案件。

15 日　京秦复线电气化铁路正式开通

京秦复线电气化铁路是国家"六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该线西起北京丰台西站，经双桥、丰润、秦皇岛，东至山海关，全长 341 公里，西端与丰沙大电气化铁路相接，主要承担山西煤炭至秦皇岛港下水的运输任务，同时分流京山线部分直通运量，是晋煤外运的北路重要通道。京秦线年设计运量为 8700 万吨，对华东、华南、华北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京秦铁路于 1982 年 3 月正式开工，1984 年下半年简易开通并开始运煤，1985 年底电气化铁路建成投产。

16 日　国家计委批准兴建隔河岩水电站

国家计委批准由湖北省和水电部合资兴建清江上的第一座梯级电站——隔河岩水电站。隔河岩工程成为中国第一个由国家和地方合资建设的大型水电工程。为了使投资双方的利益得到最好体现，隔河岩在全国率先实行了项目业主责任制。业主清江水电开发总公司既对隔河岩工程的建设施工、运营、收益实行全过程全方位负责，又对投资双方组织的董事会负责。走出了一条"借钱建坝、卖电还贷、建管结合、滚动发展"的全新运行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由国家拨款投资、指定施工单位、建成后移交电网管理的办电模式。

18 日　我国钢年产量跃居世界第 4 位

冶金部副部长徐大铨宣布，我国今年钢产量首次突破 5000 万吨，提前 13 天实现年初国务院对冶金工业提出的要求。据测算，到年底可望达到 5150 万吨，比上年增产近 470 万吨。这样，我国的钢年产量就仅次于苏联、日本、美国，跃居世界第 4 位。

19 日　邓小平谈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时谈到，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得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物价局《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等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提出，小商品的定价原则，要按照小商品的性质和生

产、流通特点，对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一律实行市场调节，由企业定价。一般小商品的具体定价办法是：工业按成本加税金、利润；商业按实际进货价加直接费用、间接费用、税金和适当的利润定价。生产和经营小商品的利润率应大于大商品，零售企业应大于批发企业。小商品的价格放开后，允许同一商品在同一市场的不同商店按不同价格出售。为使小商品价格随市场供求适时调整，近年来为稳定市场物价而采取的控制措施，凡涉及小商品的应予取消。对于贷款问题，《请示报告》提出，凡是小商品的年产值或销售收入占企业总产值或总收入70%以上的企业，即可认定为小商品生产企业，要实行低息贷款的优惠政策。对生产经营小商品的企业，各级财税部门要在税收上给予照顾。《请示报告》还对小商品的范围，生产小商品所需原材料的来源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24日　国务院决定对乡镇煤矿实行行业统一管理

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国家的煤炭资源，制止争抢资源、乱采滥掘和采矿不顾后果的做法，加强对乡镇煤矿生产与安全的技术指导，改善井下工人的生产安全条件，使乡镇煤矿保持后劲，根据国家颁布的《矿产资源法》，国务院决定乡镇煤矿统一由煤炭工业部门实行行业管理。行业管理主要是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进行检查监督。实行行业管理，不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乡镇煤矿的产、供、销仍由生产企业负责统一经营和管理。

27日　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成立

我国最大的计算机联合企业——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长城计算机集团首批成员，包括在京地区的计算机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共67家。它的组建，打破了我国过去计算机产业“部门所有”、“地区所有”、“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开始从各自分立的企业结构走向集团化企业结构的发展道路。

31日　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由于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国民经济摆脱了“过热”的状态，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的态势。全年社会总产值为18774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3%。国民收入比上年增长7.4%。

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增强，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初见成效。1986年工业总产值111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1%，超过计划规定增长8.8%的要求，扣除村办工业，增长9.2%。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6.2%，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16.7%，个体工业增长60.6%，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34.3%。工业产品结构有了新的变化。原材料工业的增长较快，钢材、生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比上年增长10%—15%，滞销的汽车、拖拉机、电子计算机等产量则有所减少。农业生产持续发展，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农业总产值3947亿元，比上年增长3.5%，超过计划规定增长3%的要求。在农业总产值中，林牧渔副业比重由上年的37%上升到37.6%。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食比上年增加1199万吨。

社会总需求得到初步抑制，投资膨胀势头得到抑制。1986年全国城乡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2967亿元，比上年增加424亿元，增长16.7%，低于上年增长38.7%的速度。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38亿元，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404亿元，城乡个人投资625亿元。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1152亿元，比上年增加78亿元，增长7.3%。消费基金增长速度放慢，当年形成的社会商品购买力比上年增长18.5%，低于1985年增长24.5%的速度。

国内市场活跃繁荣，多数商品供求正常。198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5%；扣除零售商品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5%。

对外经济联系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改善。据海关统计，1986年进出口总额达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1%。其中出口总额309亿美元，增长13.1%，进口总额429亿美元，增长1.6%。出口商品结构向深加工和精加工方向发展。进口商品结构有所调整，钢材、铁矿砂、新技术、成套设备等商品的进口显著增加，高档消费品进口减少。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经济体制改革在巩固、消化前几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一些方面取得开拓性进展。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县以上工业企业为主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已达6833个，投入资金110亿元。在劳动制度改革方面，开始实行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招用工人、辞退违纪职工和职工待业保险的四个暂行规定，同时，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试点。金融体制改革和资金市场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小型国营企业采取多种经营形式的试点又有发展。

科技、教育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科技、教育方面突出的特点是：技术市场初步形成，全年转让技术成交额为20.6亿元，“七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始在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领域中实行。“星火计划”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中等教育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职业技术高中在校学生达到480万人，占高中在校学生总数的38.3%。

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据城镇住户抽样调查，198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828元，比上年增长20.9%；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升因素，实际收入增长13%。但有少数居民家庭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比较困难。

1986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消费需求增长过快，国家财政、外汇收支不平衡，由于物价上升等因素，少数居民实际收入有所减少。

1986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

国家计委下达1986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名单，共190项。

一、部委项目176项

煤炭（16项）　河北开滦矿区、山西古交矿区、山西大同矿区、山西阳泉矿区、

山西平塑矿区、山西潞安矿区、内蒙古霍林河矿区、辽宁铁法矿区、黑龙江双鸭山矿区、江苏大屯矿区、安徽淮南矿区、安徽淮北矿区、安徽任楼煤矿、山东兖州矿区、山东枣滕矿区、河南平顶山矿区。

石油（6项）　辽宁辽河油田、黑龙江大庆油田、山东胜利油田、河南中原油田、新疆油田、华北油田

电力（52项）　吉林白山水电站、浙江紧水滩水电站、江西万安水电站、福建水口水电站、湖北葛洲坝水电站、湖南东江水电站、广西岩滩水电站、四川铜街子水电站、云南鲁布格水电站、陕西安康水电站，青海龙羊峡水电站、红水河天生桥水电站、福建沙漠口水电站、西藏羊卓雍湖水电站、北京石景山电厂、河北陡河电厂、天津军粮城电厂、山西大同新电厂、山西神头电厂、山西漳泽电厂、内蒙古通辽电厂、辽宁锦州电厂、吉林热电厂、吉林长山热电厂、辽宁大连电厂、黑龙江双鸭山电厂、黑龙江富拉尔基二电厂、黑龙江哈尔滨三电厂、河北上安电厂、上海石洞口电厂、上海望亭电厂、江苏徐州电厂、江苏南通天生港电厂、浙江镇海电厂、福州电厂、安徽平圩电厂、安徽洛河电厂、江西贵溪电厂、山东石横电厂、山东邹县电厂、河南焦作电厂、河南姚孟电厂、广东黄埔电厂、广东沙头角电厂、湖南耒阳电厂、四川重庆电厂、神头—大同—北京—天津五十万伏高压输变电工程、元宝山—锦州—辽阳—海城五十万伏高压输变电工程、吉林东丰—辽阳五十万伏高压送变电工程、徐州—上海五十万伏高压送变电工程、淮南—上海五十万伏高压送变电工程、华中—华东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铁道（17项）　南同蒲复线、北同蒲复线电化及配套送变电工程、胶济复线、成渝线电化及配套送变电工程、大秦线及配套送变电工程、新菏线、大同包头复线、衡阳广州复线电化及配套送变电工程、鹰潭厦门线电化及配套送变电工程、湘黔线电化及配套送变电工程、贵昆线电化及配套送变电工程、陇海线郑州—兰州段电化及配套送变电工程、东段复线工程、川黔线电化及配套送变电工程、滨绥复线、上海客站、徐州枢纽、河北唐山机车车辆厂。

交通（13项）　大连港、营口港、秦皇岛港、青岛港、天津港、烟台港、南京港、连云港、上海港、宁波港、黄埔港、湛江港、京杭运河。

邮电（8项）　北京国际电信局、北京邮政枢纽、北京十万门程控市话、上海长途电信枢纽、上海程控交换机生产线、上海市话网、天津市话网、广州市话网。

民航（1项）　重庆江北机场

钢铁（4项）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及冶金配套工程、武汉钢铁公司、河南舞阳钢厂、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二期工程。

有色（8项）　山西铝厂、内蒙古包头铝厂、贵阳铝厂、青海铝厂、宁夏青铜峡铝厂、江西铜业公司、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化工（10项）　天津碱厂、山西化肥厂、河北唐山碱厂、江苏连云港碱厂、山东寿光碱厂、广东云浮硫铁矿、湖北荆襄磷矿、格尔木青海钾肥厂、安徽铜陵化工厂、浙江杭州磁带厂。

石化（5项）　黑龙江大庆乙烯工程、南京扬子石化公司、山东齐鲁石化公司、宁

夏化工厂、河南洛阳炼油厂。

森工（2项）　黑龙江鹤北林业局、湖南长沙人造板厂。

建材（7项）　江西万年水泥厂、河北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广西柳州水泥厂、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安徽蚌埠平板玻璃厂、山西大原平板玻璃厂、福建顺昌水泥厂。

机械、汽车（3项）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上海发电设备制造项目。

纺织、轻工（5项）　北京化纤厂、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湖南平顶山帘子布厂、北京电冰箱压缩机厂、广州电冰箱压缩机厂。

气象（1项）　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工程。

文化、卫生、教育（10项）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医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

新闻广播（2项）　中央彩电中心工程、新华社技术业务楼。

科学（4项）　北京中国科技情报中心、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北京科技活动中心、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其他（15项）　北京中国专利局业务楼、亚运会工程、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北京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上海延安东路过江隧道、上海浦东煤气厂一期等。

1987年

1　月

2日　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版图分析系统

复旦大学研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版图分析系统”通过部级鉴定。这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的集成化版图分析系统，标志着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技术进入实用阶段。这个系统具有奇特的功能：一块集成电路芯片通过摄像机把图像送入计算机，计算机能按人们的要求产生芯片各层的版图数据。这些数据如有错误，可通过人与机器“对话”修改，然后输出这些数据给图形发生器，制作出生产集成电路用的掩膜版。同时，机器还可提供该电路的线路图。这个过程省去了原来拍照、拼照、人工画图等步骤。

5日　国家出台集资办电措施

国家决定采取三项改革措施，筹集资金，加快今年全国电力建设的步伐。这三项措施是：（一）向企业发行与用电指标挂钩的电力建设债券，数额定为20亿元。（二）出售新建投产发电机组用电权，出售的装机容量约占新建投产机组容量的10%。（三）向

社会发行一部分个人债券，利率稍高于银行存款。实行这三项措施的目的是弥补国家电力建设资金不足，确保今年600万千瓦以上发电机组有充足资金进行建设并按时投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市政用电的需要。

国家批准开办七个钢材市场

国家批准在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西安、石家庄七个市开办钢材市场，推广石家庄市放开钢材流通的经验。这将对搞活企业，调剂余缺起到积极作用。由于钢材品种规格不对路等原因，1986年底，全国钢材库存增加。为了吸引库存钢材投放市场，经国务院批准，按市场价格销售库存钢材的收入，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和调节税，全部留给企业。

9日　国务院批准颁布统计法实施细则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细则》共6章35条。包括总则、统计调查计划和统计制度、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奖励与惩罚、附则，明确规定了统计部门和统计工作者的职权和职责等内容。《实施细则》的发布实施，将推进我国统计法制建设，使统计工作在掌握国情国力、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

10日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平果铝厂建设拉开帷幕

国内迄今最大的有色金属工业中外合作项目——广西平果铝厂的建设已拉开帷幕。平果铝厂位于桂西平果县城附近，当地铝矿储量约8亿多吨，矿石品质优良，矿层厚度大，埋藏浅，可全部露天开采。邻近的红水河上丰富的水电资源和黔桂公路为铝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能源、交通条件。这个现代化的大型铝联合企业兴建后，第一期的起步规模即可年产60万吨铝矿石、30万吨氧化铝、10万吨电解铝。不仅将改变我国铝进口的局面，而且对振兴广西这个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重大意义。

11日　国家计委决定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设计复查

国家计委作出决定：今年要对待建和在建的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设计复查，以求从根本上克服重点建设重点浪费的现象，按“七五”计划要求全面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计委对这次设计复查的安排，主管部门要着重检查项目决策是否正确，有没有脱离国情和脱离实际的做法；建设单位要查有没有扩大投资规模，增加工程内容，追求不必要的高标准；设计单位要查有没有违反设计原则和设计标准，迎合一些建设单位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施工单位要查有没有降低定额、高估多算和不按设计施工等问题。

14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物价管理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为了保证把零售物价水平控制在计划之内，国务院向各地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一）1987年物价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改革，稳步前进，保持基本稳定。（二）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稳定市场粮价。（三）大中城市要认真安排好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保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四）加强生产资料价格管理。计划内的部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定价，不准擅自加价；计划外的部分，当前为了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对某些品种应规定最高限价。（五）切实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放开价格的品种和范围。（六）严格禁止乱收费、乱涨价。

（七）加强物价检查与监督。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认真搞好经常性的物价大检查工作。

15日　国家经委等部门要求进一步制止向企业摊派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审计署、财政部《关于制止向企业摊派的情况和意见》，并发出通知。《情况和意见》分析了向企业摊派的种类、摊派制止不住的原因，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制止向企业摊派的意见。国务院为此发出的《通知》指出，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问题还远未解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为了严肃纪律，在近期内要抓住一些典型案例，严肃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要通报全国。

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胡耀邦辞职

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会议指出，全党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议强调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努力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20日　邓小平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改革开放政策

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指出，8年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顺利的贯彻，国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8年来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制定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搞社会主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

国务院作出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规定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自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一年多来，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科技与生产相脱节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扭转。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1987年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在继续执行国务院已公布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同时迈出新的一步，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特作如下规定：（一）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促进多层次、多形式的科研生产横向联合，推动科技与经

济的紧密结合。国务院各部门都要实行政研职责分开，简政放权；以技术开发工作为主的大多数科研机构，特别是从事产品开发的科研机构，都应逐步进入企业、企业集团或与其实行紧密联合；其他技术开发科研机构可采取多种形式面向经济建设；科研机构要实行精简缩编；要适当加快科研事业费的削减速度，全面实行所长负责制；逐步实行科研机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二）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放宽放活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为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和鼓励部分科技人员以离职、停薪留职、辞职等方式，走出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政府机构，到城镇和农村承包、承租全民所有制中小企业，承包或领办集体乡镇企业，兴办经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贸易机构，创办各类中小型合资企业、股份公司等。

22 日　中共中央对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九项原则规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文件对继续深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文件共列了九个问题：（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二）继续改革统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三）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四）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五）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六）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的方针；（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八）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九）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海关法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共 7 章 61 条，包括总则、进出境运输工具、进出境货物、进出境物品、关税、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自 7 月 1 日起施行。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同时废止。新《海关法》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加强进出关境的监督管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促进和保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保证《海关法》的正确实施，1987 年 6 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7 月 1 日海关总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对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及处罚、处理作了 36 条规定。

22 日—25 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做好 1987 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当前必须在四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一）增强企业活力，归根结底是要增强企业再投入的能力，即增强新产品开发与技术装备更新的能力，这是企业生产经营走向良性循环的物质基础；（二）企业缺乏活力，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各种弊端的集中表现。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没有必然联系。深化企业改革，目的是要克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形式，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三）在处理企业改革同外部条件的关系上，既要坚持把企业改革放在中心地位，使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互相适应，配套进行，又要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促使企业眼睛向内，加强各项管理，完善企业行为机制，引导企业把增强活力放在搞好自身工作的基点上；（四）在解决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处理好企业内部分配关系。关键是把企业内部工资奖金

的分配权完全放给企业。会议指出，1987 年深化企业改革，要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来挖掘潜力，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把权、责、利配起套来，真正落实到企业经营者身上。至于采取什么经营形式，可以不拘一格，采用适合企业本身特点的经营形式。关于增产节约，会议指出，这不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部署。会议强调，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最根本的是要深化企业改革，找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适当形式。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把企业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蕴藏在企业里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会议强调指出，搞活企业、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23 日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列入国家规划

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联合召开“部署编制 2000 年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我国的扶贫工作今后将以帮助贫困地区进行经济开发为主，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列入国家科技、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从 1980 年至今，国家用于扶贫的钱和物，累计有 400 多亿元。为了提高效益，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决定转变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从“输血”转向“造血”，采取中央和地方结合的办法，根据各地区和中央各部门的特点、条件，有计划、有重点地帮助贫困地区开发产业，落实项目，避免“撒胡椒面”。

国家计委决定对基建项目实行“三保三压”

国家计委在安排今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确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继续压缩膨胀的投资空气，有效地控制建设总规模，今年要坚决实行“三保三压”，即保计划内项目，压计划外项目；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一般工业建设。

24 日　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成立

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委计算中心、经济预测中心、经济信息管理办公室合并组建的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在北京宣告成立（后于 1988 年改称国家信息中心）。这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信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一）为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以及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及时而准确地提供现代化的信息服务和辅助决策手段；（二）给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信息导向和社会化的信息咨询服务。这个中心总的目标就是要在我国建立起具有灵敏信息反馈和预测功能的国民经济活动的“体温表”和“晴雨表”。

28 日　我国第一座直流输变电工程全线架通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舟山与大陆直流输变电工程正负 100 千伏输电线路全线架通并通过鉴定。这是目前我国第一座直流输变电工程。它自宁波港到镇海港，穿过舟山海峡，横跨 42 公里，其中海底电缆线 11 公里，途中架空输电铁塔 115 座。它的建成使大陆华东电网与舟山群岛连成一片，华东电网每年可为舟山本岛输送 50000 千瓦的电能。

2　月

6日　邓小平谈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6日—10日　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

国务委员谷牧主持会议。1986年四个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76亿元，工业总产值达68亿多元，出口创汇近10亿美元，都比上年增长20%以上。会议认为，改革是特区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会议要求特区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中心，以搞活企业、完善特区市场体系、改进行政管理为重点，锐意改革，精心探索，努力走在全国的前头。

10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中国民航管理体制

经国务院批准，酝酿已久的中国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国民航局作为国务院主管民航事务的部门，充分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实施行业管理。将现在的六个地区管理局政企分开，组建六大国家骨干航空公司，即（1）以北京管理局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2）以上海管理局为基础组建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3）以广州管理局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4）以成都管理局为基础组建的中国西南航空公司；（5）以西安管理局为基础组建的中国西北航空公司；（6）以沈阳管理局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北方航空公司。这六大骨干航空公司中，除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经营国际航线为主，兼营国内航线和地区航线外，其余五个骨干航空公司主要经营国内航线，并兼营地区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各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均享有同外国航空企业、旅行社、货运代理业进行业务谈判和签订协议的权力；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公司间将展开竞争，并加强横向联合，增强企业活力。民航体制改革后，机场将成为独立的企业单位，设机场管理机构实施管理，所有权仍属于国家。机场与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分开，对所有民用航空企业开放，提供服务，根据有关规定实行收费制度。国际机场的确定，经国务院批准后由中国民航局对外公布，非经公布、谈判签约的机场，不得对外国民用航空企业开放。

国务院发布1987年国库券条例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七五”期间发行国库券的计划，国务院决定1987年国库券发行总额仍定为60亿元，其中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40亿元。国务院为此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87年国库券条例》。《条例》规定：国库券的发行对象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个体工商业户；城乡人民。国库券发行任务，采取合理分配的办法，并从当年1月1日开始发行。国库券的利率：单位购买的国库券，年息定为6%；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年息定为10%。计息一律从当年7月1日算起，提前交款的不贴息。偿还期定为5

年，在发行后的第6年一次偿还本息。

国务院决定发行重点建设债券和重点企业债券

国务院下达《关于发行重点建设债券和重点企业债券的通知》，决定通过银行代理发行重点建设债券和重点企业债券100亿元，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国家计划内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重点建设项目。

14日—15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抑制过大的总需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央、国务院对1987年经济工作提出的一些重大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压缩空气，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在进一步改善社会总供给的同时，着重抑制过大的总需求，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具体讲，就是通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压缩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压缩各种非生产性开支，把资金用于重点建设。要把我们办的事情放在国力能够承受的程度和范围之内。

6日　国家体改委等决定扩大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市

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扩大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市，增加北京、上海和天津等14个城市作为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广东省作为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从今年二季度起开始试点工作。至此，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总数已达到27个。新增加的14个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西安、青岛、石家庄、兰州、成都、杭州、长春、福州、潍坊、沙市。在此之前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有广州、重庆、武汉、沈阳、常州、大连、丹东、南京、苏州、无锡、宁波、温州、宝鸡市。

试点城市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作为国营大中型企业要逐步实行行长、经理负责制。各试点银行、保险公司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拥有业务经营自主权；信贷资金调配权或保险条款制定权；利率、保险费率浮动权，可按现行利率、费率上下浮动20%；中层干部任免、职工招聘和奖惩权；企业内部机构设置权；留成利润支配和工资、奖励、福利基金内部分配权。并在执行国家有关费用开支规定的前提下，在内部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承包制等。

20日　人民银行对外汇担保作出规定

为了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保证金融活动顺利开展。加强对外汇担保的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共17条，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办法》规定，外汇担保的管理机关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以下简称“外汇管理部门”）。可以提供外汇担保的机构仅限于法定经营外汇担保业务的金融机构及有外汇收入来源的非金融性质的企业法人。金融机构提供的外汇担保总额和其对外债务总额累计不超过自有外汇资金的20倍。非金融机构提供的外汇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其自有的外汇资金。外汇担保的范围是：（一）可为中国境内的按中国法律登记注册的企业提供担保，但不得对企业注册资本提供担保；（二）未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为中国驻外企业提供外汇担保；（三）除外国机构或外资企业有等值的外汇资产作抵押外，不得为外国机构或外资企业提供外汇担保。

24日　粮食合同定购实行"三挂钩"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业部、农牧渔业部、中国石化总公司《关于粮食合同定购与供应化肥、柴油挂钩实施办法》。《办法》确定的对挂钩化肥、柴油调拨和供应的原则是：肥、油随粮走，票随肥、油走，分期分批定点供应，定期内有效，尽量照顾农时需要。"三挂钩"的实施办法规定：粮食部门要根据本省（区、市）规定的粮肥、粮油挂钩标准和票证的发放办法，向交售合同定购粮的农民（生产单位）发放票证，不准克扣、拖欠和截留；供销社（商业部门）的各级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基层供销社（基层农机供油点），是粮食合同定购挂钩化肥、柴油的具体调拨、兑现单位；各级石油经营部门要根据上级下达的挂钩柴油专项计划，负责编制粮油挂钩柴油季度调拨计划，并在总资源中列出专项，优先发运，保证兑现；各级农业、农机部门要指导农民把挂钩化肥、柴油用于粮食生产；铁路、交通部门对挂钩化肥、柴油的调拨运输，在计划与运力上要优先安排，各港口对进口化肥船只的靠港、卸货、发运应予优先照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化肥、柴油市场的管理，取缔倒卖挂钩化肥、柴油票证行为，但允许农民之间互相调剂。

财政部调整奖金税、工资调节税

财政部对有关征收奖金税、工资调节税问题发出通知，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在企业奖金分配上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以调动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并能有效地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一）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自1987年度起，降低奖金税税率。（二）试行工资总额同上交利税挂钩的企业，从1987年起，工资调节税税率相应降低，企业工资总额增长占核定工资总额不超过7%的部分，继续免征工资调节税，超过部分，按修改后的税率征收工资调节税。（三）随着企业工资、奖金分配制度的改革，企业可以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和政策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自定企业内部职工工资、奖金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办法。在征收奖金税时，除了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中允许进入成本的部分，可不征收奖金税外，对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增资部分以及用职工奖励基金发放的各种奖金、浮动工资、津贴、实物等，均应按规定计征奖金税。

25日　我国首次在液氮温区获得超导体

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人员首次发现在液氮温区100K以上条件下的超导体，在超导材料研究方面获得新的重大突破。他们在实验中采用的新超导材料，是主要成份为钡化钢氧四种元素的改进的钡基氧化物。测量结果表明，这种材料超导中点转变温度为92.8K，转变宽度为4K，起始转变温度在100K以上（电阻线性过渡到非线性的变化在正110K附近），出现零电阻的温度为78.5K。这是长期以来国内外科学界梦寐以求的首次在液氮温区获得的超导体。

27日　国家科委等发布科学事业费管理暂行规定

为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并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科学事业费分类管理，保证合理而有效地使用科学事业费，推动科学技术工作更好地面向经济、面向社会，形成科学研究结构合理的纵深配置，国家科委、财政部发布《关于科学事业费管

理的暂行规定》。《规定》将科研单位划分为技术开发类型、基础研究类型、社会公益事业、技术基础、农业科学研究类型和多种研究类型分别进行管理。

国务院批准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沿海港口城市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同时，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

3　月

1日　国家工商局确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

国家工商管理局公布《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遵守如下规定：（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万美元以下（含300万美元）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7/10。（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万美元以上至1000万美元（含1000万美元）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1/2，其中投资总额在420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210万美元。（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至3000万美元（含3000万美元）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2/5，其中投资总额在1250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美元。（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1/3，其中投资总额在3600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200万美元。

2日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等提出保障农业持续稳步增长八项建议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利电力部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提出《关于保障农业持续稳步增长的建议》，主要内容有：确定以下两个目标为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动摇的战略要求：努力攀过粮食总产4500亿公斤和5000亿公斤两个台阶，保证人均400公斤粮食供给；保证农民收入稳步提高，逐步向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接近。为增强农业后劲，今后10年优先实施的八项建议是：（一）调整价格政策。（二）加速推广农业技术。（三）整治土地一亿亩。（四）鼓励扩大耕地经营规模。（五）调整产业结构，从种植业转移出一亿劳动力从事农村工业、服务业。（六）加强农村基层技术力量。（七）加强农用工业建设。（八）尽快解决贫困地区温饱和建设问题。

9日　水口水电站开工

我国“七五”重点建设项目，华东地区最大的水电站——水口水电站正式开工，从而揭开了福建水电建设史上崭新的一页。水口水电站位于闽江干流的中段，建成后具有发电、航运，防洪等综合效益，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50亿度，计划于1993年5月发电，电站将通过500千伏输电线供华东电网，220千伏输电线供福建电网。上游水库总库容26亿立方米，可改善航道约100公里，使500吨船队由南平通过电站枢纽直抵福州。

10日　信息交换用汉字点阵国家标准对外技术转让

我国信息交换用汉字点阵国家标准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今后进入中国市场的计算机汉字处理系统必须采用这一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点阵国家标准是由我国语言文字、印刷、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共同编制的。由这种点阵组成的字形规范、美观，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标准已向国外一些计算机公司转让，成为我国第一个对外进行技术转让的国家标准。汉字点阵国家标准除了在信息处理汉字化方面广泛使用外，还为实现汉字光学识别打下基础。

17日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成立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关税对调节进出口、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的作用，国务院决定成立关税税则委员会。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提出制定或修订《关税条例》和《进出口税则》的方针、政策、原则，审议税则修订草案，制订暂定税率（包括进口调节税税率），审定局部调整税率等。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海关总署署长戴杰、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王品清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海关总署。

25日　第六后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出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方针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报告指出，总的来看，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不仅对于巩固和发展当前很好的经济形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经济实力的加强，人民利益的增进，乃至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都必将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全部经济工作必须以此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并为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要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着重解决好如下六个问题：第一，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地位；第二，必须按照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的客观规律办事；第三，必须把消费的增长切实建立在生产发展可能的基础之上；第四，必须努力做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第五，必须继续防止盲目追求过高增长速度的倾向；第六，从根本上说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除了解决好上述问题外，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要真正使经济建立在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

26日　198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1987年计划草案的报告》。198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总的是通过大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搞活大中型企业和增强农业后动，争取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主要计划指标的安排是：（1）1987年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计划达到3135亿元，比上年增长4%。力争粮食总产量达到4亿至4.05亿吨，比1986年增加890万至1390万吨。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农林水利投资23.75亿元，比上年增加6.7亿元。（2）1987年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计划达到11000亿元，比上年增长7%，轻工业和重工业大体保持同样的速度。（3）198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1950亿元，基本

维持1986年的水平。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140亿元，更新改造投资600亿元。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能源、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等重点建设的投资比1986年进一步增加。(4) 1987年要继续妥善安排城镇劳动就业。职工工资总额计划比上年增加140亿元，主要用于新增职工、正常转正定级等所必需增加的工资。继续有计划地建设职工住宅，争取全年建成9000万平方米住房。

报告还提出要进一步改革计划体制，重点是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和统配物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同时，完善指导性计划的实施办法。

198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7年国家预算草案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198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986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2220.3亿元（其中国内财政收入为2141.6亿元），完成预算的103.7%；国家财政总支出为2291.1亿元，完成预算的107%。收入和支出相抵，财政赤字为70.8亿元。

1987年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原则是：从增产节约中提高效益，培养与开辟财源，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坚决把已经抬上去的可以节减的支出压下来，并合理地安排和使用资金，实行保改革，保重点，保后劲，保经济良性循环的方针；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健全预算管理，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国家预算确定的数额以内。提请审议的1987年国家预算草案，财政总收入为2379.29亿元，财政总支出为2459.46亿元。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80.17亿元。

为确保各项建设事业和经济改革必不可少的资金需要，并把财政赤字控制在最低限度以内，国务院拟定了若干有关财政收支的政策性措施：

（一）推进改革，搞活企业和增强农业后劲。今年国家将对部分国营企业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调减调节税，对电力、森工、纺织、轻工等企业减税让利，特别是对沿海地区的纺织轻工企业，在技术改造费补助和贷款贴息等方面采取若干优惠措施。在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方面，除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比上年略有增长外，国务院已确定调减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并适当调高部分粮食、油料、棉花的比例收购价格。

（二）调整投资结构，保证重点建设。今年应当在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前提下，下决心调整投资结构，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重点建设，压缩非生产性建设和计划外投资项目。

（三）合理安排智力投资，确保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必不可少的开支。考虑到当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仍然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不能象对待其他支出那样，在去年预计执行数的基础上进行压缩。1987年国家预算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共安排了387.78亿元，增长2%。

（四）紧缩财政开支，把过高的支出盘子压下来。国务院确定，今年除用于价格补贴、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等必需支出的经费以及某些特定的专项拨款外，其余各项开支都要在去年预计支出数的基础上节减10%。

（五）开征新税和适当调整某些税率，增加财政收入

（六）增加国外借款。

国务院对企业债券管理作出规定

为加强对企业债券的管理，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有效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条例》共5章30条。对企业债券的形式、主管机构、企业债券的管理、发行企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条例》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计委、财政等部门拟定全国企业债券发行的年控制额度，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省辖市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对企业发行债券实行集中管理、分级审批制度。

交通部下放港口和企业管理权限

交通部根据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将直属的沿海港口和工业企业全部下放给地方，交通部行使政府职能，实行行业管理和宏观控制。内部直属的15个沿海港口，除个别专业性很强的以外，全部下放给地方，实行“双重领导、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长江干线大小港口全部下放，有中心城市依托的下放给中心城市，部分小港小站实行大港带小港；部直属的工业企业全部下放，但工厂生产方向不变，产品的标准、规格、质量的确定及产品许可证的颁发，仍由交通部负责；部属大型骨干运输企业、基建企业实行政企分开，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保持基本分工的前提下，逐步缩小区域划分范围，对国内水运企业，放宽国际运输船舶参加国内运输的限制，鼓励企业间开展合理竞争，实行横向联合，发展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实行行政和科研分开，恢复和加强交通科学研究院，统一组织实施交通科研任务。

28日　国务院通知要求加强股票债券管理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股票、债券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对股票、债券缺乏统一管理等原因，致使集资规模缺少宏观控制；投资重点没有放在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上；有些地方借发行股票、债券乱拉资金，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扩大了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的强行摊派，使企业和群众难以承受，并助长了不正之风等等。为了更好集中财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使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股票、债券管理。通知共8条，主要内容为：（1）当前发行股票，应当在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下，主要限于在少数经过批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试行。（2）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得向社会发行股票。对少数已经批准试点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由各地人民政府负责认真检查清理，对其中确需继续发行股票的，各地人民银行要从严审批。（3）为推动横向经济联合，以互相投资、合股、参股方式新建的企业，合作各方可以试行采用股票形式，但不得向社会发行股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股票不得上市。（4）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债券。机关团体、事业单位、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公民个人不得发行债券，也不得委托其他部门代理发行债券。（5）全民所有制企业发行债券，应当按照《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执行。（6）发行债券必须优先保证用于国家计划内的重点建设项目，严禁用发行债券搞计划外的固

定资产投资。(7) 企业发行债券必须报经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发行。(8) 各地已经制定的有关股票、债券的管理办法，凡与本通知不符的，应当按本通知加以修改，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30日　国务院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

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一) 放宽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二) 改进技术改造项目的管理。(三) 调整部分行业建设项目的限额。四、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办事效率。《通知》指出，部门、地方和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权限扩大后，必须相应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和风险，并定期向上级机关反馈有关信息，接受上级机关的指导和监督。各部门、各地方要切实做好需求预测工作，认真制定行业、地区的发展规划，努力搞好综合平衡，控制投资规模，引导资金投向，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国家经委等对节约用电作出规定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用电的若干规定》。《规定》。内容包括：(1) 严格生产用电定额管理。(2) 开展调荷节电。(3) 发展高效省能设备，加速淘汰、更新设备。(4) 认真推广节电技术措施，鼓励企业利用余热、余压办电。(5) 管好农业用电。(6) 控制非生产用电。(7) 做好节电管理工作。(8) 加强组织领导。

国务院批准全国实行天然气商品量常数包干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石油部《关于在全国实行天然气商品量常数包干办法的报告》。包干办法主要内容是：全部天然气商品量均纳入国家计划管理，把年外供商品气67.5亿立方米作为包干基数，落实到各个油气田，超产部分按高价销售，高、平差价收入作为天然气勘探开发专项基金，以补充天然气工业建设资金的不足，走"以气养气"的路子。

天然气是我国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一种重要能源。工业企业和城市生活用气的需求量正日益增长。实行天然气商品量常数包干，把高、平差价收入作为天然气勘探开发专项资金，是我国推动天然气工业发展的重要措施。

31日　农牧渔业部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丰收计划"

"丰收计划"是国家为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它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国内外现有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综合应用到大面积、大范围生产中去，以达到稳产、高产、低消耗、高效益的目的。它的实施项目范围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和农机等各业的先进实用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凡是可以使农牧渔业生产增加产值，改进品质，提高劳动效益，减少消耗，降低成本，减轻劳动强度，提高资源利用和有利于环境保护，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并能在大范围应用的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均可列入"丰收计划"。

4　月

1日　国家开征耕地占用税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农用耕地，国务院特制定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条例》共16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条例》所称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占用前3年内曾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亦视为耕地。纳税人是指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条例》对耕地占用税的税额作出如下规定：（一）以县为单位（以下同），人均耕地在1亩以下（含1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2元至10元；（二）人均耕地在1亩至2亩（含2亩）地区，每平方米为1.6元至8元；（三）人均耕地在2亩至3亩（含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1.3元至6.5元；（四）人均耕地在3亩以上的地区，每平方米为1元至5元。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按上述规定税额减半征收。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发达、人均耕地特别少的地区，适用税额可以适当提高，但是最高不得超过上述规定税额的50%。

交通银行重新组建并对外营业

交通银行是我国第一家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全国性综合银行。其前身成立于1908年3月8日，创办初期为官商合办银行。1909年起为中国发行银行之一。1928年特许为“发展全国实业银行”。它是中国银行业最早在海外设立机构的银行。1957年起，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外，内地各分支机构业务分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1986年11月18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加强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国务院决定恢复交通银行机构和业务。交通银行是和其他专业银行平行的全国性综合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执行国家统一的金融方针、政策、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基本规章制度。交通银行的任务，是按照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筹集和融通国内外资金，经营人民币和外币的各项金融业务。其业务范围不受专业分工限制。交通银行可根据经济发展和业务开拓的需要，按规定的程序报批后，在国内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分支机构在总管理处领导下，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管理处设在上海。

2日　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暂行规定》。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是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搞活大型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建设计划，国家多年来都是按部门或地方分别管理的体制层层下达的。近年来在横向经济联合中建立的跨部门、跨地区的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冲破了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迫切要求进行相应的和必要的改革。《暂行规定》共分三个部分：（一）企业实行计划单列应具备的四个条件：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产品对国家生产建设和国内市场供应以及出口创汇具有重大意义；具有较高经

营管理水平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基本建设集团项目应是在一定区域内几个紧密联系、互为条件、以工业为主体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群。（二）计划单列的内容和方法：（1）单列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计划指标应在国家计划中单列。（2）单列企业的计划草案直接报送国家计委。（3）单列企业承担国家指令性生产计划或国家订货任务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由国家计委按照调拨计划或订货合同直接分配。（4）单列的基本建设集团项目所需的中央投资和统配物资，由国家计委直接安排。（5）单列企业可以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专业会议。（6）单列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字，应直接报送国家统计局。（三）单列企业与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关系；（1）单列企业应当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行业规划、技术政策和各项标准、定额的指导下，进行生产建设。（2）单列企业应向所在地方政府照章纳税。（3）有关部门和地方对单列的集团项目的建设要积极给予支持。（4）有关部门和地方不得在国家计委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外另行下达指令性任务。（5）单列企业要接受财政、银行、税务、审计、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统计等部门的监督。

首批实行计划单列的大型工业联营企业有：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核心厂，有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无锡等地企业参加的解放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为核心厂，有杭州、柳州、南京、云南、新疆等地企业参加的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由山东、四川、陕西、浙江、湖南等地汽车制造企业组成的重型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由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和东风电机厂组成的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等。单列计划的基本建设集团项目有："七五"期间重点工程河南焦作铝、煤、电综合开发项目和跨越陕西、内蒙古的神府东胜煤田。对上述企业集团和集团项目的生产安排、物资供应、产品销售、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进出口贸易、财务、劳动工资等计划指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制定中长期和年度计划时，将单独列出，直接下达。

国务院环保委通过国家环境保护"七五"计划

李鹏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环境保护"七五"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制定的，总计有15章。"七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任务是：基本控制工业污染的发展，减缓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部分水域和区域环境质量有所好转，部分重点城市和旅游区的环境有所改善，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为实现我国2000年的环境目标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这个计划突出了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和乡镇企业污染的防治重点。"七五"期间我国城市环保工作的重点是51个城市，其中又以控制工业污染作为中心任务。对乡镇企业，污染控制的重点放在造纸、电镀、印染、土法炼焦、土法炼硫磺、拆船、制革、建材等行业上。

7日　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办法

《中国银行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办法》共27条，由中国银行公布施行。1981年3月13日，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公布的《中国银行办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贷款暂行办法》同时废止。修改后的贷款办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1）贷款对象由原来只限于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扩大到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2) 增加了新建基建项目固定资产贷款。(3) 贷款利率更加灵活。(4) 明确了贷款优先支持经济效益好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新办法在贷款条件、贷款期限、审批程序、担保、贷款管理及违约处罚等方面也更加完善。

说明　已被1995年5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代替。

8日　国务院对严肃税收法纪作出规定

针对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单位只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不按国家税法的统一规定办事，自行变动税率，擅自决定减税免税，任意偷税、欠税、截留税收，甚至抗税不缴等问题，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肃税收法纪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1987年原则上不再增开免税口子。各地在试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时，包括实行租赁和承包在内，都要坚持依法纳税的原则，不能搞税收包干。

招商银行成立

我国第一家由企业投资创办的综合性银行——招商银行在蛇口正式开业。这家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的银行，由蛇口招商局集团投资创办，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均为等值人民币1亿元。招商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企业和居民的人民币和外币存款或贷款；办理国内、国际结算和汇兑；办理国内外银行间的存款、贷款、拆借；经营外汇买卖；在国内外发行有价证券并办理有价证券的转让业务；组织和参加大型项目的银团贷款；办理咨询，担保、代理和保管业务。

13日　中葡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代表各自政府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7日　国家扩大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规定》，自5月1日起施行。凡未开征能源交通基金的城乡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按缴纳所得税后利润的7%缴纳能源交通基金；缴纳所得税后年利润不足5000元的可免缴；免缴能源交通基金的项目和能源交通基金的征集管理，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26日　邓小平谈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30日　邓小平谈实现四化分三步走

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指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近九年来的实践证明，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任务来说，我们毕竟还只是开步走。可以说，十年是第一步，第一步的目标就是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美元，这个目标估计可以提前实现。然后再过十年，即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这是第二步。实现这一目标，我国达到小康水平，我们国家的力量就将会有很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第三步，目标是在实现上面两个目标之后，再用30至50年时间再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大体上达到4000美元。达到这一步，中国就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国务院批准开展第二期生育力调查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在北京、辽宁、山东、广东、贵州、甘肃进行第二期生育力抽样调查。举办这次抽样调查的目的是：深入了解我国妇女生育水平和发展趋势，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提供依据。第一期生育力抽样调查已于1985年4月在河北、陕西、上海进行。这次调查对象为50周岁以下的已婚妇女，调查内容主要是妇女的婚姻、生育、避孕、生育愿望及丈夫和家庭的基本情况。

5　月

6日　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大兴安岭地区的西吉林、图强、阿尔木和塔阿4个林业局发生严重火灾。国务院成立了由总参谋部、林业部、铁道部、国家气象局和国家物资局等部门领导参加的扑火指挥小组。经过数万军民的昼夜奋战，5月26日西线和东部地区的明火全部被扑灭。这次火灾损失严重：过火面积100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约65万公顷，烧毁贮木场存材75万立方米，汽车、拖拉机等大型设备431台，各种房屋64万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约5亿元，受灾群众10807户、56092人，在大火中丧生的达191人，烧伤221人。

8日　国务院发文制止生产资料价格乱涨价乱收费

国务院发布《加强生产资料价格管理，制止乱涨价、乱收费的若干规定》。《规定》共12条，主要内容是：（一）凡国家管理的生产资料价格、交通运价和收费标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任何部门、企业（包括企业集团）和行业协会都无权擅自变动，也不得搞变相加价、收费。（二）生产企业按照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生产和调拨的产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不得截留或变相截留计划内的生产资料转计划外高价出售。（三）实行国家指导性计划的产品，也要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如执行确有困难，按照物价管理权限，经过批准，其价格可在一定的幅度内浮动。（四）企业可以加价自销的生产资料，必要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部门会同主管部门核定最高限价。重要生产资料由国家物价局会同主管部门发布全国统一最高限价，企业可在国家规定的最高限价或浮动幅度以内自定价格，开展竞争。（五）各地物价部门对临时价格要

进行整顿。对同一产品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外两种临时价格的，应立即纠正。（六）铁路、交通等运输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将申请车皮、销售客票等正常业务转交所属的劳动服务公司等单位加收费用经营。未经国家批准擅自规定的各项收费，要立即取消。延伸服务的收费，应由当地业务主管部门提出办法，经同级物价部门审定后执行。（七）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收费的管理。（八）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价集资。（九）地方人民政府和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必须维护物价纪律，不得纵容、支持企业乱涨价、乱收费，不得越权定价。（十）要加强对执行生产资料价格和各项收费的检查监督。对违反物价纪律的，要严肃处理。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以前的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13 日　国务院颁发矿产资源管理三个暂行办法

国务院发布《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采矿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这三个办法的发布实施，是我国地质矿产、采矿业继 1986 年 3 月 19 日《矿产资源法》颁布后的一件大事。近年矿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1986 年矿石总产量达到 16.11 亿吨，天然气 134 亿立方米。矿业总产值达到 629.49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5.8%。但是，矿业开发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矿产资源勘查的项目重叠、交叉、争抢工作地盘的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黄金、有色金属等热门矿种的勘查纠纷多。采矿权属纠纷比较普遍，无证开采、越界开采以至乱采滥挖等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矿山的正常生产秩序，造成了矿产资源的破坏和重大经济损失，甚至酿成重大安全事故。三个《暂行办法》是理顺当前矿业关系，加强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宏观控制与统一管理，减少矿产资源破坏和损失的重要规定。

21 日　国务院提出城市建设要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是：（一）提高对城市和城市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二）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走计划发展的道路。贯彻“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基本方针，对城市生产力进行合理布局，有计划地逐步推进城市发展，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城镇体系。（三）搞好城市规划，加强规划管理。（四）改革城市建设体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益。要逐步克服城市建设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分散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工业、住宅建设不配套等问题，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提高城市建设的活力和综合效益。（五）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六）管好用好城市建设资金，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市政设施要逐步实行有偿使用。（七）城市政府要集中力量搞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22 日　国务院环保委发布中国自然保护纲要

《中国自然保护纲要》是我国在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方面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具有宏观指导作用的纲领性文件。《纲要》于 1986 年 12 月 23 日在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国务院环保委在发布《中国自然保护纲要》的通知中指出：

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证条件，是一项基本国策。希望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学习和宣传，把《纲要》所提的原则和政策作为开发自然资源遵循的准则。《纲要》共分四篇，19章，约13万字。第一篇，主要说明编写《纲要》的目的、作用和意义，阐述自然保护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自然保护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二篇，分别论述各重点自然保护对象的情况、特点、开发利用中的主要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第三篇，对中国不同自然区域的环境和资源特点、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及应采纳的对策作了阐述。第四篇，就共同性的对策，如技术经济对策、法制建设、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纲要》是国家有关部门和13个全国性学会的200多位专家历经3年协作完成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

6　月

1日　国家经委等提出推动乡镇工业技术进步的意见

国家经委、农牧渔业部、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发出《关于推动乡镇工业技术进步的意见》，并为此发出通知。《意见》对推动乡镇工业技术进步工作的目标、方法、步骤及有关政策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9日　国家制定全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项目管理办法

为了提高中央和地方用于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各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制订《全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对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项目的选择确定、项目的论证评估、项目的执行和监督、项目的总结验收和项目的组织领导等作了具体规定。

《试行办法》规定，当前对贫困地区各种资金实行项目投资的主要方向是：投资少、见效快，有市场，家家户户都能干都有利，有助于贫困户劳动力就业，能尽快解决群众温饱的“短平快”项目。项目的基本形式是：以千家万户家庭生产为基础，辅之以为家庭生产提供良种、技术、收购、加工、储藏、运输等系列化综合服务的服务中心，形成配套成龙的商品生产项目。试行办法还规定，适合贫困户、联户开发的小项目，也可以单独立项。

按项目投资和管理，是农村经济建设上的深入改革和进步。通过项目管理，把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发展规划具体化，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有选择地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按科学的管理程序投资，有利于提高经济开发的效益，造就新型的管理人才。

10日　国家体改委等提出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区别行业特点和企业规模，实行多种管理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1）努力增强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活力。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包括批发企业）改革的重点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多种多样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相应改革领导体

制和分配、劳动制度。(2) 进一步搞好国营小型商业企业的改革。已经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可以不变，也可以实行租赁制经营；未转未改的企业，要大力推行租赁制经营。(3) 深入改革国营批发商业。大中城市的国营批发商业要根据商品生产社会化、专业化的要求，因地制宜进行改革。中心城市的贸易中心要坚持开放和服务的原则，探索以其为常设商品交易市场的改革，创造条件逐步取代现行供应会。要根据需要发展城市批发市场、小商品市场。(4) 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有领导地稳步地进行价格改革。

国家体改委等提出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意见

国务院向各地、各部门批转了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贯彻落实。《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社员是供销合作社的主人。在经营上，供销合作社要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继续扩大社员股金或采取集资形式兴办企业；要发展农产品经营的联营制、代理制和按农产品交售量实行所得税后的分红制；有权对国家已经放开的商品实行自主经营；要严格按照社章办事，在业务经营、财务管理、领导班子的调整等方面，充分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供销合作社还要充分运用遍布城乡的网点、人员、资金和条件，逐步建立起以产品为龙头的生产、加工、运销等多功能的服务体系；要从提供信息、原材料和推销产品等方面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要积极发展跨部门、跨地区的多形式、多层次的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多种流通方式。《意见》还对供销合作社内推行企业经营责任制以及组织原则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12 日　邓小平谈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指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能放弃，甚至于不可能放慢。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最近中央在考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

23 日　第六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技术合同法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共 7 章 55 条，包括总则、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合同争议的仲裁、诉讼及附则等内容，自 198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保护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本法首次对职务技术成果和非职务技术成果作了明确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是职务技术成果。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单位，不属于完成职务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职务技术成果的个人，应当根据使用、转让该项职务技术成果的收益得到相应的奖励，但不得就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转让职务技术成果。同时，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这项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这项技术成果的个人有权就该项非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转让自己的非职务技术成果，取得收益，单位应当尊重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得侵犯。

我国于 1983 年开始实行技术合同制，全国通过技术合同实现的技术净收入逐年增

加。由于对技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一些合法的技术交易没有受到充分的保护，而有少数人则利用技术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因此，制定技术合同法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进行的一项科技立法。

25日　国家开征建筑税

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建设投资结构，有利于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税暂行条例》。《条例》共12条，自7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使用国家预算外资金、地方机动财力、银行贷款（包括外汇贷款）、企业、事业单位的各种自有资金（包括主管部门集中调剂使用的资金）及其他自筹资金，进行自筹基本建设投资、技术改造项目中的建筑工程投资以及按规定不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建筑工程投资（以下简称自筹建设投资）的地方政府、机关团体、部队、国营企业事业单位、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都要缴纳建筑税。

29日　邓小平谈改革和开放要更勇敢一些

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同卡特的交谈中透露了中共十三大的准备情况。他说，党代会在政治上将重申1978年以来的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不但要继续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还要搞得更勇敢一些。

7　月

1日　国务院决定进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这次人口抽样调查以7月1日零时为准。总共25000个调查点散布在全国1018个县的6000多个乡。我国于1982年进行过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5年来，全国人口的数量、年龄构成、文化程度、行业、职业构成、地区分布、婚姻、生育状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从1986年开始，我国人口进入了新的生育高峰，查清各地区人口出生增长情况，对于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安排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完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根据1987年1月19日国务院批准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中所规定的“国家一般每10年进行一次重大国情国力（人口、工业、农业、建筑业、服务行业等）普查。在两次普查中间进行一次人口状况的简易普查，”国务院决定进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2日　邓小平谈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大一点

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谈到，几年来的发展情况表明，凡是搞改革、开放的地方都是成功的。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我们的发展就会更快一点。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5日　我国首次进行煤炭地下气化新技术试验获得成功

煤炭地下气化是国际上正在探索的煤炭开采新技术。由中国矿业学院和徐州市煤炭工业公司联合进行的这项试验地点选在徐州市马庄煤矿遗弃的无法开采的煤层上。煤炭

地下气化新技术试验成功，对我国煤炭工业发展的前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有利于改变“打井放炮”这一传统的采煤工艺，还可以更充分地开发利用煤炭资源。按目前的常规采煤工艺开采，地下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只有40%左右，而用地下气化新技术开采，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可达95%以上。

9日—11日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召开

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研究了以下几个政策性问题：（一）合理调整公房租金；（二）坚持多住房多拿钱原则和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减免补政策；（三）积极鼓励职工个人购买住房；（四）建立住房基金；（五）银行要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住房制度改革。

8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住房问题，是亿万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建国以来，国家为城镇居民建房投资了1760多亿元，建成了13亿多平方米住房。但是，城镇住房供需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明显缓和。实践说明，现行的住房制度解决不了城镇住房问题，必须坚决进行改革。《纪要》提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实现住房商品化，即将现在的实物分配逐步转变为货币分配，由住户通过商品交换购买或租用住房，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市场，实现住房资金投人产出的良性循环，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城镇住房问题的新路子。

9日—16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提出要努力完成收入任务和支出控制指标。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903.5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财政支出完成850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1%；收支相抵，收大于支53.5亿元。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对下半年的财政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一）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双增双节”措施，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潜力挖掘出来；（二）要努力完成收入任务和支出控制指标；（三）要认真解决收入流失问题；（四）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控制地方自筹基建投资和行政经费。

21日　我国第一条国产34MB数字微波电路开通

第一条具有80年代国际水平的国产34MB数字微波电路在广东正式开通。它标志着我国微波通信技术的新突破，打破了过去国内34MB数字微波设备全部依靠国外引进的被动局面。我国的数字微波通信技术起步于70年代。佛山—顺德—中山34MB数字微波通信工程是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在1986年底承包的。目前，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微波通信集团已具备了34MB数字微波通信系统成套设备的批量生产能力，技术日臻成熟，可以满足国内用户的需求。

31日　国务院对处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作出规定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规定》共5章34条，自1987年8月15日起施行。它就处理企业行政与职工之间因履行劳动合同和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个《规定》的施行有利于保护国营企业行政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8　月

1日　烟台市住房制度改革试行方案率先出台

烟台市以“提租发券，空转起步”为特征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行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开始试行。烟台是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第一个出台方案的试点城市。这一改革向住房商品化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烟台方案采取了鼓励居民买房的各种优惠政策、措施和办法，并着手建立市、企业和个人的住房基金制度，经批准成立烟台住房储蓄银行，组织社会闲散资金和住宅资金进行商品房建设和经营，推动和加快了住房商品化的步伐。

4日　国家计委印发国土规划编制办法

国家计委印发《关于国土规划编制办法的通知》，正式将国土规划工作纳入计划工作序列，作为编制中、长期计划的重要依据。《办法》共18条，明确国土规划是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的战略方向和目标以及规划区的自然、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条件，按规定程序制定的全国的或一定地区范围内的国土开发整治方案。编制国土规划要遵循的原则是：(1) 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使规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2)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从全局利益出发，处理好部门之间、地区之间、部门和地区之间以及区内区外的关系，兼顾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3)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根据规划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技术等条件和特点及其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的优势。(4) 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相结合。(5) 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

5日　国务院对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作出规定

国务院发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共28条，自1987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个体工商户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这是一个城乡统一的、比较完整的个体工商户管理法规。

近年来，我国个体工商业发展的步子是快的，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到1987年6月底，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1228万户、从业人员1880万人；在社会商业、服务业网点中，个体户占82.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个体占13.2%，个体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安排城镇待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力，扩大劳动就业方面，个体经济作出了贡献，有助于社会的安定。《条例》的制定将保障和促进个体经济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10日　我国首次为国外公司提供卫星搭载服务

我国在四川省中部预定地区又回收了一颗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这颗卫星是8月5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发射的。卫星按计划在轨道上运行了5天，开展科学探测，并首次进行了微重力下的技术试验。这颗卫星装有法国马特拉公司的两个微重力试验装置，这是我国第一次为国外公司提供卫星搭载服务。这次试验

的装置全部是由我国的科技人员用国产材料研制成功的。我国首次利用返回式卫星进行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材料加工技术试验，全部取得地面试验无法得到的理想结果。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跨越了常规试验阶段，在独立开展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资源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5日　农牧渔业部等提出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意见

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国家机械委、水电部、林业部《关于当前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因地制宜，有选择地发展农业机械化。四部委的《报告》认为，今后十年内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需要采取如下主要措施：(1) 分类指导，重点突破；(2) 扶持和加强农机工作；(3) 机电排灌设施应当结合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修复，更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排灌能力；(4) 大力发展林业机械，抓好造林、育林、种子采集加工、森林保护、木材生产和加工机械的研制、推广；(5) 推广农机化新技术；(6) 管好用好农业机械，改善技术状态；(7) 增强农村农机化技术力量；(8) 加强县级农机化服务组织建设，做好乡村农机化服务网络的统筹规划和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协调工作；(9) 加强对农业机械化的领导，发挥农机化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

19日　国务院要求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物价管理

针对经济活动中违法行为显著增加的状况，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物价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强对市场和物价的监督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制止乱涨价，保护人民利益。通知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 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的管理。(二) 坚决取缔无照经营，对现有的无照商贩立即进行全面清理。(三) 加强对国营和集体工商业的管理。(四) 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由买卖双方协商议价。(五) 加强对价格的监督检查。(六) 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好商品生产，安排好市场供应。

25日　国家计委等对加强自筹基本建设资金管理作出规定

自筹基本建设资金不落实和来源不正当是基本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对自筹基本建设资金的管理，严肃财经纪律，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证重点建设顺利进行，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审计署、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筹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的规定》。《规定》包括四个方面内容：(1) 对自筹基本建设资金来源的规定。(2) 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自筹基本建设资金必须经财政部门审查，专户存入建设银行，坚持先存后批，先批后用的原则，存足半年再用。(3) 加强审计机关对自筹基本建设投资的审计和再监督职能。(4) 加强计划管理。

27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债统计监测作出规定

为了准确、及时、全面地集中全国的外债信息，有效控制对外借款规模，提高利用国外资金的效益，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根据该规定，我国对外债实行登记管理制度。

29日　邓小平谈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指出，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

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重申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31日 国家体改委等提出推进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六条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体改委、劳动人事部《关于推进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16个中等城市的机构改革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中等城市的专业主管部门撤销后，有些上级部门仍然按老系统、用老办法对口开展工作，致使上下左右衔接的渠道不够通畅，有的地方出现空当；职能转变仍然是改革的薄弱环节，部门间的职责权限尚未划清，相互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城市的党政如何分开，机构如何设置，干部制度如何改革等重要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

为使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工作深入健康发展，国家体改委，劳动人事部提出了六点意见：（一）加强和充实经济综合、调节和监督部门，建立和健全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有效管理的新体系。（二）在精简的基础上进行人员的结构调整。专业主管部门从事统计、财务、物价、审计、劳动工资等工作的人员，可随职能转变而转移到相关的综合部门。（三）积极探索行业管理的路子。撤销专业主管局（公司）后，各行业（科）的职能转变仍然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四）在实行市、区配套改革中，要划清市、区的职责权限。（五）试点市的机构设置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求上下对口。（六）研究建立机构管理和人员编制的自我约束机制。

9 月

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共6章41条，包括总则，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治烟尘污染、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法律责任，附则，自1988年6月1日起施行。

11日 国务院发布价格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共7章39条。《条例》规定，国家对价格管理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控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条例》对价格的制定和管理及价格管理职责的分工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企业在价格方面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它标志着我国价格管理和监督检查纳入了法治的轨道。

这一条例是在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基础上修改制订的。新颁布的条例比原来的暂行条例增加了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了国家现行的三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二是各级物价部门的任务增加了开展信息服务和加强协调、指导等职能。三是增添了“企业的价格权利与义务”，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四是强化价格监督检查，发动群众监督检查价格。

全国确立1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

中共中央今年1月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了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的精神，经各地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共同商定，并报国务院备案，先后确定了14个改革试验区：安徽省阜阳地区，黑龙江省尚志县、苇河林业局、绥滨农场，河北省玉田县，陕西省礼泉县，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湄潭县，广东省南海县，江苏省吴县、无锡县、常熟市，浙江省温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从各试验区的内容看，有的是进行综合性试验，有的进行的是某一方面的专项试验，涉及到乡镇企业制度建设、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土地规模经营与现代化建设、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完善、土地承包管理制度建设、国营农场和林业局体制改革等许多方面。

12日　国务院修订发布进出口关税条例

国务院修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共8章38条。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就进出口关税总则、税率的运用、完税价格的审定、税款的缴纳和退补、关税的减免及审批程序、申诉程序、罚则、附则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15日　国务院发布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条例共有6章35条，就电力设施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区、电力设施的保护、对电力设施与其他设施互相妨碍的处理，以及奖励与惩罚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个《条例》的实施，有利于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公共安全。

16日　全国首次进行投入产出调查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宏观管理水平，国务院办公厅于3月底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了《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决定今后每五年进行一次投入产出调查，并编制出全国投入产出调查表。通知要求各有关方面重视此项调查，确保1987年全国的投入产出调查表于1988年底以前完成编制工作。为加强对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的领导，经国务院同意，成立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协调小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任副组长，日常工作由国家统计局负责。5月11日，国务院投入产出调查协调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在石家庄市召开的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工作会议上，确立了《中国1987年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案》。这个编制方案，从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出发，吸收了国际上东西方两种核算体系的长处，规模宏大，涉及118个部门，其中物质生产部门101个，非物质生产部门17个，涉及上百万人参加。

22日—29日　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安排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在会上提出，1988年中国要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信贷、财政和物价采取收紧的政策，加强管理，同时努力增产增收，以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会议明确1988年我国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化，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有成效地发展。

25日　沈阳油田建成投产

辽河石油勘探局沈阳油田建成投产，形成年产2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成为我国最大的高凝油开采基地。沈阳油田位于沈阳市区西北，盆地构造面积800平方公里，总储量达2亿吨，每平方公里储油量居全国之首。国家投入10亿元开发建设沈阳油田。170口油井日产原油5200吨。

26日　国务院批准外贸体制改革方案

国务院同意并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1988年外贸体制改革方案》。1988年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部分行业进行试点，为完全自负盈亏摸索经验，在其他行业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现行的各项行之有效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要继续执行，并加以完善；进一步推行进口代理作价；围绕搞活外贸企业进行政策调整，积极筹备并逐步试行新的经济调节体系，为今后实行完全的企业化经营打下基础。具体内容包括：（一）实行出口退税，改革外汇留成办法，进行出口体制改革试点。（二）改革出口经营计划体制，积极发展工贸联营。（三）实行进口代理作价办法，改革进口体制。（四）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

29日　龙羊峡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龙羊峡水电站主体工程初具规模，第一台发电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并网发电。龙羊峡水电站位于黄河上游、青海省共和县与贵南县交界处的龙羊峡谷入口处。它以万里黄河第一坝、国内水库最大库容和水轮发电单机最大容量而为国内外瞩目。电站1976年开始动工，最大坝高178米，总库容量268亿立方米，电站装机4台，总容量128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60亿度。1986年10月15日下闸蓄水。

10　月

6日　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

我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举行开馆典礼。这座亚洲最大图书馆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化过渡。新馆建筑规模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居世界第二位。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1912年的京师图书馆。1931年，在北海西侧建成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改名为北京图书馆，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

10日　国家计委等对改革国营施工企业经营机制作出规定

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发布《关于改革国营施工企业经营机制的若干规定》，以促进企业尽快建立起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经营机制。《规定》要求国营施工企业从1988年1月1日起，实行上交所得税或上缴利润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实行计划利润制，废除法定利润制。施工企业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可以组织混合工种的小分队、专业承包队和由现在的施工队进行集体承包。按合同期提前竣工投产的，可将提前投产期间所得利润的60%分给施工企业；拖欠工期造成的损失，由施工企业补偿。《规定》还强调，今后一般不再组建新的国营施工企业，个别需要组建的，要经基建主管部门批准。

15 日　国家计委等对建设用地计划管理作出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共 17 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编制建设用地计划，建立土地计划管理制度，是我国计划管理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该办法对搞好建设用地计划管理，综合协调、统筹安排各种用地需求，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制止乱占滥用土地具有重要意义。

17 日　财政部等对科研单位建立三项基金作出规定

为进一步引导和促进技术开发类型科研单位加快减拨科学事业费的步伐，引导和促进其他类型中那些可以实行技术商品化的科研单位向技术开发型转化，加速科技拨款制度改革的进程，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的精神，财政部和国家各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科研单位建立三项基金的规定》。《规定》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实行奖励基金、福利基金的提取比例与减拨科学事业费幅度挂钩的办法，不同类型的科研单位，可从其纳税后的纯收入中，按下列比例提取三项基金：（一）未减拨科学事业费的科研单位，其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可分别按 20% 提取，事业发展基金按 60% 提取。（二）已减拨科学事业费的科研单位，其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均在 20% 的基础上，每减拨科学事业费 10%，福利基金可增提 0.5%，奖励基金可增提 1%，其余为事业发展基金。（三）基础研究类型的科研单位，科学事业费中的研究经费已转入自然科学基金的，应视其转入比例的多少；社会公益事业研究类型的科研单位，将纯收入抵顶科学事业费拨款的，应视其抵顶比例的多少，按上述规定比例提取三项基金。《规定》还指出：科研单位按国家规定进行工资改革，自费增资部分，可从列入科学事业费或有关的收入中列支。科研单位自行改革的，其增资部分，应从单位提取的奖励基金中开支。不足人均一个月基本工资金额的科研单位，可以用事业发展基金或经费包干结余予以补充，但两者相加最高不得超出一个月基本工资金额。

国务院成立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

为加强汽车工业的配套改革，更有效地协调与汽车相关工业的发展，对汽车工业及时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国务院成立“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由国务院、国家机械委、中汽联的主要领导组成，是负责发展汽车工业的宏观决策和协调机构。至此，中国汽车工业领导体制已基本理顺。汽车工业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由企业、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国务院协调小组三个层次构成的新体制。

汽车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经过了三步。下放企业，迈出了改革汽车工业管理体制的第一步，主要标志是一汽、二汽脱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实行计划单列。1987 年 6 月，国务院决定撤销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组建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这是汽车工业管理体制的第二步重大改革。“中汽联”执行行业管理职能，统筹安排汽车及零部件的生产定点和协作配套，使企业和原“政府机构”完全脱钩。成立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是汽车工业管理体制的又一步重大改革。

19 日　我国首次研制成功气象火箭

经过数百名科技人员 10 年艰苦奋战，被命名为“织女一1 号”的高空气象火箭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它作为原位探测 30 至 200 公里空间大气的唯一手段，填补了

我国高空气象探测的空白。它的研制成功，不仅奠定了我国小型火箭发展的基础，填补了我国高空气象探测的空白，而且将以大量的高空大气探测资料为中长期气象预报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25日　中共十三大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党的十三大报告，报告的核心是提出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报告从对我国历史的回顾，对当前情况的认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分析，对国际环境的比较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精辟的论证，科学地阐述了我们在这一阶段的任务、路线、战略、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十三大报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三大报告指出，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部署，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现在，最重要的是走好第二步。实现了第二步任务，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取得新的巨大进展：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位次明显上升。工业主要领域在技术方面大体接近经济发达国家70年代或80年代初的水平，农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将有较大提高。城镇和绝大部分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人民群众将能过上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

27日　国家计委等对天然气商品量管理作出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石油部颁发《关于天然气商品量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共7章36条，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包括总则、天然气商品量的分配和管理、天然气的输送管理、商品气供应合同管理、商品气的气质、计量、计价和结算管理、违章、附则。

31日　人民银行规范企业股票债券管理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强股票、债券管理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股票、债券的管理，保证金融市场健康迅速地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有关企业股票、债券以及其他金融市场业务管理问题

的通知》。《通知》要求：人民银行在审批企业发行股票、债券时，要严格掌握股票债券规范化的原则，股票不能还本，债券不能参加分红，股票、债券持有人应根据两种证券的不同性质享有不同的权益，承担各自的风险。债券一般不能搞有奖。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票面格式应经人民银行批准，并向人民银行提供样张备案。企业的所有有偿社会集资，均应采取股票债券的形式。目前，国营企业除经国家体改委批准进行股份制试点和以相互参股方式进行横向联合外，不能发行股票，集体企业不能发行债券，少数经济效益较好的集体企业经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发行股票。人民银行对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实行统一管理、分级审批。一个企业一次发行额在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由人民银行总行审批；3000万元以下的，由人民银行省分行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自行规定审批权限，并报总行备案。企业股票、债券的转让，须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其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发行的股票、债券的转让，应报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经营企业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转让业务的机构，目前仅限于独立核算的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个人和其他机构不得经营此项业务。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此项业务，应经同级人民银行审批。全国性信托投资公司经营此项业务。应经人民银行总行审批。同业拆借市场仅限于各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参加，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参加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拆借活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每月日平均拆进余额不得超过其自有资本金总额的一倍，即每月日平均拆进余额和其自有资本金的最高比率为2:1。任何金融机构，其拆进资金只能用于解决短期资金不足的问题，拆借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四个月。

11　月

2日　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发出《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加强和改善计划管理的一项改革措施。这一改革标志着国家对商品房屋建设实行宏观控制，并在投资、开发、经营等方面加强指导性管理。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以后，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开发公司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凡由开发公司综合开发、建成后出售的住宅、商业用房以及其他建筑物，都属于商品房屋范围。商品房屋建设资金可以用开发公司自有资金，发放住宅建设债券，向银行申请贷款以及预收一定数额的购房款等方式解决。商品房屋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如征地、搬迁、安置劳动力等均由各地政府部门负责。

5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坚决制止抬价抢购农副产品

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关于坚决制止抬价抢购农副产品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些国营、集体企业、单位盲目抬价抢购紧缺的农副产品，特别是在一些主产区收购旺季情况较为严重。抬价抢购扰乱市场，扭曲市场信号，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通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继续深化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二）进一步完善农副产品的管

理办法。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工业原料、出口物资和需要保护资源的品种，如粮、棉、油、烟、茧、麻、糖料、少数重要中药材等，实行合同定购和国家定购。其他农副产品坚持放开搞活，实行自由购销，开展多渠道流通。（三）切实加强对农副产品价格的监督检查。（四）重点要管严管住国营企业。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对国营企业执行国家政策规定的监督检查。（五）加强农副产品市场的领导和协调。

14日　国务院决定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

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全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经过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已经初步完成了从单纯救济向经济开发的根本转变，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工作发展不平衡，扶贫没有完全落实到户，解决温饱不够稳定。一是空喊三年五年解决温饱，没有扶贫到户的具体规划和措施；二是要求过高过急，脱离了现实财力、物力的可能；三是不论贫富一起扶持，不利于集中力量解决贫困户的温饱问题。为此，《通知》提出了十项具体的扶贫措施：（一）明确工作重点，扶贫落实到户；（二）发展商品经济，强化社会服务体系；（三）因地制宜，兴办乡村扶贫经济实体；（四）扶贫项目要公开招标，实行承包开发；（五）资金要按使用效益分配；（六）功夫要花在项目的准备和管理上；（七）把智力开发摆到重要的位置；（八）把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开发的支柱；（九）贫困县要把带领群众解决温饱、脱贫致富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十）国家机关各部门要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做出更大贡献。

28日　国务院要求做好粮食工作

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粮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做好粮食工作，保证各方面对粮食的基本需要，对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顺利发展关系极大。《通知》主要内容有：（一）认真做好秋粮收购工作。进一步做好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物资的兑现工作，把该供应的化肥、柴油如数供应给农民。为了保护农民生产粮油的积极性，粮食部门在完成合同定购任务之后，要积极议购，价格随行就市，略低于市价，并组织好议销。（二）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稳定粮食价格。（三）坚持粮食购、销、调拨和财务包干。1988年至1990年度，中央继续对地方实行粮食购、销、调拨和财务包干，一包三年。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认为一包三年暂有困难，也可以按1987年度的包干指标再执行一年。1988年度食油购、销、调拨计划仍按1987年度计划执行，并继续实行按规定的比例价敞开收购办法。（四）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在粮食流通上，现行的粮食购销“双轨制”政策要长期实行。

12　月

1日　我国首次以“拍卖”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

深圳市政府决定以“拍卖”的形式出让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在深圳市深圳会堂举行。这是我国首次有限期、有偿地以“拍卖”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也是我国首次允许

土地进入流通。这次“拍卖”活动，将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创了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先例，从而在深圳形成地产市场。

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从特区建立的 1980 年就开始了。当时仍沿用行政划拨的办法分配土地，改进之处在于企业用地收取土地使用费。但是，由于所收取的土地使用费十分低廉，市政府实际上得不偿失。据统计，从 1980 年到 1986 年，市政府共只收取土地使用费 3848 万元，而在同一时期，市政府为这些土地支付的市政建设投资贷款就有 6 亿多元，所收取的土地使用费连偿还贷款利息都不够，形成了市政建设投资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深圳市各开发公司，却从土地开发中赚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据抽样调查，按照建筑容积的不同，商品住宅的建筑容积为 1 比 1 时，开发公司可从每平方米用地获得超额利润 118 元；1 比 2 时，则为 368 元。而市政府对每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只收取 5 元到 9 元的土地使用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为了合理地利用越来越少的未开发土地，今年 9 月和 10 月，深圳市政府尝试用议标和招标的形式，有偿地转让了两块土地的使用权。这是深圳市政府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10 日　京津塘高速公路举行开工典礼

京津塘高速公路开工典礼在大兴县举行。京津塘公路是我国“七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通过国际竞争性招标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16 日　国家体改委等决定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

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印发《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意见》包括 18 条内容，对企业集团的含义、组建企业集团的原则、组建企业集团的条件、企业集团的内部管理及企业集团发展的外部条件作了具体规定。

21 日　国务院批准征收电力建设资金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征收电力建设资金的暂行规定》，共 13 条，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到 1995 年 12 月 31 日止。《规定》明确，为了解决全国严重缺电和电力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征收电力建设资金，作为地方电力基本建设的专项资金。电力建设资金在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征收。对所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用电，原则上均征收电力建设资金。电力建设资金征收标准为每度用电量二分钱，由用户随电费缴纳。电力建设资金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组织征收，其下属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不得重复征收。《规定》要求电力建设资金必须单立账户，专款专用。其有关电源建设规划和布局由水电部统一负责。“七五”后三年，电力建设资金首先要用于已列入国家计划的大中型电力项目建设，弥补国家计划安排项目的投资缺口。使用电力建设资金建设的项目，产权按该项资金所占电站（含配套送出工程）总投资的比例，归地方所有，并按此比例分电分利。电力建设资金实行有偿使用，其利率、还贷期限按国家“拨改贷”办法执行。

23 日　北京国际电信局开通

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北京国际电信局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开通使用。北京国际电信局是目前国内现代化的国际电话和用户电话专用出入口局，开通后直拨电话可通往业

务繁忙的日本、香港、美国、意大利、法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经转的半自动电话可通达世界各地；国际用户电报可直接通达30个国家和地区。

28日　成渝铁路全线电气化

成渝铁路电气化工程全线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成渝铁路西起成都，东至重庆，全长505公里，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由于当时的修建标准低，运能满足不了运量发展的需要，通车20多年经过多次技术改造，年运输能力由初期的300万吨提高到610万吨。进入70年代后，全线运输能力已趋饱和，迫使大批生产企业"以运定产"，成为制约四川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为解决客货运输困难，促进西南经济建设，1980年3月成渝铁路电气化主体工程正式开工，1984年国家计委将它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并先后分段建成通车。成渝铁路实现电气化以后，年运输能力由过去的610万吨提高到1300万吨，等于新修了一条成渝铁路。

31日　1987年国民经济概况

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10920亿元，比上年增长9.4%。国民收入9153亿元，比上年增长9.3%。

工业生产均衡增长。1987年工业总产值13780亿元，比上年增长16.5%；不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为11820亿元，增长14.6%。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11%，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25%，个体工业增长48%，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增长98%。工业生产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均衡增长，轻重工业协调发展。1987年轻工业总产值6560。亿元，比上年增长16.8%；重工业总产值7220亿元，增长16%。特别是过去比较薄弱的电力和支农工业有明显增长。

农业增产。农业总产值达4447亿元，比上年增长4.7%。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非农业产值达4594亿元，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食总产量40241万吨，比上年增产1090万吨，接近历史最高的1984年。棉花、油料生产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茶叶、烤烟、蚕茧、水果增产，糖料和黄红麻减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趋缓。198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518亿元，比上年增加498亿元，增长16.5%，低于上年增长18.7%的速度；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2262亿元，增长14.4%；集体所有制单位480亿元，增长22.4%；个人投资776亿元，增长19.6%。但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计划外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过多。

经济效益有所改善。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的利税比上年增长9.9%；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7.6%；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缩短3.7天。但产品成本超支，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上升4.6%。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实现利润增长6.4%，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缩短17天。

国内市场旺中偏紧。198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7.6%；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705亿元，增长22.4%；消费品零售额5115亿元，增长16.9%。由于有些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铺张浪费、公费请客旅游之风屡禁不止，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过猛，全年售予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达553亿元，比上年增长19.7%。由于购买力旺盛，一些副食品

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生产供应相对不足。部分大中城市对猪肉、食糖等陆续恢复了限量供应。但这种限量只是保证一定数量的平价供应，如果用议价和市价仍可随时买到所需的食品等。

对外经济贸易继续发展，国际收支状况明显改善。1987 年进出口总额达 82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2%；其中出口总额 395 亿美元，增长 27.8%；进口总额 432 亿美元，上升 0.7%。进出口逆差由上年的 120 亿美元缩小到 37 亿美元。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有所改善。在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的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相应上升，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特别是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大幅度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减缓，大多数居民消费水平和储蓄仍有提高。1987 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 1866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6 亿元，增长 12.4%。据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去年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 916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 1.7%。农民平均每人收入 463 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5.3%。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每人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 4.3%。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超过 3000 亿元。

1987 年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仍然大于社会总供给；市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部分商品特别是主要副食品供应偏紧；城镇中部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1987 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新开工国家重点项目

国家计委下达 1987 年第二批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新开工国家重点项目，共 18 项。部委项目 17 项

电力（4 项）　山西神头二电厂、浙江镇海电厂三期、山东邹县电厂二期、安徽洛河至于圩至繁昌输电线路。

铁道（1 项）　商阜线

邮电（1 项）　京沪数字微波工程

民航（1 项）　陕西咸阳机场

有色（1 项）　河南焦作中州铝厂

化工（2 项）　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均磷铵）

石化（1 项）　上海三十万吨乙烯一期工程

建材（2 项）　山东滕县鲁南水泥厂　陕西耀县水泥厂

军工（1 项）　十号工程

科学（1 项）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卫生（1 项）　北京协和医院（增床位）

银行（1项）　河北保定造纸厂

地方项目1项　化工（1项）　河南中原天然气化肥厂

1988年

1　月

2日　国务院批准广东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

经国务院同意，广东省进一步扩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范围，把沿海开放城市汕头市、湛江市以及茂名市和惠江地区的部分市、县列入经济开发区范围，享受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

3日　国家完善粮食合同定购“三挂钩”政策

1987年国家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同供应平价化肥、柴油及发放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售粮的积极性。但是，不少地方反映办法复杂，少数地方存在截留、克扣和挪用挂钩物资、预购定金问题，农民意见较大。为此，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三挂钩”政策的通知》，决定1988年度继续实行“三挂钩”政策，并对具体办法进行了改革、完善。1988年度，中央按照分配的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和规定的挂钩标准，将化肥、柴油和预购定金下拨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干使用。1988年度中央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仍按500亿公斤不变。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的化肥和柴油，中央安排的部分，仍按上年的标准不变。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增加机动数所需的化肥由中央解决，所需柴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筹解决。供应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的化肥和柴油，仍按1987年的价格执行，仍采取分期分批供应办法。预购定金按合同定购粮食价款总数的20%发放，在农民交粮时扣还，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

国务院要求按自筹投资一定比例购买重点企业债券

1987年国家实行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代理电力等部门发行重点企业债券办法，对调整投资结构，适当集中资金加强国家重点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为切实做好重点企业债券的发行工作，国务院下发《关于按自筹投资一定比例购买重点企业债券的通知》，确定1988年国家继续发行重点企业债券，由各专业银行代理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发行，要求各部门、地方、单位均按当年自筹投资的一定比例认购。

自筹投资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更新改造方面的新建、扩建工程，以及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用自有资金安排的建筑工程，均按自筹投资额的15%认购重点企业债券。自筹投资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超过国家计划的那部分投资，按30%认购重点企业债券。

地方用自筹投资承担中央转给地方的建设项目（中央与地方合资项目，原由地方安

排该项目的自筹投资仍需购买)，用自筹投资安排的煤炭矿井及洗煤厂、电站及输变电、矿山、黄金勘探开采、水利工程和农业商品基地、中外合资项目的国内直接配套工程，以及学校、医院的建设以及企业在国家更新改造计划内用自有资金进行的技术改造和改建工程，以及与这些工程相配套的生活福利设施（超过国家更新改造计划的那部分，应按自筹资金额的15%认购）免购重点企业债券。

重点企业债券筹集的资金，要用于当年投产或将要投产、有偿还能力的项目。

实行自筹投资购买重点企业债券的办法后，国家原征收建筑税的规定不变。

5日　国务院批准扩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

经国务院同意，广东省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范围从原来的"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变为"大三角"以后，范围扩大至28个县、市。同时，把茂名市列为省辖市，汕头、江门、茂名、湛江市和惠阳地区沿海的18个县、市、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享受中央和省政府有关规定的优惠待遇。根据中央关于开辟经济开放区应由小到大，先"小三角"，后"大三角"，以点带面的精神，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点"，除中央已明确规定的佛山、江门和中山市的市区和按"贸工农"安排生产、发展出口的13个重点县的城关区之外，省政府又批准小榄镇等59个镇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第一批重点工业卫星镇，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1日—6日　李鹏考察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代总理李鹏考察广东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与当地干部和企业负责人一起研究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他希望大家重视国际经济动态，使经济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力求取得更大的发展。李鹏在深圳大亚湾察看了正在施工中的广东核电站。先后参观了科技开发（蛇口）有限公司、新光奶品饮料公司、吉光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听取了深圳市经济发展情况汇报，在东莞市参观了发展水果生产成绩较大的附城区年丰山庄果园、大岭镇外贸出口水果基地，访问了一些农户，还考察了东英电脑织唛刺绣有限公司等合资企业。在佛山、南海参观了一些外向型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等陪同考察。

6日　北仑港电厂破土动工

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浙江北仑港发电厂破土动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参加开工仪式。火力发电的北仑港电厂位于深水良港北仑港南岸，设计总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是当时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之一，被称为"展望中的南方火力发电基地"。北仑港电厂第一期工程包括2台单机容量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以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3.5万吨运煤码头、专用淡水库等配套工程，总投资约20亿元。第一台机组1990年7月投产发电。整个一期工程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8亿度。

7日　冶金企业联合开发建设我国第一个长江冶金大走廊

武钢、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等10多家大中型冶金企业组成经济联合体，携手共同开发建设我国第一个长江冶金大走廊。长江冶金走廊，主要指江城武汉至新兴工业城市黄石，靠长江南岸一线的143公里。建国以来，国家在这一线相继兴建了我国第二个钢铁

基地——武汉钢铁公司、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鄂城钢铁厂、大冶钢厂等10多个大中型冶金企业、矿山20多座。长江冶金走廊探明铁矿储量达6亿多吨，含铁量达46%以上，钢、铁生产能力达550万吨。

8日　国家对建设工程实施全过程造价控制

为了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建立健全投资主管单位、建设、设计、施工等各有关单位的全过程造价控制责任制，合理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方案和建设标准，国家计委下发《关于控制建设工程造价的若干规定》。《规定》明确，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应对总造价起控制作用。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投资估算是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设计任务书一经批准，其投资估算应作为工程造价的最高限额，不得任意突破。各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定，结合专业特点，对投资估算的准确度、设计任务书的深度和投资估算的编制办法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必须加强工程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积极推行限额设计。投资主管单位、建设单位必须对造价控制负责，加强对工程造价的管理和监督。

11日　国务院规定对重要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实行统一管理

为了加强对重要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的管理，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制定并发布《重要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明确，石油、石化、铁道、民航、电力、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等垄断企业或垄断性行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主要收费标准，由国家物价局统一管理、制定和调整。关系重大的要报经国务院批准。生产企业必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中规定的品种、数量生产，并按时调拨供应，严格履行经济合同，执行国家规定价格。企业只有在完成指令性计划、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才允许自销按规定留成和超产的产品。不准截留或变相截留计划内产品转计划外高价出售。

实行国家指导性计划的产品，凡国家基本上供应主要原材料的，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未供应主要原材料、执行国家定价确有困难的，应按物价管理权限的规定，经过批准，其价格可在一定的幅度内浮动。物资经营单位对计划内外生产资料品种规格的串换，需报经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批准。进入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成交的重要生产资料，其价格都要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凡国家规定有统一最高限价的，不得超过统一最高限价；国家没有规定统一最高限价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部门根据不同产品的供求情况，适时制定本地区最高限价。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企业都不准突破最高限价，也不准以任何名义在限价之外加价或收取费用。

国家禁止企业、行业垄断市场价格。凡是凭借垄断地位违反国家规定，哄抬市场价格，牟取暴利的，企业之间或者行业协会、联合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串通商定垄断价格的，均属违法行为，必须严格查处。

说明　主要内容与1990年9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1995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1995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199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不相适应。

国务院对计划外生产资料实行全国统一最高限价

为了加强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的指导和管理，制止乱涨价、乱收费，国务院制定并发布《计划外生产资料实行全国统一最高限价暂行管理办法》。实行全国统一最高限价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当前价格既高又乱、供求矛盾突出的能源、原材料和重要的加工产品。全国统一最高限价的水平，原则上按略低于现行市场调节价水平制定。全国统一最高限价分为最高出厂限价和最高销售限价。实行全国统一最高限价的生产资料，任何部门、企业都不得在最高限价基础上再加价。低于最高限价销售的不受限制。计划外原油最高出厂限价按计划内高价原油出厂价格执行。计划外高价汽油、煤油、柴油，省会和炼油厂所在地 48 个市场的最高批发限价及石油公司一级站的最高调拨限价，由国家物价局和石化总公司统一规定。其他市场限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局参照中央统一定价市场的最高限价加合理地区差价制定。最高零售限价按当地最高批发限价加批零差率确定，汽油、柴油批零差率 8%，煤油 8%—10%。

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扩建工程举行奠基典礼

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引进建设项目——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扩建工程举行奠基典礼。此项工程 1990 年年底竣工。投产后，该厂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彩管生产基地。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 1982 年 12 月投产，5 年多来，已生产“彩虹牌”彩管 500 多万只。不仅荣获国家金质奖，而且打入国际市场。已上缴利税 5 亿多元，1988 年 6 月底收回建厂全部投资。这项扩建工程，由电子工业部统一对外谈判，择优选择引进对象，总投资达 7.5 亿元，是当时我国电子系统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

13 日　国家工商局颁布商标法实施细则

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布经国务院批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共 7 章 50 条，对商标注册的申请、审查、变更、转让、续展、争议裁定、商标使用的管理、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等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4 日　国家计委调整大中型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议书编制和审批办法

根据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的《新国家计划委员会“三定”方案》，国家计委着重抓好对国民经济的高层次的宏观管理，尽量避免与各专业部门职能的重复与交叉。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立项的大量具体工作由行业归口管理部门承担，并由行业归口部门提出立项初审意见，再由计委综合平衡后审批。据此，国家计委对大中型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和审批问题发出通知，提出以下意见：

所有部门、地方、投资公司、企业编制的大中型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议书，必须首先报行业归口主管部门，同时抄送国家计委。行业归口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中长期规划的要求，着重从资金来源、建设布局、资源合理利用、经济合理性、技术政策等方面进行初审，并通过部际协调会协调有关能源、原材料、运输等外部条件后报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再从建设总规模、生产力总体布局、资源优化配置以及资金供应可能、外部协作条件等方面进行综合平衡后审批。凡行业归口主管部门初审未通过的项目，国家计委不予审批立项。

部门、地方、投资公司、企业编制的大中型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议书，

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内容和深度要求。不符合要求的，行业归口主管部门有权拒绝受理。凡未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初审和外部条件不落实的项目，国家计委不予受理。

19日　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

以石家庄市造纸厂为龙头的"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石家庄市宣告成立。来自北京、甘肃、山西、山东、黑龙江等11个省市的28家造纸厂厂长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小型造纸厂组成的企业集团。造纸企业集团坚持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集体承包的形式发展成员厂家。集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各成员厂实行厂长负责制。马胜利被推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集体承包的法人代表。对各成员厂家，由集团同当地政府协商，委托代理法人。集团采取总经理向各地政府直接承包微利、亏损中小企业的方法，包进来，包下去，层层承包，逐步扩大。

2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惩治贪污罪贿赂罪作出补充规定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由国家主席签署命令发布。《补充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贪污罪以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务的行贿罪的量刑及处罚作出了明确规定。

2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水法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该法所称水资源，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该法明确，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该法提出，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总方针是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国家保护水资源，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然植被，种树种草，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水污染防治的规定，加强对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国家实行计划用水，厉行节约用水。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该法分别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水域和水工程的保护、用水管理、防洪与抗洪、法律责任等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条文，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

23日　赵紫阳谈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人民日报》发表《赵紫阳纵谈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1987年底和1988年初，赵紫阳三次视察沿海地区，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提出了意见。概括起来是：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我们要抓紧利用这个机遇，确定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沿海地区1亿多到2亿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要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看待。要实现这个发展战略，需要把握住几个要点：首先，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沿海加工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赵紫阳以上有关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得到党中央批准和国务院同意。同年3月15日，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最近政治局提出的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不只是地区性战略，而且是全国性战略。他还转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大胆地放，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25日　国家经委印发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为逐步实现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决策科学化，提高投资效益，国家经委委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提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经国家经委同意印发项目评估参考。《方法》对工业技术改造项目的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综合评价等提供了具体的指标和计算方法。

陕甘宁盐（池）环（县）定（边）扬黄工程动工

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我国西北新建一座大型扬水工程——陕甘宁盐环定扬黄工程。这项扬水工程总投资约1.69亿元，计划建24座扬水泵站，修100多公里总干渠，从青铜峡水利枢纽引黄河水至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同心县、甘肃省的环县、陕西省的定边县，以解决这几个县部分地区约27万人、80万家畜的饮水问题，同时可扩大灌溉面积30万亩。工程工期为5—6年。盐池、同心、环县、定边等县原属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根据地，大型扬水工程的修建对老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将带来积极影响。

28日　国家首次大规模发放扶贫专项贴息贷款

到1987年年底，中国农业银行已发放由中央财政贴息的扶贫专项贷款14亿元，共扶持贫困户482万多户，其中约有180万户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样大规模地发放专门用于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专项贷款，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一专项贷款是国务院为帮助贫困地区通过开发经济，尽快解决温饱问题而于1986年决定设立的。贷款发放围绕经济开发，用于投资少、见效快的生产项目，如种养业、加工业，还有一部分用于支持乡镇企业生产。据统计，扶贫专项贴息贷款1987年支持各种扶贫经济实体6937个，安排贫困户劳力23.4万多人，扶贫效果普遍较好。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农业银行联合，先后两次对这项贷款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到1987年底，贷款支持的9万多个项目，约新增产值14.9亿元，实现利润近8亿元。

31日　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动工

由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与上海市政府联合投资的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是国内首次建设的超临界发电机组，主要设备从瑞士引进。双方采取共同设计、制造的合作形式，瑞士方面提供先进技术和政府低息贷款。建成后的石洞口第二电厂将是我国最先进的大型火力发电厂，每天可发电2500万度，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两台60万千瓦机组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投产，对缓和上海地区供电紧张矛盾将起到重要作用。

2 月

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会讨论经济形势

会议认为，1987 年全国的生产、建设、流通和外贸情况都比预料的好，经济体制改革有较大的进展。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又较为正常健康，效益比较好，企业活力明显增强，宏观控制有新的进步，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某些不稳定因素正在趋于缓解。1987 年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物价问题的焦点是食品涨价。会议强调指出，1988 年的经济工作，要全面理解和正确掌握进一步稳定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以改革总揽全局。最近提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将把我国沿海开放地带推到国际市场上去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而且从根本上说，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必须坚决组织实施，决不能贻误时机。为此，必须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要大力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之配套、完善、深化和发展，发挥更大的效益。要采取坚决措施，严厉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以节约财政支出，缓和市场压力，改变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会议。

11 日 国家批准建设天津无缝钢管总厂工程

建国以来天津最大的工业项目——天津无缝钢管总厂经国家批准建设。天津与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的三家公司在津正式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天津无缝钢管总厂建成后将年产钢 60 万吨，无缝钢管 50 万吨。

12 日 赵紫阳谈承包重点是引入竞争机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部分代表，并就承包的配套、完善、深化、发展问题发表意见。他指出，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一是竞争机制目前多数企业还没有落实；二是厂长承包如何更好地依靠全体职工。今年企业推行承包制，就是配套、完善、深化、发展。要按这个方针搞下去，今后几年会大见成效。这对于我国经济局势和整个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着棋牵动全局。这两年很重要，要毫不动摇地抓下去。

22 日 国务院批准唐山城市总体规划

国务院批准冀东重要中心城市唐山 2000 年城市总体规划。国务院的批复指出，1976 年唐山地震后，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唐山人民按照中央批准的震后复建规划重建家园，现已形成比较合理的组团式城市格局。唐山市能源、原材料工业发达，今后应利用重工业基地的优势，积极发展科技、文教事业及其他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环境质量，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多种功能作用，将唐山市建设成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批复要求唐山市认真实施有关抗震防灾的各项规划措施。

24 日 国务院紧急通知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开支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开支的紧急通知》，对各级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部队、全民和集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基本建设单位1988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指标，一律在1987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压缩20%，停止购买小汽车、沙发、空调机、照相机等19种国家专控商品。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再次作出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要求对1988、1989两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在上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按可比口径计算每年压缩20%。同时，将国家专控商品由19种扩大为29种。

25日　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住房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烟台市等几个试点城市的情况来看，这项改革可以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此，国务院同意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决定从1988年起，用三五年时间，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开住房制度改革。

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提出的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改变资金分配体制，把住房消费基金逐步纳入正常渠道，使目前实际用于职工建房、修房资金的大量暗贴转化为明贴，并逐步纳入职工工资。（二）改革现行的把住房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管理体制，确立住房作为商品生产的指导性计划管理体制。（三）通过财政、税收、工资、金融、物价和房地产管理等方面配套改革，在理顺目前围绕住房所发生的各种资金渠道的基础上建立住房基金，逐步形成能够实现住房资金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四）调整产业结构，开放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把包括住房在内的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服务纳入整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循环。

根据上述目标和改革内容，今后三五年内的任务主要是：调整公房租金，按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投资利息、房产税五项因素的成本租金计租，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促进职工个人买房，并从政策、立法、社会舆论等方面采取措施，引导和调节居民消费，使消费结构趋向合理，为实现住房商品化奠定基础。

26日　我国核工业基本实现调整方案目标

《人民日报》报道，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核科技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原定的调整方案，一个“军民结合，以核为主，多种经营”的布局已经初步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核科技工业在服务方向、产业结构、工业布局、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开始调整和改革。1981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原子能工业逐步转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军民结合，以核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国限制了核军品的生产，只进行必要的核试验，并从1985年起，停止了大气层核试验。与此同时，我国大力加强核技术的和平利用。这包括核能开发、同位素和辐照技术的应用，以及与核工业相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发展核电是我国核技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要方向。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建设大中小三种类核电站。浙江秦山的30万千瓦核电站的安全壳焊接和混凝土施工质量复验合格，由国外引进的广东大亚湾两座90万千瓦反应堆的主体工程已经开工，秦山二期60万千瓦双堆核电站已经国家批准立项，它将成为我国批量生产的第一个商业化核电站。同位素辐射技术在工、农、医药方面广泛应用。全国已建成大小辐照装置160个，总装源能量300万居里，这在食品保鲜、消毒灭菌、改变物品

理化性质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1987年核工业部民品产值4.4亿元，从事民用建筑和安装的总产值5亿元，技术转让、咨询及技术服务的收入达5000万元。

我国外贸企业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现行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新的外贸体制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主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向国家承包上缴国家外汇的任务和经济效益指标。少数商品由外贸和工贸进出口总公司承包并统一经营，部分工贸总公司也要实行承包经营。

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相应改革外贸计划体制，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适当减少国家统一经营的出口商品，加强宏观指导和平衡。少数出口商品由外贸、工贸进出口总公司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或由总公司与分公司联合经营、统一成交。少数进口商品由外贸进出口总公司统一代理订货。大部分进出口商品下放由各地方外贸、工贸进出口公司和有经营能力的生产企业自主经营。在进出口商品中，涉及到出口配额和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仍按经贸部有关规定申领配额、许可证。进一步改进外汇分配办法，从1988年起，各地方、各部门、各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外商投资企业的留成外汇，允许通过外汇管理部门设立的外汇调剂中心进行调剂交易。

27日　国务院批准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国家体改委提出的这一方案共分8个部分30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深化企业改革。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政企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把资产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交给企业，强化企业在经营上的责任，建立起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企业经营机制，逐步把企业推上市场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轨道。可根据行业的不同情况，继续推行租赁承包制，有的也可以拍卖。

二、投资体制改革。1988年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对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开始实行基金制管理。中央基建基金，由国家确定的几项中央预算收入和定额拨款构成，并在财政预算中列收列支，专款专用，年终结转，周转使用。其中，经营性建设的投资实行有偿使用，并着手建立严格的投资管理、使用和回收责任制。

三、物资、商业体制改革。1988年着手将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物资的机构，区别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并入国家物资部门，逐步取消国务院各部门分配和管理物资的职能。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逐步改为由计划部门和物资部门直接将指标分配到使用企业。

四、外贸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行外贸出口以1988年出口计划为基础，确定出口收汇、上交外汇和经济效益任务，由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包干落实到外贸经营企业和出口企业，超出口收汇任务的部分，主要留在各承包单位。出口方面实行全面退税，即对出口的商品，由中央财政退还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出口商品按照少数商品统一经营、多数商品分散经营的原则，实行分类管理。进口方面，主要是进一步推行进口代理作价办法。

五、金融、财税体制和住房制度改革。在适当收紧信贷、控制货币发行量、搞好社

会资金综合平衡和有效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搞好资金融通，加速资金周转，调节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益。同时，还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

六、加强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基金和物价管理。有效运用各种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增长的幅度，抑制膨胀，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加强投资总额的控制，加强消费基金的管理。

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一是在沿海少数省建立改革开放的试验区，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行全面综合配套改革。二是在沈阳、重庆、大连、武汉、南京等城市进一步推进开放，进行以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和理顺财产关系为重点，相应建立市场体系和宏观间接调控制度以及精简政府机构等综合配套改革。选择少数省、市，有侧重地分别进行企业降低所得税，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所得税后承包经营责任制；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理顺国有资产关系；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发展证券买卖市场和外汇调剂市场；开放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职工退休费统筹等改革的试点。

八、改革政府管理机构，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强体改工作领导。

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为发展和完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条例》规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包上交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在上述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不同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他承包内容。

承包上缴国家利润的形式有：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微利企业上缴利润定额包干；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国家批准的其他形式。上缴利润的方式为：企业按照税法纳税，纳税额中超过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的上缴利润额多上交的部分，由财政部门每季返还80%给企业，年终结算，多退少补，保证兑现。《条例》自1988年3月1日起施行。

29日　我国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开发研制成功

我国“六五”和“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之一、国家经委1985—1987年重大技术开发项目—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开发研制成功。这是我国集成电路工业的一个重大突破，为国家填补了一项技术空白。

3　月

3日　鞍钢对国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鞍钢对国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报告》。鞍钢承包为期9年，从1987年到1995年。主要承包内容为“三包一挂”：一包上缴利税，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以1986年鞍钢上缴利税7.7亿元

为基数，从1987年起每年递增3%。这样，“七五”期间鞍钢将上交利税84.8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18.3亿元；“八五”期间上交104.3亿元，比“七五”期间又增加19.5亿元。其余所得利税全留给企业，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建。二包技术改造和国家批准的扩建计划。1995年前，利用外资完成增产200万吨钢和50万吨无缝钢管的计划，形成年产钢1000万吨的规模，80%的钢材要按国际标准生产。三包产出包干方案中所承担的指令性计划。从1989年开始，以1988年指令性计划为基数，递增部分保量不保价，即上交国家的钢材数量要保证，但价格可放开，所需生产条件由鞍钢自行解决。一挂就是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实现利税挂钩浮动。企业实现利税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8%。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同劳动成果、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鞍钢承包方案还明确规定了国家应承担的职责。鞍钢按指令性计划生产的钢材所需的生产条件，国家负责安排；扩建资金发生困难时，国家在贷款方面给予照顾。鞍钢这个特大型钢铁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标志着我国钢铁企业在深化改革、改善经营机制、实现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离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4日　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讨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十三大精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国务委员谷牧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加国际大循环，很不简单，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各有关方面对此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强烈的紧迫感，既不能松松垮垮，丧失良机，也不能急于求成，一哄而起，要做好通盘规划，制定有力措施，扎扎实实地办实事。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上海、天津等大中工业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要走在前头。在政策上，国家准备进一步给予支持，包括扩大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放宽外汇调剂范围，设立保税仓库，简化人员、货物进出手续，搞活金融市场，深圳、厦门实行计划单列，调整珠海特区的范围等等。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会议。

国务院批准上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

国务院原则批准上海市《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同意上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当前，上海经济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不断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搞大进大出，是实现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改造、振兴上海的根本途径。《批复》要求，上海市要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和要求，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加快经济发展，在工作中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少搞非生产性项目，把积累的资金集中用于生产。

5日　国家外汇局对金融机构代办外汇买卖作出规定

为了防范汇率风险，稳定进出口贸易（包括其他对外经济活动）成本，开展即期和远期外汇买卖业务，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发布《金融机构代客户办理即期和远期外汇买卖管理规定》，明确中国银行可以接受中国境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的委托，代理买卖即期和远期外汇。其他金融机构经营前款规定的业

务，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9日　国务院发布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国统一的交通管理法规，从1988年8月1日起施行。在这以前，我国曾在1951年公布了《城市陆上交通规则》，1960年公布了《公路交通规则》，这两个法规已分别于1955年和1987年废止。目前正在施行的是1955年公布的《城市交通规则》。这个规则在新的交通管理条例施行时废止。《条例》将全国城乡道路交通由过去公安、交通、农机等几个部门分管划归公安机关统一管理。

10日　国务院要求海关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服务

为适应沿海地区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发展，迫切需要强化海关的垂直领导和集中统一管理。为此，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海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海关认真监督执行国家对进出口货物的管理政策，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分类管理。要加强对实际进出口货物的监督、审单和查验工作，做好进出口货物统计工作，及时提供正确、全面的进出口信息，为国家宏观管理和决策服务。充分运用关税手段调节进出口，体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根据价格体系尚未理顺的实际情况和产业政策的需要，及时调整税率。加强关税和代征税的征收管理，严格减免税的审批，认真查处偷税、漏税，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实施关税优惠政策，改进管理办法，促进沿海地区大进大出。积极支持和促进“三来一补”及进料加工贸易的发展。

15日　国务院批准广东省深化改革措施

国务院原则批准广东省《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请示》。广东省作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开放继续先行一步。允许广东信贷资金实行“切块”管理。发展金融市场，经批准，企业可以在省内向社会、个人发行股票，各经济中心城市可以设立一批企业资信评估机构和证券公司。允许广东扩大外汇市场，逐步在全省大中城市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对外借款，按照外汇自求平衡、自担风险的原则，借款项目经省政府批准执行。放宽利用外资政策，扩大广东利用外资项目审批权。广东有权审批外商在省内举办独资企业；扩大出口管理和经营自主权，放宽进口审批和经营权。允许把来料、进料加工及外贸业务的成交权下放给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同意广东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理顺主要商品价格，完善配套措施，建立起新的价格管理体制；能源、交通运输、粮食等价格和一部分公用事业收费，实行计划管理并按价值规律进行有计划调整；其余放开由市场调节。国家对广东工资总额的增长，采取与全省经济增长综合指标挂钩浮动的办法进行总的控制。同意广东从1988年开始实行递增包干，一定3年不变。全面实行城镇住宅商品化，实行提租补贴，立足实转，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办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拓展地产市场。

17日　国家奖售柴油、粮食鼓励棉农积极性

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农牧渔业部、石化总公司联合发出《关于国家对收购、调拨棉花分别实行奖售柴油、粮食办法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从1988年新棉上

市起，国家实行收购棉花奖售柴油和省间调拨棉花奖售粮食的办法。这一办法规定，国家每收购50公斤皮棉奖售棉农平价柴油2.5公斤。国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间调拨棉花实行吨棉吨粮的奖励办法，即按国家计划净调出量，每吨奖售粮由中央财政补贴差价款128元。

18日　国务院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

为了贯彻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的范围包括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153个市县。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规定的各项政策，适用于这些地区。

19日　上海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

国务院批准对上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为上海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提供了重要条件，上海市据此制定了实行承包制的总方案。上海决定分三批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第一批是税利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企业；第二批是其余的大中型企业；第三批是不实行租赁的小企业。它有三个特点：一是普遍实行了“三包一挂”，即保上缴利润，保企业技术改造，保出口供货，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二是承包时间除少量企业包3年之外，绝大多数是一包5年，和市财政对中央的包干时间同步。三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承包基数和利润分配形式。上海的厂长们把选择承包形式俗称为进“几号门”，“一号门”即第一种形式，是上缴利润包干、超收分档分成。在645户中约占60%。“二号门”是上交利润包干、增长全留，约占30%。这部分主要是一些改造任务重、出口任务大或利润率过低的企业。“三号门”是上交利润递增包干以及其他形式，约占10%。

外国专家首次承包中国企业

澳大利亚退休专家肯尼斯·海斯承包武汉市长虹模具厂模架分厂的合同正式签订，承包期为三年。这是外国专家第一次承包中国企业。协议规定，由海斯全权负责的模架分厂，实行独立经营、自计盈亏方式管理；分厂每月除向总厂缴纳固定费用、变动费用外，还向总厂缴纳利润1万元人民币，其后逐年以8%的幅度递增；海斯有权任免干部和按劳付酬，但职工平均工资不得超过现在全厂平均工资的150%，开除职工需经全厂职代会批准。

23日　国务院对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作出补充规定

国务院作出《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主要内容有：扩大沿海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批权限，在沿海地区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凡属符合国家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的生产性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外汇收支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产品出口不涉及配额、许可证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和广西的自行审批权限由原规定的投资总额500万美元以下或1600万美元以下扩大到投资总额在2000万美元以下；经济特区的审批权限由原规定的轻工业3600万美元、重工业5000万美元以下扩大到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

下放外贸企业审批权。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对外经贸部门可以批准

成立经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出口业务的外贸企业，并授予其外贸经营权；可以批准有条件承包出口任务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经营本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进口和产品、技术出口业务，并授予其外贸经营权。沿海地区企业进料加工出口所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按实际加工出口的数量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产品税或增值税。加工的产品出口，免征进口关税。沿海地区可以在开放的直辖市设主外汇调剂中心。

25 日—4 月 13 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李鹏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在今后 5 年的政府工作中，必须充分体现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并牢牢把握以下方针：以改革总揽全局，把改革和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更好地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认真执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战略，更加突出地抓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进一步促进全国经济的繁荣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围绕着经济建设并为经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造成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良好社会风尚。

《报告》提出今后 5 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10 项主要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二、加快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把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三、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逐步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四、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五、切实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严肃政纪法纪。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七、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八、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认真贯彻执行计划生育和加强环境保护这两项基本国策。九、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城乡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十、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

26 日　198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 198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总结了 1987 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提出了 1988 年计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第一，大力增加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安排好国内市场和人民生活。第二，继续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作用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第三，加速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促进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第四，积极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促进整个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全面发展。1988 年计划还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继续加强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坚持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认真做好优生、优育、优教工作。积极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继续加强国防建设，进一步发展

国防技术，改善部队装备。

1987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88 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 1987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88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987 年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完成了国家预算。1988 年国家预算草案，财政总收入为 2554.5 亿元，财政总支出为 2634.5 亿元，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 80 亿元。为了确保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和改革所必不可少的资金需要，并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国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国务院确定了若干有关财政收支的政策性措施，已在国家预算中作了安排。主要措施是：(1) 开辟新的税源，扩大发行债券，增加财政资金。(2) 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3) 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保证国家重点建设。(4) 适当增加智力投资，保证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开支。(5) 适当增加职工收入，改善职工生活。(6) 实行紧缩政策，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国家对机电产品进出口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国家计委、财政部、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机电产品出口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具体办法》。《办法》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外贸总公司和工贸总公司，根据 1988 年机电产品出口计划，按国家规定的机电产品出口外汇分成比例，向国家承包机电产品出口收汇基数、上缴中央外汇额度基数、机电产品出口补贴（即价差补偿加出口奖励金）总额基数，包干完成机电产品出口任务。轻工、工艺两试点行业中的机电产品出口，属于出口收汇承包基数内的仍实行 1987 年规定的出口收汇“倒三七”分成，国家不负担财政补贴。汽车、电子出口集团按批准的试点方案实施，实行出口收汇全额留成，财政不负担补贴。机电产品超基数出口全额留成的分成办法是，对实行收购制的，出口生产企业所在地方政府留成 7%和出口生产企业留成 21%不变，其余 72%留给外贸企业；对实行代理制的，出口生产企业所在地方政府留成 7%和外贸企业留成 4.9%不变，其余 88.1%留给生产企业；对于自营出口生产的企业，除地方政府留成 7%外，全部留给企业。

4　月

1 日　国家调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

为鼓励农民大力发展粮、油、糖生产，国务院决定调整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是：小麦每 50 公斤提高 1.50 元，其中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提高 2.00 元；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粳稻提高 2.00 元；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省的玉米提高 1.50 元；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的玉米提高 2.00 元。芝麻（油）、茶籽（油）合同定购价提高到超购价水平；油菜籽（油）、葵花籽（油）提高到“倒二八”比例价水平（即 80%按超购价，20%按牌价）。从 1987 年至 1988 年榨季起，对收购糖料实行价外补贴。以省区为单位，每吨甘蔗补贴 8 元，每吨甜菜补贴 18 元。

2日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

于志安等20名厂长、经理荣获国家经委授予的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按姓氏笔划为序，这20位优秀企业家是：武汉气轮发电机厂厂长于志安，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上海彭浦机器厂厂长齐心荣，烟台港务局局长朱毅，天津自行车厂厂长兼天津自行车二厂、天津摩托车厂厂长邢起富，湖南醴陵国光瓷厂厂长邹风楼，国营南京无线电厂厂长陈祥兴，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陈清泰，青岛第九橡胶厂厂长汪海，西北国棉五厂厂长应治邦，鞍山钢铁公司经理李华忠，首都钢铁公司工厂委员会主任周冠五，山西潞安矿务局局长尚海涛，黑龙江省佳木斯造纸厂厂长孟祥海，广州铁路局局长杨其华，沈阳电缆厂厂长徐有泮，成都无缝钢管厂厂长殷国茂，大连石油化工公司经理黄春锷，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经理霍荣华。

5日　城镇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

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列入补贴范围的品种只限于猪肉（禁食猪肉民族为相应数量的牛羊肉）、大路菜、鲜蛋和白糖4种。对城市居民凭证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仍按规定供应，不提高价格。经营部门的亏损，继续由财政补贴。大中城市对职工的补贴，原则上是把暗补改为明补。按人均购买值计算，控制在当地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额的20%至25%之内。补贴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分别承担。企业职工的补贴，原则上由企业消化。国务院决定，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按定量发给职工补贴，先在大中城市试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于5月以后实行。

国家重新确定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

这个《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是1986年元月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由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负责，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体改委、中组部、国务院工业普查办公室、全国总工会、商业部、国家标准局组成的划分企业类型协调小组研究制定的。经过两年多方征求意见，对统一划分企业规模的原则、依据、企业规模的认定权限、程序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标准》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统计从1988年工业统计年报起开始执行。此后，大中小型生产企业划分标准停止套用国家计委《关于基本建设建设项目和大中型项目划分标准》，建设项目的划分仍按国家计委《关于基本建设建设项目和大中型项目划分标准》执行。

9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一、撤销部、委12个；新组建部、委9个；保留部、委、行、署32个；转为事业单位的1个。改革后的国务院组成部委41个：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能源部、铁道部、交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商业部、对外经济贸易部、物资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

经过这次机构改革调整后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9个：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国家医药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旅游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气象局、国家地震局、国家土地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国家档案局、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办事机构共5个：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共16个：国家税务局、中国专利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黄金管理局、国家核安全局、国家测绘局、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国家版权局；事业单位共5个：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批准准格尔煤田煤电路跨行业联营

内蒙古准格尔煤田一期开发工程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准格尔煤炭工业公司实行煤、电、路跨行业联营，同步建设，配套发展，原煤就地转化为电的一整套协调发展构想，并给予优惠政策。已探明的煤田垂深600米以上勘探面积达1022平方公里，探明储量268亿吨。煤田一期工程规模为年产煤1500万吨。开发后的准格尔煤田，将成为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耗能工业的重要依托。国家将为准格尔煤田一期工程矿区部分投资33.6亿元。

12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宪法作出两项重大补充修改：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3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为保障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明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其合法权益，增强其活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该法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其根本任务是：根据国家计划和市场需求，发展商品生产，创造财富，增加积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该法自1988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七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为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平

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号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者举办合作企业，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并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审查批准。中外合作者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可以是现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其他财产权利。

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设立

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批准设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批准设立海南省，撤销海南行政区。海南省人民政府驻海口市。(二）海南省管辖海口市、三亚市、通什市、琼山县、琼海县、文昌县、万宁县、屯昌县、安定县、澄迈县、临高县、信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黎族自治县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海南省是我国的第二大岛，连同南海诸岛，面积3400多平方公里，气候温和，海洋水产和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全岛现有60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99万。

《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的经济特区。(二）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国务院建议把海南岛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可以给予比其他经济特区现行规定更加放宽的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可以更为灵活。

17日　国务院批准福建省进行综合改革

国务院原则批准福建省《关于进行综合改革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请示》。国务院批准的福建金融改革包括信贷资金从1988年起实行“切块”管理，发展金融市场；允许福建按照外汇自求平衡、自担风险的原则，编制对外借款和发行债券计划；批准福建筹建区域性、股份制的金融机构；改革银行财务管理体制，加快专业银行、保险公司企业化的步伐。国务院扩大了福建利用外资项目审批权。福建省审批项目的权限为3000万美元，外商办独资企业可由省审批。扩大出口管理和经营自主权，放宽进口审批和经营权。省可批准把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及外贸业务的成交权下放给有条件的企业。国务院同意福建按全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计划要求，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省内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在2亿元以下的，由省自行审批。福建实行“划分收支，定额补助，五年不变”的财政大包干体制。国家对福建工资总额的增长采取与全省经济增长综合指标挂钩浮动的办法，进行总的控制。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实行与经济效益挂钩，由企业自主分配，机关、事业单

位的工资允许根据经济发展、企业工资水平及物价变动相应调整。福建可自行调整省属高校招生计划和专业设置。

18日　国务院批准厦门市实行计划单列

厦门市是我国重要的沿海城市，在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进一步搞活厦门特区经济，加快实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国务院批准厦门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21日　钱塘江二桥工程全面动工

被列为"七五"期间我国重点建设工程的钱塘江第二大桥全面动工。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继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山东黄河大桥之后，我国又一项重要的大桥工程。作为华东铁路网东西第一通道的沪杭、浙赣两线，是沟通沪、浙、赣、湘四省、市的大动脉，目前连接这一通道的钱塘江大桥是1951年前所建，通车能力早已处于饱和状态，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建设的需要。总投资为2.4亿元的钱塘江第二大桥是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铁路桥全长2860.8米，公路桥为1792.8米。钱塘江第二大桥由铁道部大桥局实行设计和施工总承包，1990年底建成铁路桥，1991年第一季度建成公路桥。

25日　我国第一台低能双离子束外延实验机研制成功

经过八年联合攻关，我国第一台低能双离子束外延实验机研制成功，正式投入使用。这种双离子束的外延机目前在国际上尚未见报道。这一实验机的研制成功，提供了一个省力工具，在研制新型薄膜材料、发展材料科学等方面发挥作用。

27日　国务院批准南京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地区

经国务院批准，南京市正式被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是一个以石油、化工、电子、机械、建筑材料为支柱的轻纺工业具有一定特色的综合性工业城市；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力量较强；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城市基础设施较齐备。根据国务院的文件，这一次南京市及所辖江宁、六合、江浦3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面积4717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72.4%，人口40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84%。

28日　国务院发布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

《暂行条例》禁止任何国家机关、人民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外，以任何方式要求企业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

《条例》规定不得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外向企业征收下列费用：（一）各地教育部门、学校自定的职工子女入学费；（二）建田费、垦复费；（三）进入城市落户的人头费；（四）煤气开发费；（五）集中供电费；（六）过路费；（七）过桥费（集资或用贷款建桥的除外）；（八）排水增容费；（九）各种名目的治安管理费；（十）各种名目的卫生费；（十一）绿化费；（十二）支农费；（十三）各种名目的会议费；（十四）其他名目的费用。城市市区新建项目，需要征收城市建设配套费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费用项目，任何单位不得超出征收的范围，提高征收的标准，变更征收的办法。不得强制企业赞助、资助、捐献财物。企业自愿赞助、资助、捐

献的款项只能从企业的自有资金中支出，不得计入成本。除法律、法规规定外，不得强制企业购买有价证券或以其他形式向企业集资；不得强制企业参加保险；不得将公益性义务劳动改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企业有权拒绝任何单位的摊派。《条例》自1988年5月20日起施行。

5　月

3日　国务院决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强调，当前科技体制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以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进一步加快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鼓励科研机构切实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科研机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要逐步推行在科研机构内部或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通过竞争来选择并确定经营管理者。对经营管理不好、效益很差的科研机构，可以转向、被兼并或撤销。要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参与经济，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科研机构可以和企业互相承包、租赁、参股、兼并，实行联合经营，或进入企业、企业集团，或发展成科研型企业等；要扩大科研机构的外事自主权，简化外事审批手续。自1988年起，科研机构出口创汇以1987年为基数，新增部分在三年内全额留成，用作单位的发展基金，自主使用。科研事业费部分自给的科研机构，实行奖励福利基金比例与事业费减拨比例挂钩。科研事业费完全自给的科研机构，在切实保证事业发展的前提下，其纯收入由单位自主分配和使用。目前实行科研事业费包干的科研机构，要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具有创收能力的，在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应积极挖潜创收，向科研事业费自给或部分自给的方向过渡。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实行科研事业费和基本工资总额包干，增人不增钱，减人不减钱，节余归单位自主使用；其创收部分除提留一定比例的发展基金外，归单位自主分配。为了确保科技和经济长远发展，必须切实保持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地发展，国家对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要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增加。基础研究要面向世界，重点选择有优势、有重要应用前景的领域和项目。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改革中，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继续实行和完善科学基金制，不断探索新的管理方式，择优支持基础研究方面的高水平课题和设施建设，支持优秀人才的研究工作。要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工作的相互联系和转化，促进人才交流和知识扩散。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人员互相兼职，合建共用设施。国家重点实验室要打破部门所有，向国内外开放。《决定》提出，在深化全民所有制科研机构改革的同时，积极支持和促进集体、个体等不同所有制形式科技机构的发展。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作用。鼓励有计划地组织科技人员或支持科技人员以调离、辞职、停薪留职、兼职等方式，创办、领办或承包、租赁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或到农村进行有偿服务和技术经济承包。

4日　国务院批准深化物资体制改革方案

国务院同意并印发物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方案》。《方案》提出当前物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一、逐步取消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物资的职能，将物资供应、销售机构并人物资部；二、在减少指令性计划的同时，全面推广石家庄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三、在一些城市由地方政府组织物资体制改革。

关于物资计划管理改革，主要是对现有部管物资划分为四种方式管理。第一种是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物资，主要是少数短缺的重要原材料、燃料中属于重点企业生产的部分，纳入国家指令性生产计划，所需主要原材料、燃料由国家安排，产品交国家分配。第二种是国家合同订购物资，主要是重要的机电产品，国家制订指导性生产计划，其中国家重点需要部分，下达合同订购任务，并安排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优先供货。第三种是国家组织产需衔接物资，主要是专业性强的协作配套物资，由物资部或主管部门组织供需双方协商订购。第四种是自由购销物资，主要是供求基本平衡的一般原材料和机电产品，放开流通，由企业通过市场购销。原国家计委和国家物资局管理的27种统配物资继续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对各生产主管部门管理的496种物资作如下调整：原由11个部门管理的原材料195种，其中指令性计划分配的由171种减少为42种，产销衔接的由24种增加为103种，其余50种改为自由购销。原由29个部门管理的机电产品301种，其中指令性计划分配的由145种减少为3种，合同订购的93种，产需衔接的由156种减少为106种，其余99种改为自由购销。

国务院制定政策鼓励开发海南岛

为了吸收境内外投资，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国务院制定《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鼓励境内外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投资开发海南岛，兴办各项经济和社会事业。海南岛国家所有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土地使用权出让一次签约的期限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具体情况确定，最长期限为70年；期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的，经批准期限可以延长。投资者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海南岛的矿藏资源依法实行有偿开采。允许投资者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勘探开采。投资者可以合资、合作方式在海南岛投资从事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电站、煤矿、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独资经营专用设施，并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投资经营与上述设施相关联的各类企业和服务事业，实行综合经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在海南岛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13日　长江上游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

国务院同意全国水土保持协调小组的建议，决定将长江上游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长江干流在宜昌以上统称上游，涉及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湖北等8个省、自治区，总土地面积100.5万平方公里。据1985年各省统计，上游水土流失面积35.2万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35%。80年代以来，长江上游各省虽然做了一些水土保持工作，但规模很小，进度缓慢。特别是近几年，有关管理措施没

有跟上，陡坡开荒乱伐林木未能有效制止，交通、矿业、建筑、水电等部门在开采、修路、基建等作业中，又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将长江支流的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陇南地区、嘉陵江中下游、川东鄂西的三峡库区等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四片列为第一批治理的重点。

15日　国家制定信息技术发展政策要点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科委等部门制定的《信息技术发展政策要点》。《要点》认为，信息技术是当代世界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最活跃的生产力。我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要点》着重阐明信息技术发展的总体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以市场和效益为目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的商品生产；信息技术和产业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引进适合国情的先进技术、采用质优价廉的国外元器件、零部件以至部分系统，大幅度提高信息产业出口创汇能力，有选择地实行适当保护措施，做到既有利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发展，又有利于信息技术和产业自身的发展；选择信息技术和产业的优先发展领域，主要是具有汉字处理功能的微型计算机和微型化小型计算机系统、数字程控交换、光纤通信和卫星通信技术及设备、硅模拟集成电路、硅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制造技术、软件工程化技术等；集中力量，快速推进。《要点》提出，在一定期限内，国家在税收、信贷、折旧等方面对信息产业中的企业和企业集团采取特别的和健全的优惠政策；要加强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动技术创新。《要点》对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提高信息产业出口创汇能力；鼓励顶替进口，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加强人才培养；正确处理信息共享与安全保密的关系等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16日　中国银行首次提供出口买方信贷

为促进中国机械设备、成套设备等资本性商品对外出口，中国银行与阿根廷最大的商业银行——阿根廷国民银行签署了一项出口买方信贷协议，这是我国提供的第一笔出口买方信贷。贷款金额为2000万美元，最长期限不超过10年，年利率为6.5%。此次中国银行首次向外国银行提供买方信贷，是我国运用国际通行的贷款方式，有效支持我国产品出口的新尝试。

国务院批准建立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

山东半岛将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半岛开放区的范围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日照、莱州7个市、44个县，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

18日　邓小平谈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谈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封闭的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搞活，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19日　邓小平谈理顺物价，加快改革

邓小平会见由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率领的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过这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现在过这一关，能否成功，今天还不能讲，但我们希望成功。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20日　国务院批准北京在中关村办试验区

国务院批准颁布《中关村试验区暂行条例》。北京市决定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在海淀区划出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建立外向型、开放型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规定，对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实行减征或免征税收的优惠：减按15%税率征收所得税，企业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40%以上的，经税务部门核定，减按10%税率征收所得税；新技术企业自开办之日起，3年内免征所得税，经市政府指定的部门批准，第4至6年可按前项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所得税；经市政府批准，可以免购国家重点建设债券；以自筹资金新建技术开发的生产、经营性用房，自1988年起，5年内免征建筑税；试验区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符合新技术企业标准的，也适用以上减征或者免征税的优惠。试验区内的新技术企业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免领进口许可证，海关凭合同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定部门的批准文件验收。经海关批准，在试验区内可以设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用于新技术开发，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仪器和设备，凭审批部门批准文件，经海关审核后，5年内免征进口关税。试验区内设立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可自行制定试销价格。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产品出口业务较多的新技术企业，其商务、技术人员一年内多次出国的，第一次由市政府审批，以后由企业自行审批。试验区内的新技术企业免缴奖金税。

21日　国务院成立国家旅游事业委员会

该委员会属于国务院常设的议事、协调机构，办事机构设在国家旅游局。国家旅游委员会主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成员单位有财政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轻工部、林业部、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价局、中国民航局、国务院侨办、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国家文物局等。

25日　邓小平谈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邓小平会见捷共总书记雅克什时谈到，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29日 我国企业首次试行跨国承包

广东省农垦总局和粤西农垦局跨国承包经营多哥共和国糖厂，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外进行租赁承包经营的试点项目，这个任务是由国家经贸部下达的。粤西农垦局从所属的广丰糖厂和前进农场抽调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在多哥成立中多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多哥糖厂。整个承包项目包括甘蔗种植园和糖厂两部分，主要生产白砂糖和酒精。

30日 国务院颁布防止拆船污染管理条例

《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源地、海水淡化取水点、盐场、重要的渔业水域、海水浴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严禁设置拆船厂。《条例》要求各地统筹规划、合理设置拆船厂。拆船单位应当健全环保规章制度，配备防污装置，在通过环境保护部门的验收之后，才能从事拆船活动。对造成污染损害事故的单位和个人，《条例》制定了若干处罚规定。《条例》自1988年6月1日起施行。

30日—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会讨论当前改革和经济发展形势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就当前全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9年来，我们的改革有很大进展，成效是显著的。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开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国际的经验和国内的实践表明，改革的难题拖得越久，解决起来难度就越大。改革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抓住历史给予的有利条件，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迎着风浪前进，坚决而又稳妥地把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好。

会议指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统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按价值规律办事，理顺原来很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工资问题同物价问题紧密联系。要主动地理顺物价，就必须相应地解决工资问题。价格和工资制度的改革，既要理顺关系、促进生产，又要使大多数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达到这个目标，最终取决于经济效益特别是工业效益的提高。为此，必须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管理水平，促进技术进步。要制定配套的改革措施，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会议认为，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必须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党和国家机关要把保持廉洁的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依法惩处贪污、受贿、弄权渎职、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要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法制建设，保证社会的安定。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秩序。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讲话”。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部分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列席了会议。

6 月

2日 国家对宝钢实行承包新政策

国家计委、冶金部等有关部委同意对宝钢实行定额留利，超利“五五分成”，工资

与上缴利税挂钩等政策。宝钢领导人主动要求向国家承包。他们提出的三年承包方案是，在钢、铁产量已经超过设计水平的基础上，一包国家指令性计划的钢铁产量每年递增6.1%，二包上缴国家利润每年递增8%，三包自筹一号高炉易地大修和其他技术改造项目所需资金。以承包为核心，宝钢制定了一整套调整内部经营机制的配套改革方案，以逐步建立起"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他们将以承包后的留利、多元化经营的创收以及固定资产折旧等，自行筹措技术改造资金。宝钢第三期工程的建设资金，也将以自筹为主，同时辅之以社会集资、吸引外资和贷款等办法来解决。

3日　邓小平谈发展我国经济三步走目标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谈到，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我们从1957年以后，耽误了20年，而这20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改革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还有12年时间，看来可以实现。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50年时间，达到中等国家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本世纪的最后10年，要为下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国务院发布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经5月13日国务院第四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条例》对登记主管机关、登记条件和申请登记单位、登记注册事项、开业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公告、年检和证照管理、事业单位、科技性的社会团体从事经营活动的登记管理、监督管理等有关事项作出了规定。该条例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1980年7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1982年8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1985年8月14日国务院批准、1985年8月2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5日　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

经5月18日国务院第五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暂行条例》所称租赁经营，是指在不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授权单位为出租方将企业有期限地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向出租方交付租金并依照合同规定对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的方式。《暂行条例》对出租方与承租方、租赁招标、租赁经营合同、权利与义务、收益分配及债权债务处理、承租收入等方面的内容作出了规定，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

7日　邓小平谈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谈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关键是两条。第一条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

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

9日　国务院下放外资企业审批权

国务院下发《关于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审批外资企业的通知》，决定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按照下列规定审查批准设立外资企业：

一、设立的外资企业投资规模在国务院规定的限额以下，建设条件和生产经营条件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审批，并发给批准证书。但是，如拟设立的外资企业生产的内销产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生产的出口产品属于对外经济贸易部及其特派员办事处颁发出口许可证的，属于国家实行配额管理的，以及属于国家限制利用外资的行业、项目，审批前应当征得对外经济贸易部或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

二、设立的外资企业投资规模在国务院规定的限额以上的，以及虽在限额以下，但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其申请由企业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报对外经济贸易部审批和发给批准证书。

三、对于按照第一条的规定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审批机构应在批准后30日内将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企业章程和审批机构的批准文件报对外经济贸易部备案。对外经济贸易部在收到上报备案的文件后，如发现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不符合第一条规定，有否决权，但必须在30日内通知有关地方，逾期则否决权失效。

12日　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合并成立新国家计委

作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容之一，在原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两委合并的基础上新组建国家计委，成为我国高层次的宏观管理机构。新国家计委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转变职能：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将从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到间接管理为主；计划管理的重点将转向制订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为保持对经济活动的必要调控能力，国家将直接掌握一部分投资、外汇和物资，直接管理极少数重点建设工程和特殊企业；把行业管理职能和各部门能够协调解决的事情交给各专业部门，尽量避免与专业部门在职能上的重复和交叉，国家计委不再直接管理项目投资，把中央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按计划分给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由他们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负责资金的经营和管理；把原计委的基建设计、施工和标准定额的管理职能转给建设部。同时，扩大地方的计划管理权限，建立起两级管理体制。经国务院批准，新计委委员由国家计委主任、国家体改委主要负责人、国家科委主任、财政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物资部部长、劳动部部长、国家物价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专职委员担任和兼任，共19人。在组成人员上体现了高层次的、名副其实的委员会制，新计委司局级职能机构从原两委的66个减到26个，减少60%，机关干部减少40%多，以加强宏观调控，提高办事效率。

13日　上海首办国内抵押贷款

上海市首次在国内办理抵押贷款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中的房地产抵押业务，并将逐步减少信用贷款。这是上海市为促进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扩大利用外资，促进资金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上海的企事业单位和在沪的外国投资者可以依据上海市发布抵押贷款的有关规定，用房地产、机器设备、运输工具、产成品、原材料、股票、债券和土地使用权等，向上海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贷款，并允许在沪的侨资外资银行开办土地使用权抵押外汇贷款；可以允许境外金融机构以土地使用权抵押外汇贷款。上海金融界采取的这项配套措施满足了外国投资者的需求，并以法律形式保障土地使用权抵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4日　国家计委下放大中型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权限

根据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对新国家计委职能的规定，国家计委下发《关于大中型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权限问题的通知》，将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立项的工作下放给行业归口管理部门承担，并由行业归口管理部门提出立项初审意见，再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审批。

16日　国务院批准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

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要亲自抓，务求抓出成效。对在建项目、准备建设项目和规划设计项目（包括旅游宾馆）要全面、认真地进行清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讨论，不得走过场，要坚决停一批，缓一批。停建项目要撤销立项；缓建项目可保留立项，但“七五”期间一般不得开工。从现在起，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投资，不论筹资渠道如何，一律先存入建设银行，接受监督，不得存入其他银行。今后审批楼堂馆所建设项目，必须按基建程序办理，不准各级领导者个人批条子上项目。

20日　国家计委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意见

国家计委《关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意见》对重点支持的产业和产品作如下规定：农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原材料工业，这是当前突出的薄弱环节，必须作为重点来支持。市场紧俏的轻工、纺织产品，机械、电子产品和出口产品，要采取不同措施促其发展。对于限制发展的产业和产品，《意见》规定，对市场需求量虽然大于加工能力，但加工能力又大大超过原材料供应，而这种矛盾在短期内又难以得到缓和的，要限制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大，主要有铝型材、一般塑料制品，毛纺加工、电冰箱装配、洗衣机装配、彩电装配能力（不包括沿海地区“两头在外”企业），以及一些楼、堂、馆、所等。对技术水平不高，市场需求疲软，生产能力闲置的产业或产品，促其提高产品质量、档次或转产，主要有普通人造革、低档白酒、大号机械男表、非名牌家用缝纫机、非名牌自行车、质次电风扇、低档收录机、电子计算器、技术水平低的一般通用机械和一般专用机械等。对于盲目布点、盲目建设、盲目生产的技术水平低、消耗高、严重污染环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不好的产业或企业，要坚决实行限制和改造政策。对于需求虽然旺盛但不符合我国现阶段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产品，

要采取多种措施，有计划地限制其盲目发展。这类产品主要有易拉罐装饮料、空调器、录像机等。

22日 邓小平谈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格斯图时谈到，1978年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关，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齐鲁石化30万吨乙烯二期工程建成

山东齐鲁石化公司30万吨乙烯二期工程提前建成。总投资近70亿元的齐鲁30万吨乙烯工程是以贷款的形式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随着二期工程的建成投产，一期工程乙烯生产负荷上升，能耗下降，经济效益得到充分发挥，每年可为市场提供各种化工原料170万吨。其中甲基叔丁基醚4万吨，为国内最大的生产装置；橡胶、塑料、烧碱等产量均居第一，而且50%的隔膜精制液、碱和固体粒碱将填补国内空白，改变依靠进口的状况。乙烯工程全部建成后，齐鲁石化公司将成为我国最大的石化塑料生产基地之一。

25日 国务院发布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凡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城乡私营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依照35%的比例税率计算征收。

纳税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减征、免征所得税：（一）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二）遇有风、火、水、震等灾情，纳税确有困难的；（三）纳税人因特殊情况需要减税、免税的。除此之外，其他需要减税、免税的，由财政部确定。《条例》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规定征收私营企业投资者个人收入调节税

为调节私营企业投资者的收入，鼓励私营企业投资者发展生产，国务院决定从1988年起，对私营企业投资者参加企业经营取得的工资收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对私营企业投资者从私营企业税后利润取得的收入，按下列规定征收或者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一）私营企业投资者将私营企业税后利润用于生产发展基金的部分，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二）私营企业投资者将私营企业税后利润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依照40%的比例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三）私营企业投资者不论以何种方式撤回生产发展基金或者转让企业资产用于个人消费的，依照前项规定，补征个人收入调节税。

说明 已被1999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代替。

我国第一条最长的光纤通信线路建成

我国第一条最长的光纤通信线路——武汉至荆州、沙市架空光缆通信工程通过验收。工程全长244.8公里，采用全套国产光纤通信设备。

29日 国家物资部正式成立

新组建的物资部是国务院统筹规划和管理全国生产资料流通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进行综合管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搞活流通。新物资部的职能将是由过去主要依靠指标的直接管理转向主要依靠政策和经济手段的间接管理；由过去单纯搞统配物资的分配转向搞好重要物资的全社会综合平衡，由过去主要搞产品分配调拨转向全面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同时搞好协调、服务与监督。

7日

2日 国家严格控制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

针对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继续重复引进的情况，国家计委、经贸部、机电部、海关总署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通知》，重申各地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进行彩色显像管、玻壳生产线的引进和建设工作。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包括“三来一补”）对外询价、谈判、考察、引进彩色显像管（含玻壳、高分辨率显像管、彩色投影管等）生产线（含关键设备）。没有国家批准的正式文件，经贸部门不发放设备进口许可证。无进口许可证海关不予放行；各地银行不予发放外汇和人民币贷款；勘察设计部门不予勘察设计。

4日 国家严格限制易拉罐的生产和销售

近几年来，国内陆续引进了14条易拉罐生产线，加上国产的两条共16条。全部投产后，按设计能力可年产空罐20多亿只，而生产易拉罐所需的铝合金板材和辅料目前仍需依赖进口，要支付大量外汇。根据“易拉罐要限制”的精神，经请示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计委规定，立即停止新上易拉罐项目，对上报的项目一律停止审批；对已经批准尚未签约的项目一律停止签约。禁止进口易拉罐空罐。为了控制易拉罐在国内销售，要适当提高易拉罐原、辅材料的进口关税。由中国包装总公司负责制定原、辅材料的进口计划，经贸部门根据计划发放进口许可证。

7日 农业部组织实施“菜篮子工程”

“菜篮子工程”是经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整套中近期内的组织实施措施，它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在理顺副食品价格的基础上，改革生产、流通体制；合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调整副食品供给结构；推广实用技术；强化基础设施等，到1992年争取动物性食品总量在1987年的水平上增加1260万吨，城市蔬菜实现均衡优质上市。“菜篮子工程”的基本设想和措施是，通过发展生产，调整副食品供给结构，引导消费，逐步实现肉食品消费多样化，增加节粮、高蛋白的禽、兔、蛋、奶、鱼的供给比重；在保证大路菜供应的基础上增加细菜供给。“菜篮子工程”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是为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发展作出较长远的总体布局规划。

8日　上海市有偿出让第一块土地

上海第一块土地有偿出让国际招标的决标公布，日本孙氏企业有限公司以美元支付相当于人民币1.0416亿元的出让金获得上海虹桥开发区内26号地块12900平方米土地50年的使用权，成为中国第一个以国际招标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得标者。

13日　国家统计局建议把调整用肥结构视为国策

国家统计局在一项统计报告中建议，应把鼓励农民多用农家肥，调整用肥结构视作国策来抓。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指出，我国农田用肥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日趋严重。据统计，1987年全国化肥施用量已达1999万吨（折纯量），平均每亩耕地施化肥13.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每亩6.3公斤的1倍多。有的省份每亩农田施化肥达18.2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9倍。化肥施用量的逐年增多，破坏了土壤的良性结构，造成地力下降。目前，我国耕地有机质含量仅为1.5%，明显低于美国等其他国家2.5%到4%的水平。长江和黄淮流域土壤中有机质一般不到1%，低的不足0.3%；素有黑土地带之称的东北，土壤中有机质已从原来的5%至8%下降到目前的1%至2%。地力下降已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农民投入多，产出少，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潜在危险。

16日　国务院批准试行投资管理体制近期改革方案

国务院原则同意并印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从1988年开始试行。

《方案》提出，固定资产投资关系生产力的长期布局，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投资活动的管理，必须符合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一般性的建设投资，放给企业或市场，重大的、长期性的建设投资，必须依靠国家计划调节，但要彻底消除吃大锅饭的弊端，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负责制，以及投入产出挂钩的投资包干责任制，在建设项目的选定、设计、设备供应、施工中运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并逐步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方案》提出了“七五”后三年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实行中央、省区市两级配置，两级调控。中央投资或以中央为主投资的具体范围，包括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跨地区的、面向全国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骨干设施，重大的关键的机械电子、轻纺工业项目，大江大河治理的骨干工程和重大农业基地和重点防护林工程，关键的新兴产业项目，重要的科技和文教设施，国防工业等的建设，包括重要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及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的扶持。地方投资的具体范围，包括农业、林业、水利，本地区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地方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设施，机电、轻纺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城市公用设施和服务设施等的建设。根据以上分工，中央和地方各负其责。中央和地方可以相互参股。

扩大企业的投资决策权，使企业成为一般性建设的投资主体。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工程和必要的福利设施，主要由企业投资建设。资金有富余的企业，还可以进行基本建设，搞扩大再生产。为了保证产品规模的经济合理，企业应着重组成群体联合投资。

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保证重点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经国务院批准，从1988

年起建立中央基本建设基金制。基本建设基金与财政费用分开，由建设银行按计划负责管理。基本建设基金分为经营性的和非经营性的。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分为软贷款和硬贷款两种，软贷款可用于国家政策性投资；硬贷款用于还款能力较好的项目。成立投资公司，用经济办法对投资进行管理。中央一级成立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六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负责管理和经营本行业中央投资的经营性项目（包括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

《方案》还对简政放权，改进投资计划管理；强化投资主体自我约束机制，改善宏观调控体系；设计施工单位实行招标、投标制以及基建物资供应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具体意见。

国家建立中央基本建设基金

为使基本建设的资金来源保持稳定，建设项目能够按照合理工期组织施工，国务院批准从1988年起建立中央基本建设基金，并印发《国家基本建设建设基金管理办法》。基本建设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由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中的中央使用部分、建筑税中的中央使用部分、铁道部包干收入中用于预算内基本建设部分、国家预算内拨改贷投资收回的本息、财政定额拨款等资金组成。基本建设基金的使用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种，由建设银行统一管理。

21日　中办、国办通知要求解决公司政企不分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解决公司政企不分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除国务院授权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经营权的少数公司外，其他政企不分的公司必须将经营权和政府严格分开，凡有政府职能、进行行业管理的公司一律不准参与企业经营。停止审批党政机关离退休干部和已到离退休年龄尚未办手续的干部担任公司职务和名誉职务。

26日　国务院决定改进地方财政包干办法

国务院作出《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为了稳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根据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决定，1988—1990年间，对1985年开始实行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改进，即全国3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广州、西安两市财政关系仍分别与广东、陕西两省联系外，对其余37个地区分别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

(一)"收入递增包干"办法。这种办法是：以1987年决算收入和地方应得的支出财力为基数，参照各地近几年的收入增长情况，确定地方收入递增率（环比）和留成、上解比例。在递增率以内的收入，按确定的留成、上解比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留给地方；收入达不到递增率，影响上解中央的部分，由地方用自有财力补足。实行这种办法的地区有10个，即：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不包括沈阳市和大连市）、沈阳市、哈尔滨市、江苏省、浙江省（不包括宁波市）、宁波市、河南省和重庆市。

(二)"总额分成"办法。这种办法是：根据前两年的财政收支情况，核定收支基数，以地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确定地方的留成和上解中央比例。实行这个办法的有

3个地区，即：天津市、山西省和安徽省。

（三）“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办法。这种办法是：在上述“总额分成”办法的基础上，收入比上年增长的部分，另加分成比例，即每年以上年实际收入为基数，基数部分按总额分成比例分成，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的部分，除按总额分成比例分成外，另加增长分成比例。实行这个办法的有3个地区，即：大连市、青岛市和武汉市。

（四）“上解额递增包干”办法。这种办法是：以1987年上解中央的收入为基数，每年按一定比例递增上交，实行这个办法的有2个地区，即广东省和湖南省。

（五）“定额上解”办法。这种办法是：按原来核实收支基数，收大于支的部分，确定固定的上解数额，实行这个办法的有3个地区，即：上海市、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六）“定额补助”办法。这种办法是：按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实行固定数额补助。实行这种办法的有16个地区，即：吉林省、江西省、甘肃省、陕西省、福建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和海南省。湖北省、四川省划出武汉、重庆两市后，由上解省变为补助省，其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分别由武汉市、重庆市从其收入中上交本省一部分，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补助。

国务院印发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

《暂行条例》规定，楼堂馆所建设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经批准建设的楼堂馆所必须列入地方、部门的基本建设计划，未经程序报批，不得擅自建设，不得搞计划外工程。企业流动资金、企业生产发展资金、各类救济金、扶贫资金、教育经费以及其他专项资金不得用于楼堂馆所建设。楼堂馆所的建设资金必须存入建设银行，实行统一管理。用自筹资金建设楼堂馆所的按年度投资额的30%征收建筑税。

28日　国家设立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

为做好污染源治理，合理使用污染源治理基金，国务院决定设立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并发布《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基金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环保部门设立，分级管理，独立核算，可以拆借使用。基金实行有偿使用，委托银行贷款。基金从征收的超标排污费用于重点排污单位治理污染源资金中提取，提取比例在20%—30%幅度内。《办法》从1988年9月1日起施行。

29日　沿黄河七省区经济协作带成立

沿黄河七省区政府负责人在青岛市正式签署了会议纪要，宣告沿黄河经济协作带正式成立。沿黄河经济协作带包括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七省区，总面积为19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5亿。

国务院批准建长沙科技开发试验区

长沙科技开发试验区主要开发信息技术、新型材料、生物技术、激光技术、新能源和节能新技术五大产业。

8　月

4日　国务院决定实行棉花超定购分成办法

国务院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棉花市场管理，做好1988年度棉花收购工作。供销合作社要正确执行国家标准，不得压级压价，也不得抬级抬价，防止发生收购“关系棉”和“人情棉”的现象。要正确执行奖售政策，按规定标准兑现奖售物资，不得克扣、挪用和随意涨价。国务院决定从1988年度起，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棉花超定购分成办法，具体办法由国家计委、商业部、财政部另行下达。棉花收购目前只能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不得开放棉花市场。

国家计委批准试行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章程

《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章程》经国务院第九次常务会议讨论，并授权国家计委审批发布试行。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是指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国家交通投资公司、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国家机电投资公司、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和国家林业投资公司。《章程》明确，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是国务院开发和经营固定资产投资并且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是国务院直属局级（副部级）公司，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四个投资公司由国家计委归口领导，行业归口主管部门参与指导；农业、林业投资公司由国家计委与部门归口领导，以国家计委为主。

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是从事固定资产投资开发和经营活动的企业，是组织中央经营性投资活动的主体，既具有控股公司的职能，使资金能够保值增值，又要承担国家政策性投资的职能。

5日　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北京中关村地区足我国最大的智力密集区，有近20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500家各类科技企业，科技产业初具雏型。充分利用中关村地区的这一优势，发展新技术产业，带动全国各地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形成网络，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走向依靠高技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道路。

5日—8日　国务院批准出台“火炬”计划

全国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在会上宣布，全国“火炬”计划正式开始实施。经国务院批准出台的“火炬”计划，主要是为全国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具有较强技术开发力量的大中企业、军工企业以及数十万科技人员进人沿海发展战略领域，发展高技术、新技术产业提供政策性保护，进行组织指导，培训干部、疏通技术、资金、人才合理组合和流动渠道，创造有利的国内外社会环境，以形成适宜的大气候。“火炬”计划的侧重点，是运用灵活的运行机制，推动大院大所的广大科技人员把科技成果与千家万户的中小企业结合起来，为推动外向型产品服务。“火炬”计划将“863”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国家重点攻关计划中部分成果、基础研究成果、科技发明、专利成果等，经过进一步开发，使之形成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能力的高技术产品。“863”计划、攻关计划处于“火炬”计划的上游，两者都是指令性的

计划，“火炬”计划则是国家和地方两级管理的指导性的开发计划，是前两个计划的补充和延续。

6日　国务院发布印花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均作为应纳税凭证。纳税人根据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额。具体税率、税额的确定，依照本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条例》自1988年10月1日起施行。

8日　国家对名烟生产实行计划单列

国家放开名烟价格以后，需要生产出更多的名烟以进一步稳定市场。为此，烟草专卖局决定调整名烟的计划产量，对名烟生产实行计划单列，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名烟缓解市场的紧张状况。在促产名烟的措施中，除了对名烟生产实行计划单列外，国家还将优先供应名烟生产企业的原辅材料和安排技改等。8月1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还发出通知，严禁计划内烟厂以任何形式支持计划外烟厂生产，不准各级烟草公司销售计划外烟厂的产品。

宝山钢铁联合（集团）公司成立

经国家体改委批准，宝山钢铁联合（集团）公司宣告成立。这个集团以宝钢为主体，参加的有国内工业、科研、金融、外贸等行业的50个单位。我国四大银行上海分行及中外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福建中国国际钢铁制品有限公司也参加了这个集团。这是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技术、装备、人才优势的经济联合体。

11日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控制货币稳定金融措施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控制货币、稳定金融几项措施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的措施包括：（一）进一步调整信贷结构。（二）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控制货币、信贷总规模。（三）增加货币回笼，扩大资金来源。（四）努力挖掘资金潜力。（五）督促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六）各地银行对自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律不准发放贷款，已经贷款的要坚决清理，逐步收回。同时，严禁变相用银行贷款搞自筹计划外项目。（七）今年国家确定发行的基本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和国家建设债券，各地区、各金融机构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如数完成。（八）正确引导资金市场，搞活短期资金融通。同时，要引导企业发行股票、债券，进一步开辟和扩大股票、债券流通市场，搞好有价证券的转让。

国务院在批转报告时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货币、信贷的集中管理，调整信贷结构。对农副产品生产和收购，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须的流动资金和国家计划内的重点建设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要予以保证。对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与大企业争原料的小纱厂、小烟厂、小炼油厂等企业，要坚决停止贷款。通知严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任何部门都不得以任何名义成立或变相成立金融机构，办理存款、贷款等业务。

15日　劳动部等要求把劳务输出作为贫困地区开发重点

劳动部和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劳动部门把充分利用贫困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组织劳务输出，作为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一个起步产业来抓，搞好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工作。按照"东西联合，城乡结合，定点挂钩，长期协作"的原则，组织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劳动部门要有计划地从贫困地区吸收劳动力。还要主动与对外经贸部门取得联系，争取派遣出国劳务的机会。

15日—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一方案是在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制定的。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决定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的系统方案。从6月2日起，中央责成专门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今后五年特别是明年的价格、工资改革和配套措施问题。7月11日，赵紫阳同志主持专门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了讨论。根据讨论意见，有关机构又进行了测算、修改。8月5日至9日李鹏同志主持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

22日　国务院批准改革银行结算方法

国务院同意并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银行结算的报告》。《报告》提出对银行结算制度作以下改革：放宽开户条件。个体工商户持有营业执照，城镇承包单位和农村承包户、专业户持有承包协议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银行或信用社都要允许开立账户。发展信用支付工具，大力推广使用票据，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试办信用卡。废止不适应的结算方式，拟对托收承付、现行的国内信用证、付款委托书、托收无承付、保付支票和省内限额结算六种结算方式予以取消。改进现金管理，除转账结算起点以下可以使用现金外，都必须实行转账结算。

30日　国务院明电紧急通知稳定市场平息抢购风

针对双轨制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后，中央下决心闯价格关，理顺价格，加快改革步伐。国家提高了粮食合同定购的价格，较大幅度地上调棉花收购价格以及煤、原油、电等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四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这种以给居民价格补贴来放开价格的做法缓解了这几种商品价格购销倒挂的矛盾，但是工资和价格挂钩，带来工资和价格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5月份以后，彩电价格也实行了

浮动。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于7月28日在全国统一执行。物价上涨的势头给群众造成了心理预期。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当天，全国各地出现抢购，进而各地出现挤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36.2亿元，比去年同月猛增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增长13%左右）。其中消费品零售额552.5亿元，增长39.5%；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83.7亿元，增长3.3%。这次抢购风潮的特点是：（一）来势迅猛，波及面大。抢购风自8月中旬在少数地区掀起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城市和一部分农村。（二）持续时间长，抢购商品范围广泛。（三）购买数量大，销量剧增。如：洗衣机销售增长1.3倍，电视机增长56%，电冰箱增长82.8%。（四）抢购的盲目性大，被动性强。(37) 参与抢购者遍及社会各阶层。受抢购影响，8月份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大大超出储蓄存款增长70.3%的幅度。各地反映，部分商品库存已超出最低警戒线。

8月30日，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认真讨论了当前的市场和物价形势，明电向全国发出《关于作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通知》针对一些地方出现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主要内容如下：（一）经中央政治局第十次会议原则通过的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中所讲的“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完善之中。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要据此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除疑虑。（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决定。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各地一律不得擅自提高。企业不得违反规定乱涨价。（三）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3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四）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建缓建一批楼堂馆所项目，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抓紧清理整顿公司。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要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停止贷款。（五）要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粮、棉、油的合同订购任务要确保完成，在粮食增产和丰收的地区要力争多收购一些议价粮油，棉花的收购与经营，由供销社统一经营，不开放棉花市场。

31日　国家对食盐实行计划管理

轻工业部、国家计委颁发《关于食盐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办法》明确，食盐是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商品，由轻工部委托中国盐业总公司行使分配调拨权。盐的产销均应保持合理的食盐储备。

国家编委批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三定”方案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三定”方案确定的主要职责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全部国有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其他国有资产行使管理职能，重点管理国家投入各类企业的国有资产，优化国有资产管理，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维护国有资产使用单位或人员的合法权益。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行使国家赋予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

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国家投资和收益权、资产处置权。

9　月

1日　人民银行提高城乡居民定期储蓄存款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提高城乡居民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调高银行各项贷款利率。半年、1年、3年、5年、8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分别由调整前的年息6.12%、7.2%、8.28%、9.36%和10.44%提高到年息6.48%、8.64%、9.72%、10.8%和12.42%。并增设2年期定期存款档次，利率为年息9.18%。其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整存零取、定活两便、华侨人民币储蓄等存款利率也都相应提高，同时把企业、事业单位的存款利率也提高到与个人储蓄存款利率相一致的水平。银行各项贷款利率的调整是：将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由调整前的年息7.92%提高到9%。1年期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由各专业银行在计算复利后不超过9%的限度内自行确定。固定资产贷款利率，1年以内（含1年）、1年以上至3年（含3年）、3年以上至5年（含5年）、5年以上至10年（含10年）的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分别由调整前的年息7.92%、8.64%、9.36%和10.8%分别提高到年息9%、9.9%、10.8%和12.6%。

3日　人民银行开办长期保值储蓄存款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9月10日起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并为此发布公告。《公告》明确，全国各银行、城市和农村信用社以及邮政办储蓄等部门对城乡居民个人3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均予以保值。具体保值措施是：人民银行规定的现行利率不变，对3年、5年、8年期的储蓄存款，在现行利率的基础上，按照储户所得利益不低于物价上涨幅度的原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零售物价指数，公布全国统一的保值贴补率。长期储蓄存款的保值贴补率跟随物价浮动，如果出现物价指数下降到银行规定的3年、5年、8年定期存款利率以下时，仍按原规定储蓄利率计息。实行保值措施后，如储户提前支取，仍按实存期限利率计息，不予保值补贴。保值储蓄存款到期后不取，从存款到期日至提取存款日按原利率计息，不予补贴利息。

5日、12日　邓小平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和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7日　我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性气象卫星

这颗命名为“风云一号”的气象卫星，是在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

运载火箭发射的。它是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星上装有两台甚高分辨率扫描辐射仪，共有5个探测通道，可探测白天和夜间的云图、地表图象、海洋水色图象、水体边界、海洋面温度、冰雪覆盖及植被生长。卫星主要任务是获取全球的气象信息，并向全世界气象卫星地面站发送气象资料。此外，这颗卫星还具有探测空中粒子成分的功能，为空间物理研究提供资料。"风云一号"卫星正式投入试用后，对于提高我国天气预报水平，特别是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能力，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有重要意义，

8日　国务院颁布现金管理条例

为改善现金管理，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国务院制定并发布《现金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国家鼓励开户单位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采取转账方式进行结算，减少使用现金。各级人民银行负责对开户银行的现金管理进行监督和稽核。开户银行负责现金管理的具体实施，对开户单位收支、使用现金进行监督管理。机关、团体、部队、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购置国家规定的专项控制商品，必须采取转账结算方式，不得使用现金。具备条件的银行应当接受开户单位的委托，开展代发工资、转存储蓄业务。《条例》自1988年10月1日起施行。1977年11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现金管理的决定》同时废止。

国务院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在成都宣布成立

国务院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是一个专司长江流域水土保持方面的权威机构。长江上游地区共有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北8个省区，总土地面积100.5万平方公里，最新统计表明，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5.2万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1/3以上，其中30%多的面积流失情况严重，每年侵蚀物总量约15.6亿吨，与黄河流域相似。8个省中尤以四川、云南、贵州、甘肃、湖北的情况最为严重。因此，新成立的水土保持委员会以这5个省的省长、5位副省长以及与水土流失治理密切相关的国家计委、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中国科学院等7个单位的15位副部长、主任、司长和局长组成。

9日　国务院发布筵席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第21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施行日期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暂行条例》规定，凡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饭店、酒店、宾馆、招待所以及其他饮食营业场所举办筵席的单位和个人，为筵席税的纳税义务人。筵席税按次起征，税率为15%—20%。筵席税的征税起征点为，一次筵席支付金额人民币200—500元；达到或者超过起征点的，按支付金额全额计算征收筵席税。承办筵席的单位和个人，为筵席税的代征代缴义务人。代征的税款上缴地方财政。

12日　邓小平谈中央要有权威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谈到，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条件下提出来的。我们过去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

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14 日—27 日　我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

我国成功地进行了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从 9 月 14 日开始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试验，9 月 27 日全部结束。这次试验的运载火箭，是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从水下发射的，火箭准确溅落在预定海域，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5 日—21 日　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会议认真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配套措施，会议认为，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工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改革。明后两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会议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了坚决抑制通货膨胀、深化改革的若干重要政策建议。赵紫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作讲话，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作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说明。

24 日　国务院决定开展全社会固定资产清理工作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为价格、工资改革创造条件，国务院决定开展一次全社会固定资产清理工作，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这次清理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又要调整投资结构。要保证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和农业等短线产品项目，压缩一般加工工业长线产品的项目；保证计划内安排的、各方面配套条件已落实的项目，停建计划外项目；保证必须的生产性建设项目，压缩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项目；保证重要引进技术、列入国家计划的重大企业改造和生产市场急需产品所必需的技术改造项目，压缩一般技术改造项目。

《通知》规定下列基本建设项目应当停建；一、国家下达的 1988 年基本建设计划以外的大中型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材料和生产所需燃料、动力、运输条件安排不落实的，或市场不急需的，或以银行贷款当作自筹资金的国家计划内大中型项目；国家下达的 1988 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规模以外的小型项目。二、国家下达的基本建设计划内的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和农业在建大中型项目，凡生产建设所需条件安排不落实的，要放慢速度，落实条件；在今年年底以前仍不能落实的，要停建。

《通知》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和城市建设项目的清理作出以下规定：楼堂馆所除旅游宾馆可按计划适当建设一些中低档项目外，其他项目，一是今年开工新建的一律停建；二是从 1988 年起，3 年内不开工新建。城乡建房开工面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按 1987 年开工规模的 80%作为控制指标。旧城改造从 1988 年起 3 年内停止进行；城市道路，拆迁大量房屋进行的道路拓宽和新建道路，一律停建。文化、商业等各种名目的“一条街”一律停建。

25 日　国务院组织开展 1988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这次检查的问题主要是：非法侵占、偷漏、截留、私分应缴国家的税款和收入，以

及虚报亏损、骗取国家财政补贴；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和法规，乱涨价，乱收费，钻“双轨制”价格的空子，高价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或以物易物，非法牟取差价收入；滥发奖金、补贴、实物，用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擅自购买专控、禁购商品或超过控购指标购买商品，任意扩大消费基金。检查的重点是，中央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企业和其他大型企业；各类公司；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和有罚没收入的机关单位。经过大检查，共查出各种应上缴财政的违纪款金额 74.1 亿元。

26 日—30 日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央政治局作的报告。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全会指出，深化改革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在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中，应当特别注重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明年企业改革必须抓紧。一要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二要认真完善承包制，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和发展企业集团试点。

全会强调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总方针、总政策。

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 5 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

27 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控制货币，稳定金融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控制货币、稳定金融几项措施报告的通知下达后，有些地区仍然不够重视，措施不力，效果不明显。货币投入仍然过多，贷款增加较猛、储蓄滑坡的情况没有显著改变。为此，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的决定》提出的主要措施有：银行货币、信贷必须控制在核定的指标之内，重点支持职工工资和国家规定的奖金、补贴的支出、群众提取储蓄存款的现金支出、农副产品收购包括外贸出口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流动资金贷款。除此之外，银行都要严格控制。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凡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户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各类公司等，提取工资、奖金、补贴等消费基金一律维持在 8 月份的水平上，超过部分银行不支付现金；各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必须立即停止对国家计划外项目、非生产建设性项目和自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严格控制流动资金贷款；全国各级各类信托投资机构一律停止发放信托贷款或投资，一律停止拆出资金。

国务院作出加强粮食管理、稳定粮食市场的决定

由于一些主要商品粮产区受灾较重，对粮食安排带来很大困难。为了加强粮食管理，稳定粮食市场，国务院决定：一、国家粮食储备和周转库存，粮权属于中央，必须服从统一调度，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有粮不调。必须以严格的纪律保证国家粮食调拨任务的完成，对不按计划如数调出粮食的，要追究省长的责任。二、从今年秋季开始，大米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国家对省间“议转平”大米调拨实行指令性计划，并规定合理价格，调出地区必须保证完成。对北京、天津、上

海、广东、福建需要调入的议价大米，由商业部统一组织地区之间调剂和协调；其余省间议价大米的调剂，由主产省组织批发市场和交易会进行，调入地区不得自行派采购员到产地抢购。三、逐步建立粮食批发市场，有秩序地组织市场调节。要建立在国家领导下的小麦、玉米、大豆批发市场，组织产销直接见面。省间调剂必须进场成交，价格由供求双方议定。四、加强粮价管理，合同定购的粮食，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价格收购，不准擅自提价和增加价外补贴。议购的粮食，应略低于市价。在粮价暴涨时，要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五、压缩平价粮销售，逐步做到平价粮食收支平衡。为维持市场稳定，粮食压销的步子不宜太大，应逐步进行。

国务院发布基金会管理办法

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的活动宗旨是通过资金资助推进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发展。为了加强对基金会的管理，以利于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基金会管理办法》。由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项基金管理组织，不适用本办法。

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基金会的基金，应当用于资助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事业，不得挪作他用。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20%。国外捐赠给基金会的外汇，归基金会所有，允许开立外汇存款账户。国外捐赠给基金会的物资，免征关税，归基金会所有；基金会有权将其作为资助，无偿转让给与其宗旨有关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但不得出售。

国家统一城镇土地使用税

为合理使用城镇土地，调节土地级差收入、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决定从 1988 年 11 月 1 日起，国家开征城镇土地占用税。税率依所占用土地位置不同实行差别税率，按平方米计算的征税额，大城市为 0.5—10 元，中等城市 0.4—8 元，小城市 0.3—6 元，县、建制镇和工矿区 0.2—4 元。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由财政部另行规定免税的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等免缴土地使用税。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土地使用税 5 年至 10 年。《条例》自 198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各地制定的土地使用费办法同时停止执行。

28 日　国家对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

为了制止多头插手倒买倒卖，解决市场、价格混乱的状况，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务院决定从 1989 年 1 月 1 日起对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国家委托商业部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各级供销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对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农药厂、农膜厂生产的农药、农膜，凡纳入统一分配计划的，由专营部门统一收购。非统配计划的品种，原则上实行当地专营部门与工厂合同订

购，也可实行联销或代销。进口化肥、农药、农膜（含原料）由国家实行计划管理，由经贸部的有关进出口总公司按国家计划统一对外订货。国家储备化肥、农药、农膜由中国农资公司和省（区、市）供销合作社两级专营单位承担，储备数量由国务院或省级政府审定，并逐步建立农药经营储备风险基金制度。

化肥、农药、农膜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国家统一分配的化肥、农药、农膜计划，由国家计委下达。地方的分配计划，由地方计委下达。

国产大、中型化肥厂生产的优质肥和进口肥，由各地物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核定的出厂价、进口价和计划外同品种的进价以省为单位加权平均制订综合销售价。

10　月

1 日　天津铁路枢纽改造工程正式启用通车

经国家验收被总评为优良的天津铁路枢纽改造工程正式启用通车。包括改造天津客站、南仓编组站，增建北环复线，新建南曹联络线 4 个项目在内的这项国家重点工程，在不间断京山、津浦两大干线客货运输情况下，经过不到一年半时间全面竣工。至此改造后的天津站，客运能力由 46 对车增加到 95 对，新客站候车能力由原来的 1360 人增至 1 万人，货运能力也增加一倍以上。这项工程在中央项目由地方合资包建方面创造了新经验，使竣工期较国家计委的要求缩短了两年半，做到了效率高、投资省。

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清理整顿公司

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加强对商品流通的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决定》要求，这次清理整顿的重点是 1986 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通过清理整顿，主要解决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问题。各级机关均不得用行政费、事业费、专项拨款、预算外资金和银行贷款投资办公司。取消公司的行政职能。要求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全国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要求在年底前基本结束。

中办、国办规定严禁县以上党政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为了保持党政机关的清正廉洁，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更好地发挥老干部的表率作用，遵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在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机关在职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同时，中办、国办规定：党和国家机关的（离）退休干部，不得兴办商业性企业，不得到这类企业任职，不得在商品买卖中居间取酬，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倒卖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不得向有关单位索要国家的物资，不得进行金融活动；不得到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公司）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含名誉职务）和其他管理职务，企业也不得聘请他们任职。已经任职的，必须辞去职务。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可以应聘到非全民所有制的非商业性企业任职，但到本人原所在机关主管的行业和企业任职，必须在办理（离）退休手

续满两年以后。到这些企业任职的，要经所在机关（离）退休干部管理部门批准，并与聘用单位签订合同。

6日 国务院决定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施两种控制办法

为了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国务院决定，实行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管理办法。对于县以上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全民和集体企事业、基本建设单位以及职工在200人以上的乡镇企业、城市街道企业的社会集团购买力，由上级机关分配指标，按计划管理，实行直接控制；对于县以下的单位，包括职工在200人以下的乡镇企业和城市街道企业，由上级机关提出压缩要求，自行安排落实，实行间接控制。将现在的19种专项控制商品扩大到29种。不论实行直接控制还是间接控制，凡购买专项控制商品的，都必须报经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机关审批，到指定的商店购买；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购买。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会议审批制度。严格控制招待、交际费开支。各级人民政府要按规定清理各单位的小汽车和大轿车，对超编车辆和违纪购买车辆，一律没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重新制定职工劳动防护用品发放范围和标准，按金额进行控制。财政部、卫生部要改进公费医疗管理办法，堵塞漏洞，节约开支。

9日 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建成

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全部建设项目建成。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是我国“七五”期间重点工程项目，它是我国第一个直接以油田生产的轻烃为主要原料的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

16日 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实行计划单列

国务院的批复指出，深圳市是我国的经济特区，又是毗邻香港的重要沿海城市，在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进一步搞活深圳特区经济，加快实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国务院同意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包括财政计划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国务院要求深圳市实行计划单列后，广东省人民政府要继续加强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积极给予支持。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

本日凌晨5点56分，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次对撞成功。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这项被认为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最大的科研工程，是邓小平在1984年10月7日奠基破土动工的。这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和对撞成功表明，我国高能加速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它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这一消息在我国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高能物理学界也引起轰动，称之为高能物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8日 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为了加强对全国水资源统一管理和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撤销原来设立的全国水资源协调小组和全国水土保持协调小组。这个新成立的领导小组是国务院协调、审议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全国大江大河综合规划；处理协调省际的重大水事矛

盾；处理部门之间有关水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重大问题；审定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方针、政策和重点防治中的重大问题。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水利部，不另增编制。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水利部部长杨振怀任副组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任顾问。

20日　海南岛综合开发规划编制完成

这个规划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委国土局和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合作编制。它科学地分析和评价了海南岛的开发潜力，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海南岛开发的方向、目标、战略和项目，并进行了经济开发的布局。规划以2005年为目标年度，设定海南岛的经济发展目标：按1980年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从1985年的60亿元增加到344亿元，人均约4400元；国民收入从1985年的30亿元增加到150亿元，人均约1900元，稍高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

24日　邓小平谈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谈到，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卫星发射，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市场价格尚未完全稳住，一些商品的价格涨势未减。为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国务院决定：

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的价格一律不动。大中城市要由市长负责，增加肉、蛋、菜等主要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大城市的大路菜，要实行计划价格，不能放开。已对猪肉定量供应的大城市，定量供应部分不准涨价。同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棉纱、涤棉纱、棉布、涤棉布、食盐、食糖、民用煤、洗衣粉、肥皂、卫生纸、火柴等工业品，要安排好生产和供应，不能断档脱销。

坚决制止农用生产资料乱涨价。严格执行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的最高限价，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可由地方审批临时价格的规定暂停执行。对已经放开的工业消费品价格，要进行管理和引导。大中城市应选择一批比较重要的品种，实行工商企业提价申报制度。取缔中间盘剥，重点是整顿经营批发业务的各类公司。对重要的紧俏工业品和耐用消费品规定合理的流通环节，核定合理的进销差率、地区差率和批零差率，国营、集体和个体经营者（包括工业企业自销）都要执行。整顿城市公用事业和服务行业收费。国家统一安排的调价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调价范围、幅度和时间执行。各级政府和物价部门、业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物价管理权限办事，不得越权擅自调价或变相提价。《决定》要求，1989年的物价上涨幅度要明显低于1988年，

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

28日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建成投产

国内最长、最先进的轿车生产流水线在中外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建成投产。每天可装配上海桑塔纳轿车200辆。

29日　国家计委下发电力基本建设设备储备资金筹集办法

随着电力建设规模逐渐扩大，需要的设备储备资金越来越多，原来由国家财政承担全部电力基本建设储备资金的做法已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电力建设需要。为使今后电力基本建设储备资金有相对稳定可靠的来源，以利于电力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家计委制定并下发《电力基本建设设备储备资金筹集办法》。《办法》规定，自1989年起，电力基本建设需要的设备（包括国外设备）储备资金，根据"谁投资，谁储备"的原则，按照不同的投资渠道（包括各种投资），由投资方分别按投资比例承担。国家计划安排的中央基本建设基金投资、利用外资中的国家统借统还投资，以及中央财政实际发行的债券安排的投资其所需设备储备资金，由建设银行按现行办法供应。国家计划安排的银行贷款基本建设投资，所需的设备储备资金，由负责贷款银行在年度信贷计划中安排。煤代油基建投资，部门、地方发行债券基建投资，部门、地方统借自还、自借自还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等其他基建投资所需设备储备资金，均由项目主管单位按投资渠道和一定比例筹措相应的设备储备资金，专项存入建设银行，按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项目主管单位在安排年度基本建设计划时，必须同时落实相应的设备储备资金。设备储备资金的数额一般为投资的30%左右。如果设备储备资金不落实，又急需付款的，则从当年的基建投资中支付，并扣减相应的投资规模。建设单位或项目主管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设备订货合同支付设备款。如逾期不交，设备制造厂家有权按合同规定拒交设备。

国家编委批准邮电部"三定"方案

邮电部"三定"方案明确，邮电部是国务院主管全国邮电通信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制定全国通信行业发展战略、规划、方针政策；制定通信行业标准、通信网络技术体制和技术标准；制定通信业务资费政策和收费标准；审核非邮电部门经营公众通信业务的申请，维护国家对主要通信业务的统一经营权；审批专用通信网的设立，协调专用网与公用通信网的关系，保证通信畅通；定期调查国家通信网的通信能力、运行情况和通信需求；监督检查政策执行情况。

11　月

2日—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业，明后两年千方百计夺取农业丰收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充分重视和大力发展农业》的讲话。《讲话》强调，我们已经基本解决十亿人民的温饱问题，我国

农村正在逐步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当前的农村问题或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我国粮棉生产自1984年登上新的台阶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出现了新的徘徊。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继续下去，将会给改革、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与改善带来严重影响。解决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但首先还是要加深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这虽然是个老问题了，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进一步深化认识的必要。有这么几个观念必须明确起来：第一，决不能认为，我国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就变了；第二，决不能认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了，农业问题就解决了；第三，决不能用小农经济的思想去指导现代化农业的建设。

5日　秦皇岛耀华玻璃厂浮法玻璃生产线通过验收

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组织施工的第五条大型浮法玻璃生产线，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建成后，经过两年的试生产，经国家验收委员会考核，同意正式验收，并正式移交生产。这条生产线是国家“六五”至“七五”期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1984年10月动工，1986年10月投入试生产，日熔化量为450吨。

7日　国家对黄金矿产实行保护性开采

国家黄金管理局、地质矿产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务院批准对黄金矿产实行保护性开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9年中，黄金产量增长近一倍半，平均每年递增10%，9年累计产金量比前30年的总产量还多，产金超万两以上的县已发展到20多个，跨入世界主要产金国的行列。但是由于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个体采金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乱采滥挖，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也干扰了国营金矿的正常生产和矿山秩序。为加强对黄金矿产的管理，保护国家的宝贵资源，国务院决定：将黄金矿产列为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实行有计划的开采，未经国家黄金管理局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采，不再向个体发放黄金矿产采矿许可证；取缔个体选冶、加工黄金及倒卖黄金矿石等非法活动，查封所有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氰化池、小汞板和溜槽等黄金选冶点。

8日　国务院发布土地复垦规定

《土地复垦规定》适用于因从事开采矿产资源、烧制砖瓦、燃煤发电等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破坏的企业和个人。土地复垦实行“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与生产建设统一规划。《规定》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11日　国家严格钢材计划管理

为了整治钢材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促进钢材生产，稳定钢材市场，保证国家生产建设的需要，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钢材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决定，钢铁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所有企业必须按指令性计划规定的数量、品种、规格接受订货，严格按合同交货，不得拖欠。要把完成指令性计划作为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一项主要指标，对没有完成指令性计划而将产品自销的企业，要追究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其自销多得的收入由物价部门予以没收并对企业处以罚款，上缴国家财政，这样

的企业不能评为先进企业。钢铁企业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所需的燃料、电力、炉料、运输等主要生产条件，有关主管部门按合同保证供应。对冷轧薄钢板、冷轧硅钢片、镀锡薄钢板、镀锌薄钢板实行专营。对部分计划外钢材实行定点定量供应。

17日　建设部决定整顿建设市场

近年来，建设市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建设项目开工权、工程发包权和资金、物资分配权等，索贿受贿、收取回扣或参与经营，从中牟取暴利。针对这些问题，建设部发出通知，决定从整顿建设市场秩序入手，带动整个建设领域的治理和整顿工作。整顿的重点是整“倒”治“贿”、清查违法经营，主要包括的内容有：纠正官商不分的问题；查处各种公司倒手转包转卖、牟取暴利的行为；查处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枉法肥私、索要回扣的行为；查处无证设计、无照施工等行为。

20日　水利部发布蓄滞洪区建设纲要

国务院批准水利部《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蓄滞洪区主要指河堤外洪水临时贮存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其中大多数历史上就是江河洪水调蓄的场所，在历次防洪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全国蓄滞洪区面积约有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000多万。为了合理和有效地运用蓄滞洪区，水利部在全面总结历次抗洪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个《纲要》，对蓄滞洪区的安全与建设作了原则规定，内容包括：基础工作，通讯与预报、警报手段，人口控制，土地利用和产业活动的限制，就地避洪和安全撤离措施等。

25日　国家编委批准国家旅游局“三定”方案

国家旅游局“三定”方案确定国家旅游局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国际国内旅游业，提出我国旅游业发展战略目标、方针政策，编制和组织实施旅游业发展规划计划，管理旅游业投资和利用外资，管理全国旅游资源的普查和会同开发利用，归口审批和管理旅行社、旅游涉外饭店等，并承担国家旅游事业委员会办事机构的任务，指导旅游全行业工作。

27日　国务院强调统一税法集中税权

为推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对进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和监督作用，国务院作出《关于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收管理的决定》。《决定》强调，国家税法必须统一，税权不能分散，统一税法的原则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而不能有任何动摇和变通；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照税法的规定纳税；任何地区、部门都不得截留、挪用、挤占国家税收。《决定》还明确，赋予税务机关必要的检查权，强化税务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力，切实保障税务人员正常履行公务，保障税务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28日　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国务院召开的这两个会议的主题是：按照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安排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讨论部署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对我国逐步摆脱通货膨胀的困扰，使改革健康深入，早日出现国民经济新局面具

有重要意义。李鹏总理主持会议并讲话。姚依林副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

会议提出明年计划安排要遵循的指导思想：第一，计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逐步消除经济过热，确保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力争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第二，切实压缩过大的社会总需求，实行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第三，合理调整结构，理顺经济关系，提高经济效益，避免在紧缩需求过程中出现经济滞胀现象。第四，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同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逐步建立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宏观调整体系。第五，计划安排必须瞻前顾后，考虑明后年和以后几年的衔接。

1989 年计划安排的主要轮廓：国民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率。通过切实控制需求，增加和改善有效供给，做到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务必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棉花生产有较大增长。要大力调整工业产品结构，坚决把过高的工业速度降下来。要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控制消费需求过快增长，努力安排好人民生活。合理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30 日　国务院发布审计条例

为加强对财政、财务收支以及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确定国家设立审计机关，对有国家资产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审计监督。《条例》对审计机关的主要任务、主要职责、审计工作程序、内部审计、社会审计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自 198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85 年 8 月 29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2　月

7 日　中央彩电中心通过国家验收

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主要建筑分播出区和制作区两个部分，是 1983 年 5 月开工的。主楼播出区和主楼制作区分别于 1986 年和 1987 年竣工，并陆续交付使用。

8 日　中国第一座探空火箭发射场建成

中国第一座用于科学研究的探空火箭发射场在海南建成。位于海南岛西海岸的这座发射场是目前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几个靠近赤道的火箭发射试验基地之一。

10 日　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建成投产

中国当代最大的水电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建成投产，总容量为 271.5 万千瓦，21 台机组，总投资约 60 亿元，年发电量相当于建国初期全国发电量的 3 倍以上。葛洲坝工程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1970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报告》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1981 年 1 月 4 日，长江截流成功。1981 年 6 月 15 日，大坝通航。1988 年 9 月 1 日，大江 1# 船闸试航成功。

11日　国家建立农业发展基金

国务院决定，从1989年起，逐步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国务院为此发出《关于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的通知》，规定农业发展基金由各级财政纳入预算，列收列支，专款专用。农业发展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一）从1989年开始，提高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收比例；拿出一个百分点作为农业发展基金。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七三”比例分成，并按规定用途使用；（二）从1989年起，乡镇企业税收，包括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和工商所得税，比上实际增加的部分，大部分用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三）已经开征的耕地占用税收入，全部用于农业开发；（四）农林水特产税收入，大部分用于农业投入；（五）向农村个体工商户及农村私营企业征收的税额比上年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农业投入；（六）从1989年起，从世界银行的贷款中划出25%左右用于农业，纳入国家计划，用于农业生产、大型水利和林业建设。以上各项措施，除比照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从预算外资金中征收的农业发展基金的大部分、耕地占用税收入的一部分由中央安排外，其余均由地方政府掌握。

国务院要求粮食合同定购增加挂钩化肥数量

近两年实行的粮食合同定购与供应化肥、柴油和发放预购定金“三挂钩”，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为了加快发展粮食生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继续实行“三挂钩”政策，并从1989年起，中央和地方都适当增加挂钩化肥的数量。挂钩的粮食合同定购数量仍按500亿公斤计算。分品种计：大米约188亿公斤，大豆22亿公斤，小麦170亿公斤，玉米120亿公斤。增加与合同定购粮食挂钩的化肥数量。根据中央1989年掌握的化肥资源情况测算，决定按照不同粮食品种分别实行挂钩，初步确定明年的挂钩标准增加到：每50公斤贸易粮，大米、大豆挂钩标准肥15公斤，小麦、玉米挂钩标准肥10公斤，其中，中央负担一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自有化肥资源情况确定。各地在确定了本地区的挂钩标准后，连同中央专项安排的挂钩化肥数量，一起向农民公布。中央对各省调出粮食的化肥补贴标准不变。供应与合同定购挂钩的化肥，仍按1988年的价格执行。

林业部推出全国造林绿化总体规划

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林业部推出一整套旨在保护和增加我国森林资源的总体规划。林业部制订的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的主要目标是：从1989年到2000年，在保证采伐基地及时更新的前提下，全国增加森林面积4.5亿亩，抚育中幼林4.5亿亩。实施这一目标的中心环节在于抓好面上各类造林的同时，营造一亿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和建设五大防护林体系。营造一亿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是经过国务院原则同意的一项林业重点建设工程。这项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向国家提供大量的木材，从而大大改变我们数十年延续的砍天然林、吃祖宗饭的状态。五大防护林体系是：被誉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的“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京津周围绿化工程、沿海防护林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一期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和平原农田防护林工程。林业部确定在1990年建成国家森林资源监测体系，1991年建成地方森林资源监测体系。今后将定期公布各类森林面积、蓄积和消长量，预测资源发展趋势。

12 日 我国最大重离子加速器建成

我国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在兰州建成，引出碳离子束。这是继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后，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中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建成将为我国重离子物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重要的实验手段，标志着我国的回旋加速器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将在世界科技界产生重大影响。这座加速器将作为国家实验室，实行客座研究员制度，建立博士后流动站。

15 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电力工业管理体制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将作重大改革，能源部正式推出改革方案：在现有以跨省电网为独立核算单位、集中统一基础上，所有省电网都实行独立核算、成为经济实体。这一改革方案是根据国务院制定的“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方针，在华东电力局改革试点两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增强电力企业的活力，调动各方面办电的积极性，以加快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按照上述方案，省电力局将改建为省电力公司，跨省网局将改为电力联合公司。省电力公司和联合电力公司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具有法人地位。各电力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也将进行配套改革：电力企业将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即：包上缴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按售电量提取工资总额；各类新建电厂均实行独立核算，电价要保证其具有还本付息的能力；实行调解电价。鼓励有调解能力的电厂调解，按其调解的能力和时间分档计价。

16 日 衡广铁路复线正式通车

我国南部运输大动脉衡广铁路复线正式通车。衡广复线工程于 1978 年正式动工，由于投资不足，曾被列为停缓建项目。1985 年底，国务院做出加快衡广复线建设决定，要求 1988 年底全线开通。它的建成将大大缓解京广铁路南段运输紧张状况，对湖南、广东以及华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总理李鹏专程赶赴剪彩，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世忠宣读了国务院对衡广铁路复线全线开通的贺电。

21 日 邓小平谈和平与发展问题

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谈到，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当前世界上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能够解决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 50 到 70 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作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夺取明年农业丰收的决定

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农业生

产出现了重大转折。它不仅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新的徘徊，棉花产量下降幅度较大，生猪生产也出现过波动。而人民生活消费、工业加工原料和外贸出口对主要农副产品的需求却增长较快，致使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已经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注。为了加快农业发展，夺取明年农业丰收，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十项决定，进一步明确：明年全国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不变，并适当提高合同定购粮食的价格；继续实行合同定购粮与平价化肥、柴油和预购定金“三挂钩”的政策，对粮食调出省的化肥补贴不变；稳定扶持棉花生产的各项政策，并采取措施进一步促进棉花生产的发展。计划内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投资要逐步增加。在利用外资方面，农林水建设项目应占有一定的份额。农业事业费和支援农业生产资金占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份额、地方财力用于农业的资金比例以及农业生产信贷资金比例也应有所增加和提高。要按照“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原则，多方筹集一些资金用于发展农业。从明年起，逐步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由各级财政纳入预算，列收列支，专款专用。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加强旅游工作意见

国家旅游局《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意见》明确，可以结合具体情况研究提出在国营、集体旅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具体计划和实施步骤。可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和不同的经营情况，采取不同的承包经营方式。凡有外汇收入的企业，要承包创汇指标，并制定相应的结汇管理办法。实行承包责任制要与改进企业管理、企业内部改革结合，完善劳动工资制度。

24日　国务院批准发布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和工业生产用水迅速增加，供水紧缺矛盾日益尖锐。为此，国务院批准发布《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决定从198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个规定强调，今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于40%（不包括热电厂用水）的城市，新建供水工程时，未经上一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不得新增工业用水量；城市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项目，应当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超计划用水必须缴纳超计划加价费，这项费用应从税后留利或预算包干经费中支出。

27日　国务院决定整顿税收秩序

国务院作出《关于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收管理的决定》。《决定》作为税收治理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强调必须以法治税，切实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税法，认真清理整顿减税免税。国家税法必须统一，税权不能分散，不许乱开减税免税的口子。

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土地管理法

该法经1986年6月25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并根据1988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该法对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的利用和保护，国家建设用地，乡(镇)村建设用地，以及土地管理和开发利用的法律责任等规定了明确的法律条文。该

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2年2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和1982年5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同时废止。

大秦铁路一期工程举行通车典礼

我国第一条重载单元双线电气化的现代化铁路——大秦铁路一期工程，经过7万多名建设者历时4年的艰苦施工，建成通车。李鹏总理出席典礼剪彩并讲话。修建大秦铁路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它西起大同东至秦皇岛，跨晋、冀、京、津四省市，全长653公里。一期工程从山西大同到河北三河县，长410.8公里。二期工程从三河县到秦皇岛，长242.2公里。计划1991年全线建成通车。近期运量5500万吨，远期为1亿吨。

我国最长的干线电气化铁路陇海铁路西线建成

国家"七五"重点项目——耗资11亿元的陇海线郑州至宝鸡段电气化技术改造工程宣告正式建成。至此，全长1187公里、横贯中国东西的陇海铁路西线，全部改建为电气化铁路，成为我国最长的干线电气化铁路。

31日　**1988年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概况**

1988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以1987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治理整顿方针为标志，我国由十年改革时期进入建国以来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发展方面有以下特点：

第一，社会生产持续增长，但工业发展速度过高。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9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2%；国民收入达到115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4%。粮食产量39400万吨，减产4.5%万吨。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2%，没有达到计划增长4%的要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0.7%，不包括村及村以下的工业产值则增长17.7%，大大超过计划增长8%的速度。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12.7%，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28.8%，个体工业增长46%，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增长97%。加工工业增长速度过高，超过了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增长速度和承受能力，工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

第二，投资需求继续膨胀，在建工程投资总规模大大超过国力可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314亿元，比上年增加673亿元，增长1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略有增长。但全国在建工程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约1.3万亿元。主要原因是新开工的非重点项目过多，预算外投资大量增加。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1543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其中：能源工业部门完成投资371亿元，比重由上年的22.5%上升到24%；原材料工业部门投资206亿元，比重由上年的14.62下降为13.4%；运输部门完成投资218亿元，比重由上年的15.3%下降为14.1%。当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主要生产能力有：发电装机容量999万千瓦，原煤开采3090万吨，原油开采1577万吨，铁路交付营业里程419公里。

第三，市场商品零售额大幅度增长，物价上涨过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440亿元，比上年增长27.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7.9%。各类消费品零售普遍增长。吃、穿、用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8.2%、21.4%和31.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则分别增长4.3%、7.7%和13.2%。受通货膨胀和抢购风影响，不少消费品零售额超常增长。

其中粮食增长8%，食盐增长20%，肥皂、洗衣粉增长20%以上，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分别增长20%—50%。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18.5%（其中12月份比上年同月上升26.7%），是我国实行改革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高的年份。由于物价上涨过猛，一年内相继几次出现较大的抢购风，致使市场商品短缺面进一步扩大。

第四，城乡人民货币收入有所增加，一部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1988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为1119元，比上年增长22.2%；农民人均纯收545元，增长17.7%，均超过国民收入增长幅度。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后，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2%，农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6.3%；。由于种种原因，城镇不同居民实际收入有增有减，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据13个城市抽样调查，有34.9%的居民家庭因物价上升造成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城乡居民储蓄8月份一度减少，经采取措施后开始回升。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380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32亿元，增长23.8%。

1988年对外经济贸易继续发展。全年进出口货物总额102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4%。其中出口总额475.4亿美元，增长20.6%；进口总额552.5亿美元，增长27.9%。扣除其他因素后，逆差30.9亿美元。

198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贯彻“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断发展和完善。1988年全民所有制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9024个。据对25个省、市初步统计，已有2000多个经营不善或微利、亏损企业被兼并。1988年底，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中，已有横向经济联合组织10804个。

二、价格调整迈出较大步伐。经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批准出台的价格调整和改革措施共有12项。其中主要有：煤炭按发热量计价平均每吨提价4元，原油每吨提价10元，工业用电每度提价0.2元；普遍提高粮食、油料、糖料的收购价格；各地先后提高4种主要副食品售价，同时给居民放发补贴；放开13种名烟、名酒价格；对部分进口物资实行代理价。

三、生产要素、金融和外汇调剂市场不断扩大。生产资料实行市场调节部分不断增加。据物资部统计，1988年企业计划外购进物资比重已由1987年的55.9%上升为67.7%。截至8月底，债券、股票发行额累计已超过900亿元；61个城市开辟了国库券交易市场。截至11月底，外汇调剂市场外汇调剂额达56亿美元。

四、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开拓性进展。中央确定广东、福建两省作为综合改革和开放试验区；新建的海南省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初步实施，取得效果。对外贸易全国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对几个行业实行外汇全额留成、放开经营、自负盈亏改革试点。

五、宏观调控体系有所改革。新组建的国家计委加强了间接调控职能和对产业政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对预算内投资开始实行基金制管理。实行了6种类型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银行利率水平有所提高，利率结构也有调整。

六、政府机构改革有所进展。基本完成了9个新部、委的组建和各部、委的“三

定”工作。结合投资基金制的建立，组建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6个专业投资公司，作为国家投资活动主体。

1988年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承包制不够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出现一定程度失控状态；市场秩序混乱；缺乏新的市场组织和完善的市场规则。

1988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

1988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共203项，其中新增项目（*）16项。

一、部委项目191项

煤炭（16项）　河北开滦矿区、山西古交矿区、山西大同矿区、山西阳泉矿区、山西潞安矿区、山西晋城矿区、内蒙古霍林河矿区、辽宁铁法矿区、黑龙江双鸭山矿区、江苏大屯矿区、安徽淮南矿区、安徽淮北矿区、山东兖州矿区、山东枣滕矿区、*黑龙江七台河矿区、河南平顶山矿区。

石油（6项）　辽宁辽河油田勘探和开发、黑龙江大庆油区油田勘探和开发、山东胜利油田勘探和开发、河南中原油田勘探和开发、新疆油田、华北油田。

电力（48项）　浙江云和紧水滩水电站、福建南平沙溪口水电站、福建闽清水口水电站、江西万安水电站、湖北宜昌葛洲坝水电站、湖南沅陵五强溪水电站、湖南资兴东江梯级水电站、广西巴马岩滩水电站、四川乐山铜街子水电站、云南罗平鲁布革水电站、云南云县漫湾水电站、贵州清镇东风水电站、陕西安康水电站、青海共和龙羊峡水电站、红水河天生桥坝索水电站、北京石景山电厂、天津军粮城电厂、河北宣化沙岭子电厂、河北石家庄上安电厂、山西大同新电厂、山西神头二电厂、内蒙古通辽电厂、辽宁锦州电厂、大连电厂、吉林热电厂、吉林前郭长山热电厂、黑龙江双鸭山电厂、黑龙江富拉尔基第二电厂、上海石洞口电厂、上海望亭电厂、浙江镇海电厂三期、江苏南通天生港电厂、安徽淮南平圩电厂、福州电厂、山东肥城石横电厂、山东邹县电厂二期、湖南耒阳电厂、浙江秦山核电站、贵州清镇电厂、甘肃靖远电厂、安徽洛河至平圩至繁昌五十万伏输电线路、徐州至上海五十万伏送变电工程、华中至华东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山西太原一电厂、*山西漳泽电厂二期、*浙江宁波北仑港电厂、*四川江油电厂、*天津大港电厂。

铁道（18项）　滨绥线、胶济复线、徐州枢纽、河北唐山机车车辆厂、南同蒲复线、大包复线、京广线、北同蒲复线及电气化、陇海线、湘黔线电化、贵昆线电化、鹰厦线电化、川黔线电化、大秦线（包括为大秦线配套装煤站）、商阜线、浙赣复线、天津枢纽、沪杭复线（包括杭州枢纽、钱塘江大桥）。

交通（14项）　大连港、营口港、秦皇岛港、烟台港、青岛港、连云港、上海港、南京港新生圩二期、宁波港、湛江港、黄埔港、京杭运河、西江航道整治、京津塘高速

公路。

邮电（8项）　北京邮政枢纽、北京十万门程控市话、天津市话网、上海长途电信枢纽、上海程控交换机生产线、上海声话网、广州市话网、京沪数字微波工程。

民航（3项）　陕西咸阳机场、长沙黄花机场、重庆江北机场。

钢铁（4项）　河北唐山钢铁公司、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及冶金配套工程、武汉钢铁公司、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二期工程。

有色（9项）　河津山西铝厂、内蒙古包头铝厂、江西铜业公司、河南焦作中州铝厂、贵阳贵州铝厂（包括三期）、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甘肃金昌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二期、西宁青海铝厂（包括二期）、宁夏青铜峡铝厂

黄金（1项）　*河南三门峡中原冶炼厂。

化工（9项）　天津碱厂、南堡河北唐山碱厂、潞城山西化肥厂、大连化学工业公司、江苏连云港碱厂、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寿光山东潍坊碱厂、格尔木青海钾肥厂、*河北矾山磷矿。

石化（7项）　黑龙江大庆乙烯指挥部、上海三十万吨乙烯一期工程、南京扬子石化公司、山东淄博齐鲁石化公司、河南洛阳炼油厂、银川宁夏化工厂、*广州石化总厂。

森工（1项）　湖南长沙人造板厂。

建材（5项）　大原平板玻璃厂、福建顺昌水泥厂、山东滕县鲁南水泥厂、陕西耀县水泥厂、*广东云浮水泥厂。

机电（4项）　上海电气联合公司、哈尔滨电站设备成套公司、*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科研部分）。陕西彩色显象管厂扩建工程。

汽车（4项）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重型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斯大尔项目、*南京汽车制造厂。

纺织（1项）　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二期工程。

国防军工（9项，略）

科学（5项）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北京科技活动中心、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北京中国专利局业务楼、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文化（1项）　北京图书馆。

教育（7项）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医科大学。

卫生（3项）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医院。

广播（2项）　中央彩电中心工程、*中央电视发射塔。

银行（1项）　保定造纸厂。

其他（5项）　北京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北京8371工程、亚运会工程、新华社技术业务楼、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地方项目12项

煤炭（1项）　安徽任楼煤矿。

电力（2项）　广东沙角电厂、广东黄埔电厂。

交通（2项）　天津港、辽宁沈大一级公路。

化工（2项）　杭州磁带厂（一期）、中原天然气化肥厂。

城市建设（2项）　上海延安东路过江隧道、上海浦东煤气厂。

轻工（2项）　上海铝材一材、*汕头感光材料厂。

文化（1项）　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

1989年

1　月

1日　国家调整耕地占用税分成比例

耕地占用税中央和地方分成比例由原来的对半分成调整为中央占30%，地方占70%。在调整比例后，中央让出的20个百分点给县，省、市两级不得截留。中央的收入任务各地必须完成，实际占用耕地而完不成上缴中央任务的用地方财政补足。

财政部对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缴纳矿区使用费作出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开采海洋石油资源交纳矿区使用费的规定》，要求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大陆架及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管辖权的海域内依法从事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应按规定缴纳矿区使用费。《规定》明确了矿区使用费按照每个油、气田日历年度原油或者天然气总产量计征，并具体规定了矿区使用费费率。

3日　国家税务局清理整顿减税免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清理整顿和严格控制减税免税的意见》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各地贯彻执行。国家税务局提出的具体意见包括：对原控制长线和某些特殊消费品以及“五小”企业中已经批准减免税的，一律从1989年1月1日起停止执行。对进口国内长线产品、市场价格已经放开的消费品和国家限制进口的产品，不得减免进口不节产品税、增值税。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一律不得减免生产环节的产品税、增值税。综合性公司、金融公司和流通领域公司的产品税、增值税一律不得减免，已经减免的停止执行。任何地方、部门一律不得越权自定或批准税收规定。

4日　国务院决定定期公布八项重要经济指标

国务院决定，从1989年起，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按月按季公布分地区的八项重要经济指标资料。建立这项统计发布制度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监管体系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强化计划、财政、银行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的充分发挥，增强经济生活的透明度，加强人民对国家重大经济活动的监督。定期公布的重要经济指标以及统计范围为：

1. 固定资产投资额。指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单位自年初至报告月止累计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2. 银行贷款余额及增加额。指银行贷款本期末余额及比年初的增加额。统计范围为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的数字除深圳外均不包括在地区数字内）。

3. 职工工资总额。指全民所有制单位、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及各种合营单位自年初至报告月止累计工资总额，包括各种奖金和津贴。指标解释和计算方法按国家统计局的规定执行。

4. 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报告期（自年初至报告月（季）止）工业企业按全部职工计算的用价值量表现的劳动生产率。统计范围为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6. 工业资金利税率。即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统计范围为全民所有制预算内工业企业。

7. 工业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可比产品是指去年正式生产过、今年继续生产的产品，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反映报告期生产的可比产品成本与去年同期对比的降低程度。统计范围为全民所有制预算内工业企业。

8. 工业能源消耗综合降低率。指报告期每万元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能源消耗量（折合标准煤）与去年同期对比的升降百分比。统计范围为县及县以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

10日　国家计委编制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纲要

为促进合理利用资源，更好地保护资源与环境，国家计委编制并印发《1989—2000年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个纲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积极筹集资金，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打破部门和地区限制搞横向联合、承包、租赁等，加强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

《纲要》规定，到2000年，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与利润分别达到110亿元和22—25亿元，废旧物资的回收总产值达到170亿元。其中煤炭行业有开采价值、具备开采条件的主要共生、伴生矿资源综合利用率要达到50%左右；重有色冶炼厂进厂原料中的伴生金属综合利用率要达到75%；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达到40%—50%；各类工业废水、废液中的有用物质要分别回收利用50%—60%以上；冶金行业的可燃气体、煤矿瓦斯、油田伴生天然气的利用率要分别达到近100%、80%和90%；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达到60%左右。

塔里木石油会战拉开序幕

新疆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沉积盆地，面积5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几个尚未进行全面油气勘探的大型沉积盆地之一。经国务院批准，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宣告成立，国家将投巨资全面开发塔里木石油。1988年新探明的石油地质储量和可采储量分别是5.4亿吨和4亿吨，比上年都有增长；新增加的天然气地质储量520亿立方米，可采储量300亿立方米，这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12 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

按照中央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的要求，为切实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管理，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的通知》，要求除外商投资企业外，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控制对外借款规模，凡未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自行对外借用各种形式的国际商业贷款，不得向我国在境外的机构和银行借款。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将借款存放在境外。如擅自签约借款，其合同不能生效，外汇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外债登记，银行不得为其开立外汇账户，借款本息不准汇出。对借用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未经国家批准，不得超过核准的余额。短期对外借款只能用于流动资金周转，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国外发行债券，必须在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内，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行债券的金融机构办理。借用外债的窗口，除国家已确定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以及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福建投资企业公司、海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十个窗口以外，今后不再批准对外借用外债的窗口。其他地区、部门、单位对外借用国际商业贷款，需逐笔或专项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

13 日　国务院批转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纪要

国务院向各部门、各地区转发了《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纪要》。1988 年 12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北京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期间，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会见了到会的地区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会议着重讨论了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国务院在转发《纪要》的通知中指出，沿海地区当前的任务是把坚定不移地抓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坚定不移地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结合起来，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整顿的决定，落实各项措施。要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和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大力发展“两头在外”，增加出口创汇，增加有效供给，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并在治理、整顿中认真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扎扎实实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14 日　国家计委限制国内消费和生产易拉罐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限制国内消费和生产易拉罐等一次性包装饮料具体实施措施的通知》，对易拉罐原、辅材料进口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国内销售易拉罐饮料实行限点销售；今后若干年内一律不准再以改造为名扩大易拉罐的生产能力，也不再审批以各种形式的合资、合营、租赁或外商独资的易拉罐建设项目。

15 日　国家科委等提出改革科研事业单位拨款和收益分配制度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局《关于深化改革科研单位事业费拨款和收益分配制度的意见》。《意见》提出，有条件的科研单位要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纳税后留用的纯收入用于事业发展和改善职工的生活待遇。创收较多的单位，应逐步走向经济自立。事业费完全自立的技术开发类型科研单位，实行经费

长期自理、自主使用。对这类单位纳税后留用的纯收入，在保证事业发展的前提下，国家不再规定事业发展、奖励、福利三项基金的比例和具体的分配形式。其中用于分配给个人的部分，可以搞浮动升级，也可以发奖金和建立津贴、补贴等。事业费部分自立的技术开发类型科研单位，实行奖励福利基金提取比例与减拨事业费幅度挂钩，以奖励福利基金占纯收入的50%为基数，事业费每减拨10%，奖励福利基金提取比例增加2%，奖励福利基金由单位自主使用，鼓励创收多的单位把更多的收入用于事业发展。对事业费部分自立和完全自立的科研单位，国家根据其减拨事业费的程度，给予相应的专项奖励。已经划为社会公益类型而又具有创收能力的科研单位，应积极挖潜，创造条件，逐步向事业费部分自立或完全自立过渡。这类单位按其事业费自立程度，享受与技术开发类型科研单位同等的待遇。难以创收的社会公益类型科研单位及某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单位，实行科学事业费包干，并在定编定员基础上，经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基本工资总额包干，增人不增钱，减人不减钱。同时，也鼓励这些单位积极挖潜创收。事业费包干结余和创收部分，在保证事业发展和完成科研任务的前提下，除提留不低于40%的事业发展基金外，其余部分由单位自主使用。

国家教委等提出高校开展社会服务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局《关于高等学校开展社会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意见》提出，高校开展社会服务，可以承包科技项目，参与科研协作，转让科技成果，开展技术、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可以接受委托代培学生，可以开放学校实验室，利用学校设备和技术条件对外服务；可以和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办厂，共同开发新产品或合作经营；可以办经济实体等，并提出了对开办这些服务减免税的意见。

卫生部等提出扩大医疗服务的意见

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物资局、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医疗卫生单位要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国家对医疗卫生单位的经费补助实行定额包干，节余按一定比例提留。允许从事业余有偿服务和有偿超额劳动。医疗卫生服务收费可以拉开档次。多余人员可以开展三产或工副业。

18日　我国七大江河整治规划基本完成

新华社报道，我国从1983年开始的新一轮整治开发大江大河流域及一些重要河流河段的规划工作基本完成，包括海河、珠江、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流域和长江等七大江河的规划报告和规划纲要。这些规划报告，提出了治理整顿和综合开发利用江河水资源的总体设想，其中包括水土综合平衡、梯级开发以及防洪、灌溉、航运、水力发电、水产发展、水资源保护等一系列措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规划工作不仅考虑经济效益，而且特别注意整治江河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平衡。

20日　国务院批准发布施行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在技术引进中受方和供方签订的工业产权转让或者许可合同、专有技术许可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含工业产权的转让或者许可、专有技术许可或者技术服务任何一项内容的合作生产合同和合作设计

合同、含工业产权的转让或者许可、专有技术许可或者技术服务任何一项内容的成套设备、生产线、关键设备进口合同，以及审批机关认为应当履行审批手续的其他技术引进合同等，不论供方国别和地区、受方资金来源和偿付方式，均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向审批机关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技术引进合同实行分级审批：由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直属机构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项目，其技术引进合同由经贸部审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省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主管机关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项目，其技术引进合同由同级授权审批机关审批；如果该项技术引进合同系委托跨地区的其他公司对外签订的，在征得委托方所在地的授权审批机关同意后，可以由签约地的授权审批机关审批。跨地区委托设在北京的公司（不包括北京市属公司）对外签订的技术引进合同，由经贸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从供方获得技术所签订的技术引进合同，属于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直属机构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由经贸部审批；其他的分别由授权审批机关审批。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5 年 9 月 18 日经贸部发布的《技术引进合同审批办法》同时废止。

国务院对铺设海底电缆管理作出规定

为维护我国主权和权益，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有秩序地铺设和维护海底电缆、管道，国务院制定并发布《铺设海底电缆管理规定》，自 3 月 1 日起施行。

21 日　国家建立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

为了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推广工作，加速科技成果向商品化、产业化的转化，按照技术开发推广经费管理办法的改革方案，国家计委、财政部决定建立各省、市的国家拨款与地方财政拨款相匹配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对基金实行有偿使用，并为此印发《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提出，基金的资金来源要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多渠道筹集，其主要来源有：地方财政的技术开发拨款；国家计委的技术开发拨款；原国家经委下拨的技术开发费回收部分；国家、地方银行的科技贷款；地方主持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拨款按规定的回收部分；本基金的回收部分。

基金主要用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优先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合作开发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密集、附加价值高的产品。企业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以及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新技术的推广，以国家制定的重点新技术推广项目计划为指导，优先支持推广节约能源、原材料，节水，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治理“三废”，安全生产等效益显著的新技术。开发推广农业增产增收技术。用于国家计委安排的少数的技术开发项目。基金实行有偿使用，可按一定利率收取基金使用费，企业归还基金和支付使用费，可用企业税后留利和超承包多得留利归还。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用自有资金或该基金项目实现的收入归还。

25 日　国家对彩电实行专营管理

彩电专营后的主要实施方法如下：彩电的计划指标由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生产计划由机电部负责编制，报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按现行计划渠道下达到地方政府和生产企

业；国产彩色显像管由机电部按彩电生产计划提出分配方案，报国家计委审定。彩电散件关键件的进口指标由国家计委、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根据计划联合上报经国务院批准后联合下达。整机进口计划由商业部组织编制。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和经贸部根据国家计划进行集中审批并核发进口许可证。根据使用中央外汇和地方外汇的不同，由商业部或地方商业主管部门按计划进行收购和批发，有条件的企业也可按分配计划进行批发。国家对彩电价格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定价，征收彩电特别消费税。

26日　财政部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作出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施行《关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形式主要分为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自收自支管理。没有稳定的经常性业务收入或收入较少的事业单位，实行全额预算管理，全额预算管理单位实行多种形式的预算包干、节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办法。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经常性业务收入，但还不足以解决本单位的经常性支出，需要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实行差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单位实行核定收支、定额（或定期）补助、增收节支留用、减收超支不补的办法。有稳定的经常性收入，可以基本解决本单位的经常性支出，但尚未具备企业化管理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自收自支管理，自收自支单位实行核定收支、增收节支留用、减收超支不补的办法。

2　月

11日　国务院批准南京、成都、长春实行计划单列

国务院决定，南京、成都、长春三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13日　国家设立外汇调剂基金

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1989年国家设立外汇调剂基金，以便通过该基金对外汇市场进行调节。

国家开设期货市场

经过国务院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联合考察调研，确定首先在吉林、四川、河南、武汉等地开设第一批期货市场，进行交易的主要是农产品以及钢材等生产资料。

15日　国务院批准发布施行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

国家科委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施行。该条例分别对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以及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合同争议的仲裁和诉讼、技术合同的管理等作出规定。

说明　已被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代替。

海关总署对沿海开放地区进出境货物管理作出规定

海关总署发布《沿海开放地区进出境货物的管理规定》。《规定》中所指“沿海开放城市”指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市区及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沿海开放城市待遇的其他城市的市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指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及沿海其他地区规定范围开放区的市区和重点县的城关区，以及安排以发展出口为目标的、利用外资建设的农业技术引进项目、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产品初级加工的上述市、县所辖农村。《规定》对以上地区的单位和企业在关税和工商统一税方面提供了优惠政策。《规定》自1989年4月1日起施行。

16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保险事业管理

鉴于保险业中存在的混乱现象，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保险事业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在全国经营各种保险、再保险业务的国家保险公司，是国家指定办理法定保险、外币保险、国营和“三资”企业保险以及国际再保险的机构。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力量达不到的地区，可根据需要建立少数保险企业作为补充，但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保险业务营业收入归地方财政，所得税、调节税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五五”分成的办法不变。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保险事业的主管机关，未经其批准，任何保险机构的成立均无效。

17日　国务院决定征集预算调节基金

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适当集中一部分财力为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国务院决定征集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并发布《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征集办法》，规定所有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各项预算外资金，所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都必须缴纳国家预算调节基金。调节基金按《办法》所列项目当年收入的10%计征。《办法》规定的可以免征调节基金的项目有：地方财政农（牧）业税附加，中小学校的杂费、勤工俭学收入，高等院校和中专基金，企业的大修理基金，煤矿维简费和油田维护费，林业部门的育林基金，以及其他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免征的项目。《办法》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19日　国家规范企业兼并行为

为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兼并工作，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并印发《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对企业兼并的原则、被兼并方和兼并方的确定、兼并的形式、被兼并方的资产评估作价、企业兼并的资金来源和兼并后的产权归属、被兼并方企业产权转让的收入归属、兼并后企业的财政税收管理等问题作出了11条具体规定。

国务院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清理项目领导小组和国家计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控制今年新开工项目，规定：除若干必须新开工的农业、林业、水利、教育、化肥、出口创汇、已签合同的涉外项目和住宅项目按规定报批外，7月底以前一律不得新开工。

《通知》决定适当集中新开工项目的审批权：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仍由国家计委

统一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小型和限额以下项目分类审批：总投资100万元以上的地方项目由省级政府审批，100万元以下的由省级计委或省政府授权审批。中央新开工项目由主管部门审批。计划单列市新开工项目审批权由省政府确定。1000万元以上的中央和地方新开工项目报国务院备案。这些办法限于今明两年治理整顿期间适用。

20日　**国务院组织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

为了整顿对外经济贸易秩序，加强对进出口商品流通的管理，保障外贸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务院下发《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对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包括外贸公司，工贸、农贸、技贸、军贸、地贸、边贸公司，综合贸易公司，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生产企业集团），经营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公司，认真进行清理整顿。主要解决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违法经营、业务脱节、经营紊乱等问题。按照《通知》的要求，除国务院直接授权承担某些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少数对外经贸公司外，其他各类对外经贸公司凡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一律取消其行政管理职能。凡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企业，经营混乱，经济效益很差，亏损无法弥补的，都应限期整顿，予以撤销、合并或取消其进出口经营权。

国务院决定加强捐赠物资管理

为进一步作好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物资管理，在治理整顿中严格控制高档消费品进口，国务院作出规定：各级机关不得接受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捐赠国家限制的机电产品要按国家规定限额审批，超过限额的不得批准。鼓励捐赠必需的生产资料，直接用于生产、文教卫及公用事业，可按海关的有关规定免税；鼓励捐赠现汇，经批准的可进入国家外汇调剂中心调剂。

国务院颁布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对进出口商品的检验、监督管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该法自1989年8月1日起施行。1984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同时废止。

22日　**技术改造引进项目减免税实行按指令性计划管理**

为贯彻国务院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加强税收管理的精神，国家计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局发出《关于技术改造引进项目减免税实行按指令性计划办理的通知》，对现行的技术改造引进项目减免进口关税、产品税（或增值税）办法作出补充规定，准许1989年1月1日以后正式列入国家下达的技术改造指令性计划规模内的技术改造引进项目才能享受减免税待遇，各主管海关一律凭各地方、各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才准予办理减免税手续。

25日　**国务院决定增加挂钩化肥促进粮食生产**

为增加粮食生产，国务院决定从1989年起，中央和地方都适当增加粮食合同订购挂钩化肥的数量：每50公斤大米、大豆挂钩标准肥由上年的3公斤增加到7.5公斤，小麦、玉米由3公斤增加到5公斤。

26日　邓小平谈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谈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正处于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稳定。

棉花收购实行调出调入包干办法

为扭转我国棉花生产连年徘徊的局面，调动棉农种棉积极性，国务院决定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同时实行棉花调出、调入包干办法，以逐步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产区必须保证调出，超产归省支配，减产不得少调，只能减少本省用棉。调入地方必须按计划用棉，不能向产区多要或自行采购。出口纺织棉较多的地方，应该坚持“两头在外”的方针，通过外贸部门进口一部分棉花。

东风8内燃机车通过国家鉴定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目前世界上6轴单机中功率最大的内燃机车之一——东风8内燃机车通过国家鉴定。这种机车由铁道部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主持设计制造，功率为4500马力，比美国的ND5机车功率还要大500马力。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内燃机车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3　月

2日　我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实行“双向选择”制度

国务院同意国家教委《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报告》，并为此发出通知，要求通过这项改革逐步把竞争机制正确引入高等学校。国家教委《报告》提出的改革目标是：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作为过渡性方案，先在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对边远地区和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行业及重点单位，在国家计划内安排一定比例，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就业。

国务院发布1989年国库券条例

发行数额55亿元，偿还期3年，年利率14%。

3日　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成立

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民间团体，依靠中外民间力量开辟扶贫第二渠道。李先念任名誉会长，项南任会长。

4日　国务院批转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

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安排主要是：（一）把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作为首要任务。（二）逐步建立有利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坚持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制度，同时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职能，专项贷款逐步转给专业银行，适当提高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和专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逐步将建筑税改为投资税，并根据产业政策实行差别税率。（三）抑制和引导消费，缓解分配不公，促进分配机制转换。进一步完善现有企

业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的办法；运用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提高储蓄利率，从1989年12月起，按月环比作为调整利率和储蓄保值的依据。鼓励居民购买债券、股票。大力推进住房商品化。（四）整顿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发育。（五）加强改革中期规划的研究。

北京国营企业出现首批登记失业者

北京市微电机总厂8名职工终止了同企业签定的劳动合同，回到社会待业。这是北京国营企业的首批登记失业者。

5日　国务院批准实施加强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为了减少和避免海外投资可能在经营上发生的风险，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这项办法规定，中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海外投资前，必须由外汇管理部门负责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这项管理办法共有17条规定，旨在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有利于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

国务院要求严格企业内部债券管理

为了防止盲目扩大投资和增加消费资金，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企业内部债券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企业发行内部债券，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利、有偿的原则，不得强行摊派。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非生产性企业一律不准发行内部债券。未完成购买国家债券任务的生产性企业，也不得发行内部债券。《通知》规定，企业发行内部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分级审批。企业发行内部债券所筹集的资金，一般只能用作补充流动资金。凡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其投资项目须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纳入国家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并相应核减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企业内部债券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限居民定期储蓄利率的40%。企业不得将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转为职工个人的内部债券。《通知》指出，股份制目前只能在小范围内试点。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准以试行股份制为名，擅自将国有资产折股分给经营者、职工个人和集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包括乡镇企业），不得擅自把集体积累的财产折股分给经营者和职工个人。

6日　国家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

1985年以来，有部分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精神，以各种形式试行了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为在推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同时进一步改进和逐步完善挂钩办法，国务院批转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国家对企业工资实行分级管理体制，即国家对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部门实行全地区、部门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总挂钩，总挂钩的工资总额基数、经济效益指标和基数、浮动的总比例，由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核定；地区和部门在国家核定的基数和浮动比例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不同企业实行不同的工资分配办法，审批其挂钩的形式、基数和比例。暂不能实行总挂钩的地区和部门，要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包干办法。地区和部门总挂钩的工资总额基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构成的规定，

原则上以本地区、本部门所属国营企业的上年工资总额年报数（不包括价格补贴和原材料节约奖）为基础进行核定，对个别情况个别处理。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基数，一般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础进行核定；如果上年实际完成数低于前三年平均数，则以前三年平均数为基础核定。地区和部门总挂钩的工资浮动总比例，以劳动生产率、人均税利和人均非农业国民收入的水平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工资税、利率等经济指标确定，以体现不同地区、部门之间企业经济效益高低和潜力大小的差别。经济效益增减1%，工资总额一般增减0.5%至0.75%。

7日　国家计委等要求加强和考核引进汽车产品国产化工作

为使汽车工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加强对汽车散件组装的管理和年度计划的审查，国家计委、机械电子部、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海关总署下发《关于加强和考核引进汽车产品国产化工作的通知》，明确：国产化率的计算方法仍按原国家经委进（1987）645号文《关于机电产品国产化率计算方法的暂行规定》执行。国产化的含义是用合格的国产件取代进口件，考核国产化率指标是指某一车型零部件实际取消国外订货的比例，或考核平均加权国产化率。进口散件指标要与规定的国产化率挂钩。

8日　国家计委等印发促进工程设计技术进步规定

为大力推动工程设计的技术进步，国家计委、建设部印发《关于促进工程设计技术进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从严格控制重复引进，努力提高国产化水平；设计软件实行有偿转让，加快商品化步伐；大力运用电算技术，提高装备水平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12日　国务院发布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

为了保障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正常运行，维护公共安全，国务院制定并发布《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对管道的安全保护、管道与其他建设工程相遇的关系处理等作出规定。

13日　国务院召开会议解决四大电网煤炭缺口问题

会议决定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一、对于四大电网所需煤炭出现的缺口问题采取优惠政策，由国家计委和能源部负责，分地区落实，实行计划、生产、运输合同一本账。二、各地区、各部门优先保证交通、能源、原材料等重点企业用电。国家计委、能源部要联合派出用电监督小组，严格监督各电网执行用电计划。三、责成有关部门制定电力调度管理条例，加强电力调度管理的法制化、公开化。

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第一期工程启动

沿海防护林北起辽宁的鸭绿江口，南至广西的北仑河口，大陆海岸线长1.8万余公里，包括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195个海岸线县（市、区），总面积为2510万公顷，其中岛屿县12个，面积为36万公顷。为改善沿海地区生态环境，林业部根据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把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列为全国重点防护林工程项目。这个防护林体系建设总工程量确定为355万公顷。1989年至2000年为第一期工程，工程量为249万公顷，完成之后全区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24.9%增加到34.8%；第二期工

程，时间安排在2001年至2010年，规划造林面积为107万公顷。

国务院发布种子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对种质资源管理、种子选育与审定、种子生产、种子经营、种子检验和检疫、种子储备等方面作出规定，自1989年5月1日起施行。

15日　国务院首次发布产业政策要点

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决定》提出的制定当前产业政策的原则是：第一，贯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加强宏观控制，指导市场发育，协调各方面行动，逐步缓解总需求与总供给、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第二，压缩和控制长线产品的生产和建设，增加和扩大短线产品的生产和建设。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第三，按照市场需求、产业关联、技术进步、创汇作用、经济效益等因素，安排好产业发展序列并制定相关的各项政策，明确支持什么，限制什么。同时，要妥善处理好重点产业与一般产业协调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生产要素存量调整与增量配置的关系，处理好产业总体配置与发挥地区优势的关系。第四，当前的产业政策要点是根据长远与近期结合、以近期为主的原则制定的。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将视经济发展情况，对产业政策作相应调整。第五，产业政策的制定权在国务院。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各地必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不能因局部和短期利益而破坏国家的整体和长期利益。第六，产业政策的实施，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纪律的手段，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计划、财政、金融、税务、物价、外贸、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必须目标一致，协同动作，各项调节手段和措施要相互配套。

《要点》提出了生产领域、基本建设领域、技术改造领域、对外贸易领域的产业发展序列，同时从信贷、税收、财政、价格、外汇管理以及铁道、交通、能源、物资部门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政策措施。

本决定主要是针对第一、二产业以及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服务部门制定的。

16日　国家计委要求加强小轿车销售管理

国家计委制定并印发《关于加强小轿车销售管理的实施办法》，对小轿车的经营单位、小轿车经营单位的经营范围、小轿车的价格管理等作出规定，同时决定实施关税优惠税率，促进轿车国产化、征收小轿车特别消费税等政策。国家计委为印发《办法》发出通知，并附《核定的全国小轿车经营单位名单》、《小轿车价格管理办法》和《国家轿车零部件横向配套基金的管理及使用办法》。

7月14日，国家计委、国家工商局印发《关于加强小轿车销售管理的补充实施办法》，提出了《第二批核定的全国小轿车经营单位名单》和《第一批核定的小轿车经营单位变更名单》。

20日—4月5日　第七后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李鹏总理"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工作

今明两年工作的重点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用2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努力实现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1）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2) 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3) 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4) 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5) 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6) 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当前治理整顿的重点仍然是压缩社会需求。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上年压缩920亿元，减少21%。严格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大力提倡和鼓励人民储蓄。金融和财政要实行紧缩的方针政策，继续抽紧银根，严控货币发行。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公司，切实加强物价和市场管理。在治理整顿中认真调整经济结构。集中力量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加强能够增加有效供给的产业和产品，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控制加工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使它们同基础产业的发展相适应。4月4日，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21日　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做“关于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与此同时，经济过热，需求过旺、通货膨胀逐步加剧，严重影响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稳定，影响城乡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和基本任务是：逐步消除经济过热，确保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力争农业有一个好收成。1989年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4%，其中粮食产量4.1亿吨，比上年增加1600万吨；工业生产增长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300亿元，比上年水平压缩20%，并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结构。国家预算赤字和货币发行量都要低于上年。通过切实抑制需求，增加和改善有效供给，做到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上年。该报告于4月4日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

1988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9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

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做1988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9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报告认为，总的讲，1988年预算执行情况是比较好的。根据现在的预计数字，1988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2587.82亿元，国家财政总支出为2668.31亿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财政赤字为80.49亿元。提请审议的1989年国家预算草案，财政总收入为2856.8亿元，比上年预计执行数增长10.4%；财政总支出为2930.8亿元，比上年预计执行数增长9.8%；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74亿元，比上年预计赤字减少6.49亿元。为了确保1989年国家预算的完成，1989年要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开辟财源，集中资金，大力组织各项收入；控制财政支出，压缩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深化财税改革，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对地方实行的各种

形式的财政包干办法；强化预算管理，严肃财经纪律。

23日　邓小平谈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谈到，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国务院决定加强有色金属管理

为促进有色金属生产，整治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限制不合理消费，控制出口，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需要，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强对有色金属的计划管理和市场管理。有色金属生产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任务；计划外产品接受国家计委和物资部的指导和监督；鼓励社会集资扩大有色金属生产，鼓励地方扩大有色金属生产，支持地方发展中小矿山。《决定》还要求进一步清理整顿有色金属经营企业，并加强有色金属市场的管理、价格管理，严格控制有色金属及矿产品出口，限制国内不合理的消费。

28日　上海30万吨乙烯装置点火成功

上海金山石化总厂30万吨乙烯装置由国内外集资建设，建设工期22个月。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除了30万吨乙烯装置外，还包括12万吨环氧乙烯/乙二醇，7万吨聚丙烯和250万吨常减压等四套生产装置，总投资达19.02亿元。加上金山上海石化总厂原有的11.5万吨乙烯装置经过改造，乙烯年总产量45万吨左右。

30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强工资基金管理

为贯彻中央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压缩社会总需求，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认真执行国家下达的工资总额计划，各基层单位要根据国家核定的年度工资总额，编制工资基金使用计划，经主管部门审核并经同级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后列入《工资基金管理手册》。开户银行据此监督支付工资。各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单位，只能在本单位进行现金结算的开户银行设立一个工资基金专户。《通知》强调，事关全局的工资问题，由中央、国务院通盘考虑、统一部署。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自行提高工资区类别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标准，以及增加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基本工资（包括津贴、补贴等）；无权自行决定减征或免征工资调节税、奖金税；无权动用其他资金或采取其他办法增加职21232资。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除应责令其立即纠正外，还要给予经济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

4　月

1日　设计单位工程承包扩大试点范围

鉴于设计单位实行工程总承包普遍在缩短工期、保证质量、控制和节约投资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物资部联合发出《关于扩大设计单位工程承包试点及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将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集团公司等31家单位列入试点单位，同时对设计单位总承包中的设计单位等级、投标竞争以及管理费、利润等问题作出补充规定。

2日　清理在建项目实行指标控制和考核

为了进一步搞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工作，把过大的投资规模压下来，使产业结构得到尽快调整，国务院决定，从1989年起，对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实行指标控制和考核。国务院将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考核指标和压缩投资的任务作为指令性指标下达，各地区要将控制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指标不得超过，压缩任务必须完成。各级统计部门要按季度将压缩投资规模完成情况在报纸上公布，以加强群众监督。

11日　国务院提供6亿元工业品以工代赈

国务院决定从1989年至1991年拿出价值6亿元的中低档工业品以工代赈，继续帮助贫困地区修筑道路、桥梁和人畜饮水工程。从1984年冬至1987年，国家拿出了价值27亿元的库存粮食、棉花、棉布，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公路、航道、桥梁和人畜饮水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受到贫困地区人民衷心的拥护。由于市场形势的变化，粮、棉、布已成紧俏货，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改用中低档工业品以工代赈，继续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基础设施。从1987年下半年以来，先在四川、江西、宁夏3省区进行试点，总金额为2500万元。

国务院批准调整部分行业基本建设银行贷款差别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从1989年2月1日起，人民银行调整各项存、贷款利率，并明确对部分行业的基本建设银行贷款项目继续实行差别利率。差别利率档次分为三档：第一档：农业、煤炭、原油开采、节能措施、港口、盐业和劳改劳教，按正常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下浮30%；第二档：电力、交通（除港口）、铁道、邮电、车船飞机购置、建材、森工和钢铁、有色两行业中的独立矿山项目，按正常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下浮20%；第三档：钢铁、有色、化工，按正常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下浮10%。对煤炭、石油开采、节能措施、电力、交通、民航、建材等行业的贷款项目实行差别利率后，超过基本建设“拨改贷”项目的利率部分给予贴息。对这些行业新贷款项目的差别利率原则上不再给予贴息。对凡是使用银行贷款或建设债券等安排的项目，建成投产后执行新电新价、新煤新价等市场价格。

12日　国家计委组织编制全国企业技术开发计划

根据国家编制“八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工作的总体部署，国家计委组织有

关方面的力量组织编制1989年、1990年与“八五”《全国企业技术开发计划》。按国家、行业、地区三个层次组织编制、实施这项计划，并把技术开发计划纳入各级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

《企业技术开发计划》是科技计划体系中相对独立的计划，它包括综合性、行业性和地区性三个计划层次。国家计委组织编制的《国家重点企业技术开发计划》为第一个层次；国务院工交部门组织编制的行业性的企业技术开发计划为第二个层次；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委（计经委）组织编制的地区性的企业技术开发计划为第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计划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形成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结构的《全国企业技术开发计划》。

在三个层次的计划中，第一个层次的资金来源，其国家补助部分靠国家计委掌握的科技三项费用和技术开发贷款支持。其中：国家补助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50%；国家补助资金中拨款与贷款比例，原则上各占50%；在其他资金落实后，国家补助资金再列入年度计划下达。国家补助资金中的拨款将实行有偿使用制，实行合同管理。第二个层次的资金来源，其部门补助部分主要靠国家计委分配给本部门的科技三项费用支持。第三个层次的资金来源，其地方补助部分主要靠国家计委和地方共建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以及国家计委分配给地方经委（计经委）的技术开发贷款支持。

国家建设陕西彩管生产基地

以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为主体、由14个成员单位组成的彩虹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成立。总投资为7.5亿元的陕西彩色像管总厂一期工程1979年4月破土动工，1982年12月正式投产，从此结束了我国自己不能生产彩色显像管的历史。原设计能力为年产彩管96万支，实际年产能力已达到128万支，截至1988年4月，已收回一期工程的全部投资7.5亿元。二期扩建工程总投资仍为7.5亿元，将形成年产彩管160万只的综合生产能力。

14日　我国确定海洋石油战略目标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提出我国海洋石油工业近期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按照这个目标，到1992年，我国应找到石油地质储量12亿吨，天然气1500亿立方米；原油年生产能力达到500万吨，天然气达12亿立方米。实施这个发展战略，将继续坚持和发展对外合作，坚持和发展自营的方针。针对广东、海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急需能源的状况，将继续引进外资，加强勘探，在南海西部，包括琼东南—莺歌海盆地和珠江口盆地海域，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一个海上大气区。积极开发我国沿海大陆架最大的沉积盆地——东海盆地的油气资源，争取早日实现对外合作。此外，还将选择对外合作的合适伙伴，开拓炼油化工新领域。

国务院批准收取无线电管理费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国家物价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在我国适当收取无线电管理费用。收取无线电管理费，是为了加强无线电管理，有效地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并有利于制止各地各自为政、乱收费用的现象。通知规定，设置

使用各类无线电台须缴纳注册登记费、频率占用费和设备检测费；生产、销售、进口无线电设备，须缴纳注册登记费和设备检测费；研制无线电发射设备应缴纳频率占用费。专用于战备、防火、防汛、防震等抢险救灾的电台，广播电视部门设置的实验台、对外广播台，以及业余无线电台，免收频率占用费。

25 日　煤电联营方案付诸实施

我国内蒙古伊敏河、元宝山两大露天煤矿的煤电联营工作开始。这两大露天煤矿的煤电联营是国务院批准的能源部《关于推行煤电联营的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务院批示中指出：推行煤电联营，特别是对低热值煤炭的开发利用实行联营，经济效益是显著的，也是符合改革方向的，应积极推进和支持。伊敏河、元宝山两煤矿都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比较充足的可供电厂使用的水源，煤矿与电厂的距离比较近，具有天然良好的煤电联营条件。国务院要求这两个露天煤矿要搞好煤电联营试点。实行煤电联营，应当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点面结合，逐步推开。

电冰箱出口实行“出一奖一”政策

经国务院批准，为尽快调动企业扩大电冰箱出口积极性，尽快提高我国家电出口创汇能力，加快货币回笼，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国家计委决定对电冰箱出口实行“出一奖一”政策，即每出口一台电冰箱奖励进口一台电冰箱压缩机指标用于组织生产内销。1989 年先选择五六个出口实绩好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试点。

29 日　邮电部等规定非邮电部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经营邮电业务

邮电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文，要求加强对邮电通信企业的管理，旨在扭转当前非邮电部门违反规定经营邮电业务、邮电通信秩序混乱的局面。文件规定下列邮电业务由邮电部所属企业统一经营：电信公用网的市内电话、长途电信、电报、无线电移动通信、无线电寻呼、数据传输、图文传真及电话号簿编印发行；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邮票的发行和集邮品的制作。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任何非邮电部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经营上述邮电业务。文件还规定，设立邮电通信企业应报邮电部审查同意后，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

5　月

2 日　国务院决定清理企业“三角债”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5 月份开始，由人民银行牵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联合，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企业“三角债”。全国工商企业相互拖欠的资金日益增多，形成的“三角债”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这次大规模清理“三角债”，重点帮助那些符合中央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进行清欠，做到“清理一点，解决一串”。清理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领导下进行。要通过这次清欠，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商业信用票据化。各专业银行可根据资金力量对企业的商业票据有选择地承兑或贴现，中央银行将有选择地进行再贴现。

5日　国家发行50亿元特种国债

为了集中财力支援国家建设，国务院决定发行50亿元1989年特种国债，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1989年特种国债条例》。《条例》规定：特种国债的发行对象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金融机构、企业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待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交通部车辆购置附加费管理机构。特种国债的本金偿还期为5年，利率为年息15%。特种国债采用分配认购方式发行。

11日　核电建设实行国家集中统一管理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核电建设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管理。《通知》明确，鉴于核电技术复杂，安全要求严格，涉及能源结构和合理布局等一系列问题，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核电建设必须由国家统筹规划。《通知》规定，核电建设必须纳入国家计划，由能源部统一规划和领导，授权和委托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实行统一管理，并对核安全管理工作负直接责任。

12日　国务院制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办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要求：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地区，其出让收入必须上缴财政。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40%上缴中央财政，60%留归地方财政。不论上缴中央财政还是上交地方财政的收入，都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专款专用。

土地开发利用纳入国家计划

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出《关于落实土地开发利用计划的通知》，要求各地今后必须在保护、利用好现有耕地的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发新耕地，不断补充耕地资源。各级政府要把稳定耕地面积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为了搞好土地开发利用，从今年起将土地开发利用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凡建设占用农用地的地区，原则上均应承担开发新农用地的义务。建设用地要尽可能地利用荒地、废弃地等土地资源，以减少对耕地的挤占。

国家计委提出加强商品房建设管理意见

为加强对商品房建设和管理的宏观调控，国家计委针对存在的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了5条请示意见，包括：商品房屋建设计划是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组成部分，国家每年编制的全国商品房屋建设计划作为指令性计划，由国家计委下达，各地、各部门不得突破。商品房屋必须有计划的销售，不得计划外销售。商品房屋开发建设资金总额中，开发公司的自有资金不得低于年度投资工作量的30%，预收购房款，建成销售前不得超过全部建设工作量的70%。这些意见经国务院同意批转各地各部门执行。

31日　我国首座蓝晶石机动生产矿建成

我国第一座蓝晶石机动生产矿在河北省邢台县建成，填补了国内蓝晶石机动生产的空白。蓝晶石属无水铝硅酸盐矿物，是一种稀有非金属高级耐火材料。目前世界上只有4座蓝晶石机动生产矿。邢台县蓝晶石矿是继美国3家蓝晶石矿之后的第4家。邢台县蓝晶石矿由10个矿体组成，现已探明总储量为220万吨。经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鉴定，

产品已达到部颁标准。邢台县蓝晶石矿的建成投产，解决了冶金、化工工业生产中蓝晶石原料紧缺的状况。

6　月

9日　邓小平谈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他着重谈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展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10日　国际收支和综合外汇收支计划纳入国家计划

根据1988年8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国家计委要编制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计划，各地方计委也要编制本地区的外汇收支平衡计划，以进行综合平衡，做到心中有数”的决定，国家计委于1988年9月召开了“地方自有外汇收支、进口计划工作座谈会”，并于同年11月下发《关于编制地方、部门综合外汇收支计划和进口计划的通知》。根据存在酌问题，为尽快建立并逐步完善国际收支和综合外汇收支计划制度，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五条建议，并下发各地、各部门执行。《建议》提出，明确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为汇总编报本地区综合外汇收支计划的责任单位。其他有关单位有责任向计划部门提供编制计划所需的资料、信息和统计（包括外汇调剂），并接受计划部门的协调和综合平衡。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应尽快建立适合分级管理需要的综合外汇收支统计报告制度，作为计划执行的检查、反馈手段，并为计划的编制提供必要的资料、信息。综合外汇收支计划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往来各方面计划的综合反映和要求，对所涉及的贸易、外资等单项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具有指导作用。各地方、部门编制的综合外汇收支计划，由国家计委商有关部门同外经贸各单项计划衔接并综合平衡后，编制国际收支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报、下达。

14日　国务院发布外国商会管理暂行条例

《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外国商会是指外国在中国境内的商业机构及人员按照规定在中国境内成立，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的非营利性团体。外国商会的活动应以促进其会员同中国发展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为宗旨，为其会员在研究和讨论促进国际贸

易和经济技术交往方面提供便利。外国商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成立外国商会，应向中国国际商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报送经贸部审查同意，由民政部核准登记并签发登记证书后才能成立。外国商会必须接受中国有关主管机关的监督。《暂行条例》从7月1日起实施。

16日　邓小平谈解决经济滑坡问题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能象过去想的那么高。现在主要是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这次解决经济滑坡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城市防洪实行市长负责制

国务院就批转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建设部、水利部《关于加强城市防洪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80年代以来，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但忽视防洪的现象比较普遍，给城市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留下了隐患。《通知》强调各级城市要实行市长负责制，建立统一的防汛指挥机构和相应的办事机构，抓紧抓好城市防洪排涝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并且要及早动手，不得贻误。

20日　国务院批准福建划定台商投资区

国务院批准福建沿海划定台商投资区，鼓励台湾投资者从事土地开发经营和投资办厂。被划为台商投资区的是：厦门经济特区及厦门市辖的老林、海沧地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未开发部分（1.8平方公里）。

21日　国务院发行1989年保值公债

1989年保值公债发行总额为120亿元，债券偿还期限为3年，年利率随人民银行规定的3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浮动，加保值贴补率，外加1个百分点。保值公债利息自购买之日起计算，期满3年一次还本付息，不计复利，自1989年7月1日开始发行。

23日—24日　中共十三后四中全会产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班子

全会对赵紫阳作出了严肃的组织处理，并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所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要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领导职

务。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了中央书记处。

7　月

1日　我国农村经济年总收入突破万亿元

据农业部经济管理总站提供的资料，我国农村经济年总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这是家庭经营给农村经济增添了活力，是10年改革带来的巨大成果。1988年我国农村经济总收入的增长幅度是近几年增长幅度较大的一年。除西藏外，据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农村经济的年总收入（含乡村两级企业），共计达10467.6亿元，比1987年增长31%。农户家庭经营成为农村经济收入的主要成分，达6008.1亿元，占全国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7.4%。

我国农村经济总收入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非农产业得到迅速发展。1988年，我国农村二、三产业的收入达5676.2亿元，比上年增加1846.2亿元，占全国农村经济当年总收入增加额的58.2%。在非农产业中，各地主要发展了农村工业，其收入的增加额已占全国农村经济总收入增加额的46.3%。提高了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1988年，由于适当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使种植业的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其中粮食作物收入增长11.8%。据匡算，全国粮食作物因调价比上年增收102.6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增收12元左右。

3日　1988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受国务院委托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作关于1988年国家决算的报告。根据正式编成的1988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2628.02亿元，总支出为2706.57亿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财政赤字为78.55亿元。在1988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中，国内财政收入为2489.41亿元，完成预算的102.6%；国外借款收入138.61亿元，完成预算的108.3%。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2%，国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1.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增长7.9%，外贸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20.6%。

13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决定限制生产和使用建筑用铝门窗及铝装修品

国家计委、物资部、建设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联合发出关于严格限制生产、使用建筑用铝门窗及铝装修品的通知。针对近一个时期国内在建筑用铝门窗、室内、外装修、商店铺面及柜台方面兴起的铝装饰热，导致铝型材生产企业大量盲目发展的倾向，《通知》要求今后任何部门、单位和地区（包括乡镇企业）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新增建筑用铝门窗及铝装修品（包括柜台和桌椅等，下同）的生产能力和厂点，包括不再批准利用“三资”的新建或改造项目；禁止引进铝型材及铝门窗的生产线、单体设备；所有在建、改造的有关项目必须立即停止，并取消立项。《通知》还规定，对使用建筑用铝门窗及铝装修品的单位开征特别消费税。对不允许使用铝门窗及铝装修品的场

所，设计部门不予设计，财务部门在其工程预算中不予列支，施工及装修部门在建设中对带有铝门窗及铝装修品的部分不予施工。

20日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求认真作好稀土农用工作

稀土农用经过10多年的探索已经获得成功，积累了经验，但发展不平衡。为此，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农业部作出《关于认真作好稀土农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稀土农用分别纳入相关科技攻关、科技开发与应用推广项目和科技兴农计划，并在经费、物资等方面给予支持。

24日 建设部对施工企业资质管理作出规定

为了加强对施工企业的资质管理，保障企业依法承包和经营工程建设任务，维护建设市场的经济秩序，建设部颁布《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于8月1日起实行。《规定》明确，凡从事各种房屋建筑、土木工程、设备安装、管线敷设等活动的施工企业，均适用本规定。建设部归口管理全国施工企业的资质；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管理所属施工企业的资质，业务上接受归口管理部门的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的施工企业的资质进行归口管理。凡全民所有制施工企业、集体所有制施工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施工活动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联营施工企业、合资施工企业以及需要办理资质审查的其他施工企业，都应按照本规定进行资质审查。

25日 中国银行资本居世界第十二位

英国《银行家》杂志第7期公布了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名次。按资本排列，中国银行资本为100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12位；按资产总额排列，中国银行居世界第22位。1988年末，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5597亿元人民币，其中75%是外汇资产。

26日 我国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公布

历时5年（1984—1988年）的第三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林业用地面积为26743万公顷（折合40.11亿亩）；森林面积为12465万公顷（折合18.69亿亩）；森林覆盖率为12.98%；活立木总蓄积量为105.72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为91.41亿立方米。

与第二次（1977—1981年）清查相比，森林资源变化的总趋势是：森林面积有所增加，森林蓄积量持续减少，森林质量下降，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推算，只能采伐7至8年，届时，绝大多数国营森工企业将无成熟林可采。

林业部公布的材料还分析了森林资源的变化趋势：年消耗量超过年生产量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用材林，年消耗量竟超过生长量0.97亿立方米。这次清查表明，我国森林资源危机日益加剧，下狠心解决这一问题已刻不容缓。

27日—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抓好群众关心的七件事情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下大气力抓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采取措施坚决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进行斗争，提高党在群众

中的威信。根据这个决定，党和政府着重抓以下七件事情：

一、进一步清理公司，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

二、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进行流通领域的经营；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方便条件。

三、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供”，所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

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除政府已签定长期贸易协定和国家已经批准的技术贸易合同外）。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一律使用国产车。

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

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

七、严肃认真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22日　国务院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权限

近两年来，部分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试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在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权限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不利于土地管理。为此，国务院印发《关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权限的通知》，就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权限作出规定：

政府对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权限，应与行政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权限相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国家建设用地批准权限的规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权限为：耕地1000亩以上、其他土地2000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对一次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不得“化整为零”，变相扩大批准权限。

出让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的用地指标，要纳入国家下达的地方年度建设用地计划，未经批准，不得突破。

8　月

1日　全国开展个体工商税收大检查

国家税务局决定从8月份起，利用两个月时间，将在全国进行一次个体工商业户税收情况大检查。这次检查整顿的范围包括从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饮食服务、修理修配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检查重点是个体工商大户、经营情况变化频繁和纳税情况差的个体户。检查内容主要是个体户的税务登记情况；账务、票证情况；进货环节和批发扣税情况；个体户生产经营、购销存货情况和收入情况是否与本人申报相符，有无偷漏税问题等。

3日　世界海洋环漉实验中国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世界海洋环流实验是政府间海委会、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科学联盟等国际组织发起的一项大规模国际合作调查计划。从1990年开始，进行为期10年的全球卫星观测，以进一步了解全球海洋环流变化及其对全球气候影响的机制。世界海洋环流实验中国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交通部、国家气象局、国家海洋局等单位组成。

12日　联合国粮食署援助实施拉萨河谷开发计划

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34万吨小麦、558吨黄油用于西藏拉萨河谷的农牧林业开发。这是西藏首次接受联合国组织经济援助。

援助西藏的这一项目是1987年经世界粮食计划署批准立项的。1988年5月，该署官员来藏实地考察、评估，初步确定拉萨河谷项目规划区为5163平方公里，开发建设规模为21个分项目，分两期执行，5年完成，发展灌溉，平整土地，植树种草等。1988年7月，正式签署协议并开始实施。项目实施期间，拉萨1.2万余农村剩余劳力获就业机会，27万人次得到专业技术培训。期间使用的1240万个工日，均由世界粮食计划署以所援小麦、黄油代账。

15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通报经济情况

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任务的汇报发言。国家审计局就康华等五个公司的情况向会议作了汇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上说，1989年1至7月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发展比较平稳，今后几个月的经济工作重点是三件事：继续稳定物价。争取全年农业的好收成，缓解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关于缓解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一是继续坚决压缩固定资产规模；二是坚决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银行和财政要继续坚持双紧的方针。今后几个月的工业生产既不要滑坡，又要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在资金能源等方面继续实行一定的倾斜政策，保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一些重点项目的正常进行。拿出一定资金解决重点企业的相互拖欠问题。关于改革开放措施，李鹏指出，四中全会以前已正式出台的各项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的措施，凡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或人大讨论决定的，有的还制定条例、法规和法律的，都要继续贯彻执行。凡是过去没有确定全面推广而是进行试点的改革措施，还可以进行试点。同时，还要提出一些新的题目加以研究。

15日—19日　第四次全国量火计划工作会议

第四次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兰州举行。大力发展区域支柱产业，实现星火燎原，是今后星火计划工作的主旨。这次会议对今明两年实施星火计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工作：(一)确立为发展支柱产业服务的方向，编制好今明两年的星火计划，制定“八五”发展纲要。(二)重视并认真抓好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动星火燎原。(三)努力筹措资金，保持星火计划的发展势头。(四)继续搞好培训工作。(五)搞好星火计划与其他科技计划的衔接与配合。(六)加强星火计划的管理和研究工作。(七)继续抓好星火计划的奖励与宣传工作。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对全国科技工作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和部署。第一

个层次是直接为当前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工作。国民经济建设中大量科技问题的解决，如攻关设计、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丰收计划、成果推广计划，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各项科技计划。第二个层次是以跟踪和发展高技术和新兴技术的“863”计划，以推动高技术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火炬计划，以及中央各部门制定的高技术研究发展应用计划。第三个层次是基础性研究工作。

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决定》强调，清理整顿公司，既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要通过治理整顿，坚决撤并一批不符合社会需要、重复设置、不具备开办条件、严重违法乱纪的公司，以及长期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重点是砍掉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流通领域中过多、过滥的从事商业批发、对外贸易、物资供应的公司和金融性公司。要通过清理整顿，认真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特别是查处社会影响大的有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的大案要案。并通过清理整顿，逐步建立健全公司的各项管理法规和制度，特别是财会、税收和审计制度。

23日　物资部等规定严禁用铜产品

为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改变用铜的不合理状况，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需要，物资部、国家计委、国家工商局印发《关于严禁用铜产品的规定》，提出了禁止用铜产品目录。生产出口商品不受《目录》限制。

27日　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明确职责划分

为了贯彻实施投资管理体制近期改革方案，根据国务院1989年第35次常务会议精神，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机构改革办公室就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职责划分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意见。国务院同意转发执行。《意见》提出：行业归口部门和投资公司按照各自的职责编制各自的计划；林业、邮电、交通等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分别审批；建设项目的管理，原则上由行业归口部门或地方负责；技术改造的专项贷款，原则上按现行办法管理。在投资公司的归口领导上，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4个投资公司由国家计委归口领导，行业归口部门参与指导，农业，林业投资公司由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归口领导，以国家计委为主。

28日　国务院确定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

在国家重点扶持的331个贫困县中，有少数民族贫困县141个，占42.6%，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贵州、云南、青海等14个省区。为了促进打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战，早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国务院提出目前需要解决以下几个特殊政策问题：

一、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在国家统一的产业政策指导下，可根据当地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细则和具体措施。

二、切实放开农副产品销售。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除国有矿山和国营农、林、牧场计划内产品、少数民族贫困县的合同订购粮食、棉花外，要坚持放开其他各种农、林、

牧、矿等产品销售；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粮食，可以1988年末实际完成的定购数为基数，一定四年不变，超基数的产品放开销售。

三、减轻负担，增强内部活力。继续减免贫困户的农牧业税；对没有偿还能力的贫困户所欠农贷可延长还款期限三至四年，并停止逾期罚息或实行停息挂账；贫困户免购国库券，尽量减少贫困县购买国库券任务；核定贫困县上交税收基数，超收全留。以1988年末上交省。自治区和中央的税收为基数，从1989年起到本期财政管理体制结束内，超基数部分全部留县。

四、设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集中用于每年解决一二十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群众温饱问题。每年的基金由下列方面的资金组成：(1) 从中央财政每年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的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专款中调剂一部分。(2) 从国家现在组织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大跨度联合开发的扶贫专项贷款中调剂一部分。(3) 141个少数民族贫困县所在省、自治区、地、州、盟，也应从地方财力中挤出一部分资金。此项基金由国家民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按项目进行管理，其使用不能撒胡椒面，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县搞些开发项目，搞些能增强自身活力的事业，决不能把钱挪作他用。

31日　王丙乾指出财政决策重要失误是忽视收支平衡方针

王丙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我国当前财政上的几个主要问题，认为财政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 企业的经济效益差，制约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1978年为16.9%，1988年降为8.7%；销售税利率1978年为26.7%，1988年降为18.9%。以上两个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要减少财政收入80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1979年的83.7%降到1988年的0.6%，产品积压严重，产成品资金占用额占定额流动资金的比重由1981年的18%增加到1989年上半年的25%。(二) 资金分散，“两个比重”下降过大。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由1979年的31.9%下降到1988年的19.2%。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198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7.2%，大大低于50年代70%左右、60年代60%左右的水平。(三) 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过多，超过了财政的承受能力。1988年，国家财政负担的各种价格补贴已达316.8亿元，与1978年的11.1亿元相比，平均每年递增39.8%，大大超过同期财政收入每年递增8.2%的幅度，1979年价格补贴只占国内财政支出的6.2%，1988年增加到12.3%。国家财政负担的国营企业亏损补贴，1988年已达446.5亿元，与1978年的124.9亿元相比，平均每年增长13.6%，也大大超过同期财政收入每年增长8.2%的速度，1979年国营企业亏损补贴只占国内财政收入的7.8%，1988年增加到17.9%。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项，一年使财政减收增支近800亿元，已经到了必须加以控制、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地步了。(四) 财政包揽过多，支出增长幅度过快。1978年国内财政支出为1122亿元，1988年增加到270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2%，超过了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全国出现市场疲软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0.7%，9月份下降幅度扩大到1.1%。如果剔除1988年8月、9月份抢购风的非正常因素，虽仍有所增

长，但增长幅度偏低。这种市场情况为改革 10 年来首次出现。

9　月

1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进一步搞好清理整顿公司四条措施

会议针对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委员们审议时提出的尖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搞好清理整顿公司的四条具体意见：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并充实和加强办公室的力量。二、清理整顿公司首先从国务院做起，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所属公司下决心清理整顿好。三、严格把关，该撤并的坚决撤并。重点是砍掉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流通领域中过多、过滥、过乱的公司。四、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决定中新提出的要求，抓到底，决不走过场。

国家统计局综述建国 40 年成就

经济建设日新月异。1950—1988 年，全民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 21538 亿元，4393 个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固定资产 15619 亿元。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约 50 倍，建立了航天、汽车等一批新的部门，形成了独立、齐全的工业体系。农业水利方面，新修堤防总长 17 万公里，水库 8 万多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44 万公顷，拥有农机总动力 2658 亿瓦特。交通运输方面，铁路营业里程由 2.18 万公里增加到 5 万多公里。全国除一个县外，均通了汽车。民航开通了 350 条国内国际航线。新建、扩建万吨级泊位 100 多个。邮电通信方面，邮路总长从 70.6 万公里增加到 500 万公里，其中航空邮路 30.9 万多公里。

社会生产迅猛发展。1953—1988 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7.1%，其中 1979—1988 年平均每年增长 9.6%。1988 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同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相比：纱为 10.5 倍，布为 6.7 倍，钢为 64 倍，原煤为 16 倍，原油为 428 倍，发电量为 91 倍，水泥为 92 倍，金属切削机床为 36 倍，粮食为 2；6 倍，棉花为 4.9 倍，糖料为 10.3 倍，水产品为 7.1 倍。钢产由 1949 年的世界第 26 位上升到第 4 位，原煤由第 9 位上升到第 1 位，原油由第 27 位上升至第 5 位，布、粮、棉、肉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近 10 年来，工业部门技改投资共 2400 多亿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上万项。

国内贸易繁荣兴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 1952 年的 276.8 亿元增加到 1988 年的 7440 亿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 7.3%。1981 年以来，进出口总额每年都超过 400 亿美元，1988 年突破了 1000 亿美元。

教育、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1952 年，全国居民平均实际消费水平为每人每年 76 元，1988 年为 639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 3.7%，其中 1979—1988 年，平均每年增长 7.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 1978 年末约 211 亿元增至 1988 年末的 3802 亿元。

国家计委等对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债券资金管理作出规定

为筹集重点建设项目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今年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和石油、铁道等

部门向个人或部分单位发行了基本建设建设债券和重点企业债券。债券债务人为国家投资公司、石油、铁道部门，债券资金由国家投资公司经营管理，通过建设银行办理拨款或委托贷款。为作好债券资金的管理工作，保证债券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国家计委、建设银行、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能源投资公司、交通投资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投资总公司发布《关于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债券资金管理的暂行规定》，提出，债券资金的解交，实行按种类"分别解交、统一入户"的办法，建设银行按照"先存后取、以收定支"的原则办理拨款和贷款。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视债券资金的用途，采取不同的分配、下达方式。

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城市消防规划建设管理规定

《城市消防规划建设管理规定》将城市消防安全布局和消防站、消防给水、消防车通道、消防通讯等公共消防设施纳入城市规划，与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城市消防规划由城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会同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与消防安全有关的城市规划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应当吸收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参加。该规定适用于城市的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以及独立工矿区的规划建设。

4日 邓小平谈冷静对待国际局势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5日 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成立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成立。田纪云任组长，邹家华、罗干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共12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9月5日召开的第一次小组会议上通过决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坚决撤并11类所属公司。

7日 我国实行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制度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环保局决定在全国全面实行排放水污染物申报登记制度，并逐步推行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制度，以解决我国水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这一制度要求：凡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均须在指定时间内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污申报登记手续，填写申报登记表，经批准领取排污许可证后方可进行排污活动。实行这一制度后，有关部门将首先确定区域内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再据此确定污染排放总量指标，然后通过颁发《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将排污指标以及污染物排放去向、排放方式分解落实到各个排污单位。企业排污若达不到总量控制的要求，则由有关部门采取限期治理，直至吊销《排污许可证》等方式进行处理。

11日 我国40年生产钢和铁17亿吨，钢产量跃居世界第4位

新华社报道，到8月底，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已累计生产钢和铁17亿吨。我国的钢产量已由建国初的世界第26位跃居第4位。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1952

年全国钢产量上升到135万吨。这以后的20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到1976年，产量只达到2000多万吨。十年改革开放，钢铁工业产值和钢产量年均递增速度虽然只有7%左右，而实现利税的年递增速度却高出产值和产量的一倍左右，钢产量从年产3178万吨增到5922万吨，净增2744万吨。

12日 国务院批准发布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为加强农业发展基金的管理，充分发挥资金效益，促进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制定《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施行。

农业发展基金包括以下六项：(一) 耕地占用税收入；(二) 从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中提出10%（即提高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收比例，拿出1个百分点）的资金；(三) 乡镇企业税收（包括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和工商所得税）比上年实际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四) 农林水特产税的大部分；(五) 向农村个体工商户及农村私营企业征收的税额比上年增加部分中的主要部分；(六) 各地确定从粮食等农产品经营环节中提取的农业技术改进费和纳入基金管理的其他资金。

农业发展基金的使用原则：以增加粮、棉、油产量，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为主要目标；以改造中低产田，开垦宜农荒地，推广农、林、水科技成果为主要内容；因地制宜，综合开发；择优投入，集中使用；开发一片，成效一片；民办公助，无偿支援和有偿扶持相结合。对开发项目，仅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非经营性项目，原则上实行无偿支援；对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生产经营性项目，原则上实行有偿扶持，定期收回；对于既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又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视其经济收入高低，确定有偿和无偿基金投放的比例。收回的资金，仍作为农业发展基金周转使用。

同日，国务院发布了《农业发展基金开发项目管理办法》，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分为总项目、分项目、子项目3个层次。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承包开发的项目为总项目；地（市）、县或省级有关厅（局）向省级承包开发的项目为分项目；开发建设单位向地（市）、县承包开发的项目为子项目。《办法》对项目的立项程序、项目管理、竣工验收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13日 财政收入40年增长近40倍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建国40年我国国家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6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2588亿元，增长了近40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0.20%。国内财政收入累计达29868亿元，占整个财政总收入的98%左右。在改革开放的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累计达16200多亿元，超过了建国以来前30年国家财政收入的总和。

40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达16000多亿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50%以上。其中国家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就达10000多亿元。40年来，我国通过财政支持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发展的资金累计也已达4000多亿元，特别是1979年以后，国家财政用于科、教、文、卫等事业的支出平均以每年15.6%的幅度增长。

我国大中型企业超过一万家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49年到1989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累计上缴国家财政的税收和利润近15000亿元，占国家同期财政收入的49%以上。我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到1988年，我国已经拥有大中型工业企业10676个。这些遍布于能源、冶金、机械、建筑、化工、纺织、轻工等各行业的大中型企业，规模大、资产雄厚、生产技术和设备较先进、人员素质较高，是国家财源的坚实后盾。据统计，1988年利税总额超过3.5亿元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有50家。这50家企业上缴的利税是全部1万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上缴总额的近1/3，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2%。

14日　建筑业总产值40年增长71倍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建筑业经过40年的发展，共创造总产值20522亿元，净产值5361亿元。建筑业产值已超过商业和运输业之和，在五大产业部门中，仅次于工业和农业。1988年与1949年相比，总产值增长71倍，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0.7%提高到9.8%；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0.3%提高到6.6%。到1988年底，全国建筑从业人员为2530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623.5万人，城镇集体企业421.3万人，农村建筑队854.6万人，零散队伍630.2万人。40年来，这支大军共建成各类工业项目29万个；兴建学校、医院、影剧院、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卫生福利设施60万个；改建、扩建200多个城市和上千个县镇；竣工各类房屋建筑面积100亿平方米。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在对外合作方面有很大发展，在国外从事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人员累计达30余万人次，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

我国水利建设产生综合效益累计达8000亿元

新华社报道，建国40年来，国家投资1000多亿元兴建水利事业，年复一年地治山治水，改土造田，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防洪灌溉体系，产生的综合效益累计达8000亿元。建国40年来我国整修新建的17万公里江河堤防防洪体系，保卫了经常遭受洪水威胁的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和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2/3以上地区的安全。40年来，全国已建成各种水库8万多座，总库容4500多亿立方米；5300多座万亩以上大型灌区遍布各地，初步改变了“旱涝望天收”的状况，累计增产粮食达5600亿公斤。各地在兴修防洪、灌溉工程的同时，充分开发江河水能资源，已建成5万千瓦以上大中型水电站120座，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达327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多亿度。

20日　国务院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该法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合营企业的投资、管理机构和方式、技术转让、用地以及建设计划、税收、用工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该法明确规定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营企业的主要行业是：（一）能源开发，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二）机械制造工业，仪器仪表工业，海上石油开采设备的制造业；（三）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通讯设备的制造业；（四）轻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和医疗器械工业，包装工业；（五）农业，牧业，养殖业；（六）旅游和服务业。

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审查批准。批准后，由对外经济贸易部发给批准证书。凡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金额内的，中国合营者的资金来源已落实的，不需要国家增拨原材料、不影响燃料、动力、交通运输、外贸出口配额等的全国平衡的项目，对外经济贸易部委托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局审批。

25日　我国首次双星快速定位通信演示成功

我国首次双星快速定位通信系统功能演示试验在北京完成。这项卫星应用尖端技术的演示成功，是我国独立开发利用卫星通信资源的一次新突破。将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并获得理想的试验数据，在国际上还是首次。这项试验是通过我国定点于赤道上空东经87.5度和110.5度的两颗通信卫星进行的。结果表明：该系统方案设计正确可靠，具有容量大、精度高、成本较低等特点，时间同步精度可达亿分之几秒，快速定位精度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项试验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设计研制完成的，在国内首次攻克了信号快速捕获、系统软件等技术难点。

26日　国务院制定并发布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条例》从环境噪声标准和环境监测、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噪声污染防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条例》从1989年12月1日起施行。

28日　国家计委提出省级国土规划工作要求

国家计委下发《关于加强省级国土规划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认真编制省（区、市）国土规划的要求，加快编制进度，争取在1990年完成第一次国土规划的编制任务。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要努力创造条件，尽快组织编制和完成市域国土规划工作，并积极参与和配合全国国土总体规划中确定的重点开发地区区域规划。

《通知》提出的省级国土规划工作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是：资源的综合开发，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具体包括：

一、分析论证和充分体现当地政府和上级政府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提出地区的总体发展方向和目标。

二，在对国土资源进行分析研究和确定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资源开发的时序和规模。

三、研究和提出地域的合理分工、综合开发的重点地域，并从资源综合开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角度，提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结构和布局。

四、提出区域性环境整治目标、任务、要求和措施。

五、对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项目，从资源、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的条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分析论证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29日 江泽民在建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四十年来，我们运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力量，依靠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使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4015亿元，国民收入1177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分别是1949年的19.8倍和18倍。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占世界的第八位，有些重要产品产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10 月

2日 我国评出500家最大企业

国家统计局运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对1988年大中型企业进行评估，排列出我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1988年这500家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01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5%；上缴利税600多亿元，约占当年国内财政收入的1/4。这500家企业主要分布在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支柱行业，集中了我国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等主要行业最具实力的主力军。我国500家最大企业的前20名是：鞍山钢铁公司、大庆石油管理局、武汉钢铁公司、北京燕山石化公司、首都钢铁公司、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第二汽车制造厂、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抚顺石油化工公司、齐鲁石油化工公司、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金陵石油化工公司、本溪钢铁公司、茂名石油工业公司、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山西太原钢铁公司、天津石油化工公司。

4日 江泽民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深情的黄土地》农业系列报道中，播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月初视察上海时的一段讲话。江泽民在谈话中指出：11亿人口吃饭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民以食为天。不仅吃饭问题，还有穿衣问题。粮食、棉花以及其他一些工业原料，都要靠农业解决。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新中国成立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苦努力。现在，总的说农业这个基础还比较薄弱，人均耕地很少，我国人均只有1亩多地，美国人均15亩，加拿大人均30亩。我们的亩产量以及劳动生产率都还比较低，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这是我们基本的国情。要进行国情教育，就是要让全国人民了解这些情况。我们要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发展并推广科学技术，增加农业投入，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的耕地。关键是，全党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重视农业，要重视发展农用工业来支持农业，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农业搞得更好。江泽民同志7月视察湖北，8月视察上海，9月视察陕西。

5日 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成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原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不能适应国家对经济宏观管理的需要。198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4

年多来，组织制定了我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初步方案，并于1988年开始在9个省、市进行试点试算，取得良好效果。为了统一领导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工作，使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不断完善，国务院有关部门经过协商，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该委员会。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由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工商局等组成。

国务院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作出规定

国务院发布施行《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明确，企业招用临时工应当与临时工本人签定合同；企业需要临时工原则上在城镇招用，确需从农村招用需报批，并不转户口和粮食关系。《规定》还对临时工在企业工作期间的待遇和保护等问题作出规定。1965年3月10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改进对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6日　我国首次公布全国外债余额

为了增强我国对外开放的透明度，澄清国际金融界人士对中国外债余额的种种猜测，国务院决定对外公布我国1985年至1988年各年末全国外债余额数。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确定的外债范围公布的我国1985年至1988年末全国外债余额为：1985年末全国外债余额为158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债务余额94亿美元，短期债务余额64亿美元；1986年末外债余额为215亿美元，其中中长期167亿美元，短期48亿美元；1987年末外债余额为302亿美元，其中中长期245亿美元，短期57亿美元；1988年末外债余额为400亿美元，其中中长期327亿美元，短期73亿美元。

7日　全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召开的。会议认为，军工企业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目前民品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6%。在完成军品任务的前提下，军工部门积极承担了电子对撞机等一批国家重点项目，有的填补了我国科技领域空白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会议认为，当前军工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全国军民结合的发展还不平衡；一些民用产品滞销，积压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运转，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等。但也必须看到，治理整顿同时也给军民结合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和机遇，军工企业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力协同，进一步加强军民统筹，搞好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充分挖掘军工潜力，开拓军民结合的新局面。

8日　新疆建成我国最大风力电站

我国最大的风力发电站在乌鲁木齐市郊的柴窝堡风区建成运转发电。这个风力发电站的设备由丹麦政府无偿提供，装机容量4000千瓦。目前投入运转发电的机组容量2150千瓦，年发电量可达700万度，电力输入乌鲁木齐电网。

9日　外经贸部发文严禁外商使用人民币在内地收购商品出口

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出通知，严禁外商用人民币在我国内地收购商品出口。《通知》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少数外商，特别是港澳商人，以非法手段在我境内将外汇倒卖成人民币，然后再在内地收购商品，与少数外贸公司或不法人员相勾结，利用我出口配

额和许可证，由我外贸公司或不法人员有偿为其报关出口，使国家蒙受损失。为维护国家利益，《通知》明确，严禁任何外商（包括港澳商人和境外的中资企业）用人民币在我国境内收购商品出口；国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为外商直接收购提供货源。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倒买倒卖出口配额和许可证以及为外商报关出口。

我国最大农业科研项目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杭成立

投资6000多万元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在建设中得到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支持，利用外资引进了人工气候箱群、自动温室种质库、电子计算机系统等一大批先进科研设备，许多实验室达到国际80年代先进水平。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决定筹措资金，设立中国水稻研究所基金，扶持国内水稻科研工作者到中国水稻研究所进行专门研究。

筹建过程中，中国水稻研究所从品种资源、遗传育种、生物工程、农艺、植保、土壤与植物营养、谷物化学、农业工程、农业经济与区划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和新技术、高技术的探索。1989年已在长江流域推广新品种、新组合、新技术100万公顷。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85—1987年平均，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居世界第2位，稻谷总产居世界第1位，稻谷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5%。

10日　国务院决定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强调，要充分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水利的“命脉”作用。我国是11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力更生解决。198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徘徊状态，重要原因之一，是受水旱灾害的困扰。全国耕地面积中有2/3是中低产田，主要是洪、涝、旱、渍、碱和水土流失为害，土壤肥力低。要改造中低产田，首要任务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水旱灾害能力。多年实践证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必须切实对农业实行倾斜政策，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列入计划，坚持不懈地抓，切实抓出成效。要继续贯彻“巩固改造，适当发展”的方针，提高水利工程和设施的效益。要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决定》要求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要亲自负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好坏、水利固定资产的增减，作为对各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国家计委通知要求加强联运工作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加强联运工作的通知》，重申：联运是跨行业、部门、地区而且社会性、综合性很强的行业，全国联运工作由国家计委领导，各地联运由各级经委（计经委、交委、交办）领导和协调。《通知》并同时印发《全国重点省市联运工作会议纪要》。

15日　南京扬子30万吨乙烯工程建成投产

一套规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芳烃联合生产装置在扬子石化公司投料试车。这标志着扬子30万吨乙烯工程全部建成。扬子30万吨乙烯工程，包括以30万吨乙烯、45万吨芳烃为主的10套大型化工生产装置。它的产品包括几十种塑料、化纤和其他有机化工原料。扬子乙烯工程于1984年6月动工兴建，整个工程总投资为66.83亿元，是建国以来一次性投资建设的最大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

16日　国家限制煤炭消费

物资部、国家计委制订并发布合理使用煤炭、限制煤炭消费的暂行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能源工业发展方针，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煤炭消费管理。《规定》提出，煤炭生产和供应管理部门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对重点发展和支持的产业，按照国家计划和用户需要的煤炭品种、质量组织供应。凡新上项目的企业或单位，新增或改造锅炉需要扩大蒸发量的，必须事先申请，经企业主管部门、劳动部门和燃料供应部门审核批准。对擅自扩大蒸发量的，不供应煤炭。所有企业要加强科技开发，积极推广使用节能型锅炉、窑炉和淘汰落后产品，对在用的淘汰设备要限期改造，不改造的，要减少或不供应煤炭。各地区、各部门在安排城市建设、生产建设的基建项目时，要首先考虑集中供热或热电联产设施。城镇居民炊事和采暖用煤，集体伙食、茶炉和取暖用煤，饮食和服务业用煤，要分别制定定额，凭煤证、煤票定量供应。使用煤气，采暖地区室内有供暖设施的用户，原则上不供应煤炭。

我国首台16米立式车床制成

我国第一台最大规格的16米数控单柱移动立式车床通过机电部验收。这标志着我国已成为继联邦德国、苏联等国之后，能独立设计制造精密数控超重型机床的少数国家之一。这台车床高17米，重620吨，由武汉重型机床厂制造，属国家“七五”重大新产品项目。

18日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等部门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类公司的意见

商业部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商业批发公司的意见》严格划定了商业批发公司的经营范围：国家专营专卖商品由国家指定的商业批发公司经营；国家计划管理商品的计划内部分由国家指定的商业批发公司经营，国务院专门规定的按国务院规定执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必需品，由省级政府规定品种及范围，并指定商业批发公司；特殊商品由各级政府指定专门批发公司经营；生产企业开办的商业批发公司不得经营与自产产品无关的批发业务。

对外经贸部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类对外贸易公司的意见》明确将不到中国银行或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定银行结汇严重逃汇的、协助外商在内地直接收购出口商品或办理出口业务逃汇的、同一部门和（或）地区机构重复设置的、无外销渠道委托出口的、地方公司设置的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二、三级公司等列入撤、并或取消范围。

物资部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类物资公司的意见》提出重点撤销五类物资公司应予撤销：（一）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其派驻外地的办事机构开办的各类物资公司；（二）实际注册资金、从业人员、经营场地、组织机构等不具备开办条件的物资公司；（三）靠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从事非法倒买倒卖活动牟取利润的物资公司；（四）各类物资公司与不具备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经营资格的企业、单位建立的经营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的联营公司；（五）按照国务院规定，应将物资供销机构移交物资部门管理的生产主管部门重复建立的物资公司。

25日　国务院发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

为了准确地查清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在数量、地区分布、结构和素质方面的变化，科学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检查人口政策执行情况；国务院发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1990年7月1日零时。

国家计委部署建立全国技术引进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为加强技术引进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国家计委于7月召开全国技术引进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工作会议，并安排了全国技术引进项目管理信息网络建设的分工。为切实指导这项工作的开展，国家计委制定并下发《技术引进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了系统的目标、项目管理的范围和指标体系、信息的采集、传递和管理、技术引进管理部门和信息机构的职责、报送时间等要求，从1990年1月起正式执行。

31日　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10月份完成总产值1058亿元，比上年同时期下降2.2%，并出现了轻重工业、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一起下降的新趋势。这是我国改革以来工业生产首次出现负增长。

11　月

5日　我国推行统一代码标识制度

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转国家技术监督局等十个单位关于建立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统一代码标识制度的报告。建立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统一代码标识制度，是国家发挥监督管理体系整体效能、强化管理的一项改革。“统一代码标识制度”就是给每一个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颁发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标识。它为政府各部门加强行政管理，监督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社会经济行为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为实现计算机自动化管理和信息交换提供技术保证，为完善我国监督管理体系，发挥整体效能建立技术基础。

7日　秦皇岛港成为世界最大能源输出港

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秦皇岛港煤码头三期工程通过交通部组织的验收，正式建成投产。秦皇岛港煤码头三期工程是大同至秦皇岛运煤专用电气化铁路的配套项目，于1984年开工建设。这项工程包括一个10万吨级泊位，两个3.5万吨级泊位，年吞吐能力为3000万吨。这一工程的建成投产，使秦皇岛港由中国第一大能源输出港跃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出港，年吞吐能力达到7500万吨。秦皇岛港煤码头三期工程的主要装卸工艺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和美国引进的，装卸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8日　国家规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要与新建和扩建工程实行“三同时”

为推动资源的综合利用，促进企业合理利用资源，有效地保护环境，国家计委印发《关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新建和扩建工程实行“三同时”的若干规定》，规定从1990年1月起，企业新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认真执行治理污染与资源综合利用相

结合的方针。在工艺技术和设备制造成熟，综合利用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又有市场销路的条件下，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原则上要与基本建设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新建和扩建项目申报单位提出的项目建议书，应明确规定相配套的资源综合利用的内容；勘察设计部门提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要包括资源综合利用的规模、工艺等内容。凡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工程咨询部门不予咨询，各级主管单位和资源综合利用部门不予审批立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凡不执行同时施工规定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开工。施工中有意减掉有关综合利用工程的，有关部门有权令其补建后再继续施工。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交付使用。否则，主管部门不能对主体工程组织验收投产。对于分期建设、分期受益的主体工程，可以先部分投产，但全部工程必须与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同时投产。《规定》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三同时”目录。

6日—9日　中共十三后五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全会决定，包括今年在内，用3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求相适应；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在着力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6%；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

全会要求，治理整顿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持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特别是要迅速在全党全国造成一个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齐心合力把农业搞上去，确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气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下功夫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科技水平，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路子。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

10日　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工程竣工验收

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工程通过国家鉴定委员会竣工验收，这套迄今我国能量最高、加速离子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的重离子加速装置投入正式运行，是世界上继法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台同类大型回旋加速器。

12日　第八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施行节约能源法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该法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

14 日　国务院组织清理检查"小金库"

不少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违反国家财经制度，私设各种形式的"小金库"屡禁不止，这是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助长了奢侈浪费，而且腐蚀干部，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为此，国务院决定，结合开展1989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对私设的"小金库"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和检查。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除了党费、团费、工会会费、稿费提成和职工互助金等项目外，凡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的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都应进行清理和检查。《国务院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发出以后，到12月底，全国共查出各种"小金库"资金10.01亿元，清查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国家计委等发布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管理办法

为使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的管理工作规范化，国家计委、国家税务局、国家物价局、工商银行、物资部联合制定并发布《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管理办法》，办法中所称的新产品是指民用工业新产品，其定义是：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老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新产品按地域特征分为国家级新产品和地区级新产品。国家级新产品是指在国内第一次研制、生产的新产品。地区级新产品是指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第一次研制、生产的新产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项目优先纳入国家级试产计划：（一）获得中国或外国发明专利的新产品。（二）获得国家或国际发明奖励的新产品。（三）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四）附加价值高的新产品。（五）增加国内市场有效供给的新产品。（六）具有出口创汇多、替代进口量大（或潜力大）的新产品。（七）大量节约能源、原材料的新产品。（八）支援农业的新产品。（九）提高交通运输能力的新产品。（十）能保护环境和使用安全的新产品。国家对重点新产品试生产项目采取扶持政策。

15 日　引黄济青工程全线试通水成功

国家决定修建的引黄济青工程全长252.5公里，流经山东4个地区10个县市。工程自1986年4月15日动工，总投资为8亿元，由各地区分工包干。开始接纳黄河水的棘红滩水库平面面积为14.4平方公里，蓄水能力为1.45亿立方米，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平原水库。青岛市区管网工程配套建成后，每天将有30万立方米的黄河水供应青岛市区。

23 日　物资部等决定上调国家投资新建工业企业产品

物资部和国家计委作出规定：从1990年起上调新投产工业企业的产品，以适当集中物力。我国每年都有一批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工业企业建成投产，对于这类企业，过去往往偏重于强调上缴利税，忽视了产品的上缴，加上我国指令性计划分配的物资比重已降得相当低，造成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相对减少，国家重点生产建设的需要难以保证。这一新规定要求新投产的工业企业，凡是由国家投资和统借统还外资的，其生产的产品均应按规定上缴国家分配，产品上调量原则上按计划任务书明确的数量，或按项目的总

投资比例计算。老企业改建、扩建投产后的新增能力要考虑原有设施的投资因素，在项目投产时由各有关部门具体商定上调产品的数量。对于供需矛盾突出的产品，必要时国家可以从留给企业的自销产品中划出一部分，由物资分配主管部门实行指导性销售。

27日 国务院作出科技兴农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决定

《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提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解决问题。各级政府必须把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决定》主要包括大力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农村科技队伍；大力加强农村教育，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广辟资金来源，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重视并作好农业高技术和基础研究工作；切实加强对科技兴农工作的领导等七方面的内容。

28日 全国预算外资金增长总额接近当年国家预算收入

据财政部对全国预算外资金决算汇总的情况表明，1988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总额已经接近于当年国家预算收入，但预算外资金使用不尽合理，非生产性支出增长过快。据统计，1988年全国预算外收入为2360.8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家预算收入的94.8%，比上年增加331.9亿元，增长16.4%；全年预算外支出为2145.3亿元，比上年增加304.5亿元，增长16.5%；收支相抵，当年结余215.5亿元，年终滚存结余1637.4亿元。

从1988年预算外收入情况看，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地方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都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预算外收入为1872.89亿元，比上年增加247.1亿元，增长15.2%；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收入为438.9亿元，比上年增加80.5亿元，增长22.5%。

近几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对加快企业技术改造，促进横向经济联合，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及弥补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预算外资金增长过快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财力过于分散和国家预算财力过小。特别是由于预算外资金支出结构不合理，迅速增长的预算外资金已成了目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膨胀和社会集团购买力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

30日 国家外汇局颁布外币兑换新规定

中国自1980年4月发行外汇券，在货币流通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几年，私自倒卖外汇券，或以外汇券套购外币的非法行为不断发生。为加强对外汇券的管理，防止套汇，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外币兑换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主要内容是：各国驻华外交代表、领事机构和商务、民间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从其在银行开立的外币存款帐户或人民币特种存款帐户中提取外汇兑换券后，其未使用的外汇券不得兑回外币，只能在中国境内继续使用。上述机构所属常驻人员离开中国国境时，如果将未用完的外汇券兑换成外币汇出或携带出境，银行凭本人出境证明或飞机票以及六个月内的兑换水单，兑给不超过原换数50%的外汇，不出境者不能兑回外币。短期来华的外国旅游者、华侨、港澳台同胞如要求兑回外币时，须向银行提供6个月内的兑换水单、出境

证明或飞机票，准予一次性兑回不超过原兑换数50%的外币。

这一规定自10月30日起实行。在这以前向银行兑换的外汇券，仍可按原来的规定办。新规定的实行，不意味取消外汇券，也不影响外汇券的发行和流通。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收入的外汇券，不受此规定限制，仍按《中外合资企业法》执行。

12　月

1日　江泽民、李鹏接见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代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带队同志，听取汇报，并对我国农村工作和农业发展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农业问题不只是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农业不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农村不稳定，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很难稳定。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目的，就是要在全党全国上下牢固确立和长期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指导思想。要把这个指导思想切切实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全党全国要真正动员起来，齐心协力实现农业发展的新突破。在近期内实现新突破，或者说上一个新台阶，就是要尽快结束目前的徘徊局面。粮食要达到8500亿斤到9000亿斤，棉花要达到9000万担到1亿担。要在全党全国真正形成一个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

2日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提出粮食消费应适度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提出，近几年来，在社会上高消费的影响下，粮食消费急剧膨胀，饲料和酿酒用粮增长过快过猛。1988年，我国人均肉、蛋、奶、水产品的消费量达29.3公斤，比1984年增加6公斤；各类酒的消费量人均11.5公斤，比1984年增加5公斤。这两项合计，平均每人增加粮食消费19.3公斤，合一个多月的口粮。这个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不算高，但是我国粮食的现状只是温饱水平，不能吃得太好，喝得太多。因此，只能适度消费。在组织粮食供应工作中，要有保有压，不能有求必应。

6日　天生桥至广州输电工程开工

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工程——广西天生桥至广州的50万伏交流超高压输电工程在广西境内破土动工。这一输电工程全长975公里，其中广西境内约776公里，系中外合资项目，工程总投资约9亿元。这一输电工程的建设，对缓解广东电力紧缺状况，加快两广“西江走廊”工业基地的建设，将产生较大影响。

5日—11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本着认真贯彻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具体部署了1990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姚依林听取一些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会议认为，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整个经济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突出表现在连续几年的经济过热已经降温；前些年持续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就全

国和全年来看，已经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农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膨胀的势头有所减缓；银行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得到有效控制，城乡居民储蓄有了较大的增长；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月降低，一些商品的价格甚至稳中有降，广大群众对涨价的紧张心理已基本消除。这些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以控制需求、调整结构为重点的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国民经济正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对治理整顿所取得的初步成效，既不能估计不足，也不能估计过高。必须看到，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些基本因素尚未消除，影响经济稳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会议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认为 1989 年全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突出表现在：连续几年的经济过热已经降温；前些年持续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就全国和全年来看，已经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农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膨胀的势头有所减缓；银行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得到有效控制，城乡居民储蓄有了较大增长；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月降低，群众对涨价的紧张心理已基本消除。会议认为，1990 年我国治理整顿进入了攻坚的阶段。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行各业在 1990 年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切实加强农业，力争粮棉等主要农产品有一个好收成。（2）从各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努力保持工业生产的适度增长。（3）积极开拓生产、多种经营和服务门路，努力安排待业人员。（4）严格加强市场物价管理，控制物价上涨幅度，稳定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5）坚持紧缩方针，继续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继续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合理调整信贷结构，大力增收节支，反对浪费，厉行节约。（6）努力增加出口，压缩进口，保持外汇收支平衡。（7）重视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会议重申，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企业承包责任制不变，厂长责任制不变，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不变，中央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的体制不变，继续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和吸引外资来华投资等对外开放政策不变。

12 日 上海 30 万吨乙烯装置一次试车成功

这是我国第五套年产 30 万吨的现代化乙烯装置，它以世界最好的开车水平，在上海一次投料试车成功，生产出合格产品。这一重大建设成就，使我国重要基础化工原料乙烯的生产能力猛增 18%，达到世界第 9 位。

16 日 人民币汇率下调 21.2%

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人民币汇率下调 21.2%，各种外国货币相对升值 26.9%。调整后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买入价由 1 美元合 3.7128 元人民币调整到 1 美元合 4.7103 元人民币，卖出价由 1 美元合 3.7314 元人民币调整到 1 美元合 4.7339 元人民币。

18 日 审计署等部门决定开展基本建设项目开工前审计

审计署、国家计委决定对基本建设新开工项目和恢复建设的停缓建项目进行开工审计，未经审计的项目不准批准开工或复工。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资金来源是否正当；是

否列人国家基建计划；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开复工条件等。审计的分工原则上按基建项目审批权限规定范围。

19日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

江泽民、李鹏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为获奖科技工作者颁奖。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题为《推动科学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的讲话。江泽民强调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革命，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确定的这项国策，必须在各级干部的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来，切实贯彻执行，长期坚持下去。

从1979年到1988年底，国家共奖励各领域、各行业优秀科技成果5084项。其中，自然科学奖303项，发明奖1561项，科技进步奖3082项，星火奖138项。共有25000人次获得国家奖励。这些项目创造的经济效益已达2300多亿元。

国务院决定调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

国务院批转了人事部、国家计委、财政部《1989年调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实施方案》，并为此发出通知。《方案》确定的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调一级工资，并在普调基础上重点解决下列突出问题：一、重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问题。将现行专业技术人员各职务起点工资标准和最高工资标准分别提高两个档次。二、提高研究生、大专毕业生的初期工资和见习期工资待遇；不再实行大中专毕业生定级工资办法，改为按本人表现和所确定的职务领取相应的职务工资。三、适当解决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行政人员的工资突出问题。四、相应解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人的工资问题。

24日“温饱工程”初见成效

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在长沙召开的实施“温饱工程”总结会宣布，由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农业部、国家计委、商业部、财政部、轻工部、农业银行等部门联合组织，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负责实施的“温饱工程”一年来初见成效，使553万多贫困农民的口粮不足问题得到解决。

“温饱工程”是为实现“七五”期间解决贫困地区大多数群众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是国家在一些贫困地区搞科技扶贫的一项重要措施。具体做法是：国家在具备条件适宜发展玉米生产的贫困地区，采取资金、技术、地膜、化肥、良种等综合输入的办法，大力推广杂交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在一二年内，使群众的口粮达到自给水平。这种做法被山区群众形象地称之为“温饱工程”。

26日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经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该法明确提出，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保护环

境是一切单位和个人的义务。该法对环境的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及有关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城市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由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该法明确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该法从城市规划的制定、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城市规划的实施、有关法律责任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条文，从 199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27 日　企业发行债券实行额度申报审批制度

为加强企业债券的计划管理，国家计委、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发行企业债券实行额度申报审批办法的通知》，决定从 1990 年起，对企业发行债券实行额度申报审批办法。全国的企业债券年度发行计划由人民银行和国家计委在各地计划的基础上综合平衡后提出，并报国务院批准。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债券必须纳入国家下达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规模之内。

我国粮食年产达历史最高水平

国家统计局根据据全国 28 个省、区、市抽样实测数据和海南、西藏两省、区的全面预计，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 40500 万吨，比去年增加 1000 万吨以上，增长 3.4%，达到了历史最高年份 1984 年的水平。今年播种面积达 16.86 亿亩，比去年增 2945 万亩，增长 1.8%

我国原煤年产首次突破 10 亿吨

我国煤炭和电力双双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七五”计划，原煤年产量突破 10 亿吨大关，年发电量超过 5700 亿千瓦小时，居世界前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煤炭年产量只有 6.18 亿吨，年发电量 2566 亿千瓦小时，11 年来，煤炭年产量增加 68%，电翻了一番多。

衡广复线铁路通过国家验收

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衡广铁路复线通过国家验收，1990 年 1 月 1 日起交付广州铁路局使用。由国家投资 32 亿元人民币修建的衡广铁路复线，长 526 公里，于 1987 年 11 月建成，开通使用一年来，运行情况良好，没有发生任何险性以上事故。位于复线中部的世界第十大双线铁路隧道—大瑶山隧道，始终畅通无阻。这条复线设计符合国家一级干线铁路标准，各项运营技术设备较为先进，设计和施工质量优良。

30 日　国务院成立生产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战略物资尤其是能源、重要原材料以及交通运输的计划管理，加强对大型骨干企业的生产协调，加强全国的生产调度工作，国务院决定成立生产委员会。该机构是国务院的生产协调机构，由国家计委的一名副主任兼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委员由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各一位负责人担任。生产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参与制定年度生产、物资分配及运输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指导全国工交生产工作，负责组织各部门、各地区及其骨干企业在生产、市场及运输中的重大衔接和协调工作；负责对重要物资的紧急调度工作，并解决相应的运输问题；指导企业管理；参与工业产品

的进出口审查；参与涉及企业生产的金融、物价工作等重大事项。国务院决定还强调要完善全国生产指挥调度系统。除了加强国家计委的生产调度工作与企业管理工作外，要进一步加强国务院工交部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产调度工作，形成自上而下的生产调度系统。

31日　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15677亿元，比上年增长3.9%；国民收入13000亿元，比上年增长3.7%。

农业总产值6550亿元，比上年增长3.3%。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2.1%，林业产值增长0.9%，牧业产值增长5.5%，副业产值增长5.8%，渔业产值增长8%。农村社会总产值14390亿元，比上年增长5.8%。其中，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产值增长7.9%，所占比重由上年的53.2%上升到54.5%。

工业总产值21880亿元，比上年增长8.3%。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3.7%，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10.7%（其中乡村工业增长12.7%），个体工业增长24.1%，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比上年增长44.7%。工业产品结构有所改善。全年轻工业产值1071亿元，比上年增长8.4%；重工业产值11180亿元，增长8.2%。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税1559亿元，比上年仅增长0.2%，产成品积压严重，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上年的97天延长到108天；平均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由上年的21.99元下降到19.41元；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1.6%；部分产品质量不够稳定，成本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有效控制。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000亿元，比上年减少约500亿元，下降1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压缩20%以上。在建项目总规模膨胀的势头得到遏制，全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施工项目12.3万个，比上年减少4.3万个；计划总规模9925亿元，减少619亿元；当年新开工项目3.7万个，减少4.1万个。经过清理，全国决定停缓建的投资项目1.8万个，可压缩今后几年的投资675亿元。特别是有效控制了楼堂馆所建设。

在投资总量压缩的情况下，全民所有制单位能源工业部门投资626亿元，仍比上年增长4.3%，所占比重由上年的22.2%上升到24.9%；运输、邮电部门投资339亿元，增长2.8%，所占比重由上年的12.2%上升到13.5%，改变了1986年以来投资比重下降的趋势；文教卫生部门投资106亿元，所占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

全国建成投产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57个，大中型项目的单项工程128个。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煤炭开采249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902万千瓦，石油开采1705万吨（包括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天然气开采7.6亿立方米，铁路复线里程318公里，铁路电气化里程229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4885万吨。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101亿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涨价因素，实际下降7.6%。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17.8%，其中新涨价因素为6.4个百分点，明显低于上年15.9个百分点的水平。城镇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16%；农村上涨18.8%。城镇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比上年上涨16.3%，涨幅明显低于上年20.7%的水平。城镇居民平

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货币收入为1260元，比上年增长12.6%。全国城镇安置待业人员300多万人。年末全国职工人数为137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2万人。全国职工工资总额2640亿元，比上年增长14%。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13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34亿元，增长35.1%。

1989年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供求总量失衡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差等深层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宏观经济紧缩中又出现了流通不畅、企业开工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等难以避免的新问题。

1989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

1989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总计189项，其中新增项目（*）22项，地方项目16项。

煤炭（17项）　河北开滦矿区、山西古交矿区、山西大同矿区、山西阳泉矿区、山西潞安矿区、内蒙古霍林河矿区、辽宁铁法矿区、黑龙江七台河矿区、黑龙江双鸭山矿区、江苏大屯矿区、安徽淮南矿区、安徽淮北矿区、山东兖州矿区、山东枣滕矿区、河南平顶山矿区、山西晋城矿区、安徽任楼煤矿（地方项目）。

石油（7项）　华北油田、辽宁辽河油田勘探和开发、黑龙江大庆油田勘探和开发、山东胜利油田勘探和开发、河南中原油田勘探和开发、青海油田、新疆油田。

电力（44项）　福建沙溪口水电站、福建水口水电站、江西万安水电站、湖南东江梯级水电站、广西岩滩水电站、四川铜街子水电站、云南鲁布革水电站、贵州东风水电站、陕西安康水电站、青海龙羊峡水电站、红水河天生桥坝索水电站（含天生桥—广州、天生桥—贵阳50万伏送变电工程）、北京石景山电厂、天津军粮城电厂、天津大港电厂、河北宣化沙岭子电厂、河北石家庄上安电厂、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黑龙江牡丹江二电厂（三期）山西漳泽电厂（二期）、山西神头第二电厂、内蒙通辽电厂、*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上海吴泾电厂、吉林热电厂、*江苏利港电厂、黑龙江双鸭山电厂、黑龙江富拉尔基二电厂、上海石洞口电厂、上海望亭电厂一期、江苏南通天生港电厂、浙江北仑港电厂、安徽平圩电厂、*湖北汉川电厂、*湖北隔河岩水电站、五强溪水电站、云南漫湾水电站、山东邹县电厂二期、浙江镇海电厂三期、浙江秦山核电站、*湖南岳阳电厂、*四川重庆珞玻电厂、*四川宝珠寺水电站、*宁夏大坝电厂、广东沙角电厂（地方项目）、广东黄埔电厂（地方项目）。

水利（1项）　*河南洛宁故县水库。

铁道（19项）　*焦枝复线、*侯月线、*宣杭线、*沈阳枢纽、滨绥线（含哈尔滨枢纽）、胶济复线、徐州枢纽、沪杭复线及钱塘江大桥、杭州枢纽、唐山机车车辆厂、大包复线、京广线（含电铁供电工程）、商阜线、陇海线（包括郑宝电化和徐连改造）、湘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贵昆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鹰厦线电化

(含电铁供电工程)、川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大秦线(含电铁供电工程)、浙赣复线。

交通(15项)　大连港、营口港、秦皇岛港、青岛港、烟台港、连云港港、南京港、上海港、宁波港、湛江港、黄埔港、西江航道整治、京津塘高速公路、辽宁沈大一级公路(地方项目)、天津港(地方项目)。

邮电(7项)　北京邮政枢纽、天津市话网、上海市话网、广州市话网、京沪数字微波、*广州电信枢纽、*宁汉渝光缆。

民航(3项)　重庆江北机场、*昆明巫家坝机场、陕西咸阳机场。

钢铁(4项)　河北唐山钢铁公司、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及冶金配套、武汉钢铁公司、四川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二期)。

黄金(1项)　河南三门峡中原冶炼厂。

有色(6项)　河津山西铝厂、河南焦作中州铝厂、江西铜业公司、贵阳贵州铝厂二期、甘肃白银有色公司、甘肃金昌金川有色公司二期。

化工(11项)　河北唐山碱厂、江苏连云港碱厂、山东潍坊碱厂、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磷铵工程、大连化学工业公司磷铵工程、河北矾山磷矿、格尔木青海钾肥厂、甘肃805厂、中原天然气化肥厂(地方项目)、杭州磁带厂(地方项目)、*江西贵溪化肥厂(地方项目)。

石化(6项)　黑龙江大庆乙烯工程、上海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南京扬子石化公司、山东淄博齐鲁石化公司、河南洛阳炼油厂、广州石化总厂。

医药(1项)　*牡丹江制药厂(地方项目)。

建材(3项)　广东云浮水泥厂、山东滕县鲁南水泥厂、陕西耀县水泥厂。

机电汽车(9项)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重型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斯大尔项目、南京汽车制造厂依维柯项目、无锡微电子科研生产联合公司、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二期)、*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厂(地方项目)、上海电气联合公司、哈尔滨电站设备成套公司。

轻工(2项)　汕头感光材料厂(地方项目)、上海铝材一厂(地方项目)。

纺织(2项)　*济南涤纶厂(地方项目)、江苏仪征化纤联合公司二期工程。

科学(4项)　中国专利局业务楼、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教育(7项)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医科大学。

卫生(3项)　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

军工(7项)(略)

其他(10项)　新华社技术业务楼、北京中央电视发射塔工程、北京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北京8371工程、亚运会工程、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保定造纸厂、陕西历史博物馆(地方项目)、上海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地方项目)、上海延安东路过江隧道(地方项目)。

1990 年

1　月

2 日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产核资工作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开展清查资产、核实国家资金、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简称清产核资）的工作。通过清产核资，核实各部门、各单位占用的国有资产价值总量，将一切应归国家所有的资产都纳入国有资产管理轨道，认真解决“家底”不清、管理混乱、损失浪费严重等问题。《通知》要求在清产核资工作中坚决防止和纠正损害国有资产产权的行为；完善企业的国有资产产权管理机制；改进、完善企业经济效益考核内容；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通知》指出，按照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要求，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是一项意义很大、探索性很强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要支持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工作，建立健全管理责任制，使其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冲发挥应有的作用。

4 日—8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修改了《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改革和强化企业管理的意见》，提出了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一）在治理整顿中完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做到稳定政策，兴利除弊，分类指导，多做贡献。（二）继续实行和完善厂长负责制。（三）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四）进一步发展企业集团。（五）采取措施推进企业兼并。（六）强化企业管理，向经营管理要效益。（七）有计划地推进各项改革试点工作。国务院总理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鹏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四个基本观点：一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两个基本观点缺一不可。二是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现在要探索怎样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四是当前要利用治理整顿的机会，对新的改革措施进行试点。

5 日　建设银行对借用国际商业贷款作出规定

为防止多头对外，控制借款成本，避免借用高利贷，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下发《关于加强对外筹资管理的通知》，对近期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暂作如下规定：一、除国家已确定的 10 个对外筹资窗口以及专业银行总行外，其他金融机构及国营企业近期内暂停对外借款询价。如因特殊情况需向外询价，应事先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意。二、为抑制对外筹资成本，近期内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国际市场利率水平严格控制对外筹资条件。

三、坚决贯彻国务院确定的有关借用外债谁借谁还的原则，明确和加强偿债责任，国家债由国家还，地方债由地方还，公司债由公司还。90年代我国将进人偿债高峰。保证按期偿还外债，维护对外信誉，是我国外债管理的重要原则。四、为保证借款单位按期对外还本付息，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用调剂外汇偿还对外借款本息。五、对短期外债实行余额管理。特别是新建项目，不得借用短期外债抵代长期资金。短期外债更不能用于股本投资。如有特殊情况，需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6日于—10日　首次全国国有资产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建国4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已形成了巨额国有资产。为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国务院于1988年1月决定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全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逐步形成。会议指出，当前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应做好如下工作：（一）有计划地开展清产核资工作。（二）加强产权管理，认真查处各种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问题。（三）通过兼并和划转等方式，推动国有资产合理流动，促进资产优化组合，提高利用效率。（四）参与完善国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工作，建立国有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必要的制约机制，进一步发挥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促进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五）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投资活动的监督管理，促进提高投资效益。（六）抓紧立法，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法制管理。今后在国有资产使用方面，不仅要以产值利润率、销售利润率来考核企业的经营效果，更要注意以资金利润率来考核企业的经营成果。

9日　建设银行试行缴存外汇存款准备金制度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出《关于试行缴存外汇存款准备金的通知》，决定从1990年起实行各分行向总行缴存一定比例的外汇存款准备金制度。凡经批准开办国际业务的分行，吸收的外汇存款都要向总行缴存一定比例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缴存外汇存款范围包括：活期储蓄存款、定期储蓄存款、企业活期存款、企业定期存款、三资企业存款、驻华机构及外商存款。各行按规定应缴存的外汇存款准备金，暂按外汇存款总额的10%缴存总行。

12日—7日　全国银行分行长会议强调坚持紧缩银根方针

这次会议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首次聚集，共商金融问题。会议提出1990年调整政策结构的主要措施：1.增强和改善信贷资金的宏观管理。各专业银行要在人民银行确定的贷款限额内，安排好贷款进度；并要加强现金管理；中央银行将集中一部分资金，以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贷款的调控作用。2.下大力气调整信贷资金结构。各家银行要全面开展清理现有贷款的工作；要督促企业清仓挖潜，搞活现有资金存量，加速资金周转3%—4%；继续组织清理企业拖欠，推广使用商业票据。3.加强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所有企业都必须在留利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补充自有流动资金，要使其比例逐步达到30%。4.清理企业在金融机构“多头开户”，一家企业只能开立一个基本账户办理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5.继续稳定和增加储蓄存款。6.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一要抓好金融性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清理整顿，取缔私人银行和钱庄；二要强化利率管制，严肃结算纪律。

7. 继续坚持金融对外开放的方针，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各专业银行仍要坚持“一业为主，适当交叉”的原则，合理设置金融机构。

1月16日，李鹏、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听取了会议的汇报。李鹏指出，1990年要继续执行财政和信贷的双紧方针，银行的贷款总量和货币发行量都不能突破指标，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对效益好、消耗低、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在资金上要尽量给予保证。

12日 国务院企业管理委员会批准45个企业为国家一级企业

国务院企业管理委员会宣布批准哈尔滨锅炉厂、上海柴油机厂等45个企业为国家一级企业，这是从我国近50万个企业中首批审定的国家一级企业。这45个企业经有关部门连续两年的考核，都达到了国家一级企业的标准，其主要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有的已达到国际当代先进水平。据统计，这些企业中经考核的352种（类）主要产品，达到当代国际水平的有110种（类），占30.9%，其余242种（类）全部达到或相当于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经济效益和物质消耗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一级企业人均实现利税平均为2.1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为7.8万元。一级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人均实现利税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平均数的3.28倍、6.8倍和4.96倍；安全生产符合标准；企业管理、技术进步和内部配套改革工作也都取得突出成效。

15日—18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提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的指导思想是：以粮棉生产为重点，稳定、提高增产作物和增产地区，主攻减产作物和减产地区；依靠科技，主攻单产；在突出抓好粮、棉、油、糖增产的前提下，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市场需求，发展麻类、蚕桑、水果等其他作物。

16日 劳动部颁布职业介绍规定

《职业介绍暂行规定》的颁布确立了我国职业介绍工作的法律地位，将职业介绍工作纳入依法管理轨道，为职业介绍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加强了国家对劳务市场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规范了劳务市场活动，维护了劳务市场秩序，保障了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合法权益。

19日 国务院要求清查制止部分地方政府越权批地问题

为坚决制止越权批地行为，国务院批转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部分地方政府越权批地情况报告》，并为此发出通知，提出以下意见：（一）建议由监察部会同国家土地管理局，在近期内对本报告所提到的市、州、县人民政府越权批地问题作进一步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二）在1990年上半年，各地区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建设用地的审批情况，采取自上而下、逐级检查的方式，认真进行一次清理。下级政府要及时备齐有关审批建设用地的文件、资料，如实提供情况，认真配合清理工作。（三）对清查出来的越权批地问题，按《土地管理法》和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凡是越权批地的文件一律无效。越权批准占地的在建项目，原则上要暂停建设，由原批准用地的政府提出处理意见，按批准权限逐级报批。（四）从1990年起，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审批建设用地，一律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各地区要将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批准权限，用地计划指标、定额和批准条件，收费项目和标准，“农转非”和招工指标等内容，在本级政府各部门内部公布，并定期通报建设用地审批结果。

23 日　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

为了探索适应汽车工业发展的模式，国务院在 1987 年 6 月组建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两年多来，中汽联在国家授权的范围内，在行业管理和为企业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随着改革深化和汽车工业形势发展的变化，具有社团组织性质的中汽联这种行业管理模式，与加强宏观管理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为此，国务院批准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重新组建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国务院复函指出：中汽总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由机电部归口管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机电部授权中汽总公司行使汽车工业行业管理的职能。

2　月

1 日　国家物价局规定商品和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

为了加强价格管理，维护市场价格正常秩序，鼓励正当竞争，便于监督检查，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国家物价局制定并发布《关于商品和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的规定》。《规定》明确了商品“应按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分别使用红、蓝、绿三色价格标签”，作到标价准确，一货一签。《规定》自 199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3 日　国务院通知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指出，对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作为当前治理整顿、加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好。《通知》对农民合理负担的项目和使用范围再作如下规定：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收取集体提留，数量及用途要由其成员民主商定。每年可按不同年景，做适当调整。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等，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和对特别困难户的补助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支出。管理费用于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要严格控制数量，规定用途。农民负担的乡镇统筹费，要坚持定项限额原则。农民负担的比例以乡为单位，人均集体提留和统筹费，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 5% 以内。集体提留主要按经济收入分摊，也可按土地亩数或劳力分摊。乡统筹费可按不同产业负担。

5 日—8 日　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经济特区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抓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作用，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国务委员李贵鲜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经济特区及广东省、福建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

势，一致认为搞好外向型经济既是特区建设的一贯方针，也是治理整顿向特区提出的要求，必须认真抓好。会议提出要以“软件”为重点继续改善投资环境，更好地吸收外资；要以追踪国际市场需求和质量水准为目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技术档次，建立信息、销售网络，增强参与国际交换的能力；要按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深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和富有活力的企业经营机制；要牢固树立特区为全国服务的思想，在传递经济技术信息、引进技术资金、拓展产品出口、传播先进管理经验、培训人才等方面为内地多办实事，充分发挥窗口作用。

截至 1989 年年底，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已批准外商投资项目 5700 多个，协议外资金额 94 亿美元，实际利用 41 亿多美元，占全国的 1/4 以上。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特区的投资来源日趋广泛，外商投资项目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特区的经济增长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五个经济特区 1989 年工业产值接近 300 亿元，比 1986 年增长 3.4 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产业体系，成为十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作为中国新兴的出口基地，这 5 个经济特区 1989 年外贸出口已达 38.5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近 1/10。

12 日　农业部印发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管理暂行规定

为了鼓励和引导农民股份合作企业健康发展，保护其合法权益，加强规范化管理，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农业部印发《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农民股份合作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享有自行确定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职工报酬和劳保福利待遇、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以及依法纳税、股东大会制度、企业改变名称、合并、分立、迁移、歇业、终止或其他登记事项。

23 日　国务院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审批

为加强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增长和机构编制审批制度，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治理整顿期间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编制管理的规定和要求办事，切实做到令行禁止；要严格控制增设机构、提高机构规格、增加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如确需调整增设机构、提高机构规格、增加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等，必须严格履行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在中央统一部署地方机构改革以前，地方各级的机构设置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不宜作较大的调整；人员编制总数应当严格加以控制，除某些特殊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外一般不再增加，以免给下一步进行机构改革增加困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领导，不得违反国家规定随意处理机构编制等问题，对经批准必须增设的机构和确实缺编的部门，所需编制要在现有人员编制总数内调剂解决，不能自行扩大编制或超编增加人员。

27 日　央行增加 80 亿元信贷资金清理企业“三角债”

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增加 80 亿元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大中型骨干企业流动资金急需，重点支持大中型骨干企业生产，帮助企业清理“三角债”，重点解脱大中型企业的债务负担。

28日　邮电部等决定实行专用电信网年报统计制度

为了有效地进行通信行业管理，治理整顿通信秩序，发挥通信网的综合效能，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统计局、邮电部决定从1990年开始，对各专用电信网实行年报统计制度。每年对各专用网的网络组织、通信能力、装备水平等情况进行调查统计，专用电信网年报统计的范围包括各部委、各地区的专用通信网点、各级网路中心。各部委通信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年报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计委（计经委）、统计局主要负责本辖区内专用电信网的年报统计工作，避免重复和遗漏。统计指标和指标解释由邮电部拟定。统计截止日期为每年12月31日。有关专用电信网的年报统计工作由邮电部具体负责。

3　月

3日　邓小平谈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

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进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

8日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实施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

为了加强对同业拆借的管理，规范同业拆借活动，人民银行总行制定并印发《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同业拆借的期限和利率高限由人民银行总行根据资金供求情况确定和调整。目前拆借资金的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其他金融机构对专业银行拆出资金，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四个月。同业拆借的利率最高不得高于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日拆性贷款利率的30%。同业拆借市场的中介机构原则上一个城市保留一家，统一定名为“金融市场”。《办法》还规定了在原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重新组建金融市场的原则、制度等。

10日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贷款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降低存款利率，在现行基础上降低1.2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三年以上定期储蓄存款仍然实行保值，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和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也相应降低。调整后的存款利率，从1990年4月15日起执行。1990年4月15日以前对个人发行的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仍按原规定利率执行，直至存款到期。4月15日以后对个人发行的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利率是否需要向上浮动，由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决定，在调整后的利率基础上，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10%；1990年4月15日以前经人民银行批准已经发行的一年、二年、三年期金融债券利率，仍按原规定利率执行，直至债券到期；4月15日以后发行的一年、二年期金融债券，其利率在调整后的利率基础上可再加1—2个百分点。三年期金融债券利率在调整后的利率基础上，加保值贴补率，再加1个百分点。邮政储蓄转存人民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相

应降低1.26个百分点。

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由现行的年利率11.34%下调到10.08%，专业银行可增设一年期以下的贷款利率档次。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也相应下调。粮、棉、油贷款年利率由现行的11.34%下调到9%，外贸出口商品收购贷款年利率仍按9%执行。部分优惠贷款利率也同幅度下调。降低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各金融机构上缴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存款年利率一律调整为7.92%；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不再划分档次，统一按年利率9%执行。保险公司的财产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存款年利率由8.64%调整为7.92%。

12日　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公告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施行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境外金融机构的管理，保障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凡中国境内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性公司、企业及其他组织；境外中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境外非金融性中资公司、企业及其他组织，投资设立或者收购境外主要从事存款、贷款、票据贴现、结算、信托投资、金融租赁、担保、保险、证券经营等项金融业务中的全部、数项或之一的企业机构，都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而擅自在境外设立或者收购金融机构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冻结境内投资单位相应数额的外汇或者人民币存款，责令其撤销境外金融机构或者限期补办审批手续，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办法》还对境内机构在境外设立或收购金融机构所具备的条件和有关程序做了明确规定。凡国内机构已在境外设立或收购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在《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发布实施6个月内，由这些境外金融机构的主管部门向中国人民银行补办审批手续。经国务院批准，这一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实施。

14日　全国银行电话会议决定扩大贷款规模，调低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召开全国银行电话会议，对当前金融工作作出部署，以进一步支持生产适度发展，搞活流通，稳定经济。会议上宣布了人行在金融方面的一些措施，包括：1. 适当增加上半年银行贷款规模。主要投向是：（1）国家确定的234户大中型骨干企业；（2）支持春耕生产；（3）支持外贸进出口和商业物资部门收购的资金需要；（4）支持国家计划内固定资产贷款项目的合理资金需要；（5）支持经济效益好，产品关系国计民生、适销对路的中小型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及“三资”企业的生产。2. 适当降低银行贷款利率。从3月21日起，贷款利率下调1.26%，仍实行差别利率。3. 从4月1日起，恢复托收承付结算方式。4. 继续办好保值储蓄工作。

15日　国务院决定提高铁路货运价格

国务院通知自即日零时起，提高铁路和交通部直属沿海、内河的货运票价。铁路货物运价平均每吨公里由2分1厘提到2分6厘，提高5厘，同时解决200公里以内短途

与长途运价的不衔接问题。水运货物运价平均每吨公里提高3厘。沿海、内河港口货物装卸费也适当提高。国务院还通知，自即日起，适当调低国产彩电的特别消费税，调整彩电出厂价。调价后，每台彩电产地零售价和特别消费税合计，14英寸平均下降340元，18英寸平均下降400元，20英寸平均下降300元，22英寸平均下降400元。

卫生部等制定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事有卫生保健”规划目标

卫生部、国家计委、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局、全国爱卫会制定《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并为此发出通知。《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规划目标》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限标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提出了包括把初级卫生保健纳入县、乡（镇）政府工作目标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在内的12项指标和分阶段达标构想。

16日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制定90年代扶贫开发工作目标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90年代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请示》。90年代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是：从1991年开始，全国贫困地区要在解决大多数群众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转入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经济开发新阶段。到本世纪末，要求贫困地区达到：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多数农户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初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实现上述目标，90年代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以种、养业为基础，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依靠科学技术，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发展区域性的支柱产业，由单纯生产原料向加工工业延伸，从自给、半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把富民与富县结合起来，为彻底消灭贫困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坚持和进一步采取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和措施。（一）对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实行倾斜政策，有重点地安排一批骨干项目。（二）继续增加扶贫资金和物资的投入。（三）制定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区域性特殊政策。（四）继续动员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扶贫济困活动。（五）进一步加强对扶贫工作的领导，健全、稳定扶贫机构。

20日—4月4日　七后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会议决定接受邓小平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国家军委主席。

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作的报告。报告指出，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比较好，国民经济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突出表现在：连续几年的经济过热已经降温，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了压缩，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月降低，社会生产保持适度增长。(1) 粮食生产获得好收成，农林牧副渔业继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655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3%。粮食产量比上年有较多增长，达到4.0745亿吨，创历史最好水平。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关系密切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水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由于播种面积减少，棉花、油料和糖料产量比上年有所下降。(2) 连续几年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已经降了下来。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218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不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为6.8%），达到了计划的要求。(3)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控制，一批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尽管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是：（一）多年积累下来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市场销售疲软，资金紧张，产成品库存积压，商品流通不畅，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回落过猛。（三）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一些长线的、质次价高的产品仍在增产，而一些紧缺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则增长不快。基础产业的重点建设资金不足，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工工业的行业改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同治理整顿的要求还有相当大差距。（四）经济效益差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五）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城镇待业人员增多，部分居民生活发生困难。

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是：(1) 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率。在提高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工业总产值增长6%；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2) 进一步降低通货膨胀率，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计划控制在低于上年水平。(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计划4100亿元，并切实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4) 继续从紧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国家预算赤字低于上年水平。(5) 保持当年外汇收支基本平衡。1990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切实加强农业，争取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二）积极促进市场销售，大力调整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保持工业生产适度增长。（三）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1990年计划安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4100亿元。在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前提下，计划对投资结构作调整，主要是压缩一般性建设投资，重点加强农业、能源、交通等方面的投资。（四）安排好国内市场和人民生活，继续控制物价总水平。1990年计划安排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300亿元，比上年增长14.8%。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一方面要继续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加有效供给。今年既要继续控制物价上涨总水平，又要适当调整某些产品价格，以扶持和增加基础产品的生产。（五）坚持对外开放，努力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计划安排外贸出口比上年计划略有增加，力争在执行中超过。继续抓好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工作。努力帮助办好一批已建成的中外合资、合作企

业，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六）进一步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198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作的报告。报告指出：1989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是比较好的，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了国家预算，基本上保证了建设和改革的资金需要。1989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2919.2亿元，完成预算的102.2%；国家财政总支出为3014.55亿元，完成预算的102.9%；收入和支出相抵，财政赤字为95.35亿元。中央财政收支相抵，支大于收113.94亿元；地方财政收支相抵，收大于支18.59亿元。在1989年国家预算执行过程中，资金供需矛盾突出、财政平衡非常紧张。按照现在的预计数字，国家财政赤字和中央财政赤字都超过了预算。报告具体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成绩；（一）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努力组织收入，超额完成了收入任务。1989年国内财政收入比上年增加295亿元，增长了11.9%。扣除不可比的因素，则增长了7.4%，同工业生产增长8.3%基本是适应的。（二）贯彻紧缩财政的方针，控制和节减了一些非重点的财政支出。（三）调整支出结构，增加了能源、交通、农业、教育、科技等重点投入。1989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是按国家预算进行控制的，执行结果没有突破预算，但支出结构有所调整。据统计，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约占投资总额的50%。同时，各级财政还挤出财力，较多地增加了对农业、教育、科技的投入。（四）结合治理整顿工作，全面开展了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1990年国家预算安排的主要原则是：进一步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在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继续实行控制需求、紧缩财政的政策，并把工作重点放到调整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要努力促进生产发展，开辟新的财源，适当集中资金，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调整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真正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要加强财政管理监督，严格控制财政赤字，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报告提请大会审议的1990年国家预算草案是，财政总收入为3236.53亿元，比上年预计执行数增长10.9%；财政总支出为3325.45亿元，比上年预计执行数增长10.3%；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88.92亿元。1990年国内正常财政收入比上年预计数增长6.5%，不能保证今年必不可少的支出需要。因此，在努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狠抓扭亏增盈的同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开辟新的财源，适当集中资金，增加财政收入。国内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安排124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加97.27亿元，主要用于偿还个人购买国库券的本息。今年国外借款还本付息支出安排70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加24.17亿元，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今后要保持适度的债务规模和合理的债务结构，加强债务的监督管理，进一步增强财政的偿债能力。

26日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三角债”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由于市场疲软，产成品积压，工交生产中流动资金不足的矛盾很尖锐，企业、单位之间

互相拖欠货款和前清后欠的情况十分严重，已成为影响当前生产正常进行的突出问题，也损害了社会信用。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清欠工作的原则是：清欠工作要与启动、促进当前工交生产相结合，与贯彻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相结合，与加强资金管理制度建设相结合，与推动搞活市场相结合。清欠的方法是采取条块结合、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清欠的步骤是：第一步，先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和基建、外贸、商业、物资等系统进行，由各地区、各部门自行组织清欠工作。第二步，以被拖欠货款较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中心，组织跨省（区、市）的区域性清理。第三步，在区域性清理的基础上进行全国范围的清理。清欠工作争取在1990年7月底以前基本结束。为清理“三角债”，银行要投入一批启动资金，为解决前清后欠问题，各企业、各单位必须信守合同，严格执行财务结算纪律。从1990年4月1日起，凡无理拖欠货款的单位，要给收款单位支付日息3‰的滞纳金。国务院成立以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以加强对清欠工作的领导。

4　月

7日　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亚洲一号”卫星

我国用“长征三号”火箭成功为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了由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表明我国正式进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这是首次成功地用我国的运载火箭完成为国外发射商用卫星的服务。发射亚星是“长征三号”火箭连续成功进行的第六次发射，自1984年4月8日首次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以来，它已成功地将我国自行研制的五颗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3日　农业部对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作出规定

农业部发布《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规定》，对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内容和形式、企业经营者、承包经营合同、发承包双方的权力和义务、管理与监督等作出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1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对234户重点企业实行“双保”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委《关于对234户重点企业试行“双保”的办法》。“双保”即企业保证完成对国家承担的任务，国家保证企业外部生产条件。选定“双保”企业的原则是：（一）正常生产的企业；（二）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生产的企业；（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对本行业内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四）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比例大、经济效益好、出口创汇多的企业。经选定的234户“双保”企业，1990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为1926亿元，占全国大中型企业产值46%，占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的29.7%，上缴利税385亿元，占预算内工业企业上交利税总额的35.2%。

27日　国务院通知要求做好劳动就业工作

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仍然贯彻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与自谋职

业相结合的方针。除全民所有制单位按照国家计划安排就业外，更多的要靠发展集体经济和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作用，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就业渠道。要合理控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挖掘企业潜力，妥善安置富余人员。加强领导，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劳动就业工作。

5　月

4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我国 1989 年外债数字

据公布，1989 年末我国外债余额为 413 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债务余额为 370.3 亿美元，短期债务余额为 42.7 亿美元。1989 年末外债余额比 1988 年底增加 13 亿美元，增长 3.25%，大大低于前四年平均增长 36.29% 的水平，债务率为 81.9%，低于 100% 的国际警戒线。从结构上看，短期外债比重从 1988 年的 18.25% 下降到 10.34%，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 25% 的短期外债警戒线。

15 日　国家决定发行 1990 年重点企业债券

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审计署决定，1990 年国家继续实行按自筹投资一定比例认购的重点企业债券。1990 年国家发行重点企业债券 20 亿元。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各地区、各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规模、结构等综合因素，将债券任务作为指令性任务下达给各地区、各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完成或少完成国家下达的债券任务。为确保完成购买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应将认购任务分解落实到项目的单项工程，采用先落实购买任务再下达投资计划等源泉控制办法。1990 年发行的重点企业债券期限为 5 年，年利率为 7.2%。

19 日　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为改革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合理开发、利用、经营土地，加强土地管理，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条例》规定了条例的适用范围、使用权限和合法权益；还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使用权出租、土地使用权抵押，土地使用权终止、划拨土地使用权等作出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发布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管理办法

为了吸收外商投资从事开发经营成片土地，以加强公用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办法》确定了成片开发的目标，明确规定利用开发后土地的建设项目和外商应分别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规定。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内施行。

23 日　国家体改委提出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意见》，并为此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区要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

条例》和国家体改委《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的意见》的要求，认真搞好下一步企业承包的衔接工作，抓住有利时机，把承包经营责任制加以完善，进一步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治理整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把深化企业改革和强化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各个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要进一步完善内部经济责任制和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加强各项管理基础工作，推进管理现代化。要动员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增产节约，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调整产品结构，充分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多做贡献。

体改委的《意见》中按照“稳定、充实、调整、改善”的方针，对治理整顿期间深化企业改革，提出以下意见：（一）继续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二）强化企业约束机制。（三）千方百计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四）深化企业内部配套改革。（五）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素质。（六）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七）继续进行股份制和税利分流试点。

24 日　准格尔煤田开始全面建设

建国以来我国煤炭工业最大的建设项目准格尔煤田的一期工程全面开始建设。这一筹建 3 年之久的特大型煤田的全面开工，是我国煤炭开发战略西移的重要一步。准格尔煤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带，距呼和浩特市 100 公里。煤田南北长 65 公里，东西宽 21 公里，总面积为 1365 平方公里，已探明煤炭储量 272 亿吨。

准格尔煤田是煤、电、运同步建设的综合性项目。与煤田同步建设的还有从煤田至京包线丰镇站的 215.6 公里长的单线电气化铁路，从矿区至呼和浩特、东胜、包头以及山西平朔煤矿的公路和一座装机容量为 20 万千瓦的坑口电厂，总投资 41.4 亿元。准格尔煤田一期工程自 1976 年开始筹建。整个项目要求于 1992 年底建成，1993 年大量输出煤炭。准格尔煤田建设实行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是我国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的新尝试。

31 日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对资产评估机构管理作出规定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下发《关于资产评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下设国有资产管理局评估中心负责组织、领导和监督本级政府管辖的国有资产评估工作，并指导全国国有资产评估的工作。地方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由其授权的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和监督本级政府管辖的国有资产评估工作，并指导下级国有资产评估工作。凡持有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的资产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咨询公司、审计事务所等机构或者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可的临时评估机构，均具有承担国有资产评估工作的资格，并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实行有偿服务。

国家计委提出改进现行电力分配办法的意见

198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电力统一分配确保重点企业用电的暂行规定》。为了缓解全国电力供需矛盾，从 1985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了集资办电、卖用电权、发行电力债券以及征收电力建设资金等项政策和措施，缓解了国家电力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力

地加快了电力建设。与此同时，电力投资从单一的中央投资逐步转变成为中央、地方、企业多元化投资；新建机组的电力分配也随之形成多元化定向分配的局面。由于仅靠中央投资建设的新增电力资源，难以满足国家重点企业用电增长需要，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煤炭、石油、电气化铁路、原材料等耗电集中的地区或部门，用电短缺问题尤为突出。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对电力分配办法提出如下完善、补充意见：一、指令性发电量计划的燃料供应和运输计划安排，要做到不留缺口。在计划执行中，任何地方、部门、企业均不得随意调减。二、电力分配计划要坚持“确保重点，兼顾一般，统筹安排，择优供电”的原则。三、对以下电力资源也要纳入国家统一分配：(一）华能集团公司以及所属公司建设的电厂（不含以煤代油电厂），即现已建成投产的电厂及机组的电力资源。(二）采用地方电力建设资金（“两分钱”）建设的电厂及机组的电力资源。(三）凡有国家投资的新投产机组在试运营期间的电力资源。在年度计划执行中，当燃料不足而电网设备又有能力时，从地方所组织的带料加工电量中提取30%，在月度计划中补助给本地区的国家重点企业。为保障电力生产的正常运营，以上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各类电力资源的电价，仍执行国家批准的有关规定的相应电价。四、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有关规定，由中央投资的新机电量给予地方的留成比例不得超过10%。五、各电管局、省电力局卖用电权的电力资源，应由国家重点企业优先购买。六、要调整投资结构，努力增加重点电网的中央办电投资，以适应国家重点企业和新增大中型骨干企业的用电需要。七、重点企业年度用电指标，由国家根据企业承担的指令性生产任务量核定，各地区和各电力部门要保证供应。电网因特殊原因（燃料、水情、重大事故等）不能按计划供电时，重点企业与地方用电原则上按照等比例方式调减。当重点企业需要缩小调减用电计划时，由所在地区电管局提出调整方案报能源部批准后执行。

6　月

2日　我国首次公布环境状况公报

国家环保局公布《198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的内容包括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公报指出，1989年，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在治理整顿中开拓前进。这一年，环境保护科研项目有6项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一次表彰了在工业污染防治中做出显著成绩的100家环境保护先进企业和225名先进工作者；我国还加入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签署了《控制危险废物转移巴塞尔公约》，参加了关于保护臭氧层、防止气候变暖、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方面的国际会议，并开展了有关环境保护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这是我国首次发布环境状况公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环保局将定期公布我国的环境状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10项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请示》，

批准10项政策措施和划出一定区域为保税区。国务院同意在浦东新区采取以下优惠政策：1. 区内生产性的“三资”企业，其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计征；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2年内免征，3年减半征收。2. 在浦东开发区内，进口必要的建设用机器设备、车辆、建材，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区内的“三资”企业进口生产用的设备、原辅材料、运输车辆、自用办公用品及外商安家用品、交通工具，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凡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3. 外商在区内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应以产品出口为主；对部分替代进口产品，在经主管部门批准，补交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后，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4. 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兴建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从获利年度起，对其所得税实行前五年免征，后五年减半征收。5. 允许外商在区内兴办第三产业，对现行规定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金融和商品零售等行业，经批准，可以在浦东新区内试办。6. 允许外商在上海，包括在浦东新区增设外资银行，先批准开办财务公司，再根据开发浦东实际需要，允许若干家外国银行设立分行。同时适当降低外资银行的所得税率，并按不同业务实行差别税率。7. 在浦东新区的保税区内，允许外商贸易机构从事转口贸易，以及为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代理本企业生产用原材料、零配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业务。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的方便。8. 对区内中资企业，包括国内其他地区的投资企业，将根据浦东新区的产业政策，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浦东开发与开放的企业，也可酌情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9. 在区内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政策，使用权限50年至70年，外商可成片承包进行开发。10. 为加快浦东新区建设，提供开发、投资的必要基础设施，浦东新区新增财政收入，将用于新区的进一步开发。

3日　国务院颁布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为保障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引导其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条例》对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企业的管理，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奖励与处罚等作出了规定。《条例》指出，国家保护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其财产。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吸收投资入股。《条例》自1990年7月1日起施行。

6日　陈云同志对水资源问题作出批示

陈云对水利专家张光斗和水资源研究所所长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作出批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7日　国务院调整教育费附加

国务院发布《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一、教育费

附加计征依据改为按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上述3种税额附征，附加率由1%改为2%。二、金融、保险企业的计征依据为营业收入乘以5%。三、只对生产卷烟的单位减半征收。教育费附加纳入预算管理，作为教育专项资金，根据“先收后支、列收列支、收支平衡”的原则使用和管理。自1990年8月1日起施行。

10日—27日 江泽民考察广东

江泽民就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等问题到广东考察。他先后考察了汕头、深圳、珠海三个经济特区和广州、惠州、东莞、中山、佛山、顺德等市、县，就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听取了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他在考察期间指出，特区的成功，充分说明根据邓小平倡导、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办好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实行改革开放、创办好经济特区，搞好沿海对外开放，这是关系祖国的未来，荫及子孙后代的一个大政策，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改变。他反复强调，坚持对外开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关键的问题在于必须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他指出，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们一方面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因此，开放地区和特区的党组织一定要认真抓好自身建设，特别是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好。

22日 国务院发布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为加强对陆地污染源的监督管理，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陨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条例》所称陆地污染源，是指从陆地向海域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场所、设施等；所称陆源污染物是指陆源排放的污染物。《条例》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的一切单位和个人。《条例》自1990年8月1日起施行。

7　月

2日 国务院通知要求加强国有资产管工作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把国有资产的管理作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出成效。《通知》就如何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问题首先提出8个方面的工作：1. 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开展清查资产、核实国家资金、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的工作。通过清产核资，核实各部门、各单位占用的国有资产价值总量，将一切应归国家所有的资产，都纳入国有资产管理轨道，认真解决“家底”不清、管理混乱、损失浪费严重等问题。2. 坚决防止和纠正损害国家资产产权行为。3. 完善企业国

有资产产权管理机制。4. 完善改进企业经济效益考核内容。5. 切实加强对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管理。6. 在深化改革中正式建立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7.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逐步建立全国国有资产管理机构。8. 建立健全管理责任制。

这次清产核资工作计划在“八五”期间进行。各级政府要组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股份经营、租赁经营、中外合资经营的中方资产和在境外经营的国有资产，以及企业兼并和出售小企业、国营企业办集体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搞“创收”等经济活动中的国有资产管理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检查。针对各种损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予以防止或纠正。完善企业的国有资产产权管理机制，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在新的一轮承包中，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共同参加发包，完善承包考核内容和内部分配办法，在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原则指导下，确定承包合同中的资产、财务指标，严格考核，确保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增值。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要协同财政部门，监督企业认真执行国家关于企业生产发展基金、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的提取和使用规定。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将生产发展基金挪作奖励、福利基金的，少提、不提折旧基金和将折旧基金不用于生产用途的，以及对设备不进行正常维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要采取措施，坚决纠正。国务院在通知中还要求，改进、完善企业经济效益考核内容；切实加强对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管理；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逐步建立和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3 日　内蒙古伊敏河煤矿煤电联营一期工程全面开工

我国推行煤电联营的试点工程内蒙古伊敏河煤矿煤电联营一期工程，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各项准备工作全面铺开。伊敏河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是我国重点露天煤矿之一。煤电联营一期工程计划建设年产 1000 万吨煤炭的露天煤矿和两台 50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以及相应的送变电工程。建成后，将向内蒙古海拉尔地区和黑龙江的大庆等地区供电，这对缓解东北经济区的能源紧张状况，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将起到重要作用。实行煤电联营是我国能源基地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1989 年 3 月，能源部就组成了伊敏河煤电联营规划设计协调小组，8 月完成了工程的总体设计。此项工程总投资为 29 亿元。实行煤电联营，可以使煤电生产直接结合，减少运输环节，有利于统一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可大大节约工程投资和生产成本。

8 日　西昌卫墨发射中心建成使用

国家重点工程大型运载火箭发射设施一期工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设施的主体是活动勤务塔和固定发射塔。南北方向运行自如的活动塔高 97 米，自重 4000 余吨；固定发射塔高 74 米，重 1050 吨，耸立在深达 23 米的导流槽上。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在这里完成发射前的综合测试及燃料加注等勤务保障。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发射设施，可以完成大型运载火箭的发射需要。

10 日　国家计委等决定整顿成品油市场

随着计划外油品进入市场，市场管理有所放松，各地非法插手经营成品油的单位已

涉及到工、农、兵、商、政等许多部门。由于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加码，轮番涨价，致使成品油市场十分混乱。为此，国家计委、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成品油市场管理和整顿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准许从事国内成品油的批发、零售和供应业务的单位为：中国石化销售公司系统，包括销售公司直属公司，成品油生产企业供销机构（执行国家分配计划及自销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石油公司的各级公司（上述主营单位之间原已组建的主营成品油的联营企业，凡不具备经营条件的，一律不准继续经营，今后也不准以联营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严格整顿小炼油厂，坚决取缔小土炼油炉。原由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成品油市场管理和整顿的通知》作废。

11 日　国务院第九次全会讨论当前经济形势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在第九次国务院全会上通报了国内经济形势，李鹏总理就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做好下半年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1990 年以来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进一步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经济的整个趋势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或正在逐步渡过。但是，经济形势存在着严峻的一面：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市场部分销售疲软，工业产成品积压，亏损企业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继续下降，财政收支状况比较严峻，经济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为此，国务院决定采取以下的措施：一、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微调的办法，适当降低贷款利率，同时实行差别利率。二、在全年物价上升幅度控制在 10%的前提下，对某些上游产品的价格作适当微调。三、银行适当增加更新改造贷款，定向使用于促进结构调整的效益提高。四、进一步清理“三角债”，着重解决重点建设资金不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相互拖欠的问题。五、从资金、物资供应和其他必要的方面，大力支持秋季农业生产。在指导思想上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坚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防止再次出现大的波折，“八五”前期要坚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必须把发展农业放在优先地位，力争农业有一个新的突破。粮食生产要与人口增长相适应。千方百计提高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八五”期间，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就是要少搞新项目，多搞技术改造。

14 日　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

会议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重新论证情况的汇报，决定将可行性研究报告提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这次汇报会是在 1986 年 6 月以来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进行重新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的。近三年来，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织国务院所属的十七个部门、单位，中科院所属的十二个院所，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和八个省市的近千名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参加了论证研究工作。会议指出，对于三峡工程这样一个规模大、影响深远的巨型工程的利弊得失和各类技术经济问题，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正常的。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讨论，将有助于论证研究工作的深入，有助于避免决策上的失误。在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将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审议；在党中央、国务院审议后，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定。

建设部提出进一步清理整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意见》。《意见》提出，清理整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重点是解决公司过多、过滥和名不符实的问题，使公司的数量与房地产开发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经清理整顿保留的国营房地产开发公司，应纳入国家预算管理。计划管理部门应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资质等级下达商品房屋建设计划。各专业银行开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则上应予撤销。综合性公司及其他专业公司原则上不得兼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少数办得好的，又符合社会需要，其兼营的房地产业务应从所属公司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法人，实行独立核算，归口建设部门管理。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则上应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主。对准予保留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重新领取资质等级证书后，凭新核发的资质等级证书按有关规定重新申请登记注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凡撤销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取消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的公司，不得再新开工程；其存量资产和债权、债务的清理、处置以及人员安置，由公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处理。各系统、各单位未经建设主管部门资质审查批准成立的住宅建设机构，只能从事本系统、本单位职工住宅的建设，不得经营商品房屋。

16日　我国第一枚“长征二号”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我国新研制的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助推火箭和一、二级火箭正常飞行，将模拟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枚火箭是由我国新建的大型航天发射设施发射升空的，同时还为巴基斯坦搭载了一颗小型科学试验卫星。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20日—26日　江泽民考察西藏

考察期间，江泽民在西藏的日喀则等地，深入工厂、农村、牧区、学校、医院和解放军，武警部队驻地，同西藏广大军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听取了胡锦涛代表自治区党政领导作的工作汇报，接见了自治区县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西藏自治区集体领导团结有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思稳定、盼发展、求富强，是各族各界群众的共同心愿。中央将继续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江泽民强调，今后必须把继续稳定局势放在西藏工作的首位；搞好以打基础为主的经济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重视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各级党政干部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各级党政组织和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开发智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西藏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对待。西藏是祖国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21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对撞机整机性能达到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投资为2.4亿元的国家重点工程的竣工和投入使用，使我国高能加速器的

技术跨过了世界上50、60、70年代建造打静止靶的高能加速器而直接建造高难度的对撞机，一步进入了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这项工程1984年10月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奠基，破土动工，1987年11月完成总体设备安装，1988年10月实现正负电子对撞。这样的建设速度在国际高能加速器建造史上是少有的。

国家土地管理局等发布土地登记收费管理办法

为保证收费工作顺利进行，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测绘局、国家物价局、财政部联合颁发《关于土地登记收费及其管理办法》。《办法》对收费原则、收费范围、收费项目及标准，土地登记费的收取、使用和管理等作出了规定。广东、海南、福建省收费标准自行制定。

24日 国务院颁发加强粮食购销工作的决定

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粮食购销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正确认识粮食形势，务必抓好粮食收购，切实保证粮食收购资金，进一步压缩平价粮食销售，加强粮食调运工作，加强粮油市场管理，建立和健全粮食储备制度，抓紧食油购销工作，加快粮食仓库建设，逐步解决粮食财务挂帐。国家计委要会同经贸、商业、财政等部门统一安排粮食进出口，搞好综合平衡。粮食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部门要全面安排部署，协调各方面关系，促进粮油稳定增产，保障有效供给。

26日 国家限制23种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改造

国务院发出《关于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对若干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和改造加强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产业政策贯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若干产品如汽车、乙烯、冰箱压缩机、彩色玻壳、录像、棉纺等生产线仍在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和改造，有的不顾经济规模和布局的合理要求，盲目扩大生产能力，造成严重浪费，据此，《通知》提出对23种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改造予以限制，并进一步明确：凡新建、扩建和改造的项目，都要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需要加强控制、问题较严重的少数产品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按规模分限额以上及限额以下分级审批办法的基础上，实行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建设改造规模相结合的审批办法进行管理。对有权审批单位已经审批项目建议书或设计任务书，但尚未开工的投资项目，要进行清理，需继续建设改造的，要上报国家有关行业归口部门补办核准手续。《通知》公布后，列入通知目录的产品如再发生严重重复建设和改造的问题，要追究行业归口部门主要负责人责任。

29日—8月2日 全国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来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有关部门主管工交生产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四个：如何启动市场，促进生产；如何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如何更好地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如何发挥地区协作优势，打破地区封锁。这次会议由国务院生产委员会主持召开。李鹏总理在听取了会议的情况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全国经济工作不仅在速度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效益和结构调整方面能取得进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已经度过或正在度过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等深层次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全国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都要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加强协调和调度。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

逐步掌握定量分析的本领。发挥好企业集团的优势。搞好企业集团可以使生产力配置更加合理，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能力，还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进行大的技术改造项目。目前促进生产的突破口是进一步启动市场，减少产成品的积压。但搞活经济根本出路还是调整结构。必须把调整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采取措施打破地区封锁。地区封锁实质是保护落后，破坏全国统一市场，阻碍了技术进步，最终自己也要受害。夺取农业丰收事关全局。夺取农业丰收不仅是农业战线，而且是工业战线，乃至整个经济战线的任务。

31日　国务院决定提高国内邮政资费

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后首次调整邮政资费。这次提高邮政资费的主要是平信、印刷品、函件挂号、邮政包裹和邮政快件等。调价标准在当时资费基础上平均加收150%。

8　月

1日　财政部对耕地占用税减免管理作出规定

财政部颁发《关于耕地占用税减免管理的暂行规定》，强调严格执行减免政策，从严控制减免范围，耕地占用税减免实行申报制度。对耕地占用税减免的审批权限过程和对纳税人申请减免耕地占用税的情况进行审核、检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可采取自查、互查和专查等形式定期开展耕地占用税减免执行情况的检查，报财政部和同级人民政府。

6日　国务院就加强粮食购销工作作出决定

为切实把农民需要出售的余粮收购起来，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国务院作出《加强粮食购销工作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正确认识粮食形势；务必抓好粮食收购；切实保证粮食收购资金；进一步压缩平价粮食销售，加强对粮食销售的管理，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减少不合理销量；加强粮食调运工作；加强粮油市场管理；建立和健全粮食储备制度；抓紧粮油销售工作；加快粮食仓库建设；逐步解决粮食财务挂账。

8日　国务院决定提高煤炭价格

对统配煤矿计划内综合煤平均基本出厂价每吨提高10元。地方国营计划内煤炭出厂价参照统配煤矿的出厂价格适当提价，但平均吨煤提价额不得超过10元。纳入计划的乡镇矿煤炭价格，原则上按地方国营煤炭提价幅度提高。各行各业都要努力消化煤炭提价的影响，严格控制连锁反应。计划内煤炭出厂价提高后，本着“老账不还，新账不欠”的原则，适当提高市场民用煤的销售价格。同时适当提高城市居民用煤气、液化气和天然气的销售价。

11日　央行规定专业银行不得直接从事证券交易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致函各专业银行，根据国家现行政策，证券业与银行业实行分业管理，专业银行不宜直接从事证券交易业务。经人民银行批准，专业银行已设立的证券交

易柜台，可继续办理证券交易业务；尚未设立证券交易柜台的，原则上不再新批设立证券交易柜台。经人民银行批准，专业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设立证券交易柜台，直接从事包括证券交易在内的证券业务。信托投资公司设立证券交易柜台后，经人民银行批准，可在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及储蓄所、城乡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设立证券交易代理点，代为办理证券交易业务。专业银行可根据人民银行核准的业务经营范围，办理证券的代理发行、兑付业务。

国家计委对固定资产投资自筹资金来源实行审查制度

为了加强对社会财力的综合平衡和宏观调控，有效地控制自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国家计委对固定资产投资自筹资金来源实行审查制度。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在上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时，必须对自筹投资部分做出相应的自筹投资资金来源计划同时上报。自筹投资资金来源计划包括国家规定可以用于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自筹投资的各项资金，主要有地方财政预算内自筹资金、地方和部门的全部预算外资金以及通过各种手段筹集的自筹资金等。自筹投资资金来源计划不仅包括自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的来源构成，同时也应体现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财力平衡情况和资金实际能力。各级计委（计经委）财金部门负责审核自筹投资资金来源计划，经过综合平衡，提出对自筹投资总规模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筹基建和技改投资规模的建议，编制上报自筹投资资金来源计划。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必须按照下达的计划规模、项目和批准的资金来源渠道严格执行。资金来源渠道若发生改变，必须技原来的程序重新报批。

14 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先后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问题，会议精神如下：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把它放到重要日程上来。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坚持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是作好知识分子工作的立足点；深刻理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把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6 日　国务院决定开展 1990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1985 年以来，在全国已经连续进行的 5 次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对严肃财经纪律，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各种违反财经法纪屡禁不止的现象仍很突出，这不仅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干扰治理整顿，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必须坚决予以制止。为此，国务院决定，1990 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大检查的范围包括：国营、集体、私营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以及个体工商户在 1990 年发生的违反财经法纪的问题和 1989 年发生而未检查、纠正的违反财经法纪的问题，以及 1988 年以来的各种“小金库”资金。

18 日　我国第一个远程无线电导航台组通过国家验收

该系统填补了我国远程高精度导航定位领域的空白，其性能达到了当代国际同类系统的先进水平，在经济建设中有重大作用。远程无线电导航台组分布在南海地区千里海

岸线上。整个工程占地2700多亩，铁塔天线高达240多米。多年来，我国远航在1000公里外的船舶一般靠月亮、星辰定位导航，受天气影响大，计算复杂，精确度低。新建成的我国第一个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作用距离达2000公里，定位精度为50—2200米，可覆盖2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具有作用距离远、定位精度高、国际通用和全天候连续定位等突出优点。

19日国务院发布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

为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在境内投资，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规定》明确，华侨、港澳投资者可以在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投资；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土地开发经营。投资的形式包括：举办华侨、港澳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合作生产；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购置房产；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发经营等投资形式。

21日　中国人民银行调低存贷款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适当调低存、贷款利率，调整幅度为在现行利率的基础上，平均下调1.08%。活期存款年利率下调0.72%，定期存款年利率平均下调1.74%。居民储蓄3年以上定期存款仍然实行保值。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由10.08%下调到9.36%；6个月期贷款年利率由9%下调到8.64%；技改贷款年利率由10.08%下调到9.36%，基建贷款各档次利率也分别下调。

22日—9月1日　江泽民考察新疆

考察期间，江泽民先后考察了国防科工委某试验训练基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石河子垦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江泽民指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要特别提倡亲密团结，大力协同，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各部门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都要大力发扬这种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奋斗，我们的事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特别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江泽民强调要重视培养民族干部，发挥民族干部的作用。在干部之间，尤其是领导干部之间，要形成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体谅、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合作共事的良好作风。

30日　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纳入国家预算管理

财政部印发《关于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纳入国家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90年第四季度起，将开发企业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照章缴纳国营企业所得税。各级开发企业按其主管部门财务隶属关系，将应缴所得税分别上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其中，上缴地方财政的所得税收入列做地方预算收入，中央财政参与分成。

亚运会工程完工

1984年9月，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为了保证这次体坛盛会的圆满完成，北京进行了大量的工程建设。亚运会

工程历时4年3个月，作到了适应亚运会的要求并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工程形成了总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80多个比赛训练场馆的规模。工程得到了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和海外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用于新建、改扩建和维修体育场馆、电子服务工程、市政工程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开支约20亿元。

9　月

3日　国务院批转加强通信行业管理、整顿通信秩序的意见

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务院确定的“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通信建设方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维护正常的通信秩序，邮电部《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提出：邮电部是国家管理全国通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有通信行业管理的职责。邮电部门在大力发展公用通信网的同时，要积极主动为专用通信提供咨询和服务，搞好规划和协调。要支持和帮助地区性专用通信网通过必要的技术改造与公用网联通，促进公用通信网与专用通信网的协调发展。公用和专用通信网的建设必须统筹规划，提倡并鼓励联合建设。除了有特殊要求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原则上不得再自行建设长途通信线路。各部门长途通信所需电路原则上由公用通信网提供，公用通信网暂时难以提供的，应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联合建设。大型厂、矿、企业新建局部性通信网，要纳入当地公用通信网建设规划；已有的一些与公用市内电话网并立的地区性专用电话网，要通过共同投资进行技术改造，组成统一的市内电话网。凡新建长途通信线路（包括配套项目），均应经邮电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归口会审。民用卫生通信由邮电部统一组织建设或对外租用。国际通信设施建设由邮电部负责。所有进入公用通信网的设备都要符合标准。主要通信业务必须由国家统一经营。乡镇集体电话在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由县（市）人民政府统一管理。

7日　国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金融业务

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办法》对总行设在上海的外国资本的银行、外国资本的银行设在上海的分行、外国资本的金融机构同中国资本的金融机构在上海合资经营的银行和外国资本的金融机构同中国资本的金融机构在上海合资经营的财务公司，其在上海的设立与登记办法、注册资本和营运资金、业务范围、业务管理、监督检查、解散与清算、罚则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本办法允许被批准设立的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开展外币存款、外币放款、外币票据贴现、外币投资、外币汇款等其他业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著作权法》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共6章55条，包括著作权、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的法律责任等条款，该法将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发挥重要作用。自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10日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9项具体政策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分别宣布了《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上海浦东新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货物、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管理办法》。上海市宣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商投资浦东新区的若干规定》、《关于上海浦东新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办法》、《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管理若干规定》、《关于上海市浦东新产业导向和投资指南》、《关于上海浦东新区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办法》等9个政策法规。

上述9个政策规定是依据党中央、国务院的10项优惠政策以及中央有关鼓励外商投资的法律文件，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的有关政策制订的。其中前3项法规经国务院批准，其它6个文件是由上海市政府与国务院有关部门一起商定并得到有关部门批准的。这些政策法规内容广泛，综合反映了浦东开发开放涉及的主要方面，既适合浦东的特点，又使党中央国务院的10项优惠政策具体化，使外商投资基本上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法规名称　关于上海浦东新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

发布机关及日期　1990年9月7日国务院批准1990年9月11日财政部发布

说明　已被1991年4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1991年6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7年2月19日《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代替。

11日　国家决定建立专项储备粮食制度

为增强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能力，搞好丰歉调剂，保证粮食市场供应和粮价的基本稳定，国务院第六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即由国家收购农民的余粮，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重点照顾粮食调出省和地区。国务院成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统筹解决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关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商业部。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粮食储备局，负责国家粮食储备的管理工作。国家粮食储备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商业部代管。国家专项储备粮食，粮权在国务院，各地必须服从统一调度，未经批准，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擅自动用。要建立专项统计、定期报告制度，以便及时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12日　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

我国兰新铁路西段与苏联土西铁路在中苏边疆的新疆阿拉山口站和苏联德鲁日巴站之间胜利接轨，举世瞩目的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宣告全线贯通。这条大陆桥东起我国连云港，通过西部边疆阿拉山口，与苏联的友谊站接轨，西至荷兰鹿特丹港。它横跨亚欧两大洲，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穿越中国、苏联、波兰、民主德国、荷兰等国，辐射30

多个国家。这条亚欧大陆桥全长约一万公里，在我国境内铁路4100多公里，横贯我国中部五省区。

13日　我国第一个百万吨级的海上油田投产

我国第一个年产百万吨原油的海上油田——惠州21—1油田正式投产出油。惠州21—1油田的投产，标志着我国南海东部的油田已进入勘探、开发和生产并进的新阶段。惠州21—1油田位于香港东南方160公里处的海域，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东部石油公司同意大利阿吉普（海外）有限公司、美国雪佛龙海外石油有限公司、美国德士古石油玛茨莎皮（荷兰）B·V·公司组成的ACT集团合作开发。惠州21—1油田为深度2800米至3000米的砂岩油藏，油质好，高峰时每天可产原油4000吨，年生产能力可达100多万吨。

15日　民政部等发布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民政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部，物资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对社会福利企业的审批、社会福利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福利企业的管理机构、保护扶持、企业管理、劳动工资、财务管理、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

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

国务院作出如下决定：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制止“三乱”的紧迫感。二、对现有的收费、罚款、集资项目和各种摊派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三、严格审核收费、罚款、集资项目和标准。对现有的收费、罚款、集资项目，要重新进行审核，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应在其职责范围内办理公务，除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门规定者外，不准收费。四、坚决禁止各种形式的摊派。国务院1988年4月发布的《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和1990年2月发出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执行。五、明确部门职责和管理权限，加强项目审批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权限集中在中央和省（不含计划单列市）两级。根据收费项目情况，分别由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和省物价、财政部门审批，重要项目须报国务院或省政府批准。设立各种基金的审批权集中到财政部，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重要的报国务院批准。六、建立健全收费、罚款和集资的财务、票证管理制度。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按照资金性质分别纳入财政预算或预算外管理。七、精简机构，压缩人员，努力减少各种收费。对以收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单位，经过清理要撤并一批。八、切实加强监督检查。今后，各级政府要把对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的检查列为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使之制度化，经常化。九、大力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十、切实加强对治理“三乱”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治理“三乱”领导小组，有关部门参加，统一领导、部署和协调清理整顿工作。

22日—25日　第五次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举行

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会上指出，5年来，2万多个星火科技火种项目已累计新增产值220多亿元，新增利税55.3亿元，出口创汇23.4亿元。星火计划为振兴农村经济所做出的贡献是国内外瞩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应努力推动这一计划在90年

代获得更加稳定的实施。对于依靠科技振兴农业应有广义的理解，要用大科技振兴大农业。当今农业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宽，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支农工业以及产业加工转化、保鲜、运输等都属农业范畴，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科技兴农不仅需要农业技术力量的奋斗，各学科、各技术领域、各行各业也应给予积极的支持。

30日　国务院批准建立我国首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第一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共有五处：位于河北省昌黎县的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的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万宁县的大洲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三亚珊瑚礁自然保护区和位于浙江省平阳县的南麂山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10　月

4日　商业部等部门要求进一步开拓农村市场

商业部、轻工业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开拓农村市场的通知》。《通知》指出，农村市场是我国轻工产品市场的主体。开拓农村轻工产品市场，对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轻工部门要根据农村的消费特点，定向开发、定价设计、定点生产农村适销对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轻工产品，每年要制订出“三定”计划，不断开发不同档次的新产品，满足农村市场不同消费需求。《通知》还对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工业部门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以及建立耐用消费品的“二手商品”市场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12日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

经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和河南省政府建立的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要进行省际间议价小麦的批发交易。这是我国第一个有组织、有限制、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目前，中国议价粮食约700多亿公斤。议价粮食的交易基本上是买卖双方成交，既没有规范化的批发市场，又缺乏计划指导与政府调控。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建立，将逐步把议价粮食批发业务纳入有组织、有限制。规范化的市场轨道。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后，暂定开市日为周一、三、五，品种为小麦一种，今后逐步扩大为大米、大豆、玉米等。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证券公司目前只限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和第一、二批国库券转让试点城市设立。证券公司可在公司所在地的城市内设立营业点和代办点，可在所在地城市之外设立代办点。证券公司原则上不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各地应严格控制；个别的确需设立的，由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审核后，报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各地人民银行出资开办的证券公司可以保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分行审查后，报总行办理重新登记和换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手续。《办法》分别规定了机构管理、业务范围、管理监督等方面的内容，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资金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以存定贷，自主运用，比例管理。当国家实行宏观紧缩措施时，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计划管理。农村信用社的机构设置要实行计划管理。各分行在年初应向总行报送本年度的机构设置计划，经总行审批后执行。目前已批准进行改革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仍按原有关规定继续进行试点。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合作金融组织，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信用社是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其合法权益和正当经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平调和挪用其财产和资金。

16日　我国第一座脉冲核反应堆建成

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在西南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建成并达到临界。我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这种新堆型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国家。这座反应堆由核工业总公司西南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研究设计建造，全部设备仪器都是国内研制生产的，可直接服务于教学、科研、生产与医疗事业。

17日　国家大地网数据库建立

建立有统一高程和坐标数据的国家大地网数据库，是进行现代化和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当今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建立了国家大地网数据库。我国已经在国土内布设了有各种等级的20万个三角点，测量了几亿个大地数据。但过去是采用“人工方式”管理数据，远远满足不了现代化建设应用大地数据成果的需要。这次测绘兵在国内率先建立的国家大地网数据库，其结构复杂、性能良好，有当代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群，有一整套绘图、图型显示、数据站、用户终端等配套设施。这个数据库面向军事单位和航天、航空、航海、煤炭、石油、铁道、地质等部门。目前，查寻国内任何一个三角点位的经纬数据和地球引力等数据，已由过去的几小时至几天缩短到6秒钟。

19日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制定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试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在新一轮承包中确保企业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增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在新的一轮承包中，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共同参加发包，完善承包考核内容和内部分配办法，在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原则指导下，确定承包合同中的资产、财务指标，严格考核，确保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增值。《办法》还就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严格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各项基金、提高国有资产的经营使用效益、核准国有资产基数、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建立国有资产报告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规定。本规定另有附件《承包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计算考核暂行办法》，说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内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设置和核定、指标的考核方法和指标完成情况的奖罚。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25日—31日　江泽民在辽宁考察

在考察中，江泽民强调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他指出，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的十年。我们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要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经济搞不上去；反过来，经济搞不上去，也难以保持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他要求各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勤政廉洁。江泽民十分关心企业基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基层是我们的细胞，要特别注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他说，前一阶级社会上对厂长的中心地位和党委的核心作用有一些议论，其实党委的核心作用主要是指政治领导，决不意味着去干预厂长的生产和经营管理，这与企业法所规定的厂长负责制，要两个文明一起抓，绝不是相互矛盾的。江泽民还与“雷锋班”及雷锋生前所在团干部战士举行了座谈，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更加需要在全国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学习雷锋要抓住实质，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

27日　大连瓦房店金刚石矿投产

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金刚石矿。这一大型金刚石矿的正式开采，使我国跻身于世界“金刚大国”的行列。这座金刚石矿位于辽宁省瓦房店市西南部，从70年代初至今，这里所发现的金刚石储量约占全国储量的54%。目前，我国金刚石储量居世界第十位。

31日　我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于7月1日在大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同时展开。10月3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7月1日零时，我国总人口为1160017381人。

11　月

2日　国务院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对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性质和任务、国家对企业的扶持和优惠政策、企业的产权关系和合法权益、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法律责任等，都做了明确规定。《规定》指出，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国家保护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禁止任何机关和单位非法改变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干预企业自主权和向企业平调或摊派人力、物力和财力。《规定》的颁布，对于使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5日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提出积极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积极发展环境保护产业若干意见的通知》。环境保护产业是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所进行的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商业流通、资源利用、信息服务、工程承包等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环保机械设备制造、自然保护开发经营、环境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服务等方面。环境保护产业是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保护产业已初具规模。《意见》提出，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的指导方针是：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提高环保产品和环境工程的质量，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提供物质和技术保障。当前亟需发展的环保产业和产品主要是性能先进、可靠、经济、高效的大气污染控制设备、水污染控制设备、固

体废物处理处置设备、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设备、噪声振动控制设备；节水、节能设备；电子、生物工程和高技术产业环保技术装备；氯氟烃类替代品及其回收利用技术装备；污染事故应急处理装备；各种环境保护专用材料；环境工程；农业生态工程；环境绿化工程；野生珍稀、濒危、观赏和经济动植物繁殖技术等。《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环境保护产业对于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把环境保护产业列入优先发展领域，切实加强领导，在各方面创造条件，积极支持、引导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协调组，负责制定环境保护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并委托国家计委定期发布环保产业产品优先发展目录，协调指导各有关部门的工作。

9日　中共十三后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决定》认为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治理整顿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坚定不移地把治理整顿深入进行下去。中央决定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要求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相适应；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在着力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平均每年增长5%—6%；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决定》认为，治理整顿工作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三是整顿经济秩序，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大力提高各个方面的经济效益。

10日　国务院通知要求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搞活商品流通

由于地区之间市场封锁现象有所发展，引起商品流通不畅，加剧了市场疲软的现象，对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造成了严重影响。为此，国务院印发《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提出六条要求：（一）要维护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二）要确保商品流通畅通无阻。（三）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管理制度。（四）各地银行在资金上要支持经营企业择优选购产品，在信贷上要对经销外地产品与经销本地产品的企业一视同仁，不得对经销外地产品的企业限制贷款或提高贷款利率。（五）物价部门要加强物价管理，支持企业在商品购销活动中平等竞争。（六）各地区、各部门应自觉制止和纠正地区封锁的错误做法，集中力量抓好经济结构的调整。物资、商业和供销部门要相互协作，积极开拓农村市场，保证商品在城乡之间畅通无阻。同时，要坚决反对流通领域的不正之风，严禁用不正当的手段推销商品。在本通知发布后仍继续搞地区封锁的，要追究有关领导者的责任。

国务院决定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保护价政策

国务院决定对小麦、稻谷、玉米等主要粮食品种实行保护价政策，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作为国家专项储备。从1990年秋粮收购开始，将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交售国家定购粮作为农民应尽的义务，必须保证完成。原定购任务500亿公斤的数量、收购价格和“三挂钩”政策都不变。1985年国家将粮食统购制改为合同定购制，这次将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并不是粮食购销政策的改变，而是在提法上更明确，有利于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增强农民的国家观念、义务观念和任务观念，保证国家定购任务的顺利实现。

12日　仪征化纤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我国特大型化纤骨干企业仪征化纤公司的最后一个项目——二期工程的聚酯八单元投料试车成功，国务委员邹家华专程前往剪彩。至此，仪化公司宣告全面建成投产。仪化公司是靠集资借债29亿元兴建的，分期建设，分期投产，边创效益边还债，为建设现代化大型企业提供了宝贵经验。目前，全公司年产化纤能力达50万吨，占全国化纤产量的1/3，相当于全国棉花年产量的1/8，成为我国最大的化纤及其原料生产基地。自1988年9月首期工程正式投产到1990年10月底止，已累计生产聚酯切片和涤纶短纤维124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112亿元，创利税22.2亿元，一期工程的贷款已按计划基本还清，二期工程的贷款也可在1995年前全部还清。

16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人民币汇率下调9.57%

为深化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从1990年11月17日起人民币汇率下调9.57%。

1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并进行首场交易。这是建国以来大陆上出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实行会员制的非赢利性的事业法人，其宗旨是维护国家、企业和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稳步健康发展。上海、山东、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和沈阳等地的22家证券经营机构是交易所的首批会员单位，其组织结构由会员、理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组成。交易所现阶段以国债、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交易为主，今后逐步过渡到债券和股票交易并举。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上海证券市场业务发展的产物。上海证券交易市场1984年开始建立，已建证券中介机构26家，柜台交易网点50多个，各种证券包括国债发行100多亿，全市近1/10的人参与交易，形成专营、兼管和代理多种层次的证券机构为主体的规模较大的证券市场体系。

23日　卫生部颁布进口药品管理办法

新的《进口药品管理办法》规定将卫生部核发的“进口药品许可证”改为“进口药品注册证”，有效期三年。这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药政管理工作，更好地维护国家权益和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而采取的措施。“进口药品许可证”办法是1987年开始实施的。到今年9月底，我国口岸的13个药检所共依法检验进口药品4.2万余批，其中检出不合格药品1717种，价值约3103万美元，不仅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赢得了国际信

誉，而且阻止了不合格药品进入我国市场。新的《进口药品管理办法》从1991年1月1日起实行。

25日　全国计划会议召开

李鹏在全国计划会议作题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提高企业效益》的报告。李鹏讲话包括十个问题：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方针；关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加强重点建设；继续加强和发展农业；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关于物价水平和价格改革问题；关于财政问题；关于金融问题；关于扩大对外开放和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科技和教育。报告提出了1991年经济工作的主要方针，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进行"利税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改革。要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地区结构，争取在这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尤其要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下大功夫、硬功夫。李鹏指出无论是从克服当前经济困难，还是从今后长期发展看，我们都必须抓住这个关键环节。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作了《继续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安排好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主管经济和计划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及计委（计经委）、经委主任，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27日　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

这是国内第一个全面地系统地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的地方政府法规。它分总则、证券的发行、证券的交易、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同业公会、证券主管机关、罚则、附则等9部分，于12月1日起施行。

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业务试行规则》，规定了交易市场、证券上市、竞价交易作业程序、拍卖和标购、行情告示与统计、清算交割、费用、仲裁和相应的违规处罚等。

20日　我国在世界上首次直接发现脱氧桉糖核酸新结构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在世界上首次直接观察到辫子般的三链状脱氧核糖核酸新结构，这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不仅说明扫描隧道显微镜在研究生物物质方面具有极大的前途，而且在了解脱氧核糖核酸螺旋结构上找到了一个重大突破口，从而为生物信息、生命起源等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12　月

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199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通知

《通知》指出，1991年是"八五"计划的第一年。努力争取农业丰收，确保农村经济稳定增长，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好形势，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对可能出现的困难要有充分的准备，在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时应留有余地。《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继续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摆在首位，认真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于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只要承包办法基本合理，群众基本满意，就不要变动。各级党和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要做好发展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组织工作，根据需要与可能，帮助、督促和引导当地各种服务组织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二、坚持不懈地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本着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原则，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户一起上，多层次、多渠道地筹集建设资金。三、扎扎实实地组织农业综合开发。重点是改造中低产田，同时开发一些宜农、宜牧、宜林、宜渔的荒地、荒山、荒坡、荒滩和荒水，扩大可以利用的新资源。千方百计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建立中央地方多级粮食储备制度。国家按照保护价格敞开收购。在销售中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发挥多渠道的积极作用。

2日　我国建成274个商品粮基地县

我国商品粮基地经过八年的重点建设，先后分四批建成的274个商品粮基地县，1990年总产达1166亿公斤，可提供商品粮400亿公斤，商品率达34%。这些县的耕地面积不到全国的1/5，而粮食产量却占1/4，商品粮占全国的40%，粮食增产量占全国总增量的50%左右。

4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1991年财政收支计划主要原则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在会上提出明年安排国家财政收支计划的主要原则：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开辟财源，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继续坚持紧缩方针，调整支出结构；结合价格改革，减轻财政负担；坚持总量平衡，控制财政赤字。今年由于受市场疲软、企业资金紧张等因素影响，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不够理想。经济效益差是制约财政收入增长，造成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为此，财政部门明年必须在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多下功夫。1991年是“质量、品种、效益年”，要求预算内国营企业的物质消耗比上年降低2%—3%；工交、商业企业的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和商品流通费，扣除工资、利息、折旧开支外，要比上年节约5%；工商企业的经营性亏损要降低50%，政策性亏损也要严格控制，不准突破核定的指标。工效挂钩的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效益没有提高的，不能增提效益工资；效益下降的，要相应下浮效益工资。

中国人民银行严格控制股票发行和转让

为了加强股票市场的集中统一管理，保证股份制与股票市场试点稳步进行，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严格控制股票发行和转让的通知》，《通知》规定：目前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只限深圳、上海两地试点。未经总行同意，其他地区一律不准再批准发行新的股票，一律不得批准股票上市交易。深圳、上海两地的股份制企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一律由人民银行深圳特区、上海市分行审核，签署详细审查意见后，报经总行批准。非股份制企业一律不得发行股票。

1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就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问题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鉴于股份制尚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和完善的规章制

度，为避免一哄而起，出现混乱，在股份制试点阶段，暂不扩大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范围。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股份制试点的重点放在通过企业之间的参股、持股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上，以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益。严禁党政机关干部、证券管理和从业人员进行股票交易，对利用职权进行内部交易牟取私利的，一经査出，要严加惩处。

5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汇指定银行外汇业务管理作出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外汇指定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对外汇业务的申请、审批和终止、外汇业务范围、外汇业务管理、财务报表、资料及违反规定的相应处罚等作出了规定，自1991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外汇管理局（88）汇管条字第614号《关于审批专业银行分行开办外汇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及（88）汇管条字第615号《关于有关专业银行开办外汇业务的通知》和其它与本规定相抵触者同时废止。

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开通

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在北京正式开通。这使分散于各地的证券经营者可以进行快速跨地区交易，形成全国性市场，标志着中国证券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向规范化经营发展。

9日　国务院决定取消外贸出口财政补贴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现行外贸体制存在的不够完善之处主要是出口补贴和外汇留成水平不一致的不平等竞争条件尚未消除；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机制基本没有建立；外贸公司过多，过滥，助长了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及外贸领域存在的抬价抢购、低价竞销、肥水外流等问题。为完善外贸体制，国务院决定：自1991年1月1日起取消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建立自负盈亏机制，统一全国外贸政策。继续实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逐年核定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上缴中央外汇额度任务。继续执行并完善现行各项扶持、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继续扶持鼓励机电产品出口、来料加工复出口和“三来一补”业务的发展及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专项易货贸易及地方易货贸易等。改善出口商品的计划、配额和许可证管理

11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利率管理暂行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印发《利率管理暂行规定》。《规定》要求，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利率，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以及合法发行的各种债券利率的确定、调整、执行、管理和监督，都应当遵守本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利率管理的主管机关，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利率管理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管理工作。规定还对利率的制定、管理职责、结息规则、罚则作出规定，自1991年1月1日起实行。中国人民银行1988年10月5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利率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以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其他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12日　国务院明确全民所有制公司审批权限

各级对外经济贸易专业公司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审批。各级金融性公司由中国人

民银行负责审批。除对外经济贸易专业公司和金融性公司以外的全国性专业公司（集团）授权由国务院生产委员会组织审批。大型综合性的和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公司（集团），由国务院生产委员会组织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新成立的公司不得具（兼）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个别确有特殊需要的，须报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对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作出规定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要求凡在实际上具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并与开办公司的党政机关脱钩的，一律以公司经营管理或所有的财产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被撤并公司的主管部门或清算组织，须负责清理被撤并公司的债权债务，并对公司的财产进行清点、保管和处理；各级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凡向其开办的公司收取资金或实物，用于本机关的财务开支或职工福利、奖励、补贴等开支的，应在收取资金和实物的限度内，对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虽经登记注册，但实际没有自有资金，或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由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申报单位、投资单位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通知》还规定了公司注册资金的处理及资不抵债公司债务的清偿顺序等。

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布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

经国务院批准，对外经济贸易部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细则分13章86条，对外资企业的设立程序、出资方式与期限、用地及其费用、购买与销售、税务、外汇管理、财务会计、职工、工会、期限、终止与清算等方面的详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日　国务院批准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

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经贸部、海关总署和中国银行联合制定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该办法旨在加强出口收汇的综合治理，堵塞管理方面的漏洞，防止外汇流失。从1991年开始采取“逐笔核销，跟踪结汇”的措施强化管理。新的管理办法共16款，另附21款实施细则。该办法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强贸易外汇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自1991年1月1日起施行。

22日　国务院发出清理整顿公司的通知

《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一、各级对外贸易公司，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审批。各级金融性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其他全国性专业公司（集团），授权由国务院生产委员会组织审批，其中大型综合性的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公司（集团）要报国务院批准。二、新公司不得具（兼）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个别确有特殊需要的，需报经国务院批准。

24日　邓小平谈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

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25 日　国务院颁布行政监察条例

50 年代，国务院曾对监察工作发布过有关规定。1986 年，我国决定重新恢复设立行政监察体制后，国务院发布了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行政监察机关的通知，推动和促进了行政监察工作的开展。随着以廉政监察为重点的监察工作的全面开展，监察机关把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对监察机关的职权、工作手段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共 7 章 49 条，制订了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监察机关的管辖、监察机关的职权、监察程序等方面的内容，由监察部负责解释并制订实施办法。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5 日—30 日　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闭幕时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对这次全会的估价。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是开创未来十年的重要会议，是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的重要会议。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确定了今后十年和“八五”期间的奋斗目标、基本指导方针，确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政策，确定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部署、措施。它是我们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行动纲领，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就会上讨论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讲了意见。（1）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2）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3）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4）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的问题。（5）关于共同富裕的问题。（6）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7）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8）关于进一步做好对外工作的问题。（三）制定与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最重要的是：（1）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3）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4）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5）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九十年代将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积极发展海

峡两岸的交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要积极投身于振兴中华和促进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27日　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等对无线通信网审批和管理作出规定

为切实做好无线通信网的审批和管理工作，整顿好无线通信秩序，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邮电部印发《关于加强无线通信网审批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部门、各单位申请新建、扩建、改建无线专用通信网，包括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跨地（市、州、盟）、县的短波、超短波、微波网路及需要进入公众网的地区性无线通信网的，在报送无线电管理部门审批之前先经邮电部门归口会审。无线通信网中台（站）和频率的审批，与通信网的规划建设和通信业务的管理有密切关系，各级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邮电部门要相互合作，紧密配合。

28日　财政部颁布国营金融保险企业成本管理办法

《国营金融、保险企业成本管理办法》中所称成本是指金融、保险企业在业务经营过程中支付的各项利息（包括贴息）、保险赔款和费用。《办法》规定了有关实施范围、成本开支范围、关于成本核算、关于成本计划和管理、关于监督和制裁、附则等共33条，从1991年1月1日起实行。1986年11月3日财政部发布的《国营金融、保险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停止执行。

南昆铁路动工

南昆铁路全长874公里，是我国“八五”铁路建设的重点项目。它东起广西南宁，西抵云南昆明。在我国铁路网络布局上，南昆铁路西连成昆铁路，东接湘桂、黎湛、南防铁路和广东三茂线以及拟建的广西钦州至北海铁路，分别通向湛江港、广州黄埔港、广西北海港与防城港。南昆铁路将是沟通西南与华南沿海的一条新的主干线，也是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便捷通道。贵州煤、云南磷、广西铝和石油，经由南昆铁路东运，分别比经由现有铁路线外运缩短800公里到1000公里。这条铁路计划投资50多亿元，全部按国家一级电气化干线标准施工。

31日　国务院颁布总会计师条例

《条例》共5章19条，明确了总会计师的职责、权限、任免与奖惩，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63年10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几项规定（草案）》、1978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中有关总会计师的规定同时废止。

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社会供需矛盾有所缓解，农业喜获丰收，主要比例关系有所调整，物价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收支状况改善，整个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促进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果。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7400亿元，比上年增长5%；国民收入14300亿元，比上年增长4.8%。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一、农业。全年农业总产值7382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增产。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6.7%，再创历史新水平。棉花产量比上年增长18.1%，油

料比上年增长4.7%。农业生产条件改善。1990年末全国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比上年末增长1.7%；全年化肥施用量增长10.6%。农村用电量增长5.7%。农村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8%。其中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产值增长9.9%。

二、工业生产保持增长势头。1990年工业总产值23851亿元，比上年增长7.6%。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2.9%，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9.1%，其中乡办工业增长12.5%，个体工业增长21.6%，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增长56%。1990年轻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9.1%；重工业产值增长6%。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税1271亿元，比上年下降18.5%，产成品积压增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比上年提高o.8%；部分产品质量不够稳定，成本继续超支，亏损企业增加，亏损额上升。

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回升。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451亿元，比上年增长4.5%。在建项目得到控制，全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施工项目12.3万个，比上年减少3536个；在建项目总规模增长16%。但投资效益低的状况仍无明显改善。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在国家重点倾斜政策支持下，农业、能源、运输、邮电部门建设得到加强。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中，农业投资比上年增长31.2%，所占比重由上年的2.5%上升到3%；能源工业投资814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运输邮电通信业投资393亿元，增长46.1%。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12.3%。更新改造投资比上年增长5.8%。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煤炭开采2016万吨，发电机组容量912万千瓦，石油开采1332万吨、天然气开采10.3亿立方米（均含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

四、交通运输稳步发展，运输紧张状况和运输秩序有所好转。远洋运输在世界航运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运输收入增加。铁路由于调整运价，运输收入比上年增长29.7%，但效率提高不快，铁路货运机车平均日产量85.9万吨公里，比上年仅提高0.7%。邮电通信事业有较快发展。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80亿元，比上年增长24%。

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255亿元，比上年增长1.9%。消费品零售额7220亿元，增长1.9%，其中售予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723亿元，增长4.3%；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1035亿元，增长1.7%。

六、进出口实现顺差。1990年进出口货物总额达1154.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对外支付能力增强。利用外资稳步增长。1990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2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4%；全年实际使用外资101亿美元。

七、1990年大中型工业企业设有专门的技术开发机构9156个，比上年增加1941个；组织技术开发项目4.65万项，比上年增加1.15万项。1990年末全国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432万人，其中自然科学技术人员1097万人，比上年增长6%。全国招收研究生比上年增长3.9%。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学生比上年增长2%；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稳步发展，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

九、1990年末全国医院共有病床262.4万张，比上年末增长百分之2.2%；专业卫

生技术人员389.8万人，比上年增长百分之2.3%。

十、居民消费需求有所回升。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货币收入为1387元，比上年增长10%，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6%。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30元，比上年增长4.7%，扣除商品性支出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8%。城镇就业继续增加。1990年全国城镇安置待业人员400万人。1990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13%；职工平均货币工资215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7%。城乡储蓄大幅度增加。1990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7034亿元，增长36.7%。城乡居住条件又有改善。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全国已有25.1%的乡镇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城市社会服务网络也有较快发展。保险事业进一步发展。

1990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1990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总计200项，其中新增项目（*）9项，地方项目16项。

煤炭（19项）：河北开滦矿区、山西古交矿山、山西大同矿区、山西阳泉矿区、山西潞安矿区、山西晋城矿区、内蒙古准格尔项目一期工程、内蒙古霍林河矿区、辽宁铁法矿区、黑龙江七台河矿区、黑龙江双鸭山矿区、江苏大屯矿区、安徽淮南矿区、安徽淮北矿区、安徽任楼煤矿（地方项目）山东兖州矿区、山东枣滕矿区、河南平顶山矿区、*云南小龙潭露天煤矿

石油（7项）：华北油田、辽宁辽河油田勘探和开发、黑龙江大庆油田勘探和开发、山东胜利油田勘探和开发、河南中原油田勘探和开发、青海油田、新疆油田

电力（49项）：福建沙溪口水电站、福建水口水电站江西万安水电站湖北隔河岩水电站、湖南沅陵五强溪水电站、湖南东江梯级水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广西岩滩水电站、红水河天生桥坝索水电站（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四川铜街于水电站、四川宝珠寺水电站、贵州东风水电站、云南鲁布革水电站、云南漫湾水电站、*西藏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陕西安康水电站、青海龙羊峡水电站、北京石景山电厂、天津军粮城电厂四期工程、天津港电厂、天津蓟县电厂（含50万伏送出）、河北宣化沙岭子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河北石家庄上安电厂、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山西漳泽电厂（二期）山西神头第二电厂、内蒙古通辽电厂、*内蒙古丰镇电厂、黑龙江牡丹江二电厂三期、哈尔滨第三电厂二期工程（含50万伏送出）黑龙江双鸭山电厂二期工程、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上海吴泾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上海石洞口电厂江苏常熟发电厂、江苏利港电厂浙江北仑港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浙江镇海电厂三期、浙江泰山按电站、安徽平圩电厂*江西九江电厂二期工程、湖北汉川电厂、湖南岳阳电厂、广东黄埔电厂（地方项目）、四川江油电厂、四川重庆珞璜电厂、*陕西渭河电厂、甘肃靖远电厂、宁夏大坝电厂

水利（1项）：河南洛宁故县水库

铁道（21项）；大包复线、滨绥线（含哈尔滨枢纽）、胶济复线、浙赣复线（含株州枢纽）、沪杭复线及钱塘江大桥、杭州枢红色、陇海线（包括郑宝电化和徐连改造）、徐州枢纽、京广线郑武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焦枝复线、贵昆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川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鹰厦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湘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大秦线（含电铁供电工程）、商阜线、宣杭线、侯月线、＊兰武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宝中线、唐山机车车辆厂、沈阳枢纽

交通（16项）：天津港（地方项目）、秦皇岛港、大连港（含商检设施）、营口港、上海港、南京港、连云港港、张家港二期工程、宁波港（合商检设施）、青岛港（合商检设施）、烟台港、湛江港、广州港、西江航道整治、京津塘高速公路、辽宁沈大公路（地方项目）

邮电（8项）：北京邮政枢纽、北京法国贷款通信工程、天津市话网、上海市话网、武汉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地方项目）、广州市话网、广州电信枢纽、宁汉渝光缆

民航（3项）：昆明巫家坝机场、拉萨贡嘎机场、陕西咸阳机场

钢铁（4项）：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及冶金配套、武汉钢铁公司、四川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二期）、贵州遵义铁合金厂

黄金（1项）：河南三门峡中原冶炼厂

有色（7项）：河津山西铝厂二期、江西铜业公司、河南焦作中州铝厂、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二期、贵阳贵州铝厂（含三期）、甘肃白银有色公司、甘肃金昌金川有色公司二期

化工（12项）：天津化工厂蛋氨酸工程（地方项目）、河北唐山碱厂、河北矾山磷矿、大连化学工业公司磷铵工程、江苏连云港碱厂、杭州磁带厂（地方项目）、江西贵溪化肥厂（地方项目）、山东潍坊碱厂、中原天然气化肥厂（地方项目）、＊云南昆阳磷矿、格尔木青海钾肥厂、816厂化肥工程

石化（6项）：辽宁抚顺石化公司丙烯腈腈纶装置、上海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南京扬子石化公司、山东淄博齐鲁石化公司、河南洛阳炼油厂、广州石化总厂

医药（1项）：牡丹江制药厂（地方项目）

建材（4项）：山东滕县鲁南水泥厂、广东云浮水泥厂、陕西耀县水泥厂、新疆水泥厂

机电、汽车（6项）：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重型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斯太尔项目、南京汽车制造厂依维柯项目、无锡微电子科研生产联合公司、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二期）、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厂（地方项目）、上海电气联合公司、哈尔滨电站设备成套公司

轻纺（5项）：辽宁抚顺洗涤剂化学厂、汕头感光材料厂（地方项目）、江苏仪征化纤联合公司二期工程、济南涤纶厂（地方项目）、山东淄博腈纶厂（地方项目）

科学（2项）；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教育（5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卫生（4 项）：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

银行（1 项）；成都印钞厂

其他项目（15 项），包括：北京中央电视发射塔工程、亚运会工程、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上海浦东煤气厂二期（地方项目）、陕西历史博物馆（地方项目）等。

1991 年

1　月

1 日　江泽民在政协发表新年致词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年茶话会上致词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今后十年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国家物价局提高原油出厂价格

国家物价局发出《关于提高原油出厂价格的通知》。《通知》规定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各油田高价、平价原油一律在现行出厂价基础上，每吨提价 34 元。据此，财政部决定，提价收入纳入预算，按规定缴纳流转环节各种税收。从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原油储量有偿使用费在现行按产量每吨提取 49 元的基础上，提高到 59 元。提取的原油储量有偿使用费进入生产成本，并全部上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专项用于石油勘探开发。

央行制定利率管理暂行规定

《规定》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是利率管理的主管机关，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利率管理权；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变动。金融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浮动幅度内、以法定利率为基础自行确定的利率为浮动利率。金融机构确定浮动利率后，要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4 日　国务院召开企业厂长（经理）座谈会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上强调指出，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要特别注意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国务院下达 199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计划草案》提出，199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依靠科技进步，进一步开拓和启动市场，使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继续抑制通货膨胀。国民生产总值比 1990 年增长 4.5%，农业增长 3.5%，工业增长 6%。主要措施有：坚持供需总量基本平衡，计划安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000亿元；保持财政信贷收支基本平衡，计划安排银行新增贷款规模2100亿元，增发货币400—500亿元。

国务院发布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国家土地管理局主管全国土地的统一管理工作。（二）国家所有的土地：城市市区土地、农村中依法没收、征用、征收、征购、收归国有的土地和未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三）国家建立土地调查制度和土地统计制度。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国家土地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批准执行。一次性开发1万亩以上2万亩以下土地，须经国家土地管理局批准；一次性开发2万亩以上土地，须经国务院批准。单位和个人将耕地改为非耕地，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7日—13日　江泽民视察吉林省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吉林重点考察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他指出，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搞活大中型企业不能仅仅看作是个经济问题。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企业要建立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机制，把追求质量、品种和效益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目标。

10日　国务院部署“八五”扶贫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报告》。《报告》提出“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目标是在“七五”期间工作的基础上实现两个稳定：一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提高粮食产量，使贫困地区的多数农户有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二是发展多种经营，进行资源开发，建立区域性支柱产业，使贫困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为争取到本世纪末贫困地区多数农户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创造条件。

12日　国家调整粮食购销政策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粮食购销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近两年，主要是通过稳购、压销、调价、包干，缩小国家粮食收支缺口，逐步解决粮食购销价格倒挂，使粮食流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91年至1992年度，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包干指标，按1990年度计划略加调整，继续执行2年。国家粮食定购继续实行奖售平价化肥、柴油和发放预购定金的“三挂钩”政策。自1991年开始，平价食油销售只保障城镇居民定量油和军供用油，其他各项用油改为议价供应或市场调节。

国务院加强国家体改委综合协调职能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工作。（一）国家体改委是国务院统筹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负责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和方案，组织重要改革措施的试点和推

广。(二) 国家体改委实行委员会制，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劳动部、国家物价局各指定一人参加。委员会负责审议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为国务院决策提出建议。(三) 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总体规划和年度方案，先由国家体改委研究提出指导原则和轮廓设想，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提出本部门改革的初始规划、方案，由国家体改委综合平衡，从总体上进行研究论证，形成改革总体规划、方案，上报国务院批准实施。(四) 国务院各部门拟定的全国性改革方案，在报国务院审批前，先送国家体改委征求意见，其中涉及其他部门的重大改革措施，由国家体改委进行协调。(五) 属于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试点，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有关部门或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共同协商拟定方案，报国务院审批后，由地方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国家体改委负责指导、协调。

15 日　国务院发行 1991 年转换国债

国务院决定将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持有的当年到期的国债转换为等额的新债；1991 年转换债从当年 7 月 1 日开始计息。期限为 5 年，年利率为 8%，不计复利。

国务院决定将钨、镭、锑、离子型稀土矿产列为国家保护性特定矿种

国家对钨、锡、锑、离子型稀土矿产资源实行有计划的开采，按照先中央后地方的原则，开办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零星分散资源，允许集体所有制企业开采；禁止个体(含联产) 开采。国家禁止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矿山企业与外资合作、合资开采离子型稀土矿产。

16 日　国家税务局等部门提出加强出口退税管理意见

国家税务局、经贸部、海关总署、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产品出口退税管理的联合通知》。《通知》规定：(一) 加强出口退税计划管理。出口退税实行与出口企业出口创汇任务、上缴中央外汇任务挂钩的办法。未经经贸部批准的超计划出口，中央不予退税。分季度的出口退税计划由国家税务局与经贸部确定。(二) 严格退税凭证管理。出口企业申请退税，必须提供海关盖有“验讫章”的产品出口报关单、出口销售发票、出口产品购进发票和银行的出口结汇水单。税务机关按照国家税务局、经贸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的《出口产品退税审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审核无误后办理退税。

2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行产品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通知》。规定中央各部门所属各类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的退税继续全部由中央负担；地方各类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的退税，一律由中央财政负担 80%，地方财政负担 20%。考虑到目前地方财政的实际情况，为有利于各地平衡今年的财政收支，对 1991 年地方各类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的退税，暂由中央财政负担 90%，地方财政负担 10%；从 1992 年起，中央财政负担 80%，地方财政负担 20%。

17 日　全国 95 个县市财政收入超亿元

1990 年全国有 95 个县市财政收入超亿元。其中嘉定县、无锡县、川沙县、上海县、江阴市、南海县、南汇县等 10 大县的财政收入均在 3 亿元以上。

22日　我国第一枚低度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18点23分，我国第一枚120公里高空低度运载火箭——“织女三号”在中科院海南探空发射场首次发射试验成功，填补了我国在空间领域的空白。

23日　国务院批准外贸体制改革方案

外贸体制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在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上，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机制，使外贸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轨道。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变外汇留成办法，将以往按地区实行不同比例留成，改为按商品大类实行统一比例留成。消除地区间不平等竞争；从1991年起，取消国家对外贸企业的亏损补贴，使外贸企业真正自负盈亏；总结并且完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清理整顿公司；搞活外汇调剂，在保证完成上缴国家外汇额度和收购任务后，允许外汇额度进入调剂市场，并跨省调剂；进口商品的经营管理办法基本不变，要保证适度进口规模，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继续鼓励和扶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出口；继续保持国家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西藏自治区实行的外贸体制、政策不变。这次改革，体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重视宏观手段的调控作用，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使我国的贸易体制更加适应国际贸易的规范，更便于参与国际交换和分工。

26日　李鹏谈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统计体系

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参加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的代表进行座谈。李鹏指出，统计是党、政府和人民认识国情国力、决定国策、制定计划的重要依据。统计工作要做到准确、及时、全面、方便，其中准确是第一位的。计划可留有余地，但统计不能留有余地，虚报与少报对经济决策和管理都是有害的。要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统计工作的计算机化是必然趋势，要有重点有步骤的进行，更重要的是加强统计软件的开发工作，加强预测。

28日—2月18日　邓小平视察上海

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指出，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础发展长江三角州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　月

1日　全国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国务院决定，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目的是通过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这一活动，大力提高我国企业的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使企业逐步走上投入少、产出多、质量好、消耗低、效益高的发展道路。国务院成立“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国务委员邹家华任组长。

此前1月21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在基本建设领域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一）严格计划管理。严格控制投资规模；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继续对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审计、检查；认真清理各种收费；对建设工程已完成而长期不投产吃“基建饭”的项目进行清理；认真做好项目的前期工作；安排好项目的配套建设；加强重点建设的调度工作，及时解决计划执行中的问题。（二）加强项目管理。联合投资的项目，设立董事会，董事由投资各方派人担任；全部由中央安排投资的项目，设立管理委员会，从项目前期工作开始至投产以后的生产经营，均由董事会或管委会负责，并承担投资风险。1991年新开工项目原则上要按此执行。

8日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

我国汽车工业最大合资企业，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在长春成立。该公司总投资额为42亿元人民币，长春第一汽车厂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投资比例为6:4。这家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已由前期准备转入实施阶段。

9日　国家财政支持国有企业10年累计3000多亿元

财政部宣布，国家财政从1981年至1990年，对国有工业企业的财力支持累计达4198亿元，扣除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发行国库券、提高银行利率以及开征新税等从企业征收的1098亿元，净财力支持为3100亿元。其中，“六五”期间652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内财政收入的9.7%。“七五”时期2449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内财政收入的19.13%。

国家财政对国营企业的财力支持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通过提高企业留利率，并批准部分行业和部门的专项让利措施等减税让利2529亿。其中，能源行业1121亿元，主要原材料行业378亿元，机械、汽车、轻工、纺织等行业599亿元；（二）通过实行分类折旧办法，分期分批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大修理费提存率和矿山维简费提取标准等让利653亿元；（三）通过增加新产品及新技术开发资金来源和对新产品实行减免税优惠等减税让利128亿元；（四）通过对企业基建及专项贷款实行用税前利润还贷政策让利865亿元；（五）通过贴息方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3亿元。

14日　“七五”期间国家税收超过10000亿元

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宣布，“七五”期间税务机关组织的各项税收共达11855亿元。其中工商税收8080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109%，平均每年递增10.4%。

23 日　**国务院要求扩大机电产品出口**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关于“八五”期间进一步扩大机电产品出口意见》。国务院指出，扩大机电产品出口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对继续调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振兴机电工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要继续行使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全国机电产品出口工作的职能，进一步推动、扩大机电产品出口。

《意见》提出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是：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全国外贸出口总额所占的比重，“八五”末期争取达到 20%左右。在继续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努力扩大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重点发展成套设备、电子产品、机床、家用电器、电工产品、船舶、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及工程机械等重点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出口。在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众多中小生产企业出口的同时，积极推动大型骨干生产企业走上国际市场，形成一批外向型的出口企业和企业集团。机电产品出口结汇实行全额分成，上缴中央 30%（外贸出口企业 20%，出口供货企业 10%），上缴地方政府 5%，出口企业留成 65%。上缴地方政府的外汇额度，主要用于支持机电产品出口。出口所用进口料件免征关税及产品税、增值税；出口信用保险等现行政策继续执行。“八五”期间，国家继续保持“七五”时期扩大机电产品出口专项补充技术改造贴息贷款，并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适当增加；逐步增加中长期出口信贷规模。

国家税务局细化制定私营企业税收政策

国家税务局发出《关于私营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通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征收私营企业投资者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规定》发布施行后需要明确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根据新的税收政策，凡从事出口创汇的私营企业，其获得的外汇留成额度调剂收入，通过国家外汇调剂中心按国家规定办理的，不征收私营企业所得税，但必须全额转人生产发展基金。对接受外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业务的私营企业，凡来料、来件部分价值占产品原材料、辅助材料和零部件总值 20%以上的，从取得第一笔收入的月份起，在 1—2 年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审批，可减征或免征所得税。对从事技术转让的私营企业，每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下的，在 3 年内可免征所得税，超过 10 万元的部分，仍照章征税。此外，对新办的生产性私营企业，如果纳税确有困难的，在 1 年内可酌情减免所得税；归国华侨利用侨资新办生产性的私营企业，如果侨资占投资总额 50%以上，可从投产经营的月份起，免征所得税两年。上述规定从 1991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

24 日　**江泽民、李鹏同社科院专家座谈**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怀仁堂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学者座谈。

江泽民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社会科学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出的任务，紧密结合实际，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力求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供系统的、科学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

李鹏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的可以直接为当前制定国内外政策服务，有些是长远的研究。要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在学术研究中，应坚持“双百”方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

25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讨论90年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会议提出，总目标是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企业制度，重点围绕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研究深化改革的有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则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立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相结合，以间接调控为主，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调控，以中央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会上就《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以及《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作了说明。

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治理整顿有了相对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要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加大改革的分量。

国家计委提出加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及大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意见

国家计委提出《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及大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及大型建设项目的设计、设备、施工，除确有特殊原因不宜招标外（要提前报经国家计委备案)，都要创造条件实行招标投标。招标投标可分别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和议标等方式。(二）编制标底要以国家批准的现行概预算定额、费用标准和有关规定为依据；标底必须控制在批准的总概算（修正概算）或投资包干的限额之内。(三）招标单位必须对投标者的资质进行全面审查，按照平等竞争的原则，择优选定中标单位，不得以最低报价作为中标的唯一标准。在整顿期间不得参加投标。(四）招标投标不受地区、部门、行业的限制。任何地区、部门、行业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障碍，进行封锁。(五）国家计委统一归口管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及大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

3　月

5日　国家计委提出加强对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

《意见》提出，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和企业可到海外从事一些有利于输出产品、技术、设备、劳务，并有明显经济效益的项目。这项工作要在国家宏观管理下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必须严格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意见》明确了，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凡需向国家申请资金或境外借款需

国内担保或产品返销国内需国家综合平衡以及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含100万美元）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中方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含3000万美元）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初审后报国务院审批。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下，分别由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综合部门审批。对向外转移的国有资产，要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产权登记和管理。其中经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批准的海外投资项目，由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登记和管理；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批准的海外投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负责登记和管理，并分别抄报财政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有关海外投资的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归口负责，并定期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供资料。

8月7日，国家计委印发《〈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举办境外投资项目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包括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两个阶段。项目建议是中方投资者向审批机关上报的文件，主要是从宏观上论述项目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立项的依据。其内容包括：对拟建项目的目的、投资方式、生产条件与规模、中方投资金额及投入方式、资金来源、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作出的初步测算和建议。上报项目建议书之前，按项目的隶属关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就拟建项目征求我驻在国（或地区）使领馆的意见；前往未建交国家投资的需征求外交部的意见。《规定》适用于我国的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到境外的国家或地区(含港澳地区和苏联、东欧各国）以投资、购股等方式举办或参与举办的非贸易性项目。

6日　国务院增加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继1988年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务院决定，从中再选定一批开发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一）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审定的21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东湖技术开发区、南京浦口高新外向型开发区、沈阳南湖科技开发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西安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南湖—南岭新技术工业园区、哈尔滨高技术开发区、长沙科技开发试验区、福州市科技园区、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科技工业园、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桂林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高技术开发区、兰州宁卧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济南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二）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深圳科技工业园、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分别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内，也确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国务院授权国家科委负责审定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区域范围、面积，并进行归口管理和具体指导。

国家税务局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

国务院批准印发国家税务局制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规定》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1. 开发区企业从被认定之日起，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开发区企业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7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2. 新办的开发区企业，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投产年度起，2年内免征所得税。对新办的中外合资经营的开发区企业，合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头2年免征所得税。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域范围内的开发区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仍执行特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税收政策，不受前两项规定的限制。3. 对内资办的开发区企业，其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可暂免征收所得税；超过30万元的部分，按适用税率征收所得税。对其属于“火炬”计划开发范围的高新技术产品，凡符合新产品减免税条件并按规定减免产品税、增值税的税款，可专项用于技术开发，不计征所得税。4. 对内资办的开发区企业减征或免征的税款统一作为国家扶持基金，单独核算，由有关部门监督专项用于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开发。5. 开发区企业属联营企业的，其分给投资方的利润，应按投资方企业的财务体制，扣除开发区缴纳的税款后，补缴所得税或上交利润。

9月16日，国家税务局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有关涉外税收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1. 设立在开发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可自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之日所属的纳税年度起，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 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果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对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高投资企业，允许在经济开发区和产业开发区的税收优惠规定中从优选择享受一种税收优惠待遇，但不得重复享受。3. 设在开发区内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用于高新技术开发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仪器、设备，需要加速折旧的，应由企业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上报国家税务局批准。

国家科委制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

国务院批准印发国家科委制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办法》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划定高新技术范围如下：(1) 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2) 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3) 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4) 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5) 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6) 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7) 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8) 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9) 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10) 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11) 其他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办法》明确，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具备下列各项条件：(1) 从事本办法规定范围内一种或多种高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业务。单纯的商业经营除外。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 企业的负责人是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

开发、生产和经营的科技人员，并且是本企业的专职人员。(3)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30%以上；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10%以上。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或服务的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20%以上。(4) 有 10 万元以上资金，并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设施；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本企业每年总收入的 3%以上。(5) 高新技术企业的总收入，一般由技术性收入、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一般技术产品产值和技术性相关贸易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总和应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50%以上。

国家科委制定国家寓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

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制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规定》提出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的高新技术企业除税收政策之外的各项优惠性政策，主要包括：经海关批准，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设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海关按照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以实际加工出口数量，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产品税、增值税；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或者另有规定的产品以外，都免征出口关税；高新技术企业用于高新技术开发而国内不能生产的仪器和设备，凭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经海关审核后，免征进口关税。经经贸部批准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设立技术进出口公司；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出口业务开展较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授予外贸经营权。根据业务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有关部门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条件比较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免购国家重点建设债券。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的属于国家控制价格（包括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的新产品，除特定品种须报物价部门定价外，在规定的试销期内，企业可自行制定试销价格，并报物价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备案。经营不属于国家控制价格的高新技术产品，企业可以自行定价。高新技术企业用于高新技术开发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仪器、设备，可实行快速折旧。在不影响上缴中央财政部分，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高新技术企业所缴各项税款，以 1990 年为基数，新增部分 5 年内全部返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于开发区的建设。

8 日　国家适当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

国务院批复国家计委、海关总署、国务院特区办、财政部、国家税务局《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拟予适当延长的请示》。规定：(一) 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技改项目所需设备的进口关税和进口产品税（增值税）优惠政策，自 1991 年起至 1993 年底止，继续执行 3 年。(二) 对沿海开放地区所辖农村为发展出口农业而进口的加工设备，也自 1991 年起至 1993 年底继续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税（增值税）。(三) 从 1991 年起至 1995 年底，对经济技术开发区所需要的经审批同意进口的机器设备继续给予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税（增值税）的优惠。

11日—8日　江泽民视察湖南省

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湖南省时指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和指导方针，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作为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一定要长期稳定不变；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要努力发展农村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搞好计划生育，注重移风易俗，推进农村的全面建设和全面进步。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

12日　国家取消水泥价格双轨制

国家建材局和国家物价局联合发出通知，自1991年4月1日起，取消统配水泥企业生产水泥价格双轨制。统配水泥企业生产的水泥价格实行并轨，计划内外统一出厂价格。以散装425号矿渣硅酸盐水泥为代表规格产品，在计划内外价格加权平均计算的基础上，每吨定价110元。

13日　国务院批准提高铁路货运价格

国家物价局通知，经国务院批准，自1991年3月1日起，提高铁路货运价格。每吨公里平均提高2厘。粮食、盐、化肥、蔬菜货运不提价；集装箱和零担货物运输不提价。只提高整车货物运价，提价品种每吨公里提价2.5厘。

国务院要求加强对外资企业重大项目审批工作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外资企业重大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外资企业发展很快，一批规模较大、对国民经济有一定影响的重大项目正在建设或洽谈。为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综合平衡外资企业的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国务院要求，凡投资总额在国务院授权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批权限以上的外资企业项目，以及授权审批权限以内而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或国家产业政策中规定限制建设的外资企业项目，在设立前，由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提出项目报告，报送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产业主管部门，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进行综合平衡和审批。投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重大项目，由国家计委提出审查意见，报国务院审批。

14日　国家下放物价管理权限

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国家物价局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1991年起地方提价需报国务院特批的范围适当缩小。除平价粮压销方案、定量供应的猪肉、牛肉、羊肉零售价，农用塑料薄膜出厂价、销售价，新增行政性收费，物资收费等提价仍需报国务院特批外，其余地方管理的价格和收费，均恢复由地方管理。

25日　国家计委等对台商投资项目配套资金作出规定

国家计委、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国务院台办发出《关于申请台商投资项目配套资金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吸收利用台资的配套资金，主要应立足于地方自筹解决，国家根据情况给予适当扶持。吸收利用台资的工作，由国家计委对台办公室归口管理。配套贷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申请此项贷款的项目，必须是经有关部门批准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及已经工商注册、正在建设的生产性合

资、合作经营项目。此项贷款只扶持解决部分我方配套资金不足的固定资产贷款，不能挪作流动资金贷款；不得作为股本贷款使用；不能用于台商投资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25 日—4 月 9 日　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关于 199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199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 1990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91 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会议任命邹家华、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国务委员。

从 1980 年到 1990 年，我国先后完成“六五”计划和“七五”计划，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由 4470 亿元增加到 17400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9%。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过渡，少数地区已经实现了小康。

25 日　李鹏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主要内容是：从 1991 年到 2000 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基本要求：一是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 1980 年翻两番；二是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三是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下个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四是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

26 日　199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受国务院委托向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作《关于 199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199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1991 年计划安排总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继续推进治理整顿和和深化改革，进一步改善经济秩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坚持和改进总量平衡，着力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积极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正常循环和适度增长，使国民经济逐步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199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3.5%，工业总产值增长 6%；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4.5%。在保持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大体协调的前提下，执行中争取超过这一指标。发展经济，广辟财源，增收节支，改善财政困难状况。合理安排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和物价总水平。按照国力可能，保持固定资产投

资适度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5000亿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继续有所提高。

199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受国务院委托向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作《关于1990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1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990年国家财政总收入3244.78亿元，完成预算的100.3%；国家财政总支出3395.21亿元，完成预算的102.1%；收支相抵，财政赤字150.43亿元。

1991年国家预算草案：财政总收入3443.1亿元，比上年预计执行数增长6.1%；财政总支出3566.56亿元，比上年预计执行数增长5%；收支相抵，财政赤字123.46亿元。国内财政收入：各项税收3033.27亿元；企业收入75.5亿元；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205亿元；国家预算收入调节基金135亿元；国内债务收入190亿元；其他各项收入198.68亿元。弥补企业亏损补贴556.72亿元，已在财政收入中扣除。各项主要支出的安排情况：基建支出682.89亿元；企业挖潜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168.91亿元；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同农业事业费234.56亿元；城市维护建设支出129亿元；国防费325.1亿元；行政管理费317.28亿元；价格补贴333.19亿元；国内国外债务还本付息244.44亿元；总预备费27亿元。

6月26日，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向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作关于1990年国家财政决算的报告。1990年财政赤字为139.65亿元，比预算扩大50.73亿元。

4　月

1日　水泥价格放开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建材局和国家物价局联合发出通知，从今天起取消统配水泥价格双轨制，实行计划内外统出厂价格。

4日　全国国债会议在西安市召开

会议确定1991年国家继续发行国库券100亿元、特种国债20亿元。财政部决定，今年在小范围内试行国库券承购包销试点，全面开放地市级以上城市的国债流通市场。为进一步增强国库券的流通性，并满足广大投资者对购买国库券的需要，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1月1日开始，允许1991年国库券上市转让。

国家调整粮食销售价格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粮油统销价格的决定》。决定自1991年5月1日起上调粮油统销价格。3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中等质量标准品全国平均统销价每500克提高0.1元；6种食用油实行购销同价，全国平均每500克提高1.35元。《决定》指出，这是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按照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精神，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关系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向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迈出的重要一步。这次提高城镇居民定量粮油销售价格，在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个人承受能力的情况下，按照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国家给城镇居民以适当补偿，并将提价补偿纳入职工基本工资。国家机关每个职工每月基本

工资提高6元，企业职工各级标准工资平均提高6元。对离退休人员也给予适当补助。

4月9日，财政部、劳动部、人事部、民政部、国家教委发出《关于提高粮油统销价格和适当增加职工工资问题的通知》。

5月4日，国务院代总理姚依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40次总理办公会议，听取商业部和国家物价局负责同志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调整粮油统销价格决定执行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从5月1日开始调整粮油统销价格，是20多年来粮油价格的一次重大改革，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在这次调价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和粮食、商业系统广大职工做了大量工作。调价方案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理解和支持。市场价格平稳，群众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安定。

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和外国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应缴纳所得税，税率30%；地方所得税税率3%。外国企业在中国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应缴纳所得税，税率20%。对设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按15%和24%优惠税率纳税。6月30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自1991年7月1日起施行。

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制定的。从现实情况看，这两个税法已不够规范，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率偏高，税收优惠差别较大，优惠政策中也没有突出国家需要鼓励投资的行业和重点。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了现行的两个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在不增加税负、不减少税收优惠的原则下，把对合营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的税率加以统一，对鼓励外商投资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按照产业政策，统一限于生产性企业，在税收管辖原则上，统一明确以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为准，区分法人居民纳税义务与非居民纳税义务。这样，新税法显得更透明、简化、规范，有利于投资者选择投资方式和计算投资效益，有利于引导外资投向，也便于我国对外合理地行使税收管理权。

11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经国务院授权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运行，1991年4月3日，深圳全部股票进入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同日，深圳股价指数发布。我国的资本市场，作为改革的产物发展十分迅速。1980年6月，第一个股份合作制公司——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经成都市政府批准设立。该公司是成都市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1983年7月，经宝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的方式，在深圳市招股集资。首次共集资130多万元。该公司是深圳宝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1984年8月23日，经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政府批准，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300万元。成为新中国在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第一家股份公司。1984年11月14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

成立，于1985年1月向社会和本公司职工公开发行面值50元的人民币普通股票1万股。首次筹资50万元。1986年，邓小平将一张飞乐公司股票赠送给来华访问的纽约证交所主席。1986年以前企业股票不能自由交易和流通。

1986年8月5日，经人民银行批准，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办理有价证券转让业务。

1986年9月28日，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柜台买卖业务，以挂牌方式，公开委托买卖股票。1986年9月26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和上海延中实业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通过静安证券部上市，开创了新中国股票交易的历史，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1988年4月30日，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守。9月8日，金杯公司到国家体改委发售股票。总共卖出300多股。1990年8月18日，深圳市政府批准设立深圳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人民银行于1991年1月24日批准）。11月26日试营业。

1990年11月，深圳、珠海市举办10周年庆祝，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席。江泽民指出，上海、深圳两个试验点要保留，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安达标准股票开始集中交易。1990年12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1年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逐步扩大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

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这是我国证券业第一个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管理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国务委员李贵鲜出席成立大会。据了解，我国证券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有价证券发行量累计已超过2000亿元，证券交易总额超过500亿元。证券的品种也从单一的国债，发展到国债、企业债、金融债、股票等多个品种并存。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经营机构也相应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已有59家，另外还有300多家证券营业部和证券代办点。

1991年5月15日，《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经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于同年6月1日起实施。

15日　国务院批转"八五"国家扶贫开发工作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报告》。《报告》提出，"七五"期间国家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放开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价格、对温饱尚未解决的贫困户继续给予农业减免税的照顾、核减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免征贫困地区新办开发性企业所得税等，"八五"期间继续执行。同时，"八五"期间国家每年增加5亿元专项扶贫贴息贷款，每年拿出100万吨粮食或给一部分等值工业品，实行以工代赈。

15日—22日　江泽民在四川考察

江泽民总书记在四川省考察时强调，要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我国"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关键，全党同志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16 日　国家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第 82 号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投资方向调节税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项目经济规模实行差别税率。分为 5 档：0%、5%、10%、15%、30%。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其单位工程分别确定适用的税率。税目、税率依照本条例所附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目税率表》执行。税目税率表列出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更新改造投资），税率为 15%。除适用税目税率表中 0%税率以外的更新改造投资，税率为 10%。计税依据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际完成的投资额，更新改造项目为建筑工程实际完成的投资额。

19 日　经贸部等提出发展边贸与经济合作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转发经贸部、国家民委、财政部等 6 部门《关于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促进边疆繁荣稳定的意见》。《意见》提出国家对边境贸易实行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是：边境贸易应按照自找货源、自营易货、自行平衡、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鼓励边境地区同毗邻国家的边境地区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税收优惠规定：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的商品，不超过人民币 300 元，免征进口关税。超过部分照章纳税。

20 日　央行降低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降低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在现行利率基础上平均下调 1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 0.7 个百分点。对城乡居民 3 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利率 8.28%）仍实行保值。活期存款利率由 2.16%下调至 1.8%。贷款利率，1 年期资金贷款利率由 9.36%下调为 8.64%；技术改造贷款年利率由 9.36%下调为 8.46%。各项贷款和企事业定、活期存款及城乡居民定期储蓄存款从 1991 年 4 月 21 日起执行；城乡居民活期储蓄存款从 1991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22 日—25 日　全国 863 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宣读了邓小平的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以"863"计划为代表的高技术研究计划对新时期依靠科技振兴中国的目标将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在 90 年代，我们能否把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搞上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科技界的同志一定要牢记自己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要更加艰苦奋斗，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全力推进科技事业和经济建设。要力争在高技术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大大缩短我国与世界科技前沿的距离，为祖国在世界上取得受人尊敬的地位而贡献力量、智慧和心血。

党中央、国务院于 1986 年批准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纲要》实施 5 年来取得 400 多项科技成果。其中 50 多项达到国际 80 年代中、后期水平，有不少项目已进入中间试验阶段。通过"863"计划的实施，我国已组织了一支阵容整齐的精干的国家高技术研究队伍。"七五"期间从事"863"计划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科技人员已达万人，40 岁以下的青年占 47%。

5　月

7日　国务院要求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支持农业，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国务院已决定，今年中央外汇计划内进口化肥国内拨交价格、“三挂钩”物资价格、铁路化肥运输价格以及农用柴油、生产化肥用的石脑油、重油价格均不提高。生产化肥用的天然气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也要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一）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对生产和经营化肥、农药、农膜等企业已经采取的各项优惠扶持措施，包括减免税收、财政补贴、实行优惠电价、供应平价原材料等，今年要继续执行。地方进口化肥，要尽可能用自有留成外汇，必要时财政可增加一些补贴，以稳定供应价格。对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也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持价格基本稳定。（二）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和国家物价局已明确规定，各省（区、市）提高农用塑料薄膜的出厂价、销售价，要报国务院特批；提高碳酸氢铵、过磷酸钙价格，必须从严控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三）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今年要全面开展农村电价的检查整顿工作，把不合理的电价降下来；要抓好成品油行业的价格检查，切实保证计划供应的农用柴油不涨价。

15日—7月13日　淮河，太湖流域发生洪涝灾害

我国淮河、太湖流域连降大雨和暴雨，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地处淮河、太湖流域的安徽和江苏两省灾害尤为严重，是百年罕见的大水灾。据初步统计，两省农作物受灾面积902万公顷，绝收面积225万公顷；倒塌房屋203.7万间，死亡801人，伤14478人。经济损失459亿元。

16日　国务院提出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十一条措施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通知》，提出了十一个方面的具体措施：(一）适当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除今年国家已确定的银行技术改造贷款外，对部分超储积压、冷背呆滞的商品和物资进行一次性降价销售，收回的占压资金要大部分用于技术改造。(二）酌情减少部分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扩大其产品自销权。(三）适当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逐步完善折旧制度。从1991年起增提折旧30亿元。新增加的折旧基金，在国家下达的定额内免交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四）适当增加新产品开发基金。对承担新产品开发任务较重、经济效益较好，又有消化能力的企业，经财政部批准，可以适当提高按销售收入提取新产品开发费用的比例。(五）补充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八五”期间，企业要增补自有流动资金400亿元，按照中央企业中央补、地方企业地方补的原则，由中央和地方各补充100亿元，企业补充200亿元。(六）适当降低贷款利率。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实行差别利率。(七）充分发挥已经赋予外贸经营权的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作用。同时，再选择部分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给予外贸自主权。（八）进一步做好若干国营大中型企业的

"双保"工作。(九)继续清理"三角债"。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要继续抓好清理工作，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组织清欠。(十)选择100个左右大型企业集团分期分批进行试点。对于关系国计民生、产品面向全国的企业集团，要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要给予大型企业集团一些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十一)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20日　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要点》的主要内容：(一)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要放在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上，改进企业管理，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并为此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通过深化改革，促进企业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的调整，促进企业面向市场，面向用户，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二)改革的重点是搞活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在完善和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宏观、流通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搞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以及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的总量平衡；更多的通过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信贷政策，引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改进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的管理办法，在部分行业试行用国家订货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替代部分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改变现行按生产能力和投资限额划分项目审批权的办法，实行按产业政策分行业、分产品确定项目的审批权限。调整现行技改项目审批权限的范围，适当扩大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技改项目的决策权。简化技改项目审批程序和办法。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技改资金，包括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

23日　江泽民谈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科协四大上作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它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6　月

9日　李鹏考察安徽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安徽省进行考察。他指出，搞活大中企业要眼睛向内。解决"三角债"问题需要从5个方面努力：(1)要抓紧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2)要重视推销工作；(3)要进一步进行清理"三角债"的工作；(4)要堵住基建投资的缺口；(5)要考虑对长期产品积压的企业进行必要的限制。

16日—20日　江泽民考察宁夏

江泽民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认真抓好农业这个基础和增强企业活力这两件

经济工作中的大事。在任何情况下，加强农业这个基础的决心不能动摇。今后10年我们要通过努力，使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确保粮食生产连续登上两个台阶。必须从加快企业改革步伐、大力推进技术进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来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摆脱困境，步入良性循环。

26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国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是50年代初期建立的，以后在1958年和1978年两次作了修改。近年来，各地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又进行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要求，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作如下改革：（一）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政府根据支付费用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职工的承受能力，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统一筹集。（三）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分别记入《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和当地政府规定的比例在税前提取。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在调整工资的基础上逐步实行，缴费标准开始时可不超过本人标准工资的3%，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职工工资的调整再逐步提高。（四）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转入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实行专项储存，专款专用。银行应按规定提取“应付未付利息”；对存入银行的基金，其存期根据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所得利息并入基金。积累基金的一部分可以购买国家债券。地方各级政府要设立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实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中央部属企业，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都要参加所在地区的统筹。

7　月

1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基本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实现国民经

济的现代化。

国务院严格控制生产积压产品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企业继续生产积压产品的通知》。《通知》要求为解决企业亏损增加、经济效益下降的问题，要采取果断措施，严格控制企业继续生产积压产品。控制的范围是：产品质次价高，已严重积压，仍在继续生产的企业；产大于销且库存大的企业；产品积压造成严重经营性亏损，近期扭亏无望的企业；产品性能落后或明令淘汰的企业。对属于控制范围的企业，可区别情况采取措施：限供、停供计划内的能源、原材料和运力；限发、停发银行贷款；积极采取兼并措施；有条件转产的企业，责令其转产；限期整顿，整顿无效宣布关、停；对生产关系国计民生重要物资，如煤炭、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能源、原材料企业，其超储产品由国家储备局和物资部门收购一部分；也可有计划地组织出口一部分，尽量不放空生产能力。

11 日　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成立

国务院第 81 次常务会议决定，撤消国务院生产委员会，成立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是国务院办事机构，在国务院领导下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委（计经委）、生产委的生产工作实行业务指导，对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生产工作进行必要的组织协调。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在物资、资金、进出口等方面掌握必要的调控手段，每年有 1 亿元拨款、2 亿元贷款和 5000 美元外汇的机动分配权。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

央行等提出进一步加强流动资金贷款管理的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委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资金贷款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出进一步加强对流动资金管理的意见：（一）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要坚决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认真贯彻执行“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的信贷政策，优化贷款结构，压缩不合理贷款数量。（二）对下述五项优先给予贷款支持：(1) 种养业、农业科技开发项目、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2)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适销对路，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国营大中型企业。(3) 国家“双保”企业指令性计划产品。(4) 增加适销对路商品储备和国家重要物资储备的资金需求。(5) 国家计划内换汇成本低、不亏损的外贸出口商品的收购和国家计划内进口商品的资金需求。（三）对下列五种情况要从紧从严掌握贷款：产品质次价高，不适销对路，产大于销，且库存过大；经营性亏损没有扭转的企业和产品，政策亏损没有按期弥补的企业和产品；未按国家规定自补流动资金的企业；换汇成本偏高的出口商品收购；国家产业政策严格限制发展的产业和产品。

13 日　国家计委组织试编两年滚动计划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试编两年滚动计划的暂行规定》。为进一步完善计划管理，国务院同意从 1992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试编两年滚动计划。国家计委在《暂行办法》中规定，第一个年度计划是全面完整的执行计划，第二个年度计划为框架计划，只对宏观经济发展作出轮廓性安排。其主要内容包括计划期的主要任务、计划目标、重大政策措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总量指标及少数重要的分地区、分部门生产建设

计划。

16日　党中央部署抗灾救灾工作

今年5月下旬，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洪涝灾害；6月份以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江西等省（区）出现严重干旱；7月中下旬，东北部分地区又连降暴雨。目前，东北汛情已经缓解，华南地区、西北、华北部分地区又出现旱情。今年的水灾有三个特点：一是雨期提前，降雨量大且集中，洪水来势猛，持续时间长。二是水灾发生在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的关键时节，造成两季作物减收。三是重灾区过分集中。灾情与近十年的灾情相比，前7个多月的受灾人口、受灾面积、绝收面积、倒塌房屋相当于近十年平均年份全年损失的总数；被迫转移安置人口是近十年平均年份的3倍；经济损失相当于近三年年均损失的2倍。

7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灾情、汛情的汇报，部署抗灾救灾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涝、旱、风、雹等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江淮和太湖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目前我国大部地区已进入主汛期，灾情有可能继续发生。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领导，战胜灾害。

7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三省一市负责人会议，贯彻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抗洪救灾工作做出部署：（一）抗灾救灾要立足于抗大洪，防大汛。（二）要把工作的重点转到救灾工作上。（三）要下决心进一步进行淮河、太湖的治理工作，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治河治湖的经费由国家和地方共同分担，实行以工代赈。8月15日，国务院决定，对国家有计划的行洪、蓄洪区，免征当年的农业税和粮食定购任务。内涝重灾区，免征农业税一年。

22日　国家对调出棉花实行奖励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计委、财政部、纺织部等10个部门《关于整顿棉花质量、价格和严格执行国家调拨计划的意见》和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财政部等部门《关于对调出棉花实行奖励政策的报告》。《意见》要求各棉花调出省、自治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调拨包干计划。如棉花减产减收，要相应减少本省、自治区的用棉量。棉花收购和供应价格的管理权限在国务院，任何地方、单位都不得擅自变动。对棉农增加的口粮和农业生产资料等，不得折价计入收购和供应价格，转嫁给用棉单位。

10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对调出棉花实行奖励政策的报告》提出，凡按国家计划安排的时间调拨棉花及按计划供应中央出口的棉花和国家储备棉的省（区），每调出一担棉花，由调入省（区）奖励25元。奖励款原则上由调入省（区）地方自有财力解决，可计入纺织企业成本，相应提高棉纺织品价格。同时放开民用絮棉价格。计划内进口棉花比照国内调拨奖励办法办理。

24日　国务院决定发行国家投资债券

国务院发出《关于发行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为

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广泛筹集社会资金，支持国家重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及重点技术改造，国务院决定1991年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共同发行国家投资债券。主要内容：（一）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计划发行100亿元，其中用于基本建设80亿元，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行；用于技术改造20亿元，由中国工商银行发行。（二）国家投资债券分别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债务人，由财政部提供担保。（三）国家投资债券完全采取经济发行方式，由城乡居民、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自愿认购，利息收入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四）购买的国家投资债券可以抵押，不得作为货币流通。从发行期满的第4个月起可以进入证券交易市场转让。

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财政部长王丙乾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上半年全国国内财政收入1317.27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40.2%，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6%；国内财政支出1287.44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37.8%，比去年同期增长4.6%；收支相抵，收入大于支出29.83亿元。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稍好于去年，但财政困难没有缓解。上半年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9.9%，销售收入增长14.5%，实现利润下降17.5%，上交财政的利润下降94.3%；企业拖欠税利继续增长，截至6月底，全国拖欠税利总额达210.9亿元，比年初增加87.6亿元。下半年要下功夫帮助企业广泛深入地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各项措施；对灾区开展的生产、生活自救项目，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减免税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大力加强组织收入工作，严格控制减免税，抓紧清理企业“三角债”和拖欠税利的工作，继续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财政部副部长兼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国家将采取十项措施，加快税收改革步伐，为加速经济发展服务。这十项措施是：下决心调整简并一些税种，加快流转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进程；调整部分税目税率，以实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税收征管立法进程，进一步用法律规范征纳双方的行为；改进税收征管方式方法，大力推行公开办税制度，简化工作手续，提高办事效率；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通领域的深刻变化，建议国务院在适当时机停止批发扣税，并相应建立对个体税收的控管新机制；鉴于客观情况的变化，适当调整税收检查站，除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在重点应税产品主要产区和机场、车站、码头的检查站外，中途设置的一律撤除；改进出口退税管理，保护外贸企业合法经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调整部分税收管理权限，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继续深入开展促产增收，发挥税务机关优势，深入企业搞好支、帮、促活动；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增强服务意识。

7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听取会议汇报。他指出，地方只能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减免，不能超越权限任意减免，不能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要重申统一税法、集中税权的原则。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三资”企业健康发展，必须使“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照章纳税，该收的钱都要收上来。

27日—30日　江泽民视察天津

江泽民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

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要把工作的立足点真正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考核经济工作，既要看产值及增长速度，更要看经济效益。

29日—8月2日　全国治沙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

国务院在甘肃兰州召开全国治沙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全国第三次治沙工作会议。国务委员陈俊生代表国务院在会上指出，治沙是一项涉及多行业、多部门、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办好。治沙的工作方针是：统一规划、分工负责；因地制宜，综合治理；防治并重，治用并重，治用结合；突出重点，讲求效益。要做到治理一片、巩固一片，开发一片、见效一片。要把治沙工作纳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计划，今后每年都要根据单项工程进展情况安排必要的投资，发放治沙专项贴息贷款，增加治沙工作事业费。要切实加强对治沙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要加强科学研究、积极推广应用现有的治沙经验及科技成果。

8　月

14日　财政部制定税后还贷、税后承包办法

财政部、国家体改委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试点办法〉的通知》。《办法》规定，税利分流的主要内容：税利分流是将国营企业（简称企业）实现的利润分别以所得税和利润形式上交国家一部分，并实行所得税后还贷、所得税后承包。盈利企业一律按33%的比例税率向国家交纳所得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应用企业留用资金，即税后留利、更新改造资金和其他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归还。为照顾历史上形成的借款余额过大的实际情况，可采取划分新老借款，予以区别对待的过渡办法。取消调节税税种，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利润应当上交国家的部分，可以实行承包等各种形式的分配办法。主要采取“按比例上交”，“定额上交、增长分成”，“递增上交”或者其他形式。

20日　邓小平谈坚持改革开放不能丢

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1989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要讲够。

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那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作一个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

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能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28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

这是我国证券业第一个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管理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国务委员李贵鲜出席成立大会。我国证券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有价证券发行量累计已超过2000亿元，证券交易总额超过500亿元。证券的品种也从单一的国债，发展到国债、企业债、金融债、股票等多个品种并存。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经营机构也相应发展起来。协会成立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已有59家，另外还有300多家证券营业部和证券代办点。

31日—9月4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

根据6月国务院会议提出的以清理“三角债”作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争取在半年内见到成效的要求，会议提出，清理“三角债”的主要任务是；要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缺口造成拖欠这一源头抓起，重点从大中型项目清起，顺次解决“三角债”的债务链。努力防止前清后欠，使“三角债”切实得到缓解。这次清理“三角债”的主要做法是：从源头入手，付方启动，收款还欠，连环清理。这次纳入清理的“三角债”发生时间界限，截止到1991年6月30日。

9　月

5日　国家科委等作出深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的决定

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出《关于深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推进高新技术发展的决定》。主要内容：（一）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使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政策、计划引导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平等竞争。（二）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引导和调控，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三）扩大开放，推动高新技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四）广泛吸引人才，在开发区创造一个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五）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融资体系，增加对开发区的投入，改革投资方式，提高投资效益。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风险的特点。必须逐步增加对开发区的投入并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六）逐步建立社会化支撑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建立新的企业运行机制，避免企业走小而全、大而全和企业办社会的老路，各开发区必须建立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为企业发展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

12日　国务院通知要求加强审计执法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审计执法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强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审计机关的领导，保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审计机关对法定范围内的单位进行审计，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和阻挠审计机关履行职责。审计机关依法作出的审计结论和决定，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协助执行，不得改变。审计机关正在审计的事项，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预检查和处理，有关财经部门应避免重复检查。审计机关在审计中认为被审计单位违

反财经法规的行为，是由于执行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定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相抵触而造成的，应当建议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加以纠正；其主管部门不同意纠正的，应当提请有权处理的机关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当提请监察机关追究有关主管部门领导人员的责任。审计机关为检查被审计单位非法转移国家资金、侵占国家资产的行为，需要查核有关单位以及单位以个人名义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存款的，凭县级以上审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批准的正式查核通知书，并提供存款人的姓名或其他线索等有关情况，由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协助执行。

14 日　国家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 1991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20 日，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财政部长王丙乾强调，大检查与经常性检查要双管齐下，发挥监督检查的综合效应。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共查出违法违纪金额 801 亿元，其中上缴财政 508 亿元。28 日，李鹏总理致信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会议，宣布国务院决定大检查要继续下去。

17 日—30 日　国务院召开治理淮河、太湖会议

会议决定，“八五”期间，国家和地方将投资 61 亿元，在淮河上兴建 18 项大型水利工程，以进一步治理淮河，全面提高淮河流域防洪排涝能力。将筹资在太湖流域兴建 10 项骨干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建成后，可基本解除洪涝灾害对太湖地区的威胁。

23 日—27 日　中央召开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着重研究如何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国务院总理李鹏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了题为《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的讲话。他指出，鉴于治理整顿提出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达到，经济紧缩政策已经有所调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在保持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进一转向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益。关于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要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逐步缩小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指令性计划；适当提高企业折旧，增加新产品开发基金，继续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对利率再做适度调整，抓紧落实给予部分企业的外贸自主权，继续对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实行“双保”，抓紧清理“三角债”，进一步做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坚决治理“三乱”，降低国营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要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坚持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健全企业领导体制，积极推进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把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推向市场，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坚持从严治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等等。

2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要把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件大事摆到突出位置，集中精力抓下去；要把经济工作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要给国营大中型企业逐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国营大中型企业要眼睛向内，自立自强；发展经济，搞好企业，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既要抓紧工作、又要有长期打算。

10　月

7 日　国务院批准分类处理出口还贷和专项出口外汇上缴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出口还贷和专项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问题的请示》。1990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达后，一些部门、地方相继要求免除出口还贷和专项出口上缴中央外汇任务。在外贸新体制对出口收汇实行比例分成的情况下，为维护对外信誉，尽量不给已批项目还贷造成困难，并保证中央外汇收入相对稳定，《请示》建议对项目的出口还贷和专项出口上缴中央外汇问题，分类处理，区别对待。（一）借用国内外汇贷款进口原料加工复出口的项目，继续允许用该项目进料加工复出口收汇金额先还贷后分成。（二）对借用国内外外汇贷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1990 年底前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批准用出口收汇金额先还贷后分成的项目，继续实行原办法，直到还清贷款；（2）原批准用出口收汇 80%留成还贷的项目，以及从 1991 年起新批准借用外汇还贷的项目，其出口收汇一律按外贸新体制规定的比例上缴中央外汇。（三）项目单位还贷出口原则上均应采取外贸代理制，由项目单位自负盈亏，外贸出口企业按代理出口的有关规定将留成外汇和有偿上缴中央外汇补偿的人民币及时返给项目单位，专项用于还贷。

9 日　我国 35 个城市国内生产总值超百亿元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已有 35 个城市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百亿元。这 35 个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苏州、沈阳、大连、杭州、成都、青岛、南京、无锡、扬州、武汉、大庆、潍坊、宁波、烟台、深圳、济南、南通、佛山、唐山、哈尔滨、汕头、徐州、郑州、淄博、长春、西安、盐城、福州、淮阴、鞍山。上海以 744.7 亿元雄居榜首，深圳市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7 日　全面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总目标：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从改革公房低租金制度着手，将现行公房的实物福利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货币工资分配制度，由住户通过商品交换（买房或租房），取得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使住房这种特殊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分阶段目标。(一)“八五”计划期间目标：以改变低租金、无偿分配为基本点，公房租金计划标准力争达到实现简单再生产的三项因素水平（维修、管理、折旧费），逐步增加家庭收入中住房消费支出的比重。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7.5 平方米。(二) 十年目标：到 2000 年，公房租金计租标准要努力达到包括五项因素（维修费、管理费、折旧费、投资利息和房产税）的成本租金水平。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8 平方米。(三) 长期目标：住房租金计租标准要达到包括八项因素（在前述五项因素基础上再增加土地使用费、保险费和利润)。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共同负担的原则。在保持现有建房资金渠道的前提下，增加个人在住房建设投资中的比重。坚持租、售、建并

举的原则，形成一个提高租金、促进售房、回收资金、推动建房的良性循环。坚持在统一政策下因地制宜、分散决策的原则。

1992年3月1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建设部联合发出《关于住房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6月11日，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家税务局联合发出《关于住房制度改革中财政税收政策的若干规定》。为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对涉及到的税收问题提出优惠政策。包括免征能交基金、营业税等。

21日 国务院发布国家预算管理条例

《条例》共9章78条。《条例》强调了收支平衡的原则，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预算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权责结合的原则。国家设立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国家预算由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组成。国家预算收入划分为中央预算固定收入、地方预算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预算共享收入。国家预算支出划分为中央预算支出、地方预算支出、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支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前，可以继续实行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办法。国家预算按照复式预算编制，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两部分。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应当保持合理的比例和结构。经常性预算不列赤字。中央建设性预算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的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地方建设性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自1992年1月1日起施行。1951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23日 国务院知识产权领导小组成立

国务院成立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国务委员宋健任组长，成员由外经贸部、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国家科委、机电部、化工部、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专利局、国务院版权局、国务院工商局和国务院医药局的负责人组成。

26日 国家计委安排“八五”以工代赈工作

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八五”期间用粮食和工业品以工代赈安排意见的报告》。根据国务院关于“八五”期间每年再专项安排价值20亿元的粮食和工业品（五年总规模为100亿元），用以工代赈方式帮助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决定，国家计委经与有关部门和部分受灾省区研究，提出以下安排意见：1. 投向范围。今年灾害覆盖面广，其中安徽、江苏、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尤为严重。根据这种情况，这次以工代赈的投向范围主要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2. 建设内容。五年内国家将安排80亿元以工代赈资金用于水利建设，其中20亿元专项安排淮河流域和太湖综合治理中的骨干工程。主要包括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堤防加固加高、河流治理开发中骨干工程建设、大中型灌溉工程的修复和完善配套，以及重点海堤的除险加固等。同时，安排10亿元用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毁道路桥梁和水毁商业网点的恢复，并预留10亿元，作为机动建设资金。

28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通知》，要求适当缩小农产品流通的指

令性计划管理，完善指导性计划管理，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粮食，在保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前提下，长年放开经营；棉花，继续由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经营。有条件的地方，生猪可以完全放开经营，其决策权归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二）打破地区封锁，撤掉滥设的关卡，保证货畅其流。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国务院重申：严禁地区封锁，任何部门和地方不得干预流通部门执行国家计划和合法的经营活动；各地在交通线上设置的检查站，必须持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重新审查后颁发的许可证，无证的检查站一律撤除；坚决制止一切乱收费、乱罚款的非法行为。（三）继续发挥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要逐步实现政府调控职能与经营职能的分离，除政策性经营亏损由国家补贴外，均应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四）鼓励集体和个人进入流通领域，发展多渠道经营。凡是放开经营的农产品，集体商业和个体工商户都可以经营，可以长途贩运，也可从事批发业务。（五）积极发展产销一体化经营组织。国营商业、外贸企业、供销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畜牧、水产）科技推广部门、乡镇企业等，凡有条件的都可以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牵头或参与产销一体化经营活动。（六）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要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逐步向远期合同和期货贸易发展。

国务院要求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通知》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要以乡村集体或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以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以农民自办服务为补充。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坚持农民接受服务实行自愿、服务体系的发展要量力而行和基本实行有偿服务三项原则。《通知》要求，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乡、村服务实力；充分发挥专业技术经济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支持农民、联办服务组织；建立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保证制度；把支持技术服务和完善生产资料专营结合起来。

11　月

7 日　国家调整食糖经营政策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食糖经营管理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务院决定对现行有关食糖的经营管理政策做适当调整，改革计划管理形式，放活价格，促进购销，开拓市场。从这个制糖期起，对食糖经营管理政策做如下调整：（一）改革计划管理形式。国家计委下达的食糖收购调拨计划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取消工商企业食糖收购比例，适当放开运输流向。国家鼓励完成食糖调拨计划的糖奖粮政策，以上一制糖期实际完成的数量为基数。再维持一年，以后逐步取消，调整出来的财政补贴资金用于修建食糖仓库和食糖储备贷款的贴息。（二）适当调整食糖购销价格政策。各地扶持糖料生产的鼓励政策是否保留，由各地自行确定。放活食糖出厂价格，食糖出厂价格由国家定价改为国家指导价，工商企业可按照国家指导价在上下浮动 10% 的幅度内协商定价。食糖的调拨价、批发价也相应放活。放开食糖零售价格。（三）实行多渠道经营。食糖生产企业、糖酒公司和其他国营、集体商业企业均可多渠道、少环节地经营

食糖批发业务。国家将在南方和北方各建立一个食糖批发市场，逐步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四）扩大食糖销售。对城乡居民的食糖销售实行敞开供应，特别是要开拓农村市场。（五）建立中央、地方两级食糖储备制度。为了以丰补欠，增强调控市场能力，国家建立中央、地方两级食糖储备制度。食糖储备的原则是中央进口糖由中央储备，国内生产糖由产区和销区分别储备，并逐步实现国家储备与商业经营分开。

25 日—29 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到本世纪末确保粮食总产量达到 5000 亿公斤，农村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要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企业健康发展，依法经营、纳税，保护其合法权益。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区别情况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26 日　央行宣布不再办理保值储蓄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自今年 12 月份始，不再办理保值储蓄业务。自 1988 年 9 月起开办的保值储蓄业务，体现了国家政策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得到了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经过 3 年多的治理整顿，目前我国经济已逐步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市场供给充足，物价平稳，人心安定。鉴于从 1990 年 6 月份至今年 10 月份，保值储蓄贴补率已连续 17 个月为零。为此，决定从今年 12 月份起，不再办理保值储蓄业务。此公告公布前已存入的三年期以上储蓄存款，仍给予保值。保值贴补率为零时不再公布贴补率。

30 日　海发行 B 股股票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首次发行总计 1 亿元面额共 100 万股的人民币特种股票（B 种股票）。由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发行。于 1992 年 2 月 21 日，真空 B 股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12　月

3 日　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召开全国计划、财政会议

全国计划、财政会议在京召开。9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两会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明年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继续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在巩固治理整顿的成果和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把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1992 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首先是争取农业获得一个好的收成，仍要把农业丰收放在经济工作的第一位。其次，在搞好大中型企业、提高效益方面要有所进步，取得实效。第三，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研究建立一套真正反映实际的经济指标考核体系。第四，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继续办好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搞好浦东的开发和开放。要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今年外贸取得的成果，发展外贸市场的多元化，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计划工作中要注意防止出现新的经

济过热。虽然我国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但国民经济中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未彻底解决，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第一，要防止重复建设。第二，要落实资金，切实做好可行性研究工作。各地制定的政策应当在中央已确定的 12 条措施的范围内加以具体落实。控制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绝不能冲击国家基本税收政策。

国务委员邹家华作《关于以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为重点，安排好 1992 年计划和 1993 年框架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1992 年综合经济指标初步安排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5.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5400—5700 亿元；银行信贷规模 2800 亿元，货币发行 500—600 亿元；财政赤字控制在 200 亿元内；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控制在 6%以内；出口总额 600—620 亿美元，进口总额增长 15%；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3%。1992 年深化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是：完善国家产业政策，搞好行业规划和地区布局，正确引导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改进和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改进生产、流通的计划管理，缩小指令性计划；逐步建立分级分类的工资管理制度；完善部门承包体制，搞活国务院批准的试点企业集团并在国家计划中单列。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指出，1992 年要加快“分税制”的试点步伐，已经进行“税利分流”试点的地区，要适当扩大试点面，其他省市要进行试点。中央各经济部门也要选择一些企业进行试点。

9 日　国家税务总局推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管理

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管理的报告》。《报告》就继续推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管理，充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提出以下意见：（一）坚决维护税法的统一性、严肃性。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执行统一税法，严格按税收管理权限办事。凡是地方政府和部门越权减免税的，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税务机关都有权拒绝执行，并及时向上级报告；凡自行制定与现行税法相悖的政策，都要立即停止执行。今后，处理有关税收问题，都不得自定章法，越权行事，乱开减免税口子。（二）各地在制定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措施时，必须严格遵守现行税法，无权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再放宽税收政策。（三）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征管。（四）加强涉外税收工作。涉外税收，一要维护国家权益；二要按国家统一规定，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商投资给予适度的税收优惠；三要尊重国际惯例。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国家权益，保证国家涉外税收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不得自定超出国家规定范围的对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五）税制改革的方向是：在我国逐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强化流转税和所得税主体税种，统一所得税制度，规范流转税制度，公平税负，简化税种，使税制结构日趋合理。当前，各级税务机关要积极参与国营企业“税利分流”试点，为全面实行“税利分流”打好基础。

国务院要求加强彩票市场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利用发行彩票募集资金应从严控制。目前只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举办社会福利、体育事业和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其他活动。发行彩票的批准权集中在国务院。需发行彩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

提前半年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发行计划及发行办法，经人民银行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发行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批准的发行规模和发行办法，不得突破发行规模和违章发行。发行彩票募集的资金，必须按规定使用，严禁挪作他用。

13 日　我国最大容量程控数字交换机研制成功

目前国内最大容量的程控数字交换机由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和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共同研制成功，并通过技术鉴定。HJD—04 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容量可达 6 万等效线，适用于 1.6 万线接转局或 3—4 万门的市话局，整机技术达到 80 年代末期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系统结构和交换网络都有创新，呼叫处理能力居国际领先地位。HJD—04 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是现代信息产业的高技术产品，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能够生产。这是我国现代通讯技术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

14 日　国家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请示》，并为此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企业集团是适应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为促进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国家决定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分期分批进行试点。发展企业集团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通过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正确引导；并要慎重稳妥，注意自愿原则，切忌一哄而起，以便使我国的企业集团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壮大。

《请示》提出：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要达到以下目的：1. 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2. 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特别要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实现企业优势互补。3. 形成群体优势和综合功能。4. 提高国际竞争力。5. 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试点企业集团具备条件的应区别不同情况在国家或省级计划中实行单列。计划单列的内容：1. 主要产品产量计划。2.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计划。3. 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计划。4. 主要物资、能源分配计划。5. 科技计划和教育计划。6. 劳动工资计划。7. 财务计划。试点企业集团核心企业对紧密层企业的主要活动实行“六统一”：1. 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由集团的核心企业统一对计划主管部门。2. 实行承包经营的，由集团的核心企业统一承包，紧密层企业再对核心企业承包。3. 重大基建、技改项目的贷款，由集团核心企业对银行统贷统还。4. 进出口贸易和相关商务活动，由集团的核心企业统一对外。5. 紧密层企业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资产交易，由集团的核心企业统一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6. 紧密层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由集团核心企业统一任免。试点企业集团要逐步建立财务公司。要逐步赋予试点企业集团自营进出口权。

15 日　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这是我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 30 万千瓦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位于浙江省海盐县秦山北麓，满功率发电后，每年可向华东电网（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输送核电 15 亿千瓦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经济发达而能源短缺区域的用电紧张状况。它的并网发电成功，是我国和平利用核能的一项重大成就。秦山 30 万千瓦核电机组采用了技术成熟的压水型反应堆。目前世界上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自行设计、建造这种堆型的核电站。核电技术是高科技领域的一

项综合性技术。它的建成发电，对今后我国商用核电站的建设、引进技术的鉴别、消化以及有关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日　朱镕基谈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就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当前的工业交通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大力调整结构，推进技术进步，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管理，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这不仅是明年，也是整个“八五”时期工业交通工作的指导思想。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要靠基本建设投资的倾斜。但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单靠基本建设投资倾斜是不够的，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行三个结合。一是要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方面的优点最好地结合起来。既要加强宏观调控，又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要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调控相结合。三是要把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结合起来。要搞好企业技术进步，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的关系；企业技术进步中各项工作的关系；集中与分散的关系。现在需要企业作出更大的努力，迅速转换经营机制，这是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根本。

21日　李鹏同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代表座谈

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要求进一步抓紧抓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技术进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各级领导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件大事列入议事日程，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我国国营大中型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有一个明显的进步，上一个新的台阶。李鹏指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一要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二要加强管理；三要依靠技术进步。要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来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要认真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要尽快制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的企业法的实施条例。条例的主要内容，应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解决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问题，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和经营责任，加强企业建设和分配的约束机制。

1991年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是由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共同组织召开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真正把企业技术进步工作转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

22日　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企业技术进步

会议提出并经国务院同意，决定采取12条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国营大中型企业技术进步。(一) 三年内全部免去国有大中型工交企业上缴的“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外调节基金”。(二) 加大对国营工交企业固定资产重估的步伐。(三) 降低国营大中型企业所得税税率。(四) 适当放宽财政信贷政策。(五) 增加企业新产品开发资金。(六) 国家准备增加外汇投入，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企业。(七) 实行压缩产成品资金占用与增加技术改造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挂钩。(八) 建立国家和地方两级新产品开发和消化吸收专项资金。(九) 增加国家重点技术贷款比重，相应减少一般贷款。(十) 在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技术中心，对中间试验产品定期减免所得税。(十一) 加强宏观

调控，防止重复建设。（十二）完善约束机制，提足用好有关技术进步的自有资金。

27日　国务院生产办等提出“八五”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

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体改委印发《关于“八五”期间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意见》提出，“八五”期间要把完善承包制与深化改革、提高效益结合起来。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把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与实现“八五”计划目标任务，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二是要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上下功夫；三是要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四是要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五是要与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整体素质。要按照企业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指导；1.选择一批对国民经济全局有重大影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营管理水平较好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实行长期投入产出总承包，赋予它们更大的经营自主权。2.对已确定“八五”期间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要一包上缴国家利润，二包技术改造和还贷，三包技术改造项目的投产、达产。3.对大多数企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现有承包办法，按照《承包条例》规定，区别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具体承包形式和期限。同时在部分地区和企业进行税利分流试点。4.对政策性亏损企业可继续实行定额亏损补贴包干，但承包期不宜过长。5.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没有适销对路产品、短期扭亏无望的经营性亏损企业，原则上不再实行承包，下决心实行关停并转或依法破产。要改变在确定承包基数时单纯进行指标纵向比较的办法，参考行业资金利润率等横向经济指标，对承包基数进行修正，尽可能使承包基数做到科学合理。逐步由单一挂钩指标过渡到复合挂钩指标，特别要注意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税率等作为考核指标，在审核新增工资和挂钩基数时，应尽量通过同行业企业之间效益水平的比较，确定和调整挂钩浮动比例。要将主要承包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企业提取效益工资的决定条件，未完成承包任务的企业，视具体情况不提取或不全额提取效益工资。凡是经营性亏损和虚盈实亏的企业，不得发放奖金和效益工资。

31日　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

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0000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7.7%，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1/4；乡镇工业总产值8500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乡镇企业的是中国农村改革最突出的成果之一。

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91年，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9855亿元，比上年增长7.7%；其中第一产业5289亿元，第二产业9147亿元，第三产业5405亿元；产业结构比为26.6:46.1:27.2。

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结构调整进展较慢，经济效益不高，财政困难大。巩固、发展治理整顿成果和深化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一、农业

1991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仍夺得了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全年农业总产值8008亿元，比上年增长3%。其中，种植业增长0.9%，林业增长7.8%，牧业增长6.1%，副业增长1.8%，渔业增长6.7%。棉花大幅度增产，油料、糖料、烤烟产量再创历史最高水平；蔬菜、水果生产又获丰收。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

善。1991年末全国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93亿千瓦，比上年末增长1.9%。

存在的问题是，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食略有减产，农产品流通体制还不完善，农业发展不稳定问题依然存在。

二、工业

1991年工业总产值28225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23121亿元，增长12.9%。在全部工业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8.4%，全民所有制工业新增产值占全部工业新增产值的比重由上年的37.8%提高到43.1%；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18%，个体工业增长24%，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增长55.8%。大中型企业生产开始摆脱前两年徘徊的状况，比上年增长9.2%。

存在问题是，企业经济效益低的问题依然突出，平均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为13.28元，比上年减少0.52元；其中，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下降14.2%。成本继续超支，亏损额上升，工业结构调整较慢。

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

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回升。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279亿元，比上年增加829亿元，增长18.6%。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3558亿元，增长21.9%；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629亿元，增长18.7%；个人投资1092亿元，增长9%。

国家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182个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440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投产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100个，大中型项目单项工程155个，限额以上更新改造项目115个。当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煤炭开采2714万吨，发电机组容量1184万千瓦，已连续三年超过1000万千瓦，石油开采1491万吨，天然气开采11亿立方米（石油开采和天然气开采含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炼钢396万吨，炼铁376万吨，纯碱60万吨，化肥96万吨，木材开采21.2万立方米，水泥292万吨；铁路复线里程309公里，铁路电气化里程849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609万吨。

存在的问题是，在建规模偏大，新开工项目增长过快，全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新开工项目7.45万个，比上年增加1.8万个。

四、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

国内市场稳定增长。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398亿元，比上年增长13.2%；扣除零售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消费品零售额8227亿元，增长13.5%。

生产资料市场趋向活跃。1991年全国物资系统购进生产资料2891亿元，比上年增长25.3%；销售3129亿元，增长24.5%。

居民收入增加。据抽样调查，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570元，比上年增长13.2%，扣除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10元，比上年增长3.5%；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实际增长2%。1991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33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5%；职工平均货币工资2365元，扣除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1%。城乡储蓄大幅度增加。1991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911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076亿元，增长29.5%。

1991年，价格结构性调整的力度较大。国家先后提高了原油、成品油、钢材、生

铁等基础产品和铁路货运的价格，提高了城镇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和食用油销售价格。市场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2.9%；城乡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包括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比上年上涨3.4%。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中城市物价涨幅较大，全年35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比上年上涨8%。

五、对外经济贸易和利用外资

进出口全面增长。据海关统计，1991年出口总额719亿美元，增长15.8%，其中"三资"企业出口额120.5亿美元，增长54.2%；进口总额638亿美元，增长19.5%。顺差124.5亿美元。外贸实行自负盈亏体制，促进了出口结构的调整，提高了经济效益。国际收支状况继续好转。

利用外资稳步增长。1991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6%；实际使用外资113亿美元，增长9.6%。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111亿美元，实际投资40亿美元，分别增长67.6%和13.8%。

1991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

国家计委下达1991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名单，总计182项，其中新增项目（*）14项，地方项目7项。

煤炭（21项）　河北开滦矿区　山西古交矿区　山西大同矿区　山西阳泉矿区　山西潞安矿区　山西晋城矿区　内蒙古准格尔项目一期工程　内蒙古霍林河矿区　*内蒙古平庄矿区元宝山露天矿及配套工程　辽宁铁法矿区　黑龙江七台河矿区　黑龙江双鸭山矿区　江苏大屯矿区　安徽淮南矿区　安徽任楼煤矿（地方项目）　山东兖州矿区　山东枣滕矿区　河南平顶山矿区　*河南永城矿区　云南小龙潭露天煤矿　*神府东胜矿区及配套工程

石油（8项）　华北油田　辽宁辽河油田勘探和开发　黑龙江大庆油区油田勘探和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勘探和开发　河南中原油田勘探和开发　青海油田　新疆油田　*新疆塔里木地区勘探

电力（43项）　天津军粮城电厂四期　天津大港电厂　天津蓟县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河北宣化沙岭子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　山西漳泽电厂二期　山西神头第二电厂　内蒙古通辽电厂　内蒙古丰镇电厂　*辽宁铁岭电厂　黑龙江牡丹江二电厂三期　哈尔滨第三电厂二期（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黑龙江双鸭山电厂二期　上海吴径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江苏常熟发电厂　江苏利港电厂　浙江北仑港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浙江秦山核电站　安徽平圩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江西万安水电站　江西九江电厂二期　福建水口水电站　湖北隔河岩水电站　湖北汉川电厂　湖南沅陵五强溪水电站　湖南岳阳电厂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　广西岩滩水电站　红水河天生桥坝索水电站（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四川铜街子水电站　四川宝珠

寺水电站　四川江油电厂　四川重庆珞璜电厂　贵州东风水电站　云南鲁布革水电站　云南漫湾水电站　西藏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　陕西安康水电站　陕西渭河电厂　甘肃靖远电厂　＊青海李家峡水电站　宁夏大坝电厂

水利（1项）　河南洛宁故县水库

铁道（22项）　大包复线　滨绥线（含哈尔滨枢纽）　胶济复线　浙赣复线（含株洲枢纽）　沪杭复线（含钱塘江欠桥及杭州枢纽）　陇海线（徐连改造）　徐州枢纽　郑武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　焦枝复线　川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　鹰厦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　湘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　贵昆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　大泰线二期工程（含电铁供电工程）　商阜线　＊南昆线　宣杭线　侯月线　兰武线电气化（含电铁供电工程）　宝中线　沈阳枢纽　唐山机车车辆厂

交通（14项）　天津港（地方项目）　秦皇岛港　大连港（含商检设施）　营口港　上海港　连云港港　张家港港二期　宁波港（含商检设施）　青岛港　烟台港　湛江港　广州港　西江航道整治　京津塘高速公路

邮电（4项）　北京邮政枢纽　北京法国贷款通信工程　武汉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地方项目）　广州电信枢纽

民航（3项）　＊武汉天河机场　昆明巫家坝机场　拉萨贡嘎机场

钢铁（5项）　＊山西娄烦太钢尖山铁矿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及冶金配套　武汉钢铁公司　四川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　二期贵州遵义铁合金厂

有色（8项）　河津山西铝厂二期　江西铜业公司　河南焦作中州铝厂　＊广西平果铝厂　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二期　贵阳贵州铝厂三期　甘肃白银有色公司　甘肃金昌金川有色公司二期

化工（9项）　天津化工厂蛋氨酸工程（地方项目）　河北矾山磷矿　江苏连云港碱厂　杭州磁带厂（地方项目）　江西贵溪化肥厂（地方项目）　＊湖北大悟黄麦岭磷矿　816厂化肥工程　＊贵州瓮福磷矿　云南昆阳磷矿

石化（6项）　抚顺石化公司丙烯腈纶装置工程　上海三十万吨乙烯工程　南京扬子石化公司　山东淄博齐鲁石化公司　河南洛阳炼油厂　广州石化总厂

建材（4项）　＊长春双阳水泥厂　广东云浮水泥厂　陕西耀县水泥厂　新疆水泥厂

医药（2项）　河南中原制药厂　牡丹江制药厂（地方项目）

机电汽车（5项）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　重型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斯太尔项目　南京汽车制造厂依维柯项目　无锡微电子科研生产联合公司

轻纺（5项）　辽宁抚顺洗涤剂化学厂　广东汕头感光材料厂（地方项目）　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二期工程　济南涤纶厂（地方项目）　山东淄博腈纶厂（地方项目）

科学教育（7项）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卫生（4项）　北京医科大学　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

文化（1项）　陕西历史博物馆（地方项目）

其他（10项，略）

1992 年

1　月

1 日　江泽民在政协发表新年讲话

江泽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年茶话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经过三年来的努力，治理整顿任务已基本完成。在新一年里，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6 日—10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李鹏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分量。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就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暂行条例》作重要讲话。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作了《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讲话。

15 日—8 日　江泽民在上海考察

江泽民指出，全党要始终不渝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要把加强国内科研工作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中起到“倍增器”的作用。

17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

李鹏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3 月 16 日，国务院向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议案。《议案》提出，三峡工程兴建后，可将荆江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配合其他措施，可以防止荆江河段发生毁灭性灾害；还可减轻洪水对武汉地区及下游的威胁。同时，三峡工程还有发电、航运、灌溉、供水和发展库区经济等巨大的综合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峡工程坝址选在湖北省宜昌县三斗坪镇。工程的拦河大坝全长 1983 米，坝顶高程 185 米，最大坝高 175 米。水库正常蓄水位 175 米，总库容 393 亿立方米，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1768 万千瓦。工程静态总投资 570 亿元（1990 年价格）。主体工程建设工期预计 15 年。工程建设第 9 年即可发电受益，预计在工程建成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即可偿还全部建设资金。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是可以负担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建议将兴建三峡工程列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要求“对于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1994 年 12 月 14 日，长江三峡工程

正式开工。

18日—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南方敷省发表重要讲话

1月18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要点是：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

21日 建设部提出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的工作请示》。《请示》就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工作提出：认真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

针”。加强城乡建设的统筹规划，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有计划地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要求，按照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组织制定全国和跨省、省域、市域、县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统筹安排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促进城乡建设和经济建设、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各城市要适时调整和完善八十年代初期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八五”期间还要为制定2000年后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做好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城市土地使用的控制规划、大中城市的综合交通规划和防洪、抗震等防灾规划，应当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请示》指出，我国5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78%以上的工业利税，90%以上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力量集中在四百多个设市城市。多年的实践证明，城市规划是“龙头”，要把城市建设好、管理好，首先要把城市规划搞好。

24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进一步开发开放浦东

国务院给予上海浦东开发五项优惠政策。(一) 授权上海市自行审批在外高桥保税区内设立中资、外资从事转口贸易的外贸企业。(二) 授权上海市自行审批浦东新区内国营大中型生产企业自营产品的进出口经营权。(三) 扩大上海市有关浦东新区内非生产性项目的审批权限。(四) 扩大上海市有关浦东新区内生产性项目的审批权限，总投资在1亿元以下的，上海可自行审批。(五) 授权上海市在中央核定的额度范围内自己发行股票和债券，并同时允许全国各地发行的股票在上海上市交易。为增加资金来源，国务院在“八五”期间给上海五项配套资金筹措权。

纺织部等提出控制棉纺、毛纺生产能力和加强化纤生产能力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纺织部、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严格控制棉纺、毛纺生产能力和加强化纤生产能力管理的意见》。《意见》要求纺织“三大生产能力”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自行发展；“八五”期间不再新增棉纺、毛纺生产能力。所有增加棉纺、毛纺生产能力的在建项目（“三资企业”除外)，必须立即停止建设，银行停止贷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登记。其善后事宜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对“三大生产能力”的生产要实行许可证制度，并由纺织部归口管理。

2　月

9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光大银行

国务院同意成立中国光大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是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全资附属的国营金融企业，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归口领导和管理。中国光大银行的任务是筹集融通国内外资金，主要办理机电、能源、交通等行业的大型设备信贷、飞机租赁等业务，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光大银行可以逐步设立分支机构。8月18日，中国光大银行正式成立并营业。是全国性商业银行。

10 日　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国务院批转国家土地管理局、农业部《关于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请示》。《请示》提出，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是保护耕地的有效办法。拟在全国推广这一做法。具体意见如下：（一）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关系到我国十一亿人口基本生存条件的大事，要坚决贯彻执行。根据当地土地资源、人口增长情况，统筹兼顾农业和各项非农业建设用地，稳定农田面积，保证人民生活和建设用地的需要。各级人民政府对农田保护工作应高度重视，把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和村镇规划协调一致。（二）根据不同地区确定保护重点。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要全面开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把大部分农田划为保护区，重点保护起来。西部地区良田较少，要首先把高产稳产农田、城镇郊区农田保护起来。建立基本农田的保护制度及地力补偿制度。（三）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基本农田保护办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划为保护区的耕地必须建立地力补偿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原则上不得用于非农业建设，在建设项目包括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选址时，凡涉及农田保护区的，要尽量避开。必须占用保护区耕地的，要严格按照占用农田保护区耕地的审批权限、程序履行审批手续，并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交纳占用农田保护区耕地补偿费用。开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所需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财力情况统筹安排予以解决。

17 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改进工业生产评价考核指标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国家统计局《关于改进工业生产评价考核指标报告》。《报告》提出，为了加强和改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拟从 1992 年起逐步改进国民经济评价考核指标。首先从改进工业生产评价考核指标做起，为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打下基础。建立工业增加值统计制度，完善反映经济循环和经济效益的工业生产评价考核指标。1. 为全面地反映国民生产新创造的价值，需要将总产值指标改为国民（内）生产总值指标，并分别采用现价和不变价计算。2. 在现行工业统计月报中增设“工业销售产值”指标，并采用不变价和现价两种价格同时计算；以“现价工业销售产值”指标与现价工业总产值相比计算产品销售率；以“不变价工业销售产值”指标计算销售增长速度。3. 以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和工业产品成本利润率作为评价、考核主要生产要素占用和耗费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状况的主要指标。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改为按工业增加值或净产值计算，以反映新创造价值的劳动生产率。拟在建立和健全工业财务定期统计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定期计算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制度。4. 拟将现行定期统计的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扩大为三项资金（产成品资金、发出商品及应收预付货款）占用情况。加强全社会库存统计和监测分析。

19 日　国务院批准 1992 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 1992 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要点》提出的 1992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巩固治理整顿的成果，进一步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二是坚持维护和壮大公有制经济，重点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进一步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具体途径

和方式。三是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安排，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以及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长期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确定的目标相衔接，要依照"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既保持各项重大改革措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积极试验。四是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重点，加强协调配套，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总量平衡和经济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基础上，抓住有利时机，有重点地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改革的步伐。

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以此为中心，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积极稳妥地进行价格改革，加大流通体制改革的力度；综合配套运用经济杠杆，强化间接调控；住房、社会保险和医疗制度改革要迈出较大步伐；搞好重大改革试点，为新体制和新机制的建立进行积极大胆的探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要点》提出，在总结经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搞好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上海、深圳两市要有计划地扩大股票上市企业数量；广东、福建、海南三省，可根据中央对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赋予的权力，进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不上市）股票的试验，其发行办法和规模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审批。

27日　国家计委等提出控制长线产品建设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关于控制若干长线产品和热点产品建设项目审批的请示》。《请示》提出了对一些重要的长线产品和热点产品的项目审批的处理意见：对生产能力明显超过市场需求或超过原材料供给可能的产品，停止审批。棉纺、毛纺、卷烟、农膜、彩电、电冰箱、冰柜及压缩机、复印机等，不论投资规模大小，使用内资还是利用外资，"八五"期间不再审批新项目。对市场有需求，生产能力还需适当增加，但规模经济要求高、资金密集的产品项目的建设，必须严格国家"八五"计划。乙烯、聚脂、纯碱、烧碱、轿车、轻型车、微型车、彩色显像管及玻壳、录像机、绦纶丝等产品项目，除列入"八五"计划的，1993年底以前国家不再审批新项目。对近几年开始起步发展，但已出现盲目布点的产品项目，如家用空调器及压缩机、烟用丝束、摄像机、数字式用户程控交换机等，首先从分析市场需求入手，根据各种建设条件的可能，由国家制定总体发展规划。

3　月

6日　国家再次提高粮食收购和销售价格

国务院发出《关于提高粮食统销价格的决定》。国务院决定，从1992年4月1日起提高小麦、稻谷、玉米定购价格。全国平均每50公斤玉米提高3元；籼稻提高5元；籼稻提高3元。同时提高粮食统销价格。按购销同价的原则，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中等质量标准品的统销价格，全国平均每500克提高0.11元。其他粮食品种的

统销价格也按购销同价的原则相应提高。粮食统销价格提高后，粮食企业的经营费用仍由财政补贴，并继续给城镇居民适当补偿。粮食统销价格提高后，对城镇居民口粮继续实行凭证、凭票、定量供应政策。对农村平价粮销售也继续实行计划供应。

国务院规定，在粮食调价期间，各地区、各部门不准出台其他提价项目，不准“搭车”涨价。要抓好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稳定生活必需品价格。继续对粮食企业采取扶持政策。

8 日　我国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

国务院印发《关于下达〈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的通知》。国务院指出，为在 2000 年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十三大以来历届中央全会的精神制定的，目的是阐明我国中长期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方针、政策和发展重点，指导我国到 2000 年以至 2020 年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战略是，增强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意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动员和吸引大部分科技力量投身于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注重技术创新，努力吸收和尽快应用世界上先进的适用技术，加速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技术改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以大规模生产的产业技术和装备现代化为主要方向，同时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稳定地加强基础研究，增加科学储备。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部署为依据，着重解决工农业大规模现代化商品生产中的问题，有效地控制和缓解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在若干我国具有优势的科学技术领域，必须勇于创新，保持发展势头，继续在世界先进行列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高新技术和基础研究的若干重点领域有所突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形成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到 2000 年我国工业主要领域大体达到经济发达国家 70 年代或 80 年代初的技术水平，到 2020 年达到经济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初的技术水平，在总体上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运用税收、价格、信贷、折旧等经济杠杆，引导行业和企业的科技进步，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免征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技术性收入的营业税。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阻碍科技进步的产品和技术，征收附加税。对研究开发机构和企业的研究开发，测试分析和软件等技术性投资，以及国家确定的新产品的商品化生产，给予贴息或低息贷款。

3 月 10 日，全国科技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科委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抓好的 10 个方面的工作。主要有：科技工作要努力攀登科学高峰。高度重视并切实增加科技投入。积极稳妥的引导科研机构合理分流，各得其所。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推动科技兴农向纵深发展。努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扩大开放，积极开拓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好地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使科技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巨大的威力。

9 日—1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会议指出，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14 日　国家取消进口调节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1992 年 4 月 1 日起，全部取消进口调节税，同时调整一般摄像机和小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取消进口调节税后，16 种商品的实际关税税负降低 28.6%至 61.5%。其中合成纤维和人造纤维纺织物下降 30%，32 位字长以下的微型计算机下降 45%，彩色投影电视机下降 42%，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下降 50%。对原征进口调节税的小汽车、一般摄像机的关税税率作适当调整。一般用途的摄像机取消 80%的进口调节税后，关税税率由 80%调为 100%，实际税负降低 37.5%；普通小汽车取消 80%的进口调节税后，排气量 2000 毫升以下的小汽车关税税率由 120%调整为 180%，实际税负降低 10%，排气量 2000 毫升以上的小汽车，关税税率则提高到 220%。

进口调节税是关税的一种附加税，是国家为了改善进口结构，保持进出口平衡于 1985 年开始采取的措施。我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进口中的一些混乱现象也有很大改变，而且大多数商品的进口税率本身已比较高，再加征进口调节税已不甚需要。

18 日　国务院要求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发展

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报告》，并为此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必由之路。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继续坚持“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指导乡镇企业调整结构，提高效益。要采取有力的扶持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乡镇企业，认真解决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部在《报告》中提出今后乡镇企业发展目标：到 1995 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按 1990 年不变价计算，下同）达到 16100 多亿元，其中乡镇工业产值为 11600 亿元，出口商品交货额达到 1200 亿元，“八五”期间年均增长分别为 11%、10%和 19.5%；力争安置就业人员 11000 万人，2000 年力争达 14000 万人。

继续对发展乡镇企业实行扶持政策：（一）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依靠农民自筹和乡镇企业自身积累，各级政府也要给予必要的支持。（二）充分发挥信贷资金的导向作用，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销路、技术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金融部门应给予贷款支持。（三）重点扶持乡村集体骨干企业。有关部门在资金、税收、能源、原材料、运输、人才、技术等方面应继续给予必要的扶持。（四）加快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对乡村集体骨干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偏低的，可以适当提高。（五）要把乡镇企业的人才培养列人教育发展计划。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并相应发给国家承认的职称证书。（六）认真落实国家对乡镇企业出口创汇的各项政策，鼓励乡镇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外贸公司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和联营。对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和外向型企业集团赋予外贸出口权。（七）进一步搞活企业的供销、流通。允许各级乡镇企业供销公司和各类专业公司，从事生产、销售、批发、零售和必要的异地物资串换。（八）切实减轻乡镇企业的负担。坚决制止向乡镇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乡村集体企业税后利润留给企业的部分不应低于60%，由企业自主安排，增强企业发展的能力。

《报告》指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七五”期间，税收净增量的32.8%，外贸出口创汇净增量的30%，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量的32%，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利润支出用于农村各项建设投资达459亿元，用于以工补农建农资金279亿元。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强大支柱。

20日—4月3日　第七后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鹏作《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作《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认为，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这条基本路线，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有利时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精力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有利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就要勇于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要善于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手段，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与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作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向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1992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抓紧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特别是要在搞好农业和国营大中型企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在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2.3%，货币发行和新增信贷规模与去年大体持平，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

要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进企业改革，转换和完善经营机制。政府部门要下决心消除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必要干预，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积极进行发行股票和证券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抓紧人员培训，完善规章制度，健全交易秩序，使股份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按照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改革计划体制和管理方式。进一步调整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机构要按照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继续转变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继续采取措施和完善政策，办好深圳等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努力使这些地区不但在经济和城市建设上有较快的发展，而且在改革开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上海浦东新区是今后十年开放开发的重点。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建设一些投资效益好的项目，通过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逐步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

21日　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受国务院委托，向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作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1992年计划安排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对外开放，依靠科技进步，在继续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和素质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计划要求，在大力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其中第三产业增长7.2%。在计划执行中，力争结果更好一些。计划安排的重点和主要任务如下：

第一，争取农业生产有一个好收成，并要进一步加强大农业观念，积极发展林、牧、副、渔业和其他农村经济。计划安排粮食总产量43500万吨，棉花475万吨，油料1650万吨，肉类3100万吨，水产品1350万吨。

第二，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合理调整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和交通运输计划安排是：原煤11亿吨，其中统配煤矿4.9亿吨；原油14050万吨；发电量7050亿千瓦小时；钢7100万吨；铁

路货运量 14.7—14.8 亿吨；交通部直属水运货运量 2.7—2.8 亿吨。

第三，合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结构，大力提高投资效益。计划安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 57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8%。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3870 亿元；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 675 亿元；城乡个体投资 1155 亿元。在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 2020 亿元；技术改造投资 1100 亿元；车船飞机购置 65 亿元；商品住宅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 685 亿元。计划安排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主要有：原煤开采 2536 万吨，原油开采 1300 万吨，发电机组容量 863 万千瓦，乙烯 11.5 万吨，铁路营业里程 630 公里，电气化和复线里程 1172 公里，沿海港口吞吐量 2819 万吨，粮食仓储 155 万吨。

第四，进一步丰富城乡市场，继续改善人民生活。计划安排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05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3%。

1992 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受国务院委托，向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作 1991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92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1991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 3582.8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1%；国家财政总支出 3793.8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4%；财政赤字 211.06 亿元，比预算扩大 87，6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 180.66 亿元，地方财政赤字 30.4 亿兀。

1992 年国家预算安排的主要原则是：大力支持改革开放，推进技术进步，厉行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征收管理，从严控制支出，保证重点需要，并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1992 年国家预算草案：财政总收入为 3912.13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9.2%，其中国内财政收入 3705.88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8.7%（扣除债务收入增加的因素增长 5.8%），国外借款收入 206.25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8.7%；财政总支出 4119.99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8.6%，其中用国内财政收入安排的支出 3913.74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8.1%，用国外借款安排支出 206.25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8.7%；收支相抵，赤字 207.86 亿元。

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从 1992 年起，国家预算由单式预算改按复式预算编列。按照复式预算编制办法，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的编列情况如下：

经常性预算收入 3022.41 亿元，主要收入项目的安排情况是：各项税收 3042.42 亿元；企业收入 56.67 亿元；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收入 123 亿元；其他各项收入 109.02 亿元；非生产性企业亏损补贴 308.7 亿元，已相应冲减收入。经常性预算支出 2576.31 亿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62.5%。主要支出项目：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支出 155.2 亿元；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支出 1019.77 亿元；国家政权建设支出 771.81 亿元，其中，行政管理费 366.51 亿元，国防费 370 亿元；价格补贴支出 336.02 亿元；其他各项支出 266.51 亿元；中央和地方预备费 27 亿元。经常性预算收入和支出相抵，结余 446.1 亿元。

建设性预算收入 749.57 亿元，主要收入项目：经常性预算结余转入 446.1 亿元；专项建设性收入 473.68 亿元；其他收入 28 亿元；生产性企业亏损补贴 198.21 亿元，已相

应冲减收入。建设性预算支出 1543.68 亿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37.5%。主要支出项目：生产性基本建设支出 584.57 亿元；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 179.73 亿元；增拨企业流动资金 10.18 亿元；地质勘探费 42.63 亿元；支援农业生产支出 136.53 亿元；城市维护建设支出 132.1 亿元；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18.19 亿元；商业部门简易建筑支出 9.7 亿元；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430.05 亿元，其中，国内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346.53 亿元，国外借款还本付息支出 83.52 亿元。差额为 794.11 亿元。将通过举借债务和借款弥补，其中，国内债务收入 380 亿元，国外借款收入 206.25 亿元，向银行借款 207.86 亿元。

23 日　全国范围开展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 1992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的请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

《请示》提出，进行产权登记，是保卫国有资产的重要措施，是实施国有资产所有权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依法对全民所有的资产进行登记，是依法确认企业和单位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法律行为。开展产权登记工作，重点是解决企业、单位普遍存在的产权归属不清、定性不准、账实不符、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同时，为全国开展清产核资工作进行前期准备。产权登记分为开办产权登记、变动产权登记、注销产权登记。凡占用国有资产的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都必须办理产权登记。

28 日　国务院制定清产核资办法

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印发《清产核资办法》（试行），对在全国范围内核实国有资金，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的具体办法作出了规定。清产核资的范围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军队、武警等；以及上述各企业、单位投资或举办的国内合营、联营、集体和其他等企业、单位。乡镇企业、供销社、农村信用社、轻工系统中的集体企业，只进行资产清查登记，有关所有权界定和国有资金核实等工作，放在清产核资以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进行。对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要清查中方原投资的国家股份或国有资本金数额及其增值部分。境外企业、单位的清产核资工作另作部署。

清产核资工作的内容是：清查资产状况，界定资产所有权，重估资产价值，核实国有资金占用量，核定国有资本金总额和登记国有资产产权。清产核资第一期试点的资产盘存时间点定为 1992 年 3 月 31 日 24 时。

4　月

1 日　央行清算总中心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人民银行电子联行往来制度（试行本）》。对运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和卫星通信技术，处理全国联行往来业务，以加速社会资金周转，全国电子联行在总行设立资金清算总中心，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一级分行

和地（市）分行设立资金清算分中心。各分中心受理的联行汇划业务，直接发送总中心。各分中心之间不发生直接的横向关系，由总中心负责各分中心之间汇划业务的转收转发；总中心和各分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换，必须经过当时确认之后才作为有效信息；每日营业终了，总中心和各分中心核对无误后，结平当日电子联行账务，以上存或借用反映各行资金存欠关系。

10日　国务院批准机械电子全行业统筹规划工作意见

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机电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进一步搞好机械电子行业全行业统筹规划工作意见》。《意见》提出：拟根据国家标准《全国工农业产品分类与代码》(GB 7635—87)，将机电工业全行业划分为29个分行业组。各分行业组要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产业政策、国家关于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的有关规定、国家计委关于编制中长期规划的部署和要求，组织搞好本行业的统筹规划。

统筹规划的编制程序：各部门、各地区以及国家级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公司），要根据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按行业编制规划，并将基建、技改以及引进和利用外资机电项目，分别报送29个分行业规划组审查平衡，经机电工业全行业统筹规划领导小组汇总、平衡后，分别报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

为避免外商投资机电项目（含中外合资、合作和独资项目）不合理的重复，凡属需报国家计委备案的项目，请同时抄送统筹规划领导小组备案；凡由国家计委审批的项目，先由统筹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分行业规划组和产品归口部门提出意见后送国家计委；凡由行业归口部门审批的项目，审批后抄送全行业统筹规划领导小组备案。统筹规划领导小组如有不同意见，应在收文后半个月内提出。

24日　国务院停止彩电专营

国务院发出《关于停止实行对彩色电视机专营管理及有关问题的批复》。决定停止对彩色电视机实行专营管理，停止征收彩电特别消费税。

25日　国务院批准上调水运价格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交通部联合发出通知，自1992年5月1日起水上运输货物运价上调26%。其中，渤海湾航线27%；北京沿海航线32%；华南沿海和南北直达航线20%；长江干线24%；黑龙江水系18.5%；交通部直属及双重领导的港口驳运运价25%。所有航区的化肥运价只提高10%。定量供应居民的口粮运价不提高。

28日　国务院审慎推进推动股份制企业改革

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并为此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在试点工作中要严格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审批制度办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试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改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不上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目前只在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进行。公开发行股票并交易的试点，目前只在上海、深圳两市进行。未经国务院批准，其他地方一律不准设立进行股票交易的证券交易机构。其他地区具备上市条件的股份制企业，经国务院股票上市办公会议批准，可到上海、深圳两市的证券交易所异地上市。

《报告》提出，据今年初统计，全国共有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3220家（不含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企业之间法人持股和内部职工持股约占95%以上。股份制经营方式，有利于筹集重点建设项目资金；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协调地方、部门、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有关法规跟不上；相当一批股份制企业不规范；有些试点企业资产评估过低或未予评估；社会上出现股票过度投机现象。《报告》对下一步试点工作的建议是：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尽快制定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法规、办法。加强宣传、培训等基础工作。研究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管理。抓住时机，创造条件，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试点工作。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深入开展企业扭亏增盈工作

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入开展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由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影响，企业亏损严重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1991年底，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9.7%，亏损额达310亿元。今年一季度，亏损面和亏损额继续扩大。这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为此，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深入开展企业扭亏增盈工作。今年扭亏增盈的目标是：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的亏损面，要比上年减少5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额减少10%，其中经营性亏损减少20%，政策性亏损要控制在1991年底的水平。力争用3年时间改变国营工业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要注意防止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性亏损的倾向。要认真落实扭亏增盈的政策措施。对1991年底以前发生的亏损，应由企业分析原因，列出数额，经审计部门审计后，由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银行、税务部门批准，在会计报表中如实反映。根据承包协议，属于财政应补未补的，各级财政部门要按规定补足；属于政策性超计划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企业要制定出自补规划，用以后年度的实现利润弥补。鼓励企业对1991年底以前的潜亏如数列入决算，并作出处理计划，有效抑制乃至杜绝虚盈实亏现象。企业潜亏转明亏，单独列账，原来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变，银行不加收利息。

对政策性亏损企业，要逐户核定亏损补贴额，实行定额补贴或亏损总包干，超亏不补，减亏分成。对经营性亏损企业，凡产品有销路的，各级财政、银行部门要在资金上给予扶持，促进企业尽快扭亏为盈。所有亏损企业，都要实行职工利益同企业减亏、扭亏额挂钩的办法。没有完成减亏、扭亏任务的不能发放奖金和增加工资，并给予通报批评。对亏损继续增加的企业，要减发厂（矿）长、经理和有关人员的工资，并限期达到减亏、扭亏目标；限期内达不到目标的，要追究企业主要领导人的责任。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监督和审计。

5　月

11日　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

国务院批转经贸部、国务院生产办《关于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有关意见》，并为此发出通知。《通知》指出，赋予大中型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是贯彻落实中央

工作会议精神，深化企业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搞活大中型生产企业的重要措施之一。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稳妥地选择具备条件的部分大中型生产企业报经贸部和国务院生产办审批，但不要一哄而起，以保障我国对外贸易有秩序健康地发展。

《意见》提出，赋予自营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主要应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国营大中型生产企业。对产品技术密集的机电产品生产企业，优先考虑赋予自营进出口权。对产品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非机电产品生产企业，赋予自营进出口权。对生产资源性、原料性、大宗初级产品的企业，以及产品受配额限制和市场单一的生产企业，赋予自营进出口权从严掌握，原则上不批准其经营一类商品。

15 日　江泽民、李鹏视察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江泽民强调，发展经济不能光靠扩大投资规模，更不能搞重复建设重复生产。要着力于充分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国家体改委等制定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

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制定《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办法》对股份制企业试点的目的、原则、股权设置作出规定。

股份制企业试点的目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促进政企职责分开，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开辟新的融资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引导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建设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股份制企业试点的原则：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切实维护公有资产不受侵害；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坚持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不准把国有资产以股份形式分给集体、个人；不准把属于集体的资产以股份形式分给个人；坚持"加强领导、大胆试验、稳步推进、严格规范"的精神，从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股权设置有四种形式：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国家股为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含现有资产折成的国有股份）。法人股为企业法人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或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国家允许用于经营的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个人股为以个人合法财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经批准，由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者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称为外资股。

股份制企业试点的范围：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尖端技术的企业，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的开采项目，以及必须由国家专卖的企业和行业，不进行股份制试点；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发展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可以进行股份制试点，但公有资产股必须达到控股程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尤其是资金技术密集型和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鼓励进行股份制企业试点。

16 日　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成立

国务院第 100 次常务会议决定，为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加强宏

观调控和协调日常经济工作，撤销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在原生产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

28日　上海金属交易所开业

该所由物资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组建。与现行生产资料市场相比，其交易规定有以下突破：在交易所内合约可以买卖，远期合同可以转让；在交易所内价格放开，不受现行生产资料最高限价的制约，自由浮动，随行就市；交易获利或亏损，可以在交易企业的利润中轧抵；会员可从事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允许进口资源在交易所买卖。

6　月

1日　首日外汇期货交易成功

外汇期货在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试行成功。首日成交600万美元。

8月8日，全国外汇调剂中心公开市场开业。这是我国改革和完善外汇体制的重要举措。国务院田纪云副总理题词："完善外汇调剂市场，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9日　江泽民谈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

江泽民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时，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大体有：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正常的，说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对一些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反复认识、反复讨论，并通过实践不断总结提高，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认识。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我国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

加快新经济体制的建立，当前必须抓紧解决几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二是抓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三是更新计划观念，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和方式；四是大力培育市场，建立

统一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五是要加强经济法规和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省市进行分税制改革试点

财政部决定从1992年起在浙江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津市、武汉市、青岛市、大连市、沈阳市、重庆市等9个省区市率先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按照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分工和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将各种税收收入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包括关税和海关代征的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特别消费税等。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包括农牧业税、集市交易税、奖金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中央、地方共享收入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工商统一税、资源税。分配比例，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中央和地方“二八”分享，其他地区一律实行“五五”分享。支出划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和中央掌握的专项支出三部分。按照划定的收入范围进行计算，凡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加上分享收入大于地方财政支出基数的部分，一律按5%的比例递增包干上解；凡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加上分享收入小于基数部分，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助；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适当照顾。各地区的收入基数，以1989年的决算基数为基础，在进行必要的调整后加以确定。收支基数确定后，除国务院有特殊规定者外，一律不作调整。地方财政多收可以多支，少收则少支。

西北五省区联合举办乌鲁木齐交易会

国务院批准，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五省区联合举办“1992年乌鲁木齐边境、地方经济贸易洽谈会”。92乌交会将与广州交易会、哈尔滨交易会、上海交易会相呼应，形成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新格局。洽谈会将以地方、边境易货贸易洽谈为主，兼作现汇贸易、对销贸易，同时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业务，以推动和发展大西北各省区与独联体、东欧及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达到促进开放、共同繁荣经济的目的。该洽谈会将于9月1日—10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

12日　国家税务局等制定股份制试点企业税收暂行规定

国家税务局、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股份制试点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按现行规定照章征收。股份制试点企业所得税按法人就地征收。股份制试点企业所得税按33%的比例税率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股份制试点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纳税所得额，包括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企业计算缴纳所得税的列支项目和标准，按照国家税收规定执行。归还的各种借款，分配给股东的股利，不得在缴纳所得税前扣除。股份制试点企业年度发生亏损，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予以弥补，下一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最长不得超过三年。股份制试点企业向个人分配的股利，由股份制试点企业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或个人调节税。股份制试点企业暂按控股法人股东或占有股份比例最多的法人股东的经济性质，分别适用《集体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奖金税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征收奖金税或工资调节税。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

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办理股权交割手续的单位负责有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责任，并代征代缴印花税税款。本规定从1992年1月1日起执行。

15日 国家计委等对股份制试点企业宏观管理作出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印发《股份制试点企业宏观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明确，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适当发展的方针，国家按照不同产业领域和不同经济类型，对股份制企业的组建和试点进行分类指导，实行不同的股权结构。对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尖端技术、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开采等行业，以及必须由国家专卖的企业或行业，不进行股份制试点；产业政策重点发展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可以进行股份制企业试点，公有资产股份必须达到控股地位；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国家可视需要进行参股或控股；在国家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范围内，欢迎和鼓励外资入股组建股份制企业；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不得设立外资入股的股份制企业。

凡采取联合投资新建项目和国营企业改、扩建项目，经计划部门会同体改部门批准后可以设立股份制企业；国营企业经批准可进行股份制改组，对其中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任务的国营企业和实行计划单列的企业集团进行股份制改组时，需作好指令性计划任务的衔接工作；对利用国外贷款建成的项目或企业，其进行股份制改组的方案，报原项目审批机构及有关部门审定；已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转为股份有限公司，需经原审批机构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原外商入股部分不得转为A种股票，其股票转让只能在外国、港、澳、台投资者之间以B种股票进行。

股份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国民经济计划指导和有关法规的约束下，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决策。国家主要通过制定、实施宏观政策和指导性计划对其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对原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任务的企业实行股份制改组后，国家逐步采取国家订货方式来改造和取代指令性计划，股份制企业有义务优先保证完成国家订货任务。

股份制企业用工和内部工资分配由企业自主决定。国家对股份制企业逐步取消劳动工资计划指标，主要通过劳动就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间接调控；股份制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凡不需要国家提供资金，又不需要国家平衡条件的项目，国家不再审批，由企业自主决策，自行承担投资责任。

国家主要通过国家专业投资公司以参股、控股方式进行国有资产股份投资，并由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组织国有资产股权收益的回收，继续用于国家重点投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决定》提出，根据国情，我国对国民经济按三次产业划分如下：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是除此以外的其他各业，主要包括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是，争取用十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

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90年代，要在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为此，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要高于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占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力争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是：一、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主要是商业、物资业、对外贸易业、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仓储业、居民服务业、饮食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二、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主要是咨询业（包括科技、法律、会计、审计等咨询业）、信息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三、农村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行业，为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的行业。四、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和公用事业等。

《决定》提出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主要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要放手让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和私营企业、个人兴办那些投资少、见效快、劳动密集、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不能过多依赖国家投资。积极进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和试点，大胆利用海外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各种途径、方式筹集资金；积极推进集团化经营，打破部门、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界限，组建全国性和区域性第三产业企业集团。第三产业的大部分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要放开，分别情况实行浮动定价、同行议价或自行定价，以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利用金融和税收等经济手段扶植第三产业发展。对重点行业所需贷款，在信贷计划中加以安排。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可以向效益好、有偿还能力的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固定资产和简易设备维修贷款。对一些新办的第三产业企业，确有必要时可按产业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缓征、减征所得税。

25日　国务院提高铁路、煤炭、天然气价格

国务院发出《关于提高铁路、煤炭、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决定自1992年7月1日起，提高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价格。具体方案：铁路货运价格每吨公里提高0.01元，提价后铁路货运价格为每吨公里0.0385元（含0.002元基金），提高35%。提价收入用于铁路建设。统配煤矿指令性计划商品煤出厂价格平均每吨提高10元，其中8元用于弥补亏损，2元用作基本建设基金。放开指导性计划煤和定向煤价格；取消计划外煤炭最高限价和增超产加价。四川天然气实行包干内外价格并轨，并根据各用户用气性质不同，实行分类气价，除化肥以外的各类工业用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240元，城市居民用气280元，城市商业用气420元。其他油田天然气出厂价格不并轨。

9月22日，国务院提高化肥及化肥用天然气价格。化肥出厂价，以重油、石脑油为原料的计划内尿素，每吨由428元提高到490元。以天然气为原料的计划内尿素，每吨由428元提高到520元。化肥用天然气，包干内化肥用天然气一律提高到每千立方米160元；包干外化肥用天然气每千立方米330元。

7　月

13 日　国家全面放开机械基础件价格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全面放开机械基础件价格的通知》，全面放开轴承、液压件、气动元件、液力机械、密封件、粉末冶金件、紧固件、链条、弹簧、模具等十类机械基础件价格，由生产企业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行定价销售。任何部门、任何地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定价权。价格放开后，为保证生产和经营企业开展公平竞争，各部门、各地方不得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有关部门要尽快建立交易市场，为所有生产和经营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国家对重点骨干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实行保量不保价，即价格放开，企业所需原材料的数量，在定货时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应予以保证。

15 日　国家物价局调高一批生产资料价格

为缓解统配煤炭、铁路货运提价对焦炭、生铁生产带来的影响，国家物价局决定对国家定价的焦炭、生铁价格适当调整，并实行指导价格。焦炭统一出厂价格每吨 310 元，提高 14.8%。生产企业可依据市场供求情况，在上下 5%的幅度内自行定价。生铁出厂价格由每吨 650 元提至 700 元，生产企业可在上下 10%的幅度内自行定价。放开统配玻璃价格，企业自行定价。纯碱、烧碱计划内外出厂价格并轨，取消计划外纯碱、烧碱的最高限价。生产企业在上下 10%的幅度内自行定价。

16 日　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召开

会议强调，各级金融部门要支持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下半年各级银行要积极支持农业、国营大中型企业、国家重要物资储备及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开放开发地区、珠江三角洲以及沿边开放地区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积极支持国家重点建设的合理资金需要，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要继续控制信贷总量，搞活资金存量，各家银行必须严格按国家下达的计划控制贷款规模，未经批准，任何银行都不得突破。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贷款管理，转换银行经营机制，严格管理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对股票、债券的发行，各地必须按国务院的规定办事，任何单位都不得擅自发行。

23 日　国家制定全民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经国务院第 106 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条例》的通知。指出，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点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

《条例》分 7 章 54 条，包括总则、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企业的变更和终止、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以及法律责任等。《条例》对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政府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企业财产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其他依据法律和国

有资产管理行政法规认定属于全民所有，由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

《条例》对企业经营自主权作出明确界定；企业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企业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

国务院扩大首钢经营自主权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经贸办、国家体改委《关于进一步扩大首钢经营自主权改革试点的报告》。首钢进一步扩权属于试点，系国务院特批。对首钢的扩权规定，非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企业一律不得自行援例。

《报告》在以下几方面赋予首钢更大的经营权：(1) 扩大投资立项权。首钢以留用和自行筹措的资金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建设，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由企业自主决定立项。在境外投资 1000 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的立项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由首钢自主决定。同意首钢以自制设备在中国境外投资、参股办厂。在国内总投资 2 亿元人民币以下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项目，凡不需政府协调配套条件的，由首钢审定。(2) 扩大外经、外贸、外事权。同意首钢组建“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经营下列各项业务：经营首钢及所属企业的所需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的进口和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按国家政策规定，经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和易货贸易；可在境外采购二手设备自行使用，或经修配、发行后在境外销售，有权在国外开矿并经营矿石；经营技术进口业务；同意首钢成立银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和国际惯例实行管理。

23 日—29 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六项改革措施

全国财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将推出 6 项重大改革措施：加速推行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财力划分关系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规范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利润分配关系的“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分配”的办法；以及复式预算制度、财务与会计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

国家税务总局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到会作重要讲话。会议提出要调整减并一些税种，加快流转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进程。调整部分税目、税率。加强税收征管立法进程。改进税收征管方式方法，大力推进公开办税制度。改进出口退税管理，调整部分税收管理权限。

23 日—31 日　江泽民考察山东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山东省考察。他指出，我国经济需要一个积极发展的速度，各地都要从实际出发，努力实现质量高、效益好、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较高发展速度。在加快经济建设中，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真抓实干。走出一条既有高的速度，又有好的效益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子。必须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精兵简政、提高效率。

30日　国家物价局下放物价管理权限

国家物价局发出《关于颁布〈国家物价局及国家有关部门管理价格的农产品目录(1992年本)〉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进一步推进农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管理体制，对1986年颁布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管理的农产品价格目录》修订后，属国家物价局及国家有关部门管理的实行国家定价的品种有：计划购销的粮食、棉花、烟叶、桑蚕茧、紧压茶、统配木材等6种。实行国家指导价的品种有：部分中药材、绵羊毛、松脂（松香）等3种。对上述属中央管理的价格，如需改变管理形式、调整价格水平，要报国家物价局批准，重要的要报国务院批准。粮食购销价格改革，按国务院部署要求执行。油脂油料和糖料价格管理形式和管理权限待定。原中央管理的棉短绒出厂（收购）价格、北方国有林区非统配木材和南方集体林区木材收购、出厂和销售价格、豆饼出厂（销售）价格、黄红(洋）麻、红毛茶、绿毛茶、柞蚕茧收购价格等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国家指导价。除本目录所列品种、本通知指定由地方管理品种及历次已明确规定放开价格的品种外，其他农产品的价格管理形式及管理权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计划内进出口农产品比照国产同种（类）价格分工管理权限管理。对于大宗出口的农副产品价格，物价部门可进行协调，必要时制定临时最高限价或最低保护价。

8月29日，国家物价局颁布《国家物价局及国家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价格的重工商品和交通运输目录（1992年本)》，对1986年颁布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价格的重工产品（商品）目录》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将原属中央一级管理价格的商品，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部门管22种，下放给企业定价的有润滑油（脂)、原料油、石油沥青、中煤、煤泥、纯碱、铝、铅、部分钢材、石膏、绝大部分机电产品等571种，列入修订后目录由中央一级管理价格的89种。同时经国务院批准，自9月1日起取消原油、成品油、钢材、生铁、铜、铝、铅、锌、锡、纯碱、烧碱等计划外生产资料全国统一最高出厂价或销售价。这部分商品定价权完全属于企业，任何地区或部门不得截留。

8　月

7日　国务院要求解决财政欠拨、欠补、欠退问题

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财政欠拨、欠补、欠退和企业挂账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由于财政欠拨、欠补、欠退（简称“三欠”）以及企业超亏、超支、互相拖欠等原因，企业的各种挂账大量增加。1987—1990年分别为85亿元、134亿元、301亿元和700亿元。1991年初步统计达到1045亿元，其中财政“三欠”挂账达11亿元，企业应自补未补挂账3亿元。

《通知》要求认真解决“三欠”和企业挂账问题。财政要严格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坚持谁欠谁补的原则。坚决遏制粮食企业挂账猛增的势头，对现有粮食挂账新老划断，

1991年以前；按照谁欠谁补原则逐步消化。从1992年起，国家储备粮和各地超储粮费用定额补助标准每公斤提高0.01—0.02元，重点照顾粮食主产区。

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商业部、人民银行《关于1992年上半年粮食财务挂账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出，为切实有效的制止粮食财务挂账，调动解决粮食财务挂账的积极性，中央财政从1992年起对国家任务粮、国家专项储备粮和各地超储备粮食的定额费用补贴标准每公斤提高0.02—0.04元。

8日　昆明民办高新技术产业圃成立

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的全国第一家民办高新技术园区成立。它开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官办"与"民办"并举的新格局。园区一期开发面积3.5平方公里。

9日—16日　江泽民考察甘肃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考察甘肃省。他指出，在实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1) 在经济发展上要有紧迫感，但又不能要求过急，要坚持脚踏实地，尽力而为，一步一个脚印，力争年年有所发展。(2) 要坚持把能源、交通、原材料、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不懈的抓下去。(3) 要增强科技意识、人才意识，努力缩短科技水平和人才素质方面同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差距。(4) 要始终重视和抓好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5) 要进一步加强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以利于促进扬长避短和优势互补。(6) 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财力物力，有计划有步骤办好省内的一些大事。

10日　深圳股市风波

深圳市1992年8月9日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来自各地和深圳约100万人排队买表。由于各地群众对这次新股发行反应异常热烈，进入深圳购买新股认购抽签表的人数之多超出预料。致使一些网点人多拥挤，秩序较为混乱，发售工作一度受到一些阻碍。一部分群众未经批准游行。入夜后一些人阻塞交通，烧毁汽车、摩托车。武警战士紧急出动，维持秩序，事态逐渐趋于平静。

经深圳市清查工作班子历时3个月的调查，因严重营私舞弊行为而诱发的深圳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风波基本查清。深圳市委、市政府严处新股认购舞弊者，第一批处理17名，其中处级干部2名。据统计，全市11个金融单位300个发售点中，有10个单位共95个点受到群众点名投诉举报。群众的反映与实际调查结果基本吻合。全市147个发售点自查情况统计，都有不同程度的舞弊行为，内部私分抽签表10.5万张，其中，内部职工私拿6.4万张，涉及4080人；执勤、监管人员私分2万张；送关系户1.9万张。情节最为严重的是深圳市农业银行南头支行证券部副经理黄里康。黄里康身为该发售点总负责人，截留新股认购抽签表5000张，个人从中分得3250张，本人购进360张。黄里康受到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1日　中央和地方合资建铁路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合资铁路是对传统的铁路建设和管理体制的一大突破，是深化铁路改革

的一条新路。合资建设铁路要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在兼顾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前提下，投资各方按投资比例共担风险、分享利益；国家对合资铁路实行特殊运价，并给予其他必要的优惠政策；合资铁路公司要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偿本息和自我积累。

《意见》提出，合资建设铁路要服从国家统一的路网布局，由铁道部统筹规划，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跨地区和地区性的铁路干线及重要的铁路支线，都可以由铁道部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投资单位共同投资建设和经营。合资铁路投资，包括铁路主体工程及配套工程建设投资、机车车辆购置费、铺底流动资金和建设期间的利息支出等。投资各方可以利用资金（含自贷自还的贷款）、物资、设备、土地征用及补偿费和劳务等多种形式投入。合资铁路按照保本、还贷和微利的原则实行特殊运价，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在建设和运营初期，可适当减免税、费，在贷款方面给予优惠。积极鼓励利用外资建设铁路。

13日　沿江、沿边、内陆和省会城市扩大开放

国务院决定，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实行的沿海开放城市政策，主要包括：一是扩大开放城市对外经济合作的权限；二是支持开放城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造老企业和开发现代农业；三是为鼓励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四是具备一定条件后，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兴办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次开放的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涉及12个省、自治区和16个市，横跨我国中、西两大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经济腹地。

此前3月11日，国务院已决定进一步开放黑龙江省的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省珲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允许4个边境城市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

17日　国务院决定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

国务院发出《关于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为加快旅游事业发展，国务院决定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鼓励外国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企业、个人投资开发旅游设施和经营旅游项目。

国家旅游度假区享受以下优惠政策：在区内兴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其所得税减按24%的税率征收；其中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企业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经营设备、交通工具和办公用品；常驻的境外客商和技职人员进口的安家物品和自用交通工具，在合理数量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建设度假区基础设施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基建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税（增值税）。区内的开发建设用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办理。土地出让金从该区批准兴办之日起，五年内留在区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区内的旅游外汇收入，从该区批准兴办之日起，外汇额度

五年内全额留成，用于区内自我滚动发展。

国家旅游度假区内利用外商投资建设的旅游设施项目，投资额在国务院规定的审批限额以内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自行审批，其中旅游住宿设施项目，应报国家旅游局和国家计委、经贸部备案；投资额在国务院规定的审批限额以上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利用外商投资建设的旅游住宿设施项目，企业经营期限一般不得超过30年。

20日　中编委规定国家计委主要职责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经贸办公室主要职责的通知》。《通知》规定：国家计委是国务院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部门。其主要职责是：(1) 研究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编制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以及重点产业专项发展规划，做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综合平衡。(2) 制定国家产业政策，组织建立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3) 组织制定国土开发、利用、治理、保护的规划，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规划，搞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4) 研究制定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划、布局和政策；研究市场的培育、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建立，组织制定全国性和区域性各类市场的规划、布局，促进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5) 合理安排和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审批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协同经贸办会签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审批工作。(6) 会同国家科委和有关部门组织研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7) 在制定长期规划、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以及国家产业政策中，协调和综合运用财政、信贷、利率、物价、税收、工资、汇率等经济杠杆，运用国家直接掌握的外汇、投资、国外贷款和储备物资等手段，保证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实施。(8) 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国防建设和教育、文化、劳动、人口、卫生、体育、广播、旅游、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协调好同经济发展的关系。(9) 研究制定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实施办法和有关综合性经济法规，参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10) 研究分析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及时向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并向全社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30日　全国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在全国分两步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第一步，在今明两年建立起国家和省两级新核算体系基本框架，实现初步过渡；第二步，到1995年基本完成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面过渡。第一步的主要目标是把新核算体系的基本核算表建立起来，即通过1992年度的资料，编制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表，从总体上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实现第二步目标，就是要能够比较准确完整地编制新核算体系的全部表式和账户体系，并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统计指标体系、统计分类标准和数据库系统。

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是对旧核算制度的重大改革，是提高宏观决策和宏观管理水平，促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措施。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技术要

求高，实施难度大，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作为共同的任务，努力完成。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提供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需的有关财务、统计和业务资料，做到信息共享，并按照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改革各自的核算制度。

9　月

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

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第60号主席令发布，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征管法是税收程序法，规定了纳税人应按什么程序、制度和方法交税，以及在征收管理过程中，征纳双方各自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不涉及税种、税目、税率等税收实体法内容的变动。

《征管法》有三个特点：一是统一了对内税收和涉外税收征管制度。无论纳税人是"三资"企业，还是国有、集体、私营企业、纳税个人，一律按征管法的规定执行。二是强化了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增强了税法的刚性。三是完善了对税务机关的制约制度和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度。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通知》针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值得重视的苗头和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较猛，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交通运输和能源、部分原材料供应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多，银行货币、信贷投放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的幅度等问题，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必须控制固定资投资规模，正确引导资金投向，调整投资结构，保证重点建设。要按国家产业政策和计划要求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对于自筹投资项目，任何单位和各级领导人都不得要求或强令银行用贷款垫补自筹投资缺口。切实加强对社会集资的管理，各类证券要按国家计划发行，不得搞计划外集资。加强对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的调控。为确保全年货币信贷计划的实现，今年第三季度末银行贷款规模必须坚决控制在计划以内。哪家银行突破了由哪家银行负责；哪个地区突破了，由哪个地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负责。党中央、国务院重申，金融是国家掌握的重要宏观调节手段，货币发行权、信用总量调控权和利率调整权要由中央统一掌握，各地必须服从中央统一的金融政策。进一步调整信贷结构，加速资金周转，支持经济加快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当前银行资金运用的重点，一是保证居民储蓄存款支付；二是支持秋季农副产品收购；三是支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四是支持效益好、质量高、外向型的经济发展。积极组织货币回笼，控制货币投放。

10日　国泰证券公司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国泰证券公司。国泰证券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同发起并投资。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区的全国性证券公司。

22日　国家体改委提出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改革棉花流通体制的意见》。《意见》提出，积极推进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放开经营，放开市场，放开价格，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内外贸相互联结、高效畅通的棉花流通新体制。在实施步骤上采取“先行试点、逐步推进”的方法，争取在二三年内基本完成。

1993年度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现行棉花购销政策不做大变动的情况下，积极完善和扩大棉花放开的试点；同时，在非试点省（区、市）也要划出一块搞市场调节，也可选择少数县（市）进行棉花放开试点；改革、完善对棉农的奖售办法；有计划地建立棉花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棉花储备制度；为全面推进改革摸索经验，奠定基础。建议在山东、河南两省初步试点的基础上，1993年度增加江苏省作为棉花放开试点省。

试点省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有较大突破：改革现行合同定购办法，实行市场调节。用经济办法同棉农签订合同；在试点省实行棉花供需直接见面；棉花收购和供应价格改为由买卖双方协商议价。改革棉花由供销社统一经营的办法，开放棉花市场，允许棉花上市交易。将原有的棉花财政补贴改为价格调节基金，由地方政府掌握用以调控价格，扶植生产，稳定市场。

试办棉花交易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棉花市场体系。当前棉花市场建设的重点，是在试点省和产棉省（区，市）建立区域性棉花批发市场。棉花批发市场实行会员制，凡经批准的农、工、商企业均可申请成为会员进人批发市场。

逐步建立健全国家和省（区、市）两级棉花储备制度。国家棉花储备由国家管理，所需储备资金由银行安排贷款，利息由中央财政垫付。储备棉的保管费用，由省（区、市）财政负担大部分，企业负担小部分。国家储备棉的调用权在国务院，任何部门和地方不得擅自动用。棉花储备业务要与正常的棉花经营分开。

25日　国务院制定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

《决定》指出，90年代我国农业应当在继续重视产品数量的基础上，转人高产优质并重、提高效益的新阶段。这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为更好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要进一步把农产品推向市场。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加快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方向推进。凡是有条件放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提出实施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在粮食价格暂时尚未放开的地区，对国家定购的粮食参考市场价格，拉开品种、等级差价，做到优质优价。其他尚未放开的农产品同样要实行优质优价。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要尽快转到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为主的轨道上来，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各地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农业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进人农业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同时在资金等方面增加对科技的投人。从各地实际出发，选择一批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广阔和经济效益好的重要科技成果，大力进行推广，加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转变。继续增加农业投人，调整资金投放结构。中央和地方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财政支农资金、农业信贷资金等，要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而逐步增加。同时，加

快发展农用工业，增加农业物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资料质量。要适当调整资金投放结构，增加对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投入比重，把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组织作为支持对象，把农产品加工、贮藏、保鲜、批发市场、交通运输和良种繁育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投资重点。积极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加速农业对外开放步伐，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转换机制，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加快农产品外贸体制改革。提倡农贸结合，对有条件的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包括乡镇企业与农垦企业）和企业集团，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经批准后赋予进出口经营权，使它们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10　月

5日—9日　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

中共中央十三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对赵紫阳同志1989年政治动乱中所犯错误继续审查情况的汇报，同意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并结束审查。

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快的发展。

《报告》提出，为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到全局的主要任务。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认真抓好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二是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三是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四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的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的格局。利用外资领域要拓宽。为外商投资提供更方便的条件和更充分的法律保障。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第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向，应着力提高第一产业即农业的质量；继续发展第二产业，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第四，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我国经济正面临加速发展、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重大任务，尤其需要全社会提高科技意识，多方面增加科技投入，真正依靠科技进步。第五，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第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第八，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第九，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第十，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10月19日，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江泽民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2日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

在深圳发生股市风波（“8.10事件”）后，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任主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撤销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同时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证券委指导、归口管理。刘鸿儒任主任。

此前7月4日，国务院组建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工作的日常管理职权。证券办公会议由李贵鲜召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务院经贸办、国家经贸部、国家税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委组成。

16日　国家计委等提出振兴基础机械工业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机电部《关于振兴特定基础机械和基础件若干措施的意见》。国家计委、机电部确定，振兴特定基础机械和基础件产品的范围包括数控机床、数控锻压设备、自动和大型测量仪、轴承、液压气动件、重要低压电器等11种特定产品。《意见》提出了上述特定产品的振兴目标，并对特定企业给予政策扶持。

25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经营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化肥、农药、农膜经营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各级供销社的农资经营单位是农资经营的主渠道。凡列入国家统配计划的，由农资公司按批发价供货；未列入国家统配计划的，按照市场经营机制进行。统配以外的化肥、农药、农膜，生产企业可与农资公司、植保站、土肥站、农技推广（中心）等农资经营单位进行合同定购、联销、代销或自销给农民；可直供基层供销社；也可实行农民预定、淡旺季差价的办法。除上述规定的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化肥、农药、农膜。国家安排一部分企业承担统配化肥生产任务，由国家和省（区、市）计委按年度分别下达。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随着粮、棉交易市场的发育和粮、棉价格的逐步放开，国家粮肥挂钩、棉花奖售的专项化肥应当逐步取消，放开价格，化肥的平议差价作为价外补贴，直接付给农民。农药、农膜的价格也应相机放开。

11　月

4日　国务院提出发展房地产业的具体措施

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房地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推进，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加快发展房地产业，促进土地的节约和合理利用，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加快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通知》提出以下措施：

（1）进一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要逐步扩大城镇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范围。国家投资的党政军机关办公用房、住宅建设用地，公共设施、公用事业和国营工业等建设用地，继续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其他新增建设用地，首先是商业、金融、旅游、服务业、商品房屋和涉外工程建设用地，要逐步采用土地使用权有偿有限期出让的办法。集体所有土地，必须先行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作价入股，兴办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联乡镇企业，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但集体土地股份不得转让。

（2）积极推行土地使用权出让集中管理的办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出让权。以规划为前提，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出让。要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审批、办理建设用地手续。国务院重申：不论开发区或非开发区，凡行政划拨、有偿出让的建设用地，耕地1000亩以上，其他土地2000亩以上的，必须依照有关法规报国务院审批。

（3）合理确定地价，提高土地利用效益。要根据土地不同的区位、使用性质、容积率、级差收益和供求状况等因素，由政府组织的评估机构合理确定基准地价，使之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宏观调控的要求相适应。

（4）完善房地产开发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建设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外商投资除外）。为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凡地方自筹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的项目，一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自行审批。允许各专业银行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银行贷款规模、发行债券额度等要列入信贷计划、证券计划和投资计划，实行总量控制。

(5) 加强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管理。为防止房地产增值收益过多流向企业和个人，要逐步开征房地产增值税，把房地产增值收益中应当归国家所有的部分，通过税收的形式收归国有。房地产增值收益中的大部分目前可由地方人民政府掌握，连同现行的土地出让收益、城镇土地使用税、场地占用费一起，作为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和发展农业。

10 日　改革国际海洋运输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改革国际海洋运输管理工作的通知》，决定放开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允许多家经营，鼓励竞争，以提高服务质量。凡符合开业条件、合法经营的企业，经批准都可以从事货代、船代业务，货主和船公司有权自主选择货代、船代，承运人与货主可以建立直接的承托运关系，任何部门都不得进行行政干预。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国际海洋运输事业。凡符合开业条件、合法经营的企业（包括大型企业集团和专业进出口公司），经批准都可以建立船公司，从事国际海洋运输业务。扩大船公司经营自主权。船公司根据国家的宏观要求，可自主决定航线经营、船舶配置、运力增减、船舶更新。有步骤地允许外国船公司在我境内开办独资或合资船务企业，经批准，可为其自有船舶进行揽货、签单、结汇和签订业务合同。交通部、经贸部主要是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法律等手段，对从事国际海运的船公司和货代、船代行业进行宏观管理。

15 日—22 日　江泽民在上海调研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上海调研。他指出，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不能一哄而起，也不能一刀切。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浦东开发开放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来的。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浦东开发这件大事办好。

18 日　国务院紧急通知要求严禁乱占滥用耕地

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严格禁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在经济建设中，力求少占耕地，特别要严格控制占用高产粮田和菜地；严格依法审批土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将审批权层层下放；加强对各类开发区审批、建设的管理，乡镇不设开发区，对开发区划定面积过大的，要撤并核减；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调整土地供求关系，建立规范的地产市场。凡是建设占用耕地，无论是通过划拨方式，还是通过出让方式，地价收入都要用于农业。

19 日　银河—Ⅱ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

国务院、中央军委为“银河－Ⅱ”巨型机研制成功发出贺电。银河－Ⅱ巨型计算机在湖南长沙通过国家鉴定。该计算机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每秒运算速度可达 10 万亿次，专门用于大型工程计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使我国的计算机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国家科委等对创办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规定

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印发《关于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办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界定，并明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部门是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公司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公司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体改委（办）或政府授权机构为公司的审批机构。

以无形资产作价入股时，如果无形资产中含有高新技术，经公司审批部门特殊批准，无形资产的作价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30%。但所含高新技术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为公司主营产品的核心技术；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的高新技术认定条件；认股人出具对入股技术的权属证明文件，并保证公司对该项技术的权利在约定范围内或条件下，可以对抗任何第三人；具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或其授权部门核准的技术评价机构及有资格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估证明。

为继续保证、促进公司的巩固和发展，发挥智力资源的优势，原高新技术企业改组为公司时，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批后，并由原企业在册员工会议一致决议，企业可以用个人股的形式奖励对创办原企业有显著贡献的本公司科技人员。

12 月

4日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降低关税

这次调整所涉及的进口商品范围共有3371个税目，占中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税目总数的53.6%。降税使我国进口关税的算术平均税率从42.5%降至39.9%。关税总水平下降7.3%。降税的重点商品是：国内需要长期进口的原材料。石油从3%降至2%；木材由3%降至2.5%；生铁由3%降至2%；牛皮由12%降至10%；宝石由9%降至7%。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技术产品：大型飞机由6%降至5%；制光导纤维用玻璃管由12%降至9%；计算机软件降为9%。

11日 国务院发布储蓄管理条例

《储蓄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国家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鼓励个人参加储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全国储蓄管理工作，经国务院批准，可以采取适当措施稳定储蓄，保护储户利益；根据国家住房改革的有关政策和实际需要，经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批准，储蓄机构可以办理个人住房储蓄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批准，储蓄机构可以办理下列金融业务：发售和兑付以居民个人为发行对象的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业务；其他金融业务。

储蓄存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全部提前支取的，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定期储蓄存款在存期内遇有利率调整，按存单开户日挂牌公告的相应的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本条例自1993年3月1日起施行。

14 日　国务院通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通知》对有关证券市场的管理体制等问题作出规定：

证券委是国家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主要职责是：根据证券委的授权，拟订有关证券市场管理的规则；对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特别是股票自营业务进行监管；依法对有价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以及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实施监管；对境内企业向境外发行股票实施监管；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证券统计，研究分析证券市场形势并及时向证券委报告工作，提出建议。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证券工作的职责分工是：国家计委根据证券委的计划建议进行综合平衡，编制证券计划；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同时报证券委备案；财政部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从事与证券业有关的会计事务的资格由证监会审定；国家体改委负责拟订股份制试点的法规并组织协调有关试点工作；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当地政府归口管理，由证监会实施监督，设立新的证券交易所必须由证券委审核，报国务院批准。

股票发行、上市的程序是：股份制试点企业，经资产评估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和财务审核后，提出公开发行上市股票的申请。地方企业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审批；中央企业由其主管部门商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审批；被批准的发行申请送证监会复审后，由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15 日内无异议即可发行。

其他证券发行的管理职责分工如下：国债由财政部负责；金融机构债券、投资基金证券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国家投资债券、国家投资公司债券由国家计委负责审批；中央企业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计委负责审批；地方企业债券、地方投资公司债券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负责审批。

14 日—18 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并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明年的经济工作发表了重要意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研究确定明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安排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就“八五”计划的必要调整交换意见。今年计划会议改变了过去偏重于定指标、分投资、分物资的作法，重点放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与明年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市场环境，合理确定宏观经济目标、发展重点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市场的健康运行。

江泽民在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二是正确处理发展速度同提高效益、调整结构的关系；三是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四是大力培育市场和加强宏观调控；五是加强学习和改进领导工作；六是关于机构改革问题。他指出，当前经济形势很好，全国上下生机勃勃。同时一定要正视好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力争搞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

力和综合国力，这样才是真正积极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大和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

李鹏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了市场和计划两种调控手段，必须十分重视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也必须加强和改进国家宏观调控，改革计划管理，更好地发挥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作用。

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作了题为《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针安排好 1993 年经济计划工作》的报告。

21 日—24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总结 1992 年的经济工作，研究部署 1993 年的经济工作。国务院总理李鹏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要把培育与发展市场体系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着重抓好几件事：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二是紧紧抓住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个环节，把企业推向市场。既要建立激励机制，又要有约束机制。三是要抓好市场建设，重点抓好生产资料市场的建设，促进相关市场的发育和形成。四是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逐步建立符合经济规律的价格机制。五是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抓紧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管理法规体系和执行监督体系，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封锁和行业垄断，以及内外贸的分割，逐步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衔接。六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加强对市场运行情况的监测和市场供需预测，以保证国家调控的科学性、正确性。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指出，党的十四大和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已为我们制定了大政方针，现在最重要的是狠抓落实，真抓实干，同时在大好形势下要注意防止发生经济过热，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更快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是要坚持这样的思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推进企业技术进步，进一步狠抓质量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抓好限产压库促销和扭亏增盈等项工作，这本坚持多年的“经”绝不能动摇。只要坚持不懈，扎扎实实地工作，经济工作的大好形势一定能持续发展。

22 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会议对 1993 年的财政计划和财政工作作了安排和部署，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研究了财政部门的职能转变、深化改革、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等问题。会议期间，税务系统讨论了 1993 年工商税收计划以及关于加强流转税、涉外税收管理等问题。12 月 28 号，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在全国税务局局长会上，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快税制改革，1993 年税收工作等问题发表讲话。

12 月 29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朱镕基、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等国务院领导同志与出席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的财政厅局长和税务局长举行座谈，听取汇报。李鹏指出，财政改革的核心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税利分流”是方向，要大胆试点。要改革企业所得税。

流转税改革要逐步全面推行增值税。流转税不能承包。要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加强出口退税的管理，对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经济要依法征税。

1992年12月23日，国务院召开清理“三角债”工作总结表彰会。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告全国性的清理“三角”债工作结束。

22日　首钢开办华夏银行

经国务院批准，首都钢铁公司开办华夏银行。这是我国第一家由工业企业开设的商业银行。

30日　外经贸部制定出口商品管理办法

国务院批转经贸部制定的《出口商品管理暂行办法》，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一）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资源性出口商品以及在我国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宗传统出口商品，实行计划配额管理，有38种。每年出口数量确定后，由经贸部下达。（二）我国在国际市场或某一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出口商品、外国要求我主动限制的出口商品，实行主动配额管理，有54种。由经贸部根据国内外市场情况征求有关进出口商会意见确定。（三）出口金额大且经营秩序易于混乱和重要的名、优、特出口商品以及少数确需管理的商品，实行一般许可管理，列入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范围，有22种。出口数量原则上不限制，着重管理经营秩序。（四）国外对我有配额的24种出口商品，继续实行被动配额管理。分配办法另行制订。（五）对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出口的属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立项时批准的合同安排出口配额。

1992年改革开放概况

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呈现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

对外开放。国务院先后就进一步开放沿边、沿江、沿海作出一系列决定，北方开放黑河市、绥芬河市、珲春市和满州里市；南边开放南宁市、昆明市、凭祥市、东兴镇、畹町市、瑞丽县、河口县等；沿长江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5城市；在内陆开放太原、合肥等15个省会城市。国务院新批准对外开放口岸15个，增加对外开放县26个。全国对外开放口岸和对外开放县市累计分别达到167个和825个。

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改革力度加大：国家计委将直接管理的农业、工业、物资、商业外贸出口产品计划指标减少1/3，其中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近一半；扩大地方、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放宽投资审批权限。企业改革：国务院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国务院选择100个大型企业集团进行改革试点，首批55个大型企业集团已获批准；国务院还决定赋予首都钢铁公司更大的投资立项权、外贸自主权和资金融通权。财政金融改革：浙江省等九省市率先实行“分税制”改革试点；税收改革出台八项措施，包括调整、简并税种税率，改进税收征管，停止批发扣税等。物价改革迈出较大步伐。1992年提高了粮食购销价格，出台了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等基础产品和部分公用事业的价格改革项目，不少城市在给居民适当补贴的前提下，放开了肉禽蛋、蔬菜价格，提高了房租等服务项目价格，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调节比重，价格形成机制有了较明显的改善。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部分已上升到70%以上；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部分已上升到90%左右。外贸改革：我国单方面降低225种进口商品关税；全部取消进口调节税；年底调整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改革进口商品管理体制，建立公开配额制，公布鼓励进口商品目录，取消进口商品财政补贴，以关税为主要调节机制。出口商品管理，主要规定了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范围，建立出口发展基金等。

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92年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全面加快，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全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403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80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价值11699.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863.4亿元。产业结构继续调整、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3.8∶48.0∶42.2。

一、农业

农业生产持续发展。1992年，全国农村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粮食产量44258万吨，比上年增长1.7%，棉花产量452.8万吨，比上年增长-20.2%。农业生产条件继续改善。1992年末全国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3.02亿千瓦，比上年末增长2.6%；全年化肥施用量（折纯）2947万吨，增长5%；农村用电量1107亿千瓦小时，增长15%。农田水利建设得到加强，有效灌溉面积继续扩大。

二、工业

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0116亿元，比上年增长20.8%，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在全部工业中，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活力有所增强，国有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4.4%；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15.5%。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增量占全国新增工业增加值的61%。沿海地区生产增长明显快于内地，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7个地区新增工业增加值约占全国新增工业增加值的60%。全年轻工业增加值5047亿元，比上年增长20.9%；重工业增加值5069亿元，增长20.7%。全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由上年的84提高到89。其中，工业产品销售率由95.3%提高到95.5%；资金利税率由9.7%上升为10.1%；成本利润率由4.1%上升为4.7%；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由1.55次加快到1.62次；工业净产值率由26.9%上升为27%；全员劳动生产率（按净产值计算）提高19.5%。

三、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峰。其中国有单位投资5106亿元，增长40.7%；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1233亿元，增长76.7%；居民个人投资1243亿元，增长5.1%。

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煤炭开采206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1223万千瓦，石油开采1513万吨，天然气开采15亿立方米（石油开采和天然气开采含更新

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铁矿开采125万吨，木材采运22亿立方米，水泥190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运营里程476公里、铁路复线交付运营里程323公里、电气化铁路939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4526万吨、新建公路2376公里。

四、居民消费和居民收入

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894亿元，比上年增长15.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消费品零售额9613亿元，增长16.6%；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1281亿元，增长9.5%。在消费品零售额中，城市5386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农村422713.8%。

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据抽样调查，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826元，比上年增长1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84元，比上年增长1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职工平均工资2677元，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3%。

五、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

据海关统计，1992年出口总额8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进口总额806亿美元，增长26.4%。进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已上升到80%进口国内紧缺原材料及机械运输设备明显增加。“三资”企业出口1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1%，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16.8%提高到20.4%。

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1992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6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倍；实际使用外资188亿美元，增长62.7%。到1992年末，在我国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8.4万个，比上年末增加4.7万个。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投放增长过猛；交通运输更加紧张；城市物价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偏高。

1992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国家计委下达1992年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总计161项，其中新增项目（*）14项。

煤炭（22项）　河北开滦矿区　山西大同矿区　山西古交矿区　山西阳泉矿区　山西潞安矿区　山西晋城矿区　内蒙古准格尔项目一期工程　内蒙古霍林河矿区一号露天矿　内蒙古平庄矿区元宝山露天矿及其配套工程　辽宁铁法矿区黑龙江双鸭山矿区　黑龙江七台河矿区　安徽淮南矿区　安徽淮北矿区　山东充州矿区　山东枣藤矿区　河南平顶山矿区　河南永夏矿区（原水城矿区）　云南小龙潭露天煤矿　华能精煤公司神府东胜矿区　*陕西黄陵矿区　黄陵一号并及洗煤厂（及其配套工程）　*宁夏灵武矿区　灵新大井（及其配套工程）

石油（8项）　黑龙江大庆油田勘探开发　辽宁辽河油田勘探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勘探开发　河南中原油田勘探开发华北油田　青海油田　新疆油田勘探开发　新疆塔里

本地区勘探

电力（37项）　＊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天津军粮城电厂四期　天津蓟县电厂　河北宣化沙岭子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　山西神头第二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内蒙古丰镇电厂　辽宁铁岭电厂＊吉林双辽电厂　哈尔滨第三电厂二期　黑龙江双鸭山电厂二期　上海吴泾电厂　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江苏常熟发电厂　江苏利港电厂　浙江北仑港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安徽平圩电厂（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江西方安水电站　江西九江电厂二期工程　福建水口水电站　湖北隔河岩水电站　湖南沅陵五强溪水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　＊海南大广坝水电站　广西岩滩水电站（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红水河天生桥坝索水电站（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红水河天生桥一级水电站　四川铜街子水电站　四川宝珠寺水电站　＊四川二滩水电站　贵州东风水电站　云南漫湾水电站（含50万伏输变电工程）　西藏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　陕西安康水电站　陕西渭河电厂甘肃靖远电厂　青海李家峡水电站

水利（9项）　河南洛宁故县水库　太湖综合治理骨干工程　望虞河工程　大浦河工程　杭嘉湖南排工程　＊淮河治理骨于工程　石漫滩水库工程　怀洪新河工程　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工程

铁道（18项）　大包复线　滨绥线（含哈尔滨枢纽）　浙赣复线（含株洲枢纽）　沪杭复线（含钱塘江大桥及杭州枢纽）陇海线徐连复线　徐州枢纽　郑武线电化（含电铁供电）　焦枝复线　鹰厦线电化（台电铁供电）　湘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　大秦线二期工程（含电铁供电工程）　＊京九线　衡商段　合九段　广梅汕段　南昆线　宣杭线　侯月线　兰武线电化（含电铁供电）　宝中线　唐山机车车辆厂

交通（14项）　天津港（地方项目）　秦皇岛港　大连港（台商检设施）　营口港　上海港　连云港港　张家港港　宁波港（含商检设施）　青岛港　烟台港　湛江港　广州港　西江航道整治　京津塘高速公路

邮电（4项）　北京邮政枢纽　北京法国贷款通信工程　＊上海—福州—广州光缆工程　上海—福州光缆工程福州—广州光缆工程　广州电信枢纽

民航（3项）　武汉天河机场　昆明巫家坝机场　拉萨贡嘎机场

钢铁（4项）　山西娄烦太钢尖山铁矿　＊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　武汉钢铁公司　四川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

有色（8项）　河津山西铝厂二期　江西铜业公司　河南焦作中州铝厂　广西平果铝厂　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二期　贵阳贵州铝厂　甘肃白银有色公司（合成县厂坝铅锌矿二期）　甘肃金昌金川有色公司二期

黄金（1项）　山东莱州新城金矿

化工（7项）　河北矾山磷矿　湖北大悟黄麦岭磷化工公司　＊湖北荆襄磷化学公司大峪口　矿肥结合项目　四川1816厂化肥工程　贵州瓮福磷矿　云南昆阳矿务局晋宁磷矿　＊云南磷肥工业公司

石化（4项）　抚顺石化公司丙烯腈腈纶装置工程　上海三十万吨乙烯工程　河南

洛阳炼油厂　广州石化总厂

建材（3项）　长春双阳水泥厂　广东云浮水泥厂　新疆水泥厂

医药（1项）　河南中原制药厂

机电汽车（4项）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　南京汽车制造厂依维柯项目　无锡微电子科研生产联合公司

轻纺（3项）　辽宁抚顺洗涤剂化学厂　山东淄博腈纶厂（地方项目）　*福建青州造纸厂（地方项目）

科学教育（6项）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卫生（2项）　北京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院

其他（9项，略）

1992年计划收尾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天津大港电厂　山西漳泽电厂　浙江秦山核电站　湖南岳阳电厂　四川江油电厂　四川重庆珞璜电厂　宁夏大坝电厂　胶济复线　川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　贵昆线电化（含电铁供电）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及冶金配套　连云港碱厂江西贵溪化肥厂（地方项目）　浙江杭州磁带厂（地方项目）　天津化工厂蛋氨酸工程（地方项目）　重型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斯太尔项目　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二期工程　济南涤纶厂（地方项目）

1993年

1　月

1日　我国出口管理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从1993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品种减少一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过去的66%下降到30.5%；进一步下放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分配权，并取消把出口商品分为一、二、三类的做法，使外贸企业可以进一步放开经营。至此我国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品种减少到138种。

我国13个陆上油田原油实行国际价

从1993年1月1日起，我国陆上重要油田将在价格上实行重大改革。除大庆、胜利和辽河三大油田外，华北、大港、冀东、中原、河南、江汉、江苏、新疆、长庆、玉门、青海、滇黔桂和四川等13个油田上交给国家的全部统配商品原油，由中国石油天

然气总公司比照国际油价收购。同时，胜利、辽河油田要在平价转高价数量上到位，实现投入产出资金平衡；大庆油田将在 1994 年也实现这一目标。这一举措不仅使这 13 个油田长期以来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出现的巨额政策性亏损将不复存在，同时还为油田创造了等同于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也将在国内经济中发挥有效的缓冲作用。

2 日　我国首座超临界大型电厂投产

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第二台 60 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日前圆满完成 24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并正式移交生产。至此，这座我国首次应用超临界技术建造的大型火力发电厂已全面建成投产。这个大型电站，总投资为 30 亿元。

3 日　我国银行首次向外国政府贷款

中国银行向斯里兰卡人民银行提供 682 万美元出口买方信贷的签字仪式在京举行。这是我国银行向外国政府发放的首笔贷款，将用于支持 400 辆国产公共汽车的出口。自 1980 年起，该行开办了出口卖方信贷业务，累计发放卖方信贷 80 亿美元，为国家创汇约 50 亿美元。

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为了确保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决定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李鹏担任主任委员。

4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重视粮食工作的社论

《社论》指出，1992 年秋粮收购中，由于资金等问题，各地普遍出现了卖粮难和向农民打白条现象，一些地方放松了粮食工作，这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重视农业、重视粮食，最主要是要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推进各项工作时，一定要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利益。重视粮食工作，必须有新的思路。从发展的眼光看，继续理顺价格，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所在。

5 日—10 日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讨论和安排 1993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总结交流各地加快改革开放经验，并就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交换意见。1 月 10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要像重视加快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一样，认真抓好各方面的改革，特别要积极探索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宏观调控手段，探索使企业既有激励又能约束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要继续把贯彻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作为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来抓，按照《条例》规定放开企业手脚；同时，要建立严格的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和约束机制。要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为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税制奠定基础。要继续发展各类批发市场，形成多层次的市场网络，并探索期货交易所等新的市场组织形式；同时，要把市场建设的重点转向加快培育金融、劳动、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要素市场上来。建立包括养老、待业等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有利于社会稳定。从方向上看，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要统一，实行政事分开的原则，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只管政策和法规；由专门的机构筹措和运用保险基金。保险基金的统筹权原则上应放

到省或计划单列市。社会保险基金的筹措要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在农村，养老保险主要以农民自主投保为主，不要搞强制性交纳保险金。待业保险制度要建立起来，以利于企业引进竞争机制，优化劳动组合。

7日　国家确定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目标

国务院原则同意并转发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意见》提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一）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持、积极兴办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规格的成人高等教育，进一步增加和拓宽社会成员接受高中后教育的机会和渠道，使成人高等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广泛的服务。（二）把高等层次岗位培训、大学后继续教育作为成人高等教育的重点，完善学历教育体系，建立起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需求的新的办学机制。（三）建立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形成科学的管理、调控制度。为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意见》提出了10项政策措施。

11日　国家五大电力集团成立

中国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电力集团在北京宣告成立。这五大电力集团是在我国原有的五大电网基础上成立的，在多年的统一规划、调度、运行中，已经形成了具有良好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企业集团。这五大电力集团负责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南、湖南、江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电力供应。其发电装机总量和年发电量分别为1.18亿千瓦和5057亿千瓦时，占全国装机和发电总量的70%以上，在我国电力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2日　国家改革高等教育由国家包办的体制模式

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共17条。《意见》提出，改革原有的由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单一体制和模式，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社会办学积极性、多种形式和途径发展高等教育的新路子。我国高等学校逐步形成多种办学的形式。国家教委会同国务院有关综合部门有计划地选择其中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列入国务院已原则批准的“211工程”计划（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重点办好100所大学），分期滚动实施。力争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学校管理等方面能与国际著名大学相比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是，逐步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两级负责为主的管理体制。国务院各部门重点管理好直接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在高等教育中起示范作用的骨干学校和行业性强、地方不便管理的学校。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制，逐步建立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资体制。进一步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体制，实行国家任务计划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国家任务计划是重点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基础学科和高技术研究，以及边远地区、某些艰苦行业所需专门人才。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新体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中国银行参与发行港币

香港政府和中银集团宣布，中国银行将于1994年5月参与发行港币港钞。中银集团有300多家分支机构和250多部自动提款机，遍布香港、九龙、新界，能够为公众提供提钞便利。中国银行将于1994年发行面值60亿港元的钞票，约占流通钞票总值的10%。目前香港有两家发钞银行，分别是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中银参与发钞，表明致力维护香港现有的自由兑换的港币体制，表明对现时金融制度的支持。

全国银行行长、保险公司总经理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研究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和部署1993年的金融工作。在闭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强调，要充分发挥银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银行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还不够发育、价格还没有理顺、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专业银行仍然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因此专业银行仍要保持政策性与商业性的双重机制，但要逐渐减少政策性任务，逐步向商业银行过渡。银行要把住两个总闸门：一个是贷款发放的闸门，包括各种债券、各类股票和国外的贷款。另一个是货币投放的闸门，总量一定要从严控制，不能突破。进一步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体制；建立和完善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和发展公平、高效、开放、统一的全国金融市场体系；建立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逐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法律化、规范化、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体系；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使金融业务逐步国际化。

朱镕基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要严格进行总量控制，从严进行宏观调控。金融是国民经济总量控制的最后一道关口，一开始就应该从严进行把关。银行不只是控制贷款规模，还要控制货币发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定要量力而行，认真考虑资金、外汇、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要深化金融改革，建立银行风险机制。专业银行是金融企业，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既要有激励机制，又要有承担风险的约束机制，不能把银行当作政府或部门的出纳和会计。要严格控制债券、股票的发行和新建金融机构。

13日　国家鼓励外商投资建设和经营民航基础设施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宣布，我国将对机场飞行区、航站区民航按不同情况采取灵活方式吸收外商投资。先选一两个机场作为典型示范。航空公司以股份制的方式吸收外商投资并由中方控股，先选一两个公司作试点，采取多种有效途径，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包括委托有名望的外国管理公司管理机场，聘请高级管理人才等。

20日　国务院公布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对货币出入境实行限额管理制度。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人出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出限额。携带国家货币出入境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不得在邮件中夹带国家货币出入境。不得擅自运输国家货币出入境。违反国家规定的，由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

释。本办法自1993年3月1日起施行。1951年3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同时废止。

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这个《办法》发布《关于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的公告》，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为6000元。在开放边民互市和小额贸易的地点，中国公民出入境和外国人入出境携带人民币的限额可根据实际情况由人民银行省级分行会同海关确定，报人民银行总行和海关总署批准后实施。本规定自1993年3月1日起施行。

22日　邓小平希望上海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邓小平同志在除夕之夜与上海各界人士共迎全国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邓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我向大家拜年，祝你们春节快乐，并通过你们向全体上海人民，首先是上海工人阶级拜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人民在1992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有一点小的损失不要紧。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你们上海去年努力了一年，今年再努力一年，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

30日　李鹏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

国务院总理李鹏1992年12月24日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总的来看，整个形势是好的。应该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时加以解决，就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农业生产总的说来不错，但一些地方忽视农业生产的倾向有所抬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效益没有同步增长。工业产成品积压还在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没有和工业生产同步增长。工业的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扩大投资拉动的。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改善还不大，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重复建设项目。再如金融问题。今年的货币投放量比较大，信贷规模比较多地突破了计划。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加30%以上，造成资金紧张以及部分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虽然全国物价总水平比较稳定，但大中城市生活费指数已达10%以上，这是一个信号，必须引起注意。李鹏指出，要真正形成一个充分发育的、规范化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体系，恐怕要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要把培育市场体系作为加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件工作：一是以商品市场建设为龙头，重点抓好生产资料市场的建设，促进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以及其他市场的发育和形成。二是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逐步形成以市场决定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以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三是抓紧制定法律法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管理法规体系和执法监督体系，以保证市场的统一性、公开性和公正性，促进市场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坚决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封锁、行业垄断以及内外贸易的分割。四是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

2　月

6日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研究工作取得初步成果

据《人民日报》报道，由国务院组织实施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研究工作取得初步成果。为使国家宏观决策科学化，国务院于1991年9月3日成立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研究协调小组，开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研究工作。1991年底，国务院总体研究协调小组针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先行确定了13个重大的总体研究课题，并落实了以国务院综合部门为主的课题承接单位。在课题方案设计和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使总体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按照总体研究协调小组的要求，各课题组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体现了总体研究的特色：一、突出总体性。二、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三、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四、集思广益，积极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目前，各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已基本完成，国务院总体研究小组正在陆续召开课题成果鉴定会议，审议和通过总体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

国务院批准将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逐步淘汰国家方案递交联合国有关会议讨论

由国家环保局组织有关部委、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及30位专家共同编制的《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逐步淘汰国家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报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提交3月上旬召开的保护臭氧层多边基金执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我国已加入经修正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为履行《议定书》义务，执行各项控制措施，及时获得《议定书》多边基金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我国及时编制了《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逐步淘汰国家方案》。这个削减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中长期行动计划，分析了我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消费现状，评估了其发展趋势及代用品、代用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制定了国家削减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管理机构框架、经济政策框架及技术路线，提出了包括技术开发与研究、示范、转换、推广、回收和再循环等内容的项目及申请增加援助的费用。

9日　国务院致电祝贺西（吉）、海（原）、固（原）80%农民解决温饱

国务院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发出贺电，向10年来在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和扶贫开发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西海固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工程技术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贺电勉励西海固各级干部、各族人民继续努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争取率先实现小康，为振兴宁夏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1983年开始，甘肃、宁夏两省区把有计划移民作为根治极贫区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再加上国家每年拿出2亿元投资支持“三西”地区（注：甘肃定西地区、河西走廊和宁夏，西海固部分县）脱贫，“三西”地区目前已建成能容纳上千人至上万人的移民基地50多个，小型移民点100多个，共安置移民50多万人。宁夏西海固地区80%的农民目前已解决温饱，10%的农户走上了富裕之路。

总理办公会议通过90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

《纲要》指出，我国人民的食物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及时地引导我国食物结构的改革和调整，促进食物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并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食物结构，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国民整体素质提高和国民经济发展与繁荣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的食物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食物结构和食物消费中的不合理状况日益显露出来，1. 我国人民的食物消费水平刚刚跨越温饱线，总体营养水平还较低。动物性蛋白质所占比重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食物消费中优质蛋白质食物所占比例小。2. 在动物性食品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而耗粮较少的禽、蛋、奶、鱼类和草食性动物的比重过低。3. 一些不科学、不文明的消费习惯依然存在。4. 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并存的状况有加剧的趋势。因此，90年代我国食物工作将面临着十分紧迫的艰巨任务：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食物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另一方面要大力改善和调整食物结构，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科学合理的国民膳食结构。90年代我国食物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食物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根据营养和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大力发展食物生产，全面开发利用各种国土资源和食物资源，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的食物生产和食品加工业，重视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的统筹安排；要按照“营养、卫生、科学、合理”的原则，继承中华民族饮食习惯中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外先进、适用的经验，改革、调整我国的食物结构和人民消费习惯。经过不断努力，使我国人民食物消费与营养整体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和改善，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食物发展道路。这个《纲要》于6月20日公开发布。

12日　我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与国际接轨

国家技术监督局决定，将ISO9000等同采用为我国国家标准，即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列国家标准（GB/T 19000—ISO 9000），其技术内容与ISO 9000完全相同，编写方法也完全一致。并于1993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ISO 9000系列国际标准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87年3月正式发布的。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它被作为相互认可的技术基础。我国于1988年曾将这一标准等效采用为我国国家标准，编号为GB/T 10300。

天津师大应用文科学院成为国内首家国有民办大学

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师范大学应用文科学院自1993年起改为“国有民办”的独立大学，这种新型的办学体制，在全国尚属首创。天津师大应用文科学院的前身是南开大学分校，成立于1978年，该校改制以后，将实行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全部招收自费走读生，国家不包分配。在办学层次和专业设置上，根据经济与社会的需求设置专业。在经费上，实行包干办法，改制后前3年，每年国拨经费200万元给予扶持，自1996年开始逐步减少国拨经费，直至100万。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包括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战略和指导方针，教育体制改革，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经费等教育改革和发展7个方面的50项内容。

《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第一，教育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第二，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第四，必须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努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第五，必须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第六，必须依靠广大教师，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第七，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第八，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办学，培养多种规格人才，走出符合我国和各地区实际的发展教育的路子。这些主要原则，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纲要》提出的90年代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是：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包括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大城市市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积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中城市基本满足幼儿接受教育的要求，广大农村积极发展学前一年教育。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未升学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普遍接受不同年限的职业技术培训，使城乡新增劳动力上岗前都能得到必需的职业技术训练。高等学校培养的专门人才适应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基本上立足于国内，教育质量、科学技术水平和办学效益有明显提高。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中的文盲率降到5%以下。通过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和在职学历教育，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14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重点，提到各级政府重要工作日程上来。各省、自治区在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前提下，一手抓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手抓乡镇企业；地、县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乡镇企业。二、实行适应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政策。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要面向国内外市场需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除国家明文规定的外，适合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受限制；在保证效益的前提下，发展速度能多快就多快，不受限制。三、提倡不同组织形式的乡镇企业共同发展，可以放手发展个体、私营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建立健全对乡镇企业的法律保护制度。四、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走上开发乡镇经济的主战场。对在乡镇企业生产经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实行收入上不封顶、依法纳税的政策。五、走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集中连片发展的路子。六、积极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七、多渠道增加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资金投入。国家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必须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金融，逐步建立、完善农村资金市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培植企业投资能力，广辟资金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八、抓住

机遇，推进东西部横向经济联合和城乡联合。九、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为促进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上新台阶做出贡献。国务院指出，这项决定也适用于东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19日　国务院《通知》指出水土保持是一项基本国策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通知》说，要建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凡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新上的生产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都要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机构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各级计划部门在审批项目时要严格把关。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系。各地要多形式、多渠道增加投入，大力开展水土保持。水土流失的治理，以地方投入、群众投劳为主，国家适当扶持。继续实行谁投资进行综合治理，新开发的土地归谁使用和经营的政策，调动各方面投入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对以户包为基础，集体、个人相结合的多种形式承包治理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的使用权，要长期稳定不变。

20日　国务院成立京九铁路建设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担任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原铁道部部长李森茂担任副组长。国务院领导要求"下定决心，奋战三年，铺通全线"。京九铁路（北京至深圳与九龙连接）全长2500多公里，总投资200多亿元，由北往南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9省（市），是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径路最长，由中央与地方合资建设的一条重大干线，对于缓解南北运输紧张状况，增强我国铁路运输能力，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7条内容进行了修改，主要有："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册。"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同一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使用同一商标的，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册申请。"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布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补充规定

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命令，公布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规定对刑法中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等犯罪行为的处罚和量刑，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所犯罪行的处罚作出补充规定。本规定自 199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通过，并由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 71 号令，予以发布。《质量法》规定，禁止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国家鼓励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励企业产品质量达到并且超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用户、消费者有权就产品质量问题，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查询；向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申诉，有关部门应当负责处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从事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刑法第 157 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从事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本法自 199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23 日　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粮食产销政策发布及定货会

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通过组织粮食产区和销区直接定货，使产区在产前就能了解销区对粮食数量、品种、质量的需求，并与农民签订合同，使农民主动安排生产，确保国家和销区粮食的需要；二、向全国各地发布 1993 年粮食的保护价、挂钩化肥和柴油的价外加价等各项粮食产销政策，以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次会议发布的推动粮食购销改革和促进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实行粮食分级管理，建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调控体系。第二，签订购销合同，引导农民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做好粮食的产销衔接。第三，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防止谷贱伤农。第四，改进粮棉挂钩化肥、柴油的兑换办法，从 1993 年起，将粮食挂钩化肥、柴油和棉花挂钩化肥的平议差价折成现金，对合同定购的粮棉实行价外加价，将利益直接给农民。第五，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管理，防止因价格上涨过多而损害农业生产。第六，努力增加农业投资，大力扶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经济，在资金投入和其他方面，对粮食主产区实行重点倾斜。第七，调整农林特产税率，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全

面协调发展。适当调低农林特产税的税率，使名义税率与实际负担渐趋一致。第八，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粮食企业经营与粮食专项储备管理的分流，专储制度要进一步完善。

25日 我国独立设计与制造通用人工智能计算机

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八六三”计划重点攻关项目——银河智能工具计算机系统在长沙通过鉴定。银河智能工具机是一个高性能的通用计算机系统，它配有多种人工智能语言和传统程序设计语言，逻辑推理速度高达每秒58.7万推理步，传统程序执行速度达到了每秒1790万条指令，具有手写程序自动输入和语音控制功能。它的整体性能达到了当前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填补了又一空白。这个计算机系统的诞生，标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少数几个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通用人工智能计算机的国家之一。

3 月

1日 重新修订后的外币存款章程开始实施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银行重新修订了外币存款甲、乙两种章程。修订后的新章程将于3月1日起实施。《甲种外币存款章程》主要修改内容，一是存款对象增加了“在中国境内保税区的中外企业、单位”、“经人民银行批准可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二是定期存款存期增设七天和一个月档次；三是存款品种除原有的一般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外，增加了通知存款和协定存款。《乙种外币存款章程》主要修改内容，一是存款对象明确为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二是定活期存款起存金额由原来的人民币50元和20元等值外汇分别提高为人民币500元和100元等值外汇；三是定期存款存期增设一个月档次。与旧章程相比，新章程的外币存款服务对象更为广泛，存款品种和存期可选择性增强，手续也更具灵活性。

3日 世界中小企业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国家主席杨尚昆向大会发来贺辞。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小企业走向2000年”。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及11个国际机构的代表共500余人参加了今天的开幕式。大会研讨了世界范围内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交流各国各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经验，探讨解决中小企业面临普遍问题的途径，加强国际间中小企业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与合作。大会于3月5日闭幕时通过了《世界中小企业大会北京宣言走向公元2000年——世界中小企业前景展望》。《北京宣言》认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世界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正引起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中小企业也在不断地全球化。《北京宣言》说，大会特别注意到，目前世界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而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化进程必须扩展到农村地区。鉴此，大会极有兴趣地注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规模建立和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并认为这种经验值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在实践中提出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对饱尝盲目城市化之苦的国家，尤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4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加强绿化工作加快林业发展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充分认识加快造林绿化、发展林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做到国民经济上新台阶，造林绿化和林业建设也要相应上新台阶。坚持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总体推进造林绿化工作。要统筹安排，总体推进。不断提高全民义务植树的水平，努力做到规范化、基地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加快部门造林绿化步伐。按照部门造林绿化分工负责制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制定规划，落实措施，全面完成各自负责的造林绿化任务。要加强领导，完善各级领导任期造林绿化目标责任制。

5日　中共中央十四后二中全会调整“八五”计划指标

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6%提高到8%—9%。全会认为，“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调整是必要的、符合实际的，调整后的指标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是能够实现的。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求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各地情况不同，在速度问题上不搞“一刀切”。在经济工作中，要更好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认真解决前进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国务院决定适当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

针对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正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转变的要求，解决农林特产税中存在的问题，国务院决定适当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调整的原则是，农林特产税的税负应适当高于粮食作物，以利于合理调节农业内部比较利益，稳定粮食生产。适当降低农林特产主要品目的税率，以支持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转变。

8日　国务院批转1993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

《要点》提出的1993年改革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贯彻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为重点，围绕把企业推向市场这一中心环节，加快企业改革；以加快价格改革为契机，配套推进财税、金融和计划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市场体系，加快以改革进口管理体制为重点的外贸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高综合改革试点水平，切实做好新体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点》提出，要有领导、规范化地进行企业股份制试点。积极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企业兼并。切实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搞好机构改革。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逐步建立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改革流通体制，积极发展统一的市场体系。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抓好1993年棉花生产的具体措施和政策；研究和部署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交流种好棉花的经验。在3月10日的闭幕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发表讲话，他说，要使农民知道，国家十分重视棉花生产，支持棉花生产，保护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种棉的积极性，打消农民“卖棉花难”、怕种棉吃亏的顾虑。国

家订购合同内的棉花，收购价决不会低于去年，一定确保农民获得适当的收益。一定要把棉花工作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朱镕基还宣布了鼓励扶持农民种棉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四条：一是发放扶持棉花生产的贴息贷款。二是切实解决棉花的收购资金，无论如何要消灭"打白条"现象。三是要处理好棉花销区和产区的关系，产区要严格执行国家调拨合同，销区要给产区一定的利益补偿，积极支持棉花生产。四是要继续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粮食、棉花"三挂钩"的政策，对扶持棉花生产的平价化肥、柴油供应改为按议价保证供应，平议差价作为棉花收购价的"价外加价"，如数把这项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棉农。他还指出，棉花经营体制改革要积极稳妥地进行，先搞试点，再逐步推广。绝不能把棉花经营搞乱，使棉花质量失控，重复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教训。

9　日国务院严禁行政机关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

针对近年来国内企事业单位借贷活动日益增多的同时出现一些单位要求行政机关对这类经济活动提供担保，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的问题，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行政机关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的通知》，进一步强调，要充分认识行政机关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的危害性。今后各级行政机关一律不得为国内企事业单位间的经济活动提供担保，已经提供担保的，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对违反规定自行为企事业单位间经济活动提供担保的行政机关，要追究批准人的责任。

11 日　河南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假药案曝光

《人民日报》公开揭露河南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假药案真相。这是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假药案。河南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是一个拥有 350 多名职工的集体企业，从 1987 年到 1992 年 9 月，生产假药时间长达 5 年之久；到该厂被揭发时止，已经查明该厂制造销售假药 11141 件，人用兽用药共 20 多个品种，非法获利至少 300 万元。

12 日　国务院批转西北地区经济规划问题报告

国家计委《关于西北地区经济规划问题的报告》提出，西北地区经济规划的基本思路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以市场为纽带，以外贸为突破口，联合起来"走西口"（即西部口岸）；打通西北通道，进入中亚市场，逐步走向世界，以此带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西北地区经济规划的原则是：统筹规划，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有分有合，西出东联，面向中亚，扩大开放，发展市场，联合协作，共同发展。90 年代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9%左右。

国务院批转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

国务院原则同意并转发国家计委《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要求参照这个思路，做好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的实施工作。

《基本思路》提出的第三产业发展的总目标是：争取用十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的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力争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增长速度，90 年代年平

均增长11%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2000年达到35%左右，比1990年提高7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2000年达到28%左右，比199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遵循的指导原则是：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坚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相适应；坚持不断改善第三产业结构和提高效益；坚持正确的政策引导，走依靠深化改革、放开搞活经营的发展路子；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兴办第三产业，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坚持合理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全面发展。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是：1. 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2. 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3. 农村的第三产业，主要是发展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行业及为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的行业。4. 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

13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1992年人口主要数据

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199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8.24‰，自然增长率为11.60%，出生人口为2119万，全年净增人口为1348万，与上年相比，全国少生了139万人，净增人口减少了142万人。

15日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今后5年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性目标的关键性5年。国务院根据新的形势对“八五”计划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作必要调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将由原定平均每年6%调高到8%至9%。就全国来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今后5年内就能够实现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依靠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要着实抓好的七个方面的工作。1.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2. 要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实行开发与节约并重方针，加强能源建设，要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3.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增长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4.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5. 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面。认真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6.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7.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1993年经济工作重点：加快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力争有一个好收成；努力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强交通运输建设，增加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生产；努力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16日　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受国务院委托由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向大会作的《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3年计划草案报告》。《报

告》指出，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严格进行宏观调控，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着力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在制定和实施计划中，坚持以加快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坚持把经济增长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坚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坚持促进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坚持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1)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8%。其中，第三产业增长 9%或更高一些。农业总产值增长 4%，工业总产值增长 14%。(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按新口径计算）8000 亿元，投资率控制在 30%以内。(3) 银行新增贷款规模 3800 亿元，各种有价证券发行 980 亿元；财政赤字控制在 205 亿元。(4) 外贸进出口总额 1850 亿美元，增长 11.7%；其中，出口总额增长 11.8%，进口总额增长 11.7%。保持国家必要的外汇储备。(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 12500 亿元，增长 14.7%。(6) 在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的同时，把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控制在 6%左右。(7)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能源降低 3.4%，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耗电降低 5%—10%；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提高到 10.6%，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缩短 6 天，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6.5%，企业亏损面下降 5 个百分点，经营性亏损额降低 15%—20%。(8) 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13.88%。以内。

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与主要任务：(一) 继续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积极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要按照发展大农业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要求，推动农业朝着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转变。(二) 突出抓好交通、通信、能源、水利、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骨干工程。(三) 加快第三产业的兴起，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四) 充分发挥各地优势，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继续贯彻执行扶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老根据地和边疆地区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特别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积极抓好扶贫开发，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五)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六)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巩固和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七) 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要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

1993 年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要求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立足于加快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和解决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在体制转换的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上取得新进展。(一) 继续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深化企业改革。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使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二) 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按照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的要求，今年要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较大的步伐。(三) 深化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加强社

会保障制度建设。全面推进住房商品化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逐步建立科学的经济调控体系。继续深化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1993年，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再减少50%左右；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按产值计算由1992年的12%左右减少到7%左右。对价格已经放开、产需基本平衡的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对关系国计民生、供求尚有一定矛盾、价格没有完全放开的重要生产资料，进一步减少指令性计划分配的数量。逐步以国家导向供需衔接计划和国家订货取代生产、流通的指令性计划。在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计划指标的同时，要加强预测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计划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主要是研究战略、制定规划、宏观调控、总量平衡、产业政策、培育市场、重点建设、协调服务。努力改进计划方式，逐步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经济法规进行间接调控。尽快制定今后时期的国家产业政策，为确定财政、金融、投资和利用外资等政策提供重要依据。抓紧制定振兴交通、能源和发展支柱产业的专项规划，更好地引导和促进整个经济健康成长。逐步建立合理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使各类投资主体做到责权利密切结合。健全规范的、稳定的和良性循环的基本建设基金制度。积极推行项目业主责任制。逐步扩大股份投资方式的试点。使用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借贷双方都必须承担风险和责任。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复式预算制度改革试点，强化国家预算约束。进一步搞好分税制的试点。积极推行税利分流，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改革和完善财税制度，健全新的财税法规，强化税收征管，加强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手段的宏观调控功能。今年从严控制经济总量，同时，要努力优化贷款结构。中央银行在继续实行并改进贷款规模控制的同时，加强运用利率、准备金、再贷款和公开市场业务等经济手段，逐步加大间接调控的分量。专业银行目前还要保持政策性与商业性双重职能，但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向商业银行过渡。

199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提出的《关于199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93年安排国家预算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大力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培养和开辟财源，加强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加农业、交通、能源、教育、科技投入，保证重点需要；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赤字数额，为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创造条件。按照上述指导思想，1993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安排4522.37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8%；财政总支出安排4727.37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8%；收支相抵，赤字205亿元，比上年预计执行数减少32.49亿元。在1993年国家预算草案中，中央财政收入安排2382.6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8%；中央财政支出安排2587.6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2%。收入和支出相抵，赤字205亿元。地方预算收入和支出各安排3297.31亿元，分别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7%和5.6%，收支平衡。

《报告》对有关政策措施作了几点说明：（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稳定发

展问题。国家财政将采取三项支持农业发展的措施：一是从今年起，随着国家逐步放开粮食购销价格，中央财政分三年取消对地方的粮食加价款补贴，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实行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二是改革粮棉“三挂钩”物资补贴办法，国家用于扶持粮棉生产的化肥、柴油，由按平价供应实物，改为以货币方式，在收购价格之外将化肥、柴油的平议价差以加价形式付给农民，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三是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减轻农民负担。（二）关于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今年，国家财政又将拿出72亿元，进一步支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是免除企业折旧基金上交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二是企业技术开发费可按实际开支列入费用；三是提高企业折旧率，并对某些特别需要支持的行业实行加速折旧措施。（三）关于提高商业零售环节营业税税率问题。为了缓解财政困难，筹集重点建设资金，国务院决定在今年适当时候，将商业零售环节的营业税税率，除平价粮食、食油等商品外，一律由现行的3%提高到5%。（四）国家预算安排的教育事业费494.14亿元，科学事业费63.4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8%和10.8%，均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五）关于基本建设支出的安排问题。今年，国家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共计885.42亿元，其中生产性基本建设支出711.69亿元，占80%，主要用于交通、能源、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建设。（六）计划在今年下半年适当时候，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进行一次结构性调整。这项措施，预算安排了40亿元。

为了完成今年国家预算任务，报告提出以下措施：（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二）狠抓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经济效益。（三）适应收入结构变化，改进和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四）加强支出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制止各种形式的铺张浪费。（五）转变职能，稳步推进财税改革。（六）加快法制建设，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运行创造条件。

八后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确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务院批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草案

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土地管理局编制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草案）》。《纲要》是一个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长远的、宏观指导性的战略规划，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土地利用现状和后备资源潜力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内全国土地利用的目标和基本方针；在预测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各类用地的控制性指标；协调各部门的用地需求，提出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利用方向和结构的指导性意见；提出实施规划的政策、措施和步骤。

《纲要》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为依据，以1985年为基期，2000年为规划期限，并展望到2020年和2050年。

《纲要》未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

23日　我国首次发布年度中国气候公报

国家气象局首次发布《1992年度（1991年12月—1992年11月）中国气候公报》。《公报》认为，去年中国大部地区温度变化的突出特点是：冬暖夏凉，冷暖多变，不少地方出现破记录的高温或低温，给农业等经济部门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全国大部降水偏少，气温偏低，干旱偏重，洪涝较轻，冷冻害重于常年，台风和热带风暴在我国登陆次数略多于常年，全年气象灾害属中等年份。据《公报》统计，旱灾居该年各种气象灾害之首，全年农作物受旱面积达4.9亿亩，其中成灾面积2.5亿亩，绝收面积3800多万亩，属于旱灾较重的一年；去年冷（冻）害也比往年偏重，全国有5000多万亩农作物遭受冻害，其中成灾3000多万亩，绝收600多万亩；与常年相比，风雹次数偏少，受灾程度较轻。四川的重庆地区、贵州的遵义地区、江西的赣州地区是1992年全国酸雨出现频率最大的三个地区。国家气象局决定从1993年开始，每年在3月23日“世界气象日”这天，公告年度《中国气候公报》。

31日　全国人大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自1999年12月20日起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域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图由国务院另行公布。会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

4　月

5日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工作启动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工作在东风汽车、中国重型汽车等8个企业集团启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指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企业集团中紧密层企业的国有资产统一授权给核心企业经营和管理，建立核心企业与紧密层企业之间的产权纽带，增强集团凝聚力，发挥整体优势。首批试点单位为经国家批准55个企业集团中的7个，包括东风汽车集团、东方电气集团、中国重型汽车集团、第一汽车集团、中国五矿集团、天津渤海化工集团、贵州航空工业集团。还有一个是55家企业集团之外的中国纺织机械工业集团。这8个集团中，已有东风汽车、中国重型汽车完成了试点方案的制订，并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正式批复。

7日　国务院要求强化环境监督加强环保执法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加强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当前和今后几年，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是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和宣传舆论工具，强化环境执法监督，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和检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严厉打击那些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极坏的违法行为。《通知》要求：1. 各级人民政府要迅速行动起来，把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将违法排污和非法经营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作为检查重点，力争用二三年的时间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局面。2. 在开展加强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活动中，各级人民政府要支持有关部门依法行使职权。3. 各部门尤其是环保、林业、农业、水利、建设、工商、外贸、海关、商业、公安、司法和新闻宣传部门要积极协调配合，共同做好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工作。4. 加强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活动的工作，由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牵头（办事机构按职能分工，分别设在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约请有关部门参加，及时协调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环境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检查。

10 日　海关总署修订发布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

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签发了第 44 号海关总署令，重新发布经国务院批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自 199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实施细则》上作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修改和补充：一是将"伪报、瞒报进出口货物价格偷逃关税的"走私行为从其他走私行为中分离出来，专项列明，并规定对伪报、瞒报进出口货物价格偷逃关税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偷逃关税金额三倍以下的罚款"的处罚规定；二是明确规定进出境货物申报不实的范围，对"进出境货物的品名、数量、规格、价格、原产国别、贸易方式、消费国别、贸易国别或者其他应当申报的项目申报不实的"，处以货物等值以下、或者应缴税款两倍以下的罚款。以进一步明确对偷、漏关税行为处罚的法律依据，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漏关税活动，充分发挥关税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1 日　国务院要求制止乱集资加强债券发行管理

针对许多地区、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利用发行债券等各种方式进行集资并进一步蔓延的状况，国务院下发《关于坚决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券发行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各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乱集资。任何地区、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在国务院有关规定之外，以各种名义乱集资；对已搞的高利集资，要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妥善处理。要严格控制各项债券的年度发行规模，加强对债券的审批工作。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利率政策，公司、企业债券及其他任何形式集资的利率都不得高于同期国库券的利率。要优先保证国库券和用于国家重点建设债券的发行。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突破国家下达的债券发行计划、擅自设立或批准发行计划外券种、发行或变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以高于国库券利率进行各种形式集资的，主管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者，要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同时，核减该地方或部门当年或下一年度的证券发行规模。

12 日　国务院发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

李鹏总理签署命令，发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规定》要求，企业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0.6%缴纳待业保险费。企业缴纳的待业保险费在缴纳所得税前列支，由企业的开户银行按月代为扣缴。企业缴纳的待业保险费转入企业所在地的待业保险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待业保险基金专户"，专项储存，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

个人不得挪用。符合本规定的待业职工，向企业所在地的待业保险机构办理待业登记后，方可领取待业救济金。待业职工待业前在企业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不足五年的，领取待业救济金的期限最长为12个月；待业职工待业前在企业连续工作五年以上的，领取待业救济金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待业救济金由待业保险机构按月发给待业职工。待业救济金的发放标准为相当于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金额的120%至150%。具体金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本规定自1993年5月1日起施行。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4日　国家大幅度调减专控商品品目

经国务院同意，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决定对国家现行的29种专项控制商品品目作大幅度的调减，调减后的专控商品为8种，5月1日起执行。此次调减，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和保证各项事业的正常需要，简化审批手续，方便社会集团的购买工作。

14日—20日　江泽民提出特区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海南省考察期间指出，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要办得更活、更实、更富生机、更有成效。继续当好“排头兵”，为全国的改革进一步发挥试验、探路和积极推动的作用。

20日　国务院发布安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规定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111号国务院令，发布《安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规定》。《规定》指出，安置国有企业中的富余职工，应当遵循企业自行安置为主、社会帮助安置为辅，保障富余职工基本生活的原则。企业安置富余职工应当依照本规定采取拓展多种经营、组织劳务活动、发展第三产业、综合利用资源和其他措施。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和工会组织应当指导、帮助和支持企业做好富余职工安置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培育和完善劳务市场，开辟社会安置渠道。企业为安置富余职工而兴办的从事第三产业的独立核算企业，自开业之日起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开办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安置本企业富余职工的任务。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在资金、场地、原材料和设备等方面给予扶持。企业组织本企业富余职工依法兴办的独立核算企业，可以承担本企业中原由外单位承包的技术改造或者劳务项目。企业可以对富余职工实行待岗和转业培训。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视为工龄，与其以前的工龄合并计算。鼓励和帮助富余职工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此外，还对其他相关问题作了规定。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2日　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条例》规定，股票的发行与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障国有资产不受侵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是全国证券市场的主管机构，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管理。《条例》还对股票发行的条件，发行的程序，国家股份的转让，股票的交易，股票回购，股票及其指数的期权、期货的交易，上市公司的收购，股票的保管、清算和过户，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的调查和处罚，以及争议的仲裁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5日　国家允许个人参与外汇买卖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适当放开金融机构代理客户买卖外汇业务的通知精神，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凡是有权经营自营或代客买卖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均可接受个人的委托，办理即期外汇买卖业务。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要求，参与外汇买卖业务的个人必须持有外币。金融机构办理这项业务，只能向客户个人收取买或卖金额的2.5‰的等值人民币手续费。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时还规定，经批准，企事业单位的自有现汇，也可委托金融机构办理即期或远期外汇买卖。经批准办理代客外汇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还可开办代客外汇资金管理业务。

27日　我国成为国际上少数掌握光电记录技术的国家

电子科技大学张有纲教授率相关学科的数十位专家，历经数年艰苦攻关研制成功的我国首批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这两项光电记录高新产品，经权威部门专家鉴定，认为已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此项技术并将成果实施工业化生产的国家之一。

为使这一高新科技成果尽快实现产业化，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有关主管部门大胆尝试运用股份制形式组建深圳天极光电技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电子科技大学以光电技术及系列成果作价入股，占总股份的18.33%，深圳天极公司以实收股本为注册资本，总额为3亿元，按规范作业，定向募股，3个月内认股如数完成。以一家高校为主要股东、以高新技术为龙头的企业，在我国还是第一家。

28日　国务院决定严格审批和清理开发区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开发区热”，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通知》明确：设立各类开发区，实行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审批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各级人民政府不得审批设立各类开发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审批权在国务院。凡要兴办上述各类开发区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应认真做好前期规划和可行性研究的指导工作，并向国务院申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的资源情况、实际需要和条件，批准设立少量省级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在现有权限范围内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并报国务院备案。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不得沿用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的名称和政策。对未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而自行兴办的各类开发区，各地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对缺乏基本建设条件，项目、资金不落实，过多占用耕地或占而不用的开发区，要坚决果断地停下来，并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处理好有关善后事宜。土地要还耕于农，严禁弃耕撂荒。

国家工商局颁布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期货市场法制建设方面的行政规章。《办法》对于设立期货经纪公司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了规定，如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要有合格的通讯设施；专职期货经纪人不得少于20人等。《办法》规定期货经纪公司一律由国家工商局注册登记；在登记主管机关指定的金融机构开设客户保证金专用账户，并向登记主管机关指定的金融机构缴存不低于注册资金总数25%的经营保证金。《办法》还规定期货经纪公司不得私下串通，不得垄断市场，不得进行私下对冲，不得制造、散布虚假的或容易使人误解的信息进行误导等。

5　月

5日　阿拉善盟遭特大沙暴袭击

5日傍晚至6日凌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盟狂风大作，沙石漫卷，大部地区平均风力达9至11级，局部地区风力达12级以上。初步统计，全盟被打枯、沙尘埋没打死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达3.5万余亩，受灾牲畜达30余万头（只），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650余万元。受灾最为严重的阿拉善左旗共丢失羊12万余只，风沙埋死羊8000余只，刮走牧民贮备草60万公斤，埋没水井80眼，毁坏棚圈200多座，房屋100多间，个别牧民下落不明。

11日　国家经贸委推广邯钢经验

国家经贸委在邯郸钢铁总厂召开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现场会，从推广邯钢经验入手，引导企业眼睛向内、减少亏损。邯钢是我国56家地方钢铁骨干企业中最大的厂家。1990年由于原材料大幅度涨价，这个厂处于亏损边缘。他们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成本入手，建立起市场需要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近两年市场能源、原材料等涨价较多的情况下，利润大幅度增长，1992年由于降低成本而增加的利润占当年新增利润的56.7%，企业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国家经贸委认为，邯钢的经验说明，国有企业特别是亏损企业在节能、降耗等方面大有潜力可挖。因此，在当前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而外部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对扭亏增盈的重要意义。各亏损企业要积极主动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减少亏损，保证今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面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经营性亏损额下降15%至20%。

8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关于学习邯郸钢铁总厂加强管理的经验进一步抓好扭亏增盈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参考邯郸钢铁总厂的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提高效益，抓好扭亏增盈工作。

12日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应用技术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性研究这三个层次上，纵深部署科技工作，服务于国民经济近期和远期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要优先解决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技术难题；要重点抓好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技术改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问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第二，高新技术研究要在追踪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要切实把国务院批准的技术开发区办好，加快产业化步伐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其尽快发展和发挥作用。第三，基础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要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要积极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要十分尊重和爱护科技人才，创造有利于充分发挥科技人员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国家进一步扩大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

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生产企业搞好自营进出口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的具体政策主要包括：1. 经批准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以下简称自营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后，即获得对外法人资格。自营企业有权经营本企业（集团）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及生产所需技术、设备、零配件、原材料的进口业务。对具备条件的自营企业，可赋予其对外工程承包经营权。2. 各地方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自营企业要从各方面给予支持。3. 自营企业在国家有关进出口政策方面享有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待遇。4. 自营企业在完成上缴国家外汇任务后，有权按规定使用自有留成外汇和进行外汇调剂。5. 自营企业可在办理外汇结算业务的专业银行建立外汇和人民币流动资金账户。自营企业可设立出口风险基金。6. 自营企业根据外经贸业务需要，可自行确定本企业经常出入境的业务人员名额及名单，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实行一次性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的办法。7. 鼓励自营企业在境外设立维修服务网点，进一步简化有关审批手续。8. 自营企业要在国内外市场上创立商标信誉。9. 鼓励机电产品自营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努力增加出口创汇。10. 自营企业要严格遵守国家对外经贸政策、法规，接受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15 日　人民银行调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5 月 15 日起提高现行人民币存款和贷款利率。现行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 1991 年 4 月 21 日起实施的，在这之前，银行利率曾连续下调了三次。这次在时隔两年后再次调高利率。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公告规定，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由年利率 1.8%提高到 2.16%；定期存款年利率平均上调 2.18 个百分点。在存款利率调整的同时，银行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其中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由现行年利率 8.64%上调为 9.36%；技术改造贷款、基本建设贷款各档次利率也分别上调。

财政部提高国库券利率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国债优先的原则，保护国库券购买者的切身利益，财政部发出公告，决定在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调高后，将 1993 年 3 年期国库券的票面利率由 10%提高到 12.52%，五年期国库券的票面利率由 11%提高到 14.06%。五年期国库券期满三年

后，也可按三年期国库券条件兑付本息。公告发布前已发行的1993年国库券，也按新的利率计付利息，计息期不变，仍从3月1日开始。

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奠基

万家寨引黄工程位于晋西北的偏关县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交界的黄河北干流上，由万家寨水利枢纽和引黄入晋两部分组成，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水工程。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包括在黄河上修一座90米高、库容量8.9亿立方米的混凝土重力坝，坝后建一座装机容量108万千瓦、年发电26.5亿千瓦时的电站。引黄入晋工程包括总干渠、南干渠和北干渠，南向太原引水，北向大同、朔州市引水。总长314.5公里的干渠中隧洞达200公里。整个工程由山西、内蒙古和中央共同投资，预算总投资为96亿多元。

6 月

2日 江泽民谈当前的经济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为《当前的经济》的重要讲话。文章要点是：（一）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加强农业的政策措施，力争今年有个好收成。（二）加强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趋向合理。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关键是控制好货币和信贷两个闸门。（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抓紧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10日 我国研制成功光子扫描隧道显微镜

中科院北京电镜实验室和大连理工大学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光子扫描隧道显微镜。专家鉴定认为，该光子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分辨率达到10纳米，扫描范围达10微米×10微米，并具有多种图像采集与处理功能，主要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光子扫描隧道显微镜是国际上新近发展起来的一种探索物质微观结构的精密仪器。利用光子隧道效应，将很细的光纤探针接近样品表面扫描，从而获得样品表面微观结构的图像，突破了传统光学显微镜分辨率仅为半波长的限制，把分辨率提高到1%波长以上。

11日 宝钢三期工程自筹解决建设资金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与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就加强宝钢三期工程建设资金方面的合作等事项举行银企业务合作协议签字仪式。这一举动标志着宝钢建设将由国家投资改为企业自筹资金。宝钢决定委托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为三期工程筹措全额外汇资金，由其全面负责为宝钢三期工程争取出口信贷、商业贷款及其融资方式的一切工作，并且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帮助宝钢合理使用外汇资金，避免风险；在宝钢三期工程建设过程中如发生因"时间差"原因出现人民币建设资金缺口或外汇资金暂不到位的困难，建设银行将予以支持协助。经国家同意为宝钢三期工程发行的融资、筹资证券，将委托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代理发行。

12日 国务院要求集中资金保证重点

为了集中有限的资金保证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需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集中资金保证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需要。资金的分配和运用必须突出重

点：1. 要坚决保证今年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收购的资金需要，确保今年农副产品收购不打“白条”。2. 要保证国有重点企业正常生产和流通的资金需要。工商流动资金贷款，要按照“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的原则和调整结构的要求，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国有重点企业（包括外贸企业，以下同）生产和流通的需要。3. 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基建和技改）资金及时到位。

13 日—14 日　江泽民谈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西北地区经济发展

江泽民在西安主持西北五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在谈到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和全国一样，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多种原因，东西部地区在发展上存在着差距。对此，中央十分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应该认识到，这种差距是历史形成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要坚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政策上加以调整，创造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条件，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既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争取有效益的发展速度。要重视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件事办好了，对于西北经济的振兴将发挥重要作用。当前要集中力量办几件带动全局的大事，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交通、通信、水利等重点建设上。同时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坚持科技兴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了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国家要在政策上对西北地区给予支持。

15 日　地矿部通报我国地下水资源存在的突出问题

地矿部通报近年我国地下水的动态与发展趋势，指出当前地下水开发利用中突出的问题是超量开采和地下水质受到污染。目前我国地下水天然资源 8700 亿立方米/年，可采资源 2900 亿立方米/年。从开采情况看，1243 个地下水水源地已采 832 个，其中有扩大开采潜力的占 52%，基本平衡的占 25%，超采的占 17%。据对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地下水动态监测资料分析，地下水的总趋势是水位持续下降，资源量有所减少。初步统计超采区有 150 个，形成了区域性超采漏斗，最严重的是河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地下水水位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苏锡常地区较为严重。西北地区地下水水位下降，尤其是甘肃省的西峰市。因不合理开发地下水而诱发的环境地质问题，目前主要有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和海水入侵等。截至 1992 年，已发生地面沉降的城市有 36 座，大部分在沿海地带。上海和天津市区的地面沉降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苏州、无锡和常州市地面沉降局部有加剧的趋势。据对全国 70 多座主要城市监测分析，地下水水质总体质量较好，部分城市受到点污染和局部污染。

19 日　国务院清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

国务院召开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话会议，宣布第一批取消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 37 个集资、基金、收费项目，同时宣布要纠正强制性、摊派性和“搭车”收费的有关政策和要求，取消省级以下自行出台的农民负担文件和项目。今后国家机关任何部门、单位都无权向下发布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应该发的也只由农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其余一律无效。中办、国办为此发出紧急通知，要求

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要在6月底以前把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清理完毕。

5月中旬，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进一步部署中央国家机关清理审核涉农负担文件和项目工作，并由农业部、监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局组成审核小组，对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93个收费、集资和基金项目进行了认真审核。

5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农业部通过新闻机构向社会公布了应取消的43项农村达标升级活动和应纠正的10种错误的收费与管理方法。这次会议对下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提出了七条要求：1. 不折不扣地贯彻这次电话会议精神。2. 抓紧进行省一级文件和项目的清理审核工作。3. 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督促检查。4. 注意抓好正反两方面的典型。5. 搞好试点，建立科学的农民负担管理制度，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走上法制轨道。6. 进一步开展《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宣传活动。7. 坚持不懈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22日　我国研制成功银河全数字仿真—Ⅱ计算机

"银河全数字仿真—Ⅱ"计算机通过国家鉴定。专家认为，这一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完成，表明我国仿真机研制能力已跨入国际领先行列。计算机仿真是用计算机系统模拟物理系统的一项高科技。高性能仿真计算机，在航空、航天、兵器、交通、能源、化工等领域的大型和超大型实时仿真中，有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发达国家重点开发的高科技产品。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仿真—Ⅱ"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用于动态连续系统仿真的计算机系统。各项技术指标优于国际同类机型，性能价格比高，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为实现产业化、打入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23日　国家计委建立经济信息和新闻发布会制度

国家计委正式建立经济信息和新闻发布会制度。在第一次信息发布会上，国家计委通报了上半年的经济情况：整个经济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生产、建设、流通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全面发展。国家对重点建设工程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工程建设进展较快。我国经济在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某些方面还比较突出。宏观经济环境较紧。货币投放偏多，居民储蓄增长缓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结构不尽合理。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过快。重点工程建设资金到位率较低。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部分城市物价上涨较多。只要宏观调控措施得当，出现的问题可以逐步解决或缓解，预测下半年国民经济仍可以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意见》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这些措施为：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要把住基础货币投放这个闸门，严格控制社会需求的过快增长，认真整顿金融秩序。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人民银行要停止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已经发放的贷款要限期收回。银行间的正常资金拆借，要严格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的用途、期限、利率进行。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序的同业拆借市场，使资金拆借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三、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加强利率管理，严格执行人民银行的

法定利率，不得在规定利率水平和浮动的幅度以外收取手续费。四、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对未经授权部门批准的各种形式的集资，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集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的有关规定。五、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各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年度信贷计划执行，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六、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任何地方、部门不准干扰专业银行为保证支付而进行的资金调度。七、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中国人民银行要通过改革，真正成为对全国信贷、货币进行宏观调控和统一管理各类金融机构的中央银行。贷款规模调控权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坚决取缔非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举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实体要与银行彻底脱钩。八、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配套。尽快建立政策性银行，逐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九、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十、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十一、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十三、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的漏洞。十四、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项目，要下决心停缓建。十五、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十六、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

7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10个调查组，前往20个省、市、自治区，督促检查各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的情况。

25日　朱镕基指出对副食品产销要加强宏观调控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听取全国“菜篮子工程”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菜篮子工程”建设所取得的明显成就，同时也指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还存在一些隐忧，有些同志片面认为，搞市场经济，价格一放开、把农产品推向市场，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忽视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减少对农业和副食品生产的投入，农业资金外流。各地要按照这次会议精神，重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切实加以解决。国家扶持副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各项优惠政策不能变，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优惠政策也不要变。要稳定对农业、对“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投入。在副食品产销上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手段。他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副食品生产、流通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政府要转变职能，充分行使执法、监督的职责和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责。今后，政府要把握总量平衡，努力做到供给和价格波动不能太大。要改革过去政府包揽的做法，但不是撒手不管。宏观调控手段主要包括投资、信贷、财政、税收、储备等等，这些手段的使用也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进行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把生产风险基金和价格平准基金制度建立起来。

26日　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提出要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

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布《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民营科技型企业是我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科技人员解放和开拓科技第一生产力的生动创造。目前，全国民营科技型企业总数已超过3万家。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主要行业，加上国有民营科技型企业，其数量和规模已在我国科技先导

型企业中占有相当比例。《决定》指出，新的历史时期要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力促进和引导各类民营科技型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鼓励国有科技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探索国有民营的发展模式，引导乡镇企业发挥民营优势，向依靠科技进步转轨，发展国有国营科技企业与各类民营科技型企业并存互补的格局。《决定》认为，今后新创办的民营科技型企业，要在明确产权关系基础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决定》强调，要充分肯定民营科技型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改变过去单纯按照所有制性质制定政策、管理企业的作法，切实为各类民营科技型企业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平等竞争创造条件。

我国首次在境内发行外币债券

经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批准，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委托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在我国境内发行 4000 万美元外币企业债券。债券到期后以美元一次还本付息。发行对象为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发行结束后，该债券在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NET 系统）上市流通。在境内发行外币债券在我国尚属首次。目前国内居民外币储蓄总额已达 100 亿美元，加上手持外币，其总额大约相当于国家外汇储备总量的 20%以上。通过试点探索建立国内企业在境内筹集外汇资金的有效市场机制，将能吸引大量滞留境外和沉淀国内的外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直接用于生产建设的外汇资金总量。此外，还将有利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接。

27 日　国务院决定开展全国第三产业普查

国务院决定从 1993 年开始，对全国第三产业进行一次普查，以便摸清我国第三产业的底数，为制定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提供全面真实的基础资料；同时也为完善今后经常性的规范统计，向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渡创造条件。

28 日　国务院决定修改《自然科学奖励条例》、《发明奖励条例》和《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

根据这个决定，修改后的《自然科学奖励条例》、《发明奖励条例》分别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四个等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级。奖金数额，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另行规定。此外，还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第九条，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的条文顺序作相应的调整。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修正后，于 7 月 15 日由国务院重新发布。

29 日　国务院要求三峡工程建设实行开发性移民

朱基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草案）》。会议认为，长江三峡工程是一项跨世纪的特大型工程，涉及 100 多万移民。移民安置工作不仅关系到移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三峡库区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了做好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的移民安置工作，保证三峡工程的顺利进行，促进三峡库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制定《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草案）》是十分必要的。《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实行开发性

移民的方针，由有关人民政府组织领导移民安置工作，统筹使用移民经费，合理开发资源，以农业为基础，农工商结合，通过多渠道、多产业、多形式、多方法妥善安置移民，使移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并为三峡库区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移民生活的提高创造条件。《条例（草案）》对移民安置、淹没区和安置区的管理及各项优惠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

国务院颁布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16号令，颁布《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条例》规定，村庄、集镇规划由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村庄、集镇规划的编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要求，以及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历史情况等，统筹兼顾，综合部署村庄和集镇的各项建设；（二）处理好近期建设与远景发展、改造与新建的关系，使村庄、集镇的性质和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标准，同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相适应；（三）合理用地，节约用地，各项建设应当相对集中，充分利用原有建设用地，新建、扩建工程及住宅应当尽量不占用耕地和林地；（四）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合理安排住宅、乡（镇）村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等的建设布局，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并适当留有发展余地；（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绿化和村容镇貌、环境卫生建设。村庄、集镇规划的编制，应当以县域规划、农业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并同有关部门的专业规划相协调。村庄、集镇总体规划和集镇建设规划，须经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同意，由乡级人民政府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村庄建设规划，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由乡级人民政府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本条例自1993年11月1日起施行。

7　月

1日　新财务会计制度开始实施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颁布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从7月1日起施行。新财务会计制度的实施使我国财务会计制度实现了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企业财务通则》共12章46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资金筹集、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及其他资产、对外投资、成本和费用、营业收入和利润及其分配、外币业务、企业清算、财务报告与财务评价等。《企业财务通则》统一了不同企业的财务制度，对现行的财务制度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改革：建立资本金制度；取消资金专户储存办法；改革折旧制度；改革成本管理制度；建立新的企业财务指标体系。

《企业会计准则》共有10章66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一般原则、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财务报告等。《企业会计准则》与现行会计核算制度相比，突破了传统的会计核算管理模式；规定了我国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会计等式和会计报表体系；改革了现行的成本计算的完全成本法，采用制造成

本法；对稳健性在我国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作了规定。

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共分总则、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高技术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研究开发机构、科学技术工作者、科学技术进步的保障措施、科学技术奖励、法律责任等10章。该法明确提出，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国家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使科学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和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保护知识产权。国家根据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改革和完善科学技术体制，建立科学技术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国家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推广应用科学技术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技术产业，以及应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活动。国家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该法自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颁布

江泽民签署第五号令，公布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93年7月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该法提出：国家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教育，振兴农村经济，加快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益的农业。农业技术推广应当遵循下列原则：1. 有利于农业的发展；2. 尊重农业劳动者的意愿；3. 因地制宜，经过试验、示范；4. 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扶持；5. 实行科研单位、有关学校、推广机构与群众性科技组织、科技人员、农业劳动者相结合；6. 讲求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国家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开发、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鼓励和支持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鼓励和支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技术推广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以及科技人员，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等形式提供农业技术的，可以实行有偿服务，其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推广农业技术所需的经费，由政府财政拨给。国家对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和改善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业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他们的待遇，依照国家规定给予补贴，保持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专业科技人员的稳定。对在乡、村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业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应当以考核其推广工作的业务技术水平和实绩为主。该法还对其他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颁布

江泽民签署第六号令，公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93年7月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该法共有9章66条。该法提出，国家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努力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开发、利用农村劳动力、土地和各种资源，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应，满足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建设共同富裕的文明的新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该法还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农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振兴农村经济。国家稳定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国家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教育振兴农业。国家发展水利事业和农用生产资料工业，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提供物质保障。国家对发展农业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农业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统一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支持农业，做好发展农业和为发展农业服务的各项工作。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国家保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摊派。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集资必须实行自愿原则，不得强制集资。各级人民政府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支持农业的发展，转移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该法还对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业投入、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等做出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

江泽民签署第七号令，公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1993 年 7 月 2 日通过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为了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决定》针对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生产和销售假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生产和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生产和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产品或者其他产品；生产和销售假农药、假兽药、假化肥，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冒充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对与刑法有关处罚条款作了补充规定，明确了处罚的范围和标准。

6 日　国家计委批准的实行计划单列的企业集团累计达到 25 家

国家计委批准 10 家企业集团实行国家计划单列。至此，已有 25 家企业集团纳入了国家计划单列。

企业集团计划单列工作，始于 1987 年，其主要目的，一是使企业集团的发展适应政企分开的发展方向，淡化行政隶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条块”束缚；二是突破所谓“三不变”，为推动企业法人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尽可能提供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三是探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由单纯依赖行政部门向同时依靠经济组织转变，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计划单列的实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话”。通过计划单列的形式，既使企业集团获得大量的宏观经济信息；又使国家宏观决策有了依据，并将国家的宏观

调控意图通过企业集团贯彻下去，带动和影响一批中小企业。其次是“扩权”。企业集团计划单列后，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技术引进和境外投资等方面享有更大的决策权。第三是“支持”。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重大问题，可以直接要求国家出面协调，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计划单列企业集团一定倾斜，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资金和物资上的必要帮助。为此，国家曾先后批准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东风汽车集团、重型汽车集团、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上海电气设备集团、中国西电集团、东北输变电集团、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集团、长城计算机集团、长江计算机集团、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华能集团、非金属矿集团、新型建筑材料集团等15家企业集团实行计划单列。这次又批准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宝钢集团、鞍钢集团、攀钢集团、仪征化纤集团、中国东北电力集团、东北内蒙古煤炭集团、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耀华玻璃集团、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等10家企业集团实行计划单列。

7日　朱镕基提出整顿金融秩序要约法三章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强调指出，加强宏观调控，不是实行全面紧缩，是进行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解决“瓶径”制约是当务之急。必须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迅速调整资金投向，确保工农业生产和基础建设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整顿金融秩序，把金融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是当前强化宏观调控的关键。要执行“约法三章”：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限期收回。二、不得变相提高存款利率，不准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搞“储蓄大战”。不准向贷款对象收取回扣。三、立即停止银行向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资金，要与自己兴办的经济实体彻底脱钩。通过改革，必须建立起一个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统一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系，建立一个中央银行领导下的国家政策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一个统一、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

国务院证券委发布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的《办法》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并履行相关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设立证券交易所，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以下简称“证券委”）审核，报国务院批准。证券交易所有严重违法行为，由证券委作出解散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证券交易所应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提供便利条件，以保证证券交易的正常运行。证券交易所对股票上市、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符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办法》还对证券交易所的职责、组织、监督、对证券交易的监管、违规的处罚等做出规定。

10日　我国研制成功低能强渣脉冲相对论电子束加速器

由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研制成功的这台“闪光Ⅱ号”电子束加速器，具有高束流、低阻抗、结构工艺先进等特点，最大电流达100万安培、功率为1万亿瓦、脉宽小于千万分之一秒，并在高功率开关、高电压绝缘、预脉冲电压抑制、电子束束斑面积大小控制等方面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这项国家重点高科技攻关项目的完成，使我

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跨入该领域国际先进行列的又一国家。作为强脉冲射线束物理试验模拟源，低能强流脉冲相对论电子束加速器可以模拟脉冲电子束、X射线、电磁效应等多种重要物理现象，在航空、航天、能源、激光、材料技术、高功率微波等领域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人民银行决定再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并实行储蓄存款保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7月11日起，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并对3年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年利率由2.16%提高到3.15%；定期存款年利率平均上调1.7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的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定活两便和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也相应上调。相应的，各项贷款年利率在现行基础上平均上调1.38个百分点。

财政部发布调整1993年国库券利率并实行保值的公告

为了保护广大国库券投资者的利益，国务院决定在储蓄存款利率上调的同时，相应调整1993年国库券利率；并对1992年和1993年发行的国库券实行保值。1993年发行的3年期和5年期国库券的年利率分别从12.52%和14.06%调高到13.96%和15.86%，调高后的国库券年利率仍分别比同期限储蓄存款利率高出1.72和2个百分点。

16日　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新开工项目资金来源审计

根据国务院《关于集中资金保证当前经济工作重点需要的通知》的要求，审计署、国家计委、国务院经贸委、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等5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新开工建设项目资金来源的审计。通知指出，全民所有制单位今年新开工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其资金来源必须按照规定报送审计机关进行审计。未经审计已开工的基本建设项目要限期办理资金来源审计。审计的重点是建设项目的资金是否落实和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资金来源中发现有银行拆借资金、银行投资、以银行贷款作自筹资金、未经批准的社会集资等，均属资金来源不符合国家规定。企业以留用资金和自行筹措的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的项目，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规定，应有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的验资证明。凡资金来源未经审计的建设项目，审批建设项目开工机关不予办理开工手续；建委不予核发施工执照；银行不予拨付工程用款。

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

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上海市长黄菊分别任正副主任。这一重大举措，表明上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上海市国有资产的宏观管理调控，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而确保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上海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转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市国资委，它是上海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总代表，依法拥有上海全部国有资产，并对其行使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四项权能。第二个层次由市国资委组建若干市一级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授权给这些管理公司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机构，行使所有权。第三个层次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把不同份额的国有资产投入到各个经营性企业，从而形成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通过这三类公司依法自主经营，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

值。

21日 国家教委将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和一批学科点

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面向21世纪，用10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原来国家教委确定的重点大学不作变动。这个规划被称为“211工程”。规划的中心任务是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211工程”将采取分期分批滚动实施的办法。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的筹措，采取国家投资和多渠道集资相结合的方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成立“211工程”协调小组，负责工程的宏观决策和指导。工程建设项目的立项，采取专家咨询和行政部门决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立项程序分为预审、预备立项、评审和批准立项等4个主要步骤，按照国家教委统一部署进行。列入“211工程”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实行项目目标管理。

22日 江泽民谈机构改革

江泽民与出席全国机构改革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江泽民指出，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是这次机构改革的目标。它们是紧密结合的整体，其中转变职能是第一位的，是机构改革工作中的关键。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要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方面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把属于企业的自主权切实下放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实转移给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搞好总量平衡与综合协调，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产生红外自由电子激光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制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已成功地产生了红外受激辐射，由此诞生了亚洲第一束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这标志着我国激光和加速器研究获突破性进展，自由电子激光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被科学家们誉为“希望之光”的自由电子激光（FEL）在医学、光化学、通讯、光刻、生物及半导体研究等方面具有广阔应用前景，是近年来发展的尖端科学技术。与一般激光相比，它具有波长连续可调，输出功率不受工作物质发热的限制，可产生PS量级光脉冲等特性；与一般同步辐射相比，它产生的是高亮度的相干辐射，而产生高亮度、波长可调的相干辐射正是下一代光源发展的方向。FEL被称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它对推动科学技术、工业应用及军事技术等向更高层次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全国土地管理厅局长会议提出加强土地宏观管理十条措施

全国土地管理厅局长会议指出，当前土地管理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一些地区大量越权批地，多头批地，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得不到很好的落实。二是国有土地的不合法交易，造成地产市场畸形发展。三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严重滞后。四是土地出让价

格随意性很大，大量以协议方式供地，给炒卖房地产以可乘之机，使大量国有土地收益流入“炒家”手中。五是有的地方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失控，致使房地产开发企业过多过滥。六是投资结构不合理，建高档宾馆、写字楼、度假村等过多，严重影响了国家资金的正常投向和运作。解决目前房地产市场中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为了加强土地管理，制止炒卖房地产，惩治投机行为，必须采取以下十项措施：一要强化建设用地的计划管理。二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文件，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由政府垄断。政府对土地出让的垄断，要体现在对土地开发实行统一规划征地、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上。三要适应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需要，改革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四要尽快改革供地方式。今后，除党政机关办公用地、军事用地、公共公益事业及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等用地外，都要实行出让方式，并以招标、拍卖为主，尽量减少协议出让。五是对成片开发出让土地和开发区建设要严格控制。六要清理检查土地自发交易行为，加强行政划拨土地使用权的管理。七要加强土地估价工作。八要加强土地税（费）征收工作，充分发挥税收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九要加强土地登记工作，通过登记确认权属，不经登记不受法律保护。对未办理登记的土地，政府有权收回。十要强化土地执法监督手段，充分发挥土地监察对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职能作用。

国务院成立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

为了加强对全国反走私斗争的领导，国务院决定，将原全国打击走私协调小组改为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23日　朱镕基提出财税部门要约法三章

朱镕基副总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税务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财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整顿财税秩序，加快财税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进行整顿，在整顿的基础上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要遵循四个原则：一是要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新的财税体制。要统一认识，制定方案，尽快全面推行；二是要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和两类税收分别征收管理；三是要在明确财政职能，进一步下放财政支出责权的基础上，划分税种、保证中央必要的支出；四是要按《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来规范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朱镕基在讲话中严肃提出财税部门的“约法三章”，要求各级财税部门严格遵守。第一，要严格控制税收减免。今年内不再出台新的减免税政策，临时性、困难性减免税要一律停止。凡减免税期已满的应立即恢复征税。各地越权自定的减免税收政策，要坚决按中央要求立即停止执行，并进行清理。第二，要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停止向银行挂账。财政工作要坚持量力而行、收支平衡的原则，财政赤字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不能向银行透支。地方预算要严格按《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的要求，不能安排赤字。第三，今后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要立即清理各种财政信用放贷，对用财政资金放高利贷的，要立即纠正。财税部门办的各种公司，特别是金融性公司，一律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今后无论谁违犯这“约法三章”，都要严加查处。

朱镕基提出企业要苦练内功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对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贯彻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一份调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全文如下："国务院颁布《条例》已届一年，贯彻落实《条例》也初见成效。《条例》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块基石，认真贯彻《条例》就会收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效果。各部门、各地区和许多企业为贯彻《条例》做了大量工作，形势很好。但是也有个别部门、地区在机构改革、职能转换方面，墨守成规，停滞不前；同时不少企业不适当地强调放权让利，不要约束和监管，忽视了眼睛向内，苦练内功。这些都是应该纠正的偏向。《条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明确产权关系、资产监管形式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法规，为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进行新的探索。"

26日　国务院审查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

受李鹏总理的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查批准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枢纽工程）》，至此，长江三峡工程建设进入正式施工准备阶段。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工程规模巨大，综合效益显著，举世瞩目。《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枢纽工程）》，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审查通过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于1993年第一季度编制完成的。报告共分11卷（综合说明、水文、地质、规划、枢纽布置和建筑物设计、机电、施工、概算、工程泥沙问题、经济评价、环境保护），300万字。1993年5月13日至25日，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聘请116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报告》进行了专家初审，并提出了审查意见。根据这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将采用"明渠通航，三期导流"的施工方案；单机容量由68万千瓦增加到70万千瓦，装机总规模则由1768万千瓦增加到1820万千瓦，增加了52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由840亿千瓦时，增加到847亿千瓦时；施工总工期和发电工期比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前一年，总工期为17年，首批发电工期为第11年；枢纽工程概算控制在500.9亿元（按1993年5月价格水平）以内。

上海石化股票在纽约暨港挂牌

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全球发行的16.8亿元H股同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这是首家中国公司股票在全球市场发行，是首家中国公司股票直接在美国市场挂牌交易，是亚洲最大的一笔新股在海外发行。按照1992年的销售额计算，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石化企业，也是中国第9大工业企业。1992年该公司的净销售总额达51.77亿元。

28日　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要求加强国有资产实物投入境外的管理

为加强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颁发了《关于用国有资产实物投入境外开办企业的有关规定》。《规

定》指出，今后凡是用国有资产实物作为资本到境外投资创办企业的国内投资单位，必须按照《国有资产评估条例》的有关规定精神，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报境外投资项目的资产评估立项，进行资产评估。经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授权部门批准设立的境外实物投资项目，要在获得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和授权部门颁发允许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的批准证书之后，由境内投资单位负责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立案登记和国有资产实物境外投资出口核验手续，以加强国有资产向外投资备案登记管理。《规定》要求，在境内投资单位拟将国有资产实物运往境外时，必须向海关部门出具国有资产实物境外投资出口核验表，并经海关部门对该表批注核对后予以放行。办理国有资产实物境外投资出口核验手续的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授权。

国家工商局发布商品交易市场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商品交易市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为商品市场登记管理而颁布的第一个行政性规章。这个《办法》所指的市场是有固定场所、设施，有若干个经营者人场实行集中、公开交易的各类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市场（不包括期货市场)。《办法》规定，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城镇的居民委员会、乡村的村民委员会均可成为市场的开办单位。

30日　北京仿真中心通过验收

目前亚洲规模最大、总体水平属世界一流的北京仿真中心正式通过国家验收。这标志着我国仿真技术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江泽民、李鹏等分别题词表示祝贺。江泽民总书记的题词是“发展我国仿真技术，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李鹏总理的题词是“发展系统仿真技术，为科技现代化做出新贡献”。北京仿真中心属于国家“七五”重点工程。北京仿真中心自1984年被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按照边建设边使用早见效的原则，在建设过程中已成功地为运载火箭等多种新型号的航天器及电力工业进行了仿真试验。

8　月

1日　朱镕基谈加强外汇市场管理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全国分局长会议上指出，当前外汇调剂市场的人民币汇率趋于合理，基本稳定，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强化宏观调控的措施已初见成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外汇调剂市场人民币汇价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今年以来，跌势加剧，6月中由年初的1美元兑换7.4元跌至接近11元。这种情况既给进出口企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又加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了海外投资者的信心。6月底在国务院采取一系列强化宏观调控的措施后，从7月1日开始，人民币汇价迅即回升，目前基本稳定在1美元兑换8.8元人民币左右。这个价位基本上是市场供求关系平衡的结果，既有利于促进进出口贸易，也有利于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保证重点项目用汇。继续采取调控措施，促使汇价稳定在目前的合理水平，是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一是要继续进行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适度干预，提高调控艺术，讲求调控效果，满足客户需求；二是要切实保证完成按市价收购上缴外汇的任务，该收的外汇一定要收上来，为实现市场调控创造条件；三是要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管理和监督，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调控用汇方向，严禁场外交易，打击外汇黑市；四是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体系，扩大外汇市场的覆盖范围，实现全国联网统一规则，统一报价，互相调剂的目标。加强外汇管理，要有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干部队伍。他肯定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汇管理干部提出的“约法三章”：第一，严禁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倒买倒卖外汇活动；第二，严禁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调剂外汇权、审批权、外债监管权和机构管理权等谋求出国指标、收受礼品等好处；第三，严禁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越权办理减免上缴中央外汇等外汇业务。

国务院发布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进行检举。水土流失防治区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实行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责任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批准的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专项资金，组织实施，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安排水土流失地区的部分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农业发展基金等资金，用于水土保持。《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条例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定，国家计委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拟订全国企业债券发行的年度规模和规模内的各项指标，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执行。未经国务院同意，任何地方、部门不得擅自突破企业债券发行的年度规模，并不得擅自调整年度规模内的各项指标。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必须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审批；未经批准的，不得擅自发行和变相发行企业债券。中央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批；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会同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审批。《条例》还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必须符合的条件、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的章程、企业申请发行企业债券时应当向审批机关报送的文件、企业债券的利率、企业债券的营销以及监管等作出规定。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 年 3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6 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税收管理和严控减免税收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税收管理和严格控制减免税收的通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税收（包括关税）减免。今年内国家不再出台新的减免税政策，临时性、困难性减免税一律暂停审批。属政策规定减免税的，严格按税收管理体制审批，凡政策规定减免税到期的，立即恢复征税。严格个人收入调节税代扣代缴制度。严格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管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律不得减免。要认真清理违法越权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违反税法规定和国家政策，超越权限自行制定的各类税收优

惠政策（包括涉外税收政策），一律无效。凡未经国务院批准的各类经济开发区，一律不得享受国家规定的国家级开发区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坚决纠正承包流转税的做法。国务院要求对欠缴税款的必须严格执行加收滞纳金制度；拖欠税款不缴的由税务部门或海关通知银行扣缴入库。各地严格执行“两票两单”（专用税票、进货发票，出口报关单、收汇核销单）制度，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退。切实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征管。对各地和各部门成立的各类银行、金融、保险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必须按国家规定征收所得税。今后各地和各部门新成立的各类银行、金融、保险企业，其所得税一律上交中央财政。严格加强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征收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擅自减免“两金”。对漏缴、欠缴“两金”的，要限期补缴。

12 日　全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会议提出转制中必须抓好的工作

国家经贸委召开全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贯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必须抓好十个方面的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尽快出台养老、医疗、工伤保险制度；认真解决政府机构改革中出现的“翻牌公司”和“拉郎配”集团问题；抓紧进行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等项配套改革。引导企业眼睛向内，苦练内功。继续推进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增选一批大中型企业进行清产核资试点，解决部分亏损挂账、潜亏。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对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市场容量大的产业，发展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企业集团；对规模较大，而又布局分散、产品独立、长期经济效益低下的企业，划小核算单位，分而治之；对整体优势递减、局部还有优势的大企业，可分成几个部分，分块搞活；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资不抵债的企业，采取“关、停、并、转、包、租、卖、破”的方式，优胜劣汰；对债务负担特别严重的，可先破产，后兼并。用1995 年前的三年时间，把 2/3 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活并推向市场；再用两年时间将其余盈利型企业分期分批逐个推向市场。

14 日　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0 月 1 日起施行。《暂行条例》对国家公务员的义务与权利、职位分类、录用、考核、奖励、职务升降、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管理与监督等作了规定。

15 日　建设部等部门要求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

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税务总局 4 个部门联合签发了《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提出 7 个方面的意见；一、加强对国有土地出让的计划、规划管理，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二、调整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确保为重点建设配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城镇职工住宅。三、对房地产开发经营机构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管理。四、采取有力措施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坚决制止炒卖房地产牟取暴利。五、合理调节收益分配，防止国家收益流失。国有土地出让金和土地收益金必须按现行财政体制，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管理。六、推进城镇住宅建设，加快解决困难户住房的步伐。开发公司都要承担相当于所开发的商品房面积 20%以上的微利居民住宅建设任务。七、加强对外商投

资房地产的管理。外商开发经营房地产应结合建设项目进行，以国家规定的鼓励类项目相配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主。

16日　国家计委提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的措施

为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国家计委提出了7个方面的具体措施：一、当前要从规范投资行为入手，运用经济办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立足调整投资结构，分清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把那些该压缩的投资压下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二、各地区、各部门要对所有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审核排队，予以清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在建项目，特别是高档宾馆、写字楼、度假村等项目要认真进行清理，并区别情况停缓建设。三、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今年9月底，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资金到位占年度计划的总比例，要力争不低于70%。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自筹建设资金，也要优先保证计划内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四、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下半年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开工项目。五、加强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开发区建设的管理。六、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引导和规范管理。七、完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管办法。当前要加强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管工作，各地不得越权减免，税务部门要严格把关。

17日　国务院要求在物价改革中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控体系，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国家、企业和个人可承受的范围内，国务院发出《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的通知》，就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作出12项规定：一、严格控制国家管理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提价。今年除按计划提高铁路货物运价和整顿电价，并严格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执行外，各级人民政府不许搭车涨价和超出标准自行加价。二、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的价格，年内不再提高。对已经决定在下半年出台的调价项目，年内暂不出台。三、有关部门准备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凡可能对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今年内暂不出台；非出台不可的，要会同物价管理部门共同研究，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物价的冲击。四、各级人民政府为平抑市场物价已经安排的财政补贴，不得减少。五、各地区、各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控制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一些放开价格的副食品，价格上涨过猛时，要实行最高限价。六、对部分城市出现的商界或企业联手提价、压价和拒销等行为要加以制止，防止价格垄断的出现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七、要进一步落实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各地制定的保护价水平不得低于国务院制定的基准价。八、要加强对服务收费的管理。九、要加强对房地产价格的管理。十、建立提价备案制度和定期审价制度。十一、坚持已经形成的价格监测报告制度，加强信息发布制度，正确引导企业的经营方向和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十二、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物价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2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90年代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90年代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会议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制定过一系列的重要文件。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了90年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明确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了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决定》，加强对农业宏观上的指导和协调，有必要起草一个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农业上新台阶的可行措施，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进一步扩大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以实现200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目标。《90年代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分十个部分，即：90年代农业发展的目标和指导思想；90年代农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土地和各种农业资源的单位产出率；加强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强农业发展支撑体系建设；广辟农业投资渠道，增加农业建设资金；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领导，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会议决定，将其补充修改后由国务院发布。

23日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提出尊重价值规律稳定发展棉花生产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棉花产销最终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子，但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必须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稳步推进棉花流通体制的改革。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都不会降低对棉花工作的重视程度，对棉花政策的调整也十分慎重。当前对棉花的计划管理不能削弱，这不等于不要尊重价值规律。当供求之间发生矛盾时，首先应考虑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根据目前状况，如果不提高棉花收购价格，价值规律的作用势必使棉花生产受到更大冲击。尊重价值规律，不仅仅表现在提价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棉花单产和抗灾能力，也是重要的措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可着手进行三项工作：建立完善的棉花储备体系和棉花风险基金，掌握平抑市场波动的主动权；进行棉产区和销区企业间的产、销定货试点工作，以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和畅通的购销渠道；建立健全棉花的质量保证体系。国务院决定提高棉花收购价格。本年度将现行标准级皮辊棉由每50公斤300元提高到330元（国家加价款数量不变），1994年起将结合调整等级差价再次提高棉花价格。

全国扭亏增盈工作会议召开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联合召开全国扭亏增盈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扭亏增盈不仅是个微观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宏观问题。1993年的扭亏目标是，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经营性亏损面减少5个百分点，争取亏损额下降20%。石油、煤炭、军工行业的政策性亏损，由国家制定政策，逐步理顺价格，挖掘企业潜力，力争减少亏损。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要坚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对亏损继续增加的企业，要减发厂（矿）长、经理和有关人员的工资，限期达不到减亏、扭亏目标的，要追究领导人责任。今后的扭亏增盈工作，应该在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加强管理方面大做文章。

24日 国务院要求严控财政支出和集团消费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社会集团购买力过快增长的通知》。《通知》

强调：一、严格预算管理，地方财政不准打赤字。二、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设备购置要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控购指标，不得突破。三、严格控制会议费支出。会议经费，要在预算基础上压缩20%。四、严格控制出国活动。五、严格控制各种招商办展活动。从现在起，境内招商办展活动要由省政府统一管理。境外招商办展活动，一律要经外经贸部批准。无论境内境外招商办展，都必须注重实效，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力戒过多过滥。六、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禁止滥发补贴、实物和代币购物券。

28日　江泽民谈深化改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江泽民在大连召开的华北、东北部分大中型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对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江泽民指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重点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条例》，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条例》赋予企业的权力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确保企业的法人地位和经营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要充分利用《条例》创造的环境和条件，眼睛向内、苦练内功，要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推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走内涵扩大生产的路子。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建设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第二，加快配套改革，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加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可控的要求，大力发展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发展技术、信息、劳务等市场，尽快形成健全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要通过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担，增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加快国有资产产权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的立法工作，理顺产权关系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责任制度明确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

太原煤炭交易市场开业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市场开业。这一市场是在国家计委、经贸委的指导下，由煤炭部、内贸部、铁道部、交通部和山西省政府共同组建的国家级煤炭交易市场。1992年以来，沈阳、上海、天津、郑州、秦皇岛等地市陆续建立了一些不同类型和等级的煤炭市场，但还远远适应不了煤炭生产发展、流通和消费的需要。山西是国家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是我国最大的煤炭生产省和调出省。它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25%以上，调出量占全国的78%以上，而且煤炭品种全、质量高、销售面广，因此在山西组建国家级煤

炭交易市场，不论从全国煤炭市场的布局看，还是从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看，都是十分必要的。市场实行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总裁三级管理，在国家和省宏观指导下开展工作。对于国家计划管理的煤炭，在市场内以价格洽谈进行交易；对国家放开的煤炭，供需双方根据国家控制的配额和限额全过程进行交易。

29 日　江泽民谈深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

江泽民在华北、东北八省（区、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实行两个月来，取得初步成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真正落实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还要做大量深入、扎实、艰苦的工作。第一，要进一步统一全党、全社会的认识。这次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运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目的是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到令行禁止，确保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在经济工作中，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把发展经济的着眼点和着力点真正放在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推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上来。第二，要注意研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继续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在整顿金融秩序工作中，必须堵邪门、开正门。一方面要坚决制止违章拆借和非法集资，另一方面要确保必需的资金及时到位，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要下决心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各地必须按照中央要求，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清理，决不能把资金缺口留在国家必保的重点上。要切实落实“三保”措施，保农业生产、保效益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外贸出口创汇企业、保重点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实施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过程中，特别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二是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江泽民指出，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特别要抓紧进行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完善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要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的立法工作，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必须把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要通过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

30 日—31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金融、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外贸改革总体方案

李鹏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金融、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外贸改革总体方案。会议讨论认为，这几项改革方案，是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讨论修改形成的，总体上符合改革方向，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将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法制化建设和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原则通过了这几项总体改革方案，并确定，待进一步修改后，报请中央审议。

这几方面的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如期进行。

31日　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继7月20日反应堆堆芯达到临界状态（即反应堆启动）后，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必要的试验。8月31日21时26分并网发电成功。并网功率为4.5万千瓦。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它是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与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合资建造的，具有80年代后期国际先进水平。大亚湾核电站装有两台90万千瓦的压水堆型机组，一号机组于1987年8月7日浇注第一罐混凝土，二号机组于1988年4月7日浇注第一罐混凝土，全部工程将于1994年6月份完成，其中一号机组将于1993年年底以前投入商业运行。大亚湾核电站是目前我国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两台机组全部投入商业运行后，年发电量可达100亿至126亿度。

9　月

1日—4日　全国产业政策工作会议提出新形势下产业政策基本要求

全国产业政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产业政策工作提出四项基本要求：一、把握全局，突出重点。制定产业政策要遵循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努力把握今后一个时期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点产业，首先抓好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性产业，合理布局，发挥优势，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二、了解市场，适应市场，引导市场，调控市场。一方面要支持和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要求，通过自觉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三、多方配合，统一决策。国家计委将承担全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其他有关综合经济部门和专业部门也承担相应职责。四、强化基础，规范制度。近期产业政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党的十四大关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抓紧制定出我国90年代产业政策纲要和交通运输、汽车工业等专项产业政策；认真研究制定若干重要产品的经济规模标准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研究提出实施产业政策的保障政策和制度，报国务院审定。

2日　劳动部等部门联合出台扶持劳服企业发展政策

劳动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人事部、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十部委局联合签署《关于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安置富余人员若干问题的通知》。发展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是我国安置就业工作中独特的有效的方式。《通知》根据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部署，确定了劳服企业在90年代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了90年代劳服企业发展的行动纲领。《通知》给予劳服企业发展以扶持和优惠政策，如给予发展三产一定的进出口权；允许发展股份合作制；在减免税、贷款、技术职称评定、建设企业场地、国家固定资产有偿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

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颁布

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公布了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法收人。”订立经济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经济合同的无效，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国家根据需要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的，有关企业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签订合同。”此外，还对购销、建设工程承包、加工承揽、货物运输、供用电、仓储保管、财产租赁、借款、财产保险以及其他经济合同和合同担保、纠纷的处理等方面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本法自 199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

江泽民签署命令，公布了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一）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四）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不得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侵犯商业秘密。此外，该法还对不正当竞争的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该法自 199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4 日　太行山绿化工程启动

太行山绿化工程是我国继一亿亩速生丰产林基地和“三北”、“长江中上游”、“沿海”、“平原农田”防护林体系以及全国治沙工程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之后，又一个大型生态建设工程。1984 年国务院就委托国家计委审核批准了《太行山绿化工程总体规划》，这一工程还被列为全球环境建设的重点，纳入《中国 21 世纪议程》，作为中国政府执行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决议的内容。太行山与燕山山脉构成华北平原屋脊，是京津两市及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绿化太行山，对于改善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促进地方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这一工程将涉及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四省市的 100 多个县。

18日—21日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乡镇企业工作会议

第一次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发展乡镇企业的重要批示："乡镇企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农村实现小康的有力保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创举。乡镇企业发展总的势头是好的，要坚持以市场需要为导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重视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要积极推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上一个新台阶，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促进中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会议确定了2000年乡镇企业发展目标。会上宣布，为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在今年扶持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的50亿元专项贷款和正常增加的50亿元专项贷款基础上，国务院决定从明年开始，在原来正常增加贷款的基础上，再增加50亿元专项贷款；在过去已经批准56家乡镇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基础上，再新批准83家；研究部署《乡镇企业东中西合作工程》。

19日　国务院清理和规范有偿集资活动

国务院就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从现在起，各地区、各部门及各单位举办的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者支付股息、红利的有偿集资（不包括国家统一筹措国债和出资人依法共同出资组建各类企业、公司）活动一律暂停。下列集资活动，可以依法照章进行：（1）股份有限公司依照《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有关法规发行股票，依照国家体改委《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发行内部职工股；（2）企业依照《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发行企业债券，依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发行短期融资券；（3）金融机构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强股票债券管理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发行金融债券；（4）各有关单位依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发行投资基金证券、信托受益债券。通知说，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国家财政拨给的资金、有专项用途的预算外资金、银行贷款和拆借资金参与上述所列各类有偿集资活动。

21日　国家对部分电信业务实行许可申报制

我国对一部分电信业务的经营，实行许可证和申报制度。实行许可证制度的电信业务有：无线寻呼、800兆赫无线电移动通信、国内VSAT（甚小天线地面站）通信及邮电部批准的其他电信业务。实行申报制度的有电话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电子信箱、电子数字交换、可视图文及邮电部批准的其他电信业务。

22日　国务院决定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国务院决定，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还决定我国制订并实施全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从1994年起到本世纪末，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尚未完全解决温饱的80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在解决贫困地区人民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脱贫致富。

28日　我国计算机软件界首次走向联合

我国长城集团、四通集团、联想集团、北大方正集团、中软总公司等16家计算机软件开发企业和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宣布，联合成立中文平台技术委员会（"平

台”，即平台软件，指可作为工具软件使用的高层软件），统一制定中文软件的规范和标准，推荐优秀中文软件，引导软件开发，以便形成一支真正的行业力量。这是我国计算机软件业第一次走向联合。联合是在电子工业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支持下实现的。中文平台技术委员会是在国家主管部门领导下，由各公司自愿参加的全国性民间组织，下设4个专家委员会。

10　月

6日　外经贸部国家科委决定赋予科研院所科技产品进出口权

为了加快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推动科研院所参与对外贸易和国际竞争，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与国家科委今天联合发布《赋予科研院所科技产品进出口权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了申请科技产品进出口权（以下简称进出口权）的科研院所应具备的三项条件：一、有较强的技术及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一定的生产能力，研究开发的技术和自产技术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二、在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方面取得实绩，申请进出口权前两年，委托代理出口年均创汇额（含科技出口额）一般不低于五十万美元；三、有开展进出口业务所需要的设施、资金和其他必要条件。《办法》规定，科研院所隶属于已获进出口权的企业集团和其他已有进出口权单位的，不再赋予进出口权。进出口权原则上直接赋予科研院所，不另批准成立新的进出口公司，如科研院所本身没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对外经营权可根据申请单位要求授予该单位指定的一家直属全资全民所有制企业。《办法》还规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出口本院所研制开发的技术和自产的科技产品，进口本院所科研和生产所用的原辅材料、技术、设备和零部件；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享受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承担国家的出口创汇任务并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遵纪守法，属国家限制出口的高新技术及产品应严格按有关规定办理。

7日　国务院颁布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规定，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参加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的合作开采活动及其投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国家对参加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的投资和收益不实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外国企业在合作开采中应得石油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负责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经营业务；负责与外国企业谈判、签订、执行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合同；在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区域内享有与外国企业合作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的专营权。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应当遵循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原则，通过吸收油（气）田所在地的资金对有商业开采价值的油（气）田的开发进行投资等方式，适当照顾地方利益。《办法》还对外国合同者的权利和义务，石油作业、争议的解决、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的规定。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2日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颁布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布《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国家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高科技产品，不鼓励进口一般加工设备和高档消费品；禁止进口危害国家安全和公民身心健康的机电产品。进口机电产品必须符合国际或双边（我国和产地国）认可的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并由国际或双边认可的机构提供产品安全和环境保护认证书。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外汇支付能力，按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原则，对年度机电产品进口总规模进行宏观指导。设立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机电进出口办），在国家经贸委领导下，负责全国机电产品进口的协调，管理和检查监督工作。国家对进口配额管理以外的其他机电产品，实行非配额管理。本办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14日　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

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面临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因此，搞好小城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进一步明确以小城镇为重点的村镇建设指导思想。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国村镇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是：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一组织，综合建设，加快乡村城市化步伐，使村镇建设上一个新台阶。

15日　我国第一条全部国产化的光缆干线——京汉广光缆通信干线开通

世界上最长的光缆干线京汉广暨广邕、广琼光缆通信干线正式开通。该光缆通信干线北起北京，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到广州，并向南向西延伸至海口、南宁，途经8个省市、22个地市，总长4700公里。京汉广暨广邕、广琼光缆通信干线工程总投资5亿多元，可提供长途电路10.5万条。京汉广光缆通信干线是我国第一条自行研制、生产、建设、全部国产化的光缆一级干线，其中我国首次采用的新一代四次群传输系统，比国外同类系统容量扩大了62.5%。投产运营后，将为我国中部通信提供一条“高速公路”，与京宁沪穗光缆相连，形成了沟通我国中部、东部的两条大容量数字通道。

18日　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如何全面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措施。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他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业无论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常处于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因此，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近几年来我国工业高速增长，农业却明显滞后，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比较突出。这给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明显的不利后果，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些情况已经说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单纯靠市场调节，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目标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建国初期实行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必要的。现在条件不同了，宁肯暂时少上几个工业项目，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江泽民指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应以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加强宏观指导和对农业的保护为主要

内容，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必须长期稳定，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此同时，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纽带，发展各种形式的专业性服务组织。通过服务体系联结千家万户，使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与日益发育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促进我国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建立健全农产品储备调节体系、农业生产的保护支持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走高产、优质、高效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发展势在必行的深刻变革，也是农村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一个战略性转变。粮食生产必须稳定发展，这个基本思想绝不能动摇。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必须保证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这个基本思想也绝不能动摇。在稳步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村的二、三产业，搞好小城镇建设，加速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必须把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放在与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同等重要的地位。

20日　国务院转发劳动部加强企业工资总额宏观调控意见

国务院转发劳动部《关于加强企业工资总额宏观调控的意见》。《意见》指出，今年国家对地区和部门实行动态调控的弹性工资总额计划管理，原则上按照劳动部已组织试行的弹性计划实施办法执行。全国性公司、计划单列企业集团等单位原则上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其工资总额也纳入弹性计划管理。各地区、部门的全部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和各种经营方式的企业，均应按要求认真编制本企业的工资总额计划，报送主管部门和同级劳动部门（无主管部门的企业报劳动部门）。企业工资总额的内涵，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执行。《意见》还指出，企业应在进一步改进完善工效挂钩办法的基础上扩大挂钩面。经财政部门认定的亏损企业，可实行工资总额与减亏指标挂钩的办法。企业只能在按规定提取的工资总额内自主分配。企业要严格按核定的工资总额提取和发放工资，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减人不减工资总额。经批准试行自主确定工资总额办法的企业，其工资总额基数和经济效益基数由劳动、财政部门核定，如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其工资总额相应下浮。

21日　民政部等部门要求各地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

民政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教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建设部、卫生部、国家体委、国家计生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老龄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社区服务业全面、快速地发展。社区服务的基本任务是：充分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积极性，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兴办社区服务业。开展各种便民服务，大力创办社区服务实体，立足民政，面向社会，为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采取联营共建等形式，为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服务。

25日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着重治理国家机关乱收费问题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治理乱收费的规定》。《规定》要求着重治理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利用职权乱收费，在年内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决定，全国的治理乱收费工作由财政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负责，以财政部为主。这次治理的范围首先确定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行政性收费、凭借行政职权的事业性收费及垄断行业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以下几种乱收费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坚决纠正：1. 未按国家规定的收费审批权限批准，擅自出台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2. 将国家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3. 利用办实体、搞创收，把一部分国家机关的职能转移、分解到下属从事第三产业的经济实体，进行有偿服务，从中收费提成；4. 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强行服务，强买强卖，搭车收费，从中谋利；5. 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蓄金、集资、赞助等形式变相收费；6. 只收费不服务，公开敲诈勒索。对按国家规定审批权限批准的收费项目（包括收费标准和范围），群众反映强烈的、不合理的，也要进行清理和调整。今年内不再出台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8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工作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政府法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从国家总的形势和任务出发，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的职责，加强政府法制建设，保证党的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完成，保证政府工作在法制轨道上高效率地运行。《决定》要求把做好经济立法工作作为政府立法工作的重点，加快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工作。要正确处理政府立法工作与改革的关系。坚决破除立法工作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各级政府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依法接受司法监督，接受政协及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接受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不管涉及什么机关、什么人，凡是违法乱纪的，都要严肃处理，直至依法予以制裁。

31日　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颁布

江泽民签署命令，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法》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修改：第一条修改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二条修改为："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 工资、薪金所得；2.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3.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4. 劳务报酬所得；5. 稿酬所得，6.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7.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8. 财产租赁所得；9. 财产转让所得；10. 偶然所得；11. 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

得。”第三条修改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5%—45%。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三、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四、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五、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此外，还对免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经批准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作出修改。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

江泽民签署命令，公布了由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该法还对经营者的义务、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消费者组织、争议的解决、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本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我国第一部教师法颁布

江泽民签署命令,公布了由第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这是我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教师法》。该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全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该法对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资格和任用、培养和培训、考核、待遇、奖励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的规定。该法将每年9月10日确定为教师节。该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11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11　月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耕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

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等 12 项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 30 年不变。

14 日　中共十四后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共分 10 部分，50 条：（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四）转换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五）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和社会保障制度。（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七）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八）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九）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本世纪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当前要紧紧抓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金融、财税、计划、投资、外贸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制定具体方案，采取实际步骤，取得新的突破。

19 日　国家经贸委赋予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内贸部《关于赋予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试点意见》，决定首先在商业（包括商业、粮食、供销）、物资企业中选择少数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在进出口工作方面有一定基础的企业，进行赋予进出口经营权的试点。经批准赋予进出口经营权的商业、物资企业应做到进出基本平衡，其进出口业务的经营范围原则上与其经批准的国内经营范围相一致。试点商业、物资企业在国家有关进出口的政策方面享有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待遇。《意见》提出，试点商业、物资企业应具备的主要条件是：必须是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开展进出口业务所需要的设施和资金；有健全的内部组织机构和与经营进出口业务相应的外贸、技术等专业人员；年进出口额在规定数额以上且出口额一般不低于规定进出口额的 1/3。

12　月

1 日—4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李鹏总理在会议开幕时做报告，提出 1994 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十

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94 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力争农业有一个好收成，实现乡镇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繁荣农村市场，农民人均收入有较多的增加。积极推进企业改革，把企业的注意力引导到积极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方面来。固定资产投资要和经济增长相适应。今后上项目必须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不能搞无本投资，新建项目必须具有一定比例资本金后，才能申请银行贷款；二是不能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投资，银行对此要加强监管；三是新建项目必须打足铺底流动资金，没有流动资金不能开工。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要迈出重大步伐。财税方面的重大改革有三项：一是进行税制改革；二是实行分税制；三是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通过改革，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具有调控货币供应量和保持币值稳定的能力。要组建若干政策性银行，专业银行转为商业性银行，以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要在严格规范市场管理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和搞活金融市场，特别是同业拆借市场，逐步建立国债市场，促进资金融通。要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合理的汇率和调控机制。价格改革要积极推进，但步骤要稳妥，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要加快转换对外经贸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进出口管理，从以行政控制和审批为主，转变为以关税、汇率等经济杠杆调节为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全面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形势，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善于及时发现和解决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这一点绝不能动摇。明年的改革任务很繁重，在增长速度的计划安排上，要适当留些余地，给改革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正确的宏观调控是快速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搞好宏观调控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5 日　全国计划会议提出 1994 年计划工作重点

会议指出，1993 年经济运行情况概括为四个显著特点：一、国民经济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迈出新步伐。三、对外开放继续向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扩展。四、实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为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条件。会议提出，实现 1994 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需要注意把握好几个问题：第一，要积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资源潜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保护和引导好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做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以促使国民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做到协调稳步和快速发展。第二，集中精力推进各项重点领域的改革。明确树立依靠改革加快发展的思想，把深化改革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按照中央部署，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金融、财税、投资、外贸外汇、国有资产监管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大步推向前进，并取得应有成效。实现各项宏观经济目标，要把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手段，并在推进各项改革中进一步改革计划

体制。第三，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互统一。各部门、各地方在安排经济计划时，不能绷得太紧，要注意做好各项改革之间以及改革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衔接。第四，加快发展要有新思路，发展经济不能继续走盲目追求产值和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经营老路，必须把重点放在优化结构，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上。第五，努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1994 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中，突出八个方面的重点。一、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使农民收入有较多增加。二、在严格控制投资总规模的同时，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进程。三、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在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补中优化资源配置。四、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大力控制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增强市场交易透明度，制止价格歧视和欺诈行为。五、大力开拓城乡市场，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把开拓市场的重点放在农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开发新产品、新品种、新花色、新款式。加快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六、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七、计划工作要积极配合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确保宏观经济有良好的微观经济基础。八、按照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计划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计划部门要主动同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劳动工资等具体掌管经济杠杆的部门联系和协商，使各方面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及时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积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正确发挥国家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功能，使计划适应市场变化趋势，弥补市场功能不足，引导市场正常有序地运行。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不折不扣落实财税改革方案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保证各项改革的如期出台并取得预期效果，是1994 年财税工作的中心任务。各地要顾全大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到位。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要在 1994 年初同时出台，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项关键性的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今后经济发展、关系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各级财政部门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此次财税改革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把财税改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统一步调是明年财税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即将实施的财税改革方案在设计中既遵循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财税管理的基本要求，参考了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和新老体制的衔接过渡问题；既有规范化的目标模式，也制定了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法。财税改革的三个方案都已确定，各地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首先各地在基数问题上不能搞小动作；其次在改革措施落实中，不能扭曲各项改革的基本框架，要确保财税运行机制的形成；再次在税收返还问题上要服从大局；第四要积极促进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第五要尽快解决好税务机构的分设问题，以保证分设后的机构能投入正常工作。

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提出1994年信贷资金体制改革重点

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研究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会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其主要职能应是：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科学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的基本稳定；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维护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行。1994年信贷资金体制的改革，一是要在坚持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探索运用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等中介操作目标；二是逐步改变中央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信用放款吞吐基础货币的传统方式，推广再贴现和开办国债、外汇为操作对象的公开市场业务；三是对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和业务分开管理，割断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与政策性贷款的直接联系。

全国经贸工作会议提出"万千百十、转机建制"规划

会议提出1994年经贸工作以企业工作为中心，突出企业改革、市场建设、技术改造和企业管理四个重点，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会议提出，要制定并组织实施"万千百十、转机建制"规划。即在1万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不折不扣地落实14项经营自主权和责任，贯彻实施好"两则"，完成清产核资工作；通过委派监事会的形式，分期分批地对1000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骨干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管，选择100户不同类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结合贯彻两个《条例》，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10个城市或地区进行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和提高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比重试点，摸清情况，提出分期分类解决的具体办法。国家经贸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有关地区认真研究，制定方案，共同组织实施。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做好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工作。重点协调好生产与流通、内贸与外贸、市场与企业等方面的关系。要重视市场，研究市场，抓好市场建设，加快市场培育步伐，促进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提高对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职业道德建设，调动职工积极性。1994年要开展"转机制，抓管理，练内功，增效益"活动；要依据《破产法》，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资不抵债的企业，坚决实施破产，实行优胜劣汰。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要加大力度，高起点，突出结构优化和节能降耗两个重点，向着技术装备合理化、工艺技术先进化、新产品高档化的目标迈进。要选择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技术改造，促进重点企业、重点行业上水平。要继续加大交通运输、通信、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技改资金投入。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任务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讨论《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会议提出的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在努力探索国有企业财产构成的组织形式方面，从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开始，逐步进行公司制改组。对少数盈利状况好、管理效率高、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大型企业可直接改组为国家控股或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大部分符合产业政策的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可改组成国家与其他多个法人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特殊行业的企业可改组为国家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与外商合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

有限公司。进一步扩大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具备土地资源优势又不宜设在城市中心的国有企业，可通过搬迁改造或转产改造，建成具有新机制的新企业。对国有小企业，可采取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出售、租售结合等办法进行改革，也可实行股份合作制。对长期经营不善，产品无销路，资不抵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改组改造的国有企业，应依法宣布破产。对新开工建设项目，一律实行公司法人负责制。积极进行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民营高科技企业都要通过多种形式探索，实现产权明晰，逐步改组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对私营企业，也要鼓励它们改组为规范化的公司。以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分税财政体制，是明年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金融体制改革要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银行，把现有的国家专业银行改组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逐步建立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拓宽基础性项目和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渠道，鼓励各方投资参与，积极推行公司法人责任制，政策性融资与商业性融资分开，建立中央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继续推进价格改革和培育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继续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尽快实现生产资料双轨价格的并轨，适当提高粮食保护价和棉花价格。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重点是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城镇职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切实抓好其他领域的各项改革。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科教体制改革步伐；加强改革立法工作。扎实开展建立新体制的各项先行试点工作。

第三次全国房改会议提出将出售公房作为房改着力点

第三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关于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草案）》。这次房改会议对我国城镇房改思路进行了重要调整，将出售公房作为今后房改的着力点。会议认为，房改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步子不够快。从近些年的实践看，提租面临很多困难。目前已实行房改的城市或地区，住房平均租金仅调整到每平方米 0.30 元左右，还不足 1992 年住房租金构成中维修费一项因素（每平方米 0.75 元）。特别是近几年，住房的维修、管理及新建住房成本上升很快，提租幅度赶不上物价上涨，小步提租难以摆脱低租金状态，很难打破房改僵局。大幅度提租又面临着财政、企业困难及居民承受能力问题。出售公房可以逐步缩小提租范围，赢得群众对提租的支持和理解，提高对提租的心理承受能力。租、售相比，售房回收资金快、效益好，有利于搞活住房存量，减轻国家、企业负担。有利于引导居民消费，更多地筹集建房资金。有利于住宅业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产业支柱。

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草案）》及有关配套文件，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决定（草案）》中提出了下一步房改的主要政策措施。一、合理确定售房价格；二、合理界定出售公房的产权，积

极发展房产交易市场；三、继续推进租金改革；四、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五、发展住房金融，建立政策性抵押贷款制度；六、发展住房管理、维修、装饰市场，加强售后服务和管理；七、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努力完善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供应体系；八、加快企业房改步伐，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九、继续做好离退休职工、低收入职工的减免补工作。

12日 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全面建成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是当年经邓小平同志决策的国家重大项目之一，是特大型石油化工原材料骨干项目。工程总投资90.65亿元，其中外资5.75亿美元。这项工程包括年处理原油250万吨、年产30万吨乙烯、20万吨氯乙烯、15万吨烧碱、5万吨顺丁橡胶等11套装置，分别在金山上海石化总厂、上海氯碱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高桥石化公司三个点建设。这项工程从1987年5月10日正式动工建设，1989年底起，各项装置陆续投人试生产，并基本保持了安全、稳定、持续运行。到1993年6月，整个工程已经累计创工业产值55.28亿元，实现利税14.9亿元，生产了一批国家急需的化工原材料。整个项目实现了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益的目标。

13日 国务院颁布增值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3%；1.粮食、食用植物油；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3.图书、报纸、杂志；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0；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除以上规定外，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税率为17%。纳税人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应税劳务），税率为17%。税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条例》对应纳税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项目、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增值税纳税地点等作出规定。《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税条例（草案)》同时废止。

国务院颁布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缴纳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税率为3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的部分，税率为4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5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

税率为60%。本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各地区的土地增值费征收办法，与本条例相抵触的，同时停止执行。

国务院颁布营业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以下简称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营业税。营业税的税目、税率，依照本条例所附的《营业税税目税率表》执行。税目、税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经营娱乐业具体适用的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本条例规定的幅度内决定。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目应税行为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业额、转让额、销售额（以下简称营业额）；未分别核算营业额的，从高适用税率。应纳税额以人民币计算。营业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条例》对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免征营业税的项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扣缴义务人、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等作出规定。本《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条例（草案）》同时废止。

国务院颁布消费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以下简称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消费税。消费税的税目、税率（税额），依照本条例所附的《消费税税目税率（税额）表》执行。消费税税目、税率（税额）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销售额、销售数量，或者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从高适用税率。纳税人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于销售时纳税。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税；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委托方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所纳税款准予按规定抵扣。进口的应税消费品，于报关进口时纳税。《条例》还对其他有关事项作出规定。本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国务院关于征收消费税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条例》规定的应税消费品有烟、酒及酒精、化妆品、护肤护发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鞭炮、焰火、汽油、柴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等11种。

国务院颁布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外，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条例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下列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者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一）国有企业；（二）集体企业；（三）私营企业；（四）联营企业；（五）股份制企业；（六）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

织。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3%。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条例》对纳税人的收入总额、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项目、不得扣除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时的处理方法等有关事项作出规定。本《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1984年9月1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1985年4月1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88年6月2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国务院有关国有企业承包企业所得税的办法同时停止执行。

国务院颁布资源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本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以下简称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为资源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资源税。资源税的税目、税额，依照本条例所附的《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表》及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税目、税额幅度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由财政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纳税人所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资源状况，在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课税数量；未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提供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课税数量的，从高适用税额。《条例》对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课税数量、减征或者免征资源税、纳税地点、纳税时间作出了规定。《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盐税条例(草案)》同时废止。

15日　国务院决定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分税制。主要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地方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管理制度，强化各级预算约束。

我国研制成功巨型计算机实时三维图像生成系统

我国第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型计算机实时三维图像生成系统——2100CIG系统，研制成功。这项成果填补了我国巨型计算机图像生成系统的空白。由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三研究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研制的这种系统，利用计算机、仿真等高技术，用大量的多边形拼接，生成各种复杂的三维景物世界。它运算最快速度每秒达3亿次，可处理8000万个像素，生成20万个三角形，可实时地生成随人的视点和命令而变化的逼真的动态三维彩色图像，颜色种类1600万种，可以应用于宇航员训练、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训练、飞行故障处理、导弹研制等领域。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掌握这一高技术。我国研制的这种系统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费用较低，开发方便，运行可靠。

18日 劳动部推出城乡就业协调计划第一期工程

为把逐日高涨的"民工潮"纳入正常渠道，引导和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劳动部最近推出"城乡就业协调计划"第一期工程。这项工程的目标是要在全国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本制度、市场信息系统和服务网络，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的主要输入、输出地区实现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化。此项工程的具体内容包括五项：一、输出有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合法渠道；二、输入有管理，劳动力流入地对外来劳动力就业建立起必要的市场规则和管理制度；三、流动有服务，建立健全对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全过程的服务；四、调控有手段，推进立法，加强管理，搞好监测，对全国主要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形成监测体系；五、对每年春节前后高峰期间劳动力的流动，建立一套有效的疏导管理办法。该工程共分为4个阶段。1994年到1994年3月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总结推广广东省春节期间与劳动力输出省协作，化解"民工潮"的经验，初步形成一套春节前后疏导"民工潮"的预案和应急措施。1994年4月至1995年3月为完善制度，开展信息交流阶段。1995年4月至1996年3月为第三阶段，完成华南、华东、华北三大区域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中心的建设，初步形成以各主要输入地为中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收集、处理、传播系统。1996年4月至12月为第四阶段，基本实现劳动力流动有序化。

25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系；一个中央银行领导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密切协作的组织体系；建立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人民银行今后将成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不再直接承担大量政策性信贷任务和其他财政性融资职能。中央财政收支差额通过发行国债解决，不再向银行透支。国家新成立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负责政策性信贷业务。政策性银行业务上接受人民银行监督，不能从事商业性业务，不能与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竞争业务；但是也不能把政策性银行看作是第二财政，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政策性贷款数量。政策性银行组建后，原来的国家专业银行将逐步转变为责、权、利、险相结合、相互制约、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商业银行，并鼓励和保护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上下限内浮动，开展合理竞争，允许业务交叉，面向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

国务院转发税制改革实施方案

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这次工商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税制改革首先是统一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实行33%的统一税率，为各类不同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流转税改革是这次工商税制改革的关键，主要变化是把原有的增值税、产品税、营业税改变为，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17%的增值税；取消产品税，对原来征收产品税的农林牧水产品，改征农林特产税；选择11种消费品在征收增值税的同时，

交叉征收消费税。新的流转税统一适用内资和外商投资企业。此外，还增设或合并一些地方税。这样，改革后，工商税种由改革前的32个，减少为20个左右。财税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将地方财政包干体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为适应分税制的要求，建立中央和地方两个税收体系。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

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

国务院召开全国平抑粮油价格工作会议

会议指出，粮油价格是市场基础价格，必须迅速抑制目前的涨价势头，使之恢复到合理水平，防止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这次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的举措，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必须坚决执行。全国要统一行动，迅速落实到位。第一步，在今年底以前，国有粮店把粮食销价降到相当于国家计划规定的1994年度粮食价格水平，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地区不要趁机涨价；第二步，在春节以前再适当降低，为明年预定的粮食调价留有余地。国有粮店要充分发挥调控市场的主渠道作用，挂牌降价，敞开供应。会议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精心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粮食系统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把粮食流通工作搞好；铁道、交通运输系统要把抢运粮、油、副食品放在优先地位，充分予以保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粮食、物价、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依法管好粮食市场；坚决取缔无照经营，严厉打击哄抬投机、欺行霸市的违法行为，确保粮食市场的稳定，确保降价目标的限期实现。会议强调，在稳定粮食价格和粮食市场的同时，要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搞好今冬明春的生产，力争在今年丰收的基础上明年农业继续获得好收成。

28日　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发布机电产品进口配额产品目录和特定产晶目录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联合发布了与《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暂行办法》配套的“配额产品目录”和“特定产品目录”，并将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列入配额产品目录的主要是对发展国内相关工业、调整进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对国家外汇收支地位有直接影响的重要的机电产品，包括汽车、摩托车、录像机、计算机、空调器等共18种。对进口这些产品，将按照国际惯例实行进口数量限制。列入特定产品目录的主要是国内已经大量投入资金，进行研制开发或引进生产技术，目前尚处于工业生产起步阶段，需要加速发展的机电产品，共171种，涉及纺织、通讯、电子、船舶、仪器、机床等行业。对于特定产品，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将在一定时期内给予适当保护。进口这些产品时主要通过国际招标的办法，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

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发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为了统一税制，公平税负，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决定》要求：一、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自1994年1月1日起适用国务院发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暂行条

例。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其税率和征收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二、1993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由于依照本决定第一条的规定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而增加税负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经营期限内，最长不超过五年，退还其因税负增加而多缴纳的税款；没有经营期限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在最长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退还其因税负增加而多缴纳的税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三、除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外，其他税种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适用，法律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未作规定的，依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

江泽民签署主席令，公布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这个法共分总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债券，公司财务、会计，公司合并、分立，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法律责任，附则等十一章。自 19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对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作了重大改革。公告决定，从明年元月一日起，实行汇率并轨。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说，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对外开放，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决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这次外汇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二、实行银行结汇、集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三、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四、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五、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宏观调控。

国家计委，外经贸部颁布一般商品进口配额管理暂行办法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外经贸部颁布《一般商品进口配额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是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扩大对外贸易的需要，按照公开化、规范化原则制定的新的配额管理制度，也标志我国进口管理制度逐步与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则接轨。按照这个办法，由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参照国际惯例，对尚需适量进口以调节市场供应，但过量进口会严重损害国内相关工业发展的商品和直接影响进口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商品，以及危及国家外汇收支地位的进口商品，实行配额管理。同时颁布的还有包括原油、化纤原料、木材、橡胶、农药、化肥、酒等 26 种实行进口配额管理的一般商品目录。本办法自 1994 年 1 月施行。

31 日 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社会生产继续快速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13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4%，超过计划增长 8%的速度。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4%，第二产业增长 20.4%，第三产业增长 9.3%。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粮食、油料产量创造历史最好纪录，全年粮食总产量

4564亿公斤，完成计划的103.1%，比上年增加138亿公斤。油料总产量1761万吨，完成计划的106.7%，比上年增加120万吨。

全国完成工业增加值14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1.1%，其中重工业增长22.2%，轻工业增长19.9%。主要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工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工业产品销售率由95.5%提高到96.4%；资金利税率由10.1%提高到10.6%；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由1.66次加快到1.71次。

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得到加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829亿元，为年计划的149.9%，比上年增长5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22%；其中，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完成4647亿元，更新改造投资完成2192亿元。在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14.7%上升到20.2%。铁路建设的投资强度和施工进度都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全年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133个，新增加的发电装机容量1438万千瓦，石油开采能力1542万吨，铁路新线、复线和电气化线路交付运营里程1019公里，公路3556公里，港口吞吐能力3752万吨，住宅电话367.2万户。还有一批社会公益性项目建成交付使用。

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进一步扩大。全年进出口总额19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其中出口总额918亿美元，增长8%；进口总额1040亿美元，增长29%。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全年实际利用外资36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1.5%。其中，外商实际直接投资258亿美元，增长1.3倍；利用国外贷款108亿美元，增长36.5%。年末国家现汇结存达到212亿美元，比年初增长9%。

国内市场繁荣活跃。199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37亿元，比上年增长2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全年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1356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7.8%。

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2337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21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长3.2%。城镇新安排就业705万人，年末城镇失业率为2.6%。全年新建住宅8.36亿平方米；其中，城镇2.66亿平方米，农村5.7亿平方米。

1993年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还很突出，交通、通信、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环节。一部分国有企业比较困难，亏损额和亏损面较大。特别是物价上涨幅度比较高，较多地超过了计划确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13%；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4.7%，其中35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9.6%。

1993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国家计委下达1993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共150项，其中新增项目（*）35项。

煤炭项目（22项）　河北开滦矿区　山西大同矿区　山西古交矿区　山西阳泉矿区　山西潞安矿区　山西晋城矿区内蒙古准格尔一期工程　内蒙古平庄矿区　元宝山露天矿及其配套工程　辽宁铁法矿区　黑龙江双鸭山矿区　黑龙江七台河矿区　安徽淮南矿区　安徽淮北矿区　山东兖州矿区　山东枣滕矿区　河南平顶山矿区　河南永夏矿区　云南小龙潭露天煤矿　华能精煤公司神府东胜矿区　陕西黄陵矿区　黄陵一号井及洗煤厂（及其配套工程）　宁夏灵武矿区　又新大井（及其配套工程）　郑州矿区　超化矿井郜城矿井　矿区配套工程

石油项目（6项）　黑龙江大庆油田勘探开发　辽宁辽河油田勘探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勘探开发　新疆塔里木地区勘　探新疆油田勘探开发　*广东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天然气勘探开发）

电力项目（36项）　天津蓟县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内蒙古丰镇电厂（含五十万伏送出工程）　辽宁铁岭电厂（含五十万伏输电工程）' 吉林双辽电厂哈尔滨第三电厂二期（含五十万伏输电工程）　江苏常熟发电厂　江苏利港电厂　浙江北仑港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福建水口水电站　湖北隔河岩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湖南沅陵五强溪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　海南大广坝水电站　广西岩滩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红水河天生桥坝东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红水河天生桥一级水电站　四川铜街子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电工程）　四川宝珠寺水电站　四川二滩水电站　贵州东风水电站　云南漫湾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西藏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　青海李家峡水电站　*辽宁绥中电厂　*内蒙古元宝山电厂三期（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河北西柏坡电厂　*内蒙古达拉特旗电厂　*安徽马鞍山第二电厂浙江嘉兴电厂　*河南偃师电厂　黑龙江鹤岗电厂　*内蒙古伊敏煤电联营一期工程（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上海外高桥电厂（含五十万伏输电工程）　*陕西渭河电厂二期工程　*甘肃靖远电厂二期工程

水利项目（3项）　大湖综合治理骨干工程　望虞河工程　太浦河工程　杭嘉湖南排工程　淮河治理骨干工程　石漫滩水库工程　怀洪新河工程　沂沭泪洪水东调南下工程　*甘肃引大入秦工程

铁道项目（17项）　浙赣复线（含株洲枢纽）　沪杭复线（含杭州枢纽）　陇海线徐连复线　徐州枢纽　焦枝复线　鹰厦线电化（合电铁供电工程）　湘黔线电化（含电铁供电工程）　京九线衡商段合九段广梅汕段　*向吉段（地方项目）　南昆线　侯

月线　宝中线　＊北京西客站铁道工程　市政工程　邮政工程　＊兰新复线　成达线　＊广大线　＊集通线（地方项目）　＊京广线北京至郑州电化

交通项目（14 项）　天津港（地方项目）　大连港（含商检设施）　上海港　张家港港二期工程　青岛港　烟台港　湛江港　广州港　西江航道整治　＊日照港二期工程　＊汕头港　京津塘高速公路　＊沪杭甬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　杭甬高速公路　＊海南环岛公路（东线）　工程（地方项目）

邮电项目（1 项）　＊西安——成都光缆数字通信干线工程

民航项目（2 项）　武汉天河机场　拉萨贡嘎机场

钢铁项目（5 项）　山西娄烦太钢尖山铁矿　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　四川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　＊唐山钢铁公司炼铁扩建二期工程　＊武汉钢铁公司三炼钢工程

有色项目（7 项）　河津山西铝厂二期　江西铜业公司　广西平果铝厂　甘肃白银有色公司（合成县厂坝铅锌矿二期）　甘肃金昌金川有色公司二期　河南焦作中州铝厂　＊云南大红山铜矿

黄金项目（1 项）　山东莱州新城金矿

化工项目（7 项）　河北矾山磷矿　湖北大悟黄麦岭磷化工公司　湖北荆襄磷化学公司大峪口矿肥结合项目　贵州瓮福磷　矿云南磷肥工业公司　＊陕西渭河化肥厂（地方项目）　北京乙烯工程（地方项目）

石化项目（3 项）　上海三十万吨乙烯工程　＊安徽安庆石化总厂丙烯腈腈纶工程　＊江西九江石化总厂大化肥工程（地方项目）

建材项目（3 项）　＊安徽铜陵水泥厂　＊北京水泥厂　＊黑龙江浩良河水泥厂

医药项目（1 项）　河南中原制药厂

机电汽车项目（3 项）　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依维柯项目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轻纺项目（1 项）　福建青州造纸厂（地方项目）

教育项目（6 项）　教育工程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复旦大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卫生项目（3 项）　北京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院　＊卫生部疫苗工程（上海、兰州、昆明）

林业项目（1 项）　＊“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

其他项目（13 项，略）

1993 年国家重点建设收尾项目

江西万安水电站　陕西安康水电站　上海吴泾电厂　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安徽平圩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天津军粮城电厂四期　山西神头第二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青海油田　河南洛宁故县水库　大秦线（二期）　大包复线　郑武线电化（合电铁供电工程）　胶济复线　秦皇岛港　营口港

连云港港　昆明巫家坝机场　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二期　贵阳贵州铝厂　四川816厂化肥工程　云南昆阳矿务局晋宁磷矿　抚顺石化公司丙烯腈纶工程　河南洛阳炼油厂　长春双阳水泥厂　重型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斯太尔项目无锡微电子科研生产联合公司　辽宁抚顺洗涤剂化学厂　山东淄博纶厂（地方项目）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北京中央电视发射塔工程　四川624所　北京邮政枢纽工程

1994年

1　月

1日　我国取消部分商品进口管理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取消部分商品进口管理的公告》。《公告》指出：为了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改革我国的进口管理体制，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取消对南药类、聚碳酸酯、废钢、钢坯、钢材、黑白显像管的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管理；取消咖啡及其制品、钴及钴盐、民用飞机的进口许可证管理；取消组装加工设备的进口许可证和进口控制管理；取消水果的进口配额管理；取消室内装饰材料、建筑用材料及部分机电产品的进口控制管理。此次取消进口管理的税号共283个。

我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

我国正式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专利合作条约》是继《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之后，专利领域里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条约。制定该条约是为了方便发明人向外国申请专利，减少各国就同一个专利申请进行的重复劳动。该条约于1970年6月19日由35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1978年6月1日生效。到1993年6月，成员国已达59个，包括所有工业发达国家。1993年8月2日，国务院作出了我国加入《专利合作条约》的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成为该条约的成员国，中国专利局成为该条约的受理局、指定局和选定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中文也成为该条约的正式工作语言。

2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制止低价出售公有住房

第三次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对今后房改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要求在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按照国务院的统一政策出售公房，并反复强调在出售公有住房时要特别防止低价售房。但是，最近有些地方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违反国务院有关政策规定，以过低价格突击出售公房，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的还将出售公房款挪作他用，这些错误做法，不利于房改工作的健康发展，也容易产生不正之风。为制止以过低价格突击出售公房，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的统一政策，确保房改工作健康发展，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规定；一、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发布实施以前，各地区、各部门要一律暂停出售公房。凡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突击出售公房的，要认真进行查处。二、对已出售的公房要进行清理。凡出售公房价格低于国务院有关政策规定，尚未办理产权交易和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一律暂停办理手续；对因以过低价格出售公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要提出与国务院有关政策衔接的办法，妥善处理。三、切实加强出售公房款的管理。现已出售公房的收入，要在原单位立即冻结，听候处理，不得动用。如有违反，要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4 日　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布第二批取消的收费项目

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布了全国第二批取消的收费项目。第二批取消的收费项目共 68 项，涉及公安、司法、民政、工商管理、城建、土地管理、劳动、人事、劳动管理、铁道、交通、民航、电力、金融、教育、国有资产管理、计划生育等部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财政部、国家计委为此发出的通知还规定，各级行政机关、经济执法部门不得收取各种名目的咨询费。各级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除按国家规定收取婚姻证书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也不得为其他部门代收各种收费。全国第二批取消的收费项目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涉及以上项目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5 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 1994 年农业发展目标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1994 年的工作重点是抓农民收入、抓体制改革、抓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乃至整个 90 年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核心，在关注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仍要继续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并加强扶贫开发。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以培育市场为重点，健全市场体系，加强政府对农业的引导、支持、保护和调控，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抓农村经济发展，就是要稳定增加粮棉生产，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扭转棉花生产连续两年减产的局面，稳定面积，改善品质，同时继续调整地区布局和品种结构；增加“菜篮子”产品的产量，搞好农产晶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把乡镇企业发展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会议确定，1994 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要切实抓好 5 项工作：（一）抓紧粮食生产。（二）大力发展“三高”农业。（三）继续抓好全国“菜篮子”工程建设。（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五）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此后，3 月 23 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4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 1994 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7 日　财政部确定 1994 年全国清产核资工作重点

1994 年全国清产核资工作主要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中心工作进行，继续开展清产核资试点工作，参加试点的企业总数将控制在 1 万户左右。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国家经贸委确定的实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试点的 1000 户企业；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选定的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 100 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企业组织结构改造，实行股份制、公司制和组建企业集

团，搞合资、联营等产权发生变动的企业；按照产业政策要求，需要给予扶持的基础产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清产核资的内容包括：清查各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界定企业法人财产占有量，明确国有资产界限；对主要固定资产进行价值重估，按《两则》规定计提折旧；核实国有资产价值总量、所有者权益，核实企业国有资本金；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确定产权关系；完善基础管理制度等。全国清产核资试点工作是从1992年开始进行的，其中1993年的试点规模比较大，全年共有9401户企业和82.5万个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了财产清查登记工作。

11日　全国农业综合开发会议提出要搞好综合开发为改革创造物质条件

全国农业综合开发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1994年是我国深化改革关键的一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税制、金融、投资、外贸体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而农业综合开发与改革有着直接的联系，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要紧紧围绕这个大局，努力做好工作，多生产粮、棉、油、肉、菜，稳定和丰富市场供应，为改革措施顺利实施创造更好的物质基础。要增加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投入，农林特产税比上年超收部分，要大部分用于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投资要随着中央财政状况的好转而逐步增加；多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规模要在原有的基础上逐年增加；政策性农业银行的投入只能加强，不能因改革而取消或减少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指标。各地要动员和组织农民增加综合开发的投入，利用剩余劳动力，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级政府要科学、规范开发项目的管理，切实提高开发效益。

国家立项投资的大规模农业综合开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农业发展实行宏观调控，最终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经过五年治理开发的黄淮海五省、东北大平原以及湘南、江汉平原、赣中南、海南项目区，基本实现了耕地园田化、耕作机械化、品种优良化、服务系列化，粮食产量大增。据统计，从1988年到1992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累计新增粮食171.6亿公斤，棉花504万担，油料70万吨，肉类62万吨。在国家项目的带动下，安徽、浙江、内蒙古、河南等省区还自办300多万亩"地方工程"和"农民工程"的开发。这些项目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增加了农民收入，开发项目区内，开发后人均收入一般增加200元左右。

12日　朱镕基对金融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国务院决定今年金融工作的方针是：继续整顿金融秩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不意味着整顿金融秩序的任务已经完成，这项工作是金融系统长期、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他对金融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提出了三点新的要求：第一，要严格控制今年的信贷规模总量。各级银行对于超过贷款规模总量的项目；未经批准开工的项目、化整为零的项目，一律不予贷款，一个项目也不许贷、一块钱也不能超过。第二，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以后，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过渡，今年要大胆探索，跨出开拓性的一步。考虑到当前国有企业正处在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各专业银

行先实行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逐步建立自我约束和风险责任机制，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配合《破产法》的实施，用好今年增加提取的呆账准备金。第三，各级人民银行分行要切实转变职能，在地区金融监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14日 我国政府发行第一笔全球债券

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发行10亿美元全球债券。据介绍，债券发行的牵头机构为美国的美林证券公司。债券将由包括全球各主要证券公司和银行在内的包销团承销，并同时在美国、欧洲、亚洲分销。此债券是中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全球债券，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17日 江泽民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

新华社公开发表江泽民于1993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指出：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在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贯彻《决定》精神：（一）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任何时候都必须抓好两件大事，一是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一是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从现在起，要在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上花更大的力量。扎扎实实地深化企业改革，真正把国有企业搞好，使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和骨干作用。这既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一定要下功夫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二）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这两个方面共同努力。（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大家忙于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扶持正气，克服邪气，在全社会造成浓厚的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良好风尚。（四）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实行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收支比例，目的是理顺经济关系，使经济活动规范化。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中央要考虑地方的困难，地方则要树立全局观念。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历史形成的，缩小差距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立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既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积极性，也发挥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积极性。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关系，也要发挥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19日 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

新华社公开发表1993年8月20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是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90年代，必须持续稳定地发展农业，更好地满足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奔小康的需要。当前，稳定和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还面临一些难题：第一，农业是既有自然风险又有市场风险的弱质产

业，又是本身效益小、社会效益大的基础产业，在我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调控机制还不健全，受比较利益的驱使，资金、物资投放重点将会向非农产业倾斜，对农业发展不利。第二，耕地等农业资源不断减少，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负荷日益加重。第三，农业物质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第四，农业生产效益低，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五，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缺少品质兼优的良种和低成本、高效益的种养新技术，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看，90 年代农业发展的任务将是十分艰巨的。90 年代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在数量、品种和质量上，适应全国人民小康生活和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需要。农民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步子要加快，到本世纪末，确保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90 年代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各地实际出发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农业基础，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农业再上新台阶，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按照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市场、交通、运输、仓储、信息、咨询等基础设施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带动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继续组织农业综合开发，利用荒山、荒坡、荒水、荒滩、荒沙等农业后备资源，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优化农村产业和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创汇农业，使农业逐步走上“面向市场，利用资源，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道路。实行“种养加”、“贸工农”结合，开拓农村新兴产业，促进农林牧渔业与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扩大农村就业领域，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小康目标。

27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要量力而行的社论

社论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直困扰和制约着国民经济发展。90 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但是，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顾客观条件，不计经济效益，盲目贪大求快的苗头，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实事求是，既要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决策和实施，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和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必须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进行。基础设施项目一般都是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较长、协作配套条件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遵循国家规定的建设程序。经济建设的落脚点是效益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充分考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对事关全局的、经济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项目，要千方百计、集中力量搞上去。但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循序而进，滞后不行，盲目大上，不顾可能和效益，过度超前也不行。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国家，财力、物力短缺的状况还会长期存在，更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防止因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造成大的浪费。

国务院要求加强粮棉油等主要农产晶的宏观调控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农产品生产和市场供应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是，从去年 11 月以来的一段时间内，局部地区在粮油和副

食品销售价格方面出现了一些波动。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最大的教训是在放开价格的新形势下仍然要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足。当前，我国农产品的市场调控应主要抓好三件事：一是要建立粮、棉、油、肉、菜、糖等主要农产品的储备制度。中央和地方都要进一步完善储备管理办法。二是要建立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把中央和地方原用于粮、肉、菜等项的补贴，全额用于建立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还要从其他方面筹集一些资金，使其形成一定的规模。三是要建立农产品市场监控体系，强化农产品信息网络的建设，为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会议要求"菜篮子"工作要由各地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政府来抓，实行市长负责制。每年都要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向市人代会和全市人民报告。蔬菜生产要逐步形成以郊区为主、邻近农区为辅、外埠品种调剂的格局。

29 日　国务院通知缨续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

通知指出，1993 年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投资增长过猛、在建规模偏大和投资结构改善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来，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一味争投资、上项目、扩大建设规模。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对固定资产投资严格进行宏观调控。通知强调，要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也要按照国家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注重效益、量力而行的原则，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避免盲目、重复建设。要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计划，不得层层加码，不得突破。各级财政和银行不得对计划外项目拨付建设资金和发放贷款。要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地方自筹资金重点予以落实，严禁用银行贷款和非法集资充抵自有资金来源。要从严审批新开工项目，缩短建设战线，加强对项目审批工作的管理，搞好项目规划。今年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开工项目。今后新开工项目，必须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不能搞无本投资，新建项目必须落实一定比例的资本金；二是不能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投资；三是新建项目必须打足铺底流动资金，流动资金不落实的不能开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的项目审批权不能横向分散，更不能层层下放。要加强资金源头控制，严格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管理。要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建设和开发区建设的管理。各地区房地产开发建设投资必须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贷款规模必须同时纳入国家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要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引导和规范化管理。积极鼓励和引导外资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要加强对投资宏观调控工作的领导。

30 日　国务院发布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

《规定》要求，对下列农业特产品收入征收农业特产税：（一）烟叶收入，包括晾晒烟、烤烟收入；（二）园艺收入，包括水果、干果、毛茶、蚕茧、药材、果用瓜、花卉、经济林苗木等园艺收入；（三）水产收入，包括水生植物、滩涂养殖、海淡水养殖及捕捞品收入；（四）林木收入，包括原木、原竹、生漆、天然橡胶、天然树脂、木本油料等林木收入；（五）牲畜收入，包括牛猪羊皮、羊毛、兔毛、羊绒、驼绒等牲畜收入；

（六）食用菌收人，包括黑木耳、银耳、香菇、蘑菇等食用菌收人；（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农业特产品收入。全国统一的农业特产税税目、税率，依照本规定所附的农业特产税税目税率表执行。个别税目、税率的调整，国务院授权财政部决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5%—20%的幅度内规定。此外，还对农业特产税的应纳税额、减免税等作出规定。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月

2日 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推出五年环保工作纲要

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推出了今后5年（1994年至1998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纲要。《纲要》认为，环保部门必须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强化统一监督，综合管理和宏观调控的职能，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在继续深化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到1998年，环境保护具体指标与1992年相比，工业废水处理率提高11.4个百分点，达到80%；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提高5.1个百分点，达到58%；工业废气处理率提高8.4个百分点，达到88%；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5.4个百分点，达到45%；城市放射性废物集中存贮率达到80%；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7760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8%左右；自然资源开发中遭破坏的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率力求超过5%。这些目标的实现，将减缓我国环境污染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为实现城乡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打下基础。

4日 国家工商局发布规定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

国家工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并发布实施《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所谓公用企业，是指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包括供水、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企业。公用企业不得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妨碍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也不得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公用企业不得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主要包括：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附带提供的相关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类商品；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生产或经销的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类商品；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及配件，购买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以检验商品质量、性能等为借口，阻碍用户、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其他商品等。公用企业如果发生这些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可根据情节的轻重，处以5至20万元的罚款。如果公用企业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继续实施上述违法行为，视为新的违法行为，从重予以处罚。

6日 我国产现县县通公路

一条简陋公路已修到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西藏墨脱县城。墨税扎木至墨脱县城公路全长141公里，由于这条路地处藏东南八级地震带，地理环境、地形、地质、水

文条件极其特殊和复杂，沿线地质病害严重，时时发生雪崩、泥石流、滑坡、山体崩塌等，给公路建设带来困难。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十分关心扎墨公路，先后投资近4000万元。施工人员经过长达十年的奋斗，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修通这条公路。

7日 我国在纳米科技方面实现国际领先

中国科学院北京真空物理实验室的科技人员成功地在室温条件下实现了固体表面原子的操纵和移植工作，使我国在纳米科技这一尖端领域走在国际科技前沿。纳米科技是在纳米尺度上研究物质特性的高新技术。它的最终目的是直接以原子、分子去制造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实现未来生产方式的飞跃。扫描隧道显微镜（STM）等现代化工具为纳米科技研究提供了有力手段。中科院北京真空物理实验室研究的新的表面原子操纵方法，在硅单晶原子排列的表面上直接提走硅原子，形成平均宽度2纳米（约3—4个硅原子）被镂空的线条。同时，还可以在硅表面上沿一直线方向取出原子后再将这些原子堆成另一直线，实现了可提、可植一条线的硅原子技术。还首先实现了在硅表面上原子沿晶格排列的方向整齐地移走相同的原子。这三个方面的突破，是我国科学家在原子级操纵和原子级加工这一被公认为21世纪高技术的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

19日 国家计委、税务总局要求推进税制改革保持物价稳定

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务必保持税制改革后物价稳定的通知》。《通知》说，1994年1月1日起，我国税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了保障新税制的正确贯彻和执行，避免推动物价上涨，保持市场稳定，安定人民生活，特通知如下：一、这次税制改革，总体上不增加企业税负，但也有少数产品税负有所增加。企业对增加的税负应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来消化；同时国家也相应采取措施，减轻企业的负担。因此，税制改革后，税负没有上升的企业不得涨价，税负下降较多的企业应适当降价，税负上升的企业原则上也不应涨价，个别企业因税负上升过大，需要提高价格的，必须经物价部门批准。二、目前，现行价格均包含税金在内，即为含税价格。所有纳税人都不得在现行价格之外另加增值税或其他税负，增加消费者负担。三、现行出厂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不能因税制改革而提价。四、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包括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批发、零售环节的进销差率（按现行含税价格计算）一律保持不变，各种税负一律在差率内征收。任何企业和单位不得擅自扩大差率。五、各级物价部门要加强对价格的监督检查。对属于国家定价商品未经价格管理部门批准擅自调价和由于对税制理解错误、计算有误而提高价格以及利用税制改革之机擅自涨价牟利等行为，要严肃查处，立即纠正。六、各地物价和税务主管部门要密切注视税制改革出台后的市场动向，并请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解决建议，及时向国家计委价格管理局和国家税务总局报告。

全国小城镇发展座谈会提出加快小城镇建设

民政部召开全国小城镇发展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旨在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小城镇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修订建制镇标准作准备，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小城镇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92年底，我国共有农村

小城镇5.5万个，其中建制镇14500个，而80年代初我国建制镇仅2200个。会议认为，发展小城镇是农村改革的必然延伸和客观要求，是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必然方向。会议指出，当前发展小城镇一定要注意合理布局，提高规模效益。同时，要根据小城镇的特点，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推进小城镇社会保障社会化。

22日　国家新的统计报表制度开始实施

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统计局制定了新的国家统计报表制度。新的统计报表制度初步克服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专业统计彼此分割、自成体系、互不衔接配套的弊端，从整体上提高了统计制度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这套新的国家统计报表中，包括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和固定资产投资单位等8套基层表和有关的综合表。配合实施这套新的统计报表，还制定了统计调查单位标准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等统计标准。新的国家统计报表从过去注重于采集反映速度的产值产量等信息，转变为主要采集反映效益的信息，这样的统计报表更便于从宏观决策和调控的角度了解各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济运行状况。

上海股市首次出现缩股

西安黄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出的公告称，经西安市政府批准和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该公司国有法人股、社会法人股和个人股按4:1的同比例缩股。“缩股”也称并股或称反向股份分割。即同比例减少股票股数，将数股合为一股。香港等股市曾出现过采用此种方式的事例。“缩股”在上海股市出现尚属首次。“西安黄河”原有社会个人股12358.76万股，经缩股后减为3089.69万股，扣除内部职工持股247.69万股，其余2842万股将于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5日　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签署命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外资金融机构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外资金融机构的正当经营活动和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设立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区，由国务院确定。中国人民银行是管理和监督外资金融机构的主管机关；外资金融机构所在地区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本地区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和监督。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其实收资本不低于其注册资本的50%。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规定》对设立外资银行或者外资财务公司应当具备的条件、设立合资银行或者合资财务公司应当具备的条件，申请者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书面申请时应提交的资料，审批的程度，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合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监督管理、解散与清算以及罚则作出规定。本条例自1994年4月1日起施行。1985年4月2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和1990年9月7日国务院批准、1990年9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工程院

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示》。中国工程院将实行院士制度，是我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必须从已作出重大成就和贡献的优秀工程技术专家中选举产生。第一批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根据统一的标准和条件，经过一定遴选程序，报请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工程院聘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建立后隶属国务院，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其办事机构挂靠国家科委。中国工程院的人员编制和事业经费，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财政部分别审核商定。

6月3日，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闭幕式上产生了96位首批院士。

28日　国务院部署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议于3月3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国家‘八七’扶贫计划”是1994年至2000年的七年间，全国扶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奋斗目标：一是力争在本世纪末最后的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绝大多数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500元以上，并形成稳定解决温饱、减少返贫的基础条件；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使绝大多数贫困乡和有农贸市场、商品基地的地方通路、通电；三是改变文化、教育、卫生的落后状态，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防治和减少地方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今后国家将继续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提高扶贫开发的力度。从1994年到2000年，每年再增加10亿元以工代赈资金、10亿元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同时，全社会将继续给予大力支持。会议指出，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果的关键在于扶贫工作深化改革。总的要求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努力提高扶贫开发经济效益，积极创造稳定解决贫困户温饱问题的基础条件。会议提出从7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要重点解决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592个贫困县的扶贫开发问题。第二，由政策性银行集中管理扶贫信贷资金，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地方长期存在的资金捆不起来、使用分散、济富不济贫的问题。第三，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进一步改革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方式；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第四，要变封闭式开发为开放式开发，把山里开发与山外开放结合起来，把贫困地区的开发与发达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寻找脱贫致富的途径。第五，认真抓好智力开发，科技、教育扶贫，努力提高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素质，这是扶贫的根本。第六，认真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责任制。第七，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积极争取国际合作，形成强大的扶贫攻坚支持力量。会议特别强调扶贫开发工作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扶贫县在完成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攻坚任务之前，要下定决心做到：不买小汽车，不建宾馆和高级招待所，不新盖办公楼，不搞县改市。

国务院批准商晶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计秀发布《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要求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购、销售商品或收取费用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都必须执行本规定。商品和服务的明码标价实行标价签、价目表等标价方式，具体标价方式、内容除按本规定有关条款执行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地（市）级价格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及各行业的不同特点确定。标价签或价目表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统一监制。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必须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准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一货一签、标示醒目，价格变动时应及时更换。不得高于标价出售商品和收取费用，收取费用应列出具体收款项目和标准，不得另行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由于行业特点需要减少标价签内容或某些特殊商品（如艺术珍品、古董等）不宜标价的，均须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准。凡提供有偿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均须在其经营场所或交缴费用的地点的醒目位置公布其收费项目明细价目表。价目表应包括收费项目名称；等级或规格、服务内容、计价单位、收费标准等主要内容。对不按规定执行明码标价的商品经营者和收费单位，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本规定自1994年3月1日起执行。1990年2月1日原国家物价局发布的《关于商品和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的规定》同时废止。

电子工业部提出抓好“三金”工程建设

电子工业部召开的工作会议提出，抓好国家重大电子信息应用项目——“三金”工程，积极推进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已成为电子工业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三金”工程，即“金桥”、“金卡”、“金关”工程。“金桥”工程就是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是信息化的基础设施。“金关”工程是将外贸企业的信息系统联网，目标是实现货物通关自动化、国际贸易无纸化。“金卡”工程即电子货币工程，借以实现金融电子化和商业流通现代化。电子部提出，1994年的任务是，“金桥”工程完成总体设计方案，“金关”工程上半年建成卫星总站并联网，“金卡”工程抓好中心城市的综合试点工作。

3　月

1日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4月4日，作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正式启动运营。此前2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章程。

2日　北京市公布经国务院批复的1991至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国务院1993年10月6日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务院批复强调，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规划要突出首都的特点，发挥首都的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地布局，促进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国务院重申：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占地多、运输

量大、污染扰民的工业。严格控制人口和用地发展规模。到 2010 年，北京市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 1250 万人左右（其中市区控制在 650 万人左右）。市区控制人口的重点是控制人口的迁移增长。切实保护和改善首都地区的生态环境。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必须保护古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整体格局，体现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努力提高规划和设计水平，塑造伟大祖国首都的美好形象。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步伐。由国家计委牵头，尽快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共同研究，具体落实有关南水北调、陕甘宁天然气进京、京津运河等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方案及实施步骤。加紧实施首都的交通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地铁、轻轨交通及其他大运量公共交通，进一步完善快速道路系统，建设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尽快形成现代化的综合交通网络。

9 日　全国外资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

国务院召开全国外资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全面总结改革开放 15 年来利用外资工作的经验，研究利用外资工作的方针、政策，促进利用外资工作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座谈会于 3 月 7 日结束。会议指出，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吸引外资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建立健全法制、完善市场机制、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人员素质，这是十分重要的。在吸引外资上，我国具有劳动力价格便宜、技术人才数量多、比较优秀的优势，但最大的优势还是我们有一个广阔的市场。今后主要是依靠以上优势吸引外资，让外资在中国市场上能获得合法的利润。但我们不能牺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去吸引外资，下一步要吸引更多的实力雄厚的财团、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和他们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外资的基本要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互惠互利，既要大力吸引外资，同时又要切实加强管理。对进入我国的外资，我们应货比三家，争取对我们更有利的条件。重大利用外资项目要统筹规划，避免盲目性与重复引进。适当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可以缓解企业资金紧张，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也有助于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但要加强资产评估，防止国有资产低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的骨干企业，国家应保持控股。要加强对外债的规模结构和使用效果的监控，确保还本付息的能力。保护外资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应该提到各级政府和工会的议事日程上来。

5 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犀快建立粮食风险基金

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内贸部、国家经贸委、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等有关部门共同主持召开全国粮食风险基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粮食风险基金，是国家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建立的一项宏观调控资金，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的来源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由中央补助和地方预算安排构成，以达到需要的资金规模为标准，但各地实际筹措资金总额加上中央补助资金不得少于最低规模。除中央补助资金外，缺额部分全部由地方自筹，最低规模所需资金必须在今年内全部到位。以后在年度预算中要年年安排。会议指出，粮食风险基金属于专项资金，有专门用途，不得挤占；粮食企业正常的经营性亏损和粮食企业正常周转库存所需要的费用、利息等不得用粮食风险基金来弥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克扣给农民的补助款。

5月9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由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联合制定的《粮食风险基金实施意见》，要求从1994年粮食年度起，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建立足够的粮食风险基金。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由中央财政安排，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由中央补助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构成。两项资金的配备比例原则上应为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公布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该法指出，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台湾同胞投资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台湾同胞投资，可以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全部资本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也可以采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应当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用可自由兑换货币、机器设备或者其他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作为投资。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用投资获得的收益进行再投资。此外还对其他有关事项作出了规定。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日　国务院批复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

国务院最近正式批复《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国务院在批复中强调，搞好水土保持不仅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脱贫致富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也关系到江河湖泊的开发治理和国家能源、铁路、交通、工矿等方面的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批复指出，水土保持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切实抓好预防保护和监督执法工作。要贯彻落实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在全国以黄河、长江为治理重点，同时要抓好其他江河的水土流失治理，以及各级重点防护区、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在水土流失治理进度上提出了两个方案，其中第二个方案治理速度较快。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按第二方案安排水土保持治理工作。

8日　国务院决定加强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审

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规范价格行为，使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上涨幅度控制在多数人民群众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障人民生活安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监审的通知》。《通知》明确，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监审是指：第一，通过调价备案制度，监测其价格走势，为宏观决策提供信息；第二，必要时对其中的部分品种提价行为进行审核，并视情况进行适度干预。监审价格的具体种类包括粮食、食用植物油等主副食品、日用消费品、民用燃料、服务收费项目等20项。各地方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每项中需要监审的具体品种。《通知》规定，要加强和完善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调控手段。对粮、油、肉等重要商品，要建立储备制度。要抓紧建立中央和省

（区、市）两级粮食风险基金，尽快完善和推广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制度。

10日　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1994年的经济工作，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技术进步，积极开拓市场，提高经济效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这个要求，计划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在连续两年增长13%的基础上，安排这样的速度是比较合适的。只要我们能够再连续若干年保持8%～9%的增长率，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当前经济增长的一些条件已经偏紧，"瓶颈"制约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改革又需要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必须正确分析和把握形势，既看到有利条件，又重视不利因素，力求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发展速度。各地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合理的发展速度，不要竞相攀比，盲目追求产值。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妥善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确保粮食和棉花产量稳定增加的基础上，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保持乡镇企业持续增长，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经营管理，搞好工交生产。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免除国有企业缴纳的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并且拨出专项资金用于破产企业的调整和职工安置。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切实采取措施，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扭亏增盈。国有企业要依靠自身努力扭转困难局面。企业要在积极推进改革的同时，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努力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不断开发新产品，增强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即使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也要量力而行。上新的基本建设项目，不能搞无本投资，要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不能挪用流动资金搞投资，银行要加强监督和管理；要打足投产时所需的铺底流动资金。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是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根本保证。今年的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为基础性重点建设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通过资金平衡来抑制投资膨胀；建立投资约束机制，投资主体和提供贷款的银行都必须承担风险责任；健全对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的宏观调控，规范投资决策行为，减少投资的盲目性。扩大开放，发展对外合作与交流。要注意保持适度的外债规模和合理的债务结构。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结合起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制，实行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改革税制，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时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稳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顺利实现汇率并轨。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使人民银行能够有效地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要积极而又稳妥地实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职能的分离。除组建国家开发银行外，还要组建支持成套设备进出口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承担国家粮油储备、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和农业开发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现在的国

有专业银行要逐步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各级政府要支持银行工作，使银行能够独立履行自己的职责。银行要自觉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实现人民币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并轨。要严格实施出口全额结汇和进口付汇的管理制度，严格资本项目外汇收支的监管，防止外汇流失。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今年国家将组织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积极总结经验，逐步形成规范化的实施办法，以利推广。继续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为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要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严格禁止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甚至无偿分给个人。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发展和培育市场体系。进一步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开放。继续搞好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11 日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代表国务院作 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94 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是继续保持国民经济良好发展势头的重要一年。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国工作的大局。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技术进步，积极开拓市场，提高经济效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994 年主要宏观调控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 13000 亿元。当年财政赤字 669 亿元，加上今年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息和专项用于重点建设的国外借款，今年内外债务总额为 1292 亿元。银行新增贷款 4700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6000 亿元。进出口总额 2000 亿美元。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控制在 10%以内。企业的产品销售率、资金利税率、劳动生产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和节能率都要有所提高。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13‰左右。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一）坚持把农业放在首要位置，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二）大力调整结构，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效益，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三）保持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五）切实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六）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199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作 1993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94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94 年国家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保证财税改革及

其他重大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培植财源，注重企业效益的提高，使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量力而行，调整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农业、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重点投入，保持国防和政法部门经费的必要增长，严格控制一般性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性支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今年对税收制度、财政体制和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财税改革后，预算编列口径变化较大。根据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和预算口径的变化情况，1994 年预算初步安排：国家财政收入安排 4759.95 亿元（不含国内外债务收入），比上年同口径执行数增长百分之 7.7%；财政支出安排 5429.14 亿元(不含归还国内外债务支出)，比上年同口径执行数增长 15%；收支相抵，差额 669.19 亿元。同上年比较，从今年起，对赤字编列口径作了调整，调整后的债务收入不包括在预算总收入之内，归还债务本息支出也不包括在预算总支出之内，财政收支的差额全部通过债务弥补。同时，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息，也通过借债来归还。这样调整以后，只是计算口径发生了变化，并不影响实际赤字额。

1994 财税工作的重点：（一）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确保财税改革取得预期效果。今年财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税制，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统一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时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二）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切实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促进企业的平等竞争，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努力做好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三）抓住财税改革的有利时机，改进和加强收入征管工作，防止收入流失。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有步骤地完成中央和地方税务机构的组建工作，妥善处理好机构组建过程中的业务分工和工作协调问题，确保税收征管工作正常运行。同时，要按照规定，继续抓好“两金”清欠和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两金”征管工作，不得随意减免。(四）要按照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的要求，改革国债发行办法，组织好承购包销工作，完善和扩大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规范和发展国债二级市场，增强国债的流通性和稳定性。并把国债发行同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结合起来。各级财政部门要在当地党政的统一领导下，与银行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保证国债的优先发行。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和邮政储蓄结余应主要购买国债。(五）控制支出总额，保证重点开支。除继续增加农业、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重点投入，保证国防和政法部门经费的必要增长外，要优先保证工资发放和国家粮食储备费用的开支，绝不允许挪用职工吃饭的钱去铺摊子、上项目。

12 日　中国银行在美国资本市场成功发行 5 亿美元扬基债券

中国银行在美国纽约的资本市场成功地发行了 5 亿美元扬基债券，债券期限为 5 年和 20 年。这是中国银行首次进入美国债券市场筹资，也是迄今为止中国银行在海外发行的数额最大、期限最长的一笔债券。美国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是此次债券承销团的主牵头行。债券发行期间虽然存在市场不稳定和投资者观望不前等不利情况，但中国银行

的债券却得到市场的良好反应，于发行当天就被投资者认购完毕。此笔债券所筹资金将用于国内交通、能源等重点项目的开发。

17 日　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家开发银行

为了更有效地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增强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出决定组建国家开发银行通知，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由其安排投资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资金总量和资金结构配置上负有宏观调控职责。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投资项目不留资金缺口，从资金来源上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及结构进行控制和调节，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逐步建立投资约束和风险责任机制，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通知附《国家开发银行组建和运行方案》及《国家开发银行章程》。

4 月 14 日，开发银行正式开业。

2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公布

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公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预算法》规定，国家设立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中央政府预算（以下简称中央预算）由中央各部门（含直属单位，下同）的预算组成。中央预算包括地方向中央上解的收入数额和中央对地方返还或者给予补助的数额。地方预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组成。地方各级总预算由本级政府预算（以下简称本级预算）和汇总的下一级总预算组成；下一级只有本级预算的，下一级总预算即指下一级的本级预算。没有下一级预算的，总预算即指本级预算。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下同）的预算组成。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包括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上解的收入数额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返还或者给予补助的数额。

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中央预算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中央预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关于预算、决算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关于预算、决算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预算由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组成。中央政府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中央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该法还对预算的编制、预算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决算、监督、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本法自 1995 年 1

月1日施行。1991年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23日 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农业农村工作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时隔不到半年中央再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全面部署农业和农村工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个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进一步落实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尤其是抓好粮棉油生产和"菜篮子"工程，争取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全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去年10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稳定，为各项重大改革措施顺利实施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上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25日 国务院讨论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

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这个《议程》是根据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的要求，1992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组织52个部门、机构和社会团体，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和帮助下编制的。为推动《议程》的实施，中国政府同时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议程》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毫不动摇地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同时，中国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才能实现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对策、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与实施、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费用与资金机制、教育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人口及居民消费和社会服务、消除贫困、卫生与健康、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工业与交通、通信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能源生产与消费、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荒漠化防治、防灾减灾、保护大气层、固体废物的无害化管理、团体及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等提出了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将《议程》作为各级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其目标和内容将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中得到具体体现。

7月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贯彻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和努力，促进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6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此规定已于1994年3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规定》要求：境内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以下简称

"境内机构"）的各类外汇收入必须及时调回境内，按本规定办理结汇、购汇、开立外汇账户及对外支付。并对结汇、售汇、购汇、开立外汇账户、对外支付作出具体规定。1994年4月1日起施行。以前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4　月

5日　全国物价局长会议要求控制物价过度上涨

全国物价局长会议4月5日至8日在武汉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制定的各项价格调控措施，控制物价过度上涨，确保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是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市场物价上涨过快。特别是关系群众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基本服务项目和基本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多，各方面难以承受。稳定市场物价、抑制通货膨胀，已成为当前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环节，是经济工作中最紧迫的任务，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最近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物价，主要是：一、严格进行"双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二、认真抓好农业生产和"菜篮子"工程，增加有效供给；三、加强政府对市场物价的调控管理，包括建立粮食和副食品价格风险基金，加强对20种居民基本生活必需晶和服务价格的监审，对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在全国开展物价大检查；四、果断采取若干平抑物价的经济措施，加强物资的调运和调剂，保证市场供应。会议要求各级物价部门坚决贯彻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措施，会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对市场物价进行调控和管理，这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一条共同经验。放开价格不等于改革任务完成，市场价格不能放任自流，企业定价不能没有规范。在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在市场上形成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价格调控体系，已成为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但是同时要注意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用新思路、新办法进行调控管理。要规范市场，抑制物价过度上涨，防止价格剧烈波动，同时又要避免把价格管死，重新回到计划价格的老路。

6日　国务院决定停止钢材、食糖、煤炭期货交易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停止钢材、食糖、煤炭期货交易的6点具体意见：一、停止钢材、食糖的标准化期货合约交易；已经经营钢材和食糖期货的交易所，停止推出10月份以后的期货合约。对于目前交易的期货合约，可继续交易到其交割日。二、允许继续以非标准化远期合同的形式进行交易，但是严禁非法倒卖合同，转手抬价。三、建议由煤炭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煤炭交易所和煤炭批发市场停止煤炭品种的标准化期货合约的设计和上市。四、各交易所今后一律不得自行决定上市新的期货品种。新品种上市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五、任何金融机构均不得出具期货交易保函证明。禁止任何期货交易所接受银行保函作期货交易保证金。六、当期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要求交易所提高保证金比率。

外商投资财产鉴定管理办法发布

为适应我国引进外资的需要，维护投资各方的合法权益，国家商检局、财政部发布了《外商投资财产鉴定管理办法》，并从5月1日起开始施行。近年来，外商以实物投资的比例不断上升，有的外商利用中方某些企业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缺乏经验等弱点，采取对所投设备低价高报、弄虚作假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也存在一些外商投资财产报价偏低的现象。自1991年起，国家商检部门依据国际惯例和有关法规，开始对外资财产实施价值鉴定。4年来，各地共受理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和价格咨询4000多批，其结果均得到中外合资各方认可，较好地维护了投资各方的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办法》是在全面总结已开展的外资财产鉴定工作的基础上，参照国际惯例制定的，充分体现了公正、真实、合理和平等互利原则，并便于具体操作执行，是我国扩大开放中的又一重要举措。该办法适用于国外（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各种对外补偿贸易方式中，国外投资者投人的或者受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在境外购进财产的鉴定。

9日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要求保障国家股正当权益不受侵犯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日前发出紧急通知，指出近一时期以来，一些上市公司在送配股时，对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采取不同做法，或者要求国家股放弃配股权，转归个人股东享用，或者给国家股分派现金红利而其他股东按面值分红股，或者不向国家股东送股，这种同股不同权的做法损害了国家股的正当权益，同时也很不规范，不符合国际惯例。为此，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在与中国证监会协商后，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国家股持股单位应正确、有效地行使股权，在股东会决定送配股事宜时要维护国家股利益，不得盲目赞成配股，只有在股份公司确需筹集资金、筹资最佳途径为增加股本、股东要求保持现有股权比例不被稀释、国家股东有能力追加股本投资这几方面条件同时具备时，国家股持股单位才可以同意上市公司采用配股方式发行新股。如果筹资目的不明确，或采用非配股方式筹资更为有利，或国家股东无意追加投资，则国家股持股单位应在股东会上运用表决权阻止配股；无力阻止的应设法购买配股或有偿转让配股权；任何情况下不得随意放弃配股权。如属国家有控股要求的上市公司，转让国家股配股权造成的股权结构变化应以不影响国家控股地位为限。

12日　国务院公布实施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

经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由国务院正式公布实施。《纲要》的制定遵循了以下四个原则：一是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二是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三是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四是具有可操作性，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产业政策的实施。《纲要》明确指出了90年代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和内容，要求要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要大力充实基础产业，努力缓解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局面；要加快发展支柱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要合理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同时，要继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与调整产业结构相适应，优化产业组织，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使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为了保证产业政策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实施的有效性，《纲要》规定：（一）国家产业政策由国务院决定。国家计委是具体负责研究制订、协调国家产业政策的综合部门。（二）建立国家产业政策审议制度。（三）建立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保障制度。（四）建立国家产业政策的监督、检查及评价制度。（五）省级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纲要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国家计委备案。

国务院公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

为把我国汽车工业（含摩托车工业）尽快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务院同意并印发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贸委、机械部等有关部门制订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通过本产业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汽车工业在本世纪末打下坚实的基础，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2010年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国家引导汽车工业企业充分运用国内外资金，努力扩展和开拓国内国际市场，采取大批量多品种生产方式发展。2000年汽车总产量要满足国内市场90%以上的需要，轿车产量要达到总产量一半以上，并基本满足进入家庭的需要；摩托车产量基本满足国内需要，并有一定数量出口。国家将促进汽车工业投资的集中和产业的重组，重点解决生产厂点多、投资分散；审批项目乱；重复引进低水平产品；定点厂建设及国产化速度慢（即散、乱、低、慢）的问题。其分期目标是：在“八五”期间，重点扶植国家已批准的整车和零部件项目尽快建成投产，为下一步加快发展我国汽车工业创造条件；在本世纪内，支持2—3家汽车生产企业（企业集团）迅速成长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型企业，6—7家汽车生产企业（企业集团）成为国内的骨干企业，8—10家摩托车生产企业成为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重点企业。初步确立少厂点、大批量生产体制和少数大型企业间有序竞争的市场结构，使同一类（按QC/T59—93行业标准分类）汽车产品产量居国内前三家企业的销售量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70%以上。与此同时，引导大型企业与骨干企业实行“强强联合”，在2010年以前形成3—4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和3—4家大型摩托车企业集团，实现自主开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自主发展，参与国际竞争。

19日 国务院要求严格控制进口减免税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减免进口税收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不要再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申请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要继续对现行的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政策规定进行清理。必须对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实行统一、规范、公平、公开的政策。海关和税务部门要切实加强税收征管，严格执行各项税收政策规定。对违反规定，擅自扩大政策性减免税范围的，要严肃查处。

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为了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

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21日　农业部提出推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农业部提出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意见》在肯定我国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经营机制的同时，指出乡镇企业在经营机制和企业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权责任不明确；政企职责不清楚，乡村行政领导随意干预企业的行为时有发生，职工主人翁意识淡薄，企业凝聚力不强；部分农民联户（合作）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性质没有确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意见》提出的目标是，通过改革，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之间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使各种经营方式得到完善和发展；使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意见》要求各地要不断丰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形式和内容。并提出现阶段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1) 具有一定规模、效益较好的企业，改建成股份合作制企业；(2) 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组建新企业；(3) 规模较大，效益较好，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组建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4) 以优势产业、名牌产品和骨干企业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5) 对小型、微利、亏损企业实行兼并、租赁、拍卖和风险抵押承包等。

26日　朱镕基强调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粮食购销体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4月26日至5月2日在浙江省考察农业时，针对沿海地区比较普遍存在的撂荒耕地现象，指出，这些地区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如果在经济富裕以后就把农业丢掉，把吃饭问题寄托于到内地高价购粮或进口粮食，无论从我国的耕地资源、粮食总量和外汇平衡来看，都是无法承受的。同时，单靠提高粮食价格，也难以解决这些地区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问题，还是应当探索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办法。要通过立法制止撂荒现象，同时鼓励种田能手集中承包闲置的土地。实行大户承包、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符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则，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耕地使用权向种粮大户集中，要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不能一哄而起。尤其要考虑农业机械化的条件。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化农业生产服务体系，要在农业机械、化肥、种籽、科技、流动资金贷款等方面给种粮大户以支持。对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朱镕基指出，要认真汲取去年市场混乱、粮价猛涨的教训。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粮食价格。这个价格应当是既能够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广大城市居民又可以承受的价格。二是这个价格要根据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形成，但这个市场必须由各级政府管理和调控，要放而有管，管而不死，以保持市场粮价的基本稳定。三是国有粮食部门必须掌握必要的粮源，充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粮食部门要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吞吐粮食，在粮食歉收、市场供应紧张时，要抛售粮食，平抑价格；在粮食丰收、价格下跌时，要以合理价格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国有粮食系统要深化体制改

革，将政策性和经营性两个部分从业务上、机构上分开。政策性部分主要从事收购、加工、批发、仓储，执行国家政策，稳定粮食市场，国家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予以支持。经营性部分从事粮食零售，多种经营，面向市场，自负盈亏。

5 月

1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原油成品油渣通体制

国务院决定，改革现行原油、成品油的流通体制，加强对原油，成品油生产、流通的管理，理顺油品价格，整顿流通秩序，减少流通环节，逐步建立起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促进生产发展的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这次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做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协调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二是搞好原油加工资源的合理配置；三是搞好成品油资源的合理配置；四是原油、成品油主要产品实行国家定价并保持合理的地区价差；五是理顺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六是逐步建立原油、成品油价格风险基金和两级储备制度。国务院强调，今后原油、成品油的价格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都要执行国家规定的出厂价格，所有加油站都必须严格按规定的价格销售。要清理成品油批发机构，对现有的油品经营单位进行严格整顿，要发挥石化总公司销售系统在成品油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对铁路、交通、民航、军队、外贸出口、石油等成品油用油大户实行由炼油厂直达供应。今后各级党、政、军机关一律不准从事原油、成品油的批发和零售业务。各流通环节都要严格执行统一的税制、税率，各级政府一律不得给予减免税优惠和实行包税。

中国银行在香港发行钞票

中国银行在香港发行港币钞票，5月2日起流通。中国银行今年计划发行30亿元港币，相当于香港港币现钞流通量的4%。

4日 我国研制成功世界首例转基因水稻

世界首例转基因水稻在安徽省合肥市问世。这是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用本所在国际上首创的离子束介导法，与安徽省农科院联合攻关多年育成的。这一重大突破为定向育种开拓了新路。通过有目的的基因转移，实现物种定向遗传改良，是当今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高科技领域。

10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三定”方案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根据方案的要求，国家计委将在前一段计划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原则，加强宏观调控，减少具体事务，加速职能转变。此次改革有三个要点：首先是明确了主要职能是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好经济工作的参谋；二是明确了市场是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三是明确了集中精力抓大事，凡是该由市场、地方和企业办的事，计委决不再包揽。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方案》，国家计委属于宏观调控方面的职能将进一步加强，主要包括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重大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订；对国民经济运行动态的预测、监

测和分析；对国家产业政策、重大生产力布局以及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制订并监督实施和协调；综合协调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及国家直接掌握的经济手段；监控全国物价总水平；指导管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国家储备等。

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公布

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公布了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要求，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依法维护公平的、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国家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保障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贸易方面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该法对外贸经营者、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国际服务贸易、对外贸易秩序、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规定。指出，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国家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逐步发展。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人和国民待遇。国家基于国家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外汇收支平衡等原因，可以限制国际服务贸易。因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使国内相同产品或者与其直接竞争的产品的生产者受到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的威胁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国家根据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采取进出口信贷、出口退税及其他对外贸易促进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本法。本法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17日　我国建立环境标志产品制度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成立。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授权国家环保局设立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是代表国家对各类环境标志产品进行认证的惟一第三方认证机构。环境标志又称生态标志或绿色标志，是一种证明性商标，标明产品从原材料的开发利用、生产、使用以及回收或废弃的整个过程符合一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无害或污染很小，并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和回收。今年内首先开展环境标志的6项产品，它们是：低氟氯化碳家用制冷器具、无氟氯化碳气溶胶制品（发胶、摩丝）、水性涂料、无铅车用汽油、再生的厕所用纸、丝绸类产品。按技术要求获准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企业，允许在认证的产品、包装、说明书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环境标志。

23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农业开发若干政策》。《若干政策》对农业综合开发的目标、土地资源开发治理的原则、以龙头项目带动农产品系列开发的原则、农业综合开发的管理、资金投人政策作出阐述和规定。农业综合开发的目标重点是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对水土资源的开发治理，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包括农业生态

环境），提高粮棉油肉糖等主要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多种经营，以龙头项目带动农产品的系列开发，把保证粮棉油肉糖等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与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结合起来。

26日　全国农村电气化会议部署电力扶贫共富工程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电力工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农村电气化工作会议，讨论和确定90年代我国农村电气化改革与发展目标及“电力扶贫共富工程”。会议提出本世纪内在全国消灭无电县，让1.2亿还没有用上电的贫困地区农民用上电，使全国农村通电农户达到95%以上，并建设1000个电气化县。这已成为国务院“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提出，实现农村电气化，一要靠政策，二要靠自力更生，三要靠积极开发利用当地丰富自然资源。

28日　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外资工作领导小组

为了加强对外商投资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外资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担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外经贸部，由郑斯林兼任办公室主任。

29日　我国引入BOT投资方式

由国家计委主办的“中国BOT投资方式国际研讨会”宣布，将于1994年9月1日开工、投资10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北京—通县城市快速路，被确定为我国采用规范化BOT方式进行的第一个试点项目，由外方投资，建成后经营15年，主要通过收过路费获取投资收益。BOT是建设、运营、移交的意思，是指以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政府授予投资者一段时间的经营特许期，特许期结束后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的投资方式。为更多更好地吸引外资，加快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从1993年以来，我国开始研究规范化引进BOT投资方式，已成立了由国家计委进行业务指导的专业性策划、组织实施BOT投资的北京博拓投资开发公司。

6　月

2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就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发出通知。通知说，近几年我国林业工作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全国林木资源过量消耗呈上升趋势，局部地区超限额采伐相当严重；乱砍滥伐林木和乱捕滥猎野生动物又重新抬头，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对此要予以重视，认真研究解决。第一，要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和木材凭证运输制度。国务院批准的一定时期内分年度森林采伐限额，是各地每年采伐林木资源的最大消耗量，具有法定效力。凡未经国务院或受权单位批准，各地不得突破限额。各地要在1994年下半年，对近几年采伐限额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超限额采伐的单位要严肃处理。第二，强化林地利用监督管理，实行有偿使用林地的制度。凡未依法办理手续的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和无偿划拨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使用的林地。第三，切实加强对野生动物和珍稀植物的保护管理。第四，加强森林资源林政基础

建设，稳定林业执法队伍，积极解决人员编制、经费等实际问题，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第五，严厉打击各种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第六，坚持实行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源任期目标责任制。凡任期内对乱砍滥伐、非法侵占林地和乱捕滥猎野生动物制止不力，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行政主要领导人的责任。对保护、抚育和发展森林资源成绩卓著者，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1993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由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国家环保局等 11 个部门编写的《1993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993 年我国废气排放量达 11 万立方米，其中烟尘有 1416 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国废水排放总量 355 亿多吨，比上年下降了 3%，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比上年下降 6.2%；全国大江大河干流的水质状况基本良好。说明工业污染防治已经取得成效。1993 年全国防治工业污染的直接投资达 144.9 亿元，比上年增加 26.6 亿元。工业废水处理率为 72%，比上年提高了 3.4 个百分点；外排工业废水达标率为 54.9%，比上年提高两个百分点。至 1993 年底，全国已有 57% 的城市居民用上了燃气，居民用气普及率比上年提高 4.5%，这对节约能源和改善城市环境起了重要作用。城市公共绿地面积继续增加，已达 7.4 万公顷，人均享有 4.5 平方米。1993 年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呈"双增长"趋势。占用耕地的增长势头也得到控制。然而，从去年情况看，我国环境保护任务仍很艰巨。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地面水污染普遍严重，地下水超采现象仍很普遍；全国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 1000 万公顷，每年因此损失粮食 120 亿公斤；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仍在发展；水土流失严重；渔业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发生工业污染事故 2761 起，比上年增加 94 起，直接经济损失 2.2 亿元。

8 日　国务院批准 1994 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

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国家体改委 1994 年 4 月 26 日提出的《1994 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1994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二是加快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围绕这两个重点，配套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实施要点》包括 8 部分共 25 条内容：一、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二、深化财税、金融等管理体制改革，初步确立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构架。三、适时推进价格改革，继续发展商品市场，重点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四、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五、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六、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八、进一步抓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

国家计委提出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和扶持粮棉大县发展经济实施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和扶持粮棉大县发展经济报告的通知》。为了更好地扶持粮棉主产区发展农村经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发〔1993〕11 号）的决定，国家计委会同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内贸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有关部

门，就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和扶持粮棉大县发展农村经济问题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报告》提出从 1994 年起，连续 5 年，国家每年安排 10 亿元专项贷款，在不同地区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并就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的指导思想、示范区选建原则和条件、示范区的类型和布局、建设内容和资金使用方向、示范区的审批程序和贷款规模等作了具体规定。《报告》还提出从 1994 年起，连续 5 年，国家每年安排 65 亿元专项贷款（其中商品粮大县 50 亿元，优质棉大县 15 亿元），在全国选择一批商品粮棉大县，集中扶持发展农村经济，并就扶持粮棉大县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商品粮棉大县选择的原则和项目建设的重点、项目的审批和资金安排、贷款期限与安排、项目的组织管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15 日—21 日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要求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强调，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基本政策不变，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一、经济特区要为加快建立全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积极探索和创造更多的经验。二、经济特区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三、特区要继续发展外引内联，为带动和促进全国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四、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珠海特区要继续为国家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五、要大力加强经济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特区工作的领导。江泽民指出，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经济特区的特色也要相应地随之发展。原来特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和措施会有所变化。要通过增创和发展特区的新优势来发展特区。特区还要“特”。

16 日　国务院批准清理整顿期货市场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1993 年《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下发后，有关地方和部门加强了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盲目兴办期货市场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期货交易所和经纪公司过多、过乱，运作很不规范；二是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不少属投机性质，有的已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三是一些期货经纪公司采用各种手段，欺诈国内客户，造成大量外汇流失；四是地下非法期货交易屡禁不止。我国期货市场还处在试点阶段，要本着“规范起步，加强立法，一切经过试验和严格控制”的原则稳步发展。目前要重点清理、整顿现有的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加强对交易所和经纪公司的管理，特别是要严格控制境外期货和金融期货交易，坚决打击各类非法期货交易活动。《意见》提出，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要立即停止审批新的期货交易所。对已有的期货交易所要重新进行审核和规范。在国务院《通知》下达前，经有关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于 1993 年 12 月底前已开业的交易所，要分两类进行清理。一是大部分交易所将按批发市场进行管理，不再冠以交易所的名称，不得进行期货合约买卖。二是对符

合条件的少数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下同）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经证监会从严审核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可进行标准化期货合约交易试点。经批准进行试点的交易所，要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登记注册，由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监管。《意见》指出，要严格限定期货交易的范围，各交易所要以商品期货交易为主。暂不开办金融期货业务，一律不得开展国内股票指数和其他各类指数的期货业务。各期货经纪公司均不得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已开展此项业务的不得接收新客户和新订单，已持仓者要在交割日前平仓或在交割日进行实物交割，平仓后即把汇出境外的保证金调回。《通知》下发前已设有期货经营机构的全国性公司，经证监会重新审核批准，可为本系统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但必须在证监会指定的境外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交易品种须经证监会认可。委托境外期货经纪公司代理交易，受托方必须是证监会认定的交易所的结算会员。外汇指定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证监会审核批准，可利用境外外汇期货业务进行套期保值，但要接受国家外汇管理局和证监会的监督管理。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必须取得证监会颁发的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意见》还指出，要严格审批各类期货经纪公司。暂停审批新的期货经纪公司。经证监会审核后符合条件的期货经纪公司，须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后方可开展期货业务。对于外资、中外合资期货经纪公司，原则上不予重新登记注册。要从严控制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坚决查处各种非法期货经纪活动，加强期货市场的监管工作。

21日　全国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强调从严监管金融机构

全国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于6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从严监管金融机构，认真维护金融秩序。会议认为，当前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上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擅自批准设立金融机构；一些人民银行的分支行也擅自越权批准设立金融机构；部分金融机构存在着违规、违章、超业务范围经营的问题；金融机构法人登记和招股增资等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会议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领导、管理金融业的职能部门，当前，特别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保证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行。首先，必须对违法设立和越权批设的金融机构进行认真的清理整顿。所有金融机构的设立都必须经过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未经批准，不得设立和经营。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现有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要监督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依法经营。

会议强调，金融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这一点决不能动摇，但金融机构设立也要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城乡信用合作社要坚持为城乡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服务的方向，同时，可由城乡信用合作社人股组建合作银行，调剂信用合作社资金余缺，逐步扩大对地方国营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关于组建发展合作银行，要先立法后推广，先城市后农村，不搞试点，分批进行。城乡合作银行必须坚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资金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原则。地方政府和部门不要干预其经营自主权。人民银行要加强对合作银行的管理。在农村，要扩大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自主权；要把农村合作基金会真正办成社区内资金互助组织，并不得办理存贷款金融业务。

24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切实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意见。意见提出，为了切实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工作，要切实做好六项工作：一、认真贯彻税法，强化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是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必须切实抓紧、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带动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方针。在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方针的同时，还必须注意解决好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否则，将不利于调动全体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二、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税法，增强全社会的依法纳税意识。培养公民的自觉纳税申报习惯，树立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社会风尚。三、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坚决制止随意变通税法规定和越权减免税的现象。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均不得下达与国家税收法规相抵触的文件。四、税务部门应严格执法，加强征收管理工作。五、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创造良好征管环境。六、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严厉打击偷税、抗税行为。对大案、要案的处理结果，应公之于众，以教育群众和震慑违法分子。

30日　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保持粮油市场稳定

国务院办公厅就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保持市场稳定发出通知。通知说，为了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保持市场粮油价格的基本稳定，经国务院批准，提出如下要求：一、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粮油收购，认真做好组织安排，保持良好的收购秩序。除承担国家粮食收购任务的单位和具备规定资格并经核准的粮食批发企业外，其他单位和个人都不许到农村直接采购粮食。二、销区粮食批发企业和用粮单位到产区采购粮食，必须到县以上粮食批发市场购买，严禁场外交易，杜绝偷漏税费。凡在批发市场场内成交的粮食，国家在调运、资金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粮油集贸市场常年开放，零星交易仍按现行办法执行。三、各级政府要组织工商管理、税务、粮食、物价等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对粮食批发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坚决取缔无照经营，对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哄抬粮价等扰乱粮食市场的行为，要严加惩处。四、要安排衔接好产区和销区之间的粮食购销，认真执行粮食调运计划。五、要保证粮食调运和进口粮油所需资金。对过去所欠货款要抓紧清理，积极偿还，不得再发生新的拖欠。六、培育市场机制，加强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县以上主产区和主销区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粮食批发市场，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油批发市场体系。要采取措施，逐步使市场行为规范化、法制化，向现代化市场发展。

7　月

1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正式开业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为扩大我国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不参与商业性业务竞争。但作为银行，要与国内、外同业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本部设在北京，不设营业性的分支机构，注册资本金为33.8亿元人民币，由国家财政拨款。该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在境内发行金融债券；在境外筹资；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和向国内同业拆借，以解决临时资金周转的需要。

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公布

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公布了由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发展职业教育，制定劳动标准，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劳动法》对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公布

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公布了由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该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房地产权利人应当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法纳税。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者双方协议的方式。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所确定的最低价。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由国务院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该法对房地产开发用地、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本法自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

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到科技、经济、文化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推动全社会树立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风尚，为公民和企事业单位的发明创造、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对外科技、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二、保护知识产权是一项涉及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工作，各有关部门要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以形成统一、协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三、要大力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作，建立日常监督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机制。四、为了履行我国参加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外经济技术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要强化海关在保护知识产权、制止侵权产品进出境方面的职能，采取必要的边境措施，有效地制止侵权产品的进出口。五、要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进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从国外引进技术或进口产品时，要全面了解有关技术或产品的知识产权状况，避免发生侵权纠纷或引起其他损失；向外输出新技术、新产品时，也要做好有关知识产权查询工作，防止技术或产品出口后被他人仿制或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六、各行业要把加强知识产权工作作为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自主研究开发能力比较薄弱的医药、化工和计算机软件等行业，要增加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提高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和水平。七、各项科技发展计划的主管部门要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计划管理的重要环节，要针对计划的实施和发展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战略，使知识产权工作贯穿于计划项目的立项、成果的法律保护以及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全过程。八、企事业单位要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强知识产权意识，遵守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纳入本单位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工作并形成相应的制度。九、科技、经济、文化领域的各类行业协会以及专门的知识产权社会团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推动知识产权法律实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政府有关部门要充分调动这些组织的积极性，使其成为行政管理部门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有力助手。十、当前，要大力加强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和对广大领导干部以及人民群众宣传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知识的工作。逐步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环境。十一、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本决定制定加强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的具体办法。

11日，国务院办公厅决定建立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由国务委员宋健主持。

7日　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推出首批优先项目计划

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外交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召开的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组织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正式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第一批优先项目计划，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与支持，促进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际会议。会议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需要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我们愿意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中国愿意为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卓有成效的多边、双边合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资金和技术水平有限。中国的土地退化、沙漠化、水土流失、水质恶化与水源供应短缺、旱涝灾害、森林植被退化及污染等环境问题严重，并且已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我们真诚欢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给予关注，并落到实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不仅会造福于中国人民，也将是对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

1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决定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共7个部分：（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内容。（二）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三）积极推进租金改革。（四）稳步出售公有住房。（五）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建设。（六）做好原有政策与本决定的衔接工作。（七）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积极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19日　外经贸部、国家计委发布进口商品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规定，国家对进口商品实行目录管理。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国际市场垄断性强、价格敏感的大宗原材料商品列入目录，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管理，即由国家核准有经营能力和优质服务的外贸公司（包括专业外贸公司、综合外贸公司、工贸公司、联合外贸公司和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商业、物资公司）经营；目录以外商品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各类企业按照企业经营范围自主经营。目前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商品共12种。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及进口商品经营管理情况，对外经贸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管理的商品目录提出调整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实行。各进口单位进口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可委托由外经贸部核定有该商品经营权的公司进行代理进口。国家统一进口商品由外经贸部安排的外贸公司经营。《暂行办法》还对协调监督等有关方面做出规定。

20日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是由电子工业部、电力工业部、铁道部共同发起出资组建，并吸收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大连万事通电信电缆有限公司等国内有实力的企业以及由北京凯奇通信总公司、上海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联合通信总公司代表的三市参股，注册资本为十亿元。公司的成立，是我国对通信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将改变电信业高度集中、独家经营的局面。联通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将在充分挖掘专网通信潜力的基础上，经过改造、扩容，与邮电部公用网互联互通，逐步建成联通网，经营长话、市话、无线通信、电信增值和新兴通信业务。联通公司将贯彻国家

"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网"的方针，服从邮电部的行业管理。除扩大国内的合作，还将加强对外合作。

21日　国务院批准清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拖欠问题

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清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拖欠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这次清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拖欠工作，是在投资规模过大、在建项目过多、地方自筹资金不落实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能依靠国家增加投资，扩大固定资产规模的办法来解决，应主要通过压缩基本建设的在建规模，特别是压缩国家计划外项目，调整资金投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到位来解决。清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拖欠的范围是：在建基本建设项目和1993年已经竣工投产的项目。清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拖欠工作要分别轻重缓急，按照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后一般大中型项目，先收尾投产项目，后在建项目的顺序展开。清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拖欠，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请示》还对清理的具体办法、时间提出了意见。

22日　全国扭亏增盈工作会议提出国有企业必然亏损是毫无根据的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扭亏增盈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势头良好，但由于多种原因，当前国有企业的亏损状况仍较为突出。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对于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既不要夸大，又要认真对待；既不能把国有企业亏损说得似乎一团漆黑，也不能采取无所谓和国有企业亏损是难免的不正确的态度。抓好扭亏增盈工作，必须正确分析企业亏损的成因。当前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一是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领导不力；二是企业债务包袱沉重，生产经营自有资金比重过低；三是设备老化，技术、工艺落后，消耗居高不下，产品无竞争力；四是企业的社会包袱重；五是企业增支减利因素增多；六是由于实施"两则"，把潜亏变成了明亏，也增加了亏损。下一步抓好扭亏增盈工作，第一，各级领导必须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维护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高度来认识扭亏增盈工作。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能因为国有企业遇到了困难，就动摇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大批通过改革开放和机制转换办得很好的国有企业。所谓国有企业必然亏损、扭亏无望，是毫无根据的。第二，从内部找原因，从管理挖潜力，开拓扭亏增盈的新路子。第三，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转变职能，帮助亏损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建立责任制，领导亲自抓，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下达的1994年扭亏增盈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

24日　国务院发布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认定的企业其他国有资产。建立明确的产权关系，旨在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监督机构的职责、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理顺企业财产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分工监督和企业经营的相互关系。国有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国有资产实行分级行政管理。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或者有关机构，对指定的或者其所属的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自主经营，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

的权利。《条例》还对企业财产的监督管理应遵循的原则，分级管理和分工监督、监事会、企业法人财产权、法律责任等做了规定。

27日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发展的重点和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加快发展和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努力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会议落实了西藏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62个援藏建设项目。这些建设项目包括能源、交通、邮电、农牧林水、粮油加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投资总额预计23.8亿元，其中，中央和有关部门承担30个项目，18.02亿元地方对口支援32个项目，5.78亿元。全国务省区市和6个计划单列市都承担了援藏建设任务。会议指出，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同西藏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当前，在大的方面要把握三点：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第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逐步建立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第三，发挥全国支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两个积极性，下决心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带动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西藏发展的重点，要放在加强农牧业，搞好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上，以利于增强自我发展的活力和后劲。要立足发挥本地优势，建立切合西藏实际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在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特别重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既要注意弘扬藏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又要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根据这个思路，西藏从现在起到2000年的发展目标是：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国民生产总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继续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基本完成脱贫任务，使多数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为下世纪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

8　月

4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

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规定》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准，可以向境外特定、非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股份，其股票可以在境外上市。在境外上市的股份，采取记名股票形式，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境外上市外资股在境外上市，可以采取境外存股证形式或者股票的其他派生形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或者其监督管理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与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达成谅解、协议，对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募集股份并在境外上市及相关活动进行合作监督管理。此外，还对有关审批程序及相关的监督、管理问题作出规定。

5日 财政部收回建设银行代理行使的职能

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联合发出《关于财政部收回原委托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代行财政职能的通知》。《通知》说，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财政部"三定"方案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的情况，财政部决定并商得建设银行同意，从1994年9月1日起，收回原委托建设银行代理行使的财政职能。《通知》还对一些具体业务做出了安排。

15日 朱镕基强调继续加强宏观调控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上指出，银行工作要继续加强宏观调控，严肃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商业银行改革要跨出关键性的步伐，在国家专业银行进一步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同时，要在整顿现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规范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首先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开始。城市合作银行主要以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贷款为主。这有利于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推动银行业的竞争；有利于疏导地方兴办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朱镕基指出，要进一步深化中央银行的改革。目前一要改善调控方式，从运用贷款规模的直接调控向运用利率、公开市场和存款准备金的间接调控转变；二要加强监管，依法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维护健康的金融秩序。金融系统要坚决贯彻国务院"三防一保"会议精神，防诈骗、防盗窃、防抢劫，保证银行资金安全，防止大案要案的发生。要加强对案件查处的力度，更重、更狠地打击金融犯罪活动。朱镕基重申，国家银行要与自办的经济实体彻底脱钩，为维护金融秩序起表率作用。要坚决制止银行信贷活动中拿回扣、收手续费、借故压单压票等变相提高利率，获取额外利益，腐蚀银行职工的非法行为，

16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组建方案

国务院决定将现有的6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开发银行，同时新组建一个人员精干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务院批准的组建方案规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是国务院直接联系的国有独资政策性投资机构，受开发银行监管。公司为独立法人，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投资公司的任务是：运用国家开发银行核拨的资本金及软贷款，对少数不宜由国家控股公司和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参股、控股的政策性项目进行投资，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益。主要业务范围；1. 承担少数不宜由国家控股公司和中央企业集团参股控股的政策性项目；2. 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3. 原来由6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经营，目前难以转移到其他单位经营的中外合资或参股的项目。国家投资公司不参与项目的具体经营管理工作。国家投资公司的股权可转移给国家授权的有关经营单位。

18日 国务院发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基本农田是指根据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建设用地的预测而确定的长期不得占用的和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下列耕地原则上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1.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和名、优、特、新农产品生产基地；2. 高

产稳产田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以及经过治理、改造和正在实施改造计划的中低产田；3. 大中城市蔬菜生产基地；4. 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生产条件好、产量高、长期不得占用的耕地，划为一级基本农田；生产条件较好，产量较高、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划为二级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应当贯彻全面规划、合理使用、用养结合、严格管理的方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为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由上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基本农田的义务，并有权对侵占、破坏基本农田以及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检举、控告。

22 日　国务院批准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问题的意见

国务院批复并原则同意外经贸部、国家科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外贸出口商品结构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一、鼓励外贸企业、生产企业与科研机构结合。二、拓宽实施贸工技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渠道。三、在外汇、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四、简化审批管理程序。五、建立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贸易信息传递、交流的中介机构。

3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公布

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公布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法》规定，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审计法》还对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审计机关职责、审计机关权限、审计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本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88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同时废止。

朱镕基指出棉花流通体制要坚持不放开经营，不放开市场，不放开价格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闭幕。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取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流通体制。朱镕基强调，改革不能简单归结为彻底放开，实践证明这只能导致价格失控、秩序混乱、损失严重。改革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创造条件，稳步推进。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棉花流通体制要坚持不放开经营，不放开市场，不放开价格。今年改革的重点是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合理调整棉花价格，调动农民种棉、售棉的积极性；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规范的市场流通秩序，加快健全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改进和完善国家对棉花的储备调节体系。要千方百计把棉花收上来，确保国家掌握充足的棉花资源，是当前棉花工作的重点。为此，除了合理调整价格，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外，还必须加大

市场管理的力度。产棉区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务必政策一致，行动一致，相互支持，严格制止“棉花大战”。采取坚决措施取缔非法收购、加工和经营。要继续深入开展打击棉花掺杂使假的违法犯罪活动。今年棉花工作除了做到“收得上”，还要做到“调得动”。产区、销区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产区要支持销区，销区也要支持产区。产区各级政府要顾全大局，把支持、保证、监督供销社做好跨省调拨工作，作为领导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9　月

6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工作

李鹏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他要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坚决贯彻落实十项措施：一、各级政府切实负起稳定物价的责任。二、抓好农业生产，增加有效供给，三、抓好“菜篮子”工程，保证副食品供应。四、建立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五、推进流通体制改革，整顿流通秩序。六、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七、加强对消费基金的宏观管理，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八、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九、加快价格立法工作，坚持依法治价。十、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

11日　西—兰—乌光缆干线开通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光缆干线今天正式开通。西一兰—乌光缆干线全长3130公里，总投资7.9亿元。它贯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的39个城市，东接郑（州）西（安）、西（安）成（都）和（北）京太（原）西（安）光缆，中接（北）京呼（和浩特）银（川）兰（州）和兰州—西宁光缆，西接乌（鲁木齐）伊（宁）光缆，是亚欧光缆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北地区的信息神经中枢。西—兰—乌光缆是国内第一条全程采用30芯光纤缆的大容量数字通信干线，投产运营后，将向社会提供容量大、质量好、可靠性高的新的通信传输手段，可以满足长途电话、数据通信、图像通信以及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业务的需要。

12日　国家工商局制止多层次传销中违法行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通告。一、坚决取缔擅自开展的多层次传销活动。二、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从事或参加多层次传销活动。三、对于利用多层次传销方式推销假冒伪劣商品或走私贩私物品的，依法从重处罚。四、经营者开展多层次传销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取缔：多层次传销活动参加者的业务主要是介绍他人参加，且收入主要来自其所介绍的新成员缴纳的入会费，或者经营者的利润主要来自参加人员的入会费的；以缴纳高额入会费或以认购商品方式变相缴纳高额入会费作为加入条件的；对多层次传销活动参加者的报酬或商品的质量、用途、产地等，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诱人入会的；商品价格高于合理市价，牟取暴利的；不准退货或设定苛刻的退货条件的。五、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多层次传销活动的监督管理。

14日　国务院要求检查执行新财税体制和物价政策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违纪问题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1994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通知》要求：这次大检查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充分重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社会公证机构的作用，组织一批素质较强、政策水平较高的从业人员重点检查一批企业和单位，为把大检查逐步过渡到以社会监督为主创造条件。重点检查执行新财税体制和物价政策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违纪问题。重点检查的单位是：（一）交纳增值税、消费税的税源大户和经营性亏损严重的行业与企业；（二）金融、保险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房地产开发企业、证券公司和第三产业中其他管理比较混乱的行业；（四）外贸企业和有外贸经营自主权的企业；（五）假冒民政、福利、校办、集体、联营等骗取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六）对群众反映乱涨价、乱收费、乱罚款比较突出的部门、行业和单位；（七）各地区、各部门认为需要检查的行业和企业。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纳税情况和价格执行情况，也要有重点地进行抽查。要继续委托地方重点检查一部分设在当地的中央企业和单位。

16日　兰新铁路复线全线铺通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兰新铁路复线提前全线铺通。这项工程于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立项，1992年9月开工，仅用两年时间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条长达1622公里的铁路复线。兰新铁路复线，东起武威南站，西抵乌鲁木齐，途经金昌、张掖、嘉峪关、哈密、吐鲁番等西部重镇。全线架设大中桥梁151座，凿洞隧道12座，正线铺轨1622公里，站线铺轨131公里。它的建成使兰新铁路的运输能力从1992年的12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远期可达5000万吨以上。

21日　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各地抓紧清理企业欠税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抓紧清理企业欠税的紧急请示》，要求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执行。《请示》指出，新的财税体制今年年初出台以来，运行基本正常，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均有较快增长，预算执行情况比原来预料的要好。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欠交税款逐月增加，这严重妨碍了国家财政预算收入任务的完成。为此，财政部等四部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把清理企业欠税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务求取得显著成效。一、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树立全局观念和依法治税的观念，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清理欠税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并层层督促落实。二、摸清企业拖欠税款的情况和原因，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清欠办法。三、整顿商品交易秩序，严格结算纪律。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要克服地方和行业保护主义，督促企业按期交付货款。各级专业银行要严格执行"税，贷、货、利"的扣款原则，对欠税企业收回的货款，首先要足额扣缴税款，同时要防止压票、压证和拒收税票的情况发生。四、突出抓好重点欠税行业和重点欠税企业的问题，今年欠税较多的主要是烟草、电力、石油、石化等行业。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要在当地人民政府和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下，按照两套税务机构税收征管范围，分别抓好各自的清理欠税工作。五、强化税收管理，坚持依法征税。把清理企业欠税以及清理收缴企业欠缴中央烟

酒专项收入，作为今年财税大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那些屡催无效甚至抗税不缴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其行政及法律责任。

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有资管理局、人民银行发布《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该《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金库条例》和《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制定的。《办法》规定，国有资产收益的范围包括：1. 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2.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家股应分得的股利；3.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家作为出资者按照出资比例应分的红利；4. 各级政府授权的投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收益应上缴国家的部分；5. 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6. 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股权转让（包括配股权转让）收入；7. 对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出资转让的收入；8. 其他非国有企业占有国有资产应上缴的收益；9. 其他按规定应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办法》还明确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管理工作由财政部门会同国有资管理部门负责。国有资产收益按中央、地方产权关系和现行财政体制，分别列入同级政府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23日　中务院批准暂停粳米、菜籽油期货交易，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暂停粳米、菜籽油期货交易和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管理的请示》。《请示》指出，近一个时期，粳米、菜籽油的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价格均大幅度上涨，期货交易中出现了过度投机，少数会员所持合约量过大，买卖双方对峙的现象。粳米、菜籽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期货价格的上涨客观上助长了人们的“涨价预期心理”，不利于国家稳定物价政策的实施。为保证市场的稳定和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经与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内贸易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研究后，提出了暂停粳米、菜籽油期货交易和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监督管理的具体意见。

29日　国务院批准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在批转这份意见时指出，金融机构监管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地区、各部门对中国人民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要给予积极支持和配合，对清理整顿金融机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处理，以促进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授权的金融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审批职责。设立金融机构和开办金融业务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金融业务的，一律为非法经营，要依法予以处理。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监督和查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进行干预。对未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并颁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由各地区、各部门自行批准经营金融业务的，要依法自查、自纠。确需设立的，要重新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报批。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派出机构，要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授权批准设立金融机构，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违规和越权批准设立金融机构的清理工作。财政部门办的证券机构必须尽快与财政部门脱

钩。其中符合条件、确实办得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财政证券机构，要按照统一标准，经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后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办成规范的证券公司，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邮政网点办理居民储蓄业务必须符合储蓄机构的设置条件，并领取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社区内为农业、农民服务的资金互助组织，不是金融机构。农业部负责制定有关的政策法规，指导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管理和发展。地方农业行政部门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并会同农业行政部门对违反规定办理存贷款业务的行为进行处理。《意见》强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典当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典当机构设立的审批和业务管理，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现有典当机构进行清理和规范，对超业务范围办理银行业务的，要限期予以纠正。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同级计划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债券和彩票的管理，在国家下达的企业债券发行计划内，负责发行债券的审批。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得向社会集资和擅自发行彩票。除国家授权机关批准外，任何党政机关、部队、团体以及其他国家预算内事业单位、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都不得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地方财政部门、工商企业和法人金融机构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要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条件和投资比例。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依法纳税，依法经营，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10　月

7 日　国务院要求淘汰 1000 万锭棉纺落后设备调整纺织工业结构

国务院发出《关于搞好纺织工业生产和调整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以来，由于上年度棉花减产，棉花流通领域秩序混乱，棉花及纱、坯布价格暴涨，致使大中城市国有棉纺企业原料紧缺的矛盾相当突出，针织、纺织、印染等后道纺织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为了妥善处理好目前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推进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合理组织纺织工业生产的同时，必须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快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做好以下工作：一、采取积极措施，组织好棉纱均衡生产。棉纱超产地区要研究切实可行的限产措施，千方百计把超产势头减下来。已停产的落后小棉纺厂，不得再恢复生产；对盲目超产的企业要采取行政、经济手段，促其减产、停产。二、限期完成棉纺企业的压锭改造任务。为了解决棉纺行业存在的棉纱生产能力过大、设备陈旧落后这一主要问题，国务院决定要压缩淘汰落后棉纺设备 1000 万锭。已确定的 500 万锭压锭改造任务，务必在 1996 年底前完成；其余 500 万锭压锭改造任务要在 1998 年底前全部完成。压锭改造淘汰的旧设备要予以销毁，不得转移后再使用。同时，要严格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国家定点生产的棉纺设备只能用于更新改造，不准用于扩大生产规模。三、抓住机遇搞好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在地区布局上，鼓励中心城市、发达地区纺织工业的初加工能力向原料产区转移；在产品结构调整上，要向深加工和高附加值型产品方向发展，重点提高产品质量，并注意扶持一批效益好、产品适销、出口创汇能力强、在行业中影响大的骨干企业；要改变目前低档次的同类纺织产品生产过剩和中、高档产品

供应不足的状况，力争“九五”期末高档服装面料基本上能满足出口的需要。要大力发展装饰、建筑、土工等产业用布，同时还要加快发展化纤及化纤原料，提高化纤在纺织纤维加工总量中的比重，力争“九五”期间达到45%。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技术改造进度，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五、依法组织好纺织企业的破产实施工作。要在进行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的若干城市中选择一批纺织企业依法实施破产。《通知》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按以上要求认真组织落实，并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对在调整期间确需停工、停产、转产的企业职工的生活，要采取措施，针对不同情况妥善安排，积极主动地为企业排忧解难。

劳动部等部门提出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

为深化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改革，进一步发挥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促进就业、平抑失业率和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劳动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根据《规定》，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是借鉴股份制的做法，实行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应遵循下列原则：（一）全员入股，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三）实行民主管理；（四）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规定》对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设立、产权界定、股权设置、收益分配、管理体制、变更与清算等作了具体规定。

23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强调，社会发展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最突出的是认识问题，要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的认识，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树立全局的观念和长远的眼光。会议确定了从1996年到2010年15年间我国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要求各级政府加强领导、深化改革，把社会发展工作推向新阶段。第一，各级政府要把社会发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和考核、监督标准；第二，要深化社会发展领域的各项改革，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以地方政府为主的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发展机制，建立注重社会效益、兼顾经济效益、严格国有资产管理的社会事业运营机制；第三，要保证供给，增加对社会发展的投入；第四，要统筹规划、合理分工、协调行动。会议还要求各级计划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充分发挥计划手段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把社会发展作为计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对社会发展担负起综合平衡、统筹规划的责任。

25日　国务院决定试行国有企业破产

国务院决定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并就有关问题发出通知。要求企业实施破产，必须首先安排好企业职工。并对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的处置，破产企业财产的处置，担保的处理、银行贷款损失的处理、破产企业的整体接收和濒临破产企业的重组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26日　全国农村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强调立足农村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

全国农村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是关系到农村及整个国

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关系到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的持续发展。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树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包袱，而是财富的观念。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今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措施。各地应以立足农村，就地消化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方针，要通过大力发展开发性农业、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加快小城镇建设等多种渠道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加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当前要花大力气建设和健全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组织，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和管理。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适度有序的转移。有关方面要研究制定扶持政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纳入项目管理。

28日　人民银行决定定期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

为完善宏观调控职能，提高执行货币政策透明度，保持金融稳健运行，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统计和公布暂行办法》，决定从1994年三季度起，按季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货币存量，指的是全社会在某一时点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总和。它是中央银行监测国民经济总需求变动的重要信息，也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监控只是单纯地运用现金和国家银行信贷的变化，这种监控方式是与当时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新的融资渠道的不断增加和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单纯的现金交易已不能反映经济和货币运行的全貌，单靠贷款规模也难以管住社会信用总量，因此中央银行单纯监控现金和国家银行信贷变化已不能适应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要从主要依靠贷款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此次决定制定和公布货币供应量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29日　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决定在1997年进行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从1997年起，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调查农业和农村的基本情况。

30日　全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强调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5部委联合召开全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据统计，1993年，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级取消项目和降低收费标准，减轻农民负担103亿元，人均减少11.6元；农民人均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7.88%下降到4.68%，不合理收费明显减少。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大气候。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负担“反弹”的压力增大。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和地方领导对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认识不统一，有的地方不尊重自愿原则，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兴办公益事业急于求成，注重政绩，忽视政策；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法规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

落实，致使有些地方的农民负担在今年又有所回升；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难度大，合同内负担管理不够规范。今后一个时期减轻农民负担的任务是，要加强农民负担规范化、法制化管理，争取用几年时间，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体系和配套措施，做到村提留、乡统筹和劳务控制在国务院颁布的《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的限额之内，对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和基金项目等按照法定程序严格监督审核，使农民负担的总水平同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适应。

我国首次获奠国管理科学决赛奖

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合作的"中国煤炭、电力系统投资战略研究"项目，最近获美国（国际）1994年管理科学弗郎兹·爱德曼决赛奖。这是我国管理科学研究项目首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该奖以美国管理科学鼻祖弗郎兹·爱德曼的名字命名，是美国和国际管理科学的最高奖。

11　月

2日　国务院决定由经贸委牵头组织企业改革试点工作

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近几年来，虽然国有企业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不少国有企业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表明，现有的企业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和综合配套改革，这也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增强活力的根本出路。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物，真正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方面我们缺乏成熟、系统的经验。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权的分离，推动政企职责分开，使企业摆脱对政府行政机构的依赖，转换经营机制，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由此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要依据行业和企业的特点选择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要特别注意实现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要通过法律确定企业的独立地位和债务责任；要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要加强对企业改革的领导，精心组织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国务院决定，试点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负责，会同国家体改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具体组织实施，重大问题由国务院研究确定。试点企业要坚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探索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试点工作主要靠企业自己来搞，政府以创造外部环境和改制指导为主。

会议要求认真贯彻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初步打算用两年左右时间分三个阶段进行。今年下半年为实施准备阶段，明年上半年为抓好典型、总结经验阶段，明年下半年至1996年上半年为逐步推进阶段。当前，要加强贯彻实施《监管条例》的组织领导，认真组织好学习培训工作，明确国务院授权的监督机构和被监督企业名单，做好对1000户左右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分期分批委派监事会的工作。

全国国有资产管理暨清产核资工作会议公布我国国有资产总量

全国国有资产管理暨全国清产核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近期工作纲要》，总结交流近几年来各地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经验，研究贯彻落实《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的具体措施，修订完善一批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法规，部署近期全国国有资产管理和清产核资工作。会议提出，将在三五年内为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体制打好基础。会议指出，现已初步摸清了国有资产的“家底”，基本上掌握了我国国有资产的总量和分布状况。截至 1993 年底，全国国有资产总量为 34950 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 26025 亿元，占资产总量的 74.5%，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8925 亿元，占资产总量的 25.5%。1988 年以来，我国国有资产年均递增 18%以上。

9 日　国务院要求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和加强现金管理

国务院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和加强现金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禁止行政企事业单位滥发钱物和年终前突击花钱，各单位增提的总工资和总额承包奖，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并经财税、审计、劳动部门审核。元旦前一律不得提前发放工资、奖金、津贴以及兑现承包奖，欠税单位不得兑现承包奖。对违反规定的，银行有权拒付，并由当地政府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严肃惩处。《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工资套改政策坚决控制增资总量的通知》，严格按照国家审批的工资制度改革方案执行，对于增资额超出国家下达指标限额的部分，国家不予承认，财政部门不得从财政预算中拨款。银行要按《工资基金管理手册》监督各单位的工资性现金支付，计划之外的，银行有权拒付。《通知》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开展消费基金检查的通知》对所辖地区的行政、企事业单位的消费基金和个人所得税征收情况进行检查，并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各银行要继续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认真落实现金发行、回笼计划；要努力改进服务，通过上门服务、到农副产品收购网点吸收储蓄等措施，大力组织存款，增加信用回笼。国务院明确这项工作实行“省长负责制”，由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直接负责做好贯彻执行和监督检查工作，保证各项要求和措施的落实。

15 日　江泽民对亚太经济合作提出五项原则建议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惟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各国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不断加强合作力度与协调，在更大规模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为维护世界和平奠定重要的基础。国际社会尤其要花大力气，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各自具有的优势相互补充，缩小贫富差距，使世界经济得以持久、均衡、稳定地发展。这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是发达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

范。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提出如下五项原则建议：一、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各成员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和睦相处。要提倡多商量，多探讨，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决定。二、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由于各成员之间经济水平有很大差别，政治地位不同，发展的轻重缓急不相一致，合作要务实稳妥，逐步深入。尤其在酝酿重大举措时，要勤于思，慎于行，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实施，以求实效。三、相互开放、不搞排他。首先，各成员之间要实行相互开放，不搞歧视。发生分歧时不要动辄树起壁垒。其次，在深化地区经济合作的同时，要扩大同地区外的交流与合作，以博采世界之所长。四、广泛合作、互利互惠。合作的思路可以再放开一些，合作的领域可以进一步拓宽。不仅要继续重视贸易和投资等问题，而且本地区发展中成员普遍关心的消除贫困、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问题也应该成为合作的重点。五、缩小差距、共同繁荣。要考虑到发展中成员的需要，帮助它们克服种种制约，缩小它们同发达成员之间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特别是发达成员也应对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开放自己的市场。

21 日　全国农村经济工作座谈会提出“九五”期间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

国家计委召开的全国农村经济工作座谈会提出，“九五”期间，我国农村经济要重点研究和解决四个重大问题：一是到 2000 年力争粮食总产达到 5000 亿公斤以上，比目前的生产水平增加 500 亿公斤。二是加快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争取本世纪末绝大多数农民过上小康生活。三是妥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四是切实加强水利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到 2000 年粮食总产达到 5000 亿公斤，也就是要用 6 年的时间再增产 500 亿公斤，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必须保持在 16.5—16.7 亿亩的水平。为此，在切实保护耕地的同时，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垦荒地 1800 万亩。通过节约用地，力争将耕地年均减少面积控制在 300 万亩左右。今后 6 年还要在组织实施一批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工程、大型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大力改善以灌排为重点的农业生产条件，力争 6 年内改造中低产田 2.1 亿亩。在确保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的同时，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来抓。在确保增产 500 亿公斤粮食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使农民增产增收；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并力争到 2000 年，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目前的 33% 提高到 40% 以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很大。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通过实施农业开发和精耕细作，扩大农业就业容量。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加速城市化进程，特别是要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要大力开展劳务输出。

22 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外汇兑换券停止流通和限期兑换

中国人民银行在公告中说，自 1994 年 1 月 1 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以来，我国已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已发行的外汇兑换券也在流通中逐步兑回，目前只有少量外汇兑换券在市场流通，已有条件按原定计划完成此项改革，以便在境内机构和境外来华人员结算、支付中统一使用人民币。公告就外汇兑换券停止流通和限期兑换的有关问题作了如下规定：一、在 199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外汇兑换券仍可以流通使用，或按本公告的

规定兑换成外汇或人民币。二、从1995年1月1日起，外汇兑换券停止在市场上流通。境内机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来华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境内居民均不得再用外汇兑换券标价、收付、结算。公告还对境内机构、外商投资企业、来华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境内居民个人持有的外汇兑换券兑换成美元或进行结算的时间，分别作出规定。这一办法将从11月22日起执行。

财政部、劳动部要求加强对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

财政部、劳动部印发《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是按国家规定提取、筹集和使用的专项基金，必须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自行决定该基金的其他用途。为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和完整并妥善处理该基金的保值问题，国家发行社会保险基金特种定向债券。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相抵后的结余，除保留两个月支付费用外，80%左右应用于购买特种定向债券。职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作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在保证必须支出后，其结余的一部分以及养老保险基金购买特种定向债券的结余，应根据国家下达的年度国债发行计划，积极认购其他种类的国家债券。社会保险基金购买国家债券以后仍有结余的部分，应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存入银行的专户。对于职工失业保险基金中用于转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的支出，应按规定审批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其中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必须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规模严格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已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于其他项目的，应在这一规定公布后半年内收回并返还基金。逾期仍未收回的要逐笔登记，在审计、财政、计划、银行、劳动等部门监督下，限期收回；自行投资已造成损失不能收回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严肃处理。

23日　财政部等部门要求为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

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住房公积金是一种长期性住房储金。在职工工作期间，职工个人和所在单位均应按职工个人工资和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逐月缴纳。公积金归职工个人所有，作为职工个人住房基金，专户储存、统一管理、专项使用。起步阶段职工个人和所在单位各按职工个人工资和职工工资总额的5%缴纳住房公积金。另外，还制定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支付、使用、管理的具体规定等。

28日—12月1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1995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1995年经济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继续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全党全国工作大局，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199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推

进各项配套改革，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农副产品供应，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强化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会议要求，应当科学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在好的形势下，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会议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以下几个问题：（一）必须坚决抑制通货膨胀，把平抑市场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二）真正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下大决心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争取在几年内把农业投资提高到合理水平。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这样做。（三）以国有企业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通盘考虑，统筹规划，搞好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四）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克服盲目铺新摊子、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倾向。（五）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坚决克服一些单位盲目增加个人收入和社会集团消费的倾向，同时必须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群众、低收入者和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巩固和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七）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不失时机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必须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发展，把发展经济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来。明年必须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二是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坚决抑制通货膨胀。三是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要切实抓好“米袋子”、“菜篮子”，确保主要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确保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二、三产业，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四是认真抓好公交生产，把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放在突出位置。所有企业都要面向市场，挖掘潜力，降低消耗，积极开发和生产国内外市场适销的产品，改善产销衔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要大力加强企业管理，加强公交生产的综合协调工作。五是努力增收节支，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六是改善投资环境，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七是抓紧制定“九五”计划。会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明年改革的重点。要继续贯彻《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尽快落实《监管条例》；中央和省市分别选择一批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同时对现有股份制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进行规范；围绕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一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建立破产机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企业集团；积极解决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妥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要围绕企业改革，进行以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保障水平要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考虑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要继续巩固和完善今年出台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措施，同时根据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积极培育市场，抓紧经济立法，改善经济秩序。

29日 国务院批准解决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的办法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审计署、内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粮食储备局《关于粮食

政策性财务挂账停息的报告》。《报告》提出停息的前提条件是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粮食财务挂账专户，将清理核实后的政策性挂账、企业自补挂账、其他挂账分别转入专户，逐年进行考核。一是当年不挂新账；二是5年内按规定的比例逐年解决已清理的旧挂账；三是粮食企业政企分开，划清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建立两条运行机制。凡是达到上述三个条件的，中央财政按规定对挂账实行停息。凡是停息后新增加的粮食财务挂账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财政将从核定的停息基数中相应扣除新增挂账。

30日　我国新一代实用广播通信卫星顺利升空

我国新研制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升空。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6次飞行。至此，它已将37颗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送入太空轨道。此次发射的"东方红三号"卫星，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是我国新一代实用广播通信卫星，装有24路C波段转发器，设计寿命8年。与我国在轨使用的"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相比，转发器数量增加5倍，寿命增加1倍，拥有相当于12颗"东方红二号甲"的通信能力。发射卫星的"长征三号甲"是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高轨道支载火箭，起飞推力300吨，可将2.6吨的有效载荷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2　月

3日　国家土地管理局等对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作出规定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范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在总结股份制试点企业土地使用权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体改委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根据《规定》，企业可依法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或作价入股。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司，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内，享有并须承担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登记文件所载明的权利和义务。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变革力量。依靠科技进步和知识传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我国的重要任务，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当前科普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继续做好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宣传的同时，要特别重视科学思想的教育和科学方法的传播，培养公众用科学的思想观察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其次，要把重点继续放在青少年、农村干部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身上。要努力发挥教育在科普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结合中小学教育改革，多形式、多渠道地为青少年提供科普活动阵地，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要继续面向亿万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传播和普及先进

适用技术，因地制宜、扎实有效地开展农村科普工作。要增强领导干部的科技意识和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能力，帮助他们不断扩大知识面，了解科技发展动态，认识科学技术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

10日—13日　全国计划会议提出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中心加强改善宏观调控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讨论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研究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中心，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会议指出，影响当前和明年经济全局的突出矛盾是通货膨胀，要充分认识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和抑制通货膨胀的紧迫性、重要性。会议分析了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认为除了进行价格结构性调整属于改革不可避免要付出一定代价之外，主要是连续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导致货币过量发行，从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两个方面推动了物价上涨。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最薄弱环节，一些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增长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特别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忽视农业，对“菜篮子”工程有所放松，加上水旱灾害严重，导致食品价格涨幅过高。价格调控体系和市场监管工作不健全，流通秩序混乱，也是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指导方针，明年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下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把过高的物价上涨幅度降下来，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会议要求，1995年的计划部署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中心，切实做好以下工作：(1) 根据需要和可能，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特别是考虑抑制通货膨胀的要求，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2) 大力加强农业，增加农业投入，切实落实并确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千方百计增加主要农副产品的供给，保证市场供应。(3) 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大调整投资结构的力度，集中力量，缩短战线，抓好建设项目的投产和收尾，提高投资效益。同时，要加强和改善消费基金管理，坚决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4) 工业生产要把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放到突出位置，坚持按国内外市场需求开展生产经营，加强产品开发和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5) 以粮食、棉花、食油、肉类、蔬菜和化肥等商品为重点，进一步整顿流通秩序，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物价监督，规范价格行为。(6) 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更有效地利用国外贷款，加强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和管理，把利用外资同国内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7) 积极发展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会议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搞好宏观调控，在经济体制转换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时期尤为必要；要在全面估量和正确判断宏观经济态势的基础上，恰当地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时机和力度；把加强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密切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作用，增强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有效性，并加强立法，把宏观调控进一步纳人法制化轨道；要在国家宏观调控要求指导下，正确发挥省一级经济调节的作用，保证全国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11日　上海地铁一号线开通

历时5年建成的上海地铁一号线以市区西南部锦江乐园为起点，经上海体育馆、淮

海路北折至人民广场，穿越苏州河到达上海火车站，全长 16.1 公里，沿途设 13 个车站。这条地下长龙贯穿上海最繁华的闹市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最高时速可达 80 公里，日运载设计能力约 100 万人次。上海地铁一号线从设计到施工，从速度到质量，都堪称我国同类项目建设之最，具有 80 年代后期世界先进水平，它赢得了海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并实现了上海在第四纪软积粘质土层中建造地铁的零的突破。上海地铁是运用国际融资方式进行建设的重大市政工程，由德国、法国和美国提供优惠贷款与设备。这项工程为上海合理利用外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成功经验。

13 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1994 年我国推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在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的条件下进行的，操作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不仅统一了全党和社会各界的认识，较好地协调了各方面的矛盾，使改革按照国务院的统一方案如期出台，而且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大的扭曲，确立了新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保证了新体制的平稳运行。更重要的是，财税改革没有给经济生活造成大的震荡，没有对物价水平带来冲击，没有影响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在总体上也没有增加企业的负担。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认真分析和看待当前财税改革和财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财税改革而言，目前取得的成果还只是阶段性的，不能估计过高；在预算执行和预算管理方面，还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在安排 1995 年财政收支计划时要遵循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即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坚决抑制通货膨胀；继续完善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配套改革；通过加强和改善财税管理工作，努力挖掘增收潜力，使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在保证国家政权建设和事业发展支出适度增长的同时，加大农业投入，继续抑制投资及消费需求，严格预算约束。在 1995 年的财政工作中，各级财政部门必须把支持农业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稳定增加农业资金投入，调整支农资金结构，保证支农资金的及时到位，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城郊以蔬菜为重点的副食品生产基地。要严格控制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在工资方面，行政事业单位主要是消化 1994 年出台的工资政策。同时对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也要严格管理，使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低于实现利税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低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社会集团消费方面，无论是生产、建设、流通还是消费领域，都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严肃查处任意挥霍国家资财的行为，制止以各种名目搞收效不大、劳民伤财的“办节”和招商活动。

14 日　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大会在三峡大坝坝址——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举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经过长达 40 年的论证，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又进行了近两年的施工准备，现在已经具备了开工的条件。中央决定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三峡工程将于 1997 年实现大江截流，2003 年首批机组发电，2009 年工程将全部竣工。

在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前，李鹏于 12 月 12 日、13 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

委员会专题会议，就三峡工程的若干问题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省、市负责人进行了研究。

20日　国务院实行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煤炭生产的行业管理，促进煤炭安全生产，国务院制定《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对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条件、程序及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罚则等作了具体规定。

同日，国务院发布乡镇煤矿管理条例。《条例》规定煤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煤炭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家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方针。乡镇煤矿开采煤炭资源，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国家扶持、指导和帮助乡镇煤矿的发展。《条例》还对资源与规划、办矿与生产、安全与管理、罚则等作了具体规定。

23日　内贸部提出严控批发市场中远期合同竞价交易

国内贸易部发布《批发市场管理办法》，提出加大对批发市场管理力度，严格控制中远期合同竞价交易，促进批发市场有序发展。我国目前不少批发市场开展中远期合同竞价交易活动，一些批发市场也有引进期货机制的愿望，但中远期合同竞价交易很不规范，缺乏有效的管理经验，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稳定的因素。为此，内贸部明确指出，将严格控制中远期合同竞价交易，这种交易只在少数批发市场进行慎重试点。未经内贸部批准，任何批发市场不得从事中远期合同竞价交易。对不执行管理规定的，将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94年，全国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新的成绩，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社会保持稳定。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1.8%。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5%，第二产业增长17.4%，第三产业增长8.7%。

农业生产在遭受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获得较好收成。粮食总产量4445亿公斤，比上年减产120亿公斤，仍是历史上产量较高的年份；棉花、油料、肉禽蛋、水产品、水果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全年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运输邮电业也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社会货运量完成118亿吨，增长5.8%，运输结构继续改善，公路运输和水运增长较快，运输紧张状况有一定的缓解；邮电业务总量693亿元，增长50.2%。

国家重点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完成15926亿元，比上年增长27.8%，增幅比上年回落了30.8个百分点。重点建设项目资金到位情况明显好于往年，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是近几年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较好的年份。全年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137个、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244个。一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竣工投产，促进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财政金融形势保持平稳。在新的财税体制下，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基本正常。初步汇总，全国财政收入完成5182亿元，比预算超收422亿元；财政支出5820亿元，比预算多支391亿元；收支差额638亿元，小于预算控制目标。国库券发行计划在预定发行期内顺利完成。中央银行强化了统一实施货币政策职能，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得到较好控制，加强现金管理收到了积极效果，金融秩序进一步好转。全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新增6315亿元。

对外开放继续保持好势头。全年进出口总额23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9%。其中，出口总额1210亿美元，增长31.9%；进口总额1157亿美元，增长11.2%。年末国家现汇结存达到51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一倍多。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全国实际利用外资4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6%。外商投资结构改善，境外大公司、大财团来华投资增多，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资继续增加。国际旅游业蓬勃发展，全年入境旅游人数达4368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比上年有较大增长。

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科技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完成一批重大装备的研制。在程控交换机、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工业机器人、生物疫苗、功能材料等高技术的产业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各级各类教育继续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了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全年招收研究生5.1万人，普通高校本专科生90万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工作顺利推进。成人教育和在职培训广泛开展。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各方面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新成绩，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11.21‰。就业岗位继续增加，新增城镇就业人数715万人。农村卫生工作得到加强。文化、新闻、出版、影视、广播、文物等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

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有所改变，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122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5%；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3179元，实际增长8.8%。居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社会保障事业稳步发展，约有7300多万在职职工和1600多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6%和离退休人员的80%。在1000多个县开办了农村养老保险。

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农业基础仍然脆弱，抗灾能力不强，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较差，相互拖欠资金比较严重，影响经济正常循环；特别突出的是通货膨胀加剧，市场零售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过猛，对部分城乡居民生活影响较大。各级政府在抑制价格上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和工作上的问题，全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达21.7%，大幅度地超过了10%的调控目标。

1994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国家计委下达1994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共151项，其中新增项目（＊）21项。

煤炭项目（22项）　河北开滦矿区　山西大同矿区　山西古交矿区　山西阳泉矿区　山西潞安矿区　山西晋城矿区内蒙古准格尔一期　内蒙古平庄矿区元宝山露天矿及其配套工程　辽宁铁法矿区　黑龙江双鸭山矿区　黑龙江七台河矿区　安徽淮南矿区　安徽淮北矿区　山东兖州矿区　山东枣滕矿区　河南平顶山矿区　河南永夏矿区　云南小龙潭露天煤矿　华能精煤公司神府东胜矿区　陕西黄陵矿区　黄陵一号井及洗煤厂配套工程　宁夏灵武矿区灵新大井配套工程郑州矿区　超化矿井　部城矿井配套工程

石油项目（6项）　黑龙江大庆油田开发　辽宁辽河油田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开发　新疆塔里木地区开发　新疆油田开发　广东南海西部石油公司

电力项目（39项）　天津蓟县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辽宁铁岭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吉林双辽电厂　哈尔滨第三电厂二期（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一期工程　江苏常熟电厂　浙江北仑港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福建水口水电站　湖北隔河岩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湖南五强溪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海南大广坝水电站　广西岩滩水电站（舍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天生桥水电站＝级工程（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天生桥水电站一级工程　四川铜街子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四川宝珠寺水电站　四川＝滩水电站　贵州东风水电站　云南漫湾水电站（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西藏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李家峡水电站　辽宁绥中电厂　内蒙古元宝山电厂三期（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河北西柏坡电厂　内蒙古达拉特旗电厂　安徽马鞍山第二电厂　浙江嘉兴电厂　河南堰师电厂二期　黑龙江鹤岗电厂　内蒙古伊敏煤电联营一期工程（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上海外高桥电厂（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陕西渭河电厂二期工程　甘肃靖远电厂二期工程　＊山东邹县电厂三期（含五十万伏输变电工程）　＊湖南石门电厂　＊河北衡水电厂　＊山西阳泉二电厂　＊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

水利项目（3项）　大阳综合治理骨干工程　望虞河工程　大浦河工程　杭嘉湖南排工程　甘肃引大入泰工程（地方项目）　＊河南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铁道项目（17项）　浙赣复线　陇海线徐连复线　徐州枢纽　焦柳复线　焦枝段（93年为焦枝复线）　＊襄石段　湘黔复线及电气化　京九线　京衡段新线　衡商段新线　阜九段新线　向吉段新线　吉龙段新线　广梅汕段新线　合九段新线　南浔段复线　南昆线　侯月线　宝中线北京西客站（铁道工程、市政工程、邮件处理中心）　兰新复线　成达线　广大线　集通线（地方项目）　京广线京郑段电气化　＊成昆铁路电气

化　＊横南铁路

交通项目（15 项）　秦皇岛煤码头四期工程（合商检设施）　天津港（地方项目）　大连港（合商检设施）　上海港　烟台港（合商检设施）　湛江港　广州港　西江航道整治　日照港（含商检设施）　汕头港　宁沪杭甬高速公路（地方项目）沪宁高速公路　杭甬高速公路　海南环岛公路（东线）工程（地方项目）　＊川藏公路一期工程　＊连云港港墟沟港区一期工程　＊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二期工程

邮电项目（4 项）　西成光缆工程　＊京沈哈光缆工程　＊京汉广光缆工程　＊京太西兰乌光缆工程　京大西光缆工程　西兰乌光缆工程

民航项目（1 项）　＊桂林两江机场

钢铁项目（10 项）　山西娄烦太钢尖山铁矿　四川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　武汉钢铁公司三炼钢工程　＊鞍山齐大山铁矿电站设备用钢材国产化专项　成都无缝钢管厂　舞阳钢铁公司　上海钢管厂　衡阳钢管厂　齐齐哈尔钢厂　武汉四七一厂

有色项目（6 项）　河津山西铝厂二期　江西铜业公司德兴铜矿三期　广西平果铝厂　甘肃金昌金川有色公司　云南大红山铜矿　＊广东韶关冶炼厂

金项目（1 项）　山东莱州新城金矿

化工项目（8 项）　河北矾山磷矿　湖北黄麦岭磷化工公司　湖北荆襄磷化学工业公司大峪口矿肥结合项目　云南磷肥工业公司　陕西渭河化肥厂（地方项目）　北京乙烯工程（地方项目）　＊吉化 30 万吨乙烯工程　＊贵州瓮福磷矿重钙项目

石化项目（2 项）　安徽安庆石化总厂丙烯腈纶工程　江西九江石化总厂大化肥工程（地方项目）

建材项目（3 项）　安徽铜陵水泥厂　北京水泥厂　黑龙江浩良河水泥厂

机电汽车项目（2 项）　东风汽车公司（含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轿车项目　一汽一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轿车项目

轻纺项目（2 项）　福建青州造纸厂　＊江苏仪征化纤联合公司三期工程

林业项目（1 项）　“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

教育项目（6 项）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卫生项目（3 项）　北京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院　卫生部疫苗工程（上海、兰州、昆明）

广播项目（2 项）　中国国际广播中心工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务楼工程

环保项目（1 项）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其他项目（略）

1994 年国家预备重点建设项目

＊三峡工程　＊湖南江垭水利枢纽工程　＊宝钢三期　＊首都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　＊天津汽车工业总公司夏利轿车扩建项目集成电路九〇八专项工程　＊粮食流通项目

＊山西离柳矿区

1994年国家重点建设收尾项目

内蒙丰镇电厂　鹰厦铁路电气化　沪杭铁路复线　京津塘高速公路　青岛港　张家港港二期工程　武汉天河机场　唐山钢铁公司炼铁扩建二期　焦作中州铝厂　甘肃白银有色公司　贵州瓮福磷矿　河南中原制药厂　南京汽车制造厂依维柯项目　四川成都印钞厂　青海油田　大秦线（二期）　大包复线　贵阳贵州铝厂　重庆西南铝加工厂　云南昆阳矿务局晋宁磷矿　抚顺石化公司丙烯腈纶工程　河南洛阳炼油厂　长春双阳水泥厂　山东淄博腈纶厂　北京邮政枢纽北京中央电视发射塔工程

1995年

1　月

1日　国务院决定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通知，决定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普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查清全国工业资产的底数，特别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状况；全面调查我国工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主要产品结构和行业结构状况，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及其利用状况，主要生产设备数量及其技术状况。通过普查，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工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为深化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改革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创造条件。普查对象为全部工业企业，重点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普查的主要内容为1995年工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包括生产、销售、库存和成本、费用、价格、盈利等情况），资产负债状况及其构成，生产能力利用及技术装备状况等。1995年年底以前为普查准备阶段，1996年一季度实施工业企业普查登记，1996年年底以前完成全部工业普查资料的审核和数据处理工作，并对普查资料进行分析和开发研究。

2日　全国第三次营养调查结束

与1982年进行的全国营养调查比，我国人民的膳食结构有了重大改进。全国平均食用粮食，1982年是675.9克/标准人/日，1992年下降为537克/标准人/日；与此同时，肉禽食用量，每标准人每日的平均进食量由42.8克增至58.3克，奶类由9克增至14.2克，蛋类由9.7克增至16.1克，鱼虾类由11.8克增至27.7克；植物油都有较大的增加。1992年，中国人动物性食物提供热能平均为9.3%，比1982年的7.9%有所提高。矿物质中，钙的摄入量显著缺乏。我国儿童营养状况有显著改善，与1982年比较，

1992年6岁儿童的平均身长和体重城、乡分别增长了4.6厘米、4.0厘米和2.4千克、1.2千克。调查数据表明，我国人群膳食结构和营养健康状况存在着四喜二忧：一喜是坚持了以谷类和蔬菜等植物为主和适当辅以动物性食物的传统中国膳食结构，既有利于我国人民的健康，也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二喜是主要营养素和热能摄人量足，来源合理。三喜是膳食质量明显改善。四喜是人群的健康状况明显提高，儿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增加。一忧是城乡差别没见缩小。二忧是导致“富裕型”疾病的营养因素突出。

7日　国家体改委提出1995年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任务

国家体改委提出，1995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明确划清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力，尽快建立多层次的粮食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形成吞吐及时、调节自如的粮食流通体制。继续按照政策性经营与商业性经营分开的原则，改革粮食企业体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要放在扶持生产、尽快建立市场宏观调控和质量监督机制上。

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1995年要重点发展完善批发市场和要素市场，把商品的批发市场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不仅要从实际需要出发搞好交易场所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建立新型的批发制度，搞好批发企业的改革，确立稳定的工商关系，建设好市场信息网络，以形成良好的市场关系，利于货畅其流。在培育要素市场方面，一方面要发展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按照“开正门、堵邪门”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规范银行拆借、票据贴现和国债流通市场；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和规范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科技信息市场等其他要素市场。国家对城镇土地使用权一级市场的垄断要强化，要建立健全土地评估机构和基础地价体系，加强对房地产二级市场的规范化和管理。

1995年将抓紧市场管理制度和市场法规建设工作，推动市场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更多地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调控物价。在城镇，要加强对食品和其他重要消费品批零差价的监督和调控。在农村，要进一步整顿化肥、农药、种籽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秩序，减少流通环节，保证商品质量。坚决打击哄抬物价、垄断市场、欺诈消费者的不法行为，保障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

国家计委等对基准地价评估收费标准作出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基准地价评估收费标准》。土地价格评估收费是房地产市场重要的经营性中介服务收费行为，评估机构要按照“自愿委托、有偿服务”的原则与委托方签订合同，开展评估服务工作，收取合理费用。《通知》规定，凡具备土地估价资格并经土地、物价部门确认的单位，可接受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委托，对土地价格进行评估，并按规定收取土地评估费。一般宗地评估采取差额定率累进计费，即按土地价格总额大小划分费率档次，分档计算各档的收费额，各档收费额累计之和为收费总额；城镇基准地价评估收费，由评估机构与委托城镇参照《基准地价评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为土地使用权抵押而进行的土地价格评估，评估机构按一般宗地评估费标准的50%计收评估费；清产核资中的土地价格评估，按一般宗地评估费标准的30%计收评估费。《通知》还对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监督检查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财政部制定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为了综合评价和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状况，财政部制定《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从1995年起试行。这套体系包括：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等10项指标。

"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研制成功

被国家列入"863"高技术计划和"八五"科技攻关计划共同支持的重大科研工程项目——"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研究，历经三年零九个月的紧张研制与飞行试验，已从试验空域实时地传回了机载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图像，从而标志这个项目研究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一系统的研制成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繁、造成损失严重的国家。本系统的建成可对洪涝等突发性自然灾害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快速灾情评估，从而将极大地提高我国抗灾救灾的能力。

10日—13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确定，1995年的农村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确保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收入稳定增加两大目标，突出粮棉生产、"菜篮子"产品生产和乡镇企业三大重点，千方百计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具体目标是：粮食播种面积要稳定在16.5亿亩，总产量力争达到4550亿公斤；棉花播种面积争取恢复到9000万亩，总产达到9000万担；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也要有较多的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有较多的增长。

10日—14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1994年金融工作，研究部署1995年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在金融工作报告中指出，1995年金融工作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服务，坚决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全年国家银行新增贷款，除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按收购进度保证需要外，控制在国家计划之内。全年货币发行低于计划控制目标。各家银行大力吸收存款，存款增长37.1%；城乡居民储蓄增加6315亿元，增长41.5%。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点资金需要得到了保证。1995年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服务，坚决抑制通货膨胀。金融工作的重点是：从紧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大力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强化金融稽核监管，坚持金融分业经营和管理，深入整顿结算秩序；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实行信贷管理责任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完善外汇结售汇制度，加强国家外汇储备管理。

11日　国务院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对外举债和进行信用评级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地方政府不得对外举债和进行信用评级》的通知。《通知》规定，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法律和规定，地方财政不能搞赤字预算，地方政府无权对外举债。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必要进行信用评级，正在进行的要立即停止。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属于借用国际商业贷款范畴，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

的有关规定办理，即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必须有国家计委批准的借款指标，纳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包括发债在内的对外筹资，必须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具有国际融资业务经营权的金融机构办理；对外筹资的方式、成本、市场、时间等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监督和管理。

14 日　国务院批准 1995—2000 年计划生育工作纲要

国务院批准并转发国家计生委《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纲要（1995—2000 年）》。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到 2000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 10‰以下；到 1995 年末，全国总人口（不包括台湾）控制在 12.3 亿以内，到 2000 年，控制在 13 亿以内。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把人口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同时，人口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机制。

大连造船新厂 20 万吨级船坞正式投产

我国目前最大船坞——大连造船新厂 20 万吨级船坞正式投产。船坞由国内船舶专家自行设计建造，长 365 米，宽 80 米，深 12.7 米，可承接 30 万吨级以下船舶的建造。

我国主要港口吞吐量突破 10 亿吨大关

据交通部统计，1994 年我国主要港口吞吐量首次突破 10 亿吨大关，达到 10.2 亿吨。沿海港口建成深水泊位 20 个，新增吞吐能力 2580 万吨；内河改善通航里程 349 公里，内河港口新增吞吐能力 274 万吨。全社会水运货运量比上年增长 4%，货物周转量增长 8.6%。

15 日　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劳动部联合发布实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试行办法》确定，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等于 100%，为国有资产保值；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大于 100%，为国有资产增值；亏损企业暂用减亏额作为保值增值指标。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一般以年度作为考核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考核值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定，会同财政部门下达。

16 日　255 种进出口商品暂时实行较低关税税率

全国海关发出公告：1995 年 1 月 1 日至 1995 年 12 月 31 日，海关对 246 个税号的进口商品和 9 个税号的出口商品，按比现行税率低的暂定税率征收关税。实行关税暂定税率的 246 种进口商品主要有：非零售包装农药成药、农药原药、农药中间体、药用原料、牛羊油、椰子油、塑料橡胶、木浆、新闻纸、羊毛、人造棉、锦纶丝、马口铁、锅炉钢板、型钢、镀锌钢板、机床控制装置、监视器用显像管、25 寸以上彩管玻壳、光导纤维、航空发动机、导航设备等。实行关税暂定税率的 9 种出口商品主要是栗、磷和 7 种有色金属产品。

18 日　京沈哈光缆工程全线开通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北京—沈阳—哈尔滨光缆通信工程传输系统东、西线全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京沈哈光缆工程于 1993 年 10 月上旬开工，全长 4707 公里，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的陆路最长光纤通信线路。工程分为东、西两条线路。东线是由北京经天津、沈阳、长春至哈尔滨的主线及大连至沈阳的支线，长 2104 公里；西线是由北京

经承德、阜新、通辽、白城、齐齐哈尔至哈尔滨，长2603公里；构成了横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规模光缆传输线路，成为连结我国北方地区重要通信干线网。它的开通对从根本缓解东北地区同其他地区通信的紧张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该工程是利用第三次日本政府贷款引进的项目，总投资7.56亿元人民币。日本岩井株式会社代理富士通株式会社为京沈哈光缆全线提供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2.5G高速数字同步传输设备，首期开通6万条电路。

19日　国家计委决定对食糖价格实行指导管理

国家计委就市场食糖价格管理发出通知。其内容如下：国家对糖价实行指导管理，每年由国家计委价格管理司根据产需形势发布食糖的指导出厂价和批发价；1994年至1995年食糖的中准出厂价（含税），甘蔗糖每吨3400元，甜菜糖每吨3650元，允许生产企业在不超过10%的幅度内自主定价；中准批发价（含税），甘蔗糖每吨4000元，甜菜糖4250元，批发企业可随出厂价格浮动相应浮动批发价格。生产企业要实行批量作价，国营糖烟酒（副食）公司一次购货在1000吨以上的，享受出厂批发指导价。

25日　国务院发布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国家赔偿费用的管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办法》于1995年1月16日由国务院第29次常务会议通过，共16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计委作出规定制止牟取暴利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秀发布实施《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规定》共18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规定适用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和与居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的项目，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公布、调整；其中实行国家定价的，按照国家定价和国务院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执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商品和服务的项目的基础上，决定适当增加与本地方居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品和服务的项目，予以公布，并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生产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执行国家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我国首家中外合资质量咨询公司开业

我国首家中外合资质量咨询公司——华之威质量保证咨询有限公司开业。由中国船级社和挪威船级社合资创办的这家公司，将开展与ISO 9000质量体系认证有关的咨询等业务。

2　月

6日　国家“安居工程”正式启动

为推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加速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

小组拟定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经国务院批准下发，这标志着国家安居工程正式启动实施。实施国家安居工程的指导思想是，安居工程要和住房制度改革相结合，其政策意义在于推动房改。安居工程住房要按成本价出售，走物业化管理的道路，为住房新体制的建立起示范作用。安居工程不代替现有民用住宅建设。安居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在原有住房建设规模的基础上，新增安居工程建筑面积1.5亿平方米，争取用5年时间完成。建成的国家安居工程住房，直接以成本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并优先出售给无房户、危房户和住房困难户。1995年国家安居工程的总建设规模确定为1250万平方米，在59个城市和单位实施，总投资约需125亿元。国家在固定资产贷款计划中安排贷款规模50亿元，地方政府负责自筹解决75亿元。国家安居工程采取国家银行贷款支持，地方政府利用房改资金配套并减免有关费用的方式，主要选择一批房改搞得好的大中城市实施。实施这项工程有利于调整我国房地产业投资结构，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国家安居工程从投资、建设、销售到售后各项服务管理等，都必须按照住房新体制的要求来进行，使之成为推动房改、建立新的城镇住房制度的示范工程。2月16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部署国家安居工程工作电话会议。

7日　澳门政府授权中国银行在澳发钞

澳门《政府公报》发布一项法令，授权中国银行从1995年10月16日起在澳门发行澳门元钞票。法令规定，中国银行发行的新澳门纸币，其面额为10元、50元、100元、500元及1000元；发行限额分别为1000万张、75万张、725万张、175万张和75万张。中国银行参与澳门钞票发行是中葡双方根据中葡联合声明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精神，从澳门经济金融稳定发展这一长远利益出发，于1994年7月达成协议的。

10日　我国首次颁布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规定》共5章34条，从颁布之日起施行。本着“该保的能保住，不该保的要放开”的原则，国家科委聘请有关专家采用“科技成果秘密级评价方法”，并多方听取意见而制定的这个《规定》，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科技保密工作在新时期为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服务等一系列新的指导思想；明确了科技管理部门与保密工作部门的关系；提高了整个工作的可操作性；加强了科技保密工作的政府调控职能。这一法规的颁布，对指导今后全国科技保密工作走入正轨，建立、规范全国科技保密动态管理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13日　林业部决定在全国实行使用林地许可证制度

为加强林业用地资源的管理，制止随意侵占林地、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为，林业部决定从1995年起在全国实行使用林地许可证制度。新出台的使用林地许可证制度适用范围包括：国家建设占用国有林地和征用集体林地；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内部使用林地；从事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建房、筑路、挖砂、取土、开矿以及多种经营用地；依法出租、转让林地用于非林业生产等。使用林地许可证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审批权限审批发放。新的许可证制度规定，林地经营单位只有在见到使用林地许可证后，方可办理林地拨交使用手续。

15日　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为加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资产使用效益，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和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联合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办法》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责、产权登记、资产使用、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资产处置和产权纠纷的调处、资产的报告制度、违反本办法时所应负的责任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农业部命名50个乡镇企业示范区

为引导乡镇企业走向集中连片发展的道路，农业部首次命名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镇等50个乡镇工业小区为全国乡镇企业示范区。这次命名的50个示范区是在各省、市、区择优申报的基础上评出的，其中东部地区35个，中西部地区15个。50个示范区1993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为561亿元，利税57亿元，出口交货额86亿元，分别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利税和出口交货额的1.9%、2%和3.7%。这50个示范区中，产值和利税最高的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乡镇企业小区，分别为51.8亿元和5.6亿元（1993年数，下同）；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浙江省义乌市大陈工业区，为8100元；出口交货额最高的是广东省顺德市北窖镇工业区，为11.9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高的是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为6.5亿元；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最高的是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丝绸星火密集区，为12亿元；综合评分最高分为广东省顺德市北窖镇工业区。

17日　央行要求信贷工作要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在信贷工作中把支持生态资源的保护和污染的防治作为发放银行贷款的考虑因素之一。各金融机构在向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时，要认真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对那些国家明令禁止、不符合环境保护规定的项目和企业，各级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并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对国家严格限制的行业如含汞制品、石棉纺织、重污染化工等，必须在做好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经过环境保护部门审查批准后，金融机构才对企业提供贷款；对于促进环境保护、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产业或产品，在符合信贷原则、具有还款能力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要积极予以贷款支持。通知强调，各级金融部门要继续做好林业贷款、治沙贷款等专项贷款的发放和管理工作，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22日　国务院同意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转发了国务院原则同意的、由农业部提出的《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方案。农业部在《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方案中提出，《工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工程》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全面推动乡镇企业东西合作，促进东部地区的先进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科学管理等优势与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广泛地结合起来，提高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技术素质、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推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经济的振兴，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同时，也为东部地区乡镇企

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产品更新和提高经济效益拓宽路子，达到东、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与提高的目的。

《工程》方案提出，1995年至2000年是组织实施《工程》和全面推进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的关键时期。这个期间《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一）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区域优势和效益，确立1000个东西合作示范项目，为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提高起示范和导向作用。（二）国家科委的“星火计划”、“火炬计划”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支持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项目。由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共同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组织推广1000项经省、部级以上鉴定、成熟的新技术、新产品，其中一半以上的项目要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三）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组建100对对口双边合作市、县，为发展乡镇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商贸、劳务等合作。（四）采取各种形式，为中西部地区培养1万名技术骨干和厂长，造就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乡镇企业人才。（五）开展干部交流。根据《工程》实施需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干部交流。

24日—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是，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央加强农业的各项决策，部署199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1995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任务是：打破粮食徘徊局面，尽快恢复棉花生产；抓好“菜篮子”工程建设，丰富城乡人民生活；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多渠道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物资、技术和资金投入，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林业建设，抓好山区和沙区综合开发治理；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增加粮棉油肉的有效供给；采取得力措施，抓好扶贫、救灾和计划生育工作。江泽民、李鹏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强调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从1993年10月到现在，不到两年时间，中央召开了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每次会议都强调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新课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把农业搞上去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全党同志认真研究和探索。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面临良好的机遇，又面临新的矛盾。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越发展，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越大，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农业又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因此，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在谈到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时，江泽民说，要千方百计夺取1995年农业丰收，特别是抓紧粮食生产。确保“九五”期间生产一万亿斤粮食和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实现这两个目标，必须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安排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安排工农业两大门类资金投放的比例。宁可暂时少上几个工业项目，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25日　中国证监会等颁布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颁布《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包括总则、国债期

货交易场所和国债期货经纪机构的资格条件、国债期货交易、结算及交割业务管理、国债期货经纪业务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债期货的主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对全国国债期货市场实施监督管理。《办法》指出，中国证监会将会同财政部按照规定的条件对试点交易场所进行重新审核，未经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批准的，不得再从事国债期货交易。中国证监会将会同财政部对国债期货合约和国债期货经纪机构进行审核，未经审核批准，任何机构不得从事国债期货经纪业务。

25 日—27 日　全国价格监督工作会议召开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会议。会议提出，1995 年要继续加大价格检查力度，完善监督网络，健全法规体系，强化执法手段，以整顿流通领域价格秩序为重点，推动各项调控措施的落实，努力遏制乱涨价、乱收费，抑制通货膨胀。会议提出，1995 年价格监督检查工作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切实抓好流通领域价格检查。主要是检查以粮食为重点的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化肥为重点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反暴利为重点的市场价格秩序，以医疗、教育收费为重点的行政事业收费。坚决制止乱涨价、乱收费，以确保全年物价上涨幅度比上年明显回落。

27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

决定指出，把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是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做到三个坚持：必须坚持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性质；必须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办社宗旨；必须坚持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合作制原则。党中央、国务院还决定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它将是全国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由国务院领导。党中央、国务院认为，供销合作社改革不是单纯的流通领域改革，也不单是供销合作社自身的机构改革，而是整个经济体制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流通等各方面的关系，影响面广，政策性强。

28 日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公布实施

江泽民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 号），公布施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决定》，共 6 章 62 条。为了适应税制改革的需要和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变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作如下修改：第 14 条第 1 款修改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企业印制。未经前款规定的税务机关指定，不得印制发票。"

3　月

1日　国务院决定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主要内容有：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应逐步做到对各类企业和劳动者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剂使用基金。二、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是：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政策统一，管理法制化；行政管理与保险基金管理分开。三、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四、各地区应当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五、国家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六、各地区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充分测算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统筹安排。七、严格控制管理费的提取和使用，坚持专款专用原则，确保基金的安全并努力实现其保值增值。八、提高养老保险管理服务的社会化程度，逐步将企业发放养老金改为社会化发放。九、要实行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十、已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直接组织养老保险费用统筹的企业，仍参加主管部门和单位组织的统筹。十一、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由劳动部负责指导、监督，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工作亦由劳动部负责推行。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办日元交易

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大批日资企业进入中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办日元交易。这是在原有的美元和港币两个交易币种基础上增开的又一交易币种。

2日　劳动部等要求配合企业深化改革试点做好失业保险工作

劳动部、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出《关于配合企业深化改革试点做好失业保险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对各地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的支持作用。国务院确定的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分流到社会上的富余职工，可依据企业开具的名单和有关证明，到当地劳动部门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各地劳动部门应予接收，并运用现有失业保险基金保障其解决基本生活，开展再就业服务。省级确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分流到社会上的富余职工，各地劳动部门应依据现有失业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确定接收范围。一时无能力接收的，也要积极配合做好企业内部的分流安置工作。同时，各地区要鼓励和支持现有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挖掘潜力，扩展生产经营，开办新的网点，为安置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创造新岗位。

5日　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

李鹏总理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今年的经济

体制改革，要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配套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巩固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措施，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体系，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前进。1. 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落实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全面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向部分企业委派监事会。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和保值增值考核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分别选择一批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国务院将选择几个行业，试行国家控股公司制度。2. 以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若干分项改革方案已经确定，今年要以城市为单位积极试行。3. 巩固和完善已出台的各项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措施。金融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能力，增加间接调控手段的运用。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积极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完善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机制。分期分批组建城市合作银行。按照分业管理的原则，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并加强监管，银行不得经营信托投资和证券业务。巩固外汇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结汇售汇制度。财税体制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分税制，逐步取消一些不规范的做法。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范围。加强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管，改进出口退税制度，打击偷税骗税行为。继续清理和逐步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认真执行个人所得税法，尽快建立个人收人应税申报制度，重点抓好对高收入者的征收。计划体制改革，要进一步转变计划管理职能，改进计划编制方法，加强经济信息和经济监测预报工作，搞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综合协调。投资体制改革，要明确国家投资和融资的范围，实行投资主体法人责任制，对立项、筹资、建设和生产经营、还本付息以及资产保值增值的全过程负责。逐步建立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6日 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宏观调控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17000亿元，其中国有单位投资11600亿元，集体和个体投资5400亿元。财政收支差额666.8亿元，国债发行总额1537亿元。银行新增贷款规模57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00亿元。进出口总额2400亿美元，其中出口1200亿美元，进口1200亿美元。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确保比去年有明显回落，力争控制在15%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44‰以内。宏观调控要围绕抑制通货膨胀这个首要任务，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是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重要措施。二、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三、整顿流通秩序，加强对市场价格的调控和监管。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推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五、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199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5年中央及地方预算草案

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代表国务院作《关于

1994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95 年中央及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根据初步统计，国家财政收入 5181.7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8.9%，比上年增长 19.2%；国家财政支出 5819.7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7.2%，比上年增长 25.4%。收入和支出相抵，支出大于收入 638.01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 668.14 亿元，没有突破预算确定的数额，地方财政结余 30.13 亿元。1995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安排 3827.54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329.78 亿元，增长 9.4%。中央财政总支出 4494.34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328.44 亿元，增长 7.9%。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 666.8 亿元。

刘仲藜说，今年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各方面都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保证重点，压缩一般的支出安排原则，并按照《预算法》的规定，严格预算约束，切实减少财政支出中的浪费现象。今年除继续增加农业、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重点投入，保证国防和政法部门经费的必要增长外，要优先保证工资发放，消化去年出台的工资政策。绝不允许挪用职工吃饭的钱去铺摊子、上项目，也不准乱发奖金、补贴。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社会集团消费的过快增长。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展清产校资工作

为配合深化改革、摸清国有资产家底、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全国进一步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决定 1995 年在全国进一步开展清产核资工作，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完成这项工作。通知指出，清产核资具体组织工作由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1995 年的主要任务：一是对境内外全部国有企业户数进行清查，统一编制国有企业代码；二是全国尚未进行清产核资的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要全面完成清产核资任务；三是对全部国有境外企业、机构进行清产核资；四是对全部国有企业占用的土地进行清查和估价，逐步建立国有土地基准价制度；五是将本年度完成的清产核资数据与前几年完成清产核资数据进行衔接，形成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总表；六是认真核实企业法人财产占用量，核定国家资本金，并检查清产核资各项政策落实情况。

国家经贸委提出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 1994 年 11 月 30 日提出的《关于深化改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意见》，内容如下：一、抓好国务院确定的 100 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 3 户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工作。二、继续抓好国务院确定的 56 家企业集团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试点工作。三、组织实施好若干城市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四、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五、切实抓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特别是抓好质量管理、营销管理、资金管理和成本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六、多渠道增加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建立国有企业增补生产经营资金的机制。七、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加快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八、采取措施，解决国有企业的潜亏、挂账和过度负债问题。九、加强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指导。十、探索分流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有效途径。十一、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分开。

10日—2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棉花化肥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坚持稳定完善党的农业政策，深化粮棉化肥购销体制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新的财税体制的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政府，必须承担起保证本地区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利化肥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供求平衡、价格稳定的责任，实行省长负责制。这要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方针，长期坚持下去。

11日　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在北京签署

中美两国代表就知识产权问题在北京签署协议，从而结束了中美关于知识产权问题长达20个月的九轮磋商。双方避免了一场贸易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

一个以海外回国学者为主体的高层次研究机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该中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是北京大学进行教学、科研改革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吸收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一种开创性尝试。中心的职能和任务主要是对经济理论，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长期理论、政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接受政府、企业界及国际机构委托组织专题研究，与有关单位共同招收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MBA），为外籍学者到中国研究或海外中国学者回国研究提供工作、生活便利。

18日　教育法公布实施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5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共10章84条。自1995年9月1日起施行。《教育法》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优先发展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教育法》确定了“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以及教育财政拨款“三个增长”等重要原则。《教育法》还在设立教育专项资金，征收教育费附加，开征地方教育附加费，鼓励发展校办产业，完善和规范教育集资，鼓励捐资助学，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发展，以及对学校基本建设用地及所需物资，对用于学校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进口资料和设备，对发展卫星电视教育和电化教育实行优先优惠政策等，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银行法公布实施

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共8章51条。包括总则、组织机构、人民币、业务、金融监督管理、财务会计、法律责任、附则。《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国

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1. 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2. 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3. 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4. 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5. 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6. 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7. 经理国库；8. 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9. 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10. 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11.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

20 日　我国首次发布中国计划白皮书

为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我国首次公开发布《199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即中国计划白皮书）。该书由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担任主编，报告全面翔实地介绍和评价了 1994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重大改革的进展情况，预测、展望了 1995 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走势及各主要产业的市场运行态势，阐释了本年度的国家计划目标、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部署。

人民银行对 10 家金融机构违反“约法三章”进行处理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对 10 家金融机构违反“约法三章”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指出，199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约法三章”（金融机构要立即停止并认真清理收回违章拆借资金；不得擅自和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经济实体注入资金并实行彻底脱钩），并提出对 1993 年 7 月以后违反“约法三章”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主要负责人要给予纪律处分。经过稽核检查，发现仍有极少数单位和个人违反“约法三章”的要求，我行我素，继续搞违规、违章经营。人民银行河南省融资中心办理违章拆借资金 10300 万元，其中该融资中心总经理签批 3 笔，金额 7000 万元。工商银行东莞市分行为逃避信贷规模控制，经该行一负责同志审批同意，违章拆出资金 5705 万元。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一副总经理办理两笔拆人资金，共计 1680 万元，用于投资参股。农业银行云南玉溪地区中心支行经该行行长主持办公会议决定，委托云南省信托投资公司发放贷款 1600 万元，其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187.6 万元。中国银行四川省涪城支行以自办劳动服务公司的名义违章拆借资金共 18，笔、金额 1817.16 万元，全部在银行账表外反映。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在未经该行集体研究的情况下，违规批准用流动资金向自筹基建项目发放固定资产贷款 3 笔、金额 1.3 亿元。交通银行南昌分行贷款 500 万元用于房地产投资。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公司以提高利率吸收存款。海南南华金融公司从深圳发展银行拆借 4000 万元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沈阳办事处拆入资金 1000 万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为严明法纪，教育少数违纪干部和金融系统广大职工，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单位决定：对人民银行河南省融资中心总经理、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农业银行云南玉溪地区中心支行行长、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交通银行南昌分行行长、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公司总经理以及海南南华金融公司总经理，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免去其现在所担任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对工商银行东莞市分行一位负责同志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商上一级党的组织，免去其所担任的工商银行东莞市分行

党组书记职务。对中国银行涪城支行行长、海南南华金融公司董事长（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沈阳办事处主任，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并吊销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沈阳办事处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21日　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

国务院第三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该计划确立了我国到21世纪中叶的林业发展总体目标。具体目标是：到2000年，全国净增有林地99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15%至16%，活立木蓄积量达到126.6亿立方米，荒漠化土地治理面积达到343万公顷，水土流失生物治理面积达到2137万公顷，林网化农田达到4399万公顷，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达6059万公顷。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3040亿元。到2010年，全国净增有林地289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17%，活立木蓄积量达到139.6亿立方米，荒漠化土地治理面积达到1143万公顷，水土流失生物治理面积达到3702万公顷，林网化农田达到5906万公顷，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7068万公顷，建成森林公园1900万公顷，林业总产值达到10559亿元。

24日　中美扩展双边适航协议

中美扩展"双边适航协议"新的"实施程序细则"签字生效。这表明我国民用航空产品从此获得出口美国"通行证"。根据中美扩展"双边适航协议"，美方将认可中方对5700公斤以下和19座以下小型飞机的型号合格审定以及机械类零部件项目的审查。这就意味着，中国民航总局自1987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以来所建立的适航体系不仅在生产质量监督方面，而且在小型飞机和机械零部件设计批准方面具有与美国联邦航空局同等的能力。3月28日，美国联邦航空局航空器审定司司长托马斯·麦克思威尼先生向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颁发了运十二Ⅳ型飞机FAA型号合格证。这是我国获得的第一个美国FAA适航证书。

25日　国务院决定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

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T31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28日　国务院批准农业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国务院强调，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和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必须保持长期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通过强化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等一系列措施，使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真正得到稳定和完善。农业部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就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一、切实维护农业承包合同的严肃性。二、积极、稳妥地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三、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四、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五、延长土地承包期和进行必要的土地调整时，不得随意提高承包费，变相增加农民负担。六、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承包合同由继承人继续履行，直至承包合同到期。七、加强对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领导。

31 日 中化公司综合商社试点启动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由外经贸部管理改为由中化集团管理，成为该集团的核心企业之一。外经贸部原委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办理的外国政府贷款转贷业务划转中国进出口银行管理。这家金融机构并入中化集团，标志着中化公司综合商社试点工作开始启动。综合商社是一种以贸易为主体、多功能的跨国企业集团。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中化公司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综合商社试点。试点的目标是：建成以贸易为专业，集贸易、工业、科技、金融、信息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化、实业化、多元化、集团化的综合贸易公司。中化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公司，已连续 5 年进入世界最大的 500 家综合型多元化服务企业的前 30 名。在发展石油、化肥、橡胶等商品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中化公司已在海内外投资实业项目 201 个，总投资额 8 亿多美元，组建海外集团。1994 年公司总营业额近 150 亿美元，其中国际化营业额 78 亿美元。

4 月

4 日—6 日 全国试点企业集团工作会议召开

由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全国试点企业集团工作会议提出：组建企业集团要注重机制转换和制度创新，利用改组、改制、改造的合力壮大企业集团。会议认为，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必须及时调整集团试点工作的部署：一是要将以往注重政府放权让利的政策扶持，转变为注重企业集团的机制转换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要将维系企业集团的“六统一”关系，发展到母子公司的产权联结纽带上来；三是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改组，要与企业改制、企业技术改造相结合，利用改组、改制、改造的合力壮大企业集团；四是在继续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和专业管理的同时，集团要强化经营战略的管理、资本运营的管理以及大公司、大集团体制的研究；五是政府对试点集团的管理要由直接的行政管理转为间接的管理，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等。

16 日 国务院决定实施再就业工程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部《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报告》。报告提出，从 1995 年起，在 5 年时间内组织 800 万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参加再就业工程，通过提高再就业能力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实施再就业。为实现这一目标，劳动部在报告中还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措施：一是各地政府要将实施再就业工程列入议事日程，实行目标责任制，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并抓好落实。二是加强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转业训练费和生产自救费使用的管理监督，严格掌握使用方向，提高使用效益。同时积极筹集资金，保证必要的投入。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专项基金或专项经费，用于资助安置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三是对失业职工应按规定及时发放失业救济金，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同时要认真组织好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转业训练、转岗培训、工作试用、生产自救等活动，促进他们再就业。四是鼓励企业对富余职工进行开发性安

置。支持社会各有关方面大力兴办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生产自救基地，安置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新办第三产业安置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扶持优惠政策。五是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支持企业组织富余职工到乡镇企业或其他联营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和劳务工作，支持企业主管部门对富余职工进行行业、企业间的调剂。六是对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所需的场地、摊位、设施、能源等，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做好安排。七是对国务院确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分流到社会上的职工，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应予以接收，给付失业保险待遇，帮助其实现再就业。对各地确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企业优化资本结构的18个试点城市，要在认真调查摸底，掌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失业保险基金使用计划和人员安置计划，切实做好企业改革试点中分流到社会上的职工的接收、救济和安置工作，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并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

17日　我国实施分时电价制度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电力工业部联合在上海召开全国计划用电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我国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步骤、全面推行峰谷分时电价，即对每天用电高峰与低谷的不同时间制订高低不同的电价，用经济手段激励人们削峰填谷，缓解高峰缺电局面，以提高全国用电效率和水平。这项工作用三四年时间全面实行，今年要达到全国电量的30%以上，具体部署为，东北、上海电网今明两年全面实施，山东、京津唐电网二三年内全面实施，其余地区今年准备一年，从1996年起二三年内全面实行。

21日　国家确定计算机伯息产业发展方向

全国计算机及软件工作会议召开。为了改变我国计算机产业整体水平较低，不能适应持续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对于信息化装备需求的状况，国家确定将民族计算机信息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来重点发展，将产业产值从1995年的500亿元提高到本世纪末的1700亿元。产业的发展要进一步从传统的单一制造业向现代电子信息产业模式转变，将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来，将装备制造与系统集成结合起来，将硬件制造和软件生产结合起来，将工业生产与信息系统运营结合起来。

计算机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制造业要选好重点产品，形成规模经济，建立若干个生产和出口基地；软件产业要以应用软件为主，重视发展支撑软件和系统软件，搞好商业化，同时加快园区建设，形成企业群体，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

26日—5月3日　第二届全国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成就展览会举行

“第二届全国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次展览会展示了改革开放1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巨大变化。共分产学研、电力工业、煤炭工业、机械工业等23个展馆，参展企业近千家。

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是企业技术进步的中心工作。“六五”、“七五”计划期间，全国实施技改项目45万多个，完成投资5500亿元，是建国以来28年投资总额的31倍。“八五”计划实施以来，到1993年累计技改投资额又完成4679亿元，引进、开发并推广了一批高新技术项目，使企业技术改造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技术开发方面，通过

“产学研”联合，全国每年有4000项左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了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27日 西藏邦达机场正式通航

世界上最高的民航机场——西藏邦达机场正式通航。机场拥有世界民航机场的三个之最：跑道最长（5500米）、海拔最高（4300米）、离城市最远（130公里）。

28日 内贸部等通知暂停所有商品中远期合同交易

自国家确定试点期货交易所后，内贸部和证监会多次明确指出，不得借中远期合同交易之名进行变相的期货交易，但一些市场拒不执行，严重影响了我国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整顿流通秩序和抑制通货膨胀。为此，内贸部、证监会要求各地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暂停所有商品中远期合同交易，已经开展中远期合同交易的批发市场和期货交易所，未平仓合同可在合同到期前平仓或在交割日进行实物交割，一律不得再推出新的中远期合同，各批发市场开展的现货批发交易继续进行。为防止混淆界限，保护和发展正常的现货批发交易，内贸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订中远期批发交易的市场管理办法。

5 月

5日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立

国务院为其确定的职能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是国务院直接联系的国有独资政策性投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布局政策，对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森工等政策性项目进行参股、控股投资，以提高投资效益，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公司为独立法人，注册资本金为58亿元人民币。

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决定》共分11个部分，主要内容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推动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进步；切实加强基础性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建设高水平的科技队伍，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10日 商业银行法公布实施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7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自1995年7月1日起施行。《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组织机构、对存款人的保护、贷款和其他

业务的基本规则、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

票据法发布实施

为了规范票据行为，保证票据的正常使用和流通，保障票据当事人及其他票据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票据法》共7章111条，包括总则、汇票、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追索权、本票、支票、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法律责任、附则等。

12日　我国研制成功首台载人磁悬浮列车

我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这台单转向架磁悬浮列车长3.36米，宽3米，轨距为2米，车上安装了四组八只悬浮、导向电磁铁，由四套控制系统进行控制，静止时起浮重量为六吨，起浮间隙20毫米，运行间隙10毫米，可乘坐20多人。单转向架具有独立悬浮与推进的功能，用儿个完全相同的转向架连接在一起，再覆盖车厢外壳、安装座椅，就可组成一节磁悬浮列车。磁悬浮列车的理论设计时速可高达500多公里。世界上已研制成功磁悬浮列车的国家，都还处于实验阶段。

17日　中国证监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国债期货市场屡次发生由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风波，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证监会认为，我国尚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为维护改革开放的形象，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5月18日，证监会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试点期货交易所严格控制风险，从严查处违规行为，以避免恶性事态发生。为了防止大量投机资金可能转入其他品种进行炒作，中国证监会在通知中要求各试点期货交易所在市场风险增大时，要及时采取包括提高保证金比率；调整涨跌停板幅度；降低最大持仓限额；限制会员单位开新仓等措施，以严格控制风险。证监会还要求各试点期货交易所要加强对持仓大户的监控和管理，严格执行大户申报制度、每日结算制度、保证金制度和强制平仓制度。严格按照交易规则进行运作，严禁透支交易、借仓交易、联手交易，一旦发现有这些违规行为，要从严从快查处，取消会员资格。

18日　中国电气化铁路技术首次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与伊朗德黑兰城郊铁路公司签署了一项总额为1亿多美元的电气化铁路合同，标志着中国电气化铁路技术首次进入国际市场。

22日　江泽民指出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江泽民总书记5月22日、6月26日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发表《坚定信心明确任务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负责同志，一定要全面正确地分析当前国有企业的状况，既要充分看到国有企业的优势和改革取得的成效，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决

心和信心；又要正视和加紧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下苦功夫去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努力完成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讲话包括七个方面，一、进一步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决心和信心。二、要全面准确地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三、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四、把深化企业改革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同促进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五、认真抓好各项配套改革。六、深化企业改革，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七、进一步加强对企业改革的领导。

25 日　国务院批准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银行与信托投资公司彻底脱钩，实行分业管理，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廉政建设，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这项工作今年上半年先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在 35 个大中城市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开。

26 日　国务院要求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 1994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当前要进一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对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要进行严格控制。为此，要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审批。对别墅性质的高档住宅及度假村，单位面积建筑设计造价高于当地一般民用住宅、办公楼一倍以上的公寓、写字楼项目，建筑标准四星级（或相当于四星级）及以上的宾馆、饭店，1995 年不再批准立项和开工，以后也要严格控制审批。严格禁止新上高尔夫球场、仿古城、游乐宫等项目。国务院规定，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规定的批准权限审批。对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及以上或总投资在 2 亿元及以上的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以及所有中央国家机关在京单位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立项和开工，由国家计委审批。建筑面积在 2 万平方米以上、10 万平方米以下或总投资在 3000 万元以上、2 亿元以下的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立项及开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计委审批，并报国家计委备案。以上建设规模限额均指单片开发的建设规模，不得采取化整为零、分期分块等手段越权审批。对于未按规定审批立项及开工的项目，银行不得安排贷款。对批准开工的项目，自筹资金要与银行贷款同步到位；自筹资金不落实的，银行不发放贷款，土地管理部门不得办理用地手续，建设部门不得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许可证。国务院通知要求严格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资金管理，国家预算内投资不得用于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银行现有的房地产贷款均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管理，并全部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不得在计划外发放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贷款、抵押贷款的形式和拆入资金发放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

国家计委禁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乱收费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禁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乱收费抑制商品房价格不合理上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的进入商品房成本和价格的收费，一律实

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集中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和标准由国家和省级物价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重要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报国务院批准。经营性收费的项目和标准由省级以上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对涉及面广、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收费，由国家物价主管部门或国家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

26日—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是继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制订了第一个长期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78年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号召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热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江泽民说，党中央、国务院在科学分析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集中各地方、各部门和党内外许多同志的智慧，作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这是确保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真贯彻《决定》的精神，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热潮，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积极促进经济建设转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江泽民指出，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一方针的核心是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靠体制来保证。要把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要把建立、健全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环节。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

30日　国务院批准加强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管理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内贸易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粮食储备局《关于加强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管理的意见》。《意见》指出：一、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实行分级、分部门责任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棉油收购工作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负责制。二、认真清理收回被挤占挪用的收购资金。对1991年粮食年度末的粮食财务挂账，政策性挂账由地方财政分5年消化解决，经营性挂账由企业消化解决。对1992年以来新增的粮食财务挂账，由各地人民政府负责清理，在3年内消化解决。三、财政拨补资金实行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保证总量、专户管理的原则。四、粮棉油收购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系统收购资金的管理。粮棉油收购主管部门要强化对收购企业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建立内部管理责任制。要加快粮棉油收购部门政策性业务与经常性业务的分离。五、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相互配合，加强协作，共同承担粮棉油收购资金管理的责任，做好粮棉油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六、中国人民银行要加强对收购资金的监督和检查。七、改进粮棉油收购贷款管理办法。八、要加强对粮棉油收购资金的专户管理。九、尽快建立健全粮棉油收购资金管理台账及统计报告

制度。十、建立收购资金的定期稽核检查制度。

珠海机场通航

珠海机场位于珠江三角洲，原为军用机场。1992 年 5 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立项改建，同年 12 月动工建设。珠海机场按国际标准一级民用机场标准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和建设，通航后开设了 18 条航线，可供波音 757 等大型飞机起降。设计年飞行量为 10 万架次，年旅客吞吐量可达 1200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40 万吨。

31 日　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对加强出售国有住房资产管理作出规定

为了加强国有住房出售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管理和防止低价出售国有住房，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建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出售国有住房资产管理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指出，国有住房是指国家党政机关、军队、团体、企事业单位由国家拨款、组织收入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购建的，以及接受馈赠、罚没和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确认产权为国家所有的住房。出售国有住房的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出售国有住房的单位，须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方能组织出售。《暂行规定》要求，国有住房的出售必须坚持“先评估，后出售”的原则，国有住房出售价格的评估，应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必须由合法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依法执行，不受行政干预。国有住房出售价格的核定，应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核定合理的出售价格，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不允许低价出售国有住房。《暂行规定》强调，按标准价出售国有住房的单位，须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单位和个人的产权比例，产权比例按国有住房出售当年标准价占成本价的比重确定。

6　月

4 日　九江长江大桥通过鉴定

我国目前最长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九江长江大桥通过由铁道部大桥局桥梁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主持进行的铁路公路通车鉴定。九江长江大桥铁路桥全长 7675 米，公路桥为 4460 米，大桥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 4 条道公路，下层为双线铁路，正桥共 10 墩 11 孔。公路桥已于 1993 年 1 月通车，铁路桥于 1994 年 11 月试通车。9 月 20 日，九江长江大桥又通过了铁道部科技成果鉴定。山海关桥梁工厂在承担这一特大桥钢结构制造中，采用新技术，突破了世界焊接钢板最大厚度 50 毫米的纪录，为我国历经二十余年厚板焊接试验研究划上了圆满句号。

6 日　中韩海底光缆铺设成功

我国第二条国际海底光缆——中国至韩国海底光缆在青岛登陆，并与陆地光缆相接，从而构成完整的中韩海底光缆系统。这是我国继 1993 年 12 月中日光缆系统后的第二条国际海底光缆。中韩海底光缆是我国邮电部电信总局和韩国通信共同出资建设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海底光缆通信系统。这条系统从我国的青岛至韩国的泰安，全长 550

公里。工程总投资约4700万美元。

6日—9日　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正在明显下降，已经从1992年底的8000万人减少到1994年底的7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原来的8.8%下降到7.8%。国务院要求：从1995年起，必须以每年解决1000万以上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推进扶贫开发。各省区都要按照这个年度要求——即每年解决15%以上现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调整计划，制定方案，加强工作。

8日　宝中电气化铁路通车

铁道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迎水桥编组站隆重举行宝（鸡）中（卫）电气化铁路通车庆祝活动。宝中铁路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全国铁路大会战中第一条开通的长大干线。它南起陇海铁路的（陕西宝鸡市）虢镇车站，北与包兰铁路的（宁夏中卫县）迎水桥车站接轨，穿越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的14个县市，全长498.19公里。设计年运输能力为1800万吨，逐步实施扩能措施后，最终单线运输能力可达2500万吨。

我国研制成功350毫瓦以上的氦氖激光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东南大学凌一鸣教授发明并主持研制的一种输出功率高达350毫瓦以上的氦氖激光器在北京通过专家鉴定。由王大珩院士等主持的鉴定委员会经认真评议后认为：该激光器的输出功率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这种激光器的有关技术已获中国发明专利和美国专利，这是我国激光领域首次在美国获专利权的发明。

9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工作

为了解决风景名胜区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保护管理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就进一步加强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制止在风景名胜区内的违章建设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国家计委批复第一个BOT项目

国家计委批复了第一个采用BOT方式进行建设的工程项目——广西来宾电厂二期工程。“建设—经营—转让”的BOT投资方式，一方面可以吸引大量国际商业资本和私人资本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政府的债务风险等。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国家计委从今年开始着手在能源、交通等领域挑选有条件的项目，组织开始试点工作。

11日　中国农业辐照中心在北京建成

这是我国第一家具有工业规模的农业辐照中心。可对我国批准的各类辐照食品进行辐照杀虫、保鲜、抑制发芽，也可对医疗用品、药品、化妆品等进行消毒和灭菌。

15日　人事部等提出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财政部《关于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意见》说，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要将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任期目标，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研究优秀人才的成长规律，总结培养优秀人才的工作经验；结合地区和行业特点，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建立重点突出、优势互补的人才培养格局，争取本世纪末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高效精干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队伍，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专业技术队伍的素质。《意见》要求自下而上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工作体系；坚持在重要学术、技术岗位的实践中培养、造就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进一步采取资金扶持措施，支持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对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管理；努力为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鼓励他们积极进取，促使其多出成果，尽快成长。

20 日　国家计委等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对外经贸部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共 17 条。根据《规定》，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本规定和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情况，定期编制和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列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为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不列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共 13 项，是指导审批外商投资项目的依据。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当投向金融、商业、旅游等领域。

23 日　国务院环委会审议通过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

国务院第三届环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5—2050)》。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在会上强调，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规划的头 5 年和 15 年，并建议把建立示范点列入规划。自然保护区建设的规划目标，是建立一个类型齐全、分布合理、面积适宜、建设和管理科学的全国自然保护区网络。规划分为三个阶段：1995—2000 年，自然保护区总数达 1000 个（其中国家级 120—130 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 9%左右；2001—2010 年，自然保护区总数达 1200 个左右（其中国家级 140—145 个），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达 10%；2011—2050 年，自然保护区总数达 1500 个左右（其中国家级 180—200 个），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 13%。

25 日　漫湾水电站一期工程建成

漫湾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澜沧江中游云县和景东县的交界处，是澜沧江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设计装机 6 台 25 万千瓦机组，装机容量共 150 万千瓦机组，1986 年 5 月 1 日主体工程正式开工，1987 年 12 月实现大江截流，1993 年 6 月 30 日第一台机组投产，至 1994 年，另 3 台机组亦相继投产。第 5 台机组的并网发电标志着漫湾水电站第一期工程全部建成。

26日　中央决定增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专款

为实现到本世纪末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中央决定在原来每年2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再增拨2亿元义务教育专款，并逐年增加，计划三年内增加到每年10亿元。中央增拨的专款将用于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其工程内容是：集中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力，调动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有重点地改善贫困地区及基础教育发展薄弱地区小学、初中的办学条件，使之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实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普及义务教育奋斗目标。国家教委、财政都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必须保证相应的配套资金，尽快建立义务教育专款。同时采取多渠道筹措项目资金，切实保证项目任务的完成。

中国乡镇企业评价排序结果在京揭晓

由农业部乡镇企业局、中国乡镇企业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的“1995年中国乡镇企业评价排序”活动结果在京揭晓。此次评价排序分“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和“中国最高利税总额乡镇企业1000家”两个项目。获“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前10名的企业依次为：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尧舜集团公司、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成都市双流高频（集团）公司、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美集团公司、天津津海集团公司、山东清河集团、大连大实企业集团和江苏鹰翔集团公司。获“中国最高利税总额乡镇企业1000家”前10名的企业依次为：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尧舜集团公司、浙江横店集团公司、福建联建（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美集团公司、山东万通达企业集团总公司、天津万全集团公司和山西清徐暖气片集团公司。“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1994年这1000家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高达2400多亿元，实现利税总额为247.18亿元。

30日　担保法公布实施

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0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担保法》共7章，对保证、抵押、质押、定金等进行了规范。《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关于担保人，《担保法》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之外，国家机关不能当担保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不能做保证人。

保险法公布实施

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1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共八章152条，对各类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保险法》的核心是保

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要提存各种准备金和保险基金，并首次要求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为保证保险业的稳健经营，《保险法》要求实行法定再保险制度。

7　月

1日　国家“八五”建设重点工程兰新铁路复线通车

为解决西北地区运力严重不足的问题，199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正式下达了修建兰新铁路复线的计划，并将复线建设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工程。1992年9月，兰新复线正式开工兴建，1994年9月16日完成全线铺轨。兰新铁路复线东起甘肃武威南，西抵乌鲁木齐西，途经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哈密、吐鲁番等西部重镇，全长1622公里，总投资40多亿元人民币，设计年运输能力为2500万吨，经过进一步扩能改造后将达到5000万吨。

5日　国务院发布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为了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务院令第179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要求海关对其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的，应当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备案，并在其认为必要时向海关提出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条例》对如何备案、申请等作出具体规定。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54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办法》。

12日　国务院批准将部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将部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意见》。《意见》提出，为解决部分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合理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建议将部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拨改贷”资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从1979年至1988年由财政拨款改为贷款的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试点范围是：1.“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每个城市推荐2个企业；2.参加国务院确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3.国务院确定的试点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及其全资和控股的子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原则是：以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重点支持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首先照顾归还“拨改贷”资金本息有困难的企业减轻债务负担，合理调整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采取分类审批的办法，不搞“一刀切”。

12日—14日　国家行政机关正式实行辞职辞退制度

全国推行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会议决定在国家行政机关中正式实行辞职辞退制度。国务委员李贵鲜到会并讲话，他说，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是触及传统人事制度深层次矛盾的重大改革，它要解决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解决而未能解

决或没解决好的老大难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公务员个人的切身利益或单位利益。同时，辞职辞退制度的实施会涉及到社会保险、重新就业以及住房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政府许多部门相互配合，需要有关制度配套推进。

13 日　我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居世界首位

林业部副部长祝光耀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的全国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建设现场会上宣布，目前全国森林面积累计达 1.34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上升到 13.92%，其中人工造林保存面积为 3300 多万公顷，居世界首位。到去年底，已先后有 9 个省区基本消灭宜林荒山。

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建设的第一座压水堆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一期工程总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总投资 12 亿元，1985 年 3 月 21 日，电站核岛主厂房底板浇灌，电站由此开始建造；1991 年 12 月 15 日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1992 年 8 月核电站进入试运行；1994 年 4 月 1 日核电站正式进入商业运行。1995 年月 1 月 21 日，电站完成了首次换料、按计划检修、完全壳密封试验、反应堆各种性能试验，一次并网获得成功。电站满功率发电后，每年可向华东电网输送核电 15 亿度。

14 日　我国首例核移植牛犊成功

我国首例核移植牛犊在广西南宁市罗文奶牛场降生后，平安地度过了第 10 天，这是广西农业大学动物繁殖研究所与华南师范大学激光生命科学所经过两年多时间合作研究的成果。核移植，又称胚胎的克隆技术，通过该技术不仅可对良种胚胎进行克隆复制，迅速增加其数量，加快良种牛的繁殖速度，还可加深人们对胚胎发生过程中核质互作关系的认识。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将该技术列入“863”计划。核移植牛犊将体外受精的 32——细胞阶段的胚胎分成单个细胞，分别移植到去核的体外成熟牛卵母细胞中，经电融合，体外培养，待其发育到囊胚阶段，再移植到同步受体母牛内。该牛犊重 22.5 公斤，雄性，妊娠期 284 天，是完全体外化的核移植牛犊，目前在国际上成功的例子不多，在我国也属首例。

我国第一个与美国合资建设的大型能源项目在京举行合同签字仪式

我国第一个与美国合资建设的大型能源项目——甘肃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合同签字仪式在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出席签字仪式。该工程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甘肃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甘肃省电力公司、美国 CEA 公司合资建设，总投资 25 亿元，将建设 2 台 30 万千瓦凝汽式机组，全部采用国产设备。全部建成后将成为甘肃省最大的火电厂。

18 日　联合日教科文组织中国海洋生物工程中心在青岛海洋大学成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工程委员会近期在全世界建立 5 个地区性的“植物与水生生物工程中心”，中国海洋生物工程中心是 5 个中心之中惟一的海洋生物工程中心。这个中心在东亚地区起科技带头作用，将为东亚地区青年科学家开设教育培训课程，并接受东亚地区青年科学家来中心进修和开展研究工作。

北京第一家外资银行举行开业典礼

京城第一家外资银行——东京银行北京分行，在北京发展大厦举行开业典礼。东京银行北京分行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成立于1880年的东京银行，是日本专业外汇银行，总资产2424亿美元，列世界第21位。东京银行与中国有着长达近40年的交往，已为中国多个重点项目提供贷款，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目前，该行已在上海、大连、深圳市开设了分行，在广州、成都也设立了办事处。

19日　国务院批准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改委于4月10日提出的《关于一九九五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要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配套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巩固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体系。改革的推进要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有效供给。要保持经济体制改革的连续性和配套性，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要点》包括6部分共22条：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骨干和主导作用。二、积极推进以企业职工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三、巩固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四、加快培育市场，抓紧经济立法，改善经济秩序。五、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六、抓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国务院发布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办法

国务院发布《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法对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中央级其他财政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对中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是：（一）财政部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中央预算向中央各部门批复预算的情况、中央预算执行中调整情况和预算收支变化情况；（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征收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征收应征的中央各项税收收入、中央企业上缴利润、专项收入和退库拨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等中央预算收入情况；（三）财政部按照批准的年度预算和用款计划、预算级次和程序、用款单位的实际用款进度，拨付中央本级预算支出资金情况；（四）财政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管理体制，拨付补助地方支出资金和办理结算情况；（五）财政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管理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情况；（六）中央各部门执行年度支出预算和财政、财务制度，以及相关的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情况；有预算收入上缴任务的部门和单位预算收入上缴情况；（七）中央国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中央预算收入的收纳和预算支出的拨付情况；（八）国务院总理授权审计的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专项管理的中央级财政收支情况。对中央级其他财政收支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是：（一）财政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预算外资金和财政有偿使用资金的情况；（二）中央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另外还要对省级政府预算执行和决算中，执行预算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分配使用中央财政补助

地方支出资金和省级预算外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等关系国家财政工作全局的问题，进行审计或者审计调查。

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争取到200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基本形成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职责分明，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经费投人，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为主，条块有机结合的体制框架。通过深化改革和立法，划分、规范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的权力与义务。举办者主要是投资举办学校、提供必要的办学条件、提出学校主要学科和专业的服务面向及人才培养要求、对办学实施目标监督等。教育行政管理者主要是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全国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等教育，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办学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高等学校。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把一部分中央部门所属的学校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或由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建设和共同管理。

中国联通数字移动电话网一期工程开通

中国联通数字移动电话网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开通。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出席了开通仪式并拨通了该电话网的第一个电话。

联通公司率先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建设蜂窝移动电话网。目前开通的四城市移动电话网是该网的第一期工程，投资达7亿元，系统总容量10万户，可覆盖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大城市的主要市区和部分郊区，并可在四城市之间漫游通信。

24日　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合成新核素镤-239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提供的丰中子束流氧——18轰击天然铀靶，使用奇异多核子转移反应，在“可裂变核区”合成了重丰中子新核素镤-239。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28日　我国电力发展跨上新台阶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电力部部长史大桢宣布，我国电力发展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装机容量到目前已超过2亿千瓦。我国的发电装机容量是1987年达到1亿千瓦的。目前我国电力发展呈以下几个特点：一、建设时间短，总量增加快。近几年来，每年投产的大中型发电设备都超过1200万千瓦，电力发展保持了每年8%到9%的增长速度，有的年份还达到了两位数。在电网建设方面，到去年末，500千伏输电线路达到11197公里，变电容量发展到3866万千伏安，分别比1987年增长了149.8%和188.7%。与此同时，我国的电厂规模和电网规模也进一步扩大，百万千瓦级的发电厂达到34座，百万千瓦以上装机的电网11个，大电网已经覆盖了全国的全部城市和大部分乡村。二、电源结构发生变化。随着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相继投入运行，电源结构由只有水电、核电转为水、火、核电并举。水电建设连续跨过年投产200万、300万、400万千瓦几个台阶。三、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到去年末，20万千瓦级以上

大机组总容量达到8038万千瓦，占全部装机的40.2%。全国5大跨省电网和24个省级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已实现了实用化。四、利用外资办电规模扩大。到去年末利用外资建设的大中型项目达到64项4070万千瓦。五、城乡居民生活用电上升较快。我国人均净用电量7年间从384千瓦时增长到642千瓦时，其中人民生活用电从人均24千瓦时增长到73千瓦时。

8　月

4日　京津塘高速公路通过国家验收

我国第一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建和管理的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京津塘公路是我国“七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于1987年12月10日开工建设。公路西起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东至天津市塘沽区河北路，全长142.69公里。工程总体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和当代国际先进水平。

8日　国务院公布实施淮河渣城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

国务院公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条例》共43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条例》规定，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目标：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淮河流域各主要河段、湖泊、水库的水质达到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实现淮河水体变清。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解决有关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重大问题，监督、检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并行使国务院授予的其他职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财政部等要求加强证券回购业务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就一些金融机构从事证券回购业务严重违规的问题，联合发出《关于重申对进一步规范证券回购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切实加强对证券回购业务的管理，各类金融机构必须按规定开展证券回购业务。《通知》规定，凡未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和融资中心一律不得开办证券回购业务。所有金融机构也不得参与这些场所和中心开设的证券回购市场。非金融机构、个人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一律不得直接参与证券回购业务，任何交易场所、融资中心不得接受其为会员。禁止在国家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之外私下从事证券回购业务。证券回购券种只能是国库券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回购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回购资金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不得用于期货市场投资和股本投资，不得以贷款、拆借等任何名义用于企业。《通知》强调，回购方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属于自己所有的国库券和金融债券，并将国库券和金融债券集中在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指定的一家证券登记托管机构保管。代保管单只能由该机构出具。禁止任何金融机构挪用个人或机构委托其保管的证券。禁止任何金融机构以租券、借券等方式从事证券回购业务。

9日　我国最大金融数据通信网开始建设

邮电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京签署协议：双方将联手建设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专用数

据通信网。这一专网是为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满足金融系统业务信息处理日益增长的需求，建立强有力的现代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能力，提高银行支付服务质量而建设的。银行的结算业务、信用卡业务、金融管理信息、政策债券、外汇等业务都将通过这一网络实现。

11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为最大股东，占有42.5%的股份，建行行长王岐山出任该公司董事长。第二大股东是美国摩根士丹利集团，占有35%的股份。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三家股东各占7.5%的股份。这5家股东的总资产合计超过3500亿美元。该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其业务范围包括：境内外股票、债券的承销；境内外股票、债券的自营和代理买卖；基金的发起和管理；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和收购、项目融资等顾问业务；外汇买卖；外汇资产管理和同业拆借等。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是第一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许可证的中外合资投资银行公司，是外资在华营业性金融机构中的新成员。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正在稳步推进。

24日　我国第一部农业发展年度报告（农业白皮书）面世

由农业部主持编写的这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95》，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对上年度农业发展的状况和农业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评价，对下年度农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初步预测；对农村经济运行中的若干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汇集了有关的主要数据资料，具有较强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这将有利于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农业，促进中国农业更快地走向世界。农业部今后每年都要编写出版农业白皮书。

27日　国务院批复同意成立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这是自《公司法》颁布以来第一家由国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投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负责开发经营我国最大的神府东胜煤田及其配套的铁路、电站、港口、船队等项目，这标志着我国基础产业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作出修改，增加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植树造林、城市绿化工作，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企业应当优先采用能源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国家对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落后设备实行淘汰制度。”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限期禁止采用的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工艺名录和限期禁止生产、禁止销售、禁止进口、禁止使用的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设备名录”等内容。

我国青年博士徐硒新破译的编码序列首次收入世界基因库

第四军医大学29岁的博士徐砺新在导师的指导下，经过6年不懈攻关，在世界上首次获得一个与肝细胞生长调控及癌变有关的新基因的全长编码信息序列。8月中旬，该序列被国际权威基因数据库正式收录，以供全球的科学家研究应用。这是目前中国人

发现的人类自然基因首次进入世界基因库。这一重大成果，为人类基因组及真核细胞转录调控的研究提供了最新资料，有望为临床肝癌防治提供新途径。

9　月

4日　外经贸部发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

外经贸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规定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应当符合国家的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遵守国家关于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合作企业在批准的合作企业协议、合同、章程范围内，依法自主地开展业务、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干涉。《实施细则》主要内容包括合作企业的设立、企业组织形式与注册资本、投资、合作条件、组织机构、购买物资和销售产品、分配收益与回收投资、期限和解散、关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的特别规定等等。

5日　1995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评价结果在北京揭晓

这次评价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及《管理世界》中国企业评价中心，在国务院有关工业专管部委的指导下完成，以1994年工业企业实现的销售额为主要指标。位于前15位的企业依次是：大庆油田、华东电力集团、华北电力集团、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东北电力集团、宝钢（集团）公司、一汽集团公司、华中电力集团、东风汽车集团、鞍钢（集团）公司、首钢总公司、胜利油田、广东电力公司、玉溪卷烟厂、华能集团。从1987年开始的工业企业评价活动表明，国有工业大企业是“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主体。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实力不断增强。国有大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电力、石油开采与加工、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化工、电子和大型成套设备制造等行业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

我国研制成功直径200毫米硅单晶

我国第一根直径200毫米（8英寸）硅单晶，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国家半导体材料工程研究中心诞生。这根N型、(M100）晶向硅单晶的研制成功，标志我国半导体硅单晶制造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半导体材料的科研和生产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微电子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7日　国务院决定组建城市合作银行

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务院发出《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决定自1995年起在大城市分期分批组建城市合作银行。城市合作银行是在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由城市企业、居民和地方财政投资入股组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主要任务是：融通资金，为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城市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要分期分批进行，条件成熟一个，批准一个。今年首先在京、津、沪等城市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35个大中城市逐步推开。城市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一）在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城市，凡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新发布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办法》规定

的城市信用合作社，都必须加入城市合作银行。（二）城市合作银行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的财务管理制度。加入城市合作银行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相应取消独立法人地位，其债权债务转为城市合作银行的债权债务。（三）对加入城市合作银行的城市信用合作社，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进行股权评估，然后统一向城市合作银行入股。城市信用合作社的法人股东成为城市合作银行的法人股东，个人股东可根据其意愿转为城市合作银行的股东或退还其股本。在城市合作银行组建过程中，不得募集新的个人股份。（四）城市信用合作社原有的公共积累不得私分或转移。城市信用合作社加入城市合作银行，其公共积累的产权必须明晰化。要妥善处理冲销呆账、呆账准备金、职工福利、社会保障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原股东权益等几方面的关系，由减免税形成的公共积累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五）城市合作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组建过程中，城市信用合作社的人、财、物，由该市城市合作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其他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转移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资产，不得干预城市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经营、清产核资和股权评估等活动。

10日　中国人民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重新登记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决定年内在清理越权批设金融机构和对金融机构年检的基础上，对全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一次检查验收，并重新登记。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务院的领导下，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约法三章”等一系列整顿金融秩序的政策措施，全国金融秩序有了明显好转，但当前在金融监管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是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违规较多，有些金融机构超越范围经营比较严重。这次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依照有关法律，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重新登记，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整顿金融秩序的成果，加强和完善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纠正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严重违章现象，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依法经营。这次需要重新登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证券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金融租赁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检查验收的主要内容是检查金融机构的合法性、业务的合规性和经营的安全性。清理的范围主要是越权批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进城设立机构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情况，调查了解对财政信用、资信评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典当行、基金会，以及未经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擅自办理金融业务的基本情况。

20日　南海成为我国最大海上产油区

在我国南海珠江口海域形成一个由4个投产的中外合作油田组成的、目前我国最大的海上产油区正式形成。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意大利、美国的阿吉普、雪铁龙、德士古公司组成的ACT作业者集团合作开发的惠州32－2油田和惠州32－3油田宣告投产，加上此前已投产的惠州21－1油田和惠州26－1油田，这个产油区的年产量将达到350万吨，成为最大海上产油区。并且，这个产油区油层厚、产能高、油质好，产品被国际原油市场称为“中国南海惠州轻油”。

25日—28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共分六部分：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二、主要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三、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四、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和部署；五、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全会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15年的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将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将取得明显进展，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全会指出，今后15年，要下大力量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广泛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社会生产各部门，重点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缩小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在经济建设中，重点加强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科技、教育。同时，振兴支柱产业，培育高技术产业，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国防实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今后15年的战略任务。

26日　宜（昌）黄（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宜（昌）黄（石）高速公路全长350公里，从1987年开始建设，是国家“七五”和“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它东起湖北黄石，由东向西穿过鄂州、武汉、汉川、仙桃、潜江、江陵、荆沙、枝江、宜昌等十个市、县（区），在宜昌市与三峡工程专用公路相接。它不仅连接了湖北省东西经济最发达地区，形成湖北长江经济带的运输大动脉，而且构成了三峡工程对外交通的陆上主通道，同时还是国家规划的“两纵两横”国道主干线之一的沪蓉（上海至成都）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宜黄公路实行全封闭、全立交，路面均为上下行四车道，昼夜通过能力为2.5万车次，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

27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宏观管理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宏观管理的通知》规定：一、严格控制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总规模。国家对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总量控制计划管理，对借用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二、严格按国家规定审批建设项目对外借款。基本建设项目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其申请借款规模在国家规定限额以上的，由国家计委审批借款额度；技术改造项目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其申请借款规模在国家

规定限额以上的，由国家经贸委会签国家计委审批借款额度。限额以下的，由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国家计委下达的国际商业贷款年度计划内审批。三、进一步加强对对外发债窗口单位的管理。加强对对外发债窗口的管理，窗口单位数量要从严控制。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资产负债比例、资本风险比率及经营业绩等状况，负责对发债窗口的定期审核，实行定期评审制。四、加强债务偿还的监督管理。五、完善外债统计监测。六、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动态分析。

我国又批准七家企业到境外上市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证券委批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华制药股份公司、天津中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大方正集团为境外上市预选企业。

1993年我国开始进行部分企业境外上市的试点工作。至今，1993年初国家确定的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海外上市预选企业，已全部在香港上市；1994年初国家确定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22家海外上市预选企业，已有8家在香港上市，2家在美国上市，其余企业正在积极进行有关准备工作。已完成境外上市的19家企业都比较成功，共筹措外资36.7亿美元。

28日　江泽民谈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作《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报告，内容包括：第一，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第二，速度和效益的关系。要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第三，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第四，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第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第六，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第七，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八，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在收入分配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第九，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第十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据，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第十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0　月

3日　我国第一条全自动硫化生产线建成

具有延长机械零件寿命的高科技硫化自动生产线在咸阳建成投产。这项技术被国家经贸委列入“1995年国家级新产品试制计划”，国家科委也将其列入“国家八五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这是我国建成的第一条全自动硫化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又取得了一项世界级水平的成果。

4日　我国第一条沙漠公路全线通车

我国在流动沙漠中修筑的第一条等级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这条全长522公里的沙漠公路南北贯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与油田公路及314国道相接，南与315国道相连，其中沙漠段长446公里。这条沙漠公路的建成，不仅开创了我国、也开创了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长距离等级公路的先河。

11日—13日　全国社会发展科技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全国社会发展科技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研究和布置了“九五”期间和到2010年全国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并正式推出了“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社会发展科技计划”是以指导性为主滚动实施的科技发展计划，它充分利用现有各种科技计划对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支持，并按照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自身的特点和需要作必要的补充，使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由三部分构成：“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纲要”、“社会发展科技优先发展项目计划”和“社会发展科技专项行动”。其中，“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纲要”是一个战略规划，具有长远规划的性质；“社会发展科技优先发展项目计划”主要包括一批研究开发和技术基础性项目，是一个滚动性计划；“社会发展科技专项行动”包括6个科技经济一体化的专项计划，将和已有国家科技计划相衔接，是一类纵向、全程和技术创新计划。

19日　民政部提出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1991年1月，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民政部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在山东等地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在试点的基础上正在逐步推开。几年来，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加强保险基金的管理，避免出现混乱，以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民政部提出五点意见：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二、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三、推广规范操作，逐步完善管理体系。四、切实加强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五、加强宣传教育，改进工作方法。

23日—24日　物资流通代理制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指出，推行代理制是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化物

资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措施。按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已提出了《钢材代理制试点方案》和《汽车代理制试点方案》。代理制的有关政策也已基本落实。进入第一批试点的工业企业有鞍钢、首钢、武钢、马钢、一汽集团、东风汽车公司、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和跃进汽车集团公司，第一批试点的流通企业有 61 家。

26 日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公布实行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8 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国家鼓励、支持开展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国家鼓励、支持综合利用资源，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并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活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该法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作出具体规定，并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作出特别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经纪人管理办法

为确立经纪人的法律地位，保障经纪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经纪行为，促进经纪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经纪人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对经纪人进行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责是：（一）经纪资格的认定；（二）经纪人的登记注册；（三）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经纪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保护合法经营，查处违法经营；（四）指导经纪人自律组织的工作；（五）国家赋予的其他职责。《办法》对经纪人的资格认定、经纪组织、经纪活动等作出具体规定。

11　月

4 日　我国家用电冰箱工业将逐步淘汰臭氧层消耗物质

根据《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逐步淘汰国家方案》，中国轻工总会家电办公室和家电协会确定，在今后的 10 年时间里，我国家用电冰箱工业将逐步淘汰臭氧层消耗物质，2005 年后只生产对大气环境没有破坏作用的“绿色冰箱”。几年来，我国冰箱企业一直积极筹集资金，开展替代技术和替代品的研究和应用工作。目前，海尔集团、长岭集团、科龙公司、万宝集团等国内大型冰箱企业已经采用替代技术，实现了批量生产。1994 年我国共生产了 50 万台“绿色冰箱”，削减臭氧层消耗物质 629 吨。

5 日　国家计委等要求加强港口建设宏观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交通部《关于加强港口建设宏观管理的意见》。《意见》共有五条：1. 加强港口建设的规划管理。港口建设要贯彻“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分工、大中小结合的专业化系统配套。2. 加强岸线统一管理。建立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岸线管理体制。3. 加强港口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包括万吨级和码头结构按万吨级设计的中级泊位及海上单点系泊）的建设，不论资金来源和所属部门，在项目立项审批前须经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新开港点建设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包括万吨级和码头结构按万吨级设计的中级泊位及海上单点系泊）的，需经交通部审查同意后方能办理项目立项审批手续。新增吞吐能力100万吨以上（包括100万吨）的港口建设项目，由交通部提出意见后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批或报国务院审批。凡化整为零的项目，不批准建设。外商投资建设、经营港口码头项目（包括中外合资、合作项目），按照国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的报批程序和审批权限进行审批或上报备案。凡是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项目，应征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后方可办理立项审批手续。公用码头应由国家控股或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凡需要国家投资的小型码头项目，地方人民政府在审批前应征得国家有关投资部门同意。否则，地方批准建设的此类项目，国家一概不提供投资，国家金融机构不提供贷款。4. 加强信息统计工作。5. 加快制定《港口法》及其配套法规，依法对港口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

6日　国家确定“九五”和2010年科技发展规划

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工作会议召开。“九五”期间，我国科技发展工作将继续把攻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围绕农业、高技术、社会发展等方面突出重点，加强集成，重点攻克，努力提高科技自身实力和水平，支持对经济、社会和科技长远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工作。农业科技工作首先被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科技要为农业增产目标提供50%以上的贡献份额。其次要加快高技术研究步伐，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另一方面要加快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通过技术改造使一批大中型企业提升为高技术企业。“九五”期间重点开发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和海洋技术等，速选一批有望形成大的产业、对提高生产技术总体水平、增强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要紧紧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

7日　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坚决控制境外废物向我国转移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坚决控制境外废物向我国转移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出于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将大量废物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转移污染。为保护环境，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决不能把我国作为境外有害废物倾倒、堆放的场所，但仍有一些单位见利忘义，采取非法手段从国外进口有害废物，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环境，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为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对废物进口的管理。对废物进口分两类进行管理：一类是禁止进口的废物：一类是可作为原料但必须严格限制进口的废物。对国家禁止进口的废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从事此类废物的进口贸易以及其他经营活动，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把关，坚决禁止进口。对可作为原料但必须严格限制进口的废物，由国家环保局统一审批，其他任何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均无权审批。国家环保局要严格把关。业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凭国家环保局批准的文件才能批准有关企业经营此项业

务或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手续，海关凭批准文件放行进口，并由国家商检机构列入强制性检验商品目录实行强制检验。

8日　农业部公布首批全国乡镇企业集团名单

农业部公布了首批全国乡镇企业集团名单，327家企业榜上有名。此次公布的首批全国乡镇企业集团，无论规模和实力、产品质量和档次，还是科技管理水平、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均代表了我国乡镇企业的最高水平。这些集团分布在全国19个省市，其中东部地区占90%以上，中西部地区只占不到10%。按核心企业总资产衡量，排在前5名的乡镇企业集团是：横店集团、海德集团、天津尧舜集团、天津津美集团、天津津海集团；按销售收入衡量，排在前5名的是：天津尧舜集团、天津津海集团、江苏华西集团、天津津美集团、海德集团；按利税总额衡量，排前5名的是：江苏华西集团、天津尧舜集团、天津津海集团、天津万全集团、江苏龙山鳗业联合公司。

10日　邮电部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作出规定

邮电部发布《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根据《规定》，凡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单位，必须按规定向邮电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以下简称通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单位，在取得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电信业务经营活动；未经审核批准、未领取营业执照的，不得从事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经营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单位，凭通信主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到无线电管理机构按规定申请办理频率指派和台站设置使用手续。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一律不允许境外各类团体、企业、个人以及在我国境内已兴办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经营或者参与经营，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吸引外资参股经营。《规定》明确了经营单位的管理、市场秩序的管理、通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罚则等等。

12日　北仑发电厂一期工程通过验收

浙江宁波北仑发电厂一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委员会的验收。北仑发电厂规划装机容量为5台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分二组建设。一期工程为2台60万千瓦的机组，发电设备主要由美、日、加、法等国提供，达到世界同期水平。这一期工程的建成，缓和了华东地区的用电紧张状况。

13日　国家体改委等颁发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

国家体改委和林业部联合颁发《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反映林业特点的林业经济新体制，以推进林业“九五”发展规划和建立林业“两大体系”目标的实现。《纲要》提出，我国林业建设将在营林体制、产业发展、资源保护等方面作出重大改革。在营林体制上，国家将按照森林用途和生产经营目的，将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纳入商品林类；将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纳入公益林类，实行森林培育的分类经营、分类管理。在商品林类中，将速生丰产林、工业原料林、竹林、经济林作为重点，实行集约化经营，提高林木增长质量。在公益林类中，重点发展对国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生态保障和城市生态环境影响突出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

牧区开发示范工程启动

“牧区开发示范工程”建设试点会结束，由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共同主持的牧区开发工程正式启动。为了实现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要求，改变牧区畜牧业传统的生产观念和方式，国家计委今年新增5000万元，地方政府配套5000万元，由农业部具体布置实施“牧区开发示范工程”，首批共有25个示范工程立项建设。通过示范工程建设，力争在本世纪末促使牧区畜牧经济实现由数量向效益、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15日　我国将开展全面勘界工作

全国勘界工作会议上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决定，我国将从1996年起开展全面勘界工作，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省、县两级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任务。由国家组织全面勘界，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我国首座超临界大型电站通过国家竣工验收

我国首座超临界大型电站——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一期工程两台60万千瓦机组通过国家竣工验收。石洞口第二电厂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从亚临界机组向超临界机组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是由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筹资，利用外资合作建设的，总投资37亿元。

17日　我国首台整体核电站全范围仿真系统通过验收

我国首台整体核电站全范围仿真系统——秦山300MW核电站仿真机在珠海顺利通过了出厂验收暨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验收。这台仿真机是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秦山核电公司的支持参与下，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珠海）有限公司经过33个月研制成功的。它标志着我国的核电站仿真技术已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并填补了我国核电工业中核电站全范围仿真机的一项空白，使中国一举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同时也是亚洲惟一能制造并提供该类系统的国家。

22日　国务院发布预算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经1995年11月2日国务院第37次常务会议通过。《条例》共8章79条，对预算收支范围、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决算以及对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的审计监督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23日　五十铃在中国成立投资公司

五十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该公司今后的投资重点是汽车零配件和铸锻造毛坯件项目。这是第一家外国汽车厂家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设立的投资公司。

29日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技术改造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轿车项目——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技术改造工程，经过10年建设，已经按计划全部竣工，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上海大众现已形成20万辆生产能力。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率已达87%。项目总投资36亿元，其中，自筹资金部分，一期工程占67%，二期工程达89%。到1995年11月止，桑塔纳轿车累计已生产50万辆，销售收入608亿元，上交国家税金92亿元，企业创利润51亿元。1995年上海大众的投

资利润率为44%，投资利税率达103%。

12 月

1日 我国最长的合资铁路全线正式开通并运营

我国最长的一条合资铁路——集通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营。集（宁）通（辽）铁路是由铁道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投资建设的合资铁路，全长943公里，总投资为21.7亿元，于1990年6月开工。线路设计输送能力近期为每年700万吨，远期经过配套完善可达1700万吨。

5日 中国证监会等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作出规定

为了防止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盲目参与期货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内贸易部发出《关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的规定》。《规定》指出：一、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要经主管部门或公司董事会批准。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要以套期保值为主。经营亏损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业务，不得进行投机性交易。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必须有专门的机构、健全的管理规章和完善的账目管理制度。企业、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检查本单位参与期货交易的情况。四、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持仓额超过其营运资金（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五倍时，必须得到主管部门或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5日—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和部署1996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确定，1996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降低物价上涨幅度，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全面实现“九五”计划各项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会议强调，明年和今后经济工作中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这是中央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其客观趋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明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工作开好头，起好步，对于顺利实施“九五”计划至关重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题为《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奋发进取，讲求实效，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

11日 国务院要求整顿矿业秩序，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

为切实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权益，保障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依法进行，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矿业秩序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通知。《通知》指出：一、认真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牢固树立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观念。二、依法检查整顿矿业秩序。三、认真纠正存在问题，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切实加强矿业管理。

13日　国家教委决定实施“燎原计划百千万工程”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国家教委决定从今冬开始实施“燎原计划百千万工程”。

国家教委自1988年开始组织实施“燎原计划”，“燎原计划百千万工程”是推进“燎原计划”的一项新内容。“燎原计划百千万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利用广大农村现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条件，利用广播、电视等多种教学手段，在全国上千个乡、上万个村，尽快推广上百项农村科技成果和实用性强、生产效益高的农村实用技术，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30个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地、市的一批乡和村将作为第一批实施“燎原计划百千万工程”的单位。

17日—19日　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批准全国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把2000年污染物排放量冻结在1995年的水平上。我国环保工作重点开始实行6个转移：环保管理向法制轨道转移；环保机构、制度改革重点向有利于环境总量控制转移；地方治理向工程化建设转移；部门职能向宏观调控转移；防治污染由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移；环保产业向依靠科技进步转移。

20日　我国实现“八五”森林资源增长目标

“八五”期间，我国已经实现“八五”森林资源增长目标，森林面积增加800多万公顷，森林蓄积增加3.1亿立方米，全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分别达到1.34亿公顷和101亿立方米。

23日　我国首座现代化大型悬索桥竣工

由江泽民总书记奠基、铁道部大桥局三处承建的我国首座现代化大型悬索桥——海湾大桥在汕头竣工。海湾大桥位于汕头经济特区汕头港东部出入口妈屿岛海域，南接深汕高速公路，北连汕汾高速公路，由悬索桥和南北引桥组成，全长2500米，其中悬索桥主跨跨径为452米，悬吊的加劲梁为预应力混凝土箱形梁，比加拿大赫德森霍普桥还长200余米，为当今世界同类型结构桥梁跨度之冠。桥净宽24.2米，高50.3米，可通行5万吨级海轮。

25日　国务院对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作出规定

为了规范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发行及交易，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发布《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以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但是，拟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面值总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应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报国务院批准。公司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包括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和公司增加资本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两种形式。公司发行的境内上市外资股，采取记名股票形式，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买卖，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境内上市外资股投资人限于：（一）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定居在国外的中国

公民；（四）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规定的境内上市外资股其他投资人。《规定》还明确了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条件、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程序等等。

26 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和调整进口税收政策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和调整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近年来，国务院对一部分进口减免税规定进行了清理、调整，将进口关税总水平由 42%降到 35.9%。但从总体上看，“税率高、减免多、税基小”的问题仍很突出。必须加快对进口税收政策的改革和调整，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取消过多的、不平等的进口税收减免规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国际通行规则，建立统一、规范、公平、合理的进口税收政策。《通知》包括四条：一、较大幅度地降低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内市场需求，同时考虑对中央财政的影响和国内产业承受能力，在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关税结构合理化的前提下，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将逐步降低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此，从 1996 年 4 月 1 日起，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 23%。二、对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等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三、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和我国实际情况，调整、保留部分进口税收减免规定。四、除本通知规定以外的其他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规定，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一律停止执行。

28 日　电力法公布实施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并由江泽民签署第 60 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法》共 10 章 75 条，包括总则、电力建设、电力生产与电网管理、电力供应与使用、电价与电费、农村电力建设和农业用电、电力设施保护、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电力法》规定，电力事业应当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超前发展。国家鼓励、引导国内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投资开发电源，兴办电力生产企业。电力事业投资，实行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应当依法保护环境，采用新技术，减少有害物质排放，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这部法律的颁布施行，对保障和促进电力事业发展，维护电力投资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电力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电力法》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31 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工作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村集体资产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为了切实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通知》指出：一、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二、集体经济组织要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三、积极开展对农村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工作。四、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评估的管理工作。五、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审计工作。六、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法规和制度。

我国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事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教育部、财政部、中国科协、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联合推出并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其目的是根据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到本世纪末，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造就上百名能进入世界科技前沿、在世界科技界有较大影响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上千名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保持学科优势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上万名在各学科领域里有较高学术造诣、成绩显著、起骨干或核心作用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浙赣铁路复线全线贯通

浙赣铁路复线于“六五”期间开始进行勘探规划，“七五”、“八五”期间施工。全长945公里，东连沪杭、宣杭线，西接京广、湘黔铁路，北接皖赣铁路，是中国南部重要的东西向干线，联系着华东和华南两大经济区。

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95年，我国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大事来抓，主要抓住经济总量平衡这个要害，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稳定农业和农副产品价格两个关键环节，使经济在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将1994年高达21.7%的物价涨幅，控制到预定的15%左右。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77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365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8274亿元，增长13.6%；第三产业增加值18094亿元，增长8%。

工业生产在平稳回落中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24718亿元，比上年增长14%。在全部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9.5%，其中国有企业增长7.2%；集体企业增长15.8%；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19%。大中型企业增长10.2%。轻工业生产发展快于重工业。全年轻工业完成增加值11181亿元，比上年增长16.7%；重工业完成增加值13537亿元，增长12%，石油化工、机械电子、汽车等支柱产业在调整中稳定发展。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445亿元，比上年增长1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11%），增幅比上年回落12.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经济投资10822亿元，增长16.1%；集体经济投资2978亿元，增长11.8%；城乡居民个人投资2381亿元，增长20.8%；其他各种经济类型投资3264亿元，增长35.3%。

国内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598亿元，比上年增长2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国内生产资料市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销售稳定增长。农业生产资料购销两旺，但价格水平上升幅度较高。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12389亿元，比上年增长28.2%；农村消费品零售额8209亿元，增长2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13%和6.8%。

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80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6%；其中出口总额1488亿美元，增长22.9%；进口总额1321亿美元，增长14.2%。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由上年的26.4%上升到29.4%，超过服装纺织品类成为我国出口第一大类产品。国内紧缺的原材料及生活资料进口增加较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继续大幅度上升，全年达1098亿美元，增长25.3%，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37%提高到39.1%。实际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全年实际使用外资4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77亿美元，增长11.7%。年末，已注册的外

商投资企业达 23.4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2.8 万户。

金融形势平稳。存款增加较多，贷款结构有所改善，用于支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市场和有效益的国有企业以及国家重要物资的进口和储备等方面的贷款增多。年末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4595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0880 亿元，增长 31%，其中企业存款余额为 14520 亿元，增加 3004 亿元，增长 26.1%；各项贷款余额为 4462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7971 亿元，增长 21.7%，其中短期贷款余额为 31243 亿元，增加 5321 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10532 亿元，增加 1969 亿元。年末市场现金流通量（M0）为 788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596.7 亿元，增长 8.2%；狭义货币（M1）增长 16.8%；广义货币（M2）增长 29.5%。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2966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8126 亿元，增长 37.7%。

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较多。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为 736 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220 亿美元。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 3893 元，比上年增长 22.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578 元，增长 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3%。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增长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一部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有所下降。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物价总水平涨幅仍然偏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不好。

1995 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国家计委下达 1995 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共 139 项。其中新增项目（*）19 项。

煤炭项目（20 项） 河北开滦矿区 山西古交矿区 山西阳泉矿区 山西晋城矿区 山西大同矿区 内蒙古准格尔矿区一期 内蒙古平庄矿区元宝山露天矿及其配套工程 黑龙江七台河矿区 黑龙江双鸭山矿区 安徽淮南矿区 安徽淮北矿区 山东兖州矿区 山东枣滕矿区 河南平顶山矿区 郑州矿区 河南永夏矿区 陕西黄陵矿区 宁夏灵武矿区华能精煤公司神府东胜矿区 *山西离柳矿区沙曲矿井及配套

石油项目（6 项） 黑龙江大庆油田开发 辽宁辽河油田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开发 新疆油田开发 新疆塔里木地区开发 广东南海西部石油公司

电力项目（36 项） 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 福建水口水电站 湖南五强溪水电站天生桥水电站一级工程 天生桥水电站二级工程 海南大广坝水利水电工程 四川宝珠寺水电站 四川二滩水电站 贵州东风水电站 云南漫湾水电站 西藏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 青海李家峡水电站 河北衡水电厂 天津蓟县电厂 山西阳泉二电厂 内蒙古伊敏煤电联营一期工程 内蒙古元宝山电厂三期 内蒙

古达拉特旗电厂　辽宁铁岭电厂　辽宁绥中电厂　吉林双辽电厂　哈尔滨第三电厂二期　上海外高桥电厂　浙江嘉兴电厂　安徽马鞍山第二电厂　山东邹县电厂三期　河南偃师电厂二期工程　湖南石门电厂　陕西渭河电厂二期工程甘肃靖远电厂二期工程　黑龙江鹤岗电厂　*江苏彭城电厂　*福建嵩屿电厂　*江西丰城电厂　*宁夏大坝电厂二期工程

水利项目（4项）　大湖综合治理骨干工程　河南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甘肃引大人秦工程（地方项目）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铁道项目（17项）　宝中线　兰新复线　浙赣复线　北京西客站　徐州枢纽　侯月线　焦柳复线　陇海线徐连复线　湘黔复线及电气化　南昆线　成达线　京广线京郑段电气化　成昆铁路电气化　京九线　横南铁路　*宝成复线　*哈大线电化

交通项目（14项）　大连港（含商检设施）　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二期工程　秦皇岛港煤码头四期工程（含商检设施）　烟台港（含商检设施）　日照港（含商检设施）　连云港港墟沟港区一期工程　上海港　汕头港　广州港　西江航运　川藏公路一期　天津港（地方项目）　沪宁杭市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京深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邮电项目（4项）　京太西光缆工程　京汉广光缆工程　*杭福贵成光缆工程　*京呼银兰光缆工程

民航项目（1项）　桂林两江机场

钢铁项目（4项）　辽宁鞍山钢铁公司齐大山铁矿　武汉钢铁公司三炼钢工程　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　*上海宝钢三期

有色项目（4项）　广西平果铝厂　甘肃金昌金川有色公司二期　云南大红山铜矿　广东韶关冶炼厂

化工项目（7项）　湖北黄麦岭磷化工公司　湖北荆襄化学工业公司　大峪口矿肥结合项目　云南磷肥工业公司　贵州瓮栖福磷矿重钙项目　吉林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乙烯工程　陕西渭河化肥厂（地方项目）　*海南富岛化学工业公司天然气化肥厂

石化项目（4项）　安徽安庆石化总厂　江西九江石化总厂大化肥工程（地方项目）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工程　*新疆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二化肥工程（地方项目）

建材项目（2项）　安徽铜陵水泥厂　*河北秦皇岛耀华玻璃总厂

机电汽车项目（4项）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轿车项目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轿项目*天津夏利轿车项目　*河北石家庄彩色显像管玻壳项目（地方项目）

纺织项目（1项）　江苏仪征化纤联合工业公司三期工程

林业项目（1项）　“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

卫生项目（1项）　卫生部疫苗工程

广播项目（2项）　国际广播中心工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务楼

粮食项目（1项）　*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

其他项目（6项，略）

1996年

1　月

1日　我国国家公用数字移动电话网在15个省、市、区实现联网试运行

这一名为“全球通”的国家公用数字移动电话网，现有用户约10万人。实现首批联网的地区包括京、津、沪3个直辖市和黑、辽、陕、冀、鲁、苏、浙、鄂、闽、粤、桂、琼等12个省区。该网将于9月底在全国30个省市区及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联网，实现国内、国际漫游。“一机在手，漫游神州”的理想将变为现实。

3日　国务院批准取消48项住宅建设项目收费

为控制商品房价格不合理上涨，减轻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者的负担，促进住宅建设持续稳定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出《关于取消部分建设项目收费、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收费管理的通知》，公布取消了48项未按规定程序批准、明显不合理的住宅建设收费，并就进一步整顿建设项目收费，加强收费管理做出部署。被取消的48项建设收费项目如下：

建设部门19项：建筑工程管理费，开发企业资质初审、年审及年审公告费，建安临时工棚费，建筑技术开发费，临时建筑规划管理费，建设项目贷款抵押鉴证费，统建管理费，新建房屋安全鉴定费，房屋买卖登记费，房产复查费，商品房注册登记费，自来水安装管理费，自来水表立户费，规划、定点保证金，绿化保证金，拆迁安置押金，道路污染费，绿化管理费，建设项目划定红线手续费、验线费。

土地管理部门10项：土地界桩、坐标测量费，土地出让管理、手续费，土地办证费，土地开发管理费，土地开发配套费，土地权属变更费，土地过户费，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转户费，土地占用招工保证金，土地测量费。

电力部门5项：供电安装管理费，用电入户、立户费，接电报装费，用电附加费，电网改造费。

公安部门3项：建筑消防设计、设施审验费，施工企业治安费，消防押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1项：建筑市场管理费。

文化部门2项；考古调查费，考古勘探费。

环保部门1项：建设项目环保押金。

劳动部门1项：施工企业使用临时管理费。

审计部门1项：建设资金审计费。

统计部门1项：商品房统计费。

民政部门1项：地名申请费。

教育部门1项：教育设施配套费。

体育部门1项：体育设施配套费。

邮电部门1项：邮电通信设施配套费。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交易系统建成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交易系统建成并开始联网试运行，标志着我国1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同业拆借市场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为我国中央银行逐步完善间接调控体系及今后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同业拆借是指金融机构之间相互融通资金的一种行为。它分为7天（包括7天）以内的同业头寸拆借和7天以上至4个月以内的同业短期拆借。新建成的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交易系统运用先进的通信及信息处理系统，将全国银行同业拆借活动联成了一体，它能促使资金合理快速配置，及时准确反映全国同业拆借资金的市场供求信息。这个系统分为一级和二级两个交易网络。其中进入一级网的交易主体为经人民银行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总行，及经改造后的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的融资中心等，交易活动通过中国外汇交易系统计算机网络进行。目前，进入这一网络的共有12家商业银行总行和15家融资中心。进入二级网的交易主体主要为各商业银行总行授权的分支机构、在各地人民银行开立账户的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合作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这个网络将通过各省市区的融资中心就地交易。在同一个交易日内，一级网和二级网将同时运行。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交易系统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以往存在的市场分割、封闭、多头拆借、配置扭曲，中央银行难以有效监管的局面。更重要的是，由于银行备付金率和同业拆借利率能够较为灵敏、准确地反映短期资金的供求变化，因而通过这个系统，可以为中央银行实施适时调控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5日—8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提出，199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的要求是：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针对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探索扶持、保护、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制、新措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稳定。1996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一定要加倍努力，扎实工作，千方百计夺取农业丰收，为实现“九五”计划奠定良好基础。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必须着重解决的八个重大问题是：1. 坚决贯彻优先发展农业的方针，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2. 切实解决好农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3. 努力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4. 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含量。5. 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6.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走高产、优质、低耗、高效的发展路子。7.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打好“八七”扶贫攻坚战。8. 严格控制人口、保护耕地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8日　三北防护林体系三期工程全面启动

根据规划，三期工程共需造林400万公顷，年均造林80万公顷，总投资78.57亿元。这些树木成林后，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将提高到10%以上，约有2670万公顷农田受到林网保护，70%的农田实现林网化，年增产粮食1300多万吨；使2000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治理，占应治理面积的50%以上；到本世纪末，在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京津和河北东北部、黄土高原、毛乌素沙地、新疆绿洲等地区将分别建成一批不同等级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有30%的县实现三北防护林体系总规划确定的建设目标；使三北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很大改善，人口容量增加，为下个世纪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工程重点是：在黑、吉、辽、京、津5省市建成省级防护林体系，在陕、甘、宁、青、新、晋、冀、蒙建成73个县级防护林体系；在毛乌素沙地建设区域性防护林体系；在科尔沁沙地建起东北平原黄金玉米带的生态屏障；在黄河中游营造防护林，保障小浪底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在新、青、甘、宁等灌溉农业区建设绿洲生态屏障，确保商品粮基地稳定增产；在京津周围建设水源涵养林和用材林基地，提高首都周围的环境质量；在西辽河重点水土流失区造林15万公顷，增强防洪能力，保障东北工业基地安全；在京包、包兰铁路造林9万公顷，建成绿色通道，保障安全运行。

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正式挂牌营业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正式挂牌营业。这是一家统一法人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注册资金15亿元，其中财政入股2.5亿元。

组建城市合作银行，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1984年以来，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国有专业银行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作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城市合作银行也开始建立。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是在现有北京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90家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经过9年的发展，北京市的城市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达17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9亿元，累计向国家缴纳税金12.8亿元，为首都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9日　我国第二个长途市话公用通信网投入建设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建设的接口汇接局工程已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石家庄建成并开通了13万门，其他11个城市也已启动，这标志着我国第二个长途市话公用通信网已投入建设。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是国务院于1993年底正式批准由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三家为主体组建的，其目的是打破长期以来我国电信市场的垄断局面，进一步促进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

12日　中国民生银行成立

我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在京宣布成立。民生银行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建，59家股东主要是中华全国工商联的会员企业，募集股本金达13.8亿人民币，其中80%以上来源于民营企业。民生银行是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将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筹集和

融通国内外资金，并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主要为民营工商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同时也为搞活国有经济提供融资和各种金融服务。

15日 京呼银兰光缆通信干线全线贯通

总长2052公里的京呼银兰光缆通信干线全线贯通。北京经呼和浩特、银川至兰州的光缆是我国“八五”后期国家重点通信工程，也是继西兰乌光缆之后的又一条连接西北与内地的通信干线。

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九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基本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九五”时期和今年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中提出七条基本要求：一、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深化农村改革，总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按照这个要求，要促进农村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发展连接农民与市场的中介组织；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遵循价值规律，逐步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新机制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主要农产品的储备调节和风险基金制度，建立粮棉保护价格制度和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建设。二、突出重视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三、多渠道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农业走高产、优质、低耗、高效的发展道路。五、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加速农村经济向商品化、产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六、认真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加快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进程。七、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耕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西站正式开通运营

规模居世界第四位的现代化铁路客运站——北京西站正式开通运营。北京西站作为首都客运枢纽的中心，京九铁路的“龙头”，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型客运站。北京西站坐落在京西莲花池畔，其规模是北京站的7倍多，12个候车室可同时容纳2万名旅客。北京西站采用了通告综合信息网、疏导安全网、检售票综合网、行包管理、小件寄存、子母钟、客运服务无线通信等数字化、自动化7大系统19项新技术。除客运服务外，还把餐饮、购物、住宿、娱乐等综合服务设施置于站房内。北京西站的开通运营，不仅对繁荣首都经济，加快北京向现代化大都市迈进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利于京九铁路的提前开通运营，有利于带动我国铁路客运整体水平的提高。

24日 我国掌握1微米兆位级集成电路的大生产技术

由中国华晶公司承担的“八五”微电子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1.5微米集成电路大生产技术研究”通过国家鉴定，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1微米兆位级集成电路的大生产技术。该成果的转移将推动我国原有的2—3微米大生产技术升级到1.2—1.5微米，增强市场竞争力。

25日　国务院颁布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发布施行，共17条。目的是为了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健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办法》指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是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政府对占有国有资产的各类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产权状况进行登记，依法确认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持有国家股权的单位以及以其他形式占有国有资产的企业，都应当办理产权登记。

29日　国务院颁布外汇管理条例

国务院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于1月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共7章54条。包括总则、经常项目外汇、资本项目外汇、金融机构外汇业务、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法律责任、附则。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暂行条例是1980年12月发布实施的。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使外汇管理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是必要的。《条例》规定，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统称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履行外汇管理职责。国家实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凡有国际收支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

国家税务局要求建立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申报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制度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建立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申报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制度的通知》，要求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的一切应纳税收入，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不论取得收入的个人是否属于本单位人员，都应列入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内。

2　月

1日　国家体改委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

从1995年开始，国务院确定在全国100家国有企业中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其中由国家体改委联系的30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由准备阶段转入实施阶段。但这项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大部分企业对《试点实施方案》落实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国家体改委在这次会上明确提出，在实施阶段应该达到的目标是；通过落实《试点实施方案》，使试点企业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体制和运行机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要力求实现以下八个方面的转变：企业由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由粗放型经营转变为集约型经营；由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和授权经营关系转变为政府是出资者和社会管理者，企业是被投资者被管理者的关系；由对国家授权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经营权转变为对包括出资者提供的资本在内的全部法人财产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由企业单纯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变为同时向出资者和债权人负责；由厂长、经理负责制转变为公司型法人治理机构；由依照《企业法》运行转变为主要依照《公司法》运行；由资金来源等于

资金占用的会计核算体系转变为资产负债和损益状况的会计核算体系。

16 日　国务院决定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举行。会议确定，1996 年房改工作的重点是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住房资金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继续搞好国家安居工程，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抓好企业的房改，推动企业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根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进一步提高公房租金；规范售房政策，完善政策衔接，稳步出售公有住房；加快建立政策性住房抵押贷款制度；认真抓好党政军三大系统、三个直辖市及 35 个大中城市的房改工作，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8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意见》。《意见》提出，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成败，要进一步全面推进。住房公积金不作财政预算资金，不纳人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按照“房委会决策、中心运作、银行专户、财政监督”的原则进行管理。各市（县）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或住房改革委员会由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单位的代表组成，是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领导决策机构。负责制定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使用的有关制度和政策；审批住房公积金的年度归集、使用计划和发展规划；审议确定住房公积金的预算、决算。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是当地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依法管理住房公积金的独立事业单位。管理中心受当地房改领导小组或房委会的直接领导，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独立核算。

23 日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加强期货监管工作

为进一步遏制过度投机活动，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工作，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监管工作的请示》。《请示》内容包括：一、国有或者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企事业单位）只能从事与其生产、经营有关商品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更不允许进行恶性炒作。二、各类金融机构一律不得从事商品期货的自营和代理业务。三、期货经纪公司一律不得从事期货自营业务。四、证监会将按程序对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机构和客户在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立的账户进行查询。五、各期货交易所要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建立“市场禁止进入制度”。六、在适当时机选择一些在国际上比较成熟、最具套期保值功能的大宗商品品种，在少数规范化程度较高的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进行试点。

26 日　沪宁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国家重大工程、全长 274 公里的沪宁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沪宁高速公东起上海，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重镇，西至南京，横穿我国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这条高速公路拥有 4 条机动车道，设计时速为 120 公里，建成通车后，从上海至南京只需 3 个小时。

20 日　国家开发银行首次在日本资本市场发行 300 亿日元武士债券

国家开发银行在日本资本市场成功地发行了 300 亿日元武士债券。这是国家开发银行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债券发行由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和日本兴业银行

证券株式会社作为联合主干事，发行期限10年，到期一次偿还。发债所筹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广东岭澳核电工程、伊敏电厂、绥中电厂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3　月

5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报告提出，未来15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九五”时期，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提出要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积极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三、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四、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1996年是实施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一年。党中央提出1996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降低物价上涨幅度，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全面实现“九五”计划各项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根据这一总体要求，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宏观调控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32%左右；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控制在10%左右；货币发行量控制在10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差额比上年减少50亿元，国债发行1952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2810亿美元；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以内；城镇新就业700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500万人以上。

199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199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1995年的财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财税体制继续完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财政支出在保证重点的同时，增幅也得到了一定控制。1995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都超额完成了预算，其中地方财政超

收较多。从全国情况看，支出增幅低于收入增幅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还出现了一定数额的结余，多年来支出增幅高于收入增幅的状况开始得到扭转。

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的原则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支持经济发展，继续完善财税改革，整顿财经秩序，强化税收征管，增加财政收入，坚持量入为出，从严控制财政支出，反对各种铺张消费，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努力压缩财政赤字。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汇总情况是：全国财政收入安排6872.1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1.1%。全国财政支出7486.6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9.9%。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614.42亿元。

7日　国务院批转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实施意见

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转了国家经贸委于1995年12月14日提出的《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实施意见》提出，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抓好各项企业改革试点工作。二、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三、继续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加快组织实施《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四、切实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五、学习推广邯郸钢铁总厂管理经验，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六、多渠道增加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资金。七、促进优胜劣汰，探索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办法。《实施意见》还就进一步推进配套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特殊困难行业的紧迫问题；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具体意见。最后附有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名单，包括18个试点城市和32个扩大试点城市。

27日　机电产品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自1985年10月国务院作出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战略决策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取得突破性进展，出口额持续快速增长，1995年首次超过纺织服装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据海关统计，1995年全国机电产品出口438.6亿美元，10年增长25倍。在全国外贸出口中的比重由1985年的6.1%上升到29.5%，出口机电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有了明显提高。

29日　我国实行贷款证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布《贷款证管理办法》，决定从4月1日起，在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实行贷款证管理制度。目前已批准200个大中城市，率先实行全国统一的贷款证制度。实行贷款证制度，是我国加强信贷资金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主要目的是规范企业借、还款行为，增加贷款金融机构之间相互联系，从而强化信贷资金管理约束机制，防避信贷资产风险，提高贷款质量。贷款证是法人企业向国内务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的资格证明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是贷款证的发证机关和管理机关。

我国最大的海上油田南海流花11－1油田正式投产

这一油田是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阿莫科东方石油公司、科麦奇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油田位于中国南海珠江口盆地29/04合作区，距香港东南190公里，水深

300米，石油地质含量2亿吨，高峰年产量可达249万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海上最大的合作油田。油田发现于1987年，1993年3月经我国政府批准正式投入开发建设，总费用6.2亿美元。

4　月

1日　人民银行决定不再办理新的保值储蓄业务

我国开办保值储蓄始于1988年9月，当时物价上涨与盲目抢购形成恶性循环。为了稳定市场、稳定储蓄，国家对三年以上的居民定期存款采取了保值措施。而后随着物价回落，保值贴补率降低为零，这项业务就自然停办了。直到1993年上半年，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猛，生产资料价格轮番上涨；非法集资、违章拆借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为了稳定金融，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国家于当年5月和7月两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开始恢复保值储蓄业务，并对三年期以上的国债也给予保值。这样做，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银行资金来源、维护金融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已取得明显成效，市场供给充足，物价逐渐回落。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3年期以上的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款，不再实行保值。

1日—3日　国务院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珠海召开

国务院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广东省珠海市召开。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后经济特区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重点真正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转到依靠两个根本性转变上来，以二次创业的精神，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李鹏重申了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对特区工作"三不变"的方针，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

2日　国务院决定加强乡镇企业环保工作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农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联合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主要内容有：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乡镇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县长、乡（镇）长要对本地区的环境质量负责，要将辖区环境质量作为考核县、乡（镇）主要领导人工作的重要内容。以县为单位，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把乡镇企业的排污量纳入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到2000年，所有乡镇工业企业必须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二、对乡镇企业从事的下列生产项目，坚决予以取缔或关闭：对年产5千吨以下的造纸厂，年产折牛皮3万张以下的制革厂和年产500吨以下的染料厂，以及采用坑式和萍乡炉炼焦、天地罐和敞开式炼硫、马槽炉炼铅锌、混汞法和土氰化法及溜槽选金、马蹄窑烧砖、土窑烧水泥的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取缔；对土法炼砷、炼汞、炼油、漂染、电镀以及土法生产农药、土法生产石棉制品、开采放射性矿产资源、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各类生产制品的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关闭或停产。对未按规定取缔或关闭的，要追究有关县、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及有关企业负责人的责任。严禁非法进口、加工、利用境

外固体废物。三、禁止乡镇企业新建国家法律、法规和上述规定必须取缔或关闭的生产项目。四、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要求，公布乡镇企业污染控制的重点行业和地区。

3日　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

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资源委主任邹家华在会上说，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这是国务院为了全面加强矿产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要改革。邹家华指出，从当前实践中看，矿产资源管理体制不能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没有能够按照宪法的要求，真正体现中央政府的集中、统一和有效的管理，不能在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权益，合理规划利用资源，加强政策调控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存在着多头管理、地方保护和部门分割的状况。为此，从我国国情出发，需要一个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矿产资源政策，酝酿一个时期内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行动计划和重大项目，协调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承担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促进矿产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

国务院决定扩大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

为了稳步地推进全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提出《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将从江苏省镇江市、江西省九江市扩大到全国范围的50多个城市。《意见》提出了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十项基本原则，扩大试点的主要内容、有关政策以及组织领导工作。建立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十项基本原则是：为城镇全体劳动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国家、单位和职工三方合理负担医疗费用；职工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待遇要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适当挂钩；要有利于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建立对医患双方的制约机制，遏制浪费；逐步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公费、劳保医疗制度要按照统一的制度和政策同步改革；实行政事分开，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实行属地原则，行政、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参加所在地的社会医疗保险，执行当地统一的缴费标准和改革方案。1994年，国务院确定在镇江、九江两个中等城市进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

9日　人民银行开展国债公开市场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以国债为工具的公开市场操作系统正式启动，当天共回购商业银行短期国债2.9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市场上买卖各种有价证券（如国债、金融债券等）的活动，是全国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间接调控中运用较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中央银行通过买入或卖出有价证券，向金融市场投放或收回资金，可以使商业银行的资金头寸发生变化，进而调节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实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国债公开市场操作的第一批交易对象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14家商业银行。国债公开市场操作以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为主要工具。

10日 江西铜业公司电解铜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一次注册成功

我国最大的铜工业基地江西铜业公司的电解铜在世界最具权威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一次注册成功，标志着中国电解铜质量已达到世界级水平。这是我国铜工业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江西钢业公司经过17年的建设、生产和发展，已成为采选冶加配套，科工技贸一体的特大型联合企业，所属贵溪冶炼厂是国家"六五"期间22个成套引进项目之一，1985年底建成投产，1995年电解铜产量已达11万吨。

5 月

1日 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存贷款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即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平均降低0.98个百分点，并取消华侨人民储蓄存款利率种类，合并到相应期限档次的人民币储蓄利率中。贷款利率平均降低0.75个百分点。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也作相应调整。同时，缩小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各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市信用社（含城市合作银行）为10%，农村信用社为40%。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仍为10%不变。此外，降低贷款罚息水平，金融机构对逾期贷款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即贷款逾期后按此利率计收利息，而不是在原贷款利率上再加此利率，下同）。

这次降息是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降息。1993年5月和7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幅度攀高的情况，两次提高了存、贷款利率。1995年1月和7月，又两次提高了贷款利率。这几次利率调整，与1994年以来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相配合，对于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通货膨胀得到进一步抑制，市场物价明显回落。从1995年10月份开始，到1996年3月，零售物价上涨幅度已连续半年低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1996年一季度物价涨幅为7.7%，比一年期存款利率低3.28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适当降低存、贷款利率，有利于减轻借款企业的利息负担。这次利率调整，既维护了存款人的实际利益，又注意减轻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利息负担，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3日 国务院批准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免征增值税

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资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对部分农业生产资料给予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按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从1996年元月1日起至1997年底止可享受免征增值税税收优惠的农资产品有：饲料，农膜，化肥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碳酸氢铵、普通过磷酸钙、钙镁磷肥、复混肥，原生产碳酸氢铵、普通过磷酸钙、钙镁磷肥产品的小化肥生产企业改产生产销售的尿素、磷铵和硫磷铵，农药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敌敌畏、氧乐果、辛硫磷、甲铵磷、杀虫双、丁草胺、敌百虫、对硫磷，以及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和农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同时还决定，化肥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钾肥、重钙，以及农药生产

企业生产销售的久效磷、井岗霉素、多菌灵、水胺硫磷、灭多威、五氯酚钠、氰戊菊酯、莠去津、甲基硫菌灵、克百威、异丙威、棉铃宝、甲氰菊酯、三氯杀螨醇、甲多丹、灭铃皇及乙草胺等，从1996年4月起至1997年底止也可享受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4日　江泽民谈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从4月27日到5月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考察。5月3日和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四川、河北、辽宁、山东、上海的八家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市领导同志关于搞好国有企业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目前的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就要触及旧体制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15日　统计法修改发布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共8章53条，包括总则、统计调查计划和统计制度、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法律责任及附则。该法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活动的准则，对于实行和坚持依法统计、推进统计工作的法制化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次修改《统计法》的宗旨是制止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行为，保障统计数据、信息法制化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次修改《统计法》的宗旨是制止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行为，保障统计数据、信息的真实可靠；其次，《统计法》是维护统计调查对象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规定了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在统计调查中知悉的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属于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非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再次，《统计法》是推进统计改革的有力保证，它对统计的基本职能、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统计信息自动化建设以及民间统计调查管理等方面的规定，体现了把改革决策、发展决策与立法决策结合起来的立法精神。新法比较突出的是增加了有关保证统计数据质量，规范统计活动，惩治统计违法行为的条款。针对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领导人“以数谋私”、“以权扰数”，造成统计严重失实的情况，《统计法》规定了抑制领导人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的措施；规定了保护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措施；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主体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水污染防治法修改发布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本法共7章62条。包括总则、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止地表水污染、防止地下水污染、法律责任及附则。关于生活饮用水的保护，法律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划定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威胁供水安全等紧急情况下，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包括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法律还规定：国家对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落后设备实行淘

汰制度；禁止新建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化学制纸浆、印染、染料、制革、电镀、炼油、农药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除按照国家规定征收两倍以上的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其停业或者关闭等。

科技成果转化法发布实施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共6章37条。包括总则、组织实施、保障措施、技术权益、法律责任及附则。自10月1日起施行。这部科技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步入了法制轨道，将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措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包括国家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政策、金融信贷支持以及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或者风险基金等等。

国家计委等对借用中长期国外贷款实行全口径管理

国家计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借用中长期国外贷款实行总量控制下的全口径管理的范围和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是我国在利用外资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借用中长期国外贷款实行全口径管理的范围是：我国境内机构从国际金融市场（含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筹措一年期以上，并以外国货币承担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对外借贷融资，其贷款规模均需纳入国家借用中长期国外贷款计划。在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统一指导下，根据不同的借用方式和偿还责任，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指导性计划管理。

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范围是：借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双边政府贷款、国际商业贷款中的外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企业、个人贷款和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贷款，出口信贷、延期付款、现汇偿还的补偿贸易、国际融资租赁（不含飞机租赁）、发行境外债券、海外在境内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和中期票据等股票以外的有价证券等方式的对外借款。其贷款规模纳入国家中长期和年度借用国外贷款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借用国外贷款规模如有突破，须报请国务院批准。为保持国家借用国外贷款政策的连续性，对上述范围的借用国外贷款管理，仍按照国家计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颁布的有关文件精神执行。

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的范围是：国际飞机融资租赁、可转股债券、项目融资和中方机构担保项下外商投资企业境外借款，以及进行利率、币种、期限调整的债务重组等对外筹融资。对上述方式的融资实行总量控制下的指导性计划管理。筹融资规模同样要纳入国家中长期和年度借用国外贷款计划，未经国家计委批准不得突破。

6　月

3日　全国企业调查队在北京成立

由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调查队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实施统计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全国企业调查队题词："科学、准确、高效、灵活"。全国企业调查队共配备编制7192人，在国家——省——有代表性的中心城市三级设立

相应机构。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它的主要任务有五项：一是负责对遍布全国城乡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二是开展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发展市场体系密切相关的快速专项调查和跟踪监测调查；三是进行企事业单位的统计登记工作，建立和管理企事业单位名录库；四是开展分析研究，特别是与企业和市场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决策及微观经济管理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五是承接社会各界委托的与企业和市场有关的调查、咨询和研究项目。

4日　江泽民谈农业发展也要靠两个转变

江泽民在河南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发表题为《加强农业基础，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讲话，讲话指出，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农业也不例外，也要狠抓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江泽民提出，在农村经营体制、农村市场体系、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这几个层次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国务院发布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198号令发布《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共6章45条，包括总则、规划和建设、养护和维修、路政管理、罚则及附则，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八五"期间是我国城市道路设施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重建设、轻管理"却使城市道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人为地加剧了交通状况的恶化。城市道路存在着失养失修、占路经营、"拉锁马路"等等问题。《条例》的施行，对解决城市道路现有种种问题非常重要。

9日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我国1996年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旨在保障城市居民最基本的生活。1993年6月，上海市在我国率先实施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接着，厦门、青岛、福州、大连、无锡、广州等市也陆续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目前为止，全国有100多个城市已经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这项制度。

14日　国家计秀发布实施国家重点建设填目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工作质量和按期竣工，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秀发布《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办法》共26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如下：1.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确定，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实行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留有余地、防止资金分散、保证投资落实和资金供应的原则。2.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并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公布。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督。3. 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和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计划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工期，安排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在安排年度投资计划时，应当预留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特殊需要。4.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建设项目法人负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筹划、筹资、建设、生产经营、偿还债务和资产的保值增值，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资金、建设工期、工程质量、生产安全等进行严格管理。5. 根据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和合同负有拨付建设资金责任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银行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项目的建设进度，保证拨付建设资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设备储备资金，各有关银行和部门应当优先安排；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有关的协调工作，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电力、交通。邮电、供水、供热等单位，应当优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施工和生产用电、物资运输和用水、用热等方面的需要；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优先供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6.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设备采购，除按照规定经批准可以议标、邀请招标的外，由建设项目法人依法公开进行招标，投标单位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甲级（一级）资格（资质）。中标单位未经建设项目法人的同意，不得将合同转包或者分包。7. 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直接配套的项目，应当按照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同步进行建设。为配套的项目提供建设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应当保证按照项目的建设进度拨付建设资金。8.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并经过试运营，应当由建设项目法人及时组织设计、施工等单位进行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的，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的，经过运营，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项目后评价。9.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资金以及设备储备资金，除法律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外，不得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收取费用。10. 未按照规定拨付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资金的，应当承当相应的违约责任，并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对有关责任人要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地方投资的部分连续两年未按照规定拨付的，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有权停止审批该地方下一年度的新开工项目。

18 日　**国家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在京正式成立**

经国务院批准，由电力部负责组建的国家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在京正式成立。李鹏总理题词：加强电网建设，促进电力发展。邹家华副总理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邹家华说，国家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是改革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诞生，应该有一套全新的工作思路。要充分发挥“统筹”的作用：统筹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和全国联网工程建设，统筹近期建设和远期发展，统筹和协调有关电网、省电力公司筹集电网建设资金，统筹安排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各种条件，统筹兼顾所建的国家电网中向有关省区送电的各种关系，统筹有关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新成立的国家电网建设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董事会，由电力部行使股东权，由电力部管理。该公司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和经济实体，

注册资本为25亿元人民币。

20日　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的公告》，并修订颁布了新的《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在全国范围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是我国货币管理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标志。1994年我国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汇率并轨，建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对中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同时，为了保持对外商投资企业政策的连续性，继续保留了外汇调剂中心专门为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外汇买卖。两年多来，随着外汇体制改革成果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外汇新体制日益显示其优越性，各界对外汇新体制的信心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提出要求，希望能到银行办理结售汇。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保留外汇调剂中心的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这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消除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主要汇兑限制，是向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迈进的一大步．这对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和经营环境，推动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藏首家图书馆在拉萨正式开馆

西藏一座现代化图书馆在拉萨正式开馆，结束了西藏自治区无公共图书馆的历史。这座多功能的大型公共图书馆由国家投资1800多万元，于1991年动工兴建，1995年5月竣工交付使用，系“八五”期间西藏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

28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贷款通则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全面的信贷管理的行政规章，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票据法》等有关法律，在总结国内外贷款管理有效办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其内容涉及了贷款管理的方方面面，共分12章80条，自8月1日开始实施。这次《贷款通则》公布前，已在全国金融系统试行了一年。

《贷款通则》对贷款管理突出了“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还对防范贷款风险做了许多特别规定。这些规定包括：金融机构吸收异地存款和发放异地贷款必须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备案；信贷资金不得用于财政支出；除经国务院批准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豁免贷款，不得擅自决定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

《贷款通则》对信贷机构的市场准人做了明确规定。经营贷款的机构必须是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金融机构。除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农村基金会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等金融业务。

《贷款通则》第一次提出建立主办银行制度。根据《贷款通则》的规定，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制定了主办银行制度的暂行管理办法，并开始在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行。主办银行不包企业贷款，但要对企业合理的大部分贷款优先安排，并为借款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询、代理等金融服务。

30日　岩滩水电站并网发电

岩滩水电站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红水河中游，是红水河梯级开发的控制性骨干工程，是广西第一座超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121万千瓦，由4台机组组成，年发电量为53亿千瓦时，总投资35.32亿元。1985年主体工程破土动工，1992年1号机组并网发电；至1995年6月，4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7　月

1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允许境内居民外汇存款汇出境外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从今天起，境内居民外汇户存款，存款人可将外汇存款汇出境外。境内居民外钞户存款则可以按以下规定汇出境外：对持批准双程出入境或单程出境签证护照离境的个人，允许汇出或携出；购买药品、仪器、书刊者凭信件或者发票汇出外汇，自费留学的报名费、学费、生活费可凭学校通知书汇出外汇；如存款人在境外的直系亲属发生特殊情况（重病、死亡、意外灾难）可凭境外公证部门的有效证明，或者我驻外使、领馆的证明，或者病人所在地（单位）的申请报告或者医院出具的处方汇出外汇。根据规定，外钞户汇出汇款在2000美元以内的，可由存款银行按规定审核，汇出在2000美元以上、5000美元以下的，须由当地外汇管理局审核，超过5000美元的必须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其中，外汇户是指境外或港、澳、台地区汇入外汇转存款；而外钞户则是指境内居民持有的外币现钞存款。

2日　国务院要求农村治理开放“四荒”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坚持治理开发“四荒”的基本原则，遵循有关政策，实行规范化管理，并加强领导，把治理开发“四荒”和水土保持搞得更好更有成效，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通知》说，80年代以来，一些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四荒”资源（其中包括荒地、荒坡、荒沙、荒草、荒水）较多的地方，出现了以家庭承包、联户承包、集体开发、租赁、股份合作和拍卖使用权等多种方式大规模治理开发“四荒”的好势头，对于进一步解放农村的生产力，控制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肥力和土地的产出率，对于保护、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通知》指出，治理开发“四荒”应坚持四条原则，即：合理规划、治理和开发相结合、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多种方式并举。

5日　拍卖法公布施行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共5章65条。包括总则、拍卖标的、拍卖当事人、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拍卖程序、拍卖委托、拍卖公告与展示、拍卖的实施、佣金、法律责任、附则。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拍卖法》明确了国内贸易部为全国拍卖的主管部门，解决了长期以来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有利于加强政府对拍卖业的宏观管理。《拍卖法》规定，设区的市才能设立拍卖企业，为拍卖业走规模化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拍卖法》明确设立拍

卖师，使我国有了合法的拍卖师制度。为规范拍卖行为，《拍卖法》要求“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制作拍卖笔录”，并将拍卖笔录、账簿和其他有关资料妥善保管至少五年，据此可查出拍卖过程中有无“猫腻”。

6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这是国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统筹运用预算内外综合财力，更好地发挥预算外资金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整顿财经秩序、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外资金增长较快，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近几年来有的地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擅自将财政预算资金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转为预算外资金，有些部门和单位擅自设立基金或收费项目，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预算外资金不断膨胀。同时，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预算外资金的使用脱离财政管理和各级人大监督，乱支滥支现象十分严重。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国家财政资金分散和政府公共分配秩序混乱，而且加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膨胀，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为此，国务院在决定中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禁止将预算资金转移到预算外。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财政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完善对财政资金的监督检查制度。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隐瞒财政收入，将财政预算资金转为预算外资金。各部门各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将财政拨款转为有偿使用，更不得设置账外账和“小金库”。财政部门尤其不能设置“小金库”。

7日　国家计委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化肥流通体制

为了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完善化肥流通体制的文件精神，国家计委将着重抓好四个重点环节：

第一，搞好化肥总量平衡。国家计委将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好化肥的全国供求总量平衡和地区供求平衡的衔接工作，安排好化肥生产和流转计划。国家计委还要积极组织地区间的协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化肥的地区平衡，防止出现问题。

第二，抓紧落实和完善化肥储备制度。化肥具有常年生产、季节使用的特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健全化肥储备制度势在必行，有利于缓解工商矛盾，维持均衡生产，调控市场，平抑价格。

第三，加强化肥价格管理和监督、检查。根据国务院“化肥价格继续实行政府定价、分级管理的体制”的要求，化肥价格将全部纳入各级物价部门管理的范围，任何企业无权定价或变动价格。首先要管好“源头”，加强化肥的出厂价格管理，国家计委根据“保本微利”的原则合理制定17家大型企业统配化肥的出厂价格，各级物价部门也要依据价格分工管理权限，根据上述原则合理制定17家大型企业自销和超产部分化肥以及其他企业生产的化肥出厂价格。加强进口化肥的价格管理，国家计委根据现行进口化肥作价办法合理制定中央各部门进口化肥的调拨价格，各地省级物价部门参照中央进口化肥的作价办法，制定地方进口化肥的调拨价格并报国家计委备案。推行定购粮棉与

奖售化肥挂钩政策，各地省级物价部门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合理制定挂钩肥的价格，价格水平要明显低于挂钩以外化肥价格。对挂钩以外化肥要分品种以省、地区（市）、或县为单位实行综合平均零售价格，各级物价部门要加强化肥的监督、检查，定期开展化肥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价格纪律、扰乱市场价格的行为要以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公开曝光并严肃查处。

第四，清理整顿化肥流通中的各项收费。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计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化肥流通各环节包括进口环节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化肥流通中的各种收费进行认真清理，并重新从严审核。

15 日 国家计委等对解决供销社政策性亏损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税务总局、全国供销总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转发了《国务院关于研究解决供销社政策性亏损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中对解决供销社系统政策性亏损提出了四项原则和六条具体处理意见。

1995 年 9 月由这八部委组成专题组，对供销社系统因承担政府委托任务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进行了专题研究，重点对中央政策形成的亏损进行了调查核实。专题组以内贸部 1993 年对供销社系统历年政策性亏损全面核查的统计结果为依据，核定中央政策性亏损金额为 46.67 亿元，地方政策性亏损金额为 130.83 亿元。专题组对解决供销社系统政策性亏损提出四项原则：一是供销社不负担政策性亏损，保障其合法权益；二是哪一级政府决定的，由哪一级政府负责解决；三是在确定性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政策性亏损形成的历史原因，由财政、银行、税务、企业共同努力，多渠道解决；四是分项目根据财力可能分步逐年解决。根据上述原则，专题组就供销社系统中央政策性亏损提出了六条处理意见，主要内容是：对 50 年代以来农民陈欠的预购定金、1984 年和 1986 年赊销纯棉布及絮棉损失、1981 年至 1984 年部分商品削价损失、1993 年棉花贴息贷款未按期收回本息挂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纪要》提出，对供销社发生的地方政策性亏损部分，由地方各级政府研究解决办法，并限期清理。

宝中铁路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我国“八五”重点建设工程——宝鸡至中卫电气化铁路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宝中铁路由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设计，全长 498.19 公里，纵贯陕、甘、宁三省（区）的 14 个市县，总投资 55.2 亿元。它南连陇海铁路，北接包兰铁路，经宝鸡与宝成铁路相通，是西北与内地的一条新通道，并且是欧亚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日—17 日 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举行

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国务院先后于 1973 年、1983 年和 1989 年召开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部署跨世纪的环境保护工作，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

的关于环境保护的任务，即：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0年，基本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19日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推动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关于进一步推动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的意见》。《意见》共有五条：1.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方针。2. 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3. 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思想和内容纳入各地区、各部门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4. 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5. 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

22日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成立

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建而成的我国第一家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业进入集团化分业经营的新阶段，有利于促进保险市场的发育和形成，是中国保险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保集团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监督和管理，其财务管理由财政部负责。中保集团下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现有的海外保险机构作为独立的实体直属中保集团，继续经营海外保险业务。中保集团及3个专业公司均为企业法人。中保集团以控股公司的形式对其子公司投资并实施领导、管理和监督。

24日　国务院同意建立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目标责任制

国务院同意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批转了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目标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意见》提出，近几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企业扭亏增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进一步推动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目标责任制。一、制订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目标，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二、确定考核范围和考核指标，定期公布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三、建立考核制度，促进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四、本意见原则上适用于国有非工业企业。

30日　国家经贸委等对国有企业兼并破产作出进一步规定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通知，就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中若干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定。通知要求，对有挽救希望的濒临破产企业，应充分尊重主要债权人意见，尽可能采取兼并、合并、代管、分立等方式予以挽救。其中实行分立的，须经三分之二以上债权额的债权人同意后，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依照商定的比例承担原企业债务，并订立分立协议，否则分立无效。有关城市人民政府在制定企业破产预案和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时，必须有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的代表参加。破产清算组的组成人员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行的代表。通知规定，在实施企业破产中，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的，其转让所得首先用于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对剩余部分抵押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处置土地使用权所得不足以安置职工的，不足部

分依次从处置无抵押财产、其他抵押财产所得中拨付。关于企业兼并，通知要求严禁“拉郎配”。凡已清产核资的企业进行兼并，不再进行资产评估。兼并中的土地增值税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免收。不改变土地使用用途的，土地出让金原则上暂不征收。通知说，为做好呆账、坏账冲销工作，各级银行和财政要有专人负责，并尽量简化冲销手续。国家对破产企业呆账核销实行总量控制，由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银行共同掌握。

8　月

1日　国家重点治污湖泊滇池开始置换水体

国家重点治污湖泊滇池开始置换水体，标志着抢救这颗高原明珠的环保工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滇池面积300余平方公里，是我国著名的高原淡水湖。近20年来，滇池周围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目前每年排入滇池的生活废水、工业废水达1.5亿吨左右。在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上，滇池与江苏太湖、安徽巢湖一同被列为全国三大重点污染治理湖泊。为根治滇池污染，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准备筹措30亿元巨款，投入治理工程，以期减缓滇池污染，并在2010年前，使滇池流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

10日　国务院批准取消地方限制经济型轿车使用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取消地方限制经济型轿车使用的意见》。国家计委提出，汽车工业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今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务院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已经明确，经核型轿车是汽车工业发展的重点，尤其是小排量微型轿车具有油耗低、停车占地少、价格便宜等特点，更适合当前购买力较低的市场需求。各类汽车（包括小轿车）都应允许面向国内市场，不应人为规定在某一地方只准某些型号汽车行驶，而不允许另一些型号汽车行驶。为了维护全国统一的汽车市场，促进我国汽车工业的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对取消地方限制经济型轿车使用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各地要认真贯彻执行《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不得自行制定对车型使用进行限制以及对民用汽车的保有和使用实行总量控制的政策，已制定出台的限制经济型轿车使用的措施和对民用汽车保有及使用实行总量控制的规定要立即取消。

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原则上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经营者对经国家许可生产销售的营运车辆的选择。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情况和消费者的不同需要，确定出租汽车不同车型的合理比例，该比例方案要按照出租汽车现行管理体制报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其他城市要经省、自治区有关部门审查同意。车辆的选择应符合机械部、公安部颁布的《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以及建设部颁布的《出租汽车运行技术条件》的要求。

三、各城市要抓紧制定城市交通发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城市路网、停车场、公共交通以及交通管理设施的建设。要依法从严管理道路交通，提高服务水平，充分发挥路网系统的通行能力。对确因城市路网压力过大，需对汽车的社会保有量和交通

流量进行暂时控制的城市；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人民政府，应将实施方案报公安部会同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审批；地级市应报省公安部门会同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1日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启动

国家经贸委宣布正式启动技术创新工程，把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获得商业利益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整体推进，全面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项工程是国家经贸委在“八五”期间开始实施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和扶持大型企业建立技术中心等工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企业现状和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组织实施的。国家将紧密围绕1000户重点国有企业，在其中的300户企业里率先建立技术中心，首批选择20户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试点；组织实施500个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开发5000项重点新产品。通过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企业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技术创新工程的实施周期为15年。最终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技术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

22日　国务院决定改革农村金融体制

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围绕“九五”计划和2010年农业发展远景目标，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贸、工、农综合经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改革的重点是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进一步增强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导作用。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村信用社县联社的建设；强化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和管理；中国农业银行不再领导管理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重新规范农村信用社；改革中要注意维护农村信用社的合法权益，国家要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

二、办好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农村合作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要适应新的变化，努力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导作用，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中国农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机制。对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国家将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要根据商业化经营的原则，适当调整县以下分支机构。

在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已经商业化经营的农村信用社，经整顿后可合并组建成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性质是股份制的商业银行，与城市合作银行一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要求设立。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最少要有5000万元

实收资本金。农村合作银行主要为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农村其他各类企业服务，其固定资产贷款不得超过贷款总额的30%。

三、增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加强农产品收购资金管理。按照精简、高效原则适当增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基本实现业务自营。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省级分行设立营业部，在地（市）、县（市）设立分行、支行；地（市）、县（市）同在一地的，只设一个机构；业务量小的县（市）可不设分支机构，其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代理。

四、逐步建立各类农业保险机构。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农业比重较大的县建立农村保险合作社，主要经营种养业保险。在发展农村合作保险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成立国家和地方农业保险公司，主要为农村保险合作社办理分保和再保险业务。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原有农业保险机构的基础上组建。

五、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凡农村合作基金会实际上已经营金融业务，存、贷款业务量比较大的，经整顿后可并人现有的农村信用社，也可另设农村信用社。不愿并人现有农村信用社或另设农村信用社的，必须立即停止以招股名义吸收存款，停止办理贷款业务。中国人民银行要会同农业部尽快制定《农村合作基金会管理规定》，报国务院审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债权债务关系，要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妥善处理，以保护农民的利益。

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为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创造条件，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内地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等单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审批权限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内地省、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以及中国科学院、船舶工业总公司、兵器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核工业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通知》规定，凡符合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方投资和建设、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外汇需求可自行平衡解决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性项目，上述有关地方、部门及单位的审批权限，由现行项目总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下提高到3000万美元以下；项目批准后，需根据项目建设性质分别报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备案，企业合同、章程报外经贸部备案。

23日　国务院决定试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从1996年开始，对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进行建设。投资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对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息和债务；投资者可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经营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目的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有效地控制

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按照国务院的决定，投资项目资本金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比例不得超过投资项目资本金总额的20%，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投资者以货币方式认缴的资本金，其资本来源有：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内资金、国家批准的各种专项建设基金、“拨改贷”和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回收的本息、土地批租收人、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地方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的各种规费及其他预算外资金；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及企业法人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股票上市收益资金等）、企业折旧资金以及投资者按照国家规定从资金市场上筹措的资金；社会个人合法所有的资金；国家规定的其他可以用作投资项目资本金的资金。《通知》规定，投资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经济效益等因素确定，其中，交通运输、煤油项目，资本金比例为35%及以上；钢铁、邮电、化肥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5%及以上；电力、机电、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轻工、纺织、商贸及其他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及以上。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具体比例，由项目审批单位根据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银行贷款意愿和评估意见等情况，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时核定。经国务院批准，对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可以适当降低资本金比例。此外，对某些投资回报率稳定、收益可靠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投资项目，以及经济效益好的竞争性投资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试行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或组建股份制公司发行股票方式筹措资本金。《通知》说，为扶持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主要通过在投资项目资本金中适当增加国家投资的比重，在信贷资金中适当增加政策性贷款比重以及适当延长政策性贷款的还款期等措施，增强其投融资能力。《通知》规定，投资项目的资本金一次认缴，并根据批准的建设进度按比例逐年到位。试行资本金制度的投资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要就资本金筹措情况作出详细说明。主要使用商业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投资者应将资本金按年应到位数量存人其主要贷款银行；主要使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应将资本金存人国家开发银行指定的银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只能用于项目建设，不得挪作他用，更不得抽回。

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降低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利率

为了适应物价下降的变化，进一步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再次降低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水平平均降低 1.5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水平平均降低 1.2 个百分点。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也作适当调整。

26 日　广东沙角发电厂正式投产

沙角发电厂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沙角地区，建有 A 厂、B 厂和 C 厂 3 个大型燃煤火电厂，共拥有 10 台大型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388 万千瓦。沙角 C 电厂由 3 台单机容量为 66 万千瓦燃煤机组组成，总装机容量 198 万千瓦，总投资达 19 亿美元，于 1992 年 5 月 27 日开工建成，1996 年 8 月 26 日正式投产，投产后每年至少可供电 108 亿千瓦时。

27日　国家计委等决定选择第二批大型企业集团参加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体改委联合发出通知，将选择第二批大型企业集团参加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通知指出，选择第二批大型企业集团参加试点，立足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构造母子公司体制，发挥群体优势，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选择的范围是：适于规模经营和集团化发展，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适当考虑具备条件的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市场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集团。第二批试点企业集团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已经国家或省级有关部门批准成立，并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的企业集团；二是集团母子公司和全资、控股公司的资产规模、销售额和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三是母公司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发展前景看好，经营管理制度健全。四是母公司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不是行政性公司或垄断性公司。

29日　矿产资源法修改发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届人大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矿产资源法》共7章53条，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从法律制度上强化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这有利于消除矿产资源“谁发现就归谁所有”、“在哪里发现就归哪里所有”的错误观念及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修正的矿产资源法还肯定了探矿权、采矿权的财产属性，确立了“两权”有偿取得依法转让制度，对探矿权和采矿权进人市场进行转让也作了原则规定，加大了矿业体制的改革力度，标志着我国矿业经济活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重要一步。

煤炭法公布施行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共7章80条。包括总则、煤炭生产开发规划与煤矿建设、煤炭生产与煤矿安全、煤炭经营、煤矿矿区保护、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及附则。自1996年12月1日起施行。《煤炭法》确立的煤炭开发规划、办矿审批、煤炭生产许可证、煤矿安全管理、煤炭经营管理、煤矿矿区保护、矿工特殊保护等九项制度涵盖了煤炭开发利用的各个方面，是《煤炭法》的主要内容和精髓所在。《煤炭法》将有利于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活动，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

国务院批准建造芜湖长江大桥

芜湖长江大桥是国家“九五”重点交通建设项目，20世纪国家标志性工程，按设计桥型为斜索加劲钢桁梁斜拉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部工程包括公路铁路合用大桥主体工程、铁路相关工程和公路引线工程三部分。其中铁路10497米、公路5647米，正桥2218米，大桥主跨312米，为目前国内公铁两用大桥跨径之最。其工程量相当于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的总和。

31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

意见》，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组织实施。资源综合利用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技术经济政策，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项长远的战略方针。《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包括七个方面：资源综合利用的范围；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企业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防止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采取措施，支持综合利用电厂生产电力和热力；严格管理，搞好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加快立法步伐，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等。它体现了国家对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实行鼓励和扶持的政策，如国家在税收、投资、财政、价格等方面给予长期的扶持；体现了国家加强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宏观管理的思想；充实和完善了《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对资源综合利用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方针、原则、内涵等重新进行了界定。

9 月

1 日 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一项伟大工程——京九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京九铁路纵贯我国南北、连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九省市，全长 2536 公里，1993 年初全面开工，1995 年 11 月 16 日全线铺通。京九铁路的开通运营，对缓解南北运输紧张状况，改变铁路“瓶颈”状况；完成路网布局，充分发挥运输综合效益；维护港澳地区稳定和繁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适应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和加快沿线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9 日 中国人民银行加入国际清算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 1930 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管理和国际金融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人民银行加入国际清算银行，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日益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助于我国及时了解国际金融界主要决策者的政策取向，更好地把握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动态，扩大我金融监管人员与国际银行监管人员之间的密切合作，促进我国金融业监管水平的提高。

11 日 国家科委提出进一步推动科技扶贫工作意见

国家科委《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扶贫工作的意见》出台。科技扶贫是我国政府开发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以及广大科技人员的艰苦奋斗，科技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国扶贫事业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当前，扶贫事业已进入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保如期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人口温饱问题的宏伟战略目标，必须进一步动员全国科技界和广大科技人员积极行动起来，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使扶贫开发工作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为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如下意见：一、坚决贯彻依靠科技振兴贫困地

区经济的指导思想；二、大力促进贫困地区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三、振兴贫困地区传统支柱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四、保障贫困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五、发展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六、加强科学技术的宣传普及工作，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科技文化素质；七、激励科技人员投身扶贫攻坚战役；八、组织区际间科技协作和对口支持；九、加大科技扶贫的资金投入；十、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18 日　国家计委等发布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办法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办法》。该办法是贯彻保护耕地基本国策，加强土地资源宏观管理，调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规章。1987 年 10 月 15 日颁布的《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制定的《办法》第一次明确规定占用耕地的指令性指标，将作为考评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人落实保护耕地目标责任制的主要依据。

23 日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坚决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江泽民总书记就五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一、进一步统一思想，下定决心，坚决如期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二、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三、更广泛更深入地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四、依靠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地苦干实干。五、进一步加强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层层实行责任制。李鹏总理在会上就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尽快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一、下定决心，如期实现扶贫攻坚目标。二、要把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作为贫困地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三、中央和地方都要增加扶贫投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脱贫办法。李鹏总理还就扶贫攻坚要明确对待，扶到村、扶到户；扶贫开发要与发展集体经济相结合；国家建设项目要向贫困地区倾斜，支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依靠科技扶贫，实行计划生育，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实行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改善财政状况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李鹏总理最后强调指出，今后凡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国家温饱标准的县，都要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这要形成一个制度。对摘帽的贫困县，要大张旗鼓地表彰，现有的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继续保持不变。要形成一个脱贫光荣、大家争先摘掉贫困帽子的激励机制。

10　月

3 日　国务院决定“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国务院作出《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科技界经过十年多的探索和成功实践，开创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大发展的新局面，使原来单一、封闭的计划管理体制被打破，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状况有所改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科技运行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多数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走上了按市场机制运行、面向经济建设、自主发展的道

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科技体制总体布局还有待完善，科技投入总量仍显不足，科技资源配置不够合理，科研机构设置重复、力量分散、专业和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很好解决，科技整体优势和科技储备尚需加强。"九五"期间是我国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关键时期。为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技工作要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做出贡献。《决定》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主要目标。二、主要任务。三、主要措施。四、资金保障。五、深化国防科技体制改革。"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全面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进一步落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和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方针。坚持在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发展高技术和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上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原则，加强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活动，增加科技储备，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重大、综合、关键、迫切的技术问题，尽快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多数研究开发机构直接进入市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提高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科技水平。

9日　交通部发布公路经营权有偿转让管理办法

为加快公路建设步伐，开辟公路建设资金渠道，规范公路经营权有偿转让行为，保护转、受让双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交通部发布《公路经营权有偿转让管理办法》，并于11月1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转让公路经营权中的车辆通行费收费权，应坚持以投资预测回收期加上合理年限盈利期（合理年限盈利期一般不得超过投资预测回收期的50%）为基准的原则，最多不得超过30年；转让公路经营权中的服务设施经营权应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

12日　国务院决定1996年继续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96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大检查从1996年11月份开始，1997年春节结束。主要检查1996年发生的各种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以及1995年发生但未纠正的问题。对某些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也可追溯到以前年度。这次大检查的重点是：（一）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的税源大户及有外贸经营自主权的单位；（二）财会基础工作薄弱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兴办的第三产业；（三）政府部门兴办的各类公司及其他经济实体；（四）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涨价、乱收费、乱罚款的部门；（五）规模较大、管理混乱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六）过去三年大检查从未检查过的企业和有群众举报单位；（七）各地区、各部门认为需要检查的其他企业和单位。检查内容主要是：（一）擅自越权减税。免税、退税、自行改变税率或税种等违法违纪行为；（二）擅自把应交中央财政的税款和其他收入，缴入地方财政的混库行为；（三）采取非法印制、伪造、虚开、使用假发票、真

票假开或倒卖发票等手段、偷骗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工商税收的行为；（四）乱挤乱摊成本、随意核销费用、擅自冲减资本金、截留国家收入，偷逃所得税的行为；（五）截留、转移国家和单位收入，私存或私设“小金库”的行为；（六）违反国家规定，随意支出财政资金，或采取非法手段将预算内资金转到预算外。将国有资产转为集体或个人所有的行为；（七）居民生活必需品、公用事业和垄断行业价格执行中的乱涨价行为，以及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提价的行为；（八）中小学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收费中，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收费行为；（九）各地区、各部门认为需检查的其他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今后5年扶贫工作的基本方针、任务，强调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达到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

24日　林业部和广东省联合建设30万吨的木浆工程项目

林业部和广东省联合在湛江建设迄今我国规模最大、年生产能力为30万吨的木浆工程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将为这个项目投资60亿元人民币，它的建设将改变我国低价出口木片、高价进口木浆纸的历史，我国林业产业和造纸工业由此实现历史性突破。

我国造纸工业长期处于落后局面，造纸原料以草浆为主，每年仅产木浆208万吨。木浆比重过低，造成我国以木浆为原料的新闻纸、包装纸、高档印刷纸等长期依赖进口。仅1995年，我国进口木浆、纸和纸板就用去26.8亿美元。而木浆加工能力过低，使现有木材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只能大量低价出口木片。为此，国务院决定投资建设木浆生产项目，并确定由林业部组织实施湛江30万吨木浆工程。

29日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发布施行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共8章64条。包括总则、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法律责任、附则。自1997年3月1日起施行。

乡镇企业法发布施行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共43条，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乡镇企业法》明确，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公布施行，确立了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法律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将党中央、国务院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稳定下来，明确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基本方针、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明晰了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理顺了乡镇企业的管理体制。《乡镇企业法》还提出了国家促进和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很多具体措施，对乡镇企业多年来一些政策措施和成功经验也用法律的形式进行肯定。《乡镇企业法》提出，侵犯乡镇企业合法权益以及乡镇企业不履行义务、违反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这些措施，必将有力地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法》的公布施行，标志着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保证，标志着乡镇企

业的发展及其管理步人了法制轨道。

11　月

8 日　首钢组建企业集团正式挂牌

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冶金工业部批准，首钢组建企业集团正式挂牌。首钢集团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首钢总公司为核心企业，由从事钢铁、机械、电子、建筑、航运和金融等多种行业的企业组建而成的多法人经济联合体。其成员有 28 家，分布在全国 14 个省市区。首钢集团的组建，是首钢又一次历史性转变。既能发挥首钢集团的总体优势，又有利于各分公司、子公司进一步搞活。

11 日　我国第一个国家批准的 BOT 试点项目协议草签

我国第一个国家批准的 BOT（建设、运营、移交）试点项目——广西来宾电厂 B 厂 BOT 项目特许权协议，在京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和法国电力—通用电气阿尔斯通联合体草签。这标志着我国探索利用 BOT 方式吸引外资发展基础设施的路子取得了重大突破。该项目总投资约 6 亿美元。根据双方草签的协议，来宾电厂 B 厂的特许期为自特许权协议生效后 18 年。特许期满时，由法国电力联合体投资建设、运营的电厂将无偿移交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16 日　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作出规定

为加强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防止政策性收购资金流失，保证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业务顺利进行，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联合颁布了《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规定》，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及违反规定给予的处罚等均作了具体规定。《规定》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必须根据规定和预算，将国家储备粮棉油补贴、地方储备粮油补贴、定购粮价外补贴等粮棉油政策性补贴款足额拨补到位，不得欠拨，同时不得截留上级财政部门拨给的粮棉油政策性补贴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当会同财政和粮棉油业务主管部门提前测算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的需求，按收购进度和库存值，分配和调度收购贷款规模和资金。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企业要及时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财政部门提供粮棉油收购、调销、库存的数量、价格和总值以及银行存、贷款等有关数据，同时要将粮棉油调销回笼款及时归位。《规定》指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代理行应当会同财政部门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并对专户资金实施监督。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代理行不得挤占挪用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用于发放其他贷款。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企业只能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或其代理行一家开立账户，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用于粮棉油政策性收购及其相关费用以外的支出。《规定》对违反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规定的行为，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19 日　江泽民主席提出经济合作应处理好五个问题

江泽民主席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讲话提出，经济合作应妥善处理以下五个问题：一、要把世界和亚太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开展合作的根本目标。二、要为发展中成员经济技术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三、要坚持自主自愿

原则。四、要尊重差别，恰当把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合理速度。五、要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并重的方针。江泽民表示，中国将从1996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将不低于30%。这必将对推动区域合作、实现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21日—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总结1996年经济工作，部署1997年经济工作。会议确定，1997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落实十四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物价上涨幅度，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开拓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会议强调指出，1997年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做到稳中求进。务必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动改革和建设更好地发展。为此，经济工作要做到四个结合：一是把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二是把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更好地结合起来。三是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四是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会议指出，1997年要抓住宏观经济环境比较有利的时机，把经济工作的重点，切实放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24日　国务院重申严禁非法金融活动，维护经济秩序稳定

国务院就浙江省兰溪市支行非法成立金融机构，发生储户挤兑事件问题发出通报，重申严禁非法金融活动。三家非法成立的金融机构已被取缔。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查处了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擅自设立“工作互助基金”出现支付困难的问题，有关人员将受到严肃处理。1994年6月至1995年3月，兰溪市体改委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批准设立了“兰溪市兰江民融资金服务部”、“兰溪市兰嘉民融资金服务部”和“兰溪市职工融资服务社”三家融资机构，兰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这三家融资机构颁发了营业执照，并擅自将其业务范围核定为“人民币存贷业务”。三家融资机构通过比国家法定存款利率高50%、贷款利率高90%的方式扩张业务规模。截至1996年3月底，三家非法金融机构贷款余额9700多万元，贷款逾期率达20%以上，其中职工融资服务社贷款逾期率高达50%以上。由于违章经营，管理混乱，贷款出现严重风险，支付发生困难。从1996年5月20日开始，这三家融资机构先后出现储户挤兑，直至6月上旬才基本平息。为严肃法纪，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国务院决定，对兰溪市非法成立金融机构给予通报批评，并责成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对在“兰溪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兰溪市体改委、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兰溪市支行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国务院同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地方和部门都不得擅自批准设立金融机构。各级人民银行要严格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非法设立的金融机构或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要及时予以取缔和查处；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秩序稳定、涉及到重大金融风险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对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另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未经批准，于 1989 年擅自设立了“省直单位互助基金会”，通过吸纳基层工会和职工个人资金，再以抵押、担保等方式贷出，变相从事金融业务。1992 年 6 月该基金会改称“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互助基金”，扩大了基金规模，提高了入资者的利率，把筹集的基金委托银行贷出，或以 24%的年利率贷给企业和个人，继续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截至 1996 年 8 月底，该基金债务总计已达 5 亿元。当该基金管委会有关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逮捕后，入资单位和个人纷纷要求立即清退本金，在人民银行和四川省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后，才基本解脱了到期存款本息支付困难的局面。随后，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四川省人民政府组织力量对“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互助基金”的账目进行了清理，并对批准设立该基金从事金融业务的责任人员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2　月

1 日　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我国将取消对企业商品进口和劳务支付、归还外债利息和外商投资收益汇出等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的所有限制，并且不实行歧视性的货币安排或多重货币制度，从而为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为外商来华投资和对华贸易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在取消对经常项目的外汇管制后，对资本项目外汇收支仍将有所限制，人民币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兑换货币，居民在国内还不能自由买卖外汇和自由对外支付。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我国除非发生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否则不再重新引入经常项目汇兑限制措施，这是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表现。

11 日　国家计委要求严格控制扩大原油加工能力

国家计委发出《国家计委关于严格控制扩大原油加工能力的通知》，强调“九五”期间我国炼油工业要走以改造、扩建现有炼油厂为主的发展道路。严格控制新炼油厂的建设，严禁建设小炼油装置。除个别特殊项目和一些已原则同意的中外合资企业及外商独资项目外，2000 年前不再布点建设新的原油加工企业。

13 日　北京乙烯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北京乙烯工程通过国家验收。这是建国以来北京市地方工业投资最大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60 亿元，于 1992 年 5 月破土动工。整个工程包括年产 15.12 万吨的乙烯裂解装置、年产 5 万吨的环氧乙烷、年产 4 万吨的 EVA 树脂装置、年产 4 万吨的 EVA 树脂装置和年产 7 万吨的丁辛醇装置，具有 80 年代末、90 年

代初国际水平。

14日　我国原油年产突破1.5亿吨

我国原油年产量达到1.5亿吨。这是继1978年以来踏上的又一个大的台阶。1965年，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我国原油年产量达到1000万吨，实现了原油的基本自给。1978年产油达到1亿吨，使我国进入世界产油大国的行列。“七五”、“八五”期间，陆上石油工业在勘探开发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实施“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原油产量连年稳中有升，海洋石油开发也逐年上升，全国原油产量终于在1996年突破1.5亿吨大关。预计全年产油可超过1.55亿吨，提前实现国家提出的2000年原油产量目标。

15日　国家计委、国务院证券委宣布1996年股票发行规模为100亿元

国家计委、国务院证券委宣布，1996年股票发行规模为100亿元，相当于1995年的两倍。根据以往计划执行办法，1996年股票发行规模可以跨年度使用。1996年的股票发行将主要支持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中国证监会将在确定的总规模内，按照“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原则，向各地、各有关部门下达发行上市企业家数。股票发行规模的扩大，将进一步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利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和转换机制，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16日　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文章说，1996年4月以来，股票市场逐步回升，10月以后出现暴涨。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分指数涨幅达340%。这在国际证券市场上是罕见的。当前，炒股已成社会热门话题，各界人士争相入市，证券交易所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股民已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股票市场快步上升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股票市场目前的状况，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章指出，股市有涨必有落，考察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缓涨可能缓跌，暴涨必然暴跌，这是各国股市的一条共同规律。对于股市暴涨必然带来暴跌，不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不以为然，他们众口一词，说1997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投资股市，风险自负，赚钱自得，损失自担，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目前的股市已到了很不正常的状况，孕育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需要引起投资者足够的重视。这篇文章在股市中的震动很大，引起了股票指数的大幅度下跌，当天深沪两市一半左右的股票的股价下降了10%。

17日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正式交付生产运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位于广东省大亚湾麻岭角，是我国兴建的第二座核电站，也是我国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装机总容量为180万千瓦，由2台从法国和英国引进的9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组成，年发电量100—126亿度，分送广东、香港及华南地区，总投资40亿美元。核电站于

1979年冬开始可行性研究，1982年国家批准立项。1984年4月2日破土动工，1987年8月7日主体工程正式开工，1990年底各主要建筑物土建工程基本完成。1993年7月20日，1号机组反应堆堆芯达到临界状态，8月31日并网发电成功，1994年2月1日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1994年2月7日，2号机组首次以核能发电状态与广东省电网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电网并网成功，5月6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4日　全国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圆满结束

历时四年的全国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圆满结束，国有资产的"家底"基本摸清。截至1995年12月31日，全国国有资产总量已达到57106.4亿元，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递增17.9%。在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中，全国31.5万户（含金融）国有企业经营性国有资产45063.3亿元，占全国国有资产总量的78.9%；53.4万户行政事业单位（含建设、房产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12043.1亿元，占全国国有资产总量的21.1%。在全国国有资产总量中，中央企业（单位）国有资产25907.5亿元，占45.4%；地方企业（单位）国有资产31198.9亿元，占54.6%。

从统计结果看，1995年末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中，地方排序前五名的省市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分别为广东、上海、江苏、辽宁和山东；中央部门排序前五名的均为国家基础产业，分别是铁道部、电力工业部、邮电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化总公司。从经济效益统计结果看，按照净资产利润水平排序，地方排列前五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广东、云南、福建；中央排列前五名的依次是烟草总公司、外经贸部、电子工业部、纺织总会、石化总公司。按照每人平均创造利润情况排序，地方排列前五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广东，福建、浙江；中央部门排序前五名的依次是烟草总公司、石化总公司、外经贸部、电力工业部、海洋石油总公司。

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内容如下：近几年来，针对农民负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仍然是当前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有些地方问题还相当严重。中央认为，农民负担重，已成为影响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如不坚决加以解决，势必妨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影响基层政权的巩固，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务必从政治、全局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坚定不移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不懈地减轻农民负担，禁止非法负担，管理好合理负担，推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经过努力，坚决把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全面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限额之内，严禁面向农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取消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达标升级活动，杜绝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切实把不合理的农民负担减下来，并

长期稳定在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

31日　五强溪水电站工程全部并网发电

五强溪水电站位于湖南省沅水下游的沅陵县境内，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一个集发电、航运、防洪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效益工程。电站装机5台24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53.7亿千瓦时，总投资70多亿元。五强溪水电站曾于50年代开工建设，后因种种原因而停工。1986年由国家批准复工。其中1—3号机组分别于1994年12月、1995年9月1日、1995年12月24日并网发电。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795亿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550亿元，增长5.1%；第二产业增加值33148亿元，增长12.3%；第三产业增加值21097亿元，增长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569元，全社会劳动生产率9902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比上年增长8.6%和8.3%。但经济结构不合理、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仍然突出。

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28580亿元，比上年增长12.7%。其中：国有工业增长6.4%；集体工业增长17.4%；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13.1%。大中型工业增长7.9%。轻重工业生产大体同步增长。全年轻工业完成增加值11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3.1%；重工业完成增加值16642亿元，增长12.4%。主要工业产品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产量有升有降。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本适度。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660亿元，比上年增长1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12.7%）。其中，国有经济投资12359亿元，增长13.4%；集体经济投资3490亿元，增长6.1%；城乡居民个人投资3330亿元，增长30.1%；其他各种经济类型投资4481亿元，增长37%。基本建设投资8399亿元，增长13.4%，比上年回落1.6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3745亿元，增长13.5%，上升0.4个百分点；房地产建设投资3825亿元，增长21.5%，回落1.8个百分点。

国内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销售稳定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614亿元，比上年增长19.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5%。抑制通货膨胀取得显著成效，市场物价涨幅持续回落。全年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6.1%和8.3%，涨幅分别回落8.7个和8.8个百分点，较好地完成了物价调控目标，但一些商品特别是服务性项目的价格涨幅偏大。

对外贸易规模有所扩大。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8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其中：出口总额1511亿美元，增长1.5%；进口总额1388亿美元，增长5.1%。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由上年的29.5%上升到31.9%，保持了我国出口第一大类产品的地位。进口方面，国内紧缺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设备进口增加较多。

利用外资稳步发展。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5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2%。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23.5亿美元，增长12.2%。外商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项目以及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增加。

金融形势基本平稳。1996年，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监管工作加强，调控手段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存款稳定增加，贷款结构有所调整。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6859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792亿元，增长27.3%。其中；企业存款余额为22450亿元，增加5026亿元，增长29.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38521亿元，增加8805亿元，增长29.9%。各项贷款余额为6115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683亿元，增长21.2%。其中：短期贷款余额为40210亿元，增加6653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为12673亿元，增加2041亿元。年末现金流通量（M_0）为880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17亿元，增长11.6%；狭义货币（M_1）增长18.9%；广义货币（M_2）增长25.3%。

城乡居民收支稳定增长。全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生活费收入分别为4839元、4377元，比上年增长13%和1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和3.3%。省会城市（含计划单列市）职工家庭可支配收入6235元，比上年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26元，增长2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但地区间、居民间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部分省、区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一些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还比较困难。

劳动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年末全国从业人员688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900万人。其中：城镇职工14960万人，增加52万人；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2300万人，增加255万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3140万人，增加278万人；乡村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4114万人，增加589万人。到年末，全国设立各类职业介绍机构3.1万多家，介绍890万人次就业，组织390万人参加了各类就业训练。全年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帮助200多万名失业者和企业下岗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553万人，登记失业率3%。

职工工资水平继续提高。全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6210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

1996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国家计委下达1996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共130项，其中*为1996年新增项目。

煤炭项目（18项）　山西古交矿区　山西阳泉矿区　山西晋城矿区　山西大同矿区　山西华晋离柳矿区沙曲矿井内蒙古准格尔矿区一期　内蒙古平庄矿区元宝山露天矿及其配套工程　黑龙江七台河矿区　黑龙江双鸭山矿区　安徽淮南矿区　安徽淮北矿区　山东兖州矿区　山东枣藤矿区　河南平顶山矿区　郑州矿区　河南永夏矿区　宁夏灵武矿区神府东胜矿区

石油项目（7项）　黑龙江大庆油田开发　辽宁辽河油田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开发　新疆油田开发　新疆塔里木盆地开发　广东南海西部石油公司　*陕甘宁长庆油田

电力项目（31项）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　福建水口水电站　湖南五强溪水电站　天生桥水电站二级　四川二滩水电站　西藏羊湖抽水蓄能电站　青海李家峡水电站　河北衡水电厂　天津蓟县电厂　内蒙古伊敏煤电联营一期工程　内蒙古达旗电厂一期　辽宁铁岭电厂　辽宁绥中电厂　上海外高桥电厂　江苏彭城电厂　安徽马鞍山二电厂　福建嵩屿电厂　江西丰城电厂　山东邹县电厂三期　湖南石门电厂　甘肃靖远电厂二期　黑龙江鹤岗电厂　宁夏大坝电厂二期　*浙江泰山核电站二期工程　*华能北京热电厂　*江苏扬州第二电厂　*浙江北仑港电厂二期　*河南鸭河口电厂　*贵州安顺电厂

水利项目（5项）　大湖综合治理骨干工程　河南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甘肃引大入秦工程（地方项目）　*湖南江垭水利枢纽工程　新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

铁道项目（14项）　北京西客站　徐州枢纽　侯月线　焦柳复线　徐连复线　湘黔复线及电化　南昆线　成达线京广线京郑段电化　成昆线电化　京九线　宝成复线　横南铁路　哈大线电化

交通项目（17项）　汕头港深水港区一期　大连港大窑湾港区一期（含商检设施）　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二期　秦皇岛港煤码头四期（含商检设施）　烟台港（含商检设施）　连云港港墟沟港区一期　上海港　广州港新沙港区一期　川藏公路天津港（地方项目）　沪宁杭甬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京深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青岛港前湾港区二期工程　*湖南湘江航运二期工程（地方项目）　*福建泉厦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江苏江阴长江公路桥（地方项目）　*黑龙江哈同公路（地方项目）

邮电项目（2项）　*京九广光缆　*北沿海光缆

民航项目（2项）　桂林两江机场　*首都机场航站楼扩建

钢铁项目（4项）　辽宁鞍山钢铁公司齐大山铁矿　武汉钢铁公司三炼钢工程　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二期工程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三期

有色项目（2项）云南大红山铜矿　广东韶关冶炼厂

化工项目（6项）　湖北荆襄化学工业公司大峪口矿肥结合项目　云南磷肥工业公司　吉林化学工业集团公司30万吨乙烯工程　海南富岛化学工业公司天然气化肥厂　*河南平顶山尼龙66盐厂（地方项目）　*内蒙古化肥厂（地方项目）

石化项目（5项）　江西九江石化总厂（地方项目）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　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二化肥工程（地方项目）*辽宁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聚酯工程　*广东茂名乙烯工程

建材项目（1项）　安徽铜陵水泥厂

轻工项目（1项）　*广西南宁纸厂（地方项目）

医药项目（1项）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青霉素工业钾盐工程

机电汽车项目（2项）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轿车项目　*九〇八工程

林业工程（1项）　*“三北”防护林三期工程

卫生项目（1项）　卫生部疫苗工程

广播项目（1项）　国际广播中心工程
粮食项目（1项）　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
农业项目（1项）　*农垦100亿斤商品粮项目
其他项目7项　（略）

1996年国家重点建设预备项目

*甘肃华亭矿区　*西安一安康线　*四川二滩水电站50万伏输变电　*广东第二核电站　*其他项目（略）

注：项目名称前有"*"者为1996年新增项目。

1996年国家重点建设收尾项目

陕西黄陵矿区　吉林双辽电厂　海南大广坝水利水电工程　云南漫湾水电站　贵州东风水电站　浙江嘉兴电厂　河南偃师电厂　陕西渭河电厂二期工程　宝中线　兰新复线　浙赣复线　日照港　海南环岛公路（东线）工程　湖北黄麦岭磷化工公司　陕西渭河化肥厂　石家庄宝石公司彩管玻壳扩建工程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轿车项目　天津夏利轿车扩建项目　江苏仪征化纤公司三期工程

1997年

1　月

2日　国家计委等取消48项建设项目收费

为控制商品房价格不合理上涨，减轻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者的负担，促进住宅建设持续稳定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出《关于取消部分建设项目收费管理的通知》，公布取消了48项未按规定程序批准、明显不合理的住宅建设收费，并就进一步整顿建设项目收费，加强收费管理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级物价、财政部门按照已公布取消的有关建设项目收费，立即废止本地区、本部门制定颁发的有关文件，并将废止的文件名称、文号、发文机关向社会公布。历次清理整顿收费中已经国务院同意公布取消的建设项目收费，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恢复，也不得变换名目设置新的费种。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取消的不合理建设项目收费，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不得借中央未明令取消为由进行干预。

3日　国务院颁布实施质量振兴纲要

《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年）是我国质量工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是我国质量工作的指导性计划和纲领性文件。该《纲要》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质量工作的要求和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要求。明确了政府主要在引导、协调、监督、服务等方面为质量振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出了建立商品市场的质量规范，建立健全质量认证、工程项目管理、产品标识、质量投诉和仲裁检验、产品质量保险等制度，发挥中介组织作用等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它将对今后5—15年我国质量工作跃上新台阶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纲要》是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质量和质量工作的具体要求的需要。《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国家质量奖励制度、质量振兴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开展“质量月”、“质量万里行”、“3.15保护消费者权益日”等活动。

4日　国务院批准三家公司控股试点

国务院批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中国石化总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进行国家控股试点，作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对其现有直属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依照公司法行使出资人权利，进行资产经营活动。

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关闭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鉴于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违法违规经营造成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为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决定关闭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指定中国建设银行承接、管理其债权债务。

10日—13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作了题为《正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努力实现今年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的工作报告。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主持会议。会议部署了199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要着力做好8个方面的工作；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首位，继续加大抓农业的力度；切实做好粮食收购工作，解决好农产品流通不畅问题；加快科教兴农步伐，积极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全面实现增产增收；狠抓农田水利建设，增强防灾能力；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力；下决心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国务院决定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通知》，并转发粮食部《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粮食管理办法》。这个新的粮食管理办法的具体内容包括；（一）参照最近几年的实绩，结合今后粮食生产发展和征购、销售变化等因素，协商确定各项包干数字。粮食征购包干数，包括征购基数和超购任务；销售包干数，包括非农业和农业销售，以及原由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调入包干数，包括正常的调入和原由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调出包干数为扣除专项用粮后的调出数，并确定主要粮食品种的调入、调出数量。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数字确定以后，从1982年度到1984年度一定三年。（二）为了适应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

的新情况，国家对生产队可以实行粮食征超购任务包干，一定三年。生产队、组、户在完成征超额任务后，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在正常年景下，基本上不再向农村供应粮食。对于按照国家计划种植棉花、糖料、蔬菜和经营渔、盐、林、牧业，并按计划向国家交售产品而常年缺粮的生产队，可以实行粮食销售指标包干，一定三年。（三）国家确定各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数字，一般不作调整。在包干期内，各省、市、自治区多购少销的粮食，归地方掌握，储备起来，准备以丰补歉。调拨包干数，可以在丰歉年度之间有所调剂，三年统筹，调出总数必须如数完成，调人总数不得突破。（四）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超购任务以后，积极开展粮食议购议销，调剂余缺，活跃市场，平抑粮价，并把议购作为国家掌握粮源的一条补充渠道。（五）粮食包干以后，实行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粮食的办法。（六）根据粮食包干办法和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粮食财务仍由粮食部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同时作适当的改进。

13 日—16 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

朱镕基副总理在会上讲话要求，金融部门在 1997 年要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促使物价涨幅低于去年。人民银行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依法加强金融监管，切实做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要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一是要保证粮食收购资金的供应。二是要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三是要充分运用各种金融手段，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四是金融部门要加强内部管理，增收节支，坚持勤俭办金融的方针，在保持资金使用的安全性、流动性的基础上，提高赢利水平。

国务院批准组建国家电力公司

这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已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国家电力公司由国务院出资设立，采用国有独资的形式，是国务院界定的国有资产的出资者和国务院授权的投资主体及资产经营主体，是经营跨地区送电的经济实体和统一管理国家电网的企业法人，按企业集团模式经营管理。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后，电力工业部继续行使对电力工业的行政管理职能，原由该部承担的国有资产经营职能和企业经营管理职能移交给国家电力公司。国家电力公司不具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接受电力工业部等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与监督。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履行对电力工业的行政管理与服务职能。

17 日　中国证监会公布股票发行规定

中国证监会公布《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确定，1996 年新股发行采取“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管理办法，重点对象是国家确定的 1000 家，特别是其中的 300 家重点企业以及 100 家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 56 家试点企业集团。在产业政策方面，将重点扶持农业、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从严控制一般加工业及商业流通性企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暂不考虑。

23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 1996 年经济形势及 1997 年展望报告

报告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经济运行良好，“软着陆”基本成功。1. 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物价上涨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2. 国民经济增长平稳回落到适度快

速区间，稳定性增强。3. 社会需求增长基本适度，投资与消费正常。4.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金融形势相对稳定正常。5. 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盈利企业仍占2/3，尽管国有企业盈利率下降，而集体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实现利润仍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4.7%和27.5%。但是结构不合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诸多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与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总体形势好转形成了较大反差。（三）优化结构，搞好调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重点把握好几个关键环节：（一）坚持总量适度从紧，加大结构灵活调整的力度。（二）继续加强农业基础，确保主要农产品的稳产增产。（三）以市场为导向，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争取在一些“重点”和“难点”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五）抓紧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妥善安排好困难居民家庭生活。

27日　农业部提出加快渔业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渔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使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3500万吨，养殖品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由目前的不足55%提高到60%以上，产品质量和名特优新产品比重有较大提高，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和渔民的收入有明显增加。

2　月

2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税收征管改革方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方案》确定的税收征管改革的任务是：建立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的征管模式。到本世纪末，先在全国的城市和县城实施，并逐步向农村推进，力争在2010年基本完成这项改革。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内容包括：一、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主要是确立科学简便的申报纳税办法。二、建立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服务体系。主要是建立税法公告制度。合理设置办税服务场所。积极、稳妥地发展税务代理服务。三、建立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管理监控体系，包括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开发、完善征管监控应用系统；建立四级计算机监控管理网络，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力争建成中央、省（区、市）、地（市）、县（市）四级计算机网络。四、建立人工与计算机结合的稽查体系。五、建立以征管功能为主的机构设置体系。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199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意见

（一）199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奋斗目标是：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6亿亩，总产量保持1996年4800亿公斤的水平，并力争有所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按计划解决12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乡镇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稳定发展。（二）切实做好粮食收购工作，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997年，一定要在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挂账分开和完善粮食价格机制等方面迈出决定性的步伐，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国有粮食系统是粮食经营的主渠道，要通过改革更

好地发挥作用。同时，要按照“一主多辅”的原则，积极发展多渠道流通，逐步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推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1997年中央财政新安排的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农业的要占一半以上；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国家新增贷款总规模中，用于农业的比重不低于10%，国家开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用于农业的贷款也要规定明确的比例。（四）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努力拓展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充分挖掘农村经济的增长潜力，尤其要在开发利用各种非耕地农业资源、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发展乡镇企业方面下功夫。（五）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要落实延长土地承包期的政策，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具备条件，并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16日　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束

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到1995年末，全国工业企业和工业生产单位总计为734.2万个，从业人员14735.5万人。这次普查是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协调联席会议领导下进行的，是一项规模更为全面和巨大的系统工程。根据这次普查的主要数据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公报》，从工业经济规模、工业经济类型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工业地区结构、工业劳动者、工业装备水平、工业科技活动、工业经济效益、国有工业、“三资”工业、乡镇工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等12个方面，对中国工业的现状进行了描述。

19日　邓小平逝世

邓小平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月25日，邓小平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李鹏主持追悼大会，江泽民致悼词。3月2日，遵照邓小平及其亲属的意愿，邓小平的骨灰撒入祖国的大海。

全国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国防科技工作，强化管理，确保质量，提高国防科技工业整体水平，实现国防科学技术新发展。当前，国防科研生产的核心问题是要加强管理，特别是质量管理，没有质量就没有一切。在国防科研生产中，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把质量关。各级要强化质量观念，建立健全质量责任制，加强培训，提高技能，使质量第一的方针成为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全体人员的自觉行动。各级领导一定要把科研经费管理好。使用好，用于必需，用之得当。要把经费的管理使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建立经费管理责任制。要牢固树立效益观念，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要加快跨世纪人才队伍建设，把培养中青年人才作为重点，保证国防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邹家华强调，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承担着为我军提供性能先进、质量精良的武器装备的重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

军”的方针，是国防科技工业全部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和平时期军工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务院决定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

为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进一步理顺国家与金融、保险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促进金融、保险企业间平等竞争，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国务院决定，从1997年1月1日起，调整金融保险业的税收政策。(一) 规范金融保险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对目前执行55%所得税税率的金融、保险企业，其所得税税率统一降为33%。金融、保险企业所得税的预算级次不变。(二)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有关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的规定，将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8%。提高营业税税率后，除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交纳的营业税仍全部归中央财政收入外，其余金融、保险企业交纳的营业税，按原5%税率征收的部分，归地方财政收入，按提高3%税率征收的部分，归中央财政收入。(三) 对经济特区(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设立的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企业，凡来源于特区内的营业收入，继续执行自注册登记之日起，5年内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免税期满后，按8%的税率征收；对来源于经济特区外的营业收入部分，不再执行特区内的免税优惠政策，按特区外设立的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企业的有关税收政策执行。

25日　财政部等发布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水利建设基金是用于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由中央水利建设基金和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组成。中央水利建设基金主要用于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大江大河重点工程维护和建设；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主要用于城市防洪及中小河流、湖泊的治理、维护和建设。跨流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大水利建设工程和跨国河流、国界河流我方重点防护工程的治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中央水利建设基金和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分别提取。

国家经贸委等提出“九五”期间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意见

(一)“九五”期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奋斗目标是：在提高出口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左右。按海关统计口径，到2000年机电产品出口额比1995年翻一番，达到800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5%以上，继续保持第一类出口商品的地位，为实现2010年机电产品出口额比2000年再翻一番，达到1500亿美元左右奠定坚实的基础。(二) 大力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培育和发展有出口后劲的重点商品。1.“九五”期间国家将重点支持大型和配套机电设备以及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主要包括：发电及输变电设备、船舶及船用设备、飞机及航空设备、通信设备、自动数据自理设备、高档家用电器、汽车(含摩托车)及零部件、农机及工程机械等。2. 逐年增加对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和外贸、工贸公司)的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九五”期间，每年机电产品出口专项技术改造贷款，在国家安排的年度技改贷款总规模内增加3—5亿元。为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机电产品出口企业的各项研究开发费用计入管理费；研究开发费用年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企业，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得额。(三) 加速转换机电产品出口企业

经营机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实现规模效益。1. “九五”期间要重点扶持若干出口规模达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机电企业集团的发展。推动有条件的机电外贸企业和大型生产企业向集团化、国际化、综合化方向发展。2. 凡列为机电产品出口基地和扩大出口企业的，都可赋予外贸自营权。3. 继续简化重点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出国销售、维修服务人员的出国审批手续。（四）运用多种经济手段进一步支持机电产品出口。1. 要不断加大国家对机电产品出口的金融支持力度。商业银行要对机电产品出口所需流动资金贷款按信贷原则优先安排，重点支持。2. 充分利用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支持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开发出口新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等，各地方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立地方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支持地方机电产品出口的发展。

国务院对自营出口或委托代理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办法》规定，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各类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货物，除另有规定者外，一律实行“免、抵、退”税的办法。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货物，免征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增值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货物应予免征或退还的所耗用原材料、零部件等已纳税款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款；“退”税，是指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货物占本企业当期全部货物销售额50%以上的，在一个季度内，因应抵顶的税额大于应纳税额而未抵顶完时，经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批准，对未抵顶完的税额部分予以退税。从1997年1月1日起执行。

3　月

1日　中国人民银行开办再贴现业务

自3月份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开始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开办再贴现业务。这是我国中央银行为加快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方式所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它的开办，标志着再贴现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操作，与一级分行及部分中心城市分行在总行授权范围内操作相结合的再贴现业务操作体系已初步建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开办的再贴现业务，将实行总量控制原则，即人民银行根据金融宏观调控的需要，在年度再贴现限额内，确定对各商业银行总行的再贴现总量，重点用于支持产供销关系较为稳定的国家重点产业、行业和企业的合理资金需要。根据规定，中央银行再贴现率按同档次再贷款利率下浮10%执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在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时，应具有一定的直接办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的业务量。按发生额计算，其直接办理的贴现与再贴现之比不能低于2:1。同时，在申请再贴现时，商业银行还必须提交商品交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以确保再贴现以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

1日—14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会议通过了李鹏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996年中央及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

1997年中央及地方预算、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关于修订《刑法》、《国防法》的决议、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关于九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人大代表的办法等一系列决议。

3月5日—1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鹏作政府工作报告；刘仲藜作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陈锦华作关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田纪云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张思卿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罗干．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了上述各项报告后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根据江泽民主席提议，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为副总理，迟浩田、罗干、吴仪、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为国务委员。3月16日，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日　国务院发出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规范企业破产，鼓励企业兼并，对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实施再就业工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和转换经营机制，国务院印发《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一)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1.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从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拨付。2.职工安置费一律拨付到再就业服务中心，统筹使用。3.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由当地社会养老、医疗保险机构负责管理。4.破产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职工的生活费从破产清算费中支付。(二)加大鼓励企业兼并的政策力度。国家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兼并企业要全部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并负责人员安置，不能搞“假破产、真逃债”的“整体接收”或“整体收购”方式。被兼并企业的富余职工也要实行下岗分流。兼并企业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全部债务。(三)以产定人，下岗分流，适当减免贷款利息，缓解企业困难。《通知》强调：有关文件中的破产方面的政策，只适用于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范围内的国有工业企业。非试点城市和地区的国有企业破产，只能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实施，即破产企业财产处置所得，必须用于按比例清偿债务，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只能从当地政府补贴、民政救济和社会保障等渠道解决。非国有企业的破产，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实施。

4月20日，国务院就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发出补充通知。明确，国家经贸委负责全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的组织协调工作，成立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经贸委（组长）、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土地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组成，并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参加。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国试点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协调；制订《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

就业工作计划》的编制办法；下达省、自治区、直辖市核销呆、坏账准备金的预分配规模；审核省、区、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指导省、区、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协调小组的工作；制订《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并监督执行。试点城市也成立相应机构，实施相应职责。

3 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社会颁布实施《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这是中国证监会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规范和监督，保持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暂行规定》明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登记、托管、清算机构、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投资基金托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内设业务部门负责人，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注册会计师以及资产评估人员，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投资咨询人员等，因进行证券欺诈活动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的行为，而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的，将在一定时期内或终身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对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的人员，中国证监会将通过指定报刊和其他信息传媒向社会公布。对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违反规定的，聘用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的人员的，中国证监会将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11 日　农业部提出乡镇企业改革发展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业部《关于我国乡镇企业情况和今后改革与发展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支持和正确引导乡镇企业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关系，确保乡镇企业资产特别是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实力。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东部地区要突出提高，在提高中发展；中西部地区要继续快速发展，在发展中提高。东部地区要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推动企业扩大规模、提高产品水平和产品档次，逐步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要积极实施东西合作战略。《报告》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具体政策。

14 日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99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宏观调控目标是：国民经济增长率 8%；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 6%；固定资产投资率 32%，财政赤字 570 亿元，比上年减少 40 亿元；进出口总额 3100 亿美元，进口与出口大体平衡；货币发行 1200 亿元；人口自然增长率 11.44‰；城镇登记失业率 3%左右。199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一）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确保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1997 年粮食播种面积要稳定在 16.6 亿亩，总产量保持 1996 年水平，并争取有所增长，重点增加小麦和水稻的产量。要坚持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多渠道增加水利建设投人。进一步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再增加 15 亿元财政扶贫款和 30 亿元扶贫贷款，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二）保持工业适度增长。工业生产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优化结构、

提高效益上来。（三）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大力优化投资结构。在资金配置上，新增的预算内投资和银行贷款优先用于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国防、高新技术产业和科学、教育、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继续贯彻“保重点、保竣工、保投产”和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的原则，抓紧建成一批对调整结构具有显著作用的重点项目，进一步缩短建设战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四）加强价格调控监管，防止物价涨幅出现反弹。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需要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适当解决一些突出不合理的价格矛盾。（五）进一步减少财政赤字，继续保持金融稳定。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努力增收节支，把财政赤字控制在调控目标之内。（六）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加快实施再就业工程。1997 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5%左右。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700 亿元，采取多种形式，发展第三产业，广开就业渠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1. 以增量带动和促进存量调整，努力解决经济生活中“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问题。坚决停止建设那些规模不经济、技术落后，投产后必然出现严重亏损的在建项目。对已批立项尚未开工的项目都要清理，凡属全国生产能力过剩的重复建设和资金不落实的项目，坚决撤销立项，不再批准开工建设。2.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的体制环境。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产品结构调整，继续做好“拨改贷”资金余额转为资本金的工作，着重减轻产品有销路、效益好的企业的债务负担。全面推行建设项目资本金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招标投标制和项目监理制度。结合企业股份改造和试行建设项目股份投资，进行可转换债券试点。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会议同时批准重庆市升格为全国第四个直辖市。

199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作的《关于 199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199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陈锦华在报告 199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时说，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比较好地实现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计划执行情况是好的，做到了为“九五”计划开好头、起好步。陈锦华从几个方面说明了过去一年的主要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取得显著成效；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国家重点建设得到加强；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金融形势保持平稳；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各项配套改革继续深化；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利用外资进一步扩大；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成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明显加强；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在经济总量平衡状况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问题相当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水利建设滞

后，设施老化失修，抗灾能力薄弱，有些城市防洪能力不强。中央财政赤字较大。物价涨幅回落的基础还不很稳固。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不好，停产、半停产企业和下岗待业人员增多，一些亏损企业的职工生活困难，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反映出体制改革必须继续深化，宏观调控必须继续改善，特别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引导更需进一步加强。

1997年党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落实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物价上涨幅度，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开拓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宏观调控目标：经济增长率8%；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6%；固定资产投资率32%；财政赤字压缩40亿元；进出口总额3100亿美元，进口与出口大体平衡；货币发行1200亿元；人口自然增长率11.44‰；城镇登记失业率3%左右。按照上述目标，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保持工业适度增长；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大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价格调控监管，降低物价上涨幅度；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进一步减少财政赤字，继续保持金融稳定；努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加快实施再就业工程。

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作的关于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刘仲藜在报告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时说，去年，财政金融形势平稳，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增加较多，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初步统计，全国财政收入7366.61亿元，完成预算的107.2%，比上年增加1124.41亿元，增长18%；全国财政支出7914.38亿元，完成预算的105.7%，比上年增加1090.66亿元，增长16%。收入与支出相抵，支出大于收入547.77亿元。

1996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1996年，中央财政总收入4252.26亿元，完成预算的101.7%。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收入3649.07亿元，完成预算的102%；地方财政上缴中央收入603.19亿元，与预算持平。中央财政总支出4862.26亿元，完成预算的101.4%。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610亿元，比预算确定的数额减少4.42亿元。1996年财政收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抑制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的势头。财政支出总量有所控制，支出结构有所调整，支出增幅低于收入增幅两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达到了年初压缩赤字的目标，地方财政保持一定的结余。这一结果表明，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

1997年财政收支预算安排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全面强化税收征管，使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坚持量

入为出，控制支出总量，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需要，反对铺张浪费，使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进一步压缩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大力整顿财经秩序，继续深化财税改革。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汇总情况是：全国财政收入安排8397.94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4%，与国民经济保持了同步增长。全国财政支出8967.94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3.3%。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570亿元。其中，支援农业支出安排592亿元，比上年增加73.58亿元，增长14.2%；教育事业费安排1189.07亿元，比上年增加148.85亿元，增长14.3%；科学事业费安排125.5亿元，比上年增加15.65亿元，增长14.2%。几项重点支出的增幅均高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实现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要做好的几方面的工作：牢牢把握大局，推动两个转变，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加强收入征管，继续保持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势头；建立严格的预算约束机制，遏制财政支出过快增长的势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过"紧日子"；继续深化财税改革，完善财税立法，为逐步振兴国家财政创造良好的条件；进一步规范和整顿财经秩序，加强财政监督。

25日　国务院发布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共6章42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条例》规定，进口产品采用倾销或补贴方式，并由此对我国国内已经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依照本规定采取反倾销或者反补贴措施。同年12月10日，我国外经贸部决定，对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反倾销调查正式立案。这是我国首次反倾销正式立案。

27日　国家体改委出台1997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

《要点》主要内容包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二、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改善投资结构。三、配合国有企业改制改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四、搞好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开拓住宅市场。五、以粮棉为重点，积极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六、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体制，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4　月

11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对台经济工作

为了进一步为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台经济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一）积极、主动引导台商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按照产业政策，继续实行对台商投资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对台湾大企业及上市公司投资符合我产业政策的重大项目或老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其产品可适当放宽进入我内销市场的限制；对台商投资领域和地区，可适当放宽限制条件。（二）继续安排好台商投资企业配套资金，扶持台商投资企业正常、健康发展。对与台商合资项目（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合资项目，要安排好我方配套建设资金及流动资金贷款，并允许"收回再贷"。（三）加强两岸农业合作。经国家批准，可选择若干个农业开发潜力比较大、台商投资农业有一定基础的地区，设立两岸农业综合开发试验

基地。大力推动台商投资进行荒地、荒山、滩涂的开垦、开发和中低产田的改造。在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允许进行台商投资农产品产、运销和加工“一条龙”项目的试点。鼓励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农业合作项目生产台湾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农副产品，返销台湾，以带动大陆产品进入台湾岛内市场。

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

近年来，一些地方乱占耕地、违法批地、浪费土地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面积锐减，土地资产流失，不仅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扭转在人口继续增加情况下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要求：一、加强土地的宏观管理。二、进一步严格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三、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四、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五、加强对国有土地资产的管理。六、加强土地管理的执法监督检查。七、加强对土地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确实需要占用耕地的，报国务院审批。严格控制大城市的用地，冻结县改市的审批。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农荒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高尔夫球场、仿古城、游乐宫、高级别墅区等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及兴建各种祠堂、寺庙、教堂。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主要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的方式，鼓励公平竞争。建立土地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评估的公布制度。

我国CIMS应用示范工程全面启动

“九五”期间，国家科委决定把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应用示范工程列人重中之重项目，全面启动，加大力度推广，开始大面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而推动企业生产力方式和管理的飞跃。CIMS是现代企业运行的新模式。它是一个系统的高技术群，主要包括管理技术、设计技术和生产技术。我国运用CIMS成绩显著。1994年，建立在清华大学的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美国制造工程师协会颁发的“大学领先奖”。199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CIMS工程获得美国制造工程师协会颁发的“工业领先奖”，并同时获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94/95年度“可持续工业发展奖”。“八五”期间，我国先后选择了66家企业作为CIMS应用示范企业，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51家。“九五”期间，为更充分发挥行业和地方的作用，CIMS应用示范工程将选择全国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从面上进行试点，在电子、机械、纺织、化工、冶金、轻工、邮电、广电、航空、航天、石油天然气、煤炭、船舶、兵器、石化等行业中加快推广应用，按照“效益驱动、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方针，根据企业需求，把CIMS应用与现代企业经营模式相结合，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国务院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共5章26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证监会等有关部门有关负责人组成。货币委员会的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讨论下列货币政策事项并提出建议：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

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16日　国家计委等发布境外项目融资管理暂行办法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宏观管理的要求，为规范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的行为，国家计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暂行办法》，对以境内建设项目的名义在境外筹措外汇资金，并仅以项目自身预期收入的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方式作出规定。《办法》规定，项目融资主要适用于发电设施、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城市供水厂及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其他规模大、且具有长期稳定预期收入的建设项目。以项目融资方式筹措国外资金的建设项目，主要投资者应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履约能力，外方主要投资者还应有较强的国际融资能力和进行项目融资的业绩。项目的融资、建设、经营等有关合同中，参与方应具备相应的资格和履约能力，依靠自身经济和技术能力依法履行合同，并根据项目风险性质和各方控制能力，合理分担项目的商业风险及其他风险。项目的主要投资者不应成为可能产生重大项目风险和利益冲突的合同参与方。境内机构为项目的建设、经营等合同的履行出具的支持文件，不得改变项目融资的性质；国内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境内其他机构对外提供履约担保，须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项目的国外债权人，在债务受偿、资产和权益的抵押等方面，应与国内债权人享有同等的权利。项目（包括外商投资项目）的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须由所在地方或部门的计划部门提出，经行业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国家计委审批，重大项目由国家计委审查后，报国务院审批。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国家计委批准后，应在境内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负责融资的一切活动，并应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1年内完成项目融资。

29日　国务院批转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意见

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深化大型企业等集团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一）建立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1. 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及其成员企业在清产核资、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形成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2. 明确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出资人应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少数具备条件的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作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二）进一步增强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功能。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要在制定集团发展战略、调整结构、协调利益等方首发挥主导作用，逐步成为集团的投融资、科技开发、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等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中心。1. 增强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的投资功能。2. 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享有自营进出口权，可从事与本集团相关产品、配套产品的进出口业务。3. 有条件的试点企业集团都要建立技术中心，提高技术创新、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及新产品开发能力，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三）多渠道增补试点企业集团资本金，发挥其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经国务院批准，又确定63家大型企业集团参加第二批试点，使试点企业达到120家。

5　月

12日　我国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

我国研制的新一代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由新型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研制、发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表明我国通信卫星技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6日　1997年股票发行300亿元

国家计委、国务院证券委确定股票发行的重点是支持国家确定的1000家国有重点企业、120家企业集团、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农业、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及高新技术企业。1997年的额度除解决新公司发行上市外，还将拿出一部分支持已上市公司再发行新股。已上市公司申请发行新股的，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家绝对控股、可流通股份偏小、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

21日　中国证监会等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股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做出规定，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股。1. 国有企业不得炒作股票，不得提供资金给其他机构炒作股票，也不得动用国家银行信贷资金买卖股票。2. 上市公司不得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买卖股票，不得用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炒作股票，也不得提供资金给其他机构炒作股票。3. 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为长期投资而持有已上市流通股票（在国务院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以上），应向证券交易所报告，交易所应采取措施，加强管理，监督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遵守本规定。4. 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开设一个股票账户（A股），必须用本企业（法人）的名称。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以个人名义开设股票账户或者为个人买卖股票提供资金。5. 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清算机构和证券经营机构，应对已开设的股票账户、资金账户进行检查，如发现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或者以个人名义开设股票账户以及为个人股票提供资金的，应及时纠正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23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指导原则

为了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业安全稳健运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颁发《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内容、原则、要求、管理和监督等都作了具体规定。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组织结构的控制、资金交易风险的控制、衍生工具交易的控制、信贷资金风险的控制、保险基金的风险控制、会计系统的控制、授权授信的控制、计算机业务系统的控制等。

28日　全国企业职工解困暨再就业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会上强调，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千方百计做好解困和再就业工作。据统计，到今年一季度末，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为1096万人，停减发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227万人。全国下岗职工已达900多万人，困难职工和下岗人数达到历年来最高点。这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

抓好再就业工作，当前要重点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采取切实措施，促进择业观念转变。二是大力开发就业岗位。三是组织下岗失业职工转业培训。四是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吴邦国强调，解困和再就业工作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加强领导，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都要关心这项工作，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一要加强综合协调，宏观管理。二要在资金和政策上支持。三要开展帮助活动。四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6　月

5日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按企业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提出：（一）按合作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当提高股金起点，在扩大吸收农民（尤其是专业户）个人股的同时，适当吸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股；取消股金保息分红政策，实行按股分红；建立健全社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监事会制度、发挥民主管理组织的监督作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和风险管理，并逐步完善合作金融组织的劳动工资、财务分配等内部管理制度。（二）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增设农村合作金融管理机构，专门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工作。（三）防范和化解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近几年要使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比例逐年下降3~5个百分点。（四）农村信用社要坚持面向农民、为社员服务的办社宗旨，切实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10日　公安部公布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方案》就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在小城镇办理城镇沿路住户口的条件等做出规定。小城镇户籍改革的范围限制在县（县级市）城区的建成区和建制镇的建成区。在此范围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对已开展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小城镇进行清理整顿的基础上，选择少量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财政有盈余、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一定基础、在当地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小城镇，先期进行两年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分期、分批推开。在小城镇已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已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而且在有了合法固定的住所后居住已满两年的，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6日　国家体改委下发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一）为了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允许职工投资入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职工个人投资入股，也允许少数职工暂时不入股，未投资入股的职工可以在企业增资扩股时投资入股。职工之间的持股数可以有差距，但不宜过分悬殊。不吸收本企业之外的个人入股。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职工个人股和职工集体股应在总股本中占大多数，企业应当设置职

工个人股，还可根据情况设置职工集体股、国家股、法人股。职工个人股是职工以自己合法财产向本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份。国家股、法人股是国家、法人单位已经投入的资产折股或新增投资入股所形成的股份。股东不能退股。（二）为了促进资产的流动与重组，企业改制应取得职工代表大会、出资人和主管部门的同意，由企业出申请，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审批，企业清产核资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同时应有企业出资人和职工代表参加，资产评估要由国家认可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结果要经过出资人的认可和有关部门的确认。原有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可以进行剥离、独立运作或委托改制后的企业代管，减轻企业的负担。经政府批准，可以采取多种途径，解决企业改制前离退休人员养老统筹和医疗费用不足等问题。（三）按照谁投资谁享有产权的原则，搞好原有企业产权的界定工作，国有、法人单位等出资人在企业中的投资及投资收益所形成的所有者权益归出资人所有。企业原有奖金，可以折成个人股投入企业，也可以用于企业改制前职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

17 日　国家经贸委提出 1997 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

1997 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重点包括八个方面的工作：一、重点抓好国务院确定的大型试点企业集团，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促进结构调整，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率和效益。二、搞好大的，放活小的，促进结构调整。抓好 1000 户国有大中型重点企业，首先着重抓好已经国务院确定的 512 户国有大中型重点企业。国有小企业改制、改组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必须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和审核，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三、切实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在转换机制、调整结构的前提下，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逐步提高技术改造贷款在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中的比例。四、进一步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五、多渠道增资减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抓好扭亏增盈和解困工作。继续做好“拨改贷”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工作。逐步将 1988 年以后的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六、搞好点面结合，推动面上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在推动国有企业各项改革试点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引导面上企业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坚持不懈地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七、推进配套改革，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积极探索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有效途径，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积极推进职工再就业工程，积极采取财政、社会保险、企业、个人合理分担的办法，解决分流、分离的经费问题。八、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19 日　我国研制成功“银河－Ⅲ”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

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的“银河－Ⅲ”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在北京通过国家技术鉴定。这个系统综合技术达到了当前国际先进水平，并突破和掌握了更高量级计算机的关键技术，具备了研制更高性能巨型机的能力，它标志着我国高性能巨型机研制技术取得新突破。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了高性能巨型机的研制技术。“银河－Ⅲ”巨型机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在这个领域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20日　国务院要求加强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

为保证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工作有序进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要求：（一）在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进行分拆上市、增发股份等活动，受当地证券监管机构监管，但其中资控股股东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当事后将有关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加强对股权的监督管理。（二）在境外注册的中资非上市公司和中资控股的上市公司，以其拥有的境外资产和由其境外资产在境内投资形成并实际拥有三年以上的境内资产，在境外申请发行股票和上市，依照当地法律进行，但其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当按照隶属关系事先征得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其不满三年的境内资产，不得在境外申请发行股票和上市，如有特殊需要的，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后，由国务院证券委审批。上市活动结束后，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将有关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三）凡将境内企业资产通过收购、换股、划转以及其他任何形式转移到境外中资非上市公司或者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以及将境内资产通过先转移到境外中资非上市公司再注人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境内企业或者中资控股股东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按照隶属关系事先经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后，由国务院证券委按国家产业政策、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年度总规模审批。

25日　国家计委首次发布产业投资信息

这次发布的乙烯产业投资信息政策导向是，“九五”期间，以改建现有装置为主，不再布新点。随后，作为加强间接宏观调控的方式之一，又陆续发布彩电、有色金属、铁路运输、煤炭、冶金等行业的产业投资信息。作为加强间接宏观调控的方式之一，国家计委将不定期地发布产业投资信息，以引导企业投资行为。

7　月

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与此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庄严的仪式上宣誓就职。自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在香港正式实施。

4日　国家科委等对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作出规定

国家科委、国家工商局《关于高新技术成果出资人股的规定》明确，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人股，人股作价金额可以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但不得超过35%。出资人股的高新技术成果应符合下列条件：属于国家科委颁布的高新技术范围；为公司主营的核心技术；技术成果的出资者对该项技术享有出资人股的权利，保证公司对该项技术的财产要求可以对抗第三人；已经通过国家科委或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的认定。

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全面清理按规定未被取消的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

凡利用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强行进行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属于乱收费行为，要一律严肃查处。服务性收费项目，由物价部门负责清理。建立健全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的审批管理制度。所有新增加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必须按隶属关系分别报财政部、国家计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要分别征得财政部和国家计委同意。向企业实施罚款，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向企业集资，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进行。向企业收取基金，必须按照规定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重要的报国务院审批。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的收缴和使用管理的监督，防止截留、挤占和挪作他用。《决定》共 8 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 日　第一家中外合资外贸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由上海东方国际集团与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美国大陆谷物及上海外贸公司四方合资组建的东菱贸易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批准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它标志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有了新的突破。

国家计委等提出加强汽车工业项目管理的意见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机械部、公安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和国家工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工业项目管理的意见》。《意见》提出以下措施：（一）进一步加强汽车工业投资项目的宏观管理。（二）对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项目以及加工贸易项下进口部件、成套散件，一律凭国家计委或国家经贸委的项目批准文件办理海关备案手续。（三）凡要求增资的中外合资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项目，不论限额以上或限额以下，均根据立项时的建设性质，将可行性研究报告报送国家计委或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四）企业经营范围凡涉及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的生产、装配、加工贸易等项目，应持国家计委或国家经贸委和机械部的项目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五）由机械部牵头会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在 1997 年内对现有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进行一次清理整顿，凡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的企业以及生产车型与产品目录不符、或有转让目录和出卖产品合格证行为的企业，一律取消其相应的产品目录。

15 日　审计署等联合开展新开工项目资金来源的审计

根据国务院《关于集中资金保证当前经济工作重点需要的通知》的要求，审计署、国家计委、国务院经贸委、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等 5 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新开工建设项目资金来源的审计。《通知》指出，全民所有制单位今年新开工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其资金来源必须按照规定报送审计机关进行审计。未经审计已开工的基本建设项目要限期办理资金来源审计。审计的重点是建设项目的资金是否落实和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资金来源中发现有银行拆借资金、银行投资、以银行贷款作自筹资金、未经批准的社会集资等；均属资金来源不符合国家规定。企业以留用资金和自行筹措的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的项目，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规定，应有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的验资证明。凡资金

来源未经审计的建设项目，审批建设项目开工机关不予办理开工手续；建委不予核发施工执照；银行不予拨付工程用款。

16日　国务院决定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其基本内容包括：(一) 各级人民政府要贯彻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原则，确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失业人员失业救济金的发放，积极推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同时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二) 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 (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三) 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四) 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逐步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也要逐步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五) 抓紧制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条例，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

18日　国家体改秀发布城市国有资产营运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在10个城市进行国有资产营运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本营运体系。《指导意见》共30条，对试点的目的、任务、原则、内容、步骤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其核心内容，是将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分开，确立政府的出资人地位，建立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的组织形式和营运机构，使政府更加有效地对所负责的国有资本进行营运。开展此项试点的城市包括：重庆、武汉、西安、合肥、苏州、平顶山、扬州、南通、岳阳和铜陵。

18日—24日　朱镕基在辽宁省考察国有企业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辽宁省考察国有企业时强调，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必须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现在的工作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尤其是选好企业的厂长经理；二是必须坚持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三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包括直接融资的办法，帮助国有企业增资减债。

31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扶贫基金管理办法

主要内容如下：(一) 国家扶贫资金是指中央为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支持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专项安排的资金，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专项借款。(二) 国家各项扶贫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并以这些县中的贫困乡、村、户作为资金投放、项目实施和受益的对象。非贫困县中零星分散的贫困乡、村、户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贫困县，由有关地方各级政府自行筹措安排资金进行扶持。(三) 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新增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营，修建乡村道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防治地方病等。以工代赈资金，重点用于修建县、乡公路(不含省

道、国道）和为扶贫开发项目配套的道路，建设基本农田（含畜牧草场、果林地），兴修农田水利，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等。扶贫专项贷款，重点支持有助于直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中效益好、有还贷能力的项目。（四）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增加扶贫投入。省、自治区、直辖市向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的扶贫资金，应当达到占国家扶贫资金总量的30%—50%。地方配套资金达不到前款规定比例的，中央将按比例调减下一年度向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投入的国家扶贫资金数额。多调减下来的国家扶贫资金，将安排给达到规定比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此办法自1997年8月1日起施行。

8　月

1日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任副主席。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福林、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周小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耀先、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廷焕、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史纪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黄达。

8日　国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

国务院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各地区要及时制定并公布当地议购粮保护价政策。定购粮食价格，按上年定购价执行，一律不得降低。在定购粮收购任务完成以后，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议购粮收购保护价按定购基准价执行；对质量较差、不适销对路的早籼稻和春小麦的某些品种，其保护价可以比基准价略低，但下浮幅度一般不得超过50%，具体价格水平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二）粮食部门必须坚决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的政策。国有粮食业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充分发挥粮食购销主渠道作用和市场粮价形成的主导作用。对农民留足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和必要的储备粮以外的余粮，要坚决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不拒收、不限收、不停收、不打白条，并不得代扣各项提留款。（三）有关部门必须确保粮食收购资金供应。要继续贯彻执行政府领导下分级分部门筹措收购资金责任制。（四）务必落实财政补贴。对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定购粮和按保护价收购的议购粮，其超正常周转库存部分由财政给予利息、费用补贴。补贴资金来源自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五）积极建立粮食产、销区比较稳定的购销关系。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的库存压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积极组织辖区内产销区的定购粮和议购粮调拨，并在省际间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购销关系。（六）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扩大仓储能力。（七）合理安排粮食销售价格，切实加强粮食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的政策措施后，市场粮食购销价格会逐步回升到合理区间，国有粮食企业的粮食销售价格应当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顺加作价，但零售价格最高不得超过上年各地按规定的作价办法制

定的价格水平。

11日　财政部等明确内地与香港的税收关系

随着香港的回归，外界特别是香港工商界对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税收关系越来越关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对“九七”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税收关系问题作了如下说明：一、内地税法与香港税法的关系。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回归后，继续实行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确定税目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务事项。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内地实行的税收法律、法规将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二、在对外签订税收协定及协定执行方面，内地与香港的关系。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税收协定可否适用于香港问题。《基本法》第1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从目前我国已同外国签订的56个税收协定的具体操作来看，由于税收协定依双方具体税制的特点进行谈签，协定所列我国税种仅适用于内地，所以，这些税收协定均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2. 香港可以以“中国香港”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和履行税收协定、保持和发展税务关系。三、香港同胞来内地投资、或从内地取得收入的税收问题。“九七”后，香港同胞来内地投资、或从内地取得收入，继续比照适用我国现行对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外籍个人的税收政策不变，均可继续比照享受我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四、内地与香港间开展贸易的税收问题。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间的贸易（指货物买卖，不包括服务贸易）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两个不同关税区之间的贸易，继续执行现行的税收政策。五、解决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可能产生的重复征税的基本原则。关于香港回归后解决两地间可能产生的重复征税的基本原则是：1. 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两地间可能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制度地区之间的问题，不宜采取两个主权国家之间采用的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方式解决。2. 由于香港实行单一的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对其居民来源于香港以外的所得不征税，内地税法中也有对在内地以外缴纳税收抵免的规定。因此，事实上已经基本解决了两地间的双重征税问题。3. 由于两地法律运作标准以及具体规定在操作上的不同，不能排除在个别方面产生重复征税的可能。如在个别情况下产生了重复征税，可通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税务主管当局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主管当局协商解决。六、关于我国与外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有关优惠政策能否形成港商与外商的税收差别待遇问题。我国与外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减免税。港商来源于内地的所得在香港不征税，其实际在内地的税负就成为其最终的负税水平。因此，港商与其他外商于内地投资在税收上是否有不同的待遇，不应简单地将内地税制与税收协定待遇加以比较，而应结合其在居民国征税的情况看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

26日　国务院决定组建石化产业集团公司

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金陵石化、扬子石化、仪征化纤、南化集团组建石化产业集团公司。南京地区的上述4家企业在地理位置上彼此相邻，在原料供应、产品生

产和销售等方面互为配套，但由于分属不同行业主管，导致4家企业不能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和生产能力。这次合并是国家落实“抓大放小”战略的具体体现。新成立的东联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达450亿元。

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提出如下要求和规定：(一)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第二，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第三，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大稳定、小调整”是指在坚持上述第二条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二)认真整顿“两田制”。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地方搞“两田制”，把土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主要是为了解决负担不均和完成农产品定购任务难等问题。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搞的“两田制”实际上成了收回农民承包地、变相增加农民负担和强制推行规模经营的一种手段。中央不提倡实行“两田制”。没有实行“两田制”的地方不要再搞，已经实行的必须按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认真进行整顿。(三)严格控制和管理“机动地”。在延长土地承包期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增加乡、村集体收入，随意扩大“机动地”的比例，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对预留“机动地”必须严格控制。(四)严格加强对土地承包费的管理。延长土地承包期和进行必要的“小调整”，不得随意提高承包费，变相加重农民负担。

9　月

2日　国家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1998年底以前，地级以上城市要建立起这项制度；1999年底以前，县级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镇要建立起这项制度。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逐步使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各地要本着既保障基本生活、又有利于克服依赖思想的原则，按照当地基本生活必需品费用和财政承受能力，实事求是地确定保障标准。保障标准由各地民政部门会同当地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并且随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所定标准要与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标准相衔接。

6日　国家计委调整食糖生产和流通政策

国家计委《关于调整食糖生产和流通意见》提出：(一)保护农民利益，扶持糖料

种植。把广西、云南、新疆以及广东湛江地区的糖料开发列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专项，予以重点扶持。继续进行糖料基地县的建设，适当加大投资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国有商业银行要根据糖料收购进度，积极落实收购资金，确保收购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二）理顺食糖产销体制，加强协调管理。为理顺食糖产销体制，建立新型的产销关系，应按照贸工农一体化的方向，深化食糖产销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以规模大、效益好的制糖企业和国有糖酒公司为龙头，连接糖料生产、食糖生产和流通为产代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集团化经营管理体制。成立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有关单位参加的食糖产销（部际）协调小组，负责糖料和食糖生产流通中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协调。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食糖的生产和流通工作。（三）进一步加强对食糖进口的管理。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各种贸易方式进口食糖均纳人国家进口总量进行管理。严禁外商以食糖作为投资物品进口。加强对加工贸易食糖进口的管理。加工贸易进口食糖必须在 3 个月内返销出口，不得转为内销；擅自内销者，按走私论处。

11 日　国务院通知切实做好 1997 年度棉花工作

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 1997 年度棉花工作的通知》要求：（一）稳定棉花收购政策，保护农民利益。1997 年度棉花政策总的要求是：继续坚持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经营，不放开价格，坚决做到不停收、不限收、不拒收、不压级压价，不抬级抬价。继续实行由供销社棉花经营企业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经营棉花的政策。（二）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鼓励纺织企业多用国产棉。要压缩供销社的棉花经营流通费用，降低供应价格，增强国产棉对纺织企业的吸引力。规范棉花加工贸易进口管理。从 1998 年起，各种贸易方式进口棉花全部纳人国家进口总量管理。加工贸易进口棉花，其制成品必须出口，不得内销。（三）进一步深化棉花体制改革。继续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供需双方直接见面、双向选择棉花供应方式。深化棉花供应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由集中交易为主转向长年交易为主，把棉花交易会办成全国棉花交易市场。

12 日—18 日　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江泽民总书记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在阐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时，强调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的含义，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报告》强调，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

总的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挥各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加大调整、改造加工工业的力度，振兴支柱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同开拓市场结合起来，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鼓励和引导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29日 外贸部等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作出规定

为了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含收购国内企业资产或股权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出资加强管理，外贸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明确：（一）对通过收购国内企业资产或股权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支付全部购买金。（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者均须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和期限同步缴付认缴的出资额。因特殊情况不能同步缴付的，应报原审批机构批准，并按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分配收益。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控股（包括相对控股）的投资者，在其实际缴付的投资额未达到其认缴的全部出资额前，不能取得企业决策权，不得将其在企业中的权益、资产以合并报表的方式纳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表。《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 月

1日 我国再次较大幅度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税率

根据国务院决定，自1997年10月1日起，我国再次较大幅度自主降低关税。此次降税涉及4874个税号的商品，降幅达26%，关税平均水平由23%降至17%。经过这次降低税率，我国按工农业产品分类的产品算术平均税率为：农产品为21.2%，其中原料为16.5%，半制成品为24.2%，制成品为27%；工业品为16.4%，其中原料为7.3%，半制成品为13%，制成品为19.2%。粮、棉等某些关系重大的农产品税率仍维持现行税率不变。

我国自1992年以来，已4次大范围地自主降低关税税率：1992年底降低了2898个

税号的关税税率；1993年底降低了3371个税号的关税税率；1996年4月降低了4900个税号的关税税率。

15日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部分中资企业保留一定限额的外汇收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1997年10月15日起，允许中资企业中部分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和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型企业保留一定限额的外汇收入。申请保留一定限额外汇企业的条件是：（一）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经贸公司年进出口总额在等值3000万美元以上、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型企业年进出口总额在等值10000万美元以上，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二）外经贸公司或生产型企业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法人。（三）企业财务状况良好。企业外汇结算账户可以保留的最高限额由外汇局核定，不得转让。企业外汇结算账户可以保留的最高限额为本企业上年进出口总额的15%。该账户的余额不得超过所核定的限额，超出最高限额部分必须办理结汇。

20日 国家计委等提出加强农用运输车管理的意见

《意见》提出：（一）“九五”期间，各级政府、各部门一律不得审批新的农用运输车整车厂点和多缸发动机厂点。现有生产企业要上四轮农用运输车整车和多缸发动机项目，不论是基本建设还是技术改造，不分内资还是利用外资，都视同汽车项目进行管理；投资不分限上限下，一律要经机械部提出初审意见，由国家计委或国家经贸委审批，重大项目报国务院审批。（二）凡未经国家批准的项目，机电产品进口管理部门不得发放项目所需进口设备和工装模具的有关证明，海关不得放行；行业主管部门不得将项目内车型列入“产品目录”；有关部门不得核发牌照；各级银行不得安排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三）国家对农用运输车行业将采取鼓励兼并、促进联合、发展规模经济、提高规模效益的政策，以改变目前厂点多、规模小的状况。对在兼并联合中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国家将在筹集发展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以加快其发展。

22日 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降低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决定从10月23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的利率。这是自1996年5月和8月，中国人民银行两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后连续第三次下调利率。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为适应物价的变化，进一步减轻企业利息负担。中国人民银行在公告中严禁各金融机构擅自提高存、贷款利率，或以手续费、协储代办费、吸储奖、有奖储蓄以及贷款保证金、利息备付金、加收手续费、咨询费等名目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此次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年利率平均下调1.1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的年利率平均下调1.5个百分点。

11 月

3日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考察上海纺织行业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上海考察纺织行业，并召开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三省一市负责同志座谈会。朱镕基指出，当前要把纺织行业的压锭、减员、增效作为国有企

业改革的突破口。纺织行业全国压缩1000万落后棉纺锭的任务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推进。沿海省市要压缩480万锭，1997年准备，1998年推开，1999年扫尾，提供范例。内地要压缩520万锭，1998年准备，1999年铺开，2000年全面完成压锭任务。在此后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对纺织行业的扭亏解困采取多方面措施。一是每压1万锭补贴300万元，提供贷款200万元，其中补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贷款由地方财政贴息。二是妥善安排下岗职工。三是加大兼并破产力度。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要重点向纺织行业倾斜。四是支持和扩大纺织品出口。1998年要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给纺织品自营出口企业一定比例的美、欧纺织品被动配额，并赋予其主动配额和被动配额的投标资格。五是鼓励纺机出口，实行出口信贷和全额退税。

京九铁路通过国家验收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纵贯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等9省市，正线全长2397公里，加天津至霸州和麻城至武汉联络线在内，全长共2553公里，同时还有合肥至九江280公里，作为京九铁路中段的分流线。修建京九铁路的构想始自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提出在京广、京沪铁路之间修建第3条南北铁路大干线的计划。那时的京九是指北京至九江（即“小京九”）。以后因种种原因，计划搁浅。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原铁道部副部长邓存伦等人提出将北京至九江铁路延长至香港九龙（即“大京九”），并力争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全线贯通的方案。1991年4月，京九铁路被列入国家“八五”计划，正式成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993年5月，京九铁路正式动工；1995年5月北段铺通，同年11月全线贯通；1996年4月1日全线投入货物运输，同年9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京九铁路连通京山、京秦、京包、石德、陇海、浙赣等铁路干线，是中国京广、京沪两大干线之间纵贯南北的又一条通道，也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线路最长的双线铁路干线。京九铁路设计为一级干线、双线铁路，总投资近400亿元。京九铁路建成后，其运输能力为北京至安徽阜阳间7000万吨，阜阳至江西向塘西5000万吨，修建复线后可形成5000万吨运力。

8日　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胜利实现大江截流。大江截流成功，标志着三峡水利枢纽一期工程顺利完成，并转入二期施工。长江三峡工程静态投资570亿元，动态投资约2300亿元；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共装有70万千瓦的巨型发电机组26台，年发电量840亿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工程自1994年12月份开工，200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2009年全部竣工，工程历时15年。

10日　齐鲁石化大兼并

齐鲁石化公司兼并淄博化纤总厂与淄博石化厂协议书签字仪式在山东省淄博市举行。此次兼并，因涉及债务总额30多亿元，盘活资产存量近20亿元，成为建国以来最大一起企业兼并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出席签字仪式并作讲

话。吴邦国指出，淄博化纤总厂与淄博石化厂由于投资建设完全靠银行贷款，基本无资本金，资产负债率过高，企业一投产就陷入困境。这样的企业不仅现在无法参与竞争，而且从长期发展看，也无法生存下去。这次齐鲁石化兼并淄博两厂，以及上市发行股票，既解决了资本金问题，又为齐鲁石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更重要的是，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过重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途径。吴邦国强调，如何妥善解决这类遗留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内结构调整和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关键所在。在目前体制环境下，只能是把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齐鲁石化公司对淄博两厂的兼并是现行体制下综合运用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的一个有益探索，它与南京地区四大化工企业的联合一样，对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整体搞活国有经济，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但是，企业之间进行兼并要从实际出发，按市场规律办事，实现优势互补，绝不能搞“拉郎配”，绝不能一哄而起。

12 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事会暂行规定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事会组织进行规范。《暂行规定》明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事会是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派出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保值状况进行监督的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审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财务报告，监督、评价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董事长、行长的经营业绩进行监督和评价，并提出任免及奖惩建议等。监事会对人行负责，并定期向人行报告工作。监事会由人行代表，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审计署、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有关部门代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代表及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组成。

14 日　国务院证券秀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证券投资基金法规性文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正式发布。制定和颁布该办法的宗旨是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保护基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共分 7 章 57 条，内容包括：总则、基金的设立、募集与交易、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投资运作与监督管理、罚则及附则等。办法规定，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必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关于基金设立的形式，可以是开放式基金，也可以是封闭式基金；基金托管人，限定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

17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对解决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做出具体部署。会议的目的是正确估量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做到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步伐，坚定决心，增强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依法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清醒地看到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金融体制还不能适应经济改革和发展新形势的要求，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比较混乱，

乱办金融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搞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键。

29日　财政部等对“三金”纳税问题作出规定

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发文规定，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金融机构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和基本养老保险金，不计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比例缴付的“三金”，应将其超过部分并入个人的当期工薪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提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和基本养老保险金时，可免征个人所得税。同时还规定，企业以现金形式发给个人的住房补贴、医疗补助费，应全额计入领取人的当期工薪收入，并按章纳税。但对外籍个人以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仍可按规定暂时免征个人所得税。规定从1998年元月1日起执行。

12　月

1日　南昆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南昆铁路东起南宁，南至昆明，北接红果，全长899.7公里，为国家长大干线，一次建成电气化，年输送能力近期为1000万吨，远期可达3000万吨。南昆铁路交柳州、昆明铁路局运营归管。

2日　国务院对1998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编制提出要求

（一）1998年要积极稳妥地安排财政收入。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财政收入的增幅要不低于国民经济的增幅；努力开辟财源。在调整和优化结构的基础上，培育新的财源增长点；完善税制，控制税收减免，取消到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减少税收流失，增加税收收入；通过国有企业“三改一加强”，促进企业加强财务和成本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扭亏增盈，增加财政收入。（二）1998年财政支出的增长要低于财政收入增长，中央财政赤字要在上年的基础上缩小100亿元，地方财政要收支平衡，力争略有结余；在坚持量入为出、控制总量的基础上，保证重点支出、压缩一般支出，加大调整支出结构的力度。1998年财政支出安排的重点是；第一，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对国有企业分流富余人员和下岗职工，财政要安排必要的支出，采取财政、企业、社会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培训。支持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增加银行呆账准备金，将尚未转完的“拨改贷”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第二，保证粮食政策的落实。各地要按中央规定比例足额安排并增加粮食风险基金。第三，适当调整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和个别行业出口退税政策。第四，保证工资政策的落实。对1997年行政事业单位职工正常晋档晋级、调整基础工资翘尾部分和1998年连续5年考核合格的公务员晋升级别工资等，在预算安排中要予以保证。

3日　国家计委颁布水利产业政策

国家计委颁布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第一项产业政策《水利产业政策》，并于发布之日起实施，至2010年止。《水利产业政策》共五章，分别为：总则；项目分类和资金筹

集；价格、收费和管理；节水、水资源保护和水利技术；实施。该《政策》针对我国水利建设和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政策措施。

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文取消217个基金项目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精神，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经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批准，财政部与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审计署、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取消的各种基金（附加、收费）项目的通知》，共取消217个基金项目，预计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30多亿元。此次被取消的基金项目主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未按国家规定报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越权设立的各种基金，包括资金、附加和专项性收费，其项目数量大约占目前全国各地征收的基金总数的1/3。

8日　我国首次成功发射两颗铱星

我国自行研制的“长二丙”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成功地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制造的两颗铱星送人预定轨道。这是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承揽铱星发射合同的首次商业发射，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9次发射。

9日—11日　中共中央、日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确定，1998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宏观调控，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安排好生活，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998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二）打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三）积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加速实现国民经济合理化布局，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四）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符合我国产业政策，能够带来高新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的设备进口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六）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维护城乡社会稳定。妥善安排下岗职工和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抓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地级以上城市1998年都要将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起来。

9日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周颁布国有企业破产资产评估暂行规定

《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资产评估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破产企业的评估程序和范围包括：经批准进入破产程序的国有企业，应在法院受理企业破产申请之后，由清算组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资产评估立项，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经清算组审核后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验证确认。破产企业评估方法及原则是，破产企业资产评估，一般应采用清算价格法。在评估过程中应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还对破产企业资产评估基准是以人民法院宣判企业破产并发布公告之日为准。资产评估结果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不超过6个月。《规定》还对破产企业资产评估若干重要问题包括流动资产、待摊费用和递延资产、长期投资、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及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非经营性资产的评估、抵押资产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处理原则。

17 日　劳动部提出新的就业方针

劳动部在全国劳动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的就业工作方针，把过去的劳动部门帮助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劳动者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方针转变为“以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统筹安排城乡劳动力为出发点，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实行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劳动者自主就业是指劳动者个人是市场就业的主体，有宪法赋予的就业的权利和择业的自由。市场调节就业是指通过培育与发展劳动力市场，以市场机制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实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双向选择。政府促进就业是指政府通过宏观经济与就业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经济，包括第三产业、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实行积极的就业服务，扩大投人，健全和发展就业服务体系；采取必要措施，帮助下岗职工和其他特殊群体实现就业。

18 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 1997 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在会上讲话时说，1996 年是新财税体制确立的第三年，财政工作已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初步确立了稳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机制；两套税务机构的关系已基本理顺；各级政府的理财思路发生明显转变。1996 年以来，调整了部分税收政策，实行了新的关税税则，关税税率的总水平降低 35%，下调到 23%。进一步完善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财税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整顿财税秩序取得初步成效。当前财政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收入方面，主要是税收流失还很严重，企业欠税增加。在支出方面，主要是约束不严，控制不力，增长过猛，铺张浪费相当严重，国家有限的财力难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1997 年的国家财政收支计划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把发展经济与开辟财源结合起来，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把控制支出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努力节减一切可节减的支出；把深化财税改革与振兴国家财政结合起来，逐步增加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把强化财税管理与整顿财税秩序结合起来，使财政工作逐步走上依法理财、依法管理的道路，全面完成各项财政工作任务。1997 年财政收支计划安排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全面强化税收征管，使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坚持量人为出，控制支出总量，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需要，反对铺张浪费，使财政支出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进一步压缩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大力整顿经济秩序，继续深化财税改革。

26 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取消贷款限额控制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1998 年起，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的管理体制。1998 年对国有商业银行不再下达指令性贷款计划，而改为按年（季）下达指导性计划。这个指导性计划作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监测目标，供各家商业银行执行自编资金计划时参考。各商业银行筹集的资金，由各行依法

自主使用，按照信贷原则和国家有关政策发放贷款。流动资金贷款，视资金能力自行安排；固定资产贷款，1997年底前承诺的，由各行继续执行，对新的项目贷款，由商业银行自己掌握，自主审查发放。各国有商业银行以法人为单位对资金来源与运用实行自求平衡。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货币供应量目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信贷政策和自身资金承受能力，按年分季编制全行资金计划，逐级下达分支机构执行；同时，要加强对全行资金的统一调度，采用有效办法，控制分支行的资金运用。

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价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价格法》分别规定了经营者的价格行为、政府的定价行为、价格总水平调控、价格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及附则等七章。自1998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家计委发布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从实现产业比例关系的协调转向全面提高产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为了适应这一重大变化，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国家产业政策体系，国家计委颁布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确定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的原则是：(一）符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市场需求，有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二）有比较高的技术含量，有利于企业设备更新，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三）国内存在从研究开发到实现产业化的潜在技术基础，经过努力，可以填补国内产业和技术空白，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四）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资源节约以及生态和环境保护；（五）供给能力相对滞后，提高其供给能力，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着上述原则，国家当前重点鼓励29个领域，共440种产品、技术及部分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发展。《目录》是国家引导投资方向，改善投资结构以及审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的主要依据之一。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进口设备免税的范围是：（一）对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并转让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二）对符合《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国内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三）对符合上述规定的项目，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也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目录》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1月10日起试行。

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1997年国民经济的主要特点是：1.国民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47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8%。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0.8%，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8%。这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继上年实现“软着陆”之后，

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态势。2. 社会总供求关系趋向宽松，买方市场格局初步形成，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3. 经济结构调整有新的进展，经济效益开始回升。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方面，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联合、兼并取得新进展。4. 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状况良好。5. 居民收入增加，生活继续改善。

199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在主要问题是：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产业结构还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济效益仍处于较低水平；下岗职工较多，再就业压力加大；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一份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是：

一、农业获得较好收成。199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仍达49250万吨，比上年减少122万吨，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经济作物产量有增有减。在棉花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由于主要棉花产区气候条件好，单产提高，总产量达430万吨，比上年略有增加。农田水利蓬勃发展。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21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23万公顷，节水100亿立方米。

二、工业生产在改革调整中保持平稳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31752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11726亿元，比上年增长7.1%。产品结构有所调整，技术含量高、市场需求较旺的产品增长较快。全年新产品产值率为5.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企业扭亏增盈取得一定效果，利润增加，盈亏相抵实现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16.8%，其中国有企业增长11.9%。工业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还不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积压问题仍然突出。1997年末，全国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592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7%。企业亏损问题依然严重。1997年末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341亿元，比上年末上升11.1%，其中国有企业亏损744亿元，上升8.2%。

三、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平稳增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53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8.3%）。其中，国有经济投资13419亿元，增长11.3%；集体经济投资3873亿元，增长5.8%；城乡居民个人投资3427亿元，增长6.7%；其他经济类型投资4581亿元，增长13.2%。按投资管理渠道划分，基本建设投资9863亿元，比上年增长14.5%；更新改造投资3870亿元，增长6.8%；房地产开发投资3106亿元，下降3.4%。投资结构呈现出一些积极的变化，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得到加强，比重上升。全年农林牧渔水利业投资470亿元，比上年增长40%；能源工业投资3575亿元，增长21.7%；运输邮电通信业投资3288亿元，增长14.8%。西部地区投资增速加快，所占比重上升1.1个百分点。投资效益有所提高。全年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建成投产项目86181个，新增固定资产8271亿元，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0.2%，提高1个百分点。

四、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继续平稳增长，全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增加值为4525亿元，比上年增长10.7%。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综合运输能力得到加强。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货物周转量38232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4.9%。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87846万吨，比上年增长3.1%，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35915万吨，增长12.5%。邮电部门业务总量全年完成1779亿元，比上年增长33.3%。数字数据业务、电子数据交换业务继续高速发展，数据通信总用户达到36万户。

五、商品市场在买方市场格局下继续保持平稳。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843亿元，比上年增长11.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全国432家重点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全年销售收入净额2350亿元，比上年增长8.3%。但经营效益仍未改观，全年利润总额44亿元，比上年下降5.9%。

六、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全年进出口总额32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1%。进口商品中技术密集型和资源性商品迅速增长。实际利用外资继续增长。全年利用外资协议额6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4.2%。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7%。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增加，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比重加大。国际旅游业取得新的成果。全年海外旅客入境人数为5759万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4%。

七、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深化，货币调控方式不断改进，金融形势保持稳定。1997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8239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940亿元，增长18.6%。各项贷款余额为74914亿元，增长16.7%。全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188只，共发行106亿股，筹资655亿元。通过发行B股、H股和对外发行债券，吸收外资81亿美元。全年共发行国债2412亿元。保险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全年保费收入1080亿元，增长39.3%。

八、科学技术和教育。科技队伍继续扩大。1997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914万人，比上年末增长0.4%。科技经费投入增加。1997年，全国科技机构、高等院校、大中型工业和建筑企业等单位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为961亿元，比上年增长8.6%。国家技术创新工作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国家组织完成了115项技术创新项目，组织实施了1296项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34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继续加强。1997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含诊所）32万个，床位314万张。卫生技术人员440万人。

十、环境保护事业加快发展。年末全国环境保护系统共有9.9万人，各级环境监测站2170个，环境监测人员3.7万人。自然保护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全国自然保护区达932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24个。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第一阶段目标已基本实现，水质趋于好转。

十一、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9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6%。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迅速。年末全国有8770万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全国330多个城市已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共有192万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济。

1997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国家计委确定了1997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129项），*为1997年新增项目。

煤炭项目（19项）：山西古交矿区　山西阳泉矿区　山西晋城矿区　山西华晋离柳矿区沙曲矿井　内蒙古准格尔矿区一期　内蒙古平庄矿区元宝山露天矿及其配套工程　黑龙江七台河矿区黑龙江双鸭山矿区　安徽淮南矿区　安徽淮北矿区　山东充州矿区　山东枣藤矿区　河南平顶山矿区　郑州矿区（部城矿井、配套工程）　河南永夏矿区　宁夏灵武矿区（灵新大井、配套二程）　神府东胜矿区　*河北蔚县矿区　*甘肃华亭矿区

石油项目（6项）；黑龙江大庆油田开发　辽宁辽河油田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开发　新疆油田开发　新疆塔里木盆地开发　陕甘宁长庆油田

电力项目（35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　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天生桥水电站二级　四川二滩水电站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　西藏羊湖抽水蓄能电站　青海李家峡水电站　四川宝珠寺水电站　山西阳泉二电厂　内蒙古伊敏煤电联营一期工程　辽宁绥中电厂　上海外高桥电厂　江苏彭城电厂　山东邹县电厂三期　江西丰城电厂　甘肃靖远电厂二期　黑龙江鹤岗电厂　宁夏大坝电厂二期　浙江泰山核电站二期工程　华能北京热电厂　江苏扬州第二电厂　浙江北仑港电厂二期　河南鸭河口电厂　贵州安顺电厂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　*天生桥水电站一级　*河北邯峰电厂　*河北三河电厂　*山西阳城电厂　*内蒙古达旗电厂二期　*吉林双辽电厂　*湖北襄樊电厂　*湖南湘潭新电厂　*云南曲靖电厂　*陕西宝鸡第二发电厂

水利项目（8项）：太湖综合治理骨干工程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甘肃引大入秦工程（地方项目）　湖南江垭水利枢纽工程　新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　*甘肃疏勒河农业灌溉及移民综合开发（地方项目）　*淮河治理（怀洪新河、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近期工程）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

铁道项目（15项）：侯月线　焦柳复线（焦枝复线、襄石复线、石长线）　徐连复线　湘黔复线及电化　南昆线　成达线京广线京郑段电化　成昆线电化　宝成复线　横南铁路　哈大线电化　*邯济线　*安徽芜湖长江大桥　*西安——安康线　*南疆铁路

交通项目（18项）：大连港大窑湾港区一期（含商检设施）　秦皇岛港煤码头四期（含商检设施）　烟台港西港地二期（含商检设施）　连云港港墟沟港区一期　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二期　上海港　广州港新沙港区一期　天津港（地方项目）青岛港前湾港区二期工程　京深高速公路（地方项目）[石艺（安阳）段、安新段、*湘潭至耒阳段]　湖南湘江航运二期工程（地方项目）　福建泉厦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江苏江阴长

江公路桥（地方项目） 黑龙江哈同公路（地方项目） 川藏公路 *厦门海沧大桥 *广西西江航运二期工程（地方项目） *京沈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宝抵—山海关段

民航项目（2项） 首都机场航站楼工程 *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地方项目）

钢铁项目（3项）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三期 *广州珠江钢铁有限公司 *梅山冶金公司炼钢工程

有色项目（1项） *江西铜业公司贵溪冶炼厂

化工项目（4项）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30万吨乙烯工程 河南平顶山尼龙66盐项目（地方项目）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大化肥项目 *广西鹿寨化肥厂

石化项目（3项）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大化肥项目 广东茂名乙烯工程 辽宁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聚酯工程

建材项目（1项） *天津振兴水泥厂

轻纺项目（2项） 广西南宁纸厂（地方项目） *吉林腈纶工程

医药项目（1项）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青霉素工业钾盐工程

机电汽车项目（2项）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轿车项目 九〇八工程

林业项目（1项） “三北”防护林三期工程

教育项目（1项） *高等教育“211工程”

卫生项目（1项） 卫生部疫苗工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产研究疫苗生产线、上海生物疫苗生产线、兰州生物疫苗生产线）

农业项目（1项） 农垦100亿斤商品粮项目

其他项目（5项） 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等

1998年

1 月

12日 我国海洋油气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

我国海洋石油工业1997年共完成原油1664.7万吨，天然气40.5亿立方米，总油气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达2069.7万吨。1997年海洋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比1996年增产127.7万吨和13.6亿立方米，在全国油气增长量中分别占42%和65%。

13日 朱镕基重申人民币不会贬值

全国银行、保险、证券系统行长（经理）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就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今年经济金融改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1997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1998年的国民经济形势一定会比1997年更好。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时，朱镕基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充满信心。他再次重申，人民币将保持稳定，不会贬值，这也是中国对亚洲金融稳定做出的贡献。

14日　李鹏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李鹏出访荷兰，在荷兰金融界欢迎午宴上发表讲话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久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世界许多地区，其影响至今尚未过去。在这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香港受到冲击，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功地捍卫了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了香港金融的稳定。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内地经济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但我们并没有低估这件事情，对可能产生的一些滞后影响是有警惕的，我们吸取这次金融风波的教训，研究制定了必要的防范对策。

在谈到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保持了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原因时，李鹏说，第一，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中国一度出现过高通货膨胀和某些领域的过热现象，但是我们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及时采取了措施，进行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效果。第二，中国采取了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建设需要出发，我们引进了一些外资，累计大约有3600亿美元，其中2200亿是直接投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对这些债务我们完全有偿还能力。一方面这是因为我们有14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这些债务大多是中长期贷款和项目贷款，而且不少是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借贷或由政府间安排的借贷。因此，中国不存在还债危机问题。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当然，中国也会为此付出一定代价，这主要是指对出口的影响。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降低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人民币不贬值有利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形势的稳定，中国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16日　ATM交换机通过鉴定标志我国电信与世界同步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第一台ATM交换机在北京通过鉴定。我国的这一技术达到了目前世界先进国家同类产品的同等水平。ATM交换机又称异步转移模式交换机，它是继程控交换机、数据分组交换机之后的新一代交换技术。它既可用于电话交换，也能用于数据交换、图像传输，具有极高的信息传输速度。利用ATM交换机，可以大大提高带宽的利用率，大大降低通话成本。北京邮电大学与上海贝尔公司签订协议，由上海贝尔公司批量生产ATM交换机，这意味着该技术已实现产业化。

17日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金融机构加大农业信贷投入

中国人民银行颁发《加大信贷投入、强化信贷管理，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要求国家银行新增支持农业发展的贷款不低于新增全部贷款的10%，农村信用社用于种植业的贷款不低于全部新增贷款的40%，对农村信用社社员的贷款不低于贷款总额的50%。通知强调，有关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及对高产、优质作物生产的信贷投入力度，积极支持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为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对资金需求量大、一家金融机构难以承办的企业和项目，可根据企业要求和《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的规定，为其组织银团贷款。

19日　财政部颁布行政单位财务规则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颁布《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于颁布之日起在全国施行。《规则》分为总则、单位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结余管理、资产管理、应缴款项目和暂存款项目管理、行政单位划转撤并的财务处理、财务报告和财务分析、财务监督、附则，共11章49条。《规则》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改革行政单位预算管理办法。将现行单位预算管理只对财政预算拨款包干的办法改为“收支统一管理，定额、定项拨款，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预算管理办法。取消预算包干结余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规定，规定行政单位的结余全额结转下年继续使用。改革行政单位收入管理办法。规定行政单位要将财政专户核拨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和经核准留给单位使用的预算外资金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与财政预算拨款一起，统一管理，统筹安排各项支出。

20日　国家计委提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十条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在东南亚出现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要继续按照中央的部署，务必使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进出口总额继续增长，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实现这个目标，当前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首先要保持必要的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重点增加农林水利建设，铁路、公路、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投入，提高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加快普通民用住宅建设。同时，要合理引导居民消费，扩大消费需求。在扩大内需时，要坚持和完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把握调控力度，适时进行微调。1. 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农林水利建设。水利建设重点是加强中小水利设施的维护和建设。2. 增加必要投入，加快铁路、公路、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铁路建设投资由原计划的380亿元增加到450亿元，主要用于在建项目的投资，并力争新开工几条复线建设。公路投资也比原计划增加30%。3. 加大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加技术改造贷款。4. 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大普通居民住宅建设力度。抓紧提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停止福利分房制度，建立新的住宅消费模式。扩大住房抵押贷款范围。5. 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整顿乡镇企业税外收费，减轻乡镇企业负担，对乡镇企业在信贷，出口、市场融资、利用外资等方面要给予必要的支持。6. 努力扩大外贸进出口，保持出口继续增长。积极推进大中型生产企业实行自营出口，对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企业，赋予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继续提高出口产品退税率。为鼓励加工贸易使用国产原材料，建议比照钢材、棉花的办法予以退税。7. 稳定吸收外资规模，合理引导外资投向。推进多种引资方式的试点，抓紧制定法规，引导外商投资更多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和中西部地区。8. 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加强外汇管理。清理到期债务。完善外汇市场交易，适当扩大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试点的范围。9. 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改进呆账准备金提取和管理办法，从1998年开始，只对逾期一年以内的贷款计提应收未收利息，呆账准备金改为按年末贷款余额1%提取。增加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降低商业

银行存款准备金比例。10. 加大再就业工程实施力度，努力保持社会稳定。要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失业保险金缴费率。失业保险金缴纳比例，建议 1998 年由占工资总额的 1%提高到 3%，由企业单方缴费改为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其中个人缴纳 1%，企业缴纳 2%。根据下岗人员的不同情况，地方和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提前退休、内部退养、优先招用本企业下岗职工等项分流政策。

《意见》提出，实施上述措施，需要对 1998 年的投资、财政、信贷等方面作必要调整，主要是：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比上年增长 15%左右。增加财政拨款，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中小水利建设、节水灌溉、灌区改造和配套种子工程、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以工代赈等。增加银行贷款规模，主要用于增加铁路、公路、城镇住宅、技术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购房抵押贷款等。适当调整铁路货运价格和城市供水、农用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所得收入用于铁路建设和城市供排水工程、农田水利建设。增发铁路、公路债券。这些安排作为 1998 年计划执行中的调整，原计划不作修改。

22 日　中国人民银行确定 1998 年信贷重点

1998 年信贷重点为：对国家银行贷款指导性计划 9000 亿元；国家银行新增农业贷款不低于新增全部贷款的 10%；住房贷款规模达 1000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表示，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之后，人民银行将以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为导向，合理引导信贷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今年对国家银行贷款指导性计划是 9000 亿元，比去年实际新增贷款还要多出 800 亿元以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仍是金融支持的重点，今年国家银行新增农业贷款不低于新增全部贷款的 10%。农村信用社对农业贷款和对社员的贷款比例也要逐步增加。

各家银行将加大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力度。大力发展银团贷款，支持千户国有大型企业、120 户企业集团。对 111 个试点城市的企业兼并，继续实行优惠政策。全年计划核销银行呆坏账 400 亿元。加大支持纺织行业以及军工、煤炭、森工、机械、化工行业的改革力度。扩大保留一定限额外汇收入的中资企业范围。在优先支持国有重点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支持国有小企业，支持非国有企业发展。为了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计划今年外汇贷款比去年增加 70 亿—100 亿美元，增长 10%—15%。要适当控制外债增加，对一部分借外债、用外汇的基础建设项目，改为国内外汇贷款或人民币贷款。为了支持外贸企业扩大出口，商业银行要设法满足进出口企业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同时扩大政策性银行机电产品出口信贷业务。

23 日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将实行“四分开一完善”

国内贸易部部长陈邦柱指出今年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将实行“四分开一完善”的政策，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政挂账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粮食流通体制经过几次重大改革，但并未彻底改革“大锅饭”的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流通方面的责任也不够明确，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实行“四分开一完善”的具体任务就是政府对粮食的行政管理职能与粮食企业的经营分开，使粮食企业成为真正的经济实体。同时，积极培育粮食市场，坚持粮食销售渠道“一辅多主”的原则，建立

和完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保护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当前国有经济要在主要粮食品种的流通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增强控制力，由国有粮食企业承担粮食收购和市场供应的主要责任，特别是粮食的收购不得随意放开。国务院将进一步确定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1998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意见

《意见》提出的1998年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粮食总产量9800亿斤，棉花总产量8000万担；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乡镇企业稳定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5%，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主要内容包括：1. 稳定政策，深化改革，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1) 要重点落实好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第一轮承包到期的地方，都要无条件延长30年不变。(2) 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3)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2. 调整和优化结构，提高农村经济素质和效益。抓住当前粮食供给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逐步调整我国粮食生产的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粮食的品质，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重点支持现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逐步实现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全面提高乡镇企业的素质和效益，逐步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3. 加强基础建设，实施科教兴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1) 水利建设要始终把大江大河治理放在突出地位，重视中小河流的治理。大力推广各种节水灌溉技术。(2) 国家将较多增加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建立"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开发"的投入机制。(3) 加快治理黄河上中游地区、长江上中游地区、西北和华北北部风沙区等生态环境最严峻的地区。(4) 对农业发展的重点技术和关键技术，组织力量进行联合攻关，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国外新技术。鼓励农业科技单位和技术人员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技术承包等方式参与农业开发经营。(5) 各级财政要继续增加农业投入，增长幅度不能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确保及时足额到位。

2　月

26日　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重要讲话，会议通过拟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和拟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并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起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创造新业绩。

27日　国务院提出纺织工业解困扭亏三年目标

国务院发出《关于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从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纱锭1000万锭，分流下岗职

工1120万人，到2000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为实现纺织工业的产业升级和振兴奠定基础。1998年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完成压缩淘汰落后棉纱锭480万锭、分流下岗职工60万人、减少亏损30亿元的任务；1999年其他地区基本完成压缩淘汰落后棉纱锭520万锭的任务；2000年全面完成压缩淘汰落后棉纱锭、分流下岗职工的任务，全行业基本摆脱困境。为实现上述目标，《通知》提出了包括纺织品出口配额要向纺织自营出口生产企业倾斜、统一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的措施。

3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决定从1998年元月1日起将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3月19日，为了扩大纺织品出口、缓解纺织行业面临的困难，根据国务院的精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出《关于赋予生产企业“两纱两布”自营出口权有关事项的通知》，将赋予纺织企业“两纱两布”自营出口权的工作由试点阶段转入正常审批。申报及审批标准是：(1) 凡列人国家重点联系的1000户企业名单的“两纱两布”生产企业，只要提出申请，即赋予其“两纱两布”自营出口权。(2) 对其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纺织生产企业可以申请“两纱两布”自营出口权：①连续两年“两纱两布”出口供货额平均超过500万美元的国有大型纺织企业；②连续两年“两纱两布”出口供货额平均超过1000万美元的国有中型纺织企业；③对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新疆）可考虑适当放宽标准。

3　月

1日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议案。财政部将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采取这项措施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将达到8%。

5日—20日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总理李鹏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并通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财政部长刘仲藜关于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审议并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工作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做的关于法院的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思卿做的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为国家副主席，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是：拟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拟新组建的有4个部委；拟更名的有3个部委；拟保留的有22个部、委、行、署；改

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列入国务院组成部分序列的共有 29 个部、委、行、署。(1) 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有关部长任成员，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2) 专业经济管理部门。①保留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农业部、水利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②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现在广播电影电视部、航天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信息和网络管理的政府职能，并入信息产业部。成立国家邮政局，由信息产业部管理。③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保留国家航天局和国家原子能机构，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为国防科工委的机构。④将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国内贸易部、轻工总会和纺织总会，分别改组为国家煤炭工业局、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冶金工业局、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轻工业局和国家纺织工业局。这些国家局不直接管理企业，所制定的行业规划、行业法规以国家经贸委的名义发布。⑤电力行业已组建国家电力公司，不再保留电力工业部，电力工业的政府管理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国家粮食储备局改为国家计委管理的国家局。⑥将化学工业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⑦将林业部改组为国家林业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3) 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①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教委更名为教育部。②在劳动部的基础上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③不再保留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委的职能委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行。④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⑤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电视网络管理职能划出后，改组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局，列入国务院直属序列。(4) 国家政务部门。保留外交部、国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民政部、监察部和审计署。

10 日　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作的关于 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时说，国家财政状况正在发生积极变化。1997 年财政收入在连续四年较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有所提高；财政支出增幅继续低于收入增幅，中央财政赤字进一步压缩。预算执行的结果表明，经过几年来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国家财政状况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一是财政收入总量增势不减，增长结构逐渐趋于合理。1997 年，全国财政收入总量比上年增加 1234 亿元。从财政收入的增长结构看，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在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占比重已从 1994 年的 49.3%下降为 1997 年的 30%，个人所得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营业税在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占比重，则从 1994 年的 15.1%上升为 1997 年的 21%。这种情况表明，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财政收入正在呈现出多元增长格局，这将为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二是财政支出总量得到控制，支出结构有所调整。由于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1997 年财政支出增幅继续低于收入增幅，财政支出增长

过猛的势头进一步得到控制，中央财政赤字有所减少。同时，新增财政支出的使用着重增加了教育、科学、粮食风险基金、扶贫和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投入，并在弥补地方财政历史滚存赤字和解决其他遗留问题方面安排了较多财力，财政支出结构有所改善，维护了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为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家财政仍然面临较多的困难和问题：一是企业欠税数额仍呈上升趋势，如不妥善解决，将危及财政平衡；二是企业效益仍处于较低水平，拖欠银行利息增加，国有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过大所隐含的金融风险给财政收支带来了巨大压力；三是支出结构调整滞后，行政事业单位冗员过多已大大超过财政的负担能力，粮棉流通体制和工作中的问题使亏损补贴增加较多，财政负担沉重；四是财政监督的执法力度不够。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

1998年中央财政要在去年预算执行数的基础上，压缩财政赤字100亿元。1998年中央财政总收入安排5309.19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489.55亿元，增长10.2%。其中，中央本级收入4711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494.55亿元，增长11.7%；地方财政上解中央收入598.19亿元，比上年减少5亿元。中央财政总支出5769.19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389.55亿元，增长7.2%。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752.52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227.36亿元，增长9%；税收返还和补助地方支出3016.67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162.19亿元，增长5.7%。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460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100亿元。1998年财政预算安排确定了五个方面的保障重点：第一，确保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按照企业、政府、社会共同负担的原则落实资金，妥善解决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是事关国有企业改革成败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为此，各级财政根据目前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状况，对政府需要负担的必要支出作了优先考虑。同时，为保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城市企业分流人员，企业解困工资性贷款贴息，纺织行业压锭，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返还所得税补充流动资金等企业改革措施的落实，各级预算将相应增加支出。这些项目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支出175亿元，比上年净增支140亿元。第二，确保国家各项粮食政策的落实。1998年中央预算将增加粮食风险基金37亿元，地方预算也按规定作出配套安排，增加支出55.5亿元。第三，为促进对外开放，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今年将对高新技术项目和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内外资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设备和技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约减少进口税收100亿元。同时，为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将对纺织品出口等适当提高退税率，相应增加出口退税45亿元。第四，为保证农业、教育、科学等法律规定的重点项目支出增长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将相应增加支出240亿元。第五，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宏观经济的良好局面，继续贯彻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作的《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是好的，巩固和发展了“九五”开局以来的良好势头。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1）国民经济继续快

速增长，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4772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5%，第二产业增长10.8%，第三产业增长8.2%。物价涨幅持续走低，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8%，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8%。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进展，经济效益有所提高，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上年降低了5.2%。（2）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明显缓解。在北方大面积干旱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达到49250万吨。国家粮食库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棉花产量430万吨。肉类和水产品总产量分别为5354万吨和3561万吨，畜牧和水产养殖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长点和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18000亿元。（3）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继续发展。1997年一次能源达到13.4亿吨标准煤。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376万千瓦，电力供应基本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新建铁路交付营运里程896公里，电气化1916公里，复线551公里。新增公路里程350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13公里。公路旅客周转量达到5188亿人公里，大幅度超过了铁路的周转量。邮电通信是基础设施中增长最快、变化最大的领域。新增数字微波干线14400公里，电话交换机容量1961万门。移动通讯已成为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的移动电话网之一。（4）国家重点建设进展顺利。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工程成功截流。南昆铁路建成运营。南疆铁路西段工程加快建设。陕西到北京的天然气输气管道建成投产。兰（州）西（宁）拉（萨）通信光缆铺设完毕。（5）财政收入增加较快，金融形势保持平稳。全国财政收入完成8642亿元，财政支出9197亿元，增长15.9%。货币供应量增长17.3%。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2940亿元，增长18.6%；贷款增加10703亿元，增长16.7%。国家外汇储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年末为1399亿美元，比年初增加349亿美元。（6）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力度加大，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进展。各地加快了"抓大放小"的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2500户试点企业中，改制为公司的有1989户。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由58个扩大到111个。企业集团试点由57家扩大到120家。国有工业企业扭亏增盈取得一定效果，利税增加，盈亏相抵实现利润总额增长11.9%。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套的其他各项改革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330多个城市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7）对外贸易增长较快，利用外资的质量提高。1997年，我国对外贸易已居世界第10位。全年进出口总额32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1%，顺差403亿美元；其中出口1827亿美元，增长20.9%。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取得新进展。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全年实际利用外资640亿美元，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53亿美元，借用国外贷款120亿美元，运用境外发行股票等方式利用外资67亿美元。境外实际投资18.3亿美元，对弥补国内资源不足和带动出口发挥了一定作用。（8）科技教育蓬勃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转基因水稻配制成功，并应用于杂交水稻种生产。"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卫星发射成功。银河－Ⅲ巨型计算机投人运行。直径12英寸直拉单晶硅研制成功。环境保护取得明显进展。淮河治污第一阶段基本实现工业企业达标排放的预定目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限期推广使用无铅汽油。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843亿元，实际增长10.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3.4%和4.6%。全年城镇新就业700万人，下岗人员再就业245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1%。

1998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率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控制在3%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5%以内；财政收支差额比1997年缩小100亿元；货币发行量150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3450亿美元；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6‰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3.5%左右。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稳定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业的主要措施是：（1）进一步稳定和落实土地承包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食收购政策，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2）多渠道增加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3）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4）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5）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6）加快乡镇企业改革，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质量，重视环境保护。（二）提高工业运行质量，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保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适度增长，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搞好重点项目建设。1998年续建大中型项目381项，当年计划安排投资2829亿元，年内计划投产项目100项。（四）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五）加强财政收支管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8年财政收入9684亿元，财政支出10144亿元。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培育新的财源，完善税制，扩大税基，加强税收征管，严格依法治税，控制税收的减免，加强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搞好适时适度微调。（六）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七）加大再就业工程实施力度，继续改善人民生活。

16日　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决定设置专门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置9个专门委员会，它们是：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

21日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即日起改革存贷款准备金制度。这次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是中央银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措施。主要内容是，将现行各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存款账户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13%下调到8%；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法人统一存放，人民银行按旬统一考核。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是10多年前确定的，它的主要功能不仅是用于保证存款支付，更主要的是为了集中一部分资金以便中央银行用于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调剂。因此，准备金率过高。这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决定，是针对当前物价大幅下降、贷款利率相对偏高的情况而作出的。这次利率调整存款利率下降幅度很小，充分维护了存款人的利益；贷款利率下降幅度高于存款利率下降幅度，减轻了借款人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

23日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启动

首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开元证券投资基金和金泰证券投资基金，在证券交易所公开

上网发行。开元、金泰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契约型封闭式，存债期为 15 年，发行规模各为 20 亿元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分别为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均为中国工商银行。这两只基金发行成功后将申请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基金资产 20%投资于国债，80%投资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可流通股票。

25 日　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

为了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彻底清理和纠正各类证券交易中心和报价系统非法进行的股票、基金等上市交易活动，严禁各地产权交易机构变相进行股票上市交易。中国证监会的整顿方案提出了清理整顿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1. 有条件的挂牌企业，可按照市场价格赎回其流通股。2. 在自愿的前提下，鼓励其他企业收购有发展前景的挂牌企业的流通股，作为长期战略投资。3. 允许行业相同或相近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吸收合并资产质量较好、有发展前景的挂牌企业。此类挂牌企业的流通股，可在转换为上市公司的股份期满 3 年后上市流通。4. 少数效益较好、偿债能力强、具备发行企业债券条件的挂牌企业，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依法严格审批后，可将其流通股转换为企业债券。5. 对少数业绩较好、规模较大、符合上市条件的挂牌企业，可依法推荐单独上市；对一些业绩较好、行业相同或相近但规模不大的挂牌企业，可经过资产重组后推荐上市。6. 对不具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条件的挂牌企业，要动员现有股东（特别是内部职工）继续持有股份，享受股东权益。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要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督促其做好分红派息工作。7. 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全部业务清理完毕后，由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关闭。少数非法股票交易场所经整顿符合条件的，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可组建证券营业部。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3 月 25 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这次存款利率实行小幅下调，贷款利率降幅大于存款利率降幅。存款年利率平均下调 0.16 个百分点。活期存款和三个月、半年、三年、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不变；一年、二年定期存款利率小幅下调后仍高于同期个人外汇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平均下调 0.6 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中长期贷款利率下调幅度。这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决定，是针对当前物价大幅下降、贷款利率相对偏高的情况而作出的。这次利率调整存款利率下降幅度很小，充分维护了存款人的利益；贷款利率下降幅度高于存款利率下降幅度，减轻了借款人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

4　月

1 日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

根据农业部、财政部的通知精神，这次清产核资工作的对象和范围是乡（镇）、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主要任务是查清农村各类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产状况，摸清资产存量、结构、分布及效益状况，明晰所有权，改善和加强乡镇企业财务管

理工作，推动其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本结构的优化组合，提高资本运营效益，防止集体资产流失。

7月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企业债券发行与转让管理办法

为规范企业债券市场，防范企业债券风险，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了《企业债券发行与转让管理办法》。《办法》要求，企业申请发行债券，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项目可行性及风险分析报告、经审计的发行人及保证人近三年的财务报表、担保函、企业债券发行章程、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申报文件。发行的企业债券必须有担保。

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是：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和善于利用外资，重优化结构、重质量、重效益，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服务。根据上述方针，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基本要求是：适应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保持利用外资的一定规模，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引导外资投向，调整引进外资结构，为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和效益服务。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加大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适用技术的力度，推动产业升级。促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弥补资源不足。坚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保持必要的外汇储备。正确处理扩大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继续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努力完善外商投资的地区布局；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大胆引进和积极引导跨国公司投资；认真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市政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更要改善投资软环境；稳步利用国际证券市场引进外资。选择质量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到国际证券市场上市；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国家有步骤、有选择地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

17日　我国首次发布房地产价格指数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1998年第一季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指数。这是我国首次编制并向社会发布房地产价格指数。此次发布的第一季度房地产价格指数分为三类，包括土地出让价格指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全国土地出让价格指数为101.7，其中南宁市最高，为115.7，上海市最低，为95.3；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为101.3，其中重庆市最高，为110.6，兰州市最低，为97.1；全国房屋租赁价格指数为103.7，西宁市最高，为130.6，上海市与宁波市最低，均为93.8。此价格指数以去年同季价格为100得出。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分析，从这一季度价格指数情况看，房地产价格水平呈低幅增长之势，表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发挥作用，1992—1993年房地产热以来价格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涨幅逐年回落。

18日　国务院通知禁止传销经营活动

《通知》要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禁止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此前已经批

准登记从事传销经营的企业，应一律立即停止传销经营活动，认真做好传销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自行清理债权债务，转变为其他经营方式，至迟应于 1998 年 10 月 31 日前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逾期不办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对未经批准登记擅自从事传销经营活动的，要立即取缔，并依法严肃查处。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禁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

28 日　国务院任命首批稽查特派员

国务院派出的第一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及其助理培训班在中南海举行开班仪式，94 个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总会计师培训班同时开班。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会上宣布了稽查特派员任命通知，向 21 名稽查特派员颁发了任命证书。

5 月 7 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方案》。该方案规定，稽查特派员对国务院负责，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力。稽查特派员的职责是，以财务监督为核心，对企业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情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主要领导成员的经营业绩等进行监督。稽查特派员与企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主要任务是查账，不参与和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稽查特派员监督的具体内容是，检查企业领导人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情况；查阅企业财务账目和有关资料，审查验证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否真实，主要包括资产负债情况、还债能力、获利能力、利润分配、资产运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对侵犯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对企业主要领导成员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和记录，对企业主要领导成员的奖惩、任免提出建议。

7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条例》，稽察特派员由国务院派出，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以下简称业）行使监督权力。派入稽察特派员的企业，由国务院确定。对已派入稽察特派员的企业，不再按照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的规定派入监事会。条例共 29 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　月

18 日　国务院清理铁路地方建设附加费

针对有些地方擅自在国家铁路上开征铁路地方建设附加费或车站建设费，有的擅自扩大铁路地方建设附加费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造成铁路运价秩序混乱的状况，国务院决定对铁路地方建设附加费进行清理，取消未经国务院批准的铁路地方建设附加费或车站建设费。国务院重申国家铁路运价（包括国家铁路建设基金、附加费）的制定和调整权限在国务院，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未经国务院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辖市一律不得擅自开征铁路地方建设附加费或车站建设费。已经开征的，必须立刻停止；虽经国务院批准开征，但擅自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的，也必须纠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辖市已经征收的铁路地方建设附加费或车站建设费，必须全部用于国家批准的铁路建设项目；擅自挪作他用的，由有关部门从严查处。经国务

院批准征收的铁路地方建设附加费，一律作为国家资本金用于国家批准的铁路建设项目。

20日　财政部加强中央单位收费（基金）管理

财政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央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票据管理的通知》，决定从7月1日起，对中央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征收政府性基金实行统一票据管理的办法。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在京中央单位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或征收政府性基金，除财政部另有规定外，一律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或政府性基金票据。票据实行定期限量发放制度。财政部或财政部授权机构可以对中央单位票据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26日　中国人民银行恢复债券回购操作

交易对象包括各主要商业银行在内的25家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近期债券回购操作方向主要以融出资金为主，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资金要求，为其增加贷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7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十条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各金融机构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7年1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同时，要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调整信贷投向，正确处理好改进金融服务与加强信贷监督的关系、金融支持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及时、有效地增加贷款，提供多种金融服务，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 加大对农林水利的信贷投入。国家银行新增农业贷款力争达到全部新增贷款的10%左右。2. 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革中发展、3. 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再就业工作。各商业银行要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支持成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的问题。4. 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在建项目的信贷资金投入力度。探索多渠道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措施。5. 完善住房信贷体系，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加大住房信贷投入。只要贷款人符合贷款条件，商业银行均可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的范围内发放住房贷款。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对所有城镇普通商品住宅办理自营性个人购房贷款。6. 积极支持科技进步和技术改造。7. 进一步扩大国内买方信贷，并选择若干农业生产资料和耐用生活资料商品，进行消费信贷试点，逐步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品种和形式。8. 努力支持对外贸易，积极合理利用外资。9. 改进对企业的综合配套金融服务。10. 坚持信贷原则，防范金融风险。

审计署等八部门联合清查审计农发行和粮食系统有关问题

审计署、财政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粮食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发展银行和粮食系统新增财务挂账和其他不合理占用贷款问题进行清查审计。这次清查审计主要检查农业发展银行发放和管理粮棉油收购贷款情况，粮食系统新增财务挂账和其他不合理占用银行贷款情况，拟划转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资产、负债、损益情况。通过清查审计，查实粮食系统1992年3月31日以前挂账的消化及余额情况，1992年4月1日到1998年

5月底新增财务挂账和不合理占用农业发展银行贷款的数额，分清问题性质，明确责任，为消化财务挂账和解决不合理占用贷款问题提供依据。

6 月

1日 财政部等决定适当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为增强煤炭、钢材、水泥及船舶等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即日起适当提高上述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煤炭出口退税率调为9%；钢材出口退税率调为11%；水泥出口退税率调为11%；船舶出口退税率调为14%。

2日 江泽民谈国有企业“抓大放小”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二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研讨班结业式的讲话中指出：“放小”就是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国有小企业搞活，更好地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而决不是放弃国有小型企业，不是对它们撒手不管。也决不能把“放小”变成一种形式，就只知道拍卖。如果对国有小型企业统统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是违背“十五大”精神的。

5日 中央扶贫资金达到历史新寓

为实现争取1998年解决1000万元以上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扶贫目标，国务院决定，1998年新增扶贫资金30亿元，全年中央扶贫资金总量达到183亿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中央的要求，认真落实配套资金。

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从八个方面提出了要求：1. 统一思想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妥善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它关系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关系着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着眼，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把这件事情办好。2. 明确目标任务，加强宏观调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把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作为首要任务，并力争每年实现再就业的人数大于当年新增下岗职工人数，1998年使已下岗职工和当年新增下岗职工的50%以上实现再就业。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要把握企业兼并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节奏。企业拟定职工下岗方案，要同时提出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措施。夫妻在同一企业的，不要安排双方同时下岗；不在同一企业的，如果一方已下岗，另一方所在企业不要安排其下岗。3. 普遍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再就业服务中心用于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资金来源，原则上采取“三三制”的办法解决，即财政预算安排1/3，企业负担1/3，社会筹

集（包括从失业保险基金中调剂）1/3。4.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拓宽分流安置和再就业渠道。要把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饮食业、旅游业、家庭和社区居民服务业等，作为下岗职工的主要方向。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的，3 年内可免征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行政性收费。要把发展中小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作为促进再就业的重要途径。5.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完善失业保险机制，提高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能力，从 1998 年起将失业保险基金的缴费比例由企业工资总额的 1%提高到 3%，由企业单方负担改为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其中个人缴纳 1%，企业缴纳 2%。1998 年要在全国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养老保险基金调剂机制。要严格控制企业职工提前退休。6. 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强化再就业培训。7.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宣传教育。8. 切实加强领导，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顺利进行。

10 日　国家电力公司发行 29 亿元电力债券

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国家电力公司发行 29.07 亿元 1997 年国家电力公司债券。该债券以实名制记账式发行，发行期 30 天。在指定的发售网点，面向国内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发行。97 国电债为中央企业债券，期限三年，年利率 8%，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付息，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该债券由国家电力公司以中央电力建设基金及收益提供全额不可撤销担保，由中国电力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发行。

11 日　财政部等六部委公布第二批取消的 147 个基金项目

经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批准，并请示国务院领导同意，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审计署、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发布《关于公布第二批取消的各种基金（附加、收费）项目的通知》，取消 147 个基金项目。第二批取消的基金项目，主要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未按国家规定报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越权设立或不合理应予取消的各种基金，包括资金、附加和专项收费。预计一年可减轻企业负担约 120 亿元。《通知》明确，对已经宣布取消的基金项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权拒交。今后，各地区、各部门设立各种基金，必须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重要的报国务院批准。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一律不得设立各种基金。

17 日　世行为我国农业贷款 1.5 亿美元

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期限为 20 年的 1.5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国有农场商业化项目”。该笔贷款由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中间金融机构进行转贷，用于支持、加快上述企业现有生产设备的技术现代化以及建立新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相关产业，特别是农业产业的发展。贷款投放领域包括工业、农业等方面，基本没有行业限制，但借款人必须是国有农场参股 20%以上的企业或农业部农垦局企业控股或地方政府农垦部门监督下经营的企业。

22 日　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

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任中央金融工委书记。中央金融工委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它的职责是对金融工作实施领导、保证、管理、监督、协调。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方案，

《方案》指出，当前证券经营机构存在业务范围雷同、信托与证券混业经营以及挪用客户保证金、非法设立营业机构和违法违规经营等问题。这次清理整顿要实行证券经营机构与银行、财政和信托业彻底脱钩。主要内容是，实行证券经营机构分类注册、分类管理制度；规范证券经营机构的业务范围，逐步分离其非证券业务；根据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规范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清理和重组财政系统经营证券业务的机构；取缔各类非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交易网点。

26日　中行向中国联通提供融资220亿元

中国银行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银企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中国银行将在1998年至2000年度向中国联通公司提供各类融资（含外汇）220亿元人民币，支持中国联通在辽宁、北京、上海、江苏、广州、四川等地区的GSM数字移动通信、长途通信和数据通信项目建设。

7　月

1日　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降息支持扩大内需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即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并同时降低中央银行准备金利率和再贷款利率。这是中央银行为有效扩大内需、支持国民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决策。此次降息，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平均下调0.49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12个百分点。其中存款利率，活期下调0.27个百分点，三个月、半年定期利率分别下调0.09和0.8个百分点，一年、二年定期分别下调0.45和0.72个百分点，三年、五年定期分别下调1.26和1.44个百分点。在贷款利率方面，六个月以上和一年期分别下调0.45和0.99个百分点，一年以上至三年期（含三年）下调1.89个百分点，三年以上至五年期（含五年）下调2.07个百分点，五年期以上的下调2.34个百分点。这一调整对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此举也将刺激居民住房消费，推动住房制度改革的加快。

清理整顿非外商投资商业企业

为维护我国商业领域吸收外商投资试点政策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整顿非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情况的通知》。从1997年8月起，有关部门对各地擅自越权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进行了清理整顿。经过清理需要进行整改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199家。整改的具体要求是：外商投资商业企业中方出资或分利比例必须达到50%以上（中西部地区40%以上），连锁店、仓储式商场必须由中方控股，合营年限不得超过30年（中西部地区不得超过40年），不得经营批发业务；外商独资商业企业应按上述标准改造为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商业企业。上述通过清理整顿允许继续经营的企业和经审核符合要求的整改企业，不享有进出口经营权，不得经营批发业务，不得

再扩大经营范围和建设规模，不得开设分店和延长合营年限，不得享受进口自用设备和原材料的减免税政策。

国务院调整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

国务院决定，对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由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等改组或组建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9个国家局对所属的共211所学校（其中普通高等学校93所，成人高等学校72所，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46所）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93所普通高等学校原则上都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72所成人高等学校，除几所由中央财政负担的管理干部学院原则上就地并入普通高等学校或改制为培训教育机构外，其余由企事业单位举办的成人高等学校一律划转地方管理。46所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划转地方管理。

3日　国务院提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六项措施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1. 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2. 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3. 继续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4. 采取扶持政策，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5. 发展住房金融。6. 加快改革现行的住房维修、管理体制，建立业主自治与物业管理企业专业管理相结合的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物业管理体制。基本原则是：坚持在国家统一政策目标指导下，地方分别决策，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坚持国家、单位和个人合理负担；坚持“新房新制度、老房老办法”，平稳过渡，综合配套。

国家改革国有重点煤矿管理体制

国务院决定从1998年7月起，将原煤炭工业部直属和直接管理的94户国有重点煤矿以及原随煤矿一起上收、为煤矿服务的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基建施工、机械制造、科研教育等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国有重点煤矿及企事业单位只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层层下放。继续执行中央财政对国有重点煤矿的亏损补贴、增值税定额返还政策；对32户国有重点煤矿超亏占用工商银行贷款，按照有关规定继续实行计息挂账；继续执行对国有重点煤矿的转产贴息贷款政策。企业下放后，所得税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全额交给地方政府，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统筹安排，用于困难煤炭企业的补贴；企业利润不再上缴和划转，全部留给企业。

10日　国家经贸委制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的问题

国家经贸秀发出《关于制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有小企业改制。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要选择适合企业特点的财产组织形式，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绝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小企业改制的惟一形式。要充分认识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能采取搞运动的方式进行改革。国有小企业发展要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能甩“包袱”，一卖了之。要引导企业把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面向市场，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的路

子。要积极扶持小企业发展，要规范出售国有小企业的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严防在改革中逃废金融债务。要做好资产评估，严禁低估改制企业的国有资产，更不能无偿量化分配给个人。

12日　我国最大节能项目正式实施

由国家经贸委组织开发和实施的“世行/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的项目协议、贷款协议、赠款协议，于6月底由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双方代表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署生效。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将提供6300万美元贷款和2200万美元赠款，以支持在中国引进、示范、推广节能技术服务新机制，同时，该项目的国内立项手续也已完成，这标志着我国目前最大的节能项目正式实施。该项目是国家经贸委与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在节能和环保领域的又一次重大国际合作，是我国政府在“九五”期间重点开展的节能项目之一。据介绍，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总量的10%左右，中国的节能和环保工作对全球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受到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该项目包括三部分内容：支持中国成立节能服务公司；支持国家经贸委成立非营利性的国家节能信息传播中心，加强国家节能管理机构在节能信息传播方面的能力建设；加强对项目管理和监督的能力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节能服务公司的经验。

13日　国务院发布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办法

为了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维护金融秩序，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国务院制定并颁布《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办法》。办法共5章，包括总则、取缔程序、债权债务的清理清退、罚则、附则等，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15日　朱镕基发表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重要讲话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迅速而严厉地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当前走私活动范围广、走私货物品种繁多，数额巨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利用假批文、假单证、假印章以及利用加工贸易和保税区变相走私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走私最严重的商品是“两油”（成品油和食用油）、“两车”（汽车和摩托车）、“两料”（纺织原料和化工原料），以及香烟、盗版光盘等。据有关方面估计，每年走私进来的商品高达千亿元。针对以上问题，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坚决把走私猖獗的势头打下去。要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坚决打击走私势力的嚣张气焰。要建立反走私新体制。一是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专司打击走私犯罪活动；二是联合缉私，统一处理；三是改革现行缉私罚没收支管理办法，坚持收支两条线制度。缉私罚没收入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中央财政留30%作为补税，其余部分的50%用于有关缉私部门改善缉私装备、办案、奖励缉私有功单位和人员，另外的50%返还省级财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安排，也主要用于反走私工作。

17日　农业部提出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意见

农业部发出《关于当前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促使乡镇企业在改革中健康发展。不断完善乡村集体企业改革的多种形式。可以实行股份

制、股份合作制或组建企业集团、出售、联合、兼并、承包、租赁、破产等多种形式，也可以几种形式配合使用，切不可强制推行单一形式的改革。实行出售的，对购买者要进行业务能力、组织能力、资金承受能力的资格审查，禁止和纠正由少数人内定，搞定向转让或私下交易；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失的，应令其退赔。私人购买企业或买股，必须用自有资金，不能挪用或借用集体资金，不能以未来收益抵偿或拖欠；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不得把集体资产平调为乡镇政府所有，不得将企业存量资产所有权无偿量化给个人。存量资产实行分红权量化并以现金配股的做法，应允许继续探索，但经营者和职工的差距不宜过大。职工和农民用现金购股，要坚持自愿，决不能强迫入股。经营者和管理人员可以用现金多入股，但不得强迫入大股。属于乡镇企业范围的，由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规划、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要坚决禁止和纠正将各种形式的企业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25日　国家计委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工作的建议

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提出的《建议》中指出，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以下矛盾：亚洲金融危机还在发展，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加深；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国有企业效益仍然较差；财政收入增幅回落，金融风险不容忽视；消费品销售不旺，启动市场的难度较大。为了实现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建议》指出，要做好应对更加困难局面的思想准备，迅速采取更为积极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下半年要全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建议由中央财政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定向用于农田水利、铁路交通、邮电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等建设支出。2.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力度，务求取得成效。项目安排的重点是：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继续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建设500亿斤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3.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增长。4. 进一步抓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努力提高经济效益。5. 加强税收征管，改善金融服务。今年要确保实现工商税收比上年增加800亿元（计划552亿元）、力争1000亿元的目标。6. 继续努力扩大外贸出口，加强引进外资工作。对一些确有市场潜力的出口产品，可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7. 大力拓展消费市场，继续扩大国内需求。8. 认真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各级政府和企业必须保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发放，不准减发和拖欠。凡减发和拖欠的，必须尽快补发。对困难较大的地方，可由中央财政给予必要的支持。

27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根据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精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新成立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国家在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基础上组建的石油石化企业；该公司侧重经营石油、天然

气的勘探、开发业务，同时经营石油石化业务。新成立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是国家在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基础上组建的石油石化企业；该公司侧重经营石油化工业务，同时经营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业务。

28日　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企业脱钩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贯彻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决定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对政法机关贯彻中央决定作了全面部署。10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胡锦涛在会上作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立即同所属单位办的一切经营性公司彻底脱钩。军队、武警部队要全部“吃皇粮”，政法机关也要全部“吃皇粮”。12月15日，军队、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彻底与军队、武警部队彻底脱钩，由全国交接工作办公室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接工作办公室接收。至此，党中央做出的军队、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顺利实现。

30日　京广电气化铁路全线开通

京广铁路起点北京，终点广州，途经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株洲、韶关等地，纵贯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六省市，全长2331公里。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把京汉、粤汉铁路连接起来，铁道部为这两条铁路合并命名为京广线。为使京广干线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斥巨资对京广线分段进行了电气化改造。其中，郑州至武昌段电气化改造工程已于1992年建成使用。1993年初，国家开始对京广线的咽喉区段——北京至郑州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并于1998年7月全线开通。京郑电气化铁路北起北京，南至郑州，全长695公里，它的开通标志着京广铁路长江以北的线路已全部实现了电气化，客运列车由原来的38对增加到50对，货运能力由原来的5500万吨提高到7000万吨，并形成以北京、石家庄、郑州为中心，北连京秦、丰大、大秦，南接郑武，西通陇海、宝成、成渝、贵昆，中与石太、北同蒲相会的电气化铁路网，对缓解京广铁路运输紧张状况及推动铁路提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国家“九五”重点工程——武昌至广州段的电气化改造工程开始动工，这条全长1082.4公里的电气化铁路于2000年底全线竣工。

31日　公路建设再增投资200亿元

为了确保8%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务院的要求，交通部将进一步加快公路建设，投资规模从1600亿元增加到1800亿元，今年后5个月将形成公路建设的高潮。进一步加快公路建设，追加200亿元投资规模后，今年可新增公路通车里程3.3万公里以上，是原计划2.4万公里的138%；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560公里，是原计划1117公里的139%；新增M级公路7947公里，是原计划7600公里的105%。完成1800亿元投资后，公路建设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贡献将从1800亿元时的0.21个百分点增加到0.31个百分点。此次进一步加快公路建设追加的200亿元投资来源如下：国务院从国家财政资金中安排公路建设资金130亿元，其中60亿元是解决1600亿元建设规模中资本金不足（50亿元）和安排了10亿元的西藏、青海、三峡库区。国边防等公益性的建设

项目，对亿元作为进一步加快公路建设的资本金，可以取得银行贷款130亿元。交通部已明确了这200亿元的项目安排：共172个项目，建设规模为17736公里，其中高速公路9709公里。

8　月

1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指出，目前期货市场最突出的问题是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过多，运作不规范；少数机构和个人联手操纵市场信息，牟取暴利；非法从事境外期货、外汇现金交易行为依然存在；监管部门的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手段落后。为此，国务院决定：1. 继续整顿、撤并期货交易所。只在上海、郑州和大连保留3家期货交易所。将期货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具体调整办法：①同城合并。②异地联网。除保留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外，其他期货交易所可改组为公司制地方交易厅或地方报价厅，与上述3家期货交易所进行联网交易。③对未保留的期货交易所可以改组为期货经纪公司或证券经营机构。2. 取消部分商品期货交易品种，提高部分商品品种的期货交易保证金。将商品期货交易品种由35个压缩为12个，取消23个品种。3. 取缔非法期货经纪活动，清理整顿期货经纪机构。4. 严格控制境外期货交易。未经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行境外期货交易，各期货经纪公司均不得从事境外期货业务。5. 加快法规建设，进一步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监管。

6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

为了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调剂力度，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国务院决定，加快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并将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原邮电部部分）、水利部、民航总局、煤炭局（原煤炭部）、有色金属局（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原电力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部分）、银行系统（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保集团）、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组织的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1. 加快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后，1998年内，企业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保持不变。从1999年起，调整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起步时不低于企业工资总额的13%，以后逐步过渡到与地方企业相同的比例。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煤炭、银行、民航企业的过渡期为5年，其他行业企业的过渡期原则上为3年。从1999年1月1日起，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按省、区、市确定的统一比例执行，一次到位。从1998年1月1日起，统一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调整或建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移交前后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合并计算。

11日　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三乱”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

案》。《实施方案》提出的整顿范围包括：（1）整顿乱集资。主要打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从事的非法集资活动；整顿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以还本付息或者以支付股息、红利等形式向出资人进行的有偿集资活动；整顿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募集股份的集资活动。（2）整顿乱批金融机构。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均属非法金融机构，非法成立的金融机构筹备组织也视为非法金融机构。（3）整顿乱办金融业务。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行为，均属乱办金融业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上述问题，要按照"谁主管，谁整顿；谁批准，谁负责；谁用钱，谁还债；谁担保，谁负相应责任"的原则进行处理。《实施方案》还提出了整顿的具体措施。以上全部整顿工作在2000年底以前结束。

江泽民对北方三省区抗洪救灾作重要指示

最近，嫩江、松花江发生了超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军民团结奋战，抗击洪水袭击。江泽民总书记对北方三省区抗洪救灾作重要指示，要求确保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重要城市的安全，确保大庆油田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指挥抗洪救灾，慰问受灾群众。

8月2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受朱镕基总理委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代表国务院报告了当前全国抗洪抢险的情况。报告分四个部分：1. 今年我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灾害。2. 抗洪抢险斗争取得重大胜利。3. 当前抗洪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再接再厉，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4. 加强水利建设，实行综合治理，提高防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报告》指出，1998年入汛以来，我国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松花江、嫩江出现了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由于洪水量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非常严重。截至8月22日，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3004人（其中长江流域1320人），倒塌房屋497万间，各地估报的直接经济损失1666亿元。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等省（区）受灾最重。8月14日，江泽民在湖北抗洪抢险第一线发表《夺取长江抗洪抢险决战的最后胜利》的讲话，勉励广大军民坚定信心，严防死守，决战到底。9月3日—6日，江泽民再赴湖南、江西、黑龙江等地，视察抗洪救灾工作。9月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作了《发扬抗洪精神重建家园发展经济》的重要讲话，指出，从全局看，全国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当前，在继续做好抗洪抢险最后阶段工作的同时，全国受灾地区的工作重点要逐渐转到救灾工作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上来。9月25日，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全部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9月28日，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在这次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民

族和人民展示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革命精神和新时期的创业精神一样，都是我们人民的宝贵财富。

8月28日，中办、国办通知增收节支制止浪费支援抗洪救灾工作。《通知》指出，1998年我国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这次洪灾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洪灾过后，灾区人民将面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艰巨任务，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支援。因此，1. 厉行节约，压缩一切不必要的行政事业开支。1998年下半年，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行政事业经费不得追加。2. 严禁用公款进行高消费。3. 严格控制新建各类楼堂馆所。4. 严格按规定配备和更换小汽车，购买移动电话。5. 近期原则上不安排省、部级干部出国、出访，因特殊情况必须出国、出访的，要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并严格控制出访团人数。6. 坚决精简各种会议和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原则上不在近期召开全国性会议。

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土地管理法

江泽民主席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8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该法共分8章86条款，包括总则、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护、建设用地、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等。该法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12月27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9　月

2日　国家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

经国务院批准，外经贸部发布《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同时具备下述条件的私营企业可以申请自营进出口权：(1) 已经在所在地工商管理机关依法登记注册，领取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和净资产均在850万元以上。(2) 私营生产企业连续两年年销售收入和出口供货额分别在500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美元以上（机电类生产企业此两项分别在3000万元人民币和50万美元以上）。私营科研院所年销售收入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经省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收入在3000万元以上。其中开发型企业1000万元以上。(3) 具有自营进出口业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经批准取得自营进出口权的私营企业和科研院所在批准的进出口业务范围内，可以经营本企业或院所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院所生产、科研所需要的机械设备、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可以直接从事自营进出口业务。在从事自营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可以享受公有制自营进出口企业或科研院所相同待遇。自199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

国务院成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

国务院成立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组成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下设6个项目评审组，实行集中办公，联合评审，协调落实资金和建设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投向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信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

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适用房建设。在项目部署和资金安排上，向中西部倾斜；重点安排和加快在建项目，适当安排一些具备条件、两三年内能够投产的新开工项目，同时加大对大江大河大湖的堤防和重点海堤的除险加固以及长江黄河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等方面的投入。

国家计委确定新增1000亿元国债投向

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组成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下设6个项目评审组，实行集中办公，联合评审，协调落实资金和建设条件。投向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信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适用房建设。在项目部署和资金安排上，向中西部倾斜；重点安排和加快在建项目，适当安排一些具备条件、两三年内能够投产的新开工项目，同时加大对大江大河大湖的堤防和重点海堤的除险加固以及长江黄河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等方面的投入。

10日　国家经贸委通知制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的有关问题

《通知》指出，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有小企业改制；要充分认识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能采取搞运动的方式进行改革；国有小企业改制要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不能甩“包袱”，一卖了之；要规范出售国有小企业的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要切实加强对国有小企业改制工作的组织领导。

14日　国务院决定开展全国外汇外债大检查

国务院《关于加强外汇外债管理开展外汇外债检查的通知》。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以多种手段非法逃套国家外汇的案件增多，一些地方和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到境外发债和对外提供担保，或以保证外方固定回报率形式变相对外举债。为此，国务院决定开展全国外汇外债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1. 严厉打击逃套外汇行为和外汇黑市，加强反骗汇工作。清理“三无”企业，严防逃套外汇行为。2. 从严控制外债规模，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将主要外债指标控制在安全线以内。严禁非法对外融资。国家对各种形式的对外借款实行全口径管理，除国务院授权的政府部门有权筹借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外，其他政府部门对外借款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国内中资金融机构对外借款，必须有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对外借款业务许可；符合条件的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按照规定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直接对外借款。外商投资企业各方须修改合同或章程，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后，向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手续。严格规范境外融资担保。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得对外提供担保或变相担保。任何地方、部门和单位违反规定擅自对外举债或对外担保；其借款或担保协议一律无效，银行不得为其开立外汇账户，外债本息不得擅自汇出，由此造成损失由债权人自行负责。

30日　国家经贸委等决定停止执行买用电权等有关规定

为了扩大电力销售，减轻用电企业负担，结合当前用电供需矛盾缓和的形势，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关于停止执行买用电权等有关规定的意见》对部分集资办电、限制用电的规定进行调整。1. 停止执行买用电权的规定。对已购买用电权的用户，各电力

企业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具体补偿办法，保证用户经济利益不受损失。2. 停止执行控制非生产用电的规定。过去对宾馆、饭店（包括外资企业）、商店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等，实行计划供电，并定期下达用电指标。规定不得使用电热烧水、取暖，限制使用空调、冷热风机等。目前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总体上已经改变，为支持第三产业发展和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建议停止执行国务院 1997 年关于控制用电的政策规定。3. 停止执行超计划用电加价收费的规定。

10　月

6 日　第 53 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在香港开幕

第 53 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在香港开幕。两机构首脑分别发表讲话，一致呼吁各国为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而共同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指出，走出危机的出路是：工业化国家发挥带动全球增长的火车头作用；国际社会向重整经济的国家提供有效支持；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不要在债务上单独行动，也不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或以膨胀性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适应“新世界”。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调对付危机的 3 大办法是：首先必须防范；出现危机时，必须作出有效反应；还必须建立社会“安全网”。中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银行对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关闭清算

广信是 1980 年 7 月经广东省政府批准成立的企业，1983 年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 年又被国家主管机关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并被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窗口”公司。80 年代末期以来，广信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以金融和实业投资为主的企业集团。但是，广信经营管理混乱，存在大量高息揽储、账外经营、乱拆借、乱投资等违规经营活动，致使不能支付巨额到期境外债务，严重资不抵债。自 10 月 6 日经过三个月的清算，初步查明，广信的资产总额为 214.71 亿元，负债 361.65 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168.23%，资不抵债 146.94 亿元。鉴于财务状况恶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1999 年 1 月 11 日，广信及全资深圳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和广信企业发展公司等 4 家公司分别提出破产申请。这是我国首宗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也是自《破产法》出台以来，国内最大的一宗金融涉外破产案。

7 日　大连首次向全国发行城市引水工程债券

经国家计委等部门批准，由大连市建设投资公司发行的大连市城市引水工程债券面向全国发行。大连市第一次面向全国发行的地方企业债券总额 1.8 亿元，期限为 3 年，年利率为 6.93%，在大连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州发行。募集到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大连市引碧流河水入连工程北段扫尾项目，这一项目将于 1999 年底竣工。

12 日　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中国科学院宣布，该院组织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首批 12 项试点工作年内全面启动。

这12项试点工程是，组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组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组建国家天文观测中心；建设北京物质科研基地；建设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基地；建设上海高技术研究发展基地；建设东北高性能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研究发展基地；建设北京地球科学研究基地；建设西北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启动大连化物所、理论物理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所试点等。

12日—14日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包括10个部分：1. 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2. 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方针；3. 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4. 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5. 加快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6. 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7. 推进农村小康建设，加大扶贫攻坚力度；8.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9. 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0.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决议》提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下方针：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实施科教兴农；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多渠道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全会高度评价农村改革2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创造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全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17日　国务院批转央行省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

人民银行省级机构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撤销省级分行，根据地域关联性、经济金融总量和金融监管的要求，在9个中心城市设立分行。9个分行是：天津分行、沈阳分行、上海分行、南京分行、济南分行、武汉分行、广州分行、成都分行、西安分行。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撤销后，其原有职能分别由所在辖区分行和省会城市中心分行承担。分行所在地城市原市分行撤销后，其职责和原省级分行营业部的业务，均由分行营业管理部承担。撤销人民银行省分行，设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强化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8日　国务院批准证监会“三定”方案

国务院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三定”方案，方案确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

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整治江湖兴修水利

1998年我国遭受罕见洪水灾害，主要原因是气候异常，降雨集中，同时也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有很大关系。为搞好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工作，中共中央、国

务院决定：1. 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1）停止长江、黄河流域上中游天然林采伐，森工企业转向营林管护。（2）大力实施营造林工程。重点治理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地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长江流域三峡库区及嘉陵江流域、川西林区、云南金沙江流域3个重点治理区森林覆盖率由目前的22.1%提高到45%以上；用30年左右的时间，使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区、黄土高原风沙区、青海江河源头3个重点整治区森林覆盖率由目前的10.1%提高到27%以上。（3）扩大和恢复草地植被，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高标准人工草场、改良草场和围栏退化草场约2000万公顷。通过增加植被，使这些区域60%的水土流失及荒漠化土地得到治理，从总体上扭转这些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4）加大退耕还林和“坡改梯”力度。种植薪炭林。2. 坚持“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防洪方针，建设好干支流控制工程，有计划、有步骤地平垸行洪、退田还湖。3.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搞好职工代赈、移民建镇。移民建镇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4. 抓紧加固干堤，建设高标准堤防，清淤除障、疏浚河湖。建设好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一类堤防工程。搞好重要支流称湖泊的二类堤防建设。

21日　财政部取消20个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经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批准，财政部、国家计委发出通知，公布第二批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这批取消的收费项目共计20项，涉及文化、公安、建设、旅游、广播电视、林业、口岸7个部门。公布取消的收费项目自1998年11月1日起停止征收。此举不仅是治乱减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财政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项积极措施。这批收费被取消后，预计一年可减轻企业负担40多亿元。

国家”金贸”工程正式启动

以电子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国家“金贸”工程正式启动。在国家经贸委、信息产业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实施金贸工程，抓好中国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大会，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邦柱宣布我国“金贸”工程的目标是，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全国大部分企业上网运行。

25日　国家计委提出加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意见

《关于加强房地产价格调控加快住房建设的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1. 加强房地产价格调控，建立合理的住房价格体系。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实行政府指导价，限价销售。确定价格时要严格掌握保本微利的原则，建立成本约束机制。计入房价的企业管理费原则上控制在2%以下，利润控制在3%以下，并以征地和拆迁补偿费、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安工程费、住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等四项因素成本为基础计算。2. 清理整顿建设项目收费，调整住房价格构成。3. 规范住房价格及物业管理收费行为，建立正常、良好的市场秩序。4. 积极稳妥地推进公有住房租金改革，加快实现住房商品化。提租方案要纳入价格调控计划。对超面积住房的，超过规定标准的部分可以实行高于同期现住房租金标准的差别租金；对多占住房应退未退的，实行市场租金。

中国人民银行整顿城市信用合作社

《中国人民银行整顿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作方案》提出的整顿内容是：1. 清产核资。着重做好各项资产真实风险的测评及处理、所有者权益认定及固定资产评估工作。2. 化解风险。城市信用社出现支付风险，属当地政府违法违规干预城市信用社经营管理造成支付风险的，由当地政府负责组织有关清偿。对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又不能实施收购兼并的城市信用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关闭。3. 规范改造。必须逐步将仍然带有商业银行性质的城市信用社，规范改造为真正的合作金融机构，凡在同一地（市）级城市设立城市信用社达到或超过 4 家的，应组建规范化的城市信用联合社；已设立联合社的要加以规范。在符合条件的城市，积极稳妥地推进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的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停办外汇调剂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停办外汇调剂业务的通知》，决定从 1998 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调剂业务，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均纳人银行结售汇体系。通知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调剂业务取消后，已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联网的全国外汇调剂中心更名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北京分中心，已联网的其他 35 家外汇调剂中心更名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当地分中心，负责银行间外汇市场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同业拆借市场运作，在业务和技术上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指导；其余各地外汇调剂中心一律关闭；北京分中心继续保留备份中心功能，属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事业单位。

国家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的请示》。《请示》提出改革乡镇电管站的管理体制，理顺县级供电企业与省级电力公司以及乡镇电管站的关系，实现城乡电网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价格。1. 理顺地方供电企业与省级电力公司的关系。对出售县和自供自管县的电力公司，原则上上划由省级电力公司直接管理；暂时不能上划的，可以在产权关系不变的前提下，由省级电力公司代管，或者通过参股等方式，逐步改组为由省级电力公司控股的股份公司。对直供直管县的电力资产，凡属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后由地方财政出资利用国家规定的电力建设资金建设形成的，可以由地方政府享有所有者权益。2. 对城乡低压配电电网实行统一管理。将乡镇电管站改为县级供电企业所属的供电所，负责农村电网的运行维护和经营管理。乡及乡以下农村集体电力资产可以采取自愿上缴、无偿划拨的方式由县级供电企业管理；对于其中由地方财政出资或利用国家规定的电力建设资金建设形成的资产，由地方政府享有所有者权益。3. 对城乡低压配电电网实行统一核算。由县级供电企业对乡镇供电所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供电所电费收入全部上缴，所需费用支出由县供电企业统一核拨。4. 对城乡用户实行统一价格。

11　月

4日　全国第一大税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全国第一大税案——浙江省金华县巨额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被严肃查处。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家税务总局为此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自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金华县共有218户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7日　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1998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干部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认识不足，工作不够主动，贯彻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不够得力；有些地方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没有完全到位；粮食收购市场还没有完全管住，私商粮贩违法收购粮食屡禁不止，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粮食销不出去；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仍未建立起来，不少企业仍然亏损。《决定》指出，当前，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 确立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1)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要在人财物等方面与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彻底脱钩，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2)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3) 政府积极为国有粮食收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创造有利条件。2. 建立地方政府层层负责的粮食工作行政首长责任制。(1) 各地方政府要逐级落实抓好“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把它作为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及考核行政首长政绩的重要内容。(2) 进一步落实粮食风险基金，完善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方法。3. 切实加强对粮食收购市场的管理。整顿各类粮食加工企业跨县（市）运销成品粮，必须持有粮食加工企业或县以上粮食交易市场带有承运联的销货发票。4. 粮食收储企业必须顺价销售。5. 合理确定1998年秋粮价格，原则上参照上年价格水平制定。在当前高层粮价偏低的情况下，定购粮的收购价格水平要保持基本稳定，保护价应能够补偿粮食生产成本并保证农民获得适当的收益。

国家计委等制定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规划》提出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各阶段的奋斗目标：1. 近期目标：从现在起到2010年，用大约12年的时间，坚决控制住人为因素产生的新的沙土流失，努力遏制荒漠化的发展。到2010年，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0万平方公里，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新增森林面积39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19%以上；改造坡耕地670万公顷，退耕还林500万公顷，建设高标准林网化农田1300万公顷；新建人工草地、改良草地5000万公顷，治理“三化”草地3300万公顷；建设一批节水、旱作农业和生态农业工程；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达到8%。2. 中期目标

是：从2011—2030年，在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之后，大约用20年的时间，力争使全国生态环境明显改观。到2030年，全国60%以上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得到不同程度整治，黄河、长江中上游等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大见成效；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4000万公顷；新增森林面积4600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4%以上，各类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达到12%；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技术得到普遍运用，新增人工草地、改良草地8000万公顷，力争一半左右的"三化"草地得到恢复。3. 远期目标：从2031—2050年，全国建立起基本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主要奋斗目标是：全国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基本得到整治，宜林地全部绿化，林种、树种结构合理，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坡耕地基本实现梯田化，"三化"草地得到全面恢复。根据全国生态环境建设总体布局，以及优先实施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规划》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措施。

10日　李家峡水电站主体工程竣工

国家重点工程——李家峡水电站经过11年的奋战，主体工程建竣工。该工程是本世纪我国黄河上游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年平均发电量59亿千瓦时。

16日　国务院决定深化化肥流通体制改革

针对化肥生产和经营企业亏损严重，经营环节较多，价格形成机制不灵活，进口代理机制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国务院决定：1. 改革化肥流通管理，做好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国家对化肥流通的管理由直接计划管理改为间接管理为主。取消国家对化肥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和统配收购计划，由化肥生产和经营企业自主进行购销活动。取消指令性计划后，国家计委仍会同有关部门搞好全国化肥的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2. 拓宽化肥流通渠道，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化肥生产企业可以将自产化肥销售给各级农资公司和农技推广站、土肥站、植保站，及以化肥为原料的企业，也可以直接销售给农民。赋予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化肥内贸经营权。除上述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化肥批发业务。3. 改进化肥价格管理办法，建立政府指导下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化肥出厂价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4. 加强化肥进口管理，改进化肥进口代理办法。各种贸易方式和渠道进口化肥均纳入进口配额管理。国家经贸委根据总量平衡、资源配置和优化品种结构的要求，安排全国化肥进口。中央进口化肥计划下达给供销总社和有关部门，各部门不得对进口化肥指标自行调剂。除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外，赋予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化肥进口代理经营权。5. 继续实行优惠政策，支持化肥生产和流通。

17日　国家计委等取消560项电价外加价项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请示的通知》的精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委办联合下发《关于整顿电价秩序，坚决制止乱加价、乱收费行为的通知》，明令取消各地违反国家规定，在电价外加收的560项加价项目。在国家批准的电价的基础上只保留国务院规定的电力建设资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和财政部批

准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以及国务院特批的个别电网加收的建设基金。《通知》明确，电价政策实行公告制度。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农村电网的改造，实现城乡同网同价，切实减轻农民的电费负担。

19日　国务院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全国商业保险主管部门，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法统一监督管理保险市场。主要任务是：拟定有关商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和行业规划；依法对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依法查处保险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保险市场秩序，培育和发展保险市场，完善保险市场体系，推进保险改革，促进保险企业公平竞争；建立保险业风险的评价与预警系统，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促进保险企业稳健经营与业务的健康发展。

24日　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改革现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省以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垂直领导，强化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后，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对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财务经费实行统一管理。省以下各级工商行政机关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统一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汇缴省级财政或纳入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其中涉及中央财政收入部分的，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上缴，省级财政部门根据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业务范围，对人员、公用经费、办案经费等，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统一核定和拨付。

25日　国家计委等对制止低价倾销工业品作出规定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关于制止低价倾销工业品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制止低价倾销的综合性法规。1998年6月份以来，平板玻璃、钢材等行业陆续制定、实行了行业内价格自律；8月份，国家经贸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21个工业品制定并实行价格自律。在此基础上，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制定了该项规定。其主要内容是：1. 明确低价倾销工业品不正当价格行为的判定标准及表现形式。《规定》列举了低价倾销的8种主要形式，主要有：在价格上低于成本销售、采取折扣、补贴、馈赠等让利方式低于成本销售，以次充好、降档销售等。2. 授权行业主管部门发布行业平均生产成本。按照《规定》，对于恶性降价的比较严重的工业行业和工业产品，行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况提出制止低价倾销的产品品种，报请国家计委将其列入制止低价倾销的范围。同时，国家计委授权国家工业主管部门定期测定、发布有关工业品的行业平均成本，引导企业合理制定价格。对于经营者以低于行业平均成本销售引起市场秩序混乱的，受损害者可向省级以上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举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如确认被举报者的销售价格不仅低于行业平均成本，也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即判定为不正当价格行为，由价格管理部门纠正和制止。

28日　国务院决定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

在我国棉花资源充裕，棉花替代品逐步增多的情况下，国务院决定自1999年棉花

年度开始进一步改革棉花流通体制。1. 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国家在管好棉花储备、进出口和强化棉花质量监督的前提下，完善棉花价格形成机制，拓宽棉花经营渠道，转换棉花企业经营机制，降低流通费用，建立新型的产销关系。2. 建立政府指导下市场形成棉花价格的机制。从 1999 年 9 月 1 日新的棉花年度起，棉花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国家不再作统一规定。国家主要通过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等经济手段调控棉花市场。3. 拓宽棉花经营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供销社及其棉花企业、农业部门所属的良种棉加工厂和国营农场、经资格认定的纺织企业均可以直接收购、加工和经营棉花。4. 培育棉花交易市场，促进棉花有序流通。要加快建立以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为中心、以棉花集中产销区为依托、实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的全国棉花交易网络。5. 分清职责，做好棉花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供销棉花企业的收购资金继续由农业发展银行供应，实行“库贷挂钩、封闭运行、及时还欠”，纺织企业收购棉花所需资金由有关国有商业银行供应。6. 加强棉花进出口管理。棉花进出口继续由国家统一安排，由国家核准的企业经营。7. 调整优化棉花生产布局。适当减少长江流域棉区面积；进一步压缩黄河流域棉区面积。

12 月

1 日 国家海事局成立

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正式成立。该局是在原港务监督局和船舶检验局的基础上合并组建的。该局负责行使国家水上安全监督管理和防止船舶污染、船舶及海上设施检验、航海保障和行政执法，并履行交通部安全生产管理等职能。

二滩水电站两台机组暨送变电工程正式投产

我国本世纪建成投产的最大水电工程——二滩水电站两台机组暨送变电工程正式投产。工程总投资 285 亿元。整个电站共安装 6 台 55 万千瓦发电机组，年发电量 170 亿千瓦时，计划 1999 年底全部建成投产。

5 日 国务院取缔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

国务院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的有关规定，凡没有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以及 1997 年 1 月 1 日后在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内开办的各类小煤矿，一律依法取缔。1997 年 1 月 1 日以前在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内开办的各类小煤矿，凡“两证”不全的，一律予以关闭；国有煤矿矿区范围以外的各类小煤矿凡“两证”不全的，要全部停产整顿，到 1999 年 2 月底仍达不到发证条件的要予以关闭；开采高硫高灰煤，又未采取有效降硫降灰措施的各类煤矿要予以关闭。1997 年 1 月 1 日以前在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内开办的各类小煤矿，虽“两证”俱全且合法生产的，但因布局不合理，影响国有煤矿长远发展的，也要予以关闭。按照规划，关井压产任务到 1999 年底以前完成，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 2.58 万处，压减产量 2.5 亿吨。切实关闭小煤矿后，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且地方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由中央财政酌情

以补贴。

6日　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存贷款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2月7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并同时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存款和再贷款利率。1.各项存款年利率平均下调0.5个百分点。此次调整后，活期存款利率不变，仍为1.44%；一年期存款年利率由4.77%降为3.78%；二年期由4.86%降为3.96%；三年期由4.95%降为4.14%；五年期由5.22%降为4.50%。2.各项贷款年利率平均下调0.5个百分点。此次调整后，六个月以内短期贷款年利率由6.57%降为6.12%；六个月至一年短期贷款年利率由7.92%降为6.39%；一年至三年期中长期贷款年利率由7.11%降为6.66%；三年至五年期中长期贷款由7.65%降为7.20%；五年以上中长期贷款年利率由8.01%降为7.56%。3.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和再贷款利率。准备金存款利率降低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51%下调为3.24%；再贷款利率平均降低0.55个百分点，一年期由现行的5.67%下调为5.13%；再贴现利率由现行的4.32%下调为3.96%。

7日—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确定，1999年经济工作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4%以内，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在2%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左右；进出口总额力争有所增长，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1999年着重抓好三项重点工作：一是稳定和加强农业，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是搞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四个重大问题：第一，在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同时，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优化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第二，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第三，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1999年仍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第四，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过程中，把确保社会政治稳定放在突出位置。

13日　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国家开发银行后，将保留“中国投资银行”的名称，其全部债权债务由国家开发银行承担，并向中国证监会申领资本市场业务认可证，开展投资银行业务，重组和优化存量资产，逐步实现国家重点行业和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市场化。

14日　国务院决定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在总结近年来各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改革的任务和原则。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建立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原则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2.覆盖范围和缴费办法。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

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用人单位缴费应控制在职工工资总额的6%左右，职工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3. 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一般为用人单位缴费的30%左右。4. 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机制。5. 妥善解决有关人员的医疗待遇。离休人员、老红军革命伤残军人的医疗待遇不变，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国家公务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享受医疗补助政策。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部分，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福利费不足列支的部分，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列入成本。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包括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均由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缴纳。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工作从1999年初开始，1999年底基本完成。

19日　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十一后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是一个光辉的标志，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实践证明，全会以来确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进程。

24日　国家经贸委提出深化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意见

《意见》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1. 推进厂网分开，引入竞争机制，建立规范有序的电力市场。选择上海、浙江、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六省（直辖市）进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试点。2. 坚持政企分开、省为实体的方针，深化省级电力公司的改革。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局（公司），要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时，将现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同时接受地方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均不设立电力专业管理部门。实行政企分开后，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只设立一个电力公司，对全省电网实施统一规划、统一管理。首先在东北电力集团进行试点：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所在地沈阳市设立辽宁省电力公司，将黑龙江省、吉林省电力公司改组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改组为国家电力公司分公司。3. 加快实施全国电网联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为便于三峡输变电工程的实施和全国电网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将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改组为国家电力公司的事业部。为充分利用南方电网的电力资源，中国南方电力公司实行厂网分开，其电网部分进行资产重组后，作为国家电力公司的分公司，由国家电力公司直接管理，电厂独立运作。4. 规范国家电力公司向子公司收取资产收益的办法。国家电力公司从1999年起停止对子公司收取折旧费，改为收取投资收益。

28日—30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与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会议开幕时作了题为《全面贯彻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做好1999年农

业和农村工作》的报告，并在会议闭幕时做了总结。国务委员王忠禹主持了会议。会议部署了1999年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抓好6个方面的工作：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政策观念，确保党的农村政策落到实处；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农村基层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会议确定，1999年农业和农村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农村基本政策，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下大力气抓好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两个突出问题。

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证券法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并由国家主席江泽民签发公布。《证券法》全文共12章，包括总则、证券发行、证券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法律责任、附则等共214条。该法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30日　国土资源部修改换发土地证书

为保障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土地登记的严肃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土资源部对土地证书进行了修改。新版土地证书于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启用的新版土地证书共分四种：《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新版土地证书启用后，原土地证书颁发至1999年3月31日。已经颁发给土地权利人的土地证书继续有效。新版土地证书由国土资源部监制并统一编号。未经国土资源部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印制土地证书，擅自印制的土地证书一律无效。国家依法实行土地登记发证制度。凡有下列行为的单位和个人都应按照国家规定，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土地证书：1. 依法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2. 企业改制涉及土地资产处置的；3. 依法变更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及依法改变土地用途的；4. 公有住房出售及房改房上市涉及土地使用权转移的；5. 依法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的；6. 其他依法应当申请土地登记的。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

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9553亿元，比上年增长7.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299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39150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26104亿元，增长7.6%。全年社会劳动生产率11401元，比上年提高6.9%。

市场价格总水平下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0.8%，其中服务项目价格上升10.1%；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2.6%。

劳动就业工作有所加强。年末全国从业人员6995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57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2067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71万人；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323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63万人。再就业工程有了重大进展，通过多种途径使609万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国际收支平衡，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1450亿美元。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多年重复建设，大多数行业生产能力偏大，产品供过于求，经济结构矛盾突出；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不好；部分群众生活仍然比较困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销售不旺；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一、农业。粮食生产在大灾之年获得好收成。199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9亿吨以上。棉花因调减播种面积和长江流域棉花主产区洪涝灾害的影响，产量为440万吨，比上年减产20万吨。

二、工业和建筑业。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3541亿元，比上年增长8.9%。全年轻工业增加值8984亿元，比上年增长9.1%；重工业增加值11062亿元，增长8.5%。工业经济效益有所下滑。全年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3331亿元，比上年增长4.1%；实现利润1473亿元，下降17%，亏损企业亏损额1556亿元，比上年多亏22.1%。建筑业快速发展。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5609亿元，比上年增长12%。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457亿元，比上年增长14.1%。按经济类型划分，国有经济投资15662亿元，增长19.6%；集体经济投资3717亿元，下降3.5%；城乡居民个人投资3638亿元，增长6.1%；其他经济投资5440亿元，增长19.1%。按投资管理渠道划分，基本建设投资11904亿元，增长20%；更新改造投资4467亿元，增长13.9%；房地产开发投资3580亿元，增长12.6%。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全年农林牧渔水利投资684亿元，比上年增长47.8%（其中水利投资419亿元，增长58.1%），所占比重由上年的2.6%上升为3.2%；交通通信业投资4990亿元，增长53.4%，所占比重由18.4%上升到23.6%。全年西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31.2%，分别比东部和中部地区高出14.9个和16.8个百分点。

四、交通和邮电业。交通运输发展平稳，邮电通信业继续快速增长。全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增加值为5029亿元，比上年增长8%。邮电部门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2413亿元，比上年增长35.7%。固定电话用户和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亿户大关。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10.6部/百人，其中，城市电话普及率达到27.7部/百人。中国电信数据通信总用户达到153.5万户。

五、国内市场商品销售平稳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153亿元，比上年增长6.8%，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

六、在对外贸易方面，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增长明显放慢；受国内需求等因素的，进口下降。全年进出口总额324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0.4%。出口总额1838亿美元，增长0.5%。进口总额1402亿美元，下降1.5%。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436亿美元。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额589亿美元，下降7.9%。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456亿美元，增长0.7%；对外借款110亿美元，下降8.5%。

七、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年末广义货币（M）为104499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5.3%；狭义货币（M_1）为38954亿元，增长11.9%；市场现金流通量（M_0）为11204亿元，增长10.1%；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569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402亿元，增长16.1%。全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109只，筹资440亿元。年末境内上市公司市价总值达到19506亿元。通过发行B股、H股共吸收外资7.7亿美元。保险事业稳步发展。全年保费收入1247亿元（含外资机构），增长14%。

八、科学技术和教育。科技队伍稳定发展。1998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918万人，比上年末增长2%，全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为1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年末全国普通高校1022所，招生108万人，在校生341万人，研究生招生7.3万人，普通高中13948所，在校生938万人。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十、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事业加快发展。全年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9575个，总投资10.1亿元。

十一、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全年出生人口1991万人，出生率为16.03%，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4810万人。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25元，考虑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5.8%。全国有8505万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1998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确定

1998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共包括117个项目，项目总数比上年的129项有所减少。与上年不同的是，1998年名单的次序没有像往年的那样排列，去年各行业的排序是：煤炭、石油、电力、水利、铁道、交通、民航、钢铁、有色、化工、石化、建材、轻纺、医药、机电、林业、教育、卫生、农业。而今年各行业的排序是：水利、农业、林业、铁道、交通、民航、邮电、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化工、石化、建材、医药、机械、纺织、教育、粮食、城建。水利和农林项目排在前列，说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将水利放在重中之重，确实是当务之急。今年水利项目由8个增加到10个，水电项目增加了云南大朝山水电站，表明水利的投资力度在增加。煤炭项目由19项减少为12项，并且排序比去年靠后，表明中国煤炭短缺的状况已经过去。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努力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煤炭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

1998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水利项目10项：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　治淮工程—怀洪新河—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近期工程大湖综合治理—望虞河工程—大浦河工程—杭嘉湖南排工程　*浙江珊溪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　*洞庭湖治理二期一堤防加固及洪道整治工程　湖南江垭水利枢纽工程　甘肃引大人秦工程（地方项目）　甘肃疏勒河农业灌溉及移民综合开发（地方项目）　新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

农业项目2项：农垦100亿斤商品粮项目　*吉林松原玉米加工项目（地方项目）

林业项目 1 项："三北"防护林三期工程

铁道项目 14 项：西安安康线　邯济线　安徽芜湖长江大桥　南疆铁路　湘黔复线及电化　焦柳复线—襄石复线—石长线　京广线电化—京郑段—武广段　成昆线电化　宝成复线　横南铁路　哈大线电化　*新荷兖石复线－期工程　*达万线　*朔黄铁路

交通项目 20 项：大连港大窑湾港区一期（含商检设施）　连云港港墟沟港区一期　青岛港前湾港区二期工程　广州港新沙港区一期　川藏公路　*广西防城港二期工程　*秦皇岛港戊己码头　*烟台港西港池三期　*黄骅港－期工程　天津港（地方项目）　黑龙江哈同公路（地方项目）　江苏江阴长江公路桥（地方项目）　*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地方项目）　*福建福泉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厦门海沧大桥（地方项目）　湖南湘工航运二期工程（地方项目）　广西西江航运二期工程（地方项目）　*海南环岛（东线）公路（地方项目）—海口—琼海段　京沈高速公路（地方项目）宝坻—山海关段山海关——沈阳段　京深高速公路（地方项目）—湘潭至耒阳段—安新段

民航项目 3 项：首都机场航站楼项目　*上海浦东机场（地方项目）　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地方项目）

邮电项目 1 项：国家干线光缆工程　*兰州－西宁－拉萨光缆　*呼和浩特－北海光缆　*西安—合肥光缆　*南宁—贵阳—昆明光缆

煤炭项目 12 项：河北蔚县矿区　山西晋城矿区　山西华晋离柳矿区沙曲矿井　黑龙江双鸭山矿区　安徽淮南矿区安徽淮北矿区　山东兖州矿区　山东枣藤矿区　河南平顶山矿区　河南永夏矿区　甘肃华亭矿区　神府东胜矿区

石油项目 6 项：黑龙江大庆油田开发　辽宁辽河油田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开发　新疆油田开发　新疆塔里木油田开发　陕甘宁长庆油田开发

电力项目 28 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及 50 万伏输变电工程　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　*云南大朝山水电站　天生桥水电站一级　四川宝珠寺水电站　四川二滩水电站及 50 万伏输变电工程　青海李家峡水电站　华能北京热电厂　河北三河电厂　河北邯峰电厂　山西阳泉二电厂　山西阳城电厂及 50 万伏输变电工程　内蒙古伊敏煤电联营一期工程　内蒙古达旗电厂二期　辽宁绥中电厂　江苏扬州二电厂　浙江北仑港电厂二期　江西丰城电厂　河南鸭河口电厂　湖北襄樊电厂　湖南湘潭新电厂　贵州安顺电厂　云南曲靖电厂　*重庆珞璜电厂二期　陕西宝鸡第二电厂　浙江泰山核电站二期工程　*广东岭澳核电站

钢铁项目 4 项：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三期　梅山冶金公司炼钢工程　广州珠江钢铁有限公司　*邯钢薄板坯连铸连轧工程

有色项目 1 项：江西铜业公司贵溪冶炼厂

化工项目 3 项：广西鹿寨化肥厂　*贵州瓮福磷矿重钙项目　河南平顶山尼龙 66 盐项目（地方项目）

石化项目 5 项：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大化肥项目　*天津石化公司聚酯工程　*宁夏化工厂第二套化肥工程　*镇海炼化股份公司炼油扩建工程　*洛阳石化总厂化纤工程

建材项目 1 项：天津振兴水泥厂

医药项目1项：山东鲁抗医药集团青霉素钾盐工程
机械项目1项；*大型水电设备制造项目
纺织项目1项；吉林腈纶工程
教育项目1项：高等教育“211工程”
粮食项目1项：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
城建项目1项：*河南义马煤气化工程（地方项目）
注：项目名称前有“*”者为1998年新增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1999年

1月

1日　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严禁强令企事业单位在指定金融机构存款

通知说，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人民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强行要求所属企事业单位将存款存入指定银行，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极易引发金融机构支付风险，危及社会安定，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立即纠正并严肃查处，防止此类问题再度发生。通知特作如下要求：一、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不得以行政手段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除国务院特殊规定之外，地方人民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一律不得强令企事业单位到指定金融机构开户存款。二、各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存款账户的管理，严格执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企事业单位有权按照“自愿、自主、公平”原则选择金融机构开立账户，服从开户机构的管理。严禁企事业单位多头开户，逃避银行账户管理和逃废银行债务。三、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努力改善金融服务。严禁以不正当方式搞恶性竞争，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四、人民银行要认真做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4日　农村电力体制改革措施出台

国务院通知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农村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的意见》。《意见》提出，农村电力体制改革要与我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相适应，与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管理体制方面，坚持一县一公司并实现县（市）乡（镇）电力一体化管理。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县一级管电机构和供电企业实行政企分开，由县经贸委（经委、计经委）行使政府管理职能。供电企业要成为独立核算实体，行使企业经营职能。存在多家供电机构的要按出资关系，组建成有限责任公司。改革乡（镇）电管站的现行管理模式，取消中间管理环节，将乡（镇）电管站全部改为县供电企业的供电所或营业所，其人、财、物纳入县级供电企业统一管理。乡及乡以下农村集

体电力资产，可采取自愿上交、无偿划拨的方式，由县级供电企业管理，并由其承担维护管理责任。在营销方面，要建立规范的抄表收费制度，全面推行“五统一”（统一电价、统一发票、统一抄表、统一核算、统一考核）和“三公开”（电量公开、屯价公开、电费公开），逐步实现电力销售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的“四到户”管理。

5日—11日　中共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

江泽民在研究班结业式上讲话强调，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不仅党的高级干部要加强学习，各级干部和全党同志都要加强学习，通过我们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努力把勤奋好学的风气推广到全社会。江泽民指出，一个国家，金融如果出了问题，就会给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教训，我们应该深刻地加以认识并引为鉴戒。江泽民强调要注重学习理论，学习现代经济、科技知识，学习历史，要进一步端正学风。

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由国家计委组织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当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调动亿万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全社会的力量，投入生态环境建设。《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大力开展植树种草，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建设生态农业，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建设祖国秀美山川，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实施这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既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履行有关国际公约的实际行动和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为此，国家制定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实际出发，《规划》仅对全国陆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规划，主要包括：天然林等自然资源保护、植树种草、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草原建设、生态农业等。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措施是：（一）加强领导，认真做好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工）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三）把科技进步放在突出位置，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四）继续深化“四荒”承包改革，稳定和完善有关鼓励政策。（五）抓好重点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六）建立健全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

停止执行“老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政策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决定从1999年1月1日起，停止执行“老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政策，同时将“老三资”企业出口货物不征不退政策延长两年。自1994年起，我国对“老三资”企业因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政策而增加税负的，实行了五年超税负返还政策。这种在全部“老三资”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因此，如期停止超税负返还政策，有利于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流转税政策，有利于为各类企业扩大国内市场销售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而对“老三资”企业出口货物到2000年底继续实行不征不退

办法，主要是由于现行大部分出口货物的退税率与实行免税办法所得的利益基本相当，为减少调整政策的阻力和确保“老三资”企业出口的稳定增长所采取的一项过渡性措施。

8日　外经贸部决定从1999年1月起对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实行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

这是继对国家确定的千户重点企业实行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之后，进出口经营权从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的又一重大举措。据了解，自1992年以来，经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等6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共6000多家。根据外经贸部的规定，这些企业中凡属中央管理的，可直接向外经贸部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登记，属地方管理的企业，向所在地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外经贸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主管部门须在企业提交书面申请、大型企业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有关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对大型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予以登记，并颁发《全国大型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登记证书》，企业凭该证书到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汇、工商、税务等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向外经贸部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即可开展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及加工贸易、补偿贸易业务。

12日　进出口结售汇业务实行报关单联网核查

从1999年1月1日开始，全国外汇指定银行、外汇管理局，在进行进出口结售汇业务时，正式启用“全国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利用169邮电公网调阅海关数据，对进出口企业的报关单给予核验。这将有效地防止利用假报关单骗汇、逃汇和套汇等违法事件的发生，同时提高外贸企业进出口结汇的效率。

13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把着力点放在促进再就业上

1999年1月12日至13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在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同时，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促进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上，使这些职工尽早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只有把再就业工作做好了，才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下岗职工问题。为此要进一步办好再就业服务中心，力争使实现再就业的人数大于当年新增下岗职工人数。同时要加大劳动力市场建设，落实财政核拨的经费，大力开展职工培训、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建设，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为逐步建立起市场就业机制打下基础。

14日　全国统计局长会议提出今年工作重点以提高数据质量为中心

为了保证宏观统计数据的基本准确可靠。全国统计局长会议提出统计工作要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中心，以加快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和统计信息工程建设为重点，具体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推进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在统计调查方法上，力争用3年完成在我国主要专业统计中运用抽样调查技术的战略任务。在统计资料汇总方式上，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月报实行超级汇总，建立5000家重点工业企业联网直报制度。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和价格统计体系。二是建立国家和省两级对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和

工业增长速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口自然增长率等重要指标的评估制度，以保障统计数据质量。三是进一步加强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加大惩处统计违法者的力度。四是完成国家一省一重点城市的中速广域网骨干传输系统和网络节点中心的建设，同步完成省与地（市）的局域网和广域网的建设。开通中国统计信息网，即国家“金信网”。五是加强统计分析和专项调查。

19 日　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要求证管部门把重点转到监管上来

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今年要继续把支持国有企业利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转变机制、实施结构调整作为证券业的重点工作切实抓出成效。证券监管体制实行全国集中统一的领导以后，各地证管部门要尽快转变观念，转换职责，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监管上来。不再参与上市企业的预选和推荐，不负责企业上市的合规性审核；要按照统一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把一线监管作为中心任务。依据证监会的授权对辖区内的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和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证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20 日　国务院对电力体制结构作出重大调整

国务院批准，国家电力公司将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实体化进程。东北电力集团将成为改革试点，改组为国家电力公司分公司。东北电力集团所在地组建辽宁省电力公司，将黑龙江、吉林省电力公司改组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从而完成东北电力集团公司的改组。此外，中国南方电力联营公司也将重组为国家电力公司分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确定 1999 年金融工作重点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突出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人民银行各派出机构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调控，引导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杠杆，扩大国内需求。要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经批准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都可以开办居民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支持外贸企业扩大出口。大力支持效益好的小型企业，有步骤地支持农村小城镇建设。要进一步加强信贷监督。到 2000 年年底，全面建立金融风险管理预警系统和金融监管责任制，促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明显下降，基本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实现金融秩序明显好转，要进一步加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监管，强化内控机制。根据有关法规，分别成立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事会，完成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工作。分别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和处理一部分不良资产。改进国有商业银行呆账冲销管理办法，呆账准备金只用于核销破产企业的呆账贷款以及在破产过程中实行债务重组后造成的损失。依法维护金融债权，严禁以任何名目逃废银行债务。切实加强外汇业务的风险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家外汇储备规模。要坚持不懈、毫不手软地打击各种骗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犯罪行为。

22 日　《失业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颁布

国务院发布《失业保险条例》，《条例》分为总则、失业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待遇、管理和监管、罚则、附则六章。《条例》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失业保险工作。城镇企事业单位及职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城镇企事业单位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等共计 33 条。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3 年 4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同时废止。

同日，国务院发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有关失业保险费的征缴范围、征缴管理等内容，条例施行前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 30 日内，条例施行后成立的缴费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30 日内，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等有关证件，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税务总局、中编办《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的 242 个科研机构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自主选择改革方式，包括转变成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转为中介机构等。鼓励科研机构转制为科技型企业，经国家批准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少数科研机构，也要引进企业运行机制。按照属地化原则，这些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后原则上由地方管理。科研机构转制后，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法人注册登记。整个改革工作在 1999 年上半年完成。

27 日　政府采购试点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启动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试点工作开始启动。这次政府采购向社会公开招标，计划采购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 75 台（件），用于中央国家机关 44 个部门推广离退休经费零基预算计算机管理。政府采购在西方国家已有上百年历史。我国有些地方政府近年来亦作过一些政府采购探索。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财政部门等先在国务院各部门进行政府采购试点，取得经验后，将扩大范围，全面推广。

进一步推行招标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国土资源部发出通知，进一步推行招标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要求，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整顿土地市场，为推行招标、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创造良好环境。要严格限定行政划拨供地的范围，除按《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可以行政划拨供地的，其他建设用地必须以有偿方式提供，对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范围也要严格限制。严厉打击各类土地违法交易。加大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扩大招标、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保证招标、拍卖土地使用权工作的落实。

29 日　全国粮食储备管理工作会议部署继续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国家粮食储备局召开全国粮食储备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指出，1999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精心抓好中央直属储备粮库建设，全面加强储备粮管理，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的粮食行业指导工作；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努力开创粮食流通工作的新局面。当前粮食流通工作的重点是继续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各地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突出抓好粮食收购市场的管理、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和扩大粮食销售等项工作，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

2　月

1日—2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质量工作会议

朱镕基在会上讲话指出，抓好工程质量管理，是当前经济工作中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抓好工程质量，必须提高认识。提高工程质量，深化改革，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特别要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必须强化法治，依法惩治腐败。

13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各地各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通知就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 建立和落实工程质量行政领导人责任制。(2) 严格执行建设程序，确保建设前期工作质量。(3) 健全工程管理制度，整顿建设市场。(4) 精心勘察设计强化施工管理。(5) 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把好工程质量关。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思想，以对国家、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处理好发展速度、经济效益与工程质量的关系，把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强化管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工程质量。

3日　国土资源部部署今年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五大任务

国土资源部指出：1999年是国土资源实行从地面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的集中统一管理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法制的关键一年，要全力以赴完成好五大任务。一是认真实施新《土地管理法》，切实做好新法的学习、宣传和组织实施工作，抓紧制定、修订有关配套法规；重新调整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加强耕地保护的预测预警，强化土地执法监察。二是全面提高地矿行政管理水平，努力实现矿业秩序全面好转。三是全面启动新一轮国土资源调查，采用新机制，重点做好基础调查、土地资源调查评价、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地质灾害预测预警、海洋资源调查评价等工作。四是深化国土资源管理改革，建立集中统一、精干效能、权威法治的地方国土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五是稳定地勘队伍，切实做好地勘系统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

11日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强调出售国有小型企业要依法规范操作

为制止部分地区在出售国有小型企业时出现的错误倾向，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路子，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一些地方违背党的十五大精神，把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作为改革的主要形式甚至惟一形式，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银行债务和拖欠税

款悬空，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一定的损害。通知规定，1. 要全面理解、正确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国有小型企业改革的方针，国有小型企业的出售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操作。2. 出售企业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不得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得悬空银行和其他债权人债权。3. 出售企业应当按照程序进行，搞好资产清查和原法定代表人的离任审计。4. 出售企业的净收入要上缴财政，专项用于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或支持国有中小企业发展。5. 对出售后的企业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通知还要求严格控制出售国有小型企业的范围和数量，不得出售社会公益性企业和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出售的企业。向国外（境外）购买者出售企业，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出售企业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实行人民政府逐级审批制度和应遵循的有关程序。通知要求，购买者应出具不低于所购买企业价款的有效资信证明，不得以所购买企业的资产作抵押，获取银行贷款购买这家企业。企业出售前，应依法进行资产清查，由具备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原法定代表人进行审计，未经资产清查和原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的企业不得出售。对出售企业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界定产权、评估资产和确认出售价格。在出售国有小型企业的过程中，要严格保护债权人利益，依法落实各项债权，确保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通知强调，对出售后的企业要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要加强对企业出售工作的检查和监督，对违反程序和有关规定或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谋取非法收入、与购买者串通、故意压价出售企业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出售工作的组织领导，指定部门负责出售企业的组织、协调工作，防止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和无人负责，不得以强迫命令、压指标、定任务和规定时限等方式出售企业。

22 日　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发布

朱镕基总理签署第 260 号国务院令，发布施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办法》指出：对金融机构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的规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处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未作处罚规定或者有关行政法规的处罚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依照本办法给予处罚。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和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金融机构缴纳的罚款和被没收的违法所得，不得列入该金融机构的成本、费用。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依照国家有关证券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执行，不适用本办法。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3 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扩大内需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支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有关金融机构要抓住这次业务发展的战略性机遇，提高对消费信贷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消费信贷业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1999 年起，允许所有中资商业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指导意见》要求，各有关金融机构要加大消费信贷投入，逐步扩大消费信贷的服务领域，开发新的消费信贷品种。各有关金融机

构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各自的发展目标；要在年度信贷计划中安排适当的增量，以后逐年递增。为鼓励消费者使用消费贷款，《指导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由普通住房贷款扩大到借款人自用的各类型住房贷款。同时，降低消费贷款的首付比例。对购买住房、汽车的贷款的比例可在严格防范信贷风险的基础上按不高于全部价款的80%掌握，具体贷款比例由各商业银行根据情况自行掌握。在继续做好个人住房、汽车消费贷款的同时，各银行可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试办一些新品种的消费贷款，同时，为生产厂家和商家提供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促进开展信用销售。《指导意见》指出，为适应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需要，各商业银行可针对不同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

3　月

1日　国家调低部分邮电资费

经国务院批准，自3月1日起，对邮政电信资费进行结构性调整。此次电信资费调整的项目包括：降低因特网资费和国内出租电路资费；取消各地收取的本地网营业区内附加费，基本月租费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区内通话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为每3分钟0.16元、0.18元、0.20元、0.22元；固定电话初装费指导性标准降低为500—1000元，移动电话入网费指导性标准降低为500—1500元，住宅用户同址安装两部以上电话，从第二部起不再收取初装费，农村用户的初装费收取标准还可进一步降低；长途电话附加费标准由不超过基本资费的30%降为不超过20%，目前低于20%的不得提高；国际电话资费除中东地区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凡每分钟高于12元的全部调至12元，低于12元的不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全部调至每分钟15元，广东省至港澳的电话资费不变，内地至港澳及祖国大陆至台湾的电话资费从每分钟8.10元统一下调至每分钟5元；允许联通公司收取的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通话费等，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上下浮动10%。此次邮政资费调整的项目包括：平信、印刷品资费按本埠、外埠区分。100克以上的平信资费标准及印刷品、明信片等业务资费也作了相应调整；挂号费和撤回邮件或更改收件人名址手续费上调为2.00元；国内汇款基本汇费的费率不变，最高汇费标准每笔为50元；国际与港澳台信函与印刷品恢复20克至50克一级计费档次，其他计费档次资费维持原标准不变；邮政附加费一律取消。

4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农村信贷工作指导意见

针对农村金融服务跟不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地区仍然存在农户贷款难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村信贷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指导意见》包括十方面内容，主要是：一、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村信贷服务对象实行基本分工、适当交叉，当地人民银行要做好业务基本分工的协调工作。二、根据农户的合理需要扩大贷款范围。农村金融机构在安排好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贷款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农业生产服务组织，有步骤地提供建房等消费性贷款。三、优先发放对农户从事种养业和工商业的贷款。四、支持农业产前产后

服务机构，做好对农户的服务。五、支持农业综合开发，继续发展粮棉等商品生产基地。六、支持农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现有国有、乡（镇、村）办企业按市场需求搞好农产品加工。七、扩大农村市场，开办农村消费信贷业务。支持城市商业企业到农村销售工业品。八、逐步增加农业贷款，提高农业贷款的比重。九、努力提高贷款质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十、做好农村信贷的协调和指导工作。

11 日　199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作的《关于 199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199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98 年计划执行基本实现了各项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物价总水平有所下降，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完成 795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基本实现年初确定的目标；全年粮食总产量 4900 亿公斤以上；完成工业增加值 200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84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1%，一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交付使用；灾后重建全面展开；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95698 亿元，增长 16.1%，各项贷款余额 86524 亿元，增长 15.5%；年末外汇储备达到 1450 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展顺利；价格改革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外贸进出口总额 3240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589 亿美元；科技教育取得新成就，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25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160 元，实际分别增长 5.8%和 4.3%。报告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有的还相当突出。

199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农业基本建设，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努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大力整顿市场秩序；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增长；积极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要继续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确保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正确引导居民消费，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199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 199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9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如下：1998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 548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3%。中央财政总支出 644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1.7%。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 960 亿元，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持平。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汇总，1998 年全国财政收入 985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8%，比上年增长 13.9%；全国财政支出 1077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2%，比上年增长 16.7%。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 918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 960 亿元，

地方财政结余 42 亿元。1998 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上年的 11.6%提高到 12.4%。一是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央财政基本建设支出比上年增长 90.7%。二是为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中央财政共拨付补助资金和借款 168 亿元。三是为大力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央财政用于粮食政策性补贴的支出比上年增加 102 亿元。四是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从去年起，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连续三年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同时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五是大力支持抗洪救灾，共拨付抗洪等各种救灾经费 130 多亿元。

199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主要安排以下几方面：（一）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中央财政在去年基础上再增加投入 250 亿元。（二）加大农林水利和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三）积极支持外贸出口，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四）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中央财政需给予适当补助。其中，给予军队的补助加上正常增长，今年国防费支出为 1046.5 亿元，比上年增长12.7%。（五）落实各项粮棉政策。所需费用 500 多亿元，比上年增加支出 60 多亿元。（六）大力支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1999 年，中央财政本级教育事业费增加 26 亿元，增长 21.4%，增加科技投入 8.2 亿元，增长 9.5%。（七）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999 年中央财政增加对地方的税收返还 56 亿元，增加对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扶贫资金和转移支付 22 亿元。（八）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1999 年中央财政支出增加 946 亿元，支出增加额大于收入增加额 543 亿元。再加上作为计算基数的上年预算执行数中 960 亿元的收支差额，中央财政赤字为 1503 亿元。

15 日　合同法公布

江泽民签署第十五号主席令，公布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分为总则、分则、附则，共 23 章，428 条，全文约 4 万字。这部法律将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16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外贸出口电视会议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全国外贸出口电视电话会提出，扩大内需与大力发展对外经贸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绝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要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形成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合力。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在扩大经营主体、开拓市场、转变交易方式等方面多想办法，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培育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要扩大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加快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由现行的审批制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的步伐，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降低私

营企业经营外贸的条件。要把境外带料加工、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对外援助和外贸出口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探索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的贸易方式，进一步扩大外贸合资企业的试点；利用国际商业连锁网络，实现外贸出口形式的多样化。扩大机电产品出口，是1999年中国外贸出口最有潜力的增长点。要提高机电产品的研制开发能力，加强售后服务，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力度，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要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重点是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大力培育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和医药类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要不断扩大优质名牌产品出口。各级外经贸部门继续配合有关部门深入开展打击走私、逃套汇和骗退税等各项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要提高外贸企业的收汇水平，保证国家的外汇储备。

18日　中国再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再保险公司正式成立。中国再保险公司是在原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基础上组建而成的。组建后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具有完全独立的法人资格，由国家财政出资，注册资本金30亿元人民币，外汇资本金1亿美元。

22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继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品牌，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1949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的。1996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建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199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中保集团公司，由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继承人保公司品牌，恢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为77亿元人民币。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是直属于国务院领导的全国性商业寿险公司，是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中保集团后，以中保集团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为基础改建的国家专业保险公司。公司属国有独资性质，主要经营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标的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三大类保险业务，继续承担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人身保险保单责任。

22日　工程建设违法违纪行为处罚办法出台

为了惩处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违纪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国家建设部和监察部近日联合发布了《工程建设若干违法违纪行为处罚办法》。这个处罚办法主要是根据《建筑法》和其他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明确了对建设单位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的具体处罚办法，便于进行检查和执行处罚。

29日　国家经贸委、中国证监会联合规范境外上市公司运作和深化改革

国家经贸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对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提出了以下意见：1. 公司的经营机构与控股机构必须分开。2. 进一步深化控股机构的改组工作。3. 明确公司决策程序，强化董事责任。4. 强化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功能，积极利用好社会咨询力量。5. 保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提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6. 逐步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7. 加强公司监事会的建设。8. 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用。9. 探索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办法。10. 深化公司内部改革。11. 政企分开，规范股东与公司的出资关系。

30日　财政部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管理与监督

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近日发出《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管理与监督的通知》。《通知》强调，要加强资金源头管理，确保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阶段就将资金来源管理放在突出位置，确保项目建设资金不留缺口，防止形成"胡子工程"。对所有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建设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必须加大监督力度，督促落实配套资金，否则不得安排拨付财政资金；中央补助地方投资的建设项目，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来源不能落实或明显超过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要相应调减项目，压缩投资规模。《通知》重申，要严格执行国债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法规，切实加强执法监督检查。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项目概算、预算和竣工财务决算管理，努力降低工程建设成本。凡有国债资金投入或其他财政性资金投入的建设项目，都要认真搞好工程概算审查，并将审定的工程概算，作为安排财政预算资金的依据。凡有财政资金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预算需由财政部门审查认定，作为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办理工程款拨付和结算的依据。

保监会发布公告严禁境外保险机构非法从事保险及中介活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公告，严禁境外保险机构非法从事保险及其中介活动。公告指出，未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营业性机构的外国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一律不得在中国境内招聘业务人员或委托代理人、经纪人经营保险或直接承保业务。境外保险公司在华代表机构不得从事与其业务范围不符的保险、再保险和保险中介业务活动，一经发现，将予以严肃处理，直至永远取消其在华设立代表机构的资格。

4　月

1日　修改后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颁布实施

新修订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突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了《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的适用范围。二是重新划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支行的利率管理职责；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利率制定权限。三是重新明确了金融机构办理各种存、贷款的计息、结息规则，并增补了住房金融、保证金存款、贴现、提前归还贷款、拒付存款等方面的计息规定。四是对一年期以下的短期贷款，允许借贷双方在结息方式上进行协商，既可按月结息，也可按季结息，这是利率管理的一个重要突破，适应了新形势下的需要。五是对利率违规行为及处罚方法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明确金融机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利率政策而多收的贷款利息或少付的存款利息，以及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因金融机构违规而多收的存款利息和少付的贷款利息，不受法律保护。

9日　国务院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该条例已经1999年3月17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管理和监督。本条例所称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

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条例分为总则、机构及其职责、缴存、提取和使用、监督、罚则共七章。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日　铁路全面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

全国14个铁路局分别与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在资产经营责任制证书上签字。这标志着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铁路运输系统，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行铁路局资产经营责任制，铁路局获得了12项经营权，即管内运输经营权、运输生产计划权、财务收支计划权、大修支出自主权、设备更新改造自主权、机车客车购置权、资产处置权、经营投资权、工资分配权、劳动用工权、机构设置权、物资采购权。同时，铁路局要承担起维护全路运输集中统一指挥，服从全路整体利益；确保运输安全，完成铁道部确定的行车安全，人身安全考核指标；确保铁路国有资产安全，完成铁道部确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经营性资产收益率、投资收益上交率和运输盈亏指标等经营责任。实行铁路局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铁道部落实国务院关于铁路三年扭亏为盈指标的重大举措。对在1999年度考核评定中的不合格者，铁道部将给予黄牌警告；如果连续两年考核评定不合格，铁路局长和局党委书记不仅要被免去职务，而且他们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将不予返还。

7日　四家外国保险公司获准进入我国市场

为进一步深化保险体制改革，扩大保险市场开放，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4家外国保险公司将进入我国市场。这4家外国公司分别是：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集团公司、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寿险公司。

14日　审计署要求加强建设资金和项目审计监督

审计署发出《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国家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是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各级审计机关要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排除干扰，理直气壮地开展审计工作；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审计发现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必须依法纠正、严肃处理；要注意发现大案要案线索，及时移交有关部门立案查处，在惩治腐败、规范建设市场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知》强调，在建设资金审计中，要重点检查各地政府及计划、财政等投资管理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是否按国家投资计划和工程进度拨付、使用资金，资金投向是否符合规定的用途、专款专用，有无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对重点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审计，要着重检查项目各项管理制度和工程概算（预算）执行情况，深入查处项目建设中各种腐败和损失浪费问题，促进加强项目建设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同时，结合项目审计，要依法对接受委托承办建设项目工程概（结）算审核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执业质量检查。

15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规定

为支持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加强经济适用住房贷款管理，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在借

款合同有效期内，贷款人有权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情况、贷款使用情况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借款人应按月向贷款人提供项目进度、贷款使用情况以及财务会计报表等有关资料，并为贷款人定期检查、了解、监督其贷款使用或项目经营管理情况提供便利条件。借款人申请经济适用住房贷款必须提供贷款人认可的有效担保。借款人不能提供足额抵押（质押）的，应由贷款人认可的第三方提供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以在建工程作抵押的，借款人对在建工程的自有投资应达到项目总投资的30%以上。

19日　国务院批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国务院转发由科技部、教育部、人事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局等七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规定》放宽高新技术成果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限额；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以技术入股方式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对奖励科技人员的方式做了具体规定，确定主要研发人员“所得奖励份额不应低于奖励总额的50%”；允许科技人员离岗创办高新技术企业。《规定》明确保障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自主权，允许国有和集体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吸收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参股，允许业务骨干作为公司发起人。同时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创造环境条件。各地方要支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与发展，政府利用竞标择优机制，以财政经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各地方、各部门应当积极鼓励各种科技成果转化活动，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科技人员兴办高新技术企业，鼓励科技开发应用型科研院所转制为科技型企业，切实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领导。各地方、各部门应及时研究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科技人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优化政策环境，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跃上新台阶。

20日　中国伯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首家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京正式成立。该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主要任务是收购、管理、处置由中国建设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也可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机构委托的资产管理业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全额拨付。该公司设监事会，行使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审议和监督的职能。该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并根据业务需要在北京以外地区设立5个分支机构。经国务院批准，免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承接、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的一切税收。

27日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出台

《纲要》提出了到2010年土地利用的总目标，即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明显改善，土地产出率和综合利用效率有比较显著的提高，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土地保障。《纲要》在对全国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和面临的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以保护耕地和控制非农业建设用

地规模为重点，确定了土地利用的目标、方针，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进一步协调了各类用地矛盾，提出了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用途管制的政策意见，制定了实施规划的具体措施。

25日　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草案）》

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草案）》。会议认为，科技奖励制度是我国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的精神，建立和完善国家科技创新评价体系，推进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必要深化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设立国家最高奖，完善国家级科技奖，加强对部门、地方和社会各种科技奖励的管理和指导，修改现行法规、规章，制定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将改革方案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5月23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条例》主要就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设置、评审和授予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由国务院印发。

12月26日，科技部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奖励范围、评审标准、评审机构、推荐、异议及其处理、授奖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办法做了具体规定。

5　月

5日　上海建立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制度

上海市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工作会议宣布，上海市将在1999年全面建立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制度。上海建立的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制度，主要指小企业在向银行融通资金中，根据合同约定，由依法设立的担保机构以法律保证的方式提供信用担保，以保障贷款银行债权的实现。上海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试行办法规定，担保机构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原则，与商业银行签约实行比例担保，为单个小企业提供担保的金额原则上不超过申请借款担保企业资产总额的50%，最高不超过300万元，担保期限最长两年。

6日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通知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对没有采矿许可证的采油场点，一律予以取缔；依照《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各类土法炼油设施和场点，也一律予以取缔。取缔时间均为1999年7月31日以前。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新建、未列入1998年国家原油分配计划的小炼油厂，包括加工进口燃料油的小炼油厂，必须在1999年7月底前关闭；虽已列入国家原油分配计划，但污染物排放和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小炼油厂，必须于今年12月31日

前关闭；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拟建和在建炼油厂，必须立即停止建设。

对清理整顿成品油流通企业和规范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明确了整顿的对象、目标和任务，清理整顿汽油、煤油、柴油批发企业，实现集中批发，清理整顿成品油仓储企业，要求清理整顿加油站（点），规范成品油零售市场，清理整顿外商投资成品油流通企业，加强对成品油专项用油的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实现有序竞争，并要加强组织领导。

8日　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在北京成立

财政部成立投资评审中心的主要目的，旨在通过对财政性投资项目的工程预决算审查，强化财政性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特别是加强项目资金的源头控制，此举表明，今后财政性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将实现建设资金运行的全过程监督。

13日—14日　朱镕基强调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作了重要讲话。朱镕基说，自去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坚持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重点，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充分肯定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当前粮食生产和流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随着近年来粮食生产的连续丰收，我国粮食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粮食生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劣质粮食品种销售不畅，库存大量积压，而农民仍在继续大量生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造成社会浪费，增加财政负担，而且影响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不利于我国粮食生产的长远发展。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在坚持“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政策，制定新的措施，用经济杠杆促进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把粮食生产的品种、质量、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朱镕基还对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等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5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适当调整粮食保护价收购范围；完善粮食收购价格政策；完善粮食超储补贴办法，促进顺价销售；继续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抓紧处理陈化劣变粮食；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步伐。

18日　国家计委出台重大建设项目违规举报办法

为加强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的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和国家建设资金的有效使用，避免重大项目建设中的各种损失和浪费行为，国家计委制定了《重大建设项目违规问题举报办法（试行）》，并下发施行。《办法》规定，举报范围为负责和参与国家出资项目建设的管理部门，金融机构、项目法人及其成员，以及与项目建设有关的设计、施工、设备材料供应商，咨询、监理、招投标中介机构等单位和个人。《办法》规定，受理举报的具体工作由国家计委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办公室承担。《办法》还对保护举报人和举报的奖惩进行了规定。

21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暂行规定》

《规定》指出：为了扶持、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设立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政府专项基金。创新基金是一种引导性资金，通过吸引地方、企业、科技创业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逐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新型投资机制。创新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增强其创新能力。创新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及其银行存款利息。

25日　财政部、水利部颁布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

《办法》提出，为规范和加强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切实管好用好建设资金，提高投资效益，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现行基本建设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结合水利基本建设特点，特制定本办法。《办法》共分8章40条。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办法》指出，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水利基本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依法筹集、拨付、使用水利基本建设资金，保证工程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好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的预算、决算、监督和考核分析工作；加强工程概预（结）算、决算管理，努力降低工程造价，提高投资效益。《办法》强调，各级财政部门、水利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财政部颁发的《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预算内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预算内水利基本建设资金必须按规定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工程概预结算审查，严格按照基本建设支出预算、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进度核拨资金。财政基本建设支出预算一经审批下达，一般不得调整；确需调整的，必须按原审批程序报批。针对当前建设单位管理费开支混乱、管理失控的现状，《办法》规定，未经批准单独设置管理机构的建设单位，不得开支建设单位管理费；确需发生管理费用的，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方可开支。《办法》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和水利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的监督与检查，及时了解资金到位、使用和工程建设进度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分清责任，严肃处理。对截留、挤占和挪用水利基本建设资金，擅自变更投资计划和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改变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以及财会机构不健全、会计核算不规范的，财政部门将暂缓或停止拨付资金，同时要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31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宣见》

《意见》指出，1995年以来实行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对规范加工贸易管理、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完善加工贸易管理，维护正常的加工贸易秩序，防止和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走私、逃税和逃汇等违法行为，《意见》提出了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若干措施：一、对加工贸易实行按商品分类管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逐步优化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按商品将加工贸易分为禁止类、限制类和允许类。二、加强异地加工贸易的

管理。三、严格转厂深加工管理。四、进一步完善税款追缴保障机制。五、严格控制加工贸易内销行为。六、制定单耗标准，加强海关核销。国家将制订并分批公布全国统一的加工贸易进口商品单耗定额标准，作为审批、监管核销进口料件数量的依据。外经贸主管部门严格按单耗标准审批加工贸易合同（包括结转深加工），海关严格按单耗标准进行核销。《意见》下发前已经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加工贸易合同，仍按原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规定执行。

6　月

1 日　江泽民考察湖北工作

江泽民主席 5 月 25—30 日在湖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推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国有企业，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认识经济规律，不断开辟新的发展境界。

8 日—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指出，到 2000 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个战略目标必须实现，也完全有条件实现。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标志着中国人民将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进入新世纪。扶贫开发已进入最艰难的攻坚阶段。不论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任务有多么艰巨，全党全国都要同心协力啃下这块硬骨头。江泽民强调，要牢固树立扶贫开发长期作战的思想。下个世纪继续开展扶贫开发，要首先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巩固扶贫成果，使已经解决温饱的人口向小康迈进，同时在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温家宝在会上讲话提出，今明两年扶贫开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解决温饱为中心，以贫困村为主战场，以贫困户为对象，以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和发展种养业为重点，增加扶贫投入，加大工作力度，力争每年解决 1000 万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 1998 年底，没有解决温饱的 4200 万农村贫困人口当中，一部分不适合参加生产劳动的残疾人和社会保障对象，需要家庭供养和社会救济。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有些需要搬迁移民，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解决温饱问题。除了这些特殊的贫困人口，其余 2000 万左右的人一定要在今明两年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6 月 2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

10 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并同时降低中央银行准备金存款利率、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存款利率平均降低 1 个百分点，

贷款利卑平均下降 0.75 个百分点。

14 日　国家经贸秀发布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精神，推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建设，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国家经贸委研究起草了《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共分 9 个部分。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指导原则。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形式、担保对象和担保种类。五、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职能和业务程序。六、协作银行选择和担保资金管理。七、风险控制和责任分担。八、担保机构的内外部监督。九、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组织实施与工作步骤。

《意见》指出，信用担保机构不是金融机构，不能从事金融业务，要遵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担保业务要坚持市场化运作，避免和防止行政干预，试点阶段信用担保规模要小，担保内容主要是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对象主要是产品有市场、技术含量高、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

16 日　财政部、国家计委决定恢复对江西项目审批

1999 年 3 月 22 日和 4 月 24 日，财政部、国家计委分别对江西省有关方面无视国家有关规定，在城市供水建设项目管理中弄虚作假、擅自挪用国债资金等问题作出严肃处理的决定后，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分赴有关县市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整改，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追回了被挪用的国债资金，并已如数上缴中央财政。5 月 8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家计委、财政部报告了国债项目检查、整改情况。财政部、国家计委认为，江西省对存在问题的整改，效果比较明显。为此，财政部、国家计委于日前分别作出决定，恢复对江西省国债项目的资金拨付，恢复对江西省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工作。

17 日　江泽民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在西部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江泽民强调，加快开发西部地区的总的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把西部发展同实现全国第三部发展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应该是全面的，要把水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生态环境建设、普及科学教育、推广实用技术、发展特色旅游、交通通信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要统筹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进一步加强土地转让管理，防止出现新的“炒地热”，保持农村稳定，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审定，就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量，

坚决制止非农建设非法占用土地；二、加强对农民集体土地的转让管理，严禁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三、加强对农林开发项目的土地管理，禁止征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果园”、“庄园”等农林开发；四、强化开发用地的监管，禁止利用土地开发进行非法集资；五、规范国有土地交易活动，制止炒卖土地；六、全面清理土地转让、炒卖土地情况，坚决查处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和农民集体土地非法交易的行为。

《通知》强调，城市、村庄、集镇建设一律不得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和原有建设用地要统一实行总量控制，不得超计划供地；各项建设可利用闲置土地的，必须使用闲置土地，不得批准新占农用地，闲置土地未被充分利用的地区，应核减其下一年度农用地转用指标。农村居民点要严格控制规模和范围。乡镇企业用地要严格限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严格控制高速公路服务区用地范围。加强对农民集体土地的转让管理，严禁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要强化开发用地的监管，禁止利用土地开发进行非法集资。通知最后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力量对当地土地转让、炒卖土地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坚决查处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和农民集体土地非法交易的行为。

21 日　江泽民主持黄河治理开发工作座谈会

江泽民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治理开发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治理黄河，历来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黄河治理开发总的原则是：要兼顾防洪、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三个方面，把治理开发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持续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坚持涵养水源、节约用水、防止水污染相结合；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根本，以节水为关键，进行综合治理；坚持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合理安排水利工程。要制定黄河治理开发的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全面部署，重点规划，统筹安排，分步推进，以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22 日　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工作会议召开

经过 3 年的清产核资，我国城镇集体企业的“家底”已基本摸清。截至 1997 年底，我国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在会计上独立核算并能够单独编制完整资产负债表的城镇集体企业（单位）达 72.1 万户。在已完成清产核资的 36.3 万户城镇集体企业（单位）中，86.3%是工商企业，12.9%是金融企业，还有 0.8%的城镇集体事业单位。其中，全国 31.3 万户城镇集体工商企业的资产总额（以 1998 年 3 月 31 日为清查时间点）为 184987 亿元，负债总额为 144647 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78.2%；全国 4.7 万户城镇集体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 16572.1 亿元，负债总额为 160217 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96.7%。

25 日—26 日　江泽民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

江泽民在青岛主持召开华东七省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基本制度。没有企业在管理和市场经营方面的有效机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是建立不起来的，公有

制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最终也难以实现。江泽民对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作了阐述：要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责；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用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要搞好科学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要完善企业分配机制，调动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江泽民在讲话中还要求东部地区继续加快改革发展的步伐，努力率先实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率先实现国有企业脱困的 3 年目标，率先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优化，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5 日—27 日　温家宝强调对证券市场要加强监管规范运作

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证券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有利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换经营机制，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并为企业充实资本金，减轻债务负担。发展证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吸引社会资金，增加投资，对于推动当前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加强监管，规范运作，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证。中央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由中国证监会统一负责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监管。这是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的重大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实施，是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要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指示，突出抓好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其他专业性中介机构的监管和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要不断提高证券市场规范化程度，切实保护好广大投资者利益。要全面提高证券监管干部队伍素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保证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会议宣布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将从 7 月 1 日起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已经形成。

25 日　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商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动国内市场建设，使扩大商业领域利用外商投资试点健康有序地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办法规定了合营商业企业的投资者应具备的条件、合营商业企业应符合的条件、办理程序、经营范围、适用法律，办法共 21 条，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负责解释。各地要严格按本办法规定设立合营商业企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授权机构依法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

27 日　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推进劳动预备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关于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意见的通知》，提出从 1999 年起全国城镇要普遍推行劳动预备制度，

组织新生劳动力和其他求职人员，在就业前接受1—3年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使其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后再进入就业岗位，以此提高劳动者素质，调节劳动力供求，缓解就业压力。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主要对象是城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对准备从事农业生产的初高中毕业生各地可从本地实际出发另行制定培训办法，各地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引导城镇失业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参加劳动预备制人员，由就业服务机构纳入当地劳动力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组织双向选择，优先推荐就业，并为他们提供各种就业服务。通知要求各地按照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对劳动预备制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其中技术职业（工种）的培训时间应在一年以上，非技术职业（工种）应在两年以上。参加劳动预备制的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原则上实行免试入学；其所需经费原则上由个人和用人单位承担，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可酌情减免培训费用。通知同时强调要严格实行就业准入控制。劳动预备制人员培训或学习期满后，方可就业。

28日　国务院批复组建中国铝业集团公司、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中国稀有稀土金属集团公司

国务院作出关于《组建中国铝业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组建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组建中国稀有稀土金属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组建三大集团公司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集团公司组建后，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改建和规范，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集团公司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按照相关产品和品种特点，实现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体化，围绕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防止重复建设和盲目生产，推动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

29日　中办、国办印发《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

通知说，为了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正确评价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促进领导干部勤政廉政，全面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干部管理、监督的有关规定，制定《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本规定由审计署负责解释。规定共17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正确评价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促进国有企业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由审计署负责解释。规定共19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　月

1日　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成立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朱镕基指出，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集团公司是改革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这次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是遵照江泽民总书记指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的现状，反复听取各有关方面意见后作出的重要决策。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集团公司，要着力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企分开；二是建立适度竞争的机制；三是科研力量适当集中，确保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发展；四是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五是有利于企业搞活和脱困。目的在于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企分开、产研结合、供需分离、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为跨世纪长远发展打好基础。这次成立的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2日　国家首次修订棉花标准

新《棉花细绒棉》国家标准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1999年9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27年来首次修订棉花标准，新标准较大幅度提高了棉花标准的技术要求，满足了棉花和棉纺织行业对棉花质量品级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优质优价、劣质低价的质量价格关系，强调棉花价格可随行就市；否定了原标准中引发不公平竞争的内容；新标准对实行棉花收购优质优价，引导农民压缩低质棉的种植，提高我国棉花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决定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

通知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3目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在报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各地区执行。

5日　邯济铁路提前开通运营

国家“九五”重点工程邯（郸）济（南）铁路，比原计划提前3个月开通运营。邯济铁路西起邯郸南站，东至济南枢纽的洛口站，途经河北、山东两省的肥乡、广平等市县，全长265.8公里；为国家级干线，单线，预留复线条件，设计能力为初期货运1000万吨/年、客车2对，远期货运2000万吨/年。此次开通临管运输，暂时开行货车4对。邯济铁路西接邯（郸）长（治）线，东接胶济线，构成山西省至胶东半岛及青岛港的东西干线，形成晋煤外运新的中路通道，特别是横向连接京广、京九、京沪三大南北主干线，使全国铁路网布局更趋完善。

15 日　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出台

由国家计委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引导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指南性文件《当前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正式向社会公布，138 个领域被确定为今明两年我国高技术发展的重点。编制这个指南的目的在于，明确当前优先支持、鼓励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和方向，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利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引导社会各种资源投向高技术产业，提高有限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有重点地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家计委已确定 9 个专项和一批产业化示范工程，作为首批我国高技术领域产业发展的项目。这 9 个专项包括，移动通讯系统国产化专项、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研究开发及产业化专项、软件产业发展专项、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开发及产业化专项、先进发电设备国产化专项、环保设备国产化开发及产业发展专项、稀土材料产业化及应用开发专项、农业肥料高技术产业化专项、生物技术产业化专项。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集中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对符合指南要求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项目单位可通过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向国家申请进口设备减免税。对需要国家支持的项目，国家将采取招标、竞争等方式，择优确定项目法人，并在项目资本金、贷款贴息、风险补助、开发资金投入等给予不同方式的支持。

16 日　国家经贸委提出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做好七方面工作

国家经贸委召开全国经贸委主任座谈会，会议指出，今年下半年，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两大目标，国家经贸委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关于经济工作的统一部署，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主要从七个方面加快国企改革与脱困步伐。一、继续控制总量，坚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二、加大开拓市场力度，从严规范市场秩序。三、加快兼并破产步伐，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四、准确把握政策，认真搞好债权转股权。五、落实技改贴息政策，抓好重点技术改造。六、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国企改革脱困。七、清理拖欠货款，加快企业资金周转。在做好以上七项工作的同时，要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力争实现本世纪末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20 日　中国证监会公布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条件及程序

中国证监会公布企业申请境外上市的有关条件及程序。文件指出，为支持我国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今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经重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符合境外上市条件的，均可自愿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境外上市申请。中国证监会依法按程序审批，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公司申请境外上市的条件主要有：符合我国有关境外上市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筹资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及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立项的规定；净资产不少于 4 亿元人民币，过去一年税后利润不少于 6000 万元人民币，并有增长潜力，按合理预期市盈率计算，筹资额不少于 5000 万美元等。

21日　我国固定电话用户突破一亿

中国电信宣布我国固定电话用户突破1亿户。据悉，截至1999年6月底，中国电信局用交换机总容量已达1.45亿门，长途自动交换机容量达452.5万路端，长途业务线路达到174.8万路，全国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9.54部。一个覆盖全国、连接世界，以光缆为主，卫星和数字微波为辅，集数字化传输、程控化交换为一体的通信网络已基本建成，网络的通话质量、电话接通率和运行安全性明显提高。此次电话用户突破1亿是继1992年1000万和1996年5000万用户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电信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22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加强监管整顿税纪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财政增收的重要性，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做好收入组织工作。各级收入征管部门要继续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方针，严格执法，依率计征。要进一步整顿税纪，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对于税收征管中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要坚决打击，依法严惩。税务部门要改进征管手段，进一步完善以"自行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体系。要努力巩固去年以来的打击走私成果，重点打击集团走私犯罪活动。

会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我国新的财政体制已经运行5年了，但财政职能还没有实现根本的转变，财政管理尤其是支出管理还处于传统的预算具体执行层次，还没有真正转到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规范社会经济行为、加强监督职能上来。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必须改变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监督管理的思想观念，抓紧细化预算科目，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转变财政管理方式，并把财政监督管理贯穿到财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办法，建立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与事后检查稽核相协调的监督机制，健全和完善企业会计、社会中介机构、审计和财政监督相结合的社会监督体系。

29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关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若干意见

农业部的意见提出，当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总的指导思想是，在继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需求，面向国内外市场，依靠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应坚持的原则是：(1)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要立足本地市场，面向全国，考虑国际，适应内外贸易发展的需要。(2) 坚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要因地制宜，发挥资源、经济、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区域比较优势，发展本地优势农产品，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3) 坚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继续大力开展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严格保护耕地、林地、草地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4) 坚持依靠科技进步。调整结构要坚持科技先行，通过品种改良和新品种开发、农业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普及和高新技术应用，加速我国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

(5) 坚持运用经济手段。要正确处理政府引导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政府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运用价格、财税、信贷等经济杠杆，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和发布信息等手段，适时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促进总量平衡。(6) 坚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部还提出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1) 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继续执行有关税收优惠政策。(2) 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3) 加强优质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和加工转化。(4) 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5)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6) 加强信息体系建设。(7) 加强农业标准体系建设和质量监督管理。(8) 加大资金投入。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支持和保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顺利进行。

8　月

3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规范封闭贷款管理办法

为规范封闭贷款管理，积极支持亏损严重的国有工业企业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五部门联合下发《封闭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对封闭贷款的贷款条件、审核程序、管理方式等作出了统一规定。封闭贷款的对象为资产负债率高、亏损严重，按照正常条件不能取得银行贷款，但政府已决定救助并采取救助措施的国有工业企业。只要其部分产品有市场、有效益，能够保证贷款在采购、生产、库存、销售的整个环节中封闭运行，就能得到银行封闭贷款的支持。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通知严禁擅自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

由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审计署、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的《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实施。《规定》要求，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应当统筹安排、注重效率、保证质量、避免重复。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应当事先拟定检查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备案，指定部门对行政机关的检查计划进行必要的协调，能够合并的应当合并，可以联合实施的，应当组织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实施检查。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行政机关要将检查计划报上一级机关备案，上级机关同样要进行必要的协调。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的经济检查每年一般不得超过一次；税务机关对同一企业的税务检查，每年不得超过两次；质量技术监督机关对同一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除质量抽查不合格外，每年不得超过两次。对已经派有国务院稽察特派员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有关行政机关不再对企业进行财务检查。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除法律、法规、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计委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规定》明确指出，对违反规定对企业的经济检查，企业有权抵制，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监察部门检举，收到检举的部门应当负责保密并及时处理。

国家计秀发布实施《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

针对近年来低价倾销行为正由一些工业生产行业向商业、服务业蔓延的现象，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国家计委发布实施《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规定》对低价倾销和合理降价的界限作了明确界定。《规定》指出，低价倾销行为是指经营者在依法降价处理商品之外，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所称成本是指生产成本、经营成本。

9日　国家经贸秀发布《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第一批）》

制止重复建设，加快行业调整和改组的步伐，引导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及社会的投资方向，并为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实现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国家经贸秀发布《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第一批）》。目录禁止投资的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内容确定的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造成当前生产能力过剩，需总量控制的项目；工艺技术落后，已有先进、成熟工艺和技术替代的项目；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严重的项目。目录涉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不予审批；各银行、金融机构不予贷款；土地管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消防、海关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凡违背本目录进行投融资建设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目录涉及到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处理。本目录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解释。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12日　江泽民指出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江泽民在大连主持召开东北和华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指出，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使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保持和促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强调，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已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方针，要继续全面贯彻落实。第一，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第二，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第三，大力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第四，切实解决国有企业的突出问题和困难。第五，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第六，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江泽民要求，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领导。第一，要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坚定不移地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向前进。第二，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第三，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它们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第四，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学习，深入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调查研究。

16日　秦沈客运专线破土

我国第一条快速客运专线——秦沈客运专线正式破土兴建。秦沈客运专线西起秦皇岛站，东至沈阳北站，出山海关后途经绥中、兴城、葫芦岛、凌海、北宁、盘锦、盘山、台安、辽中、新民等12个市（县、区），全长404.64公里，为双线电气化铁路，规划日通过能力为100对列车以上，设计时速为160公里。投资总规模为150亿元左右，

计划2003年8月开通。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管局、建设银行、中直管理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方案》规定，从1998年底起，中央在京党政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为保证新老住房分配办法的平稳过渡，《方案》规定，凡在1998年底前已开工的单位自建住房，或已交纳购房预定金购买的商品住房，并于1999年底前竣工的，可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规定的办法向职工出售，也可以按届时北京市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规定的出售现有公房的成本价向职工出售。住房补贴采取一次性发放和按月发放相结合的形式。方案提出，要稳步提高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现有公有住房租金，并稳步开放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市场。

20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包括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加强基础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建立住宅技术保障体系，健全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等部分。住宅产业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到2005年解决城镇住宅的工程质量、功能质量通病，到2010年城镇住宅符合适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到2005年初步建立住宅及材料、部品的工业化和标准化生产体系；到2010年基本实现住宅部品通用化和生产、供应的社会化；到2005年城镇新建采暖住宅要在1981年的水平上降低能耗50%，2010年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再降能耗30%；到2005年科技进步对住宅产业发展的贡献率要达到30%，2010年提高到35%。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决定》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一、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推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加强对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和重点的宏观引导。二、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实行企业化转制，大力促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加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营科技企业。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三、采取有效措施，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实行财税扶持政策。实施金融扶持政策。完善科技人员管理制度，鼓励转化科技成果。对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的给予专项政策扶持。正确评价科技成果和进行科技奖励。加强

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四、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全面推进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完善科技立法，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协作。

21日　国务院办公厅要求进一步做好国有粮食企业扭亏增盈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粮食企业扭亏增盈工作意见的通知。《意见》指出，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强领导，把国有粮食企业扭亏增盈作为粮食工作行政首长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要强化粮食主管部门对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的分类指导和监督考核，切实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强化内部管理。农业发展银行和有关商业银行要加强粮食企业资金监管，搞好资金供应，财政、税务部门务必要落实各项补贴和税收政策。

24日　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在北京开幕。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部署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江泽民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实现我国技术发展的跨越。这些都是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和重大决策。江泽民强调，我们既要充分估量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严峻挑战，更要珍惜它带来的难得机遇。必须抓住机遇，正确驾驭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加强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加强技术创新，最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真正形成推动技术创新工作的有效机制。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路子；第二，坚持面向经济建设，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第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第四，加强全社会的大力协同，尽快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配套体系；第五，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有效的保障与激励机制；第六，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25日　国家计委、外经贸部检查清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乱收费行为

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向外商投资企业的乱收费进行检查清理。重点检查的乱收费行为是：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自行提高收费标准和任意扩大收费

范围；不执行国家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不落实国家给予的减免费用的优惠政策；将有关政府职能转移到中介服务机构实行有偿服务收费；执行地方越权设立的收费项目或收费标准；以保证金、抵押金等方式收费及强制提供服务等乱收费行为。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布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该法规定，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一、工资、薪金所得；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所得；四、劳务报酬所得；五、稿酬所得；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八、财产租赁所得；九、财产转让所得；十、偶然所得；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5%至45%。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至35%的超额累进税率。三、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四、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五、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公布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共有总则、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及事物管理、个人独资企业的解散和清算、法律责任和附则共6章48条，《个人独资企业法》从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同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第21号主席令。《招标投标法》共分6章68条，从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增发国债和调整中央财政预算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批准增发国债和1999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增发6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增发的国债，300亿元由中央政府举借，列入今年中央财政预算，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将由年初预算的1503亿元扩大到1803亿元；其余300亿元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预算。

9　月

7日　信息产业部发布《电信网间互联管理暂行规定》

本规定共9章，51条。分别对电信企业的义务、互联技术规则、互联费用的分摊与结算、互联协议和工程建设、互联时限、互联后的网络管理、互联争议的协调与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

9日 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发布利用外资新政策，以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新政策主要包括：鼓励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进一步改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允许1993年底前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货物，选择执行“免抵退”政策；允许中西部地区在其省会或首府城市选择一个已建成的开发区申办国家经济开发区。对不利于吸收外资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全面清理与调整。

10日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印发《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办法》、《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国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办法分别对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的组织领导、项目决策和下达、项目的实施与监管、项目责任追究及惩罚，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国债专项资金安排的原则和方式、国债专项资金支持的标准及补助资金的下达、国债专项资金的使用及管理作了具体规定。

11日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强调中国将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强调，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是加强亚太经合组织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没有经济技术合作，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将缺乏持久的动力。在重视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中国的关税算术平均水平从1992年的42.5%逐年降低，目前已降到了16.7%。到2005年，中国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降到10%。中国已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了大量非关税措施。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也根据自己的国情，循序渐进地采取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重大措施。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与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上强调，“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江泽民谈到，一、重视人力资源开发，要培养具有国际商业头脑和全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家。二、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三、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指出，要使亚太经合组织保持生命力，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应该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积极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第二，积极深化区域经济技术合作，为亚太地区的中长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积极稳妥地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第四，积极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第五，积极维护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亚太经合组织的生机与活力。会议通过了题为《奥克兰挑战》的宣言。《宣言》强调，亚太经合组织要努力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强劲和开放的市场以支持经济增长，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多边贸易体制发挥领导作用，以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

16日　国务院批准实施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制订的。《条例》对发审委的组成办法、人员任期和工作程序等作了具体规定。为了保证审核质量，《条例》要求所聘请的委员须熟悉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了解证券业务，且具有足够的专业判断能力；为了增加审核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使委员在组成上更具有代表性，扩大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外委员的比例。会外委员占委员人数的78%，分别来自国家宏观调控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国有银行、证券交易所、全国工商联、科研单位、专业社团、大学及证券业中介机构，并聘请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包括香港专业人士）；为了提高发审委审核工作的权威性，条例规定由该行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任发审委当然委员。同时新聘请了证券业内证券、法律和会计等专业人士出任发审委委员。《条例》规定，发审委委员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聘任。除发审委当然委员外，其他委员聘期两年，续聘可以连任，但每次换届时至少更换1/3的委员，且每个委员连续任期最长不得超过3届。《条例》还规定发审委通过召开发审委审核工作会议的方式进行工作。委员分8个组，各组设1名组长，组长由各组委员选举产生。发审委会议由各组轮流召开，由组长或其委托的本组其他委员召集。参加会议的委员应不少于8人。委员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应当以谨慎的态度发表意见，并对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条例》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发行审核工作的质量和透明度，对股票发行审核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起到促进作用，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22日　中共中央十五后四中全会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五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全面加强企业管理，要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要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30日　国务院发布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2号发布《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储蓄机构取得人民币、外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办法共15条，自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

10　月

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首都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江泽民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

指出，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践也充分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康庄大道。我们将继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在新的世纪里不断谱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以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霸权主义和推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

1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补充通知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要调整农业和粮食生产结构，促进粮食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要认真贯彻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促进粮食顺价销售，要拉开品种质量差价、季节差价，要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维护正常的收购秩序，财政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

18日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今日挂牌成立。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收购、管理、处置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保全资产。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人民币，其中含人民币60亿元，外汇5亿美元，由财政全额拨入。其营运资金来源包括注册资本、发行公司债券、商业借款、人民银行再贷款、营业收入等。据了解，中国银行此次剥离不良贷款的范围，是根据现行贷款分类法，剥离逾期、呆滞和呆账贷款，其中待核销呆账以及1996年底以来发放并已逾期的贷款，不属此次剥离范围。

19日　国家经贸委提出促进自营企业扩大出口的意见

国家经贸委提出《关于进一步促进自营企业扩大出口的意见》。《意见》提出，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指示，落实国务院提出的鼓励扩大出口的各项措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进一步促进自营企业扩大出口提出如下意见。一、全面落实企业的外经贸经营权。对国有和集体生产企业的进出口权逐步实行登记备案制。除商品进出口经营权外，对具有一定规模的重点自营企业要赋予其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权和外事审批权，使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扩大自营生产企业的进出口经营范围。二、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制定规划，着力扶持一批技术含量高的重点出口产品。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认真做好扩大出口的基础工作。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促进出口商品上档次、上水平。鼓励成套设备出口，支持自

营企业到境外投标，进行工程承包。三、努力改善企业自营出口的外部经营环境，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帮助自营进出口企业落实并用好出口商品配额。为自营进出口企业扩大出口提供金融支持。优先保证自营企业出口所需进口重要原材料。简化进出口环节管理手续，降低收费。四、围绕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的两大目标，努力提高自营企业的竞争力。要充分运用国家关于实行兼并破产，推动企业优化重组的政策，鼓励有实力的自营企业通过兼并实现资本扩张，拓展出口产品领域，实现多元化经营。凡符合“债转股”条件的自营企业，各级经贸委要积极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开发银行推荐，并指导企业制订方案。积极支持有条件的自营企业多渠道融资，包括利用证券市场直接融资。五、鼓励自营生产企业到境外设点建厂，开展国际化经营。六、工贸结合，广开渠道，采取多种方式扩大自营企业出口。七、抓重点、抓骨干，带动自营企业出口稳步增长。八、加强领导和协调，引导和督促自营企业健康发展。

26日　电信资费再次调整

自10月1日起，再次对部分电信资费进行调整。这是自1999年3月1日电信调价后，我国再次对电信资费进行调整。其中，取消拨号上网用户的网络使用费和通话费分段计收的办法，一律按每小时4元收取，同时上网用户的通话费减半收取。这将使上网用户的支出降低。此次还降低了出租电路资费。模拟电路、数字数据电路和数字电路月租费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平均再降低30%。固定电话装移机工料费的收取标准，现行标准高于300元/线的，一律降到300元/线以内，现行标准低于300元/线的，维持现行标准不变。对分组交换业务资费也做了下调。

27日　国务院批准保险资金可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

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根据实施方案的规定，保险公司将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在二级市场买卖已上市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在一级市场配售新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中国证监会新发行的基金，将按一定比例向保险公司配售，并根据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增发新基金。

31日　朱镕基提出西部地区的开发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朱镕基总理在赴甘肃、青海、宁夏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时指出，在世纪之交，我国现代化建设即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时候，提出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决策，这不仅在经济上，更重要的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是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第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这是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根本。第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关键。第四，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这是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重要条件。朱镕基在考察过程中指出加强各民族团结，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的稳定和大开发，也关系到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胜利闭会

历时184天的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行闭幕式，国务院副总理、中国’99昆明世博会组委会主任李岚清出席闭幕式并在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来自69个国家和26个国际组织参加了本届世博会。整个会期共达成经贸合作项目325个，协议总投资和经贸总成交额150多亿元，接待海内外游客940多万人次。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早在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并根据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修正。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再次修订的《会计法》，新修订的会计法明确规定必须依法办理会计事务，同时，又加大了对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惩治力度。规定了有关会计核算、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人员、法律责任和附则共7章52条，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11　月

1日　国家计委、财政部决定降低468项收费标准

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出《通知》，决定降低468项收费标准，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外贸进出口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次降低收费标准的收费项目包括社会福利生产管理费、口岸管理费、生产许可证审查费、企业注册登记费、城乡集贸市场管理费、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国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收费等。每年可减轻企业和其他方面负担约30亿元。

6日　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第三批取消的各种基金项目

经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批准，并报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取消的各种基金（资金、附加、收费）项目的通知》，公布取消73项各种基金项目。第三批取消的基金项目，主要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未按国家规定报经国务院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越权设立的各种基金，以及虽按国家规定程序报经批准设立，但已不适应目前经济发展要求，应停止征收的各种基金，包括资金、附加和专项收费。取消之后，预计一年可减轻企业负担约100亿元。《通知》规定，公布取消的基金项目自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其他地区和部门已出台的基金项目与《通知》公布取消的各种基金项目相类似的，应一律参照本通知规定予以取消。《通知》要求，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减轻企业负担办事机构要组织专门力量对公布取消的各种基金项目进行专项检查。对不按规定取消的地区和部门，一经发现，应责令将其非法所得退还缴费单位和个人，对确实无法清退的非法收入，一律没收上缴中央财政。同时，要按规定追究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今后，各地区、各部门设立各种基金，必须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重要的报国务院批

准。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一律不得设立各种基金。

11日　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息产业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意见》提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分两类情况处理：一类是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广播电视传输光缆干线，广播电视部门未建的，原则上不得再建；要通过各种方式充分利用国家通信主干网和其他已建成的网络，不再搞重复建设。确需新建，须符合国家信息化规划并经过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同意。另一类是城市市区和县以下的广播电视分配网，也就是从市、县广播电视台的播出前端到用户的网络，应由广播电视部门形成相对完整的专用网，以适应广播电视节目管理和发展用户的特殊要求。广播电视接受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统筹规划、统一技术标准等方面行业管理的同时，凡建立有线电视频道、设立网上播出前端和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等，必须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许可。

12日　我国开放白银市场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出《关于白银管理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取消白银“统购统配”管理政策，放开白银市场，允许白银产需直接见面；取消对白银制品加工、批发、零售业务的许可证管理制度（银币除外）；支持和鼓励国内白银生产企业有计划地出口白银；适当限制进口白银及其制品。解除白银管制，开放白银市场，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50多年的白银统购统配管理体制宣告结束。

15日　八项粮食国家标准出台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稻谷》、《小麦》、《玉米》等八项粮食国家标准，新标准将于2000年4月1日起实施。此次发布的《稻谷》、《小麦》、《玉米》三项强制性标准是在原有国家标准的基础上重新修订的，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主要技术指标。同时，为了拉开粮食品种质量档次，又新制定了《优质稻谷》、《优势小麦——强筋小麦》、《优质小麦——弱筋小麦》、《淀粉发酵工业用玉米》、《饲料用玉米》等推荐性国家标准，并规定了反映粮食内在质量指标的要求。

17日　我国再生能源项目启动

我国第一个再生能源——太阳能研究生产开发基地建设项目10月底在深圳启动。由法国阿利雅—泰驰公司和深圳万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塞纳电子有限公司、金光红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2.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这个基地，将引进、消化法国在太阳能应用产品上的技术及市场份额，以太阳能灯及太阳能家电产品的生产销售为基础，同时开发研究太阳能尖端产品，一直到太阳能发电站的投资和建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江泽民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分析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全面总结了1999年的工作，提出了2000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朱镕基总理就2000年经济工作部署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2000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实行中央关

于推动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突出抓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扩大内需。进一步稳定农业的基础地位，着力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积极促进扭亏增盈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税收、价格等宏观调控手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抓紧技术改造，加快科技创新，努力扩大消费。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增加进出口，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和加强扶贫工作，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世纪。

会议对 2000 年的经济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五项主要任务：一、继续实施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二、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三、加快科技进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四、深化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五、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会议从八个方面具体部署了 2000 年的经济工作：一、确定 2000 年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二、坚持实行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三、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四、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五、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六、积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七、加快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八、切实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2000 年还要制定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

19 日　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11 月 21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2 个百分点，即由 8%下调到 6%，金融机构可用资金将增加近 2000 亿元。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 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人民银行通过较高存款准备金率集中的资金，用于向专业银行发放再贷款，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和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随着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和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改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政策性资金，已由政策性银行承担，这为中央银行真正发挥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创造了条件。1998 年 3 月，中央银行改革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 13%下调到 8%。商业银行一次性增加的可用资金，主要用于认购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

20 日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总结了 1999 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未来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需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 200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九项任务。主要任务包括：(1) 多方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增加固定资产投资。(2) 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3)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4) 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5)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传统工业技术升级。(6)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7) 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8)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搞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9) 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神舟"号发射成功

北京时间11月20日6时30分，"神舟"号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在完成预定的空间科学试验之后，21日凌晨3时41分，飞船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是我国独立自主地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的空间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和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成功的飞船。这次发射对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航天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24日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加强和改进对小企业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各商业银行要健全和强化小企业信贷部，充实信贷管理队伍；国有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大银行在网点、资金、技术、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城市商业银行要按照市场定位要求，切实办成为小企业服务的主体；城乡信用社要真正办成农民、个体工商户和小型企业入股，由入股人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股东服务的合作组织，对股东贷款可不实行抵押和担保。人民银行将在再贷款、再贴现和发行金融债券等方面积极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意见》要求改进小企业信贷工作方法。各金融机构要逐步探索建立小企业信贷评估、审批和贷款制度，借鉴国外信用评分办法，将小企业资信与小企业经营者个人信用相结合发放贷款。完善信贷管理体制，在强调防范风险、明确责任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贷款激励机制。积极支持科技型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小企业的技术进步。适当扩大出口信贷业务范围，对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可以采用卖方信贷，也可在符合贷款条件的前提下办理买方信贷业务。《意见》还就支持再就业安置工作，支持小企业为大中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及参与政府采购合同生产，支持商业、外贸及新兴领域企业的发展，适当扩大贷款的范围，支持建立小企业社会化中介服务体系，密切关注贷款投向，加强贷款管理，加强对金融机构改进小企业服务的引导和督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25日 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时，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根据行业、企业类型和改革的需要，采用不同的土地资产处置方式和管理政策。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与完善土地资产处置方式、明确土地权益相结合，降低企业改革成本，促进国有企业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实现土地资产价值。优化国有企业资产结构、减轻企业负担要与调整用地结构有机结合，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和盘活现有建设用地，促进国有企业减债、脱困和集约利用土地。

准格尔煤田一期工程正式投产

经过6年建设、3年试生产的准格尔煤田一期工程于11月24日正式移交生产。这意味着国家投资92.65亿元进行的准格尔煤田一期开发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准格尔煤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东部，位于蒙、陕、晋交界处，在已勘探总面积

136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探明地质储量为272.2亿吨。一期工程建有年设计能力1200万吨的露天煤矿及年洗选能力1200万吨的大型选煤厂，装机容量20万千瓦的坑口电厂，年运输能力1500万吨的大准电气化铁路等。

12　月

1日　中央储备粮食第三次通过市场竞价销售

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储备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竞价销售中央储备粮，这次竞价销售将持续到12月3日，这也是中央储备粮食第三次通过市场竞价销售。这次中央储备粮竞价委托销售数量为63万吨，品种有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还有黑龙江产的春小麦。与前两次相比，这次中央储备粮竞价销售在起价、履约保证金等方面更为完善，更接近实际。

2日　国务院决定对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清理整顿

这次清理整顿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规范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进行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脱钩改制；依法规范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对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指导和管理。清理整顿的范围包括：与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经济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对维护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并依靠专业知识和技能向社会提供经济鉴证服务的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含实行企业化经营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及其行业管理组织，如会计师（审计）事务所、财会咨询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各种资产评估、价格鉴证、工程造价审计（审核、咨询）等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以及相关的行业管理协会、公会、管理中心等。经清理整顿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一律实行脱钩改制，任何政府部门不得举办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也不得与其有任何经济利益关系。通知要求，清理整顿工作将分三步依次展开：第一步，对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进行集中清理统计，分类处理。保留依法设立、定位准确、管理体系健全、运作规范的中介机构；归类合并重复设置、业务交叉的中介机构；撤销设置不合理、管理混乱的中介机构。第二步，拟保留、归类合并的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挂靠单位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不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脱钩后，其名称不得冠有原挂靠单位名称字样或痕迹。第三步，规范对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管理，包括健全资格认定和管理法规，统一行业管理组织，明确政府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执业质量保障机制。

我国将全面推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企业职工养老金发放现场会上提出，我国将全面推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保证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取基本养老金，切实减轻企业的社会事务负担。力争到2000年底，全国80%以上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实现由社会服务机构发放养老金。根据这个精神，原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企业、军工企业和实行破产关闭企业的退休人员、所有企业离休人员的养老金将首先实行社会化发放；新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从参加之日起实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实行社会化发放养老金是建立和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支付的重要手段。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充分利用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网点分布广泛、服务设施完善的优势，委托其发放养老金，彻底改变由企业代发养老金的传统做法。对于居住偏远和有特殊困难不能前往社会服务机构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机构可直接向他们送发养老金。

3日　中国移动通信开通北美业务“全球通”可漫游五大洲

上午9时，筹建中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开通了与美国13个州1.9GGSM网自动漫游业务，从而使中国移动通信“全球通”国际漫游业务通达范围从原来的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一举扩展到包括北美在内的五大洲。由于美国GSM运营商采用1900MHz频率，因此中国移动通信用户在美国漫游时除了SIM卡不变外，还要有适应美国1900MHz频率的手机。

国家储备棉竞卖交易在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正式运行

国家储备棉竞卖交易在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正式运行。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是国务院决定设立，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承办的国内惟一的规范化、现代化的棉花交易市场，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组织。交易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形成价格，组织交易，规避风险，传递信息。

8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外；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企业每一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得超过该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抵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14日　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许可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参加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议标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开具保函前，须向外经贸部提出项目许可的申请。外经贸部收到企业报来的齐全材料后，按以下内容进行审理，并在3个工作日内对企业的申请予以答复。经审理合格，外经贸部将出具《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许可》。银行凭外经贸部出具的项目许可，按照银行业务的有关规定，对获准企业的保函申请予以审理，并根据审理结果决定是否为企业出具有关保函。

15日　国务院有关部委要求加大清理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工作力度

针对一些企业拖欠大量养老保险费、严重削弱社会保险基金支撑能力的现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加大清理回收欠费工作力度，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收缴率。

通知提出，今后要建立清欠目标责任制。对长期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要逐户审核，建立专门的欠费记录并进行动态跟踪。对生产正常运行、工资能够正常发放的欠费

企业要逐户制定补缴计划，在2000年年底前基本补清欠缴的社会保险费。要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把清欠责任落实到有关机构和个人，并根据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年终考评和奖励。各执行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格依法清欠。从现在起，有缴费能力但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将不准上市，不予核准其独资、参股设立新企业，不予核准设立分支机构及增加经营范围。

17日　国家税务总局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减税优惠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实施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三年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通知。可执行本项税收优惠政策的中西部地区是指：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共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部行政区域。可执行本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从事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和限制乙类项目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

25日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作如下修改：1. 第六十七条修改为："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主要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构、部门委派的人员组成，并有公司职工代表参加。监事会的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会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职权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权。""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2. 第二百二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属于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以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公司发行新股、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30日　国家经贸委发布第二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

国家经贸秀发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二批）》。《目录》要求淘汰的工艺和产品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生产方式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环境污染严重、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涉及钢铁、有色、轻工、纺织、石化、建材、机械、印刷业（新闻）等8个行业，共119项。

1999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2054亿元，比上年增长7.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212亿元，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40806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27036亿元，增长7.5%。全年社会劳动生产率11677元，比上年提高6.3%。市场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4%，多数商品价格低于上年水平。全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3%。劳动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年末全国从业人员7058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29万人。再就业工程取得新进展。1999年全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新增564万人，通过多种途径使492万人实现了再就业，退休及自然死亡等减少32万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547

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97 亿美元。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很突出，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199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是：

一、农业。粮食产量基本稳定。全年粮食总产量达 5.08 亿吨，比上年减产 397 万吨，减产 0.8%。其中，夏粮和早稻合计增产 570 万吨，秋粮由于入秋以后北方地区旱情较重，减产较多。畜牧业和渔业继续增长。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强，大江大河治理工程进展顺利，农业防洪抗旱能力增强。

二、工业和建筑业。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取得了初步成效。重点行业组建了一批大企业集团，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始实行债权转股权，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改善。工业生产持续平稳增长。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353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5%。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11603 亿元，增长 7.4%；集体企业 3462 亿元，增长 7%；股份制企业 2986 亿元，增长 11.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4201 亿元，增长 12.9%；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775 亿元，增长 13.3%。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冶金、建材、有色、石化等行业关闭了一批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高耗能的小企业。高科技产业发展明显加快，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程控交换机等生产比上年增长 12%—43.6%。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亏相抵实现利润 9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7%，是近 5 年来的最好水平；亏损企业亏损额 851 亿元，下降 15.9%；年末产成品库存为 3441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2%。但是，1999 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带有一定的恢复性，一部分企业的效益还不理想，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仍然比较大。

三、固定资产投资。1999 年，在国家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增加投入的推动下，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98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基本建设投资 12619 亿元，增长 5.9%；更新改造投资 4419 亿元，下降 2.2%；房地产开发投资 4010 亿元，增长 11%。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有：原煤开采 2070 万吨/年，大中型发电机组容量 1703 万千瓦，11 万伏以上变电设备能力（含 11 万伏）6646 万千伏安，新（扩）建万吨级港口码头年吞吐能力 1869 万吨，全国 2002 个县（市）进行了农村电网的改造，投产线路 35.7 万公里。

四、教育和科学技术。1999 年，全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160 万人，比上年增招 51 万人，在校生 413 万人；成人高等学校招生 116 万人，在校生 306 万人。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招生 9 万人，增招 2 万人，在校生 23 万人。1999 年，国家进一步加大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力度，推进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加快了科技产业化步伐。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取得新进展。全年国家组织了 663 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 1329 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 26 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成功发射了第一艘自行研制的“神舟”号宇宙飞船，标志着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迈出了重要一步。

五、交通和邮电业。1999 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完成增加值 44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周转量 41170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8.2%。完成旅客运输周转量 11250 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 5.7%。沿海主要港口完成货

物吞吐量 10.4 亿吨，比上年增长 13%。邮电业务总量完成 33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2.1%。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3.5 部/百人。全国计算机互联网络用户达到 890 万户。

六、国内贸易。1999 年，国内市场商品销售稳中趋活。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1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如果考虑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 10.1%）。生产资料市场交易有所回升，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 93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各类商品交易市场成交活跃。

七、对外经济。1999 年，由于国家采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在内的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逐步复苏，我国外贸出口转降为升。全年进出口总额 360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3%。出口总额 1949 亿美元，增长 6.1%，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全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17100 个，比上年下降 13.8%。国际旅游发展较快。全年入境游客人数 7280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4.7%。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141 亿美元，增长 11.9%。

八、金融、证券和保险业。1999 年，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货币流动性有所增强。年末广义货币（M_2）为 119898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4.7%；狭义货币（M_1）为 45837 亿元，增长 17.7%。存贷款稳定增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087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全年通过发行、配售股票共筹集资金 9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全年共发行国债 3715 亿元，比上年增加 404 亿元。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全年保费收入 1393 亿元（含外资机构），比上年增长 10.2%，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510 亿元。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较快发展。1999 年，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90.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91.6%。全国有线电视用户 7700 万户。卫生事业不断进步。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含诊所）31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 446 万人。

十、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单位总数已达 154 个；全国自然保护区达到 1146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到 137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8813 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8.8%。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防治工作继续推进。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与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的实施工作有序进行。至 1999 年 11 月底，已竣工项目 525 个，累计完成投资额 680.4 亿元。

十一、人口与人民生活。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1999 年全国出生人口 1909 万人，全年净增人口 1099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8.77‰，比上年下降 0.76 个千分点。年末全国总人口为 125909 万人。社会保障事业巩固提高，部分地区已进行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社会福利事业有新的发展。城镇建立起各种社区服务设施 18 万个，全国 667 个城市、1682 个县已全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999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一、1999年新增加的项目（11项）

水利项目1项：宁夏扬黄扶贫灌溉工程

铁道项目3项：包西铁路神木北至延安北、内昆线、水株复线

电力项目5项：福建棉花滩水电站、辽长吉哈50万伏输变电工程、华东江苏50万伏输变电工程、浙江秦山核电站三期、全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

城建项目2项：上海轨道交通明珠线一期工程、深圳地铁一期工程

二、1999年以前确定的在建项目（91项）

水利项目10项：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治淮工程（怀洪新河、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近期工程）、大湖综合治理（望虞河工程、大浦河工程、杭嘉湖南排工程）浙江珊溪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洞庭湖治理二期（堤防加固及洪道、整治工程）、湖南江垭水利枢纽工程、甘肃引大入秦工程（地方项目）、甘肃疏勒河农业灌溉及移民综合开发（地方项目）、新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

农业项目1项：吉林松原玉米加工项目（地方项目）

林业项目1项："三北"防护林三期工程

铁道项目10项：西安安康线、邯济线、安徽芜湖长江大桥、南疆铁路、成昆线电化、宝咸复线、哈大线电化、新菏兖石复线一、二期工程、达万线、朔黄铁路

交通项目15项：广州港新沙港区一期、川藏公路、广西防城港二期工程、秦皇岛港戊己码头、烟台港西港池三期、黄骅港一期工程、天津港（地方项目）、黑龙江哈同公路（地方项目）、江苏江阴长江公路桥（地方项目）、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地方项目）、厦门海沧大桥（地方项目）、湖南湘江航运二期工程（地方项目）、广西西江航运二期工程（地方项目）、京沈高速公路（地方项目）（宝抵－山海关段、山海关－沈阳段）、京深高速公路湘潭至耒阳段（地方项目）

民航项目2项：首都机场航站楼项目、上海浦东机场（地方项目）

煤炭项目12项：河北蔚县矿区、山西晋城矿区、山西华晋离柳矿区沙曲矿井、黑龙江双鸭山矿区、安徽淮南矿区、安徽淮北矿区、山东兖州矿区、山东枣藤矿区、河南平顶山矿区、河南永夏矿区、甘肃华亭矿区、神府东胜矿区

石油项目6项：黑龙江大庆油田开发、辽宁辽河油田开发、山东胜利油田开发、新疆油田开发、新疆塔里木油田开发、陕甘宁长庆油田开发

电力项目18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云南大朝山水电站、大生桥水电站一级及天生桥至广州50万伏直流输电工程、四川二滩水电站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青海李家峡水电站、河北邯峰电厂、山西阳城电厂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蒙古伊敏煤电联营一期工程、辽宁

绥中电厂、江苏扬州二电厂、浙江北仑港电厂二期、湖北襄樊电厂、贵州安顺电厂、陕西宝鸡第二电厂、浙江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广东岭澳核电站

钢铁项目3项：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三期、广州珠江钢铁有限公司、邯钢薄板坯连铸连轧工程

有色项目1项：江西铜业公司贵溪冶炼厂

化工项目2项：广西鹿寨化肥厂、贵州瓮福磷矿重钙项目

石化项目5项：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大化肥项目、天津石化公司聚酯工程、宁夏化工厂第二套化肥工程、镇海炼化股份公司煤油扩建工程、洛阳石化总厂化纤工程

医药项目1项：山东鲁抗医药集团青霉素钾盐工程

机械项目1项：大型水电设备制造项目

教育项目1项：高等教育“211工程”

粮食项目1项：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

城建项目1项：河南义马煤气化工程（地方项目）

2000年

1　月

3日　中国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管理规定

为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保险公司管理规定》，明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授权，依法对保险公司履行监管职能。《规定》对保险机构、保险经营、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保险资金管理及运用、保险公司偿负能力、再保险、监督检查以及处罚等作出具体规定，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印发国际金融组织与日本协力银行贷款管理规定

为适应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的新管理体制，规范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及日本协力银行相关贷款管理的程序和要求，财政部制定了《国际金融组织与日本协力银行贷款管理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日本协力银行贷款是我国政府的主权外债，贷款资金的借人与使用以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或转贷银行）的信誉为基础。财政部是国务院批准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日本协力银行贷款的管理部门；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务院批准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主要转贷机构；中国银行是国务院批准的日本协力银行贷款的主要转贷机构；地方财政部门是地方政府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日本协力银行的归口管理部门。

7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闭幕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1999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研究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今年的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讨论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会上讲话，对当前农村形势、今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作了全面的阐述。

会议提出了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着重抓好的几个方面工作：（一）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必须加快引进、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二）加快畜牧业发展。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三）发展农产品加工。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立足现有加工能力的改造，加快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使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有一个大发展。（四）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要积极发展高效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在生态脆弱地区，要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发展林果业和畜牧水产业，改善生态环境。粮食主产区要通过结构调整发挥粮食生产的优势。（五）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推动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的空间。

会议强调，农民收入关系全局。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要始终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突出位置。解决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广辟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从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农民增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大力气解决好这个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要把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当前保护农村生产力，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政策思想，就是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要继续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下大力气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同时，要标本兼治，逐步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乱收费。要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各地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努力完成“八七”扶贫攻坚任务。

9日　我国“九五”环保计划顺利实施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经过过去4年的努力，我国“九五”环保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截至去年11月底，11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低于规定指标，工业污染源达标率达到74%，9个城市的地面水和空气质量达到功能区标准，11个城市实现“双达标”；三河、三湖、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北京、渤海的污染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果，生态环境保护和核安全与环境监理等工作深入开展，为维护国家发展稳定的大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全国的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出现加重趋势，生态破坏的范围继续扩大，局部地区的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在加剧。

2000年环保工作的重点是：认真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实施方案，全面完成12种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抓紧工业污染源达标工作，对尚未达标的企业要采取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关停并转等措施，加快达标进程，对达标无望和逾期不能完成的，要坚决予以关停；采取坚决措施，力争使重点城市全面实现功能区达标；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抓紧抓好重点城市流域区域海域污染防治。继续落实"三河三湖"综合整治，到今年年底实现淮河、太湖流域水体变清，辽河、海河、滇池、巢湖水质明显改善；扭转"两控区"大气质量恶化趋势；加紧北京市的环境治理，确保到年底首都非采暖区空气质量、中心区水环境质量基本达标；实施《渤海碧海行动计划》，重点控制陆源污染。结合西部大开发，深化、开拓生态环境保护。搞好生态环境调查，编制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定特殊生态功能区环境管理办法，尽快制定长江、黄河源头等国家级特殊生态功能区保护规划；制定资源开发环境管理办法，建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加快生态示范区建设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积极参与综合决策，坚决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10日　国家计委组织开展价格收费项目检查

为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国家计委价格监管部门出台八项价格、收费检查项目，大力整顿价格秩序，清理各种乱收费。这八项检查项目是：

一、开展全国电力行业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违反规定，越权征收各种基金、附加费，提高或变相提高电价的问题，以及农村"权力电"、"关系电"、"人情电"、以电养人的问题。

二、开展全国公安部门收费专项检查。重点查处近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在办理户口、证照和交警乱收费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三、开展旅游行业价格检查。重点查处旅游市场各种乱收费和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

四、开展住房价格和物业管理收费检查。重点查处建设部门、土地部门、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交易市场、物业管理单位在征地、拆迁、建设、出售、物业管理等各环节收费过多、过滥、过高问题。

五、开展小轿车价外收费检查。重点查处小轿车购买、入户和使用过程中各种搭车收费，坚决取消地方政府越权出台的收费项目。

六、开展教育收费检查。重点查处一些地方和学校对扩招学生采取高收费，变相收取各种"赞助费"，搞"双轨制"，对高校毕业生收取跨地区费、跨行业费，以及其他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问题。

七、开展涉农收费、粮食价格、烤烟价格检查。重点查处农民反映强烈的农村医疗、婚姻登记、计生、建房用地等乱收费。在夏粮和秋粮收购期间继续抓好粮食价格检查。在烟叶主产区开展烤烟收购价格检查。

八、开展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的复查。重点核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计委、财

政部和省级人民政府历次公布取消、合并和降低标准的各种收费项目、基金、附加费，是否真正得到严格执行。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依法严肃处理，确保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落到实处。

为了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国家计委要求各价格主管部门，设立价格举报机构，健全举报网络，及时受理群众对低价倾销、价格垄断、价格歧视、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举报，严格按《价格法》及有关法规、规章进行处理。同时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价格监督，促使企业加强价格自律，建立和完善行业价格自我约束机制。

11日　全国统计局长会议提出反对弄虚作假提高数据质量

全国统计局长会议提出，我国统计工作将进一步贯彻中央领导反对弄虚作假的重要指示，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中心，重点抓好统计制度改革、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基层基础建设和统计法制建设四个环节，提高统计工作整体水平。统计工作改革的重点包括：一是大力推进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加快推行抽样调查方法；积极推进统计资料汇总方式的改革；进行工业发展速度计算方法改革，确定新的计算方法；改进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一步规范核算分类和核算方法；研究改进普查制度，建立统一、轻型、快速的国家普查制度；研究改革统计指标体系，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指标逐步建立起来。

农业部把2000年定为渔业质量年

为了全面提高渔业的市场化水平，农业部决定以质量为突破口，并把2000年定为渔业质量年。农业部要求渔业全行业树立质量和效益观念，全面建立渔业标准化体系。渔业质量年主要目标和工作重点包括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发展优质高效渔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建立健全渔业质量法规体系等。

我国最大矿用汽车企业改组

中国最大的矿用汽车生产企业——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宣布改组为中外合资的股份制公司。这是中国矿用汽车行业第一个有外资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新成立的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内蒙古北方重汽公司和世界著名的矿用汽车生产企业英国特雷克斯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

12日　全国高校技术创新大会在京召开

教育部在京召开全国高校技术创新大会。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讲话中指出，高等学校在国家技术创新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校是知识创新与传播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力，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基础和方面军。搞好高校技术创新工作，要着重解决好机制创新问题，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理顺校企、事企间的关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高校特点的技术创新的路子。

改革开放以来，由高校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全国的近2/3，“86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1/3，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的14%。高校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数均占全国的60%左右，获得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项目数分别占全国的1/3、1/4左右。据统计，1992年至1998年间，高校共鉴定科技成果

近6万项；签订技术转让合同3万余项，成交金额28.35亿元；出售专利近3000项，成交金额2.84亿元。

康佳彩电在美获国际大奖

在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康佳集团推出的艺术电视和彩电DVD二合一荣获“创新2000奖”。这是中国消费电子产品首次赢得国际大奖，也是中国企业在本届展览会上获得的惟一奖项。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博览会之一。

13日　我国调整部分进出口商品税目税率

自2000年1月1日起，我国调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部分税目税率。这次调整了部分进口商品税则税目，共删除92个，增加218个，增减相抵净增税目126个。调整后，我国总体关税算术平均水平由1999年的16.73%降为16.44%。

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战略性调整新阶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指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实际上就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阶段。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这一历史性跨越，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不仅是解决当前农产品销售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困难的客观要求，更是提高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有效途径。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8个方面的意见：一、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二、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三、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五、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七、强化农村土地承包、集体财务和农民负担管理。八、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

17日　国家计委召开经济计划5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

会议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计划部门积极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使计划观念、计划体制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计划手段在历次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正在制定中的“十五”计划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20年的快速增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为了把这个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应当加强发展计划制定和实施的力度，有力地集中各种生产要素用于各项战略重点。通过实施发展计划，要对地区经济进行合理布局，实现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事业进步，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综合考虑改革与社会承受能力、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以保证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制定和实施发展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今后在计划的制定中，要更多地强调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重点解决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运用，加强计划工作的法制化建设。

18 日　**自家工商局公布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实行。这意味着广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投资人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设立登记个人独资企业，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投资人签署的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申请书、投资人身份证明、企业住所证明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登记机关应当在收到全部文件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核准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

19 日　**我国首次研制成功中国“芯”**

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仅用不到 3 年的时间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6 位嵌入式微处理器，并构筑了支持微处理器设计的平台，使我国微处理器研制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专家鉴定委员会认为，这项科研成果属国内首创，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发展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微处理器产业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家研制成功的第一颗国产 16 位嵌入式微处理器，与 32 位传统 RISC 微处理器相比，它有代码密度高、功耗低、面积小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掌上电脑、信息家电等领域。

20 日　**我国首套丁基橡胶装置投产**

投资达 11 亿元的国内首套年产 30 万吨丁基橡胶装置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建成并生产出合格产品，填补了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的一项空白。丁基橡胶是生产汽车内胎的最好胶种。

21 日　**我国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开通**

我国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上海轨道交通明珠线开通。明珠线轨道工程南起闵行，北至宝山钢铁总厂，全长 24.975 公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3 日　**我国科学家首次破译微生物遗传密码**

我国科学家破译了一种嗜热菌的遗传密码，从而获得了国内第一张微生物基因组“工作框架图”，标志着我国基因组研究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首次破译微生物的遗传密码，嗜热菌也成为除病毒外国内第一个遗传密码被基本破译的生物。

微生物基因组研究是当今世界基因组研究中的前沿领域。1999 年 4 月起，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联合起来，开始测定这种嗜热菌的全基因组 DNA 序列。在基因测序中，获得了单机日产、序列读长、准确率等指数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的好结果。

25 日　**中西部外资企业享受税收新优惠**

国务院决定，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 3 年内，可以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可执行这项税收优惠政策的中西部地区是指：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共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部行政区域。可执行这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从事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和限制乙类项目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本项税收优惠政策自2000年1月1日起执行。

国务院发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

国务院发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决定2000年11月1日零时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各级人民政府的人口普查领导机构，对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负责，督促人口普查办事机构对各阶段工作进行质量控制和验收。人口普查登记和资料汇总，按照划分的普查区域进行。农村以村民委员会所辖地域为基础，城镇以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为基础划分普查区。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于2001年1月31日以前发布公报人口普查结果。

26日　我国启动企业信息化工程

国家经贸委和信息产业部共同发起“企业信息化工程”。此举旨在推进企业信息化，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以适应市场和技术发展变化的需要。由国家经贸委和信息产业部组成的“企业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将结合国家重点企业信息报送和联网培训，在全国分6个地区同时举办企业信息化专题研讨、应用展示、技术推广和现场指导等活动。他们还将选择部分国家重点企业，开展物资采购、产品营销、技术交易、人才培训等方面的电子商务探索。

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保密管理，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国家保密局发布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实现信息的国际交流，同外国的计算机信息网络相联接。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保密管理，实行控制源头、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突出重点、有利发展的原则。《规定》明确，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互联网或其他公共信息网络相联接，必须实行物理隔离。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包括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经审查、批准与境外特定对象合法交换的国家秘密信息，不得在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递。上网信息的保密管理坚持“谁上网谁负责”的原则。凡向国际联网的站点提供或发布信息，必须经过保密审查批准。保密审批实行部门管理，有关单位应当根据国家保密法规，建立健全上网信息保密审批领导责任制。提供信息的单位应当按照一定的工作程序，健全信息保密审批制度。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企业抵押贷款部分收费被取消

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发出《关于整顿企业抵押贷款收费的通知》，对企业抵押贷款收费进行整顿。明令取消政府有关部门收取的验证费、查档费、建档费、现场勘察费、过期保管费、注销费、管理费、审查费、确认费等收费项目。《通知》对中介机构的收费标准、企业贷款相关政策界限等也作了进一步明确，要求对违反通知规定的收费行为严肃查处。

上海石化乙烯改造工程启动

总投资达47亿元人民币的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70万吨乙烯改造工程正式启动。项目预计在2002年初建成。70万吨乙烯改造工程是上海石化四期工程的主体项目。工程的实施，将为上海石化成为世界级石化基地及我国加入WTO以后参与国际市场石化产品竞争打下良好基础。

28日　审计署发布中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

国家审计署制定并发布《中国国家审计准则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规定了审计的一般准则、作业准则、报告准则、报告处理准则等，以逐步实现审计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审计署还成立审计准则体系构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制定、发布与修改审计准则。

29日　国务院发布森林法实施条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制定本条例。《条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面积，不得少于本行政区域森林总面积的30%。制定林业长远规划，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以现有的森林资源为基础；（三）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相协调。林业长远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林业发展目标；（二）林种比例；（三）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四）植树造林规划。全国林业长远规划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地方各级林业长远规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林业长远规划的调整、修改，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条例》规定，勘查、开采矿藏和修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工程，需要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占用或者征用防护林林地或者特种用途林林地面积10公顷以上的，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林地及其采伐迹地面积35公顷以上的，其他林地面积70公顷以上的，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占用或者征用林地面积低于上述规定数量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占用或者征用重点林区的林地的，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国家对造林绿化实行部门和单位负责制。国家保护承包造林者依法享有的林木所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同时作废。

30日　国务院发布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条例》规定，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条例》规定，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

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月

1 日　教育部等部门决定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高等学校后勤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变。各种后勤服务实体，要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保持必要的责、权、利关系。改革必须坚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会、首府城市或高等学校较集中的城市政府统筹主导、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学校参加、社会参与、市场引导”的做法。改革过程中所需的物力、人力、财力，应主要通过对现有高等学校后勤资源的优化配置、重组和改制来实现。对必须增加的新的后勤设施，应由省、市政府统筹，并采用新机制建设、经营。《意见》提出，从 2000 年起，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到 2000 年底，所有高等学校的后勤服务经营人员、相应资源及操作运行，都成建制地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中分离出来，组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学校后勤服务实体。从 2000 年底到 2002 年底前后，在高等学校后勤系统规范分离的基础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合适的范围内，组建跨高等学校的后勤服务集团（实体、中心或公司），以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等形式，承担本地区范围内高等学校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对助学贷款管理提出意见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若干意见》，就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和开展一般性商业贷款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国工商银行开办的国家财政贴息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全日制、专科学生的助学贷款。一般商业性贷款是指金融机构对正在接受非义务教育学习的学生或其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发放的商业性贷款。《意见》提出，对确实无法提供担保、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以及其他学生均可申请信用方式的国家助学贷款。同时要求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等积极开办商业性助学贷款。

我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建立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京受理了绍兴酒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申请，这标志着我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工作开始进入实践阶段。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旨在通过原产地域产品命名及其控制手段，确定其产品生产条件和生产标准，保证其产品质量

和特色，同时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原产地域范畴以外的生产者不得使用也不得假冒专用标志，从而保护和提高其产品知名度和产品附加值。

2 日　部分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

为了有利于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结构的调整，引导农民根据市场要求，合理安排粮食生产，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从 2000 年新粮上市起，黑龙江、吉林、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的春小麦和南方早籼稻、江南小麦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玉米也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

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粮食品种的收购政策主要包括：对国务院规定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的部分粮食品种，拓宽粮食收购渠道，要允许和积极鼓励经省级或地（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粮食加工、饲料、饲养、酿造、医药等用粮企业和粮食经营企业直接收购、经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也可以按照“购得进、销得出”的原则进行收购；鼓励粮食生产者通过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出售，粮食集贸市场要常年开放。对国务院规定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的部分粮食品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继续做好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资金的供应工作，按照“库贷挂钩、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提供贷款，积极支持粮食购销企业的购销活动。部分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以后，中央对地方的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变。地方节余的粮食风险基金只能用于补贴粮食流通环节，不能挪作他用。对于 2000 粮食年度以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保护价收购的这部分粮食，仍纳入超储补贴范围，同时也要积极采取措施抓紧销售，防止出现潜亏。

国家不再注册新钢铁企业

为切实落实控制钢铁总量的目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再注册成立新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钢铁生产企业。国家经贸秀发布的 2000 年钢铁总量控制实施方案要点中明确，这些不再发展的钢铁企业包括：高炉炼铁企业，转炉、电炉炼钢企业，钢锭、钢坯压延加工企业，铁合金冶炼企业，焦炭生产企业。同时，鼓励钢铁企业转入其他产业或行业。

3 日　国务院发布人民币管理条例

为加强对人民币的管理，维护人民币的信誉，稳定金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对从事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发行、流通和回收等活动作出规定，自 200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应当报国务院批准。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人出境携带人民币实行限额管理制度。

14 日　我国新股发行向二级市场配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通知，为了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今后将在新股发行中试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的办法，即在新股发行时，将一定比例的新股由上网公开发行改为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投资者根据

其持有上市流通证券的市值和折算的申购限量，自愿申购新股。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的比例，暂定为向证券投资基金优先配售后所余发行量的50%，今后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采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部分新股的办法发行股票时，向二级市场配售与上网公开发行应同时进行。投资者同时持有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证券的，分别计算市值；各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只根据持有本所上市流通证券的市值配售新股。

15日　外经贸部发布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

为配合国家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政策的实施，并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规范、科学的管理，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科技部、外经贸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目录》是参考国际通用的高技术产品分类，以我国现行的高技术范围为基础，按照既要与国际规范接轨，又要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经过百余名技术和贸易专家评审并经相关部门审核后编制的。列人《目录》的产品，以产品的技术水平、投入水平、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及附加值高低为主要依据。《目录》共列出包括电子信息、软件、航空航天、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产品及其他（环境保护产品、地球空间和海洋）等8个领域的约1900项可供出口的民用高新技术产品。企业出口列人《目录》的产品，均可按国家规定享受国家给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优惠政策。

16日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地面监测站建成

三峡库区惟一一座水旱灾情及生态环境地面监测站在湖北省巴东县建成。这一项目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承担，长江科学院具体组织实施，引进了航天、航空遥感遥测等先进技术，建成后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灾情及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实施有效监测，并为库区生态环境调查、土地利用规划、大型建设项目的地形测量及自然灾害的灾情评估等项目提供科学数据和实验结果。检测站的建成，对改善库区环境，防止自然灾害，加快库区移民开发等都将产生重要作用。

18日　首都举行纪念毛泽东“开发矿业”题词50周年大会

这次大会是国家经贸委、国土资源部、中国矿协联合召开的。根据大会提供的资料，我国已跨人世界矿业大国行列，矿产资源探明储量潜在价值约占世界总值的12%，居世界第三位，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矿产资源保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找到171种矿产，探明储量的矿产有153种，人均45种主要矿产探明储量潜在价值由80年代中期位居世界的第83位上升到第53位。海洋油气地质勘查评价了17个含油气盆地，获石油资源量240多亿吨，天然气资源8万亿立方米。我国矿业开发进展迅速，截至1999年，年采矿石量50亿吨，矿业年总产值约4000亿元。固体金属、非金属矿产品产值约占世界相应矿产品产值的15%，居世界第二位。原煤、钨矿、锑矿、锌矿、铁矿、镁矿、锡矿、稀土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矿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特别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由于一大批大型矿产地的发现和勘查开发的成功，原先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区已有300多座新兴矿业城镇。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海洋矿产资源潜力巨大，为矿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1日—25日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了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之后，2月21日至25日在广东考察工作，围绕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两个题目进行调研。江泽民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省长卢瑞华，广州军区政委刘书田的陪同下，先后到深圳、顺德和广州市考察工作。江泽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当前，很有必要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在发展较快地区的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进一步把举国上下的智慧与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和充分发挥出来，继续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江泽民总书记十分关心和重视经济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考察期间，江泽民来到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听取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的汇报，观看了高新技术产品展示。他还先后考察了深圳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赛格日立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深圳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企业集团深圳富金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珠江钢琴集团有限公司，实地察看这些企业的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和职工亲切交谈，了解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情况。

江泽民指出，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要抓紧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实现我们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抓紧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抓紧建立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整套制度和机制。

在谈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江泽民说，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为推进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地区应积极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并通过产业转移和协作，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必然会给东部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东部地区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市场来促进自己的发展。

21日　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对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出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卫生部、药品监督局、中医药局《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对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提出14条改革意见。其要点是：1. 实行卫生工作全行业管理。2. 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即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3. 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组织、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合理分工的医疗服务体系。4. 加强卫生资源配置的宏观管理。5. 改革预防保健体系。6. 转变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7. 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8. 规范财政补助范围和方式。9.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10. 加大药品

生产结构调整力度。11. 推进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整顿药品流通秩序。12. 加强药品执法监督。13. 调整药品价格。14. 加强组织领导。

22 日　山西化肥厂工程竣工投产

历经 16 年的建设，山西化肥厂工程竣工投产。该厂是我国成套引进的第一家以煤炭为原料生产复合肥的大型现代化化肥企业，总投资 16.5 亿元，年设计生产合成氨 30 万吨、硝酸 54 万吨，是我国当时最大的硝酸磷复合肥生产基地。

23 日　国家对境外发债实行资格审核批准制

为规范我国境内机构境外发债行为，防范国家外债风险，国家计委、人民银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发债管理的意见》。《意见》明确，在境外金融市场发行的以外币表示的构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有价证券，包括可转换债券、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等，均实行发债资格和发债审核批准制。境内机构（除财政部）对外发债，经国家计委审核并会签国家外汇管理局后报国务院审批。地方政府不得对外举债。已上市外资公司对外发行可转换债券不实行资格审核批准制。

中国人民银行明令严禁金融机构不正当存款竞争

针对当前部分地区、部分金融机构存款业务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杜绝，顶风违规经营时有发生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重申严禁金融机构不正当存款竞争。各金融机构办理各项存款业务，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提高或变相提高利率，不得向经办人和关系人支付法定利息以外任何名目的费用和馈赠物品。通知要求，人民银行各分支行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存款业务的监督管理，对继续使用不正当手段进行存款竞争的，要加大处罚力度。特别是对继续搞高息揽存的，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姑息迁就。

2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部分金融机构主要领导干部交流调整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中国证监会、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部分金融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交流、调整，同时，还对中央金融工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周小川同志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姜建清同志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尚福林同志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刘明康同志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王雪冰同志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何林祥同志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刘廷焕、吴晓灵（女）同志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同志因任职年龄到限，不再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同时，党中央还决定陈玉杰（女）、谢旭人、王成铭同志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这是多年来金融系统主要领导干部交流人数最多的一次。

25 日　财政部发行 2000 年凭证式（一期）国债

本期国债发行总额为 500 亿元，分为二年期、三年期五年期三种。其中二年期 100 亿元，票面年利率为 2.55%三年期 350 亿元，票面年利率为 2.89%；五年期 50 亿元，票面年利率为 3.14%。从 2000 年 3 月 1 日开始发行，从购买之日开始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加计利息。本期国债为记名国债，以填制“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的方式按面值发行，可以挂失，可以质押贷款，但不能更名，不能流通转让。

全国城市交通管理“畅通工程”启动

由公安部、建设部联手实施，旨在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创造良好交通环境的“畅通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此次实施的“畅通工程”，根据城市交通管理现状，把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分为模范管理、优秀管理、良好管理和合格管理4个等级。评价项目主要包括中心城区主干道不发生周期性严重阻塞，阻塞率明显下降；车辆和行人通行有序，交通违章行为明显减少等内容。目标要求到今年10月31日前，实施范围内所有城市都要争取达到合格管理水平标准，再经二三年的努力，36个大城市力争全部达到良好管理水平。

28日　团中央实施中国青年西部创业行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团中央召开会议，号召全国广大团员青年关注西部发展，积极投身西部大开发。会议决定，全国将启动实施“中国青年西部创业行动”。

“中国青年西部创业行动”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导帮助西部地区青年立足家乡和本职工作创业。着重加强培训工作，提高西部地区青年的创业能力。团中央将拨出专门经费，对西部地区地、县两级团干部和少数民族青年骨干分批进行集中培训，发挥他们的骨干带头作用。二是大力推进保护母亲河行动，服务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在高质量完成已开工的、规划面积23万亩的8个全国重点项目的同时，新增2—3个全国重点项目；广泛开展以保护母亲河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活动，使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青少年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逐步探索动员全国力量参与、支持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效机制，组织西部青少年积极保护天然林、带头退耕还林、绿化荒山。三是鼓励青年人才到西部创业。全团将进一步动员组织国内和海外青年科技人才，参与西部开发，为青年人才参与西部开发牵线搭桥，促进青年科技人才与项目的对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动员组织东部地区青年企业家到西部地区投资项目、开发市场。四是进一步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扶贫支教力度。加大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手拉手等实施力度，针对西部大开发的实际需要，扩大服务规模，拓宽服务领域，促进西部地区科技和教育的发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该公司是由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依据《公司法》，通过业务、资产、债权债务、机构、人员等方面的整体重组改制，以独家发起方式设立的。该公司是一家上中下游一体化、石油石化主业突出、拥有比较完备销售网络的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为688亿元。

国务院听取“西气东输”工程论证汇报

为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关于“西气东输”工程方案的论证汇报，对工程从资源、市场及技术经济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会议认为启动“西气东输”工程是把新疆的天然气资源优势变成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的经济优势的大好事，也是促进沿线8个省、区、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举措。

近几年，新疆塔里木、吐哈、准噶尔盆地相继发现了一批前景良好的天然气资源富

集区，大量的地质勘探和研究工作表明，塔里木地区天然气地质储量丰厚，已经基本具备实施“西气东输”工程的条件。“西气东输”工程将建设4200公里左右管道，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东送，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到上海，供应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沿线各省（区）的工业和居民用气。初期年供气120亿立方米左右，以后将随着资源勘探的深入和下游用气市场的开拓，逐步增加供气量。“西气东输”工程将大大加快新疆地区以及中西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应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重大工程的实施，还将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钢铁、建材、石油化工、电力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沿线城市可用清洁燃料取代部分电厂、窑炉、化工企业和居民生活使用的燃油和煤炭，将有效改善大气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西气东输”工程包括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输气管道以及城市管网、工业利用等相关项目建设，初步预测第一期投资将达到1200亿元左右。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正抓紧进行“西气东输”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加大地质勘探力度，保证获得可靠气源，在经过严格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并履行基本建设审批程序后正式开工建设。

3 月

1日　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人民日报》发表2000年2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最近，看了两份材料，一份反映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年级一名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另一份反映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两名学生因勒索钱财将一同学乱刀砍死。今天的《光明日报》还报道，河南省安阳市一学生家长，因自己的儿子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这样的材料，以前也看到一些，确实触目惊心，引起了我的深思。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我们常委同志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都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只有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年轻一代才能茁壮成长起来。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园地，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我们的国家里，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复杂环境里，坚持这样的教育方针

是极为重要的。

21世纪，我国既需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也仍然需要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是多样化的。这是我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只要他们有为祖国、为人民贡献青春的志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认真学习和掌握实践知识与技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就一定能够成长为有用之才。学校接受的还只是基本教育，尽管这个基本教育十分重要，但毕竟不是人生所受教育的全部，做到老学到老，人才的成长最终要在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身的不断努力中来实现。这个观点，要好好地在全社会进行宣传。

我所以说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就是说对教育事业，全社会都要来关心和支持。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项工作不仅教育部门要做，宣传思想部门、政法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都要做，全党、全社会都要来做。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大家都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开展工作。

3月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教育系统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决定》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对国务院经济工作行使监督职权。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年度计划草案和计划报告的审查重点是：编制的指导方针要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主要目标和指标要符合持续、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主要措施要符合加强宏观调控，优化经济结构，安排好国家重点建设，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积极促进就业，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等要求。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投资巨大的国家特别重大建设项目，国务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必须作的部分调整，由国务院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听取并审议国务院经济工作方面的专题汇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计划安排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可以根据需要听取国务院的工作汇报，进行监督。同外国或者国际组织缔结、废除有关经济方面的条约和协定，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的，国务院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提请审议决定。

1999年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出"座次"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排出了199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排定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座次。和去年相比，前五名的顺序不变，上海居

于首位，其次是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虽然前五名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基本保持不变，但差距在缩小。一年一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于1999年首次发布，我国专家在国际上独创了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以此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分析。

上海设首家合资钻石交易所

经国务院批准，中外合资上海钻石交易所在浦东设立。这是国内首家钻石交易所，它的建立，将促进上海国际型大都市的建设和中国钻石加工业的发展，同时将给全球钻石交易商带来新的机遇。

3日　最高法院公布为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为使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更好地确保中央经济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的实施提出具体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和工作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保障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依法打击各类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坚决依法惩处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侵犯企业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等犯罪，制裁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哄抢、盗窃、破坏或者故意毁坏国有企业生产资料、设备的犯罪，特别是要打击针对国有企业的集团盗窃犯罪，保护国有企业资产。依法严惩贪污、挪用、诈骗、侵占国有企业资金的犯罪，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严厉打击采取报复手段，杀伤国有企业领导者、职工或其他侵害国有企业领导、职工人身权的犯罪，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意见》还就人民法院依法保障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依法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知识产权、以及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实施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国家旅游局对旅游标准化管理作出规定

为加快推进旅游标准化工作的开展，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国家旅游局制定并发布《旅游标准化工作管理暂行规定》。提出在全国或旅游行业范围内统一规范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制定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1. 旅游业基础、信息、通用标准；2. 旅游标志、术语标准；3. 旅游基础设施和项目设施标准；4. 旅游服务质量标准；5. 旅游规划和资源普查标准；6. 旅游专门产品和质量标准；7. 旅游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标准；8. 旅游业标准规划体系所规定的其他标准。旅游业国家标准为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资源一号卫星交付使用，结束我国没有陆地资源卫星的历史

国防科工委在京举行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1星（简称资源一号卫星）交付仪式，将卫星由研制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移交给用户代表部门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正式投人使用。这标志着我国资源卫星研制技术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资源一号卫星是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86年批准立项的国家重点研制建设项目。1988年7月经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批准联合研制。这是我国首次研制的传输型地球资

源遥感卫星，由国防科工委负责组织工程实施和总体协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院联合研制。

资源一号卫星是于1999年10月14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的，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精心组织下，完成了卫星变轨和在轨测试任务。目前，卫星已在太空安全运行140多天，绕地球2000多圈，拍摄了地球2万余幅图像。资源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结束了我国没有陆地资源卫星而只能购买国外卫星数据的历史，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在航天高技术领域合作的先例，被江泽民总书记称为“南南合作的典范”。资源一号是我国卫星研制史上携带有效载荷最多的卫星，表明我国有能力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研制高水平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将广泛应用于国土资源调查、农作物估产和长势监测、城市规划、环境监测、矿产资源调查和勘探、森林资源监测、自然灾害预报等领域。

6日　第九后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认为，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预期目标，经济结构有所调整，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种植结构开始进行调整。工业生产在结构调整中持续增长，产品销售率稳定上升。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取得重要进展。科技教育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很突出，劳动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报告》提出的2000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中西部发展；继续推进改革，全面加强管理，实现国企改革和三年脱困目标，继续有序推进财政、金融、投融资、分配、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进一步整顿市场秩序；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实行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有效的利用外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大力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认为，总的看来，1999年计划执行情况是好的，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调控目标。国民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2054亿元，比上年增长7.1%。粮食产量继续稳定在5亿吨的较高水平。工业增加值增长8.5%。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9876亿元，比上年增长5.2%。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完成11377亿元，比上年增长15,2%。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1759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狭义货币供应量、市场现金流通量分别增长14.7%、17.7%、20.1%。全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9.4万亿元，当年增加1.08万亿元。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547亿美元，增加97亿美元。全年进出口总额3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其中，出口1949亿美元，增长6.1%；进口1658亿美元，增长18.2%。实际利用外资563亿美元，比上年减

少3.9%。吸引外商投资454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皮资404亿美元，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135亿元，比上年增长6.8%，加上物价下降因素，实际增长10.1%。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城镇登记失业率3.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10元，实际增长3.8%。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国有单位投资增速从一季度的22.7%降到四季度的3.8%。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下降1.4%和3%。二是就业压力加大。截至1999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650万人待业。三是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48元。四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很突出。五是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继续恶化，部分城市污染严重。

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率7%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保持或略高于上年；进出口总额增长3%，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中央财政赤字2299亿元；货币发行量1500亿元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9.2%。

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一）继续扩大投资规模，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二）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三）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四）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五）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八）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九）加快科教兴国步伐，全面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认为，1999年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消费需求不振，物价持续走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重大决策，保持199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经济回升的好势头。主要内容包括：增发600亿长期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人和中央预算调整，较大幅度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调整外贸出口退税政策和国内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取得明显效果，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1%。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比较好。中央财政总收入6396亿元，完成预算的108.7%，中央财政总支出8193亿元，完成预算的106.6%，收支相抵，赤字1797亿元。《报告》提出了200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重点：1.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大力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3.加大社会保障投人，全面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4.大力增加教育、科技、农业投人，确保按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增长。5.适当增加国家安全防御方面的经费支出。

13 日　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就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提出要求，重申城乡规划科学确定城市和村镇性质、发展方向、规模和布局，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和节约利用土地、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与历史文化保护关系等基本原则，提出重点抓紧城镇体系规划、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详细规划、小城镇和村庄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等的编制工作，加强编制过程中的管理和领导。

14 日　国家恢复征收白银生产环节增值税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对企业生产销售的银精矿含银、其他有色金属精矿含银、冶炼中间产品含银及成品银恢复征收增值税。

15 日　国务院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监事会

为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国务院决定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监事会。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并为此制定发布《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按照《条例》规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由国务院派出，向国务院报告，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监事会以财务监督为核心，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监事会与企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保护企业负责人搞好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检查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效益、利润分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产运营等情况，监事会对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业绩进行评价，提出奖罚、任免建议。监事会每次对企业进行检查结束后，要及时作出检查报告。1994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同时废止。8 月 17 日，国务院任命 36 位副部级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批准 100 家派出监事会的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名单；中央企业工委任命了第一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专职监事。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监事会，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作，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有效形式的重要措施。

国务院向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派出监事会

为健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督机制，国务院对派出监事会的国有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的管理作出规定。《暂行条例》明确，国有金融机构监事会对国务院负责，代表国家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进行监督。《条例》对监事会的职责、工作方式、监事条件等作出了规定。8 月 21 日，由国务院派出的 15 个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正式进驻 16 家国有重点金融机构，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国务院任命了 15 位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批准了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16家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派出监事会。同时中央金融工委向与国家有关部门脱钩后移交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5家金融机构也派出监事会。

20日　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对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止地表水污染、防止地下水污染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1989年国务院批准国家环保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同时作废。

国家规定实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

为保证个人存款账户的真实性，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明确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的人民币、外币存款账户，必须使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身份证件姓名，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

23日　国家级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挂牌。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自1990年兴办以来，累计投产项目170个，实现产值112.3亿元，利税4亿元，创汇6700万美元，在辐射、带动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9日　国家税务局对个人量化资产所得税作出规定

在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个人取得的量化资产，如果职工不拥有所有权的企业量化资产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职工个人以股份形式取得拥有所有权的企业量化资产，暂缓征收个人所得税，待个人将股份转让时，按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对职工个人以股份形式取得的企业量化资产参与企业分配获得的股息、利息、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

30日　国务院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具体组成人员如下：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廷焕；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肖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张志刚；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周小川；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马永伟；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

我国发放首笔股票质押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向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放首笔期限为半年的1368万元人民币股票质押贷款。人民银行正式批复中国工商银行股票质押贷款银行资格。这是国内第一笔商业银行向证券公司发放的股票质押贷款，也是人民银行颁布《证券公司股票质押管理办法》以来商业银行发放股票质押贷款的首笔交易。

我国第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开通

我国第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北京中国互联网交换中心开通，使中国主要互联网网间互联带宽由原来不足10 Mb/s提高到100Mb/s以上。

3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专利法修正案（草案）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会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自1985年4月1日实施以来，对鼓励发明创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现行专利法部分条款作了修改，主要是扩大了专利保护范围，延长了专利保护期限，提高了我国专利的保护水平。随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现行专利法在实施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发挥专利制度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现行专利法进一步作适当修改是必要的。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民政部等部门提出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教育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外经贸部、卫生部、税务总局《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确定了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优惠政策。

《意见》提出，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要探索出一条国家倡导资助、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新路子，实现社会福利事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和服务队伍专业化，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到2005年，在我国基本建成以国家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对社会力量投资创办社会福利机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优惠。各地要将社会福利机构及床位数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在基本建设计划中统筹安排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4　月

1日　国家级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

国务院批准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而使云南有了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始建于1992年。目前区内拥有企业236个，179个项目建成投产，总投资额达48亿元人民币，其中外商投资企业39户。

4日　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发布证券交易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为保障证券交易系统的安全运转，妥善管理和运作证券交易基金，国务院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制定并发布《证券交易所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收取交易经手费的20%作为风险基金单独列账；收取席位年费的10%作为风险基金单独列账；收取会员费10%的比例一次性提取作为风险基金单独列账；新股申购冻结资金利差账面余额的15%一次性提取以及违规罚款、罚息等均作为风险基金。

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发布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为保障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安全运行，国务院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制定并发布《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按登记公司业务收入、收益的20%分别提取；结算会员按人民币普通股和基金成交金额的十万分之三国债现货和回购成交金额的十万分之一逐日交纳；新股申购冻结资金利差账面余额的30%一次性提取以及违规罚款、罚息等均作为风险基金。

8日　东海天然气开发工程启动

东海盆地绍兴6－1构造正式开钻，被称为“西气东输”姊妹篇的东海天然气开发工程开始启动。东海盆地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经20年勘探，已获得1484亿立方米天然气探明加控制储量，其中平湖油气田已于1998年底投产，向上海年送天然气4亿立方米。今日开钻的绍兴6－1构造位于东海盆地中油气资源最丰富的西湖凹陷，距上海355公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初步规划，至2010年，将部署55口评价井和20口探井，2500平方公里三维地震，2万公里二维地震，完成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2700亿立方米的目标，到2010年年产天然气100亿立方米。

10日　全国企业改革与管理工作会议确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

全国企业改革与管理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在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两大目标的决战之年，要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扎实规范地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积极推进企业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实现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1997年底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中，到1999年末已脱困3211户，脱困面达48.7%。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李荣融在会上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1994年，国家选择了100户企业进行试点，各地区、各部门的试点企业达到2400多户。通过几年的实践，基本摸清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点和难点，探索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为实现在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创造了重要条件。下一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把握好几个重点：第一，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在规范改制的基础上尽可能推进股权多元化。今后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构造国有资产营运主体。第三，探索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经营者选拔任用和激励约束机制。第四，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转变企业内部经营机制。

12日　我国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8处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批准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8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内蒙古自治区白音敖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清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省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省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北省五峰后

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南省永州都庞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市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省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省西双版纳纳版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自治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省循化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3日　交通部发布交通基建资金监督管理办法

为加强交通基本建设资金的管理监督和安全、合理、有效使用，交通部制定并发布《交通基本建设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对纳入国家和地方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用于交通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的监督和管理作出具体规定。《办法》提出的对交通基本建设资金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专款专用原则；全过程监督控制原则；分级负责、分级监督原则；效益原则。《办法》还提出了交通基本建设资金监督管理、交通基本建设资金筹集监管以及交通基本建设资金拨付监管的主要内容等。

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安徽全省和由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少数县（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4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安徽进行调查研究，并在芜湖召开的安徽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动员会上发表讲话。温家宝指出，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这项改革依法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堵住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步骤，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制定改革试点方案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首先要考虑减轻农民负担。这是第一位目标。要算财政平衡账，但更重要的是算农民负担账。决不能把以前的不合理负担合法化。二是要把改革的力度同各方面能够承受的程度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考虑使农民负担有相当的减轻，又要考虑县乡财政的承受能力，保证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履行职责、基层政权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经费开支。三是要把税费改革与其他配套措施结合起来。农村税费改革直接涉及上层建筑一些方面的改革，必须与地方机构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结合进行。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减少乡镇财政支出，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农村“三乱”和摊派，停止各种达标升级活动。

16日　2000中国企业高峰会在京举行

由世界经济论坛和中国企业联合会共同举办的2000中国企业高峰会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分别为大会题词。本次高峰会的主题是：“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与挑战”，共有600多家中外企业的代表参加，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为期3天的会议上，中外企业家将就30多个议题展开讨论，主要涉及全球化与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企业及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信息产业如何改变中国，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改善企业的运作，资本市场在变化中的形式和作用

等问题。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合作与海外拓展，兼并收购与国企改革，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保险和养老市场，医药与科技，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等热点和难点问题也同样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讨世界经济、政治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组织，它的核心成员包括全球1000多家大公司和企业。从1981年开始，中国企业联合会与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举办一年一度的企业高级领导人国际讨论会，即现在的“中国企业高峰会”。

17日　江泽民谈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江泽民《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1月19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的第一、第二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江泽民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子，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做好财税工作。第一，财税工作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社会账。从政治的高度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去确定财税工作的总目标、总方向，并依此全面而充分地发挥财税的职能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第二，要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我们的财政工作必须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开源节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三，要逐步解决“两个比重”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增长，适当增加地方财政是必要的，但从整个国家来看，财力也不能过于分散。保持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安全，中央必须掌握足够数量的经济资源，以利集中财力办一些必须办的大事情。第四，坚持依法理财，依法治税。坚决打击各种偷税、骗税和暴力抗税行为。绝不允许搞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越权减免税。

18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建立养老金社会化发放风险预警制度

为积极推进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逐步做到退离休人员与企事业单位脱离，尽快实现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关于加快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通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工作，使80%左右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实现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基本形式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国有商业银行或邮局为企业离退休人员建立基本养老账户，按月将规定项目内的应付养老金划入账户，保证离退休人员按时支取养老金。为防风险，《通知》要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建立和完善离退休养老保险数据库，建立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准备金和基金支付风险预警制度，以支付两个月养老金的基金积累水平作为警戒线。

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在沪开幕

世界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这是在我国首次举办的一次世界范围内科技界、知识界、金融界、企业界人士交流高技术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经验的盛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在开幕式上说，举办此次大会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孵化器组织的发展和世界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深远意义。

江苏田湾核电站获 18.5 亿美元保险

江苏田湾核电站建筑安装工程险的保险合同签字仪式在京举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华泰财产保险公司联手为田湾核电站提供 18.5 亿美元的建筑安装工程保险。这是国内首次由四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的核电站项目。

21 日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水利部加强嫩江、松花江近期防洪建设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水利部《关于加强嫩江、松花江近期防洪建设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是指导嫩江、松花江近期防洪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继 1999 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强治理长江近期防洪建设若干意见》以后我国水利建设的又一项重大举措，这表明，1998 年发生大洪水的长江、嫩江、松花江的防洪建设都有了科学可行的方案。

《若干意见》在国务院 1994 年批复的《辽河、松花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基础上，针对近几年特别是 1998 年大水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嫩江、松花江近期的防洪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对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大庆等城市的防洪建设作出新的安排。根据《国家防洪标准》，哈尔滨、长春两市的防洪标准由原来确定的 100 年一遇提高到 200 年一遇。与此同时，佳木斯、牡丹江、松原、乌兰浩特等城市，大庆市主城区和主力油田的防洪标准从 50 年一遇提高到 100 年一遇。确立了嫩江、松花江流域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防洪方针和以堤防为基础、大型控制性水利枢纽为骨干、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洪体系。

24 日　全国水土保持会议提出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放在首位

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水土保持会议提出，我国新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将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放在首位，以退耕还林草为重点，实施分区防治战略，进一步调整优化各项措施，转变管理职能，积极探索新机制，以加快建设步伐，为西部大开发和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水利部确定的新时期水保生态建设的基本思路：以建设秀美山川为目标，以治理水土流失为核心，以退耕还林草为重点，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合理配置，实施分区防治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管理，突出保护，依靠深化改革，实行创新机制，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放在首位，树立“生态优先”的思想；同时把水土保持与江河治理、群众脱贫致富和发展地方经济结合起来，实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在工作重点上要认真贯彻落实好“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措施，抓住以“粮食换林草”的大好机遇，加快退耕还林草步伐。把林草覆盖植被度较大、水土流失较轻的区域确定为重点预防保护区，把资源开发和基本建设活动较集中、人为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区域划为重点监督区，坚决控制人为水土流失；把以自然水土流失为主、给当地和下游造成严重危害的区域定为重点治理区，采取综合措施，实行重点治理。进一步调整优化治理措施，农田基本建设要走少而精的路子，由重数量转到重质量、重效益；加大水利水保工程建设力度，千方百计提高林草成活率和保存率；进一步增加林草措施的比重。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树立大水保的

观念，加强综合协调，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治理水土流失的新格局。积极探索推广新机制，在充分发挥政府力量的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胆探索、实践和推广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群众脱贫致富的新机制。

国家经贸委对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督与管理作出规定

为加强石油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监督和管理，国家经贸委根据《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制定并发布《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督与管理暂行规定》，对从事石油天然气生产、储运、销售、加工的企业以及管道勘察设计、钢管制造、管道施工、管道运行、管道检测、事故调查和处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25日　科技部等部门提出中央科研基础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支持中央级科研单位科技基础性工作的开展，更好地发挥具有较高科技内涵的种质资源、基础数据库等对提高科研与服务水平的作用，促进科研单位改革与发展，科技部、财政部制定并发布《中央级科研院所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专项资金的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包括：基础数据类：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科技数据与资料的采集、鉴定、分析和积累等方面的工作；基础标准类：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基础标准和计量、检测体系维护更新等方面的工作；种质资源类；其他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按照批准项目（任务）采取一次性补助的支持方式，每个项目的支持额度为30—500万元。

26日　科技部等部门制定并发布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规范科研院所公益研究专项资金管理，科技部、财政部制定并发布《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主要是中央级科研院所开展资源环境、人口健康、防灾减灾、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国家与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社会公益研究工作。专项资金按照批准的项目采取一次性补助的支持方式，每个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每个项目的支持额度一般为30—300万元。

27日　海关总署确定第一批出口加工区试点名单

根据国务院批准设立出口加工区的基本原则，海关总署提出第一批进行试点的出口加工区名单，包括大连出口加工区、天津出口加工区、北京出口加工区、烟台出口加工区、威海出口加工区、江苏昆山出口加工区、苏州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杭州出口加工区、厦门杏林出口加工区、深圳出口加工区、广州出口加工区、武汉出口加工区、成都出口加工区、吉林辉春出口加工区等15个。国务院办公厅在批复中强调，设立出口加工区不得搞重复建设，并逐步实现对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

28日　“保护母亲河工程”第二批全国重点项目建设协议签订

第二批“保护母亲河工程”全国重点项目在京通过专家组技术终审，并签订建设协议。它们是内蒙古准格尔旗万家寨库区项目、河北张家口项目、河南小浪底库区济源项目、甘肃刘家峡库区项目、宁夏盐池县项目。这是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动员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关注、投身西部地区

生态环境建设而采取的又一实际行动。截至2000年4月，全国“保护母亲河工程”项目已达13个，总规划建设面积27万亩，项目建设总投资达5400万元。

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第32号主席令，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国家采取措施，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各地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国家实行按照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征收排污费的制度，根据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要求和国家的经济、技术条件合理制定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限期禁止采用的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工艺名录和限期禁止生产、禁止销售、禁止进口、禁止使用的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设备名录。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大气污染监测制度，组织监测网络，制定统一的监测方法。

30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公开募集股份办法

为规范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暂行办法》，规定上市公司以向社会公开募集方式发行股份，必须报经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具备以下条件：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规定；具有自主开发核心技术能力；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小于总股本25%或15%（总股本4亿股以上）；能发行境内外资股。

5　月

1日　国务院批准发布工程建设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

为规范工程招标活动，国家计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制定《工程建设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施行。《规定》对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对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国家融资项目、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资金项目的范围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同时规定，达到施工单项合同估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等标准之一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

2日—7日　李鹏考察陕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5月2日至7日在陕西考察，在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程安东等的陪同下，考察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高压开关厂、陕西华圣果业公司、大唐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李鹏还听取了陕西省委、省人大和省政府的工作汇报。李鹏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对新世纪做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陕西及西部各省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各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扎扎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切不可各种项目齐头并进，一哄而上。要真正做到抓住重点，发挥优势，分类指导，循序前进。西部开发要加强公路、铁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建设黄河古贤水库、东庄水库等骨干水源工程，条件成熟，势在必行，可考虑列入国家建设发展规划，陕北有丰富的油气和优质煤炭资源，大力开展能源基地建设和西电东输工程，对西部开发和东部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李鹏强调说，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新西部。要维护好自然生态环境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黄河治理问题。黄河流域有面积达8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这里水土流失严重。经过50年的努力，1/3得到了治理，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今后治理任务仍然十分繁重。今春连续出现的沙尘暴天气，就与西部一些地方植被遭到破坏、土地迅速沙化有关。陕北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之一，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尤为重要。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地理位置上说，陕西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连北的区位优势，在能源、科技、军工和旅游资源等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陕西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好发展规划。开发丰富的旅游资源，对陕西省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要带动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二要加强旅游设施建设，开发新的旅游景点，改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三要把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作为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建设好。

6日　世界最先进热轧带钢工程在鞍钢投产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鞍钢热轧带钢厂1780毫米工程正式竣工投产。这一工程是国家"九五"重点工程，是国家经贸委确定的"双加"工程。概算投资75.6亿元，设备总重量37800多吨，是鞍钢有史以来投资最多、技术水平及装备水平最先进、工程量最大的工程，被誉为鞍钢的"希望工程"。

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人民日报》发表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共20条。《决定》认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未来几十年，在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开始缓慢下降。但是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未来十年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时期，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全民素质提高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以对党和国家、对群众利益、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科学的态度，一年接一年，坚持不懈地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抓紧抓好，确保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的实现。《决定》提出今后十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是：到2010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4亿以内，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过15‰；出生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普遍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初步形成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逐步建立调控有力、管理有效、

政策法规完备的计划生育保障体系和工作机制。

8日—12日　第三后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

本届国际周由科技部、外经贸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贸促会承办。与前两届相比，这届国际周国际化程度更高，内容更丰富。北美、欧洲、南美、东南亚及非洲等地区的40多个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专业组织以及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派团参加国际周活动。18个大型国际会议和国家级高新技术及相关贸易、投资融资、人才交流活动在国际周举行。国际周高新技术展览会以电子信息技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环境保护、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生物工程为主要领域。国际周期间，还召开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会议，举办中国跨世纪科技创新人才交流和国际科技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展示交易等多种活动。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自2000年第三届起，将作为国家定期举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盛会，每年5月在北京举办。

10日　城市水资源保障国际研讨会提出把保护水资源放在战略地位

为期3天的21世纪城市水资源保障国际研讨会在津结束。会议提出，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和合作，为21世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用水安全保障。与会专家呼吁，要把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放在城市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强节水意识和水的商品意识，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的产业化管理，强化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强水污染防治力度。本次研讨会由我国水利部、北京市、天津市和德国勃兰登堡州共同主办。

15日　国家允许在境内开设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

卫生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发布《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外国医疗机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经批准可以在中国境内（港澳台除外）与中国医疗机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合资或者合作的形式设立医疗机构。《暂行办法》对设置条件、设置登记与审批、变更、延期和终止、执业、监督等作出规定，自2000年7月1日起实施。

16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揭牌

作为我国电信体制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在京正式揭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致信表示祝贺。李鹏在贺信中指出，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移动通信作为信息产业发展最快的行业，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组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是促进竞争、提高服务质量的重大举措。希望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快改革与创新步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是在中国电信业重组基础上新组建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在25个省（区、市）设有全资子公司，并全资拥有中国电信（香港）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主要经营移动话音、数据、IP电话和多媒体业务，拥有计算机互联网络国际联网单位经营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网络覆盖全国地（市）和96%以上的县（市），与56个国家和地区的95个GSM运营商开通了自动漫游业务，客

户总数超过4500万户，是世界最大的GSM移动通信运营公司。

18日　中国人居环境奖设立

建设部决定设立中国人居环境奖，凡在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方面作出突出成绩并取得显著效果的城市、村镇、单位和个人，都可申请此奖项。中国人居环境奖采取申报制，每年评选一次，由建设部给予表彰。建设部还将从获奖的项目中选择部分优秀项目，向联合国人居中心推荐申报“联合国人居奖”和“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19日—20日　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座谈会提出西部大开发关键在于水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在京举行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座谈会，与会专家指出，我国西部的水资源既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又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西部大开发首先要解决好水资源问题。会议指出，西部地区是我国主要江河的源头，西部的水土流失、荒漠化、生态环境、江河水质等问题以及水资源与水电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不仅关系到西部，而且直接影响到东部、中部的洪水灾害、水资源和水电的有效供给、饮水卫生及大气环境，关系到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大江大河的综合治理以及西电东送的实施。解决西部水资源问题，不仅涉及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而且涉及人口、国土资源、环境、经济等部门，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赵南起，国家计委、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专家学者共100多人出席会议。

22日　财政部发行记账式四期国债

财政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财政部决定发行2000年记账式（四期）国债，发行总额140亿元，期限10年，从2000年5月23日开始发行，5月30日结束。发行期结束后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24日　国务院部门所属科研机构改革管理体制

科技部、中编办、财政部、中央企业工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劳动保障部、外经贸部、税务总局、质量监督局提出《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对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具体实施意见。《意见》确定科研机构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国家以支持项目为主，通过竞争择优扶持技术创新活动；国家财政集中用于应由国家支持、急需发展的领域和少数精干、高水平的重点科研机构；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方向是：对不同类型、分属不同部门的科研机构实行分类管理改革。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实行企业化转制。国家电力公司等已经进入企业的所属科研机构要办理事业单位注销、企业法人登记；建设部等所属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要通过转为企业或进入企业等方式向企业化转制，与原部门脱钩；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重大基础性或共性技术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的个别科研机构，调整优化组合精干队伍，继续由原部门按事业单位管理；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别不同情况实行改革。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科研机构仍作为事业单位，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其中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部分，也要向企业化转制并逐步与原科研机构分离。非

营利性机构管理和运行的科研机构，要优化结构、分流人员、转变机制，按照总体上保留不超过30%工作人员的要求重新核定编制。财政部、文化部等部门所属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按照国家关于其他类型事业单位改革的部署进行改革。鼓励科研机构进入高等学校、与高等学校合并或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海关总署发布出口加工区监管办法

为规范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的监管，海关总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暂行办法》，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办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出口加工区，只能设在已经国务院批准的现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国务院批准。海关对加工区内的进出口货物和区内相关场所实行24小时监管。

25日　国务院批准取消238项交通车辆收费项目

为切实减轻机动车购买、落籍和使用环节的负担，并为积极稳妥地实施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创造条件，财政部、国家计委对涉及交通和车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集资项目进行了清理，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计委决定取消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应当停止执行的收费项目以及省级以下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越权设立的收费项目，共计238项，并公布取消项目的名录，自2000年7月1日起执行。

27日　国务院发布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

为了保障蓄滞洪区的正常运用，确保受洪水威胁的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合理补偿蓄滞洪区内居民因蓄滞洪遭受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国务院制定并发布《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办法》规定，蓄滞洪区内具有常住户口的居民，在蓄滞洪区运用后，对区内居民遭受的下列损失给予补偿：（一）农作物、专业养殖和经济林水毁损失；（二）住房水毁损失；（三）无法转移的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水毁损失。蓄滞洪区运用后，按照下列标准给予补偿：（一）农作物、专业养殖和经济林，分别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70%、40%—50%、40%—50%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水毁情况在上述规定的幅度内确定。（二）住房，按照水毁损失的70%补偿。（三）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按照水毁损失的50%补偿。但是，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登记总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毁损失的100%补偿；水毁损失超过2000元不足4000元的，按照2000元补偿。《办法》附国家蓄滞洪区名录。

28日　广安电厂一期工程投产

国家"九五"重点工程，四川广安发电厂一期工程正式竣工投产。广安发电厂位于四川广安代市镇，规划总装机容量240万千瓦。一期工程为2台30万千瓦发电机，总投资32.4亿元人民币，是四川火电建设史上第一个按照国际惯例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管理、运作的火电厂，也是第一个没有调整概算的火电建设项目。

29日　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落实和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分析当

前粮食生产和流通面临的新形势，研究部署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会议强调，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关系到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持农村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核心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这项政策不仅符合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的现实情况，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而且符合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国家保护农民利益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一项基本政策。在当前市场粮价低、国有粮食企业还没有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情况下，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必然会导致粮价进一步下跌，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挫伤农民积极性。只有“敞开”，才能“放开”，这是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真正做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确保政令畅通，把中央的粮改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对列人保护价范围内的粮食品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必须真正做到按保护价常年挂牌敞开收购，绝不准限收、拒收、停收和压级压价。

会议指出，为了保证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的落实，国务院决定2000年再增加粮食风险基金规模80亿元，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现行的包干比例分担；继续扩大国家粮库建设规模，在已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基础上，2000年和2001年再分别安排200亿斤仓容的粮库建设。会议强调，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粮食安全，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农业，不能忽视粮食生产。

中国银行上调境内外币存贷款利率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银行上调境内美元、英镑、欧元、港币四种外币的存、贷款利率以及加拿大元、瑞士法郎的存款利率。其他中资金融机构的上述境内外币存、贷款利率也同时上调。这次境内外币利率调整后，美元、英镑、欧元、港币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分别达到5%、5.1875%、3%、5.5%，按月浮动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达到8.125%、7.8125%、5.625%、9.25%；一年期加拿大元、瑞士法郎的存款利率分别为4%、1.625%。

31日　国家经贸委提出国企脱困指导意见

为实现三年脱困目标，明确工作重点，国家经贸委提出《2000年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脱困工作指导意见》，强调着力抓好七项工作。第一，围绕脱困目标，做好规划，落实责任，把脱困工作的目标、措施落实到每一个企业。第二，在结构调整的规划和方向明确后，要配套地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企业进行综合治理，在帮助企业脱困的同时实现结构的优化。第三，促进脱困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体制创新进一步巩固脱困的成果。第四，引导企业练好内功，切实加强管理。第五，加强脱困企业的领导班子建设。第六，总结交流经验，大胆探索国有企业脱困的多种途径。第七，继续做好企业脱困的跟踪监测工作，及时准确掌握企业脱困的进展情况。

邯（郸）济（南）铁路全线通车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邯（郸）济（南）铁路全线通车。邯济铁路西接邯长线（邯郸至

长治），东接胶济线（济南至青岛），全长265.8公里，总投资31.56亿元。

6　月

2日　大连开发区成为国家环保示范区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宋瑞祥代表国家授予大连开发区ISO 14000国家示范区荣誉称号。这是我国开展“ISO14000”活动以来，继苏州新区之后第二个获得这一殊荣的经济开发区，也是全国国家级开发区中的第一个。

5日　李鹏谈实现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良性循环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京举行“6·5世界环境日”西部开发生态建设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座谈会上强调，西部大开发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李鹏指出，西部大开发要抓紧进行，但必须有规划、循序渐进，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把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过程中，必须本着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实现良性循环；在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汲取有些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而付出惨重代价的教训，做到全面规划，依法保护生态，保证可持续发展。要特别注意解决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保护好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要结合西部的特点，靠生物工程、节水工程，靠高科技发展农业和开发利用其他资源。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是解决今后中国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的根本出路。国家要贯彻西气东送、西电东送的方针，使我国的能源结构有较大的改善。要坚持治理水土流失常抓不懈，实现青山绿水。退耕还林、还草工作既要结合当地实际，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又要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让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致富。节水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战略性的高度来看待。目前全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严重缺乏。许多地区还存在生活用水、农田用水严重浪费的现象。要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结构，大力提倡节水农业，利用高科技发展各个行业的节水工程。座谈会由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主持。中宣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国务院批准集中清理乡镇企业“三乱”问题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乡镇企业负担问题，经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批准，决定2000年集中一段时间对乡镇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和各种摊派进行依次全面清理整顿，农业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务院纠风办联合下发《关于治理向乡镇企业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乱摊派等问题的通知》，重申一律取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计委和省市自治区政府明文规定之外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项目、基金项目，坚决制止超标准收费和罚款行为。取消的项目要分期分批向社会公布。

我国改革药品监督管理体制

为理顺和完善药品监督管理体制，国家医药管理局制定《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经国务院批准下发施行。《方案》对现行药品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省以下药品监管系统垂直管理，统一履行药政、药检和药品生产流通监督管理的职能。

9日　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实行重大改革

经国务院批准，专门负责中央储备粮、油经营管理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在京成立。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的组建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求，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结合当前粮食工作中的新情况而作出的重大决策。组建这家企业的目的是完善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体制，加强和改善对中央储备粮的管理，降低经营管理费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切实发挥中央储备粮为宏观调控服务的作用。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66.8亿元。受国务院委托，这家企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储备粮的收购、储存、调运、销售及进出口业务，负责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建设和设施维修，提高仓储能力等，确保中央储备粮储存安全，质量良好，调用通畅，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家企业对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体系的人、财、物实行垂直管理，目前已在全国设置北京公司等13个分公司和乌鲁木齐办事处。至12月18日，其在全国按经济区域设置的14个分公司已全部挂牌成立，至此，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已初步建立。

10日　国务院提出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和流通八项政策

针对粮食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和流通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从8个方面提出有关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 大力推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生产和流通的协调发展；2. 认真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切实保护农民利益；3. 适当增加粮食风险基金规模，保证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今年在包干资金之外再增加80亿元粮食风险基金规模，用于粮食住产区，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现行自筹比例分别负担；4. 扩大国家粮库建设规模，增加有效仓容。在已建成250亿公斤仓容的基础上，今明年再分别安排100亿公斤仓容粮库建设；5. 进一步拓宽粮食购销渠道，搞活粮食流通；6. 积极促进粮食销售、加工转化和出口，加快库存粮食转换；7. 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步伐提高企业竞争力。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粮食购销企业必须真正政企分开；8. 切实加强领导，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14日　“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办的“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在北京开幕。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著名政治家和知名人士以及中国的专家学者共5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全国政协主席、“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组委会名誉主席李瑞环主持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论坛”组委会主席叶选平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14日—19日　江泽民考察宁夏甘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在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甘肃省委书记孙英、省长宋照肃的陪同下，先后在宁夏、甘肃考察，重点就加强新时期农村党的建设和西部大开发进行考察。6月20日，江泽民在兰州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实施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江泽民说，进行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在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相继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我们要向第三步战略目标不断迈进，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为21世纪我国经济的发展开拓新的广阔空间，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江泽民强调，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国家必须予以重点支持。国家要制定支持西部开发的财税、金融、外资外贸、吸引人才和科技教育等方面政策。西部地区面貌的根本改变，需要许多代人的持续努力。我们必须充分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同时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方针。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搞好科学规划，选准实施重点，集中财力物力解决一些关系西部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以带动西部开发的全局。要根据西部各地的经济优势，选好投资项目，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在开发和建设中要高度注重社会和生态效益。要始终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既重视经济发展又重视社会发展，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认真分析并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不断开拓创新中形成地区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走出一条西部开发的新路子。力争用5到10年时间，在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山川秀美上有一个新的良好开局。

江泽民强调，要继续贯彻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同时，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东部地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要积极探索形成与中西部地区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加快发展。西部各省区市要加强交流，搞好经济协作和联合建设，充分发挥西部开发的整体优势。要努力形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15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法实施细则

1987年国务院批准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经2000年6月2日国务院批准修订。该《细则》对统计调查计划和统计制度、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以及奖励和惩罚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我国最大化肥项目正式启动

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年产45万吨合成氨和80万吨尿素，总投资近30亿元的

海洋石油化肥项目正式启动，将在海南省东方市建一家化肥厂，于 2003 年 11 月投料试车。这标志着中国海油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战略进入了实质性实施阶段。

16 日　长江中下游河道采砂管理实施审批许可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长江中下游河道采砂管理的意见，要求长江中下游各省（市）采取有效措施，对长江河道的采砂活动进行全面治理整顿，彻底取缔非法采砂活动，保障长江河道的防洪安全和航运交通安全。非禁采期的长江中下游采砂活动，必须服从长江河道（航道）整治规划、防洪需要和通航安全的要求。实行河道采砂审批许可制度，并实施采砂总量控制。

环北京地区治沙工程启动

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是全国重点地区防沙治沙工程的重点项目。该重点项目涉及北京周边地区土地总面积近 46.4 万平方公里。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范围包括：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西部、阴山以北、山西雁北、河北坝上和京津周围地区。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五省（区、市）的 116 个县（旗）。治理建设的主要任务有五项：一是对现有的林草植被要采取措施严加保护。二是对这一地区内的宜林宜草荒山荒地要大力造林种草，增加林草植被。三是对已沙化的土地加速治理，不适宜耕种的耕地要坚决退耕还林还草，同时，采取综合措施，加强草场建设，恢复林草植被。四是合理调整种养结构，改进生产方式，实行精种精养、高产高效的农林牧业方式，减轻植被破坏的压力。五是采取加强水利配套工程建设以及合理用水、节约用水等措施，实现地区的水平衡，促进植被建设。这项工程今年将先行试点示范，2001 年到 2005 年，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全面实施重点治理区的工程治理，在对重点治理区治理的基础上，适时转入非重点治理区的治理。这项工程建设任务完成后，林木覆盖率将由目前的 13.46%提高到 27%，林草植被将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恢复，扭转“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环北京地区的生态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

我国首家保险经纪公司开业

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京举行。作为我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它的开业标志着我国保险经纪市场正式启动。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保险经纪公司是基于客户的利益，为客户提供保险经纪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

19 日　国家严格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严格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的规定》。《规定》明确，“十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各地区、各部门要监督所有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新增棉纺锭。继续对棉纺细纱机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对违反者，吊销其生产许可证，并没收其违规收入；需要购置棉纺细纱机的企业，必须办理准购证，对企业违规购置的设备必须销毁。

21 日　财政部发行 2000 年记账式（五期）国债

财政部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记账式（五期）国债，发行总额为 200 亿元，期限 5 年，为固定利率债券，利率为 3%，发行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

23 日　国家禁止滥采发菜等野生固沙植物

近年来，一些草原地区采集发菜、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现象十分严重，导致草场退化和沙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农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在一些地方还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此，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发菜的保护级别由目前的二级调整为一级。甘草、麻黄草资源分布地区要逐级制订甘草和麻黄草的保护和建设规划。要实行甘草和麻黄草专营、许可证管理制度。建立甘草和麻黄草资源的保护和建设责任制。

24 日　国家制定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为推动我国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增强信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制定并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政策目标确定为力争到 2010 年使我国软件产业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经过 5 到 10 年的努力，国产软件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市场大部分需求，并有大量出口；国产集成电路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市场大部分需求，并有一定数量的出口，同时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开发和生产技术上的差距。为此，提出的鼓励政策主要包括：

在投融资政策方面，建立软件产业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对软件产业的风险投资。“十五”计划中适当安排一部分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用于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化项目。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研力量集中的地区，建立若干个由国家扶持的软件园区。国家计委、财政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在安排年度计划时从其掌握的科技发展资金中各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基础软件开发，或作为软件产业的孵化开办资金。为软件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创造条件。尽快开辟证券市场创业板。对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及人才优势的软件企业，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可由投资方自行商定。支持软件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

在税收政策方面，国家鼓励在我国境内开发生产软件产品。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2010 年前按 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即征即退，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在我国境内设立的软件企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新创办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产业技术政策方面，国家科技经费重点支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重大关键共性软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平台、开发平台、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大型应用软件系统等基础软件和共性软件。

在出口政策方面，软件出口纳入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范围，并享受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同时，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应提供出口信用保险。软件产品年出口额超过 100 万美元的软件企业，可享有软件自营出口权。

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软件企业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自主决定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鼓励企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重奖。软件企业可允许技术专利

和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并将该股份给予发明者和贡献者。由本企业形成的科技成果，可将过去3至5年科技成果转化所形成的利润按规定的比例折股分配。群体或个人从企业外带入的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可直接在企业作价折股分配。

《若干政策》还在人才吸引与培养政策、采购政策、软件企业认定制度、行业组织和行业管理、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鼓励办法。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30日　国家计委采取措施制止农村电网改造乱收费行为

针对一些地方在农村电网改造中严重存在的向用户乱集资、乱收费问题，国家计秀发出《关于进一步制止在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中乱收费行为的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在电力价格检查中，把农网改造中乱收费、乱加价行为作为突出的重点，加大力度认真查处。《通知》强调，严格价格管理权限，禁止乱收费、乱加价行为。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用电同价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投资管理规定的通知》已明确规定：国家已拨专款用于农网改造，除电能表以下入户线由农民集资购买、部分改造资金不足地区电能表由农民集资购买外，严禁再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材料费、施工费、管理费、手续费等费用。凡由电力企业组织农民出资购买的用电器材，其收费标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统一核定。农网改造工程的设备和材料的招标采购价格是设备和材料的最终购买价格，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加价收费。

我国首家债转股公司在京成立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首家债转股设立公司的企业——北京水泥厂有限责任公司在京成立。该公司注册资本为9.63亿元，其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资6.88亿元，占注册资本的71.4%；北京建材集团出资2.75亿元，占注册资本的28.6%。

7　月

6日　国家经贸委制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国家出台的第一个鼓励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文件。《意见》共提出了8个方面的25条措施，主要包括：坚持发展大企业大集团与扶持中小企业并举的方针；简化中小企业设立审批程序，减少创业成本；研究探索中小企业破产与清算的简易程序，使退出渠道通畅；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鼓励社会各类投资者以技术等生产要素投资创办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予以有效扶持；加大财税、金融政策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特别是动员和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建立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措施；各级政府要根据财力情况，安排一定的资金投入，重点用于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和创业资助、科技成果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贴息；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可由地方政府确定，对其业务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逐步放宽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的条件，切实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

《意见》提出由国家经贸委牵头，科技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部门参加，成立全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各地要结合地方机构改革，理顺中小企业管理体制，尽快明确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颁布产品质量法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决定，并重新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损害赔偿以及相关惩罚等作出规定。

国务院颁布种子法

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国务院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该法明确，国家扶持种质资源保护和选育、生产、更新、推广使用良种，县级以上政府应制定种子发展规划；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良种选育和推广；国家建立种子储备制度，保障农业生产安全。该法还对种质资源保护、品种选育与审定、种子生产、种子经营、种子使用、种子质量、种子进出口和对外合作、种子行政管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自2000年12月1日起施行。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0日　国家计委组织清理整顿各类政府性建设基金

为适应加入WTO后我国对基础产业等行业投资政策的调整，国家计委办公厅下发《关于清理整顿各类政府性建设基金有关问题的函》，决定对中央、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类政府性建设基金进行一次清理整顿。清理的范围包括：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凭借行政职权以征收、提取、价外附加、税费附加等各种形式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筹集建立的、目前仍在收取的、专门用于建设的各种名目的基金（附加、附加费）。国务院及其所属职能部门批准设立的各项建设基金由国家计委会同财政部负责清理整顿；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批准设立的各项基金由省级计委会同财政厅负责清理整顿。

11日　我国国土资源科技创新计划正式启动

由国土资源部组织实施的“国土资源科技创新计划”正式启动。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评价和资源安全、矿产资源集约利用、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西部大开发、国土资源信息化及国土资源管理等八大领域中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攻关；建立和完善对地观测、地下深部探测、灾害监测与治理等技术体系；加强基础研究。

14日　国家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

为了进一步加快国内石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步伐，建立与国际市场相适应的价格形成机制，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秀发出通知，自7月14日起，再次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汽、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00元和180元，各地市场零售中准价相应等额提高，石油、石化集团公司以国家规定的中准价为基础，在上下5%的浮动幅度内制定和公布各地具体零售价格。其他油品按规定的比价关系相应调整。

通知要求，成品油价格调整方案出台后，石油、石化集团公司要充分发挥集团优势，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千方百计增产柴油，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特别要重点保证北方部分省的抗旱和南方部分省的排涝等救灾用油；进一步规范石油经营企业经营行为，不得利用调价之机惜售、囤积以牟取利益；要在国家规定的权限内，合理安排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格，保持出厂环节到零售环节的合理价差，为基层企业维持正常经营、严格执行国家规定价格提供基础和保障，并督促所属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价格规定。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成品油价格的宣传解释工作，并对受调价影响较大的行业积极采取措施，疏导矛盾。各级物价部门要加强对市场油价的监督检查，对擅自超价和变相加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要依据《价格法》从严查处。

国产单机容量最大火电机组在沪投产

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上海吴泾热电厂工程首台 60 万千瓦火电机组正式投产。上海吴泾热电厂工程由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电力股份公司联合投资约 70 亿元，是国家重点工程。它的两台主设备，均选用目前国产单机容量最大的 60 万千瓦火电机组。投产的一号机组——60 万千瓦亚临界燃煤火电机组由上海首次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自行施工调试。机组由华东电力设计院总体设计，上海电气集团负责制造。工程各项指标均实现设计要求，技术指标达到 90 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完全能够适应国内外大型电网的调度需要。

15 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加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意见

为加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明确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及各环节责任，提高水利工程质量，国务院同意并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水利部、建设部提出的《关于加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健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将水利项目划分为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分级负责。加强水利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大江大河的综合治理及重大专项规划，由水利部负责编制，报国务院审批。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组织，各级水利部门对水利工程质量和建设资金负行业管理责任。严格水利工程项目验收制度，水利工程建设必须执行国家水利工程验收规程和规范。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计划与资金管理，中央项目的年度计划由水利部报国家计委，地方项目的年度计划由省计划和水利部门初审，其中一、二级防堤和列入国家计划的大中型项目的年度计划报流域机构审核，由省报国家计委、水利部，同时抄送流域机构备案。

16 日　国家构建电子商务平台框架

“国家电子商务平台框架及技术体系研究开发”项目被国家经贸委列入国家技术创新重点专项计划。由信息产业部主持的这一研究开发项目，总投资达 5000 万元，将致力于构建我国自主版权的电子商务应用平台，从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应用管理等方面实现各市场主体间电子商务活动的规范、协调、安全，突破数据库管理、全文检索、安全加密等关键技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子商务技术体系和标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这一项目由河南省金龙多媒体信息公司与信息产业部电子标准化研究所

等共同承担。项目完成后，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将由企业自身行为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

18日 全国人大财经委听取上半年经济形势汇报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7月17、18日举行第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委员们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经济形势明显趋好，整个经济出现了重要转机。

委员们认为，从国务院6个部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看，经济形势明显趋好主要表现在：一是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扭转了连续7年下降的态势；二是经济增长初步形成了出口、消费和投资三大需求整体拉动的格局；三是对外贸易扭转了曾一度出现的负增长，出口增幅较大，出口产品结构明显改善；四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加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跌幅逐步缩小；五是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工业生产增速加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有较大增长。这些转机和变化，主要是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受当前全球经济环境转好、国际市场趋旺的影响。继续保持和推进目前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我国经济将进一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变化还是初步的，经济回升受短期因素的影响较大，基础还不稳固，有些结构性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总体上看，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尚未根本缓解，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国有企业解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都很艰巨，难度不小，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生活安置问题不少；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当前物价仍处在低位，这是国内需求不足的集中体现，说明通货紧缩的迹象尚未完全消除；上半年基本建设投资增幅一直偏低，启动社会投资缺乏有效方式，增长缓慢，不仅直接影响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预期目标的实现，也加大了经济增长对国债和国家投资的依赖；国有银行本身的问题以及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的支付困难和风险不容忽视；农民负担重、收入增幅减缓、启动农村市场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对于农业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农产品降价带来的问题要给予高度重视。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经过不懈的努力，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保持当前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委员们认为，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充分发挥政策效应，巩固上半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努力争取全年经济比年初预计有更好更全面的发展，为“十五”计划开局打下良好基础。在当前形势下，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应当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力争更好地实现当年的计划指标，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近几年增发国债扩大投资是必要的，而且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要注意不能形成经济增长对国债投资拉动的依赖性。要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增

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强化投资的约束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在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同时，要进一步搞好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加有效供给。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搞好西部大开发的起步工作。

委员们认为，非国有经济投资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上半年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有所回升，但速度仍然较低。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国有、集体、私营企业和个体的投资积极性，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扭转社会投资增长缓慢的状况。要在充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促进社会投资较快增长的政策，做好政策协调工作，对社会投资给予必要的扶持，取消不必要的限制，放宽准人领域。要下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在当前主要农产品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要防止忽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倾向，引导和帮助农民调整结构，优化品种，提高效益。近年来农民收入增幅不断降低，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不解决，开拓农村市场，增加有效需求，都很难实现。要结合农村“费改税”试点和精简机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把“科教兴农”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扭转粮食单产下降的局面，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19 日　九家中国公司进入新全球 500 强

美国《财富》杂志根据销售额排出了 1999 年全球 500 家大公司排行榜。共有 9 家中国内地公司登上排行榜，比去年增加了 4 家。在这 9 家公司中，居首位的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它在《财富》500 强的排名为第 58 位，比去年上升了 15 位。其他公司依次是中国国家电力公司（第 83 位）、中国工商银行（第 208 位）、中国电信（第 236 位）、中国银行（第 255 位）、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第 307 位）、中国农业银行（第 341 位）、中国建设银行（第 364 位）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第 413 位）。此外，中国香港的怡和有限公司（第 462 位）和中国台湾的国泰人寿保险集团（第 489 位）也榜上有名。中国国家电力公司、中国电信、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是今年首次入围《财富》全球 500 强。《财富》在全球经济刊物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其 500 强排名历来受到全球工商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20 日—21 日　西部大开发交通建设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会上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我国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条件落后，加上基础薄弱、起步比较晚等原因，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仍然十分突出，而且与东部的差距在拉大。一是路网密度低，西部地区路网密度每百平方公里为 7.8 公里，只是全国的一半；二是公路等级低，二级以上公路比重为 6.9%，只有全国一半；三是通达深度低，西部地区不通公路的乡镇为 680 多个，占全国不通公路乡镇总数的 85%。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尽快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和长远大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紧抓

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利时机，加快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争用5至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有明显改善；再用10年时间，即到2020年建成西部地区公路骨架网络；再用30年左右的时间，即到下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公路运输网络。特别是要通过5到10年的努力，完成连通西部地区的丹东到拉萨、青岛到银川等8条国道主干线建设，打通兰州到云南、成都到西藏樟木等8条省际间主要公路通道，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有利条件。

24日—26日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国务院办公厅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重点部署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等有关工作，全面推进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议上讲话。他强调，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分担机制，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引入竞争机制，这三项改革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同步进行，才能有效地实现改革目标。当前，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采取有力措施：第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的攀升，提高服务水平，病人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可以选择若干家医院、药店作为定点医院、定点药店，病人看病可以选择医院，选择医生，促进医院之间、药店与药房之间、医生之间的竞争。第二，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办医院”转向“管医院”，实行全行业宏观管理。第三，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第四，要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对医疗机构的药品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营销之间的直接经济联系，从制度上解决医疗机构“以药养医”带来的问题。第五，规范医疗机构购药行为，通过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办法，从源头上治理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第六，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各级医疗机构可以通过调整、合作、合并等形式，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第七，依据医疗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调整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合理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第八，加强药品管理和药品价格调控，严格实行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大力整顿和规范药品流通秩序，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减少政府定价的药品种类和数量，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反应灵敏的药品价格形成和管理机制。

25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1994年的财税改革基本实现了财政收入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加，但财政支出管理改革明显滞后，支出管理手段和方式在许多地方仍在沿袭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做法，管理松弛，监督乏力，损失浪费严重，既影响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又不利于反腐倡廉。因此，必须加快改革步伐。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企业的经营性发展项目、应用性研究项目以及可以利用社会资金发展的事业，财政资金都要逐步退出来。要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要

强化预算管理，实行部门预算。要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定员定额标准，改进和完善预算支出科目体系，细化预算编制。预算单位所有的财政支出都要严格按规定标准和相应的科目列人预算，预算一经审核批准，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都要严格按预算执行；财政部门要对各部门实行从预算编制、预算下达、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并追踪问效。

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

为促进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督管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第4号中国人民银行令，实施《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金融租赁公司可设立分支机构；可以吸收外资入股，但不得吸收自然人为公司股东。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租赁公司的设立、变更、撤销等重大事项实行公告制度。

27日　朱镕基主持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

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朱镕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关于我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的报告，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建设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情况报告和关于“十五”期间建设“十二大高技术工程”基本思路的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岚清，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中科院关于我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的报告、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建设“十二大高技术工程”的基本思路。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后指出，发展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对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有着重要意义，要继续听取国内外专家的意见，通过对现有设施加以改造，用较少的投资，取得好的效益。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项目现已进行的工作深度还不够，由国家计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做好可行性论证工作。会议原则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十五”期间建设“十二大高技术工程”的初步建议，要通过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必要修改完善后纳入“十五”规划草案。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员曾培炎、盛华仁、陈至立、朱丽兰、陈耀邦、路甬祥出席会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28日　宝钢建成国内最先进冷轧生产线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宣布，该公司技术工艺水平最高的项目一五五〇冷轧工程已全面建成并投人试生产。该工程投资80多亿元，可年产140万吨冷轧钢材，整套设备的国产化率为68%，将批量生产被国内市场称为“缺中之缺”的紧俏商品——高级轿车面板用钢、中低牌号电工钢及家电面板用钢。它的试投产标志着宝钢总投资600多亿元的三期工程的建设任务已近尾声。

31日　我国国有资产总量逾9万亿元

人民日报报道，1999年底我国境内外各类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占用的国有资产总额为90964.2亿元，比上年增加8753.1亿元，增长10.6%。在全部国有资产总量中，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额66748.4亿元，占73.4%，比上年增长7%；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额24215.8亿元，占26.6%，比上年增长22.3%。在经营性国有资产中，21.7万户国有工

商企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额为53306亿元，占79.9%；国有金融企业占用8017.4亿元，占12%；国有境外企业占用1015亿元，占1.5%；建设基金及建设项目占用4410亿元，占6.6%。在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中，行政事业单位占用18557亿元，占76.6%；建设单位占用5452亿元，占22.5%；派驻境外机构占用206.8亿元，占0.9%。

8　月

4日　国家民委等要求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职教改革发展

国家民委、教育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起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民族职业教育体系，到2005年，使民族地区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比例达到50%左右。《意见》指出，要建立能够主动适应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现有乡镇文化技术学校和农村适用技术推广站的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网络，力争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使初中阶段的毕业学生普遍掌握一两项脱贫致富的实用生产技术；在经济相对较好地区，使农村初、高中阶段的毕业学生普遍掌握适应农村产业化需要的生产技术，使之获得“绿色证书”。到2005年，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兴办一批骨干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一般每个县（旗）应首先办好一所。要推进现有招生制度、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积极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人制度。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牧等类专业实行“宽进严出”政策，凡取得初中毕业文凭者，可不限年龄免试人学，学习期满，考试合格者发给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意见》还要求各地在保持与普通学校同样拨款水平的基础上要逐年增加投入，中央拨给各省、自治区的城乡职教补助费，要划出适当比例用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经费在地方财力中所占比例要逐年提高。

首条铁路宽带信息高速公路建成

我国首条采用密集波分复用技术的铁路宽带信息高速公路，经由中铁电气化工程局电信试验中心验收检测，在沪杭、浙赣线上建成开通。这条铁路宽带信息高速公路东起上海，西至株洲，全长1256公里，是连通京沪、京广、京九、鹰厦线的重要信息通道。

5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6位著名科学家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6位国际著名科学家。他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彻底消除贫困等严峻任务。关键要大力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与保障。我们将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人才，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全社会努力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江泽民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6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振宁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丁肇中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马库斯教授和德国马普学会生物物理研究所米歇尔教授等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菲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8日　“北大生物谷”在深圳兴建

由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亚洲最大的生物工程产业化基地——“北大生物谷”在深圳破土动工。北大生物谷是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签署建立的深港产学研基地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7亿元人民币，主要项目有基因工程干扰素、基因工程胰岛素等，其中干扰素的年产能力将达1亿支。这个项目已被国家计委列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工程。

12日　国家储备糖投放市场公开竞卖

国务院决定动用国家储备糖投放市场。此次出库的国家储备糖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北京食糖交易市场分批公开竞卖。国家储备糖实行公开竞卖是深化食糖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1999年年底，南方食糖生产省区遭受严重冻灾害，加之糖料种植面积调减较多，食糖大幅度减少，供求出现较大缺口，导致近期市场糖价上涨较快。动用国家储备糖可以保证市场供应，平抑过高的糖价。凡具有加工、经营食糖资格的国有制糖企业、糖酒公司、外贸公司及直接用户均可申请入市竞买。

16日　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重申严格禁止高息揽存

为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再次重申严格禁止高息揽存、利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包括邮政储蓄机构）必须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严禁擅自提高利率，或以手续费、协储代办费、吸储奖、有奖储蓄、介绍费、赠送实物等名目变相提高存款利率。《通知》规定，各金融机构要废除存款单项考核和奖励办法，不得对非存款部门下达存款考核指标，不得把存款考核指标分解下达给职工个人，不得将存款考核指标与职工个人工资、奖励、福利、行政职务安排等挂钩。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时，要根据企业的用款进度合理安排贷款，不得以发放贷款形式增加存款。

17日　国家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实行稽查制度

为了加强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监督，保证工程质量和资金安全，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建设项目的规范化管理，国家计委在总结两年来我国开展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发布施行。

《稽察办法》规定，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实行稽察特派员负责制，由国家发

展计划委员会负责组织和管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察特派员由国家计委委派，履行下列职责：(1) 监督被稽察单位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方针政策情况，监督被稽察单位有关建设项目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的权限、程序；(2) 检查建设项目招投标、工程质量、进度等情况，跟踪监测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3) 检查被稽察单位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其他资料，监督其资金使用、概算控制的真实性、合法性；(4) 对被稽察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评价，提出奖惩建议。《稽察办法》规定，对稽察发现的问题，国家计委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在职权范围内做出限期整改、通报批评、暂停拨付国家建设资金、暂停项目建设、暂停有关地区、部门同类新项目审批的处理决定；涉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职责权限的问题，则由国家计委移交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处理。重大的处理决定，要报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发行记账式（六期）国债

财政部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记账式（六期）国债。本期国债为7年期固定利率国债，利息按年支付。本期国债通过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团成员以设定利率区间招标方式发行。投标结果确定本期国债年利率为3.5%，实际发行总额为125.5亿元人民币。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承销量排名居前。本期国债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托管注册，发行结束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今后一个时期老年人口还将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将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深刻影响。《决定》提出的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的原则是：坚持老龄事业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兴办相结合；坚持道德规范与法律约束相结合；坚持关心老年人生活和特殊问题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坚持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决定》提出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是：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努力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互助制度；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逐步建立以老年福利、生活照顾、医疗保健、体育健身、文化教育和法律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老年服务体系。《决定》还就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服务业、加快老龄事业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粮库建设资金实行财政直接拨付管理

为加强粮库建设资金的使用管理，作到按照财政预算和工程进度及时拨付资金，财政部经商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同意，制定并发布《粮库建设资金实行财政直接拨付管理暂行办法》，将粮库建设资金由中央财政通过代理支付银行直接拨付到建设项目，改变了现行中央财政先将建设资金拨付到粮库建设主管部门、再由其层层下拨的拨付方式。本办法适用于新建粮库的山东省、湖北省和中国粮食储备管理总公司的河南省、四

川省的粮库项目。自2000年10月1日起执行。

我国设立三江潭自然保护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自然保护区题写区名：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国家林业局和青海省政府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通天河桥畔举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揭碑仪式。位于青海省的三江源地区总流域面积36.2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根据初步估算，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该地区。同时，这一地区也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有藏羚羊、藏野驴等青藏高原特有物种70多种。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为31.8万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6.2万平方公里，缓冲区5万平方公里，实验区20.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也是亚洲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范围包括16个县，总人口55.72万。

2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和2000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代表国务院对《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人和2000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所作的说明，并对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作出《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决定批准增发长期建设国债500亿元和2000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议案审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会议要求，国务院要在总结前两年增发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新增国债的安排使用。今年增发的国债应基本用于在建的国债项目建设，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促使这些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发挥效益。要加强国债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所有国债投资项目都要按规定程序严格审批，坚决杜绝劣质工程，制止不合理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要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审计。增发国债使用情况，年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题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专利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专利法的修改涉及了专利权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支付使用费、报酬、奖励，专利代理，专利申请、请求、审查、诉讼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增加了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得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以及违规处罚等方面的条文。

28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国防工程维护管理规定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国防工程维护管理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中央军委首次颁发的国防工程维护管理法规，它标志着我国国防工程维护管理工作已经步人法制化、正规化、制度化的轨道。《规定》对国防工程的性质、维护管理的基本任务与质量要求，军地双方的工作职责、管理队伍的组织形式与制度，以及奖惩办法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为国防工程的维护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

31日　国家计委提出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西部开发意见

国家计委《关于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西部开发的若干意见》决定进一步下放主要涉及西部地区的五项价格管理权限：一是将西部地区部分铁路运价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改革铁路支线运价形成机制，对铁路支线运输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二是对西部省区间、省区内航空支线实行浮动票价政策，允许航空公司在最高不超过国家规定公布票价10%的范围内，根据市场供求情况确定具体票价；三是将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陕西西安秦川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奥拓轿车和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生产的云雀轿车定价权下放，由企业自主定价；四是将西部地区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新药和列入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的民族药（藏、蒙、维药）价格，委托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批，报国家计委备案；五是下放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四川九寨沟风景区、四川黄龙风景区、云南路南石林、西藏布达拉宫、陕西秦始皇兵马俑、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等10个国家级旅游参观点门票定价权限，由游览参观点所在地区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价格，报国家计委备案。

为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价格运行机制，采用支持性价格政策筹集建设资金：一是继续允许西部地区修建二级收费公路，鼓励外资和社会资金投入西部公路建设。二是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扩大以收费权为核心的经营权质押政策的实施范围，鼓励外资和社会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三是积极疏导西部电网电价矛盾，鼓励对西部的电力投资；单独核定西部地区各电网输配电费用，鼓励电力生产企业与用户直接签订购电合同，降低用户电费负担；适当降低东西部地区之间骨干电网联络线的输电费用，鼓励“西电东送”。四是对新建的水利工程供水项目，实行补偿成本、合理回报的水价政策。五是对没有征收污水处理费的西部地区城市，要求尽快开征污水处理费，对已经开征的城市，要求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尽快达到补偿合理成本略有盈利水平。六是在全国出台统一的垃圾处理收费政策前，西部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提前出台垃圾处理收费政策，推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国家计委还对促进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以及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等方面灵活运用价格杠杆提出了具体意见。

9　月

12日　我国清点科技家底

经国务院批准，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科技资源统计调查工作——“全社会科研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开始在全国进行。本次调查是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制定“十五”科技发展计划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科技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国防科工委等7部门为此专门发文，要求各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调查工作，充分认识科技统计在政府宏观管理与决策中日益重要的地位，通力合作，积极组织工作力量，精心做好各项工作安排，保证按时、保质、保

量地完成。

科研与试验发展及其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弄清我国科研与试验发展资源的投入状况，准确衡量我国科技投入的现状及其国际地位，是我国制定长远发展战略，构筑国家创新体系的迫切需要。

我国首次对科技资源进行普查是 1985 年，本次普查比上次普查范围更广、项目更多、复杂程度和难度更大。本次调查分摸底调查、正式调查和数据保送及审核验收三个阶段。2001 年 1 月至 5 月实施正式调查，9 月公布第一批调查结果。

14 日　亚欧海底光缆全线开通

随着亚欧海底光缆上海登陆站的开通，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参与建设、连接亚欧海底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亚欧海底光缆系统，经过三年多的建设正式开通。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国际通信水平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亚欧海底光缆系统西起英国，经地中海连接法国、意大利等国，通过红海进人印度洋到新加坡，然后再向东，经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到达中国，最后通达日本、韩国。它全长约 3.8 万公里，连接 33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 39 个登陆站。亚欧海底光缆系统在我国上海、汕头各设 1 个登陆站。

16 日　中共中央听取党外人士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对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将为 21 世纪我国经济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将有力地增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调动全国力量参与国际竞争和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把这个战略决策实施好，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对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实施西部大开发，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策，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之举。座谈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曾庆红等出席座谈会。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协助组织，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200 多人，从 5 月上旬开始至 7 月底历时两个多月，分 7 路赴新疆、西藏、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鄂西北等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 70 个地区市县，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教育、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等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调查研究。

20 日　国务院发布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为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条例》明确，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条例》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与承包、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等作出了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1日　国家投放10万吨储备棉

由于2000年度国内新棉资源存在缺口，一些地区个体棉贩抬价抢购棉花现象较为严重，致使这些地区收购价格每斤籽棉达到2.2元至2.3元，折算皮棉价格每担达500元至580元，保本销售价最低都在每吨11300元以上。收购价格的非正常炒作，使棉花收购企业无所适从，棉农待价惜售，严重影响今年的新棉上市进度，干扰了正常收购秩序。为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决定投放10万吨储备棉，以平抑棉价，通过竞卖方式调控市场。

水利部发布1999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公报》公布了1999年全国水资源量、蓄水动态、供用水量、水资源利用、江河湖库水质等状况。全国水资源总量：1999年全国水资源总量28196亿立方米，比常年多2.7%。全国产水总量占降水总量的47%，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为29.7万立方米。全国2873座水库（其中大型406座）1999年末蓄水总量1689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减少112亿立方米。1999年全国总供水量5613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占80.5%，地下水源供水量占19.1%，其他水源供水量（污水处理回用和雨水利用）占0.4%。海水直接利用量为127亿立方米。1999年全国总用水量5591亿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用水占63.7%，林牧渔用水占5.5%，工业用水占20.7%，城镇生活用水占4.8%，农村生活用水占5.3%。与上年比较，全国总用水量增加156亿立方米，农业用水增加103亿立方米，工业用水增加33亿立方米，生活用水增加20亿立方米。1999年全国用水消耗总量3028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54%。全国平均农业耗水率为63%，工业耗水率为25%，城镇生活耗水率为25%，农村生活耗水率为80%。

1999年全国平均用水指标值如下：人均用水量为440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为680立方米，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484立方米，万元工业产值（当年价，含火电）用水量为91立方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日227升，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日89升（含牲畜用水）。与上年比较，除人均用水量和人均生活用水量略有增加外，其他用水指标值都略有减少。西北地区人均用水量为900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为2010立方米，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718立方米，万元工业产值（当年价，含火电）用水量为131立方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日177升，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日80升（含牲畜用水）。

22日　国家计委发布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

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共两大类27项。

一、农业。1. 动植物优良品种繁育 2. 重大病虫害防治 3. 农作物、家畜遗传基因工程及基因库建设 4. 种（苗）脱毒技术开发 5. 蔬菜、花卉无土栽培 6. 果、茶、桑等多

年生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及优质产品开发 7. 农作物种子（种苗）繁育、储藏、加工、检验 8. 优质、高产、高效模式化栽培及养殖 9. 先进农业技术开发及推广 10. 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及综合利用 11. 中低产田综合治理 12. 商品粮、棉、油、糖、肉、毛等农产品基地建设 13. 旱作农业、节水农业及生态农业建设 14. 天然橡胶种植 15. 草业 16. 水产品生态养殖 17. 秸秆氨化养牛 18. 奶业 19. 牛羊胚胎工厂化生产 20. 农业克隆技术开发 21. 土壤肥力培育技术开发。

二、林业及生态环境。1. 天然林等自然资源保护工程 2. 植树种草工程 3. 水土保持技术及工程 4. 优质种苗工程 5. 经济林树种、花卉、中药材良种繁育及储藏 6. 森林灾害防治 7.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特殊困难立地造林技术开发 8. 生态示范工程 9. 速生丰产林工程 10. 竹林基地建设 11. 名特优新经济林建设 12. 防护林工程 13. 退耕还林及恢复森林资源工程 14. 荒漠化防治 15. 附带原料林基地的木浆造纸 16. 人工林、小径木材、竹材和林区剩余物的深度加工及系列产品开发 17. 木材功能性改良 18. 竹质工程材料及植物纤维工程材料生产 19. 林产化学工业产品的深度加工 20. 树木生理活性物质提取技术开发 21. 固沙、保水、改土新材料生产 22. 中幼林抚育工程 23. 天然经济林树种保护及开发 24. 珍稀濒危植物、野生动物保护及森林公园建设 25. 野生动植物基因库建设 26. 生态环境及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27. 采矿植被恢复工程。

25 日　朱镕基考察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并听取了这两个所根据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要求进行的改革与调整的工作汇报。在中科院举行的座谈会上，朱镕基听取了路甬祥关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阶段工作情况和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以及全面推进阶段工作部署的汇报，还听取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知识创新工程的汇报。他强调，科技实力和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实行两年多来，进展顺利，成效明显，意义深远，要继续努力，为全面推进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奠定坚实基础。

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8 年 2 月，江泽民总书记就对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提出“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两年多来，在国务院和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的支持下，中科院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在院所两个层次凝炼和提升了科技创新目标，开始进行了建院 50 年来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学科布局和组织结构调整，开展了深层次、大力度的机制改革，显著提高了科技竞争能力，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技创新成果；在创新队伍建设和推进新老交替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队伍结构渐趋合理；创新文化和科研园区改造等工作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我国电话用户窍破两亿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到 9 月份，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 2 亿户。其中固定电话 1.35 亿户，移动电话 6500 万户，固定电话网、移动电话网的网络规

模和用户总数都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17.7%，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38%，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5.1%。中国电话用户的规模，从1979年的203万户到1992年的千万户，用了13年时间；1998年达到亿户，用了6年时间；而从1亿户到目前的2亿户，仅仅用了2年时间。这是中国通信发展史上一次新的飞跃，将为下个世纪通信业以及整个信息产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8日　科技部等部门发布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涉及电子信息、软件、航空航天、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环境保护、地球空间与海洋、核应用技术以及农业等11个领域的2056种产品。目录首次增加了农业技术领域，将农业中的高新技术产品纳入目录；适应国家对软件产品的特殊要求，目录将软件产品单独作为一个技术领域予以突出。目录中产品的可操作性强，根据技术水平分为高、中、低三档，更有利于制订相关的政策措施。这个目录是经100多位专家历时一年编制完成的。

30日　成昆铁路电气化改造成功

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成昆铁路电气化改造实现全线电气化开通，这意味着长期超负荷运行的成昆铁路的运输能力将提高一倍。成昆铁路于1960年4月开工修建，1970年7月1日通车，全长1100公里，代表了当时中国铁路建设的最高水平，作为本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成昆线的象牙雕刻至今珍藏于联合国总部。成昆线通车以来，客、货运量增长较快，年均递增4.4%，货物到发量年均递增7.5%，很多区段的实际运量已经超过了设计能力，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成昆线运能不足已成为制约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成昆线电气化改造总投资达40亿元，历时8年，其中新建车站6个、桥梁7座、隧道2座、牵引变电所26个、接触网工区33个，改建车站116个、桥梁13座、隧道269座，征地2306亩，建成后为国家I级电气化铁路干线，基本能满足沿线运输的需求。成昆铁路纵贯川、滇两省，途经50个市县，北接宝成、成渝电气化铁路，南联贵昆、南昆电气化铁路以及与越南接轨的昆（明）河（口）铁路，沿线蕴藏着大量的铁、煤、有色金属矿藏及丰富的木材、水力和旅游资源，分布着攀枝花钢铁公司、二滩水电站等我国重要的冶金、能源基地。川滇两省是多民族聚居地，云南省还紧邻越南、老挝、缅甸等南亚诸国。因此，成昆线电气化的开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0　月

11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建议》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实施第

三步战略部署。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远景目标，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2001 至 2005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到 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十五”计划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十五”计划，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建议》提出的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重大的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主要包括：一、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二、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四、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五、进一步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六、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七、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八、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九、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十、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十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十三、积极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十四、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十五、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12 日　2000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开幕

建国以来中国工程科技界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2000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次大会是在世纪之交，中国工程科技界和国际工程科技界的一次盛会，来自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名工程科技界的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回顾百年来工程科学技术的成就，探讨新世纪发展工程科技、造福人类社会的大计。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工程科技架起了科学发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可以预料，21 世纪必将是科学技术特别是工程科学技术进一步高速发展的世纪。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宋健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上，6 位演讲人作了大会主题报告，其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依德利斯博士作了题为《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演讲，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作了《探求自然界的基本构造》的演讲，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沃尔夫教授作了《21 世纪计算与信息技术面临的挑战》的演讲，剑桥大学校长布鲁斯爵士作了《合作研究一解决科研经费的有效途径》的演讲，德国弗朗霍夫研究学会主席瓦耐克博士作了《架起科学与经济之间的桥梁》的演讲，上海市市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作了《工程科技与城市经济》的演讲。大会分 8 个分会，分别对信息、生物芯片、新材料、环境、先进制造及运载技术、能源、土木工程及农业等 8 个领域的工程科技发

展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江泽民在开幕式前会见了出席本次大会的 29 位著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并与 6 位主题演讲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第二届中国国际高交会开幕

第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高交会展览中心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和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思科特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高交会组委会主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主持。吴邦国副总理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届高交会主要由高新技术成果展示与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高新技术论坛三部分组成，共征集各类项目 1.4 万项；展览总面积达 3.6.万平方米。

17 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会议

会议分析了当前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的形势。我国自 1985 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尤其是 1998 年以来，为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应对通货紧缩趋势，国家连续三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出口，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利益驱使，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活动也趋于猖獗，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蔓延，成为继走私、骗汇之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又一突出问题。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决定在全国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罗干，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主持会议并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部署了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工作。会议指出，从现在开始，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要全面铺开，突出重点，务求全胜。在继续抓好广东等地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组织专门力量，对广西、北京、福建、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北、山东等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重点检查，并对其他地区自查情况进行抽查。会议提出，这次全国集中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斗争要力争尽快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以下目标：重点商品、重点渠道、重点地区特别是涉嫌骗税案件多发地区的骗税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骗税严重的局面基本得到扭转；骗税大案要案得到彻底查处，骗税分子依法得到严惩；人民群众对打击骗税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经济秩序明显好转。

18 日　城市建设与环境国际大会通过《成都宣言》

为期 3 天的由联合国人居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球性国际会议——“21 世纪城市建设与环境成都国际大会”闭幕。与会 26 个国家的 340 名代表以“21 世纪城市建设与环境”为主题，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改进城市管理”、“住房和住房资金的获得”等课题，对南非大马弗京的整合城市发展计划、西班牙塞维利亚市圣路易斯区的“城市计划”、中国成都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等 14 个国家的 17 个范例城市的建设模式进行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讨论。大会在此基础上

形成和发表了具有历史和世界意义的《成都宣言》。

闭幕式上，与会代表在刚刚发表的《成都宣言》上一一签名，一致表示要为城市建设与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成都市政府将把这份带有签名的《成都宣言》送博物馆永久收藏，还将做成一堵签名墙，矗立在成都市府南河畔，供世人瞻仰。

28 日　我国最大中外合资石化项目中海壳牌 80 万吨乙烯工程合营合同签字

总投资达 40.5 亿美元的我国最大中外合资石化项目——中海壳牌 80 万吨乙烯工程合营合同在京签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出席签字仪式。根据这项合同，从现在起到 2005 年，在广东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崛起一座世界级规模的现代化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它的主要装置包括：一套年产 80 万吨乙烯裂解装置、一套年产 56 万吨苯乙烯单体与年产 25 万吨环氧丙烷联产装置、一套年产 32 万吨乙二醇装置、一套年产 24 万吨聚丙烯装置、一套能生产线性低密度聚乙烯的年产 20 万吨高密度聚乙烯装置和一套年产 25 万吨低密度聚乙烯装置及配套工程。整个石化企业将引进 12 项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年产 230 万吨高质量石化产品，并将取代中国市场的部分进口产品，产品的年销售额预计达到 17 亿美元左右。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和英荷壳牌化工公司首席执行官亨克斯在合同上签字。新成立的合营公司名为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外各占 50%股份。

30 日　财政部增发 500 亿元长期建设国债

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财政部在今年原定的 4380 亿元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增发 500 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入。500 亿元增发国债于 10 月 31 日以 10 年期浮动利率形式发行。发行对象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向社会销售，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托管注册。发行结束后，可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增发的国债资金基本用于在建的国债项目建设，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以促使这些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

31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88 年 4 月 1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根据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后，重新予以公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修改如下：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合作企业可以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进口本企业需要的物资，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合作企业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删去第二十条。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布外资企业法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修改 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决定修改的主要内容：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删去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五条修改

为:“外资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删去第十八条第三款。此外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布渔业法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修订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决定对《渔业法》进行25个方面的修改。这个决定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后颁布，自2000年12月1日起施行。

国家改革水价

我国水资源短缺与用水严重浪费现象并存。水价过低，是造成水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国务院关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节约用水的精神，国家计委下发了改革水价促进节约用水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了改革水价机制促进节约用水的有关政策措施。通知要求，2000年各地要结合供水体制改革、供水设施改造和整顿水价秩序工作，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提高城市用水和水利工程供工业、自来水厂用水价格，要逐步将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提高到补偿合理成本和微利的水平。农业用水价格要在清理整顿中间环节乱加价乱收费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但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

我国自行研制成功导航定位卫星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0时02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12月21日。时20分，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二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它与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一起，构成了“北斗导航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将拥有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和“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由航天科技集团所属空间技术研究院和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北斗导航系统”是全天候、全天时提供卫星导航信息的区域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建成后，主要为公路交通、铁路运输、海上作业等领域提供导航服务，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的首次发射成功，为“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1　月

7日　我国海岸带管理与国际接轨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实施的“南中国海北部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力建设项目”圆满完成，标志着我国海岸带的管理开始与国际先进手段接轨。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海洋领域援助实施的第一个国别项目，于1997年6月正式启动，由国家海洋局组织实施。项目选择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和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湾三个不同类型的海岸带地区进行。经过三年的建设和实践，项目初步形成了以港口建设和生态保护并重为重点的防城港模式、以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海陵湾模式和

以协调多种资源利用为目的的清澜湾模式。

8日　第四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

由国务院和总参谋部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在北京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闭幕会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等出席闭幕会。

朱镕基在讲话中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形势，为了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为了保卫我国伟大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国防建设。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确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指导我国军事斗争全局的总纲领、总政策。人民防空是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重要方面，因而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防空又总是和城市建设相互交融、密切相关的，因而也是现代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民防空在和平时期还可以直接为救灾、救援和日常经济生活服务，因而又是一项全民的社会公益事业。

朱镕基强调，为了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民防空工作，要立足于国家安全，坚持人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要突出重点，坚持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人民防空事业的改革；要科技领先，全面提高人民防空的能力。按照《人民防空法》的要求，将人防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五"计划，安排好相应的人防工程建设项目。要把人防工程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之中。要加强全民的国防教育，增强人防意识，搞好人防队伍的建设。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总参谋部、各大军区、省军区（警备区、卫戍区）、空军、全国人防重点城市的领导和市以上人防办以及部分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西电东送"工程开工

贵州省洪家渡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同时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首批"西电东送"工程项目开工作了重要批示："'西电东送'工程是西部地区大开发的重点骨干项目，必须全力以赴，按时完成，力争到'十五'计划期末新增向广东送电能力1000万千瓦，这对于开发西部地区电力资源，满足广东经济发展用电需要，提高双方整体经济效益，都有重要作用。'西电东送'工程的开工标志着西部地区大开发拉开序幕，我代表国务院表示祝贺。"

此前，天生桥至广东第三回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工程，云南宝峰至罗平、重庆万州至三峡的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及云南宣威火电厂项目已开工建设。11月7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电力公司在贵阳联合主持召开华南地区"西电东送"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西电东送"各项工程的规划设计，明确了保证"十五"期间从贵州、云南、广西和三峡向广东输电1000万千瓦的各项措施。这些项目包括，新建500千伏交

流、直流输电线路5条，分别为天生桥至广东第三条交流线路，湖南衡阳至广东韶关交流输电线路，三峡至广东直流输电线路，贵州至广东交流输电线路，贵州至广东直流输电线路。

"西电东送"分为北线、中线和南线三大片区。北线内蒙古、陕西等省区向华北电网输电，中线四川等省向华中、华东电网输电，南线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向华南输电。今天开工的3个水电站均在乌江流域，总装机容量149万千瓦，总投资73.53亿元，将从2003年5月开始陆续发电。实施"西电东送"将极大推动我国区域能源的优化配置，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贵州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为1640万千瓦，煤炭保有储量523亿吨，而目前的开发强度分别为12%和8%。该省计划在国家的支持下，用10年的时间把贵州建成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实现大规模"西电东送"。

13日　国家计委规定降价商品使用降价标签

国家计委出台《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规定》明确要求，降价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必须使用降价标价签、价目表，如实标明降价原因以及原价、现价。按照规定要求，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或缴费地点的醒目位置公布服务项目、服务内容、等级或规格、服务价格等；禁止混合标价或捆绑销售服务项目。对于经营者利用标价进行价格欺诈行为，规定明确，由价格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24日　国务院通知要求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指出解决城市缺水问题既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关系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认真做好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通知》提出，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城市缺水尤为突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解决城市缺水问题，要统一规划，优化配置，多渠道保障城市供水。各地区研究制定流域和区域水资源规划，尽快组织制定城市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并将其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纳入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应包括水资源中长期供求、供水水源、节水、污水资源化、水资源保护等专项规划。要坚持把节约用水放在首位，努力建设节水型城市。城市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布局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受能力。缺水城市要限期关停并转一批耗水量大的工业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于40%的城市，在达标之前不得新增工业用水量，并限制其新建供水工程项目。实行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并分解到排污单位。对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要责令其限期停产整顿或关闭。"十五"期间，要使工业企业由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转向全面达标排放。"十五"期间，所有设市城市都必须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到2005年，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污水处理率应达到60%以上；到2010年，所有设市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应不低于60%，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重点风景旅游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投向城市污水处理和回用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步伐。加快城市水价改革步伐，尽快理顺供水价格，逐步

建立激励节约用水的科学、完善的水价机制。全国所有设市城市都要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开征污水处理费。各地在调整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标准时，要优先将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调整到保本微利的水平，满足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需要。

财政部发行2000年记账式（十一期）国债

本期国傅为一年期固定利率国债，发行总额200亿元，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本期国债发行对象为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发行期结束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

29日　国家规范劳动力市场管理

为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发展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并发布《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对劳动者求职与就业、各类职业介绍所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作出规定。《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也可委托其所属的就业服务机构具体办理。原劳动部1995年9月12日颁布的《就业登记规定》和1995年11月9日颁布的《职业介绍规定》同时废止。

30日　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开展棉花打假专项行动

针对棉花收购中存在的严重掺杂使假的情况，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开展棉花打假专项行动。《紧急通知》指出，今年新棉上市以来，全国棉花收购加工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目前棉花收购加工中掺杂使假情况在棉花产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特点为点多分散，作案隐蔽，手段恶劣，而且个体、私营加工点又往往与一些基层供销合作社相互勾结，情节十分严重，且有蔓延趋势。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制止，坚决刹住这股歪风，将使国家纺织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蒙受重大损失，其后果不堪设想。各棉花产区的省级人民政府要立即组织开展一次打击棉花掺假的专项行动，作为当前全国打假联合行动的重点。要重点抓住棉花收购和加工两个环节。对从事棉花收购的个体、私营棉贩一律予以取缔，对违规经营的企业取消其经营资格；对现有的各类棉花加工点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规范其经营行为。近期一律停止审批新的棉花加工点。国务院派出打击棉花掺杂使假专项行动督查小组。督查小组由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国家纺织局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

12　月

3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研究如何更好地完成明年发展计划的各项任务，征求对“十五”计划《纲要》编制的意见。会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提出明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八项主要任务：一、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明年投资的重点是：抓好在建国债项目，加快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高技术产业化，加强科教基础设施建设，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加快重点工程的进度。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各方面增加投资。加快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加强工程质量和资金的管理。三、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四、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成果，积极推进各项改革。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五、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六、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研究和熟悉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根据承诺抓紧改革和调整工作，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七、突出重点、扎实工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八、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

4日　我国饲料工业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根据会议消息，我国饲料总产量达到6871万吨，其中配合饲料产量达到5552万吨，浓缩饲料1096万吨，预混合饲料223万吨，饲料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70年代，我国饲料工业还是一片空白，经过20多年的奋斗，我国饲料工业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包括饲料加工工业、饲料添加剂工业、饲料机械工业，以及饲料科研、产品标准、推广、教育、培训、监督检测等在内的完整饲料工业体系；在产量稳定增长的同时，产品质量也明显提高，产品结构趋于合理。

6日　我国股票总市值达4.6万亿元

截至2000年11月底，我国证券市场上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元，约为GDP的50%，开户投资者已突破5500万户，拥有1063家上市公司。199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仅有十几家，通过股票筹集的资金仅一二十亿元，每年市场交易额仅有数十亿元。

8日—12日　首届中国民营企业交易会在昆明举行

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全国性交易盛会，也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实力和水平的首次集中展示和检阅。本次交易会的主题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民营经济”，它集展示、洽谈、交易、论坛、项目合作与科技成果转让为一体。交易会期间，展示和交易各省、市、自治区民营企业的名优产品；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招商引资，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组织边境贸易考察；围绕“中国民营企业面向21世纪的机遇与挑战”组织高层次的民营经济论坛。交易会由国家经贸委、全国工商联、教育部、科技部、外经贸部、云南省政府主办。

12日　民政部提出在全国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转发这一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城市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帮助解决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社区建设向前发展。民政部的《意见》提出今后五到十年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

是；(1) 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党的组织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起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2) 以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增加服务的发展项目，促进社区服务网络化和产业化，努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3) 加强社区管理，理顺社区关系，完善社区功能，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4) 坚持政府指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不断提高居民的素质和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

18 日　外经贸部决定降低私企自营进出口权标准

外经贸部发出通知，决定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对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资格条件按国有、集体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同等标准执行。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私营生产企业（少数民族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私营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均符合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申报条件。

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提出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意见

经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的若干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意见》提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业是高风险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是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为保证 21 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要，切实改善外商来华投资办矿的环境，要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意见》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进一步开放非油气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市场。鼓励外商在中国境内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允许外商在中国境内以独资或者以与中方合作的方式进行非油气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对勘查作业区内发现的具有开采经济价值的非油气矿产资源，保障其享有法定的优先采矿权。外商投资取得的非油气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可以依法转让。加大对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的支持力度。鼓励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外商到西部地区以独资方式或以与中方合资、合作的方式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的，除享受国家已实行的有关优惠政策外，还可享受免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1 年，减半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2 年的政策。外商到西部地区以独资方式或者以与中方合资、合作的方式开采鼓励类非油气矿产资源的，享受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5 年的政策。

财政部发行记账式（第十二期）国债

财政部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发行系统，以招标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 2000 年记账式（十二期）国债，招标标的为基本利差。本期国债为七年期浮动利率国债，发行总额 252 亿元，各年付息利率按起息日当日 1 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加基本利差确定，利息按年支付。

我国公证实行责任赔售保险制

为了运用职业责任保险的方式转嫁各公证处的执业风险，更好地保障社会利益，中国公证员协会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京就公证职业责任保险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公证员协会作为总投保人，将就全国范围内的公证处统一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公证职业责任保险。对于各公证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从事公证业务时，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或公证文书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或伤害，并在保险期限内由委托人或公证文书利害关系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按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

我国第一条目道主干线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在北京宣布，我国第一条国道主干线京沪高速公路已经全线贯通。京沪高速公路全长1262公里，总投资393亿元，是连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的重要公路，同时也是国道主干线“两纵两横三个重要路段”七条路中的一条。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京沪高速公路分20个路段分期建设，整个工程建设历时13年。其中最早开工的京津塘高速公路1987年12月开工建设，1991年12月竣工。此后，其他各路段先后开工。今年11月、12月，京沪高速公路河北境内青县至吴桥段、山东境内临沂至红花埠段、江苏境内新沂至江都段相继竣工，从而最终实现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京沪高速公路设计时速120公里。

20日　交通部等部门决定认真清理整顿道路客货运输秩序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部、建设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安部《关于清理整顿道路客货运输秩序的意见》。《意见》提出要求进行清理整顿的主要内容和措施有：清理收费项目，减轻经营者负担。除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部、国家计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财政、物价部门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的政府性基金项目外，其他涉及道路客货运输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一律取消。对符合国家规定的涉及道路客货运输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不得擅自扩大征收范围和提高征收标准；对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未落实的，要予以严肃查处。在清理整顿期间，一律不得出台涉及道路客货运输的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打击非法营运，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未按规定领取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营运证件和超越核定范围经营的非法营运行为，必须予以取缔，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地方各级交通部门要切实搞好运力调控，防止车辆运力的盲目增长，制止恶性竞争。整顿期间，对经营业主要进行一次全面审验，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运输经营行为治理的重点是对无证无牌经营和宰客、甩客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力争在清理整顿后，投诉率有较大降低。加快法制建设，建立统一、科学、高效的道路运输管理体系。停止道路客货运输经营权有偿出让，减轻经营业主的负担。整顿道路交通秩序，打击车匪路霸，确保运输安全。

21日　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国务院发出通知，印发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纲要》分析了当前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状况，提出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与目标，明确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内容与要求，制定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与措施。《纲要》提出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是：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中心，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紧紧围绕重点地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区推进，加强法治，严格监管，坚决打击人为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保护和改善自然恢复能力，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努力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为实现祖国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制度。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近期目标是：到 2010 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远期目标是：到 2030 年，全面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使重要生态功能区、物种丰富区和重点资源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各大水系的一级支流源头区和国家重点保护湿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部分重要生态系统得到重建与恢复；全国 50%的县（市、区）实现秀美山川、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30%以上的城市达到生态城市和园林城市标准。到 2050 年，力争全国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实现城乡环境清洁和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

22 日　人民银行宣布未经批准不得筹建黄金交易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宣布，未经国务院授权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组织不得擅自筹建黄金交易市场。各种形式的网上交易，各地正在筹建的黄金交易市场活动必须立即停止。针对近期一些媒体竟相报道有关建立我国黄金交易市场的一些消息，央行新闻发言人明确，黄金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但是，黄金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黄金生产、流通、管理、储备和税收等重大问题，特别是黄金交易市场的建立，直接关系到黄金生产、流通、消费企业的切身利益，需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

27 日　科技部制定“十五”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就“国际科技合作”举行中外记者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在会上表示，科技部已经通过《“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并推出“国家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十五”期间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指导方针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事业发展需要，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科技发展战略部署，以平等互利、成果共享、保护知识产权、尊重国际惯例的原则，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发挥国际科技合作的先导、服务、支撑和纽带作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国际科技合作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将定位在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上。为此，我国将重点加强与世界科技发达大国的政府间合作，注重引进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积极支持企业在技术发展的前沿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

将放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上，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走向世界，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向国际惯例靠拢，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

20日　外经贸部发布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办法

外经贸部发布《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办法》。《办法》明确规定了对台贸易的指导原则，并对对台贸易管理方式、纠纷解决等进行了规范，使开展对台贸易有了公开的指导依据。这是继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后又一促进两岸经贸交流的新举措。截至2000年11月底，两岸贸易总额累计达1882.2亿美元，台湾已成为祖国大陆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市场。大陆（包括香港）已成为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2000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实现了发展和改革的各项预期目标，全面完成了“九五”计划的主要任务。

经济增长加快，综合实力增强。初步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4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0%，增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2.4%，第二产业增长9.6%，第三产业增长7.8%。按现行汇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

市场物价止降转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4%，改变广1998年以来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分项目看，服务项目上涨14.1%，居住上涨4.8%，食品中除水产品、蔬菜价格上涨外，其他继续下降。另外，受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8%，能源、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5.1%。

劳动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年末全国从业人员711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64万人。全年通过多种途径使361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

国际收支形势良好，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亿美元。外贸顺差有所缩小，全年进出口顺差24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51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年末国家外汇储备1656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9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年末1美元兑8.2781元人民币，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12个基本点。

经济效益明显改善，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全年完成税收总额12660亿元，比上年增收2348亿元，增长22.8%。

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262亿元，达到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比上年增长86.2%，特别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更快，实现利润2392亿元，增加1.4倍。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26.7%。全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17.8，比上年提高16.1点，是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社会需求持续增长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压力增

大，部分群众生活仍比较困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及适应市场能力还不高，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任务仍相当艰巨；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经济秩序有待进一步整治。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首次上升到30%以上。主要经济作物中，棉花、油料增产，糖料减产。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80多万公顷。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9570亿元，比上年增长9.9%。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发展，工业新产品生产比上年增长26.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已成为工业经济的第一支柱。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工业都实现了整体扭亏或盈利增加，国家重点监测的14个主要行业，到2000年底已有12个行业实现了整体扭亏或继续增盈。

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家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其他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下，固定资产投资扭转了上年增速回落较多的局面，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619亿元，比上年增长9.3%。投资结构有所调整。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投资中的农林牧渔水利业投资893亿元，比上年增长8.0%；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投资5392亿元，增长7.2%；工业投资增速加快，全年完成投资7699亿元，增长9.3%；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领域安排了6项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工程，总投资达到131亿元。西部地区投资增速加快。‘全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投资分别为14015亿元和5432亿元，比上年增长8.3%和13.8%；西部地区投资3943亿元，增长14.4%，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6.1和0.6个百分点。财政贴息等优惠政策促进了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长加快和结构优化。全年更新改造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上年的15.0%提高到15.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原煤开采1595万吨，天然原油开采1961万吨，天然气开采33亿立方米；大中型发电机组容量1884万千瓦，11万伏及以上变电设备能力6931万千伏安；新建铁路主线正线交付运营里程153公里，增建铁路复线交付运营里程662公里，新建公路32115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562公里，新扩建万吨级港口码头年吞吐量2946万吨；新增局用交换机容量2566万门，新增光缆线路长度30万公里，新增数字蜂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5099万户。

全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完成增加值4919亿元，比上年增长9.4%。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153亿元，比上年增长9.7%，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

全年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进出口顺差241亿美元。全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2347个，比上年增长32.1%；合同投资额624亿美元，增长51.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407亿美元，增长1.0%。全年对外签约1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完成营业额113亿美元，增长1.0%；带动出口9亿美元，增长35%。

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货币流动性有所增强。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3.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3%；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5.3万亿元。增长16%；流通中现金（MO）余额为1.47万亿元，增长8.9%。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

额12.38万亿元，增长13.8%，增幅比上年未略有提高。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年末境内上市公司（A、B股）数量由上年末的949家增加到1088家，市价总值达到4809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82%。全年共发行内债4657亿元，比上年增加642亿元。

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全年保费收入1596亿元（含外资机构），比上年增长14.5%。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598亿元，寿险保费收入851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146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527亿元，其中财产险和短期人身险赔款351亿元，寿险给付176亿元。

环保事业加快发展。当年投产的建设项目同时建设防治污染设施的占98%。全年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38101个，总投资208亿元。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初步控制。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4%。由于粮食减产，多数农产品价格仍在低位运行，农民收入增长持续减缓。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2.1%。其中，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1640元，实际增长4%。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

社会保障事业进一步巩固提高。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10408万人，月平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137万人；有10367万职工和3173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有4332万职工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

2000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一、2000年新增加的项目（12项）

水利项目1项　淮河入海水道工程

铁道项目2项　秦沈铁路客运专线　陇海铁路宝鸡至兰州增建第二线

石油项目1项　四川油气田开发

电力项目1项　江苏田湾核电站

有色项目1项　宁夏青铜峡铝厂（三期）

轻工项目1项　山东日照木浆有限责任公司漂白木浆工程

船舶项目1项　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

城建项目4项　北京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西直门—回龙观—东直门工程（地方项目）　南京地铁南北线一期工程（地方项目）　广州地铁二号线工程（地方项目）　昆明掌鸠河引水供水工程（地方项目）

二、2000年以前确定的在建项目（73项）

水利项目11项　宁夏扬黄扶贫灌溉工程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　治淮工程—淮河干流上中游河道整治及堤防加固—怀洪新河工程—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近期工程　大湖综合治理—拦路港工程—红旗塘工程—黄浦江上游干流防洪工程

—杭嘉湖北排工程　浙江珊溪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　洞庭湖治理二期－堤防加固及洪道整治工程　湖南江地水利枢纽工程　甘肃引大入秦工程（地方项目）　甘肃疏勒河农业灌溉及移民综合开发（地方项目）　新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

林业项目1项　“三北”防护林三期工程

铁道项目11项　包西铁路神木北至延安北　内昆线　水株复线　西安安康线　邯济线　安徽芜湖长江大桥　成昆线电化　哈大线电化　新菏兖石复线一、二期工程　达万线　朔黄铁路

交通项目11项　川藏公路　广西防城港二期工程　秦皇岛港成己码头　烟台港西港池三期黄骅港一期工程　天津港（地方项目）　黑龙江哈同公路（地方项目）　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地方项目）　湖南湘江航运二期工程（地方项目）　京沈高速公路山海关－沈阳段（地方项目）　京珠国道主干线湖南湘潭至耒阳高速公路（地方项目）

煤炭项目1项　神府东胜矿区

石油项目6项　黑龙江大庆油田开发　辽宁辽河油田开发　山东胜利油田开发　新疆油田开发　新疆塔里木油田开发　陕甘宁长庆油田开发

电力项目18项　福建棉花滩水电站　辽长吉哈50万伏输变电工程　华东江苏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浙江秦山核电站三期　全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　云南大朝山水电站　天生桥水电站一级、二级及天生桥至广州50万伏直流输电工程　二滩水电站50万伏输变电工程　河北邯峰电厂　山西阳城电厂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　辽宁绥中电厂　浙江北仑港电厂二期　陕西宝鸡第二电厂　浙江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　广东岭澳核电站

钢铁项目2项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三期　邯钢薄板坯连铸连轧工程

有色项目1项　江西铜业公司贵溪冶炼厂

石化项目4项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大化肥项目　天津石化公司聚酯工程　浙江镇海石化股份公司炼油扩建工程　洛阳石化总厂化纤工程

医药项目1项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青霉素钾盐工程

机械项目1项　大型水电设备制造项目

教育项目1项　高等教育“211工程”

粮食项目1项　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

城建项目3项　上海轨道交通明珠线一期工程（地方项目）　深圳地铁一期工程（地方项目）　河南义马煤气化工程（地方项目）

2001 年

1　月

1 日　我国自主降低关税总水平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再次自主降低关税总水平。关税总水平从 16.4%降至 15.3%，平均降幅为 6.6%。此次降低关税共涉及 3462 个税目，占我国税则税目总数的 49%。降税后，各大类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为矿产品 3%、金属材料 7.4%、化工品 10.6%、林产品 12.3%、机电仪器产品 14.3%、轻工杂项产品 14.8%、建筑产品 17.8%、农产品 19%、纺织品 21.1%、交通工具 24%。

我国降低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 2001 年起，我国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分 3 年从 8%降低到 5%，每年下调 1 个百分点。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为 7%；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为 6%；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为 5%。

停征两商品消费税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征收香皂和子午线轮胎两种商品的消费税（含翻新轮胎）。香皂原来属于“护肤护发品”税目，消费税率为 17%，而子午线轮胎属于“汽车轮胎”税目，消费税率为 10%。

6 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作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指示。江泽民指出，进入新世纪，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的工作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一刻都不能放松。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通过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依靠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十项任务：（一）继续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二）坚持抓好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三）逐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四）加快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五）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六）深化农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七）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八）坚持开发式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九）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十）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 2001 年农业和农村

工作的意见》。

9日　朱镕基总理考察重庆

朱镕基在考察期间指出，今年的各项工作大政方针已定，目标和任务也已明确。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特别要把加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努力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成果；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搞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养老金的两个“确保”工作；坚持扩大国内需求，保持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与良性循环；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10日　国家经贸委确定“十五”时期工业节水节油目标

“十五”时期节水总体目标：工业取水量年增长率控制在1.2%，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降到170立方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60%，电力、纺织、石油化工、造纸、钢铁五个高耗水行业通过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实现节水目标180亿立方米。

“十五”时期节油总体目标：节约和替代石油2000万吨，电力、石油化工、钢铁、建材、化工五个重点行业节油和替代燃料油1500万吨，相当于节约外汇支出27亿美元。

15日　外经贸部自主消减非关税措施

外经贸部决定自2001年1月15日起再次自主削减22个税号的机电产品进口非关税措施。这是自1992年以来我国第8次自主削减非关税措施。此次削减的22个税号的进口非关税措施中，包括配额许可证管理的雪地行走专用车及高尔夫球车等4个品种5个税号；特定管理的斗式提升机等16种产品17个税号。目前我国对机电产品进口实行配额许可证、特定和自动登记管理，其中配额和特定管理属于非关税措施。

16日　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召开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会上强调，金融系统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到严格金融监管、加强内控机制上来，大力整顿金融秩序，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努力建立现代金融管理制度。

今年金融工作的重点是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这是解决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保证金融平稳运行的关键。金融系统要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支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各项金融措施，努力改进金融服务。要继续搞好国债资金项目配套贷款，保证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企业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对一般固定资产贷款要十分谨慎，注意防止加工工业项目新的重复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继续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国有企业发展。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

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会上指出，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全面落实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各项措施，保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必要的支持力度。要密切关注经济运行特别是物价的走势，适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手段，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注意防止通货膨胀。

会议将今年货币信贷预期调控目标预定为：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增长13%—14%，狭义货币供应量 M_1 增长15%—16%，现金净投放量控制在1500亿元之内，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000亿元，与上年大体持平。剥离不良资产后，按原口径计算，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下降10个百分点，今后每年要下降2—3个百分点。四家商业银行的三家，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另外一家明年达到。

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

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会上指出，证券期货监管工作要切实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重点工作包括：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核准制度；尽快完善创业板市场筹建工作，做好投资者风险教育，为创业板及时投人运行做好充分准备；切实加强上市公司监管；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标准，推进会计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尽快出台《上市公司收购暂行办法》，规范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行为。

2　月

1日　国土资源部提出耕地控制目标

我国将继续采取严格措施加强耕地保护，确保“十五”期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9.2亿亩。今后5年我国要争取基本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各省、区、市建设占用耕地要做到占补平衡。为实现上述目标，将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强化农地转用审批，依法按规划用地管地；认真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基本农田；依法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坚持建设占用与开发整理项目挂钩，确保补充耕地的责任、资金、方案三落实；积极推进耕地储备制度，逐步做到耕地先补后占。

货币政策委员会提出保持人民币利率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1年第一季度例会认为，当前要保持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政策稳定。会议提出，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在抑制通货紧缩趋势的同时，密切观察、切实防止重复建设，警惕通货膨胀。要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货币信贷措施，加强信贷监督，降低不良贷款率，防范金融风险。会议赞同央行提出的今年货币信贷预期调控目标，广义货币 M_2 增长13%—14%，狭义货币 M_1 增长15%—16%，现金净投放量控制在1500亿元以内，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与上年大体持平。

7日　外汇存款利率下调

经人民银行批准，各商业银行下调境内外汇存款利率。1年期美元存款利率由4.125%降至3.813%；英镑降至4.125%；港币降至3.75%。其他外币相应调整。

8日　财政部发布3项新的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了无形资产、借款费用、租赁等3项具体会计准则并对以前发布的债务重组、现金流量表、投资、非货币性交易和会计政策变更等5项具体会计准则作了修订。此次发布的无形资产准则，主要解决了无形资产何时入账以及以何种价值入账的问题；借款费用准则主要就哪些借款费用应计作以及何时计作资产的成本、哪些借款费用

必须在发生时就计入当期损益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租赁准则解决了目前租赁交易核算中存在的不规范做法的问题。这3项准则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无形资产、借款费用和租赁业务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粮食播种面积减至建国以来最低

农业部负责人指出，2000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比1999年减少9000万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播种面积最少的一年。从多年实践经验看，根据对现阶段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分析，要实现产需总量的大体平衡，近期内全国粮食面积需要稳定在16.5亿亩左右。如果继续调减粮食面积，连续出现年度产需较大缺口，就可能影响粮食安全。农业部确定今后5年内将突出抓好粮食安全工作，将把主产区建成商品粮基地，稳住全国粮食生产的大头。同时，各地的粮食生产要按照口粮、加工用粮、饲料用粮对品质的不同要求，安排作物和品种布局，扩大优质稻谷、专用小麦、专用玉米、优质大豆生产。

国务院批准建设青藏铁路

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建设青藏铁路有关情况的汇报，对青藏铁路建设方案进行了研究。会议认为，修建青藏铁路对加快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福沿线各族人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执行董事会已表决通过提高中国的份额，中国在该组织的发言权已由过去的第13位提升为第8位。中国原本在IMF的份额是46.8720万特别提款权（SDR），大约相当于61亿美元；经过批准提高后的份额为63.6920万特别提款权，约相当于83亿美元。提高份额的最大意义在于提高中国的发言权，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分量。

14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发布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依法授权的金融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应依照本《办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20日　国务院决定撤销经贸委管国家局

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除国家烟草专卖局保留外，其余9个全部撤销。被撤销的9个国家局是：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煤炭工业局、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冶金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国家轻工业局、国家纺织工业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有关行政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

境内居民可投资B股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允许境内居民以合法持有的外汇开立B股账户，交易B股股票。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有A股、B股、H股、N股和S股的区分。主要依据股票的上市地点和所面对的投资者而定。B股的正式名称是人民币特种股票。它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和买卖，在境内（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往境

内居民不允许购买。

21日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

国务院在安徽合肥召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温家宝指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改革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总的要求和方针是：加强领导，完善政策，扩大试点，积累经验，周密部署，配套推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

各地在制定改革方案和实施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减轻、规范、稳定”的指导思想。所谓减轻，就是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是改革的第一位目标，在改革中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基本出发点。所谓规范，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这是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向农民乱收费的制度保障。实行税费改革后，农民照章纳税，政府依法收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有了明确的界定，再也不能巧立名目、搞没有法律依据的乱收费。所谓稳定，就是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让农民休养生息。不仅税赋制度要长期稳定，不能朝令夕改，而且农民负担总水平也要保持长期稳定，不能随意增加。

3　月

1日　国办转发《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

《意见》提出，根据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要实行分类改革。其中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确需国家支持的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要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以推进科技进步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从事社会公益为主的科学研究、技术咨询与服务活动。这类机构经科技部、财政部、中编办、税务总局审核批准，在国家机构编制管理部门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这类机构将采取政府资助和面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等方式发展，有偿服务所取得的收入按国家规定留给单位的部分，全部用于自身发展；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获取投资回报。

5日　“十五”计划纲要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国务院向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根据“十五”期间的形势和任务，《纲要》提出今后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

完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进一步开展；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十五"计划《纲要》体现了以下重要指导方针：(1) 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强调速度与效益相统一，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实现较快的发展。(2) 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今后五年要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特别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关键。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3) 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4) 坚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5) 坚持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公报。初步统计，2000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8940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0%，增速加快 0.9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2.4%，第二产业增长 9.6%，第三产业增长 7.8%。按现行汇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 万亿美元。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0.4%。年末全国从业人员 7115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564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1%。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407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4 亿美元。全年进出口顺差 241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51 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1656 亿美元，比年初增加 109 亿美元。人民币汇率比上年末升值 12 个基本点。全年完成税收总额 12660 亿元，比上年增收 2348 亿元，增长 22.8%。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4262 亿元，达到 90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比上年增长 86.2%，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 1.4 倍。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 26.7%。全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117.8，比上年提高 16.1 点，是 1992 年以来的最高值。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社会需求持续增长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压力增大，部分群众生活仍比较困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及适应市场能力还不高，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任务仍相当艰巨；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经济秩序有待进一步整治。

7 日　农业部发布 2001 年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意见

农业部发布《关于 2001 年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意见》，要点如下：(1) 突出抓好品种和品质结构调整，合理确定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2) 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调整优化区域布局。要打破"小而全"、"大而全"格局，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优化区域布局的重点。(3) 加快发展畜牧水产业，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4) 农区要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养殖和专业小区养殖，加快粮食转化增值。(5) 要保护和合理开发渔业资源，调整优化淡水养殖结构。要控制海洋捕捞强度，进一步完善捕捞许可证制度，保持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6)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级农业部门要认真贯彻落

实农业部等八部委《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意见》，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具体的配套措施，使扶持龙头企业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7) 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体系和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增加对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投入。(8) 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要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调整农业科研的方向和重点，在重视提高产量的同时，更加重视质量和效益。(9) 切实加强指导和服务。粮食供求平衡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和前提。各地要处理好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生产的关系。要加大对耕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储备，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8日　江泽民谈全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四川、云南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进入新世纪，我们具有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全党同志和全国上下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开拓进取，着力研究和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奋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抓住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紧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完成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还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还要继续扩大成果，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加快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加强科学管理，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有进有退的要求，使国有经济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通过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

朱镕基谈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放在经济工作首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指出，实现新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只有农业发展，家民增收，农村稳定，才能强国固本，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围绕增加农民收入，深化各项改革，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关系农业发展全局和农村工作成败。改革涉及面广，十分复杂，要注意研究新情况，及时解决新问题，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

曾培炎谈“十五”计划强调“以人为本”

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十五”计划是我国进入新世纪、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内容、形式、指标都有新特点。首先，注重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我国已进入到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十五”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六大战略”，即在坚持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的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其次，突出“两个创新”，即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第三，“十五”计划纲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强

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这是“十五”计划的一大特点。“十五”计划纲要把人民生活作为着重考虑的方面，提出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年均增长5%；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就业，减少失业；提出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特别关注低收入的贫困人群。到“十五”末期；中国将力争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达8000元人民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近3000元。大气质量，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大学人学率都将有新的提高。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在开放条件下，对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行全局性调整；体制创新则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进行科技创新。

11日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建议，把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列为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明确提出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生态建设，遏制生态恶化，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时期。中央已经明确，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要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首先要从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抓起。必须长期坚持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方针，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要求来进行，以增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继续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资源开发利用行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努力建立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可持续供应体系。加强海洋资源综合管理，强化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执法监察工作。要广泛应用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不断提高国土资源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14日　央行增加再贷款支持农村信用社

为进一步加大在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支持农民增加收入，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农村信用社支农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决定上半年增加200亿元再贷款，支持农村信用社加大支农力度，进二步启动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5日　全国人大通过关于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如下修改：(一) 将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合营企业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二) 将第六条第四款修改为：“合营企业职工的录用、辞退、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应当依法通过订立合同加以规定。”(三) 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合营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合营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四) 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第四款修改为：“合营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五) 删去第九条第一款。(六) 将第九条改为第十条，原第九条第二款改为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合营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

合理的原财，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七）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合营各方没有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的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21日　央行提出防范伯贷风险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行务会议上指出，将及时调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加强贷款管理，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要通过调节基础货币供应预防通货膨胀。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当前，要认真落实已出台的各项货币信贷措施，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积极发展再贴现业务，推动票据市场发展，及时调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要改进支农再贷款管理，确保再贷款资金集中用于农户贷款，支持农户扩大春耕生产和经营。要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贷款管理，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要通过调节基础货币供应预防通货膨胀，防止信贷风险，继续保持金融运行的良好势头。今后一段时间要以降低不良贷款为重点，做好金融监管工作，抓紧做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部分二级分行不良贷款的重点检查工作。

23日　112个省级和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部获批

国务院批准拉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至此，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需国务院批准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81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全部批准实施。

1999年1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各地开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当年6月，第一个省级土地利用规划——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获得批准实施。此轮规划适用至2010年，规划按照供给制约和统筹兼顾原则编制，有利于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各级规划按照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方法进行，强化了土地利用的宏观控制，有利于全国规划目标的落实。县级和乡级规划通过土地利用分区，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为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奠定了基础。

25日　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提出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由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管局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制定的《关于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的意见》，要点包括：（一）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二）整治各种违法、违规经营药品的行为。（三）严格实行药品管理政企分开的体制。（四）促进优势医药企业的发展与联合。（五）扭转药品生产低水平重复的状况。（六）清理整顿药品流通企业。（七）完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扩大集中招标采购药品的品种，逐步将主要药品品种都纳入集中招标采购的范围。（八）推进医药商品交易电子化。

26日　国家税务总局扩大重点税谭监控范围

重点税源监控范围由上年缴纳增值税、消费税2000万元以上、年缴纳营业税500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监控范围，扩大到年缴纳增值税、消费税1000万元以上、年缴纳营业税300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这样，增值税重点监控企业由过去的71户增到2655户，营业税重点监控企业将由808户增至2543户，监控总数为5198户，监控的税收从约占全国税收的20%增至31.09%。

28 日　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座谈会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运用货币信贷政策，综合采取多种手段，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当前要进一步完善《中小型企业金融服务指导意见》，促进商业银行提高对中小型企业的服务水平。进一步发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总行要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小型企业的信贷管理工作，督促分支行巩固和发展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地市分行和县支行要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上级行要合理规定地市分行、县支行的信贷权限，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人民银行将继续在再贷款方面予以支持，支持票据贴现业务的发展，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贴现数额。灵活运用利率手段，认真执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可以上浮 30% 的规定。今后，人民银行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强利率的弹性。按照信贷原则，对中小企业区别贷款对象、贷款投向，实行差别利率，对信贷风险大、但市场前景好的产业、产品，适当提高贷款利率浮动水平，按照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4　月

3 日　国内最大的尿素装置开工

中国海洋石油化肥项目奠基。该项目设计能力为年产 45 万吨合成氨、80 万吨尿素。总投资 29.5 亿元人民币，是我国目前生产规模最大的尿素生产装置。

国家级纳米中心动工建设

国家纳米中心在北京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动工建设。该基地规划总面积 388 万平方米，总投资 36 亿元人民币。

4 日　水运价格全面放开

国家计委、交通部发出通知，从 5 月 1 日开始，全面放开水路客货运输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各水运企业可以根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自行确定客货运输的具体价格。中央直属企业的客货运输价格要报国家计委、交通部备案，其他水运企业的运输价格报相关省、市、自治区价格、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国家决定建立进口预警机制

外经贸部在全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将加大进口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建立进口预警机制，以实施有效的进口宏观监控。涉及的内容包括：改革进口配额管理办法，参照 WTO《进口许可程序协议》和对外谈判承诺修改进口配额管理实施细则，逐步削减进口配额品种，增加进口配额总量，实行进口配额总量、分配和程序的公开制度；加强对重点产品的动态管理，达到对部分热点和敏感产品的调控，减少重点管理的产品范围，从今年 1 月份起提前取消 20 种产品的配额和特定产品管理，修订进口操作程序，规范并简化办事程序；实行机电产品进口审批全国联网，试行进口网上申报和网上审批，逐步实行进口配额电子数据核销，加强审批、发证、外汇、海关等部门

的协调配合，完善“进口管理查询系统”对外提供政策咨询、业务程序和发证数据查询等。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更名升格

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更名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其级别由原来的副部级单位晋级为正部级单位。此次机构升格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责和所面临的任务，考虑到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经过慎重考虑研究作出的决定。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王众孚在会上提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要以打破地区封锁和部汀、行业垄断为重点，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今年将重点依法对电力、铁路、邮政等垄断行业开展反限制竞争的专项执法行动。

8日　国务院批准调整部分税收政策

这次调整的重点是烟酒消费税及部分营业税政策，并对2000年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调整烟酒消费税政策：卷烟将从价定率的计税方法改为从量定额与从价定率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法，同时对税率进行适当调整；酒类主要是对征税办法和税率水平进行调整。营业税调整包括两方面内容：(1) 为公平税负，取消对新设立的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企业来源于经济特区内（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营业收入自注册登记之日起5年内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2) 加强对娱乐行为的税收调节，营业税统一按20%的税率征收。到期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分两种情况：一是执行政策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或企业已经具备承受能力，不需要再继续执行的政策；或需要在统一政策中通盘考虑而不宜个案规定的政策；或明显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产业政策要求的政策，到期后停止执行。二是对操作困难、漏洞较多，需要用其他规范的方式替代以及需要在规定期限内适当调减政策支持力度的，到期期后进行调整。

全国范围取消“粮油关系”

国家粮食局作出决定，从今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或者农转非的居民，将不用再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粮油关系”）。

13日　国务院决定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

这次增加工资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每人每月提高100元。基本工资包括四部分：基础工资、工龄工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这次基础工资和级别工资，每人每月增加50元。第二，从今年开始对全国13个省的634个县范围内的职工实行艰苦或边远地区津贴。分成四个档次，一类地区，每个职工每月补贴43元；二类地区86元；三类地区172元；四类地区300元。第三，从今年起，经考核称职的干部，年终发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工资的奖金。

这次提高工资涉及到4500多万人，800亿元人民币。艰苦和边远地区，中央机关和事业单位由中央财政负担；京、沪、苏、浙、鲁、闽、粤7省市自己负担；其他24个省市区，中央财政实行不同比例的转移支付，最低30%，最高80%，平均64%。

财政部等决定延续若干行业增值税免税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延续若干增值税免税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体现国家产业导向和做好政策的衔接工作,在新的文件下发前,一些文件从2001年1月1日后可继续执行。

这些文件包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农业生产资料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民贸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中"工业县以下(不含县)国有民贸企业和基层供销社销售货物免征增值税的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等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中"对国家定点企业生产和经销单位经销的边销茶免征增值税"的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中"对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电影制片厂销售的电影拷贝收入免征增值税"的规定。

14日 "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创造经济效益4300多亿元

科技部宣布,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多亿元,出口创汇23.5亿美元。"九五"中央财政投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53亿元,引导地方配套和单位自筹176亿多元,1000多个科研院所、700多个大专院校与5400多个企业的70000多科技人员先后承担和参与了科技攻关工作,共取得成果2万多项,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同时建立起4500多个试验示范和科研与应用基地。

16日 我国企业收购境外韩资工厂

我国山东省青岛海信集团投资400万美元成功收购韩国大宇集团设在南非的生产电视机的生产厂。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国外收购国际化公司的资产。

中国最大海外石油承包工程竣工

中国承建的科威特年原油生产能力1200万吨的集油站竣工投产。科威特集油站工程1995年底签约,合同金额3.9亿美元。

19日 国家计委等取消47项收费

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宣布取消47项住房建设收费项目,主要有:城乡绿化保证金、建筑工程综合规划保证金、工程造价审查费、散装水泥保证金、拆迁手续费、绿化管理费等。

23日 证券市场退出机制形成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证监会宣布依法终止连续3年亏损的PT水仙(上市公司)上市,这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上退市机制正式实施。PT水仙成为我国第一家退出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其影响不亚于第一家破产企业沈阳防爆器材厂。PT水仙在1997年首次亏损6600多万元,到2000年已连续4年亏损。负债总额4.7亿多元,净资产负5996万元。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出具了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同年底12月4日,证监会发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退市机制的形成、运用和完善,表明我国证券市场

逐步走向规范。

27 日　我国中小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启动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十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我国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化信用体系建设开始启动。

《意见》提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良好的信用关系是企业正常经营和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社会信用环境的好坏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关系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能否缓解的突出问题。目前，在我国企业总数中 99% 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和信用状况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

《意见》就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提出如下要求：一、指导中小企业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和加强信用管理，健全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质量管理、信守合同、依法足额纳税；二、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制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相关执业规范，创造有利于中介机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重视发挥中介机构在提升中小企业信用中的作用；三、制定中小企业和中介机构信用评价标准，结合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工作，开展对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价；四、实施信用工程，在充分发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工商登记年检系统等现有信用体系作用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部门间联合的信用信息征集与信用评价体系，培育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化信用体系。

我国为阿联酋承建人工岛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阿联酋迪拜酋长国政府正式签署棕榈岛建设项目协议书。该项目成为我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一个总承包工程项目。预计建设总投资达 100 亿美元。

5　月

9 日　江泽民在香港“2001《财富》全球论坛”发表讲话

江泽民指出，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更加积极地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国将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更好地实施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和科技兴贸战略，扩大货物和贸易进出口。中国将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政策，继续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和地域，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贸易等服务领域。中国正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把发展科技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加快城镇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到 2005 年，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12.5 万亿元人民币，为世界各国提供巨大的商机。

14 日　水利部实施“农村饮水解困工程”

水利部、国家计委联合下发《农村饮水项目阶段性监测与评估暂行办法》，对建设农村饮水工程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部分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山丘和边远地区，农村饮水问题还相当严重。按照现行的农村饮水困难标准，全国还有约 5000 万人饮水困难。水利部实施的“农村饮水解困工程”，各有关省（区、市）高度重视，许多省从省级财政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这一工程。我国将在今后 3 至 5 年内基本解决农村居民的饮水困难。

我国启动“高效农业科技园区计划”

科技部决定，我国今年将启动“高效农业科技园区计划”，5 年内在全国陆续建立 50 个大型高效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科技园区的资金将以地方和企业出资为主，国家提供可观的资金支持。园区的建设和管理主要以企业形式运营，也可以上市。上半年科技部将根据技术先进、实用程度、经济效益等标准，择优确定 10 大高效农业科技园区，国家每年拨款 5 亿元资助农业成果转让。

我国 CDMA 网络建设全面展开

中国联通公司宣布，中国联通 CDMA 一期工程系统设备招标工作结束。这标志着我国 CDMA 网络建设将全面展开。CDMA 系统一期工程总投资约 240 亿元，总容量为 1515 万户，系统主设备采购合同总金额为 121 亿元。这项技术拥有频率利用率较高、手机功耗低等优点。

17 日　上海宝钢集团联合重组座谈会

国家经贸委今天在上海召开上海宝钢集团联合重组经验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经贸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促进优势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加快发展壮大，选择一批具备条件的大企业，经过重组改制，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要通过战略性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分布，提高整体质量。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需要保持必要的数量和比重。要通过发展股份制，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进一步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持股等多种形式，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提出，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重大意义，按照“十五”计划《纲要》的要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未来 5 到 10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企业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集中地体现在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的实力和竞争力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演化成为各国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提出加快发展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国成功发行海外债券

我国政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发行总值 15 亿美元的欧元和美元债券。其中，10 亿美元的 10 年期美元债券年息 6.8%，比 10 年期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高 133 个基本点。

这是我国自1998年以来首次发行海外债券。

22日 国产轿车价格放开

国家计委决定放开国产轿车价格，由生产经营企业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主确定价格，以促进国产轿车市场竞争和国产轿车消费。在放开价格的同时，国家计委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轿车购买、落籍和使用环节各种收费的清理工作，并开展对已取消的收费项目执行落实情况的检查。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促进轿车消费。

23日 国务院公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5月23日签署第30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口、出口活动，都必须遵守这个条例。《条例》规定，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农业、科技、环境保护、卫生、外经贸、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负责研究、协调这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国家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实行分级管理评价制度，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标识制度。

29日 央行决定逐年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

人民银行召开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工作座谈会，部署农村信用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支农服务政策措施。央行行长戴相龙指出，要逐年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经过努力，到2005年全行业不良贷款率要控制在20%以下，全国农村信用社亏损面要控制在15%以下。

严禁信用社对地方发放贷款垫发工资、垫支经费；严禁贷款用于炒股票和发放个人股票质押贷款；上级联社不准随意抽调基层社的资金发放贷款、买卖债券。全国农村信用社要开展整顿金融秩序活动。

国有企业取消行政级别

国家经贸委、人事部等联合发文，决定今后国有企业经营者不再套用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长期以来，根据企业级别配备相应级别的经营者，任命人选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常见的情况是有经营才能者因级别不够不能入选，而级别相当者又未必具有经营才能。仿照公务员薪资标准，经营者收入与企业业绩关系不大，故而缺乏创新动力。经营者与官员的角色经常互串，经营者的价值取向往往在于“官场”而非市场。取消国有企业经营者行政级别，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30日 国务院下发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供应总量。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把土地利用引导到对存量建设用地的调整和改造上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各地要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积极稳妥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国有资产的损失。对依

法应无偿收回的闲置土地，要坚决收回。坚持土地集中统一管理，确保城市政府对建设用地的集中统一供应。各地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设立工业园、科技园、开发区等各类园、区，经批准设立的必须纳入所在城市用地统一管理、统一供应。对已经列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的村镇建设和乡镇企业用地也要按城镇化要求，统一规划、开发。为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要对建设用地试行收购储备制度。严格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国土资源部要依据法律规定，抓紧制定具体的划拨用地目录。对原划拨用地，因发生土地转让、出租或改变用途后不再符合划拨用地范围的，应依法实行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大力推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6　月

1日　金税认证系统开通运行

继金税工程的认证子系统、稽核子系统、协查信息管理子系统1月1日在“五省四市”（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开通运行后，22省市区金税工程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开通运行。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系统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凡证不符、密文有误、无法认证的发票一律不得抵扣税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档案采集工作于7月1日前采集完毕；尚未完成认证软件、企业防伪税控开票软件升级的地区，尽快抓紧完成升级工作。

4日　国家发行长期国债

财政部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01年记账式4期国债。该期国债发行总额120亿元人民币，期限15年期，固定利率，年利率4.69%。此后7月30日，财政部又发行2001年记账式7期国债，发行总额240亿元人民币，期限20年，4.26%。长期国债的发行，标志着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利率开始形成，境内企业在测算投资收益率时有了稳定的基准利率。

5日　国家经贸委确定企业兼并破产工作重点

国家经贸委决定，今年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工作重点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7月底前完成已批准兼并破产项目的清理工作，对已破产终结项目作好妥善工作，未核销的要抓紧上报核销。二是重点抓好有色金属、军工、军队保障性企业移交和煤炭等行业破产项目的实施。根据有关精神，今年全国企业兼并破产项目核销规模按500亿元安排，重点是上述行业及西藏等重点地区需关闭破产项目。三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格规范操作。各地要建立严格的项目责任制度，积极探索建立企业破产的后评估制度，对企业破产项目进行跟踪和调查，奖惩分明。对搞假破产、真逃债的地区和单位，要采取制裁措施，对有关责任人也要进行严肃处理。要继续完善全国兼并破产领导小组和各省协调小组工作制度，强化集中办公的会审方式，简化审批程序，增强项目的公开、公平和透明度。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位

信息产业部常务副部长吕新奎在全国电子信息产业技改总结会上指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目前已居世界第三位。据统计，2000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全行业产值超过

一万亿元，实现利税500多亿元，大大超过“九五”规划目标。统计表明，“九五”期间，中国信息产业技术改造总投资达到750亿元，实施重点技术改造项目2000多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中60%以上由技术改造直接创造。

国家环保局发布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这份由国家环保总局主持，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地震局等部门参加编写的公报，对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作出总体评价。公报显示，全国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任务艰巨。

根据公报，我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水源污染日益突出。其中长江、珠江水质保持良好，黄河、松花江水质保持稳定，淮河、海河、辽河污染程度有所减轻。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15亿吨，其中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达221亿吨。海洋环境方面，四大海区污染由重到轻依次为东海、渤海、南海和黄海。其中东海近岸污染加重，渤海近岸污染程度明显减轻，黄海和南海近岸水质基本稳定，水质较好。去年一年我国共记录28起赤潮，比上一年增加13起。大气环境污染方面，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只有36.5%的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有112个超过三级标准。目前全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中度退化以上的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并且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我国耕地利用程度高，目前垦殖率已达13.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0年底，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已达1227个，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9.58%。森林覆盖率已由1993年的13.92%上升为16.55%，拥有的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全国林木蓄积量继续呈现长大于消的趋势。

6日—7日　2001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上海举行。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的中国今年将举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有关专业部长会议等一系列活动。中国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确定的主题是“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并围绕这一主题拟定了三个分主题，分别为：加强能力建设，开拓未来发展机遇，使各成员从全球化和新经济中受益；促进全球和本地区贸易与投资，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为亚太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

中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20平方米

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出席联合国大会人类住区问题特别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他指出，近5年来，中国城乡住宅面积新增64.7亿平方米，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20平方米。自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以来，中国政府为落实《人居议程》的各项承诺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居住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住宅建设水平已经超过了《中国1996年国家报告》的预定目标。中国已建立了协调发展、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6.09%。

上海磁悬浮列车主线工程开工

由中铁16局和上海建工集团承建的我国首条投入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快速列车主线

工程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正式开工。磁悬浮快速列车交通线是不同于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一种崭新的现代化交通运输方式。它依靠电磁力来实现传统铁路中的支撑、导向、牵引和制动功能，运行中的列车与线路无直接摩擦。目前在国外只有德国和日本各有30公里的试验线，还没有商业运营线。上海磁悬浮快速列车交通示范线建设项目，设计时速430公里，总投资89亿元，其主线工程全长29.863公里，将于2003年3月全线建成并投入商业运营。

13日　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立即关闭矿办小井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含国有煤矿以外的各类小煤矿）一律停产整顿。《通知》要求，自通知下发之日起，所有矿办小井立即停止生产，并于2001年6月30日以前予以关闭，关闭任务重的山西、吉林、黑龙江省也必须在2001年9月底前将本省的矿办小井全部关闭。国有煤矿要对各自的矿办小井严格清理，制定切实有效的关闭措施，积极稳妥地做好关闭的各项工作，确保矿区稳定。凡与个人联营或者实行个体承包的，要立即解除合同。凡国有煤矿经营者和政府公职人员在矿办小井参股入股的，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清理；违法违纪的，一律依法予以查处。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开始实施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开始实施。《规划》提出了今后5—10年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即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提高国内矿产资源的可供性；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调整优化资源利用结构和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促进矿产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改善矿山生态环境状况，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等。

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钨、锡、锑、稀土、钼、汞等供过于求的矿产，以及重晶石、萤石、菱镁矿等出口优势矿产，将受到我国政府严格的总产量限制。我国还将调控煤炭开采总量，限制开采高硫煤、高灰煤，控制新建铝土矿矿山，暂时不批准新建硫铁矿矿山，限制开采石棉矿。我国将加强西部和海域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力度，增加原油生产能力；重视天然气开发；积极扶持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优质煤、环保煤和特殊煤种的保护性开采；鼓励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地热资源。

14日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保基金

为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开拓社会保障基金新的筹集渠道，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新股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东存量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财政部加大整治乱收费力度

财政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的通知》，要求各

级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清理整顿涉及农民、企业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管理，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

19 日　全国开展整顿外汇市场秩序工作

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面展开全国外汇市场秩序整顿工作。重点开展对资本项下收付汇业务的检查，从资本金账户、外债还本付息专户等账户入手，对资本项下账户进行检查。对账户资金流量较大或频繁的企业，将核查相应的原始单据。对资本项下实物形态外债进行检查，主要是查清是否存在境内机构签订实物形态外债，以及境外付款进口、境内重复购汇等逃套汇行为。

我国划定基本农田 16.22 亿亩

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在全国耕地保护工作会议上指出：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已调整划定基本农田面积 16.22 亿亩，到年底，保护率将达到 84% 左右，可基本完成《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今后 5 年我国耕地保护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耕地保有量 2005 年不少于 19.2 亿亩；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 16.28 亿亩；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总规模不超过 1050 万亩；大力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补充耕地不少于 1950 万亩。为此，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把耕地保护真正作为国土资源管理第一位的任务，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努力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兼顾生态”的原则，立足于保护粮食生产能力，处理好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大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和制度创新力度，确保耕地保护责任、措施、投入三到位，达到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保护三方面的协调统一，不断增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全国近 2/3 的省份建立了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基本得到控制。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省份逐年增加，从 1998 年的 17 个增加到 2000 年的 29 个。“九五”期间，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途径，全国累计补充耕地 2985 万亩。

20 日　中日韩实施专利通用制度

日本、中国、韩国三国专利局达成协议，共同建立专利通用化制度，使同内容的专利在三国同时得到认可。

我国“十五”科技规划正式发布

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科技部共同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正式发布。

“十五”科技规划提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加速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综合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大幅度提高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技素质。同时，明确了“十五”期间我国科技发展的六大具体目标，一是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使我国农业和工业、服务业主要领域的技术水平达到发达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水平；二是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有所突破；三是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四是全社会科技投入明显增长，全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提高到1.5%以上；五是科技人才不断满足发展需求；六是科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针对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和国家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需求，“十五”科技规划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了战略部署。一是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重点攻克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二是充分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作用，大力开展战略高技术研究和原创性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力争在有相对优势或战略必争的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农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1999—2000年)》。《公报》指出，目前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的总体状况良好，但部分渔业水域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局部水域污染较重。监测结果分析表明，污染面积、污染程度及对渔业的危害有进一步加重趋势。由于陆源污染物的排放，中国海域部分近岸、河口及内湾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索饵场受到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污染，水体呈一定程度的富营养化，赤潮频繁发生。加之其他污染，使一些渔业水域的渔业功能有所削弱，渔业资源和水产养殖受到很大损害。

25日　我国工业结构实行整体性战略调整

国家经贸委公布机械、汽车、冶金、有色、石油、石化、化工、医药、煤炭、建材、轻工、纺织、电力13个行业“十五”规划。《规划》表明，“十五”期间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和战略性的特点。

29日　青藏铁路全线开工

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同时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青藏铁路开工发来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格尔木市出席开工典礼，发表重要讲话并宣布青藏铁路全线开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今天在拉萨会场出席开工典礼。

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814公里已于1979年铺通，1984年投人运营。目前开工修建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北起青海省格尔木市，经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西藏自治区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南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全长1142公里，其中新建线路1110公里。格拉段沿途经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有960公里，翻越唐古拉山的铁路最高点海拔5072米。沿线地质条件复杂，经过多年连续冻土地段550公里。根据设计，青藏铁路施工总工期为6年，单向货流密度500万吨。

7　月

1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

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骄不躁，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

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城乡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今起取消

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从7月1日起，取消市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等专项用于邮电通信事业建设的政府性基金。地方出台的农村电话初装费以及附加在电话上征收的其他政府性基金项目也一律取消。预计一年可减轻社会负担约200亿元。

20世纪80年代，为改变我国邮电通信的落后状况，先后开征了市话初装费、邮电附加费、移动电话入网费等。近年来，我国电信事业发展迅速，为减轻社会负担，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决定取消收费。

2日　龙滩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国家电力公司和广西、贵州等地有关单位共同出资兴建的目前我国仅次于三峡工程的第二大水电站——龙滩水电站在广西天峨县正式开工建设。龙滩水电站位于广西天峨县境内，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它将创造三个目前世界之最：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大坝、最大的地下厂房、提升高度最大的升船机。红水河是我国第二大水电基地之一，龙滩水电站是红水河梯级开发的龙头骨干控制性工程，它的总装机容量为54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87亿千瓦时，工程总投资243亿元。

3日　社保基金入市

证监会同意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作为战略投资者的一种特殊类别，参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的申购和配售。其参与申购与配售的程序与其他战略投资者相同。

4日　国家计委公布国家定价目录

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家计委公布《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目录》放开大多数原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1992年定价目录颁布时管理的141种（类）减少为13种（类）。这

意味着在社会零售商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购销环节中，市场调节价比重已超过90%，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机制。今后中央制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是：重要的中央储备物资，国家专营的产品，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药品，教材，天然气，中央直属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电力，军品，重要交通运输，邮政基本业务，电信基本业务，专业服务等。

入世实质性谈判完成

6月28日至7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6次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会议已就多边谈判中遗留的主要问题达成全面共识。这表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质性谈判已经完成。

5日　商业银行开始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

央行制定《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对中间业务的概念、业务范围、准人制度审批程序、收费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中间业务是指构成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大致可分为结算类、代理类、担保类、承诺类、交易类及其他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代理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

全国外资工作会议

全国外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在新形势下，要把利用外资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效益相结合；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结合；同扩大企业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结合。在当前引进外资规模已经相当大（名列世界第二）和国内资金（包括外汇）相对充裕的新的条件下，应当把外资工作的重点从单纯吸引国外资金为主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引进专门人才方面来。

国务院制定措施减轻乡镇企业负担

国务院减负办制定六项措施，减轻乡镇企业负担：中央和省（区、市）两级政府必须在今年内编制好涉及企业的收费目录，并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县、乡两级主要领导作为乡镇企业减负第一负责人；对企业改制、改组、改造费用过高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治；组织全国乡镇企业减负再检查；规范政府收费行为，严格执行收费许可证、收费员证、行政事业收费票据、收费登记卡和收支两条线制度；建立严格的乡镇企业治乱减负责任制。

我国研制成功650兆瓦核电汽轮发电机

由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为秦山核电站制造生产的国产单机容量最大的650兆瓦核电汽轮发电机通过了项目验收。这部核电汽轮发电机用于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自主建设的浙江省海盐县秦山核电站，它是该核电站二期工程的重要主体设备之一。650兆瓦核电汽轮发电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机制造实现了由常规到核电机组的跨越，为我国继而开发百万千瓦大容量火电机组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该发电机国产件率达到90%，发电效率达到99%。

8日　我国首枚实用化 CPU 芯片诞生

科技部、信息产业部、中国工程院、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宣布：我国首枚实用化32位 CPU 芯片“方舟－1”在京通过专家鉴定。这一微电子与计算机领域的重大突破，改写了我国信息产业无。芯”的历史。

CPU 是一切信息设备的心脏。长期以来，这一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大公司垄断。由李德磊博士等留学归国人员创办的北京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立足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PU 设计和 SOC 技术，历时3年研制成功。“方舟－1”和基于“方舟”的网络计算机开始进入市场，标志着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CPU 的产品化，对于保障我国信息安全、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效益具有重大意义。

11日　央行修订广义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

央行决定从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_2）。修订后的 M_2 的统计口径为：M_1＋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额＋单位其他存款额＋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经修订后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比修订前的货币供应量指标高1.5个百分点。

我国现行的货币供应量统计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M_0，流通中现金；第二层次狭义货币 $M_1=M_0$＋可开支票进行支付的单位活期存款；第三层次广义货币 $M_2=M_1$＋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额＋单位其他存款额＋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

12日　外经贸部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作出规定

外经贸部制定《关于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发行 A 股或 B 股，其外资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需获外经贸部同意，要按规定和程序设立或改制，要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上市后，其非上市外资股比例应不低于总股本的25%。

“神舟二号”科学研究获得重要突破

我国在“神舟二号”无人飞船上进行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实现重要突破，取得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科学成果。在空间天文研究中，获得了多个宇宙 Y 暴完整的光变曲线、能谱和时间结构，发现有超软 X 射线、硬 X 射线到 Y 射线宽能谱覆盖的事例，这是我国在 Y 暴实测研究这一前沿领域的重要突破，证明我国自己研制的探测器系统已达到国际同类设备的先进水平；在空间环境探测中，获得了详细的大气成分质谱图和大气密度实测数据，这一成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对回收的金属合金、金属复合材料等空间材料科学实验样品的分析，表明我国自行研制的空间多工位材料晶体生长炉和相应的空间晶体生长工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微重力材料科学研究方面上了一个台阶；生物培养箱离心机、光照和温度控制在飞行中完全正常，表明我国空间生物效应实验的实验设计、实验方法等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验工艺和流程日趋成熟，为进一步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

江泽民谈信息网络化问题

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法制讲座，内容是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讲座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对信

息网络化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积极加以运用。同时，要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党的建设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也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既要积极推进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又要大力加强管理方面的建设，推动信息网络化迅速而又健康地向前发展。

13 日　中国获奥运会举办权

国际奥委会第 112 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中国北京获得 2008 年夏季奥运的主办权。

当天下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就中国政府支持北京申办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向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他明确指出，我代表中国政府再次确认中国政府坚定支持北京申请举办 2008 年夏季奥运会。我们据此已制定了在北京举办一次出色奥运会的规划。如果此次奥运会发生盈余，我们将用它来建立一个奥林匹克友谊合作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事业；如果发生赤字，将由中国政府承担。

国家提高棉纺织品出口退税率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提高部分棉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将纱、布的出口退税率由 15% 提高到 17%。具体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联）注明的海关出口日期为准。

16 日　政府实行价格听证会制度

国家计委制定《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规定凡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17 日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会议上指出，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放开棉花收购，打破垄断经营；实行社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加强棉花市场管理和质量监督。

海尔集团获 3 亿美元全球授信

中国银行给予海尔集团公司 3 亿美元全球授信额度协议签字。这是中国银行给予我国第一家也是惟一一家企业全球授信。

18 日　最大规模企业债券发行

2001 年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债券公开发行，这是目前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企业债券。该债券期限 10 年，总额 50 亿元人民币，年利率为浮动利率。

20 日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讨论世界经济减速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研究了下半年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措施，重点讨论了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要继续

贯彻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会议预测，全年广义货币 M_2 增长 13%至 14%，狭义货币 M_1 增长 15%至 16%，金融机构贷款增加 13000 至 14000 亿元，货币信贷总量将控制在年初确定的调控目标之内。会议强调，当前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应继续保持稳定。要坚持和完善 1994 年开始实行的单一的、市场供求决定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会议提出，要进一步规范和协调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有关管理办法，增强工商企业、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自我约束能力。要积极采取措施，逐步扩大外汇资金在境内的运用，进一步提高外汇资金的使用效率。

27 日　我国国有资产总量稳步增长

财政部会计决算统计，2000 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共计 9885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2000 年国有资产总量比 1995 年增长 73.1%，"九五"期间年均递增 11.6%；比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增长 13.4 倍，年均递增 12.9%。在全国国有资产总量中，经营性国有资产为 68612.6 亿元，占 69.4%，比上年增长 6.5%；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 30246.6 亿元，占 30.6%，比上年增长 14.1%。

"九五"期间，我国国有资产分布结构明显改善，2000 年底，基础产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 36645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1.1 倍，"九五"期间年均递增 16.2%，占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的 53.4%，比重比 1995 年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国有大型企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 41292.1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1.2 倍，"九五"期间年均递增 16.8%，占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的 60.2%，比重比 1995 年提高了 18 个百分点。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十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以农业主产区为重点，着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着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加强管理，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周密规划，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水平，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共投入各类资金 827 亿元，累计改造中低产田 1.73 亿亩，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1.32 亿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 6033 万亩，增加农田林网防护面积 8964 万亩，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

30 日　央行提出五大措施力阻资金违规入市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发布《2001 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防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银行与证券公司间拆借资金的管理，证券公司拆入资金只能用于头寸调剂，不得用于证券交易；严禁商业银行对企业和个人开办股票质押；鉴于目前企业挪用贷款进入股市的现象比较普遍，要求商业银行加强贷款风险管理，跟踪贷款的具体使用情况，加强贷款检查，严防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加强对个人消费贷款业务的管理，商业银行不得发放无明确用途的个人消费贷款业

务；加强银行对企业资金划转证券账户的审核管理。

8　月

2日　进出口经营资格实行登记制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出通知，将原来实行的进出口经营资格审批制度改为实行登记和核准制。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的企业，只要拥有不低于500万元的注册资金（中西部地区不低于300万元）和其他条件；生产企业（包括个人独资、合伙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300万元（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不低于200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企业不低于100万元）及其他条件，即可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予权的所在省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10日　我国掌握核心路由器关键技术

“中国高速信息示范网”核心路由器项目通过由科技部组织的验收。验收结果表明，我国在新一代宽带信息网核心路由器关键技术及系统攻关方面取得群体性突破，成为少数几个掌握新一代因特网核心路由器关键技术的国家之一。核心路由器是用于新一代因特网的关键设备之一，为网络承载信息提供巨大的动能。

14日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

《纲要》提出推动老龄事业发展的总目标和相关措施。总目标是：加快老龄事业发展步伐，重点解决老龄事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落实“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把老龄事业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体现城乡不同特点的城市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以城市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管理与服务体系；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建立老龄事业的正常投入机制；健全老龄工作体系。

相关措施包括：城镇要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全面实行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依法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和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合理增加基本养老金。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作好准备。

农村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农民养老以家庭赡养为主；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或者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抚养能力的老人继续完善以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为内容的“五保”供养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水平；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对老年人的集体福利制度；根据情况逐步建立独生子女户和两女户的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注意探索和解决城镇化过程中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16日　三北防护林体系第四期工程全面启动

1978年开始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包括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13个

省（区、市）的551个县（旗、区、市），总面积406.9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42.4%。工程到2050年结束，历时73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共需造林3560万公顷。到2000年底完成第三期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2203.72万公顷，占世界同期人工林面积的1/7。这些树木成林后，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将由5.05%提高到10.1%。经过23年的建设，三北工程共营造防风固沙林476.1万公顷，净增治沙面积400万公顷，20%的沙化土地得到初步治理；营造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662.6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81万公顷，40%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治理；营造农田防护林212.9万公顷，68%的农田实现林网化，2130万公顷农田得到了有效保护；营造牧场防护林36.7万公顷，保护、恢复草场3003万公顷。

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工程建设与振兴农村经济、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建设了一批用材林、经济林基地，培植地方财源，增加农民收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工程区森林蓄积量由1977年的7.2亿立方米增加到9.97亿立方米；营造薪炭林106.8万公顷，年产薪柴1200万吨，解决了600多万户农民的烧柴问题。营造经济林369.1万公顷，年产干鲜果品1255万吨，产值达169.8亿元。

20日　朱镕基总理考察贵州省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贵州考察期间指出，要正确把握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包括实行股份制在内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走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和发展路子；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解决倾向性问题。有的地方把国有企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笼统地看作是“国退民进”，有的把国有资产无偿或变相无偿量化到个人，美其名曰改革激励机制。这些提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方针、政策，千万不能刮这个风。

朱镕基指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一是坚持全面整治、突出重点；二是大力整顿和规范生产秩序，坚决关闭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五小”企业；三是强化市场监管执法，工商、质检等行政部门，只能当“裁判员”，不能兼当“运动员”。四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治本。

21日　低污染汽车减征消费税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限值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

国务院确定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基本思路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代表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温家宝指出，针对当前粮食生产和流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放开销区，就是推进主销区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粮食收购、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保护产区，就是保护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和经济利益，特别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省长负责，就是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粮食生产和流通真正负起责任，落实和完善粮食省长负责制。加强调控，就是增强国家对

粮食调控的能力，健全调控机制，提高调控水平。

25日　上海等9省市进行征地制度改革

上海市建设沪青平高速公路，由区政府牵头，将沿线所需2000亩土地所涉及的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组成土地公司，市政投资方再与土地公司联合成立股份合作公司，为项目公司，期限25年。其间项目公司按每年1100元/亩的标准（以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测算确定，三年调整一次）支付土地合作回报。此举一改过去一次性补偿作法，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有了长期保障。

国土资源部在上海青浦区、江苏南京、浙江温州、福建福州、广东佛山等5省（市）的9个城市，进行征地制度改革试点。今后征用农村集体的土地将不再实行一次性补偿，长期以来征地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有望得到解决。

27日　亚太经合组织2001中小企业工商论坛

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亚太经合组织2001中小企业工商论坛讲话中指出，中国政府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不断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这些问题。具体做法将包括：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等措施，扶持和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逐步放宽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的条件，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获取政策、技术、市场、人才、信息等提供方便；按照WTO规则，制定、修改有关的法律法规，在市场准人、国际贸易、财税政策等方面为各类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APEC工商论坛暨中小企业展示会于8月27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该论坛是APEC2001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的配套会议。本届中小企业工商论坛适逢世纪初年，并因其规模大、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更务实的特征而备受关注。论坛的三大议题是中小企业如何创新，如何持续发展（重点关注融资的过程），如何创造发展的环境（包括服务机构，政府对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制定等）。

28日　西气东输工程动工

西气东输工程建设开工。该项工程全长4200公里，预计总投资额1500多亿元人民币。

30日　财政部公告整治会计信息质量

财政部发布第六号公告，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在2000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中查出的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独立审计准则》的16户企业的42名责任人员和13家会计师事务所及21位相关注册会计师进行了严肃处理：12家会计师事务所分别被警告、勒令整改或通报批评，12名注册会计师受到警告处分，7名注册会计师受到暂停执业1个月到2年的处罚。

此后9月6日，财政部因查明银广夏公司（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造假问题，吊销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银广夏上市公司造假问题在媒体披露后，财政部、证监会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件立案调查。查明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

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等问题，同时也已查明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违反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为银广夏公司出具严重失实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问题，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此，财政部对该案所涉及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依法进行处罚：吊销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徐林文的注册会计师资格；吊销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格，并会同证监会吊销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同时，追究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责任。

9 月

1 日 财政部等通知要求从八个方面减轻农民负担

财政部、国家计委、农业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从八个方面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一是进一步清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取消未经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同级财政、计划（物价）部门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会同国务院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涉及农民负担的政府性基金项目，以及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规定，在“九五”期间出台的专门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二是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专项治理工作。包括做好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的专项治理工作，对农民住房建设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专项治理，以及继续治理农村电网改造和农村用电乱收费等。三是“十五”期间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外，暂不审批新的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项目和提高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标准。四是严禁一切向农民的搭车收费。严禁在农民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搭车收取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等任何收费或摊派各种报刊、学习资料；在农民子女办理入学过程中，乡镇政府不得向学生收取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及其他收费项目等。五是加强对农民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管理。向农民提供经营服务项目，不得向农民强行服务、强行收费。六是推行涉及农民的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凡是经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同级财政、计划（物价）部门批准，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实施定价管理的重要经营服务性收费以及垄断价格，均实行公示制度。七是坚持稳定农民负担的政策。已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方，农民税费负担要严格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规定核定。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方，要坚持稳定农村税费负担的政策。八是坚决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对违反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予以处罚，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10 日 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做好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的通知》。这次普查的目的是摸清我国各类基本单位的数量，全面了解各类单位的组织形式、经济成分构成、规模结构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地区、行业分布等情况，建立和完善基本单位名录库。

通过这次基本单位普查，要最大限度地衔接和统一有关部门的单位认定标准和代码，加快相关部门之间的网络互联，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县四级逐步建立和完善部门间相互衔接、互为补充、信息共享且能适时更新的基本单位名录库系统，为国家的行政管理现代化提供基础信息。

12日　全国部分地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天津、江苏、安徽、湖南、广西、海南、上海、深圳、山东9个地区已重新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这些地区的新标准分别为：天津市412元、402元；江苏省430元、360元，250元；安徽省340元、320元、310元、290元、260元、240元；湖南省325元、305元、285元、265元、245元、225元。广西壮族自治区275元、260元、235元、210元。海南省400元、350元、300元；上海市490元。深圳市574元、440元。山东省370元、340元、310元、280元、260元。至此，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由政府正式颁布并实施了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

央行上调再贴理事

人民银行调高再贴现率，从原来的2.16%提高到2.97%，已在各商业银行执行。

19日　世界石油大会亚洲地区会议

世界石油大会亚洲地区会议在上海举行，同时召开世界石油大会工作会议、2001年上海国际石油及石化展览会。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会议发言时指出，我国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地区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我国将对外开放城市天然气管网建设和经营，决定将西气东输沿线城市天然气管网建设列入对外开放的合作范围。我国还将推出新区块和未动用储量进行对外合作风险勘探与合作开发，如批准克拉2号等气田对外合作开发。为拓宽外商投融资渠道，将在西部地区扩大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的试点，开展以T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的试点。对外商投资西部石油天然气工业，可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中外合资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吸收外商投资。突破过去输气管道的建设和经营必须由中方控股或占主导地位的规定，允许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外方控股。对符合条件的西部石油天然气开发活动减免税费。还可享受减免部分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优惠政策。我国将实行有利于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的价格政策。西气东输项目的天然气价格，将采取政府管制与供需双方协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管道运价实行政府定价，井口气价采取基准价加浮动幅度的政府指导价形式，基准价格由政府核定。

世界石油大会于1933年创建于英国伦敦，每三年召开一次，其宗旨是为了人类利益加强世界石油资源的管理，并在世界石油工业中推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及经济、金融和管理的研究。本次会议是世界石油大会的第一次区域性会议，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代表出席会议。

20日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公开发布。《纲要》提出2001—2010年扶贫开发总的奋斗目标是：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

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

10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的扶贫开发情况。中国从1978年提出扶贫开发以来，取得巨大成就：解决了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其中，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从1994年的5858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1710万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间，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修建基本农田9915万亩，解决了7725万多人和8398万多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到2000年底，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95.5%、89%、69%和67.7%。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执行期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农业增加值增长54%，年均增长7.5%；工业增加值增长99.3%，年均增长12.2%；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近1倍，年均增长12.9%；粮食产量增长12.3%，年均增长1.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48元增加到1337元，年均增长12.8%。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较快。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办学条件得到改善。贫困地区95%的行政村能够收听收看到广播电视节目。

内昆铁路全线铺通

国家重点工程内昆铁路北起四川内江，南至云南昆明，全长872公里。其中北段内江至安边、南段梅花山至昆明于60年代建成。此次新建的中段起点为水富站，终点为梅花山站，全长358公里，途经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10个县。同时对宜宾至水富段进行电气化改造，扩建六盘水铁路枢纽。

新建线路一次实现电气化，最大区段年运量为1400万吨，客车8对/日，总投资120亿元，由铁道部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同出资，于1998年6月开始兴建。

吉林乙醇工程开工

目前全国最大的燃料乙醇工程在吉林省吉林市开工建设，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对开发石油替代资源，增强我国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改善环境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该项目是我国"十五"计划重点工程和2001年全国十大重点项目之一，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润总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总投资为28.9亿元，计划建设燃料乙醇工程生产线、DDGS生产线、精制玉米油车间、酶制剂车间等9项设施，将于2003年建成投产，建成后将达到年消耗玉米192万吨，年产燃料乙醇60万吨。同时还可生产下游产品玉米油4.5万吨、空心砖17.53万立方米、筑路材料18.31万吨。

中德合资扬巴一体化工程开工

中国石化和德国巴斯夫合资的"扬巴一体化工程"在南京隆重奠基，总投资约29亿美元，占地220公顷，为我国目前最大的中德合资企业。工程以60万吨/年乙烯装置为龙头，配套建设40万吨/年低密度聚乙烯、30万吨/年乙二醇、16万吨/年丙烯酸、21.5万吨/年丙烯酸酯、25万吨/年丁辛醇等9套下游石油化工装置。工程计划于2005

年全面投人商业生产，可年产170万吨高质量的化工和聚合物产品。

10　月

5日　农业税灾歉减免政策落实到农户

财政部制定并颁发《农业税灾歉减免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办法》对做好农业税灾歉减免工作，认真核实灾害损失，及时拨付补助资金，尽快落实减免政策，使受灾农户切实得到减免照顾等作出具体安排。

14日　第90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9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交易会开幕，并参观了广交会电子及家电、纺织服装等展区，详细察看部分出口商品，了解有关企业当前外贸出口情况。会见了参加广交会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此次广交会，累计到会客商101382人，比今年春交会下降9.4%；大会共成交133.67亿美元，比上届下降15.4%。其中对美国出口成交额比上届下降22%；对海湾八国下降55%。对欧洲地区的成交额明显增加。成效额的下降，直接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变化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

19日　国务院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19号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势的需要，国务院对截至2000年底的现行行政法规共756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国务院决定：(1) 对主要内容与新的法律或者已经修改的法律、党和国家新的方针政策或者已经调整的方针政策不相适应的，以及已被新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代替的71件行政法规，予以废止。(2) 对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的80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3) 对1994年至2000年底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令废止的70件行政法规，统一公布。

21日　我国实行新石油价格接轨办法

国家计委提出的油价接轨新办法主要包括：一是将国内汽、柴油价格从单一与亚洲市场挂钩改为与亚洲、欧洲、北美三地市场挂钩，以使国内油价更充分地反映国际油价变化的总趋势。二是从过去的每月一调，改为当国际油价变动超过一定幅度时才相应调整。三是在不突破根据接轨原则确定的调价总额的前提下，参照国际市场比价关系，相对调整汽、柴油价格，满足市场需要。四是汽、柴油零售价浮动幅度，由目前的上下5%改为上下8%，扩大企业定价自主权。五是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超过一定限度时，国内企业要通过成品油价格消化部分涨价因素，即价格适当少提；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下限指标时，成品油价格适当少降，以减少价格波动的幅度。

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会议并与其他领导人就全球及地区宏观经济形势、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以及APEC的未来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了务实的讨论。与会各成员领导人就

上述问题达成广泛的共识，通过并发表了《领导人宣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怖声明》。江泽民主席在会上发表题为《加强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的重要讲话。

24日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当前通货膨胀压力不大

央行货币政委员会第四季度例会认为，我国当前货币信贷总量基本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平稳，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发挥重要作用。9月末，广义货币 M_2 余额15.2万亿元，增长13.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0.9万亿元，增长13.5%。当前通货膨胀压力不大，第四季度货币政策要继续坚持稳健原则，贯彻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继续支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缓趋势。要继续保持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基本稳定，同时密切注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协调好本外币利率政策。要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车辆购置税下调

国家税务总局对车辆购置税的最低计税价格进行了调整，新的最低计税价格将从2001年11月1日开始执行，这是今年1月1日车购费改税以来的第一次调整。车购税新的最低计税价格主要是为了适应前段时间轿车大幅跳水而导致“车价降而税未变”的情况制定的。

13个省份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

在甘肃天水举行的全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现场会上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雷加富宣布：3年来“天保工程”取得明显成效，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的13个省份到2000年已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全国森林资源恢复和增长速度加快，超限额采伐得到了基本遏制。据统计，从1998年至2001年8月，国家对“天保工程”已累计投入资金200.7亿元，其中中央投入178.2亿元，地方配套22.5亿元。3年来共完成人工造林1793万亩，飞播造林680万亩，封山育林7783万亩，育苗面积21.5万亩，管护森林面积13.9亿亩。工程实现富余职工分流安置50.2万人，其中一次性安置11.2万人。

25日　国务院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岚清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政治和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推进这项改革，务必取得成效。第一，改革的重点是清理和规范经济管理事务中的行政审批项目，当前要集中力量，突出抓好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工作落实。第二，要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关键是看应该减的是否减下来了，应该保留的是否加强了监督，应该作其他处理的，是否进行了妥善处理。第三，要大胆引入市场机制。各级政府要真正在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上创新，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积极探索用市场机制代替不应由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的途径。

26日　全国实施排污总量收费

排污总量收费标准将在目前的基础上提高1到2倍。目前的办法是超标排放收费办

法，排放一吨污水收取排污费5分钱。新办法规定，排污费将作为对环境造成损害的补偿费。新办法于2002年起在全国实施。

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部分法规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进行修改。

29日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在近两年工作基础上，争取到2002年底建成一批公路、电网、广播电视、生态建设项目，努力做好油路到县、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退耕还林到户等工作，使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面貌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1　月

1日　我国将扩大对外开放领域

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时强调，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谋求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将认真履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为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贸易、商业、运输、建筑、旅游以及中介服务等领域。我们将积极开辟利用外资的新方式、新途径，允许外商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在上述领域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并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

4日　12项重点工程完成投资300亿元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子彬在亚太地区工程咨询合作论坛讲话时指出，“十五”计划头一年，我国西部地区投资力度明显加大，重点建设项目增多，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

今年1—8月，西部12个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达2650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东、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今年在国债资金中安排了500多亿元支持西部开发，全年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开发的部分将超过去年。今年新开工12个重点工程，总投资3000亿元，预计到年底可完成投资300亿元左右。

西部地区重点工程建设不仅项目多，而且进展快。一批环保项目和文化、教育、卫生项目正陆续上马，今年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和优势资源增值转化等方面共安排了12个项目，总投资20亿元；在现代中药产业化方面也安排了一批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在教育方面，今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和教育部共同投资3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中小学危房进行改造。今年，中央国债资金安排7亿元，用于西部11个省级血液中心、138个地级中心血站和142个县级中心血库建设。

6日　央行禁发无指定用途个人消费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严禁发放无指定用途个人消费贷款的通知》。《通知》规定，城乡居民申请个人消费贷款，要如实申报用途，商业银行要认真审核，任何商业银行均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的个人消费贷款。

6日—10日　世界生产力大会

第12届世界生产力大会11月6日至10日在中国香港、北京分两个阶段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约500位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层人士云集本次大会，交流、探讨新世纪企业提高生产力和创造财富的新理论、新视野和典范模式。

11月6日，国家税务局局长金人庆在香港举行的第12届世界生产力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加入WTO，必将对21世纪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税收方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有三项：对不符合WTO协议要求的现行税收政策做相应调整，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加入WTO之后，根据国内经济结构和资本结构的调整情况及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形势，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建立一套与国际通行税制相接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充分发挥税收宏观调控作用的税制体系；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11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发表题为“共同促进世界生产力的新发展”的主题演讲。温家宝指出，随着时代的前进，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和方式不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生产力发展的大势，把生产力发展推向新的水平。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日益凸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显著标志：一是科技进步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乘数效应甚至幂函数效应。二是管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愈益突出。管理也是科学，企业管理、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必将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生产力发展。三是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生产力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四是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从今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我们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根本出发点，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7日　国家计委取消五大类投资项目审批

国家计委宣布，取消第一批五大类投资项目审批。第一批取消的五类审批事项是：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不需要中央投资的农林水利项目。三、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的社会事业项目。四、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五、商贸设施项目。

国家计委对使用中央政府投资的项目，使用其他资金的涉及战略性资源开发利用、跨流域、跨省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以及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和有特殊规定的项目，继续保留审批。

自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来，国家计委在投资项目审批方面简化了审批环节，将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合并为一道审批。在国外资金利用方面，将部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自行审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与东盟应明确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并确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标。我们要抓住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有效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携手共创中国与东盟互利合作的新局面。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提出报告，建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政府将履行中方在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上作出的承诺。

9日　我国外债余额指标在安全线以内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表示，按新的国际标准调整了登记外债口径后，中国外债余额虽有所增加，但各项安全性指标仍在安全线以内。

中国原外债口径是1987年按当时的国际标准口径确定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吸取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在外债口径和期限结构上都做了调整，从而使中国原登记外债口径与目前国际标准相比较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使中国登记外债口径与国际新外债统计标准接轨，增加外债统计数据的透明度和可比性，经国务院批准，按新的国际标准口径对中国原外债口径进行调整，并开始按新标准公布今年上半年外债数据。按新的国际标准口径，中国外债口径调整如下：将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对外负债纳入中国外债统计范围，同时扣除境内机构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负债；将三个月以内贸易项下对外融资纳入中国外债统计；将中资银行吸收的离岸存款纳入中国外债统计；在期限结构方面，将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债务纳入短期债务。

10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1日晚，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多哈喜来登饭店马佳利斯大厅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并向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递交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11月20日，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致函世贸组织成员，宣布中国政府已于2001年11月11日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将于12月11日生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11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决定，同意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国首次提供船舶出口买方信贷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挪威索莫盖斯有限公司在京签署总额为6250万美元、为期10年的出口买方信贷协议，用于支持索莫盖斯公司向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购置4艘8900立方米的液化石油船。这是我国对船舶出口提供的第一次出口买方信贷。

12日　央行第九次下调外币存款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即日起下调境内中资商业银行美元、英镑、欧元、港币、加拿大元和瑞士法郎的小额存款利率。其中，1年期美元、英镑、欧元、港币、加拿大元和瑞士法郎利率分别为1.25%、2.8125%、2.0625%、1.4375%、1.625%和0.9375%，比调

整前分别下降0.75、0.4375、0.4375、0.6875、0.75、0.3125个百分点。

15日　国家计委宣布取消外来务工人员七大费用

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宣布，针对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的包括暂住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在内的多种收费将一律取消。

16日　财政部下调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

财政部决定即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2‰的税率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原税率为4‰。

国家经贸委第一批取消30项行政审批项目

国家经贸委宣布，第一批取消30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有11项是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加入WTO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它们是：1.各类石化产品质量检验中心资质的审批；2.室内装饰行业企业资质审查；3.室内装饰设计师资格审查；4.室内装饰项目经理资格审查；5.室内装饰技术工人资格审查；6.轮胎生产企业成立审核；7.轮胎生产企业增资扩股的审核；8.水电工程投资概算调整审批；9.水电工程设计文件审查；10.黄金工业工程建设施工队伍登记管理；11.黄金工业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因9个委管国家局的撤销，决定取消原委管国家局承担的化肥、农药淡季储备资金审核，有关资质审查和项目年检等19项行政审批。

“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出台

《“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五”期间产业结构升级、所有制结构改善、组织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等目标。突出以下战略重点：

明确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方向、重点和原则，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实现产权多元化。重点发展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及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明确以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为着力点，加强生产与科技的结合，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加大地区工业结构调整力度，明确三大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和发展方向。发挥信息技术在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的促进作用。

10日　国办要求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贯彻属地管理原则，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管好用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省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大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投入。每年年底前，由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根据核定的保障对象所需资金提出下一年度的用款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财政预算。中央财政将根据各地财政状况、最低生活保障任务和地方财政努力程度，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要把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不

被挪用和挤占。建立健全法规制度，推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20日　财政部取消七项行政审批事项

财政部决定取消七项涉及企业资产与财务的行政审批事项。所取消的七项行政审批包括：国家电力公司的投资收益预决算审批；葛洲坝水力发电厂的专项支出审批；投资单位境外投资经营情况的年度财务报告审批；对地方股东单位持有上市公司非发起人国有法人股及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以及上市公司国家股权、发起人国有法人股权中，因司法冻结、质押担保等引起的股权变动及或有变动事项的审批；审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取业务招待费和预提公共配套设施费；审批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变更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事项；审批国有企业被盗、贪污等财产损失事项。

21日　财政部发布两项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固定资产会计准则和存货会计准则。这两项新准则对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人账价值的确定、减值损失准备的提取、固定资产的折旧和相关报表的信息披露作了系统规定，并与相关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连同已发布的中期财务报告准则以及年初发布的无形资产、借款费用和租赁等准则，今年财政部共发布了6项新准则。并修订了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投资、现金流量表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等5项准则。

85项国债技改项目被撤销

国家经贸委投资与规划司司长甘智和表示，国家对待国债技改项目十分慎重，并实施了动态管理。目前已先后撤销两批85项，因市场发生变化、技术条件不落实等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有效防止了可能出现的盲目上项目的倾向，确保了国债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目前，国家共安排技改国债专项资金265.4亿元，到去年底安排国债技改贴息项目880个。

国家外汇管理局转变职能推出六大措施

国家外汇管理局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提出六项改革措施：一、放宽中资企业开立外汇结算账户标准，便利企业生产经营。二、取消出口收汇核销单的使用期限，放宽发单数量，简化核销手续，鼓励扩大出口。三、简化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供汇审查，提高银行办理购汇手续的金额，更好地满足个人实际需要。四、实行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减少审批环节。浙江、重庆等6个省市已经批准进行试点。五、授权银行进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审核试点，减少外汇局的事前审核。广东、上海等11个省市已经批准进行试点。六、调整部分资本项下购汇管理措施，取消或放宽部分限制。主要内容是，取消对购汇偿还逾期国内外汇贷款的限制，外汇局根据企业购汇申请分期分批核准；放宽对购汇提前偿还国内外汇贷款、外债转贷款及偿还外债的限制；放宽对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

中国加大欧元存量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指出，近两个月来中国已购买一定数量的欧元作为外汇储备，并将在将来购买更多的欧元。从双边贸易情况来看，1975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量只有24亿美元，而2000年则达到690.4亿美元，25年中增

长了29倍。欧盟是中国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欧元的流通和中国入世将使得双方的经贸往来和投资活动更加便捷和频繁。加大欧元储备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

22日　中国保险业入世开放承诺

中国保监会首次正式对外公布加入WTO后中国保险业的对外承诺：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股比可达到51%，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股比不超过50%，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全资外资子公司以及中国加入后3年内，取消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的地域限制等。

29日　外资金融机构入股南京商业银行

世界银行集团成员之一的国际金融公司宣布，以2700万美元购买南京市商业银行1.81亿普通股，共计15%的股权，这是迄今为止外资在中资银行中最大的持股份额。到目前为止，外资金融机构入股内资银行已经达到3家。

中外合资银行是特指那些外国金融机构与中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银行。合资银行与外资入股内资银行的概念不同，合资银行在注册成立之时就是合资的，政策所允许的经营范围并没有外资入股的内资银行宽泛。

目前中国境内的中外合资银行共有7家，按照成立时间先后，它们分别是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巴黎国际银行、福建亚洲银行、浙江商业银行、华商银行、青岛国际银行和华一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于1985年成立。

30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五届五中、六中全会的精神，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正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沉着应对，趋利避害，抵御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困难，以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坚持实施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结构调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团结奋斗，勤俭建国，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

会议从八个方面具体部署了明年的经济工作：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培育国内消费需求；二、促进农业发展，扩大农村市场需求；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四、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五、标本兼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六、努力促进出口，扩大利用外资，做好入世应对工作；七、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八、转变政府职能，反对奢侈浪费。

央行调整银行美元挂牌汇价定价方式

人民银行规定，各外汇指定银行在制定美元挂牌汇价时，现汇买卖价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交易中间价上下0.16%，现钞买入价不得超过其现汇买卖中间价的1%，现钞卖出价与现汇卖出价相同。这次政策调整后，美元的现钞买入价有所提高，个人到银行卖出美元现钞的价格1美元大约提高0.12元人民币。

12　月

3日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提出明年经济工作八大任务：用好管好长期建设国债，保持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切实安排好国债资金，确保在建国债项目建设收尾，使一批在建项目整体完工。适时开工建设列入规划内的重大项目如南水北调、首都水资源保护，西部国道主干线和省际公路重要路段等。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重点支持能够扩大出口和替代重要商品、设备进口的制造企业的技术进步。

认真解决“三农”问题，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继续做好扶贫工作。

加快“三化两改”步伐，提高工业整体素质。加快高技术产业化，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抓好重大装备国产化，抓紧传统工业的改组改造，努力增强产业的竞争力。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支持和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努力扩大就业容量。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

搞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做到“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退耕还林到户”，使西部开发有一个新的进展。

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深入研究入世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充分利用我们所享有的权利，履行承诺，以入世促改革，以入世促发展。

积极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全面进步，强化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开发。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适应形势的变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搞好对经济运行的监测分析，加强研究，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以完善政府定价和收费的形成机制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积极推进垄断行业价格改革。

5日　国务院批准设立产业损害调查局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贸委撤销反倾销反补贴办公室，正式设立产业损害调查局。其主要职责包括：研究拟定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法律规范，负责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的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建立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指导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宣传、咨询、培训工作等。

6日　国务院批准修改旅行社管理等条例规定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旅行社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草案)》。这四个条例和规定经进一步修改后，将由国务院颁布施行。

会议指出，为了落实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规范对外商投资旅行社的管

理，修改原有《旅行社管理条例》，是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

会议认为，制定《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草案）》，对于适应电信业对外开放的需要，促进电信业的发展，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对中国国际海运业的规范和监管，解决国际海运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承诺，有必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草案）》。

会议强调，为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保险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加强和完善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促进中国保险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管理外资保险公司的行政法规，是迫切需要的。

7日　全国经贸工作会议

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指出，2002年经贸工作主要调控目标已经确定：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9%以上，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明年经贸工作有八项任务：

按照市场需求搞好总量调控，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重点抓好煤炭、石化、冶金、建材、纺织、制糖等行业的总量调控，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市场供需平衡。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积极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推进授权经营和重组上市。大力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

大力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围绕结构调整这个主线，加大国债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重点支持具备条件的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支持承担国家重点任务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提高开发创新和生产能力。

培育和建立现代流通体系，促进生产和消费，扩大内需。制定和颁布连锁经营发展规划；培育和发展一批现代大型连锁企业集团。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应对工作。积极履行世贸谈判有关承诺，抓紧细化应对措施，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加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进出口管理体制；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做好有关经贸法律规章的“立、改、废”工作。

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重点加快信用和担保体系建设，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信用环境和社会环境。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法规体系，继续采取各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

继续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按照中央确定的工作重点，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推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向纵深推进。

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的新方式，创造性地做好经贸工作。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的导向作用、信息的引导作用、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

10日　央行发布准入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自2001年12月11日起，外资金融机构将在以下几

个方面得到准入通行证：

一、外汇业务方面，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服务对象的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服务对象，可以扩大到中国境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

二、允许设在上海、深圳的外资金融机构正式经营人民币业务，设在天津、大连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

三、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即将公布的有关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设立独资或合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办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

四、外国投资者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设立独资或合资金融租赁公司，提供金融租赁服务。

11 日　关税总水平明年降至 12%

我国将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履行入世关税减让义务，当年关税总水平将由现行的 15.3%降至 12%左右；2005 年将下降至 10%以下（9%—10%区间）。

明年我国工业品关税税率降到 12%左右，农产品关税税率降低到 16%左右。70%以上的税目的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低税率（10%）的税目大幅增加，达到总税目的一半。其中，水产品税率在 14%左右，纺织品在 18%左右，化妆品在 8%左右，交通工具在 18%左右，机械产品在 10%左右，电子产品在 11%左右。关税减幅在 100%、80%、70%、60%左右的商品，每一类都在 100%个以上。60%的税目达到承诺的最终约束水平。

明年起我国对 10 种农产品和 3 种化肥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同时，开始履行 ITA 协议，300 多个信息技术产品平均税率降到 5%左右，其中 100 多个实行零税率。

国家经贸委废止 13 项法规

国家经贸委宣布，废止 13 件过时的部门规章：《审批设立全民所有制公司暂行办法》、《棉花质量监督处罚暂行办法》、《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增加国有工业企业自有生产经营资金办法的通知》、《国家经贸委监事委派暂行规定》、《机电设备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机电设备招标机构资格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的 5 件部门规章被宣布失效，包括《关于加强录像机市场管理的规定》、《秦皇岛港中转煤炭分堆质量检验办法（暂行）》、《秦皇岛港中转煤炭分堆质量规定（暂行）》、《外贸运输计划管理办法》、《关于围绕三年两大目标切实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

全面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

人民银行颁布《关于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的指导意见》。对申请小额信用贷款的农户应具备的条件、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用途以及农户信用评定步骤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国务院公布反倾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经国务院第 46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条例》提出三大反倾销措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价格

承诺和反倾销税。

央行废止一批金融规章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新形势的需要，对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期间以中国人民银行行发文形式发布的金融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审核和清理。决定对主要内容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金融规章或者党和国家新的方针政策不相适应的以及被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金融规章代替的3个文件予以废止；对适用期已过或者因管理职能调整实际上已经失效的6个文件宣布失效。

决定废止的金融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包括：银发（1999）28号关于严禁扣划金融机构备付金存款用于其他金融机构存款支付的通知；银发（1999）383号关于规范储值纪念卡发行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银发（1999）400号关于下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统计制度》的通知。

决定宣布失效的金融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包括：银发（1999）6号关于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金融计算机犯罪的通知；银发（1999）36号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银发（1999）354号关于支持中小商业银行因转移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合理资金需求的通知；银发（1999）367号关于外汇指定银行县级和县级以下支行恢复办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1999）303号关于商业银行账外账并账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314号关于对邮政储蓄进行清理整顿的通知。

国务院公布反补贴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已经2001年10月31日国务院第46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予以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旨在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凡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有关部门将依照条例规定进行调查，采取反补贴措施。

条例共分6章58条，包括总则、补贴与损害、反补贴调查、反补贴措施、反补贴和承诺的期限与复审、附则等内容，并附有出口补贴清单。

国务院修订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五项办法和条例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五个办法和条例：《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出版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电影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认为，为了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适度发展出国旅游，保护出国旅游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国家对外汇的管理，有必要对《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作较全面修改，形成《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会议认为，修订《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和《电影管理条例》，对于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抵御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保护和发展我国出版业、音像业和民族电影业十分必要。

会议认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面临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的需要，它将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业对外开

放和经济发展，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

会议决定，以上五个办法、条例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中国电信重组为南北两大公司

国务院批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对现有电信企业进行重组，将中国电信现有资源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南、山东共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信公司归属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其余归属中国电信南方部分。北方部分和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南方部分保留"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名称，继续拥有"中国电信"的商誉和无形资产。

重组后的两大集团公司仍拥有中国电信已有的业务经营范围，允许两大集团公司各自在对方区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双方相互提供平等接入等互惠服务。南北两部分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有中国电信全国干线传输网70%和30%的产权，以及所属辖区内的全部本地电话网。方案由信息产业部负责组织实施。

中国证监会公布我国证券业入世承诺

中国证监会公布我国证券业对WTO承诺的主要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外国证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直接从事B股交易；二是外国证券机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所有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三是允许外国机构设立合营公司，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后3年内，外资比例不超过49%；四是加入后3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3。合营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以及发起设立基金。

证券业开放与证券市场开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参与国内证券业务，属于WTO服务贸易范畴。境外服务提供者进入我市场，为中国居民用中国的本币投资中国证券市场提供的中介服务，不涉及资本的跨境流动（注册资本金除外）；而后者是指允许国外投资者自由买卖我国国内证券，导致资本的跨境流动，属于资本项目范畴，不在WTO协议之列。

财政部公布废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财政部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执行《关于印发〈关于运用关税手段促进轻型客车国产化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和《关于实施〈摄录一体机国产化的关税优惠办法〉的通知》、《关于对商业企业批发肉、禽、蛋、水产品和蔬菜的业务实行"先征后返"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继续对商业企业批发肉、禽、蛋、水产品和蔬菜的业务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九五"期间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设备退增值税暂行办法》、《中央外贸企业所得税财政返还实施办法》。

失效文件；《关于1993年12月31日前批准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12日　胶新铁路开工

铁道部和山东省政府今天在临沂举行了胶新铁路开工动员大会。胶新铁路是国家新世纪的重点工程，是我国"八纵八横"铁路网主骨架之一的东部沿海通道的组成部分。

它北起胶济线胶州站，南至陇海线新沂站，新建正线长度302.5公里。该线为国家I级单线，内燃机车牵引，预留电气化条件。

国务院决定修订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5项管理条例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出版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电影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认为，为了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适度发展出国旅游，保护出国旅游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国家对外汇的管理，有必要对《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作较全面修改，形成《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修订《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和《电影管理条例》，对于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抵御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保护和发展我国出版业、音像业和民族电影业十分必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面临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的需要，它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会议决定，以上五个办法、条例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13日　农业部废止11件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被废止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对外国公司在我国进行农药田间药效实验管理办法》、《兽用生物制品管理办法》等部分内容与WTO规则要求不一致的规章以及失效的规范性文件。《关于毗邻国家进口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淡水鱼类检疫暂行规定》等十五件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农牧业税将减免三成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2001年农牧业税减免工作及核拨农牧业税灾歉减免指标的通知》，要求各地贯彻农业税灾歉减免政策，落实减免方案，把减免政策落实到农户。这次减免的农牧业税款占农业税收入的30%左右，可减轻农民1/3的税收负担。

18日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第一届理事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指出建立和搞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重大意义。他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其中一项重大举措。要努力开辟基金来源，按照规范、稳健、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搞好基金运作，防范和抵御各种风险，不断壮大基金实力，管好用好百姓的“血汗钱”、“保命钱”，为万民造福。

去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直属国务院领导。理事会的主要职能是受国务院委托，管理中央集中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本届理事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审定理事会章程和主要管理制度，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工作即将全面启动。

19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会议讲话中指出，明年财政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鼓励出口；完善和稳定税制，加强征管，积极组织财政收入；继续调整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支出需要；稳步推进财政改革，强化财政管理，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以实现国民经济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和社会全面进步。

34个中央部门实行收支脱离试点

国务院决定2002年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核心是实行收支脱钩和收缴分离。其主要内容是：对中央本级34个有预算外收入来源的行政执法机关和代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实行收支脱钩管理，即预算外收入全部上缴财政，收支在部门预算中按预测和实际需要及有关标准统一安排，由财政部门平衡、审核。选择这34个部门进行试点，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部门一部分是行政执法部门，其收费对社会影响较大，采取收支脱钩办法，有利于促进公正执法，防止腐败；还有一些部门收取的收入是通过代行行政职能实现的。同时，对预算外收入的收缴方式也要进行改革，实行收缴分离管理，从体制上防止截留、挤占、挪用预算外收入。

20日　国务院批准颁布《社保基金投资管理办法》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并于发布之日起施行。《办法》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比例规定为：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其中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得低于10%；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

《办法》规定：在基金建立的初始阶段，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以外的中央预算拨款仅限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国债，条件成熟时可报国务院批准后改按上述规定比例进行投资。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和基金投资运作的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可对基金投资的比例适时进行调整。

全国社保基金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但其投资范围仅为银行存款和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其他投资均需委托投资管理人。

国债发行总额达4200亿元

截至今年底，国债发行总量达到4203.53亿元。其中，凭证式国债3期，记账式国债16期。今年新增加15年期和20年期两个国债品种。利率分别为4.69%、4.26%和3.85%（20年期国债发行2期）。长期国债的发行，有利于长期基准利率的形成。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

《意见》分20大部分70条。（一）规定了政策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单列）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上述地区以下统称：西部地区）。其他地区的民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

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实际工作中比照有关政策措施予以照顾。（二）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三）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五）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六）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七）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八）实行土地使用优惠政策；（九）实行矿产资源优惠政策；（十）运用价格和收费机制进行调节；（十一）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十二）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十三）放宽利用外资有关条件；（十四）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十五）推进地区协作与对口支援；（十六）吸引和用好人才；（十七）发挥科技主导作用；（十八）增加教育投入；（十九）加强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二十）政策措施的解释和落实。

《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包括中央基本建设投资资金、建设国债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在坚持贷款原则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区的项目，争取提高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

24日　国家计委发布《“十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

《规划》提出“十五”期间，利用外资的重点将从引进国外资金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利用外资的领域将从加工工业为主向服务领域大力推进；利用外资的方式在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同时向多方式引资拓展；政府对利用外资的管理将从行政性审批为主向依法规范、引导、监督转变。

我国利用外资的指导方针：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更加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管理和人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在有效利用国内资金的基础上，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领域，积极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和西部大开发，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25日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今年预计全国税收收入将达15000亿元左右，增收再次超过2000亿元，其中国税收入将突破万亿元大关。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超过15.5%，比去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为改革发展稳定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

明年税务工作的重点：一是牢牢把握“完善和稳定税制，强化税收征管”的指导方针；二是强化税收征管，确保圆满完成2002年的税收任务；三是完善和稳定税制，积极落实各项税收政策调整措施；四是深入贯彻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五是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六是加强“免、抵、退”税管理和出口退税工作；七是完善金税工程二期、建设金税工程三期；八是坚持科技加管理，积极推进信息化支持下的税收征管改革；九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转变职能改进作风。

26日　音像市场向外资开放

文化部、外经贸部发布《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允许在我国境内设立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外资比例不超过49%。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文化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将开放外资进入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该办法自2002

年1月10日起实施。

全国外经贸工作会议

全国外经贸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在会议讲话中指出，明年进出口总额不低于今年水平，力争出口有所增长、多增长；努力实现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5%；吸收外资规模有所增长，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外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境外投资设厂加工装配、资源合作开发等"走出去"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进一步做好对外援助工作。

明年首要的任务就是稳定、落实各项促进政策，继续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一方面要保美、欧等传统市场，争取市场份额有所增长，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大力开拓独联体、中东、拉美、非洲等富有潜力、前景广阔的市场；大力推进以质取胜和科技兴贸战略，把抓机电产品出口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保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切实抓好重要资源性商品的出口，同时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力发展农产品出口，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蔬菜、水果、花卉、畜产品、水产品和特色产品等，要抓住有利时机，开拓国际市场。

面对新形势，要抓住机遇，不断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将重点引导外商投资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石化、化工、建材等基础产业，港口、码头、公路等基础设施；鼓励跨国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地区总部；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促进农业、中小企业吸收外资；积极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扩大出口；推动国家对西部大开发中有关外商投资政策的贯彻落实。

31日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谈《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改内容

第340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决定》，并将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就《条例》的修改情况作出说明：

(一) 关于履行入世承诺

1. 外资金融机构在满足审慎性准入条件前提下，可以在中国境内任一个城市申请设立营业性机构。

2. 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提供外汇服务，没有服务对象限制。

3. 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在华开业3年、连续2年盈利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审慎性条件。

4. 放宽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中方合作伙伴的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能够与自己选择的任何中国实体进行合营。

5. 增加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和服务对象范围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具体情况审核确定的新条款。

(二) 关于总结监管经验，体现审慎监管的原则

1. 增加外资金融机构调整业务范围、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10%以上的股东、修改章程等重大事宜需要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的事项。

2. 调整外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其境内总资产的比率，为鼓

励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人民币业务，只对外资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和境内外汇总资产提出要求，同时将该比例由40%放宽到70%。

3. 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风险须与其外汇业务风险分开考核。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调整该比例。

证券市场深帽下挫

截至2001年末，沪市上证指数收于1645.97点；深市成分指数收于3325.66点。两市分别比2000年深幅下挫20.62%和25.13%。全年利用二级市场筹集资金1192亿元，比2000年减少225亿元。证券市场流通市值12454亿元，比2000年减少3052亿元。

2001年经济概况

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宣布，初步预计，200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800多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3%，增速高于年初预期目标7%。

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农业大力推进品种、品质和布局的优化。在煤炭、冶金、建材和电力等重点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发展。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1—11月份西部地区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3%。

经济运行总体质量和效益不断改善。1—11月份完成税收总额136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7%。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069亿元，同比增长7.4%。

工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年粮食产量达到4.5亿多吨，棉花产量、糖料产量增长一成以上。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243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

国内需求增长较快。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市场销售较为稳定。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对外经济继续发展。1—11月份，进出口总额达4628亿美元，同比增长7.4%。进出口顺差204亿美元，比上年减少32亿美元。1—11月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1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6%。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较多，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有所加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7.2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8019亿元。

2001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2001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65项）

一、2001年新增加的项目（共15项）

铁道项目2项：西安至南京铁路西安至合肥段；重庆至怀化铁路

民航项目1项：广州白云机场迁建工程

水利项目1项：四川紫坪铺水利枢纽

电力项目3项：天生桥至广东第三回5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贵州乌江洪家渡水电站；内蒙古托克托电厂

石油项目1项：涩北—西宁—兰州输气管道

钢铁项目1项：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二热轧带钢厂

有色项目1项：广西平果铝业公司氧化铝二期工程

城建项目3项：重庆高架轻轨交通校场口至新山村线路一期工程（地方项目）；武汉轻轨一号线一期工程（地方项目）；长春城市快速轨道环线一期工程（地方项目）

文化项目1项：中国美术学院校园整体改造一期工程

其他项目1项

二、2001年以前确定的在建项目（共50项）

铁道项目8项：秦沈铁路客运专线；陇海铁路宝鸡至兰州增建第二线；哈大线电气化；朔黄铁路；内昆线包西铁路神木北至延安北；水株复线；新菏兖石复线二期

交通项目4项：秦皇岛港戊己码头；烟台港西港池三期；黄骅港一期工程；天津港（地方项目）

石油项目7项：黑龙江大庆油田开发；辽宁辽河油田开发；山东胜利油田开发；新疆油田开发；新疆塔里木盆地开发；陕甘宁长庆油田开发；四川油气田开发

水利项目9项：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黄河方家寨水利枢纽；治淮工程——淮河干流上中游河道整治及堤防加固——怀洪新河工程——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近期工程；大湖综合治理——拦路港工程——红旗塘工程——黄埔江上游干流防洪工程——杭嘉湖北排工程；洞庭湖治理二期——堤防加固及洪道整治工程；湖南江垭水利枢纽；浙江珊溪水利枢纽工程（地方项目）；宁夏扬黄扶贫灌溉工程；淮河入海水道工程

电力项目13项：三峡水利枢纽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云南大朝山水电站；二滩水电站50万伏输变电工程；河北邯峰电厂；山西阳城电厂及50万伏输变电工程；浙江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广东岭澳核电站；福建棉花滩水电站；辽长吉哈50万伏输变电工程；华东江苏50万伏输变电工程；浙江泰山核电站三期工程；江苏田湾核电站；全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

有色项目1项：宁夏青铜峡铝厂（三期）（地方项目）

石化项目1项：浙江镇海石化股份公司炼油扩建工程

轻工项目1项：山东日照有限责任公司漂白木浆工程（地方项目）

船舶项目1项：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

城建硬目5项：深圳地铁一期工程（地方项目）；北京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西直门—回龙观—东直门工程（地方项目）京地铁南北线一期工程（地方项目）；广州地铁二号线工程（地方项目）；昆明掌鸠河引水供水工程（地方项目）

2002 年

1　月

1 日　安徽省政府宣布，从今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辟农产品运销绿色通道。

2 日　国办转发《财政部关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和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重组改制后有关企业所得税收入归属问题的意见》。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按此执行。

4 日　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公布《电信建设管理办法》，自 20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 33 家欠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名单。这些具有缴费能力的企业仍欠缴基本养老保险在 1000 万元以上，其中包括部分上市公司。

5 日　农业部发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自 2002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6～7 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7 日　江泽民会见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5 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会议的外长。江泽民对俄罗斯外长说，在新的一年里两国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的合作。

朱镕基与蒙古国总理会谈。关于经贸关系，朱镕基说，中蒙地理相邻，经济互补性强。目前中国是蒙古国的第一贸易国和投资国，双方的合作仍有很大潜力。中方欢迎两国的大企业之间建立更密切的直接联系。

两国政府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 3 个文件。

全国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住房发展的目标和政策，应当定位于中低收入居民，要完善落实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各项政策，组织好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香港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为 1112 亿美元，在全球排行第四，仅次于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湾。

7～10 日　钱其琛在海南考察旅游工作，对海南省把旅游业作为“兴岛富民”的支柱产业加以培育和发展表示赞赏，强调要大力整顿旅游市场秩序，加强规划监管，加大旅游业开放。

8 日　中国联通 CDMA 网开通运营。吴邦国出席开通仪式并启动 CDMA 网开通标志。

中国远洋物流公司宣告成立。这是中远集团“由全球承运人向全球经营人转变的重

大举措。该公司下设8个区域公司，在全国建立了包含300多个站点的物流服务网络体系，与40多个国家的货运机构签订了，互为代理协议。

9日 中国和南斯拉夫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将积极推动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双方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鼓励和支持两国企业加深了解，推动双边贸易关系、旅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

朱镕基在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开创新世纪环保工作新局面。

财政部就2002年到期国债兑付有关事宜发布公告。

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10日 朱镕基会见南斯拉夫总统，指出中南经贸合作仍有潜力可挖。双方就两国经贸合作中的一些具体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

国家经贸委制定印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十五”发展规划》。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2002年我国将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抓住目前粮食库存较多的时机，2002年计划新增退耕还林面积3400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面积3993万亩。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我国实施减税政策并不迫切。我国将在保证每年税收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结束。农业部门要重点抓好如下产业发展计划：一要实施优质、专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发展行动计划。二要实施畜牧业发展行动计划。三要实施园艺业发展行动计划。四要实施农产品加工业行动计划。五要实施渔业发展行动计划。六要实施农垦发展行动计划。

11日 朱镕基访问孟加拉，两国政府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7个协定和备忘录。

中蒙联合公报发表。公报说，双方认真讨论了经济合作问题，愿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双方签署了中方向蒙方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办理了中方在2001年度无偿援款项下向蒙方提供成品油的换文。

重庆全长4413米、总投资约9亿元的渝澳大桥建成通车。这是重庆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合作结出的硕果。

全长200余公里，带宽达10G（100亿比特/秒），采用长途波分复用技术，由上海到杭州的全国最宽数据通信通道建成。

全国人大在京的九届代表听取了国家计委、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外经贸部等部门的工作汇报。

12日 首次“铁路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格听证会”举行。

12～15 吴邦国在广东省考察工作，强调要积极推进信息化和信用体系建设。

13日 朱镕基圆满结束对孟加拉国的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与孟加拉国总理举行了会谈，签署了中孟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2001～2003年执行计划等7个合作协定和备忘录。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推出银行卡联网通用标识，目的是为各种自动柜员机（ATM）和销售点终端机（POS）受理各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卡提供一种统一的识别标志。

14日 朱镕基访问印度并与印度总理会谈。表示，两国都面临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双方应在发展中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会谈结束后，出席了6次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它们分别是：两国政府旅游合作协定、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于中方向印方提供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汛期水文资料的谅解备忘录、人才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关于实施植物检疫措施的谅解备忘录。

14～15日 温家宝在河北省考察工作，指出当前要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搞好村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二是开展农村冬季水利建设；三是安排好灾区和贫困地区群众生活；四是抓紧春耕备耕工作。

15日 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制定公布《重要工业品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和《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自2002年2月1日起执行。

王忠禹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传达朱镕基对审计署工作的指示。朱镕基强调，审计工作要坚持全面审计突出重点，抓住典型，跟踪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今年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预目标：M_1 和 M_2 分别增长13%左右，现金 M_0 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

吴仪在全国海关关长会议上强调，要努力提高通关效率和执法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始受理和审理证券市场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

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立足防范、深入整治、强化监管。

15～20日 吴仪在浙江省调研时强调，要加快国有外贸企业改革步伐，调动民营企业出口的积极性。

16日 朱镕基在印度工商界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概况，并就促进中印两国经贸合作提出具体建议。

国家电力公司2002年工作会议召开。国电公司利润突破百亿，城乡电网改造效果显著，减轻农民负担350亿元。

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说，2001年我国水利投资创历史最高水平，中央水利投资总规模达401亿元。

16～23日 由中宣部、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总政、北京市委联合举办中国入世系列报告会，国家经贸委等8部门负责人谈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17日 江泽民与约旦国王会谈，高度评价两国在政治经贸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香港一号"和"香港二号"卫星采购合同签署。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为总承包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为分承包商，负责卫星部分系统及部件的研制和发射服务。鑫诺公司为卫星运营服务提供在轨管理服务。

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在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上提出，2002年要通过深入开展“客运服务质量年”活动，使铁路的服务质量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18日 胡锦涛会见约旦国王，就进一步加强中约经贸合作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共识。

国务院同意水利部《关于加强淮河流域2001～2010年防洪建设的若干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货币监管署联合宣布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过去管理层违规行为进行了严厉处罚。

江苏省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上4位专家被授予“农业科技功臣”的称号，并每人奖励20万元。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中国储备粮食总公司管理的中央储备粮提供因灾害保险服务，签了一张国内最大的统括保单，保额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签订设计制造75万吨级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轮合同。

中国农资集团为建农资经营网与河北省农资总公司签署农资连锁配送经营合作协议。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5.85亿美元收购西班牙瑞普索公司拥有的印度尼西亚五大油田的部分权益，从而获得每年4000万桶的份额原油。这是中国公司并购国外资产数额最大的项目之一。

我国自行培育繁殖的克隆牛诞生。

19日 漳州至龙岩，全长432公里的闽西老区首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20日 吴仪致信全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工作会议，要求努力完成2002年出口增长目标。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的重点工程——云南小湾电站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甘肃省政府宣布，2002年将用中央和自筹的38亿元专项资金，建设6大水利工程。

全国推进流通现代化工作现场会召开。今后将大力推广连锁经营这种现代流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力争经过5年努力，初步确定连锁经营在商业和服务业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援建的苏丹聚丙烯工程一次试车投产成功。该工程总投资2370万美元，设计年产聚丙烯1.5万吨。

21日 朱镕基与挪威首相举行会谈，朱镕基说，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去年贸易额超过9亿美元，加入世贸组织后，中挪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间的合作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水利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成果。遥感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水土保持取得成效，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1万平方公里。

22日 国家经贸委等16个部门联合召开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确保春运安

全有序。

23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这是电信业与民航业开展跨行业合作的首次尝试。根据协议，使用中国移动全球通手机的用户可得到免费机票，乘坐南方航空公司飞机的旅客可得到免费话费奖励。

24日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总结去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年的任务。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文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公布。

全国黄金局长会议上披露，黄金市场今年将正式开放。

中国埃及联合商务理事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两国间第一个致力于经济合作的组织，它将利用各种形式促进双边之间的贸易发展。

25日　内地与香港就成立自由贸易区举行磋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发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

欧盟委员会有关机构通过了全面禁止进口中国动物源性食品的决议。对此，中方给予严重关注。

26日　烟台至大连跨海铁路轮渡项目招商引资工作正式启动，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成立。该项目主要由轮渡码头、铁路引线和渡轮组成，既可载运火车和滚装汽车，又可载运旅客，总投资31亿元。

28日　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宣告成立。至此，中行海外分支机构达560家。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在全国首家推出“365天营业，24小时理赔”服务。

29日　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表示，有关方面在制定国有股减持方案时，将注重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02年金银纪念币项目发行计划，全年共10个项目，其中金币19个品种，铂币1个品种，银币21个品种。

新闻出版总署和外经贸部发布施行《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

3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施行《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交易管理办法》。

内地与香港特区大型基础设施协作会议召开。会议按照“优势互补、相互支持、互惠互利”原则，探讨了进一步加强协作的范围和途径。

中国—欧盟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会议闭幕。欧盟去年对华投资40亿美元。

2　月

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会上颁布了200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选和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8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4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7项，二等奖174项。

中国银行业协会召开外资金融机构迎春茶话会。戴相龙在会上说，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适当，将继续保持稳定。

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将适当放宽企业和居民的购汇限制。

3日　大唐集团和西门子公司在北京进行了全球首次TD——SCDMA户外通话公开演示并获成功。标志着我国提出的这一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4日　朱镕基与老挝总理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政府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应对入世我国农业将实施五项重大措施。一、突出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构建农业优势产业带。二、实施农业发展行动计划，把优势产品和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三、增强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四、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五、以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为重点，强化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支撑力。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公布施行《茧丝流通管理办法》。

5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西气东输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国务院批准，气源和市场已经落实，5个试验段正式开工。

5~7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整顿金融秩序、改善金融服务为主题，全面总结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的金融工作，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作出部署。

6日　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决定自即日起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我国首座国产化商业核电站——秦山核电二期工程1号机组首次并网发电成功。满功率发电后，每年可向华东电网输电40亿千瓦时。

7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吴邦国在会上要求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10日　王兆国受中共中央委托，向民主党派等通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国务院同意农业部、国务院纠风办、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办《关于2002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11日　国家计委通报了近期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对市场价格监督检查的情况，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保持对价格欺诈等不正当行为的监督检查高压势头，严厉查处各种借节假日期间、交易高峰之机的价格违法行为。

《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公布，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若干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有关问题批复铁道部、国家经贸委，原则同意组建方案和公司章程，为国有企业，注册资本45亿元人民币。

19日　中国建设银行与香港大新银行签订协议，以1.052亿港元收购大新银行所持

有的香港建新银行30%股份。至此，建行已全资拥有香港建新银行。

20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2年2月21日起，降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年利率在现行基础上平均下调0.25个百分点，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2.25%调至1.98%。各项贷款年利率在现行基础上平均下调0.5个百分点，其中一年期贷款利率由5.85%调至5.31%。金融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利率由2.07%调至1.89%。中国人民银行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分别下调0.54个百分点，其中一年期再贷款利率由3.78%调至3.24%。

《国家经贸委重点项目督查办法》公布，自2002年3月20日起施行。

21日　中共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WTO专题研究班。胡锦涛在开班式上要求高级干部深入研究当前国际形势，积极主动正确地做好入世后应对工作。

上海浦东陆家嘴以“世界第一高楼”为目标的上海金融中心宣布即将复工；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大楼等3个项目正式签约；汤臣海景公寓项目打下第一桩。这是中国惟一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面积28平方公里，外资银行数量相当于我国大陆境内外资总数1/4，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40%。

杭州西湖南线景区整合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计划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

22日　朱镕基会见美国总统，双方就两国的经贸合作及亚洲经济交换了意见。朱镕基扼要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

国务院对海关总署《关于全国二类口岸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作出批复。

25日　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积极做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工作，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从3月1日起，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将集中由少数收案较多，审判力量较强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管辖，不再由各个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分散管辖。

国家计委召开会议，对正在开展的全国涉农价格和收费检查做进一步动员和部署。检查重点：一是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建立情况；二是农村电价和农网改造收费；三是农民建房收费；四是农村中小学教育收费。

26日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举行二十八次全体会议，分别听取农业部关于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水利部关于《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方案的汇报。

国务院决定，从现在起，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贸市场（包括各类工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品、农副产品及中药材等商品交易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国办为此下发了通知。

国家经贸委首次在京举行行业市场供求和投资信息发布会，宣布：玻璃、电解铝今明两年严重供大于求。

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决定，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企业治乱减负“三查”活动，即查基层单位、查薄弱环节、查突出问题。同时，中央和省两级要向社会公布涉企收费项目、标准和收费依据，各地要对涉企收费进行再次清理。

中国和科威特第四届经贸混委会召开。双方就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中科在贸易、承包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方式与途径交换了意见。

27日　全国经贸委外经贸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

朱镕基会见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外汇储备投资与管理、信息交换、人员往来与培训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表。

国务院召开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视电话会议。李岚清在会上强调要加大力度、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务实求效。吴邦国出席了会议。吴仪作工作报告。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电讯盈科有限公司举行签字仪式。双方共出资5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共同组建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上海磁悬浮列车示范线下部结构工程竣工。

3　月

1日　外经贸部决定对来自欧盟的进口邻苯二酚进行反倾销调查。

国务院召开全国春耕抗旱和安排好灾区群众生产生活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在会上要求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春耕抗旱工作，安排好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成立。该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是国务院批准授权的20家投资机构之一，也是我国惟一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组建的企业集团。注册资本63.5亿元，总资产158亿元。

国家工商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专项整治集贸市场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严厉打击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中国海关无纸通关试点在上海海关、青岛海关启动。

欧盟委员会批准了欧盟2002～2006年对华战略关系文件。这个文件为今后5年欧盟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整体框架，为欧盟实施其对华方针政策提供了法律支持。根据这一战略文件，欧盟在今后5年内计划用2.5亿欧元支持欧盟在中国的援助项目。

亚太经合组织2002年第一次高官会议闭幕。在这次会议上签署了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企业家商务旅行卡计划的换文。

4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组建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5日　建设部发布《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5～15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朱镕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曾培炎作的关于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与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项怀诚作的关于200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6日　外经贸部就美国公布进口钢201案最终结果指出，美国政府这一决定不符世贸组织规则，使中方企业蒙受巨大损失，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

经国务院批准，建设部发出《关于降低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的通知》。

7日　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山东省政府联合宣布：经鉴定，第一批“中国制造”的5头克隆牛犊，确系“正宗”克隆牛，这一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实现了我国成年体细胞克隆牛成活群体零的突破。

8日　国务院同意建设部、国家计委、监察部《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南通电熔爆股份公司生产的三轴两联动立式电熔爆数控机床出口美国。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机床第一次走出国门。

10日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召开。江泽民在会上强调，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始终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一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1日　国务院领导对广东省南海市发生的二甲苯泄漏事故高度重视。国务院安委会组织国家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到广东进行了调查，指出了广东省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整治意见。

14日　中国政府根据WTO保障措施的有关规定，向世贸组织提出就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与美国进行磋商。

15日　朱镕基会见出席国际金融高层研讨会知名人士。

吴邦国会见瑞典国家电信集团公司总裁，介绍了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电信体制改革的情况，并希望瑞典国家电信集团公司能够积极拓展与中国电信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成为经合组织科委会观察员。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办发出《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意见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全国蜂产品市场信息交流会闭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养蜂大国，年产蜂蜜120万吨，蜂王浆1000多吨，蜂花粉约3000吨，蜂蜡3000吨、蜂胶约300吨，产值约为20多亿元。

16日　中国银行举办的“中国论坛——经济全球化与银行业未来”国际金融高层研讨会举行。温家宝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

17日　天津海河水源保护工程全线开工。

18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关于从严控制铁合金生产能力切实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首台装有摆动式转向架的铁路货车C64H车下线。由株洲车辆厂与美国一家公司共同开发生产的这种转向架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摆动式转向架，可满足我国货车提速的要求，达到时速140公里。

中国承建的伊朗德黑兰地铁又一段开通。

19日　朱镕基会见了2002年日本关西财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公布了国家信息化水平研究报告。报告说，2000年我国信息化指数（NIQ）为38.46，这是我国测量出的第一个信息化指数。

20日　江泽民与厄瓜多尔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国政府和厄瓜多尔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与厄瓜多尔——中国商会合作协议》等协议。

位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与化隆回族自治县交界处黄河干流上游的公伯峡水电站成功截流。该水电站动态投资62.57亿元，总装机容量1500兆瓦，多年平均发电量51.4亿千瓦时。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宣布，将向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意向提供50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用以支持该中心进行的奥运场馆北区2.91平方公里土地一级开发和其他土地储备项目。

21日　我国西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新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的122个本地电话网全面改造升级的有关工程合同签署。此项工程总额超过3亿元。

中国加入WTO后，批准的第一家获准经营全面外汇业务的外资银行——花旗银行浦西支行在上海正式开业。

22日　江泽民与刚果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国政府和刚果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3个文件。

吴邦国出席中国援建的巴基斯坦巴瓜达尔港口项目开工典礼。该项目一期工程将建设3个两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建成后具有年吞吐量10万个集装箱、杂件货27万吨、散粮45万吨的能力。

24日　江泽民与印尼总统会谈。会谈后，双方举行了中印尼关于成立能源论坛的谅解备忘录、中印尼经济技术合作备忘录、中印尼关于桥梁、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及中国石油天然气国际有限公司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协议的谅解备忘录等5个文件的换文和签字仪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以“作为WTO成员的中国”为主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开幕。朱镕基会见了出席论坛的外方代表，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建设部、国家计委发布《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湖北省秭归老县城爆破拆除，三峡库区二期清库拉开序幕。

25日　“神舟”3号飞船发射成功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围绕地球飞行108圈后于4月1日在预定区域准确降落。

江泽民会见了英荷壳牌集团董事长。江泽民积极评价壳牌集团与中方的合作，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情况，并希望壳牌集团能进一步积极拓展与中国能源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监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召开国债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座谈会。

26日　朱镕基与比利时首相会谈。朱镕基希望进一步扩大中比经贸合作。会谈结

束后，双方签署了中比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等2个文件。

27日　山东电力承建尼日利亚电厂建设合同签订。合同金额1.67亿美元，山东电力将为尼日利亚设计安装8台41.89MW单循环燃气发电机组，总容量为33.5万千瓦，是迄今为止我国国电系统最大的成套机电出口项目。

经国务院同意，国办发出《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7日至4月1日　李岚清在贵州考察。他强调，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实现经济和科技教育跨越式发展。

28日　朱镕基会见中韩经济研讨会代表，对研讨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认为研讨会有助于中韩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和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

目前国内最大的石化合作项目——上海90万吨乙烯工程开工。该工程总投资27.48亿美元。

国家计委发出通知，继续在全国开展农村电价和农网改造收费执行情况的检查。

国家计委公布价格欺诈10种表现形式。

石广生致函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表示中国政府对欧盟启动钢铁产品临时保障措施的深切关注。中方认为，欧盟的措施，将给中国企业造成严重损害。

人民币与日元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签署。

全长1376米上层为双向6车道，下层中间为地铁车道，两侧为公交专用车道和人行道的杭州钱塘江大桥4桥开工。

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洛阳石化总厂化纤工程通过国家竣工验收。该工程总投资59.35亿元，主要生产装置技术水平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

29日　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决定即日起对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产品聚氯乙烯进行反倾销调查。

2001年度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政府换文签署。根据换文2001年度对华日元贷款为1613.66亿日元。

经保监会批准，由广东广晟集团、首钢股份、大连实德、武汉武新等8家国内企业出资组建的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我国加入WTO后，被批准的首批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资本金为10.2亿元人民币。

29日至4月2日　朱镕基在山西考察。他强调当前要加快退耕还林步伐，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9日至4月3日　胡锦涛在广西考察。他强调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4　月

1日　江泽民主持召开6省区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他强调，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抓住机遇、推进发展，打好基础、提高水平，不断开创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辆 V6—3000 型猎豹汽车诞生。这标志着我国最大的高档越野车生产线正式投产。

连接新亚欧大陆桥的兰新铁路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段和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线路补强、扩能改造工程开工。该工程投资为 8 亿元人民币。

中央管理的国有骨干企业总会计师首期培训班开学。

河北长城旅游公路开工。该公路东起秦皇岛市，西至张家口市，贯穿该省 4 市、18 县（市），由国省道干线组成，全长 566.89 公里。

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环保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

2 日　我国首家世界级、国内最大的北京燕山石化 71 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通过中外专家验收。该工程总投资 34.5 亿元。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增值税收管理办法》，自 200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3 日　《中欧能源和环境合作项目协议》、《中欧欧研究中心项目协议》签订。根据第一个协议欧盟承诺向中国提供 2000 万欧元无偿援助。根据第二个协议，欧盟承诺向中国提供 1029.1 万欧元无偿援助。

财政部发出通知，加强收费基金管理，促进扩大和培育内需。(1) 做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深入开展农村收费专项治理，规范涉农收费管理。(2) 取消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落实企业改制收费减免政策，整顿西部公路建设收费。(3) 落实下岗工人的收费减免政策，整顿针对职工工资的各种收费，清理专门面向汽车的收费项目，规范住房建设收费行为，取消各种限制消费的收费政策。(4) 整顿集贸市场管理收费，清理招标投标和建筑市场收费，调整与世贸组织协议不一致的收费，取消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收费。

我国首台 1 米口径管球阀诞生。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掌握该技术。

4 日　朱镕基与卢森堡首相会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大各领域的合作力度。

中国和土耳其政府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举行。

5 日　我国首条磁悬浮列车实验线建成。

8 日　黑（黑龙江黑河）大（大连）公路大连段改建工程开工。

9 日　国家级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

外经贸部、财政部发布《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贴息资金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煤矿安全整治会议宣布，今后不再批准开办小煤矿。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大会举行。

9～13 日　朱镕基在海南考察。他指出，海南要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保护海南的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0日　江泽民出席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举行的宴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国家计委等5部门联合颁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取消用水最低消费，实行水价季节浮动，全国所有城市在2003年底前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

石广生与德国经济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贸易合作中的有关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10～13日　温家宝在安徽考察。他强调，要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11日　朱镕基会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各国前政要，表示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和参与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有关规定，国家经贸委公布了2002年化肥关税配额和原油非国营贸易配额。

11～12日　中国等6方与美国就201钢铁案磋商。中方声明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12日　江泽民参观大众汽车公司。参观结束后，江泽民出席了《德国大众公司和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修订和延长合资协议》的签字仪式。

国家计委、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发出《关于调整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率占用费收费办法和标准的通知》。

国务院批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14日　经国务院同意，国办转发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

15日　经国务院同意，国办发出《关于治理向机动车辆乱收费和整顿道路站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国办发出《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经国务院同意，国办发出《关于严格禁止违规建设13.5万千瓦及以下火电机组的通知》。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客机在韩国坠毁。

15～19日　李岚清在浙江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创建法制诚信公平的经济环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6日　中国和西班牙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天津中—西机床技术培训中心”奠基。西班牙政府为此项目提供976万美元赠款，两国政府共投资近亿元人民币共同管理运营。

全国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矿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举办《中国加入WTO与中日经济合作的新阶段》研讨会。

北京大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中国银行的10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该公司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电力企业，也是第一家在伦敦上市的中国企业。

16~17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第九十九次全体会议，分析研究2002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7日 财政部发布发行2002年记账式（三期）国债公告。

秦山二期工程一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该工程总投资148亿元，电站设计寿命40年。它的投产运营表明我国已经完全具有了自主设计、建造、管理、运营60万千瓦商用核电站的能力。

18日 信息产业部公布了2002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及企业2001年经营状况。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全国各地拍卖机构联合签署了春季资产全国联动拍卖暨项目推介招商合作协议。协议包括总额30多亿元的资产委托。

19日 朱镕基在土耳其工商界人士午餐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情况，并就促进中土经贸合作提出具体建议。

国家质检总局和外经贸部联合发布公告，自即日起停止从荷兰进口动物源性食品。

20日 江泽民与伊朗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后出席了中伊6个文件的签字仪式。这些文件是：油气领域合作框架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邮政、通信与信息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海运协定，2003~2005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建立双边商务理事会合作协议。

朱镕基与埃及总理举行会谈，会谈后出席了中埃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21日 朱镕基在埃及工商界人士午餐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并就扩大双方经贸合作提出具体建议。

23日 江泽民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希望双方经贸部门经常沟通，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发展。

中美商贸联委会第14次会议在京举行。

国土资源部印发《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管理若干意见》。

24日 江泽民与科特迪瓦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后出席了中国政府向科特迪瓦政府提供贷款的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25日 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国华准格尔发电有限公司新建1号机组投入运行。

27日 江泽民同马其顿总统会谈。会谈后，两国有关部门负责人签署了中国和马其顿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全国企业技术创新会议召开。

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宣布：三峡工程二期库底清理工作将全面展开，投资1.29亿元进行卫生、建（构）筑物、林木等清理。

28日 朱镕基与黎巴嫩总理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有关部门负责人签署了中黎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等文件。

农业部宣布，将在长江放流2800万尾鱼苗，以补充鱼类群体数量，加快长江渔业资源的恢复。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决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29日 由中国政府赠款叙利亚政府建设的无线本地环路电话系统实验局工程项目竣工。

30日 财政部宣布，为规范政府分配秩序，进一步扩大内需，取消政府性基金项目277项，自2002年6月1日起执行。

5 月

2日 “2002年东北亚经济论坛”在山东威海开幕。李岚清出席并致辞。会议围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21世纪的东北亚经济”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广泛交流，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合作。

6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组建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7日 中国民航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大连海域失事，机上112人遇难。

陈锦华出席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35届国际大会并作了题为《增加亚太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演讲。

8日 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58次常务扩大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切实防止重大事故发生。

李岚清出席“2002年天津·《商业周刊》论坛”并发表《新世纪的中国将更加繁荣与开放》的演讲。

国家计委、财政部、信息产业部通知，决定自2002年7月1日起调整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率占用费的收费办法和标准。停止向移动电话用户收取每年50元的频率占用费。

8～11日 温家宝考察了南水北调中线，他强调要统筹规划，科学论证，加紧做好前期工作。

9日 亚行年会举行《中国日》主题研讨会，主题为《加入WTO后的中国：机遇与挑战》。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01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并宣布，2001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继续保持双顺差，国际储备平稳增长，国际收支总体状况良好。

国土资源部发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10日 江泽民出席亚行理事会第35届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了《加强亚洲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讲话。

北京市政府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书。

中韩投资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韩国汉城召开。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全国海关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10～20日　田纪云在福建考察工作，他指出，要放手发展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

12日　内昆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朱镕基、吴邦国作重要批示。

水利部主持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淮河、太湖流域防洪建设任务。

中国农行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13日　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我国首个由地方政府开办的社会信用信息网络——汕头信用网正式开通运行。

14日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召开200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温家宝在会上强调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国和东盟10国的经济官员举行第3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就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原则、内容、时间框架等问题进行讨论。该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

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电力公司召开电视会议，对城乡用电同价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15日　我国用"长征4号乙"火箭将气象卫星"风云－号D"和我国第一颗海洋探测卫星"海洋一号"一同送入太空预定轨道。

财政部、国家计委颁布了《关于发布2001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通知》，首次公布了截至去年底的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中国）北方焦炭联合体成立。

首次采用6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的华能沁北电厂一期工程主机设备合同签字。

由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合资建立的我国最大的合资钢铁企业正式运营。该企业总投资1.8亿美元，是国内最大规模和最高水平的热镀锌生产线。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

16日　第4届世界贸促机构大会在京召开。大会主要讨论世界贸易发展的未来趋势和经济全球化中贸促机构所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的经济发展、贸促实践以及中国加入WTO对世界贸易体系的积极影响，也是会议讨论的重点。

江泽民与克罗地亚总统举行会谈。江泽民建议两国积极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企业界的直接联系。

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国辽宁省和克罗地亚海山省建立友好经贸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等3个文件。

李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矿产资源法执法检查组全会上强调，要切实加强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全国增收节支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李岚清在会上强调，要切实加强财政增收节支工

作，确保完成今年财政预算任务。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与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经重组后正式宣布成立。

16～18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住房公积金工作会议。温家宝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促进人民群众住房条件不断改善。

17日　江泽民与塔吉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能源领域合作的协定》和中国政府向塔吉克斯坦政府提供无偿援助的换文。

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从严控制海域建筑用砂勘查开采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发布《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和《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2002年中国旅游零售高峰会召开。这是我国首次举办这一领域的大型国际会议。

国内首家银行卡专营机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中心成立。

18日　主要技术设备达到目前国际先进水平的南京钢铁集团年产100万吨宽中厚板（卷）工程开工。该项目投资33.85亿元。

19～25日　全国卷烟交易会举行。

20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一季度货币政策运行报告指出，当前全社会货币信贷总量与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基本相适应，货币政策达到预期调控目标，金融整体运行平稳。今后要保持利率总水平稳定，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着重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21日　"中非知识产权论坛"在京开幕，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

22日　朱镕基与澳大利亚总理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就商签《中澳经贸关系促进框架》进行商谈。朱镕基介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决定自即日起对美国、日本、韩国进口的甲苯二异氰酸酯进行反倾销调查。

22～23日　吴仪在提高口岸工作效率现场会上强调，要积极推进"大通关"，提高口岸工作效率。

23日　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开幕。朱镕基作了《大力推进新世纪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主题报告。

财政部发行2002年记账式（5期）国债。本期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发行总额26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施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

23～24日　江泽民主持召开6省区市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强调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加快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

25日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200型客机在澎湖坠毁，206名乘客和19名机组人员遇难。

26日　亚太经合组织金融与发展项目年度论坛在京举行。温家宝出席并发表讲话。

国家“十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丹东至拉萨110国道主干线一段，全长122.6公里的内蒙古呼集高速公路开工。

27日　朱镕基与斐济总理举行会谈。会谈后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并出席了《中斐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及中斐渔业、教育、卫生合作等4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签署了总额为5亿元人民币的出口卖方信贷协议，这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外商控股企业签署的第一笔贷款协议。

国家计秀发出《关于印发粮食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

28日　广东岭澳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人商业运营。

第五届北京“科博会”闭幕。签约项目397个成交金额73.5亿美元。

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协理会会议举行。会后签署了中新两国亚洲工商人才培训项目合作。

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阳）大（连）高速公路拓宽改造工程开工，工程全长348公里，投资额近79亿元。

29日　朱镕基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大家关心的经济形势问题。

李岚清出席新加坡中国工商联合会举行的演讲会，发表了题为《共同开创中新友好合作新纪元》的演讲。

APEC第5次电信信息部长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指导亚太地区新世纪电信信息产业合作与发展的《上海宣言》和《行动计划》。

国家规划建设的西部8条省际大通道中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至鄂尔多斯市进入陕西境内全长2532公里，投资340亿元的工程开工。

29～30日　中央企业工委召开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及其对策研讨会。就国有资产流失的界定、种类、原因、特点和规律及其对策进行了研讨。

31日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200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6　月

1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2日　国务院批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第三批），由国家经贸委公布，自2002年7日1日起施行。

3日　中办、国办发出《关于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控股企业深入实行厂务公开制度的通知》。

经国务院批准，国办发出复外经贸部《关于履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透明度条款有关问题的函》。

邹家华率领的人大常委会矿产资源法执法检查组结束在江西省的检查。邹家华强

调，要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正式发布，自2002年7月1日起实施。

4日　国家经贸委公布《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办法》，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4～13日　朱镕基考察长江防汛工作，先后考察了湖北荆州长江大堤、湖南岳阳长江干堤和常德市的防洪工程，并考察了洞庭湖湖区平垸行洪、移民建镇情况，考察了江西九江大堤加固工程和鄱阳湖重点圩堤整治工程，还考察了安徽安庆、池州、铜陵、芜湖等地长江大堤，强调要提高警惕，积极准备，确保长江安全度汛。

5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6日　交通部公布《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自2002年7月15日起施行。

钱塘江上最长、最宽的桥梁——下沙大桥合龙。该桥总长8230米，宽34.5米，双向6车道，桥梁主跨232米，是目前国内同类桥梁中最大的跨径，大桥基桩深115米，创下国内特大桥梁基础施工之最。

广东核电集团首次通过证券市场融资25亿元上市。

7日　国务院同意长沙海关驻株洲办事处调整为株洲海关批复湖南省政府。

7～8日　吴邦国在河北考察了石药集团、三鹿集团、宝石电子集团、天威集团和风帆股份公司等企业，强调要努力做好国企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8日　国办关于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农村税费改革试行方案、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等分别复函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上海、浙江等省、市、自治区。

9日　因持续降雨，陇海铁路灞河桥垮塌，6月20日开工重建。

10日　温家宝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5年回顾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我国对粮食问题的原则立场。

农业部紧急部署夏季飞蝗防治工作，要求确保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等7部委局联合检查局，开始对全国集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中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市场进行检查，重点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加强税收征管和治安管理。

春兰研究院按全球开放式科研项目管理机制，面向世界公开了符合春兰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的2002年度15项科研项目。将为全球科研人才提供从事独立研究或与春兰合作研发的资金支持及工作条件。此举表明，春兰集团率先构筑的全球开放式科研平台已打造成功。

11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再生资源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建设一个现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已经成为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我国每年有500亿再生资源未利用。

12日　江泽民与爱沙尼亚总统举行会谈。江泽民说，爱沙尼亚已成为中国在波罗

的海3国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鼓励两国企业开展合作，相互投资。

受财政部委托，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北京正东电子动力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北京市大气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利用日本政府项目贷款转贷协议》，协议金额89.63亿日元，期限40年。

我国出口吉布提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合同签字。

13日　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论坛在沪开幕，吴邦国发来书面贺辞。

农业部发布实施《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自2002年7月18日起施行。

14日　江泽民与冰岛总统举行会谈。江泽民说，我们应本着互惠互利、着眼长远的原则，不断扩大两国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

国内汽车行业最大重组协议签署。天津汽车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50.98%转让给一汽；将华利公司75%的中方股权全部一次性转让给一汽集团公司。

中国和朝鲜两国政府签订海运协定。

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布实施《边销茶国家储备管理办法》。

17日　江泽民与立陶宛总统举行会谈。江泽民介绍了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紧急会议，部署抗洪救灾工作。

18日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与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土地整治储备中心4家单位签署了总额度为261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协议，联手支持西部大开发，发展重庆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深圳11家中外资金融机构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签署了外币拆借中介服务合约，这标志着深圳与沪、京一起，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外币拆借服务的签约城市。

19日　交通部公布《水运工程施工监理招投标管理办法》，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20日　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对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和韩国进口的二氯甲烷征收倾销税。

天津港南疆散货物流中心全封闭长廊胶带机开工建设。

黑龙江鸡西矿务局发生特大瓦斯爆炸。

21日　国办函复海关总署，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增设安徽芜湖、浙江宁波、江苏无锡、江苏南通、陕西西安、河北秦皇岛、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南郑州出口加工区。同意在江苏昆山出口加工区和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进行出口加工区区内企业与我国境内其他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开展深加工结转业务的试点。同意出口加工区区内企业在确有需要时，可将有关模具、半成品等运往区外进行外发加工。

信息产业部公布《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规定》，自2002年10月1

日起施行。

民航总局、外经贸部、国家计委公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22日　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南京长江第二大桥通过竣工验收。获国内特大桥竣工验收最高评分。

23日　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有关问题批复民航总局、国家经贸委。

24日　江泽民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江泽民建议，充分利用中吉地理相邻、经济互补的优势，不断挖掘两国经济合作能力，采取切实措施，提高经贸合作水平。

朱镕基邀请部分经济界专家学者重点就"三农"、财政、金融、进出口、国有企业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分配等问题举行了座谈。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的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中国联通控股公司与美集物流公司宣布，双方合资成立中国首家为信息产业提供物流服务的合资公司。

中国与日本签署"广西天湖贫困地区扶贫计划"项目的政府换文。根据换文，日本政府将提供6.7亿日元的供水设备和电力供应设备，以帮助改善广西天湖贫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中国和日本举行WTO《保障措施协定》项下的磋商。中方表示不会限制钢铁产品正常进口。

25日　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调整外国牌号碳酸饮料管理工作》的公告。

外经贸部设立反倾销公开查阅室。

26日　信息产业部公布《国际通信设施建设管理规定》，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管理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交通部公布《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资质管理办法》，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公司（CCIC）和美国UL安全检测试验室正式组建合资测试认证公司。

国家计委与微软公司签署加强软件产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国家计委支持微软公司与中国境内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等，开展一揽子合作计划，涉及金额超过62亿元人民币，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软件领域最大的一个对外合作项目。

27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上半年集贸市场和加油站及其税收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半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点工作。

全长2070米，总投资2亿元，设58个墩台的淮河铁路特大桥建成。京沪全线实现铁路客运双线运输。

国家经贸委第32号令，发布了第三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这批目录共涉及120项产品，将于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我国钢铁行业损害预警机制正式启动。

28日　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29日　青藏铁路开始铺轨。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批准2001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公布，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公布，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公布施行。

7　月

1日　上证180指数今天正式面世，取代了运行6年的上证30指数，成为反映沪市概貌的基准指数。

2日　国家开发银行与广东核电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广东核电集团将获得国家开发银行80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广核集团拥有我国第一座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75%的股权，并全资拥有岭澳核电站。

瑞士正式全面恢复进口中国产禽肉及其制品。

3日　江泽民与基里巴斯总统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出席了中基双方有关经济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朱镕基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专项规划》、《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并讨论了振兴软件产业问题。

外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召开全国银贸协作电视电话会议。吴仪批示，要努力提高银贸双方的国际竞争力。

4日　经国务院批准，西气东输工程开工典礼举行。朱镕基会见了参加开工典礼的外国企业家。

黄河首次进行调水调沙试验，科学调控小浪底水库冲刷河床减少淤积。

6日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大重点工程之一的兰州至成都、重庆输油管道工程全程贯通举行首站进油仪式。该工程全长1249.9公里，总投资近40亿元，年输油能

力达500万吨。

项怀诚在第四届亚欧财长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亚欧两大洲应根据各自特点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10日　江泽民会见尼泊尔国王，就进一步发展中尼睦邻友好关系提出建议。

会见结束后，两国有关部门负责人签署了《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与尼泊尔政府关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其池有关问题的协定》。

中国西部最大的石化基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500万吨常减压装置开工兴建。这项投资6.24亿元的工程建成后，兰州石化将成为中国西部的第一座千万吨级炼油厂。

民航总局正式向哈飞公司颁发H410A直升机型号合格证，这标志着我国又一新型民用直升机获得进入民用航空市场的“通行证”。

14日　国务院对水利部报送的《关于请求批复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工规划的请示》作出批复。

国务院作出《关于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15日　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李鹏在听取汇报后的讲话中强调，要再接再厉，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我国自行研制的首列城市快速轨道车辆在大连机车车辆厂问世。

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开始全面受理公司、个人与台湾地区的各类结算通汇业务。

占全国天然橡胶生产总量70%的海南农垦与云南农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组建全国天然橡胶交易市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邮政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15～19日　朱镕基在甘肃、陕西、河南、山东考察黄河防汛工作，并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中下游4省防汛工作座谈会，强调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确保黄河安全度汛。

16～20日　吴邦国在吉林先后考察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长春客车厂和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石化公司、延吉卷烟厂、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汇源饮料食品集团延边有限公司等企业、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吴邦国强调要努力做好国企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18日　外经贸部公布《原油、成品油、化肥国营贸易进口经营管理试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天后实施。

财政部发行2002年记账式（九期）国债。本期国债为10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利息每年支付一次．票面年利率2.70%，发行总额173.3亿元。

19日　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切实加强油站用地管理的通知》。

20日　全国年中出口工作会议结束。

20～24日　来自东部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600多家企业到青海投资、参与西部大开发。签约金额达80多亿元，到位资金达30亿元。

22～24日　朱镕基、吴邦国在辽宁考察，朱镕基强调要坚定不移进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千方百计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23日　国家投资9292万元的拉鲁湿地一期保护工程开工。拉鲁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湿地，也是世界罕见的高原城市湿地。

24日　刘晓庆因涉嫌偷税犯罪被依法逮捕。

24～27日　朱镕基在吉林、黑龙江考察，强调要有备无患，充分做好防汛工作，着眼长远，切实加强生态建设。

25日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

国家经贸委和美国商务部共同举办的“中美工业废水零排放技术研讨会”召开。

26日　总投资43.52亿元的扬子石化65万吨乙烯改造工程竣工。

全国信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吴邦国在会上强调，要提高认识，狠抓落实，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全国采用国际标准工作会议召开。吴仪在会上要求切实贯彻“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为主，分类指导。国际接轨”的工作方针，大力进行采标工作。

27日　3中法合作生产的首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地铁列车下线。

国务院作出《关于组建青藏铁路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30日　科技部宣布启动实施12个重大科技专项，预计总投入近200亿元。

中国和美国就农业协定和农产品贸易举行会谈。

8　月

1日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

新世纪的第一条大型铁路干线——西安至南京铁路全线铺轨。一期工程西安至合肥1027公里，总投资231亿元。

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2日　国务院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自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将于2002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科技部印发《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2001～2010年)》的通知。

国家质检总局发出公告，请奔驰MB100用户更换右后制动油管。

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新阶段“菜篮子”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自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

国务院作出《关于组建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组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4日　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

5日　受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一边一国”及“公民投票”的影响，台北股市暴跌284点，创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7日　温家宝在为新中国政府统计机构走过50年而致的贺信中要求各级统计部门和广大统计工作者按照“快、精、准”的要求，努力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为各级领导机关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依据，为社会各方面研究分析问题提供翔实的数据信息。

8日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国家“九五”重点工程——三峡电站至芜湖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凌空跨越长江天堑。

经国务院批准，新疆和田输气管道工程全线开工。

9日　内蒙古北部林区雷击火扑救取得阶段性胜利，朱镕基向全体扑火参战人员表示慰问，要求再接再厉，取得灭火全胜。

10日　亚洲最大的重油催化再生器在大连石化分公司350万吨催化工地一次吊装成功。该再生器重达1589吨，主体吊装重量410吨。

12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宣布，发卡银行向持卡人收取跨行ATM取款手续费，符合现有政策规定。

索尼爱立信（中国）公司成立。

12～13日　温家宝到湖南慰问遭受暴雨山洪袭击的郴州山区干部群众。

13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把全力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作为集团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

总投资9.34亿元的陕气进津工程竣工。

15日　全国交通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以国家公共信息设施为基础，以电子政务为龙头，以信息服务为切入点，以信息化带动交通行业跨越式发展。

国务院作出《关于组建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财政部公告，决定发行2002年记账式（十期）国债。发行总额200亿元，期限7年。

16日　总投资约17亿元人民币的东海平湖油田扩建工程开工。该油气田是我国在东海第一个发现并投入开发经营的复合型油气田，面积为240平方公里。自首期工程以来，该油气田成了上海市惟一天然气供气源，每天向上海持续、稳定供气120万立方米。

19日　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雷击火全部扑灭。

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与荷兰DSM纤维中间体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出资成立南京帝斯曼东方化工有限公司，新公司出资22.36亿元，购买南京东方化工有限公司的乙内酰胺装置并进行技术改造。

海关总署与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签署联网业务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网上税费支付系统。

20 日　“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 15 周年交流会暨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讨会”召开。鲁布革水电站位于云南，是我国水电建设方面第一个利用世行贷款、对外公开招标的国家重点工程。

为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确保北京奥运会和负荷中心的安全可靠供电，经国务院批准，“西电东送”北通道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中亚区域海关合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国是该组织成员国之一。

中国向伊朗出口 25 辆新型铁路发电车合同签订。这是我国新型铁路发电车首次批量进入国际市场。

中华牌轿车上市销售。

21 日　温家宝在“中国国际农产品深加工——食品工业发展研讨会”会上强调，要积极实施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发展战略。

温家宝对长江防汛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沿江防汛抗洪坚决做到万无一失。

22 日　国务院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朱镕基与俄罗斯总理举行第 7 次定期会晤。会晤后，出席了《中国人民银行与俄国中央银行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和《中国工商银行向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提供 2 亿美元出口买方信贷框架协议》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我国政府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地方 21 世纪议程、公众参与等方面的行动和成就，阐述了我国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部署和政策措施。

23 日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公安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摩托车报废标准暂行规定》，自 200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26 日　财政部公告，将发行 2002 年凭证式（第三期）国债。发行总额 400 亿元，其中 3 年期 200 亿元，票面利率 2.12%；5 年期 200 亿元，票面利率 2.36%。

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发出《关于严格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通知》。

国家计委公布 2002 年重要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办法。国家经贸委公告，调整 2002 年成品油、汽车轮胎、原油进口配额。

27 日　朱镕基与摩洛哥首相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两国举行了《中国政府和摩洛哥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中国政府向摩洛哥政府提供无偿援助的换文》，《中国政府和摩洛哥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和《中国建设部与摩洛哥领土整治、城建、住房与环境部合作协议书》等文件签字仪式。

27 日至 9 月 4 日　吴邦国在新疆、青海考察了西气东输莲花湖工地、东秋 8#、牙哈凝析油气田、霍尔果斯口岸，青海 100 万吨钾肥工程、青藏铁路第一高铁的三岔河大桥和铁路铺轨现场，还考察了中基红色产业工业园、新疆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强调要加快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建设，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28日　朱镕基会见了摩洛哥工商界人士，强调两国应积极拓宽合作领域。

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浅海海域石油平台——埕岛西DPA平台下水。标志着中美合作勘探的渤海湾埕岛西油区块正式投入规模开发。

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国家重点能源项目，我国西北地区单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陕西韩城第二发电厂开工兴建。工程动态投资52亿元。

28日至9月2日　温家宝在青海考察了农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草原保护、生产环境建设。在甘肃考察了黑河流域调水、金塔县防风固沙工程等，指出要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29日　联想万亿次机成果汇报会召开。由联想集团独立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腾LSSC—11的大规模机群系统，实际速度达到每秒1.027万亿次浮点运算。这不仅是国内第一个实际性能达到万亿次水平的计算机产品，在全世界也可排在第24位。

厦门金门首次实现双向贸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公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农业部、供销总社、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召开全国棉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强化质量监督，抓好棉花收购。

南非库博矿业公司贱金属分公司与中国赤峰红烨冶炼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同。根据合同扩建工程2.3亿元。这是我国第一家合资锌冶炼公司。

30日　首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开幕。

朱镕基与喀麦隆总理举行会谈。会谈后出席了双方合作文件签字仪式。这些文件是：中国政府向喀麦隆政府提供贷款的协定、中国政府与喀麦隆政府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中喀两国政府关于同意喀麦隆推迟偿还中方提供的一笔无息贷款的换文及中国政府向喀麦隆政府无偿提供一笔小额物资援助的换文等。

我国企业中最大的博士后站——中海石油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开站。

31日　我国首次建造的30万吨超大型油轮交工。

9　月

1日　第11届乌鲁木齐对外经贸洽谈会开幕。

2日　朱镕基出席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并讲话，指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建设银行与浙江省政府签署《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合作协议》，建行将在未来三

年内向浙江省中小企业新增贷款计划500亿元。

3日　青藏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吴邦国出席并授牌。

全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业务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4日　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温家宝在会上强调，要巩固减负成果，治理突出问题，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暂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继续作为中央收入的通知》。

国务院同意农业部《关于促进饲料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第18次会议召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6省市区与成都市等7方代表相中央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联合大开放，携手大开发，完善大通道，共谋大发展。

上海磁浮快速列车工程轨道梁全线贯通。

6日　外经贸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日本对我农产品检验检疫超出正常范围。

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公布，自2002年10月15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

首届中国企业成功女性大会举行。

9日　朱镕基会见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主席。

亚洲最大的氟涂料生产基地开工。作为国家重点技改项目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示范工程，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

中国红十字会向朝鲜红十字会赠送2万美元，以帮助遭受台风灾害的朝鲜部分地区进行恢复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10日　国办发出《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

11日　国务院体改办关于《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朱镕基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双方就世界经济形势、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车辆购置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太平洋岛国论坛驻华贸易代表处举行开幕仪式。

12日　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讲话指出，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外经贸部WTO咨询网开通。

上海大众1.6升POLO上市。

14日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岭澳核电站2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中国石油与山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山西7地市使用第2条陕京输气管道天然气的《天然气供用意向书》。

14～21日　姜春云在新疆考察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伊犁州、吐鲁番地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些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基地，工业企业、科研单位，指出要创造良好开发环境、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15日　市场运作的典型工程——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竣工。

16日　第八届亚太质量组织会议在北京召开。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宣布："十五"期间"211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国家将投入中央专项资金60亿元。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中宣部等5部委举办的系列报告会上作《中国金融业在改革中发展》的报告。

17日　财政部2002年记账式12期国债发行。本期国债为3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票面利率2.30%，发行总额191亿元。

我国加入WTO后首次接受过渡性审议。WTO成员对我知识产权履行承诺情况予以积极评价。

全国增收节支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水利部《关于加强珠江流域近期防洪建设的若干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财政部、科技部《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17～19日　尉健行在河北考察非公有制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时强调，要依法实行民主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18日　江泽民致信祝贺世贸组织与法律服务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李岚清主持召开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加大对大案的查处力度，坚持不懈地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19日　吴仪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座谈会上表示，吸收外资法律、法规和政策将保持连续性。

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宣部等5部委举办的系列报告会上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报告。

国务院信息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2005年）》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国务院作出《关于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十五"计划的批复》。

长春至哈尔滨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第14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签字仪式。人保公司将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上亿元的综合责任保险。

20日　发行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的三峡债券开始发行，期限为20年，采用固定利率，票面利率为4.76%，以1000元人民币为一个认购单位。

22日　长江口航道治理一期工程通过验收，二期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分三期实施完成，总投资约120亿元。

23日　外经贸部发布《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国武汉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举行。

朱镕基在亚欧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携手共创亚欧合作新局面。

吴邦国在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贵州中电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成立揭牌仪式。公司将负责国家西电东送主要项目安顺二期电厂两台30万千瓦火电机组的建设和运营。

24~26日　吴仪在内蒙古满洲里考察了中俄互市贸易区、公路铁路口岸以及铁路进口货物换装所。吴仪强调，发展边境贸易加强口岸建设，促进民族边疆地区经济发展。

25日　朱镕基会见丹麦企业界人士。

长江源特大桥主体工程竣工。

25~27日　温家宝在山东、天津考察旱情时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努力做好抗旱工作。

26日　青藏铁路第一长隧——昆仑山隧道贯通。

跨越长江连接鄂州和黄冈的特大型长江桥通车，该桥目前居同类桥亚洲第二、世界第三，总投资9.108亿元。

中国与印尼签署一项由印尼向中国福建每年提供260万吨液化天然气的协议。

西南铁路网上的又一条南北干线，水城柏果铁路开通，该路总投资32.4亿元。

27日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体改办、国家经贸委《关于促进连锁经营发展的若干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28日　北京城铁西段建成通车，该路总投资65.7亿元。

利用国债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大连北良国家储备粮库60万吨筒仓工程通过验收，这标志着国内规模最大的港口国家储备粮库工程已全面建成。该工程总投资3.59亿元。

国家经贸委发出《关于公布〈工业行业近期发展导向〉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29日　温家宝主持会议听取《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汇报。

合肥至安庆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公布，自2002年11月15日起施行。

国办发出《关于做好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贸易政策通报咨询和审议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发出《关于组建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务院同意《关于供销社与棉花企业分开的实施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30日　国家重点项目，总投资1.42亿元的西藏现代农业园开建。

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21亿多元的昆明钢铁公司板带工程投产。

10　月

1日　大连城市快速轨道通车。

荆州长江公路大桥通车，该桥在同类型桥梁中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2~6日　钱其琛在吉林、辽宁对旅游经济发展情况，对发展旅游扩大就业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7日　国务院同意《中央国家机关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实施方案》，由国办发出通知印发各部门贯彻执行。

8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9日　天津丰田威驰轿车上市销售。

国家计委向社会公布了《2003年重要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实施细则》、《2003年天然橡胶进口配额分配实施细则》及《2003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则》。

10日　国办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

全国人大常委会种子法执法检查组举行全会。

朱镕基与莫桑比克总理会谈并参加了《中国政府和莫桑比克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农业部与莫桑比克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

胡锦涛会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副总统并出席了中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首都圈防震减灾示范区工程通过验收。该工程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债重点建设项目，投资2.355亿元，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防震减灾示范工程。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宣部等5部委举行的系列报告会上作我国外经贸在改革开放中飞跃发展的报告。

11日　民航六大集团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吴邦国为六大集团的成立作出批示，希望集团公司确保安全，理顺内部关系，加强管理。

11～13日　李岚清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坚持开源节流，建设节水型城市。

13日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宣布，将投资5970万美元，参与通用大宇项目。这标志着中国大型汽车集团首次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汽车工业重组。

14日　朱镕基会见国际商会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农业部颁布222号公告，决定将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临时措施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03年9月20日。

15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02年11月15日起施行。

江泽民会见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支持中国经济建设和开发银行的发展给予积极评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确定，2002年度每担标准级皮棉收购贷款基准暂定为380元，允许上下浮动10元。

15～16日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分析了3季度经济形势时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扩大内需的方针。

16日　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在京召开，江泽民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奶业协会举行成立20周年纪念会。

17日　国办发出《关于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有关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

李鹏在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纪念会上指出，中国将大力促进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成立，该公司为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总资产12亿元。

18日　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公告管理和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

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发布《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自2002年11月19日起施行。

引黄入晋工程正式通水。

湖北长荆铁路建成通车，工程投资18.5亿元。

科技部、农业部举行“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奶业项目启动签约仪式，宣布投入4亿多元攻关6个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并在全国建立8个现代化生产示范基地。

国家林业局部署开展我国首次大规模防沙治沙法执法检查和调研活动。

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铁路运输效率最高的国家。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开业，到2003年即可形成5万辆生产能力。

欧美同学会商会成立。

海峡两岸和港澳经贸合作研讨会召开。

19日　云南大昆输变电工程竣工。该工程建设资金投资15.8亿元。

21日　中国和美国等13家著名企业举行5个大型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这些项目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合作的炼油化工一体化合作项目、中国联通与摩托罗拉、朗讯科技、北方电讯和爱立信公司的码分多址移动通信设备采购框架协议、中国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最大的啤酒制造商安海斯—布希公司的战略性投资协议，中国神华集团，与美国艾克森斯北美公司的“煤直接液化”项目的基础工程和技术服务合同，上海制皂集团并购美国莫泰克公司的合同生效及经营权转移协议。合同总金额达47亿美元。

中国保监会发布《再保险公司设立规定》，对再保险公司的业务类型、营运资金标准和设立要求作出了规定。

国家经贸委发布《工业行业近期发展导向》，强调“十五”后三年，我国将重点发展符合国家安全、节能、排放法规及私人用车要求的经济型轿车，从2003年1月1日起，车用汽油质量全部达到国家新标准。

22日　2002年全球工商领导人论坛开幕，吴邦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朱镕基会见了全球工商领导人论坛部分人士。

温家宝在研究优势农产品域布局规划时指出，要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公布了对进口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初裁决定，并决定对该被调查产品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23日　国家质检总局恢复受理韩国产奔驰车的进口报检。

长城工业总公司与香港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签订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亚太6号卫星的发射服务合同。

24日　2002年记账式（14期）国债发行。本期国债为固定利率附息债，票面利率2.65%，发行总额224亿元。

24～25日　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要采取措施确保农村税费改革成功。

25日　吴邦国在国务院长江三峡二期工程验收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要高度负责确保质量缜密验收。

国家开发银行向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授信140亿元。

26日　江泽民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演讲，指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的政府和工商界更要加强合作，增加信任．同舟共济。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举行全会，邹家华作矿产资源执法检查情况报告。会议还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林业、就业和再就业等工作情况报告。

27日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就亚太经合组织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广泛合作，提出了三点主张。

“中国资源2号”卫星发射成功，标志我国航天遥感技术日臻成熟。

28日　李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法制讲座上强调，要健全和完善投资基金法律制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公布，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处置海南省积压房地产补充方案》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办印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29日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朱镕基在会上强调，一定要确保工程质量万无一失；加紧工作，如期实现二期工程目标。

青藏铁路清水河特大桥主体工程完工。

31日　江泽民会见国际电工委员会主席及重要官员。

朱镕基总理与马耳他总理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两国政府教育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

外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执行。

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

11　月

1日　江泽民与加纳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后出席了《中国政府向加纳政府提供贷款的协定》等4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取消的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789项。

国办发出《关于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建设期通航建筑物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金融统计管理规定》，自2002年12月15日起施行。

横跨太行山脉的朔黄铁路全线通车，标志着我国第二条运煤大通道贯通。

中国目前最大的合资项目，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开工。该项目总投资43亿美元，项目投产后可提供1500个直接就业机会和100多万人的间接就业机会，还将在兴办大量石化下游产品方面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科技部和国家开发银行签署科技金融合作协议。

2日　朱镕基与柬埔寨首相会谈。会谈后中柬双方签署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国政府承建修复柬7号公路桔井—上丁路段项目的换文。

3日　朱镕基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并讲话。中国政府外经贸部与老挝政府签订了中国向老挝提供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与柬埔寨、老挝、缅甸签署了有关中国政府提供特别优惠关税待遇的换文。

外经贸部公告，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邻苯二酚反倾销调查的初裁决定，并决定对该被调查产品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4日　朱镕基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谈，就全面提高合作水平提出看法和倡

议。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出席了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仪式。朱镕基宣布，中国决定实施亚洲减债计划，减免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阿富汗和马尔代夫等债务国的债务。

黄河水量调度管理系统总调度中心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并加以规范管理。

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对原上市交易规则进行了重大修订，修订后的规则更侧重于规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及相关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

中国电信（美国）公司开业。

6日　经国务院同意，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自2002年12月1日起，在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设立的外资金融机构可根据有关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峡导流明渠截流胜利合龙。

广东核电公司企业债券发行。该债券为40亿元，期限15年。

国家开发银行与大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签署300亿元人民币的公开额度授信协议。

7日　全国首批西部开发工程重庆轻轨一期工程车辆采购合同签订。该工程总投资35.5亿元。

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申请者资格条件、托管、登记及结算，投资运作，资金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规范，将于2002年12月1日起施。

7～8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欧盟合作伙伴洽谈会举行。欧盟国家的296家企业与中国的384家企业，按照欧方为会议开发的专用软件编排的洽谈表进行6000多场洽谈。

8日　中国与法国签署工农业合作议定书。

8～14日　中共十六大召开。这次大会，在中共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9日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

我国首座商用（重水堆）核电站——秦山三期工程一号汽轮机首次冲转试验成功。

10日　我国目前线路最长、口径最大、压力最大的成品油管道——“兰州—成都

一重庆”管道竣工并投入试运行。

12日　外经贸部发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管理办法》。

14日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

15日　财政部公告，发行第5套人民币5元纸币、5角硬币。

16日　北京至张家口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18日　江泽民与乌克兰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后出席了两国政府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等3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朱镕基出席第16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并发表演讲。

全国安全生产电话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了最近半月以来连续发生的多起重特大事故，要求吸取教训、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加强安全生产。

19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调境内小额外币存款利率。

朱镕基会见香港特首董建华，希望香港特区政府从容应对目前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坚决维护香港经济和金融稳定，维护社会的稳定。朱镕基还会见了中央驻港机构和部分中资企业负责人、香港主要商会领袖及工商金融界知名人士，表示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

朱镕基还会见了澳门特首何厚铧。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引黄供水一期工程竣工通水。该工程总投资17.77亿元，一期投资14.14亿元。

外经贸部公告，决定对热轧普薄板、冷轧普薄板（带）、彩涂板、无取向硅电钢、冷轧不锈薄板（带）等5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最终保障措施。

21日　西安渭河特大桥合龙。该桥总投资1.8亿元。

23日　西部大开发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的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实现截流。

第三届中国环发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温家宝发表书面讲话。

25日　国家计委发布修订后的《政策价格决定听证办法》，新办法将于2002年12月1日起实施。

26日　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在京揭幕，温家宝出席揭幕仪式。

27日　中国人民保险（香港）有限公司开业。

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召开。会议确定，2003年重点治理向机动车辆乱收费和道路站点。

29日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首席承保人签下保额近40亿美元的扬子石化一巴斯夫有限公司一体化石化基地项目保险合同。

外经贸部公告，宣布冷轧板卷反倾销调查范围不包括生产马口铁用的冷轧板。

30日　湖南临湘至长沙高速公路竣工通车。该项目是国家“九五”跨“十五”重

点工程之一，总投资50.9亿元人民币，其中世界银行贷款2亿美元。

江苏扬中跨江二桥动工兴建，该项目总投资概算1.8亿元。

12　月

1日　国债建设成果图片展在京开幕。

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工作，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使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强调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签署合同，合资生产涡扇支线飞机。

上海通用汽车第10万辆轿车下线。

3日　上海市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

国务院召开全国抗旱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和部署今冬明春的抗旱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

5日　小浪底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总投资347.24亿元人民币。

中国建设部与荷兰签署“中国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经济适用技术及示范”合作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3946万欧元，其中荷兰王国提供1496万欧元赠款。

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决定对进口丙烯酸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6日　国务院同意《关于进一步扶持农业机械工业发展若干意见》，由国办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继海内外上市重组后，又一次对企业资产进行重组。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与加拿大哈斯基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南海珠江口40/30合同。这是中海油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一个深水区石油合同，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8日　南四湖干涸导致生态恶化，国家防总、水利部决定从江苏扬州江都抽水站抽取长江水，沿京杭运河经9级提升由徐州解放闸流入南四湖。

9日　朱镕基分别会见香港特首董建华和澳门特首何厚铧。在会见董建华时朱镕基说，中央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在会见何厚铧时朱镕基说，澳门经济持续增长，希望努力拓展空间，促进澳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9～10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2003年经济工作的总要求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

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10日　沙迦中国商品交易会在阿联酋开幕。来自全国的近600家公司参展。

11日　外经贸部发布《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中国与日本签署造林绿化合作协议书。协议规定，从2003年至2012年日中绿化推进议员联盟将捐资在中国黄河沿岸的山西、陕西、河南3省兴建生态林1~2万公顷。

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主持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会议，提出2002年底铁路铺轨至昆仑山；2003年在无人区全面展开550公里冻土区段工程施工，完成投资56亿元，铺轨190公里。

13日　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朱镕基作重要批示；温家宝在会议上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曾培炎作《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迈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步伐》的报告。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它的3个客户提供总额3292万美元的赔付，其中投保卖方信贷保险的云南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获赔1620万美元和954万美元，投保了买方信贷保险的中国银行获赔718万美元。

我国自行研制的"中华之星"电动车组试验时速达到300.2公里。

外经贸部发布《关于反倾销产品范围调整程序的暂行规则》、《关于保障措施产品范围调整程序的暂行规则》，自2003年1月13日起施行。公布《反补贴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定规定》、《保障措施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规定》，自2003年1月15日起施行。

16日　第二届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会议暨中国—东盟商务合作论坛召开。朱镕基致信祝贺。

16~18日　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召开。吴邦国在与出席会议的代表座谈时强调要把国企改革发展不断引向深入。李岚清对会议作出批示：经贸委在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予充分肯定。

18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吴仪与出席会议的代表座谈。

19日　港口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原中央直属和双重领导的港口将彻底下放地方，并实行政企分离。

中国人民银行法兰克福代表处举行开业仪式。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兰克福设代表处是我国与欧盟国家经济和金融关系不断加强的客观需要。

20日　外经贸部举办年终新闻发布会，回答了201钢铁保障措施对我钢铁出口的影响、如何看待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政府将对外资零售企业采取哪些措施、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今后会否减少等热点问题。

一辆赛欧轿车驶下位于山东烟台车身有限公司生产线，标志上海通用汽车拥有了第二个生产基地，烟台整车项目实现兼并重组。

21日　三峡至常州5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送电成功。这是三峡向华东送电的主干道。

22日　青海西宁湟水河特大桥建成通车，该工程总投资1.19亿元。

23日　国办发出《关于做好2003年西部开发工作的通知》。

北京现代·索纳塔轿车下线。

宝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20多亿元建设的宽厚板轧机及配套连铸、1800冷轧带钢工程等一批新建重大项目正式开工。

成都至南充高速公路通车。该路全长215公里，是国家规划的“5纵7横”国道主干线上海至成都的一段，也是目前四川省投资最大、标准最高的一条高速公路。

总投资21亿元的万州至开县高速公路开工。

中国进出口银行哈尔滨代表处开业。

24日　朱镕基与孟加拉国总理会谈。会谈后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3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国家“十一”重点建设项目，南京长江三桥奠基，该项工程投资约30亿元。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确定19个纺织产业基地和19个特色城镇。

25日　朱镕基接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要充分肯定成绩，继续深化改革，再创财政工作新局面。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召开。

26日　国务院发出《批转财政部〈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关于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策和部署，符合农村实际，符合农民利益，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会议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会议要求，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力争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举行全会，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李岚清在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和税收体系。

《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巴基斯坦瓜达尔深水港（一期）项目贷款协议》签署，协议金额4.814亿元人民币。

27日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举行。南水北调工程首先启动东线第一期和中线第一期工程，投资1240亿元。工程建成后，将使北方缺水地区增加134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

中央企业工委工作会议召开。朱镕基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国有企业的监管工作任重而道远。

朱镕基会见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代表时强调，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北京地铁5号线正式开工。

浙江德清至杭州天然气管道工程开工。

北京迄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特色最突出的文化产业聚集区和古都风貌游览区——“琉璃厂文化区”一期工程建设启动，计划投资16亿元。

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经验交流大会暨总结大会召开。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指出，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指出，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已初步建立。

吴仪与全国质检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强调，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推进质检事业全面发展。

28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公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改善东南沿海通行能力的漳诏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概算总投资51.7亿元。

29日　广州地铁2号线开通。

国家开发银行与北京市政府签署200亿元金融合作协议，一个是100亿元小城镇建设金融合作协议，一个是100亿元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金融合作补充协议。这是国内银行界签署的第一份小城镇建设合作协议，也是国内银行界签署的首份最大的科技园金融合作协议。

中国电力11家新组建（改组）公司揭牌。实现了厂网分开，引入了竞争机制。

30日　我国成功发射“神舟”4号无人飞船。

（国务院大事记组　黄寒冰）

2003 年

1　月

1日　世界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上海磁浮示范运营线通车典礼举行。

2日　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会展中心——广州国际会展中心首期工程建成投入使用。

2～4日　温家宝副总理到山西看望困难群众时指出，要把提高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3日　朱镕基总理考察国家外汇管理局。

太原钢铁公司用转炉成批冶炼出两个系列、3个品种的优质不锈钢，填补了中国冶金工业的一项空白。

由江淮汽车集团和中国扬子集团制造的980余辆卡车、大巴在上海港装上专运滚装船，准备出口北非。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将原产于韩国的部分聚酯薄膜产品的反倾销税税率调整为零。中国海关税则号为39206200以外的该类其他产品的反倾销税税率维持不变。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持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自3月1日起施行。

国土资源部发布《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自3月1日起施行。

3～7日　吴邦国副总理在海南省考察，出席了粤海铁路通道轮渡开通典礼。他要求海南省发挥资源区位优势，发展新型特色经济。

6日　国家经贸委与国家标准委在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2005年1月1日起，火力发电、钢铁、石油石化、纺织和造纸5个高用水行业将实施用水定额管理。

江泽民主席与斯洛伐克总统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签署了《中斯2003～2005文化合作计划》和《中斯林业合作议定书》。

7日　江泽民主席与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3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决定对进口经营者进口原产于日本、比利时、德国、荷兰、俄罗斯的己内酰胺和原产于韩国、印度、日本的苯酐时，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粤海铁路通道“一线一渡”工程正式通车。

全国海关关长会议召开。吴仪国务委员致信会议，强调海关要做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

7～8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一是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二是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三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四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7～9日　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8日　国防科技工业会议召开。吴邦国副总理致信会议，强调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创新发展。

“神舟”四号飞船返回舱开舱。搭载的近百种作物品种进行交接，有一批是专门为西部大开发而准备的。

财政部发布公告，2003年国债还本付息工作将开始。

岭澳核电站2号机组投入运营。至此，岭澳核电站全面完成。2号机组自首次临界至性能实验结束，没有发生非计划停堆，创下了世界核电建设史上的一项新纪录。

湘桂铁路黎塘至南宁二线工程全线建成投入运营。

贵州”西电东送”中最大的水电项目——构皮滩水电站的坝肩开挖工程开工，电站总投资138.7亿元。

8～10日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召开。钱其琛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壮大旅游业。

9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闭幕。农业部确定了2003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是：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坚持以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工作主线，以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任务，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农业，扎实推进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政府和加大政府签署了关于小农户适应全球市场发展项目、西部道路开发项目等4个项目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约2600万美元。

10日　京九铁路复线全线贯通。

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科学院联合印发《关于发布中国第一批外来人侵物种名单的通知》。

退牧还草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退牧还草的规划目标和重点范围是，从2003年起用5年时间，在蒙甘宁西部荒漠草原、内蒙古东部退化草原、新疆北部退化草原和青藏高原东部江河源草原，先期治理10亿亩，约占西部地区退化草原的40%。2003年安排退牧还草任务1亿亩，经过两年试点和完善，力争5年内使工程区内退化的草原得到基本恢复，天然草场得到休养生息，达到草畜平衡，实现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建立起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草原生态系统。

中国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之一的北京资源集团，引进德国生猪屠宰加工生产线建成投产，年屠宰能力达160万头，严格按照欧盟标准设计安装。

13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意见》。

国家环保总局印发《关于发布〈柴油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

14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分流促进再就业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会议提出，国有企业在主辅分离改革中要实行辅业改制，分离出去的辅业要改制为产权多元的经济实体，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已批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以及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3家外资银行的上海分行从事QFII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免除缅甸联邦政府部分到期债务的议定书》签署。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中国将扩大重点税源监控范围，将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税”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增值税纳税人、营业税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营业税纳税人纳入监控范围。

15日　《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贯彻实施座谈会召开，李鹏委员长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要依法促进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

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宣布，2003款美国版雅阁2.4轿车降价，比1998款的售价

还低近 4 万元。

国土资源部宣布，全国 31 个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完成。这是中国第一轮省级矿产资源规划。

中国和古巴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北京研制的首列城市铁路电动客车正式下线。

17 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宣布，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结束，中国从 1997 年至 2001 年，新开企业共 154.5 万家，80%以上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社会服务业；61%为私营企业。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占支配地位；产业结构也得到进一步调整。

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市提前执行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第二阶段排放限值，自 3 月 1 日起实施。

中信深圳（集团）公司投资 10 亿元兴建的广东惠州市东三环过境公路正式动工。

17～20 日　吴仪国务委员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巴哈马。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国向巴哈马提供无偿援助的换文。

19 日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工作会议召开。公司成立 3 年多来，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建设兵器工业的基本方针，积极实施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战略，集中力量高起点、跨越式地建设了一批科研生产基地，使公司实力明显增加，3 年实现经济总量和职工收入“两个翻一番”。

20 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改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温家宝副总理听取中国工程院关于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汇报。温家宝指出，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和生态环境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22 日　中国银行宣布，力争在 2005 年在境内证券市场实现整体上市。经过 10～15 年的建设，实力显著增强，盈利显著提高。比照 2001 年的经营情况，资产翻一番，经营利润翻两番，税后利润翻三番，跻身国际一流大银行之列。

23 日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工作会议召开。集团公司 2002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7.2%，实现利润总额 6.89 亿元，提前两年完成总体经济翻一番目标。

国家“十五”重点能源建设项目、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三板溪水电站正式开工。该电站设计总装机容量 100 万千瓦，安装 4 台 25 万千瓦机组，年发电 24.28 亿千瓦时，工程总投资 65.27 亿元，工期 5 年，预计 2005 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宁（南京）西（安）铁路正式与合（肥）九（江）铁路接轨，标志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十大重点工程之一的南京至西安铁路东段，即河南（潢川）至安徽（合肥）全长 217.585 公里段铺通。

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出席了本届论坛，他就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展望、中国的兴起对本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等问题与媒体和与会者进行了对话。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会议召开。2002 年建设银行效益创历史最高水平，境内外业务共实现经营效益 344.3 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宣布，农业银行3年迈出三大步：2000年常规业务实现盈利，2001年整体扭亏为盈，2002年实现账面利润29.02亿元，消化历史包袱83.71亿元，实际利润112.73亿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等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公布2002年工作业绩。2002年共处置不良资产1327.25亿元，收回现金317.5亿元。3年来，4家公司共收购13939亿元不良资产，其中非债转股不良资产9889亿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召开。农业发展银行及时调整完善信贷政策，切实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全面推进规范化管理，积极深化内部改革，收购资金封闭管理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召开。2002年全国航空运输收入1018亿元。2003年运输周转量争取达到185亿吨公里，客运运输量达到9500万人次，货邮运输量230万吨。

有“中国第一船”美称、为瑞典承建的“威斯比”号客滚船赴欧洲，标志中国造船业取得进入世界高级客船的“通行证”。

《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信息采集核实管理办法》和《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发布，自3月1日起施行。

25日　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第三届会议在广西桂林市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伊朗等21位论坛成员出席了会议。

28日　北京城铁第13号线全线贯通试运营。该线全长40.85公里，工程总投资65.7亿元。

29日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03年第一季度例会。会议提出，当前应继续保持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政策的稳定。同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小企业和服务业的支持力度。要密切关注二些地区房地产投资与贷款增长过快的问题。

30日　《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公布，自3月1日起施行。

31日　《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暂行办法》发布，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2　月

2日　作为深化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务院发出《关于组建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组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组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和《关于组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7日　全长3900米，主桥长750米，桥下净高46米，桥面为双向6车道，号称“世界第一”的钢拱桥——上海卢浦大桥桥面结构全线贯通。

8日　投产一年的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原油产量突破100万吨，成为克拉玛依第3个

百万吨级现代化沙漠油田。

9日　中国建设银行与天津市政府签订金融合作协议，向天津市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提供长期、稳定、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信贷支持。建设银行天津分行与天津市建设投资公司签订银企合作协议，向天津海河沿岸危陋平房改造等4个项目授信136亿元。

10日　作为深化国有印刷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发出《关于组建中国印刷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11日　《人民日报》讯，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近日召开第7次全体会议，总结近两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召开。交通部决定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资结构作战略调整，从2003年起，3年投资500亿元建设县乡村公路。

新华社电，广东省部分地区出现非典型肺炎。

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和中国南车集团眉山车辆厂共同承揽，向巴基斯坦出口1300辆铁路货车合同签字。

12日　2003年国债承销团工作会议召开。

中国再保险公司工作会议召开。中国再保险公司股改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中国建设银行东京分行正式开始营业。

13日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经过几年的更新设计重新开工。该楼高492米，地上101层，地下3层，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楼”。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共发售15.54亿股H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38.5%，每股定价2.19港元。

《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

中国稻草恢复出口日本。个别企业弄虚作假，致使中国稻草出口被禁9个月。

1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广东进行考察，指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重组分立完成，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设立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宣布在全国筹建20家分支机构。

17日　温家宝副总理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就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与美国贸易代表举行了会谈。

《药品质量监督抽验管理规定》印发。

18日　《安全生产行政复议暂行办法》公布，自5月1日起施行。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国家计委发布公告，决定继续实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国家环保总局印发《关于发布2003年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推广项目的通知》。

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小湾水电站项目长期贷款协议签订。该电站是中国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第二大水电工程，总装机420万千瓦，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项目，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分别为该项目提供150亿元、60亿元和40亿元的贷款。

日本贸易振兴会的报告指出，2002年日中两国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商品进口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佟志广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议会与世贸组织大会上呼吁，优先解决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关注的对发达成员的市场准入问题。

19日　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为中海（集团）总公司建造的中国第一艘最大的集装箱船"新浦东"号交船。该船长279.9米，宽40.3米，航速26节，载重量为6.6万吨，并配有610个冷藏箱插座，集装箱箱位达到5668个。

20日　朱镕基总理到国家经贸委，就做好国有企业监管工作，与国家经贸委司局长以上干部、中央金融工委负责人及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以及部分行业协会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吴仪出席座谈会。朱镕基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物价低位运行，对世界价格影响不大；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符合中国国情；2003年将制定利率市场化改革规划。

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工作，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土地市场。

零时，首钢第一炼钢厂燃烧了40年的炉火熄灭，宣告中国这个最早的转炉炼钢厂停产。这是首钢为确保北京奥运会环境质量，压缩200万吨钢铁生产规模的一个标志性举措。

《国土资源部关于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发布。

21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朱镕基总理在对会议作出的批示中指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财政的重要储备，类似国家外汇储备，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一定要把这项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切实搞好。

中国人民银行发表2002年年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2日　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就相互适用《曼谷协定》达成协议，双方将在2003年年内相互提供比最惠国税率更为优惠的关税待遇。

23日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工作的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着行。

23～27日　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国政府向摩尔多瓦政府提供援助的换文》等文件。

24日　国务院体改办、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迄今中国国内箱量最大、航速最快、技术性能最先进的大型集装箱船——“新天津号”下水。该船船长 279.6 米，宽 40.3 米，航速可达 26 节。

25 日　中国农科院国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在河北省廊坊市奠基开工。这是一个集科研、中试、示范、培训和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工程，预计总投资 50.8 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公开市场业务交易日由每周二一个交易日调整为每周二、周四两个交易日；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流动性日报制度，加强对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流动性的监测分析，提高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准确性。

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召开。落实中央水利投资超过 300 亿元，其中国债投资 238 亿元，投资规模与 2002 年基本持平。

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等单位的领导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院士和专家学者研讨论证“中国鲁北生态工业模式”和“鲁北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多年成功运行经验的生态工业园区的代表，其生态工业模式对中国生态园区试点和推动循环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5 ~ 26 日　李岚清副总理考察了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地并主持召开了苏州工业园区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中方理事会议，要求进一步提高园区的国际竞争力。

26 日　中国和古巴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

建设部为《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举行首发式，这是中国首次编制的全国范围的民用建筑设计指导文件。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等 32 家中外汽车、摩托车企业的产品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国家矿山救援指挥中心成立。

27 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

中国确定将在黄河流域棉区、长江流域棉区和西北内陆棉区等 3 个优势棉区重点建设 120 个棉花生产基地。

《矿产督察工作制度》印发。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印发，自 4 月 1 日起施行。

28 日　中国政府与微软公司签署了政府源代码备案计划协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江泽民主席陪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在南京参观了南京熊猫电子集团。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表示欢迎包括微软公司在内的世界知名企业到中国来投资。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格控制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加高工程坝区和库区淹没线以下区域人口增长和基本建设的通知》。

3　月

2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与叙利亚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及叙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叙利亚卡比巴油田开发增产合同。合同规定中方投资约1亿美元，将该油田日产量从目前的4000桶提高到1万桶。

5日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哈尔滨市商业银行、合肥市商业银行、贵阳市商业银行为央行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增至43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社会保障基金现场监督规则》。

5～18日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决定了国务院总理和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等。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吴邦国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温家宝当选国务院总理。经审查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关于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2003年中央预算，同意《关于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6日　国家"十五"重点电力建设项目——燃气轮机电站建设项目设备采购暨技术转让合同签字。签署的合同有集中招标9个电站21套机组的燃机电站设备，装机总容量超过800万千瓦。

7日　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局公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自4月12日起施行。

外经贸部公布《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及其补充规定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国土资源部印发《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

8日　中国天然气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LNG（液化天然气）试点项目接收站和输气干线项目一系列重大商务合同签字，标志着中国大规模引进液化天然气的首个项目全面启动。

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将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4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反倾销调查期延长6个月。

9日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会议。

10日　国务院批准，同意海关总署增设上海青浦、漕河泾、闵行，江苏南京、镇江、连云港、苏州高新区，山东济南、青岛，辽宁沈阳，浙江嘉兴，广西北海和新疆乌鲁木齐出口加工区。

11日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公布，自6月1日起施行。

《农药生产管理办法》公布，自4月11日起施行。

国家环保总局决定新建黄河、珠江、松花江流域国家环境监测网，并对其他重点流域的环境监测网进行了调整。

12日　《人民日报》报道，2002年全国造林绿化首次突破1亿亩大关，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造林速度最快、造林质量最好的一年。

中国邮政中邮物流公司与三井、科健、联想、南京熊猫等7家企业签约，为这些公司提供仓储、配送等一体化物流服务。同时，国家邮政局还决定再向中邮物流公司注资1亿元，用以建设、完善全国物流网络。

13日　国土资源部印发《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办法》。

水利部与河南省、山西省政府签订关于小浪底移民收尾工作协议，小浪底库区剩余的4586名移民（河南2690人，山西1896人）将于2004年6月底前完成搬迁安置。

郑州黄河二桥主桥基础工程全部完工。

14日　国务院批准中国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哥本哈根修正案》。

17日　《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公布，自5月1日起施行。

19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由原来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企业实施计算机联网监管办法》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

20日　瑞典和北欧地区最大的保险公司——斯堪地亚公共保险公司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筹建合资寿险公司。同时，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批准了另一家合资保险公司——信诚人寿保险公司筹备建立北京分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美国3COM公司联合宣布：双方将组建合资的华为—3COM公司，共同经营数据通信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华为公司控股。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民政部印发《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管理暂行办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出《关于调整原行业统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

美国等国家对伊拉克实行军事打击，伊拉克战争爆发。

21日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部署黄河流域抗旱工作，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沿黄各省（区）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黄河水量统一管理和调度，确保2003年黄河不断流。

21~22日　上海、浙江党政负责人座谈交流经济发展情况，签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共同探讨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联动发展”的路子。

22日　青藏铁路铺架顺利穿越海拔4600多米，全长1686米的昆仑山隧道，标志着青藏铁路在高原冻土地段铺架取得了重要成果。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由国家发改委部署成立。它以中国科学院为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最初发起单位，国家先期投资2.5亿元。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增长研究中心成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大的框架方面与

国际标准已基本接轨。

中国首架私人商务飞机静力试验机制造完成。

22～23日 回良玉副总理到山东察看旱情。

23日 吴仪副总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致辞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对世界发展和稳定的贡献。

商务部部长吕福源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的市场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为世界各地工商界带来巨大商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树清介绍了外汇管理体制近期改革要点，指出人民币汇率制度对世界都有好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说，中国的崛起给亚洲邻国带来发展机会。

秦山三期核电站2号机组首次装载核燃料工作完成。

24日 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4个文件签字。

国务院在济南召开部分地区春耕和抗旱工作座谈会，分析旱情和当前春耕生产形势，研究和部署春耕和抗旱工作，温家宝总理就此作了批示。

中国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规定》。

海关总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赔偿办法》，自5月1日起施行。

25日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香港中华总商会访问团。

商务部、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

中国人民银行简化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上市审批程序，对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中国人民银行不再逐期审批其上市。

26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三定”规定，研究部署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全国机电产品进出口会议召开。

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开园。它将政府发展银行卡的优惠政策固化下来，吸引各类银行卡企业集聚在一起，细化产业分工，形成紧密的产业链。

27日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与宝马集团合资合同签订。

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28日 全长976公里的西气东输工程甘肃段开工。西气东输工程全长近4000公里，总投资1400亿元，是国家“十五”计划期间的特大基础建设项目。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进行结构调整，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成立，它由15家企事业单位重组而成。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成立。

规划年产10万辆的长安汽车南京溧水基地奠基。

总投资8.78亿元，全长16公里的湖北宜（昌）长（阳）高速公路开工。

29日 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召开。83项课题获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

30日 总投资78亿元，全长298公里的兰州至武威增建二线铁路开工。

国家环保总局决定在全国开展生态环境监察试点工作。

31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停止执行26项行政审批项目。

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民航运价改革将召开听证会。

2002年度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总额1212.14亿日元的政府贷款合同签字。

4　月

1日　中国首家万吨级大豆蛋白纤维企业——江苏常熟江河天绒丝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投产。该技术由河南华康生物化学工程联合集团公司研究开发，其工业化生产技术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标志着中国以植物蛋白丝作纤维材料的制造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民生银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的银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双方将在间接银团贷款、直接银团贷款、信贷资产转让和回购业务等金融创新业务领域展开合作，互相推荐优秀项目和合作。

2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讨论通过国务院2003年工作要点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定”规定，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医药条例》(草案)。

北京市政府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设银行将在2008年底之前投放上千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重点支持首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奥运会场馆设施建设。

3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强调，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九届中法经济研讨会召开。吴仪副总理在会上说，北京奥运会将为各国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2002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发表。

4日　新一届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吴仪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突出重点，加大力度，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引向深入。

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正式将第1000套TC1700高性能机群系统交付用户使用，标志着中国民族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已经实现规模化。这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出《关于对存在股票终止上市风险的公司加强风险警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6日　温家宝总理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并与医学专家座谈。

7日　《人民日报》报道：记者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获悉，2003年，国家将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4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1300多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与大唐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综合授信协议。建设银行为大唐集团提供综合额度授信378亿元。

国土资源部印发《矿产勘查及油气开采督察员工作制度》。

8日　温家宝总理在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时指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双方应继续扩大经贸合作规模，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宣布，该厂生产的全球B级轿车的顶端产品，目前国内生产的惟一一款国际豪华品牌B级轿车奥迪A4将正式在全国市场投放。

建设部印发《关于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中有关资质管理的实施办法》。

9日　“中国芯产业联盟”成立，它将加速提升国内设计系统芯片的能力，从而带动国内整个IC设计产业的高速发展。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和浙江慈兴集团、万向集团等53家轴承生产企业收到美国方面的正式信息：中国球轴承倾销案不成立，以“零损害”方式结案。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在美国遭遇的首起反倾销诉讼，以中方应诉企业的胜利而告终。

国家发改委公布《价格监测规定》，自6月1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

9~13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河南许昌、开封、新乡等地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10日　第七届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本届贸易会共签订国内横向联合项目合同1041个，总投资额589.98亿元；利用外资项目合同111个，总投资额18.13亿美元；内资合同成交额125.64亿元；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合同166个，交易额14.63亿元。另外，还有700多亿元投资额的各类项目协议。

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监测分析体系，监测与分析人民币汇率贸易加权指数和双边实际汇率。

《人民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公布，自9月1日起施行。

10~15日　胡锦涛主席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抓住新机遇，增创新优势，开拓新局面，努力实现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

11日　国务院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人士对当前经济形势和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3日　胡锦涛主席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充分肯定香港特区政府为促进香港繁荣稳定所做的积极努力，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夺取同疫病斗争的胜利。

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通报当前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况，交流预防、治疗和控制工作经验，分析疫情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全面部署下一步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14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第4次宣布延长对中国产毛巾制品进行设限调查的期限指出，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注，并反对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毛巾采取任何限制措施。

14~15日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召开。

15~30日　第93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举行，本次广交会共有48个交

易团、9128家企业参展，为历届之最。累计出口成交44.2亿美元。

16日　商务部发布公告，公布对进口丁苯橡胶反倾销调查的初步决定，并决定对该被调查产品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湘江第一桥”——黑石铺大桥合龙。

中国新型建筑材料（集团）公司更名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监督管理，国家环保总局制定了《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试行）》，从2003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土资源部印发《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

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有关部门关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汇报，并对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19日　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报国务院批准的项目用海审批办法》，由国家海洋局组织实施。

20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做好电力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

21日　国家环保总局决定进一步加强城市机动车污染排放的监督管理。

22日　华东铁路“十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全长224公里，总投资34.1亿元的宣城至杭州铁路复线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路建成后，将提升华东地区铁路运输能力，助推苏、浙、皖地区经济发展。

2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总指挥；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国家计委、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发出《关于下达2003年退牧还草任务的通知》。

24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设立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清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复函》。

中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集团——上海百联集团诞生。该集团注册资本10亿元，总资产规模近280亿元，销售收入可达700亿元，各类销售网点4000多家，遍布全国20余个省区市。

信息产业部公布了依据企业2002年营业收入排定的2003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

25日　温家宝总理和法国总理出席了《中方购买30架空客飞机的总协议》、《四川白马电厂有关设备采购和技术转让合同》等3个协议的签字仪式。

中法经贸代表团还就共同关心的多、双边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印发。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公布《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26日　山东电力基本建设总公司与印度第六大企业集团斯特里特公司签署巴库4×13.5万千瓦电站项目。该项目标价约2.3亿美元，以总承包方式承建。它是目前中国公司在印度签署的合同金额最高的电站项目。

国家投资6.33亿元的拉萨贡嘎机场公路新改建工程奠基开工。这是目前西藏公路建设里程单位投资最高、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项目。

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主要职责和调整组成人员的通知》。

27日　《工伤保险条例》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调整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验收组审议并通过三峡库区二期移民终验报告。这是对三峡库区移民工程开工10年来全面性总结和阶段性验收。到目前为止，三峡库区累计搬迁安置移民70多万人，建设各类房屋2845万平方米，搬迁、关闭和破产工矿企业1043家。

28日　全长99公里的上海外环线全线贯通。表明中国沉管法隧道施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位于湖南望城县桥驿镇的大型无害化垃圾填埋场启用。位于长沙市的该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投资近2亿元，占地2300亩，总容量4500万立方米，最大日处理垃圾能力达3000吨，是国内目前最大的生活垃圾填埋场。

中国银监会发布公告，正式挂牌履职，各地派出机构正在筹建中。

国家林业局、国家王商总局发出紧急通知，立即停止野生动物市场经营活动。

30日至5月3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江西农村进行调研，他强调要全力防治农村非典，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5　月

2日　黄菊副总理在北京考察工业企业，他强调要全力以赴，确保供应，立足本职，抓好生产，发展经济，为抗击非典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和物质保证。

财政部、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

3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社会捐款捐物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发改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在必要时对生产口罩用的棉纱、卫生纱布，生产过氧乙酸等消毒液用的化王原料价格实行临时性干预措施。

6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和经济工作。

青藏铁路铺轨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成功到达海拔4700多米的不冻泉车站。

中央财政再次预拨9000万元支持地方非典防治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

建设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城市公共交通的正常营运。在防治非典期间，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不得以任何理由停运或减少车辆和发车班次。

考虑到目前外地在京经商人员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抗非典期间减免集贸市场及经营农副产品的个体工商户有关税费的实施意见》，决定从5月至7月对全市经营农副产品的个体工商户和在京经营的外地个体户实行减免税费。

商务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在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的同时，克服困难，努力完成全年进出口任务。

7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应对非典型肺炎影响，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措施。会议提出，要在全力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以下工作：一、抓好春耕夏收，稳定农业生产；二、加大投资力度，调整投资结构；三、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四、努力促进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五、对民航、旅游、餐饮、商贸、出租车等受影响大的行业，采取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适当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给予必要的扶持；六、大力增收节支，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七、进一步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八、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草案）》。

国家发改委再次向社会公开披露4起哄抬价格典型案件。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从今年开始，包括GDP在内的国民经济核算将实行新的方案。

8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

长沙防汛总指挥部全面部署今年长江防汛工作。

民政部通报非典防治捐赠情况。截止到今日接受捐赠款物逾6亿元。

中央政府援港首批抗非典物资在深圳交接。

国家发改委、国家电监会和国家电网公司联合召开“做好2003年电力供应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电力企业要大力做好自身的防治非典工作，保证电力设施正常安全运行。

9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印发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组织制订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黄菊副总理在京考察了外商投资企业。他指出，中国政府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领域，努力改善投资和经营环境，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加快发展。

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发出通知，决定从5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娱乐、民航、旅游、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实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

建设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农村饮水卫生管理。

历时8年，投资266亿元的甘肃省重大建设项目“引硫济金”工程竣工通水。该工

程是从青海省门源县将黄河支流硫磺沟的水穿越祁连山冷龙岭引至金昌。

由中国援建的赤道几内亚全长 332 公里的涅方—恩圭公路建成通车。

10 日　国务院同意在绥芬河口岸开展口岸签证工作。

11～14 日　胡锦涛主席在四川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万众一心抗非典，迎难而上促发展，夺取防治疫病和经济建设双胜利。

12 日　商务部发布公告，公布了对原产于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聚氯乙烯反倾销调查，确定反倾销幅度为 10%～115%。商务部将就此案继续调查，直到作出最终裁定。

农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 2002 年度《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02 年环境污染造成渔业经济损失 36.2 亿元。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和《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

国务院扶贫办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确保非典不向贫困地区扩散。

农业部召开蝗灾防治指挥部联席会议，部署蝗灾防治工作。

13 日　交通部公布《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自 6 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发出紧急通知，对中央民航、旅游企业短期贷款贴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卫生部联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和落实加强抗击非典型肺炎医疗设施建设和加快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设施建设任务。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批准 13 个电站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512 亿元，发电装机规模 1t88 万千瓦。

13～1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河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一手抓抗击非典，一手抓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14 日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自即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德国、伊朗、马来西亚、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乙醇胺进行反倾销调查。

14～17 日　黄菊副总理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坚定不移发展经济。

14～21 日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湖南、山东考察非典防治、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强调要用党建作保证，党员作表率，夺取抗击非典和促进发展双胜利。

15 日　交通部召开全国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003 年将启动县际及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5300 多个，建设总里程约为 7.8 万公里，总投资 750 亿元。黄菊副总理批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和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抓住有利的施工季节，力争完成今年的建设任务。

国家统计局印发《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继 2002 年首次在海外发债成功后，再次发债 5 亿美元获得成功。

15～20 日　吴邦国委员长在江西考察工作，强调深入开展非典防治工作，大力加强经济建设。

16日 监察部、民政部、审计署发出通知，要求加强防治非典社会捐赠款物管理。

国家发改委公布9起农村价格违法案件。

16～20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贵州农村调研时指出，要毫不懈怠地抓好非典防治，毫不放松地加快农业发展。

17日 民航国内航线票价中“燃油加价”上浮幅度由现行不超过公布票价的17%调整为不得超过14%。

曾培炎副总理会见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欢迎包括摩托罗拉在内的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投资，积极参与中国的信息化建设。

18日 北京市重点工程，总投资14亿元、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新保利大厦工程动工。

2003年中国（福州）海峡科技成果交易暨经贸洽谈会举行。

20日 商务部公告，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暂缓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21日 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坚持两手抓方针，夺取非典防治和经济建设双胜利。

国家发改委召开“做好投资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当前投资工作。加大重点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抓紧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

23日 天津一汽对夏利、金夏利两大系列共10款车型实行降价，下降幅度从2000元到5700元不等，最大下调幅度近10%。

山东莱州市发电厂与美国尤瑞卡能源集团通过互联网签约了总投资2900万美元的热电联产项目合同。

24～26日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陕西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6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听取中国工程院课题研究组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战略研究的汇报，要求做好研究工作，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粮食局下发《关于2003年粮食收购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粮食主产区将继续坚持保护价收购制度，收购保护价总体保持在上年水平。

水利部公布《水库降等与报废管理办法（试行）》，自7月1日起施行。

27日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公布施行。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会见阿富汗副总统时表示，中方将以实际行动帮助阿富汗发展经济。会见结束后，两国签署了中阿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3个合作文件。

国务院长江三峡二期工程验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三峡二期工程验收成果。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抗击非典物品运抵澳门。

商务部发出通知，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对餐饮、旅店等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28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签署了《关于中俄原油管道原油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议》和关于600万吨原油的铁路购销合同。

29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关于2003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再接再厉，高度负责，高质量完成三峡工程建设各项任务。

吴仪副总理会见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时表示，中国投资环境仍然最具吸引力。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人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与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河北鑫磊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划拨进入中国联合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协议。这一重大重组使中国联合水泥向国家级水泥平台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29日至6月1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安徽检查淮河流域防汛工作。

30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制定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农村教育工作。

三峡工程泄洪孔建成后首次开启。

中国保监会印发《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口货物特许权使用费估价办法》发布，自7月1日起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与神华集团合作，总投资400亿元的内蒙古胜利煤田综合开发协议签署。这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工程。

30日至6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吉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夺取防治疫病和经济建设双胜利。

31日　《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

31日至6月3日　温家宝总理在辽宁考察工作时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

6　月

1日　胡锦涛主席出席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就加强南北合作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发表了题为《推动全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讲话。

三峡工程正式下闸蓄水。蓄水水位135米，万吨级船可通过5级船闸直抵重庆。它不仅标志着三峡枢纽工程开始由二期转入三期，而且也是三峡工程由建设期进入建设管理并举时期。2003年将有55亿千瓦时电力送往华中、华东地区。

兰新铁路“百里风区”柳树泉至小草湖段改造工程开工；该段150公里受风带最高

风速达64米/秒，是12级风底限值的近两倍。

3日 胡锦涛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会谈，表示要加强两国经贸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会谈后胡锦涛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03年至2008年合作纲要》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4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当前防治非典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成果，防止反复；经济工作要抓住时机，迎难而上，努力减少损失，力争完成全年任务。

黄菊副总理会见美国高盛公司董事长，欢迎包括高盛公司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拓展业务，扩大投资，加强合作。

5日 胡锦涛主席在蒙古发表《携手共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演讲，就中蒙关系和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进一步落实房地产信贷政策，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促进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以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向伊朗发展可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计划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为由，对该公司及其子公司实施了制裁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广西开办网上农产品洽谈会。

5～9日 黄菊副总理在湖北考察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6日 商务部发布公告，公布对进口己内酰胺反倾销调查终裁决定，反倾销税率为5%～28%。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公布，自7月15日起施行。

横跨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3江的杭州钱塘江五桥合龙。该桥长3126米，桥面宽26米，总投资3亿元。它使全长123公里的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连成环绕。

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向天津市中心城区及毗邻中心城区土地资源开发、中心城区快速路工程、地铁工程、海河两岸综合开发、城区绿化工程等项目提供500亿元的合同签订。这是新中国迄今数额最大的单笔贷款。

国家电力监管委发出《关于建立东北区域电力市场的意见》，中国区域电力市场试点将率先在东北地区启动运行。

总投资22亿元的宁夏第一家风力发电厂——贺兰山风电厂开工建设。

中国首座商用重水堆核电站——秦山三期核电站二号机组汽轮机首次利用核蒸汽冲转试验一次成功，这在国内也是首次。

7～9日 北京市顺义区第12届燕京啤酒节成功举办，共有24个项目达成合同或意向，投资总额37亿元。

8日 《物业管理条例》公布，自9月1日起施行。

总长36公里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奠基。该桥总投资118亿元，50%来自浙江民营资本。

9日 由东风和日产各拥有50%股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7亿元的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成立。它是国内首家拥有全系列卡车、客车、轻型商用车及乘用车的中外合资企业。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沃尔沃卡车公司签署合资协议，总投资额16亿元人民币，双方出资比例为各5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夏季粮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工作。

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苯酚产品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10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指出，今年要着力抓好几项重点工作：一是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建设；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加快发展科技教育；五是努力创造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西安至宝鸡铁路提速工程开工。

11日 因三峡蓄水而开机不足的葛洲坝电厂恢复正常发电。

国土资源部印发《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

12日 黄菊副总理会见爱立信公司总裁。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他希望爱立信公司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信息产业界的合作，共同发展信息事业。

秦山三期核电站二号机组并网发电。

三峡水利枢纽左岸电站2号机组无负荷运转实验成功。

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

12~17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陕西调研并主持召开部分省农村经济座谈会。他强调要应对新变化，解决新问题，确保完成全年农业和农村工作任务。

13日 温家宝总理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三峡船闸首次实船试航成功。

商务部、财政部发出《关于做好2003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活动的支持力度。

13~15日 曾培炎副总理到三峡库区察看蓄水情况，检查移民安置，水污染和地质灾害治理，以及试通航前的准备工作。他强调三峡工程已进入边建设边运行的新阶段。要继续精心组织，全面力0强管理，努力建设美好库区。

14日 全长167米，排水量12700吨，能抗击8级以上大风，配有先进导航、平衡设备以及轨道升降等设备的“粤海铁2号”抵达琼州海峡，将与“粤海铁1号”对开摆渡。

目前世界最长的全长1672米、直径610毫米高压天然气管道，在天津塘沽海河彩虹大桥三岔河口穿越成功。

中国第一航空工业集团在第45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上展出了一架中国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支线飞机样机。

15日　国家林业局发布《2002年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统计公报》，2002年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共完成投资255，8亿元，共完成造林面积677.74万公顷，占全国造林面积的87.15%。

全长150公里，总投资50亿元的兰考至许昌高速公路开工。

中国民航总局发出《关于调整"燃油加价"幅度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机票燃油加价幅度再次下调，由现在的不得超过公布票价的14%调整为不超过公布票价的11%。

16日　三峡工程双线五级船闸开始试通航。温家宝总理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峡建设任务。三峡工程双线五级船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船闸。

鄱阳湖首次渔业资源人工增殖放流了400万尾鱼苗。

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发布公告，有条件地解除对荷兰食品的进口禁令。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获准进人中国保险市场。

中国驻美国大使在美国商会发表演讲强调，中美合作有利于世界。

17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见。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旅行警告。

黄河三角洲灭蝗首次推行卫星导航；首个治蝗专用机场启用；试行生物防治。

18日　胡锦涛主席与科摩罗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会谈后，出席了《中科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研究部署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2003年中国南京重大项目投资洽谈会推介102个重大项目，涉及资金820亿元，1500余名中外客商参加了洽谈活动。

总投资100亿元的重庆大学城开工建设。

中国和泰国旅游业同人签订多项协议，将携手重振亚洲旅游市场。

国家发改委公布《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自1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工商总局发出通知，对从事个体经营的200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实行有关收费优惠政策。

民生人寿保险公司开业。它是中国第一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全国性寿险公司，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建，现有股东22家，实收资本金8.73亿元。

华能集团公司和中煤集团公司签署长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建设发电厂、煤炭生产基地和煤炭集散地。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34家分理处升格伪支行，至此，建设银行在京分理处升

格的数量已经接近65%，继续走在北京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扁平化改革的前列。

西部大开发十大重点工程之一，中国“八纵八横”铁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至南京铁路西安至合肥段铺通。该线全长1027公里，总投资240.3亿元，是继京九线之后中国新建的最长的铁路。

19日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自10月1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03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讨论了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认为应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议强调，要注意防范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在房地产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中潜在的金融风险。当前应继续保持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

20日　商务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对美国作出中国彩电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初步裁决非常关注，希望案件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经国务院批准，内地与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磋商启动。

2003年记账式（五期）国债发行，发行面值总额260亿元。

21日　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特大型江底隧道上海外环隧道建成通车。该隧道投资17.48亿元，全长2880米。

上海宝钢集团与中国一汽集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合资合作攻关汽车用钢。

22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为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建造的15万吨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轮竣工交船。该船建造周期16个月，创造了世界储油轮建设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签署。

国务院下发《关于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

24日　中国防治非典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全会，听取2002年中央决算和审计工作报告等。

交通部宣布，自7月1日起，长江江苏段实施船舶定线制。今后国内内河航运将逐步全面实施船舶定线制。

26日　中国银监会、国家发改秀发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自10月1日起施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中信信托投资公司签署协议和合同。华融将132.5亿元债权资产组成一个资产包，作为信托财产，选择中信信托公司为受托方，设立财产信托。

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分组审议投资基金法草案时强调，要强化保护中小投

资者利益，规范管理人和托管人资质。

青岛港液体化工码头开工。

军队参加和支援西部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公布，自8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

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批准2002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总投资21亿余元，全长3900米，主跨直径达550米，被称为“世界第一钢拱桥”的卢浦大桥通车。

淮河入海水道工程全线通水。

东莞经深圳至香港的跨流域大型调水改造工程竣工。

全长141.561公里，总投资81.13亿元的福鼎至宁德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新疆国际大巴扎（贸易市场）竣工。

29日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

30日　宝鸡天水段电气化铁路开通。该段是陇海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一段，桥隧总长82公里，占全线总长的58%。

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北京市怀柔区等86个市、县（市、区）为第八批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

国家重点工程，贵州至广东5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正式投产，西电东送广东能力新增150万千瓦，总体能力突破500万千瓦。

7　月

1日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了富士康企业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公司，指出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走出新路子，实现新发展，办出新特色。

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韩国、美国的进口新闻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对进口单模光纤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

2日　温家宝总理对淮河防汛抗洪作出指示：一要确保人民生命安全；二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三要从全局出发，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四要强化领导，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扎扎实实地抓好防汛抗洪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境内小额美元等外币小额存款利率，其中1年期存款利率由0.8125%下调到0.5625%；放开了境内英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的小额存款利率管理，由各商业银行自行确定并公布。

2~3日　全国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3日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决定淮河蒙洼蓄洪区分洪。

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公布《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 4 个合作文件签署。

农业部发布《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自 9 月 1 日起施行。

5 日　中国最大的 30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在兰州建成投产。

7 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7～8 日　中国银监会省级派出机构筹备组主要负责人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银监会派出机构组建工作正式展开。

8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增加农民收入和妥善处理因防治非典引发的矛盾和纠纷等工作。

《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公布，自 10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关于退还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与韩国总统首席秘书会谈时表示，中国 196 家中央企业不会私有化。

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士丹利公司签署不良资产处置试点项目交易合同。这是国内首例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合作处置不良资产项目。

9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调整电力电信民航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组成人员及单位的通知》。

全国政协十届常委会二次会议进行专题讨论，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言献策。

11 日　国家电监会印发《跨区跨省电力优化调度暂行规则》。

《企业自备货车经国家铁路过轨运输许可办法》公布，自 9 月 1 日起施行。

浙江省全面启动生态省建设，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合谐的循环经济发展道路。

12～13 日　温家宝总理检查指导淮河抗洪工作，和回良玉副总理实地察看淮河水情和防洪设施。

14 日　中国和英国财金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举行，双方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金融部门的稳定和监管、财政体制改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许多共识。

15 日　吴仪副总理主持召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座谈会”，加强中国为外商投资创造更加安全优化的环境。

15～16 日　全国人大财经委举行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建议把解决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下半年工作重点。

16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打击走私和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等工作。

全长 78 公里，总投资 30.06 亿元的云南省第一条旅游高速公路——昆明石林公路通车。

17日　《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印发。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中国正处于进口高增长时期，这种高增长不仅为贸易伙伴摆脱经济衰退，实现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也为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做出了贡献。

科技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山西省政府与所属各市、地签订卫生建设项目责任书，将10亿元的国债资金和贷款用于公共卫生建设。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组建的中国最大的寿险合资企业——恒安标准人寿保险公司签约成立。该公司注册资本金13亿元人民币。

18日　《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公布，自10月1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窗口指导会议，要求金融机构注意防止资本充足率下降，防范各类信贷及流动性风险，改进和健全内部考核制度，适度控制贷款总量。

19日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分别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他们都强调，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尽最大努力帮助香港恢复经济，实现长期繁荣和发展。

北京理工留学人员创业园开园。该园位于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内。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市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支持创业园。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年营业收入超过15亿元，利税2亿元。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为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提供10亿元的担保授信额度。

中国人寿保险控股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揭牌，标志着中国人保重组改制顺利完成。

20日　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消息，上半年实现利税866亿元。

20～2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率民盟中央专家组在沈阳东软公司、本溪本钢集团公司等调研、考察。丁石孙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调整对全国有借鉴意义。

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和公共卫生建设工作。

温家宝总理与英国首相会谈，提出拓展经贸哈作，帮助两国中小企业加强交往，推动英资企业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在今后3到5年内实现双边贸易从100亿美元到150亿美元的跨越。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中远码头（前湾）有限公司、丹麦马士基集团和英国铁行集团共同签署了关于组建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合同。新公司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企业之一。几方将共同出资8.87亿美元，建成年吞吐量超过650万标准箱的中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受财政部委托，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安徽、广西、贵州、河南、湖南等省区的财政厅以及吉林省教育厅分别就9个日本政府贷款转贷项目签署了转贷协议，总金额807.6亿日元，折合人民币55.9亿元。

民政部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2日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听取了国家信息办关于电子政务建设的工作汇报。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大力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二是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三是抓紧推行电子政务；四是切实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2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

24日　《关于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的指导意见》和《电力市场运营基本规则（试行）》、《电力市场监管办法（试行）》、《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功能规范（试行）》印发。

国务院印发《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这份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科技部、外交部、教育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制订的纲要，提出中国将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六大领域推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转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分行成立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工作小组。

秦山三期核电站全面建成投产。

第五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开幕，吴仪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

25日　全国整治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生产治安秩序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发表声明，抗议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等组织申请对中国纺织品实施保障措施。

26日　国务院召开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曾培炎副总理强调要探索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新路子。

苏州创元集团汽车产业板块的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新厂一期工程投产。

28日　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赞比亚投资建设并经营的谦比希铜矿投产。

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北京市顺义区等102个市、县（市、区）为全国生态环境监察试点地区。

29日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苯酚的反倾销调查期延长6个月，截止日期为2004年2月1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独家承保权，保险金额约19亿元人民币。

中国与美国海关签署“集装箱安全倡议”合作原则声明。

上海市政府决定暂停所有的景观灯光照明，以度过目前高温天气引发的缺电高峰。

30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等。

朗科公司在北京宣布第一枚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内存盘控制芯片“优芯1号”问世。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人民币出口卖方信贷利率形成机制，即出口卖方信贷利率在国债收益率平均水平基础上加点确定。

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做好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意见》。

31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

《铁路建设管理办法》公布，自10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召开全国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对会议作出批示，强调保护土地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紧急部署南方地区抗旱工作。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与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两大股东中葡投资公司和中法投资公司完成澳电股权买卖交易，中电国际成功地收购澳门电力6%的股权。

8　月

1日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简称3C）正式实施。自今日起，电子开关、资讯科技设备、电灯、电信设备等19大类132种产品必须通过国家强制性认证并加贴"CCC"标志方可进入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邮政储蓄资金适用方式，下调新增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8月1日以后新增的邮储转存款利率按照准备金利率执行。

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项目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南海石化项目44.6亿美元的有限追索权定期贷款项目融资协议签署。该项目融资将为年产80万吨乙烯裂解装置的建设提供资金。

1～3日　温家宝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考察工作，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指出要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走出加快振兴的新路子。

2日　一种高性能聚酯路用纤维由宁波大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并通过鉴定。该成果抗拉强度高，弹性模量高，属国内首创，价格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4，它将使中国高等级公路建设跨上一个新台阶。

4日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与深圳发展银行10亿元仓单质押授信额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4～5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要求全面贯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突出重点、坚持不懈"的工作方针。

5日　温家宝总理会见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等人时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举行。双方取得共识，用10～20年时间把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建成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第五批）》发布。

6日　国务院召开12省区市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优先保证城乡生活用水。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等工作。

中央财政紧急拨付特大抗旱补助费1.7亿元，用于支持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

14个省份的抗旱工作。

吴仪副总理在“规范市场秩序推进信用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要求工商部门，积极推进企业信用建设，实施商品质量监管关口“前移”。

商务部公告，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的进口铜版纸征收反倾销税。

中国人民银行发表200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7日　温家宝总理与尼日尔总理会谈。他说，两国贸易额年年递增，其他领域的合作也成果显著。会谈后，两国总理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尔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

神华集团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8日　温家宝总理考察北京市城市建设工作，先后到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城铁东直门站、崇文区龙须沟北里和东城区南池子进行考察。

国务院同意苏州海关吴江办事处调整为吴江海关。

致公党中央循环经济考察团到辽宁考察。

中国第二家拥有进口影片全国发行权的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标志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打破垄断又推进一步。

9日　中盐集团成立。该集团制盐能力占全国制盐总能力的50%，共有成员企业57家，总资产234亿元，年销售收入140亿元。

10日　海南第一条陆地天然气长输管道建成投产。该管道总投资4亿多元，全长247公里。

11日　温家宝总理与斯里兰卡总理会谈，建议加强经贸关系，两国政府应积极鼓励各自企业到对方去发展，为它们开展投资、工程承包、资源开发等提供便利。还应推动在农业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对所得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等5个文件。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八项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加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农民外出务工的指导服务、农业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发出《关于调整国家普查项目和周期安排的通知》，对国家普查项目和周期安排作出重大调整，原工业、第三产业和基本单位3个普查合并为经济普查，并将于2004年首次实施。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03年第二次窗口指导会议，要求金融机构防范各类信贷及流动性风险。

12日　本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北京会见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经贸考察团。

12～13日　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分析了中国证券公司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证券公司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

14日　中国与日本签署一批无偿援助项目协议，用于中国贫困地区结核病防治和黄河流域防护林建设等，总额为26.6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5亿元。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扩大开办记账式国债柜台业务范围，增加了交易的券种，并将开办柜台交易的地区扩大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6省市。

国家林业局印发《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15日　国务院公布《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5～16日　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

17日　三峡电力正式售电。

18日　温家宝总理与澳大利亚总理会谈，他说，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拓宽。

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意见》。

财政部发布发行2003年记账式（七期）国债公告。发行总额460亿元。

山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19日　温家宝总理会见参加东海油气联合开发项目的中外方代表，希望中外方紧密合作，加快开发，保障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能源供应。

中外4家公司签署5个勘探和开发合同。

国家发改委公布当前价格举报热点。

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召开。

中影集团联合影视有限公司成立。它是由中影集团控股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有限责任公司，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20日　新一届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

海尔集团的广告亮相日本东京银座，这是中国企业在此地竖起的第一块广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

21日　全国审计理论研讨会闭幕。会议确定审计工作的主题是：加强权力监督，维护经济安全，关注政府效率。

第一次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8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正式建立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严禁非农业建设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通知》。

22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100亿元授信协议。

中国银监会与澳门金管局签署合作文件。

2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3年9月21日起，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6%调高至7%，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暂时执行6%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变。

24～25日　国务院召开西南6省区市座谈会，曾培炎副总理强调要把加快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中心任务。

25日　中国银监会召开在华外资银行负责人会议。中国银监会将不断提升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水平。

中国银监会与香港金管局签署合作文件。

中美两国农业部签署中美农业及相关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26日　胡锦涛主席与厄瓜多尔总统举行会谈，指出中方重视加强中厄经贸合作，鼓励和支持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参加厄的建设，也欢迎厄企业来华发展。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间关于经济技术合作、在石油领域开展合作等6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国家税务总局召开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工作会议。

为加强电子废物的环境管理，防止污染环境，国家环保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环境管理的公告》。

中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

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四次会议召开。全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12家，上半年实现账面利润36.09亿元。

2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审批2008年奥运会体育基础设施有关项目。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由中信集团和英国保诚集团合资成立的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开业。

商务部决定对欧盟产进口邻苯二酚征收反倾销税，这是中国首次以欧盟整体为对象进行反倾销。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关于实施国家第二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公告，从2003年9月1日起，执行《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和《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第二阶段排放限值。

28日　温家宝总理与匈牙利总理会谈。他说，去年双边贸易额近17亿美元，位居中国同中东欧贸易额之首；匈牙利是中国在中欧地区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国；中国银行也在匈牙利设立了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家分行。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两国6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卫生部公布《2003～2004年度全国卫生系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

深港西部通道工程开工。该项目总投资126亿元。

国家邮政局宣布，从8月30日起将调整国内特快专递和电子汇兑两项业务资费。

中国人寿重组新公司挂牌。

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重组挂牌。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广州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广州南沙龙穴岛北部安排岸线4.5公里，腹地纵深1.3公里，建设华南最大，世界一流的造船基地。广州南沙造船基地投资45亿元左右。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

山东莱钢集团公司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签署设备工艺许可协议，告别高炉、焦炉、竖炉、烧结机，引进世界最前沿的直接熔融还原炼铁技术。

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发出《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总长度 1347.3 公里的重庆忠县至湖北武汉输气管道工程开工。

中国进出口银行杭州代表处开业。

联想—英特尔未来技术研究中心成立。这是英特尔公司在中国惟一的一所联合实验室。

《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印发。

深圳华为公司与西门子信息与移动通讯集团签署备忘录，双方将组建合资公司，专注于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世界标准 TD—SCDMA 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合资公司投资超过 1 亿美元。

三峡 4 台首批发电机组资产收购协议签署，总价约 184 亿元人民币的三峡 2 号、3 号、5 号、6 号 70 万千瓦机组完成“换现”交易。

28 日至 9 月 1 日　胡锦涛主席在江西考察工作时强调，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

黄菊副总理在辽宁考察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精神，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就业、再就业工作。

29 日　西气东输源头工程——克拉 2 号气田产能建设工程开工。该气田是目前国内特高丰度、特高产、超高压的大型整装天然气田，可采储量 2130 亿立方米，单井日产量最高达 700 万立方米。

《证券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发布，自 10 月 8 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落实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再就业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

31 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江苏、浙江、上海 3 省市质检部门签署国内首份区域性合作互认宣言，在市场准入、联合打假、建立一体化标准体制、开放技术服务市场等方面达成互认协议。

9　月

1 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技大学 50 周年庆典活动时郑重宣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 50 万的基础上，2005 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再裁减员额 20 万。

温家宝总理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就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交换了看法。

河南省 18 个试点县（市）约 1210 万农民，开始实行农村合作医疗救助制度。

全国房地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市场开发计划正式启动。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关于调整境内居民个人经常项目下购汇政策的通知》。

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权，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公布了 2003 年中国

名牌产品名单。138 家企业生产的 142 个品牌共 153 个产品为今年的中国名牌产品。

2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审议并原则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研究部署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中国保监会发出《关于保险公司经营区域有关问题的通知》。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管理办法》公布，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暂行办法〉的决定》公布，自 11 月 1 日起施行。

全国农村信用社监管工作会议召开。

3 日　温家宝总理会见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时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

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经贸洽谈会开幕。

第二次东盟—中国（10+1）经贸部长会议召开。还分别召开了第六次东盟—中日韩（10+3）经贸部长会议以及第二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中国宣布将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3~6 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宁夏西海固考察扶贫工作时强调，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4 日　第十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开幕。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深化地质勘查队伍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作出《关于省（区、市）民航机场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

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北京福州高速公路美菰林隧道右线贯通，这是中国目前贯通的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该隧道（左、右）总投资 3.7 亿元人民币。

《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公布，自 1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4~6 日　“2003 年海峡两岸石油和化工经贸暨科技合作大会”举办。该会是 21 世纪海峡两岸石油和化工界第一次大规模的经贸和科技交流活动。

5 日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 13 次全体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以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三峡三期工程建设任务。

6 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第二次会晤结束。各成员国一致表示将努力消除贸易壁垒，深化经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8 日　温家宝总理与乌干达总理会谈，指出去年中乌贸易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中国政府愿继续作出努力，扩大双边贸易。会谈后两国总理出席了中乌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

第七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克莱斯勒股份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计划

生产奔驰轿车。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发布2002～2003年中国纺织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数据，这是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首次发布此类统计数据。

9日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开关。

全国最大规模公开销毁走私切割汽车活动在珠海市拱北海关海上缉私基地举行。300多辆走私旧切割汽车被碾成碎片。

中国网通通信集团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银企合作协议》，银行方将提供550亿元人民币授信。

10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问题，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北京市政府推出地铁和高速公路4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首次面向世界寻求合作。

11日　胡锦涛主席与德国总统会谈，建议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加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经济技术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监会联合发出《关于对电价违法行为进行整改，规范电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在天津召开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和消费政策座谈会。曾培炎副总理强调要调整结构，促进汽车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断航百年的京杭大运河北京通州段通航。

12日　国务院举行授予海关关衔仪式。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曾庆红副主席会见了首批海关高级关衔人员及海关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与《中国税务》杂志社联合推出2002年度纳税排行榜。

国务院召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传达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批示，安排部署进一步加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回良玉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03年第三次窗口指导会议，要求金融机构防范各类信贷及流动性风险。

中国银监会印发《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内地出版业第一家跨行业的集团。

12～13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山东沿黄河大堤考察了黄河防汛、引黄济津工程，实地察看了南水北调东线穿黄隧洞试验工程，并听取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关于黄河治理工作的汇报。

13～17日　曾庆红副主席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互利双赢原则，大力推进内地与港澳合作。

15日　黄菊副总理与马来西亚副总理会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在农业、高科技、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合作；继续鼓励双方企业开展相互投资，联手开发国际市场。会谈后，中马副总理出席了两国关于农业、航天、旅游、劳务和遥

感等5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产业政策部长论坛暨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闭幕。共签订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合资合作项目、技术交易项目224个，协议总金额46.82亿美元。

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第九批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获证单位。

国家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宣布，西气东输东段工程成功贯通，即将开始试通气。

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签署《银企全面合作协议》。银行将提供50亿元人民币意向性融资授信额度、集团账户资金管理、债务重组、资产管理等一系列金融服务。

16日　国务院同意设立鄂尔多斯海关。

16~18日　曾培炎副总理出席2003年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他指出，中国仍是对外商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有能力保障来华投资者的健康和安全。

1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十一”旅游黄金固有关工作。

温家宝总理与东帝汶总理会谈，建议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逐项落实双方在重点领域的合作项目。会谈后，两国总理出席了中国政府和东帝汶政府贸易协定等6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航一集团与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总数30架ARJ21—700型飞机购机协议。

18日　全国“十一五”规划编制准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树立新的发展观，做好规划编制准备工作，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

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召开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公布，自1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所属哈飞公司与美国德事隆集团贝尔直升机公司签订协议，确定哈飞公司为贝尔430直升机机体的惟一供应商。

《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印发。

19日　吴邦国委员长在农村土地承包法执法检查组全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法，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普及义务教育仍然是当前农村教育工作的重点。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12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中国政府承诺将继续致力于巩固与沿岸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将合作引向更加深入、更具实效的发展阶段。

国家开发银行发行了国内第一只美元债券，总额5亿美元，并相应地解决了美元债券的登记托管等技术问题。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与世界最大的磷肥出口商美国磷肥协会签订合同。两年中中国每年进口磷酸二铵200万吨左右。

2003年大亚湾发展推进会开幕。该会共签约32个项目，涉及金额12.9亿美元。

21日　华中华北电网在河南实现联网。联接线北起河北邯郸市辛安变电站，南至河南新乡市获嘉变电站，全长210.8公里，总投资4.6亿元。

以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为起点，跨越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到达昆明的“东油西送”工程开工。管道全长1691公里。

22日　胡锦涛主席与喀麦隆总统会谈，希望扩大两国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会谈后，两国政府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等3个文件。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造纸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宣布，该公司已成立发电运行公司。此举是中国电力运营体制的一个创新，实现了电厂管理层与作业层分开。

23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会晤举行。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他说，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重点领域，六国已相继建立了经贸部长和交通部长会议机制，启动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会晤结束时，各国总理签署决议，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等文件。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公告，公布已在中国境内生产或者进口的化学物质名单。

国家电网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签署备忘录，国电公司将其直属有关网省公司2002年底持有的13家发电企业的股权划转华能集团公司。

24日　温家宝总理与俄罗斯总理举行第八次定期会晤，期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关于发展相互协作关系的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关于完善中俄贸易敏感商品预警和磋商机制的议定书》、《中信实业银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合作协议》等文件。双方一致认为，应通过扩大机械、设备及其他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改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减少贸易争端、规范非正规贸易；发展在机械、轻纺、电子、通信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资源开发、森工和俄境内木材加工方面的投资合作；落实能源领域合作项目。促进中俄公司在铺设原油管道、油田开发、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对两国参与中国西气东输项目的公司给予支持；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开展利用俄方技术设备建设80万千瓦及以上功率发电机组方面的协作等。

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24～27日　安徽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江苏省考察，并与上海、江苏分别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25日　温家宝总理为中国工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经济形势报告。

25～28日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展”在埃及开罗举行，签订合同金额1.17亿美元，合作意向2.74亿美元。

2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继续给予民航旅游企业相关扶持政策等工作。

黄菊副总理分别会见了参加亚太农协第14届大会的亚太农协主席和日本汽车工业访华团。

山西大同册田水库开闸放水5000万吨给北京官厅水库，以缓解北京用水的紧张状况。

《铁道部国家邮政总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铁路将列车行李车运能向邮政开放，邮政将枢纽仓储、分拣、配送能力向铁路开放。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台湾石油公司合作的台潮石油合同第一口探井开钻。这是海峡两岸首次在石油方面的合作。

27日　胡锦涛主席会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时指出，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都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实现经济振兴、改善民生上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

27～28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

28日　国土资源部等5部门向国务院汇报了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进展情况。曾培炎副总理要求严肃查处土地违法行为，高度重视一些地方农民失地失业问题。

中国棉花协会成立。

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研究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问题。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作出《关于表彰"2000～2002年度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的决定》。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西安咸阳机场高速公路通车，该路是国家"十五"重点工程，投资10.4亿元。

全国性农村消费品连锁配送集团——新合作商贸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签订协议，购买4架空中客车A330—200飞机。

30日　天津市"十五"重点工程津滨轻轨工程实现车通、轨通、电通。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燃烧了100多年的新疆乌鲁木齐市硫磺沟地火扑灭。为此国家先后投资近1亿元。

10　月

1日　上海口岸试行"5+2"工作制，即全年天天通关。

合（肥）杭（州）高速公路芜湖至宣城段建成通车，总投资16.4亿元，总长56.354公里。

1～4日　胡锦涛主席在湖南考察工作，强调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1～5日　黄菊副总理在山东考察了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重汽济南卡车有限公司、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海尔工业园。他强调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维护稳定。

2日　国务院批转了南水北调办公室等部门《关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实施意见的通知》。

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秋冬种工作，确保粮食特别是小麦面积基本稳定。

北京西站客运口岸站开通。

3日　《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批准印发施行。

5日　温家宝总理听取海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希望海南建设生态省、发展新兴工业、热带高效农业和度假休闲旅游业，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机制，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7日　温家宝总理出席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建议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推进东亚财政、金融合作，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多边化，逐步落实10+3各方就建立亚洲债券市场达成的初步共识，探讨设立区域投资合作实体等。

温家宝总理出席了首届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并发表演讲。

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建议研究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希望尽快建立流通特别是物流合作机制，探讨建立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合作机制，扩大促进三国贸易便利化的措施；中国开始实施的“振兴东北”战略将为三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会晤后，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

8日　温家宝总理出席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将与东盟深化经贸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努力在2005年以前实现年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目标。加快谈判，如期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深化金融、服务、投资、农业、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建议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等。

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人民币汇率压力监测指标，定期分析人民币汇率压力情况。

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专项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办法》。

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世界顶级客滚船“格特兰”号，在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命名并交付瑞典船东使用。它填补了中国造船业在客滚船建造方面的空白，成为中国造船工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太原市最大的、总投资约120亿元的教育园区建设工程正式启动，12个基础设施项目开始向社会公开招商。

国际上首例冷冻克隆牛胚胎移植犊牛出生，它是中国体细胞克隆技术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

《土地开发整理若干意见》印发。

《外币代兑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公布，自11月1日起施行。

10日　国务院召开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工作座谈会。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建立新的出口退税机制，原则是：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山西煤矿瓦斯监测监控安全信息网络开通。全省11个市地共安装1127套瓦斯监测监控系统。

11~14日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决定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2日　设计时速达200公里的中国第一条快速客运专线铁路开通。该线从河北秦皇岛市至辽宁省沈阳市，全长404.64公里，总投资157亿元。

12～13日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吴仪副总理会见了7个葡语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并在晚宴上致辞。会议签署了经贸合作行动纲领。

12～17日　第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成交额128亿美元。

13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其中，小麦粉、玉米粉、分割鸭、分割兔等农畜产品货物的出口退税率由5%调高到13%。

14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淮河流域灾后重建和加快治淮工程建设有关问题。

吴仪副总理致函国家标准委，强调要加大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力度。

总投资129.2亿元的内昆铁路建设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正式交付使用。

15日　中国航天员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绕地球飞行14圈后于16日安全着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新疆塔河油田110万吨产能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

16日　黄菊副总理与越南副总理会谈，他希望加快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后续谈判，同时维护北部湾正常渔业生产秩序，切实防止侵害渔民利益的事件发生。会谈后一起出席了两国关于经济、金融等4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7日　曾庆红副主席出席《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仪式。

18日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03年第三季度例会。会议认为，目前货币信贷增长明显偏快，提出商业银行要努力防范出现新的贷款风险。要大力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丰富市场产品，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和措施是，应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前一阶段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应继续保持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基本稳定，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投资16亿元的青岛270万套子午线轮胎项目竣工投产。

19日　胡锦涛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演讲，指出应充分发挥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促进各成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温家宝总理出席世界旅游组织第15次全体大会开幕式并代表中国政府致辞。

20日　胡锦涛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讲话，就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加强成员间的合作提出三点主张：第一，要加强相互信任，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第二，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要推动相互开放市场，健全多边贸易体制。

国务院邀请专家学者座谈经济形势、听取意见。

东北军工系统贯彻落实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座谈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东北地区国防科技工业调整改造和振兴，组织有关军工集团公司与东北三省对口进行洽谈沟通。

黄菊副总理分别会见了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裁及香港船东协会代表团。

2003 年广东—湖北（武汉）经贸合作洽谈会闭幕。签约项目 419 个，总成交金额近 150 亿元。

21 日　胡锦涛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部分会议，就信息通讯技术和反恐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有关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国务院授权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名单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公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宣布，将拍卖 10 亿元人民币国有不良资产、40 多个标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切实解决建筑企业存在的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22 日　温家宝总理与加拿大总理会谈，建议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两国在能源、环保、电信、保险、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会谈后两国签署了 3 个合作文件。

北京市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获得由英国标准协会公司颁发的 ISO9001 国际标准认证书，成为国内金融界少数通过该认证的银行之一，标志着该行已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管理模式。

23 日　胡锦涛主席会见澳大利亚工商界人士。

国务院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国务院同意设立十堰海关。

《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公布实施。

第七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开幕。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签署总额为 10 亿美元的《出口项下一揽子授信框架协议》。

2003 年记账式（九期）国债发行。本期国债为 15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发行总额 220 亿元。经投标确定的票面年利率为 4.18%。

23～27 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山东、河南考察时强调，要千方百计搞好秋冬农业生产。

黄菊副总理考察了大庆石油管理局 1205 钻井队、大庆石化公司、哈轴集团、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哈飞集团、东安发动机公司、吉林化纤集团、吉林石化、中国一汽集团、长春客车厂等企业，强调要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

24 日　胡锦涛主席与澳大利亚总理会谈，建议开拓经贸合作新领域，建立两国长期稳定的能源和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中国澳大利亚贸易与经济框架》等 4 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国家税务总局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大力整顿规范货物运输业税收秩序。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开业。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在中国挂牌的外资再保险公司，标志着中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向外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公告》。

中国惟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举行再保险合同签约仪式。以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为首的国际专业再保险公司将开始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保障，从而确立双方在信用领域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4～25日　全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各地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经验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

24～26日　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时强调，要再接再厉，同心协力，全面做好三峡工程建设的各项工作。

26日　胡锦涛主席与新西兰总理会谈，建议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等。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3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宁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扶贫移民工程——“1236”扶贫扬黄一期工程竣工通水。

27日　胡锦涛主席会见了新西兰工商界人士。

28日　国务院召开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会议强调采取综合有力的措施，保护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吴邦国委员长会见了美国伊士曼柯达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一行。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闭幕，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规范处理1995年以前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借款问题的报告》的决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将分别于2004年5月1日和6月1日起实施。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强调，要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支持，切实保护耕地，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温家宝总理会见美国商务部长；还会见了美中贸易委员会董事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布，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非常时期落实价格干预措施和紧急措施暂行办法》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南京分行开业。

28～29日　国务院治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抓紧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治淮工程建设。

29日　黄菊副总理会见摩根士丹利董事长。

中国企业第八批新纪录发布。

30日　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举行。温家宝总理建议深化经贸合作等。会晤结束

后他与欧盟领导人共同出席了《中欧伽利略计划合作协议》、《中欧关于成立工业政策对话机制框架协议》和《中欧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谅解备忘录》等3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听取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阶段性报告汇报。他说，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要组织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的专家论证，这是本届政府成立时确定的一项制度。

吴仪副总理会见了沃尔玛公司总裁，指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商业领域的对外开放。

第94届广交会闭幕，出口成交额达204.9亿美元。

31日　温家宝总理与意大利总理会谈，建议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互利经贸合作，促进中小企业合作等。

陈至立国务委员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部分委员时说，要大力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管理人才。

特大型矿船"凤凰·伯爵"号装载着进口的28万多吨铁矿停泊在宁波港北仑港区，创下了中国大陆港口靠泊船体最大的散货船和单泊最大装载量两项纪录。

中国和古巴企业家理事会成立。

31日至11月1日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交流会议召开。

11　月

1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改革内地驻港澳地区"窗口公司"管理模式的意见》。

全长98.58公里、全封闭、全立交，为2008年奥运会首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北京五环路通车。

2日　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年会开幕。温家宝总理发表"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共赢"的讲话。

3日　胡锦涛主席与巴基斯坦总统会谈，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世界上首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卫星测试发射工位成功发射一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

北京卷烟厂加盟上海烟草（集团）公司的联合重组协议签字。这是中国烟草行业首次实现跨地区的结构调整。

4日　温家宝总理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时说，当前双方要重点做好：(1) 提高贸易质量；(2) 落实好在建和在谈项目；(3) 加紧商定利用中方提供的优惠信贷所支持的项目。

黄菊副总理会见美国美林（集团）董事长，希望他们一如既往积极推动中美经贸和金融合作。

TCL集团与世界第四大消费类电子供应商法国汤姆逊公司签订协议，组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企业——TCL与汤姆逊电子公司。这是中国家电企业首次兼并世界500强公

司主流业务。

4~6日　曾培炎副总理考察香港工业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强调，香港一定能实现持续稳定繁荣。

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分析今年经济形势，研究明年经济工作。

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商业周刊》第七届 CEO 年会开幕式时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家领导才能，促进企业不断创新发展。

6日　胡锦涛主席与赞比亚总统会谈，并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暨中国企业高峰会在珠海开幕。吴仪副总理作主旨演讲。会议发布《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由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主办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

国内第一家专注于国际业务拓展的国际全业务电信企业——中国网通集团国际通信有限公司成立。

7日　黄菊副总理在中国企业高峰会上寄语中外企业树立新的竞争观和发展观。

黄菊副总理会见参加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外宾。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与中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办理期限为3年期以上（不含3年），最低起存金额为3000万元的协议存款业务。邮政储蓄协议存款的利率水平、存款期限、结息和付息方式、违约处罚标准等由双方协商确定。

8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至此，由国家电网公司所属的东北、华东、华中、西北和华北五大区域电网公司已全部组建完毕。

乌江构皮滩水电站开工。电站总投资138.42亿元，装机容量300万千瓦。

北京奥运会主要场馆招标结束。这几个项目总投资约205亿元。

国务院作出《关于组建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9日　第十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闭幕，促成项目合作、技术成果及产品交易总额156亿多元，其中合同金额80.67亿元。

10日　2003年记账式（十期）国债发行，面值总额220亿元。

10~11日　全国农村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11日　黄菊副总理与英国副首相会谈。在谈到经贸问题时说，双方要落实好重要项目，加强在能源、石化、航空、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合作。

曾培炎副总理会见了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美国朗讯科技公司董事长。

西部电影集团成立。

1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全国经济普查和海洋管理工作等。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若干意见》。

亚欧会议农业合作高级别会议召开。

《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颁布，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为10%。

中国航空合作代表与美国波音公司签订协议，购买30架波音737飞机，总价值约17亿美元；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签订协议，选用该公司的发动机，用于中国的ARJ21型飞机，这一长期供货合同总价值达30亿美元。

12～14日 全国环境规划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两年来环保"十五"计划执行情况，部署了"十一五"规划的编制等工作。

1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明确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不宜流通人民币挑剔标准》。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与广东发展银行在北京启动中小企业融资试点工作启动。

14日 黄菊副总理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董事长。

民政部宣布，2003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886亿元。

国家环保总局决定开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试点工作。

15日 "中星"20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50亿元借款合同，用于该公司收购三峡机组。

烟台至大连铁路轮渡工程开工。

16日 昆明至石林高速公路通车，总投资38.06亿元，公路全长78.07公里。

由近200家企业负责人组成的浙江省经济代表团与黑龙江省有关方面在哈尔滨签订经济合作项目95个，总投资78.57亿元，其中浙江方投资76.15亿元，项目遍及工业、农业、房地产开发等领域，重点是粮食方面的合作。

首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农交会共有500多家国内企业报名参展，345家企业进场参展交易，成交总额达到150亿元人民币。

17日 黄菊副总理会见英国英杰华保险集团总裁。

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揭牌。

18日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贯彻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温家宝总理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会谈，并出席了两国政府关于成立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等4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吴仪副总理在美国驻华使馆主办的知识产权圆桌会议午餐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态度是一贯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同意为香港试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提供清算安排。

由中国海洋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与香港建滔化工集团共同投资的全国最大规模的甲醇项目开工。该项目投资预算14.7亿元。

19日 商务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深表遗憾并坚决反对。

国内最大的燃煤发电机组——华能浙江玉环电厂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主机设备合同签署。

辽宁经贸代表团在香港召开投资贸易说明会，推出 62 个合资合作项目，总投资额 273 亿美元。

20 日　胡锦涛主席与瑞士联邦主席会谈。

2003 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开幕。吴仪副总理出席并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放开金融机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下限。金融机构法人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为上限，自主确定外币小额存款利率。

商务部负责人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对美国拟对中国 3 种纺织品重新设限的决定表示遗憾，并坚决反对。

21 日　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将改进 GDP 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年末不再公布当年预计数，将对历史数据进行修正，季度核算改为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 3 个步骤。

中国第 18 颗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

塔里木石油公司宣布发现亿吨级油气田。

22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

中国决定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进口甲苯二异氰酸酯征收反倾销税。

2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关税条例》公布，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4 日　国务院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明年经济工作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25 日　由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神华集团公司、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合资组建北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签字仪式举行。

就美国对中国彩电作出存在倾销的初裁结果，商务部表示严重关切。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发布，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公布，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7 日　北京市政府和天津市政府京津塘高速公路通道建设座谈会纪要签署。

27～29 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确定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8 日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终止对日、韩进口 MDI 反倾销调查。

30 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

12　月

1日　温家宝总理与德国总理会谈，并出席了两国政府11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批示，国家发改委要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宣布，中国实施两项进一步开放银行业的措施：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增加到13个；允许外资银行在已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将受非典疫情影响的民航和旅游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2003年底。

2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成立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的决定》。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公布，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驻马店至信阳133公里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总投资33.54亿元。

中国就铁道部利用法国政府贷款引进铁路大型养路机械和电气化运营维护设备项目与法国签署了两国政府间财政议定书。

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有关问题。

温家宝总理与斯洛文尼亚总理会谈。

4日　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发行50亿元债券。

5日　国务院同意设立珠澳跨境工业区。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电力安全工作的通知》。

《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发布。

6日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山海关船厂为英国五月花能源公司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海洋风车安装船命名交船。它填补了国际造船的一项空白。

8日　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纽约美国银行家协会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提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五条原则：第一，互利互赢，从大处着眼，既要考虑自己利益，又要考虑对方利益；第二，把发展放在首位，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来化解分歧；第三，发挥双边经贸协调机制作用，及时沟通和磋商，避免矛盾激化；第四，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不动辄设限和制裁；第五，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国务院同意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与外高桥港区联动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标准化工作的通知》。

中央编制办公室印发《关于放射性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通知指出，环保部门负责放射源的生产、进出口、销售、使用、运输、贮存和废弃处置安全的统一监管。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发行30亿元企业债券。

9日　全国最大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粮食物流中心——大连北方国际粮食物流中心成立。

民生银行决定在香港上市。

温家宝总理与美国总统会谈。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发行40亿元企业债券。

世界上第一座按4线铁路修建、载荷最大、主跨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武汉第六座长江大桥奠基。

10日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及澳大利亚奥多嘉电解铝有限公司签署奥多嘉年产42万吨电解铝厂的贷款协议。该项目合同额近6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近5亿美元。它标志着中国的有色工业技术和成套设备首次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

国家环保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和改革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意见》。

2003年记账式（12期）国债发行。发行面值总额255亿元。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其中，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

北京至郑州铁路提速改造工程完工。

11日温家宝总理与加拿大总理会谈，建议加强双方在能源、环保、电讯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以资源换市场，以技术促投资，建立长期稳定、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模式。

中国保监会从今日起允许外资财产险公司经营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全部非寿险业务。同时增加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为保险业对外开放城市。

11～13日　黄菊副总理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天津港务局、天津钢管公司、摩托罗拉公司等企业考察。

12日　温家宝总理与墨西哥总统会谈，双方正式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间4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集中兑付劳务费12.6亿元，11家严重拖欠工程款的企业被严肃处理。

美国对从中国进口木制卧室家具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这将影响中国近10亿美元的出口，中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

12～17日　胡锦涛主席在山东、河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切实解决好新阶段农业、农村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13日　温家宝总理在墨西哥企业家早餐会上强调，中墨经贸合作要实现互利双赢。

15日　温家宝总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温家宝总理与埃塞俄比亚总统会谈，并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黄菊副总理对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作出批示，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落实

国有资产经营责任。

16日　中非企业家大会闭幕。17家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对口企业签署了协议、意向书或备忘录，涉及20个项目，总金额近7亿美元。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对涉及国有企业改制的主要环节和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政策要求。

全国部分地区城市建设和土地管理工作座谈会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强调要认真解决违规拆迁、滥占耕地、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

铁道部召开全路运输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12月17日至2004年1月6日20天间确保煤炭日装车5万车，突击增运煤炭1000万吨，努力缓解煤炭供应紧张局面，确保电煤和人民生活用煤需要。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宣布，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以2.27亿美元成功竞标收购OzGen公司所拥有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两大发电厂权益50%的股权。

17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清洁生产的意见》。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局集团签署进口原油运输合作框架协议。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美国和法国的进口水肼进行反倾销调查。

中国信保公司与俄罗斯驻华使馆商务代表处举办中俄贸易融资合作洽谈会。中国信保公司建立了相关风险评估体系，确定了可接受的俄罗斯银行名单。中国务家商业银行与俄罗斯银行签署的出口买方信贷框架协议总金额已达8亿美元。

18日　胡锦涛主席与以色列总统会谈，建议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等。

19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评估行业管理的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03年第四季度例会。会议研究了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和措施，认为应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基本稳定，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会议提出，要着力调整信贷结构，控制信贷资金流向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行业，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业、中小企业、扩大消费、增加就业方面的贷款支持。要积极推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

20日　中国一汽集团公司自主开发成功国内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CA6DL—“奥威”四气门大功率重型柴油机。

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ARJ21新型涡扇支线飞机在上海、西安、成都和沈阳4家飞机企业同时实现零件开工，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的飞机”项目工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1日　中国人民银行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由现行年利率1.89%下调到1.62%，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维持1.89%不变。

22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北京宣布，该公司账面价值近250亿元人民币，分为22个资产单元的不良贷款国际招标，已于12月12日正式接受了国内外11家投资者递交的10份标书。经过评审，花旗集团、JP摩根投标团等分别夺得了3个资产单元

的直接买断权，或在支付相当比例现金的前提下，就 14 个资产单元与华融谈判设立合作公司，对有关资产进行合作处置。

国务院国资委宣布，2004 年将在部分国有独资中央企业建立董事会试点工作。

23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转发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

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公布，2004 年国家统计局将全面实施新的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计算法，调整和健全统计指标体系，改进和规范地区 GDP 核算，地区人均 GDP 按常住人口计算，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宣布将合资打造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汽车用钢板生产厂，总投资 65 亿元人民币。

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向中煤集团提供 220 亿元授信。

22 时许，重庆开县川东北气矿发生天然气井喷重大事故，遇难者 233 名。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要求全力搜救中毒和遇难人员，黄菊副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率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展开全面调查。

24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措施。

24～25 日　全国环境监测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近年来全国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的经验，确立“十五”后两年环境监测目标任务。

25 日　胡锦涛主席会见了各地台资企业协会会长。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全面部署 2004 年农业和农村工作。

吴仪副总理在出口信用保险与外经贸协作会议上指出，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外经贸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座谈会暨普查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强调统计工作要保证准确性、及时性、科学性、权威性。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公布，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吴仪副总理在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做好明年商务工作，保持经济发展好势头。

国家税务总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澳门和内地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

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宣布，中央政府决定在全国实行省以下土地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国土资源的宏观调控，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会议公布，从 2 月份开始到 7 月份的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工作初见成效，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 6015 个，规划面积 3.54 万平方公里，现已撤并 2426 个，整合 294 个，乱设开发区之风已基本刹住。

27～30 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努力增加农

民收入。

28日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宣布，世界最大规模的造船基地——中船上海长兴造船基地开工。

铁路专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特货运输有限公司和中铁行包快递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中共云南省委七届五次全体会议承诺，3年内还清政府拖欠的20亿元工程款。

国内目前最长的杭州绕城高速公路通车，该路总长123公里，总投资70亿元。

29日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强调，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扎实有效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30日　中国与欧洲空间局合作项目——“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随着“探测一号”卫星在西昌发射升空拉开序幕。

黄菊副总理与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座谈会代表座谈时，要求保险业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努力开创保险工作新局面。

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北京永定河倒虹吸工程动工。总投资137亿元。

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和原则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方案。

国家电网公司50亿元企业债券发行。

（国务院大事记组　黄寒冰）

2004年

1　月

1日　商务部公布2004年化肥关税配额分配结果。化肥进口关税配额量分别为磷酸二铵625万吨，复合肥313万吨，尿素230万吨。

中国石油与上海市正式签署《西气东输天然气销售协议》，并向上海供气。

1～4日　黄菊副总理在贵州考察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某基地、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林东矿务局等企业，贵阳市劳动力市场和花溪区农村信用联社。他强调，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大胆探索，扎实推进，走出一条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新路子，实现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2日　曾培炎副总理主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建设领域清理解决拖欠工程款工作。

3日　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和高法联合发出《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

通知〉的实施意见》。

5日　财政部、民政部发出通知，印发《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

6日　黄菊副总理在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上说，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他希望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干部职工，紧密围绕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为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再创辉煌。

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兴贸工作会议。吴仪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把扩大引进技术和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把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提高传统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结合起来。

国务院决定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分别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225亿美元。

劳动保障部公布《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第8次引黄济津调水结束。

国家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西安南京铁路西安至合肥段正式开通运营。该段路全长1030.2公里，总投资240.3亿元。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成立。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成功完成H股配售，净融资30.68亿港元。创造香港H股配售多项纪录：一是增发数量最大；二是完成配售时间最短；三是配售股价增幅最大；四是配售完成后股价持续走强。

7日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后首批享受零关税优惠政策的港货入境。

《煤炭出口配额管理办法》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8日　吴仪副总理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强调，旅游行业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五个统筹”抓发展，加快全面恢复入境旅游，努力振兴国内旅游，进一步增强旅游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8~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新疆考察了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天国际酒业公司、天业集团等大型企业，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9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发出。

全国海关关长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全面启动现代海关制度第二步发展战略，努力建设科学、文明、高效、廉洁的现代化海关，高质量地完成打私、税收等各项工作任务，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中国对美出口木制卧室家具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为“倾销”。

《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公布，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9~10日　全国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会议召开。黄菊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说，必须创建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和促进信息化健康发展。

10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发出。

国家林业局向全国通报8起严重违法占用林地案：一、山西运城至三门峡高速公路

工程违法占用林地案；二、新疆博斯腾湖东泵站输水干渠工程违法占用林地案；三、山西绵山景区旅游开发项目占用林地案；四、云南易门铁矿违法占用林地案；五、甘肃舟曲县阳庄水电站违法占用林地案；六、湖北浠水县农电网改造工程违法占用林地案；七、安徽泗县经济开发区道路建设工程违法占用林地案；八、吉林长岭县第2期农网建设和改造项目违法占用林地案。

上海电气集团以65亿元优质资产吸纳境内外投资者。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配套工程——西霞院反调节水库工程开工。工程概算总投资21.97亿元。

11日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召开。针对交通运输出现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制约，交通工作围绕加快发展这个中心，加快高速公路网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公共服务能力和政府主管部门市场监管能力。运输生产要努力做到“四个确保”：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炭、原油、铁矿石等能源材料的运输，确保外贸进出口货物的运输，确保农用物资和城市居民蔬菜、副食品供应的运输，确保旅客运输和化学危险品运输的安全。

银监会宣布，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和余额均出现大幅度下降。按一逾两呆口径，截至200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金额2.4万亿元，比年初下降1574亿元；不良贷款率15.19%，比年初减少4.69个百分点。

12日　新华社电：针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党政办公大楼拖欠工程款，造成部分农民工工资无法兑付，生活陷入困境的报道，曾培炎副总理批示要求，政府要带头偿还拖欠工程款。

银监会举行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座谈会。会议提出要提高监管水平，加快向“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转变，建立一个公开透明、高效运作的银行业管理体系。

世界最大航运公司之一日本邮船株式会社（NYK），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CSSC）订购两艘17.5万吨中国自行开发设计的好望角型散装货船的合同生效。

湘财证券与荷兰银行签署资本市场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资的湘财合丰基金管理公司也更名为湘财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举行挂牌仪式。

13日　中宣部等5单位举行形势报告会，温家宝总理作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公布施行。

国办发出《关于开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

曾培炎副总理到国土资源部看望、慰问国土资源系统的院士、专家并举行了座谈会。曾培炎副总理认真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强调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土资源工作，运用先进技术管理土地和矿产资源。

全国专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积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全国建设工作会议召开。2003年中国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有力地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2003年1～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8285亿元，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23.9%。建筑业2003年全年完成增加值7600亿元左右，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112.4亿美元，新签合同144.6亿美元。建筑行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3000万人。

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分别与摩托罗拉公司签署价值5.56亿美元和5.1亿美元的合同，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与朗讯科技公司签署的合同总价值超过3.5亿美元。北大方正和联想集团分别与英特尔公司签署了采购协议。

14日　中国大豆硅谷组织筹建签字仪式举行，由北京世纪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东北农业大学三方发起成立的该组织旨在推动中国大豆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国际化进程，探索中国大豆产业全面发展新路。

15日　吴仪副总理在全国加工贸易研讨会上强调，要把握好加工贸易发展的机遇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完善政策，创新管理方式，在保存数量增长的同时，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及时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说，2003年1月至11月，中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37584亿元，实现利润2858.5亿元。说明近年来中央企业市场竞争力明显加强。

16日　人民银行宣布，批准自1月18日起，中国银联开办中国内地“银联”人民币卡在香港地区使用业务。在香港贴有“银联”标识的销售终端机（POS）上用于消费支付，在自动取款机（ATM）上可提取每日不超过等值5000元人民币的港币现钞。

中国企业联合会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成立。

17～18日　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8日　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印发《香港清算银行调运人民币现钞进出境通关业务管理办法》。

西气东输向浙江天然气管网商业供气。标志着西气东输已按期实现向长江三角洲五省市商业供气。

西部产权交易所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陕西分所成立。

国家民委、财政部发出《关于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的意见》。

20日　劳动保障部公布《最低工资规定》，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公布《集体合同规定》，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由铁道部移交国资委管理，并更名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独立运作。总资产350亿元，员工7万人。

20～28日　黄菊副总理先后到浙江、江苏、上海考察，强调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努力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26日　温家宝总理看望经济学家名宿薛暮桥、陈翰笙。

26～29日　胡锦涛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与法国总统举行会谈，就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合作交换了意见。

29日　国务院第37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

中国国际贸促会调解中心和美国公共资源争端调解协会合作创办“中美商事调解中心”的协议签署。

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联合宣布，世界最大的疫苗研究机构——法国巴斯

德研究所将在中国上海设立大型研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用于装载海关监管货物的集装箱和集装箱式货车车厢的监管办法》公布，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30日　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召开。2003年共审计13万多个单位，上缴财政148.2亿元，减少财政拨款和补贴10.1亿元。全国共对3.6万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规资金671亿元。

31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31日至2月1日　温家宝总理在安徽、湖北检查禽流感防治工作。强调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一定要坚决打好防治禽流感的阻击战。

2　月

2日　胡锦涛主席同加蓬总统会谈中建议两国深化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将农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作为合作的重点。

全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回良玉副总理强调，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落实措施，认真做好防治工作。

银监会批准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日本瑞惠实业银行上海分行、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东亚银行上海分行向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

3日　国办发出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

《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已经国务院批准，国办发出印发通知。

黄菊副总理会见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对该集团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积极开展与中国企业尤其是金融业的交流合作表示赞赏，希望该集团今后一如继往。

建设部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

3日　胡锦涛主席在与阿尔及利亚总统会谈时建议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拓展在油气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通信、农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中方支持有实力的中国公司参与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建设，也希望阿方对此提供支持和便利。

4日　国务院召开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电视电话会议。曾培炎副总理强调，要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过度投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分别约见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及各国驻华外交官，向他们通报了中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的最新情况。

《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发布，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公布，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中国内地首张由外资银行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发行，标志着外资银行正式介入中国内地信用卡市场。

5日　北京市密云县迎春灯展发生踩死挤伤游人特大恶性事故。胡锦涛主席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尽最大努力抢救受伤人员，要妥善处理死亡人员的善后事

宜，查明事故发生原因。

《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规划》印发。

《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印发。

8日　三峡电站正式向广东送电。

9日　温家宝总理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可重点探讨在矿产、渔业、林业、油气等领域的合作。

国务院新闻办就农民增收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对农民增加收入有利。2004年中央支农资金比2003年增加300亿元，达到1500亿元以上。2004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信用社的体制改革。

新中华系列轿车正式上市。

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要提高警惕，采取切实措施，严格防范候鸟迁徙带来的禽流感疫情蔓延。

10日　受温家宝总理委托，回良玉副总理与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座谈。强调要扎实工作，落实措施，坚决阻击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召开。2004年保险业要继续深化保险企业改革，完善市场保险体系，扩大开放，促进中国保险业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

国家工商总局发出紧急通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禽流感疫苗。

俄罗斯警察突击检查莫斯科华商集中的艾米拉市场，要求货主出示报关单等文件，并强行拉走部分货物。中国驻俄使馆及外交部领事司要求俄方立即归还被扣货物，保障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

11日　全国春季田间管理及春耕备耕工作会议闭幕。据各省上报农业部的数据汇总，2003年全国秋冬种粮面积3.6亿亩左右；2004年春播计划面积7.52亿亩，比上年增加2000多万亩，出现粮食面积由降变增的转变势头。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召开全国工作会议。2003年实现保费收入1620亿元。集团公司独家创立的股份公司海外上市成功，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纽约和香港两地同时上市的金融企业，中国人寿开始真正融入国际资本市场。

中国工商银行分行行长会议召开。2004年工行将严格控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度投资行业的新增贷款，加强对房地产、汽车消费信贷等业务的风险监测和防范。实行票据业务统一归口管理，推行集中办理和集约化经营。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将坚决停贷或退出。

12日　全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工作会议开幕。吴仪副总理对会议作出批示。

吴仪副总理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时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贸组织新成员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处于特殊地位，应予以其特殊和差别待遇。农业问题是新一轮谈判的关键与核心，中方欢迎美方就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期限所提出的建设性倡议。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2星交付仪式举行。中国资源卫星正步入系列化和成熟化轨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闭幕。2004年资本市场发展重点为：逐步完善市场结

构；继续深化发行上市及再融资体制改革；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积极促进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的规范发展；进一步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全面增强管合力；不断健全证券期货法规体制；努力加强人才和队伍建设。

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署《全面业务合作协议》和《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合作协议》，为中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发出《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

《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办法》和《中央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管理办法》公布施行。

13 日　国办发出《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商务部发布公告，公布了对免于征收反倾销税的用于马口铁生产的冷轧板卷的认证办法。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集集团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 6 亿美元、15 亿美元和 5 亿美元的出口买方信贷协议。

15 日　西安至宝鸡铁路提速工程竣工。提速时速 200 公里，提速段 173 公里。

16 日　为拯救白洋淀的引水济淀工程开闸放水。这是华北地区首次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宗旨的跨河调水补水工程。

卫生部、农业部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举行会谈。中方介绍了近期防控非典和禽流感的工作。世卫组织向中国提供 70000 人份的流感疫苗。

17 日　全国医疗保险工作座谈会召开。2004 年医保力争覆盖 1.155 亿人，非公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等成为重点。

18 日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近期调整的报道完全无根据。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安全生产令》公布施行。

为实现“打假、护农、保粮、增收”，由农业部联合公安、工商等 16 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全面展开。重点治理种子、农药和禽流感疫苗市场。

19 日　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召开。吴仪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家海洋局首次向社会发布《2003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分析介绍了中国海洋经济运行情况。

银监会宣布，2003 年境内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指 4 家国有商业银行、3 家政策性银行和 11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质量总体提升，但化解风险、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的任务仍然艰巨。

首辆满载总值 9800 多万元人民币的押运车由皇岗口岸进入香港。人民币现钞进出境是为配合香港银行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实施，促进内地到港个人游活动的开展。

2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吴仪副总理主持召开流通企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要求各有关部门、各地区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清流通企业面临的形势，深化改革，勇于创新，加快培育流通领域大公司、大集团。

国务院安全生产办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紧急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重特大事故上升的势头。

国办发出《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

22 日　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召开。《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开始实施。按照规划要求，到 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0 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均达到 50%，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农业部、质检总局联合公告，暂停从加拿大进口禽类及其产品。

23 日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公布，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24 日　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会议召开。黄菊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统一认识，明确责任，扎实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全国电力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电监会要求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24 日　GSM 全球大会上，GSM 协会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张立贵总经理颁发了"GSM 协会主席奖"，这是该协会对为 GSM 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公司授予的最高级别的年度奖项。此奖项证明了中国移动在全球移动通信产业中的重要性。

25 日　国土资源部宣布，根据在中国管辖海域全方位进行的新一轮油气资源战略性调查，初步计算中国海域油气资源量可达 400 亿吨以上的油当量。

全国重点行业提升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吴仪副总理对此次会议做出批示，指出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做好加入世贸组织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产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

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正式启动。

国家林业局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国家开发银行在 2004 年至 2005 年将提供总量为 80 亿元的贷款规模，用于林业产业建设重点项目的发展。

中国建设银行汉城分行开业。

26 日　温家宝总理与丹麦首相会谈时指出，中丹贸易仍有潜力，两国政府应鼓励中小企业合作，为其开辟市场提供帮助。双方还应重点加强高科技、环保、农牧业、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曾培炎副总理召开会议传达温家宝总理近期关于土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批示，进一步部署土地市场秩序清理整顿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发布，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29 日　全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2003 年全国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共查处制售假烟案 22 万起，进一步规范了烟草专卖市场管理。

中国首次设立的、授予经济学者个人的"中国经济学奖"，召开首届专家委员会工

作会议，并启动评奖活动。

《中国政府和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署。

3　月

1日　曾培炎副总理召开会议，进一步部署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北京8000多种药品平均降价9.2%。

农业部举行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新闻发布会。“九五”以来，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以年均8.6%的速度增长。到2003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3.1万亿元，占整个工业产值的22.4%。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从业人员1608万人，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28.2%。

2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的有关工作，提出改革试点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中国—东盟防治禽流感特别会议召开。会议研究了中国与东盟开展合作，预防与控制禽流感，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问题。

农业部“科技之春”大型农技推广活动以四大作物春播春管主推技术卫星网络视频培训开班为标志拉开帷幕。

中国和葡萄牙经贸混委会第五次会议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加强经贸主管部门与企业间的经常性交流，扩大在旅游领域的合作。

3日　信息产业部2004年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工作通报会召开。预计2004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销售收入会在2003年1.88万亿元基础上增长26%，达到2.37万亿元。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又一新油田涠洲12—北已投产，目前产量7500多桶油当量。2005年达到高峰产量14400桶左右油当量。

5日　内地活鸡及冰鲜冷冻家禽恢复供澳。

5～14日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后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的力度和重点。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会议批准《关于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8日　国务院公布《基金会管理条例》，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同意调整天津港区、佛山市的海关机构设置。

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国对外演出中心和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转企改制和组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实施方案》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章程》。

9日　《电力安全生产监管办法》公布施行。

深圳—澳门—台北航线开通。

10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举行。

中国铝业公司与鲁能集团晋北氧化铝项目暨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举行。

11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

全国清理整顿违法排污企业座谈会召开。

信息产业部与惠普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共建的国家软件公共服务平台LINUX软件实验室揭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签订不良债权资产处置目标责任状。

中化集团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进口原油运输合作框架协议。

人民银行公布，2004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6万亿元左右，加快发展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12日　质检总局、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公布《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15日　国家工商总局在全国统一集中开展销毁食品、药品等假冒伪劣商品行动。

16日　农业部宣布，中国前一阶段确诊的49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已全部扑灭。

国土资源部通报5起土地违法案件处理结果。这5起案件是：青岛市崂山区政府及国土资源局非法批地案，山东省齐河县政府非法批地案，南昌市政府及青山湖区政府非法批地案，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非法占地案，陕西省周至县政府非法占地案。

中央储备粮库中的113批次、38.5万吨加拿大进口小麦竞买。成交额4.1亿元。

中铁22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总资产26亿元。

17日　全国流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加快培育流通领域的大公司大集团，力争在5~8年的时间内，培育出15至20家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南京菲亚特轿车宣布降价。最高降幅超2万。

18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春耕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农业生产形势，全面部署春耕备耕工作。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自2004年4月20日起施行。

一期总投资约16亿元的2008年奥运会环保工程之一的北京第一台F级350兆瓦天然气燃气联合循环机组奠基仪式举行。

19日　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CERNET2（第2代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试验网开通。标志着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全面启动。

长江江苏段实现海轮夜航。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美国就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问题在世贸组织向中国提出磋商请求表示非常不解。

20日　黄菊副总理会见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席时说，中国希望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加快金融改革。

21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秀发布公告，决定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以示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大型复杂自动化系统和装置为中心，实施工业自动化高技术产业化专项。

23日　胡锦涛主席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会谈。会谈结束后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会召开。会议提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今年要抓好四方面重点工作；强调要处理好实施振兴战略与保持全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环境污染造成可测算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36.36亿元。

“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先进事迹报告团在京举行首场报告会。

海关总署向社会公布第一批进出口企业“红、黑名单”。69家诚信守法企业进入“红名单”，58家企业进入“黑名单”。

24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召开第一届理事大会第三次会议。黄菊副总理强调要严格管理，稳健运行，实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

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通知》。

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25日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和美国大都会人寿宣布，双方成立合资公司——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即日开始在中国运营。

河北省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香港闭幕。洽谈会签订合同项目302个，总投资62.5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38.7亿美元。

光大银行开始代销首只投资于景气行业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中融景气行业基金。

25～27日　温家宝总理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加快东部地区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发挥优势，更好更快发展。

26日　宁夏沙坡头水利枢纽首台机组建成发电。枢纽工程总投资11.97亿元，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之一。

中国接受美国就集成电路退税问题的磋商请求。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T3A主楼工程施工及监理合同签字仪式举行。机场扩建工程拉开帷幕。工程总投资194.5亿元。

中国财政部和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向内蒙古铁路修建项目贷款协议签署。

27日　三峡右岸电站发电机组采购合同签字仪式举行。合同总金额45.36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出通知，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每公斤 1.4 元。

28 日　天津津滨轻轨试运行。这是目前中国线路最长的轻轨。

吴仪副总理同马尔代夫外长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等 5 个协议。

中国内河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集装箱港区——南京港龙潭港区正式投入运营。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支持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政策措施等问题。

温家宝总理与也门总理举行会谈并出席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 7 个经济、教育和能源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黄菊副总理会见荷兰银行集团董事长斗行。欢迎该集团作为国际著名的金融机构，参股中国基金管理公司。

中船重工集团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订建造一艘 400 英尺自升式钻井船。

总投资 20 亿元的重汽、一汽、沃尔沃发动机合作协议签署。

30 日　胡锦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固树立、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

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尽快恢复撂荒耕地生产。

动态总投资 199.33 亿元的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开工。

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融资保险的中兴通信项目保险协议和保险费协议签署。这是中国官方出口信保机构支持下的第一个中外银团贷款。让世界著名外资银行作为出口信用保险的受益人，这在中国出口信贷领域尚屑首次。

31 日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发行公司债券。这是中国第一只附有发行人选择权的浮动利率企业债券，第一只将募集资金投入对外工程承包项目的企业债券，也是中国中央直属大型外经贸集团第一次进入境内企业债券市场融资。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的决定》，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4　月

1 日　国办发出《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中国外债各项指标均在国际安全线内。2003 年末中国外债余额折合 1936.34 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 1165.90 亿美元；短期外债余额为 770.44 亿美元。

2 日　中国—莫桑比克经贸联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双方同意加强农业、渔业、资源开发等多方面的合作。

3 日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印发。

国办发出《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2004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4日　红旗渠通水40周年纪念日。40年来，红旗渠创效益近17亿元。

温家宝总理在河北考察时指出，中央制定的支持农业发展，增加粮食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是着眼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大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千方百计增加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

5日　胡锦涛主席与莫桑比克总统举行会谈并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共和国第二届经济贸易技术联合委员会会议纪要》的签字仪式。

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温家宝总理与荷兰首相举行会谈。温家宝指出，2003年中荷双边贸易额增长44.3%，荷兰一跃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欧洲第四大对华投资国。

三峡移民后期扶持工作会议召开。

中美航空合作项目谅解备忘录签署。

银监会召开国有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领导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7日　国办转发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审计署《对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的意见》。

8日　被国家列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首批项目的大连振邦万吨氟涂料产业化基地正式投产。该基地投资2亿元，规模为亚洲第一。

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洽谈会共签订国内横向联合项目1039个，合同总投资额1062亿元；还签订利用外资项目合同总投资额9.33亿美元；利用外资总投资额9.77亿美元。

商业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欧盟、韩国、美国、印度的进口三氯甲烷（chloroform）采取现金保证金形式的临时反倾销措施。

海关总署与中国建设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签署开展联网业务合作协议。

8～1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深入三峡库区的厂矿企业、移民新区、学校、农户，考察了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移民工作等情况和三峡工程建设工地。

9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和走势，研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会议要求继续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国土资源部公布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签订购买21架空中客车飞机协议。

10日　国办发出《关于加强三峡工程建设期三峡水库管理的通知》。

12日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买断式回购业务管理规定》公布，自2004年5月20日起施行。

2004年在华外资银行会议召开。

15日　中国政府和拉脱维亚政府经济合作协定签订。

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社会深入开展资源节约活动。

第95届广交会开幕。吴仪副总理致信祝贺，并要求精心组织、加强协调，努力提供优质服务，把广交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首个保税物流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通过由海关总署、财政部、商务部、税务局等有关部委组成的联合验收组的验收。

15~16日　国际金融协会2004年春季成员会议举行。黄菊副总理出席16日会议并致辞。

16日　商业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俄罗斯和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进行反倾销调查。

16~17日　国务院召开振兴装备制造业座谈会。

18日　零时起全国铁路第五次大面积提速。部分线路基础达到时速200公里。提速网络总里程16500多公里，其中时速160公里及以上的提速线路达7700多公里。

中美首届经贸合资合作年会举行。

19日　国办发出《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秀发出《关于加大价格监管力度努力降低农资零售价格的通知》。

20日　中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署。

"中国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开幕。吴仪副总理致信祝贺。

20~22日　世界化肥生产技术大会举行。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

21日　吴仪副总理出席并同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共同主持第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双方一致同意在中美商贸联委会框架内成立6个工作小组，分别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救济措施、农产品检验检疫、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和贸易额统计方法等问题。双方还就服务贸易、技术标准、农产品贸易和检验检疫等达成一些共识。

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22日　中国政府和捷克政府经济合作协定签订。

24日　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胡锦涛主席出席并发表《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的演讲。

胡锦涛主席考察了海南省农田整治和粮食生产情况、铁路轮渡和港口情况，强调发展经济保护生态；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粤海铁路等新建的基础设施，推动海南更快更好发展。

国务院同意废止《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对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

26日　国办发出《关于印发2004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要点的通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

总投资1.6亿元的井冈山机场竣工通航。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韩国晓星公司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复审。

27日　中韩第二届经济研讨会举行。温家宝总理致词祝贺。

国办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协定签署。

全国经济运行工作会议召开。

中国与澳大利亚部长级经济联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会议涉及羊毛、投资促进、贸易与投资网站建设、能源、农产品、检疫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区域和多边问题。签订了中澳关于促进双向投资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三农"问题执法检查和工作调研会议。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研究部署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和严格土地管理工作。

中国政府和库克群岛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订。

黄菊副总理与出席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指出做好企业分离办社会工作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措施。

曾培炎副总理接见第六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部分代表，听取了他们对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建议。

29日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吴仪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强化责任，突出重点，扎实推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

29日至5月2日　黄菊副总理在江西考察了农村信用社、企业车间、就业市场等。强调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贯彻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部署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该停建的要停建，该限期整改的要限期整改。

30日至5月6日　胡锦涛主席在江苏深入企业车间、科研院所、田间地头、社区商场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坚持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提高效益。

5　月

1日　宁启铁路南京至扬州段开通。宁启铁路的建设对完善华东铁路网、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苏中、苏北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胡锦涛主席出席开通仪式。

2日　财政部、卫生部印发《中央补助地方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3日　温家宝总理与德国总理举行会议。温家宝说，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去年已达418亿美元。希望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在2010年实现双边贸易翻一番。高技术合作是未来中德经济合作的重要支点。中小企业合作是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总理出席了有关中国东北工业振兴领域科技合作的备忘录等7项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

工程总投资148亿元的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2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至此，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自主运营的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全面建成投产。

4日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签署了恰希玛核电站二期工程合同。

5日　温家宝总理与比利时首相举行会谈。温家宝建议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欢迎比利时增加对中国农业、环保、高科技、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并积极参与中国西部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

6日　温家宝总理在中欧投资贸易研讨会上发表题为《积极发展中国同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

温家宝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举行会谈，建议扩大经济技术合作。会谈后出席了《中欧贸易政策对话》框架性文件、《中欧纺织品贸易对话机制》等5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7日　温家宝总理与意大利总理举行会谈。温家宝说，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去年双方贸易额创下117亿美元的纪录。

9日　新组建的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正式成立。重组后拥有资产500亿元，年销售收入可达400亿元以上。

10日　温家宝总理与英国首相会谈时说，双方可将贸易与投资、财政金融、能源、科技、教育文化、环保6个领域作为今后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中方欢迎英国工商界积极参与中国正实施的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首批126台（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自动化、智能化大马力拖拉机进入黑龙江垦区53个农业现代化装备示范区，迈向农业生产装备现代化，基本实现了粮食生产全过程机械化。

长江口通航水深达9米的深水航道正式开通。每年将提高36万标准箱的吞吐能力，每天可带来40多万美元的收益。

11日　温家宝总理与爱尔兰总理举行会谈时建议，拓展经贸渠道，促进双向投资。把合作领域确定为软件、信息通讯、农牧业和建筑服务业。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公布，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联合召开全国治理车辆超载超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拉开了在全国开展公路车辆超载超限治理"攻坚战"的帷幕。中国每年因车辆超载超限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亿元。

13日　中国政府和马达加斯加政府签订经济技术协定。

14日　温家宝总理就今后中国与马达加斯加经贸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拓宽经贸合作领域；二、中方愿继续向马方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当前重点是落实好新签的援款；三、中方鼓励中资企业赴马投资兴业，同时也愿扩大从马进口。

温家宝总理在会见新加坡副总理时指出，新加坡是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目前新加坡对华投资230多亿美元，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也达到1100多家。苏州工业园区成为亚洲最具竞争力的工业园，而且已成为中新互利合作的典范。新加坡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吴仪副总理与新加坡副总理会谈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会议。吴仪表示，欢迎新方参与中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欢迎新方参加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加入"中泰蔬菜水果零关税安排"，愿与新方密切配合，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并在此框架下探讨两国加速实现贸易自由化问题。会谈后共同出席了关于"中国商贸中心"、"中国—新加坡基金"等9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4～16日　胡锦涛主席在吉林考察工作。考察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金成玉米开发有限公司和农安县开安粮库等。强调要全面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17日　胡锦涛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建议：一、推动双边贸易持续增长；二、加快和深化能源合作，以中哈石油管道项目为重点；三、确保口岸运输畅通，提高口岸过货能力；四、欢迎哈企业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关于在油气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铁路运输合作协议签字。

国办印发《2004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

商务部公告，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复审。

福建首届闽商大会开幕。给福建带来近200亿元的投资和300多个发展项目。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并核准了中小企业板块实施方案。

18日　北京至珠海高速公路重点工程郑州黄河特大桥——黄河二桥主桥工程完工。大桥全长948.16米，宽48.16米，双向八车道，是目前黄河上第一座钢管拱形特大桥。

《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公布。

首钢总公司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签署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框架协议。

华东电力市场模拟运行，标志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

浙江与重庆签署两省市“经济社会领域合作与发展的框架协议”，达成投资合作项目103个，合同金额143亿元。浙方投资达134亿元。

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广州、北京至哈尔滨特快行邮专列开行，由新时速运递公司经营。该公司由铁道部和国家邮政总局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金2亿元。

19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7届亚太区域大会开幕。胡锦涛主席出席并致词。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等工作。

“2004北京国际金融论坛”召开。黄菊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致词。

“粤港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交流会”举行。截至2003年底，广东共引进港资企业76944家，合同吸收港资1465亿美元，实际利用946亿美元。

20日 温家宝总理与越南总理举行会谈。建议深化、加强两国全方位、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力争实现2010年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

商务部公布《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

21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全面落实中央政策措施，坚定信心搞好宏观调控。

国家发展改革秀发布施行《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23日 国务院发布执行《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

24~25日 温家宝总理在上海考察了科技园区、港口、电力和造船企业。召开了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负责同志座谈会，分析经济运行形势和宏观调控措施落实的情况。

25日 国务院同意设立酒泉海关。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开幕，吴仪副总理致词。

国务院召开西部六省、区、市宏观经济形势座谈会。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

26日 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开幕。温家宝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为减少全球贫困而携手行动》的讲话。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召开。

国务院发布施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6~7日 经济犯罪侦察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做出重要批示。

27日 中国和乌干达签署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两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30日后施行。

商务部公布2003年中国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和进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名单。

招商银行与高赛尔金银公司签署协议，由招行在国内银行中首家推出实物金条业务。

28日　温家宝总理与马来西亚总理会谈。建议推进两国在农业、高科技、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扩大双边贸易额。

科技部、农业部、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局联合启动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

对外贸易经营者信用等级查询系统启动。

贵州花溪农村合作银行挂牌成立。这是国务院决定在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8个省市进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以来，首家完成改制成立的农村合作银行。

电监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电力企业认真组织落实迎峰度夏各项工作，确保夏季大负荷期间电力安全生产，确保重要用户用电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29日　马来西亚宣布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加蓬矿产、能源、石油和水资源部签署关于在能源、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框架协议。

30日　中国和马来西亚投资1.58亿元人民币组建的现代化石油钢管制造基地——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公司投产。

31日　中国建设银行首次按国际通行做法处置不良资产。打包售出40亿元抵债资产。

31日至6月1日　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6　月

1日　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政府经济技术协定签字。

棉花期货正式上市交易。

2日　中国科学院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在京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罗干出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资源。

联想集团宣布（2003年4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整体营业额为231.8亿港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4.5%，纯利增加3.5%。

2～3日　深圳30多家商家联手，以系统维护为名暂停银行卡刷卡消费。此次“停卡”是全国类似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3日　温家宝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作报告，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强调要把搞好宏观调控和推进科技进步结合起来，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

第二次全国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会议召开，吴仪副总理对此次会议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把应对贸易摩擦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认真抓紧抓好。

截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国。

4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有关问题。同意湖南省对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建设中违法违规有关责任人所作出的处理。研究部署当前煤电油运有关工作。

5日　国办转发银监会、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指导的意见》。

APEC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出席会议并与美国贸易代表、智利外长、墨西哥经济部长等举行了双边会议，呼吁各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与新加坡贸工部长、泰国商业部长共同签署了《新加坡加入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计划下加快取消关税协议的议定书》。

6日　包括新鸿基、长安、新世界、恒基、盈科、信和、信德、亚洲金融集团、东亚银行等重要财团的首脑或代表，香港贸发局、香港机场管理局、香港工业总会、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会计师、律师、金融中介等专业人士的港澳工商专业界人士赴东北考察团一行抵京，将对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作一周的参观考察。

财政部决定发行2004年凭证式（三期）国债（电子记账）。计划发行额为300亿元，最大发行额为500亿元。

三峡至广东5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产。

7日　国办发出《关于做好电力迎峰度夏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同意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制定新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在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近期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当前应特别注意投资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问题。

8日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造价1.6亿美元，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17万吨级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装置命名并交付使用。

南京重大项目投资洽谈会开幕。推出1300亿元的项目进行招商。

8～12日　温家宝总理在湖北考察，其间召开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负责同志座谈会，分析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和中部地区发展问题。先后到东风汽车公司、武钢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到华中电力调度中心了解电力供应情况；察看了荆江大堤，听取了防汛工作汇报；在田间地头察看秧情，询问减轻农民负担情况。

9日　中国建设银行发言人表示，中国建行将以分立的形式设立中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又迈出重要一步。

光大银行与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泰康人寿、生命人寿等多家保险公司的北京分公

司签订银行代理银保战略合作协议。

10日　胡锦涛主席与匈牙利总统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双方宣布建立中匈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元首出席了中匈经济合作协定等6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2003年两国贸易额达25亿美元。

中国航空工业一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二集团与美国波音公司签署了关于就7E7梦想型飞机项目进行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此次合作将在未来几年给中国航空工业带来数亿美元的业务。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票（H股）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它是内地第一家在港上市的乳制品企业，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发行H股的企业。

10~13日　黄菊副总理在内蒙古了解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和当前工业交通经济运行情况。

11日　中国和法国有关企业分别签署了涉及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和平利用核能等领域的9个合作协议。

“大企业节电节能示范工程”启动。

12日　2004年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安置搬迁运送协调会召开。截至2004年4月三峡工程库区累计完成移民项目投资389.58亿元，搬迁安置移民86.97万，外迁农村移民14万。

13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罗马尼亚邮政电信公司签署了总额1.28亿美元的买方信贷协议，用于支持中兴通讯公司承建罗马尼亚电信工程项目。

14日　中俄经贸高层会谈举行。2003年中俄贸易额达到157.6亿美元，俄罗斯成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

“2004年江西井冈山科技项目对接洽谈会”签订合作项目协议舱个，可实现年产值33.2亿元。

15日　胡锦涛主席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胡锦涛建议优化双边贸易结构，重点推动交通、能源、通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鼓励相互扩投资，提高两国经贸的整体水平。

《南水北调主体工程银团贷款银行间框架合作协议》签字。以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国内9家金融机构将为南水北调主体工程提供总额达488亿元的银团贷款。

亚太经合组织（APEC）电子商务博览会在山东烟台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后在电子商务领域举办的首次重大经贸活动。

1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分析经济形势，部署当前要重点抓好的有关工作。

进出口银行与A.P.穆勒新加坡有限公司签署4亿美元的出口买方信贷合作协议，主要用于支持该公司在未来几年内订购我国船厂的多艘成员油轮。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出版座谈会举行。

第一届中国探矿年会开幕。国土资源部提出进一步推进商业性地质矿产勘查。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邀请俄海关官员和华人华商代表举行座谈，共同探讨规范中俄两国贸易秩序的途径。

国家电网公司召开迎峰度夏安全生产会议。

17日　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要求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的监测分析。

人民银行、银监会公布施行《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18日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4年第二季度例会召开。会议认为货币供应量和各项贷款增长偏快态势已经得到控制，金融宏观调控成效显现。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对2002年12月26日至2004年3月25日由一汽生产的马自达6CA7230AT型轿车进行召回维修。这是国内首次实施的汽车主动召回。

20~22日　温家宝总理先后到山东青岛市的企业、港口、电视广播中心、电力调度中心考察，还到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澳柯玛集团、青岛啤酒集团考察。指出在开展"个人干一流工作、企业创一流品牌"活动的同时，还要开展"社会造二流环境"的活动。

21日　全国电力安全生产委员会成立。

泰国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公布，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

《基金会名称管理规定》公布施行。

22日　胡锦涛主席与叙利亚总统举行会谈，建议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在搞好双方在基础设施、纺织、家电等领域合作的同时，发挥两国互补优势，加强两国在石油、通信、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会谈后，两国元首出席了中叙水利合作协定、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经济合作协定等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青藏铁路西藏境内铺轨，标志着西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及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同，三峡水电站将向广东送电，2004年计划送电81.6亿千瓦时。

全国工商局长会议召开。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2004年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三大重点之一，年底基本实现商标申请注册网上查询。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49家金融机构签订债券承销协议。2004年农发行拟分4次发行一年期金融债券408亿元。

国家开发银行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向兵团提供80亿元开发性贷款支持。

23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首届中美中小企业与创业投资论坛开幕，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开幕式时说，中国鼓励中小企业和创业投资发展。

中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科瑞卡公司举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电解建设项目签字仪式。中铝公司作为国际供应商将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20kA大型预焙阳极电解槽及其配套技术，这标志着中国已跻身世界电解铝和氧化铝技术输出国行列。

23~25日　曾庆红副主席访问多哥。与多哥总统举行会谈时积极评价两国贸易合

作取得的成果，鼓励扩大贸易和投资。签订了两国政府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关于中国政府向多哥政府提供用于解决两国政府商定项目资金问题的无偿资金援助和无息贷款的两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中国向多哥提供优惠贷款用于实施阿贾哈拉水电项目的框架协议。

多哥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24 日　国办发出《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25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 2003 年中央决算和关于 2003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切实保障涉农法律和支农政策落到实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公布，自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听取中国工程院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汇报。

25 日　曾庆红副主席与贝宁总统会谈时建议促进两国在经贸、卫生、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鼓励两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纺织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贝宁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26 日　南京地铁一号线轨道全线贯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京、津、冀、晋、内蒙古、鲁、辽七省市区达成《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使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

27 日　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第 37 届国际大会举行。吴仪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发表了题为《互利合作、共创繁荣》的主旨演讲。

28 日　胡锦涛主席与阿根廷总统会谈时表示，加强和扩大经贸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双赢，双方可把农牧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关于民航、卫生、投资和农业等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成立。总资产 8.33 亿元。

29 日　温家宝总理与斐济总理会谈时表示，要挖掘经贸合作潜力，加强在农业、林业、渔业等领域的饰势互补。签署了中国政府和斐济政府经济技术合协定及在农业等领域合作的 3 个文件。

中国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同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南非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30 日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公布，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西气东输工程郑州至长城铝业公司线竣工投产，正式向第一家直供大工业用户供气。

上海澄西船舶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修船能力位居全国第一，产值将超过 10 亿元；年造船吨位将达 50 万吨。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成为全国近年重大的资产重组案例。

吴仪副总理出席全国税贸协作会议并讲话，要求全面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决定。

7　月

1日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布实施。

2日　由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兴建的印尼泗马大桥开工。

3日　以湖南岳阳林纸集团为首的12家国内企业针对加拿大、韩国、美国的新闻纸行业提出反倾销措施期一案终审获胜。这是中国新闻纸行业首次反倾销取胜。

4日　深圳航空公司公布了国内航空公司首个关于航班延误的现金赔偿标准。

5日　胡锦涛主席与蒙古总统会谈，提出扩大和深化两国以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经贸合作。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中蒙经济技术合作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商务部公告，决定对原产于马来西亚巴斯夫国油化学私人有限公司和印尼日本触媒公司的进口丙烯酸酯（Acrylate）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调查。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内蒙古签署了日本政府贷款转贷协议。金额97.47亿日元（折合人民币7亿元），主要用于建设呼和浩特市水环境治理项目。

5～6日　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

6日　温家宝总理与科威特首相会谈，并一起会见了海湾合作委员会联合代表团。会见后，出席了中科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劳动保障部、银监会联合召开推进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落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黄菊副总理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6～7日　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把国家扶持、各地对口支援和库区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努力将库区建设成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环境优美的新型经济区。

7日　全国农业厅局长座谈会召开。

8日　三峡船闸正式通航。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非常关注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向美国出口虾的反倾销问题。

民航总局正式将兰州、敦煌、嘉峪关、庆阳4个机场移交甘肃省政府管理。至此，中国90个机场平稳移交地方政府管理、航空运输公司与服务保障企业完成联合重组，政企分开、垂直领导的民航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国务院规定的民航体制改革各项任务完成。

9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称，中美就集成电路增值税问题达成谅解，美方将撤回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诉讼。

世界最大的8500箱集装箱船“中海亚洲号”举行首航仪式。该船是中海集团订造的5艘船中的第一艘。

10日　中国第一组超导电缆系统正式并网仪式举行。标志着中国继美国、丹麦之后，成为第三个将超导电缆投入电网运行的国家，这将对解决中国“西电东送”等长距

离大容量输电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合肥至杭州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11日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质量认证有限公司成立。

12日　温家宝总理与缅甸总理会谈，建议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11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国办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

14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国办转发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供销总社《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意见》。

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经贸合作洽谈会开幕。当天，签订能源基础设施类项目61个，金额551亿元，产业与投资类项目230个，金额302.9亿元，商务与贸易类项目44个，金额215.2亿元。

14～15日　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2004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

15日　胡锦涛主席与马里总统会谈，建议加强经贸合作。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泰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联委会首次会议举行。

16日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出，《通知》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

国家“九五”期间开工的最大能源项目之一——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岭澳核电站一期工程通过国家竣工验收。

18日　青藏铁路西藏段电气化工程开工。

19日　为指导和推动《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贯彻落实工作，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19日至8月7日　全国铁路20天共突击抢运发电用煤3473万吨，国内依靠铁路运输供应煤炭的368家发电厂用煤紧张状况得到有效缓解。

20日　胡锦涛主席会见纳米比亚总统并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关于成立经贸混委会的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2005～2008年执行计划的签字仪式。

中国建设银行发行首期次级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400亿元，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建行的附属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对该行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以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为重点，准确把握信贷政策，防范信贷风险，做好夏秋收购资金供应管理工作。

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经贸洽谈暨产品展销会闭幕，共有802个合作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达253亿元。

21日　《国务院关于做好2004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出。

国家烟草专卖局新闻发言人宣布，国家烟草专卖局没有批准任何一家国外烟草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办烟厂。

交通银行发言人称，交行财务重组完成，资产总额突破1万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60亿元。

国务院批准建设广东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浙江三门核电站一期工程，标志着中国核电自主化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22日　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传达温家宝总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批示，部署投资体制改革工作。

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9月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发布，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

24日　胡锦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25日　“探测二号”卫星发射成功。

26日　温家宝总理考察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听取国家电监会、国家电网公司负责人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全国电力迎峰度夏情况，对做好电力迎峰度夏工作提出六点要求。

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副代表表示，中国反对召开任何一种特别会议来专门讨论纺织品配额问题。

26~29日　胡锦涛主席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黄菊副总理在青海考察了省电力公司、绿色药业有限公司、青海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龙羊峡水电站和青藏铁路建设工地等，就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以及企业改革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就业再就业、西部开发等问题进行调研。

27日　中国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与韩国债权团签订收购双龙汽车公司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汽车企业首次海外收购行动，也是中国企业重大的海外并购行动之一。

29日　温家宝总理考察了北京京昌高速公路西沙屯收费站、北京铁路局茶坞货运站，详细了解铁路、交通运输情况，听取铁道部、交通部负责人工作汇报，强调要努力缓解交通运输紧张状况。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公布，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

30日　第五套人民币一元币发行。

胡锦涛主席与约旦国王会谈，建议扩大双边贸易，鼓励和支持双向投资，加强在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的合作。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31日　国内首列出境游专列——“友谊号”出发。从北京经乌兰巴托、贝加尔湖至莫斯科。

8　月

2～6日　回良玉副总理在湖北、河南考察了熊河水库大坝、襄樊城市堤防和汉江王马套险段，社旗县太和乡、舞阳县泥河洼滞洪区，还考察了水稻生产基地、种子公司以及河南唐河县黄牛繁育场和山区经济产业化示范中心。强调要毫不松懈地抓好防汛抗旱，毫不放松地促进增产增收。

3日　全长约4000公里的西气东输工程全部贯通。

商务部公告，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的进口水合肼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总投资约167亿元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独资建设的南海石化炼油项目获国家批准。

4日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制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二期工程300兆瓦民用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制造合同签字。

国家“西电东送”标志性工程——龙滩水电工程的高216.5米、长850米、底宽170米的大坝开始浇筑。该坝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大坝。

5日　耗资198亿元的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正式启用。

5～8日　温家宝总理在四川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情况。考察了长虹集团、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重型机械公司、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制造公司等企业，还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看望了科技人员。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五省区市负责同志座谈会，分析研究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6日　中国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汇丰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入股交行，入股比例为19.9%，持有77.75亿股，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144.61亿元，折合约17.47亿美金，这是迄今为止外资入股中国商业银行的最大宗交易，标志交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6～9日　黄菊副总理在陕西就中央宏观政策调控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西部大开发、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深入调研。

8日　第100万辆夏利轿车驶下生产线。标志着面向普通百姓的轿车创下了中国自有品牌中单一品牌产量首次突破百万辆的纪录。

总投资66亿元的国家重点工程黄河公伯峡水电站下闸蓄水。

9日　国办发出《关于做好涉外渔业管理工作的通知》。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签订《2005—2009年煤炭购销合同》。

曾培炎副总理在河北考察了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出海口基地、秦皇岛四期扩容工程和煤五期工程，强调积极采取措施，缓解煤电瓶颈制约。

10日　商务部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韩国和荷兰的进口三元乙丙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2004年记账式（六期）国债发行。发行总额为242.2亿元，票面利率4.86%。

《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公布，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11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煤炭工作。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公布，自2004年9月11日起施行。

12日　商务部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欧盟和美国的进口呋喃酚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12～15日　吴仪副总理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

13日　曾培炎副总理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土地市场治理整顿阶段性检查验收情况等问题的汇报。强调要巩固成果，完善制度，强化管理，标志兼治，切实防止乱占滥用耕地现象反弹。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强调，要把机制和体制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关键要抓住股份制改革和健全董事会两个环节。

13～15日　胡锦涛主席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认真落实好党的各项富民政策，带领群众谋发展、谋致富、谋稳定。

15日　黑龙江与广东签下总金额为138.34亿元的经贸合作项目。

16日　温家宝总理与巴哈马总理会谈时表示要积极寻求扩大双边经贸合作的新途径，并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3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

国务院同意青岛、宁波、大连、张家港、厦门象屿、深圳盐田港、天津保税区与其邻近港区开展联动试点。

《汽车贷款管理办法》公布，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17日　国办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

18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当前金融工作等。

浙商银行开业。该行是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注册资本15.0073亿元。

中国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上海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开业。它也是目前开展汽车金融业务公司中惟一的合资企业，注册资金5亿元人民币。

19日　胡锦涛主席与中非总统会谈并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并讲话，要求精心筹划，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

20日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23日　《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公布，自2004年8月30日起施行。

银监会、人民银行联合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经济金融形

势，部署进一步做好当前金融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有关工作。

2004年记账式（七期）国债发行。本期国债期限为7年，票面年利率为4.71%。

24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第四次学习讲座，听取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成果的报告并讲话，指出要把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温家宝总理与佛得角总理会谈时指出，中方愿与佛方深化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并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山西省财政厅签署两个日本政府日元贷款转贷协议，总金额为75.3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5.27亿元）。

25日 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中国实施石油替代战略的重大之举——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开工。这种把煤直接液化的工业化装置在世界上是首次建造。一期总投资245亿元。

成品油价格提升。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40元和220元。

《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公布，自2004年8月30日起施行。

26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听取2004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它是由中国银行整体改制创立，完全承继原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债权、债务和员工，业务范围不变。该公司注册资本1863.90亿元。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依法行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

黄菊副总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时强调，要继续推进银行改革，确保股改试点成功。

26～27日 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合作国际会议举行。吴仪副总理致信表示祝贺。

27日 吴仪副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打好保护知识产权战役，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商务部公告，对原产于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进口锦纶6.66长丝产品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27～29日 温家宝总理在浙江考察了汽轮集团、青春宝集团等国有企业和星星集团、飞跃集团、康奈集团等非公有制企业，召开了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公路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拍卖法"、"渔业法"、"种子法"、"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公布施行。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韩国经济四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讲话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增长了近12倍，韩国对华投资增长77倍，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和投资对象国，韩国也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国。

29日 总投资72亿元人民币的沈大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竣工。该路现为中国里程

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公路。

全国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座谈会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尽快形成若干个亿吨级煤炭骨干企业。

第1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共签订合同项目36个，总额48.73亿元。

30日 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黄菊副总理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他指出，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村千家万户的金融纽带，在农村金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4年凭证式（五期）国债发行。期限2年，到期年利率2.40%，最大发行额为200亿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黑龙江省政府签订《黑龙江省政府、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协议》，标志着该公司分离企业办社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31日至9月2日 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即席讲话，吴仪副总理作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9 月

1日 胡锦涛主席与菲律宾总统会谈时表示要扩大两国经贸合作，改善贸易结构。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渔业合作协议、旅游合作协议执行计划等文件的签字仪式。菲律宾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南水北调中线唐河倒虹吸工程和釜山隧洞工程开工。唐河倒虹吸工程总投资2.19亿元，釜山隧洞工程总投资1.99亿元。

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协会成立。成为国内首家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1～3日 第十届鲁台经贸洽谈会举行。共签约台资项目242个，总投资额37亿美元，合同、协议金额34亿美元。

2日 京港高层会晤暨京港经贸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两地建起合作新机制。

总投资25亿元的治推骨干工程之一——怀洪新河续建工程通过总体竣工验收。

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公布，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5日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公布施行。

6日 全国产业化扶贫现场经验交流会结束。国务院扶贫办将在全国范围重点扶持一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有较强带动和辐射能力的龙头企业。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印发。

7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签署总额为15亿美元的出口买方信贷合作协议。该笔贷款主要用于机电产品、成套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境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等项目。

吴仪副总理主持召开外商投资企业保护知识产权座谈会，强调中国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8日 胡锦涛主席与加蓬总统会谈时表示，中国将继续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到加蓬投资兴业，拓宽双方的合作领域。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吴仪副总理在“国际投资论坛”午餐会发表“鼓励跨国投资，扩大互利合作”的演讲。

民航总局与香港经济发展及劳工局签署了新的航空运输备忘录，放开了对从事两地航空运输的指定空运企业数量的限制。

9日 温家宝总理与瓦努阿图总理举行了会谈，并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间有关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国成功发射两颗探测卫星。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签署100亿元人民币的《出口信贷支持国际经营合作协议》，主要用于支持宝钢集团开展境外投资、对外承包项目及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全国保险资金运用工作座谈会召开。保监会将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切实防范风险。

10日 黄菊副总理出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国际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

澳门公司与北京公司签约兴建总投资约20亿元人民币的北京王府井附近商务建筑群。

12日 “2004年中国企业高峰会”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并致辞。

外经贸专用网主中心工程开工。

13日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温家宝总理与阿尔巴尼亚总理会谈时建议双方提高经贸合作水平，推动企业开拓对方市场。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近期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近期加强宏观调控，关键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持政策稳定。特别要通过改革，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巩固宏观调控成果。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电视电话会议。

14~16日 四川与北京签订经贸合作合同、协议总金额突破500亿元人民币；签署了《北京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两省市经济社会领域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

15日 人民银行召集国有商业银行负责人讨论商业银行发表基金业务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批准瑞士银行有限公司、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和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增加投资额度2亿美元。

16日　国务院同意设立新余海关；同意将成都海关驻机场办事处调整为成都双流机场海关；同意将杭州海关驻机场办事处调整为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同意将南京海关驻机场办事处调整为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同意将乌鲁木齐海关驻机场办事处调整为乌鲁木齐机场海关。

17日　国办发出《关于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督查工作的通知》。

中国首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启动。该项目由英国国际开发署提供1247.4万美元赠款。

中国国家农产品加工信息网开通。

2004年中国南方电网建设债券发行，总规模30亿元。

《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协议》签署。9个省会城市将发挥优势，推动体制创新，把泛珠三角区域建成中国最具竞争力、国际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

18日　2004年赣台经贸合作研讨会举行，共签约项目38个，签约台资金额9.36亿美元。

20日　财政部决定续发2004年记账式（五期）国债。本期国债续发行面额总值为303亿元。

2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全国棉花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完善宏观调控，防止棉价过大波动。

22日　总额40亿元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企业债券发行。10年期票面利率为5.3%，15年期票面利率为5.6%。

玉米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中国重要大宗粮食期货品种体系初步形成。

格鲁吉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23日　温家宝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上讲话说，要重点深化经济合作。应加快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这一长远目标创造条件。应以交通、通信、能源、农业等领域为重点，着手启动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当务之急是加快制定多边公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贵广300万千瓦直流输电工程竣工投产仪式举行，该工程标志着西电东送工程南部电网通道全面建成。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并讲话，要求2010年前西部向广东输电能力再翻一番。

23～25日　黄菊副总理在宁夏考察了启元药业公司、银川佳通轮胎公司，羊场湾煤矿、建设中的电力工业项目以及银川市劳动力市场、银川市大乡农村信用社等。

24日　中俄总理举行第九次会晤。签署了中俄关于规范中俄贸易秩序的谅解备忘录、中俄关于支持开展机电产品贸易的换函、中俄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的纪要和《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俄罗斯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和俄罗斯进出口银行合作协定》等文件。中国和俄罗斯相互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决心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

25日　振兴东北暨东北亚合作国际研讨会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并讲话。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19颗返回式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成功返回地面。

26日 北京至福州高速公路江西段、上海至瑞丽高速公路江西段全线通车。至此，江西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422公里，实现与周边6省的出省主通道和省会南昌市到省内10个市的公路全部高速化。

国内最大最先进的原油码头和矿石码头——大连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矿石码头正式投产。原油码头总投资5.3亿元，矿石码头总投资16.3亿元。

27日 胡锦涛主席与亚美尼亚总统会谈时表示要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并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

中国第20颗返回式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

财政部发行2004年凭证式（六期）国债。本期国债发行总额200亿元，其中3年期140亿元，票面年利率2.65%；5年期60亿元，票面年利率3.00%。

28日 投资44亿元的河池水任至南宁高速路开通。该路全长236.76公里，是目前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公路通道。

《中国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可行性研究第一阶段合作谅解备忘录》签字。神华集团和宁夏煤业集团分别与南非SASOL公司合作，在陕西和宁夏建设两座煤炭间接液化工厂。工厂首期建设总投资分别为300亿元左右。

30日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印发。

河南新乡至郑州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标志着国家规划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中的一纵——北京至珠海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成为目前中国“五纵七横”公路网主干线中惟一全程是高速的国道主干线。

注册资本65亿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中国首台60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华能沁北发电有限公司一期工程1号机组一次并网成功，标志着中国超临界机组国产化成功。

10 月

2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终审裁决，撤销美方公司提出的中国企业侵权指控。这是中国遭遇“337调查”中惟一获全胜案件。

6~7日 温家宝总理与越南总理会谈。双方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进展表示满意，同意积极探讨“昆明—老街—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可能性。中国承认越南经济为市场经济，支持越南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尽快完成双边市场准入谈判。越南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承诺不对中国使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16条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

6~11日 黄菊副总理在四川考察了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长虹集团、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特大企业及一些民营科技型企业，考察了二滩水电站。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壮大，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意义重大，必须继续抓紧抓好。

8日　江苏连云港至新疆霍尔果斯国道主干线全线建成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横贯东西的快速大通道，全长4395公里。

"2004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开幕。吴仪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9日　胡锦涛主席与法国总统举行会谈。胡锦涛表示要充实两国经贸合作伙伴关系。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中法信息技术领域合作、铁路合作、关于先进中型通用直升机的合作、中法小麦贸易及技术合作、采购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关于A319订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空客.4330购机协议、与空客工业公司发展合作、与阿尔特手机合资、关于电动汽车领域的合作、合资成立汽车金融公司等20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11日　上海洋山深水港东海大桥陆上段和海上段合龙。

12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中国可持续发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汇报。

1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部署加强和改进土地管理工作。

14日　胡锦涛主席与俄罗斯总统会谈，并出席12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中俄关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准入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14~15日　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召开。曾培炎副总理批示要求年底前全面完成省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15日　中国成功回收第20颗返回式卫星。

展览规模居世界第二的第96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本届交易会累计成交272亿美元，其中对欧盟成交91.9亿美元。

第二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闭幕。成交额突破200亿元，意向合同金额突破250亿元。

16日　钱塘四桥通车。这是中国首座双层多拱组合连跨拱桥，目前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8日　世界上第一条"转炉—炉卷轧机"生产线在南京钢铁集团建成投产，总投资33.81亿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宣布，将剩余的1500多亿元不良资产（不含政策性债转股）整体打包，面向国内外投资者一次性转让出售。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笔不良资产交易。

河南安彩集团投资18亿元，新增1000万套彩色玻壳年产量，成为世界最大彩玻制造企业。

首届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曾培炎副总理致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宣布开幕。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发布，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公告，决定发行2004年记账式国债，期限5年，票面利率4.30%，发行总

额336.1亿元。

19日　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业务型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2号C星发射升空。

中国和德国技术合作协定签署。

20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授予湖南永兴县“中国银都”称号。

第八届中国（廊坊）农交会闭幕，签约12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

20～21日　21省（区、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召开。

21日　河北省与铁道部签署两份会谈纪要。河北省与铁道部将合作建设8个省内铁路项目，全长约1370公里，总投资近800亿元。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印发。

商务部公告，决定中止对日本紫菜进口管理措施进行的贸易壁垒调查。

由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翡翠国际货运航空公司”签署成立协议。这是中国首家由外商直接参与管理的合资航空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中国首家外商独资汽车金融公司——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展汽车贷款业务。

23日　商务部公布2003年中国进出口额及出口额最大的100家民营企业名单。这是商业部首次发布百家民营企业进出口排名。

24日　位于北京的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主体部分全部开业。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骆马湖至南四湖段的解台泵站开工建设。标志着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开工建设阶段。

25日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扎实推进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26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对于美国做出的对中国袜类产品采取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的决定，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

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国内首家外资农险公司开业。中国农业银行与世界农业保险巨头、欧洲最大的综合性保险公司——法国安盟保险集团在成都举行了其在中国首家分公司的开业典礼，同时签署了涉及信贷保险、银行卡业务、电子商务及业务交换的全面合作协议。

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1998年特别国债付息问题的报告》。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28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48.9%股权（约5亿美元）合同签字。上汽成为双龙汽车公司的最大股东。

由曾宪梓博士捐资1亿港元设立的“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正式成立。

29日　国办转发《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意见》。

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调。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补充协议和3个附件签署。

武汉钢铁集团出资6亿元入股河南平顶山煤炭集团。

30日　东北地区最大的煤炭销售公司——黑龙江省同达煤炭营销有限责任公司揭牌。

概算总投资3.8亿元的青岛港液体化工码头一期工程竣工验收。

30日至11月2日　黄菊副总理在广东考察了盐田港集装箱码头、深圳高新技术园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他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改革发展。

11　月

1日　中国科学院建院55周年。温家宝总理到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财政部公告，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后，2004年凭证式（六期）国债的票面利率及提前兑取分档利率也将进行调整。

商务部公告，将对原产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的反倾销调查期延长6个月。

2日　温家宝总理与埃塞俄比亚总理会谈时提出扩大经贸合作，为双方企业在农业、纺织、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会谈后共同出席了双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

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共同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协议》。

中国出资1.7亿元人民币，坦桑尼亚出资2300万美元共同修建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协议书签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席津巴布韦电力公司进口中国电力设备的移交仪式。此次移交的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津巴布韦电力公司签署的农村电网改造项目第一期工程的设备。合同总额达2.9亿美元。

3日　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吴仪副总理出席商务与投资峰会并发表题为《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演讲。

博览会期间累计贸易成交额10.3亿美元，共签订涉外投资项目129个，总投资49.68亿美元；签订国内合作项目102个，总投资475.4亿人民币。

财政部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了2004年记账式（九期）国债的发行招投标。计划发行面值总额240亿元，实际发行253.2亿元。

4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意见》印发。

中国首批工商行政管理企业注册官在上海正式受聘上任。

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财政工作等。

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与赞比亚总统举行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6日　中国自行研制的“中国资源二号”03星发射升空。

8日　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与尼日利亚总统会谈时指出，中方非常重视与尼方在石油、通讯等基础设施，制造业及农业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袁隆平院士荣获2004年世界粮食奖庆功会举行。袁隆平主持的超级杂交稻课题组提前一年实现了中国超级稻中稻研究目标，大面积亩产达到800公斤。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落成，标志着中国会计、审计人员职业继续教育基地体系全面形成。

回良玉副总理会见台湾“两岸农业交流访问团”，指出在大陆投资的台湾农业企业总体经营状况良好，欢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发展，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同繁荣。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航油三大集团签署协议，组建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9日　第11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闭幕。共签订合同与协议166项，交易总额167.8亿元，其中合同金额86.3亿元，利用外资1.15亿美元。

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宣布，将在广州增城建设第二工厂。新厂首期生产规模12万台/年，投资22亿元。

10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抗旱和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奥运会筹办工作和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

中国国旅集团公司成立。该公司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与中国免税品集团总公司合并重组成立，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旅游集团。

11日　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召开。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指出美国商务部对华家具反倾销案终裁结果对中国企业不公平。

香港东亚银行罗湖支行开业，成为外资银行在深圳第一家获准开设的支行。

11～13日　胡锦涛主席对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四国的经贸合作迈出新步伐，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得到更多国家承认。中国同四国签署了39项涉及贸易、投资、航空、航天、旅游、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同智利率先启动两国自由贸易谈判。秘鲁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胡锦涛从战略和宏观的高度提出加强区域合作的主张，呼吁推动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进程。鉴于当前突出的能源问题，提出能源安全合作倡仪，促进世界能源市场稳定，并宣布中国将成立“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他的讲话传递了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正为世界带来巨大机遇的强烈信息。

12日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举行成立庆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印发。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渤南油气田项目顺利投产，日产原油4200桶，天然气140万立方英尺。

商务部公告，决定从即日起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13~15日　温家宝总理在辽宁考察了渤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分公司、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等企业和山村，鼓励艰苦创业、扎实工作，再创老工业基地的新辉煌。

14日　黄菊副总理与卢森堡首相会谈时建议深化中卢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中方欢迎卢方与中国钢铁企业合作，改善中国钢铁工业技术和产业结构；加强财政、金融合作。

第二届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成果展示暨合作洽谈会闭幕。共有45个项目签约，总额20.5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100万美元、450万欧元。

商务部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美国、伊朗、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墨西哥的进口乙醇胺征收9%~74%不等的反倾销税，期限为5年。

15日　中国首台10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4000A系统在上海超级计算机中心正式启用，并与中国国家网格成功联通。

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5亿美元境内银团贷款协议，是迄今境内中资银行借用的单笔最大金额银团贷款。

河南总点工程建设项目，濮阳至鹤壁63公里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总投资15.6亿元。

15~16日　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回良玉副总理批示，要把该工程建成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16日　总投资21.7亿多元、全长93.045公里的长治至晋城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中国矿业2004国际研讨会举行，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并讲话。他强调，中国将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深化矿业体制改革，加强勘探开发和国际合作。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听取对全国12个省（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督查情况的汇报，讨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汇报稿，研究2005年的工作思路。

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向中铁工程总公司提供总量达200亿元的开发性金融借款。

17日　国办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改进地区GDP核算工作的意见》。

18日　境内商业银行美元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上调。

“试验卫星二号”发射成功。

首列国产跨座式单轨车下线。中国成为第二个拥有此技术的国家。

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中国西部论坛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

由中国人保发起设立的中国首家专业健康险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召开。

全长187公里，由中国提供6亿元人民币贷款修建的柬埔寨7号国家公路开工。

南水北调东线又一关键性控制工程韩庄运河万年闸泵站开工建设。总投资7.77亿元。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西电东送重大项目——哈密鲁能煤电化基地奠基。

19日　保监会发出通知，公布精算责任人任职资格。

第一次全国文化系统文化产业工作会议闭幕。中国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文化服务业就业人员规模超过批发和零售业。

20日　上海浦东开发投资项目发布会召开。浦东正被定位为进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端投资经营的功能载体。

21日　黄菊副总理与埃及总统会谈，对经贸合作进行了深人探讨。

22日　世界海关组织知识产权保护地区论坛举行。吴仪副总理致信祝贺。论坛通过《亚太地区海关共同打击假冒盗版违法行为上海倡议》。

上海环保金融中心工程签约。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和上海建工集团组成的投标联合体中标。这是中国企业首获世界级外资摩天大楼总承包权。该工程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结构工程最高的大楼。

中国银行发言人宣布，中国银行已基本完成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处置和财务重组工作，资产质量改善，确保国家注资的保值升值。

新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开工。该线全长286公里，总投资60亿元。

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获得马来西亚120平方公里勘探权。

23日　国办复函吉林省政府，国务院原则同意《吉林省免征农业税试点方案》。

24日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坚决制止电站项目无序建设意见的紧急通知》印发。

财政部公告，决定发行2004年记账式（十期）国债。实际发行面值总额389.1亿元。

25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鞍钢集团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6家中央企业倡议创建资源节约型企业。

26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设立市（地）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指导意见的通知》印发。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

国土资源部发布《第一批通过规划审核的开发区公告》。首批52个开发区通过规划审核。

中国北京汽车工业控股公司和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分别与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全国农业科技入户工作卫星网络视频会议召开。农业部全面部署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作。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险业监督保险监管合作协议》签署。

国家“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重要组成路段兰州至西宁高速公路贯通。该路全长118.65公里，总投资43.75亿元。

26～27日　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改制分流经验交流大会召开。目前已有775家大中型国企实施主辅分离，43家中央企业的总体方案得到批复。

27日　合肥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正式揭牌，拟投资140多亿元　中国（合肥）科学城示范区建设同时开工。标志着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2004，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出席开幕式并作了题为《攀登战略　人本管理——论我国私有企业的发展》的主题报告。

《中国—东盟交通合作备忘录》签署。

湛江港30万吨级航道工程正式开工。工程总投资近10亿元。

28日　温家宝总理与老挝总理会谈，建议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加强在能源、矿产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全长42.9公里、投资16亿元的太原市西北环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武汉长江隧道工程正式开工。隧道总长约3630米，工程概算20.486亿元，被称为“长江第一隧道”。

29日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签署。东盟在协议中宣布所有成员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体。

温家宝总理出席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和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在会上发表“加强合作，互惠共赢”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全方位合作”的讲话。

30日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公布，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

12　月

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研究2005年经济工作。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从即日起，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扩大到昆明、北京、厦门、西安、沈阳，并进一步对外开放银行业。中国银行业在宏观调控中发展得更为健康和强大，现已有15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标准，还有6家银行在2004年底前也会达标。农村信用社改革整体进展顺利。

2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出入境携带人民币限额调至2万元。

《南水北调工程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印发。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对美国商务部公布对中国虾反倾销案终裁结果深表遗憾，要求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待遇。

3日　《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公布。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化机器人挤奶设备在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公司投入运行。标志中国奶牛养殖业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3～5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6日　胡锦涛主席与意大利总统会谈，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谈后共同出席了多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温家宝总理与德国总理会谈，建议拓展经贸合作，实现2010年双边贸易额翻番的目标。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有关中小企业合作及铁路、航空、财政、金融、化工等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签署购买23架空客A320飞机的框架协议。

7日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发布。

受中共中央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通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江苏省"九五"期间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AC500轻型飞机首飞成功，填补了国内4～6座飞机的空白。

中意商事调解中心合作协议签署。这是中国与欧盟国家成立的第一个商事调解中心。

8日　中欧领导人举行第七次会晤，双方一致表示将共同努力，不断充实和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温家宝总理与荷兰首相会谈，希望荷兰企业积极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多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联想以12.5亿美元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成为世界第三大PC供应商。这也是中国IT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家海外并购，将对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地位、改变世界PC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总投资1.58亿元人民币的满洲里机场建成通航。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东北三省与德国经贸合作座谈会召开。

全国首家混合所有制的新华发行集团在上海诞生，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48亿元获得该集团49%的股权。

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与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200亿元信贷合作协议签署。

华为公司承建荷兰全国WCDMA网络。

9日　温家宝总理在中欧工商峰会发表重要演讲，呼吁中国与欧盟加强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的合作，以进一步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北京石油机械厂与美国罗恩公司签订供货协议，向该公司

提供由中国自主研发、代表钻井工艺技术和机电液一体化石油专用设备最高水平的顶部驱动钻井装置。这是中国钻井装备首次出口美国。

10日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发布，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商务部公告，决定从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邻苯二酚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调查。

国资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开展的石油指数期货业务属违规越权炒作行为。

国家标准化管理局与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签署能效标准化合作备忘录。

13日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召开。黄菊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加快国企改革步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暨双先表彰会议召开。吴仪副总理到会并讲话。会议提出2005年要以维护食品安全为重点，以加大商标保护力度为重点，以惩治虚假违法广告为重点，深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对韩国现代石油化学株式会社向中国出口的丁苯橡胶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

商务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美国方面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案的裁决是不公平的。

14日　吴仪副总理在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国家级开发区要自觉服从经济发展大局和宏观调控。

中国建成世界最大的小卫星研制基地。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1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等。

温家宝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谈，表示要进一步提高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巴基斯坦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关于优惠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区问题的议定书及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7个文件的签字仪式。

国资委与30家企业签订首批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和2005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30家企业涉及军工、石油、电力、冶金、有色、机械、运输、建筑、建材、医药、商贸、旅游等行业。2004～2006年任期考核目标的总体情况是，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110.48%，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8.44%；2005年年度考核目标的总体情况是，利润总额为823.6亿元，比2004年企业的考核目标值增加75.6%，比2004年企业的预计完成值增长2.1%。

16日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清华大学（关于共同合作建设高温冷堆核电示范工程投资协议）签订。标志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核能发电技术工程启动。

首个国家级大气成分观测与服务中心成立。

17日　“共促西部大开发——中央企业投资发展恳谈会”召开。

《全国食品标准2004年—2005年发展计划》公布。

18日　珠海澳门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首批投资项目动工。投资超过3亿港元。

20日　中国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飞机——新舟60的20架购销合同签署，价值约20亿元。这是中国支线客机首次出口。

总投资41亿元的大（理）丽（江）铁路开工建设。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天津市18个"烂尾楼"项目公开拍卖，债权金额超过14亿元。

21日　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全国第一次经济普工作。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并讲话。

23日　胡锦涛主席与委内瑞拉总统会谈。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两国在经济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8个协议的签字仪式。

委内瑞拉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召开。2005年将突出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为进一步完善土地执法监察体制，将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

中国商业联合会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目前已达9万多家，年营业额达3.4万亿元，其中年成交额上亿元的市场有3200多家。

信息产业部公布2004年信息产业重力技术发明评选结果。信息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2004年的产业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

24日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作为全国"四纵四横"快速铁路通道之一的温（州）福（州）铁路开工建设。全长298.382公里，总投资概算为180.3亿元。

全国商务工作会议召开。吴仪副总理在会上指出，要积极引导和扩大消费，努力实现外贸基本平衡。会议披露，中国累计合同外资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预计2004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00亿美元。中国国内市场总规模突破15万亿元。全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预计将达到3200亿美元，其中出口将达到1600亿美元。已有36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召开。截至2004年11月30日，全国共完成税收收入23693亿元。

25日　沪杭线电气化改造工程开工。总投资11.8亿元。

26日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召开。黄菊副总理出席并讲话。

湘潭至韶山高速公路奠基。项目总预算3亿多元。

总投资13多亿元的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正式通车。

27日　《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公布，自2005年4月1日起施行。

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主席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巨大作用，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黄菊副总理与参加全国民航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强调民用航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保障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服务。

崇明越江通道工程启动。

中国首套大型氮肥国产化装置建成投产。项目总投资13.98亿元，国产化率达到94%左右。

商务部公告，自即日起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日本和美国的进口环氧氯丙烷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三（明）福（州）、漳（州）龙（岩）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三峡—上海±5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湖北宜昌宜都换流站正式开工。该工程是中国直接工程国产化的关键工程。

28～29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全面部署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

29日　胡锦涛主席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大力提高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问题。

全国人大常务会公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

兖矿集团首次发行10亿元公司债券。

30日　西气东输工程全线正式运营。

国务院同意设立周口海关、衢州海关。

国办转发《关于推进和规范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黄菊副总理出席并讲话。

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印发。

（黄寒冰）

2005年

1月1日　我国将从即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止，对全球出口的外衣、裙子、衬衫、裤子、睡衣、内衣等7大类33个敏感类别的148个服装税号，采取从量计征方式加征出口关税的过渡性临时措施。

1月4日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2005年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并不失时机地推进金融改革。2005年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预期增长为15%，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

商务部颁布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

1月19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处理河南郑煤集团大平煤矿10.20”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相关责任人，研究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1月24日　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至1‰。

1月27日　2004年我国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5项社会保险基金收

支总规模首次超过1万亿元，支出4640亿元，首次实现全年无拖欠。

1月31日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公布。

2月1日　从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592个国贫县的约16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

2月2日　财政部消息，今年中央将安排55亿元对产粮大县进行直接奖励。

2月5~6日　国务院西部办说，西部大开发实施五年来，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在西部地区累计投入4600亿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5000多亿元。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60多项重大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等工程相继开工，投资总规模8500亿元；退耕还林工程造林2.88亿亩，退牧还草工程治理草原1.9亿亩。

2月19日　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春风行动”在全国各地启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通过开放一批公共职介机构，推荐一批民办职介机构，表彰一批优秀民办职介机构，打击一批非法职业中介机构，净化劳动力市场，改善就业环境，使进城求职农民得到及时有效的就业服务。

2月20日　2004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1602亿元，中央共投入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40亿元，救助各类受灾群众9000多万人。

2月21日　国务院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并公布，《规则》提出：一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二要加强市场监管；三要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四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2月23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在债转股的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六项税收政策问题加以明确。

2月24日　建设部确定推进节能和绿色建筑工作“二步走”目标。第一阶段，到2010年，全国新建建筑争取三分之一以上能够达到绿色建筑和节能建筑标准，全国城镇建筑总耗能实现节能50%。第二阶段，到2020年，全国城镇建筑总耗能达到节能65%。

2月25日　国务院发布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04年第4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称，2004年金融运行平稳，货币供应量增幅回落，贷款适度增长，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今年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支持经济平稳发展，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2月26日　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建立。

2月28日　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区市决定继续或从今年起免征农业税，初步测算，大约有7.3亿农民今年将进一步减轻农业税负担200多亿元。

3月2日　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在十省市启动。

3月3日　国办通知，要求对1.25亿千瓦的违规电站开工项目认真进行清理，坚决制止违规建设电站项目的势头。近期每年新开工电站规模应控制在6000万书瓦左右，今年安排6500万千瓦。

3月3－14日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

3月5－15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召开，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面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在工作指导和部署上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一是着力抓好宏观调控；二是着力推进改革开放；三是着力建设和谐社会。今年经济发展要着重抓好四个方面工作：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3月12日　胡锦涛主持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扎扎实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3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5年3月17日起，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个人房贷利率最低提高0.2个百分点，最低首付比例适当提高。同时公布，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由现行年利率1.62%下调到0.99%，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维持1.89%不变。

3月18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减免税管理，开展减免税的清理整顿，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

社科院等机构发布《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内地最具竞争力城市前10名为上海、深圳、广州、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厦门和天津。

3月19日　铁道系统改革现有管理体制，撤销全部铁路分局，实行部一路局一站段三级管理模式。

3月22日　落实“国九条”重要举措之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启动，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九部门组成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协调小组”在京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3月25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报告，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国共停缓建电解铝产能237万吨，33家电解铝企业停产，基本淘汰了落后的自焙槽生产工艺。

3月26日　商务部调查显示，2005年上半年国内商品供求状况将进一步改善。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61种，占26.8%，与2004年下半年相比提高1.3个百分点；供过于求的商品439种，占73.2%，与2004年下半年相比减少1.3个百分点；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3月27日　国务院通过有关国有企业关闭破产的四年规划，国资委将用最后四年时间完成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中的关闭破产工作。

3月29日　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1708亿元，实现收益42.7亿元，其中股票投资占总资产的11%。

3月30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2005年工作要点》和《关

于推进200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会议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会议分析了当前钢铁供求形势和价格走势，强调要进一步搞好对钢铁厂业发展的宏观调控，采取更直接有力措施，应对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问题。严格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特别是控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规模，对于抑制钢铁等生产资料过旺要求，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良好势头，都具有重要意义。要继续落实国务院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各项政策措施。

4月1日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指出今年重点工作是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商业欺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从即日起，对钢坯等钢铁初级产品出口不再执行退税政策。

4月6日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将坚持开发性移民措施，按照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妥善安置移民。

4月7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共同确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首批直接投资设立资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

4月14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一季度形势，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发展中也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保持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偏大，对外贸易结构性矛盾突出，煤电油运还相当紧张，物价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压力仍然较大。

4月15日　《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出台，规定中小国有企业可以探索，大型国有企业不得转让，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4月17日　《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

4月20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4月21日　国务院批准中国工商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方案。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

4月24日　曾培炎副总理在部分城市房地产形势座谈会上强调，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房价波动的监测，从实际出发制定和落实调控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证券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正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

4月27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研究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问题。

5月1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经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5月1日起调整部分产品的山口退税率。包括下调煤炭、钨、锡、锌、锑及其制品的出口退税

率，取消稀土金属等产品的出口退税。

5月9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做好供需调节，遏制投机性炒房，控制投资性购房，鼓励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合理引导住房消费，促进住房价格的基本稳定和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金牛能源、三一重工、紫江企业、清华同方成为首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上市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银行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5月10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会议原则通过《纲要（草案）》，决定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即日零时起，柴油价格每吨上调150元。

5月11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草案）》，严肃处理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2.14”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相关责任人，研究兽医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5月16日　2005年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讲。在会见世界500强部分企业负责人时胡锦涛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西部大开发工作，积极进取，注重实效，扎扎实实地把西部人开发推向前进。

5月17日　从国土资源部获悉，国务院已批准了第一批通过土地市场治理整顿验收省份的城市建设用地，共计批准11个城市的建设用地1495.4公顷。

5月18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

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推出外币买卖业务，首期推出八种“货币对”即期交易，包括欧元对美元、澳大利亚元对美元、英镑对美元、美元对瑞士法郎、美元对港币、美元对加拿大元、美元对日元和欧元对日元。

5月19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他指出，要解放思想，以创新的观念、创新的思路、创新的精神推进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各项工作，着力转换体制机制，扩大对外开放，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振兴东工业基地的新路子。

2005年5月20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白6月1日起，对2005年1月1日起征收出口关税的部分纺织服装产品调整关税税率，其中：对2种产品停止征收关税，对3种产品调低出口关税，对74种调增出口关税，新增1种征税产品。

5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降低汽油价格，汽油出厂价格每吨降低150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降低幅度等额调整。

5月24日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公布粮食主产区2005年晚籼稻三等品最低收购价格，每50公斤为72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以及《短期融资券承销规程》、《短期融资券信息披露规程》两个配套文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发行短期融资券。

5月25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先税后证”的有关规定，先缴纳税款、后办理产权证书，对房地产税收实施一体化管理。

5月26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称，当前我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效逐步显现，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煤电油运供应偏紧等问题，通货膨胀压力仍需关注。

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加强2005年“三夏”期间农资价格和市场监管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今年夏收、夏种、夏管期间农资价格和市场监管。

5月28日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京闭幕。温家宝总理在闭幕会上强调采取特殊政策措施，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5月30日　国务院税则委公布，将从6月1日起对81项纺织品取消出口关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5月31日　中国证监会宣布，拟进行股权分置第二批改革试点工作。同时公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保荐机构可选名单，共有45家机构。

6月1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研究当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6月2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主要是负责对能源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能源开发与节约、能源安全与应急、能源对外合作等前瞻性、综合性、战略性工作的领导。

6月4日　回良玉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家防总办公会议，分析当前防汛抗旱救灾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6月6日　建设部发布《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推进建筑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工作，并提出将研究制定经济激励政策措施，推动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发展。

6月7日　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6月6－7日在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农村税费改革将进入新的阶段，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积极稳妥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

6月8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扶持出口名牌发展的指导意见》。

6月9日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化肥生产稳定化肥市场的意见》，要求进一步促进我国化肥生产，稳定化肥市场，保护农民利益。

6月11日　中国与欧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盟委员会关于中国部分输欧纺织品备忘录》，就未来三年中国对欧盟纺织品出口的增长达成协议。

6月12日　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增持社会公众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中宣布，“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避免上市公司股价非理性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维护上市公司形象，可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份。”

6月15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审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草案）》。

6月17日　中国建设银行和美洲银行达成协议，美洲银行首期投资25亿美元购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建设银行股份。这项交易是迄今为止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最大单笔投资。

6月20日　中国证监会推出上港集箱、宝钢股份、中信证券等42家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公司。

6月21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问题，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治理超限超载长效机制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坚决遏制车辆超限超载运输。

6月23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交易，全日报收2.825港元，较2.5港元的招股价高13%，成交额达51.58亿港元。这是内地第一只在海外上市的银行股。

6月24日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取消现行的“加工出口专用钢材”相关税收政策，自2005年7月1日起，对列名钢铁企业销售给国内加工出口企业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国产钢材，一律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再办理免抵税。

6月25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即日起，将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00元利150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格调整幅度等额提高。同时，航空煤油出厂价格每吨提高300元。

6月26日　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在天津开幕。温家宝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亚欧各国要加强全面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战胜困难和风险，把亚欧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6月27日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部署加快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有关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部署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征管工作，要求免征农业税地区将免征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全面加强耕地占用税、契税征管。

6月29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草案）》。

7月5日　主题为“加强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在昆明召开。

国家质检总局修订公布《进入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自即日起正式实施。

7月11日　农业发展银行修订和公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央储备粮贷款办法》等9个粮棉油贷款管理办法。

7月13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建议的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

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中国改革高层论坛开幕式并讲话，指出深化改革的重点：一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二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四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五是深化财政、税收、投资体制改革；六是完善有利于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7月14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新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药品目录》，调整政府制定价格药品范围、形式和权限，新的政府定价药品数量由原来的1500种左右扩大到2400种左右。

7月19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7月20日　国务院部署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端正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切实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做好新形势下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7月21日　人民银行发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公告，决定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2005年7月21日19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中央企业监督检查情况的汇报，讨论并原则通过《邮政体制改革方案》。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05年8月1日起，对目前仍在征收出口关税、2005年7月20日起受欧盟进口数量限制的17种纺织品停止征收出口关税。

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即日起上调境内商业银行美元、港元小额外币存款利率。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公告，决定清理一批不具备核准条件、不能纳入近期电力规划的违规项目。第一批叫停32个违规电站项目。

《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

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于7月21－2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了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全力构建新型煤炭工业体系。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税务机关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筛选长期亏损、长期微利或跳跃式赢利却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企业作为反避税审计对象，进一步提高反避税工作质量。

我国将建立派驻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促进党政领导干部在城乡规划方面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7月23日　国务院于7月23～2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提高应急体系建设和管理水平。

7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颁布，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7月25日　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正式启动2005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早籼稻最低收购价为0.7元/斤，与去年相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监察部、财政部共同印发《招标投标部际协调机制暂行办法》。

7月26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计提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研究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审议并原则通过《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草案）》。

7月27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公布。

7月29日　建设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

银监会发布《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指导意见》。

7月30日　国务院公布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月1日　大陆对15种原产于台湾的水果正式实施零关税措施。

8月2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大幅度提高境内机构经营项目外汇帐户限额，将境内机构经营项目外汇帐户可保留现汇的比例，由现行的30%或50%调高到50%或80%。

8月8日　《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公布。

8月9日　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扩大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利开发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8月10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问题，部署广东梅州兴宁市大兴煤矿透水事故救援处理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草案）》、《直销管理条例（草案）》和

《禁止传销条例（草案）》。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在上海浦东正式挂牌成立。

8月12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实施工作的若干意见》。

商务部发布2005年16号令《汽车贸易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月14日　温家宝总理在长沙主持召开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畸强调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8月15日　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决定自8月22日起，将氧化铝（含铝矿砂）和铁合金矿列人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国家不再审批新的加工贸易合同。

8月17日　由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和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重组的鞍本集团成立。

8月18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草案）》。

8月21日　保监会颁布《保险机构投资者债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8月22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对省级及省级以下开发区清理整顿的审核原则和审核标准。

8月23日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启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程序，提请会议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拟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500元。

证监会等五部门公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人民银行决定即日起上调境内商业银行美元、港币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

8月24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结今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研究部署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8月25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8月30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联合下发《关于调整成品油出口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在今年底前控制成品油出口，保证国内供应。

国土资源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禁止“以租代征”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人民银行发布《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

8月31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意见的整改措施，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草案）》。

9月2日　国务院公布《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分别自2005年12月1日和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9月4日　证监会正式公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9月5日　商务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磋商纪要》，商定采取过渡性灵活措施，妥善解决输欧滞港纺织品问题。

9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明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所得税优惠适用范围。

9月7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铝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修正案（草案)》。

9月9日　国资委公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9月10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

9月13日　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视野要宽，思路要新，起点要高。

9月14日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召开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创新作为特区发展的生命线和灵魂。

9月18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

9月21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职业教育工作，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9月22日

商务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打击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整治商业零售企业恶意占压、骗取供应商货款的欺诈行为。

9月23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善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汇价和外汇指定银行挂牌汇价管理的通知》。

商务部公布《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办法》。

9月28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发展工作，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共涉及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40%左右，降价金额约40亿元。

10月6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意见》，提出要切实加大公共财政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起保障农田水利建设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10月10日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确保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降低。

10月8日至12日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0月12日　中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搭乘两名航天员，于2005年10月12日上午发射，在太空中飞行115小时33分钟，完成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居，于10月17顺利着陆，航天员安全返回。

第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铁道部和交通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确保冬季电力生产和北方城镇居民采暖用煤。

10月15日　第七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作了《加强全球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

青藏铁路全线铺通，庆祝大会在拉萨隆重举行。

10月17日　中央企业首家规范董事会—宝钢集团董事会正式亮相，其中占董事会成员超过半数的外部董事全部到位。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国家粮食局联合发出《关于做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政策性粮食财务挂帐从企业剥离的通知》。

10月19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研究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问题。

10月21日　回良玉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应急机制，扎实做好防控工作。11月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研究当前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形势，部署进一步加强防控工作。11月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电视电话会议，传达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做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再次部署全国防控工作。11月1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草案）》，研究应对禽流感疫情影响扶持家禽业发展政策措施。

国家统计局在“2005中国大型工业企业发布会”上公布，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的主营业务收入居中国大型工业企业前三名。

10月22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执行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新体制。

10月23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百强县名单，前三名为江苏昆山市、广东佛山顺德市、江苏江阴市。

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10月24日　温家宝总理在江苏考察时指出，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10月25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成立“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并希望社会各界就“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

10月27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作为首家实现公开发行上市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建行的成功上市标志着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的战略决策取得了重大突破。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会，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10月28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分析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研究了明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

全国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11月3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会上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

11月4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指出今后几年，我国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重点仍是解决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和重组改制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同时，也要继续做好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刀：农村劳动者和被征地农民等的就业再就业工作。

财政部日前公布《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贴息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并将据此办法通过贴息方式，带动和引导社会投资，用于需要政府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的竞争性、经营性项目。

商务部证监会下发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涉及外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外资并购的有关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性投资。

11月7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5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认为，中国金融总体稳定，历史形成的风险已经得到有效处置，金融稳定机制正在形成与完善。

2005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开幕，胡锦涛总书记在书面致词中强调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

11月15日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召开，曾培炎副总理在贺信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矿业发展，积极鼓励矿业开展国际合作。

11月23日　受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响，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吉林、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启动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采取措施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11月24日　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强环境保护工作，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吴仪副总理在全国出口加工区工作会议上强调，促进出口加工区健康发展，推动加工正贸易转型升级。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并将于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

11月27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发布2005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继续保持“双顺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仍是基本目标。

11月28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明年农业和农村工作，部署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相关金融机构对重点家禽养殖企业、禽产品加工企业、禽流感疫苗定点生产企业已经发放但尚未到期的流动资金贷款，在疫情发生期间视企业实际困难适当延长还款期限，具体条件由贷款银行决定。

11月29日至12月1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作，深入分析了“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成就及取得的重要认识和经验，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着重强调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切实实施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在农”工作；三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四是大力节约能源资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五是继续推动东中西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六是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七是积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八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着重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阐述了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具体部署了明年的经济工作。

12月3日至12月5日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马凯主任在会上总结了今年的发展改革工作，回顾了“十五”期间取得的成就，分析了明年经济发展的环境，部署了2006年发展改革工作的主要任务，并介绍了关于编制“十一五”总体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的主要考虑。

12月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阐述了平安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平安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12月6日　历时两年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圆满结束。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14日发布第二号公报，16日发布第三号公报。并根据普查数据调整了2004年经济核算数据。

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六部委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重点检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九种情况。

12月7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配套发布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产业结构调整

确定八个方向。

12月13日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披露，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将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减让承诺，进一步降低100多个税目的进口关税，涉及植物油、化工原料、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关税总水平为9.9%。

12月15日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公布。

12月16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办和国家统计局近期下发通知，从2006年开始实施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

12月19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12月23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问题。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12月24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公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12月26日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宣布，2006年铁路春运，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临客硬座票价不上浮。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适当提高天然气出厂价格，各油气田供工业和城市燃气用天然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提高50元至150元，化肥生产用天然气提高50元至100元。

12月28日－29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研究“十一五”期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部署了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

12月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2006年

1月2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自2月1日起施行。

1月4日 商务部、证监会、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国外投资者可以对已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和股改后新上市公司两类对象进行战略投资，将于1月31日起施行。

人民银行决定，即日起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方式（简称OTC方式），改进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研究部署加快气象失业发展工作。

1月5日　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公安部、财政部、监察部、环保总局日前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取消一切针对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在行驶线路和出租汽车运营等方面的限制。文件要求清理有关限制性规定的工作必须在今年3月底前完成。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意见》。

人民银行2006年工作会议召开，讨论2006年货币政策：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预期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

1月6日　2005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2042.1亿元，财政部、民政部安排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40.48亿元。

1月8日　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我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

1月9日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并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

1月10日　国务院发布5件国家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1月11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分别通过《炼油工业中长期发展专项计划》、《乙烯工业中长期发展专项计划》、《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等。

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试行）》和《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

1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1月18日　“十五”重大科技专项“农产品深加工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项目通过验收，该专项已获综合经济效益185.2亿元，促进农民增收54.3亿元。

禽流感防控国际筹资大会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开幕，温家宝提出禽流感防控国际合作四项主张。

1月20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俨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

1月21日　国土资源部通报，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全国已责令停产整顿矿山11097座，吊销采矿许可证1082个，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1月23日　信息产业部统计，2005年我国新增电话用户9728.1万户，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7.43861亿户。全国通信业务收入6373.7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其中电信业务收入5799亿元，增长11.7%：邮政业务收入574.7亿元，增长7.7%；移动短信业务量3046.5亿条，增长39.9%。通信固定资产投资2071.3亿元，其中电信2033.4亿

元，下降4.8%；邮政37.9亿元，增长2.8%。

国资委主任李熔融表示，今年要编制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条例》自2006年3月1日起实行。

2月1日　财政部负责人表示，“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重点从四方面促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建立和完善财税政策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二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人。三是完善企业财务和分配制度，营造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四是增加财政科教投人，促进科技进步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2月6日　全国假日办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7832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3.5%；实现旅游收入368亿元，增长17.6%，其中民航客运收入23.2亿元，铁路客运收入17.4亿元。

2月7日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新改建农村公路120万公里，基本实现公路和客车村村通。

2月1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则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发布。

国家海洋局统计，2005年我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16987亿元，增加值7202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比上年增长12.2%。

2月11日　商务部统计，200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8%；其中股本投资40.7亿美元，增长53.6%，利润再投资28.5亿美元，与上年持平。

2月13日

200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受理国际商标注册申请3.36万个，其中中国1334个，比上年增长31.4%，位居世界各国第八位。

2月18日

财政部公告发行2006年凭证式（一期）国债，总额600亿元，其中三年期420亿元，票面年利率3.14%；5年期180亿元，票面年利率3.49%。

2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会议强调，“十一五”规划纲要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方向，成为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2月22日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成立，指挥中心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领导，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管理，承担全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综合监督管理职能，对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救援任务进行指导、协调、指挥和实施。

2月24日　国家税务总局报道，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1265亿元。

2月25日　我国投资7亿多元建成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地形数据库通过验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经济建设提供1:50000的精确信息。

“十五”期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74亿人，比“九五”期末增长28.1%。2006年的工作重点将是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扩大做实个人帐户的试点范围，实现“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1000万人以上计划。

2月27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城市社区卫生工作会议，胡锦涛、温家宝做出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做好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国务院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

3月1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月4日－14日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在京举行。胡锦涛在民盟民进联组会土提出“八荣八耻”，对中华民族树立正确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全面阐述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求，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建设文明民主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月6日－15日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审议通过了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重要事项。

3月11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决定发布，自2006年5月1日施行。

3月17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2005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2.99%，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6.77个百分点。

3月18日　建设部、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对两年内未开工的住房项目再次进行规划审查，对不符合规划许可的项目坚决予以撤销。

3月20日　国家粮食局长会议提出今年要重点做好5项工作。一是继续做好粮改方案的组织实施工作，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完善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继续把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作为重点。二是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努力保持粮食供求的“紧平衡”和粮食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三是加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粮食行政执法体系。四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市场为导向，大力推动粮食产销衔接和产业化经营。五是积极推进和组织实施《全国粮食现代物流设施建设规划》，着力抓好“十一五”粮食物流重大项目、重点工程。

3月21日　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提出，今后15年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

3月22日

4月1日起，消费税政策做重大调整，新增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税目，调整部分税率。政策调整突出两个重点，一是促进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重点。二是合理引导消费和间接调节收入分配。

3月23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十五”期间，出口退税总额为11944.47亿元，与

"九五"相比，增长了2.8倍。

3月24日　发改委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一是加强信贷、土地、建设、环保、安全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继续搞好固定资产投资调控，防止投资反弹。二是认真贯彻落实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继续完善行业规划，提高并严格执行环境、安全、技术、质量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市场准入标准，严格控制新增产能。三是继续清理整顿在建和拟建项目，对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依法停止建设。依法关闭一批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地企业。四是围绕提升技术水平、改善品种、保护环境、保障安全、降低消耗、综合利用等，对传统产业实施改造提高。五是按照市场原则，鼓励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行业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做强做大，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行业集中度。

3月28日　国务院提出《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